

ZHONGGUO SHIXUE DACIDIAN

中国诗学大辞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SHIXUE DACIDIAN

中國詩學大辭典

沙孟海題



中国诗学大辞典

主 编	傅璇琮 许逸民 王学泰 董乃斌 吴小林
出 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4
插 页	12
字 数	3300000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338-2917-4/G·2902
定 价	1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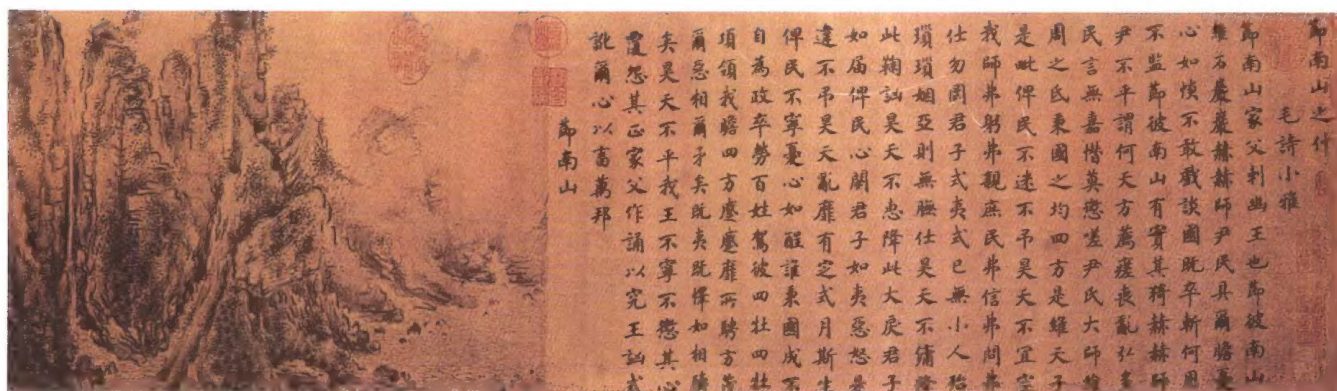
監本纂圖重訂重意互註毛詩卷第八
幽七月詒訓傳第十五
七月陳主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授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箋
毛詩國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楚辭卷第三
天問第三
朱熹集註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瑋瑋僂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



▲ 《诗经》书影（宋刻本） ▲ 《楚辞集注》书影（宋刻本）

▼ 节南山之什图（宋马和之作） ► 屈原图轴（明朱约吉作）



▼ 九歌图（元张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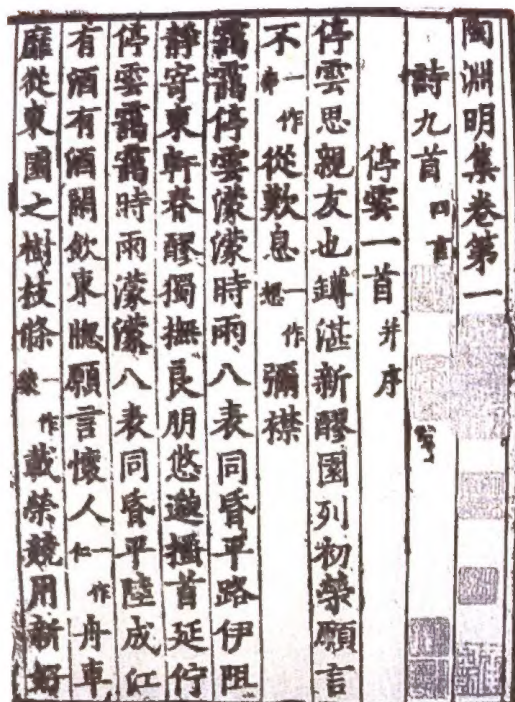
▲ 文姬归汉图 (宋张□作)



◀ 东篱赏菊图 (明唐寅作)



▲ 曹植像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 《陶渊明集》书影
(宋刻本)

▼ 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
(局部)



► 谢灵运石室山诗（清郑簠书）

▼ 渊明逸致图（明周位作）



清旦索幽果
披月越坳郊
莓兰渚急艸
落頽高石室
冠林陬飛泉
發山掬壺記
溪千載崢嶸
非一朝野翳
間見撫蘇隄
風霄散舒無
遠覽總萃美
升喬靈域
臨之隱如
與心賞交
合歡不
吝言摘芳
弄寒條

謝靈運石室山詩已秋
曾卷
心祖
清鄭簠



▲ 画谢灵运诗意图（黄宾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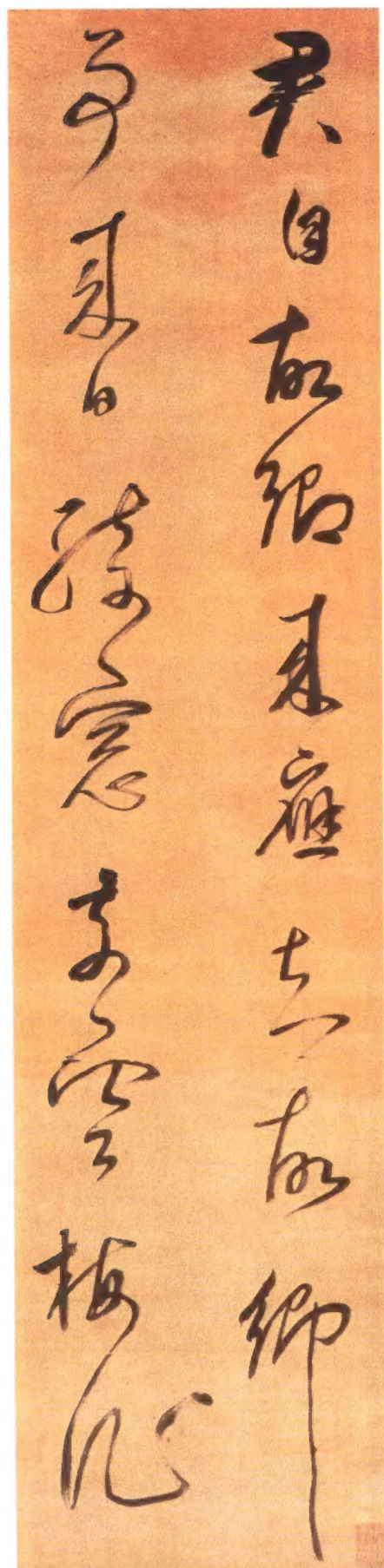


◀ 《王摩诃文集》书影（宋刻本）

▼ 辋川图（宋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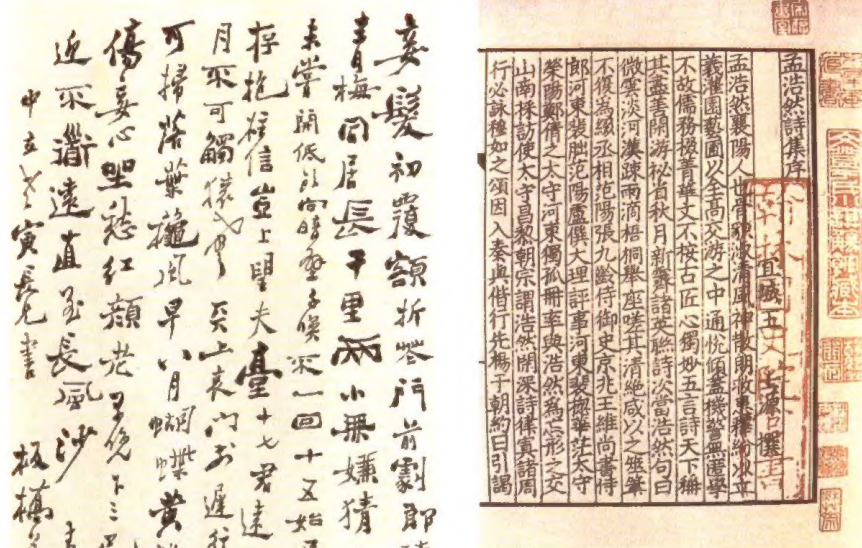
- 太白醉酒图 (清改琦作)
▼ 王维五言绝句 (明董其昌书)



李斗酒詩百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
是酒中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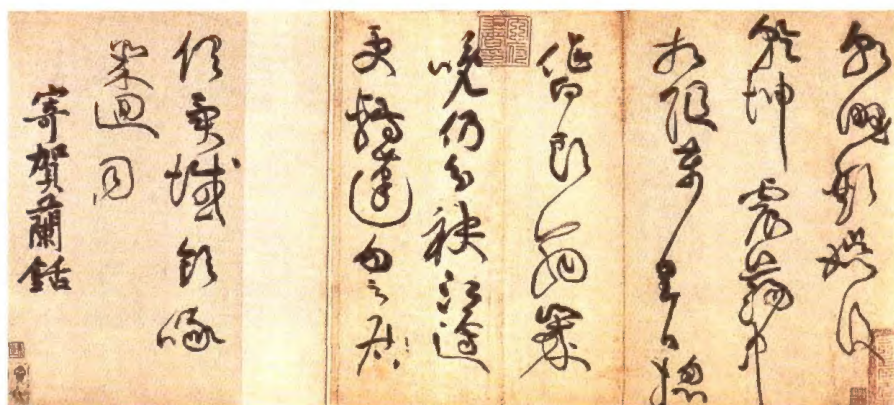
妾髮初覆額折筵前割即騎竹馬
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含羞羞不語
一十四夜君歡語
存抱信宣上明大臺
十七君遠行
月不可觸懷
可掃落葉施風早
八月烟燭黃
傷妾心
聖慈紅顏
近不識遠直
長風沙
中五
寅
長
兄
書
板橋鄭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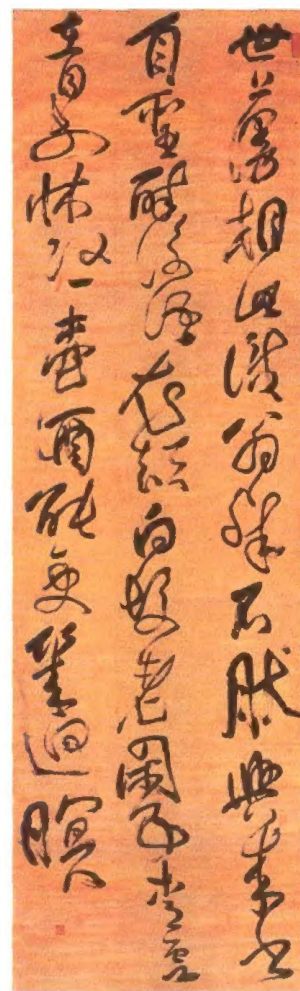
- ▲ 《孟浩然集》书影
(南宋初刻本)
▲ 李白《长干行》 (清郑燮书)



- ▲ 唐张萱作《虢国夫人游春图》
(宋赵估摹本)
- ▶ 杜甫《寄贺兰钜诗》
(宋黄庭坚书)
- ▼ 杜甫像 (清《息影轩画谱》)



- ▲ 唐代铸诗陶瓷壶
- ▶ 少陵诗意图 (明谢缙作)



- ▲ 高適五律 (清傅山书)

张好好诗
牧大和三年佐牧吏部沈
公江五弟好年十三始
以善歌舞来乐籍中
後一歲公鎮宣城後召
好於宣城幕中後二年
沈著作遷師以雙鬟納
之又二歲余於洛陽東
城重觀好感舊傷懷
故題詩贈之
君為豫章姝十三歲
餘翠坐鳳生尾井玲
蓮含顰高閣倚天半
清江連碧盡大地試
晴時使華遠鋪王公
顧四座始訝未識謝
吳王起引臂傍細腰
若語
裴腰可高下纔過
青羅裙時下無袖
一聲新鳳呼盤結進
閑細寒官引圓簾
衆香不飲逐上哀
衡主公再三欲謂天
下殊贈之天馬錦
副

▲ 唐杜牧自书《张好好诗》

通方山作負珍奇
爲詔唯教
逢荔枝得芝
松桃弓氏乃
得之才將歸
依兒
仲范



▲ 唐韩滉作《文苑图》

▶ 欧阳修像（清石刻线画）



◀ 唐韩偓七绝（明宋克书）

咸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與功開事
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
多向城中其利甚大不特城中
今與民同樂其利甚大不特城中
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陳狀
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
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
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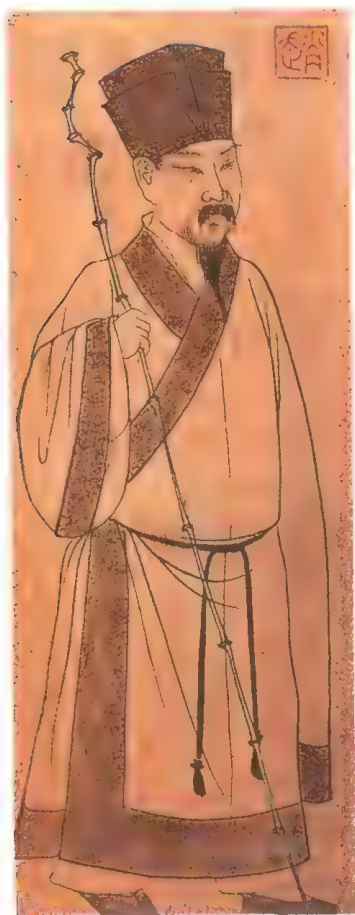
▲ 《苏文忠公文集》书影
(宋刻本)

楊柳杏花何處好
石梁茅屋雨初乾
綠垂楊
路深紅
寫清波得仙
王介甫絕句
王陽明碑記云天下之山萃於海濱連亘萬里抱天無際注東之人曰管仲於管仲
此聖之官陰陽儲儲信宿不知有山水之觀乎此其為山也

▲ 王安石絕句 (清劉墉書)

翰林平日接羣公
文酒相歡慰
白首歸田
負約黃扉
論道愧無功
攀籀路漸三山
速憂國心危
百折
今夜靜聽丹禁漏
尚疑身在玉堂中
夜宿中書東閣
政字同韻各

▲ 宋歐陽修自書詩文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
食年欲惜春主不
容惜今年又苦雨
五月社
簫瑟吹雨海棠花泥
污
燕支雪閣中偷負
去年真有力何殊少

▲ 宋苏轼自书《黄州寒食诗》

▲ 苏轼像

制诰李舍人以松扇二柄
并诗为遗上次来韵
编松为莲寄山中兼诗
其微诗一通入手凉生殊自
慰可相长听隐居风
孤山雪中寓望
片山虽水远晴雪漫漫



▲ 宋林逋自书诗

◀ 黄庭坚像（清石刻线画）



▲ 梅妻鹤子（清任渭长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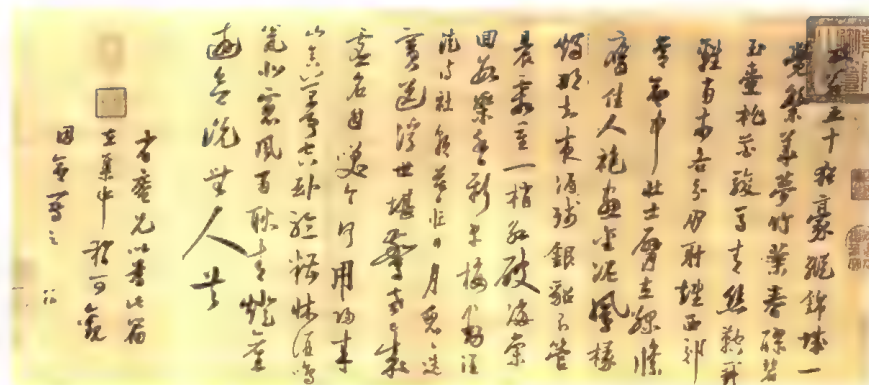
◀ 李清照像

松风阁
依山筑阁见平
川夜阑箕斗插
屋椽我来名之
意适然老松魁
梧数百年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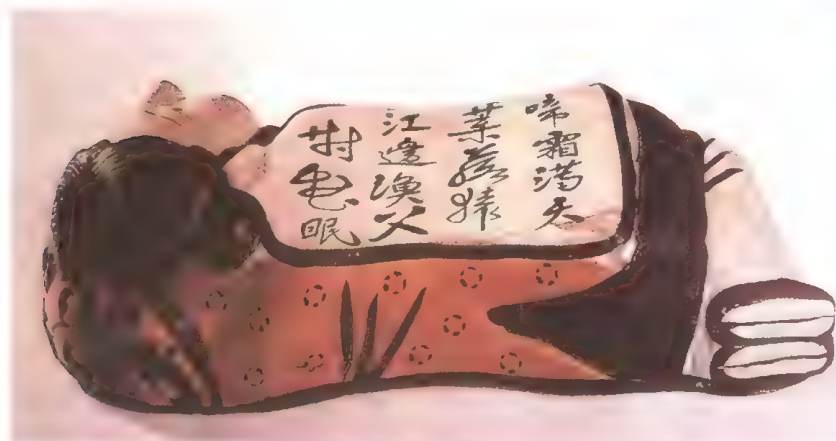
◀ 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



▲ 陆游像
▶ 宋米芾自书《苕溪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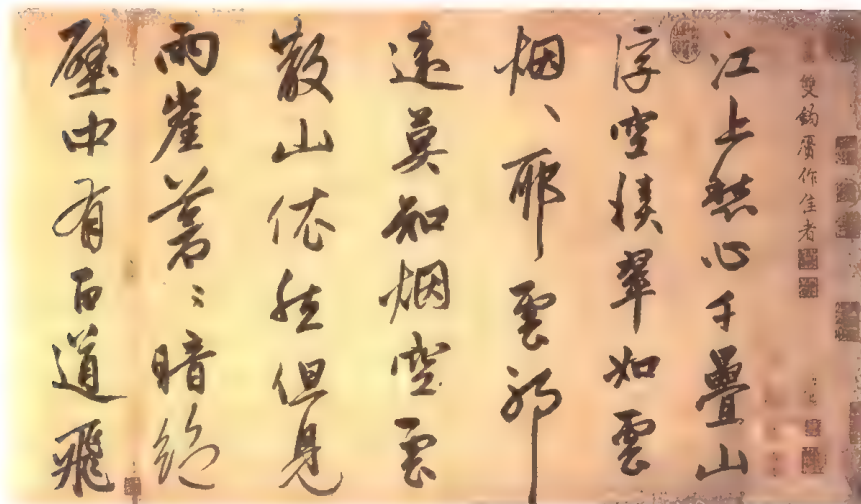
▲ 宋陆游自书《怀成都诗》



▲ 宋卧婴诗句瓷枕



▲ 《松雪斋文集》书影 (元刻本)



▲ 元赵孟頫书《烟书叠嶂诗卷》

► 元揭傒斯书《题画诗帖》

枯梅猶憐芳況此負荷身庭除猶覺
 百里誰能頻低頭沙草黃仰先天四鄰如
 何俯仰問一官水與薪
 承制學士李洞奉、初題
 沙磧茫茫塞草平沙泉下馬滿堂感曾於王會園中
 見其向天山雪外行 聖德只今包宇宙遼庭隨處
 樂農耕生結半幅唐人半曲興 君王駐遠情
 奎章閣校經郎從仕郎元揭傒斯奉 初題

欲寓新詩塵滿九味我這言淡如水自雲淡何
 從來伴我孤吟北窓裏酒味甘濃易變酸世
 情對面九疑山白雲且結無情友明月幽
 禽與德還
 八月廿日過京道雲樓樓命余賦子安淡室詩
 目賦是日踈雨生涼山光滿九味有山興也璚

▼ 明刘基自书《春兴诗八首》

春興八首 劉基撰
 新花如舊草如茵 行日新輝淡夢香枝間
 鳥鳴空水宿漁人 隱隱沙汀月滿天
 暮春猶憶水邊人 離離沙草綠如茵
 忽聽屋角啼鶯 起看園林綠漸深
 雲江日遠新來細 入河流水漸漸深
 計逐水他山 聚客悲鳴而飛限
 無處問紅妝
 於越山城控海隅 春風四首思經年
 月青曾過樓上望 樓上望江上波清
 雲中鳴鶴去 暮雲細雨餘花落
 天清到日遙
 金樽南鎮王封 蘇日陽官署翠重陰
 霞輝草木古相風 而出較龍王美此日
 玉蘭此年春 至遠至遠至遠至遠
 蕭四時供
 外龍山美越王都 群水南來入鏡湖
 四時春風運鶯聲 樓上望江上波清
 何處有春聲
 近時春語 天開
 聖王鳴鑾下土知 宜野耕報種樂
 翻拾庭前四時春 聖王鳴鑾下土知
 親寄語德茂虎將 莫教長堤掩櫓
 深春綠雨減年芳 暮館輕寒透客衣
 雲光散色紫蘭花 冷不飄香山中
 海上樓臺壓蒼長 蒼長蒼長
 相對立雲間
 憶昔江南春 起兵共山越水最知名
 暖海魚出挑李風 和乳馬鳴嘶阿
 步景畫船歌管 別傾城于今
 對舊花言感生

▼ 明唐寅自书诗

花前人自去去年
 人去年身以今
 年老明日花開
 又一枝明日未看
 又上誰明年
 今日花開否今日
 明年誰得去
 面面前斟酒來
 寒而未變時心
 已移及處
 老村莊英雄
 才秀不敢當
 但恨心不如古高
 歌伐木天濤潮
 感君稱我為
 弄士又言天下
 無相似庸庸
 碌碌我何者

▲ 元倪瓚自书《淡室诗》

▼ 明文徵明自书七律

太液池
 泱泱滄池溫古清
 芙蓉十里錦雲平
 曾聞樂府歌黃鵠
 還先秋風動石鯨
 玉練煙塔要碧落
 銀山傑妙自雲瀛
 洪知鳳筆經游地
 隻為細細掃不
 牙臺
 日上宮牆帶紫埃
 先皇閱武百層臺
 二方馳道依城在
 東面飛軒映水開
 雲信疎疎不
 數為窺仙仗
 再來金馬行
 白石陸長楊
 柳



▲ 王夫之像

湘山之高雲山高朱鳥曰兩端雲遊群仙握符顧九高翩跹步以揮旌旆遙州石
皮金局在峰頂綠苔不掩珠光炯通年六百四十六春秋紫金液老三花鼎三惠
刀圭人不識懸飭其人烹太極靜如止水暝如雲即以此金壺貯春色香泉飲之
君許吾願酌紅泉為君壽松雲蘿月數峰前玉露凝香挹天酒
李昌祐咸翁壽併正
仙山弟王人之贈

▲ 清王夫之自书《大云山歌》

明倪元璐自书诗

亦錄金之類未与壽鍾陽嗜酒衆郡姓
所之國又統示小點脚非石略能方幸此
事此等志不矣卜今之一

明陈洪绶自书诗

肉中無咎之一日。昨日如何。熟好過。吾頃刻。楊繞三日。林路勢。卻刺無主。
夜。市。整雲天。督。將。子。水。野。航。舟。五。人。都。愧。他。个。個。半。隻。
堪。育。是。洪。步。和。水。龍。槐。葉。三。上。草。飛。傳。自。勇。生。何。老。蓮。蓮。好。
事。日。多。常。以。日。唐。申。三。月。岳。嶺。步。穿。得。也。不。因。舊。而。為。人。用。生。為。者。致。
至。不。為。碑。理。兼。小。差。碑。曰。臣。臣。陳。先。王。制。禮。最。闕。就。七。十。日。番。板。昨。人。後。神。神。
明。軀。殼。理。心。情。喜。悅。如。身。身。五。月。十。日。幸。豈。真。宗。惜。生。生。老。猶。貪。乃。偉。
名。老。眼。比。時。無。要。著。皆。官。者。者。所。

[illegible]

▲ 明徐渭自书《杂诗》

► 吴郡名宦遗像
(清线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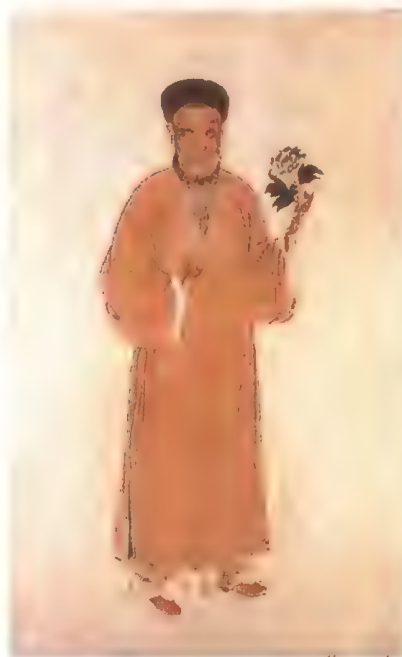


◀ 东轩吟社画像 (清版画)

茶香酒熟田子畝雲白山青如
一灣若是老天少我嫌
暮年耳與白鷗閒以中人被
利名牽上人家名利舟江
水涵涵不白隔居事苦何
板橋鄭紫

▲ 清郑燮自书诗

◀ 清袁枚像



◀ 清姚鼐自书《游江东诗册》

過廬江黃陂湖憶二十七年
與方左諸君赴金陵經過此
地今零落欲盡持艇獨來慨
歎不已乃作一詩
我年二十輕人事相遇友遊
盡後惟一夜本舟秋水上數
人羣酒月明中依一郭
青山在遠平湖落照紅
窈窕尋舊事鬢毛無限柳
梢風



▲ 黄遵宪塑像

宮柳烟含六代新
綠之思見晚
博秋無情畫裏
連搖落一夜
西風滿石頭
和錢宗伯
石屋秋吟風餐露飲
水宿漁舟竟何事
暑雨蕉江
道人歸草堂
金陵 雨泊 旧作歸山王
之老門兄教之弟王士禛

◀ 清王士禛自书诗

▼ 清康有为自书五言联

追頡義槎枒

扶和日汲

康有為

一榻夢生琴上月

星石二兄先生屬

百花香入案頭詩

少維林

葡萄四叶香
好琉璃千鍾
舊賓夜飲
年年一盞
銷魂如曉
曉從佳人
喜風如月
如故歡
醉月
之新
山

▲ 清傅山自书六言诗

► 清林则徐自书七言联

凡 例

一、本辞典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为一体,全面反映中国古典诗学风貌及其海内外研究状况的专科工具书。

二、诗与“词”、“曲”对言,专指古典诗歌,所谓“诗学”即“古典诗歌学”。诗学涵盖甚广,本辞典大抵区分为诗学概念、诗论著述、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坛掌故、诗法格律、诗学研究、海外及港台研究共十大门类。

三、各门类所收词目的时间断限,总体上说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具体而言,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坛掌故五个门类止于“五四”以前,其余门类则延及现代、当代。

四、各门类词目的编次,根据不同情况而分别设定。诗学概念部分以概念含义归类,略分先后;诗论著述、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坛掌故各部分,悉依所据时代先后为序;诗法格律部分先诗体,次诗律,然后诗法,其中又暗分若干小类;诗学研究部分先以类相从,复以时间为序排列;海外及港台研究部分则大致归并为理论、专著、综述、中外交流四个小类,具体研究某代、某个诗人者,则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先后为序,其作者按不同地域联属排列。

五、词目的解释注重史料与观点的统一,史料须信实可据,观点应能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凡学术上已有定论的,一般依据成说;目前仍有争议的问题,则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

六、辞典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辞典的历史纪年采用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古地名夹注今地名或今之归属。

七、每个词目后均括注撰稿人,文责自负。倘多个词目为一人所写而又编排在一起时,则只在首条下注明“以下某人”撰稿,不再逐条署名。

八、辞典选收与学科有关的图片,卷末并附有词目索引,便于检索。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随着爱国诗人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在华夏大地的传诵,影响中国诗坛几千年的诗骚传统便逐步确立。茫茫九州,上下几千年,诗人辈出,佳作如林,诗到唐代,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企及的一座艺术高峰。诗,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诗学研究始于《诗经》的编纂,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而发展。其领域大体包括作家作品的研究,诗歌内部艺术规律的探讨,诗歌史及研究史的描述等等,经一代代学者孜孜不倦地不懈努力,诗学已有了十分完备的研究门类 and 学术体系。为了介绍几千年来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成果,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我们约请著名学者傅璇琮、许逸民、王学泰、董乃斌、吴小林为主编,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国诗学大辞典》。它与本社已经出版的《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构成中国韵文学的专科辞典系列。

本辞典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并重,全面吸收和反映诗学研究的成果,旨在为诗学研究者、大学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文化工作者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了解诗学知识及学术成果的工具书。

本书主编和全体编委在确定辞典的性质、特色,设计全书的结构、体例,拟定各类条目及组稿、撰稿、审稿的全过程中,投入了辛勤的劳动;已故书法大师沙孟海为本书题签;编辑专家陈邦炎、徐元、方福仁审稿了部分书稿;杭州大学实习生胡海芬帮助整理了书稿;在此一并致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前 言

一

十年前,浙江教育出版社提出编纂《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等三部大型工具书,作为中国韵文系列的基础知识和学术研究的世纪性的总结。我们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是很有见地、很有气魄的一项文化举措;但是对于编纂者来说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诗、词、曲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三大学科,无论是基础知识的普及,或是学术研究的阐述,本来是可以多种方式来做,如作品选注、文体绎述、作家传记、艺术评论,以及文学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等。在这方面,近一二十年来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要采取编纂大型辞书的方式来承担中国韵文系列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梳理和传播,而且又要兼顾提高与普及,这就不是轻而易举、短时期所能完成的事。况且诗、词、曲这三部辞书是专题性的学术工具书,不是时下流行的、只靠东抄西拼、粗制滥造的手段就可以做出来的应景书。作为学术工具书,它必须要做到:一、资料丰富,能较全面包含这三门学科千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内涵;二、诠释准确,并能在较高层次上体现学术规范;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及时、充分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并能引导读者由此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正因为如此,这三部辞书,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筹商,直到九十年代后半期才陆续编成。“曲学”、“词学”已于前几年出版问世,《中国曲学大辞典》二百七十万字,《中国词学大辞典》一百八十万字,而我们从事的这部《中国诗学大辞典》则约三百五十万字,字数最多。不仅是因为字数多而

带来的工作量大,而且中国的诗学有其特殊的学术框架,我们在工作启动之初,为了确定此书的构架就经过多次的商讨,并广泛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参与编纂的学者近一百人,又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其间体例的协商,条目的确定,文字的修订,材料的复核等等,非常繁复。但使我们欣慰的是,全体编委与编纂者之间,这几年来彼此协作十分协调,终于在行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可以说这数千条目,三百几十万的文字,确实凝聚了我们学术同行的奉献与互勉之情。

二

中国是个诗的国家,在众多的文学种类中,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是发达最早、成就最高、作者最多的一种。在文学创作中,它很早就取得了正统地位。上古之时,《弹歌》之“断竹,续竹,飞上,逐肉”,可视为中国诗歌创作之嚆矢;两千五百年前编纂成书之《诗经》则被视为历代诗歌创作的典范,为历代学子所讽诵;孔夫子的教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长期影响着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和研究。自春秋时代第一位具名诗人许穆夫人到近代最后一位成就卓然的革命诗人柳亚子,中国诗人灿若繁星,像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龚自珍、黄遵宪,都是可与日月同辉的一等明星;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南社诗人作品的合集——《南社诗集》,各种诗集汗牛充栋;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为人们广泛传诵及列于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毫不逊色的优秀作品;在中国,诗歌早就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其应用的广泛性上。也就是说诗歌除了具有文学的职能之外,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身份高低的标志,趣味雅俗的分野。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见《宋诗选注·王安石》)不仅社会上如此,这种风气也延及方外,佛教里的“偈语”,道教中的“青词”,各种教派的经典,乃至神示佛谕无不带有诗的色彩,或直接用诗体韵文写成。在中国古代,诗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成就,自唐代以来,科举考试的科目大多直接或间接与诗歌有关,它被用来测验一个人的学识和能力。在旧式教育中自开蒙起便有属对作诗,学习诗歌格律和体制,因此,只要有过读书经历者,几乎都是“不废吟咏”的。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文人几乎都是诗人;如果他们有著作传世的话,其中大部分也当是诗歌。这样就使得“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林语堂《中国人》),而我们则把诗歌看成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学诗又为读书出仕之必需,因此,认识它、学习它、研究它就为世人所关注。《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历史上对诗最早的论述,而且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确定了基调;直至一百年前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才力图开拓传统诗歌的新境界。两千余年间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学理,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学

理论。这就需要加以搜集、梳理和总结,就有编纂工具书的必要。

关于工具书的编纂不自今日始,历代修纂类书、韵书都与诗歌创作、诗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工作很多都是由朝廷主持的。如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主持的《修文殿御览》,隋朝杜公瞻奉炀帝敕撰的《编珠》,唐代高祖李渊指示编纂的《艺文类聚》,这些是以收录事典为主的类书;宋代阴时夫编纂的《韵府群玉》,清代康熙皇帝指示编纂的《佩文韵府》,这些都是以收录词藻为主的韵书。尚没有全面总结诗学的工具书,编纂全面了解诗学的工具书只是晚近之事。

三

从广义来说,诗、词、曲皆为诗,三者之学,皆属于诗学。本书为“诗典”,这个“诗”是指狭义的诗,不包括词、曲。它是一部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并重的大型工具书。其读者对象以诗学研究者、大学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文化工作者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为主。本典收词力求系统、全面,除了收录了一定数量的诗人、诗集之外,凡是与诗学有关的名词术语和诗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都以词条形式搜罗囊括。

本辞典的时间断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诗人、诗集止于“五四”以前,诗学研究和海外及港台研究部分则延长至于当代。全书词目依照诗学的特点分为十大门类:诗学概念、诗论著作、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法格律、诗坛掌故、诗学研究、海外及港台研究。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每类各有特点,分述如下:

诗学概念:理解中国古代诗学概念有两个难点,一是这类概念众多,二是缺少规范。本书所取之“诗学概念”,并非有词必取,而是尽量撷取那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诗学概念和美学范畴,凡是不具备理论意义的词目一概不予收录。所收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或范畴,如意境、境界、兴象、诗教、兴观群怨、香草美人之类;二是与诗学密切相关、难以分割的传统的文论概念,如风骨、神思、时序、知言、养气之类;三是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或范畴,如势、味、雅、俗、本色、天籁之类。在阐释入选概念时,作者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尽量挖掘其具有丰富底蕴的本义;另一方面,又从现代视角加以审查。此部分每个词目都是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一个“点”,所有的“点”结合在一起就是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诗论的宏观图像。

诗论著作:此类所收条目指诗话、诗评以及有关资料等。诗话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古代的诗论著作主要形式就是诗话,论诗者喜欢用这种自由形式写作。然而,这种随意写作的诗话又不为世人所重,常见的诗话不过二三百种而已。负责这一部分编纂和撰写的刘德重先生多年从事诗话研究,在搜罗和辑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书所出诗话词目有六七百条之多,所涉及到的诗话著作许多是很少见的。

重要诗人:诗人历来是文学类工具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辞典所收诗人词目在一千条以上。做到凡是重要的诗人必无遗漏,并照顾到不同流派、不同地域、有不同代表性的诗人。书中吸收了九十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凡是对诗人的生卒年、籍贯、主要经历有新发现者,则尽量采纳。

诗风流派:本部分包括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的风格、流派、思潮运动、社团、并称等。风格,如建安风骨、上官体、后山体等;流派,如江西诗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等;思潮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等;社团,如复社、南社等;并称,如陶谢、王孟、李杜、尤杨范陆等。这一部分的写作注意区别了重点与一般。对于重要的风格流派、思潮社团除了写明其成员、代表人物、创作倾向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之外,还阐明其形成背景及原因、创作实践及其特点、前后承继关系、后人的评论等等。一个流派往往有多种称呼,本书

只详释其中之最常见者,其他用“参见”来解决。

主要诗集:包括各种总集、合集、选集、别集。这一部分除了撮述前人有详细记载各种集子的词目外,对于记载阙如或记载甚略的人选各集则不能辗转相抄,而是要依据该集之各种版本详细考证,这种情况在撰写宋代以后的各种诗集词目时是极为常见的;本书还收录了许多以往文学或诗学工具书中很少涉及的地方诗总集和稀见的总集、合集、选集、别集。

诗作名篇:这一部分在选择词目上以“名”为主,收录诗歌史上著名的和有较大影响的诗篇。选录原则是“前宽后严”。《诗经》、《楚辞》中的所有篇目全部收录。原始歌谣、汉魏六朝乐府中的篇目也近于全收,唐宋名篇收录较宽,元明清则相对较严。每条词目除了介绍了名篇的作者及该诗内容以外,对于其思想艺术还作了简要的分析,间亦介绍不同的意见,并适当地引用前人著名和有代表性的评论,以突出其学术性和知识性。

诗法格律:这一部分涉及到古代诗歌中的三个方面:一、诗体,皆收有关诗歌体裁的词目,如古体、乐府诗、近体诗、律诗、绝句之类;二、诗律,收与诗歌格律有关的词目,如诗韵、叠韵、蜂腰、鹤膝、平仄、对仗、《礼部韵略》之类;三、诗法,收与诗歌创作方法有关的词目,如命意、布局、切题、诗眼之类。此部分所收词目皆有所出,并在释文中详举原始出处;释义均采学术界通行之说,间亦采用影响较大的不同观点,以备一说。然无论通说、异说,皆有“书证”(即用古人之言对该词目作出解释)。有异名之词目,如“绝句”之与“截句”,也不采取“某”即“某”,见“某条”之法处理;而是除了点明这一点外,还引用古人有代表性的言论,指出“异名”出现的根据。在词目编排中以类相从,以同类大条统率小条。这一部分的绝大部分的词目不见于其他同类型的工具书,其立目、书证、阐释、考稽无不依据历代学者之成说,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

诗坛掌故:这一部分收录由于诗歌创作和流传而发生的典故,如诗人故实、诗人别称、诗坛佳话、诗坛佚事等等,如旗亭画壁、推敲、长安居易、雪泥鸿爪、诗仙、诗圣、五言长城等。

诗学研究:这一部分收录中国诗歌史上有关诗人、诗作及诗学研究的词目。所收多为专书,如《毛诗正义》、《诗集传》、《诗三家义集疏》、《唐诗鼓吹》、《唐诗大系》、《杜诗引得》、《李商隐年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音佛教思辨录》等等。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三部分。诗学研究部分吸取了当代最新研究成果,所录载籍直至九十年代,如出版于1993年的《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出版于1992年的《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河岳英灵集研究》、《莫友芝评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大历诗风》,出版于1991年的《龚自珍综论》、《吕留良诗选》、《唐诗赏论》等。

海外及港台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丰富、搜罗全面而编排有序,亦为本书特点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流传于海外,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海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它既包括了一千多年前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对其诗歌创作发生很大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涵盖了近一二百年才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及东欧一些国家。港台指台湾、香港、澳门等与大陆有差异的地区。因此,这一部分不仅涉及内容多,其中差别也很大。在立目、编排、写作上也很难比照其他部分处理,负责这一部分的编委和作者根据海外研究的实际情况,把所收词目分为: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中国古诗在日本、中国古诗在西方、中印诗缘、中国古诗与《怀风藻》、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等;二、中国某一部分古诗的海外研究,如《诗经》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等;三、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海外研究,如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等;四、海外一些学者运用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诗的研究,如西方神学观与《诗经》、新批评研究、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等;五、海外研究著作,如《诗境记》、《汉字作为

诗歌的媒介》等；六、重要的海外中国诗学专家，如祇园南海、吉川幸次郎、高本汉、艾德林等；七、香港、台湾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状况，如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中国山水诗研究等。读者从这一部分的词目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它为读者提供信息的丰富和多样是目前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工具书中还不曾有的。

以上十类，只是按照诗学的特点和便于编纂分工而作的大致分类，事实上，有不少条目按上述分类具有兼类现象。如诗学概念部分的某些条目同样是诗法诗律的术语，有些经过整理的诗集、选本具有诗学研究的性质，一些历史上流传的诗坛掌故、佳话佚事成为后代诗歌创作、鉴赏的技法，等等。再说，我们在全书结构设计时，主观上有一个勾勒各门类史的轮廓的初衷，因此，对少量兼跨两类的条目并不避复，条目两出，叙述各有侧重，以尽可能减少各门类条目在内容上的重要遗漏。

四

本书编纂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一部资料完备、信息准确，并且具有独立见解的工具书，使之成为古诗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本书从策划、立项、出目到写作经历了近十年，我们力图完满地实现既定目标。因此，在撰写词目时尽量遴选该学科领域的专家，如诗法格律部分请湘潭大学羊春秋先生一人撰写，羊先生研究此问题有年，并且他还是写作古体诗歌的行家，所以，这一部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可以作为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诗学研究著作看待。书中有关《诗经》研究部分大多是杭州大学洪湛侯先生一人撰写，这些也正是他《诗经》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他各个门类，各个词目的撰写情况也大致相同，如参与撰写先秦诗学部分的程俊英先生、费振刚先生、褚斌杰先生；参与撰写汉魏南北朝诗学部分的曹道衡先生、王运熙先生、沈玉成先生、俞绍初先生；参与撰写隋唐诗学部分的廖仲安先生、吴企明先生、李华先生；参与撰写宋代诗学部分的孔凡礼先生、刘扬忠先生；参与撰写金元诗学部分的邓绍基先生、卢兴基先生；参与撰写明代诗学的吴书荫先生、尹恭弘先生；参与撰写近代诗学部分的赵慎修先生；参与撰写诗学理论部分的黄保真先生等，都是在本领域颇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词目代表了当代研究的水准。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本辞典的学术质量，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又约请有关专家抽阅了部分稿件，并与编委会及时协商，再加润色。因此，这部辞典无论是策划、编撰，还是审订、出版，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成果。在这方面，责任编辑郑广宣先生在策划、组织上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

当然，作为一部成于众手的工具书，参与写作者的学识、写作能力又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因此，水平不一，有所遗漏，甚至舛误之处实难完全避免；而负责统筹此书的我们，又为水平所限，对书中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彻底解决，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心怀惴惴，恳请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以期使之日臻完善。

《中国诗学大辞典》编委会
1999年4月

《中国诗学大辞典》编委会

主 编	傅璇琮	许逸民	王学泰	董乃斌	吴小林
编 委	王丽娜	王学泰	刘德重	羊春秋	许逸民
	吴小林	周发祥	郑广宣	董乃斌	蒋 凡
	傅璇琮				

撰稿人	卜 弋	王大鹏	王止斋	王自周	王 军
	王运熙	王丽娜	王国安	王学泰	王晓平
	王 辉	王 颀	文 节	邓安生	邓绍基
	孔凡礼	尹恭弘	尹晓廉	帅雯霖	卢兴基
	史铁良	毕宝魁	吕伯涛	朱明伦	朱宝清
	郭国平	庄 伟	刘扬忠	刘明今	刘德重
	江 原	羊春秋	许志刚	许逸民	孙克强
	孙 歌	纪 伟	苏雨恒	杜维沫	杨旭辉
	杨 明	杨树增	李 华	李如鸾	李 泉
	李莉娟	李逸津	李翔征	吴小林	吴书荫
	吴企明	吴河清	何 璧	沈玉成	宋再新
	宋 红	宋绪连	张小平	张丽娟	张伯伟
	张国风	张采民	张寅彭	陈引驰	陈明洁
	陈祖美	林长永	金珍珠	周发祥	周建国
	周维德	郑永晓	孟向荣	孟昭毅	孟繁裕
	胡德怀	赵慎修	俞绍初	施玉笙	洪湛侯
	费振刚	姚敏杰	秦 克	顾 青	党圣元
	徐 俊	徐晓民	徐醒生	诸天寅	理 然
	黄维华	黄保真	黄 筠	曹道衡	戚芳芳
	跃 进	崔 彤	高克勤	阎 琦	董乃斌
	董文成	蒋 凡	蒋见元	蒋春红	蒋 寅
	程俊英	傅 刚	詹 颂	褚斌杰	管士光
	廖仲安				

责任编辑	郑广宣
扉页题签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陈明钊
责任校对	池 清 戴正泉
责任出版	陆 江

要 目

出版说明	1	主要诗集	730
凡 例	2	诗作名篇	975
前 言	1—5	诗坛掌故	1128
目 录	1—85	诗法格律	1147
正 文	1—1506	诗学研究	1227
诗学概念	1	海外及港台研究	1458
诗论著述	147		
重要诗人	275	附 录	
诗风流派	674	词目笔画索引	1507

目 录

诗学概念

诗·····	1	禅趣·····	11
诗学·····	2	以禅喻诗·····	11
诗教·····	4	诗有三思·····	12
温柔敦厚·····	4	诗有三境·····	12
主文谲谏·····	4	诗家三昧·····	12
诗言志·····	5	诗有五格·····	13
赋诗言志·····	6	文体四变·····	13
诗以达意·····	6	诗有七德·····	13
诗缘情·····	7	诗为活物·····	14
缘情绮靡·····	7	以文为诗·····	14
诗赋欲丽·····	8	以议论为诗·····	15
尚巧贵妍·····	8	以才学为诗·····	15
错采镂金·····	8	以文字为诗·····	16
诗道·····	8	以《易》为诗·····	16
诗笔·····	9	诗中有画·····	16
诗无达诂·····	9	诗中有人·····	17
诗无达志·····	10	诗为名理·····	17
诗如禅·····	10	真诗乃在民间·····	17
禅味·····	11	诗酒文饭·····	18

文	18	风教	38
文学	19	教化	38
文章	19	政教	39
文笔	20	思	39
文笔说	21	思与境偕	39
文言说	21	雅	39
文质	21	典雅	40
文质彬彬	21	雅言	40
由质开文	22	俗	41
绘事后素	22	雅与俗	41
气	22	野	42
文气	23	疏野	42
气象	24	大	43
气韵	24	重拙大	43
气质	25	和	44
气格	25	玄	44
气势	26	玄妙	45
灵气	26	玄通	45
清气为诗	26	妙	45
势	27	体	45
味	27	本同末异	46
韵味	28	六观	46
滋味	29	品	47
至味	29	观	47
至味无味	29	观风	48
意味	30	厚	49
情味	30	逸	49
辨味	30	丑	50
趣	31	远	50
兴趣	32	纤	50
意趣	32	艳	50
理趣	33	意格	51
理趣与理障	33	意象	51
情趣	34	意境	52
奇趣	34	境界	52
风	34	有我之境	53
风神	35	无我之境	53
风力	35	主观之诗人	54
风化	35	客观之诗人	54
风骨	36	境象	54
汉魏风骨	36	境生象外	55
慷慨任气	37	象外之象	55
骨力	37	言意象	55
骨气	37	言不尽意	56
风雅	37	得意忘言	56
风韵	38	言意之辨	57

音象意	58	以形写神	75
以意逆志	58	韵外之旨	76
知人论世	58	穷形尽相	76
知言养气	59	随物赋形	76
兴会	59	物象	76
兴象	60	物色	77
兴致	60	理为法源	77
兴寄	61	理外之理	78
寄托	61	胸襟	78
感兴	62	积学	78
应感	62	格物	79
兴观群怨	62	才性	79
移风易俗	63	别材别趣	79
情景	63	才胆识力	80
情与景	64	时序	80
情景相融	64	通感	81
景媒情胚	65	夸饰	81
性与情	65	天籁	82
任性而发	66	地籁	82
情采	66	人籁	82
声情	66	幻化	82
为情造文	67	重旨	82
辞情	67	涵泳	82
为文造情	67	警策	83
理事情	67	化工	83
移情	68	画工	84
情在言外	68	用事	84
因情立格	68	三易	84
吟咏情性	68	直寻	85
以情自得	69	自得	85
神骨	69	六义	85
神理	70	赋比兴	86
神气	70	思无邪	86
神妙	70	郑声淫	87
神思	71	郑卫之音	87
神会于物	71	乐而不淫	88
传神写照	71	哀而不伤	88
神与物游	72	怨而不怒	88
物我两忘	72	怨悱不乱	89
物我无间	72	香草美人	89
三准	73	虚与实	89
迁想妙得	73	动与静	90
物化	73	清与浊	91
心斋	74	离与合	91
坐忘	74	文从字顺	91
形与神	74	宁今宁俗	92

手写我口	92	咸酸之外	108
三不朽	93	韵致	108
修辞立其诚	93	隐秀	108
工夫在诗外	93	格调	108
诗品无异人品	94	格调说	109
文人相轻	94	格韵	109
美刺	95	格意趣	110
讽谕	95	独抒性灵	110
为时为事而作	96	童心	111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96	性灵	111
言直而切	96	性灵说	112
事核而实	97	真我	112
辞质而径	97	肌理	112
不平则鸣	97	肌理说	113
穷而后工	98	正变	113
成竹在胸	98	正声	113
文采风流	99	奇与正	114
诗必盛唐	99	通变	114
江山之助	99	新变	115
铺陈终始,排比声韵	99	因革	115
取影	100	别裁伪体	115
鼻观望气	100	转益多师	115
死法与活法	100	翡翠兰苕	116
坐驰役万景	101	鲸鱼碧海	116
亡国之音	101	万取一收	116
疾虚妄	101	稽古日新	116
义得言丧	101	尊古卑今	117
隔与不隔	102	贵远贱近	117
废言尚意	102	词必己出	117
废巧尚直	102	自家真态	118
无学之学	102	模拟	118
元神活泼	103	以心为师	118
化而不朽	103	偷语偷意偷势	119
反求吾心	103	点铁成金	119
幽深孤峭	104	夺胎换骨	119
孤怀孤诣	104	舍筏达岸	119
无色无著	104	一师心匠	120
虽颂皆刺	104	无一字无来处	120
典远谐则	105	化腐臭为神奇	120
神韵	105	宫声	121
神韵说	106	律为骨	121
羚羊挂角	106	意为脉	121
妙悟	106	字为眼	122
旨冥句中	107	圆美流转	122
以少总多	107	音声迭代	122
澄淡精致	107	适者为美	122

美恶对待	123	含蓄	135
醇美	123	委曲	135
分解	123	诗贵色韵	136
才调	124	妙在含糊	136
虚静	124	超诣	136
浮声切响	125	旷达	137
尽善尽美	125	飘逸	137
自然	126	沉郁	137
清真	126	沉郁顿挫	138
天真	127	沉着	138
作用	127	沉着痛快	138
直致	127	沉雄	139
本色	127	高妙	139
白描	128	洗炼	139
妙造自然	128	缜密	139
清空	129	流动	140
清奇	129	闲适	140
清奥	129	优游不迫	140
空灵	130	冲淡	140
质实	130	淡泊	141
朴拙	130	枯淡	141
绚烂	131	峥嵘	142
绮丽	131	峻峭	142
淫丽	131	晦涩	142
踵事增华	132	繁缛	142
雄浑	132	怪诞	143
劲健	133	玲珑	143
凌云健笔	133	朦胧	143
豪放	133	知音	144
狂放	134	阳春白雪	144
清雄奔放	134	不著一字	145
高古	134	下里巴人	145
简古	135	熟参	145

诗论著述

诗大序	147	笔札华梁	151
毛诗序	148	笔九花梁	151
典论·论文	148	古今诗人秀句	151
文赋	148	诗人秀句	152
文章流别论	148	诗髓脑	152
世说新语	149	沈约诗格	152
文心雕龙	149	评诗格	152
诗品(钟嵘)	150	唐朝新定诗体	152
颜氏家训	150	唐朝新定诗格	152
文笔要诀	151	乐府古题要解	152

诗格(王昌龄)·····	153	郡阁雅言·····	160
诗中密旨·····	153	法藏碎金录·····	160
诗式·····	153	南部新书·····	160
诗议·····	153	诗苑类格·····	161
诗评(皎然)·····	153	宋子京笔记·····	161
中序·····	153	宋景文公笔记·····	161
文镜秘府论·····	153	笔记·····	161
金针诗格·····	154	诗评(佚名)·····	161
文苑诗格·····	154	梅氏诗评·····	161
刘宾客嘉话录·····	154	续金针诗格·····	161
刘公嘉话·····	154	魏文帝诗格·····	161
刘公嘉话录·····	154	六一诗话·····	161
刘禹锡嘉话·····	154	六一居士诗话·····	162
宾客嘉话·····	154	欧阳永叔诗话·····	162
二南密旨·····	154	欧阳文忠公诗话·····	162
贾岛诗格·····	155	欧公诗话·····	162
诗格密旨·····	155	六一诗话附录·····	162
梁词人丽句·····	155	温公续诗话·····	162
贾岛诗句图·····	155	续诗话·····	162
炙毂子诗格·····	155	司马温公诗话·····	162
幽闲鼓吹·····	155	司马太师诗话·····	162
诗人主客图·····	155	司马君实诗话·····	162
本事诗·····	156	迂叟诗话·····	162
云溪友议·····	156	洛阳诗话·····	162
云仙杂记·····	156	中山诗话·····	163
云仙散录·····	156	刘贡父诗话·····	163
二十四诗品·····	156	玉壶诗话·····	163
诗品(司空图)·····	157	闲居诗话·····	163
缘情手鉴诗格·····	157	青箱杂记·····	163
流类手鉴·····	157	梦溪笔谈·····	163
风骚旨格·····	157	沈存中诗话·····	164
风骚指格·····	158	东坡诗话(苏轼)·····	164
诗格(齐己)·····	158	东坡诗话补遗·····	164
雅道机要·····	158	纪诗·····	164
唐摭言·····	158	乌台诗案·····	164
鉴戒录·····	158	诗病五事·····	164
诗格(文彧)·····	158	翰府名谈·····	165
风骚要式·····	159	雪浪斋日记·····	165
诗要格律·····	159	澠水燕谈录·····	165
诗格要律·····	159	律诗格·····	165
北梦琐言·····	159	芸叟诗评·····	165
诗中旨格·····	159	黄山谷诗话·····	165
诗评(景淳)·····	159	秦少游诗话·····	166
处囊诀·····	160	明道杂志·····	166
惠崇句图·····	160	后山诗话·····	166
御选句图·····	160	陈无己诗话·····	166

后山居士诗话	166	名贤诗话	172
临汉隐居诗话	166	古今诗话	172
陈辅之诗话	166	古今诗话录	173
瑶溪集	167	春渚纪闻	173
郭思诗话	167	艺苑雌黄	173
晁氏客语	167	绀素杂记	173
王直方诗话	167	靖康绀素杂记	173
王立之诗话	167	石林诗话	173
归叟诗话	167	三莲诗话	174
归叟诗文发源	167	集诸家老杜诗评	174
诗文发源	167	诸家老杜诗评	174
兰台诗话	167	老杜诗评	174
唐语林	167	诗话总龟	174
麈史	168	诗总	174
王彦辅诗话	168	许彦周诗话	174
侯鯖诗话	168	彦周诗话	175
潜溪诗眼	168	许颢诗话	175
诗眼	168	汉皋诗话	175
李希声诗话	168	诗论	175
李惇诗话	169	诗宪	175
潘子真诗话	169	五总志	175
诗话补遗	169	陵阳室中语	175
诗话补阙	169	竹坡诗话	175
遁斋闲览	169	竹坡老人诗话	176
道山清话	169	周少隐诗话	176
紫微诗话	169	珊瑚钩诗话	176
江西诗社宗派图	169	观林诗话	176
童蒙诗训	170	藏海诗话	176
诗事	170	懒真子	176
吕氏诗事录	170	风月堂诗话	177
蔡宽夫诗史	170	桐江诗话	177
诗史	170	古今总类诗话	177
蔡宽夫诗话	170	古今类总诗话	177
西清诗话	170	艇斋诗话	177
金玉诗话	171	墨庄漫录	178
蔡百衲诗评	171	诗说隽永	178
百衲诗评	171	诗话隽永(宋佚名)	178
漫叟诗话	171	西溪丛语	178
唐子西文录	171	能改斋漫录	178
唐子西语录	171	优古堂诗话	179
唐庚诗话	171	高斋诗话	179
冷斋夜话	172	扪虱新话	179
天厨禁脔	172	岁寒堂诗话	179
洪驹父诗话	172	碧溪诗话	180
唐宋名贤诗话	172	韵语阳秋	180
唐宋诗话	172	葛常之诗话	181

唐诗纪事	181	剡溪诗话	189
苕溪渔隐丛话	182	习学记言序目	189
猗觉寮杂记	182	习学记言	189
环溪诗话	182	臞翁诗评	189
瓮牖闲评	183	敖器之诗话	190
少陵诗格	183	耆旧续闻	190
庚溪诗话	183	云谷杂记	190
休斋诗话	183	沧浪诗话	190
独醒杂志	183	诗人玉屑	191
老学庵笔记	183	玉林诗话	191
老学庵诗话	184	玉林中兴诗话补遗	192
放翁诗话	184	娱书堂诗话	192
山阴诗话	184	赵威伯诗话	192
诚斋诗话	184	赵威伯诗余话	192
晦庵诗说	184	贵耳集	192
清邃阁论诗	184	林下偶谈	192
白石道人诗说	184	荆溪林下偶谈	192
白石诗说	185	吴氏诗话	192
姜氏诗说	185	深雪偶谈	192
清波杂志	185	全唐诗话	192
梁溪漫志	185	鹤林玉露	193
馀师录	185	后村诗话	193
吟窗杂录	185	江西诗派小序	193
历代吟谱	186	对床夜语	194
续句图	186	对床夜话	194
陈日华诗话	186	藏一话腴	194
萤雪丛说	186	迂斋诗话	194
容斋随笔	186	爱日斋丛钞	194
容斋诗话	187	谢叠山诗话	195
野客丛书	187	学斋占毕	195
二老堂诗话	187	弁阳诗话	195
杜工部草堂诗话	187	浩然斋诗话	195
草堂诗话	187	梅硎诗话	195
芥隐笔记	187	山房随笔	195
履斋诗说	187	诗林广记	195
云麓漫钞	188	精选诗林广记	196
漫斋语录	188	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196
苍梧杂志	188	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196
笔墨闲录	188	淳南诗话	196
师氏诗说	188	归潜志	196
竹庄诗话	188	敬斋古今藁	196
竹庄备全诗话	189	莲堂诗话	197
仕学规范	189	莲塘诗话	197
诗学规范	189	修辞鉴衡	197
选诗句图	189	庶斋老学丛谈	197
文选句图	189	隐居通议	197

诗法家数	197	拘虚诗谈	204
杨仲弘诗法	198	李诗辨疑	204
杜律心法	198	夷白斋诗话	204
杜陵诗律	198	蟬精隽	204
木天禁语	198	徐冬诗话	204
诗学禁脔	198	诗文浪谈	205
诗格(范梈)	198	俨山诗话	205
诗家一指	198	蓉塘诗话	205
诗法正宗	198	颐山诗话	205
诗宗正法眼藏	199	梦蕉诗话	205
吴礼部诗话	199	作诗体要	205
诗谱	199	诗法源流	206
诗法正论	200	谈艺录	206
诗文正法	200	娱书堂诗话	206
诗法	200	升庵诗话	206
黄氏诗法	200	谭苑醍醐	207
东坡诗话录	200	千里面谭	207
东坡诗话(陈秀民)	200	闲书杜律	207
诗词餘话	200	诗谈	207
诗话隽永(喻正已)	200	逸老堂诗话	207
沙中金集	201	名家诗法	207
南溪诗话	201	艺苑玄机	208
南溪笔录群贤诗话	201	唐诗品	208
名贤诗旨	201	四溟诗话	208
竹林诗评	201	诗家直说	209
霏雪录	201	解颐新语	209
归田诗话	201	西岱诗话	209
归田诗话录	201	四友斋丛说	209
吟堂诗话	201	元朗诗话	209
存斋诗话	201	名贤诗评	209
辨诗	201	王右丞诗话评	210
西江诗法	202	国雅品	210
诗学梯航	202	诗镜总论	210
诗家一指	202	诗体明辨	210
诗法源流	202	诗的	210
菊坡丛话	202	骚坛秘语	211
松石轩诗评	202	诗源撮要	211
诗评(朱葵培)	203	冰川诗式	211
诗法	203	全相万家诗法	211
诗话	203	说诗	211
琼台诗话	203	艺苑卮言	212
怀麓堂诗话	203	明诗评	212
麓堂诗话	203	国朝(明)诗评	212
南濠诗话	203	诗评(王世贞)	212
南濠居士诗话	204	艺圃撷餘	212
存餘堂诗话	204	骚坛千金诀	213

名家诗法汇编	213	雅论	221
欣赏诗法	213	通雅诗话	221
焦氏诗评	213	谢氏诗源	222
读诗拙言	213	诗法火传	222
诗文要式	213	澜堂夕话	222
长卿诗话	213	白云楼诗话	222
豫章诗话	214	顽潭诗话	222
诗法指南	214	钝吟杂录	222
徐炬诗话	214	严氏纠谬	223
香宇诗谈	214	梅村诗话	223
阳关三叠图谱	214	抱真堂诗话	223
西园诗麈	214	春酒堂诗话	223
兰庄诗话	215	榆溪诗话	223
诗藪	215	诗筏	224
艺林学山	215	历代诗话	224
玉笥诗谈	216	风人诗话	224
画禅室随笔	216	螭斋诗话	224
余山诗话	216	薑斋诗话	224
古今诗话	216	诗绎	225
艺藪谈宗	216	夕堂永日绪论	225
读诗	216	南窗漫记	225
批选唐诗	216	载酒园诗话	225
弹雅	217	围炉诗话	225
艺苑闲评	217	西崑发微	226
诗源辨体	217	答万季野诗问	226
恬致堂诗话	217	逃禅诗话	226
诗话类编	218	秋星阁诗话	226
唐音癸签	218	说唐诗	226
小草斋诗话	218	而庵诗话	226
说诗补遗	218	诗辩坻	226
挥麈诗话	219	载酒园诗话评	227
敬君诗话	219	寄园诗话	227
雪涛诗评	219	龙性堂诗话	227
闺秀诗评	219	原诗	227
诗府灵蛇	219	静志居诗话	228
笔精	219	西河诗话	228
冷邸小言	219	池北偶谈	228
独鉴录	220	居易录	228
诗本事	220	香祖笔记	228
诗评(蒋一葵)	220	分甘馀话	228
藕居士诗话	220	古夫于亭杂录	229
诗体缘起	220	渔洋诗话	229
蜀中诗话	220	律诗定体	229
石室谈诗	221	本事诗	229
诗谭	221	古欢堂集杂著	229
枣林艺篋	221	山姜诗话	229

诗义固说	229	月山诗话	237
西江诗话	230	兰丛诗话	237
柳亭诗话	230	漱浦诗话	237
漫堂说诗	230	消寒诗话	237
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230	野鸿诗的	237
说诗乐趣类编	230	国朝(清)诗话	237
纡斋诗谈	230	诗论正宗	238
汉诗总说	230	问竹堂诗法	238
寒厅诗话	231	小澥草堂杂论诗	238
然鐙记闻	231	鳧亭诗话	238
师友诗传录	231	全浙诗话	238
师友诗传续录	231	全唐诗话续编	238
古夫于亭诗问	231	龙山诗话	238
谈龙录	231	随园诗话	238
声调谱	231	续诗品	239
声调三谱	232	初白庵诗评	239
西圃诗说	232	查初白先生十二种诗评	239
梦晓楼随笔	232	历代诗话	239
五代诗话	232	星湄诗话	240
全闽诗话	232	闽游诗话	240
莲坡诗话	232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	240
宋诗纪事	233	骚坛八略	240
贞一斋诗说	233	声调谱拾遗	240
玉洲诗话	233	诗学源流考	241
柳南随笔·续笔	233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241
带经堂诗话	233	山静居诗话	241
谐声别部	233	山静居绪言	241
分类诗话	233	文史通义·诗话	241
消夏录	233	玉谿生诗说	242
说诗碎语	234	李义山诗话	242
杜诗言志	234	蒲褐山房诗话	242
一瓢诗话	234	北江诗话	242
一瓢斋诗话	235	拜经楼诗话	242
槐堂诗话	235	瓯北诗话	242
榕城诗话	235	十家诗话	243
剑溪说诗	235	辽诗话	243
杜诗义法	235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	243
诗学纂闻	235	毫餘诗话	243
说诗管蒯	235	婣雅堂诗话	243
定泉诗话	235	吴兴诗话	244
泾川诗话	236	鹗亭诗话	244
唐音审体	236	南野堂笔记	244
小石林文外·本朝诗话	236	茗香诗论	244
秋窗随笔	236	诗说汇	244
春秋诗话	236	古今诗说	244
辍锻录	236	艺苑名言	244

续诗人玉屑	244	全宋诗话	251
古今诗话选隽	244	达观堂诗话	251
古今诗话探奇	244	蠡庄诗话	251
石洲诗话	244	出戎诗话	251
杜诗附记	245	退庵随笔·学诗	251
咏物七律偶记	245	读渔洋诗随笔	251
小石帆亭著录	245	南浦诗话	252
王文简古诗平仄论	245	东南峤外诗话	252
赵执信所传声调谱	246	雁荡诗话	252
五言诗平仄举隅	246	闽川闺秀诗话	252
七言诗平仄举隅	246	香石诗话	252
七言诗三昧举隅	246	粤岳草堂诗话	252
雨村诗话	246	读杜韩笔记	252
雨村诗话(话今)	246	石园诗话	252
梅崖诗话	246	匏庐诗话	253
梧门诗话	246	竹林答问	253
八旗诗话	246	诗学问难	253
风雅遗闻	247	东泉诗话	253
三台诗话	247	老生常谈	253
滇南草堂诗话	247	诗见	253
芙蓉港诗词话	247	诗话耐冷谭	253
白石道人诗词评论	247	明人诗品	253
鱼计轩诗话	247	生香诗话	254
瓶水斋诗话	247	尊西诗话	254
乾嘉诗坛点将录	248	石楼诗话	254
葦原诗说	248	梵麓山房笔记	254
灵芬馆诗话	248	三家诗话	254
石溪舫诗话	248	匡山丛话	254
春雪亭诗话	248	卧园诗话	254
修竹庐谈诗问答	248	养一斋诗话	254
蓉峰诗话	248	养一斋李杜诗话	255
考田诗话	248	屏麓草堂诗话	255
履园丛话	249	十二石山斋诗话	255
履园谈诗	249	昭昧詹言	255
广陵诗事	249	樗寮诗话	256
杜工部诗话	249	春草堂诗话	256
诗学指南	249	橡坪诗话	256
渊明诗话	249	戏戒诗话	256
花薰阁诗述	250	杜诗琐证	256
快园诗话	250	小清华园诗谈	256
澹仙诗话	250	说诗诗话	256
西江诗话	250	憨斋诗话	257
阴常侍诗话	250	红叶山房诗话	257
念堂诗话	250	海虞诗话	257
六红诗话	250	国朝(清)诗人徵略初编	257
雅歌堂斲坪诗话	250	艺谈录	257

听松庐诗话·····	257	沅巢诗话·····	265
岷云楼诗话·····	257	桐荫清话·····	265
酌雅诗话·····	257	诗话新编·····	265
药栏诗话·····	258	味疏斋诗话·····	265
敦园诗谈·····	258	缉雅堂诗话·····	265
射鹰楼诗话·····	258	诗法萃编·····	265
海天琴思录·····	258	煮药漫钞·····	265
白华山人诗说·····	259	三山诗话·····	266
问花楼诗话·····	259	声调三谱·····	266
名媛诗话·····	259	可园诗话·····	266
云樵诗话·····	259	梦痕馆诗话·····	266
云樵外史诗话·····	260	明诗纪事·····	266
铎窗琐话·····	260	筱园诗话·····	266
柳隐丛谭·····	260	眉韵楼诗话·····	267
退庵诗话(何日愈)·····	260	卧雪诗话·····	267
艺概·····	260	南亭四话·····	267
读吴诗随笔·····	260	庄谐诗话·····	267
通斋诗话·····	260	湘绮楼说诗·····	267
陔南山馆诗话·····	261	蔚露盒诗话·····	267
海氛诗话·····	261	五百石洞天挥麈·····	268
勿待轩诗话存稿·····	261	定庵诗话·····	268
筠石山房诗话钞·····	261	三唐诗品·····	268
小沧浪诗话·····	261	石遗室诗话·····	268
余旬甫诗话·····	261	辽诗纪事·····	269
菱溪诗话·····	261	金诗纪事·····	269
挹翠楼诗话·····	261	元诗纪事·····	269
采辑历朝诗话·····	261	塞愚诗话·····	269
小匏庵诗话·····	261	饮冰室诗话·····	269
声调四谱图说·····	262	台阳诗话·····	270
停云阁诗话·····	262	在山泉诗话·····	270
樵隐诗话·····	262	柏岩感旧诗话·····	270
竹溪诗话·····	262	谪星说诗·····	270
观我生斋诗话·····	262	名山诗话·····	270
岷佣说诗·····	263	十朝诗乘·····	270
海山诗屋诗话·····	263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	271
谈艺珠丛·····	263	天籁阁诗话·····	271
纪河间诗话·····	263	海天诗话·····	271
越缦堂诗话·····	263	栩园诗话·····	271
宋诗纪事补遗·····	264	今传是楼诗话·····	271
东人诗话·····	264	芳菲菲堂诗话·····	271
养自然斋诗话·····	264	续诗人徵略·····	271
海粟诗话·····	264	平等阁诗话·····	271
诗缘樵说拾遗·····	264	绿天香雪簃诗话·····	272
乡诗摭谈·····	264	诗话别裁三种·····	272
苏亭诗话·····	264	诗法丛话·····	272
全浙诗话刊误·····	265	香奁诗话·····	272

然脂馥韵	272	合肥诗话	273
四朝诗话	272	尊瓠室诗话	273
蕤蕤室诗话	272	冷禅室诗话	273
惜阴轩诗话初编	272	萤雪轩丛书	273
木樨香馆诗话	272	历代诗话续编	273
雪桥诗话	272	清诗话	273
闺秀诗话	273	蔽庐非诗话	274
青楼诗话	273	碣阳诗话	274

重要诗人

尹吉甫	275	蔡琰	282
卫庄姜	275	徐幹	283
许穆夫人	275	阮瑀	283
孔子	275	应瑒	283
屈原	276	仲长统	283
荀况	276	曹丕	283
宋玉	277	何晏	284
贾谊	277	应璩	284
枚乘	277	曹植	284
刘彻	277	曹叡	285
司马相如	278	阮籍	285
卓文君	278	傅玄	285
刘细君	278	刘伶	285
东方朔	278	孙楚	285
韦孟	278	嵇康	285
李陵	278	裴秀	286
苏武	279	枣据	286
韦玄成	279	成公绥	286
班婕妤	279	张华	286
梁鸿	279	张翰	287
班固	279	邹湛	287
傅毅	280	何劭	287
张衡	280	傅咸	287
秦嘉	280	夏侯湛	287
徐淑	280	潘岳	287
郗炎	280	潘尼	288
赵壹	280	石崇	288
辛延年	281	曹摅	288
蔡邕	281	挚虞	288
孔融	281	张载	288
曹操	281	左思	288
陈琳	281	左芬	289
刘桢	282	张协	289
王粲	282	苏伯玉妻	289
繁钦	282	欧阳建	289

陆机	289	刘铄	299
陆雲	290	丘巨源	299
嵇含	290	沈约	299
束皙	290	江淹	299
张亢	290	张融	300
刘琨	290	孔稚圭	300
郭璞	291	虞炎	300
卢湛	291	范雲	300
庾闾	291	徐孝嗣	300
杨方	291	韩兰英	301
李充	291	陶弘景	301
苏蕙	291	宗夬	301
王嘉	292	曹景宗	301
苏彦	292	刘绘	301
孙绰	292	萧子良	302
许询	292	苏小小	302
支遁	292	任昉	302
曹毗	292	刘峻	302
袁宏	292	高爽	302
郗超	293	王僧孺	302
慧远	293	虞羲	303
谢道韞	293	丘迟	303
陶渊明	293	萧衍	303
殷仲文	294	谢朓	303
湛方生	294	柳恽	304
何承天	294	徐勉	304
傅亮	294	王融	304
谢混	294	江革	304
谢瞻	295	吴均	304
颜延之	295	郑道昭	305
谢灵运	295	裴子野	305
谢晦	295	陆倕	305
高允	296	徐摛	305
范晔	296	殷芸	305
刘义隆	296	陆厥	306
谢惠连	296	张率	306
袁淑	297	到溉	306
刘义恭	297	到洽	306
鲍照	297	庾仲容	306
鲍令暉	298	何逊	306
王微	298	王籍	307
颜竣	298	王筠	307
吴迈远	298	刘孝绰	307
谢庄	298	常景	307
汤惠休	298	何思澄	308
王僧达	299	伏挺	308

萧子显	308	刘删	316
庾肩吾	308	柳玟	316
萧子云	308	魏澹	317
刘遵	308	薛道衡	317
徐悱	309	杨素	317
周弘正	309	王胄	317
周弘让	309	虞世基	317
费昶	309	陈叔宝	318
王褒卿	309	孔德绍	318
朱超	309	杨广	318
刘孝胜	310	虞世南	318
刘孝威	310	褚亮	318
刘孝先	310	李百药	318
温子昇	310	王珪	319
邢劭	310	杨师道	319
萧统	311	魏徵	319
沈炯	311	王绩	319
萧综	311	许敬宗	319
鲍泉	311	王梵志	320
刘令娴	311	李世民	320
沈满愿	311	董思恭	320
萧纲	312	上官仪	320
释洪偃	312	于季子	321
魏收	312	李义府	321
徐陵	312	长孙正隐	321
萧绎	312	骆宾王	321
阳休之	313	武则天	321
陆云公	313	徐惠	321
王褒	313	卢照邻	322
庾信	313	韦承庆	322
江总	314	乔知之	322
顾野王	314	杜审言	322
何妥	314	李峤	322
刘逖	314	苏味道	322
张正见	314	郑愔	323
阴铿	314	宗楚客	323
颜之推	315	薛稷	323
傅縡	315	王勃	323
萧慤	315	杨炯	323
阮卓	315	刘希夷	324
李德林	315	王无竞	324
惠标	316	崔融	324
诸葛颖	316	卢藏用	324
卢思道	316	韦嗣立	324
陆琼	316	刘宪	324
祖孙登	316	宋之问	325

张循之	325	殷遥	333
郭元振	325	王维	333
李义	325	畅诸	333
贺知章	325	崔兴宗	333
张旭	326	裴迪	334
张若虚	326	綦母潜	334
包融	326	丘为	334
刘眘虚	326	储光羲	334
东方虬	326	贺兰进明	334
陈子昂	326	陶翰	334
武平	327	薛据	335
上官婉儿	327	卢象	335
李适之	327	景云	335
张敬忠	327	张巡	335
沈佺期	327	颜真卿	335
李崇嗣	327	阎防	336
阎朝隐	327	李颀	336
徐彦伯	327	杜甫	336
张说	328	苏源明	336
苏颋	328	薛奇童	337
崔湜	328	梁锜	337
崔液	328	张潮	337
齐澣	328	崔曙	337
张九龄	328	张谓	337
王翰	329	苏涣	337
王湾	329	李华	337
张子容	329	岑参	338
李昂	329	刘长卿	338
崔颢	329	张万顷	339
祖咏	329	张继	339
万楚	330	李嘉祐	339
丁仙芝	330	刘方平	339
李隆基	330	包何	339
王之涣	330	钱起	339
崔国辅	330	郎士元	340
沈如筠	330	孟云卿	340
孟浩然	331	刘湾	340
梁献	331	皇甫冉	340
王昌龄	331	张南史	341
孙逖	331	贾至	341
常建	331	元结	341
吴筠	332	沈千运	342
晁衡	332	王季友	342
高适	332	张志和	342
江采蘋	332	皎然	342
李白	332	清江	343

鲍防	343	杨衡	353
皇甫曾	343	柳中庸	353
韩翃	343	权德舆	353
柳氏	344	羊士谔	354
刘商	344	王涯	354
于鹄	344	欧阳詹	354
司空曙	344	裴度	354
耿纬	344	窦庠	354
崔峒	345	张籍	355
李端	345	王建	355
朱湾	345	牟融	355
王辂秀	345	令狐楚	355
刘太真	345	韩愈	356
独孤及	345	张仲素	356
严武	346	薛涛	357
灵一	346	李涉	357
严维	346	德诚	357
寒山	346	卢仝	357
拾得	347	陆畅	357
包佶	347	费冠卿	358
顾况	347	鲍溶	358
戴叔伦	347	殷尧藩	358
于良史	348	沈亚之	358
陈羽	348	裴夷直	359
韦应物	348	熊孺登	359
章八元	348	吕温	359
秦系	348	窦巩	359
戎昱	349	刘禹锡	359
卢纶	349	白居易	360
窦叔向	350	李绅	360
韦渠牟	350	柳宗元	361
李冶	350	宋若昭	361
畅当	350	元稹	362
刘言史	350	崔莺莺	362
窦常	351	施肩吾	362
朱放	351	刘叉	362
长孙佐辅	351	贾岛	363
李益	351	无可	363
雍裕之	351	姚合	363
灵澈	352	章孝标	364
窦牟	352	朱庆馀	364
孟郊	352	李德裕	364
杨巨源	352	许浑	365
马逢	353	张碧	365
武元衡	353	李贺	365
窦群	353	张祜	366

顾非熊	366	李郢	375
马戴	366	郑紫	376
郑巢	366	慎氏	376
李敬方	366	薛媛	376
韩琮	367	于渍	376
徐凝	367	张孜	376
皇甫松	367	罗虬	376
温庭筠	367	秦韬玉	376
刘得仁	368	罗邺	377
李频	368	李山甫	377
项斯	368	黄崇嘏	377
李远	368	章碣	377
崔珣	368	钱珣	377
雍陶	369	邵谒	378
曹唐	369	贯休	378
周贺	369	罗隐	378
杜牧	369	陆龟蒙	379
陈陶	370	聂夷中	379
段成式	370	曹松	379
赵嘏	370	陆希声	380
薛逢	370	皮日休	380
姚鹄	370	唐彦谦	380
方干	371	高蟾	380
喻凫	371	来鹏	380
李商隐	371	韦庄	381
李群玉	372	司空图	381
卢肇	372	黄滔	382
储嗣宗	372	韩偓	382
司马札	372	鱼玄机	382
曹邨	372	唐求	382
薛能	373	杜荀鹤	383
郑嵎	373	李洞	383
周朴	373	吴融	383
高骈	373	王驾	383
胡曾	374	尚颜	383
刘沧	374	郑谷	383
周繇	374	于武陵	384
许棠	374	崔涂	384
汪遵	374	崔致远	384
李昌符	374	徐寅	384
林宽	375	张蠍	384
步非烟	375	王贞白	385
张乔	375	蜀太后徐氏	385
喻坦之	375	齐己	385
刘驾	375	殷文圭	385
郑畋	375	李咸用	385

裴说	385	胡宿	393
李建勋	386	宋庠	393
崔道融	386	宋祁	394
修睦	386	曾公亮	394
李舜弦	386	余靖	394
卢延让	386	张俞	394
苏拯	386	陈舜俞	394
王仁裕	387	梅尧臣	394
和凝	387	石介	395
周昱	387	文彦博	395
李中	387	欧阳修	395
花蕊夫人	387	王琪	396
成彦雄	387	契嵩	396
伍乔	387	张方平	396
张泌	388	苏舜钦	396
谭用之	388	张伯玉	397
李煜	388	杜默	397
徐铉	388	赵抃	397
李昉	388	韩琦	397
宋白	388	杨备	398
田锡	389	李觏	398
张咏	389	苏洵	398
柳开	389	祖无择	398
郑文宝	389	邵雍	398
王禹偁	389	蔡襄	399
惠崇	389	陶弼	399
王周	390	陈襄	399
林逋	390	韩维	399
潘阆	390	黄庶	399
赵湘	390	杨蟠	400
魏野	390	袁陟	400
陈彭年	391	文同	400
孙何	391	刘敞	400
寇準	391	曾巩	400
钱惟演	391	司马光	401
陈尧佐	391	王珪	401
丁谓	392	苏颂	401
杨亿	392	金君卿	401
穆修	392	王安石	402
重显	392	刘彝	402
夏竦	392	强至	402
范仲淹	392	杨傑	403
晏殊	393	刘攽	403
茜桃	393	范纯仁	403
石延年	393	吕陶	403
陈洎	393	王安国	403

沈遘	404	晁补之	413
晁端友	404	游酢	413
刘摯	404	张耒	413
沈括	404	周邦彦	414
王令	404	李廌	414
沈辽	405	毛滂	414
了元	405	李昭玘	414
韦骧	405	周行己	415
郭祥正	405	司马槲	415
王观	405	司马槲	415
冯山	405	宗泽	415
苏轼	406	晁说之	415
苏辙	406	邹浩	415
朱长文	406	朱淑真	415
张景修	407	晁冲之	416
魏夫人	407	饶节	416
彭汝砺	407	谢逸	416
范祖禹	407	谢薖	416
舒亶	407	李彭	416
陆佃	407	赵鼎臣	417
刘泾	408	唐庚	417
王雱	408	陶九成	417
黄裳	408	潘大临	417
王洸	408	惠洪	417
道潜	408	苏过	417
黄庭坚	408	许景衡	418
孔武仲	409	葛胜仲	418
孔平仲	409	李正民	418
周韶	409	魏泰	418
张舜民	410	徐俯	418
吕南公	410	洪朋	418
李之仪	410	洪炎	418
华镇	410	洪刍	418
蔡肇	410	王安中	419
毕仲游	410	韩驹	419
李新	411	叶梦得	419
贾收	411	程俱	419
吴则礼	411	陈渊	420
朱服	411	李光	420
刘焄	411	何大圭	420
秦观	411	林季仲	420
李公麟	412	吕渭老	420
鲍由	412	吴可	420
米芾	412	苏籀	420
贺铸	412	阮阅	421
陈师道	412	王以宁	421

汪藻	421	李流谦	430
王铨	421	陆游	431
王庭珪	421	萧德藻	431
郭印	421	范成大	431
孙觌	422	周必大	432
周紫芝	422	尤袤	432
李纲	422	杨万里	432
曾幾	422	韩玉父	433
李清照	423	朱熹	433
吕本中	423	许及之	434
赵鼎	423	张明中	434
朱弁	424	葛天民	434
陈东	424	王阮	434
沈与求	424	张良臣	434
王洋	424	项安世	435
郑刚中	424	张孝祥	435
洪皓	424	张栻	435
傅察	425	章甫	436
李弥逊	425	陈造	436
陈与义	425	周孚	436
邓肃	425	王质	436
张元幹	425	吕祖谦	436
曾季狸	426	陈傅良	437
李若水	426	楼钥	437
王之道	426	王炎	437
张嵎	426	袁说友	437
朱松	426	刘应时	437
朱翌	427	辛弃疾	438
曹勋	427	裘万顷	438
姚孝锡	427	赵蕃	438
刘子翬	427	叶适	438
苏小娟	427	张鎰	438
胡铨	428	刘过	439
葛立方	428	敖陶孙	439
史浩	428	汪莘	439
朱皇后	428	姜夔	439
李石	428	曹彦约	440
黄公度	429	李壁	440
邓深	429	韩淲	440
李少雲	429	赵师秀	440
王十朋	429	徐照	441
喻良能	429	徐玑	441
洪适	430	黄淑	441
韩元吉	430	翁卷	441
史尧弼	430	刘宰	441
李吕	430	戴复古	441

苏洞	442	方凤	452
赵汝燧	442	郑思肖	452
华岳	442	汪元量	452
洪咨夔	443	韩希孟	453
周文璞	443	林景熙	453
吴泳	443	赵必豫	453
叶绍翁	443	谢翱	453
戴昺	443	王镒	454
郑清之	443	真山民	454
魏了翁	444	顾逢	454
周弼	444	卫宗武	454
杜範	444	汪济	454
王遂	444	蒲寿晟	454
岳珂	444	宋氏	455
王迈	445	郭晖妻	455
刘克庄	445	梅花尼	455
许棐	446	张玉娘	455
高翥	446	王清惠	455
吴潜	446	王氏	455
易士达	446	耶律倍	455
方岳	446	赵延寿	456
严羽	447	耶律庶成	456
郑起	447	耶律蒲鲁	456
陈起	447	萧观音	456
利登	447	萧瑟瑟	456
吴惟信	447	宇文虚中	456
罗与之	448	张斛	456
毛珣	448	吴激	457
赵希蓬	448	刘著	457
于石	448	高士谈	457
乐雷发	448	蔡松年	457
林希逸	448	蔡珪	457
薛嵎	449	李晏	458
张埴	449	王寂	458
董嗣杲	449	刘瞻	458
家铉翁	449	赵可	458
俞德邻	450	刘仲尹	458
陈允平	450	刘迎	458
龚开	450	耶律履	458
萧立之	450	党怀英	459
谢枋得	450	王庭筠	459
金履祥	450	张公药	459
周密	451	周昂	459
刘辰翁	451	刘昂	459
文天祥	451	赵秉文	459
舒岳祥	452	杨雲翼	460

史旭	460	高克恭	469
完颜珣	460	白斑	469
王若虚	460	程钜夫	469
辛愿	461	刘因	469
冯延登	461	胡炳文	469
李俊民	461	陆文圭	470
李纯甫	461	陈栌	470
宋九嘉	461	熊铄	470
杨奂	462	赵孟頫	470
赵元	462	陈深	470
陈赓	462	赵偕	471
元好问	462	尹廷高	471
杨弘道	463	曹伯启	471
元严	463	刘将孙	471
麻革	463	冯子振	471
陈庾	463	黄庚	471
李献甫	463	蒲道元	472
段克己	463	宋无	472
杨果	464	管道昇	472
段成己	464	袁易	472
房俾	464	方澜	473
曹之谦	464	袁桷	473
张秦娥	464	龚璘	473
耶律楚材	464	吾丘衍	473
许衡	465	贡奎	473
刘秉忠	465	黄公望	473
侯克中	465	安熙	474
耶律铸	465	张养浩	474
郝经	465	许谦	474
胡祇遹	465	柳贯	474
王恽	466	潘音	474
方回	466	杨载	475
牟巘	466	范梈	475
杨公远	466	萨都刺	475
魏初	466	虞集	476
姚燧	466	欧阳玄	476
赵文	467	揭傒斯	476
刘壎	467	萧国宝	477
陈孚	467	杜本	477
卢挚	467	张雨	477
戴表元	467	黄潛	477
元淮	468	陈泰	477
鲜于枢	468	丁复	478
仇远	468	谢宗可	478
吴澄	468	陈樵	478
方夔	468	马祖常	478

李存	478	陈基	488
洪希文	479	陶宗仪	488
陆友	479	李士瞻	489
袁士元	479	陈高	489
张端	479	郭钰	489
吴师道	479	戴良	489
朱德润	479	王逢	489
贯雲石	480	赵汭	490
岑安卿	480	张宪	490
周权	480	金涓	490
王冕	480	郑允端	490
许有壬	481	王翰	491
张翥	481	丁鹤年	491
陈旅	481	唐桂芳	491
黄镇成	481	朱升	491
沈梦麟	481	林弼	491
成廷珪	482	李延兴	492
宋褰	482	凌雲翰	492
郑元佑	482	郭奎	492
周霆震	482	赵迪	492
胡天游	482	张以宁	493
苏天爵	483	蓝仁	493
谢应芳	483	蓝智	493
张昱	483	高逊志	493
杨维禎	483	钱仲益	493
李祁	484	钱宰	494
吴莱	484	危素	494
李孝光	484	魏观	494
郑玉	484	詹同	494
卢琦	484	陈谟	495
贡师泰	485	胡翰	495
贾蓬莱	485	宋濂	495
周伯琦	485	袁凯	496
钱惟善	485	刘基	496
叶颙	485	宋讷	497
倪瓒	486	朱右	497
余阙	486	陶安	497
傅若金	486	苏伯衡	497
泰不华	486	袁华	498
孙淑	487	吴志淳	498
舒頔	487	汪广洋	498
华幼武	487	贝琼	498
月鲁不花	487	李晔	499
迺贤	487	甘瑾	499
杨允孚	488	刘崧	499
顾瑛	488	刘炳	500

刘绍·····	500	金幼孜·····	512
王祎·····	500	解缙·····	512
乌斯道·····	500	杨荣·····	512
张著·····	500	王偁·····	513
杨基·····	501	杨溥·····	513
张適·····	501	李昌祺·····	513
唐肃·····	501	龚玥·····	514
王行·····	502	薛瑄·····	514
张羽·····	502	于谦·····	514
王佐·····	502	叶盛·····	515
孙黄·····	503	童轩·····	515
徐贲·····	503	刘泰·····	515
姚广孝·····	503	沈愚·····	515
高启·····	504	刘溥·····	515
偶桓·····	504	张宁·····	515
余尧臣·····	504	马洪·····	516
吕敏·····	505	汤胤勣·····	516
殷奎·····	505	郭登·····	516
管时敏·····	505	沈周·····	516
张宣·····	505	陈献章·····	517
王彝·····	505	柯潜·····	517
张孟兼·····	506	魏时敏·····	517
谢肃·····	506	丘吉·····	517
瞿佑·····	506	史鑑·····	517
浦源·····	506	吴宽·····	518
赵介·····	507	陆容·····	518
黄哲·····	507	庄杲·····	518
李德·····	507	程敏政·····	518
程本立·····	507	杨先溥·····	519
林鸿·····	508	樊阜·····	519
刘绩·····	508	马中锡·····	519
谢缙·····	508	张琦·····	519
金华宋氏·····	508	李东阳·····	520
高棅·····	508	王鏊·····	520
王恭·····	509	石珪·····	520
黎贞·····	509	杨一清·····	521
周是修·····	509	储巏·····	521
梁兰·····	509	杨循吉·····	521
方孝孺·····	510	祝允明·····	522
练子宁·····	510	邵宝·····	522
张肯·····	510	顾清·····	522
胡俨·····	510	杭淮·····	522
王绂·····	511	蔡羽·····	523
杨士奇·····	511	游潜·····	523
梁潜·····	511	殷雲霄·····	523
黄淮·····	512	蒋冕·····	523

王九思	523	张时彻	534
陈沂	524	吴承恩	534
唐寅	524	顾梦圭	534
文徵明	524	文嘉	535
王廷陈	525	高叔嗣	535
方太古	525	袁袞	535
李梦阳	525	胡汝嘉	535
王廷相	525	廖希颜	535
刘麟	526	李开先	535
康海	526	唐顺之	536
边贡	526	皇甫濂	536
顾璘	526	王慎中	536
唐龙	527	黄姬水	536
徐祯卿	527	李先芳	536
徐缙	527	冯惟敏	537
许相卿	527	冯惟讷	537
胡纘宗	528	俞允文	537
沈琼莲	528	吴维岳	537
齐之鸾	528	李攀龙	537
何景明	528	蔡汝楠	538
孙一元	529	陈鹤	538
张含	529	欧大任	538
郑善夫	529	沈明臣	538
傅汝舟	530	梁辰鱼	539
蒋山卿	530	徐学谟	539
郑若庸	530	刘效祖	539
薛蕙	530	张祥鸢	539
李濂	530	李言恭	539
黄佐	531	吴旦	540
李玉英	531	梁有誉	540
皇甫冲	531	吴国伦	540
许宗鲁	531	宗臣	540
马汝骥	531	汪道昆	541
王讴	531	杨巍	541
敖英	532	王世贞	541
陆粲	532	高岱	542
金銮	532	徐中行	542
张本	532	李蓑	542
谢榛	532	张凤翼	542
黎民表	533	居节	543
皇甫汴	533	戚继光	543
华察	533	张九一	543
黄峨	533	张献翼	543
文彭	533	王穉登	543
卢柟	534	陈文烛	544
皇甫汈	534	赵用贤	544

姚汝循	544	汤宾尹	553
王世懋	544	袁宏道	553
王叔承	544	胡震亨	553
艾穆	545	高出	554
张元凯	545	谢三秀	554
焦竑	545	宋懋澄	554
顾大典	545	宋登春	554
朱孟震	545	袁中道	554
岳岱	545	谢士章	554
李应徵	545	刘荣嗣	555
吴敏道	546	钟惺	555
屠隆	546	冯小青	555
傅光宅	546	傅汝舟	555
冯梦楨	546	冒愈昌	556
李维楨	546	曹学佺	556
汤有光	546	陈鸿	556
梅鼎祚	547	李流芳	556
汤显祖	547	王思任	556
邹迪光	547	蔡润石	557
赵南星	547	文震亨	557
胡应麟	548	谭元春	557
唐时升	548	沈宜修	557
于若瀛	548	董斯张	557
娄坚	548	周玉箫	558
徐媛	548	黎遂球	558
陆卿子	548	华淑	558
徐燧	549	瞿式耜	558
徐燊	549	王彦泓	558
吴兆	549	吴应箕	559
董其昌	549	陈子壮	559
江盈科	549	陈子升	559
呼文如	549	杨文骢	560
区大相	550	祁彪佳	560
潘之恒	550	邝露	560
陈继儒	550	商景兰	560
吴稼澄	550	黄淳耀	561
谢肇淛	550	陈子龙	561
袁宗道	551	方孟式	561
黄辉	551	魏耕	562
龙膺	551	张乔	562
陶望龄	551	彭孙贻	562
归子慕	551	张煌言	562
孙承宗	552	李邕嗣	563
程嘉燧	552	毕著	563
李日华	552	夏完淳	563
邓云霄	552	林古度	563

钱谦益	564	杜濬	575
卢世漑	564	冒襄	575
邢昉	564	吴乔	575
徐弼	565	徐波	575
李确	565	徐芳	575
冯舒	565	高珩	576
谈迁	565	周亮工	576
黄景昉	566	许友	576
黄翼圣	566	陈瑚	576
朱芾煌	566	刘体仁	576
陈之遴	566	方文	577
徐灿	566	钱秉镫	577
王猷定	566	陆圻	577
陈洪绶	567	顾炎武	577
顾梦游	567	归庄	578
丁耀亢	567	法若真	578
金俊明	567	姜垓	578
朱嘉徵	567	宋琬	578
来集之	568	曹溶	579
朱一是	568	龚鼎孳	579
李世熊	568	柴绍炳	579
冯班	568	魏裔介	580
钱邦芑	569	余怀	580
万寿祺	569	曹尔堪	580
王翊	569	魏象枢	580
阎尔梅	569	侯方域	580
傅山	569	宋徵舆	581
朱鹤龄	570	周茂源	581
程先贞	570	施闰章	581
姜埰	570	王广心	582
胡承诺	571	顾大申	582
冯如京	571	柳是	582
李雯	571	吴嘉纪	582
傅占衡	571	尤侗	583
徐世溥	571	申涵光	583
金人瑞	572	柴静仪	583
吴伟业	572	王夫之	583
纪映钟	573	吴绮	584
邓旭	573	龚贤	584
彭士望	573	顾湄	584
蒋薰	573	张丹	584
黄宗羲	573	沈谦	585
陆世仪	574	丁澎	585
黄周星	574	林雲铭	585
方以智	574	魏际瑞	585
徐夜	574	董说	585

孙枝蔚	586	王士禛	597
梁清标	586	宋荦	598
赵进美	586	唐孙华	598
顾景星	586	曹申吉	598
姚文燮	587	李良年	598
毛先舒	587	赵俞	599
黄生	587	田雯	599
周筮	587	李必恒	599
笪重光	587	胡香昊	599
严绳孙	588	王搢	599
毛奇龄	588	汪楫	600
程可则	588	徐钊	600
陆次云	588	嵇永仁	600
邓汉仪	589	曹禾	601
钱芳标	589	李天馥	601
魏禧	589	韩荃	601
汪琬	589	邵长蘅	601
李柏	590	张英	601
陈维崧	590	顾贞观	602
李蔚	590	劳之辨	602
沙张白	590	汪懋麟	602
王士禄	591	陈玉璫	603
曾灿	591	钮琇	603
陶澍	591	蒲松龄	603
冷士眉	591	张笃庆	604
王昊	591	万斯同	604
唐梦赉	592	王隼	604
叶燮	592	吴雯	604
姜宸英	592	廖燕	605
吕留良	592	彭定求	605
钱曾	593	洪昇	605
梁佩兰	593	魏坤	605
朱彝尊	593	潘耒	605
魏礼	594	潘耒	606
屈大均	594	顾沂	606
方殿元	594	孔尚任	606
吴兆骞	595	博尔都	607
李因笃	595	黄鸢来	607
彭孙遹	595	严虞惇	607
陈恭尹	595	张远	607
潘问奇	596	查慎行	607
张远	596	陈梦雷	608
吴历	596	戴名世	608
恽格	596	汪森	608
毛际可	596	查嗣琛	609
曹贞吉	597	林以宁	609

纳兰性德	609	杨琇	621
汤右曾	609	刘大櫟	621
卓尔堪	610	夏之蓉	621
曹寅	610	彭端淑	622
陈大章	610	陈兆崙	622
王苹	610	沈大成	622
赵执信	611	商盘	622
陈鹏年	611	吴敬梓	623
周起渭	611	倪瑞璣	623
陈至言	612	姚範	623
徐昂发	612	金甡	623
顾嗣立	612	齐召南	623
杜诏	612	全祖望	624
屈复	612	王又曾	624
惠士奇	613	汪师韩	624
张廷玉	613	程晋芳	624
李紱	613	钱载	625
沈德潜	614	万光泰	625
揆叙	614	贺双卿	625
鄂尔泰	614	袁枚	625
周京	615	邵齐焘	626
程梦星	615	袁机	626
文昭	615	童钰	626
黄之隽	615	王鸣盛	626
许廷铎	615	梁同书	627
郑方坤	616	纪昀	627
薛雪	616	王昶	627
李重华	616	赵文哲	628
黄任	616	蒋士铨	628
金农	617	赵翼	628
张鹏翮	617	梦麟	629
马曰琯	617	敦敏	629
马曰璐	617	朱筠	629
符曾	617	毕沅	629
赵昱	618	汪辉祖	630
卢见曾	618	曹仁虎	630
黄子雲	618	顾光旭	630
程廷祚	618	高文照	630
厉鹗	619	朱彭	631
查为仁	619	姚鼐	631
郑燮	619	施朝幹	631
周大枢	620	翁方纲	631
严遂成	620	吴騫	632
丁敬	620	敦诚	632
胡天游	620	李调元	632
杭世骏	621	朱孝纯	633

王文治	633	吴筠	645
桂馥	633	钱仪吉	645
李日华	633	沈善宝	646
管世铭	633	范姝	646
彭绍升	634	梁章钜	646
王友亮	634	张维屏	646
邵晋涵	634	林则徐	646
汪中	634	潘德舆	647
洪亮吉	634	陈沅	647
吴锡麒	635	程恩泽	647
赵怀玉	635	梅曾亮	647
黎简	635	陆嵩	648
黄景仁	636	龚自珍	648
宋大樽	636	黄爵滋	648
陈端生	636	祁雋藻	649
法式善	637	魏源	649
铁保	637	何绍基	649
杨芳灿	637	顾春	650
孙星衍	638	张际亮	650
伊秉绶	638	汤鹏	650
杨凤苞	638	谢浣湘	651
王芑孙	638	林昌彝	651
吴鼐	639	朱琦	651
石韞玉	639	黄燮清	651
宋湘	639	姚燮	651
曾燠	640	鲁一同	652
吴文溥	640	郑珍	652
杨揆	640	贝青乔	652
王昙	640	莫友芝	653
孙原湘	641	曾国藩	653
张惠言	641	徐子苓	653
钱枚	641	刘熙载	654
张问陶	641	王拯	654
鲍桂星	642	江湜	654
阮元	642	金和	654
舒位	642	洪仁玕	655
吴嵩梁	643	邓辅纶	655
郭麐	643	李慈铭	655
乐钧	643	黄焕中	655
彭兆荪	643	王闿运	656
王豫	644	张之洞	656
查揆	644	樊增祥	656
陈寿祺	644	袁昶	657
英和	644	黄遵宪	657
陈文述	645	陈宝琛	658
周济	645	释敬安	658

沈曾植	658	包兰瑛	666
陈三立	659	黄节	666
林纾	659	冒广生	667
范当世	659	金天羽	667
严复	659	梁启超	667
许南英	660	徐自华	668
陈衍	660	陈去病	668
文廷式	660	杨圻	668
潘飞声	661	夏敬观	669
沈汝瑾	661	诸宗元	669
易顺鼎	661	林旭	669
康有为	661	沈鹄应	669
刘光第	662	秋瑾	669
梁鼎芬	662	王国维	670
郑孝胥	663	高旭	670
夏曾佑	663	于右任	671
叶德辉	663	马君武	671
丘逢甲	664	宋教仁	672
李希圣	664	宁调元	672
谭嗣同	664	苏曼殊	672
蒋智由	665	周实	672
赵熙	665	柳亚子	673
章炳麟	665	王德钟	673
黄人	666		

诗风流派

风骚	674	正始体	678
骚体	674	嵇阮	678
屈宋	675	大小阮	678
柏梁体	675	二阮	678
苏李	675	竹林七贤	679
苏李体	675	三张	679
三曹	676	二陆	679
三祖	676	二俊	679
建安七子	676	两潘	680
邺中七子	676	潘陆	680
曹刘	676	陆海潘江	680
曹刘体	677	联璧	680
曹王	677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680
王刘	677	二十四友	680
二应	677	太康体	680
邺下文人集团	677	陶体	681
建安风骨	677	谢体	681
建安体	678	陶谢	681
黄初体	678	刘郭	681

袁孙·····	682	涩体·····	688
孙许·····	682	陈杜·····	688
玄言诗派·····	682	陈拾遗体·····	689
山水诗派·····	682	阮陈·····	689
元嘉三大家·····	682	吴中四士·····	689
元嘉体·····	683	盛唐体·····	689
大小谢·····	683	张曲江体·····	689
二谢·····	683	王右丞体·····	689
三谢·····	683	孟浩然体·····	690
山泽四友·····	683	王孟·····	690
颜谢·····	683	山水田园诗派·····	690
永明体·····	684	高达夫体·····	690
新体诗·····	684	岑嘉州体·····	690
三贤·····	684	高岑·····	691
竟陵八友·····	684	王李高岑·····	691
鲍谢·····	684	边塞诗派·····	691
休鲍·····	684	太白体·····	691
江鲍·····	685	少陵体·····	692
沈鲍·····	685	李杜·····	692
沈诗任笔·····	685	会稽二清·····	693
齐梁体·····	685	竹溪六逸·····	693
南北朝体·····	685	饮中八仙·····	693
三笔六诗·····	685	二皇甫·····	693
选体·····	685	钱刘·····	693
宫体诗·····	686	钱郎·····	693
吴均体·····	686	钱郎刘李·····	693
俳体·····	686	大历十才子·····	693
玉台体·····	686	大历体·····	694
徐庾体·····	686	山中四友·····	694
二绝·····	686	六窠·····	694
阴何·····	686	五窠·····	694
何刘·····	687	韦苏州体·····	694
东海三何·····	687	柳子厚体·····	694
三何·····	687	韦柳·····	695
北地三才·····	687	韦柳体·····	695
三才·····	687	韦刘·····	695
大邢小魏·····	687	王韦·····	695
唐初体·····	687	王孟韦柳·····	695
上官体·····	687	唐四家·····	695
初唐四杰·····	687	陶韦·····	695
王杨卢骆体·····	688	韩昌黎体·····	696
王氏三珠树·····	688	孟东野体·····	696
文章四友·····	688	韩孟·····	696
方外十友·····	688	韩孟诗派·····	696
沈宋·····	688	孟诗韩笔·····	697
沈宋体·····	688	韩柳·····	697

杜韩	697	皮陆	704
杜诗韩笔	697	皮陆体	704
三杨	697	二陶	704
二包	697	三罗	704
三包	698	二曹	704
贾浪仙体	698	宋初诗歌革新运动	704
郊岛	698	西崑派	705
郊寒岛瘦	698	西崑体	706
姚贾	698	杨刘	706
贾喻	698	九僧	706
苦吟派	699	二宋	706
卢仝体	699	二刘	706
卢马	699	苏梅	706
咸通十哲	699	欧梅	706
芳林十哲	699	王荆公体	707
九华四俊	699	邵康节体	707
新乐府运动	699	东坡体	707
白乐天体	700	山谷体	707
元白	700	苏黄	708
元白体	700	韩苏	708
元白诗派	700	李杜韩苏	708
元轻白俗	700	黄陈	708
李杜韩白	701	苏海韩潮	708
韩孟元白	701	二苏	709
刘白	701	清江三孔	709
刘柳	701	后山体	709
元和体	701	陈简斋体	709
元和格	701	苏门四学士	709
长庆体	701	苏门六君子	709
三俊	702	苏门后四学士	710
张王	702	宋世二陈	710
张王乐府	702	宋四名家	710
张籍王建体	702	元祐体	710
李长吉体	702	江西诗派	710
三舍人	702	江西宗派体	711
晚唐体	702	一祖三宗	711
杜牧之体	702	杨诚斋体	711
李商隐体	703	苏陆	711
玉谿生体	703	杜氏五高	712
小李杜	703	金华五高	712
二李	703	中兴四大诗人	712
三李	703	尤杨范陆	712
香奁体	703	尤杨	712
艳体	703	永嘉四灵	712
温李	703	江湖派	712
杜荀鹤体	704	江左二宝	713

杨赵	713	吴中四才子	718
月泉吟社	713	海岱诗社	718
中州三杰	713	锡山四友	718
刘卢	713	公安派	719
虞杨范揭	713	公安体	719
元四家	713	三袁	719
遗山体	713	竟陵派	719
铁崖体	714	竟陵体	720
青丘体	714	钟谭	720
明初四杰	714	晋安二徐	720
吴中四杰	714	苕溪五隐	720
国初三张	714	复社	720
北郭十友	714	幾社	720
越诗派	714	娄东二张	720
吴诗派	714	娄东三凤	721
江右诗派	714	云间诗派	721
西江派	715	云间三子	721
闽中十才子	715	四公子	721
崇安二蓝	715	归奇顾怪	721
闽诗派	715	惊隐诗社	721
金陵三俊	715	江左三大家	721
南园五先生	715	虞山诗派	721
岭南诗派	715	海虞二冯	722
南园后五子	715	梅村体	722
南园十先生	715	娄东诗派	722
皇甫四杰	716	娄东十子	722
会稽二肃	716	宁都三魏	722
景泰十才子	716	易堂九子	722
台阁体	716	河朔诗派	722
茶陵诗派	716	广平三君	722
前七子	716	岭南七子	722
何李	717	北田五子	723
十才子	717	岭南三子	723
后七子	717	岭南三大家	723
王李	717	三君	723
李何王李	717	江左三凤凰	723
海内三才	717	国朝六家	723
前五子	717	南施北宋	723
后五子	718	宣城体	723
广五子	718	燕台七子	723
续五子	718	辽东三老	724
末五子	718	陆陈盛江四君子	724
嘉定四先生	718	西冷十子	724
练川三老	718	三丁	724
三甫	718	诗中十子	724
四甫	718	金台十子	724

神韵派	724
渔洋体	724
南朱北王	725
彭王	725
王门二弟子	725
维扬二妙	725
翰苑两诗人	725
四布衣	725
海内三布衣	725
浙派	725
查初白体	725
惠门八子	725
广陵五宗	726
蕉园诗社	726
格调派	726
秀水诗派	726
南郭五子	726
江都二汪	726
性灵派	726

江右三大家	727
乾隆三大家	727
高密诗派	727
吴中七子	727
二仲	727
毗陵七子	727
毗陵后七子	727
肌理派	728
宣南诗社	728
粤东三子	728
同光体	728
宋诗派	728
晚唐诗派	728
中晚唐诗派	728
汉魏六朝诗派	729
湖湘派	729
诗界革命	729
南社	729

主要诗集

总集

诗经	730
楚辞	731
文选	731
玉台新咏	731
文苑英华	732
古文苑	732
风雅翼	732
古乐府	733
风雅逸篇	733
古今风谣	733
古今谚	733
古诗纪	733
古乐苑	734
汉魏诗乘	734
八代诗乘	734
古诗镜	734
石仓历代诗选	735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735
古诗源	735
古诗录	736
古今诗删	736
乾坤正气集	736

诗女史	736
古今女史	737
彤管遗编	737
名媛汇诗	737
名媛诗归	737
奁制续泐	737
古今岁时杂咏	738
声画集	738
御定历代题画诗集	738
佩文斋咏物诗选	738
古谣谚	739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739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	739
建安七子集	739
续古今诗苑英华	740
玉台后集	740
古今诗人秀句	740
高氏三宴诗集	740
珠英学士集	740
李氏花萼集	741
贺监归乡诗集	741
正声集	741
辋川集	741
翰林学士集	741

朝英集	741	广十二家唐诗	748
国秀集	741	唐五十家诗集	748
河岳英灵集	742	唐诗类苑	748
丹阳集	742	唐十二名家诗	749
篋中集	742	唐五家诗	749
丽则集	742	唐诗纪	749
搜玉小集	742	唐诗集	749
中兴间气集	742	唐诗所	749
盛山唱和集	743	初唐四子集	749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743	唐诗援	749
三舍人集	743	唐六名家集	750
御览诗	743	王韦合刻	750
盛山十二诗联卷	743	唐诗选	750
三州唱和集	743	唐音统纂	750
吴蜀集	743	中晚唐诗纪	750
刘白唱和集	743	唐诗	751
彭阳唱和集	744	全唐诗	751
汝洛集	744	全唐诗逸	752
断金集	744	全唐诗补编	752
香山九老会诗	744	唐近体诗永	752
极玄集	744	唐诗定编	752
窦氏联珠集	744	全唐诗蟠根集	752
南薰集	744	唐诗矩	752
新撰类林钞	744	唐人试帖	753
唐诗类选	745	唐贤三昧集	753
虎丘题真娘墓诗	745	唐人万首绝句选	753
同题集	745	十种唐诗选	753
汉上题襟集	745	唐八家诗钞	754
瑶池新咏	745	全唐诗录	754
松陵集	745	唐诗应制备体	754
千载佳句	745	此木轩唐五言律七言律读本	754
又玄集	746	唐诗指月	754
才调集	746	唐人千首绝句	754
文章龟鉴	746	唐小律花雨集	754
唐人选唐诗(十种)	746	唐诗挹藻	754
唐百家诗选	746	五七言今体诗钞	754
万首唐人绝句	747	试体唐诗	755
丽泽集	747	唐宋八家集	755
众妙集	747	唐诗别裁集	755
二妙集	747	唐诗三百首	755
唐人五言排律选	747	七言律诗钞	756
唐诗正声	747	唐宋诗醇	756
雅音会编	748	十八家诗钞	756
唐诗选玄集	748	唐人五十家小集	756
唐大历十子诗集	748	全五代诗	756
唐音大成	748	二李唱和集	757

西崑酬唱集·····	757	国朝风雅·····	769
同文馆唱和诗·····	757	草堂雅集·····	769
南岳倡酬集·····	757	玉山名胜集·····	770
坡门酬唱集·····	758	玉山纪游·····	770
宋文鉴·····	758	乾坤清气集·····	770
回文类聚·····	758	元音·····	770
千家诗·····	758	元诗体要·····	771
柴氏四隐集·····	759	元艺圃集·····	771
诗家鼎裔·····	759	元人十种诗·····	771
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集·····	759	元诗选(顾嗣之)·····	771
江湖小集·····	760	元诗选癸集·····	771
江湖后集·····	760	元诗选(顾奎光)·····	772
南宋群贤小集·····	761	元诗别裁·····	772
前贤小集拾遗·····	761	元人选元诗·····	772
中兴群公吟稿戊集·····	761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772
两宋名贤小集·····	762	沧海遗珠·····	772
濂洛风雅(金履祥)·····	762	雅颂正音·····	773
诗苑众芳·····	762	明诗正声·····	773
忠义集·····	762	盛明百家诗·····	773
瀛奎律髓·····	763	批点明诗七言律·····	773
谷音·····	763	国朝名公诗选·····	773
宋艺圃集·····	763	国雅·····	774
宋诗钞·····	763	皇明诗选·····	774
宋元诗会·····	764	列朝诗集·····	774
积书岩宋诗选·····	764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774
宋十五家诗选·····	764	明诗综·····	775
濂洛风雅(张伯行)·····	764	明诗百州名家诗钞·····	775
宋百家诗存·····	764	闲情集·····	775
千首宋人绝句·····	765	遗民诗·····	776
宋诗略·····	765	明人诗钞·····	776
宋诗别裁集·····	765	明诗别裁·····	776
宋诗精华录·····	765	明诗钞·····	776
月泉吟社诗·····	766	清诗溯洄集·····	776
宋人集·····	766	皇清百名家诗·····	777
中州集·····	766	诗观·····	777
全金诗·····	767	感旧集·····	777
河汾诸老集·····	767	篋衍集·····	777
元文类·····	767	名家诗永·····	778
圭塘欵乃集·····	768	国朝诗乘·····	778
天下同文集·····	768	南宋杂事诗·····	778
皇元风雅·····	768	清诗别裁·····	778
敦父集·····	768	昭代诗针·····	779
伟观集·····	768	湖海诗传·····	779
金兰集·····	768	国朝诗·····	779
元音遗响·····	769	怀旧集·····	780
大雅集·····	769	旧言集·····	780

国朝诗萃	780
本朝名媛诗钞	780
国朝闺秀正始集	781
国朝闺秀正始续集	781
熙朝雅颂集	781
国朝闺阁诗钞	781
清诗铎	782
笥旧集	782
晚晴簃诗汇	782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783
近代诗钞(陈衍)	783
晚清四十家诗钞	783
南社诗集	783
近代诗钞(钱仲联)	784
三家宫词	784
二家宫词	784
全史宫词	785
冬青馆古宫词	785
东周宫词	785
十六国宫词	785
五代宫词	785
十国宫词	785
元宫词	786
明宫词	786
清宫词	786

地方总集

国朝畿辅诗传	787
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	787
遵化诗存	788
沧州明诗钞	788
国朝沧州诗钞	788
国朝沧州诗续钞	789
永平诗存	789
山右国朝诗存	789
潞安诗钞前编	789
潞安诗钞后编	789
秀容诗文集	790
南亭诗钞	790
国朝山左诗钞	790
国朝山左诗续钞	790
国朝山左诗补钞	791
青州明诗钞	791
牟平遗香集	791
益都先正诗丛钞	792
渠风集略	792

武定诗续钞	792
掖诗采录	793
中州名贤文表	793
国朝中州诗钞	793
关中两朝诗钞	793
樊南诗钞	794
山南诗选	794
二南遗音	794
雍音	794
泾猷诗存	795
洮阳诗集	795
新安文献志	795
宛陵群英集	795
宛雅初编	796
宛雅二编	796
宛雅三编	796
皖雅初集	796
宛上同人集	796
历阳诗囿	797
桐旧集	797
上江诗选二集	797
小山嗣音	798
庐州诗苑	798
江苏诗徵	798
金陵诗徵	798
国朝金陵诗徵	799
国朝金陵续诗徵	799
国朝松陵诗徵	799
国朝松江诗录	800
嘉定诗钞	800
嘉定诗钞二集	800
海曲诗钞	800
海藻	800
青浦诗传	801
青浦续诗传	801
闵行诗存	801
张泽诗徵	802
张泽诗徵续编	802
吴都文粹	802
吴都文粹续集	802
吴会英才集	802
贞丰诗萃	803
木渎诗存	803
吴江诗录	803
楔湖诗拾	803
七十二峰足徵集	804

五峰耆旧集	804	蛟川诗系	816
五山耆旧今集	804	蛟川诗系统编	817
崇川诗集	804	甬上耆旧诗	817
崇川各家诗钞汇存	805	续甬上耆旧诗	817
崇川诗钞汇存补遗	805	四明清诗略	817
明紫琅诗	805	蛟川耆旧诗	817
国朝紫琅诗	805	蛟川耆旧诗续集	818
师山诗存	805	姚江诗录	818
娄水琴人集	806	国朝姚江诗存	818
云间诗钞	806	溪上诗辑	818
沙溪诗存	806	桐溪耆隐集	819
蓬溪风雅集	807	会稽掇英总集	819
娄东诗派	807	诸暨诗存	819
梁溪诗钞	807	诸暨诗存续编	819
毘陵诗录	807	上虞诗选	819
曲阿诗综	808	剡川诗钞	819
江上诗钞	808	剡川诗钞续编	820
江上诗钞补	808	天台集	820
京江耆旧集	808	国朝天台诗存	820
海虞诗苑	809	永康诗录	821
泖溪诗存	809	金华诗录	821
淮海英灵集	809	东阳历朝诗	821
白田风雅	810	闽中十子集	822
高邮耆旧诗	810	闽诗录	822
山阳诗徵	810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	822
扬州风土词萃	811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续	823
徐州诗徵	811	闽百三十人诗存	823
胸海诗存	811	莆风清籁集	823
两浙輶轩录	812	杭川新风雅集	823
国朝杭郡诗辑	812	江西诗徵	824
国朝杭郡诗续辑	812	西江风雅	824
国朝杭郡诗三辑	812	吴楚诗钞	824
国朝湖州诗录	813	楚风补	824
国朝湖州诗续录	813	楚诗纪	824
湖阴诗徵	813	资江耆旧集	825
浔溪诗徵	813	沅湘耆旧集	825
闻湖诗钞	813	湖北诗录	825
闻湖诗续钞	814	楚庭耆旧遗诗	825
闻湖诗三钞	814	楚庭耆旧遗诗续集	826
携李诗系	814	广济耆旧诗集	826
续携李诗系	814	容城耆旧集	826
濮川诗钞	815	汉南诗约	826
梅里诗辑	815	竟陵诗选	826
续梅里诗辑	815	成都文类	827
竹里诗萃	815	全蜀艺文志	827
严陵集	816	国朝蜀诗略	827

国朝全蜀诗钞·····	828
新繁诗略·····	828
广州四先生诗·····	828
广州五先生诗·····	828
南园后五子诗集·····	828
广东诗粹·····	829
岭南诗存·····	829
岭表诗传·····	829
端溪诗述·····	829
溟南诗选·····	830
粤西诗载·····	830
明滇南诗略·····	830
滇诗嗣音集·····	830
黔诗纪略·····	830
黔诗纪略补·····	831
黔诗纪略后编·····	831

别集

张河间集·····	831
蔡中郎集·····	832
曹操集·····	832
刘公幹集·····	832
王粲集·····	832
陈思王集·····	833
阮嗣宗集·····	833
傅鹑觚集·····	834
孙冯翊集·····	834
嵇中散集·····	834
张司空集·····	834
潘安仁集·····	835
左太冲集·····	835
张景阳集·····	835
陆机集·····	835
陆云集·····	835
束广微集·····	836
刘越石集·····	836
郭弘农集·····	836
孙廷尉集·····	836
谢康乐集·····	836
鲍参军集·····	836
沈休文集·····	837
江文通集·····	837
孔詹事集·····	837
任彦昇集·····	837
丘司空集·····	838
梁武帝集·····	838

谢宣城集·····	838
吴朝请集·····	838
何逊集·····	838
庾度支集·····	839
梁昭明太子集·····	839
梁简文帝集·····	839
徐孝穆集·····	839
梁元帝集·····	840
王司空集·····	840
庾子山集·····	840
江令君集·····	840
张散骑集·····	840
阴常侍集·····	841
卢武阳集·····	841
薛司隶集·····	841
陈后主集·····	841
隋炀帝集·····	841
虞世南集·····	841
李百药集·····	841
魏郑公集·····	841
王无功文集·····	842
许敬宗集·····	842
王梵志诗校辑·····	842
唐太宗皇帝集·····	842
骆宾王集·····	842
卢照邻集·····	843
杜审言集·····	843
李峤集·····	843
王子安集·····	843
盈川集·····	844
宋之问集·····	844
陈伯玉集·····	844
沈佺期集·····	844
张燕公集·····	844
崔曙集·····	844
曲江集·····	844
崔颢诗集·····	845
祖咏集·····	845
储光羲集·····	845
孟浩然集·····	845
常建诗集·····	845
高常侍集·····	846
李翰林集·····	846
王右丞集·····	847
颜鲁公集·····	847
李颀诗集·····	847

杜工部集	847	章孝标诗集	859
岑嘉州集	848	朱庆馀诗集	859
刘随州集	849	李德裕文集	859
钱考功集	849	丁卯集	859
郎士元集	849	李贺集	859
元次山集	849	张承吉文集	860
昼上人集	850	顾非熊诗	860
皇甫曾诗集	850	温飞卿集	860
韩君平诗集	850	晚唐刘得仁诗	860
于鹄诗集	850	项斯诗集	861
司空曙集	850	李远诗集	861
耿纬集	850	周贺诗集	861
唐崔峒诗集	850	樊川文集	861
李端诗集	851	段成式诗	861
毗陵集	851	李义山集	861
严武集	851	李群玉诗集	862
严维集	851	薛许昌诗集	862
寒山子诗集	851	喻凫诗集	862
拾得诗集	851	林宽诗集	862
丰干诗集	852	刘驾诗集	862
华阳集	852	比红儿诗	863
戴叔伦集	852	罗邺诗集	863
韦苏州集	852	邵谒诗集	863
戎昱集	853	禅月集	863
卢户部诗集	853	罗昭谏集	863
中唐刘言史集	853	皮子文薮	864
李益集	853	韦庄集	864
澈上人诗集	853	香奁集	864
孟东野诗集	853	韩内翰别集	864
武元衡集	854	唐风集	864
权文公集	854	唐英歌诗	865
羊士谔集	854	雲台编	865
张籍诗集	854	于武陵诗集	865
王建诗集	854	白莲集	865
牟融诗集	855	徐公文集	865
韩昌黎集	855	咸平集	866
玉川子诗集	855	乖崖集	866
鲍溶诗集	856	河东集	866
吕衡州集	856	小畜集	866
刘宾客集	856	和靖诗集	866
白氏文集	857	逍遥集	866
柳河东集	857	南阳集	866
元稹集	858	东观集	866
刘叉诗	858	寇愍公集	867
长江集	858	武夷新集	867
姚少监集	859	文庄集	867

文正集	867	济南集	877
文恭集	867	东堂集	877
宋元宪集	867	乐静集	877
宋景文集	867	宗忠简集	877
武溪集	867	晁具茨集	877
都官集	867	溪堂集	878
宛陵集	868	日涉园集	878
徂徕集	868	竹隐畸士集	878
欧阳文忠公集	868	唐子西集	878
乐全集	869	石门文字禅	878
苏舜钦集	869	斜川集	878
清献集	869	横塘集	879
安阳集	869	丹阳集	879
击壤集	869	洪龟父集	879
蔡忠惠集	870	西渡集	879
古灵集	870	老圃集	879
南阳集	870	初寮集	879
丹渊集	870	陵阳集	880
公是集	870	石林居士建康集	880
曾巩集	871	北山小集	880
传家集	871	浮溪集	880
华阳集	871	卢溪集	881
苏魏公集	871	云溪集	881
王文公文集	871	太仓稊米集	881
彭城集	872	梁溪集	881
西溪集	872	茶山集	881
忠肃集	872	李易安集	882
王令集	872	东莱诗集	882
青山集	872	忠正德文集	882
冯安岳集	873	东牟集	882
东坡七集	873	北山集	883
栾城集	873	鄱阳集	883
鄱阳集	873	筠溪集	883
陶山集	873	陈与义集	883
参寥集	874	芦川归来集	883
山谷集	874	相山集	884
清江三孔集	875	紫微集	884
画谿集	875	韦斋集	884
姑溪居士集	875	松隐文集	884
西台集	875	屏山集	884
淮海集	875	方舟集	885
宝晋英光集	875	知稼翁集	885
庆湖遗老集	876	梅溪集	885
后山居士文集	876	香山集	885
鸡肋集	876	盘洲集	885
张右史文集	876	南涧甲乙稿	886

莲峰集	886	则堂集	897
澹轩集	886	萧冰崖诗集拾遗	897
澹斋集	886	叠山集	897
陆游集	886	仁山集	897
范石湖集	887	草窗韵语	898
文忠集	888	刘辰翁集	898
梁溪遗稿	888	文山先生全集	898
诚斋集	888	阆风集	899
晦庵先生集	889	存雅堂遗稿	899
涉斋集	889	心史	899
义丰集	889	湖山类稿	899
平庵悔稿	889	霁山集	900
于湖集	890	覆瓿集	900
南轩集	890	晞发集	900
江湖长翁文集	890	月洞吟	900
蠹斋铅刀编	890	秋声集	900
东莱吕太史集	891	心泉学诗集	901
止斋集	891	拙轩集	901
双溪集	891	闲闲老人滢水文集	901
东塘集	891	庄靖先生集	901
辛稼轩诗文抄存	891	元遗山集	901
竹斋诗集	892	礪溪集	902
叶適集	892	湛然居士集	902
南湖集	892	鲁斋遗书	902
龙洲集	893	稼村类稿	902
白石道人诗集	893	藏春集	903
昌谷集	893	艮斋诗集	903
清苑斋集	893	双溪醉隐集	903
芳兰轩集	893	陵川集	903
二薇亭集	893	紫山大全集	903
苇碧轩集	894	秋涧先生大全集	903
石屏诗集	894	桐江续集	903
冷然斋集	894	野趣有声画	904
野谷诗集	894	青崖集	904
翠微南征录	894	牧庵集	904
平斋文集	895	青山集	904
鹤林集	895	水雲村稿	904
安晚堂集	895	陈刚中集	905
鹤山全集	895	卢疏斋集辑存	905
玉楮集	895	剡源集	905
臞轩集	896	吴文正集	905
后村大全集	896	金渊集	905
秋崖集	896	山村遗稿	905
沧浪集	896	湛渊集	906
紫岩诗选	896	雪楼集	906
雪矶丛稿	897	静修集	906

墙东类稿	906	雲林诗集	916
松雪斋集	906	胡仲子集	916
玉井樵唱	907	宋濂诗集	916
养吾斋集	907	海叟集	916
月屋樵吟	907	诚意伯文集	917
清容居士集	907	西隐文稿	917
雲林集	907	陶学士集	917
归田类稿	907	凤阁吟稿	917
白雲集	908	清江集	918
待制集	908	槎翁诗集	918
杨仲宏集	908	眉庵集	918
范德机诗集	908	静居集	918
雁门集	908	西庵集	918
道园学古录	909	北郭集	919
圭斋集	909	高青丘集	919
揭傒斯集	909	蚓窍集	919
瓢泉吟稿	910	王常宗集	919
黄学士文集	910	白石山房逸稿	920
梅花字字香	910	密庵稿	920
石田文集	910	浦舍人诗集	920
吴礼部集	911	鸣盛集	920
此山集	911	秣陵先生集	920
竹斋集	911	逊志斋集	920
圭塘小稿	911	练中丞集	921
蜕庵集	911	王舍人诗集	921
安雅堂集	911	东里全集	921
秋声集	912	解学士文集	921
花谿集	912	薛文清集	921
复古诗集	912	于肃愍公集	922
雲阳集	912	石田诗选	922
渊颖吴先生集	912	陈献章集	922
五峰集	912	定山先生集	922
圭峰集	913	李东阳集	923
清阴阁集	913	熊峰集	923
环谷集	913	石淙诗稿	923
溧京杂咏	913	祝氏集略	924
九灵山房集	914	溪陂集	924
梧溪集	914	唐伯虎全集	924
东山存稿	914	文徵明集	924
南湖集	914	空同集	925
佩玉斋类稿	914	康对山先生全集	925
林登州集	915	顾华玉集	925
翠屏集	915	徐氏别稿	926
蓝山集	915	徐昌谷全集	926
蓝涧集	915	鸟鼠山人遗集	926
临安集	915	钤山堂集	926

何大复集	926	尊水园集略	939
太白山人漫稿	927	石臼集	939
少谷全集	927	默庵遗稿	939
陆子馀集	927	宝纶堂集	939
四溟山人全集	927	丁野鹤集	939
射阳先生存稿	928	钝吟老人遗稿	940
李开先集	928	隰西草堂集	940
沧溟集	928	白奎山人集	940
欧虞部集	928	霜红龛集	940
鹿城诗集	929	愚庵小集	941
太函集	929	海右陈人集	941
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	929	胡石庄先生诗集	941
王百穀全集	929	沉吟楼诗选	941
由拳集	930	梅村家藏稿	941
栖真馆集	930	慧叟诗钞	942
白榆集	930	黄宗羲诗集	942
大泌山房集	930	变雅堂集	942
鹿裘石室集	930	赖古堂全集	942
汤显祖诗文集	930	塗山集	942
陶庵遗稿	931	藏山阁集	943
负苞堂集	931	顾亭林诗文集	943
程孟阳先生集	931	归庄集	943
袁中郎全集	932	安雅堂集	943
九籀集	932	定山堂集	944
珂雪斋集	932	甲申集	944
隐秀轩集	933	江山集	944
王季重十种	933	愚山先生诗集	944
石仓诗集	933	陋轩集	945
谭友夏合集	934	西堂全集、馀集	945
莲鬚阁集	934	聪山集	945
詠怀堂诗集	934	王夫之诗文集	946
瞿式耜集	934	溉堂集	946
疑雨集	935	西河合集	946
楼山堂集	935	海日堂集	947
洵美堂诗集	935	尧峰文钞	947
峤雅	935	定峰诗钞	947
陶庵全集	936	定峰乐府	947
陈子龙诗集	936	已畦诗集	948
雪翁诗集	936	东庄诗存	948
茗斋集	936	曝书亭集	948
张苍水集	937	翁山诗外	948
杲堂诗文集	937	松桂堂全集	949
夏完淳集	937	独漉堂全集	949
初学集	938	珂雪诗	949
有学集	938	带经堂集	950
投笔集	938	渔洋山人精华录	950

西陂类稿	950	红杏山房诗钞	963
东江诗钞	951	天真阁集	963
澹馥诗集	951	船山诗草	963
秋锦山房集	951	瓶水斋诗集	964
占欢堂集	951	灵芬馆诗集	964
芦中集	951	小谟觞馆诗集	964
东皋禅师集刊	952	恩福堂诗钞	965
百尺梧桐阁诗集	952	卜魁集	965
聊斋诗集	952	碧城仙馆诗钞	965
莲洋集	953	颐道堂诗选	965
稗畦集、稗畦续集	953	退庵诗存	965
风池阁集	953	松心诗集	966
孔尚任诗文集	954	云左山房诗钞	966
广阳诗集	954	简学斋诗	966
友鸥堂集	954	程侍郎遗集	966
敬业堂诗集	954	意苕山馆诗稿	966
闲止书堂集钞	955	龚自珍全集	966
通志堂集	955	古微堂诗集	967
棟亭集	955	东洲草堂诗钞	967
饴山诗集	955	思伯子堂诗集	967
沈归愚诗全集	956	怡志堂诗初编	967
秋江集	956	复庄诗问	968
冬心先生集	956	通甫诗存	968
雅雨堂遗集	957	巢经巢诗钞	968
樊榭山房集	957	半行庵诗存稿	968
郑板桥全集	957	咄咄吟	968
石笥山房诗集	957	邵亭诗钞	968
道古堂诗集	958	曾文正公诗集	968
葺石斋诗集	958	秋螭吟馆诗集	969
小仓山房诗集	958	白香亭诗集	969
忠雅堂诗词全集	958	白华绛跗阁诗初集	969
瓯北集	959	广雅堂诗集	969
懋斋诗钞	959	人境庐诗草	969
惜抱轩全集	959	人境庐集外诗辑	970
复初斋诗集	959	沧趣楼诗集	970
四松堂集	960	八指头陀诗文集	970
延芬室集	960	闽中新乐府	970
绿烟琐窗集	960	畏庐诗存	970
春柳堂诗稿	960	窥园留草	970
容斋先生遗诗	961	文道希先生遗诗	970
洪北江诗文集	961	鸣坚白斋诗存	971
有正味斋诗集	961	琴志楼编年诗集	971
五百四峰堂诗钞	962	康南海先生诗集	971
两当轩集	962	介白堂诗集	971
孙渊如先生全集	962	海藏楼诗	971
留春草堂诗钞	963	观古堂诗录	972

岭雲海日楼诗钞·····	972	天放楼诗集·····	973
雁影斋诗·····	972	浩歌堂诗钞·····	973
谭嗣同全集·····	972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973
香宋诗前集·····	972	天梅遗集·····	974
香宋诗钞·····	972	宁调元集·····	974
北山楼集·····	973	无尽庵遗集·····	974
石陶梨烟室诗存·····	973	磨剑室诗集·····	974
黄节诗集·····	973		

诗作名篇

弹歌(古歌谣)·····	975	卷耳·····	979
击壤歌·····	975	樛木·····	979
康歌·····	975	蟋斯·····	980
南风歌·····	975	桃夭·····	980
卿云歌·····	976	兔置·····	980
塗山歌·····	976	芣苢·····	980
五子歌·····	976	汉广·····	980
麦秀歌·····	976	汝坟·····	980
采薇歌·····	976	麟之趾·····	980
饭牛歌·····	976	鹊巢·····	980
宋城者讴·····	976	采芣·····	980
穗歌·····	976	草虫·····	980
弹铗歌·····	976	采蘋·····	981
龙蛇歌·····	977	甘棠·····	981
邶民歌·····	977	行露·····	981
优孟歌·····	977	羔羊·····	981
忼慨歌·····	977	殷其雷·····	981
楚狂接舆歌·····	977	標有梅·····	981
孺子歌·····	977	小星·····	981
越人歌·····	977	江有汜·····	981
易水歌·····	977	野有死麕·····	981
丘陵歌·····	978	何彼裵矣·····	981
获麟歌·····	978	驹虞·····	981
琴歌·····	978	柏舟(邶风、鄘风)·····	982
秦始皇时民歌·····	978	绿衣·····	982
楚人谣·····	978	燕燕·····	982
子产诵·····	978	日月·····	982
秦世谣·····	978	终风·····	982
伊耆氏蜡辞·····	978	击鼓·····	982
祷雨辞·····	978	凯风·····	982
成相杂辞·····	978	雄雉·····	983
祈招诗·····	979	匏有苦叶(邶风、小雅)·····	983
石鼓诗·····	979	谷风·····	983
关雎(诗经)·····	979	式微·····	983
葛覃·····	979	鹿丘·····	983

简兮	983	蓺兮	989
泉水	983	狡童	989
北门	983	褰裳	989
北风	983	丰	989
静女	983	东门之墠	989
新台	984	风雨	989
二子乘舟	984	子衿	989
墙有茨	984	出其东门	989
君子偕老	984	野有蔓草	989
桑中	984	溱洧	990
鶉之奔奔	984	鸡鸣	990
定之方中	984	还	990
蟋蟀	984	著	990
相鼠	984	东方之日	990
干旄	984	东方未明	990
载驰	985	南山	990
淇奥	985	甫田(齐风、小雅)	990
考槃	985	卢令	991
硕人	985	敝笱	991
氓	985	载驱	991
竹竿	985	猗嗟	991
芄兰	985	葛屦	991
河广	985	汾沮洳	991
伯兮	985	园有桃	991
有狐	986	陟岵	991
木瓜	986	十亩之间	991
黍离	986	伐檀	992
君子于役	986	硕鼠	992
君子阳阳	986	蟋蟀	992
扬之水	986	山有枢	992
中谷有蓷	987	椒聊	992
兔爰	987	绸缪	992
葛藟	987	杕杜(唐风、小雅)	992
采葛	987	鸛羽	993
大车	987	无衣(唐风、秦风)	993
丘中有麻	987	有杕之杜	993
缁衣	987	葛生	993
将仲子	987	采芣	993
叔于田	987	车邻	994
大叔于田	988	驷骖	994
清人	988	小戎	994
羔裘(郑风、唐风、桧风)	988	蒹葭	994
遵大路	988	终南	994
女日鸡鸣	988	黄鸟(秦风、小雅)	994
有女同车	988	晨风	994
山有扶苏	989	渭阳	995

权舆	995	沔水	1000
宛丘	995	鹤鸣	1000
东门之枌	995	祈父	1001
衡门	995	白驹	1001
东门之池	995	我行其野	1001
东门之杨	995	斯干	1001
墓门	995	无羊	1001
防有鹊巢	996	节南山	1001
月出	996	正月	1002
株林	996	十月之交	1002
泽陂	996	雨无正	1002
素冠	996	小旻	1002
隰有苕楚	996	小宛	1002
匪风	996	小弁	1002
蟋蟀	996	巧言	1002
候人	996	何人斯	1003
鸛鸣	997	巷伯	1003
下泉	997	蓼莪	1003
七月	997	大东	1003
鸛鸣	997	四月	1003
东山	997	北山	1003
破斧	997	无将大车	1003
伐柯	998	小明	1004
九罭	998	鼓钟	1004
狼跋	998	楚茨	1004
鹿鸣	998	信南山	1004
四牡	998	大田	1004
皇皇者华	998	瞻彼洛矣	1004
棠棣	998	蓂蓂者华	1004
伐木	998	桑扈	1004
天保	999	鸳鸯	1005
采芣	999	蟋蟀	1005
出车	999	车辚	1005
鱼丽	999	青蝇	1005
南有嘉鱼	999	宾之初筵	1005
南山有台	999	鱼藻	1005
蓼萧	999	采芣	1005
湛露	999	角弓	1005
彤弓	999	菀柳	1005
菁菁者莪	1000	都人士	1006
六月	1000	采芣	1006
采芣	1000	黍苗	1006
车攻	1000	隰桑	1006
吉日	1000	白华	1006
鸿雁	1000	绵蛮	1006
庭燎	1000	瓠叶	1006

渐渐之石	1006	振鹭	1012
苕之华	1007	丰年	1013
何草不黄	1007	有瞽	1013
文王	1007	潜	1013
大明	1007	雝	1013
绵	1007	载见	1013
棫朴	1007	有客	1013
旱麓	1007	武	1013
思齐	1008	闵予小子	1013
皇矣	1008	访落	1013
灵台	1008	敬之	1014
下武	1008	小毖	1014
文王有声	1008	载芟	1014
生民	1008	良耜	1014
行苇	1008	丝衣	1014
既醉	1008	酌	1014
鳧鷖	1009	桓	1014
假乐	1009	赉	1014
公刘	1009	般	1015
洞酌	1009	驹	1015
卷阿	1009	有駜	1015
民劳	1009	泮水	1015
板	1009	閼宫	1015
荡	1009	那	1015
抑	1010	烈祖	1016
桑柔	1010	玄鸟	1016
云汉	1010	长發	1016
崧高	1010	殷武	1016
烝民	1010	离骚(楚辞)	1016
韩奕	1010	九歌	1016
江汉	1011	东皇太一	1017
常武	1011	云中君	1017
瞻卬	1011	湘君	1017
召旻	1011	湘夫人	1017
清庙	1011	大司命	1017
维天之命	1011	少司命	1017
维清	1011	东君	1018
烈文	1011	河伯	1018
天作	1012	山鬼	1018
昊天有成命	1012	国殇	1018
我将	1012	礼魂	1018
时迈	1012	天问	1018
执竞	1012	九章	1019
思文	1012	惜诵	1019
臣工	1012	涉江	1019
噫嘻	1012	哀郢	1019

抽思	1019	有所思	1025
怀沙	1019	雉子斑	1026
思美人	1019	上邪(汉乐府)	1026
惜往日	1019	箜篌引	1026
橘颂	1020	公无渡河	1026
悲回风	1020	江南	1026
远游	1020	薤露(汉乐府、曹操)	1026
卜居	1020	蒿里(汉乐府、曹操)	1026
渔父	1020	鸡鸣	1027
九辩	1020	乌生八九子	1027
招魂	1020	平陵东	1027
大招	1021	陌上桑	1027
惜誓	1021	王昭君	1027
招隐士	1021	长歌行	1027
七谏	1021	鰕鮓篇	1028
哀时命	1021	短歌行(汉乐府、曹操)	1028
九怀	1021	铜雀台	1028
九叹	1021	猛虎行	1028
九思	1021	君子行	1028
垓下歌(项羽)	1021	燕歌行(汉乐府、曹丕、高适)	1029
和项王歌(姬)	1022	从军行(汉乐府、杨炯、王昌龄)	1029
四皓歌(四皓)	1022	鞠歌行	1029
大风歌(刘邦)	1022	苦寒行(曹操)	1029
鸿鹄歌	1022	豫章行	1030
戚夫人歌(戚夫人)	1022	董逃行	1030
秋风辞(刘彻)	1022	董逃歌	1030
李夫人歌(李夫人)	1023	相逢行	1030
柏梁诗(刘彻等)	1023	长安有狭斜行	1030
李延年歌(李延年)	1023	塘上行	1030
黄鹄歌(刘弗陵)	1023	秋胡行	1030
王噫歌(梁鸿)	1023	陇西行(汉乐府、陈陶)	1031
四愁诗(张衡)	1023	步出夏门行	1031
刺世疾邪诗(赵壹)	1023	西门行	1031
羽林郎(辛延年)	1024	东门行	1031
悲愤诗(蔡琰)	1024	饮马长城窟行(汉乐府、陈琳)	1031
胡笳十八拍	1024	上留田行	1032
练时日(汉乐府)	1024	妇病行	1032
象载瑜	1024	孤儿行	1032
安世房中歌	1024	野田黄雀行(曹植)	1032
思悲翁	1024	雁门太守行(汉乐府、李贺)	1032
艾如张	1025	艳歌行	1033
上之回	1025	门有车马客行	1033
战城南(汉乐府、李白)	1025	蜀道难(汉乐府、李白)	1033
巫山高	1025	白头吟	1033
将进酒(汉乐府、李白)	1025	泰山吟	1034
君马黄	1025	梁甫吟(汉乐府、谢朓、李白)	1034

怨歌行	1034	团扇郎	1040
长信怨	1034	碧玉歌	1040
玉阶怨	1034	懊侬歌	1041
白紵歌	1034	华山畿	1041
白紵舞歌诗	1035	读曲歌	1041
白紵辞	1035	春江花月夜(乐府诗、张若虚)	1041
俳歌辞	1035	玉树后庭花	1042
昭君怨	1035	黄竹子歌	1042
琴歌	1035	神弦歌	1042
凤求凰	1035	青溪小姑曲	1042
秦女休行	1035	乌夜啼	1042
伤歌行	1035	乌栖曲(乐府诗、李白)	1043
悲歌行	1035	莫愁乐	1043
缓声歌	1035	石城乐	1043
缓歌行	1035	估客乐	1043
枯鱼过河泣	1035	襄阳乐	1043
古歌	1035	三洲歌	1044
长相思	1036	采桑度	1044
行路难(汉乐府、李白)	1036	那呵滩	1044
古别离	1036	拔蒲	1044
孔雀东南飞	1036	杨叛儿	1044
步虚词	1036	江南弄	1044
上山采蘼芜	1036	采莲曲(乐府诗、王昌龄)	1044
十五从军行	1037	采菱曲	1045
淮南王歌(民歌、谣)	1037	西洲曲	1045
城中谣	1037	长干曲	1045
京都谣	1037	出塞(乐府诗、王昌龄)	1045
桓灵时童谣	1037	入塞	1045
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	1037	折杨柳歌辞	1046
行行重行行	1038	关山月(乐府诗、陆游)	1046
青青河畔草	1038	紫骝马歌辞	1046
西北有高楼	1038	紫骝马歌	1046
涉江采芙蓉	1038	紫骝马	1046
明月皎夜光	1038	梅花落	1046
迢迢牵牛星	1038	企喻歌辞	1046
回车驾言迈	1039	琅玕王歌辞	1047
客从远方来	1039	陇头流水歌辞	1047
明月何皎皎	1039	捉搦歌	1047
苏李诗	1039	折杨柳枝歌	1047
子夜歌(南北朝乐府诗)	1039	幽州马客吟歌辞	1047
子夜四时歌	1039	陇头歌辞	1047
大子夜歌	1040	木兰诗	1048
上声歌	1040	凉州词(乐府诗、王之涣)	1048
欢闻变歌	1040	竹枝词(乐府诗、刘禹锡)	1048
丁都护歌(乐府诗、李白)	1040	杨柳枝词	1048
丁督护歌	1040	吴孙皓初童谣(民歌、谣)	1049

陇上歌	104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	1056
苏小小歌	1049	长安古意(卢照邻)	1056
李波小妹歌	1049	在狱咏蝉(骆宾王)	1056
敕勒歌	1049	度大庾岭(宋之问)	1056
黄牛峡谣	1050	渡汉江	1057
三峡谣	1050	占意呈补阙乔知之(沈佺期)	1057
杂诗(孔融、曹丕、曹植、沈佺期、王夫之)	1050	代悲白头翁(刘希夷)	1057
观沧海(曹操)	1050	感遇(陈子昂、张九龄)	1057
龟虽寿	1050	登幽州台歌(陈子昂)	1057
七哀诗(王粲)	1050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	1058
赠从弟(刘桢)	1050	过故人庄	1058
名都篇(曹植)	1051	春晓	1058
美女篇	1051	宿建德江	1058
白马篇	1051	登鹳雀楼(王之涣)	1058
送应氏	1051	咏柳(贺知章)	1058
赠白马王彪	1051	回乡偶书二首	1059
七步诗	1051	终南望余雪(祖咏)	1059
咏怀诗(阮籍、庾信)	1052	古从军行(李颀)	1059
情诗(张华)	1052	次北固山下(王湾)	1059
赴洛道中作(陆机)	1052	黄鹤楼(崔颢)	1059
悼亡诗(潘岳)	1052	长信秋词五首(王昌龄)	1059
咏史(左思、龚自珍)	1052	闺怨	1060
扶风歌(刘琨)	1053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1060
游仙诗(郭璞)	1053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	1060
归园田居(陶渊明)	1053	洛阳女儿行	1060
饮酒	1053	老将行	1060
咏荆轲	1053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1060
读山海经	1053	观猎	1061
桃花源诗	1053	少年行	1061
登池上楼(谢灵运)	1054	使至塞上	1061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1054	谓川田家	1061
代出自蓟北门行(鲍照)	1054	送元二使安西	1061
拟行路难	1054	山居秋暝	1061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1054	辋川集	1062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	1054	相思	1062
山中杂诗(吴均)	1054	终南山	1062
相送(何逊)	1055	汉江临泛	1062
入若耶溪(王籍)	1055	峨嵋山月歌(李白)	1062
江津送刘光禄不及(阴铿)	1055	渡荆门送别	1063
渡河北(王褒)	1055	长干行	1063
重别周尚书(庾信)	1055	静夜思	1063
昔昔盐(薛道衡)	1055	春思	1063
人日思归	1055	子夜吴歌四首	1063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杜审言)	1055	秋浦歌十七首	1064
正月十五夜(苏味道)	1056	赠汪伦	1064
野望(王绩)	1056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1064

梦游天姥吟留别	1064	阁夜	107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1064	登高	1074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065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1075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1065	登岳阳楼	1075
把酒问月	1065	江南逢李龟年	1075
登金陵凤凰台	1065	春陵行(元结)	1075
望庐山瀑布二首	1065	贼退示官吏	1076
望天门山	1065	枫桥夜泊(张继)	1076
早发白帝城	1066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	1076
月下独酌四首	1066	闺情(李端)	1076
古风五十九首	1066	省试湘灵鼓瑟(钱起)	1076
远别离	1066	寒食(韩翃)	1077
独坐敬亭山	1067	寄全椒山中道士	1077
哭晁卿衡	1067	滁州西涧	1077
塞下曲(李白、卢纶、李益)	1067	过山农家(顾况)	1077
题破山寺后禅院(常建)	1067	游子吟	1077
封丘作(高适)	1067	城东早春(杨巨源)	1077
别董大二首	1068	李凭箜篌引(李贺)	1078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1068	梦天	1078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68	南园十三首	1078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68	金铜仙人辞汉歌	1078
逢入京使	1068	老夫采玉歌	1078
望岳(杜甫)	1068	致酒行	1078
兵车行	1068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柳宗元)	1078
前出塞九首	1069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1079
丽人行	1069	江雪	1079
后出塞五首	1069	渔翁	1079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069	山石(韩愈)	1079
月夜	1070	南山诗	1079
春望	1070	石鼓歌	1080
哀江头	1070	听颖师弹琴	1080
北征	1070	调张籍	1080
羌村三首	1071	晚春	1080
三吏三别	1071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081
石壕吏	1071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081
新婚别	1072	夜上受降城闻笛(李益)	1081
无家别	1072	野老歌(张籍)	1081
佳人	1072	秋思	1081
蜀相	1072	望夫石(王建)	1082
春夜喜雨	1072	水夫谣	108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073	十五夜望月	1082
戏为六绝句	1073	宫词一百首	108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073	遣悲怀三首(元稹)	1082
旅夜书怀	1073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1082
秋兴八首	1074	连昌宫词	1082
咏怀古迹五首	1074	离思五首	1083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1083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1091
再游玄都观	1083	无题	1091
西塞山怀古	1083	隋宫	1092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083	晚晴	1092
金陵五题	1084	嫦娥	1092
题李凝幽居(贾岛)	1084	贾生	1092
寻隐者不遇	1084	江楼感旧(赵嘏)	1093
题金陵渡(张祜)	1084	官仓鼠(曹邴)	1093
旅次朔方(刘皂)	1084	橡媪叹(皮日休)	1093
古风二首(李绅)	1085	咏田家(聂夷中)	1093
题城南庄(崔护)	1085	吴宫怀古(陆龟蒙)	1093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	1085	题菊花(黄巢)	1093
观刈麦	1085	送人游吴(杜荀鹤)	1093
秦中吟十首	1085	山中寡妇	1093
轻肥	1085	秦妇吟(韦庄)	1094
买花	1086	春怨(金昌绪)	1094
新乐府五十首	1086	村行(王禹偁)	1094
上阳白发人	1086	山园小梅(林逋)	1094
新丰折臂翁	1086	江上渔者(范仲淹)	1094
卖炭翁	1086	示张寺丞王校勘(晏殊)	1094
长恨歌	1087	陶者(梅尧臣)	1095
琵琶行	1087	汝坟贫女	1095
暮江吟	1087	东溪	1095
钱塘湖春行	1087	庆州败(苏舜卿)	1095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 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 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	1087	淮中晚泊犍头	1095
闺意献张水部(朱庆馀)	1088	柳絮(韩琦)	1096
寄扬州韩绰判官(杜牧)	1088	戏答元珍(欧阳修)	1096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1088	晚泊岳阳	1096
江南春绝句	1088	画眉鸟	1096
赤壁	1088	煮海歌(柳永)	1096
泊秦淮	1089	蚕妇(张俞)	1096
杜秋娘诗	1089	客中初夏(司马光)	1097
秋夕	1089	河北民(王安石)	1097
山行	1089	后元丰行	1097
清明	1089	登飞来峰	1097
咸阳城西楼晚眺(许浑)	1089	桃源行	1097
商山早行(温庭筠)	1090	泊船瓜洲	1098
苏武庙	1090	明妃曲	1098
安定城楼(李商隐)	1090	书湖阴先生壁	1098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1090	北陂杏花	1098
锦瑟	1090	元日	1098
乐游原	1091	梅花(王安石、陆游)	1099
夜雨寄北	1091	暑旱苦热(王令)	1099
		和子由澠池怀旧(苏轼)	1099
		王维吴道子画	1099
		游金山寺	1100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100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1108
望海楼晚景	1100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1108
吴中田妇叹	1100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108
新城道中	1100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1108
饮湖上初晴后雨	1100	沈园二首	1108
百步洪	1101	示儿	1109
东坡	1101	观书有感(朱熹)	1109
海棠	1101	湖上寓居杂咏(姜夔)	1109
题西林壁	1101	元夜(朱淑贞)	1109
赠刘景文	1101	约客(赵师秀)	1109
惠崇春江晚景	1102	题临安邸(林升)	1110
荔支叹	1102	军中乐(刘克庄)	1110
春日(秦观、朱熹)	1102	过零丁洋(文天祥)	1110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 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 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 “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黄庭 坚)	1102	正气歌	1110
登快阁	1102	湖州歌(汪元量)	1110
寄黄几复	1103	题陆放翁诗卷后(林景熙)	1111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1103	雪梅(卢梅坡)	1111
春怀示邻里(陈师道)	1103	月儿弯弯照九州(民歌)	1111
除夜对酒赠少章	1103	岐阳(元好问)	1111
怀金陵(张耒)	1104	论诗(元好问、赵翼)	1111
早发(宗泽)	1104	观梅有感(刘因)	1112
病牛(李纲)	1104	岳鄂王墓(赵孟頫)	1112
夏日绝句(李清照)	1104	挽文山丞相(虞集)	1112
襄邑道中(陈与义)	1104	上京即事(萨都刺)	1112
伤春	1104	梅花诗(王冕)	1112
汴京纪事二十首(刘子翥)	1105	庐山瀑布谣(杨维桢)	1112
池州翠微亭	1105	岳阳楼(杨基)	1113
碧瓦(范成大)	1105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高启)	1113
催租行	1105	青邱子歌	1113
横塘	1105	岳王墓	1113
州桥	1105	石灰吟(于谦)	1113
四时田园杂兴	1106	把酒对月歌(唐寅)	1113
小池(杨万里)	1106	秋望(李梦阳)	1114
闲居初夏午睡起	1106	玄明宫行(李梦阳、何景明)	1114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1106	鲋鱼(何景明)	1114
初入淮河	1106	关索庙(杨慎)	1114
游园不值(叶绍翁)	1107	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李攀龙)	1114
游山西村(陆游)	1107	登太白楼(王世贞)	1115
金错刀行	1107	居庸关(谢榛)	1115
剑门道中遇微雨	1107	宿榆林驿	1115
书愤(陆游)	1107	王元章倒枝梅画(徐渭)	1115
临安春雨初霁	1108	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	1115
		小车行(陈子龙)	1115
		辽事杂诗	1116
		渡易水	1116
		长歌(夏完淳)	1116

别云间	1116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1121
甲辰八月辞故里(张煌言)	1116	梅花岭吊史阁部(蒋士铨)	1121
凤阳花鼓(民歌)	1117	起早(袁牧)	1121
闻王歌	1117	题元遗山集(赵翼)	1122
一年(钱谦益)	1117	杂感(黄景仁)	1122
圆圆曲(吴伟业)	1117	都门秋思	1122
捉船行	1117	圈虎行	1122
海上(顾炎武)	1118	五人墓下作(舒位)	1122
精卫	1118	出嘉峪关感赋(林则徐)	1122
山居杂咏(黄宗羲)	1118	己亥杂诗(龚自珍)	1123
髯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钱澄之)	1118	夜坐	1123
海潮叹(吴嘉纪)	1118	三元里(张维屏)	1123
舟中见猎犬有感(宋琬)	1118	寰海十章(魏源)	1123
钱塘观潮(施闰章)	1119	双鸩篇(姚燮)	1124
过湖北山家	1119	哀旅顺(黄遵宪)	1124
将归,别练塘诸子(陈维崧)	1119	锡兰岛卧佛	1124
壬戌清明作(屈大均)	1119	咄咄吟(贝青乔)	1124
于忠肃墓	1119	秋登越王台(康有为)	1124
虎丘题壁(陈恭尹)	1119	出都门留别诸公	1125
水口(朱彝尊)	1120	春愁(丘逢甲)	1125
秋柳	1120	元夕无月	1125
秦淮杂诗(王士禛)	1120	狱中题壁(谭嗣同)	1125
真州绝句	1120	读陆放翁集(梁启超)	1125
江上望青山忆旧	1120	太平洋遇雨	1126
寒夜次潘岷原韵(查慎行)	1120	狱中赠邹容(章炳麟)	1126
氓入城行(赵执信)	1120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1126
江村(沈德潜)	1121	宝刀歌	1126
蒙阴(厉鹗)	1121	孤愤(柳亚子)	1126
私刑恶(郑燮)	1121	吊鉴湖秋女士	1127

诗坛掌故

一日三秋	1128	美人香草	1129
二三其德	1128	湘灵鼓瑟	1129
不稂不莠	1128	李代桃僵	1129
天作之合	1128	双鲤	1130
未雨绸缪	1128	劳燕分飞	1130
出谷迁乔	1128	瓜田李下	1130
如履薄冰	1129	人生如寄	1130
板荡	1129	秉烛夜游	1130
投桃报李	1129	诗婢	1130
桃之夭夭	1129	秋风团扇	1130
桑梓	1129	倾城倾国	1130
青蝇	1129	河梁别	1130
黍离麦秀	1129	诗妖	1130

老骥伏枥	1130	白衣苍狗	1135
黄绢幼妇	1131	今雨	1135
官渡柳	1131	风吹雨打	1135
荡气回肠	1131	冰雪聪明	1135
七步成诗	1131	别开生面	1135
傅粉何郎	1131	春树暮云	1135
秀色可餐	1131	诗王	1135
长绳系日	1131	诗史	1135
小家碧玉	1131	诗伯	1135
一吟一咏	1131	诗圣	1135
赏奇析疑	1131	稻粱谋	1135
锦字	1131	横槊赋诗	1135
柳絮才	1131	翻云覆雨	1135
一笑千金	1132	惨淡经营	1136
一枝春	1132	五言长城	1136
八斗才	1132	孤云野鹤	1136
梦吟春草	1132	八面玲珑	1136
江郎才尽	1132	人面桃花	1136
一官一集	1132	一朝权在手	1136
驴鸣犬吠	1132	对床夜雨	1136
脂粉气	1132	曾经沧海	1136
夺锦才	1132	·串珠	1137
镂月裁云	1132	大珠小珠落玉盘	1137
一家春	1132	千呼万唤	1137
天涯比邻	1133	长安居大不易	1137
曙后星孤	1133	锦绣堆	1137
柳暗花明	1133	野火春风	1137
红豆相思	1133	望眼欲穿	1137
一泻千里	1133	压倒元白	1137
诗佛	1133	二分明月	1137
一片冰心	1133	石破天惊	1137
诗天子	1133	天荒地老	1137
诗家夫子	1133	齐烟九点	1138
旗亭画壁	1133	诗鬼	1138
更上一层楼	1133	黑云压城城欲摧	1138
不如归去	1133	天香国色	1138
马耳东风	1134	司空见惯	1138
梦笔生花	1134	春梦无痕	1138
别有天地	1134	诗豪	1138
诗仙	1134	一落千丈	1138
钓鳌客	1134	斧凿痕	1138
铁杵磨针	1134	呕心沥血	1138
锦囊佳制	1134	雕肝琢肾	1139
吟风咏月	1134	蚍蜉撼树	1139
一寸丹心	1134	寸草春晖	1139
一洗凡马空	1134	急来抱佛脚	1139

春风得意	1139	诗窖子	1142
走马看花	1139	燕足系诗	1142
藕断丝连	1139	诗虎	1143
推敲	1139	千里鹅毛	1143
前程万里	1139	近水楼台	1143
碧纱笼	1139	三上	1143
山雨欲来	1139	锦上添花	1143
今朝有酒今朝醉	1139	一枕黑甜	1143
平地风波	1139	一刻千金	1143
一柱擎天	1140	七十古来稀	1143
一场春梦	1140	失笑喷饭	1143
打油诗	1140	行云流水	1143
冰魂雪魄	1140	冰壶秋月	1143
八百孤寒	1140	环肥燕瘦	1143
扫眉才子	1140	庐山真面目	1144
绿叶成阴	1140	明日黄花	1144
落花流水	1140	抹月批风	1144
一点灵犀	1140	诗奴	1144
丁香结	1140	雪泥鸿爪	1144
剪烛西窗	1140	文字禅	1144
锦瑟华年	1140	后浪催前浪	1144
枫落句	1141	一瓣香	1144
抛砖引玉	1141	击钵催诗	1144
八叉手	1141	黄花晚节	1144
红叶题诗	1141	三平二满	1144
寻诗	1141	别具只眼	1144
歇后郑五	1141	一代风骚主	1144
兔走鸟飞	1141	无地起楼台	1145
悔读南华	1141	白发青衫	1145
一字师	1141	云烟过眼	1145
诗囊	1142	打鸭惊鸳鸯	1145
闲云孤鹤	1142	生张熟魏	1145
剜肉补疮	1142	暗香疏影	1145
鱼龙混杂	1142	满城风雨	1145
郑鹧鸪	1142	诗囚	1145
百尺竿头	1142	无边风月	1145
金榜题名	1142	两袖清风	1145
诗瓢	1142	一鳞一爪	1145
诗肠鼓吹	1142	舞风病鹤	1145

诗法格律

诗体		四言诗	1147
二言诗	1147	五言诗	1148
三言诗	1147	六言诗	1148
		七言诗	1148

九言诗	1148	瑟调曲	1153
杂言诗	1148	楚调曲	1153
半五六言体	1148	大曲	1153
三五七言体	1148	吴声歌曲	1153
五七言诗	1149	西曲歌	1153
-至七字诗	1149	江南弄	1153
一三五七九言诗	1149	但歌	1154
一句诗	1149	倚歌	1154
二句诗	1149	徒歌	1154
三句诗	1149	吴歊	1154
五句诗	1149	吴趋	1154
促句体	1149	伦歌	1154
占体诗	1149	登歌	1154
往体诗	1149	升歌	1154
古风	1149	房中乐	1154
古诗	1150	安世乐	1154
乐府诗	1150	五言古诗	1154
正乐府	1150	五古	1154
新乐府	1150	七言古诗	1154
拟乐府	1150	七古	1154
系乐府	1150	杂言古诗	1154
补乐府	1150	长短句	1154
小乐府	1150	七言歌行	1155
乐府古题	1151	拟古诗	1155
往题乐府	1151	歌行	1155
新题乐府	1151	歌谣	1155
郊庙歌辞	1151	歌曲	1155
燕射歌辞	1151	谣谚	1155
鼓吹曲辞	1151	谣	1155
横吹曲辞	1151	歌	1155
相和歌辞	1151	吟	1155
清商曲辞	1151	词	1155
舞曲歌辞	1151	引	1156
琴曲歌辞	1151	咏	1156
杂曲歌辞	1151	曲	1156
近代曲辞	1152	篇	1156
杂歌谣辞	1152	唱	1156
新乐府辞	1152	弄	1156
饶歌	1152	操	1156
郊祀歌	1152	行	1156
相和曲	1152	叹	1156
吟叹曲	1152	思	1156
四弦曲	1152	怨	1156
鼓吹曲	1152	悲	1157
平调曲	1152	哀	1157
清调曲	1153	乐	1157

赋得	1157	六言律诗	1161
口号	1157	长韵律	1161
口占	1157	五言排律	1161
调	1157	五排	1161
长调	1157	七言排律	1161
短调	1157	七排	1161
章	1157	竹枝词	1161
偈	1157	竹枝子	1162
长句	1157	杨柳枝	1162
近体诗	1158	柳枝词	1162
今体诗	1158	柘枝词	1162
格律诗	1158	屈柘枝	1162
律格诗	1158	橘枝词	1162
律诗	1158	山歌	1162
格诗	1158	打枣竿	1162
绝句	1158	挂枝儿	1162
截句	1158	锁南枝	1162
断句	1158	咏史诗	1162
绝诗	1158	咏物诗	1162
古绝	1158	题画诗	1163
律绝	1159	咏怀诗	1163
五绝	1159	讽谕诗	1163
六言绝句	1159	闲适诗	1163
七绝	1159	感遇诗	1163
仄韵绝句	1159	游仙诗	1163
散体绝句	1159	招隐诗	1163
偶体绝句	1159	无题诗	1163
拗体绝句	1159	山水诗	1164
折腰绝句	1159	游览诗	1164
五律	1159	田园诗	1164
五言律诗	1160	边塞诗	1164
七律	1160	赠答诗	1164
七言律诗	1160	叙事诗	1164
古律	1160	哀挽诗	1164
变律诗	1160	闺情诗	1165
散体律诗	1160	宫怨诗	1165
俚体律诗	1160	宫词	1165
仄韵律诗	1160	吊古诗	1165
转韵律诗	1160	悼亡诗	1165
拗体律诗	1160	寓言诗	1165
六句律诗	1161	题记诗	1165
三韵律诗	1161	弃妇诗	1165
小律	1161	写景诗	1165
九言律诗	1161	抒情诗	1166
排律	1161	应制诗	1166
长律	1161	应酬诗	1166

试帖诗	1166	偷春体	1171
省题诗	1166	折腰体	1172
府试诗	1166	折句体	1172
州试诗	1166	五仄体	1172
程试诗	1166	五平体	1172
御制诗	1166	五平五仄体	1172
御览诗	1167	璇玑体	1172
女郎诗	1167	盘中诗	1172
百一诗	1167	神智体	1172
七哀诗	1167	宝塔诗	1173
四愁诗	1167	八音体	1173
七体	1167	全平全仄体	1173
骚体	1167	爱憎格	1173
选体	1167	风人体	1173
吴体	1167	卦名体	1173
变体诗	1167	数名诗	1173
诙谐体	1168	绝弦体	1173
艳体诗	1168	藏头格	1174
伪体	1168	歇后体	1174
僻体	1168	六甲体	1174
涩体	1168	六府体	1174
拗体	1168	十二属诗	1174
俗体	1168	人名体	1174
尊题格	1168	鸟名体	1174
春帖子	1169	兽名体	1174
杂体诗	1169	药名体	1175
杂诗	1169	草名体	1175
回文体	1169	树名体	1175
进退体	1169	曲名体	1175
辘轳体	1169	车名体	1175
葫芦体	1169	船名体	1175
离合体	1170	屋名体	1175
连珠体	1170	将军名体	1175
连章体	1170	宫殿名体	1175
反覆体	1170	针穴名体	1175
联句体	1170	龟兆名体	1175
分题诗	1170	相名体	1175
分韵诗	1170	星名体	1175
和韵诗	1170	州名体	1175
叠韵诗	1171	寺名体	1175
叠字诗	1171	郡县名诗	1175
半格诗	1171	道里名诗	1175
禁体	1171	字谜体	1176
建除体	1171	藁砧体	1176
蜂腰体	1171	隐语体	1176
隔句体	1171	五杂俎体	1176

两头纤纤体	1176
四声诗	1176
集句诗	1176
百衲衣体	1176
三妇艳体	1176
蝉联体	1177
连珠格	1177
吃语诗	1177
覆窠体	1177
钉铰体	1177
打油诗	1177
大言体	1177
小言体	1177
危语体	1177
了语体	1178
蛮语体	1178
首尾吟体	1178
禽言诗	1178
问答体	1178
十七字诗	1178
诸言体	1178
诸语体	1178
颠倒韵体	1178
论诗诗	1178
促句体	1178
促句换韵体	1178
孤雁入群格	1179
孤雁出群格	1179
束广就狭体	1179
形似体	1179
质气体	1179
情理体	1179
直置体	1179
雕藻体	1179
映带体	1179
飞动体	1179
婉转体	1179
清切体	1180
菁华体	1180
跌宕格	1180
凉冷诗	1180
声诗	1180

诗律

诗韵	1180
古韵	1180

今韵	1180
韵部	1180
韵目	1180
韵脚	1180
宽韵	1180
窄韵	1181
险韵	1181
僻韵	1181
尖叉韵	1181
俗韵	1181
哑韵	1181
嫌韵	1181
出韵	1181
兼韵	1181
叠韵	1181
通韵	1181
转韵	1182
通转	1182
协韵	1182
换韵	1182
押韵	1182
限韵	1182
次韵	1182
步韵	1183
和韵	1183
依韵	1183
用韵	1183
借韵	1183
趁韵	1183
分韵	1183
拈韵	1183
相韵	1183
重韵	1183
掷韵	1184
叠连韵	1184
重字韵	1184
同音韵	1184
交锁韵	1184
葫芦韵	1184
轱辘韵	1184
进退韵	1184
平水韵	1184
声律	1184
声病	1184
双声	1184
平头	1185

上尾	1185	五平五仄式	1189
蜂腰	1185	律诗失粘	1189
鹤膝	1185	绝句失粘	1189
大韵	1185	双声正格	1189
小韵	1185	双声同音通用格	1190
旁纽	1185	双声广通格	1190
正纽	1185	双声借用格	1190
四平头	1186	双声对变格	1190
平仄	1186	叠韵正格	1190
平侧	1186	叠韵三声通用格	1190
阴调	1186	叠韵借用格	1190
阳调	1186	叠韵广通格	1190
揭调	1186	叠韵对变格	1190
粘法	1186	散句不单用格	1190
粘对	1186	换头	1190
失严	1186	双换头	1191
失粘	1186	护腰	1191
粘对规律	1186	相承	1191
五绝平仄	1186	对仗	1191
七绝平仄	1186	对偶	1191
五律平仄	1187	偏枯	1191
七律平仄	1187	合掌	1191
排律平仄	1187	正对	1191
古诗平仄	1187	切对	1191
一三五不论	1187	的名对	1191
拗体	1187	正名对	1192
拗救	1187	借对	1192
拗律	1187	假对	1192
拗绝	1187	假借对	1192
五绝顺粘格	1187	扇对	1192
五绝偏格	1188	隔句对	1192
七绝顺粘格	1188	开门对	1192
七绝偏格	1188	流水对	1192
五律正格	1188	十字对	1192
五律偏格	1188	走马对	1192
七律正格	1188	就句对	1193
七律偏格	1188	当句对	1193
排律粘对	1188	句中对	1193
五古用韵	1188	句对	1193
七古用韵	1188	交错对	1193
近体诗用韵	1188	交股对	1193
孤平	1188	犄角对	1193
三平调	1189	蹉对	1193
三平式	1189	巧对	1193
三仄式	1189	奇对	1193
三字尾	1189	蜂腰对	1193

换柱对	1193	翻切	1198
四柱对	1194	浮切	1198
十四字对	1194	四声	1198
反对	1194	五音	1198
同对	1194	五声	1198
同类对	1194	七音	1198
言对	1194	声类	1198
事对	1194	声纽	1198
异类对	1194	洪音	1198
异对	1194	细音	1198
联绵对	1194	阴声	1198
连珠对	1195	阳声	1198
双声对	1195	急声	1198
叠韵对	1195	慢声	1198
双拟对	1195	曼声	1198
回文对	1195	音和	1198
互成对	1195	古音	1198
赋体对	1195	今音	1198
邻近对	1195	韵略	1198
切侧对	1195	音韵决疑	1199
俚语对	1195	韵集	1199
一声对	1196	韵海镜源	1199
合掌对	1196	声类	1199
虚实对	1196	四声类谱	1199
双虚实对	1196	四声等子	1199
双声侧对	1196	切韵	1199
叠韵侧对	1196	唐韵	1199
平对	1196	唐韵考	1199
偏对	1196	广韵	1200
字对	1196	集韵	1200
意对	1196	韵补	1200
声对	1196	音式	1200
侧对	1196	古音丛目	1200
总不对对	1197	古音略例	1200
互文对	1197	毛诗古音考	1200
混装对	1197	屈宋古音义	1200
三十六字母	1197	音学五书	1200
清浊	1197	韵补正	1200
全清	1197	古今通韵	1200
次清	1197	易韵	1200
全浊	1197	古韵通	1201
次浊	1197	古韵标准	1201
四呼	1197	古文四声韵	1201
等呼	1197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1201
等韵	1197	切韵指掌图	1201
反切	1198	切韵指南	1201

韵学源流	1201	炼句	1205
同文韵统	1201	琢句	1205
音韵阐微	1201	句法	1205
音韵述微	1201	句眼	1205
音韵日月灯	1201	诗眼	1205
诗声类	1201	活句	1205
五方元音	1201	死句	1205
声调谱	1202	下字	1206
声调谱拾遗	1202	炼字	1206
古诗平仄论	1202	字法	1206
赵秋谷所传声调谱	1202	字眼	1206
五言诗平仄举隅	1202	哑字	1206
七言诗平仄举隅	1202	响字	1206
七言诗三昧举隅	1202	活字	1206
声律发蒙	1202	用事	1206
龙文鞭影	1202	使事	1206
声律启蒙	1202	用典	1206
笠翁对韵	1202	属对	1206
佩文诗韵释要	1203	藏拙	1207
佩文韵府	1203	章法	1207
韵府拾遗	1203	篇法	1207
韵府群玉	1203	炼意	1207
五车韵瑞	1203	炼骨	1207
礼部韵略	1203	炼气	1207
平水韵	1203	炼格	1207
五音集韵	1203	炼韵	1207
诗韵全璧	1203	炼神	1207
押韵释疑	1203	妙悟	1207
韵会举要	1203	天籁	1207
中原音韵	1204	白战	1208
洪武正韵	1204	跳脱	1208
词林正韵	1204	警策	1208
		活法	1208
		避俗	1208
		避熟	1208
		倒插法	1208
		反接法	1208
		转接法	1208
		突接法	1208
		倒装法	1208
		逆挽法	1208
		呼应法	1209
		翻案法	1209
		代字法	1209
		点染法	1209
		烘托法	1209
诗法			
诗法	1204		
相题	1204		
择题	1204		
着题	1204		
切题	1204		
布局	1204		
命意	1204		
炼局	1204		
择韵	1205		
着色	1205		
造语	1205		
命题	1205		

遮表法	1209	转意	1213
折句法	1209	互文	1213
相因法	1209	互体	1214
收束法	1209	诗思	1214
错叙法	1209	诗趣	1214
提顿法	1209	诗品	1214
掉字法	1210	诗馥	1214
关锁法	1210	诗囚	1214
透过一层法	1210	诗魔	1214
加一倍写法	1210	诗佣	1214
夺胎换骨法	1210	诗瓢	1214
点铁成金法	1210	诗筒	1215
借叶衬花法	1210	诗牌	1215
铢两轻重法	1210	创体	1215
下句抱上句法	1210	创格	1215
后二句续前二句法	1210	重韵	1215
明暗呼应法	1211	重调	1215
藏头歇后法	1211	头巾气	1215
增字法	1211	酸馅气	1215
倒押法	1211	脂粉气	1216
偷法	1211	铅粉气	1216
点化	1211	台阁气	1216
比喻	1211	富贵气	1216
借喻	1211	山林气	1216
博喻	1212	蔬笋气	1216
纤小	1212	二要	1216
开合	1212	二废	1216
起承转合	1212	三要	1216
起句	1212	三多	1216
发端	1212	三字	1216
结句	1212	三难	1216
尾句	1212	三偷	1216
落句	1212	三节	1216
起联	1212	三格	1216
首联	1212	四深	1217
破题	1213	四离	1217
颌联	1213	四格	1217
颈联	1213	四难	1217
腹联	1213	四种高妙	1217
尾联	1213	五忌	1217
笔法	1213	五俗	1217
接笔	1213	五格	1217
转笔	1213	六至	1217
刚笔	1213	六迷	1217
柔笔	1213	七得	1217
蹈袭	1213	十体	1217

十势	1217	曲尽其妙	1221
十七势	1218	同工异曲	1221
一片宫商	1218	因小见大	1221
一代风流	1218	因难见巧	1221
一字连城	1218	行云流水	1221
一字千金	1218	字字珠玑	1221
一倡三叹	1218	字里行间	1221
一斗百篇	1218	寻章摘句	1221
一吟一咏	1218	如椽大笔	1221
一觞一咏	1218	运斤成风	1221
一鳞半甲	1218	邯郸学步	1221
入木三分	1218	别开生面	1221
力透纸背	1218	别具只眼	1221
下里巴人	1218	别开蹊径	1221
下笔成章	1218	含英咀华	1222
大醇小疵	1219	字挟风霜	1222
马工枚速	1219	言之成理	1222
天衣无缝	1219	言为心声	1222
开门见山	1219	言近旨远	1222
不落窠臼	1219	沉着痛快	1222
不主故常	1219	穷而后工	1222
不留一字	1219	穷形尽相	1222
不烦绳削	1219	陈言务去	1222
不赞一辞	1219	画龙点睛	1222
飞文染翰	1219	奇文共赏	1222
无理而妙	1219	拖泥带水	1222
云谲波诡	1219	呼之欲出	1222
尺水兴波	1219	知人论世	1222
尺幅万里	1219	依样葫芦	1222
文不加点	1219	金声玉振	1222
文从字顺	1220	金针度人	1222
气盛言宜	1220	波澜老成	1222
引商刻羽	1220	诗中有画	1223
石破天惊	1220	诗家三昧	1223
可泣鬼神	1220	披沙简金	1223
探骊得珠	1220	斫轮老手	1223
浑然天成	1220	挂一漏万	1223
自成一家	1220	信手拈来	1223
自出机杼	1220	钩章棘句	1223
片言居要	1220	金鹄擎海	1223
巧夺天工	1220	神施鬼设	1223
生吞活剥	1220	点铁成金	1223
生花妙笔	1220	点金成铁	1223
出水芙蓉	1220	香象渡河	1223
夸多斗靡	1221	绘声绘色	1223
曲高和寡	1221	浮光掠影	1223

笔力扛鼎	1223	触景生情	1225
笔扫千军	1223	隔靴搔痒	1225
笔参造化	1223	缠绵悱恻	1225
流自肺腑	1223	源头活水	1225
倚马可待	1224	模山范水	1225
堆垛死尸	1224	镂月裁云	1225
移宫换羽	1224	错彩镂金	1225
得心应手	1224	铺锦列绣	1225
盘马弯弓	1224	敲金戛石	1225
着盐水中	1224	擘肌分理	1225
羚羊挂角	1224	草蛇灰线	1225
粘皮着骨	1224	剿说雷同	1225
举步换形	1224	弹丸脱手	1225
情文相生	1224	随物赋形	1225
情见乎辞	1224	斧凿痕迹	1225
情景相生	1224	嬉笑怒骂	1226
惨淡经营	1224	沉思翰藻	1226
游刃有馀	1224	兔起鹘落	1226
想落天外	1225	纡馀委曲	1226

诗学研究

诗序	1227	毛诗稽古编	1236
毛诗故训传	1227	诗经传说汇纂	1236
毛诗传笺	1228	诗藩	1237
诗谱	1228	诗切	1237
毛诗王氏注	1229	读风偶识	1237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1229	毛诗后笺	1238
毛诗正义	1229	毛诗传笺通释	1238
毛诗指说	1230	诗毛氏传疏	1238
诗本义	1230	诗古微	1238
诗辨妄	1231	诗经原始	1239
诗论	1231	诗三家义集疏	1239
诗总闻	1232	诗经形释	1240
诗集传	1232	诗义会通	1240
诗序辨说	1233	诗经通解	1240
非诗辨妄	1233	白屋说诗	1241
吕氏家塾读诗记	1233	风诗类钞	1241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1234	诗经通义	1241
诗缉	1234	诗经新义	1241
诗疑	1234	三百篇演论	1242
诗缙绪	1234	诗经学	1242
毛诗古音考	1235	诗经研究	1242
田间诗学	1235	诗经学纂要	1242
诗绎	1235	诗经学新论	1242
诗经通论	1236	诗经之女性的研究	1243

诗经音释	1243	楚辞笺注	1253
诗乐论	1243	楚辞屈诂	1253
读诗札记	1243	楚辞通释	1253
毛诗郑笺平议	1243	楚辞灯	1254
诗疏平议	1244	山带阁注楚辞	1254
诗三百篇探故	1244	离骚汇订	1254
诗经六论	1244	屈子杂文笺略	1254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1244	屈原赋注	1254
泽螺居诗经新证	1245	屈子章句	1255
诗经研究史概要	1245	楚辞韵读	1255
诗经语言艺术	1245	屈骚指掌	1255
诗经韵读	1245	楚辞释	1255
诗经语言研究	1245	屈赋微	1255
诗经古今音手册	1246	楚辞	1256
诗经选	1246	屈原赋校注	1256
诗经今注	1246	离骚集释	1256
诗经试译	1247	楚辞校补	1256
国风选译	1247	天问疏证	1256
雅颂选译	1247	天问释天	1256
诗经直解	1247	离骚解诂	1257
诗经译注	1248	九歌解诂	1257
诗经注析	1248	九章解诂	1257
诗经全译	1248	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跋	1257
诗经译注	1249	屈原赋今译	1257
诗经国风今译	1249	屈原离骚今译	1257
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	1249	屈原九歌今译	1257
诗经研究反思	1249	屈原九章今译	1257
诗三百精义述要	1249	屈原赋选	1257
诗经研究新编	1249	屈原赋证辨	1258
诗经解说	1249	楚辞选	1258
诗经述论	1250	屈赋通笺	1258
诗经	1250	屈赋新编	1258
诗经研究论文集	1250	楚辞新注	1259
诗经鉴赏集	1250	离骚纂义	1259
诗经词典	1250	离骚发微	1259
毛诗引得	1251	离骚笺疏	1259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1251	天问纂义	1259
诗经索引	1251	屈赋音注译解	1260
韩诗外传集释	1251	天问新注	1260
楚辞章句	1252	屈原赋译注	1260
楚辞音残卷	1252	楚辞注释	1260
楚辞补注	1252	楚辞讲读	1260
楚辞集注	1252	宋玉辞赋译解	1260
楚辞集解	1253	楚辞直解	1261
屈宋古音义	1253	楚辞鉴赏集	1261
楚辞听直	1253	楚辞讲义	1261

屈原	1261	古诗笺	1270
楚词新论	1261	古诗赏析	1270
楚辞之研究	1262	诗比兴笺	1270
楚辞概论	1262	八代诗选	1270
宋玉	1262	古诗歌笺释三种	1271
读骚论微初集	1262	古诗十九首集释	1271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1262	汉魏六朝诗选	1271
楚辞作于汉代考	1263	古诗十九首初探	1271
楚辞地理考	1263	古诗今选	1271
屈原研究	1263	诗纪匡谬	1272
屈原与楚辞	1263	中国中古文学史	1272
楚辞研究论文集	1264	古诗十九首研究	1272
楚辞解诂	1264	汉魏六朝文学	1272
楚辞今绎讲录	1264	魏晋诗歌概论	1272
楚辞韵读	1264	古诗论	1273
楚辞论文集	1264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1273
先秦辞赋原论	1264	中古文学史论	1273
天问论笺	1265	汉魏六朝诗论丛	1273
屈赋新探	1265	古代文学杂论	1274
楚辞要籍解题	1265	读诗三札记	1274
楚辞学论文集	1265	胡茄十八拍讨论集	1274
楚辞选注及考证	1265	古诗初探	1274
楚辞研究论文选	1265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1275
楚辞评论资料选	1266	汉诗研究	1275
楚辞资料海外编	1266	古诗考索	1275
九歌新考	1266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1276
楚辞研究集成	1266	建安文学研究文集	1276
楚辞与神话	1266	古诗别解	1276
楚辞类稿	1267	中古文学系年	1277
天问研究	1267	建安文学编年史	1277
《九歌》与沅湘民俗	1267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1277
楚辞文化	1267	中国中古诗歌史	1277
屈原论稿	1267	八代诗史	1277
东方诗魂	1267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	1278
楚辞书录	1268	张衡诗文集校注	1278
楚辞书目五种	1268	曹操集译注	1278
玉台新咏笺注	1268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1278
六朝声偶集	1268	曹魏父子诗选	1278
古诗镜	1268	三曹诗选	1278
古诗归	1269	三曹诗译释	1279
古诗解	1269	三曹年谱	1279
古诗评选	1269	建安七子年谱	1279
采菽堂古诗选	1269	三曹资料汇编	1279
汉诗音注 汉诗评	1269	王粲集注	1279
汉诗说	1269	王粲行年考	1280
汉诗统笺	1270	曹集铨评	1280

曹集考异	1280	乐府诗研究论文集	1293
曹子建诗注	1281	乐府散论	1293
曹植集校注	1281	李善注文选	1293
曹植新探	1281	六臣注文选	1294
魏陈思王年谱	1281	古钞无注本文选	1294
曹子建年谱	1281	义门读书记·文选	1294
阮籍集校注	1282	文选音义	1295
阮步兵咏怀诗注	1282	文选理学权舆	1295
嵇康集校注	1282	文选考异	1295
陆士衡诗注	1283	文选笔记	1295
陆平原年谱	1283	选学胶言	1296
谢康乐诗注	1283	文选考异	1296
谢灵运集校注	1283	文选集释	1296
谢灵运诗选	1284	文选旁证	1296
颜延之年谱	1284	昭明文选笺证	1297
鲍参军附令晖诗注	1284	选学拾沉	1297
鲍参军诗注	1284	文选李注义疏	1297
鲍参军集注	1285	文选平点	1297
鲍照年谱	1285	文选学	1298
鲍照年表	1285	文选导读	1298
沈休文诗注	1285	陶靖节诗注	1298
江文通集汇注	1286	笺注陶渊明集	1299
江淹年谱	1286	陶靖节集	1299
谢宣城诗注	1286	陶诗析义	1300
何水部诗注	1286	笺注陶渊明集	1300
徐孝穆集笺注	1287	陶渊明诗集	1300
庾子山集注	1287	陶诗汇注	1300
庾开府集笺注	1287	陶诗汇评	1301
庾子山年谱	1288	靖节先生集集注	1301
乐府古题要解	1288	陶靖节诗笺定本	1301
乐府诗集	1288	陶渊明诗笺注	1302
古乐府	1289	陶渊明集	1302
古乐苑	1289	陶渊明集	1302
乐府广序	1289	陶渊明诗文校笺	1303
乐府正义	1290	陶渊明集校注	1303
汉铙歌释文笺正	1290	栗里谱	1303
汉魏乐府风笺	1290	陶靖节先生年谱	1304
乐府通论	1290	柳村谱陶	1304
乐府诗笺	1291	晋陶靖节年谱	1305
乐府占辞考	1291	靖节先生年谱考异	1305
乐府文学史	1291	晋陶徵士年谱	1305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1291	陶渊明年谱	1305
乐府诗选	1292	陶靖节年谱	1306
六朝乐府与民歌	1292	陶渊明年谱	1306
乐府诗论丛	1292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1306
乐府诗史	1293	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1306

陶渊明年谱	1307	试帖纂注	1318
陶渊明年谱	1307	唐诗笺注	1318
陶渊明	1307	全唐试律类笺	1318
陶集考辨	1307	唐诗笺要	1318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1308	读雪山房唐诗钞	1318
陶渊明批评	1308	唐贤三昧集笺注	1318
陶渊明传论	1308	唐诗合选详解	1318
陶渊明讨论集	1309	唐诗三百首	1318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1309	才调集补注	1319
陶渊明诗文汇评	1309	批唐贤三昧集笺注	1319
陶渊明论稿	1309	唐贤三昧集评	1319
陶渊明论集	1310	唐诗二百首注疏	1319
陶渊明探稿	1310	唐诗三百首补注	1319
陶渊明新论	1310	唐诗大系	1319
三体唐诗	1310	闻一多选唐诗	1320
风雅翼	1311	千首唐人绝句	1320
唐音	1311	唐诗选	1320
唐诗鼓吹	1311	唐诗选	1320
唐诗品汇	1312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1320
唐雅	1312	唐女诗人集三种	1320
唐诗类苑	1313	唐诗三百首新编	1321
唐诗选	1313	瀛奎律髓汇评	1321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1314	唐宋诗举要	1321
唐诗解	1314	唐才子传	1321
唐诗近体集韵	1314	唐才子传校笺	1322
唐诗镜	1314	唐才子传校正	1322
唐诗归	1314	唐诗研究	1322
唐诗韵汇	1315	唐代文学	1323
二冯先生评点才调集	1315	唐诗概论	1323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1315	唐代诗学	1323
唐诗英华	1315	唐诗杂论	1323
唐诗快	1316	读全唐诗札记	1323
唐诗善鸣集	1316	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	1323
唐音审体	1316	唐代诗歌	1324
而庵说唐诗	1316	唐诗研究论文集	1324
唐诗评选	1317	唐史馀洵	1324
唐诗体经	1317	唐诗小札	1324
中晚唐叩弹集	1317	唐代诗人丛考	1325
才调集笺注	1317	唐诗人行年考	1325
寒瘦集	1317	唐代文学研究	1325
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	1317	唐诗论文集	1325
唐诗贯珠	1317	唐诗通论	1326
大历诗略	1317	晚照楼论文集	1326
唐人省试诗笺	1317	蜗叟杂稿	1326
唐省试诗笺注	1318	唐声诗	1326
唐诗律笺	1318	柿叶楼存稿	1326

唐宋诗之争概述	1327	李诗选注	1337
唐宋文学论集	1327	李杜诗选	1337
唐音质疑录	1327	李杜二家诗钞评林	1337
唐诗百话	1327	李诗通	1338
唐诗丛考	1327	李太白诗集注	1338
唐诗综论	1328	李白集校注	1338
唐绝句史	1328	李杜诗选	1339
唐诗美学论稿	1328	李白诗选	1339
唐诗学引论	1328	李白诗选	1339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	1329	李白选集	1339
唐音佛教辨思录	1329	李太白年谱	1339
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	1329	李太白年谱	1339
唐诗答客难	1329	李白诗文系年	1340
唐诗语言研究	1330	李白杜甫年表	1340
唐诗赏论	1330	李白年谱	1340
唐诗艺术技巧	1330	李诗辨疑	1340
河岳英灵集研究	1330	李杜研究	1340
大历诗风	1330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340
王绩诗注	1331	诗人李白	1340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1331	李白诗论丛	1341
王梵志诗校辑	1331	李白诗论及其他	1341
王梵志诗校注	1331	李白研究	1341
骆临海集笺注	1332	李白研究论文集	1341
骆宾王评传	1332	李白与杜甫	1341
卢照邻集编年笺注	1332	李杜论略	1341
王子安集注	1332	增订李太白年谱	1342
王勃诗解	1333	李白十论	1342
初唐四杰年谱	1333	李白丛考	1342
杜审言诗注	1333	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	1342
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	1333	李白诗新笺	1342
陈子昂诗注	1333	李白和他的诗歌	1342
陈子昂年谱	1334	李白论	1343
陈子昂评传	1334	李白研究	1343
陈子昂研究	1334	李白研究论丛	1343
张说年谱	1334	新刊校订集注杜诗	1343
崔颢崔国辅诗注	1334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1344
孟浩然诗集校注	1335	杜工部草堂诗笺	1344
孟浩然诗集校注	1335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	1345
王昌龄诗注	1335	杜工部诗通	1345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1335	杜律单注	1345
王右丞集笺注	1336	笺杜陵诗	1345
右丞年谱	1336	杜诗通	1346
岑参集校注	1336	杜工部集	1346
岑嘉州系年考证	1336	杜工部诗集辑注	1346
岑诗系年	1337	贯华堂评选杜诗	1347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	1337	唱经堂杜诗解	1347

辟疆园杜诗注解	1347	杜诗言志	1356
杜工部七言律诗注	1347	初白庵诗评	1356
杜诗提要	1348	读杜诗说	1356
杜诗阐	1348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	1356
杜诗说	1348	读杜韩笔记	1357
杜少陵集详注	1348	读杜札记	1357
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	1349	杜甫诗论	1357
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	1349	杜诗析疑	1357
杜诗直解	1349	杜甫研究	1357
读杜心解	1349	杜甫研究论文集	1357
杜诗偶评	1350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	1357
杜诗镜铨	1350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1358
杜诗集评	1350	杜诗注解商榷	1358
杜工部集	1350	杜诗杂说	1358
杜诗选	1351	杜诗论稿	1358
杜甫诗选	1351	杜诗论丛	1358
杜诗散绎	1351	杜甫古诗韵读	1358
杜甫诗选注	1351	杜诗别解	1358
杜甫草堂诗注	1351	杜集书录	1359
杜甫选集	1351	杜诗引得	1359
杜工部年谱	1351	张继诗注	1359
重编杜工部年谱	1352	元结诗解	1359
杜工部草堂诗年谱	1352	戴叔伦诗集校注	1359
杜工部诗年谱	1352	戎昱诗注	1360
杜甫年谱辨疑	1352	卢纶诗集校注	1360
重定杜子年谱诗史目录	1352	李益诗注	1360
杜工部年谱	1352	孟东野诗集	1360
少陵先生年谱	1353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1360
杜工部年谱	1353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1361
杜工部编年诗史谱目	1353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1361
知本堂读杜诗目录	1353	昌黎先生诗集注	1361
杜工部年谱	1353	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	1361
少陵编年诗目谱	1353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362
杜工部年谱	1353	韩愈诗选	1362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1353	韩集校注	1362
杜甫年谱	1353	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1362
杜甫传	1354	韩文公年谱	1362
杜甫叙论	1354	韩子年谱	1363
杜甫评传	1354	韩文年表	1363
杜甫评传	1354	昌黎先生年谱	1363
杜诗笺	1354	昌黎先生诗文年谱	1363
诸家老杜诗评	1354	昌黎先生年谱	1363
杜诗学	1355	韩愈诗文系年辨证	1363
杜诗攷	1355	韩愈志	1363
读杜寄卢小笺	1355	韩诗论稿	1364
杜臆	1355	韩愈述评	1364

韩愈资料汇编	1364	温飞卿诗集笺注	1374
薛涛诗笺	1364	温飞卿系年	1374
玉川子诗集注	1364	樊川诗集注	1374
刘禹锡传论	1365	杜牧年谱	1374
白香山诗集	1365	杜牧传	1375
白居易集笺校	1365	杜牧评传	1375
元白诗选	1365	赵嘏诗注	1375
白居易诗译析	1366	玉溪生诗笺	1375
白居易诗选	1366	李义山诗集笺注	1375
白香山年谱旧本	1366	玉溪生诗意	1376
白香山年谱	1366	李义山诗集笺注	1376
白居易年谱	1366	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	1376
白居易家谱	1366	玉谿生诗笺注	1376
白居易评传	1367	玉谿生诗说	1377
白居易研究	1367	选玉谿生诗补说	1377
白居易传论	1367	李义山诗集辑评	1377
白居易传	1367	李义山诗辨正	1378
白居易评传	1367	李商隐诗集疏注	1378
元白诗笺证稿	1367	玉谿生诗醇	1378
《长恨歌》笺说稿	1368	李商隐诗歌集解	1378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	1368	李商隐诗选	1379
李绅诗注	1368	李商隐诗选注	1379
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	1368	李商隐选集	1379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	1369	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	1379
唐柳河东集	1369	李义山诗谱	1380
柳宗元诗笺释	1369	重订李义山年谱	1380
柳先生年谱	1369	玉谿生年谱	1380
柳宗元年谱	1370	玉谿生年谱订误	1380
柳宗元传论	1370	玉谿生年谱会笺	1380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	1370	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1380
长江集新校	1370	李商隐年表	1381
贾岛年谱	1370	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1381
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	1370	李商隐评传	1381
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	1371	李商隐诗传	1381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1371	李商隐传	1381
李长吉歌诗注	1371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1382
协律钩元	1371	李商隐研究	1382
李贺诗集	1372	李群玉诗集	1382
李贺诗校笺证异	1372	曹邴诗注	1382
李贺哑谜诗歌新编	1372	于濂诗注	1382
李贺年谱	1372	韦庄《秦妇吟》校笺	1382
李贺年谱会笺	1373	秦妇吟研究汇录	1383
李长吉评传	1373	韦端己年谱	1383
诗人李贺	1373	郑谷诗集笺注	1383
李长吉歌诗研究	1373	唐集叙录	1383
李贺研究资料	1373	唐诗书录	1384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1384	东坡纪年录	1395
全唐诗人名考	1384	东坡先生年谱	1395
唐人行第录	1384	东坡先生年表	1395
全唐诗作者索引	1384	苏文忠公年谱合注	1395
全唐诗典故辞典	1385	苏诗编年总案	1395
全唐诗重篇索引	1385	苏轼评传	1396
万首唐人绝句索引	1385	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1396
李贺诗索引	1385	东坡诗论从	1396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1385	东坡研究论丛	1396
西崑酬唱集	1385	苏轼诗研究	1397
西崑酬唱集注	1386	山谷内集注	1397
西崑酬唱集笺注	1386	山谷外集诗注	1397
宋诗选注	1386	山谷别集诗注	1398
宋五家诗钞	1386	黄庭坚诗选	1398
千首宋人绝句校注	1387	黄庭坚诗选	1398
宋诗三百首	1387	山谷年谱	1398
宋人绝句选	1387	山谷先生年谱	1399
宋诗研究	1387	黄文节公年谱	1399
宋诗派别论	1387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1399
宋诗散论	1388	后山诗注	1399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1388	后山诗补笺	1400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1388	后山诗注目录年谱	1400
梅尧臣传	1388	李清照集校注	1400
欧阳修诗选	1389	漱玉集注	1400
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1389	简斋诗集笺注	1401
欧阳文忠公年谱	1389	简斋先生年谱	1401
苏舜钦年谱	1389	陈简斋年谱	1401
文同诗选	1390	陈与义年谱	1401
石室先生年谱	1390	杨万里选集	1402
王荆文公诗笺注	1390	范石湖诗集注	1402
王荆国文公年谱	1390	范成大诗选	1402
王荆公年谱考略	1390	范成大年谱	1403
王安石年谱	1391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	1403
苏东坡诗集注	1391	剑南诗稿校注	1403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1391	放翁诗选	1403
施注苏诗	1391	陆游年谱	1404
苏诗补注	1392	陆游传论	1404
苏诗补注	1392	陆游传	1404
苏文忠公诗合注	1392	陆游研究	1404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1393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	1404
苏诗查注补正	1393	文成朱先生感兴诗	1405
苏轼诗集	1393	宋文公武夷棹歌	1405
和陶合笺	1394	朱淑真集注	1405
苏轼诗选	1394	辛稼轩年谱	1405
苏轼选集	1394	陈龙川年谱	1406
苏轼选集	1394	陈龙川传	1406

姜白石诗集笺注	1406	清名家诗钞小传	1416
白石道人年谱	1407	清代诗人艺谈录	1416
姜白石系年	1407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二辑)	1416
文天祥诗选	1407	明清诗文论文集	1416
谢皋羽年谱	1407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1416
宋诗纪事著者引得	1407	初学集诗注	1417
宋辽金诗选注	1407	有学集诗注	1417
元诗三百首	1408	牧斋先生年谱	1417
元遗山诗集笺注	1408	钱牧斋先生年谱	1417
元好问诗选	1408	钱牧斋先生年谱	1417
元遗山先生年谱	1408	傅山诗文选注	1417
元遗山先生年谱	1409	傅青主先生年谱略	1417
元遗山先生年谱	1409	傅青主先生年谱	1418
广元遗山年谱	1409	傅青主先生年谱	1418
元遗山年谱汇纂	1409	吴梅村诗集笺校	1418
虞文靖公年谱	1409	吴梅村诗补笺	1418
铁崖古乐府注	1409	梅村先生年谱	1418
铁崖咏史诗注	1409	吴梅村年谱	1418
铁崖逸编注	1410	吴梅村年谱	1419
王冕诗选	1410	顾亭林诗集汇注	1419
萨都刺诗选	1410	顾亭林先生年谱	1419
明诗评选	1410	顾亭林先生年谱	1419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辑)	1410	顾亭林先生年谱	1419
高青邱诗集注	1411	顾亭林先生诗谱	1420
高启诗选	1411	龚芝麓年谱	1420
青邱高先生年谱	1411	柳如是别传	1420
明李文正公年谱	1411	吴嘉纪诗笺校	1420
于谦诗选	1411	吴嘉纪年谱	1420
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	1411	悔庵年谱	1421
唐伯虎诗选	1412	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	1421
杨慎诗选	1412	王船山先生年谱	1421
杨文宪公年谱	1412	王船山公年谱	1421
吴承恩年谱	1412	船山先生年谱	1421
徐文长自著畸谱	1412	船山年表	1421
袁中郎	1412	吕留良诗选	1421
袁宏道集笺校	1413	曝书亭诗录笺注	1422
三袁诗文选注	1413	曝书亭集诗注	1422
陈子龙及其时代	1413	朱彝尊诗词选注	1422
夏完淳集笺校	1413	朱竹垞先生年谱	1422
清诗选	1414	漫堂年谱	1422
清诗选	1414	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	1422
清诗精华录	1414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	1423
千首清人绝句	1414	王渔洋诗文选注	1423
岭南三家诗选	1415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	1423
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	1415	渔洋山人年谱	1423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1415	聊斋诗词选	1423

康熙诗选	1423	林则徐诗集	1432
纳兰成德诗集、诗论笺注	1424	林则徐年谱	1432
间邱先生自订年谱	1424	龚自珍诗选	1432
沈归愚自订年谱	1424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1433
厉樊榭先生年谱	1424	龚自珍诗选	1433
厉樊榭年谱	1424	定盦先生年谱	1433
板桥诗词撷英	1424	定盦先生年谱外纪	1433
郑板桥年表	1425	龚自珍年谱	1433
吴敬梓年谱	1425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1434
袁枚诗选	1425	龚定盦研究	1434
随园先生年谱	1425	龚自珍综论	1434
袁枚年谱	1425	龚自珍研究	1434
随园诗说的研究	1425	魏源诗文选注	1435
读随园诗话札记	1425	魏源诗文系年	1435
赵翼诗选	1426	魏源师友记	1435
瓯北先生年谱	1426	郑献甫诗选注	1435
容甫先生年谱	1426	郑子尹年谱	1435
黎简诗选	1426	郑珍评传	1435
黄仲则诗选	1426	莫友芝评传	1436
黄景仁诗词选	1426	人境庐诗草笺注	1436
黄仲则先生年谱	1427	黄公度先生诗笺	1436
黄仲则年谱	1427	黄遵宪诗选	1437
黄仲则研究资料	1427	黄公度先生年谱	1437
船山诗选	1427	铁云诗存	1437
宋湘诗选	1427	康有为诗文选	1437
近代诗选	1428	康有为诗文选	1438
近代六十家诗选	1428	康南海自编年谱	1438
近代诗举要	1428	丘逢甲诗选	1438
近代爱国诗选	1428	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1438
近代爱国诗词选	1429	黄节诗选	1438
辛亥革命诗词选	1429	秋瑾诗文选	1439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诗歌卷	1429	秋瑾诗词注释	1439
南社纪略	1429	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	1439
南社丛谈	1429	秋瑾事迹研究	1439
南社	1430	秋瑾研究资料	1439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 文卷	1430	秋瑾文学论稿	1440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诗文 卷	1430	王国维诗词笺校	1440
近代文学史料	1430	苏曼殊诗笺注	1440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	1431	燕子龢诗笺注	1440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	1431	苏曼殊诗集	1441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	1431	苏曼殊文集	1441
晚清诗界革命论	1431	马君武诗注	1441
台湾近代文学丛稿	1432	柳亚子年谱	1441
张维屏诗文选	1432	诗论	1442
		论诗	1442
		诗言志辨	1442

诗境浅说	1442	金明馆丛稿初编	1449
中国诗学大纲	1442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1449
诗赋词曲概论	1442	顾随文集	1449
中国诗论	1443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	1449
中国韵文通论	1443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1449
中国诗词概论	1443	论诗词曲杂著	1449
诗法通微	1443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民族诗歌论集	1443	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民族诗歌续论	1443	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	1450
谈艺录	1443	罗音室学术论著	1450
旧文四篇	1443	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七缀集	1443	顾学颢文学论集	1450
管锥编	1444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	1451
诗词例话	1444	诗词札丛	1451
诗歌欣赏	1444	文史探微	1451
诗词论析	1444	五大诗人评述	1451
诗词论析(续集)	1445	钟嵘诗品校释	1451
诗学广论	1445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1451
诗词散论	1445	诗式校注	1451
迦陵论诗丛稿	1445	诗式校注	1452
异体诗浅说	1445	司空图诗品解说	1452
诗缘情辨	1445	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	1452
意境纵横谈	1445	沧浪诗话校释	1452
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	1446	薑斋诗话笺注	1453
十二象	1446	诗问四种	1453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1446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	1453
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	1446	袁枚续诗品详注	1453
诗史	1446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	1453
诗歌史	1446	编珠 续编珠	1453
中国诗史	1446	北堂书钞	1454
中国诗歌发展讲话	1446	艺文类聚	1454
中国诗歌发展史略	1446	初学记	1454
中国诗歌简史	1447	白孔六帖	1454
中国诗歌史论	1447	事类赋	1454
中国诗歌史	1447	诗律武库	1454
中国诗歌漫笔	1447	锦绣万花谷	1454
梦苕龢专著二种	1447	韵府群玉	1455
绝句衍义笺注	1447	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	1455
笠翁对韵新注	1447	诗学汇选	1455
论诗绝句	1448	韵学渊海	1455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	1448	韵粹	1455
历代诗话论作家	1448	分类字锦	1455
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	1448	渊鉴类函	1455
汪辟疆文集	1448	骈字类编	1455
胡小石论文集	1448	佩文韵府	1456
寒柳堂集	1449	诗词曲语辞汇释	1456

诗词曲语辞例释(增订本)	1456	管锥编、谈艺录索引	1457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1457	中国旧诗佳句韵编	1457

海外及港台研究

中国古诗在日本	1458	史诗研究	1475
中国古诗在西方	1459	语音学研究	1475
中国古诗在俄苏	1460	中诗句法研究	1476
中印诗缘	1461	非连续诗学	1476
中韩诗缘	1462	意象研究	1477
中越诗缘	1462	意象统计法	1477
中缅诗缘	1462	新批评研究	1478
中泰诗缘	1463	歧义说	1478
中伊诗缘	1463	悖论说	1478
中国古诗与《怀风藻》	1463	悖论诗学	1479
中国古诗与“敕撰三集”	1463	反讽说	1479
和汉朗咏集	1463	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	1479
中国古诗与五山文学	1463	《诗经》里的套语	1480
中国古诗与芭蕉、芜村	1464	《诗经》里的套式	1480
中华风与西方诗坛	1464	巴罗克风格研究	1480
中国古诗与托马斯·珀西	1464	原型批评	1481
中国古诗与威廉·琼斯	1464	结构主义研究	1481
中国古诗与歌德	1465	诗之时空辨析	1482
中国古诗与戈氏父女	1465	诗境记	1483
苏黄诗与朝鲜汉诗	1465	补闲集、续补闲集	1483
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	1466	淡窗诗话	1483
《诗经》研究在国外	1466	汉文诗解	1483
读《诗》十六法	1467	诗经(德译)	1483
《楚辞》研究在国外	1467	唐诗(法译)	1483
汉代诗歌研究在国外	1467	玉书	1483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在国外	1468	诗经(英译)	1483
唐诗研究在国外	1468	中诗英译	1483
李白研究在国外	1469	中国诗歌的全盛期	1484
杜甫研究在国外	1470	汉字作为诗歌媒介	1484
白居易研究在国外	1470	神州集	1484
宋诗研究在国外	1470	汉诗百七十首	1484
苏轼、黄庭坚研究在国外	1471	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	1484
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	1471	松花笺	1484
袁枚研究在国外	1471	诗经研究	1484
新加坡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1471	玉山	1484
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	1472	英译中国歌诗选	1484
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	1472	中国文学选萃	1484
中国古典诗论在俄苏	1473	诗经注释	1484
比较诗学	1474	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	1485
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	1474	文赋(英译)	1485
西方神学观与《诗经》	1474	杜甫	1485

宋诗概说	1485	浣纱集	1488
林和靖	1485	语言·悖论·诗学	1488
《诗经》诸篇形成之研究	1485	诗人沈约	1489
文心雕龙(英译)	1485	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理论	1489
楚辞:南方的歌	1485	自然和自我:苏东坡诗歌与华尔华滋诗歌的比 较研究	1489
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其时代	1485	寒山诗全译	1489
楚辞研究	1485	东坡之路:苏轼诗歌表达的发展	1489
中国诗艺	1485	王维诗	1489
沧浪诗话(德译)	1485	丝线集	1489
中国古诗选	1485	石湖:范成大的诗歌	1489
汉魏六朝诗选	1486	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	1489
中国古诗探源	1486	唐诗创新者陈子昂	1489
陶潜诗	1486	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	1489
诗经	1486	人境庐内:黄遵宪的诗歌	1489
兰舟:中国女诗人	1486	杜诗谚解	1489
王维诗之画意	1486	陶渊明及其诗歌	1490
葵晔集	1486	王维	1490
龚自珍	1486	王昌龄	1490
诗歌和政治:阮籍生平与作品	1486	李白:心像与诗	1490
杜牧抒情诗	1486	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	1490
梅尧臣和宋初诗歌的发展	1486	李太白研究	1491
古诗十九首(英译)	1487	李商隐研究	1491
自然诗	1487	孟郊和韩愈诗歌研究	1491
中国诗歌的写作	1487	楚辞论集	1492
初唐诗	1487	潺潺流水:康乐公谢灵运的生平及作品	1492
元稹	1487	张华:西晋政治家兼诗人	1492
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	1487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	1492
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	1487	寻隐者不遇:唐代隐逸诗	1492
高适	1487	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	1492
云游集	1487	中国古典诗集(唐代)	1492
孟浩然	1487	唐代诗歌	1492
盛唐诗	1487	中国诗选	1492
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1487	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三百首	1493
中世早期的中国诗:王粲生平和诗歌	1487	中国古代抒情诗	1493
李贺诗集	1488	中国古典诗歌	1493
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	1488	诗经(俄译)	1493
曹植及其诗歌	1488	乐府——中国古代民歌选	1493
谢灵运:孤独的山水诗人	1488	白居易诗集	1493
陶渊明:作品及其涵义	1488	杜甫诗集	1493
清代诗学之发展	1488	李白抒情诗选	1493
六朝诗	1488	屈原诗选	1493
元明清诗选	1488	祇园南海	1494
待麟集	1488	广瀨淡窗	1494
中国诗歌传统里的意象读法	1488	铃木虎雄	1494
汉代民间歌谣	1488	青木正儿	1494
中国叙事诗	1488		

内田泉之助	1494	中国诗歌流变史	1500
网祐次	1494	中国诗学——设计篇	1500
藤野岩友	1494	中国诗学——鉴赏篇	1500
吉川幸次郎	1494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诗歌之部(一、二)	1500
目加田诚	1495	中国山水诗研究	1501
星川清孝	1495	敦煌诗经写卷	1501
太田青丘	1495	诗经研究方法论	1501
小川环树	1495	诗经研究论集(一)	1501
冈村繁	1495	诗经研究论集(二)	1501
铃木修次	1495	汉诗研究	1502
荒井健	1495	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	1502
高桥和巳	1495	阮籍咏怀诗研究	1502
理雅各	1495	陶诗新论	1502
崔理斯	1496	陶谢诗之比较研究	1502
亚瑟·韦利	1496	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	1503
德理文	1496	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	1503
顾赛芬	1496	禅学与唐宋诗学	1503
于雅乐	1496	敦煌的唐诗	1503
葛兰言	1496	王维诗研究	1504
戴密微	1496	杜甫夔州诗析论	1504
柴赫	1497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1504
高本汉	1497	岑参研究	1504
洪业	1497	孟郊研究	1505
薛爱华	1497	李贺诗研究	1505
刘若愚	1497	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	1505
戴维思	1497	白居易研究	1505
阿列克谢耶夫	1497	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	1505
康拉德	1498	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1506
艾德林	1498	清代诗学初探	1506
郑骞	1498	清初杜诗学研究	1506
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1499	王夫之诗论研究	1506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唐诗研究	1499		

诗学概念

【诗】 在中国诗学的传统与典籍里,诗这个名词有多种含义和用法。作为一个专名,它指的是中国古代“六经”之一的《诗经》。诗在中国起源很早,最早的诗是与乐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歌唱,以及传播于先民口中有韵的谣谚。文字产生以后,许多歌谣得到记录,商代的卜辞中就有不少歌谣;从周代开始,国家设立乐官,负责搜采民间谣谚,借以观察民风国情。当时的上层知识者也开始创作诗歌。春秋时代,国事活动和诸侯交往中,往往借诗陈言,诗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到孔子时,流传着的各类诗歌超过三千首。据传孔子曾有“删诗”之举,《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首。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被孔子删存的三百零五篇诗,简称《诗三百》,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简称《诗》,如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以《诗》为五经之首,称为《诗经》。但在后世,《诗三百》和《诗经》仍可简称为《诗》,如朱熹《诗

集传》、魏源《诗古微》,书名中的“诗”均指《诗经》。

诗的另一个更为常用的含义,是指中国文学里属于韵文的一种文体。诗这种文体由形成到完备,过程相当长。构成中国诗这种韵文形式的要素和区分各种诗体的根据,在于每句的字数(四言、五言、七言或杂言等)、每个字的声调(首先是是否讲究声调,其次是如何讲究,用平声抑或用仄声)、每篇的句数(固定抑或不定,如固定则定为几句,是四句、六句、八句或更多)、韵脚的位置和多少(是隔句抑或每句押韵)以及对偶的安排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精地发展起来的。最早的诗与乐舞相连,很可能存在着“有声无字”的情况。后来,诗渐渐独立,特别是在文字形成以后,虽然仍有一部分诗与音乐有关,如乐府诗和唐人的绝句,大部分的诗人却只是写作“徒诗”,即不用于歌唱的诗。文献记载的上古诗歌,是从二字一句开始的。那就是见于《吴越春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由于汉语和汉文单音节和一字一义的特点,此后,诗体的成长首先体现于每句字数的增加。《诗经》中的作品以四字为主(也杂有少量三、五、七言)。由楚地民歌哺育出来的屈原辞赋,实际上是杂言的诗。四言诗流传既久,渐渐衰弱,到汉代,五言为主的倾向渐显,无论民

歌还是文人创作,大多以五言为句。七言诗最初产生于民间歌谣,后为文人所学,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被认为七言体诗之始。比七言更长的句子,如九言、十一言者,在古诗中也时常可见,但那只是诗人偶尔的运用,并没有形成一种诗体。五、七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早期的中国诗,句数上没有严格规定,所以诗篇可长可短;在声调韵律和对仗排偶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要求,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的“古风”都是这样。到了魏晋时代,五言诗创作经验日丰,诗人对艺术的追求日强,又受佛经转读和梵呗声调的影响,对汉语声音的辨析日益精细。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声病说”产生。从此文人做诗开始自觉讲究“四声”(平、上、去、入)的均衡搭配,努力避免“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的出现。诗人还喜欢在诗中运用俪偶对仗,以求字面之美。延至初唐,这种声律要求严格,句数限定为八句,当中四句必须对仗的五言诗体完全成熟。为了便于和前此不讲声律偶对的古体诗作区分,遂将其称为“近体”,也就是“律诗”。继五言律诗之后,又出现了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和绝句等多种形式的格律诗。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遂大备于唐代。这种基本上是齐言的诗,其形式要求自宋至清,大体稳定,不再变化。中国诗学里所讲的比较狭义的“诗”,就指这种以五、七言古体和律绝所代表的齐言诗。

与上述狭义之解释不同,近代以来,“诗”还有较广的含义。那就是把萌发于唐代民间曲子而极盛于两宋的“词”,和酝酿于宋代而极盛于元代的“曲”也列入“诗”的范畴。从内容本质及功能、作用来看,词和曲(散曲)确实应算抒情诗的一种,只是它们的句子长短不齐,与音乐关系也更密切而已。宋以后直至清末,五、七言古近体诗在文坛上依然蔚为大观,但词曲也在各自的发展中出现了可观的高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向被称为“诗馀”的词和“词馀”的曲,实际上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故本辞典所言之“诗”,均指上述较狭之义。

诗是中国文学诸文体中形成最早、发展最充分的一种,因其所取得的成就高而普及程度又广,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中国诗学对“诗”的界定和质性的认识,除了着眼于上述种种偏重于外在形式要素以外,还很重视一系列重要的内在质素。首先是对于诗的内涵“情志”的重视。早在先秦就有“诗言志”的说法(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今文尚书·尧典》),到《诗大序》更明确地论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发端,中国诗论历来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主张以“摇荡性情”、“感荡心灵”(钟嵘《诗品》)为创作诗歌的先决条件,甚至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而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以及一切由此带来的弊病,如抄书用典等。其次,中国诗特重意境的创造。在众多意境和风格类型中,风骨健挺的雄浑崇高和淡远飘逸的阴柔优美,得到格外的重视。而两者相较,又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蕴藉含蓄,为诗家所最向往,能够达到此一境界者,则为“有神”、“有韵味”乃至有“味外之味”和“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及托名于他的《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禛《渔洋诗话》、《香祖笔记》等)。第三,中国诗历来讲究“中和之美”。从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到《礼记·经解》篇提出的“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大序》主张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直到清人沈德潜宣言的“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国朝诗别裁凡例》)。这一审美标准在中国诗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第四,十分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强调借诗以观察民风国情,用诗以感化教育百姓,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是中国诗的主要价值取向。

中国诗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诗在整个文坛的地位不免有所起伏消长,但总的趋势是形式逐渐完备,艺术愈益精美,每一种诗体都出现了成就斐然的代表性作家和许多优秀作品,即使在诗歌创作高峰的唐代以后,也不断有新的高潮和杰出诗人出现。另一方面,虽然传统诗学对诗歌创作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均有比较严格的约束,但历代思想卓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仍然通过各自的途径,创造出了种种富有个性色彩的风格,有的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流派。中国历代诗人和诗作之多、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以及诗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都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大家庭里最重要的一种体裁(样式)。(董乃斌)

【诗学】 关于诗歌的学问,或者说,以诗歌为对象的学科领域,叫做诗学。在中国,由于诗的含义有好几个层次,相应地,诗学所指的范围,也有广狭之不同。

当“诗”作为一个专名,是指《诗经》的时候,“诗学”即相当于诗经学。中国的诗学起源甚早,如果从

孔子论《诗》算起,那么几乎可以说,中国诗学就是从诗经学开始的。关于《诗经》,汉代有四家诗,魏晋以后,鲁诗、齐诗、韩诗相继衰亡,而毛亨、毛萸所传的古文《诗》独盛,“毛诗”几成《诗经》的代称,毛诗学也就相当于诗经学。虽然毛诗学本身足以构成一个不小的体系,但这仍然是诗学最狭的一种含义,它所研究的范围,只是整个中国诗学的一方面。

《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总集,乐府、歌谣、民谣等诗歌类型,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都已形成专门学问,它们既可以单称“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歌谣学”、“民谣学”,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诗学的组成部分。

包括上述诸种专学在内的中国诗学,其研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诗歌的基本理论和诗学基本范畴。前者如诗产生的原因、诗的性质、特征、功能、价值、作用、地位、风格、流派、以及诗与其他文学样式(体裁)和艺术门类(如音乐、歌舞、美术等)的关系等;后者如六义、四始、比兴、美刺、言志、缘情、才性、识力、风骨、气韵、意象、境界、兴寄、载道、形神、虚实、复古、通变,以及状写各种诗风、诗境的专门术语之类;

二、有关诗歌形式和创作技巧的问题。诸如对于各种诗歌体制的辨析,对于各种诗体的渊源流变、相互因革、承继发展关系的考察,以及所谓“诗法”的研究。诗法又可按构成诗的元素,分为字法、句法、章法、用韵、用典、对仗等方面,总结艺术规律、树立美学标准,传授创作经验,提出避忌原则;

三、对于中国历代诗歌源流,或曰历代诗歌史的研究。这里包括起源、分期、流派的兴衰起伏、理论的流变脉络、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及对于发展规律的描述,不同时地作家作品的比较,等等;

四、对于历代诗歌总集、选集、别集或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研究的方式包括搜集整理、辑逸辨伪、注释笺解、批评校点以及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鉴赏分析等等;

五、对于历代诗人及由众多诗人所组成的创作群体的研究。包括诗人家世的追索、谱系的排列、生平的考订、逸事的搜采、交游的探寻、创作师承和影响的评析、创作成就和诗坛地位的估价,以及某一流派群体创作活动状况的考察、风格特征的论述与在文学史上的评价等等;

六、对于历代诗歌理论的整理和研究。

中国诗学著作形式多样,它不仅表现为专书,还大量散见于一般的文献之中,举凡经、史、子、集,各体文章,都可有所涉及。比较常见的,如历代学者对经书的疏注讲解,历代史书的《文苑传》、《文学传》及

其论赞,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和后代多种子书中的有关论述,以及历朝章表、奏议、书札、序文、碑铭、墓志,乃至私家杂传、野史笔记等等。诗学专著专文,较早而有代表性的,如传为汉人卫宏所作的《诗大序》、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晋人陆机的《文赋》、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唐释皎然的《诗式》、留唐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编撰的《文镜秘府论》、唐末孟棣的《本事诗》等。宋人欧阳修写了第一部谈诗的随笔《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门论诗的文学批评体裁,宋代遂成为诗话最繁荣的朝代,除个人所著的单本诗话外,还出现了总集性质的诗话,如阮阅的《诗话总龟》和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宋以后,特别是清代,诗话的数量更多,对诗话的研究有所加强,并出现了诗话丛书,如《历代诗话》及其《续编》,近人所编的《清诗话》及其《续编》。诗话的内容,一般包括“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等几个方面(《许彦周诗话》),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话》中,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的序论,则对历代诗话的内容作出概括,谓其有“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等五类,大致上涵盖了中国诗学的主要方面。诗话有形制短小、论议自由的特点,缺点是比较缺乏系统性,理论展开也不易充分。诗学论文在这方面就优越得多,古代的诗学论文多见于书信和序跋,著名的如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翊书》、宋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杨万里的《江西宗派诗序》等。诗学著作也有以诗或图的形式出现的,如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元好问有《论诗绝句》,唐人张为则有《诗人主客图》。今人的诗学研究多以论文或专著为其成果的形式。

上述种种诗学著作的研究范围,大致是以五、七言古近体为主的诗歌,后来以长短句为特色的词曲,虽说也可称为广义的诗,但对于它们的研究,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一般不列入诗学,而是作为独立的学问——词学和曲学。

由于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诗是最重要的一种文体,古人,不但总是将诗置于文学领域的首席地位,而且常有把诗等同于文学的倾向,所以他们对于诗的论述,特别是涉及其基本问题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整个文学甚至艺术都隐含在内。这样,古人的某些诗学理论,就因其较强的涵盖性和形而上学性,而在实际上带有了后来所谓的文学理论或艺术哲学的意味。在西方,所谓“诗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别,

其广义者也正是指一般文学理论而言。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虽然中国诗学不乏广义“诗学”的内容，但这毕竟不是传统诗学的主要部分，所以本辞典所说的“诗”和“诗学”，仍以五、七言古近体诗（也包括四言为主的《诗经》、杂言的《楚辞》和乐府等）为主要对象，而不取广义的诗和诗学概念。

诗学原是中国传统学问，但随着文化的交流，中国诗学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诗学理论和观念，然后加以改造与熔铸，最后使之成为中国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隋唐以来佛教禅宗对中国诗学曾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诗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中，禅宗的教义已化为血肉般地不可分割。十九世纪末，随着西学的东渐，西方哲学、文论和诗学传入中国，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则影响尤为深刻。这一切使传统的中国诗学，和整个中国的各个方面几乎同步地进入了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董乃斌）

【诗教】 古代诗学概念。出于《礼记·经解》篇，托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汉儒根据儒家经学的需要，提出了“《诗》教”说，原是指古代周《诗》三百篇的伦理规范及其为政教服务的巨大社会作用。这一理论，源于孔子的“思无邪”说。而与《礼记·经解》篇几乎同时的《毛诗序》，也有相似的论调：“《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意思是说，古《诗》三百篇，以其巨大的道德感染力量，启发了人们的精神自觉，形成一股风气，达到“移风易俗”的政治目的，说明诗歌为封建政教服务的社会作用。人们把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上风化下，也可以下风刺上。但是“下以风刺上”的诗歌，应合于“温柔敦厚”或“主文谏”的封建伦理规范。这一“《诗》教”说，不仅符合汉代封建大一统的形势要求，而且符合后世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后世的封建文人，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把汉儒特指的“《诗》教”，改为泛指一般诗歌创作的“诗教”，于是逐渐形成了儒家传统诗论的政教中心说，提倡诗歌创作与评论为封建政教服务。这一“诗教”说，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诗坛，直至清中叶的沈德潜，仍然有其巨大影响。此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灭亡，它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蒋凡）

【温柔敦厚】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礼记·经解》篇，托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汉代是经学统治

的时代，一切学术文化，无不受其影响。诗论亦然。上述言论，原是汉儒从经学的角度，分析古《诗》（今称《诗经》）的理论，后来逐渐从特指的《诗》，扩大泛指一般的诗歌。论其思想，则渊源于先秦儒家。孔子论《诗》，早有“思无邪”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论，要求诗歌温良平和，适中合礼。汉儒于是根据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发展孔子诗论，倡立儒家的“诗教”说，要求诗歌创作和批评，必须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但“温柔敦厚”既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规范，又是一种积极的艺术原则。从前者言，诗之有“教”，是指封建统治者通过诗歌艺术，对臣民施行思想教化，所以《白虎通义》解释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所称“温柔敦厚”，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诗歌言志，抒发情感的一种特定道德规范，要求诗歌的思想表现为温柔婉顺，和颜悦色，待人宽厚。诗可以批评现实，讽刺上政，也允许抒发哀怒，但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合乎分寸，“怨而不怒”。这种理论是对文学批判现实进步倾向的否定，形成了思想模式。但从艺术角度着眼，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温”，颜色温润如玉，指诗歌外观的光彩；“柔”，指“情性和柔”，是性格和外在风貌；而“敦厚”则是内容充实、思想深邃、质地浑厚的样子。综合言之，“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指的是充实、浑厚而深刻的内容，通过温润柔和的艺术风貌，来加以委婉曲折地表现。这就是唐孔颖达所解释的“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意思。汉儒的“诗教”说，对于传统诗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人从艺术角度加以积极发扬，把“温柔敦厚”与诗歌的比兴艺术相联系。清焦循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雕菰集·毛诗郑氏笺》）王士禛更以“一唱三叹”来发挥，认为诗歌的“温柔敦厚”，就是含蓄蕴藉，韵味无穷（参见《池北偶谈》）。这就为诗歌的艺术联想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如果趋之极端，因此而否定痛快淋漓的豪放风格，又可能形成新的艺术框框。有人则主要从思想教化角度发挥，把“温柔敦厚”的诗教称为文学的“极则”，认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强调诗歌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调节器的职能和功用。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促进了诗歌的说教倾向，不利于艺术的发展。现在，作为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儒家诗教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从不同方面来总结其理论教训，对新文学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蒋凡）

【主文谏】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汉初《诗大

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里提出了与诗歌某种艺术风格有关的问题。郑玄解释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这是要求诗人创作可以规讽统治者，但必须通过委婉曲折的方式，而不要过于切直刻露，以维护君主的尊严和权威。而委婉曲折地运用“譬喻不斥言”的比兴手法乃是重要的艺术手段，涉及诗歌创作表现方法的问题，也可以说，“主文谏”云云，实际是儒家“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另一种说法。孔颖达《礼记正义》释“温柔敦厚”云：“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于此可见，不管是《诗大序》的“主文谏”，还是《礼记·经解》篇的“温柔敦厚”，都同样要求“依违讽谏”。所谓“依违”，就是“谐和不相乖离”的意思（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实际又与艺术美学的“谐和”原则相联系，寓含具体的思想内容和特殊的审美要求：一是思想内容上的“谐和”，一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艺术“谐和”。思想与艺术的两种“谐和”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政治“谐和”原则看，诗可以讽谏，上可“风化”下，下也可以“风刺”上，要求诗歌联系社会，讽刺时政。但是这种批判现实精神是有条件限制的，汉儒之“风刺”，又必须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原则，不是金刚怒目的批判揭露，不能伤害君主的尊严与权威，而是通过委婉含蓄之辞，寄托忠心讽谏之意，以便在统治阶级内部达到调整关系、维护团结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这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思想“谐和”，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不准许诗歌的愤怒发泄与正面的暴露批判，这就限制诗歌批判现实的斗争意义，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因而在历史上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抗争与批判。而从审美角度言：“主文谏”又强调艺术“谐和”，要求通过比兴艺术来达到含蓄表达、委婉讽谏的目的，艺术风格要求含蓄蕴藉、委婉入情。因为诗歌艺术的谐和，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易于引起感情上的共鸣，于是就能从艺术上谐和，进一步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产生“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礼记·乐记》）的巨大社会作用，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从积极方面看，艺术“谐和”要求含蓄委婉，“譬喻不斥言”，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某种程度上符合艺术思维规律，

提高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效能；但片面追求温柔敦厚、委婉含蓄，把“主文谏”当成唯一正确的艺术模式，一概反对并压抑炽热感情的倾泻，排斥意气奔腾的豪放之作，又会对批评与创作产生不利的作用。所以明末陈子龙《诗论》直斥之为“小人以文章杀人也”，可见其理论的局限性。参见“温柔敦厚”条。

（蒋凡）

【诗言志】 古代诗学概念。体现了古人对于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语出《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以为先秦流行的“诗言志”说，是儒家传统诗论的“开山的纲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从文艺主体论出发，概括地说明了诗歌文学表现思想感情的特征。但在先秦时期，这一理论还是比较朦胧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称“诗以言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诗以道志”，所谓“言志”或“道志”，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发展到汉初，《礼记·乐记》据此发挥，指出诗人所言之志是“感于物而后动”，探讨文艺产生的本原，从文艺主体论进一步探讨创作主客体的关系，涉及到文艺的本体论。《诗大序》又深一层地作具体发挥：“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作者又强调所言之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不能超越封建伦理规范。因而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很大，“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虽然所言之“志”，与后来陆机《文赋》“诗缘情”说有质的区别，还不是属于纯粹审美的意识，但是，汉人由言志扩大到道情，却开拓了诗人视野，扩大了“志”的表现范围，其中又提出了“情”与“志”的关系新课题。大概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意识的冲击，“诗言志”说在唐宋以降，也日渐增强了它的审美意蕴。如唐孔颖达，虽是经学家，但也解释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一年疏》）发为情、志统一之说。诗人所言之志，不仅是涉及政治教化的理性规范，而且可以容纳生动的个性化的情感活动。古代文论家常把“言志”与“缘情”二说加以对立，但考其源头，原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又从诗歌的认识功能，进一步论其社会教育作用。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发挥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是在“诗言志”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发扬了古代“采诗观志”的精神，充分发挥了诗歌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从抒发个人情志，进一步要求去反映生活，

以便在封建体制中完成能动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里,汉儒已逐渐把传统诗论从主体意识的表现延伸到对于创作客体的探索。但无论是“志”或“情”,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社会极为复杂,人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及其艺术反馈也就千变万化,各逞异貌。如《礼记·经解》篇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说,它是“诗言志”说众多理论表现形态中影响重大的一种。“温柔敦厚”作为传统“诗言志”的一个思维模式,要求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来“发乎情,止乎礼义”,限制了诗歌文学反映和批评现实的斗争性。这一理论规范却不可能永远一统诗坛。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诗言志”说又被后人赋予新意。传统诗论中的“诗言志”说之所以源远流长,生命绵延,这种突破与发展所注入的新鲜血液的奔腾是必不可少的。如唐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之说,认为诗歌所言之志不仅温柔敦厚,逆来顺受,而是标志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对社会环境压迫的抗争和呐喊,是诗人干预生活、改造社会并求得内在心理平衡的一种特殊需要。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又以“诗言志”为据,发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论,逐渐加强了诗歌文学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性,从而把古代的“诗言志”说,发展为富有古典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理论。而清初黄宗羲《万贞一诗序》,又结合时代斗争,对“温柔敦厚”的“言志”之说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批判了俗儒“厌厌无气”、“委蛇颓堕”的言志方式,要求诗人“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温柔敦厚”。这一新说,虽然并不符合汉儒原意,但新思维拓宽了“诗言志”说的理论视野,并赋予了新的审美活力。可惜直到晚清,仍然是汉儒所称“温柔敦厚”式的“诗言志”说统治传统诗坛。(蒋凡)

【赋诗言志】 古代诗学概念。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按:指印段和公孙段)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赋诗言志”,是根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外交场合中赋《诗》时断章取义的情况而提出的观念。如《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其实,春秋时赋诗断章取义,不仅是“多取首章”,也可以取“卒章”,如上述郑伯享赵孟,子产赋《桑扈》,原是义取首章“既见君子,其乐如何”,以表示欢迎之意;但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隔桑》卒

章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取不忘人之爱的意思。又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野有蔓草》见于《诗·郑风》,原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但子大叔所赋并非爱情,而是节取其首章“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二句,表示热情欢迎之意,所以赵孟说是“吾子之惠”,表示感谢。又如伯有赋《鹁之贲贲》,此诗见于《诗·鄘风》,《毛诗小序》曰:“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鹁鹁之不若也。”这是一首讽刺统治者淫乱的诗歌。所以赵孟事后评云:“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据此情况,清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有概括说明:“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之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为了自由表达意志,人们称引可以毫不顾及原诗题旨,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原是历史的产物,春秋以后,就很少有这种做法。但其风气所及,影响有好有坏:违背原诗,主观附会,随意批评,以合其“教化”需要,流弊甚深;但对后来“诗无达诂”之说,启迪了艺术思维的模糊理论,空灵而不泥于字面,又促进了诗歌审美艺术的发展。关于《尚书·舜典》“诗言志”说与《左传》“赋诗言志”说的关系,朱自清《诗言志辨》以为“诗言志”可能是从“诗以言志”化出,“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二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蒋凡)

【诗以达意】 古代诗学概念。“诗”原指《诗》,即《诗经》。语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司马迁“《诗》以达意”之语,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言志”说,又直接受到董仲舒的影响。董氏《春秋繁露·玉杯》分析儒家六艺的不同特点,有“《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是非,故长于治”。他们一样认识到儒家六艺,包括诗乐在内,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明显不同的是,司马迁改“道志”为“达意”,从而突出了诗歌文学诉诸感情的艺术特征。司马迁之所谓“意”,也即其“发愤著书”的意思,所以《太史公自序》又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的情感受到压抑,“意有所郁结”,终于通过

“诗以达意”的渠道,源源倾泻发泄,既获得内在的心理平衡,又引起社会的共鸣。因此,“诗以达意”之说,既是古代儒家“诗言志”说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又是通向魏晋六朝文学自觉时代以后的“诗缘情”说过渡的一座桥梁,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汉末,刘向明显受其影响。如刘向《列女传》卷四《召南申女》载:召南申女,被人无礼逼婚,申女不从,于是强暴的男家罗织罪名,“致之于狱”,迫她屈服。但申女“贞壹修容”,决不顺从,并且作诗达意,表明了决绝之心,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女(汝)从。”(按:诗见今《诗·召南·行露》。)刘向据此而加以总结和称颂:“作诗明意,后世称通。”诗是一种特殊之“言”,刘向据“诗以达意”之说而加以发挥:“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说苑·尊贤》)其辞赋《九叹》又有“冤结未舒”而“抒情陈诗”之言。魏晋以后,司马迁的“诗以达意”说影响逐渐增大,如刘勰的“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韩愈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杜牧的“文以意为主”(《答庄充书》)诸说,促进了诗歌创作理论的健康发展。

(蒋凡)

【诗缘情】 古代诗学概念。晋陆机《文赋》中以十体论文,首先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其原意是讲诗歌的特点是以精美的辞采抒发情感。“缘情”在现存的《陆机集》中凡三见。《文赋》之外,二见于《叹逝赋》:“乐隤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三见于《思归赋》:“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情”都是泛指情感。缘,因;绮靡,原指精美的织物,这里引申为美的辞藻。刘勰《文心雕龙》云:“《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辨骚》),“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都是用的引申义。魏晋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在文艺创作中,人们的审美意识一是关注人的主观情感,二是追求辞采之美。“诗缘情而绮靡”,就是这种创作思潮、审美意识的理论表现。后人对陆机之说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误解。一是将“诗缘情”直接等同于“诗言志”。如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五臣注:“翰曰:诗言志,故缘情。”这类诠释完全混淆了两个命题的不同内涵(参见“诗言志”条)。单以“情”而论,《诗大序》中虽然也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情”主要指因政治治乱,风俗盛衰而产生的怨怒、哀思,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其具体内容是政治的、伦理的;陆机所说的“情”则为纯属个人因四时风物、亲故荣落而产生的悲喜感叹。“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文赋》),其态度为体验的,审美的。情、志不分和专讲缘情,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不同看法,也是儒

家诗学与非儒家诗学的鲜明分界。二是将“诗缘情”解释为专言闺房儿女子之情,将“绮靡”说成是雕藻淫艳的形式。持此说者,多为清人。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沈德潜《说诗碎语》:“《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他们都从儒家正统诗学的立场出发,来曲解文义,讨伐异端。甚至把齐梁宫体,历代艳情之作的出现,归罪于缘情之说,根本违背历史事实。而能较正确地阐发“诗缘情”本意的,有明顾起元,清汪师韩、王闾运诸家。顾起元《锦研斋次草序》:“昔士衡《文赋》有曰:‘诗缘情而绮靡’,玷斯语者,谓为六代之滥觞,不知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旖旎佚丽之形出焉。绮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绮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饰情而为绮靡,或谓必汰绮靡而致其情,皆非工于缘情者矣。”王闾运《湘绮楼论文章体法》:“宋、齐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阁;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清儒多斥缘情绮靡为“不知义理”,汪师韩则列举历代名作,予以驳斥,见其《诗学纂闻》。

(黄保真)

【缘情绮靡】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缘情”谓诗因情而发,“绮”,“靡”,一指文辞华采,一指声音美妙,总起来表明诗歌情感性和美文性特征。《尚书·舜典》标举“诗言志”,“志”原包含有情感性因素在内,但不突出,古时诗、乐合一,对诗、乐之具情感性,有所涉及,如《荀子·乐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毛诗序》更是明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肯定诗之“吟咏情性”的特点,刘勰《七略》“诗以言情”,郑玄《礼记》注“诗谓好恶之情”都是同样见解。陆机之“缘情”由此而来,与“言志”并无本质冲突。《文选·文赋》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可以为佐证。但是“绮靡”则强调诗歌的美文性,它上承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是当时文学意识新变的体现。“缘情绮靡”的提出,强调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后代许多文论家予以积极响应,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时序》“结藻精英,流韵绮靡”;梁萧绎《金楼子·立言》“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属词婉

约,缘情绮靡”;唐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论及北朝文艺之沉寂曰:“体物缘情,则寂寞于世”;王维《上党苗公德政碑》“诗穷绮靡”;杜甫《偶题》“缘情慰飘荡”等。到了后代,有人将“绮靡”理会成“浮艳、侈丽”,与南朝诗风相联,予以贬抑,又非难陆机只“缘情”而不谈“止乎礼义”,是“导入歧途”(纪昀《云林诗钞序》)。纪昀诸人,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对“缘情绮靡”说作出了否定性的批评和解释,并不符合陆机《文赋》原意,但影响很大,至今仍沿误后人。

(陈引驰)

【诗赋欲丽】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曹丕对于诗歌和辞赋艺术特征的认识,语出其《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魏晋时代,家弃章句,儒家经学有日趋式微之势,文学的独立地位与特殊价值,逐渐被人认识,因而曹丕《典论·论文》应运而生。它突破了儒家“诗言志”说的传统理论框架,提出了“诗赋欲丽”的理论主张,开始把纯文学作品从非文学作品中区分出来,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体论,反映了时代艺术审美意识的觉醒。古代的诗赋,是纯文学的代表文体。曹丕认为诗赋的辞藻华丽,讲究文采,追求艺术形式之美,这是符合文学的艺术特征的。表面上并不涉及思想内容,实际却与内容题材及思想情感的表达有关。在三国魏时,“诗赋欲丽”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大胆设想和理论开拓,对于汉儒视文学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和摆脱旧思想桎梏的努力。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又说:“他(按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对形式的重视与追求,在当时不仅是文学获得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而且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更新,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鲜明标志。后来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绮靡”就是“华丽”,明显受到曹丕“诗赋欲丽”之论的影响。

(蒋凡)

【尚巧贵妍】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陆机对于艺术创作技巧的阐述。其《文赋》在列举诗、赋等十类文体的风格特征后概括地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会意”指作者的立意、构思。立意构思当求巧妙,遣辞造语则讲究华美。这正是陆机《文赋》的精神所在。《文赋》首句

云:“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得其用心。”此“用心”正表现在“立意”与“遣辞”上。后面称:“其始也,皆收视返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此描写“立意”。“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则描写“遣言”。所谓“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作文之道无非立意遣言二端,而此二端的要求简言之即是“尚巧贵妍”。陆机此论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风尚,从西晋开始“尚巧贵妍”的审美旨趣逐渐形成。如沈约称当时文风为“缉旨星稠,繁文绮合”,“遗风馀烈,事极江右”(《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明诗》篇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由此可见陆机此论的意义与影响。至南朝绮靡华美的文风日益盛行,陆机“尚巧贵妍”之说当亦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谢榛《四溟诗话》指责它“重六朝之弊”,则态度偏颇,为不明六朝美学风尚所致。

(刘明今)

【错采镂金】 古代诗学概念。见钟嵘《诗品》卷中评颜延之诗引汤惠休语云“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芙蓉出水”状自然清新的文学风格,“错采镂金”则形容过分地雕琢藻饰,损伤了真美。《南史·颜延之传》亦云:“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此语或为惠休所本。颜延之诗文长于廊庙之制,又好用典故,“连类合章,比物集句”(《庭诰》),故当时有此讥评。(刘明今)

【诗道】 古代诗学概念。内容涉及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或规律的问题。语见中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以叹息也。”其《诗议》又云:“且夫文章关其本性,……巧拙清浊,有以见贤人之志矣。抵而论之属于至解,其犹空门证性有中道乎!何者?或虽有态而语嫩,虽有力而意薄,虽正而质,虽直而鄙,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中唐以前,人们论诗多重儒家“诗教”,而罕见“诗道”之说。以“诗道”论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自皎然始。皎然也曾谈及“诗教”,但多继承前儒之见而少有新意,而论及“诗道”,则作出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皎然之前,如初唐陈子昂《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所称文章之“道”,包括了诗歌创作在内,但其“道”的内涵,偏重政教治化,而缺乏纯粹的审美意蕴。而皎然用“诗道”来概括诗歌的艺术

本质规律,则是受佛学启发而提出,其内涵以审美意蕴为主。《诗议》所称诗之“中道”,即来自当时的佛教学说,指脱离“两边”(两个极端)的不偏不倚的道路或观点方法。如果撇开其复杂的宗教内容,则可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完满本性,或指认识事物的正确方式、方法或途径。皎然把这一佛学概念引以论诗,赋予新的内涵,使诗的审美特质获得了理论升华。所称“诗道”突破了儒家传统观念,至少具有以下两层涵义:一是指诗歌自身所独具的完整本性或本质,二是指诗歌创作和欣赏中进行艺术思维时的审美把握的辩证方法。皎然认为“诗”是自性完满的特殊事物,其尊贵可冠于儒家六经之首,居于道家的众妙之门,直探佛家的“空王之奥”。但是诗又独立于三家之外而自有其独立完美的本性。其《诗式序》又进一步把诗的艺术特质表达得更具体更明确:“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这里也包括了他对诗歌创作艺术思维规律的见解。因而他在《诗式》《诗议》中几乎不讲风化或“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观念,而是全面地论述了诗歌艺术诸因素,和艺术思维中主体、客体及载体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如意象与境象,体德与作用,才情与识理,苦思与神会,典丽与自然,以及巧与拙,清与浊,动与静等等,都在他所称“诗道”的涵盖之中。因此,其“诗道”指的是诗的特殊艺术本质或其审美创造的特殊规律。中唐时以“诗道”论诗的还有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这同样超越儒家传统的“言志”“教化”说,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创造的意境之美和特殊规律。以“诗道”来概括审美中心的诗学体系,便同以儒家传统的“诗教”为中心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唐以后,对“诗道”理论作出重要发展的是南宋的严羽,其《沧浪诗话·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诗道如是也。”以“妙悟”论“诗道”,把中国古代审美中心论的诗歌美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详见“妙悟”条)。严羽之后,以“诗道”论诗者渐多,又从各方面扩大和深化了它的理论内涵。

(黄保真)

【诗笔】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南北

朝至唐代文体分类用语。如《南齐书·萧子懋传》:“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原来南北朝时,人们习惯以文、笔相对称,文指押脚韵的诸种文体,如诗、赋、颂、赞、铭、箴等,笔指不押脚韵的诸种文体,如诏、策、章、奏、书信、议论文等。由于当时诗歌创作风气极盛,士大夫阶层“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诗品序》),诗成为“文”中最主要的体裁,因而又流行“诗笔”之语。如梁刘孝绰兄弟中孝仪行三,长于笔,孝威行六,长于诗,孝绰乃云“三笔六诗”(《梁书·刘潜传》)。又沈约长于诗,任昉长于笔,故世称“沈诗任笔”(钟嵘《诗品》中)。萧纲《与湘东王书》亦云:“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又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夜琴昼瑟,是自娱怀;晓笔暮诗,论情顿足。”诗、笔的区分,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文学审美观念。萧绎《金楼子·立言》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系将诗歌作为文的代表。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意谓诗歌应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和感染力量,又有美丽的藻采、和谐的声律,其语反映了当时人对于诗歌类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至于笔中诸体,多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文体,当时人也要求它们具有语言色彩和声音之美,讲究骈偶、用典、词藻和声律和谐,故虽是实用文体,但也常常兼具审美因素,可供欣赏,“并为入耳之娱”,“俱为悦目之玩”(萧统《文选序》)。不过诗的审美性质更为鲜明。唐代诗歌创作亦非常兴盛,诗笔一语仍然流行。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两全。”赵璘《因话录》卷三:“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后来情形渐渐发生变化。由于古文运动开展,唐宋古文家都自称所作散文为古文,或径称为文,于是无韵之作不再称为笔而称为文,南朝文笔、诗笔对举之义渐湮,而代之以“诗文”。如宋初宋白《玉津杂诗》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引)指陶潜诗、柳宗元文。于是诗笔一语遂转为专指诗歌。如王安石诗:“闲中用意归诗笔,静定安身比泰山。”苏轼诗:“水洗禅心都眼净,山供诗笔总眉愁。”

(杨明)

【诗无达诂】 古代诗学概念。原作“《诗》无达诂”,始见于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达”,明白、晓畅;“诂”,以今言释古语。它原是汉儒根据春秋时代“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情况,而提出的阅读与应用古《诗》(即《诗经》)的一个方法或原则。汉儒以为古《诗》的时代已逝,事过境迁,因此可以不必忠于原义,而根据自己的需要应用,随心解释。作为

经学附庸的“《诗》无达诂”之说,其理论局限是明显的。但后代的文论家,有时从文学欣赏的审美思维入手,把专指《诗经》的方法,作为“诗无达诂”,来泛指一般诗歌的审美原则。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指出了“诗无达诂”与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渊源联系。说明诗歌的审美艺术,应超越单纯的训诂文字、诠释词语的范围,主要应该用心灵去捕捉诗歌的意象和境界。诗是特殊的语言艺术。“诗无达诂”正是根据诗歌的艺术特征,教人不要只看语言文字与事物之间有形的直接联系,更要看到它们之间那无形的本质联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有形和直接联系可以“达诂”;但无形的本质联系则常是反映事物之间深层结构中的心灵振荡,犹如捕风捉影,很难一下子“了然于口与手”(苏轼《答谢民师书》)。因此,一些神气浑融而发其自然精光的诗篇,就不能仅是训诂文字,牵合“事实”,而应根据作品本身所提供的意象,按照生活体验去驰骋其艺术想象,才能获得美的享受。因此,“诗无达诂”并不是说诗歌不可解释或无法明白,而是说不能拘泥字面,“以辞害志”,死于句下,强调的是诗歌审美思维的空灵性。这种解释对后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对于诗歌的语言艺术,拘泥字面,常是“诂”而不达;相反,模糊空灵的审美体悟却现出了新的光明。一般地说,科学的理性认识易精确,而诗歌的感情评价多模糊,其审美意义,很难精确度量。这就是“诗无达诂”说获得日新发展的科学根据。(蒋凡)

【诗无达志】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王夫之评唐代诗人杨巨源《长安春游》诗:“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故曰诗无达志。”(《唐诗评选》)“诗无达志”强调诗歌本文应当具有被读者灵活领会和理解的可能性。它与王夫之“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说相辅相成。以情自得之说从阅读与欣赏的立场肯定了读者的理解自由,“诗无达志”则从创作的角度向诗人提出如何为读者留下蕴涵丰富、可供多种理解、能启发多重联想的精优本文。这说明王夫之把内蕴丰厚富足,为读者联想自由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作为评估一首优秀诗歌作品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杨巨源这首诗,展示的是长安广陌高楼和富丽安乐的景象,诗的尾联采用以汉比唐的手法,轻轻点出在这人间仙境中生活着的是一些当朝权臣势家。诗人叙说的口气冷静、平和、内敛,究竟他对诗中描述的生活场景是欣喜、羡慕、讥讽、诫喻,还是其他什么态度,都很难予以确指,或者说,诗人主观的褒贬意向在诗里表现

得并不明确。然而正因为作品“无达志”,故可以“广通诸情”,才能够勾起读者的广泛思索,并作出各自不完全相同的解答。反过来说,如果诗人在一首诗中表达的意图过于具体、明确、落实,未能“广通诸情”,则读者除了与作品建立起一般的认知关系之外,很少再有驰骋想象、运用自己判断力的机会和余地,对作品寓意就难以有更多地抒发。王夫之明确肯定前一类诗比后一类诗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他反对以议论入诗,因为这正是诗有达志的表现,会框束读者,限制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读者成为作品的被动依存对象。他指出诗人作诗应去追求创立风旨,议论则留待读者自己去生发。反对议论入诗至清初早已不是新鲜的观点,王夫之坚持“诗无达志”的创作要求,从诗人、作品、读者三者整体联系的艺术审观点出发,看待诗歌议论化的消极性,这使他的批评具有新意。但是,全盘否定议论入诗并不全面,因为符合审美要求的精美议论仍有可能为读者再创造留下余地。这是王夫之上述批评欠当之处。此外,“诗无达志”自然有其很高的审美价值,但是明确、具体的诗歌也不乏精品。因此,评价诗歌优劣应该建立多元的价值体系。承认“诗无达志”说的审美理论价值,但不能据此要求以其来代替其他具有积极意义的诗歌批评标准。参见“以情自得”条。(邹国平)

【诗如禅】古代诗论概念。原借学禅以喻创作与欣赏,这是后人根据北宋末年吴可《学诗诗》三首及其诸多和诗加以概括而成。吴可《学诗诗》三首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两宋思想,不仅道学兴盛,而且佛家禅学中的南宗顿门,雄霸天下,两宋文人诗家,多深受其影响。如苏轼、黄庭坚等,诗富禅趣,诗论开以禅喻诗之先声。如苏轼诗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馀首读至夜半书其后》)吴可为苏轼门人,少时以诗为苏轼所赏识。其论诗多发挥苏氏旨趣。故其著《藏海诗话》,具苏诗禅趣,揭示了“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之旨。他的三首《学诗诗》,每一首第一句都是“学诗浑似学参禅”,加以强调,并着重指出诗、禅相通之理,一旦妙悟,自成名家。其要点有二:一是诗贵顿悟,要求直证,信手拈来,自然超诣脱俗。一是作诗贵有自家面目,反对模仿因袭,杜诗虽好,但必须跳出其窠臼,方能自显丈夫志气。这是把禅宗呵佛骂祖、“学我者死”、“汝欲禅贩我耶”等精神运用到诗学中来。在反传统、反道学家那封闭式的定向思

维,纠正江西诗派雕章琢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陋习等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利于诗歌的创新,启发了严羽以禅喻诗的“妙悟”之论。但是满纸佛家机锋,令人费解,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又是其弊。

(蒋凡)

【禅味】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指受佛学禅旨启发而在创作和鉴赏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如明邓云霄《冷邸小言》云:“诗之最上者须在禅味中悟入。”其实早在东晋时就开始有人将佛理、佛语用于文艺创作。《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这类作品,理过于辞,审美价值不大。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禅宗的发展,禅对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诗人开始将禅定之息虑凝心、专注一境的修持方式,运用于审美活动,也体验到了类似禅定之身心安稳、观照明净、清幽冲寂、超尘出世的审美快感,因而称之为“禅味”。王维的山水诗作,树立了典范。中唐的诗僧皎然开了援“禅理”而入“诗道”的先河。白居易诗也有“清静斋戒体,闲淡藏禅味”的语句。中唐以后,随着南禅的发展和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内转,特别是宋代理学家对汪洋淡泊的理趣的追求,进一步推动了禅理向审美意识领域渗透,因而直接地表现于文艺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诗歌理论中从以禅喻诗到以禅论诗逐渐蔚成风气,而且词论、画论、戏曲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也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宋代作家除了苏轼等个别人直接取禅语、禅理入诗外,理论家自范温、吴可、韩驹到严羽,以禅喻诗而提出的趣、理趣、兴趣、悟、悟入、妙悟诸说,都较注重对艺术审美特质的探求。明代以后,某些坚持儒家正统文艺观的人虽然极力排诋禅向诗、画等艺术领域的渗透,但却阻止不住以禅喻诗向以禅论诗、以禅论画的发展。汤显祖《如兰一集序》云:“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明僧普荷更有《诗禅篇》诗云:“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禅禅俨然。”直接混诗、禅为一,有绝对化之弊,影响反而不大。而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以“清、远为尚”,若有若无,却颇能从诗境中体悟禅趣、禅味。其《蚕尾续文·咏雪诗序》云“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

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其《香祖笔记》卷二中又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总之,清幽淡远,妙在象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样的诗境就是禅境,而从中所得的特定审美感受,也就是禅趣、禅味了。清贺贻荪把诗中禅趣看得很宽。《诗筏》云:“禅家、诗家,皆忌说理。以禅作诗,即落道理,不独非诗,并非禅矣。诗中情艳语皆可参禅,独禅语必不可入诗也。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由悟遣言,故慧。’余谓不然。僧诗清者,每露清痕,慧者即有慧迹。诗以兴趣为主,兴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每爱唐僧怀素草书,兴趣豪宕,有‘椎碎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之概。使僧诗皆如怀素草书,斯可游戏三昧。”贺氏以情艳之语,豪宕之概,皆可入禅,不重清远之境,尤忌禅理入诗,专从审美把握的规律着眼沟通诗、禅,可以自成一说。不过,一般讲禅味、禅趣者,还是以清幽淡远为尚。追求物我两忘,天人俱泯,和谐静谧的境界。它同禅宗标示的“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在电光石火般的刹那间超越一切语言文字境界,而顿悟“世界”即“我”、即佛的宗教体验,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保真)

【禅趣】 见“禅味”。

【以禅喻诗】 古代诗学概念。借佛家禅理以比喻创作与批评。语见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仆之《诗辨》,……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于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又其《沧浪诗话·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以禅喻诗,并非严羽首创,北宋苏轼、叶梦得与吴可等已开其端。如吴可《学诗诗》提出“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说,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均为严羽“以禅喻诗”之先河。但是比较而言,严羽理论自成系统,影响更为深远。严羽“以禅喻诗”,是说诗道与禅理相互发明,因当时文人重禅之风气,借禅为喻,意在阐明诗理,并非引禅入诗而以禅理代替诗论。严羽之喻,重在妙悟,提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论,要求从诗人的艺术思维出发,把握诗歌的艺术特征。这正接触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区别的问题,对后

世文学家颇有启迪。但是严羽的“以禅喻诗”，重“妙悟”而不提现实生活，忽视创作客体而论诗歌创作。所论含有迷离恍惚的非科学玄想的成分，又是其理论缺陷。参见“诗如禅”条。（蒋凡）

【诗有三思】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歌创作的三种构思方式。旧题王昌龄《诗格》：“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三格之中，皆有“思”字，故“诗有三格”又称“诗有三思”。苦苦思索不得，突然心境相会，萌生出新的诗思，就是“生思”。这种创作甘苦的体会，早在陆机《文赋》中已有表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语意近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同于“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感思”是指诗思源于对前贤诗文内容或形式方面的感想。“前言”、“古制”，泛指前代的诗文篇章。《文赋》也认为文思的产生，一感于物，二本于学：“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即相当于“感思”。诗思得之于外象，心境感会，神与物游，这叫“取思”。《文赋》中也描述了这类构思的情景：“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由上所述，可见“诗有三思”描述的构思途径，皆本于《文赋》，只是“生思”略有补充。从“诗有三思”的归纳，可以大致看出作者对于诗思产生根源的思考：“生思”，略同于凭虚构象；“感思”，是得于书本；“取象”，是面对自然。（张小平）

【诗有三境】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于《诗学指南》本王昌龄《诗格》。因《文镜秘府论》未录，学者多疑其伪托。其原文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日僧遍照金刚所编的《文镜秘府论》中采录了不少王氏《诗格》的论诗之语，但是文字同今传《诗格》颇有出入，可见今传《诗格》经过后人加工。遍照金刚于唐德宗贞元末来华留学，得到此书，并在采入《文镜秘府论》时放在皎然之前。可见《诗格》确为盛唐的论诗著作。就“诗有三境”中的“境”同《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录自《诗格》的有关条目中的“境”相比较，其涵义基本相同，即都是指艺术思维、审美创造的特有情状，或者说是指在诗人心中体验到的境象、意蕴，但还不是物化在艺术作

品中的艺术境界，即还不是后来“意境”论中的“意境”。所谓“物境”、“情境”、“意境”，是指诗人审美体验的三种不同的对象。“物境”是以“泉石云峰”的自然风物为对象而得到审美体验；“情境”是以人的娱乐愁怨等情感为对象而得到的审美体验；“意境”则是以人的某种思想或生活中的某种境况、事理为对象而得到的审美体验。具体对象虽然不同，但“神之于心”的把握方式，均属主体审美体验。如果我们玩味一番《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两则，更可以确证“境”的上述内涵。其一云：“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志，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境思不来，不可作也。”这里讲的基本就是“三境”中的“意境”。其二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会其题目，山林、风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这几乎同“物境”没有差别了。但是，“境”都不是审美创造的最后完成，而是推动诗人从事创作，形诸文字的内心体验。因此“诗有三境”就是因审美对象不同而得到的三种不同的审美体验。尽管如此，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境”作为审美概念而出现，还是从王氏《诗格》开始的。

（黄保真）

【诗家三昧】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宋陆游《示子遹》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郅。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三昧”原是佛教语，梵文音译，意为“定”、“正定”，即排除一切杂念和束缚，使心神平定，后引申指某事的奥妙、诀窍之意，如唐李肇《国史补》云：“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而以“三昧”喻诗之奥境，则创自陆游。陆游初学诗时私淑吕本中，师事曾几，属江西派，务求藻绘奇巧。其后学问渐增，认识到“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上辛给事书》）。“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旨，斫削之甚，反伤正气”（《何君墓表》）。此时已认识到“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所谓诗家“三昧”乃在学问，在人格精神。此议论自然是对早年学江西派过分重视句格锻炼之学的反省。但陆游的认识并未止于此。在中年入蜀从戎之后，他一方面接触了雄奇壮丽的

山水,一方面身历时危世乱的实际生活,热烈的感受,忧愤的气概,一发于诗而不能止,于是对诗的认识也进了一层。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写道:“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此时他认识到诗家三昧不在句律的锻炼,也不在修身养性工夫,而在火热的现实生活,只有投身其中,才能获得弥足珍贵的激情,从而摆脱前人的矩矱,写出有自己特色的“天机云锦”之作。陆游所称的“诗家三昧”也是一种悟境,但比之吕本中等人所谈的“活法”之悟有很大差别,它不是通过饱参前人的诗文去领悟其章法、句法,而是从生活实践中去领悟诗的精神。故其《题庐陵萧颖士诗卷后》明确写道:“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陆游之后以“三昧”标举诗歌境界者代有其人,如焦竑论诗提倡积学求悟,举学字为例云:“世言子昂书初临思陵,中学钟王,晚师李北海,亦其大端耳。书病至众,唯积学渐成,以次解脱,乃入三昧。”(《题子昂书法华经后》)谢肇淛著《小草斋诗话》提倡“意语胜象”,指出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等句,“诗家三昧,政在此中见解”。他们都标举诗家三昧,但各人所揭示的境界有所不同。

(刘明今)

【诗有五格】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的五种格调,见唐皎然《诗式》:“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比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不用事,即作诗不用典故。皎然以“不用事”为第一格,仍是发挥钟嵘论诗主旨。《诗品序》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又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皎然以“作用事”为第二格,是指运用了典故的诗。但据其自注这一格中还包括没有运用典故但立意不高的作品,那么,皎然列“不用事”的第一格,其中当含有对立意的肯定。《诗式》“重意诗例”条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钟嵘也重视立意:“每苦文繁而意少。”“直用事”,指用事直露,滥用典故。如同钟嵘批评的“殆同书钞”或“质木无文”。这一格中还包括没有用事但格调低下的诗作。“有事无事”,指诗有典故而无内容。这一格略同《诗品》批评的一种风气:“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

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第五格是指诗不但有用事而无内容,而且更无情性和品格。皎然说:“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寝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诗式》列五格,可知是有感而发。皎然生活在唐中唐时代,竞用僻典风气渐盛,“掉书袋”、“獭祭鱼”者日众,所以皎然要正本清源,并救以意、情、事、格等方面。(张小平)

【文体四变】 古代诗学概念。唐皎然《诗式》说:“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寝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文体四变”是指诗体四变。他说:“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皎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诗体。他以为苏、李诗不见用事,自然天成,当是西汉以来诗体之一变。而东汉《十九首》始见用事,这是二变。他说:“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建安七子,同属二变。他说:“邺中七子,陈王最高……不拘对属,偶成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齐梁五言诗“惟工惟精”,声律流美,雕绘偶丽,这是三变。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后人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从艺术发展的眼光来评价齐梁诗,尚属公允之言。至于当时的大历诗风,讲究对偶,嘲风弄月,气弱格低,是诗体四变。皎然颇致不满,云:“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皎然以诗史的眼光看待诗体艺术的演变,有一定的见解。后来,严羽《沧浪诗话》受其影响,分时代论诗采用汉、魏、晋、盛唐、大历、晚唐的分期法,虽非尽为的论,但其诗史眼光,启迪后人,功不可没。(张小平)

【诗有七德】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唐皎然《诗式》卷一:“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德”一作“得”。其义来自道家哲学。《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宇宙本体,“德”是“道”存在的个别形态,是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先验的依据。换句话说,“德”就是一切事物得之于“道”的特殊本质。《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韩非子·解老》:“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德者,得身也。”因此,“德”就是事物的特殊

本质或特有属性。《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则用“德”论“文”，说明“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本质的事物，形态多样，包罗万象。而皎然“诗有七德”，则用之论诗。“高古”、“典丽”、“风流”、“精神”四者，是诗中四种不同的风格，“识理”，则主要指创作主体的思想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而“质干”、“体裁”则为构成诗的艺术要素。皎然论诗，同时还讲“体德”。《诗式》卷一《辨体有一十九字》中，就有两处体、德连用。他说：“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可见“诗有七德”不足以概括诗歌之“德”的全部义蕴。从辨体列出的十九字是十九种“体德”。或者说把诗按照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不同，概括为十九类。其中有的偏重于思想内容。如“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操不改曰节”，“志，立志不改曰志”，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气”、“德”、“诚”、“达”等，可以说都是因诗人的“识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内容和品格。至于“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思，气多含蓄曰思”，等等，则和“七德”中的“高古”、“典丽”等属于同一类型。而“情，缘境不尽曰情”，“悲，伤甚曰悲”，“怨，词调凄切曰怨”等，其审美特征，又因诗的“质干”不同而不同。还有“力，体裁劲健曰力”，诗的艺术风格，则与诗人对“体裁”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由此看来，“体德”之“德”与“七德”之“德”，都是指诗歌的内容品格，艺术风格，即不同类型的诗歌作品的不同特质。“诗有七德”只是列举七种主要的类型，而不是说诗歌中只有这七种品格、风格。（黄保真）

【诗为活物】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钟惺《诗论》：“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原是他对《诗经》的作品能被历代不同读者反复研读，新意迭见现象的抽象概括，而其意义也普遍适用于诗歌的接受批评。钟惺以为，《诗》是一种流动不居的“活物”。一方面，“活”是作品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这不仅是因为诗歌作品意蕴丰富奥邃，其旨归难以为一时一地的读者全部穷尽，还因为，诗歌的艺术形式有被断章取义的灵活性，即一首诗的章节与全篇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章节本身又可以有它自己比较完整，相对独立的含义，为读者鉴赏、引用诗歌提供了较多自由，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感受、品味它的内容，结果各自领略的意蕴也不尽相同。既然作品本身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客观依据，那么，各个读者所感知的或即是作品内容的一部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

蕴义不断地重新发现，其累积的结果，遂使原作丰富的内容越来越清晰。据此，钟惺认为，《诗》所以被称为“经”，就在于它具有这种“活”的特性。另一方面，诗之为“活物”，又是读者对作品意蕴的赋予和追加。阅读同一部作品，何以会时读时新？钟惺将原因归结为读者内在条件的变化，即所谓“趣以境生，情由日徙”所致。鉴赏者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知识的积累，生活的改变，必然引起他自身的情态心境、鉴赏能力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这又影响着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个人尚且如此，不同时代的读者，读者与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发生分歧就更是在所难免了。在这方面倘若胶柱固拘，不免会有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之嫌。竟陵派另一代表人物谭元春也指出：古人作品中能够传世的精神意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佳妙者原不能定为何处，在后入各以心目合之”。因此，读者群的变化，可能会对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原来被人视为是“疵类”，“安知后世之传不即在此”（《答袁述之书》）。他与钟惺表达了相同的认识。诗为“活物”说的提出，至少避免了鉴赏批评中的二种片面观点：或者是忽视作品的原意有其确实性的一面，或者是把读者仅仅视为作品的消极领受者。它是对“诗无达诂”说的一次发展和丰富。诗为“活物”说还同时表示，钟惺把文学鉴赏的重心移到了对作品内在意蕴的把握方面来，突出了艺术感受力的重要，从而改变了文学研究中偏重名物训诂、强调学问功底的传统看法。钟惺认为，读《诗》而“分其章句，明其训诂”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如果以此为满足，不再求进，那只是表明他刚刚接近鉴赏的门槛，尚未升堂入室。重要的是通过章句、训诂之门，弄清必要的史迹实事，进而能对作品“神而明之，引而伸之”，即要从作品的内在意蕴方面去深切地领略和掌握它。这种鉴赏的要求决定了竟陵派对“慧性”的期待和重视更甚于对“学问”的追求，要求读者通过培植高度的慧性，对作品产生切实、深刻、独特、新颖的感受。这对提高诗歌鉴赏水平富有启示。然而，如果不同时努力打下扎实深厚的学问功夫，往往会对作品错读误释。清代人否定竟陵派自属片面，武断；但是，他们要求读者、批评家增加学问，重视训诂，又是对钟、谭文学批评的重要补充，也是诗为“活物”说得以正确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郭国平）

【以文为诗】 古代诗学概念。意为以作文的方式来写诗。始于宋人对韩愈诗歌艺术的评价。韩愈是中唐大力倡导古文的文章领袖，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七言古体往往运用散文式的篇章结构、句法句式，又引入大量的议论，形成独特的风貌。北宋时，古文运

动重兴,诗歌风格也正酝酿着新变,韩诗特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评议。“以文为诗”便成为很重要很新鲜的话题。欧阳修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六一诗话》)沈括以为“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诗人玉屑》引《临汉隐居诗话》,另见《冷斋夜话》);黄庭坚以为“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尔”(题陈师道《后山诗话》);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同上),陈善说:“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扨虱新话》)受韩愈的影响,以及开拓诗歌领域的时代需要,“以文为诗”逐渐成为宋诗艺术的一大特点。不过,说韩愈“以文为诗”不仅在宋时,而且在后代成为一种普遍看法。如金代赵秉文《与李天英书》:“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至近代陈三立还针对贬韩意见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可见历史上对于韩愈“以文为诗”的功过毁誉参半。韩诗于后代影响甚大,“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叶燮《原诗》),所以“以文为诗”之评亦牵涉他人。宋刘辰翁《赵仲仁诗序》:“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宋王灼《碧鸡漫志》:“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清赵翼《瓯北诗话》:“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六一学韩,才气不能奔放,而独得其情韵与文法,此亦诗家之深趣。”考察“以文为诗”之实质,其一是以散文章法写诗,如方东树《昭昧詹言》:“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有千古。”只要不过分,这通常还易于为人接受,毕竟“古诗章法通古文”(汪佑南《山径草堂诗话》)。陈善就辩护道:“韩以文为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活也……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扨虱新话》)其二是以议论入诗,则纷争最夥,批评意见也较可取。如针对韩愈《谢自然诗》,程学恂就以为:“涉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韩诗臆说》)从韩诗扩大到宋诗乃至整个诗与理的关系问题,严羽《沧浪诗话》就批评过“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明代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缶音序》)较为辩证。而屠隆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文论》)则显得有些偏颇了。“以文为诗”起于对韩诗的评议,但关涉到诗歌特质及其与文章等他种文体的关系。(陈引驰)

【以议论为诗】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严羽对于宋诗创作某种不良倾向的概括与批评。语见其

《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议论为诗”,是诗歌散文化倾向的一种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大发议论,阐述抽象的道理,简直把诗当作押韵之文,甚至是说理的议论文。这种创作倾向,在唐代韩愈诗歌中已透露端倪。但韩诗议论与强烈感情相结合,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趣”,并不完全违背诗歌的抒情特征。这一倾向发展到宋诗,经过苏轼的发扬光大,于是遂成一代诗风。苏诗不仅善于议论,而且嬉笑怒骂,皆能出之以诗。陈祥耀《中国古典诗歌丛话》评苏诗之议论云:“其人才学既富,性又豪迈,于儒道释三家之思想,善为取舍融会,故诗境恣肆开阖,……议论较多,有近于偈语,不免禅障者;然佳者皆理与情事景交融之作。……虽略偏于说理,情趣寓焉,因无损其兴发感动之力量。此其境界有陶李杜韩所未辟者,又得谓宋诗无新开创乎?”其说于苏诗之议论,评价较为全面而公允。这是针对成功的诗人而言。至于道学家视诗歌为宣传道学理语的工具,佛家作为禅偈理语的诗篇,则从抽象说理、空洞议论方面来把诗歌创作引入魔障。后世江西诗派末流不善学苏的顺情而议,于苏诗之“理趣”存理而弃趣,遂演为说理议论的有韵之文,因此而招致严羽的严厉批评。严羽以为诗是“吟咏情性”的艺术结晶,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好诗;而苏、黄以后的“以议论为诗”,违背诗歌的本质特征和形象思维的创作要求,甚至发展到“以骂詈为诗”,这就把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称之为诗之“一厄”。严羽反对“骂詈”议论之诗,其认识不能说全然正确,无法摆脱儒家“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窠臼,对于富反抗性的文学创作不利;但批评“以议论为诗”违背“情性”,接触到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特点,又给后世诗歌创作以有益的启迪。(蒋凡)

【以才学为诗】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严羽对于宋诗创作的某种不良倾向的概括与批评。语见其《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诗者,吟咏情性也。……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严羽此论,继承了张戒《岁寒堂诗话》对江西诗风的批评,针对当时诗弊,有为而发。大抵苏、黄之后,江西派诗人主盟诗坛,最严雅俗之辨,因而诗人无不重视读书学问。江西诗派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无一韵无出处,使事融会经史,高其骨格,以资标

榜。苏轼才学纵横,发而为诗,肆其辨博,自然无所不可,因其博学中洋溢着才气性情。而黄庭坚后,同样以才学为诗,而面目一变。方回批评黄诗云:“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桐江集·刘元晖诗评》)王若虚《溇南诗话》也云:“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耳。”针对江西诗派的不良诗风,严羽批评他们是“以才学为诗”。江西诗人,“多务使事不问兴致”,视读书为作诗,堆砌典实,卖弄学问,玩弄艺术,则违背诗歌“吟咏性情”的抒情特征,远离形象思维的艺术。读书并不妨碍作诗,读书可以增加间接的生活知识,所以问题不在是否读书,而在如何读法。如杜甫读书破万卷,书为诗用,不为诗累而增其情趣。故严羽论诗,并不一般地反对读书,所以说是“古人未尝不读书”;后人反之,专在诗中掉书袋,炫博逞辩,卖弄学问,则读书愈多而性灵愈窒。可见严羽的批评正中肯綮,对纠正不良诗风,发扬优良传统,具有一定的意义。(蒋凡)

【以文字为诗】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严羽对于宋诗散文化倾向的一种概括与批评。语见其《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严羽对于诗歌,提倡“兴趣”与“妙悟”,说明他对诗歌作为抒情性文学的艺术特征,以及文学创作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已有所认识。据此,他严厉抨击了苏轼、黄庭坚之后宋诗的散文化倾向。其实,对诗歌散文化的批评,并不始于严羽。如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就称引黄庭坚语云:“杜(甫)之诗法,韩(愈)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批评了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倾向。这一“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在宋诗发展中得到了加强,黄庭坚自己也难免此弊。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批评黄庭坚作诗“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又如张戒《岁寒堂诗话》批评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但是“以文为诗”,经过苏(轼)黄(庭坚)的发展,却逐渐垄断北宋诗坛而开一代诗风。当然,在文学史上“以文为诗”有功有过:开拓诗歌新洞天,增加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多运用虚词,以散文句式章法入诗,运散入诗以增强诗歌气势等,其功不可没;在这方面,严羽因其“以文为诗”而一概否定,认识有其片面性。但是,“以文为诗”不重诗和文的区别,忽视诗歌的独特抒情艺术特征和形象思维的创作要求,其过不可讳;在

这方面,严羽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以文为诗”,一般缺少含蓄蕴藉的“一唱三叹之音”,直露而无余味,令人“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处”(《沧浪诗话·诗辨》)。严羽的批评,当时如刘克庄就有共鸣,其《竹溪诗序》云:“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于此可见,严羽对于“以文为诗”的批评,利于纠正不良诗风,继承和发展了诗歌重视意境创造的优良传统,不仅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促进了后世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蒋凡)

【以《易》为诗】古代诗学概念。《易》是儒家经典之一,被后世尊为“一部探究自然天道、世事人性深层奥秘的著作。明代张蔚然《西园诗麈》云:“《易》象幽微,法邻比兴。”已经指出《易》与诗歌特点多有一致性。清初屈大均更主张“以《易》为诗”,“合《易》与诗为一”,诗“与《易》相表里”(《翁山诗外自序》)。而屈氏更进一步结合《易》道来论诗,它要求在诗歌中充实人性和天道的内蕴,使诗歌具有类似《易》的功用职能,究求道理,出鬼入神,囊括万象,并要求诗人视此为创作的“源”、“本”。屈大均肯定的“性与天道”,较多属于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准绳,但又有非其得以全部牢笼者,具有更加广厚深奥的自然、人世涵蕴,有利于诗歌题材向广度拓展和主题意蕴向纵深开掘。同时,“以《易》为诗”还指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层出不穷,莫定一辙,而诗歌缀词联句、组织意象,又能够幻忽灵动,奇变无迹。再次,屈大均借以说明诗与《易》在尚变方面的一致性。《易经》以“易”取名,原含变易之义,诗歌创作也应不断追求创新,通变不滞,这也是他反对拟古主义的重要理由之一。又次,“以《易》为诗”借《易》中阴阳男女交感生物的概念来肯定多言男女情事一类诗歌,从而为他替“托意男女”或单纯的情诗作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郭国平)

【诗中有画】与诗学密切相关的古代美学概念。见于宋代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盛唐诗人王维的字。通过对于王维诗画创作的欣赏与评论,苏轼以简洁精当的语言,概括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某些艺术特征,说明了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彼此生发的艺术交流,揭示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欣赏的普遍规律。作者认为,“诗画本一律”(见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是语言的艺术,是无形的画,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内在的神韵是通过如画一般的生动形象来传达的。诗要有意境,而诗的意境与绘画一样,必须具有生动的艺术形象,令人有所

历如在目前的感觉。而绘画虽是一种视觉艺术,它运用可见的笔墨,具体地状物写景,描绘形象,以形传神,融形象与感情于一炉,给人以审美愉悦,强调的是画中要有诗般的意境和韵味。这一理论,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晁以道和之云:“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强调了如画的艺术形象与诗歌韵外之致的完美统一。后世如明代李贽更是据苏轼之论而加以发挥,他在《诗画》一文中说:“(卓吾子)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见李贽《焚书》卷五)这一理论,揭示了内容与形式,具体与概括、物象与意象诸种关系,对后世美学中的形神、情景诸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蒋凡)

【诗中有人】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吴乔《围炉诗话》:“诗中须有人。”意谓诗人作诗应该真实地抒发个人情思、志尚,描写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内心感受,使作品带有诗人个性,而不是堆砌词藻,摹仿陈言,人云亦云。它与“言志”、“缘情”、“独抒性灵”诸说一脉相承。“诗中有人”之说要求各类诗歌,无论描写哪种题材,表现什么内容,都要倾注诗人的精神,透露自己真实的性灵。吴乔“诗中须有人”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批评明代前后七子诗歌“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浓红重绿,陈言剿句,千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诗中有人提出正是对这种不良创作倾向的有力反拨。吴乔所理解的“诗中须有人”,含义还是相当宽泛的。从诗话举例可知,凡是诗人在作品中“自托”(如黄巢《咏菊诗》)、“寄慨”(如妓女咏骰子诗)、“寄规”(如杜甫许多规谏讽喻作品),即一切“有为而作”的诗歌,都包括在这一概念范畴之内。除此而外,“诗中须有人”说还对诗人品格提出很高要求。一般说来,写诗要做到诗中有人,并不太难,因为诗人总是有感而发,所以诗人的全部诗作多少总能映现出他们的心灵和身影。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吴乔“诗中须有人”说还进一步强调诗人对高尚、博大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诗中有没有人,其实质是诗中应该表现怎样的人格和性灵。他认为,陶潜、杜甫诗歌“涵冶性情”,“忧君爱国”,境界宽厚博大,才是真正值得推崇的典范,而“叹老嗟卑”、“留连声色”,仅表现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作品并不值得多少仰慕,更不要说传递“攀缘贵要”、趋炎附势心理的卑劣之作,自当将其排斥在外。总之,吴乔要求诗中有人。不仅是指诗人要真实地抒情言志,更在于要求

诗人培养美好、高尚、宽博的襟抱志趣,以便提高诗歌抒情述志的质量和境界。剔去这些要求中包含的封建伦理落后内容,“诗中有人”说对诗歌创作的诗人襟怀的合理期望,有利于促进诗歌的积极发展。近代黄遵宪也提倡“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人境庐诗草自序》)。由此可见吴乔“诗中有人”说的影响。

(邹国平)

【诗为名理】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毛先舒《青桂堂新咏引》:“诗之为物,名理而已。”“名”谓名教,“理”谓道理、理学,名理也可简称“理”。“诗为名理”之说将儒家肯定的天理人性、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奉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信仰,视理为诗歌创作的灵魂、核心,起着统摄其他因素的主宰作用。毛氏又云:“理有义、有事、有情、有辞。”义、事、情、辞统摄于理,则无“悖义”、“夸事”、“溢情”、“芜辞”(《文论一》),这是他对诗文创作和批评的要求。“诗为名理”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对“诗教”和“尚理”说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儒家诗论的正统性和较多的保守性。其次,是强调理的诗化表现。毛氏认为,诗歌虽然和散文一样受到理的主宰驾驭,理在诗歌中的性质和地位与其在散文中并无两样,可是,它们表达理的方式和特点并不相同,散文允许对理直接宣示,诗歌中的理则更多凭借情景较为隐蔽地呈现。《青桂堂新咏引》:“顾理弗可以显为辞,而借情与景透迤迁延而后出之,故指微而音永,俾之遐思,不可直寻,诗之道也。故曰:诗之亡也,亡于理胜,非理胜之能亡诗也,以理言理,而情景亡,并理亦亡,则诗从而亡。”他反对在诗里直接“以理言理”,提倡理统领情景又从情景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而使一首诗歌“何物非情”,“何情非理”,让读者“因物而识情,因情以识理”(同上)。对情、景、理三者关系的正确把握,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作意蕴和艺术完美结合的诗歌整体。这又丰富了古代诗歌创作理论。(邹国平)

【真诗乃在民间】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民间之诗最富真情实感,能感动人,才称得上真诗。语出明李梦阳《诗集自序》:“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骂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又云:“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在这篇自序中李梦阳引王叔武语阐发了“真诗”的概念:一、真诗乃是人们生活中感情的自然流露,故称为“天地自然之音”,它与出自文人的情寡而词工的作品截然不同。二、其艺术表现形式大都是“行吟而坐歌”、“此唱而彼和”,因此都是

富于比兴的,与文人直率之词不同。三、诗之“真”不关乎其雅或俗,古代的真诗在《风》,金元时期则在胡曲(据徐渭《曲序》,李梦阳曾把《西厢记》比作《离骚》)。明代的真诗何在?此文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否定了当时文人学子的韵言。但据李开先《词谑》记载,李梦阳曾教人学诗先学《锁南枝》等,则他显然认为明代的真诗乃在当时流行的民歌时调了。关于“真诗”和真情的关系,历来文论家均颇重视。如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皎然《诗式》云:“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张耒《贺方回乐府序》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这些话对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之说有一定的影响,然尤值得注意的乃是金刘祁在《归潜志》中的一段话:“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这段话与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之说非常接近。于此可见,他对民歌俗曲的重视,几乎是与当时民歌俗曲的繁荣是同步的。金元之际北曲兴,遂有刘祁之论;明代民歌时调兴,李梦阳便发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稍后李开先继之,收集并刊印了当时的民歌为《市井艳词》,并作序加以称道:“忧则词哀,乐则词褻,以今古同情也。但淫艳褻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

(刘明今)

【诗酒文饭】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和《围炉诗话》卷一,又见赵执信《谈龙录》引述,以《围炉诗话》记载为详尽。“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牘、记载、辨解,皆实用也。实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吴氏“诗酒文饭”说指出了诗歌与实用性散文表意方式和观读效果的区别,突出了言与意非直接对应的“变形”关系,从而深刻揭示了诗歌的艺术特征。重“意”是吴乔反复强调的文学观点,他认为诗歌与散文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二者区别在于,文章服务于“人事之实用”,辞语宜“副意”而

“达”;诗歌表现“人事之虚用”,言辞“不必副乎意”,而宜婉曲。说明文章的辞意关系是直接的,诗歌的辞意关系是间接的,犹如酿米造酒,不见米的颗粒。从写作的目的和效果方面说,文章是直接讲述事理,释疑解惑,好比吃饭求饱,延续生命;诗歌抒情述志,陶冶性情,犹如饮酒而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见《答万季野诗问》)经过吴乔形象化的比喻,诗文之别非常清晰,因此赵执信赞叹:“旨哉言乎!”吴乔说的“文”主要指诏敕、书疏等一些实用性散文,与纯文艺性散文还有一些不同,其实后者的言意关系也经过作者一定的“变形”处理,不过“变形”的程度不及诗歌而已。外国文论家主要着眼于文艺性散文和诗歌的区别,将散文比喻为散步,诗歌比喻为跳舞,这与吴乔诗酒文饭之说异曲同工,适可互补。

(郭国平)

【文】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综括了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及其形式之美,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具多层次的意义,言其大者,可分为哲学层次、审美层次和文体层次。首先,“文”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先秦时代已经确立。《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易·贲卦·彖》云:“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天文包括日月星辰和山川草木等自然形态,人文则包括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存在形式。人类文明也由原始社会“结绳而治”,进步到上古三代的“易之以书契”,以文字作为文明的信息载体,于是人文之“文”也就发展成一个独立系统。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以礼乐刑政为“文”,如《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二是以五经六艺等古代典籍为“文”,如《论语·子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学者多释此“文”为“古之遗文”。三是以修饰润色为“文”。如《左传·襄公二十年》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四是以文字或言辞为“文”,如《国语·晋语》云:“言,身之文也。”五是以文德之操为“文”,如《论语·公冶长》云:“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于此可见,“人文”之“文”的含义何等广泛而丰富。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文”,就被后来的文论家用来建构其思想理论的根本依据或逻辑起点,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其次,“文”在审美层次的展开,总括了众多令人愉悦的审美形式,具体可分为形文、声文、辞采之文和情性之文四类。形文指一切由线条、颜色、形体按一定规律组成的能引发人的视觉快感的审美形式。如《周礼·考工记·画绩之

事》：“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声文则是指运用声音的清浊、长短、疾徐、高下、刚柔组成诉诸人的听觉的审美形式，即各种音乐作品。如《礼记·乐记》云：“声成文，谓之音。”辞采之文，是指语言文字所构成的审美形式。如东汉刘熙《释名》云：“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义），如文绣然也。”刘勰《文心雕龙》专设《丽辞》《声律》《事类》诸篇，系统分析了辞采之文的审美要求及其有关规律。情性之文则是指主要以人的思想情感为审美对象的纯文学作品。特别是魏晋文学自觉以后，对情文审美要求的认识日渐深刻，如《文心雕龙·情采》篇，反对“为文造情”，而要求“为情造文”，强调“五情发而为辞章”，把“文”作为“情”的审美形式加以体现。又如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表现了作为情性之文的理论自觉。这影响一直到明中晚期，由于俗文学的兴起和提倡，文论家又结合情文注入了近代性文艺变革的历史新内容。详见“性情”条。第三，“文”在文体层次的历史演进，也记录了古代文学观念演进的痕迹。两汉以前文体概念尚未明晰，至魏晋后，曹丕《典论·论文》首先将“文”分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分为十体并分析其艺术特点，这才标志着“文”的内涵在文体层次上真正进入了自觉时期。于是六朝时出现了文笔之辨，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但发展到隋唐以后，文笔之分又逐渐演变为诗、文对举，人们专指古文为“文”。这就确立了诗、文正宗，二元发展的文体论格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第一次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才真正进入了杂文学文体论向纯文学文体论转变的新时期。关于“文”作为文体，其历史演进的含义，章炳麟在《文学论略》中作了系统的总结。“文”作为一个通贯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范畴，其历史内涵的演进也到此终结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现代纯文学体系的确立，作为文艺审美范畴的“文”，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其重要性已降了级，只是作为文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仍然存在并发挥其作用。

（黄保真）

【文学】 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古今涵义有变化和不同。在中国古代，“文学”要义有四：一是泛指文化学术。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二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和一般文化学术的人。《韩非子·六反》：“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史记·儒林传》：“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三是指官名。

汉制，于诸王国，各州郡皆置“文学”。《史记·儒林列传》：“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以后魏、晋、北周、唐，均不设“文学”之官。四、也指文章或文才。如《南齐书·文学传》《隋书·文学传》同其他正史中的《文苑传》一样，都是为文章之士立传，所以“文学”概念的内涵，其义略同于“文章”，即今天所说的广义的杂文学。在中国典籍和传统文论中，也有个别的“文学”内涵接近于今天的纯文学观点的。如《梁书·简文帝纪》中说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司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这只是偶尔及之，还谈不上是自觉的纯文学的“文学”概念。就连刘熙载的《文概》，开宗明义，还是说：“六经，文之范围也。”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纯文学的“文学”概念，确切地说，是由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文中，才正式由日本引进并开始使用的。这种“文学”概念，在当时多称为“美术”。我们今天将古代的“文章”笼统地称之为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枉古从今。现代有些文学批评史家，有鉴于此，才特地使用了“杂文学”、“纯文学”两个概念。“杂文学”的外延等同于“文章”，“纯文学”的外延则为以审美为特质的各体文艺样式，如诗、词、戏曲、小说等。

（黄保真）

【文章】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它是一个涵盖面极广而与“文”交叉的范畴，几乎总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诗经·小雅·六月》有“织文鸟章，白旆央央”之语，“文”和“章”并举，用来形容旗帜的图案文采。虽已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识，但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文章”。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较全面地概括了“文章”的涵义：“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有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独以五采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彰彰。然古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申。……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是故榘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章氏本于朴学家的见地，坚持杂文学观念，以训诂之法，考论文学，反对以纯美为标准，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义界，所论有其贯通处，也有其狭隘处。总之，

“文章”既是一个审美意蕴十分丰富的范畴,又不是——一个纯美的范畴。最初,文章是指由色彩、线条按一定规律错杂交织而成的花纹、图案。这本来是纯属诉诸视觉的审美形式。但是,在远古时代,线条、颜色的错杂排列,却成了物化初民全部“天人”意识——宇宙观念、人生观念及其相互连结、转化规律的符号系统。《周易》中传说包牺氏画八卦以“—”代表阳,以“--”代表阴,阴阳三画排列成八卦,八卦重叠而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象征天地万物阴阳变化的运动规律,所以《易·说卦》称“《易》六位而成章”。高亨注:“章,文章也。”原始初民画八卦而成文章,用线条来象征对天人关系、事物变化的原始认识,这是确无疑义的。而初民创造的线条符号,蕴含着原始的审美意识,也是确无疑义的。线条交织而成文章是如此;色彩交织而成文章也是如此。《周礼·考工记》:“画绩之事,杂五色。……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可见,色彩错杂以成图形,也是古人对天、地、人间万事万物所获认识的物化形态。诉诸听觉的审美形式,也称之为“文章”。《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郑玄注:“方,犹文章也。”孔颖达疏:“方,谓文章,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谓之音也。”声音高下、清浊、疾徐、刚柔构成的听觉形式,都可概称为“文章”,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审美意义,但又都是同社会功利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进步,“文章”便成了实现政治教化目的的审美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文明人组织社会生活的审美形式了。《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为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何晏《集解》:“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文章”之义,十分明确,就是指带有审美意味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了。应当指出,远在春秋时代,“文章”已经有了纯视觉形式的涵义。《墨子·非乐上》:“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庄子·胠箧》:“灭文章、散五采。”《荀子·非相》:“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荀子·乐论》:“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文章”则都是指诉诸感觉的审美形式。汉以后,“文章”作为礼乐刑政制度的涵义,逐渐从历史上消逝,而作为纯视觉的审美形式,其涵义却保存了下来。虽然在先秦时,“文章”涵义有时也包括“文辞”,如《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但毕竟没有通行。到了汉代,“文章”则逐渐演变为主要指一切用文字写下来的文辞、篇章乃至史书、论著了。但班固《汉书·公

孙弘卜式儿宽传赞》:“文章则司马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两都赋序》:“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文章”似又专指辞赋之作。“文章”之义,又出现了向纯文学过渡的迹象。汉人的“文学”和“文章”之分,说明了“文章”的纯文学意义逐渐加强。但就总体观之,魏晋以后,自觉的文体观念虽然日趋精密,但“文章”依然是作为综括一切文体的范畴而存在,其义相当于文体层次上广义之“文”。参见“文”条。

(黄保真)

【文笔】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文笔”一词,汉代已有,语见《论衡·超奇》:“文笔不足类也。”但此“文笔”泛指文章。中国文学发展到六朝,理论观念渐趋精密,于是产生“文笔之辨”。文笔之分,始见于《南史·颜延之传》:南朝宋文帝问颜延之诸子的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至于文与笔有何不同?各家说法,亦不一致。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他是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颜延之则又将“笔”与“言”分开,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这是说,直言(口语)为“言”,文饰为“笔”,文饰而有韵者是“文”。刘勰反对颜延之的三分说,但坚持无韵为笔,有韵为文,而且不加轩輊。萧绎则把文笔之分讲得更细。他说:“不便为诗如阎纂,喜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这则是说辞采、声律、抒情性、动情性四者兼备,方可为文了。到了唐代中期,文笔之说虽仍沿用,但由于各体诗歌全面繁荣,古文运动继而兴起,文指古文,于是文笔之辨逐步让位于诗文对举。直到清代中叶,古文写作,流弊日甚,骈体文章,一时复盛。于是阮元提出“文言说——文韵说”来与桐城派古文争夺“文统”。他在《文言说》、《文韵说》、《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四六丛话序》、《学海堂文笔策问》等论著中,较系统地从理论上重新恢复了“文、笔之辨”的命题,以“奇偶相生,音韵相和”、“沉思翰藻”为“文”,以“清言质说”,“单行”散体为“笔”。他还尖锐地指出:“今人所作古文……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记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近人刘师培复广其说。他在《广阮氏文言说》、《文说》、《文章源始》等篇中,详考博征,推阐细密,以确证“三代之时,文与语别,六朝以降,文与笔分……单行之词,实与文章

有别”(《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因阮、刘二人均为仪征(今属江苏)人,所以人们又称倡“文言——文韵”之说者为“仪征派”。总之,从南朝到清末,文与笔作为文体论范畴,它们综合概括了中国古代杂文学样式中两大类别的文体系统的基本特征。清代刘天惠、侯康、梁光钊等,还各有《文笔考》一篇,持论虽非尽当,但所录历代各家之说甚详。(黄保真)

【文笔说】见“文笔”。

【文言说】见“文笔”。

【文质】古代诗学概念。“文质”既可以是由“文”与“质”两个各具独立意义的词素以并列结构组成的一个术语,也可以被当作一对并举的相对概念的缩写。语见《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文”,指外观形式的文采,这点没有疑义。但所称“质”,有的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有的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其实,这两种说法可以相通,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称“文质备也”,也有人说是“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解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论语·颜渊》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皮去毛曰鞞。毛所显示的不同花纹,不仅是质的表现形式,而且本身就是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乃有其文;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其“质资文宣”,就含有质待文现的意思。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又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即强调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当然,古代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重质轻文,由此提出了“文灭质”之论。如《庄子·缮性》云:“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人文之“文”竟然是对事物纯朴之质的破坏,“文”被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

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所以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片面的“文质”说,影响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论。后世的“文质”概念,多沿袭儒家传统之说加以发展。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格、文体特性和个人风格等。唐魏徵《隋书·文学传论》云:“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文质斌斌”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古代还有一些理论家,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如《文心雕龙·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又《通变》篇:“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隳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显示了“文质”理论的深化和中国古代诗歌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保真)

【文质彬彬】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质朴鄙野。史,古代史官近于卜祝之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卜祝之辞,率多夸饰。孔子指出,无论言辞或写作,质朴多于文采,就不免鄙野;而文采多于质朴,又流于浮夸虚饰。只有文采与质朴两者恰当地结合,才是君子的风格。彬彬,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说:“文质相半之貌。”朱熹《论语集注》云:“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文质彬彬,原是指仁义道德与礼乐文化修养兼备。但后人加以引申发挥,常指文学创作,因此对后世文艺批评影响至为深广。如《韩非子·难言》“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即本于此。其后批评家或引申以指文章风格的丽彩与质朴相配合,或引申以指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孔子“文质彬彬”之说。但按孔子原意,不论文或质,都兼有内容与形式两重意思。质,作为本质、质地、实质等,是偏于内容方面的;但朴素、自然、本色的表现,则又是属于形式的了。文,作为文采丽藻华饰,是偏于形式方面的;然而孔子论文,大都与其人的思想品德气质相联系。《论语·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就是兼指道德文化修养而言的。又《论语·颜渊》载:“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

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子贡对棘子成重质废文的片面观点表示遗憾，认为这是驷马难追的失言。他继承孔子“文质彬彬”之说，指出了文与质有其同一性，不可偏废。子贡是孔门中擅长言辞的高足，他的发挥，合于孔子意旨，孕育着内容与形式统一、朴素与华采结合的辩证因素。后来陆机《文赋》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所论文质，内涵有小别，但反映了儒家“文质彬彬”之说的影响在历代文学发展中源远流长。（蒋凡）

【由质开文】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徐祯卿论诗以质为本而又文质兼重的主张。语见其《谈艺录》：“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若乃文质杂兴，本末并用，此魏之失也。”徐氏推崇先秦两汉之诗，他认为先秦两汉的诗歌之所以远胜后代的作品，即在其“质”：“嗟夫，文胜质衰，本同末异，此圣哲所以感叹，翟、朱所以兴哀也。”他重视质，但也反对“欲拯质，必务削文；欲反本，必资去末”的偏向，因而提出“由质开文”的主张。自孔子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二者不可偏废，已成为人们论文的常识。然徐祯卿复细加分别，分为“由质开文”、“由文求质”、“文质杂兴”三类不同的状况。他认为质是第一位的，文次之，故当以质为本然后求文，即“由质开文”。先秦两汉古诗格高，其原因即在于此。而晋诗颠倒了主次，由文求质，其格所以为衰。至于魏诗则文质并重，主次不分，亦不足取。这是明显的偏重于质的观点。徐祯卿“由质开文”之说与“因情立格”之说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他重视情实的观点。他是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何景明一样都提倡复古，提倡汉魏诗歌高古的格调，但他将格调与尚质结合起来谈，力求避免徒拟声调而仅袭其貌的弊病。（刘明今）

【绘事后素】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是孔子对于礼乐与仁义关系的概括，后人引申来讨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出《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素，白色，绘画时用作底色。子夏所引之诗，见今《诗·卫风·硕人》，但“素以为绚兮”句为逸诗而不见于今本《诗经》。关于“绘事后素”句，后人有不同解释。郑玄注：“绘画，文也。

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以为是先敷彩而后布素。朱熹《论语集注》云：“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其说与郑玄有异。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则据朱说而加以发挥，译为“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今从朱、杨之说。在这里，孔子阐发《硕人》的诗意，谓绘画必须事先有素底，然后施加彩色。子夏受其启迪，很快悟到礼的内在实质，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赏。礼是什么？在孔子看来，是仁义道德观念的物化形式，即其制度化，所以杨伯峻《译注》于此补充“仁义”二字，直接译为“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这补充有道理。孔子曾说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都强调先仁义而后礼乐，仁义是内在的本质，礼乐则是外现的形式。人的内在本质——仁义道德充实，则自然外溢而发为礼乐之光彩。后代的文学家，根据孔子意思加以发挥，于是强调文学家的内在人格道德修养，启发后来人们对作家人品与文品关系的注意与研究，进一步又涉及创作中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质指思想内容，文指表现形式，内质外文，质先于文，文表现质。儒家那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学观，就建立在质先于文、文为质服务——即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的“文附质”、“质待文”的观点，以为“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即本孔子之言而发。（蒋凡）

【气】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于此见“气”对于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的重要。以气论文，虽始于曹丕《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等，但有其历史必然性。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由气所构成，人体亦不例外。不但以气解释人的生命、生理现象，而且以气解释人的精神、心理现象。如《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其气指坚强的自信心、强大的精神力量；养气即进行道德修养以培养此种力量。又如《荀子·修身》提出“治气养心”之说，认为“血气刚强”、“勇胆猛戾”、“狭隘褊小”等性格、品质特点均与气有关。“治气”即矫正、改变性格。两汉时期，人们用气解释宇宙和人体、人性更为普遍，且显得较完整而有系统。如董仲舒说人有仁、贪之气，故有仁、贪之性（见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充认为人之先天禀受,有天气、仁气、勇气等,因其所禀之多寡厚薄,遂有不同的品行。又认为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才能,之所以有贵贱贫富,也都由于禀气不同之故。汉代人还常用土地之气不同来解释各地人民性质、风气之异。又有人用五行之气不同以说明人们气质之多样性。至汉末三国时期,随着上层社会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气的概念遂也用于评价、称道具体人物,如蔡邕称申屠蟠“禀气玄妙”(《后汉书·申屠蟠传》),称胡根“应气淑灵”(《童幼胡根碑》),佚名《中论序》称徐幹“含元休清明之气”,陆绩《述玄》称扬雄“受气纯和”,韦昭等《吴书》称虞翻“有高气”,杨戏《季汉辅臣赞》称庞士元“雅气晔晔”等。正是在此背景上,曹丕以气评论作家的性格、气质特点和此种特点体现于作品而形成的总体风貌。曹丕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他称徐幹“时有齐气”,是说徐幹为齐人,禀受齐地水土之风气,性格舒缓,而其作品亦有舒缓风格。“公幹有逸气”,指刘桢为人少所拘忌,其作品亦有奔逸不羁的风貌。“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言孔融之为人既高风跨俗,其文章亦给人卓越不凡之感。曹丕又以气解释创作才能。《典论·论文》云:“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谓创作才能之高下,取决于先天禀气之清浊。气从此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后来渐渐成为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其意义大体沿袭曹丕,就作家、作品两方面而言。刘勰《文心雕龙》称曹操、曹丕、曹植“气爽才丽”(《乐府》),称刘桢“气褊”(《体性》),均指作者之性格、气质而言。刘勰还把各种性格气质概括为两大类,说“气有刚柔”(《体性》);又称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明诗》),则指作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精神状态。建安诗人遭乱流寓,内心激动不平,故情感尤为强烈,不可阻遏,喷发而出,即所谓“任气”。刘勰也认为作者的气质、精神状态与作品的风貌一致,即所谓“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后世诗文评仍大量使用气以指说作品风格,如奇气、雄健之气、清拔之气、纵横之气、伧气等。又,气以盛大为美。如《文心雕龙》有“气伟而采奇”(《诸子》)、“气盛而辞断”(《檄移》)、“气扬采飞”(《章表》)、“骨劲而气猛”(《风骨》)等语,均指作品具有雄奇、劲健、昂扬的阳刚之美。而“索寞乏气”(《风骨》)则是说作品给人以萎靡不振、无生气之感。钟嵘《诗品》称刘桢诗“仗气爱奇”、“气过其文”,也是指刚健有力的风格而言;称陆机“气少于公幹”,是说其诗不如刘桢诗富于力量。至唐宋时,古文家也多有论气者,指作家的精神状态或文章的气势。他们往往将气与道、理相联系,

认为道在气之上,气应受道的统帅和支配。他们所说养气,则多是指道德品质和审美情趣的修养。

(杨明)

【文气】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主要指行文的气势、力度和感人的内涵、力量。但在古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理论内容也是不断变化而逐渐丰富的。所谓“气”,原是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指宇宙本体万物的本原。《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气耳。”由宇宙本体之“气”引申出人的血气之气、气质之气和作为内在精神力量的气。专称精神力量为“气”始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他并没有直接说明养气与知言的联系,但是后人却受其启发而沟通二者。唐代韩愈提出的文气说,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这里的“气”主要是指行文的气势。但是这种气势是来自作者主观的精神力量。韩愈说自己创作行文时,“浩乎其沛然”的力量,主要产生于长期的主观修养,即“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结果。宋代苏辙则进一步发展了孟子、韩愈的说法。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养气”不仅指内在精神的修养,而且进一步强调生活实践,即闻见阅历的作用。而所谓“文气”,也被确指为人的精神力量的物化形态,即文章的风格、气势,感染人、说服人的内在力量和语言文字形式了。另一种文气说,则较侧重于文艺家先天的禀赋,着重讨论文艺家先天禀赋的精神、气质同文艺作品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关系。专门从作家的先天禀赋、精神气质着眼论作家、作品的一派,始于曹丕。其《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这都是说人先天的精神、气质禀赋决定了作品的艺术风格。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又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不过,他说的决定作品艺术风格的“气”又兼有了生理性的“血气”之气,精神性的“志气”之气和心理性的“气质”之气。例如他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

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就兼有上述三种意思。因此,他讲“养气”就不是单纯强调“配义与道”的道德修养,而兼及生理、心理的锻炼。因此主张“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湊理勿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养气》)。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櫟,则把以上的两种文气说,予以综合并抽象化了。他用一个“神”字不仅统括了前人所说的血气之气,气质之气,精神之气,而且兼摄其作品本质特征。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他这里所说的:“气”则近乎专指作品内在的气势、力量、审美特征。由于这样理解“文气”,所以刘大櫟一方面把文气说抽象化了,另一方面又把文气说具体化了。他指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字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不可见,以字句准之。”“文气说”发展到这里,虚实结合,精粗融贯,其理论形态可谓完备了。(黄保真)

【气象】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理论含义,由创作主体的精神气韵,到表现作品审美特征的意态风格,无所不包,其中又多用来概括壮美形态的雄浑境界。如唐韩愈《荐士》诗云:“建安能者七,卓犖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其审美意义明显。但是,“气象”原来可指自然景色。如《梁书·徐勉传》称引《答客喻》云:“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其“气象”犹气候季节,不含感情色彩或审美意蕴。后来,“气象”又常用来指人物的精神风貌,如《新唐书·王丘传》说传主“气象清古,行修洁,于词赋尤高”。但由此引申,人物气象又与艺术形象相关,如明谢榛《四溟诗话》:“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其“气象”则泛指创造主体的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在古文论中,总其要义:一指特定时代、特定流派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特质。上引韩愈《荐士》诗中的“气象”,即属此例。又如宋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云:“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茶,其病至今犹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二是指构成诗、文作品艺术之美的基本要素,并由此对诗文创提出提出了特定的审美要求。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夫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

陶明潜《诗说杂记》解释说:“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而后可以为诗。”都将“气象”视为创作要素。至于清洪亮吉《北江诗话》云:“陶彭泽诗,有化工气象,余则惟能描摹山水,刻划风云,如潘、陆、鲍、左、二谢等是矣。”又从“气象”这一特定审美要素,引申出相应的创作方法。三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一种特定审美形态,即风格壮美的雄浑境界。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称:“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纤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可见“气象”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雄浑境界,艺术要求是很高的,连韩愈都没达到。后来,王国维又以之论词。词的传统风格虽以婉约为正宗,但也有以气象浑沦、境界宏阔胜者,王氏《人间词话》云:“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惟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但清代古文家用以论古文“气象”之义,因文体特点而稍异,如恽敬《与舒白香》云:“至所谓疏古,乃通体枝叶扶疏,气象浑雅。”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与雄浑壮阔之境不同,浑雅、疏古、纯懿的审美要求,的确适用于以理论叙事为主的散文体制,而不宜于抒情造境为本的诗词。其“气象”意蕴的变化,出于文体之自然。(黄保真)

【气韵】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气韵一词最早用于评画,语见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至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采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他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以后,气韵经常见于历代画论中,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清唐岱《绘事发微·气韵》:“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之真气。凡物无气不生。……六法中原以气韵为先,然有气则有韵,无气则板呆矣。气韵由笔墨而生,或取圆浑而雄壮者,或取顺快而流畅者。”从这些有代表性的阐述中,可知气韵指绘画形象生动传神,其源于画家品格灵府高拔超逸,具体的风格表现则又多种多样,圆浑雄壮,顺快流畅等,无不以气韵流贯。“气韵”从画论移用到诗论,几乎与画论同步,

其内容也包括上述主要的含义。语见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此处“文章”，或者说主要是指诗歌。说明“气韵”是诗人“情性”、“神明”的自然流露。屠隆认为世人爱好梁鸿、陶渊明、王绩、孟浩然等人诗歌，“岂非以其抱幽贞之操，达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气韵胜哉”（《白榆集》卷三《李山人诗集序》）。具体指出气韵主要出于诗人幽贞柔澹的情操志趣。诗歌的气韵是指作品生气活力，神理内质之美，“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陈善《扞虱新话》卷七）。“晋诗如丛彩为花，绝少生韵。”（陆时雍《诗镜总论》）。“五言佳处，全在气韵，不求工于语言对偶之间”（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卷一一评邝露《洞庭酒楼》）。可见仅仅追求词藻、声律、对偶，而诗歌神理不称者，是无气韵之作。气韵又非简单地等同于诗中之志，有情的诗歌未必有气韵。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二：“唐人之诗，虽主乎情，而盛衰则在气韵。如中唐律诗、晚唐绝句，亦未尝无情，而终不得与初盛相较，正是其气韵衰飒耳。”气韵不像诗中之情那样具体，而是指涵盖作品，贯穿其间的风致神韵。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读古人诗，须观其气韵。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气韵分雅俗。”此虽提出气韵有雅俗之分，而诗人追求的气韵往往出自气味风致高雅清深的诗境。人们提到气韵，还常用“雄深”（尤袤《全唐诗话序》）、“沉雄”（袁宏道《与丘长孺》）等词加以描述。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举张巡《闻笛》、祖咏《望蓟门》二首诗有气韵的范例。张、祖诗体气浑壮，情志昂扬，以此论气韵，也含雄厚深沉之意。因此，气韵主要指生气和清韵而言，含义与神韵相近，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就是在接近神韵的意义上使用气韵一词。如果其中“气”字主要指雄浑之气而言，则气韵又与神韵区别开来。气韵可改趋于阳刚，而神韵则偏于阴柔。

（郭国平）

【气质】古代诗学概念。《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气质”，是指“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精神素质。《谢灵运传论》还说子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是“气质”在风格上的表现。《北史·文苑传》论南北文学之不同，也论以“气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气质”与“清绮”相反，“清绮”来自后天的熏染，“气质”则源于朴实的本性。吕本中《童蒙诗训》说：“初学作诗，宁失

之野，不可失之靡丽。失之野，不害气质；失之靡丽，不可复整顿。”可见，直抒胸臆，朴实刚健，就是“重乎气质”的表现。唐初，承陈、隋乱后，诗文创作“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丛脞，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明六合”（宋石介《上赵先生书》）。“气质”作用如此之大，可见它与作者的抱负、信念是分不开的。建安诗人有着救世的抱负，执着的信念，发而为诗，故充满了一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对人生的眷念难舍之情。虽然时命多舛，但决不妥协屈首；虽然满目疮痍，但不气馁愁哀。诗有“气质”，首先所指的就是这种主体胸襟的展现，满腔热情的流露。在表达方式上，它直抒情感，一吐为快，笔墨酣畅淋漓，决不含含糊糊、欲吐还休地故作姿态。诗有“气质”，语言质朴而能流动，明朗而又爽快，决不雕文镂彩以害本色。诗有“气质”，则贞刚劲健；诗无“气质”，则格调卑弱。

（张小平）

【气格】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如宋代的《宣和画谱》云：“杜牧作行草，气格雄健。”又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尊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气，指人的精神气质。诗论中，它指诗人精神气质流注于作品所形成的蕴含、生机、气势，而不同于具体内容。“文以气为主，诗亦然。”（卫宗武《赵帅干在莒吟集序》）学诗当知“气充言雄之旨”（宋濂《林伯恭诗集序》），“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即生，无气则死。但气有大小，不能一致。”（钱泳《履园谭诗》）“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皆肯定气贯通诗篇，是诗歌的精神和生命。格有二义。清薛雪《一瓢诗话》：“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品高虽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间而已。所以品格之格与体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语。”“品格”指旨义趣尚，属诗歌内容；“体格”指体制格式，主要属诗歌形式。格与气并称，主要取其第一义，如上述叶梦得赞欧阳修诗“气格”即是。又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诗文以气格为主，繁简勿论。”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愚谓长源《怀淮阴侯》诗：‘渭水波涛喧陇阪，散关形势轧兴元。’气格亦不减古人也。大约以幽、并慷慨之气出之，非尽追摹格调而成。”都是以气格指诗歌生气充盈，品格高远，气势宏放。以气格论诗，主要强调作诗要抒发真情实意，内蕴充实，境界阔大，笔力高健深厚，首尾一气贯通。它的反面是词气卑弱，滞涩晦暗。刘熙载还进一步指出：“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诗家

泛言气格,未是。”(《艺概·诗概》)他肯定清厚高雅的“气格”,其实与古人通常谈到的气格意思相近相通。

(郭国平)

【气势】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释皎然《诗式·明势》:“气胜势飞,合沓相属。”唐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云:“尝观韩吏部诗歌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势”、“气势”原是兵家用语,指士气军势排山倒海,锐不可挡。《孙子兵法·兵势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淮南子·兵略》:“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此谓气势。”文学批评术语“气势”一词由此移用而来,指散文、诗歌文气流畅宏达,富有声势力度。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提出写文章“即体成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又认为“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他认为“势”是具体而合自然的,且普遍存在于“刚柔”不同风格的作品中。王夫之认为写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之神理也”(《薑斋诗话》卷下)。说明以势辅意,宛转屈伸,方能写出诗歌神理,使作品具有矫健的活力。写散文讲究敛气以蓄势,写诗也重取势。诗歌取势之理与绘画的道理相通。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尤精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这种以少摄多,以近含远,咫尺之内包涵万里之势的构图特点,也正是诗歌(尤其是体制短小的作品)具有气势所必需的条件。王夫之对此作了说明,“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他举崔颢《长干曲》为例,“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赞美此诗“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薑斋诗话》卷下)。这首诗只写了“借问”一个动作,而将女子内心浓烈的怀恋故乡之情和盘托出。由此可见,作诗取势就是寻到一个制高点,让一腔情感勃然喷动,畅肆流泻,诗歌气势也在其中。“气势”一词还经常被用来说明笔力雄健,纵横吞吐,大气磅礴一类诗歌的艺术特点。皎然《诗式》第一条《明势》以“萦回盘礴,千变万态”形容“开阖作用之势”的“奇势”。说明“气势”是诗歌作品强韧的力度和涌奔飞动的体貌,它更多是指壮美之诗。方东树指出,诗固然重“气势”,但是又要避免写得“太尽”、“太流易”,弥补的方法是“济以顿挫之法”,增以“厚重”之质(《昭昧詹言》卷一)。这是对“气势”说的有益补充。

(郭国平)

【灵气】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灵气”一词出现较早,《管子·内业》:“灵气在心,一来一逝。”

此处“灵气”是指人心中的灵妙之气。白居易《题浔阳楼》:“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此处“灵气”是指云雾的灵动之气。前者写人,后者指物,共通之处是“灵气”妙不可说,难以言传。以“灵气”评说诗文,则指诗文意境中存在的一种灵动情韵。唐李德裕《文章论》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这也就是说,“灵气”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苏洵《仲兄字文甫说》)的创作情思的微妙表现。汤显祖发挥《文章论》中“灵气”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玉茗堂尺牍之五·合奇序》)可见,刻写景物,追求形似,是不会有灵气的。“灵气”常与“空灵”为伍,“空灵”之“灵”,即为灵气。在许多场合,“灵气”又往往近似于“神气”。然而细细辨之,两者各有畛域。“神气”有贯注之效,“灵气”呈妙行之致。贯注,故有突破放射之喷口,如东山朝阳,霞光万道,又如画中丽人,以目传神。妙行,故无东西南北之定所,如风起蘋末,不期而来,又如朵云出岫,无求无意。“神”偏于旺,故传神写照,目光如炬;“灵”倾向淡,故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周济论词云:“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姜白石的词,就有灵气,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诗歌残有雕琢痕迹,则顿失自然灵气。

(张小平)

【清气为诗】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元刘将孙《彭宏济诗序》云:“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冰霜非不高洁,然刻厉不足玩;花柳岂不明媚,而终近妇儿。兹清气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他认为清气之于诗是不可缺少的,诗中若无清气便不足观。此清气如人之仙,花中之梅,其品极高,其表现或“简远”,或“低黯”,或“古雅”,或“怪奇”,或“优柔”,或“轻盈”,总之绝无一点尘俗气。因之,它与一般所谓的情、志、意、趣也有所不同,为情、志、意、趣之清者。其特点是“得情性”,“不知其然而然”,故“发之真”,其遇之者“神”。它的获得与追逐辞藻无关,与穷形尽相的刻画无关,而在于诗人本身的人格修养。刘将孙另有一篇《九皋诗集序》也提到清气,以鹤鸣来形容它,称其“感赏于风露之末,畅适于无人之野。其鸣也非以为人媚,其闻也非其意,而得之缥缈者,无不风骨萧然”。这里所描绘的清气同样是指诗歌中的一种缥缈脱俗的情趣。刘将孙“清气为诗”之说与元初士大夫的遗民情绪有关。元初江南士人在生活上、仕途上均遭受重大的打击,他们或隐于朝市,或遁于山林,“抚事感怆,有千古之愤”,于是酿成了一种孤高绝俗的审美趣味。赵文提出“后世之诗人

不如中古之樵者”(《萧汉杰青原樵唱序》),戴表元称“诗为清言”,非“膏粱声色,宝贵豪华”之所由出,必穷而去其“昏惫眩惑之气”,而始能成就“清言”,所倡均与刘将孙“清气为诗”之说有相通处。(刘明今)

【势】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是在“道”、“文”、“意境”等范畴之下,与“形”、“神”、“风骨”、“气象”等处于同一理论层次。在诸多文艺样式的创作中,“势”指人们借助语言文字或声音节奏,遵循一定的审美规律而展现的艺术节律或变化动态。“势”既是构成文艺作品整体美的审美要素,同时又作为审美鉴赏和艺术评价的一种特定标准。刘勰《文心雕龙》专设《定势》篇,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唐宋以后,“势”的理论运用愈加广泛,义蕴也愈加丰富。但“势”作为中国古文论中特有的审美概念,有其深厚的文化内蕴。“势”在先秦的哲学、军事论著中已广为运用。如兵书《孙子》有《势》篇,谓“战势不过奇正”,“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用“势”来概括战争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静流止的变化节律及其必然趋势。而《管子》中有《势》、《形势》等篇,把“势”看作宇宙万物之“道”的表现形态,自然节律及其发展趋势的内在驱动力。这些意见,虽非论艺,但为后代文论家将“势”向审美范畴转变,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书论、画论早在汉魏时代已受其影响,如《全后汉文》录有东汉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隶势》,文字虽可能是经过西晋卫恒整理加工而成,但论其理论渊源,决非纯属伪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定势”的理论,并非偶然。此后,至唐代,有《文镜秘府论》地卷所录《十七势》,皎然《诗式》有《明势》,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势”,清王夫之《薑斋诗话》等,于诗歌创作之“势”,论述日渐广泛。综合言之,“势”的审美义蕴主要包括以下四大层次,即客体、主体、艺术手段、文学作品。在客体层次上,“势”指现实地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的运动规律、存在秩序、发展变化的艺术态势。如《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自然之势”,“势”是由作为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的“气”的流动、贯注而形成的节律。“势”与“形”或“体”相须为用,灵活多变而相机制宜,蕴含着艺术活动中的动态美。在主体层上,“势”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心理定向发展的思维规律及其内在心理驱动力。如《文镜秘府论》地卷所录王昌龄论诗“十七势”,每“势”之后,都有详细说明和例证。其第九“感兴势”云:“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势”与诗人的灵感相关,指诗人思维和情感活动在外物激发诱导下的高度活跃的艺术节律。在艺术方法层次上,主

要指不同的文学样式运用不同的艺术媒介和手段,创作艺术作品的方式、方法和规律。如《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物色》:“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指诗赋创作中运用词采、声律以造艺术之势,甚至也包括了因文体之异而进行正确选择的行文气势,如《定势》云:“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势”有时又指艺术构思和整体布局的匠心及其审美的效果。如皎然《诗式》论“明势”云:“高手述作,如登衡、巫,窥三湘、鄢、郢山川之盛,紫回盘礴,千变万态(文章开阖作用之势)。”而在作品层次上,“势”指艺术境界中的动态美及其鉴赏者的心理效应。如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其所称“势”,不仅指作品气势或体势,更强调了艺术创作中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升华,在有限的时空中,集中表现“人情物理之变”的动态、趋势,给人以余味无穷的审美享受。(黄保真)

【味】 古代诗学概念。较早见于六朝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如《文心雕龙·宗经》篇云:“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又《辨骚》篇品评屈原《离骚》云:“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上述二“味”,一作名词用,一作动词用,但是都含有审美意义。又如《明诗》篇:“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情采》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物色》篇“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所用之“味”,则是纯粹的审美概念。在此之前,“味”原指物质的气味,及其刺激人引起生理反应的味觉。在先秦时,《老子》六十三章已有“味无味”之说,前一“味”指人对宇宙万物及其本体进行把握的活动、行为。后面的“无味”之“味”,则是指生理快感。后来随着文明进步,人们由此而逐渐超越生理快感,而引申指审美感受。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论“和与同异”时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可见“味”的审美意义日渐增加。到了汉代,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虽然司马迁所说的“味”还不是指艺术的审美愉悦,但已经是指主观体验到的一种审美快感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自觉,“味”的内涵也迅速向审美属性、审美活动方面展开。嵇康直接以

“味”喻乐,其《声无哀乐论》云:“五味万殊,而大同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他把“味”用于文艺美学,他在这里运用类比思维,着重从主体方面探索文艺的审美规律,从而突出和强化了“味”的艺术审美意蕴。稍后的陆机在《文赋》中也以“太羹之遗味”论文学作品。其弟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兄前表甚有深情远旨可耽味。”很明显,“味”已是指文学鉴赏和评论中的纯粹审美感受。刘勰继承前人之说,在《文心雕龙》中广泛运用“味”的审美概念,也是水到渠成之事。不过,“味”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真正确立,应该归功于钟嵘《诗品》。因为刘勰是在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基础上来论“味”的,所以其“味”范围较宽泛,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钟嵘则不同,其《诗品》以纯文学观点论诗。他打破了儒家传统“诗教”中美刺讽谕的历史化、政治化模式,从纯粹的艺术审美的视角来观照作品。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其评张协诗则云:“词采青葱,音韵铿锵,使人味之,娓娓不倦。”其所称“味”,一指当时流行的五言诗的审美特质和它给予人的隽永精微的审美感受;二指将五言诗作为审美样式而进行的审美活动。他以具体文学现象,说明诗“味”同诗歌政治教化作用并无直接关联,诗“味”同玄学思辨、名言之理性质不同,诗之有“味”,来自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即来自纯粹的审美把握。据此可以说,钟嵘“滋味”说的提出,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是“味”作为审美范畴正式确立的历史标志。发展到唐宋以后,“味”作为审美概念已广泛运用,其艺术的审美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开拓。皎然把“味”与“取境”相联系,《诗式·辨体一十九字》云:“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皎然论诗“味”,已注意到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境界的审美特征,而且进一步注意审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艺术要素如“风韵”、“体格”等的不同作用。而司空图则深入一层,提出了“味外之旨”的美学命题,见其《与李生论诗书》。论诗而求“味外之旨”,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展史上,完成了对文艺创作中的主体要素——情、兴,客体要素——事物形象,载体要素——声律词采的审美超越。诗人完全以审美方式去把握自我、把握世界,进行完美的艺术创造。参见“韵味”条。

(黄保真)

【韵味】 古代诗学概念。一般指自然含蓄,天机活泼,超越言象之外,令人悠然神会而回味无穷的独特审美境界。诗论中的“韵味”说,创始于唐司空图,其《与李生论诗书》云:“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

以言韵外之致耳!……倘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韵味”一词,是由“韵”与“味”两个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的词组成的新概念。“味”之审美义蕴,详参“味”条。而“韵”原指和谐的声音,所谓“同声相应谓之韵”。后来,人们引申指文学作品中语言文字之美。陆机《文赋》“采千载之遗韵”,其“韵”即指美的文章。魏晋之后,“韵”又多用来品评人物的言谈举止与精神风度的统一,如《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韵”兼指形、神而言。南齐谢赫《古画品录》首次提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之法居首。其“气韵”不仅指画作的色彩线条、结构布局的形式完美,更主要指作品所反映的风神气度的神采飞扬,让读者从整体上感到画面中包蕴着客观事物的活泼生机。几乎同时,文人用“韵”或“气韵”来评论文学。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潘(岳)陆(机)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缙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颂文章“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文心雕龙·体性》称“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等等。“韵”作为一个审美概念在齐梁时就有较确切的具体内涵,唐宋以后仍旧沿用,如皎然《诗式》谓诗歌“风韵朗畅曰高”类。但是只有发展到司空图,“韵”与“味”并举成文,明确提出了“韵味”说。所称“韵味”,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须有生动、空灵的审美意象;一是具备含蕴无限、韵味无穷的“全美”或称“醇美”——即本体之美的审美品格。其《诗品》“大用外腴、真体内充”,是宇宙万物的生化存在的规律和“全美”的根据;“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审美把握的永恒法则;“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则是“醇美”之作的审美属性和诉之于人的美感特征。在司空图的诗歌美学理论体系中,“韵味”说并非专论王、孟山水诗派,而是其诗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到宋代,范温《潜溪诗眼》又发展了司空图之说,见载于今人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其意谓:“韵”是作家作品的特殊审美品格,“味”则是创作主体特定的审美体验,因“韵”而得的特殊美感就是“韵味”。范温以为“韵”生于“尽美”、“有馀”,“味”在于“深远无穷”,而赏韵玩味的特殊审美规律则是“超然神会,冥然吻合”。范温之后,“韵味”概念运用日广,如清姚鼐《与王铁夫书》:“先生之诗,而咀嚼之余,别有韵味,由于自得。”黄子云《野鸿诗的》:“绝句字无多,意纵佳,而读之易索,当从《三百篇》化出,便有韵味。”所论“韵味”义蕴并未超越前贤。而明袁宏道所论“韵致”,则于“韵味”颇有新意,其《叙负氏家绳集》强调“韵致”是“风临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则称颂稚子叫跳反掷、醉汉嬉笑怒

骂,皆出于自然无心,此所以有“韵致”。其称自然韵致,正是自然人格的审美形态,是对世俗和传统礼教规范的背离和解脱。(黄保真)

【滋味】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文心雕龙·声律》篇:“吟咏滋味,流于声律。”又钟嵘《诗品序》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是具有艺术审美意义的“滋味”说的开端。其实,“滋味”一词,早已有之,原指美味食品给人的味觉体验。如《管子·戒》云:“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其所称“齐滋味”,强调不要因过分追求口腹的滋味快感而流于“淫”。后来汉代《韩诗外传》首开以“滋味”说诗之端,卷五云:“圣人养一性而御六气,持一命而节滋味,奄治天下,不遗其小,存其精神,以补其中,谓之志。《诗》曰:‘不竟不绪,不刚不柔。’言得中也。”作者虽然把“节滋味”与诗人之“志”相联系,但还不真正具有审美愉悦的意义。以人对滋味的生理体验,来比拟人对文艺作品的审美体验,是从六朝开始,所以刘勰、钟嵘称引以论诗。其中钟嵘的“滋味”,说理论影响更大。他从美感作用和审美价值方面来讨论五言诗的“滋味”,认为五言诗的艺术价值高于四言,因为它在创作中充分运用了审美规律。他不再把五言诗当作纯粹的政治教化工具,而是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作为诗歌创作的直接目的。提倡“滋味”,首先就要求诗人自己必须全身心地沉浸于审美愉悦之中,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后世诗论家受六朝“滋味”说的影响很大,如唐窦蒙《语例字格》云:“百般滋味曰妙。”清贺贻孙《诗筏》云:“李、杜诗,韩、苏文,……反复朗诵至数十百过,口颌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至自少至老,诵之不辍,其境愈熟,其味愈长。”在唐宋以后,人们心目中的“滋味”,是仅次于“神妙”的高品高境。这说明“滋味”已具备了作为普遍适用的审美概念的理论品格。后来文论家又加以引申扩充,不仅用以论诗,而且在书法、绘画、戏曲和小说理论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于此可见其影响之大。如明项穆《书法雅言》论“书有老少”云:“所谓少者,气体充和,标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种风流是也。”徐渭《题昆仑奴杂剧后》云:“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云:“甚者《浪史》诸书,人函户臧,滋读而味说之为愉快。”“滋味”说在艺术各领域的广泛运用,或指一定的审美特性,或指作品的美感力量,或指审美的心理

体验,其理论蕴含不出此三义。(黄保真)

【至味】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歌中某种最高的审美境界。“味”原是一种人的生理味觉。《吕氏春秋·本味》早有“说汤以至味”的故事。把“至味”引入文论领域,始于唐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但由于柳氏此文,意在提倡“奇味”,所以没有直接就“至味”的审美内涵展开论述。大力提倡“至味”以论文艺的是苏轼,其《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又《书黄子思集后》云:“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他正面讨论“至味”的理论意蕴,认为是艺术美的一种最高境界,其特点是在高雅简古、浑然天成的艺术形式中,蕴含着深邃无限、难以穷尽的审美趣味。他又在《评韩柳诗》中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在《和陶诗序》中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都可以作为其“至味”概念的具体说明。“至味”涵盖了纤秣绮丽、咸酸众好,而又超越了咸酸众好和纤秣绮丽;兼备法度、技巧、言象、形式,而又超越了法度、技巧、言象、形式。创作者既需要“阅世”、“观身”,投身生活激流中去体验,但在具体创作时又是以虚静的审美方式去“阅”、去“观”。如此方能臻达“至味”的艺术高境。此后人们纷纷以“至味”论诗谈艺,如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评陶渊明诗云:“高情远韵,殆犹大羹充飴,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于此可见其影响。参见“滋味”。(黄保真)

【至味无味】古代诗学概念。指艺术美的本体,或作品最高审美境界的终极本原,也指“道”的自然而完美的体现。宋代以后,受苏轼“至味”说的影响,南宋魏了翁在《题跋》中明确地提出:“无味之味,至味也。”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也说,陶渊明的诗歌高情远韵,“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他们认为“无味之味”,是“味”的本原、极致,它超越了人凭感官所能感知的“味”,而达到了“滋味”的本体,也即与无形无声、无痕无迹的大“道”相通。这一美学思想,渊源于古代道家哲学。《老子》第三十五章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家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至高无上的“道”,是没有任何可以诉诸人的感官的具体属性的。李白诗有“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之句,所称“无味”就是“道”。唐司空图认为,美的本原是道,道是超乎言象之外的。所以他论诗求“味外之旨”,要求诗人创作,必须高瞻远瞩,“超以象外”,方能“得其环中”,直契审美最高境界的本体。这些意见,间接或直接影响了苏轼以后出现的“至味无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参见“至味”。(黄保真)

【意味】 古代诗学概念。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大抵句子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可见，既有“意”，又有“味”，才能称有“意味”。“意”之于“味”，犹盐之于水，分则两离，合则化一，而味在盐外。“意味”不是淡泊之味，而是有意之味。张戒又说陶、阮等人诗：“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可见“意味”大致指的是情味或意趣。宋代理学盛行，诗歌创作主乎意理，所以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但张戒反对作诗过分注重意理，他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张戒以“意味”论诗，是有所针对的。诗须有“味”，须将抽象之“意”化为可感之“味”。单有抽象之“意”，并非是诗。以“意味”论诗，可补宋诗乏“味”之短，故宋人说诗多品之以“味”。如魏泰说：“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气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馀味尔。”（《临汉隐居诗话》）姜夔说：诗当“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白石诗说》）。示人学诗的门径，比司空图的“味外之旨”更易掌握。诗要写得有“意味”，胸中应有新意。蹈袭窠臼，拾人牙惠，人人生厌。有新意，还须巧妙构思，将新意浑化，才耐人寻味。此外，“意味”的咀嚼，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修养学识。黄庭坚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门邪？”（《大雅堂记》）（张小平）

【情味】 古代诗学概念。情味相当于情趣。《人物志·九征》：“见乎声色，发乎情味。”诗要写得有情味，先得有“情”在心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情思摇荡，才能形诸舞咏。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由于“情”的摇荡，才有“绮靡”的变化。先有“情”，然后才能谈“味”。“情”与“理”两者相对，情多变，理求正，而“味”则得之于变。“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可见，求理过深，则难以有味。诗有情味，是指诗中抒发的情思要经得住咀嚼，要有隽永之回味。情味，并不取决于“情”的浓淡。浓而滞，则无味；淡而化，却有味。由此，浓淡不可一概看待。但是，诗中有情，也并不决定诗中就有情味，抒情若直泻而下，让人一览无馀，就无味可言。情思若是枯涩直硬，则味同嚼蜡。所以，要做到诗有情味，抒情必须含蓄曲折，给人留下咀嚼的馀地。如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对此所感，是喜是悲，是乐是愁，全不道破，而让读者根据自己经验

去体会去咀嚼，情味故在其中。情味，须自然而然，不能做作仿效。张戒说：“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岁寒堂诗话》）“一时情味”，或淡或浓，或如喷泉，或如流溪。预设法式，则如鼎中之醋盐多少已定，以此调羹，岂有味道可言？

（张小平）

【辨味】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晚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淳蓄、渊雅，皆在其中矣。……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倘复以全美为工，则知味外之旨矣。”其《诗品》则是“辨味”言诗的典范。但论渊源，它是随着古代“味”的审美范畴的逐步确立而演变和发展的，从人类的生理功能，衍化为广义的辨别学说异同或文章优劣的方式，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审美鉴赏的特殊方式。如晋葛洪虽然没有明言“辨味”，但却实发“辨味”之旨。其《抱朴子·尚博》云：“百家之言，……偏嗜酸咸者莫能识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若夫驰骤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髫髻，迄于振素，犹不得也。”其所辨之“味”，一指百家之言的学术旨趣；一指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及其所引发的审美感受。他要求读者体味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而不为主观偏见或嗜好所囿。他虽没有明确提出辨别“味外之旨”的概念或味在酸咸之外的美学命题，但要义已孕育其中，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因此，司空图的“辨味”说，是在师承和借鉴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成，其理论包含了以下两个层次：一是辨别“雄浑”、“冲淡”、“纤秣”等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境界；一是超越一切审美境界，而得其“味外之旨”或“韵外之致”。所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俱似大道，妙契同尘”（《诗品》），则属于超越言、象之“味”而直契美之本原。至此，“辨味”作为诗人或艺术家的独特审美把握方式的专用概念，便已完全确立，其理论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在文论家中，有一派继承其说，着重辨析作品中不同审美境界的审美意蕴，如顾翰《补诗品》、曾纪泽《演司空表圣诸品二十四首》、马荣祖《文颂》、许奉恩《文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等。至于袁枚《续诗品》和江顺诒《补词品》，则侧重写作方法，于此派中别树一帜。另一派则继承其直探美之本体的审美体悟，着力阐发其“味外之旨”，如苏轼

《游白鹤观诗序》云：“司空表圣自论其诗得味外味。‘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幢高’之句为尤善。余尝独游五老峰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又反复阐发了“美在咸酸之外”的审美意趣。这就扩大了司空图的影响，深化了“辨味”说的理论意蕴。元胡祇遹《优伶赵文益诗序》，更以之辨戏曲表演之“味”，云：“醯盐薑桂，巧者和之，味出于酸咸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袭故常，故食之不厌。滑稽诙谐亦犹是。拙者踵陈习旧，不能变新，使观者恶闻而厌见。”把“味外味”看作推陈出新的艺术规律，同传统说法有异，但也不妨录之聊备一格。（黄保真）

【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们用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追求作补充而获得不断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涵盖了“韵”、“味”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属性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因而，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以“趣”为词根而构成的同属“得趣”之美而个性各有不同的审美概念，如旨趣、意趣、情趣、理趣、妙趣、灵趣等等。趣之意蕴历代解说不一。有以“反常合道”为趣者，有以“生气、灵机”为趣者，有以“传神风致”为趣者，亦有以天真直露为趣者；但是，以趣与韵、味相比较，应以生气、灵机、天真直露为得趣之要。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趣的内蕴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主体层面，二是客体层面，三是作品层面。从主体层面来说，“趣”起初是泛指人的各种生活感受。如《晋书·王羲之传》：“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后来审美的意味逐渐丰富，就用来指个人的审美素养、审美追求和审美把握的独特方式。《晋书·陶潜传》“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所言之“趣”的审美意蕴还比较笼统。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称“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认为陶诗的审美特征是陶渊明独特的审美修养和审美追求的必然产物。缺乏修养，无所追求的人，单从形式上去学是学不来的。明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者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袁宏道论“趣”，带有鲜明的反礼教、反传统的色彩而追求个性解放，所以强调人的个性的真实、自然和审美把握的充分自由。明焦竑论趣还进而涉及主体驾驭艺术形式的方式、特征。其《刻苏长公外

集序》云：“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应手，落笔于言，全然溢出。”他强调趣不仅取决于思想见解，审美追求，还体现于主体驾驭语言文字，创造艺术作品的能力和个性。从客体层面来说，趣是指审美主体从审美客体本然具有的某些属性、一定本质中体验到的活泼鲜明、生机内蕴的特殊意味。所谓审美客体不仅包括审美主体之外的一切山川风物、社会事境，而且还包括被作为审美把握对象的人，特别是自我。清史震林《华阳散稿》云：“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灵机之谓也。”“趣”是审美主体从自然性和社会性客体的本质、属性、现象中体味到的生动活泼、个性鲜明的种种意味。中国古代有些善于描摹客体的成功之作，其作品中趣之为理，为事，为情，为景，就很难截然区分了。如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〇引《冷斋夜话》云：“王摩诘《山中》曰：‘荆谿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舒王《百家衣》曰：‘相看不忍发，惨淡暮潮平。语罢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天趣，也就是人所感知到的客体本有的自然之趣。审美主体从客体的本然之性中体验到的生动灵机之趣，并非是纯客观的物性本身，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审美统一。对于一般人来说它只存在于主观意识，稍纵即逝；只有艺术家才能把它物化为艺术作品，而在艺术作品中的理、事、情、景的天趣、本趣、真趣、自然之趣，也可以说属于作品层面了。趣在作品层面，首先是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蕴、思想、主旨。王逸《楚辞章句序》：“虽未能穷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列子·汤问》：“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趣”都较偏重思想主旨、意义、意蕴。后来，“趣”便主要是作为构成艺术作品的审美要素而存在。明高启《独庵集序》：“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趣亦有二，有天趣，有生趣，有别趣。庄漆园、陶彭泽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洲、韦苏州亦其次也。东方之《客难》、枚叔之《七发》，以及阮籍《咏怀》、郭璞《游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约》之作，《头责》之文，以及鲍明远、江文通之涉笔，可云有别趣者矣。”可见，在作品层面上，“趣”之义蕴也包罗甚广，主体的精神、个性、审美取向，艺术方法和作品的形式特征，皆各有其趣，偏重于客体层面的仅为其一而已。《南史·萧引传》：“笔趣翩翩，似鸟之欲飞。”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二：“词从兴生，不傍古事，语趣飞举，无惭彩笔。”“笔趣”，“语趣”，虽然融进了艺术

家的个性,但“趣”主要则是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生气、灵机”。(黄保真)

【**兴趣**】古代诗学概念。一般用来概括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质。语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在中国古文论中,“兴”与“趣”原是二个并行的独立概念。“兴”有多种意思:一指诗人被外界事物感触后所发生的情思;二指丰富联想和委婉蕴藉的艺术表现手法;三指有寄托、有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严羽“兴趣”之“兴”,多取前面二种意思。而其“兴趣”之“趣”,相当于诗歌中的韵味、滋味,或如司空图所称的“韵外之致”。严羽创造性地把“兴”与“趣”重新加以有机结合,成为一个富有独特理论个性的新的审美概念。其“兴趣”指诗的兴象与情致结合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这种审美感受,表现了诗歌的艺术特质。明陶明潜《诗说杂记》以人体器官作譬喻来形容严羽的诗的“五法”,其中云:“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精神之于人的生命活力,何等重要,可见“兴趣”对于诗歌艺术,也如灵魂一般。概括言之,严羽的“兴趣”,实际是力图表现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及其感染力量。诗因具有“兴趣”这一审美特质,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严羽据此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并称“兴趣”为“别材别趣”。具体而言,严羽“兴趣”说的理论内涵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诗歌的抒情本质,如他所说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即使是才学渊博的苏黄,一旦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势必淹没诗之性情,丧失审美主体那活生生的个性面貌。二是指诗歌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和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或意境,以增强其艺术感染力量。三是指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和自然浑成的艺术风格。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并不是说诗歌创作拒绝反映事理,而是说形象描绘应该空灵,不拘泥于言辞的表层意义,所称“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不过是通过形象譬喻,来论述诗歌艺术的主、客体之间那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严羽“兴趣”说是对唐司空图“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诸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于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一种新的理论概括,其形象譬喻,易于引发读者的艺术联想。总之,严羽“兴趣”说作为审美范畴的确立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诗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认

识的又一次飞跃,并对以后的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屠隆《文论》云:“古诗多在兴趣,微辞隐义,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其《与友人论诗文》亦称:“唐人长于兴趣,兴趣所到,固非拘挛一途。”从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出发,严分诗文区别。又如清吴乔《围炉诗话》也强调“兴趣”,批评宋代道学家之诗。所论各有偏重,但是大致仍在严羽“兴趣”的理论范围之内。(蒋凡)

【**意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主要是指创作主体以鲜明的思想情感为主导进行审美选择而创造出来的文艺作品的审美意蕴和独特风格。只是历代论及者,有偏有全,不尽一致。宋惠洪《冷斋夜话》云:“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三引《西清诗话》语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这是论诗之意趣,较偏重思想情感的例子。明汤显祖论戏曲也强调思想情感的决定作用,不过又兼指创作主体和审美客体。其《与宜伶罗章二书》云:“《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相同了。”其《答吕姜山》亦云:“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汤显祖讲意趣,强调的是鲜明强烈的主体意识主导下进行的审美选择。明谢肇淛《五杂俎》批评“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清黄钺《二十四画品》谓“意趣高妙,纵其性灵”。二家对主体意识的态度虽然不同,但都认识到它对作品意趣的决定作用。文论家谈意趣的另一种类型,则较侧重于主体的审美取向和作品的审美品格。苏轼《答李方叔书》云:“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明李开先《塞上曲后序》云:“客有读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称引乃五言律诗,非七言绝句,与所作漫不相类。中麓率然应之曰:诗在意趣声调,不在字句多寡也。”各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意趣同语言文字等艺术形式诸要素的关系,但实质上还是来自作家对艺术与生活的认识和体味。也有人从兴象、格调、风韵着眼论述意趣。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初唐词藻丰饶,而气象宏远。中唐格调流婉,而意趣悠长。”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诗之妙谛,在不即不离,若远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间。即严沧浪所谓‘镜中之花,水中之

月,但可神会,但以迹求’。司空表圣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也。盖兴象玲珑,意趣活泼,寄托深远,风韵冷然,故能高踞题颠,不落蹊径,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独探真际于个中,遥流清音于弦外,空诸所有,妙合天籁。”意趣之流宛、活泼虽然体现于格调、兴象、风韵,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的主导下所作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选择。所以有的理论家谈意趣,特别强调审美独创性。如宋张炎《词源·意趣》云:“词以意趣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接着他列举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冰肌玉骨);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姜夔赋梅的两首名作《暗香》、《疏影》。最后评曰:“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但上列诸作抒写的主体情怀,创造的艺术境界,内涵的审美义蕴,具体的美感特征,各不相同,并非都是兴象玲珑、超以象外。主体情意的复杂性,审美客体的多样性,艺术方法的丰富性决定了人们讨论“意趣”的多种视角”

(黄保真)

【理趣】 古代诗学概念。“理趣”原指一般的道理旨趣。但经文学家的运用与引申,于是逐渐衍化为诗文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理,义理、哲理、道理;趣,情趣、风趣、趣味。诗有理趣,是指诗人在诗里讲述道理,发表议论,应该同时使作品充满诗意情趣,富有艺术感染力。有理趣的诗,不同于抽象地说理布道,而是寓道理于情趣之中,熔理和趣为一炉。诗有议论、言理的功能,自《诗经》以来,诗苑中不乏这类作品,东晋玄言诗是突出的一个阶段,“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然而玄言诗除少数较佳的作品外,大都以抽象的语言谈道说理,诗意匮乏。宋诗于唐诗注重风情兴象之外,突出了诗歌议论化倾向,而议论化与宋代理学相结合,则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性理诗。这类作品以高谈心性之义为主,往往漠视诗歌的艺术性,被人讥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刘克庄《吴恕斋诗存稿跋》)。严羽对宋诗议论叙理也持贬词,说是“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但是人们基本倾向于诗可以言理,而又要求言理得趣。因为理语与理趣有别。理语属抽象思维,而理趣则合乎诗歌的形象思维。故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强调以理趣取代枯燥乏味的理语。理趣说正是主要从总结宋诗经验中得来的。刘克庄称赞诗人“深于理学”,作诗“皆关系伦纪教化”,同时又有“高风远韵”,诗体“清拔骏壮”(同上)。这实际上也是对诗有理趣的肯定。沈德潜说:“议论须带情

韵以行。”“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说诗粹语》)他举的这些例子说明,通过对具体景色、物候和形象的描摹,寓理于物象之中,泯没议论痕迹,是叙理得趣的有效方法。与理趣相对立是理障。胡应麟《诗薮》:“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内编卷二)理障指写诗纯粹叙说道理,缺乏生动的风致情韵,有理无趣。理趣说既肯定了诗可以言理,又纠正了言理而无诗味的弊失,使诗的哲理性和兴味兼济谐合,相得益彰。

(邹国平)

【理趣与理障】 古代诗论中特有的一对矛盾对立的审美概念。“理趣”是创作主体以审美方式把握道理而创造的一种特殊艺术境界或审美感受。如宋袁燮《絜斋集·题魏丞相书》云:“志之所之,诗亦至焉,……不烦雕琢,理趣深长,……故东坡公言,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理障”则相反,违背诗歌艺术思维的规律,写诗时直接使用“名言”(指抽象概念等理性形式)来大发议论,无从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应和心灵共鸣,结果是得其“理”而遗其“趣”,与艺术的审美创造规律背道而驰。如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禅家戒事、理二障。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清袁枚《续诗品·斋心》也云:“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禅机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蔼如。”“理”原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蕴义繁多,甚至可与宇宙本论之“道”、“体”同义,举凡自然或社会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和依据,变化发展的规律及其具体形态的结构、秩序等,都可以名之为“理”。因此,“理”常与事物具体之“象”对举,“理”为“体”而“象”为“用”,“理”为微而“象”为显,用以概括宇宙人生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宋代理学家就此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朱熹《答何叔京》云:“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推之于艺术创作,人的审美把握就不可能取微弃显,或反之取象弃理,而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趣”与“理障”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审美方式把握玄微之理时主体的特定感受和应遵循的规律。在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的支配下,“理”不仅是文学的内容,而且可以在诗中议论。关键不在于是否诗中有“理”,而在于如何艺术地表现“理”。遵循诗歌的审美规律,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描绘,涉理成趣,生机勃勃,无所不可,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睿智启迪,此为“理趣”。相反,空洞说理,教条僵化,枯燥乏味,毫无生

趣可言,此为“理障”。“理趣”是主体以审美方式把握“理”而创造的一种特殊审美境界,其基本特征是,不离言、象而又超越言、象,使人于浑然朦胧中悠然默会宇宙奥妙和人性真谛,从而在艺术“玩索”中获得美的享受。审美主体的“理趣”玩索,带有一定的超越世俗功利的特征,“理趣”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闲观静悟,以物待物,而体验到汪洋淡泊的萧散闲远之美。陶渊明《饮酒》(其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正是诗中“理趣”艺术的典范。反之,“理障”则多在诗中直接说教,如宋代理学家的诗,多数是在诗中大发议论,犹如高头讲章,令人昏昏欲睡。这就招致了严羽《沧浪诗话》针锋相对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歌理论与之抗争。后来明李梦阳《缶音序》也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为诗耶?”总之,“理趣”与“理障”,一正一反,多层次多视角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论的艺术辩证法。(黄保真)

【情趣】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意义主要有四:其一是指人的志趣、志向、爱好、追求,其中包括个人的审美取向。《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里的“情趣”主要是指平生志向,生活追求。《南齐书·孔稚珪传》:“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机独酌,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孔稚珪的情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志向,更突出他对社会政治(世务)的超越和追求审美人生的鲜明倾向。其二,主要指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取向,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其三,则是指艺术作品产生的某种动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特定审美感受。南朝姚最《续画品录·沈粲》:“专工绮罗屏障,所图有情趣。”“情趣”则是艺术作品的审美属性。其四,情趣还可以专指构成艺术作品的情感要素产生的动人力量、审美意味。清史震林《华阳散稿》:“诗人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情有情趣”,指因情而得的一般的生活体验。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总之,情趣虽然同志向相关,但理性色彩较淡,主要是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人生体验,审美体验。(黄保真)

【奇趣】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主要是指文艺作品中创造的奇句异境所给予人的新颖独到而异乎

寻常的审美感觉。语见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同书卷一亦云:“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诗人玉屑》卷一〇引文作“奇趣”)。有奇趣的作品,其取象、造境,物化方法的运用,审美视角的选择,往往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所以古人论奇趣,有的偏于主观审美的体验,有的着重于艺术创作规律。惠洪为宋代著名诗僧、诗论家,为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方外契友。苏轼论诗重“奇趣”,对后人影响甚大,明袁宏道的有关论述,就受其影响。清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则进一步阐发了苏轼关于“奇趣”的命题。他说:“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山谷云:‘双鬟女娣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乱谈也。尧夫《三皇》等吟,文章也。”其实“道”之为义并不是如此狭窄,艺术创作“合道”也主要不是要求合乎“义理”之类的思想规范。明张岱对奇趣的论述,则更合乎审美规律。其《琅嬛文集·与包严介》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王摩诘《山路》诗‘蓝田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又《香积寺》诗‘泉声咽危石,日色冷苍松’,泉声、危石、日色、苍松,皆可描摹;而‘咽’字,‘冷’字,则决难画出……画如小李将军,楼台殿阁,界画写摹,细入毫发,自不若元人之画,点染依稀,烟云灭没,反得奇趣。由此观之,有诗之画,未免板实,而胸中丘壑,反不若匠心训手之不可及也。”奇趣不在刻画描摹,而在匠心训手,独抒情怀,给人留广阔的想象空间,但也要合乎自然之理。清何绍基也注意到了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他说:“诗贵有奇趣,却不是怪话,正须得至理,理到至处,发以仄径,乃成奇趣。”(《东洲草堂文钞·与汪菊生论诗》)可见,奇趣离不开艺术上的独特创造。

(黄保真)

【风】 古代诗学概念。其含义既可指诗歌的一体,又兼指诗歌干预政教的社会功能。语见《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西汉时的《毛诗序》则改“六诗”为“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

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这是说,“风”原是产生于周朝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但汉儒加以发挥,从《诗》的风诗中又演绎出以下有关文学政教功能的两个重要含义:一是风化之风,居高临下,说明统治者重视并运用诗歌来教化臣民;一是风刺之风,重点是讲变风变雅那“下以风刺上”的社会功能。《毛诗序》又进一步分析了诗歌作品所赖以发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原因,涉及到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认为诗人必须具有清醒而敏锐的现实眼光,努力反映生活。另外,还提出了“主文谲谏”的写作规范,说的是与诗歌创作的某种艺术风格有关的问题。郑玄解释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后来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据此发挥说:“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这就是要求诗人在以诗规讽统治者时,必须通过委婉曲折的方式,而不要过于切直刻露,以维护统治者的尊严。总之,“主文谲谏”作为诗歌的“风刺”艺术方式,实际是汉儒“温柔敦厚”(见《礼记·经解》)传统诗教的另一说法,皆为同一经学时代的理论产品。后人从“风”中,又析出“风化”、“风教”、“风刺”、“风谏”、“风谕”诸名目。其所谓“风”,就已包括了目的、功能、方式和体制四层内涵,从而构成了传统儒家诗论的重要范畴,源远流长,影响有好的一面,如白居易提倡风谕诗,发扬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有力地促进了古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但后儒有食古不化者,则又片面以“风”的政教代替了艺术创造,因而又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参见“风谕”条。(蒋凡)

【风神】 古代诗学概念。与“才藻”相对而言,指艺术作品中具有的精神风采。原是六朝品鉴人物的用词,《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多见,如《德行》注引《文章志》“风神秀彻”,《赏誉》称王弥“风神清令”,《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谓“弘雅有气,风神调畅”,《任诞》注引《中兴书》“风神魁梧”,大抵指人的潇洒风度。进入文艺批评领域,唐代韩愈《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中见寄》:“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宋代姜夔就书法之“风神”论曰:“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泽润,七须背向得宜,八须时出新意。”(《续书谱·风神》)他说明的方面颇为杂乱,但却表明了“风神”概

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而明胡应麟诗论中的运用,则含义较为明确,是指艺术作品内蕴的风采、气质,《唐音癸签》:“唐初七言古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又加以变化灵异,故遂为大家。”《诗薮》:“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风神,畅之以才气,和之以真澹,错之以清新。”他对诗歌作了理论性分析:“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而花月宛然。”王骥德《曲律》所论虽较虚涵,但基本指向与胡应麟是一致的:“妙处正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字句之外;又须烟波渺漫,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摹观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清姚莹《论诗绝句》:“俊逸何郎妙绝伦,最雄俊处最风神。”也是指文字形迹之外呈现的风采、精神。

(陈引驰)

【风力】 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意与“风骨”相近。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风力”指诗文作品的情思表达得鲜明爽朗,具有力度,给人以富于生气之感。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赋游仙之事,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刘勰认为这是由于《大人赋》风貌较为清明爽朗,有飞动之致,故有强大的感染力。同书《封禅》批评三国魏邯郸淳《受命述》“风末力寡”,“不能奋飞”,指其不能给人以活跃健举、气扬采飞之感。又南朝齐裴子野《雕虫论》:“曹、刘伟其风力。”指汉末建安诗人曹植、刘桢的作品明朗有力。钟嵘《诗品》多次使用“风力”一语。《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认为诗歌的情感表现须骏爽有力,在此基础上再以美丽的词藻加以润饰,方为理想之作。《诗品序》又批评东晋诗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意谓当时诗歌充斥《老》《庄》玄语,辞意夷泰,没有建安诗歌那种慷慨动人的情感力量。《诗品》评陶渊明诗云:“又协左思风力。”谓陶诗中有一部分亦慷慨多气,犹如左思。左思《咏史》等抒发下层文士对于门阀世族的不满,情感强烈,表现爽朗,风格接近建安。南朝人对于建安风力的认识和概括,对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具有深远影响。

(杨明)

【风化】 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即以文艺教化天下之意,也称“风教”,是儒家诗论中关于文艺功用的重要观点。出自《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对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儒家历来有较充分的认识。孔子就曾说,学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就是因为由诗可接受熏染,从而达到改造人的思想情感的社会作用。他们认识到诗乐本乎人心而发,以之来感动人、教化人是最好的途

径。《孟子·尽心上》称：“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荀子·乐记》：“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也。”《毛诗序》将这类意见系统化了。它指出诗是“情动中而形于言”的产物，因为诉诸情感，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以此为前提，统治者用诗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以它解释各地民谣之“风”为“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是从其功能方面立论的。此风化、风教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不仅成为许多诗学批评的理论准则，且影响到某些创作的实践。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讲诗乐“情感七始，化动八方”；司马迁《史记·乐书》：“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柳冕讲“文章本于教化”（《与徐给事论文书》）；李贽讲“文之于化人也深”（《上宋舍人书》）等等，均是其流裔。传统儒家重视“风化”的社会功能，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却逐渐实现其向正统道德规范的转化，片面强调统治者教以化之的政治意义，这样机械理解，过分狭窄，又不利于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陈引驰）

【风骨】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怛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风”，意谓文章中表现出的充实、感人的情志力量，以创作主体的“意气骏爽”为前提，其基本特征是清、明；“骨”，意谓文章在语言表现上呈现的刚健的风格。“风骨”作为一个整体范畴，指坚挺刚健、简练鲜明的美学风貌。“风”、“骨”、“风骨”，原都来自魏晋南朝对人物的评议品鉴；《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世说新语·赏誉》：“陈玄伯垒块有正骨。”《世说新语·轻诋》：“韩康伯将肘无风骨。”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王羲之风骨清举。”它较早进入绘画理论。顾恺之提到“骨法”、“神气”；谢赫《古画品录》论作画六法，其一曰“气韵生动”，重在风神，其二曰“骨法用笔”，讲究“骨梗有力”。他评曹不兴画：“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文学理论领域，刘勰对“风骨”作了最为完备、系统的论述。首先指

出了“风骨”中“风”的主导地位，对“风”、“骨”的特征作了分析和规定，关于风骨和藻采的关系也作了辩证的说明：“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若风骨乏采，则鸯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而钟嵘在《诗品》中则运用了与“风骨”含义相近的“风力”、“骨气”等概念。他称誉曹植“骨气”奇高，批评玄言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成为唐代陈子昂高标“汉魏风骨”的先声。“骨气”在当时乃至后代都是一个较常见的范畴，如袁昂《书评》评蔡邕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杨炯《王勃集序》批评当时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骨气端翔”等。“风骨”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流布甚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魏收《魏书·祖莹传》：“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成机杼，成一家风骨。’”唐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宋严羽《沧浪诗话》谓“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近世选唐诗人，独高棅《唐诗正声》颇重风骨，其格最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连昌宫辞》似胜《长恨》，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胡应麟《诗薮》评曹植诗“才藻宏富，骨气雄高”；清毛先舒《诗辩诂》谓“嘉州轮台诸作，奇姿杰出，而风骨浑劲”；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谓“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翁方纲《石洲诗话》云：“陈伯玉崑山英奇，风骨峻上。”大体说来，风骨范畴在南朝刘勰、钟嵘时确立，发展至唐时愈加鼎盛，而其后则是广泛传衍和变易充实的阶段。

（陈引驰）

【汉魏风骨】 古代诗学概念。指汉魏诗歌爽朗有力的动人风貌。语见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汉代乐府诗语言质朴，不事雕采。无名氏古诗和传为苏武、李陵所作的离别诗，虽较乐府诗多文人气息，但仍自然浑成，难以句摘；其情感表现或委婉深沉，或奔放激烈，都富于感染力量。至建安时期诗作，虽已开始从事华藻，注意字句锤炼和景物描写，但因当时文人遭遇乱离，感时忧国，其情感尤为强烈，且自觉接受汉代诗歌影响，故仍呈现慷慨多气、明朗劲健的动人风貌，并不显得雕琢纤巧。至正始时期（曹魏后期），嵇康、阮籍处于曹魏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权倾轧之中，满怀忧患之感而无可告诉，乃一发之于诗歌。阮籍《咏怀》尤为深沉。虽其政治方面的忧愤不能明言，后人乃有归趣难求之叹，但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语言风格仍质朴有力，情感表现仍鲜明动人。总之，汉魏诗具有情感表现明朗、语言比较质朴的共同艺术特点。西晋诗声色渐开，讲究排偶、藻采，雕琢气息渐浓，比较缺

少爽朗动人的情感力量。东晋玄言诗多以《老》《庄》理语入诗,表现士人夷泰心情和对于玄理的体会,情感寡少,平淡乏味。刘宋诗声色大开,语言雕琢更甚于西晋,殊少浑朴自然之气。齐梁诗尤为柔靡采丽。当然晋宋以来也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但诗坛风貌确与汉魏之明朗劲健不同。陈子昂倡言复古,乃标举汉魏,实是改革诗风的又一响亮口号。其后盛唐诗人也自觉学习建安。汉魏风骨在诗歌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杨明)

【慷慨任气】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南朝梁刘勰对建安诗人创作特点的概括。语见《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轡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慷慨任气,指情感激荡,直抒胸臆。《文心雕龙·时序》并从时代环境解释此种风貌形成的原因:“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汉末社会动乱,战争频仍,激发了诗人们感时伤乱、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也培育了他们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壮志,发之于诗,便形成情思慷慨的动人风貌。同时,此种风貌的形成,与人们喜好强烈情感表现的审美情趣也有关系。曹植即自称“其所尚也,雅好慷慨”(《前录序》)。又与建安诗人接受汉代古诗和乐府影响、语言和表现手法较为质朴有关。他们“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黄侃《诗品讲疏》)。因其表现较为疏朗浑朴,故容易显得慷慨多气。建安诗歌此种优良风格,为后世所推崇。南朝时除刘勰予以称道外,钟嵘《诗品》亦重视“建安风力”,称曹植诗“骨气奇高”,刘桢诗“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均与“慷慨任气”同旨。盛唐诗人自觉学习建安诗风,对于骏爽,刚健的盛唐之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杨明)

【骨力】 古代与诗论相通的美学概念。《晋书·王献之传》:“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此处“骨力”是指线条笔力的刚健遒劲,而不是纤弱婉媚。“骨力”用于诗文批评,是指文字表达的刚劲有力。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可见,“风”是指“思”,“骨”是指“辞”。“风骨之力”,指“风力”和“骨力”。钟嵘《诗品序》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不满于诗的“风力”不足,内容如同说教。“骨力”指语辞的劲拔,则不言自明。

思想内容的特性是“动”,语辞形式的特性是“静”,故“骨”常与静态词连用,如“骨劲而气猛”,“风清骨峻”(《风骨》)等。“劲”、“峻”,显示的是“力”,所以“骨力”是指语言的强劲挺拔,端直凝重。“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风骨》)。“端直”,体现的就是“骨力”。所谓“建安风骨”,是指建安诗歌不仅有“风力”,同时也有“骨力”。雅好慷慨是“风力”,梗概(义同“端直”)笔长则是“骨力”。刘桢诗刚劲挺拔,就深得“骨力”。胡应麟说:“乐天才具泛滥,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唐间自为一格。”(《诗薮》内编卷五)“骨力豪劲”就是指文字表达的奇崛雄健,豪峻强劲。“骨力”与“风力”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无“风力”,“骨力”则易浮;乏“骨力”,“风力”则轻扬。诗意慷慨激昂,字有顿挫凝放,则无轻浮之失。

(张小平)

【骨气】 古代诗学概念。在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中,“骨”与“气”分而论之,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分别从语言和神气两方面来讨论。至钟嵘《诗品》则合二为一,卷上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但钟嵘也常将“骨”、“气”作为两义对待。他评刘桢诗“真骨凌霜”,是指诗的立意坚贞高拔,与评曹植“骨高”角度相同。他又评刘桢诗“仗气爱奇”,也与曹植评语“气奇”思路不二。“气”就是气势。陈子昂推崇“汉魏风骨”,称誉“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骨气端翔”与“骨气奇高”造语相仿,气翔则高远,骨端则耿直。序文于“骨气端翔”之前感叹说:“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可以推测,“骨气”与“风雅”密切相关,“骨气端翔”也就是赞美《咏孤桐篇》的立意不失《诗经》的雅正,同时又具有唱叹回旋的气势风韵。对曹植的评语“情兼雅怨”,即是说他的诗有《诗经》的“风雅之致”。综上可知,以“骨气”论诗,它包括立意和气势两个方面。刘勰《文心雕龙·风骨》:“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建安诗多“骨气”,“言气骨则建安为传”(《河岳英灵集·集论》),可见有“骨气”的诗,立意高拔不俗,性情梗概雅厚,决不凄凉哀怨、多愁善感。它直抒胸臆,不尚雕镂,故一气流转,得劲健之势。钟嵘评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少则气盛,多则支离,所以“体被文质”,方得“骨气”。有“骨气”的诗,其感慨多因现实而发,梗直不屈,风格刚健。杨炯《王勃集序》说龙朔年间诗文“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缺乏现实内涵,语气委弱绮靡,诗也就没有“骨气”。

(张小平)

【风雅】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指代《诗经》,《诗

经》中有《国风》、《小雅》、《大雅》，故称。后来引申来泛指《诗经》所代表的优良文学传统。初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氏论诗崇尚汉魏，不满晋宋以后诗，尤其鄙薄齐梁诗，认为晋宋齐梁诗逐渐丧失了《诗经》关心现实、情志充实深刻、艺术表现明朗真朴的优良传统。元结《箠中集序》：“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其意与陈子昂相近。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尊重传统，主张广收博取，而须有所别择，裁汰浮伪之体，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又元稹《乐府古题序》：“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主张为乐府诗者，应效法《诗经》和古乐府感慨时事，进行美刺的精神，发挥诗歌的积极政教作用。白居易称张籍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又批评李白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元九书》）比兴均为《诗经》六义之一，风雅比兴连文，亦指《诗经》所具有的美刺讽谕精神及其批判现实的意义。而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云：“格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则以风雅泛称储诗之高古，乃偏指艺术表现而言。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述其选录范围云：“但使体格风雅，理致清新，期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载，格律兼收。”也以风雅泛称作品体貌之高雅。而《中兴间气集序》评刘长卿云：“其‘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则是说这两句诗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元好问《东坡诗雅引》云：“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其风雅亦偏指艺术风貌之高古雅正而言。《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被后人认为典范，故风雅一语，可指内容之无邪雅正，也可指艺术之温婉典雅，也可二者兼指。

（杨明）

【风韵】 古代诗学概念。“风韵”一词，早先用于人物品评，如《晋书·桓石秀传》“风韵秀彻”，《南史·孔珪传》“风韵清疏”，代表了六朝文人放纵情志，不受局检的生活作风。它是人的内在精神情志通过有形风姿的外在体现：超乎尘俗，节操高尚，情感真挚，志向清远，度量旷达，意气飞扬。于是，写诗作画，自然要讲“风韵”。《世说新语·赏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长君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

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此将人身之风韵与诗文之风韵联系了起来。评人品诗，道一以贯，如陶渊明的诗，淡泊闲远，俗气不沾，清静自守，味厚而深，也就是有“风韵”。孟浩然诗与此接近，但苏轼评之为“韵高才短”（《后山诗话》引）。可见，诗有“风韵”，其襟怀必高洁绝尘，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李白的诗，洒脱放逸，也是有“风韵”之作。“风韵”之诗，重情而轻理。情的特性是曲，正与“风韵”的流动宛转相合。理的特性是直，理直则“风韵”难以描绘。前人论诗，常谓唐诗以情韵胜，宋诗因思理长。主情韵，故贵流转；重思理，故求透辟。在语言表达上，“风韵”追求的是“一种‘余意’”。范温《潜溪诗眼》：“有馀意之谓韵。”“馀意”也就是“言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诗要求得“风韵”，不能执著于实象，要从虚处传神，不能一吐为快，而要言近意远，给读者以想象和回味的余地。总之，“风韵”虽有深浅之异，丽朴之别，但总以空灵飞动内在气性为宗，而不可狭看。

（张小平）

【风教】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汉儒认为，风为《诗经》“六义”之一，《关雎》为《诗经·周南》之开篇。《毛诗序》通过对《关雎》诗意的附会，引出了诗歌的教育感化作用，进而把诗歌作为安邦治国的工具。在先秦，孔子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主张，已经包含有诗歌教育感化作用的内容。荀子也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主张统治者应自觉地利用诗乐教育人民。《毛诗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学思想，强调统治者应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重视诗歌政治、道德的教化作用，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或消极的双重作用。唐代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期“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正是风教主张的继续，对引导诗人面向社会、人生，关心人民疾苦起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忽略诗歌的艺术特色，也曾严重影响诗歌的发展。参见“教化”。

（孙克强）

【教化】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教化”即教育感化，指诗歌的教育作用而言。在先秦，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之说，概括了诗歌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荀子也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主张统治者应自觉地利用诗乐教育人民。《毛诗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学思想,强调统治者应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通过诗歌对人民的教化,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有的批评家还以此作武器批判诗歌创作中脱离现实、沉溺私情的倾向。清代沈德潜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说诗碎语》卷上)参见“风教”。(孙克强)

【政教】古代诗学概念。见于《荀子·王制》:“平政教,正法则,……使百姓尽免(勉)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又《礼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郑玄注:“教谓礼义,政谓刑禁。”“政教”原是政治教化的总称,包括行政法律,礼制乐教等统治手段。汉儒把政教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与“诗教”结合起来,成为儒家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的中心是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论诗,提出了“兴、观、群、怨”的概念,揭示出诗歌的重要社会教育作用和美感认识作用。《毛诗序》论述诗的社会作用时指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说《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指出诗歌具有潜移默化,移风易俗,裨补政教的功能。政教说对后世诗歌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白居易诗论进一步指出诗歌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对引导诗人关心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疾苦起到积极作用。但政教说在历史上也因其时代局限,加以封建统治者片面强调,忽略了诗歌的艺术特点,因而对诗歌的发展也有消极的一面。(孙克强)

【思】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释皎然有关诗歌艺术构思和体格风貌的论述,见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又云:“思:气多含蓄曰思。”这里的两个“思”字,意义有别,但又自有其内在联系。“诗人之思”,指的是诗人创作前的艺术构思。诗思之发,影响了作品的风格体貌和高低优劣,这与“取境”有关。也就是说,诗歌作品的思想风貌与艺术才调,不能离开具体形象的艺术之“境”而独立存在,高明的诗人酝酿构思之时,必须首先想到种种意境。这一“诗人之思”,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密切相关。由此出发,皎然进一步讨论“诗

人之思”后诞生的十九种诗体,其中的贞、忠、节、志、德、诚、悲、怨、意等九体偏于思想内容方面,而高、逸、气、情、思、闲、达、力、静、远等十体则偏于艺术风貌方面。由此可见,皎然诗论之所谓“体”,并不仅是指一般的诗歌体裁或题材,而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美学概念,包含了诗人艺术构思和诗歌才情风调诸方面。而辨体十九字中之“思”,则具体要求诗歌的意境必须是“气多含蓄”。诗人由心之“思”,而产生具体之“气”在体内冲突运行,于是冲口而出,化为具体的语言文字,融化于诗的节奏旋律之中。这种诗“思”,含蓄蕴藉,如捕风系影,无声无色,可望而不可及,特点在于“心”,是想象性的实际存在。后来严羽称诗歌的意境“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即受皎然诗“思”说启迪,而较形象地描绘了诗歌意境的艺术特征。而清末王国维,则进一步发展为“境界”说。(蒋凡)

【思与境偕】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王驾)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言其构思时客观境界常浮现于想象中,其诗遂能做到情思与境界、主观与客观相交融。南朝时刘勰论构思,已提出“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的命题;又铸成意象一语,言作者运思,“窥意象而运斤”(同上),表明他意识到作家运思时,脑海中常是主观之情志(意)与客观之物的映象(象)并存。盛唐时殷璠《河岳英灵集》以“兴象”为评诗重要标准之一,即要求诗歌能做到主观情思、审美感受与景物描绘相交融。王昌龄、皎然的诗论则提出了“境”的概念,以“境”指客观境界及其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强调诗人构思时须通过想象,使客观境界历历在目,如同置身于其中,然后方能进行创作。如王昌龄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皎然也屡屡言之。他论诗歌风貌,有“缘境不尽曰情”(《诗式》卷一“辨体有一十九字”)之语,含有情生于境、情境相生之意。又白居易自称所作诗“境兴周万象”(《洛中偶作》)。境、兴并提,也是说诗中既有境,又有情思、兴会。司空图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之论,并概括为“思与境偕”之说,以为此“乃诗家之所尚者”,可见情景交融、思与境偕,已成为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杨明)

【雅】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见《论语·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所称“雅”,原是从正乐的方面提出的。但古代诗、乐合一,因此“雅”又

兼指文学中之《雅》诗。后来《诗大序》解释说：“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东汉郑玄《周礼·大师》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雅”之为义，逐渐从古代正乐演变到具有文学的审美内涵的典范之义，进一步向审美标准转化。特别是魏晋以后，“雅”的审美义蕴逐步展开，形成了以“雅”为词根的概念系列，如典雅、古雅、高雅、隽雅、和雅、淡雅、安雅、雅致、雅韵、雅俗等。概括起来，其主要义蕴有四：一、《诗》有风、雅、颂三体，后以“雅”指合乎古代儒家经典范式的文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类，“一曰典雅：……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说明了“雅”之为义，是指以儒家五经为典范的文章体式或风格。在《宗经》篇中，刘勰又把合乎经典的“雅”具体概括为“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其审美义蕴于此可见。二、指主体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素养。如《世说新语·言语》：“（裴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扩展到文学写作，《文心雕龙·体性》称“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精神文化修养同艺术风格的审美表现的关系。这一层意义，此后逐渐扩展到论书、画、曲诸艺术门类。如清沈宗骥《芥舟学画编·山水·避俗》云：“笔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养性情者则存之，所以残贼性情者则去之，自然俗日离而雅可日几也。……故欲求雅者，先于平日平其争竞躁戾之气，息其机巧便利之风，揣摩古人之恬淡冲和、潇洒流利者……明此理以作画，自然出风入雅，轶俗超凡，不仅玩物适情已也。”三、指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准确性，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语言的风格特征。《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指当时诵读诗、书和举行典礼时所使用的不同于各地方言的通行的规范化的标准语。但后世由“雅言”的规范要求加以引申，又可具有加工、提炼甚至修饰润色语言的意思。两汉以后，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逐渐同口语脱离，而走上文字型的文学语言的发展道路，“雅正”的语言风格，就与引经据典、称古述今相联系了。因此发展到清代，桐城派就对古文提出了“雅”的要求，要求散文语言，辞无芜累，合乎古雅规范。直至近代章炳麟，仍然大力提倡“综核字句、必契故训”的“雅言”。四、指中国古代诗、文、书、画等文艺样式所创造的一种特定类型的艺术境界，其审美特征丰富多样，如典雅、古雅、清雅、和雅、隽雅、淡雅、恬雅诸目，均与凡俗之格对立而成。上述理论，对发展和提高文艺创作的品格，起

了促进作用；反之，运用不当，一味求“雅”而脱离凡俗，则又因其提倡复古具有贵族文化倾向，后来受到俗文学的讥弹，也在情理之中。参见“典雅”。

（黄保真）

【典雅】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指与“俗”对立的一种独特艺术境界的审美风格。唐司空图《诗品》专立“典雅”一品，云：“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皋兰课业本》解释：“此言典雅，非仅征材广博之谓。盖有高韵古色，如兰亭金谷，洛社香山，名士风流，宛然在目，是为典雅。”司空图所称“典雅”的审美境界，是由雅韵古色、超然脱俗的主体人格，和修竹茅屋、白云飞瀑的物象景观交融而成，它超越功利，一空色相，颇有隐逸之致，有时人们也称为“清雅”。清许奉恩《文品·恬雅》和杨夔生《续词品·闲雅》中所描绘的艺术境界，与此颇为相似。清马祖荣《文颂·典雅》云：“胎息圣籍，妙香暗熏。深如百和，酿成卿云。……句奇语重，高媲皇坟。明堂清庙，佳气氤氲。”所称“典雅”之品，意义与司空图旨趣略异，除了具有义理渊深、征材广博的特点外，又似乎多了点台阁雅士、贵族文人的气息。清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雅瞻》则纯以征材用事、黜浮除繁，而造自然浑朴之境为“雅”。可见“典雅”的审美意蕴也在变化之中。

（黄保真）

【雅言】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始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谓孔子当时诵读诗书，执行典礼，都运用合乎规范的“雅正”语言。雅言与方言对称，指当时王畿一带的语言。雅即正，孔安国说：“雅言，正言也。”（《论语集解》引）雅言在诗歌艺术方面，不仅要求诗歌采取文雅、合乎规范的语言，而且要有端正的创作态度，作为一种诗歌审美标准，既针对语言，也包括思想风格。“雅言”作为一种诗歌艺术的审美概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沈义父提出了作词的四条标准，“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是重要的一条（《乐府指迷》）。俗者雅之反，反对“俗”是从反面对“雅”的肯定。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其中“俗句”、“俗字”、“俗韵”均属语言范畴，都是与“雅言”背道而驰的。在思想风格方面，后世批评家从“雅正”入手，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如刘勰总结了文学作品的“八体”，其一曰“典雅”：“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要求作品的风格以儒家经典为楷模，正是对“雅言”的发展。

（孙克强）

【俗】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与“雅”相对立。《文心雕龙·才略》云：“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钟嵘《诗品》评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对“俗”的批评，已涉及思想情感和艺术风格的审美评价了。但在魏晋以前，“俗”的概念具多义性：首先指风俗、习俗，如《尚书·君陈》：“狃于奸宄，败常乱俗。”其次，又指芸芸众生，如《商君书·更法》：“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此“俗”已含贬义。第三，由于芸芸众生追求狭隘功利，于是“俗”又可指精神品格乃至学术观念的鄙陋庸俗，如《庄子·缮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又如陶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其所谓“俗”，又因与高尚精神品格相对立而具有潜在的美学意义。后来刘勰、钟嵘论“俗”，则由此引申和发展，明显具有审美意义。而真正广泛地把“俗”引入文艺理论批评领域，还是从唐代开始的。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他首先提出了“俗体”与“雅体”的对立。发展到宋代，忌俗、贬俗、要求去俗，成了诗家的普遍见解。其中，有从精神素养对文学品格的影响立论的，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榘》：“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有直接论诗文创作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宁僻勿俗。”朱熹《答巩仲至书》强调文学创作“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作为审美意识，雅与俗的对立是分明的。因此，忌俗与去俗，是文学创作成功的一个关键。另外，还有许多理论家进一步指出了“俗”的种种形态，如宋许颢《彦周诗话》引东坡“元轻白俗”之语，周紫芝《竹坡诗话》批评郑谷《雪》诗“气象浅俗”。至如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这是对唐宋以来忌俗、去俗诸说的理论概括，又为后人斥“俗”提出了一个理论纲领。后世反“俗”，大多承之而发，具体方面又有所发挥，反“俗”呼声日渐增强，如书论、画论及乐论，无不受其影响。宋刘学箕《方是闲居小稿》批评书画家的“尘俗之气”，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山水》专设“避俗”条，批评画中“五俗”，明显可见《沧浪诗话》的影响。其所谓“俗”，主要是违背文学艺术审美规律的劣质作品的美学属性。近代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云：“余尝谓山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两字最精确。俗不是坏字眼，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要求艺术创作“不将就俗目”。他从

人格与审美关系的正、反两方面，具体说明“俗”与“不俗”的对立、界限与规律，其论“俗”着重主体人格在审美创造中的物化。总之，从六朝至唐宋，随着纯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论家大力反“俗”，表现了艺术创造对于世俗功利的超越，和对艺术审美规律的尊重与肯定。但是，发展到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崛起，戏曲、小说发展，“俗”的美学意蕴发生了质的变化，肯定颂扬“俗”文学者日渐增多。这又另当别论。参见“雅与俗”。（黄保真）

【雅与俗】 古代诗学概念，由两个相互对立、又彼此渗透的重要审美概念组成。语初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论》：“林宗雅俗无所失。”又齐梁时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所称雅与俗，是指身份、等级和文化素养的不同。发展到南北朝时，雅、俗对举，已用于文学批评。钟嵘《诗品》评鲍照诗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以“清雅”和“险俗”对举。其中“清雅”，大概是陆机《文赋》所说“清虚婉约”、“雅而不艳”的意思。而“险俗”，则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言，指鲍照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又北齐魏收《魏书·胡叟传》云：“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典雅”与“鄙俗”对举，二者都指物化形式的文字风格，“典雅”指高度文字化的文学语言，“鄙俗”则指较接近于口语的、审美取向又颇同流俗的文学语言。综上所述，在南北朝文学批评中，“雅”与“俗”的对举主要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指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是高度文字化的，还是较接近口语的；二是作者的审美取向承传型的近雅，时尚型的偏俗；三是作者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识，较合乎杂文学观念者近雅，较重视纯文学观念的似俗。这三方面，既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创作实践和审美意识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唐宋以后文学创作和审美意识中“雅”与“俗”辩证发展的基本内容。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多数士大夫文人，倡“雅”排“俗”；另一方面，“俗”又从语言、情感、个性等层次，向“雅”渗透，丰富并改变了传统之“雅”的审美内涵，直到取而代之，而成为中国进行近代性质的文艺变革的重要理论范畴。这个发展过程，就是由语言形式的渐变到审美意识的解放。比如由原来的倡“雅”斥“俗”，发展到“化俗为雅”、“借俗写雅”、“以俗为雅”或“愈俗愈雅”。北宋诗人梅尧臣首先提出“以俗为雅”之说。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词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在这里，可见语言符号系统变革的两个层次：一是赋予“陈词”以新的生命；二是将

“常谈”俗语引入文学语言系统而赋予活力。这一变革,苏轼是杰出的理论家与实践者。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后来这种“以俗为雅”的命题又被黄庭坚进一步理论化了。其《再次韵杨明叔并序》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用兵。”又惠洪《冷斋夜话》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这就为从语言更新到审美意识的世俗化开了先河。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市民阶层对戏曲、小说的追求,表现了对“俗文艺”的极大兴趣,形成一代美学新思潮,于是赋予雅与俗的对立以新的社会内容和美学意义。以反传统姿态为“俗”文艺大声疾呼的是李开先和徐渭。李开先《市井艳词序》以满腔热情肯定了民歌的审美价值。徐渭《又题昆仑奴杂剧后》则云:“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他们认为俗文学高于士大夫雅文学,其审美价值在于纯任自然,直露本色,毫无装腔扭捏之态。这不仅阐明了口语型“俗”文学语言构成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规律,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字型文学语言的“雅”化倾向。这样议论“俗”与“雅”的对立,就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即集中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文艺与封建文艺的对立。他们把传统审美意识中倡雅排俗倾向,完全颠倒了过来。这一论争,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才告一段落。(黄保真)

【野】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意谓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失之粗野。“野”,本作“𡵚”,指郊原、田野。上古时部落聚居,贵者居“国”中,庶人住郊野,庶人身份低微,鄙略质朴,故以“野”称之。《论语》之“野”略有贬义。但“野人”住郊原,少受礼法约束,因此又引申为任性闲散、不受拘束之义。如《宋书·王僧达传》:“閤疾寡任,野心素积。”把“野”正式用之于文艺批评,最早约在六朝齐梁时代。钟嵘《诗品》称左思之诗,“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在这时,“野”视为典质古朴,雕润不足。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也有“文典则累野”之说。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展史上,六朝是注重形式之美,追求感官效果的时代,同八音谐畅、五色相宣相比,质朴真率,不加雕饰,即谓之“野”。在六朝人的心目中,其审美价值不高而含有讥贬之意。但在唐宋以后,美学思潮变化,当时人

审美意识的主流开始转向自然本真和意象、境界,于是人们对“野”的美学义蕴有了新发现,它便一变而为朴素之美的表现形态,成为艺术家追求的高层境界了。在诗歌美学史上,唐司空图《诗品·疏野》中对“野”的运用和生动描绘,便是理论转变的一个关键。此后,宋陈知柔《休斋诗话》云:“人为诗,要有野意。……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予尝欲作‘野意亭’以居。”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则直言:“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司空图把“疏”与“野”并列构成了新的诗歌美学概念,说明唐宋以后“野”的美学义蕴又有新发展。参见“疏野”。(黄保真)

【疏野】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较早而又全面地体现其总体美学义蕴的是唐司空图《诗品·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构成“疏野”的两个并列单词,其本义原有异同。“疏”,《说文》谓“足也”。《淮南子·道应训》“子佩疏揖”,高诱注:“疏,徒跣也。”由此引申为简素落脱、任性自然,不拘礼法。所谓“疏懒”、“疏诞”、“疏放”、“疏散”、“疏宕”等,都是指这类人的人格精神和行为模式。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后,个性意识开始觉醒,不少文人性尚通脱,甚至借以表现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性复疏懒”,《宋书·颜延之传》谓“延之好酒疏诞,斟酌当世”,等等。“疏”从指精神人格进而影响到审美态度,于是美的意蕴自然积淀其中。至于“野”,原指郊原田野,庶民居之,身份低贱,人格鄙略质朴,故孔子借用以论“文质”云:“质胜文则野。”“野”在六朝注重形式之美的时代,时人对“野”评价不高。故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有“文典则累野”之说。但唐宋以降,审美意识的主流转向自然本真,追求意象、境界,因此“野”便成为文艺家所追求的质朴之美的表现形式而受重视。而司空图则创造性地把“疏野”合称,成为一个含义更为丰富的审美概念。其《诗品·疏野》分三段:第一段四句讲主体的真实性情,和客体之万事万物是诗的本原。但主、客体相比较,主体性情的真率、自由,始终居于审美把握的主导地位。这是“疏野”境界的创造规律,也是“疏野”之美的本质所在,换言之,疏野之美是自由、真实的人性之美,诗人的审美把握必须以其自性、本真为主导,以真情实感为中介,以万物、万象为诗材,去创造一个表现自由人性的美的境界。第二段四句则是“取象”,即作者写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疏野之境,也可说是塑造了一个任性自然、真率

疏放的诗人形象。最后一段四句,则集中表述了“疏野”之美的非功利性,非世俗性,犹如《庄子》“天放”,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由表现。自司空图后,模仿演补之作日多。直以“疏野”名品者有曾纪泽《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另外,顾翰《补诗品》有《疏散》,马荣祖《文颂》有《疏放》、《朴野》等。基本上是状物、造境,偶及方法,从不同层面拓展了“疏野”的审美义蕴。参见“野”。(黄保真)

【大】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具有多层涵义。首先,其最高意义指宇宙本体及其自身固有的审美属性。语见《老子》第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所称“大”,指宇宙本体本身所自有的美,它是世界一切美之所以产出的本原。其理论肇自先秦道家之“道”,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之义无所不包,无声无息,无形无象,人无法感知它,但它却运动变化,无止无息,无所不在,具有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无尽性。所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大象”并非可闻之声和可见之象,而是它们的无形本体。人的感官虽然无法直接把握,但它却是天下一切美之所以产生的本原。“大”是至高无上的“道”的属性,也是美的本体,它无形无迹、无声无息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虽然感官无法直接把握,但是只要人顺乎自然之道,也就立心于“大”,体现了本体之美。其次,“大”指具体事物的某种特殊属性——即伟大。伟大事物虽然有形有象,有具体时间、空间,但是人的感官却难以把握,它有神奇功能,而人的思维却只能体认而无从究诘。如天地之“大”即是典型。《庄子·天道》云:“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其实,不仅是道家,先秦儒家同样尊崇天道之大德。如《易·乾》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又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由此引申,人取法天地,顺应自然而创造的光辉事业亦谓之“大”。如《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在这层意义上,“大”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崇高,或者是具有崇高感的伟大事物,但其意义与西方美学中悲剧意识的崇高有质的差异。《易·乾·文

言》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就是“大”之所以具有崇高伟大之美的实质所在。再次,是指人的审美活动中的义蕴。在这个层次上,“大”与“小”对举,用以概括人所感受到的事物的存在状态和意义。具体地说,“大”与“小”在审美活动的三个层面上构成了相互映衬、对比和转化的辩证关系。其一是视觉、听觉形象的“大”与“小”。主要表现在书画或音乐艺术的创作鉴赏活动中,具体事例此不赘言。其二,“大”与“小”是指艺术创作中选用个别物象以寄寓其广大精深的内容或精神。如《史记·屈原列传》评《离骚》云:“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又《文心雕龙·比兴》篇:“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也就是韩康伯注《易》时所说:“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小”是作为载体的物象,“大”则是由此联想引申的巨大意义。清刘熙载把这一艺术方法表述为“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艺概·诗概》)。其三,“大”与“小”还可指艺术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境界的审美特征。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大”是指艺术境界的雄浑阔大,属于壮美;而“小”则取象玲珑,小巧可爱,属于优美;二者各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相互映衬,难分轩輊。另外,艺术境界的大与小,也不能只看作品取象本身,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涵盖功能,看其“象外之象”,用现在的话说,即考察其因“小”寓“大”的艺术典型化的程度。有的物象虽“小”而境界实“大”;也有的内在审美义蕴并不丰富而张皇使大,物象虽“大”而境界实“小”。在诗歌意境创造中,“大”与“小”辩证统一,双方对转,内容丰富而形态多样。(黄保真)

【重拙大】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重,气格沉着凝重,与轻倩相对;拙,质拙朴老,与尖纤相对;大,境界开阔,托旨宏大,与细浅相对。况周颐以重拙大为词创作的三大要素,强调和追求静穆厚重,拙劲宽大的词学风格。诗论中虽然没有像词论那样明确将重拙大三者相提并论,将它们视为有机联系的艺术风格整体,但是,同样将重、拙、大分别看作诗歌美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肯定和提倡。前人论杜甫诗“沉郁顿挫”,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之为“沉着痛快”,胡应麟论李绅一些乐府诗得杜甫“沉着”(《诗薮》内编卷三),沈德潜肯定颜延之诗歌“要其厚重处,古意犹存”(《说诗碎语》卷上),潘德舆推重顾炎武诗“坚实”,不满萨都刺诗“骨不坚重”(《养一斋诗话》卷三),都是崇重之谓。诗而能重,则免于华靡轻弱,粗疏肤廓之失。但是若无流转

自然之妙,则过而伤笨,虽重不足贵。诗人尚拙,是指不刻意雕琢呈巧,保持诗歌稚真朴拙之美。吴騞《拜经楼诗话》卷四:“马君辉云:‘养子早知能背国,宫中不赐洗儿钱。’此用拙而胜也。”然而朴拙又不可沦为鄙俚,也并非一概排斥用巧,前人主张拙得恰到好处,“朴拙惟宜怕近村”(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一),还要“巧拙相济”(王若虚《滹南诗话》引周德清语),“善藏其拙,巧乃益露”(袁枚《续诗品·藏拙》)。这实际上是赞成“大巧若拙”。“以大为美”在我国古代美学和诗学理论中有悠久传统,《老子》“大音希声”,季札“能夏(意谓雅)则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李东阳以宫声求诗,钱谦益欣赏大音宫声之诗,刘熙载《艺概·诗概》“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都是对“大”之美的歌颂和追求。诗歌创作的重、拙、大基本属于阳刚风格的范畴,在诗苑有重要位置。(邬国平)

【和】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它从总体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人生审美境界的最高追求。西周末年,史伯最早提出了“和实生物”的审美命题,语见《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又云:“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和乐如一,……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是自然社会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其中所称“乐”和,因为先秦时代诗、乐、舞三者合一,常以“乐”表示艺术总称,因而其论“和乐”,即通于文艺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上,“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蕴,要义有以下几方面:一、“和”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发生的规律,存在的常态,功能的佳境。如前引史伯“和实生物”、即为“和”的最高审美义蕴提出了哲学依据。其中“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物错杂以成“文”等论点,对“和”发展为审美范畴影响尤大。而道家《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更从宇宙本体论、生化论层面,阐释了“和”是阴阳二气矛盾统一,是生成万物的内在依据或存在状态。而《庄子·天道》篇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和、人和,即是顺应自然,而不要人为地干扰,甚至破坏自然,这是万物之美所以产生的哲学根据。二、“和”是创作主体的生理机能、行为态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状态和理想规范。如《国语·周语下》云:“单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刘勰《文心雕龙》则将“和”的理论(艺术论)直接引入文学创作,《养气》篇云:“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

气,烦而即舍,勿使雍滞。”创作之时,诗人的身心调畅清和,是保证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如果是“销铄精胆,迫促和气”,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这说明审美主体的生理及心理和谐,是其审美创造能力正常发挥乃至超常发挥的内在基础。三、“和”是作品创造的雅正和平、含蕴深厚的艺术境界,这一审美特征备受传统诗论家的推崇。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就在春秋时期,孔子已为诗歌之“和”定下基调,认为“和”是诗的最高境界。但孔子同时又强调“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可见其“和”的艺术高境,即包含了社会人生的矛盾统一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否定诗歌文学揭露黑暗、讽刺时政的现实性。而发展到汉儒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其所谓“和”,强调同一,而淡化矛盾,削弱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作用。这一观点,为明清儒家正统诗论所发挥,于是出现了追求温厚和平、含蓄委婉为审美极致的理论倾向。其特点是把思想规范与审美追求合二为一,如清沈德潜等即是。而张谦宜则反之,其《茧斋诗谈》卷一云:“人多谓诗贵和平,只要不伤触人。其实《三百篇》中有骂人极狠者,如‘胡不遄死’,……盖骂其所当骂,如敲朴加诸盗贼,正是人情中节处,故谓之和。”四、“和”是艺术辩证法的适宜度量和最佳境界。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声亦如味,……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诗歌作品的艺术形式也应追求“和”。如《文心雕龙·声律》云:“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五、“和”作为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其义蕴中还包括了文学作品调节社会矛盾、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调节平衡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乐论》所称君臣上下一同听乐而“莫不和敬”,强调“乐者审一以定和”。《礼记·乐记》又据此加以发挥。但是汉以后的文论家,又多有强调“和”的审美功能而要求超越功利,其旨趣之异,不难分辨。(黄保真)

【玄】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意谓神妙的思绪情韵及幽深的艺术境界。六朝梁江淹杂体诗《孙廷尉绰》云:“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机巧。”玄远之思,情韵高雅,拔出流俗,自具艺术品格。“玄”的概念来自道家。《老子》第一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称“道”为“玄”。孔稚珪《北山移文》云:“世有周子,隼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张铤注:“玄,谓老庄之道。”故后人称道家学说为“玄”。后汉至魏晋时

期,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学,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一些文人名士以老庄之道和《周易》为依据,作辨析名理的谈论,称为“玄谈”,蔚然成风,是为“玄风”。晋葛洪《抱朴子·嘉遁》云:“积篇章为教庾,宝玄谈为金玉。”可见玄谈玄风之盛。这种谈玄之风,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反映甚多,一直到唐代李白《赠李十二》诗中尚可见到“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这样的诗句。玄言诗是魏晋玄学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西晋怀帝时,以王衍、庾敳为首的大官僚崇尚虚谈,谈玄在士大夫中形成风气,并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魏晋以来,社会动乱,士大夫托意玄虚而求全身避祸。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玄言诗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于寡味。”晋王朝偏安江南后,一些士大夫把玄谈之风带到江南,玄学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曾作出这样的概括:“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钟嵘《诗品序》也说玄言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有孙绰和许询,当时并享高名,几乎统治了整个东晋的诗坛。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艺术形象和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绝大多数作品失传。

(吴河清)

【玄妙】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西汉扬雄《法言》逸文:“或曰:辞达而已矣。曰:圣人之文,其隳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之谓元,理微之谓妙,数博之谓包,辞约之谓要,章成之谓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渊鉴类函·文章》引东汉荀悦《申鉴》称引扬雄之语,“元”作“玄”。汉时多取杂文学观念,圣贤之“文”,包括了诗赋文章及其他著作。扬雄认为,文章创作犹如探索宇宙自然的秘密,而得其深奥微妙的道理。因此,写作必须幽深有味,理在言外,令人神往,既“玄”且“妙”。后人加以引申,指深奥微妙的道理在诗歌文学中的形象表现。如《后汉书·冯衍传》引冯氏《显志赋序》云:“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唐孟浩然诗云:“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后来的艺术评论家,又把“玄妙”的美学概念加以引申发挥,指艺术创作中的想象、构思与灵感兴会。《法书要录》卷四云:“夫翰墨及文章之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

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优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这实际上已涉足于艺术创作的思维领域,因此引起后人的兴趣和关注。

(吴河清)

【玄通】古代诗学概念。语出《老子》:“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注:“玄,天地。言其志节玄妙,精与天通也。”《后汉书·党锢传·刘祐》:“吾子怀蓬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上述玄通,本意指的是古代善“士”,体察事物细致入微,思想深远而通达,其深刻程度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玄通”之说从一开始即隐约地透露出道家的审美意识。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思是说,单凭人的感官,通过声、色、形、象,是难以把握美的本质的。所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特立《冲淡》之品,认为只有“素处以默”,才能“妙机其微”,经过“玄通”这一细致入微的“神秘直觉”阶段,才能感悟到美的存在。清代孙联奎《诗品臆说》云:“机者,触也,契也,心通造化,自然妙契。”较好地解释了“玄通”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

(吴河清)

【妙】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西汉扬雄《法言》逸文:“或曰:辞达而已矣。曰:圣人以文,其隳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之谓元,理微之谓妙。”寓理精深微妙,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妙”本是一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老子《道德经》中多次提到“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老子是把“妙”作为宇宙始基的一个别号,是属于“天”的概念。庄子把“妙”表述为人生修炼的极境:“九年而大妙”。郭象注:“妙,善也。”成玄英注云:“妙,精微也。知照宏博,故称大也。”王弼云:“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这里,“妙”不过是对“玄”的又一称呼而已。“妙”的概念进入美学领域,对后世诗学影响颇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认为,“妙悟”的标志是达到汉魏、盛唐诗的高妙地步,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样实际上把诗歌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一《六法三品》云:“笔墨超群,传染得宜,意趣有馀者,谓之妙品。”“妙品”成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很高的境界。

(吴河清)

【体】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有多种意义。一指体裁。如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其“体”即指奏议等诸种文章样式。二指体貌、风格,作

品在总体上给读者的感受。原为人物品评用语。如曹操称郭嘉“体通性达”(《请追赠郭嘉封邑表》),言其资质聪慧明达。后乃用于诗文评论。《典论·论文》:“(王粲)体弱,未足起其文。”言其作品风貌较柔弱,力度不够,不足以使其文彩具有飞动高扬之致。在这一意义上,体、气义通,故李善注:“气弱谓之体弱。”《典论·论文》又云:“孔融体气高妙。”即以体、气连文。其后用此意义者甚多。陆机《文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言作品体貌多姿多变。《文心雕龙》有《体性》篇,专论作家个性与诗文体貌的关系。性指个性,刘勰认为它包括才、气、学、习四方面因素,才、气禀受于天,学、习为后天陶染所凝。体指体貌取决于性,二者统一。刘勰于个性之中,既强调先天,又加以后天因素,是其胜过前人处。又云:“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将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类型。除指个人风格外,体还可用以兼指某种流派风格。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指齐梁诗坛的三种流派风格,即出于谢灵运一体,出于傅咸、应璩一体,出于鲍照一体。又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举玉台体、宫体,既与内容有关,指以女性美为描绘对象,又指其体貌,即此类诗多具轻艳风格。其风格即由特定的表现对象所决定。又西昆体,指北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效法李商隐近体诗,多用典故,重藻彩,着意锤炼,乃形成华丽精工的风格流派。亦可用以指说某种体裁的共同风格。《文镜秘府论·南卷》有“论体”一节,云:“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谏得其实。”意谓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六种体貌各有相对应的体裁。又可用以指说某一时代作品共有的风貌,如《沧浪诗话·诗体》所举之建安体、永明体、元和体、元祐体等。还可指一篇作品的体貌。如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甚或也可能摘句而言。如《文镜秘府论·地卷》引崔融《唐朝新定诗体》“十体”之说,其中质气体、飞动体、清切体皆指风貌,而摘举两句或四句诗以说明之。皎然《诗式》举例说明高、逸、贞、节、志、气等体貌时,亦有摘句而言者。三指某种特殊的形式、格律、手法等,《文心雕龙·比兴》有比体、兴体之语,系指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中的雕藻体、映带体、婉转体、菁华体均属修辞手法。皮日休《杂体诗序》、《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中所举诸体,也属此类。《诗人玉屑·诗体》中亦

多此类,如蜂腰体、偷春体、折腰体、绝弦体、七言变体、绝句变体等。

(杨明)

【本同末异】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当然,有关文体分类及其特点的研究,并非自曹丕始。从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家,到两汉区分“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就是一个进步。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别立《诗赋略》,已有文体分类的朦胧意识。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经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了一些概括,如汉武帝时,公孙弘说诏书律令特点是“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见《史记·儒林列传》),又《盐铁论·水旱》载大夫之言曰:“议者,贵其辞约而旨明,可于众人之听,不至繁文稠辞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计。”又如汉末蔡邕《独断》和《铭论》,把天子令群臣的文体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把臣属上书天子的文体分为章、奏、表、驳四类,分别说明其体式,这也是某种文体论的滥觞。但以上是就个别文体而言,文体区分的意识模糊。而曹丕《典论·论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说法,自觉分为四科八类,一一区分其艺术特点,而且四科八类之中,隐约包含或启发了齐梁时代的文笔区分和韵散之别:其中奏议和书论,属散文,即后世所谓“笔”;铭诔和诗赋为纯文学,属韵文,即后世所谓“文”。表现出文学的独立趋势和进步。“本同”是从“虚”的方面说明文学各体,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如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以及“文以气为主”,“主”也就是“本”,指出无论何种文体,其创作必须与作家个性气质相统一,“文学的自觉”就是建立在这种“文以气为主”的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的。“末异”则是务“实”,指出各类文章体裁的特殊性,各有其艺术特点,其所谓“异”,就是不可混同等一,只有更好地注意各种文体的艺术特殊性,才能发挥“本同”的共同性。曹丕有关文体四科八类,具体地说:“奏议宜雅”,因为奏议是写给帝王看的,所以文辞和风格要求典雅;“书论宜理”,因为书、论是发议论以说服人,所以要求条分缕析,说理透彻;“铭诔尚实”,称颂功德的文字,要求实诚而不虚浮;“诗赋欲丽”,要求辞藻华丽,讲究文采。总之,“本同末异”之论,说明了文学表现形式的共同本色和多样性的统一,开创了后世文体论研究,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以及萧统《文选》,均深受其影响。

(蒋凡)

【六观】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提出的批评诗文的六个方面：“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观位体，看作品在安排体制方面做得如何。刘勰认为应据内容和需要确定体裁，而各种体裁有相应的体制，即风格特点、写作要求；若不合体制，是为文之大忌。观置辞，看作品的语辞运用、章句安排等。观通变，看作品在继承革新方面做得如何，能否推陈出新。观奇正，看作品能否在雅正的基础上酌奇取异。刘勰主张“执正以驭奇”（《定势》），反对过分追求新奇以致于讹诡，反对“逐奇而失正”（《定势》）。观事义，看作品在援举事例、典故方面做得如何。南朝用典之风盛行，刘勰也主张渔猎古书，但要求“用人若己”（《事类》），精确合宜。观宫商，看作品字句的声音是否和谐。南朝齐永明年间诸文士写作诗文注重声律之美，嗣后，作者对此均十分讲究。《文心雕龙》亦有《声律》篇加以讨论，要求作者“音以律文”，使作品诵读时有“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贯珠”之美。《知音》篇认为作品之高下是客观的艺术存在，可以通过正确的批评加以认识、衡量。但由于作品众多，形式、风格多样，而读者往往有所偏好，又常常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其鉴赏能力亦高下不齐，故正确的批评颇为不易，乃标举六观，以为衡文之径。（杨明）

【品】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主要涉及艺术的批评与鉴赏问题。语见钟嵘《诗品序》：“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轻欲辨彰清浊，摘摭利病，凡百二十人，……至斯三品升降。”其所称“品”，语源极古。《易·乾》云：“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品物”指众多之物。《晏子春秋》外篇下二：“品人饰礼烦事。”“品人”即众人，众座。《尚书·舜典》：“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国语·周语中》：“外官不过九品。”“品”指人的尊卑等差。以上“品”作名词用。也有作动词用的，如《周礼·天官·膳夫》：“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郑玄注：“品者，每物皆尝之。”上述“品”的古义，虽不含审美意味，但却是后世作为审美概念发生的语源始基。品，作为一般语词向审美概念转化，始于汉而完成于六朝。其发展轨迹是从品人到品艺，从理性判断到审美鉴赏。班固《汉书·扬雄传》录《法言》序目：“仲尼之后，迄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第十一。”颜师古注：“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这还多是对人物等差作理性评判。到了汉末，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传序》），风气大盛。又《后汉书·许劭传》云：“劭与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在对人的品藻、品题中，审美意味也发展、丰富起来。故《世说新语》专立《品藻》门，品评人物，而尤重风神、韵度及气骨之美。如《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其品评偏于人物的精神品格、风度气质和个性特征的审美鉴赏。山涛之品嵇康，更是形象地描述了品评者的审美感受和心理活动。在这种时代风尚中，六朝文士对书画和诗歌的品评鉴赏，也日渐发展。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直接以“品”名书，其序云：“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此后姚最有《续画品录》。论书法有梁庾肩吾《书品》，载汉至齐梁书法家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从内容到结构、形式，都成熟了。而钟嵘《诗品》就在这一品评人物和艺术作品蔚成风气的时代美学思潮中脱颖而出，最早说明“品”这一审美概念的意义。概言之，“品”的义蕴有五方面：一是评析优劣，分出等差。钟嵘将诗人分上、中、下三品，其“品”已含优劣之义。二是赏评概括，摘摭利病。《诗品》品评各家多属此类。三是追溯渊源，分别流品。四是体验品味，标举名作。如品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五是品录、品选各家作品。总之，到了六朝的齐梁时代，“品”作为文学艺术的审美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理性判断减弱，而纯粹审美判断的内容日渐丰富多样。“品”的形成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已完成了从社会政治的教化批评，向纯粹审美评赏的历史转折。而发展到唐宋以后，随着各种艺术形式的横向扩展，其理论义蕴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以画品、书品、文品、诗品、赋品、曲品、词品直接命名之作，已不胜枚举。综括起来，“品”义在以下三方面有重大发展：一是“品第”各家成就，不仅仅笼统分别等差，而是按各家作品审美品格特征及其艺术造诣来分序列。如唐张怀瓘《书断》直接以神、妙、能三品分优劣。二是专门品味审美境界而不分等级，这类论著以唐司空图《诗品》首开先例。他按作品审美风格特征和艺术规律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凡是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艺术境界和美的形态，皆可入“品”。这类著作很多。三是扩展到讨论创作方法、艺术规律和作者之用心。如清袁枚《续诗品》。“品”作为审美概念，含义丰富，延用至今，影响不衰。

（黄保真）

【观】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主体对自然客体、社会现象和自我

本身进行观察认识的一种活动或方式。《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中国先民创造的最早的符号系统和文化形态。它的创造的过程就是从“观”到“取”，即从直接观察、感性把握到模仿、取象、符号化的过程。其二，从读者角度看，是指接受主体对文艺作品所进行的感性直观、理性认识、心理体验等一系列复杂的活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这里的“观”，就既有对音乐、诗歌、舞蹈的视、听，也有对作品体现的社会历史内容的理性分析，也有主观心理的审美体验。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的“观”就主要是讲对作品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理性分析，肯定其认识价值。《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观”则是指对诗中反映的现实社会生活内容和百姓情绪、思想和行为状况的分析、把握。其三，指人的非逻辑、超理性的把握事物的方式。其初在道家哲学中主要被作为一种静观默察、涤除玄鉴，以把握宇宙万物的本真、本体的思维方式。《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其中的“观”不仅仅是指对纷纭变化的现象的直观，而主要是对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的运动规律的直契、体悟。佛教哲学中也主张对心性、万法静观默察，所谓“观照”、“观法”、“观心”的终极或最高层次，就是达到超逻辑、超理性的顿悟、妙契。这种把握事物的方式，就其非逻辑、超理性、超功利等特点而论，和审美规律有相同的一面，故在《庄子》中，就几乎把它作为审美创造的特殊方式了。《达生》篇中梓庆削鐻的寓言故事讲梓庆削鐻之前，先斋戒七日，达到超越功利，超越自我的境界之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于是创造出了“见者惊犹鬼神”的艺术品，即作为乐器的“鐻”。但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观”却始终没有发育成为纯审美把握方式的范畴。直到近代，王国维借鉴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才把“观”升华到纯美学的高度，使其内涵总括了审美把握方式的特点和规律。其《红楼梦评论》云：“夫美

术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贵具体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说明“观”不是用理性抽象的方法把握事物，而是寓一般于个别，以个人显现全人类的把握事物的特殊方式。《文学小言》云：“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自他方面而言之，则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人间词话》亦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观”，“直观”，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自我，不带任何欲念的审美观照、审美把握方式。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他进一步指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自大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人间词话》中，还以“观”的方式来区别两种不同的意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云：“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就审美创造而言，“观”的方式不同，即审美把握的方式不同，作品的审美品格，即艺术美的形态、类型也不一样。总之，王国维借鉴西方纯粹美学观点，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丰富经验，从四个方面系统地揭示了“观”的美学内涵，即“观”是文艺家把握自然、人生、自我的特殊方式；“观”的特点是以具体、生动的个别事物显现事物普遍的、本质的一般属性；“观”的性质是主体以纯粹的无欲之我，对事物进行超越功利的观审、观照；“观”可以分为“以物观物”、“以我观物”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直接决定了艺术美的两种基本形态——优美与壮美。至此，“观”作为中国化的审美方式的范畴的地位，才可以说完全确立了。

（黄保真）

【观风】 古代诗学概念，在古代文论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意为通过诗歌等文艺作品可以体察、了解民事、民情和风俗面貌。孔子以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其中“观”指诗具有帮助认识民间风俗之用，即郑玄所谓：“观风

俗之盛衰。”这一观念在当时及以后有极大影响。古时诗乐合一,由乐观风往往亦即由诗观风,《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知晓各国风尚即是此一体现;《吕氏春秋》中也说:“观其音而知其俗也。”古时有所谓采诗之官的说法,即收集民间歌谣以观察民间情事,它既是“观风”观念的基础,又有力地加强了观风观念的流衍。《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为民间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也。”“观风”除了其观“风俗”的一面,往往还包含了观世运、观国家兴衰的一面,即班固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季札观乐中也包含了这一意思。《吕氏春秋》也说:“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这一方面后代渐趋突出,许多诗人或文论家谈“观风”都是在讲国家世运的消长。唐元结《春陵行》反映了社会动乱,自述其作诗宗旨:“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宋李觏《上李舍人书》:“欲观国者,观文可也。”邵雍《观诗吟》:“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元赵孟頫论诗“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薛昂夫诗集序》)。明王祹:“词翰细事耳,于此不亦可观世变乎?”(《书徐文贞公诗后》)许学夷一方面讲“诗文与风俗相为盛衰”,另一方面又讲它“与国运同其盛衰”(《诗源辨体》)。清洪亮吉:“诗虽小道,然实足以觐国家气运之衰旺。”(《北江诗话》)而《尚书·舜典》、《毛诗序》以下论“诗言志”,指人的主体性而言,所以“观风”还可以理解为观人的风尚品性。唐柳冕:“古者陈诗以观人风。君子之风,仁义是也;小人之风,邪佞是也。”(《答杨中丞论文书》)这说明了观风概念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陈引驰)

【厚】 古代诗学概念。清贺贻孙《诗筏》云:“诗文之厚,得之内养。”历朝历代,诗人之“厚”,言者甚多,遂衍为中国诗学的一个审美范畴。其含义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厚”有充实、丰沛之义,在诗文理论中,指作者气盛精健,义理充盈。刘勰说:“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心雕龙·风骨》)韩愈将“气”比作水,“言”比作“浮物”,“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盈”、“盛”皆是“厚”之谓。这种“厚”的内涵偏重于作者的儒家思想道德修养,并将这种人格的完美当作提高艺术造诣的重要前提。顾炎武《日知录》提倡“重厚”,抨击《风》、《雅》“罪人”(卷一三)。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之首:“厚必由于性情。”都是强调高深的儒家道德修养对诗歌创作的启导和制约作用。二、“厚”谓深厚、丰博,诗论中指诗人能将自己真挚深厚的感情和丰厚充实的内

容浑然融合在一首诗里,在饱满中给人以无穷的兴味,在雄健中显示出较强的内聚力。钟惺《与高孩之观察》:“诗至于厚而无馀事矣。……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浚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平而厚”一类诗的特点是雍穆平远,情深义长;“险而厚”一类诗的特征则为充满奇壮和悲凉之气。这两类诗虽有平实和奇险的不同,然而又都具有丰厚饱满的共同特征,它们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作品整体浑融蕴藉之美,并不以警策佳句见长。《诗筏》:“厚之一言,可蔽《风》、《雅》。《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可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这同样是强调“厚”的诗歌浑融蕴藉之美,如果徒有声律格调外在架子,缺乏内蕴神理,这是薄而不厚。三、“厚”又是指诗歌言简意赅,语约义丰的艺术特色。钟惺评《古谚古语》说:“诸谚语有可为诗者,有不可为诗者,总之,古人数字亦可成一篇,读之使人气厚而笔简。”(《古诗归》卷二)谭元春评《笔铭》也说:“古人数字便是一篇大文章。”“古人不全说出,无所不有。”因为古人作诗“简而深”,先“有意思”,尔后才“偶然露出题目”(同上卷一)。这都是推崇上古作品以尽可能少的字句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这样一种艺术经验,作为诗人写诗“求厚”的借鉴,克服文字冗长而兴味短缺的弊病。四、“厚”指忠厚、厚道,在诗论中实是“温柔敦厚”的简称。它要求诗人写诗符合和体现儒家主文谏、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使维护君主尊严和忧国忧民、纠克时弊二者协调和谐,避免用直露尖锐言辞议论朝政得失,而改用含蓄温和的笔调进行规谏和批评。

(郭国平)

【逸】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盛行于汉末魏初,如曹丕《与吴质书》云:“公幹(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逸”原有超世拔俗,飘然不群之意,如《后汉书·蔡邕传》谓“伯喈旷世逸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谓“亮少有逸群之才”。曹丕论文学,早有“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主张。他很欣赏刘桢诗歌的“逸气”——也即飘然脱俗的奔放之气,但是又可惜他刚劲之力不足。钟嵘《诗品》列刘桢诗于上品,云:“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可见汉魏六朝文论家,视高妙通脱、拔俗不群的“逸气”为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客观上产生了否定儒家礼义对于诗人主观气质和才性的支配和决定作用。后人又据此加以理论发展。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式》,提出诗歌风格的十九体,“逸”为其中一体,并阐释为:“体格闲放曰逸。”明代胡应

麟《诗薮》云：“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李白。知二子之为逸，则逸与神，信难优劣论矣。”明代唐志契对“逸”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唯逸之一字，最难分解。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浊，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以此想之，则逸之变态尽矣。”作为文艺美学范畴的“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大。总的来说，在魏晋表现为违礼脱俗、自由抒写的精神风貌；在宋元表现为一代文人彻悟进退穷通之理，只以抒写胸中逸气以自娱的超然出世的审美文化观；在明清表现为主情派文人“大丈夫独往独来，自舒其逸”的放逸不羁的品格。在诗歌的风格领域，“逸”的影响则表现为“飘逸”。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飘逸》云：“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惠中，令色细缊。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这里，“飘逸”又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把人物的超脱世俗的孤高风貌，注入到了诗歌的飘逸风格之中。

（吴河清）

【丑】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国语·周语上》载康公之母语：“夫粦，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说文解字》释“丑”为“可恶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游引《郑书》云：“恶直丑正。”可证先秦时“丑”有“恶”义。故《荀子·非相篇》以“恶”代“丑”，曰：“美恶形相。”丑在审美活动中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庄子》中称与西施之美相反的人为“丑人”（《天运》）。艺术中的丑是生活中丑的集中反映，对美起着补充、衬托作用，通过对丑的否定突出地表现美。《抱朴子·广譬》：“不睹琬琰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覩虎豹之文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指出了美与丑的对立关系，以及通过对丑的否定达到突出美的效果。清贺裳在谈到对唐诗的欣赏时说：“不读全唐诗，不见盛唐之妙；不遍读盛唐诸家，不见李、杜之妙。”（《载酒园诗话又编》）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突出美。美与丑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古代文艺理论家特别注意美丑的相对性。《淮南子·说山训》：“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指出绝对的美和丑是没有的，即使像嫫母和西施那样著名的丑妇和美人，也有其相反的地方。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作家作品，例如杜甫诗，备受后人推崇，也有其缺点。清汪师韩说：“诗至少陵，谓之集大成，然不必一字一句之可议也。”（《诗学纂闻》）清潘德舆更指出杜诗中“好丑杂陈”（《养一斋诗话》）。美和丑的另一个特点是，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又可相互转化。清人刘熙载

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艺概》）如韩愈、卢同之诗，常有化丑为美的形象描绘。刘熙载又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同上）不仅如此，古代文艺理论家又注意到对美丑的鉴赏还受到审美主体的制约。《庄子》：“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指出了审美主体对美丑判别的重要意义。后世文学批评中常援此发论，清潘洵引黄庭坚云：“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总之，古代文艺理论家对丑的特点的认识，尤其对美丑辩证关系的认识，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起了重要作用。

（孙克强）

【远】古代诗学概念。语出钟嵘《诗品》：“古诗，其体源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又评阮籍诗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可见，古代诗论中的“远”，是指一种广阔深邃的艺术境界。唐代皎然《诗式》提出诗歌风格的十九体，谓“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望山，乃谓意中之远”。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把“远”列为诗之九品之一。陶明潜《诗说杂记》卷七云：“何谓远？沧溟万顷，飞鸟决皆者是也。”这里的“远”，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表示距离的本义，而是指诗歌所创造出的一种情思浓厚，意境深远的境界。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淡，淡而远者难知。”可见，“远”还有幽深含蓄的意味。

（吴河清）

【纤】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深浅而各奇，秣纤而俱妙。”指的是一种浓淡适中的协调美。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表达纤秣的风格特点：“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郭绍虞《诗品集解》云：“于幽杳之境，而睹绰约之姿，何其纤也，亦何其秣也。此写纤秣之意态。”这说明纤秣实际上是间于浓妆与淡抹之间，如果说绮艳表现的是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浓艳美，那么纤秣呈现的则是浓淡相宜平和悦目的清丽美。它表现出娇而不媚，“丽而有骨”的风格，可以看成是由浓趋淡、由艳至清的一种过渡，有时它靠近绮丽，有时又偏近于清雅。如陶渊明、韦应物的写景诗就接近于清幽淡远。苏轼赞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称韦诗“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就是指他们的诗风并非一味平淡、闲远，其魅力正在于它们含有纤秣绮丽的因素，将纤秀与淡远糅合在一起，达到了优美境界的极致。

（吴河清）

【艳】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刘勰《文心

雕龙·情采》：“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这里，显然是把“艳”解释为绮丽，指词章华美、境界绚丽的风格特色，它与素朴平淡相对，显示出一种色彩缤纷的气派。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专有“绮丽”一品，“雾馥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阳”，形容其特点是诗歌语言富于色彩美，表现出的境界是五光十色，娇媚动人。清代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云：“诗丽于宋，艳于齐。物有天艳，精神气泽，溢自气表。……如《卫》之《硕人》，《骚》之《招魂》，艳极矣，而亦真极矣。……浮薄之艳，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他还说“谢玄晖艳而韵，如洞庭美人，芙蓉衣翠羽旗，绝非世间物色。”反映出中国古代文论主张华美的文辞与质朴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反对片面追求声色之美。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过程来看，“艳”的风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质相称，“丽不伤浮”，如古人解《诗品》所言：“富贵华美出于天然，不是以堆金积玉为工，如春入园林，百卉向荣，自有生意。”另一种是内容贫乏，只在语言形式上雕琢粉饰，宫体诗、宋西昆体等作品即是此类代表。如明代杨慎所说：“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明代谢榛云：“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无。比如松篁之于桃李，布帛之于锦绣也。”在诗歌风格的百花园里，艳丽和素朴各有其妙，都是不可缺少的。

(吴河清)

【意格】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诗最争意格。词气富健矣，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格调清高矣，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传远。有以意格为腐谈者，中其所短故耶？”古人作诗重视炼意，肯定“以意为主”，又重视诗歌格调高古雅正。“意格”说集二者为一，强调作诗尊意尚格。“词气富健”是诗人从事创作必需具备的条件，这一点没有争议。可是讲意格却被一些人视为“腐谈”，遭到轻视，潘德舆对此表示不满。格是诗歌一定的体制规格。潘德舆以“清高”言格，是以清雅高古为诗歌体格的规范。他有时说，意是求“情理之正”（卷四），有时又说：“‘理’即‘意’之托始，‘想’即‘意’之别名。”（卷八）合而言之，意指诗人立意构思和诗歌作品的旨义。而潘德舆对这种意义又有特定的质的规定：从内容方面说，意谓符合儒家思想的精神意识；从构思立想方面说，又指构想寄托精严深刻。潘德舆对意格的解释带有较深浓的尚雅崇儒色彩，反映出他诗学观点的正统性，有其不足之处。但是他强调意、格作为诗歌有机构成因素必须受到诗人重视，这对促使诗人注重诗意的铸炼和追求诗格的完美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后来林昌彝提出：“诗

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趣以臻其妙。”（《海天琴思录》卷一）于意、格外，再加以妙趣，则是对潘德舆“意格”说的补充和完善。（郭国平）

【意象】 古代诗学概念。指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造的融汇了主体意趣的形象。较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意象”之词，虽正式由刘勰提出，但其理论含义，又自有其渊源。“意”与“象”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语词，“意”指主体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认识和认识活动，如《庄子·外物》“得意而忘言”，其“意”就是主体的认识。“象”则指可被人感知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具体形象，如《易·系辞上》：“见乃谓之象。”不过由此又可引申出模仿和象征的意思。如《系辞传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后一个“象”就是圣人模仿自然而创造的、物化人的认识的图像。正是《易·系辞上》首次把“意”和“象”联结使用：“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提出了言、象、意关系的论述，为后世“意象”作为美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而魏玄学家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又对言、象、意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具体内容详见“言意之辨”。他把言、象作为意的不同层次的信息载体和物化形态，又揭示了触类取象、因义选言的思维规律。不过，王氏所说的“意”仍是理性内容，因此，其称“言”、“象”也就还不具有审美形式的意义。最早把言、象、意引进文艺领域而赋予审美意义的文论家是陆机。其《文赋序》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氏以文、物、意为文章写作的三大要素。三者同言、象、意相比，基本相似，又略有不同，关键在于艺术思维的审美内容的不同。“文”近似于“言”，指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但陆氏之“文”又不是纯属“意”的载体，而是自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即《文赋》所称的音声迭代，五色相宣的艺术形式。“物”有二义，一指客观事物，二指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映象，即《文赋》所称“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是产生审美新质的过程。而陆氏之“意”，不仅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更主要的是感物而生的情感。陆机把创作过程看作是由感物生情到情物交融，再选义择声，物化为美的作品的过程。比较而言，王弼讲“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是运用类比思维方式以取象达意的过程。而陆机所讲“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则是运用艺术思维规律，达到审美统一的过程。虽没正式用“意象”，但陆机所论与后来刘勰的“意象”内涵接近，具有全新的审美意蕴而启迪了后人，

从而成为从哲学中的“意”“象”论向艺术审美“意象”论转化的中介环节。《文心雕龙》中的“意象”，已明显是指艺术思维展开时，创作主体头脑中浮现的融会主客观的映象，而不是创作终结时的艺术形象或境界。唐宋以后，“意象”概念普遍使用。相传王昌龄《诗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所称“意象”已具有情意与物象达到审美统一的内涵，但意义仍缺乏明确性。发展到司空图《诗品·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犹春于绿，明月雪时。”这时的“意象”，才完全成为诗人头脑中审美创造的第二自然或艺术境界，“意象”概念在中国诗论中的美学地位才算牢固地确立了。宋以后，“意象”有时作为艺术境界来使用，义略同于“意境”。另外，“意象”在书画理论中，也含义丰富，颇有影响。（黄保真）

【意境】 古代诗学概念。有时又称作“境界”或“境”。是古人以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规律的理论概括。较早见于唐王昌龄《诗格》：“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家，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夫文章兴作，……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脚下，揽天海于方寸”（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称引）。而《诗学指南》本王昌龄《诗格》中有“诗有三境”条，其中有“意境”一目。在这里，王昌龄提出了构成“意境”的三个密切相关的审美概念——意、境、象。“意”指主体的思维感情和创作动机；“物”指作为审美客体的景物、事物；“境”则是“意”和“物”相结合的产物，是诗人“以心击物”而得的审美境界，它源于客观现实，但又比生活更生动、更概括。后来皎然《诗式》有“取境”之说，如“缘境不尽曰情”（《辨体十九字·情》）；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序》）的命题，在“意境”说的形式过程中，成了从王昌龄到司空图的过渡环节。晚唐司空图虽然没有直接运用“意境”概念，但他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却超越前人而作了理论升华。其《诗品》不仅揭示了二十四种审美境界的不同特征，而且从哲学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雄浑》），“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又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思与境偕”，《与极浦书》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问题，标志着中国古代“意境”说的确立和理论的成熟。以后，如宋严羽的“兴趣”，清王夫之“情景”，王士禛“神韵”，都围绕着“意境”的创造来展开。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其实，不仅是诗，散文也讲意境。晚清林纾《应知八则·意境》云：“意境者，文之母

也，一切奇正之路，皆出其间。不讲意境，便是自塞其途，终无进道之日矣。”而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更以“意境深厚”为艺术的最高批评标准，其所称意境，是心物交融、自然兴到之作，其微妙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意境是一种特殊的形象创造，具有味之无穷的独特审美品格。但是诸家所论，兴之所之，各有卓见，却又都缺乏明确的理论界说和系统的理论综述，这一历史任务，直到近代才由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加以总结和完成。中国“意境”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有其思想来源和社会基础。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与《老》、《庄》、《易》及魏晋玄学一脉相承，在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意象”说的启发下萌芽（参见“意象”）。二是以传统儒家诗学中的“六诗”或“六义”说为源头，中经刘勰《文心雕龙》的比兴论，钟嵘《诗品》的“三义”说，直到唐代陈子昂、殷璠而逐渐成熟的“兴象”说（参见“兴象”）。三是以佛家哲学为基础，至唐代才勃然兴起的“诗境”说。而就其发展过程言，中唐以前，是“意境”说的酝酿萌芽时期。中晚唐是其形成时期。由宋至清则为其理论丰富、深化的通行时期。最后才由近代的王国维，借助西方美学思想的观点、方法，对它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可称为纯美学意义的理论升华时期。其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天，对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或鉴赏，还是一个具有勃勃生气的具有民族色彩的独特理论概念。参见“境界”。（黄保真）

【境界】 古代诗学概念，其意旨与“意境”大体相同，谓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主体情思和审美对象互相交融，虚实结合，启人想象的艺术世界。“境界”一词原意是疆域，《列子·周穆王》：“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后来成为佛学概念，如《成唯识论》：“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境”指心所缘识之外物，“境界”指觉悟的境地。旧题唐王昌龄《诗格》则以“境”论诗，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后世诗家，遂明确以“境界”论诗，如明江进之云：“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清叶燮《原诗》盛赞苏轼诗歌“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境界或意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与向来所谓“意象”含义大体相当，即情景、思象的结合，《易》“立象以尽意”的一系列论述可称为先导；其次，虚实结合，在“意象”本体外，还有“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即在“意象”之外另具一超越性的艺术新天地，不具“象外之象”的“意象”不能说是“境界”或“意境”。而从境界或意境的视角来看，这两方面具有潜在的关联。人们所讲的“境界”或“意境”或者狭义地指“象外之象”，或者指全面包含了

“意象”本身和“象外之象”的统一体,所以皎然称为“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诗议》)。唐代诗歌理论正是在后一方面有了明确的拓展,所以“境界”或“意境”之产生当断于其时,而若论其“意象”的含义则须推前。然而两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系。由“象”之本体推及“象外”,唐前非无萌芽,如谢赫《古画品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这“象外”被唐刘禹锡明确定名为“境”,“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记》)。当时人对营构“境界”或“意境”多有论述,旧题王昌龄《诗格》论“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境与意相兼始好。”权德舆《左武卫曹曹许君集序》:“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境界”或“意境”之“象外之象”的特征深刻体现了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和理想,它在许多诗学论中都得到了体现。如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百景。”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诗品》又标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论诗主“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到了近代,王国维对传统“境界”范畴用西方理论概念作了更为明晰的分析,提出了“境界”之真实性,“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写境”、“造境”之别及“隔”与“不隔”的问题等,将对此概念的理解引向深入。“境界”或“意境”在后代用例甚多,含义并不统一,各有侧重。同时它们不仅是诗歌理论中的范畴,且广泛运用于绘画、戏剧、小说等批评中,其美学内涵就更丰富了。(陈引驰)

【有我之境】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近代王国维关于诗歌意境基本形态的论述。语出其《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的“境界”,脱胎于前人的“意境”,所以《人间词话》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生于近代,受西方学术思潮启发,在美学思想上接受了康德、尼采,特别是叔本华的影响,结合了传统古典美学,于是以“境界”说发展了传统的“意境”说,提出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从创作方面

说,他把诗歌分为“造境”与“写境”两大方面;从审美批评鉴赏言,他又把诗歌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大基本形态。合而言之,“造境”就是指“有我之境”,“写境”就是指“无我之境”。诗人在“造境”时,充分表现了理想化与抒情化的倾向,他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去观察、体验、描写客观自然事物的,诗中之“物”,已经拟人化了,到处洋溢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以我观物,随处可见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说是“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是诗中有“我”,充分展现了诗人的创作个性。它与近代西方美学家所称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相似。杜甫《春望》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无知,怎能动情而落泪惊心呢?其实这是杜甫因国破家亡而移情花鸟的艺术结晶。诗人的炽热感情,把客观自然景物主观化了,而作为花鸟的客观自然属性或特征,反而被隐蔽了起来,或者简直是视而不见。可贵的是,王国维不仅划分了境界的两大基本形态——“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阐述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不同艺术特质,而且接受西方如叔本华等的美学观念,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他认为“有我之境”即相当于西方的“壮美”,“无我之境”即相当于西方的“优美”。具体所论,并不一定科学,很难一一与艺术作品相符合,但开始把中国直觉感悟式的美学体验,提到更高的美学理论范畴上加以抽象概括,这就显示了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过渡的痕迹,又自有其理论开拓的意义。参见“无我之境”。

(蒋凡)

【无我之境】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近代王国维有关诗词意境基本艺术形态的论述。语出其《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在继承传统“意境”说的同时,消化、融会了西方如康德、尼采,特别是叔本华的美学观念,用以改造旧说,另赋新意,构成了新的“境界”说。“境界”一词,原是佛家用语,前人早已用之诗论,如清初叶燮《原诗》即有“境界”之目。但是王国维化“意境”为“境界”,进一步又把诗歌境界划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大基本艺术形态。所谓“无我之境”,也就是他所说的“写境”,它与“理想”的态度相区别,是采取“写实”的态度;但是这

与自然主义的写实摹仿完全相反,是一种只有天才或“豪杰之士”才能树立的更高一层的审美意境。这里的“无我”,并不是说只忠实于自然景物,而可以毫不顾及诗人的感情或个性。“无我”是一种形象化的理论譬喻,犹如艺术理论上的“空白”式“虚无”,是自然地留下艺术空间,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诗人丰富想象的自由驰骋。苏轼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王国维理解这一点,所以进一步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如古井水静,清静空明,以之为鉴,美丑善恶,人人须眉毕见。陶渊明《饮酒》诗(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元好问《颖亭留别》:“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如电影中的空镜头,虽然不见人面,但却令人感到人的活力与存在。作者通过对客观自然景物的描绘,我和物,主观与客观,自然地浑融为一,于是在具体的自然物象中,有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不过这种感情流露,因其含蓄蕴藉无痕迹,达到了庄子所说的“物化”境界,不知何者为庄周,何者为蝴蝶,不知其然而自然流露,人们因其“平淡”而一时感觉不到,所以称之为“无我”。而尤其可贵的是,王国维还阐述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辩证统一关系,他以“樊南厚”笔名所写《人间词乙稿序》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见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附录称引)“意余于境”的观我之作,相当于“人化”了的“有我之境”;“境多于意”的观物之作,相当于“物化”了的“无我之境”,如能再进一层,二者互相错综融会,就会成为“意与境浑”的上乘艺术杰作。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鉴赏,是良好的启迪。参见“有我之境”条。

(蒋凡)

【主观之诗人】 近代诗学概念。语出王国维《人间词话》:“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王国维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他讲的“诗”包括诗词、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体裁,实谓“文学”;“诗人”则也包括小说家和戏曲家在内。他把文学分为“理想”和“写实”二派,“理想”派偏重于虚构和表现,“写实派”偏重于叙实和再现。与“客观之诗人”相对,“主观之诗人”主要指抒情诗(包括词)

作者。他们不以摹写现实生活为使命,而是以表现主观情灵为目的,对他们来说,保持纯真的童心,守护质朴的内美,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是相对于“客观之诗人”应该多阅世而言,并非说前者可以与世隔绝。王国维要求“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同样适合于他对“主观之诗人”的期待。他极力推崇李煜词,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而李煜词境的提高恰得力于他身世遭际剧烈变动,说明“主观之诗人”护持真性情与阅世多并不矛盾。王国维虽然对此认识还有所不足,后人将此话误解为脱离现实,则更多是由于他表述上的问题造成的。参见“客观之诗人”。

(邹国平)

【客观之诗人】 近代诗学概念。语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相对而成立。这里的“诗人”指叙事作品(包括叙事诗)的作者,或者就是他概括的“写实”派作者,有别于抒情诗人。这些作者以再现社会生活为创作宗旨,自然应该广泛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生众相,这样方能积累丰富的素材,写出生活的绚丽多彩,使作品内容繁富不乏,层出翻新。王国维此说已经初步涉及生活是叙事文学创作源泉的问题。然而,写出优秀的叙事作品,并不单单是一个积累“材料”的问题,还与作者主观情性密切相关,因此,培植和护持真性情对“客观之诗人”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与“主观之诗人”实质并无区别。参见“主观之诗人”。

(邹国平)

【境象】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境界之形象,既可指客观外界言,也可指外在境象在头脑中的反映。王昌龄《诗格》:“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言诗人欲描摹山水,则须通过想象,使山水胜境一一映现于头脑中,了然如在目前。皎然亦云:“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谓事物复杂多样,如景(日光)、风、心(思维)、色(色彩)之类,难以判明其属实属虚,故做诗时此类字眼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其“境象”实包举一切事物而言。当时人做诗注重对偶,认为相对偶的两字必须相称。有人乃提出虚实不得相对。如王昌龄云:“夫语对者,不可以虚无而对实象。若用草与色为对,即虚无之类是也。”(同上引)世人

以为草字为实,色字为虚,不可为对。皎然则反之,以为色、风等字虽然似非实象,但也不可谓为虚无,故可以为对。后来,境象的理论内涵有了发展变化,可泛指作品的境界意象,不必理解为具体的物象。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

(杨明)

【境生象外】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境,此处指诗歌所表现,同时也是读者所体会到的境界;象,指诗中所描绘的物象。境生象外,言诗能使读者于所描绘的具体物象之外,体会到一种诗中未直接写出、也难以写出的意境。所描绘的物象是确定的、有限的,读者体会到的境界则可以是不确切的、无限的。诗之可贵,正在于能调动读者的想象,使其通过有限而进入无限,感受到悠远深长的情味。《董氏武陵集纪》又云,诗歌“片言可以明百意”,以简约表现众多,也正与此有关。陆机曾说,为文恒患“文不逮意”(《文赋序》),谢灵运亦云“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山居赋》自注),均苦于言辞不能将自己的审美意趣全部传达出来。境生象外之说,则已认识到无须一一缕述其意,而应致力于以有限的语言形象引发读者自己去领会言外之意趣。“象外”一语,原为玄学家说理时所说。三国魏荀粲论《周易》卦意、卦象、卦爻辞的关系云:“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象外之意,指卦象所不能包孕的精微之意。以后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成为重要的美学概念。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称张墨、荀勖之作:“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谓其画描摹物象未必出众,但自有一种精微深妙、难以言说之美,形似不足而别有动人之处。又如唐皎然云:“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韩愈《荐士》亦云:“象外逐幽好。”均言诗人运思,极深极远,达于常人所想不到的微妙之处。刘禹锡此处则用来概括诗的美学特征。后来司空图《与极浦书》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即与刘氏意通。(杨明)

【象外之象】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见唐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作为文论概念的“象外之象”,从创作言,前一个“象”是指构成作品的具体的有形意象,后一“象”是作者借助具体意象的象征或暗示而创设的一个无形的虚幻景象,或者说是

在审美体验中一度显现的美的境界。而就接受角度言,前一“象”指作品所提供的具体有形意象,后一“象”则是指读者被作品中的意象所激活的审美体验中重构的美的境界。也可以说,前一“象”是由作品中的言、象构成的符号系统,后一“象”则是作品中符号系统所可能融载的审美体验或美的境界本身。“象外之象”的美学命题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就其理论的哲学基础言,它肇自古代道家哲学。《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即是说一切物象的本体和终极是超乎感官所能感觉的具体物象之外。又《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这进一步指出,语言文字只能表述人的感官经验所把握的物象,一般思维所把握的只是事物的粗迹,而事物的本体即道,则超越了人的感官和一般思维,只能静观默察,体悟妙契。后来魏晋各家,如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荀粲“象外之意,系言之表”(参“言意之辨”),僧肇“斯乃穷微言之美,极象外之谈”(《涅槃无名论》),把人的审美意识,导向了幽微玄妙的美的境界。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有“散以象外之说”。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则直接用之于文艺批评,如评张墨、荀勖之作,谓其“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荀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其指导作画和读画者超越具体物象和艺术形式,去把握审美对象的精灵神韵,这就涉及美的境界的深层特质问题了。唐代的文论家承之而发展,于是“象外”之说,成了习见之论。如皎然《诗式》称诗歌创作“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刘禹锡《董氏武陵集序》进而把诗歌创作的审美规律概括为“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明确提出了诗歌创造美的境界是在作品所取的物象之外,而审美意蕴在语言文字之表的理论观点。因此,司空图有关“象外之象”理论的提出,是古文论历史发展的结果。司空图之后,“象外之象”以及与之相关或相近的境外之境、味外之味、言外之意,不仅被用来探讨诗歌创作,而且广泛应用于书画艺术,其美学意蕴又有所扩大和深化。(黄保真)

【言意象】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语见于《易·系辞传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又云:“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作者对于言、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这里首先

指出,虽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语文辞的表达有限,而人类的思维想象之意无尽,但是作《易》“圣人”的心意还是可以被了解的,因为他通过“立象”(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手段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设立八卦和六十四卦来全面反映各种事物的真假虚实,再在卦下加以言辞说明,这就说出了全部要讲的话了。在古代“言意之辨”的哲学讨论中,《易传》认为,“言”可达“意”,但“言”与“意”之间的沟通与表达,必须通过“象”这一特殊的思维载体来完成。而与《易传》几乎同时的《庄子》,则持“言”不尽“意”论。其《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指出了书、言、意之间的矛盾,深刻挖掘了人类思维与表达方面的特殊规律。《庄子》与《易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探讨,议论各有精到之处,共同丰富、深化和启发了后世文学的想象和思维。后来王弼结合魏晋玄学,在《周易例略·明象》中,又沟通和统一了《易传》和《庄子》之说,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忘言”之说,有强调言语文辞只是一种带有象征性工具的倾向,也涵蕴形象的含义大于言语文辞的意思,故虽不言“象”而象在其中。而《易传》所谓“象”,据说是“圣人”深化地观察了纷纭复杂的事物,模仿其形态,恰如其宜地创作出来的。这里的“象”,原指卦象,并非指艺术形象,但却对后代文学的艺术形象之论产生了影响,例如《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烛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和“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诠赋》篇的“象其物宜”等等,“意象”、“象物”等范畴,即来自于《易传》。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曰:“象之所包广矣……《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又钱钟书《管锥编·〈周易正义〉二〈乾〉》也说:“是‘象’也者,大似维果所谓以想象体示概念。盖与诗歌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故陈骙《文则》卷上丙:‘《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作为一种特殊思维方式,“象”与诗歌创作的比兴艺术相似。因此,言、意、象之辨,大大启发了后世文学有关文学思维与形象创作的理论。(蒋凡)

【言不尽意】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虽然《易·系辞传上》早就称引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但《易·系辞传》实际是以此为导语而发为“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论。因此,哲学与文学上的“言不尽意”论,实际上语出于《庄子·天道》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

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意思是说,书籍文辞之所以可贵在于记录了语言,语言之可贵在于反映了人的情意,然而人的情意的产生,随具体条件而变化,其思维想象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这又不是具有物质外壳的语言所能充分、全部表达的,因而其中究竟保存多少作者的真情实意,是很难说的。一切事物都有外貌与内质,人们的认识与表达如果只停留在其形状、声音、颜色、名称的表面,而没有透过现象去发现其内在本质,发现世界事物的丰富多样、精深微妙,那实在太遗憾了。古代关于“言意之辨”问题的争论,儒家强调言可达意,如孔子标举“辞达”(《论语·卫灵公》),肯定“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思维与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理所当然地为抒情达意服务,而文学则借语言得以长期保存和广泛流传,有着对知识的延续与发展文明的伟大作用。然而言、文与意三者之间,既密切联系,又属不同的现象,其间也存在着矛盾。儒家在这矛盾的复杂关系方面,有所忽略,因而道家创为“言不尽意”之论。儒、道二说,各抒己见,容有偏胜,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探讨,都有益于对“言意之辨”问题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庄子,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恰恰为弥补其间的差距,突破言语文辞的局限,并启发了深入一层的文学思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庄子肯定了“言贵意”的前提,但同时指出了“不可言传”的客观事实。正如现代语言学家所指出,语言表达思想的功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语言只表现一般的东西,“而人们所想的,即语言所要表达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有的时候,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的复杂性难以用言词一一穷尽地表达出来,因而在所要表达的意思上留下一片空白”(叶蜚声、徐通铿《语言学纲要》)。于此可见,道家的“言不尽意”之说,虽然不可能排斥不可知论的唯心成分,但却也有其一定的科学根据,所以陆机《文赋序》有“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之叹。后来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欧阳修《书梅圣俞诗集》,随处可见其影响。《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启示诗歌文学创作追求言外之意,对于促进形象思维和文学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蒋凡)

【得意忘言】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意谓语言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故高深微妙的见解只有“忘言”之后才能体会。语见《庄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天道》篇又以轮扁斲轮为喻,说明“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其后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发挥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把“言”与“象”仅看作是得意的工具,而非意本身,因此认识便不能仅仅及于“言”与“象”,而必须求其深层之意;同时又因为“言”与“象”仅是工具,故得到“意”之后即可抛弃“言”与“象”,如同捕到兔子后可以丢掉蹄(套索),抓到鱼便可以丢掉筌(竹篓)。进一层说,既然“言”与“象”不能充分地表达“意”,那么真正高深微妙的道理也只有在“忘象”、“忘言”之后才能领会。故他下结论说:“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简言之即“得意忘言”。庄子、王弼的这一观点对后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机《文赋序》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阮籍《清思赋》云:“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陶渊明《饮酒》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云:“形而上者谓之道,……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神思》篇云:“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以上诸论是“得意忘言”说的直接发挥。此外将这观点引入艺术审美论中便产生了“象外之象”、“文外之旨”、“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说法。如唐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宋严羽论诗家妙处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们强调文艺不可执著于语言文字的表面意义,而要冥思玄想、深入地探求并体会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同样在创作上也就不应局限于表面的形似,当追求其内在的神韵,有寄托,有深意,做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所论均渊源于“得意忘言”之说。

(刘明今)

【言意之辨】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原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大论题,但是它古代文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可分为三

大派:一是主张言不尽意,以三国时荀粲为代表,不过他是继承《庄子》之说加以发挥的。《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秋水》篇又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他认为人的认识,对于宇宙本体一道,是无能为力的,思维难以认识,语言文字无法表达。荀粲继承庄子的意见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他认为人只能感知物象,而物象只是事物的“粗迹”,不能显现事物的精微本质或规律。而“理”妙在言象之外,只能静观默察、妙悟直契。他提倡的是超越思维形式的直觉体验。另一派主张则相反,倡言尽意之说,它源于《易·系辞传》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认为言可尽象、象可尽意,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言象符号具有不可限量的表意功能,因而是传播思想、指导实践的有效方式。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如欧阳建发挥了《易·系辞传》的意见,写《言尽意论》以批判言不尽意论。上述二派相互批判,各有真知灼见,又各有其片面性,因此产生了折衷会通二家的辩证的言意见者,如王弼即此辩证折衷派的代表。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循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他辩证地论述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意是内容,是思想认识的成果;言与象是“意”的不同层次的载体,是表意的符号形式和物化手段。因而肯定了言、象可以尽意。这是从作者而言。但就接受者而论,一方面必须借助言、象去把握所载之“意”,但又必须超越言、象自身,才能真正把握“意”的本质。他强调不能把“意”的载体同“意”混为一谈,从这一角度看,“意”又在言、象之外了。王弼的辩证言意见,克服了上述二派言不尽意和言可尽意论的片面性,创造性地加

以发展,启发了后世对思维规律的认识。所以言意之辨虽然是哲学论题,但它却为以后文论家理解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关系,把握审美表现、审美接受规律,进而超越传统的杂文学观念的局限去揭示文艺作品的审美特质,提供了哲学基础、思辨方法以及概念、范畴的雏形。比如古典美学中的“意象”说,就是言意之辨向审美领域的逻辑延伸。(黄保真)

【音象意】 古代诗学概念,是对诗歌音律声韵、设色构象和立意内蕴三者的要求及其相互关系的说明。语见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有三要,曰: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音”包括诗歌音律方面诸种因素如声调音节平仄押韵等。李重华强调诗的音律要出于天籁,合乎自然,认为诗人借助自然之音,能使心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之情曲微毕达,收到“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他强调诗歌创作中音韵的重要性,是针对某些人写诗随心所欲,不讲求音律谐美的现象,他讥讽“断竹而妄吹”之类的作品,与“洞箫长笛各有窍,一一按律调之”吹出美妙悦耳的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象”指诗人借助词采之美摹绘物色景象。他说:“物有声即有色。”诗歌虽有金石之音,而不同时辅以色彩之美,仍为缺失不全,因此写诗“不独征声,又当选色”,要做到“摹色以称音”。“摹色”即是构象,主要又是指“写景”而言。唯借助写景构象,使诗歌兼有声色之美,“如舞曲者动容而歌,则意惬悉关飞动”。李重华认为,无论诗人运用赋、比、兴哪一种手法写诗,都应该注意“音”与“象”的谐配。“意”指作品立意和内蕴。李重华认为“意”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主要强调诗人要“神”于立意,妙在“有意无意间”。他说:“诗缘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蕴含只在言中,其妙会更在言外。”“善写意者,意动而其神跃然欲来,意尽而其神渺然无际。”实际上是肯定诗歌意蕴的含蓄美。关于音、象、意三者关系,李重华以为意最重要,“意立而象与音随之”。但是对初学者来说,首先应当掌握诗歌音韵规律,然后,“取象命意,自可由浅入深”,既突出重点,又强调因序渐进,对启蒙学诗和指导创作,都比较切实中肯。(郭国平)

【以意逆志】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是孟子提出的阅读和理解诗歌作品的方法。“逆”,迎也。“文”是文采,“辞”是言辞,“志”是作者的思想情感。这是古今人的共识。有歧义的是对于“意”的理解。汉、宋之儒普遍认为这里的“意”是指说诗者自己的“意”,而非诗人及作品之“意”。赵岐《孟子注疏》云: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宋之朱熹,直至现代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都深受赵岐的影响。这一认识,从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角度看,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如趋之极端,脱离作品,随心所欲,牵强附会,主观妄说,则又会产生极大的弊病。宋代理学家程颐就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桎,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二程集》)而清代不少学者则反对这种“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的说法,他们把孟子的“意”解释指作品蕴藏的意旨。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分析“以意逆志”云:“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两种对立的解释,各有所见。但比较而言,评说诗歌,自应首先探索作家作品的志意,当然也不排斥说诗者本人的观点制约,因而往往是作家作品之意与说诗者自己之意的结合。统观《孟子》一书中的说诗方法及批评实践,便反映了这种两结合的倾向。总之,孟子的“以意逆志”,是要求全面而正确地分析诗人诗作,评说诗歌作品,不能望文生义,或是仅仅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而妄加雌黄,也不应对某些艺术性夸张修饰作机械理解,而必须领会全篇的精神实质,加上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倾向和作品的社会意义。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方法,影响深远,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一大贡献。参见“知人论世”。

(蒋凡)

【知人论世】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称“知人论世”是为了“尚友古人”。今人朱自清《诗言志辨》认为孟子所说,“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其实,综观《孟子》一书,“知人论世”既是一种“修身方法”,同时又是一种“说诗方法”,二者并不矛盾。尚友古人,即通过颂读古人的作品以获得帮助,吸取教益;而要从古人作品中获得教益以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又必须正确理解诗歌作品的精神实质。这样,仅仅就诗论诗,单从作品本身来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身世、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当然,这并不是脱离作品本身。“知人

论世”与“以意逆志”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联系作者的生平与其时代,可以更好地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尊重客观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渗透着一种历史的观点。这种“知人论世”的观点,对古文论及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逐渐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为历代进步文学家所遵循。近人王国维发挥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谿生诗年谱会笺序》)而反过来通过阅读和欣赏作品,也可以窥测作者的思想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而鲁迅的理解阐释则更为精辟,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这就对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直到今天,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蒋凡)

【知言养气】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孟子的主要文论观点之一。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知言”的重要性,孔子早已指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言辞是人品的表现,因而通过分析语言文辞,也可以了解其人的品质。孟子自称对于片面的、过分的、歪曲的、闪烁的言辞都能察知它们的蒙蔽、沉溺、叛离、辞屈理穷的实质所在。《孟子·离娄下》又云:“言无实不祥。”正面要求语言有真实丰满的内容,这是他“充实之谓美”(《尽心下》)这一审美理想的反映,与其“知言养气”之说密切相关。所谓“养气”,强调的是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功夫,也就是人的内在品德的“充实”之美,“养气”需要“配义与道”,长期修养锻炼,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境界。《孟子·滕文公下》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不受任何环境的干扰,威胁、利诱无法改变其操守,这种豪迈气魄,对于封建社会中正直知识分子的砥砺气节是很有鼓舞力量的。至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对于原文细加咀嚼,就可以体会到“知言”植根于“养气”。人的道德

修养、思想认识提高了,自然会加强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后来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受到孟子“知言养气”说的启发,开展了“为人与作文”关系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养气》,韩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苏轼论李白诗歌“气盖天下”(《李太白碑阴记》)……,所论具体内容或有差别,但是源远流长,无不绵亘着一个以“气”论文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审美评论,深受其启迪。(蒋凡)

【兴会】古代诗学概念。意指审美主体在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或文艺作品的激发下,产生了昂扬的诗情,或者说它是主观精神世界里突然发生的高度亢奋的审美创造欲望或审美创作的心理机制。语见齐梁时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爱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又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所称“兴会”,与六朝文学的自觉精神相呼应,一方面指诗人或作家创作时激情突然迸发的亢奋心理,它与人的性灵展现直接相关;一方面又可指诗人情兴在艺术作品中的物化形态。后来清王士禛也说:“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情性。”(《带经堂诗话》卷三)意思基本相似。作为创作主体心理活动的特殊状态,兴会淋漓时以审美情感为主导,但在杂文学仍占一定地位的环境中,它也程度不同地混杂着某些理性成分的主观意念。有时,古文论家又把“兴会”称之为“兴”、“情兴”、“意兴”、“兴致”、“兴趣”等等。当然,如果详加辨析,上述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和“兴会”并非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它们之间很难定量、定性地作出明确的区分。其实,晋陆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兴会”概念,但其《文赋》实际上最先揭示了文艺创作中兴会到来时主体心理活动的特殊状态:“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馥郁,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其所称“应感之会”,实际就是对于“兴会”到来时的具体描述。因为它所表现的正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相感相应时突然产生的高度亢奋的审美创造活力。文艺作品作为审美创造的成果,便是把这种稍纵即逝的审美心理活动物化为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从而成为感发读者,使之接受、欣赏、共鸣的审美要素。因此,“兴会”又引申出第三方面的意义,即近似地重现于

接受主体精神世界的再生形态,这种再生形态,通常只以读者接受的审美满足为终点,但有时它也能成为激活、推动接受者并进行新的审美创造的动力。“兴会”对于今天的创作和批评,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黄保真)

【兴象】 古代诗学概念。集中讨论诗歌的艺术特质及审美批评标准。始见于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凡三见:一是在序中批评南朝诗风:“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这表明他是把“兴象”作为诗歌的艺术特质来看待的,它与六朝单纯追求词彩艳丽、声律和谐、偶对精切、性灵摇荡的诗风相对立。二是卷上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可见“兴象”与“风骨”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蕴,但却可以彼此融会,合于一体。三是卷中评孟浩然诗:“文采芊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无论兴象,复兼故实。”这又说明了“兴象”离不开文采、故实、结构等形式因素。上述三处“兴象”,取义有别,但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描述了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质。同时,殷璠又以“兴象”作为审美标准来评价诗人、诗作的优劣高低。具体分析,以“兴象”见长的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气骨凛然、直抒胸臆的一派不同。具有“兴象”的作品,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主观的情、兴、意、理,同客观的人事风物及词采声律等形式要素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兴象”之“兴”,集中概括了情感、意兴、玄思、妙理等主体要素,而“象”则综合了人事风物及作为物化手段的词采声律等。所谓“兴象”,指情景交融、言意浑沦、事理统一、词调和谐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及其审美特征。“兴象”论的提出,与“意象”、“意境”诸论一样,表现了唐人对于诗歌艺术的审美认识的飞跃。但是宋人少用“兴象”论诗,而发展到明清时代,则广为运用。因其视角不同,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兴象”的审美义蕴。其要旨可分为三大层次。一是“兴象”被作为与“意境”相似的审美范畴,从总体上概括了诗歌审美创造中“境界”的艺术特质。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清纪昀《挹绿轩诗集序》云:“要其冥心妙悟,兴象玲珑,情景交融,有馀不尽之致,超然于畦封之外者。”在这里,“兴象”是一种冥心妙悟、以纯粹的审美把握方式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它的审美特征是具有情景交融、玲珑透脱,辞采声韵,浑沦一气,寄托深微,无迹可求的整体美。它常超然于时政教化之外,成为纯粹的审美鉴赏的对象。二是进一步分析构成“兴象”范畴的两大要素之间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的种种运动形态。胡应麟以为“兴象之合”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诗薮》

外编卷四云:“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意谓诗中写景取象,只是托兴手段,兴到景随,只求合乎情兴的逻辑,而不必句句坐实去考证事之有无。“兴”与“象”二者之间,“兴”是主导,是诗境之美的本质所在。三是“兴象”在明清两代,常作为构成诗歌艺术要素之一,与“意象”一样,成为构成“意境”(境界)的成分或要素,这可称为狭义的“兴象”。如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序》云:“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侈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不同。”又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云:“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调雄鬯,积习既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诂容昏镜浊流,求睹二者乎?”体格声调是诗的外在形式,而兴象风神则为诗的内在特质,一实一虚,一表一里,一粗一精,审美把握的方式自有不同。但兴象风神又不能独存于体格声调之外,诗歌创作必须以粗寓精,凭实存虚,融合无间,辩证统一。这就不仅揭示了“兴象”作为诗歌艺术要素的审美特质和价值,而且也生动描绘了诸审美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黄保真)

【兴致】 古代诗学概念。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沧浪此论,是比较江西诗派和盛唐诗风的不同而发,而“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见“兴致”就是“兴趣”,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的“兴致”、“兴趣”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它趣高情深,境界空远。其实,它本于唐末司空图的诗论。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他还以“味”作喻,追求“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这与严羽的诗论是相合不忤的。追根溯源,诗歌的“兴致”与《诗经》以“兴”写情,两者一脉相承。从汉魏至唐宋,从《诗大序》到《诗集传》,对“兴”定义的阐释和作用的分析,虽然众说纷纭,但无不肯定“兴”能导致读者对“言外之意”的联想。严羽“兴致”的提法,其着眼点也在“言外之致”。具体到表达的特点,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从以上可

以看出,“兴致”就是以“兴”为主要艺术手段而达到的充满韵味、意在言外的境界。(张小平)

【兴寄】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兴寄”指作品中寄托深沉感慨,蕴含深层意义。齐梁诗作者多为贵族显宦,生活面较为狭隘,缺少深刻体验,故其作品虽有抒发叹老伤离、企羡隐逸等情绪者,但往往浮泛浅薄,为文造情;至于因深刻社会矛盾而激发强烈情思者,实属罕见。陈子昂出身并非门阀,较多接触下层,因而视野开阔,怀抱大志,关心现实,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在仕途中又屡受挫折,故情志慷慨深沉,愈感齐梁诗之空虚无力。他提出“兴寄”,标志着他对于诗歌革新的自觉要求。其所作《感遇》诗寄慨遥深,并有直接因当时政治现实而发者,便是兴寄精神的体现。中唐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云:“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愜心,吟玩为娱。”(《答贡士沈起书》)其提倡兴寄,意与陈子昂相近。又元稹将所作诗分类,云律诗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又云“病沈(佗期)、宋(之问)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寄兴”即“兴寄”。元稹将“寄兴”与“讽”并提,偏重于指诗歌对政治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加以讽刺的深刻含义。陈子昂于感叹齐梁诗“兴寄都绝”时,又叹息“风雅不作”。风雅指《诗经》的优良传统。《诗经》向来被认为是反映社会现实、寄寓深义的典范。李白曾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高逸》);《诗经》多为四言,李白也认为《诗经》是富于兴寄的典范。兴寄之作,含蕴丰富深沉,故常能耐人咀嚼。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云:“《大风》千秋气概之祖,《秋风》百代情致之宗,虽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柏梁》诸篇,句调太质,兴寄无存,不足贵也。”言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语短情长,令人回味无穷;而刘彻等人的柏梁台联句诗过于质直,无深沉的情致感慨,故不足贵。其所谓兴寄,则发展为偏重于艺术表现而言。(杨明)

【寄托】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指寓意,如晋王羲之《兰亭序》云:“或因所寄托,放浪形骸之外。”后来被文学家所运用,于是逐渐成为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美学原则。如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寄托,指文学家运用比兴手法,藉物寄情,因事托意,由近及远,在具体事象的描述中,蕴涵无限感慨和眇渺的思致,让人读后,产生由此及

彼的丰富联想。寄托之作,既区别于直接抒情述志,更不同于单纯咏物状景,与一般的情景交融也不属同一个概念。寄托的显著特点是,诗人真实的思绪深潜在作品具象及其表面的意义背后,构成复合意蕴。古人对运用各种文体写作几乎都提出过寄托的要求,如叶燮肯定戏曲家学习屈原“不得于君,其忧愁之思,托之美人香草”(《巢松乐府序》)。柴虎臣论小说创作“必有托寄”(《李卓吾评定小说序》)。“寄托”说在诗、词创作中尤为盛行。它最典型的型态是,借美人香草以表达政治和伦理愿望。乔亿《剑谿说诗》卷下:“张衡《同声歌》,繁钦《定情篇》,托为男女之辞,不废君臣之义,犹古之遗风焉。”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写怀,假托闺情最蕴藉。”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三:“才人畸士身世之感,往往借倡妓、优人自写身分,悲歌慷慨,情见乎词。”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要之情有所寄,则思妇怨女之辞,可以悟君亲于顷刻。”所以他认为辛延年《羽林郎》、曹植《美女篇》、宋子侯《董娇饶》、繁钦《定情篇》“皆非漫为婉媚以摇动人心,其大旨实有在耳”。一篇作品表面上看是男女情词,其实是写君臣之遇和友朋之义;香花奇草的诗句,其实也不是以状写植物和景观为目的,而是表现人物的品格和志性。这种美人香草的写作传统起自《诗经》、《楚辞》,为后来诗人继承发扬,比兴寄托说也以此为最重要的内容。其次,借游仙诗以寓托身世和对现实的深思忧虑。郭璞以写《游仙诗》著称于世,钟嵘《诗品》评这组作品,“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这正好揭示了游仙诗的寄托实质。厉鹗有《游仙诗三百首》,他在序里谈到写这组诗缘起和作品的寄托,“予闲居寡欢,偶尔缀韵,辄成百章,大要游思吃语,杂以感慨。”人评其“语带烟霞,有云愁海思之遗”(陈鸿寿《樊榭山房外诗引》)。借话仙境,喻写人寰,这构成了“寄托”说的第三种特点。再次,以寄托之心咏物,则所咏事物无不蕴含深意。施补华《岷佣说诗》:“咏物必有寄托,如《观打鱼歌》‘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跃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土’,见贤才被困,愤懑无聊光景。‘君不见朝来割素鬣,咫尺波涛永相失’,告以爱惜贤才之意。‘既饱欢娱亦萧瑟’,更为饕餮者戒。”“又《观打鱼》:‘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鱣鲋随风雷。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见严法暴政,贤才引避,又是一种寄托。”以上说明,寄托的对象可以无所不包,寄托的内容也可以应有尽有。“寄托”说既满足了尊奉“主文谲谏”的人委婉表达讽喻之见的要求,也符合渴望曲尽各种隐衷而又不愿明白直陈心迹的诗人口味,所以长

期遭到众多诗人普遍的推崇。总之,应该肯定,“寄托”说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助于形象思维与意境的拓展。但是,矫枉过正,如果作为普遍的艺术法则,一切创作都必须循此而行,那就反而变成了束缚心手的框套,其片面性也是明显可见的。

(邹国平)

【感兴】 古代诗学概念。意为为外物触动所产生的强烈审美感受和创作灵感。语见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兴者,有感之辞也。”均以感物释兴。南宋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更强调了感兴的偶然性和自然而然。又《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引王昌龄语:“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亦有其例,如常建诗云:‘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又王维《哭殷四》诗云:‘浹淅寒郊外,萧条闻哭声。愁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言外物若与人心相感应,与主体情感相一致,实指审美主体的情感外射现象。后来,袁守定《占毕丛谈》又作了发挥,以为感兴之作,“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强调艰苦的艺术劳动和平时审美意象积累对触发创作灵感的重要,对“感兴”的丰富理论内容有进一步的认识。

(杨明)

【应感】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主要有三层涵义。就其历史展开的顺序,一是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说作为创作动因的人的情感,是感物而生的,其情感的内容是与物相应的。二是指艺术作品对人的作用,它能够感动人使人的精神发生与作品内容相应的变化。三是指艺术思维中达到的,心物交会的状态。作为自觉的艺术理论的应感说,最早语出《礼记·乐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应感”是人性与物态相应、相感而生哀乐;艺术作品则是情之哀乐的表现形式。在《乐记》中,同主体相应、相感之“物”,又分为两类:一是天地间自然之物。如“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同主体相互作用,而使人产生与之相应的不同情感和表现不同情感的艺术作品,二是社会的治乱兴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都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着

眼,说明了“应感”是人的情感发生的本原和艺术创作的动因。《乐记》还认为,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又反过来使人并通过人使社会生活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又是另一种相感相应:“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这样来论述客体、主体、艺术作品之间的“应感”关系还是比较全面的。不过《乐记》因受古代“天人感应”思想影响,有时也把“应感”说得过于神秘。后来陆机、刘勰、钟嵘等继承《乐记》的“应感”说发展成为“物感说”。刘勰从“道”本体论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天、地、人的内在统一性和四时物色、时代治乱同人的情感发生和文艺创作的关系(见《文心雕龙》中的《物色》、《时序》等),钟嵘《诗品序》则以“气”本体论的观点集中地揭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基本规律和四时风物变化,人生境遇种种,感人、动情、发为咏歌的多样化形态,所称“应感”,包蕴的关于文艺本原的内涵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的文艺本原论和文艺发生论。陆机《文赋》赋予“应感”以创作灵感的新的涵义是指心、物交会而达到的审美创造的昂扬状态,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文选》五臣注:“翰曰:用情有应感会合之地者,通塞于纲纪之所者,则思来不可遏而拒之,思去不可止而留之,非人力所至也。”许文雨《文论讲疏》:“郭绍虞曰:‘感兴方浓,不能遏止其发露;感兴不来,不能勉强酝酿。’此一节形容感兴起灭,确是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深知此中之甘苦者。”用文思、感兴来诠释“应感”之义是比较恰当的。这层涵义在《乐记》中是没有的。陆机从艺术思维的特点、规律着眼谈主、客体之间的应感会通,把“应感”引入审美领域,不仅扩大了“应感”的理论内涵,也深化了以后的艺术思维理论。关于艺术作品同读者之间的应感关系,《乐记》之后要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了。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騷,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但是,他比较强调利用“应感”作用,达到“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垂拱而理”天下政治的目的。其说和陆机、钟嵘着重于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大不相同。而其理论倾向又朝《乐记》阐述的政教中心的应感论复归了。后人论文艺及应感者虽多,其内涵大要不出以上诸端。

(黄保真)

【兴观群怨】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论语·阳

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起也。孔安国以为是“引譬连类”，朱熹以为是“感发意志”，前者重在创作的比兴艺术，后者则强调读者的接受和感染。二者角度不同，但是并不矛盾，都具有“起”的意思，指的是诗歌创作通过比兴的艺术方法来抒情言志，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诗歌作品具有了艺术感染力，就能起到“感染意志”的社会作用，这就是“兴”。观，郑玄以为是“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则以为是“考见得失”，通过诗歌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盛衰”，从而引起读者对于政治“得失”的思考。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称引）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对于诗歌作品的切磋讨论，沟通感情，交流思想，统一认识，提高修养，起到安定社会的团结教育作用，所以朱熹说是“和而不流”，既彼此和谐，但又坚持原则，而不受流俗偏见的影响。怨，孔安国注指“怨刺上政”，认为可以通过诗歌作品来批判现实，诗人有责任来批评统治者的为政得失，并抒发人们的怨愤之情。总之，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对诗歌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对于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言简意赅、较为全面的概括，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古典诗歌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汉儒《毛诗序》，六朝梁代钟嵘《诗品》，到清代的王夫之，历代的文学家和理论家，无不蒙受沾溉，并给予高度评价。钟嵘《诗品序》以具体事例，重点说明了“群”和“怨”的艺术特点和社会作用。而王夫之更是结合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认识，对“兴观群怨”的内在相互关系作了新的阐发和全面论述，他在《诗绎》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从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大大丰富和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的理论内容。清初黄宗羲《汪扶晨诗序》也有共同的认识，认为“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为古老的“兴观群怨”说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蒋凡）

【移风易俗】古代诗学概念。关于诗乐社会功能的认识，始见于《荀子·乐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古代诗、乐、舞三者合一，所以《荀子》之“乐”，包括了诗歌艺术在内。而《礼记·乐记》称引《荀子》之言，文字稍有异同。后来汉初的《诗大

序》则称引并加以发挥，专门用来论诗，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中，古代儒家不仅看到“感物而动”的一面，而且更进一步看到另一面：即诗歌艺术对于现实生活的能动反响。过去孔子很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论，这主要是就学习和运用的效用而言的。到了《荀子》和《乐记》，则更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主张统治者应当积极地利用诗乐来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诗大序》直接受到《荀子》和《乐记》的影响，特别强调诗歌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希望统治者通过诗歌来进行潜移默化的特殊伦理教育，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样，就把诗歌作为宣传统治思想的特殊工具，明白地揭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这与汉初封建统治者的一统天下、一统思想的要求是同步的。《诗大序》的这一理论总结，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的儒者大体上是按照《诗大序》的启迪，来建立自己的以教化为中心的诗论框架的。如唐代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见《全唐文》卷三六八）云：“《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白居易有关新乐府运动的诗歌理论，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要求裨益时政、移风易俗，也明显受《诗大序》理论的影响。儒家“移风易俗”诗歌理论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一面。揭示文学有益社会人生的能动作用，积极反映现实，是进步的；而把诗歌拘囿在封建伦理教化的小天地中，又过分狭窄，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蒋凡）

【情景】古代诗学概念。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意中有情，景中有意。”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作诗不过情、景二端。”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而情寓其中矣。”诗中情景之论，源远流长。情有时也称志、思、意，指人的思想、感情、意念等一系列精神活动的内容，而感情和心绪是其基本内涵。景也称物、物色、象、境，指自然界一切声象。情景二者相对而称，分别代表了诗歌创作的主体和客体。诗可以抒情状景，还可以叙声言理，而表现感情和摹绘景物是诗歌最普遍的功用，即使叙事诗和哲理诗中，也往往

间有抒情和状景的诗句。在我国浩瀚的古诗中,抒情写景的作品特别丰富,佳作最多,这足以反映古代诗人把情景视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经》、《楚辞》已有极其出色的情景描写,而“言志”说和屈原“发愤以抒情”(《橘颂》),表明先秦人们对用诗表现情灵的认识已较为自觉。汉儒解释《诗经》“兴”的含义包括一部分借物述情的诗歌创作主张。情景说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很快发展和完善,《文赋》、《文心雕龙·物色》、《诗品序》都将感物动情看作是激发文学创作欲望的重要触因,又将情景交会视为诗歌佳境,“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随着近体诗的产生和发展,情景二项内容及其如何在诗里构成有机、紧密的关系,倍受人们重视,他们或主张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或赞成分述情景,相映成趣,但是都肯定情景描写和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肯定情景结合,经得起读者反复寻绎玩味,也是古代诗歌意境说的重要内涵之一。

(郭国平)

【情与景】 古代诗学概念。集中概括文学创作的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较早以“情”和“景”对举论诗的是刘勰,其《文心雕龙·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开始揭示“情”与“景”之间联结的奥秘。而发展到唐宋以后,则作为艺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意蕴日渐发展和丰富。当然,“情”与“景”原是各自独立的审美概念。先秦两汉时以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在文艺本原的层次上揭示了“情”的作用。而“景”作为文艺审美范畴,则成熟稍晚。建安以前,纯粹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殆未之见。但自两晋陆机以后,努力提倡写“景”,其《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把“景”作为激发情感的客观本原。他所说的“悲”、“喜”云者,已蕴含了“情”与“景”关系的内容,只是没有直接运用“情景”概念。不过有此基础,《文心雕龙》开始讨论“情”与“景”之间的艺术辩证关系,也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是作为“情景”审美理论的成熟,是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如宋范晞文《对床夜语》:“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谢榛《四溟诗话》:“情景相触而成诗。”“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明归庄《眉照上人诗序》:“情与景合而有诗,……情真景真,从而形之歌咏,其词必工,如舍现在之情景,而别取目之所未尝接,意之所不相关者,以为能脱本色,是相率而为伪也。”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

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总之,古文论中的情、景内涵和情与景的关系,可概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文学创作本原、诗思据以发生的自然形态的情与景。二是作为创作要素和审美活动对象的情与景。三是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文艺作品引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启示读者产生丰富联想的生动境象。不过,人们虽然常以“情”与“景”并举,强调情景交融,但在诗歌创作的审美活动中,作为主体要素的“情”,经常是占主导地位的,因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视。如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见其亲切处,何可少耶?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这以“情”为主导,是从根本上肯定了一切艺术美的本质,都是人的本质的审美形态。但是“情”与“景”关系复杂,辩证统一,因而创作中的“情”与“景”,心物交感,虚实相生,这样的艺术形象或意境,并无单一不变的固定模式。在这一问题上,近代王国维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总结,其《文学小言》云:“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情感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文学之事。”在这里,王氏借用西方的纯文学观点,来分析论述传统文论中的“情景”关系,其理论虽尚未能概括文论中“情景”的全部涵义,但比一般古文论家的模糊言论,则理论的明确和深刻,又进了一步。(黄保真)

【情景相融】 古代诗学概念。如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谓老手大笔作诗,则“情景混融,错综惟意。”又清初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概,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情是人的心灵世界,主要指喜怒哀乐之情,景是自然景物事象。情景相融指诗歌创作主客体彼此浸润,水乳交融。我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状景之作居多,情与景相结合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某些诗句写景,某些诗句言情,通过二者前后联系、比照,取得谐合的艺术效果;另一类是景中含情,情中含景,景句即是情语,情语也是景句,

无间无隔,相融莫分,达到浑融一体的艺术境界。“情景相融”指第二类情况而言。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对情景结合的两类型都表示赞赏。但一般均以情景相融为佳。故明钟惺提出“境语即是情语”(此处“境语”就是景语),反对“景与情分为两截,不能作景中情语”(《古诗归》卷五、卷一一)。说明情景相融的诗歌艺术更受推重。王夫之对情景融合作了深入论述。他从诗歌创作的动因,说明诗人写诗的重要触机是情景交互感应,诗人感情在未与相应的景物相遇和交感之前,往往陷于“终年苦吟而不能自道”的窘境(《古诗评选》阮籍《咏怀》评语),而一旦感物而应,情景相会,则自然灵妙,形成佳构。在他看来,“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是一旦进入诗人艺术构思并在具体诗篇里相融会,其原先存在的区别和界限实际上已经归于消泯,“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诗绎》)。说明诗中的情与景应该作为一个融浹的整体,向人们呈显自己的蕴意。关于情景相融的方式,王夫之认为,既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以哀景写哀情,也可以相反相成,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后者通过反衬映显,有时往往能够收到特殊的艺术效果。(郭国平)

【景媒情胚】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谢榛关于诗歌创作中情景关系的论述,语见其《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情与景是诗歌内容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古代诗论于此早有触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情以物迁”,“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出了外界环境的变化对诗人主观感情的影响。至唐王昌龄《诗格》云:“事须与景与意相兼始好。”南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意中有情,景中有意。”其后随着对律诗中景联、情联的探讨,情与景相对应的概念便逐渐地明确起来。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在分析杜甫律诗的情联景联后便指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元杨载《诗法家数》云:“写景,景中会意”;“写意,要意中带景”。明都穆《南濠诗话》叙陈嗣初语云:“作诗必情与景会,景与情合,始可与言诗矣。”他们均注意到情与景在诗歌创作中的密切联系,谢榛著《四溟诗话》则就此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首先同样地肯定情与景为诗之“二要”,“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进而提出“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的看法。“观”为景观,春花秋月,高山流水,景物的存在

有其客观性,并不因人而异,此为“同于外”;“感”为诗人的情感振荡和审美感受,由于各人的心境不同,对同样的景物,其感受亦异,此为“异于内”。谢榛强调情与景的内、外之别,强调不同作家对同一景物的不同感受,无疑是突出了内在之情的主导作用。他要求“内外如一”,即情景交融,然此交融的契机乃在“出入此心而无间”,也即是作者的一点灵心。由此他归结出“景媒情胚”之语。情胚早孕,“情融乎内而深且长”,然无媒则不发,必待“景耀乎外而远且大”,然后“情景交融”,得“神龙变化之妙”,诗于是乎成(均见《四溟诗话》)。这样的诗,“同而不流于俗,异而不失其正”,意谓它描写的景物虽与别人相同,然因为其情不一,故不会流于一般化;或者虽把同一景物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但因为是感情的体现,故也不会失其正。谢榛此说与后来王夫之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精神是相通的,在情与景的关系中,均突出了作者主观感情的主导作用。(刘明今)

【性与情】古代诗学概念。“性”与“情”既各具独立的内涵,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有时并称名之为“性情”或“情性”。语见汉初《诗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又云:“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早在先秦时期,“诗言志”已成为儒家传统诗论的开山纲领,《尚书·舜典》有“诗言志”说,《荀子·儒效》也有“诗言是其志也”之句。汉儒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吟咏情性”的主张,来作为“诗言志”说的必要的理论补充。性为体而情为用,“性”与“志”近,偏于思想道德的理性判断,而“情”则是血气冲动下的喜怒哀乐一类的感情的本能表现。在汉儒眼中,虽然“性”重于“情”,但“情”作为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提出,已从哲学的理性判断或纯粹的伦理规范,逐渐转向了艺术审美方面。汉儒诗论中的“情性”,肇自古代哲学中的“性情”。性,一般是指先天赋予的人的本性或本质;而情,则是指人与人之间,或人与自然及社会相交、相接、相感、相应时自然涌现的喜怒哀乐等感情。二者的关系,性为本质,情为现象,前者为体,而后者为用。但是,情又能移性,其反作用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变人性。因此,在文艺创作中,“情”对审美活动十分重要。于是在南北朝后,开始出现了“情”独占鳌头的趋势。因此,“性情”或“情性”作为一个复合词,“情”的审美色彩愈加浓烈,“性”反而退居次要或辅助地位了。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刘勰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较深,所以“情”与“性”并重,难分轩輊。但比汉儒而言,则其“情性”的审美内涵已深了一层。至

于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则明显是强烈的抒情占主导地位，揭示了诗歌的抒情特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又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则又把“情性”的艺术本质进一步扩大到一切“文章”的领域。唐宋以后，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更明确地高倡“诗者，吟咏情性者也”。唐宋以后的作家和文论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性情与文艺作品的审美特质的复杂关系。当然，这是一般地说，具体而论，如白居易就倒退到以性为主的立场，其《祗役骆口驿……》诗云：“雅哉君子文，咏性不咏情。”口吻与后世理学家相似。不过这只是个别现象。上述诸家的“情性”说，基本上保持传统诗论的观点，在“情”与“性”统一的基础上，或“性”重于“情”，或“情”重于“性”，二者关系是相互促进彼此消长的关系。但总的说来，把抒情而非咏性视为诗歌的艺术特征在“性情”说中愈来愈占主导地位。而发展到晚明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出现了提倡个性解放的唯情论。如汤显祖提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的主张，代表着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觉醒。以“情”排“情”，又转入了新时期的新美学思潮之中。

（黄保真）

【任性而发】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意为创作时一本性情，以真为贵，不受任何束缚。语出明袁宏道《叙小修诗》：“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闺阁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诗与性情的关系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命题，“诗本性情”的观念历来为人们普遍地接受。如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张耒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然何者为性情，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毛诗序》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即诗人之情当受礼教的约束。宋邵雍《观物外篇十二》称：“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将情与性严格区分。在后世的理学家看来，性为先天的禀受，近于天理，情则是后天的喜怒哀乐，易于陷人物欲中，故尊性而抑情。袁宏道此“任性而发”一语，其所谓“性”实是“情”，其特点是“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故与理学家所提倡的“性”截然不同。且他突出了一“任”字，“任”即突破限制、不受约束之意。当时“后七子”的末流即是以汉魏盛

唐的格调相标榜，甚者亦步亦趋，墨守古人的法度而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因此袁宏道针锋相对地提出“任性而发”的主张，标举民间传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为榜样，提倡一种能真实地反映自己心声，从而也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时代的诗风。（刘明今）

【情采】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言屈原《橘颂》的思想感情和辞采都美好动人。又《才略》：“刘桢情高以会采。”言刘桢诗情思高卓而会合辞采。又《序志》称《文心雕龙》为“剖情析采”之作，乃就文章的内容和文辞二者加以论析。又有《情采》专篇，论作品的情、理和文辞藻采之间的关系：“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鞶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认为文采附著于情、理，情、理的表现有待于文采，二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而“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理居于主导地位，情理已定，辞采方畅，犹如经线正而后织以纬线，布帛乃成。刘勰对此主从关系甚为强调，称为“立文之本源”，并由此而提出“为情而造文”的著名论断，认为作者须有充实的思想感情，而发为文章，文采须为表达情理服务；反对过分文饰以致淹没内容，更反对“为文而造情”，即一味追求丽采而情思寡少、内容空洞，甚至“言与志反”，本无其情而虚伪做作。他以文学的历史发展为例，认为《诗经》是为情造文的典范，而汉代辞赋则为文造情的倾向开始滋长，后世之作更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深”。刘勰之前，陆机《文赋》已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也曾说为文“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都指出了作者情志、文章内容与文辞藻采的本末关系。刘勰继承前人之说而又有所发展。“为情造文”的命题对后世文学批评颇有影响。如明人许学夷云：“汉魏五言，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颜、谢五言，为文而造意，故其语雕刻而意冗。”（《诗源辨体》卷三）（杨明）

【声情】 古代诗学概念。刘熙载《艺概·诗概》：“诗以意法胜者宜诵，以声情胜宜歌。”“声情”一词，分而言之，声是声音，情是情感；合而言之，是指声律中表达出来的情感。体裁不同，对于“声情”的艺术要求也有变化。“声情”既可指声中之情，也可指声情并茂。理论分析固然可以“声”“情”分开，但就实际作品来说，“声”与“情”是密不可分的。《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在先而声在后，这是创作的情形。但就听者方面说，是由声知情，声在先而情在后。所以，“声情”一词，是站在鉴赏批评的角度。著名的“季札观乐”（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就是由声知情的典范。《汉书·礼乐志》：“是以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阉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这也是以声逆情。一首诗的“声”“情”之间，既可和谐统一，也能分离为二。齐梁时代，永明声律“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尽管它对唐代律体的形成曾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片面追求声美而遗弃情深，其结果，只能是有声而无情。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四要素中，声、情占二，可见在诗歌创作中其地位之重要。（张小平）

【为情造文】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为情造文”的反面是“为文造情”。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造文”的代表。“情”在这里有二义：其一谓感情性灵，其二谓诗人“讽上”的主观意图或创作动机。刘勰认为，诗人既有感情的激荡，又有讽喻得失的真实愿望，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创作诗歌，谓之“为情造文”。其产生的作品则是“要约而写真”，内容充实可信，感情真挚感人，语言简要精当，无矫柔做作的浮词游语。刘勰提出“为情造文”的主张，是建筑在他对情文关系的正确把握之上，《情采》篇亦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心定而后结章，理正而后摘藻。”虽然作者构思、创作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形和过程相当复杂，语言在文学思维中对感情的启发往往有其积极、主动的作用，但是这与刘勰首先强调作者应该怀有真情实感并无矛盾。“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对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华艳的文风具有积极意义，对以后贵情重意理论传统的形成也产生了有益影响。参见“为文造情”。（邬国平）

【辞情】 与诗论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辞情”一词，分而言之，辞是文辞，情指情感；合而言之，是指文辞通过艺术技巧表达而出的情感。刘勰《文心雕龙·熔裁》：“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也就是说，文章的构成不能离开“辞情”。“情”与“理”相对，虽然，“辞”可写“理”，但“理”并非“万趣会文”的根本。“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作者写作的真正动机，还是“情”动于中的激发。而读者是通过文辞的表达去感受作者所写之情。“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記》），这是孔子对创作中辞情的规定。如果要把真情写得淋漓尽致，就需要运用文辞的表达

技巧。刘勰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知音》）从“六观”，可见文辞具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功能，以“辞”写“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刘勰指出了两种情形，辞胜于情：“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情采》）辞弱于情：“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体性》）针对这种矛盾，刘勰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情”驭“辞”，完美统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辞”与“情”的关系，在表达上还有“情在辞内”、“情在辞外”的区别。情在辞内，则语尽神完；情在辞外，得遥想之致。后者是诗人追求的某种艺术境界。（张小平）

【为文造情】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为文造情”与“为情造文”相对立，指不是为作者真实的感情所驱动，仅仅为了追求辞藻形式的华美和名利目的而写作的不良创作倾向。他批评《诗经》以后出现的辞赋一类作品，其作者常常缺乏真情实感，片面追尚藻饰，文章“淫丽而烦滥”，其影响所及，使汉魏以来特别是宋齐时代的作者、诗人沉湎于美艳文风之中，迷失了诗歌创作的抒情述志为要务的“本源”。在诗歌史上，不重视抒述性情，热衷于敷演文字，雕琢字句，或满足于鹦鹉学舌式的效仿古语，都是“为文造情”的具体表现，有识见的批评家往往用“伪”、“贗”二字加以概括，洞中其弊。刘勰对“为文造情”的批评，为后人抨击“伪贗”文风开了良好风气。参见“为情造文”。

（邬国平）

【理事情】 古代诗学概念，讨论的是诗歌创作的客观条件。系统的理论阐述，见于清初叶燮《原诗》内篇下：“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他用理、事、情三个具体的名称来概括“物”——即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现实生活：“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殫，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之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诗歌创作的任务，就是艺术地反映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理、事、情。三者之中，创作须“先揆乎其理”，“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犹如四季代谢，万物荣枯，变化万千，貌似难测，“然观物者以自然之理推之，遂如操券之必信”。所谓“理”，指的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诗写

“自然之理”，启迪人们去写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不是满足于表面的形似。这就要求诗人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洞察生活的能力。所谓“事”，叶燮说：“其既发生，则事也。”也就是客观事物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具体现象。事物不同，规律各异，因而世界具象也就纷纭万状，各有其生动的存在形式。诗有“理”而无实“事”，则单调乏味，流于程式化、概念化。作者启示人们，诗歌创作应该是“事”中有“理”，寓“理”于“事”，通过描绘具体可感的“事”，来艺术地言“理”。所谓“情”，在《原诗》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主要不是指人们常说的主观思想感情之“情”，而是事物所具有的独特客观属性。作者解释说：“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这里的“情”，是事物的特殊性在不同条件下的生动表现，它具体说明了为什么是此物，而非彼物。“情”在诗歌创作中，就表现为各种独特的形态和生机盎然的韵味。客观之“情”，反映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从而决定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作者进一步又深入阐述理、事、情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曰理、曰事、曰情，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邪？”文学创作必须紧紧把握理、事、情三者，作为审美客体，以便“表天地万物之情”，进一步去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诗人透过现象写本质，闪现了内在之“理”的光辉。而“理”又是通过具体现象、典型事物来概括，寓“理”于“事”，是诗歌创作区别于学术著作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事”又必须按照生活万有之“情”状来表现，所以能够腾挪变化，多姿多彩。这一论述，基本上符合古典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对后世诗论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蒋凡）

【移情】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见任昉《王文宪集序》：“六辅殊风，五方异俗，公不谋声训，而楚夏移情。”张铉注曰：“言不作声誉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于善道矣。”可见，将“情”从此处移置彼处，两相合通，谓之移情。但移情并不是僵硬的转换，不是外在的涂抹，而是热情的贯注，是表里的焕发。它是指作者把心中的情感移注于审美对象，使物我交融为一。在中国诗论中，“移情”虽然没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提出，但“移情”的思想痕迹是历历可见的。先秦时期，《诗经·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句，悲心移之于景物，但尚无理论概括。魏晋以后，“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诗人们在创作中进一步注意到物我之情的交流沟通。而“移情”，也主要是指诗人移情于物，使景物人化，而具有人的感情。《文赋》描述

的创作体会，其实正是移情的功夫：“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论则尤为具体：“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观物”如果没有生命感受，创作主体必不能移情于物。“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宋邓椿《画断》），钝根之人是绝然写不出形象生动的诗句的。“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这种审美感受便是通过移情而获得的。人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自然和人一样生生不息，而不是静止的存在。所谓“一草一木栖神明”，正道出了中国诗人审美移情的哲学基础。（张小平）

【情在言外】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二：“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认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此句似平淡无奇，其实有深情远致蕴蓄于中，不直接说出，耐人寻味。卷一“重意诗例”亦称谢诗“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又卷二称王粲《七哀》云：“及至‘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察思则已极，览辞则不伤。一篇之功，并在于此，使今古作者味之无厌。”谓王粲此二句未直言伤痛，但由其回首眺望的形象中，可体会他无限的故国之思、忧伤之情。其意亦同。皎然称这样的艺术表现为“诣道之极”（卷一“重意诗例”）。

（杨明）

【因情立格】 古代诗学概念。指以情为本源、以格调为其表现的诗学观点。语出徐祜卿《谈艺录》：“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情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圆环之大略也。”徐祜卿为明前七子之一，当时李梦阳、何景明作诗标榜汉魏盛唐高古的格调，务以复古为尚，一时风靡，徐祜卿亦从而趋之。然他本出吴中，吴中之风文法齐梁，诗沿晚唐，比较华靡轻丽，又不拘一格，一任性情。因此他虽从李、何游，论诗仍比较灵活，不主张一味地规摹汉魏盛唐的格调。于是在《谈艺录》中别倡“因情立格”的主张。他认为在感情与格调这二者的关系中，感情是第一位，格调是第二位。人们触物感兴，感情丰富多变，因此表达感情的诗歌格调也应当随之而变，不必非要效法古人的某格某调不可，而应当“妙骋心机，随方合节”。其“因情立格”之说，显然是对李梦阳“尺寸古法”、拟而不化现象的纠正。

（刘明今）

【吟咏情性】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毛诗序》：“吟

咏情性,以风其上。”突出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是《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志”与“情”,意义上虽然相通,但“志”主要是指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态度。“采诗观志”的制度正由此而来。《毛诗序》结合“志”“情”对诗进行论述,而对“情”加以重视强调,进一步体现了诗歌的创作特点。当然,《毛诗序》的“吟咏情性”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制约。但发展到晋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则显示了诗人创作对“情”的自由挥洒。钟嵘《诗品序》反对用典:“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也以“情”作为诗的根本。袁枚也说:“诗写性情,惟吾所适。”(《随园诗话》)诗论中“志”“情”的分途,遂形成“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志”一般作为政治礼教之“志”来看待,“情”则作为与政教相对的因人因物而发的私情来看待。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咏物,也就是显示情性之作。“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这里的“性情”,虽有所指,但至少可以说明咏物即是吟咏情性一类。同是吟咏情性,也有真伪高低。杜甫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哀江头》)“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句句咏物,句句又何尝不是吟咏情性?其襟抱之高,不难想见。而一些苦吟诗人,为诗而造情。其情伪,其诗必不能真挚动人。所以叶燮《原诗》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而盛。”(张小平)

【以情自得】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王夫之《诗绎》:“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早在宋末元初,刘辰翁就提出:“观诗各随所得。”肯定读者从接受的角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拥有理解诗义的个人自由。王夫之则对这一思想加以理论发挥。比如他解释传统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命题,就具有突破性意义,将这句话的重点从“兴观群怨”本身转移到“可以”二字上来,提出“随所以而皆可”的自由阐释思想,为读者在诗歌审美中积极创造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情自得是指读者可以凭藉自己的情致感受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文本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读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从而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在他看来,读者对于作品来说决不是被动的存在,相反,他们的阅读活动是对作品积极、主动的参与。阅读

决非像一块镜子映显物像那样简单、机械,而是读者心绪与作品义旨之间的互相启引、渗透和融合。每个人的内在条件各具殊相,互呈异状,所谓“世万其人,人万其心”(《知性论》)。同理,天下也不会有两个主体条件完全相同的读者,这使阅读的结果见仁见智,乐山乐水,缤纷万象。对作品含义在不同的读者心中发生迁移转换的现象,王夫之充分肯定其合理性。他将阐说分成推阐发明、疏讲描述、考证验核三个等级,“上”等的推阐发明一途最便于解读者进行义理的创造,也最受他重视。他评析诗歌,对诗义的剔抉、发明颇多,反映他对古人诗作一次新的认识,这正是得益于上述方法。但是,王夫之以情自得说并不趋入另一极端,认为作品文本完全被读者的因素所淹没,相反,作者的意愿、作品的本旨仍受到他的关心和尊重。他认为读者对作品内蕴的主动选择和延伸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阅读的自由问题适度而非无限的。这个条件主要就是指作品形态和本旨对读者具有某种规定性。只有作品与接受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联系及和谐的关系,方能取得理想的阅读效果。否则,读者解读、联想、对原义的引申延发的自由也就无法谈起。于是,作品对读者带有某种定向性的启导和读者在一定范围内对作品意蕴的抉发、张延,形成文本的约束和解读的自由之间的张力,因此不能想象作品决定读者,就如不能想象读者决定作品。所以,王夫之一方面肯定“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另一方面又表示尊重作者意图和作品本旨,约束滥使读者权利的谨慎态度,戒示人们要尽量避免误读错释,陷入“迷谬”之境(见《楚辞通释·序例》)。王夫之上述解读自由及其符合适度要求的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使“诗无达诂”、诗为“活物”诸说所代表的理论传统在明清之际得到延续和新的发展,尽管他实际的诗歌评赏在运用“自由”和遵守“适度”两方面也难免出现过一些或过或不及的缺失,却无损于其理论的光彩。参见“诗无达志”。(邹国平)

【神骨】古代与诗论有关的美学概念。唐元稹《画松诗》评张璪的《古松》画:“往往得神骨。”“神骨”是指松树枝根内蕴的坚贞挺拔、刚毅健强的精神气骨:“翠帚扫春风,枯龙戛寒月”,“纤枝无潇洒,顽干空突兀”。绘画理论中的“神骨”,也兼指形状瘦劲,与“书贵瘦硬方通神”道理相通。诗文理论中的“神骨”,往往与“形貌”、“形似”相对而言,如袁中道说:“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膺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珂雪斋文集·中郎先生全集序》)“神骨”是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豪迈峻拔、刚毅凛然的个性特征。无个性,则流于形式;无气骨,则伤于萎靡。

景物描写中的“神骨”，是指景物内在的精神气骨。神须形以生，形得神而立。有“神骨”之形，必虬劲有力，如张躁画古松，容易得之“神骨”，若画烟柳，则“神骨”难以寄生。景物中之“神骨”，具体地说，就是作者之“意”的赋予，是作者个性的外托。淡泊之人，往往得“纤秀”；坚贞之士，常追求“神骨”。“纤秀”呈现“和”，“神骨”突出“傲”。“傲”骨嶙峋，故有古松的坚强不屈，挺拔屹立。诗文之“意”是“神骨”，那么“神骨”须借语言文字之“形”才得以生。它要求语言文字精约工致，峻削细刻，让人望形而知神，得貌而辨骨。“神骨”不同于“神气”，“神气”偏于柔，“神骨”偏于刚。诗求“神骨”，最需要熔炼淘洗。“吐糟粕而吸精华，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工也”（清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安石、刘禹锡的一些诗，就具“神骨”的特点。（张小平）

【神理】 古代诗学概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范文澜注：疑作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神理”是指这种艺术组合的道理是神妙自然的。它天机独运，非假人力；它难以捉摸，没有痕迹。诗求“神理”，是指诗要写得妙造自然，不能斤斤于事物的斧凿凿柄，不能孜孜于情景的机械组合。以“神理”论诗，清人最多。王夫之描述“神理”的构思，其心境是：“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鲀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他在《绪论》另一处谈得更为具体：“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这就是说，“神理”不是雕琢能得的，“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王夫之又谈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势，飘逸无迹，类同“神理”。但以“势”作为“神理”，终不免将“神理”的内涵作了缩小。所谓“神理”，当是构思、表达、语言诸方面的自然谐和。而后来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则进一步把“神理”作为“意境”来分析，给人以具体的门径。“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关系寄托”，指诗有兴致。有寄托，则诗意不板实，合于“神理”之特点。“神理”是自然之妙，是真。“直抒己见”，发自衷心，也是写真。“纯任天机”，是指诗的构思，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极自然之妙，“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司空图《诗品》）。“言有尽而意无穷”，是指达到“神理”的语言途径。意在言外，生

气远出，才得“神理”的风姿。“神理”，是整体的奇妙，不是某一方面的神奇。（张小平）

【神气】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神气”一词，原指人的精神气貌，《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魏晋时候，“神气”用于画论，指超越绘画线条色彩的精神气势。如谢赫《古画品录》评晋明帝画：“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诗文中的“神气”，指的是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性，通过语言的艺术表达而流荡在字里行间的韵神气势。苏轼《东坡志林》：“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望”字生硬，非悠然之态，有碍神韵的流畅，所以苏轼评之为“神气索然”。元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说“情性”与“神气”之关系，颇中肯綮：“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也。”他还以“神气”作为品评诗歌的重要尺度：“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论述“神气”最详的是清代刘大槪《论文偶记》，他把“神气”作为行文之道的极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他又将“神”“气”分开论述：“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文章有气无神，“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又补充说：“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由此可见，刘大槪的“神气”主要指的是语言气势，其独到之处在于能由表及里，由粗入精，由具体到抽象；缺点是仅就艺术上指点门径，没有从作者的胸襟情性方面进行强调。（张小平）

【神妙】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谓之神。”《周易·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原是变化巧妙，莫测高深之谓。而汉魏以后，“神妙”的概念引入美学领域，如嵇康《声无哀乐论》秦客云：“师襄奉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前史以为美谈。”作者则答曰“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围绕“神妙”的美学境界而反复辩难。而自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文学观念后，又被诗人与文论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美学领域。如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诗云：“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属江都王。”而白居易更进一步从诗歌美学角度进行了理论概括：“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白居易《刘

白唱和集解》)中国传统诗论认为,所谓“神”,是指一种连结宇宙造化与艺术生命的超凡的力;所谓“妙”,即“妙不可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神”表示的是“道”的变化无穷的方面,“妙”则是“神”所达到的结果,即所谓“穷神观化”。韩康伯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可见,“妙”同样也具备这种超以名外,言象莫测的性质。而“神”与“妙”这两个范畴的结合,就是艺术之顶峰。所以古人评画,“神”了也便“妙”了,“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画论如此,诗论亦然。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神妙”这一艺术范畴,最集中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种不拘于物,追求自由挥洒的精神特质,表现了追求超凡入圣的完美极致的最高理想境界。(吴河清)

【神思】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讨论的是文学创作艺术想象问题。语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又云:“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学之“神思”,是一种身在此而心在彼,可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功能。这种想象活动,具有突破时空和感觉经验局限的性能,是一种不受身体限制的心理现象。关于这一方面,其实刘勰所论,乃本于陆机《文赋》,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但刘勰并不是雷同《文赋》而因袭古人,而是对艺术的构思与想象,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神思》一文,居《文心雕龙》下篇之始,具有创作论总纲性质,是一篇完整的艺术想象论。如关于艺术想象与观察生活的关系问题,陆机《文赋》没有涉及,而刘勰《神思》篇明确指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物”不仅指宇宙自然之物,而且包括了社会人生在内。刘勰认为,无论诗人的想象是如何上天入地,移山填海,奇特无比,但这种审美心理活动,却是扎根于客观现实之“物”,一旦脱离了现实,艺术想象也就丢失了依据,丧失了活力。所以《神思》篇又云:“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据《陔馀丛话》:“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麻与布从

其纤维组织的自然属性看,并无变化,性质相同,所以说是“布”并不比“麻”高贵;但“麻”又是纺“布”的原料,一旦经过织布机的“杼轴献功”,由麻成布,于是精彩焕发,弥足珍贵。所谓“杼轴献功”,指的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活动,完成了文艺作品的创造。但是这种“布”的创造,能脱离“麻”这一现实素材而凭空想象吗?“视布于麻”云云,正说明了刘勰“神思”的概念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考察,“神与物游”是有其科学依据的。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想象活动,不外是表象的再现、表象的组合和表象的改造或创造。艺术的想象活动离不开具体的表象,而表象又是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作家如果要活跃自己的艺术想象,首先就必须不断接触现实生活,大量储存表象,以作广泛联想之用。《神思》所论,虽然没有这样明白,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已多少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另外,“神与物游”之语,也说明诗人或作家的创作思维活动是结合具体物象来完成的,这又朦胧地接触到文学的形象思维问题。刘勰论“神思”,是文艺创作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我国古文论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蒋凡)

【神会于物】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唐王昌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神,诗人之艺术思维;物,物象。神会于物,与“心入于境”意近,言诗人在想象中似处身于境象之中,苦心竭智,深穿其境,搜求形象,微妙之意兴与物象融合,乃得佳句。(杨明)

【传神写照】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神”是超脱绘画线条形式而透现的精微风姿,是人物的内在生命和精神。“照”,是超脱外相的神妙无方的心灵观照,其涵义与“神”相通,所以“写照”可与“传神”并举,绘画中的点睛之笔,就叫“传神写照”。“形须神而立”(《抱朴子·至理》),“神”得“形”以生,所以顾恺之在《论画》中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创作原则。这在中国美学史上,继承了汉刘安《淮南子》中“君形者”的理论而加以发挥,明确地区分了“形”“神”之间的关系:写“形”是为了“传神”,“形”对“神”只处于从属的地位,有“形”而无“神”,则“谨毛而失貌”(《淮南子·说林训》)。“传神”观念在艺术理论中的确立,可以说把握了艺术的本质特征,给予诗歌理论以巨大的影响。在诗歌创作理论中,“诗言志”和“吟咏情性”是传统的看法。尽管“志”和“情性”应当是诗歌艺术的表现对象,但与“神”相比较,“诗言志”和“吟咏情性”没有脱离功利的思维框

架。发展到南北朝,诗文理论开始重“神”,如刘勰就提倡“神思”。唐代,以“神”论诗者渐众,如皎然《诗式》:“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顾恺之所谓的“传神写照”,是以“眼”传神,这直接启发了宋人对“诗眼”、“词眼”艺术的深入探讨。如黄庭坚说“拾遗句中有眼”(《赠高子勉》)。在宋人看来,“诗眼”、“词眼”正是诗词的传神之处,于是“炼字”之风兴盛,句锻月炼,以求传神。此外,以“神”论诗者,如严羽把“入神”作为诗的“极致”(《沧浪诗话·诗辨》)。明清两代,“传神”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清王士禛提倡“神韵说”。不过,以明屠隆的说法最为简洁,他说:“诗道之所以为贵者,在体物肖形,传神写意。”(《鸿苞·论诗文》) (张小平)

【神与物游】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创作过程中作者主观精神与客观物象的融会贯通。语出《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在此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创作时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其文首引《庄子》“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语,来说明作者构思时可以身在此而心在彼,其艺术想象可以不受时空的局限、形骸的束缚,无远不臻,无微不烛,自由地驰骋于广阔的艺术天地之中。由此可见,“神与物游”与“因物兴感”有别,它们同样表述了作者主观情思与客观外界事物的关系,然“因物兴感”所说明的乃是作者在外物感发下产生的情思,此则强调作者在表达情思时的思维活动的特征。它离不开客观物象,但又不受具体的特定的客观外物的束缚。因此在“神”与“物”二者的关系中,“神”显然地居于主导地位。故接下来刘勰写道:“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作家的主观精神始终是创作构思时的主宰,“规矩虚位”,神游万里,于是便可将万千物象一一驱役于笔下。作者创作时艺术构思的特征历来为我国文论家所重视,先是陆机《文赋》云:“其始也皆收视返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南朝画家宗炳述作画之要云:“闲居理气,拂觞鸣琴,……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焉,畅神而已。”(《画山水序》)所论皆涉及创作时作者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象的关系,对刘勰此说当有启发。 (刘明今)

【物我两忘】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指创作

时艺术家的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语见沈约《郊居赋》云:“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其意源于《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是一种物我不分,亦即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艺术创作中,当作者构思进入最微妙的阶段,“凝思之极”,也会达到主体与客体完全融合一致的状态。庄子描写工匠锤塑造器物时“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吕梁丈夫能踏水自如,“与齐俱入,与汨偕出”,皆在其“灵台一而不稽”,能与物俱化,物我两忘的缘故。扩大引申到艺术领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能丝毫不露人工斧凿的痕迹,形神俱备。庄子借技艺来打比喻,其目的在谈道,然得道者的境界与艺术创作凝思入神时的微妙的精神状态恰有某种程度的相合,故后世文艺家每以此境来论艺。如唐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图》云:“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作画时),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他们描述画家作画时入神的状态都是忘去自身的存在,身与物化,以致物我两忘。明谢榛更以此论诗云:“思入杳冥,则无我无物,诗之造玄矣哉!”(《四溟诗话》)“无我无物”即艺术创作时主客观泯然不可辨的超神入化的状态,此时作者灵机妙发,文思泉涌,已不复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所言正是“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刘明今)

【物我无间】 古代诗学概念。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物我无间”,是诗歌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相互渗透交流,融合无间的艺术境界。“我”,指审美主体;“物”,指审美对象。这种审美境界也存在于其他艺术之中,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所以,“物我无间”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物我两忘”。在诗歌创作中,“物”一般指的是山水景物。山水景物何以与人能相通无间?在于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移情作用,因而诗人耳目所接的山水景物也自有情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入可物化;但反过来说,人化的自然也成了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知者”、“仁者”于山静水动中,见入之情性,与之融合,故而有乐。《子华子

·执篇中》：“观流水者，与水俱流，其目运而心逝者欤。”“目运心逝”，可谓是孔子“山水之乐”的阐幽发明。但这只是以山水景物来就我之性情，并非于山水景物中见其固有之性情，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所以，它以“我”为主，不是“物我无间”。“物我无间”是物心人情，两相映发，贯通无碍，自然凑泊；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物我无间”不是“物”“我”两相体状的融合泯灭，而是两相俱在的情性默契。相未泯灭，故物在我身外，可供观赏；情性已契，物我同心，故可以浑然一体，成为内向而自由的审美观照。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也是“物我无间”的一种艺术表现。（张小平）

【三准】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齐梁时刘勰有关文学创作艺术构思的三个步骤或准则。语出《文心雕龙·熔裁》篇：“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对“三准”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以为是“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是说在进入创作以后，如何表达主题”；有的则以为是动笔写作前艺术构思的三个步骤和原则。根据原文“思绪初发”、“草创鸿笔”诸语，应该是指写作前艺术形象的构思的三个步骤或准则。因为刘勰在“先标三准”之后，有“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诸语，这才是运用语言艺术，化意象为具体艺术的创作过程。刘勰“三准”，在《熔裁》篇中是指熔意方面的问题，是针对艺术构思开始时的复杂思维活动提出来的。首先是“设情以位体”，就是依据表达情感的需要来确定主旨、规划体制和安排结构。写诗作文如果缺乏中心主旨，就会乱麻一团，不知从何写起。其次是“酌事以取类”，是说文章必须选择符合表现思想情感和中心主旨的题材、材料与典故。“事”不仅指故实，还包括了题材、材料等。“取类”，取其与文情一致。第三，“撮辞以举要”，是指思考运用精要的文学语言来树立文骨。“三准”确定之后，然后进入具体创作，敷文设采，运用骈偶、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段。当然，构思时运用“三准”是三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统一的思维过程，而不是按“始”、“中”、“终”的顺序机械排列，彼此割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叙述三者关系云：“撮辞必切所酌之事，酌事必类所设之情。辞切事要而事明，事与情类而情显。三者相得而成一体，如熔金之制器，故曰‘熔’也。”总之，刘勰的“三准”，主要是指进入写作前的

“腹构”阶段的构思准则。诗人创作，有没有“腹构”，是否把握“三准”原则，大不相同。后来苏轼称赞文与可画竹时的“成竹于胸”，“振笔直遂”，受到了刘勰“三准”说的启发。天才诗人灵感火花的闪现，诗篇冲口而出，滔滔汨汨，正与“三准”的构思有关。

（蒋凡）

【迁想妙得】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见《历代名画记》）“迁想”，仔细体会、揣摩对象的特征和神气，是一种不为眼前可见的客观绘画对象所拘束，而是超越于这种对象之外、浸透了画家主观情思的想象活动。“迁想”的目的是在“妙得”。“妙得”，是获得精妙的体会和认识。只有不拘泥于眼前的绘画线条，飞驰自己的想象，才能感受并捕捉到那超于象外的不可肉视的“妙”处。“妙”也就是“神”。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说：“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楼台亭榭，都有一定的结构，虽然一时不能画成，但容易逼真，不需“迁想妙得”。画人却不一样，人各有其精神气韵，这种内在蕴藉，是非“迁想”不能“妙得”的。顾恺之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手挥五弦”是形，故易画；“目送归鸿”是神，就难以用线条传达，这就必须“迁想”，不受时空限制地发挥主观想象，抓住绘画对象本质的个性特征，把自己的情思“迁”入其中，两相融化，然后才有主客观统一的“妙得”。“迁想妙得”，虽然指的是绘画，但与诗文创作的原理是相通的。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指的就是“迁想”；“至精而后阐其妙”，约略同于“妙得”。唐皎然《诗式》说：“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即是“迁想”而后“妙得”的意思。诗歌创作，离不开“迁想”；而大家之称，尤擅“妙得”。如李白的诗，既充满离奇的想象，又能妙趣横生。“迁想”，人人可为；“妙得”，则非人人能专。故后者常为诗论家所强调。宋严羽《沧浪诗话》以唐诗为例，强调诗歌创作中“妙悟”的重要。清王士禛则把“妙”具体为“神韵”，指出诗歌创作必须借助想象去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可见，“妙得”是绘画、诗文创作的关键所在。“迁想妙得”体现了传统美学重视传神、重视表现生动意韵，并要求作家艺术家深入观照、进行充分的审美想象的思想，对后世诗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张小平）

【物化】古代与诗论有关的美学概念。《庄子·齐物论》记庄周梦蝶，不知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

庄周,“此之谓物化”。物化,是一种思维的境界。人类认识世界万物,都是主体作用于客体,于是就产生了是非。物化,是在认识过程中忘却主体自己,随物而化。“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如果庄周梦为蝴蝶,仍然记得自己是庄周,则必生是非之心,就很难“自喻适志”。物化,是将主观精神融化于客观事物,从而泯灭物我的时空界限,使主客体冥合为一,自由转化。物化,不是形而上地割裂主体和客体,它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物化不是遁离世俗,是融化自己于任何事物环境之中,是涵融万有,一无滞碍。庄子的物化说,影响于文论,就产生了“神与物游”以达物化的理性认识。刘勰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神思》)苏轼叙说文与可画竹的经验是“必先得竹于胸中”(《筼筻谷偃竹记》)。又《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诗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这都是指创作过程中的物化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述的“无我之境”,也是一种物化境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庄子的物化说,还指的是技艺上的神妙境界。《达生》篇说:“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工倕以手指画圈,达到妙合圆规的程度,是由于他不断实践,手技熟练得与物象自然谐和,不须费心计量,所以心胸澄明空灵,一无窒碍,与物俱化。引申到诗文创作,在技法上就形成了反对雕琢,天人合一的审美取向。黄庭坚评杜甫到夔州后诗和韩愈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又说:“杜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大雅堂记》)沈德潜评李白诗:“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说诗晬语》)这些都揭示了诗文艺术技巧上炉火纯青的物化境界。综上可见,诗文中的“物化”主要包括思想和技巧两个方面的内容。

(张小平)

【心斋】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语见《庄子·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瞻彼闾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是庄子用来表示获得内心空明虚静的概念,它与一般祭祀的斋戒不同,是针对内心精神状态而言的。庄子讲天地之大道自然运

行,人须达到与宇宙生命相契合的境地才获致自由,其途径即是“心斋”:排除杂念,专一心志,不拘泥于耳目之类感官知觉,不拘泥于心智之理性思虑,而是与空明之气相感应,因虚空而能容受万物,通于大道,获得吉祥。这也就是《知北游》中所谓“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的方法。庄子这一思想继承了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思想。除道家外,当时的诸子百家,也有近似的说法。如荀子说过:“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解蔽》);韩非亦云:“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屈原《远游》:“漠虚静以恬愉写,淡无为而自得。”由“心斋”而得的“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以“坐忘”名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即摆脱了感官拘束,抛弃机心智性,浑然与大道相通的境界。“心斋”不仅有助于获致宇宙大道,于工艺创作也是相通的。《庄子·达生》就有梓庆对创作前心境准备的自述:“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富于哲学意义的“心斋”移入文艺领域,成为创作中以虚静空明之心观照、容纳审美对象的重要理论,论析者如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罄澄心以凝思”,“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南朝宋宗炳主“澄怀观道”(《宋书·隐逸传》)、“澄怀味象”(《画山水序》);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讲“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宋朱熹《清邃阁论诗》:“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等等。总之,“心斋”概念对文艺创作意义重大。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心斋虚静而明,在创作过程中极端重要。诗人进入审美观照时,以主体摆脱杂事欲念为前提,而专心一致于创作。因为心斋的虚静而明,为审美主体的自由观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心境愈自由,愈能获得美的享受。

(陈引驰)

【坐忘】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庄子用来表示内心空明虚静的精神状态。语见《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即是一种超越感官知觉,机心理智,排除了一切杂念,凝神专一,与宇宙大道契合无间的境界。其思想内涵为古代文艺创作论所汲取,产生了很大影响。参见“心斋”。

(陈引驰)

【形与神】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意谓创作之难在于传神,而形貌的

描写则可通过夸饰来实现。这就提出了文艺创作中“形”与“神”的关系问题。艺术美学中的“形”与“神”，肇自哲学中的“形”与“神”，意蕴多变而丰富。综合哲学与文艺，“形”的要义有五：一指与宇宙本体相对举的一切具有能被人感知的自然之物的形体、形貌。如《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二指与人的精神相对举的身体、形貌及其外在表现。如《庄子·在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三指与自然风物的抽象本质、特征或神采相对举的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的形色、形体。如《庄子·天道》：“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四指人的思想情感或审美体验的物化或表现，即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来进行的审美活动形式。如《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五指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感性形式的艺术形象。如陆机《文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钟嵘《诗品》：“五言居文词之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神”同样具有多重涵义。一指宇宙万物未被人认识时而难以名状的奥秘。如《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二指与人的形体或感官对举的内在精神、思想意志或思维活动。如《墨子·所染》：“伤形费神。”又《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前者指与“形”对举的一般精神活动，后者则确指艺术思维及其规律。三指人或客观事物天然具有的神采、生趣或本质特征，它们是依于形色又超越形色，无法单凭感官直接感知，而要借助直觉体验、妙悟直契才能把握。如宋袁文《论形神》：“作画形易而神难。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神采，自非胸中过人，有不能为者。”四指一定时代、一定艺术体式的独特审美特质、风格或韵味。如清刘大櫟《论文偶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五指艺术创造的最高品格或精湛技艺的神化境界。如杜甫《寄薛三郎中据》诗：“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清方亨《读画录》：“神也者，心手两忘，笔墨俱化，气韵规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一切不可知之谓神也。”在中国文艺美学中，“形”与“神”作为对立统一的一对概念，其意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构成了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两个对立统一的不同层次。二是成为艺术家高低不同的审美追求。三是作为审美创造中自由选择的两种对立统一的艺术方法。《淮南子·原道训》云：“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从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上，阐明了有、无相生，形、

神相依是一切事物和生命存在的根本规律。艺术审美活动也是如此。因而“形”与“神”是构成文艺作品及其审美价值的两种基本要素。不过，就其“形”与“神”关系的发展而言，又可分为三种不同倾向：一偏形似，一重神似，一则主张形神统一，二者兼备。汉魏六朝作家多重形似，如《文心雕龙·物色》所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钟嵘《诗品》评张协、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人，也一再指出他们“贵尚巧似”。而受道家或佛家哲学影响较大的文艺家，则多重传神而略形色。如苏轼《书鄮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文艺创作贵在神韵。但后人不同意，又提出形神统一论加以驳诘，如明李贽《诗画》云：“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提倡形、神兼备，辩证统一，成为“形”与“神”关系论中的主流派，促进了中国诗画等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黄保真）

【以形写神】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语出东晋顾恺之：“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形”指艺术表现对象之外形或现象的一面，而“神”指艺术表现对象之内在精神、本质的一面。“以形写神”意为通过对艺术表现对象之形貌的刻画描写，达到对其内在精神、本质的呈现。形神之间关系的讨论原来自庄子哲学。庄子主形残而神全，《淮南子》等沿其馀波，讲神为“君形者”，以为拘泥形似而伤其神：“画者谨毛而失貌”，“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形神关系首先是在艺术中的绘画领域展开的，顾恺之论“以形写神”也不例外，而后这一观念扩大到文艺领域的各个方面。它的提出还与当时玄学的思辨成果相关。言、意关系的讨论产生了“寄言出意”，以言为意之表现和象征工具的观点。而“以形写神”通过外在形貌的刻画达到内在神明的体现的观点，与它恰相对应。在当时及后世的诗学批评中，“形”的概念运用非常普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钟嵘《诗品》：“张协又巧构形似之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苍》：“形似体者，谓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难以粗测者也。”苏轼《书鄮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是论画，但“诗画本一律”，也有关诗学。或以为这是贬损“形似”，其实是主张不泥于“形似”，当同时写

出“神似”。如王若虚《滹南诗话》中的诠释：“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即形神兼备，不抛开形，又传达到神，如宋晁说之所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这些都较好地诠释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引驰）

【韵外之旨】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歌作品在语言文字之外的情韵意境。语出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司空图总结发展了前人关于诗歌言、意之间表达关系的见解，对诗学审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先如刘勰《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皎然《诗式》“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都讲到了文字之外的余意。司空图的“韵外之致”与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理论紧密关联，较之以往论述更为深化。他的《诗品》中讲“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综合阐说，正是因为超乎文字显现的“象”，才得其“空”（《庄子·齐物论》：“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即虚涵的意旨，也就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对此司空图有一更为醒目的说法：“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一说法，揭示了诗歌艺术思维的某些特征。艺术的空白，是读者自由驰骋其艺术联想和想象的广阔天地。从接受美学角度言，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故为后代神韵说宗师王士禛所称誉。其余诸如宋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之思而得之”（《续诗话》），苏轼“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诗辨》），明袁中道“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淡戍集序》），清吴乔“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围炉诗话》）等，都是由此发扬光大的。（陈引驰）

【穷形尽相】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创作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刻画所描写事物的形体状貌。语出陆机《文赋》：“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倜傥，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意谓文学创作的风格体裁多种多样，客观事物的变化亦无穷无尽，要使文学创作能充分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发挥作者的灵思，巧妙地驾御丰富的辞藻，勤奋地探索，大胆地创新，不要受任何规矩模式的束缚，务期能透彻地、鲜明地把事物的“形”与“相”表达出来。清方廷珪释此

句云：“形，物之形；象，物之象。思必穷其形，辞必尽其相。”（《昭明文选大成》）可见此“形”与“相”均指客观物体的属性，近于“物象”，与经过艺术家心灵的折射而被反映到文艺作品中的“意象”有别。作者强调的是，文学创作不可有固定死板的格套或模式，而应根据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以曲尽其所描写对象的形象为原则。（刘明今）

【随物赋形】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作者创作时能挥洒自如地描摹客观事物，客观事物千姿万态，其文章亦能相应地驰骋变化。语出苏轼《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在这里强调指出文章体裁、风格等的变化乃是由所描写的客观对象所决定的。譬之流泉，在平地则畅衍，遇山石则曲折。作家创作的风格有时平畅，有时奇崛，亦均非故意如此，而是受其所表达的内容支配，不得不然。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自论其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意正同，均突出了真实、自然的创作态度。苏轼此论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进一步发挥。他把“随物”与文章的风格结合起来，所针砭的乃是离开所表达的内容的需要而故意追求某种特定风格的不良倾向。因此苏轼所称的“随物赋形”与陆机的“穷形尽相”之说，虽在重视所描写的对象上有相似之处，但角度不同。“穷形尽相”所论的乃是创作的要求，“随物赋形”则是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创作原则。其后王若虚《滹南诗话》评白居易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元好问论杜甫“学至于无学”，故其诗能“元气淋漓，随物赋形”（《杜诗学引》），所倡均是真实自然的创作观点，与苏轼此论一脉相传。

（刘明今）

【物象】 古代诗学概念。《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原是对《易》象起源的说明，但是“观物取象”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启发了后世对文学创作规律法则的探索。物象是指事物的形象和气象，如曹植《七启》诗：“独驰思乎天云之表，无物象而能倾。”“物象”一词用于诗歌理论，见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称李白：“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诗文创作离不开模写物象，“人心之动，物使

之然也”(《礼记·乐记》),物象的获得,不是凭空虚构的,陆机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物象的来源只能是生活。但物象并不等同于生活中的客观物状,物象只存在于艺术作品,它是艺术概念。物象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它浸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文赋》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就是说,由于作者才性气质各不相同,因而观察事物就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物象也就千变万化,复杂多样,很难描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也说:“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意思是说,物象因人而异。由生活中的事物变为艺术作品的“物象”,其创作过程不能脱离人的艺术想象。只有借助想象的翅膀,才能“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文赋》)。刘勰分说“物”、“象”:“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物色》)这也是说明创作“物象”不能离开艺术想象。“物象”既离不开艺术的想象,同时还需要情感的塑造。刘勰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象”色彩和音响的安排是随着主观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任意的涂抹和罗列。“物象”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就表现为文字。梅尧臣《答裴送序意》:“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以文字刻画物象,需要一定的艺术技巧。“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文学作品中的物象,既能给人以隽永之味,还能给人以情绪上的感染,这种效果的获得,就需要文字上的熔炼剪裁。唐司空图也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清王士禛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蚕尾文》)他们强调物象的“神韵”,都是对物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张小平)

【物色】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指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自然景物等的形貌、色彩、声音等。语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赋类有物色门,录载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诗文中描绘自然景物,由来已久。南朝宋山水诗兴盛,其后作者更倾注心力于此。魏晋南北朝时作者普遍认为自然景物能触发情感,引起创作冲动。于是刘勰《文心雕龙》乃专列《物色》一篇,论述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认为“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自然景物对于人的情感具有强大的激发力量。“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一叶之落,一虫之吟,细微如此,亦足动人。情感与物色间存在复杂关系:或“情以物迁”,其心本

静,因景物不同而产生不同情感;或“情往似赠”,带着情感观赏景物,将主观情感移入景物。因观赏景物而“兴来如答”,产生创作兴会,发为文辞。“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屈原作品之所以动人,与景物之助也有关系。又认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描写景物时,也必有作者主观情思的活动。故作品既绘形绘色,同时也表现作者的心情,又总结《诗经》、《楚辞》、汉赋以至宋齐诗文描写景物的特点。称赏《诗经》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用语简约而情态毕露;而于汉赋之堆砌铺排表示不满。对兴起于刘宋的山水风景描写,指出其特点在于注重形似,“功在密附”;又能“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语言自然而刻画细致。后世作者对于诗中的物色描绘论述颇多。初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自述其选录标准,有“以情绪为先”,“以物色留后”之语,(《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认为诗句中表现诗人情感比单纯写景更为动人。王昌龄《诗格》云:“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谓诗中景物描写乃是自然物的映象。又云:“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同上)强调诗应做到情景交融。又云:“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引)谓情感强烈时,景物似亦与人心相感应。实即指情感外射、移情于物的审美心理。又皎然云:“如‘白云抱幽石,绿篆媚清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物色带情句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认为那些诗句虽纯然写景,但其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思,因而更富于艺术感染力。(杨明)

【理为法源】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元郝经重义理而轻文法的创作观点。宋元之际论文者好谈诗法、文法,郝经遂作《答友人论文法书》,力倡“理为法源”之说,云:“为文则固自有法,故先儒谓作文体制之而后文势。虽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对文、理、法三者的关系,郝经明确地把理置于第一位,“法在文中,文在理中”。他认为对此的态度是古今作文差异的大关键。“古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后,辞由理出,文自辞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无法。”郝经此文洋洋数千言,反复辩论理与法的关系,务在抨击“求人之法以为法”、“循规蹈矩”、“窥窃模写”的现

象,提倡自立法、自名家,所论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所倡的“理为法源”之说,其局限也十分明显,因为他所谓的“理”并非诗文的特定的内容、作者的一得之见,而是被儒家奉为万世不移的伦理纲常。他说“六经,理之极,文之至也”。以《诗》而言,他认为“理”在性情教化,“法”在风赋比兴,理为本,法为末,则比兴之法的运用不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理的体现,这显然是传统儒学的偏见。(刘明今)

【理外之理】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明江盈科提倡的“奇”与“变”的文学创作观念。语见其《耳谭引》:“理有万变。理中之理,经而易寻;理外之理,棼而难析。”《壁纬编序》:“夫近世论文者辄称复古,贵正而讳言奇。然有不奇而可言文者耶!夫正者文之脉,理从脉而生息变化、时隐时见,时操时纵,时阖时辟,时阴时阳,时短时长,有自然之秀,然后尽文之态,而极虚明之变。”江盈科为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万历中期袁宏道有意革新诗文,诗集刊行,江盈科辄为之鼓吹,作《解脱集序》云:“要之君才毕竟若会稽之茧,从造化灵幻变出,是谓世间一种最奇之奇。”“最奇之奇”即“理外之理”。江盈科论理强调变,重视“理外之理”。以之论文,他不否认“正”,但要打破以正为唯一的途径,要“尽文之态”,“极虚明之变”。他还指出,一般人所谓“纯正”者,只不过是可笑的“老生腐儒训诂解经之语”,豪杰之士当“穷心之变,而自见其奇”。其所谓“奇”与“变”即“理外之理”的表现,也即袁中道评他诗文所说的“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袁中道《江进之传》)(刘明今)

【胸襟】古代诗学概念。如唐李白《赠崔侍御》诗云:“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又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诗人胸次”条:“李太白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胸襟,胸怀、胸次、襟抱,指诗人宽宏阔大的心胸气度识见,具体指诗人良好的心灵、精神、品性条件的审美理想,包括诗人高深的道德修养,广博的见闻学识,乐善爱道、悲天悯人的情怀,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匡世救俗的崇高责任,有时也指淡泊名利、闲旷高远的心趣。叶燮《原诗》内篇下对“胸襟”作了详尽地阐述:“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从他对杜甫诗歌的称颂中,可见“胸襟”的具体含义,“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状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

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得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叶燮以“理、事、情”指诗歌表现对象,“才、胆、识、力”指创作主体条件,“胸襟”是对后者的综合概括。这一主张因其学生沈德潜的突出强调而更加著名,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说诗碎语》卷上)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创作主体与文学创作成就和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诗文创作是诗人和作者心灵志趣的流露,有怎样的精神意识,便有怎样的诗文品格,犹如种植什么草木绽开何种花卉,因此十分重视诗人内美的培养。孔子:“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扬雄:“邇中而彪外。”(《扬子法言·君子》)韩愈:“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答尉迟生书》)姜夔:“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白石道人诗说》)揭傒斯:“学诗者必先调燮性灵,砥砺风义,必优游敦厚,必风流酝藉,必人品清高,必精神简逸,则出辞吐气,自然与古人相似。”(《诗法正宗》)“胸襟”说正是以上文学观念的反映,强调立“基”正“本”,功夫从源头上做起,堪称提纲挈领的理论,如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不少意见具有积极意义。(邹国平)

【积学】古代与诗论有关的文论概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积学,就是积累学识。对刘勰来说,积学意味着要从儒家经典的学习中丰富自己创作所需要的才识,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事类》篇说:“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气,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这是对“积学”的详解。积学对创作的巨大影响,也由此可见。其实,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就已经隐含了“积学”的启示。陆机《文赋》也指出文思的获得,除“玄览”还须“颐情志于典坟”:“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王昌龄《诗格》也说“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是“感思”的途径。苏洵的成就,更是得力于“积学”。“老苏自言其初学为文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历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

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严羽说诗有“别材”、“别趣”,但也不否定读书穷理。王士禛倡导“神韵”,但“神韵”之根柢乃是“学问”:“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本之风雅,以导其源;诉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带经堂诗话》)“积学”对于创作虽然十分重要,如果不化“积学”为自己的才性,那么如两脚书橱,读书虽多,虽可能成为学者,但却不是诗人。

(张小平)

【格物】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朱熹《大学章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推究。意思是说,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学问,必须探究无穷事物的原理。“致知在格物”,揭示了“知”产生的根源是“物”。“物”也就是自然,就是现实。从这一认识出发,古人对于诗歌艺术的产生,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格物”一词,具体运用于诗歌理论,以叶燮阐述最详:“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原诗》外篇上)“物”就是指客观生活。客观生活之一“触”,就是诗文创作的源泉:“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触而发宣之。”(内篇下)“物”不仅指客观自然,更多是指社会生活。他在《怀轩说》中写道:“人生与世接,要不能与世为漠然不相关之人。既相关,则人不能忘乎我,而我亦不能忘乎人。”(《已畦文集》卷二一)他以杜甫为例:“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朋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内篇下)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必须面对现实事物,探究它、反映它。此外,“物”还指古人诗书。他说,锻炼才胆识力,“其道宜如《大学》之始于格物,诵读古人诗书,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内篇下)。还有把“悟”称作“格物”的,如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

(张小平)

【才性】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古代的哲学概念及魏晋清谈的一个命题。后来引申用之于诗文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才,才能、才具、才华、才气;性,天性、性格、品性、个性。二

者都属于人的先天禀赋。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以才性品评人物及文艺的风气。《才性论》指出,天地间万物或美好或丑恶,是由于各自禀受清气或浊气不同所致。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气决定作者才性。刘勰则进一步指出,才性又决定诗歌、文章体貌。他同时又看到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说:“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事类》)“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体性》)他肯定作者通过后天刻苦学习,或者能够更好发挥其先天良好的禀赋,或者可以弥补其天资禀性的不足。在具体学习的方法上,刘勰提倡根据各人天性特点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文学才能。

(郭国平)

【别材别趣】 古代诗学概念。见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别材”“别趣”,是严羽特创的诗学术语,体现了《沧浪诗话》诗论的基本宗旨。所谓“别趣”,严羽有时称之为“兴趣”,是他衡量诗歌优劣的基本标尺。诗歌文学与其他事物一样,其中也有“理”——即思想教化等等;但诗歌又不同于一般的事物,而有其独具的审美艺术特性,不能混同于一般的事理。所以《沧浪诗话》又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一般的学术著作,力求穷辞尽理,透彻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严羽认为,诗歌创作则不同,它的词、理、意、兴——也即语言、思想、意绪、兴趣,在诗歌艺术形象中浑然一体,“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如果诗人不理解“别趣”,也就是忽略了诗歌的审美艺术特征,当然就无法达到艺术的高境。很明显,“别趣”指的是诗歌的艺术特征,是诗人的情感融化于整体艺术形象之后所产生的蕴藉深沉、余味无穷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材”,严羽有时称为“妙悟”。这是从“别趣”生发而来的又一基本概念。既然诗有“别趣”,具有不同一般的审美艺术特性,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其思维与创作也必然不同一般。“别材”或“妙悟”,就是诗人对于诗歌美学特征的心领神会或直觉体悟式的把握。所以《诗辨》又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在这里,严羽强调诗歌创作区别于一般的逻辑思维。所谓“别材”或“妙悟”,一方面指出写诗要有天才,一方面又指出了接近于今天形象思维概念的某些思维特性。而发挥“别材”、达到“妙悟”的必然途径,作者认为来自对于前人优秀之作的“熟读”或“讽咏之久”。这是

一种长期潜心地欣赏诗歌艺术珍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活动,它的思维特点是直觉的体悟,而不是凭藉书本学识去作理性的逻辑思考,是一种对于诗歌内在的神韵趣味作直接领会与把握的心理活动,进一步又化为创作的动力。总之,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二者密切相关。它在指出诗歌艺术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形象思维区别于逻辑思维等美学特点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它是针对当时诗坛弊病,特别是针对江西诗派及其末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提出来的,认为江西派诸君违背了诗歌艺术特征,走入了创作的死胡同。在江西诗派主盟诗坛的宋代,这种当头棒喝,具有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胆识,对后世如神韵派、性灵派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探索诗歌的艺术特征。当然,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理论局限也很明显,它强调的是诗歌之流,而不是源,更不是积极反映生活,一旦强调过头,容易造成重艺术而轻思想的不良倾向;同时,因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片面把二者加以割裂和对立,也有不利于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的一面,因此,招来后人的种种讥评,也是很自然的事。(蒋凡)

【才胆识力】 古代诗学概念,重点论述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关于才、识诸问题,古时早有论述,如唐刘知幾《史通》,就有《鉴识》《核才》诸篇,他说:“史有三长:才、学、识。”(见《新唐书·刘知幾传》)所论虽为史传文字,但对后代诗论也发生影响。明李贽《杂述·二十分识》对于“因才而生胆、因胆而发才”就加以论述。但前人所论,较为零碎琐屑。只有到了清初,诗论家叶燮才对才、胆、识、力四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论。其《原诗》内篇下曰:“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又解释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中国是抒情诗的王国,重在抒情言志。叶燮认为,才、胆、识、力四者,即是诗歌抒情言志的具体化,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融主客观于一炉,那“勃然而兴”的创作激情,才能化为生动的诗歌意境与形象,这是诗人创作赖以成功的主观条件。所谓“才”,指才思、才华,又兼指诗人驾驭创作法则的艺术才能。有才华的诗人,必然要不断创新,自成一家。但是,“惟有胆能生才”,有了胆,诗人才华才获充分展现。所谓“胆”,指的就是诗人敢于独立思考、打破传统偏见、进行自由创造的艺术创新精神。诗人无胆,就会如三日新妇,动恐失体。所谓“识”,指的是文学家对于

世界万物是非美丑的辨识能力。是非明,美丑分,诗人就能做到取舍在我,因情而发,辞随意定,自由驰骋。相反,诗人“无识”,则美丑混淆,是非颠倒,犹豫动摇,难取难舍,因而只能人云亦云,拾人余唾而津津自得。所谓“力”,指的是诗人运用艺术形象来概括生活现实、抒发郁勃情志的功夫和笔力,以及在创作中那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气魄和力量。如果不经长期的艰苦艺术锻炼,怎能不“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实际上,诗人所花费的心血功力大小,直接反映了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如俗话所说,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诗歌王国没有艺术懒汉立脚的余地。但才、胆、识、力四者,并非机械割裂,各自孤立,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叶燮进一步解释:“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这里以“识”为主,又直接与诗人的世界观相联系,对后世诗人道德修养的锻炼提高有所启迪。叶燮有关“才胆识力”的理论,很快发生影响,如薛雪《一瓢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无不承其绪而详加发挥。其流波所及,直至今日而不息。

(蒋凡)

【时序】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刘勰有关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概括。语出其《文心雕龙·时序》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篇末赞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在《时序》篇中,刘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他以诸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时序”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理论核心是“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二句,“时序”与“世情”并称而成文,当属同义。而“时序”或“世情”,指的是历史生活与现实面貌。其具体内容,据《时序》全篇所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如论周代诗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周初太平盛世,诗歌和平雅正,或“乐而不淫”,或“勤而不怨”,君臣上下,同声唱和,心相鸣感。西周末期至春秋,王室衰乱,民不聊生,所以诗人或哀鸣,或愤怒,《黍离》之悲与《板》《荡》之怒,正是时代的呐喊。所以他进一步加以理论概括:“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风动于上”,指朝廷政治的兴

衰隆污;“波震于下”,则指表现人们思想情感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时代政治,就有怎样的诗歌反响。二是君主的爱好的提倡文学。如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对于建安文学之盛,刘勰认为与当时的统治者曹操父子的“雅爱诗章”和大力提倡有密切关系。当然,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君主的提倡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但过分夸大帝王的决定作用,则又是刘勰的理论局限。三是学术思想面貌。如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纵横家游说盛行,因此影响了屈原、宋玉的辞赋,联藻日月,交彩风云,其“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往往影响一代文风,“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指出了玄学对于魏晋以后诗歌的影响。由此可见,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决定或影响了文学的历史发展;时代的精神,必然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文风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风貌有时偏于质朴,有时崇尚文彩,都受时势驱遣,而与时代审美趣味相合拍。所以说是“质文代变”,“崇替在选”。总之,刘勰“时序”,启人颇多。如唐刘禹锡“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之论(见其《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记》);宋戴复古《论诗十绝》有句“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见《石屏集》卷七);明李东阳“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见其《怀麓堂诗话》);清叶燮“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见其《原诗·外篇下》);无不可见“时序”的影响。(蒋凡)

【通感】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它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概念体系中原有的审美概念,而是今人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术语,用来概括中国古代审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眼、耳、鼻、舌等各种感官经验相代、互通的现象。“通感”一词,在中国古代语汇中虽然出现很早,但其本义只是“通灵感物”(汉马融《长笛赋》),常用以表述文艺作品,特别是音乐、诗歌的功能,能够使人的心灵同神祇、万物交感互通,但毕竟同今天所说的作为审美概念的“通感”的内涵不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记录审美活动中感官经验移借互通的现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观乐:“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偊,……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孔颖达《正义》:“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直”、“倨”、“曲”、“屈”等,这都是视觉形象,用以表现听觉所得。可谓视、听互移。《礼记·乐记》:“其敬心感

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里表现了听觉、视觉、触觉经验的移借交错。又:“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马融《长笛赋》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听声类形”。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则说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道家著作中,把这种通感现象,解释为对一切感官及其经验的超越。《列子·黄帝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又《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目听。”佛教典籍中,也有六根互用说,《成唯识论》卷四:“如诸佛等,诸根互用。”《五灯会元》卷一:“鼻里音声耳里香,眼中咸淡舌玄黄。意能觉触身分别,冰室如春九夏凉。”在中国古代,儒、道、释诸家不仅都承认通感现象的存在,而且都利用通感现象来宣传或神化自己的学说。这不能不对文艺创作和审美理论产生影响。如果说《乐记》中论乐,审美与功利还密不可分,那么司空图《诗品》就是纯粹的诗歌美学了。其中《冲淡》云:“阅音修篁,美曰载归。”孙联奎《诗品臆说》:“音可阅乎?阅音,当即听香读画之意。”至于文艺作品中使用感官移借来表达审美感受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著名的如陆机的《拟西北有高楼》中的“哀响馥如兰”。贾岛《客思》中的“促织声尖尖似针”。宋祁《玉楼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范成大《亲邻招集强往即归》中的“已觉笙歌无暖热,仍怜风月太清寒”,等等。钱钟书《旧文四篇》中,有一篇专论《通感》,综合古今,汇通中外,言之最详。可参阅。(黄保真)

【夸饰】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创作中的夸张增饰修辞手法。刘勰《文心雕龙》有《夸饰》篇,认为“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此前,东汉王充从学术角度,反对“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见《论衡·艺增》),批判文辞增饰的倾向。王充把学术与文学等同视之,因而忽视了文学特有的性质。刘勰则不然。他认为夸饰不仅用于描写景物、场面,而且用于表达主观情感,“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可使所写事物形象更鲜明生动,并增添文章的瑰奇风貌,“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可起到“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作用,使难以表现的事物发露无遗,而撼动人心,增强感染力量。又总结《诗》、《书》、《楚辞》、汉赋中夸饰手法的运用,认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而汉赋中有运用得当者,也有失宜者。应该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掌握分寸,有所节制,且须有事实依据,不可诬妄背理。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夸张是为了使文学所描绘或表现的事物的本质方面更加鲜

明突出,而不是故意歪曲事实,背离真理。(杨明)

【天籁】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籁”,指从孔穴中发出的声音。庄周把声音之美分为三类:“人籁”、“地籁”、“天籁”。“人籁”系用丝竹管弦等乐器奏出的声音;“地籁”是风吹自然界的各种大小孔窍所发出的声音;“天籁”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天然形成的声音。“人籁”出自人之“伪”,所以最不完美;“地籁”虽不依赖人的努力,但仍需要依靠风的大小,和孔窍的大小来产生不同的音响,因而也不能把声音之美全部表达出来。而“天籁”则最自由,完全自发,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天然生成,“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齐物论》)。庄周认为只有这种天籁是最美的,庄周提倡的“天籁”就是自然之音,这是他标举自然朴素之美,反对人“伪”艺术雕琢的美学思想的一个内容。这种美学思想对后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主张本色美、自然美的理论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钟嵘《诗品序》反对“补假”,强调“直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精神”一品提出“妙造自然”。南宋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提出“天籁自鸣”,要求诗歌创作要自然天成,反对模拟前人或过分雕琢。明、清以后的一些文论家常用“天籁”赞美民歌、民谣,清代刘毓崧《古谣谚序》以为“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总之“天籁”所体现出的自然美的思想,对后世文学史和理论批评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克强)

【地籁】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天籁”。(孙克强)

【人籁】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庄周提倡天籁,反对人籁,是他标举自然朴素之美,反对人工艺术雕琢的美学思想的形象解释。但是,文艺发展不可能排斥人工的因素。因此,在文艺观念的演进中,后人不断修正了《庄子》的观念,使“人籁”的概念获得新的理论内容,作为人的内心情感来表达。如袁枚《续诗品·斋心》:“诗如鼓琴,声声见心。心为人籁,诚中形外。”在这里,“人籁”已不再作为“天籁”的对立面而存在。参见“天籁”

(孙克强)

【幻化】 古代诗学概念。“幻化”一词,早见于《列子·周穆王》:“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后来佛经中也提“幻化”:“以诸有情,自不能知,皆如幻化。”(《大般若经·诸法平等品》)原指事物现象的空无实性。在诗文创作中,“幻化”与“逼真”皆

指艺术手法,但二者却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幻化不是幻灭空寂,空无实性,而是化实为虚,化真为幻。幻化,是幻中有真,是对真相实在从色彩上淡化、从气象上渲染。色淡以求虚空,渲染则空中涵真。所以清贺贻孙《答友人论文二》云:“龙见鸟瀾,初无定质,波诡云谲,难以形求。然以幻笔空肠,皆依实相真体。”可见“幻化”之笔是在真美基础上的提高。明谢榛论“变幻”之美:“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四溟诗话》)描写过于逼真,虽细微之处清晰可见,但缺乏神韵韵味。诗文求神韵韵味,常化清晰为含糊,化实在为虚幻,才能引发人对韵味的想象。“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古不坏,其惟虚空。”(袁枚《续诗品》)“虚空”,即相当于“幻化”。堆砌景物,不求疏密虚实,也就无情致可在空隙中流动。幻化,是对真的一种艺术审视,所以诗中写真贵求幻似。“诗贵真。诗人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陆时雍《诗镜总论》)“认真”,就是指不知将真幻化。“真中有幻,动中有静,寂处有音……诗之绝类离群者也。”(吴雷发《说诗管蒯》)《西游记》的写法也是寓实于虚,寓真于幻,用幻境写人世,所以慢亭过客的《题词》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这就是幻化的艺术效果。(张小平)

【重旨】 古代诗学概念。指文学作品不拘泥于字面的更为丰富的意旨。语见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文学作品表现审美对象之特点是以少总多,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尤重辞的旨丰言近意远,所谓“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尽心下》)。刘安就曾褒扬屈原作品:“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迕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刘勰称“隐以复意为工”即是对此的发扬。刘勰的进一步贡献明确指出了这“重旨”或“复意”当在文外而不止于文字:“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这在唐代皎然那里得到了响应:“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诗式》)其中包含的诗句之多义性及此多义性不在字面而在文外的两层意思与刘勰正相符合。由此,古典诗学传统中辞约旨丰的观念被推进到新的境界,与“境生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的主张相呼应,导向司空图由营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获致“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目的,即所谓“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诗品》)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引驰)

【涵泳】 与诗论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指水中

潜行,见左思《吴都赋》写鱼“涵泳乎其中”。后转喻为沈浸其中,如韩愈《褚衿议》:“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宋代程朱理学又借用来表示对诗文的体会玩味。《朱子语类·性理》说:“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这里的“涵泳”就具有理论批评的意义了。后来这一说法广泛运用于对诗文的鉴赏批评,它所及的对象主要是诗文中的意味,因为有“味”,才可“涵泳乎其中”,故而“涵泳”又有“涵咀”、“咀嚼”等不同的说法。欧阳修说:“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六一诗话》)“涵泳”的意义近于“品味”,文论批评中常论以“味”,指的也是“涵泳”。如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文都是语言艺术,本无“味”可言,也无从可以“涵泳”,但诗文创作不同于其他艺术,言志抒情并不直截了当,借助于汉字本身具有的多重内涵,又加以比兴、象征、夸张等艺术手法,丰富发展诗文所描绘的情境,达到意在言外,语尽而神不尽的艺术效果。读者要感受这种效果,就必须细细吟咏。“诗吟函得到自有得处,如化工生物,千花万草,不名一物一态”(《诗人玉屑》卷一〇引《漫斋语录》)。王世贞《艺苑卮言》说:“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吟而生味,这是一种审美感受,而“涵泳”是沉潜文字之中,又出乎文字之外,运用自己的想象,仔细体会,反复玩索,去捕捉这种审美感受。涵养之法,培植有方,曾国藩于此体会细微,解释详明:“涵泳二字,……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青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淳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可以说,“涵泳”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审美方法之一。(张小平)

【警策】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可见,警策虽然是片言只语,但在全篇中的位置,精采焕发,警拔夺目。通俗的说法,警策就是警句。“元宗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已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马令《南唐书·冯延巳传》)。这两句都写得情景相生,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诗之用,片言可以明百义”(《一瓢诗话》),所以,锻句炼字,诗人必极工而后已。杜甫自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然而,读者对警策的理解也因人而异。王国维《人间

词话》:“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警策之所以居要,以其真实生动地突出了诗中特定的主旨和意境,既情景交融,又警辟至深。由此,诗中“警策”也并非一篇只有一句。同时,警策之“警”,往往表现在警句中某个字上,以一字逗出警意来。“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同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东坡志林》)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警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是以“绿”字逗出警意来。这类字,古人称为“诗眼”。可见,诗中“警策”与“诗眼”的锤炼是并驾齐驱的。“诗眼”的优劣,直接影响“警策”是否精彩。但是,一味追求“警策”,而不顾及全篇的情感和立意,或者想用一二个警句来补救整首诗的平庸,这样的“警策”是没有生命基础的。“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以,对于“警策”优劣的分析,应当置在整篇之中,看它“居要”的广度和深度,而不应当孤单地拈出,随意品判。(张小平)

【化工】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指天地自然的伟大创造力,如汉贾谊《鹏鸟赋》云:“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唐李商隐《复献上杜仆射相公》云:“固是符真宰,徒劳让化工。”后人借以比喻艺术创造,表现了崇尚真实和朴素自然的美学倾向。语见李贽《杂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见《焚书》卷三)在这里,李贽以戏曲作品为例,具体论述文艺创作。他把“化工”与“画工”相比较,充分肯定了“化工”的艺术创造和美学倾向,这与其提倡艺术“童心”的理论如出一辙。“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他认为天下至文出于“童心”,那么评价文学作品就应以“真”为标准,必须出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此而崇尚朴素自然之本色的艺术风格。“化工”的艺术本旨与此天然凑泊,相映成趣。天地自然之花草树木,人见人爱,但这是出于造化的自然之力,而无关乎人为雕琢之工。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也一样,是真情实感的“童心”的自然流露,而不是“穷巧极工,不遗余力”的画匠功夫,千万不可拘于格

律而沦为“诗奴”(见其《读律肤说》)。情性不同,不可矫强而致,强调的是随性自然,不断创新,以激发艺术的生命活力。不过,李贽“化工”之说,后人强调过甚者,全面否定艺术创造工程中的“人为”努力,理论的片面性也明显可见。参见“画工”。(蒋凡)

【画工】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指古代以绘画为职业的工匠师傅,后来常以“画工”与“化工”对比,用来形容艺术平庸的文学艺术家。这里则借以批评人工的雕琢及摹拟的斧凿痕迹。语见明李贽《杂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见《焚书》卷三)在这里,李贽以戏曲作品的创作为例,说明《西厢记》《拜月亭》的艺术合于自然本色,是属于“化工”的上乘之作;而高则诚《琵琶记》,虽然精雕细琢,注意词藻修辞之工,重视结构呼应之理,但是一字一句,拘泥法度,人工斧凿痕迹太重,因而有伤自然朴素之美。李贽强调艺术的“童心”(见其《童心说》),要求文艺具有真情实感。“画工”并非从肺腑中自然流露,所以“已落二义”。这就是对于“画工”含义的具体阐述。当时不仅是李贽,如凌蒙初《谭曲杂札》也批评《琵琶记》,认为它无法与《荆》《刘》《拜》《杀》四大家并雄争长,毛病就在于《琵琶记》“刻意求工之境,亦开琢句修词之端”,违背了自然本色之旨(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可见强调“化工”,反对“画工”,是明末时代的美学思潮。其实,崇尚朴素自然之美,反对人为雕琢之工,不仅戏曲如此,诗文也是一理。这种批评“画工”的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鲍照批评谢灵运和颜延之诗,已隐含“化工”自然与“画工”雕琢之别。又如宋陆游《文章》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八三)又《读近人诗》云:“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同前卷七八)这种肯定“自然可爱”、批评“雕绩满眼”的雕琢,与李贽的“化工”、“画工”之说,相映成趣,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蒋凡)

【用事】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钟嵘《诗品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用事”就是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最早从理论上对用事进行了阐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借助

古代的事情以类比映证所要表达的论题或事物。诗歌创作中运用故事,可以达到含蓄蕴藉、深沉浑厚的艺术效果。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巧妙运用了汉代将军李广的故事,以对古代人物的景慕反衬现实中的缺憾,可谓“婉而成章”,不致锋芒毕露。诗歌中的用事,还可以烘托气氛,熔铸意境,使诗歌艺术形象更丰满感人。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即得力于词中一连用了四个故事。从典故运用的方式,用事可分“直用”和“反用”二种。直用是不改变故事的原来结构和涵义,“反用”是反故事其义而用之。《出塞》诗中李广故事,即属直用。李商隐《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召回起用放逐长沙的贾谊,对人才重视,这是故事的正面。李商隐却从这件事生发感慨:汉文帝明知贾生有治国之术而不问,却问起鬼神之事。这就是反用故事。严有翼《艺苑雌黄》说:“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诗中是否必须用事,不可一概而论。钟嵘反对用事,是针对当时任昉等作家动辄用典,“文章殆同书钞”的风气说的。王安石曾说:“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中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蔡宽夫诗话》引)诗中用事,贵在自然切当,不露痕迹,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不可有意为之。

(张小平)

【三易】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南朝沈约提出的诗文审美要求。《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事,指典故。易见事,谓虽用典故,但不生僻费解,甚至使人觉不出用典。南朝刘宋时颜延之等作诗喜堆砌典故;梁代任昉等人亦沿袭此风,动辄用事,为有识者所讥。但当时诗人多为饱学之士,所记典故甚多,作诗时不可能完全不用。沈约乃要求虽用事,但应注意不用僻典。易识字,谓勿用冷僻艰晦的字。易读诵,当有数层意思:一则应讲求用字之声、韵、调,使其有变化、不单调而又和谐悦耳。沈约为永明声律论代表人物之一,注重诗文语言的声音之美。再者应避免遣词造句之生硬拗折。刘宋及萧齐前期某些作家,为求新避熟,乃生造语词,颠倒语序。《文心雕龙·定势》云:“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即

批评此种做法。其时著名诗人鲍照、江淹的部分作品即有此种情形。“三易”之说,反映了齐梁文人诗作的语言趋于自然流畅、明朗浅易的倾向,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要求,有利于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言尚易了”,其意即与“三易”之说相通。(杨明)

【直寻】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意谓朝廷应用之文,须援据古事;诗歌则不以用典为贵,而以直寻为上。直寻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诗人应直接、敏锐地感受外物之美,将“即目”“所见”者表现于诗中;二是状物抒情均应使用自然明朗的语言,加以直接的表现,不应堆砌典故。钟嵘这一看法,与刘宋以来山水诗兴起,“自然可爱”的写景佳句为人们所欣赏的文坛风气有关,又是针对颜延之、任昉等人作诗缺乏真切审美感受而堆垛典故、卖弄学问的不良风气而发。《诗品》评鹭诗人,称谢灵运“兴多才高”,即指其于山水之美感受敏锐、兴会淋漓、表现自然;又批评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都是直寻标准的运用。后世强调才情、妙悟而反对以学问为诗者,或标举钟嵘此说。如清人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云:“天涯有客太吟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即指直寻之说而言。(杨明)

【自得】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在其理论发展中变化形成多层含义。首先,它是指对感官享受的审美超越,语见《淮南子·原道训》:“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圣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惓惓。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吾独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刘安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自得”,所论渊源于道家的宇宙论。他所谓“自得”,是不受外物引诱、超越世俗悲欢,即以“与道同出”的方式超越自我,超越外物。这又叫“以内乐外”。乐由内生,不由外得,故曰“自得”。所以,“自得”并非强调审美过程中的自我与个性,而是强调泯灭感性自我而复归于本体的大我,从人性与道的契合中获得了最高的审美感受,也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乐之乐”或曰“极乐”。其次,

“自得”引入文艺创作,指作者从自己的独特人格和独特情思出发,而获得独特的审美发现和个性化的创作。语见唐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有非师资所奖。”其言“独得”,意同“自得”,指艺术风格方面的天才独创,师心自得。又如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所称“自得”,是说超越一切形迹和法度之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审美发现。明袁宏道加以继承和发扬,又进一步强调“自我”的主体意识的张扬和艺术创作个性特征的表现。其《与张幼于》云:“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而清黄宗羲也以“自得”论诗,强调真情实感,偏于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并从中获得对审美规律的独特解悟。其《安邑马义云诗序》曰:“昔诚斋(杨万里)自序,始学江西,既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晚乃学唐人绝句,后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他称杨万里在创作中的“自得”,强调从生活中来,要求诗人自己去发现“诗材”,发现美,去进行独立的审美创造。后来贺贻孙在《与友人论文书》中,又深入了一层:“以吾之手,以吾之性,以吾之才……引而伸之,触类而通,……若夫言之所不能道,则在足下深思而自得者矣。”所论“自得”,是从创作者的独特审美悟性出发,着眼于对文艺创作规律的自觉把握。再次,“自得”又可引申指读者在欣赏作品时所获得的独特审美感受和独到的艺术见解。如宋张镃《诗学规范》云:“苏尚书符,东坡先生之孙,尝与世人论诗,……大凡文字,须是自得自到,不可随人转也。”这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强调“自得”的美学意义。这样,“自得”之义,理论上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促进了古代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健康发展。(黄保真)

【六义】 古代诗学概念。“六义”原称“六诗”,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当是先秦时代的美学观念。汉初《诗大序》加以继承和发展,改“六诗”为“六义”,成为我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大。《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按照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后来朱熹又据此发挥,称风、雅、颂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见《朱子语类》)。用今天的话来说,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方法。但近人郭绍虞《“六义”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则以为风、雅、颂、赋、比、兴原本都是古代诗体,风雅颂为入乐诗体,赋比兴是不入乐民间诗体,后来又因不入乐的民间诗体太多,不便分类,于是当时的史官或采诗官只能本于作诗表现手法来加以分体。所以后来赋比兴又逐渐衍化为三种不同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所论新颖,可备一说。不过至今一般人仍沿用朱熹的“三经三纬”之说。《诗大序》之“六义”,有关赋、比、兴的解释,可参见“赋比兴”条,此不赘述。关于风、雅、颂,《诗大序》以为风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一人”,指作诗之人。所以孔颖达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而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也就是说,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至于颂,则是祭祀时赞美祖宗的诗乐。但当作者进一步引申发挥,如谓风有风教、风化、风刺、风俗等解释;谓雅为“正”,专言王政废兴,而“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别等,特别强调各类诗体宣扬政治道德的教化功能,则不免过分牵强。“六义”说中,提出“风刺”、“变风变雅”、“主文谲谏”诸问题,从诗歌的艺术风格要求,到诗歌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后代的儒家批判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六义”说,即是一例:“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刳矣。”白氏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儒家“六义”诗论的现实意义。

(蒋凡)

【赋比兴】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故“赋比兴”可能是先秦时代的诗歌美学观念。后来《诗大序》称引文字相同,但改“六诗”为

“六义”,所以“赋比兴”又成为古代儒家“六义”说的理论核心部分。《诗大序》在总结《诗经》创作规律的时候,提出了赋、比、兴的说法,虽然序文中没有很好地展开,但如结合郑玄《周礼注》及《毛诗》的《小序》和《毛传》,就可明白其理论意义。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他又引郑众之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他们都试图通过赋、比、兴的研究,对先秦以来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出探索性的总结。关于“赋”,历来歧义较少。而关于比与兴,东汉的二郑(郑众、郑玄)从诗歌内容及其思维特征方面来加以总结。郑众主要是从比兴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去研究诗歌表现方法的艺术特点,并注意到比、兴二者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区别。这是对于诗歌的艺术规律进行理论总结的初步尝试。它表明了诗歌创作是通过具体物象(即人、事、物)来表现生活,抒发情志的。因此,比兴艺术要求诗人必须熟悉生活,观察细微,意义要含蓄,语言要精炼,启人思维,余味无穷。然而具体的艺术表现方法,又总是和一定的写作动机和艺术效果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是和一定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所以郑玄在说明赋、比、兴的艺术特点的同时,就由表及里,引申发挥,从诗歌与政教、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开拓了赋、比、兴的界说,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因此,郑玄的解释,实际上是对郑众说法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当然,郑玄主要从诗歌文学与封建政教关系方面来论述赋、比、兴的艺术,难免失之片面。如释比只言刺失,释兴专言颂美,不合具体的艺术发展事实。郑玄等汉儒以经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并不完全理解诗歌的艺术特征,处处牵合意义,时时强作解语,所以遭到后人的讥议和批评。魏晋以后,则多从艺术特征来作发挥。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论“赋者,铺也”,与古说无别,但论比、兴,则有《比兴》篇,以为“比显而兴隐”,云:“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而钟嵘《诗品序》则称“赋比兴”为诗之“三义”,云:“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困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对于诗歌创作的不同艺术手法及其艺术效果,作了简约的概括。对后世诗歌创作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参见“六义”

(蒋凡)

【思无邪】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诗经·鲁颂·

驹》：“驹驹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驹者，有驷有骍，有驷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据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这诗中的“思”字，原是句首语气词，无实义。而所谓“无邪”，原来也只是描写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在春秋时代，因为政治和“外交”场合的需要，经常赋诗言志，随机应变，所以有“断章取义”的现象。孔子也采用当时流行的“断章取义”办法，改变了“思无邪”的原意，借用来评价整部《诗》三百篇（即今本《诗经》），并把它与政治教化、“仁”“礼”伦理等方面联系了起来，见于《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称“无邪”，据刘宝楠《论语集解》引包咸之说，谓“归于正”。意思大致不错。有“邪”必有“正”，“正”与“邪”是一对矛盾。孔子称“无邪”，也就是“雅正”之意。不过孔子的“思无邪”一语，实为概括了《诗》三百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点，并非后儒所称专指思想教化。“无邪”之正，指的就是诗歌的思想情感、语言乐调等的中和之美，其界限还是比较宽广的。三百篇中有对统治者的讽刺，有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有男欢女爱的艳歌情咏，有生活理想的崇高追求，题材多种多样，情感丰富复杂，欢乐、愉悦、哀怨、悲愤，其艺术表现或深沉含蓄，或奔放执着，都被孔子一概列入“无邪”的范围，对于后代诗歌创作及诗论的健康发展，曾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比较而言，汉宋诸儒的理论发挥，表现为思想保守，理解褊狭。如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情性之正而已。”又引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几乎完全抛开诗歌艺术的中和之美，纯从思想方面的正心诚意、伦理教化入手。他们有的以“香草美人”之辞穿凿附会为“忠君爱国”、“思贤若渴”之意，有的则直斥爱情作品为“淫奔之诗”，甚至有趋之极端者，主张“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宋王柏《诗疑》卷一），要把爱情诗赶出艺术王国，这显然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来意旨，导致了后儒理论危机。后来清袁枚即痛加抨击，其《答戴园论诗书》曰：“且夫诗者由情而生者也，……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圣人复生，必不取已安之心而掉臂之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三〇）为“思无邪”说输入了新内容、新血液。（蒋凡）

【郑声淫】古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语出于《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淫”，据杨伯峻《论语译注》释“乐而不淫”云：“古人凡过分以至于到失当地步叫淫，如

‘淫祀’、‘淫雨’。”“郑声淫”，就是抨击郑声太滥太甚。所以孔子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对“郑声”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什么是“郑声”？古代说法很多。汉许慎曰：“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郑声淫’也。”（《初学记》卷十五《杂乐》第二于“叙事”下引《五经通义》）他以为古代郑国地区男女生活比较放浪，因多情歌，故称之为“淫”。朱熹《诗集传》则直接以为“郑声”指今本《诗经》中的《郑风》诸诗，因其中多言男欢女爱，故直斥之为“淫”而“放之”。但是稍加考察，显然不合事实，因为孔子以为《诗》三百篇，包括《郑风》诸篇在内，一概列入“无邪”雅正之列，怎么会自相矛盾，斥之为“乱雅”之篇呢？又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夫子言‘郑声淫’耳，曷尝言‘郑诗淫’乎？声者，音乐也，非诗词也。……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陈说从音乐入手来解释“郑声”，说法比较新鲜，有某些合理因素，但他又把歌词与音乐机械割裂开来，不合孔子常常诗乐并称的习惯，“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于《郑风》不可能只取其诗而排斥其乐。而王夫之《四书稗疏》则以为“郑声”之“郑”，是郑重、重复之意，他说：“郑，郑也，其非以郑国言之明矣。”不过王说不顾古代郑卫之音并提的情况，强作解语，显然也不合当时的艺术实际。事实上，“郑声”是指其时一种新兴的民间歌词曲调，犹如现代的流行音乐之类，情思比较放浪，节奏比较浮靡，听者为之沉湎，它不符合孔子“乐而不淫”的中和美学原则，所以才斥之为“淫”。《礼记·乐记》载魏文侯“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吕氏春秋·孟春纪》也说：“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可以想见其格调。然而孔子对于郑声这类新兴的流行艺术，不加具体分析而一概斥之为“淫”，认为不合雅正标准就坚决排斥，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观点和态度不能说是适当的。在此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些正统文人，往往依据这一口号来反对民间声乐歌诗，反对爱情作品，甚至反对新兴词曲、戏剧和小说等，其消极影响甚大。（蒋凡）

【郑卫之音】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语见《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关于“郑卫之音”，汉许慎《五经异义》解释为郑诗卫诗，也就是指今天《诗经》中的《郑风》、《卫风》。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与事实不符，东汉郑玄就不赞成。戴震《书郑风后》云：“许叔重《五经异义》以郑诗解《论语》‘郑声淫’，

而康成(郑玄)驳之,曰:“《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言烦手躑躅之声使淫过矣”其注《乐记》桑间、濮上之音,引纣作靡靡之乐为证,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间、濮上,其音由来已久。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其诗也。如靡靡之乐,滌滥之音,其始作也,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然则郑卫之音,非《郑》《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左氏《春秋》郑六卿伐韩宣子于郊,所赋诗固后儒所目为‘淫奔之词’者,岂亦播其国乱无政乎?”(见《戴震集》上编文集卷一)郑玄、戴震之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但把诗乐绝然分离,又与古代的艺术实践有距离。实际是,《乐记》所称“郑卫之音”,是一种与“古乐”相对立的“新乐”。所谓“古乐”,即孟子所云“先王之乐”,属宫廷庙堂典礼中演奏的“雅乐”,听时还要“端冕”,衣冠整齐,态度严肃,礼节周全,可见礼制规定极为严格。这类“雅乐”,沿袭已久,单调乏味,所以听者昏昏欲睡。而“新乐”——郑卫之音,即孟子所云“世俗之乐”(见《孟子·梁惠王下》),指的是在当时郑国和卫国一带流行的民间新兴的歌词曲调,因其情思放浪,节奏跳荡,激动人心,所以连统治者也是“听不知倦”。这样,“新乐”郑卫之音与“古乐”庙堂艺术,形成了矛盾与反差,引起了后世的争论。《乐记》本于儒家“郑声淫”、“放郑声”之论,抨击郑卫之音为“乱世之音”。正统文人多沿袭此说,其影响扩展到诗文领域。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可见后世儒者已把不合雅正标准而受民间流俗影响的诗文,亦称之为郑卫之音而加以批评。但郑卫之音的影响,却仍然继续发展。事实证明,古代儒家反对郑卫之音,维护礼教,以温柔敦厚的雅正标准去贬斥新兴的民间诗乐及流行艺术,是错误的,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蒋凡)

【乐而不淫】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于《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古代周《诗》的开篇就是《周南·关雎》。孔子以举例的方式来加以批评,也代表了他对全部《诗》三百篇的一种美学评价。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就曾以“忧而不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不荒”等来赞美《诗》中的《邶》、《鄘》、《卫》、《邠》和《颂》。如果《左传》的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季札的时代尚略早于孔子,而孔子所论,与之同调,可见代表了春秋末年的一种社会美学思潮。孔子认为,《关雎》的美学特色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与乐,代表了人基本感情的两大方面。孔子本来意思,是在肯定人有生活欲望这一基本原则来

论诗的。他崇尚诗歌抒发真情实感,但认为情感应该有所节制,勿使放荡无度,以致引起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损害。这无论是从美学角度或心理生理学角度看,都具有合理的因素。《关雎》诗篇之中,有思慕淑女的缠绵哀感,有钟鼓迎婚的愉快欢乐,表现得都恰如其分,真挚而和谐。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朱熹《论语集注》云:“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杨伯峻《论语译注》云:“古人凡过分以至于到失当地步叫淫,如‘淫祀’(不应该祭而去祭祀的祭祀)、“淫雨”(过久的雨水)。”因此,孔子的“不淫”、“不伤”,也就相当于中正、和谐、无邪的意思,表现了他对诗歌“中和”美学原则的重视,是其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不过,《诗》三百篇中有对统治者的讽刺,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男女爱情的歌咏,生活理想的追求,题材多种多样,情感丰富复杂,既有欢乐的颂歌,也有哀怨的刺过,表现或深沉含蓄,或奔放执著,却都为孔子一概纳入了“不淫”“不伤”的范围,并不像后世汉、宋诸儒的理解那样褊狭。后世儒家对于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封建道统的加强,日益趋于保守。因此,汉儒片面发挥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形成了“主文谲谏”的“温柔敦厚”诗教说(见《毛诗序》和《礼记·经解》篇)。后儒之说,似乎源自孔子,但与先秦儒家相比,其理论的变化及保守性已日趋严重。(蒋凡)

【哀而不伤】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与乐是人的基本感情两大方面。“乐而不淫”,系欢愉颂美之作;“哀而不伤”,多哀怨讽刺之诗。“哀而不伤”,从心理和生理上看,有一定的根据,哀怨过度,有伤身体。因此,诗歌允许抒写哀怨之情,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尺度把握,过份了就会“伤”己害人。因此,只有程度适中而感情和谐的诗篇,才是“哀而不伤”的艺术典范,这就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中和”美学原则。详参“乐而不淫”。(蒋凡)

【怨而不怒】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宋代朱熹《论语集注》,他在孔子“诗……可以怨”(见《论语·阳货》)句下注:“怨而不怒。”怨,原指诗歌可以抒写不满,泄导人情,以求得内在的心理平衡。何晏《论语集解》把“怨”诗的基本内容概括为“怨刺上政”,还是比较符合孔子原意及《诗》三百篇的实际的,这是从积极方面肯定诗歌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而朱注“怨而不怒”,则是限制怨情的程度,从消极的方面来对诗歌加以思想规范,用以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朱子之注,并不完全符合孔子的本意。孔子认为诗

“可以怨”，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人们可以对统治者表示其怨愤和不满，在当时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论语·尧曰》：“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如果从反面理解，孔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安排劳役不合理，人民就有充分理由来发出怨恨之声，并通过诗歌来发泄。据传孔子删《诗》，但是《诗》三百篇中，类似《伐檀》《硕鼠》等许多愤怒抨击时弊的讽刺诗得以登录保存，大概与其“诗可以怨”的美学理论有关。而且，诗可以怨者，也不限于政治上的，诸凡家庭、朋友、男女之间，情感有所郁结，都可以借诗抒写发泄。可见孔子所允许的“怨”，范围是较宽泛的，并不像朱熹所理解的那样单一狭隘。朱熹要求诗歌塑造的是“怨而不怒”、温柔顺和的文学形象，而不是激励人们斗志的反抗性格。因此，从艺术风格看，它要求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而排斥金刚怒目式的强烈批判现实的豪放之作，压抑炽热的情感倾泻，又会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清沈德潜的“格调”说，正可见朱子“怨而不怒”说的痕迹。（蒋凡）

【怨而不乱】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汉初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叙》，书已佚，见班固《离骚序》称引：“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文字更为详尽。不过司马迁并没有指明引自刘安《离骚传》，其中就可能杂有自己的发挥与感慨。因此“怨悱而不乱”，可说是刘安和司马迁对于屈原《离骚》及其整个创作倾向的崇高美学评价。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采取了与周《诗》中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不同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形成了我国古典文学的另一源头，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牵涉到继承什么传统，肯定何种倾向，赞扬怎样的艺术诸问题。司马迁继承了刘安的基本观点，充分展开了论述，肯定了屈原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又进一步“知人论世”，介绍了屈原的身世及其创作冲动：“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结合具体的艺术分析，把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功归结为“怨”，因“怨”而发愤创作。这不是一般儒者那“怨而不怒”之“怨”，也不是“愁神苦思”的纯属个人之“怨”，而是由于“正

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出的灵魂的惨怛呼号。《离骚》的艺术表现不同于周《诗》，上天入地，香草美人，显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光彩。但论其精神实质，却又与周《诗》中的《国风》与《小雅》相通，一样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离骚》末段云：“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的“怨悱”，更加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这就是刘安和司马迁所说的“怨悱而不乱”——诗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形象表现。对于后世的诗歌创作和文论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蒋凡）

【香草美人】 古代诗学概念。又称“美人香草”。语出东汉王逸《离骚经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在这里，他对屈原《离骚》的创作艺术加以形象的概括，并把它与周《诗》相比较，认为其“香草”“美人”等艺术手法，论其渊源，继承了周《诗》，与《诗》之讽谏比兴精神相通，所以说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但不同的是，屈原的“香草美人”，已经不仅是一种艺术修辞手段，而且铺叙故事，渲染人物，以其绚丽的神话，来编织其艺术神殿，以抒发其强烈的感情，表现了忠君爱国的激情，所以又是其积极浪漫主义创作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传唐贾岛《二南密旨·论风骚之所由》曰：“骚者，愁也。始乎屈原，为君昏暗时，宠乎谗佞之臣。含忠抱素，进行逆耳之谏，君暗不纳，放之湘南，遂为《离骚经》。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变风而入其《骚》刺之旨，正其风而归于化也。”（据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因此，后人把楚辞之类的作品，称为“香草美人”之辞。作为一种创作艺术手法而普遍运用，自屈原始，并不断发展，逐渐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后世诗歌创作，多蒙受其沾溉。“香草美人”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巨。讽谏之旨，寄托之辞，沿流溯源，可见屈原《离骚》的痕迹。如清代常州词派，就多取“香草美人”、“浮云飘风”以言“寄托”，以寻觅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于是逐渐从创作艺术原则，延伸到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的领域。虽有时难免牵强附会之讥，但从总的理论倾向看，“寄托”说开拓和深化了诗歌的艺术境界。（蒋凡）

【虚与实】 古代诗学概念。它是在唐以后随着意象、意境等理论的发展而形成并日趋成熟的。唐诗僧皎然《诗议》：“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

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见《诗学指南》卷三)又宋李涂《文章精义》云:“庄子文章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在中国古文论中,虚与实各具相对的独立内涵,又兼该历代艺术实践中创造的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丰富内容。同时,它还和有与无、心与物、形与神、情与景、空灵与质实等审美概念,存在着横向互渗的复杂关系。综合言之,虚与实的理论义蕴主要可分为文艺本原、艺术思维、符号载体三个层面。在中国古代,文艺本原论的最终依据是哲学本体论,在这个层面上,虚与实可以和有与无意思相通。“无”是指超越人的言、意、感觉之外的宇宙本体,或称为“道”,它是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搏之不得,无声无臭,无形无状的,永恒存在于一切之中。《老》《庄》中的“虚”、“无”即是。“有”则是指能够被人以言、意、感官所把握的形形色色的实理、实象。宋张载《正蒙·乾称篇下》云:“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不能为一,非尽性也。”清王夫之注云:“惟性则无无不有,无虚不实,有而不拘,实而不滞。”从本体论上探索了虚与实有辩证统一关系。这是艺术中“虚”与“实”的理论得以产生和开展的哲学根据。而前引皎然和李涂论“虚实”,则是进一步在艺术思维层面上展开论述。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内容和材料之所谓“实”,是指生活中真实发生或出现的人和事物。“虚”则指作家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清李渔云:“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闲情偶记·词曲部·审虚实》)文学家创作之时,应该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有无相生,虚实互用,艺术形象或意境才能具有典型化的意义,而无固定刻板艺术模式。明屠隆《与友人论诗文》云:“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杜若《秋兴》诸篇,托意深远;《画马行》诸作,神情横逸;直将播弄三才,鼓铸群品,安在其万景皆实?而李如《古风》数十首,感时托物慷慨沉著,安在其万景皆虚?”人称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写“实”圣手,但杜诗精神是“实”中有“虚”;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是设虚高人,但李诗微妙又在“虚”中涵“实”,经典作家作品,无不虚实辩证统一。“虚”有时又可指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兴趣韵味;“实”则可指作品中描摹的景物。王夫之论情景,即与虚实相通(见《薑斋诗话》)。而在符号载体的层面上,虚与实主要又指各种不同的艺术技法。如虚写与实写,“实”指正面直接的铺陈描写,“虚”为间接侧面的渲染照应。而在语言艺术方面,“实”指实词,“虚”指虚词的运用。明谢榛《四溟诗

话》卷一:“律诗重在对偶,妙在虚实。……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虚字多则意繁而句弱。”他以为遣词用字,“惟虚字极难”。上述“虚”与“实”多层涵义,当自细辨。
(黄保真)

【动与静】 古代诗学概念。由一对矛盾对立而又辩证统一的审美概念组成,在古代诗论中运用极其广泛。语见先秦《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宋朱熹《诗集传序》加以发展,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合言之,“动”与“静”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可分为三大层次:其一为两种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其二为两种对立统一的主体论;其三为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艺术审美规律。前二层次属哲学范畴。而《荀子·乐论》及朱熹之言,则属审美层次,是前面两个哲学范畴中动静论的自然应用与艺术延伸。而在文艺美学领域内,关于动与静的理论,又主要分为两大层次:一是艺术思维、审美活动方面的心静思动论;一是艺术辩证法方面的动与静对立统一说。艺术思维中的心静思动论,显然受道家哲学影响较大。晋陆机《文赋》开头就说“伫中区以玄览”,“玄览”就是道家哲学中的“致虚守静”、直契本体的思维方式。不过陆机论艺术思维,既讲“收视反听”的虚静,同时又强调“耽思旁讯”的意动,从根本上主张心静与思动的辩证统一。至于他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则纯为动态的思维流程了。刘勰亦然,《文心雕龙·神思》篇既讲“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同时又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一静一动,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明袁宏道《爽籁亭记》更把审美活动中心静思动的艺术境界写得栩栩如生:“及暝而息焉,收吾视,反吾听,万缘俱却,嗒焉丧偶,而后泉之变态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鸱弦铁拔;已如疾雷雷霆,摇荡山岳。故予神愈静,则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萧然冷然,浣濯肺腑,疏浚尘垢,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吾神愈静也。”总之,心静思动,以静主动,静而后动,动后愈静,动静相生,辩证统一,这就是艺术思维、审美把握的一个基本规律。在艺术辩证法方面的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其审美形态更是多种多样。如有与无,实与虚,势与态,张与弛,促与缓,放与收,起与伏等等,均属一动一静,相反相成。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

文外独绝,物无异议。……《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这大概是最早讲以动境显静境的例子。又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一》云:“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南朝宋王籍诗。原对‘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批评家通过分析诗歌作品中的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及其所创意境的优劣,来衡量其艺术价值高低。至今,无论是诗人创作,或文论家建构艺术理论,动与静的辩证统一,仍然是一对影响很大的艺术范畴。

(黄保真)

【清与浊】 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三国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水的清浊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清浊来比喻善恶美丑,“举世皆浊我独清”(《楚辞·渔父》)即指人的品行优劣而言。曹丕则加以引申,在文艺审美领域率先运用清、浊概念。他认为作品风格的形成,主要决定于作家的气质才性,而作家的气质才性又有清浊之分,清浊即高下。曹丕论文受到当时从汉代以来以清浊品藻人物的影响,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评论士人“高清明而下重浊”,以清为上,以浊为下。《世说新语》记载汉末品藻人物常用清浊,“清”指名士的风流潇洒的气质风度,如“清真”、“清通”、“清畅”等等,突出了汉魏名士超凡脱俗,不以尘世为念,精神上追求闲远境界的特点。“清”的这种内涵对后世诗歌艺术审美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杜甫评论南北朝时诗人庾信的诗为“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李白评谢朓的诗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清”指的是清新流畅,如明人杨慎所说:“杜工部称庾开府曰清新,清者,流利而不浊滞。”(《升庵诗话》)唐宋以后,“清”与“浊”的概念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中,逐渐成为诗歌审美的重要范畴。司空图《诗品》有“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司空图用“娟松”、“漪流”、“晴雪”、“玉人”、“曙月”、“秋气”等意象来形容“清奇”的诗风,主要突出了淡而不浓,疏而不密,流而不滞的特点。宋人张炎标举“清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词源》)张炎强调词要轻灵飞动,“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这一点与司空图之“清奇”有相通之处。“清”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内涵十分丰富,从审

美情趣上看,它有超凡脱俗的特点。明人胡应麟说:“清者,超凡绝俗之谓。”(《诗薮》)从作品的意境、风格、语言上看,有轻盈、流利、潇洒的特色。胡应麟说:“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诗薮》)“清”受到诗学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清人王士禛曾把司空图的《清奇》称为“品之最上者”(《带经堂诗话》),而“清”的反面就为“浊”。“浊”是凝涩晦昧、板滞而不流畅的意思,在艺术上就是“俗”,是品之下者。

(孙克强)

【离与合】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王世贞对诗文之法的认识。语出其《艺苑卮言》:“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王世贞为明“后七子”的领袖,前、后七子都倡导师古,好谈诗文之法。因为既以古人的作品为榜样,就必示人以学习的途径,具体言之即为法。李(梦阳)何(景明)之争虽然包含有个人意气的因素,但争论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法的认识与态度不同。李梦阳主张“尺寸古法”。何景明则持“达岸舍筏”之说。李何之后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毛举论难之语,以好为胜”(《何大复集序》)。王世贞对此的态度是既重法又不泥法,“合而离,离而合”。他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古人好的作品“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所谓“信手拈来,皆成妙品”。如此论古人之法,既承认古人诗文有法之存在,又持灵活的态度,肯定其“法极无迹”,因此在向古人作品学习时自然不必拘泥。在步趋古法时,要思有以“自运”;在“一师心匠”时,要期不背离古法,这即是他所谓的“合而离,离而合”。王世贞这一观点显然是对李梦阳“尺寸古法”之论的纠正,因此对李、何之争,他比较左袒何景明,云:“信阳(何景明)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李梦阳)之效颦,宁无私议?”(《艺苑卮言》)

(刘明今)

【文从字顺】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主要讨论文学语言的运用问题。语出唐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就文学语言的运用艺术而论,韩愈的“陈言务去”、“词必已出”,又与“文从字顺各识职”相辅相成。诗文创作要扫除陈辞滥调,要有“词必已出”的创造,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创造的同时,有时又会因为追求新鲜奇怪而入于险怪晦涩一路。而险怪晦涩,人所难以理解,于是又形成了新的陋习。樊宗师(绍述)的《绛守居园池记》,以及当时卢仝的诗歌,即是例证。为了纠正这种创造中产生

的不良文风,韩愈就公开提倡“文从字顺各识职”,认为流利畅达,合乎语法,使人易懂易晓,是语言创造艺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运用语言规律,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诗歌语言艺术,由于修辞需要,变化繁复,更为复杂。加以汉字汉语因形体及方言方音影响而书写困难,“言”与“文”之间,颇有距离。六朝文人,又利用汉语单音独立的特点,把汉语中的节奏、音韵等加以绝对化,给语言运用和文章表达,加上许多人为的限制,从而形成骈俪文风。骈俪可增加语言的音乐美,这没有什么不对;但非骈不行,过分绝对,几乎取消单句散行的自然语言,则又物极必反,趋于极端,导致“言”与“文”的距离与隔阂,文学与口语背道而驰,则言难达意。因此,韩愈的“文从字顺各识职”,要求语言流畅妥贴,合乎语法规范,不违背一般语言习惯,既有针对性,也有创造性,因为“文从字顺”往往由精炼而生。如韩愈评贾岛诗歌是“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评孟郊诗歌是“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奭”(《荐士》),语言的新奇,是服从诗情的需要,为塑造诗人的鲜明个性服务的;同时,语言之新奇,又与“妥贴”、“平淡”相统一,明白晓畅,并非故作艰深。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既有“奇辞奥旨”的一面,但必须符合文从字顺的规律,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云:“(韩诗)精神驱五岳,奇崛战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奭’也。”在文学语言与口语的统一方面,韩愈又前进了一步。这对后世的诗歌语言艺术的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蒋凡)

【宁今宁俗】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袁宏道《与冯琢庵师》书云:“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袁宏道曾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宁今宁俗”正是这一主张在审美观上的体现。独抒一己之性灵,“境有偶触,心能摄之”(见江盈科《敝篋集叙》),不再去揣摩古人诗文之意,此为“宁今”;而丢开古人诗文现成的格套,“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同上),此为宁俗。袁宏道称赏“今”与“俗”,其审美旨趣便与当时盛行的复古派大不相同。其《与江进之书》论古今之异云:“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因为“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因此袁宏道不但直接地肯定了当时的民歌如《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坚持向民歌学习。在与其兄伯修书中写道:“近来诗学大进,诗思大饶,

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袁宏道者也,“宁今宁俗”的主张实是其性灵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如果一个批评家虽提倡“独抒性灵”,却不赞成“宁今宁俗”的审美标准,则他所谓的“性灵”只是传统诗论中的“性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宁今宁俗”乃是袁宏道诗论的核心所在。此后竟陵派提出“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的诗学观点,正是在这根本的审美观上对袁宏道作了修正。因此竟陵派虽也提倡“真有性灵之言”(钟惺《诗归序》),“一情独往,万象俱开”(谭元春《汪子戊巳诗序》),但其基本精神与早期公安派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公安派创作之弊亦正在“宁今宁俗”的提法上暴露了出来,以至袁宏道晚年也不自禁地产生追悔情绪,认为自己少年时的诗作“太披露,少蕴藉”。(刘明今)

【手写我口】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近代诗人黄遵宪的诗歌革新主张。语见其《杂感》诗:“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它的基本内容是:承认古今语言变化和差异,反对崇古卑今,食古不化,主张创造、求新,提倡以通俗易懂的口语入诗,以促进诗歌的口语化,打破诗歌语言的时代隔阂,改变诗人写诗严重脱离口语的倾向。黄遵宪后来对上述主张又不断作了新的发挥和论证。在《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他据欧洲国家语言变迁从而促使文学兴盛,和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新的文体不断产生且日趋明白畅晓的事实,鼓吹语言与文字趋于合流,期望文体(包括诗)变得更加通俗以适合时代需要。他还以《诗经》为例,“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山歌题记》)。手写我口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以语言为突破口,要求诗歌采用当代口语,叙录新事物,使诗歌走向新变,反映了传统诗体在迎接时代挑战中脱去旧壳,换上新装自我更新的努力。在文学批评史上,王充、刘知幾、唐宋派、公安派等要求“文字与言同趋”(王充《论衡·自纪篇》),“开口见喉咙”(唐顺之《与洪方洲书》),反对“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幾《史通·言语篇》),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的文学主张,是对这一进步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赋予它以显明的近代色彩。当然,手写吾口不应该是取消语言的锤炼功夫,降低艺术标准,也不应该是新瓶装陈酒。“诗界革命”的实践者们难免有诸如此类缺点,说明手写吾口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二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而这一任务则有待于现

代新诗运动来完成。

(邹国平)

【三不朽】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和“立言”三项不朽的事业。语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穆叔之论：“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范宣子之问，提出了为什么“有言”就可以“不朽”的问题，其所问主要对象是“言”。而穆叔的回答，也主要是就“立言”而论，实际上“立德”、“立功”，反而是作为衬托。这里的“言”，主要是指表现于言辞的德教、政治而言，但是先秦时代往往言、文不分，所以也包括了著书立说及赋诗作诵，也就是说，修辞之言、文学之篇，也在其中。穆叔虽然把“立言”的地位列于“立德”、“立功”之后，但是毕竟开始把“立言”与“立德”、“立功”区别开来，肯定了包括诗歌在内的“言”的独立地位和垂诸不朽的重大社会价值。这种认识，常被后世文学批评用来作为讨论诗歌的文学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根据。后世重要的文论家，如司马迁《史记》，王充《论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刘勰《文心雕龙》，王勃《平台秘略论·艺文》等，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强调文学具有强大的社会作用和经久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蒋凡)

【修辞立其诚】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主要讨论的是言辞与道德关系。语出《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解释说：“修其教令，立其诚信，民敬而从之。”后人或将“修辞立其诚”句引申为修辞以诚为本。朱熹《周易本义》又云：“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又进一步把修辞与言事之真实相联系，言事真实而不欺妄，则又是内在道德诚信的自然表现。又《周易·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表明了《周易》非常重视修饰言辞的巨大作用及其社会影响。《周易》中的《文言》或《系辞》，作者是否孔子姑置勿论。但这几段话，托言孔子，有其根据，因为与《论语》所载孔子的一贯思想相一致。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德行与功业，与其“修辞”有关，首先是要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内心充实，焕发出外在的言辞光彩，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但反过

来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之言），言辞之文，虽为达意，但辞之“达”又必不可少。言行为“君子之枢机”，指出修饰言辞，可以鼓动天地万物。这种以严肃功利态度对待语言运用的强调，又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于言辞的重视，所以《周易·系辞下》又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古人对于言辞的刻意修饰，出于心中诚正；但内心道德之诚心，又有待外在言辞之文饰与表现。孔子对于“修辞立其诚”的论述，体现了某种审美选择，这也就暗中开启了后代对文学语言的语法结构、艺术修辞等诸多功能进行具体分析的思维道路。如孟子的“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王逸的“引类譬喻，……其词温而雅，其文皎而朗”（《离骚经序》），均可见其影响。更重要的是，后人又从道德与言辞关系进一步引申发挥，涉及到作家人品与风格、文学的文与质等关系，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凡)

【工夫在诗外】 古代诗学概念。主要讨论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语出陆游《示子遹》诗：“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郤。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所谓“诗外”工夫，与“诗内”工夫相对立而言。陆游年青时学诗，曾拜江西诗派的曾幾为师，颇受江西诗派影响，所以自称“我得茶山（曾幾）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见其《赠应秀才》）。“诗内”工夫云云，指的是“文章切忌参死句”的诗律句法方面的问题，如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或“无一字无来处”等用事诸法。但是，后来陆游的观点不断发展变化，他投身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风雨中，火热的生活斗争，激发了诗人爱国激情。在长期的深入现实生活的创作实践中，他终于认识到江西诗派的错误在于脱离现实生活而奢谈“诗法”。针对这种不良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陆游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严肃的批判，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口号，具体的理论内容，可参阅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对于诗人来说，无论是工“藻绘”，还是图“怪奇”，都仅仅是“诗内”工夫，并没有接触“诗家三昧”——即诗歌

创作的关键所在。但是,当诗人投身于炽热戎马生涯,现实生活激发了诗的灵魂,创作热情风起云涌,源源而至,不可阻遏,于是“诗家三昧忽见前”,认识到诗的灵魂存在于生活之中,而不是“诗内”的格律声色等工夫。陆游鼓励诗人,在火热生活中不断积累素材,酝酿创作灵感,不断进行艺术修炼,以饱满的激情,驱驾这“诗外”工夫,于是创作之时,自会左右逢源,妙笔生花,所谓天机云锦,随我剪裁,而皆成珍品佳作。不过,陆游虽然强调现实生活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但是也不一概否定“诗内”工夫一类的诗法。如其《题庐陵萧颜毓秀才诗卷后》诗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要写诗自然有其内在的“法”,但是诗法不能离开诗境诗情而单独存在,脱离了现实生活,专求“诗内”之“法”,犹如痴人说梦,把诗歌创作引入邪路。总之,陆游的“工夫在诗外”,对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个积极的促进与发展。

(蒋凡)

【诗品无异人品】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诗即人格的体现,学古人诗当首先求其性情神气。语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骼),有情性神气,诗之好丑高下亦然。”杨维桢认为《三百篇》、汉魏以至李杜诗,“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庫,面目不鄙,而齐、梁、晚唐、季宋之诗,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庫,其情性神气可知已”。杨维桢论诗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倡导师古,然又不满意于当时某些人专效古之文辞体格,于是提出“诗品无异人品”的观点,强调汉魏盛唐诗体格高乃其人格高之故,因此学古人诗首先当学古之情性神气,“古者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诚也尚已,故其出言如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偃,而去古愈远”。其门人吴复就此加以解释道:“君子(指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老杜以五言为律体、七言为古风,而论者谓有《三百篇》之余旨,盖以性情而得之也。”(《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以诗品与人品相比拟的观点由来已久,《吕氏春秋·音初》云:“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扬子法言·问神》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白居易《读张籍乐府》云:“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这些观点显然对杨维桢“诗品无异人品”之说有影响。但是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并非不重视体格,既然“诗品无异人品”,诗格高是人格高的体现,那么诗品、诗格还是非常重要的,学古人诗便不可不学其高古之体格。故他于《赵氏诗录序》又写道:“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

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可见杨维桢是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论者,既求人品、人格之高,又求诗品、诗格之高,颇有辩证艺术因素,而与理学家重道轻文,认为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有别。(刘明今)

【文人相轻】 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云:‘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认为,文学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批评与指导,进一步又要求文学理论批评家,树立公正客观的态度,正确地分析与评价作家作品。曹魏时期,是“文学自觉”开始萌芽的时代,“文人相轻”,一方面反映了文人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因其错误的批评与态度,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曹丕针对当时文坛“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分析其产生的认识根源和历史原因,加以严肃的批评: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善于自见”而无视他人的成绩,因而常以己之长,而轻人之短;而对于自己创作的缺陷,却又囿于自见,讳莫如深,即使是自家的一把普通扫帚,也自以为值千金之价,文过饰非,高自标榜,故难以改正错误,以求更大的进步。而不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怎能迎来作家辈出、群星璀璨的自觉时代和文学创作的丰收呢?另一方面是创作技巧和各种文体艺术特点的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读者千千万万,各有自己的嗜好要求,有的喜欢诗歌,有的偏爱散文,有的热衷辞赋,这是很正常的。但作为文人,他的艺术创作很少有可能兼擅众体,有的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但在散文辞赋方面则表现一般;有的作家,辞赋堪称大家,诗歌却平平如也。文人或批评家如果以己所长而轻人之短,以为文坛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缺陷,又怎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呢?据此,曹丕提出克服的办法:“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他写《典论·论文》,基本上就持这一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对于建安七子文学优劣的比较研究,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于是“仰齐足而并驰”,迎来了时代的文学高潮。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文人相轻”之说,颇有影响,如清尤侗《牧庵集序》:“盖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文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未可执此而弃彼,举一而废百也。……若既有一代之人,则自有一代之文。假令班、扬、潘、陆、颜、谢、徐、庾诸子聚一堂之上,分毫比墨,有如宫商相宣,丝竹迭奏,唱予和汝,相视而笑者,虽有韩、欧在座,必

不齟齬而诋讥也。”(见《西堂杂俎二集》卷三)。

(蒋凡)

【美刺】 古代诗学概念。“美刺”之说,成为系统理论概念,是汉儒之事。但追溯源流,则早在先秦时代,已见影迹。《诗经·魏风·葛屨》:“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运用诗歌武器,对于社会不平现象作出讽刺和批判。《诗经·大雅·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穆,和美。意谓尹吉甫作诗歌颂,其和美犹如化养万物的春风,让人受到感染。《诗》三百篇,诗人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美刺并用,爱憎分明。但当时重在具体运用,而没有及时对“美刺”作出理论总结。直到汉初,《毛诗序》(包括大、小序)才提到理论上概括。如《诗大序》在解说“六义”时提出了“美刺”概念:“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是“刺”。在《毛诗》小序中,更是具体运用“美刺”理论来具体分析诗歌作品,被后儒视为典范。其实,汉时何止是儒家古文学派的《毛诗》,即儒家今文学派的三家诗,也曾广泛运用“美刺”理论来分析《诗经》作品。如《关雎》之诗,薛君《韩诗章句》曰:“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张揖《齐诗》以为《伐檀》是“刺贪”(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这是“刺”。《汉书·董仲舒传》载其对策:“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后世称诵,至今不绝。”董仲舒习《齐诗》,一样称“美”。后来汉末大儒郑玄学兼今古文,他在《诗谱序》中明确提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认为诗歌“美刺”,反映了诗人对于所反映事物的立场、态度和评价,或是歌颂美好事物,作为榜样,加以敬仰和学习;或是讥刺丑恶的事物,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号召人们反对它、抛弃它。当然,汉儒之“刺”,是有局限的,《毛诗序》所谓“主文而谏”,郑玄释为“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释为“不直言君之过失”,要求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这又会削弱“美刺”理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但总的说来,“美刺”理论对后代古典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如杜甫、白居易等,无不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就像史家褒贬历史一样,针对现实斗争,积极干预生活。直到今天,文学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蒋凡)

【讽谕】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主要是概括了以文艺为手段,力图委婉曲折地干预政教、批判现实的创作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的

社会功能。《汉书·王褒传》引西汉时宣帝语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后来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也提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主张。所称“讽谕”,系由《诗大序》中的“风刺”之“风”演化出来的。其实,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辞赋时早已具有“讽谕”的精神,只是他用“风谏”之称而已,《史记·司马相如传》云:“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汉人对于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不管是批判或颂扬,所称“风谕”之旨,“风谏”之义,大同小异,均明显受汉代儒家经学的薰染。因此,以儒家正统诗学为源头而发育成的“讽谕”概念,在两汉时代,就基本确立了。对“讽谕”之义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说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他不仅创造了“讽谕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系统中的特有品类,而且还指出了讽谕诗创作的内容、目的、功能、方法和它同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密切联系,从而把“讽谕”的义蕴系统化,或者说建构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讽谕诗”理论。其集中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品,《与元九书》之外,还有《新乐府序》、《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等论文和《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采诗官》、《读谢灵运诗》等诗篇。其内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强调作品内容的批判性。他一再申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非求官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二是要求作者敢于仗义直言,无所畏惧。所谓“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都比《诗大序》中提倡的“主文而谏”,具有更鲜明的态度,更积极的精神。三是主张讽谕诗也要发挥诗歌艺术感人的力量。因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他认为张籍古乐府诗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可讽放佚君”,“可诲贪暴臣”,“可感悍妇仁”,“可劝薄夫淳”。四、他还把讽谕之作的特殊规律概括为“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和讽谕诗论,把从儒家正统诗学中演化而来“讽谕”概念的理论内涵,极大地充实发展,并予系统总结。白居易之后,历代论诗、谈词而言及“风”、“讽谕”之义者,无不受其理论影响。(黄保真)

【为时为事而作】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白居易《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谓文章歌诗之作,应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教化服务。信中回顾历代诗歌发展,认为《诗经》的优良传统,在《楚辞》和西汉苏、李诗中已开始有所亡缺;屈原、宋玉、苏武、李陵皆失职不平之人,其作品只为抒发其悲哀抑郁之情,不暇顾及其他。晋宋以后,谢灵运诗多溺于山水,陶渊明诗自放于田园,其他作者更等而下之;《诗经》传统已渐渐衰微。梁陈间诗更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虽秀句迭出,绮丽可观,但略无讽劝美刺之意,《诗经》传统尽失。于唐代则赞颂陈子昂《感遇》、鲍防《感兴》之作有讽谕之旨,而批评李白诗虽才气横溢,奇之又奇,而“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诗可传者甚多,尽工尽善,然而如“三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那样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者,亦不过三四十首而已。因此他为诗道崩坏而愤发痛伤,乃创作讽谕诗,希望能起到裨补政治的作用。其《新乐府序》云:“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意亦同。由其对历代诗的评论看,为时为事而作的理论,具有要求诗歌内容充实、关心现实的合理方面,但是,一味贬抑排斥文学的审美愉悦作用,又显得狭隘机械。白居易鼓吹此种理论时态度偏激。其实,他也写了不少吟玩情性的闲适诗、随感而作并不直接服务于政教的感伤诗,和“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的杂律诗。在其他场合,他也曾发表过不少诗可以释恨佐欢、怡情悦性的言论;对陶渊明、李白也作过很高的评价。即在《与元九书》中,也说到以“新艳小律”自娱的情形。故为时为事而作,只是反映其诗歌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

(杨明)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古代诗学概念。是唐白居易关于诗歌特点的表述。其《与元九书》云:“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强调诗歌具有重大的政治教化作用,是圣人感

动人心以达到天下和平的最好工具,因为诗有其特点:根情,指诗本因情感激动而作,又以情感打动人心,情为诗之根本;苗言,指情动而发为言辞,言为诗之苗;华声,指诗的语言富于音乐美,易入人耳,声为诗之华(花);实义,指诗之归宿在于通过动人的情感、悦耳的声音,使听者了解其意义,义为诗之果实。凡有生之物,都有情感,都爱听悦耳的声音,故都容易为诗所打动。白居易极力夸张诗的政教作用,甚至说三皇五帝之所以能“直道而行,垂拱而理”,就是因为以诗为“大柄”、“大宝”所致。又强调为发挥此种作用,须重视其固有特点,即情感和音乐性。在其他文章中他也多次表达这一观点。如《策林六十九·采诗》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反之,通过听诗、读诗,可以了解人情之哀乐、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同时,统治者让在下者借作诗以泄导其情,如同“善防川者,决之使导”,而不致壅塞成患。又如《新乐府序》自述其诗的特点,除“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外,还有“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即力求流畅通达,希望能配乐歌唱,以求易入人耳,增强感染力量。白居易此种诗歌理论,大体上继承了《礼记·乐记》、《诗大序》等儒家音乐、诗歌理论,而又针对现实,有为而发,推动了古典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

(杨明)

【言直而切】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白居易有关诗歌艺术风格的论述。语见其《新乐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篇序言,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言直而切”,意思是说,诗歌语言应该质直坦荡,直抒胸臆,切中时弊,而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借以掩盖现实黑暗。这不仅是语言艺术风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紧密联系着反映现实、批判人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问题,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诗风的斗争精神和鼓舞力量。这一理论锋芒,直接批判了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白居易不满意儒家那“怨而不怒”、“主文谲谏”含蓄不露的诗风,认为它不利于诗歌反映现实和批评时弊。因此,他不仅强调诗歌的抒情特征,而且在情感抒发方面,提倡一种“意激而言质”(《与元九书》)的激切直露的愤

慙之情,以便“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从积极方面改造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化中心说,使诗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联系得更为紧密,更富于现实的理论意义。比如说,“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新乐府一类的讽谕诗,用质直的语言,抒发激切之情,不仅事实明白,而且态度鲜明,“欲闻之者深诚也”,以收到“直谏”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古典诗歌现实精神的发展。参见“辞质而径”、“事核而实”诸条。

(蒋凡)

【事核而实】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白居易对诗歌内容提出的艺术要求。语见其《新乐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事核而实”,是就新乐府讽谕诗的思想内容而言,意思是说,诗歌所描绘的故事,句句真实,绝无谎言,经得起事实检验,可作为治政者的借鉴。这是根据司马迁的“实录”和王充的“不虚妄”等理论而加以发挥。在唐代的新乐府运动中,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比兴美刺和劝善惩恶,以便为改良封建政治服务。为了实现诗歌的这一积极社会作用,必须重视作品内容和题材的真实性。他认为只有“其事核而实”,才能使人相信,作为历史镜鉴,传之久远。诗歌作品能使人认识政治社会的真实面貌,进一步产生改革现实的要求。这与其《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指出“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可作为“事核而实”的具体说明。白居易所作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所描绘的故事,大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并非凭空杜撰,正是这一创作思想的表现。但白居易固然强调真事与核实,同时也并不完全排斥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其讽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就明显出于艺术想象。后世不善学者,一味强调真实“事核”,则可能因违背艺术特征而引入创作的仄径。参见“辞质而径”、“言直而切”诸条。

(蒋凡)

【辞质而径】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白居易对于诗歌语言艺术的要求。语见其《新乐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

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篇序言,标举了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宗旨,是其理论纲领。其中涉及到诗歌艺术的体制、语言、风格、内容等各个方面。“辞质而径”,就诗歌语言艺术而言。质,指语言文风的质直朴素,而不是指内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径,径直,直率。意思是说,新乐府诗歌的文学语言,应该朴素无华,自然晓达,浅显直率,通俗明白,令人一读就懂,容易理解。只有诗人的文学语言尽量与人民口语相接近,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以增强其斗争力量。的确,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等诗篇,语言浅显直露,通俗明白,早有“老妪能解”的传说,这不但加强了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社会效果,而且使他的诗歌不胫而走,广泛流播,大大增强了影响。据其《与元九书》,白诗“往往在人口中”,“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这和他有关诗歌语言“辞质而径”的主张有关。白诗“辞质而径”,虽然不免有过分浅率直露之嫌,但总的说来,其通俗平易、明白如话、“老妪能解”,也是经过艰苦的艺术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平淡”境界,一样具有艺术魅力,而非不加思索,冲口而出的粗制滥造。所以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称引周元公语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封建士大夫讥其“俚俗”,实是偏见。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方面,“辞质而径”的白诗,是后代诗歌创作的一个典范。参见“言直而切”、“事核而实”诸条。(蒋凡)

【不平则鸣】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这是韩愈关于诗文写作动机的表述。作者以为,诗文之作,都是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己,乃泄而为文辞。凡自古以来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辞赋、诗歌文章,均为不平而鸣的产物。其中又或鸣于盛明之时,或鸣于衰颓之世,或为国家之盛而鸣,或为一己之不幸而鸣。它并不专指忧苦之声,也包括喜乐之情;并不专指抒情,也包括发表有关政治、社会、学术等方面的见解。但韩愈意中,实

偏重于发愤抒情的一面。其《送高闲上人序》说,草圣张旭凡“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强调情感发泄而为艺术。因其作品是真情实感喷发而成,故“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其序虽言书法,而与诗文创作理亦相通。序中还说到如何方能有强烈的情感,须做到“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即须执著于人生,执著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是非利害,方能使内心世界常处于激动不平之中。如若“一死生,解外胶”,远离人生,无情无欲,则“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平静如古井水,便不可能有出色的艺术作品产生。韩愈曾说,读所谓避世者阮籍、陶潜、王绩的诗文,知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送王秀才序》),亦即知其诗文乃不平而鸣的产物。又,“不平”虽包括种种情感,有喜有悲,而韩愈实着重于悲忧一面。《荆潭唱和诗序》云:“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志得意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遭遇不幸之人,胸中有强烈的怨愤之气,故多作诗文;王公大人志得意满,则不易有强烈的情感冲动,遂不能多作。即使有所作以抒其欢愉之情,也不易动人。因为文艺欣赏的事实表明,“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因悲苦愁思而鸣,易于动人,说出了文艺欣赏中以悲为美的普遍心理。(杨明)

【穷而后工】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穷而后工”之说,源自唐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但比较而言,欧阳之说更具体而富于理论意义,因为他进一步接触到作家的生活遭遇对其创作成就的重要作用。封建社会的正直文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往往在政治上受到压抑,遭遇种种困厄,理想破灭,襟抱难开。但正是这种富贵者所缺乏的生活压抑,激发了文学家的斗志,鼓舞了诗人深入观察事物,接触穷苦人的生活。由于触事感物,忧思悲愤,因而从积极方面发扬孔子诗“可以怨”的精神,进而兴于怨刺,用诗歌来批判现实,发泄不平,唱出了穷困者的心声,写出了光辉的诗篇,引起了千古的感情共鸣。诗人的境遇愈是穷困,触物起

兴,托于怨刺的面也就愈丰富,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就愈深刻,在创作上就能够写人情之难言,因而愈穷则愈工。他所说的“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正是封建社会中许多优秀作家和天才诗人在创作上获得成就所走过的苦难历程。如屈原因长期放逐而赋《离骚》,杜甫因国破离乱穷饿飘泊而成诗圣,诗仙李白卒于流放赦还途中……。而欧阳修所称颂的同时诗人梅尧臣,也是“穷而后工”的代表人物。后来如苏轼等多受欧阳修影响,其《次韵和王巩》诗云:“谪仙窜夜郎,子美耕东屯。造物岂不惜?要令工语言。”其《答陈师仲书》又云:“诗能穷人,所以来尚矣,而于轼特甚。”黄庭坚《题韩忠献诗杜忠献草书》云:“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唐宋以后,“诗穷而工”之说影响更加深入人心。但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局限。因为“穷苦之辞”以外,也还有许多好诗佳作。如今人钱钟书《诗可以怨》(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一期)云:“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穷苦之言’才能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和欧阳修都“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不过功过相比,理论启迪要大得多。另外,后世不善学者,无病呻吟,这则是另一回事,并非“诗穷而工”的理论偏差所致。(蒋凡)

【成竹在胸】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是宋苏轼关于艺术创作构思立意的论述。语出其《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又其《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所谓“成竹在胸”,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前,必须深入客观自然的写作对象,在熟悉生活的过程中去作完整的构思立意,一旦创作条件成熟,艺术灵感来临,就应“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写诗也一样,所以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云:“作诗火急迫亡遁,清景一失后难摹。”艺术的生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画竹就必须把握到竹的整体,才能进一步去表现竹的气韵个性与生命活力。但要达到“成竹在胸”的艺术高境,又必须先有“见竹不见人”的精神修养。苏轼非常称赞文与可“其身与竹化”。他从《庄子·齐物论》的“物化”理论中获得了启发。文与可之所以能“成竹在胸”而画尽竹之情性,清新无穷,不断创新,因为他热爱艺术,已达到了虚静忘我的境界。有虚静忘我之心,竹

乃能进入心中,主客一体,物我两忘,不仅所画之竹拟人化了,就是画竹之人也拟竹化了。身与竹化,实际就是竹在自己的精神气韵之中,不仅体现了活生生的竹,而且表现了活生生的人。于此可见,苏轼从庄子物化意境中,结合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深入探究了艺术创新精神的根源。这里虽然是论画,但是苏轼一贯强调“诗画本一律”(见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所以其艺术精神与诗论相通。画竹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因为这样缺乏“成竹在胸”的完整艺术构思,是凑合之竹,不可能反映出以竹写人的神韵精髓。写诗也一样。没有事先的构思立意,缺乏生活的完整形象,东拉西扯,有一句没一句,这样的诗作必然支离破碎,不可能有流贯的气势与动人的韵味。只有“成竹在胸”,才能写出好诗佳作。在总结艺术创作实践时,苏轼已接触到艺术创作本身的某些规律性问题,具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指导意义。比如对于后代的文人画和山水诗创作,就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蒋凡)

【文采风流】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文采风流”,指的是语言文字的特点。唐刘知幾《史通·言语》说:“语存规检,言喜风流。”可见“风流”是指通过语言艺术所体现的艺术风貌,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杜甫以“风流”称许王维,也是着眼于诗句:“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诗人玉屑》载:“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秀”如“秋水芙蓉”,这意味着“文采风流”主要是指诗句色彩的浓淡相映,清秀明丽。二、皎然也常用“风流”一词,并作为“诗有七德”之一。唐人喜谈“风流”,其涵义当有共通之处。《诗式》说:“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这是从语言气势角度论“风流”。它“高而不怒”,是指气势高昂旷达若浩然之春风,绝非怒气嚣张如海浪之翻滚。它自然流畅似行云流水,而非郁滞蹇阻像冰下浅滩。“风流”,还包括用词的不尚雕琢。三、《诗式》评谢灵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尚于作用”是指构思精妙,而“不顾词彩”是指用词不假修饰,自然天成。四、此外重要的方面,“文采风流”还指语言表达的风格特点。“倚风自笑”,其疏朗拔俗,闲远自若之态,不难想见。《石林诗话》说:“初日芙蓉,非人力所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外。”这也是指表达的妙合神机。

(张小平)

【诗必盛唐】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诗必盛唐”之语,

是史家对于以李梦阳为首的明代前、后七子文学主张和诗学追求的概括。李梦阳、何景明都强调取法盛唐诗歌,学其高格亮调,轻视中、晚唐诗人,否定宋诗。所谓诗尚盛唐,主要指近体诗和一些歌行体以盛唐为宗,其他古体诗则以学汉、魏诗人为主。“诗必盛唐”说远续严羽,近承闽中十子和李东阳。严羽提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明洪武、永乐年间出现的闽中十子,要求以盛唐诗歌为“楷式”(林鸿语,《唐诗品汇凡例》引),具体体现这一主张的是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一书。李东阳强调学习唐音唐调,向往盛唐风概。七子提倡“诗必盛唐”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他们批评宋以后流行的“性气诗”言理说教和台阁体雍容舒缓的诗风,通过赞美盛唐气象,为诗坛指出向上一路,这是其合理之处。但是矫枉过正,其论陷于摹拟一途,对中、晚唐和宋、元诗的评估很不公允,这又给创作带来严重弊端。

(郭国平)

【江山之助】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认为文学风格与特定的地域风物征候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古人对诗歌及一切文艺创作风格形成原因所持的一种普遍看法,“江山之助”即是对二者关系的说明。刘勰又指出,屈原作品瑰婉朗丽、想象奇幻的特点受益于楚国云蒸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沈德潜《芳庄诗序》云:“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所处之地。”说明诗歌风格与其产生的地域景貌存在相“肖”一致的关系。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并认为这种关系不能“相易”,正因为如此,才有采诗观风的可能。“江山之助”有广狭二义,狭义仅指自然景貌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广义则兼指自然景貌和风俗人情共同作用于诗歌风格。

(郭国平)

【铺陈终始,排比声韵】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元稹对杜甫长篇古诗、排律的风格描述。其《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评李白、杜甫诗风之异同云:“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称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此即后来秦观《韩愈论》所谓杜、韩“集大成”的观点。元稹认为杜甫于诗歌各体“能所不能,无可不可”,而李白所长则仅为恣纵的乐府歌诗。故他特意拈出杜甫“大或

千言,次犹数百”的长篇古诗、长篇排律加以对比。杜甫长篇古诗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于纪行中感慨时事,抒写情怀,穿插议论,形成纵横驰骋、波澜壮阔的宏伟结构,此即“铺陈终始”之谓。而另一些长篇排律如《行次昭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起伏转折,波澜层叠,辞藻绮合,属律精切,即所谓“排比声韵”。这两类长诗不但在体制上、规模上别开生面,可以说前所未见,而且体现了中唐以后以文人诗、以学问入诗的新的发展趋向。(刘明今)

【取影】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王夫之《诗绎》:“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笳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影”,凭空设象,幻无为有,以区别于据实叙录。所谓“取影”,指诗人赋予诗中人物以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摩别的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怀思他们的音容笑貌。《诗绎》引唐诗《少年行》,王夫之认为,诗里写到少妇“遥望之情”,其实是存在于那位少年想象中的一种情境,所以称此诗“善于取影”。根据同样的理解,王夫之认为《诗经·车》最后一章的内容,并非如历来的注释所云,写“妇方采芣而见归师”,而是写“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芣”,“遥想”她们欣喜欢乐的情形,这是“取影”。“赫赫南仲”句,则是征人想象妇人异常自豪地夸奖他们像“南仲”(周朝一位大将)那样勇敢威武,这是“影中取影”。王夫之对这二首作品的解释显得独特新异,是因为他将一般人所理解的叙实内容,改变为是诗人想象世界中(通过诗中人物表现出来)的一些幻象。他认为从“取影”的角度读这二首诗,更能体味到诗人“曲尽人情之极至”的妙处,涵蕴也更加丰富。他的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诗人原来艺术构思的实际,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充分肯定了诗人“取影”即艺术想象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把钥匙。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艺术想象论较为丰富,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高度肯定“神思”(《文心雕龙·神思》)。以后历代文学批评家对想象论不断补充和发展,给予文学创作以积极的指导。王夫之“取影”说在吸取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又赋予想象论以一定的新意,不仅把艺术想象当作诗人的思维形式,还把它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法和技巧,扩大了想象论的适用范围,这是“取影”说一个鲜明的特点。(邹国平)

【鼻观望气】 古代诗学概念。钱谦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指出:诗歌是“天地间之香气”,“以鼻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以为这是“观诗方便法”(可参见其《后香观说书

介立旦公诗卷》)。“鼻观”指以嗅觉代替视觉,这是一个形象的譬喻,它指导人们阅读诗歌,领受其奥蕴,犹如以鼻嗅花,得其芳味。钱谦益又提出以“望气”之法读诗,《黄庭表忍庵诗序》云:“吾少从异人学望气之术,老无所用,窃用之以观诗。以为诗之有篇章声律,奇正浓淡,皆其体态也,有气焉,含藏于心识,涌见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熠浮动,一举目而可得。”“望气”是古人一种占卜术,通过观望云气,以附会人生世事,预言祸福凶吉,这里借以指读者探求诗歌精义。钱谦益说诗歌不易阅读,这是因为诗里隐而不现的“玄珠”、“精魂”很难寻索,那些只知“评量格律,讲求声病”的人,得到的仅是一些平常皮相(见《再与严子论诗语》)。而假如运用“鼻观”和“望气”之法读诗,才能由表及里地把握住作品的内质。所谓“气”、“香”是指诗歌内在的活力生趣、神理韵致,也即是钱谦益说的“玄珠”或“精魂”。它们作为诗歌更深层次的内容构成,藏含在“篇章声律,奇正浓淡”这些流露在外的“体态”之内,读者很难将其一目了然,而需要通过作品外层的色貌,细入去体味和感受,才能对作品的神理韵味有所契合和发现。这一方面说明读诗要以索求作品奥藏的意蕴为主,另一方面也说明,要真正理解诗歌并不容易,读者应为此付出许多心力。(邹国平)

【死法与活法】 古代诗学概念。“死法”一词,语见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批评字模句拟的创作为“僵蹇狭隘,尽成死法”。“活法”一词,语见宋吕本中《夏均父集序》曰:“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其《江西诗社宗派图序》曰:“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人,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法”指艺术表现的技巧法则、规矩和程式,“死法”谓墨守艺术表现旧成规,僵硬少变;“活法”则是对艺术表现法则成规的灵活运用,中其规矩又富于变化。吕本中的话针对江西派枯守前人诗法句格,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流弊而发,主张在不违背诗法规矩的前提下,能有所变化,是江西派诗论的演变发展,这一意见在当时亦有同道:“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而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俞成《文章活法》)。其后,“死法”、“活法”相对言便成常例,如元方回《景疏庵记》:“枯桩者,死法也;非枯桩者,活法也。”且含义较为广涵,由较多侧重与以往艺术表现方式的关系,转向较多注重艺术表现方式本身之灵活生动与否。

如明李腾芳讲“法”，第一要“活”，不要“死”，“活则虚能为实，浅能为深，晦能为显，浊能为清，轻能为重”（《文字法三十五则》）。清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便是强调艺术表现的自由、变化、创造性。对“死法”、“活法”，叶燮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他以为“法”有“虚名”、“定位”两方面特征，理、事、情三者皆能通贯的是“法”的“虚名”，而“人见法而适惬其事、理、情之用”，是为“法”之“定位”；讲究字法、句法、章法之类固定成套的是“定位”之“死法”，而另有“法在神明之中，功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这是“虚名”之“活法”。“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不可以为无者，初学能言之，不可为有者，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原诗》），意即“法”不可无“定位”，但又不可泥定，其“虚名”的一面才符合自然变化的奥妙，对“死法”与“活法”之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与论述。

（陈引驰）

【坐驰役万景】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坐驰，身不动而驰骛，指艺术想象。役，驱使，支配。言诗人想象无所不至，可以调遣各种景物形象，加以表现。关于艺术思维范围广阔的特点，前人言之已多。如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禹锡继承了前人论点而加以具体发挥。万景，一作万里。坐驰役万里，言诗人想象能突破空间限制，驱驾各种事物于万里之外，亦通。

（杨明）

【亡国之音】 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其义原指体现了国家覆亡征兆的音乐。但古时诗乐合一，于是与诗学亦有关联。语见《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他如《毛诗序》、《说苑》文字皆同。《礼记·乐记》还明确指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显示了儒家正统思想对它的贬抑态度。实际上，这一概念在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真正发挥影响的方面，是其内含的诗乐的艺术风貌与世运兴衰相关的观念，即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说明了亡国之音是乱世亡国现实生活的反映。《礼记》之前的荀子曾指出“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乐论》）。而后刘勰讲“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唐孔颖达《毛诗正

义序》：“诗迹所用，随运而移……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元吴莱评唐诗之变：“世道盛衰，时政之治乱，盖必于诗之正变者得之……当其初年，江左齐梁、宫闱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藩夷，风沙战伐之或作，是则古之所谓乱世之怨怒，亡国之哀思者。”（《乐府类编后序》）清钱谦益：“史称陈、隋之世，新声愁曲，乐往衰来，竞以亡国，而唐天宝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遂有安史之乱。”（《刘司空诗集序》）都是由此着眼论乱世之乐、亡国之音的。

（陈引驰）

【疾虚妄】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王充《论衡·佚文》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在这里，王充说明自己写作《论衡》的动机，起于“疾虚妄”。它与孔子所称《诗》三百的“思无邪”，相对而成文，是同一意思。所以《对作篇》中说明文章之作，在于“驱民使之归实诚……归正道焉”。《对作篇》又云：“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由此可见，“疾虚妄”、“归实诚”而见“真美”，是王充写作《论衡》的宗旨，也是他对一切文章写作（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文章写作，应该力求内容真实，反对虚妄。这一理论，在东汉时代，是很有针对性和斗争性的。东汉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把早已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不断地加以神学化，不仅宣传“天人感应”，而且大力提倡谶纬迷信，附会各种儒家经典而作出种种虚妄的解释，发挥或预测吉凶。于是形成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风，如文人辞赋之作，越来越缺少真情实感，不能如实地反映生活和表现作家的“实诚”之心。针对这种不良倾向，王充提出了“疾虚妄”的写真实要求，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王充关于“文”或“文学”的概念，取的是杂文学的观念，对于文史哲各自独立的本质特性缺乏区分和认识。他的真实论，也就存在不能区分艺术和学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同的理论缺陷。因此，他错误地要求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一样真实，用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去取代艺术真实，对像神话、寓言一类文学作品的想象、虚构、幻想和夸张等，一概斥为“虚妄”而加以否定，这是很片面的。

（蒋凡）

【义得言丧】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

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强调为诗之道,精妙而难以言传,非人人都可把握,须知者方能发扬之。其精妙处,在于“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义得言丧,即能使读者沉潜涵泳于诗的意旨、情味之中,而似乎将其语言文辞浑然忘却。其意与皎然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式》卷一“重意诗例”)相近,含有以平淡而不加雕饰的语言传达深远情味之意。《庄子·外物》已有“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之语。三国魏玄学家王弼以《庄子》此说阐释《周易》之卦爻辞、卦象、卦意之间的关系,认为必须通过言(卦爻辞)、象方能了解卦中所孕之意。但言、象仅是“得意”之工具,“得意”才是目的,故又须“忘言”“忘象”,即不可拘执于言象,不“忘言”便不能真正“得意”。玄学对后世士人思想影响甚为深刻,其中有的概念、命题也为文学艺术理论所借用而有了美学意义。刘禹锡以义得言丧论诗,亦其一例。(杨明)

【隔与不隔】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主要指艺术家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将头脑中形成的审美境界物化为艺术形式的程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境界为读者接受、复现的可能性,和留给读者重新创造的艺术空间如何。语见《人间词话》:“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被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他说南宋词虽不隔处亦不及前人,这是由于南宋词人在审美追求上过分注意形式而不在境界上用力的缘故。其境界在作家头脑中形成时,同五代,北宋词人相比,就浅而不深,薄而不厚,所以物化时也不能将浅者变深,薄者变厚,这不属于隔与不隔的问题。其他几例,凡“不隔”者,都是艺术家能够把头脑中的艺术境界活脱脱地表现于语言文字,物化为一幅生动的图画,读者读来觉得形象宛然,生动感人,语语都在目前,作品中的境界能在心目中近似地重现。如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中《梅花酒》等曲,写凄凉的旷野,苍黄的草色,迎霜的早兔,褪毛的猎犬,南翔的塞雁……构成了一个送别的伤心场景,令人读来如临其境,就是“有意境”、“不隔”。颜延年的作品,则往往过多地用典、使事,词彩虽然华丽,形

象并不生动,被人讥为错彩镂金、雕绘满眼,只具低层次的形式之美,所以为“隔”。南宋词人吴文英作词喜用“代替字”,如以“檀栾”代竹,“金碧”替楼,“婀娜”指柳,“红雨”、“刘郎”为桃花,就使读者不知所云。王国维用吴文英(号梦窗)词中之句“映梦窗凌乱碧”来讽刺他,就是因其词境繁碎,不成图画,是典型的“隔”。写景之作有“隔与不隔”;抒情、述事为主的作品,也是这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述事”之作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的〔正宫·端正好〕,王氏评其“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亦属“不隔”。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这段话可以作为“不隔”的定义来看。

(黄保真)

【废言尚意】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一“诗有二废”：“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谓虽然诗歌重在意义情致，不可徒事华辞，但语言的典丽仍不可忽视。典丽，犹丽则，美丽而有法度、不过分。皎然曾反对“不取其句，但多其意”的评诗原则，云：“夫寒松白云，天全之质也；散木拥肿，亦天全之质也。比之于诗，虽正而不秀，其拥肿之林。《易》曰：文明健。岂非兼文美哉？”（《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亦谓意与文采应该并重。皎然“二废”之说，相互补充，颇富艺术辩证思想因素。

(杨明)

【废巧尚直】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一“诗有二废”：“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虑不得置。”谓虽然诗歌崇尚自然率直，反对纤巧，但诗人之构思自不可废弃。皎然认为，所谓自然天成，并不是说略不经意，率然为之，为诗须殚精竭虑，始见奇妙；而又须做到成篇之后，乃似浑然一体，无斧凿痕。参见“废言尚意”。

(杨明)

【无学之学】古代诗学概念。意谓作诗不可不广泛地学习古人优秀的作品，亦不可拘泥地学习，以至生搬硬套或流于拟袭。语见金元好问《杜诗学引》：“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杜甫诗渊深浩淼，以博学称，自论其诗亦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宋人作诗最宗杜甫，尤重视杜甫在诗中所体现的学识。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

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此说影响甚大,不少人因此而穿凿附会解释杜诗,又或者作诗时短钉古人语句,以夸博识,形成了严羽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正是有鉴于此,元好问著《杜诗学》遂特别提出“学至于无学”的观点。其实这也正是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语意的理论发挥。“破万卷”为学,“如有神”为无学。广泛学习古人诗作是学诗的手段,无学则是作诗的境界。袁枚《随园诗话》云:“‘破’字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而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善学古人者当如煮盐水中,盐与水浑然为一,又如九方皋相马,得马之神而遗其色泽、牝牡。因此元好问又说:“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元好问“学至于无学”之语引自释氏,这与宋金时期人们好以禅论诗有关,然“无学”的境界却也是宋人论诗普遍的认识。黄庭坚论杜诗即曾说过“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大雅堂记》)。吕本中提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规矩存在于古人的诗文中,有规矩而又能出于规矩之外,其精神同于“学至于无学”。与元好问同时,严羽著《沧浪诗话》提出:“学诗者以识为主”,先须熟读《楚辞》以下至李、杜二集,枕藉观之,“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所谓“悟入”亦近于“无学”的境界。(刘明今)

【元神活泼】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江盈科《白苏斋册子引》:“吾尝睹夫人之身所为,流注天下,触景成象,惟是一段元神。元神活泼,则抒为文章,激为气节,泄为名理,竖为勋猷,无之非是。要以无意出之,无心造之,譬诸水焉,升为云,降为雨,流为川,止为渊,总一段活泼之妙,随触各足,而水无心。彼白、苏二君子所谓元神活泼者也。千载而下,读其议论,想见其为人,大都其衷洒然,其趣怡然。”“元神活泼”是一种自由奔放,无所拘束的精神状态,可用以形容一个人的人格,亦可以形容诗文创作的特征。明代后期,随着复古思潮的衰退,白居易、苏轼渐渐地为人们所尊奉,王世贞晚年手东坡集不释,李贽称东坡集“开看便自欢然”(《续焚书·与袁石浦》)。至袁宗道遂径以白、苏名斋,他称白居易趣高、才大、好佛、快活(《见·寄三弟》),称“坡公自黄州以后,文机一变,天趣横生”(《答陶石簪》),江盈科为《白苏斋册子》题词,于是便拈出“元神活泼”一词评之。他以云水为喻,特别强调白、苏二人自由奔放,无可无不可的精神。当时公安派中人薄视名利,讲求自适,然为官又廉明清苦,案无积牍。他们一方面“性耽赏适”,追求世间之乐;一方面又“研精性命”,

寄情尘嚣之外。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生活态度正是“元神活泼”的表现。江盈科称之“其衷洒然,其趣怡然”,洒然、怡然正是形容此活泼而无拘执的精神,以此为诗为文,自然是平亦可,奇亦可,无之而不可了。

(刘明今)

【化而不朽】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以发展眼光看待诗文,并重视其神情意态之真的观点。语出明于慎行《宗伯冯先生文集序》:“天壤之间,有形有质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后不朽。”于慎行是明万历前期的诗文作家,其时王世贞尚主盟文坛,他却能不为所囿,论文反对务为修辞,而提倡神情,指出“自《三百篇》以降,至于汉魏及唐,体裁不同,要以衰然意象之表,不可阶梯,正在神情耳”(《冯宗伯诗集序》)。以神情论诗文,自然地不主于拟袭而主于变化,故有“化而不朽”之说。他以水之流、火之传为“化”,故所言“化”,其实质是动、是变。动而变,变则不朽。因此他论诗文便批评那种一味标榜先秦、两汉而土直赵宋的观点,认为就其神化而言,正是先秦西京之文化而为“眉山氏”(苏轼),“眉山氏”之文化而为“弇州氏”(王世贞)。因此,“能不为秦汉者,而后能为秦汉”,而后可以不朽。否则的话,“合之以体”,“模之以辞”,徒得“物之形质”,“方兴方毁,方新方故,不朽何之”(《宗伯冯先生文集序》)。

(刘明今)

【反求吾心】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指以心为文章本源的观点。语出明缪昌期《文原》。缪昌期活动于万历、天启间,当时拟古一派“雷同剿袭”的流弊越来越为人们唾弃,而公安派在风靡一时之后,其“短钉”、“俚俗”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于是诗文创作何去何从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缪昌期《文原》之作正是企图回答这一问题。当时有以《五经》为文章本原之说,缪昌期不以为然,指出《五经》产生以前也是有文章的,因此“谓六籍为文之标准则是,为文之本原则非”。同时他还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孰非文章”,但若以之为本原,则文章不过是形似之物。于是他提出了以心为文章本原之说:“盖所谓化工之笔者,化工而已,必一一取肖于化工,岂化工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诗》以达意,吾心之意也;《书》以道事,吾心之事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吾心之节,和也。”这是文学上的唯心的本原论。王守仁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缪昌期吸取王守仁学说唯心的外壳,以之论文。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说,文学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机械的反映,“必一一取肖于化工,岂化工哉”,此话有合理的因素。强调人的内心感受,重视人的主观创造

精神,正是晚明时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但是繆昌期提出“反求吾心”的同时却又强调心只是《诗》、《书》、《易》、《礼》、《乐》的不同的体现,故说来说去,文章之本原仍然在于《五经》。(刘明今)

【幽深孤峭】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清之交钱谦益对晚明竟陵派首领钟惺所追求的诗歌风格的概括和批评,语见其《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云:“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虽然钱氏对竟陵派“深幽孤峭之宗”本身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一概括却比较准确地道出了竟陵派诗歌的基本风格特征。钟惺认为,“真诗”是人的“精神”产物,而“精神”实指“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幽情单绪”,是“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虚怀定力”(《诗归序》)。谭元春也肯定,“诗品”是诗人“孤怀”、“孤诣”的呈显(《诗归序》)。钟惺还说:“诗,清物也。”其特点是逸、净、幽、澹、旷(《简远堂近诗序》)。这说明,他们追求的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从内蕴含义方面讲,指表现耿介自洁、超俗脱凡的情怀;从艺术体貌方面讲,指具备清瘦幽细,深隽秀澹的风致。钟惺、谭元春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仕途坎坷,经历曲折,他们既关心现实,又深感无能为力;由于不愿随世沉浮,内心更加向往古代淳朴的人伦关系,因此两人共同养成了孤傲奇僻的性格,崇尚我行我素的哲理。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正是从他们这片心灵中绽开的艺术花朵。此外,他们努力想在前、后七子的宏壮格调和公安派的轻灵俊脱性情之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幽深孤峭的风格正是他们艺术创新意识的结晶。钟惺、谭元春编选《诗归》,主要选取叙写幽事寂境,表现诗人清思孤怀的作品,与他们自己的创作追求正相一致。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幽深孤峭自有其美学价值。后人否定竟陵派,抹煞他们的诗歌宗尚,并不妥适。但是,钟惺、谭元春及其追随者有些诗篇滥用虚词,过于僻涩,破坏了美感;《诗归》选诗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为反对肤熟而过求冷僻的缺失,这也并不可取。(郭国平)

【孤怀孤诣】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谭元春《诗归序》云:“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之咨嗟傍皇者,此诗品也。”钟惺《诗归序》也说,“真诗”要表现“幽情单绪”。二说含义相同。“孤怀孤诣”一方面指诗人与众不同,有独特的情怀志尚和心灵追求,诗歌就是要表现人类精神的这种独特性。因此,“孤”字含有表现个性和追求创新的意思。另一方面,它又指诗人洁身自持、孤傲不屈的品性。钟惺、谭元春生活在国势日下、吏治败坏、世风混浊的晚明时代,对封建王国整体力量缺乏信心,又不愿随波逐

流,而信奉洁身自好。“孤怀孤诣”以貌似回避现实的形式表现了抗俗的志操。从这种孤高的心襟孕育出的诗篇,往往在清冷幽澹的体貌下,蕴含着莹洁奇傲的情愫。在我国文学史上,矢志落魄或自处末世的诗人往往会产生迥别众尚的“孤怀孤诣”,写出幽深孤峭的篇章。柳宗元、贾岛、孟郊、姚合和宋末“永嘉四灵”及一部分“江湖派”诗人,莫不如此。钟惺、谭元春以上审美主张和追求,与这些诗人的审美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参见“幽深孤峭”。(郭国平)

【无色无著】 古代诗学概念。形容诗歌空灵、清远而不粘滞的艺术特征。语出明谢肇淛《小草斋诗话》云:“诗境贵虚,……诗情贵真,……诗意贵寂,……诗兴贵适,……诗无色,故意语胜象,淡语胜浓;诗无著,故离语胜即,反语胜正。”“无色”是佛家用语,色指物质现象,无色即是指虚空无边、无固定处所、无物质、无形体的境界。谢肇淛以之论诗,用以说明“意语胜象,淡语胜浓”。“意语胜象”即要求用一种虚灵的主观想象的描绘来代替拙实的客观物景的摹写。故“意语胜象”和“淡语胜浓”一样都以“无色”为贵,讲究雅淡空灵,不即物象。“无著”,佛家以不执于尘染者为无著,谢肇淛引之论诗,称“离语胜即,反语胜正”,也均是就其不拘泥、不执著而言。总之,他提倡的是一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风格或意境。本此论诗,他不但反对公安派“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的浅率之弊,也批评七子派堆垛铺叙、故为俊语的夸辞之病。他称:“古今谈诗如林,然发皆破的,深得诗家三昧者,昔惟严沧浪,近有昌穀而已。”确实,他的“无色无著”之说和严、徐二家比较接近。严羽说:“盛唐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徐祜卿说:“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谈艺录》)他们所标示的正是若即若离、无色无著的境界。然严、徐所言还比较含糊,谢肇淛则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发挥。(刘明今)

【虽颂皆刺】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诗歌中的颂诗,不止于歌颂,还可以含有讥刺之义,即通过赞美古代的盛世来讥讽当时社会之不足。语出明陈子龙《诗论》。自《诗大序》提出美刺之说,历来论诗者均无异辞。陈子龙作《诗论》专辩此说,认为美刺之说古人之易,今人之难。因为古代“国有贤士大夫,其民未尝不歌咏,虽其同列相与称道,不为比周;至于幽、厉之世,监谤拒言,可谓乱极矣,而刺讥之文,多于曩时,亦未闻以此见法。”而后世则不然,由于世衰道微,不恰当地“称引盛德”,即是谄媚;而若慷慨陈词,讥切当世,则又“朝脱于口,暮婴其戮”。于是他就注意到美刺的另一种形式:“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嵩高》美申,《生民》

誉甫,皆宣王之衰也。”《嵩高》、《生民》,皆见于《诗经·大雅》。陈氏指出在乱世美无可美,刺则有所不能,直接地表达诗人的美刺是不行了,但还有另一种曲折的表达方法,即通过赞美古代的盛世来讥讽当今社会的不足。由于这一类作品的“刺”表现得比较含蓄,“后之儒者”遂把它解释为美、为颂。陈子龙不同意这样简单的看法,提出要挖掘作品的深一层的含义,“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历来谈《诗》的讥刺多局限于变风、变雅,认为“《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刘基《王原章诗集序》)。陈子龙却能独具只眼,看出“虽颂皆刺”,这显然与明末艰难的时局以及陈子龙个人的身世有关。他生活于明末大动荡的年代,目蒿时艰,直接参与了明末的抗清活动,并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此,他论诗虽也谈才情,谈格调,却更强调“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幾社六子诗序》),这正是“虽颂皆刺”说的实质,体现了以诗歌批判黑暗现实的强烈斗争精神。

(刘明今)

【典远谐则】 古代诗学概念。以典远、谐音律、丽以则论诗,语见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被后人概括为“谈艺四言”。典,语言典雅,指取儒家经典和正史的语言入诗。王士禛说:“六经、廿一史,其言有近于诗者,有远于诗者,然皆诗之渊海也,节而取之,十之四五,厖结漫谐之习,吾知免矣;一曰典。”厖结,通常作椎结,也作椎髻,意谓如椎形的发髻,是古代边远少数民族的一种发式。此处与“漫谐”一词共同形容诗歌语言鄙陋荒诞,不合雅正。王士禛认为多学六经、廿一史,就能纠克这些陋习,归入醇雅。远,味外有味,意境清远。他以绘画为例,“画潇、湘、洞庭,不必蹙山结水,李龙眠作《阳关图》,意不在渭城车马,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嗒然,此诗旨也;次曰远。”这是他主张的神韵说的主要内涵。谐,指诗歌音律协调,富有音乐美。“《诗》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尝弦而歌之,故古无乐经,而《由庚》、《华黍》皆有声无词,土鼓鞀铎,非所以被管弦叶丝肉也;次曰谐音律。”则,法则,法度。“昔人云:《楚词》、《世说》,诗中佳料,为其风藻神韵,去《风》《雅》未遥。学者由此意而通之,摇荡性情,晖丽万有,皆是物也;次曰丽以则。”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是王士禛论诗所本。他要求诗歌写得美丽而又合乎法度,不为淫丽。以上反映王士禛对诗歌创作的语言、声律、意境等问题的认识和要求,实际上也是对神韵说某些重要特征的说明。梁章钜《退庵随笔》:“王渔洋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而独未拈出一‘真’字。渔洋所欠者,真耳。”以失真诟病王士禛上面的论述和全部诗学主

张,未必妥当,但是,对真的重视不够在王士禛诗论中确是存在的,梁章钜的批评有一定道理。

(郭国平)

【神韵】 古代诗学概念。它由原本各自独立又彼此相关的“神”与“韵”二者并列组合而成,但其内涵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自有新质。神韵作为一个审美概念,最初见于魏晋后的人物品评。语见《宋书·王敬弘传》:“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所称“神韵”,指的是王敬弘不受世俗功名利禄拘束,超然尘外的精神品格、生活情趣,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让人感受到的风采和气度,其中也包含了品评者非常赞赏的审美评价。“神韵”后又被运用于文艺美学。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评颜骏之(景秀)画云:“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神韵”已被用来品赏作品所表现出的人物的内在精神之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则延伸指画面传神的逼真生动,使人产生目击道存的艺术效果。后人则进一步以“神韵”与“形似”对举,形成一对辩证矛盾的审美艺术概念。如元汤垕《画鉴》:“人物于画,最为难工,盖拘于形似位置,则失神韵气象。”除此之外,“神韵”还包含了以下几个要义:一指文艺作品中超越形迹之外的审美特质。如明胡应麟批评宋人学杜得其皮骨形迹,但是“神韵遂无毫厘”(《诗薮》内编卷四)。一指情韵悠远、含蓄无尽的韵味。如清施补华《岷佣说诗》:“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一指清幽淡远的意境之美。持此见解的诗论家中,影响最大而成就最高的是清初王士禛。他继承了司空图诗论中“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理论和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辨》)之言,加以发展而详述了自己具体的审美感受和理论主张。其《池北偶谈》卷一八云:“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筵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晨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这里的“神韵”具体指清幽淡远的意境之美。细加分辨,此意境中又有两个层次:就描摹审美客体言,体物贵在传神,咏事“不著判断”。其《居易录》卷六云:“赵子固《梅》诗云:‘黄昏时候朦胧月,因思行过雨潇潇。’虽不及和靖,亦甚得梅花之神韵。”这就是说,体物咏事之妙,不在描头画脚,而在于传达出自然风物或社会事物的意趣风神,使人产生悠

然神往的审美感受。具体言之,艺术形象纯美是“清”,而余味无穷为“远”。而从审美主体言,清远之境又主要表现在超越功利的审美方式,和与之相契的冲淡清雅的风味情调。其《香祖笔记》卷二云:“七言律联句,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多见,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杨用修‘江山平远难为画,云物高寒易得秋’,……皆神到不可凑泊。”所称“神韵天然”,与强为应酬之作不同,也与经国化民,裨补教化无关。这种超然世外、淡薄功名的纯粹审美方式,自然赋予作品以冲淡清雅的风味情调。后人把王士禛上述诸论,以及他继承司空图、严羽之说,激赏盛唐王、孟山水诗派的审美情趣,加以综合归纳,概括为“神韵”说。清陈琰为王士禛《蚕尾续集》所作序中说:“司空表圣论诗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余尝深旨其言。酸咸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何?神韵也。”其论王士禛之“神韵”说,渊源于司空图的“味外味”之旨,言之有据。王氏“神韵”说对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也曾产生良好影响。但后人以偏概全,无论什么诗体都衡之以“神韵”,这又走向了艺术发展的反面。因此力矫其弊而加以批评,也势在必然。如翁方纲作《神韵论》,既扩大“神韵”之义界,又矫其空疏之病。又袁枚《随园诗话》卷八,认为“近体短章,不是半吞半吐,超超玄箸,断不能得弦外之音,甘馥之味”,追求“神韵”境界有道理,但若长篇巨制则不以“神韵”为工,而以淋漓酣畅为快,“总在相题、行事能放能收,方称作手”。指出了王士禛提倡“神韵”说的利弊,补弊救偏,启人思维。

(黄保真)

【神韵说】 见“神韵”。

【羚羊挂角】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严羽有关诗歌艺术特质的论述。语见其《沧浪诗话·诗辨》:“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这里,严羽借禅喻诗。“羚羊挂角”,原是佛家语,如《传灯录》卷一六云:“(义存禅师谓众曰)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扞摸?”又卷一七云:“(道膺禅师谓众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传说羚羊到晚上就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不著痕迹,以躲避猎狗的追寻。因此,“羚羊挂角”,用来形容“无迹可求”,含义相同。故《沧浪诗话·诗评》又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二段话相互参

证,可知“羚羊挂角”,与“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同一意思。从诗论渊源看,它显然受到唐代皎然“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诗式·重意诗例》)及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诸论的影响。首先是指绝去文字雕琢痕迹,以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其次,严羽在唐人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词理意兴”四方面来讨论,“词”指诗歌的词句,“理”指思想内容,“意”指丰富的想象与艺术构思,“兴”指兴会情趣或艺术韵味,四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无迹可求,创造了上乘的诗歌意境。总之,严羽认为,诗歌本质是“吟咏情性”之作,但光有情性,并不一定是好诗。诗歌创作的杰作佳构,还必须具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生动“兴趣”,诗人的情性自然消融于诗歌形象的浑一整体之中,从而产生一种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美学特点。它给人以审美享受,指的是一种空灵隽永、清新深沉的特殊美感,犹如水月镜花,可见而不可捉;但是又必有此水然后月可印潭,先有此镜而花可映面,“羚羊挂角”,有无相生,并非尽是玄虚之论,也有合于艺术创作规律的一面。后世诗歌中的“神韵派”,就多受其影响而言神韵和意境的创造。

(蒋凡)

【妙悟】 古代诗学概念。讨论有关诗歌创作形象思维中的有关灵感问题。语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妙悟”一词由“妙”与“悟”两个词素组成。“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原是道玄及佛学中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后引入诗歌美学而具特殊审美意蕴。而“妙悟”之“妙”,正是指出了“悟”这一广泛运用于哲学领域的特殊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活动中所独具的审美内涵,使“妙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把握和艺术思维方式。近代章炳麟《小学答问》云:“妙有二谊:一为美,《广雅》:‘妙,好也。’一为微……汉世多言微眇。”《老子》一章早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话,说明“妙”不仅是美好,而且是支配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过与一般的规律不同,它是精微奥妙,莫可名状,却又确实存在,只能强名之为“妙”。至于“妙悟”连称构成一词,佛学早有,如《肇论·涅槃无名论·妙存》云:“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即在于真。”严羽的“妙悟”说虽然可能据此引发,但却直接用之论诗,并赋予其新的特殊的审美涵义。他认为“妙悟”是诗人把握诗歌审美特质——“兴趣”的关键,是人们学诗、作诗以及赏诗的必经之路。而“妙悟”又是人们“熟参”古代优秀诗人作品的结果。因此,要“妙悟”又必须“熟参”。在这里,严羽的“妙悟”

与今人所称的“灵感”近似,指的是诗歌创作如学禅者领悟真如佛性一样,必须领悟诗歌的“兴趣”及其艺术特质。诗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文章,诗人创作灵感的爆发,带有一定的直觉思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应从审美整体去加以形象地把握。今人钱钟书《谈艺录》云:“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这样解释“妙悟”,基本符合严羽的本意。原来,佛学之“悟”有顿、渐之分。而严羽之“悟”,则揉合了顿、渐二门,由平素之渐悟(如所谓“熟参”),而入顿悟之门(即“妙悟”)。因为诗歌创作之“妙悟”,属直觉思维,这种艺术灵感,虽是骤然爆发,但却来之不易,是以多读书多穷理为前提的。所以学诗必须树立“真识”,熟读汉魏古诗到唐宋诸大家代表诗作,认真体味辨别,才能明白诗家三昧而恍然大彻大悟。一旦艺术之真是非了然于胸中,则由渐而顿,灵感纷至沓来,“妙悟”不求自至。严羽的“妙悟”说,对后代影响甚大,特别是明清以后的神韵诗派,更深受影响。还有像王夫之《古诗评选》也称:“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且如飞蓬,何首可搔?而不妨之搔首,以理求之,诎不踰蹊!”正是从诗歌创作活动中艺术思维、审美把握的特殊规律着眼来理解“妙悟”,启发了后世对于诗歌艺术特质的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黄保真)

【旨冥句中】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二:“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冥,幽深貌。“池塘”句见谢灵运《登池上楼》,“明月”句见其《岁暮》,皆谢诗中名句。皎然认为前者有微妙之情致见于言外,后者则是深邃的意绪见于句中。二者同为佳妙,但艺术表现不同。一说,冥,藏。旨冥句中,谓“明月”句虽摹写物色,但亦有深旨藏于句中。

(杨明)

【以少总多】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诗文对于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的反映,并不是纤毫俱足的机械摹仿。就语言文字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将情貌传达无遗。因此,诗文创作往往要对所反映的情貌加以取舍藏露。或者说,诗文的艺术就是取舍藏露的艺术。所谓“情貌无遗”,并不是指情貌在语言文字中表现得无一阙漏,而是指“以少总多”手法给予读者心理上的艺术效果。尝鼎一脔,可以尽知其味,有限之中正有无限在。“以少总多”的创作意愿,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所谓“艺术典型”命题的理论因子。但“以少总多”绝非少与多的任意排比组合,它是辩证法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诗大序》论“风”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已透露出艺术概括的敏锐眼光。陆机《文赋》则用形象的语言论述了艺术概括的方法途径:“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刘勰“以少总多”的提出,正是对前人经验总结的结果。“以少总多”的具体内涵,就是“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熔裁》)。前者是根据内容需要对题材进行精炼取舍,典型深刻地反映生活,所以《事类》篇主张“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后者是指以简约的言辞表达深远的旨意。然而正如葛洪所说:“属家之笔,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抱朴子·辞义》)因此刘勰又提出以“积学”、“酌理”济“以少总多”。用现代艺术眼光来看,“少”之所以能“总多”,是因为“少”既具体形象又高度概括。具体形象是个性,高度概括是共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才能曲尽情貌。如李白《静夜思》,是以一轮明月之“少”,传写普天乡思情貌之“多”。“以少总多”,兼顾个性与共性两面,才能取得“情貌无遗”的艺术效果。

(张小平)

【澄淡精致】古代诗学概念。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澄淡精致”作为一种风格,它主要是指情趣的淡远和语言的洗炼。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又评王维和韦应物说:“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王、韦的山水隐逸诗,受佛老思想影响较深,以描写山水自然、乡村生活作为精神寄托,因此在创作思想上受佛老“言不尽意”、“言为意筌”论启发不少,于是大量运用象征、比喻、暗示等手法来创造“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诗歌意境。他在《诗品》中列“冲淡”一格,就是对王、韦一派创作经验的总结。澄淡,不是淡乎寡味,而是味淡而永。“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清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杨廷芝释“冲淡”为“冲而弥和,淡而弥旨”(《诗品浅解》),可移解“澄淡”。“澄淡”之所以淡而有味,是因为它将深沉的人生感慨化为淡远的山水色彩,将浓烈的人间烟火变为清新的自然生命,所以,“人但见其澄淡精致,而不知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精致与澄淡互为表里,语言洗炼,精义内含,澄淡才不浅薄,味永才有可依。但精致不是精雕细刻,不是浓妆艳抹,而是洗尽铅华、言随意遣。精致,不崇尚夸饰,也不追求铺张,它是脱口而出,自成精美。澄淡精致的风格,非外貌腔调的摹仿能成,作家首先得有濯足清

流、尘念俱消的胸次,然后方见文学创作的功夫。

(张小平)

【咸酸之外】 古代诗歌审美概念。司空图论诗重辨味,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他以此为比喻,说明作诗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后人将司空图以上的话概括为“学诗须识味外味”(王士禛《师友诗传录》),或“味在酸咸之外”(赵执信《谈龙录》)。在司空图看来,一首诗歌除了文字直接表达的言表意象之外,若别无更深广渺邈的含蕴意境,就好比醋只给人以酸,盐只给人以咸的感觉,别无更“醇美”之味,显然此类作品不符合他的审美要求。他评诗“以全美为工”,“全美”即谓作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能以精美的外形,包孕无尽的神味,或者说,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令人反复品味,愈久不忘。他还认为,味在咸酸之外的作品,不仅只是“澄淡精致”的风格,“遁举”之章未尝不可到达这一高境。司空图求“咸酸之外”诗味的主张,上承刘勰、钟嵘“余味”、“滋味”说,下开严羽妙悟说和王士禛神韵说,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郭国平)

【韵致】 古代诗学概念,是“韵外之致”的简称。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外之致”,是指在语言文字之外,还能咀嚼出诗的醇美余味。在他看来,诗要达到有“韵致”,必须写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近而不浮”,是指诗歌的形象可感,涵蕴丰厚,历历如在眼前,使人倍感亲切;“远而不尽”,是指诗歌的境界超远,言所不追,思与境偕,余味无穷。他在《与极浦书》中提到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也就是“韵致”。“韵致”,必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品·雄浑》)。“象外”,是物象之外,“环中”,比喻虚空之处。也就是说,必须超越事物的迹象,以把握传神的虚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前一个“象”字“景”字,是指诗歌描写中具体有形的艺术形象,后一个“象”字“景”字,则是指诗中未曾描写的,由前一个“象”和“景”暗示、象征而出的无形的艺术形象。前者是实,后者是虚。诗歌不单要描写具体的物象和情意,更要创作一个读者可以体味、想象的艺术空间,这样的诗才有“韵致”。司空图的这些说法,归根结底还是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其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语言文字在表达思维感受时的物质局限和束缚。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着一字”,并不是废弃文字,而是强调诗意不要写尽,要神余言外。北宋梅尧臣说,诗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

于言外”(《六一诗话》引)。其实,这也是追求“韵致”,只不过比司空图叙述得更为清晰,让人可窥学诗之门阶,所以影响很大。

(张小平)

【隐秀】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刘勰《文心雕龙》有《隐秀》篇,其言有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即作品有言外之意,能使读者反复玩味,谓之隐。又曰:“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即篇中有警策高卓之句,能产生“动心惊耳”的艺术效果,谓之秀。又曰:“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谓秀句乃妙手偶得,非刻意雕琢所可获。秀句有“自然会妙”之美,如草木之花,光耀熠熠;若雕琢润色,则如同缁帛染采,非不鲜丽,而乏天然。但是,由于现存《文心雕龙》元刊本及一般明刊本中的《隐秀》篇均已残阙,不易对其原意作深入准确的阐释。大约隐与钟嵘《诗品序》释“兴”所谓“文已尽而意有余”意思相近,指有所寄托而言;秀则与《诗品序》“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相近,指得之于直接的审美感受,且以自然明朗的语言表达之而言。残篇中举晋人王赞《杂诗》之句云:“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或许原为所举秀句之例。南朝盛行摘句嗟赏之风,所赏者多为此类描写情景鲜明生动的诗句。唐高宗时元兢撰《古今诗人秀句》,其序今存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所举句例亦皆为写景及览景生情之句。又,明末有人称获得宋本《文心雕龙》,其中《隐秀》篇未曾残阙,遂补抄刊刻行世。但对其补文的真伪问题,学界尚有争论。又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其语既不见于《隐秀》残篇,也不见于补文。张戒并以为隐秀即梅圣俞所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之意。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五则云:“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均以为隐指诗作之含蓄有餘味,秀指形象之鲜明生动。

(杨明)

【格调】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又在集中评储光羲诗云:“格高调逸,趣远情深。”以“格”与“调”并举而成文。还有王昌龄著《诗格》,语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称引)在唐以前,“格”与“调”原是两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但“格调”并称组成新的诗论

概念之后,又有所发展,别具新义。“格”的词义具多义性,与后世审美义蕴有关的主要有三:一是格致、交感、感通。如《尚书·说命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二是量度、衡量。如《逸周书·五权》:“政有三机五权,汝敬格之哉!”朱右曾释:“格,量度也。”三是法式、规格和标准。如《后汉书·傅燮传》:“朝廷重其方格。”李贤注:“格,犹标准也。”魏晋以后,品人谈艺,所用之“格”的审美意义日渐滋生。如《文心雕龙·议对》:“谀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不过把“格”作为审美概念而加以广泛运用是在唐代以后。据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载,以“格”命名的论诗专著有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等。唐人称“格”,要义也有三:一是体格、体制的法式或标准。二是用意、取象、定体之类较高层次的技巧和规律。三是作品的某种独特审美特征或感染人的艺术力量。如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体格闲放曰逸。”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钱起诗是“体格新奇”,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所称“律体卑瘁,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上述诸“格”,可以概括艺术作品体格、格式、格力诸审美特征,但并不拘于力大势浑的雄健一格。但如传王昌龄撰《诗中宗旨》云:“诗有二格:诗意高,谓之格高,意下,谓之格下。”则艺术体格之高下,又与创作主体立意之高低优劣密切相关,这就影响到后来新组成的“格调”词义,包括了表现诗人思想感情方面的立意高低和体格规范。“调”在古代也具多义性。屈原《离骚》:“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以求女。”清蒋驥注:“调,格调;度,器度也。”后来,“调”就成了审美意义颇浓的品评人物的常用概念。以“调”为词根衍生出“智调”、“才调”、“风调”、“情调”、“逸调”、“奇调”等系列词组,它们转入文论领域之中,于是从不同方面又丰富了“格调”说的新意蕴。把“调”正式引入文论领域也在魏晋以后,如《文心雕龙·明诗》:“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北史·辛德源传》谓辛“文章绮艳,体调清华。”入唐以后,“调”的审美意义更丰富了,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祖咏诗:“剪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杜诗“词气豪迈,风调清深”,其“调”明显指作品特有的艺术风范。所以后来韦毅选唐诗称《才调集》,以“调”概括作者、评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录《四声论》云:“自《诗》《骚》之后,……其声调高下,未会当今。”又以“调”总括声韵,对偶等形式规律。“格调”作为审美概念,就是在“格”与“调”两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审美概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义蕴不仅包括了“格”与“调”上述诸义,而且具有新意。

格偏于立意方面的思想情趣的格式,调重在声律句法方面的体制,但是二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宋以后多用“格调”论诗。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二称陈去非“格调高胜”诸例即是。后又扩大到评论词曲。发展到明代,经高启、高棅等提倡,于是“格调”说成为一种流行的诗论主张。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试取所未见诗,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又指某一时代诗歌风格的审美特征。后来前、后七子高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取盛唐诗歌的“格调”特征以规范一切。这样,“格调”从诗歌的两个审美要素,体式、风格、时代艺术特征等,变成了复古的艺术模式,又逐渐成了封建末世的一种正统诗论主张。清沈德潜等大力提倡,于是出现“格调”说、“格调”派。当时翁方纲已有不满,作《格调论》上、中、下三篇加以驳诘,对“格调”义蕴、学说、主张、文学流派各方面的得失,作出较系统的评说,可以参阅。(黄保真)

【格调说】 见“格调”。

【格韵】 古代诗学概念,有多种意思:1.“格韵”联用,一指诗中摹写事物对象的精神风致,多指咏物诗而言。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评杜甫《江头五咏》诗:“物类虽同,格韵不等。同是花也,而梅花与桃李异观;同是鸟也,而鹰隼与燕雀殊科。咏物者要当高得其格致韵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称耳。”“格韵”为“格致韵味”简称,与“形似”相对,侧重指咏唱对象的内在神理。以得“格韵”为高,说明摹绘事物的风致神理是咏物诗的高境。“格韵”第二种用法,是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指诗歌的神韵趣味。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三:“许彦周谓张籍、王建乐府宫词皆杰出,所以不能追踪李、杜者,气不胜耳。余以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诸诗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韵高妙。”王士禛提倡神韵说,他论诗推崇严羽《沧浪诗话》评盛唐人诗的话,“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把这话作为神韵说重要依据。比较他上述论盛唐诗人“格韵高妙”,二者适相一致,说明“格韵”也即“神韵”。“神韵”一词最早被南朝人用于人物和绘画的品评,以后又被用于评诗。在画论和诗论中,“神”与“形”相对,往往指“神似”、“传神”。王士禛以神韵论诗,也要求表现事物对象的精神品格风韵。他肯定盛唐诗人最擅神韵,也包含这一层意思。因此,王士禛称盛唐诗“格韵高妙”,与张戒论杜甫《江头五咏》有“格韵”之美,实存相通之处。2.格、韵二字虽相并列,又各有所指。林倅:“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

乃其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陈善《扪虱新话》卷八引)王士禛《师友诗传续录》:“问:‘孟襄阳诗,昔人称格韵双绝,敢问格与韵之别?’答:‘格谓品格,韵谓风神。’”格或品格偏重于指诗人抒写的情性品操,和这种内质移情于物的诗化表现。韵或风神偏重于指诗歌的风采神味情韵。“格韵”双擅,指诗歌品格高,风神远。3.格、韵对待而言,格指豪放格调,韵指神韵超妙。王士禛《梅氏诗略序》评唐末五代诗“非惟无开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韵兴象之妙,以视陈隋之季,盖反不及一焉。”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古代两大诗说“格调说”和“神韵说”的区别了。(邹国平)

【格意趣】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一:“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格,体制格式。不同诗体有不同的格式规范,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对此有一段论述:“作古诗须先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摹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不可虎头蛇尾。此王敬美论五言古诗法。予向语同人,譬如衣服,锦则全体皆锦,布则全体皆布,无半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尝论五言,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乱离行役,铺张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与敬美旨同。”林昌彝要求诗人通过“师古”“辨体”,使诗歌体格合符雅制古范,避免各自为格,趋入“邪陋”。意,情志意蕴,与偏重词采者相反。许多诗论家都将立意看成写诗首要之义,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王士禛《师友诗传续录》:“以意为主,以辞辅之,不可先辞后意。”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作诗先须立意,意者,一身之主也。……故诗如马,意如善驭者,折旋操纵,先后疾徐,随意所之,无所不可,此意之妙也。”林昌彝认为诗歌立意,主要是指表达诗人内心真实感情,只有真情实意的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否则肤浮虚假,难以扣动读者心弦。趣,指诗歌写得传神灵妙,富有情韵风致,与枯燥无味相对。清史震林《华阳散稿》:“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诗人无论说理叙事,抒情写景,都要写得风趣生动,诗歌有趣则灵,无趣则板。林昌彝也认为趣是诗歌臻于妙境,脱离流俗凡近的关键。以格、意、趣论诗,实则强调了诗歌的规范性、抒情性和生动性。林昌彝认为三者是任何风格的诗歌都必须具备

的基本条件。“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秣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显然,这比片面突出格、意、趣三者中某一项因素而加以绝对化,要全面得多。(邹国平)

【独抒性灵】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袁宏道等针对七子派师古拟古的流弊而提出的重视作者个性的创作主张。语见其《叙小修诗》称道其弟中道之诗云:“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文中特意拈出“性灵”二字,指出性灵之语均从自己胸臆流出,不拘于古人格套,故富于个性,“多本色独造语”。又江盈科为袁宏道《敝篋集》作叙,称引了他的一段话,也言及“性灵”:“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螭蛇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雉鸣》、《驹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在这段话中,作者概括了性灵说在创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一、“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凡是心之所感,即“螭蛇蜂虿,皆足寄兴”,不必定效古人取材;二、就表达而言,凡是能“以腕运心”,即使是“谐词谑语”,亦所不妨,并不比初、盛唐诗逊色。这样的创作方法即是要求作者从内容到形式,将理学家、古文家所设置的种种清规戒律、条条框框统统打破,而一任天机活泼的性灵恣意翱翔,这便是袁宏道等所倡性灵说的精神所在。性灵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可上溯至南北朝时期,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文章篇》)当时所言性灵大抵指一种敏于感受的情性,偏重于个人的审美情趣。故颜之推《文章篇》仍以“原出五经”之“歌咏赋颂”、“书奏箴铭”为文章之正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人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又称性灵之文“使人矜伐,故忽于操持,果于进取,今世文人,此患弥切”。按照儒家正统的文学观念、抒发个人情趣的文章终是小道,故唐宋以后,随着文以载道思想的流行,文学批评中性灵一词遂不多见。迨至明万历年间,伴随着对理学、对七子派复古流弊的批判,伴随着以宣扬个性意识、肯定个人情欲为特征的市民思潮的勃兴,“性灵”一词始逐渐地为文学家所习用,且有了新的含义,用以标示与囿于封

建礼教的“性情”有别的、富于个性的、空灵飞动的性格特征。至清代袁枚继承了“独抒性灵”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性灵说”,成为与沈德潜格调说、王士禛神韵说并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诗论主张。(刘明今)

【童心】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明李贽针对理学家虚矫的文风、复古派拟袭的流弊而提出的创作观念。语见其《焚书·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夫童心者,真心也。”其所谓童心,即是未受“闻见”、“道理”障蔽的先天的纯真的赤子之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故为文之要,实在“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李贽对“闻见”、“道理”的指责,显然是针对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而发,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复古派肤廓拟袭的流弊。指出以童心为文,则“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李贽童心说表现在文艺创作观上便是追求自然真实之美,其精神与晚明汤显祖、徐渭、袁宏道等所代表的新思潮是相通的。但另一方面李贽童心说也明显地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所谓“最初一念之本心”实近于王学之“良知”,是一种先天的“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王守仁《答陆原静书》)。李贽以之论文,遂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的闻见和道理,尤其是过分地强调了最初一念的绝对纯真,这样便割断了作家主观世界与客观现实的持续的有机的联系,使童心说带有一种任意的唯心的倾向。(刘明今)

【性灵】 古代诗学概念。一般指有关创作主体的天才、个性、情感和灵机。但在明清时代,又成为“性灵”派的创作主张。语见刘勰《文心雕龙》:“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性灵”一词,溯源于秦汉哲学,指的是生命之物的特殊自然本性。只有到了六朝,人们才把“性”与“灵”组成一个完整的文论概念,并明确其创作主体的义蕴。刘勰认为,“性灵”是指人性中本然固有的超出万物的灵气,即感觉、认识、思维和创造能力,以及相应内容构成的精神现象。文章是“性灵”所创造的,表现了人性的丰富内蕴,又反作用于性灵。“性灵”是文学写作最为奥妙精微的主体要素。后人继之加以发展。如钟嵘《诗品》称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

章》谓“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庾信《赵国公集序》谓文学创作“含吐性灵,抑扬词气”。他们不仅把“性灵”作为作家个人的精神风貌、情感、灵气这层含义,而且把它看作是文学创作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描写对象。这反映了六朝以来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它与儒家“诗教”咏性不咏情的传统相比,具有进步性。而如颜之推等则更进一步把“性灵”与创作“兴会”相联系,于是“性灵”取义又扩大到天才、灵感的艺术表现。唐高适《答侯少府》:“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发展到唐代以后,“性灵”已具有多层理论意义。但是,作为性灵派所提倡的“性灵”说的核心理论主张,则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新的哲学思潮勃兴,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文学中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新思潮、新理论,也同步产生和发展。于是,表现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作家自我人格、理想和情趣,成了当时某些先进文人在创作中和理论上突出的中心。提倡“性灵”,成了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在李贽等影响下,公安派的代表袁宏道等一意标举“独抒性灵”之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的“性灵”派。再加上李贽、焦竑、汤显祖等与之相呼应,“性灵”作为一种流派主张,代表了反传统、求变革的要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同时注入了更多文学因素,表现出追求文学近代化的理论倾向。但入清以后,发展停滞,真到乾嘉年间经袁枚大力提倡,“性灵”说又日渐扩大其理论影响,为创作和文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性灵”特点有五:一崇天才,二贵独创,三重真情,四尚新变,五反教化。如《随园诗话》卷五云:“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其《仿元遗山论诗》云:“天涯有客太谗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又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续诗品·著我》)他认为文学创作中有我无我是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要害在于是否有至情或真情。主“情”是明后期文学解放思潮中的一面旗帜,其所言“情”,多缘于个人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和饮食男女的生命欲求。因而它同理学家之“理”、复古派之“法”,形成了尖锐对立。他们以为“性灵”是文学创作中最活泼、最丰富、最多样又最善变的主体因素。所以袁宏道、袁枚等又赋予“性灵”以求新尚变的内容。其理论主要揭示了主体、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如袁宏道《与江进之》云:“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语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文亦今日之文而已矣。”袁枚《答沈大宗论诗书》也说:“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唐人学

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也”。另外,性灵派较注重文学的审美抒情特质及审美感染作用,而反对空洞说教,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是一次批判和有力冲击,同时已逐渐透露了古代文论向近代文论变革的端倪。但是性灵派所抒之“情”,又因时代局限,多为个人生活的咏叹调,生活面狭隘,缺乏深刻的现实精神,此乃其弊病。

(黄保真)

【性灵说】 见“性灵”。

【真我】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王世贞《邹黄州鹧鸪集序》:“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先是宋元之际随着对师古拟古现象的批判,对文学艺术个性特征的认识也有所加深。金王若虚《论诗诗》云:“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是何人?”元胡祇遹《跋元李诗轴》云:“大抵我辈自有胸中之妙,古人笔法自当遍修,直至自成一家,乃有真态。”他们均强调诗文之真的个性特征。至明代,复古拟古之风较宋元更甚,然对复古拟古的流弊的批判亦深了一层。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提出“真诗乃在民间”,把真诗与真情相联系,但还没有认识到文学中一己之真的意义。发展到王世贞,才明确提出了“真我”之说。其《邹黄州鹧鸪集序》批评了“矩矱往昔,一循北地(李梦阳)、历下(李攀龙)之遗则”的现象,指出:“此曹子方寸间先有它人,而后有我,是用于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他明确地将“真”与“我”相联系,要以格调为己用,用以表现一己之“真我”。当时徐渭曾尖锐地批判复古拟古的现象,称:“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屠隆亦标举“诗非他人声韵而成”(《与友人论诗文》),李维桢提出“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沧浪生集序》)。他们虽没有标明“真我”,但意指相近,均体现了明万历前期文学批评的新精神。“真我”之说对稍后公安派的崛起有直接影响,袁宏道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精神正在于表达一己之“真我”。

(刘明今)

【肌理】 古代诗学概念。原指器物表面的纹理,如东汉蔡邕《弹棋赋》云:“设兹文石,其夷如砥。采若锦绩,平若停水。肌理光泽,滑不可屡。”后引申指花木等的质地纹理,特别是人的皮肤纹理。谈艺术而言肌理,始见于东汉张衡《西京赋》:“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李周翰注:“虽毫厘肌理之间亦能分擘。”这里讲的还是辨析精微的论辨艺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也有“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语,更进一步把精密周详的思维方法,直接用以分析文学现象。所

称“肌”和“理”,分别指代文艺作品的具体形质和结构规律,而“擘”和“分”则指主体认识或分析文艺现象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法。后来清代翁方纲提倡“肌理”说,虽然翁氏只溯源到杜诗“肌理细腻骨肉匀”(杜甫《丽人行》),和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评唐子西诗“格力虽新而肌理粗疏”二语,其实,其理论内涵在汉魏六朝时已肇其端。但前人常把“肌”与“理”割裂为两个独立要素,而翁氏则合二为一,视为一个完整的审美概念而大力提倡,并形成了乾嘉时代的肌理说,以此批判当时流行诗坛的格调说、神韵说和性灵说,当时颇具影响,几乎与上述三派分庭抗礼。翁方纲《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云:“格调、神韵皆无可着手者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间,而审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艰哉!智勇俱无所施,则惟玩味古人之为要矣。”以肌理说来反对格调说的浮廓,神韵说的空疏。又其《月山诗稿序》:“故为诗者,实由天性忠孝,笃其根柢,而后可以言情,可以观物。”则以传统儒家“诗教”来言“肌理”。所倡根柢忠孝之“情”,意在批判当时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是逾越了封建伦理规范。于是,从魏晋南北朝后逐渐兴盛的纯文学观念,在翁氏提倡的肌理说中,又退回到广义的杂文学观念基础之上。以“忠孝”为根柢,合性情与学问,而归之于“事父事君”,这就是翁氏肌理说对“诗”的基本看法。他把诗重新界定为杂文学样式,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乾嘉经学极盛和当时诗歌创作流弊双重激发的结果。综合翁氏有关的“肌理”论述,其要义有三:一曰活法,二曰实学,三曰义理。先讲“法”,它指的是创作形式和方法。诗歌创作的“针线”,是“肌理”义蕴的表层。他提倡的是“活法”,意思有三个层次:一指“法自儒家有”的,“立本”之法;二指“尽变”之法,三指“有我”之法。内容见其《诗法论》。次谈实学,这是翁氏要求诗歌载体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肌理说理论特色的一个论点。其《延晖阁集序》云:“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则文章即政事也。”所称“肌理”即“实际”或“实学”,其中包括了四个方面内容:一为政事,二为行事,三为学问,四为人品。而政事方面,他又要求言得失,述旧闻,借故老之言行,论学术之渊源等,所以又强调“借诗以资考据”(《石洲诗话》卷四),可见乾嘉考据之学对于诗论的影响。至于歌咏个人行事,也必须是“无一笔不可寻其根源,按其实地”(《重刻吴莲洋诗集序》)。他强调诗以“学”为本,所以赞扬“学人之诗”,道出了肌理说的真谛。他论诗虽也讲性情,但其“性情”是“天性忠孝,涵养深醇”,由学儒经而致,而与袁枚说“性情”

之本质有异。再说“义理”。肌理说中之“理”义蕴包罗甚广。其《志言集序》云：“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其“理”统摄性道，涵盖万有，实际上是把集中代表封建正统的“义理”玄化为宇宙本体，成为诗歌特殊本质存在的根本依据。所以他在《考订论》中说：“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也”。翁氏肌理说，提倡“学人之诗”以实学，批判格调、神韵和性灵三派，影响虽不及上述三派，但代表了一大部分乾嘉学者的诗学观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影响直到近代不息。但是他们轻视诗歌的独特审美特征，以学术考证为诗，脱离时代，实是理论的倒退，故当时袁枚讥之云：“误把抄书当作诗。”（《论诗绝句》）一针见血，切中要害。（黄保真）

【肌理说】 见“肌理”。

【正变】 古代诗学概念。讨论的是诗歌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汉初《诗大序》率先提出了“变风、变雅”的说法：“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所谓“风”与“雅”，指的是周《诗》三百篇（今称《诗经》）的主要诗体和作品。从矛盾的观点看，有“变”必有“正”，正变相须而成立。因此汉末郑玄据此发挥，其《诗谱序》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邴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郑玄把周朝繁荣昌盛时的作品称为是“诗之正经”，而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则称之为“变风变雅”。“正”与“变”相对而成立，后人因此概括地称“正变”。郑玄说孔子时已有“变风变雅”之称，但不见于先秦典籍记载，不知其所据。这可能是汉儒以资号召的依托之辞。但《诗大序》曾称引《礼记·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郑玄等汉儒的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的名称，大概是从这种理论中引申出来的。风雅之“正”者，就是“治世之音”；风雅之“变”者，就是“衰世之音”或“乱世之音”。所以“正变”说指的是时代的变化与诗歌历史发展的关系。后人对《诗大序》和郑玄的“正变”说，颇有异议。例如二南的作品就未必都产生于周初太平盛世，其中

也有不少反映“礼义废、政教失”的作品。今人顾颉刚《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更尖锐地指出：“凡诗篇之在先者，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反之，则一切皆反。在善人之朝，不许有一夫之愁苦；在恶人之世，亦不容有一人之欢乐。善与恶之界画若是乎明且清也！”（见《古史辨》第三册）批评了“正变”说中的复古思想因素，言之有据，其理甚明。但从总的理论倾向看，西周前期和后期以迄东周这两个时期诗歌的精神面貌，是有不同的，“刺怨相寻”，确是后一动荡时代的作品特色。因此，如果不去拘泥少数篇章而作宏观审视，观其大概，那么“正变”说的主要精神，在于说明诗歌发展反映了时代政治的治乱兴衰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环境和文学演变的真实情况的。因此，汉儒的“正变”说对后世影响很大，逐渐演变成为儒家传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古代比较进步的文学运动，如唐代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就颇受“正变”说的影响，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蒋凡）

【正声】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荀子·乐论》：“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原指雅正醇和的音乐，与通俗新变之郑声相对。历代王朝用于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的雅乐皆称正声。《旧唐书·窦琎传》：“（窦琎）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正声雅乐，琎讨论故实，撰《正声调》一卷。”后引申为泛指雅正的诗文作品。《诗经》被认为思想内容既是“无邪”、富于美刺讽谕精神，艺术风格又是委婉敦厚、优柔不迫，得中和之美，故为正声之典范。李白《古风》之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谓屈原作品之哀怨，已乖于《诗经》温柔敦厚之旨。白居易自称其讽谕诗《秦中吟》云：“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谓其诗能继承《诗经》美刺讽谕传统。林纾谓韩愈《元和圣德诗》“描写元和战功，欲穷形尽相，遂不免近于惨酷。……火色过浓，遂微乖乎正声”；而柳宗元《平淮夷雅》“力摹《大雅》，则于显叙战功处，往往为朝廷留其余地，示不欲究武之意，得经意矣”。林纾批评韩诗立意虽正，但描写杀戮之状过于直露，其风格乖离了《诗经》委婉优柔的传统。正声也可用以指某种被认为是正统的艺术风貌。明高棅尊盛唐诗，以为诗至开元、天宝间，已臻极境，其所选《唐诗正声》即以盛唐为主。清沈德潜《说诗碎语》称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之作“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也以盛唐之音为正。清朱克生《唐诗品汇删》按语谓杜甫七律“正声少而变调多”，其正声亦指传统的风格、写法。（杨明）

【奇与正】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四观奇正。”奇正之说先秦即已有之，《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膑兵法》下编有《奇正篇》，以非常为奇，以平直为正。刘勰加以引申，用来批评文学现象。他在《知音》篇中，把“观奇正”列为如何评价作品优劣的“六观”之一。所谓“正”，就是雅正。刘勰认为正既包括作品思想内容的规定性，也包括文学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的要求。思想内容上要求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政治上能够对统治者发挥讽谏作用；文学形式上要求遵循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所谓“奇”，则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方面。《文心雕龙·辨骚》篇云：“酌奇而不失其真。”“真”，唐写本作“贞”，贞者，正也。不论艺术想象如何的“奇”，思想还应符合雅正规范。刘勰把文学中的“奇”基本上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正的配合和补充，为肯定意义的奇；另一类作为正的对立面和危害因素，为否定意义的奇。肯定意义的奇指对传统的发展和创新，如称赞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辨骚》）；谓“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诸子》）。在这个意义上谈奇正的关系，刘勰认为要奇正结合，互相补充，以正为主。而否定意义的奇与“邪”、“诡”、“怪”、“异”等概念相通，是“反正为奇”（《定势》）。其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偏离儒家正道，内容荒诞不可信。在形式上还指淫滥奇诡和破坏遣词造句规范的不良文风。在这个意义上刘勰主张“弃奇”（《练字》）。刘勰关于奇与正的认识，颇富辩证因素，对文学发展的通变现象进行了理论总结，具有规律性的指导意义，后世批评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唐代皇甫湜说：“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答李生第二书》）指出奇即是新，正则为常，执正驭奇，变新而不失其正。这正是刘勰以正为主，奇正结合的主张的继续。清代谢榛论诗曰：“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譬诸诗：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执泥，隽伟而不险怪，此奇正参伍之法也。”（《四溟诗话》）在奇与正的辩证关系上，将刘勰之论进一步发展，遵“正”而不“执泥”；尚“奇”而不“险怪”。这些看法对诗歌的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孙克强）

【通变】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

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又云：“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一词，肇源于《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又《文心雕龙·通变》篇有“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二句，“会通”，源自《系辞上》“观其会通”之语，孔颖达疏云：“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意指不仅要观察事物的会合，还要领会事物会合后的种种微妙变化；而“适变”，则又是《系辞下》“唯变所适”一句的缩略语，韩康伯注云：“变动贵于适时。”意指顺应时势要求而自然变化。《周易·系辞》指出人们必须随着时势而会通变化，使事物的发展不致停滞不前。这是“通变”的哲学思想根据，原意是指事物应有所会合变化而流通不滞。刘勰的《通变》篇，则应用到文学上，指出文学应当变化创新，向前发展。但在变化创新之时，必须考虑继承过去的传统，有所继承又有所变革，把继承与革新结合起来。因此，刘勰“通变”的构词，“通”为变通，“变”为适变，共指继承基础上的“变”，所以是相辅相成的同义并列结构。但现在一般学者认为“通变”是矛盾相反的对立结构，以为“通”指继承，“变”指创新，二者对举而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是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这样解释“通变”，有理论拔高倾向，并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原意。《通变》篇说“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谓有常之体，泛指各种文学体裁风格方面的文体特点和基本要求。“名理相因”，指根据各种文体规格体势来写作，其基本要求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必须“参古定法”，以古人之文为法，所以说“体必资以故实”。如违背这一原则，就成为“谬体”或“讹体”。而文辞气力，或华美或质朴，艺术风格或绮丽或刚健，则须“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不应该有一定程式，而应当随历史时代的变化和作家才性的不同，随时变化，使之创新发展，以达到“通变则久”的目的，所以说变文之数“无方”。把有常之体方面的继承性和文辞气力方面的创造性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日新月异，富于艺术的生命活力。这是“通变”的具体内涵。刘勰言“通变”，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六朝文坛，关于文学的趋新与复古，争论激烈。如裴子野重经史质朴之文，偏于复古；萧子显强调新变代雄，萧绎强调华丽之篇，是为趋新。刘勰则取儒家中庸折衷的态度。他重视诗赋的辞采文章的艺术性，但主张文风不宜过于华艳，最好是“文质彬彬”。他明确指出了“宋初讹而新”的时弊，于是在《通变》篇中开出了治理文坛痼疾的药方：“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论文

强调宗经,指出古代儒家经典文风雅丽,文质彬彬,堪为楷模,借以树立文质兼备的风骨刚健清新的文风。刘勰指出当时文坛时弊,是正确的,但所开“宗经”药方,还是无法摆脱儒家复古思想的樊笼。参见“新变”。(蒋凡)

【新变】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主要讨论的是文学历史发展的问题。语见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针对两汉以来作为经学附庸的复古文风,萧子显提出了主张“新变”的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文学具有赏心悦目的娱乐性观赏性,若久而无变,便会使人失去新鲜感,从而产生厌倦,诗歌作品尤其如此。因此,如果诗人要求自己的作品为人所赏识,并企求取代过去作家的地位,便必须重创造求新变。这是对于六朝文学要求标新立异的时代美学思潮的理论概括,实际上是从读者审美心理和作品社会效果的角度,对文学发展变化的动因予以具体阐述。从模山范水的山水诗,到吟咏动植物器物的咏物诗,还有著眼征战戎旅的边塞诗,发展到着意描绘女性美丽风流的宫体诗,众多题材的转换和开拓,还有风靡一时的永明声律,种种文学现象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便包含着追新求变的因素,也与趋新好美的时代审美要求密切相关。萧子显所标举的具体文学事例,如晋宋以后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汤惠休、鲍照等,“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各擅胜场,皆成名家,可见其“新变”理论对于文学的丰富多样和历史变化予以充分的肯定,有利于促进后代诗歌的发展。但他对六朝“绮丽”为主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未能及时指出和纠正,在这方面,有其理论偏差,而不及刘勰“通变”之说折衷而全面。参见“通变”。(蒋凡)

【因革】 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因”指沿袭,“革”指新变,系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意为沿袭与新变互相结合,才是“通变”的方法。刘勰以“通变”论文学,重在其“变”:“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但他既指出“因革”互生是“通变”的方法,也就是看到了“变”的内在辩证性,有所承又有所易。《通变》篇重在讲文体基本道理和具体文辞文意之间的关系,而《物色》篇中,刘勰则明确将“因革”置于文学发展

传统之中:“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唐皎然以为“作者须知复变之通,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诗式》)。清吴乔就此发挥道:“诗道不出于复变。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围炉诗话》)对“因革”作了较详尽阐述的当推叶燮。他首先明确变化是世间事物包括诗的基本运动法则,因而对诗歌历史应把握其正变盛衰、因创沿革。他考察了中国古代诗歌历程,以为“因而能创”是基本规律,前后代诗歌之间,“前者启之,而后者承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原诗·内篇下》)这讲的就是继承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对诗人的要求就是“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外篇下》)。

(陈引驰)

【别裁伪体】 古代诗学概念。反映作者有关古代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观点。语见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首论诗绝句,说明轻薄之徒,非议前贤,全盘否定,态度是错误的。前贤各有其值得师从学习的地方,但学习和继承离不开鉴别,对于那些毫无生命力的“伪体”之作,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剔除。所称“别裁伪体”:别,指区分、鉴别;裁,裁汰、革除;伪体,伪者不真之别名,指的是那些违背了《诗经》以来优良的风雅传统和现实精神的作品,它们模拟沿袭,陈陈相因,诗中无我,性情失真,当然就不会有艺术的生命力。这些“伪体”如果不加指出和批判,没有经过严格的抉择,就可能鱼目混珠,美丑难分,贻误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所以别裁伪体,去伪存真,指示学习的途径,无论是对于诗歌创作或理论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指出当日诗坛的一种风气:“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杜甫的“别裁伪体”之论,正是针对这种不良倾向而发。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云:“‘伪体’云者,不真之谓。其沿流失源,甘作齐梁后尘者,固不免于伪;即放言高论,不能虚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伪体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各执一端,两无是处。”革除诗歌“伪体”的目的,是要把文学创作纳入“风雅”正常轨道,保证其健康发展。

(蒋凡)

【转益多师】 古代诗学概念。指的是诗人学习前人的途径。见于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于古代文学遗产及今人的创作成

就,杜甫认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做到“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就是说,时代无论古今,诗人不分贵贱,只要其诗歌创作有某些优点或可取之处,那么都应该一视同仁,拜之为师,好好地加以学习和借鉴,博采众长,以作为发展自己创作的必要营养。这就是“转益多师为汝师”。多多学习,能者为师,目的不是永远做一个出不了师门的“学生”,而是为了超越前人,超越老师。这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有点类似。学习古典文学的众多大师,目的是为了发展新时代的新诗章;学习同时代人的优点,正是为了加强自己那富有独创精神的艺术生命。杜甫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精神,闪烁着“转益多师”的光彩。唐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评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秦观《韩愈论》发挥说:“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见《淮海集》卷二二)通过“转益多师”的正确途径,广泛学习古今各家诗人诗体的优点,进一步消化吸收,自铸伟词,杜甫终于成为一个集大成的“诗圣”,成为后人的榜样。(蒋凡)

【翡翠兰苕】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四:“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翡翠,鸟名,羽毛美丽,有蓝、绿、赤、棕等色,可为饰品。兰苕,兰花。郭璞《游仙诗》有“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之句。此以喻诗歌风格之小巧美丽。鲸鱼碧海,则喻才力雄健,境界惊人。这首诗承前三首而言,谓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非当今凡庸者所可企及。小才修饰文采,或亦有可观;而未见有雄才巨力如掣鲸鱼于碧海之中者。故杨绳武《论文四则》于“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二句释云:“呜呼!此古人所以必严文章流别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果其根柢盘深,气骨厚重,笔力坚刚,虽间有未醇,无伤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词丰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纵完好可观,不登上乘。”杜甫所提倡的是富于“鲸鱼碧海”壮阔境界的独创精神,而对安于纤小娟媚的“翡翠兰苕”的小巧之致颇有微词。

(杨明)

【鲸鱼碧海】 见“翡翠兰苕”。(杨明)

【万取一收】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

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尘,空中浮尘;沤,海中水泡。悠悠空尘而舒缓无穷,海沤忽忽又为时无多,自然景象,同具含蓄之态,而有久暂浅深之分。如郭绍虞《诗品集解》所说:“尘与沤之浅深聚散,形形色色,博之虽有万途,约之只是一理,要均归于含蓄而已。含蓄则写难状之景,仍含不尽之情,也正因以一驭万,约观博取,不必罗列,自觉敦厚。”由此可见,司空图的“含蓄”,已经不仅是指诗歌的一种艺术风格,而且涉及到诗歌创作思维的问题。“万取一收”之说,对后来诗歌的形象化及典型化手法,是一种有益的启发。诗人驱驾形象思维的过程,不是自然主义的翻版,而是必须进行一番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工夫。诗人在无限丰富、变化万千的感觉材料面前,既不能仅仅是拾取其中的一鳞一爪,又不可能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他必须博观约取,“万取一收”,既广泛地留心各种事物,挑选其中最具特征而又富有代表性的生活现象,同时又从其他纷繁的生活现象中去汲取有用的材料。然后加以概括与提炼,通过艺术想象,重新整理和集中,统一为完整的诗歌艺术形象。这样创造出来的诗歌形象,含蓄曲折,意义深邃。所以孙联奎《诗品臆说》解释云:“万取,取一于万,即不著一字;一收,收万于一,即尽得风流。”诗歌之“一”,源于生活之“万”,可见诗歌艺术的形象化、典型化,植根于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蒋凡)

【稽古日新】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一《总论》:“始于稽古,终于日新。”稽,考究,研习。说明诗人从事创作必先经过一个学习古人的阶段,然而最终又须以追求创新为目的,要求诗人创作,必须学古与创新、继承和发展相结合。这种观点早为前人提出,《文心雕龙·通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谓“因”,“变”谓“革”,强调文学创作学古、求新不可偏废。皎然《诗式》卷五:“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返)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说明诗歌创作应该复而能变,既能符合诗歌的基本规范,又不陷入“相似之格”。毛先舒稽古日新说与前人这些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它又是针对现实的诗风提出的救弊主张。他在同一条诗话里,不同意如下一种看法:“夫诗必自辟门户,以成一家,倘蹈前辙,何由特立!”他认为,诗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体既屡变,备极范围”,主要的体裁格式都已经具备,后人写诗,想超越这些范围,完全“创发”新义,自成一格,是徒然无益的愿望。他批评晚明骛新求异的诗人“哆口高谈,皆欲呵佛”,

其实他们自己的创作缺点很多。有鉴于此,他强调学古的重要性,希望人们“思古训以自淑,求高曾之规矩”。毛先舒以上批评主要针对公安派及其追随者。由于他受明、清之际思想学术正统化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趋于保守,对公安派富有革新意义的诗学倾向评价很低,这暴露其文学观的保守性。但是,公安派一度不重视学习前人优秀的文学遗产,艺术上存在俚陋的缺点,这在其追随者中变本加厉。就此而言,毛先舒上述批评又有合理之处。他反对写诗完全阻断“前辙”,“自辟门户”,却同意“因变成化”。这种变化建筑在学古的基础上,犹如蜜蜂先采花后酿蜜,冶工先取矿后熔金。稽古日新说正体现了他对二者关系的辩证把握。刘熙载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艺概·诗概》)虽与毛先舒稽古日新说强调的重点略有差别,在要求兼有因革方面,他们的观点适相一致。(邹国平)

【尊古卑今】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是对于复古文风的批评与概括。语出《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勾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音也。”针对汉代经学兴盛,儒家复古思潮的弥漫,作者指出,能文通士很多,不一定就是古代圣人孔子墨子的同类。新时代的作者,其心意有所通于客观事物,于是作书喻意,抒写襟怀,同样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接受,就应该尊之为“新圣人”,何必一定要托之于古代神农、黄帝、孔子、墨子而说呢?但是世俗之人,由于受“尊古贱今”传统心理的影响,他们以是否合于“古”来衡量文章的是非美丑,因而今人之作,也往往假托古圣人之名,才能得到人们的信奉与崇拜。《淮南子》揭示这种荒谬心理所造成的错误批评,重压在文艺之上,严重影响了诗歌文学的发展。后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新论·闵友》中继承了《淮南子》的观点,一方面称颂同时人扬雄为“才智开通、能入圣道”的新圣人,一方面又严厉批评了当时汉儒“尊古卑今”的复古文风,说:“世咸尊古卑今,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者,必以(扬雄)《太玄》次五经也。”他热情歌颂了当代文人扬雄著作中潜在的创新精神,并用它来作为反对复古思想的理论武器。桓谭的理论,后来又被东汉初的王充发扬光大,如《论衡·齐世》:“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满奇,不肯图。[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论衡·案书》又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

书。”王充坚决反对这种厚古薄今的不良倾向,认为文章无论古今,批评标准只有一个,即善恶是非美丑,所以说“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论衡·案书》)。王充又根据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事实,指出了今胜于古的必然趋势。社会在发展,文学也日趋进步,“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彩,禹目当复重瞳”(《论衡·自纪》),是没有道理的,俗儒“尊古卑今”之论,是错误的。因此,他极力提倡文学讴歌当世,称誉同时的文人如班固、傅毅等为“文雅之英雄”(《案书》)。汉人对于“尊古卑今”的批评,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影响深远。如曹丕《典论·论文》及葛洪《抱朴子》,均可见其痕迹。

(蒋凡)

【贵远贱近】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是对于复古文风的又一批评与概括。语见曹丕《典论·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闻于自见,谓己为贤。”“贵远贱近”,是两汉以前早就存在的一种厚古薄今的不良倾向,它“向声背实”,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所以曹丕认为是错误的并加以指责。他因此呼吁人们抛弃这种复古主义的批评标准,要求从文学实际出发,“审己以度人”,确立公正而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古今作家作品,才能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其实,对于“贵远贱近”之论的批判,并非曹丕创始。东汉初桓谭曾慨叹时人对于扬雄这一当代文豪的轻视,他批评说:“世咸尊古卑今,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见《新论·闵友》)王充也发挥桓谭之论,云:“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匱矣!”(见《论衡·齐世》)曹丕的“贵远贱近”之论,即源自桓谭、王充“贵所闻贱所见”之言。不过比较而言,汉时“文学”,兼指学术。而魏晋以后,开始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因而曹丕之论,则由批判复古学风,逐渐转入文学批评,其“贵远贱近”,主要针对当时文坛流弊及诗文著作方面的复古文风而言,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参见“尊古卑今”。

(蒋凡)

【词必己出】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唐韩愈讨论创造性地运用文学语言的问题。语出其《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樊绍述诗赋文章)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在这里,作者借为

樊绍述(宗师)写墓志铭的机会,标举“词必己出”的宏论。如果结合韩愈的其他文章来读,则其理论意旨自明。其《答李翊书》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有关艺术形式、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方面,“惟陈言之务去”与“词必己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务去陈言,是从反面着手,扫除文学创作的一切陈辞滥调,如写美人则柳眉杏眼、西施王嫱;状景物则春花春鸟,秋月秋蝉。彼此沿袭,相互剽窃,沾沾自喜,不以为耻,文坛积弊,由来已久。“从汉迄今用一律”,慨叹无觉悟指迷之人。而“词必己出”,则以觉悟指迷自任,从正面着眼,从积极方面强调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即其《答刘正夫书》所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但是,穷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文学语言一“久”,又会因久生弊,代代相袭,不见自家面目而令人生厌。所以韩愈又有“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何其难也”的慨叹。因此所谓“己出”,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强调文风的个性化,从而进行新的创造。“词必己出”,光景日新,既是艺术上的独创,也是诗歌创作的生命力之所在。(蒋凡)

【自家真态】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文艺创作不雷同、不拟袭,能保持一己独特的风格。语见元胡祇遹《跋元李诗轴》:“大抵我辈自有胸中之妙,古人笔法自当遍修,直至自成一家乃有真态。”“真”为文学审美的基本概念,因所论角度、范围的不同,其具体所指,时有变化。《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此以自然为真,以诚为真。王充《论衡》:“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邵雍《诗史吟》:“诗史善纪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此以虚夸为伪,以质朴、写实为真。胡祇遹所谓的“自家真态”则不同于此二者,乃是以富于个性特色为真,强调文艺作品必须形成自己一家的风格。这是对真的深入一层的认识。其立论乃是针对宋金季世师古拟古的流弊而发的。其《跋遗山墨迹》云:“诗文字画不学前人则无规矩准绳,规矩于前人陈迹则正若屋上架屋。”《今文之弊》云:“记问辩博,掇拾铺张之学易;沉潜体认,深造自得之学难。今人下笔数千言尽非己意,不过剽窃掇拾,解红为赤,注白为素而已。”宋元之际随着对师古拟古流弊的批判,对文学艺术个性特征的认识有所加深。稍前,王若虚《论诗诗》云:“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是何人!”对真的看法与胡祇遹相

近。

(刘明今)

【模拟】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又作“摹拟”。是根据已有的艺术模式进行临摹仿写,没有创新,循规蹈矩。《北史·魏收传》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诗歌的模拟,是指对前人或同辈的诗从立意、技巧、格调、语词等方面进行模仿。对于习作入门者,模拟如小学生练字时的临帖,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长期如此,则会走向艺术的负面。钟嵘《诗品》评江淹:“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如:“江淹拟汤惠休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谢玄晖‘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即是此意。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初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辞,其弊亦然。”(《诗人玉屑》卷八)模拟,是有本可依,亦步亦趋。明代何景明批评李梦阳:“稍离旧本,便自机隍,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与李空同论诗书》)如李梦阳《艳歌行》第一节:“晨风出扶桑,照我结绮窗。绮窗不时开,日光但徘徊。”首两句即模拟《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末句模拟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模拟”与“偶合”不同。“偶合”是自出己意,偶同前人;“模拟”是绝无匠心,近于剽窃。吴乔《围炉诗话》说:“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蹈袭偷势亦是贼。”明屠隆批评前七子的诗文创作云:“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文论》)又说:“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则不至也。”(《论诗文》,以上均见屠隆《由拳集》卷二三)“模拟”与“自得”截然相反。“自得”是自出机杼,匠心独运,空诸依傍,前无古人。“模拟”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依样画葫芦,弃却朴真。元好问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论诗绝句》)强调的就是诗歌创作贵在自得,不能模拟。(张小平)

【以心为师】 古代诗学概念。金李纯甫批评当时拟袭陈腐的文风而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语见其《为蝉解嘲献诗》:“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金代中期文风渐趋萎弱,刘祁《归潜志》云:“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才心,故所取之文皆萎落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文章如此,诗坛亦不景气,斤斤于声律之学,以工巧为尚,多浮艳之语。因此李纯甫提出“以心为师”的主张,要“不落诗人诗”,即不要学当时一般诗人那样地写诗。他另有《西岳集序》一篇,就此论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

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师心”的提法与言志说、诗本性情说有相似处,因为心为思之官,是志或性情的载体,故师心之说从字面上解释就是主张各言其志,各抒其性情。但是“志”与“性情”二词另有其特定的内涵,在诗文批评中“志”往往表现为有关立身行事的一种理性认识,“性情”则概指受礼教规范的合乎先王之道的情感或品质。而心的概念则不同,它没有或较少有理性及教化的色彩(这里当排除心学家所谈的心),相反却强调了个性,所谓“人心不同如面”,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师心之论往往和强调个性相联系。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文章的体裁风格“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而颜之推论文重视事理,于是批评“师心自任”的倾向(《颜氏家训》)。李纯甫在总结前人正反经验的同时,提出“以心为师”之论,明显地有标榜个性的意图。故其为文似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为诗则光怪陆离,不可名状。

(刘明今)

【偷语偷意偷势】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诗僧皎然《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于闾域中之手。”并各举其例。偷语指显然袭用前人诗句。如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入隋侍宴应诏》)之句,取西晋傅玄“日月光太清”(《赠何劭王济》)之句,上三字全同,下二字字面不同,意义仍同(太清即天)。偷意谓稍变其字句而意象构思相似。如唐沈佺期“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系模仿梁柳恽“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从武帝登景阳楼》),从池水、高树落笔,以描写秋意。偷势如唐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独游》),皎然认为系由三国魏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送秀才从军》之四)而来。二诗均以前两句写神态、动作,后两句写内心活动,其意脉相似。古人作诗,在语言、意境方面沿袭前人者甚多,皎然主张创新,故于其中加以区别,认为偷语最为下劣,偷意亦情不可原,唯偷势仍具创造性,无可非议。《诗式》卷一“重意诗例”批评吴兢、元监所集秀句“多采浮浅之言以诱蒙俗,特入瞽夫偷语之便,何异借贼兵而资盗粮?无益于诗教矣”,亦于偷语极表鄙视。

(杨明)

【点铁成金】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江西诗派的一种创作主张。语见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点铁成金”是一个比

喻,指借用古人语汇,以故为新的炼字方法。“铁”指古人陈言,“金”指陈言新用,虽旧犹新。所以“点铁成金”主要是指师法和活用前人语辞的问题,与“夺胎换骨”法主要指师袭前人构思和诗意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借用古人辞语入自己诗中,既要着眼于被移借之辞能够增加新作的表现力,又要注意将其用得恰到好处,更重要的一点,要使它们在赋予新的语境以异趣别意时,自己也能获得一些新质。这样才算是“点铁成金”,否则,铁还是铁,与金毫无关涉。尽管“点铁成金”说包含赋陈言以新质的要求,作为一种诗歌主张,其造成剿袭雷同,陈旧有馀翻新不足的流弊却相当突出,后人讥其为“点金成铁”,若就其主张消极的一面和创作上的弊失而言,不无理由。参见“夺胎换骨”。

(郭国平)

【夺胎换骨】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宋代江西诗派的一种创作主张。见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载黄庭坚语:“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夺胎”和“换骨”主要都是指学习前人构思和诗意的问題,不同于“点铁成金”侧重于师法前人语辞。然“夺胎”和“换骨”二法在学习前人构思和取意的前提下,具体内容又略有区别。依“换骨”法写成的诗,其句法结构与前人作品基本相似,句数也大致接近,这是主要就学习前人构思立意而言;如果主要是取前人的诗意,则诗句也可衍演或缩减。依“夺胎”法写的诗,允许在原来作品基础上“形容”扩充,也就是在句法结构上可有较大变化,句数可有较多增加,甚至可以跨越一定的文体界限。无论是着重于学习古人语辞的“点铁成金”,还是着重于借鉴古人构思立意的“夺胎换骨”,它们本意都包含以故为新的思想,从江西诗派特别是黄庭坚的创作实际看,也未尝没有取得某种求新的效果,因此不能用“蹈袭剽窃”一语对它全盘否定。但是,诗歌创作的道路应该十分广阔,以上方法毕竟只是其中的一条仄径,而非主要的通途,黄庭坚对此强调太过,并不妥当,何况许多江西派诗人运用这种方法写诗,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故被王若虚讥为“特剽窃之黠者”。虽然黄庭坚不必替后人陷入蹈袭剽窃泥坑任过,但却说明,他提倡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本身包含着比较明显的缺点。元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上指出:“‘夺胎换骨’之法,诗家有之,须善融化,则不见蹈袭之迹。”立论比较公允,这种态度也适合于对待“点铁成金”之法。参见“点铁成金”。

(郭国平)

【舍筏达岸】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法

同则语不必同矣。……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舍筏达岸”,原是佛学术语,见佛典《阿梨吒经》。佛家以筏喻正法,岸喻涅槃,治正法到达涅槃彼岸,即正法亦应舍弃。这就是“舍筏达岸”的意思。明代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何景明都倾向于追摹盛唐之音,可是二人在学古态度上存在分歧。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里,将这种分歧概括为: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他自己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实际上反映了刻板地机械模仿与一定程度的灵动新变之间的区别。因此,何景明借用佛教“舍筏达岸”之说,指出作诗拘泥古人陈法不足取。他说:“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机陞,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说明学习古人诗法只是提高自己创作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要“推类极变”,写出古人所无,自我新“开”的诗篇,如果拘守“已陈”,未能消泯“拟议之迹”,犹如一个人毕生站在渡河的筏上,未能到达彼岸,这是没有出息的。虽然何景明自己的诗歌创作离开“舍筏达岸”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但其以上主张则有其合理的因素,与后来公安派、竟陵派追求新变的理论有潜通之处。袁枚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随园诗话》卷二)“得鱼忘筌”恰是对“舍筏达岸”下的注脚。

(邹国平)

【一师心匠】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以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提倡复古,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这观点与李梦阳一致,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则有所不同。李梦阳的态度比较拘执,主张“尺寸古法”(《驳何氏论文书》),以作字喻作文,务求与古人同。王世贞则比较灵活,指出“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据此而提出了“一师心匠”的理论主张。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师古方法,即大量阅读古人,主要是先秦两汉人的作品,求其融会贯通,渐渍于心,在写作时则不必存有模拟某家某作之意,而“一师心匠”,信笔写去,写出自己的

“意”与“境”。这样的文章,意境是自己的,格调却很高古,暗与古人相合。王世贞这一观点与何景明所说“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大致相同,但具体化了。当时后七子之一谢榛论学古人诗当如“蜂采百花之蜜”,取唐人十四家集中之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如此则“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四溟诗话》卷三),其精神亦正仿佛。当然此所谓“一师心匠”是建立在师古论基础上的,是师古论比较灵活的一种表现,它与反对复古论者所提倡的“独抒性灵”、“师心自任”有相当大的区别。(刘明今)

【无一字无来处】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宋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强调汲古博学,以提高诗歌创作水平。这从诗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方面讲,指学习儒家经义,会通事理,以合儒道。从语言锻造方面讲,指广泛积累古籍中的语汇,将它们得心应手地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后者即是“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认为,杜甫、韩愈写诗作文所以取得成功,其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落笔用字都有来历,而不“自作语”(《答洪驹父书》)。他引杜甫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自己上述意见张目(《答徐甥师川》)。他教诲别人读书,“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以备将来作诗之用(《答曹荀龙》四),认为将古人词汇积累多了,下笔时源源不断涌出,自然会写出好诗,所谓“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与王观复书》)。这是宋代文化学术高度繁荣,古代典籍广为流传,士人们普遍嗜好读书的风气在诗歌理论中的一种反映。学习和借鉴古人书面语言,是提高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黄庭坚也有一定的以古语铸新意的要求,因此以上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将这一点推向极端,以无一字无来历,每一语皆有出处相标榜,这并不符合古人诗文创作的实际情况,作为一种诗歌主张,必然会给创作带来弊端。参见“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邹国平)

【化腐臭为神奇】古代诗学概念。意为要能灵活变化古代传统,使之发出新的生命力,讲的是诗歌创作与传统的辩证关系。语见明代焦竑《与友人论文》:“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书》不借采于《易》,《诗》非假途于《春秋》也。至于马、班、韩、柳,乃不能无本祖,顾如花蜜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李光弼入郭子仪之军,而旌旗壁垒皆为色变,斯不谓善法古者哉。”这一说法,源于《庄子·知北游》:“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

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讲的是死生迁变而实质同一的观点。焦竑借以喻变化陈腐、焕发新生的“善法古”方式。唐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垒故事,宋时就被谈艺者广泛用来喻指善于点化前人作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魏庆之《诗人玉屑》数见。但焦竑此处与黄庭坚主张之“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偏重于技巧层面不同,而是尤其注重“脱弃陈骸、自标灵采”,犹如蜂采花蜜,自成一格(谢榛《四溟诗话》亦有“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佳味”的说法),这与他“诗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直取胸臆”的主张相协调,扬弃了明代前一时期的复古的局限,为后来标举“性灵”者倡其先声。(陈引驰)

【宫声】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桢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宫、商、角、徵、羽,原是音乐的“五声”,其中宫声宽顺和响。文学家则加以引申,用来论诗。诗之宫声,指境界阔大,气势磅礴,高响亮调的作品。所谓有“金石之声”,即用以称美这类诗歌,其意义已经超越单纯音韵的范围。《老子》:“大音希声。”推崇大音。季札评秦风为“夏声”,“能夏则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夏”意谓雅。他以雅音为大,加以赞美。宫声之说即是这种以大为美的美学传统的体现。韩愈赞美李白、杜甫的诗章“乾坤摆雷轰”(《调张籍》),也反映了对这种诗歌美境的向往。钱谦益受前人这些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也大力提倡大音宫声,将其作为理想的诗歌风格加以追求。他认为,美的诗歌应该具备铿锵宽宏、从容和清的声韵,高华骏朗、雄奇伟丽的辞采,铺陈排比、枝丰叶茂的结构,从而显示气象宏博、脉理沉厚、深稳雅健的整体风貌。钱谦益一般来说肯定诗歌的体貌应该多姿多态,竞相争长,但他并不认为不同的风格都是等值并重的,而是存在主次甚至正负的区别。他以山川形势和居室构造作比喻,说明铺陈排比和凄细幽眇两类不同的诗歌艺术特点的主次关系,指出前者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见《刘司空诗集序》)。这其实也是将大音宫声之作摆在首位。他自己的诗作很显明地反映了这些特点,评赏别人的作品,也常常对类似的风格特征作会心的赞许;反之,对前后七子疏阔嘈杂和竟陵派幽寒尖仄,因不合其大音宫声的风格要求而遭致排击,这又反映出钱谦益未能将其多种诗歌风格互相共存的思想真正坚持到底。但是,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

呼吁诗文必须有益于天下,反映天崩地解的时代,弹唱反抗凶暴,批判黑暗的高亢强音,这又从另一角度,为大音宫声之说灌注了光彩照人的思想蕴涵。

(邹国平)

【律为骨】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元方回《汪斗山识悔吟稿序》:“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此诗家大概也。”方回《瀛奎律髓序》称:“诗之精者为律。”其书“大旨排西昆而主江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选唐宋律体,评语亦大都就诗律而发。其所谓诗律大致可分为句法与结构两方面。句法主要指骈偶对仗之法,如评陈师道《寄潭州张芸叟》“秋盘堆鸭脚,春味荐猫头”语云:“‘猫头’、‘鸭脚’工矣。……句法矫健,非晚唐能嚆咿也。”评赵昌父《次韵叶德璋》云:“‘卜以决’、‘镜频看’,此联已奇。‘来今雨’、‘后苦寒’,此联又奇。诗骨耸东野,此之谓欤?”他对律句的要求是不作初晚唐丽辞,而以生新瘦硬为高,称此类诗句为有骨。如评陈师道诗“全是骨,全是味,不可与拈花簇叶者相较量也。”评赵昌父诗“句句是骨,非晚唐装贴纤巧之比”。关于结构,方回以为律诗结构重在其情景描写的安排,特别是中二联。他于《瀛奎律髓》诸评语中指出:“律诗初变,大率中四句言景,尾句乃以情徼之,起句为题目。”而杜审言后始发生变化,至盛唐大致“两句言景,两句言情。诗必如此,则净洁而顿挫也”。杜甫即是如此,“多是中两句言景物,两句言情。若四句皆言景物,则必有情思贯其间”。又谓“盛唐人诗多以起句十字为题目,中二联写景咏物,结句十字撇开,却说别意。此一大机括也”。而“晚唐诗多先锻景联、颌联,乃成首尾以足之”,如此句意便不贯。后来清冯舒就此批评道:“方君论诗必分情景,又必以一字为诗眼,此殊不然。……总之,言景必兼情,言情必兼景,或专情,或专景,而虚字、新字自具其中,此作诗之法也。”纠偏之论,指出了诗律、诗法灵动的一面。(刘明今)

【意为脉】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元方回《汪斗山识悔吟稿序》论学诗之要:“古诗以汉魏晋为宗,而祖三百五篇、《离骚》;律诗以唐人为宗,而祖老杜,沿其流止乾淳,溯其源至洙泗。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此诗家大概也。”此语为方回论诗总纲,其《瀛奎律髓》亦曾多处语及。“意为脉”之“意”指作者作诗的立意。宋人作诗主意,情、意之分是论诗宗唐或宗宋的关键。晚明陆时雍论诗主汉魏盛唐,其论称:“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诗镜总论》)方回论诗首称“意为

脉”,正体现了宋人祖述杜甫的诗学精神。

(刘明今)

【字为眼】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元方回《汪斗山识梅吟稿序》:“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此诗家大概也。”其《瀛奎律髓》一书评析甚细,十分重视一词一字的锻炼,凡句中紧要字,遂名之为句眼。如评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句,以“坼”、“浮”为句眼。评陈师道《早春》“近年遽得春,冰开还旧绿”句,以“遽”、“还”二字为句眼。评曾幾《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厌看宾客空投谒,强对妻孥略举觞”句,以“厌”、“空”、“强”、“略”四字为句眼。可见其所谓句眼乃是句中起关键作用的动词或表示强烈语态的副词、连接词等,相对于句中的名词、形容词而言,方回往往把它们都称为虚字,认为“诗中不可无虚字,然用虚字而不切,则泛也”。虚字而用得确切有力,如画龙之点睛,遂为句眼。又论云:“凡为诗,非五字、七字皆实之为难,全不必实,而虚字有力之为难。……惟晚唐诗家不悟,盖八句皆景,每句中下一工字,以为至矣,而诗全无味。所以诗家不专用实句、实字,而或以虚为句,句之中以虚字为工,天下之至难也。”当然,拘泥于诗法,斤斤计较一句一字之“诗眼”,明显有死于句下的局限。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方回提倡“诗眼”,重视诗词中虚词的重要作用,注意运用虚词来体现诗歌的精神,启发了后人对于虚词的语法作用和修辞效果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诗歌艺术语言的健康发展,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刘明今)

【圆美流转】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南朝齐梁时提出的诗歌审美要求。《南史·王筠传》载沈约之言云:“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结合当时诗坛风气,可知其语乃是要求诗歌做到声韵和谐流美,语言明朗畅达,字句锤炼工稳,结构趋于紧凑。南朝宋三大诗人中,谢灵运写景之句自然明丽,但就全诗而言,往往采取铺陈的写法,时或失于剪裁,又贵尚排偶,讲究用典,句法时亦板拙,故易给人以冗漫沉滞之感;颜延之尤喜用典,颇觉雕琢堆垛;鲍照一部分五言诗穿凿取新,常有生造语词之弊。宋齐间诗人江淹,诗风亦近鲍照。圆美流转的要求,实与刘宋诗风异趣。而谢朓本人创作,却能体现这一要求,故深为时人所爱赏。以后何逊、萧纲、阴铿等人之作,均趋向于圆美流转,对于古体诗向近体诗、六朝诗向唐音的过渡,颇有贡献。但若过于圆熟,易陷轻滑;且诗歌风格须多种多样,若限于圆美一路,久之亦易使人生厌。故后人也有提出不同看法者,如陆游《答郑虞任》:“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说方误人。”又有人认为圆美流转之意并非主张流易,而是要求周到

妥帖,完美无缺。如刘克庄云:“余以宣城(谢朓)诗考之,如锦工机饰,玉人琢玉,极天下巧妙;穷巧极妙然后能流转圆美。近时学者往往误认弹丸之喻,而趋于易。”(《江西诗派序》)还有人认为圆美流转是说作诗当用活法。如吕本中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夏均父集序》,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序》所引)其说虽未必合乎谢朓原意,但引申发挥,正可见诗歌审美趣味的历史变化。(杨明)

【音声迭代】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晋陆机讨论诗赋文章运用声律的问题。语出陆机《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嶇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渙浥而不鲜。”《文选》李善注云:“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意思是说,文学的声律是由语言的声和音的更换迭替组成的文章,犹如颜色鲜明的五彩交织而成的锦绣。在这里,陆机的“音声迭代”指文学语言的音乐美。文学佳作,不仅要有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华丽的词藻,还要在声律运用方面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特别是诗歌艺术,西晋以后,人们更注重其音节之美。语言音韵的节奏旋律,长短高低,自然变化,奥妙无穷,很难把握。诗人若能掌握它的变化,字句安排有序,音声低昂有节,那么犹如开流纳泉,就会富有诗的韵律之美了。陆机论声律,虽然还没提到平仄律,在文学史上也还是比较简单的,但却富有理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后来齐梁时代永明声律所提出的清浊相间和注意四声八病的运用,即直接受到陆机“音声迭代”的启发。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也有“声有飞沉”之说。虽然所论更为细密,但是注意运用汉语音韵的特点,来造成一片宫商的诗歌语言艺术的音乐美,其基本美学思想,明显受到了陆机的启迪。

(蒋凡)

【适者为美】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本自然,以吟写性情、悦耳快心为适的观点。语出明屠隆《旧集自叙》:“客语屠子曰:‘往子与客论诗文于京师,则古证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弹射。言辩矣,而持论杂无定,子知诗美与恶与?何说而定?’屠子曰:‘余恶知诗,又恶知美,其适者美邪?夫物有万品,要之乎适矣,诗有万品,要之乎适矣。……余读古人之诗则洒然以适,而读今人之诗则不适,斯其故何也?其

美恶之辨与?余恶知诗,又恶知美!”在此文中,屠隆以物之万品来喻诗之万品,自然风貌有“天青日出、山川晶晶”与“雷电交至,崩云走雨”之异;服饰衣着有“翟冠翠翘”与“锦衣綦巾”的不同,它们各有所适,故各有所美。诗亦然,人们的性情有急有缓,有严刻有平易,因此发而为诗,其诗歌的风格亦无所不可,或为奇崛,或为平畅,总之应当是性情的自然流露。屠隆“适者为美”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七子派复古拟古的流弊而提出的。其《与友人论诗文》云:“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七子派复古,务求古人诗作的高格逸调,模仿古人的声韵腔口,因而给自己的创作套上了枷锁,是为不“适”。屠隆也称美唐诗,但认为唐诗之妙即在“去三百篇最远”(《文论》),“唐人长于兴趣,兴趣所到,固非拘挛一途”(《与友人论文书》)。本此他批评当时诗坛云:“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可见“适”的精神在于“自得”,在于与诗人的性情相合。屠隆此论对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当有所启发,因为“以适为美”与袁宏道所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

(刘明今)

【美恶对待】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叶燮《原诗》:“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对待,双方并峙,相对而立,通常指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事物或对照鲜明的事物特征。叶燮认为,天下万物和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可发现对待之义,如日月、寒暑、昼夜、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文学作品也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如平奇、浓淡、巧拙、清浊等等。诗人的创作则有会通与异变、陈熟与生新的不同追求。凡此种种,都说明对待之义普遍存在,矛盾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文学创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叶燮与人论争,坚持如下二点:其一,对待两端,各有美恶。他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是非彼,完全以甲为美,全然以乙为恶;评价文学作品,将一种风格褒得完美无缺,而将另一种风格贬得全无是处;或者认为,诗歌创作只有追求新变才值得肯定,提倡复古则应该统统否定。叶燮认为这样的态度和做法是不足取、不值得提倡的。“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任何片面的取舍,都将陷入偏颇。这对鼓励和扶助多种诗歌风格的产生、发展,正确处理学古和求新、继承和创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二,对待两端的美恶,并不是一成不变,始终如初,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和补充兼济的,“幽兰得粪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又比如他认为,人皆以生为美,以死为

恶;以富贵为美,以贫贱为恶,然而,尽忠而死与媚佞苟全,清贫贱与浊富淫贵,其美恶又恰好换易了位置。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陈熟”偏于拟古,“生新”偏于求变,假如学古不以新变为目的,新变不以学古为前提,都将成为偏失之见,只有“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他要求诗人采掇对待的两端,使创作朝着“全美”的方向发展,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种卓越的见解。刘勰主张奇正相参,华实并茂。钟嵘肯定“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序》)。殷璠赞成“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河岳英灵集论》)。竟陵派提倡学古与写心相结合。这些主张都包含着艺术辩证法因素。叶燮的论析与他们的意见在思想实质上保持一致,而分析则非常深刻透辟,在艺术辩证法方面,又有超越前人之处,在古代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

(邹国平)

【醇美】 古代诗学概念。醇美,是指诗味的醇厚隽永、精美可口。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司空图以韵味论诗,标举“味外之旨”。“醇美”之味在“咸酸之外”,所以“醇美”也是“味外之旨”。味原本于意,意咀而有味。“醇”,非指齿牙之间口味的浓厚而腻,而是咀嚼过后余味的隽永而长。诗如何才能有“醇美”,司空图以为必须“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形象可感,近在眼前,涵蕴深厚,妙意无穷,故“近而不浮”。境界超远,言所不追,远中有远,思与境谐,故“远而不尽”。只有这样,才有“韵外之致”。这样的诗,才是“全美”之诗。“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全美”,也就是“醇美”。宋代杨万里《颐庵诗稿序》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辞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辞。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辞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辞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杨万里继承了司空图“醇美”韵味之说而加以具体发挥。“醇美”,首先要求作者笃于朴真,情感深厚。虚情假意,是写不出“醇美”之诗的。其次是要求在表达时以象传意,神余象外,不能语尽意尽,一览无余。司空图的“醇美”诗味说,对宋严羽的“妙悟”说和清王士禛的“神韵”说,都有巨大的影响。

(张小平)

【分解】 古代诗学概念。清金圣叹说自己批点诗歌,既不好释事训名,也不专门附事见义,“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徐子能增》)。据他介绍,“分解”一

词含义与庄子“庖丁解牛”的启示有关,牛体有骨架筋络,一首诗有起承转合,“分解”就是通过分析作品形式上的结构关系以求诗义的一种方法。他将一首律诗分为前解(一至四句)和后解(五至八句)两部分,每两句为一个语意单位,分别构成起承转合关系。其中前解带动后解,而前解中的一二句更是具有统辖全诗的作用,所以他论诗每重发端。他不仅认为律诗可以分为二解,唐人长篇也多以四句为一解,同样存在起承转合的结构关系。金圣叹论诗不仅重感悟,也重分析,“分解”唐诗是他重分析的表现。将律诗分为前后两解,又是针对世人好讲律诗中间两联,然后“装头装尾”凑成八句的作法,后者不符合艺术构思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原则。金圣叹把律诗分前、后解,其理论的突出之处,恰是强调诗的整体性。他说律诗前后解的关系,好比人之一呼一吸,射手拉弓放箭,雨势之来之去,完全是前后贯通,一脉相联的整体。诗人写首联时,末联实已装入胸中。如此,一首诗才会气畅势顺,严密完整。有人指责金圣叹“诗分二解”是腰斩唐诗,后人更批评他分解唐诗的方法是八股习气的表现。这些批评自有一定道理,因为他的分解说确实存在刻板、拘泥之弊,他运用分解方法解说具体作品,有时难免牵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是,金圣叹用这种方法分析诗歌,对作品释义,又确实有不少成功的例子,给人新颖之感,其成绩不可抹杀。更重要的是,分析诗歌是否能找到一个简明易懂,并且有广泛适用性的方法,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金圣叹分解说作为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和探索,是有一定意义的。(邬国平)

【才调】古代诗学概念,指诗人的才气格调。但论其语源,原是形容人的文才。如《晋书·王接传论》云:“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又《隋书·许善心传》云:“(善心)笺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谓人曰:‘才调极高,此神童也。’”后来诗人多加运用,如杜甫《送封主簿》诗云:“青春动才调,白首缺辉光。”又李商隐《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逐渐成为诗坛常用术语,以“才调”称颂诗人才华横溢,具体形容其佳构杰作的风貌格调。如温庭筠《春暮宴罢寄宋寿先辈》诗云:“苏小风姿迷下蔡,马卿才调似临邛。谁怜芳草生三径?参佐桥西陆士龙。”发展至晚唐五代,后蜀韦毅编撰唐诗总集,遂以《才调集》名其所著。自序云:“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逐渐与儒家诗教保持距离,以为诗歌非关教化,而用以自娱,是诗人才气的抒发。这与唐末以来诗坛风气相一致。其时黄滔《答陈璠隐论诗书》云:“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故韦毅《才调集》十卷,所选颇多男女

情爱之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穀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未为无见。”于是“才调”之称,在晚唐五代,具有特定的时代审美意义,与当时流行的“今体”歌诗相联系,以抒发诗人主体情绪为主,风调偏于秾丽流畅,比较自由地展现了诗人的才华。因而后代持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说者,常加批评责斥,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今体”才调歌诗的特殊审美价值。后来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以为诗人才思决定作品之格调。其所谓“才”“调”理论内容已有明显的变化,发展成为明后七子复古格调说的理论之一。(蒋凡)

【虚静】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在古代文论中是指文人从事写作时出现的一种凝神运思的特殊心态。其特点是排除杂念,宁静专一,思理调畅,志气和谐,精神达到了高度纯净与自由的境界。语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脏,澡雪精神。”对“虚静”作为创作心态给予了明确的理论概括。所论来源于古代道家哲学。《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它最早把“虚”和“静”即人的心灵的净化作为正确认识事物的主观条件。今存《管子》一书中,据考为宋钘、尹文派著作的《心术》、《白心》、《内业》诸篇,又系统地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要求主体“虚壹而静”。所谓“虚”是指“无为”、“无藏”,“去忧、乐、喜、怒、欲、利”;所谓“静”是说“勿先物动”,“感而后应”;所谓“壹”,则是“专于意,一于心”,“无以物乱官”。宋尹派的“虚静”说,沿着主体能动的方向深化、展开了。《庄子》中又把《老子》的“致虚守静”说发展为“心斋”、“坐忘”。《天道》中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知北游》中假托孔子、老聃的对话,而把“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击而知”,即主体的净化作为人与“至道”契合的途径。《达生·梓庆削鐻》更把致虚守静,超越物累同艺术品的创造活动直接地联系起来,从而给以后的创作心态论以极大的启示。如东汉蔡邕论书法创作,就强调“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笔论》)。刘勰论“神思”先讲“疏淪”、“澡雪”,也直接受其影响。不过,刘勰的创作心态论,同时也受荀子的影响。荀子从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出发,赋予“虚壹而静”以思维规律的准确内容。他认为:“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

……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解蔽》)刘勰论创作的虚静心态,既讲疏淪澡雪,净化主体,又讲“积学”、“酌理”、“研阅”、“绎词”,即把虚静心态贯通于艺术思维辩证运动的全过程。这同道家虚静说中追求的超越思维程序,使素朴人性同宇宙本体直接契合是大异其趣的。刘勰之后,把“虚静”作为艺术思维时主体心态和审美把握之特点、规律的理论家就很多了。如苏轼《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朱熹《清邃阁论诗》:“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事物……所以做得来精。”魏禧《许士重诗序》:“诗之为物,触于境,感于事,而勃然发诸言,是动物也。然非有静气以为之根,则嚣然杂出,不能自成文理。虽工于字句,侈于文,而真意消亡,无复可以言诗。”其他如清代《而庵诗话》论作诗必须“心闲”、“气静”;袁枚《续诗品》之讲“斋心”;况周颐《蕙风词话》之论“词境”等等,都把虚静心态作为审美把握的关键。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把虚静之说引入乐论、画论、书论乃至小说、戏曲创作与鉴赏。论乐如唐代薛易简之《琴诀》、白居易之《清夜琴兴》,明冷仙《琴声十六法》、杨表正《弹琴杂说》、徐上瀛《溪山琴况》;论画如宋郭若虚之《图画见闻志》,明吴宽《书画鉴影》、李日华《恬致堂集·书画谱》,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其理论影响的深广。(黄保真)

【浮声切响】古代诗学概念。原是齐梁沈约关于诗歌声律之美的论述。语出其《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以音乐节奏来比喻诗歌的声调音律之美。宫羽,原指音乐五音的宫商角徵羽,这里借喻为语音四声的代用词。浮声,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南北语音不同,谓“或失在浮清,或滞 in 沈浊”,则“浮清”并列,浮声指清音。切响,与浮声对立而言,意指浊音。又从全文看,浮切、清浊,又与轻重之义相当。所以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直谓“浮声切响,即是轻重”,也有一定道理。“浮声切响”、“低昂互节”数句,是以沈约为代表而提倡的永明声律说的总的原则,意谓诗文遣言用字,务使其声音富于变化,避免枯燥单调,以求错落有致的和谐之美;如同各种色彩相对比而鲜明悦目,又如各种乐器相配合而优美动听,给人以美的享受。沈约以此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美丑工拙的重要标准之一。并且自诩为“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其实,对于汉语汉字单

音独体易于配合成对而富音乐美的特点,沈约以前,已具朦胧认识。如晋陆机《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谓“性别宫商,识清浊”云云,皆为沈说之所本。而到六朝齐之永明年间,因受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据陈寅恪《四声三问》),沈约利用前人研究声韵的成果,结合诗歌文学的实际,正式提出四声说。在沈约等永明诗人的提倡下,诗歌的音节美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诗篇的声调韵律逐渐被发现并加以运用,四声说成为积极的声律,但是八病说则转为消极的声律,于是开辟了五言古体诗向律诗转变的途径。唐人取其有关四声的积极声律,屏弃其繁琐声病之说,于是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永明声律说,过分讲究声病,有伤语言真美,又助长了六朝堆垛雕琢的不良诗风,所以受到钟嵘《诗品》的批评。(蒋凡)

【尽善尽美】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是孔子对于古代乐舞的批评。语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相传是虞舜时的乐舞名,据说是表现舜接受尧的“禅让”以继承其帝业的内容。《武》,相传为周武王时的乐舞名,据说是表现武王伐纣以建立新王朝的内容。“美”与“善”,是孔子文艺批评的两个基本标准。孔子认为,周武王之乐《武》虽然达到了“尽美”的标准,但比起相传为舜乐的《韶》来说,则略逊一筹。主要是因为《武》未“尽善”,在表现仁德方面尚有欠缺。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韶》表现了“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则反映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朱熹注:“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说明“美”主要指艺术形式,“善”主要指思想内容。在孔子看来,“尽美”的艺术不一定是“尽善的”;同样,“尽善”的艺术,也不一定是“尽美的”。在“美”与“善”的矛盾差异中,应该力求“美”与“善”二者的高度统一,就像《韶》乐所达到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那样。虞舜的仁爱精神,自然融汇到《韶》乐中去,因而形成了与“尽美”的艺术形式完全融和统一的“尽善”内容,“美”与“善”相互融和,只见其一,而难分为二。所以孔子在齐闻《韶》,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并发出了衷心的赞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他既深深地感染于《韶》之高尚情操,又陶醉在它的优美的艺术韵味之中,精神上的审美境界,远远胜过了物质的追求与享受。后世文艺批评与欣赏中,如王充的“美善不空”(《论衡·佚文》)之论等,即受孔子“尽善尽美”的启发和影响。(蒋凡)

【自然】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在诗论方面,较早见于六朝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又钟嵘《诗品》反对堆砌故实,质言玄理,而标举“自然英旨”。在刘、钟之前及以后,运用“自然”概念者代不乏人,综其要义有五:一、自然(天)是一种本体性之美的本原。二、自然(天然、天成)为自存自在的审美客体。三、自然指创作主体特定的审美方式。四、自然又指艺术之美的境界、风格的一种类型。五、自然还是文字型文学语言审美表现的一种最上乘的境界。以上诸义,在古代是随着文艺美学实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并在思辨哲学(主要指道、玄、禅,当然儒家如《易》也言自然)的推动下,逐步展示出来的。在道家及玄学哲学中,“自然”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重要范畴。而在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古代美学中,“自然”的义蕴也主要在美的本体层面上展开。“自然”作为哲学概念初见於《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过在道家著作中,“自然”更多简称为“天”,即自然天成、不假人为、本真固存的意思。如《庄子·达生》的“以天合天”的自然,又云:“圣人者原天地之美。”(《知北游》)“天地之美”也即“自然”之美。他强调人的审美活动不应当出于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扭曲人性和物性,而应是人的本体同自然本体的契合无间。但是,以上只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然”,而表现为对于审美形式的追求和审美意义的探索,则是六朝人,如刘勰、钟嵘的论述,开启了转变的端绪。但当时的“自然”,因六朝人重华艳绮靡,所以在创作和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占主导的倾向。只有到了唐宋以后,随着禅宗哲学对文人精神生活、观物方式的深刻影响,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审美经验的丰富积累,和诗论中对冲淡素朴之美的推崇,和兴象、意象、意境诸论的发展,把人们对艺术的特殊本质及艺术思维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才逐渐成为艺术家、理论家审美追求的主要倾向。“自然”作为审美范畴的理论内涵,才在主体、客体、境界、风格等层次上逐渐充实丰富而全面展开,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理想境界。要言之,唐宋以后的“自然”至少有以下几层审美意义。首先,指自存自在的客体,其中包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社会人生的种种境象。但是,“自然”客体变成具有审美意义的客体,必须经过人自觉的审美创造活动的转化,才能现实地成为审美对象。所以古人论绘画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〇)。其二,指主体的审美方式。其特点在于审美主体对自身的性情人格和对外物的形相质地,作出超功利甚至是无意识的自由的审美

把握。如唐皎然称谢灵运“得空王之道助”,其诗“真于性情,……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既指出了这种艺术思维与佛学参悟的关系,又说明率性而适,超然无心,即为自然。唐李德裕《文箴》云:“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雕琢藻绘,弥不足贵。”又如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云:“靖节诗,直舒己怀,自然成文。”进而突出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自然流露。其三,一般又作为艺术美所达到的很高的审美境界。如李白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真自然。而司空图《诗品》专设“自然”一品,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形象地揭示出诗歌中自然之境的审美特征和创造规律。其四,指中国传统的文学中艺术语言的一种上乘表达的境界。如钟嵘《诗品序》的“自然英旨”,萧纲《与湘东王书》的“吐言天拔,出于自然”,都是例子。至宋以后的诗文理论,更深入一层讨论用字造语的“句法”、“字法”,要求从规矩法度入手,又超越于规矩法度之外而达到的自然浑成的语言艺术的高境。“自然”在语言文字符号系统的层面上的义蕴,还是对文字型文学的语言艺术之极至的一种理论概括。

(黄保真)

【清真】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晋山涛称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原用于品鉴人物,指其自然真率,不矫饰性情,不为俗尘所染。后为文学家所接受,用来批评文学。如李白《古风》之一:“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颂扬唐王朝上追黄帝、尧、舜,实行无为之治,其中亦包括实施所谓崇尚淳质、屏黜浮华的文化政策。李白认为此种政策促使文坛风气朝自然质朴的方向转变。他本人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之美,其诗作明朗自然,奔放飘逸,正可谓“清真”理想的体现。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恶华好朴,去伪存真,即“贵清真”之意,殷璠也将统治者所宣称的文化政策与诗坛风气相联系。又清代统治者曾要求文风“清真雅正”。桐城派文人方苞阐说云:“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进四书文选表凡例》)要求文章内容合乎儒道。史学家章学诚则云:“论文以清真为训。清之为言不杂也,真之为言实有所得而著于言也。清则就文而论,真则未论文而先言学问也。”(《信摭》)重视文章的精纯不芜杂和作者的学识。

(杨明)

【天真】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文自然真率,有本色之美。李白《古风》三十五:“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言有的文士不通大道,不知为文之根本,徒知文采华丽、雕虫篆刻,丧失了天然真率的本色。其语体现了李白以自然为美,鄙薄涂饰雕琢的诗歌美学思想。中唐诗僧皎然亦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诗式序》)又云:“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诗式》卷一“取境”)认为天真与修饰可以并存,做到既本色自然又词采美丽。又云:“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认为天真并非不假思索,率然命笔,而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因此,为诗须经苦思,但诗成之后,却有平易自然之貌,似不思而得。天真之境,似易而实难到。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四)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认为天然真率的诗歌具有永恒的艺术力量。

(杨明)

【作用】 古代诗学概念。特指文学家的艺术构思。中唐诗僧皎然屡用其语。《诗式序》:“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言诗人想象,须力求广泛深入,无所不至;裁成诗句,须反复苦思。其意象虽出自诗人之心,而奇妙有如神授。又云:“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诗式》卷二)势有通塞,指诗歌意脉层次之安排,或顺或逆,或断或续;意有盘礴,指意旨兴象之丰富。二者皆诗人构思所得。皎然评历代诗,认为汉代苏李诗乃“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诗式》卷一)。苏李诗古朴浑成,未见构思痕迹;《古诗十九首》乃始见构思之功效。皎然对谢灵运评价极高,而称其“尚于作用”(同上),可知他重视构思。又曾说:“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同上)谓严整的声韵格律并不妨碍诗人构思,高手自可于规矩束缚之中别开天地。明人许学夷评汉魏诗,也用作用一语。云:“汉魏五言,由天成以变至作用。”(《诗源辨体》卷三)他引申皎然评《十九首》“始见作用之功”语,评魏诗多用“作用之迹”语,并说“功”、“迹”,二者不同,“功则犹为自然,迹则有形可求矣”(同上),认为魏诗与汉诗相比,人工构思之迹明显可求。

(杨明)

【直致】 古代诗学概念。率直粗重,质朴古雅,就是直致。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七字俱平,而逸价终存。”钟嵘《诗品》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可见,直致首先是指情感的率直、粗壮、凝重、厚实而

言,它与婉曲、纤巧、矫饰、佻荡是水火不容的。刘勰评建安时文“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有正直诚实之性情,才能唱出梗概多气的诗语,虚伪做作与直致是绝对无缘的。真气内充,朴力厚积,这是直致的根本。叶燮《原诗》说:“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可称“直致”的正解。直,敢于面对苍凉的人生,所以直致往往与悲慨、怨刺结伴,反映民生疾苦。“梗概而多气”,正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但是成功的“直致”并不流于叫嚣,一泻无余,而是往往借鉴风骚的传统,形象地再现事物和表达情态。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其格调就“近于国风”,鲜明而深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慷慨悲歌,神完气足。可见,“直致”最为近古。直,才随遇而发,不拘格律,所以,直致的诗歌往往语少切对,而发音强劲。直致诗的语言虽然质朴,但不粗俗,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二句和“呦呦鹿鸣”四句,都采自《诗经》,显得唱叹有致。《潜溪诗眼》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格高雅,格律道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这一段话,于“直致”叙说最为详明。

(张小平)

【本色】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意为事物的本来颜色、本来面目和原有的特性。文学批评中,“本色”首先用于诗文批评,后来又被广泛用于戏曲、小说批评,形成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本色论”。它的主要涵义包括:一、与华采相对,指朴素质实的诗文风格。语见《文心雕龙·通变》:“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刘勰不满后世文风“采滥忽真”(《情采》),要求以朴素雅正的儒家经典为榜样,“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这是“本色”一词首次直接使用于文学批评,它与“文质论”中的“质”(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意思相近。后人使用“本色”一词,大都不离刘勰归返本素自然的主张,但又不拘泥于他以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为“本色”的看法。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称赞韦太守诗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毛先舒云:“记云:‘白受采。’故知淡者诗之本色。”(《诗辨坻》)卷一“总论”)贺贻孙云:“又如斛律金目不知书,及作《敕勒歌》云,……天然豪迈。……以此推之,作诗贵在本色。”“今日学诗者,亦须抛向水中洗濯,露出天然本色,方可言诗人。”(《诗筏》)针对人们以藻饰为难,“本色”为易的看法,有人提出:“大璞不琢”

的“本色文字”是更难企及的美境(阙名《静居绪言》)。二、“本色”往往要求直抒性情,实写景物,较少受诗歌对仗、声律、用典等格律规范的严格拘束。明代唐宋派提倡“本色论”,以为文章的“本色”在于“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这才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写诗也贵“本色”,陶渊明“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以为上乘文字”(唐顺之《又与洪方洲书》)。说明创作诗歌散文的关键是抒发胸臆,不雕琢,用自然质朴的语言,流露心声,这才是“本色”美。沈德潜指出,诗有以不援引典故而高,以弄逞学问而卑,“假如作田家诗,只宜称情而言,乞灵古人,便乖本色”(《说诗粹语》)。尚铨乔也推尚“本色极高”之诗,不满以诗“逞博”和“掉书袋”(《三家诗话》)。赵翼《瓠北诗话》卷一〇以“白描”和“使典”作对照,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评陶潜《和郭主簿》诗云:“一味本色真味,直书胸臆。”评陶《杂诗》云:“白描情景,……非庸俗摹习所及。”“白描”之意正与“本色”接近,均指据实叙事,即目状景,即心抒情。三、各类文体的风格特性和根据某种文体初创时期的艺术特点而形成的基本风格规范。如早期的词以婉丽、言情为主要特点,后来就逐渐地被看作是词的“本色”。诗与文属两种文学体裁,二者特点互淆则被看成不符“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就诗歌而言,具体的体制也有具体的风格基准,如《竹枝词》,“此体本于巴、濮间男女相悦之词,刘禹锡始取以入咏,诙谐嘲谑,是其本体”(陈仅《竹林答问》)。“本体”即“本色”,所以张笃庆论《竹枝词》:“其词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见《师友诗传录》)四、指诗人作品独特的体貌特征。如:李调元以“清远闲放”为陶渊明诗歌“本色”(《雨村诗话》卷上),杨际昌评陈维崧诗“大约风华是其本色”(《国朝诗话》卷二),延君寿举李白“欲将辞君挂帆去”的诗句为“太白本色”(《老生常谈》)。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本色”一词,意思相当于指诗人的创作个性,“十子而降,多成一副面目,未免数见不鲜。至刘、柳出,乃复见诗人本色,观听为之一变”(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在戏曲批评中,“本色”还常指诸众耳,“令老姬解得”(何良俊《曲论》)。其要求的通俗化程度又较诗文为高。(郭国平)

【白描】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指绘画

的一种技法,用墨线勾勒画物轮廓,不着颜色或略施淡墨渲染,多用于人物、花卉画。如元张昱《李龙眠画醉中八仙歌》云:“龙眠白描谁不赏?胸次含空生万象。”而“白描”一语用于文学批评,多指小说创作中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塑造鲜明生动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用“白描”一语评论诗歌,主要指即目状景,随心抒情,据实叙事,议论不著典故。赵翼以“白描”与“使典”作为对照,“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吴梅村(伟业)好用书卷,而引用不当,往往意为词累。初白(查慎行)好议论,而专用白描,则宜短节促调,以道紧见工,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翻致臃滞,一遇白描处,即爽心豁目,情余于文。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觉寒俭,一遇使典处,即清切深稳,词意兼工。此两家诗之不同也。”(《瓠北诗话》卷一〇)指出“使典”可以使诗意“深厚”,“白描”能够使诗情显达,作诗应该撷取二者长处,避免各自之失。方东树说:“大抵古诗皆从《骚》出,比兴多而质言少。及建安渐变为质,至陶公乃一洗为白道,此即所谓去陈言也。”(《昭昧詹言》卷二)“白道”即是“白描”的意思,指诗人述志抒情直畅顺达,不同于比兴之体寄意微婉幽曲。绘画中“白描”与“本色”意通,汪禹九说:“白描人物,水墨烟云,画之本色也。”(自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六)诗论中的“白描”也与注重显达自然的“本色”概念相契合。参见“本色”。(郭国平)

【妙造自然】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歌创作元气充沛,精神发越,臻于自然高妙的境地。语出唐司空图《诗品·精神》:“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鸂鶒,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司空图《诗品》列二十四品目,另有“自然”一品,以“当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杨廷芝《廿四诗品浅解》)为自然。此“精神”一品则强调“自然”之境的取得必以“精神”为底蕴,并非是不经意地随手拈来皆“自然”。首先当收摄心气,使精神振作;次则求环境之契合,譬如春日之鸂鶒,杨柳掩映下的楼台,诗人有清酒深杯相伴,有高人逸士相往来,则精神愈益爽发,此时“生气远出”,落笔为诗,便可臻于自然之妙境。因为宇宙万物自然之道本是充满蓬勃生机的,故司空图于此强调指出有生气、有精神者为自然。此亦与“自然”一品所谓“俱与道往,著手成春”之意相合。就此清孙联奎《诗品臆说》解释道:“文字不自然,精神不振作故也,有精神自能入妙。余尝爱杜诗‘两个黄鹂’绝句一首,无一字不精神,无一句不自

然,通首摸之有棱,掷地有声,又浑融无迹,则诚妙造自然而不容人裁正者也。”以自然为贵的审美观肇端于道家,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本于“道”,“道法自然”。庄子批评“澹漫为乐,摘僻为礼”(《马蹄》),指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这是一种以质朴为自然的审美观。然自然本身又是丰富多彩具有无限生机的,故渐渐地以生动为自然的审美观也出现了。钟嵘《诗品》引惠休语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李白《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亦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自然的艺术风格,均着眼于自然的生机。但是,司空图的“妙造自然”,又进一步将自然的艺术风格与作者的精神相联系,认为只要诗人有真思想,真感情,一任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就能“生气远出”,“妙造自然”,其诗力追造化,具真精神而万古常新。这一理论认识,可说更进了一层。(刘明今)

【清空】古代诗学概念。指空灵清雅的诗歌审美境界。语见南宋张炎《词源》,作者标举“清空”与“质实”相对,用以论词,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按张炎用“清空”一词来概括姜夔的词风,其目的是为了补救吴文英词的浓艳、堆砌以至晦涩的弊病。所谓清空,即是“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清沈祥龙《论词随笔》释之云:“清者不杂尘埃之谓,空者不著色相之谓。清则丽,空则灵,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表圣之诗,可称之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特别强调冲淡的风格与空灵的意境,如论“典雅”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论“清奇”云:“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论“形容”云:“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皆合于张炎所谓“清空”之境,可见张炎此论当受司空图的影响。此外,宋末元初诗坛出于对宋代江西诗风的反省,普遍反对以文人诗、以议论入诗,批评好使事用典、铺陈排比的倾向,诗论家偏向于一种空灵的富于神韵的审美趣味。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叙“自然高妙”之境为:“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严羽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描写盛唐人之“兴趣”(《沧浪诗话》)。刘将孙以“清气”论诗,谓其如人之仙,植物中之梅,鸟类中之鹤。“感赏于风露之末,畅适于无人之野”,其品极高,绝无一点尘俗之气(见《彭宏济诗序》、《九皋诗集序》)。林昉则以禅论诗,标举“句法清圆旨趣空”之“空趣”(《白云集序》)。这些议论与张炎“清空”之说相先后,都是当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诗论、词论中的表现。然“清空”与“质

实”本是一组相对应的审美概念,近于“虚”与“实”的关系,若过分地偏于一端,便易产生流弊。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故张炎以后以“清空”论诗词者,多注意不作极端之论。如清贺贻孙《诗筏》云:“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然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所论便比较全面一些。(刘明今)

【清奇】古代诗学概念。清明澄澹,不同平俗的艺术境界。“清,对浊而言,奇,对平庸而言……于俗浊平庸中见清奇”(孙联奎《诗品臆说》),属于优美一类。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出以李益为代表的“清奇雅正”和以孟郊为代表的“清奇僻苦”两流诗人。司空图《诗品·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全篇种种象喻都是形容清明澄净,前半描写“清奇”之状貌,后半勾勒“清奇”之精神。其中“清”是主导,秀松漪流是清静,雪满汀洲是清冷,可人寻幽是清雅,空碧悠悠是清朗;而“奇”是附庸,“神出古异”、脱出平俗是一种“奇”,而趋向古趣,是淡泊宁静,不妨也是一种“清”。“清奇”的境界往往存在于特定风貌、体制的诗中。明代胡应麟《诗薮》以为“清远”、“玄妙”之类,“格本一隅,体靡兼备,宜短章,不宜巨什,宜古选,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内编》卷二),“清新”、“奇峭”之类风格是“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也”。他还指出,“诗最可贵者清……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也”,这与司空图“清奇”之内涵已见关联。他分析诸家之“清”,谓“柳子厚清而峭”(均《外编》卷四),更与“清奇”相近。司空图“晴雪满汀,隔溪渔船”象喻与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显然一脉相通。后人以为“清奇”境界“在唐人中亦惟韦、柳擅场”(杨振纲《诗品解》),诚为有识之见。(陈引驰)

【清奥】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唐代诗人韩愈诗《荐士》:“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显然,韩愈此处是把鲍照和谢朓的诗歌与六朝的靡丽诗风区分开来的。谢朓诗向以“清”而著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诗),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体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点。鲍照诗“发唱惊

挺,雕藻淫艳,倾眩心魄”,以咏物而叹身世不平,亦有“清新俊秀”,深邃古朴之誉。所谓“清奥”,分而言之,如明代胡应麟《诗薮》所云:“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也。”指高洁的志向,淡雅的情趣,俊秀的气格。所谓奥,指含义的深邃,见解的深刻,即《尚书序》所言:“雅诰奥义。”《文心雕龙·体性》:“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合而言之,则指诗风的清新脱俗,含义的典雅深邃。韩愈在《荐士》诗中推崇鲍、谢诗歌的“清奥”风格,而贬斥齐梁时代“搜春摘卉”之作为“蝉噪”,表现了他强烈要求改革诗风的文学主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进步的意义。

(吴河清)

【空灵】 古代诗学概念。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七评陆机:“士衡诗亦大家……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空灵意谓超逸俊拔,不着痕迹。空灵的风格,如清风之出岫,空若无物,而自有气韵流动。唐代佛道盛行,受其影响,诗歌创作讲究空灵。司空图《诗品》中的“超诣”一格:“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描写的境界就接近“空灵”。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貌似“空”、“无”,实则“有”存,这就是“空灵”的特征。空,不是空幻寂灭,一无所有;空,是空处落想,思接千载;空,是化实为虚,外“空”内“有”。灵,不是玄妙主宰,不是万物神灵,不是物外之物,而是物中本有,是精神气韵,是神与物游。“空”是“灵”之所,“灵”是“空”之神。只空不灵,则虚无寂灭;有灵无空,则如同太玄。既空且灵,空灵相得,始有高致境界。空灵的诗歌,其境界明净澄澈,清旷淡远;语言高雅洒脱,不粘不滞。如王维的《鸟鸣涧》、《山居秋暝》、《鹿砦》、《过香积寺》、《归辋川作》等许多诗就具有“空灵”的风格。“空灵”以“超旷”为伴,结“飘逸”为邻。“超旷”得其“空”,“飘逸”得其“灵”。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得屈子之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之超旷空灵。盖庄子之文,纯是寓言。词能寓言,则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此惟在妙悟而已。”《庄子》是寓言八荒,故得其“空”;而言有寄托,又得其“灵”。这就是“有神无迹,色相俱空”,这就是“空灵”。“空灵”与“质实”相反,质实则难以超逸,缺乏流转灵动之气貌。

(张小平)

【质实】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宋张炎《词源》论词:“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他以吴文英词为例,批评它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作为“质实”的

代表作。后来“质实”一词,为一般诗家所用,遂逐渐成为诗歌批评的概念,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贬义渐消,而褒义渐生,如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怪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质,质直、质朴;实,厚实、充实。质实指质朴自然、充实厚重的诗歌风格和境界。潘德舆论“质”举元代诗人虞集作品为例子,“吾取虞道之诗者,以其质也”。讲他以“质直之气”在“争尚绮靡”的元诗坛中“矫然独出”。虞诗之“质”具体表现为,“气苍格迥”,朴而不华,“长篇铺放”却非一览无余,“老劲斩绝”又不故为斫刻,而是“质直近天机”,“精神浑质、藏而不露”,如“汉庭老吏”,“了无致饰悦人之意”,却真气充盈,清苍可爱。这说明质朴的诗歌既不同于轻绮艳美,又区别于俚浅直露,而是在敦朴中内敛着气势,本素中涵蕴着清通。他论“实”以顾炎武诗为代表,“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亭林之诗坚实,……而其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也”。顾炎武诗学杜甫,笔力雄健,境界阔大,诗风浑厚沉凝,潘德舆“坚实”二字,诚为的评。无论质或实,都与“尚词采”、“讲风神”的诗风迥然有别,潘德舆标举“质实”,正寄寓着矫正前者之艳,后者之虚的深意。他又认为,质实之诗出于“性情时事”而“有馀味”,决非“腐木湿鼓之音”,因而他将“南宋以语录议论为诗”的“俚词”,驱逐出他提倡的质实审美范畴之外。潘德舆提倡质实,对纠正清中叶以后浓艳浮靡的诗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过求质实,也会产生不利于诗歌风格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另一面。林昌彝批评道:“潘四农论诗专取‘质实’二字,亦有偏见。盖诗之品格多门,……皆各有所主,岂得以‘质实’二字遂足以概乎诗,而其余可不必问耶?不知质实易流于枯,质实易流于腐,质实易流于拙。盖质实为诸品之一品则可,谓质实用以概诸品则不可。盖质实为诸品中之一品则无流弊,若专言质实,流于枯,流于腐,流于拙,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射鹰楼诗话》卷一六)他注重诗歌风格多样化,指出应该避免仅求质实可能引起的弊失,又是对潘德舆质实说有益的补正。于此可见,“质实”诗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S”形的曲折过程。

(郭国平)

【朴拙】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朴,质朴,朴素。拙,粗糙未经雕琢,《老子》“大巧若拙”之谓。有关“朴拙”的美学思想,深受先秦道家的思想启发。老子所欣赏的美是“见素抱朴”,“反朴归真”。庄子则认为朴素自然是最高形式

的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陈师道《后山诗话》，则进一步对当时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加以总结和发挥。苏轼《题柳子厚诗》，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小序》，均曾提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歌主张。陈师道则用“朴”“拙”加以形容，强调诗歌朴素自然，落尽铅华之美。他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文采，而是力图防止诗歌流于轻巧油滑、俚俗无骨，客观上有利达到格高韵绝、笔力健峭、不落俗套的艺术高境，有其积极作用。但如脱离思想内容而片面追求朴拙形式，也会陷入形式主义泥坑。当然，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朴拙”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因而对后代颇有影响。明代诗论家谢榛《四溟诗话》说：“千拙养气根，一巧丧心萌”，主张“返朴复拙，以全其真。”又说：“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把“朴拙”与内心之“真”联系起来，因而获得了新的内容。朴拙强调的是诗歌的朴素美、本色美，语言真率自然，不事雕琢，不堆砌词藻，不滥用典故；同时又是内心自然流露的艺术表现，感情以真诚淳朴动人。这是一种艺术高境，当代画家朱屺瞻说：“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夸侈，强烈不流为滞腻。”（吴河清）

【绚烂】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苏轼论诗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引）“绚烂”指诗歌的语言华美，色彩艳丽。在先秦，孔子主张作品“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对文采提出了要求。六朝文学崇尚形式美。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批评有些文章“雅而不艳”，虽然内容质朴雅正，但缺乏华美的文辞，同样不可为法。“艳”即绚烂华美。唐代司空图《诗品》有“纤秾”、“绮丽”诸品，其风格特征与绚烂相近。诗歌作为艺术品应有文采的要求，绚烂作为文采中较为浓烈的一种，自有其价值。苏轼指出了诗歌平淡和绚烂的关系，绚烂仅是初级阶段，待炉火纯青时，就达到了平淡的境界。后世批评家由此得到许多启迪。清代田同之说“诗中平淡处，当自绚烂中来”（《西圃诗说》）。指出平淡并非没有文采，而是由绚烂华美而加以精工锻炼的自然结晶。那些“以枵腹作浅俗语，而自以为平淡”的“今人”，即缺少绚烂者，只是假平淡而已。由此可见，艺术之绚烂，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风格。

（孙克强）

【绮丽】古代诗学概念。指辞采华美的艺术风格。绮、丽，都有采丽的意思，用于文艺批评，也都指文辞的华美光采。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藻思绮合”；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流韵绮靡”；萧绎《金楼子·立言》“文者，

惟须绮縠纷披”等。李白《古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连“绮”、“丽”二字于一起，虽含贬义，但也是指文藻华丽。杜甫《八哀》论张九龄“绮丽玄晖拥”。司空图《诗品》将“绮丽”立为一目，形容道：“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浅者屡深。露馥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对以往“绮丽”的含义有所推展，“绮丽”主要不在于文辞等“形”的方面，而在于内在的“神”上。司空图辩证地分析了“绮丽”的表现：“浓尽必枯，浅者屡深”，不应一味寻求表面的光采华丽。所以“绮丽”与“纤秾”同样是美丽，但前者指包括神韵风姿在内的清雅之丽，后者则指外貌的浓艳之丽。可见“绮丽”是一种浓淡相宜而风神秀发的美的境界。这与他重韵味、意境的诗学理论相协调。这一观点在苏轼那里得到了积极响应，他评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评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从而成为诗学的重要论题。就“绮丽”之原意运用的例子甚多，如宋代王安石论杜甫风格多样，“无施不可”，其中有“绮丽精确”一项（《竹庄诗话》卷五）；范温《诗眼》：“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陈引驰）

【淫丽】古代诗学概念。指因过分追求形式之美而形成的作品风格。语见《韩非子·解老》：“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韩非批评了注重感官愉悦的文艺现象。“淫”在先秦时代就已具有了多层义蕴，与形成“淫丽”概念相关者，略有三义：一曰过度无节为淫。《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孔传：“淫，过也。”《国语·周语下》：“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韦昭注：“淫，滥也。”二曰奢华浮靡为淫。《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孔颖达疏：“淫谓过奢侈。”又《儒行》：“居处不淫。”孙希旦《集解》：“淫，侈滥也。”三以放纵感官，情逾规范为淫。《左传·昭公六年》：“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杜预注：“淫放也。”《礼记·乐记》：“礼者，所以缀淫也。”孔子是第一个用“淫”来批评文艺作品的著名理论家。《论语·卫灵公》：“郑声淫。”又《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说明“淫”是指过度无节，逾越了正统规范。孟子自称，“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波”为片面，“邪”为失正，对比之下，“淫辞”则为过分，夸大之辞。故赵岐注为“淫美不信之辞”。汉代的辞赋创作，开始自觉地追求愉悦耳目的感官效果。所以扬雄《法言·吾子》中批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将辞赋创作等同于“童子雕虫篆刻”，说是“壮夫不为也”。李轨注：“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到魏晋

南北朝时代,以华丽的辞采抒写主体鲜明强烈的情感,逐步成为文艺家审美追求的主要倾向。肯定这种倾向的理论家如曹丕主张“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而陆机在《文赋》中则更大胆地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反对者坚持儒家正统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的原则。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批评时尚“以文造情”为“淫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像唐刘知幾《史通·载文》云:“爱泊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则把历时数百年的文艺思潮,审美倾向,各种文章的艺术追求全部否定了。但是历史上持折衷论者也不乏其人。如唐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则对八代文风作了较有分寸的总结,其中对“淫丽”所立的义界,也较为全面而有历史的代表性。他说:“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彫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他用历史的态度考察、评价文风的变化得失,充分肯定了汉魏晋宋的文艺成就、审美倾向,只否定梁“大同之后”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并将其基本特点概括为“淫放”、“淫丽”,具体说来,就是“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这同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对梁代淫丽文风所作的概括基本一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如果我们撇开对齐梁文艺思潮的评价问题,单说“淫丽”概念的理论内涵,魏徵、令狐二家之说,评说公允,定义明确。总之,“淫丽”的内容,不外淫辞丽藻和“不贞”之情二端,应具体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不应一概贬斥。(黄保真)

【踵事增华】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梁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踵”,原意是脚后根,作动词用,谓追随,承袭。他以原始朴质的椎车进化到精巧华美的大辂(古时天子祭天时所乘的车)为例子,说明文学逐渐由朴素向精美演进是必然的趋势。这一方面肯定了诗文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替当时文坛占主导地位的华美的骈文和诗歌作了辨

护。在萧统以前,这种认识已经出现,如陆机指出“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羽扇赋》),葛洪《抱朴子·钧世》:“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这是他否定崇古卑今论的主要理由。萧统“踵事增华”说吸取了前人这些思想成果,又融进了自己的创造,将其集中运用于纯文学的批评,对文学发展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叶燮《原诗》内篇:“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他引述诗歌史上大量“治而益精”的事实,以论证“踵事增华”说的正确性,并且赋予它以更强的理论色彩,使萧统提出的这一观点更趋完善。(郭国平)

【雄浑】 古代诗学概念。主要指具阳刚之美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义首发于司空图《诗品·雄浑》一品:“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诗品》以《雄浑》开篇,具有双重的理论意义。一是从诗歌哲学的高度,揭示了雄浑之美的本体、本原与本质。二是具体地描摹、论述了雄浑之境、雄浑之美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清蒋斗南《诗品目录》云:“雄浑具全体。”清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兼体用、该内外,故以《雄浑》先之。”二家都认为《雄浑》在司空图的诗歌美学中兼有本体论、现象论的双重内容。开头四句,非常简明地表述了司空图美学本体论的核心观点: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其本原、本体则是虚而无形的“真体”即“道”。“道”之自身,运动不息,而具有“雄”、“健”的本然属性,这就是雄浑之美的特有本质。五至八句,揭示出雄浑之境的审美特征是气充、力大,无处不在、无时不动,既可以表现为浑沦一气,漫天翻滚的云,也能够显化作横扫千里,呼啸而过的风。但不论见之于何种物象,其共同特征总是运动流转,沛然莫之能御,而又一气包举,浑涵苍茫,具有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无尽性。九至十二句则是讲创造雄浑之境的方式、规律,告诉人们必须超越物象自身的局限才能把握住雄浑之美的本质奥蕴,而令诗思自然而然,永不衰竭。司空图论雄浑达到了相当的美学高度,给后世以有益的启示。清顾翰有《补诗品》,曾纪泽有《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但难以企其高度,顾、曾二家的续作,充其量也只能连缀物象,示人以雄浑之境的感性特征,全说不上“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妙。确切地说他们表现出来的也只是一种雄浑的语言文字风格。顾翰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泛彼中流,掀然大波。足踏蛟鲸,手鞭鼉鼉,砥柱碣石,群山嵯峨。白日欲没,壮士挥戈。前

有千古,孰知其它。”如此境界雄则雄矣,而浑然无迹,有所欠焉。曾纪泽的七律《雄浑》则云:“紫气昆仑广野间,流如烟景驻如山。黄河天上来舟楫,绛阙云中照阊阖。北海培风鹏有翼,南山隐雾豹无斑。遍游穹颢三千界,只仗骅骝十二闲。”这与其说是描绘雄浑之境,不如说更近于表现雄浑的言、象风格。在日本学者岩溪裳川、森槐南《二十四诗品举例》中,岩溪裳川举岑参《封大夫破播仙凯歌》“日落辕门鼓角鸣”证之。森槐南谓岑作,可谓“雄丽”,“浑”处不足,而王昌龄诗“大漠风尘日色昏”,“似较接近”,信然。以此较顾、曾二家之说,顾似多了点直露筋骨的“健”;曾则平添了华采飞扬的“丽”,若“紫色”、“绛阙”云云,更误落“象”中矣。(黄保真)

【劲健】 古代诗学概念。指内涵充沛、刚健有力、气势不息的风格。唐司空图《诗品·劲健》中标为一目且形容道:“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首四句形容劲健的风格特征;次写“刚健”形成之根源,吸取了真力与强劲之气,蕴蓄于胸中,这样内在雄强而后才有外之劲健;末写劲健之呈现,饮真茹强的修养恰如孟子之言“养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于是与天地并立而流迁无息,充“实”刚“劲”,能“终”便是“健”。由此可见,“劲健”包含两方面:其一为刚健有力,其二是充沛不息,不可偏执。司空图之前,杜甫曾以“健”评诗:“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论李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八哀》);皎然《诗式·辨体有十九字》:“体裁劲健曰力。”司空图之后,宋人评韩、欧诗有:“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临汉隐居诗话》)“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馀味耳”(《苕溪渔隐丛话》)。严羽曾对诗歌“劲健”风格表示异议,以为评诗“用健字不得”,批评苏轼、黄庭坚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答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所论虽有片面之处,但是指出“劲健”如运用不善,就会有粗疏而一泻无余的艺术弊病,对后人也有启发。(陈引驰)

【凌云健笔】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杜甫讨论诗赋文章艺术风格的问题。语出其《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初盛唐时,文风转变,不满六朝诗文华丽绮靡之风,但批判之时,未免矫枉过正,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然则子山(庾信字)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

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类似观点,盛传一时,但并不符合事实,影响了文学批判继承的健康发展。杜甫则不然,他较全面地评论庾信诗赋的艺术审美价值,一云“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又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指出庾信后期文风的转变,不仅以清新见长,而且萧瑟深沉,正与《戏为六绝句》相印证。仇兆鳌《杜诗详注》释曰:“首章推美庾信也。开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后人但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又杨慎《丹铅总录》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以庾信体兼众美的“老成”,解释其晚期诗风之“凌云健笔”,颇为可取。凌云健笔,指笔力劲健、气势豪迈、超尘拔俗、老而弥坚的艺术风格。杜甫对此神往不已,给予肯定的审美评价。庾信是中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以南朝丰赡华美的写作技巧,与北朝乐府民歌刚健质朴之风相结合,于是成为开启一代唐诗的先驱者。杜甫“凌云健笔”云云,正指出庾信诗赋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美学意义。其理论内涵早已超越了一般的风格美学问题。

(蒋凡)

【豪放】 古代诗学概念。指宏阔雄放,略无拘束的精神气象或艺术风格。语见唐代司空图《诗品·豪放》:“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范范,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杨廷芝《诗品浅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虽不一定如此拘泥字面,但“豪放”确实首先是内在的精神气象,司空图讲“真力弥满”,“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即此意。其余“天风”、“海山”、“三辰”、“凤凰”显示了“豪放”所具有的宏调境界,而“晓策六鳌、濯足扶桑”、“吞吐大荒”则表现了“豪放”之雄放无羁的气势。在古代文学批评中,“豪放”一词往往用来形容李白的诗歌,因为李白可说是最好地体现了内在的豪放精神气质和诗歌雄放无拘的气势、开阔广大的境界。王安石曾评“李太白歌诗豪放飘逸”(《竹庄诗话》卷五)。朱熹则别具只眼,以为“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他对“豪放”的理解可能主要侧重于雄放无拘的气势,如他以为陶渊明“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清邃阁论诗》)。以后的诗人中苏轼常被人目为“豪放”,“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李白为近”(刘熙载《艺概》卷四)。苏轼自己在《答陈季常简》中也用过这个词:“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相比较而存在,成为批评史上很大的话题。明代张继《诗馀图谱凡例》:“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对两者正宗抑或别格的争执一直延至现代。其实,大词人往往能互兼,后人评议也有辩证的:“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清沈祥龙《论词随笔》)古代诗词批评中与“豪放”字面含义相近的概念不少,应注意体会、辨析。如“豪迈”,赵翼《瓠北诗话》就曾评李白“才气豪迈”,而蒋兆兰《词说》名苏、辛一流词为“豪迈派”:“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运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陈引驰)

【狂放】古代诗学概念。《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狂放,即相当于狂肆、狂荡,它纵横肆恣,放荡不羁。最早用于评价人物,后又用于评价艺术风格,但常是二者兼之。杜甫称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狂放的诗,表现于内容,它激荡现实,追求自由;它无视“权威”,不守成法,希望冲决人生所有礼教的藩篱牢笼,无所顾忌地放任心中浪漫情感的流淌;它睥睨显达,啸傲权贵,挥斥万物,志向高远。因此,表现于形式,它充满了出奇的想象和惊人的夸张,境界开合多变,气象翻江倒海,充分展现了诗人鲜明而强烈的艺术个性。狂放诗的语言,落笔如疾风骤雨,一气贯注,不拘谨严方正,不尚精雕细刻。其抒情方式痛快淋漓,好似飓风拔树,决不吞吞吐吐,缠绵柔婉。李白的古风诗和歌行体具有狂放的特色,如《将进酒》、《蜀道难》等。狂放,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言大胆,满纸狂想,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上李邕》)。狂言背后的阔大气魄,不难想见。但狂放不是腾云驾雾的颠狂。它是狂中涵真,放而有节,绝不同于疯子的颠语、醉汉的胡话。它有旷达的胸襟,乐观的精神,决不是负气的狂歌、幼稚的矫情。狂放与豪放紧密相连,风姿潇洒,无拘无束,傲骨嶙峋,目光高洁。但豪放是昂扬进取,举止雄壮;而狂放则疾视俗世,

我行我素,更富斗争的艺术品格。(张小平)

【清雄奔放】古代诗学概念。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引马公对自己作品风格的评价:“李白之文,清雄奔放。”清雄奔放,内涵丰美,即如“清”与“雄”就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清丽往往流于纤秀,雄大则易于导致奔放。杜甫《春日忆李白》称李白诗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可见,“清”“雄”为邻的秘密乃在于此,“清”是清新俊逸,俊逸才常与雄大为伴。“雄”与“放”也是一对矛盾,“雄”未必能“放”,“放”未必能“雄”。“雄”可以万象雄立,岿然不动。“放”,却是放纵豪迈,无拘无束。李白的诗既“雄”又“放”,还在于“雄”是清新俊逸之雄,有“逸”才有“放”,有“俊”才有“雄”。清雄奔放,首先应当是作者志向高远,气魄雄伟、情感激荡的胸襟外化。萎靡缠绵者绝不会写出李白那样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想落天外,汪洋恣肆,场面壮伟。黄河的雄放正是作者旷达胸襟的展露。诗人内心世界的清雄奔放,决定了诗所驰骋的时空必然是广阔浩大的,情感的渲泄必然是放纵无羁的,所以诗中境界的阔大和气势的磅礴,是清雄奔放的第二特征。如《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极时空之变化,富有气势,显得清雄奔放。清雄奔放还表现在相应的具体可感形式上,如想象的纵横变幻,物象的瞬息万变,夸张的出神入化,语言的遒劲凝炼。以上所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清雄奔放诗歌风格。(张小平)

【高古】古代诗学概念。指高远古雅不涉俗韵的风格。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则进一步立为一目,并形容“高古”道:“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杳然空踪。月出东斗,如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首先以真人形象表现高迈、亘久这两方面的特点;次以风月相伴,太华夜钟体现“高古”结合之韵致,终以寄心于太古、风神超乎世俗规范概括“高古”的精神实质。这与司空图偏重飘逸、冲淡是互为映衬的。“高古”一词在后代曾较流行,但含义并不尽同,显示了各时代的诗学风尚。苏轼对司空图的“高古”颇有体会,他评魏晋以来诗人“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说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书黄子思诗集后》),确实得其要意。严羽标举诗之九品,首先即“高”、“古”两品(《沧浪诗话·诗辨》),他评阮籍《咏怀诗》:“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评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

色,非唐贤所及”(《诗评》)。张戒《岁寒堂诗话》:“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又评孟郊“格致高古”。至于陶明潜《诗说杂记》解严羽之“高”、“古”云:“何谓高?凌青云而上,浮颢气之清英是也。何谓古?金薤琳琅、黼黻溢目者是也。”则拘于形迹。李梦阳曾说:“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调也。”(《驳何氏论文书》)也已与司空图在风格、精神上的“高古”有所不同。(陈引驰)

【简古】 古代诗学概念。欧阳修说梅圣俞“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悦于世”(《梅圣俞诗集序》)。这里的“文章”主要指诗歌。简约古朴,谓之简古。简古,源于古代语体不尚藻饰,不假事典,言简意赅,“辞达而已”的表达特点。《诗经》就具有“简古”的风姿。“规摹简古人争看”(苏轼《次韵子由》),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简古”往往作为一种典范风格,与注重形式、内容空虚的绮靡诗风相对立。简古的诗篇,语言拙重简略,决不轻浮艳丽;内容质朴单纯,不加雕琢掩饰。简古,并非越简越古,更不是复古。言过简则义不显,语过约则意有漏。简古则是简而明,约而丰,辞取达义,言简意赅。简古不是枯淡干燥,浅薄平庸,而是朴质天然、真气内充的。简古与繁冗冗长相对立,它不是挥洒淋漓,铺张张扬,把情感一吐为快,而是纯乎自然,以质为文,淳真的感情通过朴实的形式来加以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作者具有弘扬古代优良传统的信念,和质朴淳厚的襟怀,写出的诗才有血有肉,否则只是仅得“简古”之躯壳。简古也需要熔炼,不单是熔炼形式,而且要熔炼情思,内外一体,绝无牵强,才是真正的简古。简古是以古为今,融今入古,它是向前流动的,是发展变化的。沈德潜说:“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说诗碎语》)简古作为一种诗风典范,代代都有人规摹矩仿。如果泥于形式,亦步亦趋,个性湮没,就没有诗的生命。简古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风格形式,其奥秘就在它既是一种艺术风范,又能古为今用。(张小平)

【含蓄】 古代诗学概念。概括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某种审美特性。较早见于唐释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情,缘境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所称“含蓄”,也即其《重意诗例》中所说的“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的命题。在这里,他认识到“含蓄”的审美特性,但意义仍较含混。发展到晚唐司空图,则在《诗品》中专设《含蓄》一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于是“含蓄”成为一个古代诗论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开篇二句,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

纯粹的诗歌美学命题,把创作中的艺术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即超越作品的言、象系统而妙契“真宰”,与道沉浮,以直接把握美的境界。这是他对“含蓄”之境的审美特征所作的概括。清孙联奎《诗品臆说》曰:“不著一字,非无字也。‘不著一字’即‘超以象外’;‘尽得风流’即‘得其环中’。”可见,作为审美境界的含蓄,是以超越言、象之表而获得充分的审美自由为特点的。不过,“尽得风流”的审美自由,不是主观的随意臆想,它是以“真宰”的审美取向为创作灵魂的。这显然是古代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在诗歌美学中的逻辑推衍。“含蓄”诗境中的“真宰”就是美的本真或灵魂,它深蓄于内,含而不露,而以潜移默化方式作用于人。最后四句则揭示了“含蓄”之境的创作规律。孙联奎《诗品臆说》解释云:“浅深聚散,皆题外事也。四字总结万象。”“万取,取一于万;一收,收万于一。”前者是审美选择,后者为集中升华,选择与升华的辩证统一,就是创造含蓄之境的基本规律。宋代以后,普遍运用了“含蓄”的概念。其理论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着眼于言、象、意的审美关系。其二是把含蓄作为诗歌创作的独特审美规律。如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的话说:“诗家……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含蓄之意,超越言象之表而自成佳境,言者无心,会者有意,颇耐咀嚼而余味无穷。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则对“含蓄”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他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所论实在,便于初学。后来清梁廷枏《曲话》卷二云:“言情之作,贵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论“含蓄”而进一步强调“情”的作用,把政教义理排除在外,又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含蓄”的审美内蕴。又如叶燮《原诗》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所论又有所深化,他超越了一般言语文字的层次,深入到艺术的形象思维规律来讨论“含蓄”的理论义蕴,又充分展现了“含蓄”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重大作用。(黄保真)

【委曲】 古代诗学概念。指深婉、曲折而又自然流转的艺术风格。唐代司空图《诗品》形容道:“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

之于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游伏,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又如看山不喜平的说法,历来很多同调者,讲曲折变化,忌直露无余的议论不胜枚举。司空图之体会较为周全,大体有以下几层:一、诗之“委曲”,当如山间羊肠小道,曲曲折折,不取直径,“似往已回,如幽匪藏”,也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此就层次而言,主要讲曲折变化,重在“委曲”之“曲”。后人之评杜诗“变化开阖、出奇无穷”(《苕溪渔隐丛话》卷八),袁枚讲“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随园诗话》)卷四之类,大抵是在这一方面。二、“委曲”,深婉、曲尽之致。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概括“曲有二种,有以折转为曲者,有以不肯直下为曲者”,后者即指此。“杳霭流玉,悠悠花香”,流水气霭窈深,花香悠悠渺渺,无处不至,无微不至,曲尽其致,就是形容这一境界。三、“委曲”之得来,并非强致,而是自然乘运,如水之流转,如鹏之乘风升空。末两句以道、器关系说明“委曲”之本体随势变化,自然生成的道理。这一层意思与司空图诗学之总体特征是一致的,并且因此而与一般讲造作“委曲”之技法的观点分判出高下。

(陈弘驰)

【诗贵色韵】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陆时雍所标示的诗歌审美理想,语见其《诗镜总论》:“诗之所贵者,色与韵而已矣。韦苏州诗,有色有韵,吐秀含芳,不必渊明之深情,康乐之灵悟,而已自佳矣。”明七子派论诗主于复古,以格调倡,其弊流于肤廓,徒得其形而遗其神,于是陆时雍论诗遂提倡色与韵以矫其弊。论诗,体格声调是比较具体的,可确指的,如齐梁体、元和体、江西体、唐音、宋调,然“色与韵”便显得难以捉摸。陆时雍形容道:“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他以风与水喻神韵,即是刻画其一本自然而生,来不知所来,去不知所去,拂拂洋洋,流动飘忽的特征。故在“色”与“韵”二者之间他更重视“韵”,故云:“韵生于声。”“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一击而尽,瓦缶也。诗之饶韵者,其钲磬乎?”以钲磬之声喻韵,则韵即是诗歌的袅袅不绝的弦外之音。又云:“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他认为诗歌的韵正产生于这样一种若即若离流动而隐约的状态之中。陆时雍对“色与韵”的标榜体现了明后期论诗由重视格调向重视神韵的转变,对清代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当有一定的影响。(刘明今)

【妙在含糊】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明谢榛对诗歌隐约、空灵的审美境界的赞美。语见其《四溟诗话》:“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

爱,其烟霞变幻,难以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含糊与逼真相对而言,逼真之物,一眼望尽,便无余味;含糊之景,在似与不似之间,最足启发观者驰骋想象。故他说:“作诗者不必执于一个意思,或此或彼,无适不可。诗不可太切,太切则流于宋矣。”又论评诗者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镜花水月,勿泥其迹可也。”此谓评论诗歌亦贵在含糊,不必强作解人,执一定之见去评诗。谢榛此论与汉儒“诗无达诂”之说有一定的关系,然“诗无达诂”主要谈批评鉴赏时的审美特征,此则为创作时的审美要求,反对淋漓尽致透切真实的刻画与描叙,而提倡空灵的、模糊的、不易确指的审美境界。以此来要求诗,其渊源远在司空图、严羽,近则在李梦阳、王廷相。李梦阳说:“古诗之妙在形容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形容之妙,心得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论学下》)王廷相云:“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谢榛本此作了比较具体的发挥,并以远山为喻,提出“含糊”二字为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界义。这不仅对于矫正当时后七子刻板的拟古之风是有意义的,对以后胡应麟、陆时雍乃至清代王士禛以神韵论诗,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某些方面隐然有暗合于今天的接受美学之处,在理论上具启迪作用。

(刘明今)

【超诣】 古代诗学概念。谓高远超迈了无俗韵的诗学境界。超诣可指超乎流常的品性,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蛟谁剪剔?”唐司空图《诗品·超诣》则引入诗歌美学领域:“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终与俗违。乱山乔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其中“白云”、“清风”、“乱山乔木、碧苔芳晖”等象喻都体现了“超诣”的离俗去尘、超乎寻常之品格。司空图还指出“超诣”之不着形迹、不可力求的特征,它无关于神灵机微,“远引若至,犹言似可摹仿,临之已非,犹言究竟不象”(孙联奎《诗品臆说》)。这种理论,大概是受庄子思想的启发。正如《庄子·田子方》所说,“至人”与道真同体,而“游心于物之初”,这是一种“至乐至美”的境界。而境界不是从劳心苦力的锻炼获得的,而是平时艺术实践日积月累后的自然感悟。因此“超诣”是一浑成高妙的境界,口诵心思,犹如“大音希声”,难以细辨言表。从字面讲,“超诣”可泛义地释为“造诣能超越寻常”(同上),但从上举杜甫诗中所涉及的陶渊明、谢灵运来看,“超诣”偏重

高远脱俗的一路。清代方东树评王维诗：“只是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蒙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采，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昭昧詹言》）所论虽重在诗的意象呈现而不是诗的整体境界，但其“超远”与司空图“超诣”涵义实有相通之处。

（陈引驰）

【旷达】 古代诗学概念。其义蕴主要概括了一种人生态度、审美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情境、艺术境界。语见唐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达，心迹旷诞曰达。”司空图《诗品》更专立《旷达》一品，云：“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茱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仗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岵岵。”论其思想，渊源于道家。《老子》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涣其若水释，敦兮其若朴，浑兮其若浊，旷兮其若谷。”（据《老子校读》本）以“旷”来形容“为道”者的精神、态度，意为空旷无物。由此引申为个人的处世态度、行为方式，则凡心胸坦荡，淡泊名利，秉性通脱，豁达大度，皆可谓之“旷”，如嵇康《养生论》：“旷然无忧患。”向秀《思旧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旷”皆坦荡豁达之意。不过“旷”的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旷逸、旷淡、旷夷、旷朗、旷迈、旷爽、旷远、旷适、旷放、旷浪等等。而“旷达”则较偏于强调乐天知命，任性达观。因为，“达”之为义，出自《庄子》：“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达生》）但是“旷”与“达”分开论述，还不属于真正的审美概念。直至唐代皎然、司空图才正式将“旷”、“达”并称，变成了一个总括人生态度、审美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情境、艺术境界的审美概念。司空图《诗品》所标举的“旷达”境界，是以道家的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即顺应自然，忘怀得失，以审美的态度把握人生。在中国历代作家中，比较接近这一境界的是陶潜和苏轼。孙联奎《诗品臆说》指出：“胸中具有道理，眼底自无障碍，故云旷达。旷达原非颓放一流。颓放，坏风也。……滥觞于庄子，横溢于两晋，科头箕踞，荷锸便埋，托于旷达，而非旷达之真矣。‘羨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旷达如陶公可耳。”所言甚是。但旷达与旷浪、旷放、旷迈、旷逸相比，审美义蕴同中有异，当予分别。而对两晋文人的生活与审美态度，似不可简单地以“颓放”概之。皋兰课业本《诗品》解“旷达”，则主要从对自然、人生的把握方式、审美态度着眼，所见更深入一层。其语云：“迂腐之儒，胸多执滞，故去诗道甚远。惟旷能容，若天地之宽；达则能悟，识古今之变。所以通人情，察物理，验政治，观风俗，览山川，吊兴亡，其视得失荣枯，

毫无系累，悲忧愉乐，一寓于诗，而诗之用不可胜用。故此二字所以扫尘俗，祛魔障，乃作诗基地不可忽也。”超越是非得失、利禄荣枯的悲忧愉乐，就是纯粹的审美情感；以“容”、以“悟”的方式去体察人情、物理，亦属于审美的把握方式。这的确是《旷达》中本有之义，只有司空图于此则专以感慨、物象出之，不易索解。清曾纪泽演其义云：“开门长啸风吹襟，云散遥天月满林。月有盈亏宁自主，云能舒卷亦无心。伯伦常遣锺随酒，元亮不劳弦上琴。论罢漆园《齐物论》，新诗渐觉道根深。”境界确近旷达。但与司空图所示的旷达之境相比，多了点超脱，少了点深沉。司空图生当乱世，胸有良谋，择其可为而为之，不可为亦不忘，守先待后，瞩目未来，自信人生之美与“南山”同在，这才是真正的旷达，不可简单地目为“消极”。（黄保真）

【飘逸】 古代诗学概念。指卓然不群，飘然洒脱的风貌。唐代司空图《诗品》写道：“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缙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惠中，令色缙缙，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期之，欲得愈分。”所形容的“飘逸”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特立不群，离绝尘俗；其二，飘飘洒洒，自然无羁。杨廷芝《二十四诗品小序》：“飘则高下何定，逸则闲散自定。”其《浅解》释“飘逸”为“飘洒闲逸”，大略得其意。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标举诗之九品，其中亦有“飘逸”，其《诗评》比较李白、杜甫：“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对后代颇有影响，评李白诗风格者常提“飘逸”。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对李诗“飘逸”的品目，或许推衍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司空图大概由此得到启发，所以有“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的形容。司空图对“飘逸”风格的形成及创造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它植根于创作者内心的品性和修养，是自然无伪地抒发出来的，如果有心求之，则必无收获。（陈引驰）

【沉郁】 古代诗学概念。指深沉、含蓄的艺术风格或艺术表现方法。“沉郁”常与杜甫诗歌风格的评议相联系。此实由杜甫自己肇始，其《进雕赋表》云：“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这以后，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比较李白、杜甫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从此，“飘逸”、“沉郁”便被用来分别标识李白、杜甫的诗歌艺术风格，如高棅论唐开元、天宝时各诗人及其风格就说：“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唐诗品汇总序》）对杜诗“沉郁”的评价，包含着杜甫的诗

歌所表现的情思和所呈现的格调深沉宽厚的内涵,它积淀了诗人个体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和时代特征、气氛,成为一种典范性的风格面貌。后代论艺,特别标举“沉郁”的大约是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他自述其论词:“本诸风雅,正其情性,温文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其“沉郁”或指风格、境界,或指表现方式,略嫌含浑。如他讲“诗文高境,亦在沉郁”,“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是就前者而言;“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则主要指表现方式,意指含蓄缠绵:“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倘一直说去,不留馀地”,“舍沉郁以外,更无以为词”。陈廷焯也看到了“沉郁”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表现手法与作品内容、情思之间的关系:“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风骚,乌能沉郁?”这是他论词之内容重寄托,论词之风格重含蓄的表现。(陈引驰)

【沉郁顿挫】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形容杜甫诗歌忧愤深广、含蓄蕴藉,一波三折,富于变化的艺术风格。语见杜甫献给玄宗的《进雕赋表》中自评其文:“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其后新、旧唐书杜甫传均转引了这段话,于是“沉郁顿挫”一语遂为后世论杜诗者所广泛称引。杜甫《进雕赋表》作于天宝三载,此时杜甫还不到四十岁,当时所谓“沉郁顿挫”一语还没有忧愤深广的含义。按:陆机《文赋》云:“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思按之而逾深”为沉,“郁云起乎翰林”为郁,“沉郁”即富于思想又富于文采的风貌。“顿挫”则形容篇章结构以及词句声韵的曲折多变、跌宕多姿。故杜甫早年自称“沉郁顿挫”,主要是表示学殖深厚,技巧娴熟,其创作辞意兼美,可与扬雄、枚皋并称。严羽《沧浪诗话》称:“子美以学力胜,故语多沉郁。”意即谓此。然后来经历了安史之乱,杜甫颠沛流离,备尝人生之艰辛,其诗歌创作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片忧国忧民之情郁积于心,不能自己,喷薄而出,发而为诗,于是思日深,愤日广。“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感兴幽微,寄托深远。这样随着杜甫诗歌的发展,“沉郁顿挫”一词也有了新的含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论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简言之,“沉郁”之义一为忧愤深

广的思想内容,二为含蓄蕴藉的表达手法。此外“顿挫”之美亦在杜甫后期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新诗改罢自长吟”,他苦心锻炼诗律,务求章法曲折变化,音律抑扬有致,使自己的诗臻于“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波澜老成”即是顿挫之美。当然,顿挫之美的获得不仅是锻炼诗律所成,还与杜甫所要表达的深沉的思想、拂郁的情致密切相关。“沉郁顿挫”一词正是兼顾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特征而说的。(刘明今)

【沉着】 古代诗学概念。指深沉挚切又洒脱不泥滞的艺术风貌。唐代司空图《诗品》关于“沉着”写道:“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首四句以环境与人所构成的独特景致示“沉着”之境界;次四句以分离者的思念体现“沉着”之情致;再次两句以风光月色描写“沉着”之意象;末两句喻诗语表现“沉着”之特点。司空图所谓“沉着”可指景致,可指情思,主要是指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对象之情调而言的。清代许印芳《诗法萃编·诗品跋》称:“刻挚切至,则有沉着之美。”是中鹄之论。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称诗大概可分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两大类。“沉着”与“痛快”相连,陶明潜《诗说杂记》解为“倾困倒廩,脱口而出……驱驾气势……必使读吾诗者心为之感,情为之动,击节高歌,不能自己”,可见主要指诗作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特色,与《诗品》之意旨不同。司空图恰与之相反,以为对“沉着”的表现,不能“痛快”而一泄无馀。他以“大河前横”喻言语道断,表明“沉挚之中,仍是超脱,不是一味粘滞,故佳。盖必色相俱空,乃见真实不虚,若落于迹象,涉及言诠,则缠声缚律,不见玲珑透彻之悟,非所以为沉着也”(杨振纲《诗品解》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这与司空图关于艺术表现当“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主张是一致的。(陈引驰)

【沉着痛快】 古代诗学概念。讨论的是诗歌的某种艺术风格。语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晚唐司空图把诗歌概括为二十四品,严羽继之,但约之为九品,也即九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接着,他又从丰富多彩的众多艺术风格中,以审美的眼光划分为“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大类型。“优游不迫”接近于后人所说的阴柔之美,“沉着痛快”则近于阳刚壮美。陶明潜《诗说杂记》卷七云:“古来诗人多

矣,诗体备矣,严氏所云两大界限,实足以包举无遗矣。……至于沉着痛快,……则倾困倒廩,脱口而出,……为此体者,要使驱驾气势,……必使读吾诗者,心为之感,情为之动,击节高歌,不能自己。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着痛快’四字而已。”严羽论诗,审美眼光较为开阔,阴柔的“优游不迫”,与阳刚的“沉着痛快”,兼收并蓄,同样富有艺术价值。但比较而言,严羽本人更推崇“沉着痛快”的阳刚壮美。他推尊盛唐气象,概括为“雄浑悲壮”四字(见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又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同前)可见他最向往的是一种以“沉着痛快”为主的壮美境界。汉诗的雄浑,建安的风骨,盛唐人的“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诗评》),都臻于这种境界,而以李白、杜甫诗歌为典范。参见“优游不迫”。(蒋凡)

【沉雄】古代诗学概念。沉,谓深沉、沉郁;雄,指雄浑、雄健,合谓深沉雄浑的诗歌风格。沉雄往往指具有古风的诗作特点,如《臞翁诗评》:“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引)叶燮《原诗·外篇下》论高适诗“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陈廷焯用以评词,其《白雨斋词话》卷四称陈维崧《感皇恩》四章结句“沉雄”。

(陈引驰)

【高妙】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意为高超神妙。“高妙”之重心在于“妙”字。“妙”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与“道”相连通:“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妙”在汉时已用来评艺,班固称屈原“妙才”(《离骚序》)。魏晋时代老庄之学兴盛,“妙”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大行其时。顾恺之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谢赫《古画品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孙绰《游天台山赋》:“运自然之妙有。”这导向唐代孙过庭《书谱》所论:“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张彦远也讲到“妙悟自然”(《历代名画记》),司空图《诗品·精神》讲“妙造自然”,宋代严羽讲“妙悟”,又称誉唐诗“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可以看出,“妙”越来越多地与“自然”相联系,这也是道家思想内涵显扬的结果。正因其与自然之道的沟通,因而高超而不着痕迹。姜夔以四种“高妙”指陈诗歌创作在文理、构思、表现和风格四层次的佳境,既具有“妙”之高超神妙的含义,而以“自然高妙”为诗歌整体的最终境界,

则又含有肯定“妙”与自然之道契合的意思。“高妙”一词后代沿用,也大抵是这两层意思。如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用意高妙,兴高妙,文法高妙。”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评朱彝尊《洞仙歌》:“每以朴处见长,最是高妙……愈朴愈妙。”其重点即在“妙”之质朴自然上。(陈引驰)

【洗炼】古代诗学概念。指作品琢磨淘洗及由此而来的清明简净的风格。唐代司空图《诗品·洗炼》写道:“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首先指出“洗炼”之功夫,如淘金出银,去粗取精,除杂质臻纯粹;其次形容经淘洗琢磨的“洗炼”之明净澄彻,毫无蒙翳,其素洁如流水如星月,清纯至极。由上可知,“洗炼”其一指创作过程中淘洗磨炼的功夫,其二指由此功夫而获取的作品的风格境界,两者又互相沟通,一为过程一为结果,一为手段一为目的。对艺术作品的琢磨锻炼,古代文论中多有论及。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唐之后讲诗法技巧日众,如周朴作诗“构思尤艰”,“极其雕琢”,时人称之“月锻季炼”(欧阳修《六一诗话》),宋人讲炼字、炼句、炼意者更成常谈,不胜枚举。司空图之“洗炼”除此“炼”外,更有一层“洗”义。从“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来看,有本体清明,淘洗之以显扬的含义,与通常讲琢磨锻炼臻于简炼明畅略有差异。清代许印芳体会较准确,他用了“淘洗熔炼”四字,其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的诗:“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澹,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与李生论诗书跋》)此与宋代梅尧臣等主张以“精思”达到“深远闲淡”在取径上有所不同。(陈引驰)

【缜密】古代诗学概念。指细致绵密、浑成自然的风格。《礼记·聘义》:“缜密以栗。”原是以美玉纹理细密,质地坚硬,形容人的品格。后来扩展到诗歌领域,唐代司空图《诗品》列为一品:“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当中四句形容作品细致、绵密的品貌如水之流放,露之微滴,对它的营构、观照都当仔细从事。“缜密”可包含多层次的含义,景象、情节等自身呈现的特点,及对它们的结构布局,尤以后一方面为人注意,但大多是技法层次的谈论,讲究照应、紧凑。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启行之辞,遂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李渔讲“针线细密”(《闲情偶寄》),施补华论诗:“收处作回顾之笔,兜率全篇,

恰与起笔倒人者相照应,最为整密可法。”(《岷佣说诗》)哈斯宝赞曹雪芹之手笔“文思之深有如大海之水,文章的微妙有如牛毛之细,脉络贯通,针线交织”(《新译红楼梦》序)。司空图之突出处在于对“缜密”作了辩证的理会,即以为“缜密”不仅是艺术风格的问题,更关系到艺术构思的问题,并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二句,说明进行艺术构思时,功夫要缜密,思路须活泼,要避免前后矛盾,重复雷同。其迹象应“如不可知”。他还以春天之天涯绿遍和雪月辉映之素莹形容“缜密”之浑成自然、不着痕迹的境界,不局限于技法之一隅,而是联系到作品整个的情调、风格。

(陈引驰)

【流动】 古代诗学概念。指艺术作品浑然一体、流转生动的风貌。唐代司空图《诗品》形容道:“若纳水辖,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其要端,载闻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首先司空图以水车之轮转不止和圆珠弹丸流走比拟“流动”之形象。弹丸的譬喻,是谢朓首创:“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后来吕本中(《夏均父集序》)、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都用过。此“流动”并非仅是表象,而有深刻的依据。天地流动不息,而其间自有天枢地轴为其依凭。艺术作品与天地同一流转,察其符征,得其端绪,便可超然周转无所凝滞,而又归乎本原,无迹可求。作诗当流转生动而不凝滞的说法,后来论艺者涉及不少,至于讲起承转合,意脉结构的更是难以备数。司空图之突出处,一在于强调流动的浑然一体,其表现于外者无迹可求,好像苏轼所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二在于强调将“流动”与整个宇宙之迁异相联系,试图找到最根本的依据。清代孙联奎曾指出:“谈诗小技,然司空氏往往论及天地……欲人之因小技而窥天地也。”(《诗品臆说·劲健》)这是司空图深受道、玄思想影响,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作思考和探索的一种特殊理论体现。

(陈引驰)

【闲适】 古代诗学概念。谓闲居安适之意,指表现闲情逸致的一类诗歌。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说他收辑自己过去的诗作,分作四类,其中“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这些作品大多抒写对田园宁静生活的感受,寄寓洁身自好的志趣。白居易经历了世事变迁,宦海沉浮,安时处顺的思想与日俱增,讽谕篇章越来越让位给闲适之作。《序洛诗》又云:“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

字,忧叹无一声……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其关于美刺比兴的“讽谕诗”体现了他的兼济之志,而“闲适诗”则表现了“独善”的一面。后世诗人受其影响,从表现个性情志方面拓宽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诗人主体意识的活跃。所以,后人讥评“闲适”诗歌,虽然不无道理,但总欠全面。

(陈引驰)

【优游不迫】 古代诗学概念。讨论的是诗歌的某种艺术风格。语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唐代的司空图把诗之“品”概括为二十四,严羽则约之为“九品”,也就是九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接着,他又从丰富多彩的众多艺术风格中概括出“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大类型。“优游不迫”的风格特点接近于后人所说的阴柔之美,表现为含蓄蕴藉,意在言外,闲雅从容地吟咏情性。陶明潜《诗说杂记》卷七解释说:“古来诗人多矣,诗体备矣,严氏所云两大界限,实足以包举无遗矣。……优游不迫者即陶、韦一体,从容闲适,举动自如。”以为陶渊明和韦应物的诗歌,最足以代表“优游不迫”的诗风。还有的人认为,严羽提倡“优游不迫”,实际上是排斥李白、杜甫而“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许印芳《沧浪诗话跋》)。王指王维,孟指孟浩然,是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此论并不符合严羽本意。陶、韦、王、孟的诗歌,毫无疑问具“优游不迫”之风。但是实际上严羽不仅提倡“优游不迫”,更推崇“沉着痛快”。从审美的眼光看,他又赞赏二美融汇的“入神”之作,他在《诗评》中曾以“金鸂鶒海”与“香象渡河”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李白、杜甫的“入神”诗作,兼备两美,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意境。参见“沉着痛快”。

(蒋凡)

【冲淡】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皎然《诗式·诗有六迷》批评时人“以缓慢而为冲淡”,但何谓“冲淡”,语焉不详。其理论的发展成熟是在晚唐,语见司空图《诗品·冲淡》:“素以默处,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萋萋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以违。”有关“冲淡”的美学风格、境界及其审美范畴,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在先秦、两汉时代,“冲”与“淡”既是各自完全独立的概念,同时在发展中又集中涵盖了由“冲”与“淡”为基本义,并且分别以其为词根而组

成的一系列丰富的审美概念,如“冲夷”、“冲素”、“冲雅”、“冲妙”、“冲和”、“冲粹”、“冲简”,又如“恬淡”、“闲淡”、“平淡”、“简淡”、“雅淡”、“古淡”、“枯淡”、“玄淡”、“疏淡”等等。上述诸多审美概念,细辨略有区别,但撮其要义,均可归“冲淡”统摄。就“冲淡”的历史发展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一是在思辨哲学和社会哲学层次上展开的先秦时期,其余绪可延伸至两汉并向下一阶段过渡。第二是在人性、人格、人之生活方式和行为层次上展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是在唐宋以后的文艺美学层次上充分展开的时期。先秦时代为“冲淡”之美奠定哲学基础的主要是道家的《老》《庄》。《老子》首先把“冲”和“淡”作为宇宙本体固有的审美属性,并相应地提出了把握本体之美的思维方式。《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原,而“冲”是“道”的固有属性,它很特别,超越了人的感官所能把握的范围。其特点是“无”而实“有”,“虚”而实“存”,忽兮恍兮,无状无象,又包含了现象世界一切有状之象。另外,“冲”又指矛盾的动态的和谐,《老子》四十二章称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至于“淡”,同样也是“道”的固有属性,但它除了超越感官把握之外,还具有超功利性,非实用性,于是“淡”就演化为超越感官愉悦的本体美和纯粹美。如《老子》第三十五章:“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因此,后人从“淡”还可以引申指审美主体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状态。《庄子·天道》篇强调“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则发展了《老子》之说,把美的本体由“道”而推及人的朴素本性,这就把《老子》纯思辨哲学的“冲”与“淡”,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实见实存的审美领域。在庄子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关于个体人格之美的崭新观念。当时社会动荡,玄风大盛,士林清谈蔚然成风,“冲淡”之美成了封建士人的人格理想和行为方式。如曹丕《与吴质书》称颂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名士传》称王承“冲淡寡欲,无所循尚”,成了一种人格美的典范。但是,“冲淡”理论由表及里,由实际生活评价到纯粹审美把握,真正发展成熟还是在唐中叶后,随着兴象、意象、意境诸论的提出而同步展开,于是发展到司空图《诗品》,真正完成了对“冲淡”审美意义的自觉把握。他对“冲淡”之境的美学内涵作出了最简要、最完整的论述。他上承老庄的思辨美学,又升华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格行为美学,认为“冲淡”的艺术特质,是以素朴人性为中介所显现的“太和”、本

体之美。“冲淡”不仅是一种风格学上的阴柔优美,而且直探美的本原,是一种本体美,又无所不在,可表现为人性美、物性美,而又不受任何人类感官、世俗功利的束缚和限制,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纯粹美。因此,“冲淡”之美是诗中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如陶渊明诗,即为典范。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龟山语录》云:“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又如梅尧臣、苏轼论诗歌之“平淡”,他们之所以说是“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赠杜挺之》),正是在艺术实践中深得“冲淡”之美学内涵的甘苦之言。(黄保真)

【淡泊】古代诗学概念。语出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东坡后集》卷九)“淡泊”一词用来形容一种处世修养境界,三国时期已有。诸葛亮《戒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晋葛洪《抱朴子·广譬》:“短唱不足以弘丽之和,势利不足移淡泊之心。”淡泊原指清心寡欲,恬静平和,不为利惑所动的人生态度。引申到诗歌审美领域,则指一种意境平和、色彩清淡的风格特色。唐代司空图《诗品》已有《冲淡》一品。司空图还概括王维、韦应物的诗风为“澄淡”(《与李生论诗书》)。宋代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都提倡“平淡”。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所谓淡,不是淡而无味,平庸肤浅,而是指用平易朴素而含蓄的语言,表现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但是,同为“平淡”风格,因人之功力及修养而具有不同的艺术境界。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分析陶渊明及梅尧臣之“平淡”云:“平淡有二。韩诗云:‘艰宕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尧臣)平淡是此种。朱子谓:‘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此又是一种。”由此可见,诗家“淡泊”之境,有“天籁”“人籁”之别,创造的方法不妨有异。总之,“淡泊”作为古代诗歌审美范畴受到了批评家的推崇,清代王士禛曾推为“品之最上者”(《带经堂诗话》卷三)。(孙克强)

【枯淡】古代诗学概念。语出苏轼《东坡题跋》卷上《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里“枯淡”指形式质朴而内容丰厚的诗风。“枯”,本指木之干枯,引申为诗歌的质朴形式;“膏”者,肥腴之谓,引申为诗歌丰富的义蕴。“外枯中膏”是“枯淡”的审美特征。苏轼认为,优秀的诗歌应该是外部形式质朴无华、平淡浅显,而实则内容丰

富,义蕴深厚。在这方面陶渊明和柳宗元堪称典范。以陶渊明为例,他的诗在崇尚绮丽的风气中独树一帜,平淡自然却蕴含激情。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与苏辙书》),朱熹也指出陶诗平淡中有豪放,都说明了陶诗“枯淡”的特点。苏轼反对“中边皆枯淡”,即指虽具质朴的形式,内容却贫乏苍白的作品。苏轼的这种诗歌主张对后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清贺裳《皱水轩词筌》强调“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真得词家三昧”,即受“枯淡”说影响。

(孙克强)

【峥嵘】 古代诗学概念。指诗文描写中情景气象万千,绚烂多姿。苏轼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接着以为“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见周紫芝《竹坡诗话》)。李白的山水诗就气象峥嵘,如写西岳黄河:“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钟山:“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金陵歌送别范宣》)还有《蜀道难》等,都写得五色斑斓,气象峥嵘。“峥嵘”的塑造,就创作主体说,它是作者对多彩世界满腔挚爱和对生命自由热情追求的外在表现。“峥嵘”的诗,境界纵横广大,故瀑布见之若远挂云天,泰山因之更显巍峨壮观。境界狭局,则“峥嵘”无从得生。诗之“峥嵘”,主要指物象绚烂,生机蓬勃。物象绚烂,故让人目不暇接,心旌摇荡;生机蓬勃,故令人胸襟热烈,情满青山。诗要求得“峥嵘”,语言文字必须注意从色彩的动感方面进行刻画。王世贞《艺苑卮言》评“东风摇百草”一句:“摇字稍露峥嵘。”没有动感,也就没有生机和气象。“峥嵘”与“平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苏轼所称“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元好问“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是一个意思。“峥嵘”呈外象,趋于动;“平淡”重内心,归于静。“峥嵘”若无生机真气,则徒成虚荣而已。

(张小平)

【峻峭】 古代诗学概念。葛洪《抱朴子·行品》:“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啸傲偃蹇,凌济慢俗。”这里的“峻峭”,是指人格的不拘礼法,高标不凡。“峻峭”由品评人物,渐用于诗文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昔潘岳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峻峭”作为一种诗文风格,它首先是立意的高峻不群,漠视礼法,啸傲权势,慢凌尘俗。柳宗元、刘禹锡耿介自守而迥拔流俗,他们的诗歌,就体现了“峻峭”的风格。方回《瀛奎律髓》卷四评柳诗“峭而劲”,就包含了志意情

性的孤高劲拔。“峻峭”在物象上表现为豪迈挺立,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奇松巨石,倾倒谿壑。唐吴融《禅月集序》说:“至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在境界特点上,“峻峭”因挺拔无比,落落不群,而显得孤寂清冷。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整个境界寂寞清冷,寒气逼人,但恰好衬托了斯人抗拒风雪、坚韧不拔的“峻峭”个性。“峻峭”的风格,语言遒劲有力,操调险急。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的“骨峻”,就是指文字的峻削细刻。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峻。”文字不刻削,则雍容乏力,无高峻之态;运语不险劲,则平易铺叙,无挺拔之气。“峻峭”与“淡泊”不同,虽然两者都迥拔流俗,但“淡泊”是心净似水,不问世事;而“峻峭”却寄寓着深沉的忧愤。

(张小平)

【晦涩】 古代诗学概念。文辞艰深,涵义隐晦,就是晦涩。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别集上》:“有玉晟者,天圣中为绛倅,取其《园池记》,章解而句释之,犹有不尽通者……为文而晦涩者若此,其湮没弗传也,宜哉。”诗风的“晦涩”,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魏晋时代的玄言诗,“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谈玄论道,虚无缥缈,内容本身就十分艰深远僻,隐奥生涩,所以导致“晦涩”。反过来,形式支离怪僻,也可导致意旨难明的晦涩之弊。如“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这类诗歌佶屈聱牙,晦涩不堪卒读,简直不知所云。“晦涩”,也与内容的组织表达很有关系,胶柱鼓瑟,塞鸡填鸭,就会晦涩不通。张炎说:“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词源》)“质实”,就是文辞表达,板滞不通。因此,“晦涩”也与修辞运用有关。大量堆砌僻典故,反复运用隐喻暗示,多重复加象征景物,最容易导致诗歌的“晦涩”。不仅宋代西昆末流之诗,多有此弊,就是李商隐诗,也常因此而使后人“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见元好问《论诗绝句》)。此外,对原作不能理解而囫圇吞枣的模仿,也能导致晦涩。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说:“孟东野阴祖沈、谢,而流于蹇涩。”即是一例。晦涩与朦胧的风格相近,但朦胧是有一定距离的视觉美感,而晦涩则是难以咀嚼的味觉感受。朦胧,如果失去审美距离,就会转向晦涩。

(张小平)

【繁缛】 古代诗学概念。刘勰说:“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文心雕龙·体性》)繁缛是刘氏所称的诗文“八体”之一。“博喻酿采”,是指喻象广博,辞采纷披;“炜烨枝派”,是指思绪斑斓,铺陈稠

密。可见,“繁缛”的艺术风格,既表现于内容,又显示在形式。陆机《文赋》也提到“繁”和“缛”：“炳若缛绣,凄若繁弦。”“炳”是文采,“凄”指情思,也兼括内容形式两个方面。繁缛诗风的内容特点是:繁复多样地铺陈描绘客观事物的面貌情状,穷形尽相地烘托传达细致精密的文思物理,物象锦簇有序,意丝稠叠不蔓。在形式上,繁缛追求炜烨绚烂的色彩,不尚朴素无华。它长于铺叙场景,气派宏大,风姿华贵。“繁缛”的语言,以雕文镂采取胜,细腻绮丽,炫人眼目。尤具特色的是,譬喻纷然沓来,旨如醇酿,色泛五光。“繁缛”的风格最早表现在汉赋对宫苑景物的铺张扬厉上,后来又逐渐影响了齐梁宫体诗的描述。但诗有繁缛并非仅指宫体诗。“繁缛”诗讲究繁而不乱,缛而不淫。它重视内容情理的熔裁提炼,注重文质两面的有机结合。温庭筠的诗篇就具有繁缛的风格,情思绮靡绵密,景致富丽堂皇,喻象繁出,文采黼黻,如《汉皇迎春词》、《过华清宫二十二韵》等。而宫体诗人则渐趋极端,堆砌胭脂般的秾丽词藻,趣味庸俗。繁缛和繁文缛节不同,前者情思抒写,厚密有度;后者却是胀突流脂,形同赘疣。前者文采绚烂生姿,后者却是闪烁不定。前者场景阔大,后者却是徒有虚架。繁缛与繁丰也有不同,繁缛厚重趋于静,繁丰充沛流于动。繁缛如果过分稠叠,就会导致杂乱无章,不堪卒读。(张小平)

【怪诞】古代诗学概念。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就是怪诞。韩愈《游青龙寺》诗:“却信灵山非怪诞。”怪诞风格的诗文,造境奇诡汗漫,用语搜异摭怪,物象落生无端,立意诘曲尘外。刘熙载评《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可见,《庄子》的怪诞绝非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有着真实生活基础和深刻寓意的。诗风怪诞,亦复如此。描写鬼物图画、山岳精灵、电飞星坠、楚魂寻梦……其形状既变幻莫测,又骇人耳目。与内容相适应,极度的比喻夸张成了怪诞诗的重要特色。如李贺《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怪诞的诗,硬语盘空,险字迭出,是为了表现景物的奇崛怪异、气势的巨大超凡。如韩愈《题炭谷湫》:“吁无吹毛刃,血此牛蹄殷。”怪诞诗的句式,或用五、七言,又夹杂三、四言,结构上忽起忽落,忽转忽断,复出旁生,目不暇给,都是为了加强怪诞的印象,达到动人的审美效果。韩愈的许多诗如《利剑》、《醉留东野》等就有这种特点。杜牧序李贺诗:“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怪诞诗内容形式上的特点,由此可以窥出。怪诞,并非生拉硬扯,而常是符合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一种精心结撰。它色彩瑰异怪炫,构境荒诞幻变,从而合

体渲染了一种骇人耳目、酸心刺骨的狞狰氛围,同时又把作者主观的情感思想超越迹象地幻化其中,让人觉得寓真于诞,寓实于幻。这就是怪诞一格的艺术魅力。但是,对于“怪诞”诗文风格要有正确理解,文学家须有正大的心胸,怀抱不深,徒事铺比,是决不可能化腐为奇,尽俗亲雅的。怪诞之风,一旦泛滥而趋极端,则又将走向反面。故欧阳修知嘉祐二年(1057)贡举时,即对士子中怪诞文风,如“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举,一概抹倒,大批“纰缪”二字(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即是教训。(张小平)

【玲珑】古代诗学概念。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盛唐有诗妙在“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玲珑”,是一种空明的境界。在这里,严羽以禅喻诗,理论并非严密,曾招致后世之讥,如清冯班《严羽纠谬》等。但严羽并非把诗等同于谈禅,作为譬喻,还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如以“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来比喻诗之“玲珑”境界,超凡脱俗,万虑俱空,明心见性,不粘不滞。它没有浩荡的胸襟,雄伟的气魄和慷慨激昂的情怀。其境界,空明澄澈,不染尘埃,遇之匪深,即之愈稀。它没有峥嵘的气象和绚烂的色彩。其语言文字的特点是,削尽常言,摒弃质直,没有激烈的文辞和火热的字眼。在表达上,不直截了当,追求言外的效果。故今人钱钟书《谈艺录》具体评释云:“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可映面。”透彻“玲珑”,也是虚中有实,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张小平)

【朦胧】古代诗学概念。唐李峤《早发苦竹馆》:“合沓岩嶂深,朦胧烟雾晓。”诗学风格的“朦胧”,指的也是这种视觉美感。它恍恍惚惚,依稀莫辨,虚虚实实,扑朔迷离,正如王国维所比喻的:“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隔”是隔着一段时空距离,若远若近,乍明乍暗,这是诗得以“朦胧”的主要原因。“朦胧”,首先表现在景物渲染的影影绰绰,空空濛濛,若即若离,似明似暗。李商隐的诗就有这种特点,如写月色:“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无题》)写雷声:“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柳》)“朦胧”还表现在情境构置的迷离恍惚,出没无方,似隐已见,如幽非藏。如《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写得如梦似幻,极富感染力。又如白居易《花非花》诗,起首“花非花,雾非雾”,即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诗人取喻于花与雾,通过读者自己的丰富想象

来填补艺术空白,来暗示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事物难持久长。“朦胧”还指情思表达的窃窃冥冥,虚虚实实,似是而非,即近又远。写景是为了抒情。景中无情,则景失去气氛;情中无景,则情流于粗鲁。景朦胧,情朦胧,情景交融,委曲绵邈,方得“朦胧”之致。情景缺少委曲绵邈,“朦胧”则失之浅薄而无厚味。但委曲绵邈过于深邃奥幽,“朦胧”就变成了“晦涩”。“朦胧”与“含蓄”相近,两者都追求涵蕴婉转,但“朦胧”主要指外观,“含蓄”是指内藏。有含蓄,不一定要外观朦胧;外观朦胧则必求内有含蓄,否则徒具躯壳,一无诗味。(张小平)

【知音】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指精通音律,《吕氏春秋·长见》篇云:“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南朝梁刘勰引申讨论文学批评,其《文心雕龙·知音》篇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按:指秦始皇、汉武帝)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固)曹(植)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又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其实,“知音”一词,并非刘勰首创。《列子·汤问》有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的故事,后人据此而喻知音。曹丕《与吴质书》(《三国志·王粲传》附录),有“昔伯牙绝弦于钟期……痛知音之难遇”之语。《淮南子·修务训》也有“作书以喻意以为知音”的话。“知音”难觅之叹,早已有之。但是刘勰在继承前人“知音”说的基础上,从文坛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出发,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文艺的批评与鉴赏的理论,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文学作品一旦诞生,其艺术价值客观存在,但其光彩或瑕疵,又有待于艺术的“知音”来揭示。刘勰所慨叹的“知音其难哉”,是因为长期历史积淀的传统陋习在作祟。他指出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三大弊病,因而无法成为知音。再加以诗文的风格复杂多样,人们由于性格、兴趣不同,嗜好各异,因而态度主观,同样难成为知音。刘勰针对这些传统陋习,指出应该具有比较公正而客观的批评与鉴赏实践,加以分析比较,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所谓“圆照”与偏好相反,指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后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而要

做到“圆照”,必先“博观”,广泛阅读和会心比较。为此,刘勰为“知音”说提出了“先标六观”的要求,也就是说,批评与鉴赏有规律可寻,先从研究艺术形式入手而去探讨作品优劣:“一观位体”,指考察作品的风格体制;“二观置辞”,指考察如何运用文学语言的艺术;“三观通变”,指考察作品的继承与创新;“四观奇正”,指考察如何处理奇、正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五观事义”,指考察运用成语典故是否妥贴生动;“六观宫商”,指考察作品声律是否和谐流畅。与创作先情志后形式的过程相反,批评鉴赏因作品而发,是先从客观的艺术存在入手,然后“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来探究作家所表现于作品的情志。这些意见,对于今天的文艺批评和鉴赏,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蒋凡)

【阳春白雪】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以音乐来譬喻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语出宋玉《对楚王问》(见《文选》卷四五):“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原是先秦时代楚国的高级乐曲,但因其文化层次较高,艺术把握有一定难度,因而歌唱时和者寥寥无几;不像歌唱较低层次的通俗乐曲《下里》《巴人》那样,一人唱而千人应万人和,二者的效果形成了强烈对比。因此必须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认识,以便促进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就必须强调艺术的“知音”。后来刘安《淮南子·人间训》受其影响而发挥说:“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在楚乐曲中,《采菱》《阳阿》,属于仅次于《阳春》《白雪》的高级艺术,而高诱注《淮南子》,以为“《延路》《阳局》,鄙歌曲也”,与《下里》《巴人》同属于通俗流行乐曲之类,文化层次较低。如《阳春》《白雪》《采菱》《阳阿》一类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一般的“鄙人”不能欣赏,因此和者寥寥无几;而当演唱《下里》《巴人》《延路》《阳局》一类流行的鄙歌俗曲时,则人们欢喜若狂,手舞足蹈,和之应之,场面极其热闹。这不是因为《阳春》《白雪》之类作品的艺术不高妙,也不是因为表演者技艺低劣,而是因为“听者”或“读者”受到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平的限制,无法成为高雅艺术的“知音”。事实说明,艺术的对象不同,则效果各异。所以不仅是创作者要注意到艺术对象的审美要求,批评者也要研究观众读者的欣赏趣味,才能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高级的艺术,批评家不能因为欣赏者较少而随声附和地加以指责并抛弃,而应加以

宣传提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保证作品艺术水平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进步。参见“下里巴人”。

(蒋凡)

【不著一字】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唐司空图《诗品·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所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句,被古人誉为“诗家极则”(王士禛语)。所谓“不著一字”,简言之,就是艺术上的“无字”、“无言”,或艺术的“空白”。它只是运用文学的修辞手法来论诗,并不是说诗歌不必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其艺术思想的哲学基础来自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而无所不在;又与佛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五灯会元》卷一)的禅理相通。在《诗品》中,司空图以诗歌的夸张语言“不著一字”,来概括并强调艺术“虚无”的重要意义。诗歌创作的“虚无”,并不是空空如也,一语不发,更不是凝滞不动,而是无常形而无所不为。它无所不在,随地赋形,因物而见,千变万化,流动不息,包含了运动、变化之义,同样也符合于“数”——即艺术的审美规律。

·张白纸,人们可以随意补白;但艺术“空白”却是浑然天成的整体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无须人们妄“补”,因为一旦填“虚”为“实”,就会把话说尽,大煞风景。为了破除填实补虚的陋习,创造空灵激荡的艺术境界,于是司空图不得不对艺术庸人当头棒喝,夸张地拈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句,用醒目的强调语言,来引起人们的深思,说明诗歌语言及艺术意境的创造,必须特别精警、含蓄,有的意思可以少写甚至不写,让人们在艺术“空白”中各自去作丰富的想象并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作者通过“不著一字”的特殊手段,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可以浮想联翩的艺术“空白”,把创作与欣赏、诗人与读者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尽得风流”的诗歌特殊形象——即余味无穷的深邃意境。于此可见,“空白”不空,“不著一字”的美学妙用,正在于展现诗歌那新鲜活泼而又无限丰富的内容和意义。这与现代的“接受美学”有某些相近之处,其理论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司空图“不著一字”之说,对后代诗歌美学影响很大。如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至明清时,不仅如王士禛的神韵说明显宗法司空图,就是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也说:“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内人之所游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安放此身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随园诗话》卷一三)于此可见其艺术影响。

(蒋凡)

【下里巴人】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以音乐曲调来譬喻文化层次较低的通俗流行的文学艺术作品。语出于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先秦时代楚乐曲名。后世因此以《阳春》《白雪》象征高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以《下里》《巴人》象征通俗流行的文学艺术作品。二者的文化层次高低判然有别,艺术对象和接受效果也大不相同。通俗流行的民间文艺,也具有自己的艺术效应和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后来陆机受其影响,在《文赋》中说:“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櫟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这就比较好地注意到高雅艺术与通俗文艺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张少康《文赋集释》引雷琳、张杏滨云:“如歌者缀鄙曲于高唱,亦以相形而成其奇特也。”又称引张凤翼之言:“苟臻妙境,自有光彩。辟则石之韞玉,水之怀珠,而山之辉、川之媚,恒必因之也。然常调亦不可废,犹之榛櫟勿翦,可以蒙荣而集成翠色。是以《下里》之音,适所以济《白雪》之伟。”也就是说,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矛盾相反相成,如果处理正确,可以相互推动,共同促进艺术创作和审美批评的健康发展。参见“阳春白雪”。

(蒋凡)

【熟参】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参”谓玄思冥想,明悟道理。原指“参禅”,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文学批评术语“熟参”从佛学中移借过来,强调对作品熟读深思,以领悟其奥妙。宋人好以禅喻诗。严羽之前,吴可《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严羽在前人基础上,更提出了依次“熟参”自汉魏至宋代各个阶段的诗歌,以鉴别比较它们不同的风格、造诣和境界,从而决定选择其最上一境为自己作诗的榜样,以达透彻之悟。他认为“见诗”之“广”,“参诗”之“熟”是了解“诗道”,提高创作的可靠途径。“熟参”说虽然是宋代诗、禅互渗的产物,但与古代文学鉴赏、批评理论也有内在联系。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

先博观。”“熟参”正是“博观”之意。严羽要求诗人通过“熟参”众制,确立以汉魏、盛唐诗歌为“第一义”之悟,开启了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说的先声。前

后七子漠视晚唐和宋代诗歌,则是对严羽提出的“参”诗范围不明智的减缩。
(邬国平)

诗论著述

【诗大序】 诗论著作。又称《毛诗序》。汉代解释《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诗》为古文经学,另外三家为今文经学。后来三家诗亡佚,仅能从后人的辑佚中略窥其旨。毛诗经东汉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疏,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序》是对《诗经》各篇旨意的解释。《毛诗》在首篇《关雎》前有一段总论,世称《诗大序》,其下各篇的序为《诗小序》,合称《诗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自汉迄宋,粗略统计大约有二十馀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一说为子夏所作,见郑玄《郑志》。一般认为,《诗序》的撰写从先秦延续至汉,非成于一人一时。它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诗大序》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其诗学观点,主要有:一、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既缘情又言志,二者是统一的。在先秦典籍中,“诗言志”是一个普遍的提法,春秋时亦颇重“赋诗言志”,但诗歌要打动人,则这个“志”又必须饱含着“情”。《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显然是更为周全的表达。唐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即在《诗大序》的基

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二、强调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结合《诗小序》,可以看出作者是藉此以明诗教,因而特别注重诗的教化和“风”、“刺”作用。在此基础上,《诗大序》还进而提出诗歌的个性和社会性问题:“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疏云:“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因此,中国诗歌中也强调作诗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诗大序》乃是这种思想的发端。三、强调诗歌与政治、时代的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诗大序》继承了《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揭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诗歌创作紧密相关的原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提出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

正是对《诗大序》的进一步发挥阐述。四、就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提出了“六义”说。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来的。其中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手法。“六义”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赋、比、兴”,乃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手法和基本特色,后人论述尤多。朱熹在《诗集传》中曾阐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这三种写作方法(特别是比、兴二法)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比兴的概念也处于不断丰富之中,成为诗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总之,《诗大序》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诗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有《十三经注疏》本。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曾加以选辑,并有详细注释。

(张伯伟)

【毛诗序】 见“诗大序”。

【典论·论文】 文论著作。魏曹丕撰。《典论》一书,系曹丕为太子时精心结撰之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五卷,《宋史》以后不复著录,当已亡佚。后人据《群书治要》与《意林》二书所辑,定篇目为十二,《论文》即其中之第九篇。此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题论文。其内容涉及文体论、文气论、批评论及文章价值论。曹丕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和人寿短促的现实刺激,认识到作文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将文学的地位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是对《左传》“三不朽”之说的进一步发挥。文中还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气”,即指文章的辞气,而文章的辞气又与作者的个性有关,即与“体”有关。文章的气就是呈现于文辞间的作者个性。故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中将文章分为“四科”,并分别提出各自的要求,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前二科无韵,后二科有韵,隐含了“文”“笔”区分的趋势。“诗赋欲丽”,提出了对诗歌语言风格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对诗歌体裁特点的认识。此外,文中还论及批评态度问题,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两大弊病。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问题,而曹丕引其端绪,对后世影响很大。《论文》是《典论》一书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一篇,其文字最早见于裴松之《三国志·王粲传》注,后又为萧统编入《文选》,唐初辑《艺文类聚》亦收此文,文字上有出入,可能是所据版本不同之故。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收入此文,并加以注释。

(张伯伟)

【文赋】 文论著作。晋陆机撰。该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文献。其写作年代,迄无定论。杜甫《醉歌行》云:“陆机二十作《文赋》。”今人则大多认为是陆机四十岁左右的作品。曹丕《典论·论文》中曾就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分别指出其体裁特征,陆机则分作十种文体细致地加以分析,即:“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从中可以看出,陆机“文”的概念是包括齐梁人的“文”、“笔”在内的,而尤其以诗为诸种文体的核心。陆机不仅将诗赋的排列位置提到了最前面,而且对其他文体的要求也近于一种诗的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较“言志”说更强调情感因素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并在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基础上,更强调了诗歌语言的华美。这反映了陆机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陆机对于文章,纯粹是从审美角度考察,而不取实用的或伦理道德的观念。因此,他主张立“意”贵“巧”,遣“言”贵“妍”,这样的文章,就能“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给人以审美享受。《文赋》还论述到艺术构思、写作方法、技巧方面的问题,其中以论艺术构思最为精辟:“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特别强调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在艺术构思中的重要性,写作时精神在时空中遨游,从而创造出真切鲜明的艺术形象。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文赋》还强调创新,反对因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还指出了各种文病,强调文章的整体美和动情力。《文赋》总结了东汉以来诗赋等文体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观念,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影响很大。此文收于萧统《文选》之中,也因此而扩大了影响。后人曾有多种注释、评笺,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采辑颇详。

(张伯伟)

【文章流别论】 晋挚虞撰。挚虞(245?—311?),字仲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历仕晋武帝、惠帝及怀帝三朝,位终太常卿。师事名士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有关文学者计有《文章志》二卷,《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其中《文章志》属史部簿录类,兼有文人传记和文章目录之用;《文章流别集》属集部总集类,自诗、赋以下,分体编纂,类聚区分,乃历代总集之祖。《文章流别论》原附于《文章流别集》之叙论并解题,梁以后别出,与

《文章志》并行,《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至唐始有《文章流别论》之称。其书亡于宋后。《文章流别论》遗文散见于类书及古注中,经后人辑佚,可见者凡十九则。其中有总论文章者,有分论文体者。其论文章之功用,以为可“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此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立论。其释“六诗”,亦一本《周礼》,不取《毛诗序》“六义”之称,在解释上又重情志而弃美刺。如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即与汉儒有别。其分论文体者,今存有论诗、颂、赋、七、铭、箴、碑、诔、哀策、哀辞、图讖等十一体。其中论诗体的形成,自三言至九言皆源于《诗经》,实将四言诗体中非四言句式,作为非四言诗体的源头,乃受尊经观念限制。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作品的批评,约有七则。其书影响颇大。钟嵘《诗品》许为“详而博赡,颇曰知言”,刘勰《文心雕龙》虽讥为“精而少功”,但在不少具体论述上实受其启发。

(张伯伟)

【世说新语】笔记小说。南朝宋刘义庆撰。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封临川王,招聚才学之士,著《世说新语》八卷,梁刘孝标注分为十卷。原本已不可见。今本均分为三卷(或每卷再分上下,则为六卷)。据汪藻《叙录》,知宋代已是如此,正文及注文都经过晏殊的删节。《世说新语》所记之事,自后汉迄于东晋,共分三十六门。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资料。《文学》一门,内容包括文章和学术,以第六十六则曹植作七步诗为界,可见其“文学”概念仍承先秦之旧。但书中记载了许多人物品评的新概念,如“风骨”、“言意”、“神似”、“形似”、“神气”等,后来均为文学理论所袭用。《巧艺》篇中记载论画诸语,表现了由人物品评到论文谈艺的转变。如顾恺之“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为历代论画者津津乐道。其次,书中还记载了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与欣赏,如《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此外,摘句批评的材料也以此书记载为早。摘句不仅用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也用于经书的欣赏,如《文学》篇中“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以及王孝伯行散,“问古诗何句最佳”等。这影响到唐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后来演化成句图著作,晋人可谓开其端。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人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在后世亦颇有影响,如孙绰对陆机、潘岳的评论,就影响到钟嵘《诗品》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另外一些诗人作品已佚,借当时人的评论可以略窥其特色,如晋简文帝对玄言诗

人许询的评论。《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一些文人的佚事,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坛掌故,如曹植“七步中作诗”,左思作《三都赋》,袁宏作《咏史诗》等,对后世也颇有影响。此书版本颇多。今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取材宏富,前者偏重史实,后者偏重语言,二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伯伟)

【文心雕龙】文论著作。南朝刘勰撰。刘勰(466?—538?—说466?—521?—说465?—532?),字彦和,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人,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笃志好学。后依僧祐,居钟山上定林寺十馀年,帮助僧祐整理经藏、抄撰要事。三十岁以后,开始构撰《文心雕龙》,到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成书,前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其后,他负书以干沈约,约赞其“深得文理”,刘勰其人其书乃渐为士林瞩目。梁天监二年(503),刘勰离开定林寺步入仕途,历任记室、参军、太末令等职。至天监十年,改任萧统记室,并兼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晚年主持整理佛经,遂落发受戒,改名“慧地”。其作品流传下来的还有《灭惑论》等两篇佛教方面的文章。《文心雕龙》十卷,每卷五篇,共五十篇。前二十五篇为上编,后二十五篇为下编。每篇均以两字为标题,全书共三万七千多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体大虑周”的空前巨著。全书内容可分四大部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论是前五篇,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其中前三篇又尤为重要,反映了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其后二十篇为文体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十篇为一部分,论述有韵之文;后十篇为一部分,论述无韵之笔。这二十篇的基本结构,刘勰归纳为四大纲领,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的文体分类,在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对各类文体的研究作了总结,从而超越了前人。其后二十篇为创作论,对当时文学创作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几乎都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既分析了构思的诸要素,又强调了想象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对陆机《文赋》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文学创作的技巧方面,有关文法、修辞、气势、音律、结构等,亦均一一论及。再其后四篇为批评论,分别探讨了文学与时代潮流、与才能识略、与读者鉴赏以及与作家道德的关系。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说明自己著书的缘起、内容旨趣及写作态度等。全书构架绵密,自成体系。在诗论方面,书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关于诗的定义,《明诗》篇既采用了魏晋以来的“缘情”说,又维护传统诗教的“言志”说,综合二者。其次,在诗

体上重视四言,反映出其观念的保守面。在《明诗》篇中,刘勰将四言视为“正体”,以五言为“流调”,而在其所处的时代,正是五言诗流行时期。他的这种观念,也可能是由于对当时诗风不满而形成的。再次,关于诗歌的作用,一方面注重其伦理功能和实用功能,另一方面也注重其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另外,刘勰将乐府另立一类加以探讨,主要偏重在诗与音乐的关系。《乐府》篇称:“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这种划分,与《文选》和《诗品》是有区别的。《文心雕龙》对后世影响甚大,版本亦颇多。今存最早的是唐写本残卷,最早的刻本是元代至正本。通行本有清黄叔琳辑注本、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本、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本、詹鍈《文心雕龙义证》本。

(张伯伟)

【诗品】 诗论著作。南朝梁钟嵘撰。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南齐永明中为国子生,历任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梁天监中,迁西中郎晋安王(萧纲)记室。后人亦称其为“钟记室”。《诗品》撰写的时间,在沈约卒后(513),完成于其为晋安王记室时。该书《梁书·钟嵘传》、《隋书·经籍志》、《文镜秘府论》引《四声论》并作《诗评》,似为唐代之通称。但其本名实应为《诗品》。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全书三卷,每卷之首均有序言,集中地表达了著者的诗学见解。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将三序合一,置于卷首,合称《诗品序》,或称《总序》,尤为后人重视。在钟嵘的时代,创作和批评都存在很多问题,或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或是“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而晋、宋以来的论文之作,也都存在“曾无品第”的缺陷。因此,钟嵘乃将推溯源流与品第优劣结合起来,既别裁伪体,又正本清源。《诗品》分上、中、下三品,分别评论了自汉以来的一百二十四家(包括古诗)作品,其中三十六家又分别纳入《国风》、《楚辞》和《小雅》系列,谓“入此宗流者,便称才子”。列入上品的诗人中,大多出于《国风》系列,其中包括“建安之杰”曹植,“太康之英”陆机和“元嘉之雄”谢灵运。中品诗人除颜延之外,均出于《楚辞》系列。这又体现了另一层次的高低。通过“三品升降”和推溯源流,钟嵘力图为诗歌创作和批评树立起新的“准的”。在理论上,钟嵘尤其重视外在景物及人生际遇对诗情的感发作用,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中有属于自然者,“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亦有属于社会者,“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

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较之陆机《文赋》仅偏重四时变化对人情的感发,显然是一大发展。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钟嵘强调对赋、比、兴的综合运用,指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比一味强调使用“比兴”,显然更为正确。正因为如此,钟嵘反对用典,所谓“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又反对说理,斥责玄言诗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又反对声律,认为诗歌应重视自然音韵,“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此类见解,堪称卓识,在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诗品》刻本,除辑入诗文评或类书者外,以明嘉靖年间繁露堂本为传世最古者。此后,收入丛书及单刻本甚多,明、清以来,亦偶有校、注。近人校注之作,有陈延杰《诗品注》、古直《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曹旭《诗品集注》等。

(张伯伟)

【颜氏家训】 笔记著作。隋颜之推撰。颜之推(531—591?),字介,祖籍琅玕临沂(今属山东),后徙居丹阳(今属江苏)。历仕梁、齐、周、隋四朝。青少年时“好饮酒,多任纵”,晚年则谨小慎微。《颜氏家训》作于其晚年,多老于世故之谈。此书旧本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但实际成书于隋开皇中,与其卒年相近。其写作目的,乃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全书共二十篇,内容既有修身、治家,亦有经世、涉务,而较为集中反映其文学思想的是《文章篇》。颜氏论文,颇受刘勰影响,认为文章源于六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颇同于《文心雕龙·宗经篇》。又以古代文人不注重道德修养,往往以文招祸:“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讽刺之祸,速乎风尘。”与《文心雕龙·程器篇》的论证大致相同。又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则又类似《文心雕龙·附会篇》。颜氏还强调创作才能的重要性,“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但同时又反对“师心自任”,强调严谨的创作态度。他指出:“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乎。”他赞成沈约的“三易谈”,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尤其是“易见事”,他引用邢子才的话解释道:“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西清诗话》引杜少陵语云:“作诗用事,须如释氏语,

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两者立意是一致的。此外,他还提出“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对后世亦有一定影响。摘句批评在此书中也有一定反映,如他推许王籍《入若耶溪》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句,以为“文外独绝”;又欣赏萧悫《秋诗》中“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句,“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这些鉴赏论,后来也得到宋代许颢、朱熹及清代王士禛的赞同。《颜氏家训》版本颇多,近人整理者,有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九)、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张伯伟)

【文笔要诀】诗文评著作。唐杜正伦撰。杜正伦,相州洹水(今河北临漳附近)人。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善属文,尤明释典。仕隋为羽骑尉。唐高祖武德中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太宗贞观元年,以魏徵荐擢授兵部员外郎。高宗时贬为横州刺史,卒于贬所。《文笔要诀》新、旧《唐书》均未著录。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文笔要诀》一卷,题杜正伦撰。有日本五岛庆太郎藏平安末期(相当我国中、晚唐时期)写本,昭和十八年(1943)据以影印。空海《文镜秘府论》北卷录其“句端”部分,而没其名。此外,印融之《文笔问答钞》、《眼心钞》均摘抄之。文笔之分,乃六朝以来通论,即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要诀,即要法。五代冯鉴撰《修文要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误谬,以训初学云”。以此推之,则杜氏书当与之近似。惟现存者仅为论述句端语助者。“句端”问题,六朝时已为人所注意,如《文心雕龙·章句篇》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骈文与赋尤重发端。杜正伦首加归纳、解释,引起后人重视,故其价值不可低估。今人王利器有《杜正伦〈文笔要诀〉校笺》。(张伯伟)

【笔札华梁】诗论著作。唐上官仪撰。上官仪(约607—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人。幼出家为僧,尤精《三论》。工于文辞,博涉经史。贞观初登进士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作诗,每命继和。永徽初,为高宗草诏得罪武后,坐事下狱死。《笔札华梁》二卷,见录于藤原佐世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未题撰人。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录有《笔九花梁》二卷;据中外学者研究,“九”当为“札”字形误,二者实为一本。上官仪时代,正处于律诗形成过程中,士大夫对于诗律知识之要求甚为迫切。该书内容,主要总结六朝以来有关对偶及声病理论,故有“六对”、“八对”、“八病”诸目。魏晋以来诗歌创作偶句之法渐为严密。《文心雕龙·丽辞篇》总结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

种,上官仪则增加至十种,元兢、崔融继续增补,至《文镜秘府论》东卷乃总结为二十九种对。“八病”原为沈约所创,上官仪又提出“龃齬”病,亦为声病。又有“六志”,论述言志之方法;“八阶”则与“六志”接近。其书久佚,部分内容见引于《文镜秘府论》、《小学紺珠》、《玉海》、《诗人玉屑》中。旧题《魏文帝诗格》亦据以改头换面而成。整理本有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张伯伟)

【笔九花梁】见“笔札华梁”。

【古今诗人秀句】诗句选集。唐元兢辑撰。元兢,字思敬,龙朔元年(661)为周王府参军,总章中(668—670)为协律郎。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兢“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此书久佚,仅存一序,见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尚可藉以略窥其撰写过程及大旨所在。此书之编纂,始于兢为周王府参军之时,参与其事者,有刘祎之、范履冰等人,然而当时“王家书既多缺,私家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及总章中预修《芳林要览》,元兢更加剪取,编成《古今诗人秀句》两卷。其收录范围,“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就其理论而言,与六朝诗论颇有渊源。“秀句”一词,较早出现于《文心雕龙》和《诗品》中。《隐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诗品》卷中评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道。”《古今诗人秀句》之书名当有取于此。其选录秀句的标准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予遗。”从论点、术语乃至造句,都明显受到刘勰和钟嵘的影响。魏晋以来,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在作品中不时出现“佳句”,于是在批评上也相应出现了“摘句褒贬”(《南齐书·文学传论》)、“秀句集”正是其进一步发展。《古今诗人秀句》是这类著述之祖,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僧玄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黄滔《泉山秀句》三十卷,均见录于古代史志,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录佚名之《秀句集》、《秀句录》各一卷。此外,如日本大江维时亦有《千载佳句》两卷,专选唐人“佳句”;而《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丽句》、《当世丽句》等,则又专撮东人秀句为书,可见后世仿效风气之盛及影响范围之广。“秀句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写诗时的“发兴”,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出选录者的审美情趣和理论主张,所选“秀句”即为具体可征的写作模式。“秀句集”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摘句图的出现。所以,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一书,正代表了从六朝的“摘句褒贬”到晚

唐的“摘句为图”的过渡。

(张伯伟)

【诗人秀句】 见“古今诗人秀句”。

【诗髓脑】 诗论著作。唐元兢撰。《诗髓脑》一书,未见中国古代典籍著录和征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学家类有《诗髓脑》一卷及《注诗髓脑》一卷,未题撰者姓氏。空海《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中自注云:“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其遗说均见引于《文镜秘府论》中,内容有三方面:一、调声三术。着重诗句的平仄相调;二、对属。其中的名对、异类对乃时人之通说,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为元氏之创论;三、病犯。其中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齟齬九病乃字音之病,丛聚、忌讳、形迹、旁突、翻语、长擷腰、长解铎七病是形义之病。这些内容,均为初、盛唐诗格普遍重视。元兢学说多承沈约,“八病”之说亦赖以保存。《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元氏《宋约诗格》一卷,“宋”当为“沈”之误,《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正作《沈约诗格》一卷。惟其书久佚,不知其内容与《诗髓脑》关系如何,有可能是同书异名。《诗髓脑》或即取自沈约《内典序》“或资髓脑之名”,意指诗歌写作之精义、要诀。佚文见《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东卷《二十九种对》及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征引。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沈约诗格】 见“诗髓脑”。

【评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唐李峤撰。李峤(644—713),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历仕高宗、武后、中宗三朝,官至中书令。李峤一生,前与王勃、杨炯相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歿,遂独为文章耆老,为学者取法。《评诗格》一卷,最早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陈振孙云:“峤在昌龄之前,而引昌龄《诗格》八病,亦未然也。”伪托之迹显然。就现存内容而言,其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融《唐朝新定诗体》颇多相同,如“九对”、“十体”者,均为两见。崔书又有“六犯”者,为今本《评诗格》所无;而陈氏所云其引及王昌龄《诗格》者,亦不见于今本《评诗格》。由此可知,此书乃后人杂抄崔融等人《诗格》而成,因李峤文名颇盛,而崔氏等人先已下世,故托名于峤。此书内容亦早有散佚,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唐朝新定诗体】 诗格著作。唐崔融撰。崔融(653—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属山东)人。年二十四以词弹文律科登第。历任崇文馆学士、太子侍读、著作佐郎、内史、凤阁舍人等职,兼修国史。神龙二年(706),奉敕撰《则天实录》,又奉敕为《则天哀册文》,用思精苦,发病而卒。《唐朝新定诗体》或作《唐

朝新定诗格》,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未题撰者。《文镜秘府论》征引诸书,地卷有“崔氏《新定诗体》”一目;东卷复作“崔氏《唐朝新定诗格》”,二目实为一书,崔氏亦即崔融。《文镜秘府论》引及崔氏此书内容,计有十体、八对及六犯,其内容亦为初、盛唐诗格所普遍讨论者。十体者,乃形似、质气、情理、直置、雕藻、映带、飞动、婉转、清切、菁华十目,“体”非体性风格,而是写作方法。其中形似、质气、直置、飞动等说与元兢相类,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亦多袭用。“八对”中有三对为崔融独创,即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六犯”指六种病犯,其中亦有与元兢《诗髓脑》相重者。此外,《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最后一节亦引崔氏曰,有“旁纽”及“纽声双声”二目,内容多袭自沈约。崔氏《新定诗体》内容可考者仅此数目。另外,托名李峤《评诗格》,内容多同于崔氏,亦可相参。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唐朝新定诗格】 见“唐朝新定诗体”。

【乐府古题要解】 诗论著作。旧题唐吴兢撰。吴兢(669?—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厉志勤学,博通经史。魏元忠荐其有史才,诏直史馆,修国史。神龙中,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私撰《唐书》、《唐春秋》,叙事简核,人以董狐目之。《乐府古题要解》历代著录不一,《新唐书·艺文志》经部乐类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崇文总目》录《乐府古题真解》一卷,谓“唐吴兢撰,释古乐曲所以名篇之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占乐府》十卷并《乐府古题要解》二卷,谓“唐吴兢纂,杂采汉魏以来古乐府辞凡十卷。又于传记洎诸家文集中采录乐府所起本义以释解古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疑此书为“元人所贗造”。郭茂倩《乐府诗集》屡引《乐府题解》,其内容与今本大致相同,可知此书并非元人伪造。又残存于《说郛》中之文或《炙轂子》亦引用《乐府题解》,并引及“古题及乐府杂题”,谓“古题多起汉代,杂题多起齐梁”。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卷末乃载及建除诸体并及于字谜之类”为元人伪造时凑数之作,显误。惟《炙轂子》引用书名为《乐府题解》,唐人类似书名,《新唐书·艺文志》有郗昂(一作王昌龄)《乐府古今题解》三卷,《崇文总目》有无名氏《乐府解題》,则今本究竟是否吴兢之作,虽可阙疑,但其内容,必出于唐人之手,决非后人伪造。此书乃针对后世文士撰写乐府,袭用古题而用意不同于古人,因此作为“解題”,使后学者能得以取正。如《薤露》、《蒿里》,均注明为“丧歌”。此书保存了大量文献,使后人得以考知每一乐府题目之原始意义,但就此书撰写动机看,显然代表了一种保守观点。曹操

即以乐府古题写时事,至杜甫乃“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至白居易《新乐府》,更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代表了乐府诗发展的趋向。而吴兢欲后学用古题写古意,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此书版本存世者均出于毛晋《津逮秘书》,通行者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张伯伟)

【诗格】 诗格著作。唐王昌龄撰。据《唐才子传》卷二载:“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可能指王昌龄对于时人的诗歌创作曾有过指授。《诗格》一书,《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为二卷,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宋史·艺文志》八则著录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实即《诗格》的一析为二。《诗格》一书,最早见引于皎然《诗式》。日僧遍照金刚亦曾自唐携回该书,并于《文镜秘府论》中多所资取。其诗学观点,既修正了初唐的齐梁诗风,又修正了陈子昂的复古诗观,代表了从初唐过渡到唐中期关于诗法的要求。其内容一为论声律、对偶,此乃初、盛唐诗格的主要内容;二为论“势”,此乃晚唐五代诗格之讨论重心,亦恰好证明王氏《诗格》之承先启后作用;三为论构思取境,特别指出诗有物境、情境、意境,对后世影响很大。现今流传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及《诗学指南》诸本,其中引用王昌龄《塞下曲》而题曰“古诗”,又引诗云“王少伯诗”,均非其自述语,其中当有后人伪托。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诗中密旨】 见“诗格”(王昌龄)。

【诗式】 诗论著作。唐释皎然撰。皎然(720—800?)俗姓谢,字清昼(一作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谢灵运十世孙。天宝后期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久居吴兴杼山妙喜寺。诵习佛典之余,又博涉经史诸子。文章清丽,尤擅吟咏,时号“江东名僧”。有《杼山集》。《诗式》一书泛论诗歌法式,有一卷本和五卷本。前者为简写本;后者据其序言,系湖州长史李洪在吴生协助下点窜而成,亦非原貌。《文镜秘府论》、《吟窗杂录》等书征引、辑录之《诗议》、《诗评》(或作《评论》)及《诗式》,均不见于五卷本之内容。虽题名不同,但这些内容可能就包含于《诗式》之中。《诗式》受钟嵘《诗品》影响颇大。就结构而言,《诗品》序有三章,分置各卷之首,五卷本《诗式》序亦有三段,分列于卷首、卷一和卷五前,卷一之序还标有“中序”二字。《诗式》的美学理想是追求“自然”、“天真”、“性情”,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此乃承《诗品》“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之意。钟嵘反对四声八病之拘忌,《诗式·明四声》亦指出:“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可见,尽管皎然对钟嵘偶有非议,但受其影响之迹是显而易

见的。《诗式》为较有系统的诗论专著。卷一总述诗法及诗论,其后以汉代至中唐的“名篇丽句”按“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有事无事”、“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等分列五格,并以“十九字”作诗体分类,对一些诗句予以评论。其中有不少精到见解。如“取境”,强调构思的艰苦,“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低,则一首举体便逸”。这些论述在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环节。而其取境理论,从创作上来看,显然是以谢灵运诗为总结对象的。又如论诗味,主张“情在言外”,“旨冥句中”,谓“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则与六朝的“隐秀”论有渊源关系,而在表达上更为明晰全面。再如论风格,有“辨体一十九字”,其中有偏于思想品德者,如高、逸、忠、节、志、气、德、诚、闲、达、悲、怨等,有偏于艺术表现者,如情、思、意、力等,有偏于诗境描摹者,如静、远等。此外,如“诗有二要”、“诗有二废”、“诗有四离”、“诗有六迷”等条,亦颇具艺术辩证法。《诗式》对后世影响颇大,其写作格式,如“诗有四不”等,奠定了晚唐五代诗格的基本模式。其理论影响如论“势”,晚唐诗格著作所列“势”名有直接取于此书者;论“十九体”,晚唐诗格著作亦有拟之者;而论“作用”,则至宋代形成“体用”说。就审美思想的发展而言,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都是对皎然诗论的继承和发展。可见此书在中国诗论史上之重要地位。此书一卷本,有《说郛》、《历代诗话》本;五卷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今人整理者,有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1984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版)、李壮鹰《诗式校注》(1986年齐鲁书社版)等。

【诗议】 见“诗式”(皎然)。

【诗评】 见“诗式”(皎然)。

【中序】 见“诗式”(皎然)。

【文镜秘府论】 诗格著作。日僧空海撰。空海(774—835),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市)人。曾随外舅阿部大足受《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学文章。皈依释氏后,改名无空,后又改教空、如空。三十一岁时衔命赴唐留学,入长安西明寺,受灌顶礼,后得遍照金刚名号。在唐留学三年,回国后成为日本真言密宗始祖。晚年隐居纪伊国金刚峰寺。卒后八十六年,日本醍醐帝追谥弘法大师。为普及汉诗文的写作,他曾据在唐时所搜材料删削整理,编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约成书于大同四年至弘仁七年(809—816)之间,后又摘要写成《文笔眼心钞》。此书一直流传于

日本。清光绪年间,杨守敬赴日考察后撰成《日本访书志》,论及此书,遂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1930年,储皖峰根据杨氏介绍,取其中论声病部分题为《文二十八种病》印行,受到人们重视。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全书。《文镜秘府论》乃初、盛唐诗格之集大成者,其直接引用的文献,约有十八种,其中除皎然《诗议》及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外,大多已在中土失传。即使如上述二书,文字与今本流传者亦有差异,皆堪援以参校。其内容主要涉及诗文写作之声律、对偶、体势等。全书六卷,以同六合之数。其中天卷论声韵,地卷论体势,东卷论对偶,南卷论文意,西卷论病犯,北卷论对属。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声律、对偶理论的早期材料,对于考察古诗到律诗的演变过程,以及齐梁至初盛唐的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历史上,此书曾推动日本的汉诗文写作,而对于今人从事初、盛唐诗论的研究,以及辑集六朝、唐代的佚诗佚文,亦可资利用。今人王利器有《文镜秘府论校注》,日人兴膳宏有《弘法大师空海全集·诗文篇》(《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钞》)译注。

(张伯伟)

【**金针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唐白居易撰。《郡斋读书志》卷二二及《宋史·艺文志》八均著录为三卷,今本仅一卷。晁公武曰:“居易自谓与刘禹锡、元稹皆以诗名,撮诗之体要为一格,病得针而愈,诗犹是也,故曰《金针集》。”《因话录》卷三云,白居易等五人“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风骚要式》亦引白氏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则《金针诗格》者,实即授人以金针之谓。这类书实际上与科举考试有关。此书究竟是否白居易所撰,后人颇致怀疑,且今本卷数与原书不同,内容又与旧题梅尧臣之《续金针诗格》相类似,究出何人之手,难以确论。然宋人征引此书,以范温《诗眼》为最早,则其成书至迟不会晚于北宋初年。其节目有:“诗有内外意”、“诗有三体”、“诗有四格”、“诗有四炼”、“诗有五忌”、“诗有八病”、“诗有五理”、“诗有三体格”、“诗有喜怒哀乐四得之辞”、“诗有上中下”、“诗有四齐梁格”、“诗有扇对格”、“诗有七义例”、“诗有物象比”等,多属诗法之类。其中“诗有内外意”颇得后人重视。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文苑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唐白居易撰。此书实为伪书,其伪托年代当在宋初。《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亦以为贗作,故云“称白氏,尤非也”。书中凡十七目,前七目颇类同于崔融之《唐朝新定诗格》所标“十体”。其内容除论诗外,还兼及文。如“精颐以

事”条云:“若占文用事,又伤浮艳;不用事,又不精华。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刘宾客嘉话录**】 笔记著作。唐刘禹锡述,韦绚记录整理。韦绚,字文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尝官江陵少尹、起居舍人、武义军节度使。韦绚于穆宗长庆二年(821)自襄阳至夔州时,尝从学于刘禹锡,宣宗大中十年(856)在江陵任少尹时整理昔日笔记而成此书。书名或作《刘公嘉话》、《刘公嘉话录》、《刘禹锡嘉话》、《宾客嘉话》等。全书一卷,记六朝隋唐文人轶事,共一百三十条。其中可考定为原本所有者四十五条,其他掺入《尚书故实》、《续齐谐记》、《隋唐嘉话》等书计八十五条。而宋《太平广记》、王谠《唐语林》所引,又有不见于今本者五十六条。书中除陈述历史事实、文坛掌故外,还有讨论经传、评论诗文等内容,不乏学术上的珍贵材料,一直为后代文士所重视。有《学海类编》本。又今人唐兰有《〈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载中华书局《文史》1965年第4辑)。

(张伯伟)

【**刘公嘉话**】 见“刘宾客嘉话录”。【**刘公嘉话录**】 见“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嘉话**】 见“刘宾客嘉话录”。【**宾客嘉话**】 见“刘宾客嘉话录”。

【**二南密旨**】 诗格著作。旧题唐贾岛撰。此书《崇文总目》文史类、《新唐书·艺文志》四及《通志·艺文略》八录为贾岛《诗格》一卷,《宋史·艺文志》八作贾岛《诗格密旨》,《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作《二南密旨》,当为同书异名。陈振孙谓此书“恐亦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斥之为“伪本之重儻”。全书共分十五门,“论六义”、“论风之所以”、“论风骚之所由”、“论二雅大小正旨”、“论变大小雅”等五门均传传统诗学之通说,以下十门则其新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以南北宗论古今诗,所谓“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以南北宗论文,首见于王昌龄《诗格》,实以南北地域比论南北二宗。本书则以见意先后而比顿、渐,并以此判教。释虚中《流类手鉴》颇受其影响。其二,论诗题与内容的关系。原文有四十七则,今存二十九则。如称:“梦游仙,刺君臣道阻也。”“白头吟,忠臣遭佞,中路离散也。”诸如此类,颇为牵强。其三,论总例物象,即揭示一定的物象有何特定的象征意义。如谓:“幽石、好石,比喻君子之志也。”“白云、孤云、孤烟,比喻贤人也。”这些,对虚中均有直接影响,《流类手鉴》亦专列“物象流类”节。虚中的时代稍后于贾岛,而其书已多受

《二南密旨》的影响,其“举诗类例”节又多引贾岛诗,由此看来,亦不得轻易断言《二南密旨》为伪作。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贾岛诗格】见“二南密旨”。

【诗格密旨】见“二南密旨”。

【梁词人丽句】句图著作。旧题唐李商隐撰。此书首列《献乐安公启》,略云:“世宗颇好文词,享国仅及二纪。文武之代,篇什成风。至于裨将清吟,群公让胜;缙衣奋藻,时王嫉能。咸著在缥緲,动盈卷帙。洎隋取宝器,陈受降旗,逸调空在,全篇莫存。”可知该书有辑存裨将缙衣之作的意图,故所收有二句、四句、八句等。后人辑佚梁诗,颇有取资此书者。又此书名为“丽句”,但作者重在辑存,故所取者也并不都是“丽句”。而选诗句数不一,也不能算是典型的句图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斥为伪书,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认为“不一定是伪书”。有《吟窗杂录》本。(张伯伟)

【贾岛诗句图】句图著作。唐李洞辑撰。李洞,字才江,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喜好苦吟,废寝忘食。僖宗乾符中,举进上不第。光启初,往游梓州。昭宗龙纪元年(889)赴京应试,因误试期,不第。大顺二年(891),裴贽知贡举,复不第。遂失意惆怅,游蜀而卒。工于诗,尤慕贾岛诗风,曾铸岛铜像,事之如神。《贾岛诗句图》一卷,前有自序,全书集贾岛诗警句五十联,又集唐诸人诗警句五十联。《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八、《宋史·艺文志》八等均有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文选句图〉提要》云:“摘句为图,始于张为。”其实张为《诗人主客图》偏重于讲主客派别,虽有摘句,亦有选篇,作为句图类著作并不典型。典型的句图应该是摘联,《贾岛诗句图》才是最典型的句图著作。其书久佚。《吟窗杂录》卷三五标为句图,中有贾岛句对一种,共十三联,可能即采自《贾岛诗句图》。自此以后,句图类著作甚多,既是一时风气的反映,与李洞此书的影响亦不无关系。(张伯伟)

【炙轂子诗格】诗格著作。唐王勣撰。王勣(约820前后—约900前后),蜀中新繁(今属四川)人。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有传,谓其年八十而卒。此书引及李郢诗,据《唐才子传》卷八,郢为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进士,则此书当成于其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有《炙轂子杂录注解》五卷,王勣撰。或疑此书乃从中析出者。此书首论章句所起,述三、四、五、六、七、八、九言诗之起源,多推溯至《诗经》,这种看法,自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已开其端。继论诗之体式,有所谓三韵体、连珠体、侧声体、六言体、

三五七言体等。自“一篇血脉条贯体”以下专论诗旨与章句组织之配合,其中颇有逸出当时词场规程者,颇为奇特。因晚唐五代诗格之所作,不出两种目的:一是取便初学,一是指导考试。而此书似在此二者之外。如“背律体”引杜牧《咏柳》诗,于其“失粘”处赞叹云:“此是大才,不拘常格。”《中兴馆阁书目》谓之“叙诗体式所始,评其述作之要”,可大致概括其内容。与其他诗格相比,此书虽无高论,但亦无穿凿之弊。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及今人整理之《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幽闲鼓吹】笔记著作。唐张固撰。张固,晚唐时曾任金部郎中,宣宗大中后期为桂林观察使。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九作张同,当为形似而讹。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三小说家类著录,凡一卷。全书共二十五篇,多载中晚唐遗事,大部分材料为《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书所采。其中记载的文人轶事,如白居易献诗顾况,李贺献诗韩愈等,尤为脍炙人口。尽管后人颇有怀疑其真实性者,但对于考见唐代文人风气则甚有价值。有《顾氏文房小说》、《续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诸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排印。

(张伯伟)

【诗人主客图】诗论著作。唐张为撰。张为生平事迹,史传不载。《唐诗纪事》卷六五称其为“唐末江南诗人”。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七援《永乐大典》引《宜春志》,则当为江西宜春人。因后人福州钓台山,《唐才子传》卷一〇遂误称其为闽中人。张为与周朴齐名,又与贯休、方干为诗友。《唐诗纪事》引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云唐宣宗大中戊寅(858)张为“薄游长沙,不汲汲随计”,约而计之,则张为当生于文宗时。卒年无考。今本《诗人主客图》选录之诗人最晚者为周朴,朴于僖宗乾符六年(879)为黄巢杀于福州,此书当成于其后。又吴融《禅月集序》已称“昔张为作《诗图》”,该序作于昭宗光化二年(899),则张为此书又当成于此。《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北宋人亦未论及此书。南渡后,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始录其遗文,未言其卷数。《通志·艺文略》八著录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则著录为一卷。今《谈艺珠丛》与《镜烟堂十种》本为三卷,其余均为一卷,而内容相同。今本乃后人自《唐诗纪事》中辑出者,多有残缺,原貌已不可全睹。此书将中晚唐诗人分作六派,别以主客。据张为自序,“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可知其分定主客的着眼点在于诗风流派的一致性。所谓六派,即“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丽”,并分别以白居易、孟云卿、李益、孟

郊、鲍溶、武元衡为各派之“主”。“客”中复有上人室、入室、升堂、及门之殊。总计八十九人,今阙落五人,实存八十四人。六派的区分,除“广大教化”偏于社会作用以外,其余五派多从诗歌风格着眼。在众多风格中,张为偏嗜“奇”的风格(如“清奇雅正”、“清奇僻苦”、“瑰奇美丽”),而尤重“清奇雅正”一派。此书评论诗人,自主人、上人室、入室、升堂、及门分为五层,名下各附其诗句(亦偶有全篇者),其排列略似牒谱,故以“图”名书。六朝以来,以摘句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逐渐流行,至唐元兢编《古今诗人秀句》后,又出现秀句集,进而才出现摘句为图。然而张为之品评标准颇不可解,如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韦应物为上入室,李贺、杜牧为入室,非惟高下倒置,且风格亦殊,故颇致后人非议。但此书对于了解晚唐诗论的一个侧面,以及对宋代诗派之说的影响,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张伯伟)

【本事诗】 笔记著作。唐孟棻撰。孟棻,名一作啓,字初中,唐文宗开成中(836—840)曾在梧州任职。据《唐摭言》载,“棻出入场中三十余年”,僖宗乾符二年(875)擢进士第,曾为司勋郎中。《本事诗》作于光启二年(886),为其晚年之作。其自序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故全书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门,凡四十一则,以类相聚,介绍一些诗篇的背景材料。每门之前,原来都有“小序”,可惜已经亡佚。其内容除宋武帝吟谢庄《月赋》及徐德言破镜重圆二则外,均为唐人轶事。其中如韩翃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一绝为德宗欣赏,乃得自于作者亲闻。其他如李白以《蜀道难》等诗见赏于贺知章、杜甫诗号“诗史”以及刘禹锡玄都观桃花等记载,均为后人重视。但其中亦多有采录前人作品乃至唐人传奇改写而成者,因此亦不免有传闻失实处,如骆宾王于灵隐寺为僧替宋之问续诗等事,不尽可信。亦有记载与他书相异者,如所载朱滔令士人所作代妻答诗,《又玄集》、《才调集》均谓葛鸦儿作。该书体例新创,既似传奇,又似笔记,还近于后世的诗话。从诗话体的形成来看,这是诗话的雏形。后世诗话偏于记事,也可能与此有关。有《顾氏文房小说》、《津逮秘书》、《历代诗话续编》本。

(张伯伟)

【云溪友议】 笔记著作。唐范摅撰。范摅,《新唐书·艺文志》注称其为咸通时人,当生活于懿宗、僖宗年间。吴人,徙居越州会稽郡,自号五云溪人,故名其书《云溪友议》。全书共六十五则,与诗有关者占十之七八。韦穀《才调集》、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

往往采之。然摅为处士,接交之士有限,道听途说,辄往往载之书中,故传闻失实处亦在在有之。如记李白《蜀道难》为房琯、杜甫厄于严武而作,在后世颇有影响,实不足信。但书中毕竟保存了大量资料,且多唐人说唐诗,故价值颇大。该书有二本,一为上中下三卷,每条各有三字为标题,并有自序;一本十二卷,标题并自序均失之。这种版本差异,始于宋代。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据三卷本排印。

(张伯伟)

【云仙杂记】 笔记著作。旧题五代后唐冯贽撰。原名《云仙散录》。据其自序,系成于天祐四年(907)。惟序文末纪年为天复元年(901),颇令人置疑。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断“天复”为“天成”之误。天成乃后唐明宗年号,天成元年为公元926年。然书中又引及宋人所著《五代史补》、《洞微志》、《南部新书》、《北梦琐言》、《通鉴》等书,时代颇相牴牾,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赵与时《宾退录》、洪迈《容斋随笔》等书均谓出于后人依托。张邦基《墨庄漫录》更指实为王铎伪造,但无实据。书中记载古今逸事甚多,如称戴逵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之类的典实,往往为诗家所用,亦有参考价值。有明叶氏蓁竹堂本。

(张伯伟)

【云仙散录】 见“云仙杂记”。

【二十四诗品】 诗论著作。唐司空图撰。司空图在诗歌理论史上地位颇为重要,有关著述颇多,如《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等。《二十四诗品》,亦称《诗品》,由二十四则诗构成,实际上是论诗诗。论诗诗虽由杜甫开创,并产生很大影响,但主要用来表述诗歌原理、评论古今诗人,而司空图之作乃是用以表达二十四种诗歌境界,所以在历代论诗诗中,可谓别具一格。具体品目如下: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品以六韵十二句构成,表达一种境界,亦揭示一种风格美。十二句大致又由两大部分构成,前八句揭示某品之境界或特质,后四句指出创造此境之要领。如“高古”一品,前八句云“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既以畸人的风神比喻高古,又用四句景色来形容高古,乃揭示此品之境界。下四句云:“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强调神思虚远,超然世外,便能创造出高古之境。又如“雄浑”一品,前八句云:“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先用四句议论点出此品之特质,又用四句

描写显现此品之境界。下四句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又强调遗形取神的手法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对创造此境的必要性。对于文学风格的揭示，并不始于司空图。《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就曾提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风格，但偏重于以文章的体裁和文词角度谈风格，而司空图则从意境角度揭示风格的特质，其文字本身又优美动人，而且在对二十四种风格的态度上，并不加以人为的轩轻，是一大进步所在。《二十四诗品》对后世影响颇大，这种论诗诗的形式也为后人仿效，并且扩大到其他领域，如袁枚《续诗品》、顾翰《补诗品》、许奉恩《文品》、魏谦升《赋品》、郭麐《词品》、黄钊《画品》、杨景曾《书品》等。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禛“神韵说”，与司空图在理论上也一脉相承。《二十四诗品》注释本甚多，郭绍虞《诗品集解》综罗旧说甚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近年有人疑其非司空图所作，学术界对此意见不一。（张伯伟）

【诗品】见“二十四诗品”。

【缘情手鉴诗格】诗格著作。唐李洪宣撰。李洪宣，晚唐人，生平不详。《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录为“樵人李宏宣撰”，又云：“未详何人，当在五代前。”书中所引诗例为方干、杜牧之作。方干卒于咸通末年，该书当成于此。书中内容简略，无突出见解。“诗有五不得”言作诗避忌，乃袭自皎然《诗式》中之“诗有六迷”。此外，如所谓“束散法”、“审对法”、“自然对格”者，皆论作诗方法。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及《诗学指南》本，又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整理本。（张伯伟）

【流类手鉴】诗格著作。唐释虚中撰。虚中，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约文宗、宣宗间在世，与贯休、齐己、郑谷、修睦、尚颜、栖蟾等为诗友。哀帝天祐间，至中条山访司空图，未遇而留诗，为司空图所激赏。晚住湘西宗成寺，卒于后唐明宗天成以后。有《碧云集》。《流类手鉴》一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别集类著录《诗物象流类手鉴》一卷。文史类又著录《疏类手镜》一卷，实为一书重见，“疏”亦为“流”字之形误。此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物象流类”，凡五十五类，皆为比体，如：“日午、春日，比圣明也。”“残阳、落日，比乱国也。”有时不免穿凿附会。其二为“举诗类例”，举前人诗句以求其言外之意，亦多有牵强之处。此书理论渊源乃《二南密旨》，如《二南密旨》云诗有“南北二宗”，“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此书云：“诗有二宗，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亦以顿、渐判南、北，实受禅宗影响。又《二南密旨》有“论总例物象”，遂直

接影响此书之“物象流类”。此外，如“举诗类例”节，举贾岛诗多至七例，均见影响痕迹。“物象”一节，后人多讥其穿凿，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二南密旨》“其论总例物象一门，尤一字不通”。虚中受其影响，亦难免此讥。但中国古典诗歌自《楚辞》以降，已奠定“香草美人”之传统，故一定的物象往往具有独特的暗示意义，晚唐诗格对此类物象加以综罗排列，似亦不宜一概抹煞。且此类书为初学者而作，强调诗歌创作的美刺手法，亦未可视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之作。这些理论演变至宋代，由作诗者的写作规范发展为说诗者的批评准绳，以为一字一句，皆有讥刺，则难免附会之嫌。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又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整理本。（张伯伟）

【风骚旨格】诗格著作。唐末五代释齐己撰。齐己（864—约938左右），俗姓胡，名得生，湖南长沙人。幼孤，性颖悟。七岁时至益阳南境之大洑山同庆寺牧牛，取竹枝画牛背为小诗，得僧人称赏，遂剃度为僧。居道林寺约十年，自号“衡岳沙门”。后又徙居庐山东林寺。后梁龙德元年（921）欲入蜀，经江陵，荆州帅高从诲留为僧正，居龙兴寺。卒年约七十馀岁。齐己好吟咏，多才艺，能琴棋，擅书法，与贯休、孙光宪、曹松、沈彬、方干等人多有唱和。自编《白莲集》，孙光宪为之序。又曾与郑谷、黄损等人共定葫芦、辘轳、进退等诗格，并摭选古人诗联，以类分为风、赋、比、兴、雅、颂等，皆不传。《风骚旨格》，《直斋书录解題》作《风骚指格》，《宋史·艺文志》作《诗格》，实即一本。全书一卷，凡八目：其一，“六诗”。按《周礼·春官》所载，“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同于“六义”，但齐己则以“大雅、小雅、正风、变风、变大雅、变小雅”为“六诗”，与传统说法颇有出入。其二，“诗有六义”。这与《毛诗序》全同。只是并未就“六义”含义作出明确的理论阐述，仅以诗例说明。如释“风”，举诗曰：“高齐日月方为道，动合乾坤始是心。”往往使人难于捉摸。其三，“诗有十体”。这与其后“诗有二十式”、“诗有四十门”颇有重复之处，可知“体”、“式”、“门”含义接近，均指诗歌创作的体式、标准。其中既涉及到题材，又涉及到作法。其四，“诗有十势”。齐己论“势”，与前人不同，总是在“势”前加上种种名目，如“狮子返掷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毒龙顾尾势”等等，其含义实指诗歌创作中的句法。齐己以此种方式言“势”，颇受禅宗影响，故其含义亦不易把握。佛教言“势”，其风开自讲家，禅宗继承此习，沩仰宗最为重视。齐己自幼捐俗，即依沩山灵祐禅师和仰山慧寂禅师，深染此风，故援以论诗。如“狮子返掷势”即出自禅宗话头，齐

己以“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释之,亦带有禅学眼光。“狮子返掷”属禅宗三关之第二关境界,地水火风,色声相昧,尽是本分,皆是菩提。而“离情”一联,恰能状出此境,故齐己以之为“狮子返掷势”。其五,“诗有二十式”。其六,“诗有四十门”,论述与“诗有十体”相近,颇为烦琐。其七,“诗有六断”,指诗歌创作的六条原则:“一曰合题”,指正面表达题旨;“二曰背题”,指侧面映衬题意;“三曰即事”,指直书眼前景象;“四曰因起”,指因事物触发而起兴;“五曰不尽意”,指含蓄;“六曰取时”,指诗歌能暗示季节。其八,“诗有三格”,指诗歌创作的三种高下之分,用意为上,用气为中,用事为下。由于诗格多为取便初学而作,故作者往往不惮其烦,详列格式。《风骚旨格》是晚唐五代诗格中影响最大者,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五指出:“文彧‘十势’,又仿于齐己。”又谓“徐夤多出齐己”,即指出此书对文彧《诗格》和徐夤《雅道机要》的影响。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及《历代诗话续编》诸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风骚指格】见“风骚旨格”。

【诗格】见“风骚旨格”。

【雅道机要】诗格著作。唐末五代徐夤撰。徐夤,名或作寅,字昭梦,莆田(今属福建)人。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进士(《永乐大典》引《莆阳志》作乾符元年,误),释褐秘书省正字。后依闽王王审知为掌书记。后唐庄宗即位,因夤曾作文讥刺其父,命审知杀之。审知惧,黜而不用,夤遂归隐延寿溪。《雅道机要》一书,最早著录于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作《雅道机要论》,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著录《雅道机要》二卷,云:“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夤撰。”今本不分卷,《吟窗杂录》收入于卷一六至卷一八上。但据其内容,实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者主要因袭齐己《风骚旨格》,共四节。“明门户差别”下列齐己四十门中之二十门;“明联句深浅”列齐己二十式;“明势含升降”列齐己十势,原“孤雁失群势”阙诗句,此书记作“人情苟且头头见,世路欹危处处惊”。又其中“云雾绕山”、“孤峰直起”二势为齐己所无。“明体裁变通”后列齐己十体。后者则徐夤自撰。从“明意包内外”以下,分别叙题类、体格、句度、搜觅意、磨炼、血脉、通变、分割等,长处为稍具系统。其内容亦有可与题白居易《金针诗格》相参照者,如“诗有内外意”。又此书颇受禅宗影响,如谓“夫诗者,儒中之禅也”;并将诗分南宗、北宗等。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唐摭言】笔记著作。唐末五代王定保撰。王定

保(870—940),南昌(今属江西)人,郡望琅玕。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后为容管巡官。唐末世乱,至湖南依马殷,又至广州入刘隐幕府,遂仕南汉,历宁远军节度使,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唐摭言》当成于后梁贞明二、三年(916、917)间,寄寓了作者的故国之思。书中详细记载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保存了许多有关诗人佚事、诗坛掌故及创作风气的资料。王氏自谓书中所记闻之于陆扈、吴融、李渥、颜尧、王溥、王涣、卢延让、杨赞图、崔籍若等人,而王氏本人即吴融之婿,故其记载颇足珍贵。《稗海》本有删节,《雅雨堂丛书》及《学津讨原》本为十五卷,文字较全。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张伯伟)

【鉴戒录】笔记著作。五代后蜀何光远撰。何光远,字辉夫,东海人,后蜀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此书十卷,凡六十六则,各以三字标题。内容多记唐及五代间事,而以蜀事为多,中且多讥嘲神怪之谈,与鉴戒无关,名颇不副实。其中亦记晚唐五代诗人事,并往往与它书有异,可相互参证。如载王承旨诗,《后山诗话》认为乃花蕊夫人作;又载向玘嘲蒋炼师诗,《南唐近事》以为庐山道士等。作为五代时书,所载遗事轶闻亦可资采撰。但书中荒诞不经之事亦甚多。有《学海类编》本、《说郛》本。(张伯伟)

【诗格】诗格著作。五代僧神彧撰。此书今传诸本并题作“僧文彧撰”,误。文彧,号文宝大师,五代时闽僧,与陈文亮同时。史志均未著录其有《诗格》之作。《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及《宋史·艺文志》八并题作僧神彧撰。陈振孙于《杂句图》下云:“自魏文帝《诗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见《吟窗杂录》。”陈氏著录之顺序与今本《吟窗杂录》大致相同,此《诗格》一卷正在《风骚旨格》和《处囊诀》之间,可知陈振孙所见乃北宋蔡传编《吟窗杂录》本,此书正题作“沙门神彧撰”。今本作“沙门文彧撰”,当为后人不知神彧其人,而神、文音近,遂妄改之。今本《吟窗杂录》已经南宋绍熙五年(1194)陈永康之重编,易“神”为“文”,或者即出于陈氏之手。《宋诗纪事》卷九一谓文彧“号文宝大师,有《诗格》”,并自《历代吟谱》辑其诗二句,显然是依今本《吟窗杂录》而言,不足为据。神彧,生平无可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其书于李洞《贾岛诗句图》之后,而《诗格》引诗亦多晚唐之作,又引贾岛诗而称“古人”,可推知其人当在五代宋初时。除《诗格》外,还撰有《四六格》一卷,《通志·艺文略》八著录为僧神郁撰,“郁”“彧”相通,二者实为一人。此书共八节,论破题、颌联、诗腹、诗尾,诗病、诗有所得字、诗势、诗道。其“论诗势”一节,杂取皎然《诗式》及齐己《风骚旨格》而略有损益。“论诗有所得字”举贾岛、郑谷二诗为例,谓其中“僧”字及“香”字

为有得,反映晚唐诗人苦吟之风,亦渐启后人论“诗眼”之习。“论颌联”节谓“意有四到:一曰句到意不到;二曰意到句不到;三曰意句俱到;四曰意句俱不到”云云,乃出于禅宗“句”“意”之说。即:“句到意不到:‘古涧寒泉涌,春松带露寒。’意到句不到:‘石长无根草,山藏不动云。’意句俱到:‘天共白云晓,水和明月流。’意句俱不到:‘青天无片云,绿水风波起。’”(《人天眼目》卷六)全书主旨在讨论作诗方法与避忌等。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诸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风骚要式】诗格著作。五代徐衍撰。此书最早著录于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题作“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其他目录类书“试”均作“式”。唐释皎然、辞远均有《诗式》,又有阙名《骚雅式》,以此推之,“试”亦当作“式”。《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作“《风骚要式》一卷,徐衍述,亦未详何人。”其书多引贯休、齐己、郑谷、虚中诗,则当为五代宋初人。全书共分五门:君臣门、物象门、兴题门、创意门、琢磨门。以“门”为名,受齐己《风骚旨格》的影响,意谓通入诗歌殿堂的必由之径。其中“君臣门”、“兴题门”指的是写作范式,“琢磨门”、“物象门”、“创意门”又是指艺术手法。“物象”一门,深受虚中《流类手鉴》的影响。此书专为初学诗者而作,其结句云:“今之词人,循依此格,则自然无古无今矣。”所以在结构方式上也以“门”为标志,这与其写作目的是有关联的。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诗要格律】诗格著作。诸本均题作进士王梦简撰。其人生平无可考。书中所引诗例,大多为晚唐五代诗人之作,以此推之,其人当在五代宋初时。《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著录为《诗格要律》。晚唐五代诗格著作,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注重艺术技巧,如《风骚旨格》、《雅道机要》之类;一派注重讽咏时政,如《流类手鉴》、《风骚要式》之类。此书则兼有两派之说,既注重艺术技巧,又不废美刺褒贬。全书先言“六义”,曰:“六义合于诸门,即尽其理也。”其释“六义”不同于传统说法,称:“风,与讽同义,含皇风,明王业,正人伦,归正宜也;赋,赋其事体,伸冤雪耻,若纪功立业,旌著物情,宣王化以合史籍者也;比,事相干比,不失正道,易明而难辨,切忌比之不当;兴,起意有神勇锐气,不失其正也;雅,消息孤松、白云、高僧、大儒,雅也;颂,赞咏君臣有道,百执有功于国。”其说颇偏重于讽咏时政。下列二十六门,有五门与《风骚旨格》同,可见其渊源所在。每列一门,辄附以诗句,并以“六义”之一比拟之。此书亦为初学者而作。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

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诗格要律】见“诗要格律”。

【北梦琐言】笔记著作。五代、宋初孙光宪撰。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县东北)人,郡望富春。唐末曾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天成初避地江陵,为高季兴幕下掌书记,累官荆南节度使、检校秘书少监。后劝高继冲献地降宋,被宋太祖任为黄州刺史。孙氏博通经史,著述甚多,其词作见于《花间集》、《尊前集》。此书系在江陵时所作,江陵在古云梦泽之北,故称“北梦”。序中自称“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著述态度颇为严肃。每条之后常题某人所说,或在条文之末注明得自何人,以示言必有据。书中内容颇广,特别是记载唐五代诗人如顾况、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韦庄、和凝等人的轶事,对于研究唐、五代诗学史颇有参考价值。原书据《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三十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二十卷及逸文四卷。

(张伯伟)

【诗中旨格】诗格著作。五代宋初王玄撰。王玄,曾官正字,生平无可考。该书一卷,内容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诗格,首云:“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明则咏,时暗则刺之。今具诗格于后。”其所谓“诗格”,实为示人以美刺之法,在晚唐五代诗格中颇为突出。后半部分标为“拟皎然十九字体”,就皎然《诗式》提出之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十九字,分别加以阐释,并附以诗例,多晚唐五代诗人之作。《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著录有《拟皎然十九字》一卷,称正字王元撰,则后半部分曾别录单行。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诗评】诗格著作。宋桂林僧景淳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著录此书,云:“桂林僧□淳撰”,“僧”下注“原阙”二字。卢文弨校云:“《通考》至大年本是‘德淳’”,未必可据。考书中征引诗例,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一联,乃宋初九僧之一惠崇《书杨云卿别业》句,录于其《自撰句图》之首。惠崇约卒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则《诗评》必成于此后。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僧景淳诗多深意”条云:“桂林僧景淳,工为五言诗,规模清寒,其渊源出于岛、可,时有佳句。元丰之初,南国山林人多传诵。”其诗既传诵于元丰之初,则其人当在此之前,从时代来看,正稍后于惠崇。又《冷斋夜话》同卷“象外句”条即出于本书“象外句格”,其引用无可诗例文字亦全同(《全唐

诗》即有异文)。可知惠洪不仅亲见其书,而且有所袭用。从《诗评》多引贾岛等人的作品来看,这与景淳五言诗之“渊源出于岛、可”正相印证。其言桂林僧,或是因为当时法名景淳者不一,如纂集《海会语录》的法演禅师弟子亦名景淳,故以示区别。于此可知,此书作者当为北宋仁宗至神宗朝的桂林僧景淳。此书理论上颇受皎然《诗式》之影响。如云:“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显然出于皎然所谓“意中之远”及“意中之静”。又论诗之体势,亦有取于皎然之“明势”。其言诗歌之“言”、“意”关系当“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皆不可见,意在其中”,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得以进一步发挥。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诸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处囊诀】诗格著作。宋初僧保暹撰。保暹,字希白,金华(今属浙江)人。宋初“晚唐体”代表诗人“九僧”之一。真宗景德初曾直昭文馆。以“诀”名书,始于唐人杜正伦《文笔要诀》。《处囊诀》之意,即指作诗妙诀。此书凡四目:其一,“诗有五用”;其二,“诗有七病”;其三,“诗有四合题目”,均沿袭晚唐五代诗格;其四,“诗有眼”,则开启宋人诗论之风。如举贾岛《逢僧》诗“天上中秋月,人间半世灯”云:“‘灯’字乃是眼也。”所举四例,三例出自贾岛,可审其诗学趣尚。宋人诗论中多言“句眼”、“字眼”,固然是受禅宗影响,而从诗论本身发展看,保暹“诗有眼”之说实为最早。保暹系僧人,其诗论自然亦受佛教影响。有《吟窗杂录》本、《诗法统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惠崇句图】句图著作。宋释惠崇撰。惠崇(?—1017?),淮南人,一作建阳(今属福建)人。宋初“九僧”之一,以能诗擅画闻名于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著录《惠崇句图》一卷,宋《四库阙书目》亦载惠崇《唐律诗句图》一卷,实为一本。图中所载皆惠崇所作律诗佳句,故“唐”字为衍。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永叔诗话载:本朝诗僧九人,时号‘九僧诗’。其间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图刊石于长安,甚有可喜者。”可知其篇幅有百联之多。此书久佚。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称:“余尝见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喜者,今并录之。”全录其文,故得以保存至今。惠崇诗风亦近贾岛,佳句颇有苦吟锻炼之迹。有《青箱杂记》本与《宋诗纪事》本,而《宋诗纪事》亦据《青箱杂记》转录。二书均有中华书局排印本。(张伯伟)

【御选句图】句图著作。宋太宗、真宗选。《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著录《御选句图》一卷,并云:“太宗皇帝所选杨徽之诗十联,真宗皇帝所选送刘琮诗八

联。”杨徽之(921—1000)字仲猷,浦城(今属福建)人。入宋除著作郎,并参与编撰《文苑英华》。太宗闻其诗名,尽索所著,选其中十联写故屏,今载《吟窗杂录》卷三五。真宗所选送刘琮诗八联,是两制馆阁送刘琮出镇并门之作,真宗从中选得八联。其作者八人中,如晁迥、杨亿、李维、钱惟演、刘筠等均为西昆体诗人。据释文莹《玉壶清话》云:“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琮后将此《御选句图》写立于晋祠。其文今具载于《玉壶清话》卷一,明人从中辑出《玉壶诗话》,此文亦载其中。(张伯伟)

【郡阁雅言】笔记著作。宋潘若冲撰。潘若冲,或作若同,太宗时人,曾官郡守、赞善大夫。事迹不详。此书二卷,据《郡斋读书志》著录,共五十六则。今本仅八则,系以人为纲,分别记载杜牧、李远、王易简、裴皞、崔公佐、张祐、王定保、王著八人轶事,间及诗歌评论。如“杜牧”条记其“与杜甫齐名,时号大小杜”。“李远”条评其诗“体物缘情,皆谓臻妙”等。可资参考。有《说郛》本。(张伯伟)

【法藏碎金录】笔记著作。宋晁迥撰。晁迥(948—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今属河北)人,自父仝始徙家彭门(今四川彭县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真宗时累官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以太子少保致仕。迥受学于王禹偁,以文章典赡擅名,而性耽禅悦,究心内典,有《道院集要》、《昭德新编》等。《法藏碎金录》始作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融会禅理,如宗门语录。天圣十年,整齐字数,分为十卷。其有关文学者,为论古人诗句中含佛理者,其中又以白居易诗为多。如云:“白氏有诗句云:‘梦中说梦两重虚。’今略就改,别作上句云:‘影外影为三等妄,梦中梦是两重虚。’白氏又有诗云:‘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予又拟之别作两句云:‘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多为论禅而非论诗。有《四库全书》本。(张伯伟)

【南部新书】笔记著作。宋钱易撰。钱易(968?—1026)字希白,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刻苦读书,以才藻知名。真宗初举进士,以轻俊被黜,咸平二年(999)再举进士甲科,除通判蕲州。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累迁至翰林学士。钱易才学赡敏过人,数千百言援笔立就,画罗汉极古怪,尤善山水,兼工行草。有《金闺集》、《瀛州集》等。《南部新书》为其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五代故实典章及轶闻琐事。有五卷本和十卷本二种,以十卷本为是。此书颇为后人所重,如所记项斯以诗谒杨敬之,敬之“到处逢人说项斯”;称“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以及李白与竹溪六

逸等,均为后人传诵。有《四库全书》及中华书局排印本。(张伯伟)

【**诗苑类格**】 诗格著作。宋李淑撰。李淑,字献臣,徐州丰(今属江苏)人。历仕真宗、仁宗朝,累官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河中府。李淑博习群籍,藏书二万馀卷,曾作《邯郸图书志》十卷。又有《三朝宝训》、《三朝训鉴图》等。《诗苑类格》三卷,作于宝元三年(一作“二年”)。其内容以方回《诗苑类格考》所述最为全面:“上卷冠以真宗五七言八篇,次以沈约、钟嵘、王通、上官仪、刘允济、孙翌、殷璠、释皎然、元微之、孟郊、李翱、姚合、杜牧、皮日休、司空图、顾陶、释虚中、李愚、徐生、徐衍、张洎二十有二人议论。中卷采古诗杂体为三十门。下卷别录诗格六十七门(王应麟《玉海》谓‘下卷叙古人体制别有六十七门’)。”其书早佚,遗文见引于诗话、笔记及类书中。如“三偷”之说,实本之皎然;“六对”“八对”,则本之上官仪。此当属卷一之内容。又如孔融离合体诗、窦滔妻回文体诗,当属卷二之内容。又如论及诗自三字至十一字句,论唐人律诗六格,则当属卷三之内容。此书虽大多为辑录前人之说,但对后世亦有影响,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旁参此书,范梈《木天禁语》在其基础上踵事增华。惟其散佚过多,今人已不可睹其全貌。《诗人玉屑》录存三则。(张伯伟)

【**宋子京笔记**】 笔记著作。宋宋祁撰。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与兄庠同举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迁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有《宋景文集》等。《宋子京笔记》,或称《笔记》、《宋景文公笔记》,为最早以“笔记”命名的著作。全书三卷,上卷曰释俗,中卷曰考古,下卷为杂记等。与文学有关者,多在中卷。如云:“左太冲诗曰:‘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使飘飘有世表意,不减嵇康‘目送飞鸿’语。”又颇引其兄庠之语,如云:“莒公言《诗》有《棠棣》之华,《逸诗》有《唐棣》之华,世人多误以‘棠棣’为‘唐棣’,于兄弟用之。因唐误棠。且‘棠棣’,棣也;‘唐棣’,移也,移开而反合者也。此两物不相亲。”颇为后人所重。宋人诗话多引此书。然书中亦偶有疏误。如谓“今人多误以鲍照为昭”条,实不知此乃唐人避武后之讳使然。有《说郭》本、《四库全书》本。(张伯伟)

【**宋景文公笔记**】 见“宋子京笔记”。

【**笔记**】 见“宋子京笔记”。

【**诗评**】 诗格著作。佚名撰。《直斋书录解題》著录《诗评》一卷,云作者“不知名氏”,当据北宋蔡传编《吟窗杂录》本。此书列于《续金针诗格》后,未署姓

名。后人误以为作者同前,遂题作梅尧臣撰。明抄本《吟窗杂录》卷前总目“《诗评》”下即题“梅尧臣撰”,胡文焕《诗法统宗》则题作《梅氏诗评》,并署梅尧臣撰,《诗学指南》本承之,亦署作梅尧臣。于此可知,此书作者移至梅尧臣的名下,可能是到明代才有的。此书作者既已佚名,时代亦不可考。浩然子《吟窗杂录序》谓其所收诸书乃自“魏文帝以来,至于渡江以前”,而《诗评》列于《续金针诗格》之后,其产生年代可能也在此之后,但不会晚于北宋末。从内容来看,作者颇为浅陋。如引贾岛《送杜秀才东游》,乃题作《送杜甫》,不知杜甫死后近十年贾岛才出世;又引杜荀鹤诗而题作杜寂,不知杜寂乃大历时人,而杜荀鹤为晚唐诗人。至于理论上,也只是据拾齐己《风骚旨格》以来的馀绪,无多发明。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梅氏诗评**】 见“诗评”(旧题梅尧臣)。

【**续金针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宋梅尧臣撰。此书实为后人伪托之书,系对旧题白居易撰《金针诗格》的改编扩充。故内容大致相同。书前有序云:“予爱乐天作《金针》之格,乃续之,以广乐天之用意。”其增广部分为诗例和解说。如《金针诗格》原列“诗有内外意”,《续金针诗格》乃举诗例云:“旌旗日暖龙蛇动。旌旗,喻号令也;日暖,喻明时也;龙蛇,喻君臣也。”此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吟窗杂录》系统,《诗法统宗》本承之,乃是与《金针诗格》并列者;另一是《名家诗法》系统,题作《金针集》,《名家诗法汇编》本承之,《诗学指南》本亦据以删节,乃是将《金针诗格》与《续金针诗格》合二为一者,书前序言亦不同。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

(张伯伟)

【**魏文帝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魏文帝撰。此书最早收于《吟窗杂录》卷一,《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云:“题魏文帝,而所述诗或(卢文弨校作‘式’)在沈约后,其为假托明矣。”假托之年代当在北宋中叶以后,因书中“八病”条之“平头”下已提及梅尧臣诗。此书题名虽出于伪托,但就其内容加以考察,则其征存的诗说可能较早。其中“六对”“八对”之内容,同于《诗苑类格》征引之上官仪说;“六志”之内容,又略同于《文镜秘府论》征引上官仪《笔札华梁》之说。故此书虽伪托于宋,实可以初唐人诗论视之。有《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今人整理者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本。(张伯伟)

【**六一诗话**】 诗话著作。宋欧阳修撰。该书是最早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原名《诗话》,后人又称《六一居士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

《欧公诗话》。全书一卷,二十八则。卷首小序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知此书是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退居汝阴(今安徽阜阳)以后编定的。虽然标明以“闲谈”为宗旨,内容多记诗坛佚事,但在“闲谈”和记事中也反映了欧阳修的诗学观点。从否定的方面看,欧阳修所不满并加以揶揄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倾向:一是像宋初的九僧那样离开“风云草木之类”的陈词熟字便无法作诗的陋习;二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所造成的“语病”;三是“义理虽通,语涉浅俗可笑者”;四是“后进学者”仿效西崑体“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的流弊。从肯定的方面看,则针对上述几种倾向,通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正面表达了他的创作主张:在内容上,要求有真情实感。如评孟郊《谢人惠炭》诗“暖得曲身成直身”句说:“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评贾岛《朝饥》诗“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句说:“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在艺术上,要求苦思锻炼。如称道杜甫诗“身轻一鸟过”的“过”字为人所不及,赞许周朴作诗“月锻季炼”、“构思尤艰”和梅尧臣“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等,都强调了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在锻句炼字上下功夫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的创作要求上,他称引梅尧臣的“意新语工”说和“意在言外”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实际上是从内容立意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贵创新、忌粗率、贵含蓄、忌浅露的要求。同时,欧阳修首先采用随笔的形式来撰写诗话,开创了诗话体,也对后世诗话的写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校点本。

(刘德重)

【六一居士诗话】 见“六一诗话”。

【欧阳永叔诗话】 见“六一诗话”。

【欧阳文忠公诗话】 见“六一诗话”。

【欧公诗话】 见“六一诗话”。

【六一诗话附录】 诗话辑集。欧阳修撰,日人近藤元粹辑。近藤元粹于日本明治年间汇编《萤雪轩丛书》,于所收欧阳修《六一诗话》后,又辑《附录》一卷。其小序云:“余已订《六一诗话》,更就欧公《试笔》、《归田录》二书中,抄出其系诗话者,以为《六一诗话附录》。”计辑自《试笔》六则,辑自《归田录》十三则,共十九则。其中所述如九僧诗“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诸句、贾岛《哭僧》诗“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句、孟郊、贾岛穷苦之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句,均已见于《六一诗话》,可相互参看。又如所记嘉祐二年与韩子华、王禹玉、范景仁、梅公仪同知贡举相互唱和事,亦颇具资料价值。再如林逋《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四库全书总目·续诗话提要》以为自司马光“始表出之”,实则欧阳修《归田录》已称引,书中辑入此条,亦便于考校对照。有《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温公续诗话】 诗话著作。宋司马光撰。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因家居涑水乡,人又称涑水先生。《温公续诗话》原名《续诗话》,后人亦称《司马温公诗话》、《司马太师诗话》、《司马君实诗话》、《迂叟诗话》、《洛阳诗话》。全书一卷,三十一则。卷首小序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可见该书系统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故书中所记之事,多与《六一诗话》的内容有关联。如引《诗经》“牂羊坟首,三星在罍”句说明“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是对《六一诗话》“意在言外”说的阐发;记宋初九僧之名及其诗集,是对《六一诗话》称九僧“其集已亡”并佚其八僧之名的补正;论文德殿朝士戏谑诗、王绅宫词、陈亚捷对、鲍当《孤雁》诗、韩圣钦之卒诸事,分别与《六一诗话》中的西京上大夫纪实诗、王建宫词、赞宁捷对、梅尧臣《河豚》诗、梅尧臣之卒诸条内容相类,这些都体现了它的续补性质,具有与《六一诗话》相参证的意义。除记事外,书中还重在品评诗人,标举佳句。全书有二十馀则按人列条,分别品评了惠崇、郑文宝、鲍当、林逋、魏野等人的诗作,赏鉴颇见眼力,所标佳句也多为世所公认。如魏野的“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韩琦的“花去晓丛蝴蝶乱,雨馀春圃桔槔闲”等名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寇准的《江南春》等名篇,“皆自光始表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如解杜甫《春望》诗,称“‘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辨后人改魏野诗“烧叶炉中无宿火”之“叶”为“药”,认为“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可谓求益反损也”。则在解诗辨字方面,亦颇能鞭辟入里。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续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司马温公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司马太师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司马君实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迂叟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洛阳诗话】 见“温公续诗话”。

【**中山诗话**】诗话著作。宋刘攽撰。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郡望中山。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任州县地方官约二十年,欧阳修等荐为馆阁校勘。长于史学,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任汉史部分。神宗熙宁中,同知太常礼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曹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召拜中书舍人。卒,弟子私谥公非先生。著有《东汉刊误》、《汉官仪》、《彭城集》等。《中山诗话》原题作《诗话》,后人亦称之为《刘贡父诗话》。全书一卷,六十七则,内容以记事为主。其诗学见解,强调“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大抵偏重思想内蕴,而主张文词平易。刘攽是以博洽著称的史学家,性格又好诙谐,故书中亦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多涉考证。如引刘道原语考“牙人”一词“本称互郎,主互市,唐人书‘互’为‘牙’,因讹为‘牙’”,不为无据。但书中考证也存在一些疏误,为后人讥议。二是多杂趣事。如记宫中畅宴,“优人有为义山(李商隐)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捋扯至此。’闻者欢笑”。对于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但书中所记趣事间涉神异及与诗无关之事,不免芜杂。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刘贡父诗话**】见“中山诗话”。

【**玉壶诗话**】诗话辑集。宋释文莹撰,佚名辑。文莹,字道温,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喜读书,才思清拔。留意世务,与苏舜钦、欧阳修均有交往。神宗熙宁(1068—1077)中,寓荆州金銮寺。有《湘山野录》、《玉壶清话》(或作《玉壶野史》)。《玉壶清话》“书成于元丰戊午岁”(1078),《玉壶诗话》系就其中论诗之语辑集而成,辑成年代不详。该书一卷,三十五则。以记事为主,间有论评。如评杨徽之诗称:“以天池浩露涤其笔于水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评魏野诗称:“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评徐东野诗称:“浮脆轻艳,皆铅华妩媚,侑一时樽俎耳。”可见其论诗大略。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刘德重)

【**闲居诗话**】诗话著作或辑集。宋佚名撰或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诗话总龟》录存八则,另有四则未注出处,以其文紧接所引《闲居诗话》后,伍涵芬《说诗乐趣》遂据以定其中两则亦出《闲居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又疑另两则亦出《闲居诗话》,故辑得十二则。然《诗话总龟》注明出处的八则中,有七则又见于《温公续诗话》及《中山诗话》,而将另外四则定为《闲居诗话》,均出于推测,

根据似嫌不足。郭绍虞《宋诗话考》据《宋诗纪事》卷九一谓“释智圆字无外,钱塘人,俗姓徐,自号中庸子,居孤山玛瑙院,与处士林逋为邻友,有《闲居编》”。郭氏云:“书名闲居与是书同。《闲居编》本属笔记性质,不妨涉及诗人逸事。今就所辑是书佚文而言,虽仅十二则,而论僧诗者有四则,论林逋诗者一则,此数则均不同《温公续诗话》及《中山诗话》,疑即智圆《闲居编》中语。惟智圆时代较早,而诗话之称则始自欧阳修,意此亦其后僧侣辑出别行之作。加以《诗总》经后人改窜,则属入其他诗话中语,亦不足怪矣。”所论可供参考。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青箱杂记**】笔记著作。宋吴处厚撰。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初为将作监。以王珪荐,授馆职。蔡确尝从之学,及确为相,不加授引,乃怀忿。哲宗元祐(1086—1094)中,确知安州,处厚知汉阳军,得确游车盖亭所赋诗,遂引申比附,构陷成车盖亭诗案,致确窜岭南,而处厚擢知卫州,故时论薄之。《青箱杂记》十卷,一百八十则,所记皆朝野杂事,属诗话者为数不少。其论诗称:“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又称“白居易赋性旷远”,故其诗有“旷达者之词”;“孟郊赋性褊隘”,故其诗有“褊隘者之词”。即认为诗当言志,诗可见性。然又称:“文之神妙,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乃多举诗句以证人之祸福,以为诗讖,则不足取。有《笔记小说大观》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刘德重)

【**梦溪笔谈**】笔记著作。宋沈括撰。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进士。神宗熙宁初,任馆阁校勘,参与王安石变法。累官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后知延州。元丰五年(1082),以永乐城(今陕西西脂西)为西夏攻陷,坐首议筑此城,贬均州团练副使,起复为光禄寺少卿,分司南京。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自号梦溪翁。博学善文。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为其晚年所著,二十六卷,分为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门,又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其中记诗论诗之语,后人曾辑为《沈存中诗话》。沈括论诗,称“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病最难为医也”。沈括精于音律,其论诗与乐之关系,称:“古诗皆咏之”,乐声与诗意相谐,“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

也。”所论甚是。沈括又博学多闻,其考释诗句词语亦多可资取。唯沈括乃科学家,解诗间有求实太过之病,如称白居易《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云:“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称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称韦楚老《蚊诗》“十幅红绡围夜玉”云:“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所论未免过于拘泥。王楙《野客丛书》即讥其“以九章算法”解杜诗,不知“参天二千尺”乃“言其极高尔”。有《四库全书》本、胡道静校注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刘德重)

【沈存中诗话】 诗话辑集。宋沈括撰,佚名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惟《浙江通志·经籍志》文史类与《杭州府志·艺文志》诗文评类著录之,并云据《续文献通考》。郭绍虞《宋诗话考》“疑此书即从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辑出者”。沈括之诗论,参见“梦溪笔谈”。

(刘德重)

【东坡诗话】 诗话辑集。宋苏轼撰,佚名辑。《郡斋读书志》著录,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均曾摘引其文,可见其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前期。今本仅一卷,三十二则。从书中所反映的诗学观点看,大抵主张“诗须要有为而作”,当“有补于世”;强调诗人创作要有生活实践、亲身感受,读者鉴赏也须“亲到其处”,亲历其境,如称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在艺术风格上,书中赞赏陶渊明、柳宗元“枯淡”的品味,而要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书中论用事,认为“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指出“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并称黄庭坚诗“如蝤蛴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实际上对黄诗之流弊有所批评。有《说郛》本、《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东坡诗话补遗】 诗话辑集。宋苏轼撰,日人近藤元粹辑。近藤元粹于日本明治年间汇编《萤雪轩丛书》,于所收《东坡诗话》后,又辑《补遗》一卷。其小序云:“余已就《说郛》中,取《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馀条,未足以饱人意。乃就《东坡志林》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据此,则该书全辑自《东坡志林》。《东坡志林》,宋时称《东坡手泽》,系后人辑录其遗墨而成书,有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东坡诗话补遗》从中辑得六十六则,内容兼有评论及记事。有《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纪诗】 诗话著作或辑集。宋佚名撰或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惟《诗话总龟》称引之。罗根泽据以辑得九则,郭绍虞辑得六则。罗根泽据其中有“欧阳文忠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诗成欲寄公而薨”诸语,考《听杭僧惟贤琴诗》为苏轼所作,“知此亦为苏轼所作,是否亦后人辑苏轼诗语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郭绍虞亦据所引诸条多记苏轼诗,“窃疑此书以‘纪诗’名,殆以东坡自述其作诗之由,而坡曾手写成帙,故内容往往亦见《东坡题跋》之中。此本随笔性质,漫无次序,而后人得此,复益以其他材料,或者不察,遂以为东坡自撰之诗话矣”。“实则《纪诗》为东坡未完成之作,自经后人增益窜乱,则更不能视为东坡所著矣”(《宋诗话考》)。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乌台诗案】 资料辑集。宋朋九万辑。朋九万,蜀人,生平不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十三卷,并称附有苏轼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录有三卷,称“视近时所刊行《乌台诗案》为详”。今本仅一卷,无苏轼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知非陈振孙所见本。又其内容与《苕溪渔隐丛话》基本相同,仅有一二事出入,故亦非胡仔所见当时刊行本。因而《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存目提要》推测:“或后人摭拾仔之所录,稍傅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振孙之所录,非九万本书欤?”乌台,即御史台。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权御史中丞何大正、舒亶、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奏称知湖州苏轼以诗文谤讪朝政;八月,苏轼自湖州召回,下御史台狱勘问;十二月结案,苏轼责授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该书收录有关此案的何大正、舒亶、李定所上札子,李宜之所进状,苏轼所供状,及御史台根勘结案状等,均系原文实录,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此案的档案资料。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德重)

【诗病五事】 诗话著作。宋苏轼撰。该书一卷,原载《栾城集》三集卷八,为随笔性质的五则论诗短文,并不独立成书,至《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于诗文评类,始以书待之。其内容,一称李白诗不知义理,二称《哀江头》词气得诗人遗法,三称韩愈自谓《元和圣德诗》无愧雅颂,何其陋也,四称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五称王安石《兼并》诗为诗病最酷者。其论诗,偏重于思想内容,而以“义理”作为衡量思想内容的首要标准,故指责李白诗“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又指责孟郊诗言穷困“有戚戚之忧”,不及颜回安道乐贫,而李翱、韩愈却称赏孟诗,可见唐人“陋于闻道”。凡此,皆以儒家之道为旨

归,忽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殊不足取。其指责王安石《兼并》诗,更近乎谩骂:“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显然出于党争的攻讦。《栾城集》有《四部丛刊》本,亦有今人整理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刘德重)

【翰府名谈】笔记著作。宋刘斧撰。刘斧,人称刘秀才,约北宋仁宗至哲宗时在世,曾游汴京、太原、杭州、通州等地。著有志怪、传奇小说集《青琐高议》。《翰府名谈》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诗话总龟》录存十则,《诗人玉屑》录存三则,《诗林广记》录存一则,去其重者,实存十则。其论诗,称赏“意清句雅”,“思清句雅”,“寓深意,不徒作”。评方谓《赠邑令》诗“琴弹永日得古意,印锁经秋生藓痕”云:“句虽佳,但印上不是生藓处。”(刘德重)

【雪浪斋日记】笔记著作。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诗话总龟》录存十二则,《苕溪渔隐丛话》录存三十九则,《诗人玉屑》录存十则,《诗林广记》录存五则,《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一七有节编本,仅四则,以上总共七十则,去其重者,实得四十则。其论陶渊明、谢灵运诗称:“陶、谢诗所以妙者,由人品高。”认为人品决定诗品。其论学前人诗称:“为诗当饱参,然后臭味乃同,虽为大宗匠者亦然。”同时又谓应像韩愈那样“于诗知变”,不墨守成规而能创新。其论诗家各有胜处称:“为诗欲词格清美,当看鲍照、谢灵运;浑成而有正始以来风气,当看渊明;欲深清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贾长江;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备足,当看杜子美。”即赞赏诗歌风格多样化,又提倡学诗者“转益多师”。其总论唐诗称:“诗止于唐。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荣耳。”则推崇中唐,不取晚唐。(刘德重)

【澠水燕谈录】笔记著作。宋王辟之撰。王辟之(1031—?)字圣塗,青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北)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任州县官。哲宗绍圣四年(1097)自忠州任上告老归里。《澠水燕谈录》前有绍圣二年自序,称:“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馀事,私编之为十卷。”可见该书非一时一地之作,系日久积累而成。又,现存刻本、抄本多为九卷,亦不足三百六十馀则,知不足斋本补足为十卷,尚另有佚文。全书分“帝德”、“说论”、“名臣”、“知人”等十七类,其中卷七“歌咏”类二十四事,主要记当时诗人的佚诗佚事。所记如李淑因《周少主陵》诗被劾落职,刘偶因魏野所赠诗为真宗所赏而获召升官,石延年《代意寄师鲁》诗以

关咏“增广其词为曲”乃为“人争歌之”等,均有资料价值。但“如‘谁传佳句到幽都’一诗,乃苏辙使辽时寄其兄轼之作,而误以为张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缘中官,献《醉蓬莱》词,为仁宗所斥,而以为仁宗大悦之类,亦间有舛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刘德重)

【律诗格】诗格著作。旧题宋张天觉撰。张商英(1043—1122),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治平进士。历左司谏、工部侍郎,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雄辩诡譎,耽心禅悦,时人号“相公禅”,著有《宗禅辨》。《律诗格》上下两卷,原在《无尽居士集》中,前有曹辅子方绍圣三年(1096)序。书久佚。据方回《张天觉〈律诗格〉考》云,此书“本江西僧明鉴所编,……决非无尽所作”。以为商英“于诗虽不深,其论诗亦不当如是之陋也。何谓陋?其论‘六义’比兴有曰:‘兴者,乘兴而作,故谓之兴。’予故曰此决非无尽所作也”(《桐江集》卷七)。此说可参。载其遗文最详者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四,录其“辨讽刺”一节云:“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若‘庙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类也,未如‘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花浓’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国家,‘竹细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见用也。……若此之类,可谓言尽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也。”此种论述,与贾岛、虚中之“物象流类”、《金针诗格》之“内外意”一脉相承。胡仔又举《天厨禁脔》论杜诗一节云:“觉范旧游天觉之门,宜其论诗之相似也。”可略见其承先启后之处。惟书中颇多穿凿,故不为后人重视。(张伯伟)

【芸叟诗评】诗评著作。宋张舜民撰。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又号矜斋,邠州(治今陕西彬县)人。陈师道姐夫。英宗治平中擢进士第。任襄乐令,曾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神宗元丰中,随军攻西夏,以诗记宋师失利,累贬监郴州酒税。后以司马光荐,为监察御史。徽宗初,任谏议大夫,官至吏部侍郎。后坐党籍,贬商州安置。有《画墁集》。《芸叟诗评》实为一段论诗人风格之评语,见于《复斋漫录》所引,《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又转引之。该段评语共评论同时代诗人欧阳修、王安石、石曼卿、苏轼、梅尧臣、郭祥正六人诗风。如称:“永叔之诗,如乍成春服,乍热酸醅,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介甫之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可着摸。”大抵用比喻手法,描绘一种境界,以象征其诗风。《蔡百衲诗评》、《臞翁诗评》均其后继之作。

(刘德重)

【黄山谷诗话】诗话辑集。宋黄庭坚撰,佚名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惟蔡梦弼

《草堂诗话》称引有“山谷黄鲁直《诗话》”之说。郭绍虞“疑时人纂辑为之,非出山谷自著,今其书亦无传本”(《宋诗话考》)。黄庭坚论诗之语甚多,《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均多所称引,然皆无《黄山谷诗话》之目。《中国历代诗话选》(王大鹏等编选)乃据上述各书辑选二十七条,题作《黄山谷诗话》,实已非原书。(刘德重)

【秦少游诗话】诗话辑集。宋秦观撰,佚名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惟蔡梦弼《草堂诗话》称引有“秦少游《诗话》”之说。郭绍虞“疑从《淮海集》辑其论杜诗之语而任意改题者”(《宋诗话考》)。《中国历代诗话选》(王大鹏等编选)乃“据《淮海集》重辑其论诗文字,亦名曰《秦少游诗话》,选四条”,实已非原书。(刘德重)

【明道杂志】笔记著作。宋张耒撰。该书一卷,或分为正续二卷,八十馀则。内容多记当时杂事,亦颇有记诗、论诗之语。书中评杜、韩、柳诗称:“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子厚诗律尤精”;“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于此可见其论诗大要。有《学海类编》本。

(刘德重)

【后山诗话】诗话著作。宋陈师道撰。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故该书亦称《陈无己诗话》、《后山居士诗话》。有一卷本、二卷本两种,均为八十四则,内容相同。但前人所称引的条文有些不见于今传本,可能已有残缺。又,前人曾指出该书不少疑点,如胡仔发现其中有四则出自黄庭坚《豫章集》(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方回亦列出书中四事断言“非后山所为”(见《桐江集·读后山诗话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考得书中所说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中的“雷大使”是徽宗宣和(1119—1125)中以善舞隶教坊的雷万庆。陈师道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入1102年),不可能以身后之事设喻。凡此,均说明该书确实存在问题。但陈师道门人魏衍编《后山集》时已提到陈师道有《诗话》之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后山诗话》也多所称引,可见北宋后期确有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流传,可能在陈师道身后又经过后人窜乱增补。该书记事与评论诗人、谈论诗法、考释词句兼而有之。推崇杜甫诗,主张学杜诗的规矩法度:“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同时又推崇黄庭坚诗,指出学杜的途径当由黄及杜:“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在诗风上,则要求避熟就生,主张“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至于对苏轼诗,颇

不满其“怨刺”和“粗”、“易”,称“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这些,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书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批评黄诗“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就与陈师道尊黄的态度和他本人劲峭孤拔的诗风不合,可能是后人窜乱所致。另外,书中所记又不限于诗歌的范围,而是以诗歌为主兼及古文、四六文,为后来的《唐子西文录》、《诚斋诗话》等论诗兼文的诗话开了先例。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陈无己诗话】见“后山诗话”。

【后山居士诗话】见“后山诗话”。

【临汉隐居诗话】诗话著作。宋魏泰撰。魏泰,字道辅,号溪上丈人,襄阳(今属湖北)人。其姐夫曾布为王安石变法重要人物,他本人与王安石、沈括、吕惠卿、章惇等也都有交往。徽宗崇宁、大观中章惇曾欲官之,不就。著有《临汉隐居集》(已佚)、《东轩笔录》等。《临汉隐居诗话》一卷,七十则,为其晚年所作。该书以论评为主,兼及记事。书中于唐盛称杜甫,对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刘(禹锡)以及贾岛、杜牧等均有微词;于宋则独尊王安石,至称:“荆公,大儒也,孟子后一人而已。虽万世之下,闻其风宜企慕之。”可谓推崇备至。其诗学理论,主“馀味”说,如称:“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人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馀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又称:“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馀味耳。”魏泰从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出发,认为要发挥诗歌的教化作用,必须充分注意诗歌“事详情隐”的特点,通过耐人咀嚼的“情”和“词”来感染读者、打动读者,而不应“盛气直述,更无馀味”。但他同时又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则未免囿于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传统,失之片面。书中还对黄庭坚的诗作提出了批评,认为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魏泰在当时江西诗派方兴未艾之际,率先对黄诗提出这样的批评,开启了后来一些诗人和诗论家批评江西诗派的先声。魏泰由于受到党争的影响,评论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也并不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那样“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陈辅之诗话】诗话著作。宋陈辅撰。陈辅,字辅之,金陵(今江苏南京)人,隐居丹阳(今属江苏)南

郭,遂号南郭子,人称南郭先生。少为王安石所知。不婚娶,不事科举,以诗名世。后因与丹阳郡守作诗争衡,为守令摺摭之,废弃终身。《陈辅之诗话》,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旧有《说郭》本,存十二则,《类说》本,存十三则,均系节本。罗根泽辑得佚文十七则,郭绍虞辑得二十五则。其中据《说郭》本辑得者有七则与《碧溪诗话》相同,当为《碧溪诗话》沿用陈说,或出《说郭》本编录之误。其论诗称赏杜甫“乃心王室”,称赏范仲淹“兼济加泽之心,未尝忘也”;又称引王安石语,推许王建《宫词》诗句“意味深婉而悠长也”。于此可见其论诗大要。称林逋《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近似野蔷薇”,为《野客丛书》、《梁溪漫志》所讥议,郭绍虞亦以此指其“论诗乃未能深究诗人体物之妙”(《宋诗话考》)。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瑶溪集】诗话著作。宋郭思撰。郭思,字得之,河阳温县(今属河南)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官至徽猷阁待制、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曾续补其父画家郭熙所撰《林泉高致》。《瑶溪集》,亦称《郭思诗话》,《通志·艺文略》诗评类、《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惟《通志》未题撰者姓名。原书十卷,久佚。元方回《桐江集》卷七有《瑶池集考》,“池”、“溪”字异,然所考实为《瑶溪集》。方回云所见书“得之钱塘书肆,乃士夫家录本”,则此书可能未曾刻版。方回又称该书分为十五类:“一曰诗之六义,二曰诗之诸名,三曰诗之诸体(原注:与李叔《诗格》相类,凡八十一体,可无述。按叔当作淑),四曰诗之诸式(原注:凡二十九式),五曰诗之景,以至十五曰诗之诸说。”于此尚可窥知其书大略。又《竹庄诗话》卷一四杜甫《丽人行》题后称:“《瑶溪集》多立体式,品题诸诗,强为分别,初无确论,今并不取。独所论诗之景者,为说虽泛,然其间编类,多前辈所称美而后人所脍炙,故颇加删录,得五十九篇。”以下至卷一五杜甫《雨过苏端》计五十八篇(数目相差一篇),均录全诗,而于各篇题下加注,如《丽人行》:“说帝都游春之盛。”王维《陇头吟》:“状边情。”所引所注,当均出自《瑶溪集》所谓“五曰诗之景”者。于此,又可窥见其一斑。郭绍虞据《苕溪渔隐丛话》及《竹庄诗话》辑得二则。其一称:“《文选》是文章祖宗”,“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而“老杜于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至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独步也”。其二称:诗之六义,“诗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时能兼之”。盖其论诗崇杜,而又以杜诗为上承《文选》、及乎“六义”者。此二则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郭思诗话】见《瑶溪集》。

【晁氏客语】笔记著作。宋晁说之撰。该书一卷,“乃其劄记杂论,兼及朝野见闻,盖亦语录之流”,“其中议论多有关于立身行己之大端,所载熙、丰间名流遗事,大都得自目击,与史传亦可互相参证”,而且“每条必记其所语之人,所谓‘客语’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涉及论诗之语,如称“韩文公诗号壮体,谓铺叙而无含蓄也”,记孙莘老评说杜甫诗句等,均可备一说。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王直方诗话】诗话著作。宋王直方撰。王直方(1069—1109),字立之,号归叟,汴(今河南开封)人。舍人王棣子,补承奉郎。哲宗绍圣元年(1094)监怀州酒税,寻改冀州佾官,仅数月,即投劾归。居城隅小园凡十五年,啸傲自适,喜从苏、黄游,亦江西诗社中人。有《归叟集》。《王直方诗话》,亦称《王立之诗话》、《归叟诗话》、《归叟诗文发源》、《诗文发源》、《兰台诗话》,又有误称《王子立诗话》、《王子直诗话》、《王立方诗话》者。据《郡斋读书志》云:“元祐中,苏子瞻及其门下士,以盛名居北门东观。直方世居浚仪,有别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诸公亟会其家,由是得闻绪言餘论,因辑成此书。”则该书当成于王直方晚年退居城南时。原书六卷,久佚。曾慥《百家类说》有节编本,一卷,仅五十二则。另《诗话总龟》录存其佚文二百零三则,《苕溪渔隐丛话》录存一百零九则,《诗人玉屑》录存四十六则,其他如《竹庄诗话》、《诗林广记》、《能改斋漫录》等书亦多所称引。罗根泽据以辑得二百八十二则,郭绍虞辑得三百零六则。“书中述事处多,论诗语少,即论诗之语,亦以转述他人者多,而自得者少”(《宋诗话考》)。其中录苏轼、黄庭坚语颇多,甚至有不加说明攘为己有者,又有“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者(《郡斋读书志》),还“时有不知出处而妄作解人者”(《宋诗话考》)。然书中所记诗人佚事,多为其亲历,所述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人论诗语,又多为本集所不载,因而有较高的资料价值。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王立之诗话】见“王直方诗话”。

【归叟诗话】见“王直方诗话”。

【归叟诗文发源】见“王直方诗话”。

【诗文发源】见“王直方诗话”。

【兰台诗话】见“王直方诗话”。

【唐语林】笔记汇编。宋王谠编撰。王谠,字正甫,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吕大防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哲宗元祐四年(1089),吕大防为相,荐除国子监丞,台谏极论除授不公,改少府监丞。《唐语林》八卷,其中裴佖条“佖”字作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名佖,可知当编于徽宗年间(1101—1125)。

该书“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按今本《世说新语》为三十六门),又益十七门,为五十二门”(《直斋书录解題》)。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官场逸闻、文人佚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以及典故考辨等,资料相当丰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原书久佚。今本系据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残本二卷(仅存自“德行”至“贤媛”十八门),重分为四卷;又于其后增以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之四百余则,按记事之时代先后编排,题作“补遗”,亦分四卷。前后总计仍为八卷。其中“文学”、“识鉴”、“赏誉”、“品藻”诸门以及“补遗”中所载诗人佚事,于研究唐代诗歌有较高资料价值。卷首附有所采录的五十家书目,但书中各则引文均不注明出处,是其不足之处。有周勋初点校本(中华书局出版)。(刘德重)

【**塵史**】 笔记著作。宋王得臣撰。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任岳州巴陵令,开封府判官,唐、邠、黄、鄂等州知州,福建转运副使,入为金部郎中、军器少监、司农少卿。哲宗绍圣四年(1097)以眼疾致仕。《塵史》或称《王彦辅诗话》,为其平日所记,晚年刊定,徽宗政和五年(1115)追为之序。全书三卷,二百八十四则(今本二百八十一则),分为睿谟、国政、朝制等四十四门,“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自序)。卷中有“诗话”门,三十三则,内容兼有考释、评论及记事。其论诗重“思致”,尚“实录”,称许李、杜“善用入语,浑然若己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其“为洛党中人,然评诗论文,无一字及苏、黄,亦无一字攻苏、黄”,“知其无所偏附”,“亦可谓卓然不染者矣”。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点校本。

(刘德重)

【**王彦辅诗话**】 见“塵史”。

【**侯鯖诗话**】 诗话辑集。宋赵令畤撰,日人近藤元粹辑。赵令畤(1051—1134),字德麟,又字景貺,号聊复翁、藏六居士,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宋宗室。哲宗元祐六年(1091)签判颍州公事,时苏轼知颍州,甚为相得,由轼荐于朝。及轼被贬,乃入元祐党籍。高宗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有《聊复集》(已佚)、《侯鯖录》。《侯鯖录》八卷,系记述杂事、品评诗词、诠释名物及方言习俗之笔记著作,其中属诗话者为数不少。日人近藤元粹于日本明治年间编纂《萤雪轩丛书》,遂据以辑成《侯鯖诗话》。该书一卷,内容多记诗事、评诗句及录苏轼、王安石等人论诗之语。其论诗推

崇苏、黄,又重用字、句法、佳对、使事以及风味、风调等。有《萤雪轩丛书》本。(刘德重)

【**潜溪诗眼**】 诗话著作。宋范温撰。范温,字元实,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范祖禹之子,秦观之婿,吕本中之表叔。曾直接从黄庭坚学诗。该书亦简称《诗眼》,卷数不详,当时曾为各家所引,宋以后散佚。今传《说郛》本仅三则,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辑得二十七则,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得二十九则。就所见各则来看,每则字数动辄在数百字乃至千字以上,与此前以闲谈记事为主、三言两语式的诗话大不相同。其诗学观点,大抵推崇黄庭坚,以江西诗派理论为旨归。其内容,则以谈论诗法为核心。所谈诗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字法。如称“好句要须好字”,“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二是句法。如称“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句法不当重叠”等。三是章法。如称“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可乱也”。四是命意。如称“炼句不如炼意”,“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等。范温认为,这些字法、句法、章法和命意之法,就是作诗的关键、诀窍,也即所谓“诗眼”。这种对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探讨,对于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意义。“诗眼”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学诗、评诗要有眼光、有识见。如引黄庭坚语:“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又称:“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此处所称“识”、“正法眼”、“悟门”、“悟入”,已开借禅喻诗之先河。其所评诗,则善于比较研究,如对杜甫和韩愈樱桃诗的比较,刘禹锡和李商隐马嵬驿诗的比较,陶渊明诗句、李白诗句与时人同类诗句的比较等,“每两相对照,以显优劣”,“固是别具一只眼目者”(郭绍虞《宋诗话考》)。书中以论、评为主,未见考证及闲谈琐事,比较全面地阐发了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批评价值。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诗眼**】 见“潜溪诗眼”。

【**李希声诗话**】 诗话著作。宋李惇撰。李惇,字希声,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仕至秘书丞。工诗,宗黄庭坚,亦江西诗社中人。又与米芾为友。有《李希声集》,已佚。《李希声诗话》,《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为《李惇诗话》,一卷。原书久佚,佚文散见《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修辞鉴衡》、《仕学规范》、《皇朝事实类苑》、《学林》诸书。罗根泽辑得四则,郭绍虞辑得十七则,并考定其成书年代“当在大观三年(1109)之后,绍兴元年(1131)之

前”(《宋诗话考》)。就今存各则看,其内容多述故事,较少论诗之语。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李惇诗话】 见“李希声诗话”。

【潘子真诗话】 诗话著作。宋潘淳撰。潘淳,名或作惇,字子真,新建(今属江西)人。少颖异,好学不倦,师事黄庭坚,尤工诗。以曾巩荐,补授建昌县尉。陈瓘劾蔡京,潘淳被目为陈瓘亲党,坐夺官归,自称谷口小隐。《潘子真诗话》原书久佚,卷数不详。《江西通志·艺文略》著录其祖潘兴嗣有《诗话》一卷,而称潘淳此书为《诗话补遗》,《艺苑雌黄》称引作《诗话补阙》,可能原为续补其祖之作,后人改题为《潘子真诗话》。旧有《说郛》本,仅四则,系节本。罗根泽辑得佚文三十五则,郭绍虞辑得三十七则。其论诗宗黄庭坚,称黄庭坚《喜晴应诏》诗“全篇可为楷式”,其卒章“不独清新,其气韵更深稳”;又引黄庭坚语,称杜诗“善陈时事,句律精严”;又标举林逋、黄庭坚诗句,谓“皆叠韵双声也。语尤工”。于此可见其论诗倾向。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诗话补遗】 见“潘子真诗话”。

【诗话补阙】 见“潘子真诗话”。

【遁斋闲览】 笔记著作。宋陈正敏撰。陈正敏,号遁翁,延平(今属福建)人。另著有《剑溪野语》。《遁斋闲览》十四卷,成书于宋徽宗崇宁、大观间(1102—1110)。原书久佚。《说郛》(涵芬楼本)有节编本,署范正敏撰,仅四十四则。另有佚文散见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草堂诗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能改斋漫录》等。该书多记平昔见闻,分名贤、野逸、诗谈、证误、杂评、人事、嗜嗜、泛志、风土、动植十门,其中“诗谈”等门记述诗事、论诗评诗及考释诗句等均属诗话内容。其论诗大抵主“意”、主“趣”,如称:“凡诗之咏物,虽平淡、巧丽不同,要能以随意造语为主。”又评诗多标举“趣向”、“景趣”、“得趣”等。于诗人则极称王安石,多引其诗及评诗之语,至于其诋排李白之论亦附和之。于此大致可见该书诗学倾向。

(刘德重)

【道山清话】 笔记著作。宋佚名撰。旧或题作道山先生,或题作王晔。据其书后跋云:“先大夫国史在馆阁最久,多识前辈,尝以闻见著《馆秘录》、《曝书记》,并此书为三。仍岁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书于南丰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孙。”后署有“建炎四年(1130)庚戌,孙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晔书”。知撰者乃晔之祖父,北宋时曾于馆阁任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书中内容,考得其姓氏为李,然旁证不足,亦暂存疑;又据书中“记苏、黄、晁、张交际议论特详”,而于王安石、程颐、刘摯颇为

不满,断“其为蜀党中人”。书中所记事,终于徽宗崇宁五年(1106),则书当成于此后至南渡前。该书一卷,一百三十四则,所记皆为当时朝臣名宦、文人学者之言论佚事,亦有不少论诗之语。如记“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书凡写七八纸,掷笔太息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可见苏轼对陶渊明诗之称美。又如记曾纡称黄庭坚取白居易诗句“点铁成金”,黄闻之大笑曰:“乌有是理?便如此点铁!”可见黄庭坚对别人称其诗“点铁成金”并不赞同。这些记载,均有资料价值。书中亦有一些疏误处,王士禛《居易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予指出。有《百川学海》本。

(刘德重)

【紫微诗话】 诗话著作。宋吕本中撰。该书一卷,九十则,内容以记事为主。所记主要为吕氏家世旧闻及当时诗人佚事。其学出于黄庭坚,故书中称述亦以江西诗人人居多。如谓:“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江西诸人诗,如谢无逸富赡,饶德操萧散,皆不减潘邠老临精苦也。”又记“东莱公尝言,少时作诗,未有以异于众人,后得李义山诗,熟读规摹之,始学有异”,并称引李商隐诗句,“以为有不尽之意”,“以为作诗当如此学”;还兼及张载、程颐等人诗事。可见其论诗并不专主一家。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诗体始变之时,虽自出新意,未尝不兼采众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称:“其学源出豫章,而所论不主一家,亦不主一格。”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江西诗社宗派图】 诗派名录。宋吕本中撰。该图作于徽宗政和元年(1111)。原图早佚。现存最早记载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图中所列,自黄庭坚以下依次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彭、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权善、高荷,合二十五人。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载略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是江西人较多,宗主黄庭坚也是江西人,故称之为江西宗派。《苕溪渔隐丛话》中还保存了吕本中《宗派图序》中的一段话,说明了他作此图的原委:“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对此,胡仔辨驳道:“豫章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

非也。元和至今,骚翁墨客,代不乏人,观其英词杰句,真能发明古人不到处,卓然成立者甚众,若言‘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但尽管如此,“江西诗派”却由此得名,并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功亦不可没。(刘德重)

【童蒙诗训】 诗话著作。宋吕本中撰。该书原系吕本中所撰家塾课本《童蒙训》中论诗文之语,由于多取法苏轼、黄庭坚,于朱学盛行之后,苏学受到诋毁,乃被删削,遂致散佚。后人复辑为《童蒙诗训》,《荃竹堂书目》卷四、《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原书久佚,不知卷数。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得七十五则(其中有数则,一则中又分为二则或三则)。由所辑各则来看,该书为童蒙训课之用,故不录遗闻佚事,而以论学诗为主。其论学诗,一是主张“诗词高深要从学问中来”;二是强调“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三是要求“不可凿空强作,如小儿就学,俯就课程耳”;四是指出“初学作诗,宁失之野,不可失之靡丽”。至于学习的榜样,则一是杜甫,二是苏、黄,三是江西诗派。他虽然强调学习前人,但并不主张盲从,而认为“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同时,又要求能自出新意,指出“近世人学老杜多矣,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终成屋下架屋,无所取长”。这些都是吕本中教人学诗的路子,大体不出江西诗派套数,但又较后来的江西诗派宽阔、活泛。吕本中曾说过:“学诗当识活法。”(《夏均父集序》)识“活法”“须令有所悟入”,而“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童蒙诗训》中现辑到的佚文,虽未提及“活法”,但其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诗事】 诗话著作或辑集。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其成书约在北宋末或南宋初。《竹庄诗话》录存十三则。又《能改斋漫录》卷八、卷九录有《吕氏诗事录》二则,郭绍虞以为“当即此书”(《宋诗话考》)。书中多记北宋诗事,兼重论评。其评诗称赏“自在”、“有馀意”、“有情致”、“语意俱新”等,尤推许王安石。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吕氏诗事录】 见“诗事”。

【蔡宽夫诗史】 诗话著作。宋蔡居厚撰。蔡居厚(?—1125),字宽夫,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擢进士第,累官吏部员外郎。徽宗大观初拜右正言,后进右

谏议大夫,改户部侍郎,坐事罢官。蔡京再相,起知沧、陈、齐三州,加徽猷阁待制,徙汝州。久之,知东平府,复以户部侍郎召,未至。《蔡宽夫诗史》亦称《诗史》,《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卷。原书久佚,而《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竹庄诗话》等多所称引。罗根泽辑得一百一十二则,郭绍虞辑得一百二十五则。书中内容以记事为主,稍涉评论。其诗学见解,大抵主教化而又尚气韵,故鄙薄晚唐诗,认为“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气韵甚卑”;称许浑诗虽“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称聂夷中诗虽“有《三百篇》之旨”,“又太拙直矣”。于宋代诗人,书中则多所称引,不专主一家。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诗史】 见“蔡宽夫诗史”。

【蔡宽夫诗话】 诗话著作。宋蔡居厚撰。一说《蔡宽夫诗史》与《蔡宽夫诗话》二书或即为一书二卷,前卷多论事,称《诗史》,后卷多论辞,称《诗话》,其刊行亦有先后,故各家称引题名不一(见郭绍虞《宋诗话考》)。一说《诗史》撰者名居厚,《诗话》撰者名启,二人均字宽夫(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该书据清朱绪曾《开卷有益斋读书志》卷六称,有旧抄本,三卷,似从《苕溪渔隐丛话》中辑得者,今未见。罗根泽、郭绍虞亦分别辑得八十六则和八十七则。书中论诗无门户之见,大抵主张自然浑成,而不赞成苦吟锻炼。如称:“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锻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书中评杜甫诗“红稻啄馀鸂鶒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认为虽属对工切,但“在其集中,本非佳处;不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为天然自在”。对于诗中用事,认为李商隐过于“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赞成像杜甫那样,“浑然天成,略不见牵强之迹”,或像王安石那样,“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其推崇杜甫诗的浑然天成,与江西诗派主要推崇杜诗的形式格律和诗法技巧有所不同。书中还针对晚唐以来“妄立格法”的诗格、诗法一类著作,以及片面追求声律、音韵、对偶等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提出批评。此外,书中有关考证、掌故的内容,也不乏可取之处。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西清诗话】 诗话著作。宋蔡絛撰。蔡絛,字约之,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或作无名子,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蔡京之子。徽宗宣和末,京再起为相,时已老聩,事皆决于絛。钦宗靖康中(1126),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至南宋高宗绍兴末,尚在贬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铁围山丛谈》、

《蔡百衲诗评》等。《西清诗话》，或作《金玉诗话》，三卷，《说郛》本仅十一则，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辑得一百零七则，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旧版辑得一百十二则，后发现旧抄本，一百十九则。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称：“條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條所为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碍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是书当成于禁元祐学术时，條亦曾因此丢官。实则书中论诗虽倾向于苏、黄，但于苏、黄也间有微词，于王安石也并未厚非，又多称引其父之诗及论诗之语，可见并不专主一家。其主要诗学观点，一是强调要有真实的生活感受，称“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二是主才气情致，称“诗家要当有情致，抑扬高下，使气宏拔，快字凌纸，又用事皆破觚为圜，挫刚成柔，始为有功者，昔人所谓缚虎手也”。这一见解大抵与苏轼为近。三是认为用事要含而不露，不着痕迹，称“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邪”。四是反对剽窃雷同，既不赞成后人与前人“语意互相剽窃，所谓左右拔剑，彼此相笑”，更不赞成千篇一律，“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此外，如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考药名诗非起自陈亚，辨集句盛行非始自王安石，比较“丹青吟咏，妙处相资”等，亦均不为未见，故所论多为后人称引。有哈佛燕京学社印行之《宋诗话辑佚》旧版本，台湾广文书局《古今诗话续编》据抄本影印。

(刘德重)

【金玉诗话】 见“西清诗话”。

【蔡百衲诗评】 诗评著作。或作《百衲诗评》。宋蔡條撰。卷数不详，亦不见诸家著录，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竹庄诗话》卷一各辑存一则，内容大体相同，其中有些文字亦见于《西清诗话》。所评为李、杜、王、韦、韩、柳、刘、白、欧、王、苏、黄等唐宋十四家诗人诗风，各以一二句评语点出，称“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师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皆久，故闲得而议之”。是所评仅止于此抑或尚有佚者，已不可知。其评语又多用比喻，上承《芸叟诗评》之滥觞，下启《臞翁诗评》等以象征手法评诗之风气。值得注意的是，蔡條在肯定各家风格的同时，均能指出其不足之处，即如李、杜、苏、黄，亦称：“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杜少陵诗，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至若君子高处廊庙，动成法言，恨终欠风韵。”“东坡公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也；然颇恨似方朔极谏，时杂滑稽，故罕逢蕴藉。”“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

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有《苕溪渔隐丛话》本、《竹庄诗话》本。

(刘德重)

【百衲诗评】 见“蔡百衲诗评”。

【漫叟诗话】 诗话著作。宋佚名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有《漫叟见闻录》一卷，云“不知撰人，建炎中所撰也”。罗根泽疑二书“或即一书”（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郭绍虞疑“二书殆出一手，或此书即由《见闻录》中辑出别行者”；又疑该书即李公彦《潜堂诗话》；又考得当时人罗良弼自号“漫叟”（见《宋诗话考》）。然均无定论。要之，撰者当为北宋哲宗、徽宗时人。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今传《说郛》本为节编本，一卷，仅十二则。其佚文则散见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草堂诗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书。罗根泽、郭绍虞分别辑得六十一则。内容多记事及考释诗句。其论诗讲究用事，亦重句法，然又称“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唐子西文录】 诗话著作。宋唐庚述，强行父记。唐庚（1070—1120），字子西，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与苏轼同郡，诗亦学苏轼，故时称“小东坡”。哲宗绍圣进士。宰相张商英荐为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徽宗大观五年（1111）遇赦北归，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于返蜀道中病卒。强行父（1091—1157），字幼安，馀杭（今浙江杭州）人。曾官睦州、宣州通判。该书一卷，又称《唐子西语录》、《唐庚诗话》。据卷首强行父所记，系宣和元年（1119），他与唐庚同寓于汴京城东景德僧舍时，“日从之游”，“退而记其论文之语”所成；后因“兵火无复存者”，于二十年后即高宗绍兴八年（1138）又凭回忆所追记。然“衰病废忘，十不省五六”，已非原帙。今传本三十五则，另在《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中还存有若干佚文。该书内容以论诗为主，兼及文、赋。论诗主张造语简妙自然，推崇苏轼和陶渊明。如评苏轼诗“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认为“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叙事言简而意尽”；评陶渊明诗“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认为与唐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比较，“便觉唐人费力”。但书中又很重视诗律和炼字，认为应像苏轼所说的那样“敢将诗律斗深严”，强调“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可见其所推崇的简妙自然，与刻意锻炼分不开。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唐子西语录】 见“唐子西文录”。

【唐庚诗话】 见“唐子西文录”。

【冷斋夜话】 笔记、诗话著作。宋释惠洪撰。惠洪(1071—1128),或作慧洪,俗姓喻,一说姓彭,号觉範,后改名德洪,世或称洪觉範,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哲宗元祐四年(1089)试经于汴京天王寺,以冒惠洪名得度,后指为伪度牒,责令还俗。因丞相张商英特奏得再度,郭天信奏赐宝觉圆明禅师。遂来往于张、郭之门。徽宗政和元年(1111),张、郭得罪,惠洪亦刺配崖州。后放还,又被诬为张怀素党人入狱,再获释归湘上。与苏轼、黄庭坚为方外交,工诗文,时作绮语,有“浪子和尚”之称。亦善画梅竹。有《石门文字禅》、《僧宝传》、《天厨禁脔》等。《冷斋夜话》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作六卷,称“崇观间记一时杂事”,当作于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该书性质,介于笔记与诗话之间,各家著录多入子部小说家类或杂家类。然“书中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亦可视为诗话。该书于“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同上)。如黄庭坚所谓“夺胎换骨法”,即见于该书卷一称引:“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书中对苏轼、王安石也多所称引,并均极推崇。如称:“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又称:“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可见其论诗并不专主一家。书中谈诗学理论少,且多袭前人之说;记述杂事多,又“多夸诞,人莫之信”(《郡斋读书志》),故历来颇遭非议。郭绍虞即谓:“盖惠洪喜游公卿之门,是缙流中之附庸风雅者,欲藉人言以为重,固宜其所述多不可信矣。”又称:“此书不仅论事有伪造之病,即论辞亦有剽窃之弊矣。”(《宋诗话考》)有《津逮秘书》本、《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天厨禁脔】 诗格著作。宋释惠洪撰。《天厨禁脔》之题名,意谓作诗三昧之所在。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八目,以唐、宋名句为式,标论诗格、诗法,而以句法为中心。所论句法计有“近体三种颌联法”、“四种琢句法”、“就句对法”、“十字句对法”、“十字句法”、“十四字对句法”、“错综句法”、“折腰步句法”、“绝弦句法”、“影略句法”、“比物句法”、“夺胎句法”、“换骨句法”、“遗音句法”、“破律琢句法”、“促句换韵法”、“子美五句法”、“杜甫六句法”、“古意句法”等十九目。惠洪论诗颇受黄庭坚影响。黄氏论诗,亦重句法,屡云“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句法俊逸清新,词源广大精神”,“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

欲把降幡”,“寄我五字诗,句法窥鲍谢”等等;而其“夺胎换骨”之说,亦以“句法”为核心。惠洪“夺胎句法”、“换骨句法”乃受黄氏影响之明证。惟又受晚唐五代以来诗格影响,多强立名目,自生妄见。故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谓此书“最为误人”。但书中也保存了唐人的遗说,并能反映宋代论诗风气,故其价值亦不宜一笔抹煞。《沧浪诗话》亦曾旁参此书。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明正德丁卯年(1507)刊本影印本。

(张伯伟)

【洪驹父诗话】 诗话著作。宋洪刍撰。洪刍,字驹父,豫章(今江西南昌)人。黄庭坚外甥。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徽宗崇宁三年(1104)入元祐党籍。钦宗靖康中累官谏议大夫,坐为金军搜刮财货,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流配沙门岛,卒于岛上。与兄洪朋、弟洪炎皆被列入江西诗派,时称“三洪”,又并弟洪羽合称“四洪”。有《老圃集》、《香谱》等。《洪驹父诗话》原书久佚,《通志·艺文志》、《遂初堂书目》著录,卷数不详。郭绍虞据《艺苑雌黄》曾称引此书,定“其成书当在北宋之季”(《宋诗话考》)。其佚文散见于南宋之诗话汇编及诸家诗话、笔记。罗根泽辑得二十六则,郭绍虞辑得二十二则。其内容兼有评论及记事。论诗推崇杜甫、黄庭坚,称“山谷父亚夫诗自有句法”,“山谷句法高妙,盖其源流有所自”,并以杜审言与杜甫作比。又论及用事、炼字、属对并标举佳句等,大抵主江西诗说。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唐宋名贤诗话】 诗话汇编。宋佚名编纂。原书久佚,《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卷。又《集诸家老杜诗评》、《皇朝事实类苑》称引,《遂初堂书目》文史类著录,均作《唐宋诗话》;《艺苑雌黄》、《绀素杂记》称引,《仕学规范》转引《古今类总诗话》称引,均作《名贤诗话》。故郭绍虞“疑二书实即一种”,或为《唐宋名贤诗话》之简称;并据上述诸书撰者方深道、严有翼、黄朝英等皆北宋末人,断“此书是为北宋时人所辑”,“当为宋代汇辑诗话之最早者”。按,该书现有明弘治辛亥(1491)朝鲜刊本(正文残缺),目录分品藻、鉴戒、讥讽等三十四门,系分门别类辑录唐宋名贤论诗之语。原书藏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鹤山文库,韩国汉城太学社1989年版《韩国诗话丛编》(赵钟业编)据以影印。

(刘德重)

【唐宋诗话】 见“唐宋名贤诗话”。

【名贤诗话】 见“唐宋名贤诗话”。

【古今诗话】 诗话汇编。宋佚名编撰。《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有李昉《古今诗话录》七十卷,郭绍虞、罗根泽因疑二书或为一书。李昉生平事迹无考,苏轼有《答李昉秀才以画山见寄》诗,亦不知是否一

人。其成书当在北宋之季,南渡之前。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今传《百家类说》本系节编本,仅五十九则。其佚文见于《诗话总龟》者有三百六十六则,《苕溪渔隐丛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石林广记》等书亦有录存。罗根泽据以辑得三百九十四则,郭绍虞辑得四百四十四则。书中内容,大抵以记事为主,分别采自正史、别集、地志、野史、小说、笔记、类书、诗话等书,“或直录原文,或稍加删节,或合数条性质相类之文而为一。要之出于自撰者甚少”(《宋诗话考》)。然而作为诗话汇编,则此书仅晚于《唐宋名贤诗话》,不惟成书较早,且收罗颇广,亦自有其资料价值。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古今诗话录】见“古今诗话”。

【春渚纪闻】笔记著作。宋何遵撰。何遵(1077—1145),字子远,一作子楚,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一说浦城(今属福建)人。曾从陈师道学诗。又曾官富阳令。晚年隐居富阳韩青谷,自号韩青老农。《春渚纪闻》十卷。卷一至卷五为《杂记》,多记神怪仙道、奇事异闻,多荒诞无稽之谈。卷六为《东坡事实》,所引苏轼诗、文,往往为其本集所无,故多为辑佚者所取。卷七为《诗词事略》,多记唐宋诗人之诗词佚事,间附评说或考释,相当于诗话。卷八为《杂书琴事》(附《墨说》)。卷九为《记砚》。卷一〇为《记丹药》,又多不经之语。其卷七《诗词事略》所记见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遗稿手迹,“涂窜甚多”,“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所辨《王子直诗话》(按,当为《王直方诗话》)误疵苏轼“木杪见龟趺”句,谓“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则龟趺正在木杪”。凡此皆足资参考。有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刘德重)

【艺苑雌黄】笔记著作。宋严有翼撰。严有翼,生平事迹不详,仅知为南渡前后建安(今福建建宁)人,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尝为泉、荆二郡教官。《直斋书录解題》著录,谓其“大抵辨正讹谬,故曰‘雌黄’”。其目:子史,传注,诗词,时序,名数,声画,器用,地理,动植,神怪,杂事。卷为二十,条凡四百餘。原书久佚,今传《说郛》本系节编本,仅八则。又有《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之十卷本,系明人摭拾《苕溪渔隐丛话》所引以伪托旧本,卷数不足,遂于第四卷以后全录《韵语阳秋》而颠倒其次序以凑数。然原书佚文,宋元时诗话汇编中存录颇多,罗根泽据以辑得八十一则,郭绍虞辑得八十四则。其论诗,称赏“前辈为文皆有所本”;又称“诗有夺胎换骨之说”,“信有之矣”;评诗则多重句法、字法及用事出处,于此可见其江西诗派倾向。其评鹭辨误,亦不乏可取处。然称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

“白发三千丈”等句,谓“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则不足为训。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绀素杂记】笔记著作。宋黄朝英撰。黄朝英,字士俊,建州(治今福建建瓯)人。哲宗绍圣(1094—1098)后举子。称述王安石学说。该书亦称《靖康绀素杂记》,十卷,“所记凡二百事”,今本“只有九十事”,“盖明人妄有删削,已非完书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苕溪渔隐丛话》录存其佚文十四则,《野客丛书》录存五则,《演繁露》、《艺苑雌黄》各录存一则,皆在今本之外。该书论诗之语不少,多考释诗句用事、词语来历出处,如解苏轼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谓“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此亦用俗语也”。后人于该书虽有所驳正,然其说“大抵多引据详明,皆有资于考证”(同上)。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靖康绀素杂记】见“绀素杂记”。

【石林诗话】诗话著作。宋叶梦得撰。该书据宋人著录,有作一卷者,有作两卷者,可能当时已有不同的本子。今传通行本为三卷,九十则。其写作年代,一说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禁元祐学术之前,一说已入南宋,但书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南渡以后的诗人。其主要诗学观点,是要求自然工巧,反对雕琢仿真。故对钟嵘“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之说极表赞赏,并进而指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书中对前人“初日芙蓉”(汤惠休)、“弹丸脱手”(沈约)、“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戴叔伦)等关于诗境的喻说,也都表示称许。而对于诗人“自以为工处著力太过”、“用巧太过”,则认为是作诗之“忌”。书中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正是从这样的诗学观点出发的。如推崇杜甫、王安石,主要是认为他们的诗符合自然工巧、含蓄浑成的艺术要求。对于欧阳修,书中既肯定了他“始矫昆体”之功,又指出他的诗平易疏畅,不够含蓄,“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廩,无复馀地”。对于苏轼和黄庭坚,书中也肯定了他们的佳句,所不满意的是他们牵于用事、损害词意的毛病。此外,书中引用禅宗语来形容杜诗的三种境界,“其一为随波逐流句”,“其二为截断众流句”,“其三为涵盖乾坤句”,也反映了宋人喜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风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责叶梦得“本为绍述馀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未免囿于偏见。郭绍虞指出:“石林论诗所以推重(王)安石而讥欧、苏者亦自有因,固不仅如《提要》所云出于门户之

见”，“平心而论，书中议论尚属公允，正不必从党争角度视之”（《宋诗话考》）此说较为中肯。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三莲诗话】诗话著作。宋员逢原撰。员逢原，字资深，华阴（今属陕西）人。约北宋末在世。仕至朝议大夫。有《三莲集》，已佚。《三莲诗话》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唯韦居安《梅硐诗话》有称引“华阴员资深《三莲诗话》”语，又称“《诗话》系录本，员乃南渡前人，辛巳岁（1281），偶于朋友处见之”云。郭绍虞乃据以辑入《宋诗话辑佚》，仅一则，为记富弼使辽巧对事。（刘德重）

【集诸家老杜诗评】诗话汇编。宋方深道编撰。方深道，名或误作方道深，莆田（今属福建）人。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奉议郎、知泉州晋江县。旧本题作元人，误。《集诸家老杜诗评》又称《诸家老杜诗评》或《老杜诗评》，五卷，约编成于北宋末或南宋初，为专就一家诗而汇辑诸家诗话、诗评最早者。但书中只是把有关杜诗的评语摘录成编，缺乏自己的见解，“别无新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且内容“琐碎冗杂，无可采录”（同上），故流传不广。今有抄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又，其弟方醇道（或误作道醇）辑有续书一卷，已佚。（刘德重）

【诸家老杜诗评】见“集诸家老杜诗评”。

【老杜诗评】见“集诸家老杜诗评”。

【诗话总龟】诗话汇编。其前身为《诗总》，宋阮阅编撰。阮阅，名或误作一阅，字闳休，一作字美成，一说原名美成，号散翁，又号松菊道人，庐州舒城（今属安徽）人，一作池州铜陵（今属安徽）人。神宗元丰中进士，知巢县，徽宗宣和中知郴州，爱其山川名胜，作《郴江百咏》。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以中奉大夫知袁州。致仕后居宜春。善诗，尤长绝句，时号“阮绝句”。有《总龟先生松菊集》。《诗总》原为十卷，编于宣和五年（1123），其自序说：“宣和癸卯（1123）春，来官郴州，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馀事，共二千四百馀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以便观阅，故名《诗总》。”又据自序所说：“松窗竹几，时卷舒之，以销闲日，不愿行于时也。”可能当时虽已成书，但并未刊行。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刊行时，则已经过后人增益，改名为《诗话总龟》，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后来又有人补辑后集，足成前集五十卷，后集五十卷，共一百卷。一般认为前集基本上为阮阅所辑，后集可能出于当时书坊的捏合，其成书当在南宋光宗绍熙（1190—1194）间。今通行本系出于明宗室月窗道人嘉靖年间刊本，前集四十八卷四十六门（缺“寄赠”门中、下两卷），后集五十卷

六十门。集首列有所采书目，前集一百种，后集一百种，但实际采录之书不止此数。所录各条之下，一般都注明出处。书中所辑内容，以唐及北宋诗人佚事为主，如所列门类有幼敏、知遇、称赏、自荐、投献、诗讖、记梦、鬼神等，所列书目有《零陵总记》、《湘中故事》、《明皇杂记》、《杨妃外传》、《唐史拾遗》、《小说旧闻》、《博异志》、《灵异录》等，于此即可窥知其记事性质。但书中亦辑有诗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如评论门多至五卷，又有诗病、正讹、琢句、句法等门，所录即多为前人论评、辨误、说法之语，但在全书所占比重不大。胡仔说：“阮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阮）编此《诗总》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然胡仔所见乃阮阅原来所编《诗总》底本，今本《诗话总龟》中也收有苏轼、黄庭坚等元祐诸人的诗话，已难以确定哪些为原有，哪些为增补。该书的价值，一是采录范围广，内容繁富，所引之书不少已经失传，往往赖其摭拾而得以保存。二是开创了分门别类辑集诗话的体制，对后来的诗话汇编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它所以久行不废的原因。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月窗道人刊本，又有明抄本。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点校本。（刘德重）

【诗总】见“诗话总龟”。

【许彦周诗话】诗话著作。宋许颢撰。许颢，字彦周，襄邑（今河南睢县）人。曾官宣教郎，中年出家，曾与释惠洪唱和。该书卷首小序，作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书当亦成于此时。小序中所说的“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讹缪（谬），皆所不取”，反映了宋人对诗话性质的认识，自欧阳修所说的“以资闲谈”（《六一诗话》小序）、司马光所说的“记事”（《温公续诗话》小序）以来，已渐趋深刻，撰著宗旨亦渐趋严正。该书亦称《彦周诗话》、《许颢诗话》，一卷，一百三十七则，兼有论评、考释和记事。“其论诗宗元祐之学，故所述苏、黄绪论为多。其品第诸家，颇为有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于诸家中，首称黄庭坚，认为“鲁直作诗，用事压韵，皆超妙出人意表”，“精妙明密，不可加矣”。关于学诗途径，则认为“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可除“作诗浅易鄙陋之气”。这里将黄庭坚与李商隐相提并论，说明许颢看到了黄庭坚与李商隐、江西诗派与西崑体之间有相通之处，即都偏重在用事造语等形式技巧方面下功夫。与此同时，书中对陶渊明、苏轼也颇加推许。如称“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这

涉及到人品与诗品的关系。又如称“东坡诗,不可指摘轻议,词源如长河大江,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可见许颢论诗,并不专主一家,于江西诗派之外,亦多有所取。许颢认为诗材来自书本,强调“读书不厌多”,主张从书中撷拾成语故实入诗,但他又不赞成堆砌典故,认为“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具有为江西诗派救弊补偏的意义。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彦周诗话】 见“许彦周诗话”。

【许颢诗话】 见“许彦周诗话”。

【汉皋诗话】 诗话著作。宋张某撰。张某,佚其名,北宋末或南宋初人。《汉皋诗话》原书久佚,卷数不详。今传《说郛》本系节编本,仅十一则。罗根泽辑补二则,得十三则;郭绍虞辑补四则,得十五则。其论诗多偏于考据注释,尤以校正杜诗者为多,亦不为无见。然其中“鲍孤雁”一则,既误以南唐人诗为鲍当诗,又称“凡物有群而孤者皆然,何独雁乎”,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所讥。郭绍虞亦谓“其论诗不免拘泥与疏舛”(《宋诗话考》)。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诗论】 诗话著作。宋释普闻撰。普闻,南宋初僧人。生平事迹不详。《诗论》一卷,原书久佚。《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有《诗论》一卷,不著撰人,郭绍虞以为“当即此书”(《宋诗话考》)。该书今传涵芬楼《说郛》本仅二则。其评诗谓:“老杜之诗,备于众体”;“鲁直、荆公之诗出于流辈”。又称:“炼字莫如炼句,炼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则格胜矣。天下之诗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则易琢,意句难制。境句人皆得之,独意不得其妙者,盖不知其旨也。”“盖意从境中宣出”,“大凡但识境意明白,觑见故人千载之妙,其犹视诸掌”。则主“格”,重“炼句”,强调“意”、“境”。特别是关于“意”、“境”的论述,颇值得注意。(刘德重)

【诗究】 诗话著作或汇编。宋佚名撰或辑。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据郭绍虞考,黄公绍《在轩集》有《诗集大成序》,谓“盛唐而降,诗评诗话之且千;近世所传,《诗总》、《诗宪》之有二”。以《诗宪》与《诗总》对举,可能亦为诗话汇编。当为南宋时书。其佚文仅《修辞鉴衡》录存三则,一则引《潜溪诗眼》语论布置,引《冷斋夜话》语论含蓄;一则引魏泰语论蹈袭;一则引《冷斋夜话》语论夺胎换骨。大抵本江西诗说。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五总志】 笔记著作。宋吴垞撰。吴垞,生平事迹不详,惟知为南渡前后江左(今苏南一带)人,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为枢密院编修、浙江提举。该书

一卷,前有自序,称:“龟生五总,灵而知事,古人譬诸老于学而不教者,心窃慕之,因志其首曰《五总》”;又称:“建炎庚戌(1130)上巳前一日避地无诸城,书于萧寺之道山亭。”全书约八十餘则,“皆记所闻见杂事,间亦考证旧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颇有涉及诗人诗事者。“其论诗推重黄庭坚,以为于诗人有开辟之功,盖亦江西流派”(同上)。如称黄庭坚“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又称苏轼于黄庭坚“虽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其崇黄之倾向甚明,而诋苏之语则甚无谓。又如称陈师道《见曾子开》诗,“虽全用古人两句,而属辞切当,上下意浑成,真脱胎法也”,亦可见其江西诗派路数。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刘德重)

【陵阳室中语】 诗话著作。宋韩驹述,范季随录。范季随,生平事迹不详。该书亦称《陵阳先生室中语》。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今传涵芬楼《说郛》本系节编本,仅一则。另有佚文散见于《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书。韩驹诗初学苏轼,后学黄庭坚,被列名于江西诗派,晚年于苏、黄均有所不满,遂自成一家。其论诗首申儒家“无邪”之义:“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次称“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驱奴隶;此乃以韵承意,故首尾有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联,因而成章,如此则意多不属”。于此,可见其重视思想内容及命意,主张用韵等技巧应为“意”服务。在此前提下,则强调要学习前人,要苦思锻炼,要字字有来历,要点化成语典故,讲究用字、使事、对偶等技巧。如称:“大抵作诗当日锻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字”;“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为事使”等。《中国历代诗话选》(王大鹏等编选)自《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诸书中辑选二十八则。(刘德重)

【竹坡诗话】 诗话著作。宋周紫芝撰。该书又称《竹坡老人诗话》、《周少隐诗话》,一卷,一作三卷,均为八十二条。其成书时间,可能在周紫芝于六十一岁(1142)始得官以前。书后有论兼跋,作于丁亥年(1167),称“镂板于郡”,“贻传未见之书”,可能即其初刊本,其时周紫芝已卒。该书以品评、考证为主,兼及诗事。其诗学见解,一方面认为“自古诗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语”,如评苏轼词称“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评黄庭坚诗称“山谷点化前人语,而其妙如此,诗中三昧手也”,可见其江西诗派倾向。另一方面,又认

为“诗人造语用字,有著意道处,往往颇露风骨”,“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士大夫学渊明作诗,往往故为平淡之语,而不知渊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则主张归于自然平淡,具有纠江西诗派之偏的一面。书中对一些诗歌所作的考证,如辨《嘲鼾睡》诗非韩愈作,辨“留春不住”词非王安石作,辨韩愈《调张籍》诗中“不知群儿愚”句非指元稹等,均有自己的特见。有《百川学海》本、《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竹坡老人诗话】 见“竹坡诗话”。

【周少隐诗话】 见“竹坡诗话”。

【珊瑚钩诗话】 诗话著作。宋张表臣撰。张表臣,字正民,单父(今属山东)人。官右承议郎、通判常州。南宋高宗绍兴中为司农丞。《珊瑚钩诗话》三卷,一作二卷,均为七十二则。书名本自杜甫诗句“文采珊瑚钩”,隐含自炫文采之意。书中以记事述诗为主,兼涉文章、传奇、书法、棋戏以至梦幻等,内容颇为庞杂。论诗推崇杜甫,于苏、黄则更倾心于苏轼。其诗学见解,认为作诗应当“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又称引陈师道之语说:“学诗之要,在乎主格命意用字而已。”强调以命意为主,兼重炼句炼字,反对仅从字面上学杜,均似有见于江西诗派之偏而发。其评诗标举“气韵”、“格力”:“以气韵清高深渺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认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又称:“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镂为下。如杨大年西崑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唯书中好录己诗,又多述与名流相赠和之作以自炫耀。诗话多录己诗,亦以该书为滥觞。书末还录有所作《示客》一文,对古今五十余种文体加以辨析说明,于文体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有《百川学海》本、《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观林诗话】 诗话著作。宋吴聿撰。吴聿,字子书,自署楚东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其为南宋初人,又称其学“出于元祐”。该书一卷,一百十五则,个别条文可能有残缺。全书以考证辨释为主,间及佚事。书中称引,以北宋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和王安石为多。其所考证,如引《隋书·礼志》证古乐府“长跪问故夫”句,称“古妇人亦伏拜也”;引《南史》“丘仲孚喜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证“半夜钟声,不独见唐人诗句”;引何逊《王孙游》“日碧草蔓丝”,证杜甫诗“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中“梦”字乃“蔓”字之讹;引苏轼诗“诗人空腹待黄精”句,证黄庭坚所说“(黄独)或以为黄精,非也”为暗指苏轼之误;

引所见苏轼手写《会猎》诗,辨传世本“不向如皋闲射雉”,“不向”为“向不”之误;考苏轼诗“醉眼炫红绿”,“乃‘看朱成碧颜始红’换骨句耳”,等等,大都典实有据,可资参考。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凡所考证,大抵典核,为宋人诗话之佳本”。书中还常列举同类诗句进行比较,如关于夕阳诗句:“颜鲁公云‘夕照明村树’,僧清塞云‘夕照显重山’,顾非熊云‘斜日晒林桑’,杜牧云‘落日羡楼台’,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严维‘花坞夕阳迟’也。”这种比较,可以帮助读者鉴赏,要亦不为无益。至于其考证难免偶有疏舛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予指出。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藏海诗话】 诗话著作。宋吴可撰。吴可,字思道,号藏海居士,金陵(今江苏南京)人,一说瓯宁(今福建建瓯)人,又有生于金陵而客于瓯宁、原籍瓯宁而生于金陵诸说。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宣和末官至团练使,责授武节大夫致仕。有诗名。可能在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间尚在世。有《藏海居士集》。《藏海诗话》一卷,九十三则,兼有论评、考释和记事。其论诗,一是主“意”,称“凡看诗,须是一篇主意,乃有归宿处”;“凡装点者好在外,初读之似好,再三读之则无味,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则中边皆甜也。装点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实’”。二是主“气”,称“凡诗切对、求工,必气弱。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三是赞赏自然平淡,认为“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馀,而于渊明则为不足”;“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四是认为“杜之妙处藏于内,苏、黄之妙发于外”,主张“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凡此,似均有见于江西诗说之不足而发。此外,吴可还善于以禅喻诗,曾作有《学诗诗》三首(见《诗人玉屑》卷一),均以“学诗浑似学参禅”起句,与此书中所云“凡作诗如参禅,便有悟门”相一致,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论诗每故作不了了语,似乎禅家机锋”。这也反映了当时以禅喻诗的风气。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懒真子】 笔记著作。宋马永卿撰。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今属江苏)人。徽宗大观(1107—1110)间进士。为永城主簿,历江都丞,浙川、夏县令。受学于刘安世,曾追录其言谈为《元城先生语录》,并附《行录》一卷。《懒真子》五卷,一百六十餘则,末则记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事,则书当成于此。该书“多述刘安世语,又开卷冠以司马光事,书中亦多称光,盖其渊源所自出也”,“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

之文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亦颇有论诗之语,大抵以考辨为主。如考陶渊明《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五十”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苏轼亦仅和其九韵;考杜甫《送重表侄王砮评事》诗“虬髯十八九”,“十八九”出《汉书·丙吉传》等,“皆引据确凿,不同臆说”(同上)。又谓《离骚》中“正则”、“灵均”为屈原小名小字,亦可备一说。其论白居易诗称“古人作诗,必有所拟,谓之神仙换骨法”。所谓“神仙换骨法”,当即本自江西诗派“夺胎换骨”之说。有《笔记小说大观》本。

(刘德重)

【风月堂诗话】诗话著作。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建炎初以太学生擢为两宫通问副使赴金,被拘不屈,羁留十六年,于绍兴十三年(1143)始得南归。因言金国敌情,劝高宗毋失恢复机遇,为秦桧所恶,仅转奉议郎。著有《曲洧旧闻》等。《风月堂诗话》二卷,六十九则。其自序称:“予复以使事羁縻漯河,阅历星纪,追思曩游风月之谈,十仅省四五,乃纂次为二卷,号《风月堂诗话》。”该序作于庚申(1140),书亦当成于此时,为其在金所作。书末有咸淳壬申(1272)月观道人跋,谓此书“得之于永城人朱伯玉家,断烂脱误,盖北方所传本也”,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于“度宗时始传至江左,故晁、陈二家皆不著录”。书中兼有记事和评论。所记多为元祐中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及晁冲之、晁说之、晁补之等人遗事。论诗本自钟嵘“自然”说,称:“诗人胜语,咸得于自然,非资博古。”又称:“篇章以故实相夸”,“可以表学问则非诗之至也。观古今胜语,皆自肺腑中流出,初无缀缉工夫”。针对江西诗派标举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书中反问道:“不知《国风》、《雅》、《颂》,祖述何人?”指出杜诗“句法妙处,浑然天成”。但书中又称李商隐《马嵬》诗、温庭筠《题苏武庙》诗“用事属对如此者罕有”,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联“用事如此,可谓有功矣”,则并不一概反对用事。书中除极称杜甫“近古以还无出其右,真诗人之冠冕”外,于宋代诗人中颇为推崇苏轼,如称:“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右矣。”所论苏、黄优劣,为王若虚《滹南诗话》所称引。对于黄诗,则称“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可见其所取于黄诗者,亦在于黄诗“虽矜于用事而归宿所在,仍以自然浑成为主”(《宋诗话考》)。郭绍虞亦称:“后山之论‘换骨’,东湖之说‘中的’,以及吕本中所谓‘话

法’之论,未尝不作更高一着之想,但说来迷离恍惚,有如捕风捉影,未若朱氏之剴切著明也。”(《宋诗话考》)有《宝颜堂秘笈》本。

(刘德重)

【桐江诗话】诗话著作。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今传《说郛》本系节编本,仅五则。其佚文《苕溪渔隐丛话》录存二十则,并散见于《诗话总龟》后集、《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书。罗根泽辑得二十二则,并推测其成书约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前后;郭绍虞辑得二十三则,称其成书当在《西清诗话》之后,绍兴十八年(1148)之前。书中多引诗摘句进行品藻,论诗颇重字句。如称:“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又引石延年诗称:“始知诗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联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古今总类诗话】诗话汇编。宋任舟编撰。任舟,生平事迹不详,仅知为南宋初人,曾官左宣教郎。该书亦称《古今类总诗话》,五十卷,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方回《桐江集》卷七有《古今类总诗话考》,称:“《古今类总诗话》五十卷,题曰‘左宣教郎任舟集录’。录有绍兴丙寅年序,婺板也。序文似非深于诗者。其第一卷曰诗体,二曰诗论,三曰诗评。至四卷诗仙以下多不涉出处,必不得已曰某人云,他则若出于己所云者,不如胡元任《丛话》明写出处以告人也。”其序既作于南宋高宗绍兴丙寅(1146),则成书亦当在此时。又分卷既标曰“诗体”、“诗论”、“诗评”、“诗仙”,则其编排形式亦“与阮阅《诗总》、胡仔《丛话》不同,盖兼有二者之长,而开《诗人玉屑》之先声者”(《宋诗话考》)。该书佚文,《修辞鉴衡》录存八则,其中七则又见于《仕学规范》。

(刘德重)

【古今类总诗话】见“古今总类诗话”。

【艇斋诗话】诗话著作。宋曾季狸撰。曾季狸(?—1178前),字裘父,号艇斋,南丰(今属江西)人。曾巩弟曾宰之曾孙。举进士,不第。师事韩驹、吕本中、张栻,有诗名。著有《论语训解》、《艇斋杂著》等。《艇斋诗话》一卷,有残缺,存三百余则。其成书约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书中以记述诗事及考释诗句为主。论诗多称引徐俯、吕本中语,主江西诗说,如称:“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话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即对这一时期江西诗派流行的“悟入”说作了归纳。其论学诗,亦称引徐俯语,谓:“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輹,小车无轨。”又称:“山谷诗妙天下,然自

谓得句法于谢师厚,得用事于韩持国。此取诸人以为善也。”即要求跳出江西诗派只知学杜、学黄的圈子,转益多师。其标举佳句,亦称赏有“思致”,“念不尽之意”,不赞成“刻画见骨”。此等议论皆不囿于江西诗说,不为未见。书中对江西诗人遗闻佚事的记述和诗句出处的考释,也多有助于对有关诗作的理解和鉴赏,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但其中也有牵强或疵误处。如称:“老杜‘慎勿近前丞相嗔’,出古乐府‘春梁之下有县鼓,我欲击之丞相怒。’”按古乐府为东汉桓帝时童谣,原句为“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丞卿”谓主鼓之丞及众卿,此处擅改为“丞相”。又如称“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亦殊乖事实。此等处,已多经后人指出。有《琳琅秘室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墨庄漫录】笔记著作。宋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今属江苏)人。南渡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该书十卷,前有自序,谓“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故题其首曰《墨庄漫录》”。书中记有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事,则书当成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多记杂事,亦颇及考证”,虽“时有疏舛”,然辨诗“皆极典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其中记述诗人诗作、佚事,考释、评论诗句等内容为数不少,其论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诸家诗多有见地,评诗亦颇精当。然称白居易《长恨歌》“终篇无所规正”,元稹《连昌宫词》“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则囿于儒家诗教,所见甚短。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三编》本。(刘德重)

【诗说隽永】诗话著作。宋佚名撰。罗根泽据书中内容考其撰者为建炎时(1127—1130)人(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郭绍虞更考得其姓为胡,自称曰伋,因疑为南宋初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胡宗伋(号醇儒)所撰,其成书当在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后(见《宋诗话考》)。《诗说隽永》,亦称《诗话隽永》,一卷,原书久佚。其佚文散见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林广记》等书。罗根泽据此辑得二十二则,郭绍虞辑得二十则。其内容以记事为主,间有评论。所记诗人佚诗佚事,又以江西诗派中人如韩驹、徐俯等为多。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诗话隽永】见“诗说隽永”。

【西溪丛语】笔记著作。宋姚宽撰。姚宽(1105—1162),字令威,号西溪,越州嵊县(今浙江嵊州)人。以荫入仕。曾为秦桧所抑。后官至权尚书户部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博学多才,精天文。有《西溪集》。《西溪丛语》三卷,一作二卷,二百六十四

则。书中论诗以考证辨释为主,如辨《文选·神女赋》“玉”字为“王”字之误,辨欧阳修《六一诗话》论张继“半夜钟”之误,辨刘放《中山诗话》论萧何不为功曹之误,等等,“皆极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谓杜甫诗中之黄衫少年为《霍小玉传》之黄衫客,又谓甫‘俊逸鲍参军’句为讥李白,皆失之穿凿附会”(同上)。其注诗、引诗亦间有疏舛处。“然大致瑜多而瑕少”(同上),于考究诗人遣词用字之所本不为无助。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刘德重)

【能改斋漫录】笔记著作。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因应试不第,于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以布衣献所著《春秋左氏传发挥》等书,得补右迪功郎。历敕令所删定官、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寺丞兼权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1160)为陈俊卿劾罢,后又尝起知严州,致仕。因阿附秦桧,为时论所不齿。《能改斋漫录》初刊于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1154—1157),孝宗隆兴初(1163)为人告讦,谓此书“事涉訾谤”,遂被禁毁。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始重刊行,但内容经过删削,已非旧观。书末有其子吴復跋,称所记凡二千餘则,厘为十八卷。然宋人著录,亦有作十三卷、二十卷者。自元初以后,刊本又绝。今本乃明人自秘阁抄出,缺首尾二卷,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为二,以足其卷数,实已非完帙。书中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谨正、记事、记文、方物、乐府、神仙鬼怪等十三类。又有其他传本,于分卷、分类及次序上,稍有差异。该书记载史事、考辨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有许多已佚文献资料,故颇为后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纇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书中亦多记诗、考诗、论诗之语,尤重于考辨诗句用字、用事来历出处。然其卷五“沿袭”类所载,与《优古堂诗话》几乎全同,不知孰先孰后。大抵吴曾论诗,本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主张熟读前人诗作,沿袭前人诗意或用语,进行点化、改造。故书中大量标举前后相承相袭之诗句,加以比较鉴裁,或称其“辞意益工”,或称其“不失为佳”,或称其“终不能及”前人。书中认为“沿袭”不等于“蹈袭”,反对《冷斋夜话》所称引的“夺胎换骨”说,指其为“妄语”,力辨“山谷作诗,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岂肯教人以蹈袭为事乎”?其论诗又注重炼字、立意,并于前人用事之误多所辨正。所论以杜甫、王安石、苏轼三家诗为多。又多征引宋人诗话笔记,如

《梦溪笔谈》、《西清诗话》、《王直方诗话》、《潘子真诗话》、《冷斋夜话》、《洪驹父诗话》、《绀素杂记》等,并予以补苴纠谬,所论亦多可取。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9年重版)。(刘德重)

【**优古堂诗话**】诗话著作。各本旧题宋吴开撰,惟《铁琴铜剑楼书目》题宋毛开撰。吴开,字正仲,汀州清流(今属福建)人,一作滁州(今属安徽)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中宏词科。钦宗靖康间为翰林学士承旨,以主和趋附金人,并任伪楚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相。南宋高宗建炎初,安置永州。绍兴初,再贬南雄州居住。秦桧为相,赦还,不敢归里,卜居赣上。著有《漫堂随笔》。毛开,字平仲,衢州三衢(今浙江衢县)人。其时代较吴开稍后。仕止宛陵、东阳二州。据郭绍虞考证,该书内容多见于《王直方诗话》、《高斋诗话》、《复斋漫录》,且“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按,当作卷五)所载几全相同”,故认定其“决非吴开所撰”,“似亦非毛开自著之书”,可能为毛开“辑录时人之论”而成,亦可能“由书贾牟利,在《能改斋漫录》成书之后,钞录此卷,托于吴开以欺人者”。“是则此书不特非吴开所撰,抑亦非毛开所著矣。时代久远,其人其书又不显,盖难考定已”(《宋诗话考》)。《优古堂诗话》一卷,一百五十馀则,有小标题。卷末有一则小标题为“诚斋论山谷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杨万里“时代远不相及,疑传写有讹,或后人有所窜乱”。该书以考证诗句用事出处为主。如《六一诗话》曾指出杜诗“身轻一鸟过”之“过”字为人所难及,这是从诗歌意境的鉴赏角度去体味的,并不去研究杜甫这一“过”字的来源出处。而该书则联系杜甫的“馀生如过鸟”、“愁窥高鸟过”等句,又联系杜甫自称“熟读《文选》理”,考出《文选》载有张景阳诗:“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认为“老杜盖取诸此”。同时又指出杜诗的影响,及于苏诗“百年同过鸟”、黄诗“百年青天鸟过翼”等。又如考黄诗“醉乡闲处日月,鸟语花间管弦”,上句本于唐皇甫嵩诗“醉乡日月发”,下句本自唐崔湜诗“庭际花飞锦绣合,枝间鸟啭管弦同”;考黄诗“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本自唐宋昼诗《喜陈懿老至》“一别一千日,一日十二忆,苦心无间时,今日见玉色”。此类考证,可对黄庭坚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添一佐证。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论诗家用字炼句、相承变化之由”,“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然“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暗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于求剑刻舟”。郭绍虞则认为“辗转推寻,搜求根源,亦所谓言各有

当,本宜分别论之,未可遽以求剑刻舟病之矣”(《宋诗话考》)。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高斋诗话**】诗话著作。宋曾慥撰。曾慥(?—1155),字端伯,号玉游子,或称玉游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初为尚书郎,历知虔州、荆南府、庐州,后寓居银峰。著有《高斋漫录》、《玉游子》,编有《百家类说》、《乐府雅词》、《宋百家诗选》、《道枢》等。《高斋诗话》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其佚文《苕溪渔隐丛话》录存二十三则,并散见于《诗话总龟》后集、《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竹庄诗话》等书。罗根泽辑得二十三则,郭绍虞辑得二十五则。其内容偏重于考订名物故实,兼及品题诗句。有《宋诗话辑佚》本。(刘德重)

【**扞虱新话**】笔记著作。宋陈善撰。陈善,字子兼,一字敬甫,号秋塘,福州罗源(今属福建)人。南渡前后至孝宗时(1163—1189)在世。《扞虱新话》上下二集,据自跋,上集成于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下集成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一本不分卷,另一本为十五卷。《四库全书》所收亦为十五卷。该书以考论经史、诗文为主,兼及杂事。其论诗主“气韵”,主“格”,如称:“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词藻,要非佳作也。”又称:“予每论诗,以陶渊明、韩、杜诸公皆为韵胜”。其论作诗,称:“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诗人之语,要是妙思逸兴所寓,固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其品评诗人,称“老杜诗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称“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称“韩退之诗,世谓押韵之文耳,然自有一种风韵”;称王安石“晚年诗极精巧”,“然论者犹恨其雕刻太过”;称苏轼“晚年笔墨挟海上风涛之气,益穷益工”,然早年“不能徇俗俯仰,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不及黄庭坚“浑厚”,且“用事多有误处”;又称“文章似无定论,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尔”。对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贬抑李白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持论尤多舛驳,大旨以佛氏为正道,以王安石为宗主”。“观其书颠倒是非,毫无忌憚,必绍述馀党之子孙,不得志而著书者也”。就其论诗而言,虽未必尽当,然亦不乏可取之处。有《儒学警悟》本。

(刘德重)

【**岁寒堂诗话**】诗话著作。宋张戒撰。张戒(?—1157以后),字定复,一作定夫,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为秦桧排挤出朝。曾往依岳飞。绍兴和议后,被劾“深诋和议,迎合赵鼎”,勒停。秦桧死后,稍复官,至司农少卿,终主管台州崇道观。

《岁寒堂诗话》旧本残存仅一卷,今本系据《永乐大典》所载,益以旧本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六则,综论古今各家诗;下卷三十三则,专评杜诗。其诗学见解,以儒家的传统观点“诗言志”和“思无邪”为核心。书中开首即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上卷最后则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可谓“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贯串于全书始终。而其所谓“言志”、“无邪”固囿于儒家正统观念,如书中指责刘禹锡《扶风歌》、白居易《长恨歌》、温庭筠《华清宫》等诗“皆无礼于君”,即反映出其思想局限;但针对当时诗坛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强调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书中也并不轻视艺术形式的作用,如称引刘勰“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之说,主张“文”应为“情”服务。又称引刘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和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之说,提倡自然含蓄的艺术风格和形象鲜明的艺术描绘。书中对许多诗歌作品的评论,也往往将其思想内容与意味、韵度、气格、笔力等方面的艺术特色结合起来,从整体感受上去加以考察,与江西诗派着意于字眼、句法、用事、押韵之类偏重形式方面的探讨有所不同。由这样的诗学观点出发,对于历代诗人,书中最推崇的是曹植、陶渊明、李白和杜甫,而对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则深致不满。书中对苏、黄诗风的批判,虽未必尽当,但于当时的诗坛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对于杜诗,不仅推崇其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使人读之“凜然兴起,肃然生敬”;并且称道它发自真情实感,“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称道它从生活出发和多样的风格:“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这样认识杜诗,显然较江西诗派要全面、深刻。此外,书中对李白、王维、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等唐代诗人的评论,也多有可取之处。该书虽不无瑕疵,但理论价值较高,对后世的“格调”说有一定影响。清代潘德舆称:“吾于宋人诗话,严羽之外,只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养一斋诗话》)张宗泰称:“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林昌彝称:“宋人诗话以《岁寒堂》为较胜,以其辞尚体要也。”(《海天琴思录》)均甚推重。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碧溪诗话】诗话著作。宋黄彻撰。黄彻(?—

约1162前后),字常明,莆田(今属福建)人,一说邵武(今属福建)人,或以为家本莆田而占籍于邵武者。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历官辰州溪县丞、县令,沅州军事判官,又历知麻阳、嘉鱼、平江等县。宦游十馀年,以拙直忤权贵弃官,归隐于兴化碧溪。该书十卷,前有自序及孝宗乾道四年(1168)陈俊卿序,后有其子黄廓、同宗黄永存、其孙黄焘、澧阳聂棠及清朱彝尊、黄摸等跋。据诸序跋可知,该书约成于黄彻卒前数年间,乾道五年(1169)由黄永存初刻于蕲春,继由黄廓再刻于家塾,后又由黄焘三刻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聂棠四刻于度宗咸淳五年(1269),可见当时刊刻之盛。其自序称:“诗话之集,皆因前人之语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故书中除自撰外,亦多采摭前人诗话,而于《陈辅之诗话》、《漫叟诗话》转录尤多。其论诗以儒家传统的“风教”说为旨归。然书中“以守正之过,至拘执不得诗人意者,亦往往有之”(张宗泰《鲁岩所学集·跋碧溪诗话》)。如称李白诗无补于社稷苍生,不当与杜甫齐名;指李商隐《咏淮西碑》诗“言讫屡颌天子颐”,说“人臣言不当如此”;赞杜甫诗“多用经书语”,“造次不忘君”,至比杜甫为孟子,推崇备至,并多以六义风教之说曲解杜诗等等,均不免迂腐拘执。书中对黄庭坚所说诗“非强谏争于庭,怨置于道,怒邻骂坐之所为”不以为然,也是以“忠臣义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切”这种儒家的忠君直谏观念出发的。凡此,实际上反映了南宋道学家的诗学见解。书中值得注意的较好的见解,一是重视作家的知识修养和生活经历,如称“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非徒然”,既不否认书本对于创作的作用,又更强调经历漫游、开阔眼界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这与江西诗派偏重于向书本学习不同,也与当时的一些道学家把诗变成“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不同。二是重视对诗句进行语法修辞方面的研究,如举韩愈“一蛇两头见未曾”、苏轼“迨此雪霜未”等诗句说明倒装句式的运用,举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但使残年饱吃饭”等说明“个”、“吃”之类俗字的运用等,均能独辟蹊径,给人启示。凡此,皆其可取之处。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韵语阳秋】诗话著作。宋葛立方撰。葛立方(?—1164),字常之。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徙居吴兴。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仕至吏部侍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罢归。有《归愚集》、《归愚词》、《西畴笔耕》等。《韵语阳秋》亦称《葛常之诗话》,二十卷,四百多则。书前有隆兴甲申(1164)自序,乾道元年(1165)徐林序和乾道二年沈洵序。据

徐序称：“隆兴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则该书系其晚年罢归后所作，成于隆兴元年(1163)。又据沈序称：“公既歿，或请其书镂板以传世。”则该书当初刊于乾道二年。该书分卷，大约以类相聚：一、二卷多论诗法诗格，三、四卷多记诗歌本事，五、六卷多涉考证，七、八卷多说用事，九、十卷多述评史之作，十一卷则多叙仕宦升沉之况，十二卷多谈死生达观之理，十三卷重在山川地理，十四卷重在书法绘画，十五卷重在歌舞音乐，十六卷重在花鸟虫鱼，十七卷重在医卜杂技，十八卷重在论人识鉴，十九、二十卷则为岁时风俗饮食妇女之属，涉及面颇广。书中以记事、考释居多，诗学见解主要集中在前两卷。其论诗推崇杜甫和苏轼、黄庭坚，认为创作的源泉在于书本，“欲下笔，当自读书始”，并称“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学诗者不可不知此”。凡此均未脱江西诗派蹊径。但书中又不赞成江西诗人为去陈腐而刻意求奇和为去粗俗而故作执拗的偏向，认为“陈腐之语，固不必涉笔，然求去其陈腐而不可得，而翻为怪怪奇奇不可致诘之语以欺人，不独欺人，而且自欺，诚学者之大病也”；“近时论诗者，皆谓偶对不切则失之粗，太切则失之俗，如江西诗社所作，虑失之俗也，则往往不甚对，是亦一偏之见尔”。针对这种偏向，书中标举陶渊明和谢朓，认为他们的诗“皆平淡有思致”，并称：“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另外，书中还谈到“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类，皆欲其思之来，而所谓乱思、荡思者，言败之者易也”，并引小说(按，当指《冷斋夜话》)载潘大临方思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败”为例，实际上接触到艺术构思中的灵感问题。该书也存在不少缺陷，如称屈原自沉为“狷急偏躁”不知命，称李白与杜甫、苏轼与黄庭坚都曾相轻相讥，释“七哀”诗为“病而哀，别而哀，感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谓一事而七者俱也”等，均未免偏颇、附会或穿凿。又误以郑合敬诗为郑谷诗，以江淹诗为谢灵运诗，以苏轼诗为杜甫诗，以李白诗“休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句为袭郑谷语，并多杂神仙释老之事，则又未免疏误、错乱或芜杂。此等处，颇为后人讥议。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刘德重)

【葛常之诗话】 见“韵语阳秋”。

【唐诗纪事】 诗话与诗歌汇编。宋计有功编撰。计有功，字敏夫，号灌园居士，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或作邛州安仁(今四川邛崃东北)人。徽宗宣

和三年(1121)进士。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以右承议郎知简州，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七年赴临安奏对，献所著《晋鉴》，擢直秘阁、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二十八年知眉州，后移知嘉州。为南宋抗金将领张浚从舅，曾长期参与张浚幕府。《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成书于计有功晚年，初刻于南宋宁宗嘉定甲申(1224)。其自序谓：“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官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老矣无所用心，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记大节，庶读其书，知其人。”可见其编纂此书，乃经过长期积累。凡唐代诗人，有名必录；既辑存诗歌作品，也收录诗歌本事及有关评语；如其人可考者，还撮述其世系爵里及生平经历。全书共收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搜罗面极广，内容也相当繁富。编排体制系按人立目，首列帝王后妃，末列僧道、妇女、无名氏等，中间则大致以时代为序，但并不严格。也有一人而分列两处的，如白居易见于卷三八、三九，但于卷四九又重见，可能是编排时的疏忽。该书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一是辑集了大量诗歌作品，有许多唐代诗人诗作都是靠它流传下来的。这也为后世汇编唐代诗歌总集提供了基础。胡震亨编纂《唐音统签》以及后来清代编纂《全唐诗》，于该书均有所资取。即如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由于所传版本不同，也可供校勘之用。二是从数百种前人著作中辑集了大量有关唐诗的资料，对于研究唐代诗人生平及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张为之书(按指《诗人主客图》)独藉此编以见梗概，犹可考其孰为‘主’，孰为‘客’，孰为‘及门’，孰为‘升堂’，孰为‘入室’。则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故该书历来为唐诗研究者所重视。但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在所辑诗歌中，应制、奉和、陪侍、游宴、投献、赠答一类作品相当多，而反映社会现实、思想性强的作品却比较少，像杜甫不录《三吏》、《三别》，白居易不录《新乐府》、《秦中吟》，实为一大缺憾。而在所辑的资料中，又有不少涉及鬼神迷信、梦兆谶应等荒诞无稽的内容，未免精芜杂陈。此外，书中还有一些疏误，如“李元操之为隋李孝贞字，漫附开元中；僧隐丘《琪树诗》之为《丹阳集》中蔡隐丘诗，误去蔡字作僧；晋释帛道猷诗误作昙翼，列僧中”(《唐音癸签》)；隋弘执恭误作唐人；王绩、王勣实为一人而误作二人；来鹄、来鹏实为二人而误作一人；卢渥名下出自《云溪友议》的材料

误作出自《本事诗》等,均未免疏于考证。然而正如胡震亨所说:“亦其编录浩繁,故偶尔失检,不足为疵也。”(同上)《唐诗纪事》开创了兼收诗歌与诗话的编纂体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清人厉鹗编《宋诗纪事》,近人陈衍编《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田编《明诗纪事》、邓之诚编《清诗纪事初编》,今人钱仲联编《清诗纪事》,都是《唐诗纪事》的后继之作。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校勘本,巴蜀书社王仲镛校点本。(刘德重)

【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汇编。宋胡仔编撰。胡仔(1095?—1170),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少以父荫授迪功郎,历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知晋陵县。后以父母丧,赋闲二十年,卜居湖州苕溪,以渔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其书前集六十卷,编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四十卷,编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其前集自序云:“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或)一诗而二三其说者,则类次为一,间为折衷之;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可见该书带有对《诗总》续补的性质。但与《诗总》比较,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体制上看,胡仔不满意分门纂集的办法,认为那样做是“未知诗人之旨”,所以改为“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前集自序)。如前集卷一、二立目为国风、汉魏六朝,卷三、四为五柳先生,卷五为李谪仙,卷六至一四为杜少陵,卷一五为骆宾王、王摩诘、韦苏州、孟浩然等。有些无法归入诗人名下的内容,则从事类立目,如宋朝杂记、半夜钟、长短句等。这样以时为序,以人为目,以事类作补充的办法,显然比《诗总》更明晰、更有系统,也更便于检阅。第二,从内容来看,该书虽间记杂事,但以论评为主,因而较之以记事为主的《诗总》更有诗学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阮)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第三,从汇编者的诗学见解来看,《诗总》仅直录前人诗话,并无己见;该书则除采录前人诗话外,还多附辨证考订之语。又正如《宋诗话考》所说:“(阮)阅书仅有排比之劳,胡(仔)著则有撰著之功,难易迥殊,效用亦大有径庭。”这些,都是《苕溪渔隐丛话》超过《诗总》的地方。关于该书的编纂宗旨,胡仔在后集自序中称:“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诗道邈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

持其万一也。”可见其编纂该书,原有引导人们正确学习李、杜、苏、黄,藉以振兴宋诗的用意。因此,书中所辑诗话,也以李、杜、苏、黄为多,如前集六十卷中,李白一卷,杜甫九卷,苏轼九卷,黄庭坚三卷,后集四十卷中,李白一卷,杜甫四卷,苏轼五卷,黄庭坚两卷,合共三十四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于此亦可见其诗学倾向。同时,书中还有不少标明“苕溪渔隐曰”的条文,直接反映了胡仔的诗学见解。此外,书中关于诗句来历、典故出处、字词训诂的考证,也多有可取之处;书中所保存的宋代诗话资料,可与《诗话总龟》相补充,“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而也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刘德重)

【猗觉寮杂记】笔记著作。宋朱翌撰。朱翌(1097—1167),字新仲,号灞山居士、省事老人,舒州怀宁(今安徽潜山)人。徽宗政和(1111—1118)进士。南渡后为秘书监,预修《徽宗实录》,累迁中书舍人。以党赵鼎为秦桧所贬,居韶州十九年,后历知严、潭等州。晚居鄞县。有《灞山集》、《灞山诗餘》。《猗觉寮杂记》六卷,四百三十五则。《四库全书》作二卷,以前三卷为上卷,后三卷为下卷。书中附有《与丞相洪适求序书》,洪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洪迈为之序。其内容,“上卷皆诗话,止于考证典据,而不评文字之工拙;下卷杂论文章,兼及史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以考释诗句用事出处为主,称“古今以诗名世者,用字未尝无所出”,又谓杜甫“读书破万卷”,“信矣”,可见其诗学倾向大抵属江西诗派。其间考证虽“不免于舛误”,然“其引据精凿者,不可殚数,在宋人说部中,不失为《容斋随笔》之亚”(同上)。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环溪诗话】诗话著作。宋吴沆撰,或云吴沆后人所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云吴沆后人所编次(《宋诗话考》)。吴沆(1116—1172),字德远,号无莫居士,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尝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与弟澥各献所著书,沆以误触庙讳罢归,隐居环溪。卒后门人私谥文通先生。有《易璇玑》等。《环溪诗话》,《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一卷,后各家著录多作三卷,今本亦有一卷、三卷两种。其论诗大旨,极称杜甫,而又不主一家,故以杜甫为“一祖”,以李白、韩愈为“二宗”。又称:“杜甫长于学,故以字见功;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功;韩愈长于气,故十数篇见功。”其自述少时之作,谓读陶诗则所作似陶,读杜诗则所作似杜,后又学李白、学卢仝、学白居易,乃至学黄庭坚,均能入其境界。可见吴沆颇善于博采兼收。其诗学见解,既受江西诗派影响,多主

字法、句法及用事之法;但又能不囿于江西诗说,如称:“作诗不可一字有来历,不可一字无来历,要不为事所使,要文从字顺,各当其职。”又称:“诗之工不在对句,然亦有时而用,第泥于对而失诗之意,则不可耳。”这些观点,均与江西诗说有异。书中论诗又以句中所含事物之多为工,为赵与时《宾退录》所驳;所举白间黄里、杀青生白诸偶句小巧细碎,所举己诗自谓摹仿黄庭坚而“实仅得其不佳处”,又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摘。有《学海类编》本。

(刘德重)

【瓮牖闲评】 笔记著作。宋袁文撰。袁文(1119—1190),字质甫,号逸叟,明州鄞县(今属浙江)人。好读书,不求仕进。《瓮牖闲评》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惟《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内间引其书,明代文渊阁书目有此书一部一册,卷数不详。清《四库全书》本系辑自《永乐大典》,共四百餘则,厘为八卷,卷一至四分别论经、史、天文、地理、人事、小学;卷五论诗、词、书、画,卷六至八论饮食、衣服、器用、宫室、释道、技术、物产及因果、怪异等。其论诗以考订训诂为主,如辨《汉书注》“倾城”、“倾国”之误,辨苏轼诗用《法言》字之误,辨汪藻《松》诗“五丈夫”为“五大夫”之误等,皆颇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虽征引既繁,不无小误”,“而大致赅洽,实考据家之善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1985年校点本。

(刘德重)

【少陵诗格】 诗格著作。宋林越撰。林越,名或作钺,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南宋高宗、孝宗时人。此书以杜诗为主,标举格法,穿凿殊甚。如谓《秋兴》八首,第一首为接项格,第二首为交股格,第三首为开合格,第四首为双蹄格,第五首为续后格,第六首为首尾互换格,第七首为首尾相同格,第八首为单蹄格。这类作法,乃是在唐人诗格基础上的变本加厉。在此之前,有李淑《诗苑类格》,标举唐人篇法六格,惠洪《天厨禁脔》亦多强立名目,此书与之在作法上一脉相承。后人有所谓《杜律心法》、《杜陵诗律》者,均从此出。有《永乐大典》本。

(张伯伟)

【庚溪诗话】 诗话著作。宋陈岩肖撰。陈岩肖,字子象,号西郊野叟,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高宗绍兴初,官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八年(1138)中词科。仕至兵部侍郎。《庚溪诗话》二卷,八十一则,亦有作一卷者,不全。据书中称高宗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称孝宗为“今上皇帝”,称光宗为“当今皇太子”,知该书成于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当为其晚年之作。该书以记述诗歌本事为主。上卷编次,首宋代帝王诗,次历代帝王诗,再次杜甫、苏轼诗;下卷则杂论宋人诗,亦间及词,所录

佚诗佚词,颇赖以传。其论诗宗江西诗派,认为“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并标举黄庭坚、吕本中等为江西诗派正宗:“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体诗,不拘声律,间有歇后语,亦清新奇峭之极也。”“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山谷为祖,宜其规行矩步,必踵其迹。今观东莱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痕。”可谓推崇备至。其所不满者,则为江西诗派末流:“然近时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掇,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亦可谓“切中后来之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于元祐诸人,征引尤多。于苏轼亦极力称赏,为苏、黄用事辩说颇力。此外,书中论诗尚写实,如考梅尧臣咏河豚诗,考张继诗中夜半钟事等,多据实情,言颇可采。然书中引诗,亦间有陈腐及舛误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予指出。有《历代诗话续编》本、《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休斋诗话】 诗话著作。宋陈知柔撰。陈知柔(?—1184),字体仁,号休斋,温陵(今福建泉州)人。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历知循、贺州。《休斋诗话》五卷,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其佚文散见于《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书,然均不署撰者。罗根泽据以辑得八则;郭绍虞辑得九则,并据清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考得撰者姓名。郭绍虞又称:“休斋亦宋代儒者,故其论诗推崇陶、杜,而重气象,重野意,重识物理,粹然儒者之学,然不涉于拘泥,盖合道学与诗人而为一者。”(《宋诗话考》)有《宋诗话辑佚》本。

(刘德重)

【独醒杂志】 笔记著作。宋曾敏行撰。曾敏行(1118—1175),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字达臣,号独醒道人、浮云居士、归属老人。年甫二十,以病废,不能仕进,遂专意学问。与胡诤、杨万里、谢谔等友善。《独醒杂志》十卷,系其卒后由其子编成于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有杨万里序、谢谔跋,后赵汝愚、周必大、楼钥亦为之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书中亦记有不少诗人佚诗佚事及论诗之语。如记汪藻问徐俯:“作诗法门当如何人?”俯云:“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驰骤约束,能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可见徐俯诗论之一斑。惟书中所记亦间有谬误,颇疏于考证。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刘德重)

【老学庵笔记】 笔记著作。宋陆游撰。该书十卷,成书于淳熙、绍熙间(1174—1194)。又有《老学

庵续笔记》一卷(一作二卷)。书中“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严谨;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李慈铭《越漫堂读书记》)。日人黑琦璞斋与饭村岳麓曾辑集书中论诗之语单独刊行,题曰《放翁诗话》。其后日人近藤元粹又加以校补,改题为《老学庵诗话》,编入《萤雪轩丛书》。又,《宋史·艺文志》著录陆游有《山阴诗话》一卷,久佚,可能是宋人辑集的本子。然《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又著录《山阴诗话》一卷,题李兼撰,亦佚。“二书同名,不知即一书否?”(《宋诗话考》)陆游之诗论,并不全见于笔记,其书序题跋及诗作中,多有阐发。就《老学庵笔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看,约有数十则,亦颇可观。大抵以考较评鹭诗句为主,如称白居易、晏殊、王安石均有咏蝉“第一声”之句,“三用而愈工”;称王安石《别孙少述》诗句用颜延年《靖节征士诔》句意,而“青出于蓝”;称苏轼用王建《牡丹》诗句意,而“超然不同”;韩驹诗句取自刘禹锡、王安石而“比古句盖益工矣”。凡此,皆以学习前人而能出以新意、精益求精为贵。此类比较,虽亦涉及出处,但与江西诗派斤斤于“无一字无来历”者不同。如称“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并举《岳阳楼》诗,谓“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愈远矣。盖后人原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书中论诗,又多标举“气格”,赞许“爱君忧国之意”。唯称李白“识度甚浅”,“浅陋有索客之风”,失之偏颇。有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校点本。

(刘德重)

【老学庵诗话】 见“老学庵笔记”。

【放翁诗话】 见“老学庵笔记”。

【山阴诗话】 见“老学庵笔记”。

【诚斋诗话】 诗话著作。宋杨万里撰。该书一卷,七十二则。据书中谈及“景庐入翰林为学士”事,景庐即洪迈,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入为翰林学士,知书当成于此,系杨万里晚年之作。杨万里早年学江西体,后突破江西诗派藩篱,淳熙丁酉(1177)后已自成“诚斋体”。然该书论诗,仍多主江西诗说,可能采用一部分早年的旧稿。书中称:“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平生’二字出《论语》。‘身后’二字,晋张翰云:‘使我有身后名。’‘几两屐’,阮孚语。‘五车书’,庄子言惠施。此两句乃四处合来。……要诵诗之多,择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并一再标举“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这些,均属江西诗派的正宗路数,与后来杨万里所声

称的“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大相径庭。故该书不能全面代表杨万里的诗学见解。但书中也有一些见解似有意纠正江西诗派之偏者,一是要求“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这里将学习对象由江西诗派一贯推崇的杜(甫)、黄(庭坚)扩大为李(白)、杜、苏(轼)、黄,而且要求“深得其意味”,联系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所说“唐云李杜,宋言苏黄,……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来看,确有其折衷于李、杜、苏、黄的意思在内。二是强调诗“味”,于评诗时屡称:“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句雅淡而味深长”,“有无穷之味”,“意味深长,悠然无穷矣”。联系杨万里赞赏“晚唐异味”(《读笠泽丛书》诗),创制“诚斋体”来看,在这一点上,则上承钟嵘的“滋味”说、魏泰的“馀味”说,而对其后姜夔、严羽的诗论有所影响。另外,该书虽名曰诗话,但有将近一半篇幅谈论文、赋、四六等,可见其内容界定并不严格。书中对有些诗句所作的评述,亦未为定论。有《历代诗话续编》本、《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晦庵诗说】 诗话辑录。宋朱熹述,陈文蔚等录。该书“未见以前藏书家著录,虽题‘宋陈文蔚等录’,恐是后人据《朱子语类》纂辑为之者,未必是陈文蔚等辑录刊行也”(郭绍虞《宋诗话考》)。全书一卷,七十六则,多数注有记录者名,当为朱熹弟子。书中所表现的诗学见解,一是认为诗“不用多作”,多作“无益”;二是认为要作诗必须先“讲义理”,“心虚理明”;三是认为作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浑成”,“平淡出于自然”;四是认为作诗应学六朝和李、杜,而于杜应学“夔州以前诗”,晚年诗“不可学”;五是认为“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馀意,黄费安排”,颇有微词;六是认为作诗不必有出处,“关关雎鸠,出在何处”,又称“好用经语,亦一病”。此外,还涉及对一些诗句字词的考释。有《谈艺珠丛》本。

(刘德重)

【清邃阁论诗】 诗话辑录。宋朱熹述,清朱玉辑。朱玉,朱熹十六世孙,编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清邃阁论诗》即其中之一。该书一卷,四十则,除论梅圣俞一则外,其他全见于《晦庵说诗》,编排次序除少数外亦大致相同,惟《晦庵说诗》各条下多注有记录者名,本书删去,且有数则文字间有删节。其诗学见解参见《晦庵诗说》条。

(刘德重)

【白石道人诗说】 诗话著作。宋姜夔撰。该书亦称《白石诗说》、《姜氏诗说》,一卷,三十则,一作二十七则。卷前有《自序》,称该书系淳熙丙午(1186)得之于南岳云密峰头一老翁,此可推知其成书当在淳

熙内午之后。书中不涉记事、考证,也不评析具体诗作,全谈诗学理论及诗法。其与江西诗派不同处在于:江西诗派多拘于诗法,唯求字面形式之“工”;姜夔谈诗法却不为法所拘,并认为“只求工于句、字,亦未矣”,进而提出了比“工”更高的境界,即“妙”。“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妙”固然离不开字面形式,但“妙”处又往往在字面形式之外,需要“悟”而后得。此所谓“悟”,亦非“悟”其“工”,而是“悟”其“妙”。书中还称引苏轼的话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认为语贵含蓄,“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前者即所谓“工”,后者即所谓“妙”。“妙”是姜夔诗说的核心。由此出发,书中还提出了诗有“四种高妙”说:“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即看似于事理不通,须细辨而愈觉其通,这是表达事理的高妙;“出自意外”,是立意的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是指构思、想象的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归之于平淡自然,了然无迹,使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这才是“妙”的最高境界,即“自然高妙”。这种“自然高妙”说,显然与主张模仿点化、讲究诗法格律的江西诗说不同。此外,书中还特别强调要重视诗歌的结尾,指出有四种结尾:一是“词意俱尽”,二是“意尽词不尽”,三是“词尽意不尽”,四是“词意俱不尽”。“所谓词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语,非谓词穷理尽者也。所谓意尽词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处,则词可以不尽矣,非以长语益之者也。至如词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词中已仿佛可见矣。词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实际上,不论哪一种结尾,都要求含蓄有馀,耐人寻味。姜夔关于诗歌结尾的意见,为前人所未曾道及,并常为后人所称引。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对其后严羽的“兴趣”说、“妙悟”说以及清代的“神韵”说有一定影响。有《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刘德重)

【白石诗说】见“白石道人诗说”。

【姜氏诗说】见“白石道人诗说”。

【清波杂志】笔记著作。宋周焯撰。周焯(1126—1198后),字昭礼,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祖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孝宗淳熙三年(1176),曾为使金随员。晚居钱塘清波门。《清波杂志》十二卷,有光宗绍熙壬子(1192)自序及次年张贵谟序,书当成于此时。又有《清波别志》三卷,为其续集,有绍

熙甲寅(1194)自序。该书所记皆宋代朝野杂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缺遗者”(张序)。书中间记诗人佚诗佚事,如记鄱阳重湖寺有苏轼佚诗,押二韵,以为“诗格不一”,“不必拘也”。又记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谓:“一时品第,尚尔纷纷,矧随好恶,笔削篇章,示己鉴裁之明,岂免议论?”其辨《韵语阳秋》引苏轼诗句误作杜甫,亦颇审慎。有《笔记小说大观》本。(刘德重)

【梁溪漫志】笔记著作。宋费衎撰。费衎,字补之,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南宋宁宗开禧(1205—1207)间,为国子监免解进士。《梁溪漫志》十卷,书前有绍熙三年(1192)自序,其成书当在此前。当时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于此书曾有所资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惟首二卷及第三卷首‘入阁’一条,言朝廷典故。自‘元祐党人’一条以下,则多说杂事。而卷末‘王鞏’一条及第四卷,则全述苏轼事。五卷以下多考证史传,品定诗文。末卷乃颇涉神怪。盖杂家者流,不尽为史事作也。”书中亦多有论诗之语。其论诗称:“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又引苏轼《观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称:“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可见其重学识,重本色,重自然,重神似,亦重用字、押韵等技巧,但强调技巧亦自学识中来。其考辨纠谬,颇见根柢,虽不无小疵,然多可取。卷四述苏轼事,亦足资参考。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刘德重)

【徐师录】诗文评汇编。宋王正德辑。王正德,南宋光宗时(1190—1194)人,生平事迹不详。《徐师录》有绍熙四年(1193)自序,其成书当在此时。原书久佚,今本系辑自《永乐大典》,定为四卷。该书辑录前人论诗论文之语,自北齐以迄于宋,但排列先后,并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录“虽习见者较多,而当时遗籍今不尽传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论文,多区分门户,务为溢美、溢恶之辞。是录采集众说,不参论断,而去取之间,颇为不苟,尤足尚也。征引时有小误,盖传写之讹”。有《守山阁丛书》本。(刘德重)

【吟窗杂录】诗论著作。旧题宋蔡传、陈应行编撰。蔡传(1066—1126前),字永翁,仙游(今属福建)人,蔡襄孙。从小志在学古务实,不游场屋。历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致仕。著述颇多,有《城南诗集》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著录《吟窗杂录》三十卷,云:“莆田蔡傳(当为‘傳’字)撰,君谔之孙也。取诸家诗格、诗评之类集成之。又为《吟谱》,凡魏、晋以下能诗之人,皆略具其本末,总为

此书。”其书当作于北宋末。至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陈应行重编。陈应行,字永康,号浩然子。今本既称“状元陈应行”,又称“陈学士”,但以此书内容来看,编者识见低劣,可知其必非状元,尤非学士。陈应行《吟窗杂录序》自谓:“余于暇日,編集魏文帝以来至于渡江以前,凡诗人作为格式纲领以淑诸人者,上下数千载间,亲手校正,聚为五十卷。牘分麟次,具有条理,目曰《吟窗杂录》。”可知此书原为三十卷,乃蔡传所编,陈应行增编为五十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杂句图》下云:“自《魏文帝诗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见《吟窗杂录》。”以今本核对,则知今本已经陈应行增删重编,如钟嵘《诗品》、李商隐《梁词人丽句》均不见于二十七家中,又神或《诗格》亦易名为文或《诗格》,而句图类著作均在卷三五至三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不录陈应行之名,如果不是所见为蔡氏原编本,那就是一删节本。陈氏于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通判,任职莆田,则对于蔡传之书必能详知,因此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此书聚集了大量唐五代以来的诗格、句图著作,尽管其中真伪纷杂,但是多出于北宋之前,因而仍然值得重视。有明嘉靖刻本,又有日本文政九年(1861)据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四十年刊本覆刻之《官版吟窗杂录》。

(张伯伟)

【历代吟谱】诗论著作。宋蔡传撰。《历代吟谱》著于北宋末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载蔡氏《吟窗杂录》三十卷,不列《历代吟谱》,但云:“又为《吟谱》,凡魏晋以下能诗之人,皆略具其本末,总为此书。”则此书原本在《吟窗杂录》中,卷数未详。今本《吟窗杂录》自卷一九至二九题曰《历代吟谱》,共十一卷。而《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之《历代吟谱》,乃有二十卷之多。至《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历代吟谱》,又仅有五卷,据其《提要》录厉鹗跋云:“其叙次当以汉迄唐为第一卷,宋为第二卷,名僧为第三卷,闺秀为第四卷,武人为第五卷。”以《吟窗杂录》本核之,显然是后人从《吟窗杂录》卷二九至三四之古今才妇、古今诗僧、古今武夫中辑出。至于顾龙振编《诗学指南》,亦有《历代吟谱》,篇幅不足一卷,题名也变为“浩然子陈应行编”。此书辑入自汉至北宋诗人生平及作品,其体例与《唐诗纪事》相仿,虽无理论上的发明,但辑录古今诗人佚事趣闻,亦颇资谈助。有《吟窗杂录》本、《诗学指南》本。(张伯伟)

【续句图】句图著作。宋陈应行撰。陈应行,见“吟窗杂录”条。其《吟窗杂录序》作于绍熙五年(1194),但《续句图》又引及严羽之诗,羽约卒于淳祐五年(1245),如果此书非出于后人增补,则陈氏得寿甚长。《吟窗杂录》卷三五至三七,卷四二至四四,专

录句图和续句图著作。可考者有真宗《御选句图》、《贾岛诗句图》等。此本完全抄录《吟窗杂录》中句图类书,又增加欧阳修七联,王安石八联,苏轼十三联,黄庭坚八联,范成大十五联,陆游十七联,杨万里一联,严羽四联。有《诗学指南》本。(张伯伟)

【陈日华诗话】诗话著作。宋陈日华撰。陈日华,名或作焯,字日华,福州人。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为淳安令,宁宗庆元四年(1198)前后知汀州。与姜夔相识。另撰有《谈谐》。《陈日华诗话》一卷,以记事为主,所记“多猥鄙诙谐之作,颇乖大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提要》)。据洪迈《夷坚三志》载,陈日华还编有《善谑诗词》,郭绍虞疑与诗话“殆即一书”,或“于《善谑诗词》中取其较严正者录入诗话,而其尤猥杂者则编入《谈谐》。要之诗话中之沦为说部者,当以此书为最甚矣”(《宋诗话考》)。然书中亦多称引朱熹之语,又记黄庭坚教人学诗先读经,记宋祁语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则所记亦非无可取者。有天一阁藏蓝丝栏抄本。(刘德重)

【萤雪丛说】笔记著作。宋俞成撰。俞成,字元德,东阳(今属浙江)人。该书二卷,五十九则,前有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自序,书当成于此时。自序称:“余自四十以后,便不出应举”,“优游黄卷,考究诗论,付之书记。囊萤映雪,无所不为。尘积日久,遂成一篇,目为《萤雪丛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书多言揣摩科举之学,而谆谆于假对之法,以为工巧,论皆迂鄙”。书中论卢仝《茶歌》称:“上不忘君”,“下不忘民”,“此乃尽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论“活法”称:“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论学习古人称:“大凡玩古人糟粕,须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读书,又要熟读”。可见其大抵本儒家诗教及江西诗法之说。有《儒学警悟》本、《百川学海》本。(刘德重)

【容斋随笔】笔记著作。宋洪迈撰。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举博学宏词科。历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出知赣州、婺州,召入史馆,预修《四朝国史》。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为翰林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学问渊博,与兄洪适、洪遵俱有文名,时号“三洪”。著有《野处类稿》、《夷坚志》等,编有《万首唐人绝句》等。《容斋随笔》系其读书札记,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集,前四笔各十六卷,末集未成而逝,仅十卷,合共七十四卷,亦合称《容斋

五笔》。前后历时四十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尤熟于宋代掌故”,虽不无小误,“然其大致,自为精博。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书中以考证史实、典制,记述佚闻、掌故为主,兼及评诗论文。其中论诗之语,又曾被辑为《容斋诗话》六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刘德重)

【容斋诗话】诗话辑集。宋洪迈撰,佚名辑。该书六卷,系辑自洪迈《容斋随笔》中论诗之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编诸家书目皆不载其名,惟文渊阁书目有之。《永乐大典》亦于‘诗’字韵下全部收入。则自宋元以来已有此编。”书中论诗重“余味”,主张学古人而能“别出机杼”。有《学海类编》本。

(刘德重)

【野客丛书】笔记著作。宋王楙撰。王楙(1151—1213),字勉夫,祖籍福州福清(今属福建),曾祖时徙居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后遂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孤,刻苦问学,一试不第,乃侍母不仕,杜门著述,时人称为“讲书君”。《野客丛书》三十卷,据书前自序及自记,知其成于宁宗庆元元年(1195),改定于嘉泰二年(120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皆考证典籍异同”,“其间引据既繁,亦不免小有疏舛”,然“多考辨精核,位置于《梦溪笔谈》、《绀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书中亦多论诗之语。其论诗以考证为主,如考五言诗、拗句格、药名诗、鸟名诗及重押韵等诗体、诗格,必求其最早出处;考“乌鬼”、“崖蜜”等词语,则罗列诸说,断以己意;考夺胎换骨,损益或袭用前人诗句、诗意,考诗人用事之误等,亦多言之有据。有《笔记小说大观》本。

(刘德重)

【二老堂诗话】诗话著作。宋周必大撰。该书一卷,或作二卷,均为四十六则。著于周必大晚年,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至嘉泰四年(1204)间,原载其《平园集》中,系后人抄出别行而单独成书。书中以考证为主,每则均有小标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必大学问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论多主于考证。”实则主于考证也反映了当时诗学的风气。书中如引所见古本辨刘禹锡《淮阴行》“无奈脱菜时”之“脱菜”为“挑菜”之误;引苻坚使熊邈造金银细铠事和蔡琰“金甲耀日光”句,解杜甫诗“雨抛金锁甲”,辨周紫芝《竹坡诗话》所谓“不知金锁是何物”之疏失等等,“皆极精审”,“非学有本原者不能作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书中考证也有可议之处,如“辨‘缥渺字’一条,知引苏轼诗,而不知出王延寿《灵光赋》”,辨“一麾江海”一条,知不本颜延之诗,而不知

出于崔豹《古今注》,是皆援据偶疏者”(同上)。又如曾纮尝引《山海经》证陶渊明诗“形夭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之传说,言颇成理,而该书却曲为辨说,未免偏执。有《历代诗话》本、《津逮秘书》本。

(刘德重)

【杜工部草堂诗话】诗话汇编。宋蔡梦弼编撰。蔡梦弼,建安(治今福建建瓯)人。南宋宁宗嘉泰中(1201—1204)编《杜工部草堂诗话》四十卷,《补遗》十卷。《杜工部草堂诗话》二卷,亦称《草堂诗话》,原附刻于《杜工部草堂诗笺》之后,其成书当亦同时。卷首标明“名儒嘉话凡二百余条”,但《历代诗话续编》本实际不足一百则。该书专辑宋人诗话、语录、文集、说部中论杜诗之语,所取以《韵语阳秋》为多;又仿《苕溪渔隐丛话》之例,“间附辨证之语”(《宋诗话考》)。如释杜诗“家家养乌鬼”之“乌鬼”,引《梦溪笔谈》、《蔡宽夫诗话》、《冷斋夜话》、《湘素杂记》、《诗辞事略》诸说而断以己意,认为“乌鬼”即“事乌为神,所谓神鸦也”。但诸如此类的按语或考证甚少,全书总共只有数条。而该书辑录各家诗话、诗评,颇为精审,故多为后人称引。清初钱谦益编《杜集诸家诗话》,大部分即本自该书,所增仅二十条而已,可见蔡梦弼搜辑之详赡。有《古逸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草堂诗话】见“杜工部草堂诗话”。

【芥隐笔记】笔记著作。宋龚颐正撰。龚颐正,原名惇颐,避光宗讳改,字养正,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宁宗嘉泰(1201—1204)间曾为秘书丞、实录院检讨官,预修孝宗、光宗实录。《芥隐笔记》一卷,一百三十六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考证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谬处亦时有之”。书中论诗亦以考释诗人用字、用句、用事来历出处为主,如称:“谢灵运有‘云中辨烟树,天际识归舟’;王僧孺有‘岸际树难辨,云中鸟易识’;梁元帝有‘远树云里出,遥船天际归’;阴铿诗有‘天际晚帆孤’,‘天边看远树’,‘大江浪犹静’;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犹涌,云中辨烟树’。”可资比较研究。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刘德重)

【履斋诗说】诗话辑集。宋孙奕撰,日人近藤元粹辑。孙奕,字季昭,号履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所撰笔记《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成于宁宗开禧元年(1205),其中卷九后半部分和卷一〇为诗说。《履斋诗说》即从其中辑出,一卷,四十四则。标题有“假对”、“偏枯对”、“双字”、“倒用字”、“类前人句”、“出奇”、“屡用字”、“炼字”、“属对不拘”等,所论多为用字、造语、对仗等修辞技巧问题。其特点是大量列举杜甫等人诗句作为范例,如论炼字称“诗人嘲弄万

象,每句必须炼字,子美工巧尤多”,下即举杜诗三十八例,分述“炼得句首字好”、“炼得第二字好”、“炼得句腰字好”、“炼得句尾字好”、“炼得五言全句好”、“炼得七言全句好”等不同情形。又如称晁补之《行路难》、黄庭坚《送王郎》句法出自顾况《金钗玉佩歌》,谓“晁、黄得夺胎换骨之活法于此者”。可见其诗学倾向大抵偏主于江西诗派。唯举例罗列过多,颇嫌繁冗,间亦失之拘泥。有《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云麓漫钞】笔记著作。宋赵彦卫撰。赵彦卫,宋宗室后裔,赵廷美七世孙。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光宗绍熙(1190—1194)间知湖州乌程县,宁宗庆元二年(1196)通判台州,后以罪罢官。嘉泰二年(1202)知随州,献媚韩侂胄,奏请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私史。开禧二年(1206)知徽州。《云麓漫钞》初名《拥炉闲纪》,十卷,刊于汉东学宫。后增五卷,开禧二年与前十卷并刻于徽州,改今名。后又增五卷,不知刻于何处。故《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皆作二十卷。今二十卷本已佚,仅存十五卷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可见其长于名物辨析。涉及诗中之名物,如《诗经·晨风》中之“六驳”,《离骚》中之“筵筵”,李白诗中之“压酒”,杜甫诗中之“赤羽”,梅尧臣、苏轼诗中之河豚,黄庭坚诗中之腊梅等,多有考辨,可资参考。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刘德重)

【漫斋语录】笔记或诗话著作。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其成书当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后,南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前。佚文散见于《诗人玉屑》、《竹庄诗话》、《修辞鉴衡》等书。据现存佚文,该书似以论评为主。其诗学见解,主张“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认为“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幾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又多谈句法、句眼、炼字,强调学古人而能“自得”。又称:“大率诗语出入经史,自然有力,然须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机杼风骨先立,然后使得经史中全语作一体也”。凡此,皆似以江西诗法教人作诗者。

(刘德重)

【苍梧杂志】笔记或诗话著作。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惟《竹庄诗话》录存其佚文五则。其论诗称引苏轼语,谓当以“意”摄“词藻事实”,又谓“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

(刘德重)

【笔墨闲录】笔记或诗话著作。宋佚名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惟《竹庄诗话》录

存其佚文九则,三则评韩愈诗,六则评柳宗元诗。

(刘德重)

【师氏诗说】诗话著作。撰者姓师氏,生平无考。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竹庄诗话》录存三则,分别说杜诗《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内称“此甫几乎风雅之作也”,“观甫诗,时政之美恶,皆可得而知也”。又,《竹庄诗话》卷六称引有《师先生诗注》一则,说杜诗《孤雁》;《诗林广记》前集卷二称引有“师厚”、“师民瞻”者,说杜诗《缚鸡行》二则,疑师厚、师民瞻即师氏其人。

(刘德重)

【竹庄诗话】诗话与诗歌汇编。宋何汶撰。何汶,《宋史·艺文志》作何谿汶,号竹庄居士,南宋中叶处州(治今浙江丽水)人。任新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教授。《竹庄诗话》又称《竹庄备全诗话》,编成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宋元人著录为二十七卷,今传本二十四卷,“其数少异,或传写佚其三卷,或后人有所合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元方回所见二十七卷本,“第一卷载诸家诗话议论”(《桐江集》卷七《竹庄备全诗话考》),与今本第一卷同;“第二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同上),与今本第二十三、二十四卷同。则其散佚或合并者当在中间部分。该书兼收诗话与诗作,目的在于以诗作与诗话相印证,故只收有“话”之诗。在编排上,该书开创了一种新体例。书中卷一分“讲论”、“品题”两部分,“讲论”汇集各家带有总论性质的诗话,“品题”汇集各家有关诗人评论的诗话,共五十餘则,偏重于谈论诗法、格调。卷二至卷一〇为诗话与相关诗歌的合编,按时代、作家排列,诗话在前,诗歌在后。其中两汉、建安诗一卷,六代诗两卷,唐诗四卷(只收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家)、宋诗两卷(只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四家)。卷一一至卷二〇为“杂编”,不按时代、作家排列,而根据所收诗话或诗评,将其中提及的作品辑录其后。如卷一一所收《倦游录》中的一段话提到杜牧、陈文惠、张文定、杨正伦的华清宫诗和郑嵎的《津阳门》诗,以下便将这此诗编排在一起。但这并非按题材分类,如另外还有张祜、杜裳、崔櫓三首华清宫诗,则散见于卷一三、一四、一五中,分别系于有关诗话之后。又如卷一二收范温《潜溪诗眼》中一段话:“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为《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以下便将杜甫《北征》诗、韩愈《南山》诗全文录出,以便对照参看。卷二一、二二专收有关“方外”、“空门”、“闺秀”三类诗人的诗话和诗作,也

以诗系于“话”。以上共收诗八百七十四首。最后两卷专门收录警句和评论警句的诗话,则警句在前,诗话在后。总之,全书着眼于诗话与诗作的联系比照,既有利于加深对诗作的理解,也可考究诗话评论的得失。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使观者即其所评与原诗互相考证,可以见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见论者之是非。视他家诗话但拈一句一联而不睹其诗之首尾,或浑称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语云何者,固为胜之。”书中还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所引《五经诗事》、《欧公馀话》、《洪驹父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笔墨闲录》等,后来均已散佚,赖此书保存了一部分。书中所录之诗和所辑之文,有些属于佚诗、佚文,有些与今传本不同,也有资于考校。书中有个别引文重复、混淆,有些诗歌所标作者有误。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刘德重)

【竹庄备全诗话】 见“竹庄诗话”。

【仕学规范】 笔记著作。宋张鎰撰。张鎰(1153—?),字功甫,一字时可,号约斋,西秦(在今甘肃)人,居临安。官奉议郎,直秘阁。有《南湖集》。《仕学规范》凡四十卷,后四卷论诗文。其自序谓:“寤寐前哲,采摭旧闻,凡言动举措粹然中道,可按为法程者,悉派分鳞次,萃为矩编,以便省览。”可知此书均采摭旧文而成。由于其征引原文,各著出典,因而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文献。如其引用《吴子聿诗话》、《李希声诗话》、《陈辅之诗话》、《分门诗话》、《古今总类诗话》等均多散佚,可资辑佚。又有《诗学规范》一卷,乃明人胡文焕自《仕学规范》中辑出者,刊于《诗法统宗》之中,其内容视郭绍虞辑《诗学规范》更加丰富。故此书有《诗法统宗》和《宋诗话辑佚》二本。

(张伯伟)

【诗学规范】 见“仕学规范”。

【选诗句图】 句图著作。宋高似孙撰。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浙江馀姚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历官校书郎,出倅徽州,迁守处州。《选诗句图》,又称《文选句图》,一卷,成于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高氏自序云:“杜公训儿熟精选理,儿岂能熟,公自熟耳。蚤参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袭晋,齐沿宋,凡兹诸人,互相宪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为图诂,略表所以宪述者,法精且秘,吾其杜矣。”其所选诗,均取一联,与唐末、宋初句图类似。而高氏又往往于所选诗句下列举其他相似之诗句,如李陵“远望悲风起,对酒不能酬”下注云:“刘休玄诗:‘日夕凉风起,对酒长相思。’”又在“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下注云:“苏武诗:‘愿君以令德,随时景爱光。’”以证明其“宋

袭晋,齐沿宋,凡兹诸人,互相宪述”的观点。此可谓高氏体例独创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其句下附录之句,盖即钟嵘《诗品》源出某某之意”。大致如此,但其句下亦偶有录自赋或其他著作者,亦有引用字书释义者,不可一概而论。有《百川学海》本、《诗学指南》本。

(张伯伟)

【文选句图】 见“选诗句图”。

【剡溪诗话】 诗话著作。旧题宋高似孙撰。《剡溪诗话》不见宋人著录或称引。《铁琴铜剑楼书目》诗文评类载之,并录俞弁跋语云:“愚意此书似非似孙所著,观其笔意,与《纬略》不同,姑书此以俟博洽者辨之。”此书所录,皆古代有关剡溪故事,以及相关诗句。郭绍虞《宋诗话考》疑“此为从《剡录》辑出别行之本。”惟《剡录》收于《四库全书》中,其中并无今本《剡溪诗话》之内容。故疑此书乃后人伪托,假高氏名而成。冯惟讷《诗纪别集》卷四曾称引此书,则此书之伪撰可能是明代。有抄本。

(张伯伟)

【习学记言序目】 笔记著作。宋叶适撰。该书亦称《习学记言》,为其读书札记,成书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全书五十卷,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故陈振孙《书录题解》谓‘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亦颇有论诗之语。其诗学见解,核心是重“道”。如称:“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即要以有形有限之“物”(形象)体现无形无限之“道”(思想)。其评诗称:陶渊明诗“当于义”,“自沈约以后”则“穷巧极妙而无当于义理之毫芒”。其论诗之作用称:诗“与国之废兴相关”,“夫所恶于轻靡之文者,谓其不足以致治也”。其论诗之“六义”称:“《周官》教六诗,不言诗有六义;主文谏諝,盖后人颠倒其说”;认为“(白)居易专以讽为主,固已失之”。则不赞成讽刺时政,而主张“哀而不伤,放而不怨”。有中华书局校点本。

(刘德重)

【习学记言】 见“习学记言序目”。

【臞翁诗评】 诗评著作。宋敖陶孙撰。敖陶孙(1154—1227),字器之,号臞翁,一作臞庵,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光宗绍熙末为太学生,朱熹被贬,以诗送行。赵汝愚贬死,又以诗相吊,大忤韩侂胄,遂变姓名逃归闽地。后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历漳州教授、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仕终泉州通判。与刘克庄相交往,属“江湖派”诗人。有《臞翁诗集》。《臞翁诗评》原附于诗集卷末,或称为《敖器之诗话》,实为评古今诸人诗之一段文字,其略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

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所评魏晋南北朝诗人五家,唐代诗人十五家,宋代诗人九家,计二十九家,均以比喻手法,描绘出一种境界,以象征各家诗作风格。篇末云:“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可见其于杜甫尤为推崇。诗评之体,系诗话著作中之别体,敖陶孙之前,已有《芸叟诗评》、《蔡百衲诗评》诸作,然“宋时作诗评者虽众,而惟陶孙所著独擅盛名,由其鉴裁既精,语亦俊妙”(《宋诗话考》),故多为人称引。影响所及,至明清诗话中仍具此一格。有《臞翁诗集》本、《说郛》本。

(刘德重)

【敖器之诗话】 见“臞翁诗评”。

【耆旧续闻】 笔记著作。宋陈鹄撰。陈鹄,字西塘,南阳人。南宋孝宗淳熙至宁宗嘉定(1174—1224)间在世。嘉定八年(1215)曾为滁州教官。《耆旧续闻》十卷,一本题“南阳陈鹄录正”,然诸家称引,均以其为撰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后名人言行,捃拾颇多,间或于条下夹注书名及所说人名字,盖亦杂采而成”。“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于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其论诗“以合律为工”,称赏“用字皆有来处”及“语意浑成,全不觉用事”。其他记事、考据,虽间伤猥杂,然亦有可资参考者。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刘德重)

【云谷杂记】 笔记著作。宋张昞撰。张昞,字清源,号云谷,婺州武义(今属浙江)人。宁宗庆元初预乡试,旋以荫补官。累至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守太社令致仕。以卜居绍兴,遂继施宿所撰《嘉泰会稽志》为《宝庆会稽续志》。另著有《艮岳记》。《云谷杂记》四卷,补编二卷。原书久佚,今存《四库全书》本系辑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不载。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其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得一百十条,……谨以类排次,析为四卷。”又称:“宋人说部纷繁,大都摭拾琐屑,侈谈神怪。惟昞此书,专为考据之学,……折中精审,厘订详明,于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纠其缪。”书中论诗亦以考释为主,如辨三句为韵不始自元结《唐中兴颂》,“盖效秦《泰山》、《会稽》等颂耳”;辨《石鼎联句》作者非韩愈,轩辕弥明“为一道士,又何疑焉”;释杜诗“空留玉帐术”之“玉帐”“乃兵家厌胜之方位,谓主将于其方置军帐,则坚不可犯,犹玉帐然。其法出于《黄帝遁甲》”,并举李白诗“身居玉帐临河魁”证之。凡此,皆持之有据,可备一说。有中华书局排印本。(刘德重)

【沧浪诗话】 诗话著作。宋严羽撰。该书约成于南宋理宗绍定(1228—1233)以前,至少亦成于淳祐

(1241—1252)以前,约初刻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全书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诗辨》阐发诗学理论,《诗体》阐述诗歌体制,《诗法》阐说作诗法则,《诗评》品评诗人诗作,《考证》辨订作品文字及作者等。书末附有《答吴景仙书》,对其论诗宗旨加以补充说明。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明确宣称,该书批判锋芒是针对江西诗病的:“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其理论特色是“以禅喻诗”。其诗歌理论体系,大致有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是“识”;第二是“悟”和“妙悟”;第三是“兴趣”。首先是由“识”入手:“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识”是指辨识鉴别诗歌体制风格及其高低优劣的眼光和能力。严羽认为,宋诗自王禹偁学白居易、西昆体学李商隐、欧阳修学韩愈、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至苏、黄“自出己意以为诗”,形成“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都走错了路;“四灵”、江湖诗人“独喜贾岛、姚合之诗”,更堕入旁门左道。而根据他对历代诗歌的辨识,认为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唐诗“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而唐诗中又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之分。只有汉、魏、晋、盛唐之诗,才是“大乘禅”、“正法眼”、“第一义”,才是“正路”。因此他主张“取法乎上”,即“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即所谓“师法盛唐”说。其次是如何师法的问题。严羽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别趣”是不能靠“读书”、“穷理”得到的,而需要靠“悟”和“妙悟”,通过“熟参”前人的作品,“朝夕讽咏”,“枕籍观之”,“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严羽强调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所谓“当行”、“本色”,即指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所“悟”的结果又会“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种种区别。惟有从“第一义”悟入,达到“透彻之悟”,才能进入诗歌创作的最佳境界。其三,是建筑在“识”和“悟”基础之上的“兴趣”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把“兴”、“趣”结合起来,即要求诗人将自己的丰富的情感意趣不着痕迹地融入鲜明、饱满的形象画面之中,造成一种含蓄深蕴、余味隽永、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使读者透过这种形象画面和艺术境界

去领略、玩味、品赏其中所蕴含的无穷意趣,从而收到一种最佳的审美效果。“兴趣”说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但并不是严羽对诗歌艺术的唯一要求,他还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论述了诗歌的各种要素和各种表现,如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总之,《沧浪诗话》在总结唐诗和宋诗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诗歌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律问题,比前人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更为系统的阐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沧浪诗话》对后代诗歌理论的影响很大。整个明代,它俨然被奉为诗学的权威著作。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的“四唐”说、前后七子的“格调”说和“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主张,到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都受到它深刻的影响。有《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释本。(刘德重)

【诗人玉屑】 诗话汇编。宋魏庆之编撰。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建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诗人玉屑》有黄昇淳祐甲辰(1244)序,书亦当成于此。所传版本甚多,旧通行本为二十卷,今版据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印行的校勘本为二十一卷。与《苕溪渔隐丛话》比较,该书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从所收材料的时限来看,该书以辑录南宋各家诗话为主,对于以辑录北宋诗话为主的《苕溪渔隐丛话》具有续补的意义。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胡)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按:当为理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第二,从所收材料的性质来看,该书所辑内容大都着眼于阐发诗学见解,不及琐事,也不作考证,虽然在篇幅上不及《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那样浩繁,但能“博观约取”,“尽择其精而录之”(黄昇序),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第三,从编排的形式体制来看,该书兼取《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之长,而体制更趋精严。其卷一至卷一一专收诗学理论,意在指示作诗门径,共分为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句法、口诀、初学蹊径、命意、造语、用事、押韵等四十门。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卷六命意门,下列总说、以意为主、先意义后文词、古诗之意、晦庵论诗有两重、有浑然意思、诚斋论句外之意、陵阳谓须先命意、思而得之、不带声色、意在言

外、有不尽之意等二十五目,排列大致有序。卷一二以后按时代评论古今诗人诗作,意在提供创作的规范,共分为六十餘门。其中有综合性的评论,如品藻古今人物门;有对某一种诗体的评论,如古诗门、律诗门;有对某一时代诗歌的评论,如两汉门、建安门;有对某一具体诗人的评论,如自陶渊明、李白、杜甫至南宋中兴诸贤以及禅林、方外、闺秀、灵异等门;最后附有诗馀和中兴词话两门(二十卷本无中兴词话门)。由于门目分得过多,分类标准也难以统一,未免有细碎之嫌。第四,再从汇编者的诗学见解来看,该书全系辑录前人论诗之语,自己并不直接发表意见,其所收则不专主一家一派,凡关系诗学理论者,大抵兼收并蓄。而首列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四门,几乎将《沧浪诗话》悉数收入,可见其于严羽诗论颇为推许。书中对朱熹、杨万里的诗论辑录较多,还收有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风骚句法等大量标句之作,却没有收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未免去取失当。不过这也可能跟张戒论诗重思想内容而魏庆之辑话多着眼于艺术探讨有关。据韦居安《梅涧诗话》说:“魏醇父(甫)所著《诗人玉屑》,编类精密,诸公多称之。”可知该书于宋元时已颇为流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宋代几部诗话汇编说:“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诗人玉屑》历来与《苕溪渔隐丛话》齐名,在宋代的诗话汇编中,也以这两部书价值最高、影响最大。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校勘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修订本。(刘德重)

【玉林诗话】 诗话著作。宋黄昇撰。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福州闽(今福建福州)人。不事科举,性喜吟咏。与魏庆之为友,同隐于乡里,相互酬唱。以诗受知于游九功。亦有词名。编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各十卷,合为《花庵词选》;著有《散花庵词》。《玉林诗话》亦称《玉林中兴诗话补遗》,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考《诗人玉屑》有黄昇淳祐甲辰(1244)序,又对该书多所称引,知该书必成于淳祐甲辰之前。罗根泽据《诗人玉屑》辑得佚文三十三则,据《诗林广记》辑得五则;郭绍虞亦据以辑得二十九则(其中有数则合并为一则者)。书中论诗,多标举沿用或点化前人诗句而又能自出新意者,力辨其与蹈袭之别,称:“盖读唐诗既多,下笔自然相似,非蹈袭也。其间又有青于蓝者,识者自能辨之。”并称改动数字,即“精神顿异,真如光弼入子仪军矣”。此仍沿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有《宋诗

话辑佚》本。(刘德重)

【玉林中兴诗话补遗】 见“玉林诗话”。

【娱书堂诗话】 诗话著作。宋赵与峕撰。赵与峕,字威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宋太祖十世孙。约生活于南宋宁宗(1192—1224)以后。该书又称《赵威伯诗话》、《赵威伯诗余话》,或简称《余话》,各家著录或云十卷,或云四卷,今传本二卷,六十九则。考《诗人玉屑》、《诗林广记》所引,多为今本所无,知非足本。书中内容,以记佚诗佚事为主,偶及诗法与考证。其诗学渊源出自江西诗派而兼涉江湖诗派,多称引陆游、杨万里及赵师秀之作,论诗见解平平,评语多为“善于形容”、“形容甚工”之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大抵皆凡近之语,评品殊为未当”;然所记诗事及名章佳句,则不无可观,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其“颇足以资闻见,失于芜杂则有之,要其精华不可弃也”。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赵威伯诗话】 见“娱书堂诗话”。

【赵威伯诗余话】 见“娱书堂诗话”。

【贵耳集】 笔记著作。宋张端义撰。张端义(1179—?),字正夫,号荃翁,郑州(今属河南)人,居吴县(今江苏苏州)。理宗端平(1234—1236)中应诏连上三书,以直言安置韶州。《贵耳集》凡三集,每集一卷,各有自序。初集成于淳祐元年(1241),二集成于淳祐四年,三集成于淳祐八年。其初集序称:“生平接诸老绪余,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后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又称:“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书中论诗,主张“作诗有句法,意连句圆”。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刘德重)

【林下偶谈】 诗文评著作。宋吴子良撰。吴子良(1197—1256后),字明辅,号荆溪,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官至湖南运使、太府少卿,宝祐四年(1256)以忤宰相史嵩之罢职,寻卒。幼从陈耆卿学,又曾登叶适之门。有《荆溪集》,已佚。《林下偶谈》,或冠以号称《荆溪林下偶谈》,四卷,内容以谈诗论文为主,兼及考释、记事。后人又专辑其中论诗之语单行,题作《吴氏诗话》,二卷。书中多称引叶适之语,“推重叶适,不一而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将叶适与杜甫相提并论,甚至凌

驾其上,反映了南宋后期理学家的论诗意见。同时,吴子良对出于叶适门下的“四灵”又深致不满,引叶适《徐道晖墓志》、《王木叔诗序》、《刘潜夫诗卷跋》诸语,以证叶适晚年于“四灵”“亦终不满”,并进而指出:“近世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其论诗又赞赏“意含蓄而语不费”的艺术表现和“摹想无穷之趣如在目前”的艺术境地,反映了他对诗歌在艺术方面的要求。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

(刘德重)

【荆溪林下偶谈】 见“林下偶谈”。

【吴氏诗话】 见“林下偶谈”。

【深雪偶谈】 诗话著作。宋方岳撰。方岳,字元善,号躬田,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宋末隐居不仕,以诗名。有《躬田集》,吴子良为之序,今集与序均佚。《深雪偶谈》或误作《深雪斋偶谈》,一卷,今传本仅十六则(或误合为十五、十四则),已非全貌。其中记有度宗咸淳二年(1266)事,则成书当在其后。就今传各条看,皆评论诗词之语。其论诗主性情,谓“诗无不本于性情,自诗之体随代变更,由是性情或隐或见,若存若亡,深者过之,浅者不及也”。又多称引苏轼之说,赞许“天成”、“自得”、“超然”,认为“词藻胜则糟粕,律度严则拘窘”。其评唐代诗人,则于贾岛推崇备至。惟引贾似道梅花诗句,以为绝唱,《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提要》指其“未免近于谄”。有《学海类编》本。

(刘德重)

【全唐诗话】 诗话辑编。旧题宋尤袤撰,误。该书原不著撰者姓名,然其《自序》末有“咸淳辛未(1271)重阳日遂初堂书”一语,因尤袤号“遂初”,其堂亦名“遂初”,又有《遂初堂书目》,后人遂误题尤袤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考袤……光宗时卒(按:尤袤卒于光宗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而自序年月乃题咸淳,时代殊不相及。”又“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郭绍虞《宋诗话考》亦考得“周密《武林旧事》载有‘集芳御园后赐贾平章,有秋壑遂初客堂,度宗御书’之语”,可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甚确。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第进士。为南宋权相贾似道幕客。度宗咸淳中,似道断事于葛岭私第,大小朝政,多决其手。恭帝德祐初,似道罢相,犹追随之不舍,旋自杀。家有世綵堂,颇富藏书。《全唐诗话》六卷,或作二、三、五、十卷,书中以人立目,共收唐代诗人三百二十余人,或记其生平、佚事,或录其诗作,系抄袭《唐诗纪事》部分内容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校

验其文,皆与计有功《唐诗纪事》相同。《纪事》之例,凡诗为唐人采入总集者,皆云“右某取为某集”,此本张籍条下尚未及删此一句(按:张籍条下有“右张为取作《主客图》”语;又,于鹄条下亦有此语)。则其为后人刺取影撰,更无疑义。”该书不仅抄袭《唐诗纪事》,且漫无选择标准,如于李白、杜甫,竟无一言及之;所录李约诗“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三说”之类,亦为后人所嗤。惟《唐诗纪事》篇幅浩繁,该书作了删减,检阅较为方便,故流传较广。清人孙涛尝为之续补,撰有《全唐诗话续编》二卷。而该书作为断代诗话汇编的形式,则影响到王士禛的《五代诗话》、周春的《辽诗话》,从而形成了诗话汇编中的一个系列。有《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鹤林玉露】 笔记著作。宋罗大经撰。罗大经(约1195—?),字景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宁宗嘉定年间曾入太学,理宗宝庆二年(1226)擢进士第。端平元年(1234)任容州法曹掾,淳祐十一年(1251)为抚州军事推官,其后罢官闲居。《鹤林玉露》十六卷,当著于罢官后。“其书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所引多朱子、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杨万里语,而又兼推陆九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内容,多记南宋中期社会政治历史掌故及文坛佚闻,亦多论诗之语。其持论大抵属理学家一路,强调“文以贯道”说和传统的“教化”说,主张诗“须有劝戒之意,庶几不为徒作”。其评论诗人诗作,多拘执迂腐,如称“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又如评咏昭君诗,称白居易之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故“高出众作之上”;王安石所作“则悖理伤道甚矣”。凡此,多不足取。书中记载的传闻掌故,多可资参考。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后村诗话】 诗话著作。宋刘克庄撰。该书共十四卷,近六百则,分前、后、续、新四集。据书后跋语说:“前、后集各二卷,六十岁至七十岁间所作。续集四卷,乃公告老归后所作,时近八十。新集凡六卷,专采唐诗之新警者。咸淳戊辰(1268)五月夏间也,时年已八十二矣。”其中新集六卷是刘克庄晚年失明以后背诵唐诗的记录,极少评语。前、后、续集,则以评诗为主兼及记事。书中反映的诗学见解,大抵有以下一些:一是主张诗歌要有现实的思想内容和刚健的风格。如称赏杜甫诗“感时伤世”,有“骨气”,认为《八哀》诗可比“太史公纪传”,评“三吏”、“三别”称“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推许陈子昂、李白“一扫六朝之纤弱”,认为“陈《感遇》三十八首,李《古

风》六十六首,真可以扫齐梁之弊,而追还黄初、建安矣”。批评徐陵《玉台新咏》“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二是在艺术上贵含蓄,贵本色,贵独创。如评杜甫《登高》诗称:“此二联不用故事,自然高妙。”评高适、岑参歌行称:“皆流出肺肝,无斧凿痕。”评卢纶、李益五绝称:“意在言外”,“皆有无穷之味”。而韩愈的诗虽“沉着痛快”,“但以气为之,直截者多,隽永者少”。苏轼的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认为韩、苏之诗,便非本色。又评柳宗元称:“柳乃本色诗人”,“当一世竞作唐诗之时,独为占体以矫之”。“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乎”。评杜牧、许浑称二人诗“各为体”,“不著姓名亦可辨”。即主张诗应有自己的特色,或谓独特的创作个性。三是对宋诗的认识和评析。书中称:“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又称:“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对苏、黄诗风,江西诗派及其末流的针砭,均能一语中的,颇为有识。于宋代诗人中,刘克庄特别推崇梅尧臣和陆游,称“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惟放翁……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亦可谓别具慧眼。此外,书中还大量录诗,保存了不少宋诗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宋代诸诗,其集不传于今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因而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但作为诗话著作,书中录诗及抄引前人著作如《韩诗外传》、《西京杂记》、《朝野僉载》等,往往连篇累牍,汗漫无禁,还夹入许多与诗无关的内容,又不免有冗长枝蔓之嫌。有《适园丛书》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刘德重)

【江西诗派小序】 诗话著作。宋刘克庄撰。该书一卷,十九则。前十八则分别论述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韩子苍(驹)、徐师川(俯)、潘邠老(大临)、三洪(朋、刍、炎)、夏均父(倪)、二谢(逸、邁)、二林(敏修、敏功)、晁叔用(冲之)、汪信民(革)、李商老(彭)、三僧(饶节、祖可、善权)、高子勉(荷)、江子之(端本)、李希声(惇)、杨信祖(符)等二十三人加吕紫微(本中)共二十四人诗。末则为“总序”,云:“吕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何人表颀、潘仲达大观有姓名而无诗,诗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诗绝少,无可采。徐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联一句可讽咏者,或对偶工者,各著于编,以便观览。”又谓以吕本中本人“继宗派”,庶几不失其初

意。书中论黄庭坚称：“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仇人有捋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于宋诗发展演变轨迹之勾勒及黄庭坚所以成为江西诗派宗祖之论述，极为精要，颇为后人所称引。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对床夜语】诗话著作。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号药庄，临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太学生出身。度宗咸淳二年（1266），因上书劾贾似道，贬窜琼州（今广东琼山）。入元不仕，寓居无锡以终。一说曾仕元提举杭州路学，转长兴丞，致仕后寓居无锡。《对床夜语》，或作《对床夜话》，五卷，一百三十七则。内容以论评、诗法为主，兼及考释、标句。书前有理宗景定三年（1262）冯去非序，称其“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其主要观点，一是要求真情实感，“直写其事”。如称蔡琰《胡笳十八拍》以“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故能“千载如新”；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等句“舐犊之悲，流出胸臆”。二是要求“情景兼融”，虚实结合。如称杜甫诗有“景中之情”，有“情中之景”，有“情景相融而莫分”，有“一句情一句景”等多种表现形式，“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又以情为“虚”，景为“实”，认为好诗当“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等。三是要求炼字用事，自然含蓄。如称炼字“要使一句之意尽于此字上见工”，“生字”应“下得不觉”，“死字欲使之活”；称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用事当“融化斡旋，如自己出”。此外，书中论诗法诗格，往往追溯渊源，取古人诗句相类处进行比较，于读者亦不为无益。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四灵”、江湖诗人的批判：“‘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芝也。然具眼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今之以诗鸣者，不曰‘四灵’，则曰晚唐，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所言均颇有见地。唯其指责“四灵”立志未高，止于晚唐姚、贾，实则书中也不过抬出晚唐另一位诗人许浑来代替姚、贾，想以此纠“四灵”、江湖诗人流风之偏而已。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推重许浑而力排李商

隐，尤非公论”。然又称：“当南宋季年，诗道陵夷之日，独能排习尚之乖”，“其所见实在江湖诸人上，故沿波讨源，颇能探索汉魏六朝唐人旧法，于诗学多所发明。”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对床夜话】见“对床夜语”。

【藏一话腴】笔记著作。宋陈郁撰。陈郁（？—1275），字仲文，号藏一，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一说崇仁（今属江西）人。理宗时历缉熙殿应制、东宫讲学掌书。诗文颇受度宗推崇。《藏一话腴》分甲乙两集，又各分上下卷，共四卷，一百十九则。前有岳珂序。书中“多记南北宋杂事，间及诗话，亦或自抒议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学见解，大抵属理学家一路，其解诗多附会迂谬，如解杜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谓“此盖言士君子应以直道事君，而当时小人反以直为曲故也”；又如解周敦颐《游庐山大林寺》“木色含云白，禽声应谷清”，谓“前一句明，后一句诚，道在是矣”。诸如此类，颇不足观。然主张“诗贵含蓄”、“诗当切题”，认为“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胜处”，又谓“学诗者岂晚唐五字云乎哉”等等，则不无可取之处。有《适园丛书》本。（刘德重）

【迂斋诗话】诗话著作。宋佚名著。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今传宛委山堂本《说郛》有节编本，仅五则，其中“贻诗”一则，当出《迂叟诗话》（即《温公续诗话》）。又，《宋诗纪事》卷三〇录存一则，为《说郛》本所未载。据所存佚文，其内容多记佚诗佚事。（刘德重）

【爱日斋丛钞】笔记著作。宋叶真撰。叶真，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今属安徽）人。尝应进士举而未第。隐居九华山，以著书自娱。宋末监司论荐，补迪功郎、本州签判。《爱日斋丛钞》十卷，原书久佚，今本系辑自《永乐大典》、《说郛》，前者录存一百四十三则，后者为删节本二十二则，去其重者，合共一百五十三则。另据涵芬楼排印明抄本《说郛》则有三十一则，有九则为今本未收（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书中大旨主于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其论诗诸条，尤抉摘深微，时能得古人之意，与胡仔、魏庆之诸说足以互相发明，固有未可尽废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举陈与义、吕本中诗，称“静中置心，真与见闻无毫末隔碍，始得此妙”；举杨万里诗，称“学诗法”“要踏唐人最上关”；又称杜甫诗用事“不为古事所使”，苏轼、韩愈诗“超然”、“壮伟”，李商隐诗有“悠然无尽之味，诗家未能及”等。同时人魏了翁有《答叶子（真）书》，称其“来谕屡屡恨柳惜韩，尊苏慕黄，词严而义正，志立而气昌”（《鹤山大全集》卷

三五)。其诗学倾向可见一斑。有《四库全书》本。

(刘德重)

【谢叠山诗话】诗话著作。宋谢枋得撰。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卷数不详。《诗林广记》中存有其佚文二十五则,计评唐人诗九则,评黄庭坚诗一则,评陈师道诗十五则。其诗论如称刘禹锡咏古诗“有风人遗意”,称薛能诗“游苑囿而思畎亩,览花草而记农桑,此有道者之言也”,称王驾诗“见夫妇之至情”等,多偏重思想内容。于艺术方面则主“意味”,如称赏“意在言外,寄有于无”,“意味悠长”,“有无限意味”等。同时又主张“化事”,如称陈师道诗“化事甚巧”,“不用其语,而用其意,谓之化”等。

(刘德重)

【学斋占毕】笔记著作。宋史绳祖撰。史绳祖,字庆长,眉山(今属四川)人。受业于魏了翁之门。曾官江西提举、江东提举。又尝以朝请大夫、直焕章阁衔奉祠。入元后侨居衢州,为人讲性理之学。《学斋占毕》四卷,一百二十九则,内容多为考证经史疑义,论五经者约占全书一半,而其中论《易》者又几占一半。其论诗持儒家传统的诗教说,主张温柔敦厚,“微婉见意”;认为诗对上只可以“刺”不可以“讥”;“歌咏前代之事,可以直言,而当代君臣,则宜讳君恶”。由此出发,书中评论诗人诗作,于苏轼诗之“讥诮朝廷”深致不满;称聂夷中《伤田家》诗“最得风人之体”,而又辨其诗中“二月卖新丝”句不合时令,以为“当是‘四’字,传写者讹刻画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有“疏于考据”处,然“精确者为多,亦孙奕《示儿编》之亚也”。有《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

(刘德重)

【弁阳诗话】诗话辑集。宋周密撰,日人梁川星岩、菅老山辑,日人近藤元粹重订。周密原著《浩然斋雅谈》,世无传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其书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今搜辑排纂,以考证经史、评论文章者为上卷,以诗话为中卷,以词话为下卷,各以类从,尚裒然成帙。密本南宋遗老,多识旧人旧事,故其所记佚篇断阙,什九为他书所不载。”“其评鹭诗文,则固具有根柢,非如阮阅诸人漫然蒐辑,不择精确者也。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而此书则“颇具鉴裁”。日人梁川星岩、菅老山乃专辑其中卷论诗者,刊为《浩然斋诗话》;其后,近藤元粹又辑入《萤雪轩丛书》,改称《弁阳诗话》。该书一卷,一百零三则。其论诗称赏“语妙而意婉”;推许白居易诗“深中人情”,陆游诗“多用新语”,杨万里诗“极有思致”;标举“对偶之佳者”,“天衣无缝,妙合自然”。有《萤雪轩丛书》本。

(刘德重)

【浩然斋诗话】见“弁阳诗话”。

【梅硎诗话】诗话著作。宋末元初韦居安撰。韦居安,吴兴(今属浙江)人。理宗景定间(1260—1264)进士。为宋臣入元者。《梅硎诗话》中记有“戊辰初春”(1268)事,云“今转盼十五年矣”,据此可推知该书约作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左右,其时距宋亡仅三、四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一百六十餘则,内容多记南宋后期诗人事迹,往往详载其字号、乡里、科第、仕历等,颇类似诗人小传。《四库未收书提要》称其“所论多南宋诗人之作,名篇警句,往往在是,采掇亦复谨严”。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山房随笔】笔记、诗话著作。宋末元初蒋子正撰。蒋子正,名或误作正子,曾为溧阳学官。该书一卷,四十八则。内容多记宋末元初诗人诗事,关于贾似道误国及充军被杀事,所记较他书为详,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惟所记陆秀夫挽张世杰诗,似出附会。《四库全书总目》将该书收于子部小说家类,属于笔记性质,但也可作诗话读,故何文焕辑入《历代诗话》。有《四库全书》本、《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诗林广记】诗歌与诗话汇编。宋末元初蔡正孙编撰。蔡正孙,字粹然,号蒙斋野逸,人称蒙斋先生。师事谢枋得,枋得被强送大都(今北京),正孙曾以诗送行,有“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句。《诗林广记》,又称《精选诗林广记》、《名贤丛话诗林广记》、《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其《自序》作于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距宋亡已十年。该书与《竹庄诗话》一样,兼收诗作与诗话,着眼于诗作与诗话联系比照,故只收有“话”之诗。但在编排上,《竹庄诗话》是先“话”后诗,该书则是先诗后“话”。全书分前、后两集,各十卷,共辑诗及附诗六百七十一首,引诗话等资料约一百七十餘种。前集收晋、唐诗人三十七家,后集收北宋诗人三十家。大致上以人为纲,以诗为目,诗话资料列于诗人之后,或列于诗作之后,有的还附录相类或相关的诗作以供参阅,编撰者亦有少量评语或按语。如杜甫《和早朝大明宫》诗后列有评论三则,又附贾至原诗及王维、岑参和诗三首,而岑诗后又列有评论一则。再如张继《枫桥夜泊》诗后列有关于“半夜钟”资料四则,又附皇甫冉、刘彦冲二诗,二诗后又又有蔡正孙自己所加三条按语。书中为了与所收诗话、评语相对应,对有些诗还作了删节,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唐彦谦《过长陵题高庙》均截去前半首以就评语,可见其所重在辑话。由于蔡正孙受南宋理学家影响较深,书中收辑朱熹、真德秀及其师谢枋得评语较多,故“道学气较重”(《宋诗话考》)。书中所收佚诗、佚文,有不少

颇具资料价值。如李白诗《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后附有黄庭坚、刘克庄、谢枋得三首和诗,均不见于三家本集;苏辙《足东坡赠姜唐佐》诗一首,也不见于《栾城集》。书中还保存了诸如《王直方诗话》、《蔡宽夫诗话》、《艺苑雌黄》等佚书中的一些资料。有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

(刘德重)

【精选诗林广记】 见“诗林广记”。

【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见“诗林广记”。

【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见“诗林广记”。

【溇南诗话】 诗话著作。金王若虚撰。王若虚《溇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内有《诗话》三卷、《文辨》四卷。其《诗话》辑出单行者,即题为《溇南诗话》。该书三卷,共八十九则,内容以评论为主,大抵上卷多论唐诗,中、下卷多论苏轼、黄庭坚诗,并对前人诗话及诗学见解发表意见。王若虚论诗受其舅父周昂的影响很大。卷上云:“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周昂这段话,其实也是王若虚论诗的基本观点。由此出发,他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真实的情性:“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正理也。”求“真”是他对待诗文创作的一贯主张。而他所求的“真”,是在“形似”基础上达到“神似”的“真”:“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失其题。如是而已耳。”这实际上是要求艺术表现的真实。所以他认为对杜甫《饮中八仙歌》称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两句,不必去斤斤追究“上船”是否实指,“大抵一时之事,不尽可考。不知太白凡几醉,明皇凡几召,而千载之后,必于传记求其证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这表明他强调的“真”,是顾及到诗歌艺术表现规律的。从形式上来说,王若虚主张“随物赋形”,遣词造句用事都应服从于表达内容的需要,不应“以一律限之”。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极力推崇白居易和苏轼,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意,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又称:“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而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特别不满,称:“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

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并给予“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以严厉的批评:“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应当指出:王若虚反对形式主义诗风,但并不忽视形式技巧。他对黄庭坚许多具体诗作所作的批评,恰恰是从语法修辞角度来提的。另外,朱弁《风月堂诗话》曾称江西诗派“用崑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王若虚则指出:“予谓用崑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崑体功夫。”这些见解,都较深刻。只是他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完全割断黄诗与杜诗的联系,无视形式技巧自身的继承关系。对黄庭坚在宋诗发展上的贡献和江西诗派在形式技巧上所作的探索,未能给予应有的估价。而在对具体诗作的评论上,又多从一字一句着眼,有时不免流于琐碎刻细。这些,是《溇南诗话》的不足之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归潜志】 笔记著作。金元间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州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金时举进士不第。金亡,遁归乡里。蒙古窝阔台汗十年(1238),复出应试。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有《神州遁士集》。《归潜志》十四卷,前有乙未(1235)自序。卷一至六为金末诸人小传,卷七至一〇为杂记遗事,卷一一题“录大梁事”,卷一二题“录崔立碑事”,卷一三为杂说,卷一四题“归潜堂记”,末两卷又多附诗文。其论诗谓:“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又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所论诗、词、曲,当以真情动人,颇为有识。又主张“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即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语言、风格要求,反对以文为诗,亦不为无见。书中还记载不少金代诗坛遗事,如赵秉文与李屏山的攻讦,王若虚与雷希颜的争论,均颇具文学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有《四库全书》本。

(刘德重)

【敬斋古今藁】 笔记著作。金元间李冶撰。李冶(1192—1279),本名治,字仁卿,号敬斋,栾城(今属河北)人。金末登进士第,任钧州知事。金亡后,流

落忻、崞间,晚居元氏封龙山,从学者甚众。入元,以学士召就职,后以老病辞归,卒于家。著有《敬斋集》、《测圆海镜》、《益古衍段》等。《敬斋古今藁》原书四十卷,久佚。今本八卷,系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者,以经、史、子、集四类编排,各为二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书皆订正旧文,以考证其议论,词锋峻利,博辨不穷。虽间或横生别解,有意翻新,而大致皆有根据,不同于虚骋浮词。”“评诗文于训诂之异同、体制之正变,抉择亦极为精审。”“元一代之说部,固未有过之者。”其论诗重思想内容,反对片面追求形式。认为诗当“以意为主”,“立意贵纵夺,造语贵激昂”。“诗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为之感动”。对于诗律则主张“宽简”,因为“律度益严,而其骨格益以弱也”。对于解诗,反对“求之过当”,牵强附会。凡此,皆足资参考。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刘德重)

【莲堂诗话】诗话汇编。元祝诚编。祝诚,海昌(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生平不详。据书中“题卖坟墙壁”条“至元丁丑(1277)以来”语,知其为元初人。该书又称《莲塘诗话》,上、下二卷。所辑多为宋代诗事,兼涉考证,亦间及唐与金元诗。书中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他书的佚诗佚句。但选录标准不严,且大都未注明出处。有《琳琅秘室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刘德重)

【莲塘诗话】见“莲堂诗话”。

【修辞鉴衡】诗话与文论汇编。元王构辑。王构(1245—1310),字肯堂,号安野,东平(今属山东)人。初为东平行台掌书记,擢翰林国史院编修,迁翰林修撰,历史、礼部郎中,治书侍御史,改翰林侍讲,升翰林学士,预修《世祖实录》,参议中书省事。以疾归东平。复起为济南路总管,拜翰林学士承旨。《修辞鉴衡》一书,系王构任济南路总管时授其门人刘某,后经王理请人整理于至顺四年(1333)刊刻。全书二卷,上卷论诗,一百馀则,下卷论文,八十馀则。编排按内容分类标目,资料多采自宋人诗话及笔记著作,并注明出处。其中所引用之《诗文发源》、《诗宪》、《蒲氏漫斋录》等书后来亡佚,赖此书存其一二;所收《吕氏童蒙训》三十一则,亦均为今本所不载,故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从上卷看,所收以诗歌作法为主,兼及诗人论评,去取颇为精当。由其标目“诗以风调高古为主”、“诗以意为主”、“诗清立意新”、“诗去陈腐,不可奇怪,不在难解”、“诗待境生者工”、“对偶切不切之失”、“诗不可靡丽”等及所选内容,可以看出辑者重视立意、强调风骨、反对浮靡雕琢的创作主张。书中论诗法部分有“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并要响”、“无字无来处”、“用全语有气格”、“因袭、转

易”、“夺胎、换骨”诸目,多收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诗论。有《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庶斋老学丛谈】笔记著作。元盛如梓撰。盛如梓,号庶斋,衢州(今属浙江)人。南宋末曾任崇明县判官,入元不仕。《庶斋老学丛谈》为其入元隐居时所著,全书四卷,二百二十九则。一本作三卷,而第二卷别析一子卷,实亦四卷。“其书多辨论经史、评骘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及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诗之语多集中于第三卷,颇类诗话。书中记事颇称誉贾似道,于考证亦间有失当处。有《笔记小说大观》本、《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隐居通议】笔记著作。元刘埙撰。刘埙(1240—1319后),字起潜,号水村,南丰(今属江西)人。元至大(1308—1311)末曾任南剑州学官。另著有《水云村稿》、《英华录》等。《隐居通议》为其晚岁退休时所著。全书三十一卷,分为十一门,计理学三卷,古赋二卷,诗歌七卷,文章八卷,骈俪三卷,经史三卷,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各一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论学虽堕虚无,考古亦颇短订,率无可取”,“惟说诗、论文之二十卷,则埙生于宋末,旧集多存,其所称引,今或莫识其名,又多备录全篇,首尾完具,足补诸家总集之遗。其诗话文评,亦多出诸家说部之外”。书中论诗,大抵于内容上本自传统的风教说,认为诗“系于安危理乱”,“要有为而作”,“于世道有补”;于艺术上主张“以兴意为主”,应当“语短而意长”,“悠然有深味”。书中又多记佚诗、佚序,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刘德重)

【诗法家数】诗格著作。旧题元杨载撰。杨载(1271—1323),字仲弘,福建浦城人,后迁居浙江杭州。少孤,博览群书,年四十不仕。户部贾国英数荐于朝,仁宗皇庆初(1312),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授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未到任而卒。赵孟頫在翰林时,极推重其文,故其文名隐然动京师。《诗法家数》或称《杨仲弘诗法》,一卷,乃为初学者而作,实为伪托之书。此书最早见于《诗法源流》中,前有题为杨载至治壬戌(1322)序,亦为伪托。此书共收诗法著作四种:《诗法正论》、《诗法家数》、《诗解》、《杜律心法》。其中《诗法家数》的内容,实出自卢挚《文章宗旨》,后衍变为傅与砺《诗文正法》;而《诗解》之内容,即同于今本题杨载之《诗法家数》。今本《诗法家数》的内容,又可见于题揭曼硕之《诗宗正法眼藏》中。至于今本《诗法家数》前序言,又为杂纂诸家说而成。序言云:“余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馀年”,则此书似为其三十多岁时所作,而

《诗法源流》又署为“至治壬戌”，则为其卒前一年所撰，可见此书乃漏洞百出，决非杨载所作。然此书虽为伪托，亦出于元人之手，从中仍可考见当时的诗学趋向。书中受严羽影响颇大，如标举盛唐之音，卑晚宋江湖、四灵等。有《名家诗法》、《名家诗法汇编》、《历代诗话》、《诗学指南》诸本。（张伯伟）

【杨仲弘诗法】 见“诗法家数”。

【杜律心法】 诗格著作。旧题元杨载撰。《杜律心法》最早见于《诗法源流》，前有题杨载至治壬戌（1322）四月序，其辞云：“予少年从叔父杨文圭游西蜀，抵成都，过浣花溪，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观焉，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孙杜举也。”该书即杜举所传。故吴景旭《历代诗话》收此书，乃题名“杜举《杜陵诗律》”。考其内容，实出自林越《少陵诗格》。可知此乃后人伪托杨载之名以牟利。此书既收于《诗法源流》，旧题揭曼硕《诗宗正法眼藏》亦载之。顾龙振《诗学指南》乃题作杨载《杜律心法》。有《诗法源流》、《名家诗法汇编》、《诗学指南》及吴景旭《历代诗话》诸本。（张伯伟）

【杜陵诗律】 见“杜律心法”。

【木天禁语】 诗格著作。旧题元范梈撰。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湖北恩施）人。家贫早孤，其母熊氏亲授诗书。年三十六，游京师，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荐为翰林院编修官，历任岭海廉访司照磨、闽海道知事、湖南岭北廉访经历。持身淡泊廉正，吴澄以东汉诸君子拟之，人称文白先生。《木天禁语》开卷标“内篇”二字，别无外篇。考题范德机所著之《诗家一指》，开卷标“外篇”二字。惟此名乃见于明朱绂《名家诗法汇编》之卷一、卷二，题下有“明三山杨成考订，吴会黄省曾校订”数语，考之于黄省曾编《名家诗法》，《木天禁语》见于卷三，《诗家一指》见于卷五，亦无内、外篇之说。其来历颇可怀疑。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斥为庸妄书贾伪撰。书前有序言，谓“古之论著，类多言病而不处方，是以沉痾少有疗日，雅道无复彰时”，可知此书乃为初学者传授诗法而作。略谓作诗有“六关”，即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其中又以篇法为重点。宋人李淑有《诗苑类格》，述七言律诗篇法六格，此书广为十三格，巧立名目，无益诗学；至明人王昌会《诗话类编》更广至三十六格，则更是变本加厉。其字法偏在讲述用字琢对之法，强调用宋以前史书字样集成联对；家数辨析诸家风格，尚有可取。如谓“太白雄豪空旷，学者不察，失于狂诞”；“韩、杜沉雄厚壮，学者不察，失于粗硬”。但总的看来，此书荒陋平庸，乃出自无知之徒。如李淑为宋人，而此书误为“唐人”；又五言短古篇法下引杨仲弘语，曰：“此论惟

赵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则豫章三日新妇晓得，清江知之，亦不多用。”“清江”指范梈，“豫章”乃揭傒斯，口气殊不类自称。又“豫章”乃揭氏卒后追封豫章郡公，而范氏亡于揭氏之前，不可能有“豫章”之称。其为伪书无疑。有《名家诗法》、《名家诗法汇编》、《诗法统宗》、《历代诗话》诸本。（张伯伟）

【诗学禁裔】 诗格著作。旧题元范梈撰。宋释惠洪有《天厨禁裔》，《诗学禁裔》之名亦效仿之。该书凡列十五格，每格选唐诗一首，并逐句解释。所入选诗，有苏颋、杜甫、皇甫冉、李商隐、韦庄、李颀、贾岛、司空曙、李建等人。解释偏于篇法、句法。黄省曾《名家诗法》卷六、朱绂《名家诗法汇编》卷六均收入《诗学禁裔》，前有小序：“清江范德机以诗名天下，編集唐人之诗具为格式，其若公输子之规矩、师旷之六律乎？无规矩，公输子之巧无所施；无六律，师旷之聪无所用。学诗者得此编而详味之，庶乎可造唐人之阃奥乎！”此序《历代诗话》本不存。以序文中推测，此书似亦托名范氏之伪书。（张伯伟）

【诗格】 诗格著作。旧题元范梈撰。仅见于《诗学指南》卷七。按其内容，实际上是将《诗学禁裔》和《木天禁语》中的部分节目合并而成。《诗学禁裔》分诗为十五格，《木天禁语》“七言律诗篇法”节分诗为十三格，《诗格》将两者合并，并将后者所列内剥、外剥、前散、后散四格去除。当为清顾龙振编成。（张伯伟）

【诗家一指】 诗格著作。旧题元范德机撰。范梈，字德机。《诗家一指》最早见于黄省曾《名家诗法》卷五，但不题撰人姓氏，朱绂编《名家诗法汇编》题作“范德机《诗家一指》”，下有“明三山杨成考订，吴会黄省曾校正”数语。考黄氏《诗法》刊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杨成《诗法》则刊于嘉靖三十一年，朱绂《诗法》刊于万历五年（1577），则此书或为杨成题作范德机撰。此书分十科、四则、二十四品、普说、三造等节。其内容乃杂纂《沧浪诗话》、《白石道人诗说》、《二十四诗品》及项平庵《家说》诸书而成，宗旨混乱，理学语与禅家语杂糅，当为伪书。二十四品中以“洗炼”、“清奇”二品属范德机，与范诗“豪宕清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文雄健”（顾嗣立《元诗选》初编丁集）亦颇不合。有《名家诗法》、《名家诗法汇编》、《诗法统宗》本。（张伯伟）

【诗法正宗】 诗格著作。元揭傒斯撰。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家贫，刻苦力学，博通百氏。大德间，游江汉，为程钜夫、卢挚所重。延祐元年（1314），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一生三人翰林。至正初年，诏修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诗法正宗》一

卷,开宗明义云:“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可见其大意所在。至于究竟如何学诗,著者认为,“须是力行五事”:其一为“诗本”,强调人品清高,砥砺风义。秉承儒家“有德者必有言”之旨,指出“若做得好人,必做得好诗也”。其二为“诗资”,强调博览群籍,读书万卷。其三为“诗体”,大抵以建安以上为“诗之祖”,两晋诸公为“诗之宗”,盛唐诸公为“诗之嫡派”,而以杜甫古、律为“集大成”,“独步千古,莫能继之”。其四为“诗味”,强调诗的“滋味”,达到“意外生意,境外见境”的妙处。而在各种“滋味”中,作者尤其重视“平淡”之味,这与宋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的理论有渊源关系。其五为“诗妙”,此处乃袭用禅家之语,颇受严羽《沧浪诗话》影响,所谓“凡正言若反,寓言十九,言景见情,词近言远,不迫切而意独至者是也”。这五个方面,在作者看来,应该是“养性以立诗本,读书以厚诗资,识诗体于源委正变之余,求诗味于盐梅姜桂之表,运诗妙于神通游戏之境”。对于学诗诸方面论述较全,在元人诗学著作中,是较好的一种。有《名家诗法汇编》、《诗法统宗》、《诗学指南》诸本。

(张伯伟)

【诗宗正法眼藏】诗格著作。旧题元揭傒斯撰。揭傒斯,字曼硕。《诗宗正法眼藏》系为初学者而作。“正法眼藏”原是禅语,但此书之名不一定直接受到禅宗启发,可能是从《沧浪诗话》“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而来。其宗旨在于“学诗宜以唐人为宗”,“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作者认为诗法主要包孕在律诗之中,故从杜诗中选取五、七言律十五首详加分析,欲使学者得“正法眼藏,毋为旁门邪论所惑。”这里所说的“旁门邪论”,指的大抵是晚宋江湖一派诗歌。但此书真伪颇为可疑。明万历刊本《名家诗法汇编》卷八收此书,于开篇一段文字后注云:“诗十五首见后卷。”而卷一〇在王柏《诗翼》后有“律诗”一节,其下有 small 字注云:“此编杨仲弘得自西蜀,旧刻于《诗法正宗》之后,今移置此。”考其内容,乃出自《杜律心法》,而前十五首即同于《诗宗正法眼藏》。《愁》诗下有 small 字注云:“上连五言共诗十五首,即前卷《诗宗正法》篇所论者。”可知这十五首诗,乃后人杂取《杜律心法》而成。又《名家诗法汇编》卷八在录《诗宗正法眼藏》首段文字后,续录有五段文字,考其内容,又皆出自旧题杨载《诗法家数》中。可证此书当属伪作。有《名家诗法汇编》本。

(张伯伟)

【吴礼部诗话】诗话著作。元吴师道撰。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英

宗至治元年(1321)进士。历高邮县丞、宁国路录事、建德县尹,人为国子助教,迁国子博士、奉议大夫,官至礼部郎中,致仕。有《吴正传文集》、《敬公录》等。《吴礼部诗话》一卷,六十八则,附词话七则。书中注有“见下卷”字样,可能原书不止一卷。其内容除记事外,兼重品评考释,尤着重论诗歌鉴赏。如称:“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古人模写之真,往往后人耳目所未历,故未知其妙耳。”即不仅作者要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方能写出好诗,而且读者也要有类似的生活感受,方能真正领会诗中的妙处,才会发生共鸣。吴师道举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他尝与友人同登京口北固亭,“临视大江,风起浪涌,往来帆千百,若凝立不动者”,方悟古人“千帆来去风,帆远却如闲”之句“诚佳语也”。书中又以对杜甫《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两句的理解为例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虽’字,‘敢’字,曲尽事情”。这些见解,对读者不无启发。书中还反对解诗望文生义,如杜牧《宣州开元寺》诗首句:“松寺曾同一鹤栖。”有注解作“恐是与妇人同宿,托名鹤尔”,书中指出:“此尤谬妄”,“可发一笑”。然其所解陶诗,却重蹈此病。如解《述酒》诗“鸣鸟声相闻”句为“谓南渡之初,一时诸贤犹胜也”;解“南岳无馀云”句为“气数全尽矣”,未免曲解附会。书中还有两则值得注意:一是录其乡人时天彝书《唐百家诗选》后评语十八条,内盛称盛唐,对晚唐颇有微词;一是引李道坦语,谓“学诗必以李杜为宗,唐律四十字、五十六字,成一片文章,岂可以闲冗语填之?”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吴师道的看法,可见其论诗已转崇盛唐。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诗谱】诗论著作。元陈绎曾撰。陈绎曾,字伯敷,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侨居苕水(在浙江)。元至顺中官至国子监助教。从学于戴表元,而与陈旅友善,故所学颇见根柢。另撰有《文说》一卷,专论科场程式。《诗谱》一卷,则专论历代诗歌。此书将唐以前诗分为古体、律体、绝句体和杂体四种。其中颇有足资参考之论,如云:“凡读汉诗,先真实,后文华。”“凡读建安诗,于文华中取真实。”“凡读《文选》诗,分三节:东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谢以下主辞。”其论六朝诗,每每指出唐人渊源处,如评郭璞:“构思险怪而造语精圆,三谢皆出于此。杜、李精奇处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评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李、杜取深处,多取此。”评沈约:“佳处斫削,清瘦可爱,自拘声病,气骨苍然。唐诸家声律皆出此。”对文学现象能作动态把握,并在前后发展中指出其地位。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但编次凌

乱,恐非旧貌。

(张伯伟)

【诗法正论】诗格著作。旧题元傅若金撰。傅若金(1304—1343),初字汝砺,揭傒斯改为与砺,江西新喻人。家贫,以织席针工为生。后读书,工诗文,学诗于范梈、虞集、宋褰。曾佐使安南,后除广州文学教授。《诗法正论》一卷,大旨在述其师范梈论诗之语。书中主要观点,一为尊杜。通过诗体流变现象的叙述,指出“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大成也”。二为注重个性。尽管杜诗成就很高,但其他诗人也自有其个性,不可抹煞。“诗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也。”三为唐、宋并重。元人多重唐音,往往轻视宋诗。此书则不加轩輊。所谓“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情性,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达情性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雅》《颂》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四为论起承转合,认为是“作诗成法”。“以绝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律诗则第一联是起,第二联是承,第三联是转,第四联是合。”此说虽有刻板划一之弊,但对后世影响颇大。又如论绝句为“截句”,截律诗四句而成,其说虽谬,但对于明人,如吴讷之《文章辨体》、徐师曾之《文体明辨》有直接影响,在历史上流传甚广。有《诗法源流》、《名家诗法汇编》、《诗法统宗》、《诗学指南》本。元刊本《诗法源流》首列《诗法正论》,但不题撰人,明王用章改编《诗法源流》,而题作傅与砺,《诗法统宗》题作傅与砺述。(张伯伟)

【诗文正法】诗论著作。旧题元傅与砺撰。傅若金,字与砺。《诗文正法》版本不一,王用章《诗法源流》、朱绂《名家诗法汇编》、胡文焕《诗法统宗》均题作傅与砺,而嘉禾怀悦用和編集之《诗法源流》亦载录之,题作《诗法家数》,文末云“疏斋卢学士述”。则此书作者有二,书名亦有二。考其内容,实出于卢摯(疏斋)之《文章宗旨》、《诗法家数》、《诗文正法》均非其正名。卢摯(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河南颍川人,族望河北涿郡。曾为翰林学士,迁承旨。诗、词、曲兼擅。其《文章宗旨》保存于陶宗仪之《南村辍耕录》卷九中。主要观点仍不出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旨。故谓作诗“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又分析战国以来诸家文之风格,谓“孟轲之条畅,庄周之奇伟,屈原之情深为大家”。最后一段讲述各类文体的不同要求,历述古文、记、序、碑、铭、跋、说的不同风格,这种就文体而分别论述的作法,自曹丕《典论·论文》以下而形成一种传统,而文体风格论亦为中国文学批

评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伯伟)

【诗法】诗格著作。元黄子肃撰。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福建邵武人。五岁日记数千言,七岁能属文,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授翰林典籍,升检阅,迁应奉。至正元年(1341)出为湖广儒学提举。学者称樵水先生。《诗法》,又称《黄氏诗法》,书中诗学观点颇受严羽影响。盖黄氏与严羽同邑,且师事邑中处士严斗岩,而斗岩又受学于严羽,故有此渊源。其论诗首先强调“立意”。清初王夫之《薑斋诗话》强调“立意”,与此亦相近。又强调“妙悟”、“圆活”、“高古”、“入神”、“离众”、“造巧”、“不俗”等,均秉承严羽《沧浪诗话》之旨。此书对严羽诗论亦有阐发,可视作严氏诗学之旁衍,对于理解严羽诗学思想亦有帮助,颇值得重视。有《名家诗法汇编》、《诗法统宗》、《诗学指南》诸本。(张伯伟)

【黄氏诗法】见“诗法”(黄子肃)。

【东坡诗话录】诗话汇编。元陈秀民辑。陈秀民(生卒年不详),字庶子,温州(今属浙江)人。官至浙江行中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著有《寄情集》等。《东坡诗话录》亦称《东坡诗话》,三卷,系集录诸家关于苏轼诗歌的评论,但也有个别不涉及苏诗或直录苏诗而无评论者。其论诗推崇苏轼“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之说,又称黄庭坚“夺胎换骨”和陈师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诸法。然书中称引多不注出处,亦不辨人语己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其“排纂后先,既不以本诗之事类为次第,又不以原书之年代为次第,殊无体例”;又称其作为专人诗话而所收不及《苕溪渔隐丛话》有关苏轼条目之半,“则此录之挂漏可知”;且书中又掺入明《西湖游览志》一则,故颇疑为伪作,但也有可能系后人误入。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东坡诗话】见“东坡诗话录”。

【诗词余话】诗话词话著作。元俞焯撰。俞焯,生平不详。该书今存《说郭》本、《古今诗话》本,仅六则,已残。其内容为记宋末诗人词人之佚诗佚词佚事。如首则记:“陈古遇,平江人也。作诗高古,无宋末气。”以下全文录引其《志怪》、《莫饮》二诗,末谓“皆有益于世教,惜不多见”。由此可见其论诗一斑。

(刘德重)

【诗话隽永】诗话著作。元喻正已撰。喻正已,生平不详。该书今存《说郭》本、《古今诗话》本,仅六则,已残。每则前均有小标题,六则分别为:“寒食诗”、“海鯨行”、“风之始”、“巴家富诗”、“白纸诗”、“来岁状元赋”。多记佚诗佚事,且多涉诗谶、怪诞一类内容,颇不足取。

(刘德重)

【沙中金集】诗格著作。佚名撰。此书有黄省曾《名家诗法》及杨成《诗法》本,从其所录者来看,均为明代以前所作,以此推论,此书当是元代作品。杨成《诗法》本较《名家诗法》多出“七言失粘”、“第三联失粘”、“第四联失粘”三目,朱绂《名家诗法汇编》即根据杨成本辑录。其内容不出炼字、对偶及句法等,大多杂纂前人诸说而成,其中尤以引用《诗人玉屑》、《天厨禁脔》等宋人诗法、诗话为多。(张伯伟)

【南溪诗话】诗话汇编。元末明初南溪辑。南溪,辑者别号,佚其姓名,生平事迹不详。《南溪诗话》亦称《南溪笔录群贤诗话》,三卷,前集专论杜甫;后集突出李白,兼论韦应物、孟浩然等人;续集论宋、元诗人之作,兼及创作理论。此编大体以人为纲,以时代先后为序,以此“示学夫诗者,会群思以归于正,执众言以求乎中,由是形诸歌咏”(王承裕《南溪诗话序》),供时人创作时借鉴。该书系杂抄前人诗话而成,虽注出处,但往往妄立书名,如祖孝徵论沈约“崖倾护石髓”句,即题作《祖孝徵诗话》,实非其本书。编排亦不分门类,颇显芜杂。所引诗话以常见者为多,惟所引《吕氏童蒙训》为今本所不载,可资参考。又《明史·艺文志》亦有《南溪诗话》三卷,作者程启充。程启充是否别号南溪?两书内容是否一致?已不可考。有明正德五年刻本。(周维德)

【南溪笔录群贤诗话】见“南溪诗话”。

【名贤诗旨】诗话汇编。元(?)佚名辑。该书一卷,辑录挚虞、刘勰、钟嵘至宋人五十馀家论诗之语。少者仅录一句、一段,多者如胡仔、葛立方、杨万里、姜夔、严羽等录至十数段、两三百页。所录除一家为明代谢榛《诗家直说》外,全系宋代以前著作,而元、明其他诸家诗话概未涉及。据此推测,该书可能辑成于元代,所录《诗家直说》或系后人窜入者。有《诗学指南》本。(刘德重)

【竹林诗评】诗评著作。元(?)佚名撰。该书今存《说郛》本,仅二十三则,自韦孟四言、苏武、张衡至阮籍、谢灵运各着一二句评语。如评曹植,称:“曹子建之作,亦正亦变,馥馥乎大雅之制焉。”又多用比喻,如评谢朓,称:“谢朓之作,如西山清晓,霏蓝翥黛之中,时有爽气。”就其体制看,当为宋代《芸叟诗评》、《蔡百衲诗评》、《臞翁诗评》的后继之作。

(刘德重)

【霏雪录】笔记著作。明刘绩撰。刘绩(生卒年不详),字孟熙、用熙,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其父刘涣,元时曾为三茅书院山长。刘绩亦系自元入明者,尚及与元末诸遗老游。《霏雪录》二卷,七十则。书中有“洪武乙亥冬”(1395)语,可知成书当在此后。其刊行则在成化(1465—1487)

间。该书内容为“杂述旧闻”,又“每记梦幻诙谐之事,颇杂小说家言”,然“辨核诗文疑义”,亦“颇有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论唐、宋诗称:“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短钉;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尊唐贬宋,可谓不遗余力,对后世亦有一定影响。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归田诗话】诗话著作。明瞿佑撰。瞿佑(1341—1427),名或作祐,字宗吉,号存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武中,以荐历任仁和、临安、宜阳三县训导,迁国子监助教,周王府右长史。有诗名。永乐中以诗获罪,谪戍保安十年,遇赦放归。有笔记小说《剪灯新话》及《香台集》、《存斋遗稿》等。《归田诗话》又称《归田诗话录》、《存斋诗话》、《吟堂诗话》,其自序作于洪熙元年(1425),书亦当成于此时。全书三卷,均列有标题,内容以记事为主,所记多为“其师友之所言论,宦游四方之所习闻,而有关于诗道者”(柯潜序)。书中论诗,偏重思想内容,多以君臣大义为旨归。如比较杜甫诗与李白《永王东巡歌》,认为“老杜诗识君臣上下”,李诗“略无上下之分”;比较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与崔颢《黄鹤楼》诗,认为前者结句有“爱君忧国之意”,远过后者结句的“乡关之情”;比较白居易与王安石的昭君诗,认为白诗“不言怨恨,而惓惓旧主,高过人远甚”,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三体诗序》”条和“《鼓吹续音》”条,前者全文录引方回的《唐三体诗序》,称“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对于方回鼓吹宋诗极表赞同;后者记其早年所编《鼓吹续音》序及跋诗,内称该书凡十二卷,收宋金元诗一千二百首,然至其撰诗话时已佚,仅存其序云:“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故于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附以己见,而请观者参焉。”书后跋诗又云:“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可见其提倡宋诗,反对“举世宗唐”的诗学倾向。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归田诗话录】见“归田诗话”。

【吟堂诗话】见“归田诗话”。

【存斋诗话】见“归田诗话”。

【辨诗】诗话著作。明吴讷撰。吴讷(1372—1457),字敏德,号思庵,卒谥文恪,江苏常熟人。永乐中,以医荐至京。洪熙元年(1425),擢监察御史。官至南京右金都御史。著有《小学集解》等。《辨诗》一卷,出自《文章辨体序说》之论诗部分,故云《辨诗》。《辨诗》分古诗、律诗、排律、绝句、联句和总论

六部分。首引《诗大序》“诗言志”、“诗有六义”之说,说明诗之性质、体裁和方法,然后引朱熹“古今诗凡三变”之论,即“自汉、魏以上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又论诗体的发展变化,即从古诗四言、五言、七言、歌行,到近体律诗、绝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大抵剽掇旧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体亦未能甚辨。”有《古今图书集成》本。(周维德)

【西江诗法】诗话汇编。明朱权辑。朱权(1378—1448),号丹丘先生、臞仙、涵虚子。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封宁王,卒谥献,称宁献王。著有《太和正音谱》等。《西江诗法》一卷,辑录前人诗论,芟其繁芜,校其优劣,编辑而成。卷首有《自序》,称“诗不在古而在今,非今不足以明古之意;法不在诗而在我,非我不足以明诗之法”。以表明其论诗之旨。朱权善长音律,崇尚典雅,主张独创。书中分诗体源流、诗法源流、诗家模范、诗法大意、作诗骨格、诗宗正法眼藏、诗法家数、诗学正法、律诗准绳、律诗要法、字眼、古诗要法、五言古诗法、七言古诗法、绝句诗法、讽谏诗法、荣遇诗法、登临留题诗法、征行诗法、赠行诗法、咏物诗法、赞美诗法、赓和诗法、哭挽诗法、作乐府法等二十五类,使学诗者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法其法,曲者可以绳其直”。有嘉靖十一年重刻本。(周维德)

【诗学梯航】诗话著作。明周叙撰。周叙(生卒年不详),字公叙,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丁艰家居,阅故籍,得其父所校录的叔祖子霖、东吴王汝器二家《诗法》,重加编定,间以己意补之,更名曰《诗学梯航》。卷首有正统十三年(1448)自序,卷末有彭光后序。全书一卷,分叙诗、辨格、命题、述作、品藻、通论六部分。叙诗述诗起自舜、禹之世,具体于《三百篇》,秦、汉歌曲寝盛,魏、晋作者渐多,唐诗自成一体,宋诗犹袭晚唐,元得唐人之风,明诗正声不变;辨格言古今诗格变化;命题论作诗之大要,宋、齐以后,渐加繁细;述作三篇,上中篇总论诗体,下篇专论唐律;品藻诸人,自魏至唐,上下百数十人;通论十九条,多言作诗之法,使初学者有规可循。有成化刻本。(周维德)

【诗家一指】诗话著作。明释怀悦撰。怀悦(生卒年不详),字用和,嘉禾(今浙江嘉兴)人。诗僧。怀悦论诗主张养气,认为“有气则有物有事”,所以创作必先养浩然之气;又主张以禅喻诗,认为诗有禅宗,“一视而万景归元,一举而群魔荡迹”。《诗家一指》一卷,分十科、四则、二十四品、普说外篇、三造等目。十科,即意、趣、神、情、气、理、力、境、物、事,都是创作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如谓“作诗先命意,

如构宫室,必法度形制已备于胸中,始施斤铍”。四则,即句、字、法、格,是关于遣字造句和修辞方法方面的问题。二十四品,本于司空图《诗品》,是关于艺术风格方面的问题。普说外篇,是关于创作中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作诗未必尽似,亦不必有似之类。三造,“发学者之关键”,是关于创作方法方面的问题。如“诗贵入门之正,行有未至,加以心力”;“诗以意义为主,文词次之”;“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等等。有成化刻本。

(周维德)

【诗法源流】诗话汇编。明释怀悦编。《诗法源流》一卷,分《诗法正论》、《诗法家数》、《诗解》、《诗格》四部分。卷首有尹春年序,卷末有周廷徵后序。周序谓此编“首录傅与德(砺)述范德机《正论》,并《家数》、《诗解》者,曲尽诗法之源流”。《诗法家数》,一作《诗文正法》,亦傅若金(与砺)撰,非杨载所撰之《诗法家数》。《诗解》六条,则节选自杨载《诗法家数》。《诗格》,撰者未详,共三十六格,有接项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等。每格以杜诗证之,并引王氏、吴氏、邹氏之说,阐发其义。尹序称,真德秀撰《文章正宗》,所谓正宗者,不过今人之所论句法而已,即体也、意也、声也,而《诗法源流》备此三说。有嘉靖刻本。(周维德)

【菊坡丛话】诗话汇编。明单宇辑。单宇(生卒年不详),字时泰,号菊坡,江西临川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官嵯县、诸暨、侯官知县。《菊坡丛话》二十六卷,凡论诗者二十四卷,论四六者一卷,论乐府者一卷,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诗人、风怀、婚姻、致政、耆寿、释梵、仙逸、哀溢、科举、兵戎、送赠、戏谑、身体、服饰、饮食、文史、诗法、四六、乐府等二十六类,分别辑录古今人诗话而丛集之,以示后人。卷首有成化元年(1465)自序,又有成化九年(1473)黎扩、黎近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编大旨欲配胡仔之书(《茗溪渔隐丛话》),故仍以‘丛话’为名。然采摭不及其博,又仔书多论文,此书多记事;仔书多考证,此书但钞撮旧文。例亦小殊。”有成化九年刻本。(周维德)

【松石轩诗评】诗话著作。明朱莫培撰。朱莫培(?—1491),号林竹懒仙。朱权孙,封宁靖王。卷首有《观诗录序》、《叙》,卷末有后序。《松石轩诗评》,或称《诗评》,一卷,一百四十五则。《诗评》以时代为序,上自汉、魏,下至金、元,品评作家作品,以人为主,人品作家近二百人,上自帝王将相,下及衲僧妇女,无不揽入。其中尤以评述唐代作家作品见长,达百余人。其品评作家作品多用比喻形容之语,如谓“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楫沿流,乘兴而来,兴尽

而已。左思之作,如丹崖翠嶂,金象乳壑,晶莹璀璨,光景可挹”。此外亦有用“高古”、“朗润清越”一类的评语,但不多。朱莫培评诗比较客观,不随人附和,人云亦云,如对宋、元诗人的评价,既对他们苟简颓靡、粗俗成风的习气十分不满,但又沙里拣金,不一笔抹杀。有成化十年刻本。(周维德)

【诗评】 见“松石轩诗评”。

【诗法】 诗话汇编。明杨成辑。杨成(生卒年不详),三山人。曾官太守。《诗法》,又称《群公诗法》,五卷,卷首有《重刊诗法序》,卷末有《重刊群公诗法后序》。该书辑录之诗话,“皆人所罕见”之秘籍,有白居易《金针集》,严羽《诗法》,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释怀悦《诗家一指》,某氏《沙中金集》等。后序对以上诗话作了如下的分析:“范德机秘旨之通确,严沧浪体制之要妙,杨仲弘《家数》之广备,《金针集》之意格纯正,《沙中金》之字眼响健,《一指》、《普说》之论辨精博”,学诗之法,莫备于此。《沙中金集》主要是论述修辞方面的问题,有“眼用实字”、“拗句换字”、“虚字收句”等三十几类。有成化十六年刻本。(周维德)

【诗话】 诗话丛书。明杨成玉编。杨成玉,生平不详。其汇辑此书时,官扬州府知府。其后任知府冯忠重刻于弘治三年(1490)。所收全系宋人诗话,计划收《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许颢《许彦周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十种。这些诗话后来流传甚广,但在当时却属于秘籍,颇不易得。杨成玉将它们汇成丛书刊行,在诗话的保存和流传上,是有意义的。有明刻本。

(刘德重)

【琼台诗话】 诗话著作。明蒋冕撰。蒋冕(生卒年不详),字敬之,全州(今广西桂林)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著有《湘皋集》。《琼台诗话》二卷,七十五则。该书仿程、朱门人之录其师说,摘录邱濬诗,述其本末,详加论列。卷首有自序,又有冯骥声《重刊琼台先生诗话序》。自序谓:“凡先生之乡人暨当世之士夫谈论有及诗者,冕或闻之,亦谨录于其间。”蒋冕对其师邱濬之作,推崇备至,“词多溢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前景物口头语,语言通俗化,是邱濬诗的主要特色。但邱濬诗亦有其短,徐泰《诗谈》说:“琼山邱濬,词虽丰腴,警秀则少矣。”冯骥声《重刊琼台先生诗话序》谓录一人之诗以为诗话者,始于《琼台先生诗话》。有明刊本。

(周维德)

【怀麓堂诗话】 诗话著作。明李东阳撰。该书亦

称《麓堂诗话》,一卷,一百三十多则。其诗学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崇唐抑宋。如称:“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可见其理论渊源于严羽《沧浪诗话》。不过,李东阳还承认宋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等宋代诗人,虽各有微词,但也都有所肯定。书中充分肯定了苏轼继杜、韩之后对于诗境开拓和诗歌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指出,经过韩、苏的一衍再衍,诗境虽开阔,“而其为格,亦渐粗矣”。后来胡应麟的“体以代变,格以代降”(《诗薮》)说,即由此而来。二是提倡“格调说”。书中强调:“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律”只是一种规矩,而“调”则大有巧妙,由其“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一听“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分辨何为唐音,何为宋调。这就是“格调说”的主要精神。三是不赞成刻板摹拟。如称:“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但李东阳的实践与理论并不一致,他说自己少时曾对盛唐李杜诸人“极力摹拟,恨不能万一耳”,而他最得意的诗作也恰恰是拟古乐府诗百首,实际上对后来的复古、拟古潮流,还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麓堂诗话】 见“怀麓堂诗话”。

【南濠诗话】 诗话著作。明都穆撰。该书亦称《南濠居士诗话》,一卷,七十多则。书中以记载古今诗人佚诗佚事为主,论诗不专主一家。其诗学见解,一是明确反对崇唐抑宋:“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可见明中期诗坛,虽是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天下,然宗宋诗者亦自不绝如缕。二是强调写真情实境,反对无为强作:“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山谷云:‘诗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谓今人之诗,惟务应酬,真无为而强作者,无怪其语之不工。”这显然也是针对当时诗坛流弊而

发。但总的看来,书中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不多,且往往就前人议论从而发挥之,甚少创见,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见地颇浅”。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南濠居士诗话】 见“南濠诗话”。

【存馥堂诗话】 诗话著作。明朱承爵撰。朱承爵,字子儋,号左庵、舜城漫士,江阴人。正德间(1506—1521)在世。不仕。工文擅画。好藏书,据说曾以爱妾换宋刻本《汉书》。有《灼薪剧谈》等。《存馥堂诗话》一卷,二十九则,兼涉记事、考证、评论。其中如论《天厨禁脔》所云“假借格”,举“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谓以“下(夏)”对“秋”,“因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谓以“子(紫)”对“洪(红)”,“住山今十载,明日又迁居”谓以“十”对“迁(千)”等,以为近于“凿”。论《茗溪渔隐丛话》所云:“昔贤听琴、阮、琵琶、箏诸诗,大率一律,初无的句,互可移用”,称:“余谓不然。”并举例以示其区别。凡此,均不为未见。而论“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则失之矣”,“至于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则过于拘泥。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拘虚诗谈】 诗话著作。明陈沂撰。陈沂(1469—1538),字鲁南,号石亭,浙江鄞县人。正德进士,授编修。嘉靖中出为江西参议,官至山东参政。有《拘虚集》等。《拘虚诗谈》一卷,凡四十八则,以品评作家作品为主,兼及理论,阐述其论诗主张。陈沂论诗,主张四言学《三百篇》,长辞学楚骚,五古学苏、李,近体学高、岑、王、孟、李、杜。诗宗盛唐,非薄晚唐。认为初唐承齐梁靡丽之风,晚唐声气衰弱,元诗尖巧卑弱,皆不足法。又认为诗体之变与世道之变相关。他说:“世日降,气日衰,声日淫,意日卑浅矣。”此外,对明诗的发展变化,也作了简要的论述。卷首有陈凤序,指出《拘虚诗谈》乃继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之后,“指明迷方,昭揭广路”之作。有《四明丛书》本。(周维德)

【李诗辨疑】 诗话著作。明朱谏撰。朱谏(生卒年不详),字君佐,浙江乐清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豫州、吉安二郡守。《李诗辨疑》二卷,首有小序,末有跋。朱谏有《李诗选注》一书,谓选诗要辨其真伪,凡疑者皆不入选;选诗又要辨其高下,凡语意平平,“虽是白作,亦未足深为法者”,亦不入选。故又撰《辨疑》一书,辨李诗二百十六首。谓《李白集》中,伪造者多,仅就唐人而言,就有李益、李赤之作,混入其中。如何辨别真伪?小序谓:“以今观之,其用事颇有典,而铺叙堆叠、格调卑劣者,必益之诗也。其鄙俚颠狂放肆,而无伦者,亦之诗也。”这是辨李诗真伪的标准。此外,还采用比较的方法,或采取前人

之说,辨别真伪优劣。辨证虽未尽当,但对读者、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敬乡楼丛书》本。

(周维德)

【夷白斋诗话】 诗话著作。明顾元庆撰。顾元庆,字大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家阳山大石下,乃号大石山人。其斋名夷白。嘉靖间在世,布衣终身。出自都穆门下。以图书自娱,藏书万卷,择其善本刻之。享年七十五岁以上。有《云林遗事》、《瘞鹤铭考》等。《夷白斋诗话》一卷,四十则,以记事为主,兼及考释,又述及书画。其持论平平,解诗颇迂。如称赞李东阳诗“有台阁气象”;记都穆《节妇吟》“青灯泪眼枯”,以《礼经》云:“寡妇不夜哭”,遂改“灯”字为“春”字。释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谓“鱼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密也。鱼,沉潜之物,故云”等。可见其诗学倾向。所记诗事亦较芜杂。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论诗多隔膜之语”,“所录明诗多猥琐”。但书中也保存了一些当时的诗歌资料。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蟬精集】 笔记著作。明徐伯龄撰。徐伯龄(生卒年不详),字延之,自号箴冠生,嵊县(今属浙江)人。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间在世。博学能文,工琴善书,性放旷。《蟬精集》十六卷,《千顷堂书目》著录为二十卷。“是书杂采旧文,亦兼出己说。凡二百六十一条,大抵文评、诗话居十之九,论杂事者不及十之一。其体例略似孟荣《本事诗》,其多录全篇,又略似刘埙《隐居通议》。其中猥琐之谈,或近于小说,而遗文旧事,他书所不载者,亦颇赖以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每则前均有小标题。有关诗话部分,多记诗人佚诗佚事,间及用字、用事之考证,有一定资料价值。有《四库全书》本。

(刘德重)

【徐冬诗话】 诗话著作。明何孟春撰。二卷,共七十五则,实从作者所著《徐冬序录》中摘其论诗之语而成。大抵以记事为主,论诗则从其师李东阳之说,推崇汉魏和唐诗。颇注重诗歌的用字遣词及音韵声调,如谓杜甫“花蕊上蜂须”句,妙在“上”字;李白“清水出芙蓉”句,妙在“出”字;韦应物“微雨暗深林”句,更妙在“暗”字。对陶潜、韩愈诗所用旁韵,则辨其乃用古韵而非旁出。这些,尚不失为一得之见。但解古人诗意识见较浅,如谓杜甫《呈吴郎》、《题桃树》二律“甚费解说,与他律不类”,虽承认其“自有渊奥处”,但犹以为“不可为典要”。持论又多作理学家语,如于杜甫《北征》咏马嵬事:“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谓“用意忠厚,立论精当”;而于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及“君王掩

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认为虽叙述事实,然“于臣子终非所宜”。对苏轼诗亦多有微词,如“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于云山旧衲衣”,谓用南唐韩熙载事,“非君子所宜”;又讥责苏诗《书山荣长老方丈》“还尽平生未足心”,谓“平生未足心使可还尽耶?谓之消尽则可”。诸如此类,实为拘泥,故后人评之为“以讲学之见论诗”,“胶柱而鼓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丛书集成初编》本。(陈明洁)

【诗文浪谈】诗话著作。明林希恩撰。林希恩,自署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据《说郭续》所收仅四十则,内容多论声律,以为“声之有律,非特近体为然”,古体乃至《三百篇》“亦皆声也”。其所谓“声”,不仅有平、仄,还有轻重清浊之别,认为“此天地自然之声也”。又论诗体、体格之变,称:“《三百篇》之后有汉魏,汉魏之后有六朝,六朝之后有唐,唐之后有宋,虽其美恶不齐,要之,耻相袭也。又曰:骚之后有赋,赋之后有文赋,亦耻相袭也。”又论诗法,称:“岂惟篇章之大有其法哉,虽至于一句一字之间,则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损之者矣。”又谓作诗贵得师承,“不得其师,而曰学由心悟者,自诬而诬人也”。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刘德重)

【俨山诗话】诗话著作。明陆深撰。陆深(1477—1544),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有《俨山集》等。《俨山诗话》一卷,凡三十二则。此编多记诗事,兼及考证,少理论阐述。陆深与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友善,曾共同编选袁凯《海叟集》。陆深论诗亦受七子之影响,如谓“古名手诗,有绝类如蹈袭者”,“诗句有相似而非相袭者”,实为剽窃模拟张目。此外,还评述了当代作家刘禹生、杨轼、于谦等人的诗作。有《四库全书》本。(周维德)

【蓉塘诗话】诗话著作。明姜南撰。姜南,字明叔,号蓉塘,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与陆深友善。据陆深《蓉塘诗话题引》称,蓉塘“方工进士业,余力及此书”,则知诗话为早年之作。又据书中引李东阳《怀麓堂稿》所载诗云:“读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李东阳卒于正德十一年(1516),则姜南当为正德(1506—1521)以后人。《蓉塘诗话》二十卷,卷首有陆深《题引》,卷末有张秉壶、洪梗跋。书中每卷前另有篇题,如卷一篇题《半村野人闲谈》,卷二作《洗砚新录》,卷三作《辍筑记》,卷四作《鹤亭笔乘》等。该书名为诗话,实类小说,多记文史典故,诗文佚事。其评述诗人诗作,较为肯綮允当,但少理论阐发。对时事的评述,伸张正义,多为醒世名言。如对唐玄宗、宋徽宗好色爱石、误国害民的述说,足醒

世人耳目。有些文献的辑录,为人所罕见,亦有补于正传之缺失,或校正今本之脱误。如《李百药以诗脱难》条所引《隋唐嘉话》语,今本《隋唐嘉话》佚载;又如《指天画地》条所引陆贾《新语》“修圣人之道”之“修”字,今本《新语》“修”字处空缺,足资校补。有嘉靖二十六年洪梗刻本。(周维德)

【颐山诗话】诗话著作。明安磐撰。安磐(生卒年不详),字公石,号颐山,嘉定(今属上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史、兵二科给事中,进兵科都给事中。屡抗疏直谏。《颐山诗话》有嘉靖三年戊子(1528)自序,书当成于此时。该书一卷(《明史·艺文志》作二卷),五十八则。其内容以评品诗句为多,间涉考证及掌故。“其论诗以严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诗如参禅”,“当一味妙悟”;又称“思入于渺忽,神恍乎有无,情极乎真到,才尽乎形声,工夺乎造化者,诗之妙也”。其评诗标举“意在言外,神交物表,偶然得之,有天然之趣”,又标举“风格气骨”、“贵情性”。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如以海棠为杜甫母名,尚沿小说之误;又以‘朝扣富儿门’四句讥杜甫‘致君尧舜’之妄,亦失之固”诸条外,其持论大抵平稳,比较诗句优劣亦多有可取。然其评明诗称:“本朝诗在国初,高、杨、张、徐可比唐初王、杨、卢、骆;及乎弘治、正德之间,英才继起,各以其能,追配古作,直欲越元嘉而之上,洋洋乎盛矣哉!”则未免评价过高,此亦为时人之通病。有《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梦蕉诗话】诗话著作。明游潜撰。游潜,字用之,江西丰城人。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官云南宾川州知州。著有《梦蕉存稿》、《博物志补》等。《梦蕉诗话》一卷,六十五则。内容涉及考据典故、佚诗佚事、解诗评诗等。其考据多袭前人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为“未免剽剽陈言”。其所记佚诗佚事,以明代前期居多,如记宋濂辞归事、岭南陈献章(号白沙)事,有一定资料价值,但也记有诗讖、梦兆、仙诗等神异荒诞之事。其诗学见解,一是对唐、宋、元、明(前期)诗的评价,比较平允。二是论诗重自然浑成,称赏“流水行云”。但也重炼字,称“古人诗意不凡,句内用字,亦须音律清婉、含蓄有馀,不易易也”。三是解诗,反对牵强比附,如于《许彦周诗话》和《霏雪录》强解杜牧《咏赤壁》诗,均以为“僻哉”,所论甚是。然其解刘禹锡《游虎丘寺生公讲堂》诗,则又称“梦得盖以生公比当时执政者”云云,则仍不免拘执之病。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作诗体要】诗话著作。明杨良弼撰。杨良弼,字梦征,号古岳主人。生卒年、生平事迹不详。《作诗体要》一卷,集诗体八十种,每体后附以诗例,加以

评析说明。其论诗以盛唐为宗,杜甫为法,称:“学诗者,必以老杜为祖。”又对陈子昂特别推崇,视为“唐之诗祖”。论唐诗体,与高棅不同,只分盛、中、晚三唐,而无初唐。他认为初唐诗“未脱陈、隋间习气,不成体”;而把其中优秀诗人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之作品,列入盛唐体。书中不限于论诗体,亦论述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如谓“诗以意为脉,以格为骨,以字为眼”;又以“格高、意到、语工为上”。他重视艺术风格,认为“意到语工,而格不高”,不能称为上品。他提出“诗如人性”的命题,突出了作家个性在艺术风格中的重要地位。有占岳书屋手稿本。(周维德)

【诗法源流】 诗话汇编。明王用章辑。王用章,字宪伯,荆南(今湖北江陵)人。生平事迹不详。《诗法源流》三卷,卷末有邱道隆后序,称此编出于释怀悦《诗法源流》,“增入古人论述与诗足法者,厘为三卷”。改《诗法家数》为《诗法正宗》,删去《诗解》,增入《诗法》、《诗法正宗》、《诗宗正法眼藏》为一卷。取汉、魏、晋、宋古诗为一卷。改诗格三十六为三十三,引诗从三十六首增至五十一首为一卷。入录《诗法》(黄子肃撰)、《诗法正宗》、《诗宗正法眼藏》(揭曼硕撰)。有嘉靖二十九年刻本。(周维德)

【谈艺录】 诗话著作。明徐祯卿撰。该书一卷,二十四则,专论汉魏古诗。其主要内容为创作论,基本观点是重情贵实。认为诗人受外界客观事物的触发而产生的感情活动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有了这个源头,才能由“情”而产生“气”,由“气”而生“声”,由“声”而生“词”,由“词”而生“韵”。这就把诗人的感情活动放到诗歌创作的中心地位。同时,“情”与“气”、“词”等表达得好不好,又需要借助“思”、“力”、“才”、“质”等因素来加以辅助和协调。书中并对以上诸种因素综合作用、共同完成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描述,指出不管各种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具体途径多么不同,都必须经过感情的萌发、充沛、凝聚和“气之达”、“思之约”、“韵之齐”、“质之检”、“词之藻”这样一个艺术思维的过程。在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像这样专门论述文学创作过程和艺术思维规律的,实不多见,故颇值得注意。徐祯卿主张“因情立格”:“夫情既异其形,故词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即诗歌的格调和各种艺术法则都应表现为表现诗人的感情服务,而不能削足适履,让各种不同的感情受某种固定的格调或法则的拘束。由此扩及到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书中也主张“由质开文”,而不赞成“由文求质”或“文质杂兴”。由此可见,徐祯卿的“重情贵实”说有

其完整的体系和深刻内涵。但徐祯卿并未能摆脱复古理论的影响,在对待古诗发展流变的看法上,他是持退化论的。他认为“上访汉、魏,古意犹存”,“汉诗,堂奥也”,“魏诗,门户也”,晋诗则等而下之,“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敝也不可以悉矣”。这还是“取法乎上”的意思,仍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此外,书中对于诗歌创作的思维活动和艺术规律,往往概括得比较玄虚,如称“诗者,所以宣元郁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此轮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等等,多少带有不可知论的色彩,并对后来的“神韵说”具有一定的影响。有《历代诗话》本。(刘德重)

【娱书堂诗话】 诗话著作。明阙名撰。该书据《说郭续》所收仅五则,小标题分别为“歌名”、“孟郊”、“应制诗”、“酸文”、“赤壁诗”。其论应制诗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派。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若清淡之语,终不近。”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刘德重)

【升庵诗话】 诗话著作。明杨慎撰。该书版本、卷数不一: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又有《函海》本十二卷、补遗三卷。现在通行的《历代诗话续编》本则据上述各本重新编订,共十四卷,七百五十六则,每则均有标题,次序按标题第一字笔画数排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历代诗话续编》校点本时,又增补了十八则附录于后。该书内容以考证辨释居多,评诗论诗次之,同时还兼录佚诗佚事等。从书中表现的诗学见解看,杨慎取径较宽,论诗不主一格,反对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说和尊唐贬宋的偏向。他认为,“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卷八),从总体上看,“宋诗信不及唐”(卷四),但就具体作品言,则不可一概而论。他指出,宋诗中也有佳作,并不逊色于唐,唐诗中也有劣作,并非首首皆佳,因而主张对唐、宋诗都应作具体分析。这一态度是比较客观的。从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论来看,杨慎在李、杜二家中似更称赏李白,比李诗为《史记》,比杜诗为《汉书》,故王世贞称其“为李左袒”(《艺苑卮言》)。此外,在唐代诗人中,他比较推许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在宋代诗人中,则对黄庭坚、陈师道颇有微词。对于诗歌风格,他比较赞赏“清新”、“涵蓄蕴藉”、“工致天然”,而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深致不满。不过,他又明确赞成以学问为诗,强调“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卷一四),强调“诗文用字须有来历”(卷一一)。所以在评诗时,又常用“夺胎换骨”的说法。这些,显然又接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由此出发,杨慎在书中还用了大

量篇幅去考证用字造语的来历出处,有的兼及词义的训诂和辨析,这构成了《升庵诗话》的主要内容。书中有一些前后牴牾以及考释疏误之处,可能是由于全书非写于一时一地,且远贬云南,手头无文籍可稽而造成的。总的看来,杨慎学问渊博,考证为其所长,而论、评及解诗精义较少。然“其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德重)

【**谭苑醍醐**】诗话著作。明杨慎撰。《谭苑醍醐》九卷,卷首有《自序》,谓:“醍醐者,炼酥之精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谭苑也。夫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该书多述诗事,兼及考证,少理论阐述。涉及理论的条目如《李华论文》、《萧颖氏论文》、《许浑》、《三千歌舞》、《庾信诗》、《大招》等。其中对庾诗较为推崇,称其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对晚唐许浑之诗则多微词,称“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虽腹笥所陈,或有误记,不免为后人所摭拾。要其大体,终非俭腹所能办也”。如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李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即是其例。该书除卷一《庄子解》外,其余尽载《丹铅录》中,间或有未见者,不过数条而已,疑是从《丹铅录》中辑出单行者。有《四库全书》本。

(周维德)

【**千里面谭**】诗话著作。明杨慎撰。该书据《说郭续》所收,计录诗九首,议论文字四段,所谈内容为早期七言律诗及七言排律的形成。如首录梁简文帝《春情》诗,谓:“此七言律之始,犹未能也,而格调高古,当知其滥觞。”又如录沈君攸《薄暮动弦歌》、《桂楫泛中河》二首,谓:“此六朝诗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雄浑工致,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有《说郭三种·说郭续》本。

(刘德重)

【**闲书杜律**】杜诗注本评论。明杨慎撰。该书据《说郭续》所收,仅一段文字,略谓“杜诗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辞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牵强不通,反为作者之累。”以下即批驳张伯生假托虞集之名所撰杜甫七言律注本之谬误,如引其“解‘生长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台,故春风面不可见。惟其独留青冢,故环佩声归月下闻。’”评曰:“此乃村学究腐烂讲套语,岂可笺杜乎?”又如谓“‘幽栖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姑以覩其诚意否’,是杜之阴险逆诈也,岂所谓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末云:“可恶可厌,其他尚多,聊举一二耳。牵缠之长,实累千里。此既晦杜

意,又污虞名。曷讵其板,勿误人也。”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刘德重)

【**诗谈**】诗评著作。明徐泰撰。徐泰,字子元,海盐(今属浙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官光泽知县。《诗谈》一卷,四十一则,前有小序,后有跋语。其跋语称:“右谈者俱往矣。未及知、知未悉者,弗谈也。方今作者,蛟腾凤起,彬彬乎盛矣,予毫未及也。”知该书作于其晚年。书中所评,皆明代诗人,自刘基、高启以下至黄省曾,后附女子、道士、僧人,各为品目。其体例摹仿《臞翁诗评》,大多用四言数句,概括诗人风格、成就。如评高启:“岱峰雄秀,瀚海浑涵,海内诗宗,岂惟吴下。”评杨基:“天机云锦,自然美丽,独时出纤巧,不及高(启)之冲雅。”书中于何景明条下,述及明诗的发展,云:“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可见其诗学见解,“大抵宗旨不出七子门庭”(《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提要》)。有《学海类编》本。(刘德重)

【**逸老堂诗话**】诗话著作。明俞弁撰。俞弁(1488?—1547后),字子容,一作子客,号守约居士、戊申老人,长洲昆山(今属江苏)人。好藏书,能诗。有《山樵暇语》。《逸老堂诗话》二卷,一百五十余则。据卷首自序,当成于嘉靖丁未(1547)。该书以考证辨释为主,兼及论评和记事。书中对前人诗作、诗话或诗论多所辨正,如辨《艺文类聚》载束皙《饼赋》有“牢九”之目,苏轼诗遂以“牢九具”对“真一酒”,引《酉阳杂俎》证“九”字乃是“丸”字之误,“‘牢丸’即今之汤饼是也”(卷上);辨都穆《南濠诗话》引《白燕》诗“谓杨廉夫作,据《鼓吹续编》证此诗乃常熟时大本所作”(卷上)等,均能持之有故。其诗学见解,则大体与杨慎相近,反对扬唐抑宋。同时,他也不同意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观点,引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及葛立方“欲下笔,当自读书始”诸语,大体上仍赞成以学问为诗。至于对“本朝之诗”的看法,书中则称引唐荅的话说:“……至李空同、何景明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窃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雅稍远矣。”(卷下)表明了他对“前七子”复古、拟古之风的不满。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刘德重)

【**名家诗法**】诗格丛书。明黄省曾编。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吴县人,曾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名家诗法》八卷,汇集了唐、宋、元诗格著作多种,计有白居易《金针集》、严羽《诗体》、范梈《木天禁语》、杨载《诗法》及《诗家一指》、《诗学禁脔》、《沙中金集》等七种。其中真伪杂糅,如严羽《诗体》文字颇有与今

本不同者。《沧浪诗话·诗评》云：“李、杜数公，如金鸪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名家诗法》本此条作：“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鸪擘海，香象渡河，龙吼虎哮，涛翻鲸跃，长枪大剑，君王亲征，气象自别。”即为一例。至于后附“名公雅论”，引及元人论诗之语，而统归于严羽《诗体》之下，尤为颠倒错乱。陈衍《元诗纪事》不辨，遂以讹传讹。但此书毕竟保存了古代诗论文献，尚值得肯定。朱绂《名家诗法汇编》亦曾以此书为基础编纂。有明刻本，台湾广文书局《古今诗话续编》据明嘉靖二十四年刊本影印。（张伯伟）

【艺苑玄机】诗话著作。明邵经邦撰。邵经邦，字仲德，号弘斋，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改刑部。以日食上疏忤旨，谪戍镇海卫，卒于戍所。有《宏艺录》。《艺苑玄机》一卷，七十三则，附于《宏艺录》卷首，成于嘉靖四年（1525），全为论诗论文之语。其论诗，以谈诗法为主，遍及诗之教、诗之体、诗之才、诗之思、诗之格、诗之律、诗之病、诗之意、诗之情、诗之景、诗之讖、诗之义、诗之调、诗之趣、诗之魔、诗之品、诗之注诸方面。其论诗之才、思，不同意严羽的“别材”、“别趣”、“非关学”、“非关理”之说，称“古者妇人女子莫不能诗，盖由学也”，又称“《清庙》缉熙，莫非至理所寓，未可不谓之诗，此外别无所谓理也。”然又赞同严羽“妙悟”说，称“诗贵妙悟超脱，仙家所谓超凡入圣”。又称“诗之趣主于引导性情，必性适情怡，然后加以山川之效灵、风月之助美，油油然不可遏矣”。二说未能圆融。其论诗之意，称“贵于人所不经尝，能死中求生，无中求有，则过人远矣”，又称“贵有气骨”，“今人多被旧题、旧事、旧话所厌，故胸次不高。胸次不高，则气骨委靡。必欲发其隽迈英爽之气，临文须将古人蹊径放在一边，不问先秦、两汉、初、盛、中、晚，且只畅发我胸中一段议论”。联系其评明诗所说“国初诗好者是元，成化间好者是宋，至弘德、嘉靖以来，衰乎盛唐矣”，似有不赞成拟古、蹈袭之意。有《武林往哲遗著》本。（刘德重）

【唐诗品】诗话著作。明徐献忠撰。徐献忠（1483—1559），字伯臣，号长谷，又号九灵山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举人。再试不第，授奉化知县。旋效陶渊明，弃官，徙居吴兴。与何良俊、董宜阳、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著名，时称“四贤”。有《长谷集》、《吴兴掌故集》、《乐府原》、《六朝声偶》等。《唐诗品》一卷，前有自序，刊于《唐百家诗》前，据朱警《唐百家诗后语》署“嘉靖庚子（1540）之秋”，知其成书当在此前。其自序论唐诗，主“三变”说，即“开元以还”一变，“元和而下”一变，“至于开成极矣”。

其内容为按人立目，前列太宗皇帝、玄宗皇帝，以下列虞世南、许敬宗、王、杨、卢、骆，至鱼玄机、罗虬，总共八十人，各为品评。然所评不及李、杜、元、白，不知何故。有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唐百家诗》本。

（刘德重）

【四溟诗话】诗话著作。明谢榛撰。该书原名《诗家直说》，四卷，四百余则。全书以谈论诗法为主，兼涉评诗和记事。其诗学见解，首先是尊唐抑宋，主张复古，拟古。这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基本上是一致的，称“作者当以盛唐为法”。但谢榛又看到“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因而不赞成刻板摹仿，拟古不化：“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书中有一则记载他和李攀龙、王世贞等人讨论初盛唐十四家诗集“孰可专为楷范”的问题，李、王等人“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谢榛则云：“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哀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这说明谢榛学唐的路子较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谢榛之论出而“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摭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由此亦可见谢榛诗论在“后七子”中的影响。其次，谢榛的诗歌理论，仍是建筑在“格调”说的基础上，上述所谓“神气”、“声调”、“精华”三要，实际上就是“格调”。书中又有“诗家四关”之说：“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之四关。使一关未过，则非佳句矣。”此所谓“诵”、“听”、“观”、“讲”，其实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诗调诗格所提的要求。由此出发，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谈论句法体制，平仄音韵，对偶虚实等有关诗歌格调的问题。再次，在创作上，谢榛反对先立意，而主张先“辞”后“意”，“意”随“辞”生。他认为宋诗的毛病就出在“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他把“意”分为“辞前意”和“辞后意”两种，反对“辞前意”而强调“辞后意”。他认为先有了“意”，再寻求“辞”来表达，“辞”就被“意”框住了，反而“辞不能达，意不能悉”。所以主张“辞后意”，即由客观事物触发，随同“辞”一起产生出来的“意”。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即主题不应形成于创作前而应完成于创作中；但又有其不合理成分，即“辞”和“意”是不可能截然划分开来的。谢榛重“辞”轻“意”，主张先“辞”后“意”，显然带有形式主义倾向。在这一观点支配下，他对诗歌字句的要求极其严格，强调“诗不

厌改”，并喜欢替人改诗。如他认为杜牧《开元寺水阁》诗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不工，拟将“雨”改为“月”，“落日”改为“静夜”，竟不顾全诗所写为登高晚眺，并非夜中之景；又如谢朓的名句“澄江净（一作静）如练”，他亦认为“澄”、“净”意思重复，拟改为“秋江净如练”。凡此之类，颇遭后人讥议。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刘德重）

【诗家直说】 见“四溟诗话”。

【解颐新语】 诗话著作。明皇甫汈撰。皇甫汈（1497—1582），字子循，号百泉山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云南按察使佥事。有《皇甫司勋集》等。《解颐新语》八卷，分叙论、述事、考证、论藻、矜赏、遗误、讥评、杂记八门。自称：“匡鼎说诗，人为解颐；陆贾造语，帝每称善。余窃比于二子矣。”书中多引前人之说，附以己见，虽无精识之义，但所述诗论，如“诗贵和平，令人易晓”；“人才有限，不可强饰”；“千炼成句，百炼成字”；“贵独创，尚趣味”等等，对当时诗歌创作亦曾起一定作用。卷首有黄鲁（省？）曾序，谓“此之所著，间陈乎今人之未闻，尽发乎古人之未闻”。但书中亦多谬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辨明之。有明刻本。

（周维德）

【西岱诗话】 诗话著作。明简绍芳撰。简绍芳，字西岱，江西新喻人。生平事迹不详。简绍芳与杨慎有忘年之交，论诗颇受杨慎影响。《西岱诗话》一卷，凡四则。李白有无写诗寄杜甫，明时也有争议。简绍芳认为李白有诗寄杜甫，如《沙邱城下寄杜甫》，因为这首诗的“风骨音节，为白诗无疑”。杨慎妻黄娥是位女诗人，她写的诗词多为时人所传诵。简绍芳特别喜欢她写的“才经赏月时”一首，认为此诗言感时伤别，而无断肠堕泪之语，因而评为“绝唱”之作，深得诗家三昧。有《学海类编》本。（周维德）

【四友斋丛说】 笔记著作。明何良俊撰。该书初刻于隆庆三年（1569），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为三十八卷，重刻于万历七年（1579）。其初刻本自序称：“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何子读书颇愚，日处四友斋中，随所闻见，书之于牍，岁月积累，遂成三十卷云。‘四友’云者，庄子、维摩诘、白太傅与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丛说者，言此书言事细碎，其芜秽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则冗冗不可为用者也。”全书分经、史、杂记、子、释道、文、诗、书、画、求志、崇训、尊生、娱老、正俗、考文、词曲共十六类，末卷又附以续史一类。其中谈诗三卷自卷二四至卷二六，分别标为“诗一”、“诗二”、“诗三”，共一百四十则，可作诗话读。“诗一”多论唐以前诗及诗法理论，

又多称引皎然、杨慎论诗之语；“诗二”多论唐、宋、元诗；“诗三”多论明诗。其诗学观点，大抵主“性情”说，同时又标举“风骨”，兼收“神韵”。如称：“诗苟发于情性，更得兴致高远，体势稳顺，措词妥贴，音调和畅，斯可谓诗之最上乘矣。”又称：“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录，复非言筌可得，……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盛唐之所重者风骨也，少陵则体备风骨。”又称：“严羽卿（按严羽字仪卿，明人多误作严仪字羽卿）论诗，以为当如水中月，镜中之花，此诗家妙语也。又引禅家羚羊挂角、香象渡河等语，正以见作诗者，当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学诗者诚不可不知此意。”由这些诗学观点出发，其评论历代诗人，于六朝称“当以三谢为正宗”；于初唐称王绩“能洗净铅华，独存体质，……于情性最近”；于盛唐称杜甫为“集大成者”，谓“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微君之高旷，李颀之沉着，岑嘉州之精炼，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极者也。然终输杜少陵一筹”；于中唐则盛称白居易，谓“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又称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虽推崇唐诗，但亦给予宋诗一定地位，如称：“苏东坡、黄山谷、王半山、陈后山诸公出而诗道大备。”对于明代诗坛，书中亦推许李、何等前七子，甚至把李梦阳比作唐代的陈子昂，这反映了当时的一般看法。而对前七子的诗歌成就，则认为李梦阳“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何景明“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推边贡“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可谓特见。书中还记载了当时的一些诗人佚事，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有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刘德重）

【元朗诗话】 诗话著作。明何良俊撰。三卷，出自《四友斋丛说》。前二卷多述理论，品藻前人。后一卷品评诗人，多录交游之作。参见《四友斋丛说》条。（周维德）

【名贤诗评】 诗话著作。明俞允文撰。俞允文（1512—1579），字仲蔚，江苏昆山人。年未四十，谢去诸生，致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友善，为嘉靖“广五子”之一，但不喜李攀龙诗。有《俞仲蔚集》等。《名贤诗评》二十卷，卷首有自序、凡例。该书以时代先后为序，以诗隶人，以诗话隶诗。载其全篇于前，引诸说附于诗后。入录作品采自汉、魏至唐、宋名家之作，评论取自六朝至宋、明诸家之说。评论不拘一格，异同并录。书中唐、宋部分，多袭用蔡正孙《诗林广记》语。故许学夷《诗源辨体》谓其取《诗林广记》，复稍损益，加以汉、魏、六朝，题曰《名贤诗评》，以为己有，正可谓钝贼耳。有万历刻本。（周维德）

【王右丞诗话评】诗话汇编。明顾起经辑。顾起经(生卒年不详),字长济,又字玄纬,号罗浮外史,江苏无锡人。以国子生授广东盐课副提举。《王右丞诗话评》一卷,辑录唐、宋作家评王维诗画之语。述评资料辑自文集、选集、笔记、诗话、画谱、家谱、序跋、史传等。搜辑之广,非博识之士不能为。如首条出自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他皆效此。有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周维德)

【国雅品】诗话著作。明顾起纶撰。顾起纶,字更生,号元名,一作元言,无锡人。以国子生累官郁林州同知致仕。善书法。有《句漏集》、《赤城集》、《国雅》。《国雅》为顾起纶所编明诗总集,其中附有《品目》一卷,后丁福保将其辑入《历代诗话续编》,题作《国雅品》。顾起纶自序称:“余作《国雅》既成,复就选中若干名家,溯自洪初,以迄嘉末,怜高哲之既往,嘉英篇之绝倒,辄一赏誉之。偶有所得,僭附鄙见,只从世代编次,非敢谬论甲乙。”于此可见其撰述意图。该书仿钟嵘《诗品》体例,以人系品;但不像《诗品》那样以上、中、下三品定诗人优劣,而是按诗人身份分为士、闺、仙、释、杂五品,每品之中,按时代先后编次,起自明初,迄于嘉靖末,共列明代诗人二百三十七人,其中除七十四人有品无评外,其他均就其诗作风格、特点、成就、地位等逐一予以品评。其诗学渊源,首称严羽:“若夫品之源流,前贤叙论,代有高鉴,惟严仪卿一家,颇称指南。”(自序)于明人诗话,则推崇徐祯卿《谈艺录》、谢榛《四溟诗话》、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诸家。其论诗宗旨,大抵也承前后七子而与徐祯卿、谢榛、王世贞等主“格调”而又渐趋“神韵”者为近,所以赞赏“格高调雅,驰骋于汉、唐之间,婉而有味,浑而无迹”(评徐昌谷语)的风格。书中多称引王世贞语,对前后七子也多过誉之词。由于收列诗人较多,不免有芜杂之嫌,但明代诗人诗作的资料也藉此得以流传。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诗镜总论】诗话著作。明陆时雍撰。陆时雍,字幼淳,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嘉靖进士。历知上高、永宁县,有惠政。迁工部郎中。因弹劾武定侯郭勋欺罔朝廷,落职。郭勋败后累擢江西提学副使,以疾归里。有《平川遗稿》、《南游漫稿》、《古诗镜》、《唐诗镜》。《古诗镜》、《唐诗镜》是陆时雍所编古诗总集和唐诗总集,合称《诗镜》,前附《总论》一卷,后丁福保将其辑入《历代诗话续编》,题作《诗镜总论》,共一百十九则,历评自《诗经》至晚唐诸家诗。“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主“情”而不主“意”,主“韵”而不主“法”。“情欲其真,

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这是陆时雍论诗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诗本乎“情”和本乎“意”是大不相同的:“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因此,他特别强调诗“经不得着做”,“直是不落思议法门”,并明确标举神韵:“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这样的诗,自然不可能有固定的成法:“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他认为:“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这就把“韵”提到了诗歌艺术的核心地位。他并不否定技巧:“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姿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适当的“点染”、“转折”、“犹夷”、“绰约”、“吞吐”、“游行”,他认为是“韵之所由生”的必要手段。他反对“过求”:“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也就是反对“雕虫丧天真”之意,是服从于他的本“情”求“真”的要求的。他十分鲜明地尊李抑杜,称:“太白其千占之雄乎?……少陵何事得与执金鼓而抗颜行也?”“神往神来,不知而自至之妙,太白则几及之”。“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这也显然是以“神韵”、“天然”为标准来衡量的。陆时雍不赞成复古、拟古,但仍可能受到前后七子及胡应麟“格以代降”说的影响,所以在书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崇古倾向。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诗体明辨】诗话著作。明徐师曾撰。徐师曾(1517—1580),字伯鲁,江苏吴江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著有《文体明辨》等。《文体明辨》八十四卷,盖取吴讷《文章辨体》而损益之。清人叶生、汪淇摘编为《诗体明辨》。《诗体明辨》一卷,所述诗体有谣辞,有古诗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有近体歌行、律诗、排律、绝句,又有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以及杂句、杂言、杂韵、杂名之类。其持论多取当代名家之说,如徐祯卿、杨慎、何景明、朱承爵、李东阳、王世贞、皇甫汸、谢榛等人的论诗之说,兼取古代名家之论。论述虽无新见,亦足备览索检。有《古今图书集成》本。(周维德)

【诗的】诗话著作。明王文禄撰。王文禄(1507?—1575后),字世廉,海盐(今属浙江)人。嘉靖举人。著有《廉炬》、《文脉》等。《诗的》中有“嘉靖初……时予年十六”语,由此推知其生年。前有万历乙亥(1575)三月自序,书中又有“万历乙亥仲秋”记

事,则书当成于此时。卒年亦当在其后。全书三十四则,以论评为主。其论诗称:“诗家三昧必由悟入。”“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不专在诗,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今人专意作诗,则惟求工于言,非真诗也。”可见其主“性情之正”,强调作诗应出自真情实感。同时,又主张“诗法当严”,重视诗律、诗眼、句法及赋比兴的运用等,并多举杜诗为例,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逐句进行分析。并谓杜多以俚语入诗,“且不可效之”。此等处,皆未免迂腐。有《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刘德重)

【骚坛秘语】诗格著作。明周履靖撰。周履靖,字逸之,初号梅墟,改号螺冠子,又号梅颠道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其《夷门广牍》自序作于万历丁酉(1597),可知为万历时人。好金石,工书法,又善画山水、人物,专力为古文诗词。撰有《夷门广牍》、《梅坞贻琼》、《画评会海》、《梅颠稿选》等。《骚坛秘语》三卷,上卷论诗之本、式、制、情、景、事、意、音、律、病、变、范,中卷论诗之要、格、体、情、性、韵、调、会,下卷论诗之篇法、对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辨体等。大抵杂纂诸家旧说而成,缺乏明确宗旨。如论作诗强调“须澄静此心”,并强调“真情”、“真景”,而其标举诗境,则又以“玄、圆、沉、雄、郁”为甲等,以“清、明、深、壮、密”为乙等,以“逸、雅、重、健、婉”为丙等,以“淡、奇、俊、怪、丽”为丁等。颇有龃龉。上、中二卷引书多不注明,下卷则杂纂皎然、严羽及元人《诗法家数》、《木天禁语》、《诗家一指》诸书而成。按周履靖乃当时名士,尝与文嘉、王穉登等相唱和,该书芜杂舛陋,当系坊间托名伪作。有《夷门广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张伯伟)

【诗源撮要】诗格著作。旧题明张懋贤编,周履靖校。张懋贤,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平不详。周履靖,见《骚坛秘语》条。《诗源撮要》一卷,选录杜甫诗五十三首,每首均加以注解,又多标举其诗格。末附题杨载至治壬戌(1322)《诗法源流序》。考其内容,实袭自宋林越《少陵诗格》,旧题元杨载《杜律心法》等书。如《秋兴八首》分别标为“接项格”、“交股格”、“纤腰格又名开合格”、“双蹄格”、“续腰格”、“首尾互换格”、“首尾相同格”、“单蹄格”等。有《夷门广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刘德重)

【冰川诗式】诗格著作。明梁桥撰。梁桥,字济甫,号冰川子,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嘉靖年间在世。《冰川诗式》十卷,作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涣之序及顾宪成之题辞皆谓其积三十余年学诗之功而萃于此书,则其可能生于明正德年间。此书论述

诗体、诗韵、诗格,基本上是敷演宋、元以来诗法一类著作之陈说,而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梅鼎祚《刻冰川诗式序》将它与同时的几部诗论著作如《谈艺录》、《解颐新语》、《艺苑卮言》、《诗薮》相提并论,可见其颇受时人重视。此书重视诗格,与明代诗坛上的格调理论正相呼应。其所列诗格,汇总了《木天禁语》、《诗法源流》等书中的种种名目,并一一加以解释,对后人理解阅读尚有助益。此书在明代颇有影响,万历年间周履靖之《骚坛秘语》、王昌会之《诗话类编》均有所取资。有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台湾广文书局《古今诗话续编》据明刻本影印。(张伯伟)

【全相万家诗法】诗话著作。明汪彪撰,汪廷祖绘图。汪彪,字芝轩,江西乐平人。生平事迹不详。《全相万家诗法》六卷,其中后二卷附诗。汪彪编著此书的目的,“以为启蒙之方,俟后之初学者效之,善吟者审之”,论述作诗方法,提供范例,供人仿效。这也可以说是明代拟古主义风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汪彪论诗本于严羽《沧浪诗话》,主张参禅妙悟,提倡别材别趣。但严羽忌俗,汪彪不忌俗,认为俗字俗句是难免的,只要炼俗就行。关于叠字叠意,他认为字叠不碍理,只要不叠意。他还对七言律诗的起句、联句、结句的作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又以两卷的篇幅,对古今名士之七绝、七律诗作,从立意和作法两方面作具体的论述,供学诗者模仿。此外,汪彪还把自己拟作的作品,录入诗话中,以示初学者。有明书林翠坡刻本。(周维德)

【说诗】诗话著作。明谭浚撰。谭浚,字允原,江西南丰人。生平事迹不详。《说诗》三卷,卷首有《说诗序》,谓“说者说也。说诗而解颐,说心而研虑,得其说者,知其本矣”。卷上分总辨、得式、失式、经体、时论五类,统说、性教、义原、支流、情词、兴趣、志意、道理、专一、讽喻、感发、德音、依托、事实、语类、气象、精神、音律、篇章、体制等八十门,综述诗之作用、风格、命意、布局等。卷中分章句、对偶、声韵、词义、名目、题目六类,析言、五言、七言、杂诗、拟古、律诗、排律、近律、绝句、联句、集句等一百六十七门,综述诗之分类、声对、体式诸形式。卷下分世代、正编、杂录、人物、附说五类,唐虞、三代、战国、楚风、西汉、东汉、建安、正始、太康、元嘉、六朝、唐初、盛唐、晚唐、宋等五十一门,论述诗之源流发展,品评历代选本和诗人诗作。谭浚论诗主张“道达心志,发挥性情,和顺道德”。他特别强调“情至则词至”,反对为文造情。他说:“词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而体愈下矣。”提倡诗要自然含蓄,反对雕章琢句。他说:“穷刻削,则伤巧而不壮;繁采绘,则淫丽而不雅。”有万历七年序刻本。(周维德)

【艺苑卮言】 诗话著作。明王世贞撰。该书八卷。据书前自序称,前六卷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其后“岁稍益之”,至嘉靖四十四年始脱稿,由里人梓行,至隆庆六年(1572)增入后二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全书共四百七十餘则,以评诗论法为主。其内容编次,大体上卷一为分类摘录前人论诗文之语及分体论诗歌作法,卷二、三历评《诗经》至汉魏六朝诗人,卷四专评唐宋诗人,卷五专评明代诗人,卷六、七、八多证诗人佚事兼及评议。“其持论,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这是王世贞论诗的基本观点,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复古、拟古倾向。他主张“师匠宜高,据拾宜博”,一方面反对那种让人一望而知的“剽窃模拟”,说是“诗之大病”;一方面又提倡不着痕迹的巧妙模拟。其诗学理论的核心,仍是“格调”说。但他对“格调”的阐述,也与李梦阳、李攀龙不尽相同。他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就在“格调”说中引进了“才”、“思”的概念。“格”自“调”来,“调”自“思”来,“思”自“才”来,而这个“才”,则大抵相当于严羽所说的“别材”。论诗只讲“格”、“调”,不讲诗人的才性,势必要走到刻板模拟的道路上去。王世贞强调“格”、“调”建筑在“才”、“思”的基础上,便注意到了艺术构思和才性的问题,具有为“格调”说补弊纠偏的意义。所以,他一方面讲“格调”,讲“法”、“句法”、“字法”;一方面又讲“妙悟”,讲“兴与境诣”、“神与境会”,“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神韵”说其实已滥觞于其中了。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还用了大量篇幅对历代诗人进行评论,发表了不少较好的见解。但他推崇盛唐,贬抑中晚唐,尤贬宋诗,偏称明诗的倾向也很突出。如称韩愈“于诗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他语”;称“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此是定论”;称李贺“师心,故尔作怪”;称宋欧阳修“不识诗,自标誉能诗”,“是一夜郎王耳”;称王安石学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称苏轼“之与(李)白,尘矣”;称黄庭坚、陈师道“点化”李、杜诗句,“丑态毕具,真点金作铁手耳”。凡此等等,均不无偏颇。而于明代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人,则又吹捧过甚,如称“歌行之有献吉(李梦阳)也,其犹龙乎!仲默(何景明)、于麟(李攀龙),其麟凤乎!”称律诗“古惟子美,今或于麟,骤似骇耳,久当论定”。此等溢美之词,亦不足为定评。王世贞晚年在《书西涯古乐府后》中曾自我批评说:“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麟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相,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可

见他晚年已开始觉察到复古、拟古的流弊和当年持论之偏。有《弇州山人四部稿》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刘德重)

【明诗评】 诗人传记与评论著作。明王世贞撰。该书四卷,前后各有自叙一篇,共收录明代诗人一百十八人,各人名下均列其小传及一段评语,亦有两人合一段评语者。卷一首列“李君梦阳”、“何君景明”、“李君攀龙”,其后自“徐博士祜卿”、“谢山人榛”以下,均称其官衔,未仕者称山人或布衣,唯前三人尊称为“君”,推崇备至。其评李梦阳称:“此道荒千餘年,至梦阳始辟之,社稷勋哉!其诗如孙、吴用兵,奇正阖辟,变化不穷;又如苍鹘击空,云龙戏海,健急怪伟,种种入神。”评何景明称:“景明诗如太华芙蓉,秀出云表,朝霞贴水,灿烂万状;又如西施、毛嫱,工艺绝世,婉恋有情。气力少让李梦阳,烨烨动人,颇自不减。”可见其站在七子的立场,揄扬过甚。又如评杨基谓“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颠顿特甚,情至之语,风骨扫地”,评杨士奇谓“如潦倒书生,虽复酬酢驯雅,无复生气”,亦反映了七子对于台阁体的批评。总之,书中所评虽未必尽当,但作为明人评明诗,并代表了当时后七子一派的诗学观点,亦自有其资料价值。有《纪录汇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德重)

【国朝(明)诗评】 诗评著作。明王世贞撰,程兆胤录。该书一作《诗评》,不分卷,系继承宋代《芸叟诗评》、《百衲诗评》、《瞿翁诗评》传统,以象征和比喻手法,评述明代一百餘家诗人的艺术风格。与王世贞另撰之《明诗评》相较,所评大体一致。如《明诗评》评何景明称:“景明诗如太华芙蓉,秀出云表;朝霞贴水,灿烂万状。又如西施、毛嫱,工艺绝世,婉恋有情。气力少让李梦阳,烨烨动人,颇自不减。”本书则称:“何仲默如朝霞点水,芙蕖成风;又如西施、毛嫱,无论才艺,却扇一顾,粉黛无色。”又如《明诗评》评杨基称:“基诗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颠顿特甚,情至之语,风骨扫地。”本书则称:“杨孟载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情至之语,风雅扫地。”所评反映了王世贞对明代诗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后七子一派的观点。有《天都阁藏书》、《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德重)

【诗评】 见“国朝(明)诗评”。

【艺圃擷馀】 诗话著作。明王世懋撰。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号麟洲,太仓(今属江苏)人。王世贞弟。嘉靖进士。历官南京礼部主事,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太常少卿。有《王奉常集》等。《艺圃擷馀》一卷,三十四则。全书以评论为主,诗学观点多本自王世贞而又有所发展,于“格调”说中引进了更

多的“性灵”和“神韵”的因素。他认识到,每个时代诗歌的体格声调都不相同,“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同时,时代格调又是逐渐变化,其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因此,他指出:“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这样论“格调”,显得比较圆通。他还说:“诗不惟体,顾取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声取异,安知今日不经人道语,不为异日陈陈之粟乎?”可见,“性情”在王世懋的诗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世懋也不赞成拘泥于诗法格律,认为只要能“妙悟”,“作诗到神情传处,随分自佳,下得不觉痕迹,纵使一句两人,两句重犯,亦自无伤”。王世懋此书写于王世贞《艺苑卮言》之后,其时复古、拟古运动已开始走下坡路,“格调”说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反对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王世贞晚年曾悔其少作,王世懋也不再死守“格调”说的领地,而开始从“格调”说向“性灵”说和“神韵”说转变。在学古问题上,他强调“人各自以意象声响得之”,不赞成“事事剽窃,纷纷刻鹄”,在这一点上,与何景明、徐祯卿、谢榛、王世贞相近。有《历代诗话》本。

(刘德重)

【骚坛千金诀】诗话著作。明李贽编著。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号宏甫,福建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至云南姚安知府。有《李氏文集》等。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异端”自居,提倡“童心说”,反对摹拟剽窃。《骚坛千金诀》一卷,分诗学正源、诗准绳、诗口诀、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风骚句法等类,取前人诗格诗式和当代人论诗之语,附以己见编辑而成,为学者提供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因所编资料为时人所罕见,故以“千金诀”名之。有《李卓吾先生秘书八种》本。

(周维德)

【名家诗法汇编】诗格丛书。明朱绂编。明代以来,流传诗法一类著作,亦出现汇编本。此书成于万历四年(1576),以杨成、王用章、黄省曾三家《诗法》为底本,论次校讎而荟萃之,再加上宋何无适、倪希程、王柏等编的《诗准》、《诗翼》汇编为十卷,共收诗格诗法著作十二种,即范梈《木天禁语》、范梈《诗家一指》、严羽《诗体》、杨载《诗法》、白居易《金针集》、范梈《诗学禁脔》、佚名《沙中金集》、傅若金《诗法正论》、傅若金《诗法正法》、黄子肃《诗法》、揭傒斯《诗法正宗》、揭傒斯《正法眼藏》。此书对于保存文献尚有可取。有明刻本,台湾广文书局1972年据明刻本影印。

(张伯伟)

【欣赏诗法】诗话著作。明茅一相撰。茅一相,字康伯,浙江吴兴人。生平事迹不详。《欣赏诗法》一卷,卷首有王逸民序,谓宋人诗话种种,然如严羽《沧浪诗话》者,盖十不得一焉,始信作法之难,而赏者尤寥寥矣。该书采唐、宋、元、明诸家论诗之要者,合为《欣赏诗法》。晚得皇甫汈《解颐新语》,摘而附焉。既曰“欣赏诗法”,故多从欣赏角度谈诗法。其内容包括诗源、诗体、律法、诗派、诗评、诗诀。此外,还谈到具体的欣赏方法,如一篇、二废、三体、四深、五忌、六义、七戒、八妙、九准、十悟之类。欣赏诗法,是诗话的一种新形式,是创体。有万历刻本。

(周维德)

【焦氏诗评】诗话著作。明焦竑撰。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又字从吾,号澹园,亦称漪园,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谪福州同知。有《澹园集》等。《焦氏诗评》一卷,论诗以“微言通讽喻,以温柔敦厚为教”;提倡“性灵说”,反对“以剽略相高”的创作风气。书中用随笔的形式,述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如遣词造句、声韵格律、文物典故等。品评作家作品,不人云亦云,独抒己见。此外,还论及诗歌创作中的方法问题,如“为诗殚竭心力,方造能品;至于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谓不烦绳削而合”之类。有万历刻本。

(周维德)

【读诗拙言】诗话著作。明陈第撰。陈第(1540—?),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万历诸生,绝意仕进,潜心著述。著有《一斋集》等。《读诗拙言》一卷,是关于诗韵研究的专著。陈第精通五经,善长声韵。他认为诗的用韵都是以当时的实际语音为基础的,古今音不同,是时代变迁造成的。他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变,系乎时者也。”他指出,诗歌创作虽“触物以摅思,本情以敷辞”,但“诗必有韵,诗之致也”;若诗不用韵,味同嚼蜡,就不是好诗。创作用韵,宜向《诗经》学习,因为“《三百篇》,诗之祖,亦韵之祖也”。所以陈第对《诗经》用韵,作了详细的分析,另著有《毛诗古音考》。有明刻本、清抄本。

(周维德)

【诗文要式】诗话著作。明佚名撰。一卷。首述诗文八法:曰养气、曰抱题、曰明体、曰分间、曰立意、曰用事、曰造语、曰下字。每法下,又有具体的分类述说。如养气法下,又分肃、壮、清、和、奇、丽、古、远八类。八法之后,又有取谕法、总论文、总论诗、论体、对偶、句法、字法、气象、音节、辨体一十九字等目,均述说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的问题。有《格致丛书》本。

(周维德)

【长卿诗话】诗话著作。明屠隆撰。屠隆

(1542—1605),字长卿,号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礼部主事。著有《由拳集》等。《长卿诗话》一卷。屠隆列名于“五子”,是“后七子”的支流。所以他的文学思想,从总体上说,没有摆脱七子的影响,但他却是拟古论的反对者。他说:“字句虽因,神情不传,则体合而意未尝不离。”又说:“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他重视才学,但不为才学所囿。他说:“诗非博学不工,而所以工非学;诗非高才不妙,而所以妙非才。”他主张“体物肖形,传神写意”,认为这样的作品才有艺术感染力。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诗,一人有一人之作,各自不同。他还对李攀龙、何景明、王世贞的创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诗话还摘录历代名章隽句,供阅读者欣赏。有万历刻本。

(周维德)

【豫章诗话】 诗话著作。明郭子章撰。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又号螭衣生,江西泰和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累官都御史,巡抚贵州,参与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进兵部尚书。于学术涉猎颇广。有《易解》、《郡县释名》、《黔草》等。《豫章诗话》六卷,四百餘则。前有张鼎思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序,称“以未刻《豫章诗话》见寄,且属一言弁其端”,则此时已成书而未刻。序又称:“诗话而曰豫章者,其人豫章之人也;不然,则其与也;不然,则宦而游过而登览者,豫章之山川也。”可见,该书属于地域性诗话著作,专记江西籍诗人诗作及与江西有关的诗人诗作,“上起古初,下迄于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容大抵按时序排列,卷一多记陶渊明等南北朝诗人诗及后人咏庐山、咏大孤山、小孤山诗,卷二多记唐、五代诗人诗,卷三、四、五记宋人诗,其中卷四多记黄庭坚及其族人诗,又以较大篇幅逐一记江西诗派诗人事迹,卷五兼及元人诗,卷六专记明人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多据郡县志书所采,未免芜杂”。清胡思敬重刻跋语则以瑞州各县志“无一人厕名其中”,证提要之说“不足信”,且称“自汉初及有明中叶,凡乡人负才嗜学稍能以文辞自见者,皆可考见颠末”。要之,该书虽不免芜杂,但于有关江西诗人诗歌资料亦有搜集保存之功。书中除大量录诗及记事外,亦间有考辨。书中还收录了一些与诗无关或与江西无关之事,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为“爱奇嗜博之失”。有《豫章丛书》本。

(刘德重)

【诗法指南】 诗话著作。明王禔撰。王禔(生卒年不详),字渭阳,号渭上渔人,陕西周至人。万历年(1573),以礼经魁三秦,禄仕晋庠晋秩邑侯。《诗法指南》二卷,卷首有题辞和引,卷末有黄中通、焦秀

实跋。此编主要为初学诗者所著,示以诗法,指出途径,但与一般诗法指南书又有不同之处,“未尝拘拘然先立某格,而后为某诗也”。不从其格,惟取其说,并附以诗一二首证之。又于附诗之下,“分其经纬,别其情景,详其虚实,辨其事意”,使学者触目会意,入作者之门。前卷统论近体诗的作法,后卷论述各种诗法,每以唐诗证之。间出己意,品评详明。题辞者谓此书“旨约体全,文简法备,议简理确,寻绎有据”。有万历蕴古堂刻本。

(周维德)

【徐炬诗话】 诗话著作。明徐炬撰。徐炬,生平事迹不详。该书一卷,论诗本《诗大序》之说,抒发性灵,重视教化,以《三百篇》为诗之源。提倡诗以自然为美,但不废词彩。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多从艺术性的角度分析,指出他们各自的艺术特色。如谓李陵诗“意远调高”、李白诗“狂荡不羁”、韦应物诗“平淡闲雅”等等。《徐炬诗话》,《古今图书集成》作《事物原始》。有清刻本。

(周维德)

【香宇诗谈】 诗话著作。明田艺蘅撰。田艺蘅,字子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以贡生授徽州训导,罢归。博学善文,著述甚丰,世比之杨慎。著有《留青日札》、《老子指玄》、《煮泉小品》、《田子艺集》及杂剧《归去来辞》等。《香宇诗谈》,《说郭续》收有三十四则。内容以评诗为主,不涉记事。书中诗学见解,其一称“诗关气运”,“汉世浑厚高古,魏国雄俊秀发,两晋平典风丽,六代富艳绮靡”。又称“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其二称张说、杜甫、薛能诗用“坐”字,皆本于北齐刘逖诗“纵意坐山中”句;又称许王维《夷门歌》“七十老翁何所求”句“以后人之言,而用前人之事,浑化无迹,使人不知其妙,真点铁成金手也”。其三称“诗有似拙而实妙者”,“拙忌其俚,妙忌其纤。宋俚也,元纤也”。又于唐人中韩、白二家颇致不满,谓韩诗“粗浅殊甚,都不成语,而宋人方谓之闲远”,白诗“可笑其用字之俗”。凡此,大致可见其论诗倾向。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

(刘德重)

【阳关三叠图谱】 诗话著作。明田艺蘅撰。《阳关三叠图谱》一卷,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为论题,引证据典,诠释文意。王维此诗《乐府诗集》作《渭城曲》,唐、宋人亦作《阳关曲》、《阳关调》或作《阳关三叠》。“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三叠者,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宋人李伯时又据王维诗意,画成《阳关图》。有《说郭》本。

(周维德)

【西园诗麈】 诗话著作。明张蔚然著。张蔚然,字维城(一作诚),武林(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西园诗麈》一卷,《说郭续》收有十则,徐燊

《笔精》卷三“西园诗麈”条录有四则,其中三则为《说郭续》本所无。其论诗主张先读书,不赞成严羽“别材”“别趣”之说,谓“不先穷经而以‘别才’、‘别趣’之说自盖者,究竟与此道何涉”。其论唐、宋诗谓:“唐诗偏近风,故动人易;宋诗偏近雅颂,故人人难。”又谓:“宋三百年间,名卿、硕儒、高士卓绝诸代,制作累累,岂无篇句可追踪往昔、流布来兹者?一称宋诗,意从抹杀,既未目睹,且不耳聆,相率唾弃,真可涕可怪!”(此则见《笔精》)可见其于当时崇唐抑宋之风,深致不满。又称:“世谓作诗勿入唐以后事,自五代入明,事物人群之变,不知几许,而谓尽不堪入诗料,此词家习谈,实艺林之积蠹。”(同上)亦可见其于拟古之风不满。唯称“独七言律,自唐而工,至我明而始盛”(同上),于明诗评价不当。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又《笔精》所录,有《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兰庄诗话】诗话著作。明闵文振撰。闵文振,字道充,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有《异物汇苑》。《兰庄诗话》一卷,《说郭续》所收仅四则,每则前有小标题。其论学诗称:“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词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妙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其论诗人推崇曹植,称“曹子建诗质朴浑厚,春容隽永,风调非后人易到。陈子昂、李太白慕以为宗,信乎。晋以下鲜其俦也。予每读其诗,洒然有千古之想”。又推崇陶渊明,对钟嵘《诗品》置陶渊明于中品深致不满。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又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刘德重)

【诗藪】诗话著作。明胡应麟撰。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万历举人。为当时所谓“末五子”之一。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诗藪》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共二十卷,计内编六卷,分论古、近体诗;外编六卷,历评周、汉、六朝、唐、宋、元诗;杂编六卷,补述亡佚篇章、载籍及三国、五代、南宋、金诗;续编二卷,专论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其诗论受王世贞、王世懋影响较大,核心为格调说和拟古主义,但又体现出向神韵说演变的趋势。善于调和,变而不离其宗,是其理论特色。书中主要的诗学见解,一是论“变”主“格”,即所谓“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内编卷一)。这是全书论诗的总纲,故内编分体论述,外编、杂编分时代论述。既承认“体以代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诗体,本不必倡言复古;但又认为“格以代降”,格

调还是以高古为上,这就仍然要导致师古拟古。胡应麟企图将两者调和起来,他虽然看到了历代诗歌的发展变化,但并未跳出拟古主义的圈子。二是论“悟”主“法”,即所称“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按严羽字仪卿,明人多作严仪字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梦阳)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第二者不可偏废:‘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内编卷五)。论诗重“悟”,必然会折入神韵说;论诗主“法”,则必然仍坚守格调说。胡应麟又把这两者调和起来,他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内编卷五)《诗藪》开始引进了“神韵”的概念,全书有二十馀处直接以“神韵”论诗评诗,如称盛唐诗歌“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等,这对清代神韵说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三是承七子之说,崇唐抑宋,但又认为宋诗中也有“可参六代、三唐者”,不容尽废,因而主张以风格来区划唐、宋。这较之当时盲目排斥宋诗者要高出一筹。此外,《诗藪》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见解,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对宋以来关于唐诗“夜半钟声到客船”句中“夜半钟”是否实有的争论,指出:“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外编卷四)这就看到了抒情诗“借景立言”的艺术特点。又如推崇《沧浪诗话》,称“昭代声诗,上追唐、汉,实有赖焉”(杂编卷五),也颇有眼力地看到了《沧浪诗话》对有明一代复古风气的深远影响。但书中对明诗和明代诗人的评论,往往揄扬过分,特别是对王世贞,更是推崇备至,不足为定评。要之,《诗藪》对前代诗人诗作的评论尚属中肯,且论诗细密,能自圆其说,又广征博引,亦足资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批评价值和诗学资料价值。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校补本。

(刘德重)

【艺林学山】诗话著作。明胡应麟撰。八卷,卷首有胡应麟《艺林学山引》,谓杨慎生平纂述,无虑数十百种,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篇。这些著作,“微辞妙论,亦间有未易悬解者,因更掇拾异同,续为录,命之曰《艺林学山》。”书中多考订辨正之说。其体例:正文为杨慎原文,评点为胡应麟所作,较正文低一格,以示区别。书中虽以纠正慎说为主,但亦有肯定其说者。如:“杨谓《钟馗传》为文人戏作,最为卓识。”又如杨慎谓:“庾信之作,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胡

评:“‘绮多伤质’四语,尤名言。”有广雅书局刻本。

(周维德)

【玉笥诗谈】诗话著作。明朱孟震撰。朱孟震,字秉器,新淦(今江西新干)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所为文不出当时习尚,诗则音节谐畅,而意境不深。有《朱秉器集》,又有笔记杂著《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游宦余谈》等。《玉笥诗谈》分正、续共三卷,八十二则。多据见闻所及,详载明代诗事,而涉及江西诗人诗作尤多。对明代诗人,尤推崇王世贞,称其诗篇“如灵蛇夜光,洋溢中外”,较之为“后七子”领袖的李攀龙,“诚伯仲之间”;但论李、王文之高下,则以为李能尽“拟议之功”而不善变化,“犹局促在绳墨之中”;王却能“信意所适,随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滞旧迹,滔滔莽莽,愈达而愈神,纷纷纭纭,愈变而愈妙”,“当为明兴独步”。正基于此,书中论诗见解,大抵亦以王世贞为宗,视唐诗为楷式,罕见新意。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明洁)

【画禅室随笔】笔记著作。明董其昌撰。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己丑(158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詹事府詹事,崇祯初告归,卒谥文敏。以书画著名,自成一家。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四卷,卷一论书,卷二论画,卷三分记事、记游、评诗、评文四门,卷四皆小品杂文。其卷三评诗一门,兼记诗事,共十六则,多论山水风景诗作。于前人“澄江净如练”、“齐鲁青未了”等佳句,极表赞赏,称“寥落片言,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以其取境真也”;又称“千古奇语,不必有所附丽,文章妙境,即此了然”。并以亲身游历所见,领悟“古人诗语之妙”,称“惟当境方知之”。大抵以书画家论诗,别具眼目,故特标举一“境”字。有《四库全书》本。(刘德重)

【余山诗话】诗话著作。旧题明陈继儒撰。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绝意仕进,隐居昆山,后筑室东余山,专心著述。工诗善文,所作短篇小词颇具风致。有《陈眉公全集》。又曾辑《国朝名公诗选》,上自高启、王冕,下迄李贽、屠隆等,皆各附小传。《余山诗话》三卷,共一百三十三则。大都从其笔记杂著中辑出编成,非作者自为此书。内容较为芜杂,多以记事为主,因事及诗。论诗则推崇唐以前诗家名句,认为诗皆由“奇语”体现“妙境”,而“齐隋以还,神气都失矣”。全书涉及诗作除偶解诗意、考明出典外,较少品评之语,即使间表己见,亦语多浅浮,不足为观。其编辑亦草率而漫无定则,如卷上“朱竹古无所本”条,于卷中重出;其他采摘前人说部之内容,亦

多见照录,不乏疏谬,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提要》评之为:“即真出继儒手,正亦无足取耳。”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明洁)

【古今诗话】诗话丛书。旧题陈继儒编。书前有《百家诗话引》,可能书名原作《百家诗话》。该书八卷,辑录前人诗话约八十种,其中大部分为宋代诗话,宋以前收有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及齐己《风骚旨格》,宋以后兼收元、明诗话。但其中也收有《升庵词品》、《词品》、《词旨》、《四六余话》等,颇嫌丛杂。该书最大的缺点是不收全帙,仅随意摘抄数则以凑数。如《后村诗话》原有十四卷,而该书仅收八则。如此汇辑,颇失丛书之旨。亦可能系自《说郛》中抄出者。估计为当时书贾所为,而托名于陈继儒。有明末崇祯年间坊刻本。

(刘德重)

【艺苑谈宗】诗话汇编。明周子文编。周子文,字歧阳,无锡人。万历癸未(1583)进士。该书为按人收辑的诗话汇编,计收宋濂、高棅、何景明、李东阳、徐祯卿、王廷相、杨慎、都穆、皇甫汈、王世贞、何良俊、谢榛、王世懋、胡应麟、王穉登、屠隆、焦竑、李维桢、朱长春等十九家论诗之语,或采录其文集,或摘抄其诗话。其诗学倾向,大抵宗前后七子,而奉王世贞《艺苑卮言》为圭臬。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自刻本。

(刘德重)

【读诗】诗话著作。明郝敬撰。郝敬(1558—1639),字仲舆,号楚望,湖北京山人。万历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著有《山草堂集》等。《读诗》一卷,以介绍《三百篇》为主,兼及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郝敬论诗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主张明法度。他说:“《六经》,惟诵诗多明法。”又说:“《三百篇》所以高绝千古,惟其寄兴悠远。”但宋人不解此义,“只据诗中文字,断以己意,创为新说”,不足信。郝敬认为诗应含蓄,婉而不露,言而不尽,方为妙。他提倡法度,但反对拘执绳墨。此外,书中还对赋比兴的创作方法提出新的解释,称:“铺叙括综曰赋,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维德)

【批选唐诗】诗话著作。明郝敬撰。《批选唐诗》一卷,录选唐代六十四人,诗二百五十七首,以近体诗为主。李白作品入选最多,达三十七首。入选作品,以“辞彩高华,风骨森秀,声偶雄畅”为标准。批语附于每首诗作之后,文字长短不一。长者达百字,如评李白《蜀道难》;短者则数字,如评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曰:“孤清。”其品评作品,一般比较中肯,而且多从作品的风格着眼,分析艺术特色。但由于作者从封建诗教出发,故其品评有时失之过偏。如他一方面肯定“李白诗,信笔舒卷,妙合天则,不似

他人刻画求工而反拙,所以擅长”;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李白“露才扬己,长傲负气,辞人所以多轻薄”,目为诗教大坏之罪人。唯书中不录杜诗一首,令人难解。有《山草堂集》本。(周维德)

【弹雅】诗话著作。明赵宦光撰。赵宦光(1559—1625),字凡夫,号广平,江苏吴县人。隐居寒山,读书稽古,潜心著述。有《寒山蔓草》等。《弹雅》十八卷,又有选辑本一卷。其论诗颇受严羽影响,主张以禅论诗,以识为主,宗主《诗》、《骚》。提倡格调,认为古诗重在意格,近体重在声调,离开格调而言诗,即是芜才俗学。书中说:“有才人而作诗无调,是芜才也;有学人而作诗无格,是俗学也。”又主张诗要含蓄不露,贵托讽,贵情性,贵景真。认为诗要“曲而通,微而著”,“含蓄不露”,方为上乘,若“言尽,则文也,非诗也”。此外,对遣字造句,用事用韵,也提出具体要求。有明末刻本。(周维德)

【艺苑闲评】诗话著作。明支允坚撰。支允坚,字子固,号支山道人。生平事迹不详。《艺苑闲评》一卷,卷首有《自序》,谓评非易事,力求评而有当。所以此编所评,较为公允。其品评作家作品,既肯定其所长,又指出其不足。如评杨慎的作品谓:“升庵诗甚为葩丽,而文甚弱,齿角各有分也。”其品评又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如评元稹《连昌宫词》和白居易《长恨歌》云:“《连昌》、《长恨》,情致相似,风骨亦侔;然叙事宛转胜在《长恨》,劝戒讽谕优在《连昌》。”支允坚在品评中,还指出时人的错误。他说:“‘遮莫’,即今人所谓尽教,理解为‘禁止’之词者,误也。”此外,《艺苑闲评》还辑录了一些佚诗佚事,可供参考。有《梅花渡异林》本。(周维德)

【诗源辨体】诗论著作。明许学夷撰。许学夷(1563—1633),字伯清,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隐居不仕。此书自万历癸巳(1593)动笔,历二十年,十易其稿,完成诗论十六卷(七百五十则)、诗选三十卷,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初刻诗论十六卷,诗选未刊行。此后至著者逝世,又历二十年,增写、修订为三十八卷,并将诗论与诗选归并,计诗论九百五十六则,诗选逾万首。其婿陈所学于崇祯十五年(1642)抽取修订本原稿的诗论部分刊刻,仍作三十八卷,诗选部分仍未付梓,可能后已亡佚。全书以时代为序,历评《诗经》、《楚辞》、汉、魏、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及宋、元、明诗,每代或半卷,或一卷,或两卷,惟唐代二十卷,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各代均先作综述,后按诗体分论,再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评析。又有“总论”三卷,历评前代诗论、诗话、诗歌选本等。其内容全属论评,不涉杂事;其篇幅超过《诗薮》;其体例大致有序,自成体系。从他所说“古今说

诗者,惟沧浪(严羽)、元美(王世贞)、元瑞(胡应麟)为善”,可见其诗学渊源。实际上,《诗源辨体》虽然体大帙富,但其理论主张,并未能跳出严羽和王世贞、胡应麟的圈子,只是在具体论述上更加细密或有所发挥,故可看作是继承前后七子一派的诗话。书中的基本内容,大致可分为“寻源流”、“考正变”。其卷首称:“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折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可见其基本观点仍是古诗崇汉、魏,律诗崇盛唐,与前后七子并无二致。不过,他试图通过划分“源”和“流”、“正”和“变”,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线索,说明诗歌发展中承继、因革的关系,这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他既承认诗歌体制的“变”,也承认风格内容的“变”,这一点又较胡应麟的“体以代变”说有所发展。他认为宋诗“实为大变”,“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或欲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与语释、老也”。这就是说,对待宋诗,必须承认“变”是它的主要特点,不能用对待唐诗的眼光即“正”的标准去衡量。在这一点上,许学夷是有特见的。书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具体评论,也有一些较好的见解。他主张“识贵高,见贵广”,要能“兼收容众”,所以书中论诗评诗比较客观。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校点本。(刘德重)

【恬致堂诗话】诗话著作。明李日华撰。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竹懒,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太仆少卿。善书画,精鉴别;诗文风格清隽,多表现闲适情调。有笔记杂著《紫桃轩杂缀》、《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等。《恬致堂诗话》四卷,一百四十六则。系摘其诸杂著中论诗之语,凑合成编。其中大多以记画人绘事为主,附论诗作。论诗多从诗法、意象着眼,注重“一字之妙”,推誉清远、洒落、雄迈之品格。于唐诗最崇杜甫,认为不仅用字“含生气”,而且“有比有兴,六义具涵,转辗咏之,弥堪咀味”。对杜诗因版本流传造成字讹,亦能由此作出辨析。如解杜诗:“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谓“宠光点注,唐时有此二语,施之官职选授间。所云宠光者,特恩也;点注者,注授之意,所以为妙。今本讹一字作‘点缀’,何啻嚼蜡。”其诗论虽大旨宗唐并极奉杜甫,然亦不抑宋元。如称引宋曾巩《雾淞》诗,不仅赞其“婉丽畅逸”,且为之辨道:“王昌龄不是过,而谓曾(巩)不能诗,何耶?”

又如论元贯云石：“人知其工小调乐府，而不知其歌行奇诡激烈，即卢玉川（仝）、李商隐不是过。”凡此虽语气偏激，但不唯唐是尊，不为拟古时风所囿，尚属可嘉。有《丛书集成初编》本。（陈明洁）

【诗话类编】诗话汇编。明王昌会辑。王昌会，字嘉侯，上海人。其父王圻为嘉靖（1522—1566）进士，曾官御史。《诗话类编》三十二卷，分为体格、名论、帝王、忠孝、节义、夙慧、科第、神仙、鬼怪、方外、宫词、闺秀、妓、题咏、考订、品评、诗赏、诗遇、诗穷、诗弹、诙谐、感慨、谏异、事逸、吊古、哀挽、梦幻、规讽、杂录等二十九门。书前凡例略谓：“是编纂辑成书，无敢妄作，间有数条相合，大同小异，如题红叶、题三娘墓故事，诸书错综互见，无所取裁者，漫加笔削，汇成大观。”可见其内容大体分门归类纂辑前人诗话及笔记、杂著中论诗记诗之语，亦有少量加以笔削缀合者。然各则之下不注出处，颇失其存辑价值；又不分人言己言，颇失其著述价值。有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刘德重）

【唐音癸签】诗话汇编。明胡震亨编撰。胡震亨（1569—1645），字君鬯，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年又号遂叟，浙江海盐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历故城教谕、合肥知县、定州知州、兵部职方员外郎。乞归。家藏书万卷，日夕搜讨，校读精勤。编有总集《唐诗统签》，为清代修《全唐诗》之蓝本。又撰有《海盐县图经》、《读书杂录》、《赤城山人稿》等。所编《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按天干之数分为十签，其中自《甲签》至《壬签》共一千卷，纯粹辑集唐诗，间加评鹭；《癸签》三十三卷，为其研究唐诗心得的汇编，单刻本即题为《唐音癸签》。该书体例自成系统：卷一为“体凡”，总论诗体的变迁及声病等；卷二至卷四为“法微”，先“统论”，次“通论各体”，再论“用字”、“用句”、“俪对”、“篇法”等各种表现手法；卷五至卷一一为“评汇”，按时代、体裁、题材等方面评论唐代诗人诗作；卷一二至卷一五为“乐通”，专论与唐诗有关的各种声乐、舞乐；卷一六至卷二四为“诂笺”，专门对唐诗词语典故等进行诠释；卷二五至卷二九为“谈丛”，专谈唐代诗人的遗闻佚事；卷三〇至卷三三为“集录”，分别论唐诗别集、选集、唐宋以来诗话及有关唐诗的墨迹和金石刻，可见其内容涉及唐诗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法微”三卷，“评汇”七卷、“乐通”四卷、“总论”一卷、“诂笺”九卷，多摘录前人著作，或注以人名，或注以书名，亦有一部分标注“遂叟”者，则为其自撰。其他部分，虽也多本自前人，但又多化作己意出之，基本上可视为自撰。所引前人著作，自陆机、刘勰以至王世贞、胡应麟，自诗话、笔记以至正史，涉猎既广博，择取亦较精要。其诗学见

解多本自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称引亦以此二家为多。但他并不一味盲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能自出手眼，有一得之见。如论唐代七律压卷之作，严羽推崔颢《黄鹤楼》，何景明等推沈佺期《独不见》（“卢家少妇”），王世贞谓当于杜甫“风急天高”、“老去悲秋”、“玉露凋伤”、“昆明池水”四章中求之，胡震亨则均不以为然，他指出：“吾谓好诗自多，要在明眼略定等差，不误所趋，足耳。‘转益多师是汝师’，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卷一〇）所论显然比较通达。再如，他也不赞成用盛唐的尺度去衡量中、晚唐诗，批评高棅《唐诗品汇》“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宋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卷三一）。《唐音癸签》从诗话汇编的角度看，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援引前人之说，往往随意改易，不尽忠实于原文。有些虽大意未变，但文字已非原貌，有些则错会原意，甚至产生疏误。胡震亨曾批评杨慎《升庵诗话》“往往任胸援引，非必尽确”，但他自己亦未能免去此病。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订本。（刘德重）

【小草斋诗话】诗话著作。明谢肇淛撰。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著有《小草斋稿》等。《小草斋诗话》五卷，卷首有马欽序，谓：“余友谢在杭《诗话》一帙，分内外杂三篇，大都独抒心得，发所未发，而归宗于盛唐，以扶翼正始之音馀，又摭摭宋、元以来佳句遗事，皆海内所未闻见者，真可与三家（徐昌穀、王元美、胡元瑞）雁行，声施不朽。”内篇一卷，外篇二卷，杂篇二卷。内篇谈创作理论。谢肇淛认为诗是“人心之感物而成声者也，当自得之”，不能“刻画模拟”。因此他反对本朝人“太模仿”、“得形似”的创作习气。他说：“献吉几于活剥少陵，高处自不可掩，而效颦之过，亦时令人呕哕。”对诗歌创作，他提出“四贵”、“六不可”的要求。四贵是“诗情贵真”、“诗境贵虚”、“诗兴贵远”、“诗意贵寂”。六不可是“不可太着议论”、“不可太着时政”、“不可太着艳丽”、“不可太着整齐”、“不可太着铺叙”、“不可太着堆积”。又提倡“诗以法度为主”，气骨神情，理趣色调，皆不可缺。外篇评述唐、宋以来的作家作品。在诗学理论方面，他特别推崇严羽、徐祯卿，认为他们的诗论发旨破的，深得诗家三昧。杂篇多记诗人佚事。有读耕斋林家藏三卷摹刻本，无杂篇。又有上海图书馆藏五卷抄本。（周维德）

【说诗补遗】诗话著作。明冯复京撰。冯复京（1573—1622），字嗣宗，江苏常熟人。《说诗补遗》八卷。卷一总论诗体、诗格、诗思、诗韵、诗病，卷二至卷四论唐以前之诗，卷五至卷八论唐诗。作者有感

于“凡今之人,守郢瑯之《卮言》,尊新宁之《品汇》,羽北海之《诗纪》,信济南之《删选》,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之论,于是“历观唐人诸集”,兼及汉、魏、六朝之作,从辨体辨格入手,用“一生目力”,写成此书。他通过各时代诗之具体分析,指出一代有一代之诗,不必法汉魏,宗盛唐,鄙薄齐、梁、陈、隋,对前代之作,不必句字摹拟,从而否定七子诗有定格,句字摹拟的论调。他认为唯有独创而不摹拟,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震心魄,骇耳目。对诗歌创作,他又提出十点要求,即达才、构意、澄神、会趣、标韵、植骨、练气、和声、芳味、藻饰。有稿本。

(周维德)

【挥麈诗话】 诗话著作。明王兆云撰。王兆云,字元桢,麻城(今属湖北)人。生平事迹不详。约万历末尚在世。善为小说,有《绿天脞说》、《广莫野语》等。又著《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记有明一代文士,自洪武迄万历,凡四百六十七人,各详其事迹及著作。《挥麈诗话》一卷,三十九则,均各有标题。内容杂记诗事,以明人为主,偶涉唐、宋、元人诗词及考证。对所记之诗或诗句,间作评论,侧重言诗人心志和诗中寓意,于针砭讽喻世道时风者尤表赞赏。如记边贡《七夕别父》诗“天上夫妇会,人间父子离”,及《寄李空同》“四海酒杯形影外,十年诗草梦魂馀”,评为“皆警句也”。记张弼《咏纸鸢送客之京》,内有“人生自是无根蒂,却被功名一线牵”句,表明“余爱其有含讽”。书中亦有个别几则记怪异诗事和表达“诗谶”之说,则不足取。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明洁)

【敬君诗话】 诗话著作。明叶秉敬撰。叶秉敬,字敬君,浙江衢州人。万历辛丑(1601)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通文字音韵之学,著有《字孳》、《字学疑似》、《韵表》及《叶子诗言志》等。《敬君诗话》,《说郭续》所收仅五则,小标题分别为“杜诗洞庭”、“金山寺诗”、“杜羔妻诗”、“石尤风”、“诗学”。其“诗学”一则云:“凡作诗者,绳墨必宗前人,意辞要当独创。若全依样画葫芦,便如村儿描字帖,恶足言诗也。”其“金山寺诗”一则,擅改张乔诗句,未见佳处。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

(刘德重)

【雪涛诗评】 诗话著作。明江盈科撰。江盈科,字进之,号绿萝山人,湖广桃源(今属湖南)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有《明十六种小传》、《闺秀诗评》。《雪涛诗评》,《说郭续》收有三十六则。其中以诗论、诗评为主。论诗主“性情”说,标举“真诗”、“真诗人”、“真手笔”。如称:“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人眼便

见。”“凡为诗者,若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由此出发,要求作诗自然浑成,“不着色相”,“大有天趣”,不赞成“艰难苦涩”。故又称:“凡诗欲雅不欲文”,“凡诗欲畅于众耳”,“若费解费想,便是哑谜”,“凡诗不能不使故事,然忌堆积”。于前朝诗,推崇“惟苏李河梁诗与十九首系真古”,“为未雕之璞”,“若晋魏六朝则趋于软媚,纵有美才秀笔,终是风骨脆弱”,“沿及唐兴,毕竟风气完聚,所以四杰之琳琅,十二家之敦厚,李杜之逸迈瑰玮,直凌《离骚》而方之驾,非六朝所能仿佛万一也”。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

(刘德重)

【闺秀诗评】 诗话著作。明江盈科撰。前有小序,谓“生平喜读闺秀诗,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数首,各为品题,以见女子自摅胸臆,尚能为不朽之文,况丈夫乎”。以下评崔氏、陈玉兰、鱼玄机、王韞秀、廉氏、刘采春、花蕊夫人等二十八人诗四十三首,前有作者简介,后有扼要评语。如倩桃,简介云:“寇莱公侍妇,公于歌舞颇费侈,姬谏之。”录其《束绦诗》二首,评云:“一句一字皆真切,与蹈袭者迥别。”有《说郭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

(刘德重)

【诗府灵蛇】 诗话著作。明钟惺、谭元春撰。六卷,卷一品评汉、魏、六朝、陈、隋之作,卷二至卷四品评唐代之作,卷五综述创作理论、创作方法,卷六评述诸家创作及其风格。有明刻本。详见“诗归”。

(周维德)

【笔精】 笔记著作。明徐渤撰。徐渤(生卒年不详),字惟起,更字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积书数万卷,以博洽著称。工诗文章隶,万历间与曹学佺共主闽中诗坛。以布衣终。有《红雨楼集》、《榕阴新检》、《闽南唐雅》等。《笔精》,或作《徐氏笔精》,八卷,分易通、经臆、诗谈、文字、杂记五门,其中卷三、四、五为诗谈,计三百二十四则。每则前均有小标题,内容包括谈诗句来历出处及词语诠释、考证,评唐、宋、元、明诗,评释、道、仙、鬼诗,记佚诗、佚事及掌故等,排列大致有序。其论诗引张蔚然《西园诗麈》语,不同意严羽“别材别趣”之说,崇唐而不贬宋。然所评宋诗,又往往以“宛然唐响,绝无宋人习气”,“隽永有味,不似宋格”为标准,可见亦非真知宋诗者。“至谓杜牧语多猥涩,罗隐诗极浅俗,而称高启《梅诗》‘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句为在林逋‘疏影暗香’一联之上,尤为鹵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考据亦有不少疏误。然“其采摭既富,可资考证者颇多,亦有不可遽废者”(同上)。有《四库全书》本。

(刘德重)

【冷邸小言】 诗话著作。明邓云霄撰。邓云霄,

字元度,广东东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广西参政。著有《百花洲集》。《冷邸小言》一卷,卷首有自序,卷末有裔孙仁声跋。自序谓此编“论诗什九,品古什一”。其论诗“大旨以严羽为宗,尊陶、谢而挑苏、李,左王、孟而右杜、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受七子影响,崇唐抑宋。他说:“宋、元之语,则架上且不宜存,况案头乎?”又以“和平温厚为主”,所以视王介甫《明妃词》、顾况《去妇词》为“人伦之罪人,《三百篇》之蠹贼也”。又主张含蓄,说:“结处俱不可说尽,而绝句尤须含蓄。”其品评作家作品,独抒己见,时有新解。如评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联云:“当时以为文外独绝。然两句一意,不免合掌,还带六朝气。”有清抄本。(周维德)

【独鉴录】诗话著作。明穀斋主人撰。穀斋主人,生平事迹不详。《独鉴录》一卷,凡三十五则。卷首有何伟然序,谓独鉴者,独自鉴赏。“然必自照精,而后共赏出焉”。其论诗推崇《三百篇》,称:“《三百篇》隐然不露,意在言外。”宗汉、魏,法盛唐,称:“汉、魏诗,大有风骨”;“唐人颇有风韵”。又抑宋诗,称:“若宋人,开口便露尽,此所以伤于直截,失之肤浅,殊乏蕴藉。”主张诗贵自然,反对用事,认为“诗文好用事,自是一病”。主张诗贵独创,反对摹拟,谓:“文章之陋,其最下者,蹊径是已。”至于品评作家作品,他反对人云亦云,提倡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即如李、杜大家,亦有可弹射之处,况他人者。于宋人论诗,推崇王安石,称:“宋人论诗,若王安石是具只眼者。”有《广快书》本。(周维德)

【诗本事】诗话著作。明程羽文撰。程羽文,字荃臣。生平事迹不详。《诗本事》一卷,卷首有题辞,谓因事有诗,或因诗有事,故撰《诗本事》,成一家言。此编以诗为事,可分几类:指一般称谓者,如诗史、诗圣、诗豪、诗祖、诗兄之类;指创作术语者,如诗律、诗眼、诗思之类;指文学流派者,如诗派、诗社、诗盟之类;指文学风格者,如诗格、诗骨、诗虎之类;指著作者,如《诗传》、《诗序》、《诗纪》、《诗归》之类。每条下,附以笺注。如“诗圣”条下注云:“李太白圣于诗者。”有《檀几丛书》本。(周维德)

【诗评】诗话著作。明蒋一葵撰。蒋一葵,字仲舒,常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尧山堂外纪》等。《诗评》一卷,分统论和杂论。统论二章,录高棅《唐诗品汇总序》、李维桢《唐诗纪序》,以表达其撰述之旨。蒋一葵论诗宗主盛唐,非薄晚唐和宋、元。杂论八十二则,辑录历代诗人论诗之语,杂以己见。首录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关于唐诗发展的理论。至于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杨载《诗法家数》、谢榛《四溟诗话》、皇甫汸《解

颐新语》、王世贞《艺苑卮言》等著作中评述唐诗之语,亦多收录。同时对诗歌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亦用较多的篇幅予以述说。特别对古诗、律诗、绝句的作法,述说尤详。有日本宝历刻本。(周维德)

【藕居士诗话】诗话著作。明陈懋仁撰。陈懋仁,字无功,浙江嘉兴人。官泉州府经历。著有《泉南杂志》、《续文章缘起》等。《藕居士诗话》二卷,卷首有自序,谓此系摘编旧稿而成,考证多而评鹭少。其考证着重于诗句的出处,如陶诗“非为卜其宅”,出自《左传》“非宅是卜,惟邻是卜”之类。陈懋仁及与袁宏道、钟惺、谭元春游,故其论诗大旨,以公安、竟陵为宗,特别对公安派力纠明诗之弊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说:“袁中郎力纠明诗,务去陈言,力驱剽窃,殊为有功诗道。”至于品评作家作品,亦颇有见地。此编舛漏之处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详细说明。诗话当作于崇祯时,有翰林院抄本。

(周维德)

【诗体缘起】诗话著作。明陈懋仁撰。陈懋仁著有《续文章缘起》,此编系其中的诗体部分,论述诗体之渊源所自出。如谓“二言诗,黄帝时《竹弹歌》”。《三良诗》,曹植作,并述三良之所自出,以及曹植作《三良诗》之意图。有的诗体,还引录各家评语说明之,如律诗,先述其发生、发展及形成过程,然后引录《诗法家数》、《诗家一指》、《文心雕龙》、《艺苑卮言》等书,加以说明。此编与一般论诗体之作不类同。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周维德)

【蜀中诗话】诗话著作。明曹学佺撰。曹学佺(1574—1646或1647),字能始,号石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户部主事、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议、广西右参议。因所著《野史纪略》与《三朝要典》抵牾,于天启六年(1626)削职为民。此后家居二十年,潜心著书,博闻强记,时称艺林渊薮。明末破家起兵,从唐王朱聿键为礼部尚书。清兵入闽,自缢死。撰有《天下一统志》、《天下名山志》、《蜀中广记》、《石仓集》等。《蜀中广记》约撰于四川任职期间,共一百零八卷,凡十二目,其中卷一〇一至一〇四为诗话,计二百多则,单行者即题为《蜀中诗话》。该书为《豫章诗话》之后又一部专门地域性质的诗话。前三卷记与蜀有关之诗人诗事,自上古以迄宋元,大抵按时代先后排列。所记多注明出处,如《本事诗》、《云溪友议》、《北梦琐言》、《唐诗纪事》、《云仙杂记》、《鹤林玉露》、《升庵诗话》等,摘录前人诗话、笔记、杂著不下数十种,搜罗宏富,颇具资料价值。最后一卷则专论与蜀有关之词人词事,实为词话。有四库全书所收《蜀中广记》本。

(刘德重)

【石室谈诗】诗话著作。明赵士喆撰。赵士喆，字伯潜，明末山东掖县人。《石室谈诗》前有崇祯十六年(1643)自序，则书当成于此。又有其弟赵士冕清顺治六年(1649)序及张明弼序，则其刊行当在清初。该书上下两卷，计“总论二十四条”、“论各体二十一条”、“论诸家二十二条”。其持论往往折中于“后七子”和“竟陵派”之间，既推崇王世贞《艺苑卮言》及谢榛诗论，又推崇钟惺、谭元春《诗归》，自称“固欲取王、谢、钟、谭四家言为后人式”。其论诗，一方面多称引王、谢、钟、谭之说，从而加以阐发，另一方面又对王、谢、钟、谭之说有所批评、修正，而于李攀龙《诗删》则多所不满。如此折中，自以为是“持平之论”，结果却难免“首鼠两端”之讥。其主要见解，一是要求去“俗”，谓“沧浪论诗有五俗，曰俗意、俗体、俗调、俗语、俗字。然而字句之俗，其病浅；格调之俗，其病深；最下则意俗也”。二是关于诗所涉议论：“王元美言：‘作诗者勿涉议论。’观古今大家，其诗未尝无议论也。”但“迂阔不情之议论”，或“露头巾本色”，或“为论学绳尺”，则“坠魔境”。三是讲究用事之法，以为“经史子集无非诗料”，“汉晋唐宋皆可使”。四是主张解诗应“以意逆志”，“颂其诗必知其人”，“选者、评者俱当于此着眼”，以免曲解诗意。五是称引谢榛“想头别”语，认为“其学别，其识别，其人别，则想不期别而别”，即主个性，贵独到。其论宋诗，谓“有宋诸公，其气骨在长庆、贞元之上，其学识即老杜无以过之。所以渐远于唐者，正以其抗之使高，凿之使深，离于风人之雅致，而又以其胆粗手滑，破坏前人之成法，而开后人之恶习为憾耳。王李诸公一概以为无足齿，似觉太过”。持论较为平允。而论明诗，谓“我明诗道，在开元以后实号中兴，古体虽不及汉、魏，而胜于齐、梁、陈、隋，近体虽不及盛唐，而胜于宋、元、中、晚，正、嘉、隆庆，作者云翔，何、李、李、王，实为领袖。安得谓非当户乎？”则不能无过誉之弊。要之，明代后期诗坛，由“七子”而至于“竟陵”，由“格调”说而至于“性灵”说，由尊唐贬宋而至于唐宋并尊，该书即为此转变期中产物。有《东莱赵氏楹书丛刊》本。(刘德重)

【诗谭】诗话著作。明叶廷秀撰。叶廷秀(?—1646)，字润山，号谦斋，润州(今江苏镇江)人。天启进士，官南京户部主事，后进兵部右侍郎。著有《西曹秋思》等。《诗谭》十卷，续录一卷，卷首有自序、例言。自序谓：“以为谭诗也可，谭道也可，即以为谭天下事也亦可。”说明《诗谭》的内容很广泛。书中半录旧文，半出己论。其论诗多从程、朱理学中求活计，故论诗主明道、主教化，强调事君事父，勤政爱民，宣扬“忠孝大道理”，认为“诗文无关世教，虽工何益？”

所以多辑录忠臣孝子之作和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又认为“诗生于情”，吟咏情性，必须抒写性灵。如称：“情至之作，自能动人。”所以书中也辑录了不少抒情写景的作品。其品评作家作品，较为深刻公允。有崇祯八年胡正言十竹斋刻本。(周维德)

【枣林艺箴】诗话著作。明谈迂撰。谈迂(1594—1657)，字孺木，浙江海宁人。明诸生。《枣林艺箴》一卷，凡七十五则，多记文物典故、文人佚事，不专论诗。对当代文坛要事，亦多有人录。如万历丙戌(1586)，汪道昆、屠隆、卓明卿、徐桂倡“西泠社”之类。书中不仅收录作家作品，而且收录他们的创作理论，如《冯元成论文》、《谢榛论诗》、《袁宗道论语言》之类。其持论比较公允，如对李梦阳、何景明以复古为己任，既不同意“唐有李、杜，明有李、何”的看法，也不同意钱谦益攻击李、何的言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有崇祯刻本。(周维德)

【雅论】诗话著作。明费经虞撰，其子费密增补。费经虞(1599—1671)，字仲若，号鲜民，新繁(今四川新都)人。明诸生。《雅论》二十四卷，卷首有自序。该书详论历代之诗，分源本、体调、格式、制作、合论、工力、时代、针砭、品衡、琐语、题引、盛事、音韵等十三类。每类中多引历代论诗之语，附以作品，阐述己意，亦诗话之另一体式。又自序称：“以诗余附后，为十四。”但目录及书中皆无之，或欲为之而未成，或刊刻时删之。费经虞论诗，古宗严羽之论，近法王世贞之说。但严羽论诗，“止言气象规模，风味韵度未之言也”。所以流而为江西宗派，再流而为明七子。又主张不隔，要透彻。他说：“诗要到家，只是不隔。”又说：“不透过，终隔一层，非是作者语。”诗贵含蓄。他说：“诗要辞在题中，意出题外；韵在句中，趣浮句外。”主张创新，反对拟古不化。该书材料丰富，门类众多，是历代论诗之集大成者。因此，引证中难免有错舛挂漏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作了详细辨析。有雍正刻本。(周维德)

【通雅诗话】诗话著作。明方以智撰。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鹿起，安徽桐城人。崇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参加复社，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入清为僧，改名大智、弘智、行远等，别号无可、药地、浮山愚者等。著述百余种，有《浮山文集》、《通雅》等。《通雅诗话》一卷，论诗以独创为主，反对模拟。他说：“奇者多创，创于不自知。”又说：“作相似语，是优孟衣冠。”如李白诗，得古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背离本色，非佳作。他指出，《三百篇》、《离骚》、汉魏乐府，乃诗之最上层。学诗者反复于其中，就能得蕴藉温雅之致。而蕴藉温雅之作，乃诗之胜境。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谓：“诗话之简而当

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馀则,极有契合。”有清刻本。(周维德)

【谢氏诗源】诗话著作。明(?)谢氏撰。谢氏,生平事迹不详。或以为南宋人。该书一卷,多述诗事源流典故。如谓繁钦《定情篇》“何以结同心,素缕连双针”,其典出自姜氏与文胄通殷勤,文胄赠针与姜,姜取连理线贯双针结同心花以答之。又谓辛延年《羽林郎》“广袖合欢襦”,其典出自李夫人着绣衣,作合欢广袖。又诠释诗中名物,如“杜康”,酒名;“金盐”,五加皮;“王孙”,蟋蟀之类,亦有助于诗意的理解。有《蜚雪轩丛书》本。(周维德)

【诗法火传】诗话汇编。清马上岷辑。马上岷,字雪偈,明末清初人,生平不详。此书仿唐顺之读史法,分左、右两编。右编录诗,以“精确必读”为入选标准,属于选本;左编辑话,以辨体为旨,十六卷分古歌谣、乐府、古体、近体、杂体五大类。每一类所收,按“原论”、“分体”、“综要”编排。“原论”所辑一般溯该体之渊源;“分体”则分述各体之体制特征,依体辑话;“综要”所辑进一步涉及该体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此,阅者“观原论知其来历,观分体知其体制,观综要知其精微”,井然有序。所采诗话资料,自钟嵘《诗品》、皎然《诗式》至明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等,其中尤以两胡之语为多。各家所论,意有未尽者,再作按语补正,这些按语也往往较有见识。此书搜列诗体甚详备,古体、近体之外,乐府分祭祀乐歌、鼓吹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歌辞、杂曲歌辞、新曲歌辞,新曲歌辞又分“被于声歌之诗”和“不被于声歌之诗”(即新乐府),几乎将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悉数收入。“古歌谣”一卷和“杂体”一卷,更将上古先秦之歌、谣、曲、吟、讴、诵等及两汉至两宋的三韵、和韵、联句、集句、口号等体,尽行搜罗,多达百种,确实做到了他自定的“体制求其极详”的“辑志”。书末并附有一卷“诗家总论”,辑录了上述诗论家们除却诗体之外的一些重要诗见。有顺治十八年(1661)樵李马氏古香斋刊本。

(张寅彭)

【澗堂夕话】诗话著作。清张次仲撰。张次仲,字元祐,号待轩,浙江海宁人。明天启举人,入清不仕。著有《困学记》、《周易玩辞》、《待轩诗记》等。《澗堂夕话》一卷,据杨复吉跋言,系作者少作,故“议论驰骋,锋芒未敛”。书中诗、文并议,于诗尤强调真性情和独创性,如曰:“文章之学通于性命,不容假借”;“古有古也,诗曷古哉!斯道无门无径,意之所创即为祖,时之所师即为令。拟秦则謫,拟汉则枝,拟唐则芜,拟宋则弱,何以拟之!”数语酣畅淋漓,一无羁绊,则非仅为少年意气,亦明末清初诗文创作殊

少精神禁锢的时代风气之反映。有《昭代丛书》本。

(张寅彭)

【白云楼诗话】诗话著作。旧题清杨宗发辑。杨宗发字起文,武进(今属江苏)人。布衣。从恽日初学经世之学,四十二岁以居忧刻苦成疾而卒。有《白云楼诗钞》一卷,“胎息极厚,境界极高,造语恢奇,而自具名理。篇章不富,同时辈流,鲜有能及之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诗话》附于《诗钞》后,仅五则,第一至四则评述杨诗,末则为挽杨诗,非杨氏自撰。杨氏早卒,其诗钞为邑后人洪亮吉所编,诗话附于后,当亦出自其手。有《大亭山馆丛书》本。

(张寅彭)

【顽潭诗话】诗话著作。清陈瑚撰。陈瑚,字吉夏,号确庵,太仓(今属江苏)人。生卒年约起迄于明万历二、三十年至清顺治年间,得年五十九岁。明崇祯壬午(1642)举人。入清不仕,屏迹乡里。躬耕之余,与诗友泛舟莲潭,唱和遣怀,于不及时事治乱是非之表面,隐寓故国之思。此编即其唱和诸作之汇集,而冠以诗话之名。所录多为顺治初十年间所作,各篇之前,每作有序文,略记原委事实,庶几与诗话之义相近。有1917年昆山赵氏峭帆楼刻本。

(张寅彭)

【钝吟杂录】诗话著作。清冯班撰。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有《钝吟文稿》等。与其兄冯舒齐名,时称海虞二冯。《钝吟杂录》中《正俗》(专论诗体诗法)、《读古浅说》(多评古今诗文)和《严氏纠谬》(专驳严羽《沧浪诗话》)等三卷属于诗话性质。嘉庆年间雪北山樵编《花薰阁诗述》,将《正俗》中论乐府的一部分,与《钝吟文稿》中的《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论歌行与叶祖德》等篇汇编在一起,仍冠以《钝吟杂录》之名。近人丁福保编《清诗话》又原封不动地移载入内。此辑颇能体现出冯班论诗精于辨体的长处。如《古今乐府论》辨明人对乐府诗体的窜乱,考察乐府的沿革,归类为“制诗以协于乐”、“采诗入乐”、“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自制新曲”、“拟古”、“咏古题”、“新题乐府”等七类。这种分类法,比以音乐为标准的传统分法,如汉明帝时的四分法(一、大予乐,二、雅颂乐,三、黄门鼓吹乐,四、短箫铙歌乐。见《隋书·音乐志》上),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八分法(一、相和歌,二、拂舞歌,三、白紵歌,四、铙歌,五、横吹曲,六、清商曲,七、杂题,八、琴曲)及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十二分法(一、郊庙歌辞,二、燕射歌辞,三、鼓吹曲辞,四、横吹曲辞,五、相和歌辞,六、清商曲辞,七、舞曲歌辞,八、琴曲歌辞,九、杂曲歌辞,十、近代曲辞,十一、杂歌谣辞,十二、新乐府

辞)等,更能从中认识乐府体的诗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乐的特征。他批评李东阳的三卷咏古诗不合乐府规则,就是以更为概括的“谐金石”、“取古题”、“咏时事”三条作为标准的。他对诗、乐关系演变过程的看法,如“大略歌诗分界,疑在汉魏之间。伶伦所奏,谓之乐府;文人所制,不妨有不合乐之诗。乐之所用,在郊庙宴享诸大体;或有民间私造,用之宴饮者”,也比李攀龙、钟惺等明代学者更见功力。但此本所辑仅六则,仅及冯班辨体之论的一部分,书名亦易生淆误。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严氏纠谬】诗话著作。清冯班撰。此书为《钝吟杂录》之第五卷,是历代批评严羽《沧浪诗话》发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主要以学问订正了《沧浪诗话》用禅语的疏误,如指出严羽以禅喻诗,但对禅教南北宗派、大小三乘的知识了无所察,以致所喻“漫漶颠倒”;同为最上一乘的“临济”、“曹洞”被误分出大小;“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宗”,严羽行文有误分为南北宗之嫌;小乘之下,原无权乘,严羽却有将“声闻辟支”视为小乘之下的意思,如此等等。冯班的驳正虽然言之凿凿,但于严羽论诗的实质却无多大妨碍。因为严羽原意并非以禅“为”诗,而在以禅“喻”诗,意在诗而不在禅。实际上,冯班攻击严羽,是为了批驳明七子。《严氏纠谬》对严羽和七子之间的渊源关系认识得很清楚:“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详其诗法,尽本于严沧浪,至今未有知谬者”。因此,他集矢于“兴趣说”,斥其“似是而非,惑人为最”,“止是浮光掠影”,“脚跟未曾点地”,“未得向上关捩子”,乃是为了扭转七子煽炽起来的尊盛唐的时风,因为“兴趣说”正是严羽对盛唐诗歌艺术特征的总结。这里反映出冯班诗学见解的保守性,“可谓能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杭世骏《榕城诗话》)。故其论颇遭同时诗坛之非议,终于未能如稍后的王士禛那样,接绪严羽,倡言“神韵”而风行一时。不过,冯班“学有本源,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虽间有偏驳,要所得者为多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况且《沧浪诗话》用禅之误毕竟是白璧之瑕,所以终清之世,言《沧浪诗话》者几乎都要同时言及这一卷《纠谬》。有《丛书集成初编》据《借月山房汇钞》排印本。(张寅彭)

【梅村诗话】诗话著作。清吴伟业撰。该书凡一卷,十三则。据杨学沅序云,此篇手稿始发现于康熙五十四年,“中多改窜,有涂乙不可辨者”,经杨氏译补后方行付梓。吴伟业是清初大诗人,其诗作素有“诗史”之称,颇存明清易代、家国兴衰的史实。诗话亦本此旨,记载朋辈中行迹,既有陈子龙、杨廷麟、瞿式耜诸人的慷慨殉于国难,也有与降臣如龚鼎孳等

的交游。但其私心所赞,显然在忠烈殉节者一面。所记多可与其诗相参证,如第三则叙杨廷麟参与卢象升贾庄战事,便是其五古《临江参军》的本事材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抱真堂诗话】诗话著作。清宋徵璧撰。宋徵璧,初名存楠,字尚木,华亭(今属上海)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曾入复社、幾社。入清官潮州知府。与其弟宋徵舆合称“大小宋”。此书一卷,一百二十八则,大都为前人诗作的具体品评,略详于六朝。持论甚宽,对所评各家均取其长而不及其短。各则排列漫无次序,舛误亦多,如将岑参《寄左省杜拾遗》中句属王维;将苏武“昔为鸳与鸯”诗属李陵;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谓张旭观公孙舞而草书长进,张旭被误作怀素,等等,似是未定之稿。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春酒堂诗话】诗话著作。清周容撰。周容(1619—1679),字鄮山,亦作茂三、茂山,号璧堂,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明诸生,明亡后为僧,不久以母在返俗。康熙时拒荐博学鸿词科。善诗,工书画。曾从钱谦益游。《春酒堂诗话》一卷,于论评中兼及记事。持论大抵以儒家风雅诗教为旨,如谓唐诗诸体中,绝句“最得风人遗意”,“意近而远,词淡而浓,节短而情长”。记其少时从父亲处获得的教诲之语,如杜牧《赤壁》诗“死案活翻”、“入轻薄”,李建勋《宫词》“不识廉耻”,等等。所以他颇不赞成严羽“别材”、“别趣”之说。他评诗反对“拈人单词只句”,而喜从全篇之意、韵、章法处着眼发议论。又好指摘前人之作,即连他所尊敬的钱谦益也不能免,指其所选《列朝诗》“或刻或滥,可议者十之三”,所作《历朝传》“随意写生,可诵者十之七”。但周容学、识皆备,故所指摘者,往往不为未见。书中颇记与钱谦益相过从事,可资谈助。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榆溪诗话】诗话著作。清徐世溥撰。徐世溥(?—1675),字巨源,新建(今属江西)人。明诸生,与艾南英约为兄弟。入清不仕。有《榆溪集》。《榆溪诗话》一卷,三十一则。议论以汉魏以前诗为主要对象,辨析各体源流及其特征,颇见学识根柢。大抵以《诗经》为根,以音乐为本。如谓“《国风》之比兴皆可弦歌,后世各体无复得兼;骚启赋端,而比兴亡于赋;《十九首》虽得风人之旨与音,然非民间之作;五言作而《风》亡于古诗;乐府惟《子夜》诸歌为风且入乐,然辞淫声靡,不足为训;至词与曲,本为《风》与乐府之合,古诗遂亡;逮士大夫为词曲,则又与《风》分,而乐府终亡。”其视诗体之流变兴替如此。又以曹操、鲍照、陈子昂、韩愈四人为诗之发展史上之有“开

创气象者”，其论诗之偏于重视古体，于此可窥一斑。然好古过甚，不免有失公允。有光绪中新建陶氏刊《豫章丛书》本。（张寅彭）

【诗筏】诗话著作。清贺贻孙撰。贺贻孙，字子翼，永新（今属江西）人，明末诸生。明亡不仕。顺治初，特列贡榜，不就。康熙间，荐举博学鸿词科，他剪发衣缁，逃入深山。有《水田居士诗文集》等。《诗筏》一卷，主司空图“韵味”说和严羽“妙悟”、“兴趣”诸说，对明人则基本上非七子，取钟、谭。如说：“严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钟、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二书皆足长人慧根。”贺贻孙尤以“厚”字取作《诗筏》评诗的基本论点。他解释诗之“厚”，是指“神厚”、“气厚”、“味厚”，“皆从蕴藉而出”，但也“有同一蕴藉而厚薄深浅异者”要达到“清空一气，搅之不散，挥之不开”的“化境”，“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诗筏》评诗，能当此“厚”境的，主要是《诗经》、《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王维等诗风清远平淡的一派，贺贻孙特名之为“平远”诗派。他指出，“平远”一辞，是从画境取义：“画家所谓平远者，如一幅乱山，几数百里，而烟嶂连绵，看之令人意兴无穷。”抒情诗之外，《诗筏》对叙事诗也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诨，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木兰诗》有阿姊理妆、小弟磨刀一段，便不寂寞。”这段话已经接触到场面、人物关系、情节等属于叙事诗艺术特质方面的问题，而且从所举诗例分析来看，对其艺术作用，他也已有所认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历代诗话】诗话汇编。清吴景旭辑。吴景旭（1611—1695），字旦生，一字又旦，号仁山，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诸生。入清后弃诸生。有《南山堂自订诗》。《历代诗话》共十集八十卷，无序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以推论为初定之稿。编排以时为序，十集依次分论《诗经》、楚辞、赋、古乐府以及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各朝诗人诗作，每朝一集，唯金、元合集，另辟一集专论杜诗。体例仿明人陈耀文《学林就正》，每条各立标题，先引原诗或旧说，然后杂采诸书加以考订辨正，采书范围不限于诗话著作，往往能够钩贯众说。编辑宗旨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所立各小题，系从《诗经》、楚辞、乐府及历朝诗作中的一字一辞、一物一事，取以立目。如取《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句中的“阊阖”

立目，然后集辑众说加以诠释考订。又如取韩翃《寒食》诗立目“轻烟”，引诸书考证寒食节风俗之来历；取刘禹锡《乌衣巷》诗立目“乌衣”，引诸书备述乌衣巷之变迁。此外，述诗法有倒句、落句、假对、炼字、易字、叠字、实字、用韵等条目，论诗家有王季友、昼公（皎然）、张祜、贾岛、（杨）用修、（谢）茂秦等条目，为本书增添了理论色彩。此书的疵病正如前人所指，在于“嗜奇爱博”（梁章钜《退庵随笔》）和“借题曼衍，失于芟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与全书未及最后定稿，恐有一定关系。有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张寅彭）

【风人诗话】诗话著作。清刘廷奎撰。刘廷奎，字德舆，一字舆父，号梅根，贵池（今属安徽）人。恩贡生，考授州同知，未出仕。著有《梅根集》等。杨复古刊道光本《昭代丛书》题作刘奎，据《庚辰丛编》本傅增湘跋考证，应为刘廷奎。《风人诗话》一卷，附于所著《五石瓠》后，记录明季轶事、遗诗，属崇祯朝及南明者为多。有《庚辰丛编》本。（张寅彭）

【螭斋诗话】诗话著作。清施闰章撰。此书一卷（一作二卷）共九十一则，每则立有小目。内容以记事和考辨为主。《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谓其中《颜鲁公》等十三条“皆直录旧文，以为己语”；又指出失考之处甚多，因断其为“偶然割记，不甚经意之作”。但其中论诗体、作法及品评诗作之语，亦颇可从中看出其宗唐音、主蕴藉的论诗立场，不无精义可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薑斋诗话】诗话著作。清王夫之撰。此书系后人将其三种论诗之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和《南窗漫记》合辑而成。凡三卷。《诗绎》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以谈理论为主，其中《诗绎》专就《诗经》立论；《南窗漫记》多录作者与同时人的诗事交往。王夫之论诗，专主盛唐以前，不取中晚唐，尤恶宋诗。王夫之从“兴会”、“思致”出发尊唐，专注的是诗歌艺术特质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抒情诗而非叙事诗，最能体现诗的特征。因此，《薑斋诗话》主要是对古典抒情诗的艺术特质进行理论探究。其中论述得最充分的，首先是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情与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名为二而实不可离”，二者“互藏其宅”，互相转换，呈现“景生情，情生景”和“情中景，景中情”的现象，“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情与景不仅具有相生相成的关系，情的哀乐与景的荣悴还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是王夫之的特见，比一般“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卷一）的见识要高出一筹。他认为“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

等写景名句,都是因为“情寓其中”才成为古来绝唱。王夫之还主张“以小景传大景之神”,对一味写大景持保留态度。推其原委,也是因为写小景易情亲,写大景反易“落拓不亲”的缘故。从上述可见,王夫之的情景观始终坚持了两者关系的整一性。《薑斋诗话》又非常重视“意”在创作中的统辖地位:“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但他论“意”,又辅之以“势”。“以意为主,势次之”;意和势的关系是“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即把“势”看作为“意”的一种理想的表现状态。他还指出,诗意“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更具体地说出了意所处的一种若离若即和亦虚亦实的状态。显然,这种“意”“势”结合说是一种就抒情诗立论的新说,与他之前的各种主“意”说都迥然不同。《薑斋诗话》还从时空角度来揭橥抒情诗的艺术特质,首次提出了“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论点,即抒情诗一般撷取诗人驻足的某一定点,表现诗人情感的某一瞬间,不同于叙事诗“要从旁追叙”“数月日事”。王夫之认为这种时空差别使抒情诗的传情不同于叙事诗而收到更为“纯净”的审美效果。《薑斋诗话》的论诗对象和立场,与随后产生的王士禛的“神韵”说同道,历来受到重视;但它排斥叙事诗的立场,对于广袤的中国古典诗学来说,自不免又有偏狭和局促的一面。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笺注本。(张寅彭)

【诗绎】参见“薑斋诗话”。

【夕堂永日绪论】参见“薑斋诗话”。

【南窗漫记】参见“薑斋诗话”。

【载酒园诗话】诗话著作。清贺裳撰。贺裳字黄公,号九曲阿隐者,丹阳(今属江苏)人。康熙诸生。著有《史折》、《红牙词》等。《载酒园诗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依初盛中晚的次序评论唐代诗人共一百三十馀位,第三部分按年代先后评论宋代诗人,也有百馀位之多。他论诗多囿于传统,标举“温柔敦厚”,强调“有讽喻”和“得性情之正”。他反对明人兴起的厚盛唐和薄宋诗的风气,故论唐诗特地“略于初盛而详于中晚”,详析宋诗也是出于这一动机。但上述基本立场却使他极为严峻地批判了晚唐诗的“绮丽无骨”,又以唐诗的特征为标准去评判宋诗得失,每以“标新擷秀”、“清婉动人”一类的评语称道某些宋诗人。如以“清越”、“多秀句”称许张耒,以“清致”称许吕本中,以“俊气”称许陈与义,以“清气”、“秀骨”称许释惠洪,以“神骨俱清”称许赵师秀的《示友》诗,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用这一标准评判梅、欧、苏、黄这些开创或代表宋诗风格的大诗人,完全不能容忍他们对宋诗的创新和发展。

如谓“鲁直好奇,兼喜侠事,实阴效杨、钱,而外变其音节,故多矫揉倔佶,而少自然之趣。然气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权衡,故佳篇尚多”;谓“坡公之美不胜言,其病亦不胜摘。大率俊迈而少渊淳,瑰奇而失详慎,故多粗豪处、滑稽处、草率处,又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他对宋诗的发展过程,也持一种首足倒置式的观点,即宽待尚未摆脱晚唐藩篱的宋初诗人,而严究此后的所谓“宋诗三变”:梅、欧“一变为伧父”,苏、黄“再变为魑魅”,南渡前后曾幾等至宋末江湖派“三变为群丐乞食之声”。其中尤对开新风之先的欧阳修,指斥不遗余力,诋为“开后人无数恶习”的“诗道一厄”。总之,贺裳对宋诗的分析与宋诗的真面目简直南辕北辙,这是把宋诗“寄植”于唐诗的结果。《载酒园诗话》传世甚稀,持论失当恐怕是原因之一。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围炉诗话】诗话著作。清吴乔撰。吴乔(1611—1695),又名受,字修龄,太仓(今属江苏)人,入赘于昆山。有《舒拂集》。《围炉诗话》六卷,卷一为总论,卷二论体裁,并从卷二开始,分卷依次评论汉魏、唐、李杜、宋、明诗。吴乔评价历朝诗歌的基准,概括而言,一看其有无寓意,一看其有无比兴。意为主旨,比兴为方法,诗须有意有法,法为意用,方为上乘。书中谓:“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此喻饶有神采地道出了诗用比兴曲折达意的特点。“意”似又有“己意”和“事意”之分。所谓“己意”,即要求诗意出诸自心,这便是他的“诗中有人”说:“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这段话表现出对于创作个性的追求,历来颇获好评。但吴乔在诠释具体诗作之意时,往往并不能坚持“诗中有人”说,而是热衷于比附事实,以致意旨会转移到“事”方面去。例如他心目中最有深“意”的晚唐诗,常常被他按“事意”的思路,句句“以时事考之”,强作解事,致使诗味索然。他对比兴之法的强调也有绝对化之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批评的“赋比兴三体并行,源于《三百》,缘情融景,各有所宜,未尝闻比兴则必优,赋则必劣。”吴乔推崇贺裳的宋诗观,故《围炉诗话》中大段引述《载酒园诗话》论宋诗语。不过从总的方面看,吴乔对宋诗的看法尚不如贺裳那么偏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西崑发微】诗话著作。清吴乔撰。吴乔论诗主晚唐,认为晚唐诗于比兴寄托、言外有意之旨,未之或失。所以他援引《三百篇》有《序》、唐诗有《纪事》为例,作《西崑发微》三卷,欲以解“晚唐翘楚”李商隐《无题》诗之寓意本事。但他的解释拘限于李商隐与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之间的恩怨关系,虽间有可通处,终不免牵强。有《丛书集成初编》据《借月山房汇钞》排印本。(张寅彭)

【答万季野诗问】诗话著作。清吴乔撰。此篇原系与友人谈艺之书信,故原名《与友人书》(见赵执信《谈龙录》)、《与万季野书》(见《花薰阁诗述》),至丁福保辑《清诗话》才改易今名。语言不出《围炉诗话》范围,可参看《围炉诗话》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逃禅诗话】诗话著作。清吴乔撰。此书凡二百三十七则,不分卷,文中标有八小题,依次为变复、哀乐、诗中有人、体格名目、五言诗、三唐、李杜、五绝等,各题下一则至数则不等,其体例殊无条缕。就内容而言,多与其《围炉诗话》重复,文句又不及《围炉诗话》条畅达意。吴乔论诗激赏冯班、贺裳,引以为同道,此书则于冯、贺之外,又多一许学夷:“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伯清闻而知之,定远、黄公见而知之者也。”“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盖许、冯皆长于辨体者。又吴乔深于禅(见钱陆灿《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而此书却名“逃禅”,似表达其论诗并不主禅之意。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之旧抄本。

(张寅彭)

【秋星阁诗话】诗话著作。清李沂撰。李沂,字艾山,号壶庵;莒山(今属四川)人。有《鸾啸堂集》。此书一卷,共六则,每则各有小题,顺次为“八字诀”、“劝虚心”、“审趋向”、“指陋习”、“戒轻梓”、“勉读书”等六目,是一篇指导初学之作。“趋向”指诗歌流变发展的趋向,他认为在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盛唐最易于初学者摹学,而汉、魏不易学,初唐尚带六朝余习,中、晚气骨卑下,又皆不可学,语颇切实可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说唐诗】诗话著作。清徐增撰。徐增(1612—?)字子能,号而庵,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秀才,入清不仕。曾从钱谦益游。《说唐诗》二十二卷,以解说作意、作法为宗旨,选录三百余首唐诗作品。徐增论诗重法,又服膺其同乡金圣叹“解数”之说,将诗法“总归于解数、起承转合”。他视“解”为古今诗体客观存在的普遍形式,如说:“古人诗自《三百篇》来,皆以四句为一解。后古风长篇,总是四句

积累而成,合之则成篇,分之则各自成解。”这种四句一解的分法自然更适用于句数固定的近体:“律分二解;二解合来,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又说:“作古诗以解数为主,然须变换;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故他分析古体诗也并不拘泥于四句一解之式,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他“将八人竟作八解,一解中或二语、或三语、或四语,参差不恒”。至于“起承转合”之法,早在元人论诗法的几种著作中已经提出,且已成为律诗作法的一般常识。徐增异于前人的地方在于将此法与“分解”法相结合:“首为起,次为承者,其前段也;又次为转,末为合者,其后段也。”(张潮《而庵诗话小引》)徐增曾颇为自负地说:“解数,起承转合,……吾以此法观唐诗及唐已前诗,无不焕然照面,若合符节,故知其为正法眼藏无疑也。”可是从诗歌创作和鉴赏的实践看,这种以结构分析为旨趣的诗学见解并未在后世获得嗣响。有《昭代丛书》本。(张寅彭)

【而庵诗话】此系徐增《说唐诗》之卷首《与同学论诗语》,为张潮辑入《昭代丛书》,称《而庵诗话》。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参见《说唐诗》。

(张寅彭)

【诗辩坻】诗话著作。清毛先舒撰。毛先舒(1620—1688),一名骥,字稚黄,一字驰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不求仕进。精音韵,能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并称“浙中三毛”。有《思古堂集》。《诗辩坻》四卷,前三卷为总论和历朝诗评,末卷谈作诗法则、竟陵派得失和词曲等三题。全书标格论法,与“性灵”说针锋相对:“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溢。”他将“法”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置于作家的“才”、“情”之上,一再强调:“作者,揽群才,通正变,以才裁物,以气命才,以法驭气”;反之,“法不胜才,才不胜情,注辞而倾,抒愤如盈,务竭而无后虑”者,则是“小人”。他评诗推崇盛唐以前而排斥宋诗,立场大致与严羽及明七子相近,不过态度较为平允,并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诋“上下千古,所铸金呼佛者,则唯一李攀龙”。他对竟陵诗派的批评,分“立说善者”和“立说谬者”两个方面,也并不一概抹杀。书中的诗评,细处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颇有舛误,然而大处却也自有心得,不为无见。如说:“汉诗朴处似钝,其气为之也;魏诗壮处似露,其才为之也;六朝诗典处似方,其学为之也;初盛唐诗贍处似滞,其格律为之也。”又将曹植、陆机、陶潜、谢朓、沈、宋、李煜、李颀、李、杜等人作为开诗风转换声气之先的关键人物,等等,虽有可议之处,然大致恰当,足资启悟。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载酒园诗话评】诗话著作。清黄生撰。黄生(1622—1696),字扶孟,号白山。歙县(今属安徽)人。其评语散题于《载酒园诗话》卷端,至民国间始被其后人黄宾虹集中辑成单行本问世。黄生评诗立场大抵与贺裳相同,亦不满晚唐和宋诗。如云:“宋人尽多伤时悯俗之作,无如力疲不能布格,手重不能遣调,盖非其学识之不优,实其才情之不逮耳。”但他对贺裳之见也时有补正,往往具体入微。有民国二十年(1931)神州国光社单行本。(张寅彭)

【寄园诗话】诗话著作。清赵吉士编撰。赵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顺治八年(1651)举人,官户科给事,有《万青阁集》。《寄园诗话》一卷,共计一百三十余条,皆系前人之语的汇辑,多采自诗话、笔记、稗史、别集等,内容多涉佚事,无关乎论、评。有《蜚雪轩丛书》本。(张寅彭)

【龙性堂诗话】诗话著作。清叶矫然撰。叶矫然,字思庵,福建人。顺治进士,官乐亭知县。有《龙性堂集》等。《龙性堂诗话》分初、续二集,以引录和评论前人的诗论、诗作为主。论旨重在中、晚唐和宋,故吴琬《龙性堂诗话序》将其看作是一部中、晚唐和宋、元诗的评论集。叶矫然自言“最喜读昌黎、长吉、义山、子瞻四公诗”,书中也以评论四家为最详。如论韩愈曰:“昌黎诗不似唐,却高于唐。永叔论诗,不专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见。陈后山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不知韩,并不知诗也。”论李商隐曰:“李义山慧业高人,敖陶孙谓其诗‘绮密环妍,要非适用’,此皮相耳。”指出其诗之“指点情痴”,兼用“拈花”、“棒喝”二种方式;指出李诗中的“缠人欲界”为“即色即空之义”,有“禅悟语气”。论苏轼曰:“子瞻诗包罗万象,一由我法,集中一种烟云满纸,咳唾琳琅者为最,清空如话者次之。至有时斗韵露异,不无小巧,求真得浅,未免添足。”诸语皆于前人之见有所发明。除上述四家外,叶矫然推崇的唐宋诗大家,尚有杜甫、王安石和陆游,而不甚称赞黄庭坚。当时,诗坛风气正徘徊于宗唐宗宋之间。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原诗》云:“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叶矫然之诗评,似未受此风影响,故于二者不欲作左右袒,而代之以具体分析,如曰:“晚(唐)之不及初盛者,非谓今体,谓古体也。元和今体新逸,时出开元、大历之上,惟古体神情婉弱,酝酿既薄,变化易穷。”持论颇为平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原诗】诗话著作。清叶燮撰。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进士。曾任知县,以忤上官,被劾落职。晚年寓居横

山,世称横山先生。著有《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诗》共四卷,分内、外、上、下四篇,“内篇标宗旨,外篇肆博辨”(沈珩《原诗叙》),意在推究诗歌艺术的本原,故名《原诗》。他从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入手探原,为诗学主张构筑了一个哲学框架,迥异于一般诗话著作就诗论诗的作法。如《内篇上》提出“理”、“事”、“情”、“气”四个概念,用以概括作为宇宙本体的物质和精神。“理”是万物所由发生的基始、依据;“事”是万物生成的一般过程;“情”指万物所呈现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形态。他以“一木一草”为例解释道:“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他认为“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而“气”是指有机界的生命力,是贯注于有机物的生气、活气。所以气有时可以离物,而理、事、情则“无之而不在”。气是与物相异相成的一个说明生命本体的概念。《内篇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心之精神活动,又提出“才”、“胆”、“识”、“力”四个概念,指出“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而诗人的创作活动,即“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成为作者之文章”。他曾以建筑物之地基为譬喻,认为“诗之基”在于作者之“胸襟”。上述才、胆、识、力,可以看作“胸襟”的四项基本因素。四者的作用分别是:“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四者的关系是“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唯胆以张其才,唯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见全,得半者其才见半”。因此,四者之中,“识为体而才为用”,居于较重要的地位;而“识”更是四者的基础:“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强调才与识,也就是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创作个性。叶燮认为,这是诗之“质”,诗之“骨”;至于在作家主体之外的诗法、规则和“能事造诣”之类,则是诗之“文”,诗之“皮”。作家主体精神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叶燮认为它对创造对象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意义。如前所述,才、胆、识、力与理、事、情之间,是“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关系。经过“我心”的衡量,理事情改变了原来“在物”的性质,而介乎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即所谓“不可明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所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原诗》的另一主要论题是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批判与继承问题。“变”是叶燮对文学发展史的基本看法。他说:“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对传统的“正变”说,他认识到“正”作为稳定阶段具有相对性,而“变”的阶段则是绝对的。他运用“因”、“创”

一对概念,前代文学是后代文学的创新之“因”,后代文学是前代文学的继承之果。他的“变化”观间或杂有“循环”论的成分,但核心是“踵事增华”,后来者居上。这种文学进化观使他能够充分认识宋诗的独创性和充分肯定宋诗的成就,而以并不拔高宋元诗以菲薄前代诗,避免了一般尊唐宗宋论者非此即彼的门户之见。总之,叶燮得益于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原诗》中称为“对待”)的方法论,使《原诗》立论,既能吸收格调、韵味、兴趣诸说的成果(尽管他反对严羽),同时又不囿于诸说;就其表述形式而言,论证富于系统性,突破了历来诗话一枝一节谈论诗学问题的传统体例,这是《原诗》得近代文论体制风气之先的一大长处。有《清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张寅彭)

【静志居诗话】诗话著作。清朱彝尊撰,姚祖恩辑。此书原系朱彝尊所编《明诗综》中的诗人小传,嘉庆二十四年(1819)始由其同乡姚祖恩辑出单行。共二十四卷,收录明代诗人三千四百馀家。据曾燠序称,此书专为“正”钱谦益《列朝诗集》之谬而作。钱氏宗宋诗而反对明七子,朱氏则主唐音而对七子有所肯定。艺术见地上的差别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钱氏《列朝诗集》流露出的缅怀故朝的情绪,使它在清初难以流播,后来又终被乾隆以“语涉诽谤”的罪名毁版禁行。因此,很有必要站在新朝的立场上重选一部明诗总集。朱彝尊晚年编纂是书,时距明亡已经有年,他并且有意识地贯彻了“详远略近”的原则,所以持论较钱编平允客观。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扶荔山房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张寅彭)

【西河诗话】诗话著作。清毛奇龄撰。毛奇龄(1623—1713),字大可,浙江萧山人,人以其郡望称西河先生。康熙时以诸生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旋假归,以病不复出。通经史,工音律,善诗文。其《西河合集》中有《诗话》八卷。此书虽名“诗话”,论述对象却并不限于诗歌、词曲、音乐、舞蹈,对名物、风俗、宫闱秘事、山川胜迹等,多有涉及。论诗尊唐,反对钱谦益标举宋诗。他提出“诗以雅见难”、“以涵蕴见难”、“以不着厓际见难”三条原则,正符合“诗经”、唐诗的审美特征而与宋诗异趣。《诗话》中有一则广为传播的记载:某次他与汪懋麟(蛟门)等人论宋诗,汪赞赏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诗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和“正是河豚欲上时”二句,以为“远胜唐人”;毛奇龄驳之曰:“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这种口吻,近乎强词夺理,颇不足以服人。毛奇龄深通音律,《西河诗话》中对隋唐之际诗、词、乐的错综关系,有不少精辟的

见解。可能由于重音乐的关系,他对白居易评价甚高,认为“乐天才高”,元稹远不能与之“并名”。他所认识的白居易之长处,亦主要是“工声吕”、“善歌”、“识歌法”、“诗中每寓歌格、舞法”等。他逐句分析了白居易的《答微之霓裳羽衣谱歌》一诗,以为“有舞法存乎其中”,试图通过对此诗的详细分析来复原“霓裳羽衣舞”的舞序。有《西河合集》本。(张寅彭)

【池北偶谈】笔记著作。清王士禛撰。据王士禛自序称,他曾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来命名自己的藏书处,本书亦因此而得名。全书二十六卷,分为“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目,并不是一部专门论诗的著作,但谈艺部分篇幅最多,约占三分之一强,“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全书精粹,尽在于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张寅彭)

【居易录】笔记著作。清王士禛撰。全书三十四卷,系王士禛积康熙己巳(1689)至辛巳(1701)之十二年中所记而成。题曰“居易”者,乃唐顾况戏白居易语“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反意。盖康熙己巳冬,王士禛重入京师,时年不雪,次年春夏又不雨,米价踊贵,天子命大司农祷雨,而王士禛自惭蒙恩居易,故有是题。此书论旨颇杂,诸类中以涉诗者为最精辟。又喜录本人之言与行,间错于杂说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为有自我标榜之嫌。有清刊本。(张寅彭)

【香祖笔记】笔记著作。清王士禛撰。此书据其自序称,壬午(康熙四十一年,1702)后居京师,“偶有见闻,笔之简策”;又据宋荦序称,王士禛“辑癸未迄甲申两年笔记,属校订为序”,则可知此书作于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又因居所“有兰数本,花时香甚幽淡,昔人谓兰曰香祖”(《自序》),取以名书。全书十二卷,内容“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宋荦序),而论诗之语也占了相当的分量。标举佳句、品评得失,尚能做到不徇名失实。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本。(张寅彭)

【分甘馀话】笔记著作。清王士禛撰。此书系其罢官家居时所撰。书名“分甘”者,取王羲之《与谢万书》中叙其率子孙游桑果林,“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之意。凡四卷,二百七十八则,内容亦非专门论诗,而旁涉政、经、史、地、医、文等。谈诗则多以明、清诗人为对象。“其中《沧浪诗话》一条,独举冯班《钝吟杂录》之说,反复诋排,不遗余力。则以士禛论诗宗严羽,而赵执信论诗宗冯班;核其年月,在《谈龙录》初出之时,攻班所以攻执信也。然执信讼言诋士禛,而士禛仅旁借其词,不相显斥,则所养

胜执信多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张寅彭)

【古夫于亭杂录】笔记著作。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王五一案“失察”而被罢刑部尚书职,此后一直在家从事著述。此书即其晚年罢官里居后所撰。其自序谓此书“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录”;又云:“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此书一名《夫于亭杂录》。有五卷本和六卷本两种刊本,条目数量略有差异,编次亦不同。六卷本为定本。此书为杂记琐闻类的笔记,内容极为广泛,涉及诗文品评、书画鉴赏、字义辨析、杂史小考、文人轶事、典章制度、奇谈异闻等。其中有关诗创作和品赏的内容,如评《诗经·蒹葭》等作有“言尽意不尽”之妙等,颇能反映他所标举的“神韵”说,可称为全书的精华所在。至于文、史考辨,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正误参半,非作者所长。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

(张寅彭)

【渔洋诗话】诗话著作。清王士禛撰。三卷。别有《檀几丛书》本,仅一卷,乃摘取王士禛五言诗七言诗凡例而成,实非诗话,已遭王士禛本人否定(见《渔洋诗话自序》)。《渔洋诗话》系作者归田后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七年(1708)间陆续写成者,大都记述其生平经历及与兄弟友朋论诗谐谈之语,颇可勾勒出王士禛主盟诗坛,及神韵论风靡海内的一时盛况。《诗话》中记其标录同时诗人诗作的动机云:“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俨然以一代文宗自居。而所标录者,多为学王、韦一路的流连山水、点染风景之作。间或也有涉及理论的条目,如记施闰章以“华严楼阁”喻神韵说;论当代诗人,以南施(闰章)北宋(琬)并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一五,均指出此书疏于考证,可参阅。有乾隆戊寅竹西书屋本、上海会文堂石印《史梦溪评点渔洋诗话》本、《清诗话》本。

(张寅彭)

【律诗定体】诗话著作。清王士禛撰。此书一卷,列五言仄起不入韵、五言仄起入韵、五言平起不入韵、五言平起入韵、七言平起不入韵、七言平起入韵、七言仄起入韵、七言仄起不入韵等八种体式,概论唐诗律格,破除所谓七律“一三五不论”的俗见。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本事诗】诗话著作。清徐钊撰。徐钊(1636—1708),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此书十二卷,收辑元、明及清初诸家诗之有事可

徵者,约三百馀家,多属文人之艳词逸事,曾由王士禛删定。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半松书屋刻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张寅彭)

【古欢堂集杂著】诗话著作。清田雯撰。田雯(1635—1704),字子纶,一字纶霞,号山姜,德州(今属山东)人,康熙甲辰(1664)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户部侍郎。有《古欢堂集》三十六卷。《古欢堂集杂著》一名《山姜诗话》。四卷。卷一为泛论,卷二专论五七古、五七律及七绝等五体,卷三品评作家,并有十则专评谢榛诗话,卷四记载自己的学诗经历及活动。他言诗反对分唐界宋:“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在唐、宋诗人中特别推重李商隐和黄庭坚:称李商隐为“诗中之圣”,“诗体之工,唐人实无出其右者”,绝句“佳处不可思议,实为唐人之冠”;称黄庭坚七古“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陵前轶后,有一无两”,七绝“新洁如蚕丝出盆,清飏如松风度曲,下笔迥别”。他对谢榛菲薄黄庭坚颇致不满。田雯与王士禛“不相辨难,亦不相结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他论诗亦主含蓄,间或批评杜诗“无以复加”,“俱少含蓄”,大失“风人之旨”;五古推重王、孟、韦、柳,七绝推重李白、王昌龄。这些,都是田雯不欲与王士禛合而自然相合的地方。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山姜诗话】见“古欢堂集杂著”。

【诗义固说】诗话著作。清庞垞撰。庞垞(1639—1707),字霁公,号雪崖,晚号牧翁,任丘(今属河北)人。康熙己未(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历任中书舍人、建宁府知府。有《丛碧山房集》五十七卷。《诗义固说》二卷,附于集末。据他本人解释,所谓“诗义”,系指诗的内容及形式:“内达其性情之欲言,而外循乎浅深条理之节”。所谓“固说”,系指“诗义”的不容置疑性:“如是则为诗,不如是即非诗”。全书以《毛诗·小序》“发乎性情,止乎礼义”和孔子“辞达而已矣”作为基本观点,综论历代诗歌。尤推杜甫为“宗子”。书中所引之禅语,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补严羽以禅说诗之“未尽处”。如禅语“生路渐熟,熟路渐生”,他诠释成“剿拉字眼,涂抹烟云,诗家熟路也;由志敷言,即言见志,生路也。学者一意为言志之诗,不屑为修词之诗,初时亦觉难入,追琢既久,自觉有阶可升,剿拉涂抹之途荒,而抒情言志之途熟,便可到家矣”。这种见地,自与严羽有异。与严羽相契的王士禛“不甚称垞”(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诗义固说》系“推衍严羽之说,以禅谈诗,转至于支离曼衍”。其实

庞垺立论一以贯之,并无“支离曼衍”之病。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西江诗话】诗话著作。清裘君弘编。裘君弘,字任远,号妙贯堂主人,新建(今属江西)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有《妙贯堂余集》等。《西江诗话》凡十二卷:晋唐人一卷,两宋四卷,元一卷,明及清初四卷,附仙道闺秀二卷。自序中称前代诗话“未尝剖符划域,而以地限之”,俨然以得风气之先者自居。其实明人郭子章已先辑有《豫章诗话》。裘著所录五百馀家,都是江西诗人或与江西诗事有关者。所收诗人“姓名见于通志者十之七,不见者十之三”(《凡例》),比《豫章诗话》扩充了更多的新资料。体例仿《全唐诗话》,以存人为主,录诗不多,凡辑入的诸家资料,必注明出处,颇合规范。这些长处,均为《豫章诗话》所不及。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妙贯堂刻本。(张寅彭)

【柳亭诗话】诗话著作。清宋长白撰。宋长白,原名俊,一名岸舫,字长白,以字行,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此书三十卷,编成于康熙乙酉(1705)年。全书以记录与诗相关之知识为旨,上自三代,下迄清初,引书甚富,涉猎甚广,又非仅为摘录而多有评论考辨。如《晏岵》条引杨慎《丹铅录》云:“李太白有《送族弟至晏岵》诗:‘鸣鸡发晏岵,别雁惊岵州。’注云:晏岵,地名,在单父三十里。此字《玉篇》不载,惟《宋史·李全传》有‘出没岛岵’之语”。其下作按语云:“岵字,《李集补注》作岵,岵州作涑沟,原注已失。”颇有益于学诗者探源故实。然选择不精,考辨不确之病,时亦有之,如俞樾序所指摘者。有光绪八年天苗园刻本。(张寅彭)

【漫堂说诗】诗话著作。清宋荦撰。此书一卷,虽仅十三则,诗论颇为精当。学诗主以唐以前大家为根柢,以宋元明诸家“广其波澜,发其才气”,尊唐亦不排除宋,这大约与他出唐人宋的学诗经历有关。他认为源流洞然之后,自会有“吾之真诗触境流出”,达到“随吾兴会所之,汉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汉魏、不唐、不宋亦可;无暇模古人,并无暇避古人”的自如之境。有《绵津山人集》本、《昭代丛书》本、《学海类编》本、《清诗话》本。(张寅彭)

【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诗话著作。清张泰来撰。张泰来,字扶长,江西新建人。康熙庚戌(1670)进士,官金乡知县,吏部主事,转广东兵备道。此书一卷。据书前小序,时宋荦以《江西诗派论》命题课士于江西,张氏适致政家居,因人请问,遂据王应麟《小学绀珠》所定江西诗派自陈师道而下凡二十五人,各为小传,编次成书,以俾后学览阅。“江西诗派”统系之提出,始于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后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及《豫章志》等,所举人员皆有所出入。宋荦序文和厉鹗跋语亦皆申不可拘执江西一派以求尽天下诗之义,是已非宋元人“江西诗派”观之原义。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说诗乐趣类编】诗话汇编。清伍涵芬辑。伍涵芬,字芝轩,浙江於潜(今属临安)人,康熙丁卯(1687)举人。有《读书乐趣》八卷。是书首载朱熹四时读书乐歌,以见命名题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考其非朱熹之作,但读书主乐趣之旨,则与说诗同。《说诗乐趣》二十卷,以为“韵流毫端,意溢声外,皆有旨趣足味,无趣不可谓诗”,则此趣与彼趣,亦微有异。全书荟萃历代名家诗话,以“门”为单位而类编之,有四十一门之多。如“体格门”以各体作法为主,“雅什门”专集有本事之诗,“警句门”汇录佳句隽联等,不一而足。但分类不尽谨严,如将严羽“别材别趣”说归入体格门,似不确。有康熙四十年华日堂刻本。(张寅彭)

【观斋诗谈】诗话著作。清张谦宜撰。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胶州(今属山东)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少时落拓,中年折节读书,晚乃成进士。不仕,闭户撰述。有《观斋诗》、《沉郁集》。《观斋诗谈》八卷,编排略具系统:卷一、卷二“统论”大旨、诗体,卷三为“学诗初步”,卷四至卷七评论历朝诗人诗作,卷八为“杂录”。张谦宜尝自言“吾之论诗,与他人不同”。所谓“他人”,从《诗谈》中“文人好谈禅,谈养生,并是怕人说我不会,强作解事,率易欺饰之词”,“所谓冲淡,此性情心术上事,不洗自净,不学而能”等语看,当指其时声气正盛的王士禛。这本积五十五年学诗心得写成的著作,确有不少自家体会之言,尤其能够把握住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如曰:“诗学要博,却不许杂;诗学要专,却不许急”;“诗尚平淡,平淡正其绚烂处”;“飘逸者,如鹤之飞,如云之行,如蓬叶之随风,皆有大力斡转于中”;“凡物之精者必变……三春花柳,岁岁更新,却不是另有一般颜色,此处须参”;评苏轼“精神到处只是豪放,不到处颓唐淡薄而已”;评柳宗元“此公笔力峭劲,又不是王、韦、孟流派”,等等,均有足资启悟之义。但书中也有乖戾失当之处,如评元结、韦应物,位置竟分别在李、杜和王、孟之上。全书也缺乏一个统辖始末的基本观点。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汉诗总说】诗话著作。清费锡璜撰。费锡璜字滋衡,江苏吴江人。有《掣鲸堂诗集》。性豪放不羁,诗亦如其人,好为古乐府。他与沈用济合撰《汉诗说》十卷,对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所录汉诗进行评释。其集前有总论之语,杨复吉辑《昭代丛

书》时抽出单刊,共四十五则,遂成诗话性质之作。杨氏跋语明谓此书系费、沈同撰,而卷前题下却独署费锡璜一人之名,或取其主要者以省言之。此书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持论似高,而所说殊草草。”除《提要》所列失考之处外,其揭櫫之汉诗艺术特征,亦不过习言之“高古天成”、不可以字句求、“怨而不怒”等。至于赞许“汉诗韵最奇”,而不知汉诗之长,正在乎不讲求用韵。又罗列汉诗与后世诗人之渊源关系,某人由某篇化出,多属臆断。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于汉诗“一例推尊,茫无鉴别”。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寒厅诗话】诗话著作。清顾嗣立撰。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间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特赐进士,为内阁中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授知县。以疾归。博学工诗,喜藏书,以选元诗闻名。著有《间丘诗集》等。《寒厅诗话》一卷(顾达尊跋与张士元序均作二卷),五十四则,大抵二十五则以上评鹭古人得失,二十六则以下记述当代见闻。论诗侧重宋、元,引方回《桐江集》语论宋诗源流甚详,又辨析元诗源流,原原本本,颇见作者研究元诗的功夫。有《昭代丛书》本、《清诗话》本。

(张寅彭)

【然鐙记闻】诗话著作。清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述。何世璠(1666—1729),字瞻庵,一字坦园,号铁山,新城(今属山东)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谥端简。此书一卷,二十二则,为王士禛门生记录其师谈艺语而成的数种诗话中的一种,雪北山樵《花薰阁诗述》本列为《渔洋诗问》之四。按王士禛的几种谈艺录,虽泛论诗道,然各卷大旨,亦略有所侧重。此卷所答,似在示人以作诗之法,取经并不拘于“神韵”一途。如既要求“为诗先从风致入手”,又要求“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所授音韵、体格、章句字法等,亦较通脱。有《花薰阁诗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张寅彭)

【师友诗传录】诗话著作。又名《梅谿诗问》。清郎廷槐编。郎廷槐,字梅谿,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他学诗于王士禛,记述其师语而成此篇。此书一卷,三十一则。前十九则兼采张笃庆(字历友)、张实居(字萧亭)之言,至每问而有三答。三人论旨差近,而王语往往简约,再由二张之言引申发明之。后十二则除二条兼列张实居答语外,其余均为王士禛一人答问,故别本亦有据此于第十九、二十则处析为二卷。此篇大旨,略在辨析诗体流变与时代风会。其中张笃庆考古诗十九首之作者、时代、数目,王士禛考乐府之始,二张辨乐府与古诗之别,皆不确,《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其误。此书版本甚多,但大都非足本,如《学海类编》本、《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皆只收前十九则,唯《花薰阁诗述》本和《清诗话》本为三十一则足本。

(张寅彭)

【师友诗传续录】诗话著作。又名《古夫于亭诗问》。清刘大勤编。刘大勤,字仔臣,长山(今属山东邹平)人。此书记述王士禛答问之语,因取王氏所居之“古夫于亭”以为名;又以郎廷槐先有《师友诗传录》,故亦名《师友诗传续录》。一卷,六十则。全篇泛论体制、作法,语义与《然鐙记闻》、《师友诗传录》等大同小异,间亦有失考处。其品评诗人的篇幅,则较郎录等为多。此书《谈艺珠丛》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皆仅四十则,不全;《诗触丛书》本、《诗法萃编》本、《清诗话》本则为六十则之足本。(张寅彭)

【古夫于亭诗问】见“师友诗传续录”。

【谈龙录】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一卷,书题得名于首则记载:王士禛、赵执信和洪昇三人谈龙论诗,王士禛本于“神韵”说的立场,不同意洪昇“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的见解,主张“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赵执信左袒洪昇,强调须有完龙在握:“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此处表明赵执信论诗与“神韵”说的分歧所在:王喜轻逸,赵重质实;王擅长即小见大,赵主张以大概小。二人之诗观,形同水火。赵执信服膺冯班、吴乔,书中自记曾三客吴门,遍求吴乔之《围炉诗话》而不得。吴乔的“诗中须有人在”一语,成为《谈龙录》批评王士禛的主要出发点。如指出王士禛《南海集》中诗多矫情,谓“清新俊逸”的诗风易流于“涂饰”。又谓时人(暗指王士禛)虽反对明七子的着唐人之优孟衣冠,但自己又穿上了宋人的优孟衣冠,所申均系“诗中须有人”之意。《谈龙录》批评王士禛,除了诗学观点对立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两人之间的私事诟厉。因此,《谈龙录》在记事议论之余还夹带攻讦语调,颇有碍其立论的客观性。如他一面承认王为大家,以朱彝尊与之并立,但又不无微词,批评“朱贪多,王爱好”,以致遭到后世的讥议。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声调谱】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分前、后、续谱,故亦称《声调三谱》。有合为一卷者,或分为三卷者,亦有以前后谱为一卷、续谱为一卷者,但于内容均无大出入。唐代律体盛行之后,古诗写作便产生一个避免律调的问题。对古诗声调的注意,

始于明人。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说》云：“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后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等亦有议及者。清初钱谦益、冯班、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据说赵执信曾向王士禛讨教古诗声调问题，不得其详，于是独自钻研，从唐代大家名作入手，“发愤三、四月”（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终于悟出古诗与律诗在声调上的区别，著成此书。赵谱一出，又推动王士禛门生整理出《王文简古诗声调谱》（文简为王士禛谥号）、《律诗定体》等作，从此开了论诗谈声调的风气：“自渔洋、秋谷之书行，此说几于家喻户晓矣。”（梁章钜《退庵随笔》）赵谱所论，大抵以三平为正格，又多采冯班之说。后翁方纲、翟翬、许印芳、吴绍灿、董文焕等对此书所论又有所驳正，使这一项研究更趋精密。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声调三谱】 见“声调谱”。

【西圃诗说】 诗话著作。清田同之撰。田同之，字彦威，号西圃，又号小山薑，德州（今属山东）人。康熙庚子（1720）举人，官国子监助教。此书一卷。田同之为田雯长孙，《自序》记述著书动机有云：“念我先公寻源创启，主骚坛者数十年，垂之家法，其不绝仅如线耳，门风不继，谁之咎耶？又不得已于说。”但《西圃诗说》所申，大抵为王士禛之诗学主张，而与其祖父不尽相同。如田雯论诗唐宋并举，而田同之则站在“神韵”说的立场上扬唐黜宋。他对当时的诗坛风气深致不满：“今之言诗者，多弃唐主宋，下取苏、黄、杨、陆之体制，而又遗其神明，独拾沉滓，无怪乎高者肆而下者俚，博者缚而约者疏，一切粗厉、噍杀、生涩、平熟、俗直之音，弥漫于声调间也。是可慨夫！”书中对王士禛推崇备至：“诗中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即古人亦不多觐。唯阮亭先生刻苦于此，每为诗，辄闭门障窗，备极修饰，无一隙可指，然后出以示人，宜称诗家，谓其语妙天下也。”“前人论诗主格者、主气者、主声调者，而渔洋先生独主神韵。神韵二字，可谓放出三昧，直足千古。”故沈德潜《清诗别裁》卷二四谓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拼命与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梦晓楼随笔】 诗话著作。清宋顾乐撰。宋顾乐，后改名乐，字玉才，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康熙时廪生。沈德潜《清诗别裁》卷二七录其诗四首。此书一卷，五十三则，多著录唐宋元明人诗文集及诗文评类著作而评论之。大抵主唐音，严羽“妙悟”之说，高棅“初盛中晚”之分期，皆为其首肯。论明诗则推崇王世贞、王世懋之言，推奖徐桢卿、高叔嗣一流之古淡清隽风格。而对其乡前辈钱谦益则颇致微词：“牧

翁不喜妙悟之论，公一生病痛正坐此。”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张寅彭）

【五代诗话】 诗话著作。清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郑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今福建建瓯）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官兖州知府等，有《蔗尾集》。王士禛晚年作《五代诗话》，未及成书，门人弟子即把这未竟草稿传抄出去，遂引起宋弼和郑方坤分别对其进行删补。但“弼所续入，务求其博，体例遂伤冗杂，殊失士禛之初意，而挂漏者仍复不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郑方坤删补后的《五代诗话》体例取舍较为精赅得当。王士禛原本十二卷，共六百四十二条，郑方坤删去无关诗歌者和无关五代者二百十六条，实存四百二十六条，又补入七百八十九条，于乾隆十三年最后成书。此书不仅较为齐全地汇集了有关五代的各类诗歌资料，而且从“诗之馀”的角度，将五代词人的有关资料也加以收辑，颇能体现五代踵唐诗启宋词的时代特色。不过取舍标准也有可议之处。如以“人品高尚”为由将唐人司空图、韩偓等收入；以“咏五代之事”为由将苏轼、晁补之等宋人的作品收入，颇乖该书之时限。分卷以国别为主，凡“国主、宗室”一卷，“中朝”、“南唐”、“前蜀、后蜀”、“吴越、南汉”、“闽”、“楚、荆南”六卷，另有“宫闱、女仙鬼、缢流”、“羽士、鬼怪”和“杂缀”各一卷，共十卷。因北汉等国“无一诗人可纪”，未全十国之数，故仍以原题“五代”名书。有书目文献出版社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张寅彭）

【全闽诗话】 诗话汇编。清郑方坤辑。全书十二卷，计六朝唐五代一卷、宋元四卷、明三卷、国朝（清）一卷、无名氏及宫闱一卷、方外一卷、神仙鬼怪杂缀一卷。所收自以福建诗人为主，“亦有非闽人而关涉闽事者”（《例言》），计约七百馀家。闽地自唐时才开始发达，故六朝只录郭璞、谢朓、到溉、江淹四人。采辑的资料以诗话为大宗，尚有方志、笔记等，达四百三十八种。编者对所采资料多有考证。如据郭璞、《地记》诗之七言律体，断其为后人伪托，态度颇为审慎。此书系大型地域诗话汇编。有乾隆年间诗话轩刊本。（张寅彭）

【莲坡诗话】 诗话著作。清查为仁撰。查为仁（1693—1749），字心穀，号莲坡，宛平（今属北京）人。康熙举人。著有《蔗塘未定稿》等。《莲坡诗话》原为三卷，自《昭代丛书》本改作一卷，而内容并无出入。查为仁曾被讦得罪，获释后居天津水西庄，贮书万卷，忧性于吟诗读书之中；往来名士，如赵执信、田同之等，多与之交。而所有赠答倡酬之作，必加甄录，诗话即据以成书。故此书以记事录诗为主要内容，偶涉赵执信《谈龙录》、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沈德潜《说诗碎语》等著作,皆因人着墨,非着眼其理论。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宋诗纪事】诗歌总集与诗话汇编。清厉鹗辑。此书一百卷,编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据厉鹗自序称,他因有感于“前明诸公剽拟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问,迄今流传者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逸无存,江湖林藪之士,谁复发其幽光”,于是利用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藏书,耗时二十载,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在藏书馆主人马曰琯和马曰璐的协助下,辑成此书。全书收入宋代诗人约三千六百家,体例仿《唐诗纪事》,以人立目,每一诗人之后,又大多附有小传,缀以诗话,是一部价值甚高的宋人诗歌资料集。此书所辑,大部分作品有诗而无本事,殊不符《纪事》之体,故类如总集而非诗话汇编。但因其卷帙浩大,即以所收之诗话,已为有宋一代诗话之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计有功《唐诗纪事》、陈衍《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等,汇成一个完整的专代诗话汇编系列。至于此书存在的阙收、重出、失考等不足之处,则后来有陆心源等加以续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张寅彭)

【贞一斋诗说】诗话著作。清李重华撰。李重华(1682—1754),字实君,号玉洲,江苏吴江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贞一斋集》。《贞一斋诗说》一名《玉洲诗话》,一卷,分论诗答问和诗谈杂录两部分。李重华论诗善于吸取众家之长而深受叶燮影响;至其所得,又与赵执信为近;而对当时沈德潜、袁枚之争,又能调停于格调、性质二说之间,殊无偏废。书中提出音、象、意三者为作诗“三要”,“三要”中尤以音为首要,因为音是“象”(诗体形式)的主要成分:“物有声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称音也”;而“意”又无从确指,“难以言传,其能者常在有意无意间”。作者在回答“三者孰为先”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意立而象与音随之,余所以先论音,缘人不知韵语由来,则缀辑牵合,举谓之诗,即千古自然之节胥泯焉;若悟其空中之音,则取象命意,自可由浅入深。故指示初学,音特居首也。”这段话表明了作者论诗由音调入的立场。书中又认为精通音律者甚至可以从音调细辨出各位大家、名家之区别:“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种。大家名家,各自为调。且如李杜篇什,甫闻警歎,便易分别谁某;其馀凄锵磊落者,细玩之都具本来面目。”作诗须从音调入手,读诗亦然:“欲识诗篇工拙,先听吟咏合离,此最是捷径法”,“盖古体须顿挫浏漓,近体须铿锵宛转,二者绝不相蒙”。《贞一斋诗说》中的创作论、诗体论和鉴赏论,就这样由“音调”一以贯之,虽然全书内容尚不止

音调一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张寅彭)

【玉洲诗话】见“贞一斋诗说”。

【柳南随笔·续笔】笔记著作。清王应奎撰。王应奎(1683—1760?),字东淑,号柳南,常熟(今属江苏)人。诸生。有《柳南诗文钞》等。《随笔》六卷,《续笔》四卷,《续笔》各则标有小目。此书之内容,约可归为两类:一为闻见之记述,略以明、清吴中地区士人之活动为主,尤详于其乡贤如钱谦益、冯班等。二为读书札记,凡经史子集、诗文词曲书画,几乎无所不及。其间也有采录原文者,如访得吴乔《围炉诗话》后,即选录十数则于《随笔》之中。王应奎少即有诗名,成年后八试不第,遂隐居乡里,“堆书及肩,埋头其中,而不知户外”(顾士荣序)。清初常熟地区诗声颇著,王应奎归为“有钱(谦益)、冯(班)两派”,进而作月旦之评:钱为文人之诗,冯为诗人之诗;冯“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又指出学两家不当者之弊:“魁杰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又清初诗坛,赵执信与王士禛诟厉,涉及冯班诗见之抑扬,个中是非曲折,此书记之甚详,故是书颇有益于文史研究。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张寅彭)

【带经堂诗话】诗话汇编。清张宗柟编。张宗柟(1704—1765),字汝栋,号含广,海盐(今属浙江)人。《带经堂诗话》汇集了王士禛的论诗之语达二千馀条,按性质分类,纳入八门(综论、悬解、总集、众妙、考证、记载、丛谭、外记)三十卷(卷首“御笔类”、“应制类”除外)的体制之内,可谓集王士禛诗论之大成。其中以“综论”、“悬解”、“总集”、“众妙”四门理论价值较高。综论门主要品评诗人诗作和评驳前人诗论,悬解门集中与神韵说直接有关的诸多论述;总集门编辑各种选诗凡例、序跋、题笺等,反映其各种见解及生平重要的诗学活动,众妙门泛摘唐以下历代诗句并作评论,以例证其神韵理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

(张寅彭)

【谐声别部】诗话汇编。清喻端士编。此书专将王士禛《皇华纪闻》、《陇蜀馀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馀话》等六种笔记中的论诗之语分类编纂,原刊于乾隆年间,同治年间三馀书屋重刊本易称《分类诗话》。因所辑仅限于笔记著作,故资料价值不如张宗柟纂辑的《带经堂诗话》。参见“带经堂诗话”。

(张寅彭)

【分类诗话】见“谐声别部”。

【消夏录】诗话著作。清黄任撰。黄任(1683—

1768),字莘田,永福(今属福建)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官四会知县。有《香草斋集》。徐祐永《闽游诗话》谓:“闽中近时诗当以莘田先生为冠。先生诗各体俱工,而七言律绝尤为擅场,清丽芊绵,直入中唐之室。”《消夏录》二卷,内容以辑、释诗中之掌故、风俗为主。如集白居易家妓女侍儿小名之见于诗篇者,集唐之红叶诗与事;又如王建诗《题花子赠渭州黄判官》,“花子”为妇人面饰之物;刘梦得诗句“八舍郎官换绿衣”,唐制五品官始得换去绿色官服,等等。上卷记唐,以中晚为主,延及五代;下卷记宋,延及金、元。如书名所示,此书诚为读诗消夏之一佐物。有乾隆四十年刊本。(张寅彭)

【说诗碎语】诗话著作。清沈德潜撰。二卷。卷上一百二十二则,第一至十一则总论诗道,第十二则开始依次论述《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唐诗的体制特征;卷下九十五则,前二十九则续论宋、金、元、明诗的特征,第三十则以下泛论作法、题材、选诗、考订。对诗歌格调的研究,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但沈德潜的格调说比别人更多地论及了思想学识修养在诗创作中的作用。他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在沈德潜的诗论中,“襟抱”、“学识”的主要内容乃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过沈德潜的“温柔敦厚”同时也包含着对艺术形式表现的要求,指的是“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卷上首条即总结了格调形式和诗教内容两方面的得失关系:“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行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这段话特别指出唐诗声律和《诗经》的风雅传统,具体提出了格调和诗教的原则,又指出讲究格调对于诗歌的损害,以及他欲折衷两者的用心,可以视作全书乃至沈氏全部诗学见解的纲要。不少封建正统论者每嫌屈原“露才扬己”,嫌白居易诗浅露,缺乏含蓄风味。沈德潜却对屈原和白居易作了充分的肯定,表明他的“温柔敦厚”原则,无论作为思想标准还是艺术标准,都相当宽泛。但这一标准在具体运用中也有趋于极端的情况。他曾将唐诗与楚骚、汉诗作比较,认为楚骚最合标准:“托陈引喻”,“深有取于辞之重,节之复”;汉诗次之:“汉人五言兴而音节渐亡”;“至唐

人律体兴,第用于对偶平仄间,而意言同尽矣。求其馀情动人,何有哉?”在这一论断中,温柔敦厚的原则与诗体格律的发展竟形成无法调和的对峙关系,夸大了诗教的积极性和格律的消极性。虽然如此,此书的主要成就却也正在于对历代诗歌格调规律的总结。书中对于诗体发展史上重大转变时节的把握,对于各体艺术特征的揭橥,对于以李、杜为中心的作家的品评,态度公允客观,识见开阔,避免了“神韵”论等的局狭之病。此书版本甚多,常见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张寅彭)

【杜诗言志】诗评著作。清佚名撰。此书十六卷,以儒家诗教评衡杜诗,结合其人生平时遇,探究其诗寄兴托讽之本志。以编年为体制,而不取分体汇萃之例,盖编年易按其所处之时与所遇之事,然后得以知其诗托兴之所由来。全书诠释之诗约三百馀首,全为得其志意之所存者,他则勿论。至于“三吏”“三别”等赋体诗,以“人见与己见同”,则未予录释。此书原为康熙间稿本,1979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据以校刊印行。

(张寅彭)

【一瓢诗话】诗话著作。又名《一瓢斋诗话》,清薛雪撰。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吴县(今属江苏)人。诸生,以医名。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一卷,基本观点大都直接袭取其师叶燮之语。叶燮的“诗之基在人之胸襟”、“正变系乎时”等说法,以及“踵事增华”的文学进化观,在《一瓢诗话》中均得到援引和阐发。不过薛雪师承叶燮往往徒得其貌,未能消化真髓实质。例如,他虽然自称“服膺”叶燮的“理、事、情”,却并不能领会叶燮赋予此三概念的哲学和美学内涵,只能拘蹇地揣度到“作诗三字”的程度。又如,他曾将叶燮的诗论内容概括为“不越正变二字”,他对“正变”的解释是:“温柔敦厚,缠绵悱恻,诗之正也;慷慨激昂,裁云镂月,诗之变也。”也不合叶燮原意。叶燮的“正变”观,变的是诗的辞、体,作为“意”的“温柔敦厚”,虽然结合着代代相异的辞、体而呈现不同的风貌,但实质是不变的。薛雪的解释实际上是沈德潜的看法。《一瓢诗话》中时有这种情况出现:叶燮和沈德潜的相左看法被薛雪并列在一起,而不顾忌前后的抵牾。书中比较能够一以贯之的观点,还数他师承叶燮得来的作诗以诗人“胸襟”为基础的说法。他反复告诫学诗者要先具“志气”、“人品”,不要堕入“误尽苍生”的“拟古”之路,也不要沾染上“无所触发,摇笔便吟”的“村学究幕宾之流”的恶习。他本人对此是颇为自负的,曾谈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余作《九秋》诗,因大有触发,遂多创获”;“作诗稿成读之,

觉似古人,即焚去”。此书标格论调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不无精义可采。如论“格”有“品格”与“体格”之分,十分贴切地揭示和界定了“格”之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涵义。此书在主格调一路的诗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扫叶村庄自刊本、《昭代丛书》本、《清诗话》本。(张寅彭)

【一瓢斋诗话】 见“一瓢诗话”。

【槐堂诗话】 诗话著作。清汪沆撰。汪沆,字师李,一字西颢,号槐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少时曾从厉鹗学诗。有《槐堂诗稿》。《槐堂诗话》一卷,以记述掌故、解释诗作名物为旨,每则均标有小目,如“花蕊夫人”、“葡萄”、“锦竹”、“宣城”、“女道士”等。有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张寅彭)

【榕城诗话】 诗话著作。清杭世骏撰。杭世骏(1696—1773),字大宗,号荃甫,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雍正二年(1724)举乡试,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授编修,官至御史,后因上书言事被罢官。博览群书,著述甚富。还乡后长期为粤秀、安定两书院主讲。《榕城诗话》三卷,系其于雍正十年入闽主持乡试时所辑。稽时二三月,与闽之贤士大夫晋接谈宴,随所见闻,笔之于书。因闽中多榕树,故取以为书名。三卷内容,略有所分:卷上为所遇之山川风物、民俗异闻,卷中录文人逸事,卷下记闽外人而关涉闽之事者。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张寅彭)

【剑溪说诗】 诗话著作。清乔亿撰。乔亿(1702—1788),字慕韩,号剑溪,江苏宝应人。少即有诗名,应科举不第,遂专肆力于诗,与沈德潜、查慎行等交游甚密。沈德潜对此书颇为嘉许,不仅为之作序,又作四言诗三章,以纪其事,将乔亿与钟嵘、司空图、严羽并举。《剑溪说诗》共二编。《正编》又分上、下卷,广泛议论诗体的渊源流变、作诗的具体法则、前人诗评的得失、历代诗人诗作的优劣等;《又编》则专评唐诗。作者受沈德潜影响,多从格调说的立场出发,如论诗“求合乎风人之旨”,肯定白居易的“讽谕诗有关世道,当别具只眼观之”,赞赏李梦阳、何景明“大有功于诗教”。又好辨诗之气象、音调、品格:“汉、魏、六朝诗,勿论寄兴如何,气象固自不同”;“六朝诗音无不善,唐音有善有不善,宋以下率皆有声无音,若元诗之音,又近词曲矣”。又好评一代诗人之大家、名家。于李、杜无分优劣,但更重杜诗格调。李、杜以下,复推重王、韦,但标准与神韵论者不同,许王维之“诸体兼长,气象宏远”,许韦应物之“志切忧勤”、“诗中有人”,仍大致从其格调立场出发。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杜诗义法】 诗评著作。清乔亿撰。此书二卷,

系乔亿对杜甫诗作具体评语的辑。其评语有涉于神理者,如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云:“有此本领方敢为此言。李太白云:将复古道,非我而谁?韩退之云: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敢多让。皆自信语也。”有涉于体气者,如评《游龙门奉先寺》:“清机妙理,似与襄阳为近”。乔亿论五言宗汉魏,故对杜甫五言之变调深致不满,如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云:“自是名篇,然亦气太厉矣,建安诗激昂中不失和平。”有《乔剑溪遗集》本。(张寅彭)

【诗学纂闻】 诗话著作。清江师韩撰。江师韩(1707—?),字杼怀,号韩门,又号上湖,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上,官编修,湖南学政。此书一卷,凡三十九则,每则皆标有小目。首四则《三有》(“始作有感”、“方作有义”、“成章有我”)、《四美四失》(博、新、切、巧;气不清而无音节、词不雅而无气象、切而无味则象外之境穷、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读书》、《绮丽》为总论;以下三十余则,半“明体裁之辨”,半“订沿袭之讹”。全篇“无取乎一句一字之称美”,持论亦大都平实有据。如《杂拟杂诗之别》、《乐府》、《回文集句赋得限韵次韵》等则之辨体溯源,《谢(灵运)诗累句》、《江文通杂体诗拙句》、《杜诗字句之疵》等则之指摘批评,《刘梦得金陵怀古诗》、《李义山锦瑟诗》等则之赏析解颐,皆取证甚确。《通韵》“近乃有上江诗人作《诗话》,谓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说尊杜,谓杜诗七古通韵者仅数处,必是传写之讹”云云,系驳方世举《兰丛诗话》之说,举证亦甚笃。然综观全篇,其见解不免平实有馀而精锐不足。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说诗薈】 诗话著作。清吴雷发撰。吴雷发,字起蛟,江苏震泽人。诸生。约生活于康、雍时期。有杂著《琴馀集》、《晨钟录》、《香天谈藪》等十余种。《说诗薈》一卷,三十九则,杨复吉跋谓此书“属未竟之业”,未知何据。书名取义于《左传》“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一语,盖自谦琐言,或有可采者。全篇所论,多关乎诗艺之大旨,如主张诗人须才识兼备,诗须自然有真情,诗品之高下不全系乎人品,诗不必越古越好,等等。文中自谓:“余凡诸立论,断不肯拾人牙慧,宁为人所讪笑,而人云亦云,终有所不能为也。惟从来至当不易之论,则虽人云亦云,有所不辞。”纵观全篇,“不肯拾人牙慧”之志确乎有之,然具体内容则多为“从来至当不易之论”之复述,故虽不乏可采之语而新见无多。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定泉诗话】 诗话著作。清陈梓撰。陈梓,字俯恭,又字古铭,号一斋,又号客星山人,余姚(今属浙江)人。雍正二年(1724)举孝廉方正,不就,乡居读书事亲,以布衣终。有《删后诗存》。《定泉诗话》五

卷,以诗教为旨,既评古,又论今,如评唐、宋诗之短长云:“宋人诗所以不及唐人,理胜于情,动立议论,彻底说完,绝无含蓄耳。诗必有关于世道人心,岂当以风云月露,夸多斗靡?然须有温柔敦厚之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可戒,音调铿锵,使人可歌可泣,乃为极则。若据理直说,不假文饰,此之谓有韵之论,非诗也。”则其视诗教原则既为政治、伦理标准,同时又是艺术标准。论当世诗人多限于乡里,视野不远。有《藜照庐丛书》本。(张寅彭)

【泾川诗话】诗话著作。清赵知希撰。赵知希,字环石,安徽泾县人。雍正、乾隆间举人,赴大挑而历任地方官。有《环石诗钞》等。《泾川诗话》三卷,嘉庆五年始由其侄孙赵绍祖收入《泾川丛书》而付梓。此书为乡邑诗话,卷上记晚明以来本地之能诗者,所记颇详于本族;卷中叙录有关本地史实的记事作品,多采自里人郑相如所编之《乐府集》;卷下专存己作及诗友间的酬唱活动。泾县地僻,风雅不甚彰,故此书所记,可观者少;惟泾水西之山桃花,迤迤四、五里间,颇可资吟咏,施闰章自黄山归,过泾,遂作《桃花洲》诗颂美之。有《皖人诗话八种》本。(张寅彭)

【唐音审体】诗话著作。清钱良择撰。钱良择,字玉友,号木庵,常熟(今属江苏)人。有《抚云集》。曾随大吏朝贵出使边塞海外。为诗感激豪宕,与所选唐诗之兢兢规格,如出二手。《唐音审体》原为总集,共二十卷,收唐各体诗一千三百馀首,但其宗旨不在录诗,而在备体,列有古题乐府、新乐府、古诗(四言、五言、齐梁体、七言)、律诗(五言四韵、应制诗、省试诗、五言长韵、五言绝句、七言四韵、七言长韵、七言绝句)、古赋、律赋等体。各体之前多有按语,间或附有冯复京、冯班父子的评语。后雪北山樵编《花薰阁诗述》,首次将钱良择所作的这些按语专辑成一卷,仍用《唐音审体》原名。此书长于辨体,持论切实有据,“于源委分合甚析”(雪北山樵识语),深得后世学者好评。除《花薰阁诗述》本外,另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小石林文外·本朝诗话】诗话著作。清叶笠亭撰。叶笠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系宋叶梦得(石林)之后,故号“小石林”。此书二卷,由其子叶谏、叶銮、叶凿编辑,以录清初诗坛掌故为主。所记多为大家名家,如钱谦益、吴伟业、尤侗、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查慎行等,不下数十家。不仅可资谈谑,于诸家之研究亦有所助益。有乾隆元年(1736)刻本。

(张寅彭)

【秋窗随笔】诗话著作。清马位撰。马位,字思山,号石亭,武功(今属陕西)人,官至刑部员外郎。与杭世骏为诗友。此书一卷,一百零三则,系作者自

京师归乡里,闲居漫笔而成。说诗之外,亦涉及文,乃随笔性质。据卷首小序,知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作者颇知读书,有识见。论诗摘句,则多会心于含蓄蕴藉之旨,而不喜宋人之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张寅彭)

【春秋诗话】诗话著作。清劳孝舆编撰。劳孝舆,字巨峰,一字阮斋,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少受知于经学家惠士奇,与何梦瑶、罗天尺、苏珥齐名,世称惠门四君子。乾隆初试博学鸿词科不遇,以拔贡历官贵州龙里、毕节、镇远诸县,卒于任所。有《阮斋诗文集》。《春秋诗话》五卷,系取《春秋传》中之涉《诗》者,分赋诗、引诗、解诗、拾诗、评诗五类而疏解之。赋诗,引诗,本于《左传》原义;“解诗”则系本书特撰之名,据卷前小序释义,“左氏传《春秋》”,即“解诗也”。具体言之,即是指引诗中一部分得到直接说明的作品(“就诗作解”)。如《硕人》,《左传》有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这是“解以其题”;《左传·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是对所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两句诗(按《毛诗》原文“彼”作“此”)的“解以其事”。另有“解其大旨”、“训诂其字义”、“人畅其词而另辟一解”、“断取其义而不泥其文”等,俱属解诗。“拾诗”则指《左传》中所记之轶诗,“评诗”则录吴季札观乐一篇充之。全书各卷体例略同,每于引文之后,复作按语,以申己论,如比较毛传说《诗》之详于时事和《左传》说诗之遗于时事,而谓“左氏博学,不逮毛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张寅彭)

【辍锻录】诗话著作。清方贞观撰。方贞观(1679—1747),名世泰,字贞观,一字履安,以字行,号南堂,桐城(今属安徽)人。诸生。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科,不就。因同邑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隶旗籍,十年始放归。工诗善书,晚年益造平淡之境,时称其诗得唐人三昧之旨,有《南堂诗钞》。《辍锻录》一卷,四十四则,据金楷、李塋两序,初刊于道光中。方氏论诗以唐人为旨归:“《三百篇》而下,由汉、魏以迄六朝,代有传诗,而余独以唐人为归。”全篇亦主要评论唐人诗作,不专宗一家,唯不喜李贺,嫌其好以瑰辞险语惊人,“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多检宋人语评唐,如以禅喻诗、夺胎换骨等。又如强调“多读书”,与“熔炼淘汰于有唐诸家”结合在一起,则此处之读书,显系读唐人之诗集而非学问书。他分训“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

而比较之,不取才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独首肯诗人之诗。其他如言七律“尤忌删去两字便可作五言诗读”等,皆袭宋人话题而又与宋人原意不同。又如曰“诗最忌敷陈多于比兴,咏叹少于发挥,是即南北宗所由分也”,语虽由己出,却甚得严羽诗分南北宗之原义。有《艺海珠尘》(本集)本、《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月山诗话】诗话著作。清恒仁撰。恒仁(1713—1747),字育万,一字月山,清宗室,其父封为镇国公。恒仁曾从沈廷芳、沈德潜父子学诗,有唐人之音。此书一卷,共四十三则,大旨亦主唐音,惟持论颇为细碎。书中对王士禛贬杜深致不满,系从其师沈德潜之说。又评鹭清宗室诗人,以学王士禛的文昭为第一,则仍据其宗唐之意。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寅彭)

【兰丛诗话】诗话著作。清方世举撰。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安徽桐城人。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科,不就。有《春及堂集》。方世举为方苞之弟,少从朱彝尊游,“泛览唐诗”,即作有诗话,未及成而弃去。中年在都下与翰苑诸同事“谈诗为事”,复录有《梁园诗话》,后亦亡佚。又在扬州与其侄方观承谈诗,观承录成诗话一册,未刊。《兰丛诗话》系其八十五岁时所作,凡一卷。桐城方氏,世习杜诗,方世举亦承此家法,篇中言及用韵、章句等法,大多取义于杜诗。其论诗先归于唐:“诗屡变而至唐,变止矣,格局备,音节谐,界画定,时俗准。今日学诗,惟有学唐。”再归于杜:“唐诗亦有变,今日学唐,惟当学杜,元微之断之于前,王半山言之于后,不易之论矣。”杜诗如一峰高峙,学者往往“登高自卑”,故“宜先求其次者”,“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韦、柳,七言歌行先求元、白、张、王”,七律则先求“白香山之疏以达,刘梦得之圆以润,李义山之刻至,温飞卿之轻俊”等,杜甫举而众家皆各定其位。方世举虽崇杜,但其论杜诗亦偶有误,如谓杜诗七古无通韵者,即遭汪师韩《诗学纂闻》驳正。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澉浦诗话】诗话著作。清吴文晖撰。吴文晖,原名文阵,字翼万,一字侃叔,海盐(今属浙江)人。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有《灯庵遗诗》。他专习《尚书》,旁及金石之学。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引钱大昕《传略》,谓其诗清新浑脱,不名一家,尝效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章叙述土风,可补史乘。澉浦镇属海盐县治。《澉浦诗话》二卷,系乡邑诗话,专辑澉浦历史上的达官、高僧、名士、节妇,乃至风俗、胜迹之有诗者,上溯唐时重云寺(法喜寺)之迁入,下迄清前期,尤详于明亡之际。体例与一般汇编

之作有别,多化合各家资料,再以己言述之。其子吴东发所作之按语,于正文各条多有补正。东发并再续四卷,体例仍沿其父之用。有清刊本。

(张寅彭)

【消寒诗话】诗话著作。清秦朝钊撰。秦朝钊,字大樽,号岵斋,金匱(今属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由礼部郎中出为楚雄知府。工诗,尤善古文。此书一卷,凡六十九则,内容多涉其宦游行止及闻见,以记事录诗为旨,往往有无关诗者。内中有一则记其友冯浩笺注李商隐诗之情况,略具史料价值,余则多无足观。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野鸿诗的】诗话著作。清黄子云撰。黄子云(1691—1754),字上龙,号野鸿,江苏昆山人,一作吴县人。布衣。著有《野鸿诗稿》、《长吟阁诗集》。《野鸿诗的》一卷,一百十一则。持论以儒家诗教为旨,以杜甫为宗。前者如曰:“由《三百篇》以来,诗不绝于天下者,曰美君后也,正风化也,宣政教也,陈得失也,规时弊也,著风土之美恶也,称人之善而谨无良也。”后者如曰:“孔子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成圣者也;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此或即其“诗的”之谓。但以此为的,则不免崇古非今,故其无取于中唐以后诗,尤大贬李商隐,几视李与杜为风牛马不相及者:“彼(杜)之浑厚在作气,此(李)之浑厚在填事;彼之风喻必指实,此之风喻动涉虚;彼则意无不正,此则思无不邪。”用典亦以李商隐为分界:中唐以前诗家“多本之于经、传、《史》、《汉》”,温、李以后则“专搜汉、魏诸秘书,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见者,不论其义之当与否,擒剥填缀于诗中”;至断言《锦瑟》诗之原意连李商隐本人“亦不自解”,“必当日獭祭之时,偶因属对工丽,遂强题之”云云,则已成臆说而不类批评。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国朝(清)诗话】诗话著作。清杨际昌撰。杨际昌(1719—?),字葭渔,号蓬莱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此书二卷。据书前例言,始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完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加上存人不录的原则,致使收辑之时限,约在乾隆以前之百多年间。其例言云:“秀水朱竹垞太史《明诗综》,多录国初遗民。以鄙意见之,鼎革后,明之士大夫,或抗王师而死,或捐躯而死,周顾殷义,自当属明。其馀无论登仕版与否,践土食毛,孰非臣子?故易其例,概收入卷内。”此又所以详于国初。此书评鹭标准,略主诗教温厚之旨,故其选诗、评语,甚能得顺、康诗坛之正。大抵以“专擅风神”的王士禛为一代宗匠,推许其五律“皆不愧少陵夔州作”,然不满《秋柳》诗之“韵远而骨媚”;而于同时或稍前稍后之大家如钱谦

益、吴伟业、龚鼎孳、朱彝尊、田雯、宋荦、查慎行等，亦多有所取。又兼重情韵而不拘门户：“诗不拘何派，情韵总不可离，离则非纤人即伧父也。”此又使此书所录之诗颇多情致之作。要之，此书取舍大致有则，殊无一般录当代诗者的芜杂之病。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诗论正宗】诗话汇编。清王廷铨辑。王廷铨，字昆衡，浙江杭州人。此书二卷，卷上收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仅十九则，非足本；卷下收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六十二则，较丁福保《清诗话》本所收多出二则。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张寅彭）

【问竹堂诗法】诗话汇编。清潘松辑。潘松，字雪青，号渔墩居士。奉新（今属江西）人。此书八卷，分总论、诗家要忌、各体三部分。“总论”辑各家论诗语，“要忌”所辑之语不标出处，“各体”则每体先列“原始”各家语，后附诗例。此书仅用二月时间编纂而成，局于身边之书，故采幅不广，略以明清人之说为多。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本。（张寅彭）

【小澥草堂杂论诗】诗话著作。清牟愿相撰。牟愿相，字铁李，栖霞（今属江苏南京）人。此书仿宋人蔡條《百衲诗评》和敖陶孙《臞翁诗评》，每句用一个比喻评价一位诗人（并称则不限一位），如评“曹子建诗如年少美邀，磊块中潜”，“孟襄阳诗如过雨石泉，清见鱼影”等。“诗小评”部分共六十二句，比喻评价了自汉《十九首》至唐皮、陆止的数十位诗人。“诗小评”部分之后再有“杂论诗”、“又杂论诗”二部分，具体评价历代诗人、名句，如云：“读渊明诗，觉一草一木，一酒一琴，都有‘吾与点也’之意”；“渊明只去得一‘傲’字，其诗遂高妙乃尔。可见‘傲’字坏人”；“谢康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只是卧病初起，耳目一新”，等等，诸如此类，多为前人未发之语，前后参照阅读，可使上述象征比喻之意更明。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皕亭诗话】诗话著作。清陶元藻撰。陶元藻，字皕亭，号莖邨，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贡生。袁枚曾和其《良乡题壁诗》云：“手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有《泊鸥山房集》。《皕亭诗话》二卷，论诗旨趣与创作同。如归结《诗经》之佳“全在比兴处见性情”；批评杜甫惯为律诗，对偶直致，“不能为五七绝”，微露贬抑之意。以为江西派“槎枿不材”、西昆派“俚钉难化”，故反对别立宗派，主张“本色”；又不喜回文、双声叠韵等体，因其不能畅所欲言，碍性情。由此出发，解诗则无学究气。如曹操《短歌行》“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句，方苞指君为孔融；“月明星稀”两句，苏轼坐实为赤壁之战困于周郎之事；陶元藻则谓“此诗乃兴会所至，历叙生平，百感茫茫，

悲喜交集，不专写一时，亦不专指一事也”。又如张继《枫桥夜泊》，人或云寒山寺原有钟，即名夜半钟，书中则称：“以此释钟则可，以此释诗则不必”。有清刻本。（张寅彭）

【全浙诗话】诗话汇编。清陶元藻辑。五十四卷，在地域诗话汇编中卷帙最大。计收春秋迄当朝浙江诗人一千九百余人。体例与《全闽诗话》相同，以人立目，人名下作小传，然后采列有关各家诗话。在辑录比重上，谢灵运、孟郊、罗隐、陆游、杨维桢等名家的资料甚详；其余小家，则一至四、五条不等。全书引用七百余种著作。此书与《全闽诗话》，“甫脱稿即誉挂人口”（毕沅《全浙诗话序》），堪称地域诗话汇编中的双壁。有嘉庆元年（1796）怡云阁刊本。（张寅彭）

【全唐诗话续编】诗话著作。清孙涛辑。孙涛，字乐山，石门（今属浙江）人。《全唐诗话续编》二卷，系统旧题尤袤所辑《全唐诗话》之疏漏而作。卷上为原书载其人而遗其事者，计五十三人；卷下为原书其人其事俱未载者，得五十一人。此书之采辑宗旨，据《弁言》称：“盖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当以志节经济为上；至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者，殆卑之无甚高论也。”故卷下特列张巡冠首；其余所采，亦多涉政史志节之大者，颇寓章学诚所谓“国史叙诗之意”（《文史通义·诗话》）。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龙山诗话】诗话著作。清雷国楫撰。雷国楫，字松舟，陕西蒲城人。曾任候补州佐。此书四卷，论诗以唐人为重，对明七子之学唐，也取首肯态度，与王士禛、沈德潜之立场为近，而不喜钱谦益、吴乔之说。作者交游甚广，故此书记事颇富，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作者在金陵晤袁枚之过程，书中即记载甚详。有乾隆间味经堂刻本。（张寅彭）

【随园诗话】诗话著作。清袁枚撰。此书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中广泛地论述了与性灵有关的各种问题。性灵之“性”，指诗人的性情：“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灵”指表达于诗作中的性情所呈现出的绝妙完美的状态：“诗不可以木”；“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既讲“性”之表达，又要求“灵”之妙境，比之公安三袁有性无灵的主张较为完备。袁枚论性情，不喜讲性之善恶，而注重情之真伪。他举杜甫为例：“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

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之间,何在一往情深耶?”但这种真性情又不是径直表达的率意之情。袁枚并不赞成那种“矢口而道,自夸真率”的作诗习气。才、学、识、气、悟以及刚柔之道,都是他要求诗人炼性达灵须备的几项主要素质。他在分析才、学、识三成分的比重关系时,以识领衔:“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这种尚识的立场使性灵说的创作观较为科学稳健,既无尚才的神韵说隐秘难测之失,也没有尚学的肌理说淹蔽性情之病。在“识”领衔之下,积学可以养性、贮才。所以袁枚虽然再三称道“无诗因为读书忙”,“学荒翻得性灵诗”,“读书久觉诗思涩”,此均为“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但并不废学问,而是恰当地处理了天分与学问的关系。对于创作过程中的规律法则的认识,他也能够兼及天籁和人巧两方面:“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创作过程中诸如构思、相题、音律、用典、辞采、修改等,由于他在具体阐述中往往既肯定又否定,同时从两面立论,所以能与性灵立场相反而达到相成,于矛盾中求得统一。如他并不反对用典,“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但反过来他又认为“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不仅不赞成用僻典,连普通典故也以不用为好:“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又如他也不反对音节押韵,但又不赞成次韵、叠韵之类的游戏态度。其他如创作构思中的苦思与灵感,相题时体物与体性,改诗的“不可不改”与“不可多改”,语言辞采的平易与雕琢,诗体风貌的虚空轻灵与厚重敦实,以及“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等等,他都取不偏执一端的态度。前人诗论中抵牾冲突或者顾此失彼的地方,袁枚都能相反相成地兼容并蓄,使性灵说形成一个较少片面性的诗学体系。也正因此,《随园诗话》对于前此先后主盟诗坛的神韵说和格调说均有所批评,指出“神韵”“不过诗中一格”,“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认为两说均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随园诗话》在申述“性灵”理论之外,还广泛记录了与作者有着直接间接交往的人与诗,反映出乾嘉诗坛的时代风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张寅彭)

【续诗品】诗学著作。清袁枚撰。此书仿司空图《诗品》体制,以四言六句的韵文体多首论诗学问题。但两书旨趣相异,袁枚在书前小序中明言:“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故虽曰“续”,而实有别于司空图原作。《续诗品》一卷三十二首(较二十四《诗品》多出八首),全部议论创作问题,所论略可分为主体修养和创作过

程两个方面。如《博习》、《理气》、《尚识》、《斋心》、《神悟》、《戒偏》、《求友》等题,对创作主体提出了学、识、气、悟等多方面的要求,并指明了达成此种境界所需的外在途径(“求友”)和内在途径(“斋心”);而《崇意》、《精思》、《选材》、《布格》、《择韵》、《振采》、《结响》、《即景》、《勇改》、《割忍》、《迹灭》等题,组合成了从构思立意到结构谋篇、修改成章的完整的创作过程。至于《相题》、《用笔》、《取径》、《葆真》、《安雅》、《空行》、《固存》、《澄滓》、《矜严》、《藏拙》、《著我》、《拔萃》等题,则兼有对于诗人和作诗两方面的要求。例如《相题》既反对“专习一家”,主张“多师为佳”,以拓展天性;又要求诗人在“群题纷来”的情况下善于选择性之所近的题材,正如“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只有做到“天女量衣,不差尺寸”才最佳。其他诸题提出的刚柔、丰富、虚空、固重、真雅、博极而约、避短扬长、个性独创等,也均系针对诗人又针对诗作的要求。此书对于创作问题的论述是十分充分的,被看作为与《答归愚宗伯书》并重的袁枚论诗的主要之著(薛起凤《小仓山房诗集序》)。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初白庵诗评】诗评著作。清查慎行撰、张载华辑。张载华,号芷斋,浙江海盐人。其兄张宗柟编纂《带经堂诗话》,得以附前贤而传。张载华窃向往之,因依其师许蒿庐以王士禛与查慎行并为“南北两宗”之言,哀集查慎行之评诗语。前后历时数十年,得查慎行手批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朱熹、谢枋得、元好问、虞集诸家及《瀛奎律髓》等十二种原本,厘为三卷。故又名《查初白先生十二种诗评》。查慎行之评语,多系直接针对原作之眉批、夹批,该书抽去原诗,仅剩评语,往往原委难以尽悉。因有是虞,故此书虽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前后即已编定,然至乾隆四十二年始由其甥萧嘉植付梓。有民国间扫叶山房石印本。

(张寅彭)

【查初白先生十二种诗评】上海六艺书局石印本。见“初白庵诗评”。

【历代诗话】诗话丛书。清何文焕辑。何文焕,字少眉,号也夫,浙江嘉善人。诸生。有《无补集》。足不出里,名亦不彰,惟所辑《历代诗话》流传甚广。何文焕认为“前贤诗话,微特论议精确,文笔亦自有致,故惟原本可佳,编类则失之矣。《诗话总龟》、《诗话类编》等书,可弗问也”。基于这样的认识,遂有编辑《历代诗话》之举。此书编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所收二十七种论诗之著,从钟嵘《诗品》肇始,迄于明代。就性质言,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均可视为诗话的滥觞之作;而《六一诗话》等其他二十四种,则皆为诗话之名作,可

见何氏选择之精,故此书之传布与影响历久不衰。其收辑之疏漏处,则有待于后人续补(参见“历代诗话续编”)。书后附有《考索》一卷,系其对前人论诗之失的辩议,亦时有精义可采。如他对欧阳修以“夜半非打钟时”为由否定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对许彦周以“社稷存亡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是措大不识好恶”讥诮杜牧的《赤壁》诗,都表示异议,认为其识太“拘”,不懂得诗之“词微以婉”。《考索》凡一百零一则,亦用诗话体写成,实是一卷不以“诗话”为名的诗话之作。有中华书局标点本。(张寅彭)

【星湄诗话】诗话著作。清徐传诗撰。徐传诗,字韵琴(一作韵岑),江苏昆山人。此书二卷,系乡邑诗话,所辑之地真义(正仪)属昆山。其乡诗学,自元代顾仲瑛筑玉山草堂,延揽四方人士,吟诗唱和,为风雅肇始;至清代乾隆间黄子云出,健笔凌云,遂携乡邑诗学度越前贤,卓然名世。故书中所记,即以黄子云之诗与事为详。诗话之外,另有《真义咏事诗》一百零七首,自谓亦可作乡邑诗话观。有宣统三年(1911)赵氏《峭帆楼丛书》本。(张寅彭)

【闽游诗话】诗话著作。清徐祚永撰。徐祚永,字价人,号散樵,又号余山山人,松江(今属上海)人。此书三卷。徐氏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自吴起程游闽,书中记闽地山川民俗之关系诗者甚详,如漳州之名第山因唐周匡物读书于此,登第后而得名;“榕树人诗,始于柳子厚”;邵武望江楼,系昔严羽与戴石屏论诗处,周栎园因改名为诗话楼;及闽市中之光饼、闽人贩海为业、嗜啖槟榔、冬至前一日呼为“冬住”,等等,不一而足。又汇论唐以来历代之闽地诗人,及宋诗话之出于闽人者。故是书亦颇集诗学文献,而非纯粹之纪游诗话。徐祚永系吴人,然所撰专话闽人闽事,书中颇能选择同时牵系两地之人与物而记之,如记吴门顾二娘极精制硯,黄任嗜硯,所藏多出其手;吴人黄子视学闽中,迄为闽人所重;吴乡男女婚娶以茶叶行聘,闽俗则用荔枝等,于题似离若即,颇有助于两地民俗、诗风之比较。有乾隆云间徐氏刊本。(张寅彭)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诗话、句图著作。清李怀民撰。李怀民,名宪璽,字怀民,以字行,号石桐,高密(今属山东)人。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此书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著者不满于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之将中晚唐诗分作六派,乃依其体制重订之,将中晚唐诗分作两派:一派以张籍为主,天然明白,不事雕镂,名之曰“清真雅正”,而以朱庆馀、王建、于鹄等十六人为客;一派以贾岛为主,力求险奥,不吝心思,名之曰“清奇僻苦”,而以李洞、周贺、喻

龟、曹松等十四人为客。其所搜诸人诗不知何本,持校《全唐诗》,字句多异而转佳。中晚唐诗分两派,自明代杨慎等人已倡此论,至李氏乃使之系统化。此书共两卷,首列《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说》;继列主客图人物表,起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迄于哀帝天祐三年(906);继列主客图二种,分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层,仍袭张为《主客图》之体例。以下于入选诗人逐一论述,先列传记,继以前人评论,附以按语,后引其诗,并略加评论。其《主客图说》及评诗诸语,可作诗话读。李氏以唐人专攻五律,故后人“略五言而学其七言,是弃其长而用其短也”,所以此书不及七律。又以学诗当从中晚唐入手,以其“得盛唐之精髓,无宋人之流弊”。张、贾两派,实皆出于杜甫。又强调诗之“格”,认为“法是死的,格是活的”。此书一出,影响甚大。《蠡庄诗话》云:“山左李石桐辑《中晚唐诗主客图》,分张水部、贾浪仙为两派,登莱一带,言诗者多宗之,谓之高密派。”据此书刘大观序,则李石桐近于张,而其弟李少鹤近于贾。二人乃高密诗派之首。有嘉庆十年(1805)刘氏刻本、嘉庆十七年李氏刻本及嘉庆十九年赵氏刻本。赵刻本乃李怀民之未定稿。(张伯伟)

【骚坛八略】诗学著作。清王楷苏撰。王楷苏,字眉山,号悟堂居士,山西洪洞人。此书二卷,编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嘉庆二年(1797)始获刊行。全书由源流、体裁、法律、家数、学殖、练习、领悟、款式等八略组成,颇具系统,与一般诗话之枝节论评不同。《源流略》概述诗自古歌谣至试帖之源流过程。《体裁略》以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为基础,又补叙宋末至明末诸体。《法律略》详叙各体作法,多取王士禛、沈德潜诸人成说,为全编之重心所在。《家数略》评定各朝大家名家之地位,自汉迄清之康、乾,大致公允。《学殖略》论才学关系,所列之必读书目,以诗文为主而旁涉经史,轻《毛诗》而重《楚骚》,亦本自《沧浪诗话》,其读书法以不堵塞才情性灵为指归。《练习略》即作诗实践,所谓“法在日作一首”,又开具“八病”(沈约)、“四离”、“六迷”(皎然)、“五俗”(严羽)之类口诀,作为练习之指南。《领悟略》以“悟”为诗人之本:“悟之一字,凡事皆然,而于诗学为尤切。古今大家之诗,曰才、曰气、曰学,而其实未有不由于悟者。今欲学者,易钝根为灵根,换凡骨为仙骨,其必以悟为金丹矣乎。”至最末《款式》一略,具载制题、诗柬、起草、誊真以至抬头种种格式规矩,颇便于初学就范。综观全书,实为一部便利初学者的较为完备的诗学教材。有嘉庆二年韵藻山房刻本。

(张寅彭)

【声调谱拾遗】诗谱著作。清翟翬撰。翟翬

(1752—1792),字仪仲,安徽泾县人。诸生。此书一卷,系其为续补和订正赵执信《声调谱》之未悉处而作,故名,然论旨和体式,仍大体承赵谱之旧。至其具体订正处,虽证赵谱之平仄未合甚凿,使此项研究更趋于精密,但亦只能证明古诗平仄规律之例外甚多,并不能推倒或取代赵谱之例说。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诗学源流考】诗学篇章。清鲁九皋撰。鲁九皋(1732—1794),原名仕骧,字絮非,号山木,新城(今江西黎川)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曾居家侍亲十馀年,后官夏县知县,卒于任所。有《山木居士集》。《诗学源流考》将中国诗史总括为一篇,不分则,实非诗话之体。持论较正,概叙历代诗家自屈骚以迄明季,几无所偏废,而终归于唐以前:“吾由汉迄明,其间得大宗五人焉:曰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昌黎,其他支分派别,各有攸属。”其后之诗人,皆所从来,如宋之苏、黄,前者“出于李、杜、韩三家”,后者则“一意学杜”;直于明季之屈大均,“五言直接太白”,“而有明一代之诗,至此终焉”。又论诗体亦归于古风犹存之五言:“汉人去古未远,创为五言,所作犹古风,故后之学者,以得五言为正。五言之转而七言,滥矣;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诗,抑又靡矣。”所论之能得其大者如此。此文之长,在于能总括众家之正议,然无甚创见、特见。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诗选序例、诗话著作。清管世铭撰。管世铭(1738—1798),字鍼若,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有《韞山堂文集》八卷。管世铭以擅长制艺名世,所编《读雪山房唐诗选》则不甚流传。此书三十四卷(一作四十卷),不分初、盛、中、晚之名,按体选录唐诗三千九百馀首。又仿王士禛《古诗选》及删定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之例,取源流大旨及其所得,著为凡例,分冠于诸体目录之前。光绪年间,始抽出此书序、例,并其杂著二种别刊;今人郭绍虞又据以收入《清诗话续编》,原附杂言则选录有关唐诗者二十则。洪亮吉序谓管世铭论唐诗,“于古体则高、岑、王、李、杜、韩、白、钱、刘、韦、柳而外,尤醉心次山;近体则初唐五家,天宝数公,大历十子之外,以玉溪为中兴,致尧为后劲”。持论较平稳。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山静居诗话】诗话著作。清方薰撰。方薰(1736—1799),字兰士,号兰坻,浙江石门人。工诗善画,有《山静居论画》二卷。《山静居诗话》,管庭芬跋谓其稿本原仅一卷,凡二十二则,又附录五则,故《嘉兴府志》作二卷云。今刊本与此同。此书以录时

彦诗为主,所收诸作,大抵风致辞韵皆好。其论佳诗之标准云:“意达与题清切而不模糊,措语妙者,则曲折如意,头头是道。”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山静居绪言】诗话著作。清方薰名撰。此书原为稿本,收入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时书名作《静居绪言》,作者阙名。今据徐联奎《方樗庵先生传》改正。一卷。篇幅虽不长,论列历朝之诗人诗作却颇为完备。首、尾各数则为总论,中间之评鹭,自《诗经》以迄元代,诗人诗作之重要者几一无遗漏。其论颇能折衷诸家之言,如论诗旨,始云:“志感情兴而诗所作,古诗人在乎辞达其志,情见乎辞而已。”继云:“诗之为道曰思无邪,为教曰温柔敦厚,后世虽有不迨,乌可舍是而学?”复云:“惟陈言之务去,新至乎新也。诗有恒裁,情无定位,新固在焉。”又云:“意在笔先,此吃紧语。”其概括撮要能力可见一斑。故一卷在手,犹中国诗史之鸟瞰。作者之诗道发展观亦甚精要,既能把握发展之大势:“《二南》之风渺,六义之旨微,而赡才务博,摘藻衍奇之为工,变始汉京,体备唐代,世移风易,厥有别裁,此诗之大较也。”又能由表入里,认清发展之道:“……诗道如蝉脱异形,布种得获,未常不推陈出新,不失本性也。”卷中评诗亦大体如此,重在诗人品性、诗作风格而不甚着意于体制格律。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文史通义·诗话】诗论篇章。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其后历主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书,贵识大体,于古今学术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趣舍颇不同于时尚。《诗话》系《文史通义》中之一篇,道光十二年(1832)刻大梁本为九则,庐江何氏抄本则多出九则,计十八则;吴兴刘承幹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亦为十八则,同时又将《书坊刻诗话》一篇(共八则)及咏史诗《题〈随园诗话〉》十二首一并移附于篇后。此篇专为批评袁枚《随园诗话》而作(章氏《与孙渊如论学十规》之第十规斥袁,并谓“别有专篇声讨”,其一即指此),历数其书有好色(论貌、品艳之编,导欲宣淫之具)、好名(矫情饰伪,竞趋时誉,是以俗为依归)之罪,皆不免过甚其辞。章学诚作为经史学家,自不满袁枚之“纤佻浮薄辞章”,故有是言。此文大抵后九则作具体斥言,而前九则于诗话尚有探本之论,向来为世所重视。如第三则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棻《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

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指出诗话兼通于四部,而归于论辞、论事两类。又如诗话源流问题,虽谓“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但“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而特别提出以记事为旨的孟棅《本事诗》,“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可谓别具慧眼。至于文中“唐人诗话”之称,则与史不符;而“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为诗话”等断语,显受其挟意气、行攻讦之累而失之偏颇。有中华书局叶瑛校注本。

(张寅彭)

【玉谿生诗说】 诗评著作。清纪昀撰。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中年因事谪戍塞外,后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谥文达。有《纪文达公遗集》。纪昀被目为有清一代“最善评诗”者(许印芳语)。《玉谿生诗说》系其选、评李商隐一家诗之专集,二卷,补遗一卷。因“意主说诗,不专笺注,故题曰玉谿生诗说”(自序)。上卷选诗,同时汇辑有清以来朱鹤龄等人评析李商隐诗的言论。下卷以问答形式说明去取理由,发表对李商隐诗之见解。补遗一卷则是与同里戈涛、友人汪存宽切磋义山诗之未及采入正编者。全书卷帙不多,但入选之诗与论皆极精。有《槐庐丛编》本。

(张寅彭)

【李义山诗话】 即《玉谿生诗说》。参见该条。

【蒲褐山房诗话】 诗话著作。清王昶撰。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兰泉,又号述庵,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好金石之学,编有《金石萃编》。又辑《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著有《春融堂集》。王昶交游甚众,其辑相识者之诗作而成的《湖海诗传》,凡四十六卷,以人立目,所收起康熙末年,迄嘉庆初年,约六百余家。各家之遗闻轶事,又被缀成诗话,分附于各则之下,称“蒲褐山房诗话”,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体例相同。从所收诗人资料,略可窥乾隆一朝诗坛之概貌。后吴嵩梁《石溪舫诗话》又有续补。有嘉庆八年(1803)刊《湖海诗传》本。

(张寅彭)

【北江诗话】 诗话著作。清洪亮吉撰。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贵州学政。嘉庆初,命在上书房行走。以直言批评朝政,被遣戍伊犁。旋遇赦归。他既是经学家、史学家,又是诗人。《北江诗话》六卷,论诗不主一家,对清代的大诗

人如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宋琬、沈德潜、袁枚等多有所批评。书中比较重视性情和学问,反映出性灵声气和考据学风的时代影响。如说:“今世士惟务作诗,而不喜涉学,逮世故日胶,性灵日退,遂皆有‘江淹才尽’之消矣。”(卷三)他以性情和学问相结合的标准评论同时诗人,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诗,世共推袁、王、蒋、赵矣。然其诗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谓突过前哲,而不满之者又皆退有后言。平心论之,四家之传,及传之久与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于传与不传,而决其必可不朽者,其为钱(载)、施(朝榦)、钱(澧)、任(大椿)乎。宗伯载之诗精深,太仆朝榦之诗古茂,通副澧之诗高超,侍御大椿之诗凄丽,其故当又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今四家俱在,试合袁、蒋等四家并观之,吾知必有以鄙言为然者矣。”钱载诗取径江西派,用意深微,用笔拗折,洪亮吉倾心于他,实与翁方纲相合,开晚清诗坛宗宋风气之先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张寅彭)

【拜经楼诗话】 诗话著作。清吴骞撰。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晚号兔床山人,浙江海宁人。诸生。有《愚谷文存》、《拜经楼诗集》等。“拜经楼”系其藏书处,与同里周春等日事校讎于内,不复问户外事,其诗话即取以为名。作者既长于学问,论诗亦主学识,尝推崇冯班之语:“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多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智,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谓“斯言实得学人三昧”。然此书内容,解诗甚少,其旨趣多在考辨前人所作之得失,及记述本朝诗家之事迹。如考北朝乐府《敕勒歌》非斛律金所作,辨沈约《四声韵谱》之真伪等,颇具识见。所记朱彝尊晚年欲删其《风怀诗》以自掩风流,所述查慎行晚号“初白”、谋建初白庵之出处原委等,亦不无史料价值。吴骞与周春友善,故诗话中记周春事甚详,对其《杜诗双声叠韵括略》、《辽诗话》等著评价甚高,盖两人皆学有根柢。《拜经楼诗话》据《杭州府志·艺文志》等著录,原为五卷。今已刊者四卷。又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此书续编二卷,系抄本,已由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收入《古今诗话续编》。已刊四卷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瓯北诗话】 诗话著作。清赵翼撰。一称《十家诗话》。十二卷,卷一至卷一〇选论历代大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两卷(一卷为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卷一一论众“小家”,卷一二论各体。赵翼论诗旨趣与袁枚相近,崇尚性情与创新。《瓯北诗话》的体例

即表现出新意;将年谱列入诗话,将清初的吴伟业和只比他早数十年的查慎行,与李、杜等“诗仙”、“诗圣”相提并论,即表现其史识和喜新贵新的进化观。又如论李、杜:“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姿,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并特别分析杜甫的“为前人所无”的“独创句法”。论韩愈,特地指出“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又注意研究了韩诗的各种“创体”、“创格”和“创句”。《瓠北诗话》又好翻昔人旧案。如过去不少论家,“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他则认为“陆实胜苏”。赵翼标举性情,极为注重性情的时代现实性。如他认为陆游诗胜于苏轼诗,即在于陆诗批判时政的强烈精神: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不复敢论天下事”;而陆游则一无顾忌,“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又如结合“金源亡国”的现实环境论元好问,认为他的慷慨悲歌是“地为之也,时为之也”。论吴伟业、查慎行,也都能结合两人的时代、政治、生活环境。至于表达性情的语言风格,赵翼虽然也肯定了“有精思结撰”的“盘空硬语”,但是更赞成“平易近人”的风格。如他所作元、白与韩、孟优劣的比较,主要就是语言“坦易”与“奇警”的比较。赵翼首肯元、白,因为“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坦易者”利于表达性情,而“奇警者”纯粹在“词语间争难斗险”。再如苏、黄比较,两人作诗都好用典故,但苏轼“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摭据痕迹”,用典还是服从于描写事物和表达性情的需要;而黄庭坚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赵翼长于历史考据,这使《瓠北诗话》在评价诗人时,往往对有关的诗人经历、历史事件等详加考证,指出并纠正旧注的错误。这类内容占据较多的篇幅,形成《瓠北诗话》的一大特色。有《清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张寅彭)

【十家诗话】见“瓠北诗话”。

【辽诗话】诗话著作。清周春撰。周春(1729—1815),字萼兮,号松霭,晚号黍谷居士,又号内乐村叟,浙江海宁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广西岑溪知县。著有《松霭诗钞》等。《辽诗话》初刻本为一卷,数年后增订成二卷。据二卷本两篇自序所署年月推之,一卷本约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二卷本约修定于乾隆二十七年。此书以正史记载为主干,附益以志乘、说部诸书,首次为辽代数十位诗人及与诗有关的人物立传记事,上自宫廷,下及谣谚,搜辑甚勤。

一卷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二卷本有《述古丛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等。(张寅彭)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诗谱著作。清周春撰。周春于此书用力甚勤,凡数易稿,阅二十余年而后成。又嫌其繁冗,恐失图谱贵简之意,遂由原本之十六卷删减为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再删简成《括略》八卷。此书考究杜诗之双声与叠韵,列有双声正格、叠韵正格、双声同音通用格、叠韵平上去三声通用格、双声借用格、叠韵借用格、双声广通格、叠韵广通格、双声对变格、叠韵对变格、散句不单用格、古诗四句内照应格等十二种类型。所摘引占近体诗之例句,除杜甫外,亦附汉、魏、六朝以至唐、宋诸家,堪称详备。杜甫尝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故此书于解杜诗不为无益。又此书卷七详列历代各书之论双声叠韵者,自王充《论衡》始,迄于清诸家,并加按语,辨其得失,略指清以前诸论“尚混未能详晰言之”,而于清人冯班之说则补申之,谓不仅三十六字母有正纽、旁纽,平上去入四声亦有正纽、旁纽:“凡字母同纽者为双声,凡四声同纽者为叠韵”。此书为清人论声调一类著作中的佼佼者,颇获好评。吴騞《拜经楼诗话》云:“自来读杜者,无虑千百家,从未有论及于此”,“此书实发千古之秘要,非深通音韵者,不能知其妙也”。有《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据以排印。(张寅彭)

【毫餘诗话】诗话著作。清周春撰。十卷。据其门生张骏跋:“是编甫成,遽归道山”,则为绝笔之作。据其自叙,谓晚年“草诗话以遣日,忆往事,追旧闻,所重师资,尤致意于贫交死友”。故是书所收,皆为其自少年登第以至归老林泉六十馀年中,与名公巨卿、至亲良友往来酬酢之记载。周春与杭世骏、纪昀、王昶等为同榜进士。书中有关同年生之记述亦甚详。如记纪昀编纂《四库全书》:“采近时人著述甚少,通计不过十馀人,而余甲戌同榜得三人焉:顾古湫镇、姜白岩炳章、范衡洲家相,皆晓岚先生力也。”周春所交,多系乾、嘉诗坛之重镇,故是书之记载,颇具史料价值。有上海图书馆藏道光十三年(1833)葛继常传抄本。(张寅彭)

【娟雅堂诗话】诗话著作。清赵文哲撰。赵文哲(1725—1773),字升(一作损)之,号璞函,上海人。少即有诗名,与王昶等唱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召试,赐举人,历官户部主事,殉木果木之难,赠光禄寺少卿。有《娟雅堂集》等著。《娟雅堂诗话》一卷,分体评鹭历代诗人,诸体中尤详于五古;推陶潜、王维为正宗,宋、元中衰,“佳篇甚少”;至明代“诗道还淳”,清代复盛,以王士禛为正宗。由此可见其

论诗之宗旨。有光绪三年(1877)乌程汪氏刊本。

(张寅彭)

【吴兴诗话】诗话汇编。清戴璐辑。戴璐,字琅塘,一字敏夫,别号吟梅居士。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居京城凡四十载。著有《藤阴杂记》等。《吴兴诗话》十六卷,汇辑乡邦诗学文献。大抵卷一至卷九为名贤,卷一〇至卷一二为闺秀,末四卷皆录逸事。体例略仿朱彝尊《明诗综》,每人各立小传,并附以诗话。其乡沈翰翁先有《湖州诗捫》一百八十卷,卷帙浩大,所选迄于康熙中。戴璐以之为基础,删繁就简,并补辑康熙以来八十年间之人与事,而成是编。有《吴兴丛书》本。

(张寅彭)

【鹑亭诗话】诗话著作。清屠绅撰。屠绅(1744—1801),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今属江苏)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官广州同知。有《笏岩诗稿》。其诗颇受洪亮吉称赏。《鹑亭诗话》一卷,附录一卷,凡三十六则。汪琬题记,谓此书“皆寓言储说之流,而名以诗话,殆不可解。各条虽分署作者姓名,词气则如出一手,貌渊奥而实平易,与笏岩他所著作,颇复相类。”有江阴金氏刊本。

(张寅彭)

【南野堂笔记】诗话著作。清吴文溥撰。吴文溥,字博如,号澹川,嘉兴(今属浙江)人。贡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官广州同知。有《笏岩诗稿》。《南野堂笔记》十二卷,通篇说诗,内容略可概括为自记作诗之甘苦得失,指陈古人诗作之归趣妙旨,集录当代诗人之佳篇隽句三类,而以第三类为主。评鹭同时之诗人,尤心折于袁枚。如卷三云:“袁太史小仓山房诗文集,炳烺寰区,要以灵犀独照,生面别开,而气之混涵莽苍,前古后今,未有敌手。就诗而论,一开卷烂若舒锦,不可指数其何篇何句为佳也。”有1912年中华国粹书社石印本。

(张寅彭)

【茗香诗论】诗话著作。清宋大樽撰。宋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官国子监助教。著有《学古集》。此篇即附刊集中,凡一卷。又《逊敏堂丛书》本径名《诗论》,或疑原题如此。此篇虽仅二十三则,然颇多精义。如其论《经》、艺之本末,先云:“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本也”;继而又谓“事以未来,而情以本应,末即本”,“本之中又有本”,“循条失枝,厥本焉穷”。如此,欧阳修之不喜《史记》,苏舜钦之不喜杜诗,亦不妨碍他们为“通人”;而非圣贤之书不寓目的扬雄,亦难免不写出无本之作来。可见宋大樽之论诗,本于经又非泥经不化。所以他不同于一般重诗教者之独尊杜,而是“李仙”、“杜圣”并

重。他对创作的非理性状态亦能洞幽识微,指出:“有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觐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他又强调人品与诗格的统一,既有重视诗人主体条件之作用的正确一面,亦有拘于封建礼教标准的迂腐一面。有《清诗话》本。

(张寅彭)

【诗说汇】诗话汇编。清张象魏撰。张象魏,字晓夫,南阳(今属河南)人。此书一名《古今诗说》,五卷,汇辑前人各种诗话、诗评之作,首取说杜,以正其始,末以王上慎、二张(张笃庆、张实居)之《诗问》作结,全编引书约达二百四十余种。然编次凌乱,分类不精,颇有损于资料书之价值。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学古堂刊本。

(张寅彭)

【古今诗说】见“诗说汇”。

【艺苑名言】诗话汇编。清蒋澜辑。蒋澜,字云会,号怀谷,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此书一名《续诗人玉屑》,八卷,所采历代诗评、诗话、笔记等一百一十馀部,约七百馀则。编次体例,以卷下分类,然同属一卷之各小类,其性质往往并不相类。《例言》云:“恐强分名目,不敢分类,而不类之中,类略分焉。”这种所谓“不类而类”的含混状态,颇有损于资料书之价值。又全书所辑,近半数为摘句,理论部分比重不大,收类也只有作法、风格(仅二十二则)、考辨等几项,难于比附魏庆之《诗人玉屑》。此书后曾被好事者附会为袁枚之作,易名《诗法丛话》,又抽去蒋澜原序,以一篇“随园自识”之伪序代之,其余则概仍其旧,故其伪并不难识。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怀谷轩刻本。

(张寅彭)

【续诗人玉屑】见“艺苑名言”。

【古今诗话选集】诗话汇编。清卢衍仁辑。卢衍仁字绍履,号东园,东阳(今属浙江)人。此书二卷,系随意辑录前人诗话而成。每则首立小目,下标出处,如首则“陶靖节诗”,出于《著疑录》;次则“柳诗奇趣”,出于《冷斋夜话》;三则“梅苏二家”,出于《六一诗话》,如此等等。末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录十二品。有清刻本。

(张寅彭)

【古今诗话探奇】诗话汇编。清蒋鸣轺辑。蒋鸣轺,字芥孙,一字珮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此书系补卢衍仁《古今诗话选集》之不足。二卷,排列大致有序,上卷以诗人为目,自楚辞、古诗、左太冲、庾子山至王阮亭、朱竹垞等;下卷略以题材为目,如“新月诗”、“夜雪”、“观云海句”、“钱塘诗”、“游嵩山”等。各目一般仅一条,就身边所有之书随录而已,系出于编者乾隆四十九年(1784)炎夏消遣之所为。有清刻本。

(张寅彭)

【石洲诗话】诗话著作。清翁方纲撰。此书原仅

五卷:两卷评唐诗,两卷评宋诗,一卷评金元诗;后又增《渔洋评杜摘记》一卷,及评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二卷,共八卷。翁方纲论诗标举“肌理”,自谓此词出自杜甫《丽人行》:“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间,而审乎人与天之合。”“肌理”的原意是指肌肤及其纹理,在“肌理说”中则指诗格、诗序、诗法、诗体等实体,近似于桐城派“义法论”所强调的“言有物”、“言有序”以及“义理”、“考证”、“文章”的综合。其核心论旨为“理”与“学”。《石洲诗话》运用“肌理”说评论唐、宋、金、元四朝诗,所瞩目者主要在于宋诗。因为“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最合肌理原则。《石洲诗话》分析唐诗,推重的也是杜甫、韩愈、白居易及李商隐等几位与宋诗有直接传承关系的诗人。综观《石洲诗话》评定的唐诗大家,其宗宋指向极为明显。翁方纲虽然也认识到宋代诗人风格的多样化,批评吴之振选编的《宋诗钞》“专于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执一而论也”,但他所揭橥的宋诗总体特征,也主要是“学”和“理”二义:“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他认为黄庭坚最足以代表宋诗的上述特征,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又推衍刘克庄之言:“‘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按此论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贤三昧。不然,而山谷自为江西派之祖,何得谓宋人皆祖之?”同时,又说苏诗“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一个由“学”和“法”所致,正与“肌理”说合;一个则由其天性使然,不受“肌理”说之牢笼。二家在宋诗史上的不同地位,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此乃对江西诗派的批评,而翁氏则抓住一个“宁”字,看出“其心眼并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与其置山谷于子美、义山之后之意,层层圆到,面面具足”,虽然不可谓不具眼光,然终有削足适履之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杜诗附记】 诗评著作。清翁方纲撰。此书实为翁方纲毕生读杜诗之心得。据梁章钜跋谓:“前后凡三十年始成此册,嗣后意有所得,随时点定,又三十余年,至晚岁重加装池。”全书二十卷,体例为于诗题

下直接翁氏评析之语,不录原诗;无评语者亦依次第著录诗题。翁氏欲破从来说杜诗者或“注重实典故”、或“说篇法句法”的旧例,转从艺术本身来谈杜诗。他所谓“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者,主要包括二义:一曰编次校释,编次以“宋刊某本下略有次第可见者”为据,句字则参合诸本,“宜精其剖择”;二曰揭橥“下笔之深秘”、“线迹”,发“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筭缝上下之消纳”,突出了杜诗作为语言艺术的美学特征。如卷五说《秦州杂诗》第十五首:“起句竟若消纳上章者,读至此乃愈觉上章首二字神气之长”;卷六说《送远》“第七句是筋节,是消纳”,等等。而在分析杜甫新乐府诸作时,则只言其思想意义,也是因为新乐府体的语言结缀工夫不如古、律体针脚绵密之故。翁氏认为这比王士禛从言意关系入手来揭示杜诗的艺术特征更为高明,所以在分析《冬日有怀李白》时云:“此阮亭先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而尚非杜之极至。”此书未曾刊行,上海辞书出版社藏宣统元年夏勤邦抄本,系从“合肥李氏藏覃溪先生手写”本录得。

(张寅彭)

【咏物七律偶记】 诗话著作。清翁方纲编撰。一卷,选录唐、宋、金、元、明、清历代咏物七律之作计九十八首,间附片断联句,加以评析。因选评结合,故亦近于诗话。“偶记”者,据翁方纲自谓,乃“非云选”之意,即并非用心择选的非正式选本。而评析也多为泛泛之言,无甚特见。有光绪辛巳谟觞室刊本。

(张寅彭)

【小石帆亭著录】 诗话、诗谱著作。清翁方纲编撰。共六卷,卷目为《王文简古诗平仄论》、《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三昧举隅》、《渔洋先生书目》,是专论古诗声调的著作。“石帆亭”原为王士禛所居论诗处,翁氏冠以“小”字,借以取名。盖翁方纲意欲评定赵执信与王士禛关于古诗声调之争的是非。卷一细加审辨所谓王士禛《古诗平仄论》原稿,确认其与赵执信《声调谱》不同,遂得出古诗平仄之有论实自王而非赵始的结论。卷二节录赵执信之《声调谱》,驳其失处,实为其推尊王说立场之继续。卷三与卷四是翁氏在王、赵二谱基础上的进一步立论,五言古诗多举六朝人之作品,七言古诗多举唐宋人之作品。卷五系从王士禛所选《五七言诗钞》中,择录十四家二十六首七言之作,以进一步证实王士禛“三昧”之旨不仅适于五言,且适合于七言。此书前五卷收入《清诗话》,含卷六《渔洋先生书目》之全本,则有《学诗法程》本。

(张寅彭)

【王文简古诗平仄论】 诗话、诗谱著作。题王士

慎定,翁方纲收入《小石帆亭著录》。详见该条。

(张寅彭)

【赵执信所传声调谱】诗话、诗谱著作。即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卷二,翁方纲节录赵执信《声调谱》,并加评语,而成此卷。参见《小石帆亭著录》。

(张寅彭)

【五言诗平仄举隅】诗话、诗谱著作。翁方纲撰。即《小石帆亭著录》卷三。参见该条。(张寅彭)

【七言诗平仄举隅】诗话、诗谱著作。翁方纲撰。即《小石帆亭著录》卷四。参见该条。(张寅彭)

【七言诗三昧举隅】诗话、诗谱著作。翁方纲撰。即《小石帆亭著录》卷五。参见该条。(张寅彭)

【雨村诗话】诗话著作。清李调元撰。李调元(1734—1802),字鹤洲,一字羹堂,号雨村,晚号童山老人,罗江(今属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曾官吏部主事、考功司员外郎、直隶通永道。后因事罢官,戍伊犁,不久赎归,以著述终。李调元早年即以诗与袁枚、赵翼等唱和,论诗亦与袁枚同调,申言“性灵”。《雨村诗话》有“话古”、“话今”两种。“话古”编二卷,约成于乾隆中期,评述自三代以迄前明历代诗作的得失,是谓“话古”。晚年所撰之“话今”编,专述清代诗坛春秋(参见该条)。李调元评述历代诗,大抵从音调、法度入手,尤详于析法,诸如题、章、句、字,起、承、转、合,直至方回之“诗眼”,金圣叹、徐增之“分解”,皆津津乐道。他又好为诗人溯源流,排座次。如谓李白本自陶渊明,杜甫本自庾子山;晋人以陶潜为第一,六朝则鲍照为宋人第一,谢朓为齐人第一,江淹为梁人第一,阴铿为陈人第一,北朝以庾信为第一,唐以李、杜为第一,宋以苏轼为第一,等等。评诗以规讽劝戒、发言和易为正格,将人品高洁视为诗人修养的最高标准。他不喜宋诗,尤其不喜西昆体和江西诗风,而欲以拔扬明诗矫替之。在明代诗家中则推李梦阳、何景明为正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雨村诗话(话今)】诗话著作。清李调元撰。此书十六卷,系李调元晚年所撰。自序作于乾隆六十年,而卷末有袁枚逝世(嘉庆二年)之记载,则可知全书编定后,又曾作补续。其自序谓:“《雨村诗话》前著名矣,而此复著何也?前以话古人,此以话今人也”,此为一;又前以论评为主,此以记事为主,此为二。全书所记,大抵与袁枚的诗事活动相始末,又由袁枚而及蒋士铨、赵翼。如记金陵郭外随园之营造,蒋士铨以扬州宏济寺题壁诗始为袁氏所识,赵翼以柬代身赴袁氏诗宴,袁氏晚年授诗女弟子甚众,以及逝世前仍与作者诗书唱和等。记事之余,又比较三家之短长:“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

授,非人力也。心馀诗学山谷,而去其艰涩,出以响亮,亦由天人兼之。子才亦自言:余不喜山谷而喜诚斋,心馀不喜诚斋而喜山谷。云崧则立意学苏,专以新造为奇异,而稗家小说,拉杂皆来,视子才稍低一格,然视心馀则殆有过之无不及矣。”扬赵抑蒋,后世如马桐芳《憨斋诗话》等颇称引之。三家之外,同时之诗人如钱载、法式善、陶元藻、王昶等不下数十位,乃至舆台负贩者流之片言只语,亦皆广为搜录。此书的论评全从性灵立场出发,又能熔神韵、格调诸说为一炉。如“诗有恒裁,思无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诗衷于理,要有理趣,勿堕理障;诗通于禅,要得禅意,勿堕禅机。言近而指远,节短而韵长,得其一斑,可窥全豹”,其论周圆如此,亦与袁枚相仿佛。有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张寅彭)

【梅崖诗话】诗话著作。清郭兆麒撰。郭兆麒,字麟伍,山西阳城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历官乐亭、密云知县,擢沧州刺史,后因事罢官。有《梅崖诗文钞》。《梅崖诗话》一卷,论诗大抵取王士禛之神韵说,如论诗旨云:“严沧浪论诗谓如镜中之相,水中之月,此正参禅家语也。诗固一种高浑变化不可模拟者,然或直抒胸臆,亦非可厚非,但其用意,须得温厚和平之旨,不然直灌夫使酒而已。大率用赋,不若用比兴,意有含蓄也。”论作法云:“诗戒太用意,太用意则伤巧”,“咏古诗不涉议论,领神言外者为上乘”。论作诗过程云:“诗须兴会淋漓时援笔急书,自有一种天然音节,少顷推敲,略易数字而已。”论古体诗云:“古诗音节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五古上自汉魏,无迹可求,唐以后稍涉议论”,“大率五古难于七古,七古可以气胜,五古专以神行也”,诸语皆得神韵三昧。郭氏评诗扬李抑杜的倾向,亦与王士禛差同。如谓李白“白发三千丈”等语“皆活相,又不大段修饰,乃其天分过人处,后人不能步其尘。如少陵言愁,断无‘白发三千丈’之语,只是低头苦煞耳。故学杜易,学李难。然读杜后,不可不读李,他尚非所急”。其评明人诗,置于宋元之上,且与李唐并驱,则显然抑扬失当。有《山右丛书初编》本。(张寅彭)

【梧门诗话】诗话著作。清法式善撰。法式善,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蒙古旗人。乾隆庚子(1780)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十六卷,记康熙、乾隆诗坛之逸事甚富,从中颇能感知艺林一时之风会声气。其论诗主王士禛神韵三昧之说,故书中所录之作,亦多出入于王、孟、韦、柳。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

(张寅彭)

【八旗诗话】诗话著作。清法式善撰。未见著录。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后有墨迹:“戊戌六月,集八

旗诗话……尚未集齐,俟有八旗女仕,一并采入”等语,又盖有梧门私章,未知确否出自法式善之手。全书以人为序,采入清宗室、汉军人、满洲人之能诗者约二百四十余人,如记曹寅涉猎于唐诗之功甚深,官织造时刻《全唐诗》进呈;郎廷槐官新城知县,从王士禛学诗,记诗问十九则等,皆具资料价值。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张寅彭)

【风雅遗闻】诗话著作。清戚学标撰。戚学标(1742—1825),字翰芳,号鹤泉,太平(今浙江温岭)人。早岁先有《三台诗话》之刻,继则又以乡邦为题,录诗多卷;复又合诗话、诗录而一,重排为四卷,以风雅之事有益于梓里文献,统名曰《风雅遗闻》。前二卷主论乡人之诗,后二卷主录咏乡之诗,笔涉于天台地区之历史、地理、人物、风情诸方面。有乾隆年间刊本。

(张寅彭)

【三台诗话】见“风雅遗闻”。

【滇南草堂诗话】诗话著作。清檀萃撰。檀萃,字白石,号默斋,安徽望江人。乾隆后期游宦滇南二十馀载,筑草堂,行诗教,因又以草堂号。滇人从其学者甚众。此书十四卷,封面署“檀默斋先生辑,门弟子校刊”,而各卷之首则题“白石先生、云谷老人同话,草堂弟子编次”。云谷黄姓,为滇吏十年,继又滞留十馀年,从草堂学诗吟诗,复授诗于滇人,遂有“同话”之称。但其门弟子所录,实以草堂为重而有主次之别。又封面于书名《滇南诗话》外,复题“《草堂诗话》嗣出”一行小字,给人以两书之想,而卷端皆合称《滇南草堂诗话》。全书分九题:卷一为“滇会”,专记流寓滇地者之诗会;卷二至卷五为“滇官”,专记滇吏之与草堂有诗交者;卷六为“滇客”,专记游滇者之与草堂有交者;卷七为“滇友”,专记草堂的滇友与之唱和之事;卷八至卷一〇为“滇徒”,专记草堂诸弟子及师徒间切磋诗艺之状;卷一一为“滇庭”,系草堂长子檀沐清《迎云集》、次子檀一清《侍云集》之汇编;卷一二为“滇淑”,专记宾友女眷之诗事;卷一三为“滇外”,专记滇之方外即仙释之流;卷一四为“滇记”,专记草堂居滇之异闻杂见。全书话题虽始终不离滇地,而实际以檀草堂其人为经纬,与一般地域性诗话有所不同。有嘉庆庚申(1800)蕴经堂新刻本。

(张寅彭)

【芙蓉港诗词话】诗话著作。清徐涵撰。徐涵字有容,号仲米,晚号竹溪,虞山(今江苏常熟)人。擅书画,工诗词,喜抚琴吹笛,倚声度曲,乃一多才多艺之士。又性疏狂,迹闲散,不慕功名,但求适性。平时与妻弟以诗词美句为茶话之资,雅不谐于俗情尘识。爱取交游亲朋之著作,并见闻之所得,辑成此书,一卷,多收俊逸隐者之诗与事。其主适性,却非

为无性,故深以吴乔之“诗中有人”说为然,每以之衡诗。是书编成于嘉庆戊辰(1808),然一直无机会刊行,徐涵亦不以为怀:“传与不传良有数在,吾但遣吾一时之兴会而已。”而终其世未及刊行。有光绪乙亥(1875)可庐庞氏刊本。

(张寅彭)

【白石道人诗词评论】诗话汇编。清许增辑。许增字迈孙,号益斋,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此书一卷,十五则,又补遗五则,汇辑宋元以来有关姜夔诗词的评论文字,按时代先后排列,每则均注明出处。许增喜词,尤喜姜夔词。所刊《榆园丛刻》即是一部主要收辑词作与词论的丛书,其中收录姜夔之作五种,其好尚如此。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寅彭)

【鱼计轩诗话】诗话著作。计发撰。计发字发之,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庠生,以馆僚、教授为业。此书一卷,多记述诗人故事,亦杂有评论,然可观者甚少。张均衡跋语评曰:“僻乡老儒,才名未达,存此一帙,藉慰苦心耳。”有张氏《适园丛书》本。

(张寅彭)

【瓶水斋诗话】诗话著作。清舒位撰。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山人,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戊申(1788)举人。家贫,以馆幕为生,曾随王朝梧至贵州作宾客,博学,善书画,尤工诗,与王昙、孙原湘齐名。有《瓶水斋诗集》。诗话一卷,附载于集末,约五十馀则,均出自壮年之笔。舒位天资厚,学问深,又有戎幕征战的经历,三者影响于创作,使其诗风“反虚入浑,积健为雄”。舒位的诗识与其诗风相通,主真切,反对流于“空濛虚廓”的所谓“神韵”诗。但舒位对神韵诗的艺术性亦有肯定,谓:“大抵此种最佳而最难佳,可一而不可再。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执此意以求,此种诗便可领会,否则痴矣。”他批评《刘贡父诗话》和《苕溪渔隐丛话》对严维诗句“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的指责是“全不知诗之说”,指出:“此联之得力固在花、柳二字,从柳想到春水,从花想到夕阳,则春水夕阳,正从花、柳处生情,因情生景,佳句随之,而漫字、迟字乃诗眼也。若云:两岸无柳,春水未尝不漫;一坞无花,夕阳未尝不迟(按此即刘贡父、苕溪渔隐之责),则彼自漫耳、迟耳,何地无水,何日无夕阳,只须作‘塘中春水漫,坞内夕阳迟’足矣,试问尚堪传诵耶?”他的艺术鉴赏力使其对本朝诗人的评论均颇中肯。如指出王士禛、宋荦“两公诗格绝不相似,且宋实非王敌”;指出“袁(枚)蒋(士铨)两家诗实是劲敌,袁长于抒写情性,蒋善于开拓心胸。袁之功密于蒋,蒋之格高于袁,各有擅场,不相依附也”。有光绪十二年(1886)刊《瓶水斋诗集》本。

(张寅彭)

【乾嘉诗坛点将录】清舒位撰。“点将录”一体，原非诗话。旧传明代王绍徽比附《水浒传》人物，造东林党人一百零八位为“点将录”，以供魏忠贤排黜政敌之用。至舒位移用于品评诗人之后，颇有响应者，如近人汪国垣有《光宣诗坛点将录》、今人钱仲联有《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这种以个性毕现的文学人物比照现实诗人的作法，颇能收到形象化、典型化的效果。且一百零八将的群体比附，使被比诗人之间形成相互关属的整体，不仅便于见出各家地位之轻重高下，也有助于把握一代诗坛的全貌。所点各将之下，附有赞辞、小传、评语、杂记等项材料。有光绪丁未年(1907)刊叶德辉《双梅景阁丛书》本。

(张寅彭)

【葑原诗说】诗话著作。清冒春荣撰。冒春荣(1762—1820)，字寒山，一字葑原，江苏如皋人。因居如皋城北柴湾之花源港，号花源渔长，又号柴湾樵客，乾嘉时布衣名士。《葑原诗说》四卷，以论具体诗法为主，最后被归结为“起承转合”四字：“凡诗无论古今体、五七言，总不离起承转合四字，而千变万化出于其中。”论体制则尊古抑近：“五言古，诗之根本也；其余诸体，诗之枝叶也。盖溯所从来，自《风》、《骚》而汉、魏，自汉、魏而唐。唐虽创为近体，实奄有前代之规。”这种矫枉过正的议论是针对“后人畏难就易，故多攻律体，少制古风，非所谓知本者”的现象而发的。实际上，书中对近体诗的法则也多有论述，最终得出“古诗之要在格，律诗之要在调”的持平之论。格调之外，《葑原诗说》对诗歌艺术的其他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诗肠须曲，诗思须痴，诗趣须灵”。书中引录沈德潜《说诗碎语》中多则文字，有些未标明出处。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灵芬馆诗话】诗话著作。清郭麐撰。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吴江(今属江苏)人，嘉庆间贡生，与金学莲、吴嵩梁并称吴越三才子。他虽为姚鼐弟子，但诗风不同。此书正集十二卷，续集六卷。正集前十卷论诗，后二卷论词，论及的诗人不分古今；续集六卷则以本朝诗人为对象。郭麐诗风清俊，持论亦涓细平和。集中评古议今，称许或有过当，而攻讦偏急者则罕。又好辑录近人诗之无刻本者，单辞只句，在所不遗。他交友广泛，当时诗坛如法式善、姚椿等人，均有酬唱往来，致使本书保存了较多的清人佚诗佚事。有苏州南仓桥爱莲室刻本。

(张寅彭)

【石溪舫诗话】诗话著作。清吴嵩梁撰。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东乡(今属江西)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由内阁中书官贵州黔西知州。

其诗颇受袁枚、蒋士铨、翁方纲等赞赏，诗名远播朝鲜、日本。此书二卷，以与其有交往者为人选对象，得一百零四人，按人立目，逐一评论介绍。所录多名家，论评亦有见地，不足者在多溢美之词而少批评。有《香树山馆全集》本。

(张寅彭)

【春雪亭诗话】诗话著作。清徐熊飞撰。徐熊飞(1762—1835)，字渭扬，号雪庐，又号白鹄山人，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见知于阮元，晚年得阮举荐而领翰林院典籍衔。有《白鹄山房集》。徐熊飞有诗名，其诗颇具唐人风范。《春雪亭诗话》一卷，系徐氏客乍浦军幕时所作，“春雪亭”即军中读书处。此书以记事、录诗为主，漫应谈艺者之求而采入之，议论则殊少发明。有《吴兴丛书》本。

(张寅彭)

【修竹庐谈诗问答】诗话著作。清徐熊飞撰。“修竹庐”系徐熊飞友人邵澍家庐名，徐氏嘉庆十年(1805)自都门下第南归，借寓于庐中，日夕与陆坊等谈诗论艺，笔录而成此篇，凡一卷、二十一则。每则即由陆坊问，徐熊飞答。全卷虽篇幅不大，然问答涉及之论题甚广。如问格律与性情、性情与境遇之关系；问李商隐与黄庭坚同学杜，何以各有面目；问朱彝尊、王士禛各有短长，后学者将安所适从；尤详于问苏轼诗之各种问题。徐氏之答语大抵允当，至于谓李商隐学杜仅得其七律一体，黄庭坚学杜仅得其村居一体等，则颇异于习见。有齐鲁书社《诗问四种》本。

(张寅彭)

【蓉峰诗话】诗话著作。清聂铤敏撰。聂铤敏，字蓉峰，湖南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复授编修，历官绍兴知府。有《寄岳云斋诗钞》。《蓉峰诗话》十二卷，大抵以表彰幽隐、网罗散轶为主。卷一历评清初诗坛诸大家，以王士禛为第一，谓其诗囊括众有，风调为天下所不可及。又以施润章、朱彝尊、宋荦等与之并列，持论甚为平允。对袁枚之评价，既许其“天才亮拔”，又惜其《随园诗话》“淫词过多”，而欲代为删除一过。又评历代诗话之作，独不喜王若虚《滹南诗话》，嫌其一味诋毁黄庭坚而失于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全书大部分篇幅辑录师友、同时人与己之诗作诗事，略可窥乾、嘉诗坛风气。有清刻本。

(张寅彭)

【考田诗话】诗话著作。清喻文鏊撰。喻文鏊，字冶存，一字石农，晚号考田山人，湖北黄梅人。贡生，官竹溪教谕。有《红蕉山馆诗集》。《考田诗话》八卷。考田系其乡之山名，然此书并非乡邑诗话。论诗大抵主情真语挚，如强调“真”之意云：“诗真则新，真外无新也。诗中有人在，又有作诗之时与其地。总之，其人也无不真矣，即无不新。人心不同如

其面。子肖其父,甥似其舅,审视之,则各有其面目,无一同者,便已出奇无穷。有意求新,吾恐其堕入鬼趣矣。”其视真与独创之关系如此。又重诗教正旨,不满王士禛之提倡神韵说,斥其为“藻丽之才”,而推重沈德潜,赞赏其“别裁伪体,宏阐正音”的选诗功力。然喻文鏊此书不长于持论,而以记事纪游、录诗志人为主要内容。有道光四年(1824)掣笔山房刻本。(张寅彭)

【履园丛话】 笔记著作。清钱泳撰。钱泳(1759—1844),原名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金匱(今江苏无锡)人。工书、能诗,一生多作幕客于大江南北。有《梅溪诗钞》等。《履园丛话》共二十四卷,每卷所记各不相属,如《旧闻》多记明末清初轶事;《阅古》述古器皿之收藏考订;《考索》谈考据之学,《水学》主要记述三吴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废、历代治水的得失等;《景贤》、《耆旧》、《科第》等卷多关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遗闻轶事;《臆论》主要谈修身、治家、立业方面的伦理规戒;《碑帖》、《收藏》、《书画》、《艺能》诸卷鉴别古名字画的真伪,记述历代名画名帖的收藏流传情况;《古迹》、《陵墓》、《园林》系各地园林、古建筑的游历考察记录;《笑柄》录笑语谐言,多关时弊;《祥异》、《鬼神》、《精怪》、《报应》、《梦幻》则欲明天地之大、阴阳之变及天人之合,然时涉无稽之说。全书以《杂记》终。其中《谭诗》一卷,复分“总论”、“以诗存人”、“以人存诗”、“纪存”、“摘句”等五部分,颇合诗话之旨,故民国初年丁福保将其辑出,收入《清诗话》中。钱泳论诗调停于格调说和性灵说之间,如比较沈德潜和袁枚云:“自(沈)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袁)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既对格调说持一种近乎取消的态度:“余尝论诗无格律,视古人诗即为格,诗之中节者即为律”;同时对性灵说也多有保留:“性灵者,即性情也。沿流讨源,要归于正,诗之本教也;如全取性灵,则将以樵歌牧唱尽为诗人乎?”其论折中,故可取者少。至于记事、录诗部分保存之清代诗人资料,则颇具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校点本。(张寅彭)

【履园谈诗】 此即钱泳《履园丛话》卷八,由丁福保辑出,收入《清诗话》中。参见“履园丛话”

(张寅彭)

【广陵诗事】 诗话著作。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曾主持会试,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又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尝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在广东立学海堂;修《经籍纂诂》,刻《十三

经注疏》,汇刊《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晚年入体仁阁为大学士。卒谥文达。《广陵诗事》十卷,多记扬州籍名卿贤士之嘉言懿行,有因诗以见事者,有因事以录诗者,大旨往往偏于表彰其行,而不甚重诗艺。亦有非扬州籍人士而连类及之者,如扬州流行铜鼓歌,赵执信虽非扬人,其所作《铜鼓歌》亦录及之。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张寅彭)

【杜工部诗话】 诗话著作。清刘凤诰撰。刘凤诰,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由翰林官至吏部右侍郎,以一生精力,续其师彭元瑞补注欧阳修《五代史》。《杜工部诗话》道光十七年家刻《存悔斋集》本为五卷,宣统元年(1909)扫叶山房石印本合为一卷。此书从杜甫家族祖先中的显达者述起,言及杜甫父母、兄妹、子女乃至家中仆役;又记杜甫行年,性豪嗜酒,英年不羁,最快齐、赵之游,不谙书法然深得书家三昧,不学仙而有仙气,不佞佛而深通佛理,心存济世,疏救房琯等脾性“大节”。因史籍无载,上述诸端,多从称引、考订杜诗得之。除参证杜甫家世生平外,天宝政事亦是解诗取证的重要对象。故曰:“《悲陈陶》、《悲青坂》皆识房琯兵败诗”,“《前出塞》为征秦陇兵赴交河作”,“《哀江头》、《哀王孙》二诗皆纪明皇西狩时事”,“《三吏》、《三别》‘为当时邠城师败调兵急切而作’”,等等。书中对杜诗艺术特征的分析,基本上系采自唐宋人之论杜语,计录自刘禹锡《嘉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王安石《钟山语录》、葛立方《韵语阳秋》、朱熹《语录》、洪迈《容斋随笔》等二十余家。其中《张伯复诗话》等并书名今皆不传。全书辑话与自撰篇幅约各半,考订详密,议论有据,于杜诗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有宣统元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张寅彭)

【诗学指南】 诗话丛书。清顾龙振辑。顾龙振,字苓窗,金匱(今江苏无锡)人。此书专收诗格、诗式、诗法一类著作。全书八卷,分卷次第颇为紊乱。如旧题元人所作的几种论诗法之作,分载于卷一和卷七;旧题白居易所作的《文苑诗格》和《金针诗格》,分载于卷三和卷四;卷二《沧浪诗话》和《历代吟谱》共处;卷三在一批旧题唐人之作中杂一篇托名魏文帝的《诗格》,等等,其淆乱一至于此,殊不可解。所收除严羽《沧浪诗话》和皎然《诗式》外,其他四十余种旧题唐、宋、元人的著作,又多系伪作。虽然如此,此书集中保存了一批诗格诗式之作,于诗歌批评史自有其文献价值。有乾隆间敦本堂刻本。

(张寅彭)

【渊明诗话】 诗话汇编。清吴瞻泰原辑,许印芳补辑。吴瞻泰字东岩,歙县(今属安徽)人。诸生。

有诗名,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著录其有《汇注陶诗》等。《渊明诗话》1931年上海大中书局铅印本径题为许印芳辑,误。许印芳之识语明言:“东岩此书所抄诗话至前明而止,今续前编,当抄国朝诗话。”则此书非其原辑无疑。《汇注陶诗》原编未见,疑此书即原编删去诗篇、仅存汇注者。全书所辑历代论陶之语,上自萧统《陶集序》、钟嵘《诗品》始,下迄清沈德潜、纪昀诸家,“老生常谈”语不录,故较为精粹。吴瞻泰原书后附有同邑吴松(一作崧,字绮园)《论陶》一卷,评论陶诗甚具体,许印芳校刊本亦仍其旧。有光绪刻本。(张寅彭)

【花薰阁诗述】诗话丛书。清雪北山樵编。雪北山樵,未详何人。此书十卷,专收论述诗体、声调、韵律方面的专作,计有王士禛《律诗定体》、《渔洋答问》(以上卷一)、赵执信《声调谱》、《谈龙录》附吴乔《答万季野书》(以上卷二、三)、钱良择《唐音审体》(卷四)、冯班《钝吟杂录乐府论》(卷五)、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七)、顾炎武《古音表》、《韵补正》(卷八、九)、马槱什《等音》(卷一〇)等八人十一种。其中《唐音审体》、《钝吟杂录乐府论》、《乐府诗集》、《等音》等四种经过编者删选,各卷并附有编者识语。此书所收多为辨体识律方面的佼佼者,故颇有参考价值。有嘉庆间刻本。(张寅彭)

【快园诗话】诗话著作。清凌霄撰。凌霄,字芝泉,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有诗名。其师如毕沅、袁枚等,皆名重当时。凌霄一生以师恩友谊为重,此书八卷,即为其与师友交往谈诗的记录,初名《师友录》,经增补后更名。有嘉庆间刻本。(张寅彭)

【澹仙诗话】诗话著作。清熊琏撰。熊琏,字商珍,号澹仙,又号茄雪山人。江苏如皋人。有《澹仙诗钞》。《澹仙诗话》四卷。封面内页有“续刻嗣出”字样,然未见刊行。熊琏虽属闺阁中人,诗名却播于闺阁之外。诗论虽无多创意,然亦有真切动人处。如云:“从来至情至性,即是好诗”;“诗本性灵,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成天籁。古人用笔各有佳处,岂可别执一见,弃此尚彼”。又论诗画同一云:“诗境即画境也。画宜峭,诗亦宜峭;诗宜曲,画亦宜曲;诗宜远,画亦宜远。风神气骨,都从兴到。故昔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又道摘录诗作之体会云:“凡有诗至百千首,绝无出色处,即欲摘取一二句,竟为难事。须知片羽堪珍,原属吉光之裘。”书中多录如皋及邻县人之作,且多夹以评语。有金陵杜新孚刻本。(张寅彭)

【西江诗话】诗话著作。清曾廷枚撰。曾廷枚字升三,一字修吉,号香墅,南城(今属江西)人。廪生。有《辨香山房诗集》。曾氏工诗善书,《西江诗话》系

其口述,由侄曾燠编次成书,分上、中、下三卷,因人录诗,兼及论评、记事,时限溯自东晋,下迄于清。全书不足二百则,内容多得自清初裘君弘之《西江诗话》。有《芑屿裘书》本。(张寅彭)

【阴常侍诗话】诗话汇编。清张澍辑。张澍,字时霖,一字伯淪,号介侯,又号介白。武威(今属甘肃)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永新知县。有《养素堂诗集》。张澍辑有《阴常侍诗集》,《诗话》即附于该诗集卷首,共九则,辑录历代有关阴铿诗的评论考辨文字,又加入一条按语,历数杜甫袭用、翻用阴铿之诗句,颇便于两相对照。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张寅彭)

【念堂诗话】诗话著作。清崔旭撰。崔旭,字晓林,庆云(今属山东)人。嘉庆庚申(1800)举人,官蒲县知县,有《念堂诗钞》。《念堂诗话》四卷,从明清两朝庆云邑宰中之能诗者述起,但又不以乡邑诗话为限。崔旭乡试出张问陶(船山)门下,故书中记其师言事甚多。船山论诗主情性,其论诗绝句云:“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又驳翁方纲之主学说云:“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颦眉书数卷,不加笺注不分明。”崔旭与船山虽有师生之谊,但于二家之争,却左袒翁氏,推许其“喜奥博不喜昌明,喜幽深不喜平直,喜含蓄不喜发露”数语为独善。崔旭于船山诗论,首肯其尚识的一面,视识为本,并在识的基础上统一学问与天性两端:“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学与悟不相离也。”张问陶之外,全书论评及摘录唐宋明清诗人不下数十家,而以本朝人为详。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张寅彭)

【六红诗话】诗话著作。清吕善报撰。吕善报(1772—?)字玖芸,山阴(今属浙江绍兴)人。年轻时科场失意,凡八试京兆而不第。此书系其晚年之作,前后增删五次,编定于嘉庆十九年(1814)。善报晚号鹿虹,“六红”即鹿虹之谐音。全书四卷,三百一十九则,寻章摘句,不拘一格;取议持论,绳墨亦宽。王士禛、沈德潜、袁枚之争全息于笔端,直至李笠翁传奇,《红楼梦》小说,亦皆津津乐道。当年时论对《六红诗话》颇多赞许,甚至谓其可与沧浪诸人争席。善报本人亦颇自负,欲与王士禛、沈德潜、袁枚诸公并立。大言无当,难获嗣响,故此书流传未广。有嘉道间刻本。(张寅彭)

【雅歌堂鹭坪诗话】诗话著作。清徐经撰。徐经,字艺圃,福建建阳人。此书二卷。书中有“今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等语,略可推知成书时间。惟徐经享寿八十岁以上,此书系其平生谈艺之汇集,非一时之作。书中保存了不少嘉庆、道光时期的闽

人闽诗。徐经论诗,大抵主严羽别才别趣及王士禛神韵之说,认为诗家一唱三叹,别有遗音所在。论诗之外,兼及文、词、曲、画、书诸艺,尤其对其间的分合关系,体论颇明。如谓作文如吃饭,求其精洁,作诗如饮酒,领略其味而已,有实相与虚象之别;诗文讲气格,填词赖才情,有朴拙与巧艳之别。但诗为文之余,词为诗之余,又不无相通之处。诸言虽非创论(如诗酒文饭之说本自吴乔),但都有一得之见。徐经是大旅行家徐霞客之后,性喜山水游历,足迹远至西南、西北;又喜议史,故书中多涉史赞地理纪游之语,并非纯粹说诗之作。有光绪间徐氏藏板《雅歌堂全集》本。

(张寅彭)

【全宋诗话】诗话汇编。清钟廷瑛辑。钟廷瑛字退轩,山东历城人。嘉庆举人,官黟县知县。有《退轩诗钞》。《全宋诗话》编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此书偏重纪事,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汇辑自宋至清的有关宋诗的诗话资料。钟廷瑛自序叙其编辑宗旨和体制云:“予既有宋诗话分体之钞,因得穷览宋人诗话及一切说部总类之书,札而摘之,遂成巨编。爰仿《全唐诗话》之体,以人为次,逐条汇入,复遵渔洋、竹垞两先生之式,各注书名于下。其有不可专属者,别为杂掇、总叙数卷,以尽其余,都得十三卷,盖亦已多矣。”全书止于北宋人蔡襄、汪白、徐介,与自序所述不符。浙江图书馆藏张宗祥抄本识云:“序中‘十三’二字乃书估挖改,全书若干卷竟因挖去不得知。”则知十三卷为残本。此书未曾付梓,现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张寅彭)

【达观堂诗话】诗话著作。清张晋本撰。张晋本,字浣山,湖南善化人。嘉庆六年(1801)举乡试,约卒于道光初,所作试帖,道光年间颇流传。此书八卷,论诗大抵附和袁枚,强调诗从至性流出,颇得袁枚诗论之精髓。又谓袁枚早岁登科外用,非其初志,故能早达早退,脱身尘鞅,锐意以诗名世,作人之道与作诗、论诗之道合一,此所以为一时之冠云云。其知人论世如此。此书采事录诗之旨,亦颇与袁枚《随园诗话》为近,于诗友乡贤之作,搜辑不遗余力,尤不避青楼妓女声情,识颇通达,但终不免芜杂之病。有同治刻本。

(张寅彭)

【蠡庄诗话】诗话著作。清袁洁撰。袁洁,号玉堂居士,桃源(今江苏泗阳境内)人。嘉庆六年(1801)拔贡,历官金乡知县。此书凡十卷,详于录诗摘句而略于论评。又“所采皆近人之句,不敢尚论古人”。袁洁论诗主性情,时有将其与袁枚相提并论者。本人亦颇为自负,曾引王晋逸诗云:“谪戍翻成避债台,蒲桃满引夜光杯。蠡庄更傲随园处,赢得吟身出塞来”。盖指袁枚游踪至塞外,集中却无出塞之

作。袁洁十分推崇张问陶,但他并不拘泥于一己之性情,而主张拓宽其内涵,所以又有“近温、李者不必其学温、李,近王、孟者不必其学王、孟”之说。有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张寅彭)

【出戍诗话】诗话著作。清袁洁撰。袁洁,见《蠡庄诗话》条。袁洁因事于道光二年(1822)谪戍乌鲁木齐,自“整装之日始,记事、记人、记地,偶有吟哦及友朋投赠佳句,随时登人,仍以诗话名之”(《自序》)。此即《出戍诗话》之由来。谪居乌鲁木齐凡三年,于道光六年(1826)初戍满回归。全书略以行程分卷:卷一记行前,卷二记途中及到达,卷三、卷四记酬别及返程。袁洁好以诗会友,即便归途中亦“行踪迟缓,每遇风雅之人,往往流连诗酒,经旬累月而后行。是以自秋徂冬,尚未入关”(卷四)。故是书记沿途旧朋新友酬赠之作及西域人情风土甚详。有道光八年(1828)刊本。

(张寅彭)

【退庵随笔·学诗】诗话著作。清梁章钜撰。梁章钜(1775—1849),字荪林,号退庵,长乐(今属福建)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他是翁方纲的关门弟子,诗不专学一家,而奄有众家之美。有《藤花吟馆诗钞》等。《退庵随笔》二十二卷,《学诗》为其中第二十、二十一卷,持论本于《诗经》,不仅要求继承《诗经》“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而且要求学习《诗经》“词华格调”的章句之法。这种完全匍匐在《诗经》脚下的态度甚至使他不敢承认后代诗人还有“吟咏性情”的创作自由,他说:“钟仲伟有‘吟咏性情,何贵用事’之语,严沧浪亦言‘诗有别材,非关学;诗有别趣,非关理’。此专为《三百篇》及汉魏言之则可,若我辈生古人之后,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敢曰不学而能乎?且诗兼赋比兴,必熟通于往古来今之故,上下四方之迹,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不能无所取材,又敢曰‘何贵用事’乎?”书中广泛收辑清代诸家如毛奇龄、王士禛、朱彝尊、汪师韩、袁枚、翁方纲、纪昀乃至《四库全书总目》等论诗之语,也借此表示自己的见解。大抵师从翁方纲、纪昀之说,从大处着论,亦不废韵调、句法等具体问题。对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的诗论,赵执信《声调谱》、吴景旭《历代诗话》等著作的评论,也均平允。如指出王士禛“神韵说”唯欠一“真”字,袁枚《续诗品》“乃真学诗之准绳”,等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读渔洋诗随笔】诗评著作。清梁章钜撰。此书二卷,系王士禛诗评专辑。首记纪昀、翁方纲之语,“二师皆令熟读王渔洋诗,而议论风旨,微有不同。文达师之论平而允,苏斋师之论精而严”。二师之论为其基本立场,又参以他家之说,如李兆元《秋柳诗

笺》、屈复《秋柳诗解》等,多有所采辑,而全书终以梁章钜本人之具体诗评为最详。有清刊本。

(张寅彭)

【南浦诗话】诗话汇编。清梁章钜辑。嘉庆十二年(1807),梁氏主讲于南浦书院(在福建浦城)。训课馀暇,搜采邑中志乘,旁及四部,汇集浦城地区诗人资料,自唐迄明,得九十余人。按人立目,以时为序,厘为八卷,遂成此书。据此本刊印者祝焕坡序云,《南浦诗话》先有全征兰辑本,梁章钜曾为之作序及定名;然全书未刊,至使梁书独传。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本。

(张寅彭)

【东南桥外诗话】诗话汇编。清梁章钜辑。“东南桥外”即指福建。此书十卷,专辑明代福建诗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集部别集类二二《蓝山集提要》云:“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蓝)仁兄弟为之开先,遂没其创始之功,非公论也。”梁章钜据此而将二蓝(蓝仁、蓝智)置于闽十子之前,以为明代闽诗之始。有清刻本。

(张寅彭)

【雁荡诗话】诗话著作。清梁章钜撰。梁章钜尝以七十四岁高龄游雁荡山,作游记三千餘言、长诗一首及诗话二卷。记与诗先成。诗话多取自曾惟《广雁荡山志》。雁荡山“自唐贯休始有诗,盛于宋、元、明,至国朝名公韵士,抉奥搜奇,山之灵秀毕露”(任俊跋)。梁章钜搜集前人题咏之余,再益以同游倡和及家人酬韵之作,使此书有别于一般地域性的诗话汇编著作。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张寅彭)

【闽川闺秀诗话】诗话汇编。清梁章钜辑。此书系闽地女诗人之诗事诗作选载,凡四卷,始于清初之林玉衡,采入者约百余人,而以梁章钜家眷和郑方坤家眷为最夥,如梁氏家眷即占十分之一强,此亦乡邦文献之通例。各人名下,介绍生平,列出篇章及佳句。其阙漏者亦复不少,后丁芸补辑有《闽川闺秀诗话续编》。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

(张寅彭)

【香石诗话】诗话著作。清黄培芳撰。黄培芳,字子实,号香石,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嘉庆九年(1804)副贡,官内阁中书、陵水教谕。年轻时即有诗名,与同时张维屏、谭敬昭合称“粤东三子”。亦工书画。有《岭海楼诗文钞》等。《香石诗话》二卷(一作四卷),以评论清人之作为主。其时袁枚声气刚过,诗坛正处在转换风尚之际。黄培芳论旨略主蕴藉,故对袁枚颇致不满,而转为维护王士禛。在袁、蒋(士铨)、赵(翼)三家之中,也以蒋、赵为优而独斥袁。在同时之交中,与张维屏论诗最为相契。又有李白七古评本,并欲续评其各体,仿沈德潜《杜诗偶

评》之例,编一部《李诗偶评》。孔继勋《粤岳草堂诗话序》曾谓赵执信《声调谱》专攻声调,而“古诗法仍未备”,须以黄氏此著济之,“庶可得正路”云云。有1985年上海书店据嘉庆十五年(1810)岭海楼黄氏刻本影印本。

(张寅彭)

【粤岳草堂诗话】诗话著作。清黄培芳撰。二卷,作于晚年,生前未获刊行,至宣统二年(1910)始付梓。“粤岳”指罗浮山,黄培芳结庐于山下,故名粤岳草堂。此书可视为《香石诗话》之续编,书中记与张维屏、谭敬昭等交往之事甚详,又因受知于翁方纲,而录翁氏之言亦甚详。如谓王士禛分五古之有古调、唐调而“畦畛未化”;谓虞集“深入经训之奥,而诗法奄有六朝”,“不可目为窄狭”,“唐宋以后真诗,惟此而已”,等等。又津津于七古,引翁方纲之语批评袁枚之七古“有落调而不自知”,批评沈德潜于“七古一体拟未透彻”,其偏嗜七古如此。黄培芳论诗步趋翁方纲,翁氏偷换王士禛之论而创为己论,黄氏亦以钱载之诗论接武王士禛,而越过沈德潜,所谓“阮亭尚书后当推钱絳石先生,归愚宗伯不能及也”,此实为一家之言,而非通论。有陈步墀辑《绣诗楼丛书》本。

(张寅彭)

【读杜韩笔记】诗话著作。清李黼平撰。李黼平,字贞甫,号绣子,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改庶吉士,官昭文知县,有《著花庵集》等。黄培芳《香石诗话》谓其古体有大家风味,近体亦出笔老重。生平于杜甫、韩愈二家诗用力甚勤,遂积成是书。二卷,上卷论杜诗,下卷论韩诗。多系具体诗作之评议,从训诂、考据、用事、韵律等入手,琐细有馀而概括不足。此书《嘉应州志·艺文》著录其目,然云未见其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始由李氏后人搜得刊行。有中华书局1934年聚珍仿宋印本。

(张寅彭)

【石园诗话】诗话著作。清余成教撰。余成教,字道夫,号石园,江西奉新人。嘉庆戊辰(1808)举乡试。据其友人方观序,知此书编撰完成于嘉庆壬申、癸酉(1812、1813)年间。今传本二卷,所涉皆为唐人唐诗之品评,合乎吴嵩梁序“石园所说,皆取于唐人诗”等语。然方观序及刘子春序则谓《石园诗话》所录不限于唐:“自唐而宋,而元、明,而今”。吴序作于嘉庆二十一年,而方序和刘序均作于嘉庆十八年,岂《石园诗话》别有全本,或今传本为后来之删定本?此书评鹭唐人,往往注重于论诗以及其人,如以宋之问之无行而诘难沈、宋并称之说;指出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有似少陵”;谓韦应物“性高洁”,其诗“意致简远超然,似其为人”;谓柳宗元“贬官后,自放山泽间,其堙

厄感郁,一寓于诗”等,可见此书之大较。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匏庐诗话**】诗话著作。清沈涛撰。沈涛,原名尔政,字四雍,号匏庐,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由知县累官盐法粮储道,有《柴辟亭集》。沈涛少即以诗受知于阮元,又曾从段玉裁治经,故其论诗亦喜考据源流,勘校正误。《匏庐诗话》三卷,内容亦颇有涉及考订校勘者,如以《玉台新咏》订正《文选》的伪误,指出沈德潜比较《焦仲卿妻》诗之温厚与唐人《弃妇诗》之轻薄,语出罗大经《鹤林玉露》,等等,不一而足。此书论评无甚创见,记采多芜材,亦无甚出色处。有道光庚子(1840)刊本。

(张寅彭)

【**竹林答问**】诗话著作。清陈仅撰。陈仅,字餘山,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曾官陕西安康、紫阳知县。该书一名《诗学问难》,一卷,为问答体,问题广泛,答案精要,大致按总论、体裁、作法、历代诗人诗学品评等顺序,简明论及有关问题,又能兼顾各端而无片面之失。如论诗人性灵与学力修养之关系:“学诗者有天资颖悟出手便高者,是性分中宿世灵根。摩诘所谓‘宿世本词客,前身应画师’,沧浪所谓‘诗有别趣’,此种人学诗最易,然往往缺于学术,转至自误。其由学力进者,多不能成家,以性情不相入也。故两者必相须而成。”分析钱谦益《杜诗笺注》、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杜诗注本的得失后总结曰:“说诗当去三弊,曰泥,曰凿,曰碎。执典实训诂而失意象,拘格式比兴而遗性情,谓之泥。厌旧说而求新,强古人以就我,谓之凿。释乎所不足释,疑乎所不必疑,谓之碎。”又如引经据典,攻驳袁枚“性灵”说之非:“诗本性情,古无所谓‘性灵’之说也。《尚书》:‘诗言志。’《诗序》:‘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有情然后有诗。其言性情者,源流之谓,而不可谓诗言性也。‘性灵’之说,起于近世,若情之有闲,而创为高论以自便,举一切纪律防维之具而胥溃之,号于众曰:‘此吾之性灵然也。’无识者亦乐于自便,而靡然从之。呜呼!以此言情,不几于近溪、心隐之心学乎?”其说之辩多类此。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诗学问难**】见“竹林答问”。

【**东泉诗话**】诗话著作。清马星翼撰。马星翼,字仲章,号东泉,鱼台(今属山东)人。嘉庆举人。此书八卷,首二卷评诗,后六卷录诗。卷一评唐以前,卷二评宋以后,从汉魏起评,历代而下,迄于前明。大抵扬唐抑宋,但对宋诗亦有所分析,推东坡、放翁为两大宗。于明诗则取二李(梦阳、攀龙),薄徐(祜

卿)、高(叔嗣)。论诗主性灵,不屑于多谈声律、对偶、字句之法,斥为诗之绪余,古之糟粕。故此书以大部分篇幅录时贤诗,及其本人赠答酬友、游山纪胜之作。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宝汉斋刻本。

(张寅彭)

【**老生常谈**】诗话著作。清延君寿撰。延君寿,字荔浦,山西阳城人。嘉庆时诸生。有《六砚草堂诗集》。《老生常谈》一卷,析诗甚为细密,意在示后学以作诗、赏诗之门径,如开卷第一则即分析杜甫《岳阳楼》诗之“细针密线”,然后曰:“看古人诗,要这等去讲究,自家作了诗,要这等去推敲,渐渐打将去,便到好处。”本此宗旨,其笔墨自然全落在有“针”“线”可供拆析的唐以后之作品上。汉诗无迹可求,故不涉及;魏晋诗始有作迹,则稍涉曹植、谢灵运、鲍照等数家。诗作分析以外,诗人之品性修养如读书、炼性、养气等,亦皆有所论列,固非斤斤于辞章者。论本朝人诗则详于其同时,以袁枚之新颖、蒋士铨之雄健、赵翼之豪放、黄仲则之俊逸为冠,不为未见。但其以同乡之谊而推许陈廷敬诗,则有过当之嫌。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诗见**】诗话著作。清胡寿芝撰。胡寿芝,字七因,室号东目馆,临安(今属浙江)人,约生活于嘉庆时。此书四卷,各卷内容略有所分类,每类并各标以小目。大抵卷一为总论和历代诗评,卷二论诗体和题材,卷三、卷四主要谈诗法。虽自谓服膺钟嵘、徐祜卿等之情性说,然全书之体例与论旨,实为格调说之面目,其大旨以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规度当以唐为宗”。又持论好以翻驳前人为务,如谓欧阳修“何以见其矫崑体?观其亦尝推服杨、刘,不异少陵推服王、骆”;谓苏轼“贪用书,好作禅语”,“喜次人韵,亦未免自束缚”,“否则才大笔肆,正不知添多少好句”等,虽非其特见,但亦可资人参考。有清刊本。

(张寅彭)

【**诗话耐冷谭**】清宋咸熙撰。宋咸熙,字小茗,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其父宋大樽,有《茗香诗论》,为丁福保辑入《清诗话》。《诗话耐冷谭》十六卷,《续谭》二卷,以录同时人诗,记同时人事为主,可为乾、嘉时诗坛增一谭资。录记之余,间有论评,大抵以真情清俊为尚。《耐冷谭》有民国三年(1914)扫叶山房石印本,《续谭》有道光刊本。

(张寅彭)

【**明人诗品**】诗话著作。清杜荫棠撰。杜荫棠,生平事迹未详。据书后引语,知杜荫棠另有明诗之辑,凡二十四卷,曰《洵雅集》;而此书原名“明人诗流品藻”,道光二十二年(1844)王朝忠据当时流传抄本重刊时,始易为今名。所辑多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及其他各家论明诗者。全书二卷,选辑颇为精

要,足资明诗研究者参考。有道光二十三年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张寅彭)

【生香诗话】诗话著作。清俞樾撰。俞樾生平不详。此书四卷,一百六十四则,录诗与论评比重差等,大抵主性情,反对以学问矜博,与袁枚之立场近。卷首道光二年自序引魏冰叔语以明此旨:“古人以性情为诗,今人以诗雕刻其性情。知此意始可与言诗。”俞樾品诗颇细微,持论亦具体,虽不免有论浅识小之憾,却都是自家体会之语,所谓“俯读仰思,有得于胸”者。故于王士禛、沈德潜、袁枚诸大家之诗评,亦时能提出不同之见。有清刻本。(张寅彭)

【尊西诗话】诗话著作。清张曰斑撰。张曰斑,字蔚亭,别号苔山。山东馆陶人,嘉、道间名士,心情淡泊,终日以诗酒陶情。生平所作尽自弃去,独存诗话一编,自述其诗酒行状,“设樽而赋诗,因诗而有话”,不假雕饰,活色生香,欲存神貌行止于亲友间。故初不示外人,道光十五年(1835)始由子侄辈刊行于其身后。此书二卷,论诗大抵于明人推重谢榛,于清人调停于王士禛与赵执信之间,尤视赵为连接康、雍与乾、嘉诗坛之关键:“渔洋诗法得之明末诸老宿,秋谷宛转得之,以传晓岚,雅雨、随园皆得之秋谷。”数语似无人道及,可备一说。有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张寅彭)

【石楼诗话】诗话著作。清孙煦撰。孙煦,字育万,号石楼,汉阳(今属湖北武汉)人。嘉庆、道光间名士,主盟汉上诗坛几三十年,士大夫莫不乐以一编相质正(见刘兴樾《石楼诗话序》)。有《石楼诗钞》。《石楼诗话》四卷,约作于其隐居赭山之晚年。卷一品评历代诗家,卷二专评本朝各大家、名家,卷三、卷四专记师友过从及录同时人之诗。持论略主严羽以禅喻诗及王士禛神韵之说,然亦不废他说。有道光十七年(1837)巾箱本。(张寅彭)

【梵麓山房笔记】诗话著作。清王汝玉撰。王汝玉(1798—1852),字润甫,别号韞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同治《苏州府志》著录其著述数种,多不传。此书六卷,虽题曰笔记,然记事录句,无一则不涉于诗,实为诗话之作。王氏能诗,所交之友,多为当时诗坛名士,此书即以存本人及所交文士之诗名为旨。持论略主真情自然,即如舒位之诗,亦嫌有“好奇之过”:“铁云自有真诗在,奇服何妨去陆离。”又曾从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原本过录一副本,谓此书因系游戏之作,舒氏原未明署姓名云云。有《己卯丛编》本。(张寅彭)

【三家诗话】诗话著作。清尚镛撰。尚镛,字乔客,江西南昌人。约生活于道光、咸丰年间,幼即有神童之誉,博雅负异才。工诗文,尤精史学。历主河

南三山、聚星、崇实诸书院。有《持雅堂诗文集》等。《三家诗话》一卷,据姜曾序,知作于道光五年(1825)。三家者,即袁枚、蒋士铨、赵翼。全篇分“三家总论”、“三家分论”、“三家余论”三部分,大抵许袁之巧而非其佻,许蒋之杰而非其粗,许赵之赡而非其冗杂。论诗之外,于三家之文章性行,传授源流,亦皆有所论列。又往往置三家于本朝诗人之列,以较量高下特色,故对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施闰章乃至同时之张问陶等,亦时有评鹭。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匡山丛话】诗话著作。清王偁撰。王偁,字晓堂,大名(今属河北)人。诸生。有《莲舫诗钞》。王偁曾受山东按察使靳会昌之邀,主持鹊华馆,此书即成于其时。凡五卷,大抵以夙昔所记闻之前人论诗语排比纂述而成。五卷依次为汉魏六朝、李杜、唐诸名家、五季北宋、南宋元明等。然所录仅凭记忆,又每参之以己意,致使此书既失原文之实,复不成一家之言。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巾箱本。(张寅彭)

【卧园诗话】诗话著作。清潘煊龙撰。潘煊龙,字卧园,号四梅主人,湖北罗田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历官邹平、洧川知县。有《梅花书屋诗钞》等。《卧园诗话》四卷,补编二卷,续编一卷,以记事为主。作者曾“宦游都门,前后七载有馀。一时坛坫诸君子,辄引为忘年交。唱和论诗,殆无虚日”。所记即以此类“朋友苔岑之契,生平泥爪之踪”为主。立场虽似调停于性灵、格调二说之间,然实偏于性灵。如曰:“诗有一片性灵,明白如话者,此境正未易。”评诗亦以情之深浅为标准:“闽中故多诗人,而一往情深,以黄莘田任《秋江集》为最。”书中以诗人之穷达辨诗作音调风格之异,最能体现其重性情之旨:“诗以穷而后工,亦有不穷而自工者,未可一概论也。然穷达异趣,故音节各殊。善乎郭频伽磨之言曰:台阁之诗,其志恬以愉,其音和以雅;江湖之诗,其志幽以深,其音哀以怨。深得古人诗言志之妙矣。”此言颇能体现进入晚期的古典诗论对于“诗言志”的理解。有《卧园四种》本。(张寅彭)

【养一斋诗话】诗话著作。清潘德舆撰。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举人,官安徽候补知县。有《养一斋集》。《养一斋诗话》共十卷,以儒家“风”、“雅”诗教作为论旨之本,特别强调诗人的品性修养,将论诗与论人统一于封建教化的标准。特别推重曹植、陶潜和杜甫:“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于五伦,皆极耽挚动鬼

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潘氏虽然对诗人之人格与诗作之品格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有所认识,但在评论阮籍和陈子昂时,最终还是以“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和“子昂之谄武曌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而概斥之为“小人之诗”。此外如曹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宋之问、沈佺期等人,也都被视为“乱臣逆党”而累及其诗,甚至连王安石,也因其推行政治改革而被抹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以政治道德标准代替审美标准造成的严重失误。但是《诗经》在《养一斋诗话》中又有作为审美原则的意义,潘氏指出:“《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短钉浅尽而已。”这是贯穿全书的又一基本立场。因此,从全书看,《风》、《雅》传统作为论诗准则的伦理教化性质和审美性质还是基本平衡的。《养一斋诗话》对前代各家诗论,虽均有所批评(朱熹除外),但这种批评并不全盘否定。例如,他对清代各家诗话,贬斥多于褒扬,尤其批评袁枚的《随园诗话》和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但潘氏论诗的两大支点,又恰正是袁枚标举的“性情”和翁方纲标举的“学问”。“是故古人之诗,本之于性天,养之以经籍”;“尚性情者无实腹,崇学问者乏灵心,论甘忌辛,诗教弥以不振,必当和为一味,乃非离之两伤”,等等。其论实为糅合各家之说,而后再自出机杼的一种带有集大成性质的理论。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养一斋李杜诗话】诗话著作。清潘德舆撰。此书原系其所辑李、杜诗选集《作诗本经》之《总论》部分,后因《作诗本经》未刊而附于《养一斋诗话》之后。凡三卷(一说二卷),卷一论李白,卷二、卷三论杜甫,多取宋以来各家之论,并逐条加以按语,辩短申长,借他家之言以发表己见。论李白推重朱熹之见:“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以纠历来“诗仙”之评“虚无不可知”;论杜甫则不满元稹、苏轼、秦观等之“集大成”说,以为未窥底奥:“其所以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此即元好问“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碣砮”之意。所辑各家论李、杜之语,亦颇为精审,便于阅者总揽历代李、杜研究之精华。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屏麓草堂诗话】诗话著作。清莫友棠撰。莫友

棠(?—1847),字若愚,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少从郑光策游,布衣,一生以授徒为业。此书十六卷,内容以记述师友门生及闽地风雅人士之佚事遗诗为主。王士禛《渔洋诗话》曾感慨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录闽人谢伯初之诗而使其得以传一事,莫友棠亦深以为然,照录渔洋之文并云:“世有明知好诗不欲人诵,及身附士流,即先世有所著作亦任听其等闲泯灭者,诵(欧阳)文忠之言,当亦知所愧,奋变易矣乎?”本于此意,莫氏生平于己于人,一贯留心前言往行,遂有此皇皇十六卷之录。闽中清嘉、道间吟事之盛貌,庶几于是书可见。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张寅彭)

【十二石山斋诗话】诗话著作。清梁九图撰。梁九图,字福草,号十二石山人,顺德(今属广东)人。有《紫藤馆诗文钞》。梁九图少即工诗,传闻海内。性简淡,平日以谈诗品艺自娱。潘清撰《挹翠楼诗话》谓其诗以生造为主,硬语盘空,笔情奇矫。此书四卷(一作八卷),于诗之外,尚涉及书、画、传奇、小说,大抵以闲适自然为尚。所录乾隆、嘉庆、道光时诗,颇富生活情趣。有道光刊本。

(张寅彭)

【昭昧詹言】诗话著作。清方东树撰。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一生十试而不第,五十岁后绝意举业,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有《汉学商兑》等著。《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系其晚年之著。方东树学古文于姚鼐,学诗于姚范,故此书以桐城“古文文法”论诗,多采二姚之说,可视为桐城派诗论的代表作。全书以作家论为主。从汉魏到宋元,特别推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杜甫、韩愈、黄庭坚等。所依据的标准,一为意,二为法。“意”指《六经》之意,并以“并驱《六经》”的庄子、屈原分别与陶、阮挂上联系,认为“阮公似屈,兼似经;渊明似庄,兼似道;此皆不得以诗人目之”。二谢、鲍照和黄庭坚的地位则主要由“法”而来,其中尤以谢灵运和黄庭坚的诗法得到他高度的推许。如评谢灵运曰:“谢公蔚然成一祖,衣被万世,独有千古,后世不能桃,不敢抗,虽李、杜甚重之,称为‘谢公’,岂假借之哉!”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也认识到“谢所以不及杜,以无情事足感人”,但以“明远、杜公皆有率句,爽快逸迈,康乐无之”的原因,仍然许之以如此高的身价,足见诗法在其诗学中的地位。黄庭坚也因“用功深造”、“开古今一大法门”而被推为“百世之师”。至于杜甫、韩愈,则意、法兼备:“杜、韩尽读万卷书,其志气以稷、契、周、孔为心,又于古人诗文变态万方,无不融会于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笔力,变化出之,此岂寻常龌龊之士所能辨哉!”“读杜、韩两家,皆当以李习之论

《六经》之语求之,乃见其全量本领作用。至其笔性选字,造语隶事,则各不同;而同于文法高古,奇姿变化,壮浪纵宕,横跨古今。”所以杜甫和韩愈能够“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在诸家居于最高的等第。《昭昧詹言》另一基本内容是搬用桐城文法论诗,在书中建立起一套缜密的诗法。书中一再说:“不知用意,则浅近;不知用法,则板俗;不知选字造语,则滑熟平易。”“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故字句亦为文家一大事”,“字句文法,虽诗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学,非先于此实下功夫不得”,等等。因此,书中论诗法的内容连篇累牍,仅诗题即有“序题”、“点题”、“还题面”、“收足题面”等数十法,甚至对“章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摘”的汉魏诗,也加以章句分析。这种条分缕析,对于理解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不能说全无意义。但是作得过分,“和盘托出”、“金针度人”(方氏友人批评《昭昧詹言》语),对诗意的美总是一种损害。至于分析错误,强作解事,其弊则更甚。综合上述两点,可知《昭昧詹言》之论在桐城文派和晚清同光体诗派之间,起了中转纽结的作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张寅彭)

【**樗寮诗话**】诗话著作。清姚椿撰。姚椿(1777—1853),字子寿,一字春木,娄县(今上海松江)人。监生,举孝廉方正。有《通艺阁集》。《樗寮诗话》三卷,一百零三则。内容以记录同时人之诗事为主,如记其时士人之力避袁枚:“韞山(管世铭)试江宁,客有劝谒袁简斋者,赋诗云:‘耆旧风流属此翁,一时月旦擅江东。寸心自与康成异,不肯轻身事马融。’是时昆陵人士多能自重,如张皋文、吴仲伦、恽子居,皆不肯游其门。而洪稚存、黄仲则虽与过从,亦未尝列北面。”这是嘉庆、道光间风气的反映,与姚椿师事姚鼐的立场亦相一致。姚椿有诗名,尝自言于诗用力多,然《樗寮诗话》持论并无出色处,不过撙拾时议,作模棱两可之语而已。有道光间刊《樗寮全集》本。(张寅彭)

【**春草堂诗话**】诗话著作。清谢堃撰。谢堃,字佩禾,甘泉(今属江苏江都)人。此书八卷。谢堃尝正“诗话”之名曰:“夫诗话者,话主而诗宾也。窃观时贤作诗话者,则曰某人有某句云云,此实非诗话正宗,乃唐人摘句图例也。”此处所谓“话”,即指记事,故谢堃此书通篇记事。全书共二百五十五则,每则或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或数人数事,十之九为同时之人事。就中尤赞程恩泽,谓其诗“非时人口吻”,誉其五言长古《舟次耒阳吊杜文贞》“虽少陵复生,不是过也”。论诗则以格律矫袁枚之标举性灵,亦是嘉、道间时风之反映。有清刻本。(张寅彭)

【**橡坪诗话**】诗话著作。清方恒泰撰。方恒泰,字象平,番禺(今广东广州)人。约为嘉、道间人。此书十二卷,系其与门弟子说诗之记录,乾、嘉诗坛人物之诗事,如杭世骏、蒋士铨、赵翼、王昶等,皆有所涉及。但全书择选不精,识见平平,几无可观者。有清刻巾箱本。(张寅彭)

【**劝戒诗话**】诗话著作。清黄坤元辑。黄坤元,字静轩,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此书八卷,系随编随刊而成:道光三年(1823)孟秋,首二卷率先付梓,次年仲春复辑二卷为卷三、卷四,同年仲秋又续成卷五、卷六,道光六年孟春方续完末二卷。此书全称《劝善戒恶诗话》,顾名思义,是一部以说诗行封建纲常礼教的著作。诗本性情,最易兴发善善恶恶之心,故儒家诗教之说不为无据。但不能越俎代庖,将伦理、政治替代或等同于艺术。该书即犯此忌。全书五百餘则,不外诗人行状及诗作吟唱之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妇德、友信、臣忠、官廉诸伦者。其说教色彩之纯与浓,在诗话之作中鲜有可匹者。有翼经堂刻本。(张寅彭)

【**杜诗琐证**】诗话著作。清史炳撰。史炳,字恒斋,溧阳(今属江苏)人。此书二卷,书前有道光五年(1825)自叙。凡一百二十则,随意论次,每则皆标有小目。全书泛采群籍,旁证博引,考订杜诗辞语之生歧义者,对前人之说,多有所驳正。取证有据,于读杜诗,有疏通辞义之功。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张寅彭)

【**小清华园诗谈**】诗话著作。清王寿昌撰。王寿昌,字介图,号眉仙、养斋,永北(今属云南)人。据其自叙,此书作于道光五年(1825)。二卷,卷上又分为“总论”和“条辨”。总论以口诀形式,总结历来作诗的基本原则,亦融入己见。如“诗有三真:言情欲真,写境欲真,纪事欲真”,“诗有四近:宜近情,宜近理,宜近风雅,宜近画图”。条辨则择其要者,分条辨析各概念之义,并以评鹭语和摘句实之,如“何谓真?曰:自来言情之真者,无如靖节;写景之真者,无如康乐、玄晖;纪事之真者,无如潘安仁、左太冲、颜延年。少陵皆兼而有之,故往往有生字拙句,人皆不解其故,不知乃直书所见,初不假乎雕饰者,但嫌其发泄太尽”云云,下再以杜诗分别与陶、二谢之诗比较之,体例颇不同于一般诗话之散漫无联系者。其论旨则以儒家诗教为正,如曰:“诗者,志之所之;而志者,情之主、性之迹也。性正而后志正,志正而后思正,思正而后诗正,而后无邪之旨乃可言焉。”此亦是全书绝然以汉、魏、晋、唐为式而无取乎宋元以下的原因。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说诗诗话**】诗话著作。清张昶撰。张昶,字午

躔,四川成都人。此书二卷,系未刊稿本。全书记事、录诗、考辨、论评杂处,采书甚博,考据详赡,论诗大抵以杜甫为正经,亦不废诸家。作者对此书日后的传布,期之甚殷,但终未获镌刻。有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张寅彭)

【憨斋诗话】 诗话著作。清马桐芳撰。马桐芳,字子琴,号憨斋居士,长山(今属山东邹平)人。此书凡四卷,评诗论人与录诗纪事率意编次,似是随撰随辑而成者。马桐芳受嘉、道以来宗宋诗观之影响,倡以学问为诗:“黄山谷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诚哉是言。无论咏古之作,必乞灵于典籍,而寻常游览诗、眼前景、口头语,皆须书味盎然,方能令人百读不厌。”他视“诗材富博”为清诗之主要特长,即唐诗亦不可及。本此立场,书中论清诗之流变,颇注重宋诗派之线脉,谓“查初白诗渐落宋人窠臼”,而以袁枚、赵翼接其绪,强调乾隆三大家皆学宋(袁枚学杨万里、蒋士铨学黄庭坚、赵翼学苏轼,此说始见于李调元《雨村诗话》),遂使乾、嘉诗坛之主潮与道、咸、同、光之宋诗运动趋同。此种认识,颇有助于把握清诗流变之大势,不为未见。有道光十二年饮觥堂刊本、郭绍虞藏抄本。(张寅彭)

【红叶山房诗话】 诗话著作。清姚锡范撰。姚锡范,字子俊,江苏常熟人。此书六卷,卷首有黄培芳序,归纳全书内容之大要云:“第一卷泛论名句与逸事,二、三卷博采知交诗,四卷采闺秀之节烈者,五卷采名媛仕女,六卷采沦落不遇及青楼。”约以录诗记事见其价值,至于议论,则多为习见语,无从窥其自家立场。有道光十六年(1836)羊城富文斋刻本。(张寅彭)

【海虞诗话】 诗话汇编。清单学傅辑。单学傅字师白,晚号钓翁,常熟(今属江苏)人。诸生,诗学其乡前辈冯班、王应奎一派,晚年游中原,与姚椿相唱和。一生著述颇富。《海虞诗话》十六卷,收清顺治至道光初年海虞诗家几近四百人。单氏意在续补王应奎《海虞诗苑》之阙,故详于乾隆以来王书所不及收者。其不录名家显集之旨,则与《海虞诗苑》同,此又隐寓其不遇牢骚之意。此书原属未竟稿,后经其孙单铭玉董理,咸丰初年始得刊行。有清刻本。(张寅彭)

【国朝(清)诗人徵略初编】 诗话汇编。清张维屏辑。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一字南山,号松心子,番禺(今广东广州)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南康知府。早有诗名,居“粤东三子”之首。有《听松庐诗钞》。《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六十卷,系汇辑当朝诗人生平事迹的大型诗话汇编之作,收录道光以前诗人近千家。按人立目,每人有生平、纪事、品评、

摘句等项,而以品评为最详。所辑资料,采自诗话、方志、笔记、诗集等。其自序于辑录标准略云:“见其事未见其诗,或偶见其诗而未遇会心者,姑阙之。”沈德潜《国朝(清)诗别裁》所收虽迄于乾隆二十五年,然亦得千人之数。两书采辑宽严之比,于此可见。张维屏后又辑有《国朝诗人徵略二编》六十四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刊行过一部分,但一直未曾刊全。《初编》有道光十年原刊本。(张寅彭)

【艺谈录】 诗话著作。清张维屏编撰。二卷。原属作者《松心十录》之一,为庚集。全书共收录清代顺治至道光间诗人五百五十一位。卷一所收为海内诗人,计三百十位;卷二所收为粤东诗人,计二百四十一位。每人均系以小传,征集方志、文集、诗话、笔记中的有关材料评鹭之,并附以传主的诗作例句,偶或再加自撰之语,以续未尽之意。作者另有大型评传类诗话《国朝诗人徵略》,可参看。有《张南山全集》本、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本。(张寅彭)

【听松庐诗话】 诗话、句图著作。清张维屏撰。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顺德县龙山乡举行诗会,诗卷属请张维屏评阅。此书即系诗会之作的摘录汇存。不分卷。标有“龙山诗会”和“摘句”二目,前目列赴会诸人之次序高低,后目辑诸作之佳章隽句。故虽名曰诗话,实似唐人主客图一类著作。有《张南山全集》本。(张寅彭)

【杞云楼诗话】 诗话著作。清刘存仁撰。刘存仁,字炯甫,闽县(今福建福州)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历官秦州知州。有《杞云楼集》。《杞云楼诗话》六卷,本于“爱古不薄今”之意,书中评古和述今分量各半。论诗主教化,卷首即揭集诗教宗旨,以为诗关国计民生,卷末又殷殷告诫,愿诗人极力挽护将衰未衰之太平治世。古诗人中,以白居易和陆游最获其心,而尤以第一知己许陆游。书中大量摘引陆游之句,并藉此“论其世、考其志、知其人”,自谓所作之论诗绝句“少陵从古称诗史,经济罗胸属剑南。自叹广陵今绝唱,满腔忠愤共谁谈”,“颇道出放翁心事”。于陆游诗之艺术特色虽分析甚少,然“真中有厚”、“直处不易学”等语,亦颇能识其大者。至于同时之诗人,则倾心于张际亮、吴嵩梁,论诗则心折于潘德舆。又因吴嵩梁闻达而张际亮忤于世,故述录张氏之行事遗诗详于吴氏。有清闽侯林氏刊本。(张寅彭)

【酌雅诗话】 诗话著作。清陈伟勋撰。陈伟勋,字金门,号酌雅主人,剑川(今属云南)人。书中记其于道光六年(1826)赴朝考,而书成于道光末,时已晚年。全书三卷,卷一卷二为正编,卷三为续编。全书

以奉孔子“思无邪”一言为矩范,而以释教和淫辞为“邪说”之首。如谓白居易、苏东坡“多赠妓忆妓之作,欲于二公诗集中去此等篇,以全其美”;谓袁枚狎昵女弟子,且“形诸歌咏,传诸笔墨,付诸枣梨,欲天下人皆知之,而竞艳之,郑、卫风行,廉耻道丧,害义伤教,莫此为甚”。甚至谓“《西厢》、《聊斋》、《红楼梦》三书者,余尝比之于妓馆之污”。又“辄戒学者,令勿读唐人诗中赠某上人某禅师之作”,盖因“浮屠之说,圣人之世无之,惑世诬民,莫此为甚”。其诗识迂腐如此。但陈伟勋于诗家三昧,也非全无会心,如云“《三百篇》用赋比兴三义,而比兴居其二,其味永矣”。故于“太白天才,东坡大才,乐天逸才”,以及袁枚之诗才,也同时予以充分肯定。在诸家诗话中,最推宗“持论正大”的黄彻《碧溪诗话》及瞿佑《归田诗话》,采录两作之语亦最多。有《云南丛书》本。

(张寅彭)

【药栏诗话】 诗话著作。清严廷中撰。严廷中(1795—1864),字秋槎,云南宜良人。剧作家,有杂剧《武则天风流案卷》(一名《判艳》)、《洛神殿无双艳福》(一名《洛城殿》)、《沈媚娘秋窗情话》(一名《谱秋记》),合称《秋声赋》。《药栏诗话》二卷,以评鹭同时人诗为主,有明确的评诗标准。所重在于性情之有无:“至性至情语似易而实难,或以浅目之,非知诗者也。”故于唐、宋诗人,特别推重白居易、陆游,而不喜“宋人诗话宗韩祖杜”。尤欣赏本朝诗人袁枚,认为袁诗“真挚语”在“近代诸公集中不多见”。书中录存严廷中本人《与问樵太史论诗书》一篇,提出“性近”与“性不近”的原则,作为习文作诗者的先决条件;又批评汉魏六朝诗之言情“太直”、“太浅”,批评宋人对于杜诗性情的阉割,批评韩、苏诗“排界”而“不善言情”,批评台阁体矫情、无情,等等。作者欲以此篇代《药栏诗话》自序,以其诗观俱见于此。有1914年刊《云南丛书》本。

(张寅彭)

【数园诗谈】 诗话著作。清许丙椿撰。许丙椿(约1786—1866年),一名广文,字若秋。安徽桐城人。此书八卷,续编二卷,原刊于同治年间。全书以存“我”为旨,皆自录所作,并标出其事本末。前八卷录十岁至六十岁时之诗、事,续编二卷录六十岁至八十岁时之诗、事,不外家居、游历、交友、宴乐诸题。后人披览,历历如见其生平,嘉、道间时风好尚及人物风情,藉此亦可窥一斑。有光绪九年(1883)重刻本。

(张寅彭)

【射鹰楼诗话】 诗话著作。清林昌彝撰。林昌彝(1803—1876),字惠常,又字芑溪,号磻记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等,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是一位关心国事的经学家,“留心时

务”,“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几欲拔剑起舞”(林温训《射鹰楼诗话序》)。鸦片战争起,他著有《平逆志》和《平夷十六策》,提出退英安国的一整套对策,被林则徐许为切实可行。《射鹰楼诗话》是他表达反帝爱国思想和情怀的又一部著作。“射鹰”即“射英”的谐音,据《海天琴思录》介绍“射鹰楼”:“余建射鹰楼,楼悬长幙《射鹰驱狼图》,友人题咏甚夥。楼对乌石山,山为英逆之窟穴。余于楼头悬楹帖云:‘楼对乌石,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见者皆以为真切。”故沈葆楨《例言》指出此书“意在射鹰,非同世之泛泛诗话”。全书二十四卷,首二卷专门搜集并评论了反英题材的诗作,主要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孙鼎臣等人的作品。林昌彝在品评中不时杂有对时局的看法,叙述间保存不少有关鸦片输入及禁烟的资料,颇可当作史诗和历史实录来读。除此之外,《诗话》还广泛地论述各种诗学问题,收录同时诗人的诗作。论诗立场本于所谓风雅正旨,认为“诗歌足以感激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事”。但林昌彝在事实上赋予“忠孝节烈”以反对外国侵略的新含义,有其积极意义。全书收录了四百餘位诗人的二千餘首诗篇,内中尤以同时师友之诗为多。林昌彝在清人诗话中特别推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的淹博和潘德輿《养一斋诗话》的正统精神,是因为这二者正与《射鹰楼诗话》本身广搜录和正“风化”的宗旨相吻合。此书林昌彝费时十餘年,编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有咸丰元年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张寅彭)

【海天琴思录】 诗话著作。清林昌彝撰。内容与《射鹰楼诗话》相同,不出辩正诗教得失,订定朋旧诗稿,采记风雅佚事等范围。正录八卷,略以前一项内容为主,续录亦八卷,则以后二项内容为主。林昌彝论诗较重诗的教化作用,但对诗的艺术规律,亦有所会心。《海天琴思录》调和诗教功能与诗艺规律(所谓“政事能兼文学者”),颇似潘德輿的《养一斋诗话》,故书中频频引用潘氏言论。但林昌彝对二者终不能做到完全协调。此书最值得称道者,似是反复言及的“诗者须有我在”的观点(本于清初吴乔)。如对明初诗人高启,颇加推许;针对明人批评元好问“不能学陶之平淡”,反诘以“陶作七言古诗未知能如遗山否”(卷四);比较韩愈《琴操》与斛律金《勅勒歌》,认为韩作“虽古,涉于摹拟,未若金出性情”(卷二),等等,所申皆为诗中有我之意。不过林昌彝所论,止于吴乔论点的重复和具体运用,未能在理论上作进一步发挥。而他对吴乔论诗标宗立派的做法却并不以为然(吴乔、冯班等人在清初标举晚唐诗)。与吴乔同道的赵执信,曾在《谈龙录》中提出“摹唐较

胜于摹宋”之说,受到林昌彝的批评:“学诗实不论汉、魏、六朝、唐、宋,皆可学,特词与意之别耳。何、李、王、李特词多意少,貌似神离,故目为优孟衣冠。近日学苏、黄而不能变换者,则苏、黄之优孟衣冠耳。”(卷一)同样,钱谦益的宗宋和沈德潜的宗唐也受到讥斥:“其所论,与作诗者如隔屋谈心,隔靴搔痒。”(卷五)方濬颐序谓林昌彝通乐善琴,本此以论诗,故书名曰“海天琴思录”;此书《弁言》,林氏本人亦以言琴、乐为雅事。但检索全书,并未见以乐论诗之特色。而《续录》卷七所录斌椿之纪游世界古诗十馀首,描写埃及火车、西洋白发女、人造喷泉、非洲黑人、亚丁火山等异域风物,表现了我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洋的那一代人的新奇心理,为此书平添了时代色彩。《续录》卷八所录林氏之论诗绝句一百零五首,专论本朝顺治至咸丰共一百零八位诗人,持论平实,亦值得一提。《正录》有同治三年(1864)刻本,《续录》有同治八年广州刻本。(张寅彭)

【白华山人诗说】 诗话著作。清厉志撰。厉志,字心甫,一字骇谷,号白华山人,定海(今属浙江)人。诸生。工书善画,诗学李太白,有《白华山人诗钞》。《白华山人诗说》二卷,主要从学诗角度表明诗学见解要不离“学古”一旨。如云:“凡人作诗须求与古会,勿急与今通。急与今通,必绝与古会,而今终亦不通。”他所谓“古”,指唐以前:“推思王及《古诗》第一,陶、阮、鲍、左次之,建安、六朝又次之,唯少陵能兼综其意与气,太白能兼综其情与韵。”所以他一再说,“今人就李、杜学,必不能便为李、杜”,“不必学诸公,学诸公所学可也。”皆要人取法乎古。但古今的含义又非截然不变,“此须活看,古之中亦有今在……如汉、魏以逮陈、隋,汉、魏、晋、宋是古,齐、梁、陈、隋是今。全唐之诗,初、盛是古,中、晚是今”。主张古体要学“古之古”,即汉、魏;近体要学“古之今”,即唐诗。他认为古诗之美,主要有四,即意、味、气、韵,而尤重视“气”之培蓄与运用。诗人首先要有一种“真气”、“灵气”。他不同意王士禛“唐诗主情,宋诗主气”的区分,认为“唐诗亦正自有气,宋诗但不及其内敛耳”。“气”亦有需要摒弃者,如“猛气”,厉志自述每以登山浩歌、大叫大哭之渲泻手段而使其平;气与意等美的因素要调度运用得好,诗便能去“猛戾之病”:“今人作诗,气在前,以意尾之;古人作诗,意在前,以气运之。气在前,必为气使;意在前,则气附意而生,自然无猛戾之病。”此外如“古气”、“气势”等,皆津津乐道之。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问花楼诗话】 诗话著作。清陆荃撰。陆荃,字芝香,吴江(今属江苏)人。此书三卷,成于道光二十

四年(1844),首卷评唐诗,次卷评宋、元、明诗,三卷评当代即清诗。多采辑他人之言以代己言,尤以“先广文”之教为据,故陈文述序谓此书有“三善”,以“守师说”为首善。评诗略以诗人身世、气节为尚,如以罗隐之忠义与杜荀鹤之“奴事朱温”作比,赞扬司空图之“澹蓄温雅”而不悦皮日休、陆龟蒙之“角险斗奇”;于北宋推重欧阳修,指“舍欧阳而崇苏、黄”为病,亦由慕“欧阳公文章政事,衣被天下”而致;于南宋推重陆游,采其师之言,更明言“翁非诗人”,其评诗重视“诗外功夫”如此。延至评明清诗人,拈出刘基之“功业文章”,亦属此意。此书又或有逞强失考之处,如谓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之“阳关”在辽西,“去长安一万里”;谓王建百首宫词杂入花蕊夫人等之作,皆不确。有《清诗话续编》本。

(张寅彭)

【名媛诗话】 诗话著作。清沈善宝撰。沈善宝(女,1808—?),字湘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系道光朝吏部郎中武凌云继室,有《鸿雪楼诗钞初集》。诗话稿本经历兵火,有阙失。据咸丰十一年(1861)沈氏后人重校本张美翊序,谓原稿本为八卷,现存辛酉重校铅印本与光绪寓言报馆铅印本均为八卷。文中有阙遗,末卷末则亦未完。惟北京图书馆道光二十六年鸿雪楼刻本为十二卷全本,盖八卷本所据稿经历兵火,有阙失。自南宋以来,各家诗话间载闺秀诗,然或偏于一隅,或搜采简略,备体而已。此书所辑,则以有清一代之闺阁诗人为对象,始清初顾和知,迄于道光间太清主人。沈善宝交游大率士门闺秀,全书致意于表彰节义贞孝,封建伦理气息甚浓。此种辑志,殊不及后来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之崇扬女豪杰。清中叶渐兴编纂闺秀诗话之风,至晚清而大昌。此书可谓承前启后。有咸丰十一年沈敏元重校排印本。

(张寅彭)

【云樵诗话】 诗话著作。清缪焕章撰。缪焕章(1811—1880后),字仲英,江苏江阴人。此书一名《云樵外史诗话》,二卷。卷一为查慎行各种生平资料的汇编,其卷首语云:“生平于国朝人最服膺查先生初白集,而集之佳处,《瓠北诗话》中尽之矣。今取行状、墓志、年谱,并择取他人论初白诗,汇成一卷。”所收除方苞撰写的墓志铭、沈廷芳撰写的行状及年谱外,尚有《清史稿·文苑传·查慎行》、郑方坤《敬业堂诗钞小传》、全祖望《墓表》等;“摘句”和“诸家评语”二项,篇幅反而不多,殊不类诗话体制。戊午年(1918)刊本抽去年谱,不如原刊本完备。卷二记其师徐松、李兆洛等前辈的涉诗行状甚详,并录载同时林则徐、程恩泽、祁雋藻等多人的诗作诗事。有1918年艺风堂刊本。

(张寅彭)

【云樵外史诗话】 参见“云樵诗话”。

【铎窗琐话】 诗话著作。清于源撰。于源,字辛伯,号秋沄,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贡生。有《一粟庐诗稿》。《铎窗诗话》以记事录诗为主,取材淹博,于遗闻轶事,尤多所表彰,故颇具资料价值。有道光刊本。(张寅彭)

【柳隐丛谭】 诗话著作。清于源撰。据咸丰二年(1852)杨岷序,作者曾自谓,此系《铎窗琐话》之续编。所记以道光间人与事为主,颇可资谈助。有《一粟庐合集》本。(张寅彭)

【退庵诗话】 诗话著作。清何日愈撰。何日愈,字德持,号云咳,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官岳池(四川)知县。有《馥甘轩诗钞》。作者纂辑《退庵诗话》自少而壮,及老始成。全书十二卷,卷一以理论为主,卷二以下录诗评诗。持论多折衷各家之言,平允有馀而稍欠见识。中年宦蜀,历时四十年,晚年复返粤,故书中述蜀人诗及粤中诗派尤详。有光绪九年(1883)刻本。(张寅彭)

【艺概】 艺术评论著作。清刘熙载撰。刘熙载(1813—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上,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一生以治经为主,旁通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等,尤精于音韵。主要著述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等。《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六卷,收在《古桐书屋六种》中。这是他历年论艺的汇抄,据其自叙,知编定于晚年(同治十二年,1873)。刘熙载本于经学家的立场,论艺通于道:“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而重道者谈艺,又每不喜琐细。此书亦然,其自叙云:“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馀,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如《诗概》部分,古典诗学的四大论题——作家作品评论、体裁特征、作法规则和总旨原则,书中一应俱全,且排列有序。每一论题也都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如作家作品评论部分上起《诗经》,下迄两宋,历代重要作家包举无遗。又如诗体主要论五言和七言、古体和律体;创作主要论“人品”和“格式”两个方面。而“格式”又集中于音律和章句之法,“人品”则强调“正其性情”,“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这一诗教核心,从而确立了基本立场。这种逐层递进的勾勒,使全书既要言不烦而又面目完整。刘熙载的评论识见精辟,往往能够贯通众说,兼取众长,表现出古典诗学后期圆融周全的成熟性,这也促

成了“概”之特征的实现,加大了全书的容量。如“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兴”,寥寥数语,几乎道尽了古典诗体的主要美学性质。书中对作家的评析,也是中肯繁而少偏颇。如论杜甫曰:“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以“但见性情”、“不见文字”概括杜诗,似不多见。但这样评杜,正可以摆脱乾、嘉以来只讲杜“法”的习气。又曰:“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这样讲杜“法”,高屋建瓴,便没有“枝枝节节”的毛病。又论韩愈曰:“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以丑为美”一词的内涵远比“奇”、“怪”等词丰富,这是对韩诗美学特征的更为规范的概括,不仅超越古人,也是今人犹待发掘论证的命题。此外,论李商隐“绚中有素”,论苏东坡“旷多于豪”,论王安石“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论西崑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论江西派“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等等,精妙简约。论诗如此,论文、赋、词曲、书法、经义等亦大致如此。前人谓其“涉览既多,会心特远”,确非虚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张寅彭)

【读吴诗随笔】 笔记著作。清沈丙莹撰。沈丙莹字菁士,归安(今浙江湖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安顺知府,颇著政声。有《春星草堂集》。咸丰十年(1860)摄事贵阳,公馀披览吴伟业诗集,随手加墨,由幕僚录成《读吴诗随笔》一书。二卷。所批重在吴诗之感时抚事方面,尤能会心于梅村歌行慷慨淋漓与凄凉悲怆之特色。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张寅彭)

【通斋诗话】 诗话著作。清蒋超伯撰。蒋超伯,字叔起,江苏江都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由主事历官广东候补道,有《通斋集》。《通斋诗话》系其晚年所著《盘谷蘅苏》七种之一,生前未及刊印。蒋超伯博贯群籍,涉猎甚广,论诗以考订名物、罗致异闻为主。考订如李贺诗中之“篴篴”,皮、陆诗中之“青橘子”(果名),黄庭坚、陆游等人诗中之“廷珪墨”、“龟冠”等,皆引征诸书,证之凿凿。辑异如记李德裕因梦作《舌箴序》,记宋人煎茶临时碾试之习等,不一而足。书中虽亦间有艺术之论,如谓薛逢七律有华贵之气,谓陆龟蒙“澹冶之间,仍寓冲融之态”,风致优于皮日休之一味幽奇,诸语不为未见,然终无补于全书考订繁琐,辑异芜杂之病。至言近代中国受洋教侵扰之祸患,乃由唐太宗纳景教造端,尤为愤

激过甚之辞。有1915年南昌宜秋馆铅印本。

(张寅彭)

【**陔南山馆诗话**】诗话著作。清魏秀仁撰。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号眠鹤山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此书十卷,引《新唐书·杜甫传》赞杜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之言,以表明全书采诗旨在叙史之意。书中即详采当代愤时感事之作。每则必诠释与诗相关之时事。尤详于英人贩烟和清廷禁烟一题,为中英鸦片战争提供了一部诗史。由于鸦片战争主要沿东南海岸地区进行,故此书又名“海氛诗话”,以切于所记之事。全书详于史实之记叙,而于诗艺之分析则嫌不足。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藏稿本、福建图书馆藏抄本(不分卷)。(张寅彭)

【**海氛诗话**】参见“陔南山馆诗话”。

【**勿待轩诗话存稿**】诗话著作。清马先登撰。马先登,字伯岸,大荔(今属陕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历官开封等地。有《勿待轩文集》。《勿待轩诗话存稿》二卷。马先登以陕人而仕于中州,辗转仕旅,颇留意于路崖店壁之题诗,往往移辑于集中。说诗略主自咏性情,而不尽关涉学问,亦不必动关讽劝,故于袁枚为近。书中录《随园诗话》语句甚多。有光绪五年(1879)刊本。(张寅彭)

【**筠石山房诗话钞**】诗话汇编。清杨霭编。杨霭,字慰农,铁岭(今属辽宁)人。道光进士。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布政使、顺天府尹。咸丰四年(1854)授湖北巡抚,旋擢湖广总督。次年因太平军攻下武昌而被革职。性喜泛览群书,且勤于摘抄,日久积成《愈愚杂钞》、《续录》各十册。又别录其中涉诗之语,成《筠石山房诗话钞》五册。此书录自晋宋以下一百六十余种笔记、诗话,以足资触发性灵者为辑录宗旨,故最喜袁枚之语,录达六十余条之多。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粤东粮道署校刊本。(张寅彭)

【**小沧浪诗话**】诗话汇编。清张承燮辑。张承燮字师筠,含山(今属安徽)人。约生活于道光、咸丰时。书名取自其辑书所居之吴下小沧浪馆,亦寓其论诗推崇严羽之意。全书共四卷,分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以上卷一)、乐府、咏物、论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以上卷三)、指疵、发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将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袁枚《随园诗话》、洪亮吉《北江诗话》计四十九种诗话的有关内容,分目辑录。与《诗人玉屑》前十一卷的体制相似。不过《小沧浪诗话》不标佳句,不考本事,篇幅虽不及《诗人玉屑》,但内容却也因此比《诗人玉屑》精。书中“咏物”实为题材之论;“论古”专采对历朝诗作的

风格、流变、艺术得失等方面的评论之语;“指疵”指出作诗诸忌,如《沧浪诗话》提出的除“五俗”等;“发微”集中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等人对诗歌艺术问题的论述。全书表现出与司空图、严羽一派相近的诗学趣味。有咸丰九年(1859)春古汲郡贺氏刻本。

(张寅彭)

【**余旬甫诗话**】诗话著作。清余宣撰。余宣,字旬甫,嘉鱼(今属湖北)人。夙有志于经世而不得大用。有《层高堂六大家诗选》行世。所选六家为曹植、阮籍、李白、杜甫、韩愈、李梦阳,独不取宋诗。所作诗稿千余首,未刊行。《余旬甫诗话》二卷,以摘录、评鹭同时人诗为主,间有论古之语,识颇通达。有南京图书馆藏咸丰八年(1858)风雨堂刻本。

(张寅彭)

【**菱溪诗话**】诗话著作。清余宣撰。一卷。录同邑师友之诗作,或全首,或数联,悉加评论。因其地有菱溪,即以名篇。有同治三年(1864)刊本。

(张寅彭)

【**挹翠楼诗话**】诗话著作。清潘清撰。潘清,字丽亭,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此书四卷,论古道今而尤详于当朝诗人。大抵推重袁枚,首肯袁氏之性灵说,而不取沈德潜之格调说,批评沈氏“多在门面上讲究”。此为本书之基本立场,如以“多取格调,而遗性灵”指斥王昶《湖海诗传》选诗不当。但对性灵诗人易犯的弊病,潘氏亦有所认识,如称李调元“局于边幅”,赵翼“气不醇厚”,“随园亦坐此病”等。主张以功夫济性情,所推许的舒位等人,多为乾、嘉时长于抒性写情而又深于诗功者。故此书于欣赏清诗之艺术性颇有助益。有同治二年(1863)刻本。

(张寅彭)

【**采辑历朝诗话**】诗话汇编。清胡凤丹辑。胡凤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历官湖北候补道署,督粮道。有《退补斋诗存》。《采辑历朝诗话》一卷,附于胡氏所辑《六朝四家全集》之后,系辑历代对四家(陶潜、谢朓、鲍照、庾信)的评语。采书范围不广,仅从钟嵘《诗品》和宋、元、明、清的二十余种诗话著作中辑录有关四家的评语,陶潜得三十六则,谢朓得十二则,鲍照得六则,庾信得七则。有同治年间退补斋刻本。

(张寅彭)

【**小匏庵诗话**】诗话著作。清吴仰贤撰。吴仰贤,字牧驹,浙江嘉兴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改庶吉士,历官云南迤东道。其诗学李商隐,有《小匏庵诗集》。《小匏庵诗话》十卷。《诗集》与《诗话》皆由俞樾作序。俞序评此书云:“自唐、宋以来,至本朝咸、同间之诗,皆有所采录,辨其源流,论其工拙,卓然有自得之见,不苟为去取。诗中事实亦间有考订,

视《随园诗话》多或不及，精则过之矣。”数语大体核实。此书之时限，虽起自唐、宋，却以本朝为主，尤详于乾隆以后。大家、名家如沈德潜、袁枚、舒位、钱载、吴嵩梁、张维屏、曾国藩等，及至中小诗人，采集甚富。评诗论人，一般先参用各家之说，再予以取舍，最终形成自家之见。如论钱载，既引袁枚诸人之非议语，又引洪亮吉诸人之赞许语，然后表明自己取洪舍袁之立场，再借张维屏诸人之说，具体分析钱诗之特长，最后下一断语云：“夫随园诗名满天下，而歿后排击踵起；公诗不谐于时，久而论定，远近无间言。然则士贵自立，毋徒徇一时之好尚也。”立论之周详，于此可见一斑。有光绪间刻本。（张寅彭）

【声调四谱图说】诗谱著作。清董文焕编撰。董文焕（1833—1877），原名文焕，字研樵（一作砚樵），山西洪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历官甘肃甘凉道，有《岷峨山房集》，多感时之作。古诗声调之秘，始发于赵执信《声调谱》，但赵谱过于简略，又多模糊之处，后人遂时有补正之举。《声调四谱图说》十二卷。所谓“图说”者，即将赵谱标于诗例各字旁表明平仄的○●符号，按四、五、七言，古、近体，正、拗式，平起、仄起等分列出图式，是为“图”；再各附以文字说明，以尽图所难明者，是为“说”。图说之后，详举诗例。又赵谱所举诗例，多非完璧，与其说不能尽合，或启人以疑。董氏则于各体分别从名家选本取例，如五古取于高棅《唐诗品汇》，七古取于王士禛《古诗选》，近体取于沈德潜《唐诗别裁》，以证其所示规律合乎常体。又诸体中七言古平仄递转，拗救互用，神明变化，最难分明，求诸诗例，往往百无一合，故赵谱于此论虽详而不能立为定法。董氏仍依赵谱下三字为主之说，复于每句二、四字下，逐一注明粘对、拗救、平仄等，使读者按图求之，知无定法之中，仍有一定之法，法于此者诗于彼，诗于前者法于后，交互错综，贯串会通，若合符节。此书之图谱原得自王轩（严伟《清诗话序》谓王轩有《声调四谱》，似即指此），董文焕复推广增益而成《图说》。有同治刻本。（张寅彭）

【停云阁诗话】诗话著作。清李家瑞撰。李家瑞，字香苹，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此书八卷，以大半篇幅辑录乾、嘉、道、咸时人的诗作诗事。论诗主“真”恶“率”，如曰：“真率是诗之一体，偶尔有之无妨；篇篇如此，则是学宋者日日乱头粗服，学唐者日日峨冠博带矣。况真率二字，由意境生，有心如此，便是不真，但有率耳。”此种立场，大抵与袁枚同道。又如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曰：“此等诗，字字皆鸾鹤缥缈之音，或以为刺襄，或以为好贤，均勿论也。诗之一道，有长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正言之不足，故讽谕之，方合比兴之义。必篇篇‘老夫清晨梳白头，元都道士来相访’、‘孟生江海士，古儿又古心’老老实实说起，又不尽合古人之旨矣。”此书所长及所失略与《随园诗话》相仿，惟分量及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有咸丰五年（1855）刻本。

（张寅彭）

【樵隐诗话】诗话著作。清林钧撰。林钧，字象鼎，福建人。去官后隐居于湖南岳麓山，号岳麓樵隐。《樵隐诗话》十三卷，多录同时人之诗作，持论略主性灵，往往将王士禛与袁枚对举，不甚喜袁枚之诗而服膺其论诗之言，取王士禛之诗而不服其论，显示出作者的识见。书中记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况甚详，则与诗多无关涉。有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张寅彭）

【竹溪诗话】诗话著作。清李少白撰。李少白，字云樵，号莲初，又号竹溪，浙江宁海人。此书二卷，论诗喜谈神韵，作诗亦以能得神韵为佳。有云：“诗有绘色绘声之妙，即以写景论，往往有景不甚佳，一人诗人之口，便有深致。”盖因诗人之主体机制与常人有别：“昔人有句云：坐久但于诗有味，此盖于静中涵养，使之有天趣而无滞机，怀深致而泯俗习。由是诗心清乎中，诗神妙于外，人为诗人，诗为诗人之诗矣。”这种静中涵养工夫，系从诗人与现实生活之间距得之：“人心纷躁，山林如市井；人心清静，市井如山林。然读书人亦不可无山水以发之。天下之山水，非文人无以穷其奥，阐其秘；天下之文人，非山水无以扩其胸，助其神。人自五岳归来，气象自不侔也。若太史公、李青莲文有奇气，人谓其多由山水得来。”诗人心境之虚静特征之外，神韵论者一般又喜言诗无迹可求之形式特征。此书亦然，如引史震林语曰：“诗贵无相，情中景，景无相也；景中情，情无相也。”“无相”，即无迹之翻新语。书中评诗，于明人推重二李（李梦阳、李攀龙），于清人推重六家（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宋琬、赵执信、查初白），虽置王士禛为六家之冠，然取誉尚宽，故论评并无一般神韵论者的局狭之病。有光绪三年（1877）刻本。（张寅彭）

【观我生斋诗话】诗话著作。清钟秀撰。钟秀，字官城，江西赣县人，有《陶靖节纪事诗品》四卷，品陶甚精。《观我生斋诗话》系其全面论诗之著，分《诗原》、《诗体》、《诗派》、《诗声》四卷。《诗原》卷列志、品、理、情、境、气、识、趣、神、学十目，是为总论。《诗体》卷列四言古、琴操、乐府、歌行、古风、律诗、绝句、排律、杂体诸目，是为辨体。《诗派》卷列上古、《三百篇》、《离骚》、周末逸诗及汉魏至明各朝诗目，是为评鹭。《诗声》卷列四声三十韵、五音三十六母、反切、双声叠韵、古体诗平仄、近体诗平仄、作诗用韵、诗中

声病诸目,是为音调。全书持论大抵以严羽之说为基础,复采古今各家精义综合之,于综合中见创意。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数语,评论家历来聚讼不已,目为玄论。钟秀先以“味外之味,只在味中”,“风流亦只在字中”实之,一面又反对“羚羊是羚羊,水是水,花是花”的滞凝之见,两相补济。此种立场,自然使其首肯言趣不废理、言悟不废学的严羽诗学,而不取以偏致擅胜的王士禛神韵说。有光绪四年(1878)刊本。(张寅彭)

【**岷佣说诗**】诗话著作。清施补华撰。施补华(1836—1880),原名份,字均父(一作均甫),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官山东补用道。此书系其为张勤果慕僚、戍守新疆时口授,由同僚钱渠记录整理而成。原题“砚佣说诗”,付梓过程中讹“砚”为“岷”,作者笑任之,遂沿用至今。丁福保收入《清诗话》时,阙作者名,后由郭绍虞据《两浙輶轩续录·施补华小传》补。又《两浙輶轩续录》著录。《岷佣说诗》为二卷,钱渠《书岷佣说诗后》谓原本为二〇九条,今《清诗话》本则为一卷,二一五条。此书说诗艺颇精微,大抵以五言为主而推及其他各体。如首则即论五律之为各体之基础:“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五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又论五古云:“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质浑厚为正宗。”故篇中议论五律、五古特征,评鹭五言名家名作,颇体贴入微。如论王、孟之别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若孟公则真山泽之癯矣。”又论苏轼拟陶之不逮,云:“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漠处不及也;间用驰骤,益不相肖”;“陶诗多微至语,东坡学陶,多超脱语,天分不同也。”全篇均以古人为论评对象,仅有一则叙及王士禛:“渔洋五古,实从大历诸子入,其推崇盛唐,张大门户耳。故词气清腴,而不甚朴厚。”其识多类此。有《清诗话》本。(张寅彭)

【**海山诗屋诗话**】诗话著作。清李文泰撰。李文泰,字小岩,广东吴川人。同治九年(1870)进士。工诗,且喜读同时人诗,有惬意者即录之,编为卷帙,遂成此书。全书十卷,约编成于光绪初年,所录、评者皆为本朝人诗。有粤东羊城森宝阁活字刊本。

(张寅彭)

【**谈艺珠丛**】诗话丛书。清王启原辑。王启原,字君豫,沅江(今湖南沅江)人。此书编成于光绪十一年(1885),收自梁钟嵘《诗品》至清黄景仁《两当轩诗评》共二十四人、二十七种论诗之著。其自序述历代诗学著作之流别云:“盖自梁刘勰有《明诗》之篇,

钟嵘品诗遂详派别;唐人好言类格,而表圣之品,独能入微;宋之诗涉议宗,白石、沧浪知求兴象;明则自麓堂而后,皆知以抉别法微为归。故梁知其宗,唐别其旨,宋或微中,而明其深造也。”又揭橥编辑宗旨云:“五季以上之为书,或不尽精诣,而曼衍者鲜矣,以故搜摭较广;而宋以降特严,其指归之既殊,则亦或著称于时,而今搜采有不之及者,虽使世訾其阙可也。”则知是书非为率意漫成者。有光绪十一年(1885)长沙玉尺山房刊本。(张寅彭)

【**纪河间诗话**】诗话汇编。清纪昀原撰,邵承照辑。邵承照,大兴(今属北京)人。据其自序,此书约辑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三卷。卷一卷二为内篇,取《纪文达公遗集》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论诗之语,按总论、六朝、唐、五代、宋、金、元、明及国朝(清)之序编纂之。卷三为外篇,取纪昀笔记小说中之涉诗语,按寓言、纪事、纪物、题壁、题画、题扇、纪梦、纪仙、纪鬼、纪狐、纪怪、纪乩等目,分类编纂之。此书虽篇幅无多,不足以当纪昀诗论之全,与张宗柝辑王士禛论诗之语而成之《带经堂诗话》不可同日而语,然辑者选择尚精,如引纪昀之语云:“余所见诗不下数千家,不过拟议、变化两途。然必心灵自运,而后能不立一法,不离一法。”颇可概括纪昀论诗、作诗之大旨。有光绪二十七年安乐延年室刻本。

(张寅彭)

【**越縕堂诗话**】诗话著作。清李慈铭撰,近人蒋瑞藻编。李慈铭(1829—1894),字悉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蒋瑞藻,字孟洁,浙江诸暨人。李慈铭以《越縕堂日记》为最著。《越縕堂诗话》三卷,系蒋瑞藻辑其《日记》中论诗之语而成,然不全,尚遗同治二年(1863)以前、光绪十五年(1889)以后十数言之言论,未及辑入。李慈铭工诗,卓然名家于清季。其自述学诗过程,谓从明诗入手,至得诗法之正。故书中屡赞朱彝尊之《明诗综》,“精心贯择,最称完美”(见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八日日记)。自评所作,各体以七言为第一,亦乐于模拟李梦阳、何景明(见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十九日日记),又孜孜于删选公安、竟陵诗之佳者,其雅好明诗如此。李慈铭性好雌黄,每读一书,必评鹭之,不轻许可。然褒贬有据,务得其当,后进每不嫌其苛而叹其精。如评一代文学,必诗文分观:“予谓元诗优于南宋,元文则远过于南宋;而明诗又胜于元,明文则远不及元。”(见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日记)评诗则各体分观,各家分观。即使对于所欣赏者,亦必指其疵。故其论诗大旨,虽宗唐、明而黜宋、元,殊少一般非此即彼、以偏概全之弊。评诗所据,大致以标举

生平、抒写性情为原则,体色风格则不拘一端。有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四年(1925)初版、十五年重版本。

(张寅彭)

【宋诗纪事补遗】 诗歌总集与诗话汇编。清陆心源辑。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官广东南韶兵备道,福建总办税厘通商善后诸局并海防事宜,署粮盐道。他性好聚书,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又精于校勘,生平著述甚富,其《潜园总集》多达九百四十余卷。《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系补厉鹗《宋诗纪事》之疏漏而作,补辑得宋代诗人三千余家,宋诗八千余首;对厉书重出、失考等误,亦有所订正。有光绪十九年(1893)家刻本。

(张寅彭)

【东人诗话】 诗话著作。清王韬撰。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仲弢,号弢园、天南逸叟,五十岁后又号弢园老民。江苏苏州人。曾屡赴科试不第,遂弃而入西人所设之上海墨海书馆,主笔政长达十三年。后因遭清廷通缉而逃赴香港。同治中,随英人理雅各至英国译书,乘便游历法、俄诸国,光绪初年又游日本。晚年返国,定居于上海,执掌格致书院以终。有《弢园丛书》。王韬为清末有识见之士,其政论文章大多鼓吹洋务、变法;又致力于治经,亦有所得。其文学观贵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东人诗话》二卷,亦以表现自我为其基本之主张,要求今之作“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然又要求诗人立意“关乎世教”,“归之于正”。他所谓“正”,主要指杜诗中“忧国忧民,一饭不忘君之心”。其诗见大抵调停于上述两端之间。有《弢园丛书》本。

(张寅彭)

【养自然斋诗话】 诗话著作。清钟骏声辑。钟骏声,字亦溪,号雨辰,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咸丰十年(1860)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官侍读学士。有《养自然斋诗钞》。《养自然斋诗话》十卷,旨在网罗散佚,挽救乡邦文献。开卷即引冯班、沈德潜之语申明此旨:“冯定远云:士生斯世,穷愁潦倒。百岁以往,乃始思其人而不可得其言。可谓沉痛。沈文忠公云:人之无名位者,一生无他嗜好,惟孳孳矻矻于五字、七字之中,而忽焉徂谢。苟无人表彰之,人与诗均归无何有之乡矣。此则余诗话之所本也。”据此,则凡名公巨卿或有专集传世者不录,意在表微拾坠。如卷一所录元、明人诗,皆顾嗣立《元诗选》、朱彝尊《明诗综》所未收者;卷二以下录本朝人诗,亦皆以未刻稿为主。诸卷略以地域分类:卷二、三、四专录杭人诗,卷五、六扩而录浙人诗,卷七、八、九录各省人诗,卷一〇附录闺秀诗。所收浙人诗,几全为陶

元藻《全浙诗话》所未收,殊有补辑之功。辑录资料之余,亦有评识语,略主诗味、神韵之说,然并不限于一家。有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张寅彭)

【海粟诗话】 诗话著作。清邓枝麟撰。邓枝麟,字翰伯,号兰坡,湖南人。“海粟”系其家世居之别墅名。此书二卷,上卷辨古,以往代之诗为对象;下卷搜今,则多列家族中之能诗者;又曾访粤,故颇收粤人诗;卷末又采录、评论同时人张日监诗甚详。张日监字敬之,无锡人,因心折于邓氏而出资刊印此书,故书中亦间附其识语。有清巾箱本。

(张寅彭)

【诗缘樵说拾遗】 诗话著作。清王增祺撰。王增祺,号聊园老樵,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此书六卷,续集六卷,多记其与诗朋吟友相过从之事,虽不免芜杂,然颇见性情。细按之,庶几可以勾勒出作者家居闲适之情状。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都聊园刻本。

(张寅彭)

【乡诗摭谈】 诗话汇编。清杨希闵辑。杨希闵,字卧云,号铁傭,新城(今江西黎川)人。晚年掌教海东书院。咸丰六年(1856)避乱于福建邵武,日与友人谈诗,探讨江西诗派之源流本枝,因草成是书。次年进而论定次第,分正集十卷、续集十卷。“乡诗摭谈”者,以十之九系采摭所得,又以江西人谈江西诗,故名。是书颇不满于吕本中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宗主之说,又嫌其所列之人有非江西籍者,遂沿用方回一祖三宗之例,而改以陶潜为初祖,以欧阳修、黄庭坚、虞集为三宗(欧阳为“复古大宗”,黄为“变化得正之大宗”,虞为“不失占法之大宗”)。三宗之下,又各有羽翼、及门、后起、附见等名目。如欧阳修之“羽翼”有王安石、曾巩、刘敞、刘攽四人;黄庭坚之“及门”有三洪(朋、炎、刍)、二谢(逸、邁),“后起”有姜夔等人;虞集之“羽翼”有范梈、揭傒斯等人,“附见”有傅若金等人。由此可知此书旨在为历代之江西籍诗人排定座次,即“吕舍人明一时接受之源委”,“此图则江西千古诗人之定论”。全书体例,卷首为“商论江西诗派图序”,商略吕图,列出新图;正集十卷,则将图中所列之人按朝代分卷,按人立目,各采嘉言懿行附之,明、清人不入表,而于八、九、十卷中论列其“门户正者”以为“别子之宗”;续集十卷,进一步补列表外之历朝江西诗人,得三百余人。然是书体例亦有可议处,如载刘敞等人之文章、四六摺稿等,颇乖谈诗之旨。有宣统二年(1910)新建夏氏刊本。

(张寅彭)

【苏亭诗话】 诗评著作。清张道撰。张道,原名炳杰,字伯几,又字少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有《渔浦草堂诗集》。张道潜心于读书著述,尝自言读书二万三千余卷,著书六十余卷。《苏亭诗

话》六卷,原刊于同治五年(1866),系以苏轼为单一对象的研究专著。全书列论述、考摘、考韵、故事、驳辨、补注等六类,分述苏诗特色、苏轼本事及后世苏学家之得失,钩稽群书,考辨诸说,用力甚勤。虽创见无多,然持论必以事实材料为据。如言苏诗有自袭句及语意相似句,即一一予以罗列,达数十条之多,颇可资参考。有光绪九年(1893)重刻本。

(张寅彭)

【全浙诗话刊误】诗话著作。清张道撰。此书一卷,系为正陶元藻《全浙诗话》之疏误而作。作者咸丰三年自序指出陶书“搜罗颇称繁富,但雠校未精。其中诗人部居,或前后叠见,或父子失叙,身丁晚季而闯厕国初,迹入兴朝而仍殿胜代,以及姓名不备、爵里缺如,诚作者之粗疏,亦传书之缺憾也”。全书刊误共二十六人,所刊之误,一为重出,如宋人卢襄卷一一和卷二〇重出;一为失次,如将北宋人舒亶列入南宋卷中,等等。有正觉楼丛刻本。(张寅彭)

【泓巢诗话】诗话著作。清张道撰。二卷,六十一则,每则皆标有小目。谈旨颇泛,有掌故、名物、风俗、作法、考辨、评鹭、辑佚等,不一而足。张道性耽于艺,故所谈往往入微,如评王士禛,谓其悼亡诗自肺腑流出者绝少。有渔浦草堂遗稿本。(张寅彭)

【桐荫清话】诗话著作。清倪鸿撰。倪鸿,字延年,号耘劬,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官福建候補知县。有《退遂斋诗钞》。倪鸿学诗于张维屏,功力不深而自饶情韵。《桐荫清话》八卷,系其于咸丰八年(1858)夏月避乱山林时,记与朋旧之闲话而成,内容颇杂,并非全关诗艺。有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张寅彭)

【诗话新编】诗话汇编。清倪鸿辑。此书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专辑各家诗话中有关应制应试之诗、题、事。公馀之暇,辄为手录,积至成书,共四卷。倪鸿视试律为有清一代之最,而辑为话者,顾无其人,故称其书为“新编”。有光绪十四年(1888)东塾草堂家刻本。

(张寅彭)

【味疏斋诗话】诗话著作。清余云焕撰。余云焕,字凤笙,号亢翁,湖南平江人。曾官四川知县,有《白雨湖庄诗钞》。据《味疏斋诗话》跋语称,此书系其积六十年学诗之所得而成。稿有八卷,先期刊行四卷,余四卷则未见,似终未及刊出。余云焕于诗确的心得,论古道今,略主沉雄峻刻,与同光诗派之旨差近。评诗颇具胆识,能不为时彦习见所局囿,如谓杜甫《登岳阳楼》诗“乾坤日夜浮”句似观海,与题大小不称等。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思南府署刻本。

(张寅彭)

【缉雅堂诗话】诗话汇编。清潘衍桐辑。潘衍

桐,字萃庭,号峰琴,一作绎序,广东南海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读学士。乾隆末年,阮元督学两浙,曾编纂《两浙輶轩录》五十卷。潘衍桐于同、光间亦视学两浙,依准阮书,采撷众说,又续成五十四卷、补遗六卷。复将各卷中“作者小传之后诸家记叙,有所折衷”,抽出别刊,遂成《缉雅堂诗话》二卷。所辑各条,由门生高保康按原书卷次编排先后。此书搜采清代两浙地区的文人佚事,兼评其著述得失。人各一条,略于乾、嘉以前而详于道、咸以后,计收二百二十六人。所录不限于诗人,如著录施国祁之《金史详校》、严元照之《尔雅匡名》、沈垌之《元史西北地蠡测》等。评诗持风雅正统立场,然亦不废才情。如“余最爱松如(夏之盛)咏《南宋象牙牌》一绝云:‘众柳丝丝已化烟,芳情凄断画阑边。玉楼春好无人唱,荔子红香六百年。’可谓凄艳”;“衡赞(陈籥南)佳句如‘一笑花片落,几回春寐慵。鱼急知潮长,萤多替月凉’,言情体物,都有才韵”等语,略可鉴其诗见。有光绪十七年(1891)杭州刻本。

(张寅彭)

【诗法萃编】诗话丛书。清许印芳辑。许印芳,字麟篆,石屏(今属云南)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永善教谕。有《五塘诗草》等著。《诗法萃编》分十五卷,前三卷收录《诗大序》、朱熹《诗传序》以及“于诗有关会”的汉魏六朝文论二十六篇(其中《文心雕龙》十九篇);卷四开始收录钟嵘《诗品》以下唐、宋、明、清论诗之著十七部,外加白居易《与元九书》;又在卷六(上)附录“唐人杂说”,卷八附录“宋人杂说”,卷九(上)附录“明人杂说”。许印芳论诗宗唐,所谓“唐人之诗变而日近乎古,故可法;宋人之诗变而日远乎古,故可借以参变,而不可奉为专师;明七子守法不变,既不足法,且当引为覆车之戒,此诗法大关键”(自序),故是书所收,于宋人取严羽《沧浪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等,于清人取王士禛、赵执信、沈德潜等,皆为主唐音者,辑旨甚明。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朴学斋刊本。

(张寅彭)

【煮药漫钞】诗话著作。清叶炜撰。叶炜字松石,晚号梦鸥逸史,嘉兴(今属浙江)人。同治十三年(1874)受日本文部省之聘,东渡为东京之汉学教师。滞日数年,归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再度东游,寻以病归。在彼邦以诗会友,颇著声誉。“煮药”者,谓是书成于病中药炉馀候之刻;初稿时名“闲钞”,定稿方易为“漫钞”。全书二卷,所记之事咸有意趣,所录之诗多含情韵。论诗并以真与趣为基。故不甚喜元、白《长庆集》滔滔如话之轻俗习气。尝谓:“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学随年进,要不可以无真趣,则诗自可观。”其自录之诗,东

渡前后,风格为之一变。此书有日人小野愿之序,书中并记有彼邦人士与叶氏唱和事。有光绪十七年(1891)金陵刊本。(张寅彭)

【三山诗话】诗话著作。清徐贤杰撰。徐贤杰,原名贤尊,字震卿。安徽潜山人。能诗,有《三山吟草》。《三山诗话》三卷,前二卷录诗记事,以唐、宋大家及本朝人为对象,间或言及理论,略主神韵天籁。作者生当同、光之际,时值外患频仍,故此书卷三多涉国事,如记圆明园旧观及夷兵毁园经过甚详。有清刻本。(张寅彭)

【声调三谱】诗话丛书。清王祖源辑。此书收王士禛《然灯记闻》、《律诗定体》(以上卷一)、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卷二)、赵执信《声调谱》(卷三)、《谈龙录》(卷四)等四种诗话,其中《小石帆亭著录》收录前五卷,遗卷六《渔洋先生书目》;《声调谱》前有赵执信门生仲是保序,略述清初学者研究古诗声调问题的渊源授受关系,可备一说。又《然灯记闻》、《谈龙录》并非声调、诗谱性质的著作,而全书冠以“声调三谱”之名,殊为不伦,或指赵执信《声调谱》之前、后、续三谱。有光绪天壤阁刊本。(张寅彭)

【可园诗话】诗话著作。清陈作霖撰。陈作霖,字雨生,号伯雨,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就教职谕。晚年自名所居曰“可园”,学者称可园先生。有《可园集》等。陈作霖有诗名,为同、光时“江宁七子”之一。《可园诗话》系其晚年之作,凡八卷。作者七旬后目已失明,犹口授不辍,继而目光渐复,乃自书以克其成,故署名“重光毫道人著”。《诗话》以录诗、纪事为主,时限以道、咸、同、光为断。所采多系平素知交遥相应和者,详于闾里潜修之士而略于名流。内容则不择巨细,或民生国计之变故,或离群索居之感喟,略寓采诗观风之意。有民国间铅印本。(张寅彭)

【梦痕馆诗话】诗话著作。清胡薇元撰。胡薇元字孝博,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曾官四川,为知县。清亡,以“孤臣”自居,“名其馆曰梦痕,追维愔愔之辞也”(陈九钺《〈梦痕馆诗话〉序》)。此书四卷,成于民国四年(1915),内容以记事、录诗和论评并重,卷次以时代先后为序:卷一为汉魏以前,卷二为三唐,卷三为宋、明,卷四为前清。持论颇为正统,“于汉魏不取郊祀取饶歌,为讽议不为颂祷也;于六朝不取绮靡,不欲近藻丽也”;“五代、宋诗,择其尤雅,不以偏好为恣也;元、明诗存者寥寥,合于正始乃列也;清诗人佳者多难具列,列其有合于二雅者”(陈九钺序)。所取皆以合乎风雅为旨。胡氏身经旧朝复亡之痛,故评诗颇分雅、郑,以与世之治乱隐相联系,如于明诗人重七子而轻三袁,于清

诗人扬王士禛而黜袁枚,均系此意。然论颇腐旧,全无创意特见。有《玉津阁丛书》甲集本。(张寅彭)

【明诗纪事】诗歌总集与诗话汇编。清陈田编撰。陈田,字松山,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年(188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给事中,有《滇游》、《泝沅》、《悲歌》、《津门》诸集。抚时感事,颇极慷慨激昂之致。《明诗纪事》仿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之例,编辑有明一代之诗,有事者则附辑以诗话。全书八集一百八十七卷,录诗人近四千家,远超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的篇幅。又广为甄录无事可纪之作,故录诗比重远远大于辑事。陈田尊明初而薄前后七子,认为明初不仅诗人极一时之盛,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温柔敦厚,诗教固如是也”(《自序》)。又十分重视搜辑晚明诗人诗作:“昔渔洋与竹垞论选明诗,谓不宜略远详近。以今日而溯朱明,年将三百,亦云远矣。余搜采明末诸家,补《诗综》之缺漏于斯集,尤亟致意,然未敢言备也。”(同上)这种看法影响到各集的收辑分量,形成头尾详于中间的现象,即收辑明初与公安、竟陵等晚明诗派的卷帙要详于中叶的前后七子。此书原计划编十集,末两集二十卷未能刊出,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有光绪间贵阳陈氏听诗斋刻《陈氏丛书》本。

(张寅彭)

【筱园诗话】诗话著作。清朱庭珍撰。朱庭珍(1841—1903),字舜臣,号筱园,石屏(今属云南)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应礼部试不第,终身不仕。曾参与续修《云南志》,有《穆清堂诗钞》等。《筱园诗话》四卷,从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三年(1877),三易稿始成。此书论诗首先重视诗人的主观修养,提出理、气、识三义为修养之内容:“诗人以培根柢为第一义,根柢之学,首重积理养气”,“积理养气,……皆仗识以领之。识为诗中先天,理法才气为诗之后天”。“理”之内容,“非如宋人以理语入诗也,谓读书涉世,每遇事物,无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长识力耳”。“气”有动、静之分,须以静济动,方为“真气”而非“客气”。“识”与才学并重而“尤先”,“非识则才与学恐或误用,适以成其背驰也”。如他认为“识”主要得之于“师传”、“真传”,强调直接“契自古诗家心法”,反对专从“前哲批点诸集”、“诸家选本评论”、“各种诗话诗法”等“故纸堆”中求“识”,这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明、清有影响的各位诗人和各家诗论的评析,是《筱园诗话》的又一项主要内容。大致推崇纪昀的诗论,对各家的看法也多袭取或变化于纪昀之说。于明前后七子褒何、王而贬二李,以何景明、谢榛、徐祯卿之清俊济李梦阳、李攀龙之豪廓。

在清代各家诗论中以沈德潜的“格调说”为正,谓其“持论极正,持法极严”,惟惜其“未入三昧悟,精深微妙之诣得未曾有”,故又济之以严羽的“妙悟”和王士禛的“神韵”。《筱园诗话》中的许多看法,如才、学、识的关系,相题之说,渔洋诗与桐城文的比较等,都袭自袁枚,有些甚至连使用的语言也相近,可是他却以“佞口”、“无稽臆说”的粗暴谩骂,将袁枚全盘抹杀,可见其未能超脱乾、嘉以后的诋袁时风。有《清诗话续编》本。(张寅彭)

【眉韵楼诗话】诗话著作。清孙雄撰。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号郑斋。常熟(今属江苏)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官吏部主事。有《郑斋类稿》等。孙雄原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之选,未及成书,适逢沈宗畸编《晨风阁丛书》,索书稿于孙,遂摘辑而成此编。全书八卷,以晚清四朝诗人为辑录对象,各家名下,立有小传、诗选等项目,并作按语,略评其得失。眉韵楼在常熟城东,系取其妾章韵琴眉史之名。章氏原有《眉韵楼诗话》,记录夫妇间商榷诗学之语,书已不传。孙雄用旧名题新书,以志当年影事。有《晨风阁丛书》本。

(张寅彭)

【卧雪诗话】诗话著作。清袁嘉穀撰。袁嘉穀,字树圃,一作树五,云南石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同年中经济特科第一名,历官翰林院编修、浙江提学使。有《卧雪堂诗草》。《卧雪诗话》四卷,以论评及辑存近人诗为旨。袁嘉穀通声韵学,故论诗颇看重声调谱一类的著作:“自秋谷《声调谱》、阮亭《平仄定体》出,古诗音韵日严。覃溪三谱续出,海内宗之,几以为不奉其书,不可为诗。”他进而归结诸书为“音节三要”:“一曰三平三仄,谓逆数每句第三字须与句末之字平仄相同;二曰忌四平五平连同,防板防滞,仄声有上去入之分,虽四、五可以间用;三曰上句末字四声并用押,仄韵诗上句末字尤不得多用平声。三者既备,古调谐矣。”此说化繁为简,颇易于初学。袁嘉穀论音韵多从大处著议,如谓隋初陆法言等人讨论语音之举为“中国历史上读音统一之第一大会”;谓唐兴试律,始变古诗之四声并用为平仄两对,致失古宕之妙。作者为滇人,故此书论滇诗亦颇具系统,不仅广录滇人诗,记滇地胜迹之涉诗者,而且推定杨石淙为“滇诗第一人”,杨石淙、苍雪、钱南园、朱丹木为“滇南四家”,苍雪、担当、湛福为“滇中释子三大宗”,识见似较《滇南草堂诗话》等滇地诗话为优。有云南崇文印书馆代印本。

(张寅彭)

【南亭四话】笔记著作。清李伯元撰。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以字行,号南亭,江苏武进

人。诸生。曾创办《游戏报》等,是晚清小报的开创者之一;又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谴责小说。《南亭四话》共九卷,含《庄谐诗话》(四卷)、《庄谐联话》(三卷)、《庄谐词话》(一卷)和《庄谐丛话》(一卷)等四种。所记清人诗、词、联语,多涉士林文坛之掌故轶事。作者泛览词章,妙笔生花,《诗话》、《联话》,庄、谐各半;《词话》、《丛话》,则以谐语为多。其“庄”者,固足为词章家之圭臬;而其“谐”者,尤可于酒后茶馀之消遣中,见时人之陈腐,社会之病态。如卷五《帝王度量联》一则,记甲午中日海战失败后,李鸿章奉使议和,日方伊藤侯口占一联曰:“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索李属对。李久思无以对,归语其参随,一幕僚对曰:“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李叹息称善。是庄是谐,颇堪寻味。晚清乃是古老大帝国分崩离析的时代,故此书所记之事、之趣,颇不同于《六一诗话》以来记事“以资闲谈”的传统,往往令人捧腹之余,透出家国兴亡、士林悲凉之感。有1925年大东书局石印本,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张寅彭)

【庄谐诗话】见“南亭四话”。

【湘绮楼说诗】诗话著作。清王闿运撰。此书系由其门生王简在王闿运死后编辑其师之散佚稿而成。先得四卷,题曰“诗话”;后博采而增为八卷,以其师不用唐以后之名题书,改称“说诗”。全书论评、记事、录诗错杂,几无次序类别之分,其中以记事之比重为最大。所记与同时代文人政客之交往,不无史料价值。王闿运乃一代诗文宗匠,于诗艺颇有会心处。如诗与经学之关系,既有“因道通诗”的一面:“以三四十年来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又有诗通于道的一面:“余平生志趣学问,皆由诗人,则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于大道有如是效验也。”此语道出中国诗与经学(哲学、伦理)历来所有的特殊关系(六经相通)。又如诗的古、今之分:“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他将“汉后诗”视为一体,故王闿运论诗不分唐、宋,而更重于诗、文之别:“文有朝代、诗有家数。文取通行,故一代成一代之风;诗由心声,故一人有一人之派。论文而分班、马,论诗而分唐、宋,非知言也。”此语虽有混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之嫌,但强调指出诗比之于文更具个性色彩,却也切中诗艺三昧。有1934年成都书局直排本。

(张寅彭)

【董露盦诗话】诗话著作。清施山撰,施燠辑。施山,字寿伯,一字望云,号骈菴道人,会稽(浙江绍兴)人。有《董露盦杂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系从所作之日记删存者。其子施燠复从《杂记》中摘录说

诗之语,辑为诗话,不分卷。施山诗学明七子,论诗亦以明诗为宗。咸、同时,宋诗风炽,明诗地位日下。然施山不为时风所限,其评明前后七子诗云:“嘉、隆诸公如宫殿楼观,极其壮丽,只少一主人翁耳。然不得以中无主人,遂谓不如绳枢瓮牖,辄欲燔烧之。”他分析乾、嘉诸公排诋明诗之失云:“大抵乾隆间诗人如袁、赵、孙、洪诸公,天稟皆高,观古人诗时,意气已压其上,不暇沉思。非惟观明贤诗如是,即于汉、唐亦莫不然。故其诗锤炼者鲜,而议论多在皮毛之间。”他本人对明诗确有所心得,如分析李、何、王、李学杜之异:“前明四杰七律,皆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路径谿滩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为弇州之宗,‘山连越隩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为沧溟之宗,‘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信阳之宗,‘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为北地之宗。”他对以前后七子为主体,包括公安、竟陵在内的明诗之总体看法是“不轻艳”;“文章风尚,古厚与轻艳递相变更,独明诗之变,虽陵迟至于公安、竟陵,却不轻艳。”至谓欧、王之学韩不如何、李之学杜,欲置明诗于宋诗上之,似嫌过当。有清刻本。(张寅彭)

【五百石洞天挥麈】诗话著作。清邱炜菱撰。邱炜菱(1874—1941)字蕺樊,号菽园,海澄(今福建龙海)人。清末流寓于新加坡。此书原拟名《蕺樊琐缀》,后在海外得五百奇石,有米老鼠洞天者,遂改易今名。凡十二卷,以“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十二字分题各卷。后又有《拾遗》六卷。书中援佛谈诗,话头甚活。如卷一〇论近人诗话略古详今之因,先言诗与话之关系:“作诗话者因他人之诗而及自己之话”,“见其诗而不能无话,为存吾话而特举其诗”;继言古今诗之关系,谓今诗莫不从古人出,又所谓“话”者,“不在乎手口之雌黄,而在于象数之接构”,故平昔学诗、作诗皆即为“话”诗,“则今人之所为诗,亦即今人之所以代吾而话古人之诗也。于是见今诗之源乎古者,有话合乎古者,有话变乎古者,有话反乎古者,有话印证之、推论之、弹驳之,悉于今诗。是求而吾之话乃不在古而在今。”这也是此书以采录近人之诗、论为主的一个自注。所辑各家中,录诗以潘飞声之作为最多,采言以张维屏之论为最详。邱炜菱论诗又主佛家之“解脱”:“论冲放则佛不如仙,论解脱则仙不如佛”,并曾以此为严羽辩护:“严沧浪以禅喻诗,尝为后人所非,谓天下之大道胡不在,奚必唯禅乃喻。此言虽是,未免不知沧浪。沧浪论诗,专主解脱,本非诗道之全。夫以解脱言诗,则诚除禅之外,喻无更切者矣。”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观天演斋校刊本。《拾遗》有光绪二十七年观天演齐排印本。(张寅彭)

【定庵诗话】诗话著作。近人由云龙撰。由云龙,字夔举,号定庵,姚安(今属云南)人。清季举人。有《定庵诗存》四卷。其人少志科举,攻帖括,于声诗殊少措意。及长,虽偶有佳章,终不能工。《定庵诗话》二卷,《续编》二卷,泛论古今诗派沿革变迁之故,大抵折衷于宗唐宗宋之间,然时相抵牾,前后颇不能一贯。如前编略偏于主宋,续编则转为两可之论。又论清代诗文发展大概,与学术合观,谓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究心实学,而其时之诗文能直抒胸臆;尔后文字狱兴,学术遁于考据之学,诗文则以词华典赡、雍容揄扬为尚;道光、咸丰以后讲求经世济时,于是今文之学兴,而诗坛则宗宋声气蔚成大潮。此书之录诗、记事,皆主于近代,前编泛采海内而续编详于滇贤,亦略有所分别。有民国铅印本。

(张寅彭)

【三唐诗品】诗话著作。近人宋育仁撰。宋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顺人。清末王闿运为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宋氏曾执贄门下,与顾印愚、杨深秀等人齐名。民国初年曾为国会议员。《三唐诗品》三卷,其体例摹仿钟嵘《诗品》,论唐代诸公诗,往往溯其渊源所自。如谓张九龄,“其源出于鲍明远、江文通”;王绩,“其源出于程晓、应璩”;卢照邻,“其源出于江记室”,等等。凡初唐十五家,盛唐二十八家,附十三家,晚唐十二家。三品以时代相次,无高低升降之意;但每品之中,则以高下为先后,不以时代为序,此又与钟嵘相异。其诗学宗旨乃承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及《王志》诸篇而来,故论唐诗每探源于魏晋。行文清微淡远,尤有魏晋古调。其“三唐”之论,则上承高棅之“四唐”说而变易之,盖以盛唐诗人之中,“高者起列盛唐,其次统归晚代”,故略去中唐。有清考雋堂刻本。

(张伯伟)

【石遗室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陈衍撰。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为张之洞幕僚、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讲学于南北各大学。晚年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石遗室诗话》原载于《庸言》、《东方》等杂志,1914年石印本仅十三卷,1929年商务印书馆本增至三十二卷,为作者删补旧稿后之改本。1935年又刊出《续编》六卷。此书为同光体诗派最集中的评论集兼资料集。关于“同光体”名号的确立及其含义,书中称:“同光体者,余与苏堪(郑孝胥)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书中反对分唐界宋而主张唐宋同源,归纳成“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的新说法。他又接过翁方纲的“学人之诗”口号,调整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近代诗钞序》)。所以,“博极群书,熟悉辽金

元史学與地”的考据家沈曾植,被推为“同光体之魁杰”;祁隽藻的《题饒飮亭集》、《自题饒飮亭图》等作,被评为学人与诗人结合的典范:“证据精确,比例恰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他本人也是“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夏敬观评语)。《石遗室诗话》全书的理论比重不大,也并未对宋诗提供多少新的理论见解。相比之下,该书在评论和搜辑宋诗派诗人诗作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值得注意。书中对祁隽藻、程恩泽、郑珍、莫友芝、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宋诗派代表人物的创作风格和成就均有所品评,其中对陈、郑、沈三位的评语尤详。对宋诗派以外的晚清诗人也有所评论,如学汉魏六朝的王闿运,学中晚唐的樊增祥、易顺鼎,不专主一家的李慈铭,以及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有所论及。陈衍对晚清诗歌的大力研究,实得益于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把晚清诗歌看作是清诗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他说:“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他进而将这一时期的诗人归纳成风格不同的两大派:一派“清苍幽峭”,一派“生涩奥衍”。同光体三大家中,闽派的郑孝胥属于“清苍幽峭”风格,赣派的陈三立和浙派的沈曾植属于“生涩奥衍”风格。因此,所谓两派之分,实质上是从同光体内部派别的角度立论。尔后,再把道光以来各家与同光体诗派相联系。郑珍、莫友芝各为“生涩奥衍”派的“弁冕”和“羽翼”,差属允当;厉鹗被归入“清苍幽峭”派,从其诗作所具之宋风来说,亦不为无据。至于视不受宋诗派牢笼的陈沆、魏源为郑孝胥前身,以龚自珍比附郑珍,则未免牵强。有192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张寅彭)

【辽诗纪事】诗话汇编。近人陈衍辑。此书十二卷,收诗人六十五家,包括西夏、高丽两属国之诗人十六家。辽国尚武,诗文不发达,故名寥寥,可录之事亦甚少。然此书终有补备阙如之功。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张寅彭)

【金诗纪事】诗话汇编。近人陈衍辑。此书十六卷。收金代诗人一百八十九人及阙名、谣谚、鬼仙诗十九首(附于末三卷)。排列略以科第先后为序。元好问为金诗第一人,虽先已入《元诗纪事·遗老卷》,此处仍收其《元诗纪事》所未收之作,以反映其金诗大家之地位。故两书所收,重名而不重诗。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张寅彭)

【元诗纪事】诗话汇编。近人陈衍辑。此书之辑旨,其自叙明言不同于厉鹗《宋诗纪事》之广收无事之诗,盖因元诗已有选集,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

诗”。全书初编时为二十四卷,后增至四十五卷,收录诗人六百余家,荟萃了一代诗歌资料。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张寅彭)

【塞愚诗话】诗话著作。近人张翼廷撰。张翼廷(1864—?),字翊臣,号塞愚,滦阳(今河北迁安)人。曾任清廷驻英使馆参赞、新民知县等。此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原刊本为二卷,宣统二年(1910)《寄寄山房全集》本合为一卷,序、跋有所增删。张氏早年即著有诗话四卷,未及刊印,光绪十二年遭水灾,遂至散佚。光绪二十一年始行重集,以存师友吟章为旨。张翼廷系率性之人,作诗说诗大抵取性灵立场,故是书采《随园诗话》中语颇多。又张氏已接触西学,西人言事亦约略道及。有《寄寄山房全集》本。

(张寅彭)

【饮冰室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梁启超撰。该书为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作,最初连载于《新民丛报》,共二〇四则,哀集成书后,各本所收均为前一七四则,余三十则近年始被由张海珊辑出(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七辑)。该书专为总结、宣传“诗界革命”运动而作,只谈“诗界革命”中人,只记“诗界革命”中事,只论有关“诗界革命”的各种问题,完全不同于泛论古今的传统诗话。书中第一则即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之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此处主要是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等,他们都是“诗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作者竭尽心力,广为搜录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的诗风特征,从而对“诗界革命”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也表达作者本人的诗学见解。从书中所述看,诗歌革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所谓“新学之诗”,仅在于用新辞替代旧辞。梁启超指出,“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有“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之句,喀私德系 Caste 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系 Parliament 的译音,指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夏曾佑诗“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句,龙指孔子,蛙指孔门教徒,系附会《新约》、《可兰经》中语而来。据梁启超说,当时他们正“沉醉于宗教……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这种生造的新名词,“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虽然梁启超也不反对新名词的运用,但是本末不能倒置,故书中强调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

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根据这一标准,他推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三家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三家中尤重黄遵宪,书中收录黄诗数量亦最多,成功地为“诗界革命”树起了一面旗帜。从书中收录的诗作内容及其评论来看,“新学之诗”的精神、理想、意境,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的讴歌,以及对爱国图强及为维新改良政治服务的精神行为的宣扬。例如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表现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思想文化,得到他极高的评价。黄遵宪那些以国内外重大时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书中往往不惜篇幅,全文引录,赞颂备至,并号召更多诗人来反映社会时局。然而梁启超对我国古代缺少史诗式长篇作品的遗憾,对西方诞生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等大诗人的向往,对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期望,对一些接近民歌与现代歌曲的诗作的赞美,实际上亦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旧形式的革新问题。应该说,他对诗体形式的见解,也有与“新意境”相适应的因素。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选辑》本。(张寅彭)

【台阳诗话】诗话著作。近人王松撰。王松(1867—1930),字友竹,号沧海遗民,台湾新竹人。少年时即有志经世,不得已而遁于山水诗酒之间。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被割。王松携眷归返泉州原籍,中途遇盗而折回。此后抱道自重,虽与日人显贵相往还而未与干谒。终日疏食啸歌,吏、民咸敬之。有诗集、诗话四种行世。《台阳诗话》二卷,成书于割台后十年,以录诗纪事为主,间有论评。所采详于台湾诗人而兼及中土大家,共约一百七十馀家,要以吟咏台湾乡土为准的,就中颇可观割台前后数十年间台湾之社会风情与诗坛情状。卷末附其自作诗之佳者若干首。一说此书尚有二编续出,然未见。有1905年台湾日日新报社刊本。(张寅彭)

【在山泉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潘飞声撰。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号剑士,又号独立山人,番禺(今广东广州)人。诸生。有《说剑堂集》。光绪十三年(1887)受聘至德国柏林大学掌教汉文学,寓居柏林四年馀。返国后举经济特科,不应,避居上海。此书四卷,泛记师友交往、名贤轶事遗诗等;又与日人有交往,因亦辑存有日人汉诗及译作。有广益书局《古今文艺丛书》本。(张寅彭)

【柏岩感旧诗话】诗话著作。近人赵炳麟撰。赵炳麟(1873—?),字竺垣,号柏岩,全州(今属广西)

人。光绪十七年(189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监察御史,清亡不仕。有《赵柏岩集》。《柏岩感旧诗话》三卷,以记光绪朝及民国初年事为主,因事而存诗。赵炳麟身为清臣,又为康、梁“保国会”会员,故所记颇详于戊戌、辛亥之变。所记之艺事亦有可观处,如张勋曾出万金为梅兰芳赎学徒身,似为人所鲜知。有民国《赵柏岩集》铅印本。(张寅彭)

【谪星说诗】诗话著作。近人钱振鍤撰。钱振鍤(1875—?),字梦鲸,号庸人,又号名山,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名山集》等。《谪星说诗》一卷,以论评为主,大抵推重白居易,服膺王若虚之论;强调作诗要自抒胸臆,有自我在。书中即据此意,攻驳严羽《沧浪诗话》。如严羽谓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不能辨者为上,钱氏批评云:“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占诗之为愈乎?”又如严羽谓读李杜诗犹如挟天子以令诸侯,钱氏批评云:“此明明随园所谓摹杜尊韩,托足权门者也。此辈自供其势利无知之状,可发一笑。”又云:“沧浪《诗辨》、《诗法》,拘滞不化,得未曾有。其谨守门户也,一若自在一步,便为放纵;其分界时代也,一若进退一日,便有高下。分别体制音调局法,不遗余力。其书盖笨伯一人之私言,自家以之为用功之阶梯,若必强人就我,则大谬矣。”辞锋之峻厉,与冯班《严氏纠谬》同。钱氏有《论诗》诗云:“正当痛快忽支离,玉石纷陈未可师。安得数年天假我,闭门遍改少陵诗。”其狷狂之态如此。有《名山三集》本。(张寅彭)

【名山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钱振鍤撰。此书一卷,七十三则,上自《诗经》、《楚辞》,下迄钱谦益、袁枚,皆有所道及。然作学究之陋语多,谳诗道之行话少,如反复一“实”字,先谓:“君子之言,真实不妄,诗虽小道,亦言语之一种,多为不实之言,徒为人所轻耳。”此处之“真实”,乃“事实”之转语,故其即据以责老杜“老柏二千尺”、太白“白发三千丈”等句为“滑稽”,尤不解李贺之浪漫诗风为何物。千古诗人,遂只剩一白居易合其规则。然反观此书,恰正好作大言,过激语多而“老实话”少,如世讥明七子摹仿,彼反恨“其摹仿未至,若能摹仿得工,好诗必不至此”,其言过甚,一至于此。有《名山六集》本。

(张寅彭)

【十朝诗乘】诗话著作。近人郭则沄撰。郭则沄,字啸麓,号蛰园,别号龙顾山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龙顾山人集》。辛亥革命后避居天津,专事著述,历二十馀载,成《十朝诗乘》二十四卷。“十朝”者,指顺治至宣统十帝。此书本以诗证史之旨,因感于有

清一代信史之未备,而欲以诗补之。盖清代士大夫慑于文网荼密,于时政得失,不敢有所掇述,而往往发之于诗。郭则沄曾遍睹翰林秘籍,熟悉有清历朝掌故;又尝参与选诗之役,涉目有清诗人之作泰半,故颇能胜任是书之辑撰。全编体例,大抵以事为干,而以诗证之。其事之系于治乱兴亡之大者,则反复褒讥讽谕,如康熙亲征、乾隆南巡、三藩之叛、林则徐督粤等大事,皆广泛征诗,多方发掘。时誉谓是编乃“集众诗而以为史”者,与杨钟羲《雪桥诗话》同为汇辑清代掌故之最丰者。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月栩楼刊本。(张寅彭)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诗话汇编。近人施淑仪辑。施淑仪(1877—?),女,字学诗,崇明(今属上海)人。清末民初之际在崇明创办女校,自任校长,声誉颇著。其所辑之清代女诗人资料,尚有《随园女弟子轶闻》二卷。《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十卷,补遗一卷,仿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之体例而略有变通。所收女诗人事迹,上起顺治,下迄光绪,较沈善宝《名媛诗话》仅止于道光朝为完整。计收一千三百余人,皆于诗、文、词、赋、书、画、等有一艺专长者。入选资料依例采自诗话、笔记、方志、诗文集等。全编略按时代为次,以沈云英肇始,秋瑾殿后,微寓编者崇仰女豪杰之意。有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铅印本。(张寅彭)

【天籁阁诗话】诗话著作。近人张可中撰。张可中(1900—1926),字庸庵,号木兰秋士,溧阳(今河北迁安)人。毕业于京师中国大学。有其父张翼廷所辑之《庸庵遗集》,中有《天籁阁诗话》一卷,以录诗为主,间附记事、议论。自谓:“读书而得,断句投赠,而有佳章,既恐亡佚,又难割爱,不得不笔之于书,以备浏览。则余之诗话之作,谓之诗话也可,即谓之有诗无话亦无不可。”其作书之原委与宗旨,约略可见。有《寄寄山房全集》本。(张寅彭)

【海天诗话】诗话著作。近人胡怀琛辑。胡怀琛(1881—1938),字寄尘,泾县(今属安徽)人。诸生。南社社员。有《大江集》。《海天诗话》一卷,专辑欧西、东瀛诗之译作,隶以国人诗之记海外事者,颇反映出清末民初中西文学交流之况。其中亦论及诗的翻译问题,如曰:“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区分译诗与原作之离合关系,颇为有识。有广益书局《古今文艺丛书》本。(张寅彭)

【栩园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陈栩撰。陈栩(1879—1940),初名寿嵩,字昆叔,一字栩园,号蝶仙,皆自庄子“栩栩化蝶”之意化出;钱塘(今浙江杭

州)人。南社社员。曾任申报自由谈特约撰述。有《新疑雨集》、《栩园诗剩》等。杨香池《偷闲庐诗话》谓其诗多绮艳,颇似李商隐。《栩园诗话》二卷,以记述己之诗事为主,笔涉于夫妇、翁婿、师友间。所录之诗多有情味而气局不大。此外,书中尚辑存顾炎武、魏源等之未刊诗若干首,可资参考。有光绪刊本。(张寅彭)

【今传是楼诗话】诗话著作。近人王逸塘撰。王逸塘(一作揖唐,1877—1948),原名志详,后改名为赓,字一堂,号揖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曾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后,曾先后在清廷及袁世凯、段琪瑞手下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公开附日,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8年以汉奸罪被处死刑。王氏嗜诗,早年即有撰诗话以自遣之愿,故遇古今人一篇一句之工者,随时采录,积成《今传是楼诗话》。“传是楼”者,系清初昆山徐乾学藏书之处。王氏妻亦昆山人,其母家比邻楼址,后出资购得原楼旧址,建一新图书馆,定名为“今传是楼”。诗话之名,由此而来。此书以记录近代诗坛之掌故逸作为主。因作者涉足政界甚深,所交多为头面人物,故所记颇具文史价值,如记袁世凯诸子皆能诗,与康有为交往最洽等。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公报社铅印本。(张寅彭)

【芳菲菲堂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毕希卓撰。毕希卓,字几葦,江苏扬州人。此书二卷,因作者论诗颇谙艺术规律,故所收之论,多有可观处,所录之诗,亦有韵致。大旨推重王、韦之“清深闲澹、了无尘俗”,但又不以空言神韵、专事音节为然。如樊增祥咏庚子事变之作的诗史风格,亦备受其嘉誉。有宣统元年(1909)海上娜嬛社铅印本。(张寅彭)

【续诗人徵略】诗话著作。近人吴仲撰。吴仲,字梦兰,江都(今属江苏)人。此书二卷,收晚清诗人二十馀位,体例略仿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先小传,次录诗、摘句,惟将“诗话”一项融入小传,而不再单列。书前有宣统六年(1909)李维藩序,略可推知成书年代。所记陈寅有《瓠香诗话》,迄未见刊行,亦未见著录。又记袁祖光一字瞿园,则《绿天香雪簪诗话》编撰者之署名“瞿园居士”,其人可明。有《晨风阁丛书》本。(张寅彭)

【平等阁诗话】诗话著作。近人平等阁主人撰。平等阁主人,本名狄葆贤,字楚青,一字平子,溧阳(今属江苏)人。能诗善画,壮岁遨游于燕赵,所交者多为一时名贤;晚年倦游知返,筑室栖居于沪郊,悄然起怀旧之思,遂有诗话之辑。凡二卷,除录诗外,亦颇发议论,且往往能联系社会政治以观文艺,如比较美利坚与欧洲诸国,谓其政治经济同风,然人民之

“高志琦行”，则美利坚“新造邦”终逊于西欧。究其根源，盖由两地“文词美术”（即文艺）之薄厚不同所致。故作者亟欲宏扬传统文艺以救邦国，至有“爱古即属爱国，其不知爱美术者，必其人素无国家之感念”之说。此虽属清议，然不失为有见。书中留意于采录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类新诗，亦有新气息。此书成于宣统二年（1910），实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之先声。有上海有正书局线装铅印本。

（张寅彭）

【绿天香雪簃诗话】诗话著作。近人瞿园居士编。瞿园居士即袁祖光号，字小舫，太湖（今属安徽）人。擅诗，有《瞿园诗草》。《绿天香雪簃诗话》八卷，以录诗记事为主，所记录者多为晚清人上，尤详于清末民初。袁氏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客游日本，故亦记有日人之诗事。论评一般随所记录之诗事而发。论旨不专主一端，大抵以自然含蓄为贵，以陶潜、杜甫为诗家正宗，而不喜同、光以来之学宋风气。对清、民之际新旧文学之嬗替，亦有所表态：“或问新名词不可入诗，信乎？曰：然。诗忌见新名词，犹新朝立宪政，于吏部、礼部、翰林院毫无干涉也。新与旧两概，如水火之不相入，容有新词窘借用旧者，未闻旧词拙待取材于新者也。曰：舍旧尽用新名词，可乎？曰：可。必如是乃称新人之诗。”此种认识，可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记“诗界革命”初期新诗人热衷于“捋扯新名词”之现象，并非维新派诗人所独有。有《晨风阁丛书》甲集本。（张寅彭）

【诗话别裁三种】诗话汇编。近人张世尧辑。张世尧字振宇，栾城（今属河北）人。因嫌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袁枚《随园诗话》过于繁富，遂有“别裁”之举，取其精华，汰其复杂，共得一百六十三条，厘为二卷，名为“渔随诗话别裁”，编成于清宣统二年（1910）；又据《海山仙馆丛书》本谢榛之《四溟诗话》，择得八十五条，名曰“四溟诗话别裁”，编成于民国三年（1914）。别裁之余，且时加按语，以抒己见。又自谓曾有“诗人玉屑别裁”，未见。此稿未曾刊行，仅存稿本，藏北京图书馆。（张寅彭）

【诗法丛话】题随园老人辑。有1918年上海碧梧山庄石印本。此书实即蒋澜之《艺苑名言》，坊刻者托名于袁枚。参见“艺苑名言”。（张寅彭）

【香奁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金燕撰。金燕，字翼谋，太仓（今属江苏）人。夙擅诗及古文辞，为南社名宿。《香奁诗话》三卷，卷一为闺秀之部，卷二为青楼之部，卷三为方外之部。然篇幅不大，所收清代女子之涉于诗者仅六十余人，其中又颇有作者自己狎游所遇者，故辑分量远不及稍后雷瑱、雷城所辑之数种女子诗话。有民国四年（1915）上海广益书局石

印本。

（张寅彭）

【然脂馥韵】诗话著作。近人王蕴章撰。王蕴章字蓴农，无锡（今属江苏）人，壮岁曾游历域外，有词名。此书六卷，取徐陵《玉台新咏》序“然脂（一作燃指）暝写”之语为名，然非如《玉台新咏》之专辑艳诗，而以有清三百年之闺阁诗人为辑录对象。张美翊《名媛诗话序》谓王蕴章曾据有沈善宝《名媛诗话》洋刊本，实为其编纂是书之基础。始辑于民国三年（1914），未成书前曾散载于涵芬楼各月刊中。1918年结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有铅印本。

（张寅彭）

【四朝诗话】诗话丛书。近人阙名编，疑出自扫叶山房编辑之手。收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范摅《云溪友议》、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金王若虚《滹南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清查为仁《莲坡诗话》等六种，以金附于宋，故称“四朝”。所收各书，不知其宗旨为何；而作为诗话丛书，辑分量又嫌不足，故价值不甚高。有民国八年（1919）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张寅彭）

【蕤蕤室诗话】诗话著作。近人童逊撰。童逊组，字小桥，浙江慈溪人。有《蕤蕤室类稿》三卷，《诗话》即为其中之一卷。以记乡邦诗事为主，然亦记有袁枚、阮元、林则徐等风云人物的活动。有民国八年（1919）抄本。

（张寅彭）

【惜阴轩诗话初编】诗话著作。近人张昇三撰。张昇三，字荫台，江苏沛县人。此书一卷，以别号“醒庐新”署名，编成于民国五年（1916）。张昇三身处清亡民兴国体变更之际，意以国事为重，视编辑诗话为“借人酒杯，浇我块垒”之举。故是编于香艳杂体、柔靡之作概不采入，所录以乡先辈之作为多，记忆者十之七、八，抄录者十之二、三，有较浓重的地方色彩。所录诗人皆作有生平简叙，叙事之外，再加评语，体例颇明。所收迄于前清；民国新吟，另有《爱春堂诗话》采辑之。有民国八年（1919）北京共和印刷局铅印本。

（张寅彭）

【木樨香馆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林孝颖撰。林孝颖，字可山，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约生活于清末民初。此书一卷，凡三十二则。论诗服膺严羽，主唐音，而不满于晚清之宗宋风气。曾驳轻闽诗者曰：“闽派与（明）七子为近”，而“七子不失为唐诗正轨”，“进而上之，为汉魏、为雅颂，舍三唐何所问津，则甚矣闽派之不可轻议”。又对前清诗老钓名弋利，作诗话几乎人手一册之现象颇有微辞。此书之可取处，大率如此。有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张寅彭）

【雪桥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杨钟羲撰。杨钟羲，字子勤，一字圣遗，辽宁辽阳人。清时属官翰林

院,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以著述自遣,先后成《雪桥诗话》,凡四集四十卷。各集自为起迄,随编随刊。馀集最晚出,编定于1922年秋,刊行于1925年。全书以采事录诗为旨,“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自跋》)。采辑碑传、墓志、序跋等他人著述,间有裁略。笔涉于有清三百年间之帝王宗室、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所谈每能隐然于国政兴衰相关,故有“俨具史裁,不当以诗话目之”之评(陈宝琛序)。如三藩作乱、西域边事、疏浚河渠之水利事业、修四库全书等,皆籍诗作诗事而有所反映。评鹭诗人甚平正,“推重国初之朱(彝尊)、王(士禛)、叶(燮)、沈(德潜),悉取正声,而不甚扬袁(枚)、蒋(士铨)、赵(翼)之流波,郢说歧涂,扫除净尽”(缪荃孙序)。此外,学术伦理、版本目录等,书中亦时有涉及。全书以采事之富胜。有《求恕斋丛书》本。

(张寅彭)

【**闺秀诗话**】诗话汇编。近人雷瑱、雷城同辑。雷瑱字君曜,雷城字君彦,松江(今属上海)人。此书十六卷,专辑晚清闺阁诗人之作而兼有逸事可资谈助者。据雷氏兄弟跋语,计得一千数百人,诗词数千首。录自各家诗集及诗话、笔记诸书,辑存资料颇夥,如《悟香楼诗话》、《绿萝芜馆诗话》等,今皆未见。有1928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张寅彭)

【**青楼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雷瑱辑。此书二卷。专辑历代妓女之关乎吟咏者,得一百二十余人,又有未详姓氏者若干人。大抵从诸家诗话、笔记、杂著等辑存,不作考辨,亦不按时序排列。妓女诗良莠不齐,颇不易择选,卫道者往往失之严,猥褻者往往失之宽。而是书所辑,略主情真与趣谐,似能得其环中。有民国十五年(1926)扫叶山房石印本。

(张寅彭)

【**合肥诗话**】诗话汇编。近人李家孚辑。李家孚,字子渊,安徽合肥人。此书三卷,专收安徽合肥地区之诗人诗事,肇自清初,下及民国初年,计二百零七人。体例仿吴伟业《梅村诗话》,以人为序,每人名下,先记事,后录诗,略加评语。惟所评有誉而无毁,盖欲昌其乡学。有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张寅彭)

【**尊瓠室诗话**】诗话著作。近人陈诗撰。陈诗,字子言,号鹤柴山人,安徽庐江人。诸生。其《尊瓠室诗》有如自作之小传。《尊瓠室诗话》三卷,以记录晚清诗人诗作为主要内容,略及乾隆、嘉庆时之人事。所记亦多与其自身有关,如记相识钱仲联于友人处;尝佐狄平子书局,故颇记狄葆贤行踪,如此等等。有线装铅印本。

(张寅彭)

【**冷禅室诗话**】诗话著作。近人海纳川撰。海纳

川,未详其人。此书所载,多为清季有名人物之遗闻轶事,如何绍基、曾国藩、石达开、李鸿章、张之洞、杨度、宋教仁等,不徒谈诗而已。有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张寅彭)

【**萤雪轩丛书**】诗话丛书。日人近藤元粹编订。近藤元粹(1850—1922),字纯叔,号南洲,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知名的汉学家,家藏汉籍甚富。此书即其所藏中国诗话之选辑,总计五十九种、九十八卷(自序谓一百种),编为十册,论次不按时序,盖仅就家藏范围编其所好者,随编随刊。全编所收,以宋人诗话居多数,其中陆游《老学庵诗话》,系补订日人黑崎璞斋、饭村岳麓所辑《放翁诗话》而成;周密《弁阳诗话》实即《浩然斋雅谈》中卷之改称。清人诗话仅五部,其中赵吉士的《寄园诗话》,传世甚稀。书中另收有三种附录:《六一诗话附录》、《沧浪诗话纠谬附录》和《东坡诗话补遗》,系从欧阳修、冯班和苏轼三家杂著中补辑得来的诗话性质的材料。又有《苏诗纪事》一种,系从群书中搜录苏轼遗事之涉于诗者,复成三卷。入选之诗话,皆经编者批阅一过,其评语、校刊语并圈点亦皆随文刊出。有明治二十五年(1893)日本青木嵩山堂刊本。

(张寅彭)

【**历代诗话续编**】诗话丛书。近人丁福保辑。丁福保,字仲祐,江苏无锡人。曾就读于南菁书院,以医名世;又留意于诗话资料的整理与刊行,先后翻印何文焕《历代诗话》和新辑《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三种大型专门丛书,颇有功于诗话研究。诚如其友李详所谓:“医学与诗学,丁氏‘可传者不出于彼,必在于此’”(《历代诗话续编序》)。《历代诗话续编》系统何文焕《历代诗话》之缺漏者,计收唐孟棣《本事诗》以下之论诗专著凡二十九种,多为历代诗话中之代表作。合何文焕《历代诗话》所收的二十八种,我国现存明以前重要的论诗之著,大抵均已收辑在册。如以宋代为例,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所列,现存流传者约有四十余种,除去阮阅《诗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等汇编之作,以及计有功《唐诗纪事》、何汶《竹庄诗话》、蔡正孙《诗林广记》等介乎选本与诗话之间的非纯粹之作,其余多数为二书所收(共二十八种),其中《续篇》补辑之数多达十二种。此书所采之版本也有可注意者,如《观林诗话》为天一阁藏本,《艇斋诗话》为明抄本,《藏海诗话》为永乐大典本,《逸老堂诗话》为抄本,又综合诸本校改杨慎《升庵诗话》。此书编成于民国四年(1915)。丁氏于各篇题下加附有简语,介绍该篇之作者、版本、内容提要等,颇便于读者。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张寅彭)

【**清诗话**】诗话丛书。近人丁福保辑。何文焕

《历代诗话》和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辑皆止于明代,丁氏遂有是辑。全书计收有清一代诗话之作共四十三种(原附明王兆云《挥麈诗话》一卷,今刊本已删去)。此数虽不及清诗话总数之十几分之一,但因清代为诗话发展之鼎盛期,汇纂专代丛书实属必要。故丁氏此编筌路蓝缕,体例甚正。所收各篇,兼及诗话之论评和记事二体,前者如王夫之《薑斋诗话》、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等,后者如吴伟业《梅村诗话》、顾嗣立《寒厅诗话》、王士禛《渔洋诗话》等;又注意收入清人特擅之声调谱一类著作,如王士禛《律诗定体》、赵执信《声调谱》、翟翬《声调谱拾遗》等。所收各篇之版本,多据《花薰阁诗述》、《天壤阁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昭代丛书》、《谈艺珠丛》、《诗法萃编》等,一般不再作校刊。上述丛书中的某些删节、改编之作,亦有被丁氏当作原本而予以辑入的,以至名不符实。如冯班《钝吟杂录》和钱良择《唐音审体》,雪北山樵仅摘录其中论体制之语数则,编

入《花薰阁诗述》,丁氏据以辑入《清诗话》而仍分别冠以二书原名,殊为失当。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张寅彭)

【蔽庐非诗话】 诗话著作。四卷。近人蒋著超著。1915年海上蔽庐出版。是书钩稽关涉诗歌之掌故轶事,如有关抄袭问题的材料蒐集。对唐、宋、明、清及民初诸诗人诗歌均有考订品衡。辑录打油体俗律俗绝尤多,偶涉青楼琐细、闺房密欢之事。

(孟向荣)

【碣阳诗话】 诗话著作。近人李宗莲著。1929年津印书局出版。采录自清初以来一百八十余人诗歌作品兼著生平。是编首二卷随笔记录,体例仿袁枚《随园诗话》;三卷以下由清顺治三年(1646)迄同治四年(1865),悉以科第之先后为序、无科第者则就其人之时代而先后之。有梁启超、张念祖、高鸣谦、萧树勋序和作者自记,王汉升跋。
(孟向荣)

重要诗人

【尹吉甫】周宣王(前 827 至前 782 年在位)时卿士。生卒年及事迹不详。据《诗·大雅·崧高》并序、传,厉王无道,宣王拨乱反正。申伯勤劳王事,宣王封以谢邑(故城在今河南唐河南)。吉甫作《崧高》以赠。又据《烝民》并序、传,贤臣仲山甫佐宣王,奉命筑城于齐。吉甫作《烝民》以美之。此二诗为中国文学中记明作者的最早诗篇,尹吉甫为可知姓名的最早诗人。另《大雅》中《韩奕》、《江汉》两篇,诗序亦以为尹吉甫作。台湾学者李辰冬曾提出“诗三百”皆尹吉甫一人所作,并可视为尹吉甫之自传(见李著《诗经通释》),此说不为学界所认可。

(沈玉成 李莉娟)

【卫庄姜】(前 757 前后)齐庄公之女,嫁卫庄公。齐国为姜姓,故称卫庄姜。庄姜美而无子,卫庄公又娶陈国厉妫、戴妫姊妹。厉妫生子孝伯,早亡;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完被立为太子。卫庄公另有宠妾生子名州吁。州吁有宠而好兵,其母恃宠骄僭。庄姜贤而被疏。其所作《绿衣》,以黄、绿二色颠倒,喻其被庄公嬖妾僭越之怨。卫庄公卒后,太子完继位,是为卫桓公。州吁骄纵,为桓公所废,遂逃往他国。后州吁纠集流亡卫人回国弑桓公,自立为卫君。桓公被杀后,其母戴妫被遣归陈国。庄姜为戴

妫送行之际,见燕飞而托物起兴,赋《燕燕》篇。《诗序》谓此诗为卫庄姜送归妾所作;《朱子语类》则进而谓其“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燕燕》与其首句“燕燕于飞”,是我国送别诗的名篇名句。《诗经·邶风》的十九首诗中,收录卫庄姜诗四首,除《绿衣》、《燕燕》外,尚有《日月》、《终风》二首,皆怨悵之作。卫庄姜事见《左传·隐公三年》。(陈祖美)

【许穆夫人】(前 660 前后)卫宣公妻宣姜之女,远嫁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公元前 660 年翟人伐卫,懿公阵亡,卫国覆灭。时宋桓公率师迎卫国遗民夜过黄河,卫人于曹(一作漕)邑(在今河南滑县旧县城东)拥立戴公为国君。当年,戴公卒,文公继位。许穆夫人为戴公、文公之妹,赋《载驰》诗以见其志。《诗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同翟)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许穆夫人是一位既有爱国悵诚,又具胆识魄力的女诗人。除《诗经·邶风·载驰》外,尚有《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两诗,有人认为也是许穆夫人所作。许穆夫人赋《载驰》诗事见《左传·闵公二年》。(陈祖美)

【孔子】(前 551 或 552—前 479)名丘,字仲尼,后

人尊称孔子。其先为宋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幼孤,常陈俎豆,学礼。家贫且贱,及长,为季氏委吏、乘田吏。年三十余,适齐,不得志而返鲁,聚徒讲学。或尝至周,问礼于老子。年过五十,任鲁国中都宰,升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摄相事,于齐、鲁二君夹谷之会中不屈于齐。以鲁政不可为,携弟子子路、子贡等周游卫、曹、宋、郑、陈、蔡、齐、楚诸国,皆不见重用,历时十四年乃返鲁。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病卒。年七十二或七十三。孔子号称至圣,自汉代起,其学说即为我国政治、文化之正统,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晚年兴办私学,致力教育,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之有关或据以传授弟子的典籍,后世均尊奉为“经”。《春秋》一书,前人多以为孔子自作,经近世考定为鲁国史书,或曾经其修订。其门人及再传弟子记其言行,纂辑为《论语》二十篇。孔子论文学重经世致用,其关于《诗》三百篇的看法,如“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以及关于美恶、文质、精神、人格等方面的谈论,皆言简义丰,对我国两千年来文学理论及批评曾起指导作用。南宋时,以《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为士子必读之书,其名言警句,至今犹广为人传诵。今存《论语》注释,以三国时魏何晏《论语集释》为最早,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较通行。今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主要事迹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

(沈玉成 李莉娟)

【屈原】(前339—前278?) 名平,字原,后人多称其字,或尊称屈子。屈原为楚之同姓贵族,其先封于屈,因以为氏。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深得楚怀王信赖。二十馀岁即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怀王使其造为宪令,以图变法。属稿未定,宠臣上官大夫靳尚欲夺之,不与。谗于怀王,谓屈原自夸其功,遂见疏。秦患楚、齐交好,令张仪入楚,诈许怀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而楚绝齐后,张仪竟食言。怀王十七年(前312),伐秦,败绩。乃复用屈原使齐修好。怀王十八年,秦复与楚亲,怀王誓欲得张仪。仪至楚,厚赂靳尚,设诡辩于宠姬郑袖。怀王惑之,释张仪。屈原使齐返,劝怀王杀张仪以绝秦,追之不及。后楚复背齐合秦,放流屈原于汉北。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怀王恐,乃质太子于齐,复召屈原使齐求和。怀王三十年,秦约楚怀王会盟于武关,屈原谏以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不听,入秦,为秦留为人质以求割地,不从,后遂客死于秦。怀王为秦所扣留后,顷襄王嗣

位,弟子兰为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靳尚谗屈原;顷襄王怒,再次放流屈原于江南地区,时屈原年已五十馀。顷襄王二十年(前279),秦将白起攻楚,次年,陷郢都。屈原国破家亡,悲愤不能自己,南行,自沉汨罗江。年约六十馀。屈原生当七雄争霸之世,外主抗秦,内求美政。其志不伸,屡遭谗陷,流放凡十馀年,忧愁幽思内结,发而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人以之与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并称“楚辞”。今本《楚辞》为刘向、刘歆父子编定,计《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恰符二十五篇之数。然此二十五篇是否皆屈原所作,《九歌》何以为十一篇等问题,近世学者,多有考证而颇难论定。《离骚》为屈原代表作,为我国古代篇幅最巨之抒情诗,历叙家世、政见、被谗,上下求索,神游天地,以致其忠君爱国、九死未悔之志。《史记》本传引刘安《离骚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作品文辞瑰丽、想象丰富,兴寄超远。《九歌》本楚国民间巫觋祀神之曲,经屈原加工改作,除《国殇》热烈慷慨外,率皆感情深挚、文辞优美,风格凄迷幽渺,为最具楚地民俗特色之作。《九章》各篇,非写于一时一地,思想、风格略见参差。自屈原而后,“诗”、“骚”遂同为我国古诗渊源,而骚体又兼为赋体之先河。今存楚辞注本,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为最早。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先列王注于前,复加疏证补充于后。《补注》行世,《章句》单本乃稀见。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八卷附《楚辞辩证》二卷,虽有穿凿,而大体简明透彻。清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亦各有特色。近人游国恩《离骚纂义》、《天问纂义》荟萃众说,排比考校,最为使用。主要事迹见《史记·屈原列传》、游国恩《屈原》。

(沈玉成 詹颂)

【荀况】(前314?—前217?) 当时人尊之,称为荀卿。荀、孙音近,或谓汉人避宣帝讳,故一作孙卿。后人尊称荀子。赵(今河北南部及山西一带)人。十五岁游学于齐,二十馀岁为齐祭酒,以谥王骄盈暴虐,与稷下诸学士离去。三十馀岁再至齐为祭酒。五十岁左右,又去齐至秦,见秦昭王及应侯范雎,皆不用,乃去秦归赵,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后又去赵至齐,三为祭酒。后为齐人所谗,乃至楚。时春申君黄歇为楚相,以之为兰陵令。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被杀,荀子随之被废,定居兰陵,著书授徒,李斯、韩非皆出其门下。后卒,年约九十馀。荀子为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人物,然又不主一家,兼融诸子,倡“性恶”、“法后王”之说。今传《荀

子》三十三篇,多出其自作,间亦有弟子所记。各篇以二字自为篇题,概括一篇大意。其文长于说理驳难,剖析入微,铺陈排比,善用比喻,风格淳朴精洁。其中《成相》篇已属格律韵文,全篇用三、三、七及四、四、三句式,于后代影响深广。《汉书·艺文志》录“孙卿赋一〇篇”,今存《礼》、《知》、《云》、《蚕》、《箴》五篇,以四言为问答体,作瘦辞谜语,为今所见古籍中最早以“赋”命名之作。今存注本最早者为唐杨倞注,清人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荀子简释》参稽群书,繁简得当,较为通行。主要事迹见《史记·荀卿列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游国恩《荀卿考》。

(沈玉成 詹颂)

【宋玉】字及生卒年不详。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韩诗外传》、《新序》、《襄阳耆旧传》等所记,为楚国郢(今湖北宜城陵)人。或曾师事屈原,与景差为友。与屈原被后人并称“屈宋”。《汉书·艺文志》录宋玉赋十六篇。今存署宋玉名者,《楚辞章句》有《招魂》、《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唐人所辑《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明人刘节之《广文选》有《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足十六篇之数。然颇多伪作。学者一般于《九辩》无异辞;《招魂》或以为应归屈原,悬而未决;《文选》所录尚较可信,其余则多以为出自伪托。《九辩》为宋玉名篇,骚体,开后世词客悲秋、文人失志主题之先河。《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文体赋,铺张排比,描摹细腻,情思荡佚,对司马相如、曹植、王粲等人均有影响。

(沈玉成 李莉娟)

【贾谊】(前200—前168) 洛阳(今属河南)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与善属文名于郡中,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汉文帝初继位,征吴公为廷尉,吴公荐谊于帝,召为博士。每诏令下交付议论,谊尽为之对,文帝悦之,超迁为太中大夫。后欲任以公卿之位,诸老臣如周勃、灌婴等皆以为不可,谓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遂疏之,命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四年,帝思而召之,人对于宣室,问以鬼神之事,至夜半。文帝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时匈奴强,数侵边郡,诸侯国割据自雄,多谋叛乱。谊上疏论政事,以为天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所谓可痛哭者即诸侯王强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其所谓可流涕者即匈奴之侵扰,汉不能制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刘揖太傅,谊又上疏欲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汉易制之,文帝从其计。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揖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馀,亦卒,

年仅三十三。谊工文善辞赋,其《过秦论》三篇雄奇瑰丽,尤为传诵。其辞赋存屈原体制,其《惜誓》(或认为非谊作)、《吊屈原赋》、《鹏鸟赋》等较接近楚辞,与司马相如之后近于骈文之赋尚有区别,特别是《吊屈原赋》,乃贾谊过湘水而作,是吊屈原兼自伤也,后世遂将“屈贾”并称。贾氏著有《贾谊》五十八篇,即后世所称《新书》,今传。《史记》、《汉书》皆有贾谊传。主要事迹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

(曹道衡 王学泰)

【枚乘】(?—前140) 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濞谋为叛乱,枚乘上书谏之,吴王不纳。枚乘遂去吴归梁,从梁孝王游。及汉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濞遂与六国谋反。景帝斩晁错,枚乘由是又说吴王勿为叛乱。濞不听,卒死于乱军中。七国之乱既平,景帝闻枚乘名,召拜为弘农都尉。乘不乐为郡吏,遂称病去职。复游梁,时梁孝王客皆善辞赋,乘尤高。梁孝王卒,乘遂归淮阴。武帝立,素闻乘名,乃以安车蒲轮征之,乘年老,道卒。枚乘辞赋以《七发》为最著名。《七发》之作,《文心雕龙·杂文》以为“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唐李善《文选》注则以为“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盖当时诸侯王无不生活奢侈,《七发》之作,实有讽喻之意。《七发》文风,上继《楚辞·招魂》,下开汉大赋之体。善用比喻,而无堆砌奇字之弊。其写广陵观涛一节,尤为历代传诵之名篇。此外,枚乘又有《柳赋》,见《西京杂记》;《梁王菟园赋》,见《古文苑》,后人对二赋多取怀疑态度。枚乘散文有《谏吴王书》与《重谏吴王书》,皆见《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隋书·经籍志》谓梁有《枚乘集》二卷,亡。其辞赋、散文之存者,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又《玉台新咏》有枚乘诗九首(实为八首),皆又见《文选》,入《古诗十九首》中。学者于此多致疑,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作枚乘诗收入。主要事迹见《汉书·枚乘传》。

(曹道衡 詹颂)

【刘彻】(前156—前87) 即汉武帝。十六岁即位,在位凡五十四年。其间,内兴礼乐,外拓疆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汉武帝好文学,尤喜辞赋。即位之初,即以蒲轮征枚乘,后用司马相如、枚皋、庄忌、东方朔等辞赋家。又好音乐,立乐府、采歌谣。故辞赋、乐府诗之兴盛,实与武帝之提倡有关,亦能自为诗、赋。其《悼李夫人赋》,见《汉书·外戚传》,为世所传诵。其《求茂材异等诏》一文,因收入《古文观止》,颇为人传诵。其诗多楚歌体,以《瓠子歌》、《天马歌》、《秋风辞》为最著名,尤以见于

《文选》的《秋风辞》为代表作。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汉武帝诗凡六首,其中《柏梁台诗》盖后人伪托。主要事迹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

(曹道衡 李莉娟)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小名犬子,因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书,学击剑,汉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因好辞赋,弃官从梁孝王游,作《子虚赋》。梁孝王卒,遂归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者卓王孙设宴召之,宴席间相如鼓琴,以琴音挑王孙新寡之女卓文君,文君奔之,遂与其归成都。后相如与文君卖酒于临邛,二人亲自当垆待客。王孙耻之,分以钱财,相如夫妇乃重返成都。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以为郎,曾为武帝作《喻巴蜀檄》。后拜中郎将,使蜀,略定西南夷,作《难蜀父老》设蜀父老以为辞,以言通西南夷之理。武帝大悦。后因有人上书言其使蜀受贿,失官,居岁馀,复为郎。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赋》,武帝读之,有飘飘凌云气、遨游天地之意,盖“劝百而讽一”也。后病免官,居茂陵,武帝使人求其书,相如已死,其妻上书一卷,言封禅事,即传世之《封禅文》。司马相如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凡二十九篇。其散文除《封禅书》外多亡佚。又有文字学著作《凡将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司马相如集》一卷,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又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辞赋、散文凡十馀篇。又有《美人赋》(见《古文苑》)、《长门赋》(见《文选》),二赋是否为相如所作,历来学者颇有怀疑。司马相如为汉赋代表作家。其赋尤以《子虚上林赋》为最著,“尤以气胜”。其《大人赋》变化稍多。《文心雕龙·风骨》云:“相如赋仙,气号陵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长门赋》写弃妇悲苦之情,为后世宫怨诗之祖。其父亦颇著名,《封禅文》为旧时宫廷文学名作,《谏猎疏》因见《古文观止》,亦颇为人所传诵。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三首,但对其中的《琴歌二首》,逯疑为“殆两汉时琴工假托为之”。主要事迹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

(曹道衡 李莉娟)

【卓文君】(前179?—前117?)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富商卓王孙之女,十七岁丧夫赘居母家。司马相如落魄归蜀,一次赴卓家宴时,以琴声感动文君,遂与之私奔成都。因生活窘迫,不久同返临邛,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碍于体面,不得已分与僮仆、钱财及文君嫁时衣物,相如偕文君复往成都。后相如因作《子虚赋》,为汉武帝赏识,召为郎。《西京杂记》卷三云:“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史记》、《汉书》司马相如

传均不载此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以《白头吟》为无名氏作,并说它是“汉代的‘街头巷讴’”,与卓文君无关”。诗写得哀婉动人,可为负心者之鉴诫。事见《汉书》、《史记》司马相如传。

(陈祖美)

【刘细君】(前120?—前51?)西汉宗室江都王刘建之女,沛(今江苏沛县)人。汉武帝为联合乌孙(古族名,居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都赤谷城)抗击匈奴,元封(前110—前105)中,以约十三岁的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故又称其为乌孙公主。《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乌孙公主歌》引《汉书·西域传》曰:“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王昆莫。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其所作“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题作《悲愁歌》,骚体,写其不惯异域习俗的一腔思乡望归之情。后宣帝悯之,于甘露(前53—前50)中迎其回京。事见《汉书·西域传下》。

(陈祖美)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汉武帝初,上书自荐,令待诏公车,后又令待诏金马门,后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朔以诙谐滑稽进,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好事者或言其为仙,自属不经。所作文以《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答客难》为最著。其次则《非有先生论》。《楚辞》收其《七谏》七篇。《汉书》本传谓“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谋》、《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东》诸篇。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为一卷,然其中杂有《十洲记序》等,恐非朔作。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二首及断句三句。主要事迹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曹道衡 李莉娟)

【韦孟】生卒年不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初为楚元王刘交傅,历辅元王子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诗讽谏。后去位,徙家于邹,又作《在邹诗》一篇。二诗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评其《讽谏诗》谓:“肃肃穆穆,汉诗中有此拙重之作,去变雅未远。”《汉书》卷七三有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李陵】(?—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官至都骑尉。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以无援而兵败,遂降匈奴。单于使陵说苏武降,武不降,与陵宴饮数日。昭帝立,使使求武,武得归,陵送之,起舞,作歌一首,见《汉书·李广苏建传》。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文选》存李陵《杂诗》三首，又《答苏武书》一首。其后《古文苑》、《艺文类聚》等所收陵录别诗八首，又《升庵诗话》引《修文殿御览》所载一首，自来学者多存疑。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相传苏李诗人无名氏古诗中，总以《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为题。主要事迹见《史记·李广传》、《汉书》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东)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使于匈奴。单于欲降之，武不从，单于乃徙武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上，使牧羊，廩食不至，武掘野鼠及草实而食之。单于复使李陵说之降，终不从。昭帝立，使使求之，乃得归。拜封关内侯。后又与废昌邑王、立宣帝之谋。卒年八十馀。后宣帝图其像于麒麟阁。《文选》有苏武《杂诗》四首。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又辑《答李陵》一首(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一首(见《初学记》)。学者多以为后人拟托。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尽入无名氏古诗所谓“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中。主要事迹见《汉书·苏武传》。

(曹道衡 李莉娟)

【韦玄成】(?—前36)字少翁。邹(今属山东)人。以明经为谏议大夫，迁大河都尉。父贤病卒，袭爵扶阳侯。为河南太守。后为未央卫尉、太常。以与杨惲友善免官，又以不驾驷马车而骑至惠帝庙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作诗自劾。久之，汉宣帝召玄成，拜淮阳中尉。元帝立，为少府，迁太子太傅，历御史大夫至丞相，又作诗以戒子孙。元帝建昭三年(前36)卒。《隋书·经籍志》谓有“《韦玄成集》二卷，亡”。所存诗二首，皆四言，见《汉书》本传，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曹道衡 李莉娟)

【班婕妤】(前48?—前6?)名不详，婕妤，一作婕妤，汉代女官名，武帝始置。扶风(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一说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左曹越骑校尉班况女，班彪之姑母，班固之祖姑。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得宠。后为赵飞燕所谮，自请退居长信宫侍奉皇太后，心情悲苦，作诗赋自伤。成帝卒后，她奉守陵园，卒葬园中。今存《自悼赋》、《捣素赋》和《怨歌行》三篇。后者又题作《怨诗》、《团扇歌》。钟嵘《诗品》卷上谓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团扇》诗虽《汉书》未载，但江淹有《拟班婕妤咏扇》诗，诚如钟嵘所言，这首诗道出一般妇女情致，诗虽短小，可见她作诗之工巧。后世以这首诗所表达的被弃女子的慨叹为“婕妤之叹”，“纨扇题诗”亦被作为被弃女子之典故。事见

《汉书》卷九七下本传。

(陈祖美)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生活于东汉中期。受业太学，学毕，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他舍，乃寻访失火主人，以豕偿之，不足，乃请身为佣。邻家见鸿非常人，乃责主人而以豕还之。鸿不受，归乡里。娶同县孟氏女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后东出关，过洛阳，作《五噫之歌》。章帝闻而求之，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候光，居齐鲁间。有顷，又之吴，依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与妻相敬，举案齐眉。鸿著书数十篇，在吴又思其友高恢，作诗一首。及卒，伯通为葬于要离冢旁。今存诗三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主要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曹道衡 詹頌)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博贯载籍。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年十六入洛阳太学。至年二十三，父彪卒，乃归乡里。东汉明帝永平(58—75)初，东海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才。固奏记于苍，荐桓梁等六人于苍。固以父继《史记》后续写之西汉史未详，欲成其业。既而有人上书告固私改作国史。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乃诣阙上书。明帝召见之，具言固著述之意，令郡上其书。明帝甚奇之。召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使与陈宗等共撰《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明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馀年，至章帝建初(76—84)中，大多成书。尚馀部分表志未成，固卒后妹昭及马续成之，即今传《汉书》。《汉书》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合百篇。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包举一代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事，为我国断代史开创之作。其书记事详尽核实，多载有用之文。开以后正史断代之先例，其文亦为历来散文家所推崇，故有“《史》、《汉》”、“马、班”之称。班固亦汉代辞赋名家，前人往往并称班、扬(雄)或班、张(衡)。固之辞赋以《两都赋》为最著。其写西都部分假托西都宾盛说长安宫室壮丽及市廛繁荣、游侠豪举。其写东都部分则叙东都之制度，一归之于儒家之节俭与制度。其中心思想为歌颂汉德，然所叙两都风物人情，颇有史料价值。其文闳丽，盖取法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之作，而内容已稍趋平实。固又有《幽通赋》、《答宾戏》诸作，为抒发其仕途不得志之感慨。固自章帝时，颇得幸，时集诸儒于白虎观，议五经异同，使固撰集其事，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89—105)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

以固为中护军。宪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使固为《封燕然山铭》,此文亦奇丽可诵。及宪败,固先坐免官。后以其奴犯洛阳令种放,放怒之,会宴宪事发,遂捕系固,死狱中。《后汉书》本传云:“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七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卷。今佚。明人所辑《班兰台集》,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及断句十一首。其主要事迹见《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曹道衡 詹颂)

【傅毅】(?—90?) 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西安北)人。少博学,曾作《迪志诗》。汉章帝建初(76—84)中,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秘书。作《显宗(明帝)颂》十篇奏之,由是文名显于朝廷。车骑将军马防聘为军司马,马氏败,免官。和帝永元元年(89),为窦宪主记室。及宪迁大将军,复以为司马。其卒年约在永元二年后。傅毅之作,据《后汉书》本传谓“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二卷,注云:“梁五卷”。可见《傅毅集》至隋已不全。今并二卷亦佚。存文十三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傅毅在当时与班固齐名,其作以《文选》所载《舞赋》为最著。此赋假托楚襄王命宋玉作赋,开假托占人之先例。此赋手法已与大赋颇不同,文字较流畅,颇多精细描写,形容舞姿之进退俯仰,旋转变换,颇多精彩之笔。存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后汉书·傅毅传》。(曹道衡 詹颂)

【张衡】(78—139) 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人。少年即聪敏好学,出游长安,后至京都洛阳,入太学,“通《五经》,贯六艺”。东汉和帝永元(89—105)中,举孝廉不行,公府屡次征召亦不就。精思十年,作《二京赋》,婉言针砭当时的社会现实。安帝时,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作浑天仪。顺帝初,复为太史令。顺帝阳嘉元年(132),造地动仪。后迁侍中,遭宦官谗毁,作《思立赋》以寄情志。永和(136—141)初,出为河间相,严整法度,上下肃然。在职三年,上书请求辞职,召拜尚书。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其辞赋典雅密丽,语言清新,尤其是《归田赋》,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写归隐乐趣的抒情小赋,对后来赋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今存诗中,以《同声歌》、《四愁诗》最有名。前者五言,代表东汉五言诗的成熟;后者七言,开七言诗创作的先河。而且《四愁》明写爱情,实则抒发政治抱负,缠绵悱恻,寄托遥深,艺术造诣很高。南朝

梁刘勰论历代诗歌成就,认为在四言、五言的创作中,张衡“得其雅”,“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文心雕龙·明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及断句九首。《后汉书》卷五九有传,又汉崔瑗有《河间相张平子碑》(《古文苑》)。(许逸民)

【秦嘉】 生卒年不详。字士会。生活于东汉顺帝、桓帝时。陇西(今甘肃临洮南)人。幼丧父母。与妻子徐淑感情甚笃。嘉仕于郡上,淑有疾居家。会嘉举上计掾,当入京,将行,以车迎淑,淑因疾不克往。夫妇书函往来,复有赠答五言诗。嘉入京后,寻除黄门侍郎。居数年,病卒于津乡亭。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秦嘉报奏书二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五首,残句四。今存赠答之诗,除题为苏武、李陵之拟作外,当以秦嘉夫妇之作为时代最早。生平事迹可参阅《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曹道衡 詹颂)

【徐淑】 生卒年不详。陇西(今甘肃临洮南)人,诗人秦嘉妻。东汉桓帝时,秦嘉为郡上计吏,将赴洛阳。时徐淑病居母家,秦嘉遣车迎归,意欲暂见一面。因徐卧病,空车往还,未获面别。秦作《赠妇诗》以表缱绻,徐作诗相答,遂成伉俪彼此爱重之佳话。后秦嘉留洛阳任黄门郎,秦、徐以互寄诗、书,聊慰睽隔。数年,秦嘉病卒于津乡亭。时徐淑犹年少,兄弟打算让其再醮,她毁形不嫁,终生寡居。钟嵘《诗品》卷中评秦嘉夫妇其事其诗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叙别之作”,即指现存徐淑《答秦嘉诗》。钟嵘则谓其次于班婕妤所作之宫怨诗《团扇》。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秦嘉书》二文见《艺文类聚》;《答秦嘉诗》见《玉台新咏》卷一。事见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一引严可均《铁桥漫稿》。(陈祖美)

【郗炎】(150—177) 字文胜。范阳(今河北定兴南)人。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能服其理。东汉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后风病慌忽。遭母忧,痛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系狱。炎不能理对,灵帝熹平六年(177)死狱中。炎作诗二首,皆五言,在东汉诗中颇见文采。《隋书·经籍志》谓梁有《郗炎集》二卷,录二卷,亡。今存文五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后汉书·文苑》本传。(曹道衡 詹颂)

【赵壹】 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体貌魁梧,身長九尺,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后屡抵罪,几死,友人救之得免。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到洛阳。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

数百人皆拜庭中，壹独长揖而已。逢怪而让之，壹对曰：“昔郿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遂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既出，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乃日到陟门，陟强许见之，而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遂哭。陟知非常人，乃起与语，大奇之。明日大从车骑谒壹，与谈至夕，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壹西还，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后汉书》本传谓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谓梁有《赵壹集》二卷，录一卷，亡。今存文七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赵壹赋以《刺世疾邪赋》为最著，此赋朴素平易，自成一格，揭露世态，感慨甚深。所附诗亦平易少雕饰，清新刚健，在东汉诗中不失为名作。主要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曹道衡 詹颂)

【辛延年】 东汉诗人，生平不详。作《羽林郎》一首，见《玉台新咏》卷一，记霍家奴调笑胡姬事。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曹道衡 李莉娟)

【蔡邕】(132—192) 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擅辞章，精通音律。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辟司徒桥玄府掾。出补平阿长，又召拜郎中，迁议郎。熹平四年(175)，参预正定《六经》文字，自写经文刻碑立于太学门外，观摹者填塞街陌。此即后世所称“熹平石经”。光和元年(178)，以上书弹劾宦官，被诬下洛阳狱，流徙朔方。次年，遇赦，畏谗不敢还乡，亡命江海，在吴十二年。中平六年(189)，董卓为司空，辟补侍御史，累迁侍中。献帝初平元年(190)，拜左中郎将，故后世称之为“蔡中郎”，封高阳乡侯。董卓被诛，邕被捕。上书辞谢，愿黥首刖足，以余生继续撰成《后汉书》，不可，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所著诗赋、碑铭等凡百四篇传世，后人辑为《蔡中郎集》。今存诗六首，以《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最著名。主要事迹见《后汉书·蔡邕传》。

(许逸民)

【孔融】(153—208) 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世孙。有高名清才，且性宽容少忌，为时论所重。东汉灵帝中平(184—189)中，官至虎贲中郎将。中平末，董卓入京，以融不肯阿附，出为北海相。献帝迁许，征为将作大匠，作六言诗三首赞美曹操。后操擅权渐著，融不能堪，议论书函，言辞激切。终被操使路粹诬奏杀之。年五十六。融不长于诗而长于文，文气遒劲。《后汉书》本传记其所著诗、颂、论、议等凡二十五篇。《隋

书·经籍志》载《孔融集》九卷，已佚。张溥辑有《孔少府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文一卷，三十九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作五首。主要事迹见《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王粲传》注引《续汉书》。

(曹道衡 李莉娟)

【曹操】(155—220) 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本姓夏侯，为宦官曹腾养子，东汉灵帝时买官至太尉。曹家虽然富贵有权势，却为世族高门所鄙视，曹操后来亦反对宦官干政。二十岁时受州郡举荐，以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以骑都尉随皇甫嵩等镇压黄巾有功，迁济南相。又参加西园新军，担任典军校尉。在讨伐董卓以及各派军阀的混战中，不断壮大势力。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受封丞相。至此已先后消灭陶谦、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割据集团，平定了三郡乌桓，大抵统一了北方。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进号魏王。次年，设天子旌旗乘舆，并立曹丕为太子，实际上已代汉自立。延康元年正月，病死洛阳，年六十六。当年十月，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曹操一生与诗文结缘，鞍马为文，横槊赋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本纪裴注引《魏书》)。今本《曹操集》存诗十六题二十二首，都属于拟乐府诗。四言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感世忧怀，抒写壮志未酬之苦闷，语句流转，音调壮阔，其源出于《诗经》，而又能于《三百篇》之外自开奇响。五言如《薤露》、《蒿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反映社会离乱和人民苦难，写来情景相生，慷慨悲凉，亦为文人五言诗之佳作。另如《陌上桑》、《秋胡行》等篇，叹逝嗟生，追慕神仙，情绪偏于消极，但也时时露出“忧世不治”的怀抱，反映出其思想上的矛盾冲突。运用乐府古题描写现实生活，不拘旧题声调的限制，继承和发扬《诗经》及汉乐府民歌之创作精神，此为曹操对于建安诗坛的贡献。主要事迹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许逸民)

【陈琳】(156?—217) 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汉灵帝末年，任大将何进主簿。后入袁绍幕，掌书记，作《武库赋》、《应讥》，曾为绍作檄文，历数曹操豺狼野心，孤弱王室，并斥操祖、父。后袁绍及其子尚相继兵败，琳为曹军俘获。操爱其才，不罪，使与阮瑀并为司空军谋祭酒，军国书檄，多出二人之手。后徙丞相门下督。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操征乌桓，琳作《神武赋》。建安十三年，从操南征，在江陵与王粲等同作《神女赋》。其后屡从操出征。建安二十年，与曹丕、王粲

在孟津同作《柳赋》。建安二十二年冬,遇疫卒,年六十左右。琳早著文名。曹丕《典论·论文》称琳“表章书记,今之隽也”。《隋书·经籍志》录《陈琳集》十卷,佚。明人杨德周辑其遗文为《陈孔璋集》,见《汇刻建安七子集》,然所录是否尽为琳作,尚有疑问。《全后汉文》录其文十九篇,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最为历代所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其诗五篇。《饮马长城窟》为其名作,宋长白《柳亭诗话》、刘熙载《艺概》俱以为下开鲍照之先河。今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录陈琳诗文,较前人又有增补。其主要事迹见《三国志·王粲传》及注。(沈玉成 李莉娟)

【刘桢】(?—217) 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十岁前即能诵《论语》及诗赋数万言,警悟辩捷,人有所问,应答如响。早有名于青州、徐州一带,故曹植《与杨德祖书》言“公幹振藻于海隅”。献帝建安(196—219)初,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建安十三年(208),操军南征,桢随行。十六年,曹丕尝宴请诸文学,酒酣令甄夫人出拜,众人皆俯伏,独桢平视。曹操闻之,怒,议死,减一等,输作磨石。操曾往服役现场,问:“石何如?”桢乃以石自喻,言“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操乃赦之。入平原侯曹植府为庶子,后又转于曹丕府,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尝于漳水之滨养疾,丕往视之,有诗赠答。建安二十二年遇瘟疫,卒。年约五十馀。桢气褊性傲,学博才高,诗文兼善。曹丕《与吴质书》言“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诗品》列公幹诗为上品,称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气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以今存之五言诗观之,刘诗质直骏爽,不重词采,钟氏所评,的为确论。其《赠从弟》三首、《赠徐幹》颇为后世所称诵。刘氏原有集四卷,已佚,明人辑其遗文编为《刘公幹集》。今人俞绍初所编《建安七子集》中辑存其文十一篇,诗十三首,并佚句。另有《毛诗义问》十卷,佚,后世有辑本。其传记资料见《三国志·王粲传》注,并参阅《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沈玉成 王学泰)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建安七子”之一。幼有异才,受到蔡邕赏誉。年十七,诏除黄门侍郎,适值战乱,遂不应征召而往依刘表。在荆州十六年,不为刘表重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归曹操,授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魏国建,为侍中。建安二十一年,从曹操征吴,翌年春病卒于道,时年四十一。以博物多识、才思敏捷著称,长于诗赋,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其诗局面阔大,情感真挚。代表作《七哀诗》感时伤乱,尤深沉而警策。论其成

就,钟嵘认为粲颇能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植)、刘(桢)间别拘一体,方陈思(曹植)不足,比魏文(曹丕)有馀”(《诗品》卷上),方东树则认为王氏诗文“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有《王粲集》。《三国志》卷二一有传。(许逸民)

【繁钦】(?—218?) 字休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能文有辩才,早年有名于汝、颍间,东汉末中原战乱,钦避乱于荆州,荆州刺史刘表颇重其才,而钦以表非雄才大略之主,后归曹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为丞相府主簿,从操南征。十四年,作《撰征赋》,记赤壁之役后,水军入淮情状。建安十六年,从操西征,在长安作《建章凤阙赋》。建安十七年,与曹丕作书赠答,甚称其美,建安二十三年,卒。钦长于书记,亦善诗赋,存诗八首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定情诗》是其代表作品,此篇为建安时期最长之文人五言诗,诗中以女子口吻自述与人相爱,不久被弃悲而自悔。此篇文辞巧丽,回环宛转、凄恻动人。其传记资料见《三国志·王粲传》注,并参阅《中古文学系年》、《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沈玉成 王学泰)

【蔡琰】(177—?) 字文姬,又作昭姬。原籍为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其父蔡邕,字伯喈,曾拜左中郎将,史称蔡中郎,文姬为其独生女。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七月,蔡邕任议郎,应密诏,因讥刺宦官获罪入洛阳狱,原判“弃市”,中常侍吕强为之求情,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时文姬约一岁。邕于光和二年四月被赦,旋即得罪于宦官集团,又“亡命江海十二年”。“亡命”结束时,文姬已十四五岁。在她不满十六岁时适河东人卫仲道。在此期间,董卓乱起,蔡邕被任为左中郎将。董卓于献帝初平三年(192)被诛,蔡邕亦被问罪,并于同年夏瘐死长安狱中。文姬初嫁当在父亡前夕,十六至十八岁间,因夫亡无子便归宁原籍。迄献帝兴平(194—195)间,亦即文姬十八九岁时为乱军所掠。后成为南匈奴左贤王之妻,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建安十三年(208),被丞相曹操以金璧赎回,即所谓“文姬归汉”。后当是曹操作合,嫁与屯田都尉董祀。其五言《悲愤诗》当是被适董祀后追忆而成。董祀犯罪当死,文姬亲诣曹府为之求情,其“音辞清辩、旨甚酸哀”,曹为之动容,追回成命,董祀免于死。时值天寒,曹操赐“蓬首徒行”之文姬以头巾履袜,并询及:“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答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忆诵,裁四百馀篇耳。”曹操欲命人为其抄写,文姬以男女有别不能亲授谢绝。曹操予以纸笔,文姬以“真草”“缮书送

之,文无遗误”。鉴于文姬归汉后,对整理其父文籍所作巨大贡献,后人因以“中郎有女堪传业”誉之。题名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即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的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以及见于宋朝朱熹、郭茂倩分别编次的《楚辞后语》和《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此三者不仅均系于蔡琰名下,所写亦大抵是她的身世,但是否为蔡琰所作,自北宋苏轼以来即有异议。苏轼以与史实不合和“东京无此格”为由,否认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而吴闿生却谓其为文姬肺腑中言,绝非伪托。文学史界基本肯定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而以骚体《悲愤诗》与蔡琰身世多有不符,当出于晋人伪托。关于《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从宋朝至今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五言《悲愤诗》从开头的“汉末失权柄”至“乃遭此厄祸”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中,确有与史不合之处。但诗艺与史有别,不宜据此而疑其为伪作。此诗最成功处乃在写母子之别情和末段对人物命运的“点化”,特别是被张玉穀称为“总束通章”的“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折》)的末二句,更道出了“一生抱恨常咨嗟”(王安石语)的封建时代大多数妇女的悲剧命运。蔡琰事见《后汉书·董祀妻传》和曹丕《蔡伯喈女赋·序》。(陈祖美)

【徐幹】(171—218)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建安七子”之一。幼年时即能诵文数十万言。年未二十,已能发言成章,操笔成文。时值东汉灵帝末,朝廷昏乱,门阀子弟竞相奔走权门,以求仕进,幹鄙之,闭门自守,精研经学天象。献帝即位,董卓作乱,幹避乱居今胶东高密一带。乱平,归居于临菑。州郡牧守令其出仕,幹乃避居山谷。献帝建安十年(205),幹始应召入曹操幕,为司空军谋祭酒。建安十三年,从曹操南征,预赤壁之役。建安十六年,曹丕受封五官中郎将,幹为五官将文学,侍曹丕、曹植游宴,并与建安诸子过从。建安十八年前后,以疾病转剧,乃退居穷巷,淡泊自甘,潜心著作《中论》二十二篇。建安二十三年二月,遇疫卒。年四十八。幹少无宦情,又体弱多病,强起入仕,急流勇退。曹丕《与吴质书》称其“怀文抱质,恬性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典论·论文》谓“王粲长于诗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刘勰《文心雕龙》论徐幹,有“伟长博通,时逢壮采”(《诠赋》)之语。今存诗以《室思》“自君之出矣”四句韵味深长,后人多所拟作。《中论》为论说文体,文气雍容如其人。《隋书·经籍志》录有《徐幹集》五卷,宋以后散佚。《中论》今存二十篇,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今存诗四篇九首,文十篇,分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

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又稍有增补调整。《建安七子集》收入“附录”。主要事迹见《三国志·王粲传》及注,参阅《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沈玉成 詹颂)

【阮瑀】(?—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汉献帝建安三年(198)或稍后,曹操招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徙丞相仓曹属。建安十六年,从操西征,奉命作书与韩遂,于马上草成,操无所改定。建安十七年,病卒。曹丕、曹植、丁仪等作《寡妇赋》悼之。王粲有《阮元瑜诔》。瑀长于书记,曹操书檄,多出陈琳、阮瑀之手。曹丕《典论·论文》称“琳、瑀之表章书记,今之隽也”。《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文选》所选录。有集五卷,佚。明人辑其遗文为《阮元瑜集》,有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张溥《汉魏六朝三百家集》本。今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稍有校补。今存文九篇、诗十二首。主要事迹见《三国志·王粲传》及注,参阅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在《建安七子集》中)。

(沈玉成 李莉娟)

【应玚】(?—217) 字德琰。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约于汉献帝建安初入曹操幕为掾属,曾预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建安二十二年冬,遇疫卒。玚于建安七子中成就稍弱,曹丕《典论·论文》谓其文“和而不壮”。其《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一诗多为论者所称,因其以孤雁自比,别标一格。《隋书·经籍志》记其文、赋五卷。今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十九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又稍有增补。主要事迹见《三国志·王粲传》及注,参阅《中古文学史料考略》。(沈玉成 李莉娟)

【仲长统】(180—220) 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县北)人。性倜傥,不拘小节,敢直言,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尚书令荀彧闻其名,邀至许昌,举为尚书郎,后为曹操丞相参军,又还为尚书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卒。仲长统生当乱世,有志不伸,愤世嫉俗,意在高蹈而终不忘世事。推崇崔寔《政论》,并自撰《昌言》三十四篇,十万餘言。友人缪袭在其身后为之编定为十二卷,后散佚。今所见辑本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最为完备。存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后汉书》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曹丕】(187—226) 即魏文帝。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二子,曹植同母兄。八岁能属文,知骑射。稍长,遂博贯经史诸子百家,又善击剑、弹棋。汉献帝建安二年(197),从征张绣,兵败,乘马得脱。建安九年,操军攻破邺城,丕入袁绍府,纳甄氏。次年夏,与吴质、刘桢等诸文士大会于

南皮,高谈经史文章。建安十三年,从曹操南征刘表、孙权。操于建安十五年春,返邺,整顿休息,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丕以世子之尊,与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玚兄弟、杨修、吴质等往来宴饮游乐。每有所赋咏,辄令诸文士同作,遂开我国文学史中文人倡和之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为魏国太子。延康元年(220)正月,继位为魏王,十月,汉献帝禅位于丕,改元黄初。在位七年,遇诸弟极为苛刻,毒毙曹彰,于曹植亦屡欲加罪。三次征吴,皆无功而返。黄初七年(226),病卒。年四十。曹丕为建安文坛领袖,虽才逊乃弟,亦不失“博闻强识,才艺兼该”(《魏志·文帝纪》)。丕之诗作,以《燕歌行》最为后人所称;散文书启亲切畅达,辞赋则无多足称。成书于建安末之《典论》五卷,为综合之论文集,《隋书·经籍志》入子部儒家类,佚。今《自序》、《论文》尚存全貌,其他篇目间存佚文。《典论·论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单篇论文之昉始,于文学价值、作家个性、作品风格体裁等均有独到见解;《与吴质书》主要亦论文学及当时作家,可为《典论·论文》之补充。《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二十三卷,又有《列异传》三卷,《士操》一卷,均佚。明张溥辑录遗文,为《魏文帝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丕尝命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为我国类书之祖。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其文为五卷(中含《典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四十余首。主要事迹见《三国志·文帝纪》,参阅《中古文学家考略》。(沈玉成 詹颂)

【何晏】(189?—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父早亡,母尹氏为曹操所纳,晏被收养,为操所爱。曹丕恶之,呼之为“假子”。魏齐王正始(240—249)年间依附曹爽,任散骑侍郎,迁侍中、吏部尚书。后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晏亦被杀。晏好道家之言,服五石散,与王弼等倡导“三玄”,主“贵无”之论,开清谈之风,后人并称“正始名士”。又能文。与孙邕等撰《论语集解》十卷,今存。《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景福殿赋》等文十四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诗二首及佚句二。主要事迹见《三国志》本传。(沈玉成 李莉娟)

【应璩】(190?—252)字休琬,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应玚弟。弱冠即为曹丕所赏。曹丕代汉后,官散骑侍郎。后迁散骑常侍、侍中。魏齐王正始(240—248)中入曹爽府为长史。作《百一诗》,讥切时事,众皆惊愕。诗传于世。曹爽被杀后复为侍中,参与著《魏书》。嘉平四年(252)卒。赠卫尉。《隋书·经籍志》录璩有集十卷,佚。明人张溥集有《应休琬集》一卷,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璩善书记,《文

选》录其《与满公琰书》等四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二十九篇。其《百一诗》,《文选》存一篇,《诗纪》补辑二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辑得其大批残句,皆以之为《百一诗》佚文。惜今日无由见其全貌。主要事迹见《三国志·王粲传》注。

(沈玉成 李莉娟)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同母弟。早慧,年十馀岁,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本传)。青年时期曾随曹操南征北讨,文才勃发,兼有武略,深得曹操宠爱,有意立为太子。但他生性任诞,不自雕砺,终于丧失了与曹丕竞争魏太子的机会。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丕称帝,曹植备受猜忌,屡遭贬爵,数次改换封地。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临菑侯降为安乡侯;黄初二年,改鄄城侯;三年,进封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明帝即位后,处境略佳,但仍未得到重用。明帝太和元年(227),徙封浚仪;太和二年,复还雍丘;太和三年,又徙东阿;太和六年,以郡为国,封陈王,十一月病死,年仅四十一岁。谥思,后人称陈思王。其文学业绩博大而精深,无论诗歌、辞赋、骈文、散文,皆得心应手,不乏佳作。钟嵘《诗品》列其诗于上品,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视之为诗中圣贤,可谓推崇备至。植“生于乱,长于军”,生活阅历丰富,加以后期遭受压抑,感慨丛生,因而多数诗篇写得情感真切、寄寓深刻。建安时期生活于邺城,正值华年,游燕极多,作诗多为应酬,只有《泰山梁甫吟》写北征感受、《送应氏》写乱后惨景较有现实意义,其余则嫌华而不实。黄初时期植“举挂时网”,动辄得咎,所作直抒胸臆,忧愤沉痛,诗思愈见峻拔。如《赠白马王彪》揭露王室内倾轧,《七步诗》控诉手足相残,《种葛篇》隐喻委曲求全之想等,无不悲痛缠绵。太和时期名位渐高,遂多忧生之嗟,而希冀从政报国,但亦不免有迟暮之感和游仙之思。《惟汉行》、《喜雨》、《飞龙篇》、《桂之树行》等篇,即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曹植的诗歌艺术造诣高,在诗歌发展史上贡献颇多,大致有三:(1)拓展了诗歌表现之范围。举凡抒情述志、咏史叙事、摹景状物、赠答酬唱,几乎无所不写。(2)集文人五言诗之大成。建安诗人如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皆以长于五言著称,而流转自如、情辞并茂、形制灵活、手法多变,不能不推曹植为第一。(3)变汉乐府为魏乐府。汉乐府采自民间,质朴俚俗。曹植取其体制与技巧,加以藻饰,使格调趋于高雅,文词趋于整丽,一变而为士大夫人的

咏怀诗。明王世贞说：“子建才敏于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质。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转引自《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正指出了他在汉魏乐府嬗变中的枢纽作用。南北朝作家崇拜曹植“才高八斗”，折服于其“词采华茂”。自唐以来，倡言“汉魏风骨”，又赞誉其“骨气奇高”。不论如何，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员主将，他在诗歌领域里的创造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三国志》卷十九有传。（许逸民）

【曹叡】（205—239）即魏明帝。字元冲。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曹丕长子。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封齐公。黄初三年，封平原王。黄初七年，丕病笃，始立为太子，继皇帝位，曹真、司马懿、陈群等受遗诏辅政。在位奢华，大治宫室，耽于女色，好猎，民杀禁地鹿者诛死。景初三年（239），卒。叡虽率性任心，然沉毅有决断，大臣纵直谏犯颜，不加诛戮。博闻强记，提倡文学，青龙四年（236），置崇文观，征召文士充之。又下诏收录曹植遗文。叡能诗，钟嵘《诗品》列入下品，后人因称操、丕、叡为“魏氏三祖”。有集九卷，佚。诗文殊乏精采，不能与父、祖匹敌。今所存诗均为乐府，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存文多为诏令，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三国志·明帝纪》。

（沈玉成 詹颂）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早年博览群书。曾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因为时值魏晋之交，世事纷扰，名士多遭受杀戮，于是采取隐遁避祸之生活态度，登临山水，酣饮为常。魏齐王曹芳正始三年（242），三十三岁才勉强出为吏，又为尚书郎，因病免职。正始八年，复被召为参军，不久，托病告归。嘉平元年（249），魏太傅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嘉平四年，复为魏大将军司马师从事中郎。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254），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正元二年，拜东平相，十数日辞去。魏元帝景元三年（262），求为步兵校尉。次年冬卒，年五十四。后人称阮步兵。明人辑其诗文为《阮嗣宗集》。今存诗统名《咏怀》，计五言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此集非一时所作，其中或嗟生，或忧时，或愤世，或嫉俗，内涵丰富，寄慨遥深，充分表现了阮氏既不满黑暗现实，反对礼教束缚，又想保全性命、独善其身的矛盾心理和复杂的思想状况。限于当时政局险恶，处世维艰，其诗虽也有慷慨之气，但笔法曲折隐晦，有时依托草木鸟兽，有时假借典故史实，往往通过“比”、“兴”和以古喻今的艺术手段来表达深沉的意蕴。阮诗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外”（钟嵘《诗品》卷上），“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文选注》引颜延之语）。

阮籍从生活之夹缝中找出了一条抒情述志的道路，其创作经验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晋代其他作家以及唐陈子昂、李白等的感怀诗中，我们都可以觉察到阮籍的深远影响。《三国志》卷二一、《晋书》卷四九有传。（许逸民）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末，州举秀才，累迁弘农太守、散骑常侍，封鹑觚男。入晋，进封子爵，加驸马都尉，迁侍中。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为御史中丞。泰始五年，迁太仆。后转司隶校尉，以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免官。卒于家，年六十二。谥曰刚。天性刚劲峻急，不能容人之短，但为诗却新温婉丽，善言儿女情怀。晋代郊庙乐歌多出其手，大抵长于乐府而短于古诗。《豫章行·苦相篇》、《秦女休行》为其名篇。前者代女子明其苦，设身处地，入情入理；后者写烈妇复仇，“音节激扬，古质健劲”（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有《傅鹑觚集》。《晋书》卷四七有传。（许逸民）

【刘伶】一作刘灵。生卒年不详。字伯伦。沛国（今江苏沛县一带）人。魏、晋间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形貌丑陋，淡默少言，放情肆志而不措意于文翰。在家脱衣裸袒，人讥责之，伶以“吾以天为屋，屋为衣，君不当入我裨中”为辞。好酒，妻泣谏之，伶谓当祝鬼神，自誓戒绝。妻具酒肉，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饮酒食肉。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晋武帝泰始初，对策，言无为之治，以无用罢官。后以寿终。今存《酒德颂》一篇，见《文选》卷四七，《北芒客舍诗》五言一首，见《艺文类聚》卷七。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孙楚】（218？—293）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早年恃才傲世，爽迈不群。年四十馀，始为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后迁著作佐郎，复参石苞骠骑军事。与苞构隙免官，湮废积年。入晋，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骏起为参军，转梁令，迁卫将军司马。惠帝初，为冯翊太守。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卒，约七十馀岁。其诗以《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见称，《宋书·谢灵运传论》赞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诗品》亦因此而将孙楚列为中品。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玄言入诗是孙楚的创变，唯骨力尚健，故与后来孙绰、许询所作不同。有《孙冯翊集》。《晋书》卷五六有传。（许逸民）

【嵇康】（223—263）字叔夜，谯国铨（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早年孤贫，有奇才，美风仪，励志向学，博览该通。娶魏宗室曹林（曹操孙，封沛穆王）女长乐

亭主为妻(《文选·恨赋》注引),拜中散大夫。隐居山阳二十年,与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交游,当时号称“竹林七贤”。魏末,司马氏擅政,由于嵇康为曹门之婿,政治上不与司马氏合作,颇遭疑忌。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友人吕安被其兄诬诉下狱,康为之居中辩护,竟受牵连,横遭拘捕。钟会与之有前嫌,从而构陷。尽管数千太学生为之请命,要求赦免,拜之为师,但终于不免于死。临刑,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义,时年四十。有《嵇中散集》十卷。他的文章以“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著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对于虚伪的名教大胆提出怀疑和批判。其诗则以“托喻清远,良有鉴裁”(钟嵘《诗品》卷中)见长,不过有时略嫌“讪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同前)。如《幽愤诗》长达八十六句,回顾平生,自怨自艾,即痛心于“有志不就”,又寄望于“采薇山阿”,激愤之情,一览易识。又如《赠秀才入军》十八首,文约意广,兴象生动,写春光月色,清雅不俗。前人认为这一类四言诗学习《诗经》而不为所羁,故能高出潘(岳)、陆(机)之上。(清何焯《文选评》语)他如五言诗《与阮德如》,词藻富丽,情意率真;《占意》,前半多比兴,后半多用典,慷慨悲切,矫健低徊;六言诗《思亲》、杂言诗《秋胡行》,也都在质朴哀婉中有清新之气。这种清峻隽侠的诗文风格,相对于何晏之流的浮浅空泛来说,不愧是“正始文学”的强音。《晋书》卷四九有传。

(许逸民)

【裴秀】(224—271)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好学,八岁能属文,时人号“后进领袖”。魏齐王芳正始(240—248)中,母丘俭荐之于曹爽,爽辟为掾。正始九年(248),迁黄门侍郎。嘉平元年(249),爽诛,以故吏免从坐。顷之,为廷尉正,司马昭安东司马、卫将军司马,迁散骑常侍。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屡命裴秀、王沈于东堂讲宴作文,号秀为“儒林丈人”。然秀依附司马氏,为司马昭心腹之一,晋室开国功臣。司马炎代魏,封巨康郡公。以服寒食散,病废于家。迁司空。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卒。谥元。秀洽闻广识,有集三卷,著《易论》、《乐论》,又以《禹贡》山川地名,年代久远,多有变易,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上,藏于秘府,均佚。今存文四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三篇,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詹颂)

【枣据】(230?—289?)字道彦。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北)人。本姓棘,其先人避难,易姓为枣。据美容貌,通识,兼资文武。弱冠为大将军司马昭辟为掾属。出为山阳令,有政绩。入为尚书郎,转右丞。

依附贾充。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大举伐吴,以贾充节制诸军,充请据为从事中郎。次年,军返,徙黄门侍郎。太康三年(282)前后,迁幽州刺史。入为太子中庶子。太康末,卒。年五十馀。著诗、赋、论四十五篇,遇乱多亡失。今存文五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及断句九首。其《杂诗》一篇为《文选》所录。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詹颂)

【成公绥】(231—273)字子安。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有俊才,辞赋甚丽。时人以其贫贱,不重其文,张华见之,叹服以为绝伦。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华荐绥于太常,为博士。历秘书郎,转秘书丞、骑都尉。入晋,官中书郎,每与张华受诏并为诗赋。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卒。《文心雕龙·才略》称“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赋作最著者为《啸赋》,为《文选》所录。其诗稍有韵味,成就逊于赋。《隋书·经籍志》录其集十卷,佚。明张溥辑其遗文为《成公子安集》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续有辑补。主要事迹见《晋书·成公绥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出自庶族。魏末以郡守鲜于嗣之荐,为太常博士,历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中书郎。司马炎代魏为帝,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晋初重庙堂乐章,多出傅玄、张华之手。因与伐吴密谋,进广武县侯,出任幽州都督。屡因被忌而贬官,后与诛楚王玮,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时贾后与贾谧专权,以华庶族而有谋略,无逼上之嫌而负重望,乃倚之政事。华惧贾氏之盛,作《女史箴》。进封壮武郡公,拜司空。其子劝其逊位,华恋不忍去。后赵王伦矫诏废贾后,张华亦被杀,夷三族。时年六十九。华位崇望高,为晋初文坛祭酒。喜奖掖文士,其所称引、交接者,有陆机兄弟、左思、成公绥、陈寿、褚陶、张轨、刘聪等,皆一时之选。藏书之富、见闻之博,世莫与比。著《博物志》十卷,佚,今所见本系出后人辑集。今人范宁有《博物志校证》。又尝为东方朔《神异经》作注。华工诗能文,《诗品》列入中品,称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今所见遗诗,《情诗》五首语浅情深,是为“儿女情多”之代表。其乐府《轻薄篇》、《博陵王宫侠曲》、《游猎篇》等,亦能华缛俊爽。《文心雕龙·章表》云:“晋初笔札,则张华为雋。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惜让公表今已不存。有集十卷,佚。明人张溥辑为《张茂先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诗》又续有辑补。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张翰】 生卒年不详。字季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有清才,博学。善属文,挥笔即成,文藻新丽,性纵任不拘,时号“江东步兵”。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六月,齐王冏辟之为东曹掾。时皇族攻伐,乱象已明,翰欲求退。时秋风起,托言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谓人生贵得适意,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不告而归,著《首丘赋》。俄而冏被杀,人皆以翰为见机。怀帝永嘉六年(312)后,遭母忧,哀毁过甚而卒,年五十七。其《首丘赋》佚,《杂诗》一首为《文选》所录,亦为《诗品》所称。《文心雕龙·才略》称其“辨切于短韵”。今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文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识鉴》及注。

(沈玉成 李莉娟)

【邹湛】(?—299?) 字润甫。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少以才学知名。仕魏为通事郎、太学博士。入晋,武帝泰始(265—274)初,转尚书郎、廷尉平。咸宁(275—280)中,入羊祜幕,深为祜所器重。入为太子中庶子。太康(280—289)中,授散骑常侍。出补渤海太守。惠帝初转太傅杨骏长史。骏诛,坐免官。寻起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少府。惠帝元康(291—299)末,卒。湛撰有《周易统略》五卷,佚。《晋书》本传谓其有诗及论事议二十五首,为时所重。《隋书·经籍志》记其集三卷,佚。今仅存残文一,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游仙诗》残句四,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何劭】(236—302) 字敬祖。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晋武帝总角交好。武帝即位,为散骑常侍。以受贿被劾,武帝亦曲为之宥。武帝太康四年(283),丁父忧,嗣爵朗陵公。太康末,迁中书令,受命作遗诏,令杨骏辅政。惠帝即位,为太子太师。惠帝永宁元年(301),迁太宰。十二月,卒。谥康。劭累世通显,穷极骄奢,日食四方珍贵,然尸位不贪权势,终得保富贵。能诗文,《诗品》列入中品;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称其《游仙诗》为“正体”,而郭璞诗为“变体”。有集二卷,佚。今存文《王弼传》等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游仙诗》等三首为《文选》所录。主要事迹见《晋书·何曾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傅咸】(239—294) 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傅玄子。晋武帝泰始(265—274)中,举孝廉,拜太子司马,兼司徒掾属。咸宁(275—280)初,

袭父爵。累迁侍御史、尚书右丞。咸宁五年(279),出为冀州刺史,以继母不肯随同之任,表请解职。顷之,迁司徒左长史。与潘尼善。以奏免司徒魏舒姻亲夏侯骏,忤舒,转车骑司马,迁尚书左丞。惠帝即位(290),杨骏辅政,惮咸,欲出之,以李斌谏,乃止。次年,杨骏诛。转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遭母忧,起为议郎长兼司隶校尉。惠帝元康四年(294),卒。谥贞。咸以风节称于时,能文。《晋书》本传言其诗文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咸所存辞赋为数甚多,亦不尚绮丽。钟嵘《诗品》以之入下品,称其“繁富可嘉”。就今存诗作观之,类多质木。有集三十卷,佚。今存文七十六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八首并残句,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詹颂)

【夏侯湛】(243?—291) 字孝若。谯(今安徽亳县)人。世为曹魏豪门。湛有才,善构新词。貌美,与潘岳友善,京师誉为“连璧”。魏末,为太尉掾。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与挚虞等同举贤良,对策中第,授郎中。后选补太子舍人,以山涛荐,转尚书郎,出为野王令,后内迁中书侍郎。太康(280—289)中,出补南阳相。以家艰乞还。太康十年(289),起为太子仆,未之官而武帝卒。惠帝即位,授散骑常侍。惠帝元康元年(291)五月,卒。湛博学,文擅众体。《晋书》本传记其著论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隋书·经籍志》录其有《新论》十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有辑佚。有集十卷,佚。今存诗十首,其《周诗》意在补《诗经》中《南陔》等逸诗六篇,今存一篇。所存《山路吟》、《春可乐》等骚体杂言九篇,文体介诗赋之间,影响及于东晋南朝湛方生、谢庄、沈约等。存诗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湛赋作今存二十五篇,于魏晋作家中居前列,所存赞、传、碑、铭及论文等近二十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文学》。

(沈玉成 詹颂)

【潘岳】(247—300) 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东)人,徙居巩县(今属河南)。幼以奇童见称。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司空荀颢辟为掾属。因才名冠世,为众所嫉,滞官十年不迁。直至咸宁四年(278),始被召为太尉贾充的掾属。咸宁五年,出为河阳县令。四年后转怀县令。约在太康六年(285),调补尚书度支郎。惠帝永熙元年(290),为杨骏太傅府主簿。杨骏死后免职,不久又选为长安令。元康六年(296)前后,闲居洛阳,依附贾谧,与陆机、左思号为“二十四友”。元康七年,为著作郎。元康九年,迁给事黄门侍郎。永康元年(300),被诬与石崇等阴谋奉

淮南王、齐王作乱，遇害。《晋书》传赞说：“岳实含章，藻思抑扬。趋权冒势，终亦罹殃。”颂其文思而鄙其为人。诗文重辞藻，妍巧绝丽，有“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语）、“陆（机）才如海，潘才如江”（钟嵘《诗品》卷上）之誉。又善写哀绝之情，悲而不壮，哀而不怨，但殊少社会意义。诗以《悼亡》三首、《河阳县作》二首为佳。有《潘安仁集》。《晋书》卷五十五有传。（许逸民）

【潘尼】（247？—311？）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少有清才，性静退不竞，惟以勤学著述为务。太康五年（284）左右，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出为高陆令。太康十年，为淮南王允镇东参军。惠帝时，授太子舍人。出为宛令，在任宽而不纵，勤于政务。征入为尚书郎，转著作郎。惠帝永康元年（300），赵王伦政变，孙秀专政，潘岳被杀，尼称疾请假扫墓。次年，齐王冏起兵讨伦，尼乃赴许昌，冏引为参军，兼管书记。事平，尼受封安昌公。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迁太常卿。怀帝永嘉四年（310）冬，刘曜攻洛阳，尼携家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约于次年病卒于坞壁。年六十馀。尼与从叔潘岳俱以文章见知，时号“两潘”。《诗品》列入中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称其“手笔高苍，情绪警切，而轨于雅正”。有集十卷，佚。明人辑集遗文，张溥有《潘太常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今存诗二十七首并残句，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二十六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晋书·潘岳传》、《世说新语·政事》注。（沈玉成 詹颂）

【石崇】（249—300）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为荆州刺史时，劫掠运使商客，乃益豪富。有别业在洛阳城南郊金谷涧。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崇与文士三十人送征西大将军王弼于金谷，昼夜游宴，并各赋诗。集为《金谷集》，崇作序以记。后与潘岳等二十四人谄事贾谧。号“二十四友”。永康元年（300），赵王伦政变，贾谧被杀。伦嬖人孙秀使人求石崇之歌妓绿珠，崇不与，秀乃劝伦收杀之。崇财产丰积，富侔人主，穷极奢侈，临刑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有集六卷，佚。今存文八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思归引序》、《金谷集序》叙庄园规模、景物及当时文士聚会，为重要史料。《诗品》列之入中品。今存诗八首，残句四，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思归引》、《明君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称其“情质未离，不在潘、陆下”。主要事迹见《晋书·石苞传》。

（沈玉成 李莉娟）

【曹摅】（？—308）字颜远。谯国谯（今安徽亳

县）人。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调补临淄令，决狱明审。晋惠帝中，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与欧阳建善。惠帝元康六年（296），石崇大会文士于金谷，摅有诗。以病去官，复为洛阳令。永宁元年（301），齐王冏诛赵王伦，召为记室督，寻转中书侍郎。长沙王乂又以为骠骑司马。丁母忧，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怀帝永嘉二年（308），流人聚众反，摅与之战，败死。摅工诗，钟嵘《诗品》列入中品。《文心雕龙·才略》称“曹摅清靡于长篇”。有集三卷，佚。今存诗十首并残句，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三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沈玉成 詹颂）

【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年及年岁不详。少师事皇甫谧，才学博通，为郡主簿。武帝泰始四年（268），与夏侯湛等同举贤良。授中郎，擢太子舍人，外出为闻喜令。以母忧去职。久之，召补尚书郎。惠帝元康（291—299）中，迁吴王友。永康元年（300）或稍后，历秘书监、卫尉卿。永兴元年（304），从惠帝被劫至长安，流离长安郊外。惠帝末，还洛阳，又迁光禄勋、太常卿。怀帝永嘉五年（311），石勒攻破洛阳，人饥相食，虞素清贫，竟至饿死。虞所著述，有《族姓昭穆记》十卷，《隋书·经籍志》在史部“谱系篇”中称“晋乱已亡”，又《决疑要注》一卷，《三辅决录注》七卷，均佚；《文章志》四卷，佚，《隋志》又录其《文章流别集》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为今所知分体选录之最早总集，佚。明张溥辑为《挚太常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今存赋、颂、表、策并《文章流别论》佚文六十篇（《金楼子·立言》引挚虞语，严氏失收），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六篇，皆四言，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沈玉成 詹颂）

【张载】生卒年不详。字孟阳。安平武邑（今属河北）人。性雅闲，博学多闻，妙擅文章。尝入蜀省父，撰《剑阁铭》谓“兴实由德，险亦难恃”。晋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在途又作《叙行赋》。在蜀作《登成都白菟楼诗》。其所作《濛都赋》，为傅玄所赏。武帝太康元年（280），作《平吴颂》。为著作郎，撰《晋书》。后因皇室纷争攻伐，载无复仕进意，称疾告归，卒于家。载工诗文，与弟协、亢，时号“三张”。载文似高于协，《文心雕龙·铭箴》独称其《剑阁铭》谓“其才清采”。有集七卷，佚。今存诗十二首并残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文十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左思】（252？—306？）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

山东)人。家世寒微。发愤勤学,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兼擅阴阳之术。二十岁前后,作《齐都赋》。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妹左芬以才选入宫中,思乃移家京师,撰《三都赋》。赋序自称“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约咸宁末(280左右)初稿成,时人不重。张华见之,叹为班、张之流,可与《两都》、《二京》鼎足而三。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卫权复为作注,刘注今存《文选》中。至是《三都赋》乃大著于时,洛阳为之纸贵。据《北堂书钞》卷六九引王隐《晋书》,思尝为司徒(按,当为“司空”)、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又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张华为司空,复辟为祭酒。其时贾谧专权,思与潘岳、陆机皆依附之,名列“二十四友”。惠帝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发动政变,废贾后,杀张华、贾谧,时左芬亦病卒,思乃退居洛阳宜春里,专事著述。《三都赋》屡经修改,于此时定稿。太安二年(303),张方作乱,思乃举家迁冀州,数年后以疾终。左思作品以《三都赋》声名最大,以《咏史》八首价值最高。诗风壮丽雄豪,两晋五言,可推巨擘。《文心雕龙·明诗》论四言、五言诗云:“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又《才略》云:“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可谓笃论。诗中借咏史以咏怀,开后世以古喻今一派。《诗品》列入上品,谓“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六朝尺度,至明清则胡应麟、陈祚明、沈德潜等均有驳论。其《招隐诗》亦颇有声。有集五卷,佚。明人辑录汉魏六朝遗文而未及左思,至清末丁福保始辑为《左太冲集》一卷,在《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中。今存文《三都赋》等并《齐都赋》残文七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十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吴士鉴《晋书斟注》。(沈玉成 李莉娟)

【左芬】(256—300) 一作菜。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左思妹。好学,善属文,名亚于兄。晋武帝泰始八年(272),以文名闻于武帝,入宫为美人。貌陋无宠,惟以才德见礼。体弱多病,武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谈论文义,盖以女学士遇之。芬所作今存多为颂赞、奉诏之作,然幽居之情亦见于言外。《晋书》本传记其有“答兄思书及杂赋颂数十篇”,《隋书·经籍志》录“集四卷”,佚。今存文二十四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后妃传》本传、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左菜墓志》。

(沈玉成 李莉娟)

【张协】(?—307?) 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有俊才,与兄张载(孟阳)齐名。辟公府掾,转秘书

郎,补华阴令,累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治郡清简。见晋惠帝末年世道纷乱,辞官归隐,屏居草泽,以吟咏自娱。晋怀帝永嘉(307—313)初,复召为黄门侍郎,托病不就,卒于家。《诗品》以其诗入上品,认为其特色是“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左思),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在西晋初年,诗坛有“三张”、“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占尽风骚。“三张”即协及兄载弟亢,协最优。其诗以《杂诗》为代表作。有《张景阳集》。《晋书》卷五五有传。(许逸民)

【苏伯玉妻】 晋人。一说汉代人,误。姓名、生卒年、籍贯均不详。《玉台新咏》卷九于傅玄杂诗五首后载录其《盘中诗》之题注曰:“原注失其姓氏,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归,其妻居长安,思念之,因作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九载录苏伯玉妻《盘中诗》云:“玉台新咏考异曰:按《沧浪诗话》盘中诗为一体,注曰: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据此则此诗出处以《玉台新咏》为最古,当时旧本亦必明署苏伯玉妻之名,故沧浪云尔。宋刻于题上误佚其名,因而目录失载。冯氏校本遂改题傅玄之诗,殊为疏乖。又此诗列傅玄、张载之间,其为晋人无疑……”诗以三字句为主,杂以少量七字句,共二十七韵,四十九句,一百六十七字。写于方形盘中者,由中心一字下而右转读之;写于圆形盘者由中及下逆时针读之。诗极写思妇念远之情,历来备受称道。(陈祖美)

【欧阳建】(261?—300) 字坚石。渤海重合(今河北乐陵西北)人。文辞华美,构理清微,名擅于北方。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匈奴扰边,建迎战败绩。迁顿丘太守。罢,居洛阳,与舅父石崇及潘岳等谄事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永康元年(300),赵王伦政变,贾谧被杀。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交通淮南王允、齐王冏,图杀伦。事发,俱被收杀。建时年四十左右。坚为当时玄学家,其《言尽意论》,主“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之说,为当时玄谈重要命题之一。有集二卷,佚。今存文二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石苞传》。

(沈玉成 詹頌)

【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祖陆逊为吴丞相,父抗为吴大司马。吴末帝凤凰三年(274),抗卒,机与诸兄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吴亡,退居旧里,闭门勤学达十年之久。太康末,与弟云一起至洛阳,以文才

称名于当时。太熙元年(290),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与石崇、潘岳、挚虞、左思等依附外戚贾谧,号称“二十四友”。擢太子洗马。晋惠帝元康二年(292),改著作郎。元康三年,复为太子洗马。元康四年,拜郎中令,随吴王晏出镇淮南。元康六年,入为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元康八年,补著作郎。永康元年(300)赵王伦辅政,用为相国参军,赐爵关中侯。永宁元年(301),进中书郎。次年,赵王伦被诛,机亦被拘捕治罪,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成都王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又荐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鹿苑之战,机军大败,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有《陆机集》。集中多四言诗、乐府诗,又多拟古之作。入洛以前,诗尚模仿,少有创新,间亦能抒发国破家亡之痛,凄清可诵。入洛以后,宦海浮沉,身履危艰,所作渐多人生悲欢、仕途坎坷之词。如《赴洛道中作》写客游之哀伤,《长歌行》写大志不遂的苦闷,《陇西行》写“世鲜兴贤”之愤慨,《折杨柳》写人生易逝之悲凉等,大都感情真切动人。当然后期的奉制、酬酢、代作诗也不少,皆属于浮泛应景之作。《晋书》本传称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这是兼诗文而言之。钟嵘专论其诗,以为“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诗品》卷上),刘勰又以为“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文心雕龙·才略》),“情繁而辞隐”(同上《体性》),均切中陆诗的特点与不足之处。《晋书》卷五四有传。(许逸民)

【陆云】(262—303)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少以才称,与兄陆机齐名,号“二陆”。吴末帝凤凰三年(274),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年十六,举贤良。吴亡,退居读书十一年。晋武帝太康末,与兄同至洛阳。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累迁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荐为清河内史。随司马颖讨齐王冏,为前锋都督,转大将军右司马。惠帝太安二年(303),陆机为司马颖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出讨长沙王,兵败问罪,兄弟二人同被杀害,陆云当时四十二岁。有《陆云集》。史称“机天才绮练,文藻之美,独冠于时。云亦善属文,清新不及机,而口辩持论过之”(《三国志·陆逊传》裴注引《机、云别传》),由此可见二陆优劣。《文心雕龙·才略》谓“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此又可见陆云诗风明净谨严,长于短篇,今本四言《赠顾彦先》五章、五言《答张士然》可为代表作。《晋书》卷五四有传。(许逸民)

【嵇含】(263—306)字君道,一作居道。谯国铨(今安徽宿县西)人。嵇康侄孙。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亳丘,因自号亳丘子。晋武帝太康末(289),

楚王玮辟为掾。惠帝永平元年(291),玮被杀,坐免职。旋举秀才,除郎中。齐王冏辟为参军,长沙王乂又召为骠骑记室督、尚书郎。后为豫章王炽从事中郎,转中书侍郎,出为襄城太守。皇族混战,含投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光熙元年(306),弘表含为广州刺史。含未发,表请葛洪为参军,先行催兵。时弘病卒,或欲留含领荆州,弘司马郭劭遂掩杀之。有集十卷,佚。今存文二十五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四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南方草木状》三卷,今存,题嵇含撰,惟此书始见《宋史·艺文志》,且嵇含实未至广州,故是否为其撰著,学者尚有不同意见。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沈玉成 詹颂)

【束皙】(264?—303?)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博学多闻,得张华赏识,召为掾。晋惠帝元康中,张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转著作佐郎。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为相国,请为记室,托疾辞归,教授门徒。卒年四十。以《补亡诗》著称,欲补《诗·小雅》笙诗六篇“有义无辞”之失,然“志高而词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流于模拟而已。著有《束广微集》。《晋书》卷五一有传。

(许逸民)

【张亢】(270?—335?)字季阳,安平武邑(今属河北)人。历任散骑侍郎、领佐著作郎、散骑常侍等。亢能文,又解音乐,与兄载、协并称“三张”,而才藻不逮。《晋书》本传记其有《述历赞》一篇,早亡。《隋书·经籍志》录有“散骑常侍《张杭集》二卷”,历来多以为即“张亢”之误。作品散佚不存,仅《北堂书钞》卷一四〇录“张杭”残诗四句,或即为张亢之作。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张载传》。(沈玉成 李莉娟)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少以雄迈著称,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出入石崇金谷涧,文章吟咏颇为当时所推许。又与石崇、陆机、欧阳建等,依附贾谧,号“二十四友”。晋惠帝时,历著作郎、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封广武侯。怀帝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招抚流民,抗击刘渊父子。愍帝即位,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愍帝建兴三年(315),进位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元帝建武元年(317),转侍中、太尉。大兴元年(318),为段匹碑所杀,时年四十八。其诗雄健悲凉,“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卷中)。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曹刘坐啸虎生风,万古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谓刘琨气盖一世,可与建安诸子相匹敌。有《刘中山集》。

《晋书》卷六二有传。

(许逸民)

【郭璞】(276—324) 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早年好经术,工词赋,又精研阴阳算历。西晋末年,预感到家乡将有战乱,遂避地东南。先至庐江,太守胡孟康召为军咨祭酒,继至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复自宣城东下,丹阳太守王导深重之,引参军事。晋元帝即位,为著作佐郎。与温峤、庾亮,并以才学见重当时。迁尚书郎。丁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今江苏江阴东)。起为王敦记室参军。借卜筮谏阻王敦叛乱,终为敦杀害,时年四十九。追赠弘农太守。有《郭弘农集》。以《游仙诗》(今存十四首)著称,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晋书》本传也称他“词赋为中兴之冠”。钟嵘《诗品》则认为所以称“中兴第一”,乃在于文体彪炳,“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如《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卷中)。《晋书》卷七二有传。

(许逸民)

【卢湛】(284—351) 字子谅。范阳涿(今属河北)人。刘琨内侄。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刘琨为司空,以湛为主簿,转从事中郎。后随琨投幽州刺史段匹碑。匹碑败,又往辽西投段末波。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石虎破辽西,以湛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东晋穆帝永和七年(351),石氏内乱起,湛亦遇害。湛博学多艺,工书,法钟繇、索靖。撰《祭法》六卷、《庄子注》,佚。好《老》、《庄》,善属文。《文心雕龙·才略》称其“情发而理昭”,《诗品》列入中品。集十卷,佚。今存文十四篇并《祭法》残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七首并残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卢钦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庾闾】字仲初。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生卒年不详。少孤,九岁能属文,乡里重之。约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或稍后为西阳王兼太宰掾。明帝时,迁尚书郎。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反,入据京师,闾奔徐州刺史郗鉴,为司空参军。事平,封吉阳县男,授彭城内史,郗鉴又辟为从事中郎。以文名召人为散骑常侍,领著作,综国史。咸康五年(339),出为零陵太守。后征入,授给事中,复领著作。约卒于穆帝永和(345—356)中。年五十四。谥贞。闾工诗赋。其《扬都赋》庾亮警之,以为可与《二京》、《三都》并列;谢安则贬为“屋下架屋”。其诗中已多见自然风物,不乏佳句,与平典似《道德论》者迥异。其《游仙诗》十首,今残;中有二十四句六言,非骚体,在晋诗中尤为罕见。有集十卷,佚。今存文二十二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

二十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文学》。

(沈玉成 詹頌)

【杨方】生卒年不详。字公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东晋元帝、明帝、成帝期间。少微贱,为郡守仪仗门役。好读书,未为人知。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免其役,待以门人之礼,始为人所重。王导辟以为掾,转东安太守,迁司徒参军。以出身寒贱,不愿久留于京,求补远郡,遂补高梁太守。在郡多年,年老弃郡。王导将进之台阁,固辞还家,卒。在高梁时撰《五经钩沉》十卷、《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有集二卷,佚。今存文二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合欢诗》五首,见《玉台新咏》卷三。主要事迹见《晋书·贺循传》。

(沈玉成 李莉娟)

【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弘度。江夏平春(今河南信阳西北)人。少孤,母卫铄为晋代著名书法家,充亦善楷书。充对当时放诞虚浮之习深致不满,著《学箴》,意在兼综儒、玄。约东晋成帝咸和(326—334)间,为记室参军,历剡县令、著作郎等,累迁中书侍郎,约于穆帝升平(357—361)间卒官。有《尚书注》、《论语注》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二篇,并佚。其《翰林论》五十四卷、《文心雕龙·序志》以之与《典论》、《文赋》、《文章流别集》等并称。佚,今存残文八条。撰诗、赋、表、颂等二百四十篇,《隋书·经籍志》录有“晋《李充集》二十二卷”,今存《学箴》等残文十五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苏蕙】东晋时前秦女诗人。字若兰,始平(今陕西兴平)人。其夫窦滔于苻坚时任秦州刺史,因罪被徙流沙。若兰念之甚切,乃以织锦为《回文璇图诗》寄赠。诗共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反复,皆成章句。事见《晋书·窦滔妻苏氏传》。《文选·别赋》:“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二句,李善注引“《织锦回文诗序》曰:窦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苏氏。秦州临去别苏,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妇。苏氏织锦端中,作此回文诗以赠之。苻国时人也。”唐武则天《璇玑图诗序》所述苏蕙、窦滔事,与上述全然乖异。据《四库全书总目·璇玑图诗读法提要》云:相传武则天《璇玑图诗序》系后人伪托,不可信。王士禛《池北偶谈》尝记朱淑真谓其父重金购得璇玑图,归遗于她,她便坐卧观究,因悟璇玑之理,并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春二月望后三日作《璇玑图记》。《随园诗话》卷一四以为回文诗非始于苏若兰,而《诗薮》外编卷四则云:“苏若兰璇玑诗,宛转反复,相生不穷,古今论为绝唱。”以上记载无论真伪,均可见回文诗对后

世之影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五收苏若兰《璇玑图诗》。(陈祖美)

【王嘉】十六国前秦文人，志怪小说《拾遗录》作者。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艺术》有传，然记其事殊诞妄不经，疑出当时传闻。嘉于后赵时隐于安阳之东阳谷，弟子受业者数百人。后至长安，隐终南山、倒兽山。前秦苻坚屡征之，不赴。后为姚萇所杀。其享年当在七十左右。王嘉所作《拾遗录》，《晋书》本传谓十卷。然《隋书·经籍志》有《拾遗录》二卷，题伪秦姚萇方士壬子年撰。又《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撰。今《拾遗记》，其“录曰”文字多骈俪，疑出萧绮手，其他文字，似稍质朴，疑是嘉原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及断句八首。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苏彦】生卒年、字号及籍贯均不详。《隋书·经籍志》录“晋北中郎参军《苏彦集》十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小传谓东晋孝武帝时人，未知所据。又撰《苏子》七卷，严可均曰：“《隋志》道家，梁有《苏子》七卷，晋北中郎参军苏彦撰，亡。”今存文十一篇并《苏子》佚文十二条，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秋夜长》一篇，七言、六言间杂，体在诗、赋之间。(沈玉成 李莉娟)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少与许询俱以志尚高洁相标榜，游放山水十馀年，为一时名流。起为著作佐郎，历征西将军参军、建威长史、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人为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官至廷尉卿。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卒，年五十八(见《建康实录》卷八)。诗尚简约，理胜其辞，“平典似《道德论》”，“弥善恬淡之词”(《诗品》)。与许询齐名，同为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明人辑有《孙廷尉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十三首。《晋书》卷五六有传。(许逸民)

【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今属河北)人。晋怀帝永嘉(307—313)中父随元帝过江，迁会稽内史，因家于山阴。询幼秀慧，时号神童。长慕神仙冲举之事，性好山水，隐居不仕。与王羲之、刘惔、孙绰、谢安、支遁诸人交游宴集。不就征辟，于永兴西山筑室而居。立志不归家，作书与妇，令其改嫁。后又奉佛，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悉舍寺中。寺成，穆帝赐名为崇化寺、祇洹寺。后移居皋屯之岩，后人称许玄度岩。旋卒，或曰入深山不知所之。年约三十左右。询与孙绰并为东晋玄言诗主要作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称“询有才藻，善属文”。《诗品》以孙、许并列下品，称“孙、许弥

善恬淡之词”。简文帝则称“许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有集八卷，佚。今存诗二首并残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剡溪诗话》；文二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事迹散见《世说新语》、《晋书》，参阅《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沈玉成 李莉娟)

【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南)人；或云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年二十五出家，常在白马寺，与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袁宏等游。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为众名士所服。后人刻，与王羲之交。东晋哀帝即位，召入建康，止东安寺。居三载，还东山。遁作《即色游玄论》，主“色即是空”之说。《隋书·经籍志》有《支遁集》八卷。今存文二十六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诗为玄言诗一大家，然已多写景名句，故前人评其诗已开谢灵运先声。主要事迹见《高僧传·支遁传》，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

(沈玉成 李莉娟)

【曹毗】字辅佐。谯(今安徽亳县)人。生卒年不详。少好文籍，善属辞赋。郡察孝廉，东晋成帝咸和(326—334)间，入佐为郎中，蔡謨举为佐著作郎。丁父忧去职。服阙，起为句章令，人为太学博士。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出为下邳太守。迁中书郎、黄门郎、左卫将军、光禄勋。约孝武帝太元(376—396)中卒。撰《论语释》，有集十五卷，佚。今存文十九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晋书》附注·曹毗传注；存诗及断句九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夜听捣衣诗》，为今所见此类题材最早诗作之一。又，《艺文类聚》卷七九录《杜兰香别传》，载杜兰香作二首，当出曹毗手。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沈玉成 詹颂)

【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孤贫，以运租为业。东晋穆帝永和(345—356)中，安西将军谢尚镇牛渚，秋夜乘月泛舟于江上，闻宏讽吟自作《咏史诗》，声辞皆佳，即迎之舟上，谈论达旦，引为安西将军参军。穆帝升平元年(357)，谢尚卒，宏南下，为安西将军、广州刺史谢奉司马、南海太守。哀帝时为桓温幕中大司马记室，海西公太和四年(369)，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颇有时誉。性刚直，虽为温所重，但不违心相从。稍后人为吏部郎，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出为东阳太守，卒于官，年四十九。宏长于赋，亦工诗，钟嵘《诗品》将其列入“中品”，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晋书》本传称其撰诗赋表奏等杂文凡三百篇。《隋书·经籍志》录其集三

十卷,佚,今存文十八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参阅《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沈玉成 王学泰)

【郗超】(336—377) 字敬兴,或作敬舆,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少有才气,卓犖不羁。交游士林,善清谈,与支遁交善知赏。东晋穆帝永和(345—356)中,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哀帝兴宁元年(363),温迁大司马,又转为参军。温意在篡逆,超为谋主。谢安、王坦之尝往温处议事,温令超卧帐中听之,风动帐开,安笑称超为“人幕之宾”。寻温又用其谋,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在京为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以母丧去职。服阕,除散骑常侍,不起。授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不拜。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十二月,卒,年四十二。超有集十卷,佚。今存文四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一首,为玄言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郗鉴传》,并散见《世说新语》。

(沈玉成 詹颂)

【慧远】(334—416) 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人。年十三,随舅游洛阳。少为诸生,通六经及老庄。年二十一,从道安于太行恒山。后从道安游襄阳。及苻坚陷襄阳,遂南适荆州,又至庐山。居东林寺。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南阳宗炳等立精舍。慧远在庐山,请尉廋沙门僧伽提婆译《阿比昙经》及《三法度论》。闻鸠摩罗什至长安,曾与通信致意。著《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文,宣扬佛理。又尝讲《礼·丧服》,雷次宗、宗炳等执卷承旨。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卒。《高僧传》本传谓“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隋书·经籍志》存《慧远集》十二卷,今佚。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为二卷。又有《庐山东林杂诗》一首,见《庐山记》,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沈玉成 詹颂)

【谢道韞】约于东晋成帝咸康至安帝隆安(335—401)年间在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太傅谢安侄女,书法家王羲之之第二子王凝之之妻。自幼聪颖,有才辩。谢安于寒雪日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谢安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其侄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韞应声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为之大悦。世称道韞为“咏絮才”。其适王凝之,心怀“彩凤随鸦”之怨,并谓王、谢两家中独有他不称其意,乃“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谢安宽慰之曰:“王郎不恶,何故恨之?”对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又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韞为之解围,代献

之对客,而屈之。隆安三年(399),孙恩攻破会稽城,时凝之为会稽内史,与诸子死于乱兵之中。道韞则率领侍女,手刃乱兵数人。后嫠居会稽,门风严肃,为时人敬仰。事见《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及《世说新语》言语、贤媛等篇。原集已佚。今存诗二首及联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陈祖美)

【陶渊明】(365—427) 唐人避讳又作深明、泉明。入宋更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侃曾孙。有高趣,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学综儒玄。家贫,好酒。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入仕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旋解职归。安帝隆安四年(400),在荆州任刺史桓玄僚属。次年,丁母忧,归里,躬耕自资,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元兴三年,刘裕等起兵讨玄,玄兵败西走,渊明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旋转入刘敬宣幕为建威将军参军,义熙元年(405)三月,曾奉命赴建康。是年八月,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束带见之,渊明以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适值其妹病逝武昌,乃于十一月辞官归里。归田之初,即亲预耕作,有《归园田居》五首。义熙四年夏,柴桑里旧宅遇火,林室尽焚。两年后迁居南里之南村。自辞官至此前后,与周续之、刘遗民相过从,号“浔阳三隐”。又与名僧慧远、晋安长史殷景仁往还。时慧远结白莲社,以书招之。渊明至社,忽攒眉而去。义熙十一年前后,颜延之为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接阎邻舍”,时相盘桓。其时刘裕代晋之势已成,渊明耻屈身后代,乃不肯复仕。宋少帝景平二年(423),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浔阳,往访,酣饮。临行,赠以二万钱,渊明悉送酒家,以为酒资。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檀道济为江州,往候。渊明以病馁卧床,道济劝其毋自苦,馈以粱肉,挥而去之。次年,疾情加剧。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诸友好私谥“靖节”。陶渊明志行高洁,蔑视富贵,躬耕力田,其诗作多于田园风光中咏怀言志,平和恬淡,浑成含蓄而自寓入世之情。今存诗一百二十余首,名篇除前述者外,多中晚年之作,且多组诗,如《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后世多宗为诗中冠冕。其辞赋散文今存十二篇,以《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为最著。陶诗于南朝绮丽之风中独标高格,虽未为世俗所重,然亦不乏真赏。萧统为之编集,并于序中备致推崇。入唐后,陶诗影响更形深远,杜甫屡称“陶、谢”;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韦应物诗,于渊明其人、其诗、其事多加称引。至两宋,崇陶之风乃臻于极。要之,陶渊明于晋、宋诗运转关之际,开

田园一派,唐之王、孟、韦、柳、宋之苏、陆、杨、范,莫不受其沾溉。萧统所编《陶集》已佚。今存《陶集》为宋人重编,有绍熙刊本。明、清两代,刻本极多。注释陶诗,最早为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有拜经楼刻本;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有《四部丛刊》影宋本。清人陶澍、近人古直、今人王瑶、逯钦立等注释本,后来居上,均可参考。历代学人所撰年谱,今人许逸民辑集九种,归为《陶渊明年谱》,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主要事迹见颜延之《陶征士诔》、萧统《陶渊明传》、《宋书》本传。(沈玉成 詹颂)

【殷仲文】(?—407) 字仲文。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桓温女婿。少有才藻,美容貌。约东晋孝武帝后期,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安帝初(397左右),为道子之子元显征虏长史。桓玄等抗命朝廷,仲文左迁为新安太守。元兴元年(402),桓玄攻入京师,仲文弃郡而投之,为谥议参军。玄将篡位,以仲文为侍中、领左卫将军,总诏命。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玄,杀之。仲文乃改投刘裕,为镇军长史,转尚书。迁东阳太守。义熙三年(407),以谋反罪为刘裕所杀,年约近四十。仲文善属文。江淹《杂体诗》有拟仲文《兴瞩》诗一首。《宋书·谢灵运传论》言“仲文始革孙、许之风”,是其诗作当多有摹山范水之句。有集七卷,佚。今存文一篇,见《文选》卷三八及本传;存诗及断句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晋书》本传,散见《世说新语》。(沈玉成 詹颂)

【湛方生】 生卒年、字号及籍贯均不详。据《隋书·经籍志》录“晋卫军谥议《湛方生集》十卷”,且置于桓玄、殷仲文等人之后;今存作品《庐山神仙诗序》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樵者见沙门霞飞轻举事,其生活时代当在东晋后期,卫军谥议当为其最后官职。方生诗长于写景,风格平淡。其杂言体一首,上承傅玄、夏侯湛,下启谢庄,多写愁人孤寂之感。文、赋风格近似杂言诗。今存文十八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及断句十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怀旧谣》等杂言三篇,二书兼收。(沈玉成 詹颂)

【何承天】(370—447) 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五岁丧父,幼承母训,遍览经史百家。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为桓伟参军,后入刘裕幕为太尉参军。入宋,历南台治书侍御史、尚书殿中郎兼左丞。衡阳内史、著作郎、御史中丞、廷尉等。后以受密旨泄漏,免官,卒于家。承天博学多识,尤精天文、历算,自言精研四十载。其所改定《元嘉律》被颁为官历。又精史学,其所撰《宋书》,为沈约《宋书》所本诸书之一。又有《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传杂语》九卷,有集三

十二卷,均佚。能诗,晋义熙中尝私造《鼓吹铙歌》十五首,今存,见《宋书·乐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为“深仿魏诗”。其文今存三卷,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达性论》、《报应问》等,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反佛家轮回报应之说,颜延之等尝与论辩,为宋世儒、佛间一大公案。存《鼓吹铙歌》十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李莉娟)

【傅亮】(374—426) 字季友。原籍北地灵州(今陕西铜川一带)。东晋安帝隆安(397—401)间,通籍为建威参军,元兴元年(402),为桓谦中军参军。刘裕、孟昶等起兵讨桓玄,亮在军中为孟昶建威参军。义熙元年(402),为员外散骑侍郎,直西省,掌诰命。其后一度为刘毅记室参军。义熙七年,复直西省。义熙十二年,曾从刘裕北伐。刘裕代晋自立,亮希意承旨,奔走尽力。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以佐命有功,封建城县公,入直中书省,专典诰命。次年,转尚书仆射。永初三年,刘裕卒,少帝义符立,进中书监、尚书令、护军将军,与徐羨之、谢晦并为顾命大臣。义符继位一年余,以轻浮狂暴为徐、傅、谢等所废。亮至江陵迎立宜都王义隆。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文帝即位之初,加亮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426),被杀。亮能文工诗。既受知于刘裕,义熙六年后,表策文诰皆出其手。钟嵘《诗品》列入下品。有集三十一卷,佚。明人张溥辑有《傅光禄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有《应验记》一卷,《续文章志》二卷,佚。《续文章志》、《世说新语》注、《文选》注多见引用。存诗四首,见《文选》卷三十六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颂)

【谢混】(381?—412) 字叔源,小字益寿。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孙。袭父琰望蔡公爵。东晋安帝元兴(402—404)间为中书令,曾入刘裕幕,预伐桓玄之役。义熙(405—418)初,授中领军。时刘裕、刘毅之争已趋尖锐,谢混虚与刘裕周旋,实则交通刘毅。义熙五年(409)前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尚书。义熙八年,刘裕攻刘毅,谢混亦被杀。年约三十余。谢混风姿甚美,时称江左第一。在建康常与诸侄灵运、瞻、曜、弘微等以文义赏会。工诗。《诗品序》云,“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隼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可知混于改革诗风颇有功绩。混有集五卷,佚。存文一篇,见《宋书·礼志》。又撰《文章流别》十二卷,佚。存诗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

《晋书》本传。

(沈玉成 詹颂)

【谢瞻】(383?—421) 字宣远。一作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晦次兄。六岁能属文,为当时文士所叹异。幼孤,为叔母刘氏抚养。东晋安帝元兴初(约402),在荆州为安西将军桓伟参军。以刘氏弟刘柳为吴郡内史,刘氏同行,瞻乃转入刘柳幕为建威长史。义熙三年(407)前后,转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旋又入琅玕王司马德文幕参军、主簿。在此期间,与顾恺之相识。又时与族叔谢混、弟晦、族弟灵运、弘微等以文义赏会,时人谓“乌衣之游”。义熙十一年,出为安成相,又征入为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义熙十二年,随同刘裕北伐。义熙十三年,回师驻彭城。以谢晦权倾朝野,惧祸,屡乞降黜。刘裕乃以瞻为吴兴太守,转豫章太守。刘裕代晋,永初二年(421),瞻在郡患疾,不肯疗治。卒。年三十九左右。谢瞻文章华美,史称与混、灵运相抗。有集三卷,佚。今存残文二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颜延之】(384—456) 字延年。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少孤贫,好读书。东晋安帝义熙初(约405),在吴郡太守刘柳幕为行参军,转主簿。义熙十一、十二年(415、416),刘柳在江州为刺史,延之随府,因得识陶渊明,结邻,友情款洽。义熙十二年六月,刘柳卒,乃转入豫章公世子刘义符府为行参军。是年,刘裕北伐,豫章公府遣延之北上庆贺,旋奉刘裕命至洛阳。刘裕代晋建宋,补为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少帝景平二年(424),出为始安太守。过浔阳,日日造陶渊明,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赠渊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征还建康,授中书侍郎。次年,陶渊明卒,颜延之为诔。寻转太子中庶子,又领步兵校尉。好酒疏诞,时时干犯权要。元嘉十一年,彭城王义康出之为永嘉太守。延之怨愤不平。义康欲黜为远郡,文帝令居建康思过。元嘉十九年,复起为中庶子,旋迁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元嘉二十二年后,以强买人田,为荀赤松所奏,免官。复起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次年,致仕。刘劭弑父自立,以延之为光禄大夫。孝武帝刘骏即位,以之为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卒。谥宪子。颜延之耿直褊急,时使酒骂座,肆意直言,以是为当道所忌,称之为“颜彪”。居身清俭,布衣蔬食,独酌郊野,旁若无人。与谢灵运以辞采齐名,时称“颜、谢”。然颜、谢相较,谢前颜后,已成定论。《诗品》列之于中品,以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要之,

颜诗典重而不免拙涩,亦元嘉时期承先启后之一体。其文亦颇有可观,《赭白马赋》写马之迅疾,影响及于李、杜。有集三十卷,佚。明人辑录遗文,汪士贤辑《颜延之集》一卷,有《汉魏诸名家集》本;张溥辑《颜光禄集》二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又尝为阮籍《咏怀》作注,见《文选》李善注引。今存文三十七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及断句三十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谢灵运】(385—433) 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徙居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玄,东晋名将,官终会稽内史。父瑛,生而不慧。灵运出世后,先寄养于钱塘杜明师道馆中,小名客儿、阿客,后人习称谢客。直至十五岁,始回到建康家中。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十八岁,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乐。义熙元年(405)入仕,历琅玕王司马德文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记室参军、太尉刘裕参军、宋国黄门侍郎等。入宋,复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出为永嘉太守,遨游山水间,不理政事。宋少帝景平二年(424),称病去职归始宁,修营别业。宋文帝元嘉三年(427),征为秘书监,校讎秘阁书籍,并撰《晋书》。迁侍中。元嘉五年春,免官,复归始宁。元嘉七年,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羁。元嘉九年,遭弹劾,又拒不从命,被押解至建康,诏徙付广州。元嘉十年,在广州被杀害,时年四十九岁。有《谢康乐集》。其诗大多描写始宁、永嘉等地山水,鲜丽清新,开一代风气,时称“谢灵运体”。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正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突破了东晋玄言诗的束缚,推动了宋初诗风的变革。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山水诗人,也是山水诗流派的开创者。不过他的诗仍未脱尽玄言诗的影响,哲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而且造句一味追求新奇,亦有时流于险怪艰涩。《宋书》卷六七、《南史》卷一九有传。

(许逸民)

【谢晦】(390—426) 字宣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美风姿,善言笑,涉猎文义。东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左右,入仕为建威将军孟昶府中兵参军。义熙六年,转入刘裕府为太尉参军。义熙十二年,从刘裕北伐,檀道济尝云:“人关十策,晦有其九。”后转从事中郎,迁侍中。宋武帝刘裕代晋,晦为典礼主事者,兼领警卫。武帝永初元年(420),迁中领军、侍中如故。封武昌县公。永初三年,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与颜延之相善。少帝义符即位,与徐羨之、傅亮同秉国政。废少帝,迎立文帝义隆,徐羨之矫诏授晦荆州刺史,欲令居为外援。元嘉三年(426),文帝内

诛徐、傅，外征谢晦。晦乃起荆州兵沿江东下，传檄京师。为檀道济所败。晦逃遁被执，槛送京师，被杀。晦能诗，今存代刘裕作戏马台之会诗四句，临终与谢世基连句四句，兵败槛送入京，道中作《悲人道》，体在诗、文之间，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加收录。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高允】(390—487) 字伯恭，渤海脩(今河北景县)人。年十馀，奉祖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几罢。性好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郡召功曹。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为杜超从事中郎，赴邺，府寻解，还乡教授，受业者千馀人。次年，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延和(432—434)中，太武帝弟乐安王拓跋范西镇长安，以允为从事中郎。寻征还。太延二年(436)，从乐平王拓跋丕讨上邽，参丕军事。太延五年，太武帝平凉州，允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次年，即太平真君元年，奉诏与崔浩述成《国记》。寻授景穆太子经书，颇受礼遇。后宗爱杀太武，大臣陆丽等诛宗爱而立文成帝，允颇有谋，而不言其功，赏亦弗及之。文成帝立，允尝谏起宫室及论婚娶丧葬之制，皆为帝所纳。后拜中书令。魏献文帝立，乙浑专权，文明太后诛之，遂引允禁中，参决大政。未几，允年八十左右，作《告老诗》。又作《征士颂》、《鹿苑赋》，在《宏明集》中。时献文帝北伐柔然，允又作《北伐颂》，亦见本传。年九十八卒，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高允所著书，据《魏书》本传，有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及《左氏》、《公羊》、《毛诗拾遗》、《论杂解》(校勘记以为是《毛诗拾遗杂解》或《论语杂解》之误)、《议何郑膏肓事》等百馀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又《隋志》有“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二十卷，则唐五代犹存。今佚。存文十二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允文虽质直，犹有古气，《鹿苑赋》稍有文采。唯诗皆无意兴，四言诗颂，纯系说教。即《乐府诗集》所收诗二首，亦殊稚拙，纯为模拟。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詹颂)

【范晔】(398—445) 字蔚宗，小字塽。顺阳(今河南内乡西南)人。东晋末，州辟主簿，不就。寻起家为刘裕相国掾，转刘义康参军。入宋，为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寻召入为秘书丞。丁父忧，服闋，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前后为江州刺史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元嘉八年，入为吏部郎。元嘉九年，迁宣城太守。在郡数年，集前人谢

承、华峤、袁宏等后汉史籍删订剪裁，为一家之作，即今存之《后汉书》。迁豫州长史、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嫡母卒，晔不及时奔丧，及行，又携妓妾自随，被劾，文帝爱其才而不罪。元嘉十七年，服闋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是年十二月，浚又迁镇扬州，以年幼，政事尽委于晔。元嘉十八年或稍后，迁左卫将军，元嘉二十一年，迁太子詹事，后人因习称“范詹事”。时孔熙先联络徐湛之、臧质等密谋拥立义康，并劝晔以为内应。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徐湛之上表自首，并举发谋逆。范晔、孔熙先等并被收下狱，旋被杀。晔性精微，有思致。通宫商，善琵琶。于四声音韵亦颇探究。所著《后汉书》为二十四史之一，然仅成纪、传，今传本中八志为司马彪所作，由梁刘昭合为一书。此书为现存最重要之东汉史料，刘知幾誉为“简而且周，疏而不漏”。文兼骈散，传论尤极纵横驰骋之致，于后世散文创作颇有影响。《文选》录其《皇后纪论》等五篇。《文苑传》之立，亦始自此书。能诗，《诗品》列入下品。有集十五卷，佚。今存文五篇，除《双鹤诗序》残文外，均见《宋书》本传。存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颂)

【刘义隆】(407—453) 即南朝宋文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小字车儿，刘裕第三子。东晋末历任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刘裕灭晋建宋，封宜都郡王。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少帝废，遂即皇帝位。改元元嘉，在位时大权独揽，内修政事，外抗北魏，躬勤政事，简靖为心，故时平政和，史称为“元嘉之治”。然而为人多防嫌猜忌，偏听彭城王刘义康之言，后又杀之，开南朝宗室骨肉相残之风气。立刘劭为太子，又欲废之，劭乃率兵弑父。义隆博学能文，善书工诗。在位三十年，提倡文治。裴子野云元嘉时“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元嘉十五年(438)诏命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在文学史上文帝首先以朝命形式将文学从儒学、哲学、史学中分离出来，使之更受世人重视。其所作《北伐诗》、《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书作诗》等追述中原沦陷，北方人民所遭受的蹂躏，并表达了作者立志北伐，统一全国之壮怀。诗风劲健，词采典雅。义隆原有集十卷，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其文三卷。存诗三首，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主要事迹见《宋书·文帝本纪》、《南史·宋本纪》。(沈玉成 王学泰)

【谢惠连】(407—433)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族弟。幼聪颖，受教于何长瑜，十岁能属文，不为父亲谢方明所喜。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方明为会稽太守，惠连随任。宋少帝景平二

年(424),灵运自永嘉太守任上归始宁,曾访方明,见惠连,大相知赏,告方明不当以常儿视之。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方明卒,惠连以居忧时有赠男宠诗十馀首,流传颇广,得罪名教,不得入仕。殷景仁爱其才,为之缓颊,宋文帝许其通籍,元嘉七年,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在任奉命作《祭古冢文》,又作《雪赋》流传颇广。灵运于时人少所许可,唯推重惠连,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又自称“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又云其“池塘生春草”之名句即梦惠连而得。(皆见《南史·谢惠连传》。)其小赋颇为世人所喜,其诗被《诗品》列为中品,钟嵘言其《秋怀》、《捣衣》二诗“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称赞其乐府“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见《诗品》)。后世将其与灵运、谢朓合称为“三谢”。惠连原有集六卷,已佚。明人辑录其遗文,编为《谢法曹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今存文十七篇,见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三十馀首,见逯钦立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附见《宋书》卷五三及《南史》卷一九《谢方明传》后。

(沈玉成 王学泰)

【袁淑】(408—453) 字阳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不为章句之学,博涉多通,文采遒艳,有才辩。宋文帝元嘉(424—453)中,彭城王义康命为司徒祭酒。以久疾免官。起为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元嘉十六年(439),临川王义庆迁镇江州,请为谘议参军。次年,义康被黜,乃人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丁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后迁太子右卫率。元嘉三十年,太子刘劭弑父,呼淑同往,淑不从,被杀。孝武帝即位,赠太尉,谥忠宪。淑工诗善文。尝录古来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十卷,又有《俳谐文》十卷;谢灵运辑《诗集》五十卷,袁淑、张敷补辑为一百卷。均佚。集十一卷,佚。今存文十五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骝山公九锡文》、《鸡九锡文》等五篇为《俳谐文》佚文。张溥辑其诗文为《袁忠宪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诗品》列入中品,谓“才力苦弱,故务为清浅”。然其《效曹子建白马篇》、《效古诗》,皆慷慨有古气。存诗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頌)

【刘义恭】(413—465)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第五子,聪颖美容颜,武帝特别钟爱,起居饮食,常不离左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封江夏王。元嘉九年,征为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州、六州、豫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次年,

进位司空;元嘉二十一年,进太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侵豫州,义恭畏敌,闭门不敢拒,元嘉二十九年,还朝,官位如故。次年,刘劭弑文帝自立,义恭惧而缴纳兵权。刘骏兴兵入讨,单骑出逃,刘骏即位为孝武帝,又卑辞曲意,歌功颂德。前废帝继位,狂悖无道。义恭欲谋废之,被害。义恭为人骄奢不节,嗜好无定,善骑马,解音律,工诗文。曾撰《要记》五卷,记述历史大事。另有后人所辑文一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及断句十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王学泰)

【鲍照】(414?—466) 字明远,其先世上党(今山西长治)人,移籍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家世贫贱,十五岁左右,废耕学文,有才思。约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以诗谒见江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被任用为临川王国侍郎。元嘉十七年,刘义庆改南兖州刺史,随任东还广陵。元嘉二十一年,解职归田。元嘉二十四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引为侍郎。元嘉二十六年,刘浚为南徐、兖二州刺史,从至京口。元嘉三十年,刘浚作乱被杀,受其牵连,一度遭软禁。孝武帝孝建元年(454),起用为海虞令。孝建三年,人为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不久,出为秣陵令。大明二年(458),改永嘉令。大明五年,为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前军行参军、刑狱参军。明帝泰始二年(466)正月,晋安王刘子勋称帝,刘子顼举兵响应;八月,子勋兵败,子顼伏诛,荆州治中宋景等乘机掠城,照死于乱兵中,时约五十三岁。鲍照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所作诗、赋、骈文皆有名篇脍炙人口。其乐府诗艺术成就最高,能够兼取乐府民歌与汉魏古诗之长而别创新意,善于运用比兴和刻画,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抒写坎坷遭遇,抨击门阀制度,大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些乐府诗总的风格是刚健清新,加以在形式上也有开创性,如以七言为主而杂用五言,隔句用韵,一诗之中多次换韵等,它们对有唐一代诗风形成,特别是歌行体产生,均有着明显、广泛之影响。鲍照的其他五言诗也写得朴茂深秀,有异于六朝的绮靡纤巧,故历代诗评家赞誉有加,如梁钟嵘《诗品》称其“总四家(张协、张华、谢混、颜延之)而擅美,跨两代(晋、宋)而孤出”(卷中);唐杜甫《春日忆李白》以李白取法鲍照、庾信,有句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元陈绎曾《诗谱》则谓“六朝文气衰缓,唯刘越石、鲍明远有西汉气骨,李、杜筋取此”。鲍照在南北朝诗人中,以其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确实高出同辈人一头地。有《鲍参军集》。事见南齐虞炎《鲍照集序》,《宋书》卷五一、《南史》卷一三《临川王

刘道规传》附传。

(许逸民)

【鲍令暉】约生活于东晋恭帝元熙至宋孝武帝大明(419—464)年间,东海(今江苏涟水)人,南朝著名诗人鲍照之妹。鲍照兄妹,与左思兄妹情况类似,均出身寒微,有才华。鲍照每以左思兄妹自况,而谓之弗逮。钟嵘《诗品》卷下云:“令暉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占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左思字)尔。’”此系鲍照自谦,实则鲍氏兄妹自有奇特不凡之处,其拟古诗尤为出色。鲍令暉原有《香茗赋集》,已佚。存诗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陈祖美)

【王微】(415—453)字景玄。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少好学,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术数。宋文帝元嘉十年(431)前后,起家彭城王义康司徒祭酒,转主簿,久之,乃为始兴王浚后军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元嘉二十九年前后,吏部尚书江湛举为吏部郎,报书却之,曰“岂谓不肖易擢,贫者可诱;凡此数者,君必居一焉”,意态口吻,均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相似。微素无宦情,寻书玩古,凡十数年。弟僧谦亦有才名,元嘉三十年,遇疾,微自为疗治。因用药不当而死。微悔恨成疾,月余,亦卒。赠秘书监。微好为古文,不尚骈俪,颇得抑扬之致。《诗品》以之与谢瞻、谢混、袁淑等并列中品,评为“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有集十卷,佚。又有《鸿宝》十卷,佚。今存文九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杂诗》一首,为《文选》所录。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颜竣】(421?—459)字士逊。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颜延之长子。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或稍后,入仕为太学博士,迁太子舍人。元嘉二十二年,刘骏出镇雍州,竣入骏府为主簿,甚见信任。元嘉二十五年后,刘骏屡有迁转,竣均随府为主簿。元嘉三十年,刘骏又迁江州刺史,竣为记室参军。刘劭弑父自立,刘骏等发兵东下征讨,以竣为谏议参军,总揽内外。刘骏即位,以竣为侍中,迁左卫将军,又转吏部尚书,宠信之隆,一时莫比。孝武帝孝建元年(454),为丹阳尹。孝建三年,又代谢庄为吏部尚书。丁父忧,寻又起为右将军、丹阳尹。竣于孝武帝之奢靡多所谏诤,以是见疏。大明元年(457),出为扬州刺史。大明二年,王僧达被诛前,在狱中陈竣非议朝政,免官。大明三年,以竟陵王诞谋逆事陷竣,赐死。年约四十。竣能文。颜延之尝谓文帝曰“竣得臣笔”。竣纂有《诗集》一百卷,有集十四卷,佚。今存文九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四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吴迈远】(?—474)籍贯不详。工诗。宋明帝泰始末(471左右),至江州入刺史桂阳王休范幕,为江州从事史。后废帝元徽二年(474),休范起兵反,迈远为作符檄。休范兵败被杀,迈远亦被诛。迈远善为乐府,多男女赠答之辞,兼慷慨宛转之致。好自夸而嗤鄙他人,每得佳句,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诗品》卷下记汤惠休轻之,谓迈远云:“吾诗可为汝诗父。”谢庄则云,汤诗可为吴诗庶兄。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其诗“稍有远情”,“然无全首”。有集八卷,今存诗十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生平事迹参见《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沈玉成 李莉娟)

【谢庄】(421—466)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七岁能属文,及长,以美容仪为宋文帝所赏,尚宋文帝女。文帝元嘉十七年(440)或稍后,入仕为始兴王刘浚法曹行参军,转太子舍人,又入庐陵王绍府为谏议参军,随府至江州。元嘉二十六年秋,又至荆州为随王诞后军谏议,领记室。元嘉二十八年,返建康。孝武帝即位,为侍中。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授吏部尚书。孝建三年,以疾辞官。次年即大明元年,复起为都官尚书。大明二年,复授吏部尚书。大明五年,再为侍中,领前军将军。大明六年,又与王昙首分居吏部尚书,以任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与孝武帝意见相左,免官。前废帝即位,以庄为金紫光禄大夫。寻前废帝发孝武帝宠妃殷氏墓,忆及谢庄谏文中“赞轨尧门”语,怒,下狱。明帝即位,庄乃得释,授中书令。明帝泰始二年(466),卒。谥宪子。庄多才艺,青年时期曾以木制《左传分国图》,可分可合。通音韵。兼善诗文。《诗品》置之于下品,以为“气候清雅,不逮于范(晔)、袁(淑),然兴属间长,良无促鄙”。其辞赋尤为当世所称,其《月赋》清空婉约,与谢惠连《雪赋》并称南朝小赋双璧。有集十九卷,佚。明人张溥辑有《谢光禄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纂集《赞集》五卷、《碑集》十卷、《谏集》十五卷,均佚。存诗及断句十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汤惠休】字茂远。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宋文帝时,出家为僧,善属文,辞采绮艳,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与之甚厚。孝武帝即位,命还俗,历官扬州从事史,宛朐令。工诗,风格绮丽宛转,与鲍照部分诗歌近似,时有“休、鲍”之称。《诗品》以之入下品,谓“惠休淫靡,情过其才”。惠休尝论谢灵运、颜延之,谓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以是为颜延之

所病,讥汤诗为“委巷中歌谣”。有集四卷,佚。今存诗十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徐湛之传》。(沈玉成 李莉娟)

【王僧达】(423—458) 原籍琅玕临沂(今属山东)。少聪敏强记,善属文。年十八,入仕,为始兴王浚后军参军。宋文帝元嘉二十五、二十六年(448、449)出为宣城太守。在郡游猎,不理政事。元嘉三十年,刘劭弑文帝,刘骏入讨,僧达南奔迎候,刘骏命为长史。骏即位,授尚书右仆射、征虏将军。僧达自负门第才学,以为一、二年即可为宰相。然以狂傲不为孝武帝刘骏所喜。一岁五迁,出为吴郡太守。在郡凶暴,劫掠僧寺。后迁太常、左卫将军,中书令。以门第自高,鄙薄路太后兄子琰之,又于朝政屡有非议,乃被陷谋反。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于狱中赐死。《诗品》列其诗为中品。与颜延之为忘年交,《文选》录其《答颜延之》、《和琅玕王依古》诗、《祭颜光禄》文,沈德潜《古诗源》评其答颜诗与颜体相似。有集十卷,佚。今存文七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刘铄】(431—453) 字休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宗室。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封南平王。元嘉二十二年,出为南豫州刺史。进号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八年,授抚军将军,领兵戍石头。元嘉三十年,刘劭弑文帝自立,铄附劭,授中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刘骏等起兵入讨,刘劭令铄造为策文。刘骏即位,以铄为侍中、司空,旋毒毙之。铄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作《拟古》三十首,时人以为可追踪陆机。《文选》录二首。《诗品》列入下品。其《水仙赋》,时亦比之曹植《洛神赋》。好音乐,作《寿阳乐》。有集五卷,佚。今存文一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宋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丘巨源】(?—485?) 生活于南朝宋齐间。兰陵(今属山东)人。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帝所知。宋苍梧王元徽(473—477)初,桂阳王休范欲迎之至寻阳,巨源因萧道成使留京都。元徽二年(474)休范反,道成使巨源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未获封赏。宋顺帝昇明元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道成使巨源为尚书符荆州。事平,仍不获赏。巨源自此意常不满。萧道成代宋建齐后,曾以巨源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齐武帝时,除武昌太守,巨源不愿往,改馀杭令。尝作《秋胡诗》,有讥刺语。后以事被杀。丘巨源有集十卷,录一卷,唐

修《隋书》时已佚。今存文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沈约】(441—513) 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幼丧父,流寓孤贫。笃志好学,遂博通群籍,能属文。仕宋为尚书度支郎。入齐,历太子家令,迁黄门侍郎。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与谢朓、王融等为“竟陵八友”。齐鬱林王隆昌元年(494),出为东阳太守。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改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即位,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天监十二年,卒官,时年七十三。谥隐,后人称“隐侯”。历仕三朝,该悉典章,博物洽闻,为当世所称。又擅长诗文,是当时文坛领袖。作诗讲求声律,提倡“四声”、“八病”说,与王融、谢朓等创造“永明体”诗,开古诗向近体诗发展之先河。其诗以五言为优,梁钟嵘认为他的诗风接近于鲍照,“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诗品》卷中)。清沈德潜则认为其诗“较之鲍(照)、谢(朓),性情声色,俱逊一格矣。然在萧梁之代,亦推大家,以边幅尚阔,词气尚厚,能存古诗一脉也”(《古诗源》卷一二)。有《沈休文集》。《梁书》卷一三、《宋书》卷一〇〇、《南史》卷五七有传。(许逸民)

【江淹】(444—505) 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生于江南。少好学,六岁能写诗。十三岁丧父,家境陷于贫困。性格沉静,不喜交游。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刚满二十岁,充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启蒙塾师,讲授“五经”。一度为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从事。宋废帝永光元年(465),又随始安王刘子真赴任南兖州刺史。子真死后,转至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以事受牵累入狱,上书获免。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为秀才,对策上第,任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右常侍。不久,复为丹阳尹建平王刘景素主簿,并随从调任吴兴、湘州、荆州和南徐州。宋苍梧王元徽元年(473)前后,兼东海郡丞。元徽二年,贬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录尚书事萧道成引为尚书驾部郎,兼骠骑功曹参军,军表书记皆出其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为东武令,参掌诏册,监修《齐史》。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初,出为庐陵内史。永明三年(485),还为尚书左丞。齐鬱林王萧昭业时,兼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出为宣城太守。建武四年,入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迁秘书监。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兼卫卿。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迁吏部尚书。入梁,为散骑常侍、左卫

将军,封临沮县伯。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卒,年六十二。谥宪伯。有《江文通集》。今存诗近百首,大多作于齐武帝永明初年以前。史称江淹晚年才思微退,当时呼为“江郎才尽”,实则永明后官迁政烦,加以主观上认为“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刻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自序传》),遂不再用心创作,故经历史淘汰,后期诗篇存世无多。作诗颇能修饰,善于摹拟,如《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仿汉至刘宋诸家名篇,各具风调,酷肖原作,间亦有所寄托。他如《渡泉峒出诸山之顶》、《游黄蘗山》的深邃意境,《望荆山》、《还故园》的哀怨情愫,也为人所称道。但就整体而言,他的诗未能融通前人之长以形成自家特色,故钟嵘谓其“诗体总杂”(《诗品》卷中),陈祚明讥其“意乏圆融,调非宏亮”(《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四)。有《江文通集》。事见本集《自序传》,又《梁书》卷一四、《南史》卷五九有传。(许逸民)

【张融】(444—497) 字思光,一字少子。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早有声誉。尝为封溪令,于海上作《海赋》,及还都,示顾恺之,恺之惜其不道盐。融即求笔注之曰:“灏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其文思敏捷如此。融行止诡异,萧道成笑谓:“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尝送以故衣一通。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卒。张融善言谈,与周颙并称,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二人并善《老子》、《周易》,相遇辄言玄理,弥日不倦。融于文章亦颇自负。其《门律自序》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其《临终戒子书》云:“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即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本传谓融文集数十卷。今所知者有《张融集》二十七卷,《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俱佚。今存文十余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孔稚圭】(447—501) 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举秀才,为宋安成王车骑法曹参军,转尚书殿中郎。骠骑将军萧道成引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同掌辞笔。累迁尚书左丞。入齐,历黄门郎、太子中庶子。齐武帝永明九年(491),转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齐明帝建武初,迁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上书建议北伐。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永元三年,病卒,年五十五。钟嵘《诗品》认为他的诗学张融,尤善雕饰,更胜一筹。其文则以“词章清拔,独冠当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作《北山移文》脍炙人口。存诗及断句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其中《白马篇》颇有壮语,词采亦富。然是否为稚圭作,颇可疑。有《孔詹事集》十卷,已佚。《南齐书》卷四八、《南史》卷四九有传。(许逸民)

【虞炎】(?—499?) 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齐高帝萧道成初即位,炎尝为兼散骑常侍,使行天下。齐武帝永明时,为文惠太子萧长懋所赏,官至骠骑将军。尝奉萧长懋命,编定宋鲍照诗文为《鲍照集》,并作序。与谢朓为友。据《南齐书·礼志》载,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议南郊坛场时,炎尚预其事,当卒于齐末。据《隋书·经籍志》,梁有《虞炎集》七卷,隋时已佚。今存《鲍照集序》,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钟嵘《诗品序》评时人云:“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其“黄鸟”句,即炎《玉阶怨》中之句。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范云】(451—503) 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人。少机警有才识,善属文,尤工尺牍,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入仕为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宋、齐易代(479),竟陵王萧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入子良幕中,以能识读秦时刻石文大篆,为子良所赏。齐武帝即位(482),以子良为南徐州刺史,次年,迁南兖州刺史,云并随迁转。武帝永明五年(487),子良为司徒,任云为记室参军。时子良大集文士,范云、沈约、萧衍等皆座上客,号“竟陵八友”。永明十年,奉使北魏。次年,出为零陵内史,还,又出为始兴内史。迁广州刺史。坐事征还下狱,寻遇赦。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起为国子博士。东昏荒淫,萧衍自雍州起兵东下,云入幕与沈约参赞机密。梁台建,迁侍中。萧衍代齐,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侯,又迁尚书右仆射。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卒,谥文。云位尊望重,与沈约同为齐、梁间文坛领袖。齐永明间与竟陵府中文士交往酬酢,又与周颙、到洽等善,于后进如裴子野、刘孝绰亦多方奖掖,与何逊交谊尤厚。工诗,《诗品》以之与丘迟并列,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后世论者亦称其颇有秀致而笔姿婉弱。《别诗》“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历来推为名句。有集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记作十一卷,或唐初已有散失。又《建康实录》记其有《策略》三十卷,《隋志》不录,当早佚。今存文三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十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頌)

【徐孝嗣】(453—499) 字始昌。东海郯(今属山东)人。少为宋孝武帝所赏,拜驸马都尉。宋明帝泰始(465—471)时,尚孝武帝女康乐公主,除著作郎。

宋明帝泰豫(472)至宋苍梧王元徽(473—477)初,为桂阳王刘休范司空、太尉二府参军,寻为安成王刘准(顺帝)文学。宋顺帝昇明(477—479)中,迁萧道成骠骑从事中郎,带南东海太守。萧道成为齐公,孝嗣任世子萧贲庶子。萧道成代宋,孝嗣出为晋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齐武帝永明(483—493)中为五兵尚书,转吏部尚书。武帝卒,为右仆射。齐鬱林王隆昌元年(494),为丹阳尹。齐海陵王时,为左仆射。齐明帝建武(494—498)时,为尚书令。齐明帝卒,加中书监辅政。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被赐死。徐孝嗣有集十卷,今佚。存文四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韩兰英】 宋孝武帝至齐武帝(454—493)前后在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孝武帝(454—464)时,兰英因献《中兴赋》,被选入宫。宋明帝(465—472)时,用为宫中职僚。齐武帝(483—493)时,擢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被尊呼为“韩公”。钟嵘《诗品》卷下云:“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诎多也。’”《隋书·经籍志》著录《后宫司仪韩兰英集》四卷,已佚。存诗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事见于《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

(陈祖美)

【陶弘景】(456—536) 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宋末,萧道成为相,引为诸子侍读。齐武帝永明九年(491),授奉朝请。永明十年,辞官。归隐于句容茅山,立道馆,又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梁武帝早与之游,齐末,弘景援引图讖,证以天命在梁,令弟子进呈。梁武帝即位,恩礼愈优。国有大事,无不加以谘询,王公权贵时相参候,人号“山中宰相”。晚年又奉佛。梁武帝大同二年,卒。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弘景圆通谦谨,聪明颖悟,好读书著述,老而弥笃。经史文学、阴阳五行、历数星算、山川地理、物产、医药无不通晓。又工书。著述极富,有《学苑》、《古今州郡记》、《论语集注》、《本草集注》等约三十种,又有未竟之稿十种,多已亡佚。《四库全书》收入《真诰》、《古今刀剑录》、《真灵位业图》三种。《真诰》二十卷,虽多仙家无稽之说,然所记文人行迹,颇有可资考证者。有文集三十卷,内集十五卷,为陈武帝敕令江总所编,江总并为之序,佚。明人辑录为《陶隐居集》(一名《陶贞白集》)二卷,见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存文三十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山中何

所有”一诗,意境高远,向为后人所称。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頌)

【宗夬】(456—504) 字明敷。原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世居江陵(今属湖北)。少勤学,有气局才具。弱冠举秀才。齐武帝永明初,为临川王常侍、骠骑行参军。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学士,夬亦预焉。永明三年(485),敕与任防同接魏使。南郡王萧昭业居西州,以夬掌管书记。永明九年,在随王萧子隆荆州刺史府,曾奉命与谢朓等抄撰群籍。永明十一年,齐武帝卒,昭业继位。夬静察时局,疏远昭业,为秣陵令。明帝即位,授为郢州治中,以父老去官还乡。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萧宝融为荆州刺史,引为别驾。萧衍自襄阳发兵东下,夬奉萧颖胄之命,面陈方略,并护送军资。迁御史中丞。萧衍代齐,以夬为东海太守。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征为太子右卫率,迁五兵尚书。天监三年,卒。有集九卷,佚。今存诗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頌)

【曹景宗】(457—508) 字子震。新野(今属河南)人。其父曹欣之在南朝宋任徐州刺史。景宗少嗜史籍,每读《司马穰苴传》、《乐毅传》以为“丈夫当如此”。于宋苍梧王元徽(473—477)中入仕,南齐明帝建武中抵抗北魏有功,后依附萧衍。衍代齐建立梁,官郢州刺史,封竟陵县侯。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击破北魏杨大眼,凯旋入建康。梁武帝宴于华光殿饮宴联句,令沈约限韵分咏,景宗以武人不得韵,不能参与吟咏,意甚不平,固求赋诗,而余韵仅“竞”“病”二字,景宗操笔而成:“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人路,何如霍去病。”一座惊叹。景宗为人奢侈好胜,性躁嗜酒。天监七年,迁江州刺史。卒于赴任途中。谥壮。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王学泰)

【刘绘】(458—502) 字士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绘少时善应对,为其父勔所赏。南朝宋顺帝昇明初,解褐为著作郎。昇明二年(478),萧道成为太尉,以绘为行参军。入齐后,曾为左将军萧嶷主簿。因嶷与文惠太子不平,苦求外出,为南康相。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征还。次年,为中书郎。齐武帝大渐时,竟陵王萧子良与明帝萧鸾争权,以绘曾预“竟陵八友”之列,用为军主。绘阴附明帝。明帝时,为太子中庶子等。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张谗、王珍国杀东昏侯,绘预其谋,与范雲共送东昏首与梁武帝。次年,病卒。刘绘善骈文与诗。机悟多能,工书,善诙谐。其子孝绰、孝仪、孝威、女令嫺俱有文名。绘有集十卷,今佚。存文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萧子良】(460—494) 南朝齐武帝次子。字云英。封竟陵王。祖籍东海兰陵(今属山东),东晋时过江,居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宋顺帝昇明(477—479)间,曾为宋邵陵王刘友属官。昇明三年(479)为辅国将军会稽太守。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封闻喜县公。为征虏将军、丹阳尹。武帝即位,为南徐州刺史,齐武帝永明元年(483),为南兖州刺史。永明二年,为护军将军兼司徒。永明五年,正位为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一千卷。当时游其门者如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萧衍、范云、任昉、陆倕,号为“竟陵八友”。又招致名僧,讲说佛法。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疾病,诏子良以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王融欲立子良为帝,西昌侯萧鸾闻之,急驰入宫,而萧衍已附鸾,融谋遂败。鸾立太孙昭业,是为鬱林王,寻杀之,卒夺帝位。鬱林王既立,王融下狱死,子良亦于明年卒。萧子良有集四十卷,今佚。又有《净住子》二十卷;《义记》二十卷,见《隋书·经籍志》,今佚。《南齐书》本传谓子良文笔“虽无文采,多是劝戒”。今观其诗、赋、书札,尚不得谓全无文采。疑他文未能称是。存文二十余篇,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曹道衡 詹颂)

【苏小小】 南朝齐著名歌妓,实为文学故事人物。家住钱塘(今浙江杭州),出常乘油壁香车。《乐府诗集》收有《苏小小歌》,而《玉台新咏》题作《钱塘苏小小歌》。诗曰:“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唐朝诗人张祜、李贺、温庭筠有以小小为题材的诗作。话本《钱塘佳梦》和《西湖佳话》中的《西泠韵迹》亦衍小小故事。今杭州断桥边有苏小小墓遗迹,一说其墓在嘉兴。《春渚纪闻》中所写美女故事,谓唐人苏小。《七修类稿》所记南宋著名歌妓苏小娟,亦作苏小小,她是钱塘人苏盼奴之妹,能诗词,后嫁襄阳赵院判。(陈祖美)

【任昉】(460—508) 字彦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幼而好学,早知名。仕宋为奉朝请、太常博士。入齐,为竟陵王萧子良记室参军,与谢朓、沈约等并称“竟陵八友”。齐东昏侯永元(499—501)末,为司徒右长史。驃骑大将军萧衍引为记室参军,专主文翰。萧衍建梁,历史部郎中、义兴太守、御史中丞、秘书监。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出为新安太守。为政清省,吏民便之。次年,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史称“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梁书》本传)。钟嵘《诗品》亦

说:“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约)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道变,善论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今存诗二十一首,见《任彦昇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许逸民)

【刘峻】(462—521) 字孝标,原名法虎,唐人避讳改法武。原籍平原(今属山东)。出生一月而父卒。南朝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北魏慕容白曜攻破东阳,刘峻母子被掳北上至中山,峻被卖为奴。后为人所赎。魏人徙之桑乾,贫穷不能自立,母子出家为尼、僧。后还俗,刻苦读书。齐武帝永明四年(486)二月,举家逃还江南,改名峻。遍借异书,其友崔慰祖谓之“书淫”。齐明帝建武二年(494),萧遥欣以峻为豫州刑狱参军,礼遇甚厚。梁武帝天监六年(507),任昉卒,诸子皆幼,昔曾受其汲引者多不予照顾,峻乃仿汉代朱穆《绝交论》著《广绝交论》。到溉见之,抵几于地,终身恨之。七年,安成王萧秀使抄撰《类苑》一百二十卷,未成而已行于世。天监十一年,入建康,著《辨命论》。告归,居东阳(今浙江金华)紫岩山筑室授徒,作《山栖志》。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卒。门人谥曰玄靖先生。峻性高傲不能随俗。既宦途不达,狂介之气一泄于诗文,《广绝交论》、《辨命论》气盛辞壮,其诗亦异于当时绮丽之风而颇清拔。《隋书·经籍志》录“集六卷”,佚。张溥辑有《刘秘书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为陆机《演连珠》、刘义庆《世说新语》作注,今存。《世说新语注》该洽详密,引书多至四百余种,与《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称为鼎足。今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李莉娟)

【高爽】(462?—518?) 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字号不详。其文学活动在南朝齐武帝永明(483—493)至梁武帝天监(502—519)中期。齐武帝永明初,以赠诗王俭为其所赏。王俭领丹阳尹,举爽为孝廉。曾官国子博士。梁武帝天监初,客于孙廉,以廉谄事沈约、范云,作诗以讥。天监三年(504)后,为临川王萧宏参军。坐事罢官,下狱,作《鹄鱼赋》以自比,其文甚工。后遇赦,又诣延陵县令孙谦之子孙抱。以抱无故人之情,取笔书于鼓,谓“面皮如许厚”云云以讥之。约卒于天监末期。有集,佚。史称其“博学多材”,又称其有“险薄才”。今存诗五首及与何逊《往昔陵联句》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吴均传》,参见《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沈玉成 詹颂)

【王僧孺】(465—522) 原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六岁能属文,好学。家贫,常为人抄书以养母。

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僧儒亦为游赏文士,与任昉等善。出为钱塘令,任昉赠诗有“谁其执鞭,吾为子御”之语。梁武帝时,为南海太守、中书郎、领著作,值文德省,撰《中表簿》、《起居注》。迁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少府卿等。与何逊交善。梁武帝天监(502—519)末,何逊卒,僧儒为之编定文集八卷。普通三年(522)卒,年五十八。僧儒善楷隶,好聚书,多至万馀卷,与沈约、任昉为梁代三大藏书家。多识古事,精谱牒之学,改定《百家谱》,成集抄十五卷。集有《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东南谱集钞》十卷,又撰《东宫新记》。有文集三十卷,已佚。严可均辑其遗文为一卷,史称“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今存诗三十九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存诗观之,诗风艳丽,已开晚唐情态。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李莉娟)

【虞羲】字士光,一字子阳。会稽馀姚(今属浙江)人。齐武帝永明初为太学生。永明三、四年(485、486)间,为始安王萧遥光侍郎,寻转晋安王萧子懋(《文选注》原作“建安王”,则为萧子真)征虏府主簿,转记室参军。永明末,作《咏霍将军北伐》诗,为《文选》所录。齐鬱林王隆昌元年(494),袁彖卒时,曾致书明帝萧鸾及尚书左仆射王晏,为袁彖求谥。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为晋安王宝义前军参军,后宝义以废疾去官,遂为晋安国侍郎。卒于梁武帝天监中。今存文一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及断句十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史·王僧孺传》。

(沈玉成 詹颂)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八岁能属文。南齐时累官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入梁,为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待诏文德殿。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出为永嘉太守。天监四年,临川王宏北伐,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还拜中书郎,迁司徒(《南史》作司空)从事中郎。天监七年,卒官,时年四十五。《梁书》本传称其“辞采丽逸”,《诗品》以之与范云并举,谓“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卷中)。有《丘司空集》。存诗十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书》卷四九、《南史》卷七二有传。(许逸民)

【萧衍】(464—549)即梁武帝。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在齐曾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为文学,与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等号称“竟陵八友”。累迁雍州刺史。齐和帝即位位于江陵,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和帝中兴二年(502),封梁王,代齐,建立梁朝,时年三十八。在位四十八年,政治

上未能扭转南齐以来政权日益腐败的趋势,而在文化上提倡儒学,大兴佛教,重视文士,弘扬文学,诗歌创作一时有繁荣之势。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乱。太清三年,台城陷落,遭软禁,终至老病饥饿而死,年八十六。平生笃好读书著述,“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梁书》本纪)。所著除经史著作二百馀卷外,“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同上)。其诗以乐府为长,“乐府五言,情虽丽而未甚靡,齐、梁间乐府惟武帝稍为有致。他如‘金风徂清夜,明月悬洞房’,乃齐、梁佳句。乐府七言,《河中之水歌》语虽妖艳而调犹浑成;《东飞伯劳歌》则词益艳而声益漓矣。杂言《江南弄》七首,声调与休文(沈约)相类,然多生字奇字”(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九)。有《梁武帝集》。《梁书》卷一至三、《南史》卷六有传。(许逸民)

【谢朓】(464—499)字玄晖。其先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徙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少好学。入齐,年十六,以文章清丽闻名于京师。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解褐为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齐武帝永明四年(486),迁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府,子隆为中护军,随归建康。出入竟陵王萧子良鸡笼山(今南京鸡鸣山)西邸,与萧衍、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称“竟陵八友”。永明六年,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俭死,改太子舍人。永明八年,复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后人因称“谢文学”。永明九年,奉陪随王赴任荆州,以文才受赏爱,与随王“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南齐书》本传)。永明十一年秋,为人诬告煽动随王滋事,被召还建康,补新安王萧昭文中军记室。齐海陵王延兴元年(494),为录尚书事萧鸾骠骑咨议领记室,掌中书诏诰。鸾即帝位,转中书郎。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出为宣城太守,寄情丘壑,寓意归隐。建武三年末,以选复为中书郎,奉召回建康。建武四年,又出为晋安王萧宝义镇北咨议。永泰元年(498),行南徐州事。上书告发其岳父王敬则有反意,有功,迁尚书吏部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阴谋废东昏侯自立,朓不愿参预,反遭诬陷下狱,死于狱中,时年三十六。朓诗以五言见长,讲求声律、骈偶,清丽工整,是永明新体诗的典型作品。在齐、梁间诗名已盛,沈约谓“二百年来无此诗”(《南齐书·谢朓传》),梁武帝谓“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梁简文帝谓“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庾肩吾传》)。朓诗善于写景状物,其山水诸作已洗净仙气佛理,较谢灵运又有新发展。其关于声律、骈偶之探索,也启迪了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对有唐一代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谢宣城集》。《南齐书》卷四七、《南史》卷一九有

传。

(许逸民)

【柳惔】(465—517) 字文畅。河东解(今山西解县)人。少有志行,善尺牍,妙解音律,与诗人谢朓为邻,甚受赏重。南齐武帝永明中,竟陵王引为法曹参军,累迁太子洗马。萧衍起兵灭齐,惔迎于石头,衍以为冠军将军。梁朝代齐,以惔为侍中,与沈约等共同制定新律。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出为吴兴太守,故后人习称为“柳吴兴”。在郡召吴均为主簿,时与饮宴,赋诗酬答。天监六年征入为散骑常侍,迁左民尚书。天监八年,出为广州刺史,又征为秘书监,复出为吴兴太守,在郡六年,为政清静。以疾自请解职,郡民上表挽留。卒赠侍中、中护军。惔善弹琴,著《清调论》,又能投壶、占卜、医术、博射、弈棋。梁武帝好弈,使惔品第棋手技艺,定其优劣,著《棋品》三卷。惔工诗,在齐永明间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之句闻于时,王融见而激赏,书于斋壁及所执白团扇,梁武帝设宴,必令其赋诗,其和武帝《登景阳楼》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亦颇传诵。清陈祚明评其诗云:“柳吴兴诗,音调高亮,取裁于古而调适自然,全类唐音,无六朝纤靡之习,颇开太白之先。杂入太白五言中,几不可辨”(见《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五)。有集十二卷,佚。今存诗十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王学泰)

【徐勉】(466—535) 字修仁。原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幼孤贫,六岁能文。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召为国子生,勤学不倦。起家西阳王萧子明侍郎,迁太学博士、尚书殿中郎。萧衍亦深相器赏,自雍州起兵东下,勉即至新林迎候。衍代齐建梁,授勉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梁武帝天监二年(503),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又迁侍中。天监七年,整理官制,分九品十八班,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敕知东宫事。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天监十八年,迁尚书右仆射。普通四年(523),左仆射王暕卒,勉遂领尚书省庶务。大通元年(527),授尚书仆射。以疾,求解职,不许。中大通三年(531),加特进,右光禄大夫。大同元年(535),卒。谥简肃。勉与范云于梁代同称贤相,又博通经史,多识旧闻。善属文,勤于著述。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削,编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又以孔、释二家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其所撰文章,编为《前集》三十五卷,《后集》十六卷;又编录《妇人集》十卷,并佚。今存赋、书、碑、志等十五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王融】(467—493) 字元长,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幼孤,母谢氏教以书学。融博涉有文才。齐武帝永明(483—493)间,为竟陵王萧子良司徒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与谢朓、范云、沈约、萧衍等,出入竟陵王西邸,号“竟陵八友”。为齐武帝所赏。永明九年(491)及十一年策秀才文,皆融手笔。融文藻富丽,为时人所称。永明十一年七月,齐武帝疾笃,融戎服绛衫,欲拒太孙鬱林王昭业而立子良,事不果,及鬱林王立,使孔稚圭劾之,下狱赐死。王融与沈约、谢朓并称为“永明体”创始者,作诗重声律。钟嵘谓声病之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虽钟嵘谓声病说一出,“文多拘忌”,然其说于律诗形成影响甚大。《诗品》又称其“词美英净”,而“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今观融诗,似不尽如是。《饯谢文学离夜》诸作清新可喜,小诗如《王孙游》、《思公子》,亦多情趣。《隋书·经籍志》录《王融集》十卷,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王宁朔集》一卷。今存文六十余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七十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江革】(468?—535) 字休映。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六岁能作文,九岁丁父忧。为王融、谢朓所推重。谢朓于大雪中往访,见革敝絮单衣苦学,乃解衣割毡与之。年二十,举秀才。齐明帝建武中,为太子詹事江祐府丞,参掌机要。然革深自秘密,不令人知,以是祐虽被诛而革得免。梁武帝天监五年(506),除建康令,居官明察严正,豪强惮之。先后为晋安王萧纲、庐陵王萧续、南平王萧伟、豫章王萧综、临川王萧宏、武陵王萧纪长史、太守。革与萧纪言必诗书,纪因此耽学、好文、作诗,革以此为梁武所赏,授都官尚书,以清贫少行李,至以石压行舟。萧纪出镇江州,谓“我得江革,文华清丽”。大同元年(535),卒。谥强子。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作六卷),佚。今存文一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吴均】(469—520) 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北)人。家世寒微,好学有俊才,沈约颇赏其文。梁武帝天监(502—519)初,吴兴太守柳惔召为主簿,常引与赋诗。天监六年(507),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引兼记室,掌文翰。九年,萧伟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梁武帝召入赋诗,称旨,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以私撰《齐春秋》不实,坐免职。又奉诏撰

《通史》，起三皇迄齐代，未成而卒，时普通元年(520)，年五十二。有文集二十卷。史称“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梁书·文学传》)。其诗颇多写景之句。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九说：“吴均五言，声渐入律，语渐绮靡，在梁、陈间稍称迢迈。《传》谓其‘有古气’，非也。五言四句与鲍明远相类，较诸家为胜”。此说可参。存诗及断句一百四十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书》卷四九、《南史》卷七二有传。(许逸民)

【郑道昭】(?—516) 字僖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北朝魏孝文帝时，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孝文帝征沔汉，道昭与兄懿从。后为国子祭酒、秘书监，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卒。《魏书》本传言：“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道昭又擅书法，今所存《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郑文公碑》)，论者多谓即道昭所书。其文载于《魏书》本传者，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诗今存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诗风近于鲍照、谢灵运，在北人中辞藻趋于华丽，而尚存古气。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裴子野】(469—530) 字幾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好学善属文。在齐曾任武陵王国左常侍、江夏王参军。萧景为南兖州刺史，引为录事。梁武帝天监七年(508)，范缜表荐为国子博士，以格于资历，不果。寻授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吏部尚书徐勉奏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又掌中书诏诰。大通元年(527)，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晚年信奉佛教，蔬食。中大通二年(530)，卒官。赠散骑常侍，谥贞子。子野精于史学。曾祖松之在宋元嘉中修宋史，未成而卒。齐武帝永明(483—493)末，沈约《宋书》行世，子野于齐末据以删节，又略有增益，为《宋略》二十卷，叙事评论多善，《史通·叙事》称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又有《丧服传》一卷、《续裴氏家传》二卷、《众僧传》二十卷(《续高僧传·慧皎传》作《高僧传》十卷)、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作十四卷)等，均佚。《宋略》今存《总论》、《泰始三叛论》等五篇。裴子野反对当时丽靡文风，《梁书》本传称其“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有《雕虫论》，主诗教劝美惩恶，以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为非。今存文十四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頌)

【陆倕】(470—526) 字佐公。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少勤学，杜绝往来，昼夜读书。齐武帝永明四年(486)，举秀才。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纳文士，倕亦列“竟陵八友”之一。受沈约赏识，与任昉尤善，作《知己赋》赠昉。及昉为御史中丞，文人争与交好，然参预游宴者仅殷芸、到溉、刘孝绰兄弟及陆倕，号“龙门之游”。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奉敕撰《新刻漏铭》。天监七年，受诏作《石阙铭》，为武帝所赏。天监十四年，出为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途中作《以诗代书别后寄赠》，在任有《思田赋》。普通七年(526)，卒。萧绎为作墓志铭。陆倕善作文。萧纲《与湘东王书》以“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并举。其《刻漏》、《石阙》二铭俱采入《文选》。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作十四卷)，佚。明张溥集佚文为《陆太常集》。今存文二十四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徐摛】(474—551) 字士秀，一字士绩。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武帝天监八年(509)，为晋安王萧纲侍读。萧纲迁转江州、南徐州，摛均随任。普通四年(523)，萧纲出镇襄阳，摛又随往。在郡与刘孝威、庾肩吾等十人抄撰典籍，号“高斋学士”。大通(527—529)中，参赞军务，教令军书，多出其手。中大通三年(531)，萧纲立为太子，徐摛为太子家令，兼掌管记。与修《法宝联璧》。摛作诗好为新变，诗风靡丽，在萧纲属官中年又最长，因而影响极大，其他文士纷纷仿效，至萧纲入东宫而有“宫体”之号。后出为新安太守。秩满还建康，授中庶子，迁太子左卫率。萧纲宠信之，不离左右。萧纲宴集儒、玄之士清谈，摛辞辩纵横，众难答抗。侯景攻陷台城，入萧纲居所，众皆走散，摛独侍立不动，斥景无礼，景乃下拜。萧纲即位为简文帝，授左卫将军，固辞。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侯景囚简文帝，摛气愤而卒。摛诗风格新秀轻逸，今存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除乐府《胡无人行》，余均咏物。《咏笔》一首，对仗平仄已与唐律无异。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頌)

【殷芸】(471—529) 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南朝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为宜郡王萧铿行参军。梁武帝天监(502—519)初，为临川王萧宏主簿、记室。与任昉、刘孝绰等友善，时相饮宴，时人号“龙门之游”。天监七年(508)，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豫章王萧综长史，领丹阳尹丞。天监十三、十四年间，受诏撰《小说》。与

裴子野、刘显、刘之遴等讨论典籍。又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525)，又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529)，卒。著有《小说》十卷，佚。《隋书·经籍志》录作“《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书中杂记秦汉以迄晋宋旧闻，不无可资考证。鲁迅、唐兰、余嘉锡均有辑本，周楞伽有辑注本。亦能诗，今存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陆厥】(472—499) 字韩卿。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下诏令百官举士，顾颉之表荐厥。州举秀才。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反，厥父闲被诛。厥感恸而卒。陆厥少有风概，好属文。永明末，沈约、谢朓等创“永明体”，以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谓“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厥与沈约书难之，以为“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曾不得言曾无先觉也。”盖非不悦“四声”之说，唯以为古人亦知宫商之别，其所以不合者，由于未尽其工。陆厥有集十卷，《隋书·经籍志》谓八卷。其集今佚。存文一篇，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南齐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张率】(475—527) 字士简。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与陆澄子少玄善，尽读其藏书万馀卷。齐明帝建武三年(496)，举秀才。与同郡陆倕谒沈约，由沈约称扬，得与任昉友善。尝告假东归，或以为其傲世，乃惧而作《待诏赋》，梁武帝称其兼得司马相如、枚皋之工整敏捷。又屡侍宴赋诗，武帝誉为“东南才子”、“东南之美”。嗜酒，于公务家务均不关心。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卒。张率少时作诗用功极勤，日限作一首，数日不作，必追补之。《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所载诗赋至梁已佚者，率均为补作。萧统与萧纲书，谓率“才笔弘雅”。有《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梁书》作三十卷)，并佚。今存文二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二十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到溉】(477—548) 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邳县西北)人。少孤贫，与弟洽事任昉为山泽之游，由是有名，时人比之“二陆”。与到洽、刘孝绰、陆倕等在都时与任昉相聚，时号“兰台聚”。起家王国左常侍，授尚书殿中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左右，为建安内史，历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天监末、普通

初(520左右)，为湘东王萧绎轻车长史行会稽郡事。普通中，丁母忧，服阙，除通直散骑常侍御史中丞、都官尚书、江夏太守、左民尚书诸职。大同五年(539)，为吏部尚书，大同七年，去职。后为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善弈棋，为武帝所赏。后得目疾，失明，诏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家居养疾。奉佛，不好交游，唯与张绶、刘之遴、朱异友善。太清二年(548)，卒。有集二十卷，佚。今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到洽】(477—527) 字茂沿。彭城武原(今江苏邳县西北)人。齐明帝时，尝为南徐州迎西曹从事。少清警有才学，为谢朓所赏。明帝永泰元年(498)，去职。谢朓为吏部郎，欲荐之，洽见时世方乱，拒之，隐居积岁。梁武帝天监(502—519)初，与兄溉、从弟沆俱被擢用。天监二年(503)，迁司徒主簿，历尚书殿中郎、太子中舍人，掌昭明太子萧统东宫管记。普通中为尚书吏部郎。普通六年(525)迁御史中丞。七年，出为寻阳太守。大通元年(527)，卒。有集十五卷，佚。今存残文二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存《赠任昉》、《答秘书丞张率》四言诗各八章，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庾仲容】(478—551) 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幼孤，既长笃学。梁武帝天监六年(507)，授安西法曹参军。转太子舍人。天监七年后，迁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主簿。十二年，迁晋安功曹史，历永康、钱唐、武康令，以无政绩，多被劾。天监(502—519)末，授安成王萧秀中记室。萧秀未至雍州而卒，仲容在雍州为刺史南平王萧憺宾客。普通(520—527)中，迁武陵王萧纪咨议参军，又授尚书左丞，坐推究不实免官。仲容博学不得志，乃任气使酒，作危言高论，为时人所非。中大通(529—534)中，为记室参军，曾参与修撰《法宝联璧》，后出为黟县令。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卒。仲容博学多闻，抄辑诸子书三十卷(《隋书·经籍志》作“《子钞》三十卷”)，诸家文集三十卷，有文集二十卷，并佚。今存诗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何逊】(480?—518?) 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人。八岁能赋诗，二十岁前后，州举秀才。当时名流范云、沈约爱其诗文对策，结为忘年交。入梁，起家奉朝请。梁武帝天监六年(507)，为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水曹行参军，兼记室。天监九年，随萧伟迁江州，仍掌书记。后又为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以母丧去职。服丧期满，

除会稽太守、庐陵王萧续记室。天监十六年(517)六月,萧续为江州刺史,逊复随府江州。不久卒于官,终年约四十岁。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时称“何、刘”。诗与阴铿俱以描摹山水著称,又号“阴、何”。他的山水诗继谢灵运、谢朓之后,把自然景物的描写与思乡怀人、送别赠答等诸多人生感慨融为一体,表达了一个失意士人游宦迁徙的悲凉心情,艺术手法工细微妙,而风格清新俊逸,去艳修真,在梁代诗坛独树一帜。有《何逊集》。《梁书》卷四九、《南史》卷三三有传。

(许逸民)

【王籍】(480—550?) 字文海。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七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才气,为任昉所称。南齐末,为冠军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梁武帝天监(502—519)初,为安成王萧秀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为余姚令、钱塘令,任性放纵,以是免官。天监末为萧绎参军,随府至会稽。以公事免。中大通(529—534)中,参与修撰《法苑珠林》。太清(547—552)初,萧绎引为安西府参军,带作唐令。约卒于太清中。籍诗学谢灵运,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句,为时人激赏。萧绎集其遗文为十卷,佚。工草书,笔势遒放,庾肩吾《书品》列“下之中”。今存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王筠】(481—549) 字元礼,一字德柔,小字养。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王僧虔孙。少好学,摘抄书籍百餘卷。年十六,作《芍药赋》,文辞甚美。梁武帝天监(502—519)初,起家中军临州王萧宏行参军,迁太子舍人,除尚书殿中郎。为沈约所赏,以为知音。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萧统爱文学,东宫文士如林,王筠、刘孝绰最为昭明太子所重。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卒,出为临海太守,在郡颇事聚敛,被讼,不调累年。太清三年(549),简文帝即位,授太子詹事。筠旧宅先为侯景乱兵所焚,乃寓居萧子云宅,夜有盗攻门,惊惧,坠井卒,时年六十九。王筠曾奉敕撰《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昭明太子卒,又作哀册文,均为时人所赏。存世诗中有与沈约、刘孝威等人赠答之作,乐府《行路难》、《楚妃吟》为张溥所称。晚年自编文集,以历任官职为名,有《洗马集》、《中庶子集》、《吏部集》、《左佐集》、《临海集》、《太府集》各十卷,《尚书集》三十卷(《隋书·经籍志》录五十三卷,有出入),佚。存世著作经张溥辑为《王詹事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续有辑补。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刘孝绰】(481—539) 本名冉,字孝绰,以字行。

小字阿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绘子。七岁能属文,时号神童。年十四,即代父起草诏诰。舅父王融深赏之。前辈文人沈约、任昉、范云等皆折节下访。梁武帝天监(502—519)初,起家著作佐郎,迁太子舍人,兼尚书水部郎。出为上虞令,有《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诗》。还建康,授秘书丞,梁武帝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数免数起,普通(520—527)初,迁太府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与王筠最受昭明太子知赏。起乐贤堂,使画工先画孝绰像,又执筠袖、抚孝绰肩,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普通末,昭明太子编《文选》,孝绰协理其事。大同五年(539),卒。萧绎为作墓志铭。刘孝绰恃才傲物,放荡不检,多为时人所忌恨。但文名极盛,每作一篇即被传诵,甚至流传北朝。刘氏一门能文者七十余人,史称“近古未有”,而孝绰为刘氏文宗。有文集十四卷,数十万言,佚。明张溥辑为《刘秘书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续有补辑。其文今存十七篇,诗存六十九首,多大篇。《赠陆长史倕》五言,一百二十四句,为今存南朝诗最长者。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常景】(?—550) 字永昌。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一带)人。先世避乱居凉州。少聪敏,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北魏孝文帝时,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北魏宣武帝正始(504—508)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后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512—515)初,为太子屯骑校尉,其年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出为雍州刺史元苌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宣武帝卒,孝明帝嗣位,召景还洛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兼中书舍人。又敕撰太和以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孝明帝正光(520—525)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孝昌(525—527)初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徐州刺史。杜洛周起兵,使景为尚书兼行台讨之。后守范阳,为城人所执而降于杜洛周。洛周为葛荣所破,又入荣处,荣破,得还朝。孝庄帝永安初(528),复官。参议正光王子历。东魏孝静帝天平初(534),随朝廷迁邺,除仪同三司。武定八年(550),卒。《魏书》本传谓“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今并佚。存文四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又《四声赞》一首,见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严可均未收。又《洛阳伽蓝记》卷一有其《永宁寺碑》佚文,严氏亦未收。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魏

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詹颂)

【何思澄】(481?—534?) 字元静。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少勤学,工文辞。梁初起家为南康王侍郎。梁武帝天监六年(507),随安成王萧秀至江州,作《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谓不及,使人题之于新建阁斋壁。傅昭请思澄作《释奠诗》,辞文典丽。天监十五年,敕撰《华林遍略》,徐勉举何思澄等参与其事。迁治书侍御史,出为秣陵令,还为东宫通事舍人。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卒,出为黟县令。迁武陵王萧纪中录事参军,卒于官,年五十四。有集十五卷,佚。今存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伏挺】(484?—549?) 字士标。平昌安丘(今属山东)人。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诗学谢灵运体。南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后为临川王萧宏中军参军。于宅中讲《论语》,听者倾朝。时谓伏氏三世聚徒教授,世罕其比。历官晋陵、武康令等。罢官还,不耐寂寞,致书仆射徐勉以求仕。寻授治书侍御史,受贿,惧获罪,乃出家为僧,改名僧挺。久之遇赦。大同三年(537),萧纶恩礼之,因而还俗。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约卒于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中。子知命,附侯景,叛军书檄出王伟及知命之手。景败,送江陵狱,饿死。挺自称“好属文,不合今世,不能局促节步,以应流俗”,盖诗学大谢,自不能见称于当世。有文集二十卷,佚,今存诗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著《述说》十卷。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李莉娟)

【萧子显】(487—535) 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齐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在齐封宁都县侯,入梁降爵为子。除司徒主簿、太尉录事。采录诸家《后汉书》,考正异同,成一家之书,共一百卷。又撰《齐史》,书成诏付秘阁,即现存《南齐书》五十九卷。累迁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出为临川内史,还,授黄门郎。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迁长兼侍中。中大通三年,领国子博士,启请为梁武帝编纂文集,撰《普通北伐记》,并在太学讲述武帝所著《五经义》。中大通五年,迁吏部尚书。大同元年(535),出为吴兴太守,旋卒。子显恃才傲物,深为士大夫所嫉恨,然工于迎合,颇得武帝父子赏识。《梁书》本传记萧子显有集二十卷,已佚。其所撰《南齐书》,多据檀超、江淹国史,本人又为南齐宗室,故材料丰富而文笔简练,然颇多忌讳。书中《百官志》多为后代史家所称。《普通北伐记》、《后汉书》均佚。今存文二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诗十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詹颂)

【庾肩吾】(487—551) 字子慎。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世居江陵(今属湖北)。庾信父。八岁能赋诗。初为晋安王萧纲常侍,在雍州,与刘孝威、徐摛、鲍至等十人抄撰群籍,号称“高斋学士”。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萧纲为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累迁太子中庶子。萧纲即位,为度支尚书。侯景之乱,潜避会稽,为侯景部将俘获,释以为建昌令,乃逃奔江陵。萧绎用为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诗风轻浮绮靡,拘于声韵,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之一。明胡应麟言:“唐律虽滥觞沈(约)、谢(朓),于时音调未遒,篇什犹寡。梁室诸王,特崇此体。至庾肩吾,风神秀朗,洞合唐规。阴(铿)、何(逊)、吴(均)、柳(恽),相继并兴。陈、隋徐(陵)、薛(道衡)诸人,唐初无疑矣。”(《诗薮·外编》卷二)可见他的诗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有《庾度支集》。《梁书》卷四九、《南史》卷五〇有传。

(许逸民)

【萧子云】(487—549) 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齐豫章文献王萧嶷第九子。在齐封新浦县侯,入梁降爵为子。性沉静,风神闲旷,任性自纵而兄弟不睦。二十岁撰《晋书》,六年而成一百一十卷,奏呈,诏付秘阁。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仕为秘书郎。为昭明太子萧统舍人,撰《东宫新纪》二十卷。天监十七年,迁晋安王文学,丹阳尹丞。普通六年(525),迁庐陵王萧续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大通间,迁轻车将军,人为吏部、侍中。中大通三年(531),出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大同二年(536),迁国子祭酒,领南徐州中大正。当时郊庙乐章均出梁初沈约所撰,子云以为不当,奏请改作。武帝即令其撰写。其撰作全用典故而不杂子史文章轻浅之语,今存十九首。大同七年,出为东阳太守。太清元年(547),还建康,复为侍中,国子祭酒。太清二年,侯景乱起,逃奔民间。太清三年又东奔晋陵,饿死于僧房。子云善草隶,梁武帝以为可与钟繇并驱争先。然唐太宗不喜其书,以为“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晋书·王羲之传》“制曰”)。《隋书·经籍志》录其集十九卷,佚。今存文五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及《梁三朝雅乐歌六首》、《相和六引》等,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沈玉成 詹颂)

【刘遵】(488—535) 字孝陵。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迁晋安王萧纲记室。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为太子中庶子。大同元年

(535),卒于官。萧纲深加悼惜,拟撰墓志并为辑集,与刘孝仪书,称遵“文史该富”,“辞章博赡”。撰有《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佚。今存诗九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诗风轻绮,其《繁华应令诗》一首风格低下,尤为后人所非。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徐悱】(494?—524) 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徐勉次子。幼聪明,能属文。梁武帝天监(502—519)中,起家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掌书记。累迁洗马、中舍人,仍管掌书记。以足疾出为湘东王萧绎友,迁晋安王萧纲内史。普通五年(524),卒于雍州。徐勉《答客喻》称其“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学不倦,居无尘杂,多所著述,盈帙满笥”。所作多散佚。今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玕城》为《文选》所录。主要事迹见《梁书·徐勉传》、《南史·徐勉传》。其妻刘令嫻,亦工诗文。

(沈玉成 詹頌)

【周弘正】(496—574) 字思行,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幼孤,为伯父中护军周舍所养。少通《周易》、《老子》。年十五,召补国子生。起家梁太学博士。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晋安王萧纲为丹阳尹,引为主簿。历曲阿、安吉令,司义侍郎诸职。中大通三年(531),萧纲立为太子,弘正上奏记于纲,劝以谦让。累迁国子博士。大同七年(541),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侯景之乱时,台城陷,弘正自拔至江陵。元帝授以黄门侍郎,迁左民尚书。及侯景平,敕弘正校讎王僧辩所启送图籍。江陵陷,弘正遁归建康,为敬帝侍中太常卿、都官尚书。陈武帝代梁,授太子詹事。陈文帝天嘉元年(560),迁侍中、国子祭酒,使往长安迎安成王陈顼(宣帝),天嘉三年(562),自周还,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帝太建五年(573),授尚书右仆射。明年,卒官。周弘正著有《周易讲疏》十六卷(《隋书·经籍志》作《周易义疏》);《论语疏》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庄子疏》八卷(《隋书·经籍志》作《庄子内篇讲疏》);《老子疏》五卷(《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孝经疏》二卷(《隋书·经籍志》作《孝经私记》)。于当时颇享盛名。弘正亦兼擅诗文,《陈书》本传谓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同,则是书于唐时犹存,今已佚。存文八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文多为应用文字,属骈体,然不如徐、庾之秣丽。其诗亦较质朴,与梁陈“宫体”颇异。其中如《答林法师诗》、《还草堂寻处士弟诗》、《于长安咏雁诗》等,皆较朴素遒劲,且有寄托,于梁陈诗人中稍具特色。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

传。

(曹道衡 詹頌)

【周弘让】 南朝梁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周弘正弟。生卒年不详。性简素,博学多通,善隶书。始仕不得志,隐于句容之茅山,频征不出。侯景之乱,畏祸,出为中书郎,为世所讥。王僧辩讨侯景,随兄弘正迎僧辩。寻随兄至江陵,梁元帝承圣元年(552)为国子祭酒。承圣二年,为仁威将军,居句容。陈文帝天嘉(560—565)初,以白衣领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弘让早年与王褒、庾信为友。天嘉三年(562),弘让兄弘正使周返陈,王褒作《赠周处士诗》,并致书弘让,道其思乡之悲。弘让复书。亦颇凄惋,二书文辞华美而感情真挚,皆六朝书翰中佳作。及弘让卒,王褒曾作诗伤之,王作今佚,而庾信《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诗》犹存,足见其与王、庾友谊之深。《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陈金紫光禄大夫《周弘让前集》九卷”,“陈《周弘让后集》二十卷”,今佚。存文四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留赠山中隐士》一首,清沈德潜评为“清真似陶诗一派,陈隋时得之大难”(见《古诗源》卷一四)。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费昶】 江夏(今武汉市)人。约卒于梁武帝大通(527—529)、中大通(529—534)间。年岁不详。善为乐府,作“鼓吹曲”,为梁武帝所赏,称其“才意新拔,有足嘉异”。与萧子范、子晖兄弟有诗酬和。官至新田令。有集三卷,佚。今存诗十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事迹参见《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沈玉成 詹頌)

【王臺卿】 生卒年、字号、籍贯等均不详。《南史·梁宗室·萧恪传》记,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闲世务,政委群下,宾客有王臺卿等四人。臺卿颇有借权受贿之事。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萧恪奉召入都,臺卿当留住雍州。存诗有《和简文帝赛汉高祖庙》、《山池应令》等,庾肩吾亦有同题之作,盖作于萧纲任雍州刺史时。中大通二年(530)随萧纲入京,后即在东宫为僚属。今存诗十八首,又有与萧纲、庾肩吾等联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沈玉成 李莉娟)

【朱超】 生卒年、字号及籍贯均不详。《隋书·经籍志》录“梁中书舍人《朱超集》一卷”。《诗纪》谓:“朱超、朱超道、朱越,各诗集所载,名多互见,疑是一人之作,今从《诗汇》并载而于各题下仍分注本名,以俟考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从《诗纪》,复于《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七辑佚句二,然此已明见超之《舟中望月》诗。今存诗有《赠王僧辩》、《别刘孝先》,王、刘皆萧绎部属,则超或亦在萧绎幕,江陵陷

后或曾仕后梁。今存诗十七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沈玉成 李莉娟)

【刘孝胜】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刘孝绰五弟。历官邵陵王萧纶法曹、湘东王萧绎安西记室、尚书左丞。出为信义太守,以公事免。久之,复为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后,为武陵王萧纪长史、蜀郡太守。侯景之乱,萧纪于蜀中称帝,以孝胜为尚书仆射。梁元帝承圣二年(553)随萧纪出峡口攻江陵,兵败,被执。梁元帝赦之,以为司徒右长史。承圣三年,西魏破江陵,被掳入北而卒。工五言诗,有集,乱中佚。今存诗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刘孺传》。(沈玉成 李莉娟)

【刘孝威】(496—549)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孝绰第六弟。梁武帝普通四年(523),晋安王萧纲任为法曹,转主簿。萧纲立为太子,授太子洗马,累迁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书记。太清初,迁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太清三年(549)侯景围建康,城破,孝威附景,奉命西上,是年,病卒于安陆。孝威工诗,其兄孝绰常称“三笔六诗”,六即孝威。诗风清丽,多属侍宴、奉和之作。《望隔墙花诗》似即为《莺莺传》“隔墙花影动”所本。有集十卷,佚。明张溥辑其兄弟遗文为《刘孝仪刘孝威集》一卷。存诗六十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刘孺传》。(沈玉成 李莉娟)

【刘孝先】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齐末。刘孝绰七弟。官武陵王萧纪法曹、主簿。萧纪迁益州刺史,孝先随府转记室。梁元帝承圣二年(553),随萧纪出峡口攻江陵,兵败,被执。梁元帝以为黄门侍郎,迁侍中。承圣三年,西魏破江陵,被掳入北而卒。工五言诗,有集,乱中佚。今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刘孺传》。

(沈玉成 李莉娟)

【温子昇】(495—547)字鹏举。自称太原人,晋温峤之后。世居江南,祖恭之避难归北魏,家于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因为济阴人。子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及长,博览百家,文章清婉。为广阳王元渊门下之客。北魏孝明帝熙平(516—518)初,中尉东平王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子昇为高第,补御史。后为李神俊荆州录事参军,被征还省。正光(520—525)末,广阳王元渊为东北道行台,召为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子昇手,才名转盛。孝庄帝建义元年(528),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后随元天穆讨邢杲。北海王元颢入洛,子昇劝天穆讨之,天穆不能用,遣之还洛,元颢以为中书舍人。孝庄帝返洛,子昇复为舍人。及孝庄帝杀尔朱荣,子昇预谋,

当时赦诏,子昇所作。孝武帝永熙年(532—533)间,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孝静帝时,高澄引为大将军府咨议参军。后元瑾、荀济等谋杀高澄,事泄,澄疑子昇知其谋,时方使作《献武王(高欢)碑文》,既成,囚诸晋阳狱,饿食敝襦死。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之,又为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子昇又撰《永安记》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后魏散骑常侍《温子昇集》三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十五卷,未知孰是,今存者寥寥。明张溥辑有《温侍读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温文存者约二十九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一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子昇骈文如《韩陵山寺碑》,最为当时人所推崇,辞藻华美,已不减江左作者。温诗亦自有其成就,较之梁、陈诗之柔靡,温诗实有其佳处。如《捣衣诗》,已开初唐之风,不陷于宫体之纤巧。洵为名篇。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邢劭】(496—?)字子才,小字吉。河间郑(今河北任丘北郑州镇)人。年五岁,即为崔亮所赏。十岁,能属文。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释巾为北魏宣武帝挽郎、除奉朝请,迁著作佐郎。北魏孝明帝以后,劭文独步当时,每一文出,京师为之纸贵。遂为袁翻、祖莹所嫉。北魏孝庄帝永安(528—530)初,累迁中书侍郎。及尔朱氏之乱,劭与杨愔避地嵩高山。孝武帝时,迁至太常卿、国子祭酒。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与温子昇撰《麟趾新格》十五篇。北齐文宣帝高洋代魏,朝臣皆作《甘露颂》,令劭为之序。又重修《麟趾格》。及文宣帝死,凶礼多访于劭,又令劭作哀策。及齐孝昭帝杀杨愔,劭被疏,出为兖州刺史。后加特进,卒。邢劭在北魏、北齐间文人中颇有盛名。初与温子昇并称“温邢”,又与魏收合称“邢、魏”。邢劭尝与杜弼争神灭之事,“以为人死还生,恐为蛇足”,与南朝范缜之论为近。劭于诗文,仰慕南朝之沈约,以为沈约所言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为当。劭又作《萧仁祖集序》,以为“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然其自作则仍多仿南人。邢劭文多骈体,虽华丽而不甚雕琢,盖得力于沈约之作。其文今存二十八篇,多存于类书,除《新宫赋》而外,率为应用文字。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风清淡而近古拙,如《冬日伤志篇》、《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诗》并见《初学记》卷三,皆重气质而不尚华藻;然如《思公子》(见《乐府诗集》卷七四)、《七夕》(见《艺文类聚》卷四)则辞藻亦甚华美。今存

诗及断句九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北齐书》本传,劭本有集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十一卷。今之所存,去原本已甚远。主要事迹见《魏书》、《北齐书》、《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萧统】(501—531) 即昭明太子。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502)冬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531)四月病卒,时年三十一,谥号昭明。美姿貌,性宽和,崇信佛教,爱好文学。当时东宫名才并集,文学极盛。著有文集二十卷,又撰集古今典故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已佚。又编撰《文选》三十卷,今存。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梁书》本传称赞其诗思敏捷,“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所编《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衡文标准,最能体现其论文主张,而其诗作却未见佳处。存诗三十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书》卷八、《南史》卷五三有传。(许逸民)

【沈炯】(502—560) 字礼明(一作初明)。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少有俊才,梁时解褐为王国侍郎,迁尚书左民侍郎。后出为吴令。侯景之乱,景将宋子仙逼令掌书记。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子仙为王僧辩所败,王访得炯,使掌文书。及景平,梁元帝征为给事黄门侍郎。元帝承圣三年(554),江陵陷,入西魏,授仪同三司。作表陈思归之意。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南归至建康,迁御史中丞。陈霸先代梁,加通直散骑常侍。陈文帝立,欲迎母至建康,以疾卒于吴中。沈炯有集二十卷,佚。存文十七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为一卷;诗十九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萧综】(502—532) 字世谦。入北魏后改名赞,或作纘,字德文。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朝梁武帝第二子。其母吴淑媛原在齐东昏侯后宫。齐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十二月,梁武帝萧衍兵入建康,纳吴氏,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为东昏侯遗腹。综知之,遂怀异志。武帝天监三年(504),封豫章郡王。天监十年,为郢州刺史。天监十三年,入领石头戍军事。天监十五年,迁丹阳尹。天监十六年,又为南徐州刺史。普通四年(523),出为南兖州刺史。普通六年北伐,综镇彭城,遂乘间奔北魏。在北魏官侍中、司空,封高平公,进丹阳王。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萧宝寅据长安叛魏,综奔之,为吏人所执。孝庄帝不之罪,转为司徒、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出为齐州刺史。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十二月,尔朱

兆叛军入洛阳,萧综变服为僧,潜逃至长白山,又转至阳平。节闵帝普泰二年(532),卒。综有才学,《魏书》本传称其“机辩,文义颇有可观”。在梁尝仿鲁褒《钱神论》作《钱愚论》,以刺萧宏贪鄙,文甚急切。武帝知之,下令急毁而流布已远。今存《听钟鸣》、《悲落叶》诗二首,情辞凄恻,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中《萧赞传》。

(曹道衡 詹颂)

【鲍泉】(?—551) 字润岳。生年及年岁不详。东海(今山东郯城一带)人。少事萧绎。为湘东国常侍,绎赏之。后为通直侍郎。南朝梁武帝太清三年(549),迁信州刺史。侯景攻陷建康,萧绎与萧督自相攻杀,命鲍泉攻长沙。泉故意淹迟稽缓,久不克,为王僧辩所代。迁郢州刺史萧方诸长史。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侯景攻破郢州,被擒,旋被杀。泉博学,兼有文笔。精于《仪礼》,著有《新仪》四十卷(《南史》、《隋书·经籍志》作三十卷)、《六经通数》三十卷,《金楼子·著书》记萧绎命鲍泉撰《补阙子》十卷,绎为之序,均佚。其诗今存九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沈玉成 詹颂)

【刘令嫻】 生卒年不详。约梁武帝朝(502—549)在世。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绘女,著名文学家刘孝绰三妹。孝绰弟子侄七十人皆能文,妹三人,并有才学,令嫻居三人之首,世称刘三娘。孝绰恃才傲物,与世乖忤,五次被罢官。传说曾家居不出并题诗于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令嫻续之云“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可见其诗思之敏捷。其夫徐悱,字敬业,徐勉子。敬业游宦于外,曾作《赠内》诗等以表对其妻的“回肠”之思;令嫻则作《答外二首》以抒其离愁幽怨。敬业早逝。令嫻所作《祭夫文》,辞甚凄怆清绮。徐勉本欲为哀辞,既睹令嫻祭文,遂叹而搁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刘令嫻集》三卷,已佚。《祭夫文》载《艺文类聚》。陆昶评其诗云:“笔笔清矫,语语明秀,无一尘浊气,刘家兄妹自是神仙胜会。”(《历朝名媛诗词》)今存诗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事见《梁书·刘孝绰传》、《名媛汇诗》、《历代妇女著作考》。(陈祖美)

【沈满愿】 约梁武帝朝(502—549)在世。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齐梁文坛领袖沈约孙女,梁征西记室范靖(一作静)妻。夫妇尝偕坐后园观洒翠池,又上洗心亭,共索笔砚为《映水曲》。满愿诗先成,范靖奇之。《隋书·经籍志》著录《沈满愿集》三卷,已佚。《历朝名媛诗词》评满愿诗曰:“范靖妻长于诗,所著甚富,词气浑洒,不为笔所拘局。譬如弹弦时起高调急响,而复以疏宕解之,亦能手也。”今存诗十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事见《历代妇

女著作考》卷一引《乌程县志》。(陈祖美)

【萧纲】(503—551) 即梁简文帝。字世缵,小字六通,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武帝天监五年(506)封晋安王。历南兖州、荊州、江州、南徐州、雍州、扬州刺史。中大通三年(531),被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梁武帝困饿而死,遂即帝位。大宝二年(551),为侯景谋杀,年四十九。幼而敏睿,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梁书》本纪),《梁书》言其“博综儒书,善言玄理”,“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又好引纳文学之士,讨论著述,所著有《昭明太子传》、《老子义》、《法宝连璧》等。诗风轻艳绮靡,号称“宫体”。其《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之论文主张,提高抒情诗的地位,对宫体诗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辑本《梁简文帝集》。《梁书》卷四、《南史》卷八有传。(许逸民)

【释洪偃】(504—564) 俗姓谢。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风神颖秀,昼读佛典,夜诵诗书。后游京邑,受业于龙光师绰法师。善属文,又善草隶。梁简文帝在东宫,欲令还俗,引为学士,弗能致。及侯景之乱,避地缙云,又尝至郢,及江陵陷,东归若耶云门精舍。及陈武帝代梁,建康诸僧延请,乃于陈文帝天嘉(560—566)初入都,游钟山开善定林。天嘉五年(564),卒。洪偃能诗,《续高僧传》称“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而文彩洒落,罕有嗣者。缀述篇章,随手散失。后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馀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偁尚之,封于秘阁”。《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八卷,当即何氏所见原本。今佚。存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事迹见《续高僧传》本传。(曹道衡 詹頌)

【魏收】(506—572) 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年十五,颇已属文,后随父赴边,好习骑射。为人所讥,乃折节读书。初除太学博士。北魏孝庄帝时,李神偶奏授司徒记室参军。北魏节闵帝时,迁散骑常侍。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北魏孝武帝时,为帝兄子广平王元赞开府从事中郎,寻兼中书舍人。后与王昕使梁,返,尚书仆射高隆之就求南货,不能如志,遂坐禁止。孙搴死,司马子如荐收赴晋阳,以为中外府主簿。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除正常侍,兼领中书侍郎。北齐文宣帝代魏前,如晋阳以收与崔季舒、高德政等同掌机密。及受禅,令撰禅代诏册诸文。文宣帝天保元年(550),为中书令,仍兼著作。天保二年,奉诏撰魏史,改邓渊《代记》诸书为纪传体。至天保五年奏上之,同年,又续上十志。唯以个人恩怨,褒贬人物颇失当。北齐孝昭帝时,兼侍

中、右光禄大夫,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后以罪除名。寻为清都尹。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为左光禄大夫。积迁至开府、中书监。卒。《魏收集》,据《北齐书》本传谓七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十八卷。魏收诗文,古人多谓其学南朝任昉。今存诗及骈文,俱重辞藻,而所作《魏书》,虽颇为历代所讥评,而叙事流畅,能传神,史书中文笔亦可称上乘。存文十三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魏书·自序》、《北齐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詹頌)

【徐陵】(507—583) 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少聪慧,人称“天上石麒麟”。稍长,博涉史籍,有辩才。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晋安王萧纲引参宁蛮府军事。中大通三年(531),为萧纲东宫学士,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受劾免官。久之,为通直散骑侍郎。太清二年(548)、敬帝绍泰二年(556)先后出使魏、齐,累官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入陈,加散骑常侍。陈文帝天嘉四年(563)为五兵尚书,领大著作。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天康元年(566),迁吏部尚书。陈宣帝太建元年(569),为尚书右仆射,封建昌县侯。太建三年,迁尚书左仆射。太建七年,领国子祭酒。太建十三年,为中书监。后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卒,年七十七。有陈一代文檄军书及受禅诏策,皆陵所制,号为“一代文宗”,在梁与庾信齐名,所作诗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陈书》本传),时称“徐庾体”。作品流传甚广,甚至北朝亦几至家有其书。后其文集遭丧乱散失,至唐初尚有三十卷,已佚。明人辑有《徐孝穆集》。其所编《玉台新咏》十卷传世。今存诗四十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书》卷二六、《南史》卷六二有传。(许逸民)

【萧绎】(508—555) 即梁元帝。字世诚,小字七符,号金楼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封湘东王。历会稽太守、丹阳尹。普通七年(526),出为荊州刺史。大同五年(539),领石头戍军事。大同六年,出为江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复为荊州刺史。后平侯景之乱,即帝位于江陵。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城陷于西魏,被俘。十二月辛未,遇害。聪悟俊朗,六岁便解作诗(《金楼子·自序篇》)。成年后笃志文艺,雅好著述,所著《金楼子》、《汉书注》等有十数种之多。《金楼子·立言篇》论及文、笔之分,并认为“文”的标准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在文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其诗绮靡衰飒,

属于齐、梁轻艳一体。有辑本《梁元帝集》。存诗及断句一百二十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书》卷五、《南史》卷八有传。(许逸民)

【阳休之】(509?—582) 字子烈。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北魏孝庄帝立,解褐员外散骑侍郎,迁给事中等职。北魏孝武帝入关,随贺拔胜奔南朝梁。东魏孝静帝立后,以孝静帝天平二年(535)还邺。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拜大鸿胪,领中书侍郎,北齐武成帝时,为西兖州刺史。北齐后主武平(570—576)初,除中书监,武平五年(574),以年老致仕,后主不许,明年,又除尚书右仆射。及周武帝灭北齐,被征至长安,历太子少保、和州刺史等职。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罢任,终于洛阳。《北齐书》本传谓“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并成于世。”《新唐书·艺文志》有《阳休之集》三十卷。今佚。存文一篇,即《陶潜集序录》,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四首及佚句一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北齐书》、《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陆雲公】(511—547) 字子龙。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陆倕从孙,陆厥侄。好学有才思。州举秀才。梁武帝中大通(529—534)中,先后为萧纪、萧绎行参军。尝作《太伯庙碑》,张纘叹为“今之蔡伯喈”,自是与纘为忘年交。入直寿光省,授著作郎,累迁中书黄门郎。善弈,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奉诏校定《棋品》。梁武帝暇日泛舟天渊池,惟刘之遴、到溉、朱异、陆雲公等人随侍。太清元年(547)卒。帝有手诏悼之。从兄陆才子、子陆琼,并有文名。有集十卷,佚。今存《释奠应令诗》十章,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

(沈玉成 李莉娟)

【王褒】(511?—574?) 字子渊,琅玕临沂(今山东费县东)人。出身于江左世族,博览史传,尤工属文。年二十,举秀才。历秘书丞、宣城王文学、安城内史。梁武帝大宝二年(551),赴江陵,转南平内史。梁元帝即位,拜侍中。元帝承圣二年(553),迁尚书左仆射。承圣三年,江陵陷,入西魏,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明帝时,加开府仪同三司。北周武帝保定(561—565)中,除内史中大夫。累迁小司空,出为宜州刺史,卒于位,年六十四。在梁朝为宫廷诗人,所作《燕歌行》,时称“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在北朝才名与庾信为最高,明许学夷认为其“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以全集观,不能如庾信之工也。乐府七言亦近初唐”(《诗源辨体》卷一)。

明人辑有《王司空集》。存诗四十八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书》卷三五、《周书》卷四一、《北史》卷八三有传。(许逸民)

【庾信】(513—581) 字子山,小字兰成,原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八世祖时徙家江陵(今属湖北)。庾氏自南渡以来,“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宇文道《庾信集序》),以仕宦与文学显于世。父庾肩吾,梁简文帝时官度支尚书,同时又是著名的“宫体”诗人。信天资聪慧,幼而好学,博览群籍,尤通晓《春秋左氏传》。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十五岁,侍昭明太子萧统东宫讲读。中大通三年(531),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开文德省置学士,信与徐陵皆充其选。此时庾肩吾及陵父徐摛亦在东宫任职,父子一同出入禁闥,恩礼隆厚。信与陵才情焕发,文并绮艳,世号“徐庾体”,一时家诵户弦,竞相追摹。约当二十岁时入仕,初为安南府行参军,转尚书度支郎中。大同八年(542),出为郢州别驾,曾与湘东王萧绎论用兵战阵之事,倍受赏识。大同十一年,为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以文章辞令获盛誉。返国后任正员郎,又为东宫领直、建康令。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奉命率军守桥,仓皇败退。建康陷落,遂沿江西奔江陵。梁元帝在江陵即位,为御史中丞,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元帝承圣三年(554)四月,北上长安使西魏。十一月,西魏军破江陵,从此被留不返,忍辱仕北朝。历魏、周、隋三朝七帝,直至病死,在北方共二十八年。西魏时,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入周,自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出为洛州刺史。北周宣帝大成元年(579),还为司宗中大夫,不久以病去职。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年六十九。其文学创作生涯可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时期,南朝诗今存不多,如《奉和山池》、《和咏舞》之类,流连光景,醉心声色,思想贫乏,骨力亦弱。但长于咏物写景,锤字炼句,调谐对切,斗巧出奇,推动了古诗向格律诗嬗变。入北以后所作,几乎“篇篇有哀”,一则惭事异朝,难抑亡国之痛;一则思念乡关,不尽身世之感。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刮除丽藻,直抒胸臆,颇多不平之气。他如《重别周尚书》、《寄王琳》、《寄徐陵》等,语短情长,也处处流露出对故人故土的依恋。后期诗内容充实,写来亦沉挚质劲,不过早年的俚偶结习积重难改,总体风格依然与南朝的风华靡丽一脉相承。明杨慎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卷三)庾信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可以此言为定论。明人辑有《庾子山集》。事见宇文道《庾信集序》、《周书》卷四一、《北史》卷八三有传。(许逸民)

【江总】(519—594) 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七岁而孤,依于外家萧氏。好学,有辞采。年十八,为梁武陵王府法曹参军。梁武帝极赏其诗才,累迁太常卿。侯景之乱,避难会稽,转广州。梁元帝征为始兴内史,未及赴任而江陵陷落,遂流寓岭南。至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召还建康,为中书侍郎。后主时,历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于后主至德四年(586)授尚书令,不理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当时称为“狎客”。祯明二年(588),进号中权将军。入隋,为上开府。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卒于江都,年七十六。有文集三十卷,已佚。明人辑《江令君集》,存诗近百首。诗则五言、七言俱工,“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陈书》本传),可以说是宫体艳诗的代表作家。陈亡后,情多悲凉,语亦渐洗铅华。如《哭鲁广达》,清沈德潜评为“不嫌自活,真情可悯”(《古诗源》卷一四);《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王夫之评为“萧条无限,付之不言”(《古诗评选》卷三)。《陈书》卷二七、《南史》卷三六有传。(许逸民)

【顾野王】(519—581) 字希冯。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九岁能属文。梁武帝大同四年(538)除太学博士,迁临贺王萧正德记室参军。宣城王(哀太子)萧大器为扬州刺史,野王与王褒俱为宾客。大器于东府起斋,野王为画古贤图像,王褒书赞,时号“二绝”。侯景之乱时,野王丁父忧在乡,曾召募乡人援建康。及台城陷,逃会稽,寻与刘归义据东阳拒景。侯景既平,王僧辩使监海盐县,敬帝太平元年(556),为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陈倩(陈文帝)记室参军。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为撰史学士,陈宣帝太建二年(570)为国子博士,又兼东宫管记,太建六年为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又迁黄门侍郎,光禄卿。太建十三年卒。顾野王著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记传》二百卷,未就而卒。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顾野王《尔雅音》。诸书均佚,唯《玉篇》尚存,已经萧恺及唐孙强增删,非原貌;《尔雅音》尚有佚文见《经典释文》。顾又有文集二十卷,亦佚。今存文七篇,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曹道衡 詹硌)

【何妥】(523?—593?) 字栖凤。西域何国(一说西城,今陕西安康)人。八岁游学于国,十七岁以技巧事萧绎。西魏克江陵,妥入关。北周武帝时,为太学博士。隋文帝代周,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文帝开皇六年(586),出为龙州刺史,在职三年,

以疾还都,复知学事。上封事指当世朋党,苏威、卢愷、薛道衡等皆坐得罪。后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何妥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又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乐要》一卷。又有文集十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有著录。今存文五篇,见《隋书》本传及《礼仪志》、《音乐志》等,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刘逖】(525—573) 字子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后发愤读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北齐文宣帝天保初(550),行定陶县令,坐事免。废帝乾明元年(560),兼员外散骑侍郎,使于梁主萧庄。还,兼三公郎中。武成帝时,迁散骑常侍。后主立,历江州、仁州等刺史。后主武平四年(573),陈将取淮南,后主将适晋阳,逖劝阻,为韩长鸾所谗,遂被杀,弃尸漳水。逖所制诗赋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谓四十卷),佚。存诗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逖诗重藻饰,诗风与南朝齐梁为近。主要事迹见《北齐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张正见】(528?—576?) 字见贲,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和东北)人。自幼随父(北魏怀方太守)南归于梁,十三岁时向东宫太子献颂,受到太子萧纲的赞赏。梁武帝太清(547—552)初,仕为邵陵王国左常侍。梁元帝时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因战乱避难匡山。入陈,历鄱阳王府墨曹参军、宜都王限外记室,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陈宣帝太建(569—582)中卒,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明人辑为《张散骑集》。在陈以五言诗负盛名,与一时名士徐伯阳、祖孙登、刘删等为文会之友,游宴赋诗,传为文苑佳话。其乐府诗多拟古题,其他诗篇亦多唱和之作,而且时常袭用前人名句,故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以为“南北朝人,唯张正见诗最多,而最无足省发,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其诗格调则有近于唐人者,如明许学夷《诗源辨体》所说:“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雨雪曲》、《从军行》亦近初唐;乐府七言、杂言,调虽和谐,而语尽绮靡,正梁、陈体也。”(卷一〇)今存诗九十一首及断句两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书》卷三四、《南史》卷七二有传。(许逸民)

【阴铿】 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生卒年不详。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在梁为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侯景之乱,被乱军所擒,遇救获释。陈文帝

天嘉(560—565)中,为始兴王陈伯茂中录事参军。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卒于官。有集三卷,已佚。后人辑有《阴常侍诗集》。诗承宋、齐山水之后,写景而情思微妙,琢句而自然新隽,与何逊并称“阴、何”。明胡应麟《诗薮》言:“阴、何并称旧矣。何抒写情愫,冲淡处往往颜(延之)、谢(灵运)遗韵。阴唯解作丽语,当时以并仲言,后世以方太白,亦太过。然近体之合,实阴兆端。”(外编卷二)由此可见阴、何优劣及阴在诗歌发展史上之贡献。今存诗三十四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书》卷三四、《南史》卷六四有传。(许逸民)

【颜之推】(?—590后)字介。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颜氏世习《周礼》、《左传》,之推早承家学。博览群书,词情典丽。梁时,为萧绎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萧绎遣子方诸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侯景陷郢州,屡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免。被送建康。侯景之乱平后,还江陵。时萧绎已即帝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克江陵,大将军李穆重之,荐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庆远书翰。会北齐与魏通和,遂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东奔北齐。文宣帝以为奉朝请。天保(550—559)末,为中书舍人。武成帝河清(562—565)末,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且工尺牍,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后除黄门侍郎。及周师入晋阳,后主轻骑还邺,之推进奔陈之策,未采,犹以之推为平原太守。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文帝开皇(581—600)中,废太子勇召为学士。作《颜氏家训》二十篇以教训其子弟。约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以后。《北齐书·文苑》本传谓“有文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颜氏家训》今存。其文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著录,疑唐时已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两篇,其一即《颜氏家训》自序,又一则为《北齐书》本传所载《观我生赋》。其《观我生赋》,辞采虽不如庾信《哀江南赋》,而事事微实,且有自注,为梁末及北齐之重要史料。《颜氏家训》则为散文,虽以教诲子弟为目的,亦多叙述南北士人轶事,语言质朴生动。其《文章篇》论文论诗皆具眼光,其记邢劭、魏收宗沈(约)、法任(昉)之事及记南北方文人对萧慤《秋思》之不同评价等,均为文学史上重要资料。今存诗五首及断句一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颜氏家训》《序致》、《终制》及《北齐书》本传。(曹道衡 詹頌)

【傅縡】(532—584)字宜事。北地灵州(今宁夏宁武)人。好学,善属文,笃信佛教。梁武帝太清

(547—552)末,因侯景之乱携母南逃避难,俄丁母忧。后依梁湘州刺史萧循。梁将王琳闻其名,召为记室。陈文帝天嘉元年(560),王琳与陈军作战,兵败奔北齐。琳将孙瑒以湘州降陈,陈文帝赐瑒杂物,縡为作谢启,为陈使颜晃所赏,言之文帝,召为撰史学士,迁骠骑安成王(即宣帝陈顼)中记室。宣帝太建(569—582)中,曾出使北齐,还为镇南始兴王(叔陵)谘议参军,兼东宫管记,历太子庶子等职。后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被诬下狱。縡于狱中上书,指斥后主荒淫腐败。后主大怒,顷之稍解,欲赦之,欲令縡“改过”,縡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遂被赐死。傅縡有集十卷,流行当时。今佚。清严可均辑其文四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三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詹頌)

【萧慤】字仁祖。梁上黄侯萧晔之子。北齐文宣帝天保(550—559)年间,入齐,任太子洗马等职。后历北周入隋。在隋官至记室参军。慤文集,邢劭为之序,称其文“雕章间出”。其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同,今佚。今有《春赋》佚文一篇,见《初学记》卷三,所有文字全为五七言句,较之梁萧纲诸人短赋尤接近初唐歌行。存诗十七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秋思》诗,有“芙蓉霜下落,杨柳月中疏”句,最为传诵。主要事迹见《北齐书》本传。

(曹道衡 詹頌)

【阮卓】(531—589)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幼聪敏,笃志经籍。年十五(六),自建康赴江州迎父问道之柩,值侯景乱,几经险阻。陈宣帝时,为尚书祠部郎,迁始兴王叔陵中卫府记参军。宣帝死,叔陵谋杀后主未遂,被诛。后主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异。”后主至德(583—586)中,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以文酒自娱。陈亡,入关,行至江州,遭疾卒。今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录其《咏鲁仲连》一诗,评为“有傲倪一世之概”。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李德林】(531?—591?)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幼聪敏,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为魏收等所叹赏。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557),任城王高潜举之为秀才,又荐之尚书仆射杨愔。翌年,德林入邺,为愔作《让尚书令表》,下笔立成,愔大称赏。孝昭帝高演杀杨愔,时长广王高湛为相,德林为丞相行参军,参掌机密。及高湛称帝,历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北齐末,官至中书侍郎。周武帝平齐,深

相器重。周末,隋文帝作相,德林颇推奉。周隋易代之际,曾预其谋,禅代文辞,亦多出其手。隋文帝开皇初,作《天命论》以论隋文称帝符合天心。开皇十年(590),以事为人所劾,出为湖州刺史,寻转怀州刺史,岁馀卒。李德林尝撰《齐书》未成。有文集八十卷,《隋书》本传谓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世。而《经籍志》所著录仅十卷。今所存者仅《隋书》所载文三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惠标】(?—564) 涉猎有才思。居晋安(今福建福州),与闽州刺史陈宝应为友。宝应有异谋,起兵反。惠标作诗送之,宝应得之甚悦。惠标又以诗示虞寄,寄一览便止。惠标退,寄曰:“标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终。”宝应事败,惠标亦被杀。《隋书·经籍志》有陈沙门《释标集》二卷,今佚。存诗八首,多见《初学记》、《文苑英华》诸书,惟《赠陈宝应》诗见《陈书·虞寄传》,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事迹参见《中古文学史料考略》。

(曹道衡 詹颂)

【诸葛颖】(535—611) 字汉。祖籍琅玕阳都(今山东沂水南)人。东晋初过江,寓丹阳建康(今江苏南京)。南朝梁末,曾为邵陵王萧纶东阁祭酒。萧纶败,逃奔北齐。曾待诏文林馆,历太学博士、太子舍人诸职。周武帝平齐,杜门不出十馀年。及隋文帝开皇(581—600)中,晋王杨广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广为太子,除药藏监。广立,迁著作郎,后授朝散大夫。炀帝大业五年(609),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大业七年,从炀帝北巡,卒于道。诸葛颖有《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称十四卷),今均佚。存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

(曹道衡 詹颂)

【卢思道】(535—586) 字子行,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少师事邢劭,以才学有盛名。仕北齐,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北齐文宣帝死时,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善用之,魏收、阳休之等人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不久,以母疾还乡,参与同郡祖英伯等乱事,几被杀。周静帝大象二年(580),迁武阳太守。入隋,以母老请解职。岁馀,奉诏入朝接待陈使。遭母忧。起为散骑侍郎,参内史侍郎事。卒于京师,年五十二。有集三十卷(一作二十卷),已佚。明人辑有《卢武阳集》。存诗二十七首及联句两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诗与李德林、薛道衡齐名,皆以辞藻胜。其《听鸣蝉

篇》词意清切,曾得庾信赞赏;《从军行》体近初唐,开唐人边塞诗的先河。《隋书》卷五七、《北史》卷三〇有传。

(许逸民)

【陆琼】(537—586) 字伯玉。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陆云公子。幼聪慧,六岁能五言诗。侯景之乱时,避居苦读。陈武帝永定(557—559)中举秀才。文帝时为殿中郎,当时重要文告,多出其手。经徐陵推荐,除司徒左西掾,兼通直散骑常侍,聘北齐。宣帝时,累迁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大著作,撰国史。后主时官至吏部尚书。陆琼曾续其父云公所撰《嘉瑞记》,自永定迄至德为三卷,今佚。又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可见唐初已散佚。今存文三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祖孙登】 生卒年及籍贯不详。陈文帝天嘉(560—565)初,尝居京口,游陈将侯安都宅,吟诗作赋,安都第其高下而赏赐之。宣帝太建(569—582)中,与张正见、阮卓等为文会。《陈书·文学·徐伯阳传》称“记室祖孙登”。今存诗九首,皆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书。其《紫骝马》一首,《文苑英华》作苏子卿诗;《咏水诗》、《莲调诗》二首,《文苑英华》作释惠标诗。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〇评《咏水诗》“风潭如拂镜,山溜似调琴”句“尖秀”;《咏柳诗》“稍能生新”。事迹参见《中古文学史料考略》。

(曹道衡 詹颂)

【刘删】 生卒年及籍贯不详。陈文帝初,尝与阴铿等集陈将侯安都宅,吟诗作赋。宣帝时官至长史,与李爽、张正见等为文会之友。删有《泛宫亭湖诗》及《登庐山诗》等,则其足迹似尝及江州。刘删诗今存十首,九首见《艺文类聚》,一首见《庐山记》卷四。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〇谓其“长于咏物”,又谓其《采药游名山》、《赋得独鹤凌云去》诸诗遣辞“典切”。事迹见《陈书》、《侯安都传》、《徐伯阳传》。

(曹道衡 李莉娟)

【柳晋】(537—605) 字顾言。祖籍河东(今山西南部),西晋末徙居襄阳。祖愔,梁诗人柳恽兄。晋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南朝梁元帝时释褐著作佐郎。梁宣帝立,以晋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隋文帝时,以晋为开府、通直散骑常侍,寻迁内史侍郎。又为晋王杨广谘议参军。王好招文雅之士以为学士,晋为其冠。杨广初作文为庾信体,及见晋后,文体遂变。文帝仁寿(601—604)初,杨广为太子,以晋为东宫学士。及炀帝立,为秘书监。炀帝大业元

年(605),从游京都,道卒。柳晋著有《法华玄宗》二十卷、《晋王北伐记》十五卷,又集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则为十卷,疑抄缮时分卷不同。其书已佚。今存文四篇,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五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柳晋诗似沿梁、陈之旧,以清丽见长,殊少特色。而其文虽骈体,然用典不若徐、庾之繁富。《隋书》本传言隋炀帝见晋后“文体遂变”,当指文而言。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

(曹道衡 詹頌)

【魏澹】(540?—604?) 字彦渊(《隋书》、《北史》避唐高祖讳作彦深)。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辞采赡逸。北齐时,尝为博陵王高济记室。齐后主武平(570—576)时,琅玕王高俨为京畿大都督,以澹为铠曹参军,转殿中侍御史,与魏收、阳休之修“五礼”,又与诸学士撰《修文殿御览》,书成,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周武帝灭齐,授纳言中士。隋文帝代周,出为行台礼部侍郎。文帝开皇三年(583)为通直散骑常侍聘陈,还除太子舍人。为废太子杨勇所优礼,尝令澹注《庾信集》,撰《笑苑》、《词林集》诸书。尝与卢思道、薛道衡、颜之推、萧该等会于陆爽宅,论及音韵,萧、颜等多加论定,澹会爽子法言记之,遂成《切韵》。隋文帝又以魏收《魏书》褒贬失实,平绘《中兴书》记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书成未几而卒,年六十五。魏澹有集十卷,见《隋书》本传。《经籍志》所录仅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则为四卷;《新唐书·艺文志》同。今佚。其《魏书》,《隋书·经籍志》云一百卷,与本传异。《旧唐书·经籍志》不见著录,而云有张大素《魏书》一百七卷,又一种一百卷。《新唐书·艺文志》无张著,而有魏澹《魏书》一百七卷,疑误。今魏澹文存者仅《隋书》本传所载《魏书》之义例。今存诗五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

(曹道衡 詹頌)

【薛道衡】(540—609) 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六岁而孤,专精好学。仕北齐为彭城王高澄兵曹从事,累迁中书侍郎。齐亡,归乡里。复出,仕北周,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授仪同,摄邳州刺史。入隋,历内史舍人,兼散骑常侍,聘陈。隋文帝开皇八年(588)伐陈,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还除吏部侍郎。后数岁,迁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进位上开府。久当枢要,才名益显。文帝仁寿(601—604)中,出检校襄州总管。炀帝继位,转番州刺史。岁馀,上表求致仕,拜司隶大夫。以上《高祖文皇帝颂》得罪下狱,终被杀,时年七十。有集

七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有《薛司隶集》,存诗二十一首。诗在北齐即以辞藻著闻,历周、隋并见推重。其乐府《出塞》、《豫章行》已接近初唐诗。《隋书》卷五七、《北史》卷三六有传。

(许逸民)

【杨素】(?—606) 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少有大志,善属文,工草隶,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记室,后转礼曹,加大都督。周武帝时,尝上表申理其文,由是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武帝伐北齐,素每战有功。隋文帝为相,素深自结纳。及隋文帝代周,加上柱国。平陈之役,率舟师破陈,又平江南人李稜诸人之乱。后进封越国公。隋炀帝谋废兄勇而为太子,素与有力。隋文帝病笃,素与于炀帝弑父自立之谋。炀帝即位后,汉王谅反,素率军平之。炀帝以其功大而忌之。素自知名位已极,有疾不肯服药而卒。杨素善诗,《隋书》本传谓“有集十卷”,《经籍志》同。佚。今存文七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六首及断句两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书》本传称其《赠薛播州》诗“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清沈德潜谓素“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古诗源》卷一四)。主要事迹见《隋书》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王胄】(558?—613?) 字承基。琅玕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筠,南朝梁代诗人。胄少有逸才,仕陈,历鄱阳王法曹参军、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诸职。入隋,为晋王杨广学士。隋文帝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炀帝大业(605—617)初,为著作佐郎。大业三年(607),炀帝赐酺,胄作五言诗,为帝所赏。胄与杨玄感善。玄感谋反被杀,胄与虔綽俱徙边。胄亡匿还江南,为吏所捕,诛。年五十六。《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十卷,本传谓“所著词赋,多行于世”。今存诗二十首,其《燕歌行》仅一句外,余皆较完整。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及《北史》本传。

(曹道衡 李莉娟)

【虞世基】(552?—618) 字茂世(唐人避太宗讳,改为“茂”或“茂代”)。会稽馀姚(今属浙江)人。虞世南兄。少博学,善草隶,为孔奂、徐陵所知。陈宣帝太建四年(572),释褐为陈建安王(宣帝子叔卿)法曹参军,历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诸职。及隋文帝平陈,世基入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文帝开皇(581—600)中,拜内史舍人。隋炀帝时,颇受顾遇,为内史侍郎,参掌朝政。炀帝大业八年(612)伐辽东,世基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大业十二年,炀帝游江都,行次巩县,世基以起义军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不从。世基知帝不可谏止,遂唯诺取容,不敢忤意。及宇文化及杀炀帝,世基亦被杀。虞世基集,不见《隋书》本

传及《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五卷。今佚。存文四篇,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十八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詹颂)

【陈叔宝】(553—604) 南朝陈后主。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项长子,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生于江陵(今属湖北)。宣帝太建元年(569),立为皇太子。太建十四年,即帝位。在位七年,荒于酒色,日与后妃宠臣游宴作诗。祯明三年(589),国亡于隋,被执送到长安。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卒于洛阳,年五十二。谥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有《陈后主集》。《隋书·乐志》:“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鹂留》、《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由此可见其诗风淫丽多哀。但亦有意境开阔,辞雄气劲之作,如在隋登洛阳芒山所作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此诗颇为隋文帝所称诵。清人陈祚明以为叔宝“才情飘逸,态度便妍,固是一时之隽”(《采菽堂古诗选》)。《陈书》卷六、《南史》卷一〇有传。(许逸民)

【孙德绍】(?—621) 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与陈代作家蔡凝子蔡君知为友。尝作《见太常作新乐诗》,知其在隋文帝开皇(581—600)中已入关。隋末,为景城县丞。窦建德起兵,德绍从之。窦建德自称夏王,即由德绍建议。尝为建德内史侍郎、中书令诸官。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窦建德为秦王李世民所俘,德绍亦被执。德绍尝草檄斥毁世民。世民登记水楼责之。德绍曰:“犬吠非其主。”世民怒曰:“贼乃主邪?”命摔殒楼下。孙德绍诗今存十一首,见于《文苑英华》、《乐府诗集》诸书。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主要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曹道衡 李莉娟)

【杨广】(569—618) 即隋炀帝。一名英,小字阿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隋文帝杨坚次子。文帝开皇元年(581),立为晋王。开皇八年,领兵灭陈。开皇二十年,勾结杨素等,谋废太子杨勇得逞,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即帝位。在位十四年,大修宫苑,开凿运河,游幸江都,为政苛暴,引发人民起义,终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于江都,年五十。善属文,初学庾信体,即位后文体遂变,“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隋书·文学传序》)。近人辑有《隋炀帝集》五卷,存诗一卷,多为声色游娱之作。其中写边塞诸篇,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白马篇》等,气体阔大,“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四)。七言诗如《江都宫乐

歌》等,于唐律渐近。《隋书》卷三、《北史》卷一二有传。(许逸民)

【虞世南】(558—638) 字伯施,行七。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少受学顾野王,十年精思不懈,文章赡博。仕陈为建安王法曹参军。为秘书郎。隋炀帝疾其峭正,终不甚用。唐太宗时,为弘文馆学士,改秘书监,封永兴县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寻卒,谥曰文懿。世南貌儒谨而中抗烈,议论持正,太宗曾戏作艳诗。世南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国之利。”(见《唐会要》)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其书法善正行草书,与欧阳询齐名,并称“欧虞”。诗文婉缙类徐陵,仍未脱齐梁风气,诚如明许学夷所云“盖世南维知宫体妖艳之语为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诗源辨体》)其中也不乏《咏蝉》等有寓意的咏物诗及较刚健的边塞诗。世南尝编修著名的类书《北堂书钞》。《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新、旧《唐书》本传。(杨旭辉)

【褚亮】(560—647) 字希明,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幼聪敏,好学博览,善属文,喜谈论。十八岁谒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为惊异。陈后主闻而召见,令赋诗,著名诗人江总等皆推其善。始仕陈,为尚书殿中侍郎。入隋为东宫学士。隋炀帝大业(605—617)中,授太常博士。薛举僭号陇西,以亮为黄门侍郎。及举灭,归唐,授秦王文学。历太子舍人、太子中允。唐太宗贞观(627—649)中,为弘文馆学士、迁散骑常侍,进封阳翟县侯。后致仕归里。卒,赠太常卿,谥曰康。太宗设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等为十八学士,并命人画像,使亮作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入馆者为时人倾慕,谓之“登瀛洲”。亮工诗善文,为太宗朝宫廷诗人,与虞世南齐名,论者谓“虞、褚之笔,动若有神”(《旧唐书》卷七二赞)。《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褚亮集》二十卷,已佚。《全唐诗》卷三二存诗一卷,多为郊庙歌辞及应制之作。它如《在陇头哭潘学士》、《晚别乐记室彦》等,亦颇具真情实感,质朴而哀怨。《全唐文》卷一四七存其文六篇。《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有传。(徐俊)

【李百药】(565—648) 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隋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之子,儿时多病,故以“百药”为名。七岁解属文。隋文帝开皇(581—600)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后遭嫉谢病免去。开皇十九年(599),袭父爵,授礼部员外郎。炀帝镇扬州,尝召之,百药辞疾不

赴。及炀帝即位,贬为桂州司马,后解职还乡。入唐,为涇州司户。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召拜中书舍人。次年,迁礼部侍郎。贞观四年,授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年,以撰《齐史》成,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次年,进爵为子。后数年,以年老致仕,诗酒自适。贞观二十二年卒,谥曰康。百药“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刘肃《大唐新语》卷八),卢照邻亦称其“长于五言,下笔无滞”(《南阳公集序》)。现存诗作仍未脱六朝余韵,但咏怀古迹诸诗,如《秋晚登古城》、《谒汉高庙》、《郢城怀古》等,已挣脱宫体旧习,渐趋古朴。《旧唐书》本传、《新唐书·艺文志》谓有集三十卷,已佚。后人辑为《李百药集》一卷。《全唐诗》卷四三存诗一卷,《全唐诗补编》补三首。《全唐文》卷一四二存文十三篇。《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有传。(徐俊)

【王珪】(571—639) 字叔玠。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原为乌丸氏,曾祖坤念自魏奔梁,改姓王氏。祖僧辩,梁太尉、尚书令。珪性雅淡,志量沉深,交不苟合。仕隋为奉礼郎。入唐,为太子舍人。后唐太宗知其才,召为谏议大夫,推诚纳善,每存规益,累迁黄门侍郎、侍中,与房玄龄、魏徵等同辅政。官终礼部尚书。太宗贞观十一年(637),曾与诸儒正定《五礼》。贞观十三年卒,谥曰懿。珪尝从王通受诗,其诗朴质沉健,不同时尚,《全唐诗》存二首。新、旧《唐书》有传。(杨旭辉)

【杨师道】(?—647) 字景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早年客洛阳,为王世充所拘,间归唐高祖,授上仪同。尚桂阳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唐太宗贞观(627—649)中,拜侍中,迁中书令,后又罢为吏部尚书。从太宗征高丽,摄中书令,军还,颇不职,改工部尚书,复为太常卿。贞观二十一年(647)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懿,陪葬昭陵。师道善草隶,工诗,才思敏捷,每与有名士宴集,歌咏自适,太宗“见其诗,为撷讽嗟赏”,并谓其“捉笔赋诗,如宿构者”(《新唐书》卷一〇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录文集十卷,今不存,《全唐诗》存诗二十一首,《全唐诗续拾》又补二首,多为应制、咏物之作。生平见新、旧《唐书》本传及《书史会要》卷五。(杨旭辉)

【魏徵】(580—643) 字玄成,魏州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好读书,多所通涉。隋末,李密起兵,为掌书檄。后随李密降唐,授秘书丞。建成为太子,引为洗马。唐太宗即位,擢拜谏议大夫。太宗贞观二年(628),迁秘书监,参预朝政。贞观七年,拜侍中。以预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功,进封郑国公,世称魏郑公。卒谥文贞。魏徵于太宗朝,犯颜正谏,

知无不言,史以“诤臣”称之。曾主持编纂《群书治要》,有《魏文贞公集》。其创作以奏议称,论文则折中南北文风、文理兼顾,殊罕偏颇之病。其诗多为郊庙乐章与应制奉和之作,而《述怀》一诗,慷慨苍凉,风骨兼具,绝无靡丽习气。沈德潜评云:“气骨高古,变以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卷一)《全唐诗》卷三一录其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有传。(徐俊)

【王绩】(590—644) 一作王勣,误。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郡望太原祁县(今属山西)。隋末大儒王通之弟。隋炀帝大业(605—617)年间,登孝悌廉洁科,任秘书省正字。因不乐在朝,乞署外职,除扬州六合县丞。以简傲喜酒,屡遭勘劾。大业十年(614),托言风疾,辞官还乡。后浪迹中原、吴越,大业十三年,复归故里。隋末大乱,绩客游河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应召入仕,以六合丞待诏门下省。侍中陈叔达闻其嗜酒,特准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太宗贞观四年(630),其兄王凝因事得罪朝阁重臣,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绩遂称病退隐归里。贞观十一年,第二次赴选入仕,任太乐丞。不到两年,复挂冠归里。贞观十八年,自撰墓志铭,忧愤而终。有《王无功文集》。王绩生逢乱世,三仕三隐。仰慕阮籍、陶渊明,向往自然,寄情于酒,著《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等文以见意。其文骈散兼长,疏野有致,得魏晋文之神髓。其诗多以山林田园、琴酒为题材,描写隐居和饮酒的情趣,反映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对现实的态度,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和全身避乱的归隐思想。真率自然,平淡质朴,气格遒健,直切生动,在内容、风格上与唐初宫廷诗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如田园山水诗的代表作《野望》,描写牧歌式的农村乐园,格调清宜,为唐初最早的五言律诗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云:“其诗惟《野望》一首,为世传诵。然如《石竹咏》,意境高古;《薛记室收过庄见寻二十四韵》,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其山水田园之作上承陶渊明,下启王、孟,开盛唐田园诗的先河;质朴浅近的语言,为有唐一代通俗诗派的先兆,对唐诗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全唐诗》存诗一卷又四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六十八首,断句二。事见吕才《王无功文集序》,又《旧唐书》卷一九二、《新唐书》卷一九六有传。(徐俊)

【许敬宗】(592—672) 字延族。杭州新城(今浙

江富阳西南)人,祖籍高阳(今属河北)。隋末,与魏徽同为李密管记。入唐后,高祖武德(618—626)初为秦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历仕著作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太子右庶子及中书侍郎,封高阳县男,兼修国史,先后参与《文馆词林》、《文思博要》、《瑶山玉彩》等书的修订。高宗时,历礼部尚书、郑州刺史、卫尉卿、太子宾客,迁中书令。高宗将立昭仪武氏,大臣切谏,敬宗揣帝私,阴附武氏,即妄言之,帝意遂定,谋逐诸大臣,杀长孙无忌等,致位右相,为后人所不齿,故《新唐书》将其列入《奸臣传》中。高宗咸亨三年(672),以特进致仕卒,谥繆,后改为恭。敬宗为唐初宫廷诗人,所作多为应制奉和之什。《新唐书·艺文志》录文集八十卷,今《全唐诗》仅存诗二十八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十八首,断句一。除诗外,尚撰有《丽正文苑》、《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其言多诬罔,为世所讥。新、旧《唐书》均有传。

(杨旭辉)

【王梵志】 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人。生平事迹未详。冯翊《桂苑丛谈·史遗》谓其生于隋时黎阳城东王德祖家林檎树瘿中,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名梵志。范摅《云谿友议·蜀僧喻》下则谓其“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二书所载事涉怪诞,不尽可信。敦煌遗书伯四九七八载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的《王道祭杨筠文》称其为“黎阳故通玄学士”。可知其生活年代大致在唐初数十年间。从现存王梵志诗寻绎诗人家世,知其家境曾颇殷富,后家业败落,晚况萧条。幼时曾习儒业,读诗书。有家室子女,中年后皈依佛教。享年约可七八十岁。王梵志是唐代民间通俗体诗歌的巨擘,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称“制诗三百餘首,直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远近传闻,劝惩令善”。基本概括了其诗歌特点。虽以说理议论为主,据佛教理义以劝戒世人行善止恶,但也不乏讽刺世态人情的诗篇,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嘻笑怒骂于常谈琐事之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诗风浅显平易,风格独具。但也有一部分作品流于说教,且形式也较粗率。王梵志诗在当时流传广泛,颇有影响。唐寒山、拾得、丰干等诗僧皆承其衣钵,王维、顾况、白居易、皎然等也曾受其影响,至宋代仍有人拟梵志体作诗。明清以后,其诗湮没无闻,至本世纪初敦煌遗书《王梵志诗集》写本发现,始复为人所重。今人张锡厚撰有《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徐俊)

【李世民】(599—649) 即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十八岁时,劝其父起兵反隋。唐高祖武

德元年(618),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其兄太子建成及弟元吉,立为太子,旋即即位。次年,改元贞观。贞观二十三年(649)卒,谥曰文,庙号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以隋亡为鉴,励精图治,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世民为秦王时,即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雅好吟咏,与大臣如虞世南、李百药辈时有唱和。其诗风仍未脱南朝旧习,王世贞云:“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艺苑卮言》卷四)但对宫体诗风的危害有所认识,提出“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帝京篇序》),注重诗体的雅正。其咏怀述志之作如《帝京篇》、《登三台言志》、《赐萧瑀》,巡幸田猎之作如《饮马长城窟行》、《经破薛举战地》、《冬狩》等,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宽阔胸襟和英雄气魄以及对贤才的渴求。其中《帝京篇》被胡应麟称作“藻赡精华,最为杰作”(《诗薮·内编》卷二)。总之,作为一代君王,李世民对诗歌的认识和创作实践,对唐诗的发展、繁荣有着不可忽没的作用,胡震亨谓其“首辟吟源”(《唐音癸签》卷五),《全唐诗》卷一则谓“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有《唐太宗集》(《旧唐书·经籍志下》作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四作四十卷),已佚。《全唐诗》卷一存诗一卷,《全唐诗补编》补诗十首又二句。事见《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本纪。

(徐俊)

【董思恭】 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唐高宗时任中书舍人。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因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思恭曾参与撰《瑶山玉彩》、《芳林要览》。善诗,《旧唐书》本传称“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全唐诗》卷六三录其诗十九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多为咏物之作。事见《国秀集》目录、《元和姓纂》卷六。《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有传。

(徐俊)

【上官仪】(607?—664) 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后徙居江都(今江苏扬州)。隋末,仪父为陈陵所杀,因出家为僧。唐太宗贞观(627—649)初,登进士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转起居郎。宫中宴集,常奉和作诗。高宗时,任秘书少监。高宗龙朔二年(662),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位居宰相。因为高宗草废武后诏,得罪武氏。麟德元年(664),被诬陷参与梁王李忠谋反,下狱死。仪为太宗、高宗朝著名宫廷诗人,其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旧唐书》本传云:“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又归纳六朝以来对偶方法,

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于律诗之定型有积极意义。原有文集三十卷,已佚。《全唐诗》卷四〇存其诗一卷,《全唐诗逸》收诗二首又断句十句,《全唐诗补编·续拾》辑补十二首。《旧唐书》卷八〇、《新唐书》卷一〇五有传。(徐俊)

【于季子】齐郡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唐高宗、武后时在世。高宗咸亨(670—674)中登进士第。历任侍御史、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今仅存诗七首,见《全唐诗》卷八〇。事见《元和姓纂》卷二、《国秀集》、《唐诗纪事》卷七、《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六。(徐俊)

【李义府】(614—666)永泰(今四川盐亭东北)人,原籍瀛州饶阳(今属河北)。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举进士,授门下省典仪,历仕监察御史、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与太子司仪郎来济均以文章见知,时称“来、李”。高宗即位,迁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因主张立武则天为后而重用,高宗永徽六年(655)拜相,任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封广平县男。义府外表恭顺,内里阴险偏忌,时称“笑中刀”、“李猫”。后改任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封河间郡公,为人贪婪无厌,多引心腹,广树朋党,倾动朝野。显庆三年(658),以与大臣不和之罪免相,贬为普州刺史。翌年,复拜相,又兼吏部尚书等职。为相凭借武后之势,恣意妄为,并以鬻爵为事,百官怨而不敢言。龙朔三年(663),流放嶲州。乾封元年(666)卒,追赠扬州大都督。义府尝参修《晋书》、《永徽五礼》、《姓氏谱》等,又撰有《宦游记》二十卷及《李义府集》四十卷,今《全唐诗》存诗八首。新、旧《唐书》有传。(杨旭辉)

【长孙正隐】一作长孙贞隐。河南洛阳人。唐高宗时曾官太常博士。《全唐诗》存其诗二首。事迹散见于《元和姓纂》卷七及《唐诗纪事》卷七。

(杨旭辉)

【骆宾王】(619或622、626、627、640—684后)排行四。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出身寒门,其父官青州博昌令,卒于任所。宾王早年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生活贫困落拓。七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始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曾从军西域,久戍边塞。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仪凤三年(678),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因事被诬下狱。次年,遇赦得免。复北游幽燕,投身戎幕。调露元年(679)冬,因数上疏言事,获罪下狱。次年秋贬为临海丞,世称骆临海。中宗嗣圣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拟改唐为周。同年九月,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署宾王为艺文令,掌军中

文书机要,作《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以斥武则天之罪。十一月,敬业兵败,宾王不知所终。《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等谓其兵败被杀,《朝野金载》谓其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谓其亡命不知所之。而孟棨《本事诗》则谓宾王落发为僧,于灵隐寺遇宋之问并为续诗,实不可信。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擅长七言歌行,胡震亨称其“富有才情,兼深组织”,“得擅长什之誉”(《唐音癸签》卷五)。代表作《帝京篇》铺写京都繁盛,抨击豪门奢淫,抒发愤懑之情。形式上五七言参差转换,慷慨流动,颇见才力,“当时以为绝唱”(《旧唐书》本传)。其五律也不乏佳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深微。宾王又以骈文名世,代表作《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申明忠义大节,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感情充沛,气势俊逸,与唐前堆花俚叶的文风有着明显的不同。有《骆临海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本传,又《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徐俊)

【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工部尚书武士彟次女,貌美,自幼才慧多谋,十四岁入宫为唐太宗才人,赐号武媚。太宗卒,她一度居感业寺为尼。高宗时复召入宫,封为昭仪,进号宸妃。高宗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高宗称天皇,她称天后,并称“二圣”。高宗患风疾目昏,又懦弱无主见,朝政“皆委天后详决”。中宗即位,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中宗嗣圣元年(684),她废中宗立睿宗,对唐宗室大加杀伐。睿宗载初元年(690),她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曰周,自创“曌”字为名,以示其犹如日月照临天下。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在位十六年,执政四十余年,“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皇帝。中宗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她被迫去帝号,徙居上阳宫,并于同年冬病卒,谥号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天宝八载(749),定谥则天顺圣皇后。撰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已佚。《全唐诗》存诗四十六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其诗常被提及的是《腊日宣诏幸上苑》、《如意娘》、《石淙》等。事见《旧唐书》卷六、《新唐书》卷四本纪。(陈祖美)

【徐惠】(627—650)又称徐贤妃。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据载,出生五月能言,四岁读《论语》、《诗经》,八岁能作文。其父徐孝德令其拟《离骚》为《小山篇》,所作“词甚典美”。太宗闻其才名,召为才人。她“遍涉经史,手不释卷”,才思敏捷,挥毫而就。帝益礼顾,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擢其父为水部员外郎。她曾上书太宗,力谏息兵罢役。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太宗卒,她悲恸成疾,拒不服药,以死报

其恩遇。卒时年仅二十四，谥曰贤妃。所作诗文，词采绮丽。其骈赋也典雅可观。《全唐诗》存诗五首。《旧唐书》卷五一、《新唐书》卷七六有传。

(陈祖美)

【卢照邻】(634—686，一说635—689，另一说约636—695后)字升之，自号幽忧子。一作名子升，字照邻。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十馀岁时游历南北，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弱冠，拜邓王府典签。唐高宗龙朔(661—663)中，迁益州新都尉，秩满去官，漫游蜀中。后客居洛阳，因染风疾，于上元元年(674)秋冬入太白山服饵，中毒，风疾转甚，手足挛废。后寓少室山之东龙门山，再徙阳翟具茨山，买园数十亩，引水绕宅居之。又预为坟墓，偃卧其中。武后垂拱二年(686)前后，不堪病痛，自沉颍水而卒。照邻于当时文名籍甚，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其创作以歌行、骚体尤为擅长，虽未尽洗六朝铅华，然时具愤激之情、不平之气，对于纠正“上官体”诗风之流弊，不无积极意义。其代表作如《长安古意》，借历史题材，描绘长安的繁盛景象和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揭露统治集团的横暴奢靡和互相倾轧，抒写自己心中的积郁和不平。借古讽今，寄托深微，清词丽句，委婉有致。是初唐长篇歌行的佳作。还有一些边塞、咏物之作如《紫骝马》、《战城南》、《曲池荷》等，或慷慨激昂、意境清峻，或借物寓意、耐人寻味。有《卢照邻集》。《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一有传。今人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任国绪著有《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

(徐俊)

【韦承庆】(640—706)字延休，排行大。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弱冠登进士第，补雍王府参军，掌文翰，后历仕太子司议郎、乌程令、司仆少卿、天官侍郎，兼修国史。武周长安四年(704)拜相，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唐中宗即位后，贬高要尉。岁馀，起授辰州刺史，未赴任即入为秘书处少监，兼修国史。承庆为人公正，善写文章，曾参与修撰《则天实录》、《则天皇后纪圣文》，封扶阳县子，加银青光禄大夫，俄迁黄门侍郎，未拜即卒，谥曰温。承庆才思敏捷，为文援笔而就。《新唐书·艺文志》录文集六十卷，已佚。《全唐诗》存诗七首，《全唐诗续拾》又补二句。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及岑羲《韦承庆墓志》。

(杨旭辉)

【乔知之】(?—690)排行十二。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武后时任左(一作右)补阙。武后垂拱二年(686)，随刘敬同北征同罗、仆固，摄侍御史，监护其军。迁左(一作右)司郎中。武承嗣夺其婢窈窕，知之作《绿珠篇》以寄意，密送于婢，婢感愤自杀。

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杀之。知之以文词名世，与陈子昂交谊颇深，多有酬唱。《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集二十卷，久佚。今存诗十八首，见《全唐诗》卷八一。《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有传。

(徐俊)

【杜审言】(645?—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诗人杜甫祖父。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登进士第，授隰城尉。累转洛阳丞。武周圣历元年(698)，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因与州僚不和，被诬构下狱，其子杜并刺杀仇家，冤获雪，免官还洛阳。武则天召见，甚加叹异，授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因附阿张易之，流峰州。神龙二年，召还，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二年(708)卒，年六十馀。杜审言少与李峣、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擅长五律，典丽精工，比偶精严，于五律格式之成熟有所贡献。七绝、七律也有佳作，明胡应麟称：“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诗薮·内编》卷四)原有文集十卷，早佚。《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有传。

(徐俊)

【李峣】(645—714)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幼通“五经”，二十岁登进士第，举制策甲科，授长安尉，迁监察御史、给事中。因忤武后旨，出任润州司马。后诏为凤阁舍人。武周圣历(698—700)初，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转成均祭酒，领修《三教珠英》。中宗复位，贬为通州刺史。顷授礼部侍郎，封赞皇县男。迁礼部尚书，进封县公。中宗神龙二年(706)，为中书令。景龙二年(708)，加修文馆大学士。景龙三年罢中书令，但仍以特进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贬为怀州刺史。玄宗立，贬滁州别驾，改庐州别驾卒。峣为唐初武后及中宗朝四位大学士之一，以文学称，所作世多传诵。诗多应制、咏物之作，词采典丽。《汾阴行》为唐玄宗称赏，许为“真才子”。杂咏一百二十首，唐以后常被用作童蒙读物，并远传日本。少与乡人苏味道齐名，合称“苏、李”；又与崔融、苏味道、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原有集五十卷，久佚，明人辑《李峣集》三卷，有《唐十家诗集》本。又有《李峣杂咏》一百二十首，有日本《佚存丛书》本，敦煌遗书残存唐张方注本二种。《全唐诗》卷五七至六一收李峣诗五卷，《全唐诗补编》补三首又二句。《旧唐书》卷九四、《新唐书》卷一二三有传。

(徐俊)

【苏味道】(648—705)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弱冠登进士第，调咸阳尉。裴行俭征突厥，引为管记。历官吏部员外郎、考功郎中。武周延载元年(694)，以凤阁舍人检校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

正授。次年,贬为集州刺史,俄召为天官侍郎。武周圣历元年(698),复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武周长安四年(704),贬坊州刺史,进益州长史。唐中宗神龙(705—707)初,以附阿张易之贬眉州刺史,转益州长史,卒年五十八。味道居相位数年,处世圆滑,模棱两可,时称“模棱手”。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人谓之“苏、李”。与李峤、崔融、杜审言合称“文章四友”。所作多为咏物诗,但佳作甚少,惟五律《正月十五夜》为世传诵。《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十五卷,久佚。《全唐诗》卷六五存诗一卷。《旧唐书》卷九四、《新唐书》卷一四有传。(徐俊)

【郑愔】(?—710) 字文靖,行五。沧州(今属河北)人。年十七登进士第。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荐,任殿中侍御史供奉。易之败,遂贬为宣州司户。后依托武三思,由许州司功参军迁为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拜相,任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愔倚三思之权,干扰政事,天下语曰:“崔(日用)、冉(祖雍)、郑(愔),乱时政”(《新唐书·武三思传》)。同年五月,坐赃贬江州司马。景云元年(710),预谋王重福谋逆,被诛杀。《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次为一卷。事迹散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一、《朝野僉载》卷一、四、五及《唐诗纪事》卷一一。(杨旭辉)

【宗楚客】(?—710) 字叔敖。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武后从姊之子。登进士第,累迁户部侍郎。垂拱(685—688)中,武后执政,进为内史。后因坐奸赃流岭外,岁馀而还,俄检校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中宗神龙(705—707)初,为太仆卿、郢国公。武三思又引为兵部尚书,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后、安乐公主青睞之,与纪处讷为党,世号“宗、纪”。景龙四年(710),韦氏败,楚客伏诛。《全唐诗》存诗六首,《全唐诗续拾》又补断句三。事迹见《朝野僉载》卷三、五及新、旧《唐书》本传。(杨旭辉)

【薛稷】(649—713) 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武周长寿三年(694),中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又举进士。历官祠部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707—710)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睿宗即位,以翊赞功迁太常少卿,封晋国公。累拜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后转左散骑常侍,历工部、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玄宗先天二年(713),窦怀贞以谋叛诛,稷坐知情不报,赐死狱中,年六十五。稷多才艺,擅长书画,花鸟人物,尤以画鹤为绝品。诗文兼长,其《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为初唐五古名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

集三十卷,已佚。今存诗十四首,见《全唐诗》卷七三。《新唐书》卷九八有传。(徐俊)

【王勃】(650—676?) 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郡望太原祁县(今属山西)。隋末大儒王通孙。王勃自幼聪慧绝众,号为神童。九岁读颜师古注《汉书》,撰《指瑕》十卷以摘其失。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上书刘祥道,刘表荐于朝,麟德三年应幽素举登第,授朝散郎。后为沛王府侍读。时诸王斗鸡,勃戏作《檄英王鸡文》,为高宗所恶,被逐出府。遂漫游巴蜀,后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不为同僚所容。咸亨五年(674),因匿杀官奴曹达,犯死罪,遇赦革职。其父王福时时为雍州司户参军,亦因此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勃赴交趾省亲(一说随父赴任),途经南昌,作《滕王阁序》。自交趾返,渡海溺水而卒。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以文词齐名,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子”(郗云卿《洛丞集序》)。勃为四杰之冠。杨炯称誉其作品“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王勃集序》),于纠正当时文坛积弊,颇有积极作用。所作体裁多样,古体、五绝、七绝皆佳,尤长五律。题材涉及羁情乡思、闺怨、送别、写景咏物,均情文并茂,具感染力。《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山中》、《蜀中九日》、《秋夜长》、《采莲曲》等,均为其代表作。胡应麟称其“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诗薮》)。原集有二十卷、三十卷本二种,久佚。明人张燮辑有十六卷本,清蒋清翊撰《王子安集注》,分为二十卷。另日本尚藏有古写本王勃集,多有集外佚作。《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有传。近人阎察璩有《王勃年谱》。(徐俊)

【杨炯】(650—693?) 排行七。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自幼聪慧,善属文。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应制举登第,授校书郎。永淳元年(682),为薛元超表荐,任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武后垂拱元年(685),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后任职洛阳宫内习艺馆。武周如意元年(692),出任盈川令,世称杨盈川。卒于任所。杨炯为“初唐四杰”之一,当时即有“王、杨、卢、骆”之排行,杨曾言“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见《旧唐书》本传)。张说云:“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亦不减王(勃),‘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大唐新语》卷八)其诗以五律为长,《从军行》、《出塞》、《紫骝马》等写边塞征战生活,饱含建功立业壮志,风格豪放,均为其代表作。另外闺怨诗、山水诗、送别诗,如《有所思》、《折杨柳》、游三峡诸诗和《送梓州周司公》、《夜送赵纵》等诗,代表其诗歌创作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胡应

麟评云：“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深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特别肯定他在近体诗创作中的成就。原有文集三十卷，已佚。今有明人辑本《盈川集》十卷又附录一卷，有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有传。今人闻一多撰有《杨炯年谱》，傅璇琮撰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刘希夷】(651—?) 一名庭芝，又一说字庭芝，汝州(今河南临汝)人。少有文华，善琵琶，好音乐，喜饮酒，落拓不拘常格。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所作诗歌以从军、闺情题材为长，始末为人重，后孙翌编《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乃为世人所称。代表作《白头吟》(一作《代悲白头翁》)、《公子行》、《捣衣篇》等七言歌行，宛转流畅，历代称赏，誉为开盛唐之音。《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刘希夷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希夷集》十卷、《诗集》四卷，均佚。今存诗一卷，见《全唐诗》卷八一。《全唐诗补编》辑有佚作。事迹见《大唐新语》卷八、《刘宾客佳话录》、《本事诗》、《旧唐书·乔知之传》附本传及《唐才子传》卷一等。

【王无竞】(652—705) 字仲烈，东莱(今山东掖)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应下策成章科登第，授赵州栾城县尉，历麟台正字，转右武卫仓曹参军、洛阳县丞。累迁监察御史。武后垂拱二年(686)，随乔知之至同罗、仆固。擢殿中侍御史，迁太子舍人。预修《三教珠英》。中宗神龙(705—707)初，因诋权贵，出为苏州司马。后坐交张易之再贬岭南，卒于广州，年五十四。无竞与陈子昂、宋之问有交谊，相互唱和。《全唐诗》卷六七录诗五首；《补全唐诗》补诗四首。事见孙逖《太子舍人王公墓志铭》。《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一〇七有传。

【崔融】(653—706) 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山东济南)人。唐高宗上元三年(676)，中辞殚文律科及第，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中宗为太子时，融为侍郎。武周圣历(698—700)中自魏州司功参军迁著作佐郎，历右史、著作郎，进凤阁舍人。久视元年(700)，出为婺州长史，寻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四年(704)，改司礼少卿，仍知制诰。因阿附张易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贬为袁州刺史。俄召拜国子司业，兼修国史。神龙二年，以修《则天实录》功，封清河县子。因撰武后哀册文，思苦神竭，绝笔而死，谥文。崔融与苏味道、李峤、杜审言齐名，称“文章四友”。为文华婉典丽。曾出塞为书记，故诗多征戍边塞之作，如《关山月》、《塞垣行》等，写边地风光，融入征人思归之情；写两军对阵，抒发建功立业思想，风格悲壮雄浑。又首创七言排律，其代表作

《从军行》表现将士破敌必胜的坚定信念，景物描写也极壮阔，言从字顺，音响中和。著有文集六十卷，久佚。另编预修《三教珠英》学士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今于敦煌遗书中存有残写本二种。《全唐诗》卷六六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有辑佚之作。《旧唐书》卷九四、《新唐书》卷一一四有传。

【卢藏用】(?—713?) 字子潜，排行二，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徵明偕隐于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而有意当世，时称“随驾隐士”。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武周长安(701—704)中，召授左拾遗。姚崇持节灵武道，奏为管记，还应县令举，甲科，为济阳令。唐中宗神龙(705—707)中，累擢中书舍人，数纠驳伪官。历吏部侍郎、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坐亲累，降工部侍郎。玄宗初即位，进尚书右丞。附太平公主，公主伏诛，乃流新州、驩州，会交趾叛，有抗御之劳，改昭州司户参军，迁黔州长史，判都督事，卒于始兴。藏用善文外，亦工书，善琴棋，思精远，士贵其多能。曾为友人陈子昂編集、作序、作传，首先予子昂以很高的文学地位。有文集三十卷，又著有《春秋后语》十卷、《子书要略》一卷、《老子注》二卷，今均已佚。《全唐诗》存诗八首。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及《唐诗纪事》卷一〇、《登科记考》卷二七。

【韦嗣立】(654—719) 字延构，排行二，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与韦承庆同父异母兄弟。少举进士，累调双流令，后代其兄承庆任凤阁舍人。武周长安四年(704)，拜相，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年，以避亲免相，任成均祭酒、兼检校魏州刺史，又徙洛州刺史。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再次拜相，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睿宗即位，又以中书令任相职，旋即免相，贬许州刺史。唐玄宗朝，又任国子祭酒、陈州刺史等职。玄宗开元七年(719)卒，赠兵部尚书，谥曰孝。嗣立早有诗名，今《全唐诗》存其诗八首。《旧唐书》卷八八及《新唐书》卷一一六有传。

【刘宪】(?—711) 字元度，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宪弱冠登进士第，调河南尉，累除冬官员外郎、左台监察御史。武周天授(690—692)中，受诏按酷吏来俊臣罪，宪欲痛绳之，反为所构，贬潯水令。及来氏伏诛，宪乃召为给事中，寻转凤阁舍人。唐中宗神龙(705—707)初，自吏部侍郎出为渝州刺史，俄复入为太仆少卿，兼修国史，加修文馆学士，迁太子詹事。睿宗景云二年(711)卒，赠兖州都督。《旧唐书》本传及《新唐书·艺文志》录集三十卷，已佚。今存诗二十六首，见《全唐诗》，多为应制之作。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及《元和姓纂》卷五、《登科记考》卷

二七。

(杨旭辉)

【宋之问】(656?—712?) 一名少连,字延清,排行五。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武周天授元年(690),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后授洛州参军,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因依附张易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坐贬泷州参军。神龙二年春,逃还洛阳,匿张仲之家。会仲之与王同皎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告发其事以自赎,擢授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不久,转户部员外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二年(708),迁考功员外郎,景龙三年,知贡举。因遭潜毁,贬越州长史。睿宗景云元年(710),以曾谄附张易之、武三思,再流徙钦州。玄宗先天(712—713)中,赐死徙所。宋之问为武后中宗朝宫廷诗的代表作家,其诗多应制奉和之作,以词采音韵精切工整著称,与沈佺期诗歌风格、内容相近,号称“沈、宋”。他们在齐梁新体诗与乐府民歌及王绩、杨师道、上官仪已有的五律、七律形式的基础上,吸收上官仪的“六对”、“八对”说和“初唐四杰”的五律创作经验,使五律更为成熟,达到了“典丽精工”的地步。胡应麟说:“七言律滥觞沈宋。”对此作有充分肯定。晚年流放途中所作诗,写景抒情,较之早期应制之作,不仅内容较为充实,且含蓄凝炼,诗风亦有明显变化。如《渡汉江》、《度大庾岭》、《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等,抒发迁谪之悲,沉痛哀切,感情极为真挚。另外,一些送别诗如《送杜审言》也真挚动人。还有一些描写女性诗,表现了他对女性的同情和歌颂,如《息夫人》、《浣纱篇赠陆上人》等,一些山水之作寓情于景,亦有一定的艺术性。唐人对宋之问评价甚高,元稹云:“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充分肯定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宋之问集原有其友人武平一辑集十卷,今传本已非原貌。今存诗三卷,见《全唐诗》卷五一至五三,《全唐诗补编》辑有佚作。《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二〇二、《唐才子传》卷一有传。(徐俊)

【张循之】一作张循,《全唐诗》又将其《长门怨》诗单列张修之名下,此实为循之之误。洛阳(今属河南)人。循之与弟仲之皆与苏珣之子苏晋友善,二人以学显于时。循之上书忤武后,见杀。《全唐诗》存诗六首。事见新、旧《唐书》之《苏珣传》所附《苏晋传》。(杨旭辉)

【郭元振】(656—713) 名震,以字行。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十八岁登进士第,补通泉县尉。

武后召见,上《古剑篇》。武后赏之,令抄赐李峤等诸学士。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以预谋破吐蕃功迁主客郎中。武周大足元年(701),授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中宗神龙(705—707)中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睿宗即位,召为太仆卿。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朔方军大总管。玄宗先天二年(713)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代国公。寻兼御史大夫、天下行军大元帅。后流放新州,寻起为饶州司马,道病卒。元振公务之暇,手不释卷,于诗不乏佳作。《古剑篇》托物言志,雄迈豪逸,为初唐七古名篇。原有文集二十卷,今佚。《全唐诗》卷六六存诗一卷,《全唐诗补编》辑录佚诗一首。张说撰有《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二有传。(徐俊)

【李义】(657—716) 原名尚真。一说字尚真。赵州房子(今河北临城)人。少时即工属文,年十九举于州,唐高宗永隆二年(681)登进士第。官万年县尉,武周长安三年(703),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唐中宗景龙(707—710)中,迁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睿宗景云元年(710),迁吏部侍郎。景云二年,进黄门侍郎,封中山郡公。玄宗开元(713—741)初,为紫微侍郎,俄拜刑部尚书。卒,年六十,谥贞。李义曾将兄尚一、尚贞兄弟三人诗合编为《李氏花萼集》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李义集》五卷,俱佚。《全唐诗》卷九二存其诗一卷,多应制之作。《旧唐书》卷一〇一、《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苏颋有《紫微侍郎赠黄门监李义神道碑》。

(徐俊)

【贺知章】(659—744) 字季真,一说又字维摩,自号四明狂客。排行八。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早年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少以文词名世,与张旭、包融、张若虚合称“吴中四士”。武周证圣元年(695),登进士第,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入丽正殿书院,参撰《六典》、《文纂》等书,转太常少卿。开元十三年,授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开元二十六年,李亨立为皇太子,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世称贺秘监。天宝二载(743),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玄宗许之,以其宅为千秋观,赐镜湖剡川一曲。乡居不久卒,年八十六。知章性狂放,喜饮酒,与李白、张旭等称“饮中八仙”。其诗以七绝《回乡偶书》、《咏柳》最为人知,传诵甚广。今存诗一卷,见《全唐诗》卷一一二,《全唐诗补编》另有辑补之作。《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一九六有传。(徐俊)

【张旭】字伯高，排行九。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尉，金吾长史，故世称“张长史”。性嗜酒，杜甫列其为“饮中八仙”之一。精于草书，每于醉后狂呼疾书，时人目为“张颠”。其草书极受推崇，人亦尊其为“草圣”。唐文宗时，诏以张旭草书、李白歌诗、裴旻剑舞为三绝。亦工于诗，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齐名，号为“吴中四士”。杨慎称其诗“亦清逸可爱”（《升庵诗话》）。《全唐诗》存诗六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事又见张怀瓘《书断》卷三等。（林长永）

【张若虚】（660？—720？）扬州（今属江苏）人。曾任兖州兵曹。唐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贺知章、贺朝、万齐融、邢巨、包融等吴越之士，俱以文词俊秀，扬名京都。又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合称“吴中四士”。今存诗二首，见《全唐诗》。所作《春江花月夜》后人评为“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酝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毛先舒《诗辨坻》）。沈德潜亦言此诗“题中五字安放自然，犹是王、杨、卢、骆之体”（《唐诗别裁集》）。事见《旧唐书·贺知章传》、《新唐书·刘晏传》、《唐诗纪事》卷一七。（徐俊）

【包融】排行二，原籍湖州（今属浙江），徙居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唐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贺知章、张若虚、邢巨、万齐融等俱以吴越文士，扬名京都。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合称“吴中四士”。玄宗开元（713—741）中，得张九龄荐，历官怀州司户参军、集贤院学士、大理司直等。卒后以子贵赠秘书监。融善诗，与其子包何、包佶同负诗名，时称“三包”。殷璠汇次其诗入《丹阳集》，评曰：“融诗情幽语奇，颇多剪刻。”《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包融诗》一卷，已佚。《全唐诗》卷一一四收其诗八首，《全唐诗补编》辑补一首。事见《旧唐书·贺知章传》、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二四、《唐才子传》卷二。（徐俊）

【刘眘虚】眘，一作慎。字挺卿，或云字全乙，排行大。旧说崧山人，又作江东人，不知所据。今考为洪州新吴（今江西奉新）人。或言玄宗开元中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官弘文馆校书郎，后流落不偶。《河岳英灵集》称他“惜其不永，天碎国宝”，知卒在天宝十二载（753）前。眘虚为盛唐著名诗人，与王昌龄、孟浩然、高适友善，有诗作唱和。殷璠称其诗“情幽兴远，思苦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律婉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河岳英灵集》）。唐宋书志未著录其集，《唐才子传》谓“集今传世”，《奉新县志》卷十五载刘眘虚《鹤鸣集》五卷，不传。

《全唐诗》卷二五六存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辑补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二五、同治重修《奉新县志》卷八、《唐才子传》卷一。（徐俊）

【东方虬】初唐武后时任左史、礼部员外郎。武后游龙门，命君臣赋诗，虬诗先成得赏锦袍，及宋之问诗成，左右称善，武后夺锦袍衣之问。虬诗独具风骨，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称誉其《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此诗久佚，存诗五首，见《全唐诗》卷一〇〇及《补编》。事见《元和姓纂》卷一、《隋唐嘉话》卷下。（徐俊）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少时任侠使气，十八岁始发愤读书，唐睿宗文明元年（684）登进士第，献书武后，召见金华殿，授麟台正字。武后垂拱二年（686），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至张掖而返。补右卫胄曹参军。因母丧解官归里。服阙，擢右拾遗。谏言时弊，被拘陷入狱，经年免罪复官。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参谋军事。因谏议不合，徙为军曹。军还仍官拾遗。武周圣历元年（698）以父老解职归侍。后为县令段简陷害，死于狱中。或以为段简陷害子昂，乃武三思授意（见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陈子昂被称为初唐诗歌革新之先驱，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反对“彩丽竞繁，而寄兴都绝”之齐、梁诗风，主张复兴汉、魏风骨，提倡风雅兴寄。所作《感遇》三十八首，摆脱了齐、梁诗风，为其文学理论的实践。胡应麟云：“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盖魏晋之后，惟此尚有步兵馀韵。”（《诗薮》）《登幽州台歌》感叹怀才不遇，慷慨苍凉，可称绝唱。《蓟州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托古兴怀，直抒胸臆。对于纠正唐初梁、陈遗习，下启盛唐诗风，厥功甚伟。明高棅评云：“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唐诗品汇》）胡应麟亦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诗薮》）对子昂诗论及创作，历代也有异说。唐皎然《诗议》谓其“复多而变少”，《吟谱》谓其“以理胜情，以气胜辞”，亦当属实。子昂卒后，友人卢藏用集其遗文，编为十卷，久佚。明人有辑本，亦十卷，今有中华书局排印本，补辑诗文十余篇。目前最为完备。另有彭庆生《陈子昂诗注》。事见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故右拾遗陈公旌德碑》，《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一〇七有传。近人罗庸撰有《陈子昂年谱》。（徐俊）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潞川郡王武载德子。博学，通《春秋》，工文辞。武后时，畏祸不敢与事，隐嵩山修佛法，屡诏不应。唐中宗复位，迫召为起居舍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兼修文馆直学士，迁考功员外郎。玄宗立，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玄宗开元(713—741)末卒。著有《景龙文馆记》十卷，已佚，《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新唐书》卷一九本传。(杨旭辉)

【上官婉儿】(664—710) 为上官仪孙女，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其父庭芝与上官仪同时被杀，婉儿随母郑氏配入掖庭。年十四，为武则天掌诏命。武周圣历(698—700)以后，百官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复位，为婕妤，专掌诏命，封为昭容，世称上官婕妤、上官昭容。婉儿通晓文词，明习吏事。曾劝中宗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臣。又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并为中宗、皇后及公主代作诗文，当时词臣多与交往。中宗景龙四年(710)，李隆基起兵诛韦后，婉儿亦被杀。睿宗景云中追复昭容，谥惠文。玄宗开元(713—741)初，令收集其诗文，成二十卷，张说作序，久佚。《全唐诗》卷五存其诗三十二首，多应制之诗，代表作为《彩书怨》、《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旧唐书》卷五一、《新唐书》卷七六有传，张说撰有《昭容上官氏碑铭》。(徐俊)

【李適之】(?—747) 原名昌。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生于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中宗时，拜左卫郎将。玄宗开元(713—741)年间，累迁湖州别驾、通州刺史。后历秦州都督、陕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开元二十九年(741)人为刑部尚书。天宝元年(742)八月拜左相，寻兼兵部尚书，封清和县公。受右相李林甫排挤。天宝五载，上书自求散职，授太子少保，罢知政事。贬宜春太守。天宝六载，李林甫杀李邕、韦坚、裴敦复等，朝野震惊，適之忧惧，服药自尽。適之性疏放，嗜饮酒，杜甫列其为“饮中八仙”之一。亦工诗，《全唐诗》存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三一有传。事又见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上，《唐诗纪事》卷二〇等。(林长永)

【张敬忠】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中宗朝为监察御史，后入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幕，分判军事。入朝历司勋郎中、吏部郎中等。玄宗开元七年(719)，拜平卢节度使。十一年，除河西节度使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又加经略使。历左常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等。卒年不详。敬忠能诗，《全唐诗》存诗二首。事见《旧唐书·张仁愿传》、《新唐书·张仁愿传》、《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等。(林长永)

【沈佺期】(?—713?) 字雲卿，排行三。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授协律郎。武周圣历(698—700)中，预修《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三教珠英》成，由通事舍人迁考功员外郎。长安二年(702)迁给事中。被劾入狱，未究获释。因谄附张易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被流放驩州。次年，北归。迁台州录事参军，后召为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历官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佺期善诗文，与宋之问齐名，时称“沈宋”。张说云：“沈三(佺期)兄诗清丽，须让居第一也。”(《唐才子传》)可见其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其诗多奉和应制之作，律诗谨严精工，于五律、七律形式之定型颇有影响。时人苏颋评云：“才标颖拔，思旨精微。早升多士之行，独擅词人之律。”(《授沈佺期太子詹事等制》)应制之外，尚有一些征戍、闺怨之作，如《杂诗三首》、《春闺》、《梅花落》等，七律《独不见》，写少妇别离相思之愁，对仗工密，婉转和谐，为古代诗歌史上较早最成熟的七言律诗之一。流放以后的诗作如《被弹》、《初达驩州》、《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等，沉痛哀切，动人心弦。一些山水题咏之作，如《夜宿七盘岭》等，写景抒情均有佳处。原有文集十卷，已佚。明人有辑本四卷。《全唐诗》存诗三卷，见卷九五至九七。《全唐诗补编》另辑有佚作。《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二〇二、《唐才子传》卷一有传。(徐俊)

【李崇嗣】排行三。武后时曾任奉宸主簿。武周圣历(698—700)中，尝与沈佺期一起奉勅东观修书。曾任许州参军，陈子昂有诗寄赠。《全唐诗》存诗三首。其事迹略见于《唐诗纪事》卷六所引陈子昂《题李三书斋》、《别李参军》、《酬李参军旅馆见赠》及沈佺期《黄口赞序》四篇诗文。(杨旭辉)

【阎朝隐】(?—712) 字友情，排行五。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少与兄镜幾、弟仙舟俱知名。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补阳武尉。中宗为太子，朝隐以舍人幸。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武周圣历(698—700)中，取悦于武则天，转麟台少监。久视元年(700)，谄事张易之，预修《三教珠英》。易之等所作篇什，多为朝隐与宋之问潜代为之。易之伏诛后，坐徙岭外，寻召还。唐玄宗先天(712—713)中，复为秘书少监，又坐事贬通州别驾，卒官。张说云：“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大唐新语》卷八)有集五卷，已佚，《全唐诗》存诗十三首，《全唐诗外编》又补二首。生平俱见新、旧《唐书》本传。(杨旭辉)

【徐彦伯】(?—714) 名洪，以字行。兖州瑕丘

(今山东兖州)人。少有文名,由薛元超表荐之,对策高第,授永寿尉,转蒲州司兵参军。彦伯文辞雅美,与司户韦嗣立善判,司士李亘工书,并称“河东三绝”。武周圣历(698—700)中进给事中,预修《三教珠英》。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以修《则天实录》功,封高平县子。俄出为卫州刺史,转蒲州刺史。景龙(707—710)中入为工部侍郎,除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云中迁右常侍、太子宾客。玄宗开元二年(714)卒。两《唐书》著录《徐彦伯前集》十卷、《后集》十卷,早佚。《全唐诗》卷七六存诗一卷。《旧唐书》卷九四、《新唐书》卷一一四有传。

(徐俊)

【张说】(667—731) 字道济,又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武后载初元年(689),武后策贤良方正,张说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武攸宜征契丹,为管记。久视元年(700),预修《三教珠英》,任右补阙。长安元年(701),迁右史、内供奉。长安二年,知考功贡举事,累迁凤阁舍人。因忤旨流配钦州,唐中宗朝召还。睿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开元(713—741)初,因不附太平公主,罢知政事。复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出为相州、岳州等州刺史,后又召还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迁中书令,俄授右丞相,至尚书左丞相。开元十八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入公元731年)卒,谥文贞。说先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开元前期文坛盟主。为文精丽俊密,尤长于碑志,时与许国公苏颋号为“燕许大手笔”。诗具盛唐风貌,贬官岳州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曾自编为《岳阳集》。说喜奖掖后进,张九龄、贺知章等皆曾为延誉,于盛唐诗坛颇具影响。文集三十卷,今有宋蜀刻本传世。《全唐诗》卷八五至八九存其诗五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补之作。张九龄有《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五有传。今人陈祖言撰有《张说年谱》。

(徐俊)

【苏颋】(670—727) 字廷硕,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幼敏悟,年十七登进士第,授乌程县尉。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中贤良方正科,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历监察御史、起居郎、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唐中宗神龙(705—707)中迁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迁太常少卿。睿宗景云(710—711)中丁父忧,服阙,为工部侍郎,袭封许国公。擢中书侍郎,与紫微侍郎李义对掌文诰,号为“苏、李”,玄宗以为可与苏味道、李峤相媲美。玄宗开元四年(716)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后罢为益州长史,复入朝知吏部选事。十五年卒,谥曰文宪。苏

颋工文,与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其诗多应制之作,典雅秀赡,为世所称,名篇如《汾上惊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等。原有集三十卷,久佚。《全唐诗》卷七三、七四收其诗二卷,《全唐诗补编》补辑一首。《旧唐书》卷八八、《新唐书》卷一二五有传。

(徐俊)

【崔湜】(671—713) 字澄澜,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少以文词知名,弱冠举进士,累转左补阙,预修《三教珠英》,迁殿中侍御史。唐中宗神龙(705—707)初迁考功员外郎。阿附武三思,擢为中书舍人。历兵部、吏部侍郎,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铨选失序,为御史劾奏,贬江州司马,改襄州刺史。后两度入相,官至中书令。玄宗先天二年(713),与太平公主等谋乱,事败流徙岭南,行至荆州,赐死。崔湜存诗四十三首,多为应制、酬赠之作,见《全唐诗》卷三四及《全唐诗补编》。《旧唐书》卷七四、《新唐书》卷九九有传。

(徐俊)

【崔液】(?—713?) 字润甫,小名海子。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崔湜之弟。工五言,举进士第一。历仕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玄宗先天二年(713),受兄湜谋逆罪连累,法当流放,液亡命郢州,作《幽征赋》以见意,词甚典丽,遇赦还,卒。《新唐书·艺文志》录有其友人裴耀卿所纂《崔液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十二首。事迹略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诗纪事》卷一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登科记考》卷二七。

(杨旭辉)

【齐澣】(675—746) 字洗心。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少开敏,李峤称其有王佐才。武周圣历(698—700)初,及进士第,以拔萃调蒲州司法参军。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姚崇取为监察御史。玄宗开元(713—741)初,姚复相,用为给事中、中书舍人,论驳及诰诏皆援准古谊,朝廷大政必咨之,时号“解事舍人”。马怀素等绪次四库书,表澣为副,改秘书少监。开元十二年(724)出为汴州刺史,以清毅闻,吏民颂美。开元十四年,入拜尚书右丞,转吏部侍郎。开元十七年,坐事贬高州良德丞。久之,徙索卢丞,郴州长史,濠、常二州刺史,迁润州。开元二十七年,复徙汴州刺史。天宝元年(742),召为太子少詹事,留司东都。天宝五载,用为平阳太守,卒于郡,享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全唐诗》存诗二首,《全唐诗续拾》又补一首。其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及《元和姓纂》卷三、《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八、卷一六、《咸淳毗陵志》卷七等。

(杨旭辉)

【张九龄】(678—740) 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武周长

安二年(702),登进士第。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玄宗先天元年(712),中道侔伊吕科登第,授左拾遗。秩满,去官归养,奉诏开大庾岭。开元六年(718),迁左补阙。次年,改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四年,改太常少卿。次年,出为洪州刺史。开元十八年,转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次年,人为秘书少监,转工部侍郎,迁中书侍郎。开元二十一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集贤学上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三年,封始兴县伯。后为李林甫所谮,贬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三,谥文献。九龄工诗能文,名重一时,张说常誉为“后出词人之冠”。其诗虽多应制之作,但贬谪后所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写其遭受排挤的忧思,格调清雅,兴寄深婉,论者以为与陈子昂《感遇》相近,以陈、张并称。尤长五言古诗,清王士禛谓唐五言古诗“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子昂)之力最大,曲江公(张九龄)继之,太白又继之”(《古诗选》)。五律亦清淡自然,多有佳作。《感遇》、《杂诗》、《望月怀远》、《旅宿淮阳亭口号》、《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等均其代表作。有《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传世。《全唐诗》卷四七至四九存其诗三卷,间有他人之作混入。另《全唐诗补编》辑佚二首。徐浩撰有《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二六有传。近人何格恩编有《张九龄年谱》及《曲江年谱拾遗》。

(徐俊)

【王翰】 一作王瀚,疑误。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唐睿宗景云元年(710),登进士第,先后为并州长史张嘉贞、张说所礼遇。复中直言极谏科,调昌乐县尉。后又中超拔群类科。张说为相,召任秘书省正字,擢通事舍人,转驾部员外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张说罢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后因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翰家有声妓,析多名马,发言立意,自比王侯。能文善诗,与祖咏、杜华友善,相互唱和。其诗写边塞生活,以《凉州词》二首最为著名,第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以豪放之情写军中生活,是唐代边塞诗中传诵千古的名篇。另外其七言歌行,咏叹古今,风华流丽。张说谓其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大唐新语》卷八),虽非就诗而言,但亦可知时人之评价。《旧唐书》本传、《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集十卷,已佚。今存诗一卷,见《全唐诗》卷一五六。《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

另见《唐诗纪事》卷二一、《唐才子传》卷一。

(徐俊)

【王湾】 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先天(712—713)年间进士及第,玄宗开元(713—741)初任荥阳主簿。开元五年(717),预修《群书四部录》。开元九年,书成,出为洛阳尉。开元十七年,曾任朝官,后不知所终。“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殷璠《河岳英灵集》)今存诗十首,见《全唐诗》卷一一五。事见《新唐书·马怀素传》、《河岳英灵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一五、《唐才子传》卷一等。

(徐俊)

【张子容】 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曾隐于白鹤山。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登进士第。开元(713—741)中任晋陵尉,贬为乐城尉,后弃官归旧业。后值乱离,流寓江表。子容与孟浩然为死生交,诗篇唱答颇多,诗风亦相近。《唐才子传》谓其“兴趣高远,略去凡近。当时哲匠,咸称道焉”。其集,唐宋书志不载,《唐才子传》云“有诗集”。《全唐诗》卷一一六编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另辑补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二三、《唐才子传》卷一。

(徐俊)

【李昂】 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状元及第,开元九年,与畅诸、王泠然同登拔萃科。开元二十四年,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为举人所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昂工诗,有《戚夫人楚舞歌》一篇,播传人口,《全唐诗》另载一首七古《从军行》,此外,《全唐诗外编》又补三首。其事见于《大唐新语》卷一〇,《唐摭言》卷一、卷一五,《唐会要》卷五八、卷七五,《唐才子传》卷一及《芒洛冢墓遗文》卷中《李昊墓志》。

(杨旭辉)

【崔颢】(?—754)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开元(713—741)后期曾入河东军幕,天宝(742—756)初任太仆寺卿,转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754)卒。崔颢名重当时,殷璠评云:“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代表作七律《黄鹤楼》,传说李白读后大为佩服,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诗纪事》)。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颢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〇收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另辑补五首。《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三下有传,另参《唐诗纪事》卷二一、《唐才子传》卷一。

(徐俊)

【祖咏】 排行三。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开

元十二年(724)进士及第,仕履不详。后移家归汝坟别业,以渔樵自终。咏善诗文,与王翰、王维、储光羲、卢象等诗人友善,互有酬赠。其诗多写山水景物,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殷璠评其诗“剪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至如‘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亦可称为才子也”(《河岳英灵集》)。代表作有《终南山望馥雪》等。《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诗一卷,久佚。《全唐诗》卷一三一存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事见《唐诗纪事》卷二〇、《唐才子传》卷一。(徐俊)

【万楚】 曾居盱眙(今属江苏)。唐玄宗开元(713—741)中,进士及第,久不得用。后曾入仕,官位低下,不久即退隐颍水之滨。李颀《东京寄万楚》:“仍闻薄宦者,还事田家衣。颍水日夜流,故人相见稀”。有诗名,芮挺章选其诗三首入《国秀集》,所作《骢马》诗,沈德潜评曰:“几可追步老杜咏马诗”(《重订唐诗别裁集》)。今存文一篇,载《全唐文》卷三六五;诗八首,载《全唐诗》卷一四五。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二〇。(吴企明)

【丁仙芝】 润州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登进士第,至开元十八年仍未授官,仕途偃蹇,后仅仕至主簿、馮杭县尉等职。友人储光羲叹其“高名处下位,逸翮栖卑枝”(《贻丁主簿仙芝别》)。有诗名,诗风“婉丽清新,迥出凡俗”(《吟窗杂录》卷二六《历代吟谱》引殷璠语),殷璠《丹阳集》录其诗。《光绪丹阳县志》卷三五著录丁仙芝《丁馮杭集》二卷,今已佚。《全唐诗》卷一一四录其诗十四首,《全唐诗逸》卷上补一联,《全唐诗续拾》补一首。生平见储光羲《贻丁主簿仙芝别》、《国秀集》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四“包融诗”注、《唐诗纪事》卷二四。(吴企明)

【李隆基】(685—762) 即唐玄宗。唐睿宗第三子,自称“三郎”。曾封楚王,改临淄郡王。中宗景龙四年(710),率兵诛韦后,迎立睿宗,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旋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712),即位,在位四十五年,前期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后期奢侈腐化,奸臣当政,国事日非。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次年,玄宗仓皇奔蜀。太子即位于灵武,尊之为太上皇。后还京,悒郁而卒。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世称唐明皇。玄宗多才多艺,知音律,善书法,工诗能文。后人称他“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殷璠《河岳英灵集叙》)。王世贞云:“明皇藻艳不及文皇(唐太宗),而骨气胜之。”(《唐音癸签》卷五引)于盛唐诗歌之繁荣,有倡导之功。《全

唐诗》卷三收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补之作。事见《旧唐书》卷八、《新唐书》卷五六玄宗本纪。(徐俊)

【王之涣】(688—742) 字季凌,排行七。郡望晋阳(今山西太原),五世祖后魏绛州刺史王隆之,宦徙绛郡,遂占籍绛郡(今山西新绛)。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以荫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因受人诬构,拂衣去官,家居十五年,优游山水,足迹遍及黄河南北。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前后,曾流寓蓟门,与高适交游(高适《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晚年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为官清白公正,名著于时。天宝元年(742)二月,卒于官舍,享年五十五。之涣慷慨倜傥有才略,曾游边塞,善作边塞诗,时人称其“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之一。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旗亭画壁”故事,白居易亦称开元时王之涣与王昌龄、崔国辅“联唱迭和,名动一时”(《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茱阳郑公墓志铭》)。中唐芮挺章《国秀集》选其诗三首。《全唐诗》卷二五三收其诗六首,皆为佳作,其中尤以《凉州词》、《登鹳雀楼》(《国秀集》作朱斌诗)两诗最为脍炙人口。事见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见齐鲁书社1986年版《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徐俊)

【崔国辅】 郡望清河,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一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登进士第,授山阴尉。开元二十三年,中牧宰科,授许昌令。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际,入为左补阙、起居舍人。天宝中,转为礼部员外郎,天宝十载,加集贤院直学士。因与王缙亲近,次年,贬为竟陵郡司马。肃宗至德(756—758)年间,曾入广州都督何履光幕。国辅有诗名,与储光羲、綦毋潜、常建、王昌龄等齐名,皆一时之秀。殷璠评云:“国辅诗,婉变清楚,深宜讽味。乐府数章,古人不及也。”(《河岳英灵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国辅集》,《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崔国辅诗》一卷,今存诗四十一首,见《全唐诗》卷一一九。事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唐诗纪事》卷一五、《唐才子传》卷二等。(徐俊)

【沈如筠】 生卒年不详,约唐玄宗时在世。句容(今属江苏)人。官横阳县主簿。与道士司马承祯有诗作寄酬,殷璠《丹阳集》收其诗作。《全唐诗》存诗四首。断句二联。如筠另著有传奇《异物志》、《古异记》,均已佚。其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

卷一五,《嘉定镇江志》卷一八及《嘉泰吴兴志》卷一六。
(杨旭辉)

【孟浩然】(689—740) 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世称“孟襄阳”。少时于故园度过,后隐居鹿门山。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于秘书省同诸名士赋诗,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叹为清绝,为之搁笔。次年,还乡。后漫游吴、越等地,与诗人张子容、崔国辅交游。开元二十一年,再游长安,韩朝宗欲荐之于朝,因浩然爽约而未果。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开元二十七年,离幕归里养病。次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至襄阳访浩然,相见甚欢,食鲜疾动,不久卒,年五十二。浩然早年有用世之志,但终于布衣,沦落一生,然名重当时。李白称颂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与当时著名诗人如张九龄、王维、裴膺、卢僎、裴总、独孤策等为忘形之交。浩然所写以山水田园和隐居逸兴为主要题材,与王维齐名,同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世称“王孟”。所作以五言为多,尤工五律,时人称为“文不按古,匠心独妙”(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殷璠评云:“浩然诗,文采芊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河岳英灵集》)善以清淡之笔,写秀丽之景,情幽兴远,意境清迥,风格恬淡孤清,逸韵独标,杜甫称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之六)。少数诗篇描绘壮阔山川,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势磅礴,格调雄浑。但就其整体而言,创作题材较狭隘,多局限于自我表现范围,内容不够丰富。浩然诗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禛推衍严氏之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谓“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天宝四载(745),浩然友人王士源编有《孟浩然诗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浩然诗集》三卷,今传宋蜀刻本孟集大体保持了其原貌。明人有所增补,析为四卷。《全唐诗》卷一五九、一六〇收其诗二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另参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唐诗纪事》卷二三、《唐才子传》卷二。
(徐俊)

【梁献】生卒年字里不详。玄宗时,曾任仓部员外郎。献能诗善赋,《全唐诗》存诗一首,《全唐文》存赋两篇。事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八、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及《文苑英华》卷六四《出师赋》前之赵自励序。
(杨旭辉)

【王昌龄】(690?—756?) 字少伯,排行大。京兆

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早年似曾至西北边塞。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县尉。开元二十七年,贬岭南。次年,北归,经襄阳,孟浩然有诗相送。是年冬,任江宁县丞。世称“王江宁”。天宝(742—756)中被贬龙标尉,故亦称“王龙标”。安史乱起,昌龄由贬所赴江宁,为濠州刺史闾晓丘所杀。王昌龄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共收二十四位诗人作品,其中王昌龄诗多至十六首,居诸家之首,并评云:“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称誉其诗为“中兴高作”。唐顾陶《唐诗类选序》称“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间,其亚则昌龄、伯玉……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风骨”。昌龄擅长七言绝句,人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前人多以之与李白并称。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王江陵(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宋鞏《漫堂说诗》云:“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王昌龄传》著录有集五卷,又载王昌龄《诗格》二卷。《全唐诗》卷一四〇至一四三收其诗四卷,《全唐诗逸》、《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另参《唐诗纪事》卷二四、《唐才子传》卷二。
(徐俊)

【孙逖】(696—761) 排行大。潞州涉县(今属河北)人,郡望乐安武水(今山东聊城),少时依外家客涉、巩间,故又称“河南巩人”(今河南巩县)。逖幼而有文,属思精敏,援笔成篇。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举哲人奇士科,授山阴尉。后中贤良方正科。开元十年,再登文藻宏丽科,诏授左拾遗,迁左补阙。开元十五年后,入太原李晋幕。开元十八年,入为集贤院学士。后历官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太子左庶子,仕终太子詹事。肃宗上元(760—761)中卒,谥文。逖善诗,古调今格,悉其所长。颜真卿称“其为诗也,必有逸韵佳对,冠绝当时,布在人口”(《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省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原有集二十卷,早佚。《全唐诗》卷一一八存诗一卷,卷八八二又补一首。《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另参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省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唐才子传》卷一。
(徐俊)

【常建】一说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曾任盱眙尉,后隐居鄂渚西山。旧说建为肃宗、代宗间人,疑误。其诗中无安史乱后行迹,其卒当在天宝末、至德初(756)。建以

仕途失意,放浪琴酒,为诗受时人推重,被称为“当时之秀”(顾况《储光羲集序》)。殷璠评其诗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河岳英灵集》)。代表作《题破山寺后禅院》之“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为后人称诵。常建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作一卷。《天禄琳琅丛书》影刊《宋临安本常建诗集》为二卷。《全唐诗》卷一四四收其诗一卷。事见《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卷二。(徐俊)

【吴筠】(?—778)字贞节,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少即笃志道教,隐于南阳倚帝山。唐玄宗天宝(742—756)初应召入京,请度为道士,入嵩山嵩阳观学道。天宝十三载(754),应召入京为翰林供奉。旋请归。安史之乱起,避乱南行,隐于庐山。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卒于宣城道观。其门人私谥为“宗玄先生”。筠善论道,多著述。亦能诗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筠集》十卷。今存《宗玄先生文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一卷。《旧唐书》卷一九二、《新唐书》卷一九六有传。事又见权德輿《唐故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等。(林长永)

【晁衡】(698—770)一作朝衡,字巨卿。日本国人。原名阿倍仲麻吕。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为遣唐留学生,随遣唐使团来长安,易汉名晁衡,就学于国子监太学。学成,留唐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开元十九年,由京兆尹崔日用荐举,任左补阙。开元二十二年,晁衡请求归国,玄宗不允。后为仪王友。天宝(742—756)初,李白应召入京,晁衡与之结识,成为挚友。天宝十一载(752),历卫尉少卿、卫尉卿。次年,再迁秘书监。是年,受命为聘贺使随遣唐使归国,王维、包佶等有诗相送。途中船遇大风及海盗,同舟死者一百七十余人,晁衡幸免于难。天宝十三载秋,李白以为晁衡蒙难,作《哭晁卿衡》,以申哀悼之情。次年,晁衡辗转回到长安。肃宗上元(760—761)中,授左散骑常侍。后历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代宗大历(766—779)初,罢归长安。大历五年正月卒。晁衡与当时著名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包佶等友善,是日本侨居唐国的著名诗人之一。《全唐诗》卷七三一存其诗一首,《全唐诗补编》另辑补一首。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九、《新唐书》卷二二〇《日本国传》。(徐俊)

【高适】(700?—765)字达夫。史称渤海蓊(今河北景县)人,似指郡望。其父崇文官韶州长史,适随父居岭南,后客居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河岳英灵集》)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前后,游历长

安,求仕无成,乃东归梁、宋,北上蓊门,于边塞军旅生活多所体察。开元二十年,上诗信安王李祎幕下,求援引未果,复南归宋州。开元二十三年,于长安应试制举,不第。天宝三载(744)夏,与李白、杜甫相会于梁、宋,诗酒往还。天宝八载,由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中有道科,授封丘尉。天宝十一载,辞官再游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乱后,历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官至左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代宗永泰元年(765)正月卒,谥忠。高适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与岑参齐名,世称“高岑”。代表作如《燕歌行》、《蓊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等,当时极具声名。诗以乐府、古风尤为擅长,颇为杜甫所推许。殷璠评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新唐书》本传谓适“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天宝七载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序的高适诗集,久佚。两《唐书》著录其集二十卷,亦佚。现存《高常侍集》十卷。《全唐诗》卷二一一至二一四存其诗四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十馀首。今人刘开扬著有《高适诗编年笺注》,孙钦善著有《高适集校注》。《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四三有传,另参《唐诗纪事》卷二三、《唐才子传》卷二。今人周勋初著有《高适年谱》。(徐俊)

【江采蘋】唐玄宗之妃,又称江妃,莆田(今属福建)人。玄宗开元(713—741)初,高力士选侍玄宗。九岁能诵《诗经》二《南》,聪颖善文,自比谢道韞。性嗜梅,喜淡妆雅服。所居遍植梅树,花时赏至夜半,紫树徘徊,不忍离去。玄宗因戏名梅妃,尝擅宠后宫。及玄宗移宠杨贵妃,乃迁江妃于上阳宫。拟求人代写“长门”之赋以悟玄宗。高力士不敢为求,而告之以无人欲代,乃自作《楼东赋》以遣悲怀。后卒于安史乱中。玄宗自蜀归长安后,于梅树下掘得其尸,见腋下刀痕,悲恸不已,以妃礼改葬。事见旧题曹邺《梅妃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梅妃实无其人,“盖见当时图画有把梅美人号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时人”。《全唐诗》存其题作《谢赐珍珠》一首。诗旨怨而有骨。(陈祖美)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排行十二。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白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唐中宗神龙(705—707)初,随父潜回广汉,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清廉乡。一说白生于蜀中。少年时博览经史百家,喜观奇书,好击剑任侠。玄宗开元十二年(724),白抱“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大志,出蜀漫游,曾至江汉、洞庭、金陵、扬州

等地。娶故相许圜师孙女为妻,遂留湖北安陆多年。开元十八年夏,西入长安求仕,从张垍、崔宗之等游,并出入玉真公主别馆。贺知章见其《蜀道难》诗,誉为“谪仙人”,后人因称“李谪仙”。开元二十四年后,白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惟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742),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人称“李翰林”。天宝三载春,因权贵谗毁,被玄宗“赐金放还”。出京后,与杜甫、高适相会于梁、宋,同登吹台,慷慨怀古。后即漫游东鲁、吴越,天宝十一载,北上塞垣,游幽蓟,浪迹各地,以诗酒自适。安史乱时,白隐居庐山,永王璘东巡,召至幕府。肃宗至德二载(757),永王兵败,白系浔阳狱,坐从逆罪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于白帝城遇赦,东还江夏,重游洞庭、皖南等地。代宗宝应元年(762),往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不久病卒,享年六十二。白与杜甫在盛唐诗坛上双峰并峙,世称“李、杜”,韩愈赞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杜甫称其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曰:“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诗想象奇特,清丽自然,俊逸高畅,长于歌行,乐府、绝句尤为杰出,胡震亨云:“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其绝句“气体高妙”,乃为神品,李攀龙《唐诗选序》赞之为“唐三百年一人”。李白生前曾嘱魏万、李阳冰編集其诗文(见魏万《李翰林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今已不存。《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草堂集》二十卷,今传之《李太白集》三十卷,乃北宋宋敏求裒集诸书编成。《全唐诗》存诗二十五卷,《全唐诗外编》和《全唐诗续拾》补诗三十六首,断句十。生平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二本传,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有年谱多种,宋薛仲邕《翰林李太白年谱》、清王琦《李太白年谱》较为著名。

(吴企明)

【殷遥】排行四,润州句容(今属江苏)人。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任忠王府仓曹参军。后为校书郎。遥工于诗,与王维、储光羲等友善。殷璠汇次遥等十八人诗为《丹阳集》,称“遥诗闲雅,善用声”(《吟窗杂录》卷二四《历代吟谱》)。辛文房谓其“词彩不群,而多警句”(《唐才子传》卷三)。《全唐诗》存诗五首。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之《包融诗》注、

《唐诗纪事》卷一七、《唐才子传》卷三等。

(林长永)

【王维】(701?—761)字摩诘,排行十三。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太原),其父官徙蒲州,遂为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进士及第,授太乐丞,旋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后归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擢为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迁监察御史,秋,出使凉州慰问,留任河西节度判官。开元二十八年冬,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元年(742),任右补阙,转侍御史。天宝五载,迁库部员外郎、郎中。天宝九载,丁母忧,隐居终南辋川别业,与友人裴迪优游其中,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天宝十一载,服阕,起为吏部郎中。天宝十四载,转给事中。安史乱军陷长安,玄宗入蜀,王维为叛军所获,署以伪职。乱平,降为太子中允,后迁太子左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肃宗上元元年(760),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笃志奉佛,退朝之余,以禅诵为事。上元二年卒。王维多才艺,工诗文,善绘画、音乐,其诗在生前及后世,都具盛名,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本传)。被誉为“天下文宗”(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其诗清新秀雅,兼善各体,尤长于山水田园诗,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王维自称:“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偶然作》)为诗常冶禅理、诗情、画笔为一炉,苏轼称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殷璠谓其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前人誉王维为“诗佛”,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称。王维诗对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清代王士禛标举神韵说,奉为圭臬。王维卒后,唐代宗命其弟王缙缀辑遗文,编成《王维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全唐诗》卷一二五至一二八存其诗四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补之作。《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另参《唐诗纪事》卷六、《唐才子传》卷二。今人陈铁民著有《王维年谱》。

(徐俊)

【畅诸】汝州(今河南临汝)人。旧说为畅当之弟,误。唐玄宗开元(713—741)中,进士及第,开元九年(731),中拔萃科。官至许昌尉。诸诗仅存二首,其中《登鹳鹊楼》诗最为人传诵。诗见《全唐诗》卷二八七、《全唐诗补编·补全唐诗》。事见《元和姓纂》卷九、《唐诗纪事》卷二七、《登科记考》卷七、卷二七等。

(徐俊)

【崔兴宗】博陵(今河北定县)人。王维内弟。天

宝十一载(752),任右补阙。有别业于蓝田,与王维、裴迪往还,互有赠答之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今存诗五首,见《全唐诗》卷一二九。事见《唐诗纪事》卷一六、《唐才子传》卷二等。

(徐俊)

【裴迪】排行十,关中(今陕西)人。玄宗天宝(742—756)间,与王维、崔兴宗等俱隐蓝田,日相游咏于王维之辋川别业,览物赋诗,琴酒为乐。迪有酬唱诗二十首,为王维编入《辋川集》中。安史乱起,王维被禄山拘于洛阳菩提寺迫受伪职,迪往相见,维乃作《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肃宗上元(760—761)初,王缙守蜀州,迪往依之,入幕为佐吏,遇杜甫,时相酬唱,甫尝作《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等诗,以何逊比之。迪尝任职尚书省,李颀有《圣善阁送裴迪入京》诗,咏及“相托含香署,云霄何足难”。迪工诗,擅五言,为田园山水诗派重要诗人之一。其诗风格清新,与王维相似,但不如维诗之飘逸自然,杜甫谓其“苦思缘诗瘦”(《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其中《西塔寺陆羽茶泉》一首,显系他人诗作误入。事见《旧唐书·王维传》、《唐诗纪事》卷一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吴企明 黄维华)

【綦母潜】字孝通,虔州南康(今属江西)人,晚年寄居淮阴(今属江苏)。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进士及第,授宜寿尉,入为集贤院直学士。开元(713—741)末,任秘书省校书郎。天宝(742—756)初,弃官还江东,天宝十一载(752)前后,在右拾遗任。官至著作郎,后不知所终。綦母潜工诗,与当时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颀、高适、储光羲等友善,殷璠称“潜诗屹岸峭犷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河岳英灵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綦母潜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五存诗一卷。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元和姓纂》卷二、《唐诗纪事》卷二〇、《唐才子传》卷二等。

(徐俊)

【丘为】(703?—798?) 吴郡嘉兴(今属浙江)人。初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唐玄宗天宝(742—756)初,进士及第。累官主客郎中、司勋郎中,迁太子右庶子,由左散骑常侍致仕。约卒于贞元十三、十四年(797、798)前后,年九十六。《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丘为集》,然当时即已亡佚,今存诗十馀首,见《全唐诗》卷一二九,《全唐诗补编·补全唐诗》另辑补

五首。事见《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艺文志》、《唐会要》卷七六、《唐诗纪事》卷一七、《唐才子传》卷二等。

(徐俊)

【储光羲】(706?—763?) 排行十二。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祖籍兖州(今属山东)。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应试不第,与丁仙芝同入太学为诸生。开元十四年,登进上第,释褐为冯翊县佐官,历安宜、下邳、汜水等县尉。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隐终南别业。天宝六、七载(747、748)间,出仕太祝。后迁监察御史。天宝九载,曾奉使至范阳。安史乱起,陷长安城中,迫受伪职。肃宗至德二载(757),脱身南行,历江汉,过秦岭,抵达行在,即被系狱中,因作《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诗。后贬岭南。代宗宝应元年(762)五月,见赦,未几,卒于贬所。光羲工诗,与孟浩然、王维等有交往,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作家之一。殷璠评其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河岳英灵集》)。《历代吟谱》亦谓“宏瞻纵逸,务在直置”(《吟窗杂录》卷二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后人于其诗品说法不一,顾况谓其“声价隐隐轹轹诸子(指崔国辅、綦母潜、常建、王昌龄)”(《监察御史储公集序》)。或以之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并称。但清人李慈铭则谓“远逊王、韦,次惭孟、柳”(《越缦堂读书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集七十卷,已佚。又撰《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久佚。今传《储光羲诗集》为五卷。《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事见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唐诗纪事》卷二二、《唐才子传校笺》卷一。今人谭优学有《储光羲行年考》,陈铁民有《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

(吴企明 黄维华)

【贺兰进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进士及第。天宝(742—756)后期,任信安郡太守,迁北海太守。肃宗至德二载(757),任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出镇临淮。乾元二年(759),坐第五琦党,贬濠州司马。后不知所终。进明能诗,殷璠称其“好古博达,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又有古诗八十首,大体符于阮公。又《行路难》五首,并多新兴”(《河岳英灵集》)。唐宋书志未著录其集,作品多佚。《全唐诗》卷一五八收其诗七首。事见新、旧《唐书》张巡、房琯、第五琦等传、《唐诗纪事》卷一七、《唐才子传》卷二。

(徐俊)

【陶翰】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天宝元年(742),又登拔萃科。历官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其诗十一首,并评云:“历代词

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其诗以五古尤长,其边塞诸作,如《古塞下曲》、《燕歌行》等,慷慨悲壮,为盛唐诗中的佳制。翰子问儒曾编次翰集,有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陶翰集》,注云“卷亡”。今存诗一卷十七首,见《全唐诗》卷一四六。事见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唐会要》卷七六、《唐诗纪事》卷二〇、《唐才子传》卷二等。(徐俊)

【薛据】河中宝鼎(今山西永济)人,晚岁客居江陵,故又称荆南人。早孤,为伯母林氏抚育。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进士及第,授永乐主簿,迁涉县令。天宝六载(747),登风雅古调科。天宝十一载,任大理司直。曾与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塔,赋诗唱和。肃宗乾元二年(759),授太子司仪郎,上元二年(761),至代宗广德元年(763)间,任祠部员外郎,仕终水部郎中。大历(766—779)初,客居江陵,后不知所终。据为人刚直有骨气,其诗多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杜甫、高适均予以嘉誉,殷璠评曰:“据为人骨鲠,兼有气魄,其文亦尔。自伤不早达,故著《古兴》诗,怨愤颇深。”(《河岳英灵集》)《全唐诗》卷二五三收其诗十二首,《全唐诗补编》另辑补一首。事见《旧唐书·薛播传》、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唐诗纪事》卷二五、《唐才子传》卷二。(徐俊)

【卢象】字纬卿,排行八,郡望范阳(今河北涿县),家居汶上(今山东泰安、曲阜一带)。唐玄宗开元(713—741)中进士及第,任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张九龄执政,擢左补阙(一作左拾遗),转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贬为齐、汾、郑三郡司马,后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安史之乱中曾任伪职,肃宗还朝,贬果州长史,再贬永州司户,改吉州长史。后召为主客员外郎,途中卒于武昌。卢象与王维、李颀、李白、綦毋潜、祖咏等诗人交游,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刘禹锡评其诗云:“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骖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殷璠谓“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土之风”(《河岳英灵集》)。有集十二卷,为其孙卢元符编,刘禹锡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已佚。《全唐诗》卷一二二存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唐才子传》卷二。(徐俊)

【景云】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岑参有《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上人即事》,其中云:“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应略早于岑参,为游历四方之

名僧。幼聪悟,通经论。善书法,曾学张旭,妙于草书。能诗,《全唐诗》存诗三首。事见《宣和书谱》卷一九、《书史会要》卷五。(林长永)

【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一说蒲州(今山西永济西)人(《旧唐书》卷一八七)。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登进士第。天宝(742—756)年间,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后调真源令。安史之乱起,巡招募豪杰讨贼,后与许远合力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肃宗至德二载(757)因功授金吾将军、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拜御史中丞,世因称“张中丞”。睢阳城破,被俘遇害。赠扬州大都督。巡“体质贞正,才掩贤豪,诗书自负”(高适《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全唐诗》存诗二首。《旧唐书》卷一八七、《新唐书》卷一九二有传。事又见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唐诗纪事》卷二五等。(林长永)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行十三,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郡望琅玕临沂(今属山东)。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后,初唐著名学者颜师古之从曾孙。真卿早传家学,博览群书。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登进士第。开元二十四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天宝元年(742),中文词秀逸科,历仕醴泉尉、长安尉。天宝六载,拜监察御史。天宝八载,迁殿中侍御史。时杨氏方赐名国忠,势倾天下,怒真卿之不附己,遂出为平原太守。安史乱起,发兵抵抗,聚十七州义众,推为盟主。肃宗至德元载(756),授宪部尚书、御史大夫。辄进谏议,逆鳞忤旨,乃出除州刺史,历同、蒲、饶诸州。乾元二年(759),迁昇州刺史、浙西节度使,召为刑部侍郎,旋贬蓬州长史。代宗宝应元年(762),拜户部侍郎,迁尚书右丞。广德二年(764),复转刑部尚书,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大历元年(766),元载专权,真卿疏议言路不畅,被诬怨谤朝政,贬吉州别驾。大历三年,迁抚州刺史。大历七年,转刺湖州。大历十二年,元载受诛,召还,仍任刑部尚书。德宗建中四年(783),为卢杞所忌,改太子太师,奉命往许州宣慰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八月,为李希烈缢杀。赠司徒,谥文忠。真卿才富学高,工于文词,著述丰赡。在湖州任上,尝延集江东三十馀文士,编撰大型类书《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今已佚;又前后聚文士八十馀人为诗会,联唱论诗,结集为《吴兴集》十卷。书法精绝,尤擅楷书,世称“颜体”。《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州集》十卷,已散佚;又著录《礼乐集》十卷、《五经要略》及《家教》三卷,亦不传。今传《颜鲁公集》十五卷,系宋留元刚所刊刻。《全唐诗》录其诗十首,又联句二十一首。《全唐诗补

逸》补联句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两句。《全唐文》编其文为九卷。事见新、旧《唐书》本传、令狐峒《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殷亮《颜真卿行状》。宋留元刚、清黄本骥均撰有《颜真卿年谱》。（吴企明 黄维华）

【阎防】排行九，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与颜真卿、萧颖士、李颀等同登进士第，尝任大理评事。约在开元二十五年，坐事贬湘中司户（见孟浩然《襄阳旅泊寄阎九司户》）。开元（713—741）末、天宝（742—756）初，卜居终南山，结茅读书于石门丰德寺附近，有《百丈溪新理茅茨读书》诗。遂从此不务进举。防为人好古博雅，放旷山水，高情独诣。有诗名，与岑参、孟浩然、韦应物、储光羲等过从唱酬。殷璠选其诗五首入《河岳英灵集》，称“其警策语多真素”。《唐才子传》谓“有诗集行世”，然《新唐书·艺文志》及宋代公私书目皆未见著录。《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已佚。《唐诗纪事》及《全唐诗》均存诗五首。事散见《元和姓纂》卷五、《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吴企明 黄维华）

【李颀】（690？—753？）祖籍赵郡（今河北赵县），居颍阳（今河南登封西）。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后调新乡尉，时已作吏数年，并已过中年。殷璠称“惜其伟才，只到黄绶”（《河岳英灵集》），后归隐颍阳。仍常往还于京洛之间。天宝八载（749）秋，高适任封丘尉，颀有《赠别高三十五》诗，其去世约在此后数年间。李颀与王维、高适、王昌龄、崔颢、张旭、綦毋潜、岑参、皇甫曾、朱放等著名诗人皆有交往，名重当时。工诗，尤善七言。殷璠评云：“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河岳英灵集》）胡应麟谓其七言歌行“音节鲜明，情致委折，秣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内编卷三）。名作边塞诗如《古从军行》、《古意》等豪壮奔放，慷慨深沉；赠别诗如《送陈章甫》、《别梁锴》、《赠张旭》等写友人怀才不遇、傲岸不羁的性格，笔墨传神。《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二至一三四收其诗三卷，《全唐诗逸》、《全唐诗补编》另有辑佚之作。事见《国秀集》卷下、《河岳英灵集》卷上、《唐诗纪事》卷二〇、《唐才子传》卷二。

（徐俊）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原籍襄阳，曾祖时迁居河南府巩县（今属河南）。祖审言，有诗名，擅五言律诗。甫七岁，始作诗文，年十四，出入翰墨场，人誉称“似班扬”。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东下姑苏，漫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归洛阳，举进士，不第，遂游于齐、赵间。天宝三、四载（744、745），

与李白、高适会于梁宋、齐鲁间，相与诗作唱酬。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杜甫应诏，因李林甫忌才，悉皆退下。天宝十载，进献三篇《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天宝十三载，复献《封西岳赋》。翌年，授河西尉，不受，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回家省亲，适安史乱起，迁家鄜州。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八月，肃宗立，杜甫闻讯奔行在，中道被俘，陷长安。次年五月，脱身赴行在凤翔，拜左拾遗，世称“杜拾遗”。肃宗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司功。次年，弃官赴秦州、同谷，旋入蜀，年底到达成都，营草堂于西郊浣花溪。故人严武时为成都尹，时有馈赠，常相唱酬。代宗宝应元年（762），避徐知道乱，漂泊至梓州、阆州。广德二年（764），重返成都。剑南节度使严武招杜甫至幕府，聘为节度参谋，表荐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严武卒，杜甫携家离成都，经渝州、忠州至云安。大历元年（766），至夔州，居二年，作诗四百馀首，是杜甫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大历三年，离夔出峡，转辗江、湘间。大历五年，病死于由长沙至岳阳的小舟上。杜甫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后人誉之为“诗史”。其诗“沉郁顿挫”，“律切精深”，感情深挚，诸体兼备，诚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载苏轼语）。后人将他与李白并称为“李、杜”。元稹评其诗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在我国诗史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杜甫集》六十卷，樊晃《杜甫小集》六卷，均已散佚。今存最早的杜集版本为北宋王洙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所编的《杜工部集》二十卷。前人研究杜诗的著作颇多，较为著名的有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全唐诗》编其诗为十九卷，《全唐诗续拾》补一首，断句三。生平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一本传，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唐诗纪事》卷一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杜甫年谱有蔡兴宗、鲁崱、蔡梦弼所编数种较著名，近人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最为通行。（吴企明）

【苏源明】（？—764）初名预，避唐代宗讳改今名，字弱夫。郡望扶风（今陕西西安），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玄宗天宝（742—756）间，进士及第，又登制科，尝任州县官，后迁太子谕德。天宝十二载（753），出为东平太守。翌年，召为国子司业。安禄山陷京师，源明称病不受伪职。肃宗复两京，擢源明

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尝荐元结于肃宗。肃宗乾元元年(758),除中书舍人,入翰林院为学士,后转秘书少监,代宗广德二年(764)卒。源明工文辞,雅善杜甫、郑虔、元结、梁肃,有盛名于天宝间。杜甫称其“学府醇儒姿,文包旧史善”、“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脔”(《八哀诗》);韩愈亦言:“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送孟东野序》)(《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苏源明前集》三十卷、《通志·艺文略》著录苏源明《治乱集》三卷,均已佚。今存诗三首,见《全唐诗》卷二五五;存文五篇,见《全唐文》卷三七三。生平见《新唐书》卷二〇二本传,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重修翰林学士壁记》、《唐诗纪事》卷一九。

(吴企明)

【薛奇童】一作薛奇章(芮挺章《国秀集》)。字灵孺,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玄宗天宝(742—756)年间曾官大理司直。肃宗朝,授慈州刺史。芮挺章选其诗三首入《国秀集》。《全唐诗》存诗七首。事见《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国秀集》目录等。

(林长永)

【梁锺】排行七。为人倜傥不羁,半生落魄,至四十尚无禄位。尝从军,为掌书记,性率直介躁,好作色抗辞,因与军帅不和,乃拂衣而去。唐玄宗天宝(742—756)初尝官执戟,或亦曾为兵曹。锺与岑参、李颀、钱起友善。工诗,尤擅五律。其诗风调妍艳,负名于时。令狐楚选辑《元和御览诗》,锺有十首入选。唐玄宗晚年迁西内时,常咏诵其《咏木老人》诗以遣愁。《全唐诗》存诗十五首、断句二。事见李颀《别梁锺》、钱起《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国秀集》目录、《唐诗纪事》卷二九。

(吴企明 黄维华)

【张潮】一作张朝,误。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唐玄宗开元(713—741)时处士。潮工诗,殷璠汇次潮等十八人诗为《丹阳集》,称其诗“委曲怨切,颇多悲凉”(《吟窗杂录》卷二六《历代吟谱》)。其《长干行》一诗,后人或以为李白作,实误。《全唐诗》存诗五首。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之《包融诗》注、《唐诗纪事》卷二七等。

(林长永)

【崔曙】(?—739)曙一作署。原籍博陵(今河北安平),后居宋州(今河南商丘)。少孤贫,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进士及第,授河内尉。省试诗《明堂火珠》时人称为清拔,由是得名。与薛据为友,有《送薛据之宋州》诗。殷璠评云:“曙诗言辞款要,情兴悲凉,送别、登楼,俱堪下泪。”(《河岳英灵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著录其集一卷,久佚。今存诗十五首,见《全唐诗》卷一五五,《全唐诗逸》另有辑句。事见《国秀集》目录、《唐诗纪事》卷二〇、《唐才子传》

卷二。

(徐俊)

【张谓】字正言,排行十四,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玄宗天宝(742—756)初,在长安,结识李白。天宝二年(743),登进士第。天宝十三、十四载间赴西域,佐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肃宗乾元元年(758),以尚书郎出使夏口。代宗永泰(765—766)初,在淮南田神功幕中任军职。大历二、三年(767、768)间,任潭州刺史,与元结有交往。大历四年,卸任,人为太子左庶子。约在大历六年,迁礼部侍郎,历三年典贡举,世人称其“妙选时彦”。大历十年,又知东都试。大历十二年(777),怀素作《自叙帖》时,谓尚在长安,且与诸名士有交游。卒年无考。谓工诗,有诗名。殷璠《河岳英灵集》入选其诗六首,评曰:“谓《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对酒》,行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说耳,亦何必历遐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辛文房称其诗“格度严密,语致精深,多击节之音”(《唐才子传》)。《全唐诗》存诗一卷,但有他人诗作杂入。《全唐诗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二句,《全唐诗续拾》又补二句。《全唐文》存文八篇。事见常袞《授张谓礼部侍郎制》、《授张谓太子左庶子制》(《全唐文》卷四一一、四一二)、元结《别崔曼序》、《唐诗纪事》卷二五、《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

(吴企明 黄维华)

【苏涣】(?—755)排行大,蜀人。少年时往来剽盗,善放白弩,巴中号曰“白跖”。后折节读书。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登进士第,累迁至监察御史。大历四年(769),潭州刺史、湖南节度使崔瓘辟为从事。其年,杜甫漂泊至潭州,涣访之于江浦。大历五年夏,臧玠作乱,崔瓘被杀,苏涣南奔广州,依广帅李勉。大历八年,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广州反,苏涣为其谋主。大历十年十月,路嗣恭率军破广州,斩晃,涣于甘溪。杜甫与之交善,有赠苏涣诗二首,另有《入衡州》诗,亦及涣,称其“才力素壮,词句动人”,赞其诗“突过黄初诗”,“殷殷留金石声”(《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高仲武从他的上广帅李勉《变律格诗》九首中选出三首入《中兴间气集》,并评曰:“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一鳞半甲”。《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苏涣诗》一卷,今已佚。今存诗四首,载《全唐诗》卷二五五。生平见《中兴间气集》卷上、权德舆《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南充郡王赠太子太保伊公(慎)神道碑铭》、《新唐书·艺文志四》“苏涣诗”注、《唐诗纪事》卷二六。

(吴企明)

【李华】(715—766)字遐叔,排行三。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登进士

第。天宝二年(743),中博学宏词科。授南和尉,历秘书省校书郎、伊阙尉。天宝十一载(752),入朝任监察御史。改右补阙。安史之乱起,为叛军所俘,受伪职。乱定后,贬杭州司户参军。肃宗上元二年(761),授左补阙,加司封员外郎,以病不赴。代宗广德二年(764),入李岷幕,擢检校吏部员外郎。广德三年因病去官,隐居楚州。大历元年(766)卒。李华为唐代著名古文家,与萧颖士齐名,世称“萧、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华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后人辑有《李遐叔文集》四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为常州使君祭李员外文》、《唐诗纪事》卷二一等。

(林长永)

【岑参】(717—770?) 排行二十七。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郡望南阳(今属河南)。曾祖文本、伯祖长倩、伯父羲为唐太宗、高宗、武后、睿宗时宰相;祖景倩为麟台少监、卫州刺史、昭文馆学士;父植,仕至晋州刺史。参十岁左右丧父,家道衰落,苦读。玄宗天宝五载(746)登进士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应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辟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府掌书记。天宝十载,回长安,与杜甫、高适、储光羲等唱和游咏。天宝十三载,由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表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再赴北庭。肃宗至德元载(756),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旋东归。至德二载,以杜甫等五人荐举,入为右补阙。乾元(758—760)初至上元(760—761)间历起居舍人、虢州长史等职。代宗宝应元年(762),以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同年,以掌书记随雍王适赴陕州,讨史朝义。广德元年(763),入为祠部员外郎,改考功员外郎,转虞部、库部郎中。永泰元年(765),出为嘉州刺史,以蜀乱折回,大历元年(766),以职方郎中兼殿中侍御史,随剑南西川节度使杜渐鸿入蜀平乱。大历二年,出守嘉州。因称岑嘉州。约大历四年末或五年初卒于蜀。参博览史籍,尤工缀文,“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杜甫等《为补遗荐岑参状》)。杜确谓其“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岑嘉州诗集序》)。其诗风格超拔雄奇,善写城障塞堡及征行离别之情,以边塞诗名世,与高适并为盛唐边塞诗派之代表,世称“高岑”。其《白雪歌》、《走马川行》、《热海行》、《火山云歌送别》等篇什,特具奇致壮采。殷璠评其“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陆游称曰:“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零落才百篇,崔嵬多杰句。

工夫刻造化,音节配韶頀”(《夜读岑嘉州诗集》)。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谓其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激”。其放情山水之作,亦奇造幽致,杜确称其“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并谓“时议”比诸南朝诗人吴均、何逊(《岑嘉州诗集序》)。参擅长七言歌行,其写山水题材诗则多五言。其友人杜确曾为编集,“区分类聚,勒成八卷”(杜《序》)。《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均著录为十卷。今传通行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熊相刊本为七卷。《全唐诗》编为四卷。《全唐诗续拾》补二首。《全唐文》存文一篇,《文苑英华》收赋、文各一篇。事见其《感旧赋》、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唐诗纪事》卷二三、《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闻一多有《岑嘉州系年考证》。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附《岑参年谱》。(吴企明 黄维华)

【刘长卿】(714?—790?) 字文房,排行八。宣州(今属安徽)人。一说河间(今属河北)人,盖指郡望。早岁久寓长安。尝居嵩山读书,累举不第。唐玄宗天宝(742—756)中入国子监,被推为朋头(亦作棚头)。约天宝六载(747)后,登进士第。天宝十四载,任长洲尉。肃宗至德二载(757),陷狱,旋赦出。至德三载正月,摄海盐令。上元元年(760)春,又贬潘州南巴尉。代宗大历(766—779)初在京,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转运留后。约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至777),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780—783)初,迁随州刺史。德宗建中四年(783),李希烈叛据随州,遂去官,流寓江淮。约卒于贞元六年(790)前后。长卿以工诗见著于肃、代朝,与钱起、郎士元、李嘉祐并称。李白、元结、独孤及、李嘉祐、朱放、严维、皇甫冉、皇甫曾、皎然、梁肃等均与之交往。其诗长于近体。尤擅五律,自称“五言长城”。高仲武评其“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绿,松声小雪寒’,又‘沙鸥惊小吏,湖色上高枝’,又‘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裁长补短,盖丝之纆欤。其‘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中兴间气集》)。诗多身世之慨,亦涉及国计民怨,其咏物,游览之作颇有“兴在象外”、“馀味不尽之妙”(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八)。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等选本列其为中唐第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长卿集》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同。今存《刘随州文集》十一卷,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通行于世。《全唐诗》编其诗为五卷。《全唐诗逸》补二句,《补全唐诗》补一首。《全唐文》存文十二篇。事

见《极玄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辨》。(黄维华)

【张万顷】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登进士第。天宝六载(747),调河南府法曹参军。安史之乱起,依附安禄山,任伪河南尹。乱定后以能庇佑士民免附逆罪。授濮州刺史。肃宗乾元元年(759)迁广州都督、五府节度使。上元二年(761),贬龙标尉。卒年不详。万顷工诗,与钱起有交游。芮挺章《国秀集》选其诗二首。《全唐诗》存诗三首。事见《旧唐书·肃宗纪》、《新唐书·安禄山传》等。(林长永)

【张继】字懿孙,排行二十。襄州(今湖北襄阳)人,郡望南阳(今属河南)。早年尝游于齐鲁、京洛。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与皇甫曾等同登进士第。安史乱起,继避地江东与诗僧灵一为尘外交。时刘长卿任长洲尉,亦结为至交。肃宗至德(756—758)初,寓居会稽。代宗大历四、五年(769、770)间,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尝奉使行役武昌,与皇甫冉以诗相酬答。约在大历(766—779)末,与夫人“相次没于洪州”(刘长卿《哭张员外郎》自注)。继工诗,颇自矜气节。其《枫桥夜泊》一诗传诵至今。高仲武称“其于为文,不雕不饰”、“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并评其《送郾绍充河南租庸判官》诗中“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使者乘轺去,诸侯拥节迎”诸句“可谓事理双切”,“火燎原犹热,波摇海未平”二句则“比兴深矣”(《中兴间气集》)。辛文房评其“诗情爽激,多金玉音”(《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其诗一卷。今传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录有四十七首。《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凡四十七首,然其中混入皇甫冉、韩翃等人所作十馀首(详见周义敢《张继诗考辨》)。《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断句二。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有《张继考》。(黄维华)

【李嘉祐】字从一,排行二。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唐玄宗天宝七载(748),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擢殿中侍御史。肃宗至德(756—758)、乾元(758—760)间,贬鄱阳令,谪居四年后量移江阴令。上元二年(761)迁台州刺史。代宗宝应元年(762)离任,历游吴越。大历(766—779)初,人为司勋员外郎。大历六、七年(771、772)间,出刺袁州。约在大历后期卸职,寓居吴地。约卒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后数年间。嘉祐以擅诗,与钱起、郎士元、刘长卿齐名于肃、代间,李白、皎然、独孤及、钱起、刘长卿、严维等均与之有交酬。其诗多流离之慨,辞调凄怆,故高仲武评其“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

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也”(《中兴间气集》)。其诗亦有涉及国计民瘼者,如《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晚发咸阳寄同院补阙》、《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等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集一卷,《郡斋读书志》录为二卷。今存《李嘉祐集》(又称《台阁集》)二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全唐诗续拾》补三首。事见《极玄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二一、《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有《李嘉祐考》。(黄维华)

【刘方平】排行八,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族出匈奴。家世显贵,高祖政会为唐开国元勋,封邢国公;祖奇,武后时吏部侍郎;父微曾任吴郡太守、江南采访使。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应举长安,不第东归。尝入军幕,亦不得志,乃退隐颍阳大谷,终生未仕。美容仪,才茂异。工诗,与元德秀、李颀、皇甫冉等交善,常有唱酬。其诗多五言古调,善写闺怨,不乏清新可喜之作。令狐楚选编《御览诗》,列其诗于卷首。辛文房称其“多悠远之思,陶写性灵,默会风雅,故能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唐才子传》)。善画山水,颇为李勉所赏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方平诗》一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凡二十六首。《全唐诗续拾》补一首。事见《元和姓纂》卷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〇、《新唐书·艺文志》四《刘方平诗》附注、《唐诗纪事》卷二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刘方平的世系及交游考》。(黄维华)

【包何】字幼嗣,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父融。与弟佺皆以诗鸣,世号“二包”。或尝从孟浩然学诗。唐玄宗天宝七载(748)登进士第。代宗大历(766—779)中,仕至起居舍人。约卒于德宗建中(780—783)初。与钱起等颇有诗交。其诗多寄酬赠答之作。辛文房谓其“率多素辞”(《唐才子传》)。《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凡十九首。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钱起】(710?—780?)字仲文,行大。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玄宗天宝十载(751),登进士第(一说九载);授秘书省校书郎,尝奉使人蜀采箭竹,约肃宗乾元二年(759),任蓝田尉。时王维隐于终南,多有唱酬。约代宗宝应二年(763)后,入朝任职。代宗大历(766—779)中,历司勋员外郎、司封郎中。游于驸马郭暧之门,与卢纶等相唱和。官至考功郎中。约卒于德宗建中(780—783)年间。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负诗名于肃、代朝。与郎士元并称“钱、郎”,又与刘长卿、李嘉祐齐名。诗以献酬赠别之作为多。大历间公卿奉使出牧,无其诗祖饯,则为时论所鄙。

起兼擅各体,尤工律绝。多五言。省试诗《湘灵鼓瑟》为人称奇,或谓之“鬼谣”。《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纤丽秀朗,堪称王维辋川诸作之亚。高仲武称其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并列起为大历诗人之首,认为“右丞(王维)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曼,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中兴间气集》卷上)。纪昀评其诗“温亮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录为十卷。今存四部丛刊影印活字本《钱考功集》十卷,多有他人诗作混入,如《江行无题一百首》、《同程九早入中书》、《和王员外晴雪早朝》等诗,为其曾孙钱珣所作。《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全唐诗逸》补诗一首,《全唐诗补逸》补二首,《全唐诗续补遗》补一首,《全唐诗续拾》又补诗五首、句二。事见《极玄集》卷上、《旧唐书·钱徽传》、《新唐书·卢纶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吴企明有《钱起钱珣诗考辨》。(黄维华)

【郎士元】字君胄,排行四。定州(今河北定县)人。玄宗天宝十五载(756),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安史之乱中,避地江南。代宗宝应元年(762)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大历(766—779)年间入朝任拾遗,迁补阙。又转员外郎、郎中。德宗建中元年(780)冬,除郢州刺史。卒于任。士元工于诗,与钱起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嘉泰吴兴志》卷一六)。高仲武称“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钱,时论鄙之”(《中兴间气集》卷下)。与王季友、戴叔伦、卢纶、包佶等颇多酬唱。其诗“殊洗炼有味。虽自浓景,别有淡意”(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刘辰翁语)。诗名齐于“大历十才子”。江休复《嘉祐杂志》、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则列士元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郎士元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五首、断句六。事见《极玄集》卷上、《唐语林》卷六、《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三等。(林长永)

【孟云卿】(725或726—?) 排行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郡望平昌(今山东商河)。早孤,家贫。唐玄宗天宝(742—756)中,应举不第。遂归隐嵩阳。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曾会杜甫于长安,冬末,再会于湖城,皆有诗赠答。约于肃、代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代宗永泰二年(766),南下,欲依岭南节度使,元结等均作诗送之。大历二年(767),流寓荆州,与杜甫、薛据相过从。约于大历八年遇韦应物于广陵。卒年未详。云卿少元结六七岁,以词学相友,几

二十年。云卿负诗名,然一生漂泊,仕途失意,故情怀哀伤,辞调凄怆。擅五言古体,杜甫赞其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解闷十二首》论云卿诗)元结自谓“不如云卿”,称其“声名满天下”(《送孟校书往南海并序》)。高仲武称“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中兴间气集》)。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元结《篋中集》辑其诗五首,七人入选诗最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载其诗六首(为元结集中未收者)。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河南府志》卷一·五均著录《孟云卿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凡十七首。事见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并序》、《中兴间气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二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今人孙望《篋中集作者事辑》有孟云卿条。(吴企明 黄维华)

【刘湾】字灵源,西蜀(今四川成都)人,郡望彭城(今江苏徐州)。唐玄宗天宝(742—756)中,登进士第。安史乱中避居南方。代宗广德元年(763),遇元结等于鄂州,聚吟江畔。永泰元年(765),以侍御史入湖南观察使幕。时元结方解绶道州刺史,遂再逢于衡阳,日相游从,尝与诸文士月夜欢宴,赋诗咏怀。后任吏部员外郎。德宗建中(780—783)中迁职方郎中,终黜陟使。元结称湾等“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刘侍御月夜燕会并序》)。高仲武评其“性率多直,属文比事,尤得边塞之思”(《中兴间气集》卷下)。《中兴间气集》选录其诗四首。《全唐诗》存诗六首。事见《元和姓纂》卷五、《旧唐书·于頔传》、《唐诗纪事》卷二五。(吴企明 黄维华)

【皇甫冉】(717?—770?) 字茂政,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其先世安定(今甘肃泾川)著姓,四世祖敬德时始避地南徙。十岁能属文。年十五即以文词为张九龄所叹异,称其清颖秀拔,有江、徐之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登进士第,授无锡尉。又召入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肃宗乾元元年(758),罢任,营别业于阳羨山中。尝与御史中丞独孤峻游会稽云门寺。上元二年(761)后,刘长卿自岭外贬返江浙,冉以诗交。代宗广德二年(764),应河南节度使王缙辟为掌书记。大历二年(767),召为左拾遗,旋迁左补阙。大历四或五年,奉使江南,省亲丹阳而病卒。冉与刘长卿、严维、张继、樊晃、张南史、刘方平等交善,有唱和。“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犹今之声略,涵泳风骚,宪章颜、谢。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非师资所奖,每舞雩咏归,或金谷文会,曲水修禊,南浦怆别,新意秀句,辄加于常时一等,才钟于情故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

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高仲武评曰:“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并谓其《巫山峡》、《秋日东郊作》等诗“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中兴间气集》卷上)。冉卒后,其诗由其弟曾编次,独孤及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二首、断句一联;《全唐诗续拾》补二首。事见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新唐书》本传、《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黄维华)

【张南史】字季直,排行二。幽州(今北京)人。安史乱起,避地江左。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在苏州,依江东采访使李希言。尝居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与诗僧灵一等朗咏谈宴,交往颇密。后移居扬州。代宗大历四、五年(769、770)间,尝与皇甫冉夹江唱和;刘长卿任转运判官,亦尝暂驻,与相问酬。大历十一年前后,移宣城。约德宗建中(780—783)初由李纾荐引,朝廷再召,因病未赴。卒年无考,可能在贞元(785—805)初以前。南史初以棋艺闻名,后折节学文。高仲武赏其“已被秋风教忆脍,更闻寒雨劝飞觞”(《陆滕宅秋雨中探韵》)为“物理俱美,情致兼深”(《中兴间气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其中《酬张二仓曹扬子闲居见寄兼呈韩郎中左补阙皇甫冉》(题中后六字实无)一诗为皇甫冉作(见《全唐诗》卷二四九)。《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黄维华)

【贾至】(718—772)字幼幾,一作幼邻。排行六,洛阳(今属河南)人,郡望长乐(今河北冀县)。父曾,以文词著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擢明经第,释褐为校书郎,出任单父尉。天宝(742—756)末,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安史乱起,从玄宗入蜀。肃宗至德元年(756)八月,迁中书舍人;撰传位册文,随韦见素、房琯等奉使灵武宣诏。在肃宗朝,仍以中书舍人充册礼使制官。宰相房琯自请将兵复长安,选为判官。乾元元年(758),坐房琯党,贬为汝州刺史。乾元二年,再贬岳州司马。其间多所赋咏,后编为《巴陵诗集》。是年夏秋间,适李白从夜郎放回,以故交相遇,尝同泛洞庭湖。代宗宝应元年(762),召复中书舍人。宝应二年,迁尚书右丞。广德二年(764),转吏部侍郎。永泰元年(765),知东都举。大历(766—779)初,改兵部侍郎。大历五年(770),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历七年,以右散骑常侍卒,赠

礼部尚书,谥文。至诗文兼擅,与杜甫、严武、岑参、王维等均有唱和。杜甫称其“雄笔映千古”(《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独孤及对其岳州时所编《巴陵诗集》十分倾慕,以之与阮籍《咏怀》诗并提,((《贾员外处见中书贾舍人〈巴陵诗集〉览之怀旧代书寄赠》),并评其诗文曰:“综核微言,揭厉孔门。匪究枝叶,必探本根。高论拔俗,精义入神。誓将以儒,训齐斯民。文章陵夷,郑声夺伦。兄于其中,振三代风。复雕为朴,正始是崇。学者归仁,如川朝宗。六义炳焉,自兄中兴。大名全才,仪刑百工。”(《祭贾尚书文》)严羽《沧浪诗话》列其诗为“大名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集二十卷、《别集》十五卷,已佚。《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文》编其文为三卷,《唐文拾遗》又补一篇。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二二、《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贾至考》。(吴企明 黄维华)

【元结】(719—772)字次山,自称元子,先代本鲜卑族,原姓拓拔,世居太原(今属山西),父延祖移家汝州鲁山(今属河南)。少倜傥不羁,十七岁始折节读书,受学于宗兄德秀。唐玄宗天宝六载(747),下诏广求天下士,元结与杜甫等一批士子至长安应试,因李林甫忌贤,悉皆屏退。天宝十载,作《系乐府十二首并序》。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安史乱起,举族南奔,避难于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因自称猗玗子。肃宗乾元元年(758)又徙于瀼溪,自号浪生(《瀼溪铭序》)、浪士(据孙望《元次山年谱》按)。乾元二年,国子司业苏源明荐结于肃宗,遂应诏北上,九月,上《时议》三篇,拜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因讨史思明有功,迁监察御史里行。乾元三年,集其亲友沈千运、孟云卿、王季友等七人五言古诗凡二十四首,编为《篋中集》一卷,并作序。上元元年(760),进水部员外郎,佐荆南节度使吕諲。諲卒,尝摄领府事。代宗宝应元年(762),拜著作郎。旋辞去官职,退隐樊上,自号聱叟、漫叟。广德元年(763),出任道州刺史,州陷,于翌年赴任。因见憎于元载、第五琦,一年后罢职。时刘湾在衡阳,以侍御史佐湖南使府,结与湾等诸文士日相游咏,尝月夜欢宴,赋诗言怀。永泰二年(766),再领道州。大历二年(767)冬,合所撰凡二百零三首,成《文编》十卷,自为序。大历三年,转容州刺史,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四年拜左金吾卫将军、御史中丞,仍容管使如故,后以母丧离职。大历七年正月,召回,病卒长安。元结诗文俱擅,为中唐古文运动及新乐府运动之先驱。结于诗多所建树。其论诗,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指咏时物,会谐丝竹”,要求归于“风雅”、“雅正”(《篋中

集序》),“变时俗之淫靡”(《刘侍御月夜燕会并序》),使诗歌成为“可以下感于上,上化于下”的“尽欢怨之声”(《系乐府序》),以“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提倡重美刺、尚质朴。其诗多写实,诗风简淡古雅。在道州所作《春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颇受杜甫推崇,称“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春陵行》诗及《序》)。然以其过于排斥音律,清翁方纲谓其“朴质处过甚”(《石洲诗话》卷一)。其文亦多“救时劝俗”(《文编序》)之作,“奇古不蹈袭”(高似孙《子略》),自成一家。著作颇多。《新唐书·艺文志》子部著录《元子》十卷,《浪说》七篇、《漫说》七篇、《猗玗子》一卷,集部著录《文编》十卷、《篋中集》一卷。今存《文编》(即《元次山集》)十卷、《篋中集》一卷。《全唐诗》存其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三首又二句。《全唐文》存其文四卷。事见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二二、《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孙望有《元次山集》校订本,并著有《元次山年谱》。

(吴企明 黄维华)

【沈千运】排行四,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家贫,寓居汝北。唐玄宗天宝(742—756)前期,屡举不第,有“五十无寸禄”(《濮中言怀》)之慨。迁家濮上,与高适有交往。约天宝八载(749)前后,归汝坟旧居,高适为赋《还山吟》。士流敬其清高,号曰:“沈四逸人”、“沈四山人”,后张籍过其故居,亦称之“汝北君子宅”(《沈千运旧居》诗)。肃宗乾元(758—760)初,尝议备礼征致千运,辞未应。约卒于乾元三年(760)前,享年近六十。其为诗力矫时习,一出雅正,风格质朴,气韵高古。元结谓其“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篋中集序》),所编《篋中集》,列千运诗于其首。其诗多已散佚。《全唐诗》存诗五首。事见元结《篋中集序》、高适《赠别沈四逸士》、《唐诗纪事》卷二二、《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今人孙望《篋中集》作者事辑有沈千运条。

(吴企明 黄维华)

【王季友】排行七,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家贫。笃学,尝隐于滑州山中。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冬,以处士随华阴令王宥等同谒华岳祠,刻石题记。代宗宝应元年(762),为华阴尉。宝应二年正月,尝至渭南,与钱起等游于郎士元半日村别业。后为虢州刺史李勉所引重,移官虢州录事参军。未几,李勉入京为尹,复旧职。广德元年(763),转太子司议郎。广德二年,李勉出除江西观察使,聘佐其幕,任副使,兼监察御史。大历二年(767)还京,旋归山终隐。季友工诗,与杜甫、钱起、岑参、元结、郎士元等友善,为

时人所重,岑参谓“王生今才子,时辈咸所仰”(《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其诗多歌咏山林耕隐,殷璠评曰:“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并谓其《观于舍人西亭壁画山水》诗中“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见此山谓山晓,半壁仍栖岭上云,开帘放出湖中鸟”几句“甚有新意”(《河岳英灵集》)。辛文房称:“观其笥志山水,可谓远性风疏,逸情云上矣。”(《唐才子传》)元结《篋中集》选其诗二首,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其诗六首,《唐诗纪事》录其诗五首。《宋史·艺文志》著录《王季友诗》一卷。《全唐诗》收其诗凡十三首,其中杂有另一王季友之作。事见《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孙望《篋中集》作者事辑有王季友条。另有德宗朝王季友,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

(吴企明 黄维华)

【张志和】初名龟龄,后奉诏改志和,字子同,号烟波钓徒、玄真子、浪迹先生。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唐肃宗乾元(758—760)、上元(760—761)间游太学,举明经,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寻坐事贬南浦尉,遇赦还,丧亲,无复宦情。遂浪迹江湖,结茅隐居会稽东郭。代宗大历七年(772)颜真卿守湖州,志和与陆羽等尝为座上客。尝撰《渔歌子》词,真卿、陆羽等和之。后不知所终。志和性好山水,善丹青,其诗词旨趣高远。《渔歌子》(又称《渔父》、《渔父乐》、《渔父歌》)五首为早期文人词名作,首阙“西塞山前白鹭飞”尤为人所传诵,宪宗曾写真求访之。日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即穆宗长庆三年作《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开日本填词之先河。刘熙载称其词“风流千古”,以为东坡用其成句于《鹧鸪天》、《浣溪沙》,然“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艺概》)。《全唐诗》存其诗词九首。事见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四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黄维华)

【皎然】(720?—796后)字清昼。一说名昼,字皎然,后以字行,俗姓谢,为谢灵运十世孙。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早年杂学儒、墨,颇恃才自负,应举不第,遂漫游江湖荆湘,或曾至长安,亦尝干谒侯门。安史乱前,皈依佛氏。肃宗至德(756—758)至代宗宝应(762—763)间,居湖州。代宗广德元年(763)避袁晁乱于湖州东北之毗山,又迁毗陵,次年乱平后,西上至扬、楚一带。永泰元年(765)秋,由秣陵(今江苏南京)返湖州。大历二、三年(767、768)间,受戒于杭州灵隐山天竺寺守真法师。大历三年夏,返湖州,于苕溪营建草堂。大历四年,堂成,乃禅隐于是。其间时游扬、楚,与皇甫冉、顾况、陆羽、张志和等过从甚密。大历八年,颜真卿为湖州刺史,集三十馀文士编《韵海镜源》,皎然参预其事。是年秋,

与颜真卿等会于州西南杼山妙喜寺,颇多佳什,结集为《吴兴集》十卷。大历十三年,尝南游桐庐、剡溪。德宗建中三年(782)秋,曾与秦系同游江西吉州。兴元元年(784),在湖州识灵澈。时李端为杭州司马,以门人从皎然问法。贞元(785—805)初,居湖州东溪草堂,着手撰《诗式》。贞元四年至九年后,杨顼刺湖州、韦应物刺苏州,皎然均与之过往,有诗交。贞元八年,德宗令集贤院征其文集藏于秘阁,得诗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于顼为之编,并序。约卒于贞元十二年后数年间。皎然诗名著于当世,刘禹锡少时曾从其学诗,尝言:“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澈上人文集序》)于顼评其“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菁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极于缘情绮靡,故词多芳泽;师古典制,故律尚清壮。其或发明玄理,则深契真如,又不可得而思议也”(《吴兴昼上人文集序》)。所撰《诗式》论述诗歌法式,阐说意境,提示技巧,兼评历代诗作,统说禅理诗道,对司空图、严羽之论诗有一定影响。除《诗式》外,尚撰有《诗议》(《诗评》)。又撰有《儒释交游录》、《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茶诀》一篇,今已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皎然诗集》十卷、《诗式》五卷、《诗评》三卷。今存《皎然集》(一作《杼山集》)十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七卷,《全唐诗补逸》补联句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全唐文》编其文为二卷。事见唐释福琳《皎然传》、《宋高僧传》卷二九《唐湖州杼山皎然传》、《唐诗纪事》卷七三、《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另有名皎然者,为五代时闽僧。(黄维华)

【清江】(?—811?)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幼年出家。唐代宗大历(766—779)初,从杭州灵隐天竺寺僧人守真求法。后游历中原,归越州。又北游上都,寄寓严维处。德宗建中(780—783)末离京返越。晚年徙居襄州辨觉寺,卒。工诗,生前曾与卢纶、朱湾、耿纬、严维、刘言史等交游唱和。诗名齐于僧清昼(皎然),时称“会稽二清”。其诗多抒怀、酬赠之作。《全唐诗》存诗一卷。《宋高僧传》卷一五有传。事又见《唐才子传》卷三。(林长永)

【鲍防】(722—790) 字子慎,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作“河南洛阳人”,盖指其郡望。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登进士第,授太子正字。安史乱中避归襄阳,相继辞李璘、来瑱之辟,入李光弼幕。代宗广德元年(763),为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检校殿中侍御史、尚书员外郎。时江东文士多往依之。尝与谢良辅、严维、丘丹等同赋《忆长安十二咏》、《状江南十二咏》;与刘长卿、秦系等五十余人之联唱,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大历五年(770),入为职方员外郎,后或为韩滉所引擢。大历十一年,以太原少尹、河东节度行军司马权知留后。次年,改授太原尹,充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其有政声、诏图形别殿。大历十四年,入为京畿观察使。旋出刺福州,领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德宗建中元年(780),改刺洪州,领江西观察使。建中三年以左散骑常侍征还。建中四年,泾原兵乱,扈从德宗奔奉天。翌年返京,除礼部侍郎,封东海郡公。贞元元年(785),知贡举,所举皆良才,为世所美。贞元二年,迁京兆尹。贞元五年,以工部尚书致仕,退居洛阳。贞元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九。防工诗,有诗名。尝受知于诗人陶翰,又与谢良辅交善,时称“鲍、谢”。其天宝(742—756)中所赋《感遇》十七首,“以古之政法,刺讥时病,丽而有则,属诗者宗而诵之”(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白居易亦以之与陈子昂《感遇》二十首相并举(《与元九书》)。《宋史·艺文志》著录《鲍防集》五卷、《杂感诗》一卷,已佚。《全唐诗》存录其诗八首、联句三首。据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等辨,其中仅《忆长安》、《状江南》、《杂感》三诗确系防作。《全唐诗续拾》补联句三首、四言偈一首。《全唐文》存文两篇,《唐文拾遗》又补一篇。事见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四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皇甫曾】(?—785) 字孝常,排行十六。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其先世安定(今甘肃泾川)著姓,四世祖敬德时始避地南徙。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登进士第。代宗大历(766—779)初前后,在长安,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大历三年至六年(768—771)间坐事贬舒州司马。罢职后,以司封郎中居舒州。约大历七、八年离舒,沿江东下,逢戴叔伦于京口。大历九年春,尝游湖州,与皎然、颜真卿等联唱,结集为《吴兴集》十卷。大历后期,任阳翟令。卒于德宗贞元元年(785)。曾工诗,与兄冉齐名,时人因比以张载、张协。其诗多赠别、感怀之作。尤擅五言,其“寒生五湖道,春及万年枝”两句(《奉送杜侍御还京》),为时人称赏。高仲武称其诗“体制清洁,华不胜文”,“为士林所尚”(《中兴间气集》)。《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皇甫曾集》一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事见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极玄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二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韩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登进士第。肃宗宝应(762—763)初,检校金部员外郎。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中从事,代宗永泰元年(765),侯希逸为部下所逐,上翃所作谢罪表,奉诏赦还,翃亦随返,闲居长安达十年。

之久。许尧佐所撰《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皆记翊与歌姬柳氏离合事，有《寄柳氏》诗（亦视作词，即以首句“章台柳”为调名）。居长安期间，与卢纶、钱起、李端等交相唱和，游于驸马郭暖之门。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大历八、九年（773、774）间，为汴宋留后田神玉幕佐。大历十一年，神玉卒，汴州兵乱，李忠臣代镇汴州，翊仍在幕中。大历十四年，李忠臣为部将李希烈逐，旋诏李勉镇汴，翊复入其幕。德宗建中元年（780），其《寒食诗》为德宗所赏，批除驾部郎中、知制诰，官至中书舍人。约卒于贞元（785—805）中。韩翊久在军幕，所作多边塞、赠别、酬答之篇。高仲武评曰：“韩员外诗，匠意近于史，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多士之选也。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润，山舍荔枝繁’，又‘疏帘看雪捲，深户映花关’，方之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兴深于刘员外，筋节成于皇甫冉也。”（《中兴间气集》卷上）长于七绝，以《寒食》传诵最广，他如《江南曲》、《羽林骑》等篇，均词采清丽、情致深婉。王士禛云：“七言绝句，……大历、贞元间如李君虞、韩君平诸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带经堂诗话》）《新唐书·艺文志》及宋晁、陈二《志》均著录其集五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三卷。《全唐诗补逸》补二首。事见《新唐书·卢纶传》、《极玄集》卷下、《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傅璇琮有《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翊事迹考实》。（黄维华）

【柳氏】唐玄宗天宝（742—756）前后在世。据唐传奇《柳氏传》云：天宝中，寒士韩翊（当为韩翊，字君平，大历十才子之一）与豪富之李生相友善。李之美妾柳氏心慕韩翊，李遂其意，将柳适韩。后韩为淄青侯希逸所聘，柳独留都下。安史乱中，柳削发毁形，寄身法灵寺为尼。两京收复，韩使人潜寻柳氏，并赠之以诗。柳见韩诗甚感，乃作诗答之。不久柳为蕃将沙叱利劫去。虞侯许俊用计救出柳氏，韩、柳得以团聚。这一爱情故事盛传于当时，除见于《柳氏传》外，亦收入《太平广记》卷四八五；孟棨《本事诗·情感》亦载，情节略有差异。《全唐诗》收柳氏《答韩翊》诗一首。（陈祖美）

【刘商】字子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登进士第。唐代宗大历（766—779）初，任合肥县令。德宗贞元（785—805）年间，为汴州观察判官、检校虞部郎中。后以病免。入道东游，隐居宜兴山中。卒年不详。商性耽道术。曾师从张璪学画，工于山水树石。能诗，擅长歌行。武元衡称“著歌行等篇，皆思入窅冥，势含飞动。滋液琼瑰之朗润，浚发绮绣之浓华。触境成文，随文变象。是谓折繁音于孤韵，贯清济于

洪流者也”（《刘商郎中集序》）。其《胡笳十八拍》尤为著名，“儿童妇女，咸悉诵之”（《太平广记》卷四六引《续仙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商诗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事见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诗纪事》卷三二、《唐才子传》卷四等。

（林长永）

【于鹄】籍贯不详。德宗贞元（785—805）年间，佐荆南节度使樊泽幕。后归隐山中。鹄工于诗，与张籍友善。卒后，张籍有诗哭之，称“青山无逸人，忽觉大国贫。良玉沉幽泉，名为天下珍。……我初有章句，相合者唯君”（《哭于鹄》）。张作《诗人主客图》，列鹄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入室者。辛文房称其“有诗甚工，长短间作，时出度外，纵横放逸，而不陷于疏远，且多警策”（《唐才子传》卷四）。《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鹄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二。事见《唐诗纪事》卷二九、《唐才子传》卷四等。（林长永）

【司空曙】（720？—790？）字文初，一作文明，排行十四。广平（今河北永年）人，一说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安史乱中，避居江南。唐代宗永泰（765—766）至大历（766—779）初，返至长安，登进士第，授主簿，又任拾遗，与卢纶、钱起等相从咏和。德宗建中（780—783）初贬长林县丞。贞元四年（788），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检校水部郎中。终虞部郎中。曙性耿介，有奇才，工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以送别、赠答和旅思之作为多，或描摹幽寂，或直抒哀愁，颇有真朴之笔，胡震亨谓“婉雅闲淡，语近性情”（《唐音癸签》卷七）。长于五律，辛文房评其《闲园即事寄陈公》诗曰：“属调幽闲，终篇调畅，如新花笑日，不容熏染。”（《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集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事见《新唐书·卢纶传》附、《极玄集》卷上、《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司空曙考》。（黄维华）

【耿纬】亦作耿纬。排行十三，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登进士第，授盩厔尉。大历（766—779）初，入朝任左拾遗（一说右拾遗）。后充括图书使往江淮。德宗贞元（785—805）初，为大理司法，卒年不详。纬有诗名，与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翊、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并称“大历十才子”。又与颜真卿、秦系、戴叔伦等交游酬唱。辛文房称其“诗才俊爽，意思不群”（《唐才子传》卷四）。胡震亨评其诗“举体欲真。‘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浅言偏深世情”（《唐音癸签》卷七）。贺裳谓其“善传荒寂之景，写细碎之事”（《载酒园诗话·又

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耿伟诗集》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事见梁肃《送耿拾遗归朝廷序》、《新唐书·卢纶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等。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耿伟考》。

(林长永)

【崔峒】 排行八。郡望博陵安平(今河北定县)。登进士第。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曾官于常山。安史之乱时,避地江南。扬州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崔园荐其入朝,任左拾遗。曾至江东访图书。又为集贤院学士。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改补阙。曾贬潞州府功曹参军。“后终州刺史,或云终玄武令。《文艺传》云终右补阙”(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〇)。峒有诗名,与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耿伟、夏侯审、李端并称“大历十才子”。又与严维、戴叔伦有诗酬唱。高仲武称峒“文采炳然,意思方雅。如‘清磬渡山翠,闲云来竹房’,又‘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斯亦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中兴间气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峒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新唐书·卢纶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等。(林长永)

【李端】(?—785?) 字正己,排行二。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少喜神仙术,曾居嵩山学道。弱冠寓居庐山读书。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因病辞官。后起为杭州司马。端有诗名,与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并称“大历十才子”。又与柳中庸、张芬、僧皎然等交游唱和。其诗“辞情捷丽”(《旧唐书·卢简求传》)。乔亿称为“思致弥清,径陌迥别,品第在卢允言、司空文明之上”(《大历诗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端诗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四。事见《极玄集》卷上、《唐国史补》卷上、《旧唐书·李虞仲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等。(林长永)

【朱湾】 号沧洲子。高棅《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称其为西蜀(今四川)人。隐居多年。代宗大历(766—779)年间,受永平军节度使李勉辟,为从事,假摄池州刺史。李勉军溃,归隐越中,卒年不详。湾工诗,高仲武称其“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于咏物尤工。如‘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所谓哀而不伤,国风之深者也”(《中兴间气集》卷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朱湾诗集》四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中兴间气集》卷上、《新唐书·艺文志》四、《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四五、《唐才子传》卷三等。

(林长永)

【王缙秀】(724?—777) 郑(今陕西华县东)人,一说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女。她嫁元载时,因家贫被亲朋轻视,便劝元载游学,并陪其诣长安。元载上书朝廷,为唐肃宗赏识,历任肃宗、代宗两朝宰相。缙秀劝其清廉为政,他却与宦官李辅国等勾结,为官贪横,贿赂公行,奢侈荒淫,有田庄数十区。获罪被抄没家产时,仅胡椒竟藏八百石之多。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缙秀被配入宫掖,她慨叹道:“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为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乃被笞毙。事见《唐诗纪事》卷二九。《全唐诗》存诗三首。(陈祖美)

【刘太真】(725—792) 字仲适,宣州(今安徽宣城)人。少师事萧颖士。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登进士第。安史之乱起,避乱归乡。代宗广德二年(764),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大历(766—779)年间,历常熟令、浙东观察使陈少游掌书记、淮南节度判官等职。大历十四年(779),征拜起居郎,改司勋员外郎,转吏部员外郎,迁驾部郎中、知制诰。德宗建中四年(783),授中书舍人。转工部侍郎、刑部侍郎、礼部侍郎。贞元五年(789),贬信州刺史。贞元八年卒。太真善属文,“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旧唐书》本传)。贞元四年,德宗赐宴曲江亭,与群臣唱和,以太真等四人诗为上等。《全唐诗》存诗三首。《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唐诗纪事》卷二八等。(林长永)

【独孤及】(725—777) 字至之,排行十四,洛阳(今属河南)人。少敏悟,二十馀,以文章游于梁宋间。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举洞晓玄经科,解褐拜华阴尉。肃宗至德二载(757),避乱于越。乾元元年(758),至会稽。从季父峻方镇浙东,于乾元二年奏为剡县主簿。上元(760—761)初,为江淮都统李峒掌书记,加授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代宗宝应元年(762),任湖州武康令。永泰元年(765),入为左拾遗。永泰二年,迁太常博士,逾月,拜礼部员外郎,又改吏部员外郎。大历三年(768),出为濠州刺史。大历五年,改刺舒州。大历八年,迁常州刺史,大历九年三月到任。大历十二年四月卒于任,年五十三,谥宪。卒后,弟子梁肃集其所遗诗文三百篇,编为二十卷。及工诗,文名早著。与当世名士李白、高适、贾至、皇甫冉等交善。喜鉴拔后进;权德舆、梁肃、齐抗、崔元翰、朱巨川等皆师事之。诗多五言古体。格调高古,风致远逸。于诗推重沈佺期、宋之问、崔颢、王维等,尚“涵咏风骚,宪章颜、谢”,“天机独得”,“才钟于情”(《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其为文

亦“立言遣辞，有古风格”（权德舆《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谥议》），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毗陵集》二十卷。今传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影印清乾隆赵怀玉刻本。《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全唐诗补逸》补二首，《全唐诗续补遗》补一首，《全唐诗续拾》补一首。《全唐文》编其文为十卷，《唐文拾遗》又补一篇。事见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二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近人赵望秦有《独孤及年谱》。（黄维华）

【严武】（726—765）字季鹰，排行八。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之子。以荫调太原府参军。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应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为判官，累迁殿中侍御史。安史乱起，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肃宗至德元年（756），赴灵武，房琯荐为给事中。两京收复，授京兆少尹，又转河南尹。乾元元年（758），坐房琯事，贬巴州刺史。上元元年（760），迁绵州刺史，徙剑南东川节度使，改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代宗宝应元年（762），以兵部侍郎召入。广德元年（763），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是年夏，兼任吏部侍郎，寻转黄门侍郎。广德二年，再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以破吐蕃功检校吏部尚书。永泰元年（765）四月，卒于任所。武善诗，笔力雄健，基调苍劲。复镇剑南时善遇杜甫，与之交谊深笃，多所赠答。杜甫称其“落笔惊四座”（《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新诗句句好”（《奉赠严八阁老》）、“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诗多佚。《全唐诗》仅存其诗六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唐文拾遗》录其文二篇。事见两《唐书》本传、范摅《云溪友议》、《唐诗纪事》卷二。

（吴企明 黄维华）

【灵一】（727—762）俗姓吴，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家世富。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以九岁童子出家。十三岁削发，从扬州庆云寺僧法慎师学相部律，造微臻极。肃宗至德（756—758）间，在会稽若耶溪云门寺，与皇甫冉、刘长卿等有寄唱。又舍于会稽南山之南悬溜寺，与僧友隐空、虔印、静虚讨论佛经义谛。后移余杭宜丰寺。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圆寂于杭州龙兴寺，年仅三十六。工诗，禅诵之隙，辄赋诗歌，与张继、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严维、陆羽、朱放、张南史、独孤及等结为方外交，过从唱和甚密。其诗多为近体，无论写景、赠别，均以清新流畅为特色。独孤及称其“与太初元精合其纯粹”，又谓“潘、阮之遗韵，江、谢之缺文，公能缀之”

（《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高仲武评曰：“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相迭和，不其伟欤。”（《中兴间气集》）并选其诗四首入集。尝著有《法性论》。《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灵一集》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事见独孤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宋高僧传》卷一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严维】字正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早年尝隐居桐庐。唐玄宗天宝（742—756）中尝赴京应试，不第。肃宗至德二载（757），登进士第，授诸暨尉，时年四十馀。代宗广德元年至大历五年（763至770）在浙东节度使幕，检校金吾卫长史。与鲍防等作越中联唱，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大历十二年，入河南尹严郢幕，辟为县尉。大历十四年，随郢入朝为秘书郎。是年五月代宗崩，维赋有挽歌。约卒于其后数年间。维与岑参、刘长卿、皎然、韩翃、皇甫冉、李端、丘丹、耿伟、钱起等均有交往，负诗名于肃、代间。其诗多赠别酬唱之作，有“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酬刘员外见寄》）二句，为世传诵，梅尧臣称其“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六一诗话》引）。辛文房谓其“诗情雅重，挹魏晋之风，锻炼铿锵，庶少遗憾”（《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六及联句九首。《全唐文》存文一篇。事见《极玄集》卷下、《嘉泰会稽志》卷一四、《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四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寒山】姓氏年里均不详。因隐居台州始丰（今浙江天台）翠屏山，其地深邃寒冷，当暑有雪，故又名寒岩，自号寒山子。与台州国清寺僧丰干、拾得相善，时有过从。其生活年代，旧说为唐太宗贞观（627—649）间人，所据为闾丘胤《寒山子诗集序》，近人余嘉锡已证其伪（《四库提要辨证》卷二〇）。并考定寒山子应为玄宗先天（712—713）至代宗大历（766—779）、德宗贞元（785—805）间人。或以为虽难以否定寒山其人的存在，但其诗可能非一人之作，不能依其诗推定其生平。寒山诗多宣扬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亦杂有道家服食金丹之说，借对世态人情之讥讽，以扬善抑恶，诫谕世人。亦有写山林景色、隐逸情趣之作。诗风浅显明白，多村言俚语，诙谐机警。据其诗中自述共作诗六百首，今存三百馀首，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徐灵府始编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卷，今不传。《全唐诗》卷八〇六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二首。《宋高僧传》

卷一九、《景德传灯录》卷二七有传。(徐俊)

【拾得】与诗僧寒山、丰干同时,约于唐玄宗先天(712—713)至代宗大历(766—779)间在世。旧说为太宗贞观(627—649)间人,误。幼时被弃于赤城道旁,为台州国清寺僧丰干拾归抚养,遂以“拾得”为名。后为国清寺苦行僧。与寒山友善,二人交谈,听者多不能解。或传其为菩萨化身,时人尊为贤士。其诗多宣扬佛教思想,劝谕世人,亦有吟咏山林隐逸之作,诗风浅显,颇似偈语,与寒山相近,后世称为“寒山拾得诗”。其诗由僧道翘编为一卷,附收于《寒山子诗集》之末。《全唐诗》卷八〇七收其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二首。《宋高僧传》卷一九、《景德传灯录》卷二七有传。(徐俊)

【包佶】(727?—792)字幼正,排行七,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父融,兄何,俱有诗名。唐玄宗天宝六载(747),登进士第。安史乱中尝避地江南。约代宗初入刘晏幕,为盐铁转运使判官。后历官度支郎中,谏议大夫,知制造。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获罪诛,佶坐与载善,贬岭南。大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元载党人相次引用,佶起为江州刺史。德宗建中元年(780),兼权领转运盐铁使,检校御史中丞。建中二年,人为户部郎中,十一月,改充江淮水陆运使。建中三年,转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驻扬州。建中四年,朱泚乱中,扬州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陈少游,胁取佶所总赋税钱帛为己有,佶惧避江南,又转赴江、鄂等州。贞元元年(785)人为刑部侍郎,改拜国子祭酒。贞元二年,权领礼部贡举。约在贞元五、六年间迁秘书监,封丹阳郡公。贞元八年病卒。佶工诗,与兄何并称“二包”,又与李纾齐名。当世名士孟郊、皎然,权德舆、刘长卿、顾况、窦叔向等与之交酬甚密。其诗“雅韵拔俗,清机入冥。立言大旨,为经为纪。行中文质,不华不俚”(权德舆《祭秘书包监文》)。《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全唐诗补逸》补一首。《全唐文》存文二篇,《唐文拾遗》补三篇。事见权德舆《祭秘书包监文》、《新唐书·刘晏传》附传、《新唐书·元载传》、《唐诗纪事》卷四〇、《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顾况】(727?—816?)字通翁,号华阳山人。排行十二。祖籍润州丹阳(今属江苏)。后迁居苏州海盐(今属浙江)。初与张继、刘长卿交游酬唱,又曾借读道观十年。肃宗至德二载(757),登进士第。代宗大历(766—779)初至江西,从李泌、柳浑游。又于湖州与韩章、皎然联句。大历六年(771),任温州盐务协办、盐铁转运使。德宗建中二年(781),入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幕为判官。贞元三年

(787),柳浑、李泌先后入相,征况为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贞元五年(789),贬饶州司户参军,途经苏、杭、睦、信四州与四州刺史韦应物、房孺复、韦僂、刘太真有诗相唱和。贞元九年(793),经滁州返茅山受道箓。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卒。况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尤长于诗,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升堂者。皇甫湜称其“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严羽称“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沧浪诗话·诗评》)。贺裳则谓“顾况诗极有气骨,但七言长篇,粗硬中时杂鄙句,惜有高调而非雅音”(《载酒园诗话·又编》)。翁方纲更斥为“顾逋翁歌行,邪门外道,直不入格”(《石洲诗话》卷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顾况集》二十卷。有明刻本《华阳集》三卷。《全唐诗》存诗四卷。《旧唐书》卷三〇《李泌传》有其附传。事又见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云溪友议》卷一一、《北梦琐言》卷七、《唐诗纪事》卷二八、《唐才子传》卷三等。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

(林长永)

【戴叔伦】(732—789)诗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郡望谯国(今安徽亳州)。初师从萧颖士,以文学政事见称。登进士第。入刘晏盐铁转运使幕,为湖南、河南转运留后。自秘书正字三迁至监察御史。德宗建中元年(780),以监察御史里行出为东阳令。嗣曹王李皋辟入幕中。皋讨李希烈,留其领府事,试守抚州刺史,有政声。贞元元年(785),封谯县开国男,加金紫。贞元二年,辞官,离抚州。贞元四年,授容州(今广西容县)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世因称戴容州。贞元五年,上表请度为道士,卒。叔伦工于诗,认为“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图《与极浦书》引)。时天彝称“大历后,李纾、包佶有盛名,叔伦、士元从客其间,诗思逸发,于绮丽外仍有思致,非馀子所及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贺裳称其《女耕田行》“语直而气婉,悲感中仍带勉励,作劳中不废礼防,真有女士之风,裨益风化。张司业(籍)得其致,王司马(建)肖其语,白少傅(居易)时或得其意,此殆兼三子之长先鸣者也”(《载酒园诗话·又编》)。施补华以为其《三闾庙》“并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种悲凉感慨之气。五绝中此格最高”(《岷傭说诗》)。高仲武则谓“其骨稍软,故诗家少之”(《中兴间气集》卷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述稿》十卷。《崇文总目》著录《戴叔伦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

二。《新唐书》卷一四三有传。权德舆有《唐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铭》。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二九、《唐才子传》卷五等。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的真伪考辨》，蒋寅有《戴叔伦简谱》。(林长永)

【于良史】生卒年及籍贯皆不详。代宗大历(766—779)年间，官监察御史。德宗贞元(785—805)年间，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为从事。良史工于诗，高仲武称“侍御诗清雅，工于形似。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吟之未终，皎然在目”(《中兴间气集》卷上)。胡应麟则将“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列为“中唐句”之代表(《诗薮》)。清吴乔称其“《闲居》诗得情得景”(《围炉诗话》卷二)。《全唐诗》存诗七首。事见《中兴间气集》卷上、《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三等。(林长永)

【陈羽】(733?—?)卒年及字号均不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早年曾漫游于镜湖、若耶溪一带，与诗僧灵一交往，有唱和。德宗贞元四年(788)，在杭州，与戴叔伦游，戴刺容州，羽以诗咏别。贞元七年，由桂州起解赴京应试。贞元八年，与韩愈、李观等同科登进士第。旋赴西蜀，居于峨嵋一带。曾为东宫卫佐。羽工诗，其诗多览游写景之作，警句甚多。胡仔颇赏其《春日晴原野望》诗中“渐变池塘色，欲生杨柳烟”一联(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六《唐人杂录》上)。辛文房评曰：“写难状之景，了了目前；含不尽之意，皎皎言外。如《自遣》诗云：‘稚子新能编笋笠，山妻旧解补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当门白鸟飞。’此景何处无之？前后谁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画图，非造次之谓也。”(《唐才子传》)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瑰奇美丽主升堂者之一。《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其中杂有贾岛、郎士元诗。《全唐诗续拾》补三首。事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唐诗纪事》卷三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黄维华)

【韦应物】(737?—792?)排行十九。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出身望族，先世门第鼎盛，代居高位，父奁时已甚式微。少以三卫郎入事唐玄宗。任侠负气，放浪不检。及玄宗卒，失所恃，屡为人欺，遂悔愤折节读书，一度入太学。代宗广德元年(763)，为洛阳丞。永泰(765—766)初，因笞罚军骑而被讼弃职，闲居洛阳。大历九年(774)后，因黎幹之荐任京兆府功曹。大历十三年，转鄂县令。大历十四年，除栝阳令，称疾辞归，寓长安西郊沣水北岸善福寺。德宗建中二年(781)除尚书比部员外郎，建中四年，出为滁州刺史。兴元元年(784)末，罢任闲居于滁州西涧。贞元元年(785)夏秋间，移刺江州。贞元三年，入为左司郎中。贞元四年秋，出任苏州刺史。贞元六年，

罢职，寓苏州城外永定寺，世号曰韦苏州。与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等过往酬唱。兹后数年间卒。应物秉性高洁，为官多有惠政，其诗“忧民之意如元道州”(刘熙载《艺概·诗概》)，诸如《拟古诗十二首》、《杂体五首》及其乐府诗《夏冰歌》、《采玉行》等篇什，均表现出对豪门恶行的痛恨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现实性很强。白居易谓其“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与元九书》)。韦氏亦颇多山水田园诗，以往诗评家因多以陶、韦并称，或称王、孟、韦、柳。司空图谓“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与李生论诗书》)。应物好五古，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的体”(《与元九书》)，严羽称之为“韦应物体”(《沧浪诗话》)。其如“微风夜来过，不知春草生”(《幽居》)、“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东郊》)等句，简淡秀朗，用心别到，有灵运之气韵。宋濂认为“韦应物祖袭灵运，能一寄秣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答章秀才论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源出于陶而融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上入室者。韦应物交游甚广，其交游诗数量之多在唐诗人中较为突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应物诗集》十卷。《全唐诗》存诗十卷，《全唐诗补逸》及《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全唐文》存文一篇。事见王钦若《韦苏州集序》、沈作喆《韦应物外传》、姚宽《西溪丛语》、《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有孙望《韦应物事迹考略》、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供参阅。(黄维华)

【章八元】排行十八。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师从严维学诗。唐代宗大历六年(771)，登进士第。复应制举，不中。遂归乡。德宗贞元(785—805)年间，调句容主簿。卒年不详。八元有诗名，与韦应物、刘长卿、张继、僧清江皆有酬唱。高仲武称其诗“如‘雪晴山脊见，沙浅浪痕交’，此得江山之状貌矣”(《中兴间气集》卷上)。其《题慈恩寺塔》诗深受元稹、白居易称赏，称“不谓严维出此弟子”(《唐诗纪事》卷二六)。王士禛则斥此诗为“真鬼窟中作活计，殆奴仆台隶之不足矣”(《带经堂诗话》卷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章八元诗》一卷。《全唐诗》存诗六首。事见《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卷四等。

(林长永)

【秦系】(727?—806?)字公绪，自号东海钓客。排行十四，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4)前，尝赴京应试，不第，遂归隐耶溪。肃宗上元元年(760)前后，移地剡山。代宗大历五年(770)，相州四镇节度使薛嵩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参军，辞不就，作《献薛仆射》诗以谢。山居间与徐浩、

皇甫温、崔昭等相酬唱。约大历十二、十三年,与妻谢氏离异而获谤,乃出山,尝往访刘长卿、皎然于睦州、湖州。德宗建中元年(780),流寓泉州,结茅于南安九日山,研经著撰,弥年不出。建中三、四年间,重返浙东,归居会稽。其间尝游杭州、江州等地,与戴叔伦、韦应物等过从唱酬。贞元六、七年(790、791),徐泗节度使张建封辟为从事,检校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六年,建封卒,系南返。尝隐于茅山。曾复至泉州,与姜公辅相往还。贞元二十一年,公辅卒,系为营葬,时已年近八十。约卒于顺宗永贞(805)至宪宗元和(806—820)初。系工诗,与刘长卿唱酬颇多,有唱和诗集,权德舆为序。与韦应物、皎然、鲍防、戴叔伦、钱起、严维、苗发、朱放、耿伟等均为诗交。擅五言,多山居隐逸之作。刘长卿以“五言长城”自许,系“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韦应物赠诗云:“五言今日为君休。”(《答秦十四校书》)诗风清丽可喜,时人因立亭于其会稽旧里,名以“丽句”。皎然有诗云:“姓被名公题旧里,诗将丽句号新亭。”(《酬秦山人赠别》)戴叔伦亦有《题秦隐君丽句亭》诗,称其“诗名满世间”。贞元(785—805)中所编《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已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秦系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但有少量他人诗作属入;卷二五八录陈孙诗一首(《移耶溪旧居呈陈元初校书》),应为秦系诗(详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全唐诗续拾》补一首。今传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有《秦隐君集》。尝注《老子》,不传。事散见其交游诗、《新唐书》本传、刘克庄《跋秦系诗》、《唐诗纪事》卷二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黄维华)

【戎昱】(740?—801?) 荆南荆门(今属湖北)人。美风度,善言谈。唐肃宗乾元(758—760)年间,入浙西节度使颜真卿幕。代宗宝应元年(762),经滑州、洛阳赴长安。登进士第。大历元年(766),客游蜀地。大历二年,入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任从事。曾谒杜甫。后入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瓘幕,为其赏重。大历九年,入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巖幕。德宗建中三年(782),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建中四年,贬为辰州刺史。历吉州刺史,转虔州刺史。后为永州刺史,卒。昱工于诗,内容多为伤乱、述怀,风格多样。严羽评为“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沧浪诗话·诗评》)。时天彝《唐百家诗选评》亦称“戎昱稍为后辈,多军旅离别之思,造语益巧,用意益浅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其《咏史》诗深为宪宗称赏。陆时雍称“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然总贵不烦而至。

……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过因谗后重,思合死前酬’,此亦议论之佳者矣”(《诗镜·总论》)。贺裳谓其《苦哉行》“写暴兵之虐甚工”,《过商山作》“深肖山僻之景”,《古意》“宛然如见伍举辞荆、廉颇去赵,真使逋臣羁客闻之泣下”(《载酒园诗话·又编》)。《崇文总目》著录《戎昱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戎昱集》五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残诗一首、断句二。事见《本事诗·情感》、《云溪友议》卷上、《郡斋读书志》卷四、《唐诗纪事》卷二八、《唐才子传》卷三等。今人谭优学有《戎昱行年考》,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

(林长永)

【卢纶】(748—799?) 字允言,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人,郡望范阳(今河北涿县)。唐玄宗天宝(742—756)末,避乱江西鄱阳。代宗大历(766—779)初,数举进上不第。大历六年(771),宰相元载、王缙荐为阆乡尉,旋改河南密县令,迁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与钱起、耿伟等有诗酒文宴之游。大历十二年(777),元、王获罪,纶坐与缙善,去官。德宗建中元年(780),任昭阳令。朱泚乱中,奉天行营副元帅浑瑊镇河中,纶随为判官。乱平,累迁检校户部郎中。贞元十三、十四年(797、798)间,纶舅韦牟渠称其才于德宗,召入禁中,令和御制诗。约卒于贞元十五年。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工诗,号“大历十才子”,其诗才在众人之上。《旧唐书·卢简辞传》谓“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王士禛则称之为“大历十才子之冠冕”(《分甘馀话》卷四)。宪宗元和(806—820)中,令狐楚选《御览诗》,录纶诗达十分之一。宪宗诏求其诗,得三百十篇。文宗尤重纶诗,令悉索家笥,得诗五百篇。卢纶诗风雄劲明快,除游宴奉和之作外,其军旅及部分赠答诗作,颇多慷慨不平之气,以《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腊月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等为代表,有“盛唐之音”(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胡震亨评曰:“卢诗开朗,不作举止,陡发惊彩,焕尔触目。”(《唐音癸签》)纶作诗善写实,长于白描,“字字从肺肝中流露”(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七)、“人人意中所有,独能道出”(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卷一一)。徐用吾评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诗中“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一联云:“口头语,不难亦不易”(《唐诗选脉会通判林》引)。尤擅七律,数量虽不多,颇多名篇,其“用意深妙,全以神行”(屈复《唐诗成法》)者当首推《晚次鄂州》诗中“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一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诗集十卷。《全唐诗》编

其诗为五卷,《全唐诗续拾》又移正二句。事见《旧唐书·卢简辞传》附、《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刘幼棠有《卢纶诗集校注》。

(黄维华)

【**窦叔向**】(?—780?) 字遗直,排行十九。京兆金城(今陕西兴平)人,郡望扶风(今属陕西)。唐代宗大历(766—779)初,登进士第,尝为国子博士。大历四、五年间(769、770),任转运使判官,尝奉使江南,途出洪、抚等州。后迁江阴令。大历十二年,入为左拾遗。翌年,贞懿后卒,叔向进《挽歌》三首(今存二首)。大历十四年,贬为溧水令。约卒于德宗建中(780—783)初。叔向才富当世,“于大历初名能为诗文”(韩愈《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与皇甫冉、李嘉祐、张继、梁肃、包佶等友善。所撰《贞懿皇后挽歌》,一时传诸人口。褚藏言称其“善五言诗,名冠流辈”(《窦常传》)。洪迈读时所存抄之叔向遗诗六首,叹其“皆奇作”,且称赏其《挽歌》中“命妇羞蘋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诸句,亦为其诗之不传而“可惜”(见《容斋四笔》卷六《窦叔向诗不存》条)。辛文房评其“诗法谨严,又非常格”(《唐才子传》)。五子常、牟、群、庠、巩亦皆有诗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窦叔向集》七卷,已佚。《全唐诗》存诗九首及断句二。《全唐诗续补遗》补一首。事散见羊上谔《窦叔向碑》残文,褚藏言《窦常传》,《新唐书·艺文志》四,新、旧《唐书》《窦群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四。(黄维华)

【**韦渠牟**】(749—801) 又名尘外,号遗名子、北山子。排行二十四,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韦述之侄,卢纶之舅。十一岁即能诗,尝赋《铜雀台绝句》,李白见而称异,授以古乐府之学。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时已出家为道士。约在大历八年又出家为僧,法名尘外。尝游湖州,与颜真卿、皎然等八十餘文士联唱,后结集为《吴兴集》十卷。大历(766—779)末,还俗。德宗贞元(785—805)初,为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从事。贞元八年(792),召为四门博士。贞元十二年,奉诏预三教论衡,为德宗所赏,授秘书郎。寻献诗七十韵。旋迁右补阙内供奉,又拜左谏议大夫,历太府卿,终太常卿。卒于贞元十七年七月,谥忠,赠刑部尚书。渠牟工诗,又善书。于诗主张“辩以丽,丽以则,得于无间,合于天倪”,认为“会情性者,因于物象;穷比兴者,在于声律”(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君诗集序》引)。崇尚自然清丽之诗风,其《赠窦五判官》诗有“终须撰取新诗品,更比芙蓉出水花”句。权德舆称其诗“俚词比事,纤密清巧”,并谓其所作《天竺寺》及《卧疾》诗为“胜绝”、“卓

尔独立”(见权德舆《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渠牟诗集》十卷、《贞元新集开元后礼》二十卷,均佚。《全唐诗》存诗二十一首,又有联句一首收于尘外名下。《全唐诗续拾》补题一首。《全唐文》仅存文一篇。事见权德舆《唐故太常卿赠刑部尚书韦公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四八。

(黄维华)

【**李冶**】(?—784) 冶,一作裕;字季兰,以字行。乌程(今浙江吴兴)女道士。早年居于江峡,后长期寓居江东。聪悟才敏,六岁能诗。善弹琴,工格律,诗意放逸,时人目为“女中诗豪”。玄宗闻其诗才,于天宝(742—756)年间诏其赴阙,留宫中月馀,优赐归山。唐肃宗上元(760—761)、代宗宝应(762—763)间尝赴越州杜鸿渐幕府。时刘长卿由岭南贬还,与之游。曾与诸贤会于乌程开元寺。又往来剡中,与陆羽、皎然等有酬唱。代宗大历(766—779)、德宗建中(780—783)间在长安,陷朱泚之乱,尝献诗于泚,言多悖逆。乱平,于兴元元年(784)为德宗所杀。其诗以五言见长,多寄赠咏别,兴慨感怀之作。高仲武谓其“形气既雌,诗意亦荡。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馀”(《中兴间气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冶诗以五言擅场,如《寄校书七兄》诗。《送韩揆之江西》诗,《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诗,置之太历十才子中,不复可辨。其风格又远在涛上,未可以篇什之少弃之矣。”《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集一卷,已佚。后人辑以与薛涛诗合编为二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凡十六首、断句八。《补遗》中又补二首。事见《中兴间气集》卷下,《奉天录》卷一、《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玉堂闲话》、《唐诗纪事》卷七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黄维华)

【**畅当**】(?—805?) 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及第,后任弘文馆校书郎。德宗建中四年(783),入山南节度幕。历任河中参军、太常博士,后出为果州刺史。贞元十三年(797)后,罢郡,客游澧州。约于贞元(785—805)末卒。当能诗,与同时诗人卢纶、耿伟、司空曙、李端、韦应物等皆有交游唱和,后人称其诗“平淡多佳句”(《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畅当集》二卷,《全唐诗》卷二八七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一首。《新唐书》卷二〇〇、《唐才子传》卷四有传,另参《极玄集》卷上、《唐诗纪事》卷二七等。(徐俊)

【**刘言史**】(?—812?) 邯郸(今属河北)人。一说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曾历游金陵、潇湘、广州等地。唐德宗建中(780—783)、贞元(785—805)年间依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为其赏重。武俊表奏为请官

枣强令,不就,世因称刘枣强。后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幕,署司功掾。岁馀而卒。言史工诗,与孟郊善,有诗酬唱。其诗风近于李贺,孟郊目为“精异”(《哭刘言史》),皮日休则称其诗“美丽恢贍”,“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刘枣强碑》)。严羽列其为“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之一(《沧浪诗话·诗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歌诗》六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迹见皮日休《刘枣强碑》、《唐诗纪事》卷四六、《唐才子传》卷四等。

(林长永)

【**窦常**】(748?—825)字中行,排行大。京兆金城(今陕西兴平)人,郡望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登进士第。入盐铁转运府为吏。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为淮南节度参谋,授秘书省校书郎。后改盐铁转运从事。任湖南观察副使、都团练判官。宪宗元和六年(811),人为侍御史,转水部员外郎。次年,出为州刺史,历朗、夔、江、抚四州。穆宗长庆(821—824)年间,以国子祭酒致仕。敬宗宝历元年(825)卒。常工于诗,与弟牟、群、庠、巩齐名,有《窦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辛文房称“常兄弟五人,联芳比藻,词价霭然,法度风流,相距不远。且俱陈力王事,膺宠清流,岂怀玉迷津,区区之可比哉”(《唐才子传》卷四)。《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窦常集》十八卷、《南薰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十六首。《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七五之《窦群传》有其附传。事又见褚藏言《窦常传》、《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等。

(林长永)

【**朱放**】(?—788?)字长通,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郡望吴郡(今江苏苏州)。因避安史之乱,移居越州,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置有别业。唐德宗建中三年(784),江西节度使嗣曹王李皋辟为节度参谋。后征拜右拾遗,不就。卒于扬州。放工于诗,与严维、刘长卿、戴叔伦、皇甫冉、皇甫曾、僧皎然、僧灵一、李冶等人有诗酬唱。武元衡誉为“诗家第一流”(《夏日对雨寄朱放拾遗》)。顾况称其诗“能以烟霞风景,补缀藻绣,符于自然”(《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辛文房评为“风度清越,神情萧散,非寻常之比”(《唐才子传》卷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朱放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极玄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长孙佐辅**】朔方(今陕西靖边)人。举进士不第。唐德宗贞元(785—805)年间,依其弟吉州刺史长孙公辅。隐居而终。佐辅工于诗,张为《诗人主客

图》列其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入室者。范晞文称“七言仄韵尤难于五言。长孙佐辅有诗云:‘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松叶。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好事者或绘为图”(《对床夜语》卷四)。辛文房谓其“风流蕴藉,一代名儒。诗格词情,繁缛不杂,卓然有英迈之气”(《唐才子传》卷五)。《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长孙佐辅集》一卷,并云:“其诗号《古调集》。”《全唐诗》存诗二十首。事见《唐百家诗选》卷一一注、《唐诗纪事》卷四〇、《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李益**】(748—829)字君虞,排行十。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郡望陇西。唐代宗大历四年(769),登进士第。大历六年(771)中讽谏主文科,授郑县主簿。大历九年(774),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随军出塞。德宗建中二年(781),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幕,再次从军塞上。建中四年登书判拔萃科,授侍御史。贞元元年(785),入天德军杜希全幕。后历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宪宗元和三年(808),官都官郎中。拜中书舍人。出任河南少尹。元和七年,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后降太子右庶子。穆宗长庆元年(821),官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致仕。大和三年卒。李益诗名早著。王建称“天若不生君,谁复为文纲”(《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张为《诗人主客图》推为清奇雅正主。益自称“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李君虞诗集·从军诗并序》),故边塞诗成就甚高。李肇称好事者绘其“征人歌且行”(《送辽阳使还军》)为图障,又称其《夜上受降城闻笛》“天下亦唱为乐曲”(《唐国史补》卷下)。诗工近体,尤擅七绝,“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旧唐书》本传)。胡应麟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诗薮·内编》卷六)。毛先舒亦称其“《从军》、《北征》,便不减盛唐高手”(《诗辩坻》卷三)。王世贞更称“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艺苑卮言》)。陆时雍称其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荡耳”(《诗镜·总论》)。《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李益集》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等。今人卞孝萱有《李益年谱稿》。

(林长永)

【**雍裕之**】生卒年不详,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称

其为“贞元后人”。或言其为成都(今属四川)人,或言楚(今湖北、湖南)人,皆不可定。数举进士不第,飘零四方。有诗名,辛文房称其“为乐府极有情致”(《唐才子传》卷五),其乐府今仅存《自君之出矣》一首。今存诗中,绝句也多有可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雍裕之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百家诗选》卷六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唐诗纪事》卷五二、《唐才子传》卷五等。(林长永)

【灵澈】(749—816) 一作灵彻。俗姓汤,字源澄。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即出家。聪颖嗜学,从严维学诗。唐代宗大历(766—779)初,颇有声名。后赴吴兴,居于何山。与居于杼山之诗僧皎然游处唱和。德宗兴元元年(784),皎然致书荐其于当时文坛盟主包何、李纾门下。贞元(785—805)初,返会稽。后再入长安,名振京师。贞元末,被诬陷流徙汀州。宪宗元和三年(808)前后,遇赦归,居庐山东林寺。元和四年,归湖州。后赴宣州;元和十一年,终于开元寺。灵澈工于诗,与刘禹锡、许浑、吕温等人游,颇多酬赠。其诗众体皆备,权德舆评为“上人心冥空无,而寄迹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思虑终不可至。其变也,如风松相韵,冰玉相叩,层峰千仞,下有金碧”(《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其诗作甚富。身后,其门人秀峰编为《澈上人文集》十卷。又取生前与人酬唱诗作编为《酬唱集》十卷。还著有《律宗引源》二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及断句二。《宋高僧传》卷一五有传。事又见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唐才子传》卷三等。(林长永)

【窦牟】(749—822) 字贻周,排行二。平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郡望扶风(今陕西凤翔)。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东都留守巡官。历河阳、昭义从事。宪宗元和四年(809),再为留守巡官。元和五年,拜虞部郎中。转洛阳令。入为都官郎中。又出为泽州刺史。穆宗长庆二年(822)卒,官终国子司业。牟工于诗,与兄常,弟群、庠、巩齐名,有《窦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褚藏言称其“和粹积中,文华发外……时人以为有前古风韵”(《窦牟传》)。《全唐诗》存诗二十一首。《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七五之《窦群传》有其附传。事迹见韩愈《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褚藏言《窦牟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卷四等。(林长永)

【孟郊】(751—814) 字东野,排行十二。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郡望平昌(今山东安邱)。少隐嵩山,性介少合。屡试不第。唐德宗贞元(785—805)中识张籍、韩愈、李翱等。李翱尝荐之于徐州镇

帅张建封。贞元九年(793),游长安,与韩愈、李翱等作远游联句。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经四年,调溧阳尉。县南有投金滩,郊常骑驴径往,坐水旁苦吟终日,曹务因多弛废,县令乃白上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贞元二十年秋,奉母辞官归里。宪宗元和元年(806),李翱分司洛中,时郊客居洛阳,与翱日相谈宴,诗酒过从。是年冬,受河南尹、水陆转运使郑馀庆辟,为水陆运判官、试协律郎。元和四年春,母卒,解职居丧。元和九年三月,郑馀庆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邀郊入幕,任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八月,赴任途中暴卒于阆乡。友人张籍等私谥为“贞曜先生”。郊生性孤洁,不媚世随俗,韩愈谓其“维执不猗,维出不訾,维卒不绝,以昌其诗”(《贞曜先生墓志铭》)。胡震亨曰:“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唐音癸签》卷二六)郊后期宦途颠逆,气多不平,遂成险怪诗风,所作多愤世语。郊为诗刻意求新尚实,务去陈言,有韩文风调,故唐人谓“孟诗韩笔”。韩愈称“其为诗,刳目铄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馀”(《贞曜先生墓志铭》),又谓其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荐士》诗)。而胡震亨批评其用字之奇曰:“几成杜撰,总好奇过耳。”(《唐音癸签》卷二三)郊工古风,尤擅五言。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唐摭言》卷六)其代表作有《古怨别》、《织妇辞》、《游子吟》、《苦寒吟》、《秋怀》、《寒地百姓吟》等,颇能反映民间疾苦,体现其“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郊诗《读张碧集》)之诗路。但大都吟咏一己之苦穷,意境凄清,语多冷涩,故苏轼将其与贾岛并列,称为“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严羽谓其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又云:“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见《唐音癸签》卷七引)宋濂谓其“阴祖沈、谢,而流于蹇涩”(《答章秀才论诗书》)。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僻苦主”。《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集十卷。《全唐诗》编为十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文》录其文三篇。事见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三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五。今人华忱之有《孟东野诗集》校订本并附《孟郊年谱》。(黄维华)

【杨巨源】(755—?) 字景山,排行十二。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人。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登进士第。宪宗元和六年(811),以监察御史为河中节度从事。元和九年,节度使张弘靖入朝为相,巨源随为秘书郎。元和十三年,由太常博士拜虞部员外郎,旋出任凤翔少尹。穆宗长庆元年(821),除国子司业。长庆

四年,以年七十退归故里,宰相悦其才,奏以为河中少尹,食禄终身。约卒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前后。巨源工诗,吟咏不辍,竟老而头摇,人言吟诗多所致。常以能诗训后进,与白居易、元稹、张籍、刘禹锡等均有唱和。有《崔娘诗》一绝咏元稹风流韵事,为元采入《莺莺传》。巨源以律诗见长,尤善七言。司空图将其与刘禹锡并称,谓“各有胜会”(《与王驾评诗书》)。其“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赵璘《因话录》卷二)，“七言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王夫之《唐诗评选》)。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入室之一,元吴师道评其诗“清新明严,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吴礼部诗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逸》卷上收断句十一联,《全唐诗续拾》卷二五补诗三首、断句五。事见韩愈《送杨少尹序》、《唐诗纪事》卷三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黄维华)

【马逢】东川(今四川三台)人。郡望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登进士第。贞元二十年,官盩厔(周至)尉。转咸阳尉。宪宗元和六年(811),授试大理评事,充京兆观察支度使。后以殿中侍御史任荆南节度使严绶从事。卒年不详。逢多才工诗,刘禹锡称为“茂陵才子”。辛文房称其“曾从军出塞得诗名,篇篇警策”(《唐才子传》卷五)。元稹赞为“词锋倚天剑,学海驾云涛”、“旋吟《新乐府》,便续古《离骚》”(《送东川马逢侍御史四十韵》)。《全唐诗》存诗五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事见《唐会要》卷七八、《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武元衡】(758—815)字伯苍,缙氏(今河南洛阳东南)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登进士第。累辟使府,迁监察御史。又历华原令、比部员外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事。同年十月,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召还,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年,因力主用兵削藩,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遣刺客杀害。追赠司徒,谥忠愍。“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之管弦”(《旧唐书》本传)。张为《诗人主客图》推其为瑰奇美丽主。时天彝《唐百家诗选评》称“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将相之重,声盖一时,其诗宏阔毅远,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翁方纲目其为“中唐之刘越石(琨)”(《石洲诗话》卷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元衡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二联,《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旧唐书》卷一五八、《新唐书》卷一五二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三三、《唐才子传》

卷四等。

(林长永)

【窦群】(760或765—814)字丹列,排行三。京兆金城(今陕西兴平)人。郡望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初隐毗陵。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因京兆尹韦夏卿之荐,征拜左拾遗。贞元二十年,改侍御史。宪宗即位,改膳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出为唐州刺史,又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不久,征拜吏部郎中。宪宗元和三年(808),迁御史中丞。以构陷宰相李吉甫,出为湖南观察使,未至,改黔中观察使。元和六年贬开州刺史。元和八年除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元和九年,奉诏还朝,卒于道。《旧唐书》本传及褚藏言《窦群传》均谓享年五十,《新唐书》本传谓其终年五十五。群工于诗,与兄常、牟,弟庠、巩齐名。有《窦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其《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全唐诗》存诗二十三首。《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七五有传。事又见褚藏言《窦群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卷四等。

(林长永)

【杨衡】(761?—?)字中师。《全唐诗》小传作仲师,误。凤翔陈仓(今陕西宝鸡)人。郡望弘农(今河南灵宝)。早随父宦游蜀地。曾隐于青城山。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与苻载、李象、王简言偕隐庐山,号“山中四友”。贞元五年(789),登进士第。贞元七年,随桂管观察使齐映至桂州。后入岭南节度使薛瑒幕。贞元十六年,官郴州仓曹参军。卒年不详。辛文房称“衡诗工,苦于声韵奇拔,非常格敢窥其涯涘”(《唐才子传》卷五)。范晞文称其《卢十五竹亭送侄偁归山》诗“语意清脱,略无尘土纷华之气”(《对床夜语》)。毛先舒称“杨衡《白纈》,唐乐府之佳绝者”(《诗辨坻》卷三)。《宋史·艺文志》著录《杨衡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三句。事见苻载《犀浦县令杨鸥墓志铭》、《唐摭言》卷二、《唐诗纪事》卷五一、《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柳中庸】名淡,以字行。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为柳宗元父之族兄弟。与其兄并、弟中行皆有文名。唐玄宗天宝(742—756)中,萧颖士爱其才,以女妻之。安史乱中,曾避地江南,与颜真卿、皎然等酬唱,结为《吴兴集》十卷。又与李端、陆羽为友。后往洪州,授户曹参军,不就,早亡。《全唐诗》存诗十三首。其事散见于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元和姓纂》卷七、《因话录》卷三、《新唐书·萧颖士传》附《柳并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及《唐才子传校笺》卷四。

(杨旭辉)

【权德舆】(761—818)字载之,排行三。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徙居润州丹阳(今属江苏)。唐

德宗建中元年(780),淮南黜陟使韩洄辟为从事。历杜佑、包佶、李兼从事。贞元八年(792),征拜太常博士。转左补阙。迁起居舍人,兼知制诰,转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职如旧。贞元十五年,进中书舍人。历礼部、户部、吏部、兵部侍郎。宪宗元和五年(810),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历礼部尚书、东都留守、刑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等职。元和十三年,卒于山南西道节度使任。赠左仆射,谥文。德輿工文善诗,其文“雅正赡缛”(《新唐书》本传)。严羽称其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沧浪诗话·诗评》)。徐献忠《唐诗品》称“贞元后,近体既繁,古声渐杳。权相诗先气格而后词藻,然风候既至,藻亦自丰。其在开元名手,亦堂奥之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著述甚富,多已不传。《全唐诗》存诗十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九首及断句三联,《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旧唐书》卷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六五有传。事迹又见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唐诗纪事》卷三二、《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羊士谔】(762?—822?)字谏卿,排行二十七。洛阳(今属河南)人。郡望太山(今山东泰安)。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登进士第。授义兴县尉。入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幕为左威卫兵曹参军。又为宣歙观察使崔衍巡官。顺宗朝因与王叔文等交恶贬宁化县尉。迁大理评事。宪宗元和元年(806),宰相李吉甫荐为监察御史。窦群奏为侍御史。后出为资州、巴州、洋州、睦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召为户部郎中。卒。士谔工于文,孟简称其“受气端劲,为文雅拔”(《建南镇碣记》)。又善诗,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入室者。辛文房评其诗为“造妙良选,作皆典重”(《唐才子传》卷五)。徐献忠《唐诗品》称“羊士谔风格不落卑调,然例之能品,亦萧然微尔”(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贺裳称其诗“虽不甚佳,却求一字之恶不可得”(《载酒园诗话·又编》)。《郡斋读书志》著录《羊士谔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王涯】(765?—835)字广津,排行二十。郡望太原(今属山西)。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中博学宏词科。授蓝田尉。贞元二十年,充翰林学士。历右拾遗、起居舍人、虢州司马、袁州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宪宗元和七年(812),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元和十一年,充翰林承旨学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后历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山南西川节度使等职。文宗大和三年(829),入任太常卿。大和四年,为吏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

运使。旋守尚书右仆射,进封代郡公。大和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大和九年,死于“甘露之变”。涯博学能文,为梁肃知赏。亦工于诗,其诗“风韵道然,殊超意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涯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书续拾》补诗一首。《旧唐书》卷一六九、《新唐书》卷一七九有传。事又见《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欧阳詹】(757?—802?)字行周,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受知于福州观察使常袞。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官终四门助教。与韩愈、李观、孟简等人相善。韩愈称“其志在古文”、“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欧阳生哀辞》)。亦工于诗,葛立方称其诗“皆赋情不薄”(《韵语阳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欧阳詹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见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并序》、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所引《闽川名士传》、《唐诗纪事》卷三五等。

(林长永)

【裴度】(765—839)字中立,排行十六。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登进士第。贞元八年,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年,复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授河阳尉。迁监察御史。宪宗元和二年(807),西川节度使武元衡表为掌书记。入朝历起居舍人、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礼部侍郎等职。元和十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督师讨平淮西吴元济叛乱,封晋国公,世因称裴晋公。元和十四年,出为河东节度使。穆宗长庆二年(822)、敬宗宝历二年(826),又两度拜相。文宗大和八年(834),官中书令,世因称裴令公。晚居洛阳,建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诗酒酬唱。度与当时文士诗人交往颇厚,能多行赈济之事,时人传为佳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仪》二卷、与刘禹锡唱和诗《汝洛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三三等。

(林长永)

【窦庠】(766?—828?)字胄卿,排行五。京兆金城(今陕西兴平)人。郡望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初任商州从事。鄂岳观察、武昌军节度使韩皋辟为节度副使。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皋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使,庠随往。又随至京师。除泽州刺史。后入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幕。又历登州刺史、奉天令、汝州防御判官等职。敬宗宝历元年(825),任信州刺史。文宗大和元年(827),转婺州刺史,卒。庠工于诗,与兄常、牟、群,弟玘齐名。有《窦

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褚藏言称“公天授倜傥,气在物表,一言而合,期于岁寒。为五言诗,颇得其妙”(《宴庠传》)。《全唐诗》存诗二十一首。《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七五《宴群传》有其附传。事又见褚藏言《宴庠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卷四等。(林长永)

【张籍】(766?—830)字文昌,排行十八,吴郡苏州(今属江苏)人。后迁居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因孟郊之荐至汴州谒韩愈,为其称许。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返和州,居丧。宪宗元和元年(806),官太常寺太祝。元和十一年,为国子监助教。元和十五年,迁秘书郎。穆宗长庆元年(821)韩愈荐其为国子博士。又任水部员外郎,人因称“张水部”。长庆四年,擢为主客郎中。文宗大和二年(828),任国子司业,人因称“张司业”。约于大和四年卒于任。籍工于诗,与韩愈相友善。又与裴度、王建、白居易、令狐楚、刘禹锡、贾岛等游处酬唱。其诗“思深而语精”(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钟惺评为“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思绪清密,读之无深苦之迹,在中唐最为蕴藉”(《唐诗归》卷三〇)。辛文房称其“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建)自成机轴,绝世独立”(《唐才子传》卷五)。张洎云:“公为古风最善。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唯公一人。”(《张司业集序》)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人称“张、王乐府”。毛先舒谓:“王促薄而调急,张风流而清永,张为胜矣”(《诗辨坻》卷三)。白居易称其“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云:“苏州司业诗名者,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五律“亦平淡可爱”(刘攽《中山诗话》),杨慎称晚唐朱庆馀、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俱学张籍五律(《升庵诗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诗集》七卷、《论语注辨》二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张籍集》三卷、《木铎集》十二卷、《张司业集》八卷、附录一卷。《全唐诗》存诗五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三四、《唐才子传》卷五等。今人卞孝萱著有《张籍简谱》。(林长永)

【王建】(766—830以后)字仲初,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长于关中,出身寒微,终身未能进士及第。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前后,出关往山东求学,与张籍同窗,遂结为好友。张有诗云“鹄山漳水每追随”(《逢王建有赠》),可知张、王就学之处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后在山东军幕为散吏。贞元四、五年(788、789)至贞元十四、十五年(798、799),隐居山中修道

炼丹求仙,曾从军塞上,入幽州刘济幕,离开刘济幕即远赴岭南节度使幕府任职,一度留寓荆州。宪宗元和八年(813),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宾正,后迁家关辅,居于杜陵,寻以田弘正、裴度之荐为昭应县丞。元和十二年前后,入朝为太府寺丞、太常丞及秘书丞。穆宗长庆二年(822),官秘书丞。文宗大和二年(828),出为陕州司马,数年后解职,归居于咸阳原上。王建与张籍齐名,皆工乐府,号称“张、王乐府”。其作品形式风格亦相类,皆参用古题、新题,两者皆能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生活的苦难。新题如《水夫谣》写被官军抓差的纤夫之痛苦,《田家行》反映农民遭受的种种苦难;《织锦曲》、《当窗织》描写身为“织锦户”妇女劳作的繁重与所遭受压榨之残酷。至于旧题如《从军行》、《关山月》、《陇头水》写战争的残酷与征人士卒所作的牺牲;《乌栖曲》写宫女的孤寂与痛苦,均能由表入里,形象生动。可见王氏乐府以即事名篇之作为主,所用旧题,亦寓新意,如沈德潜所云:“张、王乐府,有新声而少古意,王渔洋所谓‘不曾辛苦学妃稀’也。然心思之巧,辞句之隽,最易启人聪颖。”(《唐诗别裁》)王氏乐府多为七言歌行,篇幅较短,多不换韵,给读者以急管繁弦之感。诗中很少议论,多用形象说话,结尾多警句,颇具感染力。王氏《宫词》百首亦颇有名,此组诗以镂金错彩之词写宫中生活,建首创此体制,后世多有模仿者。王诗中还有大量描写“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苦况”之作品,这些“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王诗颇能寓精警凝练于平易浅显之中,故王安石评其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氏有诗集十卷。其传记资料见《唐诗纪事》卷四四、《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今人谭优学有《王建行年考》。(王学泰)

【牟融】生卒年字里均不详,约唐顺宗永贞(805)前后在世。与欧阳詹、韩翃、张籍、杨处厚、朱庆馀等有诗交。融长年飘泊,流居江汉,淡泊处世,终身不仕,自称“白丁”、“道人”(见《题朱庆馀闲居四首》)。其诗多赠答游览之作,常有穷途潦倒之慨,亦有寻迹林丘、寄意物外之咏。诗风闲淡,用语平直而奇,颇有佳句,如“满把新蔬和雨绿,半林残叶带霜红”(《送报本寺分韵得通字》)等。有诗名,长于七律。《全唐诗》存诗一卷。生平行迹略据其诗。(黄维华)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号“白云孺子”。排行四。祖籍敦煌(今属甘肃),家居太原(今属山西)。唐德宗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授宏文馆校书郎。历桂州、太原四府从事。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迁监察御史,拜右拾遗。历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充翰

林学士。又转职方郎中,充承旨学士。迁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徙河阳节度使。元和十四年(819),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历宣歙观察使、衡州刺史、郢州刺史、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陕虢观察使、河东节度使、吏部尚书等职。文宗大和九年(835),为太常卿,守尚书左仆射,进封彭阳郡开国公。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于任。册赠司空,谥文。楚工文善诗,曾掌制多年。元时天彝称“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将相之重,声盖一时,其诗宏毅阔远,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旧唐书》卷一七二,《新唐书》卷一六六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韩愈】(768—825) 字退之,排行十八。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因称“韩昌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三试博学宏词不中,又三诣光范门上书宰相,皆不得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表为观察推官。晋卒,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为推官。调授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拜监察御史。因上疏论关中旱饥,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遇赦,为湖南观察使杨凭所抑,量移江陵法曹参军。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皆分司东都。元和五年,改为河南令。次年,赴长安任职方员外郎。复入国子监为太学博士。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又改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随淮西宣慰处置使裴度平淮西、蔡州,任行军司马。淮西平,以功授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上《谏迎佛骨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次年,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元年(821),官兵部侍郎。后转为吏部侍郎,世因称“韩吏部”。长庆三年,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任兵部侍郎,改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八月,以病免吏部侍郎。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文,世因称“韩文公”。韩愈是唐中期著名古文家,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领袖。他以复兴道统为己任,与柳宗元一道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偶文风。二人同为当时文坛盟主,人称“韩、柳”。古文家李翱、皇甫湜、诗人张籍皆出韩门。李翱称“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韩公行状》)。皇甫湜评为“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飏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轼更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其诗与孟郊齐名,人称“韩、孟”。赵璘谓“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因话录》卷三)。孟郊称“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

赠无本》)。其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于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愈以文为诗,对后世诗风影响极大。高棅称“其诗骋驾气势,崢嶸崛强,若掀雷抉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唐诗品汇》)。钟惺称其“诗文出一手,彼此犹不相袭,真持世特识也”(《唐诗归》卷三九)。五古、七古尤为人称道。延君寿谓“昌黎五古,语语生造,字字奇杰,最能医庸熟之病”(《老生常谈》),贺裳称“七言古最见笔力,中唐名家亦多缓弱,惟韩退之有项羽救钜鹿,呼声动天,诸侯莫敢仰视之概”(《载酒园诗话·又编》)。陈师道则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胡应麟更谓其言近体“神韵全乖,故纷拏叫噪之途开,蕴藉陶熔之义缺”(《诗薮·内编》)。叶燮论唐诗至韩愈为“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韩愈集》四十卷。有《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今人钱仲联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全唐诗》存诗十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十一首。《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事又见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李翱《韩公行状》、《唐诗纪事》卷三四、《唐才子传》卷五等。有年谱多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较为详备。

(林长永)

【张仲素】(769?—819) 字绘之,排行大。符离(今安徽宿县)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88),登进士第。复中博学宏词科。入徐州节度使张愔幕为从事。宪宗元和七年(812),由屯田员外郎迁考判官。改司勋员外郎。元和十一年,以礼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元和十三年,加司封郎中、知制诰。又充翰林承旨学士。元和十四年,迁中书舍人,卒。赠礼部侍郎。仲素工文善诗,其赋与李程、王起、白居易兄弟号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赵璘《因话录》)。任中书舍人时,集同官王涯、令狐楚三人的五、七言绝句合编为《三舍人集》。辛文房谓其诗“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有未能虑者”(《唐才子传》卷五)。胡应麟称其《秋闺曲》“去龙标不远”(《诗薮·内编》卷六)。《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词圃》十卷、《赋枢》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张仲素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唐诗纪事》卷四二、《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薛涛】(770?—832?) 字洪度,一作宏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随父官蜀。父卒,流落蜀地。唐德宗贞元(785—804)年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遂入乐籍。貌美,知音能诗,名闻蜀地。出入数任西川节度使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等幕府。韦皋曾拟奏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衔,未果,人仍号为“女校书”、“薛校书”。居于成都浣花溪。晚年脱乐籍,居碧鸡坊。涛工书艺,“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宣和书谱》卷一〇)。曾创制松花小笺,时称“薛涛笺”,流传一时。善诗,与韦皋、段文昌、王播、元稹等人颇多酬唱。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升堂者。其诗“颇多才情,跌宕而出闲婉,女中少有其比”(《历朝名媛诗词》),“工绝句,无雌声”(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钟惺称其“缥缈幽秀,绝句一派,为今所难”(《名媛诗归》)。《郡斋读书志》著录《锦江集》五集。《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残诗一首。事见《云溪友议》卷九、《唐诗纪事》卷二九、《唐才子传》卷六等。近人傅润华有《薛涛年谱》。(林长永)

【李涉】号清溪子。洛阳(今属河南)人。曾与弟李渤同隐庐山。被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辟为从事。入朝任太子通事舍人。唐宪宗元和六年(811),知阍使孔戣论其与中官结交,诏贬碭州司仓参军。谪夷陵宰。穆宗长庆元年(821),遇赦,还朝任职。后再谪夷陵。入朝为太学博士。敬宗宝历元年(825),坐事流康州。卒年不详。涉工诗,与崔膺、张祜、朱昼等人有诗往还。辛文房称其“词意卓犖,不群世俗。长篇叙事,如行云流水,无可牵制,才名一时钦动”(《唐才子传》卷五),贺裳谓“李绝句多佳”(《载酒园诗话·又编》)。诗名播于当时。曾于旅途遇盗,盗首慕名索诗,厚赠乃去。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入室者。严羽则目之为“大历以后,我所深取者”(《沧浪诗话·诗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涉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有杜牧、李渤等人诗混入,《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事见《云溪友议》卷下、《唐诗纪事》卷四六、《唐才子传》卷五等。(林长永)

【德诚】唐宪宗元和(806—820)、武宗会昌(841—846)间人。药山惟俨禅师法嗣。与云岩昙晟、道吾宗智为同道交。住秀州华亭,常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人因称“华亭和尚”、“船子和尚”。其诗以歌咏渔人生活为主要内容,而寓以禅宗妙理。有元刻本《机缘集》,又称《船子和尚拨棹歌》,录诗三十九首。句法类于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全唐诗续拾》存其诗四十首。《祖堂集》卷

五、《景德传灯录》卷一四、《五灯会元》卷五有传。

(林长永)

【卢仝】(?—835或813?) 济源(今属河南)人。以县北有泉名玉川,仝尝汲水烹茶,故自号玉川子(见《河南通志》卷六五《文苑》、卷五一《古迹》)。郡望范阳(今河北涿县)。初隐登封少室山。后移居洛阳,家贫如洗,惟积图书,终日苦读,足不出户。唐宪宗元和五年(810),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才德,辄过而赈之。尝作《月蚀》诗,愈亦效仿之。元和六年冬,变卖“旧业”,以资买宅定居洛阳里仁坊,因咏《冬行三首》。元和七年曾赴常州,孟郊为赋《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诗;闻韩愈坐事贬职,尝赋《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员外职方贬国子博士有感五首》诗以抒愤。其卒年,旧说因咏《月蚀》诗得罪宦官,于文宗大和九年(835)留宿宰相王淮家,而罹甘露之祸,与淮一并被害。闻一多《唐诗大系》即据此说。一说约卒于宪宗元和七、八年(812、813),年仅四十馀(详见姜光斗、顾启《卢仝罹甘露之祸说不可信》,《学林漫录》七集)。卢仝终生未仕,守贫苦读,精研《春秋》,勤于著述,尝自谓“三五图书旧揣摩,五千道德新规矩”(《杂兴》)。韩愈称其“《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寄卢仝》)。与韩愈、孟郊、马异等交酬甚密。其诗险怪,想象特异,语多奇僻,含散文句法,其“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韩愈《玉川子诗外集序》),因自成一家,严羽称为“卢仝体”,且谓“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沧浪诗话·诗评》)。以《月蚀》诗最为人所称道,其诗豪怪奇挺,洋洋千言,旨约义远,“莫可捉搦”(孙樵《与王霖书》),令韩愈深为叹服,曾仿效其作。宋人王观国则谓其“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学林》卷八)。王世贞更指其为“病热人呓语”(《艺苑卮言》)。又有《楼上女儿曲》、《听萧君姬人弹琴》、《小妇吟》等“妩媚艳冶”(《直斋书录解題》)之作,清畅晓白,极尽风致。刘克庄评曰:“玉川诗有古朴而奇怪者,有质俚而高深者,有僻涩而条畅者。”(《后村诗话》续集卷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玉川子集》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三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全唐文》存文四篇。事见《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三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五。

(黄维华)

【陆畅】字达夫。湖州(今属浙江)人。郡望吴郡(今江苏苏州)。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登进士第。登第前曾谒西川节度使陆贽,献《蜀道易》一诗美之,为贽厚待。贽卒,朝廷欲绳其兵器皆刻“定秦”之罪,畅上疏言其故,遂解之。初官太子率府参军,累迁为殿中侍御史。后为江西观察使王仲舒从事,以“终日

长吟,不亲公牍”去。文宗大和元年(827),任淮南节度使段文昌从事。官金部员外郎。大和九年(835),以诛郑注授凤翔行军司马。卒年不详。畅性好谑,以才思敏捷知名。其诗多为绝句,时有佳篇。胡震亨称“陆畅贵主催妆句,捷成得誉,观他绝,兼亦兴豪”(《唐音癸签》卷七引)。《宋史·艺文志》著录《陆畅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韩愈、《送陆畅归江南》诗、《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尚书故实》、《新唐书·韦皋传》、《新唐书·郑注传》、《唐诗纪事》卷三五等。(林长永)

【费冠卿】字子军,池州青阳(今属安徽)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以母丧而叹“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遂隐于池州九华山。穆宗长庆元年(821)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其孝节,召拜右拾遗,不应命。隐居以终。冠卿德行操守甚著,“屏迹丘园,峻节无双,清飏自远”(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〇)。其诗亦佳。胡震亨谓其长律《答萧建问九华山》“为兹山写状,碎金堪摘,馀可无讥”(《唐音癸签》卷七)。另如《枕流石》、《桂树藤》、《闲居纪事》等抒写隐居情趣,多有可观。身后李群玉、杜荀鹤等人有诗凭吊。《全唐诗》存诗十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唐摭言》卷八、《唐诗纪事》卷六〇等。

(林长永)

【鲍溶】字德源。自谓“楚客”(《秋思》、《吴中夜别》等),或为楚人。初隐江南山中。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与杨汝士、卢钧等同登进士第。怀才不遇,仕途失路,因慨叹“我生虽努力,荣途难自致”(《秋思》)。一生落魄,羁旅四方,客终三川。后许浑有《过鲍溶宅有感》诗(按刘得仁《哭鲍溶有感》、杜牧《过鲍溶宅有感》,均重出),有“重来身已亡”之憾。溶与韩愈、孟郊、李正封、殷尧藩等友善,与李益交谊尤深。其诗多羁怀旅思、登临怀古之作。长于古诗乐府。张荐谓其诗“气力宏赡,博识清度,雅正高古,众才无不备具”(据《郡斋读书志》卷四)。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博解宏拔主”。曾巩称其诗“清约谨严而违理者少”(据《郡斋读书志》卷四)。欧阳修亦深爱其诗,且以《山中寒思》一首为最佳(何汶《竹庄诗话》卷一引《诗史》)。辛文房称其《陇头水》等感怀之作“皆古今绝唱”,“古诗乐府,可称独步”(《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鲍溶集》五集。《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诗逸》补断句五联,《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

(黄维华)

【殷尧藩】排行二十三,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家贫,穷愁度日,应试十年未第。至宪宗元和九年(814),始与张又新、陈商等同登进士第,尝官协律

郎,刘禹锡贬刺连州,尧藩有诗送别。后参佐河中节度使赵宗儒幕。敬宗宝历(825—827)间,为福州从事(鲍溶有《寄福州殷尧藩》)。文宗大和二年(828)前后,为永安县令。是年秋冬,马戴、僧无可、雍陶、贾岛等诸文士同在长安,尝会宿姚合宅,皆有诗怀念之。大和七、八年间,以侍御史为湖南观察使李翱从事。大和八年底,罢长沙幕。时姚合方刺杭州,往依之。九年,为同州刺史刘禹锡从事,时已年过半百。尧藩性简淡,耽于林泽丘壑,工诗文。与刘禹锡、姚合、鲍溶、许浑、沈亚之等友善,有唱酬。尝作《忆江南诗》三十首,白居易有和诗,称:“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诗中多叙苏杭胜事。余尝典二郡,因继和之》)惜此三十首已佚。张为选其诗四题十六句入《诗人主客图》,且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下“及门”者之一。辛文房称其诗“皆铿锵蕴藉之作”(《唐才子传》)。胡震亨评其诗“有葩艳,微嫌肉丰。《鹳鹊楼》一律,独茂硕而婉,不媿初盛遗则”(《唐音癸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殷尧藩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逸》补断句二。事见《云溪友议》卷上、《唐摭言》卷八、《唐诗纪事》卷五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

(黄维华)

【沈亚之】(?—831?)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宪宗元和五年(815),赴京应试,落第,始与李贺结交。元和七年,又不第,将归里,李贺作歌送之。元和十年,与裴夷直、任畹等同科登进士第,以记室佐泾原节度使李彖幕。同年夏,李彖卒,遂去军幕,返里省亲。后人为秘书省正字。穆宗长庆(821—824)初,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栎阳尉。长庆四年(824),任福建等州团练副使。文宗大和(827—835)初,充海节度使李同捷反,诏以栢耆为德州行营诸军计会使,亚之以殿中侍御史为其判官。大和三年(829),李同捷穷蹙求降,栢耆不听亚之劝阻,擅杀之,诸将疾其邀功,争上表诋之,耆因罪贬,亚之亦坐贬虔州南康尉,张祜、殷尧藩等众多友人均有诗赠别。大和五年,量移郢州司户参军,卒。亚之尝学于韩愈之门,以文词名世,“工为情语,有窈窕之思”(《沈下贤文集序》),李贺称之为“吴兴才人”(《送沈亚之歌》)。其诗为当时诗坛名辈所器重。与李贺、杜牧、皇甫湜、徐凝等相唱和。杜牧、李商隐尝拟其诗,可见其声名之盛。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下“升堂”者之一。胡震亨评其“意尚新奇,风骨未就”(《唐音癸签》卷七)。所撰《送李膺秀才诗序》,提倡“贡讽合韵”之诗歌创作传统,兼论李贺诗之成就,见解独到。尤长于传奇小说,为中唐重要传奇作家。晚唐司空图尝感其《冯燕传》而

作《冯燕歌》，宋曾本又演为《水调七遍》。鲁迅对其极为推崇，评谓“皆以华艳之笔，叙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中国小说史略》）。又有史才，著述颇多。然多已散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沈亚之集》九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沈亚之集》八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沈下贤集》十二卷。今传十二卷本系《四部丛刊》景邱明繙宋本，即元祐阙名序本。《全唐诗》存诗二十四首，编为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断句二。《全唐文》编其文为五卷。事见《旧唐书·文宗纪》上、《唐诗纪事》卷五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裴夷直】字礼卿。吴（今江苏苏州）人（据《唐才子传》，亦见其《秦中卧病思归》诗：“病身归处吴江上，一寸心中万里愁。”），郡望河东（今山西永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与沈亚之、任畹等同登进士第。穆宗长庆元年（821），为吏部员外郎。文宗大和（827—835）中，任右拾遗。大和八年（834），与崔珣、刘蕡、赵哲等受宣州刺史王质辟为从事。开成（836—840）初，尝为李逢吉、令狐楚唱和集《断金集》作序。开成五年（840）前，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是年正月，武宗立，夷直以不署册牒，出为杭州刺史。武宗会昌元年（841），再贬驩州司户参军。宣宗大中（847—860）初，量移江州刺史。后入迁兵部郎中。大中十年（856），授苏州刺史。次年，徙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终散骑常侍。夷直以诗名，为“士林之望”（《因话录》卷三）。擅绝句。其诗以兴怀寄赠为主，辄感于物态，意多凄怨。与白居易、李逢吉、令狐楚等交深。《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裴夷直诗》一卷，今佚。《全唐诗》存诗一卷，其中《题断金集后》一首，系令狐楚诗混入者。《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文》存文一篇。事见《旧唐书·王质传》、《新唐书·张孝忠传》附、《唐诗纪事》卷五一、《乾道临安志》卷三、《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熊孺登】洪州钟陵（今江西南昌）人。宪宗元和（806—820）年间，登进士第。先官西川，任兴元节度使郑余庆从事。改官湘中，任湖南观察使韦贯之判官。后罢归钟陵。卒年不详。孺登有诗名，与元稹、白居易结识。白居易称“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与元九书》）。罢归钟陵时，则禹锡有诗相送。辛文房称其“凡下笔，言语妙天下”（《唐才子传》卷六）。《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熊孺登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三十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四三、《豫章书》（《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三四引）、《唐才子传》卷六等。（林长永）

【吕温】（772—811）字和叔，一字化光。排行八。

河东（今山西永济）人。郡望东平（今属山东）。居于洛阳（今属河南）。从陆质治《春秋》，从梁肃学文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贞元十九年，由德宗亲自擢为左拾遗，与王叔文、刘禹锡、韦执谊等相善。贞元二十年夏，随工部侍郎张荐出使吐蕃，为副使，被吐蕃拘系经年。顺宗永贞元年（805），返朝，擢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郎。宪宗元和三年（808），迁刑部侍郎、兼侍御史。以奏劾宰相李吉甫贬均州刺史。未至任，旋再贬道州刺史。元和五年，转衡州刺史。治州颇有政绩。元和六年，卒于任所。温工文，《旧唐书》本传称其“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能诗，严羽称“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沧浪诗话·诗评》）。《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著录《吕温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二卷。《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传。事又见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唐才子传》卷五等。（林长永）

【窦巩】（772—831）字友封，排行七。京兆金城（今陕西兴平）人。郡望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宪宗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元和五年，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袁滋辟为从事。元和六年，南行赴黔，于江陵遇元稹，相与酬唱。至黔中，旋北归。又入袁滋山南东道节度使幕，随滋历襄阳、江陵、唐州三镇。后入淄青节度使薛平幕为掌书记。改节度判官、副使。敬宗宝历元年（825），入朝除侍御史，转司勋员外郎，迁刑部郎中。文宗大和（827—835）中，入浙东观察使元稹幕为副使。又随稹移镇武昌。稹卒后，巩亦北归，途中患病，抵京师告终。巩性温雅，平居与人言不出口，时号为“啜菽翁”。工于诗，与兄常、牟、群、庠齐名。有《窦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褚藏言称其“温仁华茂，风韵峭逸，遇境必言诗，言之必破的，佳句不泯，传于人间”（《窦巩传》）。其诗当时目为“友封体”。白居易称赏其绝句。其五言诗也为时重。《宋史·艺文志》著录《窦巩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三十九首。《旧唐书》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一七五《窦群传》有其附传。事又见褚藏言《窦巩传》、《唐诗纪事》卷三一、《唐才子传》卷四等。（林长永）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排行二十八。洛阳（今属河南）人。郡望中山（今河北唐县），一说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出生于苏州嘉兴（今属浙江）。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又举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十六年，入杜佑幕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改扬州掌书记。调补渭南主簿。贞元十九年，入朝任监察御史。与王叔文、柳宗元、吕温、李景俭相善，积极参与革新

弊政,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革新失败,贬为连州刺史,在道,又贬朗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召回,再出为连、夔、和州刺史。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授主客、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后出为苏、汝、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因称“刘宾客”、“刘尚书”。武宗会昌二年(842),病卒于洛阳。禹锡诗文兼擅。“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晚与居易为诗友,号‘刘白’”(《郡斋读书志》卷四上)。于诗尤为精妙,“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序例》)。白居易称其“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胡震亨谓“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唐音癸签》卷七)。禹锡工七言绝句,如《金陵五题》及仿民歌的《竹枝词》等均为人所推重。黄庭坚云:“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昔子瞻(苏轼)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四十卷、《刘白唱和集》三卷、《汝洛集》一卷、《彭阳唱和集》三卷、《吴蜀集》一卷。《全唐诗》存诗十二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及断句五。《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有《子刘子自传》传世。事又见《唐才子传》卷五等。年谱多种,以今人卞孝萱《刘禹锡年谱》较为通行。(林长永)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排行二十二。下邳(今陕西渭南东北)人。郡望太原(今属山西)。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属河南)。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中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补盩厔尉。元和二年,充翰林学士。元和三年,除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十年因上疏急请捕捉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从太子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召为尚书司门员外郎。除主客郎中、知制诰。穆宗长庆元年(821),拜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出为杭州刺史,有惠政。尝置诗筒与元稹、钱徽、李绅等酬唱。长庆四年,召还,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敬宗宝历元年(825),出为苏州刺史。后以病免。文宗大和元年(827),征拜秘书监,迁刑部侍郎。又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等职。大和九年,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世因称“白傅”。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文。后人

因称“白文公”。居易为中唐大家,与元稹、刘禹锡交游甚厚,又多诗酒酬唱,时号为“元、白”、“刘、白”。诗、词、文兼擅,其《忆江南》词脍炙人口。姚铉称其为“文之雄杰者”(《唐文粹序》),其奏议被赞为“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旧唐书·元白传论赞》)。尤精于诗。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不仅创作了大量“惟歌生民病”的新题乐府诗,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纲领性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张为《诗人主客图》推誉其为“广大教化主”。他把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称“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餘首,谓之杂律诗”(《与元九书》)。后人对其诗的成就、地位评价纷纭。元稹称其“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白氏长庆集序》)。钱易将其与李白、李贺并论,称“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南部新书》卷丙)。然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则斥为“纤艳不逞”、“淫言蝶语”(《樊川文集》卷九)。司空图称“元、白气劬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一生著述甚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今人朱金城有《白居易集笺校》。《旧唐书》卷一〇六、《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李商隐有《白公墓碑铭并序》。年谱多种,以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较为通行。(林长永)

【李绅】(772—846) 字公垂,排行二十。常州(一作润州,误)无锡(今属江苏)人,郡望亳州(今安徽亳县)。曾祖敬玄为武后朝中书令,封赵国文宪公;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遂家无锡。绅为人短小精悍,白居易等友人谑称为“短李”。年幼丧父,从其母学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不乐其职,遂东归。元和二年,镇海节度使李锜辟为从事。是年九月,锜谋反,绅受囚七旬,锜败诛,乃得免。元和七年,为校书郎。元和十四年,应山南节度使崔从辟,为观察判官;五月除右拾遗。次年,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旋迁右补阙。穆宗长庆元年(821),加司勋员外郎、知制诰。长庆二年,迁中书舍人。长庆三年,改御史中丞。未几,改户部侍郎。长庆四年,敬宗立,受李逢吉等排斥,贬端州司马。敬宗宝历元年(825),量移江州长史。

文宗大和二年(828),迁滁州刺史,大和四年,改刺寿州。大和七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擢浙东观察使。大和九年,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元年(836),拜河南尹,迁宣武军节度使。开成三年,编成《追昔游诗》三卷。开成五年,代李德裕为淮南节度使。武宗会昌二年(842),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昌四年,罢相,复镇淮南。会昌六年卒于任所,赠太尉,谥文肃。绅善歌诗,乡赋之年,其诗即诵人口。初赴荐,尝以《古风》二首谒吕温,被目为“卿相”之材(范摅《云溪友议》)。元和(806—820)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时号“三俊”。尝撰《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称其“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元、白且先后仿效,写成《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新乐府》五十首。中唐诗坛之新乐府运动,实以绅为先导。其诗“多咏物之作”(元稹《和乐天东南行》自注),善“作歌以讽”(元稹《立部伎》题注)。其纪行诗《追昔游诗》写遍一生经历,“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言”,“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追昔游诗序》)。胡震亨谓其“大是宦梦难醒,然其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为恍然”(《唐音癸签》卷七)。《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追昔游诗》(按《直》作《追昔游编》)三卷,今存;又《崇文总目》著录《批答》一卷,已佚。《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三首、一句,《全唐诗续拾》又补六首、六句。《全唐文》存其文十二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各补收一篇。事见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沈亚之《李绅传》、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校笺》卷六。今人卞孝萱编有《李绅年谱》。

(黄维华)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排行八。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因称“柳河东”。幼居长安。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贞元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四年,授集贤殿正字。贞元十七年,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迁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等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等进行政治革新。柳宗元转任礼部员外郎,与刘禹锡同为革新集团骨干。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革新遭到失败。贬邵州刺史,未到任,加贬为永州司马。居永州十年,著述甚多。宪宗元和十年(815),奉诏回长安。旋又出为柳州刺史,人因称“柳柳州”。于民多有惠政。元和十四年卒于任所。百姓追慕,建罗池庙以纪念。宗元为中唐大家,“天才绝伦,文章卓伟,一时辈行,咸推仰之”(辛文房《唐才

子传》卷五)。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二人同为当时文坛领袖,号为“韩、柳”。其古文数量多,内容广,形式多样。韩愈推评甚高,称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柳子厚墓志铭》);并谓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纪》引)。亦工诗,与刘禹锡相善,酬唱甚多。人称“刘、柳”。其诗兼擅众体,内容深刻、风格多样。尤其遭贬后所作,内容多为忧民伤时、愤激刺世。司空图称“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题柳柳州集后序》)。苏轼以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二);又称“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蔡條谓“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蔡百衲诗评》)。其小诗“幻眇清妍,与元、刘并驰而争先”(陈知柔《休斋诗话》)。五言古诗上承陶渊明、谢灵运,“句雅淡而味深长”(杨万里《诚斋诗话》)。贺裳则谓“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载酒园诗话·又编》)。名作《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诗,传诵人口。《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柳宗元集》三十卷、《非国语》二卷、《注扬子法言》十三卷。今人吴文治等校点本《柳宗元集》四十五卷较为完备。《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事又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五等。年谱多种,以今人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较为通行。

(林长永)

【宋若昭】(?—825) 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枣强一带)人。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裔孙宋廷芬有五女:若莘(一作华,误)、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有文名。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俱被召入宫,预宫廷唱和,宫中呼为学士。若荀不久卒。若莘于贞元七年掌宫中文籍,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卒。五姊妹中若昭、若宪成就为最。若昭于若莘卒后代其掌宫中文奏,与妹若宪于穆宗时均拜为尚书,所历宪、穆、敬三朝,悉被尊称为先生。若昭进封梁国夫人。敬宗宝历元年(825)卒。同年,若宪代若昭掌宫中文籍。文宗尤重其文采。文宗大和九年(835)为郑注诬奏赐死。五人生平皆见新、旧《唐书》《宋若昭传》,

《唐诗纪事》卷七九。《全唐诗》存其诗一首。

(陈祖美)

【元稹】(779—831) 字微之,别字威明。排行九。郡望河南洛阳(今属河南)。生于西京万年县(今陕西西安)靖安坊。幼孤,聪警过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贞元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补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拜左拾遗。因言时政为执政所恶,出为河南尉。元和四年,拜监察御史,勇于弹劾权幸。后因与当权宦官抗争,贬江陵上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召为膳部员外郎。次年,因转而交结宦官崔潭峻,得其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旋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穆宗长庆元年(821),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历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等职。文宗大和四年(830),拜武昌军节度使。卒于任。赠尚书右仆射。稹工于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白居易称“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与李绅、白居易等一起创作新乐府,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后人论诗多将元、白二人并举。薛雪称“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一瓢诗话》)。贺裳谓“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莽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载酒园诗话·又编》)。司空图则贬二人“气勍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稹亦工书法,善为传奇。其楷书,《宣和书谱》卷二誉为“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其传奇《莺莺传》为《西厢记》取材,家喻户晓。有《类集》三百卷、《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二十八卷,《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三,《全唐诗续拾》补诗十首、断句五十一。《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七四有传。事又见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唐诗纪事》卷三七、《唐才子传》卷六等。年谱多种,以今人卞孝萱《元稹年谱》较为通行。(林长永)

【崔莺莺】约唐德宗至文宗(780—840)前后在世,字双文。据元稹《莺莺传》曰,德宗贞元(785—805)中,有张生游蒲,寓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郑将归长安,亦止兹寺。时值兵乱,崔氏惶骇不知所托。张生与蒲将之党有交谊,遂护之不及于难。崔氏感张生之恩,设宴款谢,并出其女莺莺与之相见。莺莺年方十七,颜色艳异,光彩照人。张生自是感之,乃

向崔婢红娘道其私衷。因红娘之助,崔、张遂私相结合。后张弃莺别娶,莺亦他适。宋人王铎据元稹诗中有《莺莺传》及《梦游春》、《会真诗》等,考其年事,以为张生即元稹托名叙其少年情事,莺莺亦实有其人。赵德麟《侯鲭录》卷五《辨正》以莺莺为永宁尉崔鹏女,与元稹为中表。稹与莺莺定情后,翌年赴长安应考。文战不利,乃攀附高门望族韦夏卿,与其幼女韦丛结婚。因元稹久别不至,莺莺亦另嫁他人。后元稹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不出,作《寄诗》、《告绝》二首绝之。元稹之于双文,虽有始乱终弃之愆,但对她的情爱却终生不变。其娶韦丛系出于仕途之虑,而与双文之合则纯为情爱所系。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名句,当为莺莺而作。《全唐诗》存其诗三首。(陈祖美)

【施肩吾】字希圣,号华阳真人。睦州(今浙江桐庐)人。尝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常州(今属江苏)。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与崔嘏同榜登进士第。及第后,尝赋诗献礼部侍郎李建云:“弱羽飞时攒箭险,蹇驴行处薄冰危。”(《上礼部侍郎陈情》),乃不待除授,即东归,隐居洪州西山。以其为十二真君羽化之地,幻望成为“十三人”(《西山静中吟》),遂栖心玄门,养性林壑,终老于此。肩吾诗名早著,张籍尝赠诗云:“早闻诗句传人遍。”(《送施肩吾东归》)性放逸,访道寻真中力尚“超脱之功”(《西山群仙会真记序》),故其诗题材广泛,心驰神往无不为诗,所作《岛夷行》、《海边远望》、《晓光词》等,描绘海岛风情,写景生动,想象丰富。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下“及门”者之一。计有颂称其“为诗美丽,著《百韵山居》诗,才情富赡。如:‘荷翻紫盖摇波面,蒲莹青刀插水湄。’又:‘烟粘薜荔龙须软,雨压芭蕉凤翅垂。’”(按《百韵》诗,《全唐诗》亦仅录此两联)”(《唐诗纪事》)擅绝句。亦多冶游之作,胡震亨因谓其“尚艳硕,乏韵致”(《唐音癸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施肩吾诗集》十卷、《辨疑论》一卷,已佚。《郡斋读书志》著录《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西山集》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三住铭》一卷,亦佚。《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逸》收断句一联,《全唐诗续补遗》补诗八首,《全唐诗续拾》又补二首、四句。《全唐文》存文九篇。事见《唐摭言》卷八、《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刘叉】作刘义或刘义,皆误。不知其名,以字行。自称彭城子(《自问》诗),或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一作河朔间(今河北一带)人。少任侠,伟躯,有力。初居魏地,因酒杀人,匿名姓遁去,遇赦乃出。遂流入齐鲁,始折节读书。尝游颍洛、巴蜀,东临碣石,北至桑干。唐宪宗元和(806—820)中,闻韩

愈广接天下贫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时名出卢仝、孟郊之右。时樊宗师以文自任,文亦尚怪,见又深为赏识,独拜之。又尝从卢仝求《春秋》之义,钩玄探微,深得奥旨。常能面白人之短长,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乃持韩愈撰墓铭所得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遂复归齐鲁。元和十四年(819),愈谏迎佛骨,贬潮州,又有诗寄赠,以“勿执占”相劝慰(《寄韩潮州》)。后不知所终。又工诗,恃才不羁,自称“狂痴”、“野夫”,并谓“诗胆大于天”(《自问》)。其诗多愤世疾俗、讥砭俗弊之作,如《嘲荆轲》、《莫问卜》、《狂夫》等诗,见识非凡,语含讥讽;《冰柱》、《雪车》、《经战地》等诗,则感愤于战乱之频仍、朝政之腐败。风格雄放,造语幽蹇,承卢仝、孟郊而自成一体,尝自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百篇非所长,忧来豁穷悲。唯有刚肠铁,百炼不柔亏”(《答孟东野》)。刘克庄评其与卢仝“以怪名家”(《后村诗话》续集卷二)。《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叉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十七首,编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事见李商隐《齐东野语·刘叉》(《樊南文集》卷八)、《新唐书·韩愈传》附、《唐诗纪事》卷三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黄维华)

【贾岛】(779—843)字浪仙,亦作阆仙。自号“碣石山人”。初为僧,法名“无本”。幽都(今北京西南)人。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在洛阳曾以诗文投献韩愈,为愈知赏。后随愈入京,返俗应进士举,连败文场。又“常轻于先辈,以八百举子所业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独语,旁若无人”、“公卿恶之……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何光远《鉴戒录》卷八)。终生不第。隐于嵩山。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曾谒光州刺史王建。开成二年(837),坐飞谤责授遂州长江县主簿。世因称“贾长江”。开成五年,任普州司仓参军。武宗会昌三年(843),迁为司户参军,卒。岛工于诗,与韩愈、孟郊、姚合、王建、雍陶等友善,多所酬唱。其诗以苦吟称,尝自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又曾因吟诗而冲撞韩愈,传为“推敲”之佳话(《鉴戒录》)。其诗名与姚合相齐,时号为“姚、贾”。与孟郊又“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欧阳修《六一诗话》)、“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许印芳《诗法萃编·跋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苏轼讥为“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司空图谓“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与李生论诗书》)。岛在当时及身后均具有很大影响。晚唐李洞、马戴、唐求、方干等诗人及南宋江湖派诗人、永嘉四灵皆争

相效法。昭宗光化三年(900),韦庄奏请追赐贾岛、李贺、温庭筠等进士及第。赵师秀将其诗与姚合诗合编为《二妙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长江集》十卷、《小集》三卷、《诗格》一卷。今有陈延杰注本《贾长江集》、李嘉言《长江集新校》。《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四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四联。《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有其附传。事又见苏绛《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志铭》、《鉴戒录》卷八、《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四〇、《唐才子传》卷五等。有年谱多种,以李嘉言《贾岛年谱》较为通行。(林长永)

【无可】俗姓贾,贾岛从弟。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少时即出家(见姚合《送无可上人游越》诗)。贾岛弃俗时,尝与同居青龙寺。后云游江汉、沅湘。唐文宗大和(827—835)中,为长安白阁寺僧(据王昶《金石萃编·僧无可书幢》)。交游甚广,与马戴、张籍、喻凫等友善,与姚合交谊尤深,唱酬最多。姚合任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期间,无可辄与诸文士会宿姚宅,文酒谈宴,说禅论诗,有《冬夜姚侍御宅送李廓少府》、《冬中与诸公会宿姚端公怀永乐殷侍御》等诗,姚合亦有《和厉玄侍御无可上人会宿见寄》诗。姚合出刺金州,无可尝专程往访,与合同游南池。开成四年(839),姚合任陕虢观察使,无可有诗送其赴任。有诗名,姚合称之为“诗僧”(《寄无可上人》)。诗多五言,风格清隽,与贾岛、周贺齐名。《诗人玉屑》卷三引《冷斋夜话》评曰:“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谓之象外句”,“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下“入室”者之一。亦擅书,学柳公权(《金石萃编》引《关中金石记》)。《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无可集》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事散见其诗及《唐诗纪事》卷七四、《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姚合】(779?—859?)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玄宗朝名相姚崇之曾侄孙。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登进士第。授武功主簿,世因称“姚武功”。受辟为魏博节度使幕中从事。历富平、万年尉。人为殿中侍御史、御史台侍御史。文宗大和四年(830),任户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又任刑部、户部郎中,再出为杭州刺史。后入任右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改给事中。开成四年,官陕虢观察使。为秘书少监,人因称“姚少监”。官终秘书监。赠礼部尚书,谥懿。合工于诗,与贾岛、方干、马戴、刘得仁、郑巢等相善,颇多酬唱。李频更师事之。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入室

者。胡震亨称其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贾岛)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张)籍、(王)建之浅,而媚以倩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味亦微醺,故品局中驷尔”(《唐音癸签》卷七)。合论诗讲究体格,好苦吟,诗风清峭,齐名于贾岛,时号“姚、贾”。对宋代“永嘉四灵”、明代竟陵派诗人有一定影响。“永嘉四灵”之赵师秀曾选贾、姚二人诗为《二妙集》。“合诗体气清整”(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尤工于五律,号为“武功体”。方回称其“亦一时新体也,而格卑于(贾)岛,细巧则或过之”。又云:“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瀛奎律髓》)。曾编选由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诗一百首为《极玄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姚合诗集》十卷、《诗例》一卷。《全唐诗》存诗七卷。《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有其附传。事又见《郡斋读书志》卷四、《唐诗纪事》卷四九、《唐才子传》卷六等。(林长永)

【章孝标】字道正,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家于钱塘(今浙江杭州)。父八元,子碣,皆有诗名。唐宪宗元和(806—820)中累试不第。元和十三年(818),下第,士子多为诗刺主司庾承宣,独孝标赋《燕归》(或作《下第后献主司》),《全唐诗》作《归燕词辞工部侍郎》)诗留献。庾得诗展吟,诚恨遗才;次年,复知贡举,乃擢孝标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穆宗长庆(821—824)中,任校书郎,由杨巨源引荐,尝回杭州谒白居易(杨有《送章孝标校书归杭州因寄白舍人》诗)。敬宗宝历(825—827)间,又尝至越州谒元稹,有《上浙东元相公》诗。文宗大和(827—835)中,以大理评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从事。武宗会昌(841—846)中,尝于淮南节度使李绅席上赋《春雪》诗,一挥而就,绅大为称赏(见《唐摭言·敏捷》)。孝标诗才敏捷,负诗名。张洎谓其深得张籍“字清意远”之旨,云:“沿流而下……章孝标及门焉。”(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引)范摅称其“为诗清切”,并赏其《八月》诗中“长安夜夜家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二句,谓其“品题之中,颇得声称也”(《云溪友议》)。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下“及门”者之一。擅七言近体,胡震亨评谓“七字尤爽朗”(《唐音癸签》卷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章孝标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凡六十九首。《全唐诗逸》补诗四首、断句十六联,《全唐诗续拾》又补诗一首、断句六。今又据《西天目祖山志》辑得孝标佚诗《天目潜溪馆》一首(见张靖龙《唐五代佚诗辑考》)。《全唐文》录其文一篇。事见《云溪友议》卷下、《唐摭言》卷一三、《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朱庆馀】名可久,以字行。排行大。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尝以诗受知于张籍,因播才名于世。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仕途不顺(见其《行路难》、《自述》、《归故园》等诗)。尝漫游江湖,远至边塞。工诗,诗名早著,张籍称其“州县知名久,争邀与客同”(《送庆馀归越》)。与贾岛、姚合、顾非熊、章孝标、李馀等交善,有唱和。其诗多览游寄赠之作,善感物态,风格清丽。其《闺意》(一作《近试上张水部》)、《宫词》,含蓄深婉,最得时人称赏。擅写景,如《南湖》、《采莲》、《题蔷薇花》等篇什,均见清爽隽永,颇耐讽诵。其为诗深受张籍影响,张洎《项斯诗集序》云:“元和中,张水部为律格,字清意远,惟朱庆馀一人亲受其旨。”(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引)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及门”者之一。多近体,以绝句为佳。刘克庄评曰:“庆馀绝句,为世所称赏,然他作皆不如此。”(《后村诗话新集》卷六)辛文房谓其“得张水部诗旨,气平意绝,社中哲匠也”(《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朱庆馀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事散见《云溪友议》卷一二、《唐诗纪事》卷四六、《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李德裕】(787—849)初名臧,冠后更名德裕,字文饶,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少随父吉甫游宦四方。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返京,不愿应科举考试,遂以荫补校书郎。父吉甫入相,避嫌外出为幕府从事,曾应张弘靖之辟,为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元和十四年,随弘靖入朝,除监察御史。次年,为翰林学士,与同在翰林的李绅、元稹交好,时称“三俊”。穆宗长庆(821—824)初,德裕颇受信用,禁中书诏,多由其属草,赐金紫,两年间,由屯田员外郎经考功郎中、翰林承旨、中书舍人直至御史中丞。长庆二年(822),由于李逢吉排挤,出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在浙八年,颇有惠政。文宗大和三年(829),奉诏入京。裴度欲荐以为相,李宗闵得宦官之助先秉政,遂出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次年,宗闵引牛僧孺为相,以排挤裴度、元稹、德裕等为事,牛、李党争遂日趋激烈。大和四年,德裕转为西川节度使,在蜀时,注重边防,抵御南诏、吐蕃入侵,抑制浮屠,革除旧俗。大和六年,入为兵部尚书。次年,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政期间,除弊俗,破朋党,禁抑两淮大贾,欲有所为,而次年即因党争被李宗闵排挤出为浙西观察使,贬为袁州刺史,改滁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再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五年,武宗继位,德裕入朝为相,秉政五年余。武宗会昌(841—846)年间,德裕独揽大权,外御回鹘

侵扰,内平藩镇割据,抑制佛教狂热,破除朋党积习,裁减冗员,整顿吏治,颇有成效。会昌六年(846),武宗去世,德裕罢相,人亡政息。牛党党人白敏中,令狐绹等执政,借“吴湘案”贬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卒于贬所。德裕是政治家,不以文学名世,其存诗一百余首,以写其游宦生活为主,诗中虽未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但各地风貌习俗屡现于笔端。李氏诗注重思想感情,反对雕章琢句,追求声律。其贬岭南途中所作诸诗如《盘陀岭驿楼》、《谪岭南道中作》、《到恶溪夜泊芦岛》、《岭外守岁》等,皆能就景寄怀,纯以情感人,风格抑郁凄婉。德裕还长于骈文,风格雄奇骏伟,王士禛以为与陆贽不相上下。李氏诗文皆收入《会昌一品集》,后人或改题为《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新、旧《唐书》有传。今人傅璇琮撰《李德裕年谱》,颇详尽,对两《唐书》错误之处多有驳正。

(王学泰)

【许浑】(788—858) 字用晦,一作仲晦。排行七。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郡望安陆(今属湖北)。宰相许圜师之后。曾至夔州、颍州,或为僚属,或为从事。又游幽州。文宗大和六年(832),登进士第。为某县尉。授当涂令,移摄太平令。以病免。又任润州司马,置丁卯桥村舍(别墅),人因称为“许丁卯”。至南海使府,历桂州、兴州、韶州等地。武宗会昌(841—846)末,北归。宣宗大中三年(849),守监察御史,以病乞归。大中七年,官虞部员外郎。寻出为郢州刺史,转睦州刺史,世亦称“许郢州”。大中十二年卒。浑工于诗,与杜牧、张祜、李频、李远等人皆有唱和。时人及后人对其诗颇多推崇。韦庄赞为“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空作碧云词”(《题许浑诗卷》)。刘克庄称其诗“如天孙之织,巧匠之斫,尤善用古事以发新意。其警联快句,杂之元微之、刘梦得集中不能辨”(《后村诗话·新集》卷四)。胡应麟云:“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诗薮·外编》卷四)其诗内容以登临怀古之作多,名作《咸阳城东楼》广为传诵。而字面好用“水”字,有“许浑千首湿”(《桐江诗话》)之讥。其诗全属近体,“格甚凝炼”(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田雯称“声律之熟,无如浑者”(《古欢堂集·杂著》卷三)。方回则以为“工有馀而味不足”、“诗句句工,但太工则形胜于神矣”(《瀛奎律髓》卷十、卷四七)。杨慎更贬为“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升庵诗话》卷九)。浑自编其诗为《丁卯集》三卷。《全唐诗》存诗十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事见胡宗愈《唐许用晦先生传》、《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七等。今人谭

优学有《许浑行年考》。

(林长永)

【张碧】字太碧。约生活于德宗贞元(785—805)前后。屡举进士不第,遂退隐而终。其诗受李白影响较深。碧年辈或不在李贺下,而有学李贺之诗作(钱鍾书《谈艺录》)。孟郊称其诗“下笔证兴亡,陈辞备风骨”(《读张碧集》)。辛文房评为“天才卓绝,气韵不凡。委兴山水,投闲吟酌。言多野意,俱状难摹之景焉”(《唐才子传》卷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碧歌行集》二卷。《全唐诗》存诗十九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四五、《唐才子传》卷五等。

(林长永)

【李贺】(790—816) 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郡望陇西(今属甘肃)。唐宗室郑孝王亮后裔。家居福昌之昌谷,世因称李昌谷。少敏慧,有心志。为人纤瘦,通眉长指,善疾书。宪宗元和(806—820)初往来京、洛间,应试求仕。尝以诗谒韩愈,颇受器重;应河南府试获解后,又受其勉励,入京赴进士试。同试之争名者毁之以其父讳晋肃,进、晋同音,不应举进士,韩愈乃作《讳辩》以解之,终不第。元和五或六年(810或811),因宗人荐引,恩荫得官,仕太常寺奉礼郎。元和八年,辞归昌谷。元和九年,赴潞州依泽潞节度使张彻。元和十一年病归,卒。贺诗名早著,贞元(785—805)末即与李益齐名,世称“二李”(《谈荟》)。见知于韩愈、皇甫湜,与沈亚之友善。每出游,常骑驴,背一古破锦囊,偶有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乃足成之。其母见所书之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贺小传》)长于乐府诗。沈亚之称其“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叙诗送李胶秀才》)。如《猛虎行》、《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公无出门》等篇,对藩镇割据、封建统治颇有揭露,亦能反映民间疾苦;又有《古悠悠行》、《日出行》、《梦天》等篇,则寓其一生偃蹇、凄情怨意于歌咏之中。杜牧称其《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二诗“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并以“云烟绵联”、“水之迢迢”、“春之盎盎”、“秋之明洁”、“风樯阵马”、“瓦棺篆鼎”、“时花美女”、“荒国侈殿、梗莽丘垅”、“鲸呿鳌掷、牛鬼蛇神”等语象喻其歌诗(《李贺集序》)。其诗想象新奇,造境幽眇,融瑰奇秾丽与凄绝峻峭于一炉。吴融谓“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禅月集序》)。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李长吉体”。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下“入室”者之首。后人以“奇才”(韦庄)、“鬼才”(宋祁)、“诗妖”(潘德舆)称之者,褒贬往往不一。无七

言律诗。其五、七言绝句,则清丽晓畅,略无雕琢之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贺集》五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李贺集》四卷、外集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长吉集》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五卷,然有伪作混入。《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通行之年谱有朱自清《李贺年谱》及钱仲联《李长吉年谱会笺》。

(黄维华)

【张祜】(792?—854?)《郡斋读书志》、《新唐书·艺文志》作“张祐”,误。字承吉,排行三。早年寓居苏州(今属江苏),郡望清河(今属河北)。曾至杭州谒白居易,与徐凝争首荐,不胜而归。累举进士不第。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令狐楚上表荐之,因受谗罢。性爱山水,好游历,晚居丹阳,隐居而终。时人称“张处士”。祜负诗名,陆龟蒙称祜“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谏,时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并序》)。杜牧对祜亦称誉备至,尝吟其《宫词》,赠诗云:“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祜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张祜集》十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百五十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四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四。事见《唐摭言》卷一一、《唐才子传》卷六等。今人谭优学有《张祜行年考》。

(林长永)

【顾非熊】(795—854?)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祖籍润州丹阳(今属江苏)。父况,为盛唐著名诗人。举家曾居于茅山(据《唐摭言》等),又,其《冬日寄蔡校书京》诗云:“弱冠下茅山”。少敏悟,过目能诵。以好凌轹豪门子弟,备受排挤。约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始赴试,累不第,久困举场达三十年。屡佐使府。敬宗宝历二年(826)至文宗大和二年(828)间,在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幕中(据皇甫湜《唐著作左郎顾况集序》)。武宗会昌五年(845),应试,仍遭黜落;武宗久闻其诗名,怪其不第,敕有司进所试文章,追榜诏赐登进士第。宣宗大中(847—860)间为盱眙尉,刘得仁有诗赠别(《送顾非熊作尉盱眙》)。尝出塞,远至河湟,有《出塞即事》二首。后去官归隐茅山。约卒于大中八年左右(据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性滑稽好辩。诗名早著,刘得仁《贺顾非熊及第,其年内索文章》诗云:“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顾陶亦称其“有诗句,播在人口”(《〈唐诗类选〉

后序》)。与贾岛、姚合、刘得仁、僧无可、马戴、朱庆馀、厉玄、项斯等均有交往。其诗多感怀寄酬之作,情致深婉,语近怆恻。胡震亨称其“近体俊婉可讽”(《唐音癸签》卷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顾非熊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五首。事见《旧唐书·顾况传》、《唐摭言》卷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七。

(黄维华)

【马戴】字虞臣。兖州(今属山东)人。或云曲阳(今江苏东海西南)人。《唐才子传》作华州人,误。累举进士不第。唐武宗会昌四年(844),登进士第。宣宗大中(847—860)初,入太原李司空幕掌书记,以直言被斥,贬为龙阳尉。又曾任怀宁令。懿宗咸通(860—874)末,曾佐大同军幕。后入为国子博士,卒。戴工于诗,与贾岛、姚合、殷尧藩等人相善,多有酬唱。其诗擅近体,尤精五律。翁方纲评为“马戴五律在许丁卯之上,直可与盛唐诸贤侪伍,不当以晚唐诟矣”(《石洲诗话》)。贺裳称“晚唐诗,今昔咸推马戴”(《载酒园诗话又编》)。辛文房云:“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两不相伤,佳作也。”(《唐才子传》卷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马戴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断句二。事见《唐摭言》卷四、《金华子杂编》卷下、《唐诗纪事》卷五四、《唐才子传》卷七等。

(林长永)

【郑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姚合在杭州刺史任,巢游其门,得其赏重,屡陪合登览宴集。宣宗大中七年(853),在台州刺史李肇府。后不知所终。巢性疏野,广交两浙名僧,如贞上人、凝公等。辛文房称其诗“体效格法,能伏膺无致,句意且清新”(《唐才子传》卷八)。其诗内容多为赠别题咏。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〇《集录》一著录《郑巢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才子传》卷八等。

(林长永)

【李敬方】字中虔。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郡望陇西(今甘肃临洮)。唐穆宗长庆三年(823),登进士第。文宗大和(827—835)初,任金部员外郎,迁祠部郎中,转户部郎中。开成(836—840)末为谏议大夫。武宗会昌六年(846),坐事贬台州司马。宣宗大中(847—860)初,迁明州刺史。大中四年(850),转刺歙州。尝患风疾,赴黄山汤池浸浴,累二年始愈,因造堂,勒铭于石,且题诗四百言以记之(《汤泉铭》、《题黄山汤院》并序)。约卒于大中末。敬方工诗。顾陶称其“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唐诗类选后序》)。其诗多五言,近、古体俱佳。《题黄山汤院》叙汤泉治疾之神效,意绪丰满,挥洒自如,辞甚隽丽。又有《汴河直进船》诗,揭露朝廷“取尽脂

膏”、令“生人(民)为害”之弊,极愤慨。所赋甚丰,于大中十年已有家集三百首(见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敬方诗》一卷,已佚。《全唐诗》存诗八首。《全唐诗补逸》外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文》存文一篇。事见《旧五代史·李琪传》、《唐诗纪事》卷五八、《宝庆四明志》卷一、《嘉定赤城志》卷一〇、《唐才子传校笺》卷七。今人傅璇琮有《唐代诗人李敬方事迹辨正》(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黄维华)

【韩琬】字成封。籍里不详。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与韦楚老、韩昶等同榜登进士第。文宗开成五年(840),由李商隐荐奏,为陈许节度使王茂元判官(见《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琬等四人充判官状》)。后入为司封员外郎。宣宗大中五年(851),擢户部郎中。大中八年,迁中书舍人。大中十二年,在湖南观察使任。五月,军乱,为都将石载顺等所逐。懿宗咸通(860—874)中,仕至右散骑常侍。琬工诗,诗名早播。其诗多杂咏风物,构思新巧,造意别致,所作《杨柳枝词》、《杨柳枝》为时人传唱。辛文房称其诗“多清新之制,锦不如也”(《唐才子传》)。长于七言,胡震亨谓其“咏物,七字着色巧衬,是当行手”(《唐音癸签》卷八)。韦庄《又玄集》、韦毅《才调集》均选其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韩琬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断句一。《全唐文》存文一篇。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徐凝】睦州分水(今浙江桐庐)人。唐穆宗长庆三年(823),至杭州谒刺史白居易,与张祜争首荐,以“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庐山瀑布》)取胜。长庆四年与浙东观察使元稹游处唱和。文宗大和四年(830)至六年(832)间,作京、洛游,与白居易多所酬唱。无成而归(或说凝官至侍郎,误)。以布衣终。凝工书法,“字画有行法”、“笔意自具儒家风范”(《宣和书谱》)。有诗名,方干曾以师相事。其诗评价不一。皮日休称“凝之操履,不见于史,……朴略稚鲁,从可知矣”(《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竹庄诗话》卷二〇则云其诗“皆有情致,宜见知于微之、乐天也”。《王直方诗话》称其《庐山瀑布》一诗被苏轼目为“至为生陋”。诗作多为绝句,“殊有佳者,不尽恶诗”(吴騞《拜经楼诗话》引《青梅轩诗话》)。《宋史·艺文志》著录《徐凝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云溪友议》卷中、《唐诗纪事》卷五二、《唐才子传》卷六等。

(林长永)

【皇甫松】亦作皇甫嵩。字子奇,自号“檀栾子”。

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皇甫湜之子。终生不第。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韦庄奏请追赐皇甫松、李贺、温庭筠、贾岛等人进士及第。松兼擅诗文,尤工于词。陈廷焯称为“措词闲雅,犹存古诗遗意。唐词于飞卿而外,出其右者鲜矣。五代而后,更不复见此种笔墨”(《白雨斋词话》)。撰述甚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大隐赋》一卷、《醉乡日月》三卷。又有《大水辨》、《牛羊日历序》、《齐夔凌纂要》等,今皆不传。《全唐诗》存其诗、词二十七首,诗断句一联,《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五二。(林长永)

【温庭筠】(801?—一说812—867?—一说870)本名岐,字飞卿。排行十六。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居于鄠县(今陕西郊户东北)。少即颖悟,才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人称“温八叉”、“温八吟”。然好游狭邪。被目为有才无行。唐文宗开成(836—840)年间,曾从庄恪太子游。屡举进士不第。武宗会昌元年(841),至淮南谒李绅。宣宗大中九年(855),沈询知举,庭筠以搅扰科场罪,为执政者贬黜。被贬为随县尉,后襄阳刺史徐商署为巡官,与段成式、周繇等游处酬唱。不久,离襄阳,客江陵,又去江东、淮南等地。约于懿宗咸通四年(863),在扬州因醉酒犯夜为虞候所击至败面折齿,“污行闻于京师”。咸通六年,任国子助教,世因称“温助教”。咸通七年,贬方城尉,世因称“温方城”。冬末(已入867年)卒。昭宗光化三年(900),韦庄奏请追赐庭筠、李贺、贾岛等人进士及第。庭筠在晚唐文坛卓为大家,诗、词、文皆工妙。与李商隐、段成式三人皆善为骈体文,当时齐名,三人排行皆为十六,时号“三十六体”。其诗与李商隐齐名,号“温、李”。胡应麟谓“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诗薮·外编》卷四)。其乐府、七律尤为后人称道。薛雪誉其为“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一瓢诗话》)。延君寿称其“七律如《赠蜀将》、《马嵬》、《陈琳墓》、《五丈原》、《苏武庙》诸作,能与义山分驾,永宜楷式”(《老生常谈》)。然张戒言“其意无礼,其格至卑,其筋骨浅露”(《岁寒堂诗话》卷上),颇加贬抑。以贺裳“大抵温氏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淡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然警慧处,亦非流俗浅学所易及”(《载酒园诗话·又编》)之论较为公允。庭筠精通音律,“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成为花间词派的鼻祖。著述甚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乾馔子》三卷、《采茶录》一卷、《学海》二十卷、《握兰集》三卷、《金荃集》一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全

唐诗》存诗九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五。清曾益、顾予咸、顾嗣立有《温飞卿诗集笺注》。《旧唐书》卷一九〇有传。《新唐书》卷九一《温大雅传》有其附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五四、《唐才子传》卷八等。夏承焘有《温飞卿系年》。(林长永)

【刘得仁】公主之子。居长安通济坊。唐穆宗长庆(821—824)时即以诗名。兄弟皆以贵戚而得显仕,独得仁苦事文词。文宗开成(836—840)后,累举二十年,竟不第。尝赋诗自悼:“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如病如痴二十秋,求名难得又难休。回看骨肉须堪耻,一着麻衣便白头”。既卒,僧栖白等诗人竞相赋诗以吊。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韦庄奏请追赠及第(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遂与李贺、陆龟蒙、温庭筠、贾岛等“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者追授补阙、拾遗(洪迈《容斋三笔》卷五)。得仁尚苦吟,尝自谓“刻骨搜新句”,“长吟毕二更”,“省学为诗日,宵吟每达晨”,“病多三径寒,吟苦四邻惊”。与姚合、张籍、雍陶、无可、顾非熊、丁公著等当时著名诗人交笃,颇有酬唱。其诗多举场怨慨和羁游寄赠之作,风调清切,司空图举其于大历才子之后,与贾岛、孟郊相并,谓其“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僻苦主”孟郊下“及门”者之一。擅五言,以五律为尤。晁公武称其“五言清莹,独步文场”(《郡斋读书志》)。辛文房评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唐才子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得仁诗》一卷。《全唐诗》编为二卷。《全唐诗补遗》补诗五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五三、《唐才子传校笺》卷六。(黄维华)

【李频】(?—876)字德新。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人。《新唐书》本传作寿昌人,误。少颖悟,多记览,工诗,与方干、郑仁规、陶详为友。时姚合诗名甚著,频乃走千里从其学诗。合大加奖挹,以女妻之。唐宣宗大中八年(854),登进士第。入幕黔中,旋罢,归乡。又入鄂岳幕、鄜坊观察使幕。调校书郎,历南陵尉、南陵主簿、京兆府参军等职。试判人等,迁武功令,有政声。擢侍御史,迁都官员外郎。僖宗乾符二年(875),表请出为建州刺史。次年,卒于任。频工于诗,好苦吟。与薛能、郑谷、张乔、许棠等人游处唱和。辛文房称其“诗虽出晚年,体制多与刘随州相抗,骚严风谨,惨惨逼人”(《唐才子传》卷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频诗》一卷。有《四库全书》本《黎岳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诗续补

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新唐书》卷二〇二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六〇、《唐才子传》卷七等。今人谭优学有《李频行年考》。

(林长永)

【项斯】(802?—847?)字子迁,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初闲居杭州径山朝阳峰。唐穆宗长庆(821—824)年间,曾向张籍投献,为其知赏。又至金州谒刺史姚合。蹭蹬二十余年,累举进士不第。武宗会昌三年(843),谒国子祭酒杨敬之。杨赠诗云:“几度见诗总说好,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由是诗名大著。会昌四年,登进士第。授丹徒尉,卒于任。斯工于诗,辛文房称为“清妙奇绝”(《唐才子传》卷七)。其诗风类张籍,郑薰赠诗称“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升”堂者。刘克庄以为其诗“在方干、秦系之间,少而工”(《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项斯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事见张洎《项斯诗集序》、《南部新书》卷甲、《唐诗纪事》卷四九、《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李远】(?—860?)字求古,一作承古。夔州云安(今四川云阳)人。郡望陇西(今属甘肃)。唐文宗大和五年(831),登进士第。入福州观察使幕任从事。召为侍御史,历尚书司门员外郎。宣宗大中(847—860)年间,迁司勋员外郎。令狐绹荐为杭州刺史。又历忠州、建州、岳州、江州刺史。官终御史中丞。李远善棋爱酒,情性闲雅。工于诗赋,许浑赞为“赋似相如诗似陶”(《寄当涂李远》)。其“为诗多逸气,五彩成文”(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薛雪评为“法律井井,不减开、宝时人”(《一瓢诗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龙纪圣异历》一卷、《李远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幽闲鼓吹》、《北梦琐言》卷六、《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崔珏】字梦之,清河(今河北南宫东南)人。寓居荆州(今湖北江陵)。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间,登进士第。为崔铉幕僚,为其知赏,荐入朝为秘书郎。出任淇县令。有惠政,官至侍御史,卒年不详。珏工于诗,与李商隐善,李曾赋诗以赠。及李卒,珏作诗哭之“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哭李商隐》)。又与赵光远、孙启等游处唱和。其《和友人(鸳鸯)之什》名著一时,人称“崔鸳鸯”。胡应麟称其“岳麓长歌、鸳鸯近体,分有义山馀韵,岂亦三十六体之一耶”(《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珏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三。事见《唐摭言》卷一一、《新唐

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八等。(林长永)

【雍陶】字国钧。夔州雲安(今四川云阳)人。寓居于成都。少家贫。蜀中乱,流寓洞庭、岳阳间。唐文宗大和八年(834),登进士第。以诗为前辈名家贾岛、殷尧藩、姚合等称赏。宣宗大中(847—860)年间,授国子毛诗博士。大中八年(854),出为简州刺史。后辞官,闲居庐山。卒年不详。陶工于诗,自比谢宣城(朓)、柳吴兴(恽),与姚鹄、章孝标、刘得仁等友善,诗酒相娱。诗多酬赠、题咏之作,擅长律绝。胡震亨评为“矜负好句,为客所窥。此公工于造联,奈孱于送结,落晚调不振”(《唐音癸签》卷八)。亦善赋,贾岛称“不唯诗著籍,兼又赋知名。议论于题称,《春秋》对问精”(《送雍陶及第后归成都宁亲》)。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及门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雍陶诗集》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雍陶诗》五卷,并云“《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四,《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见《雲溪友议》卷上、《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曹唐】(802?—866?)字尧宾,桂州桂林(今属广西)人。初为道士,后还俗。累举进士不第。入邵州刺史萧革幕为从事。与杜牧有诗往还。又曾谒岳州刺史李远,“李倒屣而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暴病而卒。唐工于诗,“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曾作大小《游仙诗》近百首,而“语尤清丽”(曹学《重刻〈三曹诗集〉序》)。盛传于时,“后人赋游仙绝句实起于此”(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〇)。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入室者。胡震亨评云:“曹尧宾诗能用多句,调颇充伟。”(《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曹唐诗》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事见《北梦琐言》卷五、《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周贺】字南卿,洛阳(今属河南)人。尝客居南徐(今江苏镇江)约三年,又隐于嵩阳少室山,后居庐山为僧(有《秋晚归庐山留别道友》等诗),法名清塞。文宗大和八、九年(834、835)间,姚合为杭州刺史,爱其诗,命还俗。遂复姓字,改名贺。或自此即随合入仕,而终究罢职归隐,有“藩府十年为律业”(《赠僧》)、“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只被浮名系,宁无愧海鸥”(《秋宿洞庭》)、“已让辟书称抱疾,沧洲便许白髭生”(《送石协律归吴》)、“终欲返耕甘性拙,久惭他事与身忙”(《寺居寄杨侍御》)等诗句。仕履未详。贺工诗,与姚合、贾岛、朱庆馀等友善,有诗唱和。与

贾岛、无可齐名。多近体,“诗格清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与无可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下“入室”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周贺集》一卷。《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著录《清塞诗》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四。事散见其诗及《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七六、《唐才子传校笺》卷六。

(吴企明 黄维华)

【杜牧】(803—853)字牧之,排行十三。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于长安南下杜樊乡(樊川)有别墅,世因称“杜樊川”。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登进士第。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卫兵曹参军。应江西观察使沈传师辟为团练府巡官。后随沈转至宣歙观察使幕。大和七年,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为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大和九年,入朝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二年(837)应宣歙观察使崔郸辟任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历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武宗会昌二年(842),出为黄州刺史。历池州、睦州刺史。宣宗大中二年(848),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人因称“杜司勋”。大中四年,转吏部员外郎。自求出为湖州刺史。大中五年,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大中六年,迁中书舍人。人因称“杜舍人”、“杜紫微”(开元中曾称中书省为紫微省)。是年十一月之后(已入853年)病卒。杜牧为晚唐大家,工于诗、赋、古文。亦精于书法。于诗造诣尤为突出。其赋以《阿房宫赋》最为著名。他论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认为“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日寄小侄阿宜诗》)。贬抑元稹、白居易之作为“纤艳不逞”、“淫言媒语”(《李府君(戡)墓志铭》)。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生前与许浑、张祜、韦楚若、李郢等人友善,多有酬唱往还。诗与李商隐齐名,人称“小李杜”。牧才甚富,胡应麟称“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其才则许不如李,李不如温,温不如杜”(《诗薮》)。其诗兼擅众体,风格多样,“风调高华,片言不俗”(蔡條《蔡百衲诗话》),于晚唐诗坛别标高格。《陈氏书录》称“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徐献忠《唐诗品》称“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萎靡,独持拗峭,虽云矫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引)。李调元评为“轻倩秀艳”(《雨村诗话》),刘熙载目作“雄姿英发”(《艺概·诗概》)。尤精律绝。杨慎称“律诗至晚唐,李义山之下,惟杜

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升庵诗话》卷五)。贺裳论其绝句“最多风调,味永趣长,有明月孤映、高霞独举之象,余诗则不能耳”(《载酒园诗话·又编》)。其名作佳篇如《山行》、《杜秋娘》、《赤壁》、《过华清宫绝句》、《清明》等广为传诵。身后所遗诗文由其甥裴延翰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今有《四部备要》本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四卷。《全唐诗》存诗八卷,而混有许浑等人诗作;《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六首。《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有其附传。事又见其《自撰墓志铭》、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六等。有年谱多种,以今人缪钺《杜牧年谱》较为通行。(林长永)

【陈陶】(803?—879?)字嵩伯,长江以北人。举进士不第。唐文宗大和(827—835)初,游江南、岭南等地。曾以诗投献赵鼎、桂仲武、罗让、周墀、韦廔等。与任畹相善。宣宗大中三年(849),隐于洪州西山,与蔡京、僧贯休往还。日以读书种兰、吟诗饮酒为事。卒后,方干、曹松、杜荀鹤等人有诗悼之。陶工诗,诗多投赠、题咏之作,尤长于乐府。其七绝《陇西行》传诵人口。王世贞赞为“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艺苑卮言》卷四)。沈德潜称“作苦语无过此者。然使王之涣、王昌龄为之,更有馀蕴。此时代使然,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唐诗别裁集》卷二〇)。其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二句更为后人激赏。著有《文集》十卷,已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因其事迹多为后人与南唐之陈陶相混,集中也混有南唐陈陶之作品。事据《全唐诗》小传、今人陶敏《陈陶考》。

(林长永)

【段成式】(?—863)字柯古,排行十六。宰相段文昌之子。荆州(今湖北江陵)人。以父荫仕集贤院校书。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官秘书省校书郎。迁尚书郎。宣宗大中二年(848),出为吉州刺史。罢任,闲居襄阳。懿宗咸通(860—874)初,为江州刺史。入任太常少卿。咸通四年(863),卒于长安。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绝一时。其骈文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三人均排行十六,时人因称“三十六体”。工诗,居襄阳时与温庭筠、周繇、韦蟾等人游处唱和,诗作编为《汉上题襟集》。其《酉阳杂俎》一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翘楚”(《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汉上题襟集》十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十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庐陵下官记》二卷。《全唐诗》存诗一卷。《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新唐书》卷八九《段志玄传》有其附传。事又

见《金华子杂编》卷上、《唐诗纪事》卷五七等。今人方南生有《段成式年谱》。(林长永)

【赵嘏】(806?—852?)字承祐。排行二十二。楚州山阴(今江苏淮阴)人。唐文宗大和(827—835)初,游浙东观察使元稹幕,有诗酬唱。复入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幕。以宣州乡贡进士应试长安,不第。留寓京师,与杜牧、令狐绹等游处唱和。武宗会昌四年(844),登进士第。宣宗大中(847—860)年间,任渭南尉,人因称“赵渭南”。卒时年方四十馀。嘏工于诗,名声甚播。胡震亨称其“才笔欲横,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蘸笔浓,揭响满,为稳于牧之,厚于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痴。取冠晚调不难矣”(《唐音癸签》卷八)。元人时天彝则贬为“盖小才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其诗多有警句,七律《早秋》诗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为杜牧激赏,呼为“赵倚楼”。《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渭南集》三卷、《编年诗》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三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四。事见《唐摭言》卷一五、《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七等。今人谭优学有《赵嘏行年考》。(林长永)

【薛逢】(806—?)字陶臣,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登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会昌六年,入河中节度使崔铉幕为从事。宣宗大中三年(849),铉拜相,逢擢为万年尉。入弘文馆,迁侍御史、尚书郎。出为嘉州刺史。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历成都少尹、蓬州刺史、绵州刺史、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官终秘书少监。逢工于诗,擅七律。胡震亨称其“殊有写才,不虚俊拔之目。长歌似学白氏,虽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唐音癸签》卷八)。辛文房谓其诗为“不甚苦思。而自有豪逸之态。第长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浅露俗”(《唐才子传》卷七)。严羽则斥为“最浅俗”(《沧浪诗话·诗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与杨绍复等所撰之《续会要》四十卷、《薛逢诗集》十卷、《别纸》十三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断句一句。《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五九、《唐才子传》卷七等。今人谭优学有《薛逢行年考》。(林长永)

【姚合】(808?—?)字居云,巴州(今四川巴中)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登进士第。此前曾入陕虢观察使姚合幕。登第后入泾原节度使史宪忠幕。宣宗大中元年(847),入襄州简辞幕。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官台州刺史。卒年不详。胡震亨云:“姚居云吟笔,见甄李贲皇(德裕),如‘入河残日雕西尽’,又‘雪坛当醺月孤明’,清拔不可多得。”(《唐音癸签》

卷八)辛文房则谓其“吏才文价,俱不甚超。一名仅尔流播,亦多幸矣”(《唐才子传》卷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姚鹄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一首,事见《云笈七签》卷一一八、《唐摭言》卷三、《唐诗纪事》卷五五,《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方干】(809?—885?)字雄飞,排行十四。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人。《唐摭言》作桐庐人、《郡斋读书志》作歙人,皆误。貌陋唇缺,时人称“补唇先生”(何光远《鉴戒录》)。累举进士不第。干有清才,为徐凝所重,授以诗律。姚合也推赏之。好游园林名胜,多题咏。与李频、郑仁规、陶详、吴融、喻凫、僧齐己有交往。归隐鉴湖而终。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干诗名甚著,吴融誉为“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赠方干处士歌》)。王赞称其“人钱起之室矣”(《玄英先生诗集序》)。葛立方评其诗为“清润小巧”(《韵语阳秋》),刘克庄以为“其诗高处在晚唐诸公之上”(《后村诗话·新集》卷四)。身后其甥杨翥等辑其诗三百七十篇为《玄英先生诗集》十卷。《全唐诗》存诗六卷,《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六首。事见孙邠《玄英先生传》、《北梦琐言》卷六、《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喻凫】(810?—850?)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登进士第。释褐授校书郎。任长城县令、德清县令。官终乌程令。与方干交厚,多所唱和,干有诗哭之。与姚合、顾非熊等人也有酬赠。凫有诗名,后辈诗人皆尊为“喻先辈”。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及门者。又“效贾岛为诗,人称之贾、喻”(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辛文房评云:“晚岁变雅,凫亦风靡,专工小巧,高古之风扫地。所畏者务陈言之是去耳。”(《唐才子传》卷七)胡震亨称其五言“闲远朗秀,选句功深”(《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喻凫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又一首,《全唐诗续补逸》存断句六,《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一、《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李商隐】(811?—859?)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排行十六。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世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祖父辈均曾为县令,父又曾在浙江为幕僚。商隐十岁,父死,奉母返乡。年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为群公所赏。弱冠,以文谒东都留守令狐楚,楚奇其才,令出入其门,与诸子令狐绹等游,并授以骈体章奏法。文宗大和三年(829),令狐楚改任天平军节度使,辟义山为巡官。

大和六年,楚转河东节度,义山随往太原。在此期间,曾多次应试,均下第。后楚调任吏部尚书,义山回乡,曾短期隐居济源玉阳山。开成二年(837),因令狐绹之荐,登进士第。楚卒,受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辟,为掌书记。不久,娶王茂元女为妻。时朝廷牛、李党争激烈,令狐绹属牛党,王茂元被视作李党。义山之引起牛党不满,令狐绹攻击其“忘家恩,放利偷合”,多方排挤之。开成四年,授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以对在狱犯人减免刑事忤上,辞职请他调,南游江乡。武宗会昌二年(842),以书判拔萃,任秘书省正字。旋因母丧,丁忧居家。宣宗大中元年(847),随桂管观察使郑亚赴桂海,任支使兼掌书记,曾摄理昭州郡务。后因郑亚遭贬,义山亦辞职北归,补周至尉、京兆府掾曹。大中三年,卢弘止出为武宁军节度,辟义山为判官。大中五年,归长安,有悼亡之痛,授太学博士。同年秋,应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聘,为掌书记,赴梓州,改判上军,得检校工部郎中衔。大中九年,随柳返京。次年十月,仲郢奏充其为盐铁推官,巡察江淮盐务,遂游江东。大中十二年,因病废罢,归郑州,此年冬或来年春病逝于家中。商隐之骈体章奏,有出蓝之誉,同时温庭筠、段成式作文亦以秾致相夸,三人均排行十六,时号“三十六体”。其诗远承楚骚,近桃杜甫,而又融入骈文运典摘藻之法,以情感沉挚、寄托遥深、色彩秾丽、委婉多姿为特色。尤以《无题》及类似无题诸诗如《碧城》、《锦瑟》、《玉山》、《哀筝》等最为著名。此类诗大抵与爱情有关,且融铸全部人生体验,故涵义格外丰厚,因其意象重叠、表达曲折,历来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之语,或谓其“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韵语阳秋》引杨亿语)。涉及时事的篇什,有《行次西郊作——百韵》、《有感》、《重有感》及《隋宫》、《马嵬》等咏史之作。义山精于诗律,其七律为杜甫后第一人,对后世影响巨大。然北宋杨亿、刘筠等人,唯学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敖陶孙《臞翁诗评》)之特点,且竟至扞扞剝剝,遂为伶人所讥。商隐曾自编章奏表启为《樊南甲乙集》,共四十卷,与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均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直斋书录解題》另著录其《蜀尔雅》三卷、《杂纂》一卷、《金钥》二卷、《梁词人丽句》一卷、《李义山集》八卷。然其文集大部散佚,今传有清人辑注本,以冯浩《樊南文集详注》、钱振伦《樊南文集补编》较重要。《全唐文》卷七七一至七八二,编其文十二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三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断句四,《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残句一。其诗历代笺注评点者甚

多,以清朱鹤龄、屈复、程梦星、姚培谦诸家之注及朱彝尊、何焯、纪昀诸家之评较著名,冯浩《玉谿生诗集详注》尤精博。今人叶葱奇、刘盼遂、周振甫等或有新注,或有选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则汇集前人评笺,断以己意,晚出转精。义山年谱数家,近人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考订较详核。《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唐才子传》卷七、《唐诗纪事》卷五三等。(纪伟)

【李群玉】(812?—861?)字文山,排行四。澧州澧阳(今湖南澧县)人。少好吹笙,妙解音律。清才旷逸,以吟咏自适。湖南观察使裴休厚礼延其至郡中,颇多嘉勉。唐宣宗大中八年(854),进京献诗三百篇。值裴休为相,令狐绹又力荐,遂授弘文馆校书郎。与杜牧、张祜、段成式、方干、李频等人游处唱和。后归湘中,卒。昭宗光化三年(900),韦庄上表奏请追赐李群玉、李贺、温庭筠、贾岛等进士及第。群玉工于诗,“诗笔遒丽,文体丰妍”,“格调清越”(《唐才子传》卷七)。令狐绹称其“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籍甚于一时”(《荐处士李群玉状》)。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博解宏拔主”鲍溶之“上入室”者,然溶诗实不如群玉。诗多妙篇佳句,辛文房谓其“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为“已曲尽羁旅坎壈之情”(《唐才子传》卷七)。杨慎称其《人日梅花诗》“亦有思致”,称诗中“玉鳞寂寂飞斜月”为“真奇句也,‘暗香浮动’恐未可比”(《升庵诗话》卷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群玉诗》三卷、《后集》五卷。《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今人羊春秋有《李群玉诗集》辑注本(岳麓书社出版社)。事见令狐绹《荐处士李群玉状》、《北梦琐言》卷六、《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四、《唐才子传》卷七等。(林长永)

【卢肇】字子发,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李德裕贬袁州刺史,肇以文投献,为其知赏。武宗会昌三年(843),德裕拜相,力荐肇于主司王起,遂以状元登进士第。宣宗大中元年(847),鄂岳节度使卢商辟为从事。后又入江陵节度使裴休、太原节度使卢简求幕。入朝任秘书省著作郎,迁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直学士。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历歙、宣、池、吉四州刺史,皆有政声。卒年不详。肇兼擅诗、文、赋。林韞称其文翰“海内知名”(《拔铎序》)。其《甘露寺诗》以“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二句为张祜激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海潮赋》一卷、《通屈赋》一卷、注林绹《大统赋》二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其《文标集》三卷。叶梦得称其有《逸史》三卷(《避暑录话》卷上)。《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又一首,《全唐诗补逸》补四首,《全唐

诗续拾》补诗三首、断句三。事见其《进海潮赋状》、《云溪友议》卷上、卷中、《唐诗纪事》卷五五等。

(林长永)

【储嗣宗】润州延陵(今江苏金坛)人。郡望兖州(今属山东)。储光羲之曾孙。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登进士第。懿宗咸通(860—874)年间,任校书郎。后归隐以终。嗣宗论诗推崇王维,其《过王右丞书堂二首》称维“澄潭昔卧龙,章句世为宗。独步名声在,千岩水石空”,“风雅传今日,云山想昔时”,“千载五言诗”。嗣宗工诗,与司马札、顾非熊相善,有诗酬唱。辛文房称其“苦思梦索,所谓逐句留心、每字着意,悠然皆尘外之想”(《唐才子传》卷八)。谢榛称宋谢枋得之“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为祖袭嗣宗之“春风莫逐桃花去,恐引渔人入洞来”(《四溟诗话》卷二)。《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储嗣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司马札】《唐诗品汇》作司马礼,误。生卒年籍贯不详。唐宣宗大中(847—860)时人。与储嗣宗友善。曾登进士第。一生漂泊,落拓而终。札能诗,周容称其《宫怨》一诗“较蕴藉,不碍大雅”(《春酒堂诗话》)。许学夷评其诗“间有远韵,亦能成篇”(《诗源辨体》)。辛文房则称其与王周、苏拯、李咸用等人“虽有集相传,皆气卑格下”(《唐才子传》卷十)。《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司马先辈集》一卷。《全唐诗》于司马札名下存诗一卷。“札”实为“礼”之误。事见《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等。(林长永)

【曹邴】(816?—875?)字邴之,亦作业之。桂州阳朔(今属广西)人。累举进士不第,乃作《四怨三愁五情诗》以抒愁怨哀愤。后见知于礼部侍郎韦慤,力荐于裴休。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裴休知贡举,邴登进士第。天平军节度使韦损辟为节度推官。懿宗咸通二年(861),任太常博士。在任敢于正言劝谏。咸通四年,白敏中卒后册赠太尉,邴责其病不坚退,且逐谏臣,举怙威肆行,议谥“丑”。咸通六年,宰相高彦休卒,赠司空。邴言其为相交游丑杂,进取多蹊,以其不思安爱,请谥为“刺”。后迁主客员外郎,又任祠部郎中。出为洋州刺史。迁吏部郎中。弃官南归,隐居而终,葬于桂林。邴工于诗,与郑谷、李洞、刘驾等游处唱和。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升堂者。其诗“多怨老嗟卑之作,盖坎壈不遇,晚乃成名,故一主寄托,不出此意”(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诗风古朴,胡震亨评为“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邴、刘驾、聂夷中、于濂、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

真,不觉成此一体。……就中邺才颖较胜”(《唐音癸签》卷八)。陆时雍亦称“五言古诗非神韵绵绵,定当捉襟露肘。刘驾、曹邺以意撑持,虽不迨古,亦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矣”(《诗镜·总论》)。钟惺、谭元春称“此君艳诗好手,以快情急响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则不能妙”(《唐诗归》卷三四)。《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著录《曹邺诗》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曹邺古风诗》二卷。明人有《曹祠部集》辑本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事见《唐摭言》卷四、《新唐书·白敏中传》、《新唐书·高璩传》、《唐诗纪事》卷六〇、《唐才子传》卷七等。

(林长永)

【薛能】(817?—?)字大拙,汾州(今陕西汾阳)人。唐武宗会昌六年(846),登进士第。宣宗大中八年(854),书判入等,补盩厔尉。历太原、陕虢、河阳从事。李福镇滑州,表为观察判官。入朝历侍御史、都官员外郎、刑部员外郎等职。懿宗咸通五年(846),李福徙西川节度使,奏能为节度副使,摄嘉州刺史。复入朝历主客、度支、刑部郎中。迁同州刺史、给事中。咸通十一年,拜京兆尹。后历徐州刺史、感化军节度使、工部尚书、忠武军节度使。许州军乱,能不知所终。性耽癖于诗,而自矜其才,乃至傲视陶潜、李白等前贤。其诗多近体,而“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若刍豢悦口,咀嚼自佳”(蔡絛《蔡百衲诗评》)。《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著录《薛能诗集》十卷、《繁城集》一卷。《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事见《北梦琐言》卷六、《唐诗纪事》卷六〇、《唐才子传》卷七等。今人谭优学有《薛能行年考》。(林长永)

【郑嵎】字宾光,一作宾先,籍贯不详,少时曾在临潼依石甕寺读书,时在唐文宗开成(836—840)间。宣宗大中五年(851),中进士。在京举进士间与李都、崔雍、孙瑄并称“四君子”,为一时名士。嵎读书石甕寺时,已闻开元、天宝间玄宗遗事。后自虢入京求名,过骊山华清宫门外,宿于旅舍,“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阑酒馀,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翌日,于马上辄裁刻俚叟之话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见《津阳门诗序》)。此即其名作《津阳门诗》,除《秦妇吟》外,它是唐诗中字数最多之作。全诗记叙玄宗朝升平遗事以及安史乱后华清宫中景象。诗中时有自注,与杂录小说符合。其中对盛唐时期宫廷奢侈糜费生活的描写颇具功力,有明显地学习模仿元稹《连昌宫词》与白居易《长恨歌》之倾向,然其诗警策清越,不及元白多矣。(所引皆见杨慎《升庵诗话》)(《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皆记其存《津阳门诗》一卷,今存。《全唐诗》存其诗

一首,即《津阳门诗》,《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一联。《宋史·艺文志》记有《郑嵎表状略》三卷,已佚。其生平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七。(王学泰)

【周朴】(?—879)字见素,一作太朴。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旧说或作长乐(今福建长乐)、泉州(今福建泉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疑均误。唐末避居闽中,寄食于乌石山僧寺,与乌石僧灵观、双峰法主、大汾懒安等为禅悦之交。朴为人高傲纵逸,远尘俗,无争逐,惟与山僧钓叟相往还,以道尊德贵为时人所推重。诗人张为、贯休、李群玉等与之交往甚密。宣宗大中(847—860)末,福建观察使杨发、李海怜其才而延揽之。朴固辞不就。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攻入福州,朴不从其邀,遂为所杀。朴性喜吟诗,每搜奇抉思而忘返,其为诗思迟苦吟,盈月方得一联一句,得必惊人,往往未及成篇,已播人口,时人称为“月锻季炼”。尝野逢樵人,因感发而成“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句,竟欣喜若狂。欧阳修称其“构思尤难,每有所得,必报雕琢”,并赞其“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为“佳句”(《六一诗话》)。张为《诗人主客图》列朴为“清奇僻苦主”之“上入室”者,且引其“古陵寒雨绝,高鸟夕阳明”、“高情千里外,长啸一声初”二联为序。胡震亨评曰:“周朴从苦思中得猛句,陡目欲惊,其不合者亦多可憎,是贯休一流诗。”(《唐音癸签》卷八)朴既卒,友人僧栖浩据拾其诗一百首,于中和二年交林嵩辑集,并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周朴诗二卷,今已佚。现有席本《周见素诗集》。《全唐诗》存诗一卷,凡四十五首,又九联。《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断句七。事见林嵩《周朴诗集序》、《唐诗纪事》卷七一、《唐才子传校笺》卷九。(黄维华)

【高骈】(821—887)字千里。幽州(今北京西南)人。少习武艺,又折节为文。一生仕宦显达。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间,为灵武军节度朱叔明司马,曾一箭射落双雕,人称“落雕公”、“落雕御史”。历神策军都虞候、秦州刺史兼防御使、安南都护、天平军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僖宗乾符五年(878),为荆南节度使,封燕国公。又历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等职。黄巢起义时,骈拥兵自重,僖宗遂封其为渤海郡王,而夺其兵权。骈上书谩言不恭,致失威失势。又托求神仙,宠信吕用之、诸葛殷等人。光启三年(887),军乱,为部下所杀。骈能诗,“雅有奇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高骈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逸》补断句四,《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旧唐书》卷一八二、《新唐

书》卷二二四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胡曾】号秋田。邵阳(今属湖南)人,《直斋书录解题》、《邵阳乡土志》均主此说,《唐才子传》作长沙(今属湖南)人。曾为人气度不凡,屡试不第,尝寄愤于诗云:“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闲人折一枝。”遂遨游四方,穷年在辙,遍受公卿礼遇。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路岩罢相为西川节度使,曾入蜀赴辟为节度从事。僖宗乾符元年(874),高骈任西川节度使,辟曾如故。乾符五年,曾又为高骈荆南从事。曾居军幕中,每览陈迹,慷慨怀古,辛文房称其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后有拟效者,不逮矣。”其近体律绝,亦“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居中品不过也”(均见《唐才子传》)。有《咏史诗》三卷传世。《全唐诗》编为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全唐文》存其文四篇,《全唐文拾遗》又补收两篇。事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唐诗纪事》卷七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八。(黄维华)

【刘沧】字蕴灵,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尚气节,好谈古论今。累举进士不第;至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始成进士,时白发已生。授华原尉。后任龙门县令。卒年不详。晁公武称其“诗颇清丽,句法绝类赵嘏”(《郡斋读书志》)。严羽谓其“胜(晚唐)诸人”(《沧浪诗话·诗评》)。范晞文评其诗“序怀感之意,得讽兴之体”,“七言间类许浑,但不得其全耳”(《对床夜语》卷三)。王世贞赞其五言诗“皆铁中铮铮者”(《艺苑卮言》卷四)。胡震亨云:“刘沧诗长于怀古,悲而不壮,语带秋意,衰世之音也欤?”(《唐音癸签》卷八)贺裳称其诗“极有高调,且终卷无败群者,但精出处亦少”(《载酒园诗话又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沧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卷八等。

(林长永)

【周繇】(822?—?)字为宪,池州至德(今安徽东至)人。家贫。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登进士第。有诗名,与郑谷、张乔、许棠、喻坦之、李昌符等人号为“咸通十哲”。授福县尉。又任校书郎。调至德令。卒年不详。繇工于诗,与温庭筠、段成式等人有交游。为诗“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闾域,时号为‘诗禅’。……为不入于邪见,能致思于妙品”(《唐才子传》卷八)。诗多警句。清陆葢称其多景楼诗“绝佳,今人罕称之者”(《问花楼诗话》卷一)。《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繇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

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唐诗纪事》卷五四、《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唐才子传》卷八等。

(林长永)

【许棠】(822—?)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屡举进士不第。曾至太原谒马戴,一见如故。与张乔、周繇、张蠍时号“九华四俊”。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有诗名。与张乔、郑谷、喻坦之、周繇、李昌符等人号为“咸通十哲”。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刘邺镇淮南,辟为淮南馆驿官。授泾县尉。后任虔州从事。僖宗乾符(874—879)年间,任江宁丞。后辞归,闲居泾县陵阳别业。卒年不详。棠工于诗,好苦吟,与张乔、马戴、李频、林宽、薛能等游处酬唱。林宽称其诗“发枯穷韵律,字字合坝箴。日月所到处,姓名无不知”(《送许棠先辈归宣州》)。胡震亨称“许文化致语楚楚,《洞庭》一联,人多取以题扇。‘四顾疑无地,中流忽见山’,视老杜‘乾坤日夜浮’愈切愈小”(《唐音癸签》卷八)。贺裳则谓“读其全集,数篇之外,皆枯寂无味”(《载酒园诗话·又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许棠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二卷。事见《唐摭言》卷四、《唐语林》卷七、《唐诗纪事》卷七〇、《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汪遵】一作王遵。生卒年、字号均不详,约唐僖宗乾符(847—879)前后在世。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初为小吏,家贫无书,每借书必昼夜苦读,以是工诗,然深自晦密。后辞吏役应举,遇同乡许棠,为所轻侮;懿宗咸通七年(866),登进士第,而许棠于五年后始及第。遵善歌诗,尤长绝句,其咏史诗颇为著名,何光远评其《长城》诗:“此诗卓绝,千百集中无以加。”(《诗话总龟》卷一五引《诗史》)辛文房称其“拔身卑污,奋誉文坛”,并谓其《题李太尉平泉庄》、《过杨相宅》诗“俱为诗人称赏,其余警策称是”(《唐才子传》卷八)。《宋史·艺文志》著录其咏史诗一卷,或谓元时犹传。《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事见《唐摭言》卷八、《鉴戒录》卷九、《唐诗纪事》卷五九、《唐才子传校笺》卷八。(黄维华)

【李昌符】字岩梦。《唐才子传》作若梦,误。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有诗名,与许棠、张乔、郑谷等十人称“咸通十哲”。累举进士不第。作《奴婢》诗五十首,诸篇皆中婢仆之讳,盛传京师。咸通四年(863),登进士第。僖宗朝累迁膳部郎中。卒年不详。昌符工诗,与郑谷等人多有酬唱。王世贞称其“《婢仆诗》五十韵皆可鄙笑者,然曲尽形容,颇见才致”(《艺苑卮言》卷八)。贺裳谓其诗“写景最为刻划,而无蹇涩之态,胜诸苦吟多矣”(《载酒园诗话·又编》)。晚唐另有一李昌符,乃昭宗时之风翔节度使,以叛伏诛。后人多有将二人混而为一者。《直斋书

录解題》著录《李昌符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事见《北梦琐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七〇、《唐才子传》卷八等。

(林长永)

【林宽】 侯官(今福建闽侯)人。早年尝入太学,亦曾游边塞。或尝隐于僧舍,与诗僧栖白等有诗交。久困场屋,屡举乃第,有《下第寄欧阳瓛》、《酬陈樵见寄》、《献同年孔郎中》等诗。与诗人李频、许棠等友善,与黄滔交笃知深达数十年。其诗多即事遣怀之作,擅律、绝,尤以《闻雁》、《华清宫》、《终南山》等诗为出色。所作古体《苦雨》、《和周繇校书先辈省中寓直》则奥僻奇崛,颇受韩愈诗风影响。《全唐诗》存其诗一卷。事见其诗及黄滔《寄林宽》、《送林宽下第东归》、《延福里居和林宽何绍馀酬寄》等诗,《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

(黄维华)

【步非烟】 唐懿宗咸通(860—874)间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妾。容止纤丽,工诗文,尤善击瓠,韵协丝竹。武公业性粗暴,非烟所遇匪人,乃叹道:“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有邻人赵象,心慕非烟,求武之门媼将所作诗递赠之,诗云:“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谁来。”非烟作《寄诗答赵象》:“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谁”,付门媼遗象。后又有诗赠答;非烟并以一蝉锦香囊赠象。由此二人情爱弥笃。逾年,事为武发觉而拷问之,非烟但曰:“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武暴怒,遂笞非烟致死。赵象则更名易服,逃亡江淮。事见《太平广记》卷四九一引皇甫枚《非烟传》、《唐诗纪事》卷七九。《全唐诗》存诗四首。

(陈祖美)

【张乔】 字伯迁,池州青阳(今属安徽)人。曾隐居九华山十年。与许棠、张蠙、周繇时号“九华四俊”。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以韵律驰声”(辛文房《唐才子传》),与郑谷、许棠、喻坦之、李昌符、周繇等人号为“咸通十哲”。终生不第。僖宗广明(880—881)年间,复隐于九华山。卒年不详。乔工于诗。范晞文称“多有好绝句……亦(张)籍、(杜)牧之亚”(《对床夜语》卷五)。贺裳谓“乔亦有一气贯串之妙,尤能作景语”(《载酒园诗话·又编》)。交游甚广,与许棠、刘沧、李洞、杜荀鹤、杨夔等多有酬唱。《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乔诗集》二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七〇、《唐才子传》卷一〇等。

(林长永)

【喻坦之】 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屡举进士不第。有诗名,与郑谷、周繇、张乔、许棠、李昌符等人号为“咸通十哲”。曾

游太原、代北等地,布衣终生。坦之工于诗,与李频、曹松等友善,多有唱和。其诗多为题咏、酬赠之作,以五律占多数。《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喻坦之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语林》卷二、《唐才子传》卷九等。

(林长永)

【刘驾】(823—?) 字司南,江州都昌(今属江西)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朝廷收复河、湟,驾上《唐乐府十首》以形容盛德。大中六年(852),登进士第。仕终国子博士。卒年不详。驾工诗。与曹邴友善,又与李频、薛能等游处唱和。辛文房称其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意尽即止,为时所宗”(《唐才子传》卷七)。延君寿称其“五古诗极有风味”(《老生常谈》)。杨慎则谓“刘驾诗体卑近,无可采者,独‘马上续残梦’一句,千古绝唱也”(《升庵诗话》卷一二)。贺裳也称“刘驾诗亦多直,然集中尚不乏佳篇。世传其‘马上续残梦’一诗,诚为杰构”(《载酒园诗话·又编》)。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升堂者。《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刘驾集》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古风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摭言》卷四、《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七等。

(林长永)

【郑畋】(825—883) 字台文,排行大。荥阳(今属河南)人。唐武宗会昌(841—846)时名臣郑亚之子。会昌二年(842),年仅十八岁,登进士第。武宗因其年少而疑之,亲阅其试卷乃可。释褐为汴宋节度推官,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父贬桂州,畋随侍在侧。懿宗咸通五年(864),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县令。咸通九年,入为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寻加知制诰。次年,迁中书舍人,后以忤旨出为梧州刺史,徙郴、绛二州。僖宗乾符元年(874),擢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后加中书侍郎,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以议黄巢事,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终太子太保,卒谥文昭。畋长于制诰,亦工诗,以诗多颂圣感恩之作,如《杪秋夜直》、《麦穗两歧》等。以《马嵬坡》一诗最为有名,颇为后人称道。宋吴升以为此诗取意杜甫《北征》之“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姒”(《优古堂诗话》)。《全唐诗话》亦载:“观者以为有宰辅之器。”其写景小诗,如《夜景又作》亦清新可诵。著有《玉堂集》、《凤池稿草》等,均佚。宋《郡斋读书志》尚记其有《郑畋集》五卷,后亦散佚,《全唐诗》录其诗十六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旧唐书》卷一七八、《新唐书》卷一八五皆有传。

(王学泰)

【李郢】(832—?) 字楚望,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三引《九国志》作长安

人,误。初居杭州,不务进取功名。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应杜牧之招至湖州,有诗酬唱。大中十年(856),登进士第。历淮南、信州、睦州从事。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官侍御史,与鱼玄机有诗往还。后为越州从事,卒于任。郢工诗,方干赞为“物外搜罗归大雅,毫端剪削有馀功”(《赠李郢端公》)。时天彝称其“结思尤清”(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辛文房谓其诗“理密辞闲,个个珠玉。其清丽极能写景状怀。每使人竟日不能释卷”(《唐才子传》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郢诗》一卷。《新唐书》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三十五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事见《金华子杂编》卷下、《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郑繁】(?—899)字蕴武,行五,故人称郑五。籍贯不详。登进士第,历监察御史、仓部员外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转为户部员外郎,后擢为金司郎中,历刑、右司郎中。以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后入朝为给事中、右散骑常侍。时政局混乱,朝有弊政,每上书论列,亦常为诗刺之。昭宗赏其激昂敢讽,于乾宁元年(894)擢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入相数月后,以不孚众望去职。繁亦自嘲云:“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为诗善滑稽,好作歇后句,故有“歇后郑五”之称。苦心吟诗,近于姚合、贾岛。“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见《全唐诗话》)从中可见其审美情趣。《全唐诗话》引《古今诗话》云:“繁善诗,有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粘柱础,宿火陷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麕寒入来。’常云,此诗属对,可以衡秤,言轻重不偏也。”可知郑诗注重属词炼字。《全唐诗》录其诗四首、断句二。《旧唐书》卷一七九、《新唐书》卷一八三皆有传。

(王学泰)

【慎氏】唐懿宗咸通(860—874)前在世,毗陵庆亭(今江苏常州)儒家之女。适三史严灌夫,同归蕲春(今湖北东部,长江北岸,蕲水流域)。经十馀年无子,严因拾其过而出之。慎氏慨然登舟,以诗与夫诀别。严览诗而愧,乃为夫妻如初。事见《云溪友议》卷上。《全唐诗》存诗一首,题作《感夫诗》,一作《留别》,一作《与夫诀》,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陈祖美)

【薛媛】唐懿宗咸通(860—874)前在世,颍(今河南许昌)人,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南楚材之妻。善画,妙属文。楚材游陈颖间,久不归。颍州刺史欲以女妻之,楚材许诺。更托言不复返。薛媛微知其意,对镜图形,题诗寄之。楚材见后,幡然悔悟。归与偕

老,里人为之语云:“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事见《云溪友议》卷上。《全唐诗》存诗一首,题作《写真寄夫》。(陈祖美)

【于湊】字子滴。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蹉跎科场近二十年。唐懿宗咸通二年(861),登进士第。官终泗州判官。湊工诗,尤长古风。湊“患当时作诗者拘束声律而入轻浮,故作《古风》三十篇以矫弊俗,自号‘逸诗’”(《唐才子传》卷八)。阮阅称其诗“颇干教化”(《诗话总龟》卷一)。胡震亨谓其与曹邴等人诗“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湊诗》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于湊古风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唐诗纪事》卷六一、《唐才子传》卷八、《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四等。(林长永)

【张孜】字号无考,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末懿宗、僖宗时处士,耽酒如狂,好诗成癖。早年作品多不善,其诗友李山甫亦常轻之,后多刺世伤时之作,稍为时人所称善。关中动乱,僖宗避乱入蜀,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孜赋诗刺之云:“着牙卖朱紫,断钱賒举选”,以此为时宰所嫉。僖宗回京,遣人追捕之,故易隐姓名、渡淮河南逃,后不知所终。《全唐诗》存诗一首、断句十句,《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其中《雪诗》揭露唐末贫富对立,描写了贫民百姓饥寒交迫的痛苦,诗风平易质朴。其生平事迹见《鉴戒录》卷九,《唐诗纪事》卷六七。(王学泰)

【罗虬】(?—881?)台州(今浙江临海)人。累举进士不第。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与秦韬玉、沈雲翔等十人被称为“芳林十哲”。曾为鄞州刺史李孝恭从事。虬性狂宕躁进,曾赠歌妓杜红儿缙彩,李孝恭不令红儿受,虬即怒杀红儿。后追悔,遂赋《比红儿诗》绝句百首以追其冤,盛传一时。僖宗广明元年(880),官台州刺史。兵乱遇害。虬工诗,词藻富赡,咸通、乾符(874—879)间,与罗隐、罗邺俱享诗名,时号“三罗”。而虬“气宇终不逮”(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翁方纲则讥其“《比红儿诗》俚劣之甚……乃以此得名于时,亦奇矣”(《石洲诗话》卷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比红儿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逸》补诗一首、断句八。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吴越备史》卷一、《北梦琐言》卷一三、《唐诗纪事》卷六九、《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秦韬玉】字中明,《唐诗纪事》作仲明,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作郃阳(今陕西合阳)人。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依傍权贵、交通宦官,与罗虬、沈雲翔等十人被称为“芳林十哲”。声名狼藉,累举进士不第。后谄事宦官田令孜。黄巢攻破长安,

稻玉随僖宗入蜀,任工部侍郎、判盐铁。僖宗中和二年(882),特赐进士及第。中和四年(884),官工部侍郎、判度支。又任田令孜神策军判官。辛文房谓其“工歌吟,恬和浏亮”(《唐才子传》卷九)。胡震亨称其“调似李山甫,《咏手押髻字》诗尤娇痴可喜”(《唐音癸签》卷八)。贺裳云:“秦稻玉诗无足言,独《贫女》篇遂为古今口舌。‘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读之辄为气短,不减江州夜月、商妇琵琶也。”(《载酒园诗话又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投知小录》三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秦稻玉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事见《唐摭言》卷九、《唐语林》卷四、《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罗邺】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唐摭言》卷一〇作余杭人,误。家富于财,累举进士不第。曾出塞赴职单于牙帐。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入池州刺史幕。后漂泊潇湘间。又俯就江西观察使崔安潜督邮一职。僖宗乾符三年(876),崔安潜迁忠武节度使,邺随至许昌。又曾游蜀、秦。晚年归乡闲居而终。邺工诗,咸通、乾符间与罗隐、罗虬俱享诗名,时号“三罗”。而“当以邺为首”(杨慎《升庵诗话》卷一)。邺“才清而有致”(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其诗“无一题不以寄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僧贯休推赏为“清世诗声出,谁人得似君”(《海边见罗邺》)。贺裳则谓“邺长律亦卑浅不足观,惟绝句工妙”(《载酒园诗话又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罗邺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李山甫】(?—888?)籍贯不详。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累举进士不第。僖宗中和三年(883),入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幕,为判官。光启三年(887),奉彦祯书使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拒王焜之乱,事未成。又劝彦祯子从训劫杀河中都统王铎一家。文德元年(888),魏博军乱,乐氏父子被杀,山甫或亦卒于是年。山甫落魄而不羁,僧俗尚豪,胸怀郁郁之气。辛文房称其“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唐才子传》卷八)。其《牡丹》诗为司空图称赏,赞为“谁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属思亦纵横”(《偶诗五首》)。余成教称其《柳》诗“善于自况。……皆自然流丽”(《石园诗话》卷二)。胡震亨则称其“求名不遂,满腹怨毒,语不忌俚”(《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山甫诗》一卷、《李山甫赋》二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见《北梦

琐言》卷一三、《新唐书·乐彦祯传》、《南部新书》卷丁、《唐诗纪事》卷七〇、《唐才子传》卷八等。

(林长永)

【黄崇嘏】约唐僖宗至哀帝(874—907)前后在世。临邛(今四川邛崃)人,黄使君之女。工诗文,又善琴棋书画。幼孤,常着男装游历。昭宗(889—904)初年,因失火事下狱,乃献《下狱贡诗》于蜀相周庠以自陈,诗曰:“偶辞幽隐在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在深笼?”周庠览诗感而释之。召见时喜其应对详敏,乃荐其为摄司司户参军。在任近年,理事敏捷秉公,案牍明丽。周庠爱重其才,欲以女妻之。崇嘏上诗辞婚,自陈为女身,且未婚。旋乞罢职,归临邛与老姬同居,后不知所终。事见《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引《玉溪编事》。《全唐诗》存诗二首。明徐渭所作《女状元》即衍其事,杨慎则确信其真。(陈祖美)

【章碣】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家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章孝标之子。唐懿宗咸通(860—874)末,以诗知名于世。累举进士不第。僖宗乾符四年(877),礼部侍郎高湘主文,以其所携至京之举子邵安石及第,碣又下第,遂赋《东郡望幸》诗以刺之。后数年终登进士第。因乱离流落毗陵一带,不知所终。“碣有异才,尝草创诗律,于八句中,足字平侧,各从本韵。……自称变体”(《唐才子传》卷九)。时人多有效之者。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于“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句下注曰:“唐章碣有此体,不足为法。”其七绝《焚书坑》为人称诵。胡应麟则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皆仅去张打油一间,而当时以为工,后世亟称之,此诗所以难言也”(《诗薮·内编》卷六)。《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著录《章碣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唐诗纪事》卷六一、《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钱珣】字瑞文,吴兴(今属浙江)人。钱起曾孙。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登进士第。昭宗龙纪元年(889),官太常博士。调京兆府参军。迁蓝田县尉,充集贤校理。又为膳部郎中、知制诰。乾宁三年(896),进中书舍人。光化三年(900),贬为抚州司马。后不知所终。生前又曾任章陵令。珣工诗,尤善绝句,有《江行无题》一百首。杨慎称“钱珣《咏史》:‘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应断,始拟丘迟一为招。’此为咏梁将军陈伯之事。……诗皆用书中语,括书咏史如此,射雕手也。如胡曾、汪遵,不堪为奴仆矣”(《升庵诗话》卷一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舟中录》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又著录《钱珣制集》十卷。钱珣诗多有混入

钱起集中者。《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移正八首。《新唐书》卷一七七《钱徽传》有其附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六六、《唐才子传》卷九等。

(林长永)

【邵谒】韶州翁源(今属广东)人。少为县小吏,尝因客至仓卒,不及迎待,为县令逐去。遂截发挂县衙门上,发愤苦读。唐懿宗咸通七年(866),为国子监生。国子助教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榜彰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评赞其“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榜国子监》)。不久,登进士第。后赴官,不知所终。胡震亨则谓其“竟不得第而死”(《唐音癸签》卷一八);观谒诗《下第有感》、《自叹》、《秋夕》等,似亦终身未第,此释褐仕官之说从《唐才子传》。谒工于五古,诗多讥贬时政、抨击豪强的愤愤之作,其中以《寒女行》、《长安寒食》、《春日有感》等为代表。胡震亨评其“多有愜心句堪击节”,与曹邺、刘驾等人诗“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初看殊难入,细玩亦各有意在”(《唐音癸签》卷八)。《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邵谒集》一卷。宋李希声《诗话》记李乘彝家藏谒诗八十篇,今多佚。《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补四首又三句。事见《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校笺》卷八。

(黄维华)

【贯休】(832—913)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七岁出家兰溪和安寺,与邻院童僧处默辄相唱和,十五六岁时即著诗名。与王贞白切磋诗艺,尝改贞白《御沟诗》“此波涵帝泽”句,易“波”为“中”,为所叹服,遂结为至交。二十岁受具足戒,后移婺州五泄山寺,修禅十年。唐懿宗咸通(860—874)初,游学于洪州,居钟陵山中,后漫游江西、吴越。僖宗乾符(874—879)初,复返婺州。昭宗乾宁元年(894),往钱塘,以诗五首谒吴越武肃王钱镠,后镠以“去伪”、“平越”旌为功臣,特刊休诗于碑阴。旋游黟歙,与歙州唐安寺僧清澜游。乾宁二年初,赴江陵依荆南节度使成汭,居龙兴寺,与吴融日夕过从,酬唱循环;翌年,吴融应召还朝,于光化二年(899)为贯休作《西岳集序》。天复二年(902),得罪成汭,流放黔州,寻逃往南岳衡山隐居。天复三年秋,入蜀,以诗谒王建曰:“一铎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为建所重,特修龙华院禅寺,请为住持,因赐名“禅月大师”,亦呼为“得得和尚”。后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十二月卒。休擅诗名,与栖隐、许棠、陈陶、韦庄、吴融、罗隐、韩偓、裴说、齐己等均有酬唱,诗交甚广。辛文房谓其“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唐才子传》)。吴融评曰:“上

人之作,多以理胜。复能创新意,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自然之际,然其旨归,必合于道。太白、白乐天既没,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谁?”(《西岳集序》)而贯休并不满意吴融为其诗集所写的序,后又令弟子昙域重序(见昙域《禅月集后序》)。休又善书擅画,其书谓“姜体”,时人或比之怀素;其画以作罗汉像见长,为澜公所画十六罗汉像,为世所宝。今存《禅月集》二十五卷。《全唐诗》编其诗为十二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二首,《全唐诗续补逸》补诗八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七首、断句六。《全唐文》存文四篇。事见昙域《禅月集序》、《宋高僧传》卷三〇、《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十国春秋》卷四七本传。(黄维华)

【罗隐】(833—910)本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排行十五,余杭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少敏慧,善属文,诗名远闻,尤长于咏史,为相国郑畋、李蔚所重。然恃才傲物,多所讥讽,以故为流俗所恶。累举不第,遂改名为隐。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为衡阳主簿,是冬去任。后历淮、润诸镇,复多龃龉,乃归故里。僖宗广明(880—881)、中和(881—885)间,避乱隐于池州梅根浦六、七载,与池守窦滂交厚。光启三年(887),依杭州刺史钱镠,谒中有诗《夏口》,云:“一个衲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镠览之大喜,因加殊遇,表奏为钱塘令,迁秘书省著作郎。昭宗景福二年(893),镠筑杭州罗城,任镇海军节度使,辟隐为掌书记。尝为镠改谢表,词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又为作贺昭宗改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京城称为第一。哀帝天祐三年(906),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慕其名,尝效其诗,自谓《偷江东集》;因通谱昭穆,拜隐为叔父,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授给事中。次年,迁盐铁发运使,十二月(910年初)病卒于萧山。隐为人介僻寡合,其诗文常以讥刺为主。咸通八年自辑其小品文集《谗书》五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诗与罗虬、罗邺齐名,世称“三罗”,以隐为突出。其诗以咏史为佳,亦多咏物讽喻之作,风格“雄丽而坦率”(《唐才子传》),浅俗平易,多用口语,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自遣》),“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等,传诵至今。清戴京谓“罗昭谏诗言中有响,三百篇后颇寓讽谏之意。或者以其语多平易而忽之,要之胜填词豪艳而无当于兴感者什百矣。况其精邃自然处,正复不让唐之初盛”(《罗昭谏集序》)。长于七律,清洪亮吉评曰:“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悲凉,沉郁顿挫,实可远绍浣花,近侔玉溪,……迥非他人所及。”(《北江诗话》卷六)著撰颇多。郑樵《通志·艺文

略》著录有《罗隐集》二十卷、《罗隐江东后集》三卷、《吴越掌记集》三卷、《罗隐赋》一卷、《淮海寓言》七卷、《湘南应用集》二卷、《罗隐启事》一卷。其他书录尚著录有《谗书》五卷、《甲乙集》十卷、《谗本》三卷、《外集诗》一卷、《歌诗》十四卷、《汝江集》三卷、《两同书》二卷、《妖乱志》等。然集多散佚。今人雍文华辑有《罗隐集》，收《谗书》、《甲乙集》、《广陵妖乱志》、《两同书》、《杂著》。《全唐诗》存其诗十一卷，又联句一；《全唐诗逸》补断句二，《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逸》补诗八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五首、断句十五、移正一首。《全唐文》编其文为四卷。事见沈嵩《罗给事墓志》、《吴越备史》卷一、《五代史补》卷一、《旧五代史》本传、《唐诗纪事》卷六九、《唐才子传校笺》卷九。今人汪德振有《罗隐年谱》。

(黄维华)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望族。龟蒙性野逸无羁，少有高致，识六经大义，尤谙《春秋》。善属文，名震江左。尝往谒饶州刺史蔡京，不欢而去。懿宗咸通六年(865)，入睦州刺史陆墉幕。约在咸通九年，应举不第，遂不复赴试。咸通十年，崔璞刺吴，皮日休为郡从事，荐其入幕；皮、陆遂结为知交，时相赠和。参与皮、陆唱和者，还有张贲、李穀、颜萱、魏朴等。有唱和诗六百八十五首，龟蒙编为《松陵唱和集》，皮日休为序。咸通十三年入湖州刺史张搏幕下为从事，随搏历游湖、苏间。僖宗乾符四年(877)，郑仁规刺湖州，龟蒙往受辟。未几，仁规调任襄阳副使，龟蒙即称疾返归故里。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泽，自编诗文集《笠泽丛书》。中和初(约882)，卒。吴融曾作《奠陆龟蒙文》。昭宗光化三年(900)，由韦庄奏请追赠其进士及第，并授右补阙。其后期隐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未尝少辍。嗜茶，自判品第，为书一篇。常喜放一扁舟，设蓬席，备书卷、茶炉、笔床、钓具，泛于太湖，尝以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自比。龟蒙诗文并擅，与皮日休齐名，世称“皮、陆”。其诗以写景咏物为多，亦有关心民生之作。近体受温、李影响，皮日休谓“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松陵集序》)。其七绝如《白莲》、《自遣》、《新秋杂题·眠》等，造境清幽，联想丰富，均见其笔淡而意浓之风格。其古体受韩愈影响，以铺张恣放为特点。胡震亨谓其“江湖自放，诗兴宜饶，而墨采反复黯钝者，当繇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耳”(《唐音癸签》卷八)。其唱和诗，沈德潜谓“另开僻涩一体”(《唐诗别裁集》卷四)，但正如其《甫里先生传》中所言，“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

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兼学众体，不拘一格，富于变化，由奇险奥僻而造乎平淡，此正龟蒙之风调。小品文如《野庙碑》、《鸬鹚》、《蠹化》等，多以辛辣的讽刺映显其“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著撰颇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笠泽丛书》三卷、《诗编》十卷、《赋》六卷、《小名录》五卷，与皮日休等唱和之《松陵集》十卷。《全唐诗》存诗十四卷，《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二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文》存文二卷。事见《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六四、《唐才子传校笺》卷八。

(黄维华)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南中都(今河南沁阳东北)人。出身贫寒。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登进士第。授华阴县尉。后仕履不详，亦不知所终。夷中工于诗，孙光宪称其“精于古体，有《公子家》”，“《咏田家》，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北梦琐言》卷三)。其诗内容“率多伤俗悯时之作，哀稼穡之艰难。适值险阻，进退维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含蓄讽刺，亦有谓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胡震亨谓“(唐)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濂、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初看殊难入，细玩亦各有意在。就中……夷中语尤关教化”(《唐音癸签》卷八)。其名作《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一首最为著名，“最得风人之体”(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冯道称为“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资治通鉴》卷二七六)。《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聂夷中诗》二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聂夷中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见《北梦琐言》卷二、《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六一、《唐才子传》卷九等。

(林长永)

【曹松】字梦徵，舒州(今安徽潜山)人。早年不达，唐懿宗咸通(860—874)中，尝游于湖广。僖宗乾符二、三年(875、876)间，依建州刺史李频。频既卒，遂归江湖，一无所遇。广明元年(880)，避乱栖居洪州西山，以处士游于洪州开元寺，与僧栖隐唱酬交往。昭宗光化四年(901)，与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同登进士第。以年皆老大，时谓“五老榜”；特敕授校书郎。未几，弃官南归，不知所终。松交游甚广，与方干、陈陶、贯休、喻坦之、许棠、裴说等皆有寄酬赠答。诗多览游之作。其为诗学贾岛，铸字炼句，意境幽深，齐己有诗谓其“旧制新题削复刊，工夫过甚琢琅玕”(《寄曹松》)。辛文房评其“为诗深入幽境，然无枯淡之癖”，又云：“苦极于诗，然别有一种风味，不沦乎怪也。”(《唐才子传》卷一〇)胡震亨亦谓“点缀末运，赖此名场一隻”(《唐音癸签》)。《全唐

诗》存诗二卷又九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六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郡斋读书志》卷一八。(黄维华)

【陆希声】(?—895?) 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初为岭南从事。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商州刺史郑愚表为僚属。后隐于义庆,自号“君阳遁叟”。僖宗乾符(874—879)初,召为右拾遗,累迁至歙州刺史。昭宗闻其名,召为给事中。乾宁二年(895),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太子少师。李茂贞犯京师,避难病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希声工书,僧朥光得其授。又博学善属文,通《易》、《春秋》、《老子》,论著甚多。亦工诗,所作多为七绝。明杨慎称其《阳羨杂咏十九首》之《梅花坞》“乃‘疏影暗香’之先鞭也”(《升庵诗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颐山诗》一卷。《全唐诗》卷六八九存诗二十二首。《新唐书》卷一六六《陆元方传》有其附传。事又见《宣和书谱》卷四、《唐诗纪事》卷四八等。

(林长永)

【皮日休】字逸才,后改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生卒年不详。性傲诞,初隐鹿门山。漫游江汉,嗜酒癖诗,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又号醉吟先生,自称醉士、酒民。懿宗咸通七年(866),应试不第,退居寿州,自编诗文为《皮子文藪》。翌年,登进士第,留居京师。咸通九年,应宏词不第,离京东游。咸通十年,苏州刺史崔璞聘为军事判官。与陆龟蒙唱和吴中,时称“皮、陆”。咸通十二年,崔璞罢郡,日休有诗赠别。咸通十三年前后,入朝为著作局校书郎,约两年后迁太常博士。时吴融久困名场,与之有酬唱。僖宗乾符(874—879)中出任毗陵副使,旋随高骈军,出至常州、润州一带。黄巢军攻掠浙西,陷巢军中。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称帝,授翰林学士。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或谓为巢作谏,见疑被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谓巢败获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引《该闻录》);或谓避广明之难,依吴越钱镠而终(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日休处唐末衰世,诗文皆有为而作,自谓“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文藪序》);又自云“于中有鉴戒,一一堪雕镌”(《和鲁望诗》),十分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故多讥砭时弊、侧隐民瘼之作,以《正乐府》十篇、《三羞诗》等为突出。与陆龟蒙唱和诗“则飚流顿盛,犹空谷有声,随响即答”(《唐才子传》卷八)。胡震亨评其“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唐音癸签》卷八)。其散文和辞赋亦大都讽谕、抒愤之作,被鲁迅称道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的

小品即是其一,同样体现了其所谓“裨造化、补时政”的创作思想。有自编《文藪》十卷,又诗集一卷、《胥台集》(《唐才子传》作《滑台集》)七卷、《鹿门家钞》九十卷、《鹿门隐书》六十篇并陆龟蒙所编、皮日休为序的《松陵唱和集》。《全唐诗》存其诗九卷又五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四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六四、《北梦琐言》卷二、《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今人萧涤非、郑庆笃校点之《皮子文藪》,附有《文藪》外诗文及有关序跋。(黄维华)

【唐彦谦】(?—893?) 字茂业,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累举进士不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咸通末登进士第,今从《旧唐书》本传)。唐僖宗广明(880—881)年间,为避兵乱迁居汉南,从事著述。自号“鹿门先生”。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表为从事。擢河中节度副使。中和二年(882),任晋州刺史,转绛州刺史。贬为兴元参军事。后历兴元节度判官、节度副使、阆州刺史、壁州刺史等职。昭宗景福(892—893)年间,卒于汉中。彦谦博学多艺,尤长于诗。辛文房以为“唐人效杜甫者,惟彦谦一人而已”(《唐才子传》卷九)。叶梦得评其诗“用事精巧,对偶亲切”(《石林诗话》卷中)。郑昉辑其诗为《鹿门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卷又十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其中《逢韩喜》、《夜坐示友》等四十首诗系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之作品,误混入唐氏名下(据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贗诗证伪》,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辑)。《旧唐书》卷一九〇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高蟾】河朔间(黄河以北地区)人,郡望渤海(今河北沧州一带)。出身寒素,性倜傥,尚气节。蹉跎场屋多年,至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始登进士第。昭宗乾宁(894—898)年间,官至御史中丞。卒年不详。蟾能诗,与郑谷、僧贯休为诗友,郑谷称其为“高先辈”。时天彝谓其“工为绝句,然无甚高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孙光宪则谓其“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北梦琐言》卷七)。辛文房则称其诗体“气势雄伟,态度谐远。如狂风暴雨之来,物物竦动,深造理窟”(《唐才子传》卷九)。《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高蟾诗》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见《唐诗纪事》卷六一、《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来鹄】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家贫。累举进士不第。曾入幕宣州。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受知于福建观察使韦岫。黄巢军攻破福州,鹄曾避乱山中。广明元年(880),僖宗奔蜀,鹄亦避地入蜀。中和(881—885)年间,卒于通议郎。鹄工诗,诗思清

丽。其诗多绝句,多为咏物、纪游之作。后人多误将鹏与以文章知名的来鹄混为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来鹏诗》一卷。《全唐诗》于来鹄名下存诗一卷,实除《圣政纪颂并序》外,余皆为鹏诗;《全唐诗补逸》补残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北梦琐言》卷七、《唐诗纪事》卷五六、《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韦庄】(836—910)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唐玄宗宰相韦见素之后,诗人韦应物四世孙(《蜀梼杌》等)。少孤家贫,苦读,工诗词。早年长期浪游江湖。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年后,谏议大夫李询宣谕两川,举庄以判官随行。光化三年(900),除左补阙;编唐一百四十二人诗为《又玄集》,以续姚合之《极玄集》。十二月,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陆龟蒙等进士及第。翌年,依西蜀王建,辟为掌书记,旋征为起居郎,留蜀事建。唐哀帝天佑三年(906),任西蜀安抚副使,佐建称帝,以功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晚年居杜甫浣花溪草堂旧址,后人因称“韦浣花”。卒于前蜀太祖武成三年(910)八月,谥文靖。韦庄以诗词名世。其诗今存三百余首,除反映时局动乱及民众疾苦而外,多“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作,王粲伤时之制”(韦蔼《浣花集序》)。其早年所作《秦妇吟》在当时广为流传,时人因号庄为“《秦妇吟》秀才”。该诗凡一千六百六十六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诗篇,其结构之严密、语言之生动与白居易的叙事诗有相似之处。庄诗风格清丽,“体近雅正”(《唐音癸签》卷八)。擅长五、七言律绝,尤以七绝为佳,《台城》等诗是其代表作。庄词今存五十余首,周济评为“清艳绝伦”(《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称其“凄艳人人骨髓”(《云韶集》),但又以为“风骨稍逊”(同前),王国维则谓其“骨秀”(《人间词话》)。庄词多为闺情离愁之作,风格与温词“异曲同工”(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史称“温、韦”,并为花间词之代表。但较诸温词之“密而隐”,韦词则“疏而显”(夏承焘《唐宋词欣赏》)。韦庄用语晓畅疏朗,王国维谓其“情深语秀”“在飞卿之上”(《浣花词跋》)。陈廷焯则认为“虽不及飞卿之沉郁,亦古今绝构也”(《词则》)。夏承焘认为韦词大都作于其及第以前流落江湖之时(见《唐宋词人年谱》)。其弟韦蔼编庄诗为《浣花集》五卷。《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尚著录有《谏疏集》三卷、《幽居杂编》一卷、《韦文靖笺集》一卷、《笺表》一卷、《蜀程记》一卷、《峡程记》一卷等,均佚。《全唐诗》收录其诗六卷,《补全唐诗》补一首(即《秦妇吟》),《全唐诗续拾》补二首。其《秦妇吟》长诗久佚,于近代从敦煌石室重新发现,收入近人所

辑《六经堪丛书初集·敦煌零拾》中。《全唐诗》又收庄词五十四阙。事见《蜀梼杌》卷下、《十国春秋》卷四〇本传、《北梦琐言》卷六、《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夏承焘撰有《韦端己年谱》。

(黄维华)

【司空图】(837—908) 字表圣。祖籍临淮(今江苏盱眙),幼举家迁居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少文采。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登进士第,得主司王凝赏识。后凝为宦歙观察使,辟图为幕吏。僖宗乾符五年(876),召为殿中侍御史,因趋赴迟留,责授光禄寺主簿。乾符六年,拜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广明元年(880),黄巢军攻入长安,图退居河中。光启元年(885),召知制诰,拜中书舍人。翌年,宦官田令孜于争乱中劫僖宗赴宝鸡,图复还入河中,隐居中条山王官谷,日与名僧高士相游咏,自号为“知非子”、“耐辱居士”。昭宗即位,屡召屡辞,终归山林。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召图为礼部尚书,亦辞不起。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闻哀帝被弑,图乃不食而卒。图擅文能诗,长于绝句。其诗多林泽之吟,写景咏物,笔调清丽,有“雨微吟思足,花落梦无聊”(《下方》)、“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消”(《早春》)之句为所自赏。其《南北史感遇十首》、《狂题十八首》、《有感》、《乱前上卢相》等篇什,则多时世之慨,其“兵围梁殿金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乱后人间尽不平,秦川花木最伤情”诸句,堪为“岖崎兵乱之间”(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的写实之笔。历来对其诗褒贬不一,东坡谓其“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同前),胡震亨则谓其“篇法未甚谙,每每篇不贯浹,如炉金欠火未融”(《唐音癸签》卷八)。图以诗论见称。其《与李生论诗书》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极浦书》讲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此“韵味”说是对魏晋六朝以来“意象”派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宋严羽之“妙悟”、清王士禛之“神韵”均受其影响。图尤为推重王维、韦应物诗,谓其“澄淡精致,格在其中”(《与李生论诗书》)、“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与王驾评诗书》)。所著《诗品》则具体发挥了其“韵味”说的诗学理论,列雄浑、冲淡、纤秣等二十四品类,以概括诗歌的各种风格、意境,乃至诗歌创作的不同方式及其艺术作用。其中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遇之匪深,即之愈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真体内充”、“离形得似”等语,实是对诗歌艺术特性的绝好概括,给后人以很大启发。何文焕谓其“仿书评而别具体裁”(《历代诗话考察》),许印芳称其各以十二句四言韵语“分题系辞,字字创新,比物取象,目击道存”(《二十四诗品跋》)。后代模拟之作有袁枚《续诗品》、顾翰《补诗

品》等。《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均著录其《一鸣集》三十卷,由其嗣子荷为后记,已佚。今存其诗文集十五卷,为后人所辑。《全唐诗》存其诗三卷又十首。存词一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二首、断句三,《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全唐文》编其文为四卷,《唐文拾遗》又补一篇。事见新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今人郭绍虞有《诗品集解》。

(黄维华)

【黄滔】(840?—?) 字文江,泉州莆田(今属福建)人。屡试不第,困于场屋二十馀年,唐昭宗乾宁二年(895),人已垂老,方博一第。光化(898—901)中,为四门学博士,天复元年(901)应王审知辟,以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使推官。审知之踞全闽,深得黄滔之助。时中原板荡,士夫四散,朝中名士如韩偓、王涤、崔道融等南奔闽中,闽中文学之盛,与滔援引提倡不无关系。其交游亦极广泛,如罗隐、林宽、徐寅、翁承赞等皆一时才俊,均与黄氏往来唱酬。滔能文工诗,《十国春秋》本传言“其《马嵬》、《馆娃》、《景阳》、《水殿》诸赋,雄新隽永,称一时绝调”。诗则多为寄赠送别、记游摅怀之作,如《游东林寺》、《寄汉上友人》、《送友人》、《出关》等皆其代表作品,少数作品亦能反映当时“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书事》)的社会现实与民间苦难。确如洪迈所言,黄诗“清淳丰润,若与人对语,和气郁郁,有贞元、长庆风概。”(见《黄御史集序》)黄氏编有《泉山秀句》三十卷,书中收录唐代闽中诗人作品,已佚。有《黄御史集》十卷。《全唐诗》录其诗三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十国春秋》卷九五有传。

(王学泰)

【韩偓】(842—914? 一作 923) 小名冬郎。字致光,一作致尧、致元。号玉樵山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瞻,与李商隐为联襟。偓幼年已能即席赋诗,李商隐赞为“雏凤清于老凤声”。然久困名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方登进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遗。迁刑部员外郎。又出为凤翔掌书记。召授司勋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深为昭宗倚重,屡欲拜为相,皆固辞之。朱温恨其不附己,乃贬为濮州司马,复贬为荣懿尉,又徙邓州司马。哀帝天祐二年(905),复召为翰林学士,偓不敢入朝,举家人闽依王审知,寓居南安,卒。偓工诗。早年所作之《香奁集》,“词多侧艳情巧”(《唐才子传》卷九),高秀实评为“丽而无骨”(许颢《彦周诗话》引)。胡震亨称其“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唐音癸签》卷八)。及“为学士

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自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南依王审知后,“其词凄楚,切而不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五引《潘子真诗话》),“读其诗,当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金銮密记》五卷、《韩偓诗》一卷、《香奁集》一卷(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六以为乃和凝所作而托名于韩偓者,近人严简弼撰文已明辨其非)。《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新唐书》卷一八三有传、《十国春秋》卷九五有传。事又见《唐诗纪事》卷六五、《南部新书》卷乙、《唐才子传》卷九等。清震钧有《韩承旨年谱》一卷。

(林长永)

【鱼玄机】(844?—868) 字幼微,又字蕙兰。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初适补阙李亿为妾,随亿遍游鄂楚。以李妻不容,于懿宗咸通(860—874)中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然仍追怀旧情,多所寄咏,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之怨慨(《寄李亿员外》)。与李郢、温庭筠等过往甚善,有诗唱和。尝登长安崇真观,睹新进士题名而“自恨罗衣掩诗句”(《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咸通九年(868),因笞杀侍婢绿翘,为京兆尹温璋处死。玄机才敏过人,其诗情致繁缛,语言工丽,堪与唐代女诗人薛涛、李冶相并。有《鱼玄机集》一卷。《全唐诗》存诗四十八首、断句十。事见《唐诗纪事》卷七八、《北梦琐言》卷九、《南部新书》卷甲、《三水小牋》、《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今有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

(黄维华)

【唐求】 一作唐球。蜀州青城(今四川崇庆)人。性放旷疏逸,不与俗交。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然而归。世称“唐隐居”、“唐山人”。唐昭宗大顺(890—891)中,王建帅蜀,召其为参谋,不就。求酷好吟咏,平日为诗,每有所得,不拘长短,即撚其稿为丸,投大瓢中,日后方补足成诗。晚年卧病,投瓢于江,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得诗数十篇,遂行于世。其诗多隐逸、题咏、酬答之作,因题材较窄,被孙光宪讥为“诗思游历不出二百里”(《北梦琐言》),但“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茅亭客话》),如《送友人归邛州》等篇什,亦颇清新可喜。《全唐诗》存其诗一卷。事见《诗话总龟》卷四六、《唐诗纪事》卷五〇、《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

(黄维华)

【杜荀鹤】(846—904) 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排行十五。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杜牧在池州刺史任期间有妾怀孕,后嫁杜筠而生荀鹤。其事颇可疑。荀鹤早有诗名,而累举进士不第。曾隐居庐山十年。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登进士第。还乡。宣州节度使田颀辟为从事。天复三年(903),奉田颀命出使大梁,谒梁王朱温。颀兵败被杀,荀鹤遂留梁。哀帝天祐元年(904),朱温荐其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旋卒(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谓其卒于梁初,误)。荀鹤为晚唐著名诗人。主张“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顾云称“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信诗家之雄杰者也”(《唐风集序》)。擅乐府、近体,“为诗愁苦,悉于教化”(何光远《鉴戒录》),人称“杜荀鹤体”。胡震亨云“杜彦之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唐音癸签》卷八)毕仲洵则讥为“鄙俚近俗”(《幕府燕闲录》)。亦工书法,“笔力遒健,犹有晋唐之遗风”(《宣和书谱》卷一九)。及第后自编其诗为《唐风集》三卷。《崇文总目》著录《杜荀鹤诗集》一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风集》十卷。有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诗续拾》补诗四首、断句六。《旧五代史》卷二四有传。事又见顾云《唐风集序》、《北梦琐言》卷六、《唐诗纪事》卷六五、《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李洞】(?—897?) 字子才,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诸王孙。家贫,常苦吟,以至废寝忘食。洞自唐僖宗乾符(874—879)起曾三次应进士举,皆不中。其中,昭宗龙纪元年(889),因误期未第;大顺二年(891),献诗中有“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句,仍不第,遂失意游于蜀地,而卒于蜀。洞作诗苦吟,与贾岛近似,酷慕岛,尝铸岛像,日日事拜,又集岛之警句五十联,为《诗句图》,自为之序。胡震亨举洞《终南山二十韵》,谓其“虽学贾岛,要为自具生面,所恨刻求新异,艰僻良苦耳”(《唐音癸签》卷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洞诗》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李洞诗集》三卷。《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五。生平散见于《唐摭言》卷一〇、《北梦琐言》卷七、《唐诗纪事》卷五八、《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唐才子传》卷九。(杨旭辉)

【吴融】(?—903) 字子华,排行大,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幼力学,文辞富赡,有盛名。然久困场屋。曾隐润州茅山西。后徙居长洲(今江苏苏州)。唐昭宗龙纪元年(889),登进士第。太尉中书令韦昭度讨蜀,辟为掌书记。累迁侍御史。乾宁二年(895),坐事贬官,流落荆南,依节度使成汭。后召

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进户部侍郎。朱温犯京师,融不及从昭宗,客居闾乡。天复三年,召还,为翰林学士,迁翰林承旨,卒。融工诗善文。辛文房谓其诗“靡丽有馀,而雅重不足”(《唐才子传》)。胡震亨则讥其诗“松浅”,与郑谷同为“衰体”(《唐音癸签》卷八)。纪昀评为“以文章工拙论之,则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韩)偓为稍胜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新唐书》卷二〇三有传。事又见《唐摭言》卷五、《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卷九等。(林长永)

【王驾】(851—?) 字大用,自号守素先生。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少居乡间,及第前早有诗名。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仕至礼部员外郎。后弃官隐居,与郑谷、司空图酬唱,才名籍甚。司空图誉其“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与王驾评诗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驾诗集》六卷,已佚。《全唐诗》存诗七首(二首与他人重出),《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一九、《诗话总龟》卷一〇、《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九。(杨旭辉)

【尚颜】 俗姓薛,字茂圣。与唐末诗人方干、郑谷、陆龟蒙、吴融、齐己、李洞为诗友,有诗赠酬。早年居庐山。唐宣宗大中(847—860)间,陆肱入关赴试,尚颜有诗相赠。僖宗乾符(847—879)间,至徐州依节度使薛能。昭宗景福(892—893)前,移居荆州,居荆州十馀年。光化(898—901)间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卒于五代梁太祖开平(907—911)以后,年逾九十。作诗长于五言,多清寂苦吟之作,诗中往往流露出世思想。有《颜上人集》一卷,光化间颜尧编次并为作序。《宋史·艺文志》著录《荆门集》五卷、《尚颜供奉集》一卷,今皆不存。江标《唐五十家小集》中有影宋书棚本《唐尚颜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三十四首、断句二。事见《唐诗纪事》卷七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颜尧《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杨旭辉)

【郑谷】(851?—910) 字守愚,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幼居长安,聪悟绝伦,七岁能诗。为李朋、马戴称赏。屡举进士不第。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谷避乱奔蜀,长期漂游于巴蜀荆楚间。光启三年(887),登进士第。未授官,仍率家漂泊。有江南之游,又四次入蜀。后释褐授郢县尉,旋兼摄京兆府参军。乾宁元年(894),迁右拾遗。乾宁三年,转补阙。乾宁四年,任都官郎中,世因称“郑都官”。天复元年(901),昭宗奔凤翔,谷奔行在。后归隐宜

春,居于仰山东庄之书堂,卒于北岩别墅。谷工诗。少年时即有“一代风骚主”(《唐诗纪事》作司空图语,疑不可信)之称。懿宗咸通(860—874)年间,与许棠、张乔、李昌符等十人俱知名当时,人称“咸通十哲”。其诗为薛能、李频等称赏。归隐后与僧齐己游,改其《早梅》诗中“数枝”为“一枝”,齐己服称“一字之师”(陶岳《五代史补》)。欧阳修称“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六一诗话》)。晁公武谓“谷诗属思颇切于理,而格意凡猥,语句浮俚,不为议者所多”(《郡斋读书志》卷四)。胡震亨谓其诗“非不尖鲜,无奈骨体太孱”(《唐音癸签》卷八)。纪昀则云:“汰其肤浅,撷其精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其名作《鹧鸪》诗传诵极广,人因称“郑鹧鸪”。乾宁(894—898)间自编其诗三百首为《云台编》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于此外又著录《宜阳集》三卷。《郡斋读书志》又记《宜阳外编》一卷。《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断句六。宋祖无择有《郑都官墓志铭》传世。事又见《唐诗纪事》卷七〇、《唐才子传》卷九等。今人赵昌平著有《郑谷年谱》。(林长永)

【于武陵】(852?—928) 名邺,以字行。杜陵(今陕西长安)人。曾漂泊南北各地近十年。唐僖宗中和(881—885)年间,入蜀应举,登进士第。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任都官员外郎。天成三年,除工部郎中。因为工部尚书卢文纪所不容,忿而自经身亡。武陵“诗多五言,兴趣飘逸多感。每终篇一章,策名当时”(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及门者。胡震亨称“于邺诗小小有致,拟项斯、马戴未足,方储嗣宗、司马札有馀”(《唐音癸签》卷八)。钟惺评其《高楼》诗中“上有罗衣色,凉风吹不秋”之“吹不秋”三字“孤迥”(《唐诗归》卷三四)。《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武陵》诗一卷、《于邺诗》一卷。《全唐诗》中于武陵、于邺名下各存诗一卷,诗多重复;《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见《旧五代史·明宗纪》、《新五代史·卢文纪传》、《唐诗纪事》卷五八、卷六三、《唐才子传》卷八等。(林长永)

【崔涂】(854—?) 字礼山,江南人。唐僖宗光启四年(888),登进士第。涂穷年流转,漂泊羁旅,故每“多离怨之作”。辛文房谓其诗“深造理窟,端能竦动人意,写景状怀,往往宣陶肺腑”(《唐才子传》)。吴乔称其“律诗一气斡旋,有如口谈,得张水部(籍)之深旨”(《围炉诗话》卷三)。《新唐书·艺文志》录崔涂诗一卷,《崇文总目》及《直斋书录解題》亦同,今有明朱警辑《唐百家诗》本、清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全唐诗》存诗一卷。事迹散见于《新唐书·艺文志》、

《唐才子传》卷九。

(杨旭辉)

【崔致远】(857—928后) 字海夫,号孤雲。新罗(朝鲜古国,在朝鲜半岛南部)首都庆州人。父崔冲,曾为新罗文昌令。致远自小颖慧绝伦,精敏好学,十二岁入唐留学,刻苦攻读。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登进士第。乾符四年,授宣州溧水县尉。广明元年(880),为应博学宏词科至淮南,旋入高骈幕,任都统巡官,此时作有《桂苑笔耕集》。在淮期间,多次上表请求“锦衣还乡”。光启元年(885),准以唐使节身份回新罗。归国后,授官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曾欲引进唐朝的进步措施,遭门阀士族排斥,出为太山郡太守。新罗真圣女王七年(893),向女王进时务策,被嘉纳,拜阿餐(此为非国王嫡系亲属所任的最高官)。由于角干、魏宏等人的谗毁和一系列的挫折,四十二岁后携家隐居于伽耶山海印寺等地。其间曾写信给高丽太祖王建,后高丽王朝曾封以文昌侯,配享文庙。崔致远的创作影响极大,被誉为朝鲜文学的开山鼻祖。著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全唐诗逸》存诗一首、断句七联,《全唐诗补逸》补诗六十首,《全唐诗续拾》补诗十一首、附录其归国后诗十一首。另《三国史记》、《东文选》、《东国通鉴》中也录其归国后诗四十馀首。《三国史记》卷四六有传。(杨旭辉)

【徐寅】“寅”一作“寅”,字昭梦,莆田(今属福建)人。与闽中名士黄滔交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登进士第。礼部试《止戈为武》赋,因有“破山加点,拟戍无人”之句,侍郎李择览而奇之。是岁,释褐为秘书省正字。光化三年(900)后离京,游汴,依朱全忠,献《游大梁赋》,得朱欢心,“一字奉绢一匹”。又从汴归闽中,依王审知,与王淡、杨沂等同居幕府,以风雅唱和,闽士多宗之。后辞归,隐居延寿溪上,为泉州刺史、审知从子王延彬所礼聘,如布衣交,与之诗酒唱和,凡十馀年。寅工赋,其《斩蛇剑赋》、《御水沟赋》、《人生几何赋》尤为脍炙人口,远播至渤海国。其诗“不出五代之格,体物之咏尤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克庄赞其“丰年甲子春无雨,良夜庚申夏足眠”,“身闲不厌常来客,年老偏怜最小儿”,“皆律切”。又言从其“岁计悬僧债”诗句中“知闽人苦贫贷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见《后村诗话·后集》卷一)。著有《温陵集》十卷、《探龙集》一卷、《钓矶集》三卷、《书》二十卷、《赋》五卷、《别集》一卷、《雅道机要》八卷。今存《徐正字诗赋》二卷、《钓矶集》五卷。《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五代史补》卷二有传,《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亦有其传。(王学泰)

【张蠍】字象文,郡望清河(今属河北),家居池州(今安徽贵池)。少而聪慧能诗。家贫寒,累举不第,

后以唐昭宗奖拔孤寒,又与许棠、张乔、周繇交游,时号“九华四俊”,于昭宗乾宁二年(895)登进士第,释褐为校书郎,调栎尉,迁犀浦令。时中原板荡,避乱入蜀。王建立国建前蜀,蟘仕蜀为膳部员外郎,迁金堂令。蜀后主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见其壁间题句“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爱赏久之,赐以霞光笺,令其进诗。蟘进诗二百首,为衍所重,将召为知制造,为内侍宋光嗣所阻,终于金堂令。蟘工诗,尤长于写景状物,其早年作品浑朴豪健,以“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登单于台》)为世所称(见《全唐诗话》)。这类以边塞为题材,并为人传诵的作品还有《夏日题老将林亭》、《蓟北书事》、《过萧关》、《边庭送别》、《朔方书事》等。晚年作品趋向纤巧工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蟘诗集》二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三。《十国春秋》卷四四有传。《唐才子传校笺》卷一〇亦有其传。

(王学泰)

【王贞白】(861—?)字有道,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登进士第。后授校书郎,因世乱,辞官归隐,退居著书。贞白性恬和,笃志于诗,曾手编所作诗三百篇及赋文,为《灵溪集》七卷,《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有著录,今已佚。其诗“清润典雅”(《唐才子传》),“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闾闾”(《唐摭言》)。曾与罗隐、方干、贯休友善,有诗酬唱。尝作《御沟诗》,有句云:“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贯休将其中“波”字改为“中”,与贞白之意正相合,两人遂成至交。《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贞白诗》一卷,今有龚贤辑《中晚唐诗纪》本。《全唐诗》存诗一卷又十二首。《全唐诗补逸》补诗十二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其事散见于《唐摭言》卷七、《青琐高议后集》、《唐诗纪事》卷六七、《唐才子传》卷一〇。

(杨旭辉)

【蜀太后徐氏】(?—926)名不详。成都(今属四川)人,徐耕之次女。唐末与其姊同为王建所纳。王建建前蜀即帝位后,封她为贵妃。其姊被封为淑妃,生彭王;她生王衍。衍即帝位后,封其为顺圣太后,封其姊为翊圣太妃。蜀咸康元年(925),与其姊随王衍游青城山,观景唱和。同年十一月,前蜀亡,与王衍等降后唐军。翌年四月,在赴洛阳途中,于秦川驿被杀。事见《鉴戒录》卷五、《蜀梼杌》卷下。《全唐诗》存诗八首,但小传中误以妹为姊。(陈祖美)

【齐己】(864—937?)俗姓胡,名得生,自号衡岳沙门。长沙(今属湖南)人,一说益阳(今属湖南)人。少孤。七岁为僧寺放牛时,即取竹枝画牛背为诗。

后为僧,先后居于道林寺、庐山东林寺,游于湘江一带。曾入京都长安,居数载,遍览终南山、太华山,与贯休、孙光宪、曹松、方干、沈彬有唱和。尝作《早梅诗》谒郑谷,谷将“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数”改为“一”,齐己颇为折服,拜谷为“一字师”,结为诗友,多有唱酬。后梁末帝德龙元年(921),已依南平高季兴为龙兴寺僧,卒于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前。齐己于琴棋书诗无所不通,尤工诗,所作于清润平淡中见僻远冷峭之致,工五言律,“虽颇沿武功(姚合)一派,而风格独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现此风格者,有《剑客》、《听李尊师弹琴》诸篇。诗集《白莲集》十卷,有汲古阁刻本和《四部丛刊》影明抄本。又著有《风骚旨格》一卷。《全唐诗》存诗十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断句四。生平见孙光宪《白莲集序》、《唐才子传》卷九,《宋高僧传》卷三〇及《十国春秋》卷一〇三有传。

(杨旭辉)

【殷文圭】一作殷举,字表儒,小字桂郎。殷,宋时避讳为汤。池州青阳(今属安徽)人。唐末即有才名,唐昭宗乾宁五年(898),梁王朱全忠表荐登进士第。为裴枢宣慰判官、记室参军。后遍投启公卿,触全忠怒,欲捕之而未及。归江南后,依杨行密属下田颀,颀遇之甚厚。颀为杨行密灭后,又事行密、隆演父子,隆演建吴,文圭由掌书记为翰林学士,官终左千牛卫将军。文圭作诗“稍入风度,间见奇崛”(《唐才子传》)。作诗颇多,有《登龙集》十卷、《冥搜集》二十卷、《镂冰集》二十卷、《从军稿》二十卷、《笔耕词》二十卷,宋人目录多有著录,今皆已不存。《全唐诗》仅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三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二。生平散见《唐摭言》卷九、《新唐书·田颀传》、《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卷一〇。另《十国春秋》卷一有传。

(杨旭辉)

【李咸用】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郡望陇西(今属甘肃)。生活于唐末、五代初。曾受辟任推官。卒年不详。咸用工诗,与来鹏、僧修睦多有酬唱之作。杨万里称其“见后却无语,别来长独愁”、“月明千峤雪,滩急五更风”等诗句善写“征人凄苦之情”,“读之使人发融冶之欢于荒寒无聊之中,动惨戚之感于笑谈方悻之初”,有“国风之遗音,江左之异曲”(《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辛文房则谓“唐末,文体浇漓,才调荒秽。……如王周、刘兼、司马札、苏拯、许琳、李咸用等数人,虽有集相传,皆气卑格下”(《唐才子传》卷一〇)。《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披沙集》六卷。《全唐诗》存诗三卷。事见《唐李推官披沙集序》、《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卷一〇等。

(林长永)

【裴说】桂州(今广西桂林)人。早年,“窘迫乱

离,奔走道路”(《唐才子传》)。唐哀帝天祐三年(906),状元及第。后历仕补阙,终礼部员外郎。说与弟诤“俱有诗名”。其诗“以苦吟难得为工”(《唐诗纪事》),“为诗足奇思,非意表琢炼不举笔”(《唐才子传》)。曾与王贞白、贯休、曹松、尚颜等有诗作赠酬。《直斋书录解題》及《郡斋读书志》均录《裴说诗》一卷;《解題》并云:“世传其《寄边衣》诗,甚丽,此集无之,仅有短律而已,非全集也。”可见裴诗宋时已有佚散。《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诗二首。事迹散见《唐才子传》卷一〇、《唐诗纪事》卷六五、《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郡斋读书志》卷四中、《书史会要》卷五、《登科记考》卷二四。

(杨旭辉)

【李建勋】(873?—952)字致尧,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平王李德之子。少好学,风调雨顺。初起官金陵巡官,南唐烈祖李昇出镇金陵(今江苏南京),以建勋为副使。南唐建国后,颇受重用,拜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加左仆射,监修国史,领滑州节度使,居相位达五年。前主昇元五年(941),罢相,未几复位。中主保大元年(943),再次罢相,出镇临川三年,后再度入相,旋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保大十年卒,谥靖。建勋善七律。“其为诗,少犹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玉壶清话》)。胡应麟《诗薮》云:“虽晚唐卑下格,然模写情事殊工。”《崇文总目》著录《李建勋集》二卷,《直斋书录解題》同,而《宋史·艺文志》则记为二十卷,《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记为三卷,今有《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李丞相诗集》二卷。《全唐诗》编为一卷,《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四,《全唐诗续拾》补断句四。其生平散见于马令《南唐书》、文莹《玉壶清话》卷一〇、陆游《南唐书》、《唐才子传》卷一〇。

(杨旭辉)

【崔道融】(?—907?)荆州(今湖北江陵)人,郡望博陵(今河北定县)。因避乱,曾旅居永嘉,因自号东瓠散人。与司空图、方干为诗友,有诗作酬唱。后出为永嘉县令。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入闽,依闽王王审知,为其上客。唐征召为右补阙,未赴,旋即卒于闽中。道融禀性高奇。工绝句,如《铜雀妓》、《春闺》、《寄人》等均不失为佳作。对其《咏梅》“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句,清陆葑《问花楼诗话》评价甚高。辛文房评其诗云:“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其《申唐诗》三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东浮集》九卷,今已佚。《全唐诗》存诗一卷。生平见黄滔《祭崔补阙道融》、《新唐书·宰相世

系表二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唐才子传》卷九。另《十国春秋》卷九五有传。(杨旭辉)

【修睦】(?—918)俗姓赵。与齐己、贯休、虚中等相善,有诗作赠酬。曾居庐山,在东林寺出家。后往金陵应吴国征辟。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吴将朱瑾作乱。死于乱中。其诗多写僧寺生活,唐末诗人李咸用在《读修睦上人歌篇》中推崇其诗云:“意下纷纷造化机,笔头滴滴文章髓。”并以其诗足以继太白、长吉。著有《东林集》一卷,《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今已不存。《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七首,《全唐诗补逸》补诗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生平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三。(杨旭辉)

【李舜弦】(?—926?)先世为波斯人,其父祖随唐僖宗入蜀,后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前蜀词人李珣之妹。品貌端庄,善辞藻。前蜀后主王衍纳为昭仪。后主咸康元年(925)随驾游青城山,写有纪游诗《随驾游青城》等。王衍降唐军之后,与徐氏太后、太妃均被杀于秦川驿;舜弦或亦于咸康二年(926)同时被杀。事见《新五代史》、《十国春秋》等。《全唐诗》存诗三首。(陈祖美)

【卢延让】宋时避濮安懿王讳,或改让为逊,字子善,排行十三,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登进士第。曾受朗陵雷满之辟。满败后,入前蜀。颇受前蜀高祖王建器重,授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卒官刑部侍郎。有卓绝之才,作诗师薛能,“多著寻常容易言语”(《鉴戒录》卷五“容易格”条),不尚奇巧,而“词意入僻”(《唐摭言》),务出新意,故吴融称其诗“去人远绝,自无蹈袭”。尝自作诗云“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苦吟》),可见其吟诗之苦。时人对其诗语浅俗多有讥诮,后人亦多有指摘,王士禛曾录宋人陈辅题壁诗,并云:“名之显晦有数,任华、卢延让诗极鄙俚,反得流传于后,是可慨也。”《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录《卢延让诗》一卷。《全唐诗》存诗十四首,断句二十,《全唐诗补逸》补断句八,《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生平散见《唐摭言》卷一二、《北梦琐言》卷七、《唐诗纪事》卷六五、《郡斋读书志》四、《唐才子传》卷一〇。(杨旭辉)

【苏拯】生卒年字里均不详。唐昭宗光化(898—901)中,拯尝与奉常苏涤之子、考功郎中璞叙宗党,后以启事温卷,误犯名讳,为璞所怒,拯苍黄谢过。拯诗多五言,胡震亨谓其与曹邺、邵谒等,“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唐音癸签》卷八)。所作如《医人》、《金谷园》、《织妇女》等篇颇有讽谕之旨。但综观其诗,不免“气卑格下,负鱼目唐突之惭,窃砭砭韞袭之滥”(《唐才子传》)。胡震亨亦谓其“平平,为似学究耳”(《唐音癸签》卷八)。《直斋书录解

题》、《宋史·艺文志》著录《苏拯诗》一卷，均佚。今存诗二十九首，《全唐诗》编为一卷。事见《唐摭言》卷一一。（黄维华）

【王仁裕】(880—956) 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以文辞名于秦陇间，受辟为秦州节度判官。后秦州入蜀，仁裕事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前蜀亡，又事后唐，为废帝所重，随帝于军中，诏封诰命，多出其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入后晋后，历任司封、左司郎中、谏议大夫。后汉时，复为翰林学上承旨，累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工诗文，通晓音律，尝集其平生所作诗万余首为百卷，号《西江集》，今佚。《全唐诗》仅存诗十五首，断句一联，《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仁裕平生著作颇丰，除《西江集》外，尚有《开元天宝遗事》、《紫泥集》、《入洛记》、《玉堂闲话》及《王氏见闻录》，尤以《开元天宝遗事》最为著名。《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新五代史》卷五七及《十国春秋》皆有本传。（杨旭辉）

【和凝】(898—955) 字成绩，郢州须昌(今山东东平)人。幼即聪敏，形神秀发。十七岁举明经，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瓌辟为从事，并目为“志义之士”，以女妻之。历郢、邓、洋三府从事。后唐明宗天成(926—930)年间，拜为殿中侍御史，累迁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旋充翰林学士，迁主客郎中。长兴四年(933)，知贡举，所取皆一时之秀，时称得人。历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学士。后晋初，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又为翰林学士承旨。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帝即位，加右仆射。出帝开运二年(945)，迁左仆射。后汉高祖时，拜为太子太傅，封鲁国公。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卒，赠侍中。凝善文章，著述甚富，今均佚失。长于短歌艳曲。少时好为曲子词，后位至宰相，故人称“曲子相公”。《全唐诗》存诗一卷。词二十四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旧五代史》卷一二七、《新五代史》卷五六有传。事又见《北梦琐言》卷六等。（林长永）

【周昙】 生平未详，曾任国子直讲。《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其所作《咏史诗》八卷，今台湾中央图书馆有影宋抄本《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全唐诗》存诗二卷，皆为咏史之作，按时间顺序分列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及隋十门，以七绝形式概括叙述帝王将相以及史事，立意平平，偶有佳作。（杨旭辉）

【李中】(924?—975?) 字有中，九江(今属江西)人，郡望陇西(今属甘肃)。南唐前主李昇昇元(937—943)中，曾与刘钧共学于庐山国学。后晋高祖天福(936—942)中，登进士第(《郡斋读书志》)。周世宗显德(954—959)中，乞请归家侍双亲，复归南唐。南唐后主时，历任吉水、新喻、安福、晋陵、淦阳县令。李中作诗工苦吟，绝似方干、贾岛，多“惊人泣鬼之语”(《唐才子传》)。孟宾于评其诗曰：“缘情人妙，丽则可知……备多奇句。”(《碧云集序》)清吴乔《围炉诗话》评曰：“李中诗虽浅，而有闲淡之致。”有诗集《碧云集》三卷传世，《郡斋读书志》又录《李有中诗》二卷。《全唐诗》存诗四卷，《全唐诗补遗》又辑补二十五首。事见《唐才子传》卷一〇、《碧云集序》和《郡斋读书志》。（杨旭辉）

【花蕊夫人】 徐氏，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人，父匡璋；一说姓费。后蜀主孟昶妃。赐号花蕊夫人，又升号慧妃。幼能文。尝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咏写宫中游乐。国亡入宋，为太祖所宠。传有《述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为世所诵。旧说《全唐诗》所编《花蕊夫人宫词》一卷乃其所作。《全唐诗续拾》又补诗一首、词一首。事见《十国春秋》卷五〇本传、《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又，今据浦江清考，传世之《宫词》实系前蜀太祖王建妃所作(《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见《浦江清文录》)。建妃亦姓徐，父名耕，成都(今属四川)人。有才色。与其姐并事建，故称小徐妃，又号花蕊夫人。生后主衍，衍即位，于光天元年(918)尊为顺圣太后。恃宠专横，竟至勾结宦官，卖权鬻爵，惑主致乱而失国。后随衍归唐，为后唐庄宗所杀。浦氏考《全唐诗》所录，其“花蕊《宫词》”实为九十七首，所咏乃前蜀后主王衍之宣华苑事，“披览《宫词》，犹能想见王蜀之僭窃自大，与夫此离宫别苑中风月繁华之盛，宜可为一时之诗史……此小诗而有长诗之意味者也”(浦语)。事见《蜀梼杌》、《十国春秋》卷三八。（黄维华）

【成彦雄】 字文幹，江南人，五代南唐时进上，仕履无考。能诗，诗多写景咏物之作，尤长于绝句，如《中秋月》、《江上枫》、《暮春日宴溪亭》等为其代表作品。存诗二十七首、断句二联，除《杜鹃花》一首外，皆为绝句。《全唐诗》编为一卷。《崇文总目》著录其《梅岭集》五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著录《梅顶集》一卷，皆散佚无存。事迹见《郡斋读书志》卷四。（王学泰）

【伍乔】 字号无考。庐江(今属安徽)人。少嗜学，隐居庐山，入国学，以苦节自励。南唐中主李璟时，入金陵应进士考试，以《画八卦赋》、《霁后望钟山

诗》被擢置第一。李璟爱伍乔文,令镌于石,以为永式。曾官歙州司马,不得意,呈诗于翰林学士张洎。洎读诗颇为感动,言于李璟,迁考功员外郎,卒于官,时约在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前后。乔工诗,尤长于七律。存诗二十一首,残句二,《全唐诗》编为一卷。诗多酬赠送别、纪游题咏之作。《僻居酬友人》、《题西林寺水阁》、《游西山龙泉禅寺》、《寄张学士洎》等诗较有名,诗调寒苦。其生平事迹见马令《南唐书》卷一四、陆游《南唐书》卷一五之本传及《唐才子传校笺》卷七。

(王学泰)

【张泌】亦作“张泌”,字子澄,淮南(今江苏扬州)人。南唐后主时,登进士第,官句容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上书后主,陈治道,征为监察御史,历官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改内史舍人。后随主李煜归宋,入史馆,迁虞部郎中。终归家毗陵(今江苏常州)。泌善诗词,《全唐诗》存诗二十首,次为一卷,另收词二十七首;《全唐诗续补遗》补断句一联。生平事迹散见徐铉《骑省集》(即《徐公文集》)、马令《南唐书》卷五、《十国春秋》卷二五。

(杨旭辉)

【谭用之】字藏用,五代末宋初人。《宋诗纪事》卷三言其“官不达”。《宋史·文苑传》云:“开宝初,有颖孳、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长于七律,工写景,其“一棹冷涵杨柳雨,片帆香挂茱萸烟”等句,为人所称道。王寿昌评其“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两句为“天然成韵”者(《小清华园诗谈》)。薛雪云:“谭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实。偶有不杜撰不硬用处,便佳。”(《一瓢诗话》)《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其诗一卷,已佚。《全唐诗》存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一》著录《谭藏用诗集》一卷,《集外诗》一卷。

(杨旭辉)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徐州(今属江苏)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封为安定郡公,进郑王。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改封吴王,居东宫。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李璟迁南都,立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六月,李璟卒,煜嗣位,世称“李后主”。好声色,崇佛教,国势日衰。开宝八年(975),宋军攻破金陵。煜降宋,被执至汴京。开宝九年(976),封为违命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被毒死。煜多才多艺,工书画,知音律,尤长诗词。其亡国后词作以感情沉痛真挚、词境阔大深远负有盛名。王国维评为“神秀”、“以血书者也”(《人间词话》)。沈雄称其“在词中不失为南面王”(《古今词话》)。其词与李璟词合编为《南唐二主词》。《全唐诗》存诗十八首、断句三十二,《全唐诗续拾》补断句十。《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新五代史》卷

六二、《宋史》卷四七八有传。徐铉有《大宋左千卫将军追封英王陇西公墓志铭》。年谱多种,以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较为通行。

(林长永)

【徐铉】(917—992)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少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东称“韩、徐”。又与弟徐锴并称“二徐”。初仕吴为校书郎,后仕南唐李昇父子,历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归宋后,为太子率更令。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初,直学士院。太平兴国八年(983),出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991),以庐州女僧道安诬奸私事,贬静难行军司马。淳化三年,卒于邠州,年七十六。铉性简淡寡欲,精于小学,书法亦工。当时其诗名颇著,在宋初文坛甚有影响。其诗承袭唐代元、白之体,多唱酬之作。铉才高学博,文思敏速。《郡斋读书志》称其“尝谓为文速则意思雄壮,缓则体势疏慢,故未尝沉思”。所著有《徐公文集》三十卷及《稽神录》、《质疑论》等。《宋史》卷四四一有传。今《徐公文集》后附有其行状、墓志铭。

(张丽娟)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后汉隐帝乾祐(948—950)间,登进士第,为秘书郎,改集贤殿修撰。后周时擢知制诰,判史馆,为翰林学士。宋初,加中书舍人。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罢为给事中。谪彰武军行军司马,居延州。开宝二年(969),召还,复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开宝四年,为翰林学士,判吏部铨。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除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端拱元年(988),罢为右仆射,淳化二年(991),复相,淳化四年,罢相,次年,以司空致仕,卒谥文正。他的诗学白居易,内容多为唱和酬答,造语浅俗。《青箱杂记》云:“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有文集五十卷,已佚,今《二李唱和集》传世。他还主持编修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类书。《宋史》卷二六五有传。

(张丽娟)

【宋白】(936—1012)字太素,一作素臣,大名(今属河北)人。年十三即善属文。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擢进士甲科,乾德(963—968)初,解褐为著作郎。开宝(968—976)中连知蒲城、卫南二县。太宗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预修《太祖实录》,俄直史馆,判吏部南曹,寻拜中书舍人,赐金紫。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知贡举,历史馆修撰、集贤殿直学士,为翰林学士,与李昉主持修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凡三掌贡举,苏易简、王禹偁、胡宿、李宗谔等皆出其门下。太宗末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兼秘书监。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馆。真宗景德二年(1005),拜刑部尚书、集贤殿学士、判

院事,以兵部尚书致仕,卒赠左仆射。白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好读书,聚书数万卷,尝条类故事千馀门,号《建章集》。唐人编集遗落者,白多方补葺。对后进之士富于才华者,多予以奖掖,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诗多酬赠题咏应制奉和之作,其《宫词》百首尤有名于时。所著《广平集》已佚。《宋史》卷四三九有传。(王学泰)

【田锡】(940—1004) 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登进士第,除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左拾遗,直史馆。太平兴国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太平兴国七年,徙知相州,移睦州,还判登闻鼓院,知制诰。端拱二年(989),出知陈州,坐事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后徙单州。召还,直集贤院。真宗咸平(998—1003)初,出知泰州。咸平三年(1000),召还,官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在宋初较早提出了文与道的关系,并认为要多方吸取前人所长,达到“氤氲吻合,心与言会”(《贻宋小著书》)。作为一代名臣,诗文虽为其馀事,但亦光明磊落,如其为人。有《咸平集》五十卷,今本三十卷。《宋史》卷二九三有传。《范文正公集》卷一二有其墓志铭。

(张丽娟)

【张詠】(946—1015) 字复之,自号乖崖子,濮州鄄城(今山东濮县)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进士乙科,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再迁著作佐郎,以苏易简荐人为太子中允,迁秘书丞,通判麟州、相州。后迭为外官,两知益州、一知杭州。归朝,复掌三班,领登闻检院,以疾出知昇州,充昇、宣等十州安抚使,进礼部尚书,出知陈州,卒于官,赠左仆射,谥忠定。詠为政宽猛并用,所至皆有惠政,在益州民畏而爱之。性刚烈,往往面折人过,与寇準最善,亦每每当面指摘其缺失。詠曾参与台阁酬唱,亦名列《西昆酬唱集》中,然其作品远较杨、刘诸家平易朴实,从《劝学篇》、《悼蜀四十韵》这些名篇中即可见一斑。其诗多言志摅怀之作,即使一些应酬题赠作品亦往往富于真情实感。如《寄田锡舍人》写当时士大夫“出仕”与“归隐”之矛盾,颇有代表性。詠工于七律,其对偶多疏宕劲健,如:“吟爱好峰归越路,醉冲寒雨出秦关”(《归越东旧隐》),“汀苇乱摇寒夜雨,沙鸥闲异夕阳天”(《郊居寄朝中知己》)。七绝多清丽绵渺之作,有晚唐风调,如《雨夜》。著有《乖崖集》。《宋史》卷二九三有传。(王学泰)

【柳开】(947—1000) 字仲涂,曾名肩愈,字绍先,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登进士第,补宋州司寇参军,迁录事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擢赞善大

夫,知常州、润州、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985),坐事贬上蔡令。雍熙三年,复授殿中侍御史。后为崇仪使,知宁边军,徙全州、桂州、环州、邠州、曹州、邢州。真宗即位,知代州、忻州。咸平三年(1000),徙沧州,道病卒,年五十四。为人尚气自任,不拘小节,喜议论经义,好韩愈、柳宗元文,与穆修一起,大力反对五代宋初华靡浅弱文风,积极提倡韩、柳散文,成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风质朴。传世之诗极少,仅数首,亦古朴劲健,如《塞上》。有《河东先生集》十五卷。《宋史》卷四四〇有传。

(张丽娟)

【郑文宝】(953—1013) 字仲贤,汀州宁化(今属福建)人。初仕南唐,为校书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除修武主簿,迁大理评事,知梓州录事参军事,后知颍州。淳化二年(991),授陕西转运副使,久在西边,多所策划。后贬蓝山县令,移枝江、京山。真宗咸平(998—1003)中,召还,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货。大中祥符六年(1013)卒,年六十一。他好谈方略,对西边山川形势、风俗人情很熟悉,同时又多才多艺,擅书法,有诗名,其诗风格轻盈柔软,颇有五代遗风,一些小诗如《柳枝词》等,颇有韦庄词风韵,明丽清秀。欧阳修赞美其工于造句(见《六一诗话》)。有文集二十卷,已佚。今存有《谈苑》、《江表志》、《南唐近事》、《江南馀载》等书。《宋史》卷二七七有传。

(张丽娟)

【王禹偁】(954—1001) 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改大理评事。端拱元年(988),擢直史馆,上《御戎十策》。端拱二年,迁知制诰。淳化二年(991),为徐铉雪诬,坐贬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召拜左正言,次年再知制诰。至道元年(995),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坐谤讪罢知滁州,移扬州。真宗即位,复知制诰,以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史事,降知黄州。真宗咸平四年(1001),徙蕲州,卒,年四十八。王禹偁世为农家,在朝为官,屡遭贬谪,仕途很不得意。他对宋初诗坛浮艳、纤巧诗风深为不满,提倡杜甫、白居易的诗,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诗贴近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诗风平易质朴而又耐人寻味,开宋诗革新之先河。吴之振在《宋诗钞》中称赞其“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肯定了禹偁在宋诗坛上的重要地位。许颢言其诗“语迫切而意从容”(彦周诗话),亦很中肯。有《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二十卷(今存八卷)。《宋史》卷二九三有传。

(张丽娟)

【惠崇】淮南(今江苏扬州)人,一作建阳(今属福

建)人。善诗工画,为宋初九僧之一,诗宗晚唐体,与林逋、杨亿、寇準、刘筠等均有诗文往来唱酬,在当时颇有诗名。欧阳修《六一诗话》尝举其佳句。诗的内容大多是刻划山水景物和闲静生活。风格上讲求锻炼推敲,力求精工,忌用典,尚白描。其《访杨雲卿淮上别墅》、《塞上赠王太尉》、《晚夏夜简程至》等为最有名。《九僧诗集》中收录其诗十馀首。其画,“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见《韵语阳秋》)。王安石、苏轼皆有诗题咏。其事迹见《图绘宝鉴》、《宋诗纪事》诸书。(张丽娟)

【王周】 字号不详,明州奉化(今属浙江)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上,乾兴元年(1022),以大理寺丞知无锡县。仁宗宝元二年(1039),又以虞部员外郎知无锡县,庆历(1041—1048)中尝知明州、抚州,亦曾一度在巴蜀为官。皇祐四年(1052),致仕,居荆南。《文献通考》曾将其集载入唐人集目中,胡震亨以为周生活于五代及宋初,实际周为真宗、仁宗时人,浮沉于州县守令之间。《两宋名贤小集》收其诗一卷。其诗多写游宦生活,以律绝为多,颇具晚唐风韵,饶有馀味。如《再经秭归》“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夔州病中》“郡楼昨夜西风急,一一更筹到枕前”,《湖口县》“最是芦洲东北望,人家残照隔烟汀”,《宿疏陂驿》“谁知孤宦天涯意,微雨萧萧古驿中”等佳句皆颇能反映其诗风,亦较为人所传诵。其事迹见《全宋诗》卷一五四。(王学泰)

【林逋】(957—1028) 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性恬淡,不趋荣华富贵,家贫衣食不足而怡然自乐。初游江淮间,不遇,久之而归杭州,隐居于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抚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逋不娶无子,性喜清幽,所居植梅畜鹤,人因谓妻梅子鹤。尝自为墓于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卒后州守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赠以粟帛。逋善行书,喜为诗,既成稿随辄弃之,自谓:“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宋史》本传)今所传诗,皆为好事者所记。林诗多以其清苦的隐逸生活为题材,咏梅之作尤多,《梅花》、《酬画师西湖春望》、《山村冬暮》、《湖上初春偶作》、《西湖》、《孤山雪中写望》、《孤山从上人林台写望》皆是其代表作品。今人钱钟书论及宋初隐逸诗人作品时言:“他们的风格多少相像,都流露出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林逋算得这里面突出的作者,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他住在西湖的孤山,歌咏西湖风景的诗很多,也是他比较好的作品。”(见《宋诗选注》)有《和靖诗集》。《宋史》卷四五

七有传。

(王学泰)

【潘阆】(?—1009) 字逍遥,大名(今河北大名东)人,一说扬州(今属江苏)人。尝居钱塘(今浙江杭州)。阆为狂放不羁之士,其生平亦颇为扑朔迷离。一说尝卖药洛阳,宋太宗因王继恩荐召对,赐进士及第,寻以其狂妄,追还诏书。后继恩下狱,遂受牵累,被追捕,亡命。真宗时捕得之,释其罪,任命为滁州参军,后卒于泗上(见《郡斋读书志》卷一九)。另一说,阆参与卢多逊欲立秦王赵廷美之谋,混迹于讲堂巷,开药肆,因所谋不成被追捕,四处逃亡,后狱渐解,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见《湘山野录》)。阆为人放浪,尝有诗云:“散拽醉僧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墨客挥犀》)阆亦非安分之士,有诗云:“白日升天易,清朝取士难。”刘克庄认为与张元无异。(见《后村诗话》)其诗虽学晚唐,但较为洒脱,内容则以写隐逸生活与山水风光为主。如《渭上秋夕闲望》、《夏日宿西禅院》、《望湖楼》、《归钱塘》等为其代表作品。潘诗工于造句,如“夜凉如有雨,院静若无僧”(《夏日宿西禅院》)、“上床安枕稳,纸被转身鸣”(《客舍》)等,皆为论者所赞赏。有《逍遥集》一卷。其生平见《事实类苑》等书。(王学泰)

【赵湘】(959—?) 字叔灵,祖籍南阳,居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授庐江尉。一生仕途偃蹇,怀才不遇,沉沦下僚。方回《罗寿可诗序》将他与魏野等人归为晚唐体诗人,称其诗深涵茂育,气势极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诗:“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雕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吴棫跋其集云:“余首读其诗,清澄蠲洁,淡雅夷旷,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并言其可以“逾陶谢嵇阮之藩,而经跻其堂”。《秦淮晚泊》、《华顶峰》、《题国清寺》、《春夕偶作》等为其代表作品。有《南阳集》,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其诗文,编为六卷。事见《南阳集》卷五《释奠记》。(张丽娟)

【魏野】(960—1019) 字仲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人。世为农,生而好学,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凿土屋为室,室仅方丈,曰“乐天洞”。前筑草堂,弹琴赋诗于其中,自号“草堂居士”。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为历任郡守所礼遇,性不喜巾帻,见宾客惟纱帽白衣,不讲求礼数。宋真宗时祀汾阴,遣陕令王希召之,固辞。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恤,又遣使画其所居草堂以观之。卒赠秘书省著作郎。魏野为宋初统治者所树立隐者之样板,野上言承认“永荷帝力”;皇帝则对此不官之官备加照顾。故魏诗多与达官贵人往来投赠之作,如《谢寇相公见访》、《寇相公生辰因有寄献》、《酬王太傅见寄》、《谢

孙状元寒食见赠》等等。居心尘俗,诗亦粗鄙。然魏野享大名于一时,以布衣身份,而其诗作受到朝野乃至外邦之关注。宋代诗话中列举其名句者甚多。魏诗体制上受贾岛、姚合影响,其内容风格却似白居易晚年作品。著有《草堂集》十卷。《宋史》卷四五七有传。

(王学泰)

【陈彭年】(961—1017) 字永年,抚州南城(今属江西)人。幼有文名,南唐后主李煜曾召入宫。南唐亡后,师事徐铉为文。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登进士第,授江陵府司理参军,历澧、怀二州推官,通判海州。真宗咸平三年(1000),知金州。景德(1004—1007)初,授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与修《册府元龟》。又与戚纶详定考试条式,多革旧制。附王钦若、丁谓,历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大中祥符九年(1016),为参知政事。天禧元年(1017),为天书仪卫副使,参详仪制奉宝册使,卒,年五十七,谥文僖。史称其性敏给,博闻强记,慕唐四子为文,体制繁靡。能诗词,风格婉丽,传世之诗不多。其《瑞鹧鸪》词曾传唱一时。有文集百卷,不传。《宋史》卷二八七有传。

(张丽娟)

【孙何】(961—1004) 字汉公,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幼以诗文知名,与丁谓齐名而友善,时称“孙、丁”。王禹偁曾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见《涑水纪闻》)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陕州。召入直史馆,迁秘书丞,京西转运副使。擢右正言、右司谏。真宗咸平二年(999),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徙两浙转运使。景德元年(1004),代还,判太常礼院,俄知制诰,掌三班院,卒,年四十四。其诗音韵和谐,文字亦较为工丽,其诗传世不多,但从传下的《泛吴江》、《桐柏观》等诗来看,亦具备此特点。有文集四十卷,已佚。《宋史》卷三〇六有传。

(张丽娟)

【寇準】(962—1023) 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巴东、成安,累迁殿中丞,通判郢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淳化二年(991),拜枢密副使,改同知枢密院事。淳化四年,罢,知青州。淳化五年,召拜参知政事。至道二年(996),罢,知邓州。真宗时为三司使。真宗景德元年(1004),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辽军侵宋,力主亲征,成澶渊之盟。景德三年,罢,知陕州。天禧(1017—1021)中,复为相,天禧四年(1020),罢,封莱国公,丁谓乘机倾陷,贬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仁宗天圣元年(1023),卒于贬所,年六十二,谥忠愍。寇準的诗学晚唐体,内容多为流连山水泉石之作,构思精巧,诗风清丽。《苕溪渔隐丛话》称:“忠愍公诗含思凄惋,

盖富于情者也。”寇诗表现出作者不以富贵荣华为乐事,似有更为高远的追求,文莹就说:“莱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湘山野录》)如《春恨》、《江南春》、《书河上亭壁》、《夏日》、《春昼》等七绝,《春日登楼怀归》、《水村即事》、《题巴东寺》等五律皆有或浓或淡难以掩饰的愁怨。著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宋史》卷二八一有传。

(张丽娟)

【钱惟演】(962—1034) 字希圣,吴越王俶之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从俶归宋,为右屯卫将军,历右神武军将军。真宗咸平(998—1003)中,为太仆少卿,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诏与杨亿分为之序。除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再迁给事中,知审官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翰林学士。天禧四年(1020),为枢密副使。仁宗即位,拜枢密使。初附丁谓逐寇準,及谓将得罪,又挤谓自解。罢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后判许州。仁宗明道二年(1033),判河南府。终崇信军节度使。景祐元年(1034)卒,年七十三,谥文僖。他出身勋贵,博学能文,辞藻清丽。与杨亿、刘筠等人互相唱和,由杨亿编为《西昆酬唱集》,风靡宋初诗坛。其诗多为歌咏宫廷生活或咏物、咏史之作,风格上讲究词藻华美,描写细致,其写富贵生活的诗句为欧阳修所称道,言其“好句尤多”(见《六一诗话》)。有《典懿集》三十卷及《金坡遗事》等。《宋史》卷三一七有传。

(张丽娟)

【陈尧佐】(963—1044) 字希元,号知余子。阆州阆中(今属四川)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登进士第,授魏县、中牟县尉,历知朝邑县、真源县,通判潮州,知寿州、庐州。后提点开封府界事,为两浙转运副使,徙京西、河东、河北等路转运使。真宗天禧(1017—1021)中,入为三司户部副使,擢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后累官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迁尚书吏部侍郎。仁宗明道二年(1033),罢,知永兴军,改庐州、同州、郑州。景祐四年(1037)拜同平章事。景祐五年,罢,为淮康军节度使,判郑州。康定元平(1040),致仕。庆历四年(1044)卒,年八十二,谥文惠。工诗,《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等皆推许其诗。明人杨慎云:“陈文惠公尧佐《吴江》诗云:‘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西风斜日鲈鱼香。’后人于其地立鲈香亭,和者计百余人,皆不及也。噫,此诗尚敢和耶!又《碧澜堂》诗云:‘苕溪清浅雪溪斜,碧玉光涵一万家。谁向月明中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二诗曲尽东南之景,后之作者,无复措手。”(《升庵诗话》卷七)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潮阳编》、《野庐编》、《愚丘集》、《遣兴集》等,皆佚。欧阳修为撰神道碑,《宋史》卷二八四有传。

(张丽娟)

【丁谓】(966—1037) 字谓之,后改字公言,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时与孙何友善,得王禹偁称赏,世称“孙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授大理评事,通判饶州。历直史馆,除三司户部判官,领峡路、夔州路转运使。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谀真宗封禅,拜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历工、刑、兵三部尚书,后知昇州,徙保信军节度使。天禧三年(1019),复参知政事,迁枢密使,平章事。乾兴元年(1022),封晋国公。仁宗即位,贬崖州司户参军,徙雷州、道州。仁宗明道(1032—1033)中,授秘书监,致仕,居光州。景祐四年(1037)卒,年七十二。谓机敏善谈笑,喜为诗,《温公续诗话》云:“丁相谓善为诗,在珠崖犹有诗近百篇,号《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观林诗话》称:“丁晋公《筑毬》诗,世称曲尽形容之妙。”谓传世之诗,多为咏物之作,如《冠》、《笏》、《珮》、《玉佩》、《金》、《玉》、《珠》、《茶》、《酒》、《松》等,从这些诗题中,即可见内容之一斑。其集有《丁谓集》八卷、《虎丘集》五十卷、《万笔集》二卷、《青衿集》三卷、《知命集》一卷,均佚。《西崑酬唱集》中收录其诗。《宋史》卷二八三有传。

(张丽娟)

【杨亿】(974—1020) 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七岁能属文,年十一,送阙下,宋太宗召试,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立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年十九,赐进士及第,迁光禄寺丞。苑中曲宴,亿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待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太宗诘有司所以不召,宰相言“旧制,未贴职者不预。”即以亿直集贤院,此后遂多奉诏应制之作,多有赐赉。真宗继位,超擢为左正言,参与修《太宗实录》,凡八十卷,亿独任五十六卷。真宗景德(1004—1007)初,以家贫乞典郡江左。诏令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俄判史馆。参与修纂《册府元龟》,其序次体例皆亿所定。景德三年(1006),召为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凡变例多出亿手。亿为人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衍、陈越、刘筠等相善。天禧二年(1018),拜工部侍郎。天禧四年,复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卒谥文。亿天性颖悟,博闻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为文注重词藻用典。其骈俪之文,颇有名于时。在馆阁时,与刘筠等唱和之作编为《西崑酬唱集》,参与唱和者多仿李商隐体制,浮华纂组,雕琢太甚,时称为“西崑体”。杨诗多奉和应制及与僚友唱和之作。《西崑酬唱集》中收其诗七十五首,如《槿花》、《汉武帝》、《代意》、《馆中新蝉》、《鹤》、《公子》、《无题》等颇有代表性,其中有些言志抒怀,

咏古伤今之作,亦颇有其价值。著作颇多,除所参与编纂朝廷大典外,多散佚。现存有《历代论政要略》、《武夷新集》等。《宋史》卷三〇五有传。(王学泰)

【穆修】(979—1032) 字伯长,郢州汶阳(今山东汶上)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进士出身,授泰州司理参军。负才遭忌,贬池州。后补颍州文学参军,徙蔡州。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年五十四。穆修性刚介,好诋斥权贵,议论时病。他不满于五代及宋初华靡文风,继柳开之后,大力提倡韩、柳散文,主张作文应阐扬儒家仁义,苏舜钦等多从之游。修诗风与其论文主张或有距离,其诗仍保留晚唐五代遗风。其诗平易晓畅,亦注重以词藻为点缀,如《秋浦会遇》、《江南寒食》、《和茅秀才“江墅幽居好”》等篇章,皆能代表其风格。庆历(1041—1048)中,祖元择访得其所作诗、书、序、记、志等数十篇,集为二卷。今存《穆参军集》。《宋史》卷四四二有传。

(张丽娟)

【重显】(980—1052) 字隐之,俗姓李,号明觉大师,遂宁(今属四川)人。幼时依益州普安院僧仁铣,出家后出游荆渚间,曾至复州。宋真宗天禧(1017—1021)间至钱塘灵隐寺。晚年住明州雪窦寺。仁宗皇祐四年(1052)卒,年七十三。其诗多自然拔俗,风致清婉。其写世间人情的作品,如《送俞居士归蜀》情深意婉,颇具感染力。有《组英集》二卷,《瀑泉集》、《拈古集》、《颂古集》各一卷。《禅林僧宝传》卷一一有传。

(张丽娟)

【夏竦】(985—1051) 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以父荫录为丹阳县主簿,举贤良方正,累迁右正言。宋真宗天禧(1017—1021)初,坐事降知黄州,徙邓州、襄州。仁宗即位,徙知寿、安、洪州。仁宗天圣三年(1025),知制诰,后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罢,知襄州、颍州、应天府、永兴军、泾州等。庆历七年(1047),复为枢密使。次年,论罢,出知河南府。徙武宁军节度使,进郑国公。皇祐三年(1051)卒,年六十七,谥文庄。他的诗文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古今诗话》曾举其《琵琶亭》诗,以为题琵琶亭诗中最佳。夏竦以文学起家,有名于时,有文集百卷,不传,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附以他书所载,得《文庄集》三十六卷。《宋史》卷二八三有传。《王华阳集》卷三五有其神道碑。

(张丽娟)

【范仲淹】(989—1052) 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二岁而孤,母适朱氏,故曾名朱说。少时贫困力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仁宗天圣(1023—1032)间,为秘阁校理,通判河中府,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仁

宗亲政,召为右司谏,因力谏废后,忤吕夷简,出知睦、苏、明等州。后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景祐三年(1036),针对时弊,上《百官图》,又出知饶、润、越等州。康定元年(1040),召为陕西都转运使,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经营西边。庆历三年(1043),入为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推行新政。后罢,知邠、邓、杭等州。皇祐四年(1052)卒,年六十四,谥文正。他的诗、词、文俱佳。作为一代名臣,其诗歌具有开阔的眼界和雄放的气势。《湘山野录》称其“为诗,不徒然而作”。作品富于社会政治意识,如《怀庆朔堂》、《江上渔者》、《淮上遇风》、《牡丹》等皆能因小见大,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意境含蓄,清逸淡远。有《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传世。《宋史》卷三一四有传。(张丽娟)

【晏殊】(991—1055) 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幼有文名,被誉为神童。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召试,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历知制诰,判集贤院,为翰林学士。仁宗天圣三年(1025),迁枢密副使。后罢,知应天府。召拜御史中丞,迁参知政事,再罢,知亳州、陈州。康定元年(1040),为枢密使。庆历二年(1042),加同平章事。庆历四年,降知颍州、陈州、许州、永兴军、河南府。至和元年(1054),以疾归京师,次年卒,年六十五,谥元献。晏殊以词著名。诗作超过万篇,《宋史》称他“尤工诗,闲雅有情思”,《六一诗话》也称他“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惜其诗大多散失。其诗继承晚唐五代的传统,赡丽而不浮浅,《无题》(油壁香车不再逢)、《张殿院古瓦研》、《七夕》、《春阴》,皆其代表作品。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不传。今存《珠玉词》三卷。清胡亦堂、劳格曾辑其诗,后李之鼎又增补勒为一编,收入《宋人集乙编》中。《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二有其神道碑,《宋史》卷三一—有传,今人夏承焘有《二晏年谱》。

(张丽娟)

【茜桃】 约于宋太宗至真宗(977—1010)期间在世,北宋宰相寇準侍妾。寇準两任宰相,颇有政绩而生活奢侈,尤好夜宴剧饮,每宴必有众姬歌舞侑觞,每唱一曲即以匹绫赏赐,而歌姬仍不满足。为此,茜桃作《呈寇公二首》诗以刺之,并为天寒衣单中的织女鸣不平。寇準所作和诗则有“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曲”之语。诗、事均见《侍儿小名录拾遗》。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宋诗纪事》亦有所载录。

(陈祖美)

【石延年】(994—1041) 字曼卿,一字安仁。先世幽州(今北京)人,后晋时徙居宋城(今河南商丘)。累举进士不中,宋真宗选三举进士不中者以为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职,后听从张知白劝告而接受任

命。仁宗天圣四年(1026),知金乡县,有治名。通判乾宁军,徙永静军。景祐二年(1035),坐与范讽善,通判海州。久之,迁秘阁校理、太子中允。康定二年(1041)卒,年四十八。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为文劲健,尤擅长诗。诗格奇峭劲健。苏舜钦序其集,称其诗“振奇发秀”、“气横意举”,是“诗之豪者”。欧阳修《哭曼卿》诗中亦称其“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竹庄诗话》曾载范仲淹评价其诗云:“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其《南朝》诗“南朝人物尽清贤,不是风流即放言,三百年间却堪笑,绝无人可定中原”,言浅意深,颇为论者所称道。有《石曼卿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中。《宋史》卷四四二有传。

(张丽娟)

【陈洎】(?—1049) 字亚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陈师道之祖。曾知怀州审刑院,宋仁宗宝元(1038—1040)间,官屯田员外郎,出漕京西、淮南、京东。庆历五年(1045),转吏部员外郎,加直史馆。庆历七年,降知濠州。召为盐铁副使。皇祐元年(1049),以副使行河,还卒。颜复曾为其集作序,称其诗章往往意在栖退,词格秀古,造句愈工,则入淡泊愈深。其咏史怀古之作颇有特色,如《读刘蕡策》、《读〈子虚赋〉》、《南齐》、《过田文墓》、《开元寺凌虚阁对雪寄解唐卿》、《过项羽庙》皆言浅而慨深。今存《陈副使诗》一卷,有司马光、苏轼等人跋。事见《宋诗纪事》卷一九。

(张丽娟)

【胡宿】(995—1067) 字武平,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授扬子尉。累迁知湖州,筑石塘以治水患,称“胡公塘”。后为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迁翰林学士。嘉祐六年(1061),拜枢密副使。英宗治平三年(1066),罢为观文殿学士,知杭州。次年致仕,卒,年七十三。谥文恭。他长于四六骈偶,典重赡丽。其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锵,但内容较单薄,以题赠酬赠之作为多。有《文恭集》七十卷,不传,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及他书辑为《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宋史》卷三一八有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有其墓志铭。

(张丽娟)

【宋庠】(996—1066) 初名郊,字伯庠,入仕后改名庠,字公序。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擢大理评事,同判襄州,召试,历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知审刑院,为翰林学士。出知扬州、郢州、河南府、许州、河阳等。召为枢密使,封莒国公。再出知郑州、相州。英宗即位,改封郑国公,出判亳州。以司空致仕,英宗治平三年(1066)卒,年七十一,谥元宪。宋庠与其弟宋祁俱以文学知名,有“二

宋”、“大小宋”之称。《西清诗话》称“二宋”俱为晏殊门下士,为文必手抄寄公,恳求雕润。其《落花》诗多为人所称,诗格秾丽。集久散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编为《元宪集》四十卷。《华阳集》卷四八有其神道碑,《宋史》卷二八四有传。

(张丽娟)

【宋祁】(998—1061) 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与兄宋庠同榜进士,授复州军事推官。历直史馆、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寿州、陈州、还知制诰,为翰林学士,改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预修《唐书》。出知许州,召还,复出知亳州、成德军、定州、益州、郑州,官终翰林学士承旨。仁宗嘉祐六年(1061)卒,年六十四,谥景文。宋祁博学能文章,诗词俱工,语言典丽,其《玉楼春》词“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尤为人称赏。《王直方诗话》记其语云:“诗人必自成一派,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有集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景文集》六十二卷。清光绪间,孙星华复辑有《景文集拾遗》二十二卷。宋祁还著有《笔记》,预修《集韵》等书。《名臣碑传琬琰集》收有范镇所作《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宋史》卷二八四有传。

(张丽娟)

【曾公亮】(999—1078) 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知会稽县。累迁知制诰兼史馆修撰,进翰林学士,判三班院。出知郑州,复入知开封府。嘉祐元年(1056),擢参知政事。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鲁国公。神宗熙宁三年(1070),以老避位,为集禧观使。熙宁四年,判永兴军,旋以太傅致仕。元丰元年(1078)卒,年八十,谥宣靖。其诗传世不多,但《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诗为不可多得之佳作。有文集三十卷,《元日唱和诗》一卷,均佚。《宋史》卷三一二有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五二有其行状。

(张丽娟)

【余靖】(1000—1064) 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授赣县尉,知新建县。诏与王洙并校《史记》等书,擢集贤校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贬饶州,靖上疏救之,落职监筠州酒税。徙监泰州税,知英州。庆历(1041—1048)中,为右正言,使契丹,以为蕃语诗被劾,出知吉州。依智高反,以靖知潭州、桂州。嘉祐六年(1061),知广州。官至工部尚书。英宗治平元年(1064)卒,年六十五,谥襄。他的诗文在当时颇受重视,多才艺,能用契丹语作诗。《庚溪诗话》推其咏

落花之诗工,不减于宋庠、宋祁。《四库全书总目》云:“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于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有《武溪集》二十卷,今存。《宋史》卷三二〇有传,《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三有其神道碑铭。

(张丽娟)

【张俞】 一作张愈,字少愚,又字才叔,号白云居士,益州郫(今属四川)人。屡举不第,宋仁宗宝元(1038—1040)初,曾上书言边事。庆历元年(1041),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不就。隐居于岷山白云溪,朝廷多次征召,均不起。喜游山水,游历天下三十余年,后闭门著书,未就而卒。卒年六十五。其妻谏之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张俞为文有西汉风,苏舜钦曾赞其《洛阳怀古赋》。他的诗多为遨游山水之作。其《蚕妇》一首:“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传诵久远,为世所重。《郡斋读书志》著录他的《白云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张俞集》二十六卷,今已不传。《东都事略》卷一一八,《宋史》卷四五八有传。

(张丽娟)

【陈舜俞】(?—1075) 字令举,自号白牛居士,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登进士第,授签书寿州判官公事。嘉祐四年(1059),举制科,授著作佐郎。后弃官归,居秀州白牛村。神宗熙宁三年(1070),复出,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责监南康军盐酒税。熙宁八年(1075)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其诗气格疏散,皆自抒胸臆之言。七律流畅,好用流水对。《渊明醉石》、《和开祖丹阳别子瞻后寄》等诗,颇可视作其律体代表作。有《都官集》三十卷,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其诗文,编为十四卷,其中诗三卷。另有《庐山记》五卷。《宋史》卷三三一有传。

(张丽娟)

【梅尧臣】(1002—1160) 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即古宛陵,遂称宛陵先生。叔询,有文名于时。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询通判襄州,从行。仁宗天圣(1023—1032)中,荫补太庙斋郎,为桐城县主簿。天圣九年(1031),为河南县主簿,任中与欧阳修、尹洙等往还较密;始存稿。景祐元年(1034),知建德县。宝元元年(1038),任满,赴京师。宝元二年,知襄城县。庆历元年(1041),改监湖州盐税。庆历四年,罢,归宣城,赴京师。庆历五年,为许昌签判。庆历七年,罢,回京师。次年,为国子博士,旋签书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皇祐元年(1049),父卒,奔丧。皇祐三年,回京师,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皇祐四年,监永济仓。嘉祐元年(1056),为国子监直讲。嘉祐五年,迁尚书都官员外

郎,卒。有《宛陵先生集》传世,存诗约二千八百九十首。他论诗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传统,主张诗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应该学《春秋》“贬骨常苦笞”(《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应有褒贬,有批判,有讽刺。他关怀民生疾苦,天圣九年,有《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景祐三年,有《田家》、《陶者》;康定元年(1040),有《田家语》,揭露赋税、徭役使得农民“父子各悲哭”,“铛缶空无粥”;有《汝坟贫女》,叙贫女之老父应役,僵死壤河上,无人殓葬之悲惨遭遇,庶几诗史。他关心国事,其代表作有《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蔡君谟示古大弩牙》,写西北事,愿为之效力。其景祐三年所作《彼鸛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讽刺朝廷当权守旧势力排斥异己,谓之为“食人肉”,辛辣深刻。其《晚泊观斗鸡》、《寒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诸作,寓哲理于平常景物或事物之中,其见识往往有过人者。以上各诗,皆言之有物,有现实意义,他认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反对浮艳、空洞、晦涩的西昆体诗风,以“平淡”作为艺术的至高境界。他提倡含蓄美,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他善于以朴素自然之语,写出清切新颖之景,如《鲁山山行》写秋山荒凉幽静,笔触细微。其《食河豚》、《送欧阳秀才游江西》、《郭之美见过》、《阻风秦淮》等作,於浑朴中时出苕秀。其《梦后寄欧阳永叔》、《东溪》、《考试毕登铨楼》等作,皆有意新语工佳句。“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尤胜七言,然质而每钝,厚而多愿”(钱鍾书《谈艺录》),以致“‘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钱鍾书《宋诗选注》),缺乏文采。此类弊病,正是他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陆游称梅诗“突兀元和作,巍然独主盟”(《剑南诗稿·书宛陵集后》)。刘克庄称他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集》卷一七四)。清潘彦辅《养一斋诗话》于宋诗独取尧臣之“淡”。事迹详欧阳修所撰墓铭。《宋史》卷四四三有传。(孔凡礼)

【石介】(1005—1045) 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尝讲学家乡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祖上务农,父丙始出仕。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天圣九年,为郢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为南京推官;御史中丞杜衍荐为御史台主簿,以前论事不合,罢而不召。宝元元年(1038),为嘉州军事判官。母、父相继卒,服丧。庆历二年(1042),服除,为国子监直讲。庆历四年,擢直集贤院,仍兼国子监直讲,旋通判濮州,未赴任。

庆历五年,卒。有《徂徕集》行世。介与欧阳修为同年,提倡古文,其文“博辩雄伟而忧深思远”(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庆历三年所作《庆历圣德颂》,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直言人所不敢言,震动很大,然亦以此成为众矢之的,致卒后其妻、子羁管他州。其论诗排西昆体(《怪说》),所作“嶙峋砢兀,特立千寻”,于激直之中存温厚之意(《宋诗钞》)。《宋史》卷四三二有传。(孔凡礼)

【文彦博】(1006—1097) 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登进士第,知翼城县,通判绛州,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出为河东转运副使,都转运使,知秦州,改益州。庆历七年(1047),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祐三年(1051),罢相,出知许州、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复相。嘉祐三年(1058),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封潞国公。英宗时入为枢密使。神宗时出判河南等地。哲宗元祐(1086—1094)初复入朝。元祐五年(1090),致仕。卒年九十二。文彦博居洛时,尝与司马光、富弼等十三人置酒赋诗,号“洛阳耆英会”,其诗气度雍容,风格闲适,从《寒食游压沙寺雨中席上偶作》可见一斑,诗云:“沙路无泥地侧金,满园香雪照琼林。一枝带雨尊前看,还是去年寒食心。”有《潞公集》四十卷,其中诗八卷。《宋史》卷三一三有传。(张丽娟)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四十时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江西永丰)人。四岁而孤,家贫,竟至“无一瓦之覆,一垆之植”(《泂冈阡表》),依三叔欧阳晔生活。寡母郑氏教养成材。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游随州,得韩愈诗文遗稿,读而慕之,遂厌当时沿袭五代馀习的模拟骈偶之文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一,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与梅尧臣、苏舜钦及西京留守钱惟演等诗唱和,其文名传于天下。景祐元年(1034),授宣德郎,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被贬,谏官高若讷独以为当黜,欧阳致书责之,以为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上其书,遂贬为夷陵县令,徙为乾德令。后仁宗锐意太平,广言路,修政事,庆历三年(1043),人荐修为谏官,遂以太常丞知谏院。修勇于任事,敢于上言,论事切直,权贵侧目,人以为仇。仁宗独奖其言,赐五品服,使同修起居注,知制诰。此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修全力支持。庆历五年,范仲淹被免职,修自劾乞罢转运使。谏官钱明逸据流言加以陷害,下开封府审讯,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被贬为滁州知州。其名著《醉翁亭记》即写于滁。居二年,徙扬州、

颍州,皆有惠政,改南京(宋真宗时以宋州为宋太祖旧藩,升为应天府,后建为南京)留守,以丁内艰去职。服除,入朝,判流内铨,小人畏其复用,纷纷排挤,出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士子崇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提倡自然平易文风,文坛风气,为之大变。嘉祐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拜礼部侍郎,又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升为参知政事,封开国公。次年,更进阶正奉大夫。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英宗治平四年(1067),御史中丞彭思永、御史蒋之奇诬蔑修与其长媳关系暧昧。修以风节自持,受此污辱,九上章奏,请求辩白。朝廷使诘彭、蒋,二人理屈辞穷,皆被黜,修亦心灰意冷,连乞致仕。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次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修博学多才,是史学家、经学家与博物学家,其古文、词曲、诗歌创作皆取得很高成就。在诗歌创作上,有意矫正流行于当时的镂金错彩,注重词藻、典故而忽略内容的西昆体诗风。如叶梦得所言:“欧阳文忠公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其诗不用生僻之典,不堆砌华丽辞藻,不重奇巧对偶。只是把目所见、心所感写了出来,仿佛信手拈出,质朴平易,并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今人钱鍾书云:“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宋诗选注》)其诗作中多记事、写志、摭思、说理之作。如《啼鸟》、《答原父》、《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食糟民》、《送任处上归太原》、《戏答元珍》、《和明妃曲》等皆为其代表作品。他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还是一代诗文革新的主将。早年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汇聚成为一个锐意改革的士人集团,“同为古文歌诗”,当领袖文坛时便运用各种方式改革旧文风,提倡新文风。他爱惜人才,重视人才、奖掖人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杰出的文人才士大多为其赞赏、吸引或荐举,如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他的著作颇富,有《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新唐书》中的“本纪”、“志”、“表”等部分,约为七十五卷。《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清杨希閔为撰《年谱》。《宋史》卷三一九有传。

(王学泰)

【王琪】字君玉,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举进士,调江都主簿。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试学士院,授馆阁校勘。天圣五年,签书南京留守判官事。历集贤校理、直集贤院,两浙淮南转运使,修起居注,知制诰。庆历七年(1047),奉使契丹,感疾还,责信州团练副使。久之,以龙图阁待制知润州,复知制诰。英宗治平元年(1064),知杭州。次年,徙扬州。以礼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王琪儿童时已能为歌诗,其《九曲池》诗曾得晏殊叹赏。《石林诗话》载晏殊留守南郡时,以王琪为府签判,“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后村诗话》称其诗刻琢深厚,精妙有思致。其诗今存《漫园小稿》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中。《宋史》卷三一二有传。

(张丽娟)

【契嵩】(1007—1072)字仲灵,俗姓李,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幼时出家,十九岁始,游方天下。宋仁宗庆历(1041—1048)间,居杭州灵隐寺。嘉祐六年(1061),入京,仁宗赐号明教大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年六十六。王士禛《居易录》曾称其诗多秀句。长于五古、五律,多含不尽之意。如:“空虚澄远烟,霁色含秋景。思君每盘桓,驻目千峰顶。明月初团栾,可照美人影。美人来不来,云霞渺林岭。”(《感遇》)有《镡津集》二十二卷,其中诗二卷。据陈舜俞所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契嵩所著编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馀卷。《禅林僧宝传》卷二七有传。

(张丽娟)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少时家贫。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崑山县。复中贤良方正,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直集贤院,迁太常丞,知谏院,知制诰。累官拜翰林学士。拜谏议大夫,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无不言。复拜翰林学士,出知滁州、江宁府、杭州、秦州、益州。还为三司使。英宗时,累迁拜翰林学士承旨。神宗即位,迁户部尚书,为参知政事,寻以父丧罢。服阕,知陈州,判应天府。神宗元丰(1078—1085)中致仕。哲宗元祐六年(1091),卒,谥文定。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神宗尝赞其章疏之文“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苏轼文集》卷十四墓铭)。“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同上书卷十五《乐全集序》)。其集前五卷为诗,计三百一十五首。其五言排律《读杜诗》,历论杜诗之豪壮,妙绪不穷,可以“雄丽”当之。其《高祖庙》、《歌风台》立意不同凡响,为叶梦得《石林诗话》所称,前者并为金王若虚《溁南遗老集》所称。《宋史》卷三一八有传。(孔凡礼)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铜山(今四川中江),生于开封(今属河南)。祖父易简,父耆,皆

有名当世,《宋史》卷二六六有传。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以父荫补太庙斋郎。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县。景祐二年,父耆卒于陕西转运使任中,奔丧长安。景祐四年,自长安至京师。宝元元年(1038),知长垣县。康定元年(1040),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庆历三年(1043),旅山阳。庆历四年,以范仲淹之荐,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上书极论弊政。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依惯例卖拆封废纸钱以充其资,不足,与会者各出钱十千助席,却吏史,更召两军女伎。太子中舍李定腾谤都下,谓讪时政。御史王拱辰、刘元瑜弹奏其事。狱成,以监主自盗,减死一等科断,除名为民,同会者十余人皆连坐斥退。庆历五年,来吴中,作沧浪亭居之。庆历八年,复官,为湖州长史,未及赴任,卒。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有诗文集《苏舜钦集》。他与欧阳修、梅尧臣齐名,时称“欧、苏”或“苏、梅”。针对当时的浮艳文风,他主张诗文应“原于古,致于用”,不雕琢以害正;他认为“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所以宏政教,辅治道(《石曼卿诗集序》),其要害是反映现实。如:《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指斥执政者尸位素餐,深刻揭露吴越大地“大旱千里赤”,“暴敛不暂息”,“鞭笞血涂地”以致“死者道路积”的惨象。《庆州败》则尖锐指出庆州惨败于夏人是由于朝廷素无“备军之志”,是由于主将的怯懦无能。《送李冀州诗》、《寄富彦国》、《送杜密学赴并州》、《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等诗,鼓励友人抗御外患,效命疆场,建功立业。《吾闻》诗则强烈希望自己能投身保卫国家的战斗,以便“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腥膻屏除尽,定不存种孽”,把敌人彻底消灭。他早于陆游,第一个在宋诗里,抒发了这种英雄抱负(参钱鍾书《宋诗选注》)。欧阳修说他的诗“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六一诗话》),黄庭坚谓其诗“豪健痛快”(《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二苏送梁子熙联句》),刘克庄则谓其“歌行雄放”,“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今人张晶则谓苏诗风格可以用“豪犷哀顿为主而兼冷峻沉着”来概括(《文学遗产》1986年第五期郑孟彤等《1985年唐宋诗歌研究述评》引)。“进奏院事件”以后,退居吴中,乃“蟠屈为吴体”,“极平夷妥帖”。其《夏意》、《淮中晚泊桡头》二首,“极似韦苏州”(《后村诗话》)。其《独步游沧浪亭》则“幽独闲放”(《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二),《独酌》则闲放中有“旷达”(《梁溪漫志》卷八)。然亦不乏“雄伟”之句,如《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六一诗话》)。他在“进奏院事件”以前的诗作,修辞上“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宋诗选注》)。

事迹详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墓志铭。《宋史》卷四四二有传。(孔凡礼)

【张伯玉】字公达,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登进士第,为苏州郡从事。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以秘书丞知并州太谷县,范仲淹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至和(1054—1056)中,通判睦州,后知福州、越州、睦州。嘉祐(1056—1063)中,为御史,后选司封郎中。工诗善饮,名重当时,有张百杯、张百篇之号,言其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也。博闻强识。(见《铁围山丛谈》)《墨客挥犀》记其过姑孰,读李白《姑孰十咏》,叹美久之。后见明月泉尚未咏及,言“太白不题此泉,将留以待我也”,遂写道:“至今千丈松,犹伴数岩雪。不见纤尘飞,寒泉皓明月。”传诵一时。有《蓬莱集》二卷,已佚。事见《宋诗纪事》卷二〇。(张丽娟)

【杜默】字师雄。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宋神宗熙宁(1068—1077)末年,特奏名,为新淦尉,年近七十卒。《王直方诗话》云:“石守道作《三豪诗》,谓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杜默师事石介,以歌行自负,石介、欧阳修均有诗称赞他。《王直方诗话》还引其“圣人门前大虫”及“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之句,《临汉隐居诗话》亦举其《中秋月诗》,称“虽造语粗浅,然亦豪爽也”。事见《宋诗纪事》卷二七。(张丽娟)

【赵抃】(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除武安军节度推官,知崇安、海陵、江原县,通判泗州。至和元年(1054),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嘉祐元年(1056),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召为右司谏,以言事出知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知成都。神宗即位,召知谏院,擢参知政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反对青苗法去位,历知杭州、青州、成都、越州,复徙杭州。元丰二年(1079),致仕,退居于衢。元丰七年(1084),卒,年七十七,谥清献。抃为政简易,长厚清修,为世所称。其诗不假藻饰,触口而成,而谐婉多姿,如《芳草》、《暖风》等篇章皆可代表其诗风。有《清献集》十卷,今存。《宋史》卷三一六有传。

(张丽娟)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登进士第,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兼左藏库。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宝元(1038—1040)间,为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等共同经营西边,为民所称。庆历三年(1043),入为枢密副使,支持庆历新政。庆历五年,出知扬州、鄂州、成德

军、定州、并州。嘉祐(1056—1063)初,入为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封魏国公。神宗时出判相州,徙大名府。神宗熙宁八年(1075)卒,年六十八,谥忠献。他善为诗文,亦工小词,清吴之振《宋诗钞》评其诗“率臆得之,而意思深长,有锻炼所不及。理趣流露,皆贤相识度。”其“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九日水阁》)诗句,历来为人所传诵。有《安阳集》五十卷,今存,其中诗二十一卷。《名臣碑传琬琰集》有宋李清臣所撰韩琦行状,《宋史》卷三一二有传。(张丽娟)

【杨备】字修之,浦城(今属福建)人,杨亿弟。宋仁宗天圣(1023—1032)中,为长溪令,明道(1032—1033)初,宰华亭。丁内艰,家于吴中。庆历(1041—1048)中,为尚书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上轻车都尉。因爱姑苏景物,晚家于吴。《中吴纪闻》记其效白体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又作《姑苏百题》诗。其中《响屐廊》、《吴王井》、《剑池》、《长洲》等亦颇有韵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他的《金陵览古诗》三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他的《历代纪元赋》一卷。今存《萝轩外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中。事见《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宋诗纪事》卷一七。(张丽娟)

【李觏】(1009—1059)字泰伯,世称盱江先生、直讲先生,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俊辩能文,宋仁宗庆历(1041—1048)间,举茂才异等不第,创建盱江书院,教授生徒,从学者常数百人。皇祐(1049—1054)初,范仲淹等荐为试太学助教。嘉祐(1056—1063)中,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嘉祐四年(1059)卒,年五十一。他通经术,排斥佛、道迷信,支持庆历新政的改革,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的诗受韩愈、皮日休等的影响,出语奇特,比较有气概。然其小诗造句平易,与其古体不同,如《绝句》(人言落日是天涯)《壁月》(壁月迢迢出暮山)等。有《直讲李先生文集》(一名《盱江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宋魏峙有《李直讲年谱》,载《盱江集》卷首,《宋史》卷四三二有传。(张丽娟)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初举进士不中。景祐二年(1035),始发愤刻苦读书。景祐四年,应礼部试,不中。庆历五年(1045),至京师,与颜醇之等游。庆历六年,举制策,不中。庆历七年,自嵩洛游庐山、虔州,父卒,归。至和二年(1055),谒张方平于成都,访雷简夫于雅州。嘉祐元年(1056),送二子轼、辙抵京应试;识欧阳修、韩琦,名动京师。嘉祐五年,为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英宗治平二年(1065),礼书成。次年,卒,人称文安先生。有《嘉祐集》传世,版本很多。又有北宋残本

《类编增广老苏先生文集》二卷。今传诗五十首。洵以散文名。叶梦得谓其“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并赞其《九日和韩魏公》诗意气“不少衰”,其《送蜀僧去尘》诗“婉而不迫,哀而不伤”(《石林诗话》卷下)。陈师道引世人之言谓洵“不能诗”(《后山诗话》),失之偏颇。所作以古体为多。《宋史》卷四四三有传。(孔凡礼)

【祖无择】(1010—1085)字择之,上蔡(今属河南)人。少从孙复学经术,又从穆修学古文。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登进士第,历知南康军、海州,提点淮南、广东刑狱,入直集贤院。皇祐五年(1053),出知袁州,首建学官,置生徒。后改知陕府。英宗治平二年(1065),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进学士,知郑州、杭州。神宗即位,入知通进银台司。神宗熙宁三年(1070),谪忠正军节度副使。熙宁八年,复光禄卿,秘书监,集贤院学士,主管西京御史台,移知信阳军。元丰八年(1085)卒,年七十六。他的文章峭厉劲折,诗作亦富,与司马光、梅尧臣等多赠答唱和之作。南宋时其曾孙祖行曾编其集为《焕斗集》。今存《龙学文集》十六卷。《宋史》卷三三一有传。

(张丽娟)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晚号伊川翁,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少随父徙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城西北苏门山。少时以功名自许,于书无所不读,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游学四方,河汾淮汉,齐鲁宋郑,皆足所至。李之才为共城县令,闻雍好学,授以《河图》、《洛书》以及象数之学。雍又能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所自得。晚居洛阳,躬樵爨以事父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怡然有所自乐,名其居为“安乐窝”。当时退居洛阳之大老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皆甚礼敬,司马光兄事雍。宋仁宗嘉祐(1056—1063)中,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荐之,授将作监主簿,不赴;神宗熙宁(1068—1077)中,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亦不之任。安石行新法,持反对意见,以为新政害民。卒赠秘书省著作郎。哲宗元祐(1086—1094)中,赐谥康节。雍为人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其诗温厚和平,雍容不迫,平缓浅易,与其人相类。诗多说理咏史之作,如《首尾吟》、《闲居吟》、《闲行吟》、《观三皇》、《观五帝》、《观嬴秦》、《问鼎》、《安乐窝》、《安乐四吟》、《悟人一言》、《晚凉闲步》等,皆是其代表作品。四库馆臣言:“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毁之者,务以声律绳之,固所谓谬伤海鸟、横斥山木;誉之者,以为风雅正传。”(《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实际邵诗成就参差不齐,其多数作品流于枯燥之说理,而且是极迂极腐之“理”。这种以通俗诗体说儒家之理的诗作,后人以邵雍集名称之曰“击壤体”。雍也有少量作品描写出其隐逸生活的闲适与心境的平夷坦荡,颇有感染力。著有《皇极经世》、《渔樵问对》、《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等。《宋史》卷四二七有传。(王学泰)

【蔡襄】(1012—1067) 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当范仲淹被罢黜并殃及为之辩护的欧阳修、尹洙、余靖时,襄撰《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公忠体国之精神,斥责趋炎附势的谏官高若讷,京中人士竞相传写,一时纸贵。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皇祐四年(1052),召知制诰,后知开封府,再知福州、泉州。嘉祐五年(1060),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出知杭州。英宗治平四年(1067),卒,年五十六,谥忠惠。襄工书法,诗文清妙,其小诗尤有灵气,如《书小阁壁上》、《宿渔梁驿》、《留别旧居花槛》等。有《蔡忠惠集》三十六卷,今存。《宋史》卷三二〇有传,《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五有其墓志铭。(张丽娟)

【陶弼】(1015—1078) 字商翁,永州祁阳(今属湖南)人。曾从丁谓学兵法,有武略。宋仁宗庆历(1041—1048)中,以军功补衡州司户参军,后知阳朔县。历知宾州、容州、钦州、邕州等。神宗元丰元年(1078)卒,年六十四。平生独以文章自喜,尤工于诗,其诗擅写悲壮的情绪和阔大的景象。刘克庄评其诗云:“集中多佳句。……五言如《塞上》云:‘星落胡王死,河穷汉使归。雪山经夏冷,天马入秋肥。’《观教战》云:‘晋兴由帅让,楚败以师喧。’《行役》云:‘阴微辨樵火,霁早误僧钟。’《杂诗》云:‘久闲忘将略,多病熟医书。’《顺州》云:‘渴蜂衔砚水,饥蝶嗅瓶花。’七言《汴河》云:‘柳与扬州今独在,水和隋帝不重来。’《柳州》云:‘人心如地少平处,天气似春无冷时。’《送人》云:‘冷酒十分无客送,轻车一两有民攀。’又云:‘兵堪渡海将军老,史不占天处士闲。’《村行》云:‘路小马蹄高复下,村深鸡唱有如无。’”(《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可见其善于捕捉生活与自然界中习见而不为人所关注的事物,并把它们生动地表现出来。有文集十八卷,已佚。今存《邕州小集》一卷。《刘忠肃集》卷一二及《豫章先生文集》卷二二均有其墓志铭,《宋史》卷三三四有传。(张丽娟)

【陈襄】(1017—1080) 字述古,人称古灵先生,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少孤,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倡知天尽性之说,时称“四先生”。宋仁宗庆

历二年(1042)进士,为浦城主簿,知仙居、河阳、濠县等。以富弼荐,为秘阁校理,判祠部。嘉祐六年(1061),出知常州。英宗治平(1064—1067)间,为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后直学士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四年,出知陈州、徙杭州。后以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元丰二年(1080)卒,年六十四。李纲为其集作序,称其诗篇平淡,如韦应物。其七律、七绝亦喜用富于色彩之词藻点染。如《寄远》、《夜意》、《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出游见寄》皆如此。从《中和堂木芙蓉盛开戏子瞻》可见一斑:“千林寒叶正疏黄,占得珍丛第一芳。容易便开三百朵,此心应不畏秋霜。”今存《古灵集》二十五卷,附有陈晔《古灵先生年谱》。《宋史》卷三二一有传。(张丽娟)

【韩维】(1017—1098) 字持国,颍昌(今河南许昌)人,韩亿之子,韩绛弟。以荫入官,父没后闭门不仕。富弼辟为河东幕府史馆修撰,欧阳修荐为检讨、知太常礼院,通判涇州。后为淮阳郡王、颍王府纪事参军。英宗时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神宗熙宁二年(1069),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襄州、许州。哲宗元祐(1086—1094)中,拜门下侍郎,后知邓州,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二年(1095),坐元祐党籍,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卒,年八十二。他的诗学白居易,古淡疏畅,《艇斋诗话》举其《过孔宁极处士山居》等二诗,称为“极雍容简远”。他的《酴醾》诗亦为世所传。有《南阳集》,今存。《宋史》卷三一五有传。(张丽娟)

【黄庶】(1018—1058) 字亚父,一作亚夫,号青社,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少嗜学,有大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政之巨细,无不参与,但大抵只是主管簿书、主持狱讼,与其生平抱负,相去甚远。皇祐五年(1053),自编所作诗文,成二卷,题曰《伐檀集》,盖取尸位素餐之意。官终摄康州知州。庶诗学杜甫。以描写游宦生活、山程水驿与文人士大夫园林官舍者为多,如《山居独酌》、《山水卧屏》、《和刘卿材十咏》、《白石涧》、《登见山楼》、《宿采石》、《和柳子玉官舍十首》等。庶子庭坚外甥论庶诗云:“山谷父亚父诗自有句法。山谷书其《大孤山》、《宿赵屯》两诗,刻石于落星寺。两诗警拔,世多见之矣。余记其《怪石》一绝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禄辟邪眠苔莓。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山谷句法高妙,盖其源流有所自云。”(《洪驹父诗话》)刘克庄亦曾称赞庶善于造句,许多诗句“奇崛不蹈袭”,

并言：“亚父真黄氏之审言矣。”这些皆指出了庶诗作对庭坚诗风形成的影响。著有《伐檀集》。其传记资料散见《山谷诗集注》。

(王学泰)

【杨蟠】字公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人，一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哲宗元祐（1086—1094）中，通判杭州，时苏轼知杭州，二人唱酬居多。后知温州、寿州，卒。平生为诗数千篇，欧阳修曾称其诗。《王直方诗话》举其《莼菜诗》，称时人以为读其诗，不必食莼羹然后知其味。有《钱塘西湖百咏》颇负时名，散佚已久。清丁午辑得四十一首，皆为五绝，其中《杨梅坞》、《西溪》颇有六朝乐府小诗风韵。有《章安集》，已佚，《台州丛书后集》辑有《章安集》一卷。

(张丽娟)

【袁陟】字世弼，号遯翁，南昌（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知当涂县，历太常博士，终殿中丞，卒年三十四岁。其父袁抗藏书至万卷，陟幼时即刻苦向学，善为诗。其十七岁时所写《题百丈》诗即有名于时。游宦当涂时，郭祥正尚未弱冠，陟识其才，与之往来唱和，并荐于名诗人梅尧臣，郭从此有名于时。其诗如王直方所云：“袁世弼能为诗，慕韦应物，而遯丽奇壮过之。王介甫尝手书世弼《赠郭功父诗》云：‘方山忆共泛金舡，屈指于今五六年。风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归鞦。浮生聚散应难料，末路穷通尽偶然。欲问故人牢落事，鹿裘深入白云眠。’”（《宋诗话辑佚·王直方诗话》）《临汉隐居诗话》言其“古诗尤佳”，“文章多零落”。有《遯翁集》十卷，久佚。其事迹见清雍《江西通志》。《宋史》卷三〇一有传，附《袁抗传》后。

(张丽娟)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梓州永泰（今属四川）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皇祐二年，为邛州军事判官。皇祐四年，摄蒲江县。至和元年（1054），代还。至和二年，为静难军（邠州）节度判官。嘉祐四年（1059），召试馆职，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嘉祐六年，倅邛州。次年，居父忧。英宗治平元年（1064），服除归馆。治平二年，通判汉州，摄守邛州。治平三年，知普州。次年，丁母忧。神宗熙宁三年（1070），服除，自蜀还朝，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太宗正司条贯。熙宁四年，以太常博士知陵州。熙宁六年，知兴元府。熙宁八年，知洋州。熙宁十年，还京师。元丰元年（1078），判登闻鼓院，旋除知湖州。元丰二年，赴湖州任，卒于陈州途中。同诗在《丹渊集》卷二至卷二〇。苏轼赞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书文与可墨竹》，《苏轼诗集》卷二六），次以草书、画。谓其“诗笔当今少俦”（《苏轼佚文汇编》卷二与同第九

简），“婉而清”（《苏轼文集》卷六三《祭文与可文》），并盛称其《秦王卷衣》“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二句（《冷斋夜话》卷一《东坡论文与可诗》）。惠洪则赞“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并赞其《再赠鹭鸶》诗（《冷斋夜话》同上）。《娱书堂诗话》卷上赞其《鹭鸶》诗“清拔可喜”。盖其人品“高远萧洒”（《丹渊集》附录司马光简）使然。《升庵诗话》卷一《文与可》赞其“五言律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谓苏轼不虚赏，并举其《咏闲乐》、《过友人溪居》、《晚次江上》、《玉峰园避暑值雨》、《极寒》、《江上主人》、《咏梨花》、《咏杏花》八诗，谓“置之开元诸公集，殆不可别”。《宋诗钞》亦称“其诗清苍萧散，无俗学补缀气”。然清苍之至，往往艰涩随之。其诗除吟咏个人生活外，亦及民生疾苦，如《野老》、《大热见田中病牛》，然为数不多。其气象、规模，虽不能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比，然亦自成一家。事迹详范百禄所撰墓志铭、家诚之所撰年谱。《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孔凡礼)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人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拜大理评事、通判蔡州事。庆历八年，丁父忧。皇祐三年（1051），召试学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旋判三司开拆司。皇祐五年，迁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1054），同修起居注，旋拜右正言，知制诰。至和二年，使辽。嘉祐元年（1056），知扬州。嘉祐二年，知郢州。嘉祐三年，还朝，纠察在京刑狱。嘉祐六年，知永兴军，拜翰林侍读学士。嘉祐七年，迁礼部郎中。英宗即位，进吏部郎中。英宗治平元年（1064），知汝州。治平三年，改集贤院学士。治平四年，改给事中，明年卒。今存诗一千六百多首。欧阳修盛称其博学，以为“其文章未佳”（《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亦不称其诗。然敞才力富赡，尤长于古体。明杨慎赞其《喜雨》，谓“无愧唐人”（《升庵诗话》卷一三《刘原父喜雨诗》）；清王士禛亦赞此诗，谓不减谢朓、韦应物（《香祖笔记》）。则敞诗非不佳，特为博雅所掩耳。《宋史》卷三一九有传。

(孔凡礼)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人称南丰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官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诸州。神宗元丰三年（1080），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元丰六年，卒于江宁。后谥文定。曾巩现存诗四百四十首。巩以散文名，诗名为其所掩。其弟子秦观尝谓巩“有韵者辄不工”（《苏轼文集》卷六八《记少游论文》）；其另一弟子陈师道引世人之语谓巩“短于韵语”（《后山集》卷二三《诗话》）。持异议者甚多。如王安石甚赏其

《享祀军山庙歌》,“以为有《雅》、《颂》之意”(《升庵诗话》卷一〇《曾子固诗》)。刘克庄谓其《明妃曲》“丹青”二句,为“诸家之所未发”,《哭尹师鲁》“悲公”二句“意甚高”,《挽丁元珍》“鸛来”二句“尤精切”,《北归》七绝,极似王安石。元刘壎《隐居通议》卷七《曾南丰》以为巩“非不能诗”,“盖其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又谓“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巩亦尚赋。其《韩魏公挽诗》“宏伟尊壮”,即为赋体。然巩诗亦有比兴,如古体《麻姑山》一首,“甚似太白《蜀道难》”,可谓为讲究比兴的代表作。刘壎又谓其《城南绝句》、《夜出过利涉门》二诗“清丽婉熟”;《北归》“虽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则谓巩之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气”;五言近体如“流水寒更淡,虚窗深自明”、“一径入松下,两峰横马前”、“时见岩下雨,多从衣上云”,“颇得陶谢家法”;七言近体如《咏柳》、《离齐州后五首》其一等与七言佳句“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坐凉”、“娟娟野菊经秋淡,漠漠江湖带雨浑”、“入陂野水冬来浅,对树诸峰雪后寒”等,“皆清深婉约,得诗人之风旨”,与刘壎之见略同。今人钱鍾书以为,就唐宋八大散文家而论,巩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宋诗选注》)。除此以外,巩有《追租》关怀民生疾苦,《胡使》揭露朝廷边防失策,十分深刻。其诗和散文一样,语不徒发,内容充实,亦可称道。《宋史》卷三一九有传。

(孔凡礼)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进士,除奉礼郎,苏州签判,签书成武军判官事。庆历六年(1046),以庞籍荐,召试,除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通判并州,改开封府推官,累官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神宗擢为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神宗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编成《资治通鉴》。哲宗即位,召拜门下侍郎。哲宗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是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的诗写得质实典重,雍容闲适。他的《续诗话》中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推许杜甫为“最得诗人之体”。他的著述甚富,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及诗歌理论著作《续诗话》等。《宋史》卷三三六有传。清顾栋高有《司马温公年谱》,收入《求恕斋丛书》中。

(张丽娟)

【王珪】(1019—1085) 字禹玉,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通判扬州,召

直集贤院,历修起居注、知制诰、知审官院,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神宗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熙宁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丰五年(1082),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哲宗时封岐国公。卒年六十七,谥文恭。史称王珪“以文学进,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后山诗话》称:“王岐公诗喜用金玉珠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他的诗讲究词藻,细润熨贴,精思锻炼,赡丽典雅,好为富贵语。有《华阳集》一百卷,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得六十卷,附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題》还著录他的《王岐公宫词》一卷。《宋史》卷三一二有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八有叶清臣所撰墓志铭。

(张丽娟)

【苏颂】(1020—1101) 字子容,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人,徙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南京留守推官,皆处事精审、颇有政绩。皇祐五年(1053),入朝,历知太常礼院,集贤校理、迁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等官,因娴于政体,明于礼制而为皇帝称善。由于不同意超擢新党人物李定由州判官升至太子中允,被免去知制诰,后又出知婺州、亳州、应天府、杭州。归朝为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神宗元丰(1078—1085)初,因事被逮入御史台狱。出狱,知河阳,改沧州。元丰中,召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奉旨编纂与辽国往来文献,名《鲁卫信录》。哲宗元祐(1086—1094)初,除吏部尚书兼侍读。提议并提举新浑天仪制造。新浑天仪构造巧妙,以机械传动,再现天地日月星象之运转。颂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罢,知扬州。绍圣四年(1097),拜太子少师,致仕。徽宗立,进太子少保、封赵郡公,卒赠司空。颂极博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朝廷有所制作,必就正焉。颂不以诗名,然其诗清新平易,亦颇可观。其诗以记游宦生涯者为多,如《暮春与诸同僚登钟山望牛首》、《奚山路》、《赠同事閤使》、《次韵蒋颖叔同游南屏见惠长篇》等等,或写出使的艰辛,或据仕宦的心境,皆娓娓动听。著有《华戎鲁卫信录》、《新仪象法要》、《苏魏公集》。《宋史》卷三四〇有传。

(王学泰)

【金君卿】 字正叔,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人。宋仁宗庆历(1041—1048)间进士。皇祐二年(1050),官秘书丞,皇祐五年,官太常博士。累官知临川、权江西提刑,入为度支郎中。嘉祐(1056—1063)末,为广东转运使。君卿治五经,尤长于易学,有《易说》。其诗文皆清醇雅饬。与文彦博、韩琦、欧阳修、曾巩

等都有唱和诗文,可资考证。有集十五卷,哲宗元祐(1086—1094)间江明仲搜求遗稿编成,富临为作序,原本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编《金氏文集》二卷。(张丽娟)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因曾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随父王益游宦四方,洞悉人情民瘼;好读书,自诸子百家之书,乃至《本草》、《素问》、小说,无所不读,过目终身不忘。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第四名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早年以任地方官为主,历任签书淮南判官、知鄞县、通判舒州、知常州、江东提点刑狱。所至开发水利、发展农业、扶贫拯困、兴办学校,多有惠政。安石与同乡曾巩交好,通过曾巩延誉,文坛领袖欧阳修特别赏识其学识与文才。嘉祐四年(1059),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其时举朝上下,因循苟且,纲纪弛懈,政治腐败,国困民穷。安石早以稷契自命,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从整顿财政角度提出变法主张,未被接受。嘉祐八年,丁内艰去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服除,不入朝,在江宁聚徒讲学与著述。神宗即位,锐意行新政,召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入朝,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揭示“本朝”在“百年无事”之后所酝酿的危机,深得神宗赞同。熙宁二年(1069),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推行新法,陆续推行者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等,引起许多朝臣反对,于是安石只在趋奉者中寻求支持。熙宁七年,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安石罢相,为观文阁大学士、知江宁府,乞召韩绛自代,引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欲借他事以倾安石,新党内讧,群龙无首。熙宁八年春,再度起复为相,并上《诗》、《书》、《礼》的《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作为“新”学之基础。熙宁九年,其子王雱病卒,在政敌攻击下安石心灰意冷,坚决请辞,晚年隐居江宁,不问政事,日与僧侣佛徒往来,疏解《楞严经》,沉溺于佛典,所作小诗亦多有机锋。安石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从政治家角度看待儒学,从而形成注重功利与实际的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把文学看作政治之附庸,当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之手段和向不良政治及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之工具。因此,王诗重要之特征就是为其维新变法与清除弊政服务。如《感事》、《兼并》、《收盐》、《发廩》、《寓言》等等都是为变法服务的诗章,极有现实性,然而大多写得枯燥呆板、质木无文。还有许多作品反映出作者对于民族矛盾的关切、对边事的忧虑。从《入塞》、《出塞》、《白沟行》、《阴山画虎图》、《河北民》等名篇

中可见宋朝国势积弱导致辽国的坐大与嚣张,这不仅给国家造成威胁,也给民众带来很大损害。王诗中艺术水平最高者乃其描写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志的律绝小诗和五言古诗,如《葛溪驿》、《示长安君》、《书湖阴先生壁》、《悟真院》、《泊船瓜洲》、《江上》、《夜直》、《寄蔡天启》、《乌塘》、《柘冈》、《钟山晚步》、《钟山即事》、《杖藜》、《秋云》、《金山三首》等,皆可视为其代表作品。安石晚年七绝精妙绝伦,当时即为人称赞,名为“王荆公体”。黄庭坚云:“荆公之诗,暮年方妙。”(《后山诗话》)又言:“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见《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言安石小诗“去词去意而诗存在矣”,“《三百篇》遗味黯然而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这类小诗看似平淡闲适,却有味外之味。吴之振云:“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安石善于用典,善于炼句炼字。钱鍾书言王“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宋诗选注》)。安石亦工于古文与词。著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王文公文集》,编选了《唐百家诗选》。《宋史》卷三二七有传。清顾栋高撰有《王荆公年谱》三卷附遗事一卷,清蔡上翔撰有《王荆公年谱考略》。(王学泰)

【刘彝】(1022—1091) 字执中,福州(今属福建)人。少从胡瑗学,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主簿,移胸山令。神宗熙宁(1068—1077)初,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因言新法不便,罢。后以其习知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为两浙转运判官,知度州、桂州。熙宁九年(1076),坐事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哲宗元祐六年(1091),以都水丞召还,病卒于道,年七十。刘诗较为厚重质实,缺少文采。其诗文集《居阳集》等已佚。所遗诗不多,多论道说理记实之作。有《周礼中义》、《古礼经传续通解》、《洪範解》、《礼记大全》、《水经注》等。《宋史》卷三三四有传。(张丽娟)

【强至】(1022—1076) 字幾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除泗州司理参军,历浦江、东阳、元城令。英宗治平四年(1067),韩琦判永兴军,辟为管机宜文字。神宗熙宁(1068—1077)间,召判户部勾院,迁群牧判官、三司户部判官。熙宁九年(1076)卒,年五十五。他的诗沉郁顿挫,颇有气格,其《贾麟自睦来杭复将如苏戏赠短句》

为人传诵。文章亦佳,在韩琦幕中,表章、书记多出其手。曾巩为其集作序,称其文备古今之体。有《祠部集》四十卷,不传。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辑为三十五卷。《咸淳临安志》卷六六有传。清强汝询《求益斋文集》中有《祠部公年谱》一卷。(张丽娟)

【杨傑】(1022?—1091?)字次公,自号无为子,无为(今属安徽)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为欧阳修客。神宗元丰(1078—1085)中,官太常,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哲宗元祐四年(1089),除两浙提刑。苏轼守杭,与唱酬。元祐五年,为礼部员外郎。官侍讲,卒。有《无为集》十五卷,乃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知无为军赵士彰所编次刊行。士彰搜采杨傑遗文,“取其有补教化者”,编成此集,“若释、道二家诗文,则见诸《别集》”(《序》)。(《别集》凡十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已久佚。)傑自少时起,即有文名,其友郭祥正挽诗赞其“力学窥前古”,惜其“文章误此生”。赵士彰谓其文“遣辞典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虽兴象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送李辟疆》之类,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宋史》卷四四三有传。(孔凡礼)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一作慤父、贛父,人称公非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神宗熙宁(1068—1077)初,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熙宁四年(1071),通判泰州。熙宁八年,知曹州。熙宁十年,为开封府推官。元丰元年(1078),为京东转运使。徙知兖、亳二州,黜监衡州盐仓。哲宗元祐元年(1086),知蔡州,人为中书舍人。元祐四年,卒。攽尝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史学称,诗名为其所掩。所撰《彭城集》,存诗一千二百多首。刘攽主张“诗以意为主”(《中山诗话》),不尚文词雕琢,他的许多诗以“平易”见长。七律如《杜介供奉园亭》、《观灌园偶书》、《早春郊外》,五绝如《东楼》、《长门曲》、《池上》,七绝如《种花》、《雨后池上》、《夜坐》,极少用典故,明白如话。苏轼赞扬他的七古《送王仲素寺丞归潜山》诗格“奇古”(《苏轼文集》卷五〇《与刘贡父》第四简)。苏轼还赞扬他的一些“回文小阕,律度精致,不失雍容”(同上第三简),可惜此类作品,只有《雨后回文》、《旅舍不寐作回文四句》传下来(词未传)。《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孔凡礼)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名臣范仲淹次子,资质警悟,八岁即能回讲所授书。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以父母老未仕,从仲淹门下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游,颇增

学养。仲淹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迁襄邑县,擢江东转运判官,为地方官时多惠政。神宗朝,拜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因反对熙宁(1068—1077)新政,言安石变法妨民,被出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历转和州、庆州。秦中方饥,纯仁擅发常平仓以赈贷,全活者甚多,朝廷欲治其擅发之罪,逢秋丰收,民争归其欠,使者至,已无所负。后治以他罪,其就逮,民万数遮道,至有自投于河者。黜纯仁知信阳军,移齐州,乞罢,提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时司马光等皆在洛,相约为真率会。哲宗初,宣仁太后垂帘,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除给事中。司马光执政,欲尽改新政,纯仁反对,主张革除其弊病较多的条款,并主张不必谋皆己出,否则谄谀公行,会重蹈安石覆辙。元祐三年(1088),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时吴处厚深文罗织新党蔡确《车盖亭诗》,以为谤宣仁太后,朝廷欲置之罪,执政中独纯仁反对,并言:“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见《宋史》本传)哲宗亲政,以忤新党执政章惇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立,除观文殿大学士,促入觐,以目疾乞归。卒谥忠宣。纯仁为人博大忠厚,性格夷易宽简,其诗风雍容纾缓,类其为人。诗之内容多写游宦生活,诗中时时以为吏之道自警,可见一位有责任感的士人心态。如《自警》、《寄李朝请》、《和吴仲庶春游海云寺》、《和郑通议青州范公泉》等,皆是此类作品。著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史》卷三一四有传。

(王学泰)

【吕陶】(1027—1103)字元钧,号净德,成都(今属四川)人。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进士,为铜梁令,知寿阳县。神宗熙宁三年(1070),举制科,通判蜀州,知彭州。因反对新法,责监怀安军商税。哲宗元祐(1086—1094)初,擢殿中侍御史,迁左谏议,出为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累官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亲政,出知陈州、河阳、潞州,坐元祐党籍夺职。徽宗立,起知邛州、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陶立朝严正,诗文亦多典雅可观。其诗以古体较优,特别是五言古体如《杂诗》(夕阴敛层空)、《朝阴》(朝阴昼多雨)、《南山有嘉木一首赠友人》、《和岩起负暄》(凄风苦朝寒)犹六朝风概。《宋史·艺文志》载其集六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净德集》三十八卷。《宋史》卷三四六有传。

(张丽娟)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安石弟。幼时即以文章称于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以韩绛等荐,召试赐进士及第,

除西京国子教授。授崇文院校书,后改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他与安石政见不同,反对新法,后为吕惠卿所陷,坐夺官,归田里。熙宁七年(1074),卒,年四十七。他的诗文俱佳,十二岁时,曾出所作诗、铭、论、赋等数十篇示人,语皆警拔,遂称于世。曾巩《王平甫文集序》称“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又云:“其于诗尤自喜,其忧喜哀乐感激怨怼之情,一于诗见之,古诗尤多也。”其诗多写景题赠、摅怀言志之作。注重用典,造语典雅,词藻华美。如《杭州呈胜之》、《西湖春日》、《春阴》皆其代表作品。其名句“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宫殿影摇河汉外,江湖梦断晓钟边”等,颇为论者所乐道。本有《王校理集》六十卷,已佚。《两宋名贤小集》中收其诗一卷。王安石为撰墓志铭,《宋史》卷三二七有传。

(张丽娟)

【沈遘】(1028—1067) 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通判江宁府。历集贤校理、修起居注、知制诰。出知越州、杭州,吏治精敏。英宗即位,召知开封府,迁龙图阁直学士,拜翰林学士,判流内铨。治平四年(1067),卒,年四十。其诗清俊流逸,不染俗韵,七律尤为突出。如《送施密学守钱塘》、《南漪堂》等皆风韵华美、谐婉畅达之作。有《西溪集》十卷。南宋初其集与沈括、沈辽集合刻,称《吴兴三沈集》。《宋史》卷三三一有传。

(张丽娟)

【晁端友】(1028—1074) 字君成,一作君诚。钜野(今属山东)人。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进士。熙宁中为杭之新城令。累官至著作佐郎。苏轼序赞其诗“温厚静深,如其为人”。黄庭坚尝诵其《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龔残乌”句,“爱赏不已”(《石林诗话》卷上)。方回赞其诗“不减唐人,远逼唐人,近胜宋人”(分别见《瀛奎律髓》卷二〇《马处厚席上探得早梅》及《梅花》两诗后评语)。“当黄、陈未出之前,自为元和间唐诗”(见卷一《甘露寺》诗后评语)。并谓其《登多景楼》诗“无一字一句不工”,“五言律八句内一联而工可名世矣,此乃顿有数联,曲尽多景之妙”(见同书卷一)。惜今未能睹其全貌。原有集十卷,已佚。事迹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晁君成墓志铭》。

(孔凡礼)

【刘摯】(1030—1097) 字莘老,东光(今属河北)人,居东平(今属山东)。登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甲科。神宗朝,累迁礼部侍郎。哲宗即位,为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擢侍御史。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御史中丞,旋除尚书右丞。元祐二年,除尚书左丞。元祐四年,除门下侍郎。元祐六年,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旋罢,知郢州。次年,徙大名,又徙青州。

绍圣元年(1094),贬知黄州。再贬,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绍圣四年,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卒。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谥忠肃。有《忠肃集》,刘安世为序,称其“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摯勉励士子“以器识为先”而后文艺。(见《宋史·刘摯传》)其所作诗文,出之自然,不事雕琢,然正有佳者。如卷二〇《湖上口号三首》其一写荷花,“写景咏物,可为造微入妙”,全篇皆好(《优古堂诗话·咏荷花》)。摯事迹详《琬琰集删存》卷三一《实录·刘右丞摯传》。《宋史》卷三四〇有传。

(孔凡礼)

【沈括】(1031—1095) 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举进士,除扬州司理参军,人为馆阁校勘。神宗熙宁(1068—1077)中,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提举司天监,迁集贤校理,擢知制诰兼知通进银台司,为翰林学士。后降知宣州。元丰三年(1080)除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元丰五年,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后徙秀州。晚年居润州梦溪园,著《梦溪笔谈》。他博闻多识,于古代科技建树尤多,文章宏赡淹雅,具有典则,其四六表启有古作者之遗范。沈诗以描写山川行役,吊古抒怀者为多,勇于将矿产入诗。如“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油都似洛阳尘。”(《延州诗》)其代表作品有《汉东楼》、《开元乐词》、《江南曲》等,诗风俊爽流逸。他的《梦溪笔谈》中多有论诗之语。有《长兴集》四十一卷,《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为残本,存十九卷,仅存文,《两宋名贤小集》中《沈中允集》仅为诗。今人胡道静辑有《沈括诗词辑存》,1985年上海书店出版。《宋史》卷三三一有传。

(张丽娟)

【王令】(1032—1059) 初字鍾美,改字逢原。原籍魏郡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五岁,父母皆亡,为叔祖王乙携至广陵(今江苏扬州),遂占籍焉。少好任侠,乡里畏而服之。里中之人满执中谓其非是,遂自悔,折节读书,从执中兄满建中学。十七岁离其叔祖别居,自谋衣食,家于瓜洲,聚徒教授于山阳、天长、高邮等地。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被召入京,道出淮南,过高邮。令投书并赠《南山之田》诗,为安石所欣赏,令在高邮,从名士孙觉游。至和二年,任高邮军学官,不久辞去。知军部必怜其贫,馈以赈,不受,又举其节行荐于朝廷,不报。嘉祐二年(1057),移家江阴暨阳,聚徒讲学。嘉祐三年,经王安石介绍,娶安石妻妹吴氏为妻。嘉祐四年,在常州聚徒讲学;六月初,病卒。王令才高命短,遭遇不幸,一生处于贫困之中。令又非拘谨固穷、安贫乐道之士,其胸中蓄积的磊落不平之气、悲慨愤懑之情,皆

借诗歌一吐为快,故其作品中揭露与抨击政治的腐败黑暗、社会的不平不公,反映人民的痛苦和哀哀无告的情景,皆情词迫切、入木三分。如《和洪与权逃民》诗在揭示人民生活的悲惨与社会不公的同时竟鼓动人们反抗,这在诗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他如《梦蝗》、《不雨》、《良农》、《饿者行》、《原蝗》等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描写了人民遭受的苦难并力图揭示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王诗中更多是其抒情写志之作,许多诗中表现了作者为民纾困解难的愿望。如《暑旱苦热》诗表述在天气酷旱苦热之时,纵“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然而“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其他如《龙池二绝》、《偶闻有感》皆属此类。令对韩愈、孟郊十分崇拜,诗云:“努力排韩门,屈拜媚孟灶。惟此二公才,百牛饱怀抱。”(《答束徽之索诗》)其诗风也受到韩、孟影响,构思奇特,格调高古,意境奥衍,风格雄劲。刘克庄言其诗“骨气苍老,识度高远”(见《后村诗话》),大体近之。令亦工散文。诗文皆收入《王令集》。其生平资料见宋人刘敞撰《先生逸事》、清人吕留良《王令小传》、金镇《王令传》,今人沈文倬为撰《王令年谱》,附《王令集》中。(王学泰)

【沈辽】(1032—1085) 字睿达,沈遘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挺拔不群,长而好学,趣操高爽,不喜进取。以兄任监寿州酒税。吴充荐监内藏库。神宗熙宁初,为西院主簿,后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摄华亭县,坐事夺官,流永州、池州。元丰八年卒,年五十四。其文章豪放奇丽,尤长于歌诗,与曾巩、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唱酬往来,王安石尝赠辽诗,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之句。曾筑室于池州齐山,名曰云巢,故其集称《云巢编》,共二十卷,附录其墓志铭。《宋史》卷三三一有传。(张丽娟)

【了元】(1032—1098) 字觉老,神宗赐号佛印,俗姓林氏,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人。少出家,住持于江州开先寺,后先后住持于润州金山寺、杭州圣水寺。在圣水寺时与苏轼交往甚厚。关于东坡与佛印传说很多。了元工诗,诗工致自然,以写僧侣生活、心态与机锋禅理者为多,如《游云门》“一阵若邪溪上雨,雨过荷花香满路。拖筇纵步入松门,寺在白云堆里住。老僧却笑寻茶具,旋汲寒泉煮玉乳。睡魔惊散毛骨清,坐看秦峰秋月午。月明山鸟乱相呼,松杉竹影半窗户。令人彻晓忆匡庐,作诗先寄江南去。”诗写得表里清彻。其事见《禅林僧宝传》卷二九。(张丽娟)

【韦骥】(1033—1105) 原名让,避讳改名,字子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寿昌县尉,知武义、萍乡、海门。哲宗绍圣二

年(1095),提点夔州路刑狱。后除知明州,以左朝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官。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年七十三。骥少以词赋知名,其《借箸赋》曾得王安石称赏。亦工诗。其诗多题咏之作,如《古金章》、《登蓬莱阁》等虽亦注重描写刻画,但仍不失自然之趣。有《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另有赋二十卷。《咸淳临安志》卷六六有传。(张丽娟)

【郭祥正】(1035—1113) 字功甫,或作功父、公甫,号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净空居士。当涂(今属安徽)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除秘阁校理,为星子主簿。嘉祐五年(1060),为德化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知武冈县,权邵州防御判官。熙宁八年,为桐城令。熙宁十年,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元丰四年(1081),通判汀州。元丰五年,摄漳州。哲宗元祐三年(1088),知端州,次年,请老归。以后未出仕。有《青山集》,收诗一千四百多首。二十岁时,梅尧臣誉之为“太白后身”。王安石“称其诗豪迈出于天才”。熙宁(1068—1077)末,李廌希望他“主持”诗坛(《济南集》卷三《题郭功甫诗卷》)。胡仔谓其《金山行》“造语豪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黄昇谓《访隐者》、《山寺老僧》、《西村》“真得太白体”(《诗林广记》后集卷八引);杨慎谓其《水车岭》可与唐“四体”(《升庵诗话》卷四)。然张舜民则谓其诗“适口者少”(《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有微辞。大抵晚作不及中年以前。《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孔凡礼)

【王观】 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一作高邮(今属江苏)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神宗元丰二年(1079),为大理寺丞,知江都县,坐枉法受财,除名永州编管。或云,观赋应制词,宣仁太后以为近褻,谪之,自号逐客,恃才放荡,不自拘检。周紫芝言其善作乐府诗,“而人不甚知”,引其《游侠曲》“雪拥燕南道,酒阑中夜行。千里不见雠,怒须如立钉。出门气吹雾,南山鸡未啼。腰间解下聂政刀,袖中掷下朱亥椎。冷笑邯郸乳口儿”,并云:“此篇词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张籍)之室耳。”又谓其《莫恼翁》篇“遂与文昌争衡矣”(见《竹坡诗话》)。亦工词,欲与柳永一争高低,《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其《冠柳集》一卷,云:“世传霜瓦鸳鸯,其作也。词格不高。”今存。另有《扬州赋》一卷,《芍药谱》一卷。事见《宋诗纪事》卷二二。(张丽娟)

【冯山】 字允南,初名献能,号鸿硕先生,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冯灏之父。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神宗熙宁(1068—1077)末,为秘书丞,通判梓州。邓綰荐为台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荐于朝,官终祠部郎中。四库馆臣言,冯山诗“平

正条达,无剪红刻翠之态”。冯诗追求高古,不假雕琢刻划。其佳者自然质朴,富于韵味;其劣者则粗粝枯淡,缺少诗趣。《答江安尉鲜于顷野翁》、《西县道中》皆其佳作。有《冯安岳集》,原本三十卷,今存十二卷,均为诗。另有《冯氏春秋通解》十二卷。事见《宋史》卷三七一。(张丽娟)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嘉祐六年,应制科,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英宗治平二年(1065),除判登闻鼓院,试馆职,除直史馆。丁父忧。神宗熙宁二年(1069),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为开封府判官。熙宁四年,通判杭州。熙宁七年,知密州。熙宁十年,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移湖州,因诗文触忌被劾,赴御史台狱,岁末,谪黄州。元丰七年,移汝州安置。次年,得请常州居住,知登州,除起居舍人,至京师。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侍读。元祐四年,知杭州。元祐六年,为翰林学士承旨,知颖州。元祐七年,知扬州,除兵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元祐八年,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谪惠州。绍圣四年,谪儋州。元符三年(1100),北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南宋孝宗时谥文忠。苏轼现存诗二千七百多首。其诗初学白居易,纪昀谓其二十四岁所作《新滩》诗“纯是香山门径”(纪评《苏文忠公诗》)。此岁所作《黄牛庙》,已经注意到民生疾苦。苏轼尝引其父洵之语,赞扬“诗文皆有为而作”的作者(《凫绎先生诗集序》)。盖其得之于白居易者,不仅仅限于句调。其《巫山》诗波澜壮阔,显示出横溢的才华,则非白居易所能范围。加以刻意锻炼,其诗遂日臻成熟。清汪师韩盛赞其二十六岁时所作近体《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已“诗格老成”(《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纪昀谓其《和子由澠池怀旧》为“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王士禛谓其在凤翔所作古体《凤翔八观》为“古今奇作,与杜子美、韩退之鼎峙”(《池北偶谈》卷一一),已有大家端倪。熙宁(1068—1077)年间在朝,作诗很少。在杭、密、徐、湖,他“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苏辙撰墓铭),写了不少涉及新法流弊的诗如《吴中田妇叹》等,“造词遣言,峻峙渊深”,得刘禹锡之“波峭”(《曲洧旧闻》卷九);写了《於潜女》、《新城道中》、《无锡道中赋水车》、《石炭》这样描绘风土人物的诗;其名篇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法惠寺横翠阁》、《饮湖上初晴后雨》、《书双竹湛师房》、《中秋月》、《端午遍游诸寺》等。在黄州时,个人抒情诗增多。古体如《寓居定惠院之东……》“词格超逸”

(《诗人玉屑》卷一七),《和秦太虚梅花》“格高韵胜”(《梅涧诗话》卷下),近体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语意天然”(《瀛奎律髓》卷一〇);离黄赴汝途中,写了著名的哲理诗《题西林壁》;渐入化境。元祐(1086—1094)年间在朝,多应酬之作。王文诰谓其谪惠诗为谪黄后又一大变,渡海后则“全入化境”(《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识馀》)。其和陶诗,元好问以为“气象只是东坡”(《元好问集·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所得于陶潜者乃神理。其《行琼儋间肩舆坐睡……》“一气浩歌”(《苏诗选评笺释》卷六),随意吐属,自臻高妙。其《纵笔》、《汲江煎茶》等近体,自然成文。苏诗富于想象,长于比喻,善于体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文集》卷七〇《书吴道子画后》),呈现多样化的风格。“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他的诗和散文、词一样“有极高的成就”(钱鍾书《宋诗选注》),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一个大家。他“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铺排古典成语”是他的诗的主要毛病(《宋诗选注》)。亦工书法、绘画。其画风对文人画有一定影响。《宋史》卷三三八有传。清王文诰有《苏诗编年总案》。(孔凡礼)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轼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嘉祐六年,制科四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为大名府留守推官。神宗熙宁三年(1070),为陈州教授。熙宁六年,为齐州掌书记。熙宁十年,签书应天府判官。元丰三年(1080),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知绩溪。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在朝时,官至尚书右丞。绍圣(1094—1098)、元符(1098—1100)间,谪筠州、雷州、循州。元符末,北归。居许,号颖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谥文定。今有《栞城集》传世,存诗一千八百一十首。包括诗在内,苏辙称其兄轼之文“奇”,而已作为“稳”(《栞城先生遗言》)。苏轼称辙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盖其所乏者乃“秀杰之气”(《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王十朋称辙之“才不逮兄”轼,而“器识”则与兄“俱优”(《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一一《苏颖滨赞》)。周必大谓辙诗“温雅高妙”(《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六《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平心而论,辙为散文名家,其诗自然朴实类其文,亦有反映现实之作,然实不及其文。清吴之振编《宋诗钞》、今人钱鍾书编《宋诗选注》,皆未选其诗。《宋史》卷三三九有传。(孔凡礼)

【朱长文】(1039—1098) 字伯原,号乐圃,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以病不肯为官,筑室乐圃坊,专意著述。哲宗元祐

(1086—1094)中,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元符元年(1098)卒,年六十。平生著述甚富,博通古今,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文章多平易近人。诗亦畅达坦易,传世者佳作不多,以应酬题赠之作为主。著有《吴郡图经续记》,另有文集百卷,其从孙朱思編集遗文为十卷,附录一卷,称《乐圃馀稿》。《乐圃馀稿》附录有其墓志铭,《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张丽娟)

【张景修】(约1039—1107以后)字敏叔,常州(今属江苏)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元丰(1078—1085)末,为浮梁县令,在任时有童子朱天锡进京应神童试,到京,忘带本州公文,为礼部所却,天锡上缴景修诗以为证,神宗看后大为称赏,即欲召对,宰相王珪不赞成以一诗取人,恐长浮竞,认为不如待任期满擢用之。不久,神宗去世,于是景修遂一生沉浮州郡。两为宪漕、五领郡符,徽宗大观(1107—1110)中,始在朝为祠部郎中。年七十馀卒。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其事,并言其“少刻苦作诗,至老不衰,典雅平易,时多佳句”。景修历仕三朝,每次召对,皇帝必问及《送朱天锡童子》诗,遂以诗名于时。张诗质朴古淡,不假修饰,如《贫居》、《更高亭》等七绝亦如此。作诗数千篇,有《张祠部集》,已佚。其事迹见《吴中人物志》卷一〇。

(张丽娟)

【魏夫人】名玩,字玉汝,约于宋仁宗初年至徽宗初年在世,基本与其夫曾布(1036—1107)相始终。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文学家魏泰之妹。徽宗初年,曾布为宰相,她被封为鲁国夫人,时称魏夫人,以词名,兼及诗文。虽有论者将其与李清照并提,但亦以其非李清照之敌。《乐府雅词》存其词十首。博涉群书,工诗,尤擅人伦鉴,有诗为时所传。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三。《江西诗徵》著录有《魏夫人集》,已佚。

(陈祖美)

【彭汝砺】(1041—1094)字器资,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举进士第一,历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书记、潭州军事推官。后补国子直讲,擢太子中允,神宗用为监察御史里行,陈时政十事,指摘利害,多言人所难言。神宗元丰(1078—1085)初,为江西转运判官,还,提点京西刑狱。哲宗元祐二年(1087),召为起居舍人,拜吏部侍郎。哲宗亲政,权吏部尚书。以尝附会刘摯,降知江州。绍圣元年(1094)卒,年五十四。其诗谐婉可讽,明瞿佑《归田诗话》尝推其情致缠绵。其小诗颇能体现此特点,如《君宜弟还鄱阳,风雨未行,驰寄此诗》、《泊真州新河亭》等七绝与《拟田园乐》等六言绝句,皆有唱叹之妙。有《鄱阳集》四十卷,今存《鄱阳集》诗十二卷。《宋史》卷三四六有传。

(张丽娟)

【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一作纯父,又作纯甫,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为秘书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除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兼侍讲,兼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拜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高氏卒,哲宗欲相章惇,祖禹力言不可,不从,请外。知陕州,旋贬永州、贺州,又徙宾州、化州。卒,南宋宁宗时谥正献。有《范太史集》五十五卷,首三卷为诗,凡一百七十七首。苏轼赞其经筵讲义“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济南先生师友谈记》)。盖祖禹以文名,诗乃其余事。祖禹与苏轼有唱酬,轼曾赠以月石风林屏,祖禹赋十二韵以谢(见《苏轼诗集》卷三六),祖禹谢诗,有奇想。他诗如《资中》八首、《底柱》四首,明白晓畅,有气势,有思致。然就其全部诗作言,篇幅略窘狭。祖禹著述今传者,尚有《唐鉴》。《宋史》卷三三七有传。

(孔凡礼)

【舒亶】(1041—1103)字信道,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授临海尉。王安石称其材,用为审官院主簿,擢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神宗元丰(1078—1085)初,权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劾苏轼讥讪时政,成乌台诗案。后同修起居注,改知谏院,为御史中丞。举劾政敌,不遗余力。后以罪废罢,十馀年,始复通直郎。徽宗崇宁元年(1102),知南康军,改知荆南,由直龙图阁进待制。崇宁二年(1103)卒,年六十三。舒亶工于小令,诗词以思致妍密见长。其诗以七绝见长,如《村居》、《湖心寺》、《崇福寺》皆意境萧疏,富于情韵。有文集百卷,已佚。《四明丛书》收有《舒懒堂诗文存》三卷。《宋史》卷三二九有传。

(张丽娟)

【陆佃】(1042?—1102?)字农师,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尝受经于王安石。宋神宗熙宁三年(1170),登进士第。为国子监直讲,凡七年。元丰三年(1180),为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旋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元祐(1086—1094)中,迁吏部侍郎,进权礼部尚书,知颍州、邓州、江宁府。绍圣(1094—1098)、元符(1098—1100)间,降知泰州、海州、蔡州。元符三年(1100),为礼部侍郎,迁吏部尚书,使辽。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尚书右丞,旋为尚书左丞。崇宁元年(1102),罢,知亳州。数月卒。佃有《陶山集》,今存诗二百二十七首。佃名重经术,精于礼家、名数之说,诗名为其所掩。佃之孙陆游尝举佃海州所作《和查朝散应辰雪》诗“无地得施调国手,惟天知有爱民心”之句,谓其志“常在生民”(《家世旧闻》),怨而不怒,盖为温柔敦厚之音。佃才力富赡,其《依韵和再开芍药》,达十六首;其《依

韵和双头芍药》，亦达十六首：语意不重复，亦无凑泊之弊，其间仍不乏警句。大抵以“七言近体见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史》卷三四三有传，事迹并详《家世旧闻》。（孔凡礼）

【刘泾】（约1043—约1100）字巨济，号前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西北）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王安石荐为经义所检讨，为太学博士。后罢，知咸阳县，通判莫州、成都府，知处州、虢州、真州、坊州。哲宗元符（1098—1100）末上书召对，除职方郎中，卒，年五十八。《郡斋读书志》称其“为文奇怪”，“笃志于学，文辞奇伟。早登苏子瞻之门，晚受知于蔡京”。泾与米芾为画友，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脱尘拔俗，为世所称。诗风画风相近。其诗中不仅七言歌行如《元章好古过人书画惊世起余作歌》等酣畅淋漓，其七绝小诗如《题韩溪》等亦摆脱拘束，富于气势。有《前溪集》五卷，今不传。《宋史》卷四四三有传。（张丽娟）

【王雱】（1044—1076）字元泽，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安石子。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调旌德尉。神宗熙宁四年（1071），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注《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受。熙宁九年（1076）卒，年三十三。雱未冠已著书数千百言，名著一时。《彦周诗话》举其“钟山”诗，称：“此王雱诗，不为荆公所喜，然此诗实可传也。”刘克庄云：“王元泽诗不满百，《度关山》云：‘万马度关山，关山三尺雪。马尽雪亦干，沙飞石更裂。归来三五骑，旌旗映雪灭。不见去时人，空流碛中血。’古乐府无以复加。”并引起绝句“一双燕子语帘前，病客无憀尽日眠。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轻雨绿如烟”，谓其“殊有乃翁（指安石）思致”（《后村诗话续集》卷四）。有《元泽先生文集》三十六卷，徽宗崇宁（1102—1106）中卢崇编。另有《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等著作。《宋史》卷三二七有传。（张丽娟）

【黄裳】（1044—1130）字冕仲，一作勉仲，号演山，延平（今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徽宗政和（1111—1117）间，知福州，累迁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年八十七。其诗文骨力坚劲，不为委靡之音。王悦《序》称他“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兼众体而有之，若未易名状。”虽不免过誉，然其有些歌行淋漓酣畅，不失自然之趣。如《简元與祠部》、《燕子楼》等。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初，其子黄玠哀集其诗文，刻于建昌军学，王悦为序，是为《演山集》六十卷，今存。事见《宋诗纪事》卷二八。（张丽娟）

【王诜】字晋卿，开封（今属河南）人。宋神宗熙

宁二年（1069），尚英宗女蜀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利州防御使。元丰二年（1079）坐罪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徙颍州。后复驸马都尉，卒谥荣安。诜能诗善画，又工弈棋，作堂曰“宝绘”，藏古今书画，以为赏鉴。诜风流倜傥，为朝野所瞩目，宋代小说中亦有其传说。与苏轼等交往甚密，所存诗中多与东坡唱和之作，如《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等不仅表现出两人的深挚感情，其风格亦近于苏轼。今存《王晋卿词》一卷，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事见《宋史》卷二五五及《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一。

（张丽娟）

【道潜】原名昙潜。字参寥，号参寥子。杭州於潜（今浙江临安）人。俗姓何，幼出家受戒。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守彭城，道潜往见之。哲宗元祐（1086—1094）间，住西湖智果院。赐号妙总禅师。绍圣（1094—1098）间，苏轼南迁，亦以诗得罪，反初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复祝发，师号如故。崇宁（1102—1106）末归老江湖，卒。有《参寥集》，诗名颇盛。苏轼尝称其“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苏轼佚文汇编》卷二《与文与可》简，在《苏轼文集》内）。苏辙称其诗“无一点蔬笋气，其体制绝类储光羲，非近世诗僧所能也”（朱弁《续骈韵》引，在涵芬楼铅印本《说郛》内）。陈师道谓道潜乃“上林之秀而诗苑之英”（《序》）。《郡斋读书志》赞“其言清丽，不类浮屠语”。《宋诗钞》引道潜论唐诗僧贯休、齐己“非用意于诗，工拙不足病，以是知所贵”之语论道潜，盖谓道潜之诗锤炼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其诗如《湖上二首》之类，颇嫌语少含蓄”。然全面衡量，仍不失为北宋一作者。《咸淳临安志》卷七〇有传。（孔凡礼）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诗人黄庶之子。幼颖异，博闻强识，读书数遍则能背诵。少时从其舅李常游学于淮南，深为一些宿学名士赏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解试第一，次年中进士，为叶县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调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为留守文彦博所重。元丰元年（1078），庭坚仰慕苏轼，以诗投赠，颇受赞赏，以为其诗文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庭坚始有名于世。元丰四年，改知太和县，以平易为治。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庭坚入朝，实由旧党领袖司马光推荐，在京与苏轼、苏辙、孙觉、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人一起品书论画、诗酒唱和，颇为惬意。诗歌创作，亦获丰收，形成风格独特的“山谷体”。哲

宗元祐六年(1091),丁内艰。元祐八年,服除,被任命为国史编修官,请辞。绍圣元年(1094),出为宣州知州,旋改鄂州。章惇、蔡卞认为庭坚参与修撰之《神宗实录》多诬蔑先帝之处,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黔州亲笔书写杜甫西川诗与夔州诗,欲刻石。绍圣四年,再移戎州。有杨某捐资将黄书杜诗全部镌刻于石,并盖一高堂保存,庭坚题为“大雅堂”。蜀中文士慕而从之游者,经其指点,学问诗文皆有所进步,下笔皆有可观。徽宗即位,调和党争,庭坚被调为监鄂州酒税,改为奉议郎、签书宁国军判官、权知舒州。召为吏部员外郎,请辞,知太平州。徽宗崇宁六年(1102)六月,至太平州,仅九日便被罢官。次年,下诏销毁三苏、黄庭坚等人诗文集,并立元祐党人碑,全面迫害旧党人士。执政赵挺之本与庭坚有隙,借此对黄罗织罪状,以其所撰《承天院塔记》中有“天下财力屈竭”语句,诬为“幸灾谤国”,被除名,羁管宜州。在宜州备受苦难,竟卒于此。庭坚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文名仅逊于苏轼兄弟,论诗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并提倡矫劲峭拔、清奇健举的诗风,一些同辈(如陈师道)或后辈(如洪炎、洪刍等)受其影响,竞相效法,形成后世所称之“江西诗派”,亦被诗论家称为“一祖三宗”的“三宗”之首。黄诗以写自己的游宦浮沉与文士生涯为主,在这类作品中,不仅再现了仕途的险恶、党争的激烈和士人生活的风雅精致、丰富多彩,而且也反映了诗人纷繁复杂的心态。《登快阁》、《夜发分宁寄杜涧叟》、《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寄黄幾复》、《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老杜浣花溪图引》、《和答元明黔南赠别》、《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都是其代表作品。他也有一些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作,如《流民叹》、《次韵邵之才将流民过悬帛岭均田》、《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虎号南山》、《戏和答禽语》,皆可见作者对于百姓苦难的同情。黄诗风格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惊心动魄。如清姚鼐所说,黄诗“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援鹤堂笔记》)。庭坚亦工于用典,凡佛经、道书、语录、小说等杂书之事典无不可入诗,擅长炼字造句,其律诗对偶多拗句、警句,为后世学江西诗者所效法。黄诗虽瘦硬,但内容却较温和,与其对诗歌理解有关:“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诉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这种认识必然削弱其创作的批判性。其末流则更走上脱离现实、追求纯艺术技巧的道路。庭坚虽为“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之一,然其文学成就远高于苏门其他诸人,故后世将其与苏轼并

称“苏、黄”。其词、其文皆有独特成就,除秦观外,远非馀子所及。书法也为北宋四大家之一。著有《豫章先生内外集》。《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其孙黄簪所撰《年谱》最为翔实。(王学泰)

【孔武仲】字常父,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调谷城主簿,为国子直讲。哲宗元祐(1086—1094)初,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著作郎,国子司业,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迁礼部侍郎。后出知洪州,徙宣州。坐党籍夺职,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武仲与兄文仲、弟平仲均有才名,当时号为三孔,黄庭坚曾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说,将三孔与苏轼兄弟并提。武仲诗虽不如其弟平仲,但其小诗意境超远,情韵绵渺,如《五鼓乘风过洞庭湖,日高已至庙下》等。今存《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其中武仲十七卷。他还有《诗书论语说》等著作。《宋史》卷三四四有传。(张丽娟)

【孔平仲】字义父,一作毅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文仲、武仲之弟。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应制科。以吕公著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为江东转运判官,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哲宗绍圣(1094—1098)、元符(1098—1100)间,以元祐党人,谪衡、韶、英州。徽宗立,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出提点永兴路刑狱,帅郾延、环庆。党论再起,奉祠,卒。平仲诗在《清江三孔集》中。其《夏旱》“早风扬尘日流血,高田已白低田干,陂池行车井泉竭”,历叙旱情,忧心如焚。其《十月二十一日夜》叙百姓遭火灾,末云:“明朝起视火起处,焦木颓垣不知数,白头老姥啼向天,叹息之声满道路。”集中不乏此类关怀民生疾苦之作。其雪夜所作“斜拖阙角龙千丈,潜抹墙腰月半稜”之句,不经人道,受当时人称赞(《逸老堂诗话》)。喜集句,周紫芝谓其《寄孙元忠》“殆不减《胡笳十八拍》”(《竹坡诗话》)。《宋诗钞》赞其诗“夭矫流丽”,超出文仲、武仲。今人钱鍾书谓其诗“很近苏轼的风格”(《宋诗选注》),选其《霁夜》、《禾熟》二首。集中有《诗戏》,以人名、药名、回文为诗,为游戏笔墨,《宋史·艺文志》有著录,盖为集外单行本。《宋史》卷三四四有传。(孔凡礼)

【周韶】北宋杭州妓女。苏颂过杭,杭守陈襄设宴款待,使周韶侑酒,她趁机泣求落籍。时韶正着孝服,苏颂指白鸂鶒令其作诗。韶援笔立成一绝句云:“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一座嗟叹,遂得以从良。同辈皆有诗送之,其中胡楚、龙靓所作最善。胡诗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龙诗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固知杭人多慧。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引《侯鯖录》等;亦见于《宋诗纪事》。周韶诗题一作《求落籍》,一作《白鸚鵡》。(陈祖美)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自号矜斋。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襄乐令。神宗元丰(1078—1085)中,环庆帅辟掌机宜文字。哲宗元祐(1086—1094)初,为监察御史。徽宗时,累官至吏部侍郎,知定州、同州。坐元祐党,谪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复集贤殿修撰。卒于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后。有《画墁集》。今存诗约二百首。生平“最刻意于诗,晚年为乐府百餘篇,自序称年逾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郡斋读书志》卷一九)。其代表作为《打麦》,抒写农家之苦,为传诵名篇。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七选其《次韵赋杨花》,谓其诗学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舜民之诗“笔意豪健,与苏轼相近”。然苏轼但谓之“稍能诗”(《苏轼文集》卷六八《书张芸叟诗》)。今考其实,知轼所言者,乃舜民中年作品。舜民评诗有见地,如谓苏轼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不觉令人神慄,仔细检点,不无利钝”,“世以为知言”(《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三引)。《宋史》卷三四七有传。(孔凡礼)

【吕南公】(1047—1086)字次儒,号灌园,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不逐时好,宋神宗熙宁(1068—1077)中,一试礼闈不中,遂退居筑室灌园,着意读书为文。曾立意修《三国志》,借史笔褒贬善恶,名所居斋曰“衮斧”。哲宗元祐(1086—1094)初,曾肇上疏推荐,欲命以官,未及而卒,终年四十。他与曾巩是好友,推崇韩、柳之文,其《读李文饶集》称“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重道而不轻文,强调经世致用,认为文章要与时而变,不袭一体。他评价贾岛的诗“约而覃,明而深,杰健而简易,故为不可多得”,由此可见其诗学观点。其诗多咏史怀古之作,颇富气势。其古风《老樵》、《勿愿寿》反映了长寿对于贫苦老人来说,只是长受罪。有《灌园集》二十卷,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张丽娟)

【李之仪】(1047—1117)字端叔,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后徙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少时居楚州。约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官四明,为河中府万全县令。神宗元丰(1078—1085)中,入鄜延幕府,尝使高丽。哲宗元祐(1086—1094)中,为枢密院编修官。元祐末,苏轼守定,之仪入其幕掌机宜文字,仅半载。绍圣(1094—1098)间,通判原州。绍圣四年(1097),罢。元符(1098—1100)中,监内香药库,旋勒停。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京西北路转

运使(或副使)。崇宁元年(1102),坐为范纯仁草遗表,编管太平州。遂居当涂,自号姑溪居士,或姑溪老农。有《姑溪居士集》传世,存诗五百九十二首。之仪富于才华,释道潜赞为“俊逸千里驹”(《参寥子诗集》卷四《晓发桃源渡寄端叔》)。其诗如《次韵东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诗》、《唐公兄惠顾海上既行辄有诗奉送》,俊逸可喜。苏轼读之仪诗书后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之句(《苏轼诗集》卷三〇),范温《诗眼》、葛立方《韵语阳秋》谓此盖倣其用意太过,以致僻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为其诗魄力雄厚不敌轼,“然大抵轩豁磊落”,无钩棘艰苦之状,范等解释非是。自今观之,轼之意盖谓之仪诗有禅宗影响。王士禛《池北偶谈》则谓其“全集殊下秦、晁、张、陈远甚,然其题跋自是胜场”。《宋史》卷三四四有传。(孔凡礼)

【华镇】字安仁,号云溪,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军事。平生喜读书,博学好古。曾有《会稽览古诗》一百多篇。《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诗文云:“才气丰蔚,词条畅达。虽不足与欧、曾、苏、黄比繁长短,而在元丰、元祐之际,亦哀然自成一家。”傅崧卿言其诗:“词格清丽,兴寄深远,足以垂观来者。”(《宋诗纪事》卷二七引)其集原有一百卷,又有《长短句》一卷,《会稽录》一卷,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掇辑詮次,编为《云溪居士集》三十卷。事见《宋史翼》卷二六。(张丽娟)

【蔡肇】(?—1119)字天启,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哲宗元祐(1086—1094)中,为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入为户部、吏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后出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旋罢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又夺职,提举洞霄宫。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蔡肇工诗善画,曾受知于王安石,又从苏轼游,诗名尤盛。其诗格豪俊,《苕溪渔隐丛话》举肇《申王画马图诗》称其气格有类东坡,世因误入《东坡集》中。其题画诗如《题李伯时照夜白马图》、《题三茅风雨图》、《题李世南画扇》等都写得字凝句炼,音韵婉畅。《题画授李伯时》尤精绝:“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冈老木尚寒烟。付君餘地安渔艇,乞我寒江听雨眠。”有《丹阳集》。《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张丽娟)

【毕仲游】(1047—1121)字公叔,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后迁郑州(今属河南)。举进士,调寿丘柘城主簿,罗山令,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宋哲宗元祐(1086—1094)初,召试学士院,其文得苏轼称赏,

擢为第一,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河东路刑狱,知耀州、郑州、郢州。徽宗时,为吏部郎中,坐元祐党籍,官终于西京留司御史台,后提举鸿庆宫。徽宗宣和三年(1121)卒,年七十五。苏轼对他颇为称赏,曾举以自代,赞他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议论有馀。其文风格近于苏轼,大多雄伟博辨,而能切中情理。其诗多直抒胸臆之作,如《寄郑介夫》:“郑子安强否?梅花万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龙鳞。北阙今无数,南方信有人。可怜妻子在,年少不谋身。”诗明快流畅,颇能代表其风格。有《西台集》五十卷,不传,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二十卷。《宋史》卷二八一,《永乐大典》卷二〇二〇五有其墓志铭。(张丽娟)

【李新】字元应,自号跨鳌先生,仙井(今属四川)人。宋哲宗元祐(1086—1094)间进士。刘涇尝荐于东坡,命赋《墨竹》一绝,立就。元符三年(1100),为南郑丞。徽宗崇宁元年(1102),因元符末年上万言书,被划为元祐党人,夺官,谪居遂州。徽宗大观(1107—1110)中,赦还,后为普州司法参军。宣和(1119—1125)间,为资州司录参军,沉沦于州杂县佐之间。其诗气格开朗,无南渡后繁杂细碎之音,但不流于枯瘠,注重词藻色彩之点染。如《折杨柳》、《锦江思》皆可见这种倾向。有《跨鳌集》五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编为三十卷。《元祐党人传》卷七有传。(张丽娟)

【贾收】字耘老,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有诗名,喜饮酒。《庚溪诗话》载苏轼在杭州时,令笔吏尽录士大夫题咏有美堂诗,“而未著其姓名,默定诗之高下,遂以贾收耘老诗为冠。其诗曰:‘自刊宸画入云端,神物应须护翠峦。吴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檐望尽回头懒,万象搜来下笔难。谁信静中疏拙意,略无踪迹到波澜。’坡因此与耘老游从。”收素贫,苏轼尝写古木怪石以赠。后收作亭,名“怀苏”,有诗一编,号《怀苏集》。《梅磴诗话》亦云:“贾收字耘老,雪(浙江吴兴)之隐君子也,居城南。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耘老有诗集行于世。”事见《宋史翼》卷三六、《嘉泰吴兴志》卷一七。(张丽娟)

【吴则礼】(?—1121)字子副,号北湖居士,永兴(今湖北阳新)人。以荫入官,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为卫尉寺主簿。元符三年,坐事编管荆南。徽宗崇宁(1102—1106)中,累官至直秘阁,知虢州。晚居豫章。宣和三年(1121)卒。他曾与唐庚、韩驹、陈师道等相唱和,《四库全书总目》评云:“则礼诗格峭拔,力求推陈出新。虽间涉于颓唐,而逸趣环生,正复不烦绳削。近体好为生拗,笔力纵横,愈臻道

上。”南宋诗人尤袤喜诵则礼三首七绝,最末一首云:“枫叶芦花满钓船,水风清处枕琴眠。觉来失却潇湘月,却问青山觅酒钱。”(见杨万里《诚斋诗话》)可见其与音韵谐婉的传统七绝之差别。有《北湖集》,其子垕编为三十卷,韩驹作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十卷、长短句一卷,久佚,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三百馀首,词、文若干,编为三卷。事见《宋诗纪事》卷三二。(张丽娟)

【朱服】(1048—?)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历国子直讲,秘阁校理,监察御史里行,知谏院,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知润州,徙泉州、婺州、宁州、庐州、寿州,有善政。哲宗绍圣(1094—1098)初,召为中书舍人,拜礼部侍郎,后谪知莱州。徽宗时,知庐州、广州、袁州,坐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改兴国军,卒。曾因诗句“孤臣正泣龙髯草,游子空簪凤尾花”而被指为罪状,见其子朱彧所著《萍州可谈》。存诗不多,其小诗亦多清新可诵,如《九日》。《宋史》卷三四七有传。(张丽娟)

【刘翥】(1048—1102)字伟明,吉州安福(今属江西)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知峨眉县,改太学博士。哲宗元符(1098—1100)中,进《南郊大礼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以疾卒。其文大都气体宏整,词致敷腴,周必大为其集作序,推为继欧阳修之后的一代儒宗。其诗亦峭拔不俗。律绝近体,不追求音韵和谐婉畅,往往于拗涩中别具韵味。其七律《九曲池》、五律《莆田杂诗》(清樾陂陀外)、七绝《题吉水南华院》,皆显示这一特点。有《龙云集》三十二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张丽娟)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更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之为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少时为人豪隽,好读兵家书,慷慨之气溢于文词,举进士不第。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往徐州,拜见时为徐州刺史的苏轼,表达向慕之情。次年,为撰《黄楼赋》,轼以为观有屈宋之才,后并写信向王安石推荐。安石称许秦诗“清新似鲍(照),谢(朓)”。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官定海县主簿,调为蔡州教授。哲宗元祐三年(1088),以范纯仁荐,参加“著述之科”考试而为宣教郎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秘书正字。擢为国史院编修官。在京期间,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论文品诗,切磋学问,并以“苏门四学士”之一著称于世。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为相,元祐党人案起,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写《题法海平阁黎》云:“寒食山州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

弥陀七万言。”此诗为政敌劾以“谒告写佛书”罪,被贬至郴州。绍圣四年,加重对元祐党人之处分,被编管至横州(广西横县)。元符元年(1098),再贬至雷州(广东海康县)。徽宗即位,党争稍有和缓,观被任命为宣德郎,允许北归。道经藤州,卒。秦氏以词名世,诗文成就遂为词名所掩。秦诗一直被评论家称“诗似小词”、“妇人语”、“女郎诗”、“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见敖陶孙《诗评》)。实际只有部分绝句能体现这种婉弱诗风。四库馆臣引吕本中语,以为其“过岭以后诗,高古严重,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作品内容多题赠应酬之作,与苏门诸君子唱和尤多,相对较为贫弱,亦有少数关注现实的篇章,如《田居四首》写农民的苦辛与官吏的凶残。《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期望收复失土,《雷阳书事》三首、《海康书事》十首写南国的风光、风俗,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上皆有一定成就。著有《淮海集》、《淮海居上长短句》。《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王学泰)

【李公麟】(1049—1106) 字伯时,号龙眠山人,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哲宗元符三年(1100),致仕,归老于龙眠山岩壑间。徽宗崇宁五年(1106)卒,年五十八。李公麟好古博学,对钟鼎彝器款识多所研究,工诗善画。善画山水佛像,山水学李思训,佛像学吴道子,被认为是宋画第一。苏轼、苏辙等都曾为其画题诗。其诗传世者不多,多为七言近体,诗风平易流畅,追求画境,如《四时乐》四首。有《考古图》五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张丽娟)

【鲍由】(约1049—1100) 一作慎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今属浙江)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徽宗时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历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后知明州、海州,奉祠归,卒,年五十六。曾从王安石学,与苏轼有交,《宋史》本传称“其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鲍诗恬淡自然,畅达平易。杨慎曾举其《与荣子阳郑公华白胸山邻舟行》一诗,言其“颇得邻舟江行之趣”。诗云:“舟行有后先,相去能几许。铿轰金鼓声,见面不得语。水花来幽香,岸柳过疏雨。登舻各乘流,解帆会联浦。携我小龙团,睡起就君烹。”(见《升庵诗话》)其五古《雨馀》等皆符合这种诗风,并富生活情趣。曾注杜甫诗,有《夷白堂集》,已佚。《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张丽娟)

【米芾】(1051—1107) 一名黻,字元章,号家居道士、无碍居士、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人称米南宫,米襄阳。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世居太原

(今属山西),后徙襄阳(今属湖北)。以荫补浚光尉,知雍丘县,涟水军,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卒,年五十七。或曰大观三年卒,年五十九。书画俱精,喜蓄古器,举止怪异,人称“米颠”。其诗亦佳,为文奇险,《韵语阳秋》评其《不及陪东坡往金山作水陆诗》及《栖云阁》两诗云:“如此二诗,殆出翰墨畦径之表,盖自迈往凌云之气流注,非寻规索矩者所可到也。”岳珂序称其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宋史》卷四四四有传。清翁方纲有《米海岳年谱》一卷。

(张丽娟)

【贺铸】(1052—1125) 字方回,晚年自号庆湖遗老,卫州(今河南汲县)人。自称唐诗人贺知章之后。为人气宇雄爽,身长七尺,面呈铁色,人称“贺鬼头”。喜谈时事,于是非可否之间,不稍假借,虽贵官权要,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好辩,画家米芾亦以健谈闻名,二人每相遇,则抵掌议论,辩锋相当,终日不分胜负,世传以为口实。其先为武职,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李清臣执政,荐为承事郎,通判泗州,徙太平州,迁奉议郎,以任酒使气,不得美官,年五十八致仕。甫二年,复起管洞霄宫,以后族(铸为孝惠皇后族孙)恩,迁朝奉郎。明年,又致仕,卜居苏州,家藏书万馀卷,手自校讎,无一字误。善为乐语词章,往往播于众口。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自黔还,极赏其《青玉案》词“梅子黄时雨”句,以为似谢朓。贺亦以此句被人称为“贺梅子”。与程俱交好,其歌词《东山乐府》,程为之序。铸虽以词名世,其诗亦颇有造诣,蒋一葵言:“方回少为武弁,以《定力寺》绝句见奇于舒王(王安石),知名当世。诗文咸高古可法。”(《尧山堂外记》)其诗,特别是律绝,近于其词,工致秀洁,时有逸气,如《野步》、《题诸葛谿田家壁》、《清燕堂》等,皆能反映作者之风格。宋《王直方诗话》记载:“方回尝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者深通于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诗林广记·后集》)实际上这是贺铸自己对于诗歌创作艺术经验之总结,与笼罩北宋末、南宋初的苏、黄二派皆有所不同,贺铸是独立于苏、黄二派之外有相当成就的诗人之一。著有《东山乐府》、《庆湖遗老集》。今人夏承焘为撰《贺方回年谱》(见《唐宋词人年谱》)。《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王学泰)

【陈师道】(1052—1101) 字履常,一字无己,自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幼而好学,律己颇严。年十六谒曾巩,受到器重与赏识,并就学于曾

门,文行出处,闻名一时。宋神宗元丰(1078—1085)间曾巩、章惇皆多次荐其入仕,未果。哲宗元祐(1086—1094)初,苏轼与傅尧俞、孙觉等人交荐之,起用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荐而为太学博士,后改为颍州教授。绍圣(1094—1098)初,新党执政,以师道由旧党进,遂以其非科举出而罢归,寻调为江州彭泽县令,不赴。元符三年(1100),朝内调和党争,起复为棣州教授,随除秘书省正字。师道家素贫,或经日不炊,而为人耿介,不苟于取。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与赵挺之为姻娅,而恶其为人贪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冬,预郊祀大礼,衣无绵,其妻假赵挺之一裘,而师道却之,遂以寒得疾卒。师道致力于学,通诸经,尤深于诗、礼,为文精深雅奥,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其诗学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陈诗多写其寒士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及痛苦,并反映了其安贫乐道的狷介性格。如《送外舅郭大夫西川提点刑狱》、《送内》、《别三子》、《寄外舅郭大夫二首》皆写家贫不能赡养妻子儿女从而随游宦在外的岳父奔走四方之情景,从中可见作者的窘态与悲哀。《秋怀十首》、《触目》等作品又能从个人的贫苦推己及人,想到世间的不平。师道以苦吟著名,在遣词造句上模仿杜甫,即“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步里客谈》),但在诗风上却较近于孟郊、贾岛。四库馆臣言:“其五言古诗出入郊、岛之间,意所孤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处,则未脱江西之习。七言古诗颇学韩愈,亦间似黄庭坚,而颇伤褻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长也。五言律诗,佳处往往逼杜甫,而间失之僻涩。七言律诗风骨磊落,而间失之太快太尽。五、七言绝句,绝为杜甫《遣兴》之格,未合中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后山谈丛》、《后山诗话》、《后山居士文集》。《宋史》卷四四四有传。(王学泰)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七岁能属文。十三岁从王安国于常州学官。父端友为杭之新城令,补之从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见苏轼于杭,得其教。熙宁七年,归故里。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第。为澶州司户参军,移北京国子监教授。除太学正。哲宗元祐元年(1086),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升校书郎。元祐六年,通判扬州。元祐七年,为著作佐郎。次年,迁秘书丞,又迁著作郎。绍圣元年(1094),知齐州。次年,通判应天府,移通判亳州。丁母忧。元符二年(1099),监信州酒。元符三年,北归。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屡迁神宗国史编修官,为吏部郎中,知河中府。崇宁元年(1102),知湖州,移密州,罢。大观四年(1110),知泗州,卒于任

所。有《鸡肋集》传世。补之富于才华,苏轼誉之为“天麒麟”(《苏轼诗集》卷三五《和陶饮酒》)。少时即“苦吟”(同上卷一二《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所作《七述》,为苏轼所盛赞。后遂“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并驱联镳,世号元祐四学士”(苏诗施元之注)。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胡仔谓“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苕溪渔隐丛话》卷五一),如《行路难》。其《芳仪怨》叙南唐主李璟女芳仪事,悲恻感人,元宋无《睢阳集》、明杨慎《升庵诗话》均引之。其五律《和普安院壁上苏公韵》“雨园鸠唤妇,风径燕将儿”一联,为宋孙宗鉴《东皋杂录》所赞,盖谓其体物入微。清王士慎《池北偶谈》“举宋人绝句可追踪唐贤者”,有补之《扬州杂咏》其五、《题工部文侍郎周翰郭熙平远》其二。其《香祖笔记》则谓补之“《陌上花》八首,工妙不减苏公(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补之“诸体诗俱风骨高骞”。然平情而论,以古体言,其学韩、欧,往往失之散缓。其散文成就在诗上,词亦有名于世。《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孔凡礼)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学者称廌山先生,又称广平先生,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为萧山尉,召为太学尉,迁太学博士。求知河清县以便养亲。范纯仁守颍昌府,辟为府学教授,后复为太学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州、舒州、濠州,徽宗宣和五年(1123)卒,年七十一,谥文肃。游酢与兄游醇以文行知名,曾师事程颐兄弟,著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著作。酢亦工诗。诗风恬淡清新,不流于“讲义语录”,如《水亭》:“清溪一曲绕朱楼,荷密风稠咽断流。夹岸垂杨烟细细,小桥流水即沧洲。”其他如《山中即景》等皆写得风景如画。今存《游廌山集》四卷。《宋史》卷四二八有传,《龟山集》卷三三有其墓志铭。(张丽娟)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游学陈州,识苏辙。熙宁六年,登进士第。熙宁七年,授临淮主簿。熙宁九年,丁父艰。元丰元年(1078),任寿安尉。元丰六年,罢,居洛。次年,到咸平丞任。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京师,为太学录,试学士院,迁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除著作佐郎。元祐六年,除秘书丞,旋除著作郎,兼国史院检讨官。元祐八年,除起居舍人。绍圣元年(1094),知润州,旋移宣州。绍圣三年,罢宣守,入京,除管勾明道宫。次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1099),坐元祐党籍,再谪复州监酒。元符三年,通判黄州,旋移知兖州。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召为太常少卿,出知颍州。崇宁

元年(1102),知汝州,又坐党籍落职,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崇宁五年,去黄州,赴淮阴。政和四年(1114),卒。未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作《函关赋》,已传人口。他出仕之初,已慨叹“予生之多艰”(《怀知赋》)。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钱鍾书《宋诗选注》),如《劳歌》反映“长街负重民”出卖苦力的艰辛,《诉魃》历陈“秀者焦兮实者悴”的严重旱情,《输麦行》写农民劳动所得“半归仓廩半输王”的痛苦,《和晁应之悯农》写壮夫为盗乃因“力田竟岁犹无获”,《有感》讽刺虐害人民的官吏。他也写农民丰年的欢乐,如《感春》。他的诗以平实见称,很少用僻典。出仕之初所作《初见嵩山》、《福昌官舍》,明白晓畅,已形成风格。晁补之《鸡肋集》卷一八《题文潜诗册后》所云“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开百花”,杨万里《诚斋集》卷四〇《读张文潜诗》所云“晚爱肥仙(按:即张耒)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就是对这种风格的赞扬。《宋史·张耒传》谓耒诗“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宋诗钞》则谓其“近体工警不及白”,《宋诗选注》亦谓其诗“词意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然总的说来,其诗在苏轼门中,“要在秦、晁以上”(《宋诗钞》)。《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孔凡礼)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幼涉猎书史,极博百家之书。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被选拔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歌颂熙宁新法,为神宗所赏识,命为国子学正。哲宗元祐三、四年(1088、1089)间,出为庐州教授,转为荆州教授。元祐八年(1093),知溧水县,其政敬简,去后为民所思。绍圣四年(1097),被召回京,任国子主簿。元符元年(1098),哲宗召对,使诵《汴都赋》,除秘书正字。徽宗时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徽宗政和二年(1112),出知隆德府。政和五年,徙知明州。政和六年,召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在职期间整理古调,创制慢曲,颇有功于词曲音乐。重和元年(1118),出知顺昌府,移知处州,未到任,被罢官,奉祠提举南京(宋真宗时以应天府为赵匡胤旧藩,建为南京,址在今河南商丘南)鸿庆宫,归乡,欲终老睦州,适逢战争,返南京,卒于鸿庆宫中。邦彦以工词名于后世,其诗亦颇可观,虽大多已佚,但从所存诸作可见作者关注国之大事,当时许多重要事件在其诗中有所反映,如:《天赐白》痛悼在与西夏的边境战争中宋军丧师辱国,惋惜真正将才被贬谪而不能一展其长才;《薛侯马》除为不遇的将才一鸣不平外,还歌颂了普通将士的爱国热情;《开元夜宴图(并序)》针对徽宗的荒淫腐化,以写唐天宝之祸为之

敲起警钟。这些作品与其词之内容、风格有明显不同,诗明畅豪宕。著有《清真词》。其诗文有今人罗忼烈辑本,名为《周清真诗文辑存》。其事迹见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年表》及今人刘扬忠之《周邦彦传论》。(王学泰)

【李廌】(1059—1109)字方叔,自号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华阴一带)人。居颖昌之阳翟(今河南禹县)。六岁孤,能自奋立。宋神宗元丰(1078—1085)中,见苏轼于黄州。哲宗元祐三年(1088),轼知贡举,廌应试,不第。廌定居颖昌之长社。有《济南集》传世。廌才气横溢,苏轼尝赞其“笔势澜翻”,“有漂砂走石之势”(《苏轼文集》卷五五《与李昭玘》);又赞其“辞意整暇”,“笔势翩翩”(卷四九与廌书);盖因其不同文体言之。李之仪谓其文“如大川湍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济南月岩集序》)。周紫芝亦谓其“豪迈英杰之气,过人十倍”,故发为文词,才若是其痛快(同上)。其神宗熙宁(1068—1077)末所作七古长篇《题郭功甫诗卷》,一千数百言,历论当时诗坛诸巨匠,欲郭祥正(功甫)主盟,抒发“文章敌天下”之壮志。盖祥正学李白,廌之才情亦似白,故尔相投。其《太华》首二句状华山之气势,实得李白之神韵,然全篇则不称。其七绝《汉陂》,格调清新。其《田家女》写田家未出嫁劳动女子,可与苏轼《於潜女》比美。《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孔凡礼)

【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徙嘉兴(今属浙江)。宋哲宗元祐(1086—1094)中,苏轼守杭州,滂为法曹。苏轼得其《惜分飞》词,大加称赏,滂由此知名。元符二年(1099),知武康县。依附蔡京兄弟,得以进用。官至祠部员外郎,知秀州。滂以词知名,诗文在北宋末亦足以自成一派。《四库全书总目》评云:“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文亦大气磅礴,汪洋恣肆。”五古《秋日书怀》、五律《晓出定光寺》、《下渚湖》皆能代表其诗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东堂集》六卷、诗四卷、书简一卷、乐府二卷,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东堂集》十卷,其中诗四卷。另有《东堂词》一卷,今存。事见《宋史翼》卷二七。(张丽娟)

【李昭玘】字成季,号乐静先生,钜野(今属山东)人。宋哲宗元祐(1086—1094)中进士,为徐州教授。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秘阁校理。通判潞州。入为秘书丞,开封推官,后提点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坐元符党夺官。徽宗初为太常少卿,知沧州。崇宁(1102—1106)初,罢,主管鸿庆宫。被划入元祐党人,居闲十五年,寄意于书法图画。钦宗靖康(1126—1127)初已卒。有诗才,少与晁补之齐名,

为苏轼所知。其诗文皆光明俊伟,无依阿渙澁之态,亦无嚣呼愤戾之气。昭玘侄言其诗“奇丽愜适,章断句绝,余思羨溢,得诗人味外之味”(转引自《宋诗纪事》)。从《观画》(梦泽正天寒)、《春日游金明池》来看,亦近于其侄所言。有《乐静集》三十卷,其中诗四卷。《宋史》卷三四七有传。(张丽娟)

【周行己】字恭叔,号浮沚,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于乡。再入为馆职,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早岁师事程颐,传其学。又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等人相唱和,尤推崇苏轼、黄庭坚之诗文。所作皆娴雅有法。其诗多以日常生活为题,其五言古体较佳,颇有汉魏遗意。如《送别》(人生如断蓬)、《营居有感》(有鹊衔枯枝)、《肺病》、《蚊》(天地不爱人)、《雨中有怀》(世态纷戢戢)、《迁居有感》(四时忽代序)等皆于平易畅达中饶有馀味。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所载,搜罗排比,共得八卷。事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张丽娟)

【司马樞】字才仲,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从孙。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赐同进士出身,调关中幕官,累迁河中府司理参军。终知杭州,卒于官。《郡斋读书志》卷一九称其“喜赋宫体诗,故世传其为鬼物所祟而卒”。《升庵诗话》载其《洛春谣》诗,谓其尚有长吉、义山之遗意。其《无题》二首(香梦依稀逐断云、肌生香雪步生尘)、《闺怨》(销尽轻寒不自禁)等代表作品皆步趋唐代温、李诸家,缺少创造性。有《夏阳集》二卷,不传。事见《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二。(张丽娟)

【司马槱】字才叔,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从孙,樞弟。登进士第,亦尝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以党锢不召。《郡斋读书志》卷一九称其“诗虽纤艳,比其兄稍庄雅”。诗亦学晚唐,近于杜牧或唐彦谦。如《江干小雪》云:“枫落吴江小雪天,三三两两捕鱼船。蹇驴瘦马何方客,眼看风波不着鞭。”有《逸堂集》十卷,不传。事见《宋诗纪事》卷三二。(张丽娟)

【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力陈时弊几万馀言。元祐八年,为大名府馆陶尉。元符元年(1098),知衢州龙游。丁母忧。徽宗崇宁二年(1103),知莱州胶水。大观三年(1109),知晋州赵城。政和三年(1113),知莱州掖县。政和五年,通判登州。宣和六年(1124),判巴州。钦宗靖康元年(1126),知磁州,与金人周旋,旋充兵马副元帅抗金。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屡迁为京城留守,兼开封

尹,屡疏请高宗回銮,不报。建炎二年,积忧成疾,卒时,连呼“过河”者三。有《宗忠简集》传世。其所作文“不事雕琢,浑然天成,丰约中度”(《遗事》),“无非从忠义中流出”(方孝孺序),“详明恳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今存十九首,“平平实实,并不在文字上用工夫”(钱鍾书《宋诗选注》),一如其文的风格。代表作有七言绝《早发》。事迹详集后《遗事》。《宋史》卷三六〇有传。(孔凡礼)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一字伯以,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补之从弟。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哲宗元祐(1086—1094)中,苏轼以著述科荐之。为兖州司法参军,蔡州、宿州教授,知磁州武安、定州无极。坐党籍放斥。通判鄆州,知成州。钦宗即位,官至中书舍人。高宗即位,召为侍读,旋奉祠。卒于江宁府舟中。《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说之所撰《晁氏景迂集》十二卷,乃其孙子健所编,刊于南宋初。其后补入续得遗文,重编为二十卷,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刊于临汀郡庠,《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题《景迂集》。今《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旧钞本《嵩山文集》,即源出乾道本;该本卷四至九为诗,共八百六十多首。其诗清新晓畅,钦宗靖康前所作,大抵缘情遣兴,间及时事。如《题明王(皇)打毬图》,乃借古喻今,揭露朝政腐败。靖康变起,所作十之七八赋国事,或“思献策”而欲“叩天阍”(《远戍》),或感叹“刘琨祖逖无由见,邺下关中何所之”(《拭目》),或指斥“王师真不战,天险易摧残”(《感事》),令人感愤。事迹详文集附录《晁氏世谱》。(孔凡礼)

【邹浩】(1060—1111)字志完,自号道乡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为扬州、颍昌府教授。哲宗时为右正言,累上书言事,削官羁管新州。徽宗立,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进中书舍人,迁吏部、兵部侍郎,知江宁府、杭州、越州。再责衡州别驾,寻窜昭州。徽宗政和元年(1111)卒,年五十二,谥忠。王士禎《居易录》称其古诗似白居易,律诗似叶梦得,又称其受学程门,而特嗜禅理,诗文多宗门语。其七绝亦颇精妙。有《道乡集》四十卷,今存,其中诗十四卷。《道乡集》附录有其墓志铭及年谱。《宋史》卷三四五有传。

(张丽娟)

【朱淑真】一作淑贞。约生于南宋初,一说生于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一说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二年或三年(1079或1080)。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仕宦之家。出嫁后,夫游宦淮南、潇湘,尝随之,然与夫不谐,怏怏抱恨。卒于南宋孝宗淳熙(1182)前不久,一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

初。作品颇多,卒后为父母所焚,魏仲恭为辑其遗而传之。淑真“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魏仲恭序)。元刊本《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前集》卷九为“闺怨”卷。其《愁怀》诗怨“东君不与花为主”;《诉怨》诗诉说“良辰美景俱成恨,莫问新年与旧年”,年年月月,俱在恨中;《旧愁》诗抒写整日过着“乱愁依旧锁眉峰”的生活。淑真颇关怀农事,有《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喜雨》、《新冬》等诗,实属可贵。《自责》诗以妇女受封建束缚而愤慨不平,盖身世使然。其咏史诗品评历史人物有见地,如《韩信》、《陆贾》。其写景咏物诗尽四时景物变易,富有情趣。明顾起纶《国雅品》谓其诗“无铅粉气,且雅善用虚字,亦鱼玄机之亚”。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赞其“水光激浪高翻雪,风力吹沙远涨烟”之句“近唐句”。清陆昫《历朝名媛诗词》谓其“诗有雅致,出笔明畅而少深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谓“其诗浅弱”,遂列之存目中。(孔凡礼)

【晁冲之】字叔用,一字用道,号具茨先生,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补之从弟,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之父。少有才华,受知于陈师道,并从之学诗。举进士不第,后授承务郎(一说曾为大晟丞)。宋哲宗绍圣(1094—1098)间,新旧党争剧烈,晁氏诸兄弟多被划为元祐党人,贬窜边荒,冲之飘然远逝,家于具茨山下。徽宗时屡荐不起,隐居以终。冲之诗法源于师道,故被列入江西诗派之中,喻汝砺、吕本中皆与之交好。其诗多抒情写志之作。喻汝砺云:“叔用既以油然栖志于林涧旷远之中,遇事写物,形于兴属,味其风规,渊雅疏亮,未尝为凄怨危愤激烈愁苦之音。予于是有以见叔用于晦明消长用舍得失之际未尝不安而乐之者也。”(《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这一特点在其小诗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如《戏留次哀三十三弟》、《春日二首》、《夜行》、《春晚圃圃田道中》三首等颇能体现喻汝砺所赞美之风格。至于其古体、律诗中,亦多有慷慨激昂之作,如《田中行》、《纪愁》、《僧舍小山》、《别昭德弟怆然伤怀》等等。刘克庄曾言这些慷慨激烈之作,“南渡后放翁可以继之”(《江西诗派》)。著有《具茨集》。其生平事迹见《宋诗纪事》及其集。(王学泰)

【饶节】(1065—1129)字德操,为僧后,名如璧,号倚松道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尝为曾布客,后祝发为浮屠,挂锡灵隐,晚至襄阳之天宁寺,在襄、汉间声望甚重。《江西诗社宗派图》将其列入,其诗受黄庭坚影响较深。《许彦周诗话》称其“作诗有句法,苦学副其才情”。《紫微诗话》称其诗“萧散”,“为僧后,诗更高妙”。今其集中诗多为僧后所作。张邦基

赞美其七言绝句,认为可接武王安石,又言其“《咏梅花》一联云‘遂教天下无双色,来作人间第一春’,风味亦不浅。”(见《墨庄漫录》)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其诗为“近时僧中之冠”。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卒,年六十五。有《倚松老人集》二卷传世。事见《倚松老人集》卷末附录引《嘉泰普灯录》。(张丽娟)

【谢逸】(1065?—1113)字无逸,号溪堂,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孤,博学工文词,从吕希哲学,再举进士不第,遂不仕。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卒,年未及五十。逸以布衣而名重搢绅,于书无所不读,于文无所不能,而尤工于诗。黄庭坚尝阅其诗“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查牙噪春鸟”,惊为“张、晁流也”。惠洪亦云:“无逸又喜论列而气长,诗尚造语而工,置于文潜、补之集中,东坡不能辨。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价,殆非虚语也。”(《石门文字禅·跋谢无逸诗》)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将其列入。其诗风格隽拔,时露清新,与弟谢薖均负诗名。有《溪堂集》十卷,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史翼》卷二六有传。(张丽娟)

【谢薖】(?—1116)字幼槃,号竹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工诗文,与从兄谢逸同学于吕希哲,时称“二谢”。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卒。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将其列入。王士禛《居易录》称其诗“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沈雄豪健之气则去之远矣”。查慎行《得树楼杂钞》评其“古诗学杜而力弱”,“律诗拗劲处不减涪翁,七言较胜五言”。并举其佳句,如:《招李成德》:“棋无多算愧三北,诗要重窥论二南。”《送珍上人》云:“寻山红叶半旬雨,过我黄花三径秋。”《招汪叔野》云:“两牛鸣处地非远,万竹阴中吾所庐。”《赠通守陈虚中》云:“人道奸藏有三窟,公知民病极千疮。”但佳联多而通篇相称者少。有《竹友集》十卷,凡古诗四卷,律诗三卷,杂文三卷。事见《宋史翼》卷二六。(张丽娟)

【李彭】字商老,号日涉居士,南昌军建昌(今江西永修)人。少能文词,与其弟齐名。曾出仕,谢薖《示李商老兄弟》诗中有云:“月夜宜披宫锦袍,定知公辈岂蓬蒿。文如修水波澜阔,人与庐山意气高。”少时犹能上接苏轼、黄庭坚、张耒、陈师道等元祐先辈,与之往来唱和,后与吕本中等交好,在《江西诗派图录》中名列第十五,居韩驹之亚。工书法,字有钟、王之风,自言法右军之贍丽,用鲁公之气骨,猎奇峭于诚悬,体韵度于凝式。其书一出,人争宝之。其诗多题赠唱酬之作。如《梦访友生》、《望西山怀驹父》、《阻风雨封家市》、《题吕少冯听雨堂》、《春日怀秦髯》等皆其代表作品。李诗工于造句,对句多警策,但“诗体拘狭,少变化”(刘克庄语),如《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所言,其诗“边幅未宏”,“在江西派中,与谢逸、洪朋诸人足相颉颃,终非江湖末派所能及也”。有《日涉园集》十卷。《宋史翼》卷二六有传。

(王学泰)

【赵鼎臣】(1070—?) 字承之,晚自号苇溪翁。卫城(今河南境内)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时年已及冠。绍圣二年(1095),登宏词科。历度支员外郎、右文殿修撰。徽宗宣和(1119—1125)间,以徽猷阁待制知邓州,召为太府卿。约卒于徽宗末。有《竹隐畸士集》传世,存诗近三百首。其卷七《棠梨》:“晓驱羸马日将中,眼饱何曾念腹空。可是爱花狂不彻,棠梨树下觅残红。”《喜凉亭》:“小亭新筑藕花边,为爱陂塘五月天。最好一番风雨过,琼珠无数荡清泉。”清新可喜。其卷三《嘲春诗》:“天公是春父,后土是春母。风雨作春媒,桃李为春妇。桃李嫁春来几时,春工不肯使人知。昨夜小桃微破萼,漏泄春情春不觉。”“天公”、“后土”、“桃李”、“风雨”以拟人出之,别开生面,饶有风趣。其诗不以用典取胜,较少江西诗派影响。要之,鼎臣才气过人,诗锤炼有致,自是北宋末一作者。

(孔凡礼)

【唐庚】(1070—1120) 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早年即有诗名,文采风流,人称“小东坡”,年十四赋《明妃曲》、《题醉仙崖》诸作,老师匠手皆畏之。宋哲宗绍圣(1094—1098)间,登进士第,为州县官。至徽宗大观(1107—1110)中,稍迁为宗子博士。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贬官,安置惠州,会赦北归,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归泸南,道卒于凤翔。庚游宦半生,其诗多写各地闻见,有些篇什反映了百姓的疾苦、统治者的骄奢淫佚与国力的衰弱,如《城上怨》、《送赵安道下第》、《读邸报》、《讯囚》、《内前行》、《大熟行》、《悯雨》等等,从中可见诗人的忧国忧民的热情。其写山川风物之作,亦颇有成就,特别是谪居惠州之诗,描南国风光,如《湖上》、《双榕》、《杂诗》两组等,“皆曲尽南州景物,略无憔悴悲酸之态”(《宋诗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唐诗“刻意锻炼,而不失气格”。并引刘夷叔言其“工于属对”。今人钱鍾书也说唐庚“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宋诗选注》)。其实庚亦喜用口语、俗语入诗,不故作艰涩之语如《张求》、《采藤曲效王建体》、《示蜚》皆娓娓如平日说话,不见锻炼痕迹。庚论诗主张学杜,其语被强幼安所记述,编为《唐子西文录》一卷。其诗文收入《眉山唐先生文集》。《宋史》卷四四三有传。(王学泰)

【陶九成】 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大约是北宋宫女。所作《宫词》十五首,以其切身感受,从诸多侧面,相当深刻地表达了宫女身不由己的痛苦。宫词

系五言绝句,善避前人俗套,惜其笔墨,简洁而有风致。见《名媛诗归》,《历代名媛诗词》对其有所评析。

(陈祖美)

【潘大临】 字邠老,黄冈(今属湖北)人。与弟大观皆有诗名,曾从苏轼、张耒游。家素贫,客死蕲春。他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得句法于东坡”,黄庭坚尝称为“天下奇才”(见《潘子真诗话》)。惠洪《冷斋夜话》说他“工诗,多佳句”。潘耒引其在江间所赋佳诗,皆五言。(见《潘子真诗话》)而大临却以七言断句闻名后世。《冷斋夜话》记云:“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此断句历来为人所称赞,谢逸曾为之补成四绝。陆游赞他“诗妙绝世”,而刘克庄则云:“其诗自云师老杜,然有空意,无实力”。有《柯山集》二卷,张耒为作序,雅相推重。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张丽娟)

【惠洪】(1071—1128) 又名德洪,号觉范,俗姓喻,一说姓彭,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宋哲宗元祐(1086—1094)间,试经于汴京天王寺,后徙洪州石门。以医识张商英,又往来于郭天信之门。徽宗政和(1111—1117)初,张、郭得罪,惠洪亦受累配朱崖。后北归。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年五十八。惠洪好为诗词,喜游公卿间,当时颇有诗名。《彦周诗话》云:“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颇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类衲子。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著有《冷斋夜话》十卷、《天厨禁脔》三卷、《石门文字禅》三十卷。事见《宋诗纪事》卷九二。(张丽娟)

【苏过】(1072—1123) 字叔党,号斜川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哲宗元祐六年(1091),礼部试不利。绍圣(1094—1098)、元符(1098—1100)间,父轼谪惠、儋,过侍。北归后,随叔辙居许昌。徽宗政和二年(1112),监太原税。政和五年,知郾城。宣和二年(1120),罢。宣和五年,通判定州,卒。有《斜川集》传世。过十三岁时,叔辙赞其兄弟“雕镌不遗治章句”(《栾城集》卷一三《次韵于瞻留别三首》)。十九岁在杭,已“文彩非凡近”(《参寥子诗集·送仲豫叔党赴试春帙》)。度岭后,得父之教,其诗益进。父轼尝谓“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赞其《送昙秀》诗“殆咄咄逼老人”(《苏轼文集》卷六八《书过送昙秀诗后》),尝称之为“小坡”(《苏轼诗集》卷四三《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今综观其诗,才力不及其父之超轶,篇幅不及其父之宏阔,然语自己出,锤炼有致,关心民生疾苦(如《讼风伯》),题材亦复不狭,视其父乃具

体而微。《宋史》卷三三八有传。(孔凡礼)

【许景衡】(1072—1128) 字少伊,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进士。徽宗宣和六年(1124),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忤王黼而被逐。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召,迁中书舍人。高宗时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卒,年五十七。谥忠简。曾从程颐学,其诗吐言清拔,《四库全书总目》举其“玉樽浮蚁一样白,青眼与山相对横”句,称为“殊饶风调”。有《横塘集》三十卷,原本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卷。《宋史》卷三六三有传。(张丽娟)

【葛胜仲】(1072—1144) 字鲁卿,常州江阴(今属江苏)人,徙居丹阳(今属江苏)。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杭州司理参军。以荐试学官及词科,俱得第一,除兖州教授。入为太学正,累迁为太常卿,续订《太常因革礼》,并兼太子谕德,以《仁》、《孝》、《学》三论献太子,复采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之迹,日进数事,诏令嘉之,为国子祭酒。寻知汝州。李彦在汝州括民田,破产者众。胜仲请免除不当括者。彦怒,劾之,改知湖州、徙邓州。权宦朱勔数言其短,遂罢官,归乡。南渡后,高宗建炎(1127—1130)中,复知湖州,有惠政,绍兴元年(1131),乞奉祠归,卒谥文康。胜仲虽经战乱,然其诗很少涉及战争动乱及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痛。其诗多为题赠友朋与咏物、咏史之作,如《读史八首》、《蒙文中县丞以诗送苦笋走笔六首为谢》、《次韵张仲宗绝粮五首》、《试墨》、《龙井》、《幽居》、《龙堂》等这类题材作品在其集中颇有代表性。其诗浅易清新,七律音调浏亮。著有《丹阳集》。《宋史》卷四四五有传。(王学泰)

【李正民】 字方叔,扬州(今属江苏)人,李定孙。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历官中书舍人,吏部、礼部侍郎,曾任职于吉州、筠州、洪州、湖州、温州、婺州、淮宁府,晚奉祠归。《宋史·艺文志》著录其《大隐集》三十卷,久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等辑出文六卷、诗四卷。其文温润流丽,诗亦妍秀可诵。事见《大隐集》卷六及《南宋文范作者考》。(张丽娟)

【魏泰】 字道辅,号汉上丈人。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曾布妻弟。试院中殴主文几死,坐是不得取。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间,章惇欲官之,未就。卜居汉上。《潘子真诗话》称他“少与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极群书,尤能谈朝野可喜事,……作诗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他还著有《东轩笔录》、《临汉隐居诗话》传世。他论诗主“余味”说,认为“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均见

《临汉隐居诗话》)。《桐江诗话》称其《荆门别张天觉》诗律峻峭,有《临汉隐居集》,事见《宋诗纪事》卷二八。(张丽娟)

【徐俯】(1075—1141) 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以父荫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门郎。宋钦宗靖康(1126—1127)中,张邦昌僭位,俯遂致仕。宋室南渡后,任右谏议大夫。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赐进士出身。绍兴三年,迁翰林学上,俄擢端明殿学上,签书枢密院事。绍兴四年,兼权参知政事。绍兴九年,出知信州,奉祠归。绍兴十一年卒,年六十七。俯为黄庭坚甥,年幼能诗。黄庭坚《题所书诗卷后与徐师川》称其诗“词气甚壮,笔力绝不类年少书生”,受黄庭坚影响极深。晚年诗力求平易自然,不堆砌雕琢。与曾几、吕本中游,为江西诗派重要诗人之一。有《东湖集》,已佚。《宋史》卷三七二有传。(张丽娟)

【洪朋】 字龟父,南昌(今属江西)人,民师子,黄庭坚甥。与洪刍、洪炎、洪羽并有才名,号称“四洪”。曾两举进士不第,年三十八而卒。长于诗,其诗受黄庭坚影响甚深,语言生新,情趣幽僻。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将其列入。黄庭坚《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称“龟父笔力可扛鼎,它日不无文章垂世”,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亦称“龟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有《洪龟父集》二卷。《宋史翼》卷二七有传。(张丽娟)

【洪炎】 字玉父,一作玉甫,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宋哲宗元祐(1086—1094)末年登进士第,为谷城县令。不久新党执政,因元祐党人案与兄弟朋、刍等同被贬窜,后复官知谯颖上县,并有惠政,累官著作郎、秘书少监。钦宗靖康(1126—1127)初,家于豫章。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时,避寇于龙潭,及返,室庐尽焚。绍兴(1131—1162)间,高宗召为中书舍人。当时,政局纷乱,制诰纷繁,洪炎属稿,才情敏捷,以快捷与训词典雅为同列所叹服。洪氏兄弟四人,朋、炎、刍、羽,皆工诗文,号称“四洪”,并为黄庭坚之甥,受诗法于庭坚,其作品亦与黄有相似之处,故被吕本中列入《江西宗派图》中。炎生活于北宋、南宋之交的战乱之中,其诗以描写离乱之间的感受见长,如《山中闻杜鹃》、《次韵公实七月一日雨感怀》、《迁居》、《旧庐伤怀》等。洪诗潇洒落拓,哀而不伤。著有《西渡集》。尝编《尘外记》及录杂家小说行于世。《宋史翼》卷二七有传。(王学泰)

【洪刍】 字驹父,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坐元符(1098—1100)间上书,降两官,监汀州酒税。又尝为晋州学官。徽宗崇宁三年(1104),被划为元祐党人。崇宁五年,叙复宣德

郎。钦宗靖康(1126—1127)中,官至谏议大夫。汴京陷落,在为金人搜括金银之时入诸王邸中,以势挟王府官人为之唱歌侍酒,得罪名教,于南宋初被长流沙门岛,永不放还,竟没于岛上。乌与其兄朋、炎、弟羽齐名,并称“四洪”,尝从其舅氏黄庭坚受诗法,名列江西诗派之中。乌诗多题赠之作,亦有不少写于行旅之中,如《拟岘台》、《寄题双井黄稚川云巢》、《石耳峰》、《金陵作》等。诗风较其舅平易。著有《香谱》、《老圃集》等。《元祐党人传》卷八有其传。

(王学泰)

【王安中】(1076—1134) 字履道,号初寮,中山曲阳(今属河北)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调瀛州司理参军,大名县主簿。徽宗政和(1111—1117)间,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上疏劾蔡京,迁翰林学士承旨。宣和元年(1119),拜尚书右丞,宣和三年,迁左丞。宣和五年,知燕山府。钦宗靖康元年(1126),贬象州安置。高宗绍兴四年(1134),卒,年五十九。他以词藻擅名,史称他为文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曾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以记其事,书于屏上。《挥麈后录》曾举其诗。其存诗多写于行旅,以题咏名山胜迹者为多。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数百篇,次为八卷。《宋史》卷三五二有传。(张丽娟)

【韩驹】(?—1135) 字子苍,号牟阳,学者称陵阳先生,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徙汝州(今河南临汝)。父为峡州夷陵令,因不能侍奉父妾被逐出,投其父友内侍贾祥。祥以其诗文献于徽宗,徽宗览而奇之,赐进士及第,除秘书正字。寻坐为苏氏学,谪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知洪州分宁县。后召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与三馆学士分撰清祠、明堂、圆坛、方泽等乐曲。徽宗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宣和六年,为中书舍人兼修国史,颇为徽宗所重,兼直学士院。制词简重,为世论所推许。后坐乡党曲学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知江州,卒于抚州,赠中奉大夫。韩驹诗多以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为题材,如《题中寂堂》、《答蔡伯世食笋》、《食煮菜简吕居仁》、《次韵馆中诸公游慈云寺》、《题采菊图》、《李氏娱书斋》、《谢人送凤团及建茶》皆为其代表作品。其所存诗多写于北宋,有名于时者,亦多粉饰太平之作,如《次韵馆中上元游葆真宫观灯》等。靖康之难后,也写了许多怀念中原故土,悲悼神州陆沉之作。《宋史》本传言“驹尝在许下从苏轼学,评其诗似储光羲。”而吕本中将其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刘克庄云,韩驹“学出苏氏,与豫章不相接,吕公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其诗有磨淬剪裁之功,终身改窜不已,有已写寄人数

年,而追取更易一两字者,故所作少而善”(《江西诗派小序》)。驹虽不承认自己诗学江西,然其注重炼字炼句与点化前人诗句,与江西派诗人有一致之处。著有《陵阳集》。《宋史》卷四四五有传。(王学泰)

【叶梦得】(1077—1148) 字少蕴,号肖翁,又号石林,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嗜学,早有成就,记忆广博,善谈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因蔡京荐,召对称旨,特迁祠部郎官。徽宗大观二年(1108),迁翰林学士。大观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颍昌府,发常平粟赈民,得罪权要,寻罢奉祠。北宋亡,高宗继位,迁翰林学士兼侍读,户部尚书。上言待敌之计有三,曰形、曰势、曰气,因请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高宗绍兴(1131—1162)初,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江防八事、对拱卫临安,颇有贡献。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弭平海盗。因与监司有异议,上章请老,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梦得论诗注重内容,强调“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详见《石林诗话》)。其所存诗作多写于北宋灭亡之后,许多作品流露出因神州陆沉、中原沦陷而痛苦和悲愤,并表现了作者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如《雨夜与模论中原……》(千年石头城)、《山间每岁正月望夜梅花正开……》(山头野梅白玉花)等,抚时感事,颇多慷慨之音。但更多的诗篇则反映了作者对恬静的、太平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著有《石林春秋传》、《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石林词》。诗文收入《石林居士建康集》。《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王学泰)

【程俱】(1078—1144) 字致道,号北山,衢州开化(今属浙江)人。九岁丧父。以外祖父邓润甫恩,补假承务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授苏州吴江县主簿。徽宗大观(1107—1110)初,监常州市易务。政和元年(1111),知泗州临淮县。累迁著作佐郎。宣和二年(1120),赐上舍出身。宣和三年,除礼部员外郎。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间,为太常少卿,知秀州。绍兴元年(1131),为秘书少监,寻除中书舍人。次年,罢。绍兴六年,除徽猷阁待制。累官至朝议大夫。有《北山小集》传世,其前十一卷为诗,余为文。叶梦得谓“其文精确深远”,“诗章兼得唐中叶以前名士众体”。(《序程集语》)《宋史》本传称其文“典雅闲奥”。《宋诗钞》谓其诗“取途韦、柳,以窥陶、谢,有忘言自得之趣”,乃“标致之最高者”。或由于过分追求萧散古淡,集中乱离之作既少且平平。钱大昕赞

其“诗文有风骨,在南宋可铮铮佼佼者”(跋程集语)。事迹详程瑀所撰行状(本集附录)。《宋史》卷四四五有传。(孔凡礼)

【陈渊】(?—1145) 初名渐,字知默,又字幾叟,世称默堂先生。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充枢密院编修官。绍兴七年,赐进士出身。绍兴九年,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得罪秦桧,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辞。改宗正少卿,论罢,奉祠。有《默堂先生文集》。渊受业杨时,阐扬儒家学说,以“至当”为归,不“以多文自富”(沈度序),立朝敢直言,故其文“词质而达”(杨万里《序》)。其诗如其文,明白晓畅,无江西诗派扞扯典故之习,“时露真趣,异乎宋儒之以诗谈理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旅途诸什。渊关怀民生疾苦,如《被檄下乡督税作释负》。《宋史》卷三七六有传。

(孔凡礼)

【李光】(1078—1159) 字泰发,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除参知政事。绍兴九年,罢。绍兴十一年,以得罪秦桧,谪藤州。越四年,移琼州。居琼八年,移昌化军。秦桧死,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谥庄简。光以节概称,诗名为所掩。然宋人张浚《云谷杂记》赞其所作《双雁》、《道中赠枢密使》为清绝可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抵多托兴深长”,其“波澜意度,亦约略可睹”。光自是一作者。其在海南时所作《海南谣》,揭露海南民遭赃吏之厄,“衔冤无所诉”,乃“相炽起为贼”,官府血腥镇压,致“遗骸横道路,流血千里赤”。实乃一首史诗。有《庄简集》十八卷。《宋史》卷三六三有传。

(孔凡礼)

【何大圭】字晋之,广德(今属安徽)人。早年有俊声。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宣和元年(1119)为太学录。宣和六年,官秘书省正字,迁著作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为滕康、刘珏属官,因失守洪州除名,编管岭南。绍兴二十年(1150),以左朝请郎直秘阁,后主管台州崇道观。《庚溪诗话》称“其人拓弛不羁,不能自重”,而“其咏殊有可喜者。”并言:“尝记其一诗曰:‘茅屋松窗小隐家,茶烟漠漠水斜斜。檐间乳燕未成语,庭下石榴争放花。赖有诗书销白日,倦随车马走黄沙。林间旧约好径去,风雨满江垂钓鱼。’”事见《宋诗纪事》卷三九及《全宋词》。

(张丽娟)

【林季仲】字懿成,自号芦山老人,又号竹轩,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授秘书郎,迁祠部员外郎。绍兴七年,以直龙图阁知泉州,徙婺州。

《直斋书录解題》称季仲以赵鼎荐入朝,因沮和议得罪,在当时颇负清流重望。《庚溪诗话》称季仲喜为诗,并举其《题赤松山黄初平祠》等二诗,称其“诗语佳而意新”。《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其所作“虽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而笔力挺拔,其清隽亦可喜也”。有《竹轩杂著》十五卷,原本不传。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六卷,《永嘉丛书》本并有《补遗》一卷。

(张丽娟)

【吕渭老】一作滨老,字圣求,嘉兴(今属浙江)人。北宋末年以诗名,《四库全书总目》引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赵师秀为其集所作序云:“其忧国诗二联、痛伤诗二联、释愤诗二联,皆为徽、钦北狩而作”。《直斋书录解題》称他为“宣和末人,尝为朝士”。他的词亦佳,杨慎《词品》称其词佳处不减少游。今存《圣求词》一卷,有《四部备要》本、《四库全书》本等。事见《宋诗纪事》卷四二及《全宋词》。

(张丽娟)

【吴可】字思道,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宣和(1119—1125)末年,曾任职开封,官武节大夫。高宗建炎(1127—1130)以后,转徙于楚、粤。至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间尚在世。他与王安中、赵令畤等有诗文酬答。李端叔称其诗略无斧凿痕,字字皆有来历。他的《藏海诗话》可反映其诗学观点。他推崇杜诗,主张“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认为诗“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的诗“大致清警,与谢逸、谢薖兄弟气格相近”。有《藏海居士集》二卷,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藏海诗话》一卷,亦为辑本。事见《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

(张丽娟)

【苏辙】字仲滋,眉州(今属四川)人。苏辙之孙,迟长子。十馀岁始侍辙侧,后记其言,成《栾城遗言》一卷。以祖荫补官陕州仪曹掾。南宋高宗时官太府监丞、将作监丞。孝宗时卒,年七十馀。辙历北宋末南宋初,其不少诗篇对当时战争离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有所反映,如《舟中怀古》、《去年》(去年胡来清水岩)、《群盗》等。其诗佳者境界开阔,颇有气势,但大多较为滞重,有乃祖苏辙之风,与伯祖东坡迥异。有《双溪集》十五卷,今存。集中有上秦桧书,“皆极言和金之利,所以归美于桧者,无所不至,不免迎合干进之心。又杂著中别有《进取策》一篇,复力言攻刘豫以图金,前后议论,自相矛盾,盖皆揣摩时好以进说,小人反复,有愧于乃祖实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清人伍崇曜引其《南园》诗云:“花骢油壁隐轻雷,消却冰山不复来。坟土未干为馁鬼,园花虽

好为谁开?”认为其晚年经过反思,有所悔悟(见《双溪集跋》)。事见《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五。

(张丽娟)

【阮阅】或名一阅,字阅休,又字美成,自号散翁,又号松菊道人,庐州舒城(今属安徽)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榜名“美成”。曾为钱塘幕官,入朝为户部郎,知巢县。徽宗宣和间(1119—1125),曾知郴州,作《郴江百咏》,名闻一时。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以中奉大夫知袁州。初至州狱讼繁多,乃大书“依本分”三字,印榜于四城墙壁,郡民感而化之,狱讼清省,乃榜四厅为“无讼堂”。致仕后乃留居宜春(袁州州治所在)。阅能诗,工于绝句,人称“阮绝句”。所著《松菊集》已佚,惟《郴江百咏》尚存九十二首,此组诗皆为七绝,富有馀韵,未流于图经地名之解释,被收入《四库全书》。另有《诗总》十卷(后发展为《诗话总龟》)详见该条),为北宋诗话之总汇。生平资料见今人郭绍虞《宋诗话考》。(王学泰)

【王以宁】字周士,湘潭(今属湖南)人。以太学生任鼎、澧帅幕,宋钦宗靖康(1126—1127)初,征天下兵,走鼎州,求援解太原围。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初,以枢密院编修官出守鼎州。建炎二年(1128),为京西制置使,直显谟阁。后落职,责监台州酒税。绍兴二年(1132),责永州别驾,潮州安置。绍兴十年,复右朝奉郎,知全州。以词名,有《王周士词》一卷,收入《宛委别藏》等丛书中。亦能诗。事见《宋诗纪事》卷四二。(张丽娟)

【汪藻】(1079—1154)字彦章,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进士,调婺州观察推官,改宣州教授。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众臣属和,唯汪诗最佳,迁为著作佐郎。因与时相王黼不合,长期不得用。钦宗继位,召为屯田员外郎,迁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南渡后,高宗召为中书舍人兼知学士院,擢给事中,迁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诏令多出其手。尝论诸大将拥重兵,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卒如其策。高宗绍兴元年(1131),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上所修日历六百六十五卷,升显谟阁学士,出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论其曾为蔡京、王黼之客,夺职居永州,卒于该州。藻为人清俭廉洁,通显三十年无室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藻早年曾受江西诗派中坚徐俯、洪炎等赏识,亦曾向韩驹学诗,然其诗主要受苏轼影响,风格高华有骨,兴寄深远。许多作品描写战乱之中奔波逃难中的种种感受,如《次韵向君受感秋》、《避地函亭野步》、《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等皆是此类作品。工于五古、七律。著有《靖康要录》、《裔夷谋复录》、《青唐录》、《浮溪集》等。孙觌为撰墓志

铭。《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王学泰)

【王铨】字性之,人称雪溪先生,自称汝阴老民,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年,官迪功郎,曾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赏识。后罢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晚年遭受秦桧排斥,避地剡溪山中。铨记闻该博,尤长于宋代典事,尝撰《七朝国史》、《默记》、《四六话》、《谈苑》等。亦工诗,诗学温、李,但脂粉气、富贵气均不如温、李之浓重,其佳篇如《云门寺》、《雪后渡西溪》、《山村》皆如水墨图画中稍点染色彩。其诗收在《雪溪集》中。铨还撰有《补侍儿小名录》。《宋史翼》卷二七有传。(王学泰)

【王庭珪】(1079—1171)字民瞻,安福(今属江西)人。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为衡山茶陵丞。弃官隐居邑之卢溪。胡铨得罪秦桧,被贬,庭珪赠诗,赞勉胡铨。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坐是流岭南。绍兴二十五年,桧死,不久得归。孝宗即位,赐国子监主簿。孝宗乾道六年(1170),复除直敷文阁。有《卢溪集》,存诗七百多首。其学生杨万里赞其不畏“权臣”,诗“言直”(《卢溪集》序)。其赠胡铨诗,即有“男子要为天下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百炼不屈刚为肠”(《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韵》)之句。周必大赞为“格力雄健”(为庭珪所写行状中语)。同情农民,在《寅陂行》中,直记老农之语,揭露朝廷兴修水利乃“虚名”。久居农村,其《和周秀实田家行》、《移居东村作》、《二月二日出郊》,皆畅达清新。如钱鍾书所说,他的诗也有“好些地方模仿黄庭坚的格调,承袭他的词句”(《宋诗选注》),缺乏创造性。他的文和词亦有名于时。事迹详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九中《王庭珪行状》、胡铨《澹庵集》卷二九中《王庭珪墓志铭》。(孔凡礼)

【郭印】成都人。自号亦乐居士。有《云溪集》传世。其卷一〇《上政府》有“政和乙未对彤庭,袖笔曾陪四海英”之句。《宋诗纪事》卷三九谓印登徽宗政和(1111—1117)中进士,其所据当在是。其登第之年当即政和五年乙未(1115)。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略前,为永康军通判。隐居云溪(在今四川境内)。绍兴二十四年,作《云溪杂咏》。寿至八十。有《云溪集》传世,存诗近七百首。印生当北宋、南宋之交,戎马骚扰,其诗历写“宫阙翳草莽,井邑成墟丘”惨象(《送喻迪孺赴召》),深寓忧国忧民仇敌之怀。其《再用南伯韵》云“乾坤谁整顿,世乏英雄姿”,盖为有抱负之士。其《次韵刘文饶题绝尘亭诗》“斜斜远树绕江头,十里平波似不流。更欲寻源穷窈窕,一蓑烟雨羡渔舟”,格调清新,意趣盎然。印与曾慥、计有功、刘仪凤等游,盖为胜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

印诗“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机杼”,然“瓣香实在眉山”苏氏,“犹有典型”。(孔凡礼)

【孙覿】(1081—1169)字仲益,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政和四年(1114),举词学兼茂科。历官侍御史、翰林学士。主和议,为钦宗草降表,被李纲斥罢。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中,为黄潜善引入朝,官户部尚书,知温州、平江府。绍兴二年(1132),知临安府,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晚年居太湖。孝宗乾道五年(1169)卒,年八十九。有文才,尤长四六,工俚语。周必大为其集作序,称其名章隽句,晚而愈精。晚年所作诗淡雅有境。七绝颇有唐人风味。《存馥堂诗话》举其《枫桥三绝》之一“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敲枕犹闻半夜钟”,并言“亦可谓鼓动前人之意矣”。然人品卑下,诋李纲,诬岳飞,为时人所不齿。有《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乾道临安志》卷三有传。(张丽娟)

【周紫芝】(1082—1155)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属安徽)人。家贫力学,曾两赴礼部应进士考试,皆不第。少时曾与李之仪、吕本中、晁说之等北宋末名家游,曾向“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张耒学诗,犹可耳闻苏轼、黄庭坚馀论。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登进士第,历官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知兴国军,为政清简不扰而事亦治。秩满奉祠归庐山。周氏能词工诗,其诗多题赠之作,其集中收有颂美秦桧及其子秦熺之作,颇使论者不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为摘出,云:“紫芝通籍馆阁,业已暮年,可以无所干乞。而集中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三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七首、又《时宰生日诗》三十绝句、又《时宰生日》五言古诗六首,皆为秦桧而作;《秦少保生日》七言古诗二首,《秦观文生日》七言排律三十韵,皆为秦熺而作。又《大宋中兴颂》一篇亦归美于桧,称为元臣良弼,与张嶠《绍兴复古颂》用意相类,殊为老而无耻,贻玷汗青。”并讥其此类作品为“供官诗”。然其诗亦不乏佳构,如《题钱少愚四画》、《题湖上壁》、《题作小诗用少陵事》、《秋兰》、《禽言》等,皆清新活泼,近于张耒,无南宋初雄踞诗坛江西诗派的粗粝枯涩之风。著有《毛诗解义》、《太仓稊米集》、《竹坡诗话》等。《宋史翼》卷二七有传。(王学泰)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邵武(今属福建)人。自其祖始居无锡。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宣和七年(1125),为太常少卿。时金军败盟南下,纲刺臂血上疏,请徽宗禅位于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除

兵部侍郎,坚决主战,反对迁都。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不久,以“专主战议”被谪。北宋亡,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初,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十议,就国家的战、守、和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主张以守待战,并荐张所、傅亮到河北、河东等地组织敌后抗金力量,以宗泽为开封留守。在职七十馀日,因受投降派首领黄潜善等所沮,罢相。绍兴(1131—1162)间,历任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平弭溃卒流民之乱,曾上疏论攻战守备措置之方。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官终于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负重望,身系国家安危,其或在朝或在外,皆为时人所瞩目。其忠义之气渗入诗歌创作之中,《恭被诏书褒赠陈公少阳忠义痛感有作》二首悼念学生领袖陈东,褒扬他在国家危难时刻勇于与权奸作斗争,悲悼陈被昏君奸臣所杀害;《奉寄吕丞相元直》惋惜吕颐浩被秦桧排挤出朝廷。李诗中更多是摭写其不被理解、不被重用和不能施展其救国救民抱负的苦闷,如《铜陵阻风》、《张南仲置酒心渊堂值雨》皆是此类作品。李诗学杜甫,注重气格,诗风“雄深雅健,光明磊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其为人。一生颠簸,而著作颇多,计有《易传》内外篇二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劄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以及《梁溪集》等。《宋史》卷三五八有传。历代为纲撰年谱者数家,今人赵效宣为撰《李纲年谱长编》。(王学泰)

【曾幾】(1084—1166)字吉父,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人,徙居河南(今河南洛阳)。幼时,舅孔武仲、孔平仲誉为奇童。以兄弼恤恩,授将仕郎。试吏部,优等,赐上舍出身。历校书郎。宋钦宗靖康(1126—1127)初,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改提举荆湖北路茶盐公事。历福建路、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江西及浙西提刑。忤秦桧,去位。居上饶茶山寺,自号茶山居士。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末,为浙东提刑。绍兴二十六年,知台州。绍兴二十八年,为礼部侍郎。提举玉隆观,除敷文阁待制。孝宗隆兴二年(1164),致仕。卒谥文清。有《永乐大典》辑本《茶山集》传世。曾幾论诗,崇尚黄庭坚,《茶山集》卷五有“案上黄诗屡绝编”之句;卷七《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其二首云“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所以,他的学生陆游说他的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他也向韩驹学诗,其句律有相似处(《诗人玉屑》卷一九)。吕本中与曾幾为同龄人,幾亦向本中“请问句律”(《东莱先生诗集》卷首序)。本

中倡活法，幾领会甚深。明抄本《诗渊》第二十三册《读吕居仁旧诗》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外。”其“大意”在“欲人悟”。曾幾自列其诗入江西诗派（见上引“老杜”诗的第三、四句）。他人亦有以属之者。方回谓幾学黄，“往往逼真”，如《岁尽》，或“脱胎换骨”，如《所种竹鞭盛行》（分别见《瀛奎律髓》卷一六、二七）。然吕本中为《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无曾幾之名。陆游评其诗，有“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之句（《剑南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谓其诗不专主黄。赵庚夫《跋曾文清公集》则谓其诗“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江湖后集》卷八），以“新”、“淡”，为其风格特征。盖幾由黄庭坚入，而浸润于吕本中者尤深。今人钱鍾书谓其诗“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宋诗选注》），如《苏秀道中……》、《三衢道中》、《夏夜闻雨》等。《宋史》卷三八二有传。

（孔凡礼）

【李清照】（1084—？）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父格非，有文名。宋徽宗建中靖国（1101）元年，适赵明诚。时格非及明诚父挺之皆官居京师。崇宁二年（1103），明诚出仕，崇宁四年，授鸿胪少卿。自大观元年（1107）起，与明诚居青州。明诚于宣和三年（1121）守莱州，钦宗靖康元年（1126）守淄州，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建康。建炎二年，清照至建康。次年，明诚罢，驻家池阳，旋赴建康；清照闻明诚病，自池阳赴建康；明诚卒于建康，清照抵越州，旋往台州。建炎四年，清照至温州，回越州，岁暮往衢州。绍兴元年（1131），赴越，卜居土民钟氏家。绍兴二年，赴杭，再适张汝舟，旋离异。绍兴四年，作《金石录后序》；避地金华，卜居陈氏第。次年，回临安。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数年间，上《金石录》于朝，卒。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其中《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作于少时闺中。其视野远非同时代女子所能及。诗中云及当借鉴唐安史之乱，以为“深戒”，“深有思致”（周辉《清波杂志》卷八），盖有感于当时之时事。然较之张耒（文潜）原作，功力尚不深。成婚后所传“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句，为晁补之广泛称扬，人以为“能抉出诗人神髓”（《黄姝余话》卷八）。南渡后所作“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抚时感事，忧心如焚。其《上枢密韩肖胄诗》，则力陈恢复愿望，词所不能尽情表达者，以诗表达之。其《乌江》诗实为歌颂守土卫国之雄杰而作，笔墨凝重，较南渡前笔力益进。其他题材作品则未能称是。事迹详《李清照事迹编年》，载《李清照集校注》。

（孔凡礼）

【吕本中】（1084—1145）初名大中，字居仁，号紫微，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世为显宦，吕公著孙、好问子。幼颖悟，公著奇爱之，稍长从学于杨时、游酢、尹焞，皆一时名儒。以公著遗表恩授承务郎。宋哲宗绍圣（1094—1098）间，新旧党争起，因属元祐党人子弟被免官。元符（1098—1100）中，历为州县府掾吏。徽宗宣和六年（1124），除枢密院编修官。钦宗靖康元年（1126），迁职方员外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召赴临安，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权知学士院。因主张恢复，与主战派赵鼎善。秦桧欲引为己用，本中屡加抵制，忤其意，遂罢官，提举太平观，卒。赐谥文清。本中博学，勤于著述，学者称东莱先生。其诗学黄庭坚、陈师道句法，其论诗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又言：“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并主张诗应使人“兴观群怨”，读之可使人兴起为善之心。（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吕紫微》）本中首创江西诗派之说，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编选《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据《宋史·艺文志》，此编已佚），对后世影响较大。本中历经宋、金战争，北宋灭亡、金人南侵，亦曾颠簸流亡，备受战乱之苦。其晚年诗作颇能摆脱拘束，描写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抒发因万方多难而产生的感慨。其代表作品如《兵乱后杂诗》、《柳州开元寺夏雨》、《还韩城》、《送常子正赴召二首》等。吕诗虽受黄、陈影响，然其风格较为轻松明畅，长于律体，工于造句与对偶，历代诗话往往例举其对仗佳句。著有《春秋集解》、《师友渊源录》、《童蒙训》、《紫微诗话》、《紫微杂说》与《东莱诗集》等。《宋史》卷三七六有传。（王学泰）

【赵鼎】（1085—1147）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四岁而孤，母教成材，通经史百家之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对策斥章惇误国。累官为洛阳令。北宋亡后，于南宋建立之初权户部员外郎，多有建白，凡言四十事，已施行者三十有六，遂迁侍御史。金兵南下，鼎忠勇谋国，由御史中丞进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多有建树。金与刘豫合兵南下，举朝震恐，鼎独言不足畏，坚持主战，挫其锋锐，不久金兵遁归，又荐主战派张浚，协心以图恢复。后主和派秦桧当政，诬其结交台谏与诸将，出为绍兴知府。桧又指使言官劾鼎曾受张邦昌伪命，谪官居兴化军，移漳州，又责为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门谢客，又编置吉阳军，自知桧必欲杀之，乃自书墓中

石,自书旌铭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闻而悲之。孝宗即位,谥忠简,赠太仆,追封丰国公。赵诗学杜甫,以苍凉劲健之笔摅写中原沦陷的悲哀与有志报国而屡受疑忌和放逐的愤懑。如《过高邮饮张才甫家作诗为别》、《和郑有功次范元长韵》、《岁晏感怀》(扫荡边氛渐有期)、《再用前韵示范六》(举目山河往恨沉)、《和元长书怀二首》(神灵久愤敌尘侵)等皆是此类作品。鼎工于七律,律体属对工切,多警句,风格沉雄。有《建炎笔录》三卷、《忠正德文集》十卷。《宋史》卷三六〇有传。

(王学泰)

【朱弁】(1085—1144) 字少章,自号观如居士,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妻以兄女。靖康之乱,家破碎,南奔。高宗建炎(1127—1130)初,议遣使问安两宫,弁奋身自献,诏借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出使金。至云中见粘罕,邀说甚切,粘罕不听,使就馆,守之以兵,迫仕伪朝刘豫,弁守节不屈,金人一度断其供给,被拘留十五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和议成始被放归。秦桧恶其洞悉敌情,抑之,仅转奉议郎。弁存诗较少,多写于拘留金时。其诗以写被拘禁的苦闷和对故国的怀恋为主,如《客怀》、《白发》、《元宵有感》、《送春》、《攄抱》、《春阴》皆是此类作品。诗情凄婉悲凉,学李商隐,但“词气雍容,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见《宋史》本传)。著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尚书直解》、《聘游集》、《新郑旧诗》、《南归诗文》等,后三种为诗文集,皆佚。其诗多存于《中州集》中,朱熹为之撰《行状》。《宋史》卷三七三有传。

(王学泰)

【陈东】(1086—1127) 字少阳,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宋徽宗时,入太学。钦宗即位,上疏论蔡京等为六贼。李纲罢,他率太学生上书,从者数万人。高宗即位,召他到南京。此时李纲复罢,他上书力请留李纲。黄潜善陷之,被杀,年四十二。陈东当国难之时,坚主抗金,指摘权奸,气节凛然。其诗文亦如其人。《梅磔诗话》曾举其古诗一篇及“山岳遭埋没,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积势,还费扫除功”之句,谓诗中可见其志操。有《少阳集》十卷,今存。另有《靖炎两朝闻见录》存世。《宋史》卷四五五有传。

(张丽娟)

【沈与求】(1086—1137) 字必先,德清(今属浙江)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累迁至明州通判。召对,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历知台州、潭州。高宗绍兴四年(1134),出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召回,除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绍兴七年(1137)卒,年五十二,谥忠敏。他政治上主张抗

金,为人耿直敢言,所论多切中时弊。诗亦警拔,不苟作。他的《次吴江》诗反映了靖康之难后江南农村的衰败景象,富有现实内容。有《龟溪集》十二卷,今存。《宋史》卷三七二有传。

(张丽娟)

【王洋】(1087—1154) 字元勃(渤)。山阳(江苏淮安)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高宗绍兴元年(1131),除秘书省正字。绍兴年,为校书郎,旋为吏部员外郎,为起居舍人,罢。历典三郡。晚守鄱阳。绍兴二十三年,以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卒。有《东牟集》传世,存诗七百餘首。韩淲《涧泉日记》卷中谓王洋与吕本中、曾幾厚,“善诗”。洪迈《容斋三笔》盛赞其《琵琶洲》“塞外风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乃“真佳句”。洋生当北宋、南宋之交,亲历中原板荡,其《和秀实寄诗》,有“肃慎燕陲吾北土”之句,盖亦忧时忧国之士。其《悯旱》云“天心爱民非不勤,民心有眼天必闻”,爱意拳拳,代民求天。其《季文作真率会》云“一风一雨天酝雪,溪上行人手吹裂,主人扫巷作光华,满注金罍喧宾客”,气象开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洋诗“极意镂刻,往往兀界自喜,颇不为边幅所拘”。《宋史翼》卷二七有传。

(孔凡礼)

【郑刚中】(1088—1154) 字享仲,一字汉章,号北山,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甲科进士,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由秦桧荐于朝,心怀其恩,故桧主和议,不敢议其非;然郑与桧不同,曾大力营救主张斩秦桧之头的主战派胡铨。移宗正少卿,请去,不许,改秘书少监。后出为川陕宣谕使、陕西分画地界使,与金人交涉地界,金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改为四川宣抚副使。治蜀颇有方略,奏蠲蜀中杂征,营田屯兵,选将授任,改变地方建制,颇有治绩。秦桧怒其专擅,罢其官,责居桂阳军,再责任濠州团练副使,安置于复州,又徙封州而卒。秦桧死,复其官,谥忠愍。刚中博学,能文工诗。元人方回跋郑集云:“北山文简古,诗峭健,在封州诗尤佳。”其诗颇有江西诗派作品风味,但较江西诗顺畅,如《修修窗前芦》、《寒意》、《辛未元夜》皆其晚年佳作,特别是前二诗颇有自我反省之意。其诗亦颇喜描写“幽趣”,如《幽居》十二首,《春昼》、《寒意》、《初夏》、《初春》、《故居》、《栽竹》等皆颇能体现幽独闲旷之美。著有《周易窥馀》、《经史专音》、《西征道里记》等。其诗文收入《北山集》。《宋史》卷三七〇有传。

(王学泰)

【洪皓】(1088—1155) 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宣和(1119—1125)中,为秀州司录。高宗建炎三年(1129),擢徽

猷阁待制,使金,留金十五年,备尝艰辛,至绍兴十三年(1143)始还临安。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忤秦桧,出知饶州,后责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谥忠宣。皓博文强记,滞留北方期间,所著诗文,人争诵读。其《奉使留金金臣悟室求诗口占漫答》,颇有感人力量。词亦工,多思念故国之作。今存《鄱阳集》四卷及《拾遗》一卷、《鄱阳词》一卷(彊村丛书本)。《宋史》卷三七三有传。清洪汝奎编有《洪忠宣公年谱》一卷,刊入洪氏晦木斋丛书中。(张丽娟)

【傅察】(1089—1125) 字公晦,孟州济源(今属河南)人。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十七举进士,调青州司法参军,历永平、淄川丞,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吏部员外郎。宣和七年(1125),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会金人渝盟入侵,为劫持北去,不屈而死。赠徽猷阁待制。谥忠肃。《宋史》称他“自幼嗜学,为文温丽有典裁”。周必大为其集作序,称他的诗温纯该贯,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诗古体学韩不成,近体亦乏深致。然其七律音调铿锵,诵之颇有气势,五绝小诗平稳停当,饶有风韵,如《咏雪》三首、《次韵杜无逸西园独坐》四首、《思家》、《马上》等。有《忠肃集》三卷,今存。《宋史》卷四四六有传。(张丽娟)

【李弥逊】(1089—1153) 字似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政和八年(1118),屡官至起居郎,旋以上封事废。宣和七年(1125)知冀州。钦宗靖康元年(1126),知筠州。高宗绍兴七年(1137)复官为起居郎,试中书舍人。旋试户部侍郎。绍兴八年,上疏沮和议。绍兴九年,知漳州。次年,归隐连江西山。绍兴二十三年,卒。有《筠溪集》传世,存诗六百馀首。弥逊以忠节称。晚年著诗,有“十年去国心常赤”之句,足见其惓惓忧国之意。朱熹《朱子语录》,称弥逊亦一好前辈;又尝跋其宿观妙堂诗后,倾倒甚至(《朱子文集》卷八三《跋李侍郎武夷诗》)。楼钥序称弥逊归隐后,以诗自娱,“笔力愈伟”。今人钱鍾书说“他的诗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宋诗选注》)。其代表作有《东冈晚步》、《雲中道中晚步》、《春日即事》等。《宋史》卷三八二有传。(孔凡礼)

【陈与义】(1090—1138) 字去非,自号简斋居士。洛阳(今属河南)人。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居母丧住汝州,识葛胜仲。宣和四年(1122),以葛之荐,为太学博士、著作佐郎。宣和六年,为省闾考官。寻谪监陈留酒税。靖康变起,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高宗建炎四年(1130),为兵部员外郎。绍兴元年(1131),迁中书舍

人,拜吏部侍郎。绍兴六年,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次年,参知政事。卒。有《简斋集》传世,存诗六百二十六首。与义少踔厉不群,诗学杜甫律体,于黄庭坚、陈师道之外,“一洗旧常畦径”(葛胜仲序),得杜之弘亮而沉着的声调音节,而为黄、陈之所不及,其词句明净,较之江西派诗受人喜爱;其占体诗则主要受“黄、陈的影响”(钱鍾书《宋诗选注》)。其《书怀示友》之七因怀才不遇而愤怒斥责当时社会;其《和张规巨水墨梅五绝》之一寓世间万物白不能变为黑之理于其中,十分深刻。其他作品,大都流连光景。靖康之难后,与义诗创作进入后期。其逃难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即声言学杜老诗。后期作品主要集中在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元年五年间。五年乱离,加深其对杜诗的领会,“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宋诗选注》)。此一时期所作常有“忧”字,如《重阳》、《游董园》、《夜赋》、《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等,忧国伤时居主导地位。其《伤春》直斥“庙堂无策可平戎”,为最有代表性的爱国诗篇。其《雷雨行》、《次韵尹潜感怀》、《鄂州西轩书事》之六等作,笔墨辛辣,揭露最高统治者腐朽无能,大臣之间互相倾轧;其《刘大资挽词》赞扬刘杓靖康间为国殉难的忠烈精神;其《题画》、《牡丹》等作表达了对受金人奴役的故乡的深切关念;皆为爱国力作。其他题材作品,如《登岳阳楼》,纪昀谓为“意境宏深,直逼老杜”(《瀛奎律髓刊误》)。张嶠为与义所撰墓铭,谓其诗“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为“不类”。他后期仍未完全摆脱江西派的余习,但不是江西派。《宋史》卷四四五有传。(孔凡礼)

【邓肃】(1091—1132) 字志宏,南剑沙县(今属福建)人。少机敏能文,李纲引为忘年交。入太学,作诗讽东南花石纲扰民,被逐出学。宋钦宗时召对,补承务郎,授鸿胪寺簿。张邦昌僭立,肃赴南京,擢左正言。李纲罢,肃上疏救之,触怒执政,罢归居家。高宗绍兴二年(1132)卒,年四十二。他认为,“诗有四忌,学白居易者忌平易,学李长吉者忌奇僻,学李太白者忌怪诞。若学作举子诗者,尤忌说功名”。推崇苏轼之诗。著有《栟榈集》十六卷,其中诗、词各一卷,文十四卷。《宋史》卷三七五有传。(张丽娟)

【张元幹】(1091—1161) 字仲宗,自号芦川居士、真隐居士、真隐山人,晚年自称芦川老隐,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北宋间为太学上舍生,颇著声誉。徽宗政和二年(1112),出仕为押戟,后为陈留县丞,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围汴京,李纲任亲征行营使,元幹为其属官,不久即与李同时遭贬。南渡初期,元幹流离于道路,备尝苦辛。高宗绍兴元年(1131),以将作匠致仕还乡。绍兴二十一

年(1151),秦桧以元幹曾作词送反对议和之胡铨,将其交付大理司处置,被除名削籍,其著作亦被搜检没收。桧死,为国子监学录,卒赠正议大夫。元幹以词得名于后世,其初却以诗享名于当时。徽宗宣和(1119—1125)间,其诗已流传于士大夫间。胡仔言其在宣和时已借录元幹诗卷。元幹从江西诗派中坚徐俯学诗。徐称其“诗如云态度,人似柳风流”(见《艇斋诗话》)。其诗亦得“江西师友之传”(《芦川归来集序》)。然元幹诗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其诗气势酣畅,自然奔放,无江西拘窘之态,受苏轼影响更大。元幹身处北宋、南宋之交的战乱年代,作品反映此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举凡汴梁被围、奸臣误国、徽钦二帝被俘、金兵南侵、高宗仓皇逃窜、宋朝军兵的奋勇御敌等皆得到充分的反映,可见当时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之情景。《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建炎感事》、《乱后》、《花飞》、《上张丞相十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张诗中还有少量反对和议、反对投降,力主北伐、力主恢复的篇章,如《奉送李叔易博士被召赴行在所》、《次友人寒食书怀韵》等皆是此类作品。著有《芦川归来集》。今人黄佩玉撰《张元幹事迹编年考略》,见其所著《张元幹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版),王兆鹏撰有《张元幹年谱》。(王学泰)

【曾季狸】字裘文,号艇斋,南丰(今属江西)人。举进士不第,隐居家乡,郡守张孝祥、枢密刘拱荐于朝,皆不起。师事韩驹、吕本中、张栻,与朱熹、陆游等均有交往。陆游作《曾裘文诗集序》称:“予绍兴己卯、庚辰间,始识裘文于行在所,自是数见其诗,所养愈深而诗亦加工。”季狸以诗名,诗风近于江西派,他所作《艇斋诗话》,颇多有关江西诗派诗人的资料,今存。事见《宋诗纪事》卷四八及《宋诗话考》。

(张丽娟)

【李若水】(1093—1127) 原名若冰,字清卿,洺州曲周(今属河北)人。上舍登第,调元城尉、平阳府司录。为太学博士。钦宗靖康元年(1126),迁著作佐郎,擢吏部侍郎。靖康二年,随钦宗至金营,不屈而死,年三十五。谥忠愍。诗多言志之作。《梅涧诗话》举其《都下言怀诗》等,称赞其气节。《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诗具有风度,而不失气格。有《李忠愍集》十二卷,其中附录二卷,已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三卷。《宋史》卷四四六有传。

(张丽娟)

【王之道】(1093—1169) 字彦猷,自号相山居士。濡须(今安徽无为)人。幼颖悟,八岁通一经。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与兄之义弟之深同登进士第。钦宗靖康(1126—1127)初,调和州历阳县(今属安徽)丞,摄乌江令。罢,率族党保乡里,有功。摄乡

郡,抚摩疮痍,招集流亡,境内帖然。通判滁州。时方议和,陈敌有可胜者五,大忤宰相秦桧意,遂归。卜居家乡相山下,以诗酒自娱,凡二十年。桧死,起知信阳军。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到郡。除湖北提举常平,改湖南转运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有《相山集》传世。之道为人质直尚风节,议论伟然。其诗大抵自抒性情,清新可喜。如《竹城道中》:“一溪清水浸馀霞,风里归鸿字脚斜。今夜不知何处宿,路回山崦两三家。”集中关心民生疾苦之作屡见,如“大旱弥千里,群心迫望霓”(《秋日喜雨题周材老壁》)。然篇幅略嫌窘狭。事迹详《相山集》卷三〇附录尤袤所撰《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宋史翼》卷一〇有传。

(孔凡礼)

【张嶠】(1096—1148) 字巨山。襄阳(今属湖北)人。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进士。高宗初,应张浚辟,为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上疏论边防,除秘书省正字。绍兴六年,上疏请修政。绍兴七年,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再迁著作郎。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绍兴九年,除司勋员外郎,兼实录院检讨官。次年,擢中书舍人,升实录院同修撰。知衢州。奉祠。卒。嶠生当北、南宋之交,亲历中原板荡,其《避贼》、《建炎庚戌溃兵犯襄汉寒食阻趋光化拜扫追慕痛哭因成二诗》、《过郢乡寒食日》等,皆叙乱离之苦,深切感人。嶠为陈与义表侄,少尝从学,诗作得力于与义者颇多。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举嶠《夷陵》、《初夏》、《防江》等诗,谓其“词高简,意味幽远”,“真南渡巨擘”;又摘五言绝句“青林拥萧寺”、七言绝句“故国坟树想青葱”等篇,谓为“精丽宛转有思致”。然在宋代,深赏其诗者不多。平情而论,嶠“颇足以自名一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评诗论文,亦有见地,刘克庄予以高度评价。有《紫微集》传世。《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孔凡礼)

【朱松】(1097—1143) 字乔年,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高宗绍兴四年(1134),累官秘书省正字。绍兴七年,为校书郎。绍兴八年,除著作佐郎,旋为度支员外郎。历司勋、吏部郎。沮秦桧和议,出知饶州,未上,卒。有《韦斋集》传世,存诗四百馀首。“其诗初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行状》)。如其《送志宏西上》:“解龟醉江湖,酒面山月堕。起瞻帝乡云,感叹不成坐。何须飞霞佩,自办凌风舸。瀛州渺溟渤,万里一掀簸。”傅自得序其诗,以“高远而幽洁”赞之。其《睢阳谒双庙》盛赞张巡、许远“英气凛冽横穹旻”;谓“肉食宜鉴当年因”,盖直指时事,有为而发。其《久旱新岁乃雨》谓“下田不受犁”,写

农民之苦;甘雨既降,则“笑语喧畛畦”,与农民同乐。仁人之言,发自衷曲,颇能感人。松自是北宋、南宋之交的一作者。事迹见朱熹《朱子大全》卷九七《皇考朱公行状》、周必大《文忠集》卷七〇《朱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孔凡礼)

【朱翌】(1097—1167) 字新仲,自号潜山居士、省事老人,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高宗绍兴(1131—1162)中为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绍兴十一年(1141),秦桧恶其不附己,责授将作少监,谪居韶州。绍兴二十五年,充秘阁修撰。绍兴三十年,知宣州,移平江府,授敷文阁待制,后罢。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年七十一。其父曾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家学,而才力富健,故所作有元祐遗风。其诗跌宕纵横,伟丽伉健,喜以成语属对,而妥帖自然。有《潜山集》三卷及《猗觉寮杂记》存世。刘克庄言:“《潜山集》多不经人道语。此公读书多,气老笔遒。《题颜鲁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视坎趋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与客晚集》:‘足下一来同晚步,先生小住大村春。’《春晴》云:‘四野绿回春补阙,乱山尘净雨修客。’”并赞扬其对仗工稳。(见《后村诗话续集》卷四)事见《宝庆四明志》卷八、《延祐四明志》卷四。

(张丽娟)

【曹勋】(1098—1174) 字公显,亦作功显,号松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词人曹组之子。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以荫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考试,赐甲科。钦宗靖康(1126—1127)初,为阁门宣赞舍人,除武义大夫。靖康之乱,从徽宗北去,受徽宗半臂绢书,自燕山遁归。高宗建炎元年(1127),以御衣所书呈进,高宗泣以示辅臣。勋建议招募敢死之士由海道救徽宗归,忤执政意,出为外官,凡九年不得迁秩。绍兴(1131—1162)中,曾三度使金,以迎韦太后归有功,拜昭信军节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举皇城司。请祠居天台山。卒赠少保,谥忠靖。曹诗多为平庸的酬赠之作,但勋曾数度使金,其间所作诗文不仅可以考见其时事,亦可见作者对沦陷国土的眷恋与对恢复故土的渴望,并反映了中原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及其爱国热忱。如《入塞》、《出塞》、《望太行》等皆是此类作品。今人钱锺书评论其诗的价值云:“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巨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愤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

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宋诗选注》)曹诗注重词藻,风格绮丽。著有《北狩见闻录》、《松隐文集》。《宋史》卷三七九有传。

(王学泰)

【姚孝锡】(1099—1181) 字仲纯,自号醉轩。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调代州兵曹。入金不仕,住五台,善治生,遇岁饥,出粟振贫乏。中年以后,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有《鸡肋集》,其友人田彦皋谓孝锡“淋浪风月三千首”,遭丧乱,至金之末叶,止存律诗五卷。元好问选录其诗三十二首,入《中州集》卷一〇;小传中并摘引诗句十馀联。然孝锡实为宋人,宋陈思辑、元陈世隆补辑《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七三收其诗八首,题以《怡云轩诗集》。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写本《宋元小集》亦收孝锡诗。清曹庭栋辑选《宋百家诗存》,全收孝锡诗三十二首,题以《醉轩集》。滕茂实北宋末使金,未能归,终于金,孝锡《题滕奉使祠》诗,有“遗老只今犹涕泪”之句,以遗老自居,怀念故宋。其《次李平子登台有感韵》,念及“疲民卒岁方怀土”,居乡不忘民生疾苦。其《用峰山旧韵》“松根缠石瘦,云磴出岩斜”,体物真切,锤炼有致。其《柳溪别墅》“山市日高人未集,柴门客至鸟先啼”,得自然之趣。《中州集》卷一〇有传。

(孔凡礼)

【刘子翬】(1101—1147) 字彦冲,号屏山,亦号病翁,崇安(今属福建)人。未冠游太学。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正月,父赍死难,庐墓三年。服除,通判兴化军。官满,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学者称屏山先生。累阶右承议郎。有诗文集《屏山集》,存诗六百七十九首。其《汴京纪事》二十首,感慨靖康之变而且设想沦陷中的汴梁的景象,广为传诵,《宣和遗事》后集就引了三首。其《北风》亦写国事,《瀛奎律髓》卷三二评为“忠愤至矣”,“不减唐人”。此类诗是他的代表作。吴之振以为他的“五言幽淡卓炼,及陶、谢之胜,而无康乐繁缚细涩之态”(《宋诗钞》),如《潭溪十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谓其“古诗风格高秀,不袭陈因”。他是一个道学家,但首先是一个诗人,“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他沾染‘讲义语录’的习气最少,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钱锺书《宋诗选注》),如《读平险铭寄李汉老》。《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孔凡礼)

【苏小娟】一作苏小小。钱塘(今杭州)人。与其姊盼奴同为南宋著名歌妓,俱俊丽工诗。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笃诚相爱。不敏家贫,盼奴出资助其卒业。后不敏应礼部试得中后,授官襄阳府司户。盼奴既为官妓,其名被编入乐籍,必欲嫁人,则需落籍

从良,而不敏无力为她削籍,便不能携往其襄阳任所,二人只得挥泪作别。不敏赴襄阳仅三年,遂一病不起。临终嘱其任院判之弟将其积蓄分作两份,一份遗弟,一份赠盼奴。又嘱望其弟求娶俊雅能吟的盼奴妹小娟为偶。弟泣而领命,及葬毕其兄,赶往钱塘寻访盼奴时,得知盼奴卒已逾月,小娟则身陷府狱。祸事肇于挪用官费宿妓之於潜客商,被告发后,事涉盼奴,又累及小娟。后幸得赵之同宗桑梓钱塘府判之助,不仅为盼奴姊妹昭雪,还将院判的一封信亲交小娟。她启封览之,原来是七绝一首:“当时名妓镇东吴,不好黄金只好书。借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府判好事,命小娟依韵赓和。小娟当堂挥毫作《答赵倅》诗曰:“君住襄江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於潜绢也无。”诗事见《宋诗纪事》卷九七、赵翼《陔馀丛考》卷三九《两苏小小》条。《初刻拍案惊奇》之《赵司户千里遗音》篇,即衍此事。(陈祖美)

【胡铨】(1102—1180) 字邦衡,晚自号澹庵老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028)进士。累官至枢密院编修官。绍兴七年(1137),上疏乞斩秦桧,得罪,谪签书威武军判官。绍兴十三年,谪新州。绍兴十八年,谪儋州。桧卒,还。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官至资政殿学士。谥忠简。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已佚。今存诗文中,有诗一卷,仅十六首。《舆地纪胜》等书中,所引颇多,可资辑佚。铨才力富赡,其《和和靖八梅》,一举而成,大有佳语(《瀛奎律髓》卷二〇)。大抵“恢奇高响,无风呻雨喟者”(文集附录侯峒曾评语)。亦有“清丽可爱”者,如题《潇湘夜雨图》(《梅涧诗话》卷上)。《宋史》卷三七四有传。(孔凡礼)

【葛立方】(?—1164) 字常之,号归愚,晚号懒真子,丹阳(今属江苏)人。世代甲科出身,其父葛胜仲官终于湖州知州,故徙家于吴兴。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历官秘书正字、校书郎、中书舍人、吏部侍郎,曾出知宣州、袁州。从袁州罢归。晚年以著书自娱。尝撰诗话《韵语阳秋》,其论诗主张“先德行而后文艺”,强调“作诗者,兴致先自高远”,才会有意境高远之作品。其诗虽不如其论,但亦有不少怀念中原故土、感慨战乱的作品,如《避地伤春》等。诗平易通俗,尚不足以成家。其词风流妩媚,远胜于诗。除诗话外,还著有《归愚集》、《西畴笔耕》、《归愚词》等。其传附于其祖父葛密传(见《宋史》卷三三三)中。(王学泰)

【史浩】(1106—1194) 字直翁,自号真隐居士,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初官余姚县尉、历温州教授,除太学正,

升国子博士,为建王(即后来之孝宗皇帝)府教授,迁宗正少卿。金兵犯境,建王上疏请率兵为天子前驱。浩以晋申生、唐肃宗之事力言太子不可将兵,建王感悟,立使浩草奏,请随皇帝,以供子职。高宗方怒,览此奏意顿释,并称赞史浩“真王府官也”。建王立为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太子受禅,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上。孝宗隆兴元年(1163),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被采纳。一度出知绍兴、浙东安抚使与知福州。淳熙(1174—1189)初,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淳熙五年(1178),复为右丞相,因在处理京师军人闹事问题上,与孝宗意见相左,求去,出为保宁军节度使。淳熙十年,以太保致仕,封魏国公。光宗继位,进太师,卒封会稽郡王。浩喜荐人才,如陆九渊、陆游、杨简、叶适等皆其所荐,后大多位至通显。其词胜于诗,诗多奉和应制、题赠酬酢之作,虚比浮词,为文造情。然也有些小诗清新隽永,意韵深长,如《和钟山晚步》、《和斜径》等。其所创作《大曲》中有《采莲舞》、《太清舞》、《柘枝舞》、《花舞》、《剑舞》、《渔父舞》等,其中有乐语、歌词、有吹、有演,次序姿势,纤悉皆备。可见作者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著有《尚书讲义》、《鄮峰真隐漫录》。《宋史》卷三九六有传。(王学泰)

【朱皇后】(1107?—1127?) 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武康节度使朱伯材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入宫,封为皇后。约一年后,汴京被金兵攻破,徽宗、钦宗父子及宗室、后妃等数千人一同被俘,朱氏亦在其中。在押送北庭途中,金人强令其陪饮,不胜悲泣,强持杯作《怨歌》诗,不肯受辱,以死抗拒,卒于燕京,年仅二十。诗、事见《名媛诗归》、《宋诗纪事续补》。(陈祖美)

【李石】(1108—?) 字知幾,自号方舟子,学者称方舟先生。资阳(今属四川)人。九岁举童子。登进士乙科,为成都户掾。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起居郎赵逵奉诏以学识高明、志节高果举之。绍兴二十八年,除太学录。绍兴二十九年,除博士,旋罢为成都学官。闽越之士万里而来,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孝宗乾道三年(1167),为成都倅。召为都官郎中,旋复论去。起守眉州。授成都路转运判官,到官十日罢。淳熙八年,方议除官,不久卒。有《方舟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五卷。陆游盛赞其诗之笔力似“八月秋涛”(《剑南诗稿》卷三八《感旧》),谓其被摧压以死。并谓其“风流似贺季真”,“乃千载士”(同上卷七〇《怀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石之“文字渊源,出于苏氏,故所作以闲肆见长。……诸体诗纵横跌宕,亦与眉山门径为近”;盖石少

时从苏轼之孙符游,故濡染有自。其代表作有《次张益州芝草十二韵》。其《彭州送花》“市上芳菲小洛阳,谁家细马走红妆,名花未恨东风老,只恨先生两鬓霜”,格调清新,意味盎然,所长不仅在闲肆。集中似此者亦间见。(孔凡礼)

【黄公度】(1109—1156) 字师宪;号知稼翁,莆田(今属福建)人。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考试第一,任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代还,除秘书省正字。秦桧认为公度与主战派首领赵鼎善,不悦。桧党迎合其意,上书弹劾公度著私史以谤时政,罢归,主管台州崇道观。当初,公度赴朝,过分水岭,曾有诗曰:“呜咽泉流万仞峰,断肠从此各西东。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诬陷他的人即以此为词,言其欲赵鼎归来,以触秦桧之怒,再贬判肇庆府。秦桧死,召还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寻以疾卒。南宋初定时期,朝廷一味向金称臣纳贡以求苟安,使正直的士大夫感到屈辱与压抑。公度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士大夫的这种情绪,如《悲秋》、《春日怀王庆长》、《送陈应求赴官》、《秋城晚望》、《奥村晚望》、《初秋夜坐》、《返照》、《倚薄》、《闲居》等,皆以明畅的诗句表现了“平生忧国意,客至问朝廷”之心态。公度五、七言律诗较佳。林大鼐志其墓云“诗效杜甫,古格律句法逼真”,大体近实,但无杜诗深沉,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平易浅显”。著有《汉书镌误》,已佚。今存《知稼翁集》、《知稼翁词》。《宋史翼》卷二四有传。

(王学泰)

【邓深】 字资道,一字绅伯,或云别号大隐,湘阴(今属湖南)人。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进士,初为教官,入为太府丞。以轮流召对,论京西、湖南、北户士大夫风俗,受到高宗赏识,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就近家乡之地方职司,被任命为衡州知州,赴职后颇有政绩,“茶陵、安仁、溪峒之盗,望风帖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古罗志》)。擢为潼川路转运使,当地盐酒虚额,久为百姓之害,上书请于朝,蠲免川中盐酒之引四十七万,民得其利。为政严峻,守令有贪污则上书弹劾,深为宰相虞允文所称许。官至朝散大夫,晚岁优游家园,爱东湖之胜,建阁曰“朗秀”,卒于家。深能诗,但传世作品不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其诗一百八十馀首,编为二卷。所存作品多写于游宦之中,以模山范水与题赠答之作为多。其诗工丽,五律清深稳健。《古罗志》称其有文集十卷,已不传。《四库全书》所收之《永乐大典》本二卷,题作《邓绅伯集》;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则称其集为《大隐居士集》,故近人李之鼎刊《宋人集》时亦收《邓绅伯集》,但径改为《大隐居士集》二卷。《宋史翼》卷二一有传。

(王学泰)

【李少雲】 少雲为字,名不详。南宋人,士族女,十五岁嫁人。后夫死无子,弃家着道士服,往来江淮间。许颢曾见于金陵。其诗有“几多柳絮风翻雪,无数桃花水浸霞”句,殊无脂泽气。又喜炼丹砂。曾谓许颢云:“我命薄,恐不能成此药。”后二年,许见李瘦病骨立,问之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则鹤背能胜也。”笑曰:“忍相戏耶?”病中作《梅花诗》云:“素艳明寒雪,清香任晓风。可怜浑似我,零落此山中。”事见《彦周诗话》。《女骚》所著录《方书》、《诗集》已佚。其《梅花诗》亦见于《宋诗纪事》,题作《病中咏梅花》。

(陈祖美)

【王十朋】(1112—1171) 字龟龄,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入太学,主司异其文。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及第第一人,授绍兴府签判。绍兴二十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寻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复除著作佐郎,罢其兼职。绍兴三十一年,除大宗正丞,旋奉祠。次年,起为司封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兼崇政殿说书,除国子司业。孝宗隆兴(1163)元年,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讲。次年,知饶州。乾道元年(1165),移知夔州。乾道三年,移湖州,寻奉祠。乾道四年,起知泉州。乾道六年,移台州,力辞,奉祠。次年,除太子詹事,未赴,卒。十朋有《梅溪集》五十四卷,其中收诗一千八百多首。十朋诗编年。其徽宗宣和(1119—1125)间所作《观国朝故事》,感叹昔日之盛,隐刺今日国事日非。南渡初所作《伤时感怀》,念“亿万苍生陷犬戎”,欲“献孤忠”而无路,致“眼泪满襟血”。自是至登第前,所作除伤时外,尚有关怀民生疾苦之作,如《贫家连岁蚕荒今年尤甚……》等。十朋自出生到登第前皆乡居,足迹及浙东西,游览登临每有作,如《剡溪杂咏》及咏雁荡山诸什。十朋喜咏史,有《咏史》一百零七首。登第之后,诗的境界为之扩大。十朋为宦绍兴、饶州、夔州、湖州、泉州,有多诗叙各地胜概,赞美其先贤。其道途所经,亦笔之于诗,可以资今日考证者颇多。其治郡廉洁公正,深得人心。其在泉州所作《宴七邑宰》诗,有“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斟”之句,“真情恳切,足以动人之良心”(《梅硐诗话》卷中)。集中此类爱民之作殊不乏。刘珙称十朋“平居无所嗜好,顾喜为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梅溪王先生文集序》)。明陆钺(静逸)以为他的诗“句句似杜”。清陈衍选有宋一代诗,突出有代表性的十五人,为《十五家诗选》,十朋为其一。陈衍说他“一生肆力稽古,诗章蕴藉深厚,集中推尊韩昌黎不置”,以为其诗源出韩。事迹详汪应辰撰十朋墓志铭。《宋史》卷三八七有传。

(孔凡礼)

【喻良能】 字叔奇,号香山,义乌(今属浙江)人。

与兄良倚同入太学,同登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补广德尉,迁国子监主簿。向朝廷进《忠义传》,其中收录战国至五代一百九十人小传,书凡二十卷,乞颁之武学,授之将帅。孝宗嘉叹,称其“质实平正”,亲书其名于屏风间。丁内艰,服除,以国子博士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旧职。请外知处州,寻奉祠归。以朝请大夫义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致仕,营家圃曰磐湖,日以觞咏自娱。乡人慕之,立石以表其地。喻诗以写闲适生活及题咏山水胜迹者为多,如《题东林寺》、《题开先寺》、《鹅湖寺二首》、《亦好园四咏》、《秋晓野步》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格与杨万里“约略相近,特不及万里之博大”。实际上喻诗清婉有馀,活泼不足,缺少意趣。除《忠义传》外,还著有《诸经讲义》、《家帚编》、《香山集》。《宋史翼》卷二八有传。(王学泰)

【洪适】(1117—1184) 字景伯,号盘洲,初名造,字温伯,一字景温,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皓长子,幼敏悟。皓出使金国被羁留,适以此补修职郎。绍兴十二年(1142),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改秘书正字。父皓归,因得罪秦桧,被劾出知饶州,适亦出为台州通判。皓在外九年始还,卒于道。适服阕,起知荆门军,改知徽州。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孝宗时任司农少卿。孝宗隆兴二年(1164),召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金人再侵淮,羽檄沓至,书诏填委,咨访酬答,率称旨。乾道元年(1165),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未几,奉祠引退,家居十六年,以著书自娱,卒谥文惠。洪诗多写其家居时闲适生活,以吟咏自乐,如《盘洲杂咏》竟有两卷之多,即写其隐居生活之舒适,其风格纤丽,显得特立于粗粝瘦硬的江西派诗风之外。著有《盘洲集》、《隶释》、《隶续》。《宋史》卷三七三有传。清钱大昕为撰年谱一卷。(王学泰)

【韩元吉】(1118—1187) 字无咎,开封雍丘(今属河南杞县)人。南渡后,寓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之南涧,自号南涧翁。高祖维,元祐初官至门下侍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元吉知建安县。绍兴二十九年,官满赴行在。绍兴三十一年,为司农寺主簿。孝宗乾道四年(1168),为大理少卿。乾道八年,为吏部尚书。次年,使金。淳熙元年(1174),知婺州。封颍川郡公。有《南涧甲乙稿》(《永乐大典》辑本)传世。陆游赞其诗文“不事雕镌”,“气充以全”(《渭南文集》卷四——《祭韩无咎尚书文》)。朱熹赞其诗“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朱子语录》卷一四〇)。方回谓其诗“与尤、杨、范、陆相伯仲”(《瀛奎律髓》卷二〇元吉《红梅》诗评语)。吴师道盛赞其《霜天晓角》(“倚天绝壁”)词,以为未有能

继之者(《吴礼部诗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宋史翼》卷一四有传。(孔凡礼)

【史尧弼】(1119—?) 字唐英,称莲峰先生。眉州(今属四川)人。童卯即迥出非凡。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李焘为眉州解魁,第二人即尧弼。以古乐府、《洪范》等论,往见张浚于潭州,浚以为大类苏轼,留馆之。浚子枋从游。绍兴二十七年,登进士第。不久卒。有《莲峰集》传世,存诗一百馀首。其《离临安舟中……》诗“杨柳垂垂小港流,杨花无算逐空游。离情自是纷如絮,不是伊能惹客愁”,因物抒怀,堪称佳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扬他“天姿卓绝”,有其乡前辈苏轼的“遗风”,纵横排宕,摆脱恒蹊。然其《湖上》诗“浪汹涛翻忽渺漫,须臾风定见平宽,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今人钱鍾书以为乃用苏轼、韩愈之句,“旧货翻新,把巧妙的裁改拆补来代替艰苦的创造”(《宋诗选注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语或有未当。要之,史尧弼仍不失为有才华的诗人。其生平见《南宋文范作者考》。

(孔凡礼)

【李吕】(1122—1198) 字滨老,一字东老。邵武军光泽(今属福建)人。十四岁丧父,能自立。年四十,弃科举,不仕。爱物利人,有德于乡里。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卒,年七十七。有《澹轩集》传世,存诗二百馀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文“虽多近朴直,少波澜回复之趣,不能成家,但明白坦易,往往有关于劝戒,不失为儒者之言”。其《遣兴》“丈夫各有自立意,或出或处非一途”云云,即关劝戒。其《忧旱》“田园如燔木叶黄,火轮从早上扶桑”云云,谓之“明白坦易”固是,然锤炼不足,读之未免索然,殊有失诗之情致。然如《登赋台》云:“紫云之山几千尺,势压岷峨欲争长,茫茫巨浸辟山开,万穴鱼龙寄深广”,气势殊不凡,在其诗中,可谓别具一格。事迹详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中之《平园续稿》卷三五《澹轩李君吕墓志铭》。(孔凡礼)

【李流谦】(1123—1176) 字无变,号澹斋。汉州德阳(今属四川)人。幼敏悟,十五岁时,父良臣拥节而南,以序送别,凡四五百言。嗜诗,尽取唐以来名辈之作,采其句之杰伟者,类而集之,名《诗林摘奇》。以父荫补将仕郎,为成都府灵泉县尉,调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抚全蜀,招致幕下。雅州秩满至吴,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通判潼川府。卒。有《澹斋集》传世,存诗六百三十馀首。所历名迹胜境,率赋咏以自娱。次峡中,赋百韵以纪之,状其胜殆尽,人盛称之。其《悯农》诗叙农民终年辛勤耕作,其结果竟是“未了一日食”;而“守令民父母”,对此无动于衷,“俯默”不

言。揭露之深刻,在南宋初诗人作品中不多见。其他作品,则“边幅稍狭,间伤浅俚”,然“笔力峭劲,不屑屑以雕琢为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格调在后来的江湖派之上。(孔凡礼)

【陆游】(1125—1210) 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荫补登仕郎。绍兴十二年,始从曾幾游。绍兴二十四年,试礼部,以得罪秦桧,黜落。绍兴二十八年,为宁德主簿。绍兴二十九年,为福州决曹。绍兴三十年,为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一年,为大理司直。绍兴三十二年,除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赐进士出身。孝宗隆兴二年(1164),通判镇江。乾道元年(1165),通判隆兴。乾道六年,通判夔州。乾道八年,入汉中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参预军机活动,旋改成都安抚司参议官。乾道九年,通判蜀州,摄嘉州。淳熙元年(1174),摄荣州。淳熙二年,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次年,解职。淳熙五年,别蜀东归,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淳熙六年,改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淳熙七年,罢官,归山阴。淳熙十三年,知严州。淳熙十五年,除军器少监。次年,除礼部郎中,旋兼实录院检讨官,复罢归山阴。宁宗嘉泰二年(1202),奉召入都,为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嘉泰三年,除宝谟阁待制,致仕,回山阴。嘉定二年除夕(已入1210年),卒。陆游有《剑南诗稿》行世,现存诗九千三百多首。从初步入诗坛的《夜读兵书》、《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到临终的《示儿》,爱国之情,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而且要“从戎”,要“上马击贼”,“手枭逆贼清旧京”,把这种情绪发挥得淋漓酣畅,以此“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钱鍾书《宋诗选注》)。这是他同包括杜甫在内的前辈诗人同类诗篇不同的地方。他寓悲愤于咏画马(《龙眠画马》)、牡丹(《赏山园牡丹有感》)、雁唳(《冬夜闻雁有感》等)、酒(《长歌行》等)、草书(《醉中作行草数纸》等)之中,流露悲愤于梦中(《枕上梦》、《纪梦》、《异梦》等),触景兴怀,题材广泛,表达深入,亦为他集所无。写农村的诗,在其集中亦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岁暮感怀》、《记老农语》、《书叹》、《秋获歌》写农民疾苦;《农家》、《农家叹》、《春晚即事》写农家劳动。他的《沈园》诗,是宋代爱情诗中的佳作。除此以外,他有很多留连光景的闲居遣兴诗,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等;清李慈铭从陆诗中摘出很多类似联句作为楹联(《越缦堂诗话》)。清潘德舆认为这一类诗对于他的爱国诗篇来说,是次要的,其爱国诗篇,才是“诗之大主脑”、“真力量”(《养一斋诗话》卷五)。他的近体多于古体。

赵翼谓其律诗“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亦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未见”(《瓠北诗话》)。潘德舆谓其七绝为“诗之正声”,“虽不似唐人而万万不可废”(《养一斋诗话》)。赵翼谓其古体“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自有其特色。尤袤评其诗曰“俊逸”(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引),杨万里谓曰“敷腴”(《诚斋集·千岩摘稿序》),方回谓曰“豪荡丰腴”(《南湖集》序)。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谓陆诗“明白如话”,“言简易深”。刘克庄《题放翁像》谓陆游“自过江后一人”(《后村集》卷三六),实乃定评。清朱彝尊说陆诗“句法稠叠”(《曝书亭集》卷五二《书剑南集后》),不过其小疵。《宋史》卷三九五有传。(孔凡礼)

【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居士,长乐(今属福建)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进士,曾任乌程县令,后为峡州知州、湖北参议、长沙通判。在湖湘一带结识姜夔,颇赏识其才华,妻以侄女。晚年爱乌程弁山山水,遂家焉。早年曾从曾幾学诗,与陆游有同门之谊。工诗,当时极享盛名。杨万里云:“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千岩摘稿序》)当时与陆游、范成大、尤袤被称为四大诗人。杨万里有“尤萧范陆四诗翁”(《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的诗句。刘克庄云:“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但才慳于诚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验。……今摘其律帖精诣不甚费研寻者于此:‘著语能奇怪,呼天与倡酬。’(《中秋》)‘疾走建德国,乃为渊明先。失脚坠榛莽,刘伶扶我还。’(《和陶》)……真诚斋敌手也。”(《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德藻本有《千岩摘稿》七卷、《外编》三卷、《续编》四卷,均佚,现存诗不多,与其盛名颇不相符。传世者多为小诗,如《古梅》二绝、《樵夫》、《采莲曲》二首等,皆清新可诵。其生平见桐城光聪谐之《有不为斋随笔》丁。

(王学泰)

【范成大】(1126—1193) 字至能,亦作致能、志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九岁能文词。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绍兴二十六年,为徽州司户参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为编类高宗圣政所检讨官。隆兴二年,为枢密院编修官,岁末,除秘书省正字。乾道元年(1165),为校书郎,旋兼国史院编修官,复迁著作佐郎,仍兼国史院编修官。乾道二年,除尚书吏部员外郎,仍兼国史院编修官,旋罢归。乾道四年,知处州。乾道五年,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又兼国史院编修官。乾道六年,摄起居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旋奉使赴金。使还,除中书舍人兼同修

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乾道七年,除知静江府。淳熙二年(1175),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淳熙四年,应召赴临安,除礼部尚书。淳熙五年,兼直学士院,迁参知政事,旋罢归,居石湖。淳熙七年,知明州。次年,移建康,兼行宫留守。淳熙十年,以病请解职,归石湖。光宗绍熙三年(1192),知太平州,旋告休归石湖。次年卒,谥文穆。有《石湖居士诗集》传世。存诗一千九百二十五首。与陆游、杨万里、尤袤(或萧德藻)为南宋四大家。其“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夜宴曲》,自云效李贺,其《乐神曲》,自云效王建,其《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杂长庆体,其《嘲里人新婚》、《春晚》、《隆师四图》,为晚唐五代之音。然亦及江西派。如《续长恨歌》等作多用僻典。官徽州时,有“江山得句有神功”之句,风骨渐遒,遂自成一家。此后仍有江西影响。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一二《次韵石湖居士见梅》有“且容诗伯继黄陈”之句,作于成大晚年。成大关怀农民疾苦,早岁即有《缲丝行》、《催租行》,以后又有《后催租行》。其代表作为《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历代甚为重视。宋方岳《深雪偶谈》谓“验物切近”,元周伯琦此组诗石刻跋谓“曲尽吴中郊居民土风俗”(《六艺之一录》),明吴宽谓时复寓“感叹民隐之意”(《匏翁家藏集》跋此组诗语),清潘钟璫谓“田家诗,王(维)、储(光羲)诸公以五言擅场;石湖更作七绝,别开风气”(康熙黄刻本诗集校语)。今人钱鍾书谓此组诗“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宋诗选注》)。其爱国诗作,有使金赴燕途中组诗七十二首,凡遗民之涕泪、权奸之误国、金人之奴役、恢复之信心、完节之决心,纷形笔下,实为其爱国思想之集中表现。他如《题张戡蕃马射猎图》、《题夫差庙》皆为爱国作品中的名篇。杨万里谓范诗“清新”(《诚斋集·千岩摘稿序》),尤袤谓为“温润”(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方回谓为“典雅标致”(《南湖集》卷首题词),宋濂谓为“宏丽”(《宋学士全集·答章秀才论诗书》),陈迂谓为“高峭而不寒俭”,盖各赏其一端,说明其诗风格之多样。成大亦善文章,赡丽清逸,兼备众体,词亦清婉自然。事迹详周必大所撰神道碑。《宋史》卷三八六有传。(孔凡礼)

【周必大】(1126—1204) 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绍兴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卒谥文忠。有《省斋文稿》、《平园续稿》、《文忠集》等。今存诗六百多首。诗初学黄庭坚,十九岁时所作《赣江》,有明显的江西诗派痕迹。以后渐趋平易,如《池阳四韵·翠微亭》,比喻

生动,明畅通达。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气骨虽稍弱,然格调清新。晚年所作《上巳访杨廷秀》、《寄题高仲一夔殿撰识山堂长韵》等诗转为凝重,得力于杜甫,《王藉文学求读书堂诗》即有“万卷方知甫也神”之句。其诗“盖由白傅而溯源浣花者”(吴之振《宋诗钞》)。必大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为友,倡酬颇多,然边幅较三人窘狭。他“为文雄深博雅,制草尤典则”(王赠芳《周益国文忠公集后序》)。事迹详李壁所撰行状、楼钥所撰神道碑(均见《文忠集》附录)。《宋史》卷三九一有传。(孔凡礼)

【尤袤】(1127—1194) 字延之,自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为泰兴令。孝宗乾道七年(1171),为秘书丞。乾道八年,为著作郎,乾道九年,知台州。为江东提举常平,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为江东提刑。淳熙十一年(1184),为枢密院检详文字。淳熙十二年,为右司郎中。淳熙十三年,为左司郎中。淳熙十四年,为太常少卿。淳熙十五年,为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旋为中书舍人。次年,罢职。光宗绍熙元年(1190),起知婺州,改太平州。绍熙三年,为给事中,兼侍讲,旋兼侍读。绍熙四年,为礼部尚书。次年卒,谥文简。有《遂初小稿》,已久佚。今所传《梁溪遗稿》,乃后人辑录。尤袤的诗,早岁与萧德藻齐名,或称“尤、萧”(方回《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绍熙二年(1191),杨万里为萧德藻《千岩摘稿》作序,以范成大、尤袤、陆游、萧德藻并列,并称袤诗“平淡”。宁宗庆元二年(1196),万里复称以上四人为“近代风骚四诗将”(《诚斋集》卷三九《谢张功父送近诗集》)。嘉泰三年(1203),万里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句(同上卷四一《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而尤袤则以范、杨、萧、陆并列(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引)。然萧德藻之诗,传世者少。至方回,始以尤、杨、范、陆并列,谓中兴以来言诗必曰此四人;其《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称尤、范之诗“冠冕佩玉,度骚媲雅”,与杨、陆“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法,出则自然”,而《题张功父南湖集》(《南湖集》卷首)谓尤诗“娇淡细润”。方回深赏其诗,其入选《瀛奎律髓》者达三十二首。以后遂日就湮抑。尤袤论诗,反对江西派,所作平易晓畅,创作主张与实践一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残篇断简尚足与杨、陆、范抗衡。今人钱鍾书则谓其《淮民谣》为民请命,乃集中压卷之作,其他作品“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宋诗选注》)。《宋史》卷三八九有传。(孔凡礼)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为

赣州司户参军。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勉以正心诚意之学,因自名书室曰诚斋,遂号诚斋。孝宗乾道五年(1169),知隆兴府奉新县。乾道六年,上《千虑策》陈国事。宰相陈俊卿、虞允文荐之,召为国子博士。乾道七年,为太常博士。寻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知漳州。淳熙四年,知常州。淳熙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寻除本路提刑。淳熙九年,母丧,去职。淳熙十一年,服满,任吏部员外郎,旋为郎中。淳熙十二年,地震,应诏上书,乞朝廷“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淳熙十三年,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讲。次年,迁秘书少监。淳熙十五年,出知筠州。淳熙十六年,召为秘书监,旋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光宗绍熙元年(1190),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绍熙三年,得罪时相,改知赣州,不赴,自是不复出。宁宗开禧二年(1206),卒,谥文节。有《诚斋集》传世,存诗四千二百多首。他关怀国事及民生疾苦的诗篇不多,但有佳什。其关怀国事之作,如《读罪己诏》,希望孝宗勿因符离失利而改变抗金策略,清翁方纲以为此诗“元从真际发露”,“极佳”(《石洲诗话》);其接伴金使时所作《初入淮河四绝句》,摹写淮南北人民渴望恢复心态,实为宋代爱国诗篇中之上乘;此类代表作尚有《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雪霁晓登山》、《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等。其关怀民生之作有《竹枝歌》、《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至后入城道中杂兴》、《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但内容稍琐屑。他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钱锺书《宋诗选注》)。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之语(《白石道人诗集》卷下《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凡宦仕所历,山川之胜,皆以诗纪之。如《晓行望云山》、《过宝应县新开湖》、《过松源晨炊漆公店》等。寒暑交往,风雨变化,曲尽其趣。钱锺书尝称其“写雨绝句,几无篇不妙”(《谈艺录》)。花果虫鱼,纷形笔下。《宿潮州海阳馆独夜不寐》写触前蚊,为钱锺书所赞。盖万里擅写生,“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蹶风”,乃万里之特有。万里初学江西,后学晚唐,最后独辟蹊径,师法自然,形成“诚斋体”。万里提倡“活法”,其立足点亦为师法自然,即“生擒活捉”(项安世《平庵悔稿》卷五《题刘都监所藏杨秘监诗卷》)自然界景象,用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他有时还熔炼俗谚口语入诗。《竹枝歌序》称隐括纤夫舟人“吟讴嘯謔”而为歌,汲取民歌营养。万里在当时与陆游、范成大等齐名,声誉很高,金诗人李纯甫亦颇推许(刘祁《归潜志》卷八)。“他的诗

教人觉得很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了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钱锺书《宋诗选注》)。以致有人讥其诗“油滑”(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粗头乱服”(陈衍《宋十五家诗选》)。《宋史》卷四三三有传。

(孔凡礼)

【韩玉父】玉父一作玉,或作玉文、玉真。约于宋高宗至孝宗(1127—1189)时期在世。秦(今陕西)人,其祖父为朝官,因避乱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幼时李清照曾教其作诗。玉父十五岁时,嫁上舍太学生林子建。不久,林得官回原籍福建,玉父倾囊助其盘资。林与约秋冬之际接其返闽。久之,音信全无。她便携婢女从杭州乘船,展转到福州寻夫。玉父到达福州,林子建却已移官盱江。她只得又回到延平,经由顺昌,假道昭武前往。客旅之可厌、人事之多乖,令其生无限感慨,于漠口铺一处墙壁上写下《题漠口铺》诗。诗、事并见《醉翁谈录》乙集卷二;《彤管遗编》后集卷一—所载略同。《宋诗纪事》卷八九亦录其诗并序。

(陈祖美)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徙居建阳考亭(今福建建阳)。诗人朱松之子。幼颖悟,年十八贡于乡,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为泉州同安主簿。孝宗继位,有恢复志,熹入对,言“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并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除武学博士,不就,归。孝宗乾道六年(1170),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淳熙(1174—1189)初以荐召为秘书郎。淳熙五年(1178),以差知南康军,讲求救荒之政,恰逢旱灾,全活无数。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乞复其旧,亲自制定书院《学规》。因上书直言,触帝怒,以疾请退。淳熙八年,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前救荒有功,除直秘阁。会浙东大饥,赴浙东救荒革弊。淳熙十四年,提点江西刑狱。光宗即位,知漳州,除宝文阁待制知江陵府,旋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宁宗朝,韩侂胄有定策之功,朱熹反对其预政,为侂胄所忌。宁宗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庆元六年,卒。嘉定(1208—1224)初,谥曰文;理宗宝庆(1225—1227)中,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1241—1252)中,从祀孔庙。熹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实际为官时间不长,但皆竭心力为政,凡所奏闻,皆本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道,亦颇能切中时弊。熹平生好学,亦愿以所学教人,居崇安时,榜厅事曰紫阳书堂,又创草堂于建阳之雲谷,自称雲谷老人。晚年卜筑于建阳之考亭,作

沧洲精舍,自称沧洲病叟,又号遯翁,考亭为讲学之所,故人称考亭学派。熹论文虽强调文以害道,贬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然其论诗主张诗由感物而发,指出诗言志与咏歌其情为诗之根本,反对浮华不实之诗风。熹亦能诗,诗风清新简淡,善于用五、七绝小诗说明生活哲理,如《偶作三首》(门外青山翠紫堆)、《泉声次林择之韵》、《吴山高》、《水口行舟二首》、《观书有感》、《春日》、《泉井》、《桃溪》等。其描山绘水之作亦颇可观。朱诗用笔自然,仿佛不经意而成,不求工而自工。故《宋诗钞》编者谓朱“虽不役志于诗,而中和条贯,浑涵万有,无事模铸,自然声振,非浅学所能窥。此和顺之英华,天纵之余事也。”著述极富,有《周易本义》、《周易参同契考异》、《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等,皆行于世。平生为文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后世撰朱氏年谱凡数十种。较早者有宋李方子《朱文公年谱》三卷。《宋史》卷四二九有传。(王学泰)

【许及之】(?—1209)字深甫,温州永嘉(浙江温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知袁州分宜县,入朝为宗正簿,乾道元年(1165),为右拾遗。光宗即位,除军器监,迁太常少卿。历官淮南转运判官兼淮东提刑、大理少卿。宁宗即位,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宁宗嘉泰二年(1202),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兼参政。开禧(1205—1207)北伐失利后,侂胄诛,御史中丞雷孝友奏及之附和侂胄用兵,降两官。后罢官居泉州,卒。及之工诗,所传作品多为题名山胜水及咏亭台园林、花木虫鱼之作。如《池塘小景》、《绿野堂》、《灌园亭》、《人面竹》、《梅花十首》等。及之曾出使金国,其《涉斋集》第十七卷有半卷皆为使金之诗,其中除一二首(如《过龙德宫》、《归途感河南父老语》)还有些沧桑之感外,其余多写山光水色,心境恬淡,很少有悲哀与怨愤。其诗平易,颇少警人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学王安石,虽“未能青出于蓝,而气体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较宋末江湖诗派刻画琐屑者,过之远矣。”未免过誉。许集本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诗十八卷,题为《涉斋集》。《宋史》卷三九四有传。(王学泰)

【张明中】号敬斋。约为南宋末人,生平爵里不详。明中《谢惠诗》有“语带诚斋句妙香”之句,赞友人学杨万里诗有成绩,他自己也学杨万里诗。如

《燕》“芹泥夹岸融融日,野水当门淡淡花。王谢堂前旧时客,如何肯访野人家”,翻唐人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一诗之意。《谢惠红桃》“报我勤渠有木桃,肤腴密洒茜花膏。枯肠消得三十颗,只恐儿曹赋老饕”,写日常生活;“带雨含情挥泪重,迎风无力欲人扶”,写牡丹;“刚被东风留住着,却酩酊脸未归来”,写探春花。皆活泼有风趣,得杨万里神韵。《题朱陵观》“依山靠岭都开垦,三岁为新三岁畲”,写农村,生活气息浓厚。《谢惠三贤文集》赞扬三人“冰涵心底鉴,雪释性中天”,笔调深沉;同时感慨“干戈湮澗秋”。明中诗见于《诗渊》者约六十首,见于《永乐大典》者四首,古近体皆有。(孔凡礼)

【葛天民】字无怀,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移居台州黄岩(今属浙江)。早年出家为僧,名义铎,字朴翁,后还俗,居杭州西湖之葛岭,与当时名流陆游、姜夔、韩淲、张镃、俞灏等人交好。陆游有《赠经山铎书记》诗言“铎公声名满吴会,惟有放翁最先识”,是知葛曾入某官之幕,并有名于时。周密《癸辛杂识》记其曾受权宦张知省之馈赠,知其生计多来于贵官大僚之资助。葛诗多写杭州四时景色与自己隐逸生活,长于七绝七律,风格恬淡清新。其《绝句》(二十四友金谷宴)曾为张端义所称诵(见《贵耳集》),其实亦平平。著有《无怀小集》。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王阮】(?—1208)字南卿,德安(今属江西)人。北宋神宗时抵御西夏名将王韶之曾孙,故阮常以“将种”自命,好学尚气节。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时孝宗初继位,有恢复之志,阮试礼部,其对策中主张孝宗移驻建康,随时准备北伐。知贡举范成大读其策,叹曰:“是人杰也。”调南康都昌主簿,有廉洁名,移为永州教授。光宗绍熙(1190—1194)中,知濠州,日讲守备,与边民亲访北境事宜,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抚州。权臣韩侂胄欲借北伐取功名,闻阮名,欲诱以美官,罗致门下。阮不愿出其门,触侂胄怒,去官,归隐庐山。阮学诗于张孝祥,孝祥又取法苏轼,故阮诗纵横豪宕,亦稍有神似东坡之处,特别是七律属对工切,其写景抒情皆有出色之篇章,如《题高远亭》、《蓬屋》、《出丰城》、《龙塘久别乘月再到奉呈同社》、《姑苏泛月》等,传世有《义丰集》一卷,《宋史》卷三九五有传。(王学泰)

【张良臣】字武子,一字汉卿,号雪窗,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金兵南下,北宋亡,良臣随父避兵祸徙家于鄞县(浙江宁波)。受知于名臣魏杞,与之唱和。笃学好古,学者尊为雪窗先生。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官止监左藏库,淳熙(1174—1189)末年卒。楼钥题其诗集后云:“武子闭门读书,室无一物。

性嗜诗,不轻作,或终岁无一语,故所作必绝人。”良臣工于七绝,语意浑成,格调清新,虽所传篇章不多,可读之作不少。如对宋末叶绍翁《游园不值》有所启迪的《偶题》:“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其他如《晓行》、《梅市道中》、《赋》、《示长芦仁禅师》、《西湖晚归》、《遗家书》等皆为七绝佳作,可与稍后之白石比肩。著有《雪窗小稿》,清顾修又辑得若干首,补于《南宋群贤小集》之后。其传记资料见于《宋诗纪事》、《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诸书。(王学泰)

【项安世】(1130—1208) 字平父,一作平甫,号平庵,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徙居江陵(今属湖北)。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除秘书正字。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太上皇所居)安世上书谏之,留中不报,遂遗书宰相求去,寻迁校书郎。宁宗即位,诏求直言,安世上书激烈批评自上而下、日益严重的“侈且滥”之风,并率馆职上书要求朝廷重用朱熹,“使辅圣学,则人主无失,公议尚存”(见《宋史》本传)。未采纳,随即为言官弹劾,出为重庆通判,未拜,党禁起,以“伪党”被罢官。开禧(1205—1207)间,韩侂胄对金用兵,起复知鄂州,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宋金开战,立有战功,权京、湖宣抚使,擢太府卿,以擅杀幕官坐免,后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判官,未上,以台章夺职。安世博学,工诗文,杨万里言其是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见《诚斋诗话》)。长于五、七言绝句,诗风浅易疏宕,与后起江湖诗风类似。刘克庄曾列举其五、七言小诗十馀首,其中不少佳作。如《送水心淮东总领》云:“蓝缕疾耕家四壁,铁衣高卧日千金。四朝饷士前无古,一旦和戎患至今。”(见《后村诗话》续集卷四)有《平庵悔稿》十二卷,存诗一千二百八十五首,为陆游、杨万里之后存诗较多诗人之一。另有《周易玩辞》及《项氏家说》。《宋史》卷三九七有传。(王学泰)

【张孝祥】(1132—1169) 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唐诗人张籍裔孙。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年,金人侵和州,随父渡江,居芜湖。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第一,未授官即上疏为岳飞鸣冤辩诬,言岳“忠勇天下共闻”,要求“表其忠义,播告中外”。遂为秦桧所忌,指使言官诬孝祥之父张祁有反谋,下大理寺狱。适逢桧死,祁狱得解,授孝祥秘书正字。历官校书郎、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抚州知州。孝宗时知平江府。张浚荐之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兼建康留守。孝宗乾道元年(1165),为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乾道三年,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乾道四年,徙知荆南湖北

路安抚使。在荆筑金堤,有效防止水患。孝祥久为地方官,所至多有惠政。为人英迈豪特,诗词类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张诗学苏轼,言其“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而根柢稍薄,时露竭蹶之状”,“然其纵横兀傲,亦自不凡”。其诗多写其旷达豪迈之胸怀,亦有一些表达对北方故土的思念和为国雪耻的壮志豪情,如《上丁斋宿》、《与胡邦衡》、《中兴颂》等。孝祥诗不如词,其词影响更大。著有《于湖集》、《于湖词》。《宋史》卷三八九有传。今人宛敏灏为撰《张孝祥年谱》,载于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之《词学》。(王学泰)

【张栻】(1133—1180) 字敬夫,或作钦夫,又字乐斋,学者称为南轩先生,绵竹(今属四川)人。张浚之子,少颖异,随父官永州、连州及湖湘各地,从赵鼎受学,又曾往衡山向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备受前辈学者称赞。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以荫补官,甫登仕途即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内赞密议,外参庶务。孝宗亦喜其少年有为。次年,北伐失利,其父被迫去位,病故。栻愤而屏居旧庐,不预人事。乾道四年(1168),起复知严州。次年,为吏部侍郎兼起居郎侍立官。孝宗每咨以时政,栻侃侃而论,颇受重视。栻念靖康之耻,心系一统大业,积极上言。后因与宰辅意见不合,出守袁州。淳熙二年(1175),改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有惠政。淳熙五年,任秘阁修撰,改荆湖北路转运使,知江陵府,在任期间礼遇诸将、安抚士卒,勉以忠义。常巡视诸郡,访贫问苦,省刑薄赋,秉公执政,颇受郡民爱戴,亦为权奸所嫉。屡求去,不许,后以病力辞,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未及拜命,病卒。闻丧,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静江、江陵两府百姓哭之尤哀。栻有其父风,广交结。一时知名之士人,如朱熹、吕祖谦、杨万里、张孝祥、周必大、胡铨、辛弃疾、陈亮、陈傅良、虞允文、刘过、潘端叔等皆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又在所至之处建立书院,培养后进,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吴翌等皆出其门。栻诗多流连光景、描山绘水之作,但颇有兴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永州所题三亭陆山诸诗,时方二十馀岁,兴寄已落落穆穆如此”。其《立春偶成》、《题福岩》、《和元晦醉下祝融峰》、《东渚》、《丽泽》、《西屿》、《题城南》、《采菱舟》皆是写风光山水之佳作。其诗风清新隽永,颇具哲理,时见理趣。一生著作极富,有《易说》、《癸巳论语解》、《书说无逸解》、《孟子详说》、《癸巳孟子说》、《经世纪年》、《通鉴论笃》、《诸葛武侯传》、《奏议》、《伊川粹言》、《希颜录》、《张子太极解义》、《南轩先生问答》、《南轩诗集》等。朱熹为撰神道碑,今人胡宗楙

为撰《张宣公年谱》。《宋史》卷四二九有传。

(王学泰)

【章甫】字冠之,自号易足居士,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孝宗时名士,少从张孝祥游,飘荡不受拘束。陆游《入蜀记》中载:孝宗乾道六年(1170)八月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旧址”。是知此时已为“秀才”,且生活于荆江一带,张端义《贵耳集》称淳熙间(1174—1189)淮有三士,其一即章甫,可知其移居真州当在孝宗朝晚期。甫工诗,今人钱鍾书认为其诗“受杜甫和苏轼的影响”。(见《宋诗选注》)其作品较为关注农民的苦难与国事的艰虞。如《苦旱》、《忧旱》、《悯农》、《田家苦》、《白露行》、《白露》等写天灾人祸给人们造成的痛苦和诗人出自内心的关爱与同情,皆极感人。《即事》十首以沉郁顿挫之笔摅写忠君爱国之情及对朝廷政策举措失当的批评,颇有杜诗之神韵,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其格律虽稍近江湖一派,而骨力苍秀,亦具有研锻之功。”撰有《自鸣集》,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诗若干首,厘为六卷,后附《杂说》三篇。事迹见《贵耳集》、《宋诗纪事》卷五六。

(王学泰)

【陈造】(1133—1203)字唐卿,号江湖长翁,高邮(今属江苏)人。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调繁昌尉,改平江教授,士子未知其名,及受教,咸服其学问议论,恨师从之晚。在吴结识老诗人范成大,与之唱酬,成大亦甚赞赏其诗,拟之以高邮先贤秦观。转为定海县令,房陵通判,官至淮南西路安抚使参议,时人称“淮南夫子”。造仕当朝中风气萎靡之时,多与当权者龃龉不合,以为无补于世,置之江湖乃宜,遂自号江湖长翁。申屠珙《宋故淮南夫子墓志铭》中称“其于海诱则良师,于抚字则循吏,身笃操修,道体兼用”(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颇能反映其为人。今人钱鍾书云:“他敢批评当时的社会习尚,肯反映人民疾苦。”如《田家谣》、《都梁》二首皆为忧民忧国之作。其诗清新活泼,其缺失则如钱鍾书所言:“只可惜堆砌和镶嵌的古典成语太多,意思不够醒豁,把批评的锋口弄得钝了,反映的镜面弄得昏了。”(见《宋诗选注》)撰有《芹宫讲古》、《江湖长翁文集》。《宋史翼》卷二九有传。(王学泰)

【周孚】(1134—1177)字信道,自号蠹斋,人称蠹斋先生。济北(今山东境内)人,寓家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天资颖悟,勤奋好学。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辛弃疾以兄事之。乾道八年,以左迪功郎为真州州学教授。卒于任。有《蠹斋铅刀编》传世,存诗三百七十首。友人陈珙序其集,谓孚“以后山为法,其后由陈而黄、黄而杜,属思高远,炼句精

稳,少而工,壮而新,晚而平淡”。丘密序其集,谓其诗“大要本诸黄太史而滥觞于江西诸贤,不为蹈袭,高爽刻厉”(《嘉定镇江志》附录)。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四《书周蠹斋孚集后》亦谓其诗“诗律严整,且字字有来历,有杜少陵、黄山谷之风”。要之,孚诗涵濡于江西者甚深。其《即事》诗谓“此日苍生望安石,向时老将忆廉颇。周宣汉武规摹在,谁为君王赋伐柯”,惓惓国事;又云“风饕雪虐鸢鹗地,湖海无能泣病臣”,以无能尽力国事自责,深切感人。周孚学杜,实为有得。事迹见《宋诗纪事》卷五三。(孔凡礼)

王质(1135—1188)字景文,号雪山,兴国(今湖北阳新)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绍兴三十一年汪澈宣谕荆襄,绍兴三十二年张浚都督江淮,孝宗乾道六年(1170)虞允文宣抚川陕,皆致质于幕下。人为敕令所删定官,迁枢密院编修官。以鲠直为权贵所忌,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山居绝意禄仕。淳熙十五年(1188),卒。在世时,已刊《雪山集》三卷。卒后,王阮编次其所作,为四十卷,仍以《雪山集》名。质以文学名重于时。其论和战守疏及上孝宗诸疏,词旨剴切。其诗作《何处难忘酒》四首,历陈时政及生民疾苦,抒心中郁结。《程史》卷五《何处难忘酒》条及《贵耳集》卷中皆举其诗,分别以“隽放豪逸”、“豪放”誉之。然今《雪山集》只存一首,知所佚者尚多。《后村诗话·后集》赞其《与王枢使公明》、《与虞丞相》“甚隽快”。《瀛奎律髓》卷一四赞其《东流道中》“道美”。《宋史》卷三九五有传。

(孔凡礼)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为显宦,吕蒙正之后,好问之孙,本寿州(今安徽凤台)人,至好问始居婺州(今浙江金华)。祖谦渊源家学,有中原文献之传,后又与张栻、朱熹为切磋友,学问益精。三人并称“东南三贤”。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复中博学鸿词科。除秘书郎、国史编修官。以修撰李焘推荐,重修《徽宗实录》,书成进帙,迁著作郎。奉旨编纂《皇朝文鉴》(即《宋文鉴》)凡一百五十卷,书成,诏除直秘阁,旋主冲祐观。卒谥成。吕学以关洛为宗,朱熹曾引之同纂《近思录》,后因论毛诗不合,朱与陆九渊论争时遂兼及祖谦。祖谦能文工诗。其诗多描写山光水色,自然风光,借以寄托情志或说明哲理,如《西兴道中》、《登八咏楼有感》、《春日》、《野步》、《晚望》皆属这类作品,诗风清新明畅,似不经意而为之。一生著述极富,重要者有《古周易》、《易说》、《书说》、《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历代制度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少仪外传》、《近思录》、《丽泽论说集录》、《卧游录》、《诗律武库》、《东莱吕太史集》,编辑了《宋文鉴》、《古文关键》。明

阮元声为编《东莱吕成公年谱》一卷。《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王学泰)

【陈傅良】(1137—1203) 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少时为文,不随流俗,自成一家,为世所重。曾受学于郑伯熊、薛季宣,传永嘉之学。入太学,与张栻、吕祖谦等友善,得切磋之益。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中进士甲科,教授泰州,以荐入朝为太学学录,出为福州通判。光宗立,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光宗绍熙三年(1192)除起居舍人。次年,兼中书舍人。因光宗不纳谏劝,挂冠而去。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宁宗嘉泰二年(1202)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进宝文阁待制。次年,卒,谥文节。傅良为南宋重视实学之道学家,自三代以下之学靡不研究,必稽考得其实而后已。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皆深研其究竟,务期于实用。著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传章指》、《历代兵制》、《永嘉八面锋》等。论者以为其诗格“苍劲,得少陵一体”(见《宋诗钞》)。其诗虽多题赠酬酢之作,但其中不少描写儒者的情志、胸怀、抱负与人格,如《读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除夕用前韵》(又添犬马齿)、《寄题陈同甫抱膝亭》、《送鲍清卿教授莆中》、《怀同舍石天民编修》、《夷门歌送修德还阙》、《述怀》、《送辛幼安帅闽》等都是这类作品。诗文收入《止斋文集》。叶适为撰墓志铭。《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王学泰)

【楼钥】(1137—1213) 字大防,自号攻媿主人,明州鄞县(今属浙江)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知温州。光宗时,官至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宁宗嘉定元年(1208),除同知枢密院事。次年,除参知政事。嘉定六年,得请归田里,寻卒。谥宣献。钥有《攻媿集》一百二十卷。钥有文名于时,真德秀序文称其“文备众体”,“词气雄浑,笔力雅健”。《宋史》本传称其“文辞精博”。今存古今体诗一千一百七十三首。吴之振《宋诗钞》谓其诗“雅赡有丰,然往往浸淫于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工于声偶”。其七言多佳句,如“晓雾暗燕山寺雨,松风深隐海门潮”(《西山资国寺》)、“三板放开千丈雪,一奁照破四山秋”(《题雪窦锦镜桥亭》)。王士禛在《居易录》中亦举其“一百五日麦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风”,“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等佳句。《宋史》卷三九五有传。

(孔凡礼)

【王炎】(1138—1218) 字晦叔,一字晦仲,号双溪,新安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任崇阳主簿。张栻帅江陵,炎从之受学,并入其幕,秩满授潭州教授,改知临湘县,入都为博士。宁宗庆元四年(1198),为实录检讨,转著作佐

郎,出守湖州。累官至军器监、中奉大夫,赐金紫,封婺源县男。与朱熹交情颇笃,相期以道义。朱于宁宗守丧之中为之讲经,炎致书责以非礼。晚年老病相兼,著《易解》,书未成而病笃,祝天曰:愿须臾勿死,以成此书。病稍愈,书成,卒。炎所居在武水之阳,双溪合流,故以之为号。炎能诗词,其诗有不少篇章表达了对平民生产、生活的关切,如《游砚山》写对凿山采砚的石工辛苦的同情,《麦苗已有生意掘乌糲者未止》写青黄不接时农民要靠掘野菜充饥,其他如《丰年谣》五首、《冬雪行》、《劝农道山场》等,都表达了诗人民胞物与之思想。诗风平易,近于晚唐之聂夷中、杜荀鹤。《宋诗钞》编者认为王诗“亦多庸调”,是为偏见。著有《读易笔记》、《尚书小传》、《双溪集》。《宋史翼》卷二四有传。

(王学泰)

【袁说友】(1140—1204) 字起岩,号东塘居士,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流寓湖州(今浙江吴兴)。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丙科,调建康府溧阳县主簿。后入京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历官国子学正、太常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秘书丞兼权尚书左郎官。出为浙西安抚司参议官、知池州、衢州,提举浙东路常平茶盐、提点浙西路刑狱、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加徽猷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宁宗嘉泰三年(1203),官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罢以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奉祠致仕。说友学问渊博,好学不倦,官成都时尝令属官辑蜀中诗文,编为《成都文类》五十卷。通《易经》,著有《择善易解》。其诗以写文士生活中闲情逸致者为多。如《斗茶》、《尝顾渚新茶》、《遗建茶于惠老》、《试砚》、《曝书》、《持课》、《读书》、《训子》、《治药》、《理发》、《饮归》、《咏墨》、《和程泰之阁咏雪十二题》等,从诗题即可想见其生活之一斑。集中也有一些涉及当时重大事件的篇什,如《扬州堡寨》写春风十里之扬州在宋金战争中已经变成“环城九里十六步”,“峭壁临深沟”的争战之地。长于古体,五、七古格调清新,五言近体平易,承转自然。著有《东塘集》二十卷。《宋史翼》卷一四有传。

(王学泰)

【刘应时】 字良佐,号颐庵居士,四明慈溪(今属浙江)人。名儒刘继宽之子,生平经历不详。有《颐庵居士集》二卷。范大成深赏其诗,《闻范至能句祠》有“酷爱新诗成异遇,每于广坐语诸儒”之句。陆游序其诗,举“颇识造物意,长容吾辈闲”、“日晏犹便睡,犬鸣知有人”、“世事不复问,旧书时一看”、“一夜催花雨,数家邻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浊酒不能浇别愁”、“觅句忍饥贫亦乐,钞书得味老何伤”之句,谓为“卓然自得”。盖谓锤炼之极,出以自然,无做作之迹。杨万里亦序其诗,赞其“睡魔正与诗魔战,窗

外一声婆饼焦”信手拈来、颇涉粗犷之句。盖陆、杨作诗,风格不同,欣赏的角度也就不同。全面权衡,其诗“格力稍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仍具有南宋初、中期的气象与规模,在后来的江湖诗人之上。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九二有传。(孔凡礼)

【辛弃疾】(1140—1207) 字幼安,坦夫,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少尝往燕山。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归,为江阴签判。淳熙八年(1181),累官至两浙西路提刑,罢居上饶带湖,始以稼名轩。知福州。宁宗庆元二年(1196),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嘉泰三年(1203),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罢归。卒,恭帝德祐元年(1275),谥忠敏。弃疾之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后村集·辛稼轩集序》),“悲壮激烈”(《宋史》本传),“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词苑萃编》卷四徐钊按语),为宋之大家。弃疾诗,原收《辛稼轩集》,《集》已早佚,残存者仅一百四十一首(内一首残篇)。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云“稼轩落笔凌鲍谢”。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赞其《送别湖南部曲》“悲壮雄迈”,惜其为词所掩,未能为人所知。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格调高雅,曲尽武夷之妙,《感怀示儿辈》、《赵文远见和用韵答之》、《傅岩叟见和用韵答之》、《诸葛元亮见和复用韵答之》则转而为深沉,抒心中郁结。堪称作者。其文“英伟磊落”,“笔势浩荡”(《辛稼轩集序》)。《宋史》卷四〇一有传。(孔凡礼)

【裘万顷】(?—1222) 字元量,自号竹斋,新建(今属江西)人。有孝行,节操学问,一出于正。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宁宗嘉定六年(1213),除吏部架阁。次年,迁大理司直,上疏求任外官,以便奉养,敕旨差为江西抚幹,卒于官。万顷在乡间与胡桐原、万澹庵、徐竹堂往来唱和,称为“四杰”。胡、万、徐三人作品俱佚。裘为江西人,正处于江西派风行之际,而受江西派影响不大。其诗清婉流利,不染江湖风习,多以生活琐事为题材,摭写个人情趣,如《次余仲庸松风阁六首》、《大雪次前韵》、《早作二首》等皆似其同乡前辈杨万里。裘诗中也有些忧国忧民之作,如《老农叹》写幸而丰收,但租税催逼,农民贱价出售稻谷,《不雨》写忧国深情,皆富于感染力。刘克庄对其诗评价颇高,言其诗“若近而远,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远而深者不可能。为人自贵重,耻表曝,惟诗亦然”(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近真。著有《竹斋诗集》三卷,集中附有墓志铭及其传。(王学泰)

【赵蕃】(1143—1229) 字昌甫,一作昌父,号章

泉。其先郑州(今河南新郑)人,徙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以祖荫补州文学。为太和主簿,受知杨万里。调辰州司理参军。奉祠三十三年。理宗宝庆元年(1225),除太社令,不拜。终直秘阁。卒,谥文节。有《乾道稿》、《淳熙稿》、《章泉稿》,赵汝腾为序。方回《桐江集》卷四《跋赵章泉诗》谓宝庆(1225—1227)初得其书,知蕃在世时已刊。《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已云残缺。其后遂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分别厘为二卷、二十卷、五卷,得诗三千七百零四首,文二篇。《聚珍版丛书》本补文二篇,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补诗十六首。蕃与陆游、范成大亦有交往,刘克庄寄诗有“四海诗名主玉山”之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寄赵昌甫》),刘宰谓其诗“不经意而平淡有趣,读者以为有陶靖节之风”(墓表)。方回谓赵蕃“平生恬淡,而诗尚瘦劲,不为晚唐,亦不为江西,隐然以后山为宗”。自是南渡后一重要作者。《宋史》卷四四五有传。(孔凡礼)

【叶适】(1150—1223) 字正则,号水心,永嘉(浙江温州)人。少怀大志,颇以经济自负。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以第二名登进士第,授平江节度推官。丁母忧,屡为外官,士人多从之游。因参知政事龚茂良推荐,召为太学正,迁博士,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多次上书论时政之弊,力主抗金,反对和议。曾官太常博士,湖南转运判官,兵部、工部、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宁宗开禧(1205—1207)北伐失利,官宝文阁待制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金军锋锐。金兵退,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侂冑诛,御史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冑用兵,遂夺职,自后罢废凡十三年。官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卒赠光禄大夫,谥文定。适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提倡“事功之学”,在诗歌创作上不满意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晚唐,特别尊崇唐贾岛、姚合清淡流利,并扶植“永嘉四灵”。其诗多题咏山水胜迹及往来应酬之作,诗多佳句而少佳篇。刘克庄赞其《中塘梅林》二首“兼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后村诗话》),但这样的完篇并不多。今人钱鍾书批评其“诗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宋诗选注》)。著有《习学记言》、《水心集》。《宋史》卷四三四有传。(王学泰)

【张镃】(1153—1221?) 字功甫,亦作功父,又字时可,号约斋,晚年号约斋居士,因卜筑南湖,人又称之以“南湖”。先世居成纪(今甘肃天水),南宋初移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名将张俊之后,以荫受官,为承事郎、宣议郎、奉议郎,直秘阁通判临安。宁宗开

禧(1205—1207)间,为司农少卿。北伐失利,朝中权臣史弥远谋诛韩侂胄以向金人谢罪,镒参与其事,并为谋主,后以此自伐其功,为弥远所忌,贬于湖州,后放还,又密谋除史弥远,事泄,于嘉定四年(1221)谪居象台,卒。张镒长于达官权贵之门,又耽于享乐,周密称其“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齐东野语》)。其诗多写享乐生活,如登临宴饮、园林风光等,如《宿吴江塔院》、《晚晴》、《题六合院》等皆属此类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都清新独造,于萧散之中时见隽永之趣,以视嘈杂者流,可谓翛然自远”,虽评价稍高,但张诗中佳者亦可当此评。张氏在当时诗坛颇享大名,杨万里有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可见镒被视为南宋四大诗人继承人。镒亦工词,善画竹石古木。著有《仕学规范》、《南湖集》。事迹见《宋诗纪事》、《齐东野语》等书。(王学泰)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少怀志节,读书论兵。南宋宁宗时,多次上书朝廷,陈恢复大计,不报。为韩侂胄客。屡试不第,放浪江、浙等地,与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交游。有《龙洲集》。其诗“感时抚事,血泪迸流,精悍之色,非同时江湖诸子所及”(清邵晋涵序)。其《夜思中原》,悲壮慷慨;其《登凌云高处》,气势高亢;其《望幸金陵》直言“天下关中为本根”,“金陵古帝藩”,清人李文藻以为其“义心所激,不知忌讳”;其《登多景楼》,立意深沉;其《送王简卿归天台》二律,辛稼轩赞为“伟甚,真所谓‘横空排硬语,妥帖力排界’”(《归田诗话》)。怀古、写景之作,亦有佳者,如《过泰和宫》“蝴蝶”一联,凄断之语,沁人肝脾,李文藻以为此乃“宋诗最佳者”。清王士禛谓过之诗“叫嚣排突”,至斥为“风雅扫地”(《香祖笔记》),盖其才气“跌宕纵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偶不协于雅言则有之,士禛所论,未免以偏概全。《宋史翼》卷二九有传。(孔凡礼)

【敖陶孙】(1154—1227)字器之,号臞庵,或称臞翁,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领乡荐第一,为太学生。宁宗庆元(1195—1200)初,赵汝愚被韩侂胄排挤罢相,谪守福州,陶孙题诗于三元楼,有“九原若遇韩忠献,休道如今有末孙”,讽刺权相侂胄无其先祖之风,专以排除异己为事。因此为当道所追捕,陶孙微服变姓名,逃回家乡。汝愚被谪死,又赋《甲寅行》以哀之。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历官海门主簿、漳州教授、泉州签判、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终奉议郎,奉祠主管华州西岳庙,卒于乡。陶孙与刘克庄交好,亦属江湖派诗

人。其诗多为关注时政之作,擅长用七言歌行摅写自己对朝政黑暗与腐败的不满,如《次韵冯孔武雪中简闻人簿乞炭》痛斥近臣权贵之误国,《中夜叹》写愤世嫉俗之情,皆淋漓酣畅,情馥于辞。其五古清丽,写情叙事,娓娓动人;近体较差。著有《臞翁诗集》收入《江湖小集》、《两宋名贤小集》及顾修编刻之《南宋群贤小集》中。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臞翁诗集》二卷(收入《江湖后集》)与上述三本不同,补诗八十四首。另有《敖器之诗话》一卷,颇享盛名,书中评论历代诗人,“鉴裁既精,语亦妙俊”(《宋诗话考》),故为人所称道。刘克庄为撰墓志铭,载于《后村大全集》。(王学泰)

【汪莘】(1155—1227)字叔耕,号柳塘,休宁(今属安徽)人。隐居黄山。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间,三上书朝廷,陈述民情及行阵之法,不报。开禧三年(1207),徐谊知建康,欲荐之,未如愿。晚年自号方壶居士。莘原有自编诗稿三编,曰《柳塘集》,至宋末,散失已多,后人搜存之,名《方壶存稿》,凡九卷。又有《方壶先生集》四卷,其诗“造境生而出语险”(《宋百家诗存》)。如《击鼓行》“豺狼闻之脑门裂,狐鼠粉碎臭满穴”;《群玉堂即事》起四句“蓬莱道山到者稀,忽随飙驾同来归。天横阊野望不尽,地绝瀛寰如无依”,道人所未道,然不能出之以自然。诗受李白影响,“源出李白,而天姿高秀不及之,故往往落卢仝蹊径”,然“亦不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亦不乏清新之作,如《三月十九日过松江二绝》、《晚晴即事》。其词亦有名。事迹详《新安文献志》卷八七《汪处士传》。《宋史翼》卷三六有传。

(孔凡礼)

【姜夔】(1155—1221)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寓居武康(今浙江德清)。父姜噩曾任汉阳知县,早年随父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及江淮之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丧父,一度依姊于汉川山阳。淳熙十三年(1186),客居湖南,受到诗人萧德藻之赏识,妻以侄女,约往寓居湖州。次年,由德藻介绍得以结识诗人杨万里。“万里许其文无不工,甚似陆龟蒙,并以诗送往见范成大”(见夏承焘《姜白石系年》)。成大以为姜之人品翰墨皆似晋、宋间雅士,征求其新作。光宗绍熙(1190—1194)初,夔曾客合肥,居赤栏桥西,并恋一女。绍熙间,又曾两度往游,之后写了大量情词。绍熙二年(1191)冬,往谒范成大,为度新曲,撰新词,作《暗香》、《疏影》,成大以歌女小红为赠,除夕返湖州,成十绝句,大雪中过垂虹桥,赋《过垂虹》“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可见其生活情趣。宁宗庆元二年(1196),客无锡,曾谒尤

表论诗。庆元三年,向朝廷上书论雅乐,并进《大乐议》一卷、《琴瑟考古图》一卷,指出当时乐曲、乐器、歌诗的不足之处。宁宗下诏太常寺研讨,为太常寺官吏所嫉,未果。庆元五年,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诏免解可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未第。夔长年居家,中年以后贫困潦倒,后往杭州为张鑑府上清客,居张家十年。鑑去世后,生活无着,就食于嘉兴、金陵等地友朋。嘉泰(1201—1204)末、开禧(1205—1207)初一度依辛弃疾,与之唱和。嘉定十四年(1221),卒于西湖畔,家贫不能治丧,友人吴潜等醵金葬于钱塘门外西马塍。夔一生未仕,除卖字外大都依靠豪门贵官为活,终身清寒,然其文化素养很高,品格狷介,这些在其诗中皆有较充分的表现。其诗以写游食行程及日常生活中点滴感受为主,题材较小,而醇醪有馀味。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过垂虹》、《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平甫见招不欲往》、《三高祠》、《过德清》、《武康丞宅同朴翁咏牵牛》、《昔游》等,皆是其代表作品。其七绝历来为人所推重,清妙秀远,饶有韵味。今人钱鍾书言及其诗云:“他早年学江西派,后来又受了晚唐诗的影响;在一切关于他的诗歌的批评里,也许他的朋友项安世的话比较切近实际:‘古体黄陈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当然在他的近体诗里还遗留着些黄、陈的习气,七律却又受了杨万里的熏陶,而且与其说温、李,也还不如说皮、陆。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宋诗选注》)夔工书法,其词为词坛巨擘。所作《白石老人诗说》在宋人诗话中颇有理论色彩,在诗艺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一生著述可考者约有十二种。传世者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续书谱》等。明张羽等为之作传,今人夏承焘为撰《姜白石系年》。(王学泰)

【曹彦约】(1157—1228)字简甫,亦作简夫,号昌谷。都昌(今属江西)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进士。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主管机宜文字。宁宗时,知隆兴、成都、福州。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迁礼部侍郎。加宝谟阁学士。卒,谥文简。有《昌谷集》传世,存诗三百馀首。彦约通达政体,有识见,鲠直敢言,史称“可与建立事功”。其发之于诗,不乏关心民事、国事之作。其《得雨》首云“跼蹐民无地,焦熬岁不天”,贫困农户急切盼雨之情,跃然纸上;中云“调饷今方尔,捐租恐未然”,哀农户捐租之望,势将落空,得雨亦未能解倒悬之急;末云“古来勋业盛,根本诿沉绵”,向朝廷当权者发出呼声,农乃根本,不可任意榨取。其《闻官军收复新息》,作于宁宗开禧(1205—1207)初,中云“获蔡驰新

捷,收京有定谋”,为收复失地而欢欣鼓舞。其《祁门道中即事》抒写农村景物,格调清新。其诗“稍伤质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锤炼间显不足。《宋史》卷四一〇有传。(孔凡礼)

【李壁】(1159—1222)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又号石林,眉州丹稜(今属四川)人。著名史学家李焘之子,以父荫入仕。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宁宗开禧元年(1205),充贺金生辰使,还言兵未可轻动。开禧二年,上疏请追夺秦桧王爵,以激励复仇雪耻之志。开禧(1205—1207)北伐,以草北伐诏书进权礼部尚书,后拜参知政事。侂胄北伐失败,史弥远谋诛侂胄,壁预闻其事。侂胄诛,兼同知枢密院事,后为御史劾罢。四年后,复除端明殿学士,知遂宁府,平定当地溃兵。寻以疾奉祠,卒谥文懿。壁嗜学如渴,熟于典章制度,能文工诗。刘克庄称赞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并举其佳句如“平生阅世朦胧眼,偏向白鸥飞处明”,“鸦健触翻红荻荻,鸥闲占断碧鳞鳞”(见《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四朝闻见录》载其《使北作》一首:“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河山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颇能反映南宋士人爱国情绪。有《雁湖集》一百卷,已佚。另撰有《王荆公诗注》。《宋史》卷三九八有传。

(王学泰)

【韩泂】(1159—1224)一作韩琥。字仲止,号涧泉。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南渡后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以父元吉荫补官。尝官临安药局,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秩满,归。数年后出,嘉定四年(1211),复归。有《涧泉集》,存诗二千四百馀首。泂与赵蕃(章泉)并称“二泉”。刘克庄《寄韩仲止》言“诗家争欲推盟主”(《后村集》)。方回亦曾称赞其三十五岁所作《探梅》诗已卓有成就(《瀛奎律髓》卷二〇),并以“古淡”评其《涧东临风饮梅花尚未全放一树独佳》(同上,卷二〇),以“老淡”评其《寒食》(卷一〇),以“自然而古峭”评其《雨多极凉冷》诗(卷一七)。然其诗亦有“悲壮激烈”(卷一二对其《风雨中诵潘邠老诗》的评语)者。晚年诗益进,如《探梅》于“瘦淡之中自秾粹”(卷二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其诗“稍不逮其父”。泂尚著有《涧泉日记》。事迹散见《瀛奎律髓》卷一〇《晚春》、卷一二《七月四日》、卷二〇《探梅》注文。(孔凡礼)

【赵师秀】(?—1219)字紫芝,号灵秀,又号天乐,永嘉(今属浙江)人。宋宗室。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任上元主簿。后为筠州推官。晚年宦游,逝于临安。有《清苑斋集》传世,存诗一百三十二首。他在永嘉四灵中学晚

唐诗学得“最熟而有馀味”(《瀛奎律髓》卷四八对其《一真姑》诗的评语),是四灵之冠(同上卷四十七《桃花寺》)。他尊姚合、贾岛为“二妙”,所编《二妙集》选姚诗一百二十一首、贾诗八十一首,以五言为主。又编《众妙集》,选自沈佺期起,共七十六家,无杜甫,而刘长卿诗却多达二十三首,编选宗旨与《二妙集》相似,大约是其补充。长于五言,如《桃花寺》诗“石幽秋鹭上,滩远夜僧闻,汲井连黄叶,登台散白云”四句,清幽淡远,全篇则不能称。其诗大抵如此。他自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后村集·野谷集序》引)其工盖得力于锻炼,其不称或由于才力。其《约客》、《数日》两绝,采用白描,风格清新明净,为名家选本选入。《宋史翼》卷二八有传。

(孔凡礼)

【徐照】(?—1211)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永嘉(今属浙江)人。布衣终身。为永嘉四灵之一,首倡学晚唐贾岛、姚合诗。有《芳兰轩集》传世,存诗二百五十九首。徐照比较熟悉下层社会,其乐府诗《促促词》,对比农民与小吏之子在部伍中的不同待遇,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其《缲丝曲》写缲者之苦;有王建、张籍风。其《畏虎》、《江上翁》分别写老农、老渔无求于人,自有其情趣。其他诗作,大体缘情遣兴,然题材较窄。徐照刻意字句“斲思”(《水心集》卷一七墓志铭),其《山中寄翁卷》有“吟有好怀忘瘦苦”之句。其高者如《题翁卷山居》,“不减晚唐”(《瀛奎律髓》卷二三)。一般情况是:只有佳句而通篇不称,如方回评其《永州寄翁灵舒》,“第六句好,眼前事但道着便新”,评其《寄筠州赵紫芝推官》“三、四好”,评其《山中》“中四句工”,评其《送翁灵舒游边》“第四句新甚”,评其《题钓台》“尾句自来无人道”(《瀛奎律髓》卷四二、二三、三〇、三),盖才力有所不济。《宋史翼》卷二八有传。

(孔凡礼)

【徐玑】(1162—1214)字致中,一字文渊,号灵渊,永嘉(今属浙江)人。为建安主簿;移永州司理;丞龙溪县,为民修水利。移武当令,改长泰令,未赴,卒。有《二薇亭集》传世,存诗一百六十六首。南宋中叶,叶适反对江西派,提倡晚唐贾岛、姚合诗。玑与乡人徐照、翁卷、赵师秀从其说,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为“风骚之至精”(《水心集·徐玑墓志铭》)。四人之号皆有一“灵”字,于是世称四人为永嘉四灵,称四人之诗为“四灵体”。玑诗流连山水之作居多,然亦有《传胡报》、《送太守傅尚书易镇当涂二十韵》多篇切齿胡虏、亟望中兴之作。其《春望》、《大龙湫》、《秋日登玉峰》、《壬戌二月》、《题东山道院》、《过九岭》、《夏日闲坐》、《丹青阁》诸作,格调清新,然终觉浅露。其《新凉》可称为代表作。其《山

居》“近乎烂熟”,其《不食姑》之题即仿唐人,用字亦有“下得不甚好”处(《瀛奎律髓》卷二三、四八)。四灵诗往往如此。《宋史翼》卷二八有传。(孔凡礼)

【黄淑】字致柔。建宁(今福建建瓯北)进士王防妻。嫠居后,族人议欲其再嫁庐陵令,不从,赋《咏竹》诗以见志。诗云:“劲直忠臣节,孤高烈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钟惺《名媛诗归》评云:“语朴而气老。”诗、事见《宋诗纪事》卷八七。

(陈祖美)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永嘉(今属浙江)人。登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乡荐,布衣终身。四灵中最后死。有《苇碧轩集》传世,存诗一百三十八首。刘克庄赞扬翁卷工《文选》体(《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赠翁卷》)。今集中古体诗,如《思远客》、《送刘幾道》、《山中采药》、《酬友人》等,酷似《文选》中的汉、魏五言诗,但局限于摹仿。其近体诗《乡村四月》,宋时,谢枋得已选入《千家诗》,今为传诵名篇。其《野望》亦清新淡远可喜。翁卷为诗极“清苦”(《沧浪诗话》)。其《送陈郎中栋知严州》“官清管钓台”句,锤炼之至,不见痕迹(《瀛奎律髓》卷二四);而《冬日登富览亭》立意学晚唐,着意推敲,然止咏景物的“中四句工”(同上书卷一三)。其诗乏慷慨激昂之作,格调不免卑弱,盖由于视野狭窄,生活贫乏,“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溉其本根”(《升庵诗话》卷九引黄郛山评翁卷语)。总的说来,在四灵中,翁卷的影响次于赵紫芝,高于二徐。《宋史翼》卷二八有传。

(孔凡礼)

【刘宰】(1166—1239)字平国,号漫堂病叟,金坛(今属江苏)人。南宋孝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授江宁尉,下令禁绝巫风,协助帅守赈荒,多所全活。后继为真州司法、泰兴令,为政清明,多惠政,有能吏之名。父丧丁忧归。理宗立,以为籍田令,迁太常丞、知宁国府,皆不就。家居隐处近三十年,奉祠以卒。宰为人刚大正直,明敏仁恕,居乡见义必为,置义仓,创义役,一年三为粥以与饿者,倡生产,毁淫祠,凡有利于乡邦者无不竭其力而为。其一生自奉甚俭,无嗜好,惟好读书。诗亦如其人,许多作品表现出对于民生疾苦的关切,如《鸦去鹊来篇》写土地兼并给农民带来的苦痛,《野犬行》写灾害之惨,《猛虎行》写苛政猛于虎,《运河行》写整治运河应顾及沿途农民之利益,《开禧纪事》写连年灾荒百姓处境之悲惨。这些作品或失之粗糙,或失之冗长,但对百姓的关切、对弱者的同情,确出之于真心。其诗淳古质直,不事藻饰,而自然畅达。著有《漫堂文集》三十六卷。《宋史》卷四〇一有传。

(王学泰)

【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台州黄岩

(今属浙江)人。既长,笃意古、律,与林宪、徐似道游,讲明句法。又见知真德秀。尝登陆游之门学诗。终生布衣,以诗鸣江湖间垂五十年,足迹及梅岭、闽峤、西江、衡岳、江东、北淮、南越、襄汉、舒黄。晚年归隐故乡南屏石屏山下。八十多岁卒。有《石屏诗集》,存诗九百十八首。复古论诗,有“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之句(《论诗十绝》),推崇杜、陈。其《遇淮人问薪黄之变……》、《寄姚楚州》、《频酌淮河水》、《江阴浮远堂》、《盱眙北望》、《闻时事》、《书事》、《闻边事》、《所闻》、《寄虚斋赵侍郎》诸作,“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王桢序),而其平日,则“于广座中口不谈世事”(《瀛奎律髓》卷二〇对其《寄寻梅》的评语)。盖“耿耿寸心”(姚镛序)、“感慨激发”(包恢序),不能不言之。复古“衣食四方”(赵汝谈序),同情民生疾苦。其《织妇叹》揭露南宋时赋税之重;《庚子荐饥》写大灾之年,“杵臼成虚设,蛛丝网釜鬻”,饥民不得不食草木,啸聚山林,而官司赈恤,“不过是文移”;其《嘉熙己亥大旱荒……》其三则揭露官司之残忍,有“人将委沟壑,谁肯发仓廩”句。复古早年受永嘉四灵的影响,学晚唐诗,其诗之内涵和境界,实超出四灵之上,以复古之诗重“实用”,“不专在风云月露间”(王桢序)。然其风云月露间诗,亦不乏佳者。如《江村晚眺二首》、《山村》等,即致思婉巧,饶有馀韵。“在晚唐间而无晚唐之纤陋”(《桐江集》卷四《跋戴石屏诗》)。其“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一联,得之于实境,曲尽其妙,人以为奇对(《归田诗话》)。赵蕃序复古诗,谓复古《思家》用陈师道韵,“全篇似陈”。复古《论诗十绝》有“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之句,赞扬江西派。其晚年诗有江西影响,曾赋《望江南》词自嘲,谓“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欲调停江西、江湖两个流派(见《宋诗选注》),自成一派。《宋史翼》卷二九有传。(孔凡礼)

【苏洵】(1170—?)字召叟,一作赵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苏颂四世孙。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起,拜陆游门下。宁宗庆元元年(1195),随其父入蜀。嘉泰二年(1202),陆游奉召修史,洵有赠诗,时在山阴。嘉定元年(1208),省试,旋出游。嘉定二年,归。尝再入建康幕,以荐得官,沉沦下僚,偃蹇以终。平生交游广泛,往来唱和者多当时名士,除陆游外,还有辛弃疾、刘过、周文璞、赵师秀、葛天民等,与姜夔交情尤深。夔去世后,洵作诗悼念,传诵一时。著有《泠然斋集》。现存诗八百五十余首,今人栾贵明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六首。洵承陆游师教,努力锤炼,其诗益进。其《金陵杂咏》二百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为“出奇无穷”。其《癸亥岁五月

望日……》一诗为民请命,代民立言,谓民为盗贼,乃官府有以致之,民“在在绝粒食”,不得已而为盗贼,今乃“尸诸市”,“恐负天地德”,其识见在同时江湖诗派诸诗人之上。事迹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八。

(孔凡礼)

【赵汝燧】(1172—1246)一作汝燧,字明翁,号野谷,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进士,授馆职。嘉泰二年,辛弃疾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时,汝燧应邀入其幕府。开禧三年(1207),曾官江陵,目睹开禧北伐失败之过程。嘉定(1208—1224)中,分司镇江管榷,官至刑部郎中。汝燧属江湖派诗人,其诗虽以写于游食江湖者为多,也有不少关注现实、忧国忧民之作,如:《耕织叹》二首写农民与蚕户丰收后被公私勒索一空;《翁媪叹》写荒年饥民受官府追逼租赋。这些作品反映出作者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其他如《古剑歌》、《昭君曲》、《荆门行》皆表达了对金人侵略的痛恨和对战争带来苦难的悲悯。刘克庄跋其诗云:“明翁诗兼众体,而又遍行吴、越、百粤之地,眼力益高,笔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顿挫,刳蛟缚虎手也。及敛为五、七言,则又妥帖丽密,若唐人锻炼之作。”(转引自《宋诗纪事》卷八五)清王士禛则“称其五言律时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漫无音节顿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刘、王二人的扬抑未免均失之偏颇。今人钱鍾书言汝燧在“江湖派诗人里算他的才气最豪放;他的古体不但学王建、张籍,也学李白、卢仝,近体不但传‘四灵’的家法,也学杨万里,都很畅快伶俐”(《宋诗选注》)。此评价较实际。也就是说其古体较为沉雄豪放、近体明白爽利。著有《野谷诗稿》六卷。刘克庄为撰墓志铭。《宋元学案补遗》卷七三有其小传。

(王学泰)

【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武学生。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上书请诛韩侂胄,下建宁狱。侂胄诛,上《平戎十策》。于嘉定七年(1214)左右,北归。嘉定十年,登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属。谋去丞相史弥远,下临安狱,被杖死。文集《翠微北征录》,凡十二卷,所收除《平戎十策》外,尚有嘉定元年所作《治安药石》,论抗金复国具体措施。其请诛韩疏,忠愤激越,为宋代难得的好奏疏。其诗大抵抒写爱国怀抱,诉说内心冤苦与人间不平,揭露权奸,痛斥朝廷纳币求和。“脱口豪纵,多破胆险句,锤炼处又极冶衍道丽”,乃“卓然诗人之杰”(清曹庭栋《宋百家诗存》)。今人钱鍾书谓其诗“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宋诗选注》)。华岳尚有词十八首,收入《全宋词补辑》,其中有写得

非常深沉的爱国词。《宋史》卷四五五有传。

(孔凡礼)

【洪咨夔】(1176—1236) 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今浙江临安)人。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进士。授如皋主簿,累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加端明殿学士。卒谥忠文。存诗一千馀首。“他是抨击当时政治黑暗的著名人物,集里常有讽刺官吏、怜悯人民的作品”(钱鍾书《宋诗选注》)。讽刺官吏的代表作是《狐鼠》,其第三、四句“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变成了后世描写贪官污吏、暗无天日的成语。此类作品尚有《促织》,深刻讽刺赋税制度的苛刻。怜悯人民的作品,如《刘后溪和雁湖即事诗十绝见示次韵》、《次韵闵饥》、《酬程嘉定杨汉州见和》,直接反映农民疾苦,接触到农村贫富对立的事实。“他的诗歌是江西派的风格,也受了些杨万里的影响,往往有新巧的比喻”(《宋诗选注》),如《泥溪》“晚花酣晕浅,平水笑窝轻”分别用“酣晕”、“笑窝”比喻晚花和平水。他还善于描写农村景物。其散文、词也均有名,当时尊之为“词宗”(《咸淳临安志》卷六七本传)。《宋史》卷四〇六有传。

(孔凡礼)

【周文璞】字晋仙,号方泉,又号野斋、山楹,阳谷(今属山东)人。少聪慧,以能诗称于宁宗之时。官溧阳丞,为内府守藏史,旋以事去官,游食江湖,足迹遍于两浙、吴中、金陵、巴蜀。苏洵有诗称其为“四海周风子”,可见其为人之放诞。文璞与姜夔、葛天民、韩淲等人交好。晚年卜居于无锡凤皇山,山有方泉,因以为号。周诗虽多写旅途之山光水色,但也有不少关心国事的作品,如《金陵怀古六首》、《戊辰感事二首》、《剑客行》、《感兴七言三首》等都是这类作品。长于七绝。其作品如曹庭栋所说,颇能“刊落醜肥,夭矫秀削”(《宋百家诗存》),似姜夔之小诗,如《山居书事》、《晨起》、《上强寺》、《访梅》、《题钟山》皆为其佳篇。著有《方泉先生诗集》三卷,集中包括诗赋。《宋诗纪事》、《全宋词》中皆有其小传。(王学泰)

【吴泳】字叔永,号鹤林。潼川(今四川三台)人。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理宗绍定五年(1232),除秘书丞。绍定六年,为著作郎。端平元年(1234),为军器少监。端平二年,为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以宝章阁学士知宁国府。进宝章阁学士,知温州,捐租救饥,有善政。知泉州,罢。有《永乐大典》辑本《鹤林集》传世,存诗三百首。吴泳在朝,以正色直言称。其关心人民疾苦、关心国事之情,每形之篇什。其《夫远征》诗叙夫君出征已久而不返,生计艰难,有男儿尚不能充夫丁,然府帖已有其名,将被“抽征”。诗仿杜甫《石壕吏》,而凄苦

亦正同。其《送陈和仲常博倅嘉禾》,云及“浙西数年来,风景非昔时,红蚕不上箔,青麦空生陂”,关怀民瘼之意,跃然纸上。其《祁山歌》首言“祁山之西当太白,战士弯弓抱明月”,又言“明朝探骑前来报,为言敌死秦川道”,抒爱国壮怀。其诗大抵直抒胸臆,锤炼间有不足。《宋史》卷四二三有传。(孔凡礼)

【叶绍翁】字嗣宗,号靖逸,祖籍固始(今属河南),徙居浦城(今属福建),定居龙泉(今属浙江)。曾从叶适学,与真德秀游,其学以朱熹为宗。尝为朝官,其仕履不详,亦曾寄食于贵官,属于江湖诗派。绍翁以悼念岳飞诗,有名于时。《吴礼部诗话》云:“叶靖逸《题岳王墓》诗云:‘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学取鸱夷理钓船。’是诗流传,脍炙人口。”绍翁工于七言绝句,其作品清新活泼,善于以小见大,如《田家三咏》、《夜书所见》、《西湖晚秋》、《嘉兴界》、《西溪》等皆其代表作品。《游园不值》中名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古今传诵不绝。著有《四朝闻见录》、《靖逸小集》。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戴昺】字景明,号东野,黄岩(今属浙江)人。戴复古从孙。少工吟咏,复古称其“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进士。理宗嘉熙三年(1239),授赣州法曹参军。宝祐(1253—1258)中,曾为池州幕僚。昺诗多流连光景、题咏山水之作。复古称其诗“体格纯正,气象和平”与“言语之工”(《石屏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作五言”如“眼明千树底,春入数花中”,“秋床梧叶雨,晓袂竹林风”,“清池涵竹色,老树蚀藤荫”,“草润蛩声滑,松凉鹤梦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动,海云平压雁行低”,“颺柳轻风寒忽暖,催花小雨湿还晴”。格虽不高,而皆清婉可讽,亦颇具石屏家法”。著有《东野农歌集》,存诗百馀首。其传记资料见《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郑清之】(1176—1251) 字德源,初名燮,字文叔,别号安晚,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少从名儒楼钥学,能诗文。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授峡州教授。嘉定十六年,迁国子学录。因参预立理宗有功,授诸王宫小学教授,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理宗绍定元年(1228),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绍定六年,权臣史弥远卒,命清之为右丞相。郑在相位汲引清流,如真德秀、魏了翁、赵汝谈、游似、洪咨夔、李宗勉等,时号“小元祐”。端平二年(1235),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后封申国公、卫国公、越国公,赐第于京师。

淳祐七年(1247),再度入相,政多出其妻及侄孙太原,昏谬贪贿,为人所议。淳祐十一年,以齐国公致仕,卒追封魏郡王,赐谥忠定。清之为人大度,政尚清俭,对于史弥远制造之江湖诗案及所迫害之江湖派诗人采取保护态度,故为江湖诗人所感激,《江湖集》亦收其诗小集,其七绝颇有胜处,善于用常见的事物、浅显的语言以说理。一些小诗颇具禅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今观所作,大都直抒性情,于白居易为近。其《咏梅》、《咏雪》七言歌行二十首,亦颇有可观。”著有《安晚堂集》。《宋史》卷四一四有传。

(王学泰)

【魏了翁】(1178—1237) 字华文,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曾筑室于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学者称为鹤山先生。少聪颖,过目不忘,乡里称为神童。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授金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召为国子学正。次年,改武学博士,权臣韩侂胄欲开边以自固,了翁上书非议,被贬为校书郎出知嘉定府。侂胄丧师辱国,朝廷招收诸贤,了翁丁父忧去职,讲学于白鹤山下。起知汉州,徙眉州、泸州,在蜀为官十七年。入为兵部郎中,累官权工部侍郎。因直言为谏议大夫朱端常所劾,降三官贬居靖州,筑鹤山书院,学者云集。权臣史弥远死,召为礼部尚书,上章论时政十弊,为廷臣所嫉,出为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未几卒,赠太师,谥文靖。了翁为端谨之学者,其诗多为题赠酬酢,其中颇多劝勉之词,不少流于说教,如《送黄宜州寔之郡》等即是此类作品。其少数直摅胸臆之作,或忧国忧民,或愤慨时事,亦颇可称道,如《送安同知丙赴阙》、《李参政壁生日》等。诗风明畅质实,少唱叹之妙。一生著述极富,有《周易要义》、《尚书要义》、《仪礼要义》、《春秋左传要义》、《经外杂钞》、《古今考》、《续古今考》、《正朔考》、《鹤山笔录》、《礼记要义》,以及《鹤山全集》等。《宋史》卷四三七有传。

(王学泰)

【周弼】字伯弼,郢州阳谷(今属山东)人。寓居笠泽。诗人周文璞之子,少时即博闻强记,好吟咏。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间进士,曾任江夏令,历宦吴楚江汉之间近四十年。以诗名闻江湖,其所选《三体唐诗》亦为世所重。其论诗推重三唐,曾云:“言诗而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馀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体制至此始散,僻字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词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见《对床夜语》)其言及诗法,则以许浑体制自励并谆谆诲人。工于七律与七绝,多为留连山水及题咏胜迹之作,如《山居春晚》、《中和节》、

《钓台》、《夜深》、《除夕思归》、《赠野逸》等皆善于发现生活与大自然中情趣,清新工致,无粗犷叫嚣之江湖习气。编有《三体唐诗选》,著有《端平诗集》。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宋诗纪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王学泰)

【杜範】(1182—1245) 字成之,一字成已,号立斋,黄岩(今属浙江)人。朱熹再传弟子。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授金坛尉。嘉定六年,迁大理司直。理宗端平二年(1235),上书言事,揭露当时政治腐败在于君相之私。改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时相,去职。改太常卿,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拜殿中侍御史,上言指责理宗不用其言而超迁其官,是“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失”。出为江东提点刑狱,寻改浙西提点刑狱。嘉熙二年(1238),知宁国府,多有惠政。嘉熙四年,还朝,上书极言内忧外患之剧,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淳祐四年(1244),拜右丞相,深得太学生支持。上“五事”、“十二事”论当时利病,颇为士论所认可。卒赠少傅,谥清献。範为人正直,生平以节俭自持,处富贵如寒素,平日所食,惟葱羹麦饭而已。曾留富客食此,客怒而去。杜贻诗云:“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见《宋百家诗选》)範诗多题咏山川胜迹及友朋往来赠答之作,从中亦可见作者的耿直性格,如《别金坛刘漫塘》四首、《别陈常簿垠二首》、《雁荡》、《归自明远醉中作》、《观水》、《照胆潭》、《寄题芦洲》等。其诗未被时人及后世所重,然颇具风骨,五古、七绝尤有特色。著有《杜清献集》。《宋史》卷四〇七、《南宋书》卷五三皆有传。

(王学泰)

【王遂】(1183—1249) 原字颖叔。少慕战国策士,真德秀勉其志于道,为改字去非。号实斋。金坛(今属江苏)人。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进士。理宗绍定三年(1229),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入朝,拜监察御史,迁右正言,拜殿中侍御史,敢言。迁户部侍郎。出知遂宁、成都、平江、宁国、建宁、隆兴等府。残本明抄本《诗渊》收遂诗八十多首,惜其集不传,公私藏书目录亦未见著录。其代表作为《谢赵庐州送淮白》二首。其第一首立足于淮河南岸,认为“淮源自古贯中州”,说明淮河南北岸、上下游必须统一,对统一充满信心;第二首自淮河北岸立言,抒写淮北人民苦难及思念故国之情。二诗笔调深沉,在南宋爱国诗篇中,实属上乘。他如《读武侯传》,气格雄浑,亦为佳作。刘宰称遂“为文雅健,无世俗浮靡之气,足以名世”。遂有理学著作多种,已佚。《京口耆旧传》卷七、《宋史》卷四一五有传。(孔凡礼)

【岳珂】(1183—1240以后) 字肃之,号亦斋,又号

倦翁、东几，汤阴（今属河南）人。名将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少时随父游宦粤中。南宋宁宗开禧（1205—1207）初，为镇江饷幕庾吏。开禧元年（1205），试南宫，不第，仍归镇江幕。适逢抗金派词人辛弃疾守镇江，与其往来密切，并与刘过交好。开禧北伐，欲与其事，未获准，遂沿运河而北，途中所作诗题为“北征”。开禧三年（1207），权发遣守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宝谟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以恩封邟侯。守嘉兴时，定居于府治之西北金陀坊。珂痛其祖为秦桧所害，为之剖白辨冤，奔走呼号，作《吁天辨诬集》、《天定录》等书，后又编辑岳飞遗著、朝廷命令、札子等，汇为一书，总名《金陀粹编》。珂工诗词，其词多用摭写忠愤，其诗反映的社会生活较为广泛，如《夏旱三首》写农民生活的苦难，《拙妇吟》写“一生苦乐由它人”的贫家妇女的痛苦，其他如抒写对北方故土的怀念以及表达其“忧时一片心”（《玉唾壶》）的诗篇则比比皆是。岳诗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虽时伤浅露，少诗人一唱三叹之致，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传世之诗收入《玉楮集》与《棠湖诗稿》。其著作除《金陀粹编》二十八卷外，还有《金陀续编》三十卷、《愧郾录》、《桎史》等书。其传记资料见《宋诗纪事》、《全宋词》等书。

（王学泰）

【王迈】（1185—1248）字贯之，号臞轩，人称臞轩先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为潭州观察推官。理宗绍定五年（1231），为南外睦宗院教授。端平二年（1235），试学士院，论时弊。通判漳州、赣州。淳祐元年（1241），通判吉州。知邵武军，旋卒。有《臞轩集》，存诗四百餘首。迈诗如其人。其《嘲轻薄》诗，揭轻薄者之恶，“曲尽其情状”（《梅硯诗话》卷中）。他和许多号称有胆量、敢批评的人在诗歌里却表现得颇为“温柔敦厚”不一样，“他在作品里依然保存那股辣性和火劲，处处替人民讲话，不怕得罪上司和同僚”（钱鍾书《宋诗选注》）。其《简同年刁时中俊卿诗》尖锐揭露刁时中这个恶吏施行暴政使“诸邑疲于应付”、民间憔悴不堪的罪恶。其《读渡江诸将传》直言“功高成怨府，权盛是危机”。其《飞雲楼》云“神交故国三千里，目断中原四百州”，盖念念不忘中原失地。《山中读诚斋诗》盛赞杨万里为“太羹”，然他的诗“还是受江湖派的影响居多”（《宋诗选注》）。王迈自是南宋中、末期一重要作者。事迹详《后村集》卷一五二墓志铭、《宋史》卷四二三本传。《莆阳文献传》亦有传。

（孔凡礼）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出生官宦之家，幼秉异质，

日诵万言，为文不属稿，援笔立就。少时即得名于诗坛词场。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以恩补官，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珣幕府，有立功疆场的壮志。嘉定十七年，为建阳县令，因《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句，被谏官李知孝、梁成大诬以讪谤罪，免官，废弃十年。故其《病后访梅九绝》之一自嘲云：“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理宗端平元年（1234），因受丞相郑清之及洪咨夔、真德秀等赏识，被起用。端平二年，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因直言敢谏，受吴昌裔弹劾，再次罢官。寻起知漳州。嘉熙元年（1237），改知袁州。在袁州整顿社会秩序，崇风化，肃纪纲，访故家，礼名贤，因宽得众，颇有政绩。坐言济王事，为御史蒋岷所劾，再度罢归。嘉熙三年，李宗勉为相，荐擢江西提举，改提举广东常平，升转运使，兼提举市舶使，除江东提刑，补信州，为地方官数年，皆有惠泽及民。嘉熙五年，右丞相游似荐召赴临安，受到理宗赏识，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等职。因劾权奸史嵩之十一条大罪，第四次被罢官。郑清之再度入相，克庄四次被起复，除秘阁修撰，福建提刑，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右文殿修撰，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为相，克庄与之有旧，撰写了《贺贾太师复相启》与《再贺平章启》，因而被认为晚节不终。度宗咸淳四年（1268），擢为龙图阁学士，致仕，卒于乡，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克庄工诗善文。其诗除酬赠题咏、流连光景之作外，多描写国家多难、官场黑暗，从中可见作者忧国忧民之情。其《有感》诗云：“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他如《筑城行》、《开壕行》、《运粮行》、《苦寒行》、《军中乐》、《真州北山》、《感昔二首》、《久旱即事》、《读邸报二首》等等也都是“忧时”之作。克庄早年崇尚“永嘉四灵”，学晚唐诸家，自称“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所学对象颇多，除贾岛、姚合外，还有许浑、王建、张籍、李贺等人，中年以后推重陆游“好对偶”与“奇对”本领。写下许多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诗章，但终不能摆脱江湖派浮滑喧嚣之风的影响。许多律诗，用事冗塞，以事典词藻弥补诗意之不足。《宋诗钞》云：“论者谓江西苦于丽而冗，莆阳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对，又能变化而活动。盖虽会众作，而自为一宗者也。”如仅就其对偶言，亦大体公允。克庄在当时文坛影响颇大。“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见林希逸所撰行状），是江湖派中最有成就之诗人。其词豪迈雄健，堪为辛稼轩之后劲。著作极富，有《后村诗集》、《后村词》、《后村诗话》，皆收入《后村大全集》。

编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林希逸为撰《后村先生刘公行状》，洪天锡为撰《后村先生墓志铭》。《宋史翼》卷二九有传。今人张荃为撰《刘后村先生年谱》。

(王学泰)

【许棐】(1194—1249) 字忱父，号梅屋，海盐(今属浙江)人。南宋理宗嘉熙(1237—1240)中，隐居秦溪，未出仕，储书数千卷，植梅屋之四檐，耕读自乐，慕白居易、苏轼为人；室内悬二人像，以事之。为人淡于名利，自云“是今人衣冠，苞着个古人肠肚”(《写真自赞》)。棐亦一度游于江湖，故有“江海归来二十春，闭门为学转辛勤”(《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之句。与陈起交好，属于江湖诗派。其诗多咏物题赠之作，也有少量关注现实的作品，如《泥孩儿》、《戍妇热》、《筑城曲》等。其描写山林闲适生活之作品较佳。曹庭栋言“其诗清俊闲远”，虽揄扬稍过，其佳者与此评相去不远。棐亦工词。著有《梅屋诗稿》、《融春小缀》、《梅屋三稿》、《梅屋四稿》各一卷。《宋史翼》卷三六有传。

(王学泰)

【高翥】字九万，号菊涧，余姚(今属浙江)人。南宋孝宗、光宗间游士，足迹曾至两浙、江淮、湖湘、巴蜀之间，与方岳、刘克庄、方信儒交好，宁宗开禧(1205—1207)年间北伐失败后，函主战派韩侂胄之首求和于金，翥曾为诗表示愤慨。其诗多写其浪迹江湖、飘泊不定之生活，摭写其“秋风倦客千里，夜雨怀人天一方”(《秋夜书怀》)之感受。也有许多篇什涉及时政边事，从诗内所表达的感情，可见诗人的爱国心与正义感，如《丁卯冬送方岩》、《寄方岩》、《自赋》、《老将》、《感怀二首》、《行淮书事》、《郁孤台》等皆属此类。翥长于七律、七绝，亦属江湖派。今人钱鍾书认为“他是‘江湖派’里比较有才情的作者，黄宗羲甚至推重他为‘千年以来’余姚人的‘诗祖’”(《宋诗选注》)。诗风明畅而有情趣，语言平易而见才气。本有《菊涧集》，已佚。《南宋群贤小集》中有《菊涧小集》，其后人高士奇为辑《信天巢遗稿》一卷。其传记资料见《宋诗纪事》、《全宋词》。

(王学泰)

【吴潜】(1196—1262) 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举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镇东军节度判官。理宗绍定四年(1231)，迁尚右郎官，后历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淮西总领，迁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潜反对对金屈辱投降，但亦不主动轻举妄动。端平元年(1234)，任秘阁修撰，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使司。后历官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淮东统领、知镇江府、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等职。淳祐七年(1247)，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次年，罢相。宝祐四年(1256)，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后封为崇国公，判宁国府，拜左丞相，封庆国公、许国公。开庆元年(1259)，蒙古兵渡江攻鄂州，潜表现出反抗侵略、保土卫国的决心。对南宋最高统治者一向苟且偷安的主张深感忧虑，指责当权的章鉴、丁大全、高铸、萧泰来等人的狼狈为奸和推行误国政策。卒为沈炎所论劾，谪建昌军、徙循州安置；卒于贬所。恭帝德祐(1275—1276)初，追复官爵，赠少师。潜工词能诗。其词慷慨激昂，多感慨时事之作。其诗大多已佚，所存者多写由于官场斗争激烈而导致的对仕途的厌倦。如《闻同官会碧沚》、《占春亭即事》二首皆属此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颇平衍，兼多拙句”，“通体浑成者，殆不多见”。吴集已佚，所存《履斋遗集》四卷，系后人所辑。《宋史》卷四一八有传。

(王学泰)

【易士达】《永乐大典》卷二五四〇引《易士达集·题邓氏船斋诗》，亦见明抄本《诗渊》第十九册，云出自“宋易士达《松菊寓言》”，知《易士达集》即《松菊寓言》，其作者为易士达。《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易幼学《松菊寓言》”一部一册，幼学当为士达之号。《全芳备祖》有易士达《杜鹃花》诗；该书刊于理宗宝祐(1253—1258)间，知士达为宋末人。士达有《题〈秋江烟草〉诗卷》。《秋江烟草》乃张弋撰。《宋百家诗存》称弋为“江湖诸子中卓卓者”。士达亦属江湖派。其《后坑茅舍》写田园风光，《山居自道》写山居生活，《滕王阁》、《登拟岘台》、《浯溪》、《育王塔》、《金山寺》写旅游胜概，皆格调清新，富于情趣。《竹林伤田家》“新谷登场腹不饱，新丝出盎身不丝”，伤田家之苦，境界高出同时代一般江湖诗人；然此类作品乃少数。士达所作皆五、七言近体，见于《诗渊》者约七十首，见于残本《永乐大典》者共七十一首。

(孔凡礼)

【方岳】(1199—1262) 字巨山，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幼聪颖，七岁能诗。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进士，后为准东制置使赵葵延置幕府，深得器重。端平(1234—1236)间，蒙古灭金，并向南宋进攻，湖北制置使史嵩之准备妥协，方代赵葵写信责之。嘉熙三年(1239)，史嵩之为相，岳被罢官，闲居四年。淳祐四年(1244)，复出，先为赵葵督视江、淮、京、湖军马行府参议官，后知南康军。此地据鄱阳湖要道，湖广总领贾似道派人在此把持水闸，敲詐民船，对此，方岳予以严惩，从而开罪贾似道，被劾，调知邵武军，不久辞归。程元凤当权，又出知袁州，累迁至吏部侍郎。后以忤权相丁大全罢归。岳精史学，工诗词。其诗以题咏山水、描写田园隐逸生活者

为多,亦有不少摭写不得志的愤懑,如《郑金判取苏黄门图史园囿文章鼓吹之语为韵见贻复康载》八首、《感怀》十首、《春日杂兴》九首皆是此类作品。岳工于七律、七绝,擅长对仗造句。今人钱鍾书云:“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宋诗选注》)著有《重修南北史》、《宗维训录》、《方秋崖先生全集》等。《宋史翼》卷一七有传。(王学泰)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曾应举出仕,长年隐居乡里。南宋理宗绍定(1228—1233)间,因避家乡变乱,出走豫章、浔阳及洞庭、潇湘一带。端平(1234—1236)年间,曾出游吴越,至建康、扬州、吴中临安一带。所著《沧浪诗话》,影响极大,其诗则远不及其论诗主张高妙。所存诗作多写于两次游历之中,以写沿途山水风光为主,如《登豫章城》、《游临江慧力寺》、《楚江晚思》、《和上官伟长芜城晚眺》等皆属此类。亦有一些感慨时事、摭写忧国之情的作品,如《有感》二首、《出塞行》、《塞下》、《三衢邂逅周月船临别赋此》等。其古体诗摹汉魏六朝,近体仿盛唐,但不仅没有作到其所倡导的“玲珑透彻”,而且“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钱鍾书《宋诗选注》)。其诗佳者近于王维、孟浩然,时有清新俊逸之句,如“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访益上人兰若》)、“孤云随马首,风雨隔河关”(《有怀闽风山人》)、“杯行江色里,棹进月明中”(《怀南昌旧游》)、“残云和雁断,新月带潮生”(《江行》)等,颇具禅味。著有《沧浪诗话》、《沧浪吟》。其事迹见今人郭绍虞《宋诗话考》、《沧浪诗话校释》。

(王学泰)

【郑起】(?—1262) 初名震,后更名,字叔起,号菊山,福州连江(今属福建)人。早年游临安,有声。晚年尝主安定、和靖二书院。卒于苏州。起颇多杂著文章,已早佚。诗有《倦游稿》。元初,仇远选其中四十首,曰《清隽集》,冠于其子思肖《所南诗文集》之前,父子合集。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柴志道为序。起与周弼、林希逸同行辈;二人以诗名,切磋交游,自出机杼。晚宋江湖诗人尚近体,其末流遂入于油滑。起之近体,抒情写景,类皆清隽可喜,仇远以“清隽”名其集。但其古体《采桑曲》感叹蚕姑“晴采桑,雨采桑”而“只着麻衣裳”,注意民生疾苦;其《鄂州南楼》气象开阔;《招魂酌翁宾旸》韵律富于变化,哀惻感人;则非“清隽”所能概括。起事迹详柴志道序。

(孔凡礼)

【陈起】字宗之,号陈道人,又号芸居,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宁宗时乡贡第一,或称陈解元。于杭州睦亲坊经营书肆,刊刻大量宋以前重要典籍,刻

诗集尤多,后皆署“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或称“陈宅书籍铺印行、刊行”。起与许多落魄江湖诗人交好,叶茵赠诗云:“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郑斯立《赠陈宗之》云:“昔人耽隐约,屠酤身亦安。矧伊丛古书,枕籍于其间。读书博诗趣,鬻书奉亲欢。君能有此乐,冷淡世所难。……诵君所为诗,刻苦雕肺肝。陶韦淡不俗,郊岛深以艰。君勇欲兼之,日夜吟辛酸。”言其生性淡泊,以写诗刻书为己任,诗风类似陶潜、韦应物、孟郊、贾岛。起常为落魄文士刊诗集,统名《江湖集》,形成江湖诗派。后因诗中有“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句,刺及权相史弥远,被流放,《江湖集》被劈版。经丞相郑清之援救,不久赦还。其诗多以杭州风光及市隐生活为题材,诗风清淡。有《芸居乙稿》。事迹见方回《瀛奎律髓》及江湖诗人所赠诗词。

(王学泰)

【利登】字履道,号碧涧,南城(今属江西)人。家居仙塘,依山结屋,中年以前过隐居读书生活。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江西土寇蜂起,扶母携妹逃难,备尝战乱之苦。其长诗《梅川行》、《盗犯金川境扶持母妹复走兴安有怀》等诗即记其事。淳祐元年(1241),以《礼记》擢进士第,仕至宁都尉。晚年曾为出仕而悔恨,故《临平春日有怀》云:“誓从鹿豕游,乃复叨一第。两年三作别,云雾生马耳。”《至家》诗中亦有“羞逢山友长低面,悔把渔竿不到头”句。登亦属江湖诗派,是此派中较为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人,如《野农谣》写封建时代地方官吏“劝农”之残农、害农实质,《田父怨》写丰收后农夫偿却公私税债之后了无餘裕,只好“贩山烧炭过残冬”。这些作品皆写得平易质朴,却有其感人力量。长于古体,善用白描手法写景抒怀,如《野烧》写燎原火势,形象生动,并用长短错落之句法以突出其不可向迤之气势。著有《跛稿》一卷。生平传记散见于《宋诗纪事》与《全宋词》。

(王学泰)

【吴惟信】字仲孚,号菊潭,雪川(今浙江湖州)人,客居嘉定(今上海市)白鹤村。江湖游士,尝奔走于权相史弥远之门,与其子史宅之交好。《齐东野语》记,理宗宝庆(1225—1227)间史弥远疑《江湖集》中有诗讽刺自己,遂劈其版,江湖游士以诗为讳者两年。后因史宅之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诗禁遂解,诗道复昌。惟信有诗名于时,吴中老儒称其为“谪仙人”。与江湖诗人施枢交好,施与其唱和酬赠之诗近十首。惟信工于七律、七绝,萧散清润,无江湖游士肤廓粗浮之习。《自序》、《谋生》、《立春日即事》、《春闺怨》、《湖上雨吟》、《苏堤清明即事》、《伤春》、《赠别上官良吏》、《秋夕》、《野望》等是

其代表作品。其七绝颇有韵味,虽存诗不多,亦足珍视。著有《菊潭诗集》,其传记资料散见《宋诗纪事》、《齐东野语》等书。(王学泰)

【罗与之】字与甫,一字北涯,号雪坡,螺川(今江西吉安)人。生活于南宋后期。理宗端平(1234—1236年)间累举不第,其《下第西归》云:“抛却银袍制芰荷,春风一曲紫芝歌。古来至宝多横道,何事荆山泣卞和。”遂归隐。晚年潜心于性命之学,尝作《谈道》、《卫生》诸诗,为后世称为“悟道”之语。其晚年似亦曾游历,足迹至武昌、潇湘一带。与之属江湖派诗人。其集亦入《江湖集》。刘克庄对其诗评价颇高。诗多为浪迹江湖之作,写客居行旅之落寞情怀。如《玉梁道中杂咏》十首、《绝知》、《江行阻风小市》、《客里》、《客行》、《潇湘道中》等皆是此类作品。诗风明畅平易,特别是五言绝句,如《寄衣曲》、《山居闲思》、《商歌》三首颇似古乐府。今人钱锺书言其“简练精悍,颇有孟郊、曹邨的风味,同辈很少赶得上的”(《宋诗选注》)。著有《雪坡小稿》二卷。其生平资料见《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毛珝】字元白,号吾竹,三衢(今浙江衢州)人。屡举不第,有“几踏槐花角寸长,担簦羞作老来忙”(《和张海深》)之句。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间有诗名,端平元年(1234年)前后,在江右、江左一带游历,曾寓兴国、丹阳、仪真、苏州一带,并一度到江淮前线,写下《边月》、《海陵之堡城三首》等,反映了当时蒙古与南宋暂时相安无事的太平景象。淳祐九年(1249年),再度客淮,所写《己酉客淮》即有“烽燧春尤急”之句。珝诗虽亦多写于旅途客居,以摭写客情况为主,但也有些忧国忧民之作,如:《吴门田家十咏》承继范成大《田园杂兴》之传统,写当地农民之苦乐;《丹阳馆》、《甲午江行》等皆写北方“旧仇”金亡后,孕育着更大的隐忧。珝属江湖诗派。其诗清深雅正,李贽云:“毛元白诗人之秀者也,通今达古,著蔡后生。采诗之家,得其一二,如宝肆中犀璧混于螺贝。”(《吾竹诗序》)著有《吾竹小稿》一卷。其传记资料杂见《宋诗纪事》,李贽《吾竹诗序》。(王学泰)

【赵希蓬】一作希逢。宗室,属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房。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以从事郎为汀州司理。次年,丁忧。见《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三引《临汀志》。与华岳合撰《华赵二先生南征录》,华唱赵和。明抄本《诗渊》各册存希蓬诗约一百七十首。益以《后村千家诗》所选,约一百八十首。希蓬之作,虽云次韵,然意自己出,无次韵之迹。华岳得罪韩侂胄,贬于建宁;希蓬赋“休言抱道更怀才,大叫天门云欲排”(《和头巾》),鸣其冤苦,认为华岳之贬,乃“孤忠自莫胜群器”(《和谢忤判院惠米》),盛赞其

节概。钱锺书评华岳的诗“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宋诗选注》),希蓬的诗也如此。《诗渊》尚有希蓬和华岳词十九首,已收《全宋词补辑》。其和《满江红》“庙社如今”一词,盛赞华岳为“为国家子细计安危”的爱国志士,痛斥南宋统治集团“甘心修心,无心逐北”的投降行径。慷慨陈辞,撼人心魄。在南宋爱国词作中,实属上乘。其生平资料见《宋诗纪事》及其本集。(孔凡礼)

【于石】字介翁,号紫岩,一号两溪,兰溪(今属浙江)人。早年曾从著名儒者王瀚学辞赋。瀚为吕祖谦、朱熹弟子,使石得以闻先贤故老之余论。瀚卒于嘉定四年(1211),是宋亡时石已至耄耋之年。金履祥为于集作序,言宋亡时其年三十,当有误。为人貌古气刚,喜诙谐,知识广博,通诸子百家之学。宋亡后,高隐不出,专意从事诗歌创作,豪宕激发,气骨苍劲,望而知为山林旷士。所存诗多为中年以后之作,许多作品反映了战乱和统治者的过度盘剥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邻叟言》、《路旁女》等。有些还表达了对亡宋的悼念以及对恢复故国的期待;这类作品有《感兴》、《述怀》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古诗感时伤事者,多哀厉之音”,其律诗则多“游览闲适”之作,如《半山亭》、《春事》等等,“有清迥之致”。胡应麟称赞其诗“新拔,多奇句”(见《诗薮》)。然其古、近体皆伤于浅易,缺少持久的感染力量,其诗中有写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者,知其享年必在八九十岁之间。撰有《紫岩诗选》。《宋史翼》卷三五有传。(王学泰)

【乐雷发】字声远,晚年自号雪矶,宁远(今属湖南)人。少颖悟,长诗赋,累举不第。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其弟子姚勉状元及第,上疏欲以科名让其师;理宗亲自召对廷试,面试八事,称旨,赐特科状元及第。当时北兵大起,西北多虞,上书数议时政,不被重视,遂辞朝归隐,以吟钓自适。雷发关心时政,其作品多为时事而发,如《乌乌歌》、《次韵李监丞日夕闵雨》、《罪言》、《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时事》、《逃户》等诗中皆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乐诗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读系年录》诸篇,尚有杜牧、许浑遗意。即《秋日村落》绝句‘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之类。虽涉纤仄,亦无俗韵也。”今人钱锺书称其诗“比较有雄伟的风格和激昂的情调”(《宋诗选注》)。所论皆较切合实际。著有《雪矶丛稿》。其生平资料见《宋诗纪事》及其本集。(王学泰)

【林希逸】字肃翁,一字渊翁,号竹溪,一号虞斋,

福清(今属福建)人。善书能画,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初为平海军节度推官,后历官国子监学录、秘书省正字、校书郎。郑清之为相,屡荐希逸,理宗谕令上封事,希逸耻于自鬻。迁枢密院编修官,因不满史宅之括田,出知兴化军。景定(1260—1264)间,累迁司农少卿,直舍人院兼礼部郎官。度宗咸淳四年(1268),擢秘书少监。明年,除翰林权直,迁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官终秘书监。希逸以道学名世,而因曾上启权相贾似道,极口称誉,至以赵普、文彦博喻之,为上论所讥。与刘克庄交好,特别是在晚年,二人诗词往来极多。克庄言其诗文于“槁干中含华滋、萧散中藏严密,窘狭中见纾馀”(转引自《宋诗纪事》)。林诗以应酬题赠之作为多。其佳者如《题达摩渡芦图》、《题马和之觅句图》,亦尚可读,但终失之粗疏,缺少韵味,著述颇丰,有《易讲》、《春秋正附篇》、《老子口义》、《庄子口义》、《列子口义》、《考工记解》、《竹溪稿》、《虞斋续集》等。其生平资料见《宋元学案》、《宋诗纪事》及《福建省志》。

(王学泰)

【薛嵎】(1212—1272以后)字仲止,一字宾日,号云泉,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学宗永嘉学派之叶适,以治《尚书》有名。屡试不第。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始以第五甲三十八名中进士。官终长溪主簿。其足迹不出两浙之间,晚年隐居于范湾。嵎为长期生活在乡间之寒士,诗学以孟郊、贾岛为师的永嘉四灵,但较四灵平易,诗作内容以两浙的山水风光与不得已而处于隐逸的清寒生活为主,如《湖上别业四咏》、《渔村》、《山居述怀》、《闲居杂兴十首》、《渔父杂句十首》等,颇能代表其作品之内容与风格。其诗清新工切,在永嘉诗中尚属有成就者。南宋赵汝回评其人与其诗时云:“薛君仲止以诗名于时,本用唐体,而物与理称,更成一家。其人萧散之际,自有绳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靖不求,本于天性,未易以矫揉学者。虽其诗未足以尽其人,然必有是人而后有是诗,读者当自得于言语之外云。”(见《云泉诗序》)。撰有《云泉诗》一卷,生平资料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诗纪事》等。

(王学泰)

【张埴】字养直,号卢滨(泸滨),吉水(今属江西)人。少孤贫,笃志力学。尝游湖湘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赵葵为江东西宣抚使,以埴为天下奇才,欲荐于朝,埴不就。埴早岁即有诗名,其《书后村诗卷》云:“我看后村诗,未许后生到。油然真意兴,流出好怀抱。”其诗深受刘克庄影响,出之以真性情。往往随手拈来,得自然之趣,如《寄樊上友人》“桃红杨柳绿,莺歌蝴蝶舞。春风吹野水,饮客如渴虎”。

或则反复锤炼,抒心中郁结,如《三用韵谢士安》中二联:“北海无风鹏不运,南山有雨豹能文。更令此手曾扶日,未必吾冠不切云。”他之所以不为官,尚有苦衷在。或作豪语,如《答客》“夜尽莫吟奇险句,恐惊明月堕波寒”(见光绪《吉水县志·张埴传》),出之以奇气。诗格虽不甚高,自是宋末一作者。《永乐大典》有引自《张泸滨集》诗十五首,《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埴《泸滨性情集》一册,《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埴《泸滨集》(一作《泸滨性情集》)五卷,已佚。《诗渊》录埴《性情集》(或作《情性集》)诗约九十首。事迹见清光绪《吉水县志》卷二七《张埴传》。

(孔凡礼)

【董嗣杲】字德明,号靖传,杭州(今属浙江)人。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榷茶九江富池。为武康令。度宗咸淳十年(1274),任满。宋亡,隐于黄冠,改名思学,字无益,号老君山人。嗣杲有《西湖百咏》二卷,附明陈贽和韵,收入《四库全书》。《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嗣杲《庐山集》,谓“一部五册,残缺”。其书久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五卷,收诗三百七十二首,然遗漏颇多;今人栾贵明复检《永乐大典》残卷,得二十首,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四库全书》复辑出嗣杲《英溪集》一卷,计诗七十四首;栾贵明亦自《永乐大典》辑补六首。影印明抄本《诗渊》各册尚有引自嗣杲《百花诗》数十首;栾贵明自《永乐大典》辑补二首。此外,《永乐大典》尚有嗣杲二诗,未著书名。前后合计,嗣杲今存诗共五百多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嗣杲诗属江湖派,“然吐属新颖,无鄙俚琐碎之态”,“诗格颇工整”。自是宋末一作者。事迹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孔凡礼)

【家铉翁】(1213—?)自号则堂。眉州(今属四川)人。以荫补官。累官知常州。迁浙东提点刑狱。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知绍兴府,为浙东安抚。恭帝德祐元年(1275),知临安府,为浙西安抚。德祐二年正月,赐进士出身,除签书枢密院事。元兵次临安近郊,奉使元营,被俘至燕,不仕元。居河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文天祥被俘赴燕途中见之,赞以“丹心贯碧霄”(《指南后录》)。至元三十一年,放还。又数年卒。有《则堂集》传世,存诗九十九首。其诗大半作于河间。其《和归去来辞》“哀天宝之末造,世日降而日非”,悲咸淳、德祐往事。其《朱儒叔……往长安省幕》勉儒叔入蜀,乡人故老问及,“为言仗节瀛海上,齿发衰谢气如虹”,其心可鉴,其气浩然。其《寄江南故人》:“曾向钱塘住,闻鹃忆蜀乡。不知今夕梦,到蜀到钱唐?”故国情深,堪称宋遗民爱国诗代表作。《宋史》传四二一及《宋季忠义录》卷一

○有传。

(孔凡礼)

【俞德邻】(?—1293) 字宗大,号佩韦,又号大玉山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徙居丹徒(今江苏镇江)。性孝友,乐施与,博学多闻。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进士。以文章负世重望,学宗永嘉学派,长于经史。元兵侵入,曾被劫为人质,不屈,卒全其身以归。入元,行省交辟,皆不就,晚年优游山林以终。德邻工诗。其诗多写沧桑之感与闲适之情。《秋日客中》、《书斋》、《过钓台》、《姑苏有赠》皆可视作其代表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德邻诗恬淡夷犹,自然深远,在宋末诸人之中,特为高雅。”著有《佩韦斋辑闻》四卷,《佩韦斋文集》十六卷。其传记资料见《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陈允平】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奉化(今属浙江)人。试上舍,不遇。南宋恭帝德祐(1275—1276)期间,曾任沿海制置司参议官。帝昀祥兴元年(1278),为仇家所告发,言其致书约南宋都统苏刘义,期于九月以兵船下庆元,自己愿为内应。元军统帅张弘範遣招讨使王世强拘捕,备受拷掠,后经同官袁洪解释得释。入元后,以人才征至大都,未受官,被放还。纵情山水,往来吴淞淮泗间,不知所终。允平工诗善词,与张炎、周密、王沂孙等人作词友,与翁元龙等齐名。其诗多为徜徉山水的写景之作,亦有少量关注现实作品,如《鄂王墓》、《雪》等。诗中较突出者为其组诗《香奁体》。写艳情诗,在宋代已不多见,而此组诗又以五律写成(按“香奁多用七律或七绝写成”),则更为罕见。诗以典雅精致见长,但也有不少疏落平易带有江湖诗风的作品。著有诗集《西麓诗稿》、词集《日湖渔唱》、《西麓继周集》。存诗八十馀首。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宋元学案》、《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龚开】(1222—1307) 字圣予,或作圣与;号翠岩,又号龟城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南宋理宗景定(1260—1264)间,曾官两淮制置司监官,与陆秀夫同在抗元名将李庭芝幕中。宋亡,居吴,深隐不出。家贫甚,坐无几席,作画时令其子龚浚俯伏,以背为几,铺纸运笔,而其作品颇有神韵,以鬻画为生,画可当数十金。在吴时,与书法家龚璘为忘年交,对其颇有提携,人称“楚两龚”,以比汉之两龚。开善画马,山水人物亦佳。汤垕《画鉴》称其画马师唐曹霸,得神骏之意,人物师唐曹霸与韩幹,山水师宋米元晖。龚诗多题画与歌咏山水之作,不少篇什寄托了故国之思与沧桑之感,如《黑马图》、《瘦马图》、《自题山中出游图》、《自题山水画卷》、《高马小儿图》皆其代表作品。其诗风格清峻古雅,于缤纷之辞藻中颇见气骨。所作《宋江三十六赞》是士大夫对于梁山

聚义的较早记载,其中称宋江为“盗贼之圣”,对后来《水浒传》之形成颇有影响。著有《龟城叟集》。传世之画有《瘦马图》、《中山出游图》等。《宋史翼》卷三五有传。

(王学泰)

【萧立之】(1222—?) 一名立等,字斯立,自号冰崖,宁都(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进士。知南城县,调南昌推官,移判辰州。包恢尝以著述之科荐,不应。宋末,元兵南下,国事急,尝入勤王兵中以卫国。宋亡,归隐萧田。有《萧冰崖诗集拾遗》传世。其《请兵道中作》“申包胥有伤时泪,南霁云无食肉心”,《春晴试笔》“钟虞尘深唐九庙,金铜泪尽汉中天”,抒写国破家亡之际的内心悲痛。其《又和》“门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见番书”,鄙夷、憎恶元代统治者之情,跃然纸上。其《春寒叹》“深山处处人夷齐,锄荒饭蕨填朝饥”,“今年有田谁力种,恃牛为命牛亦冻”,深刻揭露在元人统治下人民遭受的苦难。立之善于描写景物,如《第四桥》“一江秋色无人管,柔艸风前语夜深”,溶前人语句,超出前人。元人韦居安《梅磻诗话》赞其《秋日》、《琵琶亭》、《咏秦》、《咏疑冢》“有新意”。杨慎《升庵诗话》赞其《落梅》“工致似李义山”,“不类晚宋”。今人钱鍾书则谓“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超过了谢翱和真山民。事迹杂见《萧冰崖诗集拾遗》附录题跋文字。(孔凡礼)

【谢枋得】(1226—1289) 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宝祐五年,为建宁府教授。开庆元年(1259),赵葵宣抚江东,辟为属。景定五年(1264),校文江东,发策,摘贾似道政事为问,得罪,谪兴国军。度宗咸淳三年(1267),放归,以史馆召,不赴。恭帝德祐元年(1275),任江西招谕使,知信州。德祐二年,元兵入信,变姓名奔建阳。妻李氏为元兵所执,不屈死。弟侄多人殉难。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十四年,元人欲起用枋得,辞。至元二十五年九月,元参政魏天祐执之北去。次年四月,至燕,不食死。有《叠山集》。枋得忠肝义胆,高名峻节,为世所称,诗乃其写照。其《初到建宁赋诗一首》,李养吾以为“与《西山》、《易水》之歌当并行”(《读叠山北行诗后》)。其《谢刘纯父惠木绵布》有“三宫坐穹庐,雨雪或十旬,安得遗此惠,飞到君王身”诸语,念及太皇太后谢氏、恭帝显在北方遭受磨难,令人欷歔。其文章“博大昌明,具有法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史》卷四二五有传。(孔凡礼)

【金履祥】(1232—1303) 初名祥,入学后更名开祥,后又改名履祥,字吉父,或作吉甫,号仁山,兰溪(今属浙江)人。少时颖悟,于书无所不窥,其学遍及

天文、地理、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诸领域。及壮,师事同郡之名儒王柏,又从何基游,专攻濂洛之学,颇有成就。南宋恭帝德祐(1275—1276)初,召以史馆编修,未及用而宋亡。入元,无仕进意,隐居于金华山中,著书立说以教授弟子为生。晚年讲学于丽泽书院,元代及明初金华学派之名儒多出其门。履祥能诗文,其诗学北宋邵雍,仿佛“击壤”之一肢一节。并编《濂洛风雅》,专收两宋道学家之诗,仿照《江西诗社宗派图》作《濂洛诗派图》,将道学家作品独标一体,颇为历来论者所訾议。履祥诗多说理论道之作,而较之《击壤集》中佳作,相去远甚。只有一些写景和抒发个人情感之作,稍有韵味,如《箕子操》、《小龙门》等。著有《通鉴前编》、《大学指义》、《尚书表注》、《论孟集注考证》等。诗文收入《仁山集》,柳贯为作《行状》。《宋季忠义录》卷一、二有传,《元史》卷一八九亦有传。(王学泰)

【周密】(1232—1298) 字公瑾,号草窗、蘋洲、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晚年流寓吴兴弁山,又号弁阳老人,弁阳啸翁等。祖籍济南(今属山东),曾祖周秘随高宗南渡,始居吴兴(今属浙江)。少时从父宦游闽浙,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在临安和剂药局任职。度宗咸淳元年(1265),为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咸淳十年,任丰储仓检察。端宗景炎元年(1276),曾任义乌县令。次年,因“兵火破家”遂寄寓杭州,以著述为事,与张炎、王沂孙、仇远、唐珏等结社填词,分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以寄托亡国哀思,编为《乐府补题》。又编选《绝妙好词》,所选之词大多格律严谨,注重字法句法。词谱亡佚后,此编可作为了解宋词格律音韵之依据。晚年结识爱国志士邓牧、谢翱等,相与往还唱和。密长于词,亦工诗。所存诗篇多写于宋亡之前。其内容以写四时景色与山水风光者为多,如《送西秦张仲实游大涤洞天》、《夜归》、《西陵秋日即事》、《西太乙宫》、《题温日观葡萄》皆属此类作品。钱鍾书谓其诗“学晚唐体,在一般江湖派所效法的晚唐人以外,又搀进了些李贺、杜牧的风格。诗里的意境字句常常很纤涩,例如‘喷天狂雨浣香尽,绿填红阙春无痕’,像李贺的诗,更像吴文英的词”;并谓其诗“更使人想到精细的盆景”(《宋诗选注》)。所论较为中肯,道中周密诗风来源及其特征。其诗存于《草窗韵语》六卷,所收皆宋亡以前作品。另有词集《蘋洲渔笛谱》、《草窗词》。著有笔记数种:《武林旧事》十卷、《齐东野语》二十卷、《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别集二卷、《浩然斋雅谈》三卷、《云烟过眼录》四卷、《志雅斋杂钞》一卷、《澄怀录》二卷等。《宋史翼》卷三四有传。今人夏承焘为撰《周草窗年谱》。(王学泰)

【刘辰翁】(1232—1297) 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时就学于大儒陆九渊之门,曾补太学生。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应进士考试,廷试对策,因言:“济邸无后可恊,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憾”,忤权奸贾似道,欲黜之。理宗赏之,置丙等,后因亲老须奉养,请为濂溪书院山长。度宗咸淳元年(1265),任临安府学教授。咸淳四年,江东转运使江万里辟为幕僚。恭帝德祐元年(1275),授太学博士,因元军犯境,道途阻隔,未就任。宋亡,隐居不仕,埋头著述,游于方外与一些爱国志士如邓剡等往来甚密切。辰翁词胜于诗,但两者内容大体相近,以写国破家亡的沧桑之感为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辰翁“于宗邦沦覆之后,睚眦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两者不同的是:词表达较为委曲隐晦,而诗则较为明快直接,如《送李鹤田入浙赴赵春谷招》一诗,直是长歌当哭,诉说了在异族统治下“天下南北车书通”给南宋士人们带来的痛楚。《宣和双蟹图》用浅白的语言指斥宋徽宗玩物丧志,误国害民。辰翁还有大量描写四时景物风光之作,编为《四景诗集》四卷,每诗皆以四时写景之句命题,凡一百五十一题,诗一百六十七首。诗学晚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于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自蒙庄,故恹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此评虽不免过甚,但却亦道中其弊。辰翁亦染江湖习气,其诗格律建构、遣词造句,多失之粗,不够含蓄。著有《须溪集》、《班马异同评》、《须溪记钞》,编选了《放翁诗选》。评点过杜甫、王维、李贺等人诗集。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宋元学案》、《宋诗纪事》等书。《宋史翼》卷三五有传。(王学泰)

【文天祥】(1236—1283) 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及第第一。开庆元年(1259),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景定二年(1261),为秘书省正字。景定三年,进校书郎。景定四年,除著作佐郎,旋权刑部郎官,差知瑞州。景定五年,除礼部郎官。度宗咸淳元年(1265),为江西提刑。咸淳三年,除尚书左司郎官。咸淳四年,兼权直学士院。咸淳五年,知宁国府。咸淳六年,除军器监,兼右司,旋除秘书少监。咸淳九年,除湖南提刑。次年,知赣州。恭帝德祐元年(1275),起兵勤王,为浙西江东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抚大使。德祐二年正月,元兵至杭郊,除右丞相兼枢密使,诣北军讲解,北留不遣。寻逃归,四月,至温州。五月,端宗即位于福安,授右丞相、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端宗景炎二年(1277),

转战福建、江西、湖南北。景炎三年,转战广东,十二月,被俘。帝昺祥兴元年(1279)二月,厓山兵败,宋亡。三月,元人押赴北,十月至燕,被囚。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就义。天祥德祐之变以前的前期诗作,收在《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卷二,计二百四十首,其赠相士、日者之诗竟达四十首,应酬之作占的比例过大,像《登双溪阁》、《题吴城山》这样经过锤炼的力作比较少。德祐之变以后的后期诗作,见于《全集》的《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者,共三百多首,与前期“格力相去殊远”,盖“志益愤而气益壮”(《宋诗钞》)。五古如《正气歌》,五律如《南安军》、《安庆府》、《除夜》,七律如《过零丁洋》、《金陵驿》,七绝如《扬子江》,皆为感人至深的名篇。这一时期诗,“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钱鍾书《宋诗选注》)。其集杜诗二百首,作于狱中,“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且“裁割熔铸,巧合自然”(《宋诗钞》),足见功力之深。存词仅数首,“风骨甚高,亦有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宋史》卷四一八有传。(孔凡礼)

【舒岳祥】(1236—1301) 字舜侯,一字景薛,又字东野。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为奉化尉,仕终承直郎。宋亡不仕,避地奉化,与戴表元友善。读书阆风台,人称阆风先生。卒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有《阆风集》传世,存诗八百余首。岳祥少时有文名。王应麟序其集,谓“言语妙天下”。因久居乡间,熟悉农家疾苦、欢乐。其《十妇词》云:“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菜菔似羔肥。囊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情趣盎然。其《秋夜》云:“院静泉声合,夜深虫语多。近窗移素榻,敲枕见星河。”《十月初三日自邑夜归》云:“北风茅店晚炊迟,吠犬声中踏黑归。溪上人家应夜绩,松明一点出疏篱。”自抒性情,“不事雕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胡长孺序其集,谓“其诗韩子苍、陆务观不足高也”,难免溢美,然岳祥自是宋遗民诗人中一作者。《宋史翼》卷二九有传。(孔凡礼)

【方凤】(1240—1321) 一名景山,字韶卿,或作韶父,号存雅,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幼有才学,曾游临安,结交皆一时名士。试太学、举礼部不中,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学。宋亡,隐居于浦江东北仙华山之阳,与世隔绝。元朝稳定后出游两浙,又北至金陵京口,南过东瓯海上。多与宋遗民相往还,与谢翱、吴思齐、吴渭等人交友,相与结“月泉吟社”。该社曾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征集《春日田园杂兴诗》,由凤与谢翱负责铨定名次。凤与诸遗民以诗唱和,慷慨悲歌,使浦江诗风为之一变。至元二十六年,凤与谢翱编撰《金华游录》,只书甲子,不书年号,翱卒于杭州,凤千里赴丧,并将其遗骨葬于严子陵钓台之南。临终,命其子樗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凤眷怀故国,坚持民族气节,其诗感慨悲凉多黍离麦秀之感,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泽畔行吟,往往眷念宗邦,不忘忠爱……幽忧悲思,缠绵悱恻,虽亡国之音,固犹不失风人之义。”如《北山道中》、《哭陆秀夫》、《仙华山》、《故宫怨》、《东瓯雪中山茶盛开》等等,皆属此类作品。撰有《野服考》、《存雅堂遗稿》。柳贯为撰墓碣铭。《浦江人物记》下卷,《宋史翼》卷三五皆有传。(王学泰)

【郑思肖】(1241—1318) 字忆翁,号所南。其名为宋亡后所改,意为思赵,其字、号亦皆寓怀念前朝之意。福州连江(今属福建)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南下,思肖上书朝廷,忤当路,不报。居吴,终身不娶。有《心史》,收诗约二百五十首。其《咸淳集》作于宋未亡时,所收《逢陈宜之》诗中有“近闻边事急,畎亩得无忧”句,其基调为“忧”字。其《大义集》、《中兴集》历叙家国倾亡,激励恢复,“砺”字诗达四十首,盛赞忠义,痛斥权奸及失节者,慷慨悲愤,字字血泪。又有《所南诗文集》,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刊于其父起《清隽集》之后;其《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收诗一百二十首,咏怀古人,《尧民击壤图》隐寓怀念故国深情,有关屈原、苏武、诸葛亮、陶潜各章则颂其爱国高节,与《心史》诗相通;其《锦钱馥笑》二十四首,写居吴生活,“皆白话诗,饶有风趣”(张元济《清隽集跋》),然风趣中有激愤;文八篇,约作于晚年。洪武《苏州府志》有传。(孔凡礼)

【汪元量】(1241—?) 字大有,号水云、楚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时尝入宫中。稍长,入宫给事,并习书史。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初,以词章给事宫掖,并以琴事皇太后谢氏及王昭仪。咸淳中末期,尝与柴望游会稽越王台,曾入太学。恭帝德祐二年(1276)春,元兵入杭,以太皇太后谢氏北去,元量随行;秋初,抵大都。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奉元命祀岳渎。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俘至大都。元量多次慰天祥于囚所。天祥就义后,尝与宋三官出居庸关至上都,复至居延、天山。后以黄冠南归。南归后,曾结诗社于杭州。尝游湘、蜀,数往来匡庐、彭蠡之间。约卒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后不久。有《增订湖山类稿》行世,存诗四百八十首,咸淳中期所作《题王导像》感叹江左半壁,欲洒新亭之泪;德祐

元年所作《贾魏公出师》三诗写鲁港败北,直斥贾似道。德祐二年剧变,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悉叹之状,备见于诗”,遂为“宋亡之诗史”(李珣《书汪水雲诗后》)。其《醉歌》十首,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斥太皇太后谢氏率先屈膝元人,满腔悲愤。其《越州歌》二十首,描述元兵入杭,“三十六宫随辇去”,东南半壁遭受蹂躏,悲歌当哭。其《湖州歌》九十八首,依次记述元兵入杭,宋室投降及“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此三组诗乃元量诗史代表作,其深度、广度,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诗,所述之事,往往可补史籍。元量南归后所作《钱塘》、《兴元府》写“平芜古路人烟绝”、“官吏不仁多酷虐”,亦可以诗史视之。元量师法杜甫,于颠沛困顿中,领悟杜诗“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元量诗有其特有的苍凉与悲愤,如《黄金台和吴实堂韵》、《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浮丘道人招魂歌》等。事迹详《增订湖山类稿》附录《汪元量事迹纪年》。《南宋书》卷六二有传。

(孔凡礼)

【韩希孟】(1242—1259) 名不详,希孟为字。巴陵人。宋名相韩琦五世女孙,襄阳尚书之子贾琼之妻。少明慧,知书。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元兵南侵至岳阳,十八岁的希孟被元卒所掳,将把她献给元军主将。希孟知难免厄运,投水自尽。三日后得其尸,于衣襟中发现了两首绝命诗,表达了“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的决心。诗、事见《宋史·列女传·韩氏女传》、《宋诗纪事》。

(陈祖美)

【林景熙】(1242—1310) 一作景曦,字德旸,亦作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上舍释褐,授泉州教官,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有人发会稽宋陵,弃其遗骸。景熙与邑人郑朴翁拾葬之。归授徒于乡,旋往来吴越间。有《霁山集》,存诗三百首。景熙同时代人方逢辰序其集,称“其诗凄惋”,“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义之遗音”。其七绝《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为其凄惋格调的代表作。其《南山有孤树》,以“孤树”喻故国,以“寒鸟”自喻;其《寄四明陈楸昭》,写国亡后艰难处境;其《赠泰霞真士祈雨之验》诉说家乡农民之苦难。其《拜岳王墓》为岳飞鸣冤;其《题陆秀夫负帝蹈海图》赞陆秀夫“流芳千古更无前”,其《读文山集》“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铿锵有声,乃又一篇《正气歌》;而《秦吉了》、《孙供奉》痛斥奸佞,与以上三首赞忠良形成鲜明对比。明胡应麟谓景熙所作“忠义气概,落落简编,有足多者”(《诗薮·杂编》卷五)。《宋诗钞》引方逢辰语,谓“诗家门户,当放一头”。他的诗在宋遗民爱国诗篇中,

占有重要位置。《南宋书》卷六二、《宋史翼》卷三二有传。

(孔凡礼)

【赵必瑤】(1245—1294) 字玉渊,号秋晓,宋太宗十世孙,居于东莞(今属广东)。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与父崇岫同登进士。初任高要县尉,摄四会县令,再任南康县丞,多有惠政。南宋末,元军南下,文天祥组织抵抗,开府于惠州。必瑤投笔从戎,辟为判官,摄惠州军事。不久,南宋灭亡,入元,不肯出仕,隐居温塘村以终。必瑤虽有集传世,但所存诗文篇帙无多。其诗多为感慨兴亡与描写隐逸生活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必瑤在“宋末诸家中未为颖脱,然体格清劲,不屑为靡靡之音。如‘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夕阳’诸句,固未尝不绰有情韵”。著有《覆瓿集》六卷。《宋史翼》卷一七有传。

(王学泰)

【谢翱】(1249—1295) 字皋羽,晚号晞发子、晞发道人,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试进士不第。端宗景炎元年(1276)七月,文天祥起兵,倾家资率乡兵数百人赴难,署谘议参军。宋亡不仕,漫游两浙,终于杭。有《晞发集》,诗传于今者有二百八十多首。其《宋铙歌鼓吹曲》、《宋骑吹曲》,写宋太祖建国时“东征西讨之事”,“文句炫煌,音韵雄壮,如使人亲在短箫鼓吹间”(吴莱《渊颖吴先生文集》卷一一《宋铙歌骑吹曲序》)。明杨慎谓其古体诗“精致奇峭”,谓所作《鸿门宴》,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贺所作《鸿门宴》,“不及此远甚”;其他如《短歌行》、《海上曲》、《明河篇》,“虽未近望开元、天宝之萧墙,而可以据长庆、宝历之上座”(《丹铅总录》)。胡应麟亦谓其“奇奥得长吉风流”(《诗薮》外编卷五)。近人陈衍谓所作《效孟郊体》“有奇想,视东野,殆将突过黄初”(《宋诗精华录》)。盖“当天地变革之会,拂郁愤懑之气,发之于词”,故“雄厚奇杰”如此(清陆大业序)。其近体则“卓炼沉着,自成一派”(清姚鼐《宋诗略》评语)。其《书文山卷后》丹心碧血,可质鬼神。其《怀峨嵋家先生》遥想参政家铉翁被羁北方,魂梦巴峡,令人不能卒读。其《过杭州故宫二首》及《重过二首》抒思念故国深情。其绝句“牵牛秋正中,海日夜凝曙”云云,杨慎以为“绝妙可传,郊、岛不能过”(《丹铅总录》)。而王士禛《居易录》谓见于《晞发道人近集》之近体诗“刻画晚唐,酸涩无足录”,失之苛刻。黄宗羲谓文章盛于宋亡之日,“而皋羽其尤”,谓翱之文乃天地间之“至文”(《吾悔集》卷一《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其《登西台恸哭记》乃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为哭祭文天祥而作,曲折地表达了内心悲愤。其《金华洞记》“形容变怪,物无遁形”(《宋遗民录》卷五《金华游录》)鲍廷

博题跋)。其《游赤松观羊石记》写羊石群象,形神俱肖。其文风格峭劲,得力于柳宗元。事迹详宋方凤所撰行状。《宋史翼》卷三五有传。(孔凡礼)

【王铤】字介翁,括苍(今浙江丽水)人。生活于宋末元初,曾为县尉,临安被元兵攻陷,弃印绶归隐湖山,与尹绿坡、虞君集、叶招山等人结社赋诗,题所居曰“月洞”,时人比之陶潜之栗里、桃源,有晋人之高致。铤为宋遗民,其诗多缅怀故国之作。曹庭栋称其“每对时愤闷,辄形于诗,如‘山河隔今古,天地老英雄’,‘青松秦世事,黄菊晋人心’。语涉怨悱,要不失风人之遗”(《宋百家诗存》)。其《古杭感事》、《避乱柯崑绿坡诸公以诗见寄》、《金陵感秋》、《钱塘江》等皆寄寓了诗人的兴亡之感。其诗宗晚唐,汤显祖以为其七绝有“闲逸之趣”。四库馆臣摘其五律数联,如“蝉声秋岸树,雁影夕阳楼”,“马嘶经战地,雕认打围山”,“橹声荷叶浦,萤火豆花田”,“斜阳晒渔网,疏竹露人家”,“晴雪添崖瀑,春云杂晓烟”等,认为皆“绰有九僧之意”(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诗在宋末名家之外小有成就。撰有《月洞吟》。其生平见《宋诗纪事》等书。(王学泰)

【真山民】事迹不详。旧传其人自呼“山民”,故人亦以“真山民”称之。或云名桂芳,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宋末进士。又有李生乔叹以为不愧乃祖真德秀,是以知其姓真,为名儒之裔。然诸说均无确证。山民工诗,所至辄好题咏,因有诗作流传人间,人或拟之以陶渊明。其诗以写麦秀黍离之悲与山林隐逸生活为主。诗学晚唐,风格清丽,颇多警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其佳句:“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风蝉声不定,水鸟影同飞”,“与鸥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灯昏见,岩泉雨歇闻”,“水清明白鹭,花落失青苔”,“曳杖云同出,开帘山自来”,“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泉石定非骑马路,功名不上钓鱼船”,“水禽与我共明月,芦叶同谁吟晚风”,“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秋思笛声中”,“小窗半夜青灯雨,幽树一庭黄叶秋”,“洞暗只闻泉滴沥,山青剩见路分明”,“几亩桑麻春社后,数家鸡犬夕阳中”;并认为这些诗句“颇得晚唐佳趣”。存《真山民集》一卷,仅近体,无古体。其传记资料见《宋诗纪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学泰)

【顾逢】字君际,一字世名,又作名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南宋末举进士不第。南宋亡后,放情山水间,隐于临安,别号梅山樵叟,人以梅山称之。与郑思肖、林石田等有交往。后为吴县教谕。卒年七十四。逢少学诗于周弼。弼论诗尚唐。逢承师教,诗风清新自然,锤炼而不见痕迹。所作为五、七言近体,尤长于五言,人称顾五言。以所作多写田家,逢

自署其居曰五字田家。友人赠诗,亦有“五字诗名著少年”之句(《诗渊》第四百十七页)。有日本僧人喜爱逢诗,将其诗集携回国中,为之传布(见影印《诗渊》第一册《寄谢李雪林》)。逢有《梅山集》十卷,《永乐大典》卷七五〇六、一四三八三引录,《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已佚。《诗渊》各册收逢诗近二百首,引自《顾逢诗集》。此《顾逢诗集》当即《梅山集》。除此以外,《珊瑚木难》等书中尚有逢诗多首。逢尚撰有《船窗夜话》一卷、《负暄杂录》一卷,亦佚。《元诗选癸集》之甲有《顾逢传》。(孔凡礼)

【卫宗武】(?—1289)字淇父,自号九山。华亭(今江苏松江)人。南宋理宗淳祐(1241—1252)间,历官尚书郎,知常州。官至朝请大夫,宋亡,闲居以诗文自娱,不仕。有《秋声集》传世,存诗三百馀首。其《和戚秋涧遗诗》有“年逾八十身方健”之句,则其生年约在宋宁宗开禧(1205—1207)、嘉定(1208—1224)间。其诗大抵写退居生活,《秋山》诗有“秋山抱奇姿,不肯事妩媚,犹夫尘外士,飘然有仙气”,实以秋山自喻,不愿俯首新朝,其志节足嘉。其《野塘晚步》:“数亩涵空碧,波光可染衣。荷枯惟藕在,荻老作花飞。水净游鳞见,天寒过雁稀。十分清绝处,秋月散明辉。”纯用白描,不事雕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大都气韵冲淡,有萧然自得之趣”。其《挽都务弟》云“地下那知多岁月,人间别是一乾坤”,悲痛之语,以达观出之,倍令人伤怀。其诗仍属南宋末江湖派,间失之浅薄。然其诗品实在江湖诸集之上。传记资料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元张之翰所作集序。(孔凡礼)

【汪济】字济叔。约为古番川(今江西波阳一带)人。终身不仕。有诗集《饭牛稿》,《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云“一部一册,缺”。《诗渊》各册所收录,约为一百一十首,《永乐大典》亦录数首。此后未见征引,其佚已久。《诗渊》第一册有佚名《寄饭牛翁》诗云“早计关防意气粗”,知汪济少时有志报国。入元后所作《淮阴怀友》,有“黄河今在眼,故国此为边”句,怀念感伤之情,跃然纸上。他在福建同安客居过,曾经“横挑诗担上楚州”,曾瞻仰过武侯祠,曾多次到宣城、金陵,曾游淮西大地,曾驱驰长沙道中,皆有诗纪之。其《梅浦作》有“蚊虫蚤虱成三害,风月琴书是四邻”句,可见旷达。其《水月梅》诗云“天上恐无人世梅”、“广寒丹桂只凡才”,亦颇有新意。其古诗有才致,为宋末江湖派一般诗人所不及。(孔凡礼)

【蒲寿晟】号心泉,别号法石,其先西域人,或云阿拉伯人、或云占城人。居泉州(今属福建)。少而能文,以美风姿、好奇服、富于财货而为时人所瞩目。南宋理宗开庆(1259)、景定(1260—1264)间因与弟寿

庚平海寇有功,被授官,入领环卫,一度退隐奉祠家居,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始出知梅州,在任清廉,移吉州,不赴,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下,自称处士。此时其弟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掌握泉州攻防大权,寿晟密谕寿庚纳款于元。宋益、广二王逃难航海至泉州,寿庚拒之不纳,遂使二王漂泊海上,宋终亡于崖山,论者以为谋出于寿晟。入元,寿晟未仕,优游以终。寿晟虽非汉族士人,但其深受汉文化影响,近人陈垣称其为“华化”之西域人。寿晟能诗词,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诗风冲淡闲远。亦有少量感慨时事、描写离乱之惨、摭写沧桑之感的篇章,如《郊行有感》、《头陀成庵主刺血写法华经》等皆属此类作品。著有《心泉学诗集》。近人余嘉锡曾对寿晟生平详加考证,载于所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近人陈垣在《西域人华化考》卷一中对其经历亦有所考订。

(王学泰)

【宋氏】天台(今属浙江)人。家本富,后贫,鬻庐于邻,价成,作诗云:“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殷勤说与东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见诗惻然,即以券还之,亦不索其直,乡人嘉其谊。诗、事见赵葵《行营杂录》,亦见《宋诗纪事》。

(陈祖美)

【郭晖妻】宋代人。姓名、生平均不详。其夫郭晖给她寄信时,误将白纸装进了信封。她回寄了一首题作《答外》的诗:“碧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诗、事见于《宋诗纪事》。《元诗纪事》则从《山堂肆考》,记作元吴仁叔妻韩氏事,诗的第三句作“料想仙郎无别意”,其余三句亦略有不同。

(陈祖美)

【梅花尼】姓名不详,南宋人。因其《咏梅花》绝句,为人称赏,号“梅花尼”。其诗曰:“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诗见《元诗纪事》。《历朝名媛诗词》云:“诗有悠然自得之趣,此尼直已悟道,不特诗句之佳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载此诗作某尼悟道诗。据此,是诗宜作南宋人或南宋以前人所作。

(陈祖美)

【张玉娘】约于南宋理宗宝祐至元世祖至元(1253—1294)间在世。字若琼,自号贞一居士,一作一贞居士,松阳(今属浙江)人。父张懋,为提举官,母刘氏,年半百始生玉娘。幼好文墨,尤擅诗词。少时许字表兄沈佺,后父母欲取消婚约,玉娘不从。沈随其父游于京师,玉娘深为鱼雁阻隔所苦。沈卧病不起,玉娘赠诗以死相誓。沈病卒,父母欲为另择配偶,玉娘闻之曰:“妾所以未亡者,为有二亲耳。”矢志不移,后以忧卒,时年二十八。父母哀其志,将其与沈合葬。玉娘生于宋、元之交,《四库全书总目》、《元

诗纪事》、《全金元词》及众多诗词选本均将其视为元人。但如果玉娘生于宋宝祐(1253—1258)中,距宋亡尚约有二十年,而其享年仅二十八岁,固亦可视为宋人。《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一》中著录其《兰雪集》一卷;谓其志“可哀”,而其“诗格浅弱,不出闺阁之态”。《玉镜阳秋》云:“其拟乐府及古诗,间有胜语。”《名媛诗话》则称其“文章博雅,诗词得风人旨”。其事见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邑人王诏所作《张玉娘传》及《松阳县志》卷九。《历代妇女著作考》对《兰雪集》之存录状况裒辑颇详。

(陈祖美)

【王清惠】南宋度宗(1265—1274)昭仪。恭帝德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失陷,清惠随三宫一同被掳北去。途中题《满江红》(太液芙蓉)词于驿壁,一时广为传播,一些抗元志士如文天祥、邓剡等均有和词。入元后,自请为女道士,号冲华,后自缢死。清惠虽以此词名,但其与供奉内庭的琴师汪元量,同时被掳北上,且有诗词唱和。《宋诗纪事》录有清惠《送水云归吴》诗云:“朔风猎猎割人面,万里归人泪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钟为君劝。”事见陶宗仪《辍耕录》、周密《浩然斋雅谈》。

(陈祖美)

【王氏】名不详。临海(今属浙江)人。南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入浙东,王氏被掳。元兵的一个头目杀其舅、姑与夫,欲纳之。她誓死不从,因诳骗元兵头目说:“能让我为舅姑与夫服丧满一月,乃可相从。”头目见她不畏一死,只得从其所请。后被押途中过嵊县之青枫岭,她决心死于此地,即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岩石上云:“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题罢,投崖身亡。诗、事见《宋诗纪事》及所引《东园客谈》。

(陈祖美)

【耶律倍】(899—936)小字图欲,辽太祖阿保机之长子。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辽太祖神册元年(916),立为皇太子。尝从阿保机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天赞五年(926),从征渤海。灭渤海后,阿保机改其国名为东丹,以倍为人皇王主之,赐天子冠服。不久,阿保机死,倍让帝位于其弟德光。德光继位,是为太宗。倍反而受到猜疑,被徙至辽南京。倍遂离国适后唐。后唐明宗赐倍姓东丹,名慕华,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渤海郡开国公,充怀化军节度使、瑞慎军州观察使。后又赐姓李,名赞华,任滑州节度使等职。后唐明宗死后,闵帝嗣位,不久为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倍密报德光讨之。从珂兵败,召倍与之俱死,倍不从,被害。时年三十八。后辽太宗谥曰文武元皇帝,后屡改谥,至辽兴宗重熙二十年(1051)增谥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倍深受汉文化熏陶,

尝建议阿保机尊崇孔教。博学多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熨之术,善画本国人物,工辽、汉文章,亦能诗。其《海上诗》广为流传,清代赵翼评此诗“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辽族多好文学》条)。其子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辽史》卷七二有传。

(王军)

【赵延寿】(?—948) 本姓刘,后为赵德钧养子,改姓赵,恒山(今河北正定)人。后唐明宗以女妻之,拜驸马都尉、枢密使。后与德钧降辽,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辽太宗耶律德光伐晋,以延寿为先锋,封魏王,灭晋后,以其为中京留守。德光死后,延寿自称权知南朝军国事,图帝中原,为永康王耶律阮(旋称帝,为辽世宗)所囚,于辽世宗天禄二年(948)卒。延寿少美容貌,好书史,尤好宾客,亦能诗。其诗多描写契丹风物,有慷慨雄豪之气。《辽史》卷七六有传。

(王军)

【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陈六,季父房之后。父吴九,检校太师。庶成幼好学,读书过目不忘。辽兴宗重熙(1032—1055)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后因其妻胡笃诬陷,以罪夺官,絀为“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道宗清宁(1055—1064)年间始归,诏复本族,仍迁所夺官。尝奉诏译方脉之书,使契丹人皆通习医事。又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曾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有诗文行于世。《辽史》卷八九有传。

(王军)

【耶律蒲鲁】字乃展,耶律庶箴子。幼聪悟好学,七岁即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不到十年便博通经籍。辽兴宗重熙(1032—1055)中,举进士第。因辽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兴宗以擅令子就科目罪鞭打庶箴二百,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受到兴宗嘉赏。蒲鲁亦擅骑射。后转通进,宠遇日隆。卒于道宗清宁(1055—1064)初。其父曾寄《戒谕诗》,蒲鲁以赋相答,人皆称其典雅。《辽史》卷八九有传。

(王军)

【萧观音】(1040—1075) 辽道宗(1056—1101)皇后,枢密使萧惠之女。辽兴宗重熙九年(1040)五月五日生,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能自制歌词,好音乐,尤善琵琶。道宗清宁元年(1055)立为懿德皇后。后生太子浚,有专房之宠。伶官赵惟一善琵琶,得侍萧后左右。宫婢单登亦弹琵琶,与赵惟一争能。萧后进谏道宗曰:“单登为叛家女,不可近御前。”由是单登怀恨萧后。枢密使耶律乙辛与萧后家不和,遂与单登合谋诬萧后,谓其所作《怀古诗》中含“赵惟一”三字,以证萧后与赵有私。道宗大怒,族诛惟一,

赐后自尽。临终作《绝命词》,闻者莫不称冤。死时年仅三十六。天祚帝乾统(1101—1110)初,追谥宣懿皇后,与道宗合葬。今存《回心院词》、《怀古诗》、《绝命词》等十四首词。诗、事见《辽诗话》。《辽史》卷七一有传。

(陈祖美)

【萧瑟瑟】(?—1121?) 渤海人。国舅大父萧房之女。乾统(1101—1110)初,辽天祚帝幸耶律挾葛第,见而悦之,匿宫中数月,乾统三年(1103)冬,立为文妃,生晋王。善歌诗,多藻思,尤有识见。时女真乱作,天祚帝犹猎游不息,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天祚帝见而恨之。后以废立事诬妃,赐死。有《讽谏歌》、《咏史》诗传世。诗、事见《辽诗话》、《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三引《古今女史》。《辽史》卷七一有传。

(陈祖美)

【宇文虚中】(1079—1146) 字叔通,号龙溪,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宋徽宗大观二年(1109)登进士第,历官州县,入为起居舍人,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贬韶州。建炎二年,复资政殿大学士,以祈请使出使金国,被留,接受金官爵,与韩昉等俱掌词命。金熙宗天眷(1138—1140)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皇统四年(1144)转翰林学士承旨,迁礼部尚书。皇统六年,以谋反罪,全家被杀。关于他的死,史书记载有种种不同,但死后宋孝宗追赠他开府仪同三司,并谥肃愍,说明他的死与反金、忠于南宋有关。虚中为当日诗坛盟主。他既接受金国的高官厚禄,又不忘南宋,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往往发于诗歌。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宋使臣洪皓以其仕金而对之鄙视。虚中曾写《己酉岁抒怀》,诗中自叹“今日穷愁何足怜”,而寄望于“是非留与后人传”,并自白他之所以“孤臣不为沉湘恨”,目的乃是“怅望三韩别有天”,隐忍是为了别有所图。证以后事,亦不为虚言。由于一直没有忘记故国,所以在金日对亲人,对故乡和故国的怀念成了其诗篇的重要内容,如《在金日作三首》、《春日》、《又和九日》等,这些诗都写得感情真挚,语意沉痛,如他自己所说,“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全金诗》录其诗五十三首及断句四。《宋史》卷三七一、《金史》卷七九有传。

(史铁良)

【张斛】字德容,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尝由辽入宋,任武陵守。金初北归,官秘书省著作郎。元好问在《中州集》中称“其文笔字画皆有前辈风调”,深受宇文虚中激赏。其诗格调高雅,写景状物尤见功力,如《海边亭为浩然赋》、《小孤山》等,有唐人风味。张斛身为北人,经历由北入南,复由南返北之变化,在南方所作如《沙边》等诗,颇多故乡之思;入金后,诗风清新自然;晚年所作诗多有感慨人世沧

桑之作。著有《南游》、《北归》诗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十九首、断句七联。生平事迹见《中州集》、《金诗纪事》。(王军)

【吴激】(1090—1142) 字彦高,号东山,建州(今福建建瓯)人,著名书法家米芾之婿。宋钦宗靖康(1126—1127)末,奉命使金,金以其为知名之士,留而不遣。命为翰林待制。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激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米芾笔意。尤精于词,以《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最为著名。元好问称他“自当为国朝第一手”(《中州集》)。与蔡松年齐名,时称“吴蔡体”。他的诗时有对江南的怀念,如《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岁暮江南四忆》、《张勘北骑》等,都是以回忆江南风光的形式,叹息老于风沙之中,感慨殊深。刘无党题其集有“万里山川悲故国”、“梦魂应逐过江船”等语,即是指出这一方面的特点。其律诗对仗工整,如《三衢夜泊》的“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之类。著有《东山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二十七首,断句十一联。《金史》卷一二五有传。

(史铁良)

【刘著】 字鹏南,晚号玉照老人。舒州皖城(今安徽潜山)人。北宋徽宗时登进士第,入金后预铨调,碌碌于州县。年六十馀,始入翰林,充修撰。后出守武遂,官终忻州刺史。皖城有玉照乡,晚年因以为号,以示不忘故土。刘著北宋时即有文名,其诗有“南朝词客北朝臣”(《月夜泛舟》)之句,入金后与吴激、高士谈等多有唱和。诗作境界开阔,沉痛悲凉,抒发凄楚的思乡之情,如《出榆关》、《闻雁》等,并有直陈胸臆,不事雕琢的特点。《全金诗》录其诗二十四首。生平事迹见《中州集》、《金诗纪事》。

(王军)

【高士谈】(?—1146) 字子文,一字季默。亳州蒙城(今属安徽)人。宋徽宗宣和(1119—1125)末任忻州户曹参军。入金,仕至翰林直学士。金熙宗皇统(1141—1149)初,因宇文虚中案,有司以其家藏异域图书,锻炼成狱,被杀。其实高士谈并没有反金的行为,所以被捕后他不像宇文虚中那样自知“死自吾分”,而是觉得“意外得俘囚”,并申述他对金的“忠信”,并自信与家人“会有相逢日,牵衣话更长”(见《丙寅刑部中二首》)。平时诗中也无愤激情绪,有些诗篇欣赏、向往田园山水的乐趣,如《晓起戏集东坡句二首》、《志隐轩》、《偶题》等。其小诗写景清丽,颇有情韵,如“睡起不知春已老,一帘红雨杏花风”(《睡起》)。不过他毕竟是由宋入金而仕的,去国之情,家山之念,还是不能忘怀,所以诗中不时流露出这种感情,如《不眠》、《晚登辽海亭》等,《题禹庙》所说“可怜

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则是明显的站在故国立场而指金为外人了。有的篇什所表达的故国之思很含蓄,如《秋晚书怀》曲折透露其内心深处的隐情。著有《蒙城集》,已佚。《全金集》收其诗二十九首、断句四。事见《中州集》卷一、《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史铁良)

【蔡松年】(1107—1159) 字伯坚,其家乡别墅有萧闲堂,晚年因自号萧闲老人。父蔡靖于宋徽宗宣和(1119—1125)末守燕山,兵败降金;松年随其父降,初被辟为令史,后授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遂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于汴置行台尚书省,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完颜宗弼伐宋,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师还,荐授刑部员外郎。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迁左司员外郎。海陵王天德(1149—1153)初,擢户部尚书。后拜参知政事,迁尚书左丞,进拜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1159)卒。谥文简。他工词,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他仕途顺利,位至宰相,可是其诗中较多地反映出对仕途风险的担忧。史称金海陵王怀疑他向宋使者泄密,“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他诗中有“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漫成》)、“出处上大节,倚伏殊茫茫”(《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十三首》之十一)反映出作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宇文虚中和高士谈的结局对他也不可能没有刺激,因而在宦海中不得不仰金人鼻息,这便产生出“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淮南道中五首》之二)之屈辱感。唯一的退路只有隐居,此为其经常咏唱之主题,不过终其生都未能做到。其诗受苏轼诗影响,议论较多,而诗中也有清丽之作。有词集《明秀集》六卷,今存三卷。《全金诗》录存其诗五十九首。《金史》卷一二五有传。(史铁良)

【蔡珪】(?—1174) 字正甫,号无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蔡松年之子。七岁赋菊诗,语意惊人。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进士,除澄州军事判官,迁三河主簿,入为翰林修撰,在职八年,改户部员外郎,除河东北路转运副使,迁礼部郎中。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出守潍州,因风疾致仕,寻卒。蔡珪之前,活跃在金代文坛上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如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所指出,“皆宋儒”,难以金代文派论之,至蔡珪,始得视为金文派的“正传之宗”。珪学问渊博,能辨识古文奇字。其诗以写景为主,大抵是羁旅行役中所作。他曾由华北到东北、蒙古等地,途中大自然的风光引发他的诗兴,所作如《登陶唐山寺》、《春阴》、《雷川道中》等,意境都较优美,具有诗情画意。诗以七律为工。其文名尤高,胜过诗名。元代郝经对其作品评价颇高,誉为“建瓴一派雄

燕都”。《全金诗》收其诗四十九首。《金史》卷一二五有传。(史铁良)

【李晏】(1123—1197) 字致美,号游仙野人,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人,唐顺宗第十六子福王綰之苗裔,父森字彦实,工于诗。李晏少年时即风流倜傥,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登经义进士,授临汾丞,迁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闻其才名,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历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章宗立,上书十事,均被采纳,改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出为沁南军节度使,致仕。章宗念其为先朝旧人,复起为昭毅军节度使。明昌六年(1195),归老。承安二年(1197),卒,谥文简。李晏善为文,为官屡行善政,为人称赞。其诗以律诗见长,对仗工整,意境空幽,代表作如《高丽平州中和馆后草亭》、《白云亭》等并显流转自如之风。《全金诗》录其诗十一首。生平事迹见《中州集》卷二。《宋史》卷九六有传。(王军)

【王寂】(1128—1194) 字元老,蓟州玉田(今属河北)人,宗出北宋三槐王氏。其父王础系金初名士,仕金四十年。寂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登进士第。世宗大定二年(1162),为太原祁县令。大定十五年,曾奉使往白霄治狱。大定十七年,以父丧归,次年复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迁通州刺史兼知军事,又迁中都副留守。大定二十六年冬,因救水灾失职,由户部侍郎出守蔡州。大定二十九年被命提点辽东路刑狱。章宗明昌(1190—1195)初,召还,终于中都路转运使,卒年六十七。谥文肃。寂为大定、明昌年间的著名诗人,元好问称其“专于诗”(《中州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境清刻隗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寂生活在金中叶,是金代的相对稳定时期,可是由于仕途曾遭挫折,所以诗中时有倦于仕宦、向往归隐的内容,并有牢骚,如七言长篇《拙轩》,对为官的心劳政拙多有烦言,希望“归丘陵”。如《易足斋》、《日暮倚杖水边》、《元夕有感》等也都流露出这种思想。元好问指出后一首中“残梦关河鳌禁月,旧游灯火马行春”是“人共传之”(《中州集》)的佳句。寂诗对稍后的王若虚、李俊民有影响。著有《拙轩集》。《全金诗》收录其诗二百七十八首、断句六。《大金国志》卷二八有传。

(史铁良)

【刘瞻】 字崑老,号樱宁居士,亳州(今安徽亳县)人。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登进士第,世宗大定(1161—1189)初,召为史馆编修,卒于官。党怀英、郾权、魏抃皆尝从之学。瞻以诗名世,工于野逸。其“寒食归宁红袖女,外家纸上看蚕生”(《春郊》)、“藻荇半浮苔半湿,浣纱人去不多时”(《所见》)等句,

皆有清新之气。《中州集》称其“有集行于世”,今已佚。《全金诗》录其诗三首、断句四。生平事迹见《中州集》、《金诗纪事》。(王军)

【赵可】 字献之,号玉峰散人,高平(今属山西)人。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进士,仕至翰林直学士。可博学高才,卓犖不羁。海陵王天德(1149—1153)、贞元(1153—1156)间,有声场屋。后入翰林,一时诏诰多出其手,流辈服其典雅。其《来远驿雪夕》诗题下注云“使高丽时作”,说明其曾奉使高丽。善诗词,词尤工。有《玉峰散人集》,已佚。元好问称他“风流有文采”(《中州集》)。有《玉峰散人集》,已佚。《全金诗》收录其诗五首。《金史》卷一二五有传。(史铁良)

【刘仲尹】 字致君。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后迁沃州(今河北赵县)。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登进士第,历官赞皇尉、潞州节度副使,以都水监丞卒于任。其家豪侈,而能折节读书。诗、词俱蕴藉有致。元好问谓其诗受江西诗派影响,“参涪翁(黄庭坚)而得法者也”(见《中州集》)。其诗好描绘景物,尤以吟咏花卉为多,如《墨梅》十首、《西溪牡丹》等,大多寓情于景。亦有不少抒写个人情怀之作,如《自理》、《晚阴》等,抒写不愿追名逐利的清高之志,颇见情致。有《龙山集》,已佚。《全金诗》收录其诗二十九首。生平事迹见《中州集》、《金诗纪事》。

(王军)

【刘迎】(?—1180) 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今山东掖县)人。初以荫试部掾,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用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次年,登进士第。除幽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为皇太子允恭所亲重。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迎为金代中叶著名诗人,当时经济比较繁荣,社会亦较安定,这在其诗中有所反映,如《上谷》诗有“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之句。与此相应,他也写了一些表现闲适情趣的作品,如《陪诸友登三山亭》、《秋郊》、《次韵诸园不暇游览》等。其七古雄放,《鲋鱼》诗中的“雪浪如山半空立”句就有苏轼诗“黑风吹海海欲立”气势。迎亦有以议论入诗之作,如《河防行》、《修城行》等。其七律如《莫州道中》诗由写景转入思亲,感情真挚动人。他的诗文词集《山林长语》,已佚。《全金诗》录其诗七十八首。其生平事迹散见《金诗纪事》、《中州集》等书。(史铁良)

【耶律履】(1131—1191) 字履道,号忘言居士。义州弘政(今辽宁义县)人。契丹族,辽东丹王耶律倍之七世孙。以荫补国史掾。金世宗朝,累迁蓟州刺史,入翰林为修撰,擢尚书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章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礼部尚书,特赐孟宗献榜

下进士及第,拜参知政事。章宗明昌元年(1190),进尚书右丞。次年卒,年六十一,谥文献。世宗尝问履:宋代名臣孰为优?履以苏轼对,并录轼奏议上之,诏令国子监刊行。履善属文,能诗,通六经百家之书,精历算书绘事。有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一首、断句一。《金史》卷九五有传。(王军)

【党怀英】(1134—1211) 字世杰,号竹溪。其父纯睦自冯翊宦于泰安军,为录事参军,卒于官,妻、子不能归,遂为泰安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怀英少时聪颖,师毫社刘岩老,与辛弃疾同学。尝试东府取解魁,后困于名场,遂不以世务为怀,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箪瓢屡空,亦不以为忧。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擢进士甲科,调成阳军事判官,除汝阴令。大定十八年,入为史馆编修,应奉翰林学士。章宗承安二年(1197),出为泰定军节度使,为政宽简。次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卒于家,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善属文,精书法,是金代中叶文坛盟主。赵秉文言其文似欧阳修,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渊明、谢灵运,奄有魏、晋。(见赵秉文《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其《夜发蔡口》、《喜雨》等诗,语言质朴,景象鲜明,不时结合人生的感慨。他善于描绘景物,有壮阔如《奉使行高邮道中》者,有清秀如《宿宣湾》者。出仕前之贫困生活,在他诗中也有所反映,如《雪中》四首等。所著《竹溪集》已佚,《全金诗》收其诗六十八首。《金史》卷一二五有传。(史铁良)

【王庭筠】(1151?—1202) 字子端,号雪溪,平生爱天平黄华山水,因又自号黄华山主,盖州熊岳(今属辽宁)人。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登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再调馆陶主簿。章宗明昌元年(1190),以在馆陶曾犯赃罪去官,卜居彰德,读书黄华山寺。明昌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明昌五年,迁翰林修撰。承安元年(1196)坐赵秉文上书事,削官下狱。次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承安四年,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1201),复为翰林修撰。次年卒。庭筠为人喜称人之善,所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元好问称其“文采风流,映照一时”(《中州集》)。书画学米芾,尤善画山水墨竹。诗学黄庭坚。《金史》本传谓其“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在宦途遭受挫折时,其诗哀怨有节,如《狱中见燕》、《狱中赋萱》、《被责南归至中山》等。不少诗色调明朗,反映了金代中叶社会安定的一面,如《河阳道中》的“林深不见人家住,道上唯闻打麦声”。绝句则颇有情韵。元耶律楚材爱其诗,有“雪溪词翰辉星斗”之语。有文集四十卷,已佚。近人金毓黻辑得《黄华

集》八卷,并为撰年谱。《全金诗》收录其诗四十四首、断句八。《金史》卷一二六有传。(史铁良)

【张公药】字元石,滕州滕阳(今山东滕县)人。其祖张孝纯曾为相,公药以文、荫入仕,曾为郾城令。生活于金章宗期间,颇有诗名,其诗如《新年》、《寒食》、《春晚》等,为时人传诵。诗风清新自然。其他如“老子频年厌羊酪,故溪新绿正肥鱼”(《往鄆州》)“梦归草堂卷疏箔,几点白鸥眠浅沙”(《二月》)等句,融思乡之情于春日景色之中,见出情致。著有《竹堂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四首、断句三联。生平事迹见《中州集》。(王军)

【周昂】(?—1211) 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年二十四登进士第。初为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后坐事罢官。久之,起为隆州都军,以边功得复召,为三司官,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侵犯金边境,权行六部员外郎,随参知政事完颜承裕戍边。是年八月,承裕军败,昂死于难。昂尝教其甥王若虚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金史》本传),周昂诗学杜甫。其后期作品颇多国势衰落之忧,如《翠屏口》、《山家》等。与昂大致同时的诗人李纯甫云:“德卿以孝友闻,又喜名节,蔼然仁义人也。学术醇正,文笔高雅,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诸儒皆师遵之”(《中州集》引)。著有《常山集》,今佚。元好问《中州集》中录其诗一百首,为全集之最;《全金诗》录存一百零三首。《金史》一二六卷有传。(王军)

【刘昂】(?—约1201) 字之昂,兴州(今山西略阳)人。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登进士第。年三十三为尚书省掾,调平凉路转运副使。后为当途者所忌,连蹇十年,卜居洛阳。章宗泰和(1201—1208)初,自国子司业擢为左司郎中,坐事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元好问称其“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中州集》)。所作《赠张秦娥》二首,描绘一风尘女子色衰后的凄凉景况,笔调哀婉。秦娥得诗,为之泣下。《全金诗》录其诗十四首。《金史》卷一二六有传。(王军)

【赵秉文】(1159—1232) 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自号闲闲。幼时颖悟。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登进士第,调安塞簿,迁邯郸令。章宗明昌六年(1195),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因上书论事得罪,免官。后起为同知苛岚军州事。泰和二年(1202),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出为宁边州刺史。次年,改平定州。卫绍王大安(1209—

1211)初,人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转翰林直学士。宣宗贞祐四年(1216),除翰林侍讲学士。兴定元年(1217),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哀宗开兴元年(1232),卒,年七十四。秉文历仕五朝,官六卿,而自奉养如寒士。工诗文书画,是党怀英之后金代文坛领袖。秉文曾谓作诗文“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见刘祁《归潜志》卷八)。元好问称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用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中州集》)晚年值蒙古军南侵,金国势日危,其诗多忧时之作,他也因忧时得疾而去世。著有《滏水集》。《全金诗》收录其诗六百四十四首。《金史》卷一〇有传。(史铁良)

【杨雲翼】(1170—1228)字之美,平定乐平(今属山西)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经义进士第一,词赋中乙科,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1199),出为陕西东路兵马总管判官。泰和元年(1201)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授提点司天台,兼礼部郎中。宣宗贞祐三年(1215),转礼部侍郎。兴定元年(1217),迁翰林侍讲学士。次年,拜礼部尚书。兴定四年改吏部尚书,又改御史中丞。哀宗即位,拜翰林学士。哀宗正大五年(1228)卒,年五十九。谥文献。雲翼为人雅重,自律甚严,待人则宽,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博通经传,至于天文、律历、医卜、术数,无不通晓。贞祐二年南渡后二十年,与赵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门生半天下。赵思文《吊同年杨礼部之美》称他是“海内文章选,人中道德师”。其文名胜过诗名。他在一首题画诗中称赞赵秉文诗“五言造平淡”,平淡也正是他自己诗歌的风格。其诗语言平易,洗尽铅华,如《父老》、《蔡村道中》、《双成寺中登楼》等,在平易中抒发深情,描出如画风光。《全金诗》录其诗二十四首。《金史》卷一一〇有传。

(史铁良)

【史旭】字景阳。第进士,历临真、秀容二县令。秀容为元好问故乡,史旭为秀容令时,元好问父德明与之多有交往,称其诗“时有佳句”(《中州集》卷二)。如“青黄绕屋禾将熟,紫白依栏菊半开”(《交口杨氏庄》)、“也解笑人沿路菊,不堪供税带山田”(《差赴绥德》)等,写来闲适自如,淡然生趣。其诗亦有感时之作,如《早发驢驰朔》,慨叹金兵之不可用,元好问认为可见“诗人之忧思深矣”(《中州集》卷二)。《全金诗》录其诗四首、断句二联。生平事迹见《中州集》卷二。

(王军)

【完颜璘】(1172—1232)本名寿孙,金世宗赐名璘,字仲实,一字子瑜,晚号樗轩老人。女真人,世宗

之孙,越王永功之长子。博学有俊才。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加奉国上将军,时年仅十六岁。哀宗正大(1224—1232)初,进封密国公。喜作诗,工真草书。章宗明昌(1190—1195)以来,诸王法禁严,诸公子不得与外间交通,于是他穷日力于书,读《通鉴》至三十馀遍。少日学书于任君谟,学诗于朱巨观,有出蓝之誉。资雅重,薄于世味,好贤乐善。父永功逝世后,稍得出游,文士亦时至其门。与赵秉文、杨雲翼、元好问等交善。南渡居汴,家人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只能设蔬饭共食。元好问称他为“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其诗明白如话,以致被人讥为浅俗,其实并不乏诗之意蕴,亦有深而委曲之作,如《梁园》便寄托了深沉的兴亡之感。《过胥相墓》借吊金平章政事胥鼎表达对国事之忧,寄意深远,刘祁《归潜志》指出其“甚有唐人远意”。南渡后诗中还有叹老嗟贫和思乡的内容,如《漫赋》、《思归》等。他一生所作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词一百首;因所居有如庵,其诗号《如庵小藁》,已佚。《全金诗》录其诗四十四首、断句二。《金史》卷八五有传。

(史铁良)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溲南遗老。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幼聪颖,博学强记,诵古诗至万馀首。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登进士第,调鄆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人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出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1224—1232)初,迁平凉府判官,后转延州刺史,人为翰林直学士。天兴元年(1232),他不畏强暴,拒绝为崔立草功德碑。金亡不仕,东游泰山而卒,年七十。他是金末文坛领袖之一,也是有金一代的著名学者,经史考证,文学批评,无所不能。曾师舅父周昂,周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其文论和诗论多源于舅氏。在其《溲南诗话》中,主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反对“雕琢太甚”、“经营过深”,不主奇诡,也不主藻饰,提倡“真”,说“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即诗歌应抒发真情实感。又强调作诗要“出于自得”,反对“以衣钵相传”。这种诗论与江西诗派格格不入,基于此,他力攻江西派,对江西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他斥之为“特剽窃之黠者耳”。其文学理论与白居易相近,诗也宗白居易,称赞白诗“情致曲尽”,“随物赋形”,对于有人鄙视白之“俗”,他加以驳斥,因为白之“俗”正是他所倡导的平易。于宋诗,他尊苏轼。他的诗论对于金代后期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文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文辨》和论诗绝句(即评东坡、山谷四绝、评王子端四绝)中。他的诗写得平易

自然,发乎情性,尤其是金亡之后的作品更为感人。金亡后,他北渡返乡,写了《还家五首》,抒发“不但人非物亦非”的亡国之痛。他的五古多议论,如《欸愤》、《感秋》、《生日自祝》等。史传所著录《慵夫集》已佚,今传《淳南遗老集》。《全金诗》录其诗四十二首。《金史》卷一二六有传。(史铁良)

【辛愿】(?—1231)字散之,因居县西南女几山下,以力田为业,遂自号女几野人,晚又号溪南诗老。嵩州福昌(今河南洛宁)人。年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一读即欲罢不能,由是博极群书,杜诗韩文未尝一日离手。为人不修边幅,性豪放,贵人宴客,他麻衣草鞋,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旁若无人。后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门客。廷玉为府尹所诬,他亦受牵连,几不得免。从此,人不敢与之相交,生活更为穷困。他恃才负气,不能从俗俯仰,为饥寒所迫,又不得不与世接。其枯槁憔悴,流离顿踣,往往见之于诗。金宣宗元光(1222—1223)初,曾访元好问、李钦叔于孟津,在席间叹息说:“平生饱食有数,每见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当与老饥相抗去矣。会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韩城之间,以天地为棺槨,日月为含殓,狐狸亦可,蝼蚁亦可耳。”哀宗正大(1224—1232)末,没于洛下。元好问称他为“特立之士”,视为“三知己”之一。辛愿诗工五言,诗律深严,而有自得之趣。对金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反映较深。其名作《乱后》就逼真地写出兵灾之后农村的凋敝,又揭露了官府的压榨。《乱后还三首》则使人想起杜甫在安史乱中的诗作。他还写了一些歌唱隐逸、鄙视功名的作品。有诗数千首,常贮竹囊中,已不传,《全金诗》录其诗二十首。《金史》卷一六七有传。

(史铁良)

【冯延登】(1176—1233)字子俊,号横溪翁。吉州吉乡(今山西吉县)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进士,初为临真簿,泰和元年(1201),转任宁边令。累官至国子祭酒、假翰林学士承旨。哀宗正大八年(1231)春,出使蒙古,被羁管丰州二年。天兴(1232—1234)初返朝,复祭酒职,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蒙古兵陷汴京,被俘,投井而死,年五十八。延登资禀淳雅,好贤乐善。与赵秉文交好,相与考论文义。因身处乱世,亲历战争,其诗多感时伤怀之作,如《鄆州道中》等。写景诗也多有佳作,如《登封途中遇雨留僧舍》、《德顺道院晓泉》等。著有《横溪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十九首。《金史》卷一二四有传。(王军)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属山西)人。年轻时通程氏之学,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

字。不久弃官,教授乡里。金室南迁后,隐于嵩山,后徙怀州,又隐西山。忽必烈在藩邸闻其名而召见,仍求还山。蒙古忽必烈汗中统元年(1260)卒,年八十五,赐谥庄静(集作庄靖)。俊民生当金末元初,其诗对当日社会动乱反映较多,风格深沉,多奇崛之句。如《客中寒食》、《即事》,或抒发乱世深愁和黍离之悲,或写战乱之后的荒凉景象,多幽忧激烈之音,寄怀深远。其小诗情意含蓄,如《避乱》、《香梅二首》等。刘瀛评其诗说:“格律清新似东坡,句法奇杰似山谷。集句圆转,脉络贯穿,半山老人之体也。雄篇鉅章,奔腾放逸,昌黎公之亚也。”(见《庄靖集》卷首刘瀛序)著有《庄靖集》。《全金诗》录其诗八百二十四首。《元史》卷一五八有传。(史铁良)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登经义进士第。宰执爱其文,荐入翰林。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南侵,以上疏论时事不报,弃官。金室南迁后,再入翰林,擢尚书左司都事。以母老辞去。后复入翰林,连知贡举。哀宗正大(1224—1232)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年四十七。纯甫为人聪敏,于书无所不读,以材自负。先习词赋,后改习经义之学,又喜谈兵。中年度其道不行,遂纵酒自放,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不拘礼法。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性好提奖后进,号为当世龙门。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又读道家书。自将其文分为两类,凡论性理及有关佛、老者为“内稿”,其他为“外稿”。他以散文著称,师法《庄子》、《列子》、《左传》和《战国策》。对金代后期文学颇有影响,刘祁《归潜志》云:“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纯甫论诗文尚奇,也重创新,“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常说“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见《归潜志》卷八)。其诗以七言古诗最好,风格雄健,时有诙谐,如《送李经》、《雪后》、《怪松谣》等,接近韩愈诗风。由于不能行其志,部分诗作也反映了出世思想。他于儒、释、道三家均有著述,而集已失传,《全金诗》录其诗三十三首、断句四。生平事迹见《归潜志》卷一。《金史》卷一二六有传。(史铁良)

【宋九嘉】(1185?—1233)字飞卿,夏津(今属山东)人。金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登进士第,历任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皆有能声。召补省掾,为权要所忌,求去。后为延安帅府辟充经历官。召为南京右巡院史,又以不能事权贵,罢官。不久,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哀宗正大(1224—1232)中,因病失音,废居。天兴二年(1233),死于战乱中,年未

五十。九嘉少游太学,有辞赋声。长从李纯甫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平生不喜佛,其诗有“壮哉砥柱颓波里,惟有渊明换不来”(《莲社图》)之句,以陶渊明自况。其为文简古,法宋祁《新唐书》;诗清淡质朴,多忧时伤怀之作,其代表作《途中书事》三首,描写饥民困顿惨状,反映金亡前夕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较为深刻。《全金诗》录其诗十二首、断句四。生平事迹见《归潜志》卷一。《金史》卷一二六有传。(王军)

【杨奂】(1186—1255) 又名知章,字焕然,号紫阳。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金末举进士不中,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未及上而归,教授乡里。金亡,北渡依冠氏帅赵之。元太宗十年(1238)以儒生就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在官十年,请归。宪宗五年(1255)卒,年七十,谥文宪。奂博闻强记,致力于名教,时称关西夫子。其文言辞精约,条理分明,多记旧事,可备文献不足。其诗多感时伤怀之作,如《录汴梁宫人语十九首》等。著有《还山集》六十卷,已佚。今存《还山遗稿》二卷。《全金诗》录其诗一百十八首。《元史》卷一五三有传。(王军)

【赵元】一名宜禄。字宜之,号愚轩,忻州定襄(今属山西)人。经童出身,举进士不中,曾任巩西主簿,不久因失明去官。少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金章宗泰和(1201—1208)以后有诗名。李纯甫为赋《赵宜之愚轩》诗,有“落笔突兀无黄初”之句,由是名声大振。宣宗贞佑二年(1214)南渡后,往来洛西山中,为赵秉文、雷渊、元好问等著名诗人所推重。失明后专力于诗,故诗益工。他与金代一般诗人不同处是亲身参与农事,其《学稼》诗云,“垦山聊作下农夫”,又在寄元好问诗中说,“西畴将有事,老农真吾师”(《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之二)。又亲身经历了“近日愚轩睡眠少,打门时复有追胥”(《学稼》)的下层百姓生活,因而对社会矛盾的揭露较为深刻,如杂言乐府诗《邻妇哭》、《修城去》,抨击金统治者用人不当,御敌无方,却残酷地压迫百姓。他写诗不主藻饰,而追求平淡的风格,如五古《村居夏日》、《晚出》等。有诗自述云:“初学悔大谬,篆刻工文辞。年来厌酸咸,淡爱陶潜诗。”(《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元好问则云:“若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中州集》卷五)著有《愚轩集》,已佚,《全金诗》收其诗三十五首、断句二。其事迹散见《归潜志》卷二、《中州集》卷五、《金诗纪事》等。(史铁良)

【陈赓】(1190—1274) 字子颺,号默轩,猗氏(今山西临猗)人。与弟庾、膺皆有文名。金末,监蓝田子午酒,改陕盐场管勾。入元后,累官至河东两路宣

慰司参议,以疾归。至元十一年(1274)卒,年八十五。尝从麻革、房皞等人元好问交游,并常与其弟以诗倡酬。其诗以古体诗见长,或境界开阔(如《游龙祠》),或意象清幽(如《岷山秋晚图》),皆得天然之趣。存诗一卷,收入《河汾诸老诗集》。《全金诗》录其诗二十首。生平事迹见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故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公墓碑》、《元诗选》三集甲卷、《宋元学案补遗》等。(王军)

【元好问】(1190—1257) 字裕云,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其先系出鲜卑族拓跋氏,北魏孝文帝时改元氏。北宋末,由河南迁居山西。生父元德明亦以诗文鸣,有《东岩集》。他自幼即过继于叔父格,幼年曾随其宦游于掖县、冀州、陵川、陇城诸地。他七岁能诗,称神童。十馀岁时,先后受教于当时的古文家路铎和学者郝天挺。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南下,陷秀容,其兄好古遇难。好问举家南渡。曾先后迁居河南福昌之三乡、登封。兴定五年(1221),登进士第。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鸿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正大三年,出为镇平令。次年,改内乡令,一年后丁母忧去职。正大八年,出为南阳令。当年秋,受诏入汴京,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入汴京。好问随被俘官吏北渡黄河,被羁管于聊城。摆脱羁管后,曾移居冠氏,此后二十馀年中,过着遗民生活。五十岁时,回到故乡,筑野史亭,悉心著述,以传文存史为己任。在访诗和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曾往来于晋、豫、鲁、冀等地。蒙古宪宗七年(1257),卒于获鹿寓舍,终年六十八岁。好问有多方面成就。史学方面,著有《壬辰杂编》、《南冠录》、《金源君臣言行录》,均佚。今存之《中州集》以诗存史,后附《中州乐府》,与其已佚之《壬辰杂编》一起,为元人修《金史》提供了大量史料。文学方面,编有《锦机》、《杜诗学》、《唐诗鼓吹》、《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等书,除《唐诗鼓吹》外,均佚。好问一生,以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一生作诗五千馀首,今犹存约四分之一。其大量作品反映所经历的时代动乱,著名的如《石岭关书所见》、《箕山》、《琴台》、《宛丘叹》、《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南冠行》、《续小娘歌十首》等,对其诗,历来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为“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清人赵翼赞其律诗云:“唐以来律诗之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瓠北诗话》)其词题材广泛,山河之痛、儿女之情,都是其内容。况周颐《蕙风词话》谓为“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寄托于词”。但也有如张炎《词源》所谓“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之作。其馀古文、

散曲,亦均有可观。《金史》本传云:“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所著尚有志怪小说集《续夷坚志》四卷存世,内容皆“中原陆沉之事”(荣誉《续夷坚志序》),并非单纯为洪迈《夷坚志》之仿作。好问早年有志于文学批评。以诗论诗,尤为所长。《论诗三十首》、《论诗三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等,都集中反映了其诗歌批评的见解。其余衡文品诗,尚可见于《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及《中州集》诸小传中。他把诗歌美学的核心归结为“诚”,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认为诗歌的特质,在于真情实感,表现出“天然”与“真淳”,因而强烈反对诗歌美学上的形式主义和模拟复古。他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宝贵遗产。其诗、文、词、曲均收入《遗山先生文集》。《全金诗》录其诗一千三百八十三首。生平事迹见其自作《南冠录引》、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祭遗山先生文》、清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施国祁《元遗山先生年谱》、余集《遗山先生年谱略》、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丁晏《元遗山年谱》等。今人缪钺有《元遗山年谱汇纂》。《金史》卷一二六有传。(王军)

【杨弘道】(1190—1272?) 字叔能,号素庵,淄川(今山东淄博)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监麟游酒税。金亡入宋。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任襄阳府学教谕。次年,摄唐州司户。后元兵攻下唐州,弘道北归,不复出仕。卒年八十馀。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追谥文节。工诗,与元好问、李汾、杜仁杰称,深受赵秉文、元好问、杨雲翼等名流激赏。其诗风格多样,五言古诗得比兴之体,时时近汉魏遗音;律诗风格高华,颇有唐调。四库馆臣称其诗“虽不及好问之雄浑苍坚,然就一时诗家而论,固不可谓非北方之巨擘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小亨集》十五卷,久佚,《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整理,编为诗五卷、文一卷。《全金诗》录其诗二百八十九首。生平事迹散见于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儒士杨宏道赐号状》、《元诗选》癸集甲卷、《元诗纪事》等。(王军)

【元严】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之妹,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系出自鲜卑族拓跋氏。貌美多才。张平章拟求婚而往访之,询其所作,出《补天花板》诗云:“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诗旨委婉,而寓拒婚之意。张见诗警恐而退。严后适进士杨思敬。思敬歿后,严遂为女道士。诏为宫教,号浯溪真隐。《忻州志》著录其《浯溪集》,已佚。事见

《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四引《忻州志》。元严另有《雨竹图赞》、《风竹图赞》等诗,则见于《玉台文苑》。

(陈祖美)

【麻革】(?—1244以后) 字信之,号貽溪,临晋(今山西临猗)人。尝随其父西观太华,东游至洛。金哀宗正大(1224—1232)间,与杜仁杰、张澄隐居内乡山中,日以作诗为业。金亡后,隐居从教而终。革生于金末乱世。其前期诗作尚有闲淡之致,如《渡洛》等;而后期诗作则多感慨悲凉之音,诸如“豺狼满地荆榛合”(《过陕》)、“百年繁华成劫灰”(《关中行送李仁卿》)诗句,比比皆是。其散文亦超拔不凡,尤擅山水游记。《河汾诸老诗集》存其诗一卷,《全金诗》录其诗三十六首。《元诗选》三集甲卷有传。

(王军)

【陈庚】(1194—1261) 名一作庚,字子京,号澹轩,猗氏(今山西临猗)人,陈赓之弟。金末遭兵乱,转徙无常,后应平阳高鸣之招,署郡教授。耶律楚材尝奏置经籍所于平阳,其子耶律铸命庾领之。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荐授平阳路提举学校官。次年卒,年六十八。庾尝与麻革、段成己、段克己、房皞、张宇、曹之谦等从元好问游,与其兄赓多以诗倡酬。其诗多赠和之作,直陈胸臆,不刻意锻炼;写景诗清空疏远,意境高远。有《澹轩文集》三十卷,已佚,仅《河汾诸老诗集》存诗一卷。《全金诗》录其诗十九首。《新元史》卷二三四、《元史》新编卷四六有传。

(王军)

【李献甫】(1195—1234) 字钦用,河中(今山西永济)人。诗人李献能的堂弟。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与献能及其二兄同登进士第,名噪一世。历咸阳簿,辟行台掾。曾赴西夏议和,以其机智折服夏人。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人为尚书省令史。哀宗天兴元年(1232),拜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次年,随哀宗出奔蔡州。天兴三年,城破,死于难,年四十。献甫博通书传,精于左氏及地理学。亦能诗,为元好问“三知己”之一。其诗风多样,尤善歌行,诗格苍老。其代表作《长安行》描绘战乱时艰,悲愤激切。著有《天倪集》,已佚。《全金诗》录其诗十三首。《金史》卷一一〇有传。

(王军)

【段克己】(1196—1254) 字复之,号遯斋,又号菊庄,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幼时与弟成己以文章擅名,礼部尚书赵秉文誉为“二妙”,大书“双飞”二字题其里。又有“稷亭二段”之称。读书时即有大志,以王佐自期。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登进士第。金亡不仕,与弟成己偕隐于龙门山中二十年。蒙古宪宗四年(1254)卒,年五十九。元泰定(1324—1328)年

间,其孙段辅合刻克己、成己诗,题为《二妙集》行世。克己身历乱亡,其诗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大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值故都倾覆之余,怅怀今昔,流露于不自知。吴澄序言其有感于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其诗兼而有之。所评良允。”所写各体诗中以七古尤好,写得清新刚健,如《景纯浩然见过……书长语赠二子》、《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情见乎词》等。《全金诗》录其诗一百十七首。克己亦工词,有《遯斋乐府》。曾廉《元书》卷九一有传。(史铁良)

【杨果】(1197—1271) 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登进士第。历知偃师、满城、陕县。金亡,入史天泽幕,为参议。蒙古世祖中统元年(1260)为北京宣抚使。次年,入拜参知政事。世祖至元六年(1269),出为怀孟路总管。至元八年卒,年七十五,谥文献。果文采风流,名盛当时。工为文章,尤长于乐府。杨果目睹金亡,虽为元臣,诗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如《羽林行》、《老牛叹》等;写景绝句,借苍凉景色抒抑郁之情,如《登北邙山》、《岷山秋晚图》等。尝著《西庵集》。《全金诗》录其诗十一首。《元史》卷一六四有传。

(王军)

【段成己】(1199—1279) 字诚之,号菊轩,段克己之弟。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登进士第,授宜阳主簿。金亡后与其兄克己隐龙门山中,克己歿后,自龙门山徙晋宁北郭,闭门读书。元世祖时,起为平阳路儒学提举,坚辞不赴,被誉为“儒林标榜”。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卒,年八十一。其诗韵味悠长,风格淡远。他用庄子思想对待贫寒,出以淡泊,描写隐逸之趣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如《吕氏用静斋》、《崧阳归隐图》、《送冯資深归西山五首》等。但他笔下隐士不完全是沉迷山水之人,总隐寓首阳薇蕨的故国之思,反映了他不仕新朝的遗民立场。诗收入《二妙集》。吴澄序《二妙集》称其有感于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兼而有之。《全金诗》录其诗一百九十九首。成己亦能词有《菊轩乐府》。曾廉《元书》卷九一有传。(史铁良)

【房皐】(1199—?) 字希白,号白雲子,临汾(今属山西)人。由金入元,隐居不仕,尝于诗中写道:“人以官为荣,我以官为辱,平生喜高洁,为官近卑俗。”(《寄呈岳阳诸友》)在作诗主张上,反对雕琢字句,认为“天然一语自然工”(《读杜诗三首》之二);又反对刻意追奇,以为好的作品都是“只把寻常话做诗”(《读杜诗三首》之一)。其诗亦一如其主张,造语亦新,如“行非杨秉三无惑,性似嵇康七不堪”(《戊子》)等。著有《白雲子集》,已佚。《河汾诸老诗集》收其

诗一卷。《全金诗》录其诗三十五首。《元诗选》三集甲卷有传。

(王军)

【曹之谦】 字益甫,号兑斋。应州(今山西应县)人,寓临汾。幼知力学,金宣宗兴定(1217—1222)年间进士,后与元好问同掾东曹,虽机务倥偬,商订文字,未尝少辍。金亡后,居平阳三十余年,与诸生讲学,以伊洛理学为宗,文风为之一变。所著古文、杂诗三百首,题名《兑斋文集》。王恽为之序曰:“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择之精,语之详。浑涵经旨,深尚体之工;刊落陈言,极自得之趣。而又抑扬有法,丰约得所。可谓常而知变,醇而不杂者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其诗多学者气,绝句较清新自然,颇有情致。《河汾诸老诗集》收其诗一卷。《全金诗》录其诗四十六首。《元诗选》三集甲卷有传。

(王军)

【张秦娥】 金人。能诗,其赋《远山》诗云:“秋水一抹碧,残霞几缕红。水穷霞尽处,隐隐两三峰。”其后流落。刘昂赠诗云:“远山句好画难成,柳眼才多总是情。今日衰颜人不识,倚炉空听煮茶声。”又云:“二顷山田半欲荒,子孙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萧萧雨,红日花梢入梦无。”秦娥览诗,为之泣下。从此二诗可见其晚境之凄凉困苦。《全金诗》收录其诗四首。事见元好问《中州集》卷四“刘左司昂”小传、《金诗纪事》卷一三。

(陈祖美)

【耶律楚材】(1190—1244) 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辽皇族后代,父耶律金事金世宗,官至尚书右丞。楚材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长而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初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辟为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队占领燕京后,元太祖成吉思汗闻名召用。元太宗时,官至中书令。年五十五卒,谥文正。楚材事元太祖、元世祖三十余年,征讨之中,诸将皆争夺子女金帛,楚材独取书籍、药材。死后仅遗琴瑟十馀,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因而对蒙古王朝制度建设和保存典籍,颇有贡献。楚材从成吉思汗西征,关河跋涉六万馀里,亲历塞外景观、异域风情,这些见闻发为诗歌,极富特色,既成歌咏西域名篇,也成研究历史、风俗的重要材料。其西征诗气势磅礴,境界阔大,与一般描写边塞诗歌不同,诗中突出塞外的奇崛,而不渲染它的荒凉,其笔下的阴山雄伟壮丽,连江左名山也不足与比。《西域河中十咏》则清新优美,对西域生活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前人曾经指出,耶律楚材于军务倥偬、政事繁忙之余,时有诗作,皆信手拈来,“若不用意为者”,因而其诗不事雕琢,语言通俗,是胸臆的自然流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语皆本

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王士禛《池北偶谈》曾摘录他的诗,认为“颇有风味”。他被尊为蒙古王朝的一代词臣。著有《湛然居士集》,诗多于文。《元史》卷一四六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许衡】(1209—1281) 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世代为农,家贫苦学。蒙古宪宗年间,忽必烈王秦中,以衡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位后,召至京师,授太子太保,累官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曾与郭子敬等制定“授时历”。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请还。次年,病卒,年七十三,谥文正。衡与姚枢、窦默等同是北方著名理学家,任国子祭酒时独尊程、朱之学,在使理学成为元代官学过程中有重要作用,被人尊为开国大儒。后代理学家对他十分尊重。理学家之诗尝被讥为“押韵讲义”;衡诗却多有雅秀之作,其七绝《宿卓水》以明白晓畅语言写出清幽意境,《风雨图》诗则写得富有妙趣,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诸体诗亦具有风格,尤讲学家所难得也”。著有《鲁斋遗书》八卷。《元史》卷一五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刘秉忠】(1216—1274) 本名侃,拜官后改名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不久因不愿为刀笔吏而弃去,隐居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法名子聪,以其能诗文,使掌书记。秉忠博学多才,《元史》本传谓其“自幼好学,至老不衰”,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雍《经世书》,又精天文、地理、律历、阴阳术数等。后见赏于忽必烈,以布衣身份随征大理、云南及南宋,时人称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后,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又奉命娶窦默之女。元初制度建设多出其手,“大元”国号即是他所提议。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无疾而终,年五十九。初谥文贞,成宗时改谥文正。秉忠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淡泊自处,常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不求新奇,类其为人,而病在粗疏平淡,如《江边晚望》,诗意明白如话,从格律到语言皆给人以粗糙之感,此为元初一些北方作者之通病。其写从军生活之作品较有新意,如《过天井关》、《过居庸关》等。秉忠尚有词与散曲传世。著有《藏春集》。《元史》卷一五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侯克中】(1220?—1315?) 字正卿,号艮斋,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幼失明,以耳代目,成其学,尝专攻《易》,著《大易通义》,袁桷为其作序。已不存。年九十馀而卒。克中工诗能文,自创“谐音格”诗,每首全以音通字异者相叶,共作五十馀首。其诗以律

诗为长,亦好咏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颇近击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赋景之作,亦时有足资讽咏者”。其抒景写景之作如“风转忽吹云散尽,树梢一点夕阳红”(《晚晴》),不失为清新超脱,与其涉理路之作如“乾质刚健推元化,坤以安贞保太和”(《学易》),面目迥异。著有《艮斋诗集》十四卷。生平事迹见《录鬼簿》、《全元散曲》等。(王军)

【耶律铸】(1221—1285) 字成仲,号双溪,契丹人。辽东丹王九世孙,耶律楚材次子。少聪敏,善属文,工骑射。楚材卒,嗣领中书省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拜中书左丞相。至元元年(1264),加光禄大夫。至元四年,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至元五年(1268),复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后迁平章军国重事。至元十九年(1282),再拜中书左丞相。至元二十年,坐事罢免。至元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后追赠懿宁王,谥文忠。铸生长北漠,十三作歌诗。尝从宪宗征伐,足迹涉历西北穷远之区,其文多述塞外地理典故。其诗作颇有乃父遗风,于平易流畅中见出豪放。著有《双溪醉隐集》。《元史》卷一四六有传。(王军)

【郝经】(1223—1275) 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贫苦读,博览群书。理学家赵复的弟子。其祖郝天挺为元好问之师;郝经曾从元好问学诗文。蒙古宪宗二年(1252),得忽必烈赏识,用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受命南征宋。后因宪宗逝世而班师。忽必烈即位后,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出使南宋议和。南宋丞相贾似道恐虚报战功的阴谋败露,将经囚禁于仪真达十五年之久。经始终不屈,直到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丞相伯颜奉命伐宋,才被放归。次年,病卒,年五十三,谥文忠。其论文主文道合一,于文章作法则认为“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答友人论文法书》)。其论诗批评李贺之奇、卢仝之怪、杜牧之惊和元稹之艳。其在征行途中所作诗反映战乱之中“居人尽室去”的荒凉景象,并有“欲复太平代”(《随州》)的愿望;在囚禁中所作则有凄苦之情,如《秋思》“星麾重霜露”一首、《甲子秋怀》、《后听角行》等。从《题汶阳王太师彦章庙》、《宿州夜雨》、《满城道中》等诗则可看出其诗风之奇崛、挺拔,而《静香亭二首》、《宿黄陂县南》、《同阙彦举南湖晚步》等诗又表现出其深秀的一面。五言长古则较干涩枯燥。著有《陵川集》。《元史》卷一五七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胡祇遹】(1227—1295) 字绍闻,一作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元世祖中统(1260—1264)初,张文谦宣抚大名,辟祇遹为员外郎,至元元年(1264),授应奉翰林文字,寻兼太常博士,累转左

右司员外郎。因忤权臣阿合马,出为太原路治中,改河东按察副使。后任湖北宣慰副使,迁济宁路总管,升山东按察使。召拜翰林学士,不赴,改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不久病归。成宗元贞元年(1295)卒,谥文靖。胡祇遯学出宋儒,以笃实为宗,不好空谈。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傍,也无所雕琢,以理明词达为主,《元诗选》癸集所收《题思圣堂》、《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即为此类诗作。著有《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元史》卷一七〇有传。

(王军)

【王恽】(1227—1304) 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父祖世代仕金。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左丞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不久以选入京师,擢为中书省详定官,转翰林修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元五年(1268),建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至元九年,授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善决疑狱。至元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至元十九年,改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六年,授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八年召至京师,授翰林学士。成宗元贞元年(1295),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大德五年(1301),致仕。大德八年卒,年七十八,谥文定。恽为人方正,好学,善属文,曾师事元好问,是元初著名文臣之一。在元代前期作家中,王恽是主张“宗唐”的先导者之一,虽然诗作总体成就平平,但有一定影响。有些诗作笔力雄浑,如《双庙怀古》、《大雹行》等,部分小诗较有韵味,如《白峰岭》、《夏夜》(庭竹影扶疏)、《游栖岩寺》(其二)等。但因才气不足,且乏推敲,作品良莠不齐。有些诗议论过多,如《拜奠先圣林墓》、《陪总管陈公肇祀商少师比干墓》等。著有《秋涧先生大全集》。《元史》卷一六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方回】(1227—1307) 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初谄事贾似道。贾将败,又率先上十可斩疏。元兵南下时,任严州知府,声言死守,而元兵至则开门投降,得任元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在杭州、歙县一带终老。其品行常为人所讥弹,周密《癸辛杂识》曾记其秽行。论诗推崇《诗经》,认为“思无邪”是诗之体,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是诗之用;也重汉、魏、晋的古诗;于唐则尊李、杜、韩、柳,排斥李贺,更轻晚唐,有“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的话;于北宋则取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反西崑派,尤推崇江西诗派,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于南宋则尊陆游、范成大,贬四灵派。其论诗主张主要体现在所编《瀛奎律髓》中。冯班批评他只重江西派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但他晚年所撰《唐三体诗》序中

比较地转益多师。方回自视甚高,自称“四海紫阳翁”,又以杜甫自比,有“怀抱颇似之”之句。其诗时有反映现实黑暗之作,如《路旁草》、《题苦竹港寓壁》、《石头田》等诗。其绝句写来有似行云流水,意境自出,像七绝《过湖口望庐山》的“莫道无人肯相送,庐山犹自过湖来”,便是别开生面之作;《舟行青溪道中》诗更可与黄庭坚绝句中的佳作比美。由于主张“剥落铅华”,不免有粗率生硬乃至以鄙俚粗俗为雅音之病。著有《桐江集》和《桐江续集》,前者或又名《虚谷集》。曾廉《元书》卷二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牟献】(1227—1311) 字献之,其先蜀人,徙居湖州(今浙江吴兴),遂为湖州人。南宋理宗时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因触忤权相贾似道罢官。入元不仕,闭门三十六年,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切磋义理。仰慕陶渊明,说“千载一元亮,舍此将安从”。程端学序其集,说他“出处有元亮大节,正不当徒以诗律求之”,实是称赞他不事二姓。从他的诗作看,也不失为一诗家。其诗学陶渊明,恬淡有致,诗中常咏酒,咏菊,咏贫,舒淡自然,五古和五言近体均有这种风格,如《赠厉白云上人》、《溪边钓船》等。诗中也有对故宋的怀念,如《送娄伯高游吴》。晚年所作微露诙谐。著有《陵阳集》,系其次子所编。曾廉《元书》卷九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杨公远】(1228—?) 字叔明,号野趣,歙县(今属安徽)人。由宋入元,未仕,而其诗中多有干谒当路、颂扬德政之作。其诗有《野趣有声画》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不出宋末江湖之格,盖一时风尚使然。一丘一壑,亦有佳致”。意为其诗在局部境界描绘上尚佳。生平事迹见《元书》卷八九、《元诗纪事》等。

(王军)

【魏初】(1232—1292) 字太初,号青崖,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辟为中书省掾,后拜监察御史。出金陕西、四川按察司事,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人为治书侍御史。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于扬州,迁江西按察使。至元二十八年,改南台御史中丞。次年卒,年六十一。谥忠肃。初长于《春秋》之学。尝师事元好问。为文简而有法,诗作格律坚苍。因其先世为金臣,诗中颇多遗民心态,如《田家谣》一诗,写战后感慨,语调苍凉。著有《青崖集》。《元史》卷一六四有传。

(王军)

【姚燧】(1238—1313) 字端甫,号牧斋。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伯父姚枢是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初期的著名文臣。燧少孤,随枢隐于苏门山讲学,倡濂洛关陕之学,曾以所作就正

于许衡,得到许衡赏识。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至京师,随许衡教授蒙古贵族子弟。至元十二年,为秦王府文学,不久,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至元十七年,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调山南湖北道。至元二十四年,为翰林直学士。至元二十七年,授大司农丞。成宗元贞元年(1295),参与修世祖实录。大德五年(1301),授江东廉访使。大德九年,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武宗至大二年(1309),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德四年告病归。次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谥文。燧以文章名世,其文受韩愈文影响。诗作以古体较佳,亦受韩愈影响。其《清明日陪诗僧登落星寺》诗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既有韩诗奇诡、豪健之风,也未能避免韩诗晦涩的毛病。他的五律又见出学汉魏古诗痕迹,清淡古朴。著有《牧庵集》。《元史》卷一七四有传。(史铁良)

【赵文】(1239—1315) 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理宗景定(1260—1264)、度宗咸淳(1265—1274)间,曾冒宋姓,三贡于乡,后始复本性,由国学上舍仕南雄府教授。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兵败返乡,隐居不出。后被强起为东湖书院山长,寻授清江儒学教授,晚年以理学自任。赵文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饰。其文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其诗好借古事抒心意,如《公无渡河》、《团扇歌》等,惟均有道学气息。著有《青山集》八卷。《元书》卷八九有传。(王军)

【刘壎】(1240—1319) 字起潜,号水雲村,南丰(今属江西)人。壎研经究史,网罗百家。年三十七而宋亡。入元后,越十八年,始荐署昭郡学正,年七十,受朝命为延平教授。元仁宗延祐六年,卒于家,年八十。刘壎才力雄放,尤长于四六。其古文多入元后所作,灏翰流传,颇为有气,而时以俳句绮语掺杂其间。其论诗以为“诗以原伦美化为本,非曰谐俗寄情而已”,故其诗多颂扬忠义、提倡教化之作,如《补史十忠诗》即取宋亡时死节之臣的故事,铺陈排比,以求“系彝伦,关风教”。著有《水雲村稿》十五卷。生平事迹见《元诗选》、《元诗纪事》。(王军)

【陈孚】(1240—1303) 字刚中,号笏斋,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元世祖至元(1264—1294)中,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孚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副使。使还,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后为廷臣所忌,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再迁治中衢州。秩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卒年六十四。著有《观光稿》、《交州稿》、《玉堂

稿》各一卷。孚所作诗大多记所经山川古迹。其诗文任意而成,不事雕琢,笔力雄健。其五言古诗有简淡之风,如《潇湘八景》;七言律诗整丽匀和,如《鄂渚晚眺》、《凤凰山》等;七言古诗骨格遒劲,才气横逸,如《咏神州八景》等。怀古之作《白门》诗,写三国事,瞿佑《归田诗话》认为是佳作。叶盛《水东日记》则批评其歌行全用出奇一体。《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王军)

【卢挚】(1242?—1315以后) 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间,历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陕西提刑按察使、河南路总管。成宗元贞(1295—1297)、大德(1297—1307)间,授集贤学士,出持宪湖南,复入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卒。挚为元初著名诗文作家,世称其文与姚燧并肩,诗与刘因齐名,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主张诗宗汉、魏,吴澄说他“所作古诗类皆魏、晋清言”,其《寄博士萧徵君维斗》、《宣城南郊何氏游集》等便是力追汉、魏之作,诗风澹雅。七言绝句流利明畅而又形象动人。其五言诗成就最高,受到时人称赞,虞集曾说:“五言之道,近世几绝,人称涿郡卢公。”挚论诗重传统的教化作用,曾言“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文章宗旨》)。其《题太白墓》一诗中对李白提倡风雅极表赞赏。其诗文集已失传,清顾嗣立《元诗选》收录若干佚作,题作《疏斋集》,今李修生有《卢疏斋集辑存》。《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戴表元】(1244—1310) 字帅初,一字曾伯,号剡源先生,又号质野翁、充安老人。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七岁即能诗,多奇语,受业于王应麟、舒岳祥。宋度宗咸淳(1265—1274)中,入太学,试礼部为第十,登进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以兵乱不就。宋亡后,隐居家乡,授徒卖文自给。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被荐为信州教授,再调婺州,以疾辞。卒年六十七。表元针对宋诗文之弊,以振起斯文为己任,主张“宗唐得古”,又主张在“不悖于古”的前提下“放焉而为”(见《余景游乐府编序》)。其复古主张与后来明七子的复古虽有类似之处,但与七子实有不同。表元认为唐人家数甚多,后人应当像蜜蜂酿蜜那样“杂采众草木之芳腴”。他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刻板规模,强调学诗要先学“游”,所谓“游”有生活实感之意。清顾嗣立称其“诗律雅秀,力变宋季馀习”;又言其诗“类多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辞。”(见《元诗选》),如《剡民饥》、《采藤行》等诗描写了人民生活的困苦,《行妇怨次李编校韵》揭露了蒙古军队的暴行。表元虽仕元,诗中时

有不忘故国之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就说他的《感旧歌者》“有故国之思”。其《苏李图》写李陵、苏武事,有“直到如今说未休”之句;《同陈养晦兵后过邑》诗中“休学丁仙返辽左,聊同庾老赋江南”云云则更明显地借典故抒发思念前朝的感情。五言诗大抵写得潇洒闲适,对仗空灵自在,了无斧凿痕迹,如《苕溪》、《社日城南作》、《赵君理约同途不至》等,也都有“诗律雅秀”的特色。著有《剡源集》。《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元淮】字国泉,号水镜。原籍抚州临川(今属江西),幼年随家迁邵武(今属福建)。宋末任军职,入元后继任军职。元世祖至元(1264—1294)初,以军功显于闽。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溧阳路总管,在职五年左右,后退隐福建。他由武职改任文官有诗记其事:“截发搓绳联断铠,扯旗作带系金创。卧薪尝胆经营了,更理毛锥治溧阳。”归家之日又有诗说:“问归行李轻于羽,沿路吟诗有一船。”其诗意境开朗,极少哀伤低沉情绪。闺情诗颇有唐人情调,如《春闺》。写景诗中也有上乘之作,如《立春日赏红梅》、《郊行》、《南园新柳》等。他还有五首诗咏及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和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岳阳楼》,这种题材的诗作在元人诗中实为罕见。著有《水镜集》,又名《金困集》(《元诗选》作《金困吟》),金困是溧阳古称,但集中所收作品并非都是在溧阳所作。《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

(史铁良)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号困学民,又号直寄老人、西溪子、虎林隐吏。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元世祖至元(1264—1294)间,以材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改江浙行省都司,迁太常寺典簿。枢为人傲岸不羁,每晨出则带笔牍,与其上司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而后为快。至晚归则焚香弄翰,陈古鼎彝器于前,搜抉断文废款。又喜与宾客饮酒醉歌,被视作世外奇人。晚年居钱塘之西溪,营造一室,名“困学之斋”,懒不耐事,常闭门谢客。成宗大德六年(1302)卒,年五十七。赵孟頫曾为他画像,虞集题词云:“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轶米、薛而有馀,风流拟晋、宋而无作。”(《元诗选》二集鲜于枢小传中引)称赞他豪放、风流的名士风度及才能。枢善诗、赋、曲,工行书及画,善鉴定法书、名画及古器物,当时文名与赵孟頫不相上下。他虽被视作世外奇人,但诗中却不乏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过桐庐漏港滩示舟人》、《水荒子歌二首》、《湖上曲》等诗,或写舟师之辛苦,或写农民逃荒,或写妇女卖艺,都有较强的现实性。有的小诗清新可读,如《题高房山画》、《僧巨然画》、《观寂照葡萄》。著有《困学斋集》。《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仇远】(1247—1326)字仁近,一字仁父,号近村,又号山村民,人称山村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中即有诗名,与白珽并称吴下,人称“仇白”。宋亡后,曾以逸民自居。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五十八岁时,为溧阳州学教授,后任杭州知事。致仕后,喜与方士游名山佛寺,足迹所到,常有题咏。其近体诗学唐,古代诗宗汉、魏,其友人释弘道赠诗说:“吾爱山村友,诗工字亦工。波澜唐句法,潇洒晋贤风。”就指出了这一渊源关系。宋亡之初所作诗有兴亡之感,情绪伤感,《和韵胡希圣湖上》的“赐火恩荣皆旧梦,禁烟风景似初秋”,语意极为沉痛,《凤凰山故宫》诗中“凤鸟不来山寂寂”更对故宋有深切怀恋。其诗冲淡幽静,有闲适之趣,退隐之后所作诗如《卜居白龟池上》、《高卧》、《雨馀》等诗即属这类作品。有《金渊集》六卷、《山村遗集》一卷,均为清人辑本。另有《山村遗稿》,收入明瞿遵所编《兴观集》。《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

(史铁良)

【吴澄】(1247—1331)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幼时聪慧,三岁即能诵诗,九岁试乡校,每中前列。曾举进士不第。入元,任江西儒学副提举,仅三月,以病辞官。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仁宗皇庆元年(1312),升司业,拜集贤直学士。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英宗至治(1321—1323)末,辞官归。文宗至顺二年(1331)卒,年八十五,谥文正。所居草屋,程钜夫题为“草庐”,他以此为号,人称草庐先生。与著名理学家许衡齐名,著述甚多。几次北上为官,大抵是逼于应召,内心并不乐意,当他被任为集贤直学士北上经过彭泽时,写过“顾余白发归来晚,羞过渊明五柳庄”,竟以仕进为羞。他虽是理学家,但诗亦有巧思,能超脱理学蹊径,如《立春日寓北方赋雪诗》。其题画诗大都构思精巧,往往突出观画者的主观色彩,如《题雪洲图》。澄长于五言律诗,诗风淡雅,如《送富州尹刘秉彝如京》、《豫章贡院即事奉和雲林提举晚春间居旧韵》等。七律也有清婉可诵之作,多有句可摘。著有《草庐集》。《元史》卷一七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方夔】又名一夔,字时佐,号知非子。建德淳安(今属浙江)人。生于宋末,曾从何基学义理之学,屡举不第,退居富山,授徒讲学,学者称富山先生。著有《汉论》十卷、《富山懒稿》三十卷,已佚。其裔孙方世德等汇编其诗为《富山遗稿》十卷。夔五言诗气势苍莽,胜过七言。其《古意》组诗较有名,其中“龙文双宝剑”一首约为年轻时作品,通过咏宝剑以明志,

有风云际会之想,另一首“秦皇灭诸儒”,情调迥然不同,追求世外桃源的境界。其诗不事雕琢,浑厚淡雅,如《早行》诗“早起理归装,残灯耿曙光。开门半山月,立马一庭霜。钟响知云寺,波声认石梁。修途留不住,去去出山庄”,写早行人的心情和破晓景象,细致逼真,语言平易。他有不少描写农村、农事的作品,其中七绝《田家》很有生活气息,把农民的耕种收获都写进诗中。顾嗣立《元诗选》指出其集中的《闵忠》、《诛奸》二首,一指文天祥,一指贾似道,“忠义之感,凛然言外”,这又与他作为宋遗民的身份相称。《元诗选》初集甲卷有其小传。(史铁良)

【高克恭】(1248—1310) 字彦敬。西域人,居燕之房山(今属北京),因自号房山老人。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间,初仕为省郎,累迁监察御史,历中书都事、兵部郎中,出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迁山南廉访副使,成宗大德元年(1297),除南台治书侍御史,历工部、吏部侍郎,改刑部,官至刑部尚书。武宗至大三年(1310)卒,谥文简。克恭好作墨竹,善画山水。为诗不尚钩棘,自得天趣,其题画之句如“木落秋宇空,天寒远山静”、“冷光湿翠相转处,曾向庐山月下来”、“云气外无出路,山声中有人家”等,颇有奇秀之气。绝句有唐人意度,如“无限飞红随马足,春光更比路人忙”(《过信州》)、“斜阳又送西轩影,一就移床待月生”(《题道院》)等。著有《房山集》。《新元史》卷一八八有传。(王军)

【白斑】(1248—1328) 字廷玉,号湛渊,晚号栖霞山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八岁能赋诗,长习科举业,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中,与仇远同以诗名。宋亡后以授馆为业,伯颜、程钜夫、刘伯宣先后相荐,皆不赴,后李衍力起之,授太平路儒学正,不久代理教授事,升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再迁兰溪州判官,致仕。先结庐于西湖金沙洲,门外有泉,题为湛渊,因以自号。晚年归老栖霞山,又号栖霞山人。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卒,年八十一。方回言其冠绝古人,有英雄大丈夫气。他的描写山水田园的诗,人或称其“逼陶、韦”,不过有的诗也受南宋范成大田园诗的影响,如《余杭四月》,对农村风光的描写不在抒发隐逸闲适情趣,而是写得生气盎然,与陶、韦有所不同。其诗不事雕琢,风格古雅,布局严整,如《春日田园杂兴》、《山中怀友》、《游天竺寺》等诗,前首的布局谋篇就深得当时月泉吟社的好评。琚诗格甚高,与他同时的戴表元、方回和刘辰翁等人都很推崇他的诗。著有《湛渊集》,原集已佚,今本为清人所辑。《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史铁良)

【程钜夫】(1249—1318) 初名文海,避元武宗海山之讳,以字行,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属

江西)人。宋末随叔父程飞卿以建昌降元,初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后为元世祖忽必烈所赏识,擢应奉翰林文字。不久,进翰林修撰,累迁集贤直学士。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荐赵孟頫等二十余人。至元三十年,出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成宗大德四年(1300)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学士。武宗至大四年(1311),为翰林学士承旨。仁宗延祐五年(1318)卒,年七十,谥文宪。钜夫工古文,对元代的古文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五言律、绝写得冲淡修远,如《孤云》、《秋江钓月》、《卢学士诗卷》等。五古长篇则显呆板,有说教之病。七律章法严整,如《送尹生归江西》,层次分明。著有《雪楼集》。《元史》卷一七二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刘因】(1249—1293) 字梦吉;原名颢,字梦骥,尝游郎山雷溪间,自号雷溪真隐,又号樵庵。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称所居为“静修”,人称静修先生。幼年聪慧,六岁即能诗,七岁能文。长而习程朱之学,为理学名儒,与许衡齐名,但并不斤斤拘守程朱门户。其为人性不苟合,不妄交结,即使公卿相访,也多避而不见。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征拜右赞善大夫,不一年,以母病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又以疾固辞,被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至元三十年,病逝家中,卒年四十五,谥文靖。元初北方诗人中,因成就最大,诗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其古体受韩愈、李贺影响,想象奇特,色泽浓烈;《登镇州隆兴寺阁》诗最足以代表。七律沉郁豪迈,《渡白沟》和《遂城道中》等均是佳作。晚年学陶渊明,有《和陶诗》七十馀首,风格淡雅。他祖上世代仕金,诗中有怀思亡金、故宋之作,前者沉痛呜咽,后者叹喟悲凉,故清人全祖望说他“南悲临安,北怅蔡州”。刘因还写有不少题画咏物诗,大抵托物言志,抒发抱负,感慨疮痍,关怀民瘼,这类作品诗艺既佳,品位也高。他论诗提倡风骨高古,以及沉郁、清刚之气。他的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实践了他的论诗主张。著有《静修先生文集》。《元史》卷一七一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胡炳文】(1250—1333) 字仲虎,号雪峰。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平生潜心朱子之学,作《四书通》、《易本义通释》、《纯正蒙求》诸书。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任江宁教谕。成宗大德五年(1301),为信州路学录。武宗至大(1308—1311)间,其族子胡淀为他建明经书院于婺源。炳文掌教事,四方来学,儒风之盛,甲于东南。顺帝元统元年(1333)卒,年八十四,集贤院剡谥文通先生。他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攻击前代诗人无补于“修齐治平”,但

他自己也写诗,有时不免生硬,诗中用典有时也不够灵活。风格近于《击壤》一派,但《北寺昏钟》、《廖坞晚烟》、《拜岳鄂王墓》等诗则富于情韵,时露性灵。著有《云峰集》十卷。生平事迹见《云峰集》卷九附录《云峰胡先生行状》、《新安文献志》卷七一汪幼凤撰《胡云峰传》。《元史》卷一八九附见《胡一桂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陆文圭】(1252—1336) 字子方,江阴(今属江苏)人。幼而颖悟,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以《春秋》中乡选,时年十八。宋亡后,隐居城东,学者称墙东先生。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间复科举,有司强之就试,再中乡举。朝廷数遣使聘之,以老病辞。顺帝至元二年(1336)卒,年八十五。《元史》本传称其为文“融合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东南学者皆宗师之”。亦能诗。著有《墙东类稿》二十卷。《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王军)

【陈栎】(1252—1334) 字寿翁,晚号东阜老人,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年十五,乡人皆以为师。宋亡,致力于理学。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间复科举,有司迫其应试,乡试中选后,不再赴礼部试,教授于家,诲人不倦,足迹不出乡里数十年。吴澄很尊敬他,凡向自己求学的江东之士,尽遣而归栎。顺帝元统二年(1334)卒,年八十三。栎推崇朱熹之学,著《四书发明》等书,发扬朱熹之说。因所居堂名定宇,学者称他为定宇先生。栎亦能诗,与方回是诗友,相与切磋唱和,对方回很尊敬,和方回诗有“小草依松风”之句。而方回宗江西诗派,陈诗也受黄庭坚影响,诗风古拗峭拔。顾嗣立《元诗选》所引“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听水声”等佳句,在其集中可惜太少,以至被称为“沙中金屑”。著有《定宇集》。《元史》卷一八九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熊铄】(1253—1312) 字位辛,初名禾,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建阳建宁(今属福建)人。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进士,授宁武州司户参军。为求廉、洛之学曾从朱熹学生辅氏学习。宋亡不仕,入武夷山,设云谷书院,执教终生。谢枋得闻其名,曾特意相访。他论诗推崇屈原、陶渊明和杜甫,认为他们的诗“痛愤忧切,皆自其肺肝流出”,反对“呕心冥思,极其雕镂”(见《元诗选》小传)。其诗律体写得较好,写景状物,细致生动,如“野鹤窥鱼笱,沙鸥避客船”(《泊舟野望》),“柴扉初放牛羊出,渔艇方携蟹蛤还”(《越州道中》)诸句。七言绝句如《平江舟中不寐》、《江边客舍》、《客舍雨》等,写得疏朗有致。咏物诗如《赠笔生》、《赠琢砚》等能于小中见大,颇有深意。但

他的五言古诗有时议论太多,如《上致用院李同知论海舶》一诗,长达一百零四句,流于说理,几无诗味可言。所著有《勿轩集》。《新元史》卷二三四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赵孟頫】(1254—1322) 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南宋时,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孝宗赐伯圭第于湖州(今属浙江),遂为湖州人。十一岁丧父,十四岁以父荫得官,后授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荐孟頫于朝,受元世祖赏识。至元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至元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后迁知汾州。武宗至大三年(1310),召至京师,为翰林侍读学士。仁宗延祐元年(1314),迁集贤侍讲学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延祐六年,告老南归。英宗至治二年(1322)卒,年六十九,谥文敏。孟頫以宋宗室身份仕元五朝,曾在世祖面前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句,遂为士论所轻,赵氏宗族视其为叛子。孟頫曾往秀州看望族兄赵孟坚,孟坚只准其从后门入,会面加以冷嘲热讽,走后洗其坐具。他在蒙古贵族眼中也被视为贰臣,而由于受到世祖、仁宗恩宠,更招致人忌,经常遇到排挤倾轧。在这种外部非议、排挤以及自身的忧虑和自谴中,度过了富于悲剧性的一生。因其身份特殊,虽然仕元,但诗中也不免有故国之思,如有名的《岳鄂王墓》诗深得陶宗仪赞许,被认为是诸家咏岳王墓诗中的佼佼者。这种怀念故宋的感情在其怀古诗中有较明显的流露,如《钱塘怀古》。有的诗则表达了“一生事事总堪惭”的自我谴责,其中《罪出》一篇,诗语更为沉痛。还有一部分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如《送高仁卿还湖州》等。孟頫与戴表元相知颇深,同是推崇唐诗的著名诗家,就诗作总的成就来说,赵胜过戴。赵诗在元前期诗坛上有很大影响,明胡应麟《诗薮》称他“首创元音”,后人将他和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并称。其诗风格清丽,富于情趣,在各体诗作中,以七律最为出色。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通晓音律,又是书画名家,其书法被称为“赵体”,画山水、木石、竹花、人马尤精致,其画尚有手迹传世。著有《松雪斋集》十卷、外集一卷、续集一卷。《元史》卷一七二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陈深】 字子微,号清全,所居名宁极斋。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宋亡后闭门著书,与赵孟頫有交往。元文宗天历(1328—1330)间,奎章阁臣以其善书荐,深躲避不出。至顺(1330—1333)年间犹在世。所著有《读易篇》、《读诗篇》,已佚,《读春秋篇》收于

《通志堂经解》中。其诗有抄本流传,后收入《四库全书》,顾嗣立《元诗选》录其诗近三十首。深立志隐居,从其《曹叔时见过索钱篇》诗可见这种志向,实际上是决心做遗民。《江上》诗即表达了不忘故国、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由于具有遗民的感情,因而在写景之作中也不时流露出兴亡盛衰之感,如《晓望吴城有感》、《雪后游石湖》等。其诗中亦有部分色调明朗的作品,如《小园即事》、《答霜晴诗二首》、《赋桂山》等。著有《宁极斋稿》。《新元史》卷二三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赵偕】字子永。宋魏王赵廷美之后,其祖迁于慈溪(今属浙江),遂为慈溪人。约宋亡前后在世。入元之后,以宋宗室之后,不求禄仕,隐居大宝山东麓,宗宋理学家杨简之学,学者称宝峰先生。其学生乌斯道序其遗文,称其文章为“有道之言”。顾嗣立称“其诗不多,类皆陈腐之语”(《元诗选》初集己集)。《元诗选》中只选录其“稍蕴藉者”六首,但诗中仍多议论和说教,如《送阿里择之都目之浮梁》诗即以“古人在畎亩,尚不忘乎君。为官不尽职,何以为人臣”诸句发端。绝句写得较蕴藉,如七绝《题梅书于周坻道宅壁间》诗中写梅善解人意,末句“一枝随月上窗来”,较为灵动。著有《宝峰集》。曾廉《元书》卷九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尹廷高】字仲照,号六峰,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遂昌县志》称其元成宗大德(1297—1307)间,任处州路儒学教授。顾嗣立《元诗选》小传谓其“遭乱转徙,宋亡二十年始归故乡。尝掌教于永嘉,秩满至京,谢病归”。《四库全书总目》举其“集中有《永嘉书所见》一首云‘此邦幸小稔,窃禄似有缘’,又有《永嘉任满代者未至》诗,又有《告病致仕谢掌尚书》诗,则廷高仕瓯及谢病实非无据”。又云:“其诗气格不高,而神思清隽,尚能不落俗氛。”其写景诗清朗而有情致,以七律为佳,如《三岩瀑布》、《平远亭》、《双溪道中值风雨》、《卢沟晓月》等诗,后者从过桥的角度作动态之描写,更有特色。其诗多写羁旅之苦和故国情怀,如《客中秋社》、《秋夜旅怀》、《客中思归》等刻画飘零心境,凄切感人,《钱塘怀古二首》、《会稽古陵》、《悯忠阁》等诗所抒发的怀念故宋之情与兴亡之感。廷高还有一些揭露社会黑暗之作,如《永嘉书所见》写流民惨状,《车中作古乐府》讽刺贪官回乡时满载财物美女,并运用对比手法,使揭露更为有力。著有《玉井樵唱》。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甲卷有其小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曹伯启】(1255—1333)字士开,济宁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求学于东平府学,师李谦。元世祖至元(1264—1294)中,以荐除冀州教授,累迁常州路推

官,迁河南省都事、台州路侍中,擢拜西台御史,改都事。仁宗延祐元年(1314),升内台都事,迁刑部侍郎,出为真定路总管。延祐五年,迁司农丞,不久拜南台治书侍御史。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访使,不久拜集贤学士、御史台侍御史。泰定帝泰定(1324—1328)初,北归。文宗至顺四年(1333)卒,年七十九,谥文贞。欧阳玄对他评价颇高,认为他“思致敏贍,襟韵朗夷,临文抒志,造次天成”(转引自《元诗选》初集丙集)。其诗流畅平易,即使五言长古也无枯燥之病,如《寄谢陆义斋廉使诸公》、《和傅住山九日秋闱》等。在各体之中以七律为高,如《夜雨》、《陪诸公仗履登梁王吹台,悠悠悼古之情不能自己,呈孟子周、子文二友》等,自然天成,情意蕴藉。还有少量颇有风趣之作,如《九日省舅郭西独行因书所见五首》之五,立意幽默,极具情趣。著有《汉泉漫稿》。《元史》卷一七六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刘将孙】(1257—?)字尚友,号养吾,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刘辰翁子。少时质鲁,长而颖悟过人。曾为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将孙濡染家学,颇习其父文风,与辰翁共为诗文名家,深受时人激赏。将孙认为宋人“尚文者不能畅于理,尚理者不能推之文”,切中宋人之弊。论文推重韩、柳、欧、苏,反对高语奇古,不能文从字顺。但其为文与其理论不甚符合,好作奇崛语。其诗宗唐,感遇诗作多效仿陈子昂、张九龄,寄托深远。近体多佳句,如“新雨惊秋鸣草树,行人随雁落江湖”、“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送钱方立游荆二首》)等。著有《养吾斋集》三十二卷。生平事迹见《元诗选》三集甲卷、《新元史·刘辰翁传》。

(王军)

【冯子振】(1257—1337?)字海粟,号怪怪道人,又号瀛州客,潭州攸州(今湖南攸县)人。元成宗大德(1297—1307)间,官承仕郎、集贤待制。与陈孚友善,陈极敬畏他,自以为不可及。为人豪放,于书无所不记,文思敏捷,宋濂云:“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发,一挥万馀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元诗选》三集冯子振小传中引)其诗富想象,佳作如《塔灯》、《登金山》、《钟馗图》等,《塔灯》被《诗薮》评为“全篇整丽,首尾匀和”。或称《梅花百咏》为其名作,但缺乏真情实感,又少寄意。其诗散佚甚多,今所传多为题画诗。清顾嗣立将其诗编入《元诗选》三集,题为《海粟集》,《梅花百咏》附于后。事迹见《元诗选》三集、《元史类编》卷三五、《元史新编》卷四七,又附见《元史》卷一九〇《陈孚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黄庚】(1260—1328?)字星甫,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宋亡后,浪迹江湖,以教馆为业。清人厉

鶚认为他不仕元朝,属宋遗民,把他的诗列为宋诗。实际上,宋亡时庚尚幼,元灭宋五十二年后他犹在世,诗中有“献赋未逢杨得意,怜才难遇杜司空”(《偶成简任肃斋教谕》)之言,是欲仕而未能仕。其诗集《自序》中言,习举子业时,无暇于诗,科举不行后,“放江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曾客山阴,越中诗社征稿,所赋《枕〈易〉》诗被评为第一,为当时推重。庚诗中多穷愁之言,也有故国之思,以近体为佳,风致清远,如《渔隐为周仲明赋》表达隐士情怀,自然工整,尾联“狂奴台下水,犹作汉时清”,诗意明显而韵味自然。他作诗着意推敲,曾有“耽书自笑已成癖,煮字原来不疗饥”(《杂咏》)、“斜阳明晚浦,落叶瘦秋山”(《幽居》)等诗句。但也有不够自然、露斧凿痕迹的毛病。清朱彝尊贬黄庚诗庸下不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沿江湖末派”,有失公允。著有《月屋漫稿》、《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蒲道元】(1260—1336) 字得之,号顺斋,兴元南郑(今属陕西)人。强记过人,钻研濂洛诸儒之学。尝为郡学正,罢归,绝口不言仕进。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征为国史院编修官,改国子博士。延祐七年(1320),辞归,优游林泉。惠宗至元二年(1336)卒,年七十七。其诗文平实显易,不事华藻,不假雕琢。其《偶书》诗云,“平生爱冲淡”,如《初至京城寓居言怀》就表现了他的淡泊情怀。其诗不像有些理学家的诗淡而无味,如五律《将至中山》、《九月十八日黄菊始开时且禁酿漫成示德衡弟》等就写得清幽雅致。有些作品也揭露了当时的弊政,如《闲居记事二首》之二就揭露了皇宫选美给民间带来的骚扰不安,但这类诗歌不多,更多的是友朋赠答、题画之类。著有《闲居丛稿》。《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史铁良)

【宋无】(1260—1340?) 字子虚。旧以晞颜字行,名名世,家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因兵乱避吴,遂为平江(今江苏苏州)人,曾冒朱姓。年轻时即有诗名。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博文以茂才荐举,以亲老固辞。壮岁负气,视富贵如浮云。自为《吴逸士铭》云:“年逾知命,或勉以往教……伸占毕垂廿载。”诗中又曾以“冷官”自喻,是当过学官。自铭作于他八十一岁时,其中说到一生“斡流东西”,“游方遐览”,“谷隐岩栖”,“以微吟自怡”,自称逸士。无诗学唐,自言“直欲继前唐”(《己亥秋淮南饥客中怀故里朋游寄之》),主要学李贺,在其乐府诗中有明显痕迹,如《乌夜啼》,从造语之生涩到意境之幽冷阴森,皆与李贺诗相似。当时名人如赵孟頫、冯子振、及明高启等对他的诗评价颇高,虽然不无溢美之处,但其诗自有特色,风格雅秀蕴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无对“五言律诗、五言长律最为擅长,七言绝句次之,七言律诗又次之”。其乐府歌行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如《公无渡河》、《枯鱼过河泣》、《古砚歌》等;律、绝秾丽而不艳,如《次友人春别》、《无题》等。诗中时有不平之气,大抵是针对当时轻视儒生的现实而发,如为冯子振所激赏的《李翰林墓二首》所表达之情感在元代士子中颇有代表性。还有少量作品反映了民间疾苦,抒发了作者对亡宋的思念。著有《翠寒集》。《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史铁良)

【管道昇】(1262—1319) 字仲姬,一字瑶姬,世称管夫人。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管仲之女,其夫赵孟頫系宋太祖子德芳之后。宋亡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6),孟頫被荐于朝,道昇偕行。后孟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封道昇为吴兴郡夫人。仁宗延祐四年(1317),加封魏国夫人。延祐六年,患疾还乡,至临清,卒于舟中,年五十八。道昇能诗词,工书画,尤善画墨竹、梅兰。《居易录》云:“管夫人画竹卷,长丈馀,离披错落,姿态百出,与怪石奔峭相间,气韵生动,真奇作也。”《丹青记》云:“夫人性喜梅兰,下笔辄妙,不让山仙。”仁宗尝命道昇书《千字文》,敕玉工磨玉轴送秘书监装池收藏。又命孟頫书《六体千文》。子赵雍,亦命书一卷。仁宗曰:“令尽知我朝有善书夫人。且一家俱能书,亦奇事也。”又尝为元皇后写竹,几七八十种,清神幽思,曲尽变态。其姊道杲适南浔姚氏,亦善书,尝为道昇画后题字。道昇现存诗数首均为题画诗。事见赵孟頫撰《仲姬墓志》、《乌程县志》、《宫闱氏籍艺文考略》、《丹青记》等。

(陈祖美)

【袁易】(1262—1306) 字通甫,平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敏于学,宋亡后不求仕进,部使者拟荐于朝,固辞。后一度出任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不久即罢归,隐居吴淞,筑室名“静春”,聚书万卷,手自校定。室外植松、菊、梅、竹、荷等。时或泛舟湖上,扣舷高歌,如世外之人。赵孟頫为作《袁公卧雪图》,又称其与龚璘、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卒,年四十五。著名词人张炎与之交往颇深,两人词风亦相近。易颇有诗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吐言天拔”,“风骨遒上”。其诗多凄苦之词,这与其在出仕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有关,也与其在生活中遇到的艰难有关。其写忧愁,委婉曲折,如《春雨漫兴》(其三)、《湖上即事多怀月心之辞》(其二)、《和师言穷居即事韵二首》。易诗中还有一些表现隐居闲适之趣的作品,如《首夏村居杂兴二首》等。其《重午客中三首》和《寄吴中诸友六首》被鲜于枢评为“命意闲远,下语清丽,可谓不流于俗”。清人厉鹗

在《静春堂集》跋语中认为易诗似黄庭坚、陈师道之学杜甫，往往以苍硬盘郁出之，不染元人纤靡之习，又激赏其七古《八月一日雨后》，称其才情奔放如苏东坡。其诗以近体为佳，古体流于平实。著有《静春堂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史铁良）

【方澜】（1263—1339）字叔渊，莆田（今河北完县）人。隐居吴中，独身不娶，闭门读书，授徒以自给，人比之于宋代林和靖。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卒，年七十七。朱德润说他“壮年厌世纷，岁暮少知己”（转引自《元诗选》方澜小传），可以想见其为人。其《渊明》一诗称颂陶渊明，而批评嵇康、阮籍，认为他们虽能逃世，但“终非出自然”。他是个真隐士，因而诗写得非常静穆，如《早秋夜坐》结尾“但息人间累，仙乡不离房”两句有自性清静之禅意。其诗以五言为主，往往在诗的最后抒发有关人世的感叹。著有《叔渊遗稿》。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己集有其小传。（史铁良）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童时即以能文称，先后拜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为师。部使者举茂才异等，授丽泽书院山长。元成宗大德（1297—1307）初，程钜夫等荐为国史院检阅官，进十议，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英宗至治元年（1321），迁侍讲学士。泰定帝泰定（1324—1328）初，辞归。泰定四年（1327）卒，谥文清。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著有《易说》、《春秋说》、《清容居士集》。元代中期文坛上，袁桷颇为活跃，人视其文字如圭璋珠贝，愿一睹之而不可得。其论诗，推崇“唐人风调”。在其各体诗作中，以七言绝句最能体现学唐之痕迹，如《晚访仲章不遇》，写得工整雅致，意境优美，语淡而意浓，确有唐人风调。其五言古峭，但喜说理，兼受晋人玄言诗影响，这在他的《舟中杂咏十首》中表现得较明显，往往由景物而悟理。七言古诗则不同，流利顺畅，颇多警句。他曾到上京，写过一些歌咏塞外风光的诗作。《元史》卷一七二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龚璘】（1266—1331）字子敬，宋司农卿渠之子，自高邮迁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宋亡，渠绝食而卒，璘悲不自胜，遂与其弟理刻苦于学，声誉籍甚，人称“二龚”。后起为学官，历任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宁国路儒学教授、宜春县尹，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与袁易、仇远等交好，赵孟頫称璘与袁易、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璘论诗讲究返诸性情之正。其诗作多性情率真，格调清雅，不甚雕琢，颇能自出新意，如《泊舟》、《偶题》、《吴中寒食》等，都见出诗人身为儒学闲官的闲适、淡泊之情。著有《存梅斋稿》。《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王军）

【吾丘衍】（1268—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贞白、竹素、竹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性旷放，意气简傲。隐居乡间，教授生徒。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因事遭逐卒摔辱，不胜忿恚，留《别仇山村》诗一首与仇远后，自投西湖而死。衍通经史百家之言，工篆隶，晓音律。其诗仿效李贺体，如《洛城晓》、《玉佩谣》等诗，色彩浓烈，想象奇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不能尽脱元人窠臼”，但又谓其“胸次既高，神韵自别，往往于町畦之外，逸致横生，所谓王、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著有《竹素山房诗集》三卷。《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王军）

【贡奎】（1269—1329）字仲章，宁国宣城（今属安徽）人。年轻时即以文学知名，曾任池州路齐山书院山长。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授太常奉礼郎兼检讨。大德九年，迁翰林国史院编修。武宗至大元年（1308），转应奉翰林文字。仁宗延祐元年（1314），除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延祐五年，迁翰林待制，后拜集贤直学士。文宗天历二年（1329）卒，年六十一，谥文靖。平生著述甚多，有《雲林小稿》、《听雪斋集》、《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和《南州纪行》。其著作于明成祖永乐（1403—1424）间被征入秘府，遂不传。惟《雲林小稿》为其后人所存。贡与当时著名诗人袁桷、马祖常、虞集互相唱和，诗多赠答之作。五言古诗古朴无华，但诗味不浓。其诗又多议论，王士禛《居易录》论其诗境地未能深造，当指这类诗歌而言。屏绝议论的律、绝则写得清丽爽朗，如《枪竿岭》、《居庸关早行》、《舟中偶成》等，写景抒情能浑然一体。七绝《池州郡斋除夜寄呈家君》中的后二句“不是今生惜今夕，只缘明日是明年”，在自然平易的语调中蕴含着浓厚的亲情，是其诗中上乘之作。有《雲林集》。《新元史》卷二一一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黄公望】（1269？—1358？）一名坚，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本姓陆，世居平江常熟（今属江苏），髫龄时嗣永嘉黄氏，遂徙居富春（今浙江富阳）。幼有神童之称，应童子科。元世祖至元（1264—1294）中，浙西廉访徐琰辟为书吏，以经理钱粮获罪归，起为中台察院掾，忤权豪，被系狱，出狱后居松江，其时为仁宗延祐（1314—1320）末。自此野服黄冠，易姓名为苦行净竖。卒年八十六。公望博极群书，尤通音律，作画擅长山水，师法董巨源，与王蒙、倪瓒、吴镇为元末四大画家。其诗宗晚唐，多题画之作。他以画家兼诗人的眼光题画，所以诗中既有清晰的画面形象，又有引人遐思的神韵，如《王摩诘春溪捕鱼图》、《王晋卿万壑秋云图》、《为袁清容长

幅》等。诗风飘逸空灵。诗多描写隐者情趣,远离尘嚣,远离社会。即使像《西湖竹枝词》这种民歌体作品,情调也与题画诗相类似,诗中的“湖船女子”也如一位女隐士。这种诗风与他的为人有关,杨维桢说:“其据梧隐几,若忘身世,盖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元诗选》二集黄公望小传中引)。著有《大痴道人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安熙】(1270—1311) 字敬仲,号默庵,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慕刘因,将造其门,而因已歿,乃从因门人乌冲学。后家居教授,推崇刘氏学,力倡朱熹之说,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发展。一生不屑仕进,教授数十年,四方来学者多有成就。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卒,年四十二。其门人苏天爵为撰行状,言其文以理为主,皆是有为而作。其诗学陶渊明,也学朱熹,自然平易,或抒发怀抱,或描写景物,如《拟古次韵六首》、《病卧穷庐时咏静修仙翁和陶诗以自适辄效其体和〈咏贫士〉七篇……》等。其诗题材比较狭窄。作为理学家,诗中时有理语,但与以语录入诗者毕竟不同,而与刘因诗相比,则无论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均相去甚远。有《默庵集》五卷。《元史》卷一八九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张养浩】(1270—1329) 字希孟,号云庄,又号齐东野人,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初为东平学正,游京师,辟为礼部令史,选授堂邑县尹。武宗至大(1308—1311)间,拜监察御史。因言事切直,为当道者所忌,构以罪罢之。养浩恐遭迫害,遁去。后召为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仁宗延祐(1314—1320)初,设进士科,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后以父老弃官归。多次不赴朝廷征召,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赴关中救灾,到官四月,未尝家居,忧劳成疾,卒于任所,年六十,谥文忠。养浩为官清廉,颇有政声,百姓曾为他立碑颂德。为人正直敢言,仕途中常得罪权贵,遭到排挤打击,几遭杀身之祸,因而向往归田过闲适生活。早年文学上受姚燧影响。其诗有较深切的社会内容,如《哀流民操》,就如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在有些怀古诗、纪游诗中也寓讽谕之意。其诗风格潇洒疏淡,间有苍凉色调。其论诗反对模仿,强调诗歌在于抒发自己的情志(见其《和陶诗序》)。养浩亦工散曲,所作大抵平静淡泊。著有《归田类稿》。《元史》卷一七五、《新元史》卷二〇二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许谦】(1270—1337) 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后徙居婺之金华(今属浙江),故谦为金华人。幼孤,发愤

于学,虽病不废,于书无所不读,从金履祥受业,尽得其所传。浙东宪府闻其名而辟之,不就。廉访使刘廷直、副使赵宏伟先后举茂才异等,又以遗逸荐,皆固辞。仁宗延祐(1314—1320)初,居东阳八华山讲学,四方来受业者多达千余人。他一生教授,足不出乡近四十年。为金华学派重要传人。晚年自号白云山人,人称白云先生。顺帝至元三年(1337)卒,年六十八,谥文懿。著有《读四书丛说》、《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抄》、《观史治忽几微》等。谦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认为诗文之作应“扶翼经义,张维世道”,其所作诗实践了这种主张,而能于理趣中含兴象,如《遣兴四首》等。其五言诗高古,颇有汉、魏之音。七言古体较有气势,如《雨花台》、《放棹行》等。著有《白云集》。《元史》卷一八九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柳贯】(1270—1342) 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曾从金履祥学性理之学,又学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至京师,得程钜夫、吴澄器重。元成宗大德(1297—1307)间,始用察举为江山儒学教谕,历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出为江西儒学提举。顺帝至正(1341—1368)初,起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七十三。私谥文肃。与黄潜、虞集、揭傒斯齐名,人称“儒林四杰”。贯以文章著名,其文雄浑严整,长于议论,而不蹈袭陈语。诗作亦多,黄潜言其诗“占硬奇逸”,少作尤甚,实受江西诗派影响,他自己也说“诗成置我江西社”。其五言古诗有古朴之气,但诗味不浓,如《尊经堂诗》,长达一百四十句,诗中竟以议论儒学统绪为主,很少诗味。七律诗中,如《次韵鲁参政观潮》写来雄奇生动,《夜行溪谷间梅花迎路香影离离可爱》又呈冷艳朦胧,《寒食山居》表达闲适之趣,都是较好的作品。其门人宋濂与戴良类辑其诗文为四十卷,谓揭傒斯称赞其诗文“如老将统百万之兵,旗帜鲜明,戈甲焜煌,而不见有喑呜叱咤之声”(见顾嗣立《元诗选》),语虽过当,但可见时人对其评价之高。著有《柳待制文集》,《元史》卷一八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潘音】(1270—1355) 字声甫,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一说绍兴新昌(今属浙江)人。十岁时,闻厓山之变,愀然不乐,以至累日昏迷不食。长大后从吴澄学,终身不仕,衣服礼节一仍宋时之旧。曾认真地效法伯夷、叔齐,一度采野蔬自给,《山中寄友人》诗说:“经岁无稻粱,侵晨采薇蕨。”后经人劝告才事耕作,躬耕祖田十馀亩,非其力不食。筑室南洲山中,名其轩为“待清隐居”。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诏征天下遗逸,坚辞不赴。至正十五年卒,年八十六。平时感愤,则形之歌咏,以抒悲思。他以“《春秋》严

内外,乾坤定冠履”(《远游》)的态度表示其民族立场。诗中屡有“汉月”、“汉遗老”、“汉家”等字样。《读岳武穆传》、《悼文丞相》诗悲歌慷慨。他是一位道地的宋遗民。其诗经元末之乱,散佚很多,直至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才由他的七世孙搜集其遗稿及读书录,编成《待清轩遗稿》。邵远平《元史类编》、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庚集皆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杨载】(1271—1323) 字仲弘。先世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因为钱塘人。少孤,博涉群书。年四十,不仕。户部贾国英数荐于朝,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调管领系官海船万户府照磨。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初,应科举,登进士第,授承务郎、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英宗至治三年(1323)卒,年五十三。其文章深得赵孟頫推重,因而名动京师。载讲究诗法,著有《诗法家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系后人伪托)。据传虞集得其所传诗法。载作诗极为认真,瞿佑曾亲见其诗稿,称其“字画端谨,而前后点窜几尽,盖不苟作如是”(《归思诗话》卷下)。其各体诗作中皆有佳作,瞿佑《归田诗话》对他的诗甚为欣赏,称其作“沉雄典实”。载主张“诗要炼字,字者眼也”,提倡“使字当,下字响”(见《诗法家数》)。他推崇汉魏和盛唐诗歌,认为学诗应由此入门,谓“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见《元诗选》初集丁集)。其五古如《雪轩》,就既有汉魏的朴实,又有唐人之风致,运笔空灵而气韵生动。载诗最为人传诵者为七律《宗阳宫望月》;此诗清空圆润,被人称为“绝唱”。其七言歌行雄浑流利,如《古墙行》、《梅梁歌》在当时就为人所推许。范梈对他的评价颇高,范序《仲弘集》云:“仲弘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集,占纸命辞,傲睨横放,尽意所止。众方拘拘,已独坦坦,众方纤徐,已独驰骏马之长坂而无留行。……要一代之杰作也。”有《杨仲弘集》。《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范梈】(1272—1330) 字亨父,一字德机,人称文白先生。临江清江(今属江西)人。家贫,少孤,赖母亲教育成人。三十六岁入京师,即有声名,被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出为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所至兴学教民,雪理冤狱。迁江西湖东,选充翰林应奉,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不久,以疾归故里,天历三年(1330)卒,年五十九。梈为官廉正淡泊,能为民兴利除弊,吴澄称他为“特立独行之士”,《元史》本传称其“耽诗工文,用力精深”。论诗重视教化,《苍山感秋》云:“机关系风化,词语特细事”,对当日

“雅颂日凋弊”的诗风深为不满,要“举手遏颓波”。虞集评梈诗“如唐临晋帖”,意谓其学古而肖,梈亦尝自言:“吾平生作诗,稿成,读之不似古人,即削去改作。”(见《元诗纪事》卷一三)他的学古主要是学唐,力追李、杜,但与后来明代复古派不同,无生硬模仿之病。《诗法正论》指出:“范公践履不愧古人,故其词翰亦不愧于古人,要皆自其胸次流出,不可强学而能也。”他曾针对现实弊政作歌讽谕,《元史》本传谓其任福建闽海道知事时,“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无别尤甚,梈作歌诗一篇述其弊。廉访使取以上闻,皆罢遣之,其弊遂革”,此诗题作《闽州歌》。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亦予以鞭挞,如《掘冢歌》,对为贪图钱财出卖祖宗坟地而迁走祖坟的人冷嘲热讽。梈作诗好为歌行,如《王氏能远楼》、《题李白郎官湖》、《奉和李监丞醉赠羽人之作》等,挥洒自如。纵横奔放,有李白歌行之风格,特别是前一首,被明人胡应麟当作元人歌行的代表作之一,称它“雄浑流利,步骤中程”(《诗薮》外编卷六)。其近体则绝句胜过律诗。他还总结诗之作法,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二书。有《范德机诗》七卷。《元史》卷一八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萨都刺】 生年有公元1272、1274、1290、1300、1305、1308诸说,卒年有1340、1345、1355诸说,尚难确考。字天锡,号直斋。回族,当时属色目人。一说为蒙古人。祖父及父亲均为武官,因功镇云、代二郡,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萨都刺遂为雁门人。虽出身豪贵,但至都刺家道中落,处于“家无田,囊无储”(《溪行中秋玩月》自序)的困境,因而不得不外出经商。元泰定帝泰定四年丁卯(1327),应进士试及第。干文传《雁门集序》称其“逾弱冠登丁卯进士第”,《新元史》称其“弱冠成泰定四年进士”;也有人谓其成进士时“已经五十五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萨都刺》)。其仕履前人和今人多有异说。据其自序,曾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江南行御史台掾史、闽海廉访司知事、燕南河北道廉访司经历等职。其晚年情况不可确考,据传曾投方国珍幕中,一说晚年致仕,不知所终。萨在当时以写宫词著称,杨维桢云:“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锡善于宫辞,且索余和什”,并称赞其宫词“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见杨维桢《宫词序》)。由于他多年为生计而四出奔波,入仕后,历任品秩较低的地方官,这种生活经历使他能够广泛接触社会,从而写出不少反映现实的作品,如《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等。他的《纪事》诗更为大胆地直指元朝皇帝,对元文宗为争夺帝位而骨肉相残的行为极力讽刺。他的此类作品被后人称为“诗史”。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写了不少山

水诗,由于亲临其境,江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塞外风沙,草原落日的雄浑景象,在他笔下都有细致动人的描绘。诗的风格多样,时而豪放,时而婉丽,又有奇峭、险劲之作。清顾嗣立指出他“能于袁(桷)、赵(孟頫)、虞(集)、杨(载)之外别开生面”(《元诗选》初集戊集)。其诗当时即负盛名,虞集指出,“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清江集序》)。前人又指出他能广泛吸取唐诗精神,学唐之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正是形成他多种艺术风格的原因之一。萨都刺以诗名家,为元代重要诗人。他的词作亦有佳篇,虽传世不多,而其《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为历来传颂的名作。著有《雁门集》。生平事迹见干文传《雁门集序》及今人张旭光撰《萨都刺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虞集】(1272—1348) 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后徙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虞集早年与其弟读书时,有二室,书陶渊明、邵尧夫诗于壁,一题陶庵,一题邵庵,人称邵庵先生。集三岁即知读书,战乱中其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传》以及欧、苏文。元成宗大德(1297—1307)初,至京师,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除国子助教。仁宗即位,为太常博士。仁宗延祐六年(1319),除翰林待制。泰定帝泰定(1324—1328)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文宗即位,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文宗死后,谢病归临川。顺帝至正八年(1348)卒,年七十七,谥文靖。集为理学家吴澄之门人,但并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在学术思想和文艺见解上比较通达,他甚至把时论以为“小道”的杂剧视为“亦不失美刺之一端”,明人还说他作过杂剧。集为元代著名诗人,是当时诗坛领袖人物,世称元诗四大家即以其为首。瞿佑曾引王叔载的话,认为“元朝诸人诗,虽以虞、杨、范、揭并称,然光芒变化,诸体咸备,当推道园,如宋之有坡公也”(《归田诗话》)。沈德潜也认为四家中“又以汉廷老吏为最”。虞集曾评元四家云:杨载诗“如百战健儿”,范梈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诗“如美女簪花”,而他自己的诗“乃汉廷老吏”(见陶宗仪《辍耕录》卷四《论诗》条及《元诗纪事》卷一一),意为法度严整,圆熟老练,是自负之言。集诗多为寄赠题咏之作,不少是应酬文字,但诗中有较强的麦秀黍离之悲,《挽文山丞相》一诗可作代表,陶宗仪谓读此诗“而不泣下者几希”(《辍耕录》卷四),其他如《送杨拱辰》、《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君宋亡隐居不仕而歿……》、《赵千里小景》等也属这类作品。在朝时因屡遭排挤打击,因而诗中常反映出希望退隐田园的心

情,如《张令鹿门图》、《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自赞题白云求陈可复所写像》等诗。在各体诗中,七律成就突出,被明人推为元人七律之冠。著有《道园学古录》。《元史》卷一八一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欧阳玄】(1273—1358) 字原功。祖籍庐陵(今属江西),迁居潭州浏阳(今属湖南)。年十四即下笔成章,经史百家无不研究,尤通理学。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赐进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决疑狱,抑豪右。召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待制。文宗天历(1328—1330)初,署奎章阁艺文少监,修《经世大典》。顺帝元统元年(1333),拜翰林学士,升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后至元五年(1339),拜翰林学士。至正(1341—1368)间,总裁修辽、金、宋三史。至正五年(1345),拜翰林学士承旨。屡乞休不准。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已入1358),卒于大都寓舍,年八十五。谥文。其一生三任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玄以古文名世,诗名却不及虞集、马祖常等人。其诗作以绝句为胜,有些颇有情趣,如《为所性侄题小景》,有些意象飞动,如《京城杂咏》。为前人所称的诗句如“下帘危坐听松涛”、“一夜吹香满六桥”、“为君眠断白云乡”也都有这种特点。诗集中也有像《和李溉之舞姬脱鞋吟》这类香艳之作。著有《圭斋集》。《元史》卷一八二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揭傒斯】(1274—1344) 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贫,读书刻苦,早有文名,为程钜夫、卢摯所器重,荐于朝,授翰林院编修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元文宗天历(1328—1330)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特授艺文监丞。顺帝元统(1333—1335)初,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改翰林直学士,再升侍讲学士。至正三年(1343),总裁辽、金、宋三史。至正四年,《辽史》成,病卒,年七十一。谥文安。他与虞集、黄潜、柳贯号“儒林四杰”,黄潜称赞他的文章“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法”。又与虞集、杨载、范梈共称元诗四大家。虞集评其诗“如美女簪花”,又谓“如三日新妇”,他对此不满,曾亲质于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此类诗如《桃花鹦鹉》、《赋得吴歌送人归吴中》、《云锦溪棹歌》等。其诗也有豪放的一面,歌行师李白,如《登祝融峰赠星上人》、《赠玄上人》、《居庸行》等,气势奔放,一泻千里。所作写景诗则淡雅清新,如《北楼雪后酒醒独吟》、《过江州》、《南康夜泊闻庐山钟声》等诗,都有清幽的意境,题画诗也有这种特色。

他的《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诗使人觉得他在烟云雨幕之中酝酿着人间生活乐趣,是另辟蹊径的山水诗。其诗中也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临川女》、《雨述三篇》、《祖生诗》等。在各体诗作中,五言短古写得甚为圆熟,也有一些平易流畅、有民歌风的歌谣体诗。著有《揭文安公全集》。《元史》卷一八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萧国宝】字君玉,号辉山。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乡举官吴江。东鲁孔涛为其集作序,称近世浙右以诗名者称张、邓、仇、白,余皆获从之游,独以不及一识君玉为憾。时为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由此可知萧国宝与仇远、白珽同时。现存诗仅二十多首,顾嗣立《元诗选》选其诗十二首。其七言律诗时露雄豪之气,如《饯张大使游淮》、《夜过吴江》、《晚兴》等。《晚兴》前六句写萧瑟秋色,末句却转出“满目青山入翠微”的明朗景象,表现出襟怀的开阔。其五言律诗则以工整见长,诗中炼字亦见功力。孔涛序称其“握瑜怀璞,韞而不沽,发而为诗,皆有补于世道”。著有《辉山遗稿》,系其后人所编。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甲集有其小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其先京兆杜氏,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属江西),故为清江人。博学善文,工书法。吴越岁饥,上救荒策,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大奇之,用其言,米价顿平。遂力荐于武宗,被召至京师。会武宗逝世,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即位后,征之不起。顺帝至正三年(1343),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编修官,行至杭州,以病辞归。至正十年(1350)卒于武夷,年七十五。学者称为清碧先生。所著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又曾集宋末遗民二十九人诗百篇,题名《谷音》,鉴别甚精。自谓得杨载诗法,与虞集、杨载有诗赠答,但平日作诗不存稿,所传百无一二。其诗语言极通俗,如《武当山张真人奉诏祷雨有应》,写来如同口语。其诗病在浅俗,顾嗣立谓其“集中所载,应酬俚率,殊不称其名”(《元诗选》初集己集)。然其五言、六言小诗却有淡雅之作,如《小隐岩》、《题柯敬仲梅》诸篇。著有《清江碧嶂集》,系其门人程嗣祖所编。《元史》卷一九九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张雨】(1277—1348)字伯雨,一字天雨,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崇国公张九成之后。博学多文,襟怀洒落。二十岁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弃家为道士,法名嗣真,登茅山,授《大洞经篆》。曾与开元宫王真人一同入京,朝廷欲授以官职,不受。往来华阳云石间,作黄篋楼,储

古图史甚多。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卒于开元宫斋舍。雨虽然托迹黄冠,其实仍属文人士大夫,交游很广,以方外诗人,与馆阁词臣相颉颃。赵孟頫授之以李北海书法,又从虞集受学。范梈、袁桷、马祖常、杨载、揭傒斯、黄溍等均与之结交,名震京师,晚年尤为杨维桢所推重。其诗清雅新奇,亦有豪迈之气。明顾起纶在《国雅品》中将其列入“仙品”,称“其诗如深谷幽兰,苾芬远袭,亦品中灵秀也”。杨维桢亦称其诗“俊逸清淡”,其《怀茅山》诗,即属此类。清王士禛则欣赏其诗颇有“坡、谷遗风”,这当指他的《万壑松涛》一类诗。雨虽为方外之士,但也不能完全忘怀世事,如《避暑图》中民生之苦便流于笔端。著有《句曲外史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世称金华先生。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少时从南宋遗民方凤学,受老师影响,壮岁隐居不仕,县吏强迫他应试,中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授台州宁海丞,改诸暨州判官,皆有治绩。文宗至顺(1330—1333)初,以马祖常荐,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转国子博士,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亟请侍亲归,俄以秘书少监致仕。顺帝至正七年(1347),起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升侍讲学士。屡上章乞休。至正十年,得请南归。至正十七年卒,年八十一。谥文献。史称溍清高节,足不入权势之门,纤尘不染。与虞集、揭傒斯、柳贯齐名,号“儒林四杰”。以文章出名,为文严谨精切。诗以五言见长。杨维桢称其诗“多冲淡简远之情”,胡应麟《诗薮》也称其“仿孟浩然”,大抵指其五言诗而言,如五古《游西山同项可立宿灵隐西庵》、五绝《山中偶题》等。虽然溍出生时宋室已倾覆,而其诗中亦有故国之思,如《金陵天津桥》、《宣和画木石》等诗都流露出对故宋的怀念之情。溍诗多议论,如描写塞外风物的《上京道中杂诗十二首》中也杂以议论。著有《黄学士文集》。《元史》卷一八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陈泰】字志同,号所安。长沙茶陵(今属湖南)人。约元世祖至元(1264—1294)中至仁宗延祐(1314—1320)间在世。曾与欧阳玄同举于乡,以《天马赋》得荐。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官龙泉主簿,终于此任。平生惟以吟咏自适,所传诗以七言歌行为主,大致气格近李白,造句则多类李贺、温庭筠,如《秋江钓月图歌》、《朔方歌》、《松障图歌》。诗中常有怀才不遇的感慨,《题赵子昂画马歌》借马言怀,《将离京师别李朝端陈伯奎二同年》亦是抒发不平之气。亦有如《贫女行》等反映民生艰难、社会黑暗的篇章。还有一些模仿民歌体的作品,与其为数不多

的五言律诗一样,写得清婉有致。著有《所安遗集》,系其后人所编,到明代成化年间重刊时,已多有蠹损。《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丁复】字仲容。天台(今属浙江)人。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初,游京师,公卿奇其才,与杨载、范梈同荐入馆阁。复度当政者不能用,翩然离去,遨游江湖,定居金陵。买宅于城北,南户有两桧树,醉则倚树吟咏,因而命其诗集为《双桧亭诗》。丁复学博才敏,为诗不事雕琢,主张格超趣远,求得古人真味。好酒,常常酒后引觞挥毫,时人比作李太白。其《月湾钓者歌》一诗,句句扣“月”字,末句“酒后耳热醉舞明月歌呜呜”直是作者的真实写照。一生不仕,诗中尝有窥破世情,深知人世无常之感,如“人生有时亦如此,请看秦淮江水流”(《淮上作》)、“何如官寺听车马,空伴黄尘起断钟”(《送万容长老归故山》)。著有《桧亭集》九卷。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己卷有小传。

(王军)

【谢宗可】字号不详,自称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约元文宗至顺(1330—1333)前后在世。疑与杨维桢相识。有咏物诗一百零六首,均为七言律诗,风格纤巧,人称“百咏诗”,当时颇传诵。与前人咏物有所不同,他别出心裁,不一般地咏燕、蝶,而咏“睡燕”、“蝶使”,也不一般地咏雁、莺,而咏“雁字”、“莺梭”。其标题纤仄,继承了唐代雍陶等人的传统而愈趋于新奇。其诗佳句不少,而全篇皆佳者不多,以《走马灯》、《莲叶舟》、《睡燕》、《卖花声》数首为好,在语言风格方面,“绮靡而不伤于华,平淡而不伤于俗”(《元诗选》初集谢宗可小传中引汪泽民语),能极肖物态而有情趣。顾嗣立对其诗颇为欣赏,《元诗选》选录四十首,又摘句二十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格调虽卑,才思尚艳。”宗可诗中极少能引人深思的寄托,如写纸鸢的“半纸飞腾原在己,一丝高下岂随人”这种富于启迪性的佳句几乎绝无仅有。著有《咏物诗》。《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陈樵】(1278—1365)字居采,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隐居閤谷间,衣鹿皮,自号鹿皮子。一生不赴征台,专意著述,长于说经。与黄潜、杨维桢和刘基友善。好为古赋,组织绵丽,有魏、晋人遗风。其诗则古体五言胜七言,近体七言胜五言。七言古体学李贺与温庭筠,七言近体学陆龟蒙。顾嗣立评其诗“属对精巧,时有奇气”,并摘录其诗句说,“可以步武西崑诸作”(见《元诗选》初集戊集)。但与李贺诗相比,其精刻之思毕竟与山泽相近,为隐者之诗。其诗以题咏为多。杨维桢非常赏识陈诗,称其学李贺诗之“势”,而非袭其词,如《太霞洞》就写得色泽冷

艳,《虞美人草词》、《雁来红》、《海人谣》等都表现出构思奇巧之特点。其诗题材比较狭窄,主要表现文人隐士的兴趣与心态。集中有《北山别业三十八咏》,分写其隐居之所水石花竹之趣,则可知其亦非穷乡苦寒之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古体诗开闭口韵通押,近体诗押韵过宽。但或是有意为之,以示不受拘束。其诗病在雕琢太甚,如“诗无獭髓痕犹在,梦有鸾胶断若何”之类。著有《鹿皮子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世为庸古部,雍古即汪古,也称白鞑鞑,曾被视作蒙古族的一部。六世徙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锡里吉思,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其子孙循以官为氏之例,即姓马。曾祖月合随元世祖南征至汴,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移家于光州定城(今河南潢川),祖常遂为光州人。七岁知学,及长,益笃于学。蜀儒张颐讲学仪真,往受业其门,为颐所器重。仁宗延祐(1314—1320)初,参加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改宣政院经历。因弹劾奸相铁木迭儿,左迁开平县尹。为避祸退居光州。铁木迭儿死后,任翰林待制,寻兼翰林直学士,除礼部尚书,迁江南行台中丞,顺帝元统元年(1333),拜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不久,辞归光州。至元四年(1338)卒,谥文贞。祖常为文宏赡精核,务去陈言,宗法先秦两汉,而自成一派。尤工于诗,与虞集、袁桷互相唱和,是仁宗延祐、文宗天历(1328—1330)年间京都诗坛之活跃人物,是元代少数民族卓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曾漫游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又到过西夏故地,诗歌内容丰富。诗中对达官贵人、贪官污吏、无耻小人以及当时弊政,时露讽刺之意,对民生疾苦则充满同情。《元史》本传赞其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其实其写景还有气势磅礴之一面,如《龙虎台》、《都门壮游》。著有《石田集》。《元史》卷一四三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李存】(1281—1354)字明远,又字仲公,饶州安仁(今属江西)人。好为古文辞,通医术。从上饶陈立大学陆九渊之说,论学以省察本心为主。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间开科举,一试不第,即决计隐居。后以隐逸荐,不应。李孝光举以自代,当局将以翰苑处之,未果。修书室,题为俟庵,有诗云:“生则居庵中,死则埋庵旁。”以授馆为业,人称番阳先生。晚年为学生迎养于临川。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卒,年七十四。与祝蕃远、舒元易、吴尊光志同行合,号为“江东四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文“平正醇雅,不露圭角”。他于理学家之义理,文学家之辞工,二者兼而有之。古体诗学汉、魏以上,如《下

第南归别俞伯贞》即步趋汉、魏古诗之作，只是气骨较弱。《西山歌》则模仿《诗经》。虞集称其诗高古，当是指此类诗而言。其诗在明白晓畅中表现出锤炼的功夫，可以看出其炼字炼句之工力。有些小诗颇有韵味，如《怀友》。在其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品中有一首《伪钞谣》，这种题材在元诗中属罕见。著有《俟庵集》，系其子李卓所编。《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洪希文】(1282—1366) 字汝质，号去华山人，兴化莆田(今属福建)人。其父洪岩虎为宋贡士，宋末曾任兴化教谕。会兵乱，父子二人居万山中，朝餐孟饭，烧芋咬菜相唱和。父死后，在家乡授徒为业，后被聘为郡庠训导，卒年八十五。同郡人林以顺谓其诗得意处，皆自肺腑流出。至于造语炼字之法，颇费工夫(见《元诗选》初集洪希文小传)。其诗受江西诗派影响，五言古诗古硬，五言律诗略呈拗涩，如《独立》诗之“鸭头流水净，鱼尾断霞赭”。诗中也偶有“袖千钧铁何伟哉”(《癸酉六月十四日臂痛不自聊戏作短句》)这样的散文句式，前四字成上一下三的形式，打乱诗中节奏以求奇，还有喜用僻字之病。不过洪作中仍有不少流畅可诵之作，多为七律，如《仙邑馆所归溪行书触目》、《客中遇寒食》、《新秋客中》等。蔡宗充序希文集，称其诗“譬诸夏鼎商鬲，华采虽若不足，而浑厚朴素之质，使望诸知为古器”(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父有《轩渠集》，希文因自名其集为《续轩渠集》。《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陆友】字友仁，号砚北生，平江(今江苏苏州)人。父业贾，友攻读于学，为邻里窃笑。曾至上都，受柯九思、虞集激赏，未及用，因二人去职而返吴。辟斗室，名曰志雅斋，终生不仕。博于鉴古，兼工隶楷，凡三代而下钟鼎铭刻，法书名画，一入其目，真贋立辨。经其品题，价增数倍。为诗有法度，尤长于五言律。亦善题画诗。其《题米元晖画山水》、《题倪幻霞良常草堂图》等，皆深得画意，清新淡远；《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涉宋江聚义故事，为研究《水浒传》者重视。著有《杞菊轩稿》。《元史新编》卷四七有传。

(王军)

【袁士元】一名宁老，字彦章。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约元顺帝至正(1341—1370)前后在世。年近四十时犹未求仕。御史奥林以茂才荐，授鄞县县学教谕，调鄞山书院山长。参政危素荐为平江路学教授。后召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不赴。在城西筑别墅，种菊数百株，自号菊村学者。放情山水间，与僧人、隐士相唱酬。其诗较有唐人风韵。危素序其集，称其诗“清丽可喜”，如《简楼伯容》、《和嵯县梁公

辅夏夜泛东湖》、《题水西轩和府推何德孚韵》等，语言平易而韵味悠长，意境清幽。也有忧叹现实之作，如《北门团练贝子美》、《米贵》等。部分诗缺乏浑成的诗境，而语言伤于粗浅。著有《书林外集》。其传记资料见曾廉《元书》卷九一及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己集。

(邓绍基 史铁良)

【张端】字希尹，江阴(今属江苏)人。元顺帝至元(1335—1340)末前后在世。博学好修，工诗。以荐授绍兴路和靖书院山长，历官海盐州判官、江浙行枢密院都事。人称为沟南先生。与倪瓒有诗唱和。其诗平易，一般不用僻典，善于刻画心理，如《秋怀》之写飘零之感，《和传可除夕》之感叹时光流逝。他还写了一些民歌体作品，其中《宾鸿吟》受到前人称许。《白头母次徐孟岳韵》写一老妇的悲惨命运，是其集中现实性最强的作品。更多的是对埋没人才的叹息，或正用或反用典故来抒发这种感慨。著有《沟南漫存稿》。生平见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己集。

(邓绍基 史铁良)

【吴师道】(1283—1344) 字正传，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少与许谦同师金履祥，登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进士第，授高邮县丞，再调宁国路录事，迁池州建德县尹，因荐入为国子助教，不久升博士。其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许衡之成法。以礼部郎中致仕。顺帝至正四年(1344)，终于家。著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辨》等。他在和吴莱诗中说“丈夫穷达岂所论，要以不朽垂乾坤”，可见其抱负。师道好学善记，才思涌溢，常与黄潜、柳贯、吴莱往来唱和。诗作古体为多，胡应麟对其七古评价颇高，称其“《十台怀古》诗，气骨铮铮”(《诗薮》外编卷六)。近体以七律为佳，其中《赤壁图》和《野中暮归有怀》等均属上乘之作。五言律诗时有“悬空飞万瀑，拔地立千峰”一类佳句。从总体看，其诗气骨遒劲，亦有意境。著有《吴礼部诗话》，认为“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强调亲历其境的重要。论诗不拘一格，称即使卢仝奇怪，贾岛寒涩，也自成一家。而对陶渊明的诗则十分推崇。有《吴礼部集》。《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朱德润】(1284—1355) 字泽民，世居睢阳(今属河南)，先祖于金时南迁平江(今江苏苏州)，遂为吴人。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游京师，经赵孟頫推荐，仁宗召见于玉德殿，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出为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英宗猎于柳林，召见，献《雪猎赋》，旨留京师。英宗死后，辞官归吴，杜门屏居三十年。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起为江浙行省照磨官，参军事，代理长兴州尹，一年后因病免官。至正十五年(1355)卒，年七十

二。工诗能文,善书札。又擅长画山水人物,文名为绘事所掩。虞集曾诫之云:“自兹以往,泽民其丰于文而啬于画可也。”(见《元诗选》初集朱德润小传)。由于善画故往往诗中有画,如《沙湖晚归》、《晓晴》、《翠雨亭诗》等。又曾写过一组仿白居易新乐府的诗歌,通过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描写,触及到社会黑暗和不平的某些方面,对当时的弊政有所揭露,在其他诗作中亦有这种内容。其七律较有气势,如《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又和顾仁甫观潮》等诗。然多数作品缺少深长的情韵。著有《存复斋集》。《新元史》卷二三七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贯云石】(1286—1324) 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姓,初号疏仙,后改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出身于畏吾(即今维吾尔族)贵族,祖父阿里海涯为元初名将,随世祖征战有功,官至湖南行省左丞相,其父曾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云石生于大都。年十三,膂力过人,善骑射,可飞身上奔马,运槊生风。稍长折节读书,初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治军极严。数年后让爵位于其弟,北上师从姚燧。仁宗为太子时,选他为硕德八剌(即英宗)官邸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仁宗延祐(1314—1320)初,称疾辞官去江南,寓居杭州,过着“浪士”生涯,或混迹于屠沽,或与樵牧为友,曾卖药于市中。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卒,年三十九。谥文靖。云石富有才情,吐辞为文,不蹈故常。《寒厅诗话》称其与冯子振等人于四大家之外,“开阖变怪,骇人视听”,《元史》本传记姚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晚年诗风清丽冲淡。其诗集久佚,现存诗不足四十首。他又是散曲名家,诗名遂为曲名所掩。著有《酸斋集》。《元史》卷一四三有传。今人杨濂著《贯云石传》,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绍基 史铁良)

【岑安卿】(1286—1355) 字静能,余姚(今属浙江)人,因其所居近栲栳峰,遂自号栲栳山人。一生未仕,有《会资敬庵》诗云:“我穷不出门,颇觉天地窄”,正是其坎壈一生之写照。其五言诗质朴,时有议论,而缺乏文采,诗意较淡,但诗中体现的孤高之情,正类其为人。相形之下,他的七言写得较好,气势流畅,也有文采,如《凤凰台》、《谢李仲容见赠》诸诗。有些诗作见出李贺的影响,除《伤心行用李长吉韵》这种直接仿效的作品外,其《逢秋》诗亦有李贺诗的意境,语言风格也极类似。有《栲栳山人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周权】(1286?—1345?) 字衡之,号此山,处州丽水(今属浙江)人。少壮负才而不得志,元仁宗延

祐五年(1318),入京师,得赵孟頫、袁桷、欧阳玄等人赏识。袁桷认为他可以选预馆职,力荐于朝,未果。于是权益肆力于词章,诗名日起,唱和日多。与陈旅是知交,又与当时文坛耆宿赵孟頫、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马祖常等人相互酬答。赵孟頫赠诗有“顾此山中,风神照松色”之语,又亲笔书“此山”二字以赠。陈旅为之选《周此山诗集》,并赞其诗“简淡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欧阳玄也为作序,称其诗“无险劲之词,而有深长之味;无轻靡之习,而有春容之风”。其诗对大自然有精细的描绘,如《溪之滨》、《山中云》、《惠山寺九龙峰下酌泉》等,写景和谐优美,意境雅淡,想象也有出奇之处。顾嗣立《元诗选》摘其佳句,如《村行》诗中的“桥断春堤多积雨,溪深野碓自春云”之类。不过他笔下的山村并不都是宁静美好的,《悯荒》诗就写出了“时阳忽久亢,生意几不堪”这种令人忧心的景象。著有《此山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王冕】(1287—1359) 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九里先生、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出身农家,幼年牧牛,常入村塾偷听学生诵书,夜则入佛寺就长明灯苦读。著名儒者韩性闻其好学,收为弟子,遂通《春秋》。应进士试不第。李孝光屡荐之府吏,以不愿当“抱案奴”而不就。绝意仕进,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大川,与奇才侠客交,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呼为狂奴。北游大都时,泰不华荐以馆职,冕云:“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遂南下,携妻儿隐于会稽九里山,结茅屋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又命其居为竹斋。题舟为浮萍轩,游于鉴湖。曾著书一卷,自言“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见《明史》本传)。关于其结局,有两说,宋濂《王冕传》说他为朱元璋所用,为谏议参军,并参与策划明军攻打绍兴,一夕病卒;徐显《稗传》说王冕为元末逸民,未任明参军,系不降其志而死者。朱彝尊也力主后说。顾嗣立据此说将其诗收入《元诗选》,而不赞成视其诗为明诗。冕诗风格自然质朴,刘基在《竹斋集序》中称其诗“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冕反映现实的诗作效杜甫诗法,其《伤亭户》与杜诗《石壕吏》写法酷似,这类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是相当深刻的。冕尤工于七言。其七言歌行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似受李白诗影响,如《寄太素高士》、《剑歌行次韵》、《赵千里夜潮图》等。而明顾起纶《国雅品》则认为其七言“抽思虽奇,而摘词未秀”。冕一生爱梅,其咏梅之作往往表现出清高孤傲,《墨梅》诗中“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两句,正是作者本人品

格的写照。冕又是画家,尤工于画梅,以缙幅长短计价,其没骨体梅花曾耸动京师,贵人争购。著有《竹斋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许有壬】(1287—1364) 字可用。彰德汤阴(今属河南)人。年二十授开宁路儒学正,辟山北廉访司掌书。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延祐六年,除山北廉访司经历。英宗至治元年(1321),迁吏部主事。至治二年,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改中书左司员外郎。泰定三年,升右司郎中。文宗天历三年(1330),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顺帝元统二年(1334),拜中书参知政事。至元(1335—1340)初,归彰德,南游湘汉间。至元六年,召入中书,仍为参知政事。至正元年(1341),转中书左丞。至正二年,称病归。至正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五年,拜中书左丞。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八。谥文忠。有壬仕宦七朝,近五十年,是“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元史》本传)之诤臣,因此常遇到宦海风波。诗多感愤之作,揭傒斯称其“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忧愁感愤,一寓之于酬唱”(转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许有壬小传),如《闲居杂诗四首》、《和傅汝砺寄来韵二首》(之二)等即是。顾嗣立也说:“观此等诗,亦可以知其不得意之概矣。”(《元诗选》初集许有壬《闲居杂诗四首》后的评语)其诗题材比较广泛,如描写民生苦难的《哀弃儿》;对“官家开边”提出异议的《喜逢口》,这种题材在元诗中不多见。他到过上京,所作《上京十咏》写少数民族地区特产新奇有趣。晚年在圭塘别墅留连觞咏,多咏闲适之趣。著有《至正集》、《圭塘小稿》。《元史》卷一八二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张翥】(1287—1368) 字仲举,号蜕庵,晋宁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年轻时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为意。后闭门读书,先从江东大儒李存学陆九渊之说,后师著名诗人仇远,以诗文名一时。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以隐逸荐,召为国子助教,不久退居淮东。会修辽、金、宋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历翰林应奉、修撰,迁太常博士,升礼仪院判官。又迁翰林,历直学士、侍讲学士,以侍读兼祭酒,除集贤学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至正二十八年(1368)卒,年八十二。翥善诗文,而文不如诗。其写作态度十分认真,释来复在《蜕庵集序》中称其“造语命意,一字未曾苟作”。明、清时胡应麟、王士禛对其诗作评价甚高,认为不在赵孟頫、虞集之下。翥诗多讽谕,有元、白、张、王传统。工近体,多忧时伤乱之作。其五、七言律,诗法熟练,对仗工整自然,

如《岳心亭》、《赋中书左曹小瀛州》等。其诗时有雄浑之气。写景也不乏精美之作,《秦淮晚眺》、《浮山道中》都如画图。翥亦以词名。陈廷焯称其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为“一代正声”(《白雨斋词话》卷三)。著有《蜕庵集》、《蜕庵词》。《元史》传一八六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陈旅】(1288—1343) 字众仲,兴化莆田(今属福建)人。幼孤,笃志于学,于书无所不读,被荐为闽海儒学官。马祖常奇其才,与游京师。虞集见所为文,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见《元诗选》初集戊集陈旅小传),即与祖常为延誉于公卿间。平章赵世延力荐为国子助教。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至元四年(1338),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1341),迁国子监丞。至正三年卒,年五十六。旅为文典雅峻洁,文名大于诗名。其诗有民歌风,如《和萧秀才歌风台》等怀古之作,不用律体,而有歌谣风味,再如《分题得车遥遥送方叔高之官》,也采用民歌体制,从中可见其受六朝歌谣体影响,部分律、绝能描绘出优美之意境,如《建昌胡氏小有楼》、《次韵本元上人相别》、《题虞先生词后》等;后者用虞集名作《风入松》词意,十分切题。但从总体看,其诗个人风格不够突出,有时好用僻字。著有《安雅堂集》。《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黄镇成】(1288—1362) 字元镇,号秋声子。邵武(今属福建)人。立志于学,不慕荣利,筑南田耕舍,隐居著书。元文宗至顺(1330—1333)间,曾历览楚、汉名山,周游燕、赵、齐、鲁之地,浮海而还。经屡次荐举,皆不就。其后授江西儒学副提举,命下而已卒。集贤院定号为贞文处士。由于历游南北,得江山之助,其山水景物诗便成诗集中之精品。王士禛《居易录》称其《秋风》、《秋山小景》、《五曲精舍》三诗,认为“具有风调”,但其韵致楚楚之作并不仅此三首,他如《东阳道中》、《舟过大茅洋》、《春日行近山》等诗亦具情韵。其诗中且不乏佳句警句。新安郑潜为镇成所著《秋声集》作序,称其诗云:“如太音希声,天籁自鸣,抑亦有所激而鸣其不平者耶?”从《余作南田耕舍……因作写怀二首以自解云》、《城西纪事》等诗看,镇成实为不能行其匡时之志而隐于山林者,故诗中自有忧时感事之语。著有《秋声集》。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皆有其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沈梦麟】 字元昭,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举乡荐,授婺源州学正,迁武康令。至正(1341—1368)中,解官归隐花溪故里。明初以贤良征,辞不起。尝应聘入浙、闽校文,两次

会试同考,明太祖称其为“老试官”。年近九十而卒。梦麟与赵孟頫为姻家,传其诗法,七言律体最工,时人称为“沈八句”。刘基早年与之游,尝寄赠诗云“杜陵老去诗千首,陶令归来酒一尊”,可见其人其诗。杜甫晚年律诗炉火纯青,故用以比沈,后句陶令云云言其不事二姓。著有《花溪集》三卷。生平事迹见《宋元学案》、《大明一统志》等。(王军)

【成廷珪】(1292?—1362?)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扬州(今属江苏)人。好学而求仕进,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有山林意趣,自题所居为居竹轩。自谓:“仕宦无天分,田园无先业,学艺无他能,惟习气在篇什,朝哦夕讽,聊以自娱而已。”(见《元诗选》成廷珪小传)其作诗态度十分认真,以至入迷,与人谈论,心中却“注思揣练,有得则跃跃以喜,一字或聱,必帖乃已”(张翥序)。与当时著名诗人张翥友善,其音律体制,往往得益于张。又与名诗人杨维禎、危素、余阙、张雨、倪瓒等人相唱和。元末之乱中,避于吴中,后歿于松江,年七十馀。其诗能反映元末社会的动乱情景,如《戚戚行》、《闻中原河决盗起有感》、《赋林泉民》等。五言诗务求自然,不事雕琢。七言律诗最工,其友人邹奕称其声名与张翥相颉颃,其实张翥七律一气贯注,颇有气势,为廷珪所不及。七言古诗则清华道丽,如《半山歌为徐干周逸君作……》、《雪舟歌为王子中赋》等。邹奕称廷珪“能揣练六朝之情思,以入唐人之声律,变化寻常之言为警策之句”(见《元诗选》成廷珪小传)。其名作《题宋徽宗白头翁图》即属此类作品。著有《居竹轩集》。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戊集有其小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宋褰】(1292—1344)字显夫。大都(今北京)人。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登进士第,除秘书监校书郎,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顺帝至元三年(1337),擢监察御史,遇事敢言。出金山南廉访司事,改陕西行台都事。月馀,召拜翰林待制,迁国子司业,与修宋、辽、金三史,拜翰林直学士。卒年五十三。谥文清。褰博览群书,与兄宋本齐名,人称“大宋小宋”。中进士前,于仁宗延祐(1314—1320)中挟所作诗歌,随兄入京师,得当时名公元明善、张养浩、蔡文渊等人赏识。诗名较大,欧阳玄称其诗“务去陈言”,“清新秀伟”;苏天爵称其诗“清新飘逸,间出奇古”;危素称他的诗“精深幽丽”,“成一家之言”(见《元诗选》二集宋褰小传)。但其多数诗作实流于一般,且有粗粝之病。《阅乡道中》是他五言中较好的一首,但后半首也嫌直露。其诗有时出以奇思,如《洗车雨》,构思不同于一般的七夕诗,从中又可看出学李贺诗的痕迹。著有《燕石集》。传附《元

史》卷一八二宋本传。(邓绍基 史铁良)

【郑元佑】(1292—1364)字明德,儿时因乳母失手,致伤右臂,长大后能以左手作楷书,世称一绝,遂自号尚左生。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后侨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年十五为诗赋,往往出奇语惊人,于书无所不读,广交名士。浙省宪台荐于朝,因臂疾不愿仕,优游吴中近四十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授平江路儒学教授,一年后因病去职。后七年,擢江浙儒学提举。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三。其时张士诚已降元,杭、嘉、湖、苏是士诚势力范围,后人说郑元佑依张士诚,即指任学官事。元佑与当时名诗人多有唱和,是顾瑛玉山草堂文酒之会的座上客,雅集记序之作,多出其手笔。为文豪宕有气,诗格清峻苍古。学杜甫,甚至以杜甫自比,《出塞七首效少陵》即仿杜甫的前、后《出塞》。其诗中,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如《岁暮感事》诗。在《杭州即事》中,又借杜甫的忧国忧民事来抒发对时局的焦虑。在元佑的各体诗中,七律以清峻见长,如《和萨天锡留别张贞居寄倪元瓚》、《送章高士入闽兼简杜清碧先生》等。五言较苍古,如《岳生画竹》和《云林小景》等。著有《侨吴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周霆震】(1292—1379)字亨远,因先世居石田田西,自号石田子初。吉安安福(今属江西)人。曾两次应进士考,不第,遂杜门授徒,专意古文辞。晚年遇元末战乱,避乱奔走。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卒,年八十八。门人私谥为清节先生。霆震论诗反对靡丽,排斥晚唐。五言古宗汉、魏。因目睹元代之盛,又见其亡,故诗多乱离之音。诗中还表达其效忠元王朝的心情,对为元王朝死节之人多有歌颂,如《古金城谣》、《李浔阳死节歌》、《普颜副使政绩歌》等,都写得感慨激昂。其集中也有写得蕴藉的小诗,如《篱间小花》、《雨中》等。因他亲历动乱,描写时事,言之凿凿,所以其诗被认为“可为国史补”(陈一德序中语),而他本人则被称为“江南野史”。著有《石初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胡天游】名乘龙,以字行,别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氏。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约卒于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幼年即有诗才,七岁所作短诗《游法兴寺》即具风力。生值元末之乱,隐居不仕,孤高自负,以诗自娱。其七言歌行豪迈悲壮,如《拟赋荆轲馆》、《醉歌行》等。其小诗别有情趣,如《春词和韵七首》,描写少女的娇态鲜明生动。前人谓其诗歌“与虞(集)、赵(孟頫)诸公相出入”,或“视伯生、子昂,不输一筹”(均见《元诗选》初集胡天游小传),则

不免有溢美之处。著有《傲轩吟稿》。《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苏天爵】(1294—1352) 字伯修,学者因其所居,称为滋溪先生。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少从学于安熙,为国子学生,吴澄、虞集、齐履谦先后为之师,又得马祖常赏识。国子学公试,名列第一。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文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次年,升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顺帝元统二年(1334),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至元(1335—1340)年间,历刑部郎中、礼部侍郎、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枢密院判官、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至正(1341—1368)年间,历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陕西行台侍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等职。官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于饶、信。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天爵善治狱、理财、办学。著有《国朝名臣事略》、《国朝文类》、《滋溪文稿》等。《元史》本传称,是时“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其为文长于叙事,平易温厚,具有宋文的特点。其诗多古体,从容严谨,但有些诗只是模仿《诗经》、《楚辞》,如《鹤寿堂诗》、《千夫长梁侯寿诗》、《甄处士访山亭》之类。《元史》卷一八三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谢应芳】(1296—1392) 字子兰,号龟巢。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为人耿介尚节义。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江浙行省举为三衢清献书院山长。阻兵,居吴之葑门,转徙吴淞江上。教授之暇,以诗酒自娱。入明后,年逾八十,归隐横山。应芳细绎经史,作为文章,皆有根柢,多关于国计民生、人心风俗。闽人张志道评其诗雅正纯洁,可与傅若金相伯仲。(见《元诗选》二集谢应芳小传)其律诗、绝句大多蕴藉有致;而其五、七言古诗则多以白描手法描绘战争惨景,慷慨悲烈,如《淮夷篇》、《过无锡书所见》、《烈妇歌》等。著有《龟巢稿》二十卷。《明史》卷二八二有传。(王军)

【张昱】字光弼,号一笑居士。吉安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事虞集,得其诗法,又为张翥所知。曾在江浙行省左丞杨完幕下参谋军府事,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杨死后,弃官不出。元亡,被征召入京,明太祖怜其老,言:“可闲矣。”厚赐使归。于是更号可闲老人。退居西湖寿安坊。曾于酒间对瞿佑言:“我死,埋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见《元诗选》初集张昱小传)卒年八十三。其诗风格雄浑悲凉,七古《过歌风台》是其得意之作,曾亲自以界尺击桌,为瞿佑朗诵,瞿称此诗“豪迈跌宕,与

题相称”。(见《归田诗话》卷下)律体中,有气宇阔壮之作,如《五府驿代杨左丞留题》,也有思意缠绵之作,如《饮吴令家》。其诗法度老成,但也有不少平庸之作,像《辇下曲》一百零二首,《宫词》二十一首,主要写宫闱中事,其格局不出前人窠臼,仅有可资史家考证的价值。著有《张光弼诗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杨维桢】(1296—1370) 字廉夫,其父筑楼铁崖山中,聚书万卷,使维桢于楼中读书五年,因自号铁崖,又号铁笛道人。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进士,任天台尹,改钱清盐场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后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赴,逢兵乱,避于富春山。后徙居钱塘,张士诚召之,不往。后筑室松江,有小蓬壶、草玄阁诸胜,与文人墨客诗酒唱和,以声色自娱,生活放纵。维桢有时吹铁笛作《梅花弄》,坐客踟蹰起舞,被视为神仙中人。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召维桢纂修礼乐书,推辞云:“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次年,仍遣使敦促,维桢进《老客妇谣》一首以明志,进京留一百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求归。太祖成其志,赐安车还山。宋濂赠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抵家卒,年七十五。与陆居仁、钱惟善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维桢为元末诗坛领袖。论诗主张写个人性情,不同于传统的“性情之正”即“温柔敦厚”说,实际上开明代性灵说之先河。还反对元初以来在宗唐风气中出现的模拟弊端,在《吴复诗录序》中言:“后之人执笔呻吟,摹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偃,而去古愈远。”由于维桢与弟子及其追随者形成一个诗派,所以其诗名声很大,有铁崖派之称,其诗则被称为铁崖体。论诗和创作都表现出排斥律诗而提倡古乐府的倾向,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而对他潜心写作的古乐府则十分自许。其学生也以此宣扬他为一代文宗。维桢诗作以古乐府最为著名,张雨对其古乐府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铁崖先生古乐府序》)。其古乐府很少沿袭乐府旧题,而是自制新题。又好用历史故事,却以己意翻新,寄寓其评价。故前人常论及他的咏史诗自有特色。在诗风上耽嗜瑰奇,沉沦绮藻,受李贺影响较深,有时不免奇诡怪僻。其《庐山瀑布谣》以神奇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描写梦中的奇情幻景,在元诗中少见;其《五湖游》描写仙境与人世杂陈,时空跳跃,想象奇幻,被人称为“天仙之语”。清钱谦益既肯定了其古乐府“前无古人”的一面,又指

出“窈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诮”的缺点。(见《列朝诗集小传》)在古乐府之外，杨维桢的竹枝歌也很著名。他还写了一些宫词和香奁诗。其竹枝歌写得婉丽动人，语言清新通俗，具有民歌风味，当时影响就很大，一时和者五十余人，极受明、清时代人的激赏，乃至认为他是刘禹锡后的第一人。明代胡应麟对其《西湖竹枝歌九首》中的“劝郎莫上南高峰”一首评价尤高，认为“其婉丽，梦得靡加”。其《香奁八咏》承唐代韩偓之后，有过之无不及，胡应麟评为“精工刻骨，古今绮辞之极”。(均见《诗薮》外编卷六)这类诗也招来不少非议，瞿佑谓其“皆言宴赏游乐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归田诗话》卷下)。杨诗良莠不齐，前人攻击他为“文妖”，斥其创作为“淫辞怪语”，则亦过分。所著有《铁崖先生古乐府》、《东维子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李祁】(1296?—1373?) 字一初，号希遽，茶陵(今属湖南)人。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除婺源县同知，迁江浙儒学副提举，因母丧解职。时天下已乱，遂退隐永新山中。在动乱中曾被乱兵砍伤，僵卧路旁，被千户俞子茂救回而免于死。明初，征召旧儒，祁独力拒不起，自称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馀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比作宋遗民谢枋得。他忠于元室，以未能如同年进士余阙那样死难而深感遗憾，在为余阙《青阳集》所撰序中自言“常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论诗重内容，强调诗应“关于人心世道之大，而非徒取其辞之美”(《长留天地间集序》)。其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忠贞，如《昭君出塞图》，借昭君明志，表示决不负元。又如《次王子让韵二首》、《和钟德恭见寄》等，都属所谓“关于人心世道之大者”，被其五世从孙李东阳称为“清激悲壮，可咏可歌”。与此相关的还有忧时伤乱之作。著有《雲阳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吴莱】(1297—1340) 字立夫，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七岁即能作文，与黄潛、柳贯同受业于方凤。元仁宗延祐(1314—1320)间，贡举法行，有司以《春秋》荐，试礼部不第。出游海上，历蛟门峡，过小白华山，登盘陀石，著《观日赋》以见志。归后居同县陈士贞家，后以茂才荐，署饶州路长芎书院山长，未行而病卒，年四十四。著有《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古职方录》等。其学生宋濂等人认为其经义玄深，文辞贞敏，私谥为渊颖先生。其同门柳贯一生极少称许人，却每每赞吴莱为“绝世之才”。(见《元史》本传)莱文章雄深宏博，诗多古体歌行，气势纵横，很少写近体律、绝。胡应麟称其诗“大篇气骨可观，而多

奇僻字”(《诗薮》)。王士禛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中以一“奇”字概括其歌行的特色，以之与杨维桢并提。其诗常描写仙境，如七言歌行《泰山高寄陈彦正》，以参差的句式，整齐的节奏，出奇的想象，显示了“气骨可观”的特点。小诗则写得平易而有深意，如《题赵大年林塘晚秋图》、《潮州二首》(其一)等。著有《渊颖集》。《元史》卷一八一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李孝光】(1297—1348) 字季和，号五峰狂客。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教授，居雁荡山五峰下，泰不华尝师事之。行台御史屡荐居馆阁，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诏征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进《孝经图说》。至正八年，升文林郎秘书监丞，卒于官，年五十二。孝光为元后期著名作家，与杨维桢、张雨等友善。李去世后，杨维桢感叹已作古乐府“和者寡矣”，当时或以李、杨并称，但今存李诗中古乐府并不很多。前人对其诗作评价颇高，张雨赠诗说：“孰与言诗李髯叟，载闻新作过黄初。”李美须，故称李髯叟。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顾嗣立《元诗选》录李诗三百题三百五十馀首，亦可见对李的推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道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著有《五峰集》。《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邓绍基 王军)

【郑玉】(1298—1358) 字子美，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幼年聪敏好学，既长，两应进士举，不第，即弃举事业，钻研儒学经典，通六经，尤精于《春秋》。从学者众，所居不能容，学者相与即其地构师山学院。人称师山先生。元文宗至顺(1330—1333)初，随父游京师，当时名流巨公见其文，交相称赞，欲荐之于朝，玉奉亲南归，绝意仕进，而勤于著述教学。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征拜翰林待制，以疾辞。至正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军攻破徽州，迫其出仕。玉曰：“吾岂事二姓者耶？”自缢死。其论义理宗朱熹之学，又调和陆九渊与朱熹之说，不抱门户之见。为文不事雕琢，雅洁无枝蔓，严而有法，为虞集、揭傒斯、欧阳玄所称赏。其诗多吟咏山水，有闲适隐逸之趣，能以淡雅的笔调描绘出如画一般的风光。其诗七言胜过五言。著有《师山集》。《元史》卷一九六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卢琦】(?—1360?) 字希韩，号立斋。泉州惠安(今属福建)人。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进士，授州录事。至正十二年，迁永春县尹。至正十六年，改调宁德，历官漕司提举，除平阳县。命下而卒。为官有

惠政。因世居圭峰之下,故所著题名《圭峰集》,为他人编定,集中真贋杂陈,大半见萨都刺集,又误入陈旅等人诗。顾嗣立评其诗云:“良吏高风,情词婉约,蔼然自见于言外。”(《元诗选》初集卢琦小传)其《游洞岭诗》、《和林子苍湖亭晚酌》、《游吴廷用南庄》等诗意境都清幽闲淡。七言古诗如《秋千》、《烛》、《秋蚊》及七律《美人折花》等,写得华丽,与萨都刺的某些诗(如乐府诗)相似,前人说他们“体格相近”,当指这些诗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清词雅韵,亦不在陈旅、萨都刺下”。琦工于写景,由景入情,嬗递自然。明徐燊《笔精》曾摘录其写景佳句,其“清典可咏”,“实有唐调”。《元史》卷一九二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贡师泰】(1298—1362) 字泰甫。宁国宣城(今属安徽)人。诗人贡奎之子,性倜傥。以国子生中江浙乡试,除太和州判官,荐为应奉翰林文字,出为绍兴路推官。再入翰林为应奉,迁宣文阁授经郎。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擢吏部侍郎,除浙江都水庸田使,不久拜礼部尚书,调平江路总管。张士诚率众攻城,师泰领兵出战不敌,遁匿海滨。至正二十年,改户部尚书,分部闽中。至正二十二年,召为秘书卿,卒于路途,年六十五。师泰长于政事,有政绩,也以文字知名。少承家学,又从吴澄受业,与虞集、揭傒斯游。杨维桢为其《玩斋集》作序,盛赞其诗“驰骋虞、揭、马(祖常)、宋(褰)诸公之间,未知孰轩而孰轻也”。师泰集中清空之作颇多,如《姑孰道中》、《台州寄杨子秀》、《题渊明小像》等。一生为官,又有田园之趣,所以诗中有时反映出幽人怀抱。其诗无论五言还是七言,都写得整丽流畅,五言古诗华赡,论者谓略如曹植。其诗反映的生活面较广,凡官宦民情、战争行役、灾害农事等等,都是其诗之题材。如《河决》、《书河上成安驿》等诗写天灾人祸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在前一诗中明确说明写这种诗的目的是“备采择”,继承了古乐府的精神。著有《玩斋集》,系其门人所编。《元史》卷一八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贾蓬莱】元顺帝至正(1341—1368)前后在世。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初与闽人上官粹议婚,后父母将其许配林氏子,上官坚念蓬莱,乃赋《凤分飞曲》以寄之。蓬莱读之垂泪赋《龙剑合曲》答之,示终身相从之意。林死得归上官。至正间,随宦闽中。盗起,一门被戕,蓬莱亦自刎死。《福建通志》著录其《絮雪稿》,已佚。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四引《剪灯馀话》及《元诗纪事》卷三六。又《宋诗纪事》卷八七收贾蓬莱《春晓》、《谢姊惠鞋》两诗,故或视其为宋人。

(陈祖美)

【周伯琦】(1298?—1369?) 字伯温,别号玉雪坡真逸,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自幼随父宦游京师,入国学为上舍生,以荫补南海尉。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为授经郎,特命金广东廉访司事。至正八年,人为翰林待制,累升直学士。至正十二年,升兵部侍郎,与贡师泰同擢监察御史。至正十三年,迁崇文太监。至正十四年,为江东肃政廉访使。至正十七年,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名义招降平江张士诚,拜江浙行省左丞,留平江十馀年。张士诚为明太祖所俘、自缢而死后,归鄱阳,卒于家。伯琦博学工文章,尤以书法擅名当时。他曾随元顺帝北巡上京,写有《纪行诗二十四首》,回大都时又写有《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五首》,其中记山川之险之作较好。七律《过太行山》苍凉而有气势,为其上乘之作。从其诗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朝廷的某些典章制度及风土人情。其诗较为通俗浅易,自谓“诗体俚近,取以适时”。著有《近光集》、《扈从诗》及《元书正讹》、《说文字原》等。《元史》卷一八七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钱惟善】(1300?—1373?) 字思复,号曲江居士,又号心白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于毛氏诗学,强记而多才。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乡试,试题为《罗刹江赋》,三千考生中惟惟善引枚乘《七发》证罗刹江即钱塘之曲江,大为试官称赏,由是知名。官至儒学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退隐吴江之筒川,又移居华亭。入明后,与王逢、陆居仁等均以遗民自居。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卒。与杨维桢、陆居仁同葬干山,人称三高士墓。其诗以七律为工。陈旅序称惟善诗“妥适清茜,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风焉”(转引自顾嗣立《元诗选》);《诗谈》称“钱惟善鍾湖山之秀而发于诗,故多秀句”(转引自《元诗纪事》)。其集中《正月十六日游湖上》、《晚雨过白塔》、《极目亭》等诗,都是清秀之作。陈旅又指出惟善诗未尝不议论,而不像宋人诗之议论。其诗有议论而归于形象之中,自不同于道学家之说理诗。晚年诗作常有哀愁之情,即使面对杭州景物,也是“凄凉犹自觉繁华”(《雨后登吴山过城隍庙眺望》),这与他作为遗民的心境有关。有十首《西湖竹枝词》,瞿佑认为“皆佳作”,其实仅“阿姨住近段家桥”及“钱湖门外”二首较好。所著有《江月松风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又附见《明史》卷二八五《杨维桢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叶颙】(1300—1374后) 字景南,号雲顓天民,又号樵雲老人。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顾嗣立据其《挽琳荆山上人》,考其生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庚子(1300年),又据其《独乐歌》,考其明洪武七年(1374)

为七十五岁(见《元诗选》初集叶颙小传)。钱谦益《列朝诗集》言其字伯恺,“洪武中,举进士,官行人司副”,惟此时颙已七十岁左右,集中诗又无一涉及仕宦,且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袁凯为叶集所写序中为他未能晚生数年,与“一时俊义并列庶职”而遗憾。故钱说可能误入另一同姓名者事迹。颙晚年值元末之乱,隐居不出,结庐城山东隅,名其地为“云颙”,后又移居山之西隅,与樵夫刍叟往返其间。七十岁时作七言长篇《樵云老人独唱歌》,七十五岁又作《云颙天民独乐歌》,记其山林之乐。尝一人乘月色登上峰顶,高吟长啸,以致惊醒数十人家。诗中多闲适自得之趣。空灵清秀。其诗注意锤炼字句,如“白石和云煮,青山带月耕”之类,以创造幽静淡雅的意境。亦有少数篇什关怀世事,如《乙巳正月十二日雪中感怀》。著有《樵云独唱》。顾嗣立《元诗选》有其小传。(邓绍基 史铁良)

【倪瓒】(1301—1374) 字元镇,尝变姓名为奚玄朗,字元暎,号雲林居士,又号幻霞生、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萧闲仙卿等。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其先世为吴中有名富户,而瓒不治家人生产,自称“懒瓒”,又称“倪迂”,终生不仕。所居有阁名清閼,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并陈列古鼎、法书、名琴、奇画于其中。时与友朋诗酒唱和,同当时诗坛领袖杨维桢和玉山草堂主人顾瑛往来无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知天下将乱,变卖田产,散其财物,出外漫游,浪迹江湖。张士诚累次召他,都逃避不赴。又拒绝其弟张士信买画,后被张士信重加箠挞,他不发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他说“出声便俗”。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回到家乡,死于姻亲邹惟高家,年七十四,身后凄凉。周南老志其墓曰“元处士雲林先生”。明顾起纶《国雅品》称瓒“高风洁行,为我明逸人之宗”。瓒以画著称,长于水墨山水画,并工书法,也有诗名。他的一些律、绝有如画的特点,清新可读。尤以五言出色,写得自然秀拔,素淡无华。吴匏庵评其诗说:“倪高士诗能脱去元人之秾丽,而得陶、韦恬淡之情。”(见《元诗选》初集倪瓒小传)其《寄李隐者》、《对酒》、《早春对雨寄怀张外史》等,都用淡墨轻抹,意境清幽,无尘俗气。顾起纶赞其《俞子过荆南精舍》及《江南曲》“振秀绝响,不忝韦、柳”。孤鹤、白鸥、浮云、秋树等是其诗中常常出现的意象。他写过《竹枝词》八首,对历史兴亡殊多感慨,如“阿翁闻说国兴亡”等首。七律整饬,《三月一日自松陵过华亭》可为代表。著有《清閼阁集》。《明史》卷二九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余阙】(1303—1358) 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属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父沙刺臧卜官于庐州

(今属安徽),遂为庐州人。阙年幼丧父,及长,与理学家吴澄弟子张恒友善,文学日进。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不久,人为应奉翰林文字,转中书刑部主事。因不阿附权贵,弃官归。以修辽、金、宋三史,又召入翰林,为修撰,拜监察御史,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至正十五年(1355),为淮东都元帅,拜淮南行省左丞,守安庆。至正十八年,陈友谅军攻安庆,城破自杀。谥忠宣。元末义军纷起之后,阙为最早战死之封疆大吏,且为人正直刚烈,为政严明,治军与兵士同甘苦,所以明、清时代封建统治者皆赞扬其忠节。在元代少数民族文人中,也是著名人物。阙留意经术,为文有气魄,曾读书青阳山中,学者称青阳先生。阙工诗,宗汉、魏,以五言见佳。《元史》本传称其“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诗风古朴自然,如《拟古》、《白马谁家子》、《吕公亭》等。部分七言诗则有民歌风。著有《青阳集》。《元史》卷一四三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傅若金】(1304—1343) 初字汝砺,揭傒斯为他改字与砺。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家贫,以织席为生,又改业针工,后刻苦读书,为同郡范梈所知,得范传诗法。以布衣入京师,数日之间,词章广为传诵,京中名流无不倒屣而迎,诗名大振。得虞集、揭傒斯、宋褫赏识,以异材相荐,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佐使安南。归任广州文学教授。后安南入贡使者往往称其能,入国门则先问“傅先生安在”。至正三年(1343)卒,年四十。揭傒斯认为其诗与范梈相近,在为傅集所撰序中云:“余每读与砺诗,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范德机也。”虞集称其诗作风韵足以及于成宗大德(1297—1307)年间各大家,明人胡应麟,清人王士禛对傅诗评价也较高。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民生疾苦,在诗中都有反映。在各体诗作中,以五律为高,胡应麟认为其五律为元人之冠,虽未免溢美,但其整饰工巧则是事实,如《金陵晚眺》、《卢沟桥》、《京师守岁》等。清人《元诗别裁》所收七言律体中,以若金作品最多,达十三首,可见其七律也有功力。著有《南征稿》、《使还新稿》、《牛铎音》,后与其文集总为一编,名《傅与砺诗文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泰不华】(1304—1352) 初名达普化,元文宗为赐此名,字兼善。色目人。其父曾为台州录事判官,遂定居台州(今属浙江)。不华十七岁时江浙乡试第一。次年,赐右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历秘书监著作郎、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拜中台监察御史。顺宗至正元年(1341),除绍兴路总管召入史馆,与修辽、

金、宋三史。书成，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至正十一年，由翰林侍读学士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守温州。次年，在与农民军方国珍部作战中战死，时年四十九。谥忠介，是元末著名的死节之臣。不华好读书，以文章知名。善篆隶，温润遒劲，盛称于时。当时江南不少文士都与之交往，曾拜著名学者李孝光为师。其诗以五言见长，如《送友还家》、《衡门有馀乐》等，有诗格清淡的特色。《元诗选》录其诗不足三十首，题作《顾北集》。《元史》卷一四三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孙淑】(1304?—1328) 字蕙兰。祖籍汴(今河南开封)人。元曲家孙周卿之女，诗人傅若金之妻。六岁丧母，其父教读诗书，亦兼做纺织、刺绣、缝纫等女工，也善弹琴，孝敬继母。贵室求婚，父不许。少时学唐诗，悟得音格，能作五、七言近体诗，语皆闲雅可诵，但不多作，又常毁其所作诗稿，家人劝之，她却道：“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纴组紃，以致其孝敬，词翰非所事也。”年二十三嫁新喻人傅若金。傅氏家境贫寒，以织席、针工为生。淑不嫌其贫，夫妇情深意合，惜婚后仅五月，淑即谢世。若金悲不自胜，哀戚之情多见于诗。淑生前有七绝二首云：“楼前杨柳发青枝，楼下春寒病起时。独坐小窗无气力，隔帘风乱海棠丝。”“绿窗寂寞掩残春，绣得罗衣懒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满帘飞絮正愁人。”淑死后，若金赋《追和蕙兰二首》寄哀云：“小窗开尽碧桃枝，忆得青鸾化去时。昨夜秋风妒幽怨，梦中吹断素琴丝”；“江上愁时复值春，带围宽尽不宜身。阶前旧种樱桃树，日暮飞花故着人。”淑卒后，家人出其所作诗十八首，未成章者二十六句，由傅若金编辑成帙，题名《绿窗遗稿》。其诗风，冉弱静好，悉为女郎语，可想见妆铅点黛时气韵。今存《绿窗遗稿》一卷，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雲间啸园沈氏刊本，为《四妇人集》之一，前有傅若金序，后附《悼亡诗》、《殡志》，末有黄丕烈跋。又有吴兴刘氏刊本，收入《嘉业堂丛书》。事见《辍耕录》卷一三、《元诗选》初集壬集、《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四引《宫闈氏籍艺文考略》、《名媛诗归》及《元诗纪事》卷三八等。

(陈祖美)

【舒頔】(1304—1377) 字道源，号贞素，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年十五六，与同郡朱允升、郑子美、程以文研讲经史之学，后受业于李青山之门，得马祖常、韩伯高器重。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江东宪使燕只不花辟为池阳贵池教谕。秩满调丹徒教官。至正十年，转台州学正，因时艰道阻不赴，奉亲携书，归避山中，以陶渊明自比。至正十七年，明军定徽郡，交章礼聘，以疾辞不出。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卒于家，年七十四。自辞聘之后，结庐为读书之所，题

名贞素斋，以明自守之志，学者称贞素先生。自作《贞素先生传》，言其隐居之趣。有《寄兴》诗云：“湖海半生客，乾坤一布衣。义哉周伯叔，饱食首阳薇”，以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自居，甘作元遗民。但其文章却多颂明功德。其诗纵横排宕，不尚纤巧词华，七言古体尤擅胜场。诗常有对乱世景象的描绘、对太平社会的向往。山水诗境界清幽，有时在写景中又转出世事艰难的慨叹，如《峤原》。其同乡唐仲寔评其诗说：“公之为诗，盘桓苍古，不贵纤巧织纴之习。”(转引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其书法亦知名。著有《贞素斋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华幼武】(1307—1375) 字彦清，号栖碧，无锡(今属江苏)人。家饶财富，少孤。当时公卿曾荐引其入仕，力辞不就，筑春草堂奉母。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卒，年六十九。曾从陈方学诗，陈戏题其稿曰《黄杨》。其诗风格淡远，以歌唱山林隐逸为主。在其有关元末动乱之诗篇中也极少如其他诗人那样的激愤或凄苦之辞。他还写了一些歌谣体作品，除乐府之外，部分七绝有竹枝词的色彩。其诗成就平平，个人风格不够突出。著有《黄杨集》。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有其小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月鲁不花】(1308—1366) 字彦明，号芝轩。蒙古逊都思氏，居绍兴(今属浙江)。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登进士第，授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丁忧归。至正元年(1341)，授行都水监经历，入为集贤待制，除吏部员外郎，累升吏部侍郎，改工部，迁保定路达鲁花赤，改大都路，拜南台中丞。至正二十六年，除浙西廉访使，寻改山南道，浮海遇倭贼，不屈被害，谥忠肃。其诗好为七律，多为与见心和尚唱和之作，意境清幽，亦颇显情趣，如《次韵答见心上人二首》等。《元诗选》三集录其诗十一首，称《芝轩集》，并在其小传中云：“诗见蒲庵禅师《来复澹游集》中若干篇。”《元史》卷一四五有传。

(王军)

【迺贤】(1309—?) 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本突厥葛逻禄氏，葛逻禄译为汉语意为马，故又名马易之。先世居金山(即今新疆北部之阿尔泰山)之西，元统一全国后，移居南阳(今属河南)，故迺贤称南阳人。早年随其兄宦游江浙，定居于鄞，二十馀岁时至京师，以能文名，尤长于歌诗，每一篇出，士大夫辄相传诵。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与迺贤同至京师，被视为“江南三绝”。后归浙东，任东湖书院山长。以荐授翰林编修官，出参桑哥失里军幕。卒年不明。其诗在当时即有盛誉。欧阳玄序其集，评为“清新俊逸”。“贡师泰称其词清润纤华，五言类谢朓、柳恽、江淹，七言类张籍、王建、刘禹锡，而乐府

尤流丽可喜,有谢康乐、鲍明远之遗风”。(见《元诗选》初集迺贤小传)有不少讽谕现实之作,如《新乡媪》、《颍州老翁歌》、《卖盐妇》等,其友盖苗指出,《新乡媪》“其词质而婉,丰而不浮,其旨盖将归于讽谏云尔”(见《元诗纪事》卷一八)。这类诗歌继承了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闻”的传统。有些诗则抒发个人的郁闷,表达归隐的心情。迺贤曾至上京一年,写了不少歌咏边地风光和少数民族风俗的诗作,如《塞上曲五首》、《榆林》、《李老谷》等,尤以前者写得明快流丽。著有《金台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杨允孚】字和吉。吉安吉水(今属江西)人。明初犹在世。罗大己跋其集云:“杨君以布衣襦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其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无不以咏歌记之。”(见《元曲选》初集杨允孚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其诗注,以为他是元“顺帝时尚食供奉之官”。其诗今存一百零八首,题为《滦京杂咏》。他的同乡友人郭钰说:“茫茫天壤名常在,赖有《滦京百咏》诗。”在允孚之前,马祖常、虞集、柳贯等人曾赴上京,写过有关西北的诗歌,而不及允孚诗之详尽。他用七言绝句的形式,以征行路线为顺序,由建德门出昌平,过居庸关,经榆林、龙门直至上京,记沿途风物,抵上京后则记上京见闻。诗中所记系亲身经历,后人读来“当时事宛然如见”(明罗璟志语)。这些诗的文学价值似不及它的历史价值,诗中所记多史所未详,可资考证。而诗中如“芳草撩人香扑面,白翎随马叫晴空”这种清新的诗句则较少。《滦京杂咏》中的后八首当是元亡后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元王朝的怀念之情。曾廉《元书》卷九一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顾瑛】(1310—1369) 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号金粟道人。平江昆山(今属江苏)人。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授以官职,避地隐居坚不出仕。因其子元时仕为水军副都万户,元亡随例徙临濠,亦随之同往。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卒。其家业豪富,轻财结客。曾筑玉山草堂,有亭馆三十六处,园池声伎之盛,甲于江左。又为自己修建生圻,名金粟冢。常聚四方名士,如杨维桢、倪瓒、张雨等,诗酒唱和,名闻一时。后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其《自题小像》说:“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兴,五陵鞍马洛阳街。”这正是其晚年的形象,明顾起纶说:“读之想见其旷达豪迈,超然物外。”(《国雅品》)顾瑛是元末南方诗坛的活跃人物之一,诗名虽不及杨维桢,然其诗词语流丽,亦时有动人之作。诗的基本情调是闲适恬淡,其《玉山佳

处以“爱汝玉山草堂静”分韵得“静”字》是各体诗中较好的一首,也最足以代表他的诗风,写得古雅秀逸。在豪华放纵的生活中,瑛亦常流露出颓废思想,在长达一百多句的五古《金粟冢中秋日宴集》中,极言人世无常及死后逍遥,时人目为旷达,实则是颓废。但诗中夹叙夹议,人间与天上,实景与幻境交叉而出,也自有特点。《以玉山亭馆分题得金粟影》诗也写由眼前而跃入仙界,见出方外之趣。这实际上都是元末社会动乱中部分文人心态的反映。不过也表现了作为诗人的想象力,可看出其诗风格的另一面。他的宫词写得绵联缛丽,得杨维桢称赏。瑛亦善画,工山水花卉。著有《玉山璞稿》和《玉山逸稿》。《明史》卷二八五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陈基】(1311—1370) 字敬初。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受业于黄潛,随潛至京师,授经筵检讨。曾为人起草谏章,力陈宫中并后之非,几获罪,避归。奉母入吴,教授诸生。后以左右司员外郎参张士信军,进参张士诚太尉府军事,迁学士院学士。张士诚政权的军旅书檄多出其手,为张的重要文士之一。张败亡后,明太祖朱元璋未究陈罪,后又召其预修《元史》,书成,赐金而还。太祖洪武三年(1370),卒于常熟寓舍。基主要生活在元末动乱年代,忧时伤乱为其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既伤上地荒芜、民生凋敝,又痛恨农民起义军,称之为“贼”、“寇”、“豺虎”。对参与张士诚军幕,他内心是有矛盾的,可是对元王朝的忠心又使他对归顺元朝的张士诚军队大唱赞歌。其七言律诗写得气势豪迈,如《次韵孟天炜郎中看湖四首》。五言古诗学汉、魏,有《古诗十九首》风味,如《秋怀五首》。乐府诗则明白如话,而情意深长,如《裁衣曲》。因其所居有夷白斋,故名其集为《夷白斋稿》。《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陶宗仪】(1312?—1401?) 字九成,号南村。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元时举进士,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著名诗人张翥、李孝光、杜本。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曾被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咨,亦不赴。家贫,授徒自给,亲自耕种。入明,累征不就,晚年,有司聘为教官。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率诸生赴礼部试,赐钞归,有诗记其事。惠帝建文(1399—1402)年间犹在世。他于元末写成《辍耕录》,书中对当时包括朱元璋在内的义军颇多指责,称寇称贼,不一而足,对战死的元王朝大臣,颇多赞美。而入明后,则写有不少歌颂明朝的诗作,如《过胭脂河》、《濯足》、《三月朔入都门》等。惠帝即位改元建文时,他诗中有“老臣扑舞南村底,笑

对儿孙两鬓霜”句。由于长期村居,关心农事气候,所以集中有关气候的诗很多。明末毛晋曾刻他的诗入《十元人集》,评其诗如疏林早秋,这只能概括他的部分诗,主要是其题画小诗。这类诗写得较清空,如《题林泉高士图》、《题纨扇折枝竹》、《题画二首》中的《抱琴高士》等。其五古诗古朴无华,但缺乏骨力。著有《南村诗集》。但更为人知的是其笔记体史料著作《辍耕录》三十卷及其所编《说郭》一百卷。《明史》卷二八五有传。(邓绍基 史铁良)

【李士瞻】(1313—1367) 字彦闻,先世南阳(今属河南)人,后徙居荆门(今属湖北)。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以布衣游公卿间,荐为知印,非其所愿。不久,中大都路进士,中书辟为右司掾,除刑部主事,累官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因功就拜行省左丞,召入为参议中书省事,进参知政事,改枢密副使,拜翰林学士承旨,封楚国公。至正二十七年(1367)卒,年五十五。其人襟度弘远,立朝忠直,有经邦济世之才。士瞻生活于元王朝风雨飘摇之中,这在其诗中有所反映,或在题目中点出,或在自注中说明。诗中常流露出对元王朝的忠诚,以至于有“到家一饭忍忘君”(《送秦甫贡先生还朝便先往浙东访妻子》)之言。其诗无论五言或七言都写得平易,较少特色。七言古诗《坏舵歌》是其集中较好的一首,前半首较有气势,而后半首却流于神仙护国的说教。他与诗人贡师泰相友善,集中有多首赠贡之作。著有《经济文集》。《新元史》卷二一六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陈高】(1314—1366) 字子上,号不系舟渔者。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授庆元路录事,不到三年,自行免去。方国珍军占领浙东,高拒绝方氏征聘,弃妻、子,往来闽、浙间。至正二十六年(1366)到山东,见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密论江南虚实,扩廓帖木儿欲授他官职,知非其所愿,亦不勉强。不久病卒,年五十三。其诗文自举子时即为流辈所推重,到京师后,得张翥、欧阳玄、贡师泰等人赏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五言古体,源出陶潜”,就其部分五古而言,确有冲淡和平的特点,如《青田山房为刘养愚赋》就极富恬淡之情,写景抒怀都有陶诗情貌。五律之佳者,如《新岁忆曾子白》、《赠章以元昆仲》等则诗律较细,工整而又自然。他忠于元王朝,忧虑时局,这在其长篇《丁酉岁述怀一百韵》中有较详细的记叙,而对当时“官粮预借三年后,军食尤居两税先”(《即事漫题五首》之三)这种对百姓的盘剥也有所揭露。其《种槿花》一诗,别具一格,记叙了从播种棉籽,到精心培植,直到织布裁衣的全过程,因其史料价值,被采入《木绵

谱》。著有《不系舟渔集》。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有其小传。(邓绍基 史铁良)

【郭钰】(1316—?) 字彦章,号静思。吉安吉水(今属江西)人。年轻时已有诗名,与虞集有交往。当元末之乱,隐居不仕,中年以后,流徙于战乱之中,艰苦备尝,曾在《春夜寒》诗序中自言:“余值时危,一穷到骨,薪米不给。”入明后,以茂才征,辞疾不就。其《癸丑首正》诗明显地表现了他怀念故国、甘作遗民的态度。年逾六十,竟因贫穷而死。其诗清丽有法,格律整严,如《访友人别墅》、《雨中有怀》等。因其辗转兵戈,流离道路,目击时事艰危之状,所以诗多愁苦之词,凄婉动人,如《春雨》写自己的断炊情景,《采蕨歌》中写东邻老翁的凄惨遭遇,皆真实生动。集中有不少乐府诗,语言通俗;七言绝句则有竹枝词的特色。其乱离诗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而且有的可补史料之阙。罗大己序其集称其“所载郡邑失复月日与当时死事故实,可裨野史”(见《元诗纪事》卷二二),如《悲庐陵》诗序中对至正十六年吉安攻战的始末就有详细描写。所著有《静思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戴良】(1317—1383) 字叔能,世居九灵山下,因自号九灵山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学文于柳贯、黄潜,学诗于余阙,通经史百家及医卜、释老之说。明太祖朱元璋初定金华,用良为学正,朱回师后,弃官逃去。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事不可为,避于吴中,依张士诚。后见张士诚将败,携家浮海至山东,欲联络豪杰反明,事未果,寓昌乐数年。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南归,隐居四明,以元遗民自居,与耆儒故老宴集唱和,击节歌咏,闻者悲而壮之。洪武十五年,被召至京师,太祖欲授以官职,以老病坚辞,忤旨待罪。次年四月,自杀于京师寓舍,年六十七。苏伯衡称赞良忠于元室云:“其跋涉道途也,类子房之报韩;其彷徨山泽也,犹正则之自放。”(见《元诗选》二集戴良小传)自元之亡,良不忘故国旧君,正如自赞所云:“歌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如七律《怀宋庸庵》、《秋兴五首》等,都是反映其遗民立场的“磊落抑塞之音”。诗作多古体,王祎谓其“上追汉、魏之遗音”(见《元诗选》)。这类诗写得质朴冲淡,亦可见陶渊明的影响。在各体诗中,以律体见长,如七律《插秧妇》,写江南雨中景色极富生机,也可见作者炼字炼句之妙。著有《九灵山房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王逢】(1319—1388) 字原吉,号梧溪子、席帽山

人,晚号最闲园丁。江阴(今属江苏)人。弱冠即有文名,元顺帝至正(1341—1368)中,作《河清赋》,行台及宪司交荐,均以疾辞。张士诚占领苏州后,东南之士多为其所用,逢虽经多次征辟,固辞不就,却通过友人王晟向张士诚之弟张士德劝说张氏兄弟降元。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征召甚急,又以老疾辞。洪武二十一年(1388)卒,年七十。曾学诗于陈汉卿,得虞集之传。其诗才气宏敞,而不失谨严。诗多写于丧乱之际,杨维桢序其集云:“《梧溪集》者,江阴王逢氏遭丧乱之所作也。”他自称“才非元亚甘刘后”,以忠于金室的元好问、刘因自喻。钱谦益把他比作宋末元初著名遗民谢翱。逢讽刺朱元璋称帝是“孺子成名”,直到临死之年,还称朱元璋是“南朝天子”。钱谦益称其“前后《无题》十三首(包括《书无题后凡三首偶感燕太子丹事》),伤庚申之北遁,哀皇孙之见俘,故国旧君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见《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这方面的诗篇还有《过杨员外别业》、《宋娼容王氏辞》等。他有诗云“平生气节诗千首”,是其对自己一生忠于元王朝之概括。著有《梧溪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赵沍】(1319—1369) 字子常,号东山,休宁(今属安徽)人。师事黄泽、夏溥、黄潜,受《易》象、《春秋》之学。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虞集敬异其学,延致于家。未几归,作东山精舍以奉母,隐居著书。至正末,曾辅元帅汪同起兵保乡井,授为江南行枢密院都事,后结茅星溪古阊山。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召修元史。因不愿仕明,书成乞还,未逾月以疾卒,年五十一。沍文律得于虞集,故其议论有根底,而波澜意度皆有典型,为元代文坛较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作往往因感发而形诸歌咏,如《病士》、《悼子琯》等诗,皆发诸真情;《峡源瀑布》、《题碧山图》等诗,写景疏阔淡远,意境清幽。有《东山存稿》七卷。《新元史》卷二三六有传。

(王军)

【张宪】(1320?—1373?) 字思廉,家于玉笥山,因号玉笥生。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负才自放,曾游京师,不遇而还。张士诚占领平江,接受元王朝的太尉官职后,辟张宪为太尉府参谋,后迁枢密院都事。张士诚败亡后,宪改变姓名,逃亡杭州。当其薄游四方时,自誓不娶、不归故里,晚年寄食杭州报国寺以终。曾师事杨维桢,古乐府得杨维桢之体。杨维桢评其诗云:“吾用三体咏史,古乐府不易到,吾门惟张宪能之。”又云:“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其似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见《元诗选》初集张宪小传)其感时怀古之作如《岳鄂王歌》,意气豪迈,淋漓悲壮,认为岳飞应当不受君命,

则“铁马长驱功可必”。这一见解与一般咏岳飞诗有所不同。刘钊在《玉笥集序》中特地拈出这首诗,并指出其咏史“非徒详其事实,且寓褒贬鉴戒之意”。乐府歌行如《怯薛行》、《戏赠乍浦税使歌》等都是针对现实的有感之作。其长诗富有气势和奇兀色彩,他曾说“我诗直欲追韩奇”,不过也像韩愈诗一样,有时过分散文化而有损于诗的音节美。著有《玉笥集》。《新元史》卷二三八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金涓】 本姓刘,先世避吴越王钱镠嫌名,改为金氏。字德原,号青村。义乌(今属浙江)人。尝受经于许谦,又学文章于黄潜。为虞集、柳贯所知,交荐于朝,皆辞不赴。入明后州郡辟召,亦坚拒不起,教授乡里以终。涓志趣颇高,为文雅健有奇气。其一生不求仕进,游于云山水石间,故其诗多写景之作,山光水色,恬淡疏远。诗中常流露不屑仕进,乐于隐居的情思。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已佚。今有《青村遗稿》。《元书》卷九一有传。

(王军)

【郑允端】(1327—1356) 字正淑。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宋丞相郑清之五世孙女,嫁同郡施伯仁,能诗文。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军攻入平江,家为兵所破,贫病悒悒而卒,年仅三十。宗族私谥贞懿。著有《肃雝集》,自为之序曰:“郑氏系出贵胄,世尚儒业,父兄以经学教授诸生,著名吴下。某自幼承家庭之训,教以读书识字,在后向学,剽窃余绪,粗知义理。及长,归同郡施伯仁氏,而伯仁又文献故家,儒雅之士,气味相类。妇职之暇,尤得操弄笔墨,吟咏性情。尝怪近世妇人女子作诗,无感发惩创之义,率皆嘲咏风月,陶写情思,纤艳委靡,流连光景者也。余故铲除旧习,脱弃凡近,作为歌诗,絃诸篋笥,以俟宗工斤正,然后出示多人。今抱病弥年,垂亡有日,惧没而无闻,用写别楮,詮次成帙,藏诸家塾,以示子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集首有叙传,纪其始末。集为允端没后,伯仁哀其遗稿而成。钱塘钱惟善、青城杜寅为作前、后序。明嘉靖中其五世孙仁始刻之。其诗词意浅弱,失粘落韵者,不一而足。钱惟善等皆一代胜流,不应滥许至是。”而《玉镜阳秋》则云:“郑诗高素隽永,占体尤胜,五言如《罗敷曲》、《纪梦》、《听琴》诸作,七言如《山水障歌》,皆格韵超胜,居然作者。昔济尼云:谢夫人有林下之风,顾家妇乃闺房之秀。以拟孙、郑二媛,淑殆犹尤顾,郑乃如谢云。”《历朝名媛诗词》云:“所著颇多,好为古体。凡闺阁之笔只宜近体,古诗局法,音节未谙,欲古而不古也。略存几篇小诗颇幽秀有风致。”事见《元诗选》初集壬集郑允端小传、《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四引《宫闱氏籍艺文考略》、《元诗纪事》卷三六

等。

(陈祖美)

【王翰】(1333—1378) 初名那木罕,字用文。先世本齐人,没入西夏,元初赐姓唐兀氏,从下江淮,以领兵千户镇庐州(今安徽合肥),遂为庐州人。翰十六岁袭爵,除庐州路侍中,改福州路侍中,升同知,又升理问官,综理永福、罗源二县。升江西福建行省郎中。陈友定任福建行省平章,留翰居幕府,表授潮州路总管,兼督循、梅、惠三州。明太祖朱元璋军攻闽,陈友定败亡,翰欲浮海抵交趾,未果,于永福之观猎山隐居十一年,着黄冠服,因生平酷爱石,自号友石山人。入明后,多次不受征召。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辟书再至,有司迫就道。翰以幼子托付友人吴海,自刎而死,年四十六。死前赋诗见志,有“一死了却君亲恩”之句,足见其对元室的忠诚。这种忠诚贯串其一生,也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其诗篇什不多,而沉郁顿挫,感愤激烈,如《挽失漳州》、《挽柏金院》、《送陈同金》等。元亡之后,诗多凄苦之词,其《题画葵花》诗也有“怜渠自是无情物,犹解倾心向太阳”之句。庐陵陈仲述为其集作序,称其诗“皆心声之应,而非苟然炫葩组华者”。著有《友石山人遗稿》。《新元史》卷二三三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丁鹤年】(1335—1403?) 亦曰字鹤年,一字永庚。回族,西域人。父职马禄丁,元末官武昌县达鲁花赤。当时回纥(回回)人名末常为一“丁”字,后代遂以丁为姓。鹤年自曾祖以下,名末都有一“丁”字,因为丁姓。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红巾军攻武昌,鹤年时年十八,奉嫡母走镇江,母歿,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鹤年转徙逃匿,或授徒,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诗有“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计野人同”之句,是其当时生活之写照。元亡后十二年才回到武昌。其时生母也已病卒,因痛哭行求,得母尸骨,以葬。晚年学佛,屏绝酒肉,结庐居父墓侧。明成祖永乐(1403—1424)中卒。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博学多闻,生当元末乱世,诗作内容多国亡家破之感,如《自咏》、《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兵后还武昌二首》等。戴良为其诗集作序,以为一篇一句皆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觉涕泗横流,而其《采莲曲》,写男女爱情,则颇具南朝乐府民歌风味。其题画诗也为人称赞,胡应麟就称其《长江万里图》二首有“天趣”(《诗薮》外编卷六)。鹤年精于诗律,诗作以近体为工,炼句精致,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中的后劲。著有《海巢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邓绍基 史铁良)

【唐桂芳】(1299—1371) 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歙县(今属安徽)人。桂芳幼习儒业,

通诗文。弱冠为明道书院司训。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为建宁路崇安县教谕、南雄路学正等职。因丁父忧归里。明太祖克徽州,闻其名,欲授以官,桂芳以双目失明辞,不久摄紫阳书院山长。卒年七十三。桂芳诗歌多题赠及歌咏山水之作,诗中寄寓了生活于乱世的恬淡襟怀,如《答仁和》中云:“今朝好风日,出门随所欣。南山拭晴翠,矫首天无云。山深寡人事,可以遗世纷。乃知紫芝曲,俱是逃秦人。荷锄筋力倦,未敢辞其勤。”其诗以七言为佳,工于七律、七绝,诗风如四库馆臣所云,“清谐婉丽,颇合雅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爱杀溪山画不真,梅花雪压小桥春。近闻诗思清如许,煎被尘埃字字新”(《溪行简汪彦通》),“庐山三百六十寺,上有高僧绝世氛。今日饱看真面目,晓风吹散一江云”(《泊庐山下》)。桂芳早年诗注重炼字,晚岁渐趋平淡。著有《白云诗稿》四卷、《白云文稿》三卷,后明人程敏政刻《唐氏三先生集》,将此七卷全部收入。另有《武夷小稿》。《国朝献徵录》卷一〇〇载有钟启晦所撰《唐公行状》。

(王学泰)

【朱升】(1299—1370) 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徙居歙县(今属安徽)。通性理之学。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举人,曾为池州路儒学正,避盗弃官隐石门,专心著述。明太祖攻下徽州,闻升名而访之。升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太祖所嘉纳,遂命参预帷幄密议,甚受信任,为所居梅花初月楼书写匾额。升所赞画,大抵为礼乐、征伐之事,官至翰林学士兼东阁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太祖洪武二年(1369),以年迈告归。其所著述多为阐发儒学之专著,亦能诗。诗多为题赠酬酢及描写隐居生活之作,很少有时代动乱的影子。《题柏山齐祈寺和唐子华韵》一诗是应朱元璋敦请出山时所写的七律(时在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在其诗中最富于时代气氛:“西风笳鼓东南来,国本应须老手裁。净洗甲兵过练水,早随冠冕上云台。传宣马系门前柳,作颂人磨石上苔。机会到时须勇进,天边莫待羽书催。”急于用世之情溢于言表,与平日所写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诗恰成鲜明对照。其诗清净骏爽,无理学家诗歌的酸腐之味。升于五经皆有旁注。于易尤详,另著有《小四书》、《女诫》等。有《朱枫林集》十卷。《明史列传》卷一一、《明史》卷一三六有传。

(王学泰)

【林弼】 曾名唐臣,因禁以国号为名氏改为弼,字元凯。龙溪(今福建漳州)人,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进士,授建宁考亭书院山长,擢漳州路知事。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内附于明,与修《元史》,授考功主事,又参加纂修礼书。洪武三年,奉使安南,

却其千金馈赠,还授丰城县令,以事逮至京,从狱中上书太祖,诏令释放,命为吏部郎中,出为登州知府,卒于官,故又称为林登州。弼虽主要生活在元末,然其诗格高气爽,冲和浑穆,无元末诗人柔靡纤弱之风。在出使安南途中,弼以诗写景记事,写下许多记录广东、广西、安南一带风景、民俗的作品,如《厓里隘》、《獠处隘》、《南宁府》、《龙州十首》等都是描写“龙州溪洞极南边,鸡犬桑麻各有天”这一类风物的。《播州隘》写当时此地之荒蛮、溪洞之险隘:“溪洞有馀隘,播州扼南夷。径小石齿交,树古藤脚垂。乱竹无人伐,槁枝何离披。林杪天一窍,云密不得窥。举步皆胁息,间关风磴危。”诗写得真切生动,可见诗人铺叙之才能。《峒中妇》写两位汉女被峒人虏掠为奴,一被家人赎回,一无人赎,哭甚哀,使者怜之,代其父母赎之。此女考虑家中久无音讯,又未能忘情于峒族丈夫,故又深夜遁去,回到峒人群中。此诗描写妇女矛盾心情十分真实,从中亦可见当地习俗。其七言近体亦颇有唐人体格,多可诵之篇。所作本分为《梅雪文稿》、《使安南集》等,后总编为《林登州集》。明王廉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李延兴】字继本。东安(今河北安次)人,元初占籍北平(今北京)。少以诗名。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登进士第,授太常奉礼兼翰林检讨,以中原战乱,遂隐居不仕。河朔学者,多从之学,以师道尊于北方。入明后,多次主持县邑之学,其自述云“洪武乙卯(1375),典邑校于滦”,“戊午(1378)夏,永清刘宰招致,摄其乡学”(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集中有代雄县知县所草《祷雨文》,署洪武二十八年(1395),可知洪武(1368—1398)后期延兴仍在世。明初诗人集中在大江南北,淮河以北很少有以诗名世者,延兴为一例外。延兴虽已食明朝俸禄为明之学官,然其上代在元朝累世富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入明落拓潦倒,故其诗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如《山中值雨》诗云:“风雨连天黑,关河入望遥。青山怀故国,白首恋中朝。小市河鱼上,残城野火烧。寄身岩壑里,生意日萧条。”其他如《和友人韵》、《滦河》、《窗灯》等诗中皆可见诗人这种情绪,这在南方诗人中是不多见的。其诗多以北方自然风光为题材,如《度居庸》中所写岁暮北方山径的风雪险途,《福源精舍》诗中“京城六月日如火”的大都客舍,以及“水碧沙云白,山青柿叶红”(《舟次松陵》),“蛇伏黄蒿噓毒雾,鬼吹青火出空林”(《送翼主归相州》)等是南方诗人很少涉及的题材。诗学杜甫,风格老成。有《一山集》九卷。其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等。(王学泰)

【凌雲翰】字彦翀,号拓轩。仁和(浙江杭州)人。

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以《周易》登浙江乡榜,除平江路学正,不赴。才高学博,为乡党所重。入明不仕,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为人作《题钟馗图》,不数日为乡人官于外郡者所举荐,里胥临门,胁迫进京,授成都府学教授,因在职时乏贡举,贬谪南荒,卒。归葬西湖,瞿佑作诗送之。雲翰才情奔放,其诗虽多题赠唱和之作,但从中仍可见诗人性情。如《关山雪霁图》由图画写到现实,从远游写到家居,最后以突出自己归隐之志作结,一气贯穿,颇见才气。其诗不为格律所限,有些诗似古似律,如:“香凝燕寝宵未分,急雨打窗浑不闻。美人忆在湘江水,行路恍隔梨花云。残灯纸帐尚知我,落叶屋梁疑见君。西湖东阁雨奇绝,眼中蝴蝶何纷纷。”(《梅花清梦为沈士敬赋》)其他如《江山图为傅德让赋》、《云门草堂为徐彦鍾赋》亦是此类作品。四库馆臣言其诗“华而不为靡,驰骋而不离乎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合乎实际的。有《拓轩集》四卷。瞿佑《归田诗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皆有其传记资料。(王学泰)

【郭奎】(?—1365)字子章。巢县(今属安徽)人。少从余阙学,治经学,阙亟称之。世乱仗剑行游,飘泊江湖间,明太祖朱元璋尚称吴国公时,奎往投之,为其幕僚。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侄文正开府南昌,为大都督,元璋特选郭奎以儒生为辅佐参谋。至正二十五年,文正得罪,奎以不谄谏而被诛。奎当社会动乱、干戈扰攘之际,投笔从军,备尝险阻,其慷慨激越之情、苍凉凄楚之感一发于诗。如《富池江口夜泊》云:“华发青灯共一船,闻鸡独起看龙泉。风云未遂平生志,惭愧周瑜长十年。”“草昧英雄望列侯,梦中三十六春秋。功名总被儒冠误,两岸猿啼一夜愁。”其言志摅怀,慷慨淋漓,屡见于篇章。著名者还有《次钱子贞蓟门感怀》、《蕲州营作》、《秋兴》(月下清砧响夜阑)、《答王克让》等。四库馆臣评其诗云:“五言古体,原本汉、魏,颇得遗意;七言古体,时近李白;五言律体,纯为唐调;七言律体,稍杂宋音;绝句则在唐、宋之间。元末明初,可云挺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评价嫌过高,但所言郭氏诸体裁所取法之对象,大体符合实际。撰有《望雲集》五卷,赵沅、宋濂皆为序。《明史》卷二八五有传。(王学泰)

【赵迪】字景哲,号鸣秋山人。怀安(今福建福州)人。值时多故,隐居不仕,投老林泉,居白湖,故又称白湖小隐。迪善画山水,学米南宫,其诗亦多以山水风景与隐居生活为主。诗风近于中唐之韦应物、柳宗元,如《题雨竹》云:“黄陵日已昏,萧瑟凉飈起。残雨挂空江,溟濛若千里。暝色夕鸟前,寒声暮猿里。应知叶上秋,尽入湘江水。”顾起纶在《国雅

品》中将赵与郭奎并称,言其“兴洽清真,并是逸才”。俞宪《盛明百家诗》中又言其与林鸿齐名,验其作品,确实皆是取法于唐者。著有《鸣秋集》二卷,《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列朝诗集小传》、《闽画记》、《明诗记事》皆记其简单履历。另外明初还有一赵迪,亦能诗,为河南宜阳人,初姓张,由岁贡官至吏部左侍郎。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误两人为一。

(王学泰)

【张以宁】(1301—1370) 字志道,号翠屏山人,古田(今属福建)人。幼聪颖,八岁时曾为其伯父对簿公堂,县令异之,命赋《琴堂赋》,立就,以此得文名。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以《春秋》学举进士,由黄岩判官进六合尹,坐事免官。元顺帝至正(1341—1368)时征为国子助教,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元亡,赴南京见明太祖,以奏对称旨,授侍讲学士。太祖洪武二年(1369),奉使安南,封其国主,以不辱使命,受到太祖嘉奖。次年,归还,卒于道。以宁为官清廉,不营财产,为时人所称道。闽中诗学自严羽以来多以盛唐为宗。以宁诗上承严氏,下开“闽中十子”。其七古学杜甫、韩愈,多题画之作,善于用富于色彩的词藻生动再现画中的美丽景色,如:“溪旁秀林昨夜雨,落花一寸无行路。歌阑桃叶人断肠,艇子招招过溪去。红日青霞半晦明,白云碧峰相吞吐。……雁去冥冥红叶天,猿啼历历青枫树。”(《题马致远〈清溪晚渡图〉》)其《题李遂卿画》中的《春鹅杏花》、《秋鹭霜荷》两诗,一首色彩缤纷、艳丽热烈,一首霜清水明、淡雅素洁,皆化画为诗的精品。其近体诗则多描写行役与题咏古迹之作,有时也在旅途艰辛的铺写中透露出社会动乱的影子,如:“客路春将晚,征帆日又曛。深山昨夜雨,流水满溪云。渡里渔舟集,村空戍鼓闻。故园频梦去,植杖已堪耘。”(《泊河头水长》)浑厚沉郁,颇似杜甫。后世对其古诗有较高的评价。清汪端言:“志道七古骨力遒健,才气排宕,发源杜陵,出入遗山、道园之间,可以独张一军。”(见《明三十家诗选》)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以及《翠屏集》等。《明史列传》卷一二、《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蓝仁】字静之。崇安(今属福建)人。元末,清江人杜本隐居武夷,崇尚古学,蓝仁与其弟蓝智同往师之。杜本授以任士林诗法,蓝仁遂谢科举,一心为诗。后辟为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明初内附,例徙临濠,居琅琊数月,放归,以老寿终。其诗作善于通过描写环境来烘托人的心态和情绪,如《暮归山中》,通过月涧、栖鸦、暗树、流萤、凉松、疏星,对表

现人的情绪起了良好的渲染作用。其诗骨格老苍,常能造成一种浑成的境界,颇见工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著有《蓝山先生诗集》六卷。其生平附见《明史》卷二八五《陶宗仪传》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蓝智】字明之。崇安(今属福建)人。蓝仁之弟。元末弃去科举学,与其兄共同师事杜本,倡和为诗。明初,以荐授广西按察司佥事。从刘炳《挽蓝氏昆季》诗“桂林持节还,高风振林谷”两句看,他并未客死他乡,而是卸职还里。根据其诗集前的张昶序,可知他学诗的旨趣:“古仿佛魏、晋,律似盛唐,长句豪健,五言温雅。”他在诸体诗中,均有一些较好的诗章。其七古《铜雀台瓦》,人称有泣鬼神的艺术力量。通篇诗作顿挫浏亮,雅有唐风。其五律尤为出色,如《雨中同孟原金登嘉鱼亭》,将情景交汇一起,形成了深沉的意境。有《蓝洞集》六卷。其生平附见《明史》卷二八五《陶宗仪传》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高逊志】又名巽志,字士敏。萧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兴,徙居吴门(江苏苏州)。受业于贡师泰、周伯琦等,并与当时名士如张翥、危素、张以宁等游,善属文,被荐为鄞山书院山长。在吴时又曾与高启等人唱和,被视为“北郭十友”之一。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被荐参预修订《元史》,授翰林院编修,转秦府纪善,未几引退。洪武十五年(1382)召为试吏部侍郎,旋罢官。惠帝建文(1399—1402)初,征入翰林,迁太常少卿。燕王朱棣夺皇位后,弃官而去,遁迹雁荡山中以卒。逊志一生少仕多隐,其诗以描写隐居生活及题赠之作为多,诗风优游从容,高启称之为“山林馆阁”,颇能道中其特点。如《题遂幽轩》云:“闭门销声与世疏,岩居消散属潜夫。竹间展席移茶具,花底清吟移酒壶。喜向山林便野服,懒因轩冕溷泥涂。令人长忆鸱夷子,欲趁高秋泛五湖。”其他如《城南小隐为松江郭彦礼赋》、《赠章安甫老人》、《寄陈彦博奉常》等也都写得从容不迫,反映了作者与世无争的胸襟与气度,诗中亦有一些愤世疾俗之作,如《以少陵“文章憎命达”句为韵赋五章》即是这类作品。其诗文收入《菴庵遗稿》。《明史列传》卷一九、《明史》卷一四三有传。(王学泰)

【钱仲益】名允昇,一作永昇,字仲益,以字行。无锡(今属江苏)人。元末中浙江乡试举人,为杭州路录事。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为华亭令。洪武末,举明经,为本县训导。惠帝建文(1399—1402)中,以荐为太常博士。以参预修订《太祖实录》,擢为翰林修撰,待诏禁垣。以精于棋术,成祖呼为“棋仙”。后改为汉王府长史,卒于任。仲益以古

体诗见长,虽多应酬题赠之作,而诗格老成,在明初诗人群中亦属作手。七言歌行富于气势,如《奉令作战马歌》、《奉令作大将军八面威风歌》、《为王纪善赋独秀山房歌》等虽为应命或应酬之作,也都写得气势酣畅,神完气足。其五古则于平易流畅中显示出隽永之诗味。如《弈棋》诗云:“我老无所好,所好唯弈棋。每遇对手时,竟夕不告疲。不惟忘忧乐,宁复知饱饥。方当得意候,如病逢良医。又如好饮人,妙趣只自知。”把沉醉于弈道棋迷的心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其近体风格爽朗,亦有佳作。仲益诗与钱子正、钱子义作品合刊为《三华集》,以仲益诗水平最高。有《锦树山人集》八卷。其生平见都穆《杂纂》、《昆陵人品记》卷六、《明诗纪事》乙签卷五。(王学泰)

【钱宰】(1302—1397) 字子予,一字伯钧。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五代越王钱镠十四代孙。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曾登进士第,以亲老不仕,教授乡里。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以明经征修礼乐书,寻以病归乡。洪武六年(1373),授国子助教,撰《历代帝王庙颂》乐章。洪武十年,以年老告归。太祖以其在国子学中教学卓有成就,特授文林郎,以国子博士致仕。洪武二十三年,召为会试考官。洪武二十七年,再奉诏至南京预修《书传会选》。书成归乡。卒于家。宰工诗,不屑为侧艳之体,多为拟古、题画、咏物、怀古之作。其拟作汉、魏诸诗,在当时颇有影响,现今看来殊为平庸。其所长为七律、七绝,这类作品大多写得清丽婉畅,如:“雪上平林半是云,索居别墅乐闲身。蘋花落日江南唱,杨柳沧湾若下春。隔岸青山连画卷,当门绿树接比邻。外家第宅相过近,内翰风流世有人。”(《题崔彦辉云林小隐》)著有《临安集》。《明史列传》卷一二、《明史》卷一三七有传。(王学泰)

【危素】(1303—1372) 字太朴,一字雲林。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少通五经,曾游于名儒吴澄之门,亦曾向名诗人范梈学习。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以荐为经筵检讨,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预修宋、辽、金三朝史。明军入大都,召至南京。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授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洪武三年,兼弘文馆博士,与宋濂等共修《元史》,甚为太祖礼重。一日在宫内,太祖闻其履声自远而近,问为谁,危对曰:“老臣危素。”太祖不快,曰:“我道是文天祥来。”又被御史劾为:“亡国之臣,不宜重用。”遂谪和州,守余阙庙。岁馀,抑郁卒。素虽处于乱世,因高居庙堂,诗中很少反映时事动乱之作,以题赠、写景之作为多。其体制亦如范梈,“尤好为歌行”与五言古体。诗风平缓流畅,虽刻意学唐,但缺少唐人的浑成与气势。如:“良朋宴游不可失,邓

氏诸昆晚同出。横槎溪口弄飞泉,桐树坳头看落日。长山唐突短山青,山上十丈苍云横。大风振林归鸟疾,枯木压石残蝉鸣。登高长啸招晴月,古竹吹凉夜如雪。夜如雪,秋氤氲,溪流无滓山无尘,写诗聊寄山中人。”(《五月廿有二日同邓渐叔仪暨季招旭肆父昶喇父晚眺以森木乱鸣蝉分韵》)诗亦可读,但缺少警人之处。其歌行、五古大体如此。素虽生活于元末,并已仕明,但其诗文更像元朝中叶文人作品,缺少元末明初大多数有成就的文士所具有的飞扬磅礴之气。有《吴草庐年谱》、《元海运志》、《危学士集》等。宋濂为撰墓碑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魏观】(1305—1374) 字杞山,号梅初。蒲圻(今属湖北)人。元末隐居读书于蒲山。明太祖攻下武昌,聘授国子助教,擢浙江按察司佥事,迁两淮都转运使,入知起居注,进太常卿,改侍读学士,迁国子祭酒。太祖洪武四年(1371),坐事谪知龙南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由廷臣荐,出知苏州府。张士诚据吴时在苏州府第起吴宫殿,迁府署于他处。魏知苏州,以府署过隘,乃于吴宫处重建府署,为人所诬陷,谓私造宫殿,有不臣之心,遂被诛杀。既而太祖悔之,命致祭归葬。观传世之诗多写于旅途行役,中多反映战乱之际人民生活的悲惨,如《大同江口舍舟而涂抵樊昌四十里纪实》中写道:“少顷闻病翁,叫出蓬首妇。妇出拜且言:穷苦日难度。夫远充民兵,儿小当递铺。翁病经半年,寒馁缺调护。军需未离门,活计不成作。荒山要收丝,荒亩要输赋。诛求里长急,责罚官府怒。近来点弓兵,拘贫放权富。迫并多逃亡,苍黄互号诉。左右三五家,春深失耕务。纷纭下牌帖,勾捉犹未杜。所言既真悉,俾我心骇怖。”其他如《建德县三十韵》、《东流县》、《两浙寄子橐家书》皆对平民的疾苦有较深入的描写。其五古质朴平淡,而饶有馀味;近体清新流畅而多佳句;七律联语多警句。有诗集名《蒲山牧唱》。《明史列传》卷一一、《明史》卷一四〇有传。(王学泰)

【詹同】(1305?—1374以后) 初名书,字同文。婺源(今属江西)人。少颖悟好学,前辈文人虞集呼为“才子”。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中举,除郴州路学正。遇乱,徙居黄州,事陈友谅,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明太祖攻破武昌,灭友谅,任命为国子博士,赐今名,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太祖洪武(1368—1398)初,进翰林学士,升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奉旨编修《大明日历》、《皇明宝训》,与宋濂同为总裁。洪武七年(1374),致仕。同以诗受知于明太祖,与宋濂、吴沈、乐韵凤并称“中朝四学士”。诗文与高启、杨基、宋濂、王祿齐名。同富有才气,宋

濂序其集,谓其“酒酣耳热,捉笔四顾,文气綦缟,从口鼻流出,顷刻盈纸,烂烂皆成五色”(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詹诗虽多题赠唱和之作,但在这类应酬诗中也可见当时社会动乱和作者的怀抱。如《题俞友益画鹰》最后云:“君不闻深山大泽木石寒,中有白蛇生肉冠。杀人如麻不可制,夜深毒雾冲林端。草莽之间或可避,焉得相逢在平地?使此击之肝脑碎,未必青冥老垂翅。”《题赵子昂〈双骏图〉为陈子将作》中写道:“自从干戈时变迁,牙签锦轴多飞烟。吴兴遗迹存者几?残绢坏墨今难全。况复湖州桥水边,先生故垆空累然。白杨吹雨晚萧瑟,石麟欲泣穹碑前。昔贤一逝不复作,如此画者当家传。君不闻凤膺虎脊世希有,按图索骏应天缘。千金市骨古人意,所贵不在尻脰圆。为国死生能致力,不愧玉勒珊瑚鞭。岂比驽骀饱刍豆,但知肥肉经残年?”从中可见诗人“老骥伏枥”之志。其小诗亦多意趣:“扁舟晓渡真堪画,浪静风恬曙色酣。绝胜向来茅屋底,五更飞梦过江南。”(《题李伯英〈春江晓渡图〉》)所著《海天集》已佚,其《天衢舒啸集》二卷,亦仅有清钞本传世。《明史列传》卷一一、《明史》卷一三六有传。

(王学泰)

【陈谟】(1305?—1390?)字一德,号心吾。泰和(今属江西)人。幼能诗文,专力研治经学,旁通诸子百家,亦留心经世济人之学。教授于乡里,曾主清节书院,隐居不求出仕。谟处于易代之际,作为理学家,亦不提倡愚忠死节,曾著《通塞论》引微子、箕子之事,反复申明,谓革代之际,不必死节。四库馆臣认为此论“最为害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实,这正反映了其立论之通达。论学注重人的本性,并主张应能融会贯通礼乐、刑政、钱谷、甲兵等实用之学。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称海桑先生。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征至京师议礼,受到太祖重视。宋濂、王祚推荐为国子学博士,谟引疾辞归。屡次应聘为江、浙二行省之考官,所甄拔之人,多为知名之士。其诗多描写琐屑的日常生活,但从中可见作者的急于用世之情或坦荡平易的儒者情怀。如:“榕荫翠盖倚重重,相送城南复向东。上将故多黄石略,参军况是紫髯翁。重题锦字云生纸,独转沧浪月满蓬。徙倚松根看野色,青山缥缈意何穷。”(《榕树下别参军再赋就简指挥》)诗中把建功立业的向往与对平凡生活的渴求交织在一起,反映了作者豁达的胸襟。著有《书经会通》、《诗经演疏》、《东宫备览》等。其诗文收入《海桑集》。《明史》卷二八二有传。

(王学泰)

【胡翰】(1307—1381)字仲子,一字仲申。金华(今属浙江)人。少时曾从吴师道受经,从吴莱学习

古文,复游学于同邑许谦之门。其文深受同郡散文家黄缙、柳贯之赞赏,游大都,得到公卿揄扬,或劝之出仕,未许。归乡,适逢天下大乱,避地南华山,著书自适,以文章名天下。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授衢州教授,聘修《元史》,史成,赐金帛归。隐居北山,洪武十四年(1381)卒,享年七十五。翰虽未登高位,却怀澄清天下之志。其诗多用以摅写报国之情,诗中充满了自信与自负,如《拟古》诗云:“一夕复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见春花开,忽睹秋叶飘。人非金石姿,安得长不凋?穷年事觚翰,驾言远游遨。手提具櫜剑,拂拭鸛鹑膏。含英变光彩,上薄青云霄。愿君勿弃置,佩此长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长蛟。斫蛟取猛虎,始贵非铅刀。”诗写得慷慨激昂,可见作者急于用世之情。《拟古》中的第七首更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于时光流驶的焦灼:“仲尼七十说,未遇身削迹。为云不上天,焉能雨八极。”但翰非惶不择径者,其《桐谷山房》一诗表达了对真理的追求与执著。翰诗质朴,不如刘基诗富于想象,但在慷慨多气上是一致的。钱谦益称其五言古诗“超然复迈,虽潜溪亦莫企及,余子何足道哉”(《列朝诗集小传》)。著有《春秋集义》、《胡仲子集》、《长山先生集》、《信安集》。吴沈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少聪敏好学,九岁即能诗,曾师从吴莱、柳贯、黄缙等元末著名道学家及文学家,尽得其学,以文名海内。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以大臣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固辞,入仙华山为道士,自号玄真子,又著书于东明山,历十馀年。明太祖取婺州,召见;次年,征至金陵,授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改起居注。太祖洪武二年(1369),充《元史》总裁官。史成,除翰林院学士,官至翰林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大夫。明初许多典章制度皆其手订,太祖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77),致仕。洪武十三年冬,以长孙慎坐丞相胡惟庸党案,阖家安置于茂州。明年,以疾卒于夔州。武宗正德(1506—1521)中,追谥文宪。其文学成就主要在古文;诗传世者不多,但亦颇可观。其诗除为庙堂所撰颂体歌词外,多为言志摅怀之作,如《赠虎髯生诗》、《忆山中》、《浩怀》、《始衰》、《遣兴》、《赠刘俊民先辈》等皆为其代表作品。《晓行》诗描写一位奔走国事的士人形象:“荒鸡一再号,驱车事晨征。寥寥秋风肃,况此花月明。万顷琉璃中,着吾一身行。肝胆皆冰雪,毛发亦含情。超然鸿蒙初,顿觉百虑冥。安得王子乔,为言此时情。”这也正是作者生活的写照。濂长于古体,其才力格调规模杜甫、韩愈,但较为平易,主要以情辞

恳切感人。著有《潜溪》、《銮坡》、《芝园》、《萝山》、《朝天》诸集,凡七十五卷。明正德间,张缙合刻为《宋学士文集》。清朱兴梯、戴殿江编有《宋文宪公年谱》。《明史》卷一二八有传。(王学泰)

【袁凯】(1310?—?) 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凯幼孤力学,曾以《白燕》诗受到元末诗人杨维桢的赞赏,并连书数纸,尽散坐客,一时呼为“袁白燕”。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入明后,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被荐为御史。太祖尝审犯人毕,命凯送太子复审,太子为减罪。凯还报,太祖问:“朕与东宫孰是?”凯顿首答云:“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太祖认为他持两端而左右逢源,遂恶之。凯惧祸,遂托疯疾以归。太祖曾派人考查,凯佯狂以免祸。其诗多咏物寄怀、题赠、唱酬之作。早年作品曲折表达了元末的政治黑暗与社会动乱,如《老夫五首》、《夜归》、《沙涂行》皆是这类作品。其《蚊》诗中写道:“群蛇戢戢方斗争,虾蟆蝼蛄相和鸣。百足之虫行无声,毒气着人昏不醒。蚊蚋虽微亦纵横,隐然如雷吁可惊。东方日色苦未明,老夫闭门不敢行。”这是以寓言形式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感受。《客中除夕》则以摅怀写情方式反映了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离散:“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其晚年作品对于明初的残暴统治亦时时予以讥刺。《辛酉大醉书东郊主人壁》诗中劝人及时行乐,不要贮财贻患,否则“一朝籍县官,虽悔何所追”。这是讽刺明太祖好抄官民之家。《乡友携酒至舍下》诗借饮中不能畅谈反映当时政治气氛之恐怖:“上谈羲皇际,下逮唐与虞。秦汉无足论,且复话樵渔。樵渔虽微贱,颇似淳古初。戒之勿易言,相顾但嗟吁。”其古体诗学汉、魏,但诗中缺少警句与开阖变化之妙;律体学杜甫,但多是有句无篇;五、七言绝句艺术上较为成功。其五绝有古乐府民歌风格,如:“江水一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到早还乡。”(《京师得家书》)七绝绰约有中唐风致,如:“木落淮南秋色空,闲登高阁送归鸿。白头老妇痴儿女,尽在萧条望眼中。”(《登阁》)凯在明代是较有影响的诗人,何景明谓“我朝诸名家集,独海叟诗为长”。(转引自《明诗纪事》)《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刘基】(1311—1375) 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幼聪颖,过目成诵,十四岁为郡学生员,博学多才,涉猎诸子百家,精通天文、兵法、阴阳符之学,向郑复初学习濂洛性理之学,于书无不窥。名儒赵天泽把他列为江左人物之首,认为他是诸葛亮一流人物。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进士,授江西高安县

县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因违上官,辞去。后又连为数官,皆不得志,弃官逃入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见志。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明太祖下婺州;受聘至金陵,为筹划军国大计,翦灭群雄,建立明朝。太祖为吴王时,刘为太史令;称帝后,为御史令。太祖洪武三年(1370),迁弘文馆学士。同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基为人正直,功高震主,受到权臣的嫉妒与太祖的猜忌。洪武四年,被赐归老还乡,隐居青田山中,饮酒下棋度日,绝口不谈自己功勋。后因被人谗毁,至南京,引咎自责,忧愤成疾,丞相胡惟庸遣医送药,不久即卒。基兼工诗、词、古文。其诗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在元朝所写作品,此时诗作多表现人民在社会动乱中所遭受的苦难,并抒发了诗人报国拯民之志和悯时伤乱之情。乐府《北风行》、《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篇,或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或讽刺政令繁苛,或批判苦乐不均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向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并进一步揭露官逼民反的真理:“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这些诗句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表现出战斗精神。在其《咏史》中也肯定了武力反抗暴政的正义性:“秦人任法令,斩艾尊君师。六合始一家,恩爱始乖离。一旦山东客,揭竿以为旗。叫呼骊山徒,天下响应之。素车拜轺道,谁复为嗟咨。”这不仅是在谈论历史经验,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这些言志摅愤的诗歌,如钱谦益所云,“魁垒顿挫,使读者愤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列朝诗集小传》)。其后期入明后作品,由于生活面狭隘,多歌颂承平和叹老伤怀之作。亦如钱谦益所云:“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肆矜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又云:“窃窥其所为歌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其深衷托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每盍然伤之。”(见《列朝诗集小传》)间亦有一些气势豪迈之作,如《二鬼》长达一千二百餘字,描写管理日、月二鬼(结麟与郁仪)违背上帝意旨,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极北极,替人民安排合适生活,结果被上帝派飞天神王捉住软禁起来。这是以寓言形式比喻自己与宋濂担负着重整山河、修复乾坤的使命和受到明太祖约束不能施展的苦闷。全诗想象奇特,气势雄伟,富于浪漫主义精神。基工于古体,其早年作品感慨苍凉,气势豪迈。如:“古人盗天地,利源不

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纷纷九衢内,连袖如长虹。共笑沮溺鄙,各事游冶雄。悠悠方自此,袞袞何时终?”(《感怀三十一首》)此诗不仅理语精警,而且带有傲兀不平之气。至于其晚年作品,则转为清新,亦有寓幽忧愤激于恬淡者,如:“蟋蟀已在宇,鸿雁方来宾。天秋风露寒,阴谷何时春?欲为商声歌,恐惊梁上尘。衡门掩仲蔚,庶用存吾真。”(《秋怀》八首)把忧谗畏讥之情以极朴实平淡的语言表达出来。基为越中诗人之首,其成就只有高启才能与之比肩,对于明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学者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其著作极富,有寓言杂文集《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以收早年诗文为主)、《犁眉公集》五卷(晚年诗文集)、《写情集》四卷(词集)、《春秋明经》二卷。这些后皆被收入《诚意伯文集》。《明史》卷一二八有传。王馨一为撰年谱一卷,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王学泰)

【宋讷】(1311—1390)字仲敏,号西隐。滑县(今属河南)人。性持重,学问渊博。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进士,授盐山知县,旋弃官归。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曾为北平考官。洪武十三年,征儒生十八人编制礼乐诸书,讷为其中之一,事竣而归。后又以杜敦荐出为国子助教,升翰林学士,改文渊阁大学士,迁国子监祭酒,卒于任。讷为国子学官时表彰程、朱理学,对于监生约束甚严,颇受明太祖赏识。武宗正德(1506—1521)中追谥文恪。讷处于易代之际,入明虽为重臣,在元亦曾出仕,故其诗多感慨兴亡盛衰之作。《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客北平闻行人之语感而成诗四首》、《直沽夜泊》、《舟过长芦》皆是这类作品。这些诗,既肯定了“宝鼎千年归汉室,锦帆千古似隋家”以明代元的合理性,又同情元朝皇室的离散播迁:“后宫鸾镜投江渚,北狩龙旗没塞沙。”更多诗篇则表达对新朝的赞颂,如:“几年陵谷变迁中,壮岁回头已衰翁。狂客彩笺犹吐凤,佳人锦瑟罢移鸿。衣冠复古多新制,尊俎论文有旧风。极目干戈无事日,车书重见万方同。”(《归来即事再用前韵寄霍东崖元方》)讷工于七律,音调铿锵,气象雄浑,但往往有句无篇。著有《西隐文集》十卷,其中诗三卷。《明史》卷一三七有传。(王学泰)

【朱右】(1314—1376)字伯贤,一字序贤,号邹阳子。临海(今属浙江)人,徙居上虞(今属浙江)。早岁从陈德永学,以文章受知于李孝光、危素等,元末累举不就。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先以考订“三礼”被征,后为宋濂推荐修《元史》。洪武六年修《日历》,除翰林院编修。洪武七年,修《洪武正韵》,寻迁晋府右长史。卒于官。右精于史学,存诗不多,仅数十首,多写志抒怀之作。诗风雄浑典重,颇有唐风,

如:“水国风高木叶霜,满舟山色入荒凉。小孤残照收江左,大别寒烟锁汉阳。新饭软炊菰米白,浊醪香泛菊花黄。故乡千里空回首,云树茫茫鬓发苍。”(《江上秋怀》)其他如《次刘伯温都事感兴》、《春怀》、《江夜》等皆为其代表作品。右工于古文,尝选定韩、柳、欧阳、曾、王、三苏八先生集。唐宋八大家之说始于此。著有《白云稿》,另有《春秋类编》、《三史钩玄》、《秦汉文衡》、《深衣考误》、《历代统纪要览》、《元史补遗》、《书传发挥》等等。传附《明史》卷二八五《赵壘传》。(王学泰)

【陶安】(1315—1371)字主敬。当涂(今属安徽)人。少从名儒李习游,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举乡试,授明道书院山长。元末大乱,避地家居。至正十五年(1355),明太祖渡江,安与李习率父老出迎,陈述攻取天下之谋略。留置幕府,授左司员外郎,出为黄州知府,坐事谪桐城知县,迁饶州知府。太祖自立为吴王时,召为翰林学士,即帝位后,命知制诰,兼修国史,寻迁江西行省参政,卒于官。赠姑孰郡公,追谥文宪。安尤长于易学,善卜筮。明初议诸礼,率由安裁定,故太祖赐以亲书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亦工诗,其诗多写其处于乱世的感受与建立功业的志向,如:“英雄逐秦鹿,诸兵日相侵。义师独縞素,感动天下心。三杰功名显,亚父终陆沉。时方求善策,不计陈平金。”“孤桐倚绝壁,长养材质奇。截为焦尾琴,奏成白雪辞。悦非爨下声,知者复其谁?物固有佳遇,待时何足悲。”(《次韵刘彦炳典签》)诗中借写秦末群雄逐鹿之争以喻元末局势,并表达了有抱负的士人积极用世的热情。其诗清新而有劲健之气,律诗联语多佳句,如:“树头烟浪沉浮日,水底星河上下天”(《三湖》),“浔阳九派疑无地,庐阜千峰直造天”(《泊江天》)等。有《陶学士集》。《明史》卷一三六有传。(王学泰)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今属浙江)人。宋苏辙后裔,父友龙,为许谦门人,亦有名于时。伯衡警敏绝伦,博洽群籍,长于古文,元末贡于乡。明太祖开府于金陵,被聘至礼贤馆,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明朝建立,被荐,召见,擢为翰林编修,随即以病辞官,留京校讎《元史》。次年,还乡。太祖洪武十年(1377),宋濂致仕,举以自代,征入京,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洪武二十一年,聘主持京中会试,事竣复辞还,寻为处州教授。后因所上表笺忤旨,下狱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伯衡长于文,不以诗名,然诗亦颇可观。其诗以摅情言志、酬酢题赠之作为多,工于古体,如:“江雨殊未已,江风生早寒。今我悄不乐,喟然起长叹。决去苦不早,无营尚盘桓。徒贻父母忧,岁晏衣裳单。”(《江上连雨》)诗中曲折反映明

初朝臣在明太祖暴戾统治下的忧惧和对自由乡居生活的向往。另外许多作品也表达了这种情志,如《东斋夕书》:“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惬素。高枕一酣眠,长廊独闲步。白云谁云长,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阶,凉风满高树。偶随孤鹤行,时见疏萤度。即此有馀欢,何况山中去。”在无可奈何之中可隐隐感到诗人的忧惧。伯衡诗风凄婉,诗味隽永,为越派中较有影响的诗人。有《苏平仲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袁华】(1316—1373之后)字子英。昆山(今属江苏)人。少颖语不群,读书一二遍辄不忘,曾向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学诗,与诗人顾瑛交好,曾居顾氏玉山别墅中,顾所藏名书画被其品题殆遍,诗名闻于缙绅间。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为苏州训导。其子为县吏,被罪,坐牵累被逮,徙于南京,卒。华多题咏书画及唱和应酬之作。其题画诗往往将自己写入画中:“我昔系缆桑落洲,好山无数当船头。大孤绝立小孤险,江水远兼湖水流。扁舟老叟钓斜日,断崖古木含清秋。草堂抚卷重感慨,满眼风尘怀旧游。”(《秋江钓艇图》)只在最末二句才点明是题画。其他如《雲林筠石春树图》、《文湖州墨竹苏文忠题其上》等诗亦如此。其诗于流畅平易中而又典雅有法,开明初春容典丽之诗风。由于华活动范围较小,明初虽入仕而未至显达,故其诗名不著,如四库馆臣所言:“明之初年,作者林立。华为诸家盛名所掩,故人与诗皆不甚著。实则衔华佩实,具有典型,非后来伪体所能及,固未可以流传未广轻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诗集二种:一为《耕学斋诗集》十二卷,录诗千馀首;一为《可传集》一卷,由杨维桢删定,去取颇严。又编有《玉山记游》一卷。生平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等。

(王学泰)

【吴志淳】字主一,号雁山老人。曹县(今属山东)人,一作无为州(今安徽无为)人。元末以父荫曾历官靖安、都昌二县主簿,红巾军起,徙家豫章,后又徙居浙江鄞县之东湖。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执政奏为翰林待制,为权幸所阻。入明年已老,不仕,优游于田园。吴工古隶,学《孙叔敖碑》,为时人所重。其诗以写隐居田园优游自在生活为主,如《竹外居》、《柳南渔隐》、《春游三首》、《夏日园中消暑三首》等。这类作品写得清新俊逸,如:“江岸萧条草树枯,野人生计在鱼罾。满天风雪烟篷底,唱罢渔歌笑拥炉。”(《题小山水景》)也有少量反映当时社会动乱与民生艰难的作品,如:《儿牧牛》中在敦促孩子专心专力牧牛耕田的同时也写出了“牛不耕田廩无粟,淮上三年食人肉”的句子;《官掘壕》写战乱之中,官为拥城自保,逼迫人们掘民田作壕,破坏生产,小吏

还借此索钱,鱼肉百姓。从这些篇章中,可见战乱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著有《柳南渔隐》、《环碧轩》二集,皆不传。明俞宪《盛明百家诗后编》中有《吴主一集》一卷。传附《明史》卷二八五《赵抃谦传》。

(王学泰)

【汪广洋】(?—1397)字朝宗。高邮(今属江苏)人。少从余阙学,善篆,工诗歌,元末举进士。明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出参军事,曾任江南行省提控,迁江南行省都事及江西行省参政等职。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山东新平定,命往安抚新归附之官民。召入为中书省参政,后以御史弹劾,放还乡,再徙海南。寻召还,封忠勤伯,拜右丞相。左迁广东参政。召为御史大夫,复拜右丞相。坐贬广南,舟次太平时赐死。广洋位至台辅,其诗虽多题咏应制之作,但气魄雄伟,颇能体现开国气象。这一特点在七言歌行中更为突出,如《歌风台》虽咏汉高祖刘邦还乡事,实际上是借诗歌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歌颂明朝之建立:“古台秋风吹野蒿,大江直下奔惊涛。块然崛起下数仞,意气尚欲凭之高……故乡故乡归去来,槌牛酹酒临高台……酒酣拔剑大风里,自舞自歌隆准起。愿以猛士守四方,山川草木从风靡。惜哉汉高之虑在目前,於变时庸恐未然。”《从军乐》更为直接地表现开国之初明军将士的责任感、荣誉感:“天子有诏征不庭,重选前锋扫幽朔。出门万里不足平,宛驹照耀黄金络”,“少年忽忆慷慨事,便起酌酒浇心胸。酒酣耳热声摩空,手提三尺青芙蓉。前将军,古都护,将士在荣不在富。一朝手格楼兰归,人拥都门看驰骛”。这是只有在国家兴盛、人们自信心较强时才有的景象。广洋诗中描写朝中大典的作品多丰赡典雅,浑朴端重,富于气势,这与其身份地位有关。宋濂在为汪诗集所写的序中称其久处台阁“览乎城阙宫观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言淳庞而雍容,铿锵而铿锵”。指出了作者生活经历与其风格的关系。其近体诗则多清新明畅之作,如《岭南杂录》三十首等。著有《凤台吟稿》十卷。《明史列传》卷九、《明史》卷一二七并有传。

(王学泰)

【贝琼】(1316?—1378)字廷琚,一名阙,字廷臣。崇德(今属浙江)人。少学诗于元名诗人杨维桢,年四十八始领乡荐,成举人。张士诚据江浙,隐于笈山,屡征不就。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征修《元史》。洪武六年,除国子助教。洪武八年,迁中都国子学助教,教功臣子弟。洪武十年,致仕,卒于家。琼大半生生活于乱世,向往归田隐居,而由于战争、动乱,难求一隅乐土。其诗反映了时代的苦难和诗

人对安定和平生活的追求。如《暮春杂诗》云：“世乱疲奔走，空伤万事非。塞鸿还北度，戎马未南归。乐土居人散，丰年野客饥。闭门风雨过，一径落红稀。”又《晚眺》诗云：“极目三边静，伤心万室空。断山明落日，飞鹜卷回风。汉节无归使，夷歌有野童。烟尘几时稀？归钓古城东。”这些都是其有代表性的作品。琮诗沉警似杜甫，在明初足以名家，但只有五言律体较为成功，其他体裁与五律不称。其七言歌行颇有元末明初吴派诗人之特点，注重词藻与音节谐婉，如《醉芙蓉叹》、《题火龙烹茶图》、《徐给事山水歌》皆是这类作品。有《清江集》。《明史》卷一三七有传。

(王学泰)

【李晔】晔或作昱，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以荐为国子学助教，因病免官。移居永康，馆于胡氏，与胡伯宏兄弟等唱和。晔工于古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才力雄贍。古体长篇，大抵清刚隽上，矫矫不群”。汪端亦称其诗“源于杜陵。七古力劲神完，纵横如意，有骏马下坂之势”（《明三十家诗选》）。其七言歌行往往句法错落，随意着笔，但前后一气贯注，如《王子约双钩竹歌》长五百三十馀字，全诗仿佛任意下笔，先言王画竹为人所喜爱，再言王画竹与众不同，注重到产竹之处实际踏勘，了解竹性，并把它与自己情感结合起来，然后例举今人古人的画竹成就，把当代的吴门道士张溪云，宋代的文同、苏轼，元代的李衍、赵孟頫、柯九思等都拉来与王生画竹相比，并生动地写出这些画中之竹所引起的审美联想：“诸公画竹工画影，隔帘仿佛潇湘景。我欲鼓柁游潇湘，碧云万顷浮天光。美美娟娟隔秋水，欲来不来空断肠。”诗的最后写王生赠画深情。全诗纵横捭阖，看似无序，但由语言、韵律所形成的态势把许多零碎的感受粘合在一起，似断不断，意脉相连。其诗多题赠唱合之作，近体较差，大多平顺而已。有《草阁集》六卷、拾遗一卷、文集一卷。生平见《金华诗录》。

(王学泰)

【甘瑾】字彦初。临川（江西抚州）人，一说余干（今属江西）人。元末与著名诗人张翥往来甚多。张翥对其诗颇为赞赏，比作美女簪花。入明，为严州府同知，后不知所终。瑾诗多咏史、怀古之作，往往借史事以感慨世事动乱。如《公孙》一首借咏汉代割据一方的公孙述事迹，以反映割据江西的陈友谅的兴盛与败亡。《读史有感》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反映元朝的覆灭。即使在一些应酬诗中亦可见时代动乱的影子，如《寄马彦曾》云：“百战孤城血未干，故人书札报平安。秋风代马思燕草，夜月湘歌怨澧兰。万里江湖仍旅食，百年天地自儒冠。山阴更有诛茅地，

仗剑休辞行路难。”其诗音节高亮，颇有唐音。诗集不传，其作品散见于一些明诗总集中。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

(王学泰)

【刘崧】（1321—1381）初名楚，字子高。泰和（今属江西）人。世业儒，七岁能诗。家甚贫，值世乱，奔波辗转，不挫其志，元末，举于乡。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经明行修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副使，有异政，坐事谪输作京师，寻放归。洪武十三年，太祖手敕召为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归乡。洪武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卒于官。崧为人清介，晚年贵显，淡泊如旧，为官不携家眷，惟携一僮往，至则遣还。公馀之暇，独处一室，据案吟咏，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壮，诗愈工。崧大半生生活于元末明初大动乱中，江西又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其诗大多反映了在战争与各种灾害中人民饱尝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品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民辗转于水火的苦况，也暴露了农民军的许多弱点。《壬辰感事》六首写江西战乱的由来与发展，可称史诗。《南乡怨歌》写兵匪相续、虎去狼来，“杀尽丁男掳奴女，手麾牛羊雨中去”。《养牛叹》、《采野菜》、《后掘冢歌》等揭露了地方军队（寨军）胡作非为。《布谷鸟》写由于“丁壮从军”、“中男筑城”，春来土地无人耕种。《虎逐狼》写各种军队如虎似狼，无不扰民害民，人民备受痛苦。《凶年有弃子于江渚者诗以寄哀》一诗更令人不可卒读：“骨肉岂不亲，无食难为恩。抱子弃水中，哭声吐复吞。母饥骨髓枯，儿饥眼眶出。终然两难存，何以共忧恤。岁月不相贷，恩爱从此分。我死尚可忍，儿啼那复闻。儿啼那复闻，江水流浩浩。不忍回视之，衔悲入秋草。”虽然汉末王粲就写过这个题材，但这样细腻的描写才更能展示这类事件的悲惨。其《石炭行》写挖煤工人之苦：“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复滂沱。斲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研空忽崩反。十人同入几人归，接便篝灯出牵挽。”此题材，其他诗人很少涉及。另一些诗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园居杂兴》等。崧擅长歌行，用此体写人叙事，平易畅达，很少用辞藻，但却富于感染力，其描写的世界中充满了悲哀与血泪。其近体及抒情作品因过于平易，诗味寡淡。崧为明初江西（或称江右）诗派创始人，其诗风影响家乡作者达数十年之久，永乐、宣德之间盛于朝堂的台阁诗风就是江西诗派的直接产物。崧所倡导的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也卑亢而不振。”（《列朝诗集小传》）著有《北平八府志》、《槎翁诗文集》、《职方集》等。《明史列传》卷一三、《明史》卷一三七有传。

(王学泰)

【刘炳】字彦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其父斗凤,与元名诗人虞集、揭傒斯交好。炳值元季战乱,与弟煜结里闲自保,后依固守安庆、反抗红巾军之元将领余阙,以其孤军不振辞归。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明太祖起兵淮南,炳上书献策,平江西,授中书典签。太祖洪武(1368—1398)初,为大都督府掌记,出为东阿知县,旋引疾归,卒年六十九。炳生活于战乱时期,一生经历丰富,其诗多以生平经历为题材;许多作品写其从军生活,如《东武吟》回忆其“壮年投笔去,手提三尺箠。戎衣才至骭,短剑光陆离”。这正是当时许多士人的出路。《予昔与孟思鲁参戎事于三衢监司宋公幕府及兵溃得间道还乡遂归休之志故历叙之》诗中叙述其从军作战及归乡过程。作者身在军中,很少看到军队对人民的祸害,但也感到战乱给社会带来的萧条,因此,在许多怀古忆往之作中表现出感伤情绪,如《浔阳行》、《明妃曲》、《题李陵苏武泣别图》以及一些古乐府等。在描写自己生平的作品中也有些反映了沧海桑田之变,从而笼罩着悲剧气氛,如《寄徐宗周兼柬杨焕文、阮宗泰》、《寒食客秦淮忆旧》。特别是《见月行》通过诗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情境下望月,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作者一生中时局的重大变化。炳擅长古体与七言歌行,其诗于平易流畅中有一股雄爽挺拔之气。著有《春雨轩集》(一名《刘彦昇集》)。传附《明史》卷二八五《王冕传》。(王学泰)

【刘绍】字子宪,号纬萧野人。建昌新城(今江西黎川)人。生活于元末明初。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曾北上奔走于中原、大都之间,以求功名,不遇。又曾往闽中帅府参谋军事,未遂所志。入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官翰林应奉。绍耽吟咏,人称有“诗癖”,其诗与同乡黄肃齐名。诗以写行旅与沿途风景为多,其中亦时时透露出战乱的阴影。如《真定城》诗云:“客行抵燕南,独夜车轧轧。斜月耿流光,繁星动天末。逶迤出深壁,仿佛见城阙。击柝接耳闻,哀笳向晨发。维时重围解,二镇兵祸结。吞噬徇乃私,边隅忍流血。防虞此何谓,国耻殊未雪。感此竟惘然,悲歌激林樾。”诗句平易畅达,但不流于疲弱,给读者以风清骨峻之感。绍诗被编入《元音遗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绍为“元之遗民”。陈田指出其误,并云:“明初江右诗家,始推刘子高(即刘崧),如子宪者,正可雁行”。(见《明诗纪事》卷一二)绍诗在《元音遗响》中独占一卷,其事迹散见于《建昌志》及其作品之中。(王学泰)

【王祹】(1322—1373)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幼聪敏,及长师从浙东著名学者柳贯、黄潜,遂以文章名天下,元末,睹时政衰敝,往大都上书时宰,

未报,归隐青岩山中。明太祖进军浙东,征为中书省掾,进《平江西颂》,改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迁侍礼郎,兼引进使,寻掌起居注,出为南康同知,多惠政。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上疏建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诏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官,书成擢翰林待制,奉使吐蕃,未至召还。谕招抚云南,梁王不从,遂遇害。惠帝建文(1399—1402)中,赠翰林学士,谥文节。英宗正统(1436—1449)中,改谥忠文。祹壮年出游,经历丰富,多借记游之作摅写其情志怀抱,如《七月八日同季高东归述怀》诗云:“蚤年志湖海,嘉遁非所甘。驱车燕赵北,弭节吴越南。季子夸远适,虞卿劳负檐。谓将风翱翔,讵能辙鳞淹……”其《长安杂诗》云:“淑灵之所钟,宜有异人作。如何千载间,踪迹转萧索。姬旦不复生,三代已云邈。后来王佐才,劳我思景略。”可见诗人是以“王佐才”自诩的。其作品中还有许多描写地方风物的小诗,如《临漳杂诗》十首等。祹诗质坚体洁,颇见才情,五律多佳句,如“地临冬少雪,海近夜多风”,“茉莉头围白,槟榔口沫红”,“不雨犹穿屐,因暄尽佩香”(皆见《临漳杂诗》)。祹在越派诗人中影响较大,俞宪说:“忠文诗平易切实,然在当时与宋潜溪(濂)首倡浙东,功不可泯。”(《盛明百家诗选》)著有《大事记续编》。诗文收入《王文忠公集》。《明史》卷二八九有传。

(王学泰)

【乌斯道】字继善。慈溪(今属浙江)人。少时与其兄乌本良皆有名,得到浙东名儒宋濂称颂。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以荐被任命为石龙知县,调永新知县,皆有惠政,因事谪戍定远,不久放还,卒。斯道善弈,工画,精琴,楷书行草尤妙。罢官后,求诗及求书法者,户内常满。其诗具有浙东诗风特征,不注重修饰词藻,善于用质朴古拙的诗句表达对政治、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上的感受。如“驱车陟太行,中道车轮折。挽舟溯河流,中流纓縻绝。前途郁漫漫,彷徨欲怀归。积雪被长坂,洪涛荡寒晖。胡不戒未然,阗中慎所之。徒怀百年志,自贻千里悲”(《古诗》)。可见与浙东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如刘基、宋濂、胡翰等人作品在精神实质上是相相似的。这类作品还有《泽畔》、《潇湘水云》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诗“寄托深远,吐属清华,能铲除元人繁缛之弊”。著有《秋吟稿》、《春草斋集》。传附见《明史》卷二八五《赵壘传》。(王学泰)

【张著】字则明,自号永嘉子,人称永嘉先生。平阳(今属浙江)人。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游学常熟,因战乱兵阻不得归。遂占籍焉。学者争师

之,举为州学训导。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授延安肤施(今陕西延安)知县,以吏事干练见称于时,公余与金文徵、黄廷玉唱和,编为《长安唱和诗集》流播于时。升为临江府同知,卒于官。著曾至陕北为官,集中许多篇章写于延安或来去征途之中,再现西北战乱之后凄凉景象,如《三川水涨金别驾用老杜韵题壁间余续其后》使读者感受到战乱之后呼啸而来的水患的可怖。《出延安南关》写离任告别延安时的感受:“向年跃马入南关,策策羸骖此日还。行过江南莫回首,塞云深处万重山。”战后的凄凉真是不堪回首。其诗典丽劲健,古体、律体颇见功力。有《永嘉集》十二卷,其中诗九卷,仅有钞本传世,集前载有庐陵周桀所著《永嘉先生传》。(王学泰)

【杨基】(1326—1378)字孟载,号眉庵。其先嘉州(四川乐山)人,其祖父仕吴中(江苏苏州),遂家焉。生于吴,家于天平山南赤城下。幼时聪颖过人,九岁能背诵六经。著书十数万言,名《论鉴》。元末诗人杨维桢来吴,基于坐上赋《铁笛歌》。维桢得此诗大喜,携与俱东,盛赞其才。天下大乱,隐于乡,张士诚据吴,曾入幕为记室,与吴人高启、张羽、徐贲相唱和,人称“吴中四杰”。明太祖攻下苏州以杨为张士诚之右丞饶介客而被安置于临濠,旋徙河南,不久放归,起用为荥阳知县。召至京城,改官太常典簿。寻谪钟离,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不久,又获罪罢职。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复职,奉使长沙,还京后改任兵部员外郎,后迁山西按察副使,进按察使。以受他人谗毁被撤职,贬为输作,参加劳役,死于工地。基工诗文,善书画。其诗多描写个人生活琐事、闲情逸致,其中咏物题画,寄赠怀人之作亦颇多。有些作品透露出时代动乱的影子,表现出对元朝的眷恋。《送陈资深归广》的五古描写因战乱道路不宁,亲戚朋友会面之难:“奈何干戈际,万里涉沅潞。兹城颇阜庶,有女供奉养。世乱得粗安,胡劳问乡党?君言苦无家,一夕魂九往。乡书昨日至,捧读屡泫潏。四丧寄浅土,未得掩诸圻……”诗中还表达了作者的期望:“安得混本书,妻孥共罗幌。兹事竟难期,泪眼一凄怆。”全诗五十句,言浅情深,很像古乐府。入明之后的作品中反映了对出仕的忧惧情绪,这与其经历有关。在《樟树镇舟中作》委婉地写道:“依是吴淞钓鱼叟,全家生长吴江口。迟钝长飞众鸟先,迂阔每落众人后。城中父老少相知,乡里儿童亦见欺。几上细钞高士传,壁间大篆《考槃》诗。春风百草承沐膏,长掷渔蓑亲案牍。胥吏犹嘲吏事疏,妻孥欲笑形容俗。羸马长途恐不堪,君思何日许投簪?”诗中有自我表白,也有难以摆脱的痛苦。这些在《寄题水西草堂》、《闻蝉》、《哭高季迪旧知》等诗中表现得

为明显。基在吴派诗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其风格纤秾华靡,如其《结客少年行》“豪名独擅秋千社,侠气平欺蹴鞠场,白璧一双酬剑客,明珠十斛买胡娘。金丸挟弹章台左,宝骑闻笳太液旁。梅子隔墙羞掷果,桃花深院求酒浆”,正是吴中才士生活的写照。这种诗风影响了几代吴中才子派诗人。基工于对偶,佳句甚夥。明都穆《南濠诗话》云:“孟载诗律尤精,如云‘花无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官不博三竿日,万事无过两鬓星’,予爱其闲旷。及云‘乱世身如危处立,异乡人似梦中来’,‘千金已废床头剑,一字无存架上书’,则又叹其困穷。如云‘红雨落花来袞袞,绿波芳草去迢迢’,‘六朝旧恨残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予爱其含蓄。及云‘柳色嫩于鹅破壳,藓痕斑似鹿辞胎’,‘小雨送花青见萼,轻雷催笋碧抽尖’则又惊其新巧”。这些对句无论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议论皆用词妥帖,精警动人。其五古冲逸峭拔,多有兴寄,七绝则较含蓄,有晚唐风调,七言歌行则学初唐。有《眉庵集》。《明史》卷二五八有传。(王学泰)

【张道】(1330—1394)字子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父为元海道万户总管,庶出,为嫡母所妒。幼时颇颖悟,七岁能赋诗过目成诵,十三赴乡试,时称“圣童”。入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以秀才举,擢工部都水郎,以病免职,在乡觞咏自得。后复以明经举,授广西布政理问,调云南鱼课大使,考满改宣课大使,为官清廉自守,衣食不给,竟死于任上。道诗多为描写隐居生活与游宦生活之作,诗风迢丽俊逸,五、七言近体皆多可诵的篇章。如“落日江城烟雾深,宦游每感岁华侵。山川殊助登临兴,雨露常存恋阙心。一鸟远啼沿水树,众峰齐露出云岑。衰年抱病天涯外,目断乡关思莫任。”(《登柳州城楼》)这是写宦游时的思乡情绪,如果与唐代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相比较,可见其写情之作不执著于情,表现出潇洒通脱的一面。这样的人生态度与风格更宜于描山绘水与歌咏物外高致,如其《南塘泛舟》诗:“一百五日又清明,江花冉冉鸟嚶嚶。拂水柳条千万缕,东风不碍酒船行。”道曾与倪瓒、高启等元末明初的吴中有代表性诗人唱和,其诗风也受到他们影响。诗集名《乐圃集》、《江馆集》、《南湖集》、《江行集》、《滇池集》与文集合为十二卷,称《甘白先生集》十二卷。俞贞本为撰墓志铭。《吴中人物志》卷七有传。(王学泰)

【唐肃】(1331—1374)字处敬。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少聪颖,九岁入郡学,通经史,兼学阴阳、医卜、书数,与谢肃刘名,有“会稽二肃”之称。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中江浙乡试。张士诚据江

浙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至正二十五年,转嘉兴路学正。士诚败,被押赴南京,寻以父丧归。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荐入京参与修订礼乐诸书,擢为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科举行,为分考官;以失朝罢官。洪武六年,谪佃濠梁。次年卒。肃居吴时曾与高启、杨基等唱和,互有影响。其作品多题咏写景摅怀之作。诗语骏爽劲健,时有不平之气。其《送陶元庸》诗云:“有酒浇赵州,无酒酌鹦鹉。不逢平原君,何须识黄祖。杀姬谢翫士,兹事付尘土。谁能爱文章,甘受嫚骂侮。丈夫气盖世,身为知己许。苍茫风尘际,因子慨今古。临歧舞铜剑,霜隼凌平楚。去矣江国遥,相思隔津鼓。”其与吴派诗人的一致之处是重视词藻的色彩与音节的谐婉,特别是七言歌行,更是如此。如《题画》(春斋昼坐花落初)、《秋江图》、《缙云归隐图歌送陈鲁山》皆有此特点。著有《丹崖集》八卷。苏伯衡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王行】(1331—1395) 字止仲,号淡如居士,又号半轩,亦号楮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时随其父依卖药徐翁家,记药物,应对如流,能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主人翁异之,令其学,遍读主人所藏书,年未弱冠,授徒于城北望齐门,淹通经史百家言。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银以镒计,行辄麾去。曾与邻居高启等互相唱和,为“北郭十友”之一。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郡学延之为经师,已而谢去,隐居于石湖。郡守魏观访之,不肯出。其二子役于南京,行往视之,馆于凉国公蓝玉家,数荐之于太祖,得召见。后蓝玉以谋叛被诛,行亦连坐死。其作品多题画酬赠之作,诗风清刚骏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与高启称为劲敌”,则似称誉太过。其《自题所作画》“高馆良宵睡思迟,葛巾重着半醺时。都将满抱林泉兴,付与闲窗墨半池”及《题雲林画》“乱鸿沙渚烟中夕,黄叶江村雨外秋”均可见其清逸之趣。著有《楮园集》、《半轩集》及《墓铭举例》。《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张羽】(1333—1385) 字来仪,后以字行,更字附凤。本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侨寓吴兴(今属浙江),元末中举后,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居于吴(江苏苏州)。与高启、杨基、徐贲等为诗友,并称为“吴中四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征至京师,以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太祖重其文,洪武十六年自述滁阳王事,命羽撰庙碑。寻坐事谪岭南,未至,召还。羽自知不免于难,遂投龙江以死。羽曾入张士诚幕中,素为太祖所忌,太祖统治又极暴戾,故其诗中多流露出忧灾畏祸之情和对平安闲适生活之向往。如《甲寅纪行》十首

之一的《金川门》(此为张奉旨往凤阳祭皇陵时所作)最后写道:“吾来犯清晓,天空霜露繁。列宿森在列,北斗峭可援。江光合海气,溟滓神攸存。俯视不敢唾,中有蛟龙蟠。浮屠者谁子,高居凌风幡。不见渡口人,扰扰蜂蚁喧。愧彼超世士,去去将何言。”简直是如履春冰。可是不出仕又不可能,所以他特别羡慕隐士:“为问只今江海上,如今无事几人同。”(《唐叔良溪居》)明初残酷的专制统治,使得才士多无善终,对此,作者诗中屡有反映,如《题陈长司画》描写了画家陈惟允临刑从容作画的情景,控诉了统治者对于文学艺术的摧残。这类作品还有《悼高启》三首,这组诗表达了对诗人无辜而被杀的痛悼。《槎史赴台》中写道:“平生五千卷,宁救此日艰?天网岂恢恢,康庄遍榛菅。所恃莫可灭,才名穹壤间。”可见当时政治黑暗,无辜者告诉无门。《怀友》诗二十三首表达了在乱世中朋友们不能常聚的苦闷。这些诗都是时代的产物。羽兼善丹青,故多写题画诗,这些题画诗亦颇能表现出图画之妙处。其古体较佳,五古质朴浑成,七古歌行,笔意雄放,音节婉畅,在“吴中四杰”中独树一帜。有《静居集》,传附见《明史》卷二八五《高启传》。

(王学泰)

【王佐】(1334—?) 字彦举。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少时随父官南雄,中原战乱不能归,遂占籍南海(今广东广州)。与同郡孙蕡齐名,结社赋诗,遂与蕡、黄哲、赵介、李德号“岭南五子”(或称“南园五先生”)。孙蕡在《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中描写了他们诗酒唱和共同创作情景,对于王佐才情推举备至。元末,何真割据粤中时,佐为掌书记,参与谋议,劝其归明。入明还乡。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被荐,征入京师,拜给事中,居二载,即乞归。当时臣僚自请解官还乡者,多被刑戮、遣斥,佐为人恭谨勤慎,得以归山,当时以为难得。佐诗可分前、后二期。其早年作品多以山水景物题材,写自己优游放浪之生活。入朝后多应制酬酢之作;其《应制赐宋承旨马》记明太祖赐宋濂马事,歌颂君臣风云际会,受到太祖的欣赏。其《唐仙方使图》借写唐开元、天宝之盛与首都长安的辉煌壮丽以颂美新朝。后期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他对家园与早年自由自在生活的追恋。如《江行》:“江水悠悠行路长,孤鸿啼月有微霜。十年踪迹浑无定,莫便逢人问故乡。”后被放还,《寄同朝诸公》诗中写道:“天上鹄鸾还接武,江边鸥鹭已忘机。他年行部如相问,秋水芦花是钓矶。”从这首诗中,可见其脱出樊笼的愉悦之情。有《听雨轩集》、《瀛洲集》,稿多遗失,仅存诗一卷,收入《广州四先生诗》与《广中五先生诗选》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孙蕡】(1334—1389) 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博学,工诗文。元末何真保南海,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黄哲、李德并受礼遇,人称“岭南五子”或“南园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蕡为何真草降表,归附永忠,寻征其主持郡学。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登进士第,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有政绩。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城垣。蕡讴吟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洪武十五年,起为苏州经历。洪武二十二年,因受连累,谪戍辽东。后蓝玉党发,蕡曾为玉题画,遂论死。临刑,吟诗而逝。蕡诗多为记录自己行踪经历之作,其中一些表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反映了明初知识分子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其临刑所吟诗云:“鼙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据赵翼《陔余丛考》指出,此为五代时江为的临刑诗。)蕡处于明初社会走向稳定与发展时期,许多作品反映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城市的繁华。如《广州行》“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乱鸣鼙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在此之前尚没有诗人用此浓墨重彩描绘在中原看来是“蛮荒烟瘴”之地的广州。《南京行》更着力铺排南京的繁华佳丽,而且反映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文士通过写作卖钱以改善生活。其他如《湖州乐》、《蒋陵儿》、《紫骝马》、《上京行》、《长安篇》等,或以城市景物为描写内容,或以城市豪门子弟的浪漫生活为题材,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明代的开国气象。蕡长于七言歌行。其歌行题材广泛,清丽婉畅,富于才情,取法于初唐的卢照邻、骆宾王与中唐的元稹、白居易。其近体较为平易,但亦注重词藻。其七绝组诗《闺怨》一百二十四首,《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规模宏大,较为杰出。蕡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第一位生于粤南、卓有成就与影响的诗人(唐代张九龄、陈陶,宋代的余靖皆生于粤北),对于广东诗歌创作的开展起了推动与示范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蕡当元季绮靡之余,其诗独卓然有古格,虽神骨俊异,不及高启,而要非林鸿诸人所及”,比较准确地指出其在明初诗坛的地位。著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和陶集古律诗》等,多已散佚。其诗文收入《西庵集》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王学泰)

【徐賁】(1335—1383) 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居常州(今属江苏),再徙吴(江苏苏州),居城北齐门外,故又自号北郭生。賁与余尧臣、杨基、张羽、王

行、王彝、宋克、吕敏、陈则、释道衍并称高启之“北郭十友”。曾为张士诚所礼聘,不久即辞去,与张羽避地吴兴间。张士诚被明太祖灭后,徙居临濠,与杨基相邻。太祖洪武七年(1374),被荐至京。洪武九年春,奉使廉访晋、冀,直达雁门、代郡,行程五千余里。及还,检其囊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右。改监察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著,擢为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过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賁诗多模山范水之作,有些作品则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以寄托感时念乱、悲天悯人之情。其诗注重法度,特别是长篇古体,结构完整,气脉一贯,字句熨贴,足以补其才气不足,但有时不免规行矩步,显得拘谨。如《杨孟载画竹》诗先从真竹写起,其次写江南处处有竹,所以竹不足贵,然后写自己对竹之爱和竹之用途,重申爱竹成癖,最后才写道:“竭来并州苦寒地,沙土扑面心烦懣。宁无寒草共山花,惟觉忿疏俗吾眼。胸中尘气久已积,对此汾河诩成浣。君心抱有渭川思,挥洒风烟意闲散。封图远送邀我题,措辞苦涩颜何赧。”此诗条理分明,立意完整,几乎与竹相关的人事全都说到,但缺少灵气、韵味。其诗之佳者多为短章小诗。这些作品有民歌风韵,风格婉丽,含不尽之意,如:“鳞鳞水溶春,澹澹烟销午。不见唱歌人,空来荷叶浦。何处寄相思,停舟采芳杜。”(《过荷叶浦》)“江声千里万里,客路长亭短亭。后夜相思何处?芦花明月沙汀。”(《送别沈德虔》)“梦里绿阴芳草,画中春水人家。何处江南风景?啼莺小雨飞花。”(《记梦》)其七绝更是词采绮丽风韵凄朗:“檀板朱丝出研声,停杯齐听月当楹。分明自是凉州曲,不解何人最有情?”(《月明听胡琴》)这些诗于景物中深藏着哀怨。有《北郭集》。传附见《明史》卷二八五《高启传》。

(王学泰)

【姚广孝】(1335—1419) 又名天禧,初为僧,名道衍,字斯道。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年十四度为僧,读书工诗画,曾与高启等唱和,或以其为“北郭十友”之一。又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明太祖洪武(1368—1398)中,诏通儒书之高僧试礼部,不受官而还。后以僧宗泐荐,选侍燕王朱棣,至北平,住持庆寿寺。惠帝建文(1399—1402)初,朱棣策划起兵夺帝位,广孝为其谋主。朱棣登帝位后,录姚功为第一,复其姓,赐名广孝,拜太子少师,命蓄发还俗,不肯,赐以宫女,不受,终生不脱僧服。监修《太祖实录》,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卒赠荣国公。广孝虽为政治和尚,然其诗却追求清寂枯淡之境界,《读韦应物诗》中曾云:“古淡岂易学,五字真吾师。”其作品也多此类篇章。如:“空林长掩关,闲云去无迹。

偶来值禅侣,清谈忘永夕。坐久磬声沉,松堂一灯寂。”(《师林精舍遇盈师夜坐》)“波澄一溪云,霜红半山树。荒烟满空林,疏钟在何处?不遇采樵人,复抱孤琴去。”(《访震师不遇》)这些都是历代诗僧们的传统题材与传统风格,但广孝非普通僧人,乃是深通政治权术的策士,也是力图建立不世之功的野心家,故其诗中也常流露愤世嫉俗之情,或急于用世之志,如写于洪武间礼部试后的《京口览古》云:“樵枵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姚诗本有《独庵集》,高启为之序,称其诗兼采诸家,浓淡迭显,险易并陈。此集未传于世。后人将其诗文总编为《逃虚子集》十一卷,刻于吴中,另有《类稿补遗》八卷。四库馆臣将姚集比作严嵩《钤山堂集》,认为“同为儒者所羞称”,故仅列于存目。显然比拟不伦。明成祖朱棣为撰神道碑,王鏊为作《姚公传》。《明史列传》卷二一、《明史》卷一四五并有传。(王学泰)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又号槎轩。长洲(江苏苏州)人。少聪颖警敏,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博学工诗。卜居于长洲北郭,与同时居住北郭的文士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宋克、唐肃、余尧臣、吕敏、陈则等人以诗文相切磋,互相唱和,号称“北郭十友”;又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以拟“初唐四杰”。自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据吴县,统治苏州十年,在吴招揽宾客、礼贤下士。启被待为上宾,曾在张氏占领区内作吴越之游,领略了当地的奇山秀水、名胜古迹,写下许多优美诗篇。明建立后,太祖下诏求贤,开《元史》馆。启应征召,负责《元史·历志》与《元史·列女传》。太祖洪武二年(1369)书成,授翰林院编修,陪侍皇太子,教授诸王读书。洪武三年,召对称旨,擢为户部侍郎,以年少未谙理财之术固辞,赐白金放还。洪武五年,魏观任苏州知府,改造府衙,从原址搬至张士诚故宫旧地,又疏浚锦帆泾,被诬告为图谋不轨,启曾为之撰《上梁文》,文中又有“龙蟠虎踞”之句,益触帝怒,一并得罪,启被腰斩于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诗多怀古咏史、登山临水、往来酬赠之作,借以摅写其壮阔的胸怀和不慕名利的志向。如《青丘子歌》、《赠薛相士》、《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咏隐逸》十六首等都是这方面代表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寄兴无端,言此意彼,耐人寻味。一些蔑视世俗礼法,不肯为世所用、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句直可视为对朱明王朝极端专制统治的挑战。如在《钓台歌》中赞美有良史才而不愿意仕宦的徐尊生:“先生当代载笔有良史

才,不展调元手、居鼎台,却思钓台亟归去,胸襟洒落何如哉,胸中之乐何如哉。”其集中也有许多作品反映了明初政治气候的严酷与士大夫惴惴不安的心态。这类作品有《忆昨行寄吴中故人》、《京师苦寒》、《清明呈馆阁诸公》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叙事诗,以当时重大社会事件与劳动人民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元末明初社会动乱、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给平民百姓带来的苦难与人民的喜怒哀乐,如《采茶词》、《养蚕词》、《废宅行》、《羁旅行》、《牧牛词》、《伐木词》等。其作品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自然风光、人情心态等诸多方面,在艺术上也有许多优长之处,如清汪端所说:“青邱诗众长咸备,学无常师,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绘。俊亮之节,醇雅之旨,施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明十三家诗选》)高诗佳处在于兼善诸体,熔铸变化,自成一家。其律体工于对句,笔健辞秀,一扫元人颓风。其绝句往往意显辞豁,但却余味无穷。如被传为是作者得罪之由的《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又如《寻胡隐君》:“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这些诗颇有唐人风味。有《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录其诗两千余首;又有《扣舷集》一卷收其词,《凫藻集》五卷收其文。《明史》卷二八五有传。李志光、吕勉为作《凫藻集本传》、《槎轩集本传》,金檀为撰《高青丘年谱》。(王学泰)

【偶桓】(1339—1420)字武孟,因眇一目,每自题“瞎牛偶桓”,又号瞎虎,别号海翁。太仓(今属江苏)人。性落拓嗜酒,年少任侠,常客于外,曾结识名诗人杨维桢、倪瓒,受到他们赞赏。瓒令其为诗,语多警绝,遂延誉于名公间,名声鹊起。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2),应秀才举,为崇安从事,授广西桂林河泊大使,终荆门吏目,致仕归。途中遇淮南故人蒋文用,即随之入京,侨居建安坊下,放情觞咏,久之乃还乡,年八十二卒。自作挽诗曰:“堪怜八十白头翁,自笑生前万事慵。北阙荐贤虽有刻,南村作守竟无功。耽诗不愧诗才拙,嗜酒惟愁酒盎空。留得五湖风月在,浪游谁复继遗踪。”可以想见其为人。偶诗以登山临水、题赠应酬之作为多,诗风清新流畅、萧疏骏爽,类其为人。如《王孟端墨竹》、《题唐人马图》、《题李道衡画》、《清真观》等皆能体现其风格。著有《江雨轩稿》、《醉吟录》、《凤台吟啸集》。编纂了《乾坤清气集》。《吴中人物志》卷四有传。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对其生平有所考订。(王学泰)

【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早以文学名世,客居会稽,于元末动乱中有保越之功,入吴,曾为张士诚客,家居北郭,与高启、徐贲、高逊志、

唐肃、宋克、张羽、吕敏、陈则、王行等相唱和，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入明，以附士诚被谪濠梁。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赦还，授新郑丞。尧臣耽于吟咏，高启有酬赠诗云：“日高破灶烟未起，闭户不绝哦诗声”。又云：“须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如瑰琼”。著有《菜蕖集》，惜已佚，故其诗流传者绝少。较有名的篇什为《秀野轩诗》，诗风清丽，颇能体现吴派风格。传附见《明史》卷二八五《王行传》。

（王学泰）

【吕敏】字志学，无锡（今属江苏）人。少时向学，欲举进士，遭兵乱，隐于梁溪、汾湖之间，授徒为生，颇历艰辛，遂着黄冠入道。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官无锡教谕。洪武十三年（1380），举人才，不知其官所终。张士诚据吴时曾居吴北郭，与高启、徐贲等唱和，称“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其诗多题赠酬酢之作，诗风迢丽，与高启、杨基等风格相近。如《为惠机长老题徐幼文写〈惠山图〉》云：“天寒华表鹤归迟，隔世令人起远思。偶见漪澜堂上画，犹看悟澹卷中诗。”著有《无碍居士集》。传附见《明史》卷二八五《王行传》。

（王学泰）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号强斋。昆山（今属江苏）人。少从杨维桢受春秋，精于性理之学，学行纯正，为当时所重。入明，以荐试高等，本拟授郡县职，因老母七十馀岁，请授近地，触怒明太祖，被任命为陕西咸阳县教授。在任时克己奉公，鞠躬尽瘁。在咸阳四五年，纂修关陕诸府图经又带病襄助修建礼殿，病死于任上，门人私谥文懿先生。明初诗人多生活于江南，描写北方生活的诗作很少，奎晚年生活于咸阳，故其作品多以关中风物为题材，记录了关陕一带经元末战乱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如《咸阳官舍述怀》：“兵后咸阳亦可怜，饥民延喘待丰年。一城瓦砾黄尘里，万井蒿莱白日前。就养路遥惭禄薄，从游地僻失英贤。情知自古儒官冷，未似吾官冷最偏。”其他如《渭陵》等亦属此类作品。其诗风可分为前、后期。前期为生活于吴中、与顾瑛等唱和之时，诗风流旖旎，注重词藻。后期为去咸阳后，诗风转向浑厚质朴，喜写七律，颇似晚唐杜荀鹤。著有《道学统系图》、《家祭仪》、《陕西图经》、《关中名胜集》、《昆山志》、《咸阳志》、《娄曲丛稿》、《支离稿》、《渭城寐语》及《强斋集》等。《吴中人物志》卷六有传。又卢熊撰有《故文懿殷公行状》。

（王学泰）

【管时敏】（1339—？）名讷，以字行。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幼而颖异，九岁能诗文，曾从元末名家杨维桢学习古文，元末不仕，以授徒为业。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进士，丁外艰归乡。洪武九年，征拜楚王府纪善，后擢为长史，在楚王府二十五年，深得

信任。年七十致仕归里，楚王请命于朝，留居于楚，禄养终身。时敏生活面比较狭隘，后半生多在楚王府中，诗作以酬酢题赠、咏物寄怀者为多。如《清明感怀》写长期游宦于楚对家乡的怀念：“十年宦学楚江滨，老景垂垂上此身。种柳忽逢三月节，看花又过二分春。青山风雨多新鬼，白发江湖少故人。东忆墓田千阜下，可堪回首一沾巾。”语淡而情深。其咏物之作多警句，如《月中桂》“根从天地分时种，花在山河影里开”两句，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月中”之桂花。《双竹》的“夷齐同隐高节在，皇英对泣遗恨深”两句，联想奇特，又十分工切。《和左长史史秉贤咏炭》写炭火“晴生五色云霞气，春冶千年铁石根”。其诗春容淡雅，近于中唐。著有《秋香百咏》、《蚓窍》、《还乡记行》等集。周子治《全庵记》记其生平颇详，见《蚓窍集》。

（王学泰）

【张宣】（1341？—1373？）初名瑄，字藻仲。江阴（今属江苏）人。少有才名，尤善草书，时人高启《草书歌赠藻仲》诗中云“高堂把笔若把槊，长绡一拂悲风生”，可见其为时人推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考礼被征召入京。不久入史局，与修《元史》。明太祖亲书其名，召对殿廷，即日授翰林院编修，常呼为“张家小秀才”，奉旨归娶，年已三十。洪武六年，因事谪濠州，死于道途。张诗颇富才气，受到高启影响，古诗流畅婉丽，语多警绝。如《染丝行》：“吴蚕吐丝白于银，染丝上机颜色新。往来抛梭不停手，及时花样随他人。以色媚人人见喜，不惜兰房劳玉指。莎鸡吊月鸣死鸣，杼轴咿哑泪如水。明日彤廷促功赏，输官不得亏铢两。绩麻成布自可衣，染丝莫上寒女机。”此诗虽写官府宫廷对于劳动妇女的剥盘，但在遣词造句、神韵格调上仍然具有吴派诗风。著有《青阳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王彝】（？—1374）字常宗，号蚋蛭子。其先世为蜀人，父官昆山教授，遂迁居嘉定（今属上海）。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真文，得浙东兰溪金履祥之传。杨维桢曾擅名于元末，彝尝著文，诋为“文妖”。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布衣召赴南京修《元史》，书成赐金还。后以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魏观任苏州知府，聘彝与高启、张羽等修订经史。魏在苏修建府治，疏浚锦帆泾，获佳砚，为著《获砚颂》。洪武七年，魏观因此得罪死，彝被目为魏党，连坐被杀。彝诗多酬赠题画之作，风格近于中唐大历诸子，如《秋林高士图》：“岚峰半残阳，彩翠明林杪。僧坞远钟微，归人下山少。风杉落叶声，惊起栖烟鸟。携手愿言还，前村月初皎。”王士禛谓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堕入恶道，馀体亦不能佳”（转引自《明诗记事》），未为笃论。著有《三近斋集》。清朱彝尊为

著《王彝传》。《吴中人传志》卷七、《明史》卷二八五有传。(王学泰)

【张孟兼】本名丁,以字行。浦江(今属浙江)人。以古文名世。刘基曾为明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洪武三年(1370),与修《元史》,书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孟兼性傲,尝被谪为输作,后复官,未几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以廉劲疾恶、施政严猛,为奸猾所惧,声闻朝廷,擢为山东按察副使。山东布政使吴印,原为僧,为太祖所宠眷,孟兼负气凌之,数与之争。吴先上言,太祖怒曰:“竖儒与我抗邪。”逮至京,捶楚至死。孟兼死后,诗文零落,传世很少。其诗温雅清丽,多可诵之篇。如“访古来钟阜,寻僧问草堂。千年猿鹤静,一径石苔荒。泉落春冰细,梅留腊雪香。乡心怜薄暮,矫首碧云长。”有《白石山房稿》、《蜀山遗集》,皆未传世。现存《白石山房逸稿》乃后人所辑成。方孝孺为撰《张孟兼传》。《明史》卷二八五有传。(王学泰)

【谢肃】字原功,号密庵。上虞(今属浙江)人。少负盛名,与越州山阴唐肃并称为“会稽二肃”。从师贡师泰。博学多才,为人不羁,负气敢言,好议论天下大事,颇有战国时策士之风,钱谦益谓其“坐论海内事,若囊之出物,无所不有”(《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张士诚据吴时,欲向朝廷献偃兵息民之策,又欲登朝,说动人主,一吐胸中之奇,终不遇,遂遍游西北山水,盘桓于齐、鲁、燕、赵、魏、晋之郊,感今怀古,多见于诗文。入明,归隐于越。明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举明经,历官福建按察司佥事,风裁凛然,与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防不职,置于法。后坐事被逮,明太祖亲自审于文华殿。肃大呼:“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下狱,被狱吏用土囊压死。肃于元末足迹历遍大江南北,其诗多记游记行、登临怀古之作,其中饱含着对战乱的厌倦与对太平的向往,如《入阊门》诗:“乱后阊门暂得归,暮春三月马骅骝。遗花也复如人面,柳絮依然点客衣。画舸神仙流水远,彩云楼阁劫灰飞。姑苏两度看游鹿,莫倚东风问是非。”其他如《洪泽》、《盱眙》皆属此类作品。诗学杜甫,注重法度,有些记行诗酷似杜甫,如《河阴渡》等。长于五古与七律。五古朴健,时有佳构;七律严整,特别突出者不多。有《密庵集》。《明史》卷二八五有传。(王学泰)

【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俊才,能诗,十四岁时父友章彦复至其家,指鸡为题,瞿作诗云:“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声名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复大为称赞,为画桂花一枝,题诗曰:“瞿君有

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天下麒麟原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佑父遂将家中厅堂取名为“传桂堂”。元末诗人杨维桢访其家,佑见维桢《香奁八咏》悉和之,佳句甚夥,深为杨所叹赏,又曾尽和凌云翰咏梅词、咏柳词,号《梅柳争春》,凌称之为“小友”。佑以善写艳体诗、风月词闻名于时。明太祖洪武(1368—1398)中,以荐历任仁和、临安、宜阳等县训导,擢为周王府长史。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因诗祸被逮入狱,谪戍保安十年。仁宗洪熙元年(1425),英国公张辅奏请放还。放归后一度馆于张家,后还乡,撰《归乡诗话》三卷。书中录其师友论诗之语,记宦游四方之见闻,载佳篇美句之所出,述可广流传之诗事,多可资取,是一部较好的记事诗话。佑流传于当时之诗多为假红倚翠之语,因此,郎瑛言其诗“题咏不出闺房,玩赏不过风月,殆非庄人雅士之所为”(《七修类稿》)。其诗之佳者多在咏古诸作中,如《故宫人》、《旧镜叹》、《伍胥庙》、《题和靖墓》等。这些作品虽风情逸丽、组织工巧,近于李贺、温庭筠,但颇有识见,能融真知卓见于浮华纂组之中。著有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为模仿唐人传奇之作。另著有《春秋贯珠》、《阅史管见》、《诗经正葩》、《学海遗珠》、《香台集》、《香台续咏》、《香台新咏》、《存斋诗集》、《乐府遗音》、《徐清词》、《游艺录》等二十余种。传世者有《剪灯新话》、《归田诗话》、《乐府遗音》、《香台集》、《咏物诗》等。生平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清朱文藻《归田诗话·跋》。(王学泰)

【浦源】(1344—1379)字长源,号东海生。无锡(今属江苏)人。少负异才,喜读书,工诗,曾与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人并称“吴下十才子”。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应求贤科考试,被委任为晋王府引礼舍人。时林鸿论诗,以开元、天宝为准,认为当时诗人“声律大成,为学者式”。源闻而善之,遂借收购书籍,奉使入闽。时林鸿正与其弟子周玄、黄玄结诗社。“二玄”请其所作,源诵《送人之荆门》一律,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惊叹曰:“吾家诗也。”鸿遂邀浦入诗社,日与其唱酬,流连既久,唱和益多,遂有诗名。当时士论以鸿诗第一,源诗第二。源为人轻财重义,高启冤死后,抚其遗孤,刻其遗集,尽朋友之道。洪武十二年(1379),出使秦中,渡淮河,风涛大作,覆舟而卒。源善画山水竹石,深得倪瓒笔意,或称为倪氏弟子。诗学盛唐,然诗风近于中晚唐,长于七律、七绝,以题赠唱酬之作为多。丁福保言其诗“深得中晚唐风致,而李于鳞称其词采秀润,嫌其气格声响不足”(《浦舍人传》)。《明诗别裁》称其“名句如‘细雨疏灯闻落叶,断云高树见河明’,‘衣上暮寒吴苑雨,马头秋色晋陵山’,‘雨中黄

叶孤村路,湖上青山远寺钟’,‘杏花寒食春江店,榕叶熏风瘴海船’,均是诗中有画”。这类诗句颇能证实李于鳞的论断。有《浦舍人集》(或称《东海生集》)。近人丁福保为之作传,《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赵介】(1344—1389) 字伯贞。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博通六籍与佛、道典籍,与南海李铉齐名。黄哲赠之诗云“夷白(指李)抗浮云,临清(指赵)延素赏。何因继芳躅,一邱同偃仰”,可见其不慕名利之风致。有司屡次推荐为官,皆固辞。好诗,行常以囊自随,遇美景,则赋诗投囊中,日往来西樵云石间,不肯出仕。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坐累(可能因孙黄涉及蓝玉党案)被逮入京,死于南昌舟次。介善于以七言歌行或七言律诗、七言绝句描写富于色彩之明丽景物。如其《怀仙吟题玉枢经卷后》、《南楼对月》或写超凡脱俗之仙境,或写清秋空明之月色,都写得玲珑剔透,如:“夜上南楼看月色,水晶帘卷银河碧。冰轮倒射沧波寒,对此清光是何夕?举酒邀月真吾俦,夜长不用秉烛游,万里凉风满襟袖,洞庭七泽涵清秋。秋声冷拂珊瑚树,湘娥鼓瑟鲛人语……”(《南楼对月》)给读者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之感。有《临清集》二卷,已佚,其作品多见于《广州四先生诗》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黄哲】字庸之,学者称雪篷先生。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少时刻苦读书,通五经,尝借《文选》手抄之,遂能作诗。性好山水,结庐蒲涧,往来罗浮,峡山诸名胜,犹未为足,辞家度大庾岭,游吴、楚、齐、燕。海内英豪,多与之交游。明太祖崛起于两淮,李善长、汪广洋交荐之,拜翰林待制,入书阁侍太子读书,寻兼翰林典签。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奉使青州、徐州,出知东阿县,为政清明,民多归附,皆复其业。洪武四年(1371年),擢为东平通判,疏决河于梁山,上疏陈时务。太祖怒其狂妄多事,罢官放归。洪武八年(1375年),召回山东任地方官,因他事诬误,竟置于法。哲早年在乡与孙黄、王佐、赵介、李德结诗社,称“岭南五子”(或“南园五子”)。他们的诗风互相影响,颇多共同点。哲擅长七古、七律、七绝,以这些体裁写南国美丽的风光和南国文士们的浪漫生活。如《醉歌行为邝复初雄飞昆仲赋》、《王彦举听雨轩》等皆属此类作品。《醉歌行》中写道:“林间幽人心事闲,相逢一笑开云关。问我别来春几度,五见飞花满行路。黄橙丹荔绕池栽,水清离离照芳树。登高酌我黄金壘,倾情写意无嫌猜。携觞复就花下饮,鸟啄馀花铺绿苔。我惜落花君莫扫,乘兴即来坐芳草。江山如此多阅人,与君相期恨不早……”从这些作品,可见以孙黄及“岭南五子”所代表

的粤派诗风颇有点明朝开国气象。有《雪篷集》,已佚。其作品见于《广州四先生诗》与《广中五先生诗选》中。《明史列传》卷一八、《明史》卷二八五皆有传。

(王学泰)

【李德】字仲修。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少与孙黄等人友善,与黄、王佐、黄哲、赵介结吟社,人称“岭南五子”(或“南园五先生”)。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明经被荐,授洛阳长史,继为济南、西安二郡幕官。自陈年老不能胜任吏职,愿就教官,被任命为汉阳教谕,秩满,改广西义宁教谕,义宁颇为荒陋,德为之劝学,文教渐兴,倦游解官南归,卒于家。德早年耽于吟咏,晚年好洛、闽之学,谓诚意为古圣哲心之要,故岭南人称理学者,自李德始。德擅长七言,其古体注重词藻色彩,如《秋情》云:“蜡炬摇红纱隙冻,沉香帐底鸳鸯梦。芙蓉波冷薄霜凝,一夜离鸾忆单凤。梧桐金井曙啼鸦,梦郎封侯归妾家。开门自扫枇杷花。”其他如《青楼曲》、《房中曲》皆属于此类作品。也有些与粤派诗人风格相近的作品,如《天上谣》、《春兴》六首等,或写远离凡尘的神仙世界,或写明媚鲜丽的春光,都清朗绮丽,无沉滞之迹。有《易庵集》,已佚。其作品见于《广州四先生诗》与《广中五先生诗选》中。《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王学泰)

【程本立】(?—1402) 字原道,号巽隐。桐乡(今属浙江)人。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举明经秀才,除秦王府引礼舍人,以母忧去官,服除,补周王府礼官,进长史,从王入觐,坐累贬为云南吏目。当地土酋煽动叛乱,布政使张统知本立贤,属行县典兵事,且抚且御,前后九年,民安其业。惠帝建文(1399—1402)初,征入翰林,修《太祖实录》,擢为右佾都御史。闻朱棣自燕率兵南下谋夺帝位,自经死。朱彝尊云:“建文诸臣,文莫过方希直(方孝孺),诗莫过程原道。”(《静志居诗话》)本立游宦足迹半天下,其诗多写各地风光及题咏古人遗踪胜迹。如:“连然驿路马曾谖,落日行人思不堪。地极九州铜柱北,山蟠六诏铁桥南。汤池水底皆阴火,盐井烟中半夕岚。回首蓬莱天万里,忍教尘鬓白毵毵。”(《晚至安宁》)他如《过甓社湖》、《昆明池》、《留洱西驿因过三塔寺》、《宿昆阳》等均写于行途,所给予读者的皆是匆匆路人的眼中的景象。本立学杜,其五、七律流于模拟,探骊得珠之作不多,而其五古平易流畅,如野人相对喁喁而语,颇有杜陵风概,如《赋得桃花崦送李学正之易州》的前半“野性好林壑,胡为来市廛?岂无桃花崦,着我屋数椽。深深崦中花,万树春霞鲜。居民非避秦,鼓腹戴尧天。花间长子孙,看花不计年。我欲往求之,路隔松萝烟。怅望小姑峰,玉立青娟娟。”

诗中全用赋笔写自己对隐居桃花崦的向往,并惋惜李学正离此而去博一微官。有《巽隐集》。《明史列传》卷一九、《明史》卷一四三并有传。(王学泰)

【林鸿】字子羽。福清(今属福建)人。少任侠,为人放荡不羁。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训导,居七年,拜膳部员外郎。太祖临轩试诗,鸿以《龙池春晓》、《孤雁》二诗名动京师,是时年未四十。因性格脱落不善仕,遂自免官归乡。鸿论诗,推崇唐音,并认为“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林鸿传》)。此说实本宋代严羽(亦为闽人)。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林为首。其诗多为记游、记行,以及送别怀人之作。还有不少奉旨应制之作,这些作品歌颂承平,多为谀词。有些并非写给皇帝看的诗篇所流露出的喜悦则往往是对新朝的肯定。如“汉客临边日,天骄已清和。看花辞紫陌,犯雪度交河。水草留行帐,云沙想玉珂。谁知清漠北,娄敬策居多。”(《送高郎中使北》)在《老卒还田里》一诗中以凄凉之笔写老兵在战乱之后得以生还的喜悦。“锐气暗随秋气尽,老情翻乐故园闲。战场尚记归时路,村径遥依旧日山。留得少年长剑在,壁间悬却独频看。”诗语平淡,却耐人寻味。鸿虽取法盛唐,诗作却很少有盛唐气象。其古体寡淡,缺少变化;五、七律似中唐大历诸家,有佳句而少完篇。其学唐以模拟为主,故钱谦益云:“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列朝诗集小传·高棅传》)其专学盛唐的论诗主张,不仅在闽中为后学所取法,而且影响了有明一代,后世的茶陵派、前、后七子皆是主张“诗必盛唐”者。有《鸣盛集》。《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刘绩】字孟熙,家有西江草堂,人又称西江先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初诗人刘渔之子、贡悦之甥,以诗传家,不乐仕进,以教授乡里为生。家贫,转徙无常地,所至辄悬卖文榜于门,得钱便市酒取醉,好宾客,常倾其所有以款客。顾起纶谓“其才思雄健,长歌颇放诞。如‘马嘶秋风阔,雕落暮云平’,‘野雪消不尽,春江流正深’。属兴豪华,非鄙促语。七言《早春寄白虚室》云:‘帝城佳气接烟霞,草色芊芊紫陌斜。霁雪未销双凤阙,春风先入五侯家。歌钟暗度新丰树,游骑晴骄上苑花。独有扬雄才思逸,应传丽句满京华。’颇遒丽,自是弓裘家范也”(《国雅品》)。其诗风近唐,注重兴象、格调与气势。诗作以题赠和描写隐居生活者为多,亦有少量关注平民生活的篇什,如《征夫词》、《征妇词》写出征士卒的痛苦,《去妇词》写被丈夫抛弃的妇女的辛酸,皆颇感人。著有《嵩阳稿》、《诗律》、《雪霏录》等。其传记

资料参见《列朝诗集小传》等。明代另有一刘绩,江夏人,镇江知府,著有《三礼图》、《春秋左传类解》等。

(王学泰)

【谢缙】一作谢晋,字孔昭,号葵邱,又号深翠道人,兰庭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可考,约于明成祖永乐(1403—1424)前后在世。擅长画山水,重叠烂漫,千幅不同,寻丈之间,不日而就,或戏称“谢叠山”。为人耿介,为乡里所疾,以工于绘事起贡京师,侨居金陵二十余年,以目疾放归。缙为画家,其诗亦多题画及吟咏山水风光之作。如《题画》(“逍遥西涧翁”)、《北郭》、《题秋江后待渡》、《题画》(“杨柳人家白板扉”)等,皆画家眼中的自然风光,注重形象的生动。陈田以为谢诗“在宋人中,似陆游一派”(《明诗纪事》)。这主要体现在七律中对偶句的体物细腻和声调的铿锵,如“风帘静卷紫飞絮,烟篆微销过午香”(《晚春用杨孟载韵》)、“愁里听穷三日雨,客边吟到一分春”(《早春过望亭驿》)、“半篷残雪留寒在,几树斜阳送晚来”(《丹徒湾暮泊》)、“西邻夜静闻春稻,南浦秋深罢采莲”(《秋日江村即事有怀沈秀才》)。有《兰庭集》二卷。《姑苏志》、《列朝诗集小传》皆有关于谢缙的记载。(王学泰)

【金华宋氏】金华府(今浙江金华)人。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在世。其夫衢州进士,任阆州知府,被诬陷至死。她被株连获罪,坐戍云南金齿,奉姑偕行,途经武陵,题诗邮亭壁上,诉其流离困踣之苦。宋氏卒后,御史阴汝兆为她建祠刻碑,都御史黄中在碑阴题词。事见《列朝诗集小传》。全诗一百零八句,七百五十六字。《诗薮》称此诗“颇真朴浓至,脱元习。”《名媛诗归》则云:“序事诗写得一历如在目前,使人可哭可涕,正以其直也。读此可以悟《木兰诗》、《焦仲卿诗》之妙。”(陈祖美)

【高棅】(1350—1423) 出仕时更名廷礼,字彦恢,别号漫士。长乐(今属福建)人。博学能文,诗有名于时,书得汉隶笔法,画学宋代米南宫父子,其诗、书、画被称为“三绝”。明成祖永乐(1403—1424)初,召至京城,为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书成授翰林典籍,卒于官。棅为“闽中十子”之一。其诗以描写山中隐居生活及往来应酬之作为多。钱谦益认为“其山居拟唐之作,音节可观,神理未足,时出俊语,铮铮自赏”;并谓其应酬之作则“尘坌堆积,不中与宋元人作奴,何况三唐”(见《列朝诗集小传》)。棅在艺术上注重模拟,对盛唐有成就的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李颀、崔颢、张说等,几乎模拟殆遍,而且多拟他们的高华典雅的七律,但成功之作很少。使高棅享名后世者是他编选了《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前者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大型唐诗选

本,全书一百卷(包括后十卷《唐诗拾遗》),录诗六千七百二十三首(约占后世所编《全唐诗》的七分之一),入选作者六百八十一人(占《全唐诗》的三分之一)。此书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唐诗的发展演变,提出初、盛、中、晚四分法。对唐诗艺术的特点,著名诗人艺术成就、风格也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唐诗正声》为《唐诗品汇》的精选本,在明代对学唐诗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诗集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王恭】字安中,号皆山樵者。闽县(今福建长乐)人。少游江海间,中年葛衣草履,归隐于七岩山,凡二十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纂修《永乐大典》,征召天下文士。郑定、高棅交荐之。永乐四年,征至北京,参与其事,年已六十馀。永乐六年,《大典》成,试诗,位高等,授翰林典籍,不就,投牒归乡,徜徉于林壑之间。恭为“闽中十子”之一,其诗宗法唐开元、天宝诸家。五律学王维、孟浩然,佳者亦颇能乱真,如:“迢递清莲宇,云边事事幽。松花山路晚,鹤梦寺门秋。黄叶僧前落,清泉屋上流。所嗟尘累久,那得此淹留。”(《松寺清秋》)因其太似王、孟,遂丧失了个人风格。其诗以歌颂国家安定、社会太平和摭写自己终老不遇、枯守山村的愤懑者为多,如《牛上翁》就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平静祥和:“时既和,年既丰,乐莫乐如牛上翁。短衣半湿杨柳露,长笛吹老棠梨风。……翁家有粟牛有莎,世人造物如翁何。牛饱归来浩浩歌,江上儿孙雨一蓑。”这是经过长年战乱后人民得以喘息的一刻,不纯是谀颂之词。《长歌赠别高漫士赴召天京》的诗中也反映了国家一统、道途安宁的太平景象。恭一生潦倒,其苦闷、不满在诗中表现得也很强烈。诗学唐,颇注重设色选声,佳者风华跌宕,有韵外之致;劣者如集唐人诗句,流于模拟。有《白云樵唱》、《草泽狂歌》、《凤台清啸》。最后一种已佚。无名氏撰《皆山樵传》,收入《白云樵唱》中。《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黎贞】(1350?—1408?)字彦晦,号陶陶生,晚号秣坡。学者称为秣坡先生。新会(今属广东)人。少聪颖,从广东名诗人孙蕡学习,博涉经史,发而为诗文,滔滔自胸中流出,无斧凿痕迹。好议论古今治乱、世道得失及臧否人物,多有独见,著《古今一览全书》。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补庠生,洪武八年(1375),以明经荐至南京,因不肯赴吏部参加考试,赋诗离京而归,为时论所重。归乡后,使者以其学行俱优,署为本邑训导,辞不就,退筑钓台于所居之前,自拟严光。洪武十八年,因事为讼者所诬,遭戍辽东。在辽时,其师孙蕡以蓝玉党案被诛。贞为

之典衣营葬,为文祭之,读者莫不堕泪。流放凡十三年,困厄之中,学愈博,而识趣愈高,议论愈正,受到当地官员礼遇,待之如宾,声名益著。洪武三十年(1397),赦归,四方学者从之学者益众。贞循循善诱,随浅深皆有所造就,对于岭南文化发展颇有贡献。陈献章曾云:“吾邑以文行海后进,百馀年来,秣坡先生一人而已。”(见《邑志本传》)贞诗大多写于家乡与流放之地辽东,展示了岭南与塞北两地不同的自然风貌。其抒情之作多反映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一些摭写愤懑不平之气的作品。其诗以七古、七绝见长,代表作品有《沙门渡海吟》、《冬至咏雪》、《听莺曲》、《澄溪清隐图》、《宿定公港》等。著有《古今一览》、《家礼举要》,其诗文收入《秣坡先生集》。李承箕、黄佐为之作传。《明史》卷二八五有传,附于孙蕡传后。

(王学泰)

【周是修】(1355—1403)名德,字是修,以字行。泰和(今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学。明太祖洪武(1368—1398)末年,举明经,为霍丘训导,擢周王府奉祠正。惠帝建文(1399—1402)初,为衡王府纪善,留京师,预翰林纂修。好陈说军国大计,数度指斥奸臣误国。燕王朱棣举兵南下夺帝位,破南京,是修留书别友人,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书系衣带间,自经于应天府学尊经阁。是修为明代江西诗派的晚期代表作者。他主要生活在社会生活已趋于安定时期,以其所擅长的七古歌行,写了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如:《牧童谣》写牧童的辛苦与乐趣;《渔郎谣》写“载歌一曲沧浪晚,棹入烟波何处寻”、带有隐士色彩的渔翁;《桑妇谣》、《临川女》、《瞿塘贾》描写了养蚕女、军人妻子与商贾妻子的忧愁与烦恼,可见当时不同阶层妇女生活之断面;《归宁妇》写在娘家久住女子复杂心态,她既留恋娘家生活亲切温暖,又思恋久别未见的丈夫;其他如《柳条长》、《种粟谣》、《樵夫谣》都是一诗一事,记录了普通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清代朱彝尊赞美是修此类作品“犹存张、王遗韵”(见《明诗综》),指出这些歌行在描写普通人生活与风格浅显平易上很接近唐代张籍、王建乐府诗。张、王乐府平淡质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结尾精警;是修叙事诗只在平淡质朴方面类似,但在生活提炼方面较差。张、王乐府是“成如容易却艰辛”,而是修诗较为草率,在情节、语言上皆少锤炼。著有《诗小序集成》、《论语类编》、《家训》、《纲常彞范》等,其诗文收入《乌尧集》。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解缙曾为之撰墓志铭,杨士奇为之作传。《明史》卷一四三有传。

(王学泰)

【梁兰】(?—1410)字庭秀,又字不移。泰和(今江西太和)人。隐居不仕,日与故人寻山水之乐,载

酒赋诗,任意所适,在城西柳溪上辟畦种菜,杂植花竹,引泉灌注,筑室其中,逍遥自得。兰长于五言古体,以描写田园闲适生活的作品为多,如《西畦自适》中写道:“守拙一圃间,衡纵五亩馀。艺麻在高邱,杂以果与蔬。春至百草生,趁晴聊荷锄。筋力岂不劳,芜秽亦已除。家人会知我,慰以酒满壶。偶坐斟酌之,日落西山隅。归来北窗下,我心一事无。”其风格平易自然,颇近陶潜。台阁体代表作家杨士奇曾从之学诗,颇受其影响。著有《乐畦先生集》,本附其子梁潜《泊庵集》以行,《四库全书》别为一编。杨士奇曾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宁海(今属浙江)人。少从宋濂学,卓有成就,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除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读书之室曰“正学”,学者称正学先生,亦曰侯城先生。惠帝即位,廷臣交荐,为翰林院侍讲学士,颇受倚重。燕王朱棣举兵入京夺帝位,召其草诏,孝孺号哭彻殿,掷笔砚于地,严拒之,遂被夷十族。孝孺为纯儒,具有很大的抱负与严格的操守,其诗表面上看来十分平淡,但却有一股“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其《闲居感怀》诗云:“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诗人所想已经超越一姓一国的局限。他对生死的问题也作过严肃的思考,在《次王仲缙感怀韵》中说:“翠鸟质微细,乃以羽自戕。犀象兽之雄,每因齿角亡。彭聃死于寿,夭者死于殇。万古谁长存,所贵得誉光。古来志节士,立身大有方。孰云萧艾蕞,果胜兰蕙芳?”其他如《勉学诗》、《感橙树有作》也都是说理之作,但这些道理与议论是诗人对人生与世界严肃思考的结果,并挟带情韵而行,因而仍具有感人力量。其七绝也颇有风致,如“烟鸟归林已夕阳,野人相引度高冈。马头一片青山影,经过锦衣似水凉。”(《彭山道中》)其论诗,主张唐、宋并重,《谈诗五首》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前一首直谓宋人近体超过唐人。后一首讥评元人学唐之作不及宋人远甚,这是针对明初有些诗人承继元诗而发。有《逊志斋集》。《明史》卷一四一有传。

(王学泰)

【练子宁】(?—1402) 名安,字子宁,以字行,号松月居士。新淦(今江西新干)人。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以一甲二名登进士第,授翰林修撰,以荐擢升为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惠帝继位,累迁为御史

大夫。燕王朱棣靖难师起,子宁力主用兵。朱棣入南京,令缚子宁至,出语不逊,棣命人断其舌,言:“吾欲效周公辅成王。”子宁以手探舌血,大书地上曰:“成王安在?”遂被凌迟处死,族其家。受牵连而死者一百五十一人,谪戍者三百七十余人。子宁为人倔强,在殿试时曾对明太祖滥施刑戮提出批评,反对“以小善而遽进之,以小过而遽戮之”,指出人才难得,不应“以区区之小故而即付于刀锯斧钺之地”。故其抗志不屈于新主,亦非偶然。子宁工诗,其早年作品多写山林隐逸,后期则以写朝廷台阁为官作宦生活为主。其代表作品有《待月歌》、《水竹居诗》、《辋川钓者图》、《玉山谣赠时宪》、《早朝》二首、《元旦》、《送人之官》等。其诗风娟秀妍雅,长于七律。朱彝尊于《静志居诗话》曾例举其七言警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严禁藏其诗文,有片纸只字者,皆治罪。宣宗后,其诗文方出于世。有《练中丞集》。袁宏为之作传。《明史》卷一四一有传。

(王学泰)

【张肯】 字继孟,一字寄梦。吴县(今属江苏)人。少从宋濂学,为诗文清丽有法。布衣终身,主要生活在明太祖洪武(1368—1398)至英宗天顺(1457—1464)年间,享年八十馀。其题画诗写得风情宛然,颇见特色,如《朱泽民寒林平远图为徐用理作》、《沈如美所画美人图为徐文辉作》、《题海棠双鸟》等诗皆具有这样特长。尤善词作,词风雅丽清逸,如《买陂塘·赋东郭草堂》、《浪淘沙·咏莎滩》、《醉落魄·咏苔径》、《如梦令·咏石径》皆是较好的作品。清王昶《明词综》选录各人词作均不多,但张肯有五首词作入选,可见其词作的影响。著有《梦庵诗稿》、《梦庵词》,今均亡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胡俨】(1361—1443) 字若思,号颐庵。新淦(今江西新干)人,侨寓南昌(今属江西)。少好学,医星象卜,谶纬之术,无不通晓,工书画。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举人,为华亭教谕。惠帝建文(1399—1402)初,迁桐城知县。成祖永乐(1403—1424)初,授翰林检讨,入直文渊阁,历翰林侍读,左春坊谕德,改国子祭酒,兼翰林侍讲,掌翰林院事。仁宗洪熙元年(1425),以疾乞休,进太子宾客仍兼国子祭酒致仕。宣宗宣德(1426—1435)初,以礼部侍郎召,辞归,家居二十年卒。俨以文学名世,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其诗风与同朝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不同,受宋代江西派诗风的影响,注重词旨深入,但不流于晦涩,如:“一棹空明溯碧涛,遥看赤壁耸江皋。开樽晚对青蘋雨,倚剑秋生白苧袍。夏口东边山月小,武昌西上楚云高。醉来直欲骑黄鹤,接迹飞仙万

里遥。”(《过赤壁》)其七绝亦诗味隽永,如:“一径绿阴清杳杳,双溪流水碧迢迢。如何画得溪中景,花映青山柳映桥。”(《双溪流水》)钱谦益称其诗“多旅人、思妇屏营吟望之辞,怨而不怒,有风人之遗焉”(《列朝诗集小传》)。其近体较佳,古体则较为平缓,不耐久读。有《颐庵集》三十卷,传世者稀少,常见者有《颐庵文选》二卷,收入《四库全书》。杨溥为撰墓碑。《明史列传》卷二四,《明史》卷一四七并有传。

(王学泰)

【王绂】(1362—1416) 字孟端,别号友石生,又号九龙山人。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博学工诗。未仕时隐居九龙山中,味泉石以为乐,尤嗜绘画,不由师授,而卓绝过人。游览之余,每遇长廊素壁,纵横挥洒,若不经意,而笔下层峦叠嶂,烟云浩渺,不可测其端倪。画上题诗,咸若宿构。浪迹江湖间,越太行,上巴蜀,历名胜,探古迹以蓄其奇气。纵情诗酒,交结名士,游于公卿贵人之间。其书法亦为人所爱,笔意出于晋、唐之间。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被举荐至京师,寻以事坐戍朔州,后得归乡里隐居。成祖永乐(1403—1424)初,诏求天下文章之士及善书者二十八人,绂获首荐,供事文渊阁。永乐十年(1412),除中书舍人,卒于官。绂以书画名于时,其书工于小楷,画以竹木山石为最佳。不苟作,兴至则醉墨淋漓,平时有以金帛购其画者,辄拂袖而去,或闭门不纳。其诗以题画及描写自然风光者为多,用以摅写其追逐与回归大自然之情趣以及旷远高逸之胸怀。《题画》(结屋千山万山里)、《题画》(衡门掩秋色)、《静乐轩》、《雨中过欧阳编修馆题竹木画上》皆可视为其代表作。其诗风如章炳如所言,“所作古诗类韦柳,律诗类晚唐,词语婉媚”(《故中书舍人王孟端行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神思本清,故长篇短什,随意濡染,不计其工拙,而摆落尘氛,自然合度”。有《王舍人诗集》五卷,王洪为之作传,胡广为之撰墓表。《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杨士奇】(1365—1444)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泰和(今江西太和)人。少孤贫,刻苦自学,授徒自给。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以史才被推荐到南京参与修纂《太祖实录》。成祖即位,改任翰林院编修,入内阁参预机务。成祖北巡,长期留守南京,辅佐太子。仁宗即位后,擢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进少傅,兼兵部尚书。宣宗时,位至首辅。晚年以子稷杀人下狱,积忧病卒,赠太师,谥文贞。士奇身历四朝太平时期,长期秉政,其诗虽多奉敕颂圣、歌咏承平之作,其中有些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如《涿州行》真实地反映了涿州一带的太平景象:“涿州百里近都门,北去南来无晨昏。道边邮

亭连古堠,时平不置官军守。土墙茅屋尽耕地,半插新帘卖新酒。牛车辘辘冲早寒,争先稿秸输县官。少年家家便骑射,雉兔如林不论价。由来意气倾山岗,邂逅相逢肯相借。”涿州自“五胡乱华”以来,不是逐鹿交锋的战场,就是被异族所统治,只有到了明朝,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后才有此景象。因此,这类作品虽为歌颂之作,但诗中内容却真实而无谀词。其记游诗亦饶有情致,如《汉江夜泛》、《游东山》等。有些小诗颇有唐人风致。如:“飞雪初停酒未销,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入骨,贪看梅花过野桥。”(《刘伯川席上作》)又如:“巴陵西畔楚江分,曾泛湖波望岳云。借得君山小龙笛,月明吹向洞庭君。”(《题少保杨澹庵〈江乡归趣图〉》)士奇与当时入阁的杨荣、杨溥号称“三杨”,他们秉国政、文柄数十年,其中以士奇文学成就最高,对于当时文风、诗风影响也最大。士奇诗佳者雍容平易,如钱谦益所说:“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丽藻,不矜佳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列朝诗集小传》)其下者则平庸乏味,陈陈相因。而世人所效法者往往是杨氏之下乘,这就是为后世所厌恶的台阁文风。士奇一生勤于著述,撰有《周易直指》、《成祖实录》、《三朝圣谕录》、《北京记行录》、《平吴录》等及《杨东里集》九十四卷。杨槩为撰《太师杨文贞公年谱》。《明史列传》卷二五、《明史》卷一四八有传。(王学泰)

【梁潜】(1366—1418) 字用之,号泊庵。泰和(今江西太和)人。诗人梁兰子。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人,授苍溪训导。后以荐历任四会、阳江、阳春三县知县,皆有政绩。成祖永乐元年(1403),召修《太祖实录》,擢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逢修《永乐大典》,代礼部尚书郑赐为总裁,官至翰林侍读。成祖屡赴北京,留太子在南京监国,谗者构陷太子,言其擅放罪人陈千户,事牵连梁潜,下狱死。潜诗文并有名于时,为人所重,其被逮系狱后,籍其家,平日所作诗文皆随书册卖掉,得钱入官。陈循遣人访求,倍价赎还,潜作品遂得见于世,但在明代其诗集仍很少见。清圣祖康熙二十年(1681),潜裔孙梁天清续刻家集小引言“泊庵公诗集,已瘞文冢,不复存人间”(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实不然,近人陈田言:“余所获《泊庵诗钞》,乃用之曾孙廉,嘉靖中刻于辰州者。”并言潜诗“五言选体为多,近体有唐人格律,时参宋派,永乐诗家最为杰出”(《明诗纪事》)。其诗以描写行役与登山临水之作为多,其代表作品如《清风亭偶题》、《题环秀山房》、《赋马台》、《过汉州》、《巴东》等。这些作品皆能深入曲折地刻画自然风光的细部,再现山水之神韵。如《蟠龙山》:“壮哉蟠龙山,势高凌青冥。嵯峨控梁益,幽森会神明。稍

见雪山白,还望阳台青。清湍落危涧,散作万壑霆。平生磊砢怀,奔驰忽伶俜。”有《泊庵文集》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有文无诗。另有《泊庵诗钞》一卷。杨士奇为撰墓碣铭。《明史列传》卷二四、《明史》卷一五二有传。

(王学泰)

【黄淮】(1367—1449) 字宗豫。永嘉(今属浙江)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除中书舍人。成祖即位,入直文渊阁,累官至右春坊大学士。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为汉王高煦所潜,系诏狱十年。仁宗即位,复官,终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宣德(1426—1435)初,因病乞休。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卒,年八十三岁,谥文简。其诗歌创作,颇有台阁气,春容安雅,尤其是所作应制诗,多歌功颂德之辞。就是在其系狱期间,所作也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见其诗风颇有一致性。其与友朋赠答诗,还有些真情,较为清新可诵。著有《省愆》、《退直》、《入觐》、《归田》等集。其生平见《明史》卷一四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金幼孜】(1368—1431) 名善,字幼孜,以字行,号退庵。新淦(今江西新干)人。惠帝建文元年(1399)举人,次年,登进士第,授户科给事中。成祖永乐(1403—1424)初,改翰林检讨,入直文渊阁,历侍讲、右谕德,进文渊阁大学士,从幸北京。成祖北征,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有旨属起草,据鞍立就,自后帝出塞必扈从。居内阁几三十年。仁宗洪熙元年(1425),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卒赠少师,谥文靖。幼孜多次扈从成祖出征,其诗亦颇多出塞之作,惜未尽传。从《春日随驾北征次清河》可见一斑:“万乘统元戎,鸣銮出九重。暖尘生辇路,晴雪照行宫。旗影西山外,笳生落照中。书生怀脱略,须敌万夫雄。”这种词雄句杰的诗风也见于一些非以从征出塞为题材的作品。如:《赋赤壁赠萧长史用导之靖江》中的“月下胜游非旧日,眼中遗迹感英雄。猿啼断岸孤帆雨,鹤唳沧州一笛风”,《为王侍讲时彦题〈秋意图〉》中的“苍烟迥萧瑟,落日生迢递。回首大江西,故乡何处是”。无论从意境,还是从遣词造句,其风格还是倾向雄浑劲健的。原有《北征诗集》,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已不得见,仅存《金文靖集》十卷。另有《北征录》、《后北征录》二卷。杨士奇为撰墓志铭。《明史列传》卷二四、《明史》卷一四七有传。

(王学泰)

【解缙】(1369—1415) 字大绅,一字缙绅。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少时聪敏,以“神童”称,传说其五岁即有诗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笔?丹府在吾家。”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7),登

进士第,授中书庶吉士。缙才思敏捷,倚待辄数万言,未尝起稿。善为狂草,挥洒如风雨。应制赋《春雨诗》、《养鹤赋》,援笔立就,造语奇崛,深为太祖所爱。好直言,为众臣所忌。洪武二十三年,放归,俾其归乡侍父。太祖与相约:“进学十年后,来事朕。”八年后,太祖卒,缙前来奔丧,权臣谓赴临非诏旨,贬为河州卫吏。成祖篡位后,擢为翰林院侍读,与杨士奇等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后为侍读学士,主持编纂了两万二千餘卷的《永乐大典》及《太祖实录》、《列女传》等。在立太子问题上,因反对废长立幼,得罪汉王朱高煦。高煦多次谗毁解缙。成祖永乐五年(1407),以谏讨交趾忤旨,出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既行,又为李至刚等所构陷,言其心怀怨望,改贬至交趾。永乐八年,回京奏事。因以谒见太子为高煦所潜,被贬督饷化州,又因上书请用数万人凿赣江以利南北交通,触成祖怒,下锦衣卫,永乐十三年命狱吏灌以烧酒,埋雪中死。缙早年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其诗亦多为应制奉旨之作。这些诗以近体为主,对偶多佳句,如“鱼龙变化九天阔,草木敷荣大地同”(《武英殿喜雨》)、“星斗遥临花外落,旌旗只在杖中看”,“天门掩映莺花曙,黄道澄清淑气寒”(《早朝》二首)。杨士奇言解“诗豪宏丰赡似李、杜”(《解公墓志铭》),王世贞言“解大绅诗如河朔大侠,须髯戟张”(《艺苑卮言》),所指皆是其直摅胸臆的七言歌行,如其表现对“忠无不信”提出怀疑的《长歌行》:“有泪莫泣蛟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赤心徒使按剑看,至宝翻令笑鱼目。千金蹈海称达人,五噫出关东去秦。负刍无复遇知己,空歌白石南山春。楚卿相弃复何有,於陵甘作灌园叟。杂悬偶集鲁东门,惆怅胡能事杯酒……”这类作品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其他如《行路难》、《听琴歌》、《采石吊李白》、《题龙山李氏行乐图》皆有此特点。著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疏奏》等,多散佚不传,后人编其遗稿为《解文毅公全集》十六卷。解缙为撰《解学士年谱》二卷,《明史列传》卷二四、《明史》卷一四七有传。

(王学泰)

【杨荣】(1371—1440) 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翰林编修。成祖篡位后,入直内阁,深得信任,并为之更名荣。历官翰林修撰、侍讲、右谕德、右庶子掌翰林院事。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擢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朝廷重大政务决策。多次从成祖出征,累官至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卒赠太师,谥文敏。荣历仕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五朝,高文典册,多出其手,与杨士奇、杨溥主持文柄凡数十年,号为“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文风影响文坛数十年。其论诗主张“自然醇正为佳”(《逸世遗

音集序》),其仕途一帆风顺,反映到其诗文中就形成了平正典雅,雍容纾徐的台阁体。在“三杨”中,杨荣以诗见长。其诗以描写优游行乐及题赠应酬者为多,如:“美景怀东郭,重游乐盛时。杯香琼作醴,花暖锦成堆。雅奏娱人久,新莺度曲迟。兴浓还有约,来岁副深期。”(《游东郭草亭》)在平正之外,还注重色彩与声调,这是他与杨士奇的不同之处。他有些不经意之作,反而颇有意味。《闽小记》记载,闽有贫生客京师,饥寒濒死,善丹青,不能售一钱,因以两幅献杨荣,荣题诗而还之,诗曰:“谁家老屋枕溪滨?十里青山半是云。此处更无尘迹到,只应啼鸟隔花闻。”此诗远胜其精心结构之作。著有《训子编》、《北征记》及《杨文敏集》二十五卷,杨士奇为撰墓志铭,苏缙、杨肇为撰《杨文敏公年谱》四卷。《明史列传》卷二五、《明史》卷一四八有传。(王学泰)

【王偁】(1373?—1415?)字孟扬。其先东阿人,宋理宗宝庆(1225—1227)中没于西夏,元赐姓唐兀氏,被视为西域色目人,其父翰,于元末被荐为潮州路总管,因战乱道途梗阻,泛海至闽,留永福山中,遂为闽人。明初,有诏征翰,翰自引决死。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偁中举,乞归养母。母去世,庐墓六年。成祖永乐元年(1403),诏修《永乐大典》,聘偁至京,待以殊礼,众皆属目。自陈愿退处学校,遂授国史院检讨,充《永乐大典》副总裁。英国公张辅征交趾,偁以故官参谋其军事。在交趾与解缙交好,缙为人谗毁被逮,偁坐缙党,亦下狱死。偁生长于闽。其诗受闽中学唐风气的影响,为“闽中十子”之一。偁诗以题赠酬酢及行旅之作为多,内容较为单薄。闽中诗人标榜盛唐,而作品风格却近于大历、贞元。如偁《送沙子进赴禄州别驾》诗“客舍酒初香,都门柳色黄。一官仍别驾,万里赴炎荒。江路猿声早,山城榕叶凉。远人劳抚字,且勿厌殊方”,如顾起纶所言,“并是司空、皇甫之余”(《国雅品》)。其随意而作的小诗,则往往写得意味深长,如《题米老山水》:“海岳庵前觅旧踪,苍茫云树米南宫。别来几片青山影,都付寒鸥一笛风。”偁亦工书法,王兆雲《词林人物考》称其“书法道妙”。有《虚舟集》五卷。《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杨溥】(1375—1446)字弘济。湖广石道(今属湖北)人。少工词章,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乡试第一。建文二年,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成祖永乐二年(1404),为司经局洗马。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瓦剌归来,太子遣使迎接迟缓,溥以东宫属官下锦衣卫狱,达十馀年。在狱中时,家人供食数次被迫中止,与死为邻,而溥愈励志读书不辍,难友止之曰:“势已至此,读书何为?”溥答曰:“朝闻道,夕死可

也。”在狱中,五经、诸子,读之数遍。仁宗即位,出狱为翰林学士。宣宗宣德(1426—1435)间,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同参机务,迁礼部尚书。英宗正统(1436—1449)初,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卒赠太师,谥文定。溥与士奇、杨荣并称“三杨”,为台阁体文风提倡者之一。其诗平正典雅,常流于浅显,短于诗味,如:“同居贵安逸,同行共苦辛。牵车朝出门,长坂沙没轮。前呼后相应,推挽到平津。岂徒贵同力,尤贵同心人。”(《宣德丙午巡边途中感兴》之一)其集中有些小诗尚清新可诵,如:“槐阴滴翠满前除,芸阁凉生暑雨馀。啼鸟数声清昼永,北窗睡起课儿书。”(《送素庵给谏还里》)可以想见赋闲乡绅们的优游自在的生活。有《水云录》二卷、《杨文定公全集》十六卷。彭诏为作传。《明史列传》卷二五、《明史》卷一四八有传。(王学泰)

【李昌祺】(1376—1451)名桢,字昌祺,以字行,号侨庵、运甓居上等。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父伯葵有诗名,昌祺二十岁时文名鹊起。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参与编纂《永乐大典》,僻书疑事,人多就质。书成,擢为礼部主客司郎中,藩宪缺员,以才望特简出为广西布政使,因事撤职,被罚劳役,不久得到赦免。仁宗洪熙元年(1425),起用为河南布政使。在职期间,抑制豪强,严惩贪官,疏滞举废,救灾恤贫,颇有政绩。宣宗宣德(1426—1435)初,丁母忧回乡。河南大旱,百姓思之,夺情返任。英宗正统四年(1439),告病致仕,家居十馀年足迹不入公府,伏腊不充,故庐仅蔽风雨。其一生耿介廉洁,自甘淡泊,不以贫贱夺其操,亦不因富贵易其节,其自赞自己画像云:“貌虽丑而心严,身虽进而意止。忠孝秉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乎得体。不劳朋友赞词,自有帝王恩旨”。昌祺在文学史上以小说传世,然其诗亦颇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清新华赡,音节自然。陈循序称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气。故雅淡清丽,宏伟新奇,无不该备”;又云,其诗“一变绮靡纤巧之习,而以流逸出之,故别饶鲜润,迥异庸芜。”陈田亦言其诗“色新意古,诸体并工,在永乐诗家中,独标一格”(《明诗纪事》)。其诗以题赠行役之作为多,如《题双燕图寄表弟陈安行》、《宿废普济寺》、《雨中发洪都》、《送子生还乡》皆属佳作。亦有少量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写于河南的《新安谣》三首,其中有云:“垂老相逢岁薄收,秋租多欠卖耕牛。县官不暇怜饥馁,唤拽官车上陕州。”昌祺继瞿佑《剪灯新话》撰《剪灯馀话》四卷二十篇,以“搜寻神异希奇事,敦尚人伦节义风”为主旨。诗文集有《容膝轩草》、《侨庵诗馀》、《运甓漫稿》等多种。钱习礼为撰墓碑

铭。《明史列传》卷三三、《明史》卷一六一有传。

(王学泰)

【龚诩】(1382—1469) 一名翊,字大章,号莼庵。昆山(今属江苏)人。其父龚晷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官兵科给事中,以言事忤明太祖意,籍其家,谪为五开守卒。诩遂隶军籍,年十四补为戍卒,调守金川门。朱棣率燕卒南下篡位,破金川门,翊大哭遁去,夜走任阳,寄于马、陈二氏之家,藏匿二十余年,遍读二家所藏书。禁稍解,则卖药授徒,颇有名于时。巡抚周忱两荐为学官,坚不应,有田三十亩,艺豆麻以自足,咏歌适志而已。卒年八十八,门人谥曰“安节先生”。龚氏非词章之士,其诗以直摅胸臆为主,诗风介于长庆、击壤之间,便于诵读,伤于浅易。如“远慕渊明自把锄,从渠时辈笑迂夫。生怜花鸟如儿女,酷爱溪山似画图。不饮幸然无酒债,好吟常自负诗逋。年来尚觉疏狂在,折简应知未易呼。”(《漫成》)由此可见其诗风一斑。其诗文收入《野古集》,此集乃其八世从孙龚挺所刻,刊于思宗崇祯(1628—1644)间,收入《四库全书》。其裔孙龚纘为撰《安节先生年谱》一卷,《明史列传》卷二〇有传。

(王学泰)

【薛瑄】(1389—1464)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山西稷县)人。少聪明好学,十一岁随父薛贞官云南,曾向云南都督沐晟献《平云南赋》,深受赞扬。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河南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第。宣宗宣德三年(1428),为御史,因不附权要,出监湖广银场。在此期间,精研性理之学,学问日进。英宗正统元年(1436),为山东提学僉事,亲自为诸生讲课,被称为“薛夫子”。正统八年,因忤权宦王振,下狱论死。将刑之日,振老奴伏灶下而泣,人问之,言:“闻欲杀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动,乃免之。归乡隐居六年。代宗嗣位,召起为大理寺丞,参与保卫北京之战。景泰二年(1451),擢南京大理寺卿,执法不阿。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一度入阁,参与机务。于谦被陷入狱,曾竭力营救,无效,遂坚请告归。致仕后,四方学者多登门请益。英宗天顺八年,临终前赋诗曰:“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通”字最后一笔未完,悠然而逝。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清。瑄虽为理学家,但诗中说理之作并不多,一扫训诂语录之习。其诗多为记游、览古、咏史、抒怀写志之作。如《杂咏》六首从不同角度歌咏自己对国家、社会的献身精神,诗写得平和、坦诚、明朗,虽然立言浅近,但蕴蓄深厚,这与作者人格修养有关。其流连山水之作,也多情淡趣长,如《兰陵怀古》、《宿山亭》、《舟发城陵矶》、《仪真》等。如

《徐州见黄河》云:“我家正在龙门下,流出黄河几曲长。忽向徐州城外见,牵情一水正思乡。”陈田云:“文清古体淡远,律体雄阔,绝句极有风韵,非一时讲声律者所能及。”(《明诗纪事》)所评至为允当。瑄一生勤于著述,著有《孝经今古文》、《从政录》、《读书录》、《读书续录》以及《文清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存诗一千馀首。李贤为撰神道碑铭,杨希闵为著《明薛文清公年谱》。《明史列传》卷四二,《明史》卷二八二有传。

(王学泰)

【于谦】(1398—1457) 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大志,性格果毅。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登进士第。宣宗宣德(1426—1435)初,授御史,颇受宣宗赏识。巡按江西,多平反冤狱,昭雪囚犯数百人。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前后达十九年之久,多有惠政,深受民众爱戴,其间因不肯贿赂朝中权宦王振,下狱论死。由于无实证及日数千起的河南、山西百姓伏阙上书,得以获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复出巡抚二省。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召为兵部左侍郎。瓦剌也先部兵犯大同,英宗亲征被俘,郕王监国,朝中震动,许多大臣力主南迁,谦独排众议,拥立郕王即帝位。拜兵部尚书,提督天下兵马,为中外倚任。也先逼京师,谦身自督战。也先败退,论功授少保,总督军务。英宗复辟后,谦以拥立景帝,又被徐有贞、石亨等诬陷,遂被处死。孝宗弘治(1488—1505)中,追谥肃愍,神宗万历(1573—1620)中,改谥忠肃。田汝成云:“于肃愍高风大节,不在词华,而其断简残篇,得于煨烬之余,往往脍炙人口。”(《西湖游览志馀》)这些“脍炙人口”者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少年时所作《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其一生品格与事业之写照。于诗中最感人者为其自警自诫之作,这类作品确从心中流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如《无题》之三云:“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缁袍。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一钱付江水,死后有馀褒。苟图身富贵,腴剥民脂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这些作品尽管如钱谦益所云,“格调不甚高”(《列朝诗集小传》),但因充满了赤诚,在平实中仍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他还有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关心国家命运以及抵抗瓦剌入侵、决心以身许国的充满了爱国激情的作品,如《荒村》、《田舍翁》、《出塞》、《入塞》、《夜坐念边事》等。其诗清新活泼,格调婉转,饶有寄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转出文士之上。”平生著作甚多,被难后大多

散佚,今存《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皆为后人拾掇遗佚而成。于继志为著《于忠肃公年谱》。《明史列传》卷四一、《明史》卷一七〇有传。

(王学泰)

【叶盛】(1420—1474) 字与中。昆山(今属江苏)人。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擢右参政,督宣府,协赞军务。天顺(1457—1464)时,以右金都御史巡抚两广。宪宗成化四年(1468),擢礼部右侍郎,后转吏部左侍郎。成化十年,病卒。盛长于七律、七绝,往往写得俊逸浑融,颇见功力,如《廉州》、《开封怀古》等诗皆有这样特长。陈田《明诗纪事》评其七言近体说:“风格道上,即精研声律者,无以过之。”另外,盛有不少感时伤世的诗作,如《通州驿夫行》、《伤流民》、《西兵未解,城中时疫死亡相枕藉》等,都能及时反映现实问题。著述甚多,有《开封纪行》、《菴竹堂稿》、《泾东小稿》及《菴竹堂书目》等,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叶氏赐书楼曾汇集其稿,刊刻成《叶文庄公全集》,凡三十卷。《明史》卷一七七有传。

(尹恭弘)

【童轩】(1425—1498) 字士昂。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代宗景泰二年(1415)进士,授南京吏科给事中,历官都给事中、寿昌知县、云南提学佥事等职。宪宗成化(1465—1487)初,以右副都御史总制松潘军务,后进南吏部侍郎,再进南礼部尚书。其诗的抒情色彩较浓,《咸阳晚眺》是因地抒怀,《清明书感》是因时抒怀,颇有感染力。另外,他的乐府诗,也能表达不同类型的感情,颇见功力。如《门有车马客行》表现“前年因征徭,十户九冻馁”的困苦,《将进酒》表现“仰天大笑浮云东”的豪情。《采莲曲》表现“小红艇子”采莲时的欢快。轩诗学唐,一些意境浑茫、音调圆润的诗作时露其笔底,如《谪所有怀旧游诸友》、《九日》等诗就有这种特长。所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其“诗有唐体裁”,陈田《明诗纪事》称其诗“在景泰间,当首屈一指,刘钦谟(昌)、夏正夫(寅)及十才子辈,皆在下风”。著有《清风亭稿》八卷、《枕肱集》二十卷,前者今存,后者今存有残本,仅佚其卷一。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刘泰】 字士亨,号菊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明英宗正统(1436—1449)至天顺(1457—1464)年间。隐居不仕,以诗词名一时。泰擅长七绝。他的一些咏物小诗,含义隽永,颇有寄托,如《咏猫》:“口角风来薄荷香,绿阴庭院醉斜阳。向人只作狰狞势,不管黄昏鼠辈忙。”他如《秋莺》、《秋茄》等,皆写得警拔朗爽。另外,他隐居家乡,常以西湖为背景表现一些生活情趣,也颇为生动,如《春日湖上》、《湖上暮归》等皆如此。泰诗作的语言风格妍丽秀

逸,善于对所表现的对象进行色彩的描绘和勾勒,如:“白烟土锉炊新稻,红雨糟床滴旧醅。”(《恰似村为诸立夫题》)“一瓮晓日红蒸衲,四壁秋烟翠染萝。”(《次韵夏大卿寄玛瑙寺献上人》)“径小黑翻飞去燕,池香红点落来花。”(《寄沈大径》)著有《菊庄》、《晚香》等集,今均佚,其作品有待辑编。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沈愚】 字通理,号崧峒生。昆山(今属江苏)人。愚博涉百家,善行草,晓音律。或劝之仕,曰:“吾非笼络中物也。”敛迹不出,业医授徒,以终其身。他主要生活在明英宗正统(1436—1449)至天顺(1457—1464)年间。善长乐府诗。其诗清丽微婉、摇曳飞飏,颇有南朝文人所作乐府的风味,如《吴宫词》、《吴娃曲》、《乌夜啼》、《莫愁曲》、《车遥遥》、《大堤曲》、《夜坐吟》、《房中曲》等皆如此。王锜《寓圃杂记》称其“乐府尤高,有《吴宫词》诸篇,往往脍炙人口”。除乐府外,还善写七绝,如《旅次石城》、《陈宫怀古》等,不管是游览,还是怀古,皆见功力。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其七绝“尤矫矫轶群,在刘、白之间”。其七律有时学李商隐,如《追和杨眉庵次韵李义山无题诗》五首就是这样作品,但这些诗缺少李商隐那深情绵邈的意境,缺少李商隐那镂物精细、用典工切的艺术特长。著有《吴歙集》五卷、《笈簪集》二十卷,今均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刘溥】 字原博,号草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彦敬以医有名于世,尝事燕王朱棣。溥幼即能诗,八岁咏《沟水诗》云:“门前一沟水,日夜向东流。借问归何处,沧溟是住头。”人皆以为“圣童”。长随祖父游两京,研究经史,尤精天文、历数之学。宣宗宣德(1426—1435)初年,以文学征,有言其善医学,授惠民局副使,调太医院吏目。溥耻以医名世,日以吟咏为事,初与刘珏、徐有贞等唱和,后又与汤胤勣、苏平、苏正等唱和,号称“景泰十才子”,结诗社,溥为主盟。钱谦益谓其“诗初拟西昆,晚益奇纵,悲愁叹愤,一寓于诗,塞雁南飞之什,闻者伤之”(《列朝诗集小传》)。所谓“塞雁南飞之什”乃指刘氏所写《感怀》诗中思念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当时为人所重。另有《题钟馗画像》乃应刘珏之邀而作,亦为京中朝臣文士所竞相传抄,今日视之,皆属平平。溥较擅长七绝七律,佳者颇擅风华。如“灯影分明隔绛桥,玉阶行尽转迢迢。春风只在银屏里,残雪和愁几日消?”(《偶作》)有《草窗集》二卷。《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张宁】 字靖之。海盐(今属浙江)人。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英宗天顺

(1457—1464)中,奉使朝鲜,与朝鲜诗人、陪伴中华使臣的朴元亨相唱和。游太平馆,张宁赋七言长律六十韵,朴随和之,不相上下。归来后,擢都给中。为人负志节、持正义,与叶盛、林聪齐名。大臣忌之,出为汀州刺史,不得志,致仕家居,凡三十年,屡召不出。宁长期过着家居闲适的生活,生活面狭窄,其诗内容亦较贫乏,多为题赠之作,而且有大量组诗,如《草虫杂图四十二首为伍金宪作》、《唐安八景》、《乐山八景》、《南川八景》、《西湖十咏》之类。其《奉使录》中作品为奉使朝鲜时纪行之作,这些作品从许多方面描写了中朝友好关系。如《登凤山楼留题》中的“不用咨询重吊古,四邻无事息征徭”,《登汉江楼》的“贤王好宾客,诸相总风流”,《孙寿山司译院判事》中的“鸭绿江头分别后,只应含泪入山城”,《朴枝司译院判事》中的“千里相随一月情,别时深见此心诚”。从这些诗句都可以感到中朝之间的融洽关系和使臣与伴使间的深情。宁诗中也有少数关心时事的作品,如《纪事》写宪宗成化八年(1472)海堤决口成灾,诗中描写了“青苗白屋随奔流,红颜皓首尸横丘”的可怖景象。顾起纶在《国雅品》中言其诗“纵调骋情,颇称作者。其《采莲》、《昭君》,风力丹彩俱备,堪以陶写幽心。至‘林叶绡霜尽,河冰近午开’,是前贤未振语。殷璠所谓‘意新理惬’,斯得之”。著有《读史录》、《奉使录》、《方洲杂言》以及《方洲集》二十六卷。宁致仕后筑草堂于海滨,名曰方洲草堂,故以名集。《明史列传》卷四九、《明史》卷一八〇有传。

(王学泰)

【马洪】字浩澜,号鹤窗。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主要活动在明英宗朝。隐居不仕,布衣终身。洪与陆昂同出刘泰之门,时人以为昂得其诗,洪得其词。王世贞则谓其词有出蓝之美。杨慎《词品》赞其词作“含吐珠玉,锦绣胸肠”。洪亦工诗,有和曹唐游仙诗百首,盛传一时。著有词集《花影集》,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汤胤勳】(?—1467)字公让。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英宗正统(1436—1449)末,有人荐其有文武才,驿召赴京。于谦请试之,立将台下,摘古今将略及兵事以问,应对如洪钟,万众环视叹赏。授锦衣卫百户,后转千户。代宗景泰(1450—1457)中,进署指挥僉事。英宗天顺(1457—1464)中,坐事谪为民,编籍常州。宪宗成化(1465—1487)初,复官,充参将。成化三年(1467),守延绥战没。胤勳善于七古,辞彩纷呈,浩气婉转,如《水月舫为奚川钱竹深赋》、《为钱理容题美人月琴图》、《竹深处为奚川钱理平作》、《铁券歌》、《题谢卫同钟馗移家图》、《竹泉翁席上赠歌者杨氏》等诗皆具有这样的特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

传》谓其“为歌诗,豪放奇崛,援笔挥洒,如风雨晦冥中电光翕焱,人多为之夺气”。这正指出其七古的特色。至于其七律,有一些是学李商隐的,如《无题次刘虞部韵》、《守宫》等。对其《守宫》诗,刘昌认为“不减李商隐”,其实只是表面的词采与色泽似李,并未达到商隐独具之深情绵邈的意境。胤勳也能词,其《浣溪沙》“燕垒雏空日正长”一首描写景观颇为传神。有《东谷遗稿》十三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一七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郭登】(?—1472)字元登。临淮(今安徽凤阳)人。七岁能诗文。明成祖永乐(1403—1424)末,充勋卫。代宗景泰(1450—1457)初,从都督僉事守大同,以破敌功封定襄伯。英宗复辟,命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寻谪戍甘肃。宪宗成化(1465—1487)初,复爵守甘肃,后召还总神机营。成化八年(1472)卒。登为能诗之武将,才力雄博。其长篇诗作《楸子树》、《泉》,笔力纵横恣肆,联想翩翩,颇具一定功力。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曰:“定襄《山王》、《楸树》诸篇,力已排晁,至咏《泉》之作,直兼张、王、韩、杜之长,岂惟武臣,一时台阁诸公,孰出其右?”由于登南征北战,其诗常能反映各地民情民俗,如《自缅甸回感怀寄沐征南》等。有时还能塑造当地的人物形象,如《西屯女》描写的年十八的西屯女儿颇有情趣。其诗亦或反映民生疾苦,如《飞蝗》篇。其诗作的题材是较为宽广的,笔墨也是多样化的。著有《联珠集》,今已佚,其作品有待辑编。生平见《明史》卷一七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父沈孟渊、伯父贞吉、父恒周皆为隐士,工书画,对周颇有影响。年十五游南京,作百韵诗献巡抚崔恭。恭面试《凤凰台赋》,立就,深得崔氏叹赏,比之以唐代王勃。代宗景泰(1450—1457)间,郡守以贤良荐,却之,终身隐居不仕。周极博群书,古文学《左传》,书法学黄庭坚,画尤享大名于时,后人将沈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明四大家。《丹青志》云:“沈周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卉禽鱼,悉入神品。”与其画相比,其诗名为画所掩。其诗以题画咏物之作为多,善于用近体小诗捕捉生动的形象,描绘美好的意境。题画之作与画相得益彰,咏物之作亦往往深得其神理,如:“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阳犹在小桥西。微吟不道惊溪鸟,飞入乱云深处啼。”(《题画》)又如:“谁放春云下曲琼,一重薄隔万重情。珠光荡日花无语,疏影通风笑有声。外面令人倍惆怅,里边容眼自分明。知无缘分难轻入,敢当杨花燕子争。”(《赋帘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挥翰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

句取工。徒以栖心丘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由于过分追求天趣,其诗中也有许多粗率之作。如《咏落花》、《咏混堂》等,既无寄托,又浅露浮泛。其追求放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与诗风皆对吴中文士有深刻影响。著有《客坐新闻》、《石田杂记》、《江南春词》、《石田集》及《石田诗选》十卷。王鏊为撰墓志铭。《吴中人物志》卷一三、《明史》卷二九三有传。

(王学泰)

【陈献章】(1428—1500) 献章亦作宪章,字公甫,号石斋。因居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新会(今属广东)人。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再上礼部,不第,归隐白沙。从名儒吴与弼讲学,勤于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不出。后复至京城游国子学,国子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邢惊叹曰:“龟山(杨时)不如也。”遂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上疏解官,为献章弟子。归乡,弟子愈众。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召至京师,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上疏乞归终养老母,授翰林检讨以归。后屡荐,终不起。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其学由繁至约,洒然独得,论者谓其于自然中得鸢飞鱼跃之乐。兰溪姜麟称之为“活孟子”。卒后,神宗万历间从祀孔庙,追谥文恭。献章学道,不欲以诗文显于世。其诗多信口信手而致,佳者自可见其一介寒儒之生活乐趣、胸襟怀抱,或能从其描摹的四时风物中见理趣;而劣者则流于押韵讲义。如《冬夜》、和陶诗十二首、《筑室》、《示儿》等皆其佳作。《东轩独坐》云:“桃花寂寞梨花开,山中薄酒三五杯。村西有客可人意,风雨今朝期不来。”此诗仅写生活中一小事,但意趣无穷,可作多种理解。王世贞言:“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于法与体及题之外者。余少学古,殊不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醉,不知其所以然也。”(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诗风格恬淡,纾徐舒缓,从容不迫,但亦偶有愤激之词。如《阅马氏均田文》等。著有《言行录》、《白沙子》八卷,《文集》二十二卷,《遗编》六卷。张诒为撰墓表。《明史》卷二八三有传。

(王学泰)

【柯潜】字孟时,号竹岩。莆田(今属福建)人。主要生活在明代宗景泰(1450—1457)至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景泰二年(1451)进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冲淡清婉,不落蹊径”。陈田《明诗纪事》也说其诗“俊爽出尘”。他爱以山水为背景抒写情怀,如《题山林图

送林伯安还乡》;他也爱游览山水,如《重游梁溪》。正因为其诗多山水之趣,其风格自然就冲淡清婉,但有时缺乏一定的熔炼,精警略嫌不足。有《竹岩集》十八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一五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魏时敏】字竹溪。莆田(今属福建)人。主要活动在明宣宗宣德(1426—1435)至英宗天顺(1457—1464)年间。天资警敏,以才辟为邑从事,日坐曹署治文牍,暇则焚香鼓琴,洒墨作山水,尤笃于诗。游京师,与刘昌等人往来倡和,由是诗名传播更广。谒选时,冢宰尹旻闻其名,试以诗,对其“简拔自惭非汉吏,威仪今喜识周官”之句,大为称赏,除无锡县丞,后改宿迁。未几,致仕归。其在无锡及家居,皆与一时名流结为诗社。年八十馀,犹未尝一日废吟事。其为诗,无论在炼句方面,还是在追求意境浑成、诗味隽永方面,都有步武唐人倾向,因而有不少佳句。正如徐燊《笔精》所描述的:“余阅灯市,有魏竹溪诗,隽永可味,警句甚多,不能殚述,细抽一二,以示同好。如‘残历愁中尽,流年梦里过’,‘客思秋闻雁,乡心夜听潮’,‘林深芳树合,涧转夜泉分’,……‘雨馀一水当溪落,岚净千峰入户低’,‘林隐晓岚山半出,湖添秋雨水平铺’,‘茶灶晓烟笼野色,砚池秋雨洗溪声’,……皆婉转切情,新越可喜。”但其诗有些模拟痕迹,因而陈田称其“步武唐人,有唐临晋帖之似”(《明诗纪事》)。著有《竹溪诗集》,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及《明诗纪事》。

(尹恭弘)

【丘吉】字大祐。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主要生活在明宣宗宣德(1426—1435)至代宗景泰(1450—1457)年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言其“天性淡约,游眺吴越山水间,飘然远俗”。其诗作,与其性格相反,崇尚藻丽。如《吕山花圃池亭》、《和姑苏刘工部昌无题》等诗都说明他这种艺术情趣。但其诗虽纤丽但还不秾艳,尚能表现诗人的感情活动,其七绝尤为突出,如《春夜》、《寄馆天宁寺》、《采莲曲》等都具有这样特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其诗纤丽,主温、李,为吴兴诗人领袖。”陈田《明诗纪事》亦云:“永、宣以来,两浙诗人,多矜丽藻,吴兴则以丘大祐为眉目,时誉归之。”著有《顺信斋集》,今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史鑑】(1434—1496)字明古,因家居西村,人称西村先生。吴江(今属江苏)人。布衣终身。家居水竹幽茂,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从中可知其情趣。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家遭火灾,文物大部被毁,只有晋、唐书画一

籍,以沈周借看,留水月观中,得存。好着占衣冠,曳履挥麈,望之者以为列仙之儒。少受知于徐有贞,长与沈周、吴宽相友善。其部分诗作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如《黜陟使》、《征租使》、《祗候人》都是讽刺当时一些官吏的劣迹,《饮马长城窟行》是揭露明军抵御入侵者的无能。其大部分诗作则以描写自然景观,抒写性灵为主,这些诗往往饶有情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落落无俗韵”。著有《西村先生集》,今存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八卷本,一为二十八卷本,后者搜罗较为详备。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吴宽】(1435—1504) 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为诸生时即颇有闻望,遍读左氏、班、马、唐、宋大家之文,欲尽弃制举业,从事古学。部使者迫促,乃就锁院试。宪宗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孝宗弘治元年(1488),以旧学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后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后改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弘治十六年,进礼部尚书。卒于官。其集中有些悯农诗,或忧或喜,与农家的感情交流在一起,为难能可贵之作。面对“赤地连秦晋,清流涸内泾”的惨状,诗人是“端愁禾种断,久待麦苗青”(《忧旱》)。其“效范文穆公(成大)”的《西山杂兴》更是对农家的各种困苦生活作了充分的表现。其与友朋唱酬、赋咏山水、题画之作,则主要还是表现其闲情逸致。平生最好苏轼,因而其诗也受其影响。其占体往往注意气势豪放、辞意畅达,如《入玄墓寺》、《题海虞钱氏所藏王均章虞山图》、《钟馗元夜出游图》、《秋雨叹》、《为盛舜臣题山水画卷》、《赵松雪长江叠嶂图》、《东坡乐水图》等诗皆具有这样特色。其近体较注意琢句的清润朗爽,因而形成既和平恬雅、又不十分雍容呆板的诗风,如《题杨铁崖墓铭后》、《送刘职方时雍赴福建参政》、《谒耶律丞相墓》、《寄光福徐雪屋》等诗皆有这种特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其诗“深厚酝郁,自成一家”。著有《匏庵家藏集》七十七卷,今存。其生平见《明史》卷一八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陆容】(1436—1495) 字文量,号式斋。太仓(今属江苏)人。少与张泰、陆钊齐名,时号“娄东三凤”。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进士,观政工部,后授南史部主事,改兵部,历员外、郎中。在因公务去张家口期间,曾访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的遗闻。因奏夺二武弁夤缘中贵升都督者,为当道所不悦,出为浙江右参政。复条奏两浙不便者八事,后以浮议罢归。其诗多抒怀之作,如《发鄞县》、《城西草堂》、《桐江夜行》都能因地生发情怀,感受较真切,

但锤炼稍嫌不足。著有《式斋集》三十八卷、《菽园笔记》十五卷,今皆存。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庄昶】(1437—1499) 字孔旸,号木斋,又号卧林居士。江浦(今属江苏)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元宵放灯,命史馆赋诗,昶与同馆章懋、黄仲昭等不奉诏旨,被谪为桂阳判官,后改为南京行人司副。丁忧归,卜居定山二十馀年,学者称之为定山先生。孝宗弘治(1488—1505)间,召至京,徐溥议复其翰林原官,大臣不可,迁为南京吏部验封郎中,得风疾,乞归,卒于乡。熹宗天启(1621—1627)初,追谥文节。昶耽于讲学,其诗作用《击壤集》体类似打油者如“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多传于世,人遂以为昶不能诗。而李东阳云:“庄定山孔旸未第时已有诗名,苦思精练,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稳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树’,往往为人传诵。晚年益豪纵,出入规格,如‘开辟以来元有此,蓬莱之外更无山’之类。陈公甫有曰‘百炼不如庄定山’,有以也。”(《怀麓堂诗话》)杨慎亦云:“定山晚年诗入细,有可并唐人者。古诗如《题竹》及《养庵》两篇,七言如《题玉川画》,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树,江清著数鸥。与君真自厚,不是两相留’,七言律如《游琅琊寺》‘偶上蓬莱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尘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岩七十峰’,又‘秋灯小榻留孤艇,疏雨寒城打二更’,‘北海风回帆腹饱,长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韵》‘心无牛口干秦穆,迹继龙头愧邛原’,《寄刘东山》云‘尘外有人占紫气,镜中疑我尚朱颜’,《次东桥》诗云‘电悬双眼疑秋水,髻拥三花御野风’……此数首若隐其姓名以示人,观者决不谓定山作也。”(转引自《明诗纪事》)可见成见与昶诗颇有差距。昶工于七言,其写景悟性之作,言短意长、可耐寻味者甚夥。著有《定山集》十卷。《明史列传》卷四八、《明史》卷一七九有传。

(王学泰)

【程敏政】(1445—1500左右) 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十岁时随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明英宗召试,悦之,使读书翰林院。宪宗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编修,历左谕德,直讲东宫。其学问之博,为一时之冠。孝宗继位,擢侍讲学士。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主持会试,举人徐经、唐寅(伯虎)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其鬻题卖士,敏政、华昶、徐经、唐寅皆下狱,敏政以曾接见徐、唐而勒令致仕,华以言事不实而降官。敏政出狱,愤而病卒。后赠礼部尚书。明成祖永乐(1403—1424)以后,士人学问日渐空疏,敏政为笃于学者,并勤于著述。其诗亦多达数千首,然

芜杂草率之作颇多。其中之精者则可见其诗学功力,如:“几处炊烟认水村,数声山犬吠篱门。寒天日落明鸦背,荒岁田空剩草根。垂涧石如牛马饮,排云山似节旄屯。眼中无限诗情在,欲对沙鸥了一尊。”(《杨村道中》)中间两联,对仗工稳,明丽如画。工于七律,联语多佳句,如:“四时山色涵空翠,万折泉声泻断虹。清爱竹孙穿冻雪,静闻松子落香风”(《松萝山》),“竹筒有情时共阅,楸枰无偶但空扣”(《病中斋居兼谢西涯学士见过》),“坐怜白日绳难系,起望青山手可招”(《次韵原博喻德》),“山寺茶烟冲鹤起,石门空翠逼人清”(《客请游望湖亭修碧轩不及往次韵》),“三更满地星月碎,九夏半空风雨生”(《松崖为县人胡昭题》),“宦海积薪随下上,客途飘梗更西东”(《留别济宁周同守》),“一龙擎石树根古,万弩射潮风壑哀”(《弘治辛亥岁仲冬念五日在万山观作》)。其警句可随手拈来,决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求其警策者殊稀”。一生著述甚夥,有《新安文献志》、《宋遗民录》、《宋纪受终考》、《真西山心经附注》,并编纂《明文衡》、《唐氏三先集》、《咏史集解》等。其诗文收入《篁墩集》。汜东之为作传。《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杨先溥】字文卿。沂水(今属山东)人。主要活动在明英宗天顺(1457—1464)至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宪宗成化五年(1469)进士,曾官山西按察副使。晚年家居。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云:“文卿诗,有闲适之趣,觉柴桑风景,去人不远。”颇能言中其诗的特点。其《六十》诗中亦云有“嗜酒刘玄石,耽诗孟浩然”之句,可见其生活情趣与艺术追求。其代表作品,如《村居漫兴》、《春日村居》、《初归》、《春归》等,皆清润飘逸,有陶、孟之风。著有《沂川集》,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

(尹恭弘)

【樊阜】字时登,号古崖。缙云(今属浙江)人。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举人,官延平训导。阜善于熔炼诗句,正如陈田《明诗纪事》所说,其“五言如‘夕阳雨外明,溪上山色好’,‘枣花落靡靡,一犬护柴关’,七言如‘夕阳半落山回影,蹇驴一老寻诗还’,‘人家三两溪南村,桃李成行门对门’,‘石门晴雪落松响,沙鸟寒云压竹低’,‘半帘暝色松杉静,一箸春香笋蕨肥’,‘山回薄暝牛归后,江变新寒雁过时’,‘厨烟著树添岚翠,野水归塘乱瀑声’,‘暝色催人诗欲就,一声沙鸟半溪云’,‘桥西有客耽诗癖,买遍青山种白云’,皆佳句也”。阜善于描写景观,如《灵峰岭道中》、《醉中到白崖而归》等。著作已散佚,其诗作主要保存在曹学佺的《历代诗选》里。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马中锡】(1446—1512)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自幼聪敏,三岁识字,七岁能诗。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第,授刑科给事中。为官正直。万贵妃弟万通骄横不法,中锡两次上疏弹劾,两次受到廷杖,濒死不悔;公主侵畿内民田,亦断还给原主;又弹奏权宦汪直。为权贵不满,出为云南按察僉事,改陕西。弘治五年(1492),召还任大理寺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武宗正德元年(1506),调任兵部侍郎,因弹劾权宦刘瑾党羽冒边功,为瑾所恨,矫诏贬至南京工部,寻罢官,械送辽东,尽鬻田庐家产,缴纳大批粮草,才赆职为民。正德五年,刘瑾被诛,中锡被起用为大同巡抚。河北文安刘六、刘七兄弟起事,反对宦官专权与酷吏欺压,义军波及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山西一带,命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与惠安伯张伟讨刘六、刘七。中锡主张招抚,议者劾其纵贼,被逮下狱,逾年卒于狱中。后御史卢雍追讼其冤,复原官。孙绪云:“东田诗悯时痛俗,以极于体物尽性,而要诸变,雄浑深沉,无急蹙狭小之病。间于闺情幽思、旅怀宫怨以自况,而闲情逸兴,时得之讽诵之外。”(转引自《明诗纪事》)虽然未免过誉,但所指出的其风格云“雄浑深沉”及时有寄托是符合实际的。如《秋日西园》就不是单纯感慨秋天凄清,其中蕴涵着忧谗畏讥之情:“散策西园一径幽,袖风巾雨足淹留。鳬鹭塘浅蒹葭晚,蟋蟀篱疏蕙苳秋。怪事漫劳书咄咄,别名还拟号休休。客来莫共谈机事,抱瓮先生已白头。”其他如《落花》、《即事》、《闺怨》都可以感到诗人的隐忧。中锡工于五言、七言律体。孙绪序中锡集言其诗卑者亦迈许浑,高者当在刘长卿、陆龟蒙之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中锡诗格,实出入于剑南集中”,较为允当。中锡还工于古文,其所著《中山狼传》,为后世所传诵。有《东田漫稿》六卷,为其子马师言所编,另有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其乡人贾棠所编《别本东田集》,较完善。靳贵为著墓志铭,毛奇龄著有《马中锡传》。《明史》卷一八七有传。

(王学泰)

【张琦】字君玉,号白斋。鄞(今浙江宁波)人。家贫,弱冠游学吴、楚间,每诵读至夜分。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98),举于乡。次年,成进士,授南大理评事,历寺正,迁兴化知府,升本司左参政致仕。归二十年而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其“自少至老,刻意攻诗,呕心刻肾”,可见其志趣。其作诗,力去陈言,颇能自成一格,如《浴凫轩为封君林太守》、《乞王廷直山水歌》、《风雪图歌》、《越中盛水感事》等。陈田《明诗纪事》评论说:“白斋诗,如饮苦酒,食谏果,森森自有正味。在李(梦阳)、何(景明)盛行

时,不可无此一体。”著有《白斋》、《竹里馆》等集,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号西涯。祖籍茶陵(今属湖南),生于北京。少聪颖,四岁即能书径尺大字,被目为“神童”,于四、六、八岁时三次为明代宗召见。英宗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登进士第。从此在朝为官五十年,先后担任翰林编修、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孝宗弘治五年(1492),擢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久之,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晚年,权宦刘瑾专断朝政,东阳与之虚与委蛇,因循隐忍,颇受一些正直朝臣的非议。其门生罗玘竟写信劝其退位,自求削门生之籍。武宗正德八年(1513),致仕,卒谥文正。东阳一生只三次离京,一次回乡认祖归宗,二次至南京主持乡试,三次到曲阜祭孔,先后不足一年,其余时间皆居京师,故生活贫乏,其诗多为咏史怀古、奉敕应制、题赠酬酢之作。在当时颇有名的《拟古乐府》一百首,与元代杨维桢所写古乐府一样,受小说戏剧写历史题材的影响。如《三字狱》写岳飞受秦桧诬陷,慨叹奸臣误国。《文成死》写汉代方士文成将军欺骗汉武帝,讥讽梦想成仙之愚妄。《绵山怨》写春秋时晋介之推不愿接受君禄,深隐绵山而被晋君烧死事,突出了“君王恩重翻为仇”,揭示了封建时代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意志,不能稍有违拗,否则吉凶难测。这些作品都非单纯“拟古”,皆有寄托,与明代政治现实有很大关系。其乐府诗中议论很多,往往多于叙述、描写,这是与杨维桢拟古乐府的不同之处。其中有些议论具有控诉力量(如《绵山怨》),但大多流于枯燥的说理。又由于《拟古乐府》中有许多篇章是歌颂忠臣义士、幽人贞妇的,因之道学气很重,总体说来是不成功的。东阳三次出京途中有意将自己的见闻化为诗篇,现实性较强,多有佳作。如《风雨叹》写宪宗成化八年壬辰(1472)海上狂风暴雨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与诗人的忧国忧民之热忱:“壬辰七月壬子日,大风东来吹海溢。峥嵘巨浪高比山,水底长鲸作人立。愁云压地湿不翻,六合惨淡迷乾坤。”“东村西舍喧呼遍,牒书走报州与县。山厓谷汹豺虎噪,万木尽拔乘波涛。州沉岛灭无所逃,顷刻性命轻鸿毛。”此诗气势雄伟,布局起伏跌宕,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行旅途中还写了一些揭露官府弊端、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较有生活实感。如《白杨行》写因天灾和迎送官员被剥削得“出入无完裤”的饥民的惨状,颇有感染力量。东阳还善于写景抒情,其小诗亦多佳作,如《黄莺》:“柳花如雪满春城,始听东风第一声。梦里江南四时路,

隔溪烟雨未分明。”作者重视诗歌音调的轻重疾徐、清浊高下,以及用字虚实与结构的起承转合。其律体音调谐美,七律多佳句,如:“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雨几重阳”(《九日重阳》),“万树松杉双径合,四山风雨一龙寒”(《游岳麓寺》),“云去好山争入座,雨来溪水欲平桥”(《泛南池有怀南溪圣公》),“舟中梦醒闻春雨,楼上诗成坐夕阳”(《寄庄孔旸》)。其诗风骨遒劲,典雅工丽,有意克服台阁体的平庸呆板诗风,但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其论诗强调音律格调,注重比兴,主张取法于唐,特别倾心于杜甫,他这些观点对后世的前、后七子有一定影响。东阳身居高位,主持文坛数十年,又好奖掖后学,因之在其影响下形成了茶陵诗派。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宪宗实录》、《孝宗实录》皆由其主编完成,又主持了《大明会典》、《历代通鉴纂要》的编纂工作。其诗文收入《怀麓堂全集》一百卷中。明崔杰为撰《李文正公年谱》二卷,清朱景英为撰年谱一卷,清法式善为撰年谱七卷。《明史》卷一八一有传。(王学泰)

王鏊(1450—1524) 字济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历侍讲学士,充讲官,反对皇帝盘游无度。武宗正德(1506—1521)初,累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与权宦刘瑾竭力周旋,拯救正人端士。未几,以志不获逞求去。正德四年(1509)致仕,家居十馀年,世宗嘉靖(1522—1566)初,遣行人存问。将召用而卒,赠太傅,谥文恪。鏊博学而有识鉴,吴中文士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陆粲等皆出其门,对于吴中文风有一定影响。在京曾与同乡京官结为诗社、互相唱和,“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震泽集·送广东参政徐君序》)。而且“数日辄会,举杯相属,间以吟咏,往往入夜始散去”(《匏翁家藏集·赠周原已院判诗序》)。故其诗多题赠唱和之作,诗风则受到台阁馀风的影响,平易徐缓,少警人之作。有些描写个人琐事及偶然闪现性情的作品颇有动人之处。如《闻蛩》“一声促织破秋鸣,远客无端意自惊。忆着年年儿女戏,雕盆相对斗输赢。”剥去衣冠假面,袒露出一颗童心。著作甚富,有《史馀》、《姑苏志》、《震泽编》、《震泽长语》、《春秋词命》,以及《震泽集》三十六卷。文徵明、王守仁皆为之作传。《明史列传》卷五〇、《明史》卷一八一有传。(王学泰)

石琚(?—1528) 字邦彦。藁城(今属河北)人。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与其兄玠同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历修撰、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擢南吏部侍郎。武宗正德(1506—1521)间,改召礼部。武宗盘游无度,上书谏之,不报。转吏部,入

内阁,专掌敕诰。世宗嘉靖(1522—1566)初,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议大礼,世宗欲其助己,瑄从容谏之。世宗不快,遂致仕,家居卒。谥文隐。瑄虽至高位,为官清廉有操守,当致仕归乡时,行李只有一车,装被褥而已。都人叹息,言自宰相离京,无如石瑄如此简朴者。瑄为李东阳得意门生,其诗文与东阳多有相似之处,平正通达,舒卷自如,雍容典雅。其古体诗多摭言写怀之作。如:《暮夜金》通过写拒绝知友的馈赠,表明了作者高尚人格;《雨夜坐述怀》不仅写出了自己的怀抱、志向、人格,而且还表达了对诗文崇高境界的理解。其长篇古体还有许多关注现实的作品。如:《樵夫吟》表现对滥征赋税的不满;《菜佣行》写封建法律只管民不管官,更不敢管大权在握之人;《阿堵行》是一篇新《钱神论》;《金穴行》讽刺世人“见利不见血”。这些题材都表现其虽久处高位,却未闭目塞听,而且勇于把世间丑恶现象写入诗中,加以鞭挞。这在其诗中屡屡得见,确如王世贞所云:“石少保诗,如披沙拣金,时时见宝。”(《艺苑卮言》)其近体诗以题赠与写身边琐事者为多,不如古体之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著有《熊峰集》十卷。《明史列传》卷六二,《明史》卷一九〇有传。(王学泰)

【杨一清】(1454—1530) 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安宁(今属云南)人,父徙巴陵(今湖南岳阳),又徙丹徒(今江苏镇江)。一清八岁,以奇童荐入翰林,十九岁成进士,授中书舍人,声华籍甚。出为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在陕八年,究边事甚悉。召为太常少卿,进南京太常卿,拜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进巡抚总制三边,擢右都御史。以忤权宦刘瑾被逮下狱,寻解,致仕。后起总制军务,召拜户部尚书,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官至太子太师、特进上柱国、华盖殿大学士。为张璁、桂萼等构陷落职。卒赠太保,谥文襄。一清历官五十六年,出将入相,久为方面大吏与中枢大臣,博学善权变,畅晓边事,识大体,人或比之以唐代贤相姚崇。其诗多摭写忠君爱国、忧时悯民、规迪僚友之情,如:“宦游踪迹半江湖,直以风波作坦途。一代勋名方自许,百年纲纪正须扶”,“历尽悲欢年未老,阅来夷险路方真”,“也知物论终难屈,莫把文辞作楚声”(皆见《送张兼素谪师宗》),“聊以文章供岁月,耻将温饱负平生”,“投荒合是孤臣分,肉食纷纷恐未安”(均见《送履庵萧文明还镇宁》)。这些出自肺腑、或勸己或勉人的句子,在杨诗中俯拾皆是,反映明朝士大夫以气节自重的时代风习。其诗中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有意模仿民歌。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往往用古体长篇。朱彝尊言:“邃庵古诗,原本韩、苏,近体一以陈

简斋、陆放翁为师。”(《静志居诗话》)陈田言:“文襄《石淙全集》,利钝杂陈。其杰出之篇,实可与茶陵旗鼓相当。”(《明诗纪事》)其实,一清诗的内容远比李东阳作品丰富,在艺术上也比李诗富于变化,由于人多震灼于李东阳的盛名,往往轩李轻杨,有失允当。著有《西征日录》、《车驾幸第录》、《明伦大典》及《杨一清奏议稿》三十卷、《石淙类稿》四十五卷,诗二十卷。谢纯为撰行状。《明史列传》卷六一、《明史》卷一九八有传。(王学泰)

【储巏】(1457—1513) 字静夫,号柴墟。泰州(今属江苏)人。九岁能属文。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乡试与次年会试皆名列第一。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为官严正,考注臧否,一出至公,改为郎中,擢太仆卿,历左金都御史,户部侍郎,所至尽革宿弊。权宦刘瑾用事,巏愤其所为,引疾求去,瑾败,以故官召,辞不赴。后起为南京户部左侍郎,改吏部,卒于官。世宗嘉靖(1522—1566)间,谥文懿。巏师李东阳,为茶陵派中坚。其诗具有茶陵派特征,典雅和穆、雄浑跌宕,多题赠酬酢,登临胜迹,怀古咏史之作,如《大房金源诸陵》颇有代表性:“长白山高朔漠连,金源风致故依然。千秋魂魄尤思沛,万里邱陵却到燕。感事重翻江统疏,伤心莫问靖康年。幽兰一曲雄图歇,汝水悠悠入墓田。”情辞慷慨,颇有几分杜甫《咏怀古迹》意味,其他如《清源舟夜》、《彭城有怀》、《金台》等皆与此相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规仿陶、韦”,实为不着边际之语。著有《皇明政要》及《柴墟集》十五卷、《驹野集》一卷,顾璘为撰行状。《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杨循吉】(1458—1546) 字君谦,一字君卿,号南峰。吴县(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多病,好读书,每读到得意之处,不禁手舞足蹈,因此得“颠主事”之绰号。一岁之中,数请病假,长官厌而诃之,遂致仕归,年仅三十一岁。回乡后结庐支硎山下,读书支硎山南华寺中,每闻某家有异本,必购求缮写。为人狷介,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难人,往往使人难堪。正德(1506—1521)间武宗南巡,驻北固山,见循吉留题,因召见。循吉见帝,不能对,遂遣归。晚年以贫病卒。循吉为人率性而行,其论诗云:“予观诗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然后定为好诗。其他短钉攒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吾无取焉。”(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多写身边琐事,冲口而出,自然清新,时亦流于琐屑浮浅。如《续吴录》记其《题扇》诗云:“蚕豆香生涧水深,溪边闲立听风吟。有人识得寒山子,直到天台寺里寻。”直如说话,亦有情韵。也有少量

作品敢于直斥官吏的凶恶,《逸老堂诗话》云:“成化间,吴中大水,郡守刘瑀酷虐子民,督征粮税,乡民苦楚,血肉狼藉,破产荡业,不胜拷掠,时人目之‘白面虎’。杨仪部循吉有《酷吏行》刺之云:‘酷吏面上无慈色,手中长提法三尺。怒肉横生髯奋张,高呼拍案气扬扬。鞭笞在前视如戏,人血纵横流满地。水浸生荆尚怪轻,铜包大杖犹嫌细。贫穷百姓真可怜,每每见官多被鞭。忍饥忍痛哭向天,公人竟觅行杖钱。’”百姓挨打,还要向公人缴纳行刑之钱,此一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一生著述不辍,有《春秋经解摘录》、《辽金小史》、《吴中往哲记》、《庐阳客记》、《宁海州志》、《奚囊手镜》、《明文宝》、《苏谈》、《苏州府纂修识略》、《七人联句诗记》、《吴邑志》、《金山杂识》及《松筹堂集》十二卷、《灯窗未艺》一卷、《攒眉集》一卷。曾自撰生圻碑。《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祝允明】(1460—1526) 字希哲,因生而六指,自号枝指生,又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聪敏,五岁可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籍,文思敏捷,对客挥毫,思若泉涌,尤工草书,亦善画,名动海内,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吴中四才子”。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举人,进士考试屡不第,后补广东兴宁知县,历官应天府通判,不久告病辞归。其诗长于描写吴中文士的放浪生活。如《春阳曲》、《吴趋》等篇就是他们歌酒相逐生活的写照。即使为官,也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如其《广州戏题》诗云:“生世投闲四十年,瘴江班顶试鸣弦。今朝也是为官日,白日青天闭户眠。”也有一些描写天灾人祸的作品,表明其对于人民疾苦的同情,如《拟伤乱》、《九愍》、《代江江南水灾谣》等。诗学六朝晚唐,注重词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允明诗取材颇富,造语颇妍,下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体。”但其小诗则能独辟蹊径,饶有风致。如“历乱茅堂草树深,隐居踪迹杳难寻。只应独自携琴去,小答松篁太古音。”(《题画》)其散文与笔记亦有成就,文笔“潇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巨观,而一邱一壑,时复有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苏材小纂》、《祝子罪知》、《浮物》、《野记》、《前闻记》、《志怪录》、《笔记》以及《怀星堂集》三十卷。陆粲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邵宝】(1460—1527) 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十九学于著名理学家庄昶。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许州知州,在许躬农桑,仿朱熹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岁灾荒。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书院以处学者,其教以

致知力学为本。武宗正德四年(1509),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忤刘瑾,被勒令致仕。刘瑾被诛后,起为贵州巡抚,升户部侍郎,请养母归,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复前官。宝以母老恳辞,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其学以洛、闽为归,注重躬行。尝言:“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宝受知于李东阳,又曾登堂入室求教,东阳亦以衣钵门生期之,因此,其诗、文有着鲜明的茶陵派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清和澹泊,尤能抒写性灵”。钟惺亦言:“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惟邵二泉耳。”(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乞终养未许》诗云:“乞归未许奈亲何,帝里风光梦里过。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远白云多。客囊衣在缝尤密,驿骑书来字欲磨。圣主恩深臣分浅,百年心事两蹉跎。”这首诗把徘徊于国与家、君与老亲的矛盾心态写得十分逼真生动,因此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谓“读之令人感动激发,最为海内传诵”。其诗亦重格调音调,长于五、七言律。著有《左觿》、《简端录》、《学史》、《漕政录》、《许州志》、《定性书说》、《大儒奏议》、《慧山记》及《容春堂集》六十一卷。杨一清为撰神道碑铭,邵鲁为作《邵文庄年谱》。《明史》卷二八二有传。(王学泰)

【顾清】(1460—1528) 字士廉,号东江。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孝宗弘治五年(1492),举南京乡试第一。次年,礼部考试第二,选翰林庶吉士。李东阳为其馆师,得李指点,益有名于时,散馆授编修。武宗正德(1506—1521)初,刘瑾秉政,清独不与通。瑾恶之,出为南京兵部员外郎。刘瑾被诛后,复故官,擢侍读学士,累官至礼部侍郎,罢归,起为南京礼部侍郎,进本部尚书,致仕。卒谥文僖。清为东阳门人,受到茶陵诗风的影响,即钱谦益所谓“深得长沙衣钵”(《列朝诗集小传》)。这主要表现在注重格调与法度上,以矫台阁文风的粗疏草率。其诗清新婉丽,律度严谨,如:“金兽香残昼漏稀,嫩槐庭院午风微。密房分子蜂初静,书阁垂帘燕自飞。小碾试茶催爨鼎,轻刀裁葛已成衣。故园遥忆三江外,梅豆青青笋过扉。”(《首夏记事》)此诗格律严整,对仗工稳,词藻色泽清丽,无可挑剔。清长在于七律,如《九日世兴席上有感用齐山韵》、《以灯圆饷陆太仆》、《游南庄》等皆可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内容以写身旁琐事及题赠之作为多,古体好用险韵,注重铺排,有效韩愈、苏轼逞才之意。著有《松江府志》、《傍秋亭杂记》、《东江家藏集》四十二卷。孙承恩为撰墓志铭,《明史列传》卷五四、《明史》卷一八四有传。

(王学泰)

【杭淮】(1462—1538) 字东卿,号双溪。宜兴(今

属江苏)人。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出为浙江按察僉事,进副使,改山东,又改云南,历湖广按察使,河南、山东布政使,累官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人与其诗云:“淮与兄济,并负诗名,与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诸人,递相倡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弘治、正德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其诗言:“双溪诗极其道炼,如茧丝抽自梭肠,似涩而有条理,五言尤擅场,可亚少谷(郑善夫)。”陈田《明诗纪事》谓:“东卿诗,不事叫嚣,自饶古格,在七子派中,与大复(何景明)、昌谷(徐祯卿)为近。”从这些评论中,可认识其诗的特长及不足。著有《双溪诗集》八卷。其生平见朱彝尊《明诗综》、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蔡羽】(?—1541)字九逵,号林屋山人、左虚子、易洞。吴县(今属江苏)人。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起应试,十四次皆受挫。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以太学生赴选调,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嘉靖十五年,解职归。其诗的发展变化过程,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言:“早岁诗,微尚纤丽;既而涤除靡曼,一归雅驯;晚更沉着,时出奇丽。”其晚年确有不少整秀奇丽之作,如《覆舟山临望》、《龙江驿晓发》等。其缺点是缺乏含蓄,所以王世贞《艺苑卮言》评其诗云:“蔡九逵诗,如灌莽中薔薇,汀际小鸟,时复娟然,一览而已。”著有《林屋集》二十卷、《南馆集》十三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游潜】字用之。丰城(今属江西)人。主要活动在孝宗弘治(1488—1505)至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曾官宾川知府,因忌者疏劾而罢归。归里后,在山脚下的小桥流水旁,结茅数椽,赋诗自娱。其诗爱描述自然风光,自家园林首先成为歌咏对象,如《蜗道》、《燕图》、《蚁封》、《蝶所》、《螭区》、《梦蕉亭》等都是这样作品。潜喜外出寻幽探胜,如《江行》、《游明水寺》、《泛湖》等皆写其游览中所作。在其诸体诗作中,七绝较优。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云:“用之古诗,摹李长吉、温飞卿,袭调而窘于才。近体绝句,颇近晚唐,兼杂宋调,于明人中,又刻意学陈白沙,大约绝句工于律体。惟古诗近拙,选家多不见收。”著有《梦蕉存稿》四卷、《梦蕉诗话》二卷。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殷云霄】字近夫。寿张(今属山东)人。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疾归,作菑艾堂,读书其中。后授靖江知县,调青田,升南京工科给事中,卒于官,年仅三十七岁。云霄与孙一元、郑善夫为诗

友,常一起登临山水,因而其诗多借山景水色抒写情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其诗言:“诗体偏侧,略近继之(郑善夫),而风调不及。”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云:“近夫好占振奇,豪情健句,杂沓而来。古诗稍落痕迹,七律学杜拾遗,不失为陈正字也。”从两人的评论,大致可见云霄诗作的优、缺点。著有《石川集》五卷,今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蒋冕】(1463—1533)字敬之。全州(今属广西)人。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武宗正德(1506—1521)间,累官户部左侍郎,进礼部尚书。正德十一年(1516),命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次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四年,扈帝南征,还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时主昏政乱,冕持正不挠,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维新,而上下扞格弥甚,冕为首辅仅两月,卒龃龉以去。年七十一卒,谥文定。其诗作较为平淡,但小词颇有韵致。著有《湘皋集》。《明史》卷一九〇有传。(尹恭弘)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郿(今陕西户县)人。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举人,弘治九年,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武宗正德元年(1506),入史馆纂修《实录》。正德四年,《实录》成,进讲经筵,调吏部主事。正德三年,迁吏部郎中。宦官刘瑾败,因名列瑾党,滴寿州同知,寻勒令致仕。九思先追随李东阳,诗文效其体,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唱和,称“前七子”。罢归后,因与康海遭遇相同,时聚于汧东、郿杜间,相与过从谈宴,征歌度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郁。俞汝成云:“渼陂礧礧廓落,有太仆不雕之风。”(《明诗综》)钱谦益则谓其“《渼陂集》粗有才情,沓拖浅率,《续集》尤为冗长”(《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内容较为广泛;一是能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之惨状,或述寺人气焰之嚣张,或写官场中之世态炎凉,皆真实动人。二是抒发仕途失意之牢骚,如抒怀诗《秋夜》,咏史诗《朱仙镇谒岳王庙》等。三是写致仕家居时征歌度曲之风流生活,如《对山草堂宴集》:“对客辄弄笛,平生桓叔夏。花时携妓游,岂让东山谢。满溪花正香,何必黄四娘。雪儿歌《杨柳》,花奴行玉觞。斜阳挂远树,勿用伤迟暮。……”无论是揭露、牢骚,还是欢乐,皆具真情实感,从中可见九思之性格风貌。其诗佳者秀美圆润。其下者则确如钱谦益所言,“沓拖浅率”,近于词曲,至于模拟之作,更是等而下之了。所撰杂剧《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或认为影射李东阳而作。著有《渼陂集》十六卷、《续集》三卷、《碧山乐府》四卷、

《碧山诗馀》一卷、《南曲次韵》一卷(与李开先酬和合集)、《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杂剧、《中山狼》院本各一卷。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张宗孟合刻为《重刻汉陂王太史先生全集》二十七卷。事迹见李开先《汉陂王检讨传》、《康王王唐四子补传》(《闲居集》卷一〇)、《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传附《明史》二八六《李梦阳传》后。

(吴书荫 尹恭弘)

【陈沂】(1469—1538) 字宗鲁,改字鲁南,号石亭。原籍浙江鄞县,以太医院籍居南都,遂为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幼颖异。五岁能属对,八岁能摹古人画,十岁能诗,总角著《孔墨辨》、《赤宝山赋》,传诵人口。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参预修《武宗实录》。世宗嘉靖二年(1523),礼部聘为同考官,嘉靖四年,《实录》成,进侍讲。嘉靖六年,出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嘉靖八年,量移山东左参政,多惠政,如发官帑市牛,给民垦植,并宽其赋税,又为捐除种马、薪木、运布诸征,使民获息。因不附权臣张璁、桂萼,改山西行太仆寺卿。上疏致仕,归筑遂初斋,杜门著述,绝意世务。鲁南初与顾璘、王韦,号“金陵三俊”,后朱应登继起,合称为四大家。顾璘称其“少好苏氏之学,笔势澜溢,人谓其类东坡,亦自号曰‘小坡’。中岁再变其格,诗宗盛唐,文出入《史》、《汉》,归于简古”(《山西行太仆寺卿陈先生沂墓志铭》)。沂作诗注重学杜,时有佳句,顾起纶《国雅品》例举其佳句云:“如‘鸟声林叶暗,山影石溪寒’,‘悬灯动星月,转梵起鱼龙’,‘漏转云车急,花深月殿开’,‘鹊观月华还映雪,龙池水色已含春’,恍乎临蓬山而俯瞰闽州,深远郁然。”亦喜度曲,工画及篆隶。著述丰富,有《石亭文集》十二卷、《拘虚集》总六卷、《诗谈》一卷、《游名山录》四卷、《金陵世纪》四卷、《询苕录》、《善谑录》等笔记六种。还著有《善知识苦海回头》杂剧,散曲作品在《南北宫词纪》中。生平事迹见顾璘所撰墓志铭(《凭几集》续编卷二)。传附《明史》卷二八六《顾璘传》后。

(吴书荫 尹恭弘)

【唐寅】(1470—1523) 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商贾之家,少时入乡学,才气奔放。因与同里秀才张灵嬉戏游荡,为同学所轻视,寅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应乡试,果中魁首,为解元。其才学为乡试主考梁储与次年会试主考程敏政所叹赏,会试时因唐寅同舍徐经贿赂敏政书僮,得到考题,事发,程、唐、徐等皆下狱,事讫出狱,绝意仕进,生活放浪,曾远游洞庭湖、南岳、浙江天台山及福建武夷。江西宁王宸濠慕其才名,以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乃佯狂纵酒,言

其丑事。宁王不能堪,遂放归。归吴后,筑室桃花坞,与宾客宴乐其中,自篆闲章曰:“江南第一才子”。有时坐临街一小楼,卖画易酒。自题诗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常时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可见其为人。寅诗多以苏州四时风物、日常生活为题材,题画赠答、伤时讽世之作亦为数不少。如《花月吟效连珠体》、《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观鳌山》、《桃花庵歌》、《叹世》六首皆其代表作品。寅诗是作者风流放诞人品的写照,如:“衲衣乞食自行歌,十院烧灯拥翠娥。天下风流谁可并?洛阳雪里郑元和。”(《题自画韩熙载图》)《贫士吟》十首则借咏古来贫士以表现布衣之士的自豪感。寅早年学六朝,喜其秾丽;中年学白居易、刘禹锡,喜其坦易,通俗;晚年则不拘成格,不避俚俗,对传统诗风有所突破。王世贞讥其诗如“乞儿唱莲花落”(《艺苑卮言》),《四库全书》不收其集,言其诗“颓唐浅率”,说明寅诗是背离正统文学的,但其诗也确有不少油滑浮浅之作。寅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他们的诗歌(徐氏早期诗歌)在浪漫主义倾向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其散文小品、词、曲亦有独到之处。其画最工山水,取景写物时出新意,亦善画人物仕女,生动妩媚,不落俗套。有画谱与《六如居士全集》传世。祝允明为撰墓志铭,今人阎风为撰《唐六如年谱》与《唐六如评传》。《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文徵明】(1470—1559) 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幼不慧,稍长,聪颖异常,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学文于吴宽,皆有成。又与同郡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相切磋,号“吴中四才子”,名声益著,然科场不利,乡试屡挫。武宗正德(1506—1521)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诸生岁贡诣试吏部,授翰林待诏。世宗嘉靖(1522—1566)间,参预修订《武宗实录》,侍经筵,后乞归。徵明为人淡于名利,不肯与权贵往来,曾却宁王宸濠之招聘。其诗书画皆有名于时,主持吴中文坛数十年,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纸。其诗以描写四时风景、咏物题画、诗酒酬赠之作为多。风格清新雅饬、秀丽细致,宛如其画。如:“绿树敷荫翠荇香,方舟十里下回塘。白鸥飞去青山暮,落日唱歌烟水长。”(《题画》)也有些作品表现其孤傲的个性,如:“三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感怀》)这正是他官场生活的实际感受。徵明工于律体,其七律学陆游,对偶多警句,如《煮茶》诗中名句“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烧

松翠鬣香”。其他如：“人语不分尘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烟”（《月夜登阊门西阊桥》）；“春风依旧吹芳杜，陈迹无多半夕阳”（《沧浪池上》）；“凉风度竹风如雨，碎影摇窗月在松”（《冬夜》）等，也都流畅自然，细致工丽。其诗之病在于缺少社会内容，浅显柔弱，不耐涵咏。有《甫田集》三十五卷传世。另著有《图画见闻志》、《温州府君遗事》。《明史》卷二八七有传。其子文嘉撰有《先君行略》、王世贞为撰《文先生传》，黄佐为撰墓志。（王学泰）

【王廷陈】字稚钦，号梦泽。黄冈（今属湖北）人。廷陈颖慧绝伦，髫年缀文，不假师授。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吏部给事中。武宗南巡，上疏力谏，杖于庭，出为裕州知府。廷陈不惯为吏，又失职怨望，簿牒堆案，漫不省视，下狱，削秩归。自此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诏修《承天大志》，顾璘以王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仅赐银币而已，其诗作有不少愤懑之辞。《登裕州短歌》生动地描绘了“缚我囚车”的惨状。他如《咏怀》、《行路难》、《遣兴》、《杂诗》、《别张子言》等诗都表达了这种感情。他归居乡里后，时在“闲步”、“夜坐”、“春游”等活动中寻找诗情，这是其诗作另一方面的内容。廷陈擅长五言，五古、五律皆有佳作。其五古善将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体，如《别曾仲礼》叙述中夜起床送别朋友，但其中夹有“唧唧草虫间，助我扬悲吟”的抒情、“亲交信不薄，先民良可钦”的议论，凸现出情谊的真挚。其五律意警语圆，时有佳句，如：“海田犹有变，洞壑岂无哀”（《吊道士》）；“初月悬枫岸，馀霞恋竹扉”（《溪边晚兴》）；“絮飘兼鹤毳，花落冒珠丝”（《春尽》）；“峡束愁江怒，云盘古栈悬”（《送王知事还蜀》）；“篱边春水至，檐际暖云生”（《春日山居即事》）；“把烛秋蛾集，开檐夕鸟过”（《夜坐》）。有的出语奇特，有的富有画意，有的发人想象。著有《梦泽集》二十三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方太古】（1471—1547）字元素，晚号寒溪子。兰溪（今属浙江）人。少受经学于章懋。年十八，走南海，谒陈献章。归而废经生业，读书学古。已而复出游，吊陈献章于江门。后纵游金陵、吴会，与杨循吉、沈周、文徵明、孙一元结诗酒社。明武宗正德（1506—1521）初，隐于白云源。世宗嘉靖（1522—1566）初，徙金华之解石山、茅山之金笥庵。晚归溪上故里，不应征召，以终其身。为人负气慷慨，高自位置，故其诗常表现其疏狂、傲举之性情，如《忆溪上梅花》、《读孙太初去冬所寄杂诗》等都具有这样特

点。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云：“太古负气傲举，山泽俊人，诗亦洒落不凡。”著有《寒溪子集》，今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梦阳】（1472—1529）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庆阳汉属北地郡，故人又称之为北地。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因征税得罪权要被构陷下狱。弘治十八年，应诏上书，凡五千言痛陈时弊，言及外戚，下锦衣卫，寻释出。武宗正德（1506—1521）间，又因代尚书韩文上书劾权宦刘瑾被逮下狱，将杀之，赖康海说情得免，复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为宁王宸濠作题记被削籍，卒于家。梦阳在京时，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朱应登、陈沂、郑善夫、顾璘等号“十才子”，又与何、徐、边、康、王及王廷相号“七才子”。七子皆睥睨一世，而梦阳尤甚。七子以复古自命，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方面要摆脱茶陵派“出入宋、元”的影响，一方面也要扫荡明成祖永乐以来平庸板滞的台阁体馀风，梦阳为其领袖，影响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其诗作惟古是尚，多拟古、咏古及题赠应酬之作，缺少真实感受，如钱谦益所言：“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字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列朝诗集小传》）梦阳诗中也有一些揭露政治黑暗、奸佞当道，抨击权贵把持朝政的作品，如：《玄明宫行》揭露权宦刘瑾当权时“威刑霹雳缙绅毒，自尊奴仆侯与公。变更累朝意叵测，掊克四海真困穷”；《士兵行》、《豆筵行》写在江西宸濠之乱中朝廷用兵不当，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林良画两角鹰歌》借题画讽刺封建帝王玩物丧志。这些都是较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并富于感染力。梦阳对壮美有所偏爱，故其写景摭怀之作多以壮丽风光与高远怀抱为题材，如：“日抱扶桑曜，天横石碣来”（《泰山》）；“风雨江声壮，兵戈地色寒”（《明远楼春望》）；“隘地黄河吞渭水，炎天白云压秦山”（《潼关》）；“黄尘古渡迷飞鞚，白月横空冷战场”（《秋望》）。此种意境作品，开卷即是，不仅失之于单调乏味，而且不少是优孟衣冠，缺少生气。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崔铣为撰墓志铭，安泓为撰《李空同先生年表》。《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

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武宗正德三年(1508),以言事谪亳州,未几改知商淳县。次年,召为监察御史,巡按陕西。正德九年,因得罪镇守中官,被诬下狱,寻谪赣榆丞。正德十一年,调任宁国知县。次年升为松江府同知,历四川佥事、山东提学副使、山东右布政使。后迁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世宗嘉靖七年(1528),提拔为兵部侍郎,进南兵部尚书。后拜右都御史,加兵部尚书。嘉靖二十年,因处理郭勋事不及时,革职为民。嘉靖二十三年,病卒。廷相为前七子之一,推崇李梦阳,为倡导复古之风起了推动作用。其诗擅长古体,能反映现实。《西山行》揭露中官横行不法的累累罪行,可谓淋漓尽致。《西京篇》讽刺漫求神仙的荒唐举动,颇有现实意义。其古体诗喜用排比,亦有一些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不过,其诗缺乏剪裁,有的论者讥其粗硬。著有《王氏家藏集》五十六卷、《内台集》七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一九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刘麟】(1474—1561) 字元瑞,一字子振,号南坦。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知绍兴府。以忤刘瑾,罢为民。寓居湖州,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结诗社,号为“苕溪五隐”。刘瑾被诛,起知西安府,历陕西参政、云南按察使,谢病归。召拜太仆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再引疾归。起大理卿,擢工部尚书。后因得罪群小,被勒令致仕;复以显陵殿阁雨漏,追论其失职而罢官。麟归隐湖州后,赋诗自娱。其诗作,意境清远,诗情恬淡,颇有韦应物之风。著有《刘清惠集》十二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一九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康海】(1475—1541) 字德涵,号对山,别署浒西山人、汧东渔父。武功(今属陕西)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弘治十六年,因母思之切,告假还故里。武宗正德元年(1506),奉母入京,纂修《实录》。正德二年,充经筵讲官。次年,为会试同考官,拔吕柟第一。时宦官刘瑾专政,欲招致之,海不往,会李梦阳下狱,乃往谒瑾说之,得释。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因名列瑾党而罢官,于世宗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已入1541年)卒于家。康海曾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等为文社,讨论文艺,互相唱和,为“前七子”。康海诗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多行旅应酬之作,其中写行旅见闻,颇有可取者,如《潼关早发》记述了运粮役夫的苦辛;晚期诗写于归隐之后,多为艳体,写其征歌逐酒之放浪生活,借以抒发不平之鸣,如《邀客》等。其论诗陈义甚高,《四溟诗话》记其答人问诗云:“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

也。”然其作品,如王世贞所云:“康源出秦汉,然粗率而弗工,有质木者可取耳。”(《艺苑卮言》)海罢官归里后,每与王九思等相聚汧东、鄠杜间,放情诗酒,以山水声伎相娱。尤善弹琵琶,擅弹按歌,连老乐工亦自愧不如。所著有《对山集》、《汧东乐府》,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王兰卿服信明贞烈》及《武功志》。另有《纳凉余兴》、《春游余录》、《即景余录》、《张氏族谱》等,皆不传。传附《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后。生平事迹又见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国朝献徵录》卷二一)、吕柟《康公墓表》(《泾野先生文集》卷三二)、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闲居集》卷一〇)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吴书荫 王学泰)

【边贡】(1476—1532) 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除太常博士,擢户科给事中。在京时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称“七子”,亦为当时“十才子”之一。孝宗去世之际以敢于弹劾权宦及权贵误国而有名于时。武宗正德(1506—1521)间,出为卫辉、荊州等地知府,升山西、河南提举副使,丁母忧归乡居丧。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用为南京太常少卿,迁太仆寺卿,改太常卿,提督四夷馆,拜南京户部尚书。贡少有才名,熟悉吏事,而在南京任上以日夜游览饮酒赋诗为事,遂为人所劾,去官。平生好收藏图书文玩,所储甚富,忽毁于火,仰天大哭,从此一病不起,遂卒。其诗名在当时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故后人又称四人为“弘治四杰”。诗多应制、酬赠之作,亦有不少关切现实、注意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描写了运河上船夫之苦辛;《筑桥怨》写太监之专横贪暴;《牵夫谣》写黄河上纤夫的哀怨。这些诗篇感情深厚、简短精练、醇厚质朴,颇似唐之张籍、王建乐府,但无模拟痕迹,实胜于李、何、徐三家。其律诗平淡和粹,亦有胜于梦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于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薛蕙善于用短,而夷犹于诸人之间”。此评语谓贡徘徊于诸家之后。亦有独许贡诗者,何良俊言:“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四友斋丛说》)著有《华泉集》十四卷。《明史》卷二八六、《明史稿》卷二七六并有传。(王学泰)

【顾璘】(1476—1545) 字华玉,号东桥居士。祖籍吴县(今江苏苏州),因上祖籍属工匠,明初徙居上元(今江苏南京)。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广平知县,敏于政务,颇有治声,被征入南京为吏部主

事,擢为郎中。武宗正德四年(1509),出为开封知府。因抵制宦官,曾下锦衣卫狱,释后贬为全州知府,有政绩,迁台州知府。在台州兴利除弊,肃贪倡廉,查出历年为官吏吞没之筑城费,用以加固台州城,减轻人民负担,并弛盐禁,给百姓带来许多方便。因功擢为浙江右参政。世宗嘉靖(1522—1566)初,升为山西按察使,因病告归。嘉靖九年(1530),复出为浙江布政使。两年后,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又以父老病告归。嘉靖十六年(1537),再度起用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在湖广平徭税,劝农桑,与民休息,并遍走各州郡,访问民情,多有建白。嘉靖十八年,擢为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升任为南京刑部尚书。罢官归,卒于家。璘一生为地方官吏,精于吏理,又勇于任事,所经之处,多有治绩,为百姓所拥戴。璘富有才情,在青年时与同里王韦、陈沂称“金陵三俊”,后又加朱应登称“金陵四大家”,在北京时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唱和,号称“十才子”。明自迁都北京后,以居京诗人为代表的北方诗风与以吴中诗人为代表的南方诗风有很大差别。璘力图沟通二者,所著《国宝新编》作十三诗人传,包括了李梦阳、何景明、祝允明、徐祯卿、朱应登、孙一元、都穆、唐寅等北、南双方有代表性的诗人。其诗以描写其为官作宦之生涯为主,从其诗中可见其所经之处的自然风光及风土民情,代表作有《初到全州》、《度枫木岭》、《灵隐寺》、《拟宫怨》等。其“诗矩矱唐人,才情烂然,格不尽古,而以风调胜”(《列朝诗集小传》)。晚岁家居,喜接宾客,文誉籍甚,执书问学者颇多。其论折衷南北,学与才并重,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有《顾华玉集》四十卷及《国宝新编》、《近言》等。文徵明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唐龙】(1477—1546) 字虞佐,号渔石。兰溪(今属浙江)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郟城知县。世宗嘉靖七年(1528),累官至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曾奏罢淮西官马种牛,罢寿州正阳关榷税及通、泰二州虚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嘉靖十一年,进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数败入侵者。后改刑部尚书,以母老乞归。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改吏部,坐事罢。卒谥文襄。其诗作擅长五言,以俊逸研练见长,如《子午岭》等即显示此特长。他重视炼词,因而诗中有不少佳句,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列举,“莺花边地少,风雨暮春多”,“云气雨中白,山光鸟外清”,“断湟春水浅,乱石晓山稠”,“赤峡青冥外,飞泉急雨中”等,皆有风致。著有《渔石集》四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〇二。

(尹恭弘)

【徐祯卿】(1479—1511) 字昌谷,又字昌国。本

琴川(今江苏常熟)人,后徙家吴县(今江苏苏州),遂占籍焉。天性聪颖,博学强记,家不蓄书,而无所不通。少时即与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并驰誉吴中,号称“吴中四才子”。颇有诗名,其名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文章烟月》)最为人所传诵。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大理寺副,请求外任,因失囚,贬为国子博士。在京期间,与北方诗派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来往甚密,互相交流论诗主张,为“前七子”之一。其论诗主情致,强调诗歌以情为源,因情动人,主张广泛学习历代佳作,辨识源流、体制,涵蕴融会,与时新变。其作品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指在吴期间,此期诗学白居易、刘禹锡,风情秀丽清逸,多用以表现吴中旖旎风光以及风流才子们的浪漫生活;后期指在朝期间,此期作品虽以唱酬之作为多,但也有不少讽刺政治现实的作品,如《杂谣》四首、《拟古宫词》七首等,王夫之曾赞美说:“居然高寄,自是昌谷本色。”(《明诗评选》)在京期间作品虽不能完全脱离江南才子之本色,但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如钱谦益所言:“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消。然而标格清妍,摘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佻父槎牙莽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列朝诗集小传》)。著有《迪功集》、《徐氏别稿》、《谈艺录》、《新倩籍》等。王守仁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徐缙】 字子容。吴县(今属江苏)人。主要活动在明孝宗弘治(1488—1505)、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兼学士。谥文敏。擅长五言诗,五律尤为突出,声调谐畅,属对工稳,如《春日忆李子》、《赠薛君采》、《冬夜与原德节夫燕集》、《送刘德徵之夔府》、《中秋日虎丘待月》等诗皆有这样特色。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云:“文敏五字诗,音节浏亮,颇近边华泉(贡)。”曾有集五卷,已佚,其作品有待辑佚整理。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许相卿】(1479—1557) 字伯台,号雲村,一字台仲,号九杞。海宁(今属浙江)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世宗嘉靖(1522—1566)初,授兵科给事中,频频上疏言事。宦官张锐、张忠有罪论死,帝欲宽之,许相卿上疏切谏。宦官张钦义子为锦衣世袭指挥,相卿言:于谦子止锦衣千户,王守仁子止锦衣百户,现宦官子反过之,忠勋大臣后裔不如幸奴,谁不解体?但所言皆不听,遂谢病归。居山中几四十年,累征不起。据《携李诗系》载,相卿“罢归,以盐邑紫雲村山水佳胜,移居村南茶磨山,剔石引泉,疏畦艺茗,时跨黄犊,短蓑高笠,二鹤自随,往来山谷

间。尝大雪上云岫绝顶赋诗,人望之以为神仙”。“又于永安湖买山,置杜曲冈、云涛庄,后人因名其山曰九杞”。相卿诗作多表现隐居生活的闲雅情怀。学诗不主一家,曾在《自题绝句》里说自己诗作“杂宋腔”。其作诗聊取适意,运笔疏朗,诗风清润。有《云村集》十四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〇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胡纘宗】(1480—1560) 字孝思,后改字世甫,号可泉,又号鸟鼠山人。秦安(今属甘肃)人。先世为陇西巨室,高祖胡钧时徙于秦安。少随父游于京师、四川,年二十游学西安,二十二岁中举,后被荐入国子监。在京期间,受知于李东阳、杨一清,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康海等人交游。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第,授翰林检讨,入史馆预修《孝宗实录》。后刘瑾被诛,案牵多人,纘宗因之被贬为嘉州判官,移守潼川,人为南京户、吏二部郎中,出知安庆府。安庆当兵燹之余,百废待兴。纘宗赴任之后抚流亡,缮城垣,革弊政,省徭役,兴水利,奖农桑,治道路,通商旅,多有惠政,受到当地百姓拥戴。移治苏州,在吴期间廉洁辨治,名与况钟颉颃。公余与吴中诗人觞咏留连,诗酒唱和。又历任山东、浙江、山西参政,擢为山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改理河道,上表弹奏骄奢纵恣、扰害吏民的鲁王,以安百姓。因治河有功,升任总理河道,主持开挖考城黄河支流,以减轻归德、睢州水患,遗惠后世。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巡抚河南,因开封官署大火,焚及敕符,引咎乞归。在乡以著述为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被奸人王联告讦,身陷诗狱,同案牵连者甚众,在狱中泰然自若,豪气不减,仍以吟咏为事,取锦衣狱中柱械之类,作制狱八景诗,为同案所答。胡笑曰:“坐诗当死,不作诗得免死耶?”幸赖大臣相救,得不死,杖四十,削职为民。出狱时,诗人谢榛赶往探视,贻之诗云:“白首全生逢圣主,青山何意见骚人。”纘宗棒疮创甚,犹呻吟作答。乡居期间写成《愿学编》。卒于家。纘宗处在前七子为代表的北方诗派与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吴中诗派创作活跃时期,却能摆脱依傍,自辟蹊径。其论诗注重《诗经》、汉魏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诗亦能关注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具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民穷财尽,日不聊生之情景,如:《偶成巴东》、《发眉州》、《发青神县》、《发罗江纪事》皆描写了四川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与人民的反抗;《怀杨殿撰三首》、《拟古杂诗十首》揭露了专制统治残暴,并抒发了诗人的愤慨。无怪朱彝尊云:“鸟鼠山人是诗直书其事,亦取祸之萌也。”(见《明诗综》)其诗风格清健悲壮,于当时独树一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其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声,是其所短。”其诗文收入《鸟鼠山人小集》、《鸟鼠山人后集》、《拟涯翁拟古乐府》、《拟汉乐府》等。另著有《愿学编》、《仪礼集注》、《春秋本义》、《读子录》、《近取编》、《安庆志》、《巩郡记》。编选了《汉音》、《魏音》、《唐雅》、《雍音》、《秦汉文》等书。何栋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〇二有传。(王学泰)

【沈琼莲】 约于明孝宗弘治(1488—1505)前后在世。字莹如,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一说字莹中,湖州人。父沈安、弟沈溥皆为举人。琼莲慧甚,博览经史,过目成诵,八岁口占协声律。十三岁被选入宫,为女秀才。历官女学士,卒于宫中。尝制《宫词》十首,与寄兄送弟诸律,世多传诵。人呼为沈阁老,亦称沈大姑。有《女阁老集》,著录于《乌程县志》。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五引《乌程县志》、李日华《书女学士沈大姑诗稿后》、《宫闱氏籍艺文考略》。

(陈祖美)

【齐之鸾】(1483—1534) 字瑞卿,号蓉川。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迁兵科左给事中。朱宸濠反,从张忠、张泰等南征,张忠、张泰广搜逆党,株引无辜,之鸾多所开释。世宗立,大计京官,被中伤,谪崇德丞,迁宁夏僉事。在任上,尝采饥民之蓬子献上,并上疏言时事可忧者三,可惜者四,剴切为时所称。后历河南、山东副使,擢河南按察使。卒于官。他是一位关心民瘼的诗人,常有忧时之作,如《三山暂驻》诗慨叹“土屋无完堵,饥人未尽还”,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笔力遒劲,较有气势。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蓉川入夏诸诗,山川险隘,诵之有如聚米,与尹金事耕并工,惜乎志边关者未之采录也。”陈田《明诗纪事》也认为,其“诗有蹶张之力,超距之勇,不屑屑于诗流派别,而句奇语重,可与当时名家各分一席”。著有《蓉川集》七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〇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何景明】(1483—1521) 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八岁能赋诗作文,被视为神童,十五岁中举人。轰动一时,其所经过,往往被人围观。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时宦官刘瑾当政,曾上书吏部尚书许进等,劝其抵制权宦,措词激烈,未被采用,遂告病还乡。次年,被免官。刘瑾失势后,由李东阳推荐,复原官。武宗正德(1506—1522)间,朝政昏乱,武宗仍然宠信宦官,将宦官钱能家奴钱宁收为义子,抽调边军入京。景明上疏云:“义子不能畜,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矛头直指皇帝,朝野为之震动。正德十一年(1516),擢为吏部员外郎,直制敕房,出为

陕西提学副使,曾痛殴在外欺压百姓及官吏的太监廖銮之家奴。在陕四年,以经术儒学诲诸生,因劳瘁过度,引疾归,至家六日卒。景明工诗,在京时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相唱和,号为“七子”,后世称为明前七子。七子中除去王廷相,增加朱应登、陈沂、郑善夫、顾璘四人,号称“十才子”。《明史》本传称其“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但景明因年辈较低,不似梦阳之傲睨一切,以文坛盟主自居。景明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李、何二人取法不同。《明史》言“梦阳主摹仿,景明主创造”,颇能道中两人的区别。梦阳学诗如临古帖,景明则强调“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与李空同论诗书》),并视所学对象皆为佛家所喻之筏,“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同上)。其作品与其诗论基本一致,注重才情,清俊浏亮。其古体诗中有不少揭露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以及人民痛苦的作品,表现出诗人的正义感,如:《岁晏行》描写人民处于饥寒仍要纳税服役;《玄明宫行》借描写刘瑾竭民力以造宫室,宫成而瑾败,欲求一丘土而不可得之事,以告诫炙手可热的权贵。其近体诗以摅怀写志为主。景明注重词藻音律的谐婉流畅之美,这在其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明月篇》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李梦阳讥景明诗“读之若抔沙弄泥,散而不莹,又粗者弗雅也”(《再与何氏书》)。后世评价景明诗者则以肯定者为多。宋徵舆云:“仲默直欲追踪《风》、《雅》,故微辞淡旨,以《三百篇》为则,其为汉、魏、六朝、初盛,不过因体以属词,存其形似耳。”(见《皇明诗统》)其诗文作品收入《大复集》,另撰有《雍大录》三十六卷。孟洋为撰墓志铭,李开先为作传。《明史》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孙一元】(1484—1520) 字太初,尝辞家人太白山,栖于山颠,因自号太白山人。自称秦人,或曰蜀人,亦有云其本安化王宗人,因王犯法被诛,故变姓名避难。一元风仪秀朗,踪迹奇谲,常着玄巾白袷,以铁笛鹤瓢自随。善饮酒,好谈论,喜吟诗,混游贵贱,所至颇能倾动士大夫。尝西入华山,南至衡山,东登泰山,又入吴中,遂居于此。明武宗正德(1506—1521)中,与刘麟、龙霓、陆崑、吴琬游,结诗社,合称“苕溪五隐”,又与闽中郑善夫交好。买田雪水,就婚施氏,生一女而卒。一元诗多为描写其游历及隐逸生活之作,如《致道观看七星桧树歌》、《幽居杂兴》(归卧茅檐下)、《避寇吴兴山中》、《西湖》、《独往》、《久雨书闷》等皆为其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一元才地超轶,其诗排翳凌厉,往往多悲壮激越之音。《静志居诗话》谓其瓣香在黄庭坚。体格固略相近,然庭坚之诗,沉思研练而入之,

故蟠拏崛强之势多;一元之诗,轩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气盛。其意境亦小殊也。”陈田亦云:“山人诗激宕处亦是摹杜,而练句练字,时出入于王摩诘、孟襄阳、岑嘉州诸公间。长歌气魄稍弱,律绝固是一时之秀。”(《明诗纪事》)其五律优于七律。有《太白山人漫稿》。李梦阳、祝允明皆作有《太白山人传》。《明史》卷二九八有传。

(王学泰)

【张含】 字愈光,号禺山。永昌(今云南保山)人。主要活动在明武宗正德(1506—1521)、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正德二年(1507)举人。布衣终身。杨慎谪滇,含与杨士云、王廷美、胡延禄、李元阳、唐铨皆与之游,人称“杨门六学士”。其诗中多赠答杨慎之作,有的写得精警圆美,如《己亥秋月寄杨升庵》,有的写得情意深长,如《忆升庵》。在诸体诗作中,律诗较优,但过于注重雕镂字句,有时不够妥帖自然。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其诗“如拙匠琢山,斧凿宛然”,实指出其弊之所在。有《禺山诗选》、《禺山七言律抄》,皆杨慎手自评鹭。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郑善夫】(1485—1523) 字继之,号少谷山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少有才名,善为古文词,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十举于乡,次年,登进士第。未任官,即与值中书者何景明诗文切磋,颇相得。与之往来交好者如王廷陈、薛蕙、顾璘、方豪等皆有诗名。不久,父母相接去世,归乡守丧。武宗正德六年(1511),始授户部广西司主事,出理吴中浒墅关税,以公正廉明闻。权宦刘瑾用事,力请告归,筑少谷草堂于金鳌峰下,作迟清亭以见志,岩居六载。正德十三年,起为礼部主事、进员外郎。因谏武帝南巡,被杖于廷,罚跪五日,寻复乞归。世宗嘉靖元年(1522),以都御史周季凤荐,起为南京刑部郎中,未上,转为吏部郎中。行抵建宁,便道游武夷,时值风雪,又绝粮,遂病卒。善夫继“闽中十子”之后,为福建又一位重要诗人。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皆学杜甫,写下不少忧国忧民之作,反映明中叶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如:《百忧行》用赋体历数全国各地兵乱民变,并揭示出由于奸邪当道、主昏臣佞使得局势更为严峻;《大水行》写大灾之后朝廷仍然诛求不已;《兵起》反映动乱之中百姓生命没有保障。还有少量作品揭露了皇帝的昏愤,如《大田篇》等。这类作品在孝宗弘治(1488—1505)、武宗正德(1506—1521)之际的诗坛显得十分突出,此期间代表作家“前七子”也很少有如此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这个特点已为稍后一些评论家所注意。王世贞言“郑继之诗如冰凌石骨,质劲不华”,“又如天宝父老谈丧乱,事皆实际,时时感慨”(《艺苑卮言》),指出了善夫诗在思想

内容与艺术风格上与杜甫相近之处。亦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林嫌在《福州府志·文苑传》中言及正德时期诗坛学杜倾向时云:“至善夫并袭其(指杜甫)意,时非天宝,地靡拾遗,殆无病而呻云。”对此,钱谦益云:“以毅皇帝时政观之,视天宝何如?犹曰无病呻吟,则为臣子者必将请东封、颂巡狩而后可乎?”(《列朝诗集小传》)四库馆臣亦云:“然武宗时阉竖内讧,盗贼外作,诗人蒿目,未可谓之无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两家皆对林说加以驳斥。王世贞谓“郑善夫得杜骨”(《艺苑卮言》),则未免评价过高。善夫学杜基本上是亦步亦趋,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有《少谷全集》,二十四卷。黄绾为作《少谷子传》,林钺为撰墓碑。《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王学泰)

【傅汝舟】一名丹,字木虚,号丁戊山人,又号磊老。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约生活在明武宗正德(1506—1521)、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十四岁诵黄帝姚姒之书。二十岁谢诸生,而通天官、堪舆、释典、老庄。少与高濂并游郑善夫之门。郑善夫十分器重他们,临死时,遗言说:“诗文妻子付高、傅二弟经理。”傅汝舟中岁以后好神仙,轻别妻孥,到处求仙访道,遍游吴会、荆湘、齐鲁、河雒之间。其诗多为游历山水、访仙求道之作。这类诗作往往表现其悠然自得的天然情趣。《列朝诗集小传》引徐渤语云:“汝舟诗虽师郑吏部(善夫),而天然之趣尤胜。如‘虽贫一榻能高卧,总老名山欲远寻’,‘焚香漫与僧来径,得句惟应弟倡酬’,‘郊原乱后飞磷火,村落年来变劫灰’,‘异书自得作者意,长剑不借时人看’,‘呼来鸂鶒添新侣,抛去鸂鶒省旧粮’……吏部当为却步矣。”著有《前丘生行己外篇》。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尹恭弘)

【蒋山卿】(1486—?)字子雲,号南泠。仪真(今属江苏)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至金陵访顾璘、朱应登、顾、朱教以汉、魏、晋、宋、唐人之诗。武宗正德九年(1514),登进士第,授工部主事。因谏武宗南巡,杖谪为南京前府都事。世宗嘉靖元年(1522),复官,迁刑部郎中,历守河南、浚州、南宁,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坐谗言罢。嘉靖二十七年(1548)作《宿休诗》,时年已六十三岁,仍在世,卒年已不可考。其诗开爽清婉,有一定个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论说:“子雲之诗,发源于金陵,成就于亳州,主于学唐,不为剿杜,其亦生于北郡之后,而不堕其云雾者欤?”有《南泠集》十二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一八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郑若庸】(1489—1577?)字中伯,号虚舟,又号蛭蛭生,耻谷生,人称虚舟山人。昆山(今属江苏)

人。诸生,三试落第,隐支硎山中,杜门为古文词赋。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游杭州,作《钱塘观潮赋》。嘉靖三十年,赵康王朱原煜闻其名,派使延聘入邳,挚友陆粲病中督其行。次年春,至彰德,与谢榛、吕时臣,同被奉为上宾。嘉靖三十三年冬,宫詹程文德(《康熙苏州府志》误为程敏政),冢宰李默,又迎至京师。因拒绝严嵩父子之邀请,寻返邳,应康王请,始纂《类隽》。嘉靖三十九年,赵康王死,去赵居清源,卖文为生。穆宗隆庆三年(1569),王锡爵为序诗文集《北游漫稿》。隆庆四年,胡迪辑其家居诸作成集,中伯自题为《蛭蛭集》,郑存仁为作序。神宗万历元年(1573),王世懋过访,若庸时年已八十有五。次年,王世贞为《类隽》作序,卒年盖在九十左右。著有《蛭蛭集》八卷、《北游漫稿》五卷,传奇《玉玦记》、《大节记》(佚)、散曲《虚舟词馀》一卷、《类隽》六十卷。另有《郑虚舟尺牍》二卷、《市隐园文纪》三卷,未见。事迹见詹玄象《蛭蛭生传》(见《蛭蛭集》卷首)、《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吴书荫)

【薛蕙】(1489—1541)字君采,号西原。亳州(今安徽亳县)人。年十二能诗。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不久,引疾归。后以故官再起,改吏部,累官至考功郎中。世宗嘉靖(1522—1566)初,大礼议起,蕙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及辨张璁、桂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忤旨下狱,不久贯出之,夺俸三月。又为陈洸所潜,遂解职归。其诗作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吐露自己因两次直言上书而受杖、下狱的愤恨之情,如《行路难》悲叹“可怜豪杰死道边,总为奸邪在君侧”,并描述了在“群小猜谗已横集”的情况下,一位志在四方的“男儿”,只能“白首徒怀经济策”;二是表现其远离朝政、甘居田园的恬淡胸怀,或写“丘园虽寂寞,悠然殊自适。徘徊弄文史,流连眷泉石”(《郊居作》)的郊居生活,或写“晚棹沿流急,春衣逐吹轻”(《泛舟》)的水面泛舟,或写“幽人已相候,隔水启荆扉”(《晚过邻叟》)的邻里往还,都充满了田园生活的情趣。其诗的主要风格是清削婉约,醇雅秀逸,只是有些篇章诗味欠浓。著有《考功集》十卷。生平见《明史》卷一九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李濂】(1489—?)字川甫,号嵩渚。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沔阳知州,迁宁波府同知,擢山西按察司僉事。世宗嘉靖五年(1526),免归,年方三十八。归田后四十余年乃卒。初受知于李梦阳,后不屑附和。濂反对摹拟,有绝句云:“唐人无选宋无诗,后进轻狂肆贬词。真趣盎然流肺腑,底须摹拟失神奇?”《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评其诗云：“《嵩渚集》，濂所自订，皆于七子之外自为一格，大抵笔锋踔厉，泉涌飚驰。而裁剪尚疏，不免才多之患。”其诗能自写情愫，近体诗优于古体诗，七言律诗又优于五言律诗。有《嵩渚集》一百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黄佐】(1490—1566) 字才伯。香山(今广东中山)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进上，选庶吉士，授编修。省亲归，除江西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闻母病致仕。家居九年后起编修兼司谏，累官至少詹事，与大学士夏言论河套事不合，不久罢归。归里后，日与诸生论道，学以程、朱为宗，学者称泰泉先生。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都是他的弟子。在其创作的诸体诗中，律绝较见情韵，论者言其诗“极得唐人格意”。如七律《彭城怀古》：“华发萧萧羁旅情，片帆冲雨过彭城。黄楼此日河声急，赤帝当年剑气横。魏阙自生千里草，长陵谁荐一杯羹。歌风台下休回首，惟有寒潮诉不平。”格高气劲，颇见工力。又如绝句《闻雁》：“潇湘水碧莓苔青，白雁掠云时一声。疏灯古壁照蓬鬓，江湖心事秋冥冥。”俊逸清秀，也见才情。其古体诗，稍嫌堆砌。著作甚丰，有二百六十餘卷，除《泰泉集》六十卷外，还有《乐书》等著作。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李玉英】约于明武宗至世宗(1506—1566)前后在世，锦衣卫千户李雄之女。李雄前妻、玉英生母留有一子三女。李雄继室仅有一子，残酷虐待玉英同母四姐弟。李雄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西征阵亡时，玉英弟承祖年仅十岁，后被继母毒死，姊被卖于豪家为婢，玉英则被诬告为奸淫不孝，被判死罪。她上疏奏辩，世宗察有冤情，遂为其昭雪。《明诗综》录其《送春》诗云：“柴门寂寂锁残春，满地榆钱不疗贫。云鬓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诗中寓有身世之悲。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玉英颇知典籍，年十六伶仃穷迫，作《送春》诗云。”事见《列朝诗集小传》。《醒世恒言》中《李玉英狱中讼冤》即衍此事。

(陈祖美)

【皇甫冲】(1490—1558) 字子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举乡荐，但一直到死也未能成进士。好骑射，通挟丸击毬、音乐博弈之戏，吴中文士与轻侠少年，咸推为渠帅。又好谈兵，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侵，焚掠京郊，因著《兵统》、《灭胡径》。嘉靖三十三年，目睹倭寇事急，于是著《枕戈杂言》。冲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俺答入侵时，他不但著兵书，而且写了长诗《顺义战》，热情歌颂了民众中奋起抵抗入侵者的英雄：“城邑不破

残，凡以二子庇”，并为他们“功高主不知，事往名亦坠”深表惋惜，因而发出“李广岂数奇，耿恭终弃置，斯理自古然，况乃居今世”的沉痛叹惜。与此相反，明朝军队却极其腐败，他在《袁抑之黄门防秋师还》里给予了有力揭露。其诗还对敢于直谏的官员表现了无限的崇敬，如《舟中读杨兵部疏》。这些诗作，是非分明，感情激烈。另外，还有不少抒发自我情怀的诗作，这些诗作写得较为雅淡，如在旅途中想起自己身世的《下邳》诗，就充满着功名无望的惆怅，而其赠答友朋的《过济宁怀周白川尚书》诗，又在惘然中生出一种清樽对月的闲适之情。曾著有《华阳集》六十卷，今已佚。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许宗鲁】(1490—1559) 字伯诚，一字东侯，号少华。咸宁(今属陕西)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选庶吉士，擢监察御史。世宗嘉靖(1522—1566)初，视湖广学政，以义倡士，楚风益振。后以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辽东。嘉靖三十一年(1552)，致仕归。归里后，构草堂，积图书，置酒赋诗。其诗婉丽秀俊，诸体诗中皆有上乘之作。如五古《寒夜怀皇甫世庸》，字句严飏，篇章方整。又如七律《功德寺》，位置匀稳，首尾妥帖，尽管不够含蓄，但爽朗可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诗“诸体皆工，寓和婉于悲壮之中，譬之秦筝，独无西气，足与边廷实(贡)、王子衡(廷相)并驱。”陈田《明诗纪事》甚至认为：“东侯固是关中之俊，音亮气遒，对山(康海)、溪陂(王九思)皆在下风。”著有《少华山人集》五十二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马汝驥】(1493—1543) 字仲房，号西玄。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以谏武宗南巡，被杖，出知泽州。世宗即位，又召还为翰林编修，历修撰、南北国子司业、南京国子祭酒，升礼部右侍郎。一生清廉，死无以为殓，属吏醵钱为办丧事。溢文简。汝驥诗“镂金错彩，颇极璀璨之观，惟少变化”(陈田《明诗纪事》)，如《驾幸西坛》即如此。诗作颇为华整，但缺少情性，从《芭蕉园》诗可见一斑。总之，汝驥刻意为诗，但成就不太高。著有《西玄集》八卷。生平见《明史》卷一七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王讴】字舜夫。白水(今属陕西)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工部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历山西佥事。以疾归卒，年仅三十六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较全面评论了其诗的优缺点，谓：“舜夫风神散朗，负气任侠，有高才而无贵仕，故多烦促噍杀之音。五言隐秀，时可寻味；七言专力学杜；古体多率易而乖音节；今体每缠绵而乏神理。然其视关

中同时许伯诚(宗鲁)、马仲房(汝骥)之伦,则已超乘而上矣。”曾著有《彭衙集》九卷,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敖英】字子发。清江(今属江西)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除南工部主事,历礼部郎中,出为陕西提学副使,改河南,进四川布政使。英反对晦涩文风,曾在《绿雪亭杂言》中说:“近见一种文家,险涩其语以为奇,僻怪其字以为古,隐晦其意以为深,突兀其体以为高,盖以盘庚为古文之鼻祖,而浅视《史记》、《汉书》,以樊绍述为古文之宗子,而下视韩、柳、欧、苏,鲸吞鳌扑,牛鬼蛇神,瑶翻碧艳,鬼眼倾耳,挥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因此,其作诗追求自然清新,感情明显在诗中跳荡。在当时颇有诗名,人称敖清江,但其诗含蓄稍嫌不足。著有《心远堂稿》,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陆粲】(1494—1552)字子余,一字浚明,号贞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年十四,选隶校官弟子,与兄焕、弟采,自相师友,时人称为“三凤”。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补工科给事中,嘉靖八年,以疏斥张璁、桂萼专权,谪贵州都匀驿丞。嘉靖十年,迁江西永新知县。嘉靖十三年,念母老乞归。里居十八载,卒于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入公元1552年)。粲曾师王鏊,研心经史,善为文章。黄宗羲云:“贞山文秀美平顺,不起波澜,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欧阳氏之支流。”(《明文海》)其诗篇什不多,独出机杼,不落窠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忆父》诗一首,《明诗综》云七岁所作,然风格老成,不应至是,疑或有所夸饰。至于《担夫谣》之类,有香山新乐府遗音。《赠别王直夫》二首之类,亦绰有风格。著有《陆子余集》八卷,及《左传附注》、《春秋胡氏传辩疑》、《左氏春秋镌》等。《明史》卷二〇八有传。生平事迹又见尹台《陆公墓志铭》、黄佐《陆公墓表》、徐明行《陆公传》、彭年《陆公行状》(均附于陆氏诗文集后)。(吴书荫)

【金銓】(1494—1583)銓,一作“鸾”,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游宦,侨居南京。性俊朗,好游任侠,喜结交四方豪士,往来淮扬两浙间。早年,曾从天水胡纘宗学制科业,及来金陵,家道中落,科举不第,遂弃举业,学为歌诗。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冯惟敏至南京,过访金銓,赠以[黄钟醉花阴]《酬金白屿》,恨相知之晚。穆宗隆庆二年(1568),欧大任赴南京参预修纂《实录》,与銓、邢一凤、许穀、盛时泰等时相宴集。隆庆五年,銓与张献翼、王寅、梅鼎祚等入清溪社。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秋,梅鼎祚“以调宫徵字阴阳相质难”(《陇西

金隐君銓》),此时銓年已九十。寻卒,沈明臣《挽金在衡》诗有“一代词人九十翁”句。钱谦益称其“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称“其五、七言近体,风情朗润”(《静志居诗话》)。銓精于音律,尤擅长散曲。何良俊云:“南都自徐髯仙后,惟金在衡最为知音。善填词,其嘲调小曲极妙,每诵一篇,令人绝倒。”(《四友斋丛说》卷三七)著有《徙倚轩诗集》一卷、《萧爽斋乐府》二卷及《摄山栖霞寺志》。其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吴书荫)

【张本】(1494—?)字斯值,晚号五湖漫士。吴之东洞庭山(今江苏吴县)人。王鏊以退傅家居,本从其学古文。尝读书福济观,赋《九月梅花》诗,都穆十分欣赏,就之晤语,赋诗赠之。本布衣终身。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作《七十自寿》诗,其时仍在世上。卒年已不详。本擅长以感情化、动态化的诗句描写自然景观,如《秋夜登阊门城楼》、《新春雨后石湖漫兴》、《虎丘秋夜》、《雨阻天池寺》写诗作皆具有这样特色。在诸体诗作中,最善于五律,写得清雅圆润。陈田《明诗纪事》谓其“五言格、意俱高”。黄姬水、张献翼共定其诗,曰《五湖漫稿》,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谢榛】(1495—1575)字茂榛,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老人。临清(今属山东)人。少时即能度曲、作乐府商调,临清德州一带少年争歌之。为人性格豪爽,喜游侠,好交游,长而折节向学,刻意为诗歌,以诗名于时。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曾到彰德(今河南安阳)游历,受到藩王赵康王礼遇。后游京师,援救陷入冤狱的才士卢柟,为士论所称誉。在京期间,与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结为诗社。榛年最长,以布衣为此“七子”之领袖。后李攀龙声誉日高,与榛论诗主张有异,遂加以排挤,与之绝交,并作人身攻击。榛眇一目,攀龙言“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将其挤出“七子”之列,而榛诗名益高,交游益广,陕西、山西一带藩王争相邀请,遂游诸藩王之间,以在赵王府最久。神宗万历元年(1573),再次至彰德,赵康王曾孙穆王为其刻印全集。榛为作《竹枝词》十四首,穆王令宫姬贾氏演唱,后又将贾嫁与谢榛。榛载贾姬游河北各地,至河北大名,有人请写寿诗一百首,榛写至八十餘首,投笔而逝。榛对诗歌创作有自己之主张,“七子”结社之时,诸子对于唐诗名家感到无可适从,榛言:“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见《列朝诗集小传》)诸人心师其言。其论诗,主张“文随世变”,虽主

复古,但又认为“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学古注重气格;新变则强调意象、兴会、妙悟。在明代复古派诗论家中颇有创意。榛以布衣游于王侯卿相之间,其诗多为酬对投赠之作,有些就是适于歌儿舞女之口,点缀于歌筵舞宴的宫词艳曲,如《秋宫词》等。其诗中亦有不少抒发自己沉沦不偶、事业无成的感慨,如《暮秋即事》、《宿淇门驿有怀》等。还有许多记游、记行和表达作者对国事关切的作品,如《渡黄河》、《赴石门峡》、《居庸关》、《晚眺》、《野兴》、《榆河晓发》、《哀江南》八首等。此类作品大多写得意境深厚、雄浑沉练。工于近体。其诗法度森严句响字稳,气逸调高。其五律学习杜甫,尤为逼真,只是缺少独创性。著有《四溟诗话》。其诗收入《四溟山人集》。《明史》卷二八七、《明史稿》卷二六八皆有传。

(王学泰)

【黎民表】字惟敬,号瑶石山人。从化(今属广东)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授翰林孔目,转为吏部司务。执政知其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擢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改户部,进郎中,出为河南参议。神宗万历(1573—1620)中,致仕。民表为人胸怀坦荡,工书画,好读书。其诗先与梁有誉、欧大任齐名,为岭南著名诗人。进京后,受王世贞等人影响,又与王道行、石星、朱多炏、赵用贤并称“续五子”。其诗多为登临记游、酬酢赠答之作,如《出郭十里望白云山》、《登泰山作》、《香炉峡》皆其代表作。民表虽受到“后七子”复古诗风的影响,注重风华兴象,但又有岭南诗人沉着质实之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风骨典重”,朱彝尊《明诗综》称其诗“沉着坚韧”,皆指出其不同于李、王之处。近人陈田则谓朱所云“沉着坚韧”,“此第论五古一体耳。集中五律,精深华妙,七律风调流美。五绝清微淡远”(《明诗纪事》),各有造诣。著有《瑶石山人稿》、《清泉精舍小志》及《北游稿》、《谕后语录》、《养生杂录》等。《明史》卷一八一有传。

(王学泰)

【皇甫湜】(1497—1546)字子安,号少玄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皇甫冲大弟。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历仪制员外郎、主客郎中。在仪制任上,夏言为尚书,连疏请建储,皆皇甫湜起草,故夏言深知皇甫湜才能,荐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言者论其致官有私,贬谪为广平府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迁浙江佥事。后又以南曹事论罢,悒悒发病卒。湜居官砥厉廉隅,然颇操切,多忤物,数被谗谤,又自负高峻,故在仕途上屡蹶不达。其诗往往触景生发哀怨,如《秋夜忆山中》即渲染了这种情绪。“残”、“空”、“孤”、“衰”这些字眼,为他的诗作所反复咏叹,如:“溪前压寒色,浪

里流残阴,兀坐但羈影,空看沙际禽”(《书感》);“微生不偶世,孤拙恒自将”(《观石梁夜宿万年寺述游寄伯氏子循子约三弟周山人》);“后湖衰草色,空对汉宫仪”(《有怀乔白岩司马》)。湜擅长五言,善于情景交融,如《雨宿桐岩岭》、《登云峰最高顶》、《入舟》、《夕泛遣思》、《之昆邑道中书怀》等诗作,皆有这一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则宪章汉、魏,取材六朝,古体多于近体,五言多于七言……要其婉丽之词、绵邈之神,以骖驾昌谷(徐祯卿)、苏门(高叔嗣),固无愧色也”。著有《少玄集》三十六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华察】(1497—1574)字子潜,号鸿山。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进士,与吴人陆粲、袁袁、屠应峻同馆,并有才名,选庶吉士,为当轴者所不悦,出为户部主事,进车驾郎中,再召入,为翰林修撰,迁侍读学士,掌南院,以给事御史论罢。家本素封,罢官里居,修其业而息之。其诗多表现其逃避尘世、归居田园的恬淡情怀,往往能刊洗浮华,写得简远清淡,如:“天高宿雾尽,木落空山秋”(《山台晓望怀仅初不至和姚山人韵》);“疏钟隔云渡,残叶映泉流”(《惠山寺与子羽话别》);“寒照隐城树,苍烟深壁梦”(《与仅初再过任大理别墅》)。王慎中在为其集所作序中谓其诗“意象之超越、音韵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独契冥滓,若木居草茹,隐遁栖息者之所为言,非世人语也”。龚用卿也认为其诗“冲淡闲旷,如秋水芙蓉,不事雕琢,步骤陶、韦而得自在”(转引自《明诗纪事》)。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今属四川)人,工部尚书黄珂女,翰林修撰杨慎继室。博通经史,工笔札,能诗词,散曲尤有名。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慎以直言极谏被谪戍云南永昌。嘉靖五年,黄峨诣杨慎戍所。杨慎父卒,黄偕杨奔丧毕,杨还戍所,黄峨流居新都,理家政。由是二人鱼雁往还,其寄夫之诗、词为艺林传诵。杨慎亦云:“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杨有答妇诗,又别和三词,皆不及黄峨所作凄惋感人。卒于穆宗隆庆三年,年七十二。有《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曲》三卷、《杨夫人乐府》四卷、《杨夫人词馀》五卷、《锦字书》一卷。生平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历代妇女著作考》。

(陈祖美)

【文彭】(1498—1573)字寿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岁贡生就任秀水训导。穆宗隆庆二年(1568),升任国子监博士。彭为文徵明子,其诗风与文徵明有类似之处,笔力洒

脱,音节清亮,多为写景抒怀之作。其诗的缺点是时有浅显直露的现象,成就不如其父。有《博士集》二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卢柟】字少樛,一字子木。涪县(今河南浚县)人。主要生活在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以贵为国学生,博闻强识,负才忤县令,县令诬以杀人,榜掠论死。系狱数年。谢榛走京师,为称冤,适陆光祖代为县令,才平反其冤狱。后遍游吴会,落魄病酒而卒。柟诬下狱的生活经历,是其诗歌咏的主要题材。如《系狱敬呈王大怀侍御、李复斋工部丈六十韵》、《狱夜书愁敬呈吴少槐吏部》、《书怀投李篁台外傅》、《狱结后书情呈王龙池二府》等长篇都是写身陷囹圄的凄苦。曾与谢榛论诗言:“格贵雄浑,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耶?刻削有伤元气尔。”(《四溟诗话》)柟诗则才气横放,词情回荡,并无拘挛局促之态。即使是近体诗,也写得圆润、自然。陈子龙《明诗选》认为其诗“排荡自喜,有越石清刚之气。”《醒世恒言》之《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即敷演其事。著有《螻蛄集》五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皇甫汈】(1498—1583)字子循,号百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皇甫冲的二弟。七岁能诗。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进上,历工部虞衡司郎中。名动公卿,严嵩等人皆引与酬和。因监运陵石稽缓,贬为黄州府推官。嘉靖十八年抵黄州时,作《赤壁赋》。累官至南京吏部稽勋郎中,再贬为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升云南按察司佥事,以计典论黜。罢官后,复为人所窘,几破其家。其为人和易,不修边幅,近声色,好狎游,而不能通知户外事,以故数困,然信心而行,以诗文自娱,行游湖山之间,撷芬采和,以老寿终其天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子循少与伯仲氏及中表二黄(鲁曾、省曾)称诗,掉鞅词苑五十馀年。其在燕中,则有高叔嗣、王慎中、唐顺之、陈束。在留署,则有蔡汝楠、许穀、王廷幹、施峻、侯一元、中山徐京。再赴阙下,则有谢榛、李攀龙、王世贞。而谪楚,则交王廷陈。迁滇,则交杨慎。咸相与上下其议论,疏通其音律。”其诗甚多游览名胜之作。有的名胜引起诗人对往古的追忆,如《临高台》;有的景观引起诗人哲理的沉思,如《白云山》。另有不少赠答朋友之作,或写怀念,或写送行,都写得婉雅闲旷。擅长五言,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言,其诗“清音藻思,五言整于小谢,五律隽于中唐,清真朗润,妙绝时人。”著有《司勋集》六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一字九一,号东沙。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

进士,授南兵部主事,改礼部,历员外、郎中。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历福建参政、云南按察使、山东、河南布政使,以佾都御史巡抚四川、江西。入为南刑部侍郎,改兵部,进尚书。因倭寇入侵,勒令致仕。归里后,精心撰著。家有别墅,时引上客觞咏其间。其乐府诗,不摹拟古人,颇有新构,深受时人推许。如《子夜歌》抒写恋情,清新动人。又如《关山月》表现豪情,悲壮凝重。其五律诗也较有特色,写得宛倩丽逸,有初唐风范。其他诗体较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七言近体,粗坳芜秽,若出两手”。著有《芝园定集》五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〇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祖上世代书香,至父辈家境败落,贩布为商。自幼敏慧,博极群书,以文名著于乡里。但科举则屡屡失利,中年后补岁贡生。后迫于家贫母老,为长兴县丞,不久辞去。又一度任荆府纪善。晚年归乡,贫老以终。一般认为,长篇神话通俗小说《西游记》为吴承恩所独力创作。此书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采用民间传说,借神鬼之事以“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禹鼎志序》)。承恩一生诗、文创作数量很多,曾与文徵明、王宠诗酒唱和,晚年与陈耀文、邵元哲等为翰墨交。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诗、文已散佚。其诗发诸胸臆,独运匠心,如陈文烛所云,“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长篇歌行疏旷豪放。词作则清雅流利。其诗、文存者,有明人编《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今人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其传奇小说有《禹鼎志》,已佚。其词集有《花草新编》,存残抄本。其生平事迹见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明天启年间《淮安府志》、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及今人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苏兴《吴承恩年谱》、苏兴《吴承恩小传》等。

(顾青)

【顾梦圭】(1500—1559)字武祥,号雍里。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勋司主事,迁验封司郎中。擢广东布政司参议。海北有平江、青莺、杨梅、乐民四珠池,诏书督采甚急,民不堪劳役。梦圭于嘉靖十七年疏请停止采珠,因世宗不听,作《采珠叹》长诗以志慨。寻迁江西左参议。丁父忧。服除,升山东按察司副使,改提学河南。升福建布政司左参政,本省按察使。擢江西右布政使,赴任行至建宁,病作,上疏乞致仕,归时年四十馀。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已入公元1559年),年五十

九,封中奉大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文“皆平正通达,直抒胸臆,无钩章棘句之习。惟诗有捶字未坚,盖当有明中叶,风气初更,学问移于姚江,而文章未移于北地,犹沿长沙旧习也”。著有《北海》、《齐梁》、《武平》、《还山》诸稿及《就正编》、《疣赘录》等,后经其手定,合刻为《疣赘录》九卷、《续录》二卷。散曲作品存《南词韵选》中。生平事迹见归有光《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政仕雍里顾公权厝志》(《震川先生集》卷二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吴书荫)

【文嘉】(1501—1583) 字休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之子,文彭之弟。曾以岁贡生授乌程训导,后迁和州学正。其一生主要从事文艺活动,吟诗、作画。明世宗嘉靖元年(1527),随父访金陵嘉善寺,刻诗竹上。嘉靖八年,与华云、袁表同游宜兴。嘉靖二十三年,追记宜兴旧游小景,辑《二洞纪游册》。嘉靖二十七年,自以长诗题其所作《雪林钟馗图》。嘉靖三十四年,和吴承恩《帝京乐》诗。穆宗隆庆二年(1568),其所编《钤山堂书画记》刊行。其诗多为自然山水以及题画之作,并借此抒发其恬淡情怀,风格清雅和润。著有《和州集》一卷,为其子文梦珠所搜辑。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高叔嗣】(1501—1537) 字子业,号苏门山人。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少有才华,年十六作《抒情赋》几万言,见者惊异。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谢病归。再出为山西左参政,迁湖广按察使。卒年仅三十七岁。其诗主要为自己高材遭忌、身染多病、客居他乡、友朋贬谪而嗟叹悲歌。诗中感慨“世情堪叹息,身计任蹉跎”(《简子阳廷评》);抱憾“俱为轩冕误”,“忧馀有多言”(《简袁永之狱中》)。因其多病,其抒写的情怀就更为凄楚。叔嗣常年在外,每有沦落之感,如:“我生岂断梗,逐年任飘沦”(《量移湖南用文谷韵》)。对友朋贬谪,也多发悲叹之辞。总之,其诗多悲吟、哀歌。但风格淡雅清旷。其风格形成,有一个过程。其少时受知于李梦阳,但并未宗主其诗风。他认为“本非所长,而强力慕之,度必取訕于众”(《读书园稿自叙》)。他既是一位抒发主观情思的诗人,为了更好地表达“上睹日月之易迈,下悼齿发之将衰”(《考功稿》)所流露出来的感情,需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情思的方式,这是他要走与李梦阳相异道路的内在因素。其诗中较好作品,能做到表面淡雅,中自丰腴,情韵也较深长。当时论者称其诗为“本朝第一”,未免过誉。但其所表达的悲叹情思往往是封建社会许多知识官僚所会遭遇到的,因而能引起共鸣,受到推

崇。著有《苏门集》八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袁表】(1502—1547) 字永之,号胥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会有诏翰林官并除郎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任未久,兵部火,下诏狱,谪戍潮州。会赦归,以荐起补南职方员外郎,出为广西提学僉事。不久,移疾乞休。归里后,读书横山别业,著《皇明献实》、《吴中人物志》,甫脱稿而卒,年四十六。其诗作清婉朗爽,五律尤优,惟不够含蓄,较为直露。著有《胥台先生集》二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胡汝嘉】 字懋礼,一字沁南,号秋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言事忤执政,出官河南沁阳。其诗善于借景抒怀,写得亲切动人,如《沁桥行》、《王屋山歌》等皆具有这样特色。著有《沁南稿》、《倩园集》,今均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廖希颜】 字叔愚。茶陵(今属湖南)人。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除高安知县。召为工部主事,历郎中。又出为山西提学副使,迁浙江按察使。其诗才俊爽,尤擅七律,或写景,景中有情绪的宣泄,如《立夏》;或写情,情必有景观的烘托,如《次韵答澄江宪伯》。这些诗皆写得词格轩昂,词采清雅。曾著有《思复堂稿》四卷,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李开先】(1502—1586) 字伯华,号中麓,中麓子,亦称中麓山人。章丘(今属山东)人。幼聪颖,七岁能属文,知声律吟咏之学。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户部云南司主事,调吏部考功司主事,升考功司员外郎,历稽勋司郎中、验封司郎中、文选司郎中,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因性素伉直,不善事权贵,为权臣夏言等所忌恨;嘉靖二十年,会九庙灾,四品以上大臣,例应自陈乞休,遂借机将其罢官。不再起用,以闲居终老。开先与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吕高诗歌唱和,称为“嘉靖八才子”。壮年归田,时时以其抑郁不平之状发之于诗。其诗不满“前七子”的拟古风气,清新自然,不事雕琢,“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列朝诗集小传》)。其诗感时伤世,较有现实意义,如《悯农》、《平阳哀》、《边事》、《夏日闻倭报》、《边报行》、《闻倭寇杀伤山东民兵》、《地震》、《忧时事》等,皆属此类作品。但诗的艺术性不够强,缺乏锤炼,诗味较少。家藏词曲极富,有“词山曲海”之称,尤好为金、元乐府。所撰《宝剑记》,享誉剧坛,为嘉靖时著名曲家。著有《闲居集》十二卷,传奇《宝剑

记》、《登坛记》(佚),院本《一笑散》六种(今存《园林午梦》、《打哑禅》),散曲《中麓小令》;还有《词谑》、《画品》及《诗禅》等,今人路工辑为《李开先集》。《明史》卷二八七有传。事迹又见殷士儋《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李开先墓志铭》(《国朝献徵录》卷一七)、《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书荫 尹恭弘)

【唐顺之】(1507—1560) 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授兵部主事,改吏部,再改翰林院编修,历右春坊司谏。上疏请朝东宫,夺职为民。嘉靖三十三年,起任职方郎中,视师浙江,屡破倭寇。超拜金都御史,巡抚淮扬,力疾度焦山,至南通州而卒。顺之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学者称为荆川先生。熹宗天启(1621—1627)中,追谥襄文。其主要创作成就是散文,但也能诗。诗学初唐,在当时颇能自成一格,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说:“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束)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诗风丽雅圆润。著有《荆川集》十二卷,编有《文编》六十四卷。其生平见《昆陵人品记》卷九、《皇明书》卷三八、《名山藏林记》卷二一、《明史》卷二〇五、《明儒学案》卷六、《畴人传》卷三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

(尹恭弘)

【皇甫濂】(1508—1564) 字子约,一字道隆,号理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皇甫冲的三弟。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工部主事。嘉靖二十六年,监惜薪厂,因究治勾结官吏的奸商,贬为河南左政司理问,迁兴化同知。后改官福建,不赴职还。里居数年,闲居散斋,不通宾客。少学琴于雲间张氏,晚更精诣。又皈依释氏,从名僧检经说难,多所撰述。其诗善于描写幽绝的景观,以表达其冲淡闲旷之情。诗作也善于言情,其悼念儿子的二首诗作,颇受推崇。总的看来,其诗不够精警,成就不如其三位兄长。曾著有《水部集》二十卷,今已佚。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王慎中】(1509—1559) 字道思,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晋江(今属福建)人。幼聪慧,四岁即能诵诗。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成进士,年方十八岁,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主事。时四方名士唐顺之、李开先、赵时春、熊过等都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问大进,时人有“嘉靖八才子”之誉。大学士张璁欲见,辞不赴。后稍移为吏部郎中,因忌者谗言而谪为常州通判。累官至河南参政,又因忤大学士夏言而落职。慎中壮年遭废弃,益肆力于古文,当时

问业者踵至。卒年五十一岁。慎中为唐宋派作家之一,主要创作成就在散文。但其前期诗作,也写得清丽淡雅,颇见功力,如《登江东城楼》:“花片飞飞柳色深,登楼一倍搅乡心。长堤烟草迷人去,远寺斜阳带磬沉。江水无风时起浪,春云不雨每成阴。踌躇满日谁相会,惆怅前林怅翼禽。”其后期诗作,搀杂讲学,信笔自放,过多地以议论入诗,成就不如前期诗作。著有《遵岩集》四十卷。其生平见王惟中撰《王先生行状》(《国朝献徵录》卷九二)、《名山藏》卷八一、《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

(尹恭弘)

【黄姬水】(1509—1574) 字淳甫,亦作淳父。吴县(今属江苏)人。五岳山人黄省曾子。幼聪颖,父出入必携之俱,有所占属,每令同赋。年十四,补邑诸生。性至孝,哭父母积哀成疾,遂弃诸生。家道中落,甘贫自守,力却赠遗,曾作《贫士传》以见志。嘉靖三十四年(1555),避倭寇徙家金陵。与朱日藩、何良俊、金大舆、盛时泰、顾应祥、文伯仁等宴集唱酬;服膺杨慎,曾与上述诸同好集会,赋《人日草堂诗》一卷,寄赠杨氏,其时慎已先死。嘉靖三十九年,返故里,虽家徒四壁,但愈益喜法书名画;编订金陵所作诗为《白下集》。姬水工诗,学书法于祝允明,传其笔法。王世贞评其诗云:“始务以清丽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趋淡辞雅调,晚节益自喜为工语,东南诸诗人,不能先淳父而指屈也。”(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云“黄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纠,才色既自可观,时出俊语,为客所赏”(《艺苑卮言》),则褒中寓有贬意。著有《白下集》十一卷、《高素斋集》二十九卷,钱谦益谓“托寓凄婉,人以《白下》为最胜云”(《列朝诗集小传》)。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其婿顾大思哀此二集及未刊稿并梓之,题为《黄淳父集》,凡二十四卷。事迹见冯时可《黄淳父姬水传》(《国朝献徵录》卷一一五)、《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吴书荫)

【李先芳】(1511—1594) 字伯承,号北山。濮州(今山东濮县)人。年十六,美如冠玉,会选良家子尚公主,名在籍中,寻罢归。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除新喻知县。征授户部主事,改刑部,历郎中。再改尚宝司丞,进少卿。因傲睨御史,后被外贬为亳州同知。在任上,又奴视僚属,罢归。家故多资,壮年罢官后,又精于计算,家益起。于是,大构园亭,广蓄声伎,优游林下,享文酒声伎之奉四十余年,年八十四岁而卒。其诗风和粹淡雅,从《夜渡清江》可见其一斑:“闻橹那能睡,倒衣时扣舷。虫声悲野草,渔网集潭烟。江涨晚来急,月明秋可怜。一为山县吏,夜夜带星还。”但其诗缺乏风骨,缺少研炼,

也少诗味,其未能进入七子之列,并非无因。著作甚丰,除诗文集《东岱山房稿》三十卷外,还有《折衷录》、《蓬玄杂录》、《五岳志略》、《阐微录》、《安攘新编》、《拾翠轩杂纂》。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冯惟敏】(1511—1580?) 字汝行,号海浮,亦称海浮山人。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贵州按察副使裕三子,生于晋州官舍,随父宦游南京、平凉、石阡等地。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裕致仕,从归里,时已二十四岁。嘉靖十六年,举乡试;明年,会试落第。嘉靖三十七年,山东巡抚段顾言,贪虐无厌,惟敏亦受其害,被逮至历下,久之乃解,愤作《七歌》诗。嘉靖四十一年,入京谒选,授涑水知县。寻,解官归。嘉靖四十四年,改镇江府学教授。次年,至南京,与金銮、许穀、邢一凤诸人会;刊刻所著曲集《山堂辑稿》及《海浮山堂词稿》,自为序。穆宗隆庆元年(1567),应聘典云南乡试。隆庆三年,自镇江任调保定通判,在任,奉檄修府志,集杨继盛遗文行世,陈郡利害十六事。隆庆六年,左迁鲁王府属官,不赴,去官回临朐。构即江南亭于冶源别业,日邀朋辈觞咏其上。神宗万历六年(1578),撰《清江引》《戊寅试笔》,已六十八岁,尚在世。惟敏以曲名世,其散曲豪放洒脱,直抒胸臆,多愤世讥时之作。诗文亦见称于时,与兄惟健、惟重及弟惟讷,称“临朐四冯”。《列朝诗集小传》谓其“诗虽未功,亦齐鲁间一才人也”。著有《石门集》、《冯海浮集》各一卷(后者收入《盛明百家诗》);散曲,经后人增为《海浮山堂词稿》四卷,今有点校本行世,杂剧《不伏老》、《僧尼共犯》两种,分别收入《盛明杂剧二集》和《孤本元明杂剧》中。其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维桢《冯氏家传》(《大泌山房集》卷六五)及今人郑骞《冯惟敏及其著述》(《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又收入《景午丛编》下集,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版)。(吴书荫)

【冯惟讷】(1513—1572) 字汝言,号少洲。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生于安徽萧县。贵州(《明史》误为云南)按察副使裕四子。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宜兴令,历官魏县令、维扬丞、南京户部员外郎,补北驾部,出为陕西佥事,升河南右参议。嘉靖三十七年,所编《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刊行,张四维作序。嘉靖四十一年,擢浙江提学副使。次年,迁山西右参政、省按察使。为官清廉无私,三晋号为“神君”。嘉靖四十五年,升陕西右布政使。穆宗隆庆二年(1568),转江西左布政使。隆庆五年,入觐,进光禄寺卿,致仕。明年,卒于家,年六十。惟讷仕宦三十余年,除图书诗卷外无长物。工诗文,余继登称其“文章温淳尔雅,古诗诗取则建安,近体在天宝、

大历之间”。钱谦益云:“评其诗者,以为博洽多记,自出为鲜。”(《列朝诗集小传》)所著有《冯光禄诗集》,未见,今存《光禄集》一卷(见《冯氏五先生集》)、《冯少州集》一卷(见《盛明百家诗》前编)。另有《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及《风雅广逸》、《楚辞旁注》、《唐诗纪》、《唐音翼》、《杜诗删注》、《选诗约注》、《文献通考纂要》等。事迹见《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及余继登《光禄寺卿冯公惟讷墓志》(《淡然轩集》卷六)、李维桢《冯氏家传》(《大泌山房集》卷六五)。

(吴书荫)

【俞允文】(1513—1579) 初名允执,后更名允文,字仲蔚。昆山(今属江苏)人。少有文名,年十五,为《马鞍山赋》,长老皆推逊之。虽补郡庠弟子员,但不好举子业,唯喜读古文辞及临摹法书。作诗模拟古人,以魏、晋为法。尚书刘麟、参议张寰等结湖南雅社,推允文为上客。与王世贞相交最善,被列为“广五子”之首。世贞“称其五言古诗,气调殊不卑,所乏精思耳”,又言其“于今诗不满李于鳞,于书不满怀素,于古人不满意郭有道,盖仲蔚之持论,不苟为同异如此”(见《列朝诗集小传》)。有《仲蔚先生集》二十四卷。《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事迹见王世贞《明故处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铭》、顾章志《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均附于集后)。(吴书荫)

【吴维岳】(1514—1569) 字峻伯,号霁寰。孝丰(今浙江安吉)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江阴知县,征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改兵部,出为山东督学副使,历湖广参议、江西按察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其诗顺畅清新,五律尤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有“岑嘉州、张司业风格”,并举其“清飙凉带叶,零雨细沾沙”,“乱水穿林响,残星缀岭低”,“剪藤舒柏叶,芟草出瓜苗”,“湖生风听急,江远雨看无”,“涧水斜牵筏,林烟远出村”等诗句为证。著有《天目山斋岁编》二十四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攀龙】(1514—1570) 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攀龙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二十四岁补廪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厌为八股,日诵古文与诗,里人共目为“狂生”。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登进士第,授刑部主事。在京与谢榛、吴维岳、李先芳等结为诗社,经常聚会,品评诗文,互相唱和,在文坛初露头角。后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进京入诗社,吴维岳、李先芳出京,攀龙、世贞等人被称为“后七子”;谢榛初为七子领袖,后被排斥,攀龙遂为领袖。嘉靖二十九年,擢为员外郎。次年,升郎中。嘉靖三十二年,出为顺德知府,有善政,兴利除弊,被擢为陕西按察

司提学副使。以倨傲得罪长吏同僚,遂以病归乡。筑白雪楼以居,闭门读书,专心著述,不见达官显贵,又以“简倨”闻于官场,受到当道者的忌恨。穆宗隆庆元年(1567),按原官起用为浙江按察副使,分管沿海边防,擢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升河南按察使。以丁母忧去职,卒于乡。攀龙继明“前七子”,在诗、文创作上主张复古,而且是极端的复古派。他只重盛唐以前诗,连李白、杜甫的天宝以后诗篇都取鄙夷态度。其诗中有大量的拟古之作,其中许多只是改动原作数字,便据为己作。其好友王世贞云:“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艺苑卮言》)其诗中较有价值的是那些描绘河山壮美、摭写自己傲岸个性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如《郡斋》、《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平凉》、《广阳山道中》、《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大阅兵海上》四首、《赠殿卿》等。攀龙论诗讲求音韵格调、气韵兴象,故其近体多气象雄浑、浏亮可诵之作。陈子龙言其“五律杂出盛唐诸家,精工雄浑,一字不苟”,“七律有王维之秀雅、李颀之流丽,而又加以整练高华沉浑,固为千古绝调,绝句词甚练而若出自然,意必浑而每多可思,照应顿挫,俱有法度”(见《皇明诗选》)。所言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就李诗中精品而言,此评价大体相去不远。其缺点是缺少创造性与变化,故集中有不少诗意雷同、意象重复之作品。《尧山堂外纪》云:“李于鳞诗,多‘风尘’字,人谓之‘李风尘’。”其他如“万里”、“秋色”、“长安”、“斗牛”等词语,也反复运用,令人生厌。其诗文收入《沧溟集》。另编选有《古今诗删》。殷士儋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七有传。(王学泰)

【蔡汝楠】(1516—1565) 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今属浙江)人。儿时随父在南京,听祭酒湛若水讲学,辄有所悟。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成进士,年方十八,授行人。从王慎中、唐顺之、高叔嗣学诗。不久,进刑部员外郎,徙南京刑部。与皇甫湜兄弟友善,尚书顾璘引为忘年交。出为归德府知府。以母丧归,聚生石鼓书院,与说经。后历江西参政、山东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召为兵部右侍郎,后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几卒。洪朝选曾述其学诗过程:“初学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学刘长卿,最后又学陶、韦。”(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尚能自写情愫,但章法不够严谨。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如娇女织流黄,不知丝理,强自斐然”。著有《自知堂集》二十四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陈鹤】(1516—1560) 字鸣野,一字九皋,号鸣轩,又号海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家世绍

兴卫武胄,年十七,袭官百户,后弃去,着山人服。曾隐居飞来山之息柯亭,闭户读书,手不释卷。七年始出。为人豪放诙谐,高谈阔视,工诗善画,名重一时。与徐渭、萧勉、杨珂、朱公节、沈鍊、钱梗、柳文、诸龙泉、吕对明等称为“越中十子”。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寓宣城,与梅守德(梅鼎祚之父)倡和诗近百篇(《光绪宣城县志》卷二六)。次年,卒于金陵。徐渭称“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间出己意,工贍绝伦”(《徐文长三集》卷二五《陈山人墓表》)。朱彝尊《诗话》则云:“比于田水月,虽才情不及,而铸词差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绝句颇为清隽,不止彝尊所摘律诗数联,然趁笔而出,往往利钝互陈,视孙一元《太白山人集》,尚未足旗鼓相当焉。”著有《海樵先生集》二十一卷;传奇《孝泉记》,佚;散曲《息柯亭余韵》,未见,散见于《南北宫词纪》中。另辑有《越望亭诗集》二卷。事迹见徐渭《陈山人墓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书荫)

【欧大任】(1516—1595) 字桢柏。顺德(今属广东)人。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读书金陵,次年,至吴门谒见文徵明。嘉靖四十一年,荐入京为贡生。嘉靖四十五年,授官江都训导。在任,与陆弼、茅濬、郭第等结竹西社。穆宗隆庆四年(1570),赴河南光州学正。次年,以母病辞官归粤。神宗万历二年(1574),任国子监助教,历大理寺评事,升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曾结清溪社,与冯惟敏、李言恭、顾大典、臧晋叔、王穉登、金銮、梅鼎祚等为诗酒会。万历十二年,致仕,回岭南。万历二十三年,卒,年八十。王世贞列其名于“广五子”内。钱谦益谓其“虽驰骛五子之列,而词气温厚,颇脱蹶张叫嚣之习,识者犹有取焉”(《列朝诗集小传》)。朱用晦认为其“乐府近太康,古诗师邺下,歌行准嘉州,间出青莲语,近体羽翼盛唐,七言佳境颇类龙标”;李舒章则云:“桢伯诗如新裁贡锦,虽机杼未古,而时有鲜藻。”(《明诗综》)有《欧虞部集》五十七卷、《欧虞部文集》二十二卷、《百粤先贤志》四卷。《明史》卷二八七有传;事迹又见欧必元《家虞部公传》(附于欧集)。(吴书荫)

【沈明臣】(1519—1595) 字嘉则,号天放翁,人称句章先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少为博士弟子,科举失利,不再进取。胡宗宪督师浙江御倭时,闻其文名,被招致幕府,辟为记室。宗宪尝宴将士烂柯山上,酒酣乐作,请明臣为《铙歌》十章,援笔立就。其中《凯歌》有“狭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联,宗宪起而捋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命刻石置山中。后宗宪冤死狱中,明臣持所写谏文,遍告其冤状。后遂浪迹江湖,遍游吴、楚、闽、粤间,故其诗

多写各地风物与咏怀古迹之作。在幕府时,与徐渭最善,并终生保持友谊。与汪道昆、梁辰鱼、屠隆、孙禹锡、陆无从等,亦多所唱和。王世贞引为同调,列《四十咏》中。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卒于里,享年七十八(明臣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已入1519年,但按旧历计算年龄,仍应从上一年起算)。一生作诗七千多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才气盆涌,得之太易”。在其诸体诗中,古体顺畅,但稍冗杂;近体时有精警之作,但构思重复,平淡者亦有不少。万历二十四年(1596),陈大科为校梓《丰对楼诗选》,凡四十三卷,录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另撰有《越草》一卷、《丰对楼文集》三卷。事迹散见集中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吴书荫 尹恭弘)

【梁辰鱼】(1519—1591) 字伯龙,号少白,别署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以资为太学生。性豪纵好游,足迹遍吴、楚间。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散曲集《江东白苎》成,张凤翼为作序。嘉靖三十七年,文徵明为序《梁伯龙诗》。嘉靖四十五年,北上应顺天乡试,道经无锡,持诗一册往见俞宪,后以《梁国子生集》编入《盛明百家诗》。漫游齐鲁,谒见李开先、李攀龙。穆宗隆庆元年(1567),同殷都、孙七政等,结社于南京鹫峰禅寺。神宗万历十年(1582),集其所作诗为《鹿城诗集》,屠隆为作序。辰鱼精于音律,年少即好为新声,又得魏良辅传授,所作传奇《浣纱记》为昆山腔最早之剧本,梨园弟子争相传唱。晚年,“艺益高,名益起,而穷日益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九)。万历十九年,卒。辰鱼以曲名世,诗特其余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七古最为出色,律、绝次之,古乐府则兴会飏举,独具体格,“在曲家中固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著有《鹿城诗集》二十八卷、传奇《浣纱记》、杂剧《红线女》、《红绡伎》(佚)、《江东白苎》二卷、《续稿》二卷。生平事迹见张大复《梁辰鱼传》(《昆山人物传》卷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吴书荫)

【徐学谟】(1521—1593) 初名学诗,字思重,改字叔明,号太室山人。嘉定(今属上海)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兵科主事,改中书舍人,丁忧归。起礼部郎中,出为荆州知府,在任上,为辽王校阅《庚申稿》。以事罢归。再起为南阳知府,进湖广副使,改江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学谟虽负诗名,但佳作不多,间或有一些倾吐友情之作,尚清新可诵。著有《海隅集》七十七卷、《春明稿》十四卷、《归有园稿》二十九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刘效祖】(1522—1589) 字仲修,号念庵。其先

出山东滨州,明初徙都下,遂为北京大兴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登进士第,授卫辉司理。嘉靖三十二年,官户部广东司主事。嘉靖三十五年,督漕天津。嘉靖三十七年,升广西司员外郎,旋改云南司郎中。为官清廉,政声日起,又善具奏疏,严嵩父子欲罗致门下,效祖婉拒。遂外任陕西固原兵备副使。嘉靖四十二年大计,为忌者所中,罢归。辟日涉园,寄情诗酒,结社吟咏其间。工诗,篇什流传禁中,穆宗尝问其姓名,因赋诗志感曰:“更生双鬓已萧骚,敢谓文章擅彩毫。过误偶承明主问,因缘不是郁轮袍。”惜其诗集散佚,《明诗综》仅录四首。尤长散曲,以小令居多,或愤世疾俗,如[黄莺儿](堪笑世情薄)、[沉醉东风](怕待看蛾眉妒宠),或描写市井生活,质朴率真,颇具民歌风格。著有《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时行乐》二卷、《灯市谣》、《长门词》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语》、《短柱效颦》、《闲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华》、《莲步新声》共七卷,均已散佚,其后人辑有散曲集《词禽》一卷。另撰有《四镇三关志》十二卷,今存。事迹见王一鹗《陕西按察司副使刘公效祖墓志铭》(《国朝献徵录》卷九四)、《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吴书荫)

【张祥鸢】(1522—1586) 字道卿,号虚斋。金坛(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河东运司同知,迁云南知府。因触忤当路,遂请告归。归里后,读书赋诗,足迹不入城市。其诗善于因景生情,写得清润俊爽,颇受诗论家的好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道卿与七子同时,亦相往还。其诗以清润为主,不染叫嚣之习,故不为时人所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道卿诗潇洒绝俗,颇类永嘉四灵。”陈田《明诗纪事》则云:“华阳洞诗声调俊爽,七律亦与七子调相近。”著有《华阳洞稿》二十二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李言恭】(?—1599) 言恭一作寅恭,字惟寅,号青莲居士。盱眙(今属江苏)人。明初功臣岐阳武靖王李文忠之裔孙。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袭封临淮侯。万历四年,任中府佾书,加少傅。万历十四年二月,总督京营,留守南京。万历二十年,加少保。万历二十七年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李氏自岐阳父子,已好文墨,亲近文士。惟寅沿袭风流,奋迹词坛,招邀名流,折节寒素,两都词人游客,望走如鹜。并评其诗云:‘惟寅诗风气婉弱,时有韵致,《送安茂卿》诗云:‘梦回芳草远,人去落花多。’艺苑至今传之。”穆敬甫则云:“临淮诗清远有调,庶几大历中语。”(《明诗综》引)由于言恭生活优越,故其诗能从容抒写悠然自得的性情,如《还山中》即表现其

身处山中的欣慰之情。其诗一般写得从容安详,布置匀称。但诗境稍嫌呆板。著有《贝叶斋稿》四卷附录一卷及《青莲阁》、《游燕》诸集。另有《日本考》五卷。事迹见《明史》卷一〇五《功臣世表一》、《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吴书荫 尹恭弘)

【吴旦】字而待,号兰皋。南海(今广东广州)人。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曾官归州知州。与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齐名,世称南园后五先生。著有《兰皋集》,已不传。陈文藻辑五先生集,仅录旦诗十馀首,陈田又从郭棻《岭南名胜记》中得诗五首(《明诗纪事》)。从现存诗看,他十分注意研磨词采,因而诗中有不少较好精警的佳句,如:“翠涵岫类滴,云抹林疑剪”(《月溪》);“孤峰留晚照,平野带秋阴”(《翠峰草堂》);“刹影江鸿触,钟声海雾笼”(《海珠游览》);“夜谷蜀禽犹迸血,秋来湘竹总成斑”(《厓门吊古》);“明月故人千里共,白云禅室九秋期”(《宿南华寺》)。有的属对工稳,有的用典贴切,有的绘景细腻,有的造句奇特,表现了较高的功力。其诗散失过多,难以窥见全貌。生平见陈文藻编《南园后五先诗》中的《吴兰皋先生传》。

(尹恭弘)

【梁有誉】字公实,号兰汀。顺德(今属广东)人。少与欧大任、黎民表从学于黄佐。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诗社,倡导复古,人称“后七子”。因不肯趋附贵官大僚,居曹无事,惟以读书著作自娱。因思母,以病归里。归里后,与欧大任、黎民表相与唱和,号南园后五子。与黎民表相约游观罗浮,因海飓未果,宿田舍三夕,身染寒病而卒,年仅三十六岁。其诗婉而多讽。其赠友诗,既吐露情谊,也表现对时局的忧愁,如《喜述归怀,留别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宗子相四子一百韵》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其咏史诗,常常寄寓着对时世的感慨,如《汉宫词》:“蕊宫别有欢娱处,春色人间总未如”,嘲讽世宗为了炼出延年金丹而大肆搜罗少女的荒唐行为。其诗更多的是吐露一种远避尘世、洁身自好的情怀。诗中佳句甚多,《国雅品》所举“天涯尺素经残腊,客里分阴似小年”,“云暗故关听断角,日沉残垒见孤鸿”,“吴楚地当瓜步折,东南山拥秣陵高”,“石楼积翠临沧海,铁柱飞泉落紫墟”,“候虫声起灯光落,社燕巢空木叶疏”诸句,均才情意秀,具见功力。著有《兰汀存稿》八卷。王世贞为撰墓表,欧大任为作传。《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有传。

(尹恭弘)

【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川楼子、南岳山人。兴国(今湖北阳新)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中书舍人,迁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贬谪为江西按察司知

事。量移南康推官,后调归德,居二年弃去。嵩败,起为建宁同知,历邵武、高州知府,迁贵州提学副使、河南左参政,后罢归。归里后,诗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王世贞),则西走兴国(吴国伦)。他比较关心时事,如《庚戌秋纪事》三首选择了三个典型事件,比较有力地揭露敌军压境时明朝军队的腐败与无能。一是当敌人伪装成“入贡”而大举进攻时,明军仍醉生梦死,致使“郊原入夜号新鬼,却恨军前插羽迟”。二是开战以后,明将却起用方士,妄想遣送阴兵破敌。三是两军对阵、需要兵器时,司库者却要坐索千金,等兵器到手,敌军早已得意而去。沉痛的诗句流露出诗人对国事的焦虑,也寄寓了深刻的嘲讽。《暮秋感怀》三首,透过对自然秋景的伤怀,也看出他对民劳国艰状况的担忧。国伦还善于描写各地的奇风异俗。《高州杂咏》以“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鬼符书辟瘴,蛮鼓奏登陴”诗句描画出当地的风俗人情。沈德潜品评此诗,认为:“风土诗,须此奇警之笔,方写得生动”(《明诗别裁集》)。《阁鸦行》对阁鸦周围的少数民族的种种习俗的描写,尤为逼真。《次奢香驿因咏其事》赞美一位使西南地区“承平二百载”的奢香夫人,也很有识见。这些诗是作者长期在滇境生活的写实。王世贞《艺苑卮言》评其诗“能求诣实境,使首尾匀称,宫商谐律,情实相配”,较准确地说明了其诗创作上的艺术特点,无论是刻画风景,还是抒发情怀,都写得朴素真实,很少过分的夸大之词,读来较感亲切。国伦诗作繁富,才力又不很足,故时有重复雷同的现象。胡应麟讥其“用句多同,故十篇之外,不耐多读”(《诗薮》)。著有《觚觚洞稿》五十四卷、《续稿》二十七卷。其生平见冯梦楨撰《吴明卿先生传》(《快雪堂集》卷九)、《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刑部员外郎。性耿介,不附权贵。嘉靖三十六年,因作文祭奠杨继盛而得罪严嵩,被贬为福州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曾率众击退倭寇。寻迁提学副使。卒于官,年仅三十六岁。其诗始学李白,所作歌行纵横跌宕,亦时有超忽飞动之作。其律体则时露秀逸,表现出取法王、孟、钱、刘之倾向,常有警句,如:“鱼龙残笛夜,风雨急秋砧”(《闻雁》);“秋夜下风露,夕草乱芙蓉”(《秋夜顾二丈来集》);“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除夕钱惟重夜至》);“手把芙蓉步石壁,苍翠乱射猿鸟惊”(《登云门诸山》);皆善于描写眼前景。其律诗缺点是时有隽句而甚少完篇,另外还有雷同现象,所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讥议其诗是“薜荔芙蓉,靡芜杨柳,百

篇一律”。宗臣绝句也有些较有情韵之作,如《送吴山人》“黄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阳,回首燕云暮”,颇有画境。有《宗子相集》。其生平见王世贞撰《方城宗君墓志铭》(《国朝献徵录》卷九〇)、《名山藏》卷八一、《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汪道昆】(1526—1593) 字玉卿,更字伯玉,号南明、南溟,别署天都外臣,方外司马,晚年自号函翁。歙县(今属安徽)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义乌知县,历南京工部主事、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擢武库司员外郎,署郎中事员外郎,升湖广襄阳知府。嘉靖四十年,升福建按察副使,备兵福宁,与戚继光一起,抗击倭寇的骚扰。后升为按察使,改官金都御史,福建巡抚。嘉靖四十五年,罢归。穆宗隆庆四年(1570),以原职起用,巡抚郧阳,次年,调任湖广巡抚。隆庆六年,入为兵部右侍郎,视阅蓟辽保定边务。神宗万历三年(1575),因与张居正意见不合,乞归,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享年六十八(道昆生于嘉靖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已入1526年,但按旧历计算年龄,仍应从上一年起算)。道昆年十二时,即喜涉猎书史,后酷爱戏曲,撰作杂剧,推崇《水浒》并为之作序。道昆以诗、文名世,与王世贞并称南北司马,共主盟文坛,名列“后五子”。致仕家居后,于万历八年与胡应麟、屠隆、李维桢、梅鼎祚、潘之恒等结白榆、肇林诸社,互相唱和。万历十四年,游杭,又有西泠、南屏社之集。其文简而有法,诗则趋于复古。对其诗的评价分歧很大。钱谦益谓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小传》);而胡应麟则认为其诗“格调精严,句律整峭,斲削锻炼之工,几于毫发无憾”(《诗薮》)。二者意见皆有偏颇之处,持平而论,其诗不够出色,但间或也有些颇可讽诵之作,不可一笔抹杀。著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太函副墨》二十二卷;杂剧《大雅堂乐府》四种、《蔡圪塔》(佚)。另有《春秋左传节文》十五卷、《增订五车霏玉》三十四卷、《楞严经注》十卷。《明史》卷二八七有传。生平事迹又见龙膺《汪伯玉先生传》(《纶瀚集选》卷八)、喻均《汪南明先生墓志铭》(《山居文稿》卷七)、其子汪无竞撰《汪左司马公年谱》(附于崇祯刊本《太函副墨》)。

(吴书荫 尹恭弘)

【杨巍】字伯谦,号梦山。海丰(今山东无棣)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除武进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出为山西佥事、阳和兵备副使,特旨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再抚陕西,以右副都御史移晋。入为兵部侍郎,改吏部,以终养归。起为南户部尚书,召为工部尚书,改户部,进吏部尚书、加太子太

保。致仕归里十五年后卒,享年九十二。其诗既有伤今之辞:“干戈正扰攘,何处可凭栏?”(《雁门九日无兴登高作二首》之一)“城垒酸风日,干戈积岁年。”(《石州陷后作二首》之二)也有吊古之什:“丞相名偏重,遗祠世共尊。”(《过文山祠》)“潜龙终见奋,惊鹤自难收。”(《读谢叠山传》)另外,夜宿生悲、闻雁思乡、过岭感时、郊居逸兴等等感情活动都能在其诗作中表现出来。诗风古淡,清人王士禛评论说:“吾郡杨太宰梦山,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业(叔嗣)、华子潜(察)季孟间。”其生平见叶向高撰《梦山杨公墓志铭》(《苍霞续草》卷一二)、《明史》卷二二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王世贞】(1526—1590) 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家世显贵,幼承家学,读书过目不忘。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登进士第,授刑部主事,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所主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唱和,后谢榛入京,七人常聚会论诗,相互唱和,被称为“后七子”。屡迁为员外郎、郎中,因得罪权奸严嵩,转为青州兵备副使。其父王忬以滦河失事及严嵩构陷,被处死刑。此事对世贞打击颇大,决心寄情山水,终老林下。穆宗隆庆元年(1567),世贞兄弟伏阙讼父冤,复忬官,世贞复出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饬大名等处兵备,历浙江右参政,迁山西按察使。丁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为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因不附权相张居正,令回籍听用。在乡栖迟于弇山园(即小祇园)中,与僧、道谈禅论道,读书著述。居正去世后,世贞起用为应天府尹,旋擢为南京刑部右侍郎,皆未到任。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万历十七年,擢为南京刑部尚书。卒于乡。世贞博学,数十年来,诗文著作始终不辍,初与李攀龙主持文坛,攀龙没后,独持文柄二十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竞相奔走其门下。在其影响与培植下,形成了“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以及“四十子”等,可见其在文坛上的地位。世贞早期文学观点与李攀龙大体相同,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中年以后,其观点有所变化,领悟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由于世贞身处当时政治斗争激流中,所以忠奸斗争、国事艰虞皆在其诗中有所反映,如:《乐府变》十章即事名篇,评议朝政,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袁江流钁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缕述了严嵩父子起家、显赫、衰败、垮台过程,历数了其父子误国罪行,揭露了封建时代当权者的腐朽、官僚政治的黑暗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江陵使》、《钧州变》、《楚愍王》

等皆反映了明代诸侯王称霸一方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其他如《太保歌》、《尚书乐》、《咏史》一百首等亦皆有丰满的社会内容。其晚年在南京写的二十首七绝,则透过南京表面的繁华,揭露了现实的弊端。其诗风格多样,早年注重格调,多气象恢宏之作;晚年倾向才思性灵,渐趋平淡。其古体乐府畅快淋漓,七绝恬淡自然,皆有可传之作。一生著作极富,有《宛委余篇》、《世说新语补》、《艳异篇》、《凤洲笔记》、《王氏笔记》、《短长语》、《史乘考误》、《觚不觚录》、《剑侠传》、《权幸录》、《朝野异闻》、《王氏画苑》、《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艺苑卮言》等。这些连同诗文皆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四部续稿》。清钱大昕为撰《年谱》,王瑞图为撰《年谱合编》。《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有传。

(王学泰)

【高岱】字伯宗,号鹿坡居士。京山(今属湖北)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刑部主事,时董传策、张翀、吴时来等疏劾严嵩,严嵩欲致之死,高岱力言于尚书郑晓,得遣戍。又为治装,送之出郊,严嵩大怒。会景王之国,出为长史。据《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伯宗初与李伯承(先芳)结社长安,进王元美(世贞)于社中。及于鳞(李攀龙)诸人鹄起,而伯宗左迁去,遂不与七子之列。”其实,他的论诗主张与七子相似,古诗学汉、魏,近体学盛唐。他的一些自抒情思的诗作,具有研炼精警的特点,如七律《送方兆行虞衡赴卢龙别署》:“东去卢龙塞草青,匆匆立马暂歧亭。河山并入吟边丽,草树空馀战后腥。万里胡天悲曙角,百年宦迹感流萍。凭君为问边城将,可汗何时系汉庭。”但其诗作也时有模拟未化的缺点。著有《居邸稿》、《西曹集》、《樵论》、《楚汉馀谈》等。其生平见《皇明世说新语》卷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徐中行】(?—1578)字子舆,一作子与,号龙湾、天目山人。长兴(今属浙江)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为汀州知府,寻以父忧归。后补汝宁知府,因事谪长芦盐运判官,迁端州同知,擢山东佥事,历云南参议、福建副使、参政,累官至江西布政使。卒于官。中行为“后七子”之一。其一生游宦四方,故其诗多能描绘各地山川风貌和社会习俗,并时时寄寓着诗人到处奔波的无限感慨、怀念乡土的悠悠情思。其《初入滇关》的“白日开南徼,青天豁大荒”两句,形象地概括了滇疆的景色,观察细致,笔力苍劲。贵州人陈田认为后句“非至滇境者不知其妙”(《明诗纪事》)。《盘江驿舍阻雨寄汪惟一》在勾勒了“春早蛰龙蒸赤水,夜深山鬼啸青林”的盘江驿舍后,自然流

露出“谁怜道远妻孥累,实恐衰年疾病侵”的惆怅。《暮发滁阳》则在“悬崖青欲滴,芳草绿堪迷”的滁阳美景中,发出“洵美非吾土,翻然忆故溪”的感叹。中行擅长七律。胡应麟《诗薮》评论其诗“宏大雄整,卓然名家”,如《山陵道中风雨》、《答孙侍御秦中见怀之作》、《送莫廷尉之任南都》,皆是苍然爽健的作品。但部分律诗也有刻意学杜而未臻化境的毛病。著有《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青萝馆诗》三卷。其生平见王世贞撰《天目徐公墓碑》(《国朝献徵录》卷八六)、王世懋撰《徐方伯子与传》(《王奉常集》卷一四)、《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蓑】字于田,号黄谷。内乡(今属河南)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除检讨,改南礼部郎中,出为贵州提学副使,罢归。归里之后,纵情声伎。有一次,女优登场,蓑杂于伶中持板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坐。及去,借主人枥上马,挟女优连骑而去。可见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其诗大抵皆安雅有法,但缺少深警之思。有些绝句颇有情韵。其《嘉靖宫词》则有一定史料价值。他曾编纂《宋艺圃集》、《元艺圃集》两书,尽管错漏不少,但在当时言必称汉魏盛唐的情况下,有开阔人们眼界的作用。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赞其编《宋艺圃集》云:“时在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于田独幽闲挾异,撰有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著有《太史集》六卷。其生平见李若讷撰《李公神道碑》(《五品文稿》卷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墟,又号铃然居士。世称凌虚先生。长洲(江苏苏州)人。早岁工古文辞,与弟猷翼、燕翼并有才名,时人称为“三张”。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后屡赴会试均失利,至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已五十四,因母老始绝意公车。晚年以卖字鬻文为生。所作诗文,师法古人,而不立门户,多写胸臆,直抒性情。其《吴民谣》、《租税谣》、《吴民谣赠姜将军兼呈曹抚台》、《闻将兴大工佐以开矿作》诸诗,则受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揭露时弊,关心民瘼,尤为难能可贵。王世贞谓其因“才不能尽发,而为乐府新声”(《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五四《张伯起集序》)。精于曲律,并能登场演出。年少时所撰《红拂记》,轰动歌坛,演习之者遍国中。万历二十年,徐渤游苏州,得识凤翼,尽窥其所作传奇,并从友人处获《红拂》、《窃符》、《灌园》、《虎符》、《祝发》诸记。万历二十八年,又为总兵李应祥撰《平播记》。著有《处实堂集》,前集八卷,后集六卷;戏曲除《虞彦记》、《平播记》散佚外,其馀均有传本;散曲《敲月轩词稿》,佚,零篇散见于《吴骚令

编》等曲选中；另有《谈谔》三卷、《文选纂注》十二卷、《梦占类考》十二卷。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徐晟《续名贤小记》。(吴书荫)

【居节】(1527—1585) 字士贞，一作贞士，号商谷。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从文嘉学画，文徵明见其运笔，惊喜，遂授以法，成为其弟子。尚气节，不屑仰事侯门。晚年因得罪织造太监孙隆，坐以逋帑拘系，破家。所与交，多山人衲子。因穷困而卒。其诗能较细腻地表现诗人追求闲雅，但略怀孤寂的复杂心态。诗多为近体，颇注意属对的工稳、首尾的匀称，但创新之作不多。著有《牧豕集》，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戚继光】(1528—1587) 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属山东)人。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世袭为登州卫指挥僉事。历浙江参将，大破倭寇于台州，进秩三等。后倭寇侵犯江西、福建，皆命援击，战功卓著。升任福建总督，治兵有方，人称“戚家军”，军威震南方。会蓟门多警，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边备修饬，节制严明。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谢病归。万历十五年卒，谥武毅。他是一位战将，因而其诗有其独特之处。一是能表达他在戎马生涯之中的豪情，如：“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马上行》)，“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盘山绝顶》)。二是能较具体表现士兵生活，如《蓟门述》有力揭露边塞“戍逻卒”的悲惨状况。除这些师旅之作外，他也有一些清婉调畅的燕闲之章，如《江楼》：“半溪晴日衔疏柳，无数秋山入小楼。谁伴主人一潇洒，滩边钓石石边鸥。”有《止止堂集》。其生平见汪道昆撰《戚公墓志铭》(《国朝献徵录》卷一〇六)、戚祚国编《戚少保年谱》十二卷、《明史列传》卷八六、《明史》卷二一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张九一】(1533—1598) 字助甫，号周田。新蔡(今属河南)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黄梅知县，累官至南尚宝少卿，贬为广平同知，后擢为湖广僉事。景王之封国，过岳阳，随从太监要索以千万，他以计免之。家忧归里。起复后，官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致仕卒。陈田云：“助甫能作奇语，与子相(宗臣)略同。古体不及子相，近体秀拔流逸，乃复过之。”(《明诗纪事》)纵览其诗，其近体诗的确较优。其诗多为游览之作，颇能借景抒发诗人的情趣，也较注意熔炼诗句，因而其诗多精警动人之语。有《绿波楼诗集》十四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张献翼】(1534—1604) 初名鹏翼，后又更名枚，字幼于。长洲(江苏苏州)人。年十七，以诗贻于文徵明，为文所赏识。与兄凤翼、燕翼齐名，时人称为“三张”。以贻入为国子监生。好《易》，十年中笺注凡三易稿。工诗。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纨绮集》。穆宗隆庆五年(1571)，游金陵，与金銮、王寅、梅鼎祚等结清溪社。神宗万历三年(1575)，《文起堂集》成，求序于徐缙。后有越中之行，归访嘉靖七子之一张佳胤，时正巡抚浙江。王世贞列其名于《四十咏》中，引为同调。献翼为人狂放不羁，好声妓。万历二十九年，苏州以葛成为首民变，反对税监孙隆的横征暴敛，献翼作《蕉扇记》传奇讥刺其事，得罪乡绅丁某(见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二二《书葛道人》)。三年后，养痾荒园，为仇家所杀害(见张凤翼《处实堂后集》卷六《哭弟文》)。时哄传其因狎妓而死，以掩饰劣绅之罪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文多参以俳偶。盖献翼虽颇与李攀龙笔札往还，而与皇甫湜尤契，故学其含咀魏、晋，而未能成家云”。其诗作能坦露胸怀，直抒情愫。在其诸体诗作中，律绝较优。如当时颇负盛名的《七夕同赵今燕赋》云：“翠帐红妆送客亭，佳人眉黛远山青。试从天上看河汉，今夜应无织女星。”就诗作而言，“三张”中，献翼较佳。有《纨绮集》十一卷(今存一卷)、《文起堂集》十卷、《兰芳集》二卷、《舞志》十二卷、《读易纪闻》六卷、《韵考》七卷。事迹见王世贞《张幼于生志》(《翕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二)、《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书荫 尹恭弘)

【王穉登】(1535—1612) 字伯穀，亦作百穀，号玉遮山人。原籍常州(今属江苏)，徙居长洲(今江苏苏州)。四岁即能属对，六岁已能书写大字，十岁能诗，长而名满吴门。太学监生。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入京师求官，客于大学士袁炜家，为炜当堂赋紫牡丹诗，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受到炜赏识，将荐之于朝，不果。一度以布衣校书秘阁。神宗万历(1573—1620)中，诏修国史，未上而史局罢。一生未走上仕途，卒于乡。吴中自文徵明卒后，诗坛无主将，穉登尝及徵明门，犹可上接“四才子”之流风馥韵，又好奖掖寒素，敦笃故旧，尝倾身援救王世贞之仲子，为士论所推许，从之者甚众，遂主领吴中风骚三十馀年，如钱谦益所述“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踏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多为纪行纪游和表现其风流洒脱个性之作。《垂虹亭对月与管建初》、《中秋日送钱象先游豫章》、《虎丘》、《长安春雪曲》皆其代表作品。沈德符称其诗“纤秀为人所爱”(《野获编》)，朱彝尊言“百穀诗亦华整，第嫌肉胜

于骨”(《静志居诗话》),皆较中肯。著有《吴郡丹青志》、《奕史》、《吴社编》等。其诗文收入《王百穀全集》。李维桢为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王学泰)

【陈文烛】(1535—?) 字玉叔。沔阳(今属湖北)人。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除大理评事,出守淮安,官终南京大理寺卿。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十九岁,仍同冯梦楨同游金陵天界寺并作记,卒年当在其后。其诗模拟痕迹较重,创新之作甚少。但其五律中尚有一些清婉典饬、意境蕴藉之作。著有《二酉园集》三十九卷。其生平见李维桢撰《廷尉陈公寿序》(《大泌山房集》卷二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赵用贤】(1535—1596) 字汝师,号定宇。常熟(今属江苏)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除翰林检讨。神宗万历五年(1577),上疏论张居正不守制,被杖责六十为民。张居正死,召为春坊赞善,历南京国子祭酒、南礼部侍郎。久之召还北京,改吏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二,谥文毅。其诗模拟痕迹较重,但深受王世贞的推重,王世贞作《续五子诗》提到他,作《末五子诗》又提到他。著有《松石斋集》三十六卷。其生平见钱谦益撰《赵公神道碑铭》(《初学集》卷六二)、《明常熟先贤事略》卷九、《明史列传》卷八二、《明史》卷二二九。

(尹恭弘)

【姚汝循】(1535—1597) 初名理,以字行,改字叙卿。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除杞县知县,征授南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知大名府,以事罢归。起桂阳同知,迁嘉州知州,入觐,坐假驿符罢归。老于秦淮之上,与名人韵士为弹筝邀笛之游。汝循善于借景抒情,诗风清雅和畅。注意诗句熔炼,因而有不少佳联秀句,如:“闲花苔上落,清磬雨中沉”,“酒边过白鸟,镜里出青山”,“离愁随草长,别泪迸莺啼”,“槛竹报晴仍带雨,瓶梅裹冻固留春”,皆有风致。著有《屏居集》八卷、《浪游集》六卷、《耕馀集》八卷,均佚。其生平见冯梦楨撰《姚叙卿先生墓志铭》(《快雪堂集》卷十二)、焦竑撰《知府凤麓姚公墓表》(《澹园集》卷二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王世懋】(1536—1588) 字敬美,号墙东生,别署损斋;因室名麟洲,世称麟洲先生。太仓(今属江苏)人。王世贞弟。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登进士第,以父忬为严嵩诬构论死,归赴家难,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父冤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神宗万历元年(1573),丁母忧归。服除,补祠曹,寻授尚宝丞,迁江西参议,升按察副使,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进为省左参政分守福兴道,迁南京太常寺少卿。

万历十五年,辞病归。次年,卒,年五十三。其诗经李攀龙、王世贞推引,遂著称于时。胡应麟云:“敬美王公特拔新标,异于四家、七子之外。古诗歌行,劲逸迢爽,宗、吴、李、谢,方之蔑如,以配哲昆,诚无愧色。”五言律,气骨虽自老杜,旨趣时属右丞。至七言律,即右丞不能脱秣丽,而独以清空简远出之,词直而气婉,语淡而致浓,此格古未睹也。”(《诗薮》)李舒章则曰:“奉常诗如乌衣群少,粗有风格,不足对扬父兄。”(《明诗综》)世懋推崇李攀龙、王世贞,早年《呈于鳞》一诗中说:“王生落落天地间,自言得御李君还。从他百道吴门色,我自衔杯望泰山。”他认为:“诗家集大成者,皆惟子美(杜甫),今则吾兄。”(引自《列朝诗集小传》)世懋诗也注意学习汉、魏、盛唐,一些诗很注重色泽与声调,如《横塘春泛》:“吴姬小馆碧纱窗,十里飞红点玉缸。蜡屐去寻芳草路,青丝留醉木兰舫。山连暮霭迷前浦,云拥春流入远江。棹里《长干》听一曲,烟波起处白鸥双。”到晚年,他开始认识到模拟的弊病,在《艺圃撷馀》中指出:“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于鳞,纷纷刻鹄,至使人厌。”“李(梦阳)、何(景明)尚有废兴,徐(祜卿)、高(叔嗣)必无绝响。”显然已注意到才情的重要性。著有《奉常集》六十九卷。集中收诗文以外还包括《澹思子》、《艺圃撷馀》、《易爻解》、《却金传》、《经子臆解》、《闽部疏》、《窥天外乘》、《三郡图说》、《二酉委谈》等。其生平见王世贞撰《亡弟敬美行状》(《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四〇)、汪道昆撰《王次公墓碑》(《太函集》卷六七)、《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清王瑞国有《瑯琊凤麟两公年谱合编》。

(尹恭弘 吴书荫)

【王叔承】(1537—1601) 初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晚又更字子幻,号昆仑山人。吴江(今属江苏)人。家贫赘妇家,为妇翁所逐,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而贫益甚。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彰德,访客居赵王处的郑若庸,因赵王贵倨,他不愿见之,乃作“羞向侯门待晚餐”诗而辞去。后客大学士李春芳处,纵观西苑、南内之胜,作汉宫数十曲,流闻禁中。性嗜酒,李春芳有时嘱其撰述应制祝釐之作,常醉而弗应。久之乃谢归,纵游吴越山水,继而又赴闽、楚、塞上。从塞上归里后不复出。年六十五卒。他才情焕发,善写七言歌行。王世懋序其诗,谓其七言歌行“顷刻数百千言,可喜可愕,种种变幻,真能以牛溲马勃为药饵,嘻笑怒骂为文章”(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如其《赵州柏林寺双壁画水歌》之描写水态就有这样特色。著有《壮游篇》三卷、《吴越游编》八卷、《荔子编》二卷、《潇湘编》二卷、《岳色编》二卷等。其生平见王世贞撰《昆仑山人传》(《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四)、《明史》卷二八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

传》等。

(尹恭弘)

【艾穆】字和甫,一字纯卿。平江(今属湖北)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除阜城教谕,入为国子助教,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以劾张居正夺情被杖,谪戍凉州。张居正死,起户部员外郎,出为四川佥事,擢光禄少卿,历南鸿臚卿,召拜太仆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以病归。其诗善于抒发自我情愫,如《出都诗》表现其旷达情怀,《舟中漫兴》表现其闲逸心情,皆写得较为亲切。其诗步趋杜甫,声调浏亮,时有奇气。著有《终太山集》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列传》卷八二、《明史》卷二二九。(尹恭弘)

【张元凯】(1538—?)字左虞。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受毛氏诗,折节读书。以世袭为苏州卫指挥,从戎非其愿。曾督漕出徐淮,达燕冀,纵观古英雄战争都会之地,贯酒高歌。又入京都览观宫阙苑囿,亲见斋宫醮坛之盛,作《西苑诗》,窃比讽谏之义。因有功不得叙,自免归,益纵酒自放,卒年已不可考。其诗不事摹拟,能直抒胸臆,倾吐情怀,如《江上遇蔡都尉》,表现了同病相怜的心态,《春日花下饮》描述了他放浪的性格,皆见一定功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大抵推陈出新,不袭窠臼,而风骨道上,伉壮自喜,每渊渊有金石声”。著有《伐檀斋集》十二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为诸生时,即有盛名。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乡试。次年,赴会试,落第归,从耿定向读书崇正书院。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至南京,日与汤显祖等听其讲学。万历十七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后选为东宫讲官。万历二十五年,主北闕考试,于落第卷中拔徐光启为第一(见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竑既负重名,性复疏直,政府恶之,大学士张位尤甚,遂借口应试文中“多险诞语”,谪官福宁同知。次年,辞官南还。从此杜门治学,讲课授徒。此年刻所辑《诗学会海大成》。与李贽交谊笃甚,主持其《藏书》在南京刊行,作序赞之;又为其刻所辑《坡仙集》。万历四十八年,卒。熹宗天启元年(1621),赠谥德。福王时,追谥文端。竑博极群书,勤于著述,不拘于儒学,旁及释、道二家学,为一代宗师,诗乃其余事。撰有《澹园集》四十九卷、《焦氏笔乘》八卷、《玉堂从语》八卷、《国史经籍志》六卷、《焦氏类林》八卷、《老子翼》三卷、《庄子翼》八卷、《俗书刊误》十二卷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吴书荫)

【顾大典】(1541—1596)字道行,一字衡宇。吴江(今属江苏)人。少失怙,依母家,喜学为古文词。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绍兴府学教授。神

宗万历二年(1574),授刑部职方司主事,以母老,请改南京兵部,后升南京吏部郎中,迁山东按察副使,主驿传,多所裁革。万历十二年,调为福建提学副使。校文精严,请托不行。忌者遂以考功法追论其为郎时放于诗酒,谪为禹州知州,遂自免归。再起开州,不赴。家有谐赏园,呼朋聚友,流连诗酒,徜徉其中。工诗,宗唐人,兼擅绘事。其“诗画书在吴中称三绝”(徐渤《红雨楼题跋》卷二)。诗风秀丽纤秾,旖旎缠绵,受词曲影响,不够精警。与张凤翼、沈璟等善,妙解音律,尝自按红牙,教家童唱曲。著有《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等,后三种未见;传奇有《青衫记》、《葛衣记》、《义乳记》、《风教编》,合称《清音阁四种》,后两种佚。事迹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潘圣章《松陵文献》卷九《顾大典传》。(吴书荫)

【朱孟震】字秉器。新淦(今江西新干)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除南刑部主事,出知重庆府,历陕西、山西副使,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人为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孟震性好吟咏,以诗家自许。其诗往往注意音节的谐畅、选词的隽雅,如其写景诗《玄武湖》、抒情诗《漳河怀古》皆体现此特色。著有《朱秉器集》、《玉筍诗谈》等。其生平见陈文烛撰《朱秉器诗序》(《二酉园续集》卷二)。(尹恭弘)

【岳岱】字东伯,号秦馀山人、漳馀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主要生活在明世宗嘉靖(1522—1566)、穆宗隆庆(1567—1572)年间。中年出游恒、岱诸岳,泛大江,览留都名胜,渡涛江,访丰南禺于四明,历览天姥、天台、雁宕、武夷、匡庐而返,遂不复出。其诗多为有感而发,如《忧旱》等诗就反映了这样特点。另外,他的《咏怀》诗在当时也颇有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论说:“作《咏怀》诗九十六篇,其自序以为时序之变迁、人事之遭迁,悲愁喜乐,古怨今情,以至赞大功、称盛美、晰人伦、追旧雨,情动于中,言形于外,所谓物失其平鸣,有以焉尔。嘉、隆之间,古学渐远,吴士争从浮华相尚,如东伯之咏怀,可谓有志者也。”著有《山居稿》三十一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应徵】初名衷毅,字伯远。嘉兴(今属浙江)人。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举人,除临安教谕,迁南京国子博士。主要生活在万历(1573—1620)年间。其诗能自成一格。歌行往往写得腾挪跌宕,有李白的诗风。如《梦偃松篇》想象丰富,感情激越,大起大落,具见其工力。其律诗也有不少清峻开爽的篇章,如《同冯开之登东目》中的属对就颇耐人寻味。许灿《梅里诗辑》评论其诗说:“嘉、隆之际,于鳞、元美,狎

主吟坛,海内靡然向风。博士稍后出,及与元美游,而不为苟同,独以清矫之气,行其卓越之才,允推作手。”著有《素莲馆》、《澄远堂》、《偶寄轩》、《菴园》等集。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吴敏道】字月南。宝应(今属江苏)人。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充贡生。万历二十年,在里修志。其诗开爽清丽,乐府诗与律体诗均具有此特色,如:《鸛鹑行》以词旨清晰,声调爽朗见长;七律《黄质山寄诗因答》也以意境清朗,感情明晰见美。其诗深为诗论家所推重。王世贞评论说:“日南诗,辞旨清丽,神采流畅,发端必工,尾结必遒,隆、万之际,灼然巨擘也。”(《弇州山人续稿》)陈田评论说:“日南诗,清俊洒落,古今体俱入格,选家多未见收,亦珊瑚之遗珠也。”(《明诗纪事》)著有《观槿》、《白云》、《折麻》、《月舫》、《竹西》、《水影堂》等集,均佚。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屠隆】(1543—1605) 隆,一作“龙”,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号鸿苞居士、娑罗道人等。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安徽颍上知县,改青浦县令,迁礼部主事、郎中。万历十二年,因行为放纵,又与刑部主事俞显卿有私怨,被劾罢归。因佛郁不平,遂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工诗文,与沈懋学多所唱和,又与汪道昆、胡应麟、龙膺、俞安期等结为白榆社。万历十四年,汪道昆游杭,又招之结西泠社、南屏社。王世贞列其为“末五子”。陈子龙《皇明诗选》则谓其诗“如冲烦驿舍,陈列壶觞,顷刻办就,而少堪下箸”。隆精通音律,家有戏班,常阑入群优中作技。撰述甚多,诗文集有《由拳集》十卷、《白榆集》十二卷、《栖真馆集》十卷;传奇有《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三种,均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另有《鸿苞集》四十八卷、《考槃余事》四卷、《娑罗馆清言》一卷。《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事迹见李邺嗣《甬上耆旧传》卷十九、《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吴书荫)

【傅光宅】(1544—1601) 字伯俊,号金沙居上。聊城(今属山东)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灵宝知县。召为监察御史,迁工部郎中。出为重庆知府,改知遵义。在任安置流亡,饶有政绩。累官至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万历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八岁。谢肇淛在为其诗集所作序中指出其诗“出于性情,而不出于豪举,求之酝酿,而不求之纤秾”,说明了光宅诗之特色。光宅较善于融情人景,力求情景交融,抒写情怀,力求平稳蕴藉,但创新之处仍不多。其生平见于慎行撰《傅公合葬墓志铭》(《穀城山

馆文集》卷二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冯梦桢】(1546—1605) 字开之,一字具区,号真实居士。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会试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与同年沈懋学、屠隆以文章意气相豪。万历十五年,京察以浮躁谪官。里居,师事罗汝芳,讲性命之学,又精研佛典。万历二十年,补广德州判官,量移南京国子司业,历右谕德、右庶子,拜南京国子祭酒。在祭酒任上,奖掖后学;一时隽彦,向风景从。万历二十六年,为南曹郎劾免,遂不复出。回杭州,筑室孤山下,家藏《快雪时晴帖》,名其堂曰“快雪”。钱谦益称其诗文“疏朗通脱,不以刻镂为工。而佛乘之文憨大师极推之,以为宋金华之后一人也”(《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则评曰:“诗亦不蹈时习,五古能盘硬语,尤见意匠经营,同谱若沈君典、屠纬真皆不及也。”(《静志居诗话》)著有《快雪堂集》六十四卷、《快雪堂漫录》一卷、《历代贡举志》一卷。事迹见钱谦益《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一)、《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吴书荫)

【李维桢】(1547—1626) 字本宁。京山(今属湖北)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参与修《穆宗实录》。书成,升修撰。神宗万历三年(1575),出为陕西参议。自是官于秦、晋、梁、蜀、江、淮,历提学副使、参议、参政、按察使等职,浮沉外僚,凡三十年,后稍迁南太常寺卿。熹宗天启(1621—1627)初,以布政使家居。天启四年(1624),召为南礼部右侍郎,进为尚书。天启五年,乞归。次年,卒于家,年八十。崇祯四年(1631),赠太子少保。维桢弱冠登朝,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有“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之语。因转徙各地,交游甚广,文名重于当时,列于“末五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朱彝尊《明诗综》,亦谓“本宁著作如官厨宿饌,粗鹿肥麋,虽腍臑具陈,鲜薏杂进,无当于味”。今核是集,知非故为诋毁矣。但如汰去浮滥,还有些较好作品,如《银州》:“前旌时隐见,石壁转萦回。流水寒城咽,孤鸿远戍哀。山盘光禄塞,云镇赫连台。忽尔风沙合,骅骝方马来。”描写塞上景观,也有几分传神。著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其中诗仅六卷;《史通评释》二十卷,《黄帝祠额解》一卷。《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事迹还见于钱谦益《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一)、《启祯野乘》卷七。(吴书荫 尹恭弘)

【汤有光】(1548—?) 字慈明。南通(今属江苏)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从沈明臣学,并为明臣

选诗。万历十一年,客顾养谦薊辽军中。万历三十九年,入范凤翼在里所结山茨社。思宗崇祯元年(1628),作《无屋叹》诗,时年已八十一岁,仍在世上,卒年当在其后。其诗清新浅俗,所以《山茨社诗品》评其诗:“如西人造神仙酒,曲水既备,顷刻而成,可以供一时之欢笑,然味则近市,难饜兰陵之口。”然而,在其近体诗中,间或有一些精严之作。著有《汤慈明诗集》三十二卷。其生平见张慧剑编《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尹恭弘)

【梅鼎祚】(1549—1615) 字禹金,号汝南居士、无求居士、千秋乡人、乐胜道人等。宣城(今属安徽)人,生于北京。父守德,由云南参政致仕,归里家居,喜延接四方骚人墨客,禹金受其熏陶,年少即以诗称。长与同邑沈懋学齐名。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汤显祖客宣城,与之订交。万历八年,入汪道昆白榆诗社,与沈明臣、屠隆、李维桢等宴游。鼎祚自十六岁为诸生以来,屡蹶场屋,万历十九年,秋试又落第,遂绝意进取。申时行欲荐之于朝,辞不就,归隐于书带园,家贮书甚富,或读书著述于其中,或听歌拍曲,寄情声色。亦常往来于姑孰、金陵一带,访友寻书,刊印所编《书记洞诠》、《青泥莲花记》诸书。一生虽撰述宏富,但如《列朝诗集小传》所云:“禹金于学,博而不精。其为诗,宗法李、何,虽游猎汉、魏、三唐,终不出近代风调。七言今体,步趋李于鳞,又其靡也。‘秋减叶声中’,五字擅场,虽千章万句,亦何以加?”著有《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传奇《玉合记》、《长命缕》,杂剧《昆仑奴》;还编纂有《历朝文纪》二百三十六卷、《八代诗乘》四十五卷、《古乐苑》五十二卷、《才鬼记》十六卷、《宛雅》十卷等。事迹散见于诗文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并有传。(吴书荫)

【汤显祖】(1550—1616) 初字义少、义叔,改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从罗汝芳受学,又从徐良傅习古文词。年十四,补县诸生。弱冠即有文名,常与里中谢廷谅、曾粤祥、吴拾芝等相唱和,称为“临川四雋”。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举乡试。万历四年春,客宣城,与沈懋学、梅鼎祚游。旋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万历五年,因不肯依附首相张居正,落第而归。万历十一年,即张居正去世后一年,才考中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历南京詹事府主簿,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时弊,抨击朝政,贬为广东徐闻典史。万历二十一年春,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在任五年,多善政,如兴建书院,遣囚度岁观灯,抑制豪强等。并编所著诗文为《玉茗堂文集》。万历二十五

年,赴京上计;次年,告归。从此,不再出仕,退居玉茗堂中,潜心于戏曲创作,先后写出《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传奇,“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识者谓神仙中人云”(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万历三十年,李贽自杀于狱中,作《叹卓老》诗哀悼。晚年,好佛典,却并未忘情于世,如其所自言:“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答牛春宇中丞》)显祖虽为戏曲大师,但其诗、文亦卓然成家,仅诗就存二千多首。论诗力主抒写真情,反对前后七子摹拟之风,常谓“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又强调要有“自然灵气”(《合奇序》)。《列朝诗集小传》称其“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其诗以绝句为佳,律诗稍逊。状景写物之诗,清新警拔,写志抒怀之作,则慷慨而沉郁。显祖去世后五年,即熹宗天启元年(1621),吴兴韩敬辑其诗文,合刻为《玉茗堂全集》;思宗崇祯九年(1636),沈际飞又刻《玉茗堂选集》,其中收有《临川四梦》。今人钱南扬、徐朔方将其现存作品加以校订,合编为《汤显祖集》,后徐朔方又有《汤显祖诗文集笺注》行世。《明史》卷二二〇有传。生平事迹,又见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调象庵集》卷三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今有徐朔方《汤显祖年谱》、《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吴书荫)

【邹迪光】(1550—1626) 字彦吉,号愚公。江苏无锡人。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黄州知府,福建副使提调学政,官至湖广提学副使。万历十七年,罢官归里。时年不及四十,卜筑惠山下,征歌度曲,饮酒赋诗,极山林园亭之乐。与王世贞、李维桢、屠隆、梅鼎祚、汤显祖、冯时可等交游。为文排诋公安,而维护弇州。晚年佞佛,故“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累累而是”(汤显祖《调象庵集序》)。其诗多表现自己隐居后的闲雅生活。但“诗材庸熟,望而生憎,绝句差清婉可诵”(《静志居诗话》)。亦兼擅绘事,画山林脱尽时俗。著有《郁仪楼集》五十六卷、《调象庵稿》四十卷;选刻《文府滑稽》十二卷。尚有《石语斋集》、《始有阁集》、《天倪斋诗》,佚。事迹见李维桢《调象庵稿序》、钱谦益《邹彦吉七十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吴书荫)

【赵南星】(1550—1627) 字梦白,号侗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氏)人。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文选员外郎,方严疾恶,上疏陈四大害,触时忌,乞归。再起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尽量贬斥,因而被严旨落职。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被时人拟之“三君”。后累官至左都御史,慨

然以整齐天下为己任,进吏部尚书,锐意澄清,起用废劄,中外方忻忻望治,魏忠贤矫旨削籍,戍代州,卒于戍所。思宗崇祯(1628—1644)初,谥忠毅。南星主要创作成就在散曲,但也能诗。其诗淋漓峻爽,感情较为充沛,如《寄魏懋权时乃兄以言得罪》:“浮云满天地,吾道竟何其。仕路生俱拙,交情死不疑。鹄鸽君有泪,乌鹊我无枝。昔忆同樽酒,茫茫未可期。”陈田《明诗纪事》评其人与其诗说:“忠毅三历铨曹,一为太宰,激浊扬清,凜不可犯。可谓姜桂之性,老而愈辣。诗亦风骨耸峻。”著有《赵忠毅公集》二十四卷。其生平见姚希孟撰《赵忠毅公墓志铭》(《棘门集》卷三)、高攀龙撰《芥子园先生小传》(《高子遗书》卷一〇)、《明史列传》卷九二、《明史》卷二四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尹恭弘)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举人,后屡次参加会试皆不第。性嗜书,曾购书四万馀卷,筑室贮藏,逐一披览。才力富健,作诗善于铺排,长律可增至二百馀韵,但诗味不浓。倒是他的一些近体诗,还写得清俊朗爽,如《破山寺老衲夜谈作》:“一径入苍翠,飞云袅袅屯。危亭标木末,古刹翳松根。海月时窥牖,山风日扫门。凭呼野衲至,信宿共芳尊。”全篇构成了荒漠幽深的意境。其诗歌创作成就不算太高,但其诗论著作《诗薮》颇有价值,发表了不少有识之见。还著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其生平见王世贞撰《胡元瑞传》(《弇州山人续稿》卷六八)、《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晗撰《胡应麟年谱》。(尹恭弘)

【唐时升】(1551—1636) 字叔达。嘉定(今属上海)人。少有异才,年未三十,谢去举子业。通达世务,好讨论成败兴亡之故,神气扬扬,若身在其间。家贫好施予,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晚年时闭门止酒,味庄、列之微言,以养生尽年。与程嘉燧、娄坚、李流芳并有时名,人称“嘉定四先生”。其诗常对人世间的变幻生发感慨,还对他的闲淡的生活情趣多所描述。与这些内容相适应,其诗风也和畅清浅。在其诸体诗中,五古较优,能较好地写景、抒情、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著有《三易斋集》二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于若瀛】(1552—1610) 字文若,号子步,晚号念东。济宁(今属山东)人。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90)进士,除兵部主事,历郎中。出为河南佾事,历南尚宝少卿,迁通政参议。召拜太仆少卿,以右佾都御史巡抚陕西。卒于官,谥襄敏。其诗不入当时流派,能

自成一家。其古体诗爽朗矫健,如寓言诗《马对》,通过马的对答,表达了诗人“何日罢防边,归马华山阳”的和平愿望,颇有一些艺术感染力量。其近体诗也写得俊逸精警,有一定艺术工力。著有《弗告堂集》二十六卷。其生平见叶向高撰《于公墓志铭》(《苍霞续草》卷九)。(尹恭弘)

【娄坚】(1554—1631) 字子柔。嘉定(今属上海)人。幼好学,其师友皆出归有光之门。以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五十岁贡于国学,不仕而归。晚而学佛,长斋持戒。与程嘉燧、唐时升并称“练川三老”,再加上李流芳,称“嘉定四先生”。在各体诗中,较善古体。其占体诗能刊落浮器,较直率地抒发自己的情愫,生发自己的议论,一般都写得清雅和畅,但时有直率有馀、兴味不足的缺点。著有《吴歙小草》十卷、《学古绪言》二十五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徐媛】 约于明穆宗隆庆至神宗万历(1567—1620)前后在世。字小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太仆徐时泰之长女。少时即能诗文,有“谢娥后身”之称。嫁范允临(又名长倩,字忞岳)。范家道中落,媛劳苦夜织以资家用。背其父暗自变卖首饰妆奁佐助其夫攻读。当时其亲朋以至佣人仆妇无不轻视范允临,而她却能举案齐眉躬自侍夫。不久范得中功名,授任副使。媛随其先后供职于南京、云南、贵州等地,见闻日广,允临职事之余,相互切磋诗文,著作亦日富。为不忘其夫妇当年夜绩苦读之劳,媛名其集为《络纬吟》,编作十二卷。媛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相唱和,吴中士大夫交口而誉之,称吴门二大家。但时论多以为徐稍逊于陆。据《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六引《宫闱氏籍艺文考略》云:《络纬吟》初名《金荃草》,而《然脂集·引用书目》云:徐媛又有《金荃草》,即《络纬吟》稿本,颇有异同。《悲生赋》一篇,即录自《金荃草》,为《络纬吟》所无。《历代妇女著作考》又云徐媛著有《倡和集》,为《江南通志》著录。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及《拜经楼诗话》等书。(陈祖美)

【陆卿子】 约于明穆宗隆庆至神宗万宗(1567—1620)前后在世。名服常,以字行。姑苏(今江苏苏州)人。尚宝卿陆师道之女。十五岁嫁太仓赵宦光(字凡夫)。夫妇隐居寒山,以农耕为生。卿子工于词章,翰墨流布,一时名声昭著。其夫读书不多,然亦爱好著述。卿子学殖优于宦光,二十五岁左右即刻有《云卧阁稿》,未可示人,遂不存录。晚年名重,所著《考槃集》六卷、《玄芝集》四卷为《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诗文与明代另一女作家徐媛齐名,而胜之。人称隆、万间闺流能文者,未见其匹。事迹见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

(陈祖美)

【徐燧】字惟和，号幔亭。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后十多年参加会试皆落第。工诗，为当时张献翼、王穉登等文坛名流所推重。其近体诗注意学习唐人，七律安雅婉丽，属对工巧，七绝声谐调畅，甚有情韵。清沈德潜评论其《邮亭残花》诗云：“绝句七章，词不必丽，意不必深，而婉转关生，觉一种至情余于言意之外”(《明诗别裁》)。其最为用心的创作是五律，曾在《自题小像》诗中说：“五字吟成心独苦，不知身后得传无？”其五律工于发端，清畅婉转。著有《幔亭集》十五卷，编纂《晋安风雅》十二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徐燧】字惟起，一字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徐燧弟。主要生活在明神宗万历(1573—1620)至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家于鳌峰麓，环堵萧然，但富于藏书，积至五万三千餘卷，并仿郑氏《艺文略》、马氏《经籍考》之例，撰《红雨楼家藏书目》四卷。布衣终身。才思敏捷，信手写来皆是诗，一日甚至可得二三十首。曹学佺《和其春日闲居》尝形容其作诗之速：“诗无宿债轻酬客，笔不停耕可当农。”与曹学佺在当时主闽中词盟，后进皆称“兴公诗派”。其诗学唐音，尤长七律。其七律诗能注意诗境的雄浑、声调的谐和。由于他学识渊博，一些咏怀古迹诗，写得哀感苍凉，甚见功力。如《韩文公祠》、《苏长公祠》，通过祠旁凄凉环境的渲染和烘托，使唐、宋两位大文豪的身世显得分外感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兴公藏书甚富，近已散佚，予尝见其遗籍，大半点墨施铅，或题其端，或跋其尾，好学若是，故其诗典雅清稳，屏去粗浮浅俚之弊，与惟和(徐燧)足称二雄。”比较起来，他的其他诗体比起七律来，笔力稍嫌纤弱。著有《鳌峰集》二十六卷、《笔精》八卷。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吴兆】字非熊。休宁(今属安徽)人。少警敏，喜为传奇词曲，游少年场，推为渠帅。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游金陵，留连曲中，与郑之文合作《白练裙》杂剧，讥嘲马湘兰，青楼人皆指目，有樊川轻薄之名。已而自悔，改弦为歌诗。与曹学佺尤相善，偕游闽中诸山及武夷、匡庐、九华，复还白下。久之，别曹学佺归里。后又出游，访故人于岭南，客死于广东新会。其诗早年秾华婉至，中岁以后清真潇洒。其诗的佳处在于能“傅之以性情，斡之以风调，工力并深，兴象兼会”(《列朝诗集小传》)。著有《金陵》、《游闽》、《豫章》、《武林》、《姑苏》、《东归》、《广陵》、《溪上》、《南游》等稿。其生平见李维桢《吴非熊诗序》(《大泌山房集》卷二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

传》。

(尹恭弘)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署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学湖广。万历三十三年，被诸生噪逐，遂卸事归。万历四十八年，召为太常寺少卿。熹宗天启二年(1622)，擢为正卿，命纂《万历事实纂要》。天启三年，升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侍郎，调掌南京翰林院事，纂《南翰林院志》。天启五年，拜南京礼部尚书。时奄竖用事，次年请告归。思宗崇祯四年(1631)，起为故官，掌詹事府事。崇祯七年，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崇祯九年卒，年八十二。福王时，谥文敏。其昌以书画擅名，能集宋元诸家之长，论者比之米芾、赵孟頫，“然其诗、文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词章之学不及孟頫多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由于他精于书画，所以他一些题画小诗，写得楚楚有致，如《长松高士图》：“虬松绣青铜，峭壁立积铁。下有逃虚人，长啸空山裂。”总的说来，其诗歌成就不高。著有《容台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生平事迹又见《启祯野乘》卷七、《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吴书荫 尹恭弘)

【江盈科】(1555—1605)字进之，号渌罗，又号雪涛。桃源(今属湖南)人。农家子，少有异才，颇知苦读，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授长洲县令，与当时官吴县令之袁宏道治所相邻。两人论文谈艺，诗酒唱和，颇为相得。盈科曾为宏道《锦帆集》、《解脱集》作序，并受到宏道性灵说之影响，其持论与“三袁”大体相同，亦以“后七子”复古主义的论诗主张为非。召为吏部主事，在京与袁宗道、宏道等结葡萄诗社，赋诗论学。累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视蜀学政，卒于蜀。盈科出身下层，关注民间通俗文学，故较容易接受公安派之文学主张。其诗作较袁氏兄弟作品更为通俗平易，多用以直书所见所思。袁宏道谓其“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并云：“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雪涛阁序》)著有《明十六种小传》、《雪涛小说》、《雪涛谐史》等。其诗文收入《雪涛阁集》。袁中道为作《江进之传》。

(王学泰)

【呼文如】小字祖。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江夏(治所在今湖北武昌)营妓。知诗词，善琴，能写兰，与其姊举齐名。西陵丘齐雲，字谦之，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于万历四年(1576)以民部郎出守粤，过黄州。郡中宗伯宴请丘生，文如侑酒，遂相悦定情。丘欲携文如东去，丘之父不允，不得已，乃

作书谢绝文如。文如痛不欲生,刺血写诗以报,誓死不渝。后丘又过楚,与文如相见,共订丝萝之约。至万历十年,呼父贪利,将卖文如与商人。时丘已罢官归里,文如买舟夜奔丘处,相与抱持痛哭。丘将此事书报其父,乃成婚礼。丘罢官后无长物,携文如遍游名山,弹琴赋诗以终其身。丘将文如诗作哀辑成帙,名曰《遥集编》,其中以二人情事为题材,唱和甚多,其《刺血寄生诗》云:“长门当日叹浮沉,一赋翻令帝宠深。岂是黄金能买客,相如曾见白头吟。”诗、事见《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陈祖美)

【区大相】字用孺,号海目。高明(今广东高鹤)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历太子赞善、太子中允,改南京太仆丞。大相是继黎民表、欧大任以后又一位重要的岭南诗人。朱彝尊言:“海目持律既严,铸词必炼,其五言近体,上自初唐四杰,下至大历十子无所不仿,亦无所不合。岭南山川之秀,钟此国琛,非特白金水银丹砂石英已也。”(《静志居诗话》)其诗多为写景摅怀、行旅酬赠之作,也有一些关注现实的诗章,如《田家吟》、《过皇店》写明统治层之贪婪,《南行感怀》四十首中的许多篇章写朝廷派宦官出使各地骚扰百姓、民不聊生之情景,这些都是情辞迫切,具有感染力的作品。大相上承南园前、后“五子”,下启明清之际岭南诸名家。在岭南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著有《区太史集》二十七卷。事迹见《明诗纪事》庚签卷一。

(王学泰)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号鸾啸生、亘生、庚生、冰华生、天都逸史、天都山史、山民、髯翁等。歙县(今属安徽)人。太学生,自幼从汪道昆游,年长科举不得志,遂弃去,肆力于诗。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入汪氏白榆社,文名鹊起,任侠好游,足迹遍吴、越、齐、楚、燕、赵,广交文坛耆宿,互相赠答唱酬,袁宏道称为“诗侠潘髯”(《致钱象先》)。尤酷好戏曲,年五岁,于汪道昆家筵观海盐腔女演员金凤翔演出,后侨居金陵等地,征歌选伎,品评剧艺,研讨曲派流变,为各色艺人撰写传记。其为诗“感事而发,触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语”(汤宾尹《兼葭馆诗集序》)。王世贞亦谓其诗“质文剂矣,情实谐矣,抑扬顿挫足矣,可以雄矣”(《潘景升诗稿序》)。著述丰富,今存《涉江诗选》七卷、《漪游草》三卷、《鸾啸小品》十二卷、《亘史》六十卷、《黄海》、《三吴杂志》等。散佚者有《鸾啸轩诗》、《冶城草》、《戊己新集》、《金闾集》、《潘庚生诗集》等十余种。今人汪效倚从《亘史》、《鸾啸小品》中辑出有关戏曲部分,成《潘之恒曲话》一书。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及其本集中。

(吴书荫)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自号空青先生。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幼颖异,能文章。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馆于娄江王锡爵家,伴其子衡读书支硎山,多所唱和,结为知交。万历十二年,同应应天乡试,皆落第。万历十四年,焚弃儒衣冠,隐于小昆山。思宗崇祯元年(1628),受聘纂《松江府志》。崇祯十二年,卒于东余山之精舍,时年八十二。继儒博学多识,以山人游于公卿间,声倾朝野。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工诗善文,尤以短章小品为世所重。书法苏、米,兼擅绘事。生平著述甚富,有《陈先生眉公集》六十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散曲《清明曲》一卷、《古今诗话》八卷、《余山诗话》三卷、《眉公杂著》四十八卷。还辑有《乐府先春》三卷。《文奇豹斑》十二卷、《国朝名公诗选》十二卷。《明史》卷二九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传。事迹又见自撰《陈空青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一五)及《眉公府君年谱》(《全集》卷首)。(吴书荫)

【吴稼竳】字翁晋,号大涤先生。孝丰(今浙江安吉)人。父维岳,为嘉靖“广五子”之一。以父任为郎,官南京光禄寺典簿,累迁云南通判。为人简默寡谐,与臧懋循、吴梦旸、茅维相友善,时称“苕溪四子”。弱冠称诗,为王世贞、汪道昆所推许。钱谦益谓其“游弇州、大函之门,风声气韵,多所熏染。求其超乘而上,则未能也”(《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云:“翁晋乐府,如健儿骑骏马,左右驰突,靡不如意。近体颇合西昆,然摹古终太有痕也。”(《静志居诗话》)著有《玄盖副草》二十卷。又有《北征》、《南谐》、《滇游》诸稿。事迹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吴梦旸《玄盖副草序》及李维桢《吴翁晋诗序》(《大泌山房集》卷二十四)。(吴书荫)

【谢肇淛】(1558?—1614?)字在杭。长乐(今福建福州)人。少博学能诗文。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湖州推官,量移东昌,迁南京兵、刑二部主事,转工部郎中,视察黄河于张秋镇,作《北河纪略》,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为后世治黄河者所重视。升云南参政,历广西按察使,至右布政使,有善政。肇淛诗多写游宦生涯,其中记行记游、题赠奉酬之作占其作品绝大部分,如《宫人斜》、《过隋宫》、《送徐兴公还家》等皆是此类作品。其诗犹有明初闽派遣风,以七律、七绝见长。其中之名篇佳句,如张幼于所云:“其辞宛以丽,其气雄以健,其摅思优以隽,其援事典以则,其振响和以平。”(转引自《静志居诗话》)著作甚富,有《史觚》十七卷、《滇略》十卷、《北河记》十三卷、《五杂俎》十六卷、《小草斋集》三十卷。《明史》卷二八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下有传。

(王学泰)

【袁宗道】(1560—1600) 字伯修,号石浦。公安(今属湖北)人。宏道长兄。少聪颖,十岁能诗,年二十即编有诗文集,并立志“此生以文章名世”。不乐仕进,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以父命进京会试,至黄河边而返。万历十四年,迫于父命,再次进京,考中会元,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奉使湖北,请假还乡,与弟宏道两次至麻城会李贽,受到“以禅诠儒”学说的影响。万历二十二年,再度入京复职,改任太子春坊中允,擢为右庶子。在京期间,与其弟宏道、中道、谢肇淛、黄辉、江盈科、钟起凤等组织葡萄社,诗酒唱和,相得甚欢。后卒于京。光宗泰昌元年(1620),追赠礼部右侍郎。宗道年轻时曾好李攀龙、王世贞诗文,入翰林后厌复古之学,遂与同馆之黄辉排击复古派理论,曾撰《论文》二篇,文中指出李、王“持论大谬,迷误后学”,并言:“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其论已开“性灵说”之端。清朱彝尊曾言:“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静志居诗话》)宗道诗不如乃弟宏道、中道,以写日常生活琐事及其对隐逸、闲适生活之向往为主。诗风平稳畅达,和易清秀,如《食笋鱼》、《春日闲居》等皆可视为其代表作品。著有《白苏斋集》。袁中道为撰《石浦先生传》。《明史》卷二八八、《明史稿》卷二六九、《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皆有传。(王学泰)

【黄辉】字昭素,一字平倩。南充(今属四川)人。幼颖异,稍长,博览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时同馆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而黄辉的诗与书,均与之齐名。历中允、谕德、庶子,官终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其诗风劲健奇崛,所作的古体诗《石鼓歌》就体现了这一特色。陈田《明诗纪事》认为:“明人咏石鼓诗,大复(何景明)而外,此为杰作。”其近体诗,也大多笔锋劲健,如《宿阆乡时河南岁荒甚》:“周原秦塞两苍茫,徙倚桃林正夕阳。真气西来千嶂紫,浊河东去六州黄。何堪大泽哀鸿雁,耐可重关踞虎狼。虚博采风随堠吏,龙泉剩有旧时装。”读来有厚重之感。他虽与公安三袁相友善,有相近的文艺观,但诗风却有所区别。著有《铁庵集》八十卷、《平倩逸稿》三十六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龙膺】(1560—?) 原字君善,后改字君御,号朱陵,别署鹢公、纶叟,又号太虚里人,偃骨无学人、鹫人、醒翁,晚号渔仙长。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进士,任徽州府推官。因以

“诗酒诳吏议”,于万历十四年罢官归里。后调温州府学教授,稍迁国子博士,升礼部祠祭司主事,复谪浙江盐运判官,转巩昌府通判,历同知,迁南户部员外郎。久之,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整饬甘山兵备分巡道副使。万历四十四年,任山西参政。终官南太常寺卿。工诗文,任官徽州时,值汪道昆致仕家居,入汪氏所主持之猗中诗社;又与汪氏及屠隆、吕玉绳、沈明臣、梅鼎祚、潘之恒等结白榆诗社。万历二十二年秋,游扬州,与陆无从等结横山社。其古近体诗皆有一定功力。古体长于铺陈,如《宿废邑端氏古刹偶书》,幻化出一个令人遐想的艺术境界,读来颇有兴味。近体诗较注意锤炼,时有精严之作,如《得袁中郎小修洛下书并出塞诗用韵和答》等。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称其为“嘉、隆后楚风之劲者”。著有《纶隐》、《九芝》、《湟中》、《晋宁》诸集,其后人编定增辑为《纶隐文集》二十七卷、《纶隐诗集》十九卷。亦善词曲,有传奇《蓝桥记》、《金门记》,已佚,散曲两卷,收入诗集中。事迹见《沅湘耆旧传》卷二〇、《明诗纪事》庚签卷一三。今人叶德均《明代曲家龙膺》(《戏曲小说丛考》卷上),对其生平考订较详。

(吴书荫 尹恭弘)

【陶望龄】(1562—1609) 字周望,号石簪,又号歇庵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南京礼部尚书承学子。少读书金陵,即有文名。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与同官焦竑、黄辉及袁宗道游,讲性命之学,精研佛典。历官中允、谕德。万历二十三年秋,卸职归。望龄最推崇徐渭其人其文,万历二十八年,应商濬约,论次《徐文长三集》,并为作序;又撰《徐文长传》。万历二十九年,入都,起用为国子祭酒。万历三十六年,卒,年四十八,谥文简。望龄工诗、文。钱谦益云:“周望于诗,好其乡人徐渭。……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黄辉)、周望为眉目云。”(《列朝诗集小传》)黄汝亨评云:“陶子诗为陶为柳,间似长吉。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明诗综》)著有《水天阁诗集》十卷、《歇庵集》十六卷,后者今存明万历(1573—1620)年间刻本及熹宗天启七年(1627)《陶文简公集》十三卷本。《明史》卷二一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均有传。事迹又见黄汝亨《祭酒陶先生传》(《寓林集》卷一一)。(吴书荫)

【归子慕】(1563—1606) 字季思,号陶庵。昆山(今属江苏)人。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季子,年十四五即能作文,佳篇秀句,传于乡里。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参加进士考试,不第。为人恬淡、安贫乐道,屏居江村,筑室陶庵,不与衣冠之会,不诣州府,不受当权者馈赠,不为宗族争讼,不为子侄干请。

与无锡高攀龙、嘉善吴志远相友善,三人以道学相砥砺。以病卒。常熟县令私谥清远先生,思宗崇祯(1628—1644)初,诏追赠翰林院待诏。子慕以学陶潜为人自许,诗亦似之,其作品以五古为多,多用以摅写自己恬淡之襟怀。故许令典言:“其诗靖节,令人翛然。”(《陶庵遗稿跋》)朱彝尊言:“季思诗学陶而得其神髓,韦苏州后,鲜有其伦,诵之令人增簞瓢陋巷之乐。”(《静志居诗话》)其代表作品有《杂诗》(有生不暂静)、《暮春》(为欢不卜日)、《五月五日采药》、《戊戌秋夜不寐》、《江村》、《移居》、《西窗》等。其诗风质朴,铲尽华泽,专趋简淡,终因太似陶潜,缺少独创,题材亦较为狭隘,但其个性还是在诗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著有《陶庵遗稿》三卷,《割记》二卷、《续稿》一卷。戴瓚、高攀龙、张大复皆为作传。《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亦有传。

(王学泰)

【孙承宗】(1563—1638) 字稚绳,号恺阳。高阳(今属河北)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沉毅有智略,尤晓畅边事。熹宗天启(1621—1627)初,累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又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在关四年,成绩卓著。因遭魏忠贤阉党连连疏诋,乞归。思宗崇祯二年(1629),又起守通州,三年后引疾归。崇祯十一年,清兵攻高阳,他率家拒守。城破,投缳而死。谥文正。其诗不问声病,不事粉泽,但有一股卓犖沉潜之气。也善词。如《阳关引》(无那杨花闹)抒写“仗剑对尊酒”的豪情,《塞翁吟》(云叶才生雨)表现“痛饮黄龙”的信心,皆有阳刚之美。而《浣溪沙》(谁写南溟玉一湾)描写闲情,则又是另一副笔墨。词作成就胜过其诗。著有《高阳集》。其生平见钱谦益撰《孙公行状》(《初学集》卷四七)、孙铨撰《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五卷、《明史》卷二五〇。(尹恭弘)

【程嘉燧】(1565—1644) 字孟阳,号松圆,又号偈庵。原籍休宁(今属安徽),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少学制艺,不成,改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诗。年三十,遂以诗名。在里中与唐时升、娄坚并称“练川三老”。谢三宾刻“三老”及李流芳四人诗集,题曰《嘉定四先生集》,于是嘉燧又被视为“嘉定四先生”之一。一生不仕,寄食于人,早年曾客于大僚顾养谦。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随故人长治县令方方叔居于潞,后又随之入京,为公卿所瞩目。思宗崇祯(1628—1644)间,钱谦益罢官家居,筑耦耕堂于拂水,邀嘉燧偕隐,前后十年。崇祯十四年(1641),嘉燧归休宁,卒于乡。其诗特别为谦益所赏,卒后,尊之为松圆诗老。嘉燧一生落拓,其诗多描写下层文士之清寒生活,抒发不平之鸣,反映了沉

沦于下层文人之悲哀。其题材虽然陈旧,但多清词丽句。七言律体以深稳清切见长,为时人所重。钱谦益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体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列朝诗集小传》)如《风雨》、《放歌行》、《忆金陵杂题画扇》,皆为其代表作品。由于钱谦益对嘉燧诗评价过高,有阿其所私倾向;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则故意贬低程诗,言其“格调卑卑,才庸气弱”,亦未尽公允。著有《松圆浪淘集》、《松园偈庵集》、《耦耕堂集》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王学泰)

【李日华】(1565—1635) 字君实,号竹嬾,又号九疑。嘉兴(今属浙江)人。幼有文名,与其表叔周履靖比屋而居。周氏抚之曰:“他日文章风雅宗也。”并为延奖名公卿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九江推官,降授西华知县。万历四十四年,迁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熹宗天启(1621—1627)中,起尚宝司丞。思宗崇祯元年(1628),升南京太仆寺卿。崇祯八年卒,年七十一。日华能书善画,好古博物,尤精于鉴赏,仅次于同时的王惟俭、董其昌。其为人,和易安雅,淡于仕进,先后家居二十余年。诗如其人,其诗风也是安雅清淡,表现其恬淡心境。如《秋日独坐怀南湖醉游》:“秋雨淡无色,高梧翻昼阴。鸟来窥散帙,客到罢弹琴。世态交游见,风期山水深。南湖好风月,梦里亦追寻。”其数量甚多的题画诗还表现了他精于画艺的艺术修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云:“其诗非选非唐,别裁风格,颇与王辰玉、陈仲醇同流,微尚纤艳。”著有《恬致堂集》四十卷(卷十为诗馀)、《恬致堂诗话》三卷、《六砚斋笔记》总十二卷、《紫桃轩杂缀》总七卷、《竹嬾画媵》二卷及《味水轩日记》。《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嘉禾徵献录》卷四七均有传。

(吴书荫 尹恭弘)

【邓云霄】(1566—1632) 字玄度,号虚舟。东莞(今属广东)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登进士第,授长洲县令。万历三十三年,赴京考选,在北京二年,常同张萱、韩上桂、许自昌等过从社集。万历三十六年,迁南京户科给事中。后出为湖广衡永兵巡道,历官四川参议、陕西西安府驿传道、广西梧州府苍梧道、广西布政使司参议。熹宗天启四年(1624),丁继母忧,归后不复出。思宗崇祯四年(1631),遭诬陷,于十二月初九日(已入1632年)发愤病卒,年六十六(仍按旧历计)。云霄工诗文,其诗不乏同情民生疾苦、抨击税监、慨叹仕途险恶之作。钱允治称其诗云:“先生之作具在乐府,脱去蹊径,翩翩欲仙;古诗自运机轴,咄咄逼真;近体与时高下,传以神采,皆超

诣卓越,有言外意。”(《百花洲集序》)亦喜填词度曲,撰有杂剧《竹林记》。著作行世者有《百花洲》、《浮湘》、《漱玉斋》、《竹浪斋》、《紫烟楼》、《西征》、《解弢》、《白下》、《镜园》诸集,共十九种。今存《百花洲集》二卷(其后附有《燃桂稿》、《越鸟吟》、《秋兴集》)、《漱玉斋文集》三卷。事迹见邓逢京《虚舟公传》、姚希孟《邓虚舟先生传》(《漱玉斋文集》卷首)。

(吴书荫)

【汤宾尹】(1568—?) 字嘉宾,号霍林。宣城(今属安徽)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授编修。万历三十八年,由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次年,因充同考官时私门人韩敬,被劾罢官。熹宗天启六年,辑自有宣城以来之文事,为《宣城右集》。宾尹以制举业名于当时,诗则多应酬之作,非其所长。今存《睡庵稿》二十八卷、《宣城右集》二十八卷。事散见汤显祖《睡庵文集序》(《汤显祖诗文集》卷二九)、顾起元《大司成霍林汤公五十序》(《懒真草堂集》卷一)。

(吴书荫)

【袁宏道】(1568—1610) 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又称六休。公安(今属湖北)人。少聪颖,幼工诗文,闻于乡里。年十六为诸生,结诗社于城南,自立为长,为同侪所服。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过公安,宏道曾向其请教。万历二十年,成进士,在京拜识了著名学者焦竑。竑与李贽为知己之交,故宏道有“自笑两家为弟子”之句。成进士后归乡,曾两度前往麻城拜访李贽,深受其影响。其弟中道曾说:“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行状》)可见袁氏之提倡性灵,反对复古是受到李贽启发的。万历二十二年,到北京候选,结识了汤显祖、曹学佺、董其昌等名士;当年十二月,被选派为吴县知县。在吴县任上,任事敏捷,勇于裁断,公庭鲜事。公余与士大夫谈诗论文,始揭复古主义之旨。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官而去,归乡前,游历了杭州、桐庐、山阴、无锡、歙县等地山水,作了大量诗、文,并形成了清新活泼、鲜明秀逸之诗风。万历二十六年,起复为顺天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在京期间,与其兄、弟以及谢肇淛、黄辉、钟起凤、江盈科等人组织葡萄诗社,诗酒唱和,过从甚密,并进一步宣传其反复古的文学主张。万历三十八年,告病归养。乡居期间,检讨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及其流弊。六年后,再度出仕为礼部主事,擢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之法,遂为定制。迁为稽勋郎中,后谢病归,卒于乡。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齐名,并称“三袁”。他们创立了反对模拟剽窃文风、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宏道

分析当时文坛状况云:“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抄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叙小修诗》)他认为文学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抱残守缺,崇古贱今,是完全错误的。尝言:“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他主张文学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并认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答李元善》)这些论点一出,明前、后七子的影响受到削弱,如钱谦益所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列朝诗集小传》)宏道诗作尚妙悟,贵创造,任自然,重机趣,多为即景抒情之作,用以表达自己热爱自然、厌恶拘束、狂放不羁的个性,如《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为山林韵》、《闲居》六首、《和进之杂咏》四首,皆是此类作品。其诗中也有不少关心现实、批评时政、同情人民、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如:《索通谣》写东南地区日益富庶而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猛虎行》鞭笞矿监税使之贪婪凶残;《古荆篇》揭露张居正为相时的奢侈腐化。诗中还有一些揭露神宗刻酷寡思与宦官横行的作品。诗风清新流畅,活泼平易,语言通俗浅显,使当时读者耳目一新,从之者甚众。如《明史》所言,“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而人们之竞相摹仿学习导致一些庸碌之辈发展了公安派的弱点,使得诗坛“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宏道本人诗中,也有一些流于鄙俗轻佻,或坠入恶趣。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例举的《偶见白发》、《西湖》,皆属此类。其诗、文收入《袁中郎集》,另有《广庄》、《觴政》、《瓶史》、《珊瑚林》、《西方合论》等杂著。袁中道为撰行状。《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有传。(王学泰)

【胡震亨】(1569—1645?) 字孝辕,号遁叟,又号赤城山人。海盐(今属浙江)人。博学多才,少即以经济自负。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屡会试不第,选为固城教谕,迁合肥知县。思宗崇祯(1628—1644)中,以荐补定州知州,擢兵部职方员外郎,乞归。震亨家中富藏书,日夕探讨,校读精勤,编成《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此书辑录有唐一代诗作,卷帙浩繁,搜罗宏备,为私家总集纂辑之冠。此编发凡起例于熹宗天启五年乙丑(1625),历十年而成,书中诗人小传考订诗人生平,旁征博引,尤具学术价值。其《癸签》广泛搜辑有关评论及阐释唐诗的资料,作了精密的类比与安排,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对唐诗的源流与演变、体制形成、风格高下、作家短长、常用词汇的解释与考订、总集别集的

编订与流传,皆作了系统的评述,为唐诗学中重要著作。还著有《读书杂记》、《海盐县图经》、《李诗通》、《杜诗通》及《赤城山人稿》等。《嘉兴府志》有传。

(王学泰)

【高出】字孩之。莱阳(今属山东)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除大名知县,改曲周,再改卢氏,迁南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苏松参议,进副使,仍治兵备事如故,钱谦益曾写《赠苏松兵使高君加衔留任序》。后迁河南参政,改易州道。调辽东道监军,进按察使,降副使、广宁道监军,改西平堡监军。辽阳失,被逮下狱。其诗擅长五古,既具有阮籍那种忧患意识,又具有谢灵运工秀的特长。著有《初删稿》六卷、《槎亭稿》二卷、《山中识遗稿》一卷、《卢隐稿》六卷、《郎潜稿》六卷、《拘幽集》四卷。其生平见钱谦益所作序及陈田《明诗纪事》。(尹恭弘)

【谢三秀】字君采,一字之瑞。贵阳(今属贵州)人。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以贡生为教官,后弃职作万里游,足迹遍及湖湘、江右、吴越一带,与当地文士骚客游,交流了创作经验。他是一位忧时感世的现实诗人,如《藁州乱后有述》所咏叹的“凄风断角吹残垒,落日哀猿啸废城”的凄凉景象,《村行即事》所描绘了“逢人皆菜色”的社会现实及生发的“相对说兵戈”的感慨,都渗透着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不事模拟,善于自由地抒写情愫,能自成一格。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论其诗说:“君采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著有《雪鸿堂集》、《远条堂稿》,前者已佚,后者今存。其生平见朱彝尊《明诗综》、陈田《明诗纪事》。

(尹恭弘)

【宋懋澄】(生卒年不详)字幼清,其先人为宋宗室,汴(今河南开封)人,南渡后,家于杭,宋亡,因以国为氏,入明,迁松江(今上海),为当地大族。幼孤,年十三能为诗文,不乐循规蹈矩,慕战国烈士之风,私习古兵法,散家结客,欲建不世之功;因无以自见,则寄于狂歌痛饮之中。礼俗之士,嫉之如仇,屡欲陷于罪,皆以智术得免。年三十馀始折节为儒,北游京师,为太学生,所交皆海内豪士。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三上春官皆不第。为人仗义轻财,急人之难,不问识与不识。人有急,夜半叩门求千金,无不立应者;非其人,则一介不与。其抵掌论时事,多有预见,尝感叹曰:“二十年后,天下将有兵,而我不及见也。”(《宋幼清先生传》)终年五十一。懋澄为人慷慨豪宕,其诗品亦似之。李雯云:“其诗激烈,声多商羽,似孤城严角,夜临秋风。”(《皇明诗选》)其代表作品有《游子吟》、《思妇吟忧国计也》、《离别引伤怀人也》、《送叔父游燕赵》等。有《九籀集》。陈子龙为

之作传,吴伟业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宋登春】字应元,号海翁。新河(今属河北)人。主要生活在明世宗嘉靖(1522—1566)、神宗万历年(1573—1620)间。少能诗,善画。年三十,一岁中妻、子、女五人皆死,遂弃家远游。晚依其兄子,居江陵之天鹅池,自号鹅池生。徐学谟守荆州,深敬礼之。后学谟致仕归,登春访之吴中,买舟浮钱塘,径跃入江水以死。其诗能自写情愫,诗风雅淡和畅。有《宋布衣集》。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尹恭弘)

【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鳧隐。公安(今属湖北)人。早慧,十馀岁撰《黄山》、《雪》二赋,五千馀言,为人称道。及长,以豪杰自命,走马击剑,呼卢纵酒,泛舟西陵,走马塞上,尽情游览了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一带,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约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与二十一年间两度随其兄宗道、宏道至麻城拜访李贽,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万历三十一年中举,四十四年登进士第,授徽州府教授,迁北京国子监博士。后要求回南改任南京礼部主事。熹宗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因病乞休,卒于官。中道为公安派中坚,与其兄宗道、宏道并称为“三袁”,其论诗亦坚持公安派主张,但亦看到公安理论的弱点,对其空疏、偏颇之病有所修正。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曾言:“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顰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对于公安派末流有所批评。宏道称中道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诗以描写山水风光、抒发“贫病无聊之苦”、痛陈“哀生失路之感”者为主。其诗风如宏道所言:“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叙小修诗》)《邕城道中》十首、《铜雀砚歌为黄观察赋》、《七夕同彭长卿中郎》、《雨变》、《感怀诗》五十八首,皆可以视为其代表作。其诗早年较为浅易,活泼生动是其长,其短处则流于露。其中年以后作品则有意向幽深奇崛方面发展,与后起的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诗风有一致之处。著有《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珂雪斋集选》、《游居柿录》等。今人钱伯城合为一集,总名《珂雪斋集》。《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有传。

(王学泰)

【谢士章】字含之。普安卫(今贵州盘县)人。主要生活在明神宗万历(1573—1620)至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除增

城知县,于衙斋内构建秋似亭。迁南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后出为重庆知府。他淡于仕进,性耽吟事,诗作常表现诗人这种恬淡的心境。与其恬淡的性情相呼应,诗风也幽闲雅淡。陈田《明诗纪事》指出:“明代黔中诗人,以谢君采(三秀)为称首。舍之生于天末,不染当时气习,与君采同,诗品亦在君采之次。”著有《计偕》、《笑玉轩》、《退食轩》、《秋似亭》、《罗浮》、《七星岩》、《燕台》、《懒云》、《郢中》、《巴音》十集,今均佚。其生平见陈田《明诗纪事》。

(尹恭弘)

【刘荣嗣】(?—1638)字敬仲。曲周(今属河北)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除户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出为山东参政,历布政使,入为光禄寺卿,顺天府尹,拜户部右侍郎,擢为工部尚书,衔命治河。时骆马湖溃,运道填淤,乃创挽黄之议,起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运,三年绩用弗成。南给事中曹景参上疏纠劾,下狱论死。崇祯十一年,狱未解而卒。其诗常能忧时伤怀,有一定的现实感。诗的风格清逸流畅,甚少伉爽奇崛之辞,所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其虽为北人,却操南音。著有《半舫集》,今已佚。其生平见《启祯野乘》卷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又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临终受戒,自号断残。祖籍吉安(今属江西),高祖始移居竟陵(今湖北天门),遂占籍焉。少时体弱多病而努力向学,笃好诗文,十八岁补诸生,困于诸生十二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次年,与谭元春订交。万历三十六年,遭丧子之痛,狂走南京,与林古度兄弟游。万历三十八年,登进士第,授行人,曾使蜀及典试黔中,稍迁工部主事,后改南京礼部主事,迁郎中,出为福建提学佾事。熹宗天启二年(1622),丁父忧去职,由闽经武夷、杭州、吴门还乡。惺倾心学佛,乡居注《楞严经》,草《家传》,注《楞严经如是说》十卷。天启五年,病亟,为《告佛文》,发愿受五戒,卒。惺论诗,注重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强调独创性,为矫公安派的俚俗轻率之弊,“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列朝诗集小传》),其所求的“真诗”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诗归序》)这一对诗境的理解,则不免过于狭窄,是认为只有表现“幽情单绪”、“孤行”、“独往”的作品才可称为“真诗”。故其所作诗也多运瘦硬雄健之笔刻画奇山异水、幽谷险境,以抒发其落落寡合、孤芳自赏之情。其中有些是托物言志,以物喻人,表现其不肯趋附权贵的耿介性格。其代表作品有《红叶》、《坠蝉》、《桃花涧古藤歌》、《邨中歌》、《江行俳

体》、《邸报》等。诗的取境大多幽深孤峭,构思巧妙奇特,用语避熟就生,喜用险韵。惺开创了竟陵派,其作品则成为该派作者模仿的对象,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又与谭元春编选《古今诗归》五十一卷,其目的在于“引古人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求古人真诗所在”(见《古今诗归序》),作为开宗立派之经典。但钱谦益谓其“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而寡陋无稽,错谬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策以攻其短。《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洫之盈于是乎涸然无馀地矣。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馀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列朝诗集小传》)。于此可见钱氏对竟陵派之评价,在明末清初,此论颇有代表性。惺著有《史怀》二十卷、《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禹贡合图纂注》一卷,编选、批注了《诗经》、《左传》、《汉书》等,另编有《古今诗归》、《周文归》、《秦汉文归》、《唐宋八大家文选》、《宋文归》、《名媛诗归》等。其诗文收入《隐秀轩集》。谭元春为撰《墓志铭》,今人李先耕、崔重庆为撰年表。《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有传。(王学泰)

【冯小青】名玄玄。明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容态妙丽,通文翰,解声律,精诸技。十六岁嫁武林(今杭州)冯千秋为妾。古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臆说,故讳之,只称小青。婚后为冯千秋正妻所嫉,无奈徙杭州西湖孤山别墅独居。因其青春失意,年仅十八岁便抑郁而卒。著有《焚馀草》、《翠楼集》,明刊本附于《风流院传奇》之后。关于冯小青其人,一说“小青”二字合为“情”字,为假托之名,并无此人;一说姓钟,“钟小青”即为“钟情”。然其《焚馀草》所收十二首诗中,有一首《与杨夫人书》,即是小青与其亲戚杨淇园夫人诀别时的赠诗。杨夫人很同情小青,曾劝她另嫁,小青未从。有杨氏后人幼时见过小青手书,其夫确为冯千秋云云。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六引《西泠闺咏》等。(陈祖美)

【傅汝舟】字远度。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幼孤,奇崛好古,读书能知大意,矢口辨驳,多有别解。好谈经济大略,矫尾厉角,人无以难。著述颇多。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自序所作《七幅庵草》;万历四十四年,自序所作《步云集》;万历四十七年,自序所作《拔剑集》。熹宗天启五年(1625),自定《藏楼集》。思宗崇祯九年(1636),邹典作《白日掩荆诗》,

征求傅汝舟、邢昉等人共作,由此可见,傅汝舟当卒于此年以后。除上述著述外,还著有《箴篋集》、《唾心集》等,合称《远度十集》。其诗好为怪诞之辞。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其“为诗皆牛鬼蛇神,旁见侧出”,指出了其诗的特点。其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冒愈昌】(?—1633)字伯麀。如皋(今属江苏)人。为学官弟子,有时名,负气伉直,为怨家所中,浪迹避地,遍游吴、楚间。作诗敏捷,千言不草,矫尾厉角,舌辩如悬河,所至士大夫皆畏而礼之。曾游王世贞、吴国伦之门。王、吴怜其才,每为白其冤状。明神宗万历(1573—1620)末年,抨击七子者日众,他依然恪守师说,抗词枝柱,愤楚人之訾訾,至欲以身死之。他虽然奉王世贞、吴国伦为祖祢,但其诗作并不太袭七子流派。其五律、七律皆写得清圆流动,有一些诗读来还颇有情趣。著有《金陵集》、《绿蕉馆集》等。其生平见李维桢撰《冒伯麀诗序》(《大泌山房集》卷二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又号雁泽。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南京大理寺正。居闲官七年,肆力于学。累迁为南京户部郎中,调四川右参政、按察使。熹宗天启二年(1622),降为广西参政。天启六年,迁陕西副使。挺击案起,学佺著《野史纪略》,直记此案本末,得罪权宦魏忠贤,除名为民。思宗崇祯(1628—1644)初,复起为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于石仓园中,编《石仓历代诗选》(一名《石仓十二代诗选》),有五百零六卷之巨,自上古至明,蔚为壮观,盛行于世。学佺曾感慨,释、道二家皆有“藏”,独儒家无,于是着手编辑《儒藏》,耗时十馀年,因两京破,明亡,遂未就。唐王立于闽中,授学佺为太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清兵入闽,唐王败。学佺逃入深山,投缢殉国,谥忠节。一生写诗数量极多。钱谦益谓其“入蜀以后,判年为一集者,才力渐放,应酬日烦,率易冗长,都无持择”(《列朝诗集小传》),可知其诗歌以应酬之作为多,但其中也有不少富于社会内容者,如《静志居诗话》所举:《泰昌皇帝挽歌》描写宫廷斗争的激烈;《送李元白擢淮扬运长》写朝廷对江南赋敛征求之繁剧;《送茅止生北征》写内乱外战不止,皆极具现实意义。其诗风格清丽,其佳句“明月自佳色,秋钟多远声”,为程嘉燧所激赏。一生著作甚富,除《石仓历代诗选》外,还有《易经通论》、《周易可说》、《书传会衷》、《春秋阐义》、《舆地名胜志》、《蜀中名胜记》、《西峰字说》、《凤山郑氏诗选》、《石仓诗文集》等。《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有传。

(王学泰)

【陈鸿】(1575—1647)字叔度,一字轩伯。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起于寒微,自幼能诗,曹学佺招其入诗社。曾集于听泉阁,鸿有“一山在水次,终日有泉声”之句,曹学佺大加叹赏,因此名声大著。卒年七十三岁,贫不能葬,同社醵金,与莆田布衣赵十五合葬于福郡小西湖之侧。其诗清婉雅丽,时带凄凉色彩,如《淮阴旅怀》咏叹:“杨柳已凋终馆恨,靡芜虽死亦关愁。”这种情调与诗人的寂寞的身世密切相关。在诸体诗中,尤擅律诗,构思精巧,属对工警,确有一些上乘之作。著有诗集《秋室篇》,取李贺诗“秋室之中无俗声”之义。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沧庵、慎娱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后三次参加会试皆落第。熹宗天启二年(1622),广宁陷,京师震惊,遂束装南返,作《南归诗》以志慨。归里,筑檀园,读书其中,绝意进取。性好佳山水,曾数次至西湖,诗酒笔墨,淋漓挥洒。与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并称“嘉定四先生”。颇关心时事,时魏忠贤专权披猖,他往往中夜叹息饮泣。魏忠贤建生祠,他坚不往拜,并说:“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最后他沉浸于佛教,病中仍手书《华严》不辍。其诗风清雅简淡,逸气飞动。钱谦益谓“其持择在斜川、香山之间……晚尤逊志古人,草书杜、白、刘、苏诸家诗,至数十巨册,故于诗律益细”(《列朝诗集小传》)。著有《檀园集》十五卷。其生平见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四)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尹恭弘)

【王思任】(1576—1646)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谿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兴平、当涂、青浦知县,袁州推官。稍迁刑、工二部,出为江西九江按察使佾事。思任为人性刚,在弘光朝中曾上书怒斥马士英专擅朝政、祸国殃民。士英败走至越,思任拒之曰:“我越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污纳垢之地。”清兵攻破南京,鲁王监国于绍兴,任礼部右侍郎,进尚书。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绍兴城破,思任誓不降,闭门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死。思任有隼才,居官通脱自放,不事名检,性好谑浪。钱谦益云:“季重为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岔出。”但又云:“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旗鼓,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列朝诗集小传》)因时乖命蹇,仕途坎坷,仰慕陶渊明为人,思任曾写《律陶》诗一卷以自遣。文多奇趣,尤擅长游记小品。亦兼工绘画,有《溪山孤亭图》等传世。

《明史·艺文志》著录《王思任文集》三十卷,今存《王季重十种》十五卷。还编有《百家诗钞》十二卷等。生平事迹,见邵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思复堂文集》卷二)、《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吴书荫)

【蔡润石】字玉卿。浙江人。约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后期至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前后在世。黄道周之继室。道周曾因上疏指斥大臣杨嗣昌等谪戍广西。南明弘光帝任为礼部尚书。南京失守,与郑芝龙等在福建拥立隆武帝。自请往江西征集军队,至婺源为清兵所俘。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在南京被杀。润石幼读书知大义,十岁能属文,亦能诗。书法学道周,乍看不能辨,尤精绘事。事母甚孝。及适黄,事姑复以孝著。道周殉难前,润石曾致书道周云:“自古忠贞,岂烦内顾,身后之事,玉卿图之。”道周临刑则咬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十六字,从容就义。后润石使长子偕门客之江南,得齿发归葬北山墓侧。流离播越,不脱衰经。晚卜居龙潭,长斋二十载,卒年八十三。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引《玉台书史》、《桥西杂记》。有《蔡夫人未刻稿》一卷附于《黄石斋未刻稿》后,凡诗三十首,间有评语。(陈祖美)

【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之曾孙。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卒业于南京国子监,流寓白下。思宗崇祯元年(1628),官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崇祯十三年,与黄道周同下狱,旋释。崇祯十七年,北京城破,思宗自缢后,避地阳澄湖,呕血死。他的不少游览诗、题画诗,饶有画境。其《柳色》中“楼台远更宜”一句,徐钊认为“非工于画者不能道”。另外,他的《秣陵竹枝词》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风貌,也是难得之作。著有《金门集》、《一叶稿》等。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自幼博学多闻,少时即能诗,二十岁时因佩服同邑钟惺的文学主张而与其结交,合作编选了《唐诗归》、《古诗归》。二书影响颇大,遂使钟、谭之名满天下。早年进学,直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方得中乡试,名列第一。会试屡落第。思宗崇祯十年(1637),再度进京会试,客死于旅店。元春与钟惺齐名,同为竟陵派代表人物,论诗崇尚性灵,又把“性灵”理解为奇趣别理、幽情单绪。元春的主张较钟惺更为偏执,在其《诗归序》中云:“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诗归序》)元春诗作远不如钟惺,如钱谦益所云,其诗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

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列朝诗集小传》)。词虽激烈,但大体符合实际。其诗多写景摅怀以及描写行旅之作,风格冷僻苦涩,词不达意之处,亦屡屡出现。元春与钟惺合作批点了大量的诗文,以宣传竟陵派之论文主张,除古、唐《诗归》外,还有《明诗归》、《宋文归》、《韦苏州集》等。著有《诗触》、《遇庄》以及《谭友夏合集》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王学泰)

【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今属江苏)人。约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至思宗崇祯末(1628—1644)在世,其父沈琬官至山东副使。宜修通经史,工诗词。十六岁嫁同邑叶绍袁(1589—1648)。绍袁曾官工部主事,以母老告归,明亡后隐遁为僧。叶、沈生有五男三女,合家均负才学之名。宜修著有《鸥吹集》,又有梅花绝句百首,题作《雪香吟》。其子叶燮幼颖悟,工诗文,为著名文论家。著有《原诗》及《己畦集》。长女纨纨(1610—1632),字昭齐,三岁能诵《长恨歌》,十三岁能写诗,书法遒劲有晋人遗风。嫁赵山袁氏。崇祯五年(1632),其妹小鸾将嫁,纨纨写了一首催妆诗,诗甫就而小鸾夭折的噩耗传来,因哭妹过悲,发病而卒。所著《芳雪轩遗集》,后更名《愁言》。次女小纨(1613—?),字蕙绸,嫁沈永祯。著有《存馀草》。为伤悼姊、妹早卒,曾作《鸳鸯梦》杂剧。三女小鸾(1616—1632),字琼璋,一字瑶期,貌美早慧,四岁能诵《离骚》,所作七古及绝句视姊为胜,能棋,善琴,工画,所模画山水,落花飞蝶,皆有韵致。十七岁许婚昆山张立平,将嫁而卒。所著《返生香》一卷,原名《疏香阁遗集》。宜修及三女歿后,叶绍袁集宜修《鸥吹》、纨纨《愁言》、小鸾《返生香》诸集,及哀挽伤悼之什,并附小纨所作《鸳鸯梦》,编为一集,总名为《午梦堂十集》,盛行于世。宜修从妹沈静专,字曼君,戏曲理论家沈璟之女,嫁诸生吴昌,亦以诗名。著有《适适草》、《颂占》、《郁华楼草》等。沈氏姊妹及叶氏姊妹之事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苏州府志》、《然脂集》和《午梦堂十集》等。

(陈祖美)

【董斯张】(1586—1628)字遐周,号瘦居士,又称静啸斋主人,借庵先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家世本贵显,至斯张少时,遭变故而日趋衰落。年十二,从乡贤蕲庵先生学诗古文。廪贡生。屡试不第。平生嗜学,耽文史,勤于著述。晚年贫病交加,尤为足病所苦,遂游心佛典,梵呗不绝。工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其“初学诗于周广业,及入闽,心折

曹能始,归与吴允兆、王亦房酬和。是时公安、竟陵派盛行,浙江风气,不尽移易。遐周洽闻周见,与吾郡沈景倩略同,诗亦相似”。有《静啸斋集》,未见,《明诗综》录诗十二首,其他散见于《吴兴艺文志补》、《南浔镇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其“年未四十而卒”;而斯张之孙董裘夏《遐周先生言行略》则云:“崇祯戊辰八月廿四日卒……年仅四十有三。”(见《南浔镇志》卷三五)著有《静啸斋遗文》四卷(收入《吴兴丛书》)、《吹景录》十四卷、《广博物志》五十卷、《吴兴备志》三十二卷。另有《吴兴艺文志》六十三卷,后人补为七十卷。所作散曲存《太霞新奏》中。事迹散见遗文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吴书荫)

【周玉箫】明代闽中(今福建福州)人,商人女,年十七侍武人方輿为妾。玉箫自幼聪颖嗜书。方輿虽武人,读书任侠,妻妾皆谙晓书史。家多书,任其取读。玉箫能过目成诵,且好谈古今节义事,对薄义轻节者极尽针砭,其所作五绝《谢太后》即是对南宋度宗时被尊为皇太后而进表降元的谢道清之嘲讽。方輿因向朝廷建议安抚被称为“红夷”的荷兰人而忤大帅旨意,系狱七年。在狱期间,他曾遣玉箫再嫁,她却誓死不离去。方出狱后,感愤时事,诣阙上书,遇国变又数年不得归。玉箫感慕病歿。有诗一百三十篇,女方蕙刻而传之。以其集中有“悬此贞心托杜鹃”句,命名《悬鹃集》。集中常采古代妇女懿、劣之行,衍为褒、贬之诗以教儆后人。其咏古小诗,尤其史笔。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引《福建通志》等。

(陈祖美)

【黎遂球】(?—1645)字美周。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博学能文,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举人。扬州进士郑元勋集四方才人于影园赋《黄牡丹诗》,诗坛盟主钱谦益为之品题,遂球即席立成十首,冠于群贤,被众呼为“牡丹状元”。清兵南下,奔走救亡。唐王立,授兵部职方司主事,提督广东兵,前往增援赣州,清兵攻城方亟,参与守城,城破巷战,与弟黎遂琪同日殉难。遂球为明末卓有成就岭南诗人之一,其传世作品以描写吴中、扬州一带与作者家乡美丽风光和赏心乐事者为多,特别是描写家乡粤东的诗章既多且佳。诗风风流绮旎、风致嫣然,如徐世溥在《莲鬚阁诗集序》中所言:“始得黎子诗读之,如春风骀荡、夏云崔嵬,如坐百花,杂陈箫韶,美人剑客,翩动左右……”其代表作品《南国篇》、《春望篇》、《同陈秋涛、黄逢永诸公社集南园作》,皆能体现这种风格。遂球也有一些痛快淋漓之作。屈大均《广东新语》云:“美周诗,五古最佳,有《古侠士磨剑歌》云:‘十年磨一剑,绣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

《结客少年场》云:‘生儿未齐户,结客少年场。借问结交时,不属秦舞阳。泣者高渐离,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张子房。感恩思报仇,相送大道旁。’其困守虔州,临危时,击剑扣弦,高吟绝命。有云:‘壮士血如漆,气热吞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鬼伯舐复厌,心苦肉不甜。’一时将士闻之,皆为之袒裼争先,淋漓饮血,壮气腾涌,视死如归。”(转引自《明诗纪事》)这些作品更能反映其烈士之心态。著有《莲鬚阁集》。其生平资料见《莲鬚阁集》所附之传志、祠记像赞等及《广东新语》。(王学泰)

【华淑】(1589—1643)字闻修,号断园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家有小筑曰断园,常引客倡和其中。于诗苦心数十年,别成杼轴。他尝自叙其诗曰:“吾不取一时之好,冀千百年后有一人知我。千百帙中存其一帙,千百篇中存其一篇,而吾二十余年心血或借此一帙一篇以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其诗的特点说:“其诗以清新深婉为宗,虽问津于时人,而能不堕其鬼趣。”著有《雪蕉集》,今已佚。其生平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尹恭弘)

【瞿式耜】(1590—1650)字伯略,一字起田,别号稼轩。常熟(今属江苏)人。家累世贵显,少时受到良好的教育,曾拜在钱谦益门下。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进士第。万历四十六年,任江西吉安永丰县令,有惠政,兼吉水令。熹宗天启元年(1621),调江陵,百姓乞留,遂再任永丰令。天启三年,丁父忧归里。思宗崇祯元年(1628),任户科给事中,上书论政事,多有建白,颇当帝意。后为温体仁等所排挤,使常熟某告钱谦益与式耜贪肆不法,下刑部狱。体仁去位,狱遂解。北京城破,思宗殉国后,弘光帝立于南京,起为应天府丞,迁右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弘光朝为清所灭后,与两广总督丁魁楚奉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式耜在永历朝中担任吏部、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多次提出改革建议,未被采纳。后与张同敞留守桂林,清大军攻城,城破与张一起被俘,狱中拒绝诱降,与同敞赋诗唱和,留下一百馀首以气节相励之诗作,从容就义。式耜诗学钱谦益,工于七律,所存诗多为在广西坚持抗清时所作,诗中记录了永历元年(1647)至四年重大政治与军事事件,充满了爱国激清;特别是其《浩气吟》写于被俘后监禁之中;诗中表达了对入侵者的憎恨和从容就义的决心,极富感染力。著有《瞿式耜集》。《明史》卷二八〇有传。今人瞿果行撰《瞿式耜年表》,附于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刊《瞿式耜集》后。(王学泰)

【王彦泓】(1590?—1642)字次回。金坛(今属江苏)人。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名臣右都御

史王樵之孙。穷年力学,屡试不第,遂纵情声色。曾以岁贡游北京,后被任命为华亭训导,卒于官。彦泓诗传于后世者仅有艳体诗,这与当时风气有关。严绳孙云:“金沙当承平之日,甲第相望,一时裙屐子弟,席华胼,擅才情,平居以声色相征逐,拂袖挂钗、留髭送客之事,习为故常,至于擘笺刻烛,才亦足以副之。故当日能诗之士,盖多其人,而风尚所归,并同一辙。虽其酣嬉荡轶,不可谓为正音,然由后以观盛衰之端,感慨系之矣。”(《疑雨集序》)其诗中格调高者,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思慕,细致刻画了处于爱情之中的少男、少女之心态,如《瞥见》、《忆著》等。侯文灿以为王诗实是借美人香草以摅其愤懑不平之情,他认为彦泓“实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无聊与少陵无家垂老之忧伤憔悴,而特托之于儿女丁宁、闺门婉娈,以写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红粉青楼、裁云镂月之句目之也”(《疑雨集序》)。以此看法印证于王诗,适见其牵强附会之可笑。著有《泥莲集》、《疑雨集》,仅后者传世。其生平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金坛县志》及所著《疑雨集》。

(王学泰)

【吴应箕】(1594—1645) 始字凤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贵池(今属安徽)人。少治诗古文词、推崇前、后七子,善今古文,所点定经义为士子所诵习,极负盛名。为人疾恶最严,于稠人广座,高言指斥,辞气涌射,被目为“狂生”。久试不第,于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中南都副榜。应箕为当时著名社团——复社之中坚。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削籍居南京,联络南北附逆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复社诸人为《留都防乱公揭》声讨之,列名者一百四十余人。南明弘光朝阮大铖得势,谋害复社支持者周铤,应箕独入狱探视,几为大铖所害。清军南下破南京,应箕起兵于贵池,奉唐王正朔,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应箕为著名复社活动家,关注现实政治,其诗大多以重大社会问题为题材。明末社会面貌及各阶层的生活在其诗中有较为全面的反映,如:《南都社集》写复社活动,诗中突出了以道义为纽带的组织力量。《和周仲取十四哀》歌颂了为正义前仆后继而牺牲的东林党人;《五人墓》表彰了为东林党人而牺牲的市井细民。诗中更多的是描写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篇什,如:《何以》写上下互相欺骗,《京口行》揭露官兵如匪;《皇华来》写父子相食;《食土行》写百姓无粮而食观音土的惨状;真是举国危机四伏,没有一块乐土。又如《莫道》、《瓜架》、《又题泥湾》、《春兴》八首,再现了南明覆亡的过程。诗风古朴,不尚华藻,而感情充沛,如伍崇曜所云:“分宜张尔公(自烈)尝称先生人文似陈龙川,诗旨类屈正则,可以飞繁霜、泣鬼神。”

(《楼山堂集跋》)其诗注重氛围的烘托渲染,善于运用赋体。著有《熹朝忠节传》二卷、《两朝剥复录》十卷、《留都见闻录》三卷、《东林本末》六卷、《续觚不觚录》二卷及《楼山堂集》二十七卷。刘城为作传,刘世珩为撰年谱。《明史》卷二七七有传。(王学泰)

【陈子壮】(1596—1647) 字集生,号秋涛。南海(今广东广州)人。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熹宗天启(1621—1627)末,典试江浙,以发策忤魏忠贤,削籍为民。思宗崇祯(1628—1644)初年,起为太子谕德,擢少詹事,进礼部侍郎。以言事忤帝,除名下狱,放还。起为故官,未上,北京陷落,遂南归。弘光帝即位于南京,授礼部尚书。永历帝时,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兵陷广州,形势危急,子壮乃散尽家财募军,于南海九江村起义军抗清。永历元年(1647),各路义师密约攻广州,事泄,兵败,退守高明,旋被俘至广州,不屈而死。与张家玉、陈邦彦合称为“广东三忠”,赠番禺侯,谥文忠。子壮工诗文,其诗仍有岭南诗派流风余韵,长于近体,情声蕴藉,注重词藻,风格高华,因一生多舛,时亦流露出悲怆之气。撰有《练要堂集》、《秋痕集》、《南宫集》、《云淙集》等。并纂辑了《昭代经济言》十四卷。《明史》卷二七八有传。

(王学泰)

【陈子升】 字乔生,号中洲。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子壮之弟。早擅才华,年十五,知府拔冠一郡,目为“奇童”。南明弘光(1645)时,以明经举第一。隆武帝即位于福州,拜为中书舍人。永历帝时,拜吏科给事中,迁兵部右给事中。永历朝覆灭后,潜身草野,布衣终生。子升工诗。钱谦益序其诗云:“乔生学殖富有,才笔日新,以《风》、《雅》为第宅,以《骚》、《选》为苑囿,缚绣凄弦,蒙茸集翠。”子升承继孙蕡在南海所开创的流美诗风。薛冈生序其诗云:“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诗数变,独粤中犹奉先正典型,自孙典籍(蕡)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转引自《静志居诗话》)其诗多怀恋故国、感慨兴亡之作。潘飞声称其诗“伤怀故国,感愤时事,篇中有血,自不可磨灭。如五古摘句:‘子羽不由经,渡江能刺蛟。子房若妇人,椎秦翊汉朝。不为方有为,阖闾成昭昭。’七言律如《蜀中》云:‘当关一士可胜万,分鼎中原翻在边。’《元日》云:‘米汁从今斋绣佛,露盘依旧捧铜仙。’《寄澹归》云:‘何能容易谈天下,只学阿难白世尊。’《寄陈子明》云:‘水国有芦遮伍相,阊门何庀寄梁鸿。’《哭云淙兄》:‘一生心事托弘碧,百粤经营伍子涛。’《喜翁山归》云:‘十年丧乱同王粲,万子归来独子卿。’皆寓沉郁悲愤之意”(《在山泉诗话》)。潘飞声还例举了子升许多勉励自己及他人保持晚节

的诗句。其早年诗风近于李商隐,艳而有骨,入清后折而学宋,气力深厚。著有《中洲草堂遗集》二十六卷。《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杨文骢】(1597—1645) 字龙友,一字山子。贵阳(今属贵州)人。少负奇伟,文章剑术,兼擅其能,尤耽书画。明神宗万历(1573—1620)末举人,除华亭教谕,移家南京,后迁青田知县,改永嘉、江宁知县。思宗崇祯(1628—1644)末,御史劾其贪污,夺官候讯,事未竟,北京城陷,弘光帝立于南京,起用为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迁兵备副使,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常镇,兼抚沿海诸军,与清军隔江相持。后清军渡江,败走苏州。清军使鸿胪丞黄家鼐往苏州安抚,文骢杀之,退至处州。隆武帝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提督军务,清军攻衢州,率兵救援,兵败负重创,退守浦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文骢家南京后,从董其昌学书画,加入复社,日与复社文友谈诗角艺,又性喜交游、推奖士类,颇多友朋。弘光朝其亲戚马士英秉政,迫害清流,文骢却因之而至高位,故为当时所轻;亦因其能以身殉国难,终获后世谅解。文骢善画,喜游山玩水,其诗多为记游、题画之作。如《盘石看月》四首、《游太湖龙咀》、《观海》九首、《暮雨山行》、《题画》(一抹寒林水一湾)等,皆可视为其代表作。陈子龙评其诗云:“有幽峭之思、沉郁之色,壮烈而不失和平,夷旷而中存庄雅。”(转引自《明诗纪事》)著有《山水移》、《洵美堂集》。今人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为之立传。《明史》卷二七七有传。(王学泰)

【祁彪佳】(1602—1645) 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主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名藏书家祁承燾之子。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兴化府推官,历任御史,苏、松诸府巡按。为官正直,关心民生疾苦,在米价腾贵之际,严闭籴,搜囤积,压平粮价,使饥民得食。见朝政腐败,上疏请求退休,家居九年,专做救荒赈济工作,行和籴法、分巢法、设粥厂法、给米法,活民不可胜计。思宗崇祯九年(1636),召掌河南道事。崇祯十七年,北京城陷,谒福王于南京,在南明任右金都御史,巡抚江南。群小诋之,称疾辞官。次年,南京失守,杭州继而陷落,清人劝降,不从,决定一死报国,写了绝命书与“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的诗句,自沉于池。彪佳多才艺,能演戏、蹴鞠,通书画音乐、园林建筑,并撰有传奇《全节记》演汉代苏武故事。其诗传世很少,仅三十馀首,除《遗言》一首为绝笔言志之作外,其他多为宴集亭园的写景之作,如《笛亭》、《酣漱廊》等。诗风清朗明畅,多隽永可诵之句。其妻商景兰亦工诗词。其子祁理孙、祁班孙,媳妇张德惠、朱德

蓉,以及彪佳的四个女儿皆能诗。彪佳传世的全部著作皆收入《祁彪佳集》中,有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明史》二七五有传。(王学泰)

【邝露】(1604—1650) 字湛若。南海(广东广州)人。少聪慧,补南海诸生,多才艺,为人狂放不羁。学使曾试诸生以《恭宽信敏惠》为题,露制义五比,以大篆、小篆、隶、行草五体书于卷,学使不悦,列在五等,遂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京城诸贵人不为礼,而在江东一带颇为文士所推崇。阮大铖与之交好,后得知阮氏人品,致书与之绝交。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以事得罪南海县令黄某,欲罪之,弃家走粤西,为瑶族女土司云辨娘之记室,著《赤雅》以记其山川风土、仪物歌舞、战阵之制等,文字瑰奇藻丽,时人方以《山海经》。南明隆武帝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在永历帝朝为翰林,奉使广州,适逢广州为清兵攻陷,遂抱其古琴投水而死。露工诗文,其诗早期多以山川风光为题材以寄托其孤傲高洁之襟怀,风格清丽超妙,即王士禛所云“有骚人之遗音”(《香祖笔记》),亦如《明诗综》引沈山子所云“湛若诗镂金叶玉,以雕琢为工”,皆指其喜用富于色彩的词藻,类似《九歌》、《招魂》。此期代表作品如《洞庭酒楼》、《道明水望三十六峰》等等。其晚期作品以摅写亡国破家之恨为主,从中表现出与清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恨。如《长安梦》、《后归兴诗》、《浮海》等是此期代表作品。屈大均曾以委婉隐晦之语指出其后期作品有着充实而鲜明的政治内容:“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广东新语》)如果说其早年诗只是形似楚辞的话,那么在明亡前后的作品则追求神似了。王士禛在《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评其诗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遗音。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这正是从内容到形式皆肯定邝露是向屈、宋学习的。露论诗则注重音调,曾说:“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辨其词,而绕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转引自《广东新语》)著有《赤雅》三卷、《峤雅》二卷。其生平事迹散见于《楚庭稗珠》、《广东新语》、《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及其后裔邝廷瑶所著《邝海雪集笺》。(王学泰)

【商景兰】(1605—1677 稍后) 字媚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吏部尚书周祚之女,祁彪佳之妻。彪佳于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后,初任兴化推官,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为御史,巡按苏、松。不久辞官家居九年,颇著乡望。南明弘光(1645)时任右金都御史,巡抚江南,不久被马士英排挤去职。清兵攻陷南京,南明覆亡,他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的诗句,沉水自尽。对于祁彪佳的死,商景

兰在悼诗中有“公自垂千古”之句,可见其夫妇有着共同的操守。彪佳自尽时,景兰只有四十二岁,教子持家,名德重于时,人谓当世贤媛以景兰为冠。她有二媳四女皆工诗,每逢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携笔砚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事。有《锦囊集》一卷。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六引《两浙辘轳录》等。(陈祖美)

【黄淳耀】(1605—1645) 初名金耀,字蕴生,号陶庵。苏州嘉定(今属上海)人。年十七补诸生,注重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反对当时流行的浮靡淫丽之文风。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登进士第,不受官职,归研经籍。北京陷,福王立,南都诸进士悉授官,淳耀独不赴选。弘光元年(1645),清兵南下,南京破。嘉定人民起兵抗清,淳耀被推为领袖,坚守嘉定孤城十餘日,城陷后与其弟渊耀自缢于僧舍。淳耀受理学影响极深,不愿以诗、文自显,但诗、文创作亦有成就。其诗早期受到拟古之风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拟古诗,与前、后七子、云间诗派不同之处是除了模拟汉、魏、六朝(主要是陶潜)与唐代作家外,还模拟宋代苏轼。这类作品很少有诗味。后期由于社会矛盾剧烈,其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写了许多讽时感事之作,如:《野人》组诗揭露了明末天灾人祸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北客行》则针对入关灭明的清统治者,表达了对入侵者的敌视与仇恨。其晚期作品,风骨遒劲,浑雅天成,五律特别见工力。著有《自监录》、《知过录》及《陶庵全集》。其门人侯玄泓为作行状附于《陶庵全集》。《明史》卷二八二有传。(王学泰)

【陈子龙】(1608—1647) 字卧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号轶符,改号大樽,别号颍川明逸、於陵孟公,一度出家,法名信衷。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陈氏世代耕读,在乡颇有清望;子龙幼承家教,奋志读书,博通经史,十餘岁即有文誉,为东林人士所重。明思宗崇祯(1628—1644)初,加入复社,又与名士夏允彝、徐孚远等结幾社,以古道及诗文互相勉励。崇祯十年(1637),登进士第,初仕绍兴推官,以定东阳之乱擢为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失陷,思宗自缢,弘光帝即位于南京,子龙连上谏疏,言防江之策,又劝弘光帝励精图治,为权奸所忌。次年,遂乞终养。清兵南下,夏允彝殉国,子龙念祖母年九十,遂遁为僧。后接受鲁王监国之委任,与吴胜兆联络,于太湖结兵起义。事败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投水殉国。子龙在诗歌创作上主要受到“后七子”,特别是乡先贤王世贞之影响,倾向复古,早年亦多拟古之作,拟古乐府,拟《古诗十九首》,汉、魏名作,模拟几遍。此期间内也有一些描写江南

才子浪漫生活与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前者如《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是写名姬柳如是与自己的恋情;后者如《小车行》写逃荒亡者的痛苦,从中可见时局的艰危。崇祯以来,国事日非,子龙遂忧国忧边之作,如《壬午除夕》二首表达了诗人对满洲入侵者日益强大的忧虑。两都倾覆后,子龙投身抗清斗争,其诗多表现入侵者的残暴、江南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侵略的战斗精神以及自己以死报国的坚强意志。此期代表作品有《易水歌》、《秋日杂感》十首、《晚秋杂兴》八首等等。子龙诗沉雄瑰丽,慷慨淋漓,在艺术上亦颇有成就。朱雲子言:“卧子五古,初尚汉、魏,中学三谢,近相见辄讽太白诸篇,其才性故与相近。七占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气老,秀亮淡逸;绝句雄丽。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宽然有馀。”(转引自《明诗综》)子龙在乡曾与李雯、宋徵舆相互唱和,诗多忧愤念乱之言,以寄惻隐望治之旨。三人诗曾编为《三子诗选》,时人称为“云间三子”,成为明末清初云间派代表作家。子龙亦工词,其词风流婉转,专学北宋小令,如《香车金犊》,流连阡陌,在明为空谷绝响。词学久不振,陈词出,开词复兴之先声。一生著述甚富,编有五百餘卷之《皇明经世文编》,又与李雯、宋徵舆编选、评点了《皇明诗选》。其诗、文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焚馀草》、《湘真阁集》等多种,其词编入《湘真阁词》、《江蓠槛词》等。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王昶编为《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有年谱三卷(前三卷为自撰,后一卷为王昶所续)。《明史》卷二七七有传。(王学泰)

【方孟式】(?—1640) 字如耀。桐城(今属安徽)人。其父是明大理卿方大镇,弟是兵部侍郎方孔炤。素秉忠孝,敏而好学。九岁能文有咏絮才,为其父所笃爱,常目之而叹曰:“有此子为快,惜是女。”十五岁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字含之),尽心侍奉公婆、丈夫,两家尊亲皆称之。她跟随丈夫远宦燕、闽、楚、粤,夫妇间唱和吟咏,相互爱重。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张秉文守济南,战死于城上。孟式告诫侍婢云:“事急则推我入池水中。”城陷,临池恸哭,并催促侍婢说:“推我,推我。”遂堕池而亡。原有《纫兰阁前后集》八卷已不传,今有重辑本《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妹名仲贤(1585—1668),字维仪,以字行。十七岁嫁姚孙荣,旋为嫠妇,守志于清芬阁,与弟媳吴令仪共以文史代纺织,悉心教养其侄方以智,使其得以成长为政治活动家和著名的哲学、自然科学家。有《清芬阁集》及《楚江吟》。又编历代妇女作品为《官闺诗史》。姊妹事迹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

及《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五。(陈祖美)

【魏耕】(1614—1663) 谱名作时珩,又名璧,字楚白,后改名耕,又名甦,字野夫,号雪窦,又号白衣山人。慈溪(今属浙江)人。少聪颖,十八岁童子试第一,成诸生。清兵南侵,弃衣冠,积极从事抗清活动。先奉鲁王为监国,旋败。又交接各地豪侠,联络抗清志士,秘密图谋恢复大业。曾入海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会合,并接应张氏进攻江浙,力说煌言与郑成功以舟舰入长江,下金陵。事败后,游于江湖,伺机而起。后为奸人出卖,被官府逮捕,不屈,被害于杭州。魏耕是清初散处于江浙一带抗清武装力量的联络者与策动者,其诗多为记事之作,记录了浙江一带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投身于民族斗争之情景和作者抱着坚定的民族信念四处活动、秘密联络、奔走国事的情况。如:《醉时歌与朱廿二》写朱廿二掩护抗清义士,不顾个人安危,从而被捕入狱的故事;《湖州行》写对往昔参加湖州反清起义的回忆。至于写其亡命江湖、备尝艰辛的诗篇,开卷即是。耕论诗,最反对造作,他说:“余谓诗……苟无所为而为之,虽拟议尽变,曲肖曩篇,无疾呼痛,伪托可笑。故余之于诗,初无矜饰,务达其情。凡博弈饮酒,朋友酬酢,以至山川、风俗、城郭之所历览,遗迹之所辨证,杂然前陈,有触于怀,发之咏叹,以为合于作者不能自己之旨,此则余之所自道也。”(魏耕《息贤堂诗集自序》)魏诗古体学李白之奔放豪迈;近体学杜甫,苍凉悲壮,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明末清初诗坛独树一帜,特别为屈大均所激赏。有《息贤堂前后集》及《雪翁诗集》。全祖望著《雪窦山人坟版文》、魏霞撰《明处士雪窦先生传》记录其生平经历。《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五有传。(王学泰)

【张乔】(1615—1633) 字乔婧。长吟唐杜牧《赤壁》七绝之末句“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因自号二乔。原本吴籍,其母入粤生乔。秉性伶俐聪慧,很小能记歌曲,尤好诗词。又善弹琴,工画兰竹。常与黎遂球诸名流联吟酬唱,才色倾动一时。粤俗豪华,知己宴集,选妓征歌,四座如云。其间豪华子,辄以三斛珠挑之,坚不为动。一日为街头浪荡子调戏,赖番禺名士彭孟阳为之解围,乔遂与彭氏交好。在其重病不起、不久于人世时,彭出数百金为之脱籍。明思宗崇祯六年(1633)三月十六日病卒,年仅十九。乔素昔结交多为蒿目时艰之文人雅士,殡葬之日,百十余人送葬,且人各作诗一章、植花木一株以为祭奠,名曰“百花坟”,又称张丽人墓。墓为彭孟阳所营建,黎遂球为撰志铭。广州白云山下至今仍有此冢故址。《粤东诗海》所著录张乔《莲香集》之名系彭孟阳

所命。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六引《粤东诗海》。

(陈祖美)

【彭孙贻】(1615—1673) 字仲谋,一字羿仁,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贡生,痛父殉国难,入清后布衣蔬食,终身不仕。与同邑吴蕃昌创瞻社,为名流所重,被称为“武原二仲”。能诗善画,有文名,邑中碑铭记颂多出其手。上自经史百家,下至氏族、方技、释老、稗乘之书,靡不毕究。明亡后,杜门不出,留心史事,尤熟于明代掌故,借修私史以自见。孙贻存诗很多,几近万首。其诗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伤时感之作很多,如《广陵记事》、《愍乱诗》、《避地村居》、《青州客》等都是这类作品。其乐府学魏晋六朝,特别是短小的《江南可采莲》、《青溪小姑曲》等,皆清新活泼,颇有情致。七言歌行受到初唐和李贺影响,如王士禛所云:“宏深奥衍,穷变极奇。”(见《明诗综》)近体惟七绝较蕴藉;律体平庸,很少佳作。著有《茗斋集》,另有史学著作《甲申以后亡臣表》、《明朝纪事本末补编》、《流寇志》等。《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张煌言】(1620—1664) 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属浙江)人。少而能文,兼善骑射。十六岁补诸生,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崇祯十七年北京城陷,思宗自缢。次年,清兵南下,苟安南京之弘光朝旋亦覆灭,浙西亦被清军占领。浙东乡绅委派煌言至天台迎鲁王至绍兴监国。鲁王赐煌言进上出身,官翰林编修,入典敕诰,出筹军旅,投入抗清斗争。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清兵渡浙,鲁王兵溃,入闽。煌言率军辗转于沿海诸岛之间,坚持抗清武装斗争儿二十年,曾与郑成功互相呼应,联合北伐,一度以船不过百、卒不逾万的微薄兵力直捣南京、京口,连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震动大江南北。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在昆明殉难,郑成功、鲁王先后卒于台湾、金门,恢复无望。遂于康熙三年(1664)解散余部,隐居悬岙岛,后被叛徒出卖,被俘,慷慨就义。煌言为明末抗清领袖,其诗为严酷艰苦的抗清斗争之记录与诗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以及彪炳千古的爱国主义精神之写照。如“楼船十万石头城,钟阜依然拱旧京。弓剑秋藏云五色,旌旗夜度月三更”(《师次观音门》),就记录了作者与郑成功率部攻打南京之情景。特别是被俘后所写的诗篇表现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如“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被执过故里》),“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甲辰八月辞故里》),这些皆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其诗慷慨激昂,豪迈苍劲,虽处逆境,而不作萧瑟衰飒之音。

著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录》等，皆收入《张苍水集》。黄宗羲为撰墓志铭，全祖望为撰神道碑铭和年谱。《清史稿》卷二二四有传。

(王学泰)

【李邺嗣】(1622—1680) 原名文胤，字邺嗣，后以字行，别号杲堂。鄞县(今属浙江)人。父李柄为反抗民族侵略的战士。邺嗣二十馀岁时即随其父奔走山寨，参加抗清复明活动。鲁王政权倾覆，清王朝大肆搜捕甬上搢绅，李柄被捕入省狱，死于杭州。邺嗣亦被驱至定海，缚马厩中七十日，幸经友人营救，始得出理父丧。不久，再度被捕，饱尝囹圄之苦。后获释，暂不应荐举、考试，暂不出仕清朝，而且立志反清复明，并倾囊资助为抗清入狱或捐躯者之家属和掩护过许多秘密活动的抗清斗士。邺嗣少即能诗，年十三即有秀句传诵于世。后遭逢国破家亡之重大变故，感慨益深，其诗益进。诗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民族斗争，谴责了清王朝的血腥统治以及为虎作伥的帮凶。如《虎哭行》、《苦哉行》、《悲歌行》、《叫天歌》、《叹歌行》、《置侬行》，都是这类作品。更多的篇什寄托了亡国之恨、兴亡之感，歌颂了浙东人民在反抗民族压迫中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士大夫们抗清复明的壮志。如《杲堂诗续钞》卷四中的五言律诗几乎皆是此类作品，其中多感人至深的诗句，如：“花鸟当春异，茫茫百感深。花仍发寒食，鸟岂变吴音”(《当春》)；“不可登高望，寒枫瑟瑟哀。秋奔千里岸，涕老百年台”(《秋望》)；“乾坤迷鼓角，风雨溅刀头”，“悲风嘶虎石，毅鬼立蛟门”(《泊定海夜哭》)；“大愤留天地，英雄掷目中”(《大愤》)，这类苍凉激越的句子比比皆是。邺嗣诗以五古、五律为最佳；乐府钩章棘句，读似生涩，但别有韵味。著有《杲堂诗文集》，另编有《甬上耆旧诗》三十卷、《甬上名僧四大家诗选》、《杜工部诗选》等。黄宗羲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毕著】字韬文，一作名毕朗，字昭文，一作名著歙，字弢文。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幼工文翰，兼能挽一石弓，善击剑。明末，其父守蓟丘，兵临城下仍力战拒敌，战死，尸陷于敌。众议请兵复仇，毕著谓请兵则旷日，易为敌知而戒备，即于当夜率精锐入敌营。敌正在饮酒，毫无防备，见状惊骇不已。毕著手刃敌之首领，焚其营，抬运其父尸还葬于金陵，时年二十。作有《纪事》诗自述此事。后嫁昆山王圣开为妻，布裙荆钗，一无往时义勇之气，与其夫白首偕隐，有《村居》诗记其安贫的生活。有《织楚集》二卷著录于《苏州府志》，而《安徽通志》作《韬文吟稿》。事见《清诗别裁集》卷三一及《小腆纪年》。《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一四引《嘉定县志》云：“昭文字少陵，明

季宫人，甲申(1644)后流落燕市，昆山王圣开挈归成伉俪。后以授徒寄居城南熊家村。善鼓琴，画美人兰菊。”当是传闻异词。(陈祖美)

【夏完淳】(1631—1647) 原名复，字存古，别号灵胥。华亭(今属上海)人。父允彝，为江南名士，有文名，与陈子龙为莫逆交，曾在松江结几社。允彝与子龙对完淳影响极大。完淳早慧，有“神童”之誉，五岁读完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便将其所作诗、文编为《代乳集》。允彝为福建长乐知县，完淳随父往闽任职。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随父为祖母守制，返回家乡，拜在陈子龙门下，后又与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崇祯十七年，北京城破，思宗自缢死。次年，清兵南下。允彝、完淳父子为吴志葵军参谋军事，投入了抗清斗争。志葵被俘牺牲，允彝投水殉国。完淳继父之志，倾其家资以资助抗清斗争，并投入吴易领导的太湖义师。后吴被俘牺牲，完淳写《吴江野哭》以哀悼。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完淳得知鲁王遥授其为中书舍人，写表谢恩，事泄被捕，被押至南京，在审讯中表现出直而不屈，勇而不惧的英雄主义精神，对审讯者洪承畴大加讥讽。在拘押期间，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文，编为《南冠草》。临刑，意气扬扬，英勇无畏，时年仅十七。完淳文、赋词、曲皆有一定成就。其诗之题材与主题大多集中在抗清复明大业上，诗中充满了高昂的爱国激情与自觉的为正义事业的献身精神，特别富于感染力。如：《细林野哭》哀悼其师陈子龙；《忆侯幾道雲俱兄弟》、《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追忆死难同志；《鱼服》写军营生活；《柬半邨先生》写慷慨就义的决心；《六哀》、《六君子颂》歌颂抗清殉国的烈士，都写得慷慨激昂、悲壮淋漓。其诗、文在其牺牲后多散佚，直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末，才有《夏内史集》之刊刻，后编为《夏节愍全集》。《明史》卷二七七有传(附于夏允彝传)。今人郭沫若曾作为作传。

(王学泰)

【林古度】(1580—1666) 字茂之，一字那之，或云号那之。福清(今属福建)人。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以诗闻于世。曾赋《挝鼓行》，为屠隆所知。与曹学佺友善。诗风清绮婉丽，后结识钟惺、谭元春，受到性灵派的影响。明亡后，曾序刻《铁函心史》以寄托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晚年寓居南京珍珠桥陋巷中，非常贫困。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王士禛选存其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前的作品为《林茂之诗选》二卷，“于是古度故君故国之思、凭吊兴亡之作，胥不传矣”(《清诗纪事初编》)。林诗多为写景和描写自己贫困生活之作，风格清丽，如杨际昌《国朝诗话》所举联语：“松声流夜雨，草色积春烟”，“乡心云

外尽,春色雨中过”,“流水到门响,梅花绕屋多”,“今日已春色,深山犹未知”,皆可体现其诗风。《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有传。

(王学泰)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绛云老人、东涧遗老等,世称虞山先生。常熟(今属江苏)人。少聪颖,早年倾心明前、后七子。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万历三十七年,登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遭劾削籍归。思宗崇祯元年(1628),以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又因朝内党争激烈,被革职回籍。北京陷落后,谦益因谄事拥立福王为帝的马士英,被南明弘光朝起用为礼部尚书。弘光元年(1645),清兵渡江,南京破,与大学士王铎等迎降。清廷任以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不久,引疾归,从此隐居不仕,从事著述,并参加了秘密的地下抗清活动。谦益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与民族斗争中翻云覆雨,颇有可訾议之处,然其诗歌创始却取得极为可观之成就。其诗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以明朝灭亡为分界。明亡以前,其诗注重以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题材,举凡东北边患、朝内党争、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皆有所反映,如:《群狐行》写权宦魏忠贤死后,其党羽树倒猢猻散,纷纷以反阉党自居;《王师二十四韵》描写“王师”对农民起义军的残暴镇压,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五芳井歌》写保定人民抵抗清兵入侵时的英勇与顽强,并揭露了清兵对汉族妇孺的血腥屠戮。此外,还有一些描写社会黑暗、政治混乱和监狱恐怖的作品。明亡后,其诗主要反映了惨遭清兵蹂躏后江南大好河山的破败景象和诗人对明王朝的悼念及对清侵略军的敌视,如:《西湖杂感》二十首全面描写西湖美景所受到的摧残,其中“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鹰毛占断听莺树,马矢平填放鹤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劈面柳攒眉”诸句,皆可见诗人之用意。他还在《投笔集》的许多诗篇中表达了对抗清复国事业的关切,其反映明末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篇什,可作诗史读。谦益一生推崇杜甫,诗以学杜为主,取径多门。近人徐世昌引郑则厚言曰:“其诗博大闳肆,鲸铿春丽,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香山、眉山、剑南以博其趣。”又云:“本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见《晚晴簃诗话》)就其诗法渊源及对清诗坛的影响,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谦益兼通各种诗体,于七律尤工,其《和秋兴八首》、《后秋兴》用杜甫诗韵,一和再和,情真辞切,风格沉雄博丽,与原作相比,殊无逊色。其论诗强调性情、世运、学养并重。他说:“夫诗文之道,萌拆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

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有学集·题苍略自评诗文》)到晚年,他更加强调多难的时代与不幸的个人遭遇对产生好诗的重要,认为诗“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周元亮〈赖古堂今刻〉序》)。他还注重独创,对于主张模拟的明后七子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是清初大家,与吴伟业、龚鼎孳合称“江左诗文三大家”,主盟文坛达五十年之久,亲受其炙有成就的作者有数十人之多,开创了虞山诗派。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又辑选明代诗歌为《列朝诗集》八十一卷,集中收明代作者两千余人,目的是“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保存了一代文献,成为研究明诗、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还著有《杜工部集笺注》、《国朝群雄事略》、《密云禅师语录》等。金鹤冲撰有《牧斋先生年谱》,王峻为之作传。《清史稿》卷四九四、《清史列传》卷七九有传。

(王学泰)

【卢世澹】(1588—1653) 字德水,别号紫房,晚号南村病叟。其先代本涑水(今属河北)人,明初徙居德州(今属山东)。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户部主事,未几归侍母,母病逝后强起补礼部,旋改监察御史。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督漕运。入清,即家拜监察御史,征诣京师,病笃不能行。世澹为人简易佚荡,嗜酒剧谈、工诗善文,人或以嵇康、阮籍拟之。卢诗学杜,清真古淡,洁净精微,论者以为得杜之神髓。其所存诗多作于明亡之后,其中许多作品反映了诗人降清后的内心痛苦,如《闭关以后作》七律三十首就有“鬓都是雪那堪拔,心已成灰不用降”的诗句。世澹一生读杜诗四十馀遍,每与人会晤,辄谈杜诗。于所居尊水园建杜亭,设杜甫象祀之,自号杜亭亭长。编刻《杜诗胥钞》十五卷、《读杜私言》一卷。其论杜颇能发微抉髓,略去皮毛,直揭杜甫生平性情,风格韵致,多能道前人所未道,为研究杜诗者所重视。其诗文收入《尊水园集略》。凡十二卷,其中诗四卷。王永吉为撰墓志铭、田雯为作传。

(王学泰)

【邢昉】(1590—1653) 字孟贞,一字石湖,家临石白湖,或称邢石白。高淳(今属江苏)人。明末诸生,复社名士,家贫,寄食四方。明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曾被考官斥为“太狂”,因而著《太狂篇》,弃举子业,筑室石白湖边,沽酒自给。入清不仕,怀亡国之痛,一寄于诗。昉诗分前、后两期,以甲申明亡为界:前期作品多同情人民疾苦,反映明末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和表现自己傲岸个性的作品;后期作品则以反映故国之思和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情绪为主。诗篇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泛,如:《煮盐行》描写了煮盐工人的辛酸,《挑菜行》则写荒年男女老

幼在青黄不接时争挑野菜充饥的情景。其“《田圃》、《闵雨》、《忧旱》诸章，一赋再赋，盖有慨于民食之艰，不啻为民请命”（《清诗纪事初编》）。诗中大量揭露清统治者野蛮屠戮汉人的作品都写得十分沉痛，如《广陵行》、《琵琶亭下作》、《读祖心〈再变记〉漫述五十韵》等。防性孤介，“落落穆穆，多否少可。一语不合，辄拂衣去，耻与尘俗俯仰”（见卓尔堪《明遗民诗》）。其诗与其性格相近。施闰章说：“其为诗以陶汰为工，以冲淡为则，以婉恻悲凉为致。其企而之峻洁也，若病者思清冷；其厌秽而引避也，若见羸豕之负泥涂，而纨绮之蓄粪土也。故其诗清越无纤埃，人病之为郊寒岛瘦不恤也。”（《邢孟贞诗序》）其诗风格峻洁，不尚华饰，惟以真挚动人，有《石臼集》。《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八有传。（王学泰）

【徐弼】（？—1670）字伯调。山阴（浙江绍兴）人。居梅市，扁舟箬笠，弋钓自娱。初擅举子文，为“云门五子”之一，后专攻诗古文，知名海内，与当时著名文人如钱谦益、宋琬、施闰章、毛奇龄等皆有交往。弼诗以写山光水色与隐居生活者为多。其五古学谢灵运、谢朓；七绝婉约娟秀，有晚唐风调，如《流萤篇》“井榦星萤数点流，美人腰细不禁秋。水晶帘外梧桐月，几度黄昏便白头”，可见一斑。有《岁星堂集》，宋琬、施闰章为之作序。毛奇龄为其作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一三有传。（王学泰）

【李确】（1591—1672）初名天植，字因仲，后更名确，改字潜夫。浙江平湖人。明思宗崇祯六年（1633）举人。明亡，遁迹龙湫山，称龙湫山人，数十年不入城市，家奇贫，以绩棕为鞋、劈竹为器易钱换米为生，不受人食，往往绝粮。明遗民魏禧从江西来，造其庐，相对而泣，临别，以银五钱赠之，五反不受。禧固请之曰：“此非盗跖物也。”乃纳之。晚年耳聋，与人相接无一言，久或相视而泣。其诗多以山中风物、隐居生活和贫困境遇为题材，诗风激逸。其《赋伤郑婴垣冻死》写其老友年八十一，无妻无子兼无食，性高傲物，不肯干人，冻死雪中。诗云：“贫居傲性不干人，楚楚衣冠迥绝尘。昨夜雪中骑蝶去，白云堆里一遗民。”这也是其自我写照。《嘉兴府志》记载确“年八十二，预知死日，赋诗偃卧，乃卒。私谥介节先生”。其诗作收入《九山游草》、《蜃园集》中。《清史稿》卷五〇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一有传。（王学泰）

【冯舒】（1593—1646）字已苍，号默庵，又号癸巳老人。常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早弃举子业，沉浸经史，与其弟班并笃专于诗，吴人称之为“二冯”。冯舒为人直肠快口，动辄与俗忤，与同邑钱谦益、瞿式耜善，钱、瞿挂朝籍，因朝内党争被逮，入刑部狱，

冯亦受到牵连。入清不仕，耿直如故，因议县内赋役事触怒县令瞿四达。瞿深恨之。适逢冯哀集同邑亡友数十人之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清朝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语，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之句，语涉讥谤。瞿借此捕舒下狱，属狱吏杀之狱中。舒宗尚《玉台新咏》、《才调集》，对明前、后七子，公安、竟陵之诗学，皆加以掎击。其作品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如写于被捕北上期间的诗篇记述了由于灾荒、兵乱而导致北方乡村城镇一片凋弊景象，而朝臣大臣却忙于党争，不以民生为念。这类作品有《宿禹城，烟火断绝，怅然感怀》、《入良乡县，到县治，县官正治事，吏胥伍伯不数人，清简可怪，土人云亦以兵故》等。入清以后则多揭露清军暴行和怀恋故国之作，如《雪夜归村中即事》、《丙戌岁朝》等。此类作品往往写得情辞激烈，从“喜人魑魅神逾旺，择肉豺狼技未殫”（《早春述怀次夕公韵》）等句可见一斑。诗学晚唐，其律体注重色泽、音调，大多写得委婉曲折，耐于咀嚼。七古较豪纵，有《黔庵吟稿》，另有《炳烛斋文》、《文毅》等，编纂《历代诗纪》一百卷、《诗纪匡谬》一卷，以纠正明冯惟讷所编《古诗纪》之失。《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谈迁】（1593—1657）初名以训，字孺木，一字观若。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明诸生。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受知于当时大僚张慎言、高弘图。曾在高幕府为幕僚。南明弘光朝，高弘图入相，欲荐入史馆，苦辞之。入清不仕，以为人作幕友为生。为人清介，县志言其“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海宁县志·隐逸传》）。迁一生从事史学研究，手不释卷，明亡后一意修史，为订正其史学巨著《国榷》，年六十时北游北京，并抱遗民之恻，哭崇祯陵墓。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自京返乡。次年，往平阳哭张慎言墓，客死于道途。迁为严正、勤奋的史学家，其诗亦长于咏古，且多于咏史怀古中寄托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如：《渡江》一诗借咏京口附近历史遗迹以感慨南明弘光朝的腐败及其败亡；《广陵》一诗借咏古扬州古事表达清兵屠城的愤慨。其诗中还有许多以现实战乱为题材的作品，以深刻的史笔揭露清军南侵给江南人民带来的苦难。这类作品有《新城帅府行》、《南昌妇》、《河上行》、《旗鼓行》等。迁在诗歌创作上以学杜为主，善于驾御重大题材，诗风沉郁顿挫。有《枣林集》。其历史著作有《国榷》、《北游录》、《枣林杂俎》、《史论》、《西游录》、《枣林外传》、《海昌外志》等。黄宗羲撰有《谈君墓表》。《清史稿》卷五〇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六三

有传。

(王学泰)

【黄景昉】(1596—?) 字太稗,号东崖先生。晋江(今属福建)人。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以詹事兼掌翰林院。崇祯十五年六月,召对称旨,擢居相位。次年,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大学士。不久,触帝怒,连上疏引归。南明弘光帝时起复原官,复告归。入清,家居十余年卒。景昉处于易代之际,又曾为高官,除早年写了一些“出言有章”、“斟酌情文”、“和合朝野之谊”的作品外,多为感慨国破家亡之作。其同乡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从其《荒感》限韵八十二首摘数联,如“有泪铜人甘恋汉,无情玉马苦朝周”,“春去尚怜望帝魂,信来谁答子卿书”,“市上骆驼惊马脊,榜中蝌蚪见虫书”,“啼鸟也知亡国恨,汗牛空信古人书”,“乌狗已陈宁避囊,桔槔虽巧略嫌机”,其中有对故国的眷怀,也有对清统治者的讥讽,更有对自己无力改变局面的自嘲。其诗力避陈言,专尚新警,近体尤为雕绘,风格瑰奇葩艳,多有警句。有《瓯安馆集》,另有史学著作《国史唯疑》、《宦梦录》等。《明史》卷二五一有传。(王学泰)

【黄翼圣】(1597—1659) 字子羽,号摄六。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以贡生廷试,授新都知县,升安吉知州。干戈之际,勤于簿书,劳于戎马。南明安宗弘光元年(1645)后,弃官归,筑莲蕊楼,皈依净土,自号莲蕊居士,亡国之痛一寄于禅、诗。其诗写于明末者“激昂磅礴,无非忠君爱国、勤劳王事之语”(朱彝尊《明诗综》)。入清以后,则多感事伤时之作;一些寻常应酬的作品亦往往寄托兴亡之感。如《寿家奉倩初度二首》之一云:“看看竹马事嬉游,此日樽前共白头。兄健转嫌增弟老,国亡何忍为家谋。谱成节烈平生事,卖剩田园数亩秋。一任时人笑痴绝,五更频梦复神州。”在为亲友祝寿时也没有忘记以“节烈”相勸勉。诗篇清新有雅思。钱谦益言其诗“如么弦哀玉,自有天韵”,并为之撰墓志。其诗收入手自刊定之《黄摄六诗选》。此集久佚,清末翁同龢始得之,方为世所知。生平事迹见《明诗纪事》辛签卷三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

(王学泰)

【朱芾煌】 字子衷,又字玉璫,自号濡须江渔。无为(今属安徽)人。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进上,除徐姚知县,改乐安,人为户部主事,谪顺天教授,迁国子博士,历兵部主事,进郎中。入清不仕。“四库”馆臣言:“芾煌诗大都蒿目时艰,诗多感慨。七言律诗中如《春愁》、《秋怀》诸篇,纪明末朝政纷纭,乱亡之象,亦可见其大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有一些诗篇描写易代之悲和对明王朝的怀恋,如《江洲》:

“长江夜静起涛声,无限伤心对月明。芳草春风随处遍,如今只不到江城。”情辞婉转,意见言外。有《文禧堂诗集》二卷。生平事迹见《明诗纪事》辛签卷二〇。

(王学泰)

【陈之遴】 字彦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十年(1636)进士,授翰林编修,迁太子中允。崇祯十一年,因父坐失事系狱,仰药死,被牵连革职,永不叙用。入清,授侍读学士,历迁至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之遴机智练敏,娴习掌故,一切时政因革厘定,俱出其手。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因涉党争,以原官发往盛京居住,旋即召还。顺治十五年,因以贿勾结内监罪,免死革职籍没,全家流徙尚阳堡。圣祖康熙五年(1666),死戍所。邓之诚云:“其人不足道,而诗词则意捷语新,稍嫌才累,诗格颇似吴伟业。《白头宫女行》,置之《梅村集》中,几不能辨。《永和宫词》以少许胜多许,结句‘可怜龙堕乌号日,不及椒风短命人’,似较‘汉家伏后知同恨,只少当年一贵人’(吴伟业句)为和婉。”(《清诗纪事初编》)陈诗多取材于明清之际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有一些感慨仕途坎坷的作品,如得罪后写的《感怀》二十首、《杂诗》十首、《秋日偶成》等。这些诗篇皆写得辞婉意深,颇有义山风韵。有《浮雲集》十二卷,为其亲自编集,所录诗作只占其作品十之一二。《清史稿》卷二四五、《清史列传》卷七九有传。(王学泰)

【徐灿】 字湘蘋,一字明深,晚号紫筓。江苏苏州人。光禄丞徐子懋之女,幼颖悟,通书史。后嫁浙江海宁人陈之遴为继室。之遴为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官中允,后降清,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之遴以贿结内监吴良辅论斩,幸得免死,尽室流放关外尚阳堡,后死于流放地。徐灿随其流徙十三年之久。晚归海宁,奉佛度日。徐灿通晓诗文,以词名,善画仕女,工净有度。晚年画水墨观音,间作花草。有《拙政园诗集》二卷,收诗二百四十六首。又有《拙政园诗餘》三卷。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一三引《国朝画徵录》。《清史稿》卷五〇八有传。(陈祖美)

【王猷定】(1598—1662) 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明贡生,为人倜傥自豪,以诗古文自负,与侯方域齐名。少时驰骋于声伎狗马、陆博神仙迂怪之中。性亢直,襟怀恬淡,乡贡不试,然关注国家,谈天下事如视掌上纹。史可法闻其贤,征为记室。袁继咸奉命江楚,亦疏荐之,不就。明末遭乱,居广陵。入清,日以诗文自娱。晚年居杭州西湖僧舍,卒以客死。其诗多借描写山光风物,感事伤时,以寄托家国之痛。如《反扬州喜晤孙无言》:“却讶秋还在,萧条

满目非。江山千骑暗，城郭一人归。见子南冠泪，犹惊楚客衣。庭花何烂漫，寂寞伴伊威。”其他如《阜城》、《登燕子矶》都是这类作品。猷定长于五律，风格沉郁萧森，接近杜甫乱中诸作。有《四照堂文集》行于世，其中诗四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陈洪绶】(1599—1652) 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明思宗崇祯(1628—1644)中，召为中书舍人。入清，削发为僧，改字悔迟，又号老迟，又称弗迟。少时即以能画工书闻名，相传四岁时为其妇翁画关羽像于墙壁，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后被召入宫供奉，与北京崔子忠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明亡，混迹浮屠间，纵酒自放，歌哭无端。洪绶“生平作画，懒于题咏，偶有所题，亦未尝存稿。其老友姜绮季与共晨夕，见有题，辄为抄录。久而得诗一卷，镌于板。老莲见之，大喜，因自为序，名曰《陈老莲集》”(阮元《两浙辖轩录》引《凫亭诗话》)。其诗多题画赠人之作，诗句平易，不求工而自工。如《偶咏》：“不识如何笑作愁，东阡西陌且闲游。儿童共道先生醉，乱折黄花插满头。”《忆旧》：“枫溪梅雨山楼醉，竹坞茶香佛阁眠。清福都成今日忆，神宗皇帝太平年。”语言质朴无华，也很少用典，但其逸气自在，风韵天然。陈集后哀成《宝纶堂集》九卷，拾遗一卷。朱彝尊、毛奇龄曾为其作传。《清史稿》卷五〇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顾梦游】(1599—1660) 字与治。江宁(江苏南京)人。少称神童，十岁作《荷花赋》，十九岁为廪生。一意攻古文词，与四方豪杰名士深相结纳。入清后，弃举子业，致力于书法与诗歌创作，晚以鬻书为生。其书法古劲，妙绝一时。其诗也多以南京盛衰为题材，如《秦淮感旧》借回忆“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饷笙歌次。一夜扁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以感慨清兵南侵后南京秦淮的衰败：“当时只道长如斯，四十年中几迁易。渡头犹是六朝烟，画阁珠帘久憔悴。鹧首全随戈甲人，马嘶乱入王侯第。即今月好几船开，惟为空明照酣醉。”梦游平生好义，敦友谊，恤死友，故其送别怀人之作，大多写得情真意切，富于感人力量。如《岁暮寄慧公》担心饥岁慧公无处托钵乞食：“耕牛闲早土，野雀噪饥村。托钵应空返，霜天煮蕨根。”《徐昭法山房同姜如须杨明远赋》的“得朋能愈疾，留客不知贫。天地存诸子，兼葭老此人”。《吴门别友二首》之一：“可怜衰柳路，犹作断蓬飞。胜地宜游屐，良朋待款扉。”无论是款待佳客，还是送别良友，都写得一往情深。其诗古体近初唐，近体学中唐、晚唐。周亮工言其“诗清真绝俗，别成一家”(《顾与治

诗序》)，即指这类律诗。梦游去世后，诗人施闰章整理其遗著，辑得其诗文十卷，后删定为八卷，名《顾与治诗》。另一本四卷名《茂绿轩集》。施闰章著有《顾高士梦游传》。《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四四有传。

(王学泰)

【丁耀亢】(1599—1671) 字西生，号野鹤，别号紫阳道人，晚年病目，又号木鸡道人。山东诸城人。明诸生，少从董其昌、乔剑圃游，尝与陈古白、赵凡夫结山中社。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赴北京充镶白旗教习。顺治十一年，以贡生官容城教谕，升福建惠安知县。圣祖康熙三年(1664)，因文章“訕谤”而入狱，后被赦免。耀亢虽为清朝小官，但许多作品表现了对清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如其所言：“好为文章，杂以诙谐，不脛而行，卒为祸胎。”(《自述年谱以代挽歌》)也就是说他常用冷嘲热讽的文字以摅写其激愤，并抨击清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些作品往往感情激烈、措辞尖锐，很难使人想象它产生于文字狱迭起的清初。如《薙发》诗中以“客尘清瓠蔓，霜气到蓬根。故劳镜凭吊，新纓笑独尊”的自嘲形式摅写了诗人对清统治者“留头不留发”政策的抵触与怨愤。《咏鹦鹉》、《木鸡口号》皆藉物咏志，揭露了专制主义的黑暗，抒发了自己的愤懑。还有许多作品描写明末清初的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如《移兵德州》等。其诗浅易通俗，富于情趣，热衷描写新奇的事。有《丁野鹤集》十九卷。耀亢还作有小说《续金瓶梅》及传奇《西湖扇传奇》、《蚺蛇胆传奇》、《赤松游传奇》、《化人游传奇》、《非非梦传奇》、《星汉槎传奇》和《天史》、《出劫纪略》、《家政须知》等。事迹见《清诗纪事初编》卷六。（王学泰）

【金俊明】(1602—1675) 初名袞，字九章，号耿庵，又号不寐道人，更名后字孝章。吴县(江苏苏州)人。明诸生，数次应乡试，不中，遂弃举子业，佣书自给，以善书名吴中，亦善画，喜画树石，萧疏有致，所画墨梅尤工。入清，弃诸生，隐居市廛，既卒，门人私谥贞孝先生。俊明亦工诗，人以“郑虔三绝”(诗、书、画)喻之。其诗多题画咏怀之作。陈田言其“诗笔老苍，弥多艰苦之音”(《明诗纪事》)。如“百年如此日，孤抱向谁明”(《和致一韵》)，“古人寂寞存微尚，吾道艰难有固穷”(《次韵海序秋日见怀》)，皆可见其怀抱。其诗收入《春草闲房诗集》，另有《阐幽录》《康济谱》等。《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七六有传。（王学泰）

【朱嘉徵】(1602—1684) 字岷左，号止谿。浙江海宁人。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入清，署会稽教谕，谒选得叙州推官。时值大乱之后，居民离散，城中仅十馀户，嘉徵一意招抚流民，从各地招回、

賤回一千餘戶，市井稍復。在官六年，告歸。嘉徵少與朱一、范驥等結十二子社，歸里後與張次仲、朱朝瑛等，講經論史，著述百餘卷。其家一子、三孫、一媳、一女孫皆工詩，偶倡一章，門內和者已有六人，藝苑以為佳話。嘉徵詩多為記游寫景之作，其入蜀諸作，或寫城鄉之凋弊，或狀山川之險巖，如《閬中》、《自題草堂》、《田家雜詩》等皆写得蒼勁嶮峭，接近杜甫入蜀詩的风格。刊有《止谿文集》、《止谿詩集》各一卷，只是其詩、文著作極小一部分，還有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游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皆未刊刻。另編纂有《樂府廣序》三十卷、《古詩廣序》、《詩系》等書。黃宗羲為其作墓志銘。《國朝耆獻類徵》卷二五〇有傳。（王學泰）

【來集之】（？—1682）字元成，號樵道人，又號倘湖樵人。浙江蕭山人。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官安慶推官。南明魯王監國時，以兵科給事中監兵長河，官到太常少卿。入清不仕，以隱居終。工詩，其《倘湖近詩》自序云：“世軸更換，偷活草間，石田茅屋，耕鋤自給。無用之人，只宜棄置林泉。若云高隱，則是自欺之人。無事生事，輒有題咏，不效詩史，感触時事，不學詩魔，走入醋瓮，短章細吟，聊用寄意耳。”（轉引自《清詩紀事初編》）其詩多為歌咏隱居生活和感慨興亡盛衰之作。此集二卷，皆為七絕，一卷咏月令、補月令、花月令；一卷游仙詩，則為悼亡之作。精于易理，著有《倘湖樵書》、《博學匯書》。亦工戲曲，著有《藍采和》、《阮步兵》、《鐵氏女》、《挑灯》、《碧紗籠》、《女紅紗》等。其詩除上述《倘湖近詩》二卷外，還散見于其他清詩總集，選集。毛奇齡為撰墓志銘。（王學泰）

【朱一】字近修，號欠庵。浙江海寧人。明思宗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自負經世之才，崇禎十六年參加會試，欲上書言事，而時已不可為。清兵南侵，遁逃海上，飢寒顛沛，百折不回，所以自號“欠庵”者，言自己惟欠一死耳。入清，堅隱不出，晚年披緇授徒，主持文社，對清初杭郡文壇有一定影響。一是早年詩作多寫憂國憂民之情，中年以後則多寫自己貧困生活和亡國之恨。其代表作品有《北塞》、《淮望》、《初入都雜賦》、《溪上》等。長于近體，五、七律尤工。朱彝尊舉其佳句：“十暑杜陵葛，一寒范叔袍”，“秋懸游子夢，日落異鄉山”，“泪似傷時尽，愁須醉日多”，“妻子他鄉泪，文章浩劫灰”，“三夢烽烟新幕府，六朝烟雨旧楼台”，“瀑布秋风摇练影，石渠新雨惨藤花”，皆調雄氣逸，音响清鏗，情文并致。還長于繪畫，《讀畫錄》言其作《江上數峰圖》淡遠空闊，怡人心目。有《為可堂集》傳世。《國朝耆獻類徵》卷四七七有傳。（王學泰）

【李世熊】（1602—1686）字元仲，號但月，別號槐庵，又筑書舍名檀河，故遠近士稱之為檀河先生，又號寒支子。寧化（今屬福建）人。少負奇氣，敢任難事，其才力亦足以相副。平生喜讀異書，雖千里必多方購之。六經諸子百家，靡不貫究，獨好屈原、韓非、韓愈之書。曾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訪鄭芝龍，對鄭有所期望。明諸生，弘光帝時以荐授翰林博士，辭不赴。明亡入山祝髮隱居。三藩叛亂時，耿精忠數迫之出，亦不就。杜門不出，深自韬晦。世熊深懷亡國之痛，所作詩歌多為愴懷故國、悼念師友之篇。李家瑞《停雲閣詩話》言其詩“哀梗頑艷斑駁陸離，不名一格”，例舉其佳句云：“《獨松》詩云：‘回薄山水青，摩弄日月白。上友不羈云，下友忘年石’，其氣節已可想見。又有《寄懷》詩云：‘細雨侵帘懶賦詩，懷人雙閣燕來時。春山翠不關螺黛，却笑張郎懶畫眉’，則深得風人含蓄之旨。”其他如《丙戌九月即事》、《聞說馬上俘婦》都写得奇詭淒麗。如陳田所云：“元仲詩，淒婉如謝皋羽，藻麗似杜牧之，沈摯又似黃雙井、陳后山。”（《明詩紀事》）其詩文收入《寒支初集》十卷、《寒支二集》六卷，另有《錢神志》、《狗馬史記》、《本行錄》、《史感》、《物感》等。魏禮為其撰《墓志銘》。《清史稿》卷五〇一、《清史列傳》卷七〇有傳。

（王學泰）

【馮班】（1602—1671）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今屬江蘇）人。明諸生，錢謙益入室弟子，與兄舒齊名。屢試不第，遂棄去。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動不諧俗，以狂名于時。入清，佯狂避世，當其被酒無聊抑鬱憤懣時，常就座中恸哭，因班行二，故人稱“二痴”。班論詩推崇晚唐溫、李和北宋西崑，與其兄舒評點《才調集》，并作《嚴氏糾繆》以批駁嚴羽所主張之“興趣”、“神韻”與詩尊盛唐之說。其詩取法溫、李。早期詩作多以四時風物與男女戀情為題材，如《十二月樂辭》寫深閨少女眼中的春夏秋冬的景色，雖是模仿李賀，但比李氏更重詞藻，鏤金錯采，秾艷靡麗，風格纖弱。其所寫風情也多为妖姬妙妓與公子才人之間的艷情，可取者不多。惟有《游仙詩》五十首寄托了嚴肅的政治內容。此組作品是“托為虛無倘恍之詞”，以摭寫對錢謙益、瞿式耜、馮舒因黨爭而被明廷逮捕北上的憤懣不滿之情。入清以後，詩風有所變化，常用詩歌寄托亡國之恨與表現詩人與世相忤之個性。如《江南雜感》：“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凭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班詩大多平弱，但其有寄托者也達到了錢謙益所說“其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見《馮定遠詩序》）之境界。班博學多奇，雅善持論，為文也重考據，并精書法，四體皆工。有《鈍吟雜錄》十卷、《鈍吟

老人遗稿》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钱邦芭】(1602—?) 字开少,号他山,又号知非居士。丹徒(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唐王时任御史,桂王时擢右佥都御史,桂王自粤移安龙,邦芭为贵州巡抚。孙可望入黔,自置官属,遂避居于徐庆县之蒲村,又辟柳湖于村之他山下,聚邑人士讲学于播北水西。可望索之急,遂削发为僧,称柳湖旧居为大错庵,自名大错和尚。永历朝覆亡后,居滇之鸡足山。久之,离滇赴衡岳,卒于衡山。其诗多以南明朝廷的内部斗争为题材,亦有不少描写隐居乡间的闲适生活,如《还山》、《晚步盍盂庵》等。诗风清新质朴,不假雕饰,有《大错遗集》。生平事迹见《明诗纪事》辛签卷九下。(王学泰)

【万寿祺】(1603—1652) 字年少,一字介若,又字内景,晚年僧服,易名慧寿,称明志道人,或称寿道人,或但曰寿、若,或曰若若。其先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后移家徐州(今属江苏)。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举人,青年时游南京、苏州等地,参与复社活动。清兵南下,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抱必死之志。其自述起义经历云:“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京师陷,五月南渡。其明年乙酉五月,江以南郡县皆陷。炳(沈自炳)、僑(戴之僑)、芭(钱邦芭)起陈湖,瑞(黄家瑞)、龙(陈子龙)起泖,易(吴易)起笠泽,皆来会。八月溃,被执不屈,将加害,有阴救之者。囚系两月馀,得脱还江北,作《泛湖图》第四。”(《清诗纪事初编》)明亡后不仕,与顾炎武等交往甚密,阴图恢复,贵志以歿。寿祺多材艺,书画雕刻、琴棋剑器,以及刺绣、百工技艺,无所不通。有诗名,与阎尔梅并称“阎万”。其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以甲申之变为界;早期作品多以江南文士才人生活为题材,如《京口社集》写复社文人聚会,《秣陵舟燕》写才人燕集;后期作品悲凉激楚,成变徵之音,大多通过吊古伤今、抚今追昔以表达作者的故国之思、恢复之志,如《南都杂咏》八首等都曲折表达了“国仇未雪身仍在,家散天成志有馀”(《丙戌正月一日》)的悲愤。诗中还有一些揭露清兵野蛮与残暴的作品。工于近体,其七律如陈田所云:“年少诗壮丽,有芒砀猛士之风。国变后,尤多激楚之音。”(《明诗纪事》)其七绝兴象高华,有唐人韵味。有《隰西草堂诗集》五卷,另有《隰西草堂文集》三卷,和《逖渚唱和集》一卷。罗振玉为其作传。《清史稿》卷五〇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一有传。(王学泰)

【王翊】(1603—1653) 字介人,号秋槐老人。浙江嘉兴人。家故业染,至翊已很贫困,止破屋一间。自幼失学,《论语》、《孟子》未卒读,仅识字而已。弱

冠,偶阅《琵琶记》,欣然会意,即据案咿唔学填词,竟合调,自后向学不稍懈。工词曲,又攻诗,然贫日甚,犹抱膝苦吟,不问家人产业。尝访其从弟于岭南,次赣州时,诗歌杂著皆没于水,后凭记忆录之,十不存一。翊为人性格豪放,不应科举,不求仕进,布衣终生。陈子龙曾为其诗集作序。诗多咏古记游、酬赠感怀之作,部分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如《清河县》、《北归后得友书感赋》等等,其诗风冲淡深婉兼而有之。明末竟陵诗风行于浙西,至翊始变。杨钟羲言:“梅里诗派盛于竹垞(朱彝尊),而实开于介人。”(《雪桥诗话馀集》)其诗收入《秋槐堂集》。另著有传奇《红情言》、《纨扇记》、《榴中怨》、《词苑春秋》、《博浪沙》等等。《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七有传。(王学泰)

【阎尔梅】(1606—1679) 字用卿,号白耑山人,又号古古。沛县(今属江苏)人。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举人。早岁曾游江南,参加复社,有重名。北京沦陷后,拥护南明弘光政权,史可法守扬州时曾力主其北进河北、山东。弘光朝覆亡后,积极奔走于抗清斗争,毁家纾难,结豪杰屡次起兵,旋皆破灭。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被捕;次年,被释,携子出亡。十余年间,遍游西北,事久乃解。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再度被捕,其友龚鼎孳为刑部尚书,为之开脱始获释。后出家为僧,称蹈东和尚,以示不与清廷妥协之意。尔梅一生足迹遍于四方,其诗多为描写各地风物、民情之作,其间或借以揭露清统治下的恐怖、黑暗,或暗寓恢复之志。前者如《京师杂咏》、《燕赵杂咏》之类,后者如《重过兖州》云:“亭长台西旧酒徒,疏狂名姓满江湖。每从世外寻高蹈,不识人间有畏途。”其诗苍凉悲壮,慷慨激昂,格律严谨,声调沉雄。朱庭珍云:“徐州阎古古尔梅独工七律,对仗极整齐,时有生气,亦颇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处太多耳。”(《筱园诗话》)尔梅与同郡万寿祺齐名,世称“阎万”。有《白耑山人诗集》十卷、《文集》二卷。《清史稿》卷五〇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〇有传。(王学泰)

【傅山】(1606—1684) 初名鼎臣,字青竹,更名山,又名真山,字青主,又字仁仲、侨山、公他等,别号极多,凡三十馀,常用者有公之它、石道人、朱衣道人、斋庐等。祖籍忻州(山西忻县),寓居太原,求籍阳曲(山西太原北郊)。明诸生,以举子业不足习,遂读十三经、诸子史及方外之书,受知于学政袁继咸。袁为阉党张孙振所陷系狱,山联合诸生伏阙上书,纠孙振赃私,名震一时。好行侠仗义,急人之难。入清不仕。为人所卖,下太原郡狱,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后得到纪映钟、龚鼎孳的援救,得以开释。五十以后

游江南,与顾炎武等爱国志士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晚年以黄冠卖药市中为生,而名闻天下。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山拒不应试。康熙十八年,逼迫其上道,辞以疾。有司令役夫舁其床,至京师,死不入城,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学者,一生坚持进步的社会理想和坚定的民族信念,其高尚人格也体现于诗中。在生死荣辱面前,他不动摇,不改变其理论与信念。其《山寺病中望村侨作》云:“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冉冉真将老,残篇视再抽。”傅诗原编中有“甲申”一集,皆收甲申、乙酉北京沦陷和清兵大举入侵两年之作。这些作品大多反映其悲愤心情与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其诗中还有许多描写作者行医卖药、服务于乡里农村的作品,如《儿辈卖药城市诮杜工部诗五字起得十有二章》等诗中表现出“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安”的高尚医德和诗人与乡里人民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山长于律体,尤工五律,学杜工部,但较杜艰涩,多用隐喻,言此意彼。今人邓之诚言其“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即隐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清诗纪事初编》)。山博通经史及各种杂学,公开以“异端”自命,主张经、子合流,打破儒家对正统垄断,把诸子提到与六经同等的地位,实开清代评诂诸子之风气。又工书画,精医术,人皆谓其“文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见《清诗纪事初编》)。著有《霜红龕集》及戏曲《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两汉书姓名韵》、《傅氏男科》、《女科仙方》等。清末丁宝铨撰有《傅青主先生年谱》一卷,附于《霜红龕集》后,全祖望为其作事略。《清史稿》卷五〇一、《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朱鹤龄】(1606—1683) 字长孺,号愚庵。吴江(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明亡后不仕,以著述为事。曾注杜甫诗,为钱谦益所赞赏,“延馆于红豆庄者三载。纵观藏书,注更大备。宗伯为大会门下诸名士于吴郡张氏假我堂,而以先生为客。宗伯即席诗成,预会七人皆和,吴下传为盛事”(《松陵诗徵》)。因潜心读书与写作,行不知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因以为号。与顾炎武交好,共同组织“惊隐诗社”。鹤龄为明遗民,虽未参加实际战斗,但亡国之痛也得深切,故其诗也多感事伤时、眷怀故国之作,特别是歌颂反清斗士、遗民斗争精神的作品,感情真挚,富于感染力,如《临江王节士歌》、《精卫词》等。其诗中还有一些描写天灾人祸的作品,如:《湖翻行》写太湖泛滥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满清政

府的追索仍不稍停;《刈稻行》写雨暘失调,稻谷歉收,百姓无以为生。这些诗写得抑扬哀怨,颇能传达灾区百姓的痛苦和愤懑。鹤龄虽深入研究过杜甫诗和李商隐诗,但其创作则受白居易的影响较大。其诗平易浅白,流畅通达,不尚雕饰,却有感人力量。鹤龄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颀齐名。称海内“四大布衣”。致力于经学,著有《毛诗通义》、《尚书埤传》、《禹贡笺注》、《左传日钞》、《春秋左传集说》等。又著有《杜工部诗辑注》、《李义山诗笺注》。其诗、文收入《愚庵小集》。《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

(王学泰)

【程先贞】(1607—1673) 字正夫,号蕙庵,晚年自号海右陈人。德州(今属山东)人。世官工部水曹,其祖父绍为工部侍郎,入清以祖父荫为工部水曹员外郎。为官不到两年,告归终养,家居三十余年。德州为南北交通要冲,当时许多南来北往之士大夫寄居其家,与钱谦益、顾炎武、高珩、周亮工、田雯、程周量、王士禛兄弟、卢世淮等交好。先贞工诗,受到钱谦益、顾炎武、王士禛等人的称赞。其诗题材广泛,注意到一些引人注目而又较少入诗的题材,如:描写杂技艺术和反映杂技艺人不幸遭遇的《观高绌伎效东坡古缠头曲》、《燕姬马解歌》、《即观高绌伎听伊夫述所由来再次前韵》;写古董并寄寓兴亡之感的,《丰侯歌》、《葛巴喇碗歌》;写纸牌赌博的《叶子吟》等。这些作品使读者耳目一新。诗中还有一些触及时事,并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丁未六月漫纪》写丁未一年灾害频仍,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柴麦行》、《后柴麦行次前韵》写农民柴麦换银以了赋税过程所遇到的种种苦难。其诗出入于陶潜、杜甫之间,比较质朴平实,如《偶过西郊》:“偶向郊原外,行游抵暮过。斜阳衔远岫,潦水灌平河。海禁鱼盐少,风殊鼠璞多。戍楼闻鼓角,伏枕意如何。”于平易之中蕴涵着作者对时局的不满与愤懑。著有《还山春事》、《燕山游稿》、《蕙庵诗草》、《窥园百一十二合选》等集。晚年合选为《海右陈人集》。《清诗纪事初编》卷六有小传。

(王学泰)

【姜埰】(1607—1673) 字如农,一字卿墅,自号敬亭山人,宣州老兵。山东莱阳人。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进士。由仪征知县转官礼科给事中,以建言触帝怒,于崇祯十七年谪戍宣城卫。清兵南下,遂家吴门。弘光朝起复原官,不拜,会马、阮用事,避地徽州,祝发黄州。鲁王监国时以兵部右侍郎征之,亦不拜。入清,与弟垓卜居苏州,人称“二姜”。病卒,遗命葬于宣城。埰晚年始为诗,已有较丰富的阅历,故其风格一本杜甫,其内容亦以感事伤时、忧国忧民为主,如《慕村用东坡游孤山韵》写出“满眼哀鸿难绘

摹”的乱后农村凋弊景象,其他如《宣州有感》、《东归省墓留别吴门亲友》、《广陵遇嘉禾友感赋》写身世之感,撼家国之恸,都十分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采诗才本清刚,气尤激壮,故诗文皆直抒胸臆,自能落落不凡。然纵笔所如,不暇锻炼,故粗犷之语,亦时时错杂其间。”有《敬亭集》十一卷,收崇祯十七年甲申至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4)己亥诗、文,后又刻《博托集》收顺治十七年庚子至圣祖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诗、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一有传。

(王学泰)

【胡承诺】(1607—1681) 字君信,号石庄老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举人,入清不仕,隐居天门、巾柘间。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部诠县职,不就。圣祖康熙五年(1666),被征至京师,以老乞归,筑石室于西庄。承诺生平为有用之学,曾著《绎志》十九卷、《读书说》四卷。其诗如清末其乡人樊增祥所云:“先生存稿断自思陵(指明思宗)之末,举凡荆棘铜马之哀怨,金戈铁马之锵鸣,触绪纷来,开卷即是。”(见《胡石庄先生诗集》)但其诗中所表达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恨较为委婉平和,多通过怀古咏物以比兴方式表现,如《古意》(杨柳托禁烟)表面上写繁荣之不常,实际上表现对故国的眷恋。其诗中还有不少描写清初战乱给人民带来苦难的作品,如《入村》组诗、《村居杂咏》、《役者讴》、《筑城词》等都表现出作者对苦难中人民的同情。承诺诗严整平易、无剑拔弩张之态,富于韵味,有意矫其同乡先辈钟惺、谭元春所倡导的竟陵诗风之弊。清初邓汉仪言:“自竟陵说行而风雅之道微。君信生于其乡,乃矫然不从乎其说,是真豪杰之士卓立于波流者。”(《诗观》初集)有《胡石庄先生诗集》传世。《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

(王学泰)

【冯如京】 字修武,又字紫乙,号秋水。山西代州(今代县)人。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诏举天下贡士,如京列榜首,官永定同知。崇祯十三年(1640),诏廷对,授滦州知州。入清,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晚年乞归侍养,约卒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叶,年六十馀。如京一生屡为外官,足迹半天下,所经名胜古迹,多有题咏。其诗清利,工于五言。因其生长于西北,驱驰戎马,明末清初,参与定乱,故诗中一些描写战乱的作品,颇有激楚之音。《宫词》六十首,托词吟咏盛唐,但屡言射猎弓马,是知即写清宫闺生活。有《秋水集》十六卷,其中诗八卷,《宫词》一卷。《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五二有传。

(王学泰)

【李雯】(1608—1647) 字舒章。青浦(今属上海)人。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入清,荐为内阁

中书舍人,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以父丧归,寻卒。雯少负才名,与夏允彝、陈子龙等人相唱和,人称“云间六子”,后又与宋徵舆、陈子龙倡云间诗派,名满江左。雯之友人多为抗清志士,而雯出仕清廷,视颜事敌,对此常怀愧怍。其诗常表现忏悔、自我谴责和对故国的怀恋,吴骞《书李舒章诗后》云“庾信文章真健笔,可怜江北望江南”,即指此而言。其诗宗后七子,高拟三唐,但由于感情真挚,其自我摧抑之作远比王世贞、李攀龙作品感人。有《蓼斋集》四十七卷、《蓼斋后集》五卷。两集后被列入禁焚书目。《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三九有传。

(王学泰)

【傅占衡】(1608—1660) 字平叔。江西临川人。明诸生。少时颇以经世济人自负,以重事功的陈亮自命,有远见卓识,不为浮丽无用之学。其学不苟同,亦不好立异哗众,持论大多公允。谙熟明朝故事,对其因革利弊、是非邪正,了然于胸,然厄于科第,不得用于世,隐居以终。占衡于国家多难之际,胸怀大志,不为世用,一寄于诗。其诗反映清兵南下及各种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灾。《清诗纪事初编》云:“集中《崇祯行》、《上梁行》、《七言律十六首》、《骨董篇》、《失晞发集》、《西马行》、《塘兵行》、《海棠树引》、《四松堂饮酒诗二十七首》石破天惊,可泣鬼神。其集乾隆时遭禁,当由于此。”这些诗中或揭露清兵的残暴,或表达对明朝的怀恋,因此为清廷所不容。占衡五古诗学陶潜、储光羲,蕴藉安雅,格调浑成;近体学杜甫,音节爽亮,造语清新。如《自若东来居慈意有‘春尽且登山’句因用为题以赠》:“萧然无事心,屋外惜春阴。细草出门远,馀花背岭寻。人烟村树满,鸭水野田侵。兰若当峰尽,还同灵澈吟。”神似杜甫在草堂期间写的五律。有《湘帆堂集》二十六卷,其中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族孙士凤始行活字印行全集。事迹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二。

(王学泰)

【徐世溥】(1608—1658) 字巨源。新建(今属江西)人。少聪颖,十六补诸生。艾南英闻其名约为兄弟。钱谦益亦颇推重。南赣巡抚潘曾纘得王执俭所修《宋史》,请其重加更定。明亡后,山居晦迹,绝意仕进。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陈名夏秉执作书遭司理致聘,坚拒不受。是夜有盗入室索币,被火燔死。世溥雄才气盛,其诗取材博,用意远,多借感事摅怀以写人生哲理,如《初夏苦雨毛浚明潜夫置酒寓楼》即通过写友情以表达对人生美好情意的眷恋:“岂不爱奇观,孤怀难达夕。我心如青山,欲雨便头白。一觞可晤言,所以资酒德。”著有《榆墩集》、《榆溪诗钞》二卷、《逸诗》二卷及《韵藪》、《夏小正解》等。

钱谦益为撰哀词。《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六二有传。(王学泰)

【金人瑞】(1608—1661) 原姓张,名采,字若采,更名人瑞,最后改名叫,字圣叹。长洲(江苏苏州)人。少时以“大材”自负。自云:“为儿时,自负大材,不胜侘傺。恰如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止我一人独沉屈者。”(《杜诗解》评《黄鱼》)八岁开始“拈书弄笔”,十岁入乡塾,十一岁泛读《史记》、《离骚》、《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涉猎极广。在明为诸生,个性狂放,不为世俗风气所拘,打破畛域,登坛向僧俗讲经说法,批点当时尚不为儒生文士所承认的俗文学——戏曲、小说。并把《水浒传》列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列为第六才子书,使之与《史记》、杜诗等并列。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世祖病死,人瑞因不满吴县知县任维初贪赃暴虐,与诸生千余人,哭于文庙,遂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人瑞一生足迹未离吴门,生活面狭窄,其诗多以四时风物与身边琐事为题材,内容较为贫乏,有少量表现其狂放个性的作品,如《浩荡》等较可取。金诗学杜,但远不如杜诗深厚,其模仿多停留在题目与形式上。其批点唐诗、杜诗也多用评点时文之法,如海纳川所云:“金圣叹批唐人律诗,无论其语气如何,必以前四句为一解,后四句为一解,人号为腰断唐诗。”(《冷禅室诗话》)而南邨以为:“圣叹批书,独具只眼……特所选之《唐才子诗》,则未免非大雅之道,而取材说义,有奇僻牵强、附会穿凿之弊……而以评小说之眼光评诗,实其致病之要点。但俊眼灵思,于诗道发明处亦不少。学者于此,当深思严辨之,究不可一概抹杀也。”(《攄怀斋诗话》)著有《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圣叹批唐诗》、《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其诗收入《沉吟楼诗选》。清人尤侗、廖燕皆有《金圣叹传》。(王学泰)

【吴伟业】(1609—1672) 字骏公,号梅村,有时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早岁从复社领袖张溥读书。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中举,次年会试第一,殿试为榜眼,授翰林编修。伟业为复社成员,出仕不久即卷入朝内党争,被排挤出京,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明亡后,一度在南明弘光朝廷中为少詹事,旋即辞官归隐。在清军南侵的战争中,伟业奔波逃难,饱尝战乱之苦。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被征召至北京为秘书院侍讲,后升任为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以丁母忧南还归隐,在忧惧和苦闷中度过其余生。临终前,忏悔自言在改朝换代之际自己用“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与子曝疏》),并嘱以僧装装敛,葬在苏州邓尉灵岩

附近,墓前立一圆石题“诗人吴梅村之墓”。伟业目睹明末社会之黑暗、政治之腐败、明清之际的战争动乱,清初民族压迫之严酷,其诗多为哀时伤事而作,常以明朝的衰朽灭亡、南都倾覆、绵延长久的抗清斗争及清统治者的暴行为题材。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描写历史遗迹以及忆旧怀人、抚今追昔等形式,反映那个激荡时代的多重矛盾,并寄托了诗人的兴亡盛衰之感。如:《松山哀》写明大将洪承畴降清之后“为王前驱”积极剿灭汉族抗清力量的丑行;《临江参军》则描写抗清将领卢象升的英雄事迹;《矾清湖》写清兵的铁蹄对江南山河的践踏;《悲歌赠吴季子》描写清统治者故意制造的“科场案”给江南士子造成的恐怖。其他如《永和宫词》、《银泉山》、《萧史青史曲》、《楚两生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雁门尚书行》等等,皆借咏一人一事,以寄托家国之慨。其传诵一时的《圆圆曲》,借姑苏妓女陈圆圆一生不幸遭遇,描写了崇祯(1628—1644)时朝政腐败、文臣武将误国,并揭露和斥责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背叛民族、开关迎敌、引狼入室之罪行。此外,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如《直溪吏》、《临顿儿》、《董山儿》是仿杜甫“三吏三别”而作。《直溪吏》写逼租,《临顿儿》写歌儿被掠卖时骨肉分离的痛苦,《董山儿》写战乱中父女分离,都是充满血泪之作。其七言律诗也多佳作,如《扬州》四首、《登上方桥》等。伟业初学元、白,擅长歌行,后转向庾信、杜甫、李商隐,诗作较为深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道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言其律体本乎初唐四杰,“而情韵为深”,则不如直言其本于杜甫、李商隐;言其叙事诗类乎白居易,“而风华为胜”,则确实如此。其“风华”表现在感情深挚、意象鲜明、结构富于变化、婉转多姿上;这类作品词藻华丽,音韵谐美,便于咏唱。后人所说的“梅村体”即指此。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实际其成就有超过钱氏之处,龚氏更远在钱下。伟业多才艺,工词善画,亦善写杂剧传奇。其笔记小品,文笔清丽。其散文、诗歌收入《梅村家藏稿》,其中包括《梅村词》。另有杂剧《通天台》、《临春阁》,传奇《秣陵春》。还有《梅村诗话》、《复社纪事》、《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以及《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陈廷敬为作墓表,王昶为作志传,《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七九有传。

(王学泰)

【纪映钟】(1609—1681?) 字伯紫,又作伯子、槩子,号慙叟,自称鍾山遗老。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明诸生,与张溥等人创立复社,名闻天下。映钟尤喜交纳,与同里顾梦游同被推为领袖,因梦游早歿而独领袖文坛。入清不仕,躬耕养母。少时与龚鼎孳善,鼎孳为清初贵官,招之入京,寓居十年。鼎孳去世,南归,移家仪真卒。映钟处于易代之际,多愤时忧国之作。今人邓之诚例举云:“其《边氓行》为伤海禁而作,乐府《女姬姜》、《海滨仇》、《三妇泣》、《海滨吏》、《运粮难》、《运粮苦》、《杂歌》、《渔妇怨》诸作,一字一泪,力陈疾苦,真诗史也。”(《清诗纪事初编》)其古体、律体,痛快淋漓,笔力雄劲,五律格调尤为苍老,如:“送君归鹿宕,山色正萧萧。雨气江湖白,秋声日夜骄。残书破碣户,幽鸟带松寮。他夕天门月,鍾期信可招。”(《送鍾子黄归鹿宕》)其七言绝句,风华旖旎,而寄兴深远,如:“片雨过城细草薰,江山如画鸟空闻。谁家楼上穿针坐,一片秋云似舞裙。”(《秦淮夏日词》)有《真冷堂诗稿》、《慙叟诗钞》,另辑有《补石仓集》。《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三有传。(王学泰)

【邓旭】(1609—1683) 字元昭。安徽寿州人。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出为甘肃洮岷道。罢官归,家于江苏南京,买城西竹园居之,有六朝松石之胜,遂为南京人。旭优游林下几十年,五岳游其四,其诗多为记其游踪行旅与描山绘水之作,莫釐、九华、庐山、华山、衡山皆屡有题咏,故邓之诚言其诗“不啻一部游记也”(《清诗纪事初编》)。诗学唐人,不事涂抹亦不作颓唐语,古体尤奇放,如七古《钱唐看潮》写钱塘大潮:“须臾海门走匹练,白虹蜿蜒吐长线。渐看鳌背负山来,汹涌顿令天地变。龙吹笛,鼙击鼓,冯夷天吴江山舞。万斛舳舻如败叶,怒涛一卷送平浦。”无论从用笔,还是从音调看,都是典型的唐音。有《林屋诗集》九卷。事迹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五。(王学泰)

【彭士望】(1610—1683) 本姓危,字达生,号躬庵,又号晦农。南昌(今属江西)人。少时受其父彭哲影响,颇重名节。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直臣黄道周被逮,曾倾力营救。南明安宗弘光元年(1645),史可法督师扬州,召入幕府,曾说以用高杰、左良玉之兵清君侧之恶。可法不能用,遂引去。绍宗隆武(1645—1646)时,曾官湖东道,后转湖西道。兵败,至宁都,依魏禧等,居翠微峰巅,并与禧弟兄等讲学于此,号“易堂九子”,结为生死之交。四十年间时时出游,亦有意结交伟人豪杰,以恢复天下为志。邓之诚言:“其诗所谓‘六十过头犹奔走,半为衣食半交友’。交友诚有之,衣食为托辞。”(《清诗纪事初

编》)后赍志以歿。士望善诗古文辞,诗以纪录其生平交游为主。其“诗文不依傍门户,勿假涂泽而意无尽自序其诗,谓即年谱交谱游谱,故事无不具,几于字字皆史。《感旧诗》一千七百馀言,述师友知戚二百馀人,终于牖下者三十七人,馀皆惨死。梁以樟称为甲、乙(指甲申、乙酉)以后第一篇诗史。盖惊心动魄,自昔所无矣”(《清诗纪事初编》)。其五古《冬心诗》三十首探讨丧乱之由,“愷切沉痛,皆中当时之症结,徒以时局大坏,虽豪杰有志之士,拮据赴难,无裨毫末”(陈田《明诗纪事》)。其七律或沉郁,或兀傲,皆有馀味,有一唱三叹之妙,如《同祝仲立潇湘泛月》:“十载江湖秋梦多,月明谁共话烟波。忧来只与青山近,老去其如白发多。芳草同舟公子思,落花空谷美人歌。纷纷木叶辞前渚,独有西风恋黍禾。”举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融入一片月色之中,含不尽之思,神馀言外。有《耻躬堂诗钞》十六卷,另有《耻躬堂文集》十卷,以及《春秋五传》等。陆麟书为之作传,附于《耻躬堂文集》。《清史列传》卷六六、《国朝耆献类徵》卷四〇〇有传。(王学泰)

【蒋薰】(1610—1693) 字闻大,号丹崖。海宁人,寄籍嘉兴(今属浙江)。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清初按籍授官,任缙云教谕,后迁伏羌知县,适逢饥荒,流移载道,请豁免民间所欠赋税,不允,又请革除滥征,勒碑通衢,并作诗劝民不必急于输租纳赋,府、司遂以其性迂阔,交劾落官而归。归乡后,自称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麦陇间,终年不入城府,日以诗文自课。合少壮所作,多至万篇,手自汰除,犹存五千馀首。其论诗以言志为本,言六朝诗不必学汉,唐不必学六朝,宋不必学唐,元不必学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学。此主张与浙东诗人学宋之风相悖。其诗一空依傍、凌厉直接,意透情深,亦复苍凉有韵。诗中感慨身世,伤时念乱之作很多,有悔恨入清轻易出仕之意,如《七月十二日有感下泪作》就有“忽念四十年,受恩不能死。终作老痴顽,涂颜对乡里”之句,可见其愧怍之深。生前刊有《留素堂文集》十卷、《诗集》十八卷、《外集》一卷。后又刊有《留素堂诗集》二十七卷、《外集》五卷。后又刊有《留素堂诗删后集》六卷,皆录清圣祖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680—1686)之诗。朱彝尊为撰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一六有传。(王学泰)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尊素,为东林名士,以弹劾魏忠贤遭杀害,宗羲十九岁入京伸冤,用铁椎击毙仇家。师事一代名儒刘宗周,在南京参加复社活动,曾与周铤、吴应箕等草《南都防乱揭》力斥阉党阮大铖,以防其东山再起,后阮大铖用事,几遭杀害。

清兵南下,召募义军从事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时,为左副都御史,曾与冯京至日本乞师,不果。南明反抗被平定后隐居,以著述为事,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其所著《明夷待访录》,发挥了孟子民贵君轻之思想,为近代民主观念之嚆矢。宗羲为清初思想家之一。其诗多为怀念故国、悼念战友之作。《八哀》、《哭沈崑铜》等都写得十分沉痛,如:“廿年苦节何人似,得此全归亦称情。废寺醺钱收弃骨,老生秃笔记琴声。遥空摩影狂相得,群水穿礁浩未平。两世雪交私不得,只随众口一闲评。”(《八哀·张司马苍水》)也有少数诗篇表现出诗人对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和对异族统治者淫威的蔑视,如:“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山河杂咏》)宗羲作诗注重学间性情,不事雕饰。其七律多佳联,如“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卧病》)、“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送万季斯北上》)等,皆精警动人。一生勤于著作,其哲学、史学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完)、《明史案》、《明文案》等等。其文收入《南雷文定》,诗收入《南雷诗历》,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九十年代初出版《黄宗羲全集》。全祖望为之撰神道碑。《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今人谢国桢为撰《黄梨洲学谱》。(王学泰)

【陆世仪】(1611—1671) 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世称桴亭先生。太仓(今属江苏)人。明诸生,才名早著。入清后不仕,与同里陈瑚等讲求实学,反对空谈心性,自天文地理、礼乐农桑、封建郡县、战阵刑法,无不源流毕贯。京中权贵屡召之,不至,以训蒙自给。世仪与陈瑚交最笃,陈瑚“序其诗,谓古风取材汉魏,近体得法李唐”,“平日论诗以《三百篇》为主,故一字一句必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非若世之以剽窃词华拟议声病为能者”(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世仪中年遭值国变,其诗反映了清兵对江南的蹂躏和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如《江宁谣》、《感遇诗》、《张睢阳庙》等都是这类作品。还有许多篇章描写了天灾人祸,如《大水歌》、《水没头歌》、《前旱》、《钱塘行》等,反映了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下,清统治层无意减轻对人民的压榨与剥削。这些作品与汉魏乐府之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其五、七言律格调轩爽,音节苍凉悲壮,如:“营头夜陨海涛奔,真宰茫茫未可论。绝岛君臣留正朔,瘴天风雨葬忠魂。谁将心事传龙比,赖有遗书属弟昆。千古崖山成恨事,临风遥恻一倾尊。”(《遥哭希声钱公》)从此诗可见其风格。因诗中触犯时忌处甚多,故匿不受梓,直至清圣祖康熙(1662—1722)末,方有张伯行刊本《桴亭先生诗集》十卷。其学术著作有《近思录辑要》等。全祖

望为之作传。《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王学泰)

【黄周星】(1611—1670) 初育于周氏,从其姓,字景虞,号九烟,入清后,复姓黄,自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别号圆圃,又号汰沃主人,笑苍道人。湘潭(今属湖南)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布衣素冠,寒暑不易。人有一言不合,辄谩骂。流寓湖州。诗文书画篆刻,无不精妙,愤激尤甚。清圣祖康熙十九年五月五日,忽感怆于怀,自撰墓志,作《解脱吟》十二章,与妻孥诀,取酒纵饮,尽一斗,大醉,自沉于水。周星愤世嫉俗,又处于易代之际,其感慨怨怼,一寄寓于诗,如七古《楚州酒人歌》,长达八百余言,赞美历代酒人,愿他们“一世二世传无穷”,而“下视王侯将相皆粪土”。陈田云:“九烟长歌,真气喷薄而出,微嫌杂拉。近体傲兀,自见风节。”(《明诗纪事》)黄诗初刻有《乌狗斋集》、《圃庵诗集》,皆未见传世,后刊有《九烟先生遗集》六卷。又编选有《唐诗快》。《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三有传。(王学泰)

【方以智】(1611—1671) 字密之,号鹿起,入清后出家为僧,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名弘智、浮山愚者,别号药地,一号墨历。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编修。与冒襄、侯方域、陈贞慧并称明季四公子。清军南下,南京陷,徒步走江、粤,游南海,在永历朝廷中任经筵讲官,后挂冠去,隐于粤西。清廷促其降,遂弃妻子为浮屠。以智学识渊博,举凡哲学、天文、物理、地理、生物、医药之学皆有所研究,亦工书法绘画,诗歌乃其余事。其作品如徐世溥言:“密之乐府,深厚雄杰,出奇不穷;古风渊雅。无复浮声,又能备拟历代,兼擅众长,高凉苍郁,一振唐风。”(《榆墩集》,转引自陈田《明诗纪事》)《告哀诗》、《哭卧子》、《独往》等为其代表作品。其作品收入《博依集》、《方子流寓草》、《浮山别集》等。学术著作有《通雅》、《易菴》、《古今性说合观》、《一贯问答》、《药地炮庄》等等。《清史稿》卷五〇〇《清史列传》有传,任道斌撰有《方以智年谱》。(王学泰)

【徐夜】(1611—1683) 初名元善,字长公,入清后慕嵇康(叔夜)之为人,更名夜,字嵇庵,又字东痴。山东新城人。明诸生,与王士禛为中表兄弟,明亡后绝意仕途,隐居东皋郑潢河上土室中,足迹不入城市。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一度游钱唐,过孤山,访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溯桐庐,登严子陵钓台,酹谢皋羽墓,徘徊赋诗而返,遂不复出。清圣祖康熙十七、十八年(1678—1679)间征召岩穴之士,有司欲以其名上达,力辞乃免。其诗学阮籍、嵇康,长于五古,

风格于自然恬淡中,时现哀婉之音,如《东村》、《初夏田园》等;七律,气势雄阔,多佳联。王士禛尝索夜诗稿,谢不与,后渡浔阳,稿没于水。士禛为摭拾遗诗,得二百首,编为《徐东痴诗》二卷。《清史稿》卷四八、《清史列传》卷七有传。

(王学泰)

【杜濬】(1611—1687) 本名绍先,字于皇,号茶邨。黄冈(今属湖北)人。明思宗崇祯十一年(1638)副贡生。少怀壮志,中年历经战乱,避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四十年。入清,绝意仕途,隐居鸡鸣山右,刻意为诗,十分贫困,至数日不能举火。慕其诗名者踵至,多谢绝之。钱谦益访之,闭门不纳。濬目睹明、清易代巨变,又以文章气节自励,故其诗多摭写亡国之痛和表现其淡于名利、安贫自守之情怀。如:“闻道三株树,崢嶸古至今。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孤撑体抱恨,苦楝亦成荫。”(《古树》)诗中借树自喻,表明自己坚持民族气节决不更改。其他如《遭跌伤甚秋水惕斋枉问赋谢》、《归来》、《至清江浦》、《清明客瓜渚作》都是这类作品。其诗中还有一些描写时世风俗作品,是珍贵的社会史料,如《初闻镗船鼓吹歌》写南京秦淮灯船之盛,明末作于北京的《竹枝辞》十八首,写北京民俗,亲切有味。长于五律,专学杜甫秦州、夔州时五律,沉郁顿挫,思力深厚,如:“星火梦瓜州,灯时得胜游。难逢今夕月,复此大江流。碧浸三山影,烟含万古愁。夜深谁击楫,吾道在渔舟。”(《元夕江楼看月》)风格沉雄悲壮,善于融情于景。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于时贤多有訾议,独许濬之五律,称为“诗圣”。有《变雅堂集》。《清史稿》卷五〇一、《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冒襄】(1611—1693) 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庵。如皋(今属江苏)人。明副贡生。少游董其昌之门,十四岁能诗。其昌序冒诗,譬之于王勃。所交游皆当时豪俊,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齐名,号“四公子”。积极参加复社活动,揭露隐伏在南京的阉党余孽阮大铖之罪恶。弘光朝马士英当政,兴党狱,襄仅以身免。清兵南下,备尝流离苦难。入清不仕,隐居故里,家有园池亭馆之胜,名水绘园,招致名士,为文酒宴游之欢。清圣祖康熙(1662—1722)中,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不就,以著述为乐。其诗多以诗酒宴乐为题材,其中亦寄寓了兴亡之感。徐世昌引杜濬言曰:“巢民才高任侠,与侯朝宗、陈定生、吴次尾诸人标榜南都坛坫。晚为遗民,诗益萧寥跌宕。刘公馥谓读其集如听绣岭宫前翁唱开元曲,哀感顽艳,足以动人。”(《晚晴簃诗汇》)其七律、七绝,风流旖旎,有晚唐风调,如“淡烟丝柳冒横塘,明月清秋读谢庄。夹岸哀筝横笛外,谁家小立怨昏黄”(《小秦淮

曲》),可见一斑。著述甚富。有《水绘园诗文集》、《朴巢诗文集》,又编其师友所赠诗文为《同人集》,还有《影梅庵忆语》等。《清史稿》卷五〇一有传。韩昈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吴乔】(1611—1695?) 又名爰,字修龄。昆山(今属江苏)人。一生困厄,息交绝游,生平不彰。其诗学西崑,对明末清初诸名家,深致不满,作《正钱录》攻钱谦益诗文,其中深文巧诋,指摘不遗余力。其论诗强调“诗中须有人在”,此说深为赵执信所服膺。又反对神韵、格调之说,对王士禛诗论颇为不满。其诗佳者可与温庭筠、韩偓比肩,其下者则步趋杨亿、刘筠而已。如“质子妖姬货可居,六王未毕已邱墟。鞭桥东去无灵药,驂乘西归有鲍鱼。黄犬泪中惭废立,白蛇醉里报驱除。当时早为秦非计,牧地为封食有馀”(《秦》),咏秦始皇一统天下到秦亡,用以影射清统治者,有一定意义,但在艺术上确如沈德潜所说:“摹仿西崑,然重重襞积纛祭,而未归自然。”(《清诗别裁》)板滞涩重,缺少灵气。作诗千有馀篇,多不传,有《舒拂集》。另著有《围炉诗话》六卷,《答万季野诗问》二卷、《西崑发微》三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七〇有传。

(王学泰)

【徐波】 字元叹,明亡后自号顽庵。吴县(江苏苏州)人。明诸生,曾入太学。少工为诗,隐艺香山中,筑室奉母。波为人淡于荣利,笃于交友,苦心于读书,感愤于世道,悉资之以诗。曾游楚中,与竟陵派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交好。谭氏曾为其题“落木庵”。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年尚在世。其七十四岁时自撰之《顽庵生圻志》言自己“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废吟诗,而发言莫赏”,可见其性格与为人。诗受竟陵诗风的影响,清凄富于幽趣。如《寄邵陵王侍臣》:“土壁昏灯鸡再啼,夜阑楼色转低迷。秋来积水无穷阔,此夕愁君梦画溪。”其作品收入《谥箫堂》、《杂香庵》、《落木庵稿》等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徐芳】 字仲光。南城(今属江苏)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为泽州知州,以治行第一征。入清,绝意仕进,与友人邓廷彬入山偕隐,亦时为衣食而出游,但不轻谒公卿。平生著作甚多,清人叶矫然记其论诗之语云:“诗之道,以气格为上,而结构亦不可遂轻;以性情为先,而声响亦不可遂废。词莫陋于缛赘,而轻率之句,亦不可谓之自然;境莫妙于目前,而凡俚之言亦不可名为真至。韵而不靡,朴而不粗,淡而不枯,工而不诡,使事而不流于杂,谈理而不坠于腐,模古而不伤于痕,蹈空而不病于凿。”(《龙性堂诗话》)这段议论比较好地理解了艺术上的“度”。

有《悬榻编》、《松明阁诗选》。《国朝耆献类微》卷二五〇有传。(王学泰)

【高珩】(1611—1696) 字葱佩,别字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淄川(今属山东)人。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入清,授翰林检讨,官至刑部左侍郎。请急归,乡居十馀年,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魏象枢以清节荐,复起为刑部右侍郎。次年,以老病乞骸归,优游林下十馀年卒。珩慕白居易为人,故诗风格情致亦与香山为近。所作诗以表现其闲适心境和酬赠之作为多。有些诗篇标明拟香山,如《后长恨歌》。此诗写清灭弘光朝后,南明宫女妃嫔被虏北上,又被乱兵争来抢去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妇女命运的悲哀。王士禛曾举其《都门清明送客》云:“故园小圃又春风,杏子樱桃次第红。明日春明门外路,清明消遣马蹄中。”(《渔洋诗话》)颇能代表其小诗风格。其诗平易通俗,下者流于草率滑易。平生作诗不下万首,而不甚爱惜,随手弃置,只存《栖云阁诗集》十六卷、《拾遗》三卷。另存《栖云阁文集》十五卷。王士禛为其撰神道碑。(王学泰)

【周亮工】(1612—1672) 字元亮,一字减斋(或作緘斋),号栎园。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少好学能文,从海内诸名士游,声名籍甚。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潍县令,以守城功,擢御史。京师陷,间道归乡。入清,以御史诏抚两淮,授两淮盐法道。调扬州兵备道,入为左副都御史,擢户部侍郎。福建总督佟岱劾其贪酷,下狱论死。后遇赦得释,起山东海防道,调江安粮储道。又被劾论绞,再遇赦,出狱不久即卒。亮工怜才好士,好奖掖寒士,有著作不显著者,务表彰之不遗余力。其论诗,注重性情。入清后,两度入狱,忧谗畏讥,情见乎辞,诗中反映了当时满、汉官员矛盾的尖锐与降清的汉族官吏寄人篱下、惴惴不安的心态。如《与林铁崖》组诗中写道:“强项吾徒贱,群侯勿遽嗔。热官思已熟,冷灶耻相因。”其写于狱中的《望家书不得与无间、望如、庭发》、《送章甫补臣出塞同田无间、王望如、吴庭发赋》、《七月十九日夜》、《庚子中秋》等篇都生动写出清初欲效忠清廷而不获信任的汉族官吏的悲哀。其诗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东、中原一带攻城略地、夺取政权的战争,以及东南沿海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复明斗争,都被写入诗篇,但因站在统治者立场,对历史真象有所歪曲。其五、七言律,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其小诗构思巧妙,语浅意深。有《赖古堂全集》。亮工嗜绘画、书法、篆刻,精于鉴赏,家又富于藏书故又有《因树书书影》十卷、《闽小记》四卷、《字触》六卷;另存《读画录》、《印人传》等。钱陆灿为其作墓志,姜宸英为撰

墓碣,鲁曾煜撰有《周栎园先生传》,周在浚撰有《周栎园年谱》。《清史列传》卷七九有传。(王学泰)

【许友】 初名宰,又名友眉(一作有眉),字介寿,又字有介,一字鸥香。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明诸生,为钱谦益及门弟子。谦益赏识其诗,所编纂《吾炙集》中选许诗最多(107首)。又善画,周亮工言:“有介画如其诗,苍楚有致,无一毫烟火气。好画小竹,仿管仲姬,柔枝嫩叶,姿态横生。自镌‘许友画竹’章,每作即用之。因予累至京师,渡河而北,不复画竹,忽放笔为枯木寒鸦,苍凉之态不可把视。”(《读画录》)由此可见友与周亮工交好,并对清统治有所不满。友推崇米芾,曾构米友堂。其诗以写景题画之作为多,风格孤绝旷远,与其画风格接近。有《米友堂集》传世。《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陈瑚】(1612—1674) 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举人。入清绝意仕进,隐居昆山之蔚村。瑚与清初名儒陆世仪交好,互为诤友,论学相辩驳,必无疑义而止。瑚崇尚实学,明末,知天下将乱,学横槊舞剑、弯弓弄刀,作名、利、酒、色四箴,以天下为己任,并钻研天文、河渠、兵农、礼乐之学,尝导乡人改造沼泽,筑垒蓄水,岁获丰稔。游其门者,多俊伟之士。瑚工诗,多以百姓苦难为题材,揭示明末清初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并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所见》、《悲洪都》、《昌国卫》、《瞿稼轩临桂挽词》、《过吴门有感》、《湖南》、《蚕妇怨》皆是其代表作品。其诗风雄健沉着。有《确庵诗钞》、《确庵文钞》。其学术著作有《淮云问答》、《筑围说》、《治病说》、《救荒定义》等共五十八卷。《清史稿》五〇〇、《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王学泰)

【刘体仁】(1612—1677) 字公馥。河南颍州(今河南许昌)人。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因家难弃官,从孙奇逢讲学。后官吏部考功郎中。少游江南与诸名士相过从,中年在京与王士禛、汪琬诗酒唱和,主持风雅。罢官后同明遗老傅山等往来,尝访傅山于太原松庄。体仁诗追摹晚唐,注重色泽,音调。也有些作品“出以生新、每近于涩”(沈德潜《清诗别裁》)。王士禛亦言:“公馥诗颇有奇气,如‘直溪束天色,湍激橡林左’,削刻极似东野语。”《送戴务旂游华山》也是具有孟郊风格的作品。诗中云:“我无济胜具,心悬神仙宅。椽壁闻蚁缘,索度或猱掷。即至玉女盆,莲花岂堪摘? 颇穷造化由,能识巨灵擘。一身出天地,笑看培塿积。归来毛髓异,定跨茅龙脊。”颇能代表其效法晚唐之作品有《曲阿灯岸》、《寄阮亭司理》、《即事》(西湖小阁多延月)等。诗以题咏酬赠之作为多,也有一些感事伤时之作。体仁亦善

著文填词,工书画,尝仿《云烟过眼录》作《识小录》。其诗集初名《蒲庵集》,后名《七颂堂文集》,共十四卷,其中诗九卷。另有《七颂堂词绎》一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方文】(1612—1669) 字尔止,一名一耒,字明农,号涂山。桐城(今属安徽)人。明诸生。幼孤,少有才名,思振其家声,与复社名流如吴应箕等相厚善,与其从侄方以智齐名。入清后,经亡国之痛,辄放废不自绳检,避兵吴江,病困南京,以教馆及受人接济为生。后游历徐州、燕北、杭州、兖州、曲阜、庐山、豫章、赣州,晚居南京,以医卜自活。为人狷介,愤世嫉俗,放任好嫚骂。刻意为诗,大多摭写性灵,直抒胸臆,举凡亡国之惨、破家之恻、民生之苦、世道之艰,无不写入篇章。如王潢所言:“尔止顾独郁郁不得志于时,又遭家难,漂泊江淮间,渡河逾济,直走幽蓟,与燕市酒人悲歌饮泣,已而短衫破帽,策蹇驴,出入关塞,寻卢龙之故垒,吊首阳之荒墟,发为诗歌,以泄其沉顿无聊、肮脏不平之气。”(《北游草序》)如《大明湖歌》藉其姐夫张秉文一家守济南抵抗清兵全部殉国的壮烈故事,摭写其家国之恻,长歌当哭,十分感人。写诗很少忌讳,《南浔叹》直接写庄氏“明史狱”;《都下竹枝词》揭露八旗兵丁的腐化堕落;《初度书怀》组诗中表现作者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这些皆是可引发文字狱的。其七律多佳联,郑方坤例举其“万劫不烧惟富贵,五伦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羁马,老来心似后凋松”,“性情最是游不倦,富贵何如诗可传”等等(见《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其诗由杜入白,如施闰章所云:“尔止为诗,虽民谣里谚、涂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款曲如话。人或疑为率易,不知其惨淡经营,一字未安,苦吟移日。故其诗真至浑融,自肺腑流出,绝无斧凿之痕。”(见《西江游草序》)著有《涂山集》。朱书方著有《涂山先生传》。《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三有传。

(王学泰)

【钱秉镫】(1612—1693) 字幼光,号田间,别号西顽,自粤归后,更名澄之,字饮光,避乱时曾削发为僧,法名幻光。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末诸生。早年因战乱四处奔走。明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移家南京白门,居钟山脚下,参加复社活动,与方以智交好。南明弘光王朝定都南京,秉镫因参与揭发掌权的阉党余孽阮大铖而被追捕,遂远走吴越。清兵南下,参加嘉善钱棨领导的抗清义军。不久,义军失败,妻孥遭难。唐王即位于福州,秉镫往归,授漳州府推官。唐王被害后,桂王即位于肇庆。秉镫于桂王永历二年(1648)往肇庆,授礼部仪司主事,官至翰林编修,知制诰。清军攻占桂林,自粤归乡,辗转关

山,历尽苦难。晚年家居,隐居不仕,以耕读写作自遣。秉镫博学多才。其所著《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皆持论平允,考证切实,为世所重。《庄屈合诂》一书则是“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文,尤负重名,诗作分早、晚两期。早期诗篇多写于战乱亡命之中,以描写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并反映其忧国家国的激越情怀;这些作品皆收在《藏山阁文集》中。晚期诗篇则多写于隐居韬晦之时,以描写田园风光及战后农村凋敝景象为主,时亦表现故国之思;这些作品则收在《田间诗集》中。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一〇引姚文燮语,谓其诗“不拘一格,上有汉、魏,下迄中、晚,随兴所至即为之。古诗感慨讽谕,婉而多讽,直得古《三百篇》之旨”。其著作除上述外,尚有《田间文集》。桐城方苞为其撰墓表(见《望溪文集》卷一二)。《清史稿》卷五〇〇、《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

(王学泰)

【陆圻】(1613—?) 字丽京,又字景宣,号讲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贡生。少与弟培、培齐名,人称“三陆”。又与柴炳绍、毛先舒、丁澎、沈谦等结文社,称“西泠十子”。清兵南下,弟陆培死于国难,圻远渡海参加义军,不果,归隐于医。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庄氏“明史狱”发,圻列名参校,因自首并输金得免。圻耻于苟全,遂于圣祖康熙六年(1667),弃家为僧,不知所终。女莘行作《老父云游始末》以寄哀思。诗以绮丽为宗,注重词藻,时号西陵体,《百一诗》、《咏史七首》、《十八滩舟行纪事》十首皆为其代表作。有《威凤堂文集》。《清史稿》四八四有传。

(王学泰)

【顾炎武】(1613—1682) 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更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晚年曾化名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人。少时从嗣祖顾绍芾学,即关注天文、地理、兵、农等实际学问,遍读“二十一史”及《大明一统志》,积极参与复社活动,为江南士大夫清流之中坚。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次年,清兵南下,炎武曾参与苏州反清起义与保卫昆山之战。江南沦陷,嗣母王氏绝食十馀日,以身殉国,临终遗嘱“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此嘱更坚定了炎武反抗异族统治之志。从此浪迹天涯,行遍四方,考察各地形势,交结英雄豪杰之士,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尝五谒孝陵(明太祖之陵墓)以示不忘故国,北上齐鲁,往来于燕赵齐鲁之间,特别着重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平、蓟州、昌黎等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写下了《昌平山水记》等书。后又遍游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最后定居于华阴。炎武认为华阴地形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可经

营。壮游期间,多次拒绝清廷征召,又曾陷于文字狱,多赖友朋相救,而其志不少挫。晚年其甥徐乾学、徐元文皆位至高官,在家乡买田置宅,请其归以终老,炎武始终不肯南归。清圣祖康熙二十年(1681),从华阴往游河东,复至曲沃。明年正月,卒于曲沃韩氏家。其诗多为政治抒情诗,用以描写国家民族兴亡大事,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充溢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思想,表现了诗人对于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殷切希望。其代表作品《秋山》、《海上》四首、《京口即事》、《吴兴行赠归高士祚明》、《江上》等皆有强烈的震撼力量。洪亮吉言其诗有“金石气”;潘德舆言其诗“坚实”,非“以诗为诗”,皆指出其诗作蕴涵丰富,笔深而意长。沈德潜云,宁人肆力于学,“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汪端言:“亭林诗,凭吊沧桑,语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茂,直合靖节、浣花为一手,岂宋《谷音》、月泉诸人所能伯仲哉?”(《明三十家诗选初集》)皆对顾诗内容、风格、流源及其成就作了很好的论述。炎武一生著述极富。其重要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之余》四卷、《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肇域志》一百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另有《亭林文集》六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亭林佚文辑文辑补》一卷、《亭林余集》一卷、《亭林诗集》五卷、《亭林佚诗》一卷。吴映奎、张穆等皆撰有顾亭林年谱。全祖望为撰神道碑,李光地为作小传。今人赵俣生著有《顾炎武传略》。《清史列传》卷六八、《清史稿》卷四八一有传。(王学泰)

【归庄】(1613—1673) 一名祚明,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各种别称很多,如归妹、归藏,归乎来,字或称元功,园公、悬弓、尔礼,晚岁居僧舍又称圆照等等。昆山(今属江苏)人。明诸生。明文学家归有光之孙。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昆山县丞阎茂才摄县事,下令薙发,庄率县民杀之,登城固守,事败亡命多年方归。后又与顾炎武、万寿祺等人招纳豪杰,伺机起义,不果,以教书为生。后弃儒冠,浪迹江湖间。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大川,凭古吊古,辄大哭,见者惊怪。与同里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目。庄为人狂放不羁,满腔磊落不平之气皆藉歌诗以发之,故尝自云其诗作“率感遇之作十三四,忧时之作十六七”(《吴馀常诗稿序》),“至于无益之应酬、不情之篇什,则概从谢绝”(归庄《谢寿诗说》)。其诗中描写国仇家难的作品极多,而且感情激愤,读之令人血脉奋张,如《哭二嫂》、《亡兄忌日》、《伤家难作》、《悲昆山作》、《别故庐作》、《哭万年少》、《送瞿公

子入广西》等。还有许多篇章以激烈的词句鼓舞同志,如:“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上莫便殉田横”,“豪杰由来须际会,寒灰他日定重然”(《冬日感怀贻山中同志》)。有些诗句则相信农民必然燃起武装反抗的烈火,如:“商君法令牛毛细,王莽征徭鱼尾赧。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日》)。一些登临书怀之作,亦写得工丽飞腾,笔意酣畅。庄工词曲、善书画,其作品在词曲史、书画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有《归庄集》。相传俗曲《万古愁》也为庄所作。《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六四有传。

(王学泰)

【法若真】(1613—1696) 字汉儒,号黄石,一号黄山。山东胶州人。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进士,入翰林院,官至侍讲。顺治十年,外补,官至江南右道布政使。圣祖康熙九年(1668),以母忧去官。后遂隐居林泉。康熙十七年,拟补河南布政使而未用,以“博学鸿儒”征而称疾不赴试,隐于胶州西七十里黄山上庄慈云庵。若真早年进士及第后遂沉滞于翰林、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之间,未能擢升高位,故其诗中常反映官场之中纵横捭阖的争斗和翻云覆雨的阴谋,如《壬戌纪事》反映权相明珠贿卖学差;《和孟百聚落花诗》自注云,“时有颠倒跋扈之雄”,指出此诗影射满洲大臣擅权,致有太阿倒持之虑;《有鸟》诗庆幸满族权贵的倒台。其他反映时政之弊和民间疾苦的作品,亦复不少,如写海禁的严酷、征敛的无已、文字狱的残酷,皆不加隐晦,而且往往以小注说明,略无避忌。若真早年倾心李贺,但其诗风“略无长吉气息,晚渐平淡,有杜之悲感,无其格律,不能以杜拟之”(见《清诗纪事初编》)。工书画,擅长山水。法存诗四千馀首,编为《黄山诗留》十六卷。《清史列传》卷六七、《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五一有传。

(王学泰)

【姜垓】(1614—1657) 字如须。山东莱阳人。姜采弟。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行人。垓兄采因建言触帝怒,下诏狱。垓昼夜奔走营救,得不死。明亡后,流寓天台,号佇石山人。入清不仕,与兄采隐居吴门,人称“二姜先生”。垓等论文讲学,嘉惠后进,三吴学子翕然从风。二姜歿后,吴人筑祠于鹤涧上祀之。诗风沉郁,其《兰江岁晏杂感》、《雨华庵》或写岁暮之感,或写逆旅滞留之情皆蕴涵着家国之恸。有《笈篋集》。《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一有传。

(王学泰)

【宋琬】(1614—1673) 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少负异才,自十八九岁时即以古文辞名世,每一篇出,学者视若拱璧。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至吏部郎中。因其家乡有于七

起义事,为挟嫌者两度诬告,一在顺治七年,一在圣祖康熙元年,言其与于有牵连,全家逮入京师,一门尽系西曹,久之为人所援,事乃得解。获释后,流寓于吴、越间。康熙十一年(1672),有诏起用补四川按察使。次年,入觐。卒于京师。琬一生屡遭不幸,所作诗记录其仕途坎坷、乱离飘泊以及两陷图圉的种种悲惨经历,反映了清初出仕的汉族士大夫所遭受的疑忌与歧视。其狱中诗真实再现了封建时代监狱的黑暗与恐怖,读之令人不寒而栗。诗中还讽刺了法吏、狱官滥施淫威,描绘了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感慨官场的腐朽,委婉地批评了朝政弊端。其代表作《七哀》模仿汉末蔡琰《胡笳十八拍》,描写其全家入狱的悲哀,悲怆惨怛,长歌当哭。《诏狱行》、《晨星叹》、《苦雨叹》、《听钟鸣》、《悲落叶》、《蟋蟀吟》皆是从狱中发出的呼喊与哀吟。特别是《狱中八咏》,咏狱中常用物事:芦席片、煤土炕、折足凳、砂锅盆、黑瓷盆、土火炉、苦井水、铃柝声,从中可见监狱生活,亦可见诗人坐牢时的复杂情感。琬晚年宦游四川,思乡而不得归,故其诗中也有不少抒发思乡之情与描写巴蜀山川的作品。伍涵芬言宋琬诗“全体皆苍茫灏瀚,藏万千气象,势莫能当,足以踢破三唐,驾轶两宋,实前代诸名家所未及,不可以碎锦求也。予强摘数句,亦存全豹于一斑耳。……宋句如‘少华西来朝白帝,太行东望走黄河’。又:‘霄汉何人骑白鹿,天门有路跨苍龙。’又:‘但留东海栽桑地,敢作南山种豆书。’‘山色浅深随夕照,江流日夜变秋声。’……皆能以雄情大力,开辟蚕丛,不欲随人作靡靡之声者。”(《说诗乐趣》)伍氏所摘之句多写于蜀中。琬长于歌行,取法杜甫、韩愈,傲岸苍浑,有雄悍之气,但又不失其质朴自然。其诗章法多变,音节激扬顿挫,七律学南宋陆游,注重对偶、雄健磊落、联语多警句。琬在京师时与施闰章、丁澎、周茂源、张文光、赵宾、严沆等相唱和,号“燕台七子”,又与施闰章齐名,人称“南施北宋”,影响了一代诗人。著有《安雅堂集》十八卷。亦能曲,在狱中时著有《祭皋陶》杂剧。王熙为撰墓志。《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曹溶】(1614—1685) 字洁躬,号秋岳、倦圃,别号金陀老圃。秀水(浙江嘉兴)人。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直言敢谏,内官为之侧目。入清仍任原官。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被革职。顺治十一年,起用为太常寺少卿。次年,进户部侍郎,迁广东布政使,降山西阳和道。圣祖康熙三年(1664),以裁缺归。自后优游林下,屡征不起,晚年以蒔花种竹、写诗著书为事。溶富于藏书,勤于诵读,好交游,爱才若渴,置酒倡和无虚日,四方之士倚

为雅宗者四十年。工诗词,与龚鼎孳齐名,时人称之为“诗坛双角”。其诗多写宦游经历,对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及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也有所反映,如《广应州童谣》写应州灾荒后“人食鸟,牛饮水”,“食鸟之人瘦如鬼”的惨况。《悯荒》二首更写出“寇祸烈兹土,举目无故观。百里一空城,蓬蒿郁相蟠”的城乡凋弊情景。长于五古,有汉魏风概。亦能词,对浙西词派有较大影响。著有《静惕堂诗集》四十四卷、词一卷,世宗雍正(1723—1735)间直隶总督李维钧出资刊刻。另著《续献徵录》、《五十辅臣传》、《粤游草》、《倦圃植蓀记》、《刘豫事迹》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八有传。(王学泰)

【龚鼎孳】(1615—1673) 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今属安徽)人。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兵科给事中,以敢言著,坐言事下狱,甫论释而明亡。降清,起吏科,转礼科,以才名受知于清世祖,擢为左都御史,进刑、礼、兵三部尚书。为刑部尚书时,对志士遗民陷于图圉者,尤多矜恤,艰难之际,善类或赖其力;轻财重义,常倾囊以恤穷交,故在当时亦享盛名,鼎孳才思敏捷,邓汉仪言:“公赋诗有三异:每与同人酒阑刻烛,一夕可得二十馀首。篇皆精警,语无咄易,此一异也;当华筵杂沓之会,丝竹满堂,或金鼓震地,而公构思苦吟,寂若面壁,俄顷诗就,美妙绝伦,此二异也;他人次韵,每苦棘手,而公运置天然,即逢险韵,愈以偏师胜人,此三异也。”(《诗观初集》)鼎孳一生仕历三朝,但身处易代之际,朋从故旧多为坚持抗清之士,故诗中时表现其悲凉哀伤、负疚愧怍之心境。如《送曹古遗给谏归殡汾阳》十四首既有自我表白和自我辩解,主调还是失足的悲痛,如:“喋血方龙斗,危身或虎争。责人知过当,时论本难明”(其五),“我且忘公祖,人翻骂正平。应怜余失路,此哭不成声”(其十二)。其集中还有大量感慨兴亡盛衰的篇什和少量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挽船行》、《秋日感怀》六首、《岁暮行》等。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人称“江左三大家”,但实际成就难与钱、吴比肩。其作品内容比较狭隘,诗风也不及钱、吴富于变化。其风格以婉丽酣畅为主,也有少量沉郁苍凉之作。朱庭珍言:“龚芝麓宗伯诗,词采有馀,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炼之妙,好骋笔而少酝酿深厚之功。气虽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尽;调虽高,然浮声较多,切响较少。当时幸得才子之称,后世难入名家之列。”(《筱园诗话》)有《定山堂集》,又将其宠妾名妓顾眉事谱为《白门柳》传奇。《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九有传。(王学泰)

【柴绍炳】(1616—1670) 字虎臣,号省轩。仁和(浙江杭州)人。明诸生。博闻强记,下笔数千言,工

诗古文,与陆圻、毛先舒等称“西泠十子”。为人清慎自守,以训徒至京师,杜门不交贵游,终日拥书吟讽。晚年辨析礼书,一轨于正。清圣祖康熙八年(1669),诏举山林隐逸之士,力辞乃已。绍炳诗,占体殊少特色,七律颇具风骨,绝句则风格绮丽。如《哭觉上人》“彩笔豪吟四十春,谁知布衲老风尘。江南花草浑闲梦,不道文通是恨人”,颇能代表其小诗风格。著有《省轩文钞》、《诗钞》、《白石轩杂稿》、《考古类编》、《古韵通》、《省过记年》、《家戒明理论》等。毛际可为其作传,毛奇龄为其作墓状。《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魏裔介】(1616—1686) 字贞白,一字崑林,号石生,又号贞庵。直隶柏乡(今属河北)人。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进士,选庶吉士,授工部给事中,累官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后致仕家居十六年,卒后追谥文毅。裔介立朝有风节,于国家大政多有建言,清朝大典半为其奏议所定,故裔介以存留清初文献自命,曾编《观始集》(未传),又继而编《清诗溯洄集》以传清初诗歌及诗作者。又好与文士来往,特别是北方遗老孙奇逢、申涵光等颇受其知遇,有欲领袖北方文坛之意。其诗文平平,无特别出色之处,部分诗篇颇能关注百姓疾苦,如:《投河叹》写顺治十一年(1654)春,流民因无钱渡滹沱河,夫妇率子女投河而死,用此以揭露当时圈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哀流民》、《秧歌行》都表达了对哀哀无告流民痛苦的同情。一些说理作品如《戒贪进》等也都写得情真词朴,符合其论诗“贵真不贵伪”之说。有《兼济堂诗集》八卷,《兼济堂文集选》二十卷。另有《崑林小品》、《崑林外集》、《薛文清读书录纂要》、《易经大全纂要》等。徐乾学为其撰墓志铭,任启运为其作传。《清史稿》卷二六二、《清史列传》卷五有传。

(王学泰)

【余怀】(1616—1695后) 字淡心,一字无怀,一字广霞,自称鬻持老人。莆田(今属福建)人,寓居南京。明末诸生,复社成员。其少时如自述所云:“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态媚互引,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板桥杂记序》)明亡后,浪迹江湖,晚年隐居吴门,犹能与清圣祖康熙间(1662—1722)苏州织造曹寅相接,享年在八十以上。怀工文善诗,为吴伟业、龚鼎孳、王士禛所赏识。其诗主要以闲适生活与感时伤事为题材,多清词丽句。杨际昌云:“近人多爱其‘绿萝僧院孤烟外,红梅人家小阁西’一联。予谓写景虽工,要是装色画,非逸品也。不如‘芳草故都春闭户,落花寒食夜开樽’淡宕有味。”(《国朝诗话》)所举诗句有余

诗中颇有代表性。陈田云:“淡心诗,擅六朝之华藻,运唐贤之格调,吐属隽雅。角逐词场,不减子山哀艳、小杜风流。”(《明诗纪事》)怀以《板桥杂记》闻名于世,诗收入《研山草堂诗集》,但不多见。余集多以不同时期所刻小集行世,如《甲申集》、《江山集》、《味外轩集》等。杂著有《余子说史》、《东山谈苑》、《四莲花斋杂录》、《茶史》、《砚林》、《妇人鞋袜考》、戏曲《集翠裘》、《鸳鸯湖传奇》等等。《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八有传。

(王学泰)

【曹尔堪】(1617—1679) 字子顾,别字顾庵。嘉善(今属浙江)人。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讲学士。因事罢归,优游田园,或作远游,诗酒流连,篇什益富。与宋琬、王士禛、王士禄、施闰章、汪琬、程可则、沈荃并称“海内八家”。尔堪十岁能属文,十二善诗词,时人拟之“圣童”。又善强记,诸琐屑事皆能举其原委,若舆图要害,山川形势,指画纤悉,听者神竦。才思敏捷,诗文顷刻便成,若同宿构。诗学晚唐,其律体颇有温、李风韵,如:“腊雪街亭满,何时到巩昌。关心樽底月,斧钺帐前霜。阁暖调鹦鹉,花浓隐麝香。出门怜旧伴,白首尚为郎。”(《送宋荔裳少参之任秦州》)其诗以吟咏山水和酬赠之作为多,也有少量作品反映民生疾苦,如《养蚕词》写养蚕人的辛苦与战乱给纺织、蚕桑业带来的萧条。亦工词。著有《杜鵑亭稿》、《南溪文略》、《南溪词略》,编选有《秋水轩唱和词》。《八家诗选》中存尔堪诗一卷。《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一五有传。

(王学泰)

【魏象枢】(1617—1687) 字环极,一字环溪,号庸斋,晚称寒秋老人。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进士,选庶吉士,旋受刑科给事中,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以病乞休。立朝端劲,沈德潜称其为“本朝直臣第一”(《清诗别裁》)。清圣祖尝赐“寒松堂”匾额,卒谥敏果。象枢不以诗文见长,但喜吟咏。姚莹《识小录》谓其“每作文诗,质之阮亭(王士禛),一字一句,瑕颚必指。公大喜,尝有割谢云”。其诗直抒胸臆,不假雕琢。在一些交往酬酢之诗中多宣扬理学。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如《剥榆歌》等。有《寒松堂集》九十二卷、《寒松堂全集》十二卷。另有《儒宗录》、《知言录》等。陈廷敬为其撰墓志铭。《清史稿》卷二六三、《清史列传》卷八有传。

(王学泰)

【侯方域】(1618—1654) 字朝宗。商丘(今属河南)人。父恂为东林党魁之一,方域少时以贵公子游于党人耆旧之间,在乡曾与贾开宗等创立雪苑社,后至南京参加复社活动,遍交东南名士,并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四公子”。为抑制阉党徐夔阮大

铖东山再起,参预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南明弘光朝建立,马士英、阮大铖秉政,方域逃往扬州依史可法,又客高杰军中。清兵南下,南京破,归乡。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参加河南乡试,为副贡生。后抑郁以终。方域以古文名世,与魏禧、汪琬齐名。其诗受明后七子的影响,拟古不化,学杜甫而少成就。因所处时代与少陵有相似之处,其描写社会动乱与感事伤时之作或有少陵风韵,如五言《哀词》九章,颇类杜甫《八哀》,诗中歌颂为国献身的民族英雄,如史可法,而对于变节者如李雯等亦有曲谅之词。方域少时风流倜傥,流连花酒(《桃花扇》即以其为主角),有些与歌妓往来小诗颇具才人韵致。如《游吴遇李校书》:“零落衫裾到芰荷,湘灵皎月照愁多。停舟曾向浔阳过,怕听当年白傅歌。”有《壮悔堂文集》十卷,《四忆堂诗集》六卷。邵长蘅为其作传。《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宋徵舆】(1618—1667) 字直方,一字辕文。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明代为诸生时,曾与陈子龙、李雯组织几社,以古学相砥砺,号称“云间三子”。其诗学明“后七子”,尤其推崇王世贞。早年诗作多窗课社稿,以拟古人之作为主,明亡前后则多反映社会动乱之作。如《参军行》写明军主将卢象升苦战无援,朝中奸臣坐观其败。其小诗颇有晚唐风韵,如《冬闺夜怨》云:“落尽飞云暮色寒,黄昏北斗照阑干。可怜一片如霜月,惟有深闺独自看。”有《林屋诗稿》、《林屋文稿》。另辑有《全闽诗选》及《明诗选》。《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六有传。(王学泰)

【周茂源】(1618—1677) 字宿来,号釜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出为处州知府。守处将五载,招抚流亡,开辟山路,颇具才干。顺治十八年,被劾去职。晚岁葬明末民族英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并厚恤其女及嗣孙,为人所称道。茂源少时曾入几社,与陈子龙、李雯等相唱和。为京官时,与施闰章、丁澎、宋琬等人诗酒往来,称为“燕台七子”。茂源诗多为唱和酬酢之作;擅长七律,有时亦用律体写民生疾苦,如:《偶感》写“征求久已困江村,岩谷依然井税繁”;《闽民就食江右》写“满目流亡剧可怜,尚馀残喘适江天”。此类作品通俗流畅,很少用典。其写景摭情之作,则刻意烹炼字句,注重用典,亦多警句,如“悬笔未消秦吏狱,持旌难发汉家仓”(《薊门杂咏》);“偶然花月春江夜,共此蒹葭秋水心”(《雨中诸子集予机山别业》);“冰天破笠东林寺,雪夜孤灯左蠡船”(《彭古晋归自南康邀同楚越诸子小集》)。正如邓之诚所云:“诗善比附,字字工切,才不及卧子(指陈子

龙)而深稳过之。”(《清诗纪事初编》)有《鹤静堂集》十九卷。其子周纶为撰行状,《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一六有传。(王学泰)

【施闰章】(1618—1683) 字尚白,一字岢云,号愚山,晚年又号矩斋。宣城(今属安徽)人。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刑部主事,充山东学政,取士有“冰鉴”之誉。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圣祖康熙六年(1669),以裁缺归。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授侍讲,转侍读,参与修明史。闰章少时即以古文诗赋名噪江左,长更以诗名世。王士禛云:“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琬)之右。”(《池北偶谈》)宋、施皆属入清后出仕的第一代诗人(不包括由明降清者),其诗没有激烈的民族情绪与强烈的反清意识。由于生活在清初,施诗对清入主中原过程中的种种暴行有所反映,但立足点与明遗民诗人不同,只是客观地展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描写清兵屠戮妇孺的《上留田行》,用极简洁的笔触勾勒出极悲惨的一幕:“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御怀中乳。”至于凶手为谁,诗中并未点明。其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与民族矛盾联系起来。郑方坤言:“吉、临、袁三州,兵马蹂躏之余,邑多逋赋,追呼急,辄相聚为盗,作《劝民急公歌》,垂泣谕之。遍历崇山广谷,备悉民间疾苦,作《弹子岭》、《竹源坑》诸篇,以告诸长吏,读者感泣,比诸元道州之《舂陵行》,而民亦相劝输赋,毋敢后时。于是一意休息,吏不能为暴。”(《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可知闰章以循吏立场写人民苦难,使各级官吏不要剥削过度,否则百姓会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如《海民行》、《牧童谣》、《临江悯旱》、《皇天篇》、《湖西行》等皆是。人间至悲至惨之事,往往以温柔敦厚出之,决无激烈指斥之语。闰章诗大多为写景摭情之作,长于五言。陈文述言其写景之作“神骨俱清,气息穆静,非寻常嘲风弄月比也”(《施愚山诗钞后》);并举闰章五言联语“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华灯明客馆,霜月满江城”,“风雨残雨路,关河独去人”,“凉风生昨夜,秋色渡长河”,“看云孤阁暮,听雨万峰秋”,“微雨洗山月,白云生客衣”,言其皆有禅意。王士禛列举其近体五言八十二组佳联作“摘句图”(见《池北偶谈》)。入选联语形式鲜明,余韵深长,格律工稳,从中可见其诗学工力。闰章尝自言:“吾诗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确如所言。闰章论诗,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以议论入诗,尊唐贬宋;主张“诗如其人,不可不慎”,反对浮华叫嚣,因之其诗风空灵凝炼,意境幽深。有《学馀堂诗集》五十卷、《文集》二十八卷。

另有《燠斋诗话》、《矩斋杂记》、《端溪砚品》、《拟明史》、《青原志略补辑》等。汤斌为撰墓志铭,毛奇龄为撰墓表。《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王广心】字伊人,号农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世祖顺治六年(1449)进士。授行人。顺治十一年,分校顺天乡试,奉使楚中,却馈遗,止携竹簟数束而归以奉亲,人称“竹簟行人”。巡视京通二漕仓,清除积弊,又修筑通会河,运道无阻。以亲老乞归,卒年八十一。广心少年时曾参与几社活动,与陈子龙、李雯、夏允彝等唱和。其诗受到乡先辈王世贞、吴伟业影响。杨际昌谓其诗“秀气成采,长篇如《大梁行送林平子》,韵致仿佛梅村”(《国朝诗话》)。这类作品不仅风格韵致与吴伟业类似,内容也与其相近。皆善用婉转铺排的长篇歌行以歌咏兴亡盛衰。如杨际昌所举之诗即写大梁,在明朝时福王曾开府于此,备极繁华风月之盛,后经战乱、水淹,到清初已残破不堪,诗人为此感叹再三。其他如《后拙政园歌》、《尚书墓道行》皆与此相类,感慨富贵繁华不永和人生无常。广心近体、特别是七言律诗主要受王世贞的影响,注重气势、音调、字面,但缺少社会内容,以酬赠之作为多。其诗文收入《兰雪堂稿》、《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三三有传。

(王学泰)

【顾大申】本名镛,字震雉,号见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工部主事,擢为郎中,分司夏镇河道,节约开支,筑镇城,设两湖书院,升洮泯道僉事,卒于官。少时曾参加几社活动,与王广心、宋徵舆、周茂源等唱和,后又与施闰章相酬酢。其诗学明后七子,乐府诗拟汉魏六朝,五七律拟杜甫,皆神完气足,论者以为可接武陈子龙。诗多感事伤时之作,在唱和酬赠之作中亦往往有所寄托。如《雪后登歌风台示沛令》:“一剑收秦鹿,秋风万里心。悲歌谁掩泣,壮士已成禽。井邑新丰旧,龙蛇大泽深。残碑埋野戍,雪后此登临。”此歌借怀古以伤今,寄托了作者对明朝覆灭的悲哀。其律诗气象高华,对偶多警策,如“万山争一险,绝壁鸟飞难”(《故关》)、“乱石淹人迹,层冰怯马蹄”(《出平定州》)、“地随督亢依山尽,河控桑乾入塞来”(《始发良乡》)、“荒城野戍鸣秋柝,海峤孤臣冷葛衣”(《秋雨移酌栢园舟中》),皆为其翘楚。大申还善丹青,尤工设色。其诗集本有《鹤巢集》、《燕京唱和集》、《泗亭集》等,后删订为《堪斋诗存》八卷。将《诗经》、《楚辞》、《文选》诗、唐诗编为一集,名《诗原》。又著有《鹤巢乐府》、《河渠论》十二则、《图经》二十八篇。《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二〇七有传。

(王学泰)

【柳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又名云娟,字影怜,后改姓柳,名隐,名因,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吴江(今属江苏)人,一说嘉兴(今属浙江)人。明末名妓,能画工诗,情辞婉丽。后为钱谦益妾。《历代妇女著作考》引《宫闱氏籍艺文考略》云:“初适云间孝廉。孝廉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弃去游吴越间,以词翰名。及归宗伯(指钱谦益),堆书征僻,订讹考异,间以谐谑,略似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宗伯撰集《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册。所著有《戊寅草》,邹斯瀚刻其诗于《诗媛十名家集》中。”在南明弘光朝,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弘光朝覆亡,柳劝钱殉节,钱不采纳而降清,以礼部侍郎衔值秘书院事兼明史副总裁。后因为当道者所忌告病归。谦益博览群籍能文善诗,为清江南一大家,主盟文坛达五十年之久。《东山酬唱集》即为钱、柳倡和之作。今存柳之专集有《柳如是诗》一卷、《我闻室梅花集句》三卷、《湖上草》一卷、《尺牋》一卷等约十种,又编有《古今名媛诗词选》,积久得诗一千馀首,词四百馀阙。自跋云:历代名媛聚于一帙。披诵把玩,借以遣兴。钱谦益谢世的当年,柳因家族争产纠纷而自杀。事见《苏州府志》等。今人陈寅恪撰有《柳如是别传》。

(陈祖美)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东淘(江苏东台)人。其祖父吴凤仪为王艮弟子,嘉纪自幼受到阳明学之影响。少时多病勤学,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参加州试,获第一。入清,绝意仕进,居海滨,自甘贫困,靠教书与好友接济为生,不与达官贵人来往,但与冷士嵎、孙枝蔚等能诗工文之遗民友善,互相唱和,自题其室曰“陋轩”。王士禛任扬州推官时,与之交往甚密,后贫困而死。嘉纪后半生以平民身份与海边盐民生活在一起,经历了从同情盐民到与盐民成为一体之过程:“往昔遇汝曹,心魂悸且恫;今予独何辜,栖止与汝同。”(《通盐钱逃至六灶河住》)因此,其作品深刻反映了盐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陆廷抡云:“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策,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女女,辛苦蛰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咏《春陵》,何以过?”(《陋轩诗序》)嘉纪诗还描写江淮一带人民在清统治下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如:《临场歌》、《归东淘答汪三韩过访五首》写农民所受的勒逼租税之苦;《李家娘》、《难妇行》写老百姓受清兵杀戮抢掠之惨;《邻翁行》、《江边行》写清政府的海禁政策给沿海人民带来的灾祸。其他如写风灾、水灾、兵灾等天灾人祸给人们带来苦难的作品触目皆是,而且富于感人的力量。还有少量反对

民族压迫,怀恋故国的作品,如《过史公墓》、《过兵行》等。其诗运思深刻,风格孤峭严冷,措词隽洁朴素,不事雕饰,不用典故,如汪懋麟所言:“其为诗,工于严冷危苦之词,所撰今乐府,尤凄急幽奥,皆变通陈迹,自为一宗。近代岩栖之作,鲜有过者。”(《吴处士墓志》)但这些又都出之以自然,林昌彝言吴诗“老辣严畏,有姜桂之气,然出于天籁”(《海天琴思录》)。今人邓之诚谓“其诗学杜,得其神,遗其貌”(《清诗纪事初编》)。嘉纪僻处一隅,世少知者,后得到王士禛、周亮工的揄扬,才为世人所称赏。孔尚任在《题居易堂文集屈翁山诗集序后》则把他与王士禛、屈大均并推为当时三大诗人。有《陋轩集》行世。其事迹见汪懋麟所著《吴处士墓志》。《明遗民录》中有传。今人杨积庆撰《吴嘉纪年表》,附于其所编注《吴嘉纪诗笺校》之后。《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尤侗】(1618—1704) 字同人,一字展堂,号悔庵、艮斋、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末参加复社,颇著声誉。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以拔贡谒选为永平推官,以擅自殴打旗丁降调归。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以献诗受到褒扬,赐以御书“栖鹤堂”,迁为翰林侍讲。侗工诗文,早年诗作颇重才情,诗近温、李。如其咏李涣诗云:“十郎才调福无双,双燕双莺话小窗。送客留髭休灭烛,要看花睡炤银缸。”(《再集笠翁寓斋顾曲叠韵》)中年以后,学白居易,流于俚俗浅近,且多游戏率意之作。有些篇什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如:《咏史》八首写顺治间清廷在扬州一带采买少女,以供宫中淫乐;《漕船行》描写清室运粮之船在运河中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之情景,并揭示了“转饷本供军国乏,今费一石致一斗,国用日虚民日竭,运弁如狐军如虎”,给江南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其他如反映清统治者横征暴敛、清军南侵残酷践踏江南人民的作品也不少。其《外国竹枝词》写海外风物,《明史乐府》写明史重大事件,亦颇有特色。侗亦擅长骈文、词曲。著有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传奇《钧天乐》等。另有笔记《杂俎》、《病约》等传世。其诗文词曲等皆收入《西堂全集》、《馀集》共一百三十五卷,另有《鹤栖堂稿》,六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

(王学泰)

【申涵光】(1619—1677) 字和孟,或字鳧孟、孚孟、符孟,号鳧盟、聪山。直隶永年(今属河北)人。明贡生。父佳允殉国难,入清遂绝意仕进,杜门奉母,足不入城市。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曾为大学

士魏裔介所荐,坚辞不就。工诗善文,与鸡泽殷岳、永年张盖并称“畿南三才子”,开河朔诗派。涵光生活的家乡是受清野蛮政策祸害最烈之处,其诗对于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反映,如:《哀流民和魏都谏》写清初圈地政策造成农民流亡和沦为满洲贵族奴隶的情景;《春雪歌》写清统治者视民命如儿戏;《燕京即事》写清贵族生活时也揭露了他们对人民的奴役。涵光还有许多描写自己安于贫困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他提倡,“诗必唐,唐必盛,盛必杜”。诗风浑厚质朴,长于古体,多用白描,不用词藻。其七绝有特殊成就,善于用平易的诗句写出美丽的景色。杨际昌曾例举其七绝多首,如:《游黄花谷》“竹杖寻源入上方,满山榭叶晚苍苍。乱碑零落游人少,一道飞泉下夕阳”;《溪上》“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闲登万里台。两岸芦花飞白雪,午桥烟里一舟来”。有《聪山集》、《荆园小语》等。《清史稿》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柴静仪】字季嫻。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柴雲倩次女,沈汉嘉妻,沈用济(字方舟)母。工书画,善鼓琴;有《凝香室诗抄》、《北堂诗草》,与其儿媳朱柔则同里,且同为清初蕉园女子吟社之成员。柔则,字顺成,又字道珠,约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在世,方舟之妻。有《绣帙馀吟》一卷及《嗣音轩诗抄》。《名媛诗话》谓静仪诗“落落大方,无脂粉习气”;又称:“道珠情深,于词笔妙。”沈德潜则评静仪诗“本乎性情之贞,发乎学术之正,韵语时带箴铭,不可于风云月露中求也”(见《清诗别裁集》卷三一)。事迹见《名媛诗话》、《国朝闺秀诗·正始集》等。(陈祖美)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薑斋,双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石船山,又自署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兵进入湖广,曾与管嗣裘等志士密谋起义兵于衡山,不果,辗转入粤,参加南明政权,以瞿式耜荐,为行人司行人。时永历朝内党争甚烈,连上三疏以伸正论,不纳,被排挤出朝。返乡,受到清政权追捕,乃改名易装,自称瑶民,居于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等地。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基本平定,乃返衡阳,先住南岳双髻峰续命庵,后徙居衡金兰乡高节里,以著述为事,撰写了大量的史论与哲学著作,也写了大量的诗、词。其诗多为摭写亡国破家之痛和表达自己经历艰辛、愤懑穷愁而不改变初衷的激情,如《江行》、《广哀诗》、《哀雨诗》、《续哀雨诗》等都真实再现其为了坚持民族气节、反抗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所走过的艰险道路,并表达了对为民族献身同志的哀悼。在极端困难下,他有着十分坚定的信念:“半岁青青半岁荒,高

田草似下田黄。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月霜。”(《绝句》之六)他常以花喻志,希望自己的奋斗,能给世间带来变化:“浩劫天台忆不真,飞花偶掠鬓丝银。闲抛万点猩猩血,掷与人间唤作春。”(《桃花流水引》之一)这类作品触目皆是,如《正落花诗》十首、《续落花诗》三十首、《广落花诗》三十首、《寄咏落花》十首等。其《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更是长歌当哭,诗中以血泪文字记录其一生屡蹈死地、几遭凶险和一门忠烈的情景。夫之兼擅诸体,如陈田所云:“其学问深邃,才力宏富,占体时与魏、晋、盛唐合辙。七律七绝,音调洪亮,词旨沉着,可与遗山、山谷分席。又其遭时多难,器音堵口之作,往往与杜陵野老吞声、皋羽西台恸哭,同合于变雅、变骚之旨。”(《明诗纪事》)邓显鹤亦谓其诗“词旨深复,气韵沉郁,读之如夏鼎商彝,如闻哀猿唤鹤,使人穆然神肃,邈然意远”(《沅湘耆旧集》)。一生著作极富,其史学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等,哲学著作有《黄书》、《噩梦》、《张子正蒙注》、《尚书引论》、《周易稗疏》、《诗广传》、《庄子通》等。其诗收入《董斋诗集》。又编选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各种著作共三百五十八卷,收入《船山遗书》。余廷灿为之作传。《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

(王学泰)

【吴绮】(1619—1694)字菌次,一作圉次,号听翁,又号丰南,人称红豆词人。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清世祖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生,以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升兵部主事。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明杨继盛故事为题材的《忠愍记》),称旨,即以杨官官之,为武选司员外郎。圣祖康熙五年(1666),由郎中出为湖州知府,多惠政。湖州人因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称之为“三风太守”。康熙八年,以风雅好事失官。归后购废圃以居,有求诗文者以花木为润笔,因名其圃曰“种字林”,日读书其中。喜宾客,在湖州为官时与四方名流过从,赋诗游宴无虚日。绮才华富艳,瓣香晚唐。其诗以酬酢题赠之作为多,风流蕴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为“一时才士”,如:“怪石颓云势不平,乱云卷出大江声。渔郎醉卧芦花里,笑指何人触浪行。”(《题画》)诗中描写艳情的作品刻意学李商隐,如:“憔悴春衫杏子纱,潘郎二月葬梨花。愁能无泪天将老,死到多情月不华。抛散珍珠思闹扫,丢残铁钹在琵琶。莫言蜡烛因灰尽,想到当年油壁车。”(《董少君哀辞》四首之一)此组诗写冒襄与董小宛情事,并哀悼小宛早逝,从诗情之缠绵深挚,到词藻之工丽,用典之深曲、音调之华美,皆神似玉溪之《无题》。绮工骈文,与陈继崧并称。亦善写词,以《醉花间·春闺》上片的“思时候,忆时候,

时与春相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被称为“红豆词人”。有《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凡文十二卷、诗十卷、词三卷、曲一卷。编纂《宋金元诗永》,另有《岭南风物记》。《清史稿》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龚贤】(1619?—1689)又名岂贤,字半千,又字野逸,号野遗,又号半亩、柴丈人等。昆山(今属江苏)人。早年参与复社活动,与方文等人交好,后厌金陵喧嚣,移居广陵。晚年结庐于南京清凉山下,葺半亩园,筑扫叶楼,栽花种竹,隐居不仕,悠然自得,以鬻书画、开馆授徒为生。其画有名于时,张庚《画徵录》把他列为“金陵八家”之首。笔墨之暇,赋诗自适。其诗学中晚唐,擅长五律,诗风恬淡,善于以平易的字句,再现江南、金陵一带山水景色,与其画相类。如《晚出燕子矶东下》前四句“江天忽无际,一舸在中流。远岫已将没,夕阳犹未收”;《扁舟》前四句“扁舟当晓发,沙岸杳然空。人语蛮烟外,鸡鸣海色中”等,皆能显示其诗风。贤致力于唐人诗集的整理与编辑,刻有《中晚唐诗纪》。有《香草堂诗集》、《半亩园诗草》。《清史稿》卷五〇四、《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七有传。

(王学泰)

【顾湄】字伊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湄本惠安县令程新子,新与顾梦麟交好,梦麟无子,湄自幼养于顾家,遂为梦麟嗣子,以太仓名儒陈瑚为师。明末清初慎交社、同声社兴,皆以得湄为重。梦麟长于毛诗郑笺,湄传其业,尤工诗,为吴伟业所重,吴选《太仓十子集》,即包括其作品。湄诗师法吴伟业之近体。特别是五、七律皆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其内容则以感时念乱和怀念明故国者为多。如《己亥六月杂诗》写张煌言、郑成功进兵镇江及兵事扰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诗序云:“予里兵戈络绎,窜伏无常,东西邻负老携幼,作风雨散去。予母病不获行,敝庐孑影,闻马足声,则心怔怔然若春,如是者凡两匝月。”其第一首云:“偷生逢世难,局促敢求安。南国沙虫异,西风禾黍残。身孤馀涕泪,亲老迫饥寒。岂不怀朋友,其如行路难。”虽然战乱由明复国志士所引发,而作者之心还是倾向于他们。其他如七律《感怀》(石城笳鼓不堪听)、《阅江楼》或愤弘光小朝廷之腐败,或感慨明太祖创业之艰难,都反映出诗人对故国的怀恋。著有《水乡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张丹】(1619—?)一名纲孙,字祖望,号秦亭,又号竹隐君。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少时与陆圻、毛先舒、柴炳绍等诗酒唱和,号称“西泠十子”。性恬淡,好游历,喜山水,其诗亦多行旅及描山绘水之作。长于五古与五律。毛先舒言其诗风“苍澹顿挫,如大

漠风云,莽莽无极”(《西泠十子诗评》),乃指其晚年所写五古。如北游时所写的《琉璃河》“仲冬严气寒,坚冰白似骨。策马琉璃河,桥滑不可越。从者挽缰绳,两足尚棹机。前人或后徒,那知堕倏忽。阑干有铁棒,半插沙水窟……”确如邓汉仪所说:“可颇颇少陵入蜀诸作。”(见《诗观二集》)有《张泰亭诗集》十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沈谦】(1620—1670) 字去矜,号东江子。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明诸生。少聪颖,六岁能辨四声,长益笃学,入清不仕,隐于医,然不废吟咏。邓之诚云:“华亭蒋平阶称其文行并高,刻励向学,择交取友,颀然自异于流俗。”(《清诗纪事初编》)与毛先舒、陆圻、柴炳绍等并称“西泠十子”。谦诗学晚唐温、李,兼采六朝。诗温丽委婉,颇似《才调集》中作品。如《新霁》:“晓起积阴散,荒原极望时。云晴芳草合,日上大江迟。世事独不见,天涯有所思。山中愧高卧,得有外人知。”谦还长于韵学,著有《东江词韵》。有《东江集钞》,其中诗五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丁澎】字飞涛,号药园。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初官刑部主事,调为礼部主客郎中。顺治十四年,主持河南乡试,为榜首试卷更易数字,廷议谪戍奉天,谪居塞上五载。圣祖康熙四年(1665),赦归,当已有五六十岁。澎少有隼才,其所作《白雁楼诗》,流传吴下,士女争先采摭,书之衫袖。居盐桥,与其弟景鸿、濬并称为“盐桥三丁”,又与陆圻、柴绍炳、毛先舒、沈谦等相唱和,人称“西泠十子”。通籍后,在京师与宋琬、施闰章等诗酒往来,人号“燕台七子”。赦还后,遍游名山大川,故其诗多题赠唱酬、行旅写景之作。也有许多描写遣戍谪居的篇章,如《录别八首》写遣戍上路时自己与前来送别亲友的复杂心情:“送客黯无色,强辞慰我颜。相怜复自痛,不久当回还。十里各分手,吊影身独单。”把流放者的凄凉和亲友的强颜安慰写得十分生动。又如《初至靖安寄邸中诸旧友》、《东冈》、《辽海杂诗》、《度岭见长城》等诗写谪戍之地的艰苦和自己的思乡情绪都很感人,但这些篇章大多写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未敢触犯时忌。著有《扶荔堂集》与《信美堂诗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林雲铭】字西仲。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徽州府推官。圣祖康熙六年(1667),以裁缺归。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中,为耿精忠所囚。逾三年,清兵破闽,始获释。居杭州,以卖文为活。雲铭少嗜学,每探索精思,数日

不食,里人皆呼之为“书痴”。因久在徽州为府县吏,其诗多写当地百姓在战乱、苛政、陋俗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如《登陴纪事》、《白门治狱》、《悯旱》、《猛虎词》、《老女行》皆属于这类作品。诗学白居易,流畅通俗,于平易之中时有郁勃之气。著有《损斋焚余》八卷、《吴山穀音》四卷、《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又善于以通俗文字解释、分析典籍,著有《楚辞灯》、《庄子因》、《韩文起》、《古文析义》等书。其所著文言小说《林四娘记》流传颇广。《国朝耆献类徵》卷二四九有传。

(王学泰)

【魏际瑞】(1620—1677) 原名祥,字善伯,号伯子。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与其弟禧、礼并称为“宁都三魏”。入清,禧、礼皆弃诸生不应试,惟际瑞支持门户,独应试不改。为顺治十七年(1660)岁贡生,以所得脩脯济其二弟之困。家贫,游食四方,恒在浙、闽、粤军中,扰攘之际,可以权宜救人。与当时方面大僚范承谟交好,助其蠲荒赈饥,两浙饥民赖以存活者数百万人。其北贡京师,亦以文名倾动一时,朝中满、汉亲贵乐与之往来,朝鲜使臣亦以之为奇士,其名传于域外。际瑞勇于任事,为乡里捍患,冒白刃而不悔,一方倚为安危者三十年。其诗多以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为题材,如:《猛虎行》写苛政猛于虎;《将军行》写官府与盗贼一样逼得百姓卖儿卖女,甚至鬻及老母。这类作品大多写得古直质朴、激越悲壮。有些近体诗富于气势,与其人格相类:“大江东下海门宽,万里奔流激箭湍。不信山从水地出,却疑身在画中看。龙窝灯火千株动,蜃气楼台一点寒。谁道风波不可涉,风波危处却平安。”(《金山》)最后二句极富哲理。著有《魏伯子集》十卷,另有《五杂俎》五卷。魏禧为之撰墓志。《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皆有传。

(王学泰)

【董说】(1620—1686) 字若雨,号西庵,又号鹧鸪生;明亡弃诸生,曾改姓名林蹇,字远游,号南村,亦称灵胡子,又称槁木林;一度为僧,名智龄;亦署静啸斋主人,又名南潜,字月函,亦字尧峰,又字宝雲,号补椎,一号枫庵,亦号漏霜等等。有些是写小说等杂著时所署。乌程(今属浙江)人。少聪颖,十岁能文,十三岁为诸生,十六岁补廪生,二十馀岁善观天象,明末乱起,遂无意于功名。值岁荒,乃出金珠米谷,用给饥寒之家。入清,遂出家,三十馀年,足不履城市,惟与黄周星最善。其诗“不名一家,才思所至,穷极幽窈,以写其空阒崖海之思”(《清诗纪事初编》)。长于七律,多佳联,如:“香拈细雨招新梦,门闭春风仗短童”(《春日》);“眼底三千年旧迹,梦中七十二青峰”(《漫兴》);“愁来草阁四窗雨,梦里江南万叠山”

(《书屋初成》);“秋晚每租邻舍艇,日斜去看别村花”(《客有和竞孚斜韵诗余用其韵》);“空堂炼墨捣茶臼,细雨借书披钓簑”(《庵居杂事》)。这些诗句,或写对故国的怀恋,或写乡村隐士生涯,皆十分凝炼。著有《丰草庵集》,其中诗集十一编,为《人间可哀编》、《采杉编》、《落叶编》、《西台编》、《病孔雀编》、《红蕉编》、《登峰编》、《临兰亭编》、《雒阳编》、《洞庭雨编》、《斗韵牌编》。这些作于清世宗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作者出家之前。另著有小说《西游补》。《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一有传。

(王学泰)

【孙枝蔚】(1620—1687) 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少年时适逢李自成义军攻潼关,尝起兵对抗,兵败逃往扬州。初业贾,旋即折节读书。性好诗,间为诗而自曼声以歌之,然不事生产,家益贫。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枝蔚与荐,求罢不允,促入试,不中式而出。以年老授内阁中书职衔。放归益贫,游食为生。枝蔚处于易代之际,入清后又极贫困,如王泽弘为其诗文集所作《序》中言,“穷老无归,以谋生不暇,日奔走于燕、赵、鲁、魏、吴、越、楚、豫之郊,其所阅历山川险阻、风土变异及交友世情向背厚薄之故,皆一一发之于诗,以鸣不平而舒怫郁”。其诗还涉及了作者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忆昔》、《与客二十余人夜发三原赴张果崖》等反映明末关中久战不息、城乡萧条;《村居杂感》、《甲申述怀》、《甲申春日记事》等反映作者在李自成政权统治下的感受。至于眷恋故国、悼念抗清牺牲志士、揭露清军在南方屠戮的作品更多。诗中最感人的乃是描写个人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抑郁之情的作品,如《客句容五歌》、《秋怀诗十一首次韩韵》等。枝蔚学陶,长于五古,风格质朴老健,平易畅达,而令读者感到蕴蓄无穷,也有些雄豪之作。其近体诗较为一般,有些过于平直,短于诗味。有《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文集》五卷、《诗余》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梁清标】(1620—1291) 字玉立,一字苍岩,号蕉林,一号棠村。正定(今属河北)人。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降清仍原官,寻授编修,累官至侍讲学士、户部尚书。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议撤藩时,曾赴广东移尚可喜家属。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清标工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后,则飒飒于春容之音矣。”实际梁集中写于明代的作品极少,而写于清代的作品,“感慨讽刺之言”并不少见。《落日行》写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对

南明用兵时,催粮派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挽船行》、《上滩行》写康熙间平定三藩之乱时人民所承受的种种灾难。其中“讽刺之言”、指斥之语通篇皆是,如《落日行》云:“君不见,前年楼船下闽海,村村烟灭空庐在;又不见,伏波将军度洞庭,桑麻鸡犬无时宁。百战苦为封侯计,万家祁寒夜流涕。”其讽刺、鞭挞之意皆很明显。清标诗中也有一些与其身份相应、颇能体现“春容之音”的作品,如:“半船坐雨冷潇潇,仿佛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听处是芭蕉。”(《自题蕉林书屋》)读这类诗篇,“如披春风,如覩宫阙,如睹威风在霄”(申涵光语,见《晚晴簃诗汇》),使人心契神飞。清标也工词。有《蕉林诗集》十八卷、《蕉林文集》、《堂村词》与《蕉林随笔》等。《清史列传》卷七九有传。

(王学泰)

【赵进美】(1620—1692) 字巖叔,一字韞退,号清止。山东益都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入清为太常博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进美少有诗名,中进士后,名声籍甚,与姜垓、宋琬、方以智、陈子龙、李雯等以诗名雄视南北。其论诗崇尚唐音,故自序其集云:“予尝取古今论诗之合者,于宋得严沧浪(羽),明得徐昌谷(祜卿)、王元美(世贞)。”(《清止阁集自序》)进美前半生处于战乱之中,其诗对明末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以及清入主中原过程中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有所反映,如《北征》十六首、《对雨作》、《途中杂感》、《禁旅》、《置酒行》、《乌豆行》皆为此类作品。晚年则多记行怀古之作。王士禛云:“公少为诗清真绝俗,得王、孟之趣。使江西时,尤刻意二谢。其《放吟》一卷皆乐府诗,丁明末造,多悲天悯人之思,顾盼跌宕,不主故常,有邯郸生天人之叹。”(《赵公墓志铭》)如“桥上孤烟断,天高野色开。晚岚浮月出,夜舫载秋来。城冷蒹葭暗,风清鸛鹤哀。萧萧闻梵响,幽影散莓苔”(《济水》),虽学王孟,却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缺少恬淡之韵致。其所开拓的诗风对王士禛有所影响。著有《清止阁集》九卷。王士禛为撰墓志铭,赵执信为撰行实,田雯为撰墓碑。

(王学泰)

【顾景星】(1621—1687) 字黄公,一作字赤方,号黄公。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聪颖,六岁能作赋,八九岁遍读经史,有“神童”之誉。与胡承诺等著名于江汉间。明贡生,南明弘光时授推官。清兵南下,遂隐于淀湖间。后为贝勒士赖所得,命以原官随军,南征浙、闽,固请始得放归,自后屡征不出。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托病不与试,后遂翛然遗世。景星为明遗老,清初局势稳定后常常漫游四方,故其诗多记行旅见闻、山川形貌、风土人情。有些作品也反映了民生疾苦与故国之思,但较

为浮泛。诗中间有自注,颇能与时事相参稽。其代表作品有《吴易擒》、《攻魁篇》、《扬州钞关》、《楚宫老妓行》、《恶溪渔父行》等。诗作通俗流畅,少馀味,亦有少量小诗写得颇具风韵。袁枚曾例举其《忆内》“静夜停金剪,含情对玉缸。数声风起处,花雨上纱窗”,《姬人睡》“玉腕明香簟,罗帷奈汝何。不知梦何事,微笑启腮窝”;并赞其“风韵独绝”(见《随园诗话》)。著述颇多,大多不传。传世者有《白茅堂全集》四十六卷。另有《读史集录》、《南渡来耕集》、《阮籍咏怀诗注》、《李贺诗注》及《虎媒记》传奇等。《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六有传。

(王学泰)

【姚文燮】(1621?—1691?) 字经三,号羹湖,晚号听翁,又号黄柏山樵。桐城(今属安徽)人。清世宗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裁缺,起补直隶雄县知县,升云南开化府同知,署阿迷州知州。会“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被拘下狱,不屈。后逃归北京,未补官。居京师三年,请归养母,居龙眼山中,丧母,以哀毁卒。文燮宦游半生,诗作多写行旅山水,其写于滇、黔者多记其异于中原的景观与习俗,亦有不少描写滇中兵乱的作品,如《荒峤》、《铁索桥》、《黔中谣》等。陈诗在《尊瓠室诗话》中谓其“工琢句。五言如《感别》云:‘马渡湖天白,鸿归海气青。’《临安道中》云:‘蠹树泉穿腹,螺峰雾束腰。’《赠友》云:‘鹤回梅影舞,鹿过药苗平。’七言如《舟次》云:‘朱檐梦隔桃榔雨,画舫晨封橘柚云。’《开化杂诗》云:‘钟鸣寨顶欢牛饮,火暗林丛赛盂神。’《曲靖》云:‘月明古庙歌《梁文》,雨剥残碑拜党人。’”这些诗句虽不如李贺诗句之怪异,但可见其造句方式有受贺影响之处。姚诗分集刊刻,有《薤麓吟》、《壬寅诗》、《雄山草》、《滇行草》、《黄柏山房诗文集》。另有《无异堂文集》十二卷和《昌谷诗注》四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毛先舒】(1622—1688) 一名騄,字稚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奇慧,八岁能诗,十八岁著《白榆堂诗》,受到陈子龙的赏识,为作《猷景楼诗序》。长与柴炳绍相善,与陆圻、丁澎等称为“西泠十子”;又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语云:“浙中三毛,文中三豪”。明末诸生。入清,绝意仕进,晚居钱塘东园,一生不出里门。光舒诗受到明后七子影响,以盛唐为宗,音节浏亮,内容较为空泛。邓之诚云,毛“尝著《诗辩坻》四卷,论诗极精,举诗戾凡十有七端,深以讥刺为戒。故所作篇章,不涉时事,可谓善于自全者”(《清诗纪事初编》)。其诗集有《东苑诗钞》、《蕊雲集》、《晚唱》,词集有《鸾情集选》,文集有《小匡文

钞》、《思古堂文集》、《稚黄子文泚》、《东苑文钞》等。诗学、韵学著作有《诗辩坻》、《填词名解》、《南曲正韵》等。毛奇龄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黄生】(1622—1696) 原名琯,又名起溟,字扶孟,号白山。歙县(今属安徽)人。明末诸生,入清弃去,以著述为事。生博学广艺,工于书画,尤精小学,著述甚多。自称研究杜诗三十年,著《杜诗说》。又有《唐诗摘钞》、《诗麈》等诗学著作。其诗多以明、清易代之际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为题材,有些作品还反映了清初种种弊政。《清明有感》、《筑堤行》等为其代表作品。诗笔雄骏,造语通俗明畅。其诗集为《一木堂诗集》因有碍语,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被禁焚。其著述还有《论衡》、《识林》、《叶书》、《字诂》、《义府》等。《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

(王学泰)

【周筑】(1623—1687) 初名筠,字初贞,更名后,改字青士,号筼谷。浙江嘉兴人。明诸生,入清弃去,隐于米市,边贾边读,与同里朱彝尊、朱一是等相倡和。筠于交友,胸无柴棘,人有匮乏,倾肆中之钱、米与之。岁荒,出私钱为粥以赈,生计渐窘。于是往来嘉善、桐乡间以诗格授人,以资衣食。晚年入京坐馆二年,返乡途中,卒于宿迁。筑自云:“似士不游庠,似农曾读书,似工不操作,似商谢奔趋。立言颇突兀,应事还粗疏。饥冻不少顾,吟诗作欢娱。”其诗正是这种独特身份和性格的写照,如阮元《两浙輶轩录》记其除夕鼓棹、元旦访皋山僧道蕴诗云“作诗卖米周青士,白业还能精进无”,即为一例。筑位卑名高,以诗倾动一时。今人邓之诚云:“筑诗格老成,实过朱彝尊,彝尊但华好耳。读筑诗,字字沉着,凄人心脾。求之同时异曲同工者,惟一吴嘉纪足以匹敌之。”(《清诗纪事初编》)一生作诗甚多,传世者惟《采山堂集》。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李维钧刻此集时,谓筑诗佚存尚千馀首。其古文出入欧、曾,尤精词律。著有《词纬》三十卷、《今词综》十卷、《析津日记》、《投壶谱》等。《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七有传。

(王学泰)

【笪重光】(1623—1692) 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晚改名蟾光,号郁冈真隐。江南句容(今属江苏)人。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进士。由刑部郎中转湖广道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执法严峻,以劾权臣明珠、余国柱罢归,寄居丹徒。晚好道,与田夫野老游。时流中最善龚贤、张风、程邃等高人逸士。笪诗多写景摅怀之作,往往借山水以寄托其闲旷之思、世外之情,诗平易浅俗。亦工书画,为世所重,人得其片纸,珍若拱璧。著有《江上诗集》十卷及《书法》、《画荃》、《文

法》等。《清史稿》卷二八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三三有传。(王学泰)

【严绳孙】(1623—1702) 字荪友,号藕荡渔人。无锡(今属江苏)人。六岁时能作径尺大字,及长以诗古文擅名一时。为人萧疏澹远,脱然尘埃之外,识者目为倪瓒一流,以布衣名动公卿。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应博学鸿儒科试,因目疾仅赋《省耕诗》一首。帝亲阅卷,亟命取进,授翰林检讨。时论以为荣。与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在职五年,颇受圣祖眷顾,曾为江西学政,主持乡试,迁为右中允,未几告归。归乡后,杜门不出,另筑雨青草堂、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晚岁有以诗书画请者,一概不应。其诗古体宗黄初、建安,近体出入晚唐温李,蔚茂婉丽。诗多借描写山川胜景、四时风貌以寄托自己对隐逸的追求和对仕途险巇的畏惧,如“京江春树隔芊绵,咫尺神灵意惘然。青壁近迷山寺雨,绿蓑遥入海门烟。江鱼水阔难通市,石燕风多不避船。我欲然犀照幽渚,梦魂犹自怯潺湲”(《烟雨渡江》),结尾二句表达了诗人仕履清朝的忐忑之情。著有《秋水集》八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并有传。朱彝尊为撰墓志铭,陆楣为之作传。

(王学泰)

【毛奇龄】(1623—1716) 一名姓,字齐于,一字大可,又字春庄,号初晴,一号秋晴,以郡望人称西河先生。萧山(今属浙江)人。明诸生。少时曾参加抗清活动,明亡后为仇家所害,变姓名亡命江湖十馀年,事稍懈,乃归里。复以文学游食四方,有重名。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中二等,授翰林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为会试同考官。旋乞假归,居杭州,得痼疾,遂不复出,以著述为业。晚年性乐易,好奖拔后进。奇龄博学强记,自视甚高。睥睨古今之士,好辩驳,语多过激,流于肆诞而不自觉。奇龄为清初著名学者,强调惟有饱学之士才能作诗人。故其作品典事多、辞藻多而性情少,议论多、学问多而生活少,模仿多而创造少。曾自言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临感慨无闻焉,工拙可知矣”。此语虽系自谦,从中可知其对于自己创作脱离实际生活的情况尚有所认识。诗中也有一些咏史怀古、谈学论道、题画咏物以及描写浪迹江湖羁旅生涯的作品,如:“凉月几时落,渡头风正生。四时寒役苦,百虑晓眠惊。岁晏吴关路,江高季子程。青天看不极,一雁向东行。”(《晓发呈伯兄》)其他如《闻笛》、《晚泊口号》、《早渡扬子》以及著名的七古《明河篇》都是这类作品。从中可见作者辗转流离、飘泊不定的生活和隐隐约约的战乱阴影。其投赠应酬之作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奇龄长于五言。其古体初拟

选体,又拟齐梁,最后学唐。五律则从初唐入手而学杜。格律工稳,起结亭当,对偶贴切,多笔意深长之句。其七言古体学初唐,委婉腴丽,思路绵邈,音调谐美,如《雨中听三弦子》、《白雪楼歌》等皆为佳作。亦工古文、词、曲。著作极富,后世编为《西河合集》,共有四百九十二卷之多,其中诗五十四卷。还著有传奇《放偷记》、《买家记》。《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生前尝自撰墓志铭,全祖望撰《毛检讨别传》;传中对奇龄备加诋议,言其墓志几乎字字皆诬。(王学泰)

【程可则】(1624—1673) 字周量,一字彦揆,又字湟濠,小字佛壮,号石臞。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少时与屈大均皆师事陈恭尹之父陈邦彦。清军南下,邦彦殉国,大均、恭尹皆弃诸生。入清,可则仍应试,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会试第一,大学士范文程题参其文义理纰缪,被黜落。顺治十七年春应阁试,授内阁撰文中书,迁户部主事,擢兵部郎中。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出知桂林府。时方会檄撤藩,京师百务纷拏,可则以敏捷干练称。及赴任,以忧疾卒于全州。可则出仕游宦时值岭海初通,以南人孤士居于仕途,自觉力孤势单,故广通声气,与江东及中原名士游,曾与曹溶、朱彝尊订交,东游江浙,西至豫章,与施闰章赋诗赠答,又北走燕赵,循太行至京师与王士禛、汪琬、王士禄等相倡和,故其诗多题赠唱和、记行记游、怀友感旧、登临摅怀之作。《送杨鄂州职方使安南》、《卖船行》、《怀小金山旧馆》、《送徐庾清钱柏归越》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学唐,歌行富于气势,俊伟腾踔,如《送邵横庵之秦中》开篇四句云:“五月火云烧幽州,大风驱之云不流。昨夜雨来不盈掌,山鬼叫啸农为愁。”五律苍凉清逸,如:“天意存羁旅,春山放早晴。乍看峰影出,真觉马蹄轻。浅水流花过,长亭问柳行。好风吹不尽,已是定州城。”(《晴》)其七律亦颇有特色,五、七绝则较为一般。程氏有《海日堂集》七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王学泰)

【陆次雲】字雲士。钱唐(今浙江杭州)人。高才绩学,颇有名于时,连不得志于有司。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参加博学鸿儒科试,不中。后以拔贡被任命为河南郟县知县,以丁父忧去职,复起补为江阴县令。所历诸官皆有善政,去郟之日,耆旧垂髫走送累百里。知江阴时,风雅好客,一时名士至常州者必过访。汤右曾未遇时曾客江阴,次雲理政之暇,与之互相酬唱。其诗多记其游宦生涯及身边琐事,少量的咏史与宫词也颇有特点。代表作品如《北征杂咏》、《五溪杂咏》、《泛洞庭湖》等都写出了旅途艰辛。《出门》写游子与母、妻女作别情景,生动感人。

写与幼女别时,“弱女方四龄,初知离别意。恐其牵袂啼,深伤游子绪。乘彼睡未醒,温存加絮被”。字字真切,纯以真情至性感人。其宫词咏史,亦多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垒块。如《咏史》云:“儒冠儒服委丘墟,文采风流化土苴。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陆生”指陆贾,为刘邦谋士。此诗虽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亦有影射清初文字狱之意。次雲擅长五言,五古、五律清新朴茂;七古、七律较为浅俗,少唱叹之妙。一生著述极多,有《北墅绪言》、《湖壖杂志》、《八紘译史》、《八紘荒史》、《译史记余》、《峒溪纤志》、《纤志记余》、《芙蓉城四种》、《尚论持平》、《析疑待正》、《事文标异》、《史册拾遗》等。其诗作收入《澄江集》。亦工词,有《玉山词》。《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邓汉仪】字孝威,号钵叟。泰州(今属江苏)人。早负诗名,与吴伟业、龚鼎孳等名诗人及故老遗民游,为胜流所推重,曾采当时与之往来朋友之诗编为四集(四十卷)名曰《诗观》。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应博学鸿儒科试,不中,以年老授内阁中书,考试后归来名益重,“寓董子祠,执事就问者塞市”(阮元《两浙輶轩录》)。汉仪诗虽多描山绘水、记行记游之作,但也往往寄托了易代之痛,如:“江州迁客未归秦,弦索初开泪满巾。今日善才风调尽,虾蟆陵下总新人。”(《过江州琵琶亭》)其《题息夫人庙》更为有名:“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此诗确实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许多士大夫依违新、旧之间的心态。其近体诗颇有六朝风味,七绝态秣意远,胜处尤多。除编《诗观》四集外,还编辑有《愚山诗钞》、《慎墨堂诗品》等名家诗集选本。其自著诗按年编纪,名为《淮阴集》、《官梅集》、《过岭集》、《濠梁集》、《燕台集》、《甬东集》、《被征集》等,从中可见诗人经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

(王学泰)

【钱芳标】(?—1678?) 初名鼎瑞,字葆汾,一字宝汾。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顺天乡试举人,历官中书舍人。康熙十七年(1678),荐试博学宏词科,值丁内艰,未赴考,不久即卒。朱彝尊评其诗云:“其辞雅以醇,其志廉以洁。其言情也,绮丽而不佻,信夫情之挚而一本乎自得之欤。”(《钱舍人诗序》)芳标受到云间诗派的影响,主张诗必盛唐,推崇高华缛丽的诗风,在学习云间前辈诸子注重词藻、格调的同时,还强调诗情的真挚与气势的雄健。如《击鲜行》、《长春寺病马行》皆为其代表作品。著有《金门稿》、《湘瑟词》。《国朝耆献类徵》卷一四一有传。

(王学泰)

【魏禧】(1624—1680) 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诸生,入清弃去。与兄际瑞、弟礼结庐金精翠微峰,自为师友,号“宁都三魏”。又与李腾蛟、彭士望、曾灿等结为生死之交,号为“易堂九子”,名为讲学,实为志在恢复的秘密团体。他们视人合如天视,以至子孙而不改,自律极严。诸子皆贫,不巧取人财,率自耕以食。禧力持人才支持世界之说,乃出游江南江北,入浙中,居闽、粤海滨,所至以文会友。以传播其学说,结纳当时贤豪遗老,为起事之准备。后卒于道途。禧诗质朴无华,多用平易词句写人民在不合理社会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代表作品有《入郭行》、《卖薪行》、《从征行》、《孤女行》、《孤儿》、《出郭行》等等,从中可见其写作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禧长于古体,短于近体。尝自云:“余于律诗,心无所自得。”(《西江诗话》)有《魏叔子诗集》八卷、《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及《左传经世》等。邵长蘅为之作传;魏礼为之作志略。《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汪琬】(1624—1690) 字苕文,号尧峰,一号钝翁。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江南“奏销案”起,谪为北城兵马司指挥,复为户部主事。以病归家,结庐于洞庭山尧峰之麓,以著书自娱。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辞科,授翰林编修,参预《明史》编纂。次年,告归。卒后,门人私谥文介。琬诗初学晚唐,注重字句色泽。在京时,与王士禄、王士禎兄弟并称。此时作品除酬赠题咏外,多流露出徘徊于仕、隐之间的矛盾心情,如《史馆有感》,“痴蝇争暖栖难稳,小柳含风卧未成”,反映出其经“奏销案”后尚有馀悸的心态;有时甚至想以韬晦之术退出在朝汉族士人争斗的核心,如《小游仙词》云:“天上材华又一新,几多牛鬼与蛇神。修文老吏迂疏甚,不是琼楼作记人。”其归隐后诗则学南宋陆游、范成大。郑方坤言:“淮上阁百诗(若璩)每肆讥评。谓仅可妆点山林、附庸风雅,比于山人清客然者,语涉轻薄。今三复其集,大致脱去唐人窠臼,而专以宋为师,于宋人中所心摹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径太狭,造语太纤,且隐逸闲适话头,未免千篇一律。”(《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琬擅长古文,尤工于史传之文,自称平生有文五六千篇。其文华而不纤,质而不俚,海内翕然推之。与魏禧、侯方域并称。生前刻有《钝翁类稿》,凡诗稿十二卷、文稿三十八卷、外稿十二卷;《续稿》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凡诗稿八卷、文稿二十二卷、别稿二十六卷。晚年重订诗文为《尧峰文钞》五十卷,其中诗十卷、文四十

卷。另有《说铃》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陈廷敬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李柏】(1624—1694) 字雪木。陕西郿县人。少孤贫力学,自耕而食,明诸生,母亡后弃去,结庐太白山中,读书乐道,与盩厔李颙、富平李因笃齐名,人称“关中三李”。柏自甘寂寞,不务声名。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邓之诚言柏“诗文皆极险怪逋峭,盖心伤故国,歌哭行吟,通天入地,以寄其悲愤无穷之感。若加绳墨,则为不知柏者也。《南游草》有云:‘嘉靖、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廷,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廷也。’此顾炎武、黄宗羲所不能道者。”(《清诗纪事初编》)《崇祯儒将》四首揭露了明末将帅的腐朽,《老人》写出了百姓在苛政虐待下悲惨的遭遇,可见其诗作与其思想是一致的。其作品收入《榭叶集》;此集五卷,附《南游草》一卷。钱仪吉为作传。《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王学泰)

【陈维崧】(1625—1682) 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贞慧为复社名士,维崧少时即有才名,吴伟业称之为“江左凤凰”。其父宴集才彦名流,每侍于侧,援笔作序记,千言立就,瑰玮无比,众皆惊叹,莫不折辈与之交。长与王士禄、王士禛、宋实颖、计东等倡和,名益大噪。补诸生,困于场屋。后出游,诗坛酒社,到处逢迎。自王公卿相以下,凡贺赠、宴饯、颂述之作,必得其片纸以为荣。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荐应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授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在馆四年,勤于纂辑,以病卒任。维崧诗、词、文俱佳,以词及骈文闻于世。维崧一生浪迹四方,交游极广,其诗多为题赠酬酢与记游记行之作,许多诗中涉及到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与才士名流。如《拙政园连理山茶歌》借写苏州名园拙政园中的一株山茶,述及此园主人陈之遴(顺治朝大学士)在政治斗争中的浮沉。《寄黄梨洲先生求为先人志墓》借向黄宗羲为其父求墓志,写出了两家世谊和明末清初的两朝时局。《顾尚书家御香歌》借写顾家好客为燃明朝所赐御香以抒发兴亡之感。诗最后写道:“君不见客衣零落诘堪论,半渍香痕半泪痕。忍看天宝年间物,我亦东吴少保孙。”其他如《酬许元锡》、《赠李研斋太史》、《得桐城方尔止先生书感赋兼怀密之先生》都是这类作品。这类作品不仅写出了作者沧桑之感,也表达了对亡明的眷恋。其记行诗亦颇多感慨,如《汝宁杂感》:“莽莽平舆对水开,年年汝水抱城隈。已拚客到中原老,更值秋从绝障来。沙接郡楼寒拂槛,风传戍鼓暮衔杯。秦川公子飘蓬甚,废宅重经只自哀。”诗中所表现的是对游荡

生活的厌倦。维崧工于七言,七古歌行学吴梅村,婉转流畅,风华典赡;七律出入于云间派,沉郁顿挫,格调苍老;七绝则近于晚唐,哀艳流逸,悱恻缠绵,如:《红桥》云:“轻红桥上立逡巡,绿水微波渐作鳞。手把柳丝无一语,十年春恨细如尘。”著有《两晋南北史集珍》六卷、《湖海楼诗集》八卷、《文集》六卷、《俚体文》十卷、《词集》三十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徐乾学为撰墓志铭,尤侗、储欣为之作传。(王学泰)

【李灏】(1625—1684) 字景雱,号坦园,又号据梧居士。高阳(今属河北)人。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举人。次年,登进士第,选翰林庶吉士,授检讨,累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历充修纂《世祖实录》、《太祖高皇实录》及《明史》监修总裁官。娴熟掌故,朝廷大典,必以属之。灏长期为文学顾问之臣,其诗多为应制奉和以及歌咏宫廷生活之作,内容比较贫乏,诗中很少涉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内心的激烈冲突,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冲和雅正,不为叫嚣之音,亦不蹈纤仄之习,……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谓台阁文章者,盖若是矣。”其行旅诗写旅途见闻、山川风貌,较为出色,如《舟发浦城》、《初发都门》等篇章皆学南朝大小谢而又不流于模拟,较有价值。著有《心远堂诗集》十二卷、《二集》四卷。《清史稿》卷二五〇、《清史列传》卷七有传。

(王学泰)

【沙张白】(1625—1691) 原名一卿,字介臣,号定峰。江阴(今属江苏)人。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补诸生。入清,两次应乡试不中,曾向大学士魏裔介上书,皆不遇,后遂闭户读书。张白与当时诗坛耆宿名流,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杜濬、高珩、汪琬等皆有交往。龚鼎孳对其诗颇为欣赏。张白重视诗歌的“奖正刺邪,讽谏规箴”之社会作用,认为诗歌应成为“匹夫匹妇之心声”。其诗多以百姓生活为题材,摅写了人民的不满与愿望。如《蚕妇叹》、《二月丝》、《元麦行》、《续繅纴行》等篇描写了官税之苛酷。诗人笔下的百姓有几分反抗性,他们敢于指斥“锦衣玉食冠虎肥,累累沟壑良善尸,不知长官知不知?”(《二月丝》)他们敢指官长是衣冠之豺虎,愤怒、切齿之声如闻。《洛城谣》中写道:“洛阳城门多金穴,洛阳城外多饿殍。金聚一家不厌多,殍散四方不厌少。”在这种情势下,诗人认为“一朝殍起裹黄巾,洛城金穴都成尘”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他如《大田叹》、《巢林燕》、《采桑女》、《牧羊儿》、《拆屋》、《铸钱引》等等,或写天灾人祸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或写战乱弊政使得社会千疮百孔,皆极生动、沉痛。其诗学唐张籍、王建乐府,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结尾多用冷隽之笔,力

透纸背而又深长有味,如:《方塘》一诗写天旱,只方塘有水,而此塘养有官鱼。禁止百姓取水,诗最后两句为“禾枯稻死不敢对,杀鱼重等杀人罪”。《续春陵行》写农民替官军饲马,为此把家什变卖一空,最末三句为:“大男死征戍,媳妇喜新寡,卖媳买粟饲官马。”张白长于史学,著有《读史论略》。其诗集仅存《定峰乐府》十卷。(王学泰)

【王士禄】(1626—1673) 字子底,号西樵山人。山东新城人。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进士,选莱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迁员外郎,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因事下狱免官,之吴越,偕诸名士作六桥、三笠之游。嗣仍以原官补用。逾年闻母丧,哀毁而卒,亲知私谥节孝先生。士禄自少能文章,工吟咏,以诗法授士祐、士禎诸弟。其诗受晚唐影响较大。汪琬《说铃》云:“二王好香奁诗,唱和至数十首。”王士禎也言其“时逃于绮语”(《考功集序》)。其所作《竹枝词》则刻意模仿刘禹锡,如:“渡江向晓聚兰桡,胜日春风粉黛饶。相唤茅家埠边去,纷纷摇过第三桥。”(《西湖竹枝词》)其七古歌行注重铺叙,更近于北宋苏轼。士禎评其诗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考功集序》)此语如指士禄少量佳篇美什则可,如用以概括其全部作品则未免溢美。其诗中题咏酬赠之作较多。有《表馀堂诗存》二卷、《十笏草堂诗选》九卷。《辛甲集》七卷、《上浮集》四卷,另有《读史蒙拾》。《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曾灿】(1626—1689) 本名传灿,字青藜,号止山。江西宁都人。少有诗名,父应遴为明侍郎,死于国难,灿遂改僧服行游。后归山中自耕以养祖母与母。与魏禧兄弟、彭士望等称“易堂九子”,结为性命之交,秘密联络遗民豪士,力图恢复。出游东南,乐苏州光福、玄墓之胜而寓居二十余年,以诗文与海内名流交往,晚岁以笔舌糊口四方,卒于京师。灿早年为贵公子,诗“以风流相尚”,诗风“工美多艳”,“及遭世变,诗日趋老朴”(见《明诗纪事》引魏禧语)。“其思则《黍离》、《麦秀》也;其志则《天问》、《卜居》也。”(钱谦益《曾青藜诗序》)其代表作品有《感乱》、《战城南》、《羊城歌》等。著有《六松堂诗文集》,编纂当时名家诗选二十卷,名《过日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王学泰)

【陶澍】(1626?—1699?) 本名介,字昭万,明亡,弃举子业,更名澍,字季深,后以一字行,曰季。江南宝应(今属江苏)人。早负异才,潜心经史。入清后,肆力于诗。性耽游览,尝至齐、鲁、燕、晋、吴、越,涉八闽,浮三湘七泽,游履所到,声名翕然。与布衣莱阳董樵友善,二人至京师,时方征试博学鸿儒,有人

欲荐之,力辞。澍一生多奔走于路途,其诗多写其行旅游踪。对于明末弊政、清初民生疾苦亦有所反映;如《饥民谣》、《击柝谣》、《淮水谣》皆是这类作品。故沈德潜言其诗“英伟沉挚。感时伤乱之作,以诗为史,直欲上溯杜陵”(《清诗别裁》)。陶集卷末《草草》一诗,可能为其绝笔,从中可见其胸襟与生平。诗云:“草草百年贫,劳人倍苦辛。舟车空自老,笔石耗吾真。结舌从谁吾?攒眉竟莫申。平生黄绮志,犹喜未称臣。”陶诗才锋踔厉,风发泉涌,不为篇幅所窘,跌宕有馀,陶炼未至。诗多写于路途,故名其集曰《舟车集》,凡二十卷。另有《舟车后集》十卷,《湖边草堂集》、《集唐诗》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冷士眉】(1626—1711) 字又湄,号秋江。丹徒(今属江苏)人。明诸生。清兵南侵,与其兄之曦起兵反抗。兵败后,之曦被杀,家遂破。入清,弃举子业,致力古文辞。《丹徒县志》称其蓑衣箬笠,竹杖芒鞋,晦明寒暑不易。或怪之,士眉曰:“吾戴箬笠,痛胜国之天不复见;着芒鞋,痛胜国之地不复履。”可见其民族意识之强烈。因家贫,常囊笔游吴越荆楚之间,晚归江冷阁,以课徒自给。大学士张玉书过访之,不报谒,及还朝招之,不往。士眉高怀绝俗,寄情世外,然家国之恨、故国之思往往见之于篇章。如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所例举之《别孝陵下作》、《挽史忠正》、《岳墓》、《黄将军墓》,皆是这类作品。其诗学杜,多为激烈之音。有《江冷阁诗集十二卷》、《诗集续编》十二卷,另有《江冷阁文集》四卷、《续集》二卷。《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八〇有传。(王学泰)

【王昊】(1627—1679) 字惟夏,号硕园。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文学家王世懋之孙。少聪敏,授书一过,即能记诵。工文,下笔如宿构,尝作《鸿门行》,吴伟业叹为绝才。昊氏编选《太仓十子诗选》,收昊诗一卷。后遂被目为“娄东十子”之一。性傲岸,不肯就省试。清初吴下文社尚盛,争先延致。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同声、慎交两社在虎丘春楔社饮,至者数千人,昊曾代表同声社佐章在兹主持大会。曾别筑当恕轩寝处其中,研经绎史,授徒自给。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应博学鸿儒试,不第,因其年老且名声早著,赐内阁中书,昊已先卒。其诗多感慨个人穷愁潦倒与时局动乱之作,如:《大雨行》写清兵南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兵船行》写清统治者为了镇压东南沿海汉族人民的抗清活动,大造兵船、横征暴敛给吴民带来的损害。其《杂感》组诗反映了当时许多重大问题。昊诗长于七言,七古近于吴伟业,七律纵横豪宕,刻意学杜。著有《当恕轩随笔》与《硕园诗

稿》三十五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唐梦赉】(1627—1698) 字济武,号豹岳。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数次忤直言事。顺治十年,李呈祥上“辨明满汉一体”疏,谓八旗重臣不宜与政,下狱论斩。梦赉上疏救之,得罪放归,遂不复出,优游林下数十年,与高珩等研究学问、诗酒唱和。梦赉究心当世之务,以经济自负,并洞悉实用之学,而志不获伸,遂“务为韬晦,寄情山水,栖心禅悦。然词雅意和,无复怨尤,类乎学道有养者”(《清诗纪事初编》)。其诗多为记游酬赠之作,缺少丰富的社会内容,风格清新自然,接近宋体,故王士禛谓“其诗出于苏、陆”(《渔洋诗话》)。有《志壑堂全集》四十九卷。《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一五有传。

(王学泰)

【叶燮】(1627—1703) 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寄寓吴江(今属江苏)。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进士。康熙十四年,谒选为扬州宝应知县。时逢三藩之乱,宝应地值南北要冲,县境又濒运河。军兵往来,扰攘之处实多,又遭岁谷不登,民乏食,惟赖燮经营擘画,地方得以保全。因忤直不附上官之意,至县不到二年而落职,当时同被罢黜者还有嘉定知县、名儒陆陇其。燮闻之,不以去官为忧,以与陇其同劾为幸。罢官后,纵游泰岱、嵩高、黄岳、匡庐、罗浮、雁荡诸山,晚年定居吴县之横山,故人又称横山先生。一生性好山水,海内名胜游览几遍,其诗多为记其行旅与描写山水名胜之作,如《大庾岭》、《括苍道中》皆为描山绘水之佳作。其写景,刻意生新,不追求神韵兴象,如:“二月花争发,寻山一径冥。峰回常抱影,云断半衔青。柳露沿溪屋,人归隔岭亭。桑榆留晚照,尚及渡前汀。”(《寻山》)正如徐世昌所言,其“诗不屑随俗作甜熟语,宁拙毋巧”(《晚晴簃诗汇》)。其《杂诗十二首》皆写作者作宝应县令时“实事”,揭露了清兵南征三藩之乱时之骄横不法、滋事扰民,以及广大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灾难下所遭受的痛苦,如:《御马来》写皇帝禁军侍卫不可一世,随意践踏一切;《军邮速》写当地官吏与百姓对传递信息军邮人员的恐惧;《荷锄夫》写人们无衣少食,而丁壮仍要被征去整治河道,以利军运;《湖天霜》写县官草菅人命。从这些作品中可见到“康熙盛世”之另一面。燮论诗自成系统,以唐诗为宗,又能广泛吸收历代诗歌创作成就,并从文学史角度与运用归纳法,研究诗的源流正变,成一家之言,对于薛雪、沈德潜有很大影响。著有《己畦文集》、《己畦诗集》、《原诗》等。沈德潜为作传。《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

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姜宸英】(1628—1699) 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诸生,博学工古文辞,驰誉江表,亦精于书法,为清圣祖所知。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被视为“江南三布衣”,翰林学士叶方霭举荐参加博学鸿儒试,后至而罢。又荐入《明史》馆,食七品俸,未授官。分撰《刑法言》,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及东、西厂之害。尚书徐乾学领修《一统志》,设局洞庭东山,疏请宸英偕行。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登进士第,年已七十。廷试时,圣祖识其字迹,擢至一甲三名,并言宸英积学能文,至老弥笃,可拔至一等,为天下读书人劝。授翰林编修,后二年,充顺天府乡试副考官,以物论纷纭,被御史鹿佑所劾,与主考李蟠同被系刑部,下狱勘问,事未及白,瘐死狱中。宸英诗多摅怀言志之作,时时流露出一遇之悲哀和对滥入仕途者的不满,如《感怀》云:“文章用尽终无力,犹向沧波一问津。北阙新除搜粟尉,西山遥贡采薇人。林宗有道身仍隐,元叔无官相岂贫。物色虚劳明主意,早知麋鹿性难驯。”三、四两句讽刺清廷实行的捐纳制度和对明遗民的笼络。宸英诗多有小注,从中可见当时轶事。其诗格律深稳,学杜而有成,其古文学北宋,闷博雅健;书法钟王,尤入神品。著有《湛园未定稿》十卷、《西溟文钞》四卷、《真意堂佚稿》一卷、《湛园藏稿》四卷、《湛园杂记》四卷、《湛园题跋》一卷、《苇间诗集》五卷、《湛园诗稿》三卷、《诗词拾遗》一卷,凡九种,三十三卷,合为《姜先生全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全祖望为撰墓表。

(王学泰)

【吕留良】(1629—1683) 字庄生,原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少时颖悟绝人,八岁善属文,十二岁即与里中人结社,一时名宿皆避其锋。明亡,散万金之家产以结客,往来湖山间,跋风涉雨,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后为人所告,其从子亮功代其伏罪,留良幸存,隐于医。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浙省大吏以博学宏辞举,自誓必死以免。后三年,又欲以隐逸举,留良闻之,喷血满地,乃于枕上剪发,出家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留良学宗程、朱,诋毁陆、王,严“华夷之辨”,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影响很大。世宗雍正(1723—1735)间,曾静读留良书,受到启发,策动反清。事发,留良被戮尸。其诗颇能揭露清统治者的残暴野蛮,并表达作者对清政权的憎恨和对明朝的眷恋,如:《乱后过嘉兴》写清军屠戮之惨;《憎氓》将清统治者喻为吸吮人血的蚊子。有些抒情作品充满了凌轹之气:“悔来早不葬青山,浪窃浮名饱豆簞。作贼作僧何者是,卖文卖药汝平安?便令百岁徒增感,行及

重泉稍自宽。一事无成空手去,先人垂问对应难。”(《祈死》之二)诗学宋,古朴苍劲,不尚华藻,善于刻画。有《东庄诗存》七卷、《唤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一卷。编纂有《宋诗钞》等。另有《吕晚村论文偶钞》、《天盖楼四书语录》、《四书讲义》、《吕晚村家训》。吕葆中为撰行略。张符骧为撰事状。

(王学泰)

【钱曾】(1629—1701) 字遵王,号也是翁。常熟(今属江苏)人。谦益族孙,明诸生。少时好学,受到谦益赞赏。谦益《族孙遵王诗序》云:“遵王生长绮纨,好学汲古,逾于后门寒素。其为诗,别裁真伪,区明风雅,有志于古学者也。”曾为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中诗作注。曾诗学晚唐,典雅精细,陶炼功深。工七律。其《秋日杂怀》八首、《海上》、《偶感》等都表达了诗人对清统治者的痛恨、对恢复故国的渴望。诗中有些语句非常激烈,如:“偶逢欢作聊称圣,既是遗民合道顽”;“圯桥若是论家世,孺子公然说相韩”;“话到沧桑唯恸哭,愿随鸡犬逐狂秦”;“酒阑夜半情怀恶,腰刃还过剧孟家”。有《怀园》、《莺花》、《交芦》、《判春》、《奚囊》、《今吾》、《笔云》诸集,或云《笔云》即《怀国》。这些小集皆以钞本流传。包括《今吾集》以外六个小集的《钱遵王诗稿》(柯氏响山堂藏)共录诗三百八十二首,亦以钞本形式传世。另有《读书敏求记》。钱大成著有《钱遵王年谱稿》。《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二有传。

(王学泰)

【梁佩兰】(1629—1705) 字芝五,一字药亭,号郁州。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少即工文,日记常数千言,通五经百家之学。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第一,时年二十六,诗名已播海内。会试屡不中,遂砥砺文学,究心诗事,与海内名士相唱酬,声名籍甚。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徐乾学榜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在馆一年,告假归乡,清洁自好,流连诗酒,为乡邦所重。番禺王隼尝选佩兰、屈大均、陈恭尹之诗为《岭南三大家诗选》,与“江左三大家”相抗衡。康熙四十二年,诏令词臣在籍者进京就职,复入都,逾月散馆,以不黠满文,革庶吉士。次年,归乡,结社兰湖,与同邑程可则、番禺王邦畿、方殿元、方远、方朝、陈恭尹称“岭南七子”,逾年卒。佩兰诗多描写风景与酬赠之作,如:“我有荔枝酒,迟君不肯来。别离无限意,相送越王台。”“珠海光如雪,珠娘倚棹歌。虎门潮水至,为尔导风波。”(《送汪寓昭、查德尹归余杭》)这类赠别之作不仅感情真挚,而且带有浓郁的南国色彩。其诗中有一些描写劳动人民生活与生活的作品,如《采珠歌》、《采茶歌》、《樵父词》、《岁维癸未行》、《雀飞多》,不仅再现了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场面,也反映了他们在沉重压迫、剥削下的痛

苦;也有少量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如:“至今亡国泪,洒作粤江流。黑夜时闻哭,悲风不待秋。海填精卫恨,天坠杞人忧。一片崖山月,空来照白头。”(《秋夜陈元孝独漉堂读先大司马遗集感赋》)佩兰长于古体,以歌行闻于岭南。其代表作品《易水行》、《日本刀歌》、《惠州王紫诠太守筑罗浮子曰亭落成作歌》、《养马行》等皆神足气健,光怪陆离,在岭南三家中独具特色,与岭南前辈诗人黎遂球颇有一致之处。著有《六莹堂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吴荣光为撰墓碑。

(王学泰)

【朱彝尊】(1629—1709) 字锡鬯,号竹垞、馥舫,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少时见天下将乱,舍时文不学,而肆力于三《礼》、《春秋》内外传、楚辞、《文选》等。十七岁始学诗。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在吴越间参与党社活动,与当时著名明遗民学者、诗人有密切的往来,如顾炎武、屈大均、李良年、李符等都与之有交往;并参与魏耕、祁班孙等人“通海”活动,协助郑成功、张煌言从海上大举反攻,震动了江南半壁江山。兵败后,魏、祁等死难,彝尊避祸亡命永嘉。圣祖康熙(1662—1722)初,政局稳定,方回到家乡。康熙三年(1664),开始漫游四方,曾往扬州、山西、福建、江宁等地,其名声已著于大江南北。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宏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直南书房,成为文学侍从之臣。康熙二十三年,因私抄禁中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原官。康熙三十一年,再度被罢官,辞京归乡,晚年以著述为事。彝尊早年抱遗民之恨,并一度秘密从事抗清活动,故其早期诗篇颇多怀恋故国之作,通过托物言志、怀古抒情以表达国破家亡的悲痛与抗清复明之志,其中较著名者有《岳忠武王墓》、《于忠肃公祠》、《文丞相祠》等,但多忌讳,不敢正面涉及民族矛盾和斗争。此时期作品多摭写其因国事飘泊在外的感受和揭露清官兵的暴行,如《登大庾岭》、《捉人行》、《马草行》等,从中可见在战乱尾声中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还是十分深重的。彝尊后期投入清统治集团,其作品则多为应酬而敷衍成篇者,甚至有些篇章为旧作改题而再存者,才华较早期作品大为减色。有些描写各地风物民俗的组诗,如《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写其家乡风情;《雄州歌》、《岭外归舟杂诗》、《西湖竹枝词》、《太湖汎船竹枝词》等富于民歌情调,充满乡土气息。以作者青年时代爱情生活为题材的《风怀二百韵》,描写细腻,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性很强的叙事诗。于源云:“竹垞太史《风怀诗二百韵》,摘词美富,冠绝古今。晚年定稿,有愿不食两庑特豚(按,指宁肯舍弃配享孔庙的资格)语。”(见《柳隐丛谭》)足见作者对此诗的珍视。

其诗,早期风格豪迈激荡,吴梅村曾以太白譬之;中年以后逐渐变为浑厚苍凉。彝尊反对分唐界宋,不以师承相标榜,学富才赡,诗风颇能与其所写题材相适应。如《玉带生歌》描写文天祥等人的英雄事迹与民族气节,豪纵跌宕,富于气势;写爱情的作品则风流旖旎;写民风民俗的绝句则明朗婉畅。彝尊学识极富,亦往往以学问入诗,能寓典则于文从字顺之中。朱庭珍云:“朱竹垞诗,书卷淹博,规格浑成,力才雄富,工候湛深,造诣实过阮亭。”(《筱园诗话》)当时彝尊与王士禛齐名,有“南朱北王”之说,实际其成就超过士禛。彝尊还工古文与词,其词与陈维崧齐名,曾合刊《朱陈村词》,并主张宗法张炎,提倡“清空”,开创了浙西词派。在经学、史学上亦均有成就。其诗文收入其晚年自订的《曝书亭集》八十一卷。此集只存诗二千余首,二十二卷,删去了许多早年所写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还编选《明诗综》一百卷、《词综》三十四卷。著有《静志居诗话》。另编纂了大型经学著作《经义考》三百卷,北京方志《日下旧闻》四十二卷及《欧阳子五代史注》等。陈廷敬为撰墓志铭,杨谦撰有《朱竹垞先生年谱》。《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魏礼】(1630—1695)字和公,号季子。江西宁都人。明诸生。与其兄际瑞、禧齐名,并称“宁都三魏”。常出游,多与遗民豪士相交游。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至吴中,再至粤,与“北田五子”深相结纳。远至琼崖,又北至燕,西入秦,访孙奇逢及“关中二李”。后归乡,施教于“易堂九子”之后辈。礼为人沉毅刚苦,勇于义概,虽水火白刃之前,不易其一言。其诗多为记其行旅游踪之作,其中对社会黑暗、民生疾苦也有较深刻的反映。如《平西道上》写“官兵志剿民,系民恣所获”,《再到岭南诗》写岭南冤狱之众,皆措词尖锐,鞭辟入里。诗学韩,有散文化倾向。以五古为长,辞朴而意深。有《魏季子文集》十六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华夫,又字介子,更名后字骚余,号翁山,别号很多,较著名者有非池、冷君等。番禺(今广东广州)人。自幼好学,十四岁能文,十六岁补南海县生员,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陈恭尹之父)。清兵陷广州,曾参与武装抗清。南明永历帝至肇庆,大均曾上《中兴十大典书》,以大学士王化澄引荐,将得服官中秘,因父病,匆匆离去。清兵再陷广州,为逃避追捕,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不屈服之意。清世宗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北游,至南京谒明孝陵,又到北京哭拜于明思宗死所,东出山海关周览辽东、辽

西山形势,意在恢复。南下后,流连于齐、鲁、吴、越之间。顺治十六年,在会稽与魏耕、祁班孙等参预“通海”之谋。准备迎接郑成功、张煌言举兵攻入长江。事败后,为逃避清廷指名追捕,避居桐庐,北走陕西、代州。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起。次年,参加吴三桂军队,被任命为广西按察副使,监军于桂林。不久,失望东归家乡,靠务农,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从事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罗和编纂工作。大均诗多为反抗民族征服及维护民族尊严、民族自由之作,愤激指斥之语几乎篇篇有之,如:“杀气满天地,日月难为光。嗟尔苦寒子,结发在战场”(《大同感叹》);“慷慨无衣赋,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为子入秦来”(《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这些既是诗人生活的写照,更是其激情的抒发。诗中揭露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的篇什也写得情感激愤、措词尖锐,如:“白金乃人肉,黄金乃人膏;使君非豺虎,为政何腥臊”(《民谣》);“初捕金五千,再捕金一万。金尽鬻妻孥,以为府君饭”(《民谣》)。这些大悖诗教之作,表现其明显的独特性。毛奇龄言:“翁山诗超然独行,与世罕偶。”(《岭南屈翁山诗集序》)大均长于五言。五言古体,突兀奇崛,多有不经人道之语;五律精警凝炼,有夭矫飞腾之势。邓之诚云:“大均有著述之才,不止以诗、文重,然诗、文独步一时,未有能及之者。”(《清诗纪事初编》)诗与陈恭尹、梁佩兰齐名,并称“岭南三大家”。著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四朝成仁录》。此五种被称为“屈沱五书”。另编纂有《广东文选》等。自撰《生圻自志》。《清史稿》卷四八四、《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九有传。(王学泰)

【方殿元】字蒙章,号九谷。番禺(今广东广州)人。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进士。曾为郟城与江宁知县,丁忧去官。适逢三藩之乱,不得归乡,侨寓苏州。家有广歌堂,用以招揽四方文士,诗酒唱酬,盛极一时。殿元诗承继明以来岭南诗派(以南园前后五子为代表)传统,以学唐为主。擅长七古歌行,多用以描写当时时事与作者旅途的感受。如《六歌》写“三藩之乱”,“西南烽火几半天下”,给百姓带来了无数灾难;第六歌《五羊城》写道:“五羊城,我生之初犹太平。朱楼甲第满大道,中宵击鼓还吹笙。南隅地僻昧天意,二王赫怒来专征。城中诸将各留命,百万烝黎一日烹。家家宛转蛾眉女,尽入王宫作歌舞。”这反映了尚可喜叛乱以后广州的混乱。《章贡舟中作歌六首》写动乱中旅行的艰难,其篇窘韵促,颇有神似杜甫《寓同谷县作歌七首》之处。凌誉钊谓“其乐府节韵,尤苍峭入古。时吴风竞尚苏、黄,九谷独操唐音,吴下豪俊多从之”(《国朝岭海诗钞》),可见

其诗风在康熙初年在吴中一带有一定影响。著有《九谷集》六卷,凡诗四卷、文一卷、《环书》一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吴兆骞】(1631—1684) 字汉槎。吴江(今属江苏)人。少负才名,童时作《胆赋》五千言。吴伟业以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与兆骞为“江左三凤凰”。平日傲岸自负,为人所嫉;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发,被仇家所告,下刑部狱,被流放宁古塔,居塞外二十三年。其挚友顾贞观曾寄《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以情真意切传诵一时。后所著《长白山赋》为清圣祖所赏,贞观商于纳兰性德,由宋德宣、徐乾学为之捐资赎归。不久,患腹疾卒。兆骞作品分前后二期,以入狱遣成为界。前期作品多登临摅怀、咏史怀古之作,许多篇章寄托了兴亡盛衰之感。其假名刘素素的《虎丘题壁》二十首绝句,以被清兵掳去的少妇口吻控诉了清兵暴行,哀感缠绵,文情并茂,如其中的两首云:“回首家山似断蓬,峨眉欲画怨春风。自怜憔悴无人问,惟有慈亲入梦中。”“对酒难禁红泪垂,天涯何日是归期。愁心却是春江水,日日东流无尽时。”其写于甲申(明都城北京陷落之年,时作者十三岁)的《秋感八首》,怀古伤今,表达对明朝灭亡的悼念。此组诗写得典雅工丽,词采斐然。其后期作品则多以塞外风光与满洲风俗为题材,摅写其抑郁侘傺之情,如:“穹帐连山落日斜,梦回孤客尚天涯。雁飞白草年年雪,人老黄榆夜夜笳。驿路几通南国使,风云不断北庭沙。春衣少妇空相寄,五月边城未着花。”(《帐夜》)这类作品大多写得哀感缠绵,缺少愤懑不平之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荷戈边塞,穷愁之语易工,故当时以才人目之”,并言其“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兆骞还有一些诗篇模仿吴伟业歌行,如《榆关老翁行》、《白头宫女行》、《浚稽曲》等。诗学六朝、初唐,风调华美,精致工丽,富于词藻。有《秋笳集》八卷。徐钊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李因笃】(1631—1698?) 字子德,更字孔德,号天生。富平(今属陕西)人。明诸生。明末见天下大乱,遂走塞上访求奇杰之士,未有应者。入清后,北游雁门,南游三楚,意有所图。与爱国志士顾炎武为忘年交。炎武因《启祯诗选》案被牵连入狱,因笃走三千里脱其难。长于经学,与李颀、李柏合称“关中三李”,颇负重名。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以母命应博学鸿儒试,列一等,授翰林检讨。未几,以母老乞养归。讲学于朝阳学院,发明关中张载以礼教人之旨。著有《诗说》、《春秋说》、《古今均考》、《汉诗

音注》、《汉诗评》等。其诗学唐,并以杜甫为宗。论诗主张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漓(见《晚晴簃诗汇》)。其早期作品多写其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以及不忘恢复之怀抱;后期则多写行旅与题咏山川胜迹之作,代表作品有《秋兴客长安作》(四首)、《边上》、《望岳》、《潼关》等。因笃反对清初诗论家对明前后七子的批评,其诗风明显地受到李梦阳、李攀龙的影响。有《受祺堂诗》三十五卷、《文集》四卷、《续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

(王学泰)

【彭孙通】(1631—1700) 字骏孙,号羨门生。浙江海盐人。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内阁中书。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宏词科,列一名,授翰林编修,历十年,为礼部侍郎,久之,迁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三十六年,致仕告归,御书松桂堂额以赐之。孙通幼慧,少时即能吟咏,号神童。长成后,逢战乱,父期生为明江西布政使,守赣州时殉国。其早期作品多行旅避乱之作,并在诗中寄托了厌乱思乡情绪。其中有些作品还反映了战乱之中百姓所遭受的灾难,如:《沂州道中见流民作》写因战乱所造成的田园久废与百姓流亡;《贫妇叹》、《老翁叹》写清兵远征台湾时给吴中经济造成的破坏,使一些小康之家,皆遭受破产流离的命运;《上洋农》写旱灾之后农民无力交纳租税,胥吏如虎似狼逼税情景,从中可见作者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孙通中年以后长期为文学侍从之臣,作品多奉和应制之作。这类作品词采清华,立言得体,时见巧思,为时所重。现在看来则为粉饰谀颂,无甚价值。孙通成年以后,曾慕香奁体制,写了大量艳体诗。这些作品多流于轻薄,如《金粟闺词》一百首中的“少年情景费寻思,容易销魂是此时。月下定情花下语,罗襟欲解故矜持”。其他如《无题同贻上作》十二首、《五日闺词》十首、《春闺杂咏》、《绣衾》、《绣枕》等均有此病。其诗工整平和,富于词藻,风格以闲静淡远者居多,论者或以为“在唐人中最近大历十子,在十子中最近文房”(《国朝诗别裁》)。此评若指彭氏全部作品未免比拟不伦,如指其早期以行旅和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殆或近之。孙通在京时与王士禛相唱和,曾刻《彭王倡和集》。亦工词。有《松桂堂全集》传世。《清史稿》卷四八四、《国朝耆献类徵》卷五九有传。

(王学泰)

【陈恭尹】(1631—1700) 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又自称罗浮布衣。顺德(今属广东)人。十五补诸生。清兵陷广州,其父邦彦起兵抗清,兵败全家遇害,只恭尹只身逃出。南明永历帝至肇庆,恭尹陈述其父起义遇害事,袭锦衣指挥金事。清世祖顺治

七年(1650),清兵再陷广州,逃匿西樵山,后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往来于粤、闽、吴、越间,历四年无成,始归娶。又四年入海,收合余众,无成,一度欲入滇从永历朝廷,未果。永历帝被害,南明覆灭,于顺治十七年返回广州,定居城南,与梁樑、何衡等深相结纳,称“北田五子”。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因“三藩之乱”受到怀疑下狱。次年,事解出狱。恭尹从此心怀戒惧,又以为天下已定,遂以诗酒与世徜徉,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乃至有人讥消:“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恭尹早年诗多感事伤时,抒写其报国的壮志,如:“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伸?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中夜召仆夫,将适赵与秦。方建金石名,安念血肉身”(《拟古》之三);“孤棹一辞天万里,几回风雨吼吴钩”(《西樵旅怀》);“十年含叹为谁来?啸倚芙蓉匣中水”(《夜中叹》)。还有许多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贪婪无厌的诛求,如《缣丝歌》、《耕田歌》、《感怀》等。恭尹兼擅各种诗体,尤工七律,其风格豪迈雄奇,蕴藉含蓄,音调铿锵,无论写景、抒情议论,皆多佳句,如:“龙虎片云终王汉,诗书馀火竟烧秦”(《咸阳怀古》);“三万里从星海出,一千年为圣人清”(《黄河》);“灯前鬼芋穿沙出,霁后僧门凿雪开”(《衡寺》);“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虎丘》);“死求马骨言终验,生搢秦胸计已疏”(《燕台》),皆精警凝炼,沉雄勃郁。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齐名,称为“岭南三大家”。著有《独漉堂全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潘问奇】(1632—1695) 字雲程,又字雲客,号雪帆。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诸生,入清弃去,以游食作幕为生,曾客秣归、大梁、昌平、京师、海陵、扬州等地。居僧舍三十年,一生孤寂如僧。六十以后,祝发于扬州天寿山。后客死于扬州天宁寺。问奇名位不彰,民族意识颇强。邓之诚云:“其诗意境深厚,节调沉雄,尤工七律。《秋柳》二首,论者谓丰神寄托远在新城(王士禛)之上。唯《戊午杂兴》颇及时事,馀多异代禾黍之悲。如《燕京感旧》、《读吴梅村宫詹〈萧史青门引〉感而有作》、《今日》、《伤甲乙间南都事》、《芜城吊史可法》、《玉容歌为长平公主作》诸诗,几欲与娄东争席。”(《清诗纪事初编》)其七古歌行学吴伟业,七律精警清雄,多佳联。有《拜鹄楼诗集》四卷,扬州知府傅泽洪为刻于作者逝世之前。问奇死后,傅氏葬之于扬州平山堂侧,并为撰墓志。

(王学泰)

【张远】(1632—1699以后) 字迹可。浙江萧山人。诸生,困于场屋三十年,至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以贡生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又十二年,始

选缙云教谕。远博学多识,受到其同乡毛奇龄的称赏。诗多摭写个人落拓之生活,风格近于中唐,音节谐适,每于题下标明“悬脚体”、“偷青体”、“截上格”、“截中格”、“扇对格”、“辘轳格”,可见其在诗歌形式上酷好标新立异,几近于文字游戏。其少作有《蕉园集》一卷。拔贡以后作品有《梅庄集》诗文各一卷,在缙云为训导时有《雲峤集》一卷。另有《易经本义发明》、《诗经晰疑》、《昭明文选会笺》、《杜诗荟萃》、《李太白诗笺》、《北曲司南》、《诗韵存古》等。事迹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七。

(王学泰)

【吴历】(1632—1718) 字渔山,号墨井道人,又号桃溪居士。常熟(今属江苏)人。明文学家吴讷之后。少从同里钱谦益学诗,从王时敏学画,又从陈瑚学经世之略。于画道特别有成。而其“人品高逸,欲其画者不可以利动,不可以力得,贵官大贾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陆廷灿《南村随笔》)。布衣终生,年近五十,皈依天主教,学道于耶苏会之三巴教堂,居澳门七年,后归隐家乡,以卖画为生。诗中以题画与咏天主教及西洋新事物者为多,如《诵圣会源流》、《咏沙勿略》、《西灯》、《七十自咏》四首等皆造语甚新,独辟境界。著有《墨井集》三卷,其中包括《墨井诗钞》、《墨井题跋》、《三巴集》各一卷。最后一集多为学习天主教义时作品。《清史稿》卷五〇四有传。

(王学泰)

【恽格】(1633—1690) 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叔子,号南田,又号白云外史、云溪外史、东园客、草衣生等。江南武进(江苏常州)人。八岁能诗,父日初为复社遗老,学问节概,名闻一时。明末随父避兵乱至闽,中道相失,几经曲折,始得重聚。归后,以卖画养父。初画山水,笔意与其好友王翬相似,终觉不如翬,乃舍山水画花鸟。《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谓其“作花卉写生,含苞怒放,残英半堕,渲染皴裂,别开生面。间作一虫一鸟,传神阿堵,刻欲飞动,而题诗、书法兼工,故世称‘南田三绝’”。又谓其“诗率幽渺凄戾,托寄遥深。故与月泉吟社相似。其《咏梅》曰:‘可怜雪霰相催急,才到春风已白头’,可想见其憔悴枯槁矣。”恽诗中感时伤事、酬赠题画之作为多,亦时见感激豪宕之气,如《赠石谷》:“收得江山在锦囊,霜天乘月下沧浪。尚留琥珀兰陵酒,襖被同君醉草堂。”其诗初刊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为庄令舆、徐永宣选刊,名《南田诗钞》,宣宗道光(1821—1850)中,蒋生沐增辑为《瓯香馆集》,凡诗十卷、题识二卷、补遗一卷。《清史稿》卷五〇四、《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六有传。

(王学泰)

【毛际可】(1633—1708) 字会侯,号鹤舫,晚号松皋老人。遂安(今属浙江)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

(1658)进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改知城固县,调祥符县。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应博学鸿词科试,不第,返旧任。不久,以事去官。际可居官有善政,颇能抑制豪强,于疑狱多有平反。少负隽才,博学多闻,与毛奇龄、毛先舒齐名,京师有云“浙中三毛,东南文豪”。为人虚怀善下,好人讥弹其文。朋友往来,必以有所规益相督勉。尤乐汲引后进,四方从游者甚众。工诗词,善古文。诗多酬赠与描山绘水之作,诗风近宋。有《安序堂文钞》三十卷、《松皋诗选》二卷、《拾馀诗稿》四卷、《浣雪词钞》二卷、《黔游日记》一卷。另有《春秋考异》五卷。毛奇龄为作传。《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一八有传。

(王学泰)

【曹贞吉】(1634—1698) 字迪清,一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丘人。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圣祖康熙三年(1664)进士,考授内阁中书,出为徽州府同知,内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以疾辞湖广学政归里。贞吉性耿介孤特,笃于师友。王士禛尝选宋琬、田雯、王又旦、丁炜、汪懋麟、曹贞吉等十人之诗为《十子诗略》,世称“金台十子”。贞吉作诗受到其外祖父刘正宗提倡济南诗派(其代表者为李攀龙)影响,亦从学习“后七子”入手,注重格调气势,后亦出入苏轼、陆游之间,注重铺排句式,不以模拟为工。其诗多写行旅游踪。邓汉仪引吴剑宜语:“新安山水佳胜,而近得中翰曹公来治吾郡。诗才文笔,照耀岩峦,固为人地两绝。而甫莅浙江,旋承辑端,往来燕、齐道上,著《朝天集》。河声岱色,尽贮奚囊。他时搜胜天都,发为诗歌,灵奥当复奚似?”(《诗观三集》)贞吉还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轧轧机声彻晓催,机声未尽剪刀裁。问君何事匆匆极,长吏新膺上考来。”“如掌山田蔓草青,儿童菜色妇鸠形。不辞努力躬耕去,里正勾人到县庭。”(《山民叹》)可见“长吏”的成绩与“上考”是建立在对百姓残酷剥削之上的。《灯市叹》揭示当时“太平”、“繁华”景象背后所掩藏的百姓血泪:“太平物力富年年,五侯七贵囊金钱。一挥中人数家产,持向深闺伴绮筵。呜呼,金可竭,灯不灭。六鳌皆上繁星列,斑斑照见苍生血。”(《灯市叹》)诗格高苍清劲,老而弥健。又工词,其词出入于南北宋之间,多有寄托。著有《珂雪集》二卷、《朝天集》一卷、《鸿爪集》一卷、《黄山纪游诗》一卷、《珂雪词》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张贞为撰墓志铭、祭文。

(王学泰)

【王士禛】(1634—1711) 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歿后避清世宗讳改名士正,高宗命改书士禛。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世祖顺

治十五年(1658)进士。顺治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祖康熙三年(1664),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等上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擢为礼部主事,后累迁为礼部郎中。康熙十一年,主持四川乡试。康熙十七年,召对懋勤殿,称旨,擢翰林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康熙二十九年,调任兵部督捕侍郎。历户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官至刑部尚书。卒于乡。高宗时补谥文简。士禛与兄士禄、士禧、士祐皆能诗。士禛少有诗才;曾作《落叶》诗为长辈所称赞。顺治十四年,游历下,邀诸名士集于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即兴作《秋柳诗》四首。此组诗借物摅怀,寄托遥深,词旨隐约,哀感缠绵,属和者甚众。一经传扬,大江南北和者凡百数十家,甚至传入闺中。在扬州时,曾谒见诗坛耆宿钱谦益,颇受钱推许,并与许多遗民诗人有亲密交往,如杜濬、吴嘉纪、孙枝蔚、朱彝尊等。后在京城、乡里或其他地方,与许多地位不同的诗人有广泛的往来,如宋琬、施闰章、余怀、陈维崧、邵长蘅、洪昇、彭孙遹,并给予从事《聊斋志异》创作的布衣作家蒲松龄以大力支持。士禛以其才学、地位与礼贤好士之精神,主持文坛数十年,成为顺、康期间最有影响的作家。早期颇多追念前朝、寄托兴亡之感的诗作,如《史局漫兴》、《淮安新城有感》二首、《姑苏怀古》三首等。士禛善于运用空灵轻妙之笔描山绘水或题咏书画,如:“官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和牧斋〈题沈朗倩石崖秋柳小景〉》)此期亦有一些揭露现实社会矛盾和描写农民艰苦生活的作品,如《复雨》、《蚕词》、《蚕租行》、《春不雨》等等。中年以后,官位渐高,多歌功颂德、记行游览、咏物赠答之作。为朝官时多次奉差遣出行,所到之处,皆有题咏,为山河增色、为胜迹增加典事,如写于典试四川的《雨中度故关》:“危栈飞流万仞山,戍楼遥指暮云间。西风忽送潇潇雨,满路槐花出故关。”其诗富于神韵,境界缥缈淡远,用笔空灵含蓄,工于造句。士禛论诗,早年大力提倡神韵说,崇尚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诗风,强调“兴会神到”,并承继了严羽“以禅喻诗”说。中年以后论诗的主张有所变化,提出“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混一”,并认为不可执著学某一家,至于近于何家诗风要随诗题而定,持论比较圆融。一生作诗一千馀首,但题材较狭隘,风格较单一,故袁枚曾云,“一代正宗材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士禛著作极多,皆收入《带经堂集》中。除诗文集外,有《渔洋诗话》、《古欢录》、《南来志》、《北归志》、《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于亭杂录》、《分甘馀话》、《陇蜀馀闻》、《皇华记闻》。编纂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

绝句选》、《十种唐诗选》、《古诗选》、《吾炙集》、《感旧集》等。宋荦为撰墓志铭,惠栋著《王渔洋年谱》。《清史稿》卷二六六、《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王学泰)

【宋荦】(1634—1713) 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别号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清初大学士宋权之子,少以大臣子入宫为侍卫。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出为黄州通判,累擢为江苏巡抚,以清节著称,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未几,致仕归。少有才名,曾与侯方域结社,习为古文辞。居高位后,颇喜奖掖、笼络文士,提倡风雅。其诗多为酬唱、纪行与记其为官生涯之作。有少量纪行作品不仅描绘了路途的景色,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如:《荻港避风》诗中写出了安徽铜陵县沿江小镇傍晚景色的同时,还突出了战乱给农村带来的破坏与灾难;《登废城》也写出了战争对城市的毁坏,将战前的繁华与今日的凄凉作了对比,最后写道:“回头市井间,人烟已非故。凄凉二十年,小康犹未赋。”荦抚吴十九年,宦况悠闲,有许多篇章写苏州园林泉石之胜与官衙生活的闲散,故杨际昌称之为“以台阁人成山林格者也”(《国朝诗话》)。其诗风前后有所变化,自言:早年“初接王(世贞)、李(攀龙)之余波,后守三唐之成法”;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二年癸丑(1672—1673)后,“阑入宋人畛域”;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舟泊鄱阳湖,月夜望匡庐”,“忽有所得”。并认为放翁论诗长句所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见《漫堂说诗》)荦中年以后受苏轼影响较大,得其清放之气,古体纵横奔放,近体刻意生新。荦与王士禛交好,唱酬颇多,当时邵长蘅曾选刻二人诗,名为《王宋二家集》。荦曾刻诗十四集,后为江西巡抚时重自芟汰,并为《绵津山人诗集》,晚岁又编为《西陂类稿》五十卷。另撰有《沧浪小志》、《怪石赞》、《漫堂墨品》、《筠廊偶笔》、《漫堂说诗》等,编纂有《江左十五子诗选》。顾栋高为之作传。《清史稿》卷二七四、《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王学泰)

【唐孙华】(1634—1723) 字实君,号东江。太仓(今属江苏)人。少聪颖,十七岁为生员,读书日记千言,学问赅博,甚负才名,而科场不利,至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始成进士,又迟迟未授官职,至康熙三十三年始被任命为朝邑知县,行将赴任,以荐试改礼部主事,寻改吏部主事。康熙三十五年,被诬降职,遂告归。尝授大学士明珠子揆叙读。揆叙贵幸用事,屡召之,不应,里居二十余年卒。孙华所处时代为清初到清中叶过渡时期,此时诗坛较为沉寂,明代遗老凋零殆尽,清初名家所剩无几。孙华善于运用铺陈的手法与通俗、平易诗体反映当时政局、民

隐,举凡满族亲贵及官吏之横暴、人民之贫困、征索之急、刑政之酷,无不摄入诗中,如写对文字狱感到“藏身复壁疑无地,密语登楼怕有声”的《记里中事》,及揭露贪婪无厌、掠夺成癖贵公子的《时事公子行》,都写得十分激烈、尖锐。诗学苏轼,以才气胜,工于使事用典。孙华论诗,“以为学问性灵缺一不可,有学问以发抒性灵,有性灵以融洽学问,而后可与言诗”(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有《东江诗钞》十二卷。顾陈埏为作传。《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一有传。

(王学泰)

【曹申吉】(1635—1680) 字锡馀,号澹馀,又号逸庵。山东安丘人。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翰林编修,历官贵州巡抚、副都御史,三藩之乱,被吴三桂俘获,或云从吴,或云死难。申吉为贞吉之弟,二人均受其外祖父刘正宗影响。正宗于顺治(1644—1661)间力倡济南诗派。此派以李攀龙为代表,论诗主格调,通之性情,期于近法盛唐,远绍《三百篇》遗音。申吉诗亦注重格调、气势,有与李攀龙一致之处,只是攀龙长于七律,申吉长于五律,如《武昌杂诗》:“隔岸晴川影,帆樯触浪奔。禹功江汉大,楚俗鬼神尊。地湿阴常盛,天低日易昏。荒洲犹寂寞,词赋拟招魂。”诗多题咏酬赠之作,在其被俘后写下一些怀乡和描写纍继之苦的篇章,特别富于真情实感。邓之诚言:“张贞《渠邱耳梦录》载申吉陷贼后诗,如:‘千里风烟沅水月,一生心事越山薇’;又云:‘兵戈凄断楚江湄,君去滇南慎莫悲。回首故乡真万里,此生倘有梦还时。’信如贞所谓幽愤结轖,语多凄悽。”(《清诗纪事初编》)有《澹馀诗集》四卷、《黔行集》、《黔寄集》。张贞为其作墓志与哀词。《清史列传》卷八〇有传。

(王学泰)

【李良年】(1635—1694) 字武曾,初更名卢兆潢,字法远,号秋锦。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少家贫,努力向学,十岁能诗,与其兄绳远、弟符并称,言诗者目为“三李”。与朱彝尊交好,以诗学互相切磋。北游京师,为公卿贵人所推重。曾从曹申吉游贵州。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科试,落第,遂归。后曾游福建、苏州。康熙三十年,于乡筑秋锦山房,亲自筹划,南曰观槿,东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卧其中,弟子著录者日众,遂未再出。良年擅长填词,与朱彝尊共创浙西词派,为“浙西六家”之一。其诗如其自言:“盖矜慎有馀,而排宕不足矣。出游万里,不废吟咏,要其所作,不过山川临眺、友朋赠答之语。盖田野之士所宜言止此。若夫有为而为,予则非其人也。”(转引自《清诗纪事初编》)是知江南屡遭文字狱后,一般士大夫惧祸,不敢指摘时事,只于格律句法上下功夫。但其诗中也有一些涉

及时事与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如:《闻罢海贩纪事》写清廷之海禁政策;《出都下口占》组诗赞扬明遗民对博学鸿儒考试的抵制;《水车行》、《苦旱词》、《告灾行》写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清统治者对此漠不关心。诗清峭洒落,格律深稳,工于炼字造句,只是取径较狭,缺少变化。著有《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朱彝尊为撰行状。(王学泰)

【赵俞】(1635—1713) 字文饶,号蒙泉。嘉定(今属上海)人。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登进士第,与同邑进士孙志弥、王晦、侯开国齐名,称“嚳城四子”,时论以为结党,备受责难。逢其座主徐乾学之狱兴,独以身赴师友之难,牵连下狱。后亡命走京师,历五年事始白,以捐纳复官,为定陶知县。俞宦途多舛,其诗多摭写牢骚与不平。《闻鹧鸪》一诗写出自己在家乡所受的诬枉与攻击:“月照霜华石磴危,钩辀苦怨客归迟。故乡亦是惊魂地,只恐山禽尚未知。”《咏史》、《感遇》诸篇,言其与徐乾学共患难事,辞气慷慨,揭露康熙(1662—1722)中叶朝中大臣分群结党,以互相倾轧为能事。诗中也有少量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如:《踏车曲》写农民“赤露两肘腹无粥,踏车辛苦歌如哭”;《纺车曲》写农妇纺棉度日之艰难,诗语质朴无华,注重神足气完,有时才露太过,缺少令人涵咏之韵味。著有《绀寒亭诗集》八卷、文三卷。《清史列传》七四、《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三并有传。王昶为之撰志传。(王学泰)

【田雯】(1635—1704) 字子纶,又作紫纶,一字纶霞,号山薑子,又号漪亭,晚号蒙斋。德州(今属山东)人。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工部郎中,督江南学政,取士多异才,授湖广督粮道,迁光禄卿,巡抚江宁,调贵州,官至户部侍郎。以疾归。雯一生宦游四方,其诗多题咏名胜古迹及描山绘水之作,善于运用婉丽而生涩的字句写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峰衔新月黄,云拥山容变。深谷一钟响,蔽亏烟树断。樵人语前浦,古寺隔幽涧。翠滴衣衫重,松黑黢黢窳。疏灯出深竹,依微露绀殿。井栏摘茂葵,僧厨供茗馔。偶来访支遁,吟栖有馀恋。夜半大壑鸣,风雨四山乱。”(《晚投卧佛寺宿》)其他如《翠微寺》、《山脚晚行》、《登采石矶太白楼观萧尺木画壁歌》也是如此,硬语涩韵与清词丽句并存,明显地受到杜甫夔州诗风和黄庭坚诗风的影响。雯论诗反对分唐界宋,在唐、宋诗人中特别推崇李商隐、黄庭坚,称李为“诗中之圣”,“诗体之工,唐人实无出其右者”,称黄庭坚七古“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陵前轶后,有一无两”(《古欢堂杂著》)。从这些议论,更可见其诗渊源所自。雯在贵州时也写了一

些反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其困苦生活的作品,如《清溪行》、《淘金谣》等。雯好奇,记诵亦博。沈德潜称其“才力既高,取材复富”(《清诗别裁》)。故诗文组织繁富,推敲锻炼,极为刻苦。亦好用典,甚至主张用奇字,摘人佳句善字,有俚钉之讥。雯与王士禛同时,论诗主张与诗风绝不相同,亦有夺席之意。郑方坤言:“先生享盛名四十年,从游半天下,学者因其所名书屋,尊而奉之曰山薑先生。坛坫之盛,几与渔洋埒。”(《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著有《古欢堂集》三十六卷,其中附《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另有《山薑诗选》。《清史稿》卷四八四、《国朝耆献类徵》卷五二有传。(王学泰)

【李必恒】字北岳,后更字百药。高邮(今属江苏)人。廪生,工诗古文,少以诗文驰名郡邑,然不得志于场屋,多次乡试报罢,发为幽忧之疾,辗转床第。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帝亲征准噶尔,胜利班师,必恒奏檄作《铙歌》千五百言以献,高古恢阔,得未曾有,受到江苏巡抚宋荦重视,招之入幕府,待以上宾。并因其多病,易其字为百药,选刻江左十五子诗,取李诗最多,欲以姓名荐达,不幸早死。必恒诗多以自己贫困生活与耳闻目睹百姓苦难为题材,如《民篇》、《乙丑纪灾诗》等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风质朴苍凉,也有少量婉约明丽的小诗,如:“岸芷汀蒲取次生,运河冰泮绿波明。凭将粉墨全钩染,身在江淹赋里行。”(《题春水放船图》)生前曾刻《樗庵诗选》,另有《三十六湖草堂诗集》。在宋荦幕中时,与邵长蘅一起对《施注苏诗》残本进行了整理与补注。《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六有传。(王学泰)

【胡香昊】(1635—1707) 字竹紆,号芋庄。江南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治举子业,见金陵应试者披襟跣足及为隶卒搜检之状,认为士不可贱,应考是一种自贱行为,乃弃帖括八股不事,而专力于有韵之文,历三十年始卓然成家。家素贫,以训徒卖文为活,欲筑香草堂三楹,恁格为之作画,历二十年而堂不成,胸怀夷旷,视贫贱富贵一也。其诗不主一家,歌行似东坡,五言似工部,七律工细似放翁,工力颇深,而无模拟痕迹。又善于用典,往往熔两三事于一句之中,而且天衣无缝,不着痕迹。平生作诗很多,不甚重视保存,去世后,同里友好为刻《香草堂诗钞》五卷。庄楷为撰《胡芋庄小传》。事见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王学泰)

【王掇】(1636—1699) 字虹美,号汲园。太仓(今属江苏)人。著名画家王时敏第七子。太仓王氏代以书画诗文名世;时敏九子,除早卒者外,并有才名。掇最为当世称道。幼遭亡国之痛,抗节不仕,虽其叔时宪官到翰林检讨,其弟掇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掇则

与明遗老相往还,以遗民自命。中年以后出游,南逾岭峤,北至卢龙,早年曾从同乡吴伟业学诗,又受到乡先贤王世贞的影响,多拟古、步和古人之韵的作品,成功之作不多。一些以歌行之体写亡国之痛的诗篇,如《上阳白发人》、《教坊老叟行》、《侯生行》等亦仅形似。其后期多为记行、题咏各地山川胜迹之作,其中许多寄寓了亡国之痛与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有《登多景楼》、《过润州有感》、《秦淮闲泛》等,如《至白门》云:“白下旧山川,萧条又一年。秋风经战垒,野哭满江天。草木馀兵气,村墟少爨烟。空闻呜咽水,滚滚石头前。”其到达北京后所写《进教化门》诗则表达了对新朝新贵的鄙视:“屠狗今逢奇士少,烂羊方见贵人多。五湖烟水苍茫外,归唱南山种豆歌。”摅与吴兆骞交好,对“科场案”与兆骞因此案被遣戍关外十分不满,许多诗篇涉及此事,表达了对兆骞不幸遭遇的同情。集中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较出色,多幽奇悲壮之作。有《芦中集》传世。《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六并有传。

(王学泰)

【汪楫】(1636—1699) 字舟次,号悔庵。原籍休宁(今属安徽),客居江都(今江苏扬州)。少能诗,与孙枝蔚、吴嘉纪齐名。屡试不第,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康熙二十一年,充册封琉球正使,赐一品服,时论荣之。未几,出为河南知府,积升为福建布政使,后被开缺,遂归。楫诗如王士禛所言:“以古为宗,以洁为体,以清冷峭峭为致,大抵与嘉纪同。当其自得于心,即亦不必尽同也。”(《悔斋诗集序》)入翰林后,其诗风易幽峭为典重高华,颇有台阁之气。诗多为与故老名流倡和之篇,也有大量的描山绘水的作品,如:《哀鸛鹤为吴野人作》写布衣诗人吴嘉纪遭际之不幸;《一钱行》写遗民诗人林茂之穷困潦倒和对前朝的怀念;《寿郝羽吉三十》描写了从事鱼盐之业的诗人郝仪的神情风貌以及他对吴嘉纪的帮助。这类作品大多写得平易畅达,与萧远闲旷、境界幽深的山水诗不同。著有《悔斋集》五种,包括《悔斋诗》六卷、《山闻诗》一卷、《山闻续集》一卷、《京华诗》一卷、《观海集》一卷,共十卷。另有《中山沿革志》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唐绍祖为撰墓志铭、朱彝尊为撰墓表。

(王学泰)

【徐钊】(1636—1708) 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晚称枫江渔父。吴江(今属江苏)人。早岁聪慧,天姿英敏,工诗词古文,善画山水人物。监生,入慎交社,声誉日隆,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检讨,与修《明史》,未几转外官,遂乞

归。归里后,闭户读书,著述不辍,时亦为豫章、闽、越之游。圣祖南巡时,诏复原官起用,辞不就。晚以写诗填词自娱。钊以诗名江表三十余年,诗风几度变化。潘耒云:“电发早岁工诗,体尚华秀;壮游京阙,周历江、淮、海、岱之间,与豪隽相切磨,才力纵横,爽朗道健,无忝作者;泊乎结绶登朝,鸿章钜篇,粹然大雅。盖其境数变而格日益进,作日益多,可谓尽心耳矣。”(转引自《国朝松陵诗徵》)其诗以记游记行与登临怀古之作为多,也有一些以宫中轶闻为题材的作品,如《宫怨》、《拟唐人上皇西巡歌》、《凉州词》、《长门怨》等。今人邓之诚疑皆为世祖的种种传说而作。(见《清诗纪事初编》)长于五、七绝,有些颇有唐人风味,如:“乱落杨花搅白绵,皖江江水绿于烟。南朝狎客无人见,肠断声声《燕子笺》。”(《杂感》)钊尤工词,著有《菊庄乐府》。其诗、文收入《南州草堂集》凡三十卷、《续集》(又名《松风馀稿》)四卷。辑有《本韦诗》十二卷、《词苑丛谈》十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

(王学泰)

【嵇永仁】(1637—1676) 字匡侯,改字留山,号抱犊山农。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徙家于锡山,居近东林书院,名其庐曰东田书屋。少有异才,博学识而困于场屋。游幕四方,当世知其具经济之才,或聘之以治河,或聘之以谏荒政,历有成效。后欲隐于医,适范承谟为福建总督,聘为幕客。清圣祖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反,执承谟,并胁永仁降,不从,投入狱中。后承谟被杀,永仁自经死。永仁诗分两部分,早年诗作,收入《葭秋堂诗》。邓之诚云:“《葭秋堂诗》中所往还者多前朝遗老,诗皆五律,末附《初秋杂咏》七绝十二首咏顺治己亥郑成功江上之师,集或刻于此时。”(《清诗纪事初编》)这部分作品表达对明朝的怀恋。另外一部分则是被耿精忠囚狱中所作,如《吉吉吟》、《百苦吟》等。顾光旭云:“以上《百苦吟》,集载共百首,先生自序谓‘用炭屑画于四壁,真情实境,不假思索。吟者撚须未断,读者触心即酸,聊作患难图绘’者也。”(《梁溪诗钞》)这类作品“皆缕述当时实事”,反映了作者对清室的忠诚。其诗平易顺畅,不假修饰,得质朴自然之美。有《抱犊山房集》六卷:一为《吉吉吟》,二为《百苦吟》(二者为狱中之诗),三为《和泪谱》(为同难之人所作小传)、四为《葭秋堂诗》,五为《竹林集》(二者为旧刻诗、文),六为同系于狱者:王龙光、沈上章之诗。永仁又好填词,工北曲,著有传奇《扬州梦》、《双报应》、杂剧《续离骚》(包括四短剧《扯淡歌》、《泥神庙》、《笑布袋》、《骂阎罗》);亦善岐黄之术,著有《东田医补》四卷。钱仪吉为撰事状,张伯行为作传,陆楣为撰墓表,顾栋高为

撰墓志铭。《清史稿》卷四八八、《清史列传》卷六五有传。

(王学泰)

【曹禾】(1637—1699) 字颂嘉,号峨嵋,一号未庵。江阴(今属江苏)人。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内阁中书。告归养母。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中式,授翰林编修,屡官至国子祭酒。后罢归。在京时与田雯、宋荦、曹贞吉、丁澎、汪懋麟等人诗酒唱和,人称“都门十子”。禾为王士禛门下士,曾与盛诚斋编《渔洋精华录》。其诗却学杜甫、韩愈,注重锤炼字句,不似士禛只追求兴象神韵,如《淮水叹》写“黄河决,淮水涨,人民漂流,县官役民夫筑堤,鞭楚之声数百里”,情迫辞尽,不追求韵外之致。其《秋夜述怀》写作者兼济天下之志,亦采取直叙铺陈的写法。著有《未庵初集诗集》四卷、《文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李天馥】(1637—1699) 字湘北,号容斋。河南永城人,寄籍合肥(今属安徽)。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在位时喜援引后进,清初一些名臣如李因笃、赵进美、秦松龄、陆陇其、彭鹏等皆曾受其推荐,文士从游者众。明遗民如阎尔梅等亦与之有密切的交往。卒谥文定。天馥久在朝中,其诗多写当时宫廷或朝政大事,如徐世昌所言,天馥“平生遭际圣明,陶写风雅,故其诗经经纬史,而皆以雍容渊秀出之”(《晚晴簃诗汇》)。如《秋怀诗》十首记“三藩之变”,记录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人经历和反叛过程。《征南凯旋诗》写清廷平叛的胜利。此类作品大多写得典雅有馀,生动不足,政治上则是站在朝廷一边,声罪致讨。邓之诚云:“其诗体格清俊,自注时事,足为参考之资。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自序‘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语意甚显。”(《清诗纪事初编》)可知李诗对于当时宫闱秘事,亦有记载,只是后因有所避忌,未敢将此类作品收入诗集。其古体、律体诗多伤于板滞,绝体小诗尚有活泼可诵者,如:“晓猎城西好,高风远帐开。红尘不断处,一骑臂鹰来。”(《晓猎》)平生作诗三四千首,令毛奇龄删定,存诗千首,故其集名为《容斋千首诗》。另有《容斋诗馀》等。韩奕为撰墓志。《清史稿》卷二六七、《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王学泰)

【韩奕】(1637—1704) 字元少,号慕庐。长洲(江苏苏州)人。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寻充日讲官,纂修《孝经衍义》,知起居注,主持康熙十四年乙卯顺天乡试,历翰林院侍讲、侍读,擢内阁学士。圣祖颇赏识其诗文,奉应文字多出

其手,馆阁撰述,奕必参与。当时南北分党,奕中立无倚,以疾请假归,家居八年。康熙三十三年,复召还朝主持修《一统志》。康熙三十九年,升礼部尚书,以疾卒于官。奕久为朝官与文学侍从之臣,其诗多酬酢题赠、应制奉和之作,春容典雅有馀,生动活泼不足,更少性灵神韵。著有《有怀堂集》二十卷、《诗稿》六卷。另有《瀛洲亭经说初集》、《直庐集》、《诗疏草》等。朱彝铭为撰墓碑,方苞为撰墓表,沈德潜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二六六、《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王学泰)

【邵长蘅】(1637—1704) 一名衡,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南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聪敏,读书目数行下,十岁进学为秀才,因江南“奏销案”起,被罢除名。束发能诗,弱冠以古文雄视一时。既谢举子业,则尽去其少作,沉酣于“三史”、唐宋诸大家诗文,与邑人董以宁、邹祗谟等相切磋。后携所著书游京师,名震先达显贵间,王士禛、徐乾学、施闰章、朱彝尊、陈维崧皆折辈与之交。入太学,随牒试吏部,为尚书宋德宜所赏,拔第一,例授州同知,不就。再应顺天乡试,报罢,遂绝意仕途。归江南,益纵情山水,尤爱武林湖山。宋荦巡抚吴中,罗致于幕府,助宋著书。长蘅处于清政权逐渐稳定时期,又性好山水,故其诗多行役羁旅、题咏山水之作,佳者有《雪后登滕王阁放歌》、《经彭蠡湖口望庐山》、《浔阳舟中》等。长蘅诗中也有部分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措词之激烈、尖锐也不亚于对清统治者怀有深仇大恨的明遗民诗人,如:《沙民谣》:“鸡飞鹑鹑狗彘彘。官兵来,毁我屋。夫出走藏妻为虏。官兵带刀行放火。言奉黄纸驱汝,汝啼官府杀汝。”诗中把清官兵写成一帮杀人放火的强盗,而且把矛头指向朝廷。《豫民谣》写清统治者假借救济陕西灾民给河南农民造成的苦难。其《启祯乐府》组诗记录了晚明宫廷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其诗作受宋诗特别是苏轼诗的影响,矜博使才,酣畅淋漓,汪洋恣肆。七古颇具气势,只是不够含蓄,韵味不足。律诗苍秀沉雄,如《九江》“吴楚一江共,波涛九派分。湖光寒自白,庐岳晓常云。虎斗荒村迹,猿啼落日闻。琵琶亭废久,枫叶正纷纷”,颇能代表其律诗风格。著有《青门簏稿》十六卷(其中诗六卷)、《青门旅稿》六卷(其中诗二卷)、《青门剩稿》八卷(其中诗三卷)。参与补注、整理宋施元之所注苏诗。又参与编纂了《毗陵邑志》。陈玉璫为作传,宋荦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四九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张英】(1637—1708) 字敦厚,一字梦敦,号乐圃。桐城(今属安徽)人。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进士,入翰林院,以翰林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至

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主持编纂了几部清廷官修大书,有《渊鉴类函》、《一统志》、《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康熙三十八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四十年,以老病乞归,准以原官致仕,临行,赐宴畅春园,并赐以御书笃素堂匾额。卒谥文端。英一生宦途顺利,很少波折,与其为人耽于田园之乐、爱好种树看山、性格执谦逊退有关,其诗亦以描写田园闲适之趣者为多,如《拟古田家》、《田园杂兴》等。其写农村风光,时有新颖生动之处,如:“新晴土膏动,原上春草生。陂塘引涧壑,活活春水鸣。桑阴悦好鸟,布谷时一声。夜来饱饭牛,朝来从耦耕。”(《拟古田家词》)又如:“不识风尘劳扰,但知云水盘桓。买畚偶来城市,祀神一着衣冠。”(《田园杂兴》)英在着重写农村闲适生活的同时,也述及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其《拟白乐天秦中吟》就对苛敛酷政、贪官污吏、浇风陋习、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作了真实的描写。因久在朝中为文学侍从之臣,也写了大量应制奉和诗章。这类作品大多立言得体,时见巧思。沈德潜云:“本朝应制诗共推文端,入词馆者奉为枕中秘,而风格性灵不系此也。”(《清诗别裁》)诗学陶潜、王维、白居易,但大多只是形似,未造其境。其七律颓放,颇与陆游归隐之后律体有相似之处。有《双溪集》五十六卷,其中《存诚堂诗》二十五卷、《应制诗》五卷、《笃素堂诗》七卷、《文集》十六卷。还著有《恒产琐言》、《聪训斋约语》、《饭有十二合说》等等。方苞代李光地为之撰墓表,张廷玉为撰行述。《清史稿》卷二六七、《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王学泰)

【顾贞观】(1637—1714) 字远平,一字华峰,或作华封,号梁汾。无锡(今属江苏)人。清圣祖康熙五年丙午(1666),顺天乡试第二名,擢为内阁典籍。康熙七年(1668),丁外艰。康熙十五年(1676),复入京,馆于相国明珠家,与其子纳兰性德交好,曾以《金缕曲》(寄吴汉槎)两阙求性德解救因科场案被远戍关外的吴兆骞,为时论所嘉许。康熙二十三年(1684),还里,不复出,读书终老。临歿时自选诗一卷,授门人杜诏,诏付梓以传,不足四十篇,皆味在咸酸之外者。贞观少时已名噪东南慎交社,入都题诗寺壁,有“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之句,为龚鼎孳所赏,并为之延誉于朝。其诗多寄赠怀人、歌咏四时风光之作,诗似小词,风流旖旎,伤于柔弱,如:“帽檐欹侧看倾城,巷陌寻常小燕迎。记得疏狂旧踪迹,鸳鸯池上月微明。”(《嘒城感旧》)“古城柳暗越江春,拂地千丝飏麴尘。惆怅远山青不尽,倚篷闲却画眉人。”(《书婺州城外禅月第一层浮图》)诗笔韶倩清丽。其晚年自订之诗以古淡瘦硬为主,颇有梅

尧臣韵味,可看作诗人晚年之追求。如:“一灯山牖出,隔竹露先泫。坐听香台人,法华中夜转。清泉漱寒玉,细入吴音软。嚼蜡况横陈,凡襟何时遣?”(《夜闻梵音》)贞观文兼诸体,擅长于词,与陈维崧、朱彝尊齐名。人称“词家三绝”。其《弹指词》远播域外。著有《笥塘集》、《积书岩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劳之辨】(1639—1714) 字书升,晚号介岩。浙江石门人。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官至左副都御史。康熙四十七年,以上疏保奏废太子胤初,革职交刑部责四十板逐回原籍。康熙五十二年,复职。次年,卒。劳诗多记事之作。之辨久居朝中,于当时重大政务的兴革了然于胸,并形诸诗篇。邓之诚谓之辨:“诗慕香山,喜及时事,自注甚详。如丁未(康熙六年)《淮扬道中》云:‘南北舟楫,不由淮上,取道周家闸入洪泽湖,以达于高、宝。一望汪洋,尽成泽国。’《黔阳杂感》云:‘水西有土无流。康熙初年,改设四郡。近以捐粮功,复安氏故职。’甲子(二十三年)《同满汉榷部巡历濠境》云:‘时初开海禁,置榷官。’癸酉(三十二年)《元旦》云:‘东宫前庆贺,自本年始。’《寄刘六皆视学山东》云:‘丙辰(十五年)、戊午(十七年)捐生与减额之例并行。’”(《清诗纪事初编》)这些皆可以补史籍记载之不足。在纪事诗中,之辨善于运用赋体,状物写情,形象而生动。如《琉璃厂行》描写琉璃厂元宵节时的景象,从中可知此地尚未成为书肆所聚之前是外城娱乐中心,十分繁华,人们才在“官署前头作广厂,鼎彝书画布成行”。《红刺船行》写清政府为保障漕运顺利,对运河两岸人民过度剥削,“十家产破难辞役,数顷荒田仍驾舟”。“回思冬兑临江浒,悍弁骄丁猛于虎。巧立因公贴白镪,诛求加耗防红腐。莫言人事无循环,到此亦歌行路难。君不见,田家作苦胼胝裂,官粮未了私先竭。军剥民兮船剥船,一丝一粒皆膏血。”其他如《桃源竹枝词》述兵役之苦;《榆树皮行》写贫人剥树皮为食。这些记事之作则意在为民请命。其诗平易通俗,委曲详尽。著有《静观堂诗集》三十卷。杨瑄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二八六有传。

(王学泰)

【汪懋麟】(1640—1688) 字季角,后更蛟门,晚号觉堂。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举人,康熙六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举博学鸿词,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参与修《明史》,补刑部,能辨疑狱,发奸摘伏。后被劾罢官归乡,杜门谢客,后以疾卒。临歿为诗云:“恶梦虚名久未闲,孤云倦鸟乍还山。平生心事无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间。”可见其以善治狱自负。懋麟少聪慧,笃志经史,

曾受业于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诗才隽异,与汪揖齐名,初年沉酣于唐调,中年变化于宋、元,诗不专于一体,不学一人。王士禛言其“诗才,票姚跌宕,其师法在退之、子瞻两家,而时出新意”(《汪比部传》)。在京时与田雯、宋荦、丁炜、曹贞吉、颜光敏、谢重辉等诗酒唱和,人称“辇下十子”。诗以题赠应酬之作作为多。擅长铺排描写,故作品中以七古歌行优长。如《柳敬亭说书行》着意渲染柳氏说书时的气氛,极为形象、生动:“英雄盗贼传最神,形模出处真奇诡。耳边恍闻金铁声,舞槊横戈疾如矢。击节据案时一呼,霹雳迸裂空山里。激昂慷慨更周致,文章髣髴龙门史。”其《元夜寓直观禁中观放华火歌》,中用博喻的手法描写烟火:“银花火树齐开张,珠斗明星尽奔放。金鹅赤凤无不有,玉女仙人各奇状。云中宝塔何嵯峨,海上蜃楼起烟浪。更有奇花次第悬,千枝堕地生金莲。火山吞吐走日月,急如万弩离箭弦。爆竹声中作霹雳,又如铁马攻战相回旋。”从中可见韩愈、苏轼诗风对其诗的影响,亦可见其才情横溢,豪迈跌宕。其七绝小诗,或描山绘水,或抒情言志,婉转清丽,颇有晚唐风韵。著有《百尺梧桐阁诗集》十六卷、《文集》十卷、《遗稿》十卷、《锦瑟词》一卷。徐乾学为撰墓志铭,王士禛、张贞各为作传。《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陈玉瑾】字赓明,号椒峰。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内阁中书。康熙十八年,试博学宏词,不中式,归乡隐居。玉瑾少有大志,凡天文地理、兵刑礼乐、河渠赋役诸大事,莫不讲求,言之娓娓。其才思敏捷,偶有所触,发为诗文,旬日之间,动则盈尺。其诗以律体为优,特别是五律,专力学杜甫,颇有神似之处,如:“袞袞登楼兴,披襟坐上头。果知天地大,不尽古今愁。孤塔烟中断,诸峰波面浮。凭栏一长啸,明月夜横秋。”(《同友登京口避风馆高阁望江题壁》)也写了一些反映当时政事、民俗的作品,如《杂兴》二首或写清廷注重清理明末清初著作的犯忌之处;或写粤督上疏主张驱赶僧道还俗,似褒似讽,实际上曲折反映了对清统治者的不满。尝编当世古文为《文统》,又以自己所作古文与邹祗谟、董以宁、龚百药之文合刻为《毗陵四子文》。撰《学文堂文集》四十三卷、《诗集》十卷、《词集》三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四一有传。(王学泰)

【钮琇】(?—1704) 初名泌,字书城,号玉樵。吴江(今属江苏)人。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生,由教习考授知县,初为河南项城县令,兼署沈邱事,继为陕西白水县令,兼摄蒲城事,终于广东高明县令。琇所至皆有善政,如安集逋逃、昭雪沉狱、除

强暴、严守御、减苛税、修水利,为百姓拥戴。卒于广东任上,旅榇萧然,越数年乃得归葬。琇博雅工诗文,簿书之暇,不废笔墨。今人邓之诚指出其“诗多纪事之作。《感事》及《弼教坊》咏庄史之狱,至云‘只应日夜钱塘水,怒作寒涛千载声’,怨而怒矣;《农言》、《修塘谣》伤税敛之烦;《秋雨叹》、《泣柳词》为民请命。其他咏物写怀,皆有寄托”(《清诗纪事初编》)。其《采煤曲》云:“云根斲尽龙山拆,辘轳深绠垂千尺。额灯蒲伏漆为肤,饥驱贫子齐肩入。朝入还期夕数钱,忽逢崩石生长捐。千村土锉炊烟出,中有民命如丝悬。”这类作品皆能反映民生疾苦与重大社会问题,有关理乱,足备诗史。这些记事作品大多造语平易浅俗,而感情激切,结语冷隽,颇有唐人张籍、王建乐府诗之风格。故潘耒言其诗“一篇中必有沉思警句,言简旨深,绎之殊有馀味”(转引自《国朝松陵诗徵》)。亦工文,善叙事。著有小说《觚觚》。其诗文收入《临野堂集》,凡三十三卷。《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二并有传。

(王学泰)

【蒲松龄】(1640—1715) 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先生,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以志怪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少聪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受知于诗人施闰章,以县、府、道三第一补生员。与同邑诗人张笃庆等结为郢中社,诗酒唱和。后久困于场屋。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应友人宝应知县孙蕙之邀入其幕。后曾在山东名流王敷政、唐梦赉、高珩、毕际有等家坐馆,并结识了文坛领袖王士禛。松龄于四十三岁时补廪膳生,七十二岁时考中岁贡,一生大多在贫困潦倒中度过,其诗也多表现自己贫困生活、屈辱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如《日中饭》写其全家的惨状:“儿童不解爨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恹恹。中男尚无力,携篮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盎如饿鹰”。由此产生的愤懑不平也随处可见。如《夜坐悲歌》、《感愤》、《漫兴》、《客斋》二首等皆属此类诗章。松龄诗中还有许多同情百姓苦难的作品,如《糠市》、《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流民》、《饿人》、《离乱》、《旱甚》皆写得十分沉痛。《饭肆》云:“旅食何曾旁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其诗质朴刚健、清新畅朗,兼而有之,亦有少量颇具神韵的作品。一生著述极勤,除写作达四十馀年的《聊斋志异》外,还著有俚曲十四种、《怀刑录》、《省身语录》、《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有《聊斋诗集》六卷、《聊斋文集》四卷。《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一有传。蒲箬撰有

《柳泉公行述》。今人路大荒撰有《蒲松龄年谱》。

(王学泰)

【张笃庆】(1642—?) 字历友,号厚斋,别号崑崙山人。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少与蒲松龄皆受知于学政施闰章,为诸生。又与松龄、李尧臣等结郢中社,诗酒唱和。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考贡生,为济南府第一,赴都入监,参加顺天府乡试,不第,遂归,杜户不出,以著述为事。笃庆诗学唐,尤擅长歌行与七律,多题赠应酬、咏史摭写之作。其《明季百一诗》以七律体写明灭亡之过程及缘由,沉郁悲凉,诗中有史,如“敕使当年出未央,纷纷矿税采诸方。山川绝少金银气,诛求何殊花石纲。一任竖貂盘社鼠,谁将盐铁议弘羊。可怜国脉从兹丧,浪说朱提入太仓”,言明末矿税之害,于议论中见激情。其摭怀诗更具风韵,如:“王母西来晓露浓,碧城隐隐月溶溶。云中悬圃三千里,天畔琼楼十二重。手种桃花多岁月,自寻瑶草饲鸾龙。双成已到人间否?海水枯时定一逢。”(《碧城》)王士禛言其歌行“不失空同(李梦阳)、大复(何景明)家法”(《渔洋诗话》)。其七律亦如此。笃庆也有少量描写民间疾苦的诗篇,如《勘灾史》等。著有《八代诗选》、《班范防截》、《五代史防截》、《两汉高士赞》。郎廷槐所撰《诗问》、《续诗问》,各有一卷为郎问,张笃庆答,从中可见其论诗主张。其诗文收入《崑崙山房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并有传。(王学泰)

【万斯同】(1643—1702) 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少时即游于黄宗羲之门,年最少,得史学之传。熟读二十一史及明朝各朝实录,以纂修明史为己任。出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问往事,于郡志、邑乘、杂家志传,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巡道许宏勋荐之,力辞。次年,开局修《明史》,总裁徐元文荐入史局,不就,乃延之其家,委以刊削之事,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而稿皆由其审定。后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为总裁,皆延之。客京师江南馆者二十年,冀成一代之史。史稿五百卷,皆经其手定。性不乐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名节相砥砺,及卒,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斯同少时亦致力于诗及古文辞。其诗即是其淡泊高洁人格写照。诗学宋,风格质朴恬淡,多用赋体。有《石园文集》八卷。另有《历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宋季忠义录》、《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疑辨》、《石经考》、《明季两浙忠义考》、《两浙忠贤录》等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王学泰)

【王隼】(1644—1700) 字蒲衣。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其父邦畿以诗名,隐居罗浮。隼少承家学,

七岁能诗。早岁多病,故入匡庐学道,六七年而归,结庐于西山之麓,深隐不出二十余年。其妻潘孟齐亦通文能诗,乐贫偕隐。隼性嗜音乐,每自度曲,作昆腔,其女瑶湘亦通音律,能吹箫而和。一门风雅,颇为相得。隼又善弹琵琶,尝取古今人词曲之佳者,谱入琵琶,著有《琵琶楔子》。晚年返儒服,卒,私谥清逸先生。隼诗多写其隐居生活,其《拟杜少陵七歌》组诗与《杜门》都是这类作品,《杜门》云:“杜门离乱日,麋鹿是吾徒。身贱惭人识,颜衰赖酒扶。寒云飞眼阔,秋叶落心孤。何处寻知己,狂吟向野芜。”隼有一组昆体诗《无题》一百首,风格绮丽,蕴藉含蓄,远在王次回《疑雨集》之上。隼曾选辑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诗为《岭南三大家诗选》,编辑《岭南诗次》。另著有《诗经正讹》、《梳山七书》。其诗、文收入《大樗堂初集》,所录皆为早年作品。《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王学泰)

【吴雯】(1644—1704) 字天章,号莲洋。原籍辽阳(今属辽宁),后占籍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少聪敏,记览甚博,尤长于诗,善参活句。尝游京师,为其父执刘体仁、汪琬所激赏。诗坛领袖王士禛目为“仙才”,尝与叶方霭同值,诵其警句,方霭下值即访之,于是雯名噪京师。大学士冯溥出扇索诗,即书二绝句以答。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试,不中选。游食于燕、赵、齐、鲁、吴、越、秦、楚,足迹遍四方。丁母忧,以哀毁卒。雯为王士禛及门弟子,其诗学唐,重神韵,诗多写景之作,清新自然,不待修饰而妙。赵执信与士禛论诗多迂,独赏吴雯,曾在《谈龙录》中云:“千顷之陂,不可清浊。天姿国色,粗服乱头亦好。皆非有意为之也。储水者期于江湖,而必使之潋洄澄澈,是终为沼溪耳。自矜容色,而故毁其衣妆,有厌弃之者矣。免于此二者,其唯吴天章乎?”这说明了雯诗中不论经过锤炼整饬者,或质朴粗放者,皆合乎自然。延君寿《老生常谈》中举其《寄向书友》诗云:“曾闻向始平,能注南华经。之子真苗裔,江山发性灵。寒蛟终谢饵,老鹤不梳翎。载酒莺花节,长吟入洞庭。”言其“无一字不锤炼而出”,但全诗极其流畅,造语平易,合于自然之道;至于着力不多的《留王孟穀游风穴时将归楚》“风穴何年寺,传闻水石间。云中千树密,溪上几僧闲。花信宜携酒,春心且看山。休言涉鱼齿,冻雨损朱颜”,更是清新自然,韵味隽永。雯工于造句,查为仁《莲坡诗话》,及郭麐《灵芬馆诗话》中皆大量举其佳联警句与出色的绝体小诗,如:“潮来全楚白,云上半江阴”;“一灯残夜后,百感壮年来”;“阶前双树老,户外一峰闲”等皆能反映其诗风格。著有《莲洋集》二十卷。王士禛为撰墓志铭。《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

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廖燕】(1644—1705) 本名燕生,弃诸生后更字梦醒,后字人也,号柴舟。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博学多才,自负经世之略,于古今是非,颇喜放言议论。燕倡言读“无字书”,而以天地万物为“无字书”;又批评明太祖主张“治天下可愚不可智”,言其以制艺取士,与秦皇焚书无异;皆可见其见识。一生穷困潦倒,与金堡、陈恭尹等明末遗民交好,专事著述。工戏曲,其所撰杂剧中常以自己为主角,将自己姓名写入剧本。其诗多以自己贫困潦倒生活为题材,并用以摅写愤懑不平。也有少量作品反映其民族意识,如《哀北徙者》:“战马南来血洗城,曾将人命换簪缨。至今剑手妻孥在,亦作哀鸿向北征。”“富贵冰消势莫支,王孙归路更凄其。欲将别泪山头洒,争奈当年已仆碑。”此组诗写“三藩”之一的尚可喜部为清军击败后被俘北上情景。他们当初曾作为清统治者走狗屠戮过岭南人民。还有一些诗篇表现诗人恬淡襟怀和对人生尘世冷静观察,如《饮酒》、《山居》等。燕诗新警雄逸,不重词藻,纯以气胜。工书法,尤擅草书。其古文小品佳作颇多。撰杂剧四种,即《醉画图》、《诉琵琶》、《续诉琵琶》、《镜花亭》。诗文收入《二十七松集》。《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〇有传。曾璟为作传、王源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彭定求】(1645—1719) 字勤止,又字访濂,号南昀。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其父玠授以高愈之学,后又师事汤斌,好陆王之学。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八年,以外艰归,遂不再起。曾作《高望吟》七章以表达对阳明学派与东林党人中七贤的倾慕。七贤者指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罗洪先、顾宪成、刘宗周、黄道周。康熙四十四年(1705),奉旨就扬州书局编校《全唐诗》,事竣径归。定求诗以酬唱之作为为多,好用诗歌以阐述儒家思想,道学气较浓。也有一些富于激情的作品,如:《五人墓》为明末苏州反抗宦官暴政而牺牲的五位市民而作;《汤阴谒岳忠武故里庙像》,为悼念民族英雄岳飞而作;《过淇县怀同年高振声给事》为敢于弹劾权臣的同年高遐昌而作。这些作品颇具气势,对仗工稳、造句精警,类似南宋陆游、范成大。其理学著作有《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等。其诗文收入《南昀诗稿》十卷、《诗续稿》十七卷、《文稿》十二卷。自撰有《生圻志》。罗有高为撰行状,《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六并有传。(王学泰)

【洪昇】(1645?—1704) 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又号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好学,曾从陆繁弢学骈文,从沈谦、毛先舒学词曲、音律。在

京期间,曾从王士禛、施闰章学诗。监生,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进国子监肄业。次年,返乡。因遭家难,康熙十三年,再至京师,客居于京。长于戏曲创作,与孔尚任有“南洪北孔”之称。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上演其名剧《长生殿》,被劾入狱,后被削籍回乡,从此断绝出仕之路,故时人咏之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在乡生活十分潦倒,晚年因酒醉失足落水而卒。昇擅长度曲,亦工于诗。其诗多为作者往来南北(由京至越)之记行、记游、赠答寄怀、怀古伤今之作。这些作品是作者贫困落魄生活的写照。还有一些作品记录了家庭的不幸及人民的苦难,如:《送父》六首采取联章体形式摅写与父母离居的痛苦和因不能与日益衰老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愧疚之情;《衢州杂感》十首则描写了人们在天灾人祸双重打击下的苦难。有少量篇章还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看法,如《长安》云:“棋局长安事,旁观迥不迷。党人投远戍,故相换新堤。无复穷通感,真将得丧齐。布衣何所恋,不向小山栖。”长于律体,五律尤佳,毛奇龄谓其“五字律酷似唐人。其气韵神味、格意思旨,虽似极平,而唐人阃奥自是如此”(见金植《不下带编》)。昇创作传奇九种,除《长生殿》外,还有《回文锦》、《回龙记》、《锦绣图》、《闹高唐》、《孝节坊》、《天涯泪》、《青衫湿》、《长虹桥》,杂剧一种《四婵娟》。其诗集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等。《清史列传》卷七、《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〇并有传。今人章培恒著有《洪昇年谱》。

(王学泰)

【魏坤】(1646—1705) 字禹平,号水村。浙江嘉善人。少承家学,工诗,及长慕志节,与遗民陆嘉淑、陆元辅定忘年之款。以贫客游南北,至京师,撰《石鼓赋》,国子学中师生交相击赏,所填乐章,亦能被于歌管,播于众口。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终老不遇,未登仕途。坤诗多写于客游之时,故多记各地风物、摅写羁旅情怀,以及与知交题赠唱酬之作,如:《寄居虫》借咏蜗牛抒发自己“岁岁困旅次”的“深喟”;《历下城东观刈麦》写山东一带割麦、收麦与尝新麦的风俗;《捕蝗纪事为李慎斋先生赋》生动描写在官府组织下如何捕蝗、灭蝗之场景。诗学唐,其古体富于气势,其绝句缠绵杳渺,寄托微婉,如:“翠钿遗处杳难搜,望里荒烟接暮愁。留得故宫螺黛影,春山如髻满城头。”(《饮嘉树轩》)著有《倚晴阁诗钞》七卷、《秦淮杂咏》、《历山唱酬集》、《粤游纪程诗》、《水村琴趣》等。《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六有传。朱彝尊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潘耒】(?—1663) 字圣木,一字力田。吴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弃去,在乡隐居,与民

族意识强烈的顾炎武、归庄、吴炎、顾有孝等组织惊隐诗社，一名逃社，四方高蹈能文之士，多聚于此。怪章通天文地理、皇极太乙等书，专精史学，与吴炎私修明史，既购得实录，又收集了丰富资料，历十馀年已完成十之六七。庄氏史狱发，怪章因列名参阅，被磔死，家籍没，妻孥发往宁古塔为奴。其诗多摭写对现实生活不满和胸中愤懑之作，特别是在狱中所写诗章如《漫成四律》，从中可见封建专制制度之残酷。其诗收入《观物草庐焚馀稿》，此集一直以钞本传世，民国初年有《潘力田遗诗》印本，收录较全。另编有《松陵文献》。《清史稿》卷五〇六有传。

(王学泰)

【潘耒】(1646—1708) 字次耕，又字稼堂，晚号止止居士。吴江(今属江苏)人。兄怪章罹“庄史狱”之祸，家累戍边。耒徒步送嫂至燕山。后刻苦读书二十馀年而未应试，受业于同郡遗民徐枋、顾炎武，因而得识徐乾学兄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又充会试同考官，不久即以浮躁降调归。圣祖南巡接驾复原官，遂埋头于著述。性好山水，早年往游燕、赵，中年后遍游罗浮、天台、雁荡、武夷、黄山、庐山、中岳等名山大川，尽穷其胜。其诗多为记行记游、登临怀古之作。北起燕山，南至羊城，西起西安，东至海滨，三山五岳、长江大河的壮丽景色皆能摄入诗篇，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往往杂以议论，摭写豪情，如《汴河行为方中丞欧余作》一诗中描写汴河风景的诗句不多，通篇都是为善于治水而遭忌罢黜的方欧余鸣不平。其《华峰顶》以神来之笔把天台山最高峰——华峰顶幻想成为崑崙山之馀脉：“崑崙之脉从天来，散作岳镇千琼瑰。帝怒东南势倾削，特耸一柱名天台。天台环周五百里，金坡擘翼龙分胎。峰峦一一插霄汉，涧瀑处处奔虹雷。”从此篇可见其山水诗之一斑。诗中也有些涉及其家难的作品，如《恸哭七十韵》、《度关曲》、《吴圣玉归自辽左志喜》等。这些篇什不仅表达了作者不能援救其兄的负疚之情，而且揭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与荒诞。耒诗质朴而不流于奢涩，畅达而不流于平易，词意丰腴而不流于靡弱，于唐、宋之外别成一家，在清初是有特色的作者。曹溶以为其诗可与李因笃并称，有“北李南潘”之目，其文多论学之作。著有《遂初堂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沈彤为作行状并传。(王学泰)

【顾汧】(1646—1712) 字伊在，号芝麓。原籍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历任左中允、左右谕德，迁左庶子、侍讲学士，升

内阁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官至河南巡抚。康熙四十八年，致仕归，后三年卒。汧长期在朝为文学侍从之臣，故其诗多为朝庙宴享、应制奉和之作，如《瀛台宴赛纪恩百韵》、《首春懋勤殿应制》、《乙丑正月雨应御试赐膳纪恩》、《恭谒福陵》、《传集雍和门颁赐人参恭纪》等都是这类作品。这些所谓“盛世之音”内容贫乏，千篇一律，以谀颂为主，是典型的庙堂文学。其怀古赠行，记事咏物之作也缺少真实性情。惟因久居京官，朝中大典，多所经历，诗中有些内容不无史料价值，如：《扑交行》描写八旗攒跤手较量的场面十分生动；《过同年颜淡园寓观蹴鞠》写京师“侠少”足球比赛，不仅题材新颖，而且刻画得穷形极象。只是这类作品数量很少。著有《凤池阁集》十六卷，其中诗八卷。王鸿绪为撰墓志。(王学泰)

【孔尚任】(1648—1718) 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世孙。弱冠为诸生，有才名，却久困于场屋。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捐贡为监生。康熙二十三年，帝南巡，过曲阜，尚任以御前讲经符旨，擢为国子博士，一度从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安、扬州治淮，曾经仪征至南京。康熙二十九年，返京。在京期间，创作了传奇《小忽雷》、《桃花扇》。康熙三十九年，官至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即罢官。晚年在游历与乡居中度过。尚任现存诗作大部分写于来往于淮扬一带及在京为官期间。前者多是与“江左遗贤”往来唱酬之作，往往通过怀念明末佚事表达对故国的眷恋，如《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又至海陵寓许漱雪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山裳、戴景韩话旧分韵》等。此期还有一些反映治淮工程与仕途官场情伪利弊作品，如《维扬舟中即事》、《渡黄河》、《淮上有感》、《驿亭乞》等。后者则多写作闲官的苦闷以及京师之风土人情与文化界情况，如《早春过琉璃厂》、《除夕口号》八首、《辛未除夕》等。其《燕台杂兴》四十首、《燕台杂兴》三十首与诗中小注全面记录了北京当时各界名流轶事，如写诗坛领袖王士禛：“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比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注云：“王阮亭司农龙门高峻，寒士不易登造，每过慈仁廊下购书，乃得一望颜色。”其他如曾画《南巡图》的王翬、歌者陆九、妙擅琵琶的黄卫、数学家梅文鼎、燕市侠客庞去奢、怀抱“赤子心”的学者李塨，一时奇士皆入篇章，从中可见康熙(1662—1722)中叶京师文化之繁荣。其诗清丽流畅，细腻工致，古体善于铺叙，近体富于情致。尚任晓音律，早年著有《律吕管见》，又辑有《鲁谚》，还著有《节序同风录》、《会心录》等。其诗文收入《孔尚任诗文集》凡八卷，其中诗五卷。《国朝香

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今人袁世硕撰有《孔尚任年谱》。(王学泰)

【博尔都】(1649—1708) 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满洲皇室,其父辅国公拔都海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博尔都袭封为三等辅国将军。所居东庄有园林之胜,工诗,亦究心性理之学,好与汉族名士文人往来,王士禛、汪琬、施闰章、陈维崧、毛奇龄、顾贞观,乃至明遗民石涛等皆与之游。生时负盛名,死后坐事追削爵位,其事多湮没无闻。因系宗室,行动受到许多限制,故其诗多写四时风物及生活琐事。如其《问亭诗集》中《东皋杂咏》则专写隐居游钓生活,《茫茫吟》则为悼亡而作。诗风清新隽永,如《雁》诗云:“零露冷汀洲,归鸿度小楼。秋心齐唤起,不止动边愁。”其诗体物细腻,工于造句,如:“密树含风冷,归云裹日斜”(《雨后坐闲园》);“窗落穿松月,檐飞度水云”(《题友人山房》);“门静尘随车辙浅,阶前苔逐屐痕生”(《喜晴》)等皆可见一斑。有《问亭诗集》十二卷,除包括《东皋杂咏》一卷、《茫茫吟》一卷外,还包括《白燕栖草》八卷、《联句集句》一卷、《红吟》一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有传。(王学泰)

【黄鹭来】(1649—?) 字叔威。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少时豪迈不群,性慷慨,喜谈兵,文名藉甚,为诸生,乡试不中,遂漫游四方,南至广州,北游辽沈,西达川黔。在成都师事理学家费密,至京师居梅花堂,与当时名流遗老交往颇多。费锡璜《友鸥堂集序》云:“谈经济、稽典故、论理论、衡文章者,必期于梅花堂,以叔威为归。”后不知所终。鹭来诗多记行、题咏山川古迹及言志摅怀之作,如《正阳署中冬日杂感》、《岁暮杂感》、《西湖春游杂咏》、《杂兴廿首》等组诗皆为其代表作品。费锡璜《序》谓其“蓄数十年之学力,欲有所建白于时,乃一无所用,而困顿流离以终,独借此诗以传其不得已之怀抱”。其诗悲壮激越,有金石之音。如:“闲斋枉拥一炉红,白纸糊窗御朔风。月纬岁经惭织妇,朝三暮四笑狙公。雄谈扞虱人偏远,问舍求田道亦穷。男崑高峰最关念,望中天海自交通。”(《岁暮杂感》)著有《友鸥堂集》、《见山堂集》。其生平资料见其所著诗文集。(王学泰)

【严虞惇】(1650—1713) 字宝成,号思庵。常熟(今属江苏)人。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一甲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馆阁文字多出其手。江南科场狱兴,虞惇因子、侄连中,试官李蟠、姜宸英皆同年友而受到吏议罢官归。后数年,圣祖南巡,献诗十章,旋起补国子监丞,转大理寺副,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又充湖广乡试正考官,皆称得人,累官至太仆寺少卿。虞惇诗以写个人身世与应酬之作为多,体制不拘一格,以学唐为主。其律体音调铿锵,顿挫有

致,受明代前、后七子的影响,如:“六王毕后霸业空,三百离宫一炬中。八水凄清秋色早,九巖嵒岌夕阳红。车回博浪沙中客,舟引蓬莱海上风。自料骊山万年计,岂知遗恨在樵童。”(《咸阳怀古》)长于古文,师学欧、曾,尤推崇归有光。深于《诗经》之学,著有《读诗质疑》三十一卷,凡六易其稿。其诗文收入《严太仆先生集》凡十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杨绳武为撰墓表,陶贞一为作传。(王学泰)

【张远】(1650—1724) 字超然。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少孤,从母氏受章句,稍长贯穿经书大义,下笔有奇气。时闽中战乱频仍,官吏以苛敛为能事,乃流亡至吴、楚、百粤,萍踪无定处。客游七年始归,母已逝。清圣祖康熙十四年(1675),赘于常熟何氏,遂家焉。自后几度还闽、多次入京,又曾两下粤西、粤东,足迹几半中国。康熙三十八年(1699)乡试第一,年六十八为云南禄丰知县,卒于官。早年道出西江。题诗滕王阁上,适诗人曹溶持节过此,大加激赏,召入幕,为之延誉。王士禛、宋荦尤深器重,皆引以为入室弟子,诗名鹊起,传遍都下。今人邓之诚举远送友人之日本、之西洋诸作及叶燮《送张超然出洋》诗,并云:“是固足证其时海通之盛,而远之出游,岂必尽在谋食耶?”(《清诗纪事初编》卷八)盖远固抱恢复故国之志,而台湾郑成功既亡后,死灰无再燃之望,遂任一县令,远遁西南。远一生踪迹,多在客中,故其诗多记行、记游,题咏山水胜迹之作,也有不少感怀时事、摅写沧桑之痛的作品。其代表作有《下建溪诸滩》、《题黄山山人墨竹》、《闽中杂感》八首以及《哭母诗》等。其诗悲慨淋漓,抑扬顿挫。著有《无闷堂诗集》十一卷、《文集》七卷。《清史列传》卷七〇、《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五并有传。(王学泰)

【查慎行】(1650—1727) 原名嗣璫,字夏重,后更名慎行,字悔馥,号他山,晚年筑初白庵以居,故又称初白。浙江海宁人。少时从黄宗羲学,又从遗民诗人钱澄之学诗法。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入京,游太学,馆于权相明珠家,后以国丧期间观《长生殿》剧,获谴。康熙三十二年,中举。康熙四十一年,以大学士陈廷敬、李光地等人推荐,入进南书房修书。次年,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文学侍从之臣。常侍皇帝游幸,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之句名闻禁中。曾奉诏参与编辑《历代咏物诗》、《佩文韵府》,后乞假归。世宗雍正四年(1726),因受其弟嗣庭文字狱之累,入狱。次年,放归乡里,不久卒。慎行早年从军黔、滇,中年以后遍览江西、河南、直隶等地,直至晚年仍奔波于北京、浙江、福建、广东之间,凡地方风物、人民生活、山川形

势、名胜古迹,多形诸诗篇。慎行熟悉农民生活,也有许多诗篇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如:《麻阳运船行》写西南用兵,人民为转运粮草所受的种种苦难;《养蚕行》写养蚕人在动荡不定商品经济中无所适从的困境。其他如《芜湖关》、《偏桥田家行》、《飞蝗行和少司马杨公》、《麦无秋行》、《淮浦冬渔行》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广大人民处境的悲惨。其绝大部分作品描写行旅生活,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的安定。慎行诗学宋,北宋崇尚苏轼,南宋瓣香陆游。其古诗长于白描,不尚丽藻、用典,但从细节描写的真实、细腻与生动中可见其功力。其七律婉转畅达,颇工对偶,多佳句,赵翼《瓯北诗话》中摘其律诗佳联数百,可见倾倒之至。清朱庭珍评其诗曰:“查初白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筱园诗话》)其诗之病在于纤弱,空灵有馀,气魄不足。著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敬业堂诗续集》六卷。还著有《周易玩辞集解》、《苏诗补注》、传奇《阴阳判》、《陪猎笔记》、《黔中风土记》、《庐山游记》、《人海记》等。其外曾孙陈敬章为撰《查他山先生年谱》。《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陈梦雷】(1650—1741) 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耿精忠之变,梦雷归乡省亲,被迫授伪职,谋于同乡李光地,由梦雷在闽作内应探听虚实,由光地离闽北上,向清廷进蜡丸密疏,递送情报。光地进京后独上密疏,将蜡丸之事据为己功。三藩乱平,擢光地为大学士,梦雷以从逆论斩。梦雷刻与李光地“绝交书”,责其欺君卖友,徐乾学密为之开脱,得减死流尚阳堡。康熙二十一年,赴戍所,居沈阳凡十馀载。康熙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沈阳,梦雷献赋称旨得以召还京师。次年,侍诚王胤祉读书,主编《古今图书汇编》(后改名《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世宗雍正(1723—1735)初,胤祉被禁锢,梦雷再度被谪戍黑龙江,卒于戍所。梦雷为友所卖,一生遭际悲惨,长期谪戍关外,故其诗多摭写自己无辜蒙冤的悲愤与对欺君卖友鬼蜮行为的痛恨,如《寄答李厚庵百韵》、《上总宪魏环极先生百韵》都直接叙写李光地如何借“三藩之乱”遽登高位与如何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从中可见为圣祖所信任的理学家李光地之阴险狡诈。其他如《秋兴八首》、《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弟》等抒情组诗,更是长歌当哭,痛快淋漓地抒发其负屈含冤而又哀告无门的痛楚。《西曹坐系书怀》云:“方寸谁明谤早侵,蜡书偏阻爱书寻。代桃祸且同根至,投杼疑缘三至深。摩诘只惭

留病骨,钟仪犹忆奏南音。可怜圜土今朝事,七载孤臣日夜心。”其诗质朴,很少文饰,纯以气胜。其中佳作确如黄鹗来所云:“如疾风寒夜,金铁皆飞;又如深岩流泉,鸣声幽咽。至使读者扼腕,流连涕下。”(《闲止书堂集序》),著有《松鹤山房诗集》九卷、《文集》二十卷、《闲止书堂集钞》二卷,除编《古今图书汇编》外,还主编有《奉天通志》。《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一六有传。(王学泰)

【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忧庵,一号南山。桐城(今属安徽)人。少有才辩,家贫,以课徒自给。贡生,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往来于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生。喜读《史记》,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抒其抑郁。尝自言非求名利于世,因胸中有书数百卷,非与众人雷同之言,故需“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才能著之竹帛,传诸其人。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编修。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诏下部议,查出其所著《南山集》中《与余生书》言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又将其拟之帝昺(南宋)、蜀汉,遂以“大逆”定罪。康熙五十二年,下诏“法外施仁”,将凌迟改为斩首。名世因文字之祸,著作遭到禁焚,但其作品仍以抄本秘密流传,更名为《潜虚先生文集》。名世不以诗名,其诗作多零落湮没。近世发现之《古史诗箴》,共得诗一百一十首,皆为七言绝句,每诗皆立四字小题,始于“涿鹿始战”,终于“郑氏抗节”,评四千年以来史事,自序云:“史者,有所为而作也。传愚民之统而怪诞兴,趋当时之势而阿谀作,守一家之固而是非倒,寄隐衷之怨而曲直蒙。必也破统、离势、毁囿、销怨而后史联乃萌。”可知此组诗意在历史事实作出突破传统之评价。如《逼上梁山》云:“刮脂吮血逞凶顽,屈膝强胡益厚颜。不是衣冠皆盗贼,小民那忍上梁山?”组诗中更多的篇章表达了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承畴降虏》、《维扬大节》、《天下己任》、《郑氏抗节》等都是这类作品。《古史诗箴》通俗流畅,也有人认为非戴氏所作。有《戴名世集》。《清史稿》卷四八四有传。萧穆为撰事略。(王学泰)

【汪森】(1653—1726) 字晋贤,号玉峰,又号碧巢。原籍安徽休宁,居浙江桐乡。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拔贡,历摄临桂、永福、阳朔知县,为桂林通判,后转太平,擢知郑州,会丁母忧,未赴。服阙补刑部山西司员外郎,迁户部江西司郎中。年六十一告归。森少时即工诗、词,曾迎周贫至家,从之学诗,得以交接两浙名士,既复与黄宗羲、朱彝尊、朱

鹤龄、潘耒等名贤前辈商榷,艺业益进。其宦游及归乡后皆注重著述。在广西时曾编《粤西诗载》二十四卷附词一卷、《文载》七十五卷、《丛语》三十卷。此编博采历代诗文轶事记录成帙,归田后复借朱彝尊藏书,荟萃订补,论者以为可与明周復俊所编《全蜀艺文志》媲美。森在乡曾营碧巢书屋以为“吟窝”,筑华及堂以宴宾客,又游宦二十余年,故其诗多为与诗朋酒友唱酬以及宦游四方之作,如《草堂春尽独坐寡营偶检东坡集见〈百步洪诗〉喜而次之》、《望海》、《读臞庵枕上偶成诗和韵》、皆为其代表作品。也有少量作品涉及民间疾苦,如:《宿田家即事》写田舍老翁所诉“大男从军去,生死天一涯;小男阙租赋,时苦刑罚加”;《自濡须至维扬回舟取道吴江见水潦淤野感赋》中写“四海半兵革”之时又逢水灾,“饥寒久迫身,鲜有不为贼”。其诗古体较好,五古近于陶潜、韦应物,质朴而有馀味,七古歌行则有高适、岑参风格,苍凉雄浑。著有《小方壶存稿》十八卷,又辑有《虫天志》、《名家词话》,助朱彝尊辑《词综》。《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四二并有传。(王学泰)

【查嗣琛】(1653—1734) 字德尹,号查浦。浙江海宁人。名诗人查慎行之弟。少聪颖,早岁即有诗名,与慎行齐名,人称“二难”。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上,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擢为侍讲。在馆十年,名与慎行皆为帝所知。与兄先后归里。年皆在七十以外,极唱和之乐。其弟嗣庭于世宗雍正四年(1726)罹文字狱,次年瘐死狱中,仍戮尸枭示。阖门就逮,嗣琛遣戍陕西,卒于戍所。嗣琛早年游迹遍四方,所至与贤豪长者唱和无虚日,故其诗多览眺留题、吟咏各地风物之作。其《燕京杂咏》一百四十七首,咏北京史事,其中时涉及明末与清初宫廷史实。如“分明鞞鞞绕龙文,亲捧天子过五云。遮路儿童浑不识,错呼天子是将军”,即写清初皇帝之好武。此组诗大多诗旨隐晦,以时事为典,故为当时人传诵。可视为其记行诗代表作的《过白沙岭寄同年张砚斋》云:“积翠浮空不见峰,群峰俱拥万株松。怪来小驿重关路,忽与千岩万壑逢。丹壁斜飞千尺练,白云遥送一声钟。龙眠居士如相识,画我山庄第几重?”诗中写层峦叠嶂与浮岚翠霭互相掩映,写人在山间小路行进而不见山之真貌的情景皆十分生动。嗣琛诗风与慎行近似,著有《查浦辑闻》、《南北史识小录》、《音类通考》等。其诗收入《查浦诗钞》,凡十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王学泰)

【林以宁】(1655—1730?) 字亚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林纶之女,监察御史钱肇(字石臣)之妻。有《墨庄诗钞》二卷、《凤箫楼集》。《历代妇女著

作考》卷一一引《正始集》云:“亚清能文章,工书善画,尤长墨竹。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媿,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关于清初蕉园女子诗画社成员,一说为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凤纶“五子”。《正始集》所云“七子”中的顾、冯、张、毛,成就虽不及徐、柴、朱、林、钱,但亦有诗名。顾姒,字启姬,顾桢云次女,鄂幼舆妻。幼舆好远游,尝偕姒入京,卒无所遇,穷困而归。有《未穷集》、《静御堂集》、《由拳草》、《当翠园集》。冯娴,字又令,同安宰冯仲虞之女,诸生钱廷枚之妻。读书过目成诵,下笔文如凤鸾,尤工绘事。有《和鸣集》、《湘灵集》。张昊,字槎云,孝廉张坛之女,胡大濬之妻,年二十五卒。有《趋庭咏》二卷及《琴楼合稿》,后者系夫妇唱和集。毛媿,字安芳,毛先舒之女,徐邨之妻,有《静好集》二卷。顾、冯、张、毛四子诗文集之著录、序跋情况均见《历代妇女著作考》。(陈祖美)

【纳兰性德】(1655—1685) 字容若,后因避废太子讳改名成德。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补诸生,入太学,祭酒徐元文深器重之。次年,应顺天府试,为徐乾学所识拔。康熙十二年举进士,因病未与殿试。康熙十五年,应殿试,名列二甲,选为三等侍卫,出入禁闥,进止有度,寻晋升一等侍卫。一度出使唆龙诸羌,年三十一病卒。性德工词,其诗尚不成熟。以拟古摹仿之作为多,惟写景小诗较有风韵,如《密云》:“白檀山水声秋,地踞潮河最上流。日暮行人寻堠馆,凉砧一片古檀州。”其境界、格调皆类其词。性德编刻历代解经之作为《通志堂经解》(此编具体校勘编纂为顾湄),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赋一卷、诗四卷、词四卷,经解序三卷,序、记、书一卷,杂文一卷,《绿水亭杂识》四卷、附录二卷。韩荃为撰《神道碑》,徐乾学为撰墓志。《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汤右曾】(1656—1722) 字西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少著才名。以诗见赏于王士禛,受知于徐元文兄弟。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为人伉直,在谏垣敢直言,条议甚众。圣祖颇赏其诗,尝命书之以进,当时以为荣,目为诗公,名满京都。卒于京。右曾诗多题咏山水名胜古迹之作,其风格、体制颇类王士禛。黄叔琳序其诗,谓其诗“得宇宙之清气,泠泠有天际真人想”。其诗与浙西词派崇尚“清空”有一致之处,如:《入桃源诗》“世外神仙界,云中犬吠声。舍舟何路人?沿棹有人行。闻道春来水,桃花几瓣横。年年流出在,长共楚江清”;《磁州道

中》“夹堤柳色映泉流，滏口清源汇曲沟。二十里中荷叶路，水风吹绿到磁州”。如郑方坤所言，其使黔后诗“大抵温雅以发其情，爽朗以达其气，锻炼澄汰，神韵泠然，而诗品复乎无上矣”（《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只是题材狭隘，缺乏社会内容。右曾与其前辈朱彝尊相辉映，谈浙西诗者认为“前推竹垞，后推西厓”（《清诗别裁》）。《清史稿》卷二六六、《清史列传》卷九并有传。方苞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卓尔堪】（1656？—？）字子任，一字鹿墟，别号宝香山人。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孤失学，有勇力，能挽五石弓，年未二十，从李之芳南平福建耿精忠之乱，为右军前锋，摧坚陷阵，身被数创，为士卒先。从军七年，以母病乞归，既遭母丧，遂不复仕。壮而游历四方，辽、江、荆、衡，皆所游历，又曾航海数千里，经普陀、蓬莱观海市。与当时名流孔尚任、曹寅、梅文鼎、吴绮有密切交往，又与明遗老如龚贤、石涛、杜濬、杜芥、魏禧、屈大均等皆有唱和与往来。曾经多年访求，编成明《遗民诗》十六卷，收录作者五百零五人、诗两千八百六十七首。尔堪富于诗才，孔尚任称其才“百倍于人”（《近青堂诗序》）。吴绮言其阅历丰富，“闽粤燕秦，霜雪备经车马；江淮河海，风烟历饱樯鸟。一切东西南北之情，皆归旅筇；百凡阴阳寒暑之状，并入奚囊”（《近青堂诗集序》）。其诗多以其生平经历为题材，长于古体歌行，如《从军行》写其从军即行，上堂辞别老母情景，真切感人。其他如《采莲曲》、《采菱曲》、《扬州蹋灯辞》，平易亲切，具有江南民歌风味。其《海内歌》描写所见之海市蜃楼，全诗光怪陆离，杳渺变幻，又历历在目，恍如真境界。其五、七言绝句，有民歌风味。著有《近青堂诗集》四卷。《国朝耆献类徵》卷三二七有传。（王学泰）

【曹寅】（1659—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自署千山。内务府包衣旗人，属正白旗，其先为辽阳人，从满人入关后，受田宝坻（今属天津）。其母为清圣祖乳娘。年十三，选为御前侍卫，圣祖康熙二十九年（1690），以郎中差遣为苏州织造，经二年改为江宁织造，连任二十年之久。康熙四十三年，与妻兄苏州织造李煦迭兼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官至通政使，而其贵幸实在江南督、抚之上。圣祖六次南巡，四次皆以曹寅江南织造署为行宫。寅天资聪颖，少即嗜诗，如杜芥所言：“诗者，曹子不可须臾离者也。曹子以诗为性命肌肤，于是导之、引之、抑之、搔之，辗转反侧，恒有诗魁郁勃于胸中，此精微烂金石，视陈思何异哉？”（《楝亭诗序》）寅日常不离诗，故其诗多以日常生活琐事为题材，多方面地描写了汉化旗人贵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再现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具有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如《菊露和酒》、

《月凉饮茗歌》、《插瓶菊夜供有感》、《南轩种竹》、《石湖泛舟》、《和芷园消夏》十首、《看西廊秋叶》、《西堂》、《惠山纳凉歌》、《寄题东园》八首等等。从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与汉族士大夫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寅对西洋传入的用具、食物、饮料也颇有兴趣，亦常常把它们写入诗篇。如《夜饮和培山眼镜歌》、《客馈洋茶半开戏题》、《罌粟》等。其诗通畅平易，时亦流于浅俗，学白居易，时亦阑入宋调。寅久在江南为宫廷买办，实际是为朝廷耳目，故多与明遗民故老相往来，如朱彝尊、余怀、顾景星、杜濬、尤侗、毛际可等皆为其坐上宾。喜藏书，好刻书，曾刊《楝亭十二种》。《全唐诗》、《佩文韵府》亦为其主持刊刻。撰有《楝亭诗钞》八卷、《诗钞别集》四卷、文一卷、词一卷。《清史稿》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陈大章】（1659—1727）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属湖北）人。少侍父官粤，与陈恭尹、梁佩兰为忘年交，工诗古文。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选为庶吉士，以母老乞假归养，筑室松湖，以教授弟子为生，不再起。家境非丰，食指八口，间课桑麻以自奉。曾却江汉书院之聘，自云：“盖缘鸿冥近性，非比矫激立名。”颇喜游山，江南名山游览殆遍，如翠微、庐山、金焦、北固、苏台、白门等。大章深于毛诗，著有《诗传名物辑览》，一百卷，凡三易其稿乃成。大章诗以描写名山大川与表彰隐逸、崇尚志节之作为多，如《登小孤山》、《游庐山》等。作者善于用恬和之笔写山水之可亲可近，如《九江夜泊》云：“解帆及斜阳，系舟旁枯柳。天低九派流，浪抱孤城走。奇峰插斗南，势雄压江右。云中五老人，见我时招手。静夜冷鱼龙，古戍沉刁斗。欹枕不成眠，且饮浔阳酒。”诗中完全没有竟陵派诗人幽单孤峭之余习。其他如表彰杜濬的《柬车双亭余右弓嘱访杜茶村遗集》、悼念曾灿的《哭青藜》皆表达了对具有高风亮节的明遗民的崇敬。其诗雍容平易；音和节缓，颇类元末明初之江西诗人虞集、刘崧等人作品。著有《抱节轩类记》、《读史随笔》、《北山文钞》以及《玉照亭诗钞》二十卷。《清史列传》卷六六、《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一有传。

（王学泰）

【王苹】（1661—1720）字秋史。世居杭州，父钺官江南上元，自江宁流寓济南（今属山东），遂为济南人。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授知县，以母老改成山卫教授，逾年乞终养归。苹性好读书，少负奔轶之才，嗜古好奇，视乡里间人皆无当其意者，独好为诗，闭门索句息交绝游，人以狂士目之。王士禛赏其诗，尤酷爱其“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之句，称之为“王黄叶”，由是名声大噪。其作品

还受到田雯、吴雯之推重。莘一生致力于诗,诗多摭写自己穷愁落拓、凄楚无聊之情怀,如《春日述怀》云:“泉头十九年前住,试看垂杨大几围。犹是只鸡招近局,依然山鸟怪儒衣。诗如上水船难进,身似沾泥絮不飞。屈指年华竟虚掷,从前悔未买渔矶。”也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之作,如《吊张布衣》、《松椒山是董樵隐处》、《读吴嘉纪集》皆写布衣穷士不遇于时的悲哀。其诗清绝拔俗,擅长近体,七律多佳句。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十二卷、《蓼村文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

(王学泰)

【赵执信】(1662—1744) 字伸符,号秋谷,晚号诒山老人。博山(今山东淄博)人。福建按察使、诗人赵进美之从孙。进美诗名甚著,执信渊源家学,少聪颖,工吟咏。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受到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等人的推重,订为忘年交。诗坛领袖王士禛亦欲罗致门下。康熙二十三年,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寻擢右春坊右赞善。康熙二十八年,以国丧期间观《长生殿》剧为给事中黄仪所劾,削籍。既归,放情诗酒,所居因园,依山构筑亭榭,各极天趣。性好游历,尝逾岭南,再陟嵩山、少室,五过吴阊、维扬、金陵,所涉及的范围北起天津,南至广州,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七省,借游山玩水,探奇寻幽,以开拓心胸,排遣郁闷,凭吊胜迹,访求知音。所到之处,冠盖逢迎;乞诗文书法者纷至沓来。在南游期间,拜冯班墓,称私淑弟子。自世宗雍正三年(1725)归乡后,遂不复出,晚年失明,自编其诗文著作。其诗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当时农民生活之困苦、农业劳动之艰辛、贪官污吏之盘剥、军队盗匪之横行,多见诸于篇章。特别对农民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描写,如:《纪旱》、《久旱》反映了旱灾为害之烈;《大堤行》、《碧波行》写水灾之恐怖;《纪蝗》、《后纪蝗》描写了蝗灾肆虐。还有一些作品写到风灾、雹灾。诗人还注意到与天灾联系在一起的人祸,如:《木偶人》揭露尸位素餐的无耻官吏;《诅雨师》斥责那些掌握民命而又一味胡来的饮差大臣;《两使君》讽刺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的封疆大吏。其《甬入城市》写出了百姓在天灾人祸双重逼迫下铤而走险、进行暴动的情景,并揭示出官逼民反的合理性。诗中还有大量赠人怀友的篇什,从中不仅可见作者笃信义、重友谊的品德,而且保存了当时许多名流才士的史料。诗风近于宋诗,思路剴刻,格调清新,擅长赋体,其描写必穷形极象而后止,力去浮靡,多盘空硬语,笔力沉挚,古体较为优长。执信论诗,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认为在这种主张指导下所作

之诗必是“诗中无人”;推崇冯班、吴乔,主张诗中有人,“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谈龙录》)。这些论诗主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著有《诒山诗集》二十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后谱》一卷、《诒山文集》十二卷、《礼俗权衡》二卷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并有传。

(王学泰)

【陈鹏年】(1663—1723) 字北溟,号沧洲。湘潭(今属湖南)人。其祖与父皆明朝旧臣,自幼受到民族意识的熏陶。清圣祖康熙三十年(1691)进上,初为浙江西安令,历官至河道总督、兵部侍郎,谥恪勤。为官以正直清廉闻于世,所至兴利除弊,惩奸雪枉,人争颂之,呼之为“陈青天”,也受到一些满族权贵的嫉恨。官苏州时,受到巡抚张伯行倚重,事无巨细,多与裁决,触怒总督噶礼。噶礼遂摭其《重游虎丘》诗中有“代谢已怜金气尽”之句,句句旁注,密奏劾之,以为大逆。幸圣祖诏云:“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人人罪?”命复其官。为江宁知府时,总督阿山欲从税中加火耗二三分,以为皇帝南巡之资,受到鹏年反对。后阿山遂劾其以南市娼楼改建为乡约讲堂,中列有圣谕,为大不敬,又劾列他过,太子必欲杀之,赖织造叩头流血力救,幸从宽得免。后阿山坐事免官,噶礼以罪诛,太子被废,事遂解。鹏年一生专注政务,诗歌乃其余事。其诗多为应酬之作,也有一些篇什反映了宦途艰险和自己仕途的坎坷,如《述愤次李崆峒韵》、《江干》、《冬日感怀》等。其《新春杂感次韵和中山》以比兴形式写其在江宁任上的艰难:“铁瓮城边路,金焦江上山。蛟螭蟠地轴,豺虎踞天关。皎日群阴散,春风十亩闲。烟云俨图画,蜡屐好跻攀。”其律诗沉郁顿挫,悲歌慷慨。其绝句清华秀贍,颇有晚唐风韵,如:“隔帘幽韵上焦桐,一曲湘灵曲未终。略记年时春雨夜,海南新试小薰笼。”著有《历仕政略》、《河工条约》、《道荣堂诗集》十卷、《文集》六卷。《清史稿》卷二七七、《清史列传》卷一三有传。余廷灿为撰行状,张伯行为撰墓志铭,曹一士亦为撰墓志铭、神道碑。

(王学泰)

【周起渭】(1664—1713) 字渔璜,号桐野。贵州贵阳人。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在馆时,与史申义(蕉饮)有“馆中两诗人”之目。曾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历官詹事府詹事,才名动馆阁。起渭为诗,上自建安,下逮竟陵,无不研究,尤肆力于苏轼、元好问、高启。其诗多题赠应酬之作。有些七古歌行,状物写事,陈述铺排,淋漓尽致,如《万佛寺大钟歌》一时推为杰作。其《避风赤壁登苏公亭放歌》、《阻风鄱阳湖泊鸡山下三日湖中又有一小山名蜈蚣山皆俗人以形呼之舟中闷甚

戏作此诗》都写得酷似苏轼,感慨豪宕,神足气完。起渭是清初黔中最有影响的诗人,对后来的黔中诗人莫友芝、郑珍有一定影响。著有《桐野诗钞》四卷,录诗三百五十馀首。《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陈至言】字山堂,一字青厓。浙江萧山人。早年与同郡张远齐名,受到乡先贤毛奇龄的赏识。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官翰林编修,曾值南书房,尝参与修《一统志》、《四朝诗》、《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朱子全集》等。至言少负诗名,诗多言志摅怀之作,长于五古与五、七律。五古遒劲严整,颇似杜甫。律体属对雄整,而出之以流丽,有晚唐风韵,如《北平送友人南归》:“哀角严城起,悲秋泪满衣。如何游子恨,偏自送人归。霜落孤鞍急,天高独雁飞。赏心零落尽,朋旧日应稀。”著有《菴青集》二十一卷,其中诗十二卷、文七卷、词二卷。《国朝书画家笔录》卷三有传。(王学泰)

【徐昂发】榜姓管,字大临,号纲庵。昆山(今属江苏)人。少有异才,善读书。间作考证,持择矜慎,叙述简洁,正舛订讹,成《畏垒笔记》四卷,足资闻见。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其《宫词百首》,遍播旗亭酒社间,为世所称。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康熙五十三年,充福建乡试副考官,康熙五十九年,提督江西学政。世宗雍正(1723—1735)初,因事遣戍新疆,后不知所终。昂发诗分前后两期。前期诗学晚唐,风流缠绵,丰神飘逸,受李商隐、杜牧的影响,内容则多为咏物言志,如《咏柳》:“为有春风怨玉箫,江南是处拂长条。多愁人嫁娉婷市,送远车回宛转桥。月影半沉烟霭霭,莺声不断语潇潇。可怜张绪才名减,赢得风流似舞腰。”晚期诗趋老苍,风格近于杜甫,多纪行纪游、怀古言志、感慨时事之作,代表作品有《过彭蠡湖》、《经广武城》、《观打鱼戏为鸬鹚歌》、《得树园古樟叹》、《后古樟叹》等。也有少量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下田雨叹》、《淫雨》等。其前期诗作收在《乙未亭诗集》中,凡六卷,后期诗作收在《畏垒山人诗集》中,凡四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二有传。(王学泰)

【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间邱,因家有秀野园,常自署秀野,故人又以秀野称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尝浪迹南北,遍访名儒故老,于诗学颇有成就。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值圣祖南巡,有以嗣立名荐者,并进其所编著《元诗选》,受到嘉许。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复南巡,因宋荦荐召试,遂被选至京师,入馆纂修《宋金元明四代诗选》、《皇朝全览》等书,以工作勤勉于康熙五十一年特赐

进士及第,康熙五十三年,复荐入武英殿纂修《鸟兽虫鱼广义》。康熙五十四年,以不习满文改授知县,后移疾归。嗣立《寒厅诗话自序》云:“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其所著《寒厅诗话》不仅记录诗人遗闻轶事,还辨析了元诗发展源流,书中表现出作者倡导宋诗、元诗的倾向。嗣立游历颇广、交游甚多,其诗多为游览名山胜水与题赠应酬之作。《日观峰》、《自钱塘江口至常山舟中杂诗》、《峡山行》、《串月歌》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初学元好问、虞集等金、元名家,后学韩愈、苏轼,擅长运用铺排描写,如《串月歌》中描写石湖八月十八夜明月成串奇景时,采用博喻手法多方面地再现这一奇观:“金盆出水耀光芒,琉璃迸破银瓶泻。散作明珠千万颗,老兔寒蟾景相吓。”长于古体;近体较为平易,少顿挫之致。诗中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著有《间邱辨圃》、《昌黎诗笺注》、《温飞卿诗笺注》。辑有《元诗选》十集、《诗林韶濩》四十卷。其所著诗收入《间邱诗集钞》十卷、《秀野草堂集》六十八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有自撰《间邱年谱》。(王学泰)

【杜诏】(1666—1736)字紫纶,号云川,又号蓉湖词隐。无锡(今属江苏)人。少从严绳孙、顾贞观游,从其学作诗填词,词尤胜,有才名。科举不利,屡困于场屋。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南巡,献《迎銮词》十二章,试列高等,特命供职内廷,参与修纂《历代诗馀》及《词谱》等书。康熙五十年中举,次年会试,本已落第,圣祖命再阅遗卷,特赐一体殿试,选庶吉士,后以终养告归。在乡为诗坛主盟,世宗雍正元年(1723)尝大会虎丘,吴中名士毕集。雍正十三年(1735)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考试,辞不获命,未入都卒。诏酷好中晚唐诗,曾编选中晚唐诗为《唐诗叩弹集》,其论诗专主性情,出入温、李之间。性好山水,尝游秦陇、江楚、闽越、兖豫,其诗多徜徉山水、题咏名胜古迹之作,如《隋堤曲》、《黄金台》、《对马台》皆为其名作。其《雨泊吴阊送春同顾梁汾先生作》写江南晚春景色、兼怀忘年之友,颇似李商隐七律而少骨力:“吴宫花老泪胭脂,点点残红堕晚枝。自是东风无着处,本来西子有归时。锦帆冷落青帘舫,玉管阑珊白芷词。双桨绿波留不住,半塘烟雨柳如丝。”诏擅长填词,词格在周密、张炎间。古文学欧阳修。著有《云川阁诗集》十四卷、《词集》七卷、《读史论略》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李果为作传。(王学泰)

【屈复】(1668—1749?)字见心,号金粟,晚号梅翁。蒲城(今属陕西)人。年十九参加童子试,名列

第一,忽弃去。年二十五出游,只身走万里,寓山东沂、剡最久;中更历齐、鲁、燕、赵、吴、越、闽、粤等地,尝四至京师,名声籍甚。在京尝以诗学教授弟子,从其学者甚众。有“近日北方诗人多宗蒲城屈征君梅翁,南方诗人多宗长洲沈宗伯确士”(《读雪山房杂著》)之说,可见其与沈共主清世宗雍正(1723—1735)、高宗乾隆(1736—1795)初年诗坛。乾隆元年(1736),以布衣荐试博学鸿词,不赴。遨游公卿间,不屈志节。复熟于历史兴亡陈迹,以及关河阨塞、兵马漕盐、天文律历诸事。邓之诚以为其“出游非谋食,亦非啖名,盖有所为。故两辞朱邸之招,举丙辰鸿博不应,而终身不归故乡,与顾炎武、刘献廷略同”(《清诗纪事初编》)。清人郑方坤亦言:“翁之寄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盖其志在伺机起事而终未能谐者。其足迹半中国。诗多取材各地名山胜水、荒台堕殿,用以寄其歆歆感慨,故听见于篇章者,“大率多残山剩水之思,《麦秀》、《黍离》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乱流欲渡,令其累歆增感而不能自己”(《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其代表作品有《长安怀古》十首、《洛阳怀古》四首、《朱仙镇岳武穆祠》三首等。诗中也有许多揭露世道人心、社会黑暗的诗篇,而且写得极尖刻,如《浩歌》云:“皂则黑,朱则赤,神不明,五色一。囊有金,作儿孙;金入手,成寇仇。木无皮,不生枝;鸟无翼,安能飞?逆吾德,谄吾贼。烹走狗,食其肉;杀耕牛,取其革。烛为阳,日乏光。悲欲死,时如此。寒露零,鸩化鹰;鹰喙利,啄人心。”其嫉恶如仇的个性得到十分鲜明的表现。复长于律体,沉雄勃郁,深情绵渺,兼而有之。著有《楚辞新注》八卷、《玉溪生诗意》八卷、《唐诗成法》八卷、《弱水集》二十二卷、《江东南草集》等。《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八〇有传。(王学泰)

【惠士奇】(1671—1741) 字仲孺,号天牧,又号半农居士、红豆主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名学者惠周惕之子,少即笃志经史,年十二善为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为名流激赏,弱冠补诸生。清圣祖康熙五十年(171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两度充会试同考官。康熙五十九年,充湖广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士奇在粤提倡经学。世宗雍正五年(1727),奉旨修理镇江城,以产尽停工罢官。高宗乾隆元年(1736),奉旨进京。乾隆二年,补侍读学士。乾隆四年,以病告归。士奇诗学唐诗中古淡一派,多以农村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如《樵客行》、《田家行》、《簇蚕词》、《牧童词》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中还有不少写游宦

生活的篇什,如《广州书怀》:“暂作南中客,淹留岁月徂。鲛人元有泪,野女本无夫。山径逢樵父,烟波狎钓徒。持竿将入海,直欲拂珊瑚。”其风格酷似唐之孟浩然。士奇深于经学,著有《易说》、《春秋说》、《礼说》、《大学说》。其诗分集刊刻,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归耕集》、《人海集》等,又有《半农诗徵》。《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钱大昕为作传。(王学泰)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一字砚斋。桐城(今属安徽)人。太傅张英次子。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直南书房,五迁至刑部右侍郎。世宗雍正(1723—1735)初,政事繁剧,谕旨日数十下,廷玉承命应奉,精敏详赡,悉称旨,擢尚书。雍正四年(1726),拜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六年晋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世宗死,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高宗乾隆十五年(1750),致仕,卒谥文和。廷玉立朝四十余年,诗多奉和应制之作。这些作品立言得体,善于刻画皇家园林美景。杨际昌言其诗风格类似其父,秀骨天成,清新拔俗,列举其律句“绿芜酣宿雨,红杏破轻烟”,“在藻鱼吹浪,衔芝鹿近人”,“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松影团成幄,花光散作云”,皆轻倩流丽,宛若画图。其颂圣之作则多读令人生厌。著有《澄怀园集》三十七卷。《清史稿》卷二八八、《清史列传》卷一四有传。(王学泰)

【李绂】(1673—1750) 字巨来,别号穆堂。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幼以神童称,十岁能诗,十二岁即与里人结诗社。家贫,备尝苦辛。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累官至工部右侍郎。曾因劾权臣田文镜,忤旨,下狱,两次决囚,缚之西市,刀加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李言:“臣愚,虽死,不知文镜好处。”乃宣旨赦还。高宗乾隆(1736—1795)初,召授户部侍郎,官至内阁学士,以病致仕。绂崇尚陆、王之学,论学大旨亦在致良知、穷理格物。其诗多写游宦生活,风格清新明快,活泼生动,如“庄舄经春只越吟,菜根滋味忆山林。夕阳千树鸟声寂,凉月一庭花影深。窄堵波原难作宅,磨兜坚已自题箴。惟馀结习残书在,窥见羲皇以上心”(《秋山学圃为张韦斋明府题》),写士大夫罢官以后清慎自守的生活。诗风明朗平易,与后起的性灵诗风十分相近,故袁枚多次称颂其诗,并摘其佳句。绂亦工文,文学北宋欧阳修、曾巩。著有《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学晚年全论》、《阳明学录》。其诗、文及全部学术著作皆收入《穆堂初稿》五十卷、《穆堂别稿》五十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江西巡抚吴绍诗上奏言“查出李绂各集,语多愤嫉”,建

议削夺级生前官职,并将其子孙革职听审。高宗亲自审查,认为“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讹谤实迹”,故只将其集版片焚毁,以免贻误“世道人心”。吴绍诗奉旨执行。而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又有《穆堂别稿》、《穆堂初稿》之刊刻。《清史稿》卷二九三、《清史列传》卷一五有传。全祖望为撰神道碑,袁枚为作传。

(王学泰)

【沈德潜】(1673—1769) 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学诗,重诗律,曾馆于尤家,其诗受到尤侗赞许。论诗上溯《诗经》、楚辞、下迄三唐,以和平敦厚得性情之正者为宗,与同里张景崧、徐夔、张锡祚、陈培脉等先后结南村诗社、北郭诗社,专力于诗。长期困于场屋,至清高宗乾隆三年(1738),六十六岁始中举。次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晋侍讲,擢至礼部侍郎。高宗早闻其诗名,及在翰林,每与唱和。乾隆十四年(1749),以老乞归。高宗赋诗赠行,有“我爱德潜德,醇风抱古初”之句,并为其《归愚诗钞》作序,卒,谥文悫。德潜诗可分前后二期:其未中进士以前则多游览赠答、咏史怀古、赋物题画之作,从格律到字句皆不脱模拟痕迹;中进士后则多恭和应制、歌功颂德之作。前、后期也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晓经平江路》写饥民流离惨状:“晓经平江路,相遇逃亡民。非人亦非鬼,匍匐泥涂间。老翁拄竹杖,老妻相牵攀。病妇布裹头,双足亦不缠。儿女盛竹筐,其父担道边。行李芦叶席,坐卧无冬春。”另外还有不少作品涉及时政利弊,如《百一诗》等。其前、后期皆有此类作品;前期大多有感而作,有为民请命之意,如“斯意当语谁,令我忧心病”(《百一诗》);“闻阖一何高,排云听谁叫。”(《论苏松丁粮》);晚期则是完成皇帝所交之任务,即奉旨汇报民情,诗中在反映民情后常有“颂圣”之语;因而其揭露时弊也颇能掌握分寸,有时看来言词激切,但实际上都不违“宸衷”,如《制府来》在揭露两江总督噶礼贪贿无厌、作威作福的同时,也歌颂了皇帝的英明。也有一些诗触及敏感题材作品,如:《汉将行》借写汉代卫青、霍去病影射年羹尧;《送杭堇浦太史》同情因论“宜泯满、汉之见”被罢黜之杭世骏,从中可见其心态。德潜诗,古体较自然,近体则多人工痕迹,均以平正典雅为皈依,如朱庭珍所言,其诗“平正而乏精警,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筱园诗话》)。其论诗,主“格调”,倡温柔敦厚之说,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大型诗歌选本以贯彻其说,著有《说诗碎语》四卷。有《沈归愚诗全集》,包括《归愚诗钞》、

《归愚诗钞余集》、《竹啸轩诗钞》。另有《归愚文钞》十二卷。德潜曾自订年谱。《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一九皆有传。

(王学泰)

【揆叙】(1675—1717) 字恺功,号惟实居士。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明珠为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权相,其兄纳兰性德为著名词人。以父荫为侍卫。康熙三十五年(1696),授翰林侍读,后六年跻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左都御史,仍兼掌院。揆叙为皇帝近臣,圣祖谒陵游幸,北狩南巡,无役不从,其诗即为这些侍从生活之记录。今人邓之诚言其“诗皆编年,于山川、道里、产物、风俗,记载特详。域外见闻,多可征信。属辞巽雅,多作恬退语”(《清诗纪事初编》)。揆叙少从查慎行、吴兆骞、唐孙华学诗,三人皆擅长运用赋体以记事写物,特别是查慎行注意用笔“透”“露”,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得宋人之长。揆叙诗亦具此特点,如:《攒花》中描写节日烟火;《咏冰床》写冬日冰床之戏;《归化城观打鬼》写满族萨满教驱鬼活动;《鹰坊歌和他山夫子》写八旗子弟所调养海青神鹰,皆刻刻细腻,神形兼备。揆叙自订诗集名《益戒堂自订诗集》十二卷,收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至四十二年癸未(1692—1703)诗,另有《益戒堂诗后集》十二卷,乃其子永寿所蒐集遗稿,皆为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至五十四年乙未(1704—1715)之诗。《清史稿》卷二八七、《清史列传》卷一二有传。

(王学泰)

【鄂尔泰】(1677—1745) 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授侍卫,从猎和诗称旨,迁内务府员外郎。世宗在藩邸时善之,及继位,特授江苏布政使,未几,迁广西巡抚。世宗雍正三年(1725),为云贵总督,倡改土归流之策,迁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多次镇压云、贵苗民之武装反抗。雍正十年,以功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授一等伯。世宗死,为顾命大臣。高宗乾隆(1736—1795)初,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卒谥文瑞。鄂尔泰身为满族高官,热衷提倡风雅,在吴中曾刻《南邦黎献集》以收江南诗人作品。其诗除应制奉和者外,还多摭怀言志之作,如:“踏雪飞鸿任此身,载辕回首已前因。从知三万六千日,半是东西南北人。怅别群僚纷涕泣,遄归一老念尊亲。平蛮坊底休烦思,记取天涯若比邻。”(《滇中回宿易隆诗示送行者》)其诗造语平易,感情诚挚,风格近于晚起的性灵派。袁枚《随园诗话》开篇即评鄂诗,非仅因其地位崇高,亦由于两人诗风相近。有《西林遗稿》六卷,存诗五百余首。《清史稿》卷二八八、《清史列传》卷一四有传。袁枚为撰行略。

(王学泰)

【周京】(1677—1749) 字西穆,一字少穆,号穆门,亦号辛老,晚号东双桥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廪监生。中年南游闽海,北游燕、赵,西游秦、晋,欲结交海内英杰。所至巨公大卿,皆倒屣而迎。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举试博学鸿词,因荐至京师,卒称疾未与试。后考授州同知。晚年息影蓬庐,共里中诗老结吟社,放浪湖山间。京遍历南北名山大川、墟莽古迹,故中年之诗多题咏摅怀之作。晚年则多拈韵分题、与诗友唱和之作。中年游历时代作品如《代州》、《燕来》、《杨花》、《游国山寺》等,其诗不作剗刻艰深之语,诗体和平中正,时有隽语,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其诗“源出剑南”,就其七律而言,确实如此,如“万里黄云压陇头,迩来六月正披裘。阳坡麦熟关山雨,冷碛羊屯塞草秋。板屋门前看雪岭,金城帐外认熙州。夜凉独觉清晖苦,此是河湟旧戍楼。”(《临洮城》)京亦工书法,其自书诗为当时所重。诗集为厉鹗所定,名《无悔斋集》,凡十五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三有传。全祖望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程梦星】(1679—1755) 字伍乔,易为午桥,号泖江,一号香溪。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颖异,弱冠时即以诗鸣。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丁内艰归,不复出,筑筑园并漪南别业,诗酒留连,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名流过扬者,多与之游。梦星诗多题赠应酬与流连光景之作,如《雲栖》、《归画行》为其代表作品。梦星长于近体,七律、七绝尤胜。袁枚言:“午桥先生古风力弱,近体风华,不可没也。”(《随园诗话》)其近体学李商隐,较为清疏,佳句有“蜡屐也思新草色,病醒偏负晓莺声”(《看花不果》)、“百里烟深因近水,一年秋早为多山”(《桐庐》)等。王昶在《湖海诗传》中曾列举其名句:“碧流似带环双峡,青嶂如屏抱一村”,“菱荷风自浮轻幔,罗绮香多过别船”,“一院雨声留客后,半窗梅影上灯初”等,从中皆可见其风华清丽的特征。著有《平山堂志》、《李义山诗集笺注》。其诗分为十集名为“江峰”、“分藜”、“香溪”、“畅馀”、“蠹馀”、“漪南”、“五颺”、“山心”、“琴语”、“就简”,总名《今有堂集》,附以《茗柯词》。《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

(王学泰)

【文昭】(1680—1732?) 字子晋,号芑婴居士,又号北柴山人,因家中有“紫幢轩”,人又称之为紫幢。宗室,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少时曾从王士禛学诗,才名籍甚,为清圣祖所知,“尝谕近臣曰:‘宗室文昭,诗学甚好,可惜身有残疾,不能行走。’”(《梧门诗话》)文昭“自恨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高山大谷、浦云江树,未尝属目,故诗不能工”

(《清诗纪事初编》)。其诗以写园林四时风光及闲适生活者为多,有“花香高阁近,书味小楼深”句,曾为岳端所赏。诗风清新俊逸,亦王维、孟浩然之流亚。有些诗作记载了北京风俗,如《踏灯竹枝词》、《丁未王正》、《琉璃厂买灯并国初诸家全集》皆可备京师掌故。尝手录曹植、陶潜、陈子昂、张九龄四家为《古诗管》,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杜牧五家为《三唐诗管》,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刘基、高启、王士禛八家为《五朝诗管》,又录宗人诗为《宸蓐集》。几种选集似皆未刊刻。其诗作收入《紫幢轩诗集》,分二十一个小集,凡三十二卷。《清史稿》卷四八四、《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一有传。(王学泰)

【黄之隽】(1680—1760) 字石牧,号唐堂。华亭(今上海)人,原籍休宁(今属安徽)。少聪颖,过目成诵。为诸生二十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世宗雍正元年(1723),以进《中元祭圣祖仁皇帝文》称旨,召见,授翰林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奉命提督福建学政。雍正二年,迁中允,为福建巡抚毛文铨所劾,降编修,旋革职。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试博学鸿词,未终卷,罢归。后屡辞诸省各大书院之聘,安贫向学,惟以著书自娱。之隽诗多为描写个人生活琐事和题赠应酬之作,但从中亦可见其为人。其主福建学政时,谢绝请托,被劾罢官,诸生醵金赠行,不受,作《谕士》诗云:“吁留诚不可,馈赆亦何安?老子贫为骨,诸生义出肝。七闽惭得士,三载拙居官。德业相期望,蓬池拭目看。”之隽诗中也有不少描写生产劳动与人民疾苦的作品,如:《踏车谣》写江南农夫、农妇车水灌田,《水碓》写以水为动力的碾盘,《蚕女》写浙江蚕女之苦辛及所受盘剥之重,皆质朴平易,真切感人。诗以古体为长,其五古歌行学汉魏乐府,时有神似之作。近体通俗浅易,失于平淡。所写五、七言排律尤多,更为庸滥。又尝集唐诗九百四十二首,各体皆备,以绝体为多,题为《唐香屑集》。自著诗文编为《唐堂集》五十卷、《补遗》二卷、《续集》八卷、《冬录》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五有传。

(王学泰)

【许廷铤】 字子逊,号竹素。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英敏,气豪矜胜,尝学峨眉枪法,能盘马弯弓、击剑夺鞘,遍游四方,结交海内名士,有侠风。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官福建武平知县,有善政。一官即归。晚年居乡,与沈德潜、王昶等往来唱和。廷铤为人豪纵旷达,诗多遣兴摅怀之作,长于七绝,《送春》八首、《芜城感旧》为其代表作。诗学杜牧,绮丽豪宕兼而有之,如:《湘中曲》之五“楚泽灵均渺嗣音,西风吹乱女婴砧。前山云起感迟暮,一夕美

人湘水心”；《玩月至宵分》“山风云外堕天香，回首瑶台枉断肠。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它乡”；以及颇能体现其豪放心胸的《咏飞诗》“垂老犹横槊，穷愁未废诗。荐章终日上，不到傅修期”。著有《竹素园诗钞》八卷。《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郑方坤】字则厚，号荔乡。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进士，授直隶邯郸知县，考绩卓异，擢知景州，调河间同知，迁山东登州知府，后调武定、兖州等地。所历皆有善政，于饥荒之岁，发帑银、截留漕米以放赈，并释贫民因饥夺富室谷而被诬为盗者，后以足病自免其官。方坤博学强记，论诗力攻严羽“诗不关学”之说。有九女，皆工吟咏，其中七人有集传世。官兖州时，退食馀暇，日有诗课，拈毫分韵，相互酬唱，有《垂露斋联吟集》。方坤与其兄方城齐名，互相唱酬，有《却埽斋倡和集》。其诗学韩愈，好逞才炫学，用僻典险韵奇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下笔不休，有凌厉一切之意”，“于涩字险韵，恒数十叠，虽闻见层出，波澜不穷，要亦不免炫博。”诗多唱和题咏之作。集中有《暖锅诗》咏北方火锅，仿韩愈《石鼎联句》用二十三梗韵，共三十六韵，常见字使用殆尽，纯用赋体，刻画描写极为细腻。其小诗颇富情趣，如“竹院绿崖架似楼，篮舆取径捷于舟。山花红润矜人面，石笋青巉露佛头”(《岭行杂诗》)，流畅平易，不似其古体之险怪。著作极富，有《经稗》十二卷、《五代诗话》十卷、《全闽诗话》十二卷、《国朝诗钞小传》二卷及《岭海丛编》等。其诗文集名《蔗尾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清史稿》卷四八四有传。

(王学泰)

【薛雪】(1681—1765后)字生白，号一瓢。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博学多通，工于绘事，善拳勇。医术尤精，与苏州名医叶桂(天士)齐名，救人颇多，为吴中所传诵。性孤傲，公卿延之不肯往。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报罢。尝与沈德潜俱师事叶燮，论诗传其衣钵，注重诗人的胸襟气质，认为“诗之基，其人胸襟是也”(《一瓢诗话》)。雪诗以清新婉丽者为多，如《夜别汪山樵》云：“客中怜客去，烧烛送归桡。把手各无语，寒江正落潮。异乡难跋涉，旧业有渔樵。切莫依人惯，家贫子尚娇。”其诗名为医名所掩。著有《周易粹义》、《医经原旨》、《一瓢诗话》及《一瓢斋诗存》。编选《唐人小律花雨集》。《清史稿》卷五〇四有传。

(王学泰)

【李重华】(1682—1755)字实君，号玉洲。吴江(今属江苏)人。少时从张大受学诗，有俊才。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

修。雍正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生平游历颇广，入巴蜀，客山左，留秦关，经三楚，故其诗多登临凭吊，抒发感慨，题咏名山大川、古今胜迹之作，如《剑阁》(五古)、《五丁峡》、《鸡头关》、《登蓬莱阁》、《送徐编修徵斋册使琉球》等，气势恢阔，境界开阔，笔力雄健，其《剑阁》七律云：“宋玉狂言亦快哉！果然长剑削天开。泉声独引雷车落，峰影双扶日驭回。壮士枉穷排嶂力，犬文终重勒铭才。中原龙虎无销歇，日见关门驷马来。”其论诗受叶燮、沈德潜的影响，注重诗的“音”、“象”、“意”，是为诗之“三要”，“三要”之中以“音”为首要，因为“物有声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称音也”(《贞一斋诗话》)，与“格调说”十分相似。著有《贞一斋诗话》二卷、《三经附义》六卷。又有《贞一斋集》。刘大櫆为撰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黄任】(1683—1768)字于莘，一字莘田，号十砚老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流寓姑苏，颇事声色，大病而归。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会试不中，赴部论选，为广东四会县令，兼摄高要，有惠政，长于吏事，为上官所器重。时值岁饥，为粥赈饥，全活者无数。为谗者所劾，言其纵情诗酒不理事，罢归时即以“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自旌其舟而去。归时惟端砚数枚、诗束两牛腰而已。一生落拓不偶，其诗多借咏物怀古、美人香草以摅写其负谤含冤和矢志不平之情，如：“酒垒诗城昔张军，冷灰残烛痛离群。南皮散后风流歇，临老襟怀尽在君。”“君去还能几日留，友声无伴苦相求。秋江已长蒹葭水，怕听伊人说买舟。”(《夏日香草斋即事同朱六幼芝作》)诗人之感伤不仅因为友人离去，也包含有身世之感。任以艳体闻名于世，艳诗虽多为涉足狭邪之作，但不流于轻薄猥亵、尖新刻露，而往往写得低徊宛转、醇厚蕴藉，如其名句：“莲子有心生太苦，藕丝无力系偏长”；“肠成寸寸回文锦，泪是星星记事珠”(皆见《无题八首和徐懋云》)。也有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写于广东四会的《筑基行》揭露了恶吏借修筑水利工程以鱼肉农民；《赈粥行》描写了青黄不接时农民濒于死亡的情景。这类诗篇大多质朴通俗，不加修饰，与其整体风格有异。任长于近体，尤工七绝，存诗一千一百馀首，七绝居六百馀首。诗学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苏轼的俊逸之处，故清丽芊绵、深长有味。其《杨花》一首为当时所传诵：“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杨花可暂停。留底不知别离苦，后身还去作浮萍。”还工书法，好储砚。著《秋江集》六卷。《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金农】(1687—1763) 字寿门,又字司农,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取居士、心出家庵粥饭僧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性情通峭,好古嗜奇,收金石文字千卷,与同里名士丁敬、陈章等唱和,切磋诗艺。性好游历,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与当时名人才士多有交游。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以布衣荐试博学鸿词,不就。年五十始学画,初画竹,继画梅,继画马,最后画佛。其布置花木,奇柯怪异,设色尤异于常。人重其画,尤喜其题款,多新隽语。晚年贫困,居于扬州二十余年,以鬻书画为生。书法尚古劲,尤工于饿隶体。与罗聘、郑燮等以书画多新意被目为“扬州八怪”。农于诗最景慕唐之李商隐、陆龟蒙。自云:“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随之间。玉溪赏其窈眇之音而清艳不乏;天随标其幽遐之旨而奥衍为多。”(《冬心先生集自序》)农足迹半中国,其所历“或名岳大河倾写胸臆;或荒台堕殿触古怀;或雨零风歇感伤羁屑;或箬人酒徒飞扬意气。”(《自序》)故其诗多借题咏山水、登临怀古以摅写其不谐俗、不阿世之胸襟,如《咏淮堤柳》:“绿柳一枝红板桥,东风用力媚春朝。可怜种向淮堤上,不是低头便折腰。”其诗中还有大量题画之作,《题瘦马图》云:“古战场中数箭斑,悲凉老马识桑干。而今衰草斜阳里,人作牛羊一例看。”诗中流露出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及其不肯同流合污的精神。除有大量书画作品外,还有《景申集》、《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续集》。《清史稿》卷五〇四、《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张鹏翮】(1688—1745) 字天扉,一字抑斋,自署南华山人。嘉定(今属上海)人。少时姿质鲁钝,且多疾病,年十七忽开悟,取经史子集读之,如旧已习之,为时文及韵语,走笔立就,仿佛宿构。弱冠补诸生。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雍正十三年,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乾隆(1736—1795)年间,以诗思敏捷与磅礴淋漓之山水画、苍润劲秀之书法受知于高宗,迁詹事府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后擢为詹事。乾隆十年,以省墓乞假归,病卒于途。鹏翮为宫廷诗人,高宗颇重其才,有作便使步韵,顷刻数篇立就。其诗多应制奉和、题赠咏物之作,如《泥美人》、《粉团》、《玉环》、《落叶》、《和柳絮诗》等皆为其代表作品。这类作品多则失之于滥。鹏翮逞才好胜,往往一题数十咏,在京邸赋《雁字落叶》七律,自晨至午,成三十首,庸滥之作,自不可免。有些小诗颇具情韵,如:“碧湘门外渺寒波,欲采芙蓉奈晚何。今夜黄陵庙前月,茜裙谁唱竹枝歌?”(《长沙》)鹏翮书、画皆有成就,与诗被称为“张翰林三绝”。诗作分别收入《进呈集》、《庚韵集》、《传

宣集》、《双清阁集》等,后编为《南华山房诗钞》。《清史稿》卷五〇三、《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沈德潜为撰行状。(王学泰)

【马曰琯】(1688—1755) 字秋玉,号嶧谷。本籍安徽祁门,徙居江都(今江苏扬州)。曰琯为扬州盐商,生平勤学好客,四方名士过扬州者必造庐相访,全祖望、符曾、陈撰、厉鹗、金农、陈章、姚世钰皆尝馆其家,结邗江吟社,觞咏无虚日。嗜古能诗,酷爱典籍,富藏书,有希见者,不惜千金购之。其藏书之园小玲珑山馆与天一阁、传是楼齐名。乾隆(1736—1795)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曰琯曾进图书七百七十六种,受到高宗褒奖。曰琯性耽山水,吴中、京口一带,游历殆遍。其诗多咏其悠然自得、富足而风雅之生活,也有许多题咏山水与唱酬之作。其《街南书屋·看山楼》云:“我有山中心,不得山中宿。爱此两三峰,凭栏肆遥瞩。”可见其心境。《春江渔父词》、《冬夜宿南庄》也是这类作品。诗风清新流畅,风韵天然。著有《沙河逸老集》六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五有传。杭世骏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马曰璐】字佩兮,号半槎,或称半查,亦号南斋。原籍祁门(今属江西),徙居江都(今江苏扬州)。扬州盐商,曰琯之弟,号称“扬州二马”。博学工诗。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举试博学鸿词,不就。乐贤好善,惟恐不及。一时名流才士过扬州者,无不访马氏兄弟。好异书,其小玲珑山馆藏书之富,甲于东南。厉鹗馆其家,曾利用其藏书,并得其协助,辑成《宋诗纪事》。曰璐诗受厉鹗影响,清削隽永,多游山邀水之作。其《林屋唱酬集》即专收与酒侣诗朋游吴中之作。《游冷泉亭》颇能代表其诗风:“钟韵一星星,幽寻独此亭。山从入寺好,泉欲过时听。冷气怯春服,清晖隐翠屏。我来岩下坐,刻石记曾经。”著有《南斋集》。辑有《韩江雅集》十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又《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五有传。(王学泰)

【符曾】(1688—1760) 字幼鲁,号药材,晚号贯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监生。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诏令内外臣工各举贤良方正之士,送部引荐擢用。曾被荐为七品京官,送户部学习,监万安仓。高宗乾隆元年(1736),被荐试博学鸿词,因丁内艰,未与试。后官至户部郎中。曾能诗,与厉鹗齐名,又与厉鹗、沈嘉辙、吴焯、陈芝光、赵昱、赵信等人赋《南宋杂事诗》七百首,采摭浩博,足资考证。曾诗多写四时风物,也有许多题赠与唱和之作。论诗崇奉柳宗元、梅尧臣、姜夔,其诗亦在梅、姜之间,深情孤诣,语淡意远,清而能腴,淡而弥永,长于五律、七绝,如《九日暮登陶然亭》“人去荒烟合,亭空落叶深。残庐

延雪色,孤雁抱秋心。野兴夕犹发,客怀高可寻。重阳如此过,草草菊边吟”,《归自横塘》“浮石环溪水半篙,绿鳞鳞动散鱼苗。归来满地夕阳影,知了一声鸣柳梢”,皆可代表其诗风。其诗集,初刻有《赏雨茅屋稿》,在京为官时刻有《春鳧小稿》,后又刻《雪泥纪游稿》及《半春唱和诗》等。《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赵一清为作传。(王学泰)

【赵昱】(1689—1747) 原名殿昂,字功千,号谷林。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贡生。家富藏书,昱与其弟信旁抄博购,筑小山堂藏之,名闻一时。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与弟信并举博学鸿词,报罢。内阁学士李绂欲留昱共修“三《礼》”,昱以母老辞。归后读书自娱,筑春草园,有池馆之胜,与在杭诗人名流,如厉鹗、符曾、金农、丁敬、奚冈等觞咏其中。又与厉鹗等七人赋《南宋杂事诗》七百首,采摭浩博,足资考据。昱诗多描写隐逸闲适生活,还有大量题赠唱和之作。其诗清疏淡雅,颇类中唐大历之作,如《九日过白云山房有感》:“风流耆旧远,尽日掩秋堂。野水落寒石,乱山低夕阳。白云从过眼,黄菊又初霜。空有琴书在,尘封已半床。”昱长于五言,用笔隽秀。《慧日峰访亦谿上人不值留题二首》、《甲辰上元前二日宴集南华堂用少陵〈雨过苏端〉韵简郑进士瀛洲》、《苦寒》等皆为其代表作品。昱在其园中主持唱和活动,对浙西诗派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著有《爱日堂集》。《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杭世骏为作传。(王学泰)

【卢见曾】(1690—1768) 字抱孙,号雅雨山人,亦号澹园。山东德州人。清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后历任四川雅洪、安徽蒙城等县知县,安徽六安州、亳州、颍州等州知州,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尤注重水利。高宗乾隆元年(1736),擢为两淮盐运使。见曾到任,清理积案,调剂民食,整顿盐务,得罪盐商,以微嫌被劾,候勘羁扬州。乾隆五年,遭诬陷,遣戍军台,出塞至杭嘉山麓,三年后召还,起用为直隶滦州知州、永平知府等职。乾隆十六年,迁长芦盐运使。乾隆十八年,复为两淮盐运使,在任十年,以老告归。两淮盐运使任所在扬州,见曾怜才好士,四方名流咸集,诗酒唱和,极一时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等皆与之往来甚密。见曾以王士禛自许,尝赋《红桥修禊》四章,一时和者千余人。一生宦游四方,诗多登临题赠之作。其出塞期间所著《出塞集》一卷,描写塞外壮丽风光,反映出诗人虽万里投荒,穷愁困厄,却安详自若,充满豪情。其《杭嘉竹枝词》十三首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具有异族情调,如:“锦鞦迎得女如花,骝骑儿郎莫浪夸。骀叟一双齐纵轡,看谁先到阿婆家。”其诗笔力健拔,时见郁

勃之气。喜藏书刻书,尝校勘、刊刻高氏《战国策》、郑氏《尚书大传》、李鼎祚《周易集解》,补刊朱彝尊《经义考》,皆有功于后学。又采山东诸诗人作品,仿元好问《中州集》体例,辑《国朝山左诗钞》。一生作诗很多,共分八集,焚于火,后所刊《雅雨堂诗集》二卷、《文集》四卷,仅为其诗文的十之一、二。还撰有传奇《旗亭记》、《玉尺楼传奇》。《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一〇补录有传。卢文弨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黄子雲】(1691—1754) 字士龙,号野鸿。昆山(今属江苏)人,后迁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布衣终生。少落拓,不事家人产业,依靠友人接济为生,常奔走四方。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1718),尝随翰林编修徐葆光使琉球,曾作《葵诚向》九章,表达他对国家大政方针之见解。乾隆二年(1737),著《野鸿诗的》系统论述其诗学主张。晚年隐居支硎山麓,无子,生活极贫困。其论诗宗主杜甫,主张真、新、朴、雅、浑。其诗歌创作亦学杜。其诗多以自己的贫困生活与浪迹生涯为题材,如《舟行望南韶诸山》、《赠外舅》二首、《冬尽喜外舅吴士型携米酒至》、《那坝望海》等皆为这类作品。子雲长于律体,以沉郁顿挫、意深境阔见长,工于对偶,如《大洋》云:“不觉舟如叶,随风入杳冥。潮来天宇白,日照海门青。孤屿遥相认,危樯觉有灵。中流抚身世,万里一浮萍。”有些小诗写生活中琐事,亦颇有情趣,如:“儿童喧笑各纷纷,未解灯前刺绣纹。夜半醉归人不觉,叩门独有老妻闻。”(《夜归》)著有《野鸿诗的》、《野鸿诗稿》、《长吟阁诗集》。汪缙为作传。(王学泰)

【程廷祚】(1691—1767) 初名默,字启生,号绵庄,晚号青溪居士。原歙(今安徽歙县)人,曾祖迁至江宁,占籍上元(今江苏南京)。弱冠为诸生,雅静修洁,人目为“秀才娘子”,或呼以“程娘子”。为学专治经;其治经学一空依傍,独立于世,深造自得,颇有成就。凡星经、地志、乐律、礼仪,咸洞其本原,不为汉学、宋学所束缚。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被荐应博学鸿词试,不肯逢迎权贵,报罢。乾隆十六年,江苏巡抚复以“经学”荐,亦罢归。廷祚与程晋芳、吴敬梓交好。据传《儒林外史》中贤士,或取材于廷祚。廷祚亦工诗,情深语挚,华实并茂,袁枚谓其“诗甚绵丽,不作经生语”(《随园诗话》),如《海淀园林》:“隔岸迢迢御路明,林间倒影见人行。朝天多少朱轮过,添入山泉作水声。”其名篇《忧西夷篇》认为西洋人东来,包藏祸心,将来必为中国之害,并以吕宋被翦灭为属国作为例子提醒国人注意。此诗表现出诗人的远见卓识。著作极富,有《大易择言》三十六卷、《易通》十四卷、《易说辨正》四卷、《读易管见》一卷、《尚

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二十卷、《晚书订疑》二卷、《裨衿辨误》二卷、《春秋识小录》九卷、《鲁论说》四卷。其诗文有《青溪文集》十二卷、《续编》八卷、《岫云阁诗钞》、《盎园集》等。《清史稿》卷四八〇、《清史列传》卷六六有传。程晋芳、袁枚皆曾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厉鹗】(1692—1753) 字太鸿,一字雄飞,号樊榭,一号南湖花隐,又号西湖渔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孤家贫,其兄卖烟叶以养之。读书数年,学为诗,有佳句,于书无所不窥。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会试屡不第,而诗名满京都。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应博学鸿词考试,误将论写在诗前,报罢。及老思赴部铨选,得一官以养亲,行至天津,居查为仁水西庄,同撰《绝妙好词笺》遂不就选而归。一生未能出仕,以授徒与朋友接济为生。鹗酷爱宋诗,并上承陶潜、谢灵运诗法,偏爱清澹粹雅之境,故其诗多用五言古体刻画深山僻水以寄托其孤寂寡和之情怀。因久居杭州,诗中多描写西湖湖光山色的四时变化,及其朝夕晦明的不同景色,展现了“莹然而清、窅然而邃”的西湖美景。其代表作品如《灵隐寺月夜》写月夜阒寂之景:“月在众峰顶,泉流乱叶中。一灯群动息,孤磬四天空。”又如《晓至湖上》写西湖秋雾之晨:“水上寒雾生,弥漫与天永。折苇动有声,遥山淡无影。稍见初日开,三两列舴舺。”其他如《理安寺》、《西溪晓起》、《西溪巢泉上作》皆是此类作品。其诗内容狭隘,涉及广阔社会生活者不多。风格妍练幽隽,味久回甘,但因喜用僻典,其下者流于廋词谜语。朱庭珍谓其“往往求妍丽姿态,遂失于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无雄浑阔大之局阵篇幅,谐时则易,去古则远也。樊榭集中,工于短章,拙于长篇;工于五言,拙于七言;七古尤劣”(《筱园诗话》)。鹗亦工填词著文。尝馆于藏书家扬州马曰琯之家,利用其书撰《宋诗纪事》一百卷。还著有《辽史拾遗》、《南宋画院录》、《东城杂记》、《湖船录》、《玉台书史》、《秋林琴雅》、《南宋杂事诗》。其诗、文收入《樊榭山房集》中,凡三十九卷,其中诗二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全祖望为撰墓碣铭。

(王学泰)

【查为仁】(1693—1749) 字心穀,号莲坡。原籍浙江海宁,侨居帝都,且三世,遂为宛平(今北京)人。清圣祖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九,举乡试第一。为仁家本富有,故人言其以贿买得中,被拘狱中八年。被释后,功名之念全消,遂结庐天津沽水之西,为水西庄,筑板屋曰花影庵,贮书万卷。往来名士;多住其家。著名诗人厉鹗在水西庄寄寓多年。为仁中年后,一直在其别墅中优游岁月,其诗多写其萧闲自在

的生活,如:“郊居尘埃少,幽访共沿回。柳下孤篷泊,花间白版开。高人还掩卧,稚子识曾来。小立窥鸥鹭,忘机客不猜。”(《同友集空谷园》)诗风清新淡雅。王昶在《湖海诗传》中列举其佳句:“落花寒食节,飞絮午晴天”,“晚经黄花开有色,晓程残月落无声”,“一榻茶烟留客话,半帘花影枕书眠”,皆可体现其诗风。其诗收入《蔗斋未定稿》。又曾将当世诗人遗闻轶事及名篇佳句编为一本,名为《莲坡诗话》,并与厉鹗同撰《绝妙好词笺》。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学泰)

【郑燮】(1693—1765) 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属江苏)人。少颖悟、刻苦为学,读书多新解,绰有文名。家贫,从其父(塾师)学。弱冠,往真州读书,兼学书画,后即在此设村塾,鬻书画以自给,并时出游以开拓心胸。清世宗雍正十年(1732)中举。高宗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未即授官。乾隆五年,再至京师,受到慎郡王紫琼道人允禧礼遇。乾隆六年被选为山东范县知县,后转为潍县知县,在范县五年,潍县七年。官潍县时,岁歉收,人相食,燮以工代赈,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流供给;有积粟者,则责其平糶。救人无数,而因忤大吏,罢归。晚年居扬州,以鬻书画为生。其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与金农、李鱓等开创了不拘古法的扬州画派,为“扬州八怪”之一。燮为人放浪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弟子游,日放言高谈,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而其根本则源于儒家仁爱学说。故其自言:“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自叙》)燮诗多为同情民间疾苦、抨击苛政、揭露时弊与题画之作。其《悍吏》诗“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比吏为豺狼;《私刑恶》揭露鱼肉乡里的酷吏,写他们用极端残酷的刑法折磨不能遂其欲的百姓;《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等揭露了社会的不平,描绘了社会中弱者——孤儿与儿媳的悲惨遭遇。其他如《还家行》写饥民还乡后去赎典出的妻子和此女与后夫及所生子女别离的惨剧;《思归行》再现了农村破产之景象。燮以这些作品自豪,曾说取之与吴嘉纪描绘民间疾苦诗同读,或亦不甚相让。其题画诗亦时与百姓苦乐相联系:“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更多的题画诗是借以明志,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以白描取胜,风格质朴泼辣,富于意趣,语言通俗流畅,多

用口语。张维屏引《松轩随笔》言其诗、书、画“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国朝诗人徵略》），故其作品具有感人力量。亦工词善文。有人认为其词佳于诗。其文浅近，其家书写日常生活及琐屑情感，娓娓道来，亦颇动人。其《道情十首》则以民歌形式抒发人生感慨，通俗流畅，妙语警人。除大量书、画作品传世外，其诗词文集有《板桥诗钞》二卷、《题画诗》一卷、《补遗》一卷、《板桥词钞》一卷、《板桥家书》一卷，今人编为《郑板桥全集》。《清史稿》卷五〇四、《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周大枢】（1694？—1752之后）字元木，号园牧。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邑廪生。工诗文，与杭世骏、齐召南、万光泰等交好。江东诗社中唯大枢与胡天游诗最为杰出。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举试博学鸿词，报罢。果毅公阿尔袞爱其才，延之为上客，公徐命其讲《通鉴》数条。居京师，穷愁潦倒。乾隆十四年，又举明经，不中，于乾隆十七年举顺天乡试，后以举人充平湖教谕，卒于官。大枢博学多才，究心经籍，尤邃于《易》。其诗以七古为佳，法式善谓其“诗工七古，洋洋洒洒，沉郁似杜，奔放如苏”（《梧门诗话》）。诗多题赠应酬之作，亦常摭写自己怀才不遇及穷途末路之感。如《海云歌》描写了海市蜃楼所展现的神仙般世界：“忽从浮槎弱水西，丹邱缥缈望丹梯。楼台百座林端出，鸾鹤千群烟际迷。拍肩把袂飞仙人，氍毹羽服青霞裙”，但最终转到“呼之欲下不肯下，笑我短褐身贱贫。我宁住世趋尘埃，略欲识字窥典坟。但在顽仙何足珍，上界官府还纷纷”，用仙界以影射统治集团上层。其他如《管仲墓》、《题钓鳌图》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近体华整婉丽，与古体风格有较大差异。亦工词，有《调香词》。著有《周易井观》十二卷、《居俟堂集》、《存春轩集》十卷、《附录》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严遂成】（1694—？）字崧瞻，一作松占，号海珊。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进士，授山西临县知县。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适丁母忧，遂不赴。服阙，历官直隶阜城知县，迁云南嵩明州知州，调镇雄州，以事罢官。后开复，就补云南而卒。遂成游宦南北，所至注重文治，修水利，平反冤狱，多有善政。少即工诗长于怀古咏史。吴应和言其“历游豫、楚、滇黔，登临吊古之作，率皆悲壮激烈，奇气横溢。铁崖（杨维禎）乐府、渊源（吴莱）歌行，殆兼师其意而不袭其貌”（《浙西六家诗钞》）。其《明史杂咏》四卷，赋明朝一代之事，古体、近体相间，评议多于刻画描写，而且多翻历史定案，表现出诗人之史识。其《三垂冈》咏唐末李克用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

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写英雄垂老暮景，极富感情。其写景咏物诗也颇有特色，不仅刻画描写极为细腻，而且善于以不同风格的语句描写不同的景物，如《梅》“残笛一声凉在水，远峰数点碧如烟”，《咏桃花》“怪他去后花如许，记得来时路有无”，《莲花庄》“无数垂杨遮不住，好风吹出读书声”，《曲峪镇远眺》“雕盘大漠寒无影，水裂长河夜有声”，《胡泰舒银台归自蜀述西师始末》“绝壁跨空横铁索，危江剪溜泛皮船”，“特制软材平底履，满天风雪过桃关”等等，皆可见其诗雄奇豪健，旖旎清丽兼而有之。著有《诗经序传辑疑》二卷、《海珊诗钞》十一卷、《补遗》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八有传。程晋芳为作小传。

（王学泰）

【丁敬】（1695—1765）字敬身，一字砚林，号钝丁，又自称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不习举子业，酿麹甕卖酒以自给，身杂佣保，未尝自异。年甫冠方折节读书，好金石文字，穷岩绝壁，于自摹拓，证以志传，著《武林金石录》。工篆书，笔如屈铁。善篆刻，然非笃旧，不能得其一字。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以布衣与试博学鸿词，未第，遂以隐居终。敬性好诗歌，与乡邻金农、张沅等相唱和。其诗多以山水风光及隐居生活为题材，造语奇崛，与胡天游诗风相近。善为七古长歌，如《小雪初晴樊榭见访同游梵天讲寺》、《周穆门招同人游玛瑙寺访元僧芳洲后仆夫泉分得石字》、《龙泓憩馆图》、《回回李翰十纸联幅墨蒲桃歌》、《魏景初帐构铜歌》皆其代表作品。近体诗亦峭拔瘦硬，有江西诗派风格，如：《小雨新霁集琴趣轩》“云卷中宵雨，天青向午风。朋来三径好，恰喜一尊同。馀滴听蕉叶，新梢揽竹丛。尤怜葵放处，淡映夕阳红”；《过春草园》“径草萧萧蔚似麻，文梁徙燕槛升蜗。无情最是高松树，曳翠牵萝荫别家。”生前刻有《越游小集》。卒后，魏成宪为刻《砚林诗集》四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六有传。杭世骏为作传。（王学泰）

【胡天游】（1696—1758）榜姓方，一名骥，字雲持，一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有异才，于书无所不窥，下笔千言，未尝起草。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副贡，后再举副贡。高宗乾隆元年（1736），以荐试博学鸿词，因持丧服未与试，服阙补试，因鼻血污卷报罢。当时名士聚集京师，于稠人广座之中，天游纵笔为文，纵横奥博，见者叹服。气性耿介，未尝谒公侯。乾隆二十三年，客游山西，卒于蒲州。天游才与学相济，其作品奇情逸藻，古体取径韩愈、孟郊，

近体效法李商隐。诗多题咏山水古迹之作,善于用幽峭拗折、生涩瘦硬的笔法刻画风景和摅写自己的情怀。其《晓渡安东观海市已骤风雨》有句云:“黠幻嗟可怪,忽干造物嗔。大声噫然号,雪蜺恣崩奔。蹴踏万银屋,昂轩来咀吞。闪倏晦昧际,日月颠尻臀。向来嵒嵒观,诡噩不及辰。文章或抱化,瑰丽未肯论。百状穷孺褊,敲然吐轮囷。特聳耳目怪,被物何所勋。”诗中描写暴雨骤雨中的海上景色。其他如《石堂雨夜》、《将登华岳》、《画天台石梁》、《雨中题云台寺》、《望岳》等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中还有少量题材新颖的作品,如《海贾》写外贸商人,为前人所未及。天游所开创的模拟韩、孟的诗风对晚清郑珍、江湜都有影响。有《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补遗》一卷、《诗集》十一卷、《诗馀》一卷、《补遗》二卷、《续补遗》二卷、《年谱》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

(王学泰)

【杭世骏】(1696—1773) 字大宗,号堇浦,晚号秦亭老民。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少家贫,努力向学,假书于人,穷昼夜读之,与同里名人结读书社。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举人。高宗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名列一等,授翰林编修。乾隆八年(1736),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世骏下笔为五千言,其中有言:“满洲贤才虽多,较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触怒高宗,本拟将其处死,后放归。在乡与厉鹗、周京等唱和,曾主讲于广州粤秀书院、扬州安定书院。晚颇落拓。龚自珍言: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南巡,世骏接驾,“帝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是夕,返舍卒”(见《杭大宗逸事状》)。世骏诗主要以其游宦生涯为题材,多题咏山水胜迹之作,如:《出国门作四首》写其因直言被斥归时的心境,《清远舟中望对山野烧》写诗人旅途所见到的山林大火,《福州竹枝词十八首》写福州历史及民情风土,皆可见其才情。其诗主要取法于宋,如其五古歌行多为宋体,而其律、绝仍有学唐的倾向,如《无题》四首即为典型“香奁体”。诗喜用典,时以学问补诗情之不足。世骏为清中叶著名学者,著作极富。有《续礼记集说》一百卷、《石经考异》二卷、《词科掌故录》十七卷、《馀话》七卷、《订讹类编》六卷、《续编》二卷、《三国志补注》六卷、《道古堂外集》二十六卷,《两浙经籍志》等。编选《禁林集》八卷。其诗文及《榕城诗话》皆收入《道古堂诗集》二十六卷及《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六有传。应礼为撰墓志铭,许宗彦、夏孙桐皆为作传,洪亮吉、龚自珍皆有专文记其遗闻逸事。

(王学泰)

【杨琇】 约于清康熙末至乾隆中前期(1716—1755)在世。字倩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诸生沈丰垣妻。沈、杨系中表兄妹,曾相约私奔。杨家讼于官,琇被太守鬻于驻防旗下。琇披头散发,佯装疯癫,甚至以自饮其溺遮人耳目,旗人恶之,沈丰垣则趁机买归,有情人得成眷属。琇生一女旋卒。有《远山诗钞》、《远山楼词》。事见袁枚《随园诗话》。

(陈祖美)

【刘大櫟】(1698—1779) 字才甫,又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属安徽)人。嗜读书,工于为文,年二十馀以布衣游京师,谒同乡古文家方苞,受到揄扬,因之名满京师。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十年,两应顺天府乡试皆登副榜,不获举。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乾隆十五年,举经学,亦不中。朝官相知出为学政者率邀之幕中阅文。年六十始出为黟县教谕,又数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大櫟以古文名家,为桐城派中巨擘,亦工诗。程晋芳谓其“诗胜于文”(《随园诗话》),姚鼐言其“历天下佳山水,为诗歌自发其意”(《刘海峰先生传》)。其诗,多记游记行之作,擅长以清丽之笔写山水之风貌,如《西山》:“西山过后染朝岚,千尺平冈百顷潭。啼鸟数声深树里,屏风十幅写江南。”其写景多名句,符堡森尝列举其佳句,有“薄云疏雨过,深树乱鸣蝉”;“日边双鸟白,霞外一天青”;“江声夜雨增悲壮,海色朝霞接混茫”。言其“不减大历才人”(见《寄心齋诗话》)。其诗清新婉丽,往往自然入妙。有《海峰先生文集》十卷、《海峰诗集》十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并传。姚鼐为作传,吴定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夏之蓉】(1698—1785) 字芙裳,号醴谷。高邮(今属江苏)人。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举人,官盐城教谕。雍正十一年成进士。高宗乾隆元年(1736),试博学鸿词,授翰林检讨。乾隆九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提督广东、湖南学政。归乡后曾主讲于钟山丽正书院。之蓉博学多才,其古文曾为方苞所赞赏,尝与之删定唐宋八大家古文。诗多题赠唱和、登临感怀、记游记行之作。也有些作品颇能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如《柴米行》、《泰安州谣》、《贫女吟》等。其《饥口行》写奉旨勘察饥民所看到的种种悲惨景象,他们所食竟是“腐恶令人呕”的“蕨其子”,饥民借此以不死,诗中感慨“谁云人命重,仅与蝼蚁比”。其歌行跌宕淋漓,如《建阳避虎行》、《灵川河》诸作,笔力遒劲,亦为佳作。著有《读史提要录》、《半舫斋偶辑》、《半舫斋文集》八卷、《半舫斋诗钞》二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茹敦和为

撰墓志铭。

(王学泰)

【彭端淑】(1699?—1779?) 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十岁能文,与弟肇洙,遵泗读书于紫云山下,互为师友,苦读六年。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中举。雍正十一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高宗乾隆十二年(1747),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为广东肇罗道。为官清慎,以不扰民为主,为吏民所称颂。又延名儒何梦瑶主讲端溪书院,造育人材。在粤六年,后因督粮粤西,归途失足落水,得救幸不死,遂告归。归蜀后,居成都,主讲于锦江书院凡二十年。端淑自言:“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其诗多记游记之作,晚年则多摭写其淡泊襟怀,如《大士崑》、《发宜昌》、《种蔬》皆为其代表作品。也有少量同情百姓疾苦的篇章,如《夏镇》写荒年歉收,百姓无衣无食:“粟米贵如珠,频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长于五古,诗风苍健沉郁,取法杜甫、陶潜。亦工文,取法于司马迁、韩愈。著有《白鹤堂文稿》、《白鹤堂诗稿》、《雪夜谈诗》等。《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一有传。

(王学泰)

【陈兆崙】(1700—1771) 字星斋,号句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聪慧,十五岁读毕十三经,旁涉子史,以博闻强识称于时。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进士,以知县分发福建。闽浙总督郝玉麟器之,请其主持鳌峰书院讲席。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检讨。乾隆六年,充湖北乡试正考官。乾隆七年,充日讲起居注官,累充《大清会典》、《明纪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十八年,迁太仆寺卿,充《续文献通考》总裁。乾隆十九年,擢顺天府尹,官终太仆寺卿。兆崙以时文名世,誉之者谓其以古文为时文,纵横排奰,自成一派。其诗蔚然深秀,多应制奉和、题赠酬酢之作。因笃于友朋昆弟之谊,这些应酬性质的作品也写得极有感情,如《闻同年杭二菴浦(世骏)就聘闽闾诗以志喜》云:“宿昔情怀各自知,飞来风驭岂前期,文章声价凭他日,山水遭逢在此时。十里红云移日月,中宵紫气耿雄雌。相看莫漫悲离别,为我摇笔赋好诗。”兆崙擅长七律,对偶多佳句,如“山气昏黄天骤暝,湖光明白月徐来”(《西湖晚归》)、“秋似美人无碍瘦,山如好友不嫌多”(《题画》)等。工于书法,擅长行书。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诗集》十二卷。《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郭麐为撰神道碑。

(王学泰)

【沈大成】(1700—1771) 字学子,号沃田。华亭(今上海)人。父裔堂官直隶青县时为护民力而自经

死,后家道遂衰。清世宗康熙五十六年(1717)诸生,试冠乡校。后游幕四方,由粤而闽、而浙、而皖,前后四十年。晚年客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又馆于江春家。大成交往极广,当时学人名士多与其往来,如惠栋、戴震、任大椿与之相友善。其他如程廷祚、陈黄中、程晋芳、杭世骏、程瑶田、王昶皆常与之问学论文。其学邃于经、史,又旁及天文地理、乐律算学、音韵训诂、金石考古等领域。为学至老不倦,《自寿诗》云:“我年交七十,屹屹尚治经。晓日半窗白,昏灯一穗青。漫宗高密学,欲拟子云亭。差喜同心侣,犹能环坐听。”杭世骏谓其以“学人而兼诗人”。诗多题咏器物文玩书画及四方山水名胜之作,表现出丰富的学识,如《借玲珑山馆杜氏通典校竟诗以谢之》、《题方正学先生阅耕轩记手迹家大山兄所藏》、《九原丈人石碣歌》、《冒巢民灵璧砚山歌为张墅桐作》皆是这类作品之代表。其近体清隽醇雅,颇多画意。王昶例举其名句“五言如‘春灯照孤雨,高枕静闻钟’,‘乱泉樵径没,清磬寺门深’,‘远水橈帆小,孤村桑柘深’,‘香泥双履滑,春草一庭宽’,‘夕阳红在树,新绿涨平堤’;七言如‘微风竹外流清籁,急雨樽前送嫩凉’,‘秋风一一催征雁,暮雨星星点客衣’。”与其堆垛学问的七古长歌有明显的区别。大成与戴震合校《水经注》。著有《学福斋诗集》三十七卷、《文集》二十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皆有传。黄达为作传。

(王学泰)

【商盘】(1701—1767) 字苍雨,号宝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工诗,与同学结社,髫年所作《新蝉》诗已为人们所称道。弱冠受知于学政何世璜,贡于太学。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以养亲乞外任。历官镇江、海州、南昌、南康、太平、郁林、庆远等州府守令,累官至云南元江知府。盘宦游半生,不废诗篇。结集时经芟汰尚存诗三千余首,可见其写作之勤勉。其诗清丽芊绵,情深意远,以写艳情者为最佳,如《忆金陵》、《新绿》、《钗娘至淮》、《送春》等皆是其代表作品。其较有社会意义者是描写所至各地土风民情的诗篇,如:《江右纪风》组诗中有许多批评赣中陋俗的篇章,《放野》写赣人多买粤女令其从事采薪的繁重劳动;《弃妇叹》写“江人鬻妻不惜,都昌甚焉”;《莫生女》写江西“溺女”之陋俗,每首皆有自序,保存了许多民俗史料。这类作品多用古体,有与元稹、白居易相似之处。其七绝风流俊逸,颇有杜牧神韵,如:“此去南朝士女非,君家旧巷剩乌衣。寒花一族斜阳冷,不见红襟燕子飞。”(《送王穀原游建康》)著有《质园诗集》二十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二

三〇有传。蒋士铨为作传,王昶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吴敬梓】(1701—1754) 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滁州全椒(今属安徽)人。幼聪颖,善记诵,年二十二为诸生,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就,性豪放,不治家人产业。自全椒移居南京,寄寓秦淮水亭,在南京结识了许多文士、学者。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试博学鸿词,因病未赴。尝集同志捐资修复雨花台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名贤二百三十余人。因家庭贫困,移居城东大中桥。其家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旦夕自娱,常为冻馁困扰。其名著《儒林外史》即写于家在南京期间。后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卒于客中。敬梓亦工诗,多为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之作,如《将往平山堂风雪不果》之二云:“空怀迁客擅才华,不见雕栏共绦纱。却忆故山风雪里,摧残手植老梅花。”借阻于风雪不得往平山堂访欧阳修遗迹,摅写对家乡的怀念。其诗娟秀清新,亦自成风格。有《文木山房集》四卷,其中诗二卷,存诗一百三十七首;近人辑有《吴敬梓集外诗》存诗二十六首。其他如《诗说》、《史汉纪疑》等著作皆不传。《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五有传。今人胡适撰有《吴敬梓年谱》。

(王学泰)

【倪瑞璠】(1702?—1731) 字玉英。江苏宿迁人。庠生倪绍瓚之女,宜兴徐起泰继室。幼奇慧,六岁听兄读《易经》即可记诵,七岁学作古文,八岁学诗及骈体,博闻强记,诗才超逸,或云类李白,亦间作元稹、白居易歌行体。著有《篋存诗稿》三卷和《静香阁诗草》。《清诗别裁》卷三一谓其“独能发潜阐幽,诛奸斥佞,巾幗中易有其人耶?每一披读,悚然起敬。”其所作《阅明史马士英传》等诗即堪称“诛奸斥佞”的犀利之作。事见《徐州诗徵》、《宜兴县志》等。

(陈祖美)

【姚範】(1702—1771) 字南青,或字已铜,号姜坞,又号石农。桐城(今属安徽)人。清高宗乾隆七年(1742)进士,选庶吉士。乾隆九年,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次年,授翰林编修,充三礼馆纂修官。后告归,卒于里。範为学务求博览,不名一家。喜校书,所藏旧籍悉加丹黄点勘,至老不辍。遇有讹误衍误,或与他本异同,随手订正,记于简端,多发前人所未发。卒后六十年,其曾孙姚莹始自群籍中录出其批注点校之语,为《援鹑堂笔记》五十卷。自经、史、子、集以至说部、佛经,皆摘录异文佚义,多有辨正,可见其学养之深。其诗注重词藻的色彩,又运之以拗折瘦硬的句法,形成其独特风格。如其《山行》“百道飞泉喷雨珠,春风窃窕绿靡芜。山田水满秧针出,一路斜阳听鹧鸪”,《题袁朴村丈〈春郊揽胜图〉》“九门风

雪夜耽耽,拥袖人如抱茧蚕。一笑披图竟归去,梅华开日到江南”,从字面上看似温、李,从格调上看近江西。著有《援鹑堂文集》五卷、《诗集》七卷。《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六补录中亦有传。吴德旋为撰墓表,包世臣为撰墓碑。

(王学泰)

【金甡】(1702—1782) 字雨叔,号海住,晚号蠡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中举,沉滞于公车二十年。高宗乾隆七年(1742),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编修。乾隆九年,主持广东乡试,擢赞善,历左庶子,迭主江西、山西乡试,督学安徽,擢侍讲学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甡在上书房凡十七年,官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晚年主讲敷文书院。甡诗分前后两期;前期奔走江湖,备尝艰危之境,故多写羁旅情怀;后期立朝二十馀年,诗则多为应制奉和之作。甡为官后多次奉旨出差。途中多题咏山水胜迹及与同僚唱酬之作,如《宿东平》、《万山甘露庵》、《舒桐间风景可爱杂言志爱寄同年姚石农编修範》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以古体为优长,多用赋体,如《逢鱼苗船有慨》前八句云:“绛帛举其标,铜钲立其号。舟师气粗豪,谗是鱼秧到。茸茸蚕始生,戢戢蝗未跳。漆筐陶缶中,数与恒沙较。”著有《清悟录》、《史汉评林订误》及《静廉斋诗集》二十四卷。《清史稿》卷三〇五卷、《国朝耆献类徵》卷八七并有传。袁枚为作传,朱珪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齐召南】(1703—1768) 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副贡生。高宗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乾隆八年,大考,名列前等,擢右中允,洊升至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十三年,充会试同考官,入直上书房,大考列等一名,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历充《大清一统志》、《会典》、《明鉴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副总裁。后因堕马受伤,乞归养。晚年主讲于戴山、敷文诸书院,后因族子齐周华牵入吕留良案中,被逮入京,被革职归,寻卒。召南博闻强记,观书目十行下,一览终身不忘。一生为学,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輿地,无不究习。天才敏捷,诗、文援笔立就,晚喜集句,集李、杜、韩、苏诗如出一手。召南与杭世骏情好甚密,诗风亦与其相近,多题咏唱酬之作,喜以学问考据入诗。其《书吴鉴斋传后》言三吴水利,诗中历数扬州一带形势,并论述此地水利设施之重要。其《官箴诗》十首阐明为官之道,亦引经据典,虽多至理名言,但缺少诗味,为学人诗之代表作。有些小诗流畅明快,如《忆梦》“病里关山人梦遥,秋出声咽月明清。呻吟枕

上过初夏,曾过仙人落马桥。”著有《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历代帝王年表》十三卷、《明鉴前纪》二卷、《宝纶堂文钞》八卷、《诗钞》六卷、《和陶百咏》一卷。《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杭世骏为撰墓志铭,陈用光为作传。(王学泰)

【全祖望】(1705—1755) 字绍衣,号谢山,又号双韭。浙江鄞县人。年十四为诸生,十六岁能古文。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被选为贡生,至京师上书与方苞等论《礼》,苞大异之,声名鹊起。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因是春会试已先成进上,不再与试,选庶吉士。为权相所嫉,次年散馆,列最下等,以知县候选,遂归,不复出。既归,贫且病,衣食不继,好学益勤,人有所馈,皆峻辞。主讲戴山、端溪两书院,成就人材甚众,为学林所仰重。以疾卒于家。祖望学问渊博,于书无所不窥,经史诗文皆所擅长。平生最服膺黄宗羲,受其民族意识影响,尝辑《续甬上耆旧诗》一百二十卷,其中多收明末抗清烈士与遗民作品,志在表彰民族精神。其诗作也注重阐扬宋末、明季抗节死难之事,且“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索幽佚”(《越缦堂读书记》),不仅足资闻见,而且给反抗民族压迫者以鼓舞,如《漳浦黄忠烈公夫人写生画卷诗》、《扬州石刻文信公画像歌》、《瞿将军行》、《信宿姚江舟中偶作三哀诗》。有些作品甚至接触到现实中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杭世骏以上言论“宜泯满汉之界”而得罪,祖望在《杭堇浦编修以言获谴诗以讯之》中将满汉问题化为北人、南人问题,并对杭氏主张表示同意。诗学宋,古拙质朴,有散文化倾向。著作极富,其重要者有修黄宗羲未完成之《宋元学案》、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另有《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年华录》四卷、《句馀土音》三卷、《甬上望族表》二卷、《经史问答》十卷。其诗、文集有《崎埼亭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其弟子蒋学镛、董秉纯为撰年谱一卷。

(王学泰)

【王又曾】(1706—1762) 字受铭,号穀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诸生。少与同里钱载并有诗名,有“钱王”之目。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南巡至浙江,召试,赐中书舍人。乾隆十九年,登进士第,为礼部主事,后转为刑部主事。以律例素非所习,且病,遂乞归,浪迹于东南诸省,赋诗斗酒凡十余年,潦倒而卒。又曾诗多以山水为题材,时时寄寓飘泊落拓之感。如:“如丝风外雨纤纤,早晚丁耽响画檐。芸饼衾裯春风扰,杏花楼阁晓寒严。时窥吹沫鱼浮沼,不放衔泥燕入帘。除却缁袍无可典,寻常酒债任频添。”(《春雨次陶篁村韵》)其他如《酬桐石》、《简玉

李》皆与此相似。其古体敛华就实,于质朴中见隽永,如《读南华经》五首、《晓渡马鞍岭曲折行涧道中从剪刀峰下人观大龙湫还憩龙湫舫》等。此类诗带有哲理诗风味,如《浙西六家诗钞》编选者所言:“其至高者,多见性理,专务沉静功夫。明窗净几,扫地焚香读之,令人矜躁浮嚣之气顿释。”其诗集为晚年自定,起自壬子,讫于辛巳(1732—1761)凡十七卷,词三卷,名《丁辛老屋集》二十卷,为新安曹氏所刻,刊于乾隆四十年(1775),后又有钱载点定本,为十二卷,刊于乾隆五十二年。《清史稿》卷四八五、《国朝耆献类徵》卷一四五皆有传。(王学泰)

【汪师韩】(1707—?) 字抒怀,号韩门,又号上湖。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以文名四方,亦能诗。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高宗乾隆元年(1736),协修起居注。旋丁母忧。服阙,武英殿总裁荐师韩校勘经史。乾隆八年,充湖南学政。后降调入都。以大学士傅恒荐入值上书房,复授编修。因未造门谢傅、奉以师礼,未几复落职。游畿辅;直隶总督方观承延之主讲于莲花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归乡里,约卒于六十岁以后。师韩中年以后,一意穷经,于诸经皆有著述,倾慕韩愈,自居为韩门弟子。其所著《韩门缀学》,考证经史,语多精到。其论诗,注重“读书”、博学,其作品自亦与学者之诗相近,喜用长篇古体题赠咏物,以逞才炫博,如《寄题方乐只明府凤山赏番图》、《朱西峻凤尾砚歌》、《后凤尾砚歌》皆是此类作品。有些诗用事偏僻。每自加注,故袁枚讥其“《蚊烟诗》十二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也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与摅写个人感慨的作品,如《丛睦坊旧宅》写其弱冠时寻访歙州故里,《杂述》写其对故乡钱塘的思念,《愁霖篇》写春夏长潦,至秋蚊虫肆虐给人们带来的危害,皆诗旨明畅,读之有味。其诗往往避熟就生,避平易而就艰涩,佳者味久回甘,别有妙处。著述极多。有《观象居易传笺》、《孝经约义》、《谈诗录》、《诗学纂闻》、《诗四家故训》、《文选理学校舆》,以及《上湖纪岁诗编》四卷、《续编》一卷、《春星堂诗集》、《上湖分类文编》一卷、《补钞》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程晋芳】(1708—1784) 初名廷铨,字鱼门,号蕺园。原籍歙县(今属安徽),以家世为盐商迁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家素富饶,好儒,罄其貲购书五万卷,招致名儒学士,虚怀求益。少问经义于程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又与袁枚、商盘等人切磋诗艺。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召试,赐内阁中书。乾隆三十六年,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以校勘《四库全书》改翰林编修。游宦三十余年,家益落,无以自给,

至关中依陕甘总督毕沅,到西安病暑而歿。晋芳以诗学自信,袁枚亦称誉晋芳云:“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见《随园诗话》)其诗多题咏器物文玩、山水胜迹之作,如《王莽货布歌》、《题梅妃吹笛图》、《景阳钟歌》、《日月合璧砚歌》、《韩幹神骏图》、《仇实父汉宫春晓图》、《太白罇》等皆其代表作品。作者善于用流畅平易的歌行描写器物文玩的形制、特色、历史,间发议论,不流于艰涩,但诗味不足。其晚年有些描写生活琐事与诉说自己落拓生涯的作品,则诗情浓郁,如《寄答杨二鉴云》言自己不善生计,晚境凄凉情景,娓娓道来,颇有感人力量。一生著作颇多,因晚年贫困多未刊刻,遂散逸。流传至今者有《毛郑异同考》十卷、《群书题跋》六卷、《勉行斋文集》十卷、《戴园诗集》三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翁方纲、袁枚各为其撰墓志铭。

(王学泰)

【钱载】(1708—1793) 字坤一,一字根苑,号箨石,又号瓠尊,亦作壶尊,晚号万松居士。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少学诗,不喜制艺,渔猎百家,博学杂搜。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乾隆十七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乾隆二十二年,为会试同考官,后屡主诸省乡试,主持衡文,官至礼部左侍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老告归,晚年以卖画为生,家徒壁立,十分清贫,卒于里。载工于绘事,擅长书法,又善鉴别法书名画,其诗除应制奉和之作外,多为题咏山水、书画、器物之作,不尚词采浮华,喜以学问入诗,与当时“肌理派”倡导者翁方纲声气相合。诗之佳者,如《过弋阳六七十里江山绝胜过目成歌》描写弋阳附近山水之险巖清绝,颇见功力:“一峰转江江碧澄,峰峰插江以为恒。一峰如城砖甃层,如台如笔还如鹰。牛卧狮搏龙矫腾,青霞千里纵横凝。一溪落江桥隐藤,溪来峰阴百折曾。一砥砥江老模棱,涛痕四蚀如环甃。”其他如《潭柘云岫寺》四首、《入七里泷》三首都是这类作品。其题咏器物、书画作品中有着丰富的知识。如:《木棉叹》叙述木棉之来源、特征,还描写了棉农之苦难;《考具诗》十首分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之用具,包括“柳条筐”、“线络”、“锡水壶”、“卷袋”、“黄油帘”、“青布棉氅衣”、“矮凳”、“号舍”、“号板”、“号灯”等,可见当时考具之形制,诗中也透露出匍伏于科举制度下士子之悲哀。其赋事咏物“大要以清真镌刻为主。有时或入于涩滞,而必切事以抒辞;有时或出以纤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凡诗中空架子、假门面之语,皆扫而空之,故集中时有独到处”(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这种苍劲瘦硬、不求悦耳娱目、于拗折窘涩中别具风味之诗篇,与当时风行于诗坛

的“性灵派”诗风大相径庭。诗中也有许多乱用语助、堆垛典事、过度散文化之作,则为其恶诗。著有《箨石斋诗集》四十九卷。《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二五皆有传。

(王学泰)

【万光泰】(1712—1750) 字循初,一字拓坡。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幼聪敏,才思富赡。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荐试博学鸿词,报罢,是年举于乡。光泰精于小学、音韵、天文、律算,对《周髀算经》研究尤为深入。诗多以其隐居、游历生活为题材,亦有不少酬唱题赠之作。其代表作有《题开元寺》、《金鳌玉玦桥》、《西湖晚归》、《盘山》等。近体学宋,于生涩中有馀味,如《绿荫》云:“抱影连朝户不开,林光青到纳凉杯。一池倒浸莺簧语,半屋横遮客屐来。”著有《转注绪言》二卷、《遂初堂音类辨》一卷、《汉音存正》二卷。其自订集凡十二卷,分为十个小集,名为《南村草堂集》、《栎于集》、《闻鱼阁集》、《北郭草堂集》、《江船集》、《闻鱼阁续集》、《觚屋集》、《江船续集》、《五上春司集》、《青乳轩集》。《清史列传》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全祖望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贺双卿】(1715—?) 字秋碧。江苏丹阳人,居四屏山麓。清世宗雍正十年(1732),年十八,嫁樵家子周某。其夫长双卿十馀岁,姑恶夫暴,惨遭虐待。双卿貌美多才,体弱性柔,内心悲苦,而态度和顺。自幼好学,闻书声即喜。其舅为塾师,她在隔壁闻其诵书,悉暗记在心。无笔砚,偶作词,以粉书写在花叶上,后人辑为《雪压轩词》(一卷)。亦能诗。某次春谷时,气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将其推倒在春臼旁,杵压于腰,忍痛爬起,继续春米。方煮粥,疟疾复发,火烈粥溢,双卿于急中以水止之,其姑怒掣其耳环,耳裂环脱,血流及肩。其夫亦因粥溢而不许其进午餐。双卿抒米出臼,俯地叹曰:“天乎!愿双卿一身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千秋万世后,为佳人者,无如我双卿为也。”乃以胭脂写所作《诗九章》于帕上,死之日,愿以为殉。事见《西青散记》卷三。

(陈祖美)

【袁枚】(1716—1798) 字子才,号简斋,晚称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家贫。刻苦为学,十二岁为诸生,二十一岁至广西巡抚幕府省其叔父,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受到金赞赏。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金荐枚应试。被荐二百余人中,枚最少,虽报罢,但因之名满四方,乾隆三年,中举。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知县,分发江南。初为溧水知县,调江浦、沐阳,再调江宁。枚有吏才,敏捷干练,颇受两江总督尹继善赏识。乾隆十四年,以病乞休,三年后再

出,发陕西以知县用,因上万言书于陕甘总督黄廷桂,不之省,寻丁父艰归,遂请归养母,卜筑于江宁小仓山,号随园。此后四十余年不复出仕。性好游,“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自称一生“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所好轩记》),可见其坦率性格。其论诗,倡“性灵说”,主张诗要写“真性情”,并且是富于情趣、体现了机敏与机智的真性情。著《随园诗话》、《续诗品》以宣扬其论诗主张。枚诗多以个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为内容,如描写亲人、师友间的深厚情谊,夫妻间的爱情生活,漫游名山大川、探幽览胜所产生的激情等等。如:“江南江北路迢迢,同是门前水一条。一日两家流得到,如何人不似春潮。”(《寄鱼门》)在许多写景咏物诗中,往往别有会心,如:“华清宫外水如汤,洗过行人流出墙。一样温存款寒士,不知世上有炎凉。”(《温泉》)诗中也有些揭露社会弊病、描写官场黑暗和对处于天灾人祸中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作品,如《府中趋》、《陇西将军》、《南漕叹》、《征漕叹》、《苦灾行》等。其作品大多浅易通俗,具有反传统精神,为一些卫道士所不满。其诗佳者,清新灵巧、情韵悠然;其劣者浮滑流易,鄙俚庸俗。亦工文,骈散皆佳,惟谀墓之作太多,为人所讥议。亦擅著小说,文笔颇生动。著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尺牋》十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新齐谐》(即《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十卷等。《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姚鼐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邵齐焘】(1718—1769)字荀慈,号叔一。昭文(江苏常熟)人。幼聪敏,受书能晓大义。高宗乾隆七年(174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在词馆十年,两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尝献《东巡赋》,为公卿所称赞,争欲致之门下。齐焘落落寡合,廷试不利,即罢归。乾隆三十年,高宗南巡,诏在籍词臣试阙下,以母老辞。主讲于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皆尝从之学。齐焘工骈体文,欲矫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家之失。亦工诗。其诗冲淡闲适,多借吟咏山水田园以摅写其恬淡情怀,如《游石梅山池》、《寄黄生信》、《赠雪林上人》等。也有一些七言歌行感慨豪宕,富于气势,如《宿迁道中望黄河用少陵〈溪陵行〉韵》:“我闻黄河之水天下奇,浩荡势欲无湖陂。浑流九曲走沙砾,急浪千叠翻琉璃。”好奖后学,一门兄弟五人,三人先后为翰林,在当时影响颇大。著有《玉芝堂集》九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袁机】(1720—1759)字素文。仁和(今浙江杭

州)人。袁枚之三妹。幼许字如皋高氏子。后高以子有恶疾,愿解除婚约。机云:“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适高,而高氏子却为人轻佻,性情暴戾,吃喝嫖赌,不仅家产败尽,机之妆奁也悉被变卖,不敷使用,高便对她鞭笞火灼,其姑相救,高则殴其母致齿折,最后想卖掉袁机以抵债。机不得已只得归母家,素衣素食侍奉老母。高氏子病死,她哭泣尽哀,经年亦去世。机一生,一则遇人不淑,一则本身受旧礼教毒害过甚,自食苦果。其《素文女子遗稿》一卷为《杭州府志》、《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为袁枚所编《三妹合稿》(包括袁机、袁杼及堂妹袁棠)之一,前有袁枚序,后附兄枚弟树之挽诗。《三妹合稿》中的袁杼,字静宜,号绮文,为袁枚之四妹,嫁松江韩思永,著有《楼居小草》一卷,收诗六十五首。《合稿》中的袁棠(1734—1771),字雲扶,一字秋卿,袁枚堂妹,嫁扬州汪楷亭,著有《绣馀吟稿》、《盈书阁遗稿》。事见《随园诗话》卷一〇。(陈祖美)

【童钰】(1721—1782)字二如,号二树,又号朴庵、借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弃举业,专攻诗、古文。性豪侠,不治家人产业。与同郡刘文蔚、沈翼天、姚大源、刘鸣玉、茅逸、陈芝图结社联吟,称“越中七子”;又与商盘等结社,号“西园十子”。客大梁最久,为河南巡抚阿思哈修河南省方志凡三十六县,分疏总校,条例严谨,人多称之。后卒于扬州。钰终生布衣,少时即受知于知府顾某,下笔千言立就,兼工画梅,善隶草书,名满大江南北。少所许可,独推崇袁枚。卒后,袁为校定遗稿。钰诗亦学袁枚,崇尚性灵,多写山水风光与身边琐事,尤爱咏梅,每画一梅,必题一诗。其《题画》诗云:“写梅只合号梅痴,长为梅花过六时。记得甲申元日集,三千三百十三诗。”其诗清新雅健,如《黄河》:“一气直趋海,中含万古声。划开神禹界,横压霸王城。几见荣光出,刚逢彻底清。浮槎如可借,应犯斗牛行。”其五言诗多佳句,上虞陈少亭曾为钰作《摘句图》。生前刊有《竹啸集》、《抱影庐集》、《秋虫吟》、《雪香斋遗稿》等。逝世后袁枚为手定《二树山人遗稿》十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六有传。

(王学泰)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幼从沈德潜学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英敏聪慧,记诵博奥,援笔万言。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以一甲二名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乾隆二十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二十四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鸣盛无声色

玩好之嗜,惟读书写作是好。其诗凡几变:初宗汉、魏、盛唐;在京师见钱载、蒋士铨等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对明前后七子、陈子龙、清初朱彝尊、王士禛等人作品,服膺无间;晚年笃好李商隐,将尽改其生平所作,效其体制,终未及。其诗多记行记游、题山水胜迹之作,如《乌石滩》一诗,写水石相激所发出声音一段,极刻画之能事:“水石本无情,相触因成喧。悠扬止复作,决决还潺潺。静听恍有会,仙籁非人间。梵呗流寒空,风松响层峦。有时急瀑来,一泻云涛翻。”也有许多类似盛唐的作品,如:“古戍标荆塞,危城见蜀津。云移三峡暮,江接百蛮春。行役何时已?音书总未真。登楼欲有赋,感激独伤神。”(《夷陵远望》)鸣盛以史学家名世,其《十七史商榷》为作者毕生治史之结晶。另有《尚书后案》、《蛾术编》、《周礼军赋说》。早年所刊诗有《竹素诗草》三卷、《日下集》一卷,后又刻《西庄始存稿》四十卷、附录一卷,其中诗、赋、词十八卷,所收皆为四十二岁以前作品。在其身后又有人刻《西沚居士集》二十四集。《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皆有传。石钧为作传,钱大昕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梁同书】(1723—1815) 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又号新吾长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诗正,官至大学士。少颖异,性端重。清高宗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乾隆十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擢侍讲,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以丁父忧归,婴疾,遂不复出。为人清俭,自奉甚薄,不宴客,不受馈赠,不干谒当道,不为人庆寿,杂宾不厕坐,佛子道徒不入其门,惟喜接纳词客文士。同书只有在京为官及居乡赋闲之经历,其诗内容贫乏,多为题咏书画文玩及酬酢唱和之作,如《秋圃杂咏同述庵作》、《题董旭终南进士图》、《铁画》、《后铁画歌》,皆为其代表作品。擅长赋体,常以议论入诗,多风趣之语,如《反游仙》借写游仙诗而骂世:“漫说长生有秘传,餐芝绝粒几经年。登仙直是寻常事,鸡犬由来亦上天。”亦工书法,少学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为当世独绝,与刘墉、王文治并称于时。著有《频罗庵遗集》十六卷。《清史稿》卷五〇三、《清史列传》卷七三有传。(王学泰)

【纪昀】(1724—1805) 字晓岚,一字春帆,别号石云。献县(今属河北)人。清高宗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第一。乾隆十九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擢至侍读学士。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籍家,昀与卢为姻亲,漏言于其孙卢荫恩,被革职,遣戍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赦还,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昀

学问渊博,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万卷提纲,一手编注。昀自云:“余于癸巳受诏校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诗序补义序》)其《总目》考异同,辨真伪,撮著作之大凡,审传本之得失,使读者展阅了然,为目录学中之佳构,远过于列史之《艺文志》、《经籍志》。昀久居词垣,诗多应制奉和题咏书画文玩之作,内容较为贫乏。其被遣戍乌鲁木齐时所著《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分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部分,生动地描写了新疆风土民情与欣欣向荣景象,摅写了诗人的壮怀与爱国激情,带有浓郁的边塞色彩,如:“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闲挂只春耕。瓜期五载如弹指,谁怯轮台万里行?”可见当时军屯军垦的壮阔场面。著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齐名。其诗文收入《纪文达公遗集》,凡文十六卷、诗十六卷。后邵承照辑其论诗之语为《记河间诗话》三卷。《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二六皆有传。朱珪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王昶】(1724—1806) 字德甫,一字琴德,号兰泉,晚号述庵。青浦(今属上海)人。少从沈德潜学诗,颇有才名,与王鸣盛有“江东二王”之称,又与鸣盛、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吴泰来、黄文运等称“吴中七子”。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登进上第。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试一等,赐内阁中书,擢为吏部郎中,后从征金川、缅甸,凯旋,擢为刑部侍郎。主令试,屏绝请托,一秉至公,由是多忤于人,为避免中伤,遂以目疾告归。晚年居三泖渔庄,延诸名士校勘平时撰著数十种,渐次付梓。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凡士以诗文见者,与之谈诗论文,终日不倦。历主娄东、敷文两书院,造就人才颇多,洪亮吉、黄景仁皆出其门下。昶论诗主其师沈德潜“格调说”,诗风也与沈氏接近,而其学养,经历皆较沈丰富,故成就较高。其未仕前诗多以山水风光为题材,醇雅清切,律、绝尤有风致。召试以后官中书、值军机房期间则多应制奉和之作,及从征期间,其诗大得江山之助,凡戎马阅历、滇蜀烟云,多入诗篇,前后九载,得诗颇多,诗风恢博雄奇,如《白马篇》、《军抵山神沟》、《驰传过清溪得冲之学使手书兼诗见忆》皆为此时代代表作品。其《六月十九日》中写战场雷雨一段:“山椒作雨山头雪,脚底惊雷山欲裂。如墨浓云泼面来,电光一线从中掣。似同巨炮斗神威,却与昨朝湔战血。西峰忽见掩金乌,东岭犹看挂雌蜺。飞电宁容雕鹗藏,回飈半觉杉楸折。”可见此期作品一斑。晚年优游林下,多唱酬之作,诗风清微平远,如:“西风吹早雁,江上有遗音。送子西陵去,迢迢山水心。夕阳红叶晚,孤棹白云深。余亦归三泖,幽栖松桂林。”(《送

吴颢云归杭州))其诗出入唐、宋,以学唐为主。著述极富,曾主修《青浦县志》四十卷,辑有《金石粹编》一百六十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青浦诗传》三十四卷、《琴画楼词钞》二十五卷。其诗文集名《春融堂集》,凡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清史稿》卷三〇五、《清史列传》卷二六皆有传。严荣为撰《述庵年谱》二卷。(王学泰)

【赵文哲】(1725—1773)字升之、损之,又字璞庵、璞函。上海人。赋才英敏,少有诗名,与王鸣盛、钱大昕、吴泰来、王昶、黄文运、曹仁虎等相唱和,号“吴中七子”。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南巡,召试,献诗,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受到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赏识。因与王昶、纪昀等泄漏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将待罪事,被削职。适逢尚书阿桂总督云贵,奏请文哲为掌书记,许之。寻从副将军阿里衮进征缅甸,后以功复授户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温福征小金川,驻营木果木,兵败而卒,赠光禄寺少卿。文哲享大名于时,王鸣盛尝言:“今日江左诗人,当以赵损之为第一”。(见《梧门诗话》)其诗沉着工丽,特别是从征之后作品,苍凉悲壮,凡蜀、滇山川之险怪、风俗之俶诡、可惊可怖之事,皆借诗以传之,如《冒雨行老秧田道中听啼猿满山率而成咏》、《大风过芝草白榕诸滩》、《乌石滩》、《猛拱土司进四象诗》、《十二月十三日斑斓山纪事》皆为此时代表作品。其早年作品风流旖旎,颇具标格,如:“几日田田碧一洼,空亭倚遍石栏斜。池塘人静影临水,风露晓凉香胜花。未许冲波依舫屋,最宜听雨隔窗纱。分明载酒重游处,两板红桥绿半遮。”(《荷叶》)著有《娟雅堂诗集》十二卷、《诗续集》四卷、《嫫隅集》十卷、《别集》六卷、《词集》四卷。其中《娟雅堂诗集》为出征前作品,《嫫隅集》为出征时作品。《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昶为撰墓志铭,吴省钦为撰墓碑。(王学泰)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号定甫,别署离垢居士。江西铅山人。少时家贫,从母为学,既长工诗文,见赏于学政金德瑛。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以举人官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二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以病乞休。晚年曾主戴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士铨以诗与袁枚、赵翼齐名,号称“江右三大家”。尝自言:“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忠雅堂集·学诗记》)论诗主性情,但其性情多指“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见《钟叔梧秀

才诗序》)故其诗中有许多表彰节妇烈女、忠臣孝子之作,封建道德气息较重,如:《江孝子》歌颂孝子割肉以疗父母;《黄烈妇诗》歌颂“二十而嫁两月寡,身入夫棺人弗许”,最后悬梁而死。此种违反人性作品,令人生厌。其中也有一些合于人情,描写亲子人伦之爱的作品,如《岁暮到家》等。其诗题材广泛,其中许多描写当时重大事件与社会习俗的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也是珍贵的社会史料,如:《台湾赏番图》描写台湾少数民族风俗及其汉化情景;《京师乐府词》十六首描写北京民俗和下层社会各种行当人们之生活;《弄盆子》写杂技演员弄盆技艺;《象声》写口技表演;《戏园》写北京之剧院兼用作茶馆、饭馆;《鸡毛店》写北京社会底层的鸡毛小店与生活于此处贫民之痛苦等等。其《豫章乐府》、《固原乐府》两组组诗笔触涉及社会生活许多弊病。士铨长于古体,于七古乐府,造诣尤深。中年以后受黄庭坚影响较大,于古拗中时见粗犷,也有不少作品流于粗率,以七律为多。有些描写山水风光及写志抒情的篇什在当时流传颇广,如:“湿云鸦背重,野寺出新晴。败叶存秋气,寒钟过雨声。半檐群鸟入,深树一灯明。猎猎西风动,湖心月乍生。”(《湖上晚归》)亦工词,擅长戏曲,著有杂剧、传奇十六种。其中《一片石》、《第二碑》等九种合集,称《藏园九种曲》。戏曲题材广泛,语言近汤显祖。有《忠雅堂集》四十三卷,其中诗二十七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陈述为撰年谱。(王学泰)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聪敏,十二岁能属文,日作文七篇,人皆奇之。清高宗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乾隆二十六年,以一甲三名成进士,授翰林编修,与修《通鉴辑览》,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一年,授广西镇安府知府,有善政。时征缅甸,令赴滇赞画军事。乾隆三十五年,调广州知府。次年,擢为贵西道。后以母老请归,遂不复出。晚岁主讲安定书院,以著述自娱,取唐宋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寻绎各家得失,著《瓯北诗话》。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亦相友善。翼为史学家,作诗亦好议论,多描写历史遗迹、咏史怀古之作,诗中往往表现其独特史识。如:《骊山冢》云“祖龙原识长生假,正在求仙又筑堊”;《乾陵》中同情武则天,“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马嵬坡》批评了以女人为祸水思想,“怜香不尽千词客,招乱何关一美人”。这些见解都突破了传统观念。其诗中还有一些描写人情世态的作品,善于用精练诗句揭露市井小人与趋炎附势之徒的卑劣本质,讽刺极尖刻,如:“一生只见罍中粟,举世争趋饭后钟”(《遣兴》之三);

“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感事》)；“往日肉膻趋蚂蚁，只今树倒散猢猻”(《感事》四首之一)。晚年还写了许多反映兵燹民瘼、天灾人祸的作品，如《忧旱》、《逃荒叹》、《荒景》、《年饥》等。其组诗《京师乐府词》描写北京下层社会风习，不仅趣味盎然，也具有社会史料价值。其诗不以兴象神韵或刻画描写见长，而在于议论。这些议论多带情韵而行，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张维屏谓其诗“发论太尽，于古人浑厚含蓄、一唱三叹之旨，几不复存。然胸中有识，腕底有力，眉开口爽，自成为有韵之文。且其所言，每如吾意中所欲出，读至惬意处，似情麻姑痒处搔也”(《国朝诗人徵略》)。诗风清晰明畅，宛如说话，不主一家，随境而变，如袁枚所言：“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忽叩虚而逞臆，忽数典而斗靡。读者游心骇目，碌碌然不可见其町畦。”(《瓠北集序》)有些篇什也流于浮滑浅露，枯燥无味。翼才思敏捷，一生勤于著述。除《诗话》外，尚有《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纪胜》四卷、《檐曝杂记》六卷、《瓠北诗集》五十三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尚镛为作别传。孙星衍为撰《赵瓠北墓志铭》一卷。

(王学泰)

【梦麟】(1728—1758) 字文子，号午堂，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少聪敏颖达。清高宗乾隆十年(1745)，未弱冠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乾隆十八年(1753)，典江南乡试，未几视学江苏，宏奖才士，不遗余力。既而召陟工部侍郎，旋改户部侍郎，参予机务，欲大用之，忽病瘵以歿。梦麟诗多古体，五言萧寥澄旷，七言多激楚苍凉。其诗或写民间疾苦，或直摅胸臆，大多言之有物。其《触目行》写宿迁一带水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朝廷虽下诏赈济，也是费而不惠，百姓没有得到好处。诗中写洪水泛滥、潴留不去一段颇动人心魄：“下河东望浩无际，积潦乃与天争高。闻昔少伯堤坝决，扫落不敌天吴骄。湖涨没河河倒闸，中间弗辨横堤高。眼见田庐肆冲突，不别贫富齐飘飏。淮阳所属作藪泽，一任河伯恣贪饕。田禾漂荡仓廩没，妻卧灶下夫出逃。洪泽水溢急已甚，黄流况乃乘其凋。”《哀临淮》写洪峰方来之景象：“淮流欲入洪泽湖，湖水逆淮淮倒驱。夜乘厥势来吾郭，汹涛骤涌人叫呼。夫逃子逐牵其孥，坐抛屋宇君负嵎。有室而没田而潴，细流入括仓廩储，巨流横灌牛马徂。”从中可见梦麟古体诗的描写能力。其近体也有佳作，如《观象台诗》沉雄瑰丽，独出冠时。可惜其寿不永，未能一展长才。著有《大谷山堂集》及《喜堂诗》。《清史稿》卷三〇四、《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有传。王昶为撰神道碑。(王学泰)

【敦敏】(1729—1796) 字子明，号懋斋。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六世孙。其五世祖阿济格因宫廷内矛盾被赐自尽，家世衰落。少从其叔父恒仁学诗，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交好，曾为锦州税监。工诗，多用以摅写其落拓情怀。诗学唐，多简疏淡远之致，如《雨窗偶感》：“萧飏何处雨？凉意满庭柯。雁叫寒云重，秋声落叶多。星星双鬓掩，草草半生过。回首成清梦，惊心感逝波。”其他如《典裘》、《和敬亭春郊吊废园》皆属这类作品。诗中还有许多怀念及酬赠曹雪芹作品，从中可见雪芹之精神风貌。著有《懋斋诗钞》。(王学泰)

【朱筠】(1729—1781) 字美叔，一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大学士朱珪之兄，二人并有才名。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乾隆三十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三十五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提督安徽学政。乾隆三十八年，诏求遗书，筠奏请从《永乐大典》中勾稽失传之古籍。后纂辑《四库全书》，得之《大典》者五百馀部，皆世已不传之书。总办《日下旧闻》纂修事。乾隆四十四年，提督福建学政。筠博闻宏览，好奖掖后进，陆锡熊、程晋芳皆所取士，戴震、邵晋涵、汪中、黄景仁、洪亮吉先后在其幕中，其诗多题咏山水胜迹、书画器物之作，诗风与翁方纲相近，学唐之韩愈，以散文笔法写诗，如《哨鹿同江岳南同年作》前十句写清帝狩猎之处木兰围场风光：“古塞八月霜严威，天风发发妃呼豨。云荒叶脱木不飞，哨鹿之制传行围。木兰以北山崔嵬，野鹿乳字交匹妃。杈枒环角头则颀。圆花遍体毛毵毵。衔草相食鸣相依，岁岁游牝群无违。”从用韵到笔法都十分接近韩愈的《山石》。其名篇《平定准噶尔恭纪》更是直接模仿韩的《元和盛德诗》著有《笥河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十卷。《清史列传》卷六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八有传。罗继祖为撰《朱笥河年谱》一卷。(王学泰)

【毕沅】(1730—1797) 字纘衡，一字秋帆，自称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少从沈德潜学诗，有才名。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举人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乾隆二十五年，以一甲一名登进士第，授翰林修撰。乾隆三十年，升侍读。后转外官，历经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授陕西巡抚。乾隆四十七年，署陕甘总督。乾隆五十三年，擢湖广总督。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沅有干才，礼贤下士，海内才士名流多从之游，有天下龙门之望，如袁枚、洪亮吉、程晋芳、孙星衍等皆曾客其署。其诗多题咏山水胜迹、书画文玩之作，如《咸阳怀古》二首、《寄题赵二损之舍人昔岭军营》三首、《李元妃

妆台》等皆为其代表作品。诗中以七律较为优长,其佳者苍凉悲壮、沉郁顿挫、神似杜甫,如《荆州述事》组诗中最末一首云:“江水茫茫烟霭深,纸钱吹满挂枫林。冤埋鱼腹弹湘怨,哀谱鸿鸣写楚吟。南国郑图膏雨逮,西风潘鬓镜霜侵。莫嗟病骨支离甚,康济儒生本素心。”著作极富,其重要者有《经典文字辨证》五卷、《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篇目考》一卷、《西安府志》八十卷、《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关中金石记》八卷、《中州金石记》八卷、《山左金石记》二十四卷、《灵岩山人诗集》四十卷。《清史稿》卷三三二、《清史列传》卷三〇有传。其门人史善长为撰《弁山毕公年谱》一卷。

(王学泰)

【汪辉祖】(1730—1807) 字焕曾,号龙庄,又号归庐。浙江萧山人。少孤,赖母教之成立。习法家言,佐州县幕,持正不阿,为时所称。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关心民间疾苦,执法甚严,每决狱,纵民观听。后又两署道州,兼署新田县,皆有惠政,以足疾告归。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值绍兴西江塘圯,巡抚吉庆强辉祖任其事,费省工坚,时论称之。娴熟治术,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其为政阅历有得之言,入《循吏传》。辉祖亦工诗,其诗质朴,多言之有物。其《内帘十咏》以七律写其分校湖南乡试十事,包括“入帘”、“分屋”、“掣卷”、“命题”、“阅卷”、“荐卷”、“落卷”、“搜遗”、“草榜”、“揭晓”,从中可见分校官之职责与诗人任此官时心态。如“荐卷”写试卷在手难定高低、最后拣卷而荐的情景:“为拣精金披尽沙,编斓入手望尤赊。堂前许试量才尺,暗里还分障眼纱。便有瑕瑜能不掩,终难铢两信无差。从教近墨增声价,都是春阶桃李花。”辉祖也通史学,著有《元史本证》五十卷、《史姓韵编》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补遗》四卷、《增补》一卷、《三史同姓名录》四十卷。文有《龙庄四六稿》二卷,诗有《纪年草》一卷、《独吟草》一卷、《题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楚中杂咏》四卷、《谿愁符词草》二卷。《清史稿》卷四七七、《清史列传》卷七五有传。王宗炎为撰行状、阮元为作传。

(王学泰)

【曹仁虎】(1731—1787) 字来殷,号习庵。嘉定(今属上海)人。少读书,辨悟通达。年十六补诸生,学使崔纪目为异才。工诗,与王鸣盛、钱大昕、王昶、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运等唱和,号“吴中七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南巡,召试,列一等,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次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历官翰林侍讲、右庶子,擢翰林侍读。每遇大礼,高文典册,多出其手。乾隆五十一年,督学

广东,遭母忧,以哀毁卒。仁虎博学,尤娴于诗,初学唐初四杰,七言歌行风华缛丽,壮年以后向慕杜甫、韩愈、苏轼、陆游,乃至元好问、高启等,多方取材。其诗以七律较著名于时,多言志摅怀、题咏山水胜迹之作,佳者典赡高华,风流倜傥。代表作品有《韩庄》、《西苑春望用王德甫、吴冲之韵》、《梁溪道中》等。其劣者流于肤廓。其五律清微淡远,颇有王、孟风韵,如“凉月照高柳,草堂夜际分。断鸿空际渡,清磬静中闻。叶落全疑雨,池荒半是云。弹琴不能寐,萧瑟感离群。”(《秋夜》)著有《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考》、《转注古音考》。其诗文有《宛委山房集》、《春槃集》、《瑶华唱和集》、《秦中杂稿》、《辕韶集》、《鸣春集》、《蓉镜堂文稿》等,后汇为《曹学士遗集》三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鸿逵为撰年谱。

(王学泰)

【顾光旭】(1731—1797) 字华阳,号响泉,晚号晴沙。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东林党人顾宪成八世孙,以直节传家。自幼读书惠山,慕先辈清芬,远乎流俗。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迁御史。出为宁夏知府,擢甘肃甘凉道。值水旱,请恤赈,与布政使意见不合,光旭先发银米,使民无饥。时方有金川之战,调蜀,署四川按察使,寻罢归。主讲于东林书院,颇有声誉。精书法,亦自成家。尝取自汉至清中叶邑人遗诗选为《梁溪诗钞》,入选者一千一百余人,凡五十八卷,选毕取诸稿埋之,名曰“诗冢”,作诗记之,一时传为佳话。其诗之佳者多写于为外官奔走于道途之时,颇能描摹陇蜀一带山川风貌及反映人民生活真相。《南征》、《口占》、《青岚山》、《咏惠陵》等皆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工于刻画描写,如写于蜀的《渠江》云:“软舆轻梦岩渠边,林鸟频呼上渡船。绿到鸭头春水足,嫩晴风色薄云天。”轻脱明快,颇能代表其诗风。著有《响泉集》。《清史稿》卷三三六、《清史列传》卷七五有传。王昶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高文照】(?—1775) 字润中,号东井。浙江武康(今德清)人。少随父游宦金陵,得从袁枚游。袁言其“少年韶秀,嶷嶷自立。父植宰德化,有贤声。所得俸尽为东井买书。年未二十,诗已千首。目空一世,于前辈中所心折者,随园与心馀(蒋士铨)而已”(《随园诗话》)。朱笥典学安徽,曾游其幕,时黄景仁亦在朱幕,主客登临啸咏,几无虚日,与黄并称二才子。清高宗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游京师,馆于满洲某公家。乾隆三十九年,考中举人。次年,卒于京师。文照一生游荡四方,其诗以题咏山水名胜、咏史怀古以及摅写其落拓情怀者为多。《赵北口》、《扁鹊湖》、《任邱怀古》、《献县怀古》二首等皆其代表

作品。诗慷慨多气,倜傥不群。也有一些小诗以清新婉丽见长,如:“一笑浓檀满颊生,酒旗摇曳带心旌。郎今不醉缘何事,门外滩流如许清。”(《香口题酒家壁》)“雪后江南揽物华,颓山惊睹女郎花。重寒未减丝丝雨,闲杀炉头卖饼家。”(《赠白堤钱猛之》)辑《韵海》八十餘韵。诗有《高东井诗选》四卷、《蕙香词》一卷。(王学泰)

【朱彭】(1731—1803) 本马姓,少育于外家朱氏,遂冒其姓。字亦钱,号青湖。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以诗称于时,补弟子生员,省试不遇,后为岁贡生。阮元视学浙江,与谈名物掌故,皆有所得。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诏举孝廉方正,郡县以名闻,彭固辞不就。彭困于场屋,专力为诗,以诗法教人。杭州之诗自西泠诗派至厉鹗等诗人多以宋人为宗,而彭一矫此风,专以沈德潜《唐诗别裁》、《国朝诗别裁》传示学者,崇奉格调说,使杭州诗风为之一变。其诗多题咏器物、书画及描写隐居生活之作。如《招勇将军宝刀歌》、《题张铁桥画马》、《赵松雪相马图》、《谢彬钟馗嫁妹图》、《题唐明皇斗鸡图》皆其代表作品。常用七古歌行以咏物摅怀,而笔力较弱,缺少精警、富于气势之作。有少量作品描写到江湖流浪者的生活,如《走索行》、《姑苏船娘曲》等。王昶于《蒲褐山房诗话》、郭麐于《灵芬馆诗话》中摘其佳句甚夥,然集中完篇较少,在各体中只五律较佳,风格清微淡远,如:“一雨涤残暑,翛然郭外行。松凉人气健,山霁鸟声清。野老携锄返,樵童扫径迎。自欣来往熟,到处惬幽情。”(《早秋山行》)彭熟悉杭郡古迹,著有《南宋古迹考》、《吴越古迹考》等书。有《抱山堂诗集》。《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赵坦为作传。(王学泰)

【姚鼐】(1732—1815) 字姬传,一字梦穀,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属安徽)人。少家贫,体羸多病,而嗜学如命。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1763),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历充山东乡试副考官、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累迁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以大臣荐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后因病乞归。归后,历主安徽敬敷书院、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讲席凡四十年,造就人材极多。卒于南京。鼐为刘大櫆弟子,治学推尊程、朱,并强调义理、辞章、考据并重,为桐城派中集大成者。其诗多为友朋赠答、记游怀古、咏物题画、模山范水之作。其论诗崇尚“大美”,如《柬王禹卿病中》:“群舒山色如连云,万里江涛蹙山动。我昔结屋山中居,敲雾蒸云日溷洞。青蓑短棹放中流,山壑贞观信天纵。”其写庐山瀑布:“石梁忽贯青霞落,倒海流云走空壑。万谷钧天广乐鸣,思鸟哀猿一时作。”(《望庐山瀑布》),其他如《米友仁楚江风雨图卷》、《朱白泉观

察以其先都统公指画〈登山虎〉见示因题长句》、《登泰山观日出》等皆气势雄伟,境界浩茫,沉雄横逸,读之使人开阔心胸,精神拳举。鼐善于以古文义法融入诗中,使得诗章劲气盘折、风格孤峭。这也体现在其近体诗中:“海上青天雷雨怒,惊涛奔入乱山开。青冥楚越孤帆去,浩荡淮沂四面来。春草不知韩信里,秋风曾到项王台。谁明鼓楫中悲慨,仰视云霄数雁回。”风格苍老,笔劲气健。鼐开桐城诗学,其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等人都受其影响,推动了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年间诗风的转变。一生著作极富。有《九经说》十九卷、《三传补注》三卷、《老子章义》一卷、《庄子章义》十卷、《江宁府志》五十六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卷、《诗集》十卷、《诗后集》一卷、《惜抱轩尺牍》八卷。编纂《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五七言今体诗钞》十八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桐城郑福昭为撰《姚惜抱先生年谱》一卷。

(王学泰)

【施朝幹】(?—1796?) 字培叔,一字小铁,号铁如。仪征(今属江苏)人。自幼吟诗,精熟《文选》,贯通汉、魏诗学。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官郎中、御史,官至太仆寺卿,宗人府丞。乾隆六十年(1795),充山东省乡试正考官,撤闈后奉命督学湖北,卒于任所。朝幹为人耿介,居邗上不与盐商富贾往来,居京师敝车羸马,破屋数椽,俸不足,益以称贷,终不与热官往来。有诗名。王鸣盛刻《江左十子集》,朝幹居其首,其诗质朴清真,不尚才藻,多用以表现自己清寒生活和孤介情怀,如《不寐》:“秋惊黄叶候,梦断绿云隈。河水三更急,悲风高枕来。空囊销壮志,平世爱凡才。不寐衾如铁,车轮饥几回。”其他如《江夜》、《送别》、《即事》,皆属此类作品,工于五言,五律尤佳,五古时流于枯涩。也有些反映百姓苦难的作品,如《田家叹》二首,或写无儿无食之田翁,或写意欲求死而又不忍抛病妻的樵夫,皆言简意长。著有《六义斋诗集》四卷、《云岫词》一卷,乾隆(1736—1795)末刊。仁宗嘉庆(1796—1820)初,又刊《正声集》四卷、《词》一卷。宣宗道光(1821—1850)间,补刊《一句集》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九七有传。(王学泰)

【翁方纲】(1733—1818) 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顺天府大兴(今属北京)人。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擢国子监司业,官至内阁学士。先后典试江西、湖北、顺天乡试,曾督广东、江西、山东等省学政。方纲精研经术,著有《诗附记》、《礼记附记》、《论语附记》、《孟子附记》、《经义考补正》等书。尤精金石之学,所著《粤东

金石略》、《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并参以《说文》等书，考证至精。亦精于诗学，有《杜诗附记》、《苏诗补注》以及《石洲诗话》、《小石帆亭著录》等著作。方纲屡主学政，享高寿，一时名士才子多出其门，成为一代诗学领袖，对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间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清初至乾隆前半期诗坛为神韵说、格调说所牢笼，格调说易流于空疏，神韵说则近于寥阔，方纲别树一帜，强调在“研理”、“观书”的基础上，倡导肌理说，开创了“学人之诗”。其诗学末，注重铺叙刻画，如陆廷枢所言：“覃溪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复初斋诗集序》）诗多为题画题字、说道论艺、行旅访古之作，如《石鼓歌》、《苏诗补注刻成有述》、《拱北楼刻漏歌》等。善用赋体，对于所描写的事物刻画得穷形极相，充分表现出其描写之才能，如张维屏所言：“《复初斋集》中诗几乎言言征实，使阅者如入宝山，心摇目眩，盖必有先生之学，然后有先生之诗。”（《听松庐文钞》）方纲以学问入诗，平庸之作便流于枯涩呆板。洪亮吉批评肌理派时云：“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篇》。”（《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袁枚也批评翁方纲说：“天涯有客号吟痴，误把书抄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这些批评虽不无以偏概全之嫌，却切中其部分作品之要害。方纲也有一些写景抒情小诗颇可诵，如：《寄内》中的“三千里外挑灯话，四十年前听雨心”；《韩庄涧》中的“秋浸空明月一湾，数椽茅店枕江关”。无论写情，还是绘景，在摆脱学问之后，显示出其清新感人的一面。著有《复初斋诗集》、《文集》、《复初斋集外诗》、《集外文》等。《清史稿》卷四八五有传。（王学泰）

【吴嘉】（1733—1813）字槎客，号兔床山人。浙江海宁人。贡生。少负异禀，过目成诵。笃嗜典籍，遇善本则倾囊购之，校勘精审，所得不下五万卷，筑拜经楼藏之。常自制一舟，往来湖上、郡城，时作近游。有诗云：“十二桥南烟舍，第三溪口渔翁。青箬绿蓑归去，桃花细雨东风。”颇可见其优游自在之生活。诗清醇和雅，多闲适之作。其《戏为画中八仙歌》效杜甫《饮中八仙歌》，咏画家朱方霭、钱载、方薰、奚冈等八人，词气安雅，颇能代表其诗风。其五律、七律典雅清丽，如《春晚宿朱甥瑞榕馆》：“别墅依兰榭，闲轩枕薜萝。雨馀春树老，风定鸟声多。玉茗初分焙，珠泉恰泻坡。明朝樱笋会，已约老僧过。”其七绝亦有佳篇，如：“春风迢递木兰舟，醉脱兰陵玉兔裘。楼上灯光帘外月，夜深吹笛过扬州。”（《闻受笙有淮上之游却寄》）著有《国山碑考》、《桃溪客语》、《小桐溪吴氏家乘》、《拜经楼诗话》、《论印绝句》、《愚

谷文集》及《拜经楼诗集》十二卷、《续编》一卷、《再续编》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二七有传。（王学泰）

【敦诚】（1734—1791）字敬亭，号松堂，别号闲慵子，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六世孙，敦敏之弟。自谓“泊长，不乐荣进，缘家贫亲老，出捧一檄”。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曾榷山海关税务，不久即告归，归则“常经旬不出，不得已而遇吊丧问疾事，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哺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见《闲慵子传》）。可见其为人。其诗多题赠唱和，描写四时风光之作，一些篇章中摭写了其宗室身份带来的约束拘羁，如其《题枯林系蹇图》云：“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风雪教他自在行。”与《红楼梦》作者交好，诗中保留许多与曹雪芹往来和赠酬之作，如《寄怀曹雪芹（霑）》、《佩刀质酒歌》等。其诗以七古为最佳，学苏轼、韩愈豪迈奔放。著有《四松堂集》四卷，其中诗二卷、文二卷。另有《鹑鹑庵笔尘》一卷（八十一则）。其生平事迹见敦敏撰《敬亭小传》（收入《四松堂集》）。（王学泰）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州，号雨村；又号童山、蠹翁等。罗江（今四川德阳）人。少聪敏，五岁就读，七岁能属对，十九岁补诸生。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第五名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吏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寻迁吏部员外郎，再督学广东。任满回京，擢直隶通永道，以劾永年知府被讦下狱，遣戍新疆伊犁。行至涿州，因新任直隶总督袁守侗为之上言，得以万金赎归。归乡后遂不复出，以著述自娱。调元论诗，近于袁枚，亦颇推崇袁诗，其视学广东时曾刻《袁诗选》以为诸生学诗法式。与赵翼、纪昀等人交好，诗风亦与之近。其诗题材广泛，对于其经历行迹、亲好交游皆有所记载，至于模山范水、题咏文玩书画、名胜古迹、摭怀写志之作更多。也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石匠行》、《窑户行》、《乞儿行》、《担炭行》等皆描写了农民以外的下层社会人们的苦难。诗风质朴豪放、雄健挺拔，袁枚称之为“才豪力猛”。调元博学多才，工书画，精通曲学，编写有《春秋配》、《花田错》等川剧本。又性嗜书，撰述极富，涉及经史、音韵、文字、方言、地理、风俗、博物诸多方面。著有《易古文》二卷、《尚书古字辨异》一卷、《郑氏尚书古文证讹》十一卷、《童山诗音诗》四卷、《正斋琐录》十二卷、《剿说》四卷、《诸家藏书簿》十卷、《雨村赋话》十卷、《雨村诗话》二卷、《雨村词话》二卷、《雨村曲话》二卷、《制义科琐记》四卷、《蔗尾丛谈》四

卷、《唾馀新拾》十卷、续十六卷、补十二卷、《井蛙杂记》十卷、《南越笔记》十六卷、《粤风》四卷、《粤东皇华记》四卷,辑有《蜀雅》二十卷、《蜀碑记补》十卷、《全五代诗》一百卷,编辑大型丛书《函海》,其中收录有关巴蜀之著作一百余种。其诗文收入《童山诗集》,凡四十二卷,文收入《童山文集》二十卷。另有《蠹翁词》二卷、《童山自记》一卷。《清史列传》卷七十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七三并有传。(王学泰)

【朱孝纯】(1735—1801) 字子颖,号思堂,一号海愚。汉军正红旗人,先世居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曾从刘大櫟学诗古文。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大挑为四川简县知县,擢叙州同知、重庆府知府,移守泰安,迁两淮盐运使,以风痹解职归。孝纯多才艺,工丹青,尤擅孤松怪石,为官泰安时曾画《泰岱全图》。性格豪迈,诗作多感激豪宕之音,以七言为佳,其《题横幅大松》等七古颇富气势。其七律清苍悲壮,如写于蜀之《洪椿坪》:“金碧垂空乱夕阳,天池云表望星房。无边雪岭千层白,不尽霜枫万树黄。飞鸟与人争道路,啼猿知我忆家乡。烟丝雨雾迷归梦,那得羁人不断肠。”诗多写游宦生涯,内容较贫乏,艺术上缺少变化,尚不足以名家。著有《泰山图志》八卷、图一卷,《海愚诗钞》十二卷及《昆弥拾悟诗草》。《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一二有传。(王学泰)

【王文治】(1736—1802) 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属江苏)人。幼年意气豪放,少以诗称于丹徒。至京师则见称于京师。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翰林侍读全魁使琉球,文治应邀同往。入海舟覆,遇救得不死。乾隆二十五年,以一甲三名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曾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与会试同考官,大考一等,擢为侍读学士,旋出为云南临安知府,以事免归。常往来于吴、越之间,专买伶童教之度曲习艺,行无远近必以戏班自随。每作乐后,客去伶散,则默然禅定。其书法秀逸,时以董其昌称之,与刘墉齐名,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语。其诗雄伟瑰丽,音节洪亮,其随使琉球所著《海天游草》、出守云南历经蜀、滇所写篇章多佳作,如《将往琉球留别诸同学》写诗人对海上冒险生活的向往,《木芙蓉》、《个旧厂》描写蜀、滇风光的奇险与美丽,皆写得富于气势。其七绝风华秀逸,如:“春帆一片大江西,铁瓮城头日欲低。此去长安若回首,江南何处不莺啼?”(《春帆留别词》)曾就杭州西湖景编新戏《龙井茶歌》、《祥征冰蚕》等九出。其诗编为《梦楼诗集》二十四卷。《清史稿》卷五〇四、《清史列传》卷七二皆有传。姚鼐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桂馥】(1736—1805) 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孔子庙洒扫户,至馥始攻举子业。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云南永平知县,卒于任。馥一生苦心向学,不求知闻,其诗多反映清贫孤寂学者生活,如《送周进士永年》、《悔过》皆其代表作品。其诗质朴醇厚,颇具风骨。还擅长戏曲,著有《后四声猿》一卷。馥以文字学家著名,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札璞》十卷。诗文收入《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孔宪彝为撰墓表。(王学泰)

【李旦华】(1738?—1766?) 字宪吉,号厚斋。浙江嘉兴人。幼有神童之目,五岁就傅读书,经史外旁及《文选》及李、杜、韩、欧、苏轼之书。年十八补生员。乾隆二十二年(1757),高宗南巡,召试列二等。乾隆二十四年,以优贡为国子监学生。乾隆二十七年,召试,又列二等。后以劳瘁终,年仅二十九。旦华诗多题咏山水胜迹、怀古咏史之作,以摅写落拓不遇之情怀,如《题马令南唐书后为金秀升先生赋》、《咏古》、《宿赵北口》、《登紫阳山绝顶》皆其代表作品。其诗初学宋,后学唐,七律颇似唐李颀、许浑,如:“河朔阴森莽阵云,唐馀战斗正纷纷。六州强大盘根久,两姓兴亡移足分。铁错铸成真失计,银枪募得号能军。遥瞻亚子登坛地,不见灵旗绕紫氛。”(《邺下怀古》)旦华学贯经史,勤于著作。著有《十六国世系表》及《后唐书》(未完稿)。其诗集为《青莲馆集》凡六卷。生平事迹见郭麐《灵芬馆诗话》续编。(王学泰)

【管世铭】(1738—1798) 字鍼若,号韞山。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以制义有名于时。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擢广西道监察御史。行走内廷时,有礼部尚书奏请禁焚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三人诗集及吴绮词集,以为其中有违碍之语,世铭为之辩,得解,并以诗记此事:“诗无达诂最宜详,咏物怀人取断章。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语关新故禁销宜,平地吹毛赖护持。辨雪仍登天禄阁,三家诗草一家词。”(《追纪旧事》)晚年欲劾权相和珅,大学士阿桂止之。一日与友人宴,座中多誉和珅者,世铭拂袖去,归舍遽卒。世铭论诗重唐音,崇奉李白、杜甫、王维。其诗多题赠文玩器物、古迹书画之作,如《题泉砚》、《昭陵石马歌》、《灵药篇》等。也有一些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如:《畿南行》写积旱久灾之后,人们逃亡流离、羸黎满地情景;《乘驿谣》写驿吏之苦与驿吏看人行事情状,十分生动。其诗健朗深厚,注重格调,不肯附和当时诗坛领袖袁枚。编有《读雪山房唐诗选》四十卷。诗文集有《韞山堂文集》八卷、《诗集》十六卷。《清史稿》卷三五六、《清史列传》卷七二有

传。管绳莱为撰行状，陆继辂为撰墓表。

(王学泰)

【彭绍升】(1740—1796) 字允许，号尺木，又号知归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启丰，官至兵部尚书，家世清华，簪缨相望。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选知县不就。究读《大藏经》，中年茹素，与夫人别屋而居，每初一、十五，与家人一见，以“大家努力修行”相勸而已。其礼佛不下楼者数十年，尝与袁枚往返辩论死生之说，不能胜。亦研究陆、王之学，说经好与朱熹立异。其诗多用以谈禅说道。诗风恬淡，如《挥手》：“挥手谢人世，萧然此闭关。有怀长傍佛，无梦不依山。竹送墙头翠，苔侵户齿斑。闲云如有约，朝往暮来还。”著有《二林居士集》二十卷，《测海集》六卷，又有《一行居集》、《观河集》。《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七有传。

(王学泰)

【王友亮】(1742—1797) 字景南，号东田，又号葑亭。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少年即以诗名。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章京。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刑部主事，迁员外郎，转山东道监察御史，擢礼科、兵科给事中，累迁通政司参议，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在刑部时多平反冤狱，为人所称。友亮诗风近于袁枚，多为言情写志、描绘四时风光之作。其早年所作《金陵杂咏》及晚年巡视南漕时所撰《视漕小草》，名闻一时。其诗清新流畅，而警人处不多，如《太白楼》：“见说骑鲸客，曾为汗漫游。当时轻一醉，此地重千秋。画槛青嶂在，长桥卧碧流。高风犹宛在，三十六峰头。”其七古长篇《后说鬼行》长六百餘言，历数各种鬼魅形状，光怪陆离，如罗聘《鬼趣图》。著有《双佩斋文集》四卷、《骈体文》一卷、《诗集》八卷，附《金陵杂咏》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一〇四有传。姚鼐为撰墓志铭。

(王学泰)

【邵晋涵】(1743—1796) 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四库全书”开馆，特诏晋涵入馆纂修。乾隆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大考后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晋涵为经学、史学、小学名家，于书靡不窥，而其诗摭志写怀，却无堆垛学问之弊。诗以五言见长，其五古、五律“多古意，蕴蓄既深，发声自远”(见《晚晴簃诗汇》)有唐张九龄风韵，如《秋夜作》、《题张水屋游西山图》、《病起》等皆可代表其风格。其七绝小诗，颇著风华，与五言诗有显著不同。如：“折枝赠别晓江寒，好句长留画壁看。三载销魂梅岭雨，黄榔根苦荔枝酸。”(《和童二树梅花诗》)。著作

甚富，重要者有《尔雅正义》二十卷、《旧五代史笺注》一百五十卷、《旧五代史考异》五卷、《南江札记》四卷、《孟子述义》、《穀梁正义》、《韩诗内传考》。其诗文集为《南江文钞》十二卷、《诗钞》四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有传。钱大昕为撰墓志铭，王昶为撰墓碑。

(王学泰)

【汪中】(1744—1794) 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孤，家贫不能外就傅，其母教其识字，授四书，稍长助书贾鬻书于市，乃得借读经史百家之书，过目成诵，博综典籍。年二十补诸生。杭世骏主讲安定书院，见其著作，深为叹服。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以母老竟不赴朝考。尝有志于用世，故对古今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深究。三十以后，专心经术，与李惇、王念孙、刘台拱等为学友，互相讨论切磋，于经学建树颇多。中性情兀傲，凌轹时人，又好谩骂，故不见容于时，人谓“狂生”。晚年贫甚，王昶、毕沅荐于盐政全德，使其掌扬州大观堂所颁赐《四库全书》。后全德移任杭州，又属其兼管西湖《四库全书》，赴杭前，大醉而卒。中一生贫困潦倒，又以博学狂傲闻名于世，其诗多描写自己贫困生活与抒发不遇于时的不平之鸣，如《除夕》云：“凿冰持作糜，朝炊不及夕”，“高言王霸略，衣食苦无策”。《千里》、《述怀》、《吾生》均描写其贫穷、漂泊的生涯。《别母》一诗写其为谋衣食，不得不抛家别母，语浅情深：“细雨春灯夜未分，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别，明日思亲梦里人。”还有一些描写世道艰难的作品，对比他更不幸的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如《不平》、《悲落叶》、《旅食》等。诗学汉魏，质朴刚劲。洪亮吉言：“汪明经中诗，如病马振鬣，时鸣不平。”(《北江诗话》)也有一些感旧怀人之作，大多写得韵清辞雅，流畅婉丽，如：“忆梅何日下西州，一曲清淮五月秋。水阁画帘人独坐，乌篷阅尽泪双流。”其诗多作于三十岁以前，但现传诗集则多作于三十岁以后。中亦长于骈文，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著作极富，因去世时子幼家贫，多不传。传于世者有《广陵通典》十卷、《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及《策略谏闻》。其诗收入《容甫遗诗》，凡五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八皆有传。其子汪喜孙为撰《容甫先生年谱》一卷。

(王学泰)

【洪亮吉】(1746—1809) 字稚存，一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孤家贫，寄于外祖父家，有才名，能诗，与同邑黄景仁诗歌唱和，时称洪黄。后从安徽学政朱筠游，同幕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等皆通经饱学之士，乃立志穷

经,居家与孙星衍相切磋,学益宏博。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一甲二名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乾隆五十七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督贵州学政。黔省僻远,缺少书籍,为购经史、《通典》、《文选》等,散置各书院。仁宗嘉庆二年(1797),命在上书房行走。嘉庆四年,诏求直言,乃上书极陈时事,触帝怒,流伊犁。次年,释放回籍。晚年徜徉山水,以著作自娱,并主讲洋川书院。亮吉诗多为记录行旅游览而作,每次出行或游赏皆有专集记其所经所至、所见所闻,并摭写因见闻而引发的感慨。其中有些篇章涉及民生疾苦、时政弊端,如:《宜沟行》写来往驿路官吏扰民;《朝阪行》三首写官吏惟知借整治黄河以搜刮民财,黄河水来则不顾人民死活,只闭城自保;《自柏乡至磁州道中杂诗》写河北柏乡到磁县一带人民生活之贫困。其遣戍新疆所写《伊犁纪事诗》组诗展现了天山南北雪岭大漠的瑰丽景象,并记录了戍守在那里官兵的日常生活,以及汉族士人、谪居官吏对边疆文化发展的贡献。亮吉长于五古、七言歌行,富于想象力。毕沅谓其“奇思独造,远出常情,五言歌行杰立一世”(《吴会英才集》),如《潼关》前十二句写潼关景色:“出险复入险,别山仍上山。河流五色夜昏黑,一片红日先射关。壮哉龙门涛,至此始一折。惊流无风舟尚失,大鱼如龙欲迎日。风陵津北起黑波,重波径向中流过。河声渐远坡愈迥,却控马首看全河。”从构思到造句用字都近于韩愈。其近体诗较粗率,佳作较少。亮吉长于骈文,与袁枚、胡天游并称为“三大家”。亦通经术,尤长于舆地之学。穷日著书,老而不倦。著有《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六书转注论》十卷、《四史发伏》十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北江诗话》四卷。主编了许多府县方志,如《宁国府志》、《澄城县志》、《长武县志》、《登封县志》、《泾县志》等。其诗文收入《洪北江诗文集》,凡六十六卷,其中诗三十八卷。《清史稿》卷三五六、《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其门人吕培等为撰《洪北江先生年谱》一卷。(王学泰)

【吴锡麒】(1746—1818) 字圣徵,号穀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五年两充会试同考官,擢右赞善,入直上书房,转翰林侍讲、侍读。因生平不趋权贵,权相和珅欲招致门下,不从,故徜徉词垣二十余年始官至国子监祭酒。锡麒曰:“得为国子宗师,吾愿足矣。”(见《嘯亭杂录》)即以母老请假归养。至扬州,主讲安定书院、乐仪书院,以及爱山、云间诸书院,造就多士。并校刊《全唐文》,晚以卖文为生。锡麒工试帖律赋,骈体文尤著名于时。其诗继厉鹗之后再振浙派旗鼓。诗

多记游怀古、题咏书画文玩及与朋友酬酢唱和之作,如法式善所言:“先生喜游,又喜偕余游,游必有诗纪胜。”(《梧门诗话》)其代表作品有《师子林歌》、《题翁覃溪前辈所藏唐泰山摩崖铭拓本》、《黄土梁》、《夜观乌龙山野烧》等。其诗五言清隽孤峭,七言真力弥漫,沉博瑰丽,如《观夜潮》:“高楼极目大江宽,为待潮生夜倚栏。隔岸忽沉灯数点,如山涌到雪千盘。鱼龙卷地秋风壮,星斗摇天海气寒。明月渐低声已歇,一枝塔影卧微澜。”诗中描写了钱塘江大潮涨落全过程,境界开阔,神足气完,颇能代表其七言古体及律体风格。其七绝婉秀,也多佳作。锡麒诗文颇为朝鲜文士所欣赏,故朝鲜使者来华常购其集。著有《有正味斋诗集》十六卷、《诗续集》八卷、《诗外集》五卷、《骈体文》二十四卷、《骈体文续集》八卷、《词集》八卷、《词续集》二卷、《词外集》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赵怀玉】(1747—1823) 字亿孙,一字映川,号味辛,晚号收庵。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丁父忧归,遂不复出。后主通州石港书院讲席六年,诸生极爱戴之。性坦荡,胸无城府,笃于友朋,与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齐名,时称孙洪黄赵,皆以诗名。怀玉诗多题咏书画文玩及与朋友送往迎来、唱和酬赠之作,其中有许多关心民间疾苦、批评弊政陋俗的作品,如《德政碑》写郡县官吏离任后多立碑纪“德政”,大多徒有虚名:“名存实则亡,石在人已朽。”其他如《连珠池》、《吴童冤》、《过关行》、《县门敞》、《回兵行》、《水车谣》、《清水谣》等皆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其诗以古体较佳,平易简朴,质胜于文。著有《亦有生斋文集》五十九卷,其中诗集三十二卷、乐府二卷、词五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黎简】(1748—1799) 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又号百花村夫子。顺德(今属广东)人。十岁能诗文,稍长综群书,兼工书画、印章。真草篆隶,得汉魏笔意,山水画直造元四大家之室。后与同邑张锦芳、番禺吕坚等相唱和,诗名鹊起。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调元视学广东,以古学试士,得其《拟昌黎石鼎联句》惊为奇绝,置第一,补诸生,诗名益振,遂自署“石鼎道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膺选拔贡,得赴廷试,寻丁外艰。服阙后,得气虚疾,益淡于仕宦之情,遂一生未曾逾南岭,而其诗名则远近皆知。简慎于交友,袁枚至粤,欲一见,力却之,并遗书摘其平日诗中伤忠厚之语以责之。简既淡于进取,遂深居于百花村中,筑亭曰众香,筑阁曰药烟,以鬻

书画为生。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其诗初学李贺,后出入于二谢、杜、韩、苏、黄之间,取径博大,严于锤炼,力避平熟。其《答同学》云:“简也于为诗,刻意轧新响。当其跨步时,语亦颇倜傥。”又《与人论诗》云:“绝境无坦步,高唱有裂笛。弯弓石为肉,磨刀水先赤。要于其发端,真气贯虹霓。”可见其诗注重炼句炼字,注重发端起句及刻意求新,追求奇警峭拔之风格。其诗多以两广地区农村景色及山川风物为题材,南国情调十分浓郁,如:《广州歌》写广州一带风土人情;《歌节》写广西瑶族妇女赛歌场面,不仅生动感人,亦有史料价值。还有一些反映百姓苦难和政治腐败的作品,如:《官放仓》写饥民买官放平价米时的困难,《四月二日》记录了广州地区饥民抢米风潮,《田中歌》描写了孤苦零丁的寡妇母子之悲惨境遇,均可见作者对贫困人民的同情。简为著名画家,诗多富于画意。其《内人归省还》云:“杨柳晓依依,桃花水满陂。波暖恬恋影,香雨软濛丝。白袷空江色,青云重鬓垂。罗敷自今出,不使路人知。”早年尝批点李贺集。自编诗集名《五百四峰堂诗钞》,凡二十五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苏文耀为撰《黎简先生年谱》。(王学泰)

【黄景仁】(1749—1783) 字仲则,又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孤,赖祖父抚养以成立。少工制艺,十七岁为诸生,次年与同里洪亮吉为友,始学作诗。家贫,不愿授徒,遂游食四方,先后客于徽州府同知王祖肃、浙江道台潘恂、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及安徽学政朱筠署中。平生于功名不甚关切,独恨己诗无幽燕之气,尝蓄意北游燕、赵、京师。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抵京师,名公卿如翁方纲、纪昀、冯敏昌等皆奇其才,争与之交。次年,高宗东巡,途经天津,各省士子进献诗赋,景仁至津门与试,考中二等,授武英殿书签。乾隆四十二年,迎老母妻子至京,应顺天乡试,不售。后受业于王昶门下,与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洪亮吉等结都门诗社,诗酒唱和,而家境益困。后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游西安,得金捐资为县丞。乾隆四十七年,返京,赴吏部候铨选,在京为债家所迫。次年,欲再至西安求助,抱病而行,卒于山西运城盐运使沈业富署中。景仁存诗千馀首,为其贫病交加、飘泊潦倒、抑塞不平而又倜傥不羁的一生之写照,如《送春》、《太白墓》、《秋兴》、《夜起》,皆可见诗人之愤懑充溢于字里行间。《杂感》诗云:“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其孤傲与悲愤在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其描写自己穷困生活的作品颇能引起寒

士的共鸣,如:“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甌尘凝病妇炊。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都门秋思》)其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亦为人传诵。如《绮怀》中的名句“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摹珠箔数春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结束铅华悔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等皆流传极广。诗中也有许多赠友怀人或表现进取精神的作品,如《金陵待稚存不至适容甫招饮》、《少年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观潮行》等。景仁诗学李白,又出入于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朱庭珍云:“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仲则七古佳篇,造诣颇似如是。”(《筱园诗话》)邱炜萆则评以“清刚”两字(见《五百石洞天挥麈》)。著有《两当轩集》二十二卷,洪亮吉为撰行状、王昶为撰墓志铭。毛庆善、季锡畴为撰年谱。

(王学泰)

【宋大樽】字左彝,号茗香。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尝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居乡里多为善举,凶年煮粥活人,隆冬施衣絮,倡义学,以教贫苦子弟,置水器御灾,为乡人所敬。性好山水,东南诸名胜如天台、雁荡、黄山等地,莫不穷幽探胜。诗学李白,多模山范水之作。其《游天台诗》于当时颇负盛名。阮元云:“宋茗香大樽有《游天台诗》。茗香诗法青莲,意境超妙,置之琼台石梁间,尤觉飘飘欲仙也。”(《定香亭笔谈》)此外,《过仙人拍手崖》、《招叶二青游天台》皆为其代表作品。其学李白豪放风格之作往往流于模拟、形似;学李白自然纯真之作则较为成功,如《寄山塘酒家》:“美人安在哉,犹在姑苏台。一片五湖月,香魂独自回。春风忽吹散,化作桃花开。笑劝当垆女,如何不举杯?”大樽晚年诗学汉、魏。郭麐云:“惜其晚年悔弃少作,欲变而之汉、魏,如枯僧作禅语,了无生气。往时酣嬉跌宕之作,概从刊削,深可恨也。”(《灵芬馆诗话》)其诗论见其《茗香诗论》,多循传统诗论,少有发明。著有《学古集》四卷、《诗论》一卷、《牧牛村舍外集》四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陈斌为作别传。(王学泰)

【陈端生】(1751—1796) 字春田,一作字雲贞,号春田。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祖父陈兆仑官至通政司副使,著有《紫竹山房文集》,曾主持修纂《续文献通考》,反对“女子不可以才名”的说法。其父陈玉敦,清高宗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能诗。母汪氏亦

能诗,且懂弹词。乾隆三十三年,端生十八岁,开始创作《再生缘》,不到两年写成十六卷六十四回,约七十万字,后因其母亲和祖父先后去世而中辍。二十三岁出嫁后,更无暇写作。三十岁时,其夫范莛(字秋塘)因科场案(一说因继母诉其忤逆案)发配伊犁。《再生缘》的写作间断了十四年,直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方恢复撰写,又写了一卷,连前共写成十七卷,未终稿而又辍笔。仁宗嘉庆元年(1796),范莛赦归故里,端生亦于同年谢世,年仅四十六岁。《再生缘》的后三卷由梁德绳(字楚生,浙江钱塘人)续成,由侯芝(字香叶,江苏上元人)修改润色后付梓。《再生缘》虽属曲艺形式,也可视作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它托名元代女子孟丽君男装应试,及第后历官至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居的动人故事,文笔细腻,为陈寅恪和郭沫若所推重。端生另有诗集名《绘影阁集》。事见《再生缘》及陈寅恪、郭沫若对此书的研究论著。

(陈祖美)

【法式善】(1752—1813) 蒙古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榜名运昌,中式时,清高宗赐改今名,字开文,号时帆,又尝筑梧门书屋,学者称梧门先生。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擢国子监司业,移左庶子,迁侍读学士。以大考不合格左迁工部员外郎。后升至国子祭酒。式善在翰林最久,主持北方诗坛垂三十年。吴锡麒称其奖藉士类,乐与有成。一时贤士大夫,屣满户外,四方宾客,奉尺牍问讯者,日数十至(见《存素堂集序》)。生平以文字、朋友为性命,家造诗龕,以奉友人酢赠之诗作,题云:“情有不容己,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见《随园诗话》)好藏书,自言自登仕版以来,一甌一裘,悉以易书,交游既广,江南北、浙东西,相知者也多以藏书副本见赠,故所贮极富。尝从禁中借出《永乐大典》,命胥吏钞录,十五年中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装为一百七十七册。(见《存素堂文集·宋元人集钞存序》)式善崇信“神韵说”,诗多题咏山水及四时风光之作,其佳者清微淡远、冷然轻妙。杨芳灿序其诗云:“桃花流水,灵源自通;桂树小山,清梦长往”,颇能形容其风格。式善留心文献,勤于记载,著有《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备忘录》一卷、《明李文正公年谱》五卷、《梧门诗话》八卷、《八旗诗话》二卷。辑有《同馆试律汇钞》、《同馆赋钞》等。其诗文集数度刊刻,名为《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诗稿》一卷、《续》一卷、《诗二集》八卷、《续》一卷、《存素堂诗续集录存》九卷、《存素堂文集》四卷、《续集》二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其《存

素堂诗续集录存》中附有年谱一卷。(王学泰)

【铁保】(1752—1824) 原姓觉罗,因觉罗为当时皇室一脉尊称,遂改姓栋鄂,字冶亭,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世为将门,至保始折节读书。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吏部主事,袭恩骑尉世职。大学士阿桂屡荐之,迁郎中,擢少詹事,补员外郎、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历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迁礼部侍郎,兼副都统。仁宗嘉庆四年(1799),出为漕运总督。嘉庆七年,迁广东巡抚。嘉庆十年,擢两江总督。嘉庆十四年,因运河堤屡溃,河工日坏,吏治日弛,酿成重狱,褫职遣戍乌鲁木齐。逾年,给三等侍卫,寻擢礼部尚书,后又因事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嘉庆二十三年,召为司经局洗马。宣宗道光(1821—1850)初,以疾乞休,赐三品卿衔。道光四年(1824)卒。铁保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编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后复辑为一百三十四卷。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为旗人第一部诗歌总集。铁保游宦四方,几经升降,其诗多记其境遇变迁。自云:“诗以纪事,纪君恩,缅祖德,申屹岵之思,写棠棣之乐,笃室家之爱,联友朋之情;推之山水奇踪,风云变态,鸟兽草木,托兴适怀,诗存则境存,于以验少时之性情,证中年之得失,励晚节之操舍。”(见阮亨《瀛舟笔谈》)此论正可概括其诗内容。诗风通俗浅显,时见情趣。如:“浪迹东南兴复幽,书生情性总宜秋。等闲不敢探名胜,多恐溪山笑宦游。”(《和陈雨人》)工书法,与翁方纲、刘墉齐名。著有《淮西小草》一卷、《玉门诗钞》一卷、《梅庵诗钞》五卷、《惟清斋文钞》六卷、《诗钞》五卷、《年谱》一卷。《清史稿》卷三五三、《清史列传》卷三二有传。

(王学泰)

【杨芳灿】(1753—1815) 字才叔,号蓉裳。金匱(今江苏无锡)人。戏剧家杨潮观之子,幼有神童之名,年十九为诸生,试江宁,见赏于袁枚。学使彭元瑞奇其才,拔贡应廷试,授甘肃伏羌知县,善为政,应变敏决,以功擢知灵州,因其弟揆为甘肃布政使,例应回避,入赘为户部员外郎,与修《会典》。后丁母忧,归。尝主衢州、杭州及关中书院数年,又曾入蜀修《四川通志》,主讲锦江书院。芳灿诗多题咏酬赠之作,善于以清丽芊绵之七言古体与朋友唱和赠答,如《长歌赠笠舫兼寄紫屋》、《珠江曲送徐大景春之广东》、《喜汪大容甫(中)过访长句赠之》、《晚春花事盛开因寄怀亦斋三兄、荔裳二弟》、《寒夜有怀黄大仲则(景仁)》等皆是此类作品之代表。七古歌行学初唐四杰,藻情绮思,音调宛转,兼李商隐之工丽、白居易之缠绵。如前所举《珠江曲》开篇云:“芙蓉湖头春水流,芙蓉峰畔春云愁。沙棠双桨木兰桹,送君远向珠

江游。珠江曲曲环南国,丁星金翠繁华窟。蛮乡怪物载图经,海国方言通象驿。”以下历数岭南风景之美、物产之奇,最后写到分别:“无端送别黯销魂,把袂临溪未忍分。我所思兮望明月,君之出矣逐浮云。渭城三叠殷勤唱,碎曲零歌惹惆怅。碾碗斟来且莫辞,布帆吹去应无恙。十八滩头走急流,计程五月下珠江。倘逢庾岭归来使,寄我罗浮蝶一双。”这类作品确是“回波舞雪,振羽沉宫,声情之美,往往移人”(《石溪舫诗话》)。芳灿也有不少反映广阔社会生活及民生疾苦的作品,风格古朴,与其效法初唐的七古长歌迥然不同,如《盖神庙》写庙会、商人借盖庙盘剥穷人。其宁夏采风组诗较全面地反映了宁夏一带弊政陋俗及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堡渠长》、《卖女谣》、《粮草税》、《渠工税》、《两蕃部》等皆是其中较深刻的作品。芳灿主持修订《四川通志》二百二十六卷。其诗文有《真率斋初稿》十卷、词二卷,所收皆早年作品,刊于高宗乾隆四十四年(1779)。晚年刊有《芙蓉山馆诗钞》八卷、《词钞》二卷、《文钞》一卷、《续钞》一卷,为仁宗嘉庆十年乙丑至十二年丁卯刊(1805—1807)。其逝世后,刊有《芙蓉山馆诗钞》八卷、《补钞》一卷、《词》二卷、《词附钞》一卷、《文钞》八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自撰《杨蓉裳年谱》一卷。(王学泰)

【孙星衍】(1753—1818) 字伯渊,一字渊如,号季逯。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习诗古文辞,与同里洪亮吉、黄景仁、杨芳灿等齐名。弱冠以诗谒袁枚,袁称为“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不愿以诗名世,遂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之学。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一甲二名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充三通馆校理,散馆改刑部主事,为法宽恕,历官员外郎、郎中,转山东兖沂济曹道,权山东按察使,凡七阅月,平反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仁宗嘉庆四年(1799),丁母忧,归,后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服阙,嘉庆十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权布政使。嘉庆十六年,引疾归,以著述为事。星衍不欲以诗名,但其诗笔悍厉,造语峭拔,七古光怪陆离,有可传之篇。其七言歌行多题咏文玩器物与赠答唱和之作,如《留鼎歌》、《偕杨三(伦)洪大(礼吉)黄二(景仁)放舟看荷至平山堂》、《秋夜》、《登废寺千佛楼作》、《楼上倚声图》等皆其代表作品。星衍诗学李贺,效其幽思隽句,避其艰涩。如:“松梢浮烟暮霞薄,榭叶无人自相逐。山根草死闻枯香,碎石马蹄声促促。回崖千盘失徒侣,日入空山响樵斧。双溪石发生暗泉,十月山禽作春语。”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及揭露政治黑暗的篇什,如《乡人有言饥民者》、《割麦词》、《贵家谣》等。著述极富,重要者有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仓颉篇》三卷、《元和姓纂》十卷、《松江府志》八十四卷、《偃师县志》三十卷、《澄城县志》二十卷、《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编辑了《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小岱南阁丛书》等。其诗文编为《孙渊如先生全集》,其中《方茂山人诗录》十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邑人张绍南为撰《孙渊如年谱》二卷。(王学泰)

【伊秉绶】(1754—1815) 字组似,号墨卿。福建宁化人。少服膺程、朱理学,讲求立身行己之学,工诗古文词,受知于朱珪,纪昀亦甚器重之,延课其孙。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仁宗嘉庆三年(1798)充湖南乡试副考官,出知广东惠州府,在惠州有善政,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因吏议去官,士民吁留,旋授扬州知府。丁忧归。嘉庆二十年,服除入都,至扬州而卒。秉绶为循吏,关心人民疾苦,这也反映到诗歌创作之中。洪亮吉谓其“诗如贞元朝士,时务关心”(《北江诗话》),即言其多反映民生疾苦及时事动乱之作,如《赈灾》、《扬州》等诗写当时高邮、宝庆一带水灾给人民带来苦难和作者因不能及时解救而产生的歉疚之情。其他如《大竹屯歌》、《通渭歌》、《吕堰驿歌》都涉及乾隆(1736—1795)与嘉庆(1796—1820)年间的社会动乱。秉绶一生尊崇苏轼,诗亦效苏,多清深雄迈之作。亦工书,其书出于刘墉,欲别辟蹊径,伟岸自喜。著有《留春草堂诗钞》七卷。《清史稿》卷四七八、《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赵怀玉为撰墓表。(王学泰)

【杨凤苞】(1754—1816) 字傅九,号秋室,又号黄汴、小玲珑山樵、西园老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廪膳生。少时即以才子名于乡,尤以《西湖秋柳词》名扬诗坛,人称“杨秋柳”。性孤傲,不乐至城市,经史小学,皆有根柢。阮元编纂《经籍纂诂》,凤苞参与分纂。尤熟于晚明史,撰《南疆逸史跋》十二篇,又详记庄廷钺“《明史》案”本末。晚年馆郡城陈氏家。留意乡邦文献,陈焯辑《国朝湖州诗录》,为增补数百家,并考其爵里。其诗初学李商隐,后服膺朱彝尊,晚年学厉鹗,喜爱使事用典,崇尚词华。其七言歌行,沉雄激荡,摆脱拘羁,如《贯休罗汉》、《梁将军画兰》等篇实兼李梦阳、朱彝尊之所长。著有《秋室集》十卷,后五卷为诗。《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三有传。沈登瀛为作传。(王学泰)

【王芑孙】(1755—1817) 字念丰,号惕甫,一号铁夫,又号楞伽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异禀,年十三能操觚为文。客京师,以诗闻于时,曾馆董浩、梁诗正、王杰、刘墉、彭元瑞等朝中显贵之家,

为诸人捉刀代笔,后充教习,与馆阁之士游,故虽未挂朝籍而朝廷有重大典礼,所用文章,芭孙多参与属草。芭孙肆力诗、古文,久困场屋。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授华亭教谕。芭孙名位不高而交游甚广,有《岁暮怀人诗》六十四首,当时知名学人文士皆为其友,与张问陶、法式善、杨芳灿、何道生唱和尤多。诗学杜甫、韩愈,富于气势,多题咏书画文玩、模山范水及与诗友唱和之作。《为任征士文田题〈观书图〉》四首、《鲑鱼关》、《绣佛幢为金贞女作》、《送洪稚存(亮吉)出督黔学兼寄石琢堂(韞玉)楚中》皆其代表作品。“其诗以五言古体为最工,落笔有芒,压纸有力,浮响肤词,划削殆尽,譬诸铁笛横秋,霜钟警夜,天高月白,木落江青。其境殊不易到。”(《石溪舫诗话》)如:“西风飒然来,梧叶飘庭除。援琴抱明月,渺渺云谁思?伊人隔湘浦,云水远间之。临风再三抚,弹我相思辞。”(《古风二首简任文田》第一首前八句)可见其体格。芭孙精通金石学,撰有《碑版广例》。辑有《古赋识小录》八卷、《泖东近课》五卷。其诗文有《渊雅堂编年诗藁》二十卷、《惕甫未定稿》二十六卷、《集外诗》二卷、《瑶想词》一卷、《读赋后词》一卷、《文外集》四卷、《文续稿》一卷、《编年诗续稿》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五八有传。秦瀛为撰墓志铭,王牖为作传。

(王学泰)

【吴薰】(1755—1821) 字及之,号抑庵,一号山尊。安徽全椒人。少孤家贫,勤奋向学,博闻强识。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嘉庆八年,大考,以一等二名升侍读学士。次年,充广西乡试副考官,升侍讲学士,因受同僚妒嫉以母老告归。归田后,曾于六安主讲赧颍书院,后历主扬州梅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与修《全唐文》,辑《百蓂红词》。薰诗学唐之韩、孟、皮、陆,以题赠酬酢及怀古咏史之作为多,如《咏明赵忠毅公铁如意》、《不灰木炉》、《题画梅》、《出都怀朱习之》等为其代表作品。也有少量反映贫困农民苦难的作品,如:《骤雪》反映贫富不均,《怜卖妇》写灾民将女卖与人作童养媳的情景,皆通畅平易,与其斗险排弃之作不同。工骈体文,操笔力就,哀艳感人。有《吴学士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抑庵遗诗》八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夏宝晋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石韞玉】(1756—1837) 字执如,号琢堂,又号花韵庵主人,晚号独学老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聪敏,十八岁为诸生。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一甲一名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乾隆五十七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旋奉命提督湖南学政。

仁宗嘉庆元年(1796),充日讲起居注官。嘉庆三年,入直上书房,寻出为重庆知府兼川东道。因镇压白莲教有功,嘉庆十年,擢陕西潼商道,因有善政,旋擢山东按察使。以事被劾革职,后念在川军务劳绩,赏给编修。旋以足疾乞归。在乡主持紫阳书院二十余年。韞玉诗多写其游宦生涯,其中许多篇章描写到当时社会问题与民生疾苦,如:《双旌谣》写“执法之臣善弄法,睚眦必报心始快”,揭露吏治黑暗;《瘦马行》写吴中嫁女,“爷娘论财不论耦”,使女子所适非偶;《迎神谣》批评吴中迎神浪费民财之陋俗;《即事杂诗》以七律组诗形式反映川中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其诗不主一格,兼学唐、宋。七绝小诗秀洁工丽,如:“酒旗风飏杏花村,野店人稀掩笋门。鸚鵡一声山雨足,板桥绿到旧潮痕。”(《舟行杂咏》)善写杂剧,作有《花间九奏》,包括九种单折短剧,多以古代诗人事迹为题材,如《桃叶渡江》、《桃源渔夫》、《乐天开阁》、《贾岛祭诗》、《琴操参禅》、《对山救友》等。著有《多识录》、《读左卮言》、《独学庐诗文集》四十六卷、《袁文笺证》十六卷、《补注》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九五皆有传。

(王学泰)

【宋湘】(1757—1826) 字焕章,号芷湾。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九岁能文,下笔有奇气。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嘉庆十二年,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次年充贵州乡试正考官。嘉庆十八年,出为云南曲靖知府。该府所属马龙州地瘠民贫,湘捐俸购木棉教妇女纺织,当地遂盛于机织,所产之布名“宋公布”。寻署广南府,亦有惠政。宣宗道光五年(1825),迁湖北督粮道,卒于任。湘诗多以其家乡与其久居之地云南风物为题材,描写山村水郭、田园野林之趣,如:“夜雨湖沙没,春风岸草遥。罾支三板艇,柳幔六堤桥。沽酒记前渡,看花还几朝?等闲分岁月,深竹卖饴箫。”(《湖居》)其他如《家园杂忆四十韵》以清新流丽的笔调、简练精工的语言描述了广东故园风景之美及其对故乡的思念。湘为廉吏,在其诗中颇能自我反省,如《感兴》诗中云:“我今前去滇南守,知是豺狼是父母?竹马无情呼不来,车乘翘翘畏我友。”诗中也颇能反映民生疾苦,如:《河南道中书事感怀》五首描写了令人怵目惊心灾区人民的惨状;《买鱼叹》反映了官府对人民的劫掠及人民与官府的对立;《骡驮二章》用隐喻的手法暗示出人民不堪压迫,最终会导致反抗。湘襟抱豪迈,寄兴无端。其七古歌行驰骋纵横,笔墨淋漓,句法错落,富于气势;七律气魄雄厚,力辟新境界;五言古体、近体,自然恬淡、多用白描;七绝有民歌风味。其诗在

广东颇有影响,与黎简并称,代表了清中叶粤诗最高成就。著有《史传事略》一卷、《山东盐法志》二十二卷、附编十卷、《红杏山房诗钞》十三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曾燠】(1759—1831) 字庶蕃,号宾谷。南城(今属江西)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丁忧后,充军机章京。乾隆五十五年,迁员外郎。乾隆五十七年,转外官,授两淮盐运使。后历任湖北、湖南按察使,迁广东布政使。仁宗嘉庆二十年(1815),擢贵州巡抚。后因事降授两淮盐政。燠诗多写其游宦生活,也有大量与僚友唱和之作。《游慧山饮第二泉》、《真州淮堤庵老梅行》、《瓜洲登大观楼记所见》、《正月十二日探梅邓尉》二首皆其代表作品。张维屏评其诗云:“宾翁诗不专一家,不名一格。其朴实遒健者,既属称心而言;其熔铸精深者,亦复超心炼冶。性灵佐以书卷,故非空疏之性灵;才气范以准绳,故非叫嚣之才气。”(《国朝诗人徵略二编》)此评语言燠对当时流行的肌理、性灵二派有所折衷。其五、七言绝句,风神淡逸,颇有唐音,如:“檐动微风来,虚堂一钟悄。阶前瘦蛟影,斜月在松杪。”(《秋夜宿万寿寺》)“扬子江头绿涨天,芜城一片是春烟。春来何处无杨柳,不拟扬州最可怜。”(《扬州柳枝词》)燠久官扬州,时与宾从赋诗为乐,辟题襟馆于盐运使署后,周植花木,为唱和之所,对东南诗坛有影响。辑有《邗上题襟集》一卷、《续集》一卷、《分效江醴体诗》一卷、《朋旧遗诗合钞》二十二卷、《续钞》一卷、《江西诗徵》九十四卷、附刻一卷、补遗一卷、《国朝江右八家诗选》八卷、《国朝骈体正宗》十二卷。其诗集名《赏雨茅屋诗集》二十二卷、《外集》一卷。《清史列传》卷三三、《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九二有传。(王学泰)

【吴文溥】字博如,号澹川。浙江嘉兴人。恩贡生。少时曾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西游关中,佐其幕。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南巡,召试,报罢。馆吴门数年,后又曾游闽台、湖北。仁宗嘉庆元年(1796),阮元为浙江学政,文溥子向阮呈文溥诗,阮“定为浙中诗士之冠”,并言其“《关中草》、《闽游草》尤为直逼古人。”(《定香亭笔谈》)嘉庆三年(1798),客济南。嘉庆四年,阮元抚浙,罗致幕中,为其修订《两浙輶轩录》。次年,病归,卒于乡。文溥精于韬略,尝参预苗疆、台湾之役,为时所重。尝“自言幼嗜吟诗,三十岁而成癖,寝食都废”(《冷庐杂识》)。其《示儿》诗则云:“除却警人诗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其诗分两类:一类是游关中、闽海时作品,诗多沉郁苍凉,颇有杜甫、韩愈笔意,如《入关马上作》九首、《甘泉山》、《杜陵曲》、《青门观侯生舞双剑赠益都

沈八丈歌》等;另一类是写其隐逸生活或描写江南风光作品,气体高华,笔意简淡,近唐代王、孟、韦、柳诗风,如《江头春夜有忆》:“江水去不已,年华亦暗流。东风吹客梦,杨柳作春愁。此夕故园月,何人独倚楼?归来携素手,须及卷帘秋。”文溥还有一些对百姓疾苦表示关切的篇什,这类作品大多写得质朴亲切,如:“临觞意倍深,卒食心如捣。昨有啼饥人,朝来路旁倒。感激念同类,平生耻独饱。”(《酒间感赋》)文溥一生沉于幕僚,阅历颇多。著有《南野草堂笔记》十二卷、《续笔记》五卷、《所见录》、《师贞备览》、《汉唐石刻目录》。其早年诗收入《霍林山人诗集》,凡五卷,有乾隆三十六年研山堂精刊本。晚年诗收入《南野堂诗集》,凡七卷,有乾隆五十九年味兰居刊本。《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皆有传。(王学泰)

【杨揆】(1760—1804) 字同叔,号荔裳。金匱(今江苏无锡)人。幼聪颖,少即涉猎经史,年终弱冠,赋咏盈千。与其兄芳灿齐名,人有“二难”之目。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乾隆五十五年,充文渊阁检阅,入军机处行走。乾隆五十六年,福康安出征卫藏,奏揆从行,擢内阁侍读,旋授四川北道,历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四川布政使,参与川中军务。后以积劳卒于官,赠太常寺卿。揆从征十馀年,出塞数千里,其诗多写塞外风光,如《青海道中》、《熊耳山》、《鲁工喇》、《飞越岭》、《丹达山》、《星宿海歌》、《皮船》等皆奇横峭拔、雄传古奥,如《索桥》借写行人过桥时的内心恐怖以显示山高谷深与索桥之险:“曳踵窘不前,森然竖毛发。宛宛虹舒腰,落落蛇蜕骨。迴疑匹练铺,窄抵长矩拽。谁遣高梯横,莫挽巨筏脱。翻风乍飞翥,缘云更艤飏。手怯朽索扞,足苦缩版裂。”揆早年学初唐,诗风清丽芊眠,出塞后诗风始变。著有《桐华吟馆诗词稿》十二卷、《词稿》二卷、《文钞》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赵怀玉、秦瀛各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王昱】(1760—1817) 又名良士,字仲瞿,号蠡舟,又号昭明阁外史。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好游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马如飞,慷慨悲歌,不可一世。其座主吴省钦馆和坤家,昱曾三上书于吴,请其弹劾和坤,不听。仁宗嘉庆(1796—1820)初,川中白莲教起事。吴省钦荐昱能作掌中雷,为仁宗所深斥。朝士闻之,遂薄昱。后昱屡应会试不第,益放纵,郁郁而终。昱诗多通过描摹山水风光、咏史怀古以摅写其落拓不耦、抑塞磊落之气,如《对雨》、《项王庙》、《住穀城之明日谨以斗酒年膏琵琶三十二弦致祭于西楚霸王之

墓》等皆悲歌慷慨,表达其怀才不遇而产生的愤懑之情。其诗富于感染力,工于七律,如《落花诗》:“三十韶华栩栩过,杀花声里坐销磨。百年流水随春去,一代红颜奈老何。天上好风君子少,世间无福美人多。西窗一种凄凉事,灯火更深月照他。”晁亦工骈文。著有《烟霞万古楼文集》六卷、《烟霞万古楼诗选》三卷、《仲瞿诗录》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九有传。龚白珍为撰墓表铭。

(王学泰)

【孙原湘】(1760—1829) 字子潇,晚号心青。昭文(今江苏常熟)人。三四岁即知读诗,口咏指画,若能通晓。自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与席佩兰成婚,始学为诗,积两年得五百余首,夫妻唱和甚得其乐。才弱冠,诗名已噪京都。乾隆六十年以第二名中举。仁宗嘉庆十年(1805)以会试第二名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后因病请假归,遂不复出。曾主紫琅、娄东、游文诸讲席。原湘居乡,十分关注乡里民间疾苦,有水旱赈恤事,必先为经划之。不喜入官府,见官则以里闾疾苦相告。其论诗本诸袁枚(其妻席佩兰为袁女弟子)“性灵说”,尝言:“诗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又云:“规规于唐宋者,类似剽窃摹拟,失己之本来面目,而性情亡矣。”(见赵允怀《翰林院庶吉士兼武英殿协修孙先生行状》)其诗以两类为最突出。一类是反映民间疾苦及讽刺弊政陋俗之作品,如:《开仓谣》描写农民纳粮交税时官吏用大斗量进,作超度剥削;《太守来》借企望清官以写当时吏治的腐败;《养蚕曲》写养蚕人家之苦况;《吴趋吟》全面反映了吴中陋俗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杂记》组诗描写了北京城中饿殍满地和政治黑暗。这些作品正如赵允怀在为孙原湘所写行状中所言,可与“白傅《秦中吟》、少陵《石壕吏》并传”。一类是写身边琐事与写夫妇之情的作品,孙妻佩兰亦能诗,夫妻唱和之作极多,其中多佳作,如《叠韵示内》、《寄内》、《寄家书作》、《得内人书》、《内子思结一廛于湖上属余赋其意》、《病起》等。这类作品以近体为多,以风韵胜。如:“晚霞斜驻玉颜红,一角秋山落镜中。小饮不辞莲子盞,嫩凉刚袭藕花风。心期何待盟初月,笑语还防送远空。知否双星应妒汝,药炉经卷伴梁鸿。”(《七夕同内人》)洪亮吉言其诗“如玉树浮花,金茎滴露”,颇能得其实。原湘亦工骈文。著有《天真阁集》五十四卷、《外集》六卷,其中诗三十八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赵允怀为撰行状。

(王学泰)

【张惠言】(1761—1802) 初名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时即通《周易》大义,十四岁

为童子师。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嘉庆六年,散馆,授翰林编修。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又尝辑《词选》,倡“微言大义”之说,推尊词体,开创常州词派。在骈文领域,与恽敬创立了阳湖派。其诗传世者不多,诗风近于韩愈,如《宜山令歌题杨右侯遗照》以错落句法与散文化诗句歌颂清官。著作极富,有《周易郑氏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仪礼图》六卷、《茗柯文编》九卷。《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

(王学泰)

【钱枚】(1761—1803) 字枚叔,又字实庭,号谢盒。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父钱琦与袁枚交好,生枚时正逢袁造访,故以袁名名之。少好读书,曾手抄《汉书》一过。与其弟钱林齐名,有“二难”之目。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纵酒成疾,以贫病卒。枚论诗继承袁枚“性灵说”,有诗云:“风格分明见性灵,步趋前辈有门庭。旗亭妙绝双鬟唱,老姬何曾解细听。”(《偶然作》)其诗多写日常琐事、四时风光。诗风清秀隽永,长于律绝,如:“东风卷絮渐成灰,渡口何年打桨回?不访桃花访桃叶,春潮肯为美人来?”(《秦淮杂兴》)其古体则多赘词。亦能词,所著《微波亭词》亦名于时,著有《斋心草堂诗钞》四卷,龚自珍为作序。

(王学泰)

【张问陶】(1764—1814) 字仲冶,一字柳门,又字乐祖,号船山,别署蜀山老猿、豸冠仙史、宝莲亭主、群仙之不欲升天者、药庵退守等。四川遂宁人,生于山东馆陶。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仁宗嘉庆五年(1800)、六年两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十年,迁御史,有直声。嘉庆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改吏部郎中。次年,出任莱州知府,因与上官相齟齬,遂称病辞官。卸任后,寓居苏州。晚年邀游吴、越,时往来于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病卒。问陶崇奉“性灵说”,但由于关注现实生活,其诗颇能反映当时重大社会问题,如其早年所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反映了川楚一带白莲教起事,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此组诗当时传遍都下,使问陶享大名。其他如《丁巳九月褒斜道中即事》、《南城判事示吏民》、《拾杨稊》都反映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切。问陶诗中较多的是其多次往返北京、四川途中以及在江南居住时描山绘水的即兴之作。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山川风貌,而且描写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诗学袁枚而比袁诗更为流利和富于情趣,如《戏题罗两峰〈鬼趣图〉》八首之六:“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凡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扇道路,丰

颐随意插牙须。笑他一样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诗中寓庄于谐，对人情世态的揭露十分深刻、严峻。其七律工于属对，但不注重镂文错采、使事用典。七绝平易流畅，无论写景叙事，或说理抒情，皆能曲尽其妙。其《论诗绝句》云：“跃跃诗情在眼前，骤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问陶多才艺，工书擅画，书法近于米芾，画近于徐渭。著有《船山诗草》二十卷、《船山诗草补遗》六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蔡琬为撰《张船山先生年谱》一卷。

(王学泰)

【鲍桂星】(1764—1826) 字双五，一字觉生。安徽歙县人。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嘉庆八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出任河南乡试正考官，提督河南学政，转侍读、侍讲，充山西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北学政，擢工部右侍郎。嘉庆十九年，以“妄言乱政”部议革职，不准回籍，令其在京闭门思过，仍责成五城御史不时稽察，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嘉庆二十四年，复职，为编修。宣宗道光(1821—1850)间，以侍讲乞休。桂星被革职以前多题咏山水胜迹及酬酢唱和之作，革职家居时多咏物、咏史之作，其集中七律咏史诗百餘首、五律咏物诗百餘首皆家居时作。诗格苍凉沉郁，出入于杜、韩之间。著有《续近思录》十四卷、《觉生诗钞》十卷、《咏物诗钞》四卷、《咏史诗钞》三卷、《感旧诗钞》二卷、《觉生诗续钞》四卷。《清史列传》卷三三有传。有作者自订年谱。

(王学泰)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云台，又作芸台。仪征(今属江苏)人。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大考第一，超擢少詹事，入直南书房，迁詹事，充文渊阁直阁事，提督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擢内阁学士。仁宗嘉庆(1796—1820)初，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尝总裁会试，得士最盛，一时名士如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汤金钊、郝懿行等悉出其门。其后复出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等省巡抚，曾为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大学士致仕，后加太子太傅，卒谥文达。元一生宦游四方，足迹半中国，其诗多为题咏名山大川、古迹名胜及与僚友唱和酬酢之作。七言古体最佳，如《大龙湫歌用禁体》、《谒会稽大禹陵》、《邀同人游皋亭山看桃花》、《登州听海涛声》皆为其代表作品，风格清雄，富于气势，受苏轼、陆游歌行影响。诗中时咏新事物，如：《望远镜中望月歌》描写在望远镜中所见到的月

球景象；《同人分咏远物得红毛时辰表》咏西洋机械表；《翡翠玉效乐天乐府》写缅甸之绿玉。这些篇章皆写得细腻而富于趣味。其律体较弱，七绝似晚唐，如：“桥外长林绿满天，夕阳影里听鸣蝉。一从瀛海扬帆后，别却烟波五十年。”(《绿野舟杂咏》)元虽为达官，不废治学，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皆造其微。又好奖掖人才，刊刻丛书，表彰绝学；主持风会，领袖文坛数十年。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设立学海堂，对当时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皆有影响。曾罗致学者编辑《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汇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餘卷)。著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石渠随笔》、《两浙、山左金石志》、《两浙輶轩录》、《广陵诗事》。辑有《淮海英灵集》。其诗文收入《擘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三卷、《续集》十一卷、《再续集》七卷、《外集》五卷。《清史稿》卷三六四、《清史列传》卷三六有传。

(王学泰)

【舒位】(1765—1815) 字立人，号铁云。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因父官广西河池州，其伯父官江南，遂寄家于吴。十岁下笔成章。曾随父出镇南关，迎安南使者，赋《铜柱诗》相赠答，传诵海外。父丧后，侨寓湖州乌镇十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后应贵州道台王朝梧之聘赴黔，适逢苗疆不靖，屡有战事，为治文书，甚得主帅勒保器重。勒保移督四川，召之往，以母老辞，归后，贫无以养，乃乞米吴、楚间。岁归省母，在真州闻母丧，星夜驰归，以哀毁卒。位一生为糊口奔走四方，穷困潦倒，依于他人。其诗多以典衣买米、羁旅穷愁为题材，以摅写愤懑与不平，并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世相，如《典裘》组诗、《米价》组诗等。其诗反映社会生活面较为广阔，如：《和尚太守谣》以幽默笔墨讽刺捐纳制度；《杭州关税吏》描写关吏搜索过往行人的白银青铜，无异于盗贼；《芦沟桥行》写目不识丁的芦沟桥关吏刁难过桥举子，目的在于敲诈勒索。集中还有大量以黔中苗民生活、风俗习惯为题材作品，如《黔南竹枝词》五十二首涉及四十多个少数民族或部族，描写了他们的生活与哀乐，诗后小注记录了所写民族部族的源流变迁，有史料价值。诗风郁怒恣肆，自由奔放，其七古尤能摆脱拘束，挥洒自如。张维屏言其诗“出笔则雷霆精锐，运思则冰雪聪明，使事则触手成春，用书则食古而化”(《国朝诗人徵略二编》)。其书法秀拔绝伦，兼善音律，每填词曲，辄按管弦以调之。著有《瓶水斋诗集》十六卷、《诗别集》二卷、《瓶水斋诗话》一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九有传。石韞玉、陈文述各为作传。(王学泰)

【吴嵩梁】(1766—1834) 字子山,号兰雪。江西东乡人。年十五即有文名,未冠赴金陵应南巡召试,归乡后曾从蒋士铨学诗,出游吴、越,为袁枚所激赏。仁宗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内阁中书,名振都下,翁方纲、王昶、法式善、吴锡麒并相推重。其篇什流播海外,朝鲜侍郎申纬推为“诗佛”,吏部判书金鲁敬父子以梅花一龕供其像及诗。曾为国子博士,琉球陪臣向邦正请入监,出其门下,后奉使来华者以得其赠诗为荣。以议叙得出知贵州黔西州,两充乡试同考官。嵩梁诗在当时享盛名,与黄景仁同为朝中好文之名公巨卿所推重。王昶言:“子山才高气逸。其诗若神龙之夭矫而不可攫也,若天马之腾踏而不可羈也,若鸾凤之翔于云表而不能自隐其苞采也。”(《香苏山馆诗集序》)朱庭珍言其诗“笔力雄宕清峭,得力苏、陆二家。七古、五古胜于近体,尤长于写山水名胜。全集以《庐山纪游》一册为冠,卓然可传,无忝名家。惟集中应酬诗太多,满卷公卿,投赠感激之什,十居其七,致后人以为口实。又律诗好贪秀句,不免媚时,自贬品格,神完气足之篇绝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近人,亦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筱园诗话》)。嵩梁诗作,少时沉丽,晚境清苍。《听香馆悼亡诗为岳姬绿春作》十五首、《九鸟滩》、《弋阳溪》、《康山草堂歌》、《莺脰湖》皆其代表作品,著有《香苏山馆诗集》二十一卷、《文集》二卷、《词》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

(王学泰)

【郭麐】(1767—1831) 字祥伯,号频伽,又号复生、复翁。吴江(今属江苏)人。诸生。少有神童之目,一眉莹白如雪,举止不凡,姚鼐极称许之。与查揆、胡元杲等人交好,同读书于清平山之拂尘庵。家贫,客游,受知于浙江学使阮元,参与编辑校定《两浙輶轩录》及《笔谱》诸书,以诗名于吴越。归筑灵芬馆,日以吟咏为事,摅其愤懑无聊之感。晚岁侨居嘉善以终。麐论诗宗袁枚性灵说,同时也受到姚鼐、翁方纲影响,对各家之说有所折衷。其诗以题画咏物、酬赠感怀、怀人哀损之作为多,善于写情。张维屏云:“国朝诗人善言情者不少,以黄仲则、乐莲裳、郭频伽三家为最。频伽含情若柳,吹气如兰,于憔悴婉笃之中,有悱恻芬芳之致。”(《听松庐诗话》)何日愈例举其言情佳句云:“若郭频伽之‘诗思逢秋容易瘦,美人如月本来孤’,‘远道人来烟雨外,伤心事在别离前’,‘明知相见难为别,便恐重来不是春’,‘容易相逢如梦寐,不多时节又黄昏’,‘粉黛独饶名士气,画图原是女儿身’,则香沁心脾,感均顽艳矣。”(《退庵诗话》)其诗风如沈其光所言:“频伽诗不拘流派,盖熔冶香山、诚斋诸家诗而自成一脉,能曲折道人胸臆

间意,使人动魄悦魂,咏叹淫佚,不能自己。”(《瓶粟斋诗话》)著有《灵芬馆诗集》、《灵芬馆杂著》、《灵芬馆诗话》、《江上日记》、《蘅梦词》、《浮眉楼词》、《忤余绮语》等。《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乐钧】 初名宫谱,字元淑,号莲裳。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喜为奇丽之文,曾撰《耳食录》,壮岁益工韵语,兼擅骈骊之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举人,游京师,屡试不第,嘉庆十六年(1811)会试报罢后,出京游吴、越,无所遇,奉母侨寓江淮间。嘉庆十七年,曾燠为两淮盐运使时,曾招钧入其幕。又曾客岭南,后郁郁以终。钧与吴嵩梁齐名,张维屏比较两人说:“江西诗家,蒋荅生(士铨)后,当推乐莲裳、吴兰雪(嵩梁)。两人同为江西人,同为孝廉,同为翁覃溪(方纲)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遨游王侯公卿间。莲裳久居幕府,兰雪久居京师。晚岁诗名,吴盛于乐。然合两集观之,香苏(吴集名)应酬投赠,外心较多,不如青芝(乐集名)多内心也。”钧诗以写落拓不遇情怀者为多,如《历下杂诗》:“海棠已见委苍苔,急为红梨冒雨来。春色春情都绝世,可怜墙角背人开。”沈涛评此诗云:“后二语为天下失路才人同声一哭。”(《匏庐诗话》)其写情之作《绿春》六十首,写吴嵩梁与其姬绿春之恋情,哀感顽艳,一时传播众口,因而与黄任、黄景仁、郭麐并称为清代写情四大高手。其诗中也有许多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作品,如《岭南乐府》组诗中有许多反映了当地陋俗、弊政、民生疾苦与帝国主义之侵略,其中《十三行》、《鸦片烟》、《金罐》、《械斗》、《买凶》、《断肠草》、《造饷》等都是佳作。其他如写百姓荒年无收仍被县吏逼索官粮、拆屋抵租的《划草行》,写凶年百姓以上为食的《观音土行》,皆真切动人。杨希闵言:“莲裳才气似逊兰雪、茗孙,而真意流露,秀韵天成,则反胜之。”(《乡诗揆谭正集》)著有《耳食录》十二卷、《二编》八卷、《青芝山馆诗集》二十二卷、《断水词》三卷、《骈体文》二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夏宝晋为著《权厝志》。(王学泰)

【彭兆荪】(1768—1821) 字湘涵,又字甘亭。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少随父官宁武,神隽有声。早为诸生,十五岁应顺天乡试,即已名满科场,诸公卿争欲罗致门下,后竟屡困科场,久不售。父歿后,家贫,破产为父兄偿债,自鞠养幼弟,只身客游于公卿之门。曾入江苏布政使胡克家与两淮盐运使曾燠幕,胡、曾皆重其才。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诏举贤良方正,长吏以之荐,固辞,不久即卒。兆荪诗可分前、后两期:其早年客居塞上,长楸走马,单骑射生,击剑读书,意气横出,故其诗有三河年少、扶风豪士之概,风格慷慨豪迈,如《镇朔楼十二韵》可作为此

时作品代表;其父亡后,斥田偿逋,落魄名场,驰驱道路,糊口四方,则多幽忧之音,此时则多用诗以描写其贫困潦倒生活和抒发磊落不平之感并表达满腹才学不为世用的愤懑,如《迁居》六首、《卖书行》、《读书》、《读书堂》、《除夕赋得四十明朝过》二首等。龚自珍谓其诗“郁怒清深”,主要体现在这类作品上,如《迁居》之一:“阑风伏雨夜茫茫,八口移家上野航。五亩园廛抛栗里,十年封券了巾箱。可能春藿长充膳,略换秋茅好拒霜。盼到纸窗萝屋底,一门团话小沧桑。”兆荪还效法元、白写了一些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乐府诗。举凡农民生活的困苦贫穷、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贪官污吏之残酷盘剥、土豪劣绅之横行乡里,都在诗中有所描写,如:《浚河渠》写官长为行船方便,用鞭子驱赶人们在“赤日行天汗如雨”条件下疏浚河道;《偏灾行》写农民在大灾之后得不到救济,发下的救灾钱物皆落在胥吏手中;《输租乐》揭发官绅勾结将绅士田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其他如《长官寿》、《当官仆》在叙事写人方面皆很成功,描绘了僚吏与仆役谄上骄下的丑恶咀脸。在艺术上其七律佳作较多,于丽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气。兆荪亦擅长骈文,在当时颇享盛名。著有《小谟觴馆诗集》八卷、《诗馀》一卷、《文集》四卷、《诗续集》二卷、《文续集》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三、《清史稿》卷四八五有传。姚椿为撰墓志铭。(王学泰)

【王豫】(1768—1826) 字应和,号柳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诸生。一生酷嗜诗,曾来往于杭州、苏州、扬州、泰州间,以选诗、辑诗为事,并受到阮元、王昶等支持,辑有《扬州图经》、《群雅集》四十卷、《二集》十八卷、《江苏诗徵》一百八十三卷,与张学仁合辑《京江耆旧集》十三卷。居于瓜步东之翠屏洲,修竹垂杨,环绕村舍,登楼而望,则三山峙列,江流浩瀚,故其胸次开朗,日坐山光水色中吟咏不辍。其诗学王、孟、韦、柳,多以四时风物与隐逸生活为题材。《初冬村居写怀》即其生活之写照:“愁绝翻辞酒,交多转避名。霜稠凋树色,风冷助江声。茅屋少尘事,田家多古情。著书拟闭户,休更负平生。”其他如《城南访鹤山》、《秋日宝莲庵作》、《石湖小憩》、《翠螺山》皆为其代表作品。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江都令陈文述荐以“孝廉方正”,豫致书力辞。其诗收入《种竹轩诗选》四卷、《续集》一卷,另有《种竹轩古文初集》五卷。《清史列传》卷七三有传。(王学泰)

【查揆】(1770—1834) 一名初揆,字伯葵,一字梅史。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查慎行之后。家贫,为养亲而苦读,虽极穷困,耻事干谒,数往来于杭州,居西湖最久,不妄与人交。又尝渡钱塘江而东,之甬上,之括苍,旅食四方,无知之者。后受知于浙江巡

抚阮元。清仁宗嘉庆九年(1804)中举,礼部会试,不售,而其名为京中公卿所知。其诗文集初刊成即盛传于都下,受到钱大昕、法式善等名流赞赏。谒选吏部,曾官安徽安庆、直隶饶阳,擢为蓟州知州,卒于任。揆论诗主南宋严羽之说,别立“销纳”两字以概括严氏诗论。“尝谓,严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销纳二字之妙”(《国朝正雅集》)。揆诗以写游宦生涯、山水风光者为多,也有少量关切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哀新塔》写水灾时灾民趋走,争奔僧塔,后塔倒民死的悲惨情景;《紫花草》写贫妇为哺饥儿,采掇田中紫花草,被田丁污辱遂自尽而死的故事。两诗皆极沉痛,富于感染力。其诗清绵宛丽,七绝尤有特色,如《即事》:“玉匣冰奁铅水流,垂杨影里见梳头。夕阳似与红窗约,不近黄昏不上楼。”《为郭频伽题僧庐听雨图》:“客民滋味想能谙,铃语郎当最不堪。道是惯听还怕听,一楼黄叶梦江南。”亦工骈文,文重气韵,不以涂泽为工。著有《菽原堂初集》十卷,其中诗八卷。《笈谷诗钞》二十卷、《文钞》十二卷。《清史列传》卷七一有传。(王学泰)

【陈寿祺】(1771—1834) 字恭甫,号左海,一号莘仁,晚号隐屏。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少能文,年十八以献百韵诗而得才子名。以高行邃学自期。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寻告归,以父命入都。嘉庆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嘉庆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嘉庆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丁忧后遂不复出,以著述自娱。晚年曾主讲清源、鳌峰两书院。寿祺诗为学者之诗,多题咏书画器物之作,《题画》、《题渡口斜阳画册》、《题画黄梁梦》等皆其代表作品。寿祺关注现实中重大事件,对台湾林爽文起事及四川、湖北白莲教起事,皆有所反映,只是站在清王朝立场,对人民武装反抗多有诋毁,如《海外纪事诗》、《平定台湾恭纪》皆属此类作品。其《和甸男》写蜀中战乱:“剑外尘沙落日昏,珠铃帟幄莫轻论。彝陵群盗窥秦塞,夔府孤城阻益门。岂少蜺旌专外阃,仍烦虎旅出中原。可怜一片关山月,夜夜霜刀照雪痕。”此类作品,气魄雄厚,可与李梦阳相颉颃。其七绝小诗如《橘枝辞》等,颇有风韵。寿祺治经学,宗主汉儒,笃信许、郑。著述甚多,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疏证》、《欧阳夏侯经说考》、《鲁齐韩诗说考》、《礼记郑读考》等。其文集有《左海文集》十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骈文》二卷、《绛趺堂诗集》六卷。《清史稿》卷四八三、《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高树然、阮元、钱仪吉等为撰《陈恭甫行状》一卷。(王学泰)

【英和】(1771—1840) 姓索绰络氏,字树琴,号煦斋,幼名石桐,号粤溪生,晚号霄叟。满洲正白旗人。

少随父游宦四方,曾受业于汉族士大夫,如程在嵎、田大椿、董猷定、侯坤、方体等,皆尝为其师。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递升侍讲、侍读学士,历任吏部、户部、礼部、理藩院侍郎,及八旗满汉军副都统、都统、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军机大臣。宣宗道光八年(1828),因督造孝穆皇后陵寝地宫不力,被革职系狱,籍没家资,发往黑龙江充苦役,三年后自卜魁城放还,卒于家。英和起家词林,工书善画,尤长于诗。其诗多以北京风光及侯门贵官日常生活为主。晚年远谪塞外,《卜魁》一集,描写关外风光,记录满、蒙异俗,活泼清新,饶有趣味。著有《恩福堂笔记》与《恩福诗钞》。《清史稿》卷三六三有传,并有自订《恩福堂年谱》。(王学泰)

【陈文述】(1771—1845) 初名文傑,字隽甫,号雲伯,又号退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诗名,受知于浙江学政阮元,以赋《仿宋画院制团扇》诗最佳,人称为“陈团扇”。清仁宗嘉庆五年(1800)举人,游京师,在京五年,诗作颇多,刊《碧城仙馆诗钞》,传诵一时,与杨芳灿齐名,人称“杨陈”。后经吏部铨选,曾为全椒、常熟、江都等县知县,所历皆有善政。文述一门风雅,其妻龚玉晨、侍姬管筠、文静玉、薛纤阿、蒋蕊兰皆能诗,其中管、文二人有诗集传世。文述诗可分前、后两期。其早期作品学西崑与吴伟业,多以艳情为题材,以七古、七律为优长。其七古“如临风舒锦,五色纷披,观者莫不叹为奇丽”(萧抡《颐道堂诗选序》)。其代表作品如《董小宛像》、《琴心曲》、《柳如是初访半野堂小像》、《月夜海上观潮》等。其七律风流绮旎,“如锦绣屏开,炫人心目”(陈来泰《寿松堂诗话》),如《闲情》八首之八:“往事无端怅洗红,蓬山容易路曾通。铜环门掩桃花雨,玉押帘垂柳絮风。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衍波翦取春江水,自记前缘证雪鸿。”其他如《杏花》组诗、《落叶》、《落花》组诗、《秋雁和李纨兰女史》皆是此类作品。后期诗风为之一变,一改昔时镂金错彩之习,取径较宽,题材也较广泛。萧抡言:“其中登临吊古之作,或指陈前代得失,或阐扬昔人忠孝,意存劝戒,诗不徒作。至如《和张船山太史宝鸡驿题壁》及《诸将》等作,则抚时感事,少陵诗史之遗意也;《芭蕉篇》、《采官米》、前、后《水车行》等数十篇,则忠厚悱恻,道州《春陵行》之继别也。”(《颐道堂诗选序》)后期作品出入于杜、韩、苏之间,风格沉雄苍老。文述亦工骈文。一生写诗极多,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即有诗五千余篇,故其诗集曾多次刊刻,最早刊《碧城仙馆诗钞》十卷,后刊有《颐道堂诗选》十四卷、《西泠怀古集》十卷、《西泠仙咏》三卷、《西泠闺咏》十六

卷、《秣陵集》六卷附《金陵历代纪年事表》一卷、《图考》一卷、《颐道堂诗选》三十卷、《外集》十三卷、《戒后存诗》十六卷、《补遗》六卷。另有《颐道堂文钞》三十卷。《清史列传》卷七三有传。(王学泰)

【周济】(1781—1839) 字保绪,又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安。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九岁能属文,稍长深沉有远志,自负有经世之略,兼治兵家言,习击刺骑射,交江淮豪士,与同郡李兆洛、张琦及泾县包世臣交好。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河南、山东教民起事,尝匹马孤行锋镝中凡数十日,作《山东新乐府》数十首,描写社会动乱情景。嘉庆十年(1805),登进士第,廷对时纵言天下事,以字数逾格,选为知县,改淮安府学教授,旋引疾去。曾应两江总督之请,缉侦两淮走私盐枭。年四十七,始折节读书,董理故业,以著述为事。济性格豪迈,魏源言其常过酒楼酣饮,“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挥霍如飞,满堂风雨;醒则磨墨数斗,狂草淋漓,或放笔为数丈山水,云垂海立,见者毛发竖,人皆莫测君何许人。”(《荆溪同君保绪传》)其诗多摭写豪情,也有一些关心民间疾苦作品,如《泽农谣》写以种茭白、鸡头米为生的农民之痛苦,《萋萋芽》写采摘野菜之饥民之辛酸,皆语浅情深。济深于史学,曾著《晋略》六十五卷,论者以为作者借史事以自抒猷画。另有《介存斋文稿》二卷。亦通音律,擅长填词,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辑有《宋四家词选》、《词辨》附《介存斋论词杂著》。著有《味隽斋词》一卷。诗收入《介存斋诗》六卷、《止庵诗》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王学泰)

【吴筠】(1781—1808) 字湘萍,号畹芬。浙江嘉兴人。父吴基为上虞训导。畹芬自幼聪敏好学,年十岁即与歌诗结缘,自汉、魏至明、清各代诗家名集,遍览博采,吟诵不辍。十八岁嫁同邑举人李貽德。李为经学家孙星衍之座上客,亦长于诗。尝于夜晚与筠拈笺分韵,篝灯对坐,唱吟通宵。筠辛勤理家,周到侍姑,事事亲躬,劳瘁过度,卒时仅二十六岁。其《早花集》一卷之同治六年(1867)刊本,附于李貽德《揽青阁诗钞》后。事见《早花集》所载传、跋。

(陈祖美)

【钱仪吉】(1783—1850) 初名逵吉,字衍石,后字嵩人,号心壶,亦号新梧。浙江嘉兴人。年十二效“选体”作《山赋》千言,张问陶见之,击节称赏。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进上,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累迁至工科给事中,寻罢归。罢官后,出游岭外,主讲学海堂,晚岁为大梁书院山长。仪吉以学者名世,其诗亦为浙派之翘楚。诗以学宋为主。徐世昌谓其“诗托兴高远,造意密微,绝无巉削深刻之迹,而

自远于流俗”。又谓其“诗有云：‘都官(指梅尧臣)郁奇节，约气为深沉。人物皆饮羽，随风自鸣琴。’又云：‘落笔自造意，只字防前侵。’盖即自状其诗境也。”(《晚晴簃诗汇》)仅吉诗以模山范水者为多，五古、七古颇工描写刻画，近体清韵盎然，如《山行》二绝：“雨丝吹暝湿微茫，松径连天一发长。决起舆前双白鹭，冲烟先我入斜阳。”“浓翠天开识午晴，俄闻淅沥响帘旌。清泉百道竹千个，并作四山风雨声。”撰有《三国会要》。辑录有《碑集传》一百六十卷，并汇刊《经苑》以补《通志堂经解》之阙。其文收入《衍石斋记事稿》十卷、《续稿》十卷，其诗收入《闽游》、《北郭》、《澄观》、《定庐》、《刻楮》、《旅逸小稿》、《后稿》等集。《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有传。

(王学泰)

【沈善宝】字湘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州判沈学琳之女，知府武凌云继妻。曾撰《名媛诗话》，自序云：“……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颖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惟余拙于语言，见闻未广，意在存其断句零章，话之工拙，不复计也。”又有《鸿雪楼初集》四卷。以上二书均著录于《杭州府志》

(陈祖美)

【范姝】字洛仙。江苏如皋人。诗人范献重侄女，诸生李延公妻。九岁能咏新月，深得祖父喜爱。其夫亦善文，闺门倡和，极笔墨之乐。后蒙家难，乃椎髻着布衣，辛勤持家，且吃斋念佛，夫妇同舟共济。又喜结诗友，与客居之名媛周羽步、吴蕊诗简赠答不绝。有《贯月舫集》。事见《通州志》等。(陈祖美)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一字茝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江南淮海兵备道，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与林则徐、陶澍、龚自珍、魏源等均有交往。鸦片战争时驻兵上海，防堵英军入侵，并曾邀龚自珍入幕，未成。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疾引退。早年从翁方纲学诗，翁氏曾谓其弟子“皆不若茝林之得路，不过沉着按切而已，无他巧也，而一时才隽竟皆莫能近”(见符保森《国朝正雅集》)。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间，为京师宣南诗社重要成员，后历署诸省，主持风雅，与友朋、僚属唱和尤多。部分诗作颇关心时务，反映民生凋敝，愤慨投降派丧

权辱国。大多数篇什则为纪游、题咏、怀古、唱酬之作。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其诗才学赡博，用笔生健，喜选险韵，而能控制自如。翁覃溪言：门下诗弟子百十辈，茝林最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诸家之美云。”著有《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笔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诗话《退庵随笔》、《南浦诗话》、《闽州闺秀诗话》，及《师友集》、《归田琐记》、《枢垣纪略》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及《退庵自订年谱》。

(王臧)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别号松心子、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今广州)人，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少即以才学名于乡里，清仁宗嘉庆九年(1809)举人，以祖母年迈，不赴会试，而肆力于诗，卓然成家，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至京师，翁方纲惊叹“诗坛大敌至矣”。后五应会试不中，乃广交诗友，历游山川。宣宗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历署黄梅、松滋、广济县令，调襄樊同知。能尽心民事，尝亲驾小舟勘险救灾，拒征浮漕，颇洽舆情。丁忧服阙，改掣江西，任袁州同知、太和知县、吉安府通判、南康知府。终以不耐官场腐败，辞官归里，隐居珠江南花地，并筑听松园以居。林则徐赴粤禁烟，曾造访晤谈。晚任学海堂长，著述授徒，诗酒自娱。《晚晴簃诗汇》称其“早有诗名”，“以诗游京师，一时倾倒”；并谓其“诗高华沉着，不专一格”。前期诗多为咏山水、闲情，感慨仕宦生活及赠答、唱和之作，亦有关切民生疾苦、暴露吏胥贪毒的篇什。鸦片战争后，颇有激昂之音，如《三将军歌》、《江海》、《书愤》、《海门》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所作《战场》、《新年入城》等，皆表彰抗战，指斥投降。其《三元里》一诗尤著称于时，论者推为“历代诗史中最光荣、最热烈、最悲壮之作”(屈向邦《粤东诗话》)。其《金山篇》则为最早咏美国旧金山华工之诗，并含发展资本主义之思想。其诗名尝远播海外，越南、高丽、琉球、暹罗(泰国)、小吕宋(菲律宾)均曾访求其诗集，并流传至美国。早期诗刊为《听松庐诗钞》十六卷。生平诗编为《松心诗集》十集二十九卷，又选其中十之二三辑为《松心诗录》十卷。另有《松心文钞》十卷、《听松庐骈体文钞》四卷、《国朝诗人徵略》六十卷、《徵略二编》六十四卷，及《艺谈录》、《听松庐诗话》、《花甲闲谈》、《读经求义》等，著述合辑为《张南山全集》。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续碑传集》卷七九)。

(王臧)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号石麟，晚号戛村老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清仁宗

嘉庆九年(1804)举人,嘉庆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御史,出为杭嘉湖道。不满官场腐败,一度以父疾告归。宣宗道光二年(1822),复出为浙江盐运使,历迁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江宁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擢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任内尽心勤政,关切民生,缓征救灾,多所兴革。道光十八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严令外国烟贩缴出鸦片二百余万斤,于虎门销毁;并筹备海防,倡办义勇,屡次击退英军进犯。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诬革职,遣戍伊犁。道光二十六年,复起为陕西巡抚。次年,擢云贵总督,因病辞归。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文宗嗣位,授钦差大臣赴广西督理军务,行次潮州,病卒,谥文忠。则徐少工骈文,早年诗沉博艳丽。嘉庆(1796—1820)末,曾参与京师“室南诗社”。间有轶念民瘼、嘲讽官场之作。赴粤禁烟及遣戍新疆后,诗风一变为沉郁苍凉,忧愤国事,志节磊落。其《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联尤为传世名句。《晚晴簃诗汇》谓:“文忠经世之才,馀事为诗,缘情赋物,靡不裁量精到,中边俱澈,卓识宏论,亦时流露其间,非寻常诗人所及。谪戍后诸作,尤悱恻深厚,有忧国之心”。陈衍《石遗室诗话》称其诗“使事稳切,对仗工整”。著有《云左山房诗钞》八卷,《云左山房文钞》、《林文忠公政书》、《滇轺纪程》、《荷戈纪程》、《信及录》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李元度《林文忠公别传》、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王臧)

【潘德舆】(1785—1839) 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少孤,笃学守礼。先后十二次应乡试,到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始中举。会试又屡失利,大挑得安徽候补知县,未赴任,以疾卒。其论诗力斥“嘲风雪、弄花草”、“叹老嗟穷”,以救“随园(袁枚)佻纤之失”,主张“诗只一字诀,曰‘厚’,厚必由于性情”,强调诗要有真情厚意,提倡“质实”,重视诗人人品,归结为发挥“诗教”作用,以求“有益于国之敷政、人之植行”。曾有意与黄爵滋、郭仪霄、徐宝善、张际亮等转移乾嘉诗风。其诗颇有关系民生、暴露社会衰败之作,大多则写其日常生活而抒怀寓感,古淡质朴,尤以五古见长。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四农诗境高洁”,并谓其论诗主张“足挽江左诗派之失”。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则谓:“自道光以来五十余年,唯潘四农之五古差有真意。”其诗论及诗风,影响及于近代鲁一同等人。著有《养一斋集》二十六卷,包括诗十卷、文十五卷、赋一卷,另有《养一斋诗话》十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鲁一同《安徽候补知县乡贤潘先生行状》。(王臧)

【陈沅】(1785—1826) 原名学谦;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一甲一名成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周锡恩《陈修撰沅传》谓其“卒年四十一”,即卒于道光五年(1825),误。《清史列传》记其卒于道光六年,龚自珍有《二哀诗》悼陈沅,作于丙戌(1826),可证。沅与龚自珍、魏源交尤契,推誉龚、魏,并以所作相质。魏源称其虽“运际休明”而“常有忧勤惕厉之思”(魏源《简学斋诗集序》),故诗不苟作,而多关民生世情。《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濮州道中》、《扬州城楼》等反映灾民惨绝,官兵残暴,社会衰败,抒其悯民忧世之情。中年后治朱熹之学,部分诗多性理语。其诗刻意琢磨而归于质朴平淡,陈衍谓其诗“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列为近代“清苍幽峭”一派之首。((《石遗室诗话》))著有《简学斋诗存》四卷、《简学斋诗删》四卷、《简学斋赋钞》一卷及《管课试律存》、《试律续钞》,合刊为《简学斋诗文钞》。其手录诗稿名《白石山馆诗》。另有《诗比兴笺》、《近思录补注》等。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三、周锡恩《陈修撰沅传》((《碑传集补》卷八))。(王臧)

【程恩泽】(1785—1837) 字芸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少孤,力学。曾从经学家凌廷堪游,治汉学。清仁宗嘉庆十八年(1811)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迁贵州学政、湖南学政、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官至户部侍郎。多年入直上书房,校刻御制诗文集等。学问广博,自经、史至天文、地理、金石、书画、医算,无不涉及,尤精文字之学。主张“义理自训诂出”,并推之于诗文,认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金石题咏汇编序》)。其诗“初好温(庭筠)、李(商隐),年长学厚,则昌黎(韩愈)、山谷(黄庭坚),兼有其胜”(张穆《程侍郎遗集序》)。少量作品如《粤东杂感九首》、《束炬叹》等写及鸦片流毒及民生之苦;大多篇什为唱酬、题咏之作,而“多于句调上见变化”(陈衍《石遗室诗话》),好用虚词,奇险拟折,以文为诗。陈衍《近代诗钞》,以他与祁寯藻为清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间“喜言宋诗”、“合学人、诗人二而之一”一派的倡导者。其门生如何绍基、郑珍及莫友芝,均受其濡染,影响及于后来陈衍、沈曾植、陈三立等一辈“同光体”诗人。有《程侍郎遗集》十卷,生平见《清史稿》卷三七六、阮元《春海程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一〇))。(王臧)

【梅曾亮】(1786—1856) 字伯言。江苏上元(今

南京)人。少好骈文,后与同邑管同就读钟山书院,师从姚鼐,亲得桐城义法,遂致力于古文,与管同、刘开、方东树并称“姚门四弟子”。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进士,以知县候用,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一时治古文者皆从之问义法。道光二十九年,告归,主讲扬州书院。文宗咸丰三年(1853),以太平军攻破南京,避居兴化,又移淮安,寄于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署为馆师。以文著称于时,诗名遂为所掩。诗宗杜、韩及北宋诸家,本桐城诗派风格。其《柏枧山房自序》云:“顾以少好吟弄,长多坎坷,凡为悲欢,萃此楮墨。欲使已灭之迹,按履可寻;不停之声,眠琴如故。”故虽身边琐事,应酬赠答,亦多身世之感。刘声木称:“其于诗也,意欲其深,词欲其粹。一思之偶浅,必凿而幽之;一语之稍粗,必袭而精之”,“故坚致古劲,神锋内敛”,“天机清妙”(《桐城文学渊源考》)。著有《柏枧山房诗集》十二卷,《柏枧山房文集》十九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江宁府志·梅曾竟传》,吴常焘《梅郎中年谱》(《国专月刊》四卷一期)。(王庵)

【陆嵩】(1791—1860) 字希孙,号方山。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少侍父豫中。清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返吴,拔补苏州府庠生。以“学不趋时”,乡试屡不中,遂绝意科场。先后为浙江学政陈用光、安徽学政沈维峤延佐学幕。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受命参与勘灾发赈。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选授镇江府学训导,掌教宝晋书院。道光二十一年,英军攻镇江时,曾募集乡勇自卫,保全城南诸村。文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破镇江,一度避迁,后辞归。咸丰十年,太平军攻苏州,避至金泽,客中病死。一生仕宦不达,中年以后,专力于诗,“初从玉谿门径入窥杜;继乃纵览诸大家,而独得杜真髓;至晚年则尤得杜质厚一体”,“一生诗宗杜老”(陆懋修《方山府君行状》)。所作较广泛地反映鸦片战争前后政治腐败、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抨击清政府官兵在战争中畏敌无能,表彰民众抗敌精神,讴歌抗敌英雄,表现了爱国热情。诗多质朴平畅,而韵味不足。其孙陆润庠,穆宗同治(1862—1874)年间状元,官至大学士,曾刻其诗集行世。有《意苕山馆诗稿》十六卷,据《苏州府志·艺文二》著录,尚有《续集》一卷,《古文》二卷。另著《读杜一得》、《玉谿生诗解义》。生平事迹见陆懋修《麻翁文钞·先考方山府言行状》。(王庵)

【龚自珍】(1792—1841) 初名自暹,及长,名自珍,字璚人,号定庵,一号定公,晚号羽琇山民;曾名巩祚,又曾更名易简,字伯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官宦文学世家。因家学渊源,八岁即涉经

史,十二岁从其外祖父、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学《说文》,以字说经、以经说字,并及考据、目录、金石诸学,治古文诗词。年方弱冠,所为诗、文已有不可一世之慨。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会试不中,考授内阁中书,充国史馆校对。曾从刘逢禄受今文经学,主张经世致用。宣宗道光九年(1829),始登进士第,殿试因楷法不合规格不列优等,仍回中书原班,后历官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道光十九年,终以动触时忌而辞官南归。道光二十一年,任丹阳云阳书院讲习,不久暴卒。自珍从青年时代起就敏锐觉察到清王朝已进入“衰世”,“岌岌乎不可支日月”,于是放言危论,揭露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官风、士习种种积弊朽象,疾呼“更法改图”,提出改革主张。进而以历史批判家自任,探究“世变”,倡言“天地非圣人所造,众人自造”,抨击专制统治压制摧残人才,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并预见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危险,林则徐赴粤禁烟时,他致函力主以武力抗英。与魏源同为近代思想启蒙先驱,世称“龚魏”,对晚清思想解放产生重大影响,“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清代艺术概论》)。于文学也力破“束缚”,主张“尊情”,提出“诗与人一,人与诗一”,期待文体“大变忽开”。所为诗文都“继往开来,自成一家”(曹鼐《定庵文集序》)。其诗尤“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部分诗作以直抒或象征手法暴露社会黑暗、讥嘲官场腐败、抉发时弊,呼唤改革;大部分诗则表达了深沉的时代危机感、浓郁的孤独感,和对腐朽现实的憎恶、对美好世界的憧憬。意象独特,联想丰富,语言瑰丽,“声情沉烈,恻怛道上”(程金凤《己亥杂诗跋》)。《能令公少年行》、《西郊落花歌》、《咏史》、《又忏心》、《夜坐》、《秋心》等均为名篇。由三百十五首七绝组成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更是诗歌史上奇作。对晚清诗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苏曼殊、姚锡钧、潘飞声等产生广泛影响。小说家曾朴也称其“全力改革文学”,“实是新文学的先驱者”(《译龚自珍〈病梅馆记〉题解》)。近人钱仲联则谓“其诗笔乃横扫一世之彗星,光芒辐射,拔奇于古人之外,境界独辟。其瑰玮之形象,如天马蹶云,不同凡骥”(《论近代诗四十家》)。所著文、赋、诗、词,辑为《龚自珍全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孙文光《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郭延礼《龚自珍年谱》。(王庵)

【黄爵滋】(1793—1853) 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进士。授翰林院编

修,历迁监察御史、工部给事中、鸿胪寺卿、大理寺少卿,官至刑部左侍郎。为言官时,凡所建白,多切中时弊。道光十八年,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严禁鸦片,名重一时。道光二十一年,以刑部侍郎偕祁寓藻视察福建海防,支持邓廷桢加强战备,著《海防图表》等,力主抗战。鸦片战争失败后,以事罢职,后以候补员外郎起用。治学主经世致用,为“有用之学”。论诗亦主张“发至情于歌泣,陈大义于死生,中有自得之真,外无他求之巧”(《云涛山房诗序》)。鸦片战争前夕,曾有意与徐宝善、张际亮、潘德舆等共倡变革乾嘉诗风,对一批在京文士和应试举子如汤鹏、姚燮、鲁一同等有一定影响。所作诗清朴厚重,蒿目时艰之作不少,而锋芒内敛。潘德舆称其“非有益于国之敷政、人之植行者,则不以命笔”(《仙屏书屋诗序》)。张际亮谓其:“不作激昂慷慨、讽刺深刻语,倍觉读之感人”(黄爵滋《仙屏书屋诗录自序》引)。著《仙屏书屋诗录》十六卷、《诗录后集》二卷,《仙屏书屋文录》十六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孙衣言《光禄大夫前刑部左侍郎黄公行状》(《续碑传集》卷一〇)。(王飏)

【祁寓藻】(1793—1866)字叔颖,一字淳甫,后因避讳改实甫,号春圃,晚号饒飏亭叟。山西寿阳人。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进上。改庶吉士,授编修,历迁湖南学政、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擢兵部尚书。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文宗咸丰四年(1854),以病乞休。穆宗即位,特诏起用。穆宗同治元年(1862)入直弘德殿,与翁心存、李鸿藻等侍穆宗读书。同治三年,乞归。卒谥文端。论学主张通训诂、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欲调和汉、宋学。论诗亦重学识,以为“非学无以扩识,非识无以范才。至于穷通显晦,境遇各殊,敦厚温柔,体要斯在,则视乎其人之自得”(《饒飏亭集自序》)。诗多咏物、纪游、感恩、扈从、及官场酬应之作,清真瘦硬。少数篇什关心民生现实。陈衍尤赏其《题饒飏亭集》等诗,谓其“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石遗室诗话》);又谓“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为黄”,“而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近代诗钞自序》),将祁、程并推为近代喜言宋诗一派之倡导者。著有《饒飏亭集》三十二卷、《后集》十二卷。生平见《清史稿》本传、秦细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王飏)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更名源,字默深,亦作墨生,一字汉士,别号良图。湖南邵阳金潭(今湖南隆回)人。尝入都,从胡承珙、姚学瑛等问汉、宋学,复从刘逢禄受公羊学,并与龚自珍结识,同治今

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举人。会试屡不第,纳赈为内阁中书。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之聘佐幕,参与筹画改革漕运、盐务、水利诸弊政,并由经营票盐致富,于扬州筑絮园定居。鸦片战争发生,曾为钦差大臣裕谦延致军幕,赴浙东前线。后辞归,受林则徐之托,据林所编译《四洲志》撰成《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状况。道光二十四年(1844),会试中式,次年,补行殿试,始成进士。历任东台、兴化县令,迁高邮知州。文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破扬州,以“迟误驿报”罪被劾革职。自此居家著述,息心佛理,时往来吴、越。咸丰七年,卒于杭州。源与龚自珍齐名,时称“龚魏”,为近代启蒙思想先驱,主张更革弊政,“因时制变”,重视发展商业,坚持禁烟抗英,首倡言开译馆,知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近代向西方学习之先声。论文学也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所为诗文,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反映国步艰难、民生凋敝,广泛揭露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积弊。抒发爱国忧国之思与师夷救国之志,此类政治诗多用新乐府体及七律,承杜甫、白居易之风,以史入诗,以诗为疏,而“占质如谣,明畅如策,栴比如赋”(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序》)。平生踪迹半中国,集中山水诗居大半,遍写各山巨川“难显之状,未道之景”,“自汉魏唐宋以来亦别为一体”(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多为五、七言古体,“奇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陈衍认为他属于“清苍幽峭”一派,“而才气所溢,时出入于他派”(《石遗室诗话》)王闿运称其“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诗法一首示黄生》)。李慈铭则谓其“多超迈警卓之语”而时失之“粗犷”(《越縕堂诗话》)。初有《清夜斋诗稿》、《清夜斋文集》;后增辑为《古微集诗集》十卷、《古微堂文集》十卷,后刊为《魏源集》。另有《圣武记》、《海国图志》、《诗古微》、《春秋公羊古微》等,辑《皇朝经世文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六九,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王飏)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猿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清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贡生,出程恩泽门下。道光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充武英殿、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道光二十六年,因议纂三品以下臣列传为总裁穆彰阿坚阻,即辞提调职。先后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文宗咸丰二年(1852),擢四川学政,随时访察地方吏治废弛、冤狱迭兴诸情形具奏,致权贵侧目,谤议腾喧。咸丰五年,以条陈时务被斥为“肆意妄言”而降调,遂绝意仕

进,遍游蜀中名山。后历主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等十余年。穆宗同治八年(1869),应聘主持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兼浙江孝廉堂讲席,往来吴、越。卒于苏州。绍基博通经史,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律算,书法自成一体。诗亦“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陈衍《近代诗钞》),与同出程恩泽之门的郑珍同走学人而工诗一路,为晚清宋诗派重要诗论家和诗人。其论诗,主张“先学为人”,读书悟理,“明理养性”,“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使“温柔敦厚”之旨与“自写性情”统一调和,所谓“人与文一”;主张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等,“概从刊落”。所作诗多纪游、抒怀、友朋唱酬及题咏金石书画,间有关系民生时局者,而以山水游历之作最佳,“横览万象,兀傲雄浑”(苗夔《使黔草序》)。朱琦序其诗称:“子贞平日既肆力于经、史、百子、许、郑诸家之学,其所为诗,不名一体,随境触发,郁勃横恣,非积之厚而能达其意所欲出者,不能尔也。”可见其“学人之诗”的诗风。但与郑珍不同,他以学苏轼为主,金天羽《艺林九友歌序》称其为“晚清诗人学苏最工者”。陈衍推之为“道、咸以来”“喜言宋诗”的代表诗人。著有《东洲草堂诗草》三十卷,《东洲草堂文钞》二十卷,及《说文段注驳正》、《惜道味斋经说》等。生平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熊少牧《道州何君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九)、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眠琴阁遗文》)。(王臧)

【顾春】(1799—1880?) 本名西林春,字梅仙,一字子春,号太清,满镶蓝旗人。曾祖为清世宗雍正(1723—1735)顾命大臣鄂尔泰。嫁为贝勒奕绘(高宗之曾孙)侧室,呈报宗人府时假托顾姓,冒为护卫顾文星之女,故名顾春。春工诗词,奕绘亦好文学,夫妇唱和,作品颇多,春并善绘画,有《杏花图》传世。婚后生四女、三男。奕绘去世后三个月,被逐出贝勒府,赁宅于西城养马营,生活困顿,晚景凄凉。奕绘府邸在宣武门内太平湖附近,龚自珍辞官南归之时(1839)恰是顾春被逐出府不久,龚氏《己亥杂诗》中有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诗后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此诗词意隐约,后世故老相传,谓春曾与自珍相恋,以此被逐。后世称此为“丁香花诗案”,肯定者有之,否认者亦有之,材料不足,难以定讞。春词胜于诗,刻意学北宋周邦彦。诗多写离情别苦,诗风明畅。其诗、词,除存于奕绘之《子章子集》外,还有《天游阁集》五卷(诗集)和《东海渔歌》四卷(词集)。生平史料见孟森、冒广生、启功、齐燕铭、黄世中、金启琮等人所著文。(王学泰)

【张际亮】(1799—1843) 字亨甫,号松寥山人、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少孤,伯兄业商,资助其读书,肆业于福州鳌峰书院,为山长陈寿祺器重。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以拔贡入都,朝野重其名。因书责盐运使曾燠及其门下“廉耻俱丧”,遂负“狂生”名,为朝贵所忌,应试辄不取。在京与黄爵滋、汤鹏、潘德舆、徐宝善等交往唱和。后历游山川,曾上书两广总督卢坤,请严缉鸦片走私。道光十五年,更名亨辅应试,始中举人。次年,会试不售。与黄爵滋等发起禁烟。道光二十年,应台湾道姚莹之邀,欲赴台,至厦门西返,之浙东,适鸦片战争起,目击战乱。道光二十三年,闻姚莹以守台抗英而被诬下狱,扶病入都,为姚奔走。姚莹事白出狱,而际亮劳瘁致疾卒。以诗负盛名于仁宗嘉庆(1796—1820)、宣宗道光(1821—1850)间,尝批评乾、嘉以来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诸名辈“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流弊海内,欲“力挽颓波”,以转移诗风自任。诗多慨叹政敝世衰,民不聊生,抒写遭际落宕、壮志难伸之郁愤。鸦片战争时所写篇什,哀痛浙东惨遭蹂躏,抒发爱国抗敌之热忱。潘世恩称“亨甫负经济才,磊落有奇气。读其诗如天马行空,瞬息千里,又如神龙变化,不可捉摸”,“而激昂慷慨,可泣可歌,则少陵之嗣响”(《张亨甫全集题辞》)。一时朋辈,推许为“一代奇才”(朱庭珍《筱园诗话》),“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符保森《国朝正雅集》),唯稍后李慈铭则谓“亨甫极负时名,诗亦规抚作家,而粗率豪易,毫无真诣”(《越缦堂诗话》)。早年诗刊为《松寥山人初集》十卷。其门人所刻《张亨甫全集》有文六卷、诗二十七卷,所收诗不全。自订《思伯子堂诗集》三十二卷。另有笔记《金台残泪记》、《南浦秋波录》。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姚莹《张亨甫传》、李雲浩《张亨甫先生年谱》(《张亨甫全集》)。(王臧)

【汤鹏】(1801—1844) 字海秋。湖南益阳人。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进士,授礼部主事,年甫二十馀,时人目为异才。道光十年,充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道光十五年,擢御史,勇于言事,未逾月而三上章。以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叱辱司官而议处过轻事,上疏抗言,忤旨,罢归户部,转郎中。于是感慨愤郁,著《浮邱子》一书,数十万言,“剖析天人王霸,发抒体用本末”,而实皆关政要。及鸦片战争失败,犹上书三十条,极言防务之要、改革之策。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姚莹均与之交。诗多愤世嫉俗、刺时议政,及俯仰身世,抑郁沉痛之作,长篇尤纵横恣肆,打破旧格。于道光(1821—1850)间诗名甚大。其集存诗二千馀首,评跋者不下

数十人。张际亮以为“其才气之纵溢、骨力之雄界、声情之激壮、思理之浩富，出入《骚》、《雅》，包举汉、唐，洵近代之所稀也”。林则徐尤称“其所为琴操、占歌谣，则尤备古人之所不及备，为今人之所不能为”。龚自珍评其“诗与人一”，以为“海秋心迹尽在是”，“要不肯捋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以上评语均见《海秋诗集评跋》）。有《海秋诗集》二十六卷行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王拯《汤君行状》、姚莹《汤海秋传》、邵懿辰《汤海秋哀词》（《续碑传集》卷二〇）。

（王臧）

【谢浣湘】（1801—1871）字芸史，福建诏安人。其父谢声鹤，字梅宾，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曾任仙游、清流县学训导，著有《雪溪诗集》。其弟谢颖苏，字琯樵，诗画兼擅。浣湘亦少即能诗，才思出众。婚后夫妇感情不治，遂长期寄居母家。后在其弟的别墅开设私塾，自任教师三十余年。其私塾男女长幼兼收，慕名求学者遍及乡邑内外，乃至福建省外。弟子中多有成为秀才、举人者，亦有任教于书院者，为此浣湘大受乡贤长辈称道，赞为：“学礼学诗男弟子，教忠教孝女先生。”作为名扬省内外的私塾女先生，除了谢浣湘，在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出第二位。著有《咏雪斋诗录》一卷。事见女诗人沈兰等多人为其诗集所作序言。

（陈祖美）

【林昌彝】（1803—1876）字惠常，一作惠裳，又字乡溪，自号疎庵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受业于鳌峰书院汉学家陈寿祺，后乃潜研经学，尤精三《礼》。清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出何绍基门下。八应会试不售，南北游历，所交多慷慨士。文宗咸丰二年（1852），进呈所著《三礼通释》于礼部，赐官教授。先后司教福建建宁、邵武府学，未几辞归。穆宗同治元年（1862），游广州，为郭嵩焘延请授馆，后掌教廉州海门书院，晚岁往来闽、粤。生平治经精博，而留心时务，尤痛愤鸦片战争之败，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著《破逆志》四卷及《平夷十六策》，其族兄林则徐以为“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所撰《射鹰楼诗话》，取名谐音“射英”，首二卷专辑爱国抗英之诗，为鸦片战争时期诗史珍贵资料。其所为诗亦根柢学问而蕴意深厚，或矢志抗英，讽世刺时，或纪游唱和，论诗题画，多健雅坚苍，然亦有谓其诗“肉胜其骨”者。曾与魏源一起商榷诗作，因激赏魏源诗而录入诗稿，故其诗集中有多首与魏源诗重出。著有《衣衲山房诗集》八卷及《诗外集》一卷，《小石渠阁文集》六卷及《赋钞》一卷，《射鹰诗话》二十四卷，《海天琴思录》及《续录》各八卷，及《三礼通释》等。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

三，林庆炳《焚余偶录·家严七秩寿辰敬征诗文启》。

（王臧）

【朱琦】（1803—1861）字伯韩，一说字廉甫，号伯韩。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清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道光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改御史。深忧国势衰颓，而耻士气萎靡、言官无敢谏者，屡上书言国事，切直敢言，时与苏廷魁、陈庆镛号“谏垣三直”；合金应麟，又号“四虎”。以言不见用，于道光二十六年去官归里。太平天国起义时，在广西办团练守城，文宗咸丰六年（1856），起为道员。咸丰十年，随浙江巡抚王有龄之杭州，总理团练局。次年，太平军攻破杭州，死于乱中。其诗、文均受桐城派影响，曾自言其诗“早年取径香山，及与伯言梅郎中（梅曾亮）游，始改师杜、韩及北宋诸家。”（宗鉴成《怡志堂诗集书后》）。其《感事》、《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关将军挽歌》诸作，记述鸦片战争史实，讴歌抗英殉难将士，“表扬忠节，感泣鬼神”，而“气韵沉雄，风骨俊逸”（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梅曾亮论其诗称：“学韩而自辟异境”，“乐府及五、七古视近体尤胜，其中长篇雄深峻迈，如百金骏马，蓦坡注涧，绝不蹉跌。”（《怡志堂诗集初编·评跋》）。有《怡志堂诗初编》八卷、《怡志堂文初编》六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方宗诚《朱伯韩先生传》。

（王臧）

【黄燮清】（1805—1864）原名宪清，字韵珊，一作蕴山，后字韵甫，自号吟香诗舫主人、茧情生、两园主人。浙江海盐人。家贫，少有才，工词翰，审音律，兼擅绘画。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出翁心存门下。后七应会试不第，奔波困顿。鸦片战争时，一度仓皇避乱，备尝艰辛。后游幕赣、皖。文宗咸丰二年（1852），以实录馆誊录叙用知县，分发湖北，乞病不赴，归乡园居。后应杭州知府王有龄之聘为记室。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破海盐，携家辗转赴湖北。穆宗同治元年（1862），就任宜都县令。次年，改任松滋。卒于任。早年以词曲名于时，所撰《帝女花》等，流播人口，传至日本。人比之尤侗。中年后，“自悔少作，忤其绮语”，乃肆力于诗。南北奔波，目击民生凋敝，官吏苛酷，形诸篇章，语颇激切。鸦片战争时期所作，感事伤时，纪实怀古，皆寓忧国之思，为集中精华。而一生蹭蹬。诗多感怀不遇，抑郁愤懑。张鸣珂称其诗“沉雄绵丽，雅近玉溪”（《寒松阁谈艺琐录》）。有《倚晴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四卷、《诗馀》四卷，及《倚晴楼七种曲》，合刊为《倚晴楼集》；辑《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生平见《清史列传》卷七三，吴镜铁《倚晴楼诗续集序》、黄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王臧）

【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野桥，中年后自

号复庄,别署大梅山民、上湖生、二石生、复道人等。浙江镇海人。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三应礼部试不第。道光十八年,由誊录即选知县,未赴。道光二十四年,再试不售,遂绝意仕进,以著述授徒终身。早年与厉志、叶元阶等甬东诗人结枕湖吟社,已负时名。数度应试,往来南北,目击疮痍;在京与黄爵滋、汤鹏、朱琦、张际亮、潘德舆等,痛论时事,诗境一变,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鸦片战争时,镇海失陷,携家仓皇避难。汤鹏谓其“出入干戈,备尝艰苦,空山拾橡,歌啸伤怀,旋膺危疾,濒死几殆”,“其为诗也,一变为苍凉抑塞,逼近少陵”(见《复庄诗问·诗评》)。陈泰来谓其“叹夷纪事诸篇,并沉雄奔放,独出冠时”(《寿松堂诗话》)。程恩泽谓其“处境愁郁,故旨合《风》、《骚》;拓胸阔大,故辞无庸浅”(见《复庄诗问·诗评》)。谭献称之为“浙东一巨匠”(《复堂日记》);近人钱仲联则以为“岂特浙东,直是一代之杰”(《论近代诗四十家》)。夔兼工绘画、骈文、词曲,对戏曲尤有研究,并曾评点《红楼梦》,于经史、舆地、释道亦无不探究。著《复庄诗问》三十四卷、《疏影楼词》五卷、《复庄骈俪文榷》及其二编共十六卷,合刊为《大梅山馆集》。另有诗《红桥舫歌》一卷(存《蛟川诗系》)、《西湖棹歌》一卷(存《民国象山县志》),词《续疏影楼词》八卷、《苦海航乐府》一卷。辑《蛟川诗系》三十一卷,以及《今乐考证》、《今乐府选》、《红楼梦类索》、《茧拇录》、《洋烟述考》等。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三,徐时栋《姚梅伯传》、张培基《姚某伯传》、蒋敦复《姚君墓志铭》(均见《大梅山馆集》)、董沛《姚复庄先生墓表》(《续碑传集》卷八一)。(王飏)

【鲁一同】(1805—1863) 字兰岑,一字通甫。江苏山阳(今淮安)人。早岁曾师事潘德舆。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后数应进士试,不中,益精于学。留心时务,学主经世实用,于吏治衰朽、士气萎靡尤怀深忧,言多激切。林则徐重其才,调赴湖广总督任时,曾邀偕行佐幕,以亲老未成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国藩、江忠源皆欲延致幕府,均不赴,而为之谋划献策。曾从梅曾亮受古文法,故世或以桐城派目之,而为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阳刚之气,并以古文家而为诗人之雄。少时学诗颇勤,中年以后,不事苦吟,非有真情实感不苟作。名篇如“荒年谣”等,忧悯灾黎,事皆征实,言通俚俗;鸦片战争时所作《读史杂感》、《重有感》、《三公篇》等,雄直苍凉。李慈铭称其诗“气象雄阔而未成家,蹊径亦多未化,然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固为偏师之雄矣”,“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越缦堂诗话》)。有《通甫诗存》四卷、《通甫诗存之余》二卷、《通甫类稿》四卷及

《续编》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吴昆田《鲁通甫传》、汤纪尚《鲁通甫先生传》(《续碑传集》卷七九)。(王飏)

【郑珍】(1806—1864) 字子尹,号柴翁,又号巢经巢主、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等。贵州遵义人。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拔贡,出程恩泽门下。后程调湖南学政,招之佐幕。道光十七年中举人,会试以目疾报罢。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以教职用,历任古州厅、镇远、荔波县学训导。文宗咸丰五年(1855),苗民起义攻荔波,曾率兵守拒。次年,苗民退,即辞归。穆宗同治二年(1863),以祁雋藻荐举,征为知县,未行,疾卒。生平治学及作诗均受教于程恩泽,学精三《礼》,通音韵训诂;诗宗杜甫、韩愈、孟郊、黄庭坚,与何绍基、莫友芝同为学人工诗,即后来陈衍所称“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近代诗钞叙》),为道光(1821—1850)后宋诗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其诗“凡所遭际,山川之险阻、跋涉之窘艰、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离,与夫盗贼纵横、官吏割剥、人民涂炭,一见于诗”,“而波澜壮阔,旨趣深厚,不知为坡、谷,为少陵,而自成为子尹之诗”(唐炯《巢经巢遗稿》序)。部分诗作“生涩奥衍”,“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陈衍《近代诗钞》),大多篇什则出语平易,以俗语、俗事入诗,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子尹诗之卓绝千古处,厥在纯用白战之法,以韩、杜之风骨,而传以元、白之面目者,遂开一前此未有之境界。”“同光体”作家如沈曾植、陈三立、范当世等皆宗尚郑珍,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推为“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而梁启超则以为:“时流咸称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遣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巢经巢诗钞跋》)。有《巢经巢诗钞》九卷、《巢经巢诗钞后集》六卷、《外集》一卷,又《遗诗》六首,《巢经巢文集》四卷,及《仪礼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等,共十五种著述,合刻为《巢经巢全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三,《清史列传》卷六九,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黎庶昌《郑子尹先生行状》、《郑征君墓表》,赵恺《郑子尹先生年谱》,凌惕安《郑子尹年谱》。(王飏)

【贝青乔】(1810—1863) 字子木,号无咎,又号木居士。江苏吴县人。诸生。出身寒士,家境清贫。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前后曾于江苏巡抚林则徐署中任职。鸦片战争爆发后,激于义愤,于道光二十一年投效奕经东征军,随至浙中,冀有所树立。曾只身潜入宁波城侦探英军情形及进剿路线,又率乡勇派赴前敌,后于军中帮办文案,论功行赏时自引《大清会典》以为例当为功贡生,故世亦称“贝明径”。道

光二十三年,应京兆试,以父丧归。道光二十七年,游黔,谒流放复职之林则徐,越三年,经滇、蜀东还,归途为济灾民倾囊购米,于峡江覆舟,仅以身免。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奔波于江、浙,游幕为生。穆宗同治二年(1863),就直隶总督刘长佑之聘北上,卒于旅途。早年尝受诗法于朱绶,“生平具干济才”,“跌宕有奇气”而“落寞无所遇”(王韬《瀛壖杂志》),遂委志于诗。从军期间所作一百二十首七绝大型组诗《咄咄吟》及鸦片战争前后诸诗,揭露讽刺清军腐败,歌颂爱国军民抗英,“识者以为不愧少陵诗史”(同上)“其《半行庵诗》对当时社会之黑暗面,多所揭发,沉雄哀惋,胎息少陵,亦有诗史之目”(陈声聪《兼于阁诗话》)。青乔一生旅食四方,其记游之作,尤其是游云、贵、川时,诗境得江山之助,刻画奇险,并咏及少数民族风情。诗风多劲直健朴。著有《咄咄吟》二卷、《半行庵诗存稿》八卷。生平见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感逝集》、王韬《瀛壖杂志》,王飏《贝青乔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王飏)

【莫友芝】(1811—1871) 字子偁,号邵亭,晚号瞿叟。贵州独山人。清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后屡应进士试不中,文宗咸丰十年(1860),选知县,意所不乐,弃去。出京师,游鄂、皖,先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为曾所器重,遂移家皖南。穆宗同治二年(1863),以祁雋藻等荐,征为知县,辞不赴。同治七年,应丁日昌聘为苏州书局总纂。同治十年,于访求《四库全书》残本途中客死兴化。友芝长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证,尤精版本目录之学,擅书法。诗宗黄庭坚、陈师道,而上溯孟郊、韩愈、元结,古朴深微,“刊落时艳”,“生峭凝炼”(金武祥《粟香随笔》)。其山水、抒怀、旅思之作颇有佳构,少数作品哀民生多艰、胥吏横行,愤英法联军入侵。郑珍称“其言情状事处,深入曲达,特是擅场”,“其取旨也务远,其建词也务新。句揉字炼,使其光黝然,其言缪然,绝无粗厉猛起景象”,“惟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邵亭诗钞·题识》)。友芝与郑珍自少年交,同师其父莫与俦,同治考据词章,同为程恩泽所倡宋诗派之代表诗人,世称“郑莫”。陈衍以为“郑、莫并称,而子偁学人之诗,长于考证,与子尹有迥不相同者”(《石遗室诗话》),“二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诗情尤挚耳”(《近代诗钞》)。有《邵亭诗钞》六卷、《邵亭遗诗》八卷、《邵亭遗文》八卷,及《黔诗纪略》等,合刊为《独山莫氏邵亭丛书》;另有《影山词》、《韵学源流》等。生平见黎庶昌《莫征君别传》、张裕钊《莫子偁墓志铭》。(王飏)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

生。湖南湘乡人。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由翰林院检讨,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侍郎。在京从唐鉴受义理之学,并治考据、词章。文宗咸丰二年(1852),以母丧回籍,在服丧期内奉命在乡办团练,建湘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以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加太子少保衔,晋封一等毅勇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穆宗朝,与李鸿章等倡办洋务,创江南制造局等。卒赠太傅,谥文正。在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间,以继古今圣哲、扶持名教为己任,又身居高位,幕中网罗众多人材,遂成一时文坛宗主。平生好雄伟瑰奇之文,而推尊姚鼐及桐城派古文,实借此自立门户,别开湘乡文派。于诗宗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兼取陶潜、李商隐、陆游,而尤崇黄庭坚。其《题彭旭诗集后》云:“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胖蚤”,“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遂继程恩泽、祁雋藻而广宋诗派之流。陈衍《石遗室诗话》谓“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晚晴簃诗汇》亦称其“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翳,独宗西江,积衰一振。”而章炳麟则以为:“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珵谿辞相等”,“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国故论衡》)。钱仲联又谓其“于山谷尤有深契”,而“晚年专尚闲适之境”,“惜曾氏为功业所分心,自为诗未能臻以恬淡之境。即其气象宏阔之作,亦壮观有馀,凝炼不足。此其于诗之造诣,所以尚不逮其文也”(《梦苕庵诗话》)。著有《曾文正公诗集》四卷,并其奏稿、文集、家书、书札、日记、杂著等合刊为《曾文正公全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〇五本传、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焘、刘喜《曾文正公墓志铭》,朱孔彰《曾文正公别传》。(王飏)

【徐子苓】(1812—1876) 字西叔,一字叔伟,号毅甫,亦作易甫、毅夫,晚号南阳子、龙泉老牧等。安徽合肥人。早岁曾师事姚莹。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入京,获交曾国藩、邵懿辰、张穆等知名之士,然性耿介,人目为“怪”。会试不第。后客居池州县令陈源充所。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先后佐江忠源、曾国藩、英翰军幕有年。战后,英翰欲疏荐之,而与同事朱景昭、王尚辰皆拂衣归里,时人谓之“庐阳三怪”。穆宗同治五年(1866),拣选知县,以不乐为吏,改教职,选和州学正。以诗文驰名文宗咸丰(1851—1861),穆宗同治(1862—1874)间,谭献曾选其诗及戴家麟、王尚辰诗合刻,称“合肥三家”,而陈衍则以为“戴不如王,王不如徐”(《近代诗钞》)。姚莹称其诗“古直浑坚,其源自汉、魏来”,“五、七言近

体体洁思清,时获妙绪,佳者在高、岑、王、孟之间”;何绍基亦称其“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锤炼精坚,当以五古为尤胜”(均见《敦艮吉斋诗存题词》)。著有《敦艮吉斋诗存》二卷。生平事迹,见金天羽《皖志列传稿》,马其昶《龙泉老牧传》。(王臧)

【刘熙载】(1813—1881) 字伯简,号融斋,又号蓊崖子,江苏兴化人。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文宗咸丰二年(1852)入直上书房。咸丰六年,外放道员,以病乞假。客山东,讲学授徒,后应胡林翼之聘,主持湖北江汉书院。穆宗同治三年(1864),复征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官至广东学政。同治五年,未满任即乞归。晚岁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生平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论学不专宗程、朱,兼取陆、王心学,主慎独静敬,并通音韵、天文、历算,尤长于文论,所著《艺概》,分别概论文、诗、赋、词曲及书法、时文等发展源流,品评作家,并总结概括若干基本理论,为一部较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诗概》提出“不发乎情,即非礼义”,“发乎情,未必即礼义”,强调诗“不可有古而无我”,重视品格、气象、意境、理趣等,每多独到见解。亦能诗文。所为诗、文、词曲等合编为《昨非集》四卷,并其《艺概》六卷,及《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合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后人又汇刻其遗稿《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为《古桐书屋续刻三种》。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〇,《碑传集补》卷四二。

(王臧)

【王拯】(1815—1876) 原名锡振,字定甫,一字少和,号少鹤,又号龙壁山人。广西马平人。幼孤,赖姊抚养成人。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道光二十一年成进士,官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曾从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文宗咸丰(1851—1861)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卿。穆宗同治三年(1864),迁太常寺卿,官至通政使,署左都副御史,屡上书言事。寻告归,卒于乡。在京师时,曾从梅曾亮游,问古语法,与朱琦、龙启瑞等并为桐城派流衍广西的代表作家。诗亦与朱琦相伯仲而稍逊之。其诗初学王维、李白,后宗杜甫、韩愈、孟郊、苏轼,于清代诗人中颇推重黎简。林昌彝谓其“抚时感事之作,音节凄怆,如哀笳晓角”(《海天琴思录》)。有《龙壁山房诗集》十七卷,刊入《岭西五家诗文集》,另有《龙壁山房文集》、《茂陵秋雨词》、《瘦春词》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

(王臧)

【江湜】(1818—1885) 字持正,一字弢叔,别署龙湫院行者。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年甫弱冠补府庠生,后三应乡试不第。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

以贡生游京师。次年,出游山东学政殷述斋幕。道光二十七年,从其表丈福建学政彭蕴章入闽佐幕。历三年,返乡授徒江村。文宗咸丰四年(1854),复入闽佐李联琇学幕,因论诗不合,辞去。及李调江苏学政,邀其回乡应试,辞不应。咸丰七年,因窘于生计,赴京投彭蕴章。时彭任大学士,赠资为其授例得从九品衔,分发浙江,掌杭州盐运司文书。十年,以太平军攻破杭、苏,辗转至闽。穆宗同治三年(1864),为温州长林场盐课大使,又调杭州佐海运事,落拓以终。其诗于近代自创新面,别为一体,多自道身世,抒写困顿抑塞、旅食天涯之孤苦。刻画世态,语多讥嘲;描摹旅景,辞多生新。似孟郊、杨万里而不为两家所限,尤以白描取胜。陈衍《石遗室诗话》云:“弢叔诗力深透……而身世坎壈,所写穷苦情况,为东野、后山所未言。近人则郑子尹、金亚匏未能或之先。寻常命笔,必有一二语可味者。咸、同间一诗雄也。”金天羽《答苏堪先生书》云:“弢叔其时一穷薄儒素耳,……创坛坫于江海之上,独吟无和。吴中文采绮靡,弢叔独以清刚矫浓醇”,“曲折洞达,写难状之隐,如听话言。”著《伏敌堂诗录》十五卷,《续录》四卷。生平事迹见黄华《长洲江弢叔先生传》(《伏敌堂精华录》)。

(王臧)

【金和】(1818—1885) 字弓叔,号亚匏。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父早卒,母为吴敬梓堂侄孙女,由母督教成人。少有才名,性狂放,为文不拘守八股程式,故仅为增生,终生未得仕进。鸦片战争时,曾亲历英军围城,目睹清官兵腐败诸状。文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与妻弟张继庚同谋作清军内应,并潜逃出城至清营请兵,未遂。后流寓江、淮间,充馆师、佐吏以谋生。咸丰十年,游幕广州。太平天国失败后,于穆宗同治六年(1867)返归金陵,益落拓。唐景星在上海办招商局,知其才,招之,自是留沪上有年。一生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乱,“兵刃死亡,非徒闻见而已,盖身亲之”(谭献《来云阁诗序》),诗中纪事诸作,多嘲骂、讥斥公卿大吏及清军在英军面前畏怯求和,而对百姓肆意掠杀之残暴。其《断指生歌》、《兰陵女儿行》、《烈女行纪黄婉梨事》等甚且同情平民对清军暴行之反抗,亦有许多咒骂太平军的诗及刻画世态、自嘲落拓之作。为诗有意于“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往往以文为诗。讽刺之笔,受《儒林外史》影响,尖刻而稍嫌直露。陈衍称“其古体极乎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惨淡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子尹”(《近代诗钞》)。梁启超称其“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秋蟪吟馆诗钞序》),并以之与黄遵宪并举为“晚清两大家”,“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以为金、黄的“两部

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胡先骕则谓:“金氏之诗,才气横溢,言词犀利,诚有过人之长,惟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轻薄,殊缺诗人之高致。”(《评金亚匏〈秋蟪吟馆诗〉》)。有《秋蟪吟馆诗集》六卷、《来云阁词钞》一卷、《来云阁文钞》一卷。生平事迹见束允泰《金文学小传》。(王臧)

【洪仁玕】(1822—1864) 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少习经史,累试不第。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洪秀全所创拜上帝会,为最早会员之一。次年,赴清远任教,并发展拜上帝会会员。因未能赶上金田起义队伍,于文宗咸丰二年(1852)转至香港。识瑞典教士韩山文,并受洗礼,曾任伦敦布道会布道师,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咸丰九年,转辗至南京,封干天福,晋精忠军师,干王,总理朝政。撰《资政新篇》,提出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穆宗同治三年(1864),护幼天王转战至江西,被俘就义。能诗,而多散佚,今存诗见于《军次实录》及被俘后所撰《洪仁玕自述》。早年所作《甲寅四月冬自上海乘海轮返香港》、《香港钱别》等,即景骋思,情豪辞雄,表达对太平天国的向往与壮怀。《军次实录》系咸丰十一年作者赴皖、浙催兵途中为晓谕军民、鼓舞士气所作诗文辑录,“文浅意深,语近旨远”(刘闳忠《军次实录序》)。诗多雄伟高昂之作,情志格调,均异于传统诗歌。部分诗作宣扬“天恩”,有辞过俗白之病。所存诗、文,选辑为《洪仁玕选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生平事迹见《洪仁玕自述》,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洪仁玕》,郦纯《洪仁玕》。(王臧)

【邓辅纶】(1828—1893) 字弥之。湖南武冈人。少与王闿运同肄业于长沙城南书院,与其弟邓绎及龙岷臣、李篁仙立兰林词社,号“湘中五子”。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文宗咸丰元年(1857),中乡试副榜,捐资助饷,叙官内阁中书。太平军攻江西时,赴南昌佐其父邓仁堃守城。后为人中伤,引疾去官。以曾国藩奏保,为浙江候补道员。杭州城破,以不能殉职被劾免归里。晚年主讲湖南东洲书院、南京文正书院,卒于讲舍。与王闿运并为晚清湖湘诗派,亦称汉魏六朝诗派首领。吴翊寅称其“诗法陶(渊明)、谢(灵运)”,“上该汉、魏,下掩宋、齐。时亦出入三唐间,然非所屑也”(《白香亭诗集跋》)。尤好陶渊明,集中专有一卷《和陶诗》。诗多古体,近体较少;又多拟古之作,尝遍拟魏、晋、六朝诸家。王闿运曾谓其“诗学杜甫,体则颜、谢”(《湘绮楼说诗》),又称其“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诗法一首示黄生》)。许振祎亦谓其诗“实深守杜法,语多幽愤沉郁”(《邓弥

之同年诗集序》)。集中颇有关关注民生的凄怆沉痛之作。晚年肆情山水,萧闲冲淡。陈衍评曰:“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觉千篇一律耳。”(《石遗室诗话》)有《白香亭诗集》三卷。生平事迹见王闿运《邓弥之墓志铭》。(王臧)

【李慈铭】(1829—1894) 初名模,字式侯,更名慈铭,字悉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少即有诗名,而应乡试十一次皆不第,入赘为户部郎中。至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始中举。德宗光绪六年(1880)成进士,仍归户部。光绪十六年,补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书言事,批评时政,纠弹权要,而多不见用,郁郁以终。慈铭治学广博,自经史子集、小说佛典、诗词戏曲无不涉猎。读书所得,成《越缦堂日记》数十巨册。所著散文、骈文、考据、笔记、诗歌、词曲甚丰,而自言“所得意者莫如诗”(《白华绛跼阁诗初集自序》),且自视甚高,尝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越缦堂日记》)。其诗取径较广,不名一家,不专一体,而所作或慨叹身世落拓,或吟咏山水风物,多感愤切挚之作,登临闲适之篇,少数篇什间或触及时事,愤恨列强侵略。诗风“清淡平直,不炫异惊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写景之诗,句多明秀。其弟子樊增祥对之推崇备致。近人钱仲联则以为其诗“未免落乾、嘉以来浙派窠臼。意境格局,无出人意表之处”(《近代诗钞》)。有《白华绛跼阁诗初集》十卷,尚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未刻。吴道晋自其日记辑未刊诗为《杏花香雪斋诗》十卷。另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霞川花隐词》,及后人所辑《越缦堂诗话》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平步青《李君莼客传》(《碑传集补》卷一〇)。(王臧)

【黄焕中】(1832—1912以后) 字尧文,号其章。广西宁明人,壮族。贡生。生四月,父即被土官殴伤致死,母林氏抚孤成立。青年时与乡中文士共同创办思齐书院,授徒为生。清文宗咸丰(1851—1861)、穆宗同治(1862—1874)间,曾加入地方团练,为幕僚。约于德宗光绪八年(1882),入刘永福黑旗军戎幕,参赞军务。曾赴越南抗击法国侵略军。甲午战争时,又随刘永福入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内渡后,留军幕驻海南钦、廉边防。前后追随刘永福二十余年。光绪(1875—1908)末返乡,后赴龙州教学,暮年归里,教读本家子弟。年逾八十,卒年不详。其记中法、中日战争的诗篇,歌颂刘永福及黑旗军抗战业绩,抒发报国壮志,愤慨谴责朝廷妥协投降,爱国之情,慷慨激越,孤愤之思,沉雄悲凉。晚年所作《龙州竹枝词》、《海渊竹枝词》、《丽

江竹枝词》等,吟咏南疆风情,及二十世纪初村镇生活新景,清新流动。焕中为近代壮族诗人中成就较著者。著有《天涯亭吟草》,今佚。仅《思乐县志》、《宁明耆旧诗辑》中存诗不足三百首,计律诗一百四十余首,绝句一百三十余首,及少数五、七言古。生平事迹,见曾庆全《近代壮族爱国诗人黄焕中》(《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王飏)

【王闾运】(1833—1916) 初名开运,字纫秋;更名闾运,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少贫苦学,遍治经史百家,尤肆力于文,与邓辅纶、李寿蓉等结兰林词社,号湘中五子。清文宗咸丰七年(1857),补行癸丑科(咸丰三年)乡试,中举人。咸丰九年,应进士试不第,为尚书肃顺延为上宾,旋辞归。文宗咸丰(1851—1861)、穆宗同治(1862—1874)间几度入曾国藩军幕,有所建言,而以宾客自处,不受实事。以言有不合,自同治四年(1865)退归著述,作《湘军志》等。德宗光绪四年(1878),应四川总督丁宝桢聘,主尊经书院,于经学主今文,而不废古文,门下士人从之,号称蜀学。光绪十二年,返湘,历主长沙思贤讲舍、校经书院,衡山东洲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复应聘任江西高等学堂总教习,主豫章书院。光绪三十四年,以湖南巡抚岑春煊之荐,赐翰林院检讨,加侍读。入民国,任国史馆馆长,兼参议院参政。旋辞归,卒于乡。闾运为近代湖湘诗派魁首,诗宗汉、魏、六朝,以为“作诗必先学五言,五言必读汉诗”,“诗法备于魏、晋,宋、齐但扩充之,陈、隋则开新派”,又谓诗“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而“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自谓“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熔铸而出之”(《湘绮楼说诗》)。诗多刻意拟古,而内容也间关时事,或感时抒慨,情思绵邈,名篇有《圆明园词》、《独行谣》等。其写景诗清雅自然,五古能得谢灵运神韵。七言近体,时近李商隐,然自定诗集时,只收五、七古及五律,不收七言律绝,七言近体另编别本。闾运与邓辅纶同倡八代,时称“王、邓”,同时如高心夔、门下如陈锐、杨度及其妹杨庄等,皆得其诗法,遂于宗唐、宗宋外别开一派。陈衍谓:“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唯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石遗室诗话》)。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则置之榜首,以为“要其精思盛藻,近百年内,无与抗手,光、宣后诗人不足以知之也”(《王闾运传》)。夏敬观谓其“造诣卓绝,神理绵邈”,“足以救乾、嘉之弊矣。独屏宋诗,若蜂蛰鸩毒,则其言过而不察耳”(《忍古楼诗话》)。有《湘绮楼诗集》十四卷、《湘绮楼说诗》八卷、《文集》八卷,及《诗

经补笺》、《春秋公羊传笺》、《庄子注》、《湘军志》等。其诗文合刊为《湘绮楼全集》,并其经史著述由门人辑为《湘绮楼全书》。生平见《清史稿》卷四八二、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王飏)

【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穆宗同治二年(1863)进上。授编修。同治六年,督湖北学政,创经心书院。同治十二年,调四川学政,创尊经书院。德宗光绪六年(1880),授翰林院侍讲,迁右庶子,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等纠弹时政,时号“清流党”。次年,擢内阁学士,出为山西巡抚。光绪十年,擢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又立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调湖广总督,兴办实业,设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年,代两江总督。中日甲午战后,上疏阻和议,主变法,并兴工商。曾列名上海强学会,后又承旨查禁。旋回湖广总督任。撰《劝学篇》,倡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三年,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清末帝溥仪即位,晋太子太保,卒谥文襄。之洞以晚清重臣而工诗,论诗务以清切为主,不喜纤佻,尤不喜黄庭坚、江西派诗。尝谓“黄诗多槎枿,吐语无平直”(《摩围阁》),又谓“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过芜湖吊袁宏》)。大抵采苏轼、王安石等宋人诗路而出以唐人格调。写景抒怀,多清隽深切,晚岁所作,能自道封疆大吏面临国势衰微之忧心与怀抱,用典精当,雅重宽博,“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闾运)、陈伯严(三立),而别开雍容雅缓之格局”(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为湖广总督时,梁鼎芬以及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皆或罗致幕中或相与酬唱,其门下如袁昶、樊增祥、易顺鼎等,诗风亦各异,故胡先骕许为“领袖群英”。有《广雅堂诗集》四卷,其诗、古文、骈文及著述文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二百二十九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三七,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铭》、陈衍《张相国传》。(王飏)

【樊增祥】(1846—1931) 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天琴。湖北恩施人。少工诗文,穆宗同治六年(1867)举人。湖北学政张之洞赏其才,授之以学,并荐主潜江书院,故后与易顺鼎、袁昶共称“南皮三弟子”。同治十年,游京师,从李慈铭受词章之学,亟相倾重。德宗光绪三年(1877)进士,选庶吉士。改外放,官陕西宜川县令,历知咸宁、昌平、长安诸县。光绪十九年,调补渭南知县。光绪二十五年,以荣禄荐招,以道员充武卫军事。八国联军入侵时,为慈禧太后及德宗逃西安作前驱,擢政务处提调,屡起草诏

书。旋迁陕西按察使、布政使,调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民国初,曾为参议院参政,与袁世凯子克文征歌赋诗。晚年以遗老自居,息影旧都。富于诗才,有诗三万馀首。少喜读袁枚、赵翼,自言为诗则“初涉温(庭筠)、李(商隐),后溯刘(禹锡)、白(居易)”,宗中晚唐诸家。风格兼清华与博丽。少作及任地方官时所作,虽多咏物闲情,尚不失清切旷逸。而好为艳体,多冶游绮语,晚岁更颓唐率易,为世所讥。唯甲午战争及庚子事变时感念国事之作,颇激切愤慨。前后《彩雲曲》写赛金花事,颇负盛名。七律尤工于隶事,巧于裁对,喜用生典,整密工丽。与易顺鼎齐名,世称“樊、易”。张之洞尝谓:“洞庭南北,得二诗人,千秋歌行,云门今体,皆绝作也”(陶在铭《樊山集序》)。讥之者则斥为“樊、易淫哇乱正声”(柳亚子《论诗六绝句》)。有诗集《云门初集》、《转蓬集》、《淥水集》、《镜烟堂集》等四十一种,并有词集文集,先后汇刻为《樊山诗钞》、《樊山诗文钞》、《樊山集》、《樊山续集》等。其事迹见钱海岳为撰事状。

(王飏)

【袁昶】(1846—1900) 原名振蟾,改名昶,字爽秋,又字重黎,别号芳郭钝叟、钝椎、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从刘熙载读,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同治八年,应聘为杭州书院总校。同治十三年,纳粟为中书舍人。德宗光绪二年(1876),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光绪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五年,记名御史。尝采录时人关于取法泰西之论述积数十册,题曰《筹洋丛牋》。光绪十八年,出任徽宁池太广道,卓有政绩。光绪二十四年,诏地方官筹议练兵筹饷方策,乃条陈时政、综论全局上奏,深受德宗赏识,授江宁布政使,调直隶布政使,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补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起,上《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主张镇压。八国联军攻陷大沽,清廷下令围攻各国驻华使馆,对外宣战,与许景澄上书反对,被杀。后追谥忠节。昶博学多识,通内典,重气节,笃实践。工诗,被视为近代宋诗派的代表诗人,与沈曾植同被视为后期浙派魁首。张之洞称之为“双井”(黄庭坚)半山(王安石)君一手”(《过芜湖吊袁沅蓂》)。陈衍称其诗“根柢鲍、谢,而用句遣词力求僻涩,则纯于桃唐抱宋者”(《近代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曰:“平生博极群书,出入仙释。其诗意新味古,兀傲自喜,殆如其人。”诸祖耿曰:“间尝读清季诸贤之诗,内籀者莫工于浙西,外籀者莫侈于入境。入境不免乎粗放,而浙西微嫌其细碎,然二子没而嗣音又绝。”(《天放楼诗续集序》)著有《浙西村

人初集》十卷、《安般经诗》十卷、《于湖小集》一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六,谭廷献《太常寺卿袁公墓碑》(《续碑传集》卷一七)、章钺《袁昶传》(《碑传集三编》卷九)。(赵慎修)

【黄遵宪】(1848—1905) 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今梅州)人。遵宪四岁入塾读书。十岁塾师以《一览众山小》命题作诗,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诗句一鸣惊人,饮誉乡里。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应顺天乡试中举。同年,应聘为驻日使馆参赞;次年,赴任。驻日期间受日本明治维新及卢梭、孟德斯鸠著作之影响,开始萌发维新思想,并着手撰写《日本国志》,以为中国之借鉴。尝谓“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己亥杂诗》自注)。光绪八年春,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时值美国掀起排斥华工运动,据理力争,使华工利益得到一定保障。光绪十一年,请假回国,完成《日本国志》。光绪十五年,任驻英使馆参赞。光绪十七年秋,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江总督张之洞以筹防需人,奏请调其回国。次年,就任江宁洋务局总办,负责处理江西等五省教案。同年加入强学会,并倡议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奉旨陛见,陈请变法维新。次年,改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员,署理按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设保卫局,并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办理时务学堂,创办《湘学报》、南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以期开通民智,提高绅权,削弱官权。光绪二十四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国大臣,因病滞留上海。戊戌政变作,得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之助而幸免于难,但被革职回籍,以读书、办学、教育子弟自遣。病逝于乡。遵宪初登诗坛即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后更言“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事异于古,今之人亦不必与古人同”,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其诗篇以反映反侵略战争与较早以来外事物入诗著称,尝被称为“诗界革命”的冠冕。梁启超曰:“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饮冰室诗话》)。高旭曰:“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愿无尽庐诗话》)陈衍曰:“人境庐诗,惊才绝艳,人谓其濡染定庵,实则宗仰《晞发集》甚至。”(《石遗室诗话》)钱仲联曰:“黄公度遵宪人境庐诗,以旧格律运新理想,诚不愧诗界之哥伦布。然传诵一时之《今别离》四章、《以莲菊桃杂

供一瓶作歌》诸首,笔路粗疏,大似张船山一流,并不见佳。余最爱其《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长五古,曲折详尽,语皆本色,真公度所谓我手写我口者。运用古乐府之神理,而全变其面貌,不足与皮相者道也。”“人境庐诗,于写景似非所措意,然偶然兴到,亦有佳作。”(《梦苕庵诗话》)钱鍾书曰:“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瓠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盦,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谈艺录》)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四、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一三)、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杨天石《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赵慎修)

【陈宝琛】(1848—1935) 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桔隐、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闽侯)人。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登进士第,改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十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德宗光绪元年(1875),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光绪五年,充甘肃乡试正考官。光绪八年,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即授江西学政。直言敢谏,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清流”。光绪十年,中法战争起,屡上疏论和战利害,奉旨充南洋大臣会办。以举荐失当,降五级调用。清末帝溥仪宣统元年(1909),起复原官。特命掌礼学馆。寻补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实录馆副总裁。宣统三年,授山西巡抚,未就,更命以候补侍郎銜于毓庆宫教授溥仪读书,兼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入民国,仍忠于清室,溥仪授以太保、太傅。有《沧趣楼诗集》十卷、《听水斋词》一卷、《沧趣楼律赋》一卷、《沧趣楼文存》二卷。生平事迹见陈三立《赠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

(赵慎修)

【释敬安】(1851—1912) 俗姓黄,名读山,出家后名敬安,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湖南湘潭人。出身农家。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衣食无依,为人放牛、伴读。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在湘阴法华寺出家。次年,赴衡阳岐山仁瑞寺,受精一律师吟诗之影响。同治十年,登岳阳楼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受郭菊荪赏识,授以《唐诗三百首》,遂学诗。同治十二年,补作《祝发示弟》诗,存诗始于是年。此后曾游长沙岳麓山寺、常州天宁寺、三茅山普安寺、四明山阿育王寺。德宗光绪二年(1876),与吕文舟、胡鲁封、徐酩仙等结社吟诗。次年,在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烧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故自号“八指头陀”。光绪十二年,王闿运等结碧湖诗社,应邀参加。光绪十五年,为衡阳大罗汉寺住持,并与俞明震、陈三立、

曾广钧等人畅游南京,作“白门佳会”。光绪二十七年,为长沙上林寺住持。其后长期为宁波天童寺住持。武昌起义爆发后,曾语人曰:“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宏旨,最适共和。”(冯毓荪《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1912年,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被推为首届会长。是年冬,示寂于北京法源寺。尝自言其诗“传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贾、孟之气体”(见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第六章)。其诗谈禅说理、感怀时事,写景纪游之作皆能自成一格,而尤以描摹寂寞凄清之情景见长。王闿运称其诗“自然高淡,五律绝似贾岛、姚合,比之寒山为工”(《八指头陀诗集》序)。叶德辉曰:“其诗宗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殆宕,不主故常,骛骛乎有与邓(辅纶)、王(闿运)犄角之意。”(《八指头陀诗集》序)狄葆贤称其《夜登玲珑台》“多作险语,颇有唐李洞‘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之致”(《平等阁诗话》卷下)。有诗约一千九百多首,曾刊印《八指头陀诗集》、《八指头陀诗续集》、《嚼梅吟》、《白梅诗》等。今人梅季辑为《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第1版)。生平事迹见冯毓荪《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梅季《八指头陀年表》(见《八指头陀诗文集》附录)等。

(赵慎修)

【沈曾植】(1851—1922) 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署东轩、蕙庵、睡庵、逊斋、谷隐居士等。浙江嘉兴人。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进士。由刑部主事,兼充总理衙门章京,迁员外郎、郎中。曾赞助康有为创办京师强学会,支持康上书言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应张之洞之聘,主两湖书院史席。庚子事变时,曾力主“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九年,简放江西广信知府,历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清末帝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以遗老居上海。1917年,张勋复辟时,扶病赴京,授学部尚书。卒于沪。学识渊博,通经史诸子、音韵训诂,治西北、南洋地理,尤熟于辽、金、元史,旁及佛、道,兼治刑律、医学、金石书画等,名传海内外。其诗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诸家,而能合学人、诗人之诗而一,取奥语、奇词、佛典、僻典以入诗,发挥其经学、佛学及医学、诗学之思,部分诗作表达对戊戌变法及富国强兵的支持。张尔田云:“公诗以六籍、百氏、集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轶,而以辞为辖。”(《寐叟乙卯稿后序》)陈三立亦谓“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海日楼诗集跋》)。然亦有清隽之作,故陈衍谓其“雅尚险奥,警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沈乙庵诗叙》)。为近代“同光体”中浙派代表。著《海日楼诗集》十二卷,其

1915年诗别刊为《寐叟乙卯稿》一卷。另有《海日楼文集》二卷(未刊)、《曼陀罗寐词》一卷,及《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海日楼丛札》、《海日楼题跋》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八)、王遽常《沈寐叟先生年谱》。(王遽)

【陈三立】(1852—1937) 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列别名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佐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湘推行变法,提倡新学,与黄遵宪、江标等参与筹划新政,特荐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与谭嗣同并称“两公子”。戊戌政变后,与其父同被革职,退居南昌西山,筑靖庐。西山旧称散原山,因以散原自号。后移家南京。光绪(1875—1908)末,曾参与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兴建南浔铁路。清亡后,以遗老自居,与沈曾植等唱和。然亦与革命党人李烈钧等往还。1933年迁居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侵略者威胁利诱,疾发不服药而卒。工诗文,尤以诗著称,为“同光体”诗派首领。诗宗黄庭坚,推崇黄诗能“奥莹出妩媚,冥搜贯万象,往往天机备”,非徒“涩硬”而已。故陈衍称其“避俗避熟,力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石遗室诗话》)。杨声昭以为“散原以名父之子赞襄新政,颇树名绩;中更党锢,志业未酬,诗文时多伊郁”(《读散原诗漫记》)。早年所为诗编集时已自删去,今《散原精舍诗集》所收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后所作,部分作品仍存风云之气,愤激之情。辛亥以后则多遗老苍凉之思。郑孝胥谓其诗“至辛丑(1901)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慨,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界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散原精舍诗序》)。梁启超云:“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林庚白则以为其“能屹然自成其一家”,而“方面太狭”,“不能自开户牖”(《丽白楼诗话》)。著有《散原精舍诗集》二卷、《散原精舍诗续集》三卷、《散原精舍诗别集》一卷、《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生平事迹见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陈三立》、吴宗慈《陈三立传略》。(王遽)

【林纾】(1852—1924) 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蠡叟、践卓翁、春觉斋主人等。福建闽县(今闽侯)人。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举人。后七赴会试不第,又目击官场腐败,遂绝意仕进。召为邮传部郎中,不赴。历任杭州东城讲舍,北京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教职。清亡后,却清史馆名誉纂修之聘,拒受袁世凯所聘高等顾问、参政之职,以教学、鬻文为生。晚年

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北京孔教大学、励志学校讲席,以清遗老终,其弟子私谥为“贞文先生”。不谙外文,据他人口译而笔述,译世界各国小说一百八十余种,统称“林译小说”,名盛一时,影响巨大。古文、诗、画并擅。其论诗,主张“诗之道,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反对“分唐界宋”,尤力辟“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早年诗颇“多悲凉怆楚之音”(《西湖诗序》),未结集,唯存《闽中新乐府》。晚年所作诗,则“雅步媚行,力戒甚嚣尘上矣”(陈衍《石遗室诗话》)。其记游、题画之诗,多清矫之气,而伤时、忆旧诸作,每寄遗老之思。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及《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春觉斋论文》,小说《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小说集《蠡叟丛谈》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朱义胄《贞文先生年谱》。(王遽)

【范当世】(1854—1905) 原名铸,改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与弟钟、铠称“三范”。以行长,称大范。从张裕钊学。与张謇、朱铭盘为“通州三生”。曾讲学于保定莲池书院。屡试不第,终生贫困。自称“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与张幼樵论不应举书》)。以诗人与古文家著称。与吴汝纶、陈三立、俞明震等游。陈三立谓其“虽若文士,好言经世,究中外之务。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范伯子文集序》)。诗法苏轼、黄庭坚、元好问。其《除夕诗狂自遣》诗云:“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道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王吴班。”长于议论,多散文句式。陈衍《近代诗钞》曰:“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也。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读之往往使之不欢。”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曰:“诗学东坡、临川,心摹手追,直造其域。”著有《范伯子诗集》十九卷,文集十二卷。生平事迹见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载《碑传集三编》)。(赵慎修)

【严复】(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改名复,字幾道,晚号癸廌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穆宗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德宗光绪三年(1877),赴英留学。从光绪六年起,历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达二十年。1912年后历任京师大学堂总督、袁世凯总统府顾问。1915年,参与筹安会,鼓吹帝制。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著称,与林纾之翻译西方文学齐名,世称“严林”。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尤以《天演论》影响为最大。首倡“信、达、雅”

翻译三原则(见《译〈天演论〉例言》)。论诗不主宗派。尝言“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说诗用琥韵》)。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严又陵哲学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诗才之渊懿,或罕知者。”钱鍾书《谈艺录》(增订本)谓其“《瘠壁堂诗》词律谨飭,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缙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直译西谚……点化镕铸,真风炉日炭之手。著有《瘠壁堂诗集》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除收入《瘠壁堂诗集》外,又收《补遗》诗三首,及未刊《瘠壁诗》目录。牛仰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版),收集严复生平及其他资料较多。(赵慎修)

【许南英】(1855—1917) 字蕴白,一作允白,号霁云,别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昆舍耶客、春江冷宦。先人由广东揭阳移居台湾安平(今台南)。六岁丧父,由母抚育成人。清德宗光绪四年(1878),为家庭塾师。后又在其家窥园设闻樾学舍授徒讲学,直至三十五岁,均以教书为业。光绪十一年中举。光绪十六年,登进士第,授兵部主事。旋辞归。光绪二十年,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聘为台湾通志局协修。中日开战后,改台南采访局为团练局,使之统兵两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奋起抗日,为筹防局统领。事败,赴汕头。漫游泰国、新加坡等地。两年间囊金荡尽,复被迫走上仕途。光绪二十三年,赴京,自请开去兵部职赴广东任知县。光绪二十五年,随潮州镇总兵赴惠阳、潮州、嘉应办理清乡事务。光绪二十六年,委充佛山汾水税务总办。次年,署徐闻县知县。其后,调署阳春知县、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曾开办阳江习艺所、阳江师范传习所,选派留日学生。光绪三十三年,改任三水知县。秉公办事,开罪乡绅,拟辞职,会授电白知县。将赴任,武昌起义。回漳州,被举为革命政府民事局长。1913年任龙溪县长,旋辞职。1917年12月病卒于印尼棉兰岛。平生景仰苏轼、黄庭坚。诗作感情真挚,不尚修饰,颇有慷慨激昂、美刺时事之作。虽崇尚苏、黄,而气韵格调亦有点类晚唐之作。汪春源《窥园留草序》评其诗曰:“不事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1937年印行《窥园留草》,附录《窥园词》,收诗一千零三十九首,词五十九首。卷首收有《窥园先生自定年谱》、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赵慎修)

【陈衍】(1856—1937) 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九岁习唐诗,十岁习举子业。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举人。光绪十一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光绪二十四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从日人河濑如同学日语、经济学及数学。编《商务》

杂志,译日本著作。著《戊戌变法榷议》,主张各省设陆军学堂,实行印花税,发展农业,翻译西方著作。光绪二十七年,著《货币论》,译日本《商律》。次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光绪三十三年任官报局总编、学部主事。晚年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是“同光体”诗派的主要提倡者与理论家。论诗提倡“三元”说,即以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宪宗元和时期、宋哲宗元祐时期为诗歌发展史的三个高潮。以“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为中国诗史的两大主要派别。以为诗歌是荒寒之路,无关乎利禄,提倡诗歌的非功利主义。论诗歌风格往往取折衷态度,如主张诗贵风骨,然要色泽;诗贵淡荡,然亦贵浓至;诗贵疏野,亦贵精微。诗须骨力坚苍,但其弊也窘;须才思横溢,但其弊也滥;须句法超逸,但其弊也轻纤,故必须济之以兴味高妙。其诗多为纪游写景之作,间亦有咏史怀古之作。平实质朴,极少用典。李肖聃评曰:“石遗论诗甚精,而自为诗则拘于才气,而以格律自苦。”(《星庐笔记》)著有《石遗室诗集》三卷、补遗一卷,《石遗室诗续集》六卷,《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生平事迹见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等。

(赵慎修)

【文廷式】(1856—1904) 字道希,亦作道羲、道熾、道溪、道兮。号芸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匡庐山人等。江西萍乡人。祖文晟官广东惠州知府,父文星瑞官广东高廉兵备道。廷式生长于广东。年十七,师事陈澧,为菊坡精舍高材生。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三名,才名渐著。孜孜研究西学,学习英语和德语,注意研究世界形势。光绪十二年,参加会试落第,但与王懿荣、张謇、曾之撰合称“四大公车”,名动公卿。光绪十六年,以一甲第二名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光绪十九年,充江南乡试同考官。次年,大考翰詹,德宗亲擢廷式为一等第一名,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中日甲午战争起,主战,上疏弹劾李鸿章妥协误国,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参与创办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被视为帝党中坚。遇事敢言,为后党所忌恨。光绪二十二年,由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章弹劾,以遇事生风、语多狂妄、互相标榜,及与内监往来等罪名革职,逐回原籍。戊戌政变作,于康有为处查得文廷式致康信件,清廷密电江西巡抚缉拿,避匿湘潭。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应日本同文会之邀赴日,三月,返国。同年七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唐才常等发起的“中国国会”。自立军败,清廷再次下令缉拿。晚年寄情诗酒,以佛学自遣。光绪三十年八月病逝于萍乡。廷式诗词均不尚苟同,而欲自立门户,如其

《论诗》七绝云,“洪炉自有陶钧术,怕看人间集字诗”,“莫宗李杜效钱郎,别调元人旧擅场”,要求做到“生面重开”。廷式以词名世,诗亦别具一格。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曰:“萍乡文芸阁廷式以词名一代,其词气王神流,得稼轩之髓,于晚清王半塘、郑叔问、朱古微、况蕙风四家外,别树一帜。平生与沈乙庵先生颇投契,尝问乙庵曰:余诗于古人奚似?乙庵曰:君诗自具一种冲和之气,殊肖王摩诘。此意外人那得知,则亦以为似高青邱也。可谓名论。今按《云起轩诗录》一卷,虽所存不多,卓然可传。”著有《云起轩词抄》一卷、《文道希先生遗诗》一卷、《纯常子枝语》四十卷、《知过轩随笔》一卷、《闻尘偶记》、《补晋史艺文志》等。生平事迹见胡思敬《文廷式传》(《碑传集补》卷九)、汪叔子《文廷式》(《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汪叔子编《文廷式集》附录《文廷式年表稿》、钱仲联《文廷式年谱》(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赵慎修)

【潘飞声】(1858—1934) 字兰史。别署老兰、剑士、水晶庵道士。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间,其祖父之双桐圃与张维屏之听松园、邓荫泉之杏林庄,皆有壶觞吟咏之盛。飞声年十四,从何葵青学诗。年十六,以《秋月篇》呈陈良玉,中有“独有肝肠未许人,愿上青天嫁明月”句;陈赞以“绮艳中时露奇矫之气。天生此才,固自不凡”。应广州学海堂课卷,学长李光廷、陈澧、陈璞誉之为“桐圃凤雏”。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应聘赴德国柏林讲学。光绪十六年,回国。旅居香港十年,晚年居上海。少年时代曾醉心于清代邝湛若、黄仲则、陈县及唐李商隐之诗。尝称李商隐为“情天教主”(《在山泉诗话》卷二)。入南社,与傅屯根君剑、高天梅钝剑、俞锷剑华,并称“南社四剑”。又入淞社、鸥社。与胡朴安、胡寄尘兄弟过从甚密。诗多为纪游、写景、咏物、酬答之作,闲适典雅,间亦有感时抚事之作。胡朴安《南社诗话》曰:“兰史与沪上遗老常为文酒之会,且其秉性与南社之革命文学不相近。其隶籍南社也,只以诗文之故,无有其他意义。”其诗文“略具有缙绅文学气味”。王竹友《台阳诗话》以潘飞声、丘逢甲、王晓沧、林敏俊为“四子”,称潘诗“雄迈奇气,不减李谪仙”。著有《说剑堂全集》、《饮琼浆馆骈文词钞》、《罗浮游记》、《在山泉诗话》。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有小传。

(赵慎修)

【沈汝瑾】(1858—1917) 字公周,号石友,别号钝居士。江苏常熟人。诸生。终生未仕。生平足迹不出吴、越间。好诗,喜藏砚。尝自谓以诗言志,以砚

比德。以守旧、守拙为能。其诗主要师法杜甫。集中颇有同情劳苦大众、伤时感事之作。有《鸣坚白斋诗存》一二卷、补遗一卷。生平事迹见其自著《钝居士生圻志》。

(赵慎修)

【易顺鼎】(1858—1920) 字实甫,又字中硕,号哭庵、一庵等。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举人,捐资得刑部山西司郎中。六应会试不第。光绪十三年,改官河南候补道,历司厘税、赈济、水利三局。督修贾鲁河,充三省河图局总办。进呈《修三省黄河图说》,加按察使衔、二品顶戴。光绪十四年,典河南乡试。居二年,辞官。之庐山,筑琴志楼。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经史文课。旋丁母丧,遂号哭庵。中日甲午战争起,刘坤一奏请参戎幕,奉父命北上从军。力主对日作战,上《拟陈治倭义疏》、《敬陈管见疏》、《请罢和议褫权奸疏》,猛烈抨击李鸿章和李莲英。《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度主动赴台和刘永福等筹划抗日事宜。刘坤一奏称其学识贯通,请破格录用。慈禧太后两次召见,询问江南近况。光绪二十六年,督办江阴防务。八国联军入侵,赴西安行在,督办粮食转运。光绪二十八年,任广西右江道,调署太平思顺道。被岑春煊弹劾罢官。光绪三十四年,授云南临安开广道。旋调广东钦廉道,署广肇罗道。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袁世凯当国时期,任印铸局秘书。1920年,病卒于北京。曾作《哭庵传》自述其生平曰:“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友谑之为神龙。其操行无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与樊增祥齐名,并称为晚清中晚唐诗派中坚。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称其诗“学谢,学杜,学韩,学元、白,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为最佳”。“古体务为恣肆,无不可说之事,无不可用之典,近体尤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一称其《魂南集》、《魂北集》“诗格一变,真力弥满,而间有颓老之笔”,“慨当以慷,出笔如环,亦觉声满天地也”。其诗纯熟而多变,有反映国事与民生之作,亦有庸俗之作,以甲午战争时期之作为佳。集中山水纪游诗占相当数量。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十二卷、《琴志楼游山诗集》八卷、《四魂集》四卷、《壬子诗存》二卷、《甲寅诗存》二卷、《癸丑诗存》二卷等。生平事迹见其《哭庵传》、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四一)等。

(赵慎修)

【康有为】(1858—1927)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更姓。广东南海人。年十一,丧父,随

祖父读书。年十九,就读于同县大儒朱次琦。年二十二,游香港,始知西学。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研究西方政治制度与自然科学,在乡创办不缠足会,开始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光绪十四年,赴京应顺天乡试,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国势日蹙,作《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光绪十七年,办学于广州长兴里,传播维新思想。光绪十九年,中举。光绪二十一年,与梁启超入京会试,适当《马关条约》签订,遂联合各省进京举人上书朝廷,要求拒绝和约。是年,登进士第,授工部主事,未就,又两次上书朝廷,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与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继续培养维新干部,作《日本变政记》,赴澳门办《知新报》。二十四年,德宗召见,询问变法方略,进呈《日本变法考》、《俄彼得变政记》,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督办《时务报》。维新运动失败,六君子殉难,有为出走香港,漫游日本、加拿大等世界各地,自号更生,于美洲等地华侨界组织保皇会,任保皇会总长。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仍坚持保皇立宪,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反对民主共和。1913年,因母丧回国。1917年,参与张勋拥戴清末帝溥仪复辟事,受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又自号更姓。1927年,病逝于青岛。终生从事政治活动,以馀事为诗。历经维新运动领袖、保皇党魁与复辟派的中坚人物,其诗政治内涵亦大致如此。尝自言一生经历行踪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程六十万里。又尝自言其诗“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鬼神惊。扫除近代新诗话,倘恍诸天闻乐声。兹事混茫与微妙,感人千载妙音生”(《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之三)。其诗题材丰富,意境恢宏。早期多政治抒情诗,气势飞动。后期多长篇记叙诗,记述世界各地风光人物而杂以议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曰:“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称其“偶事歌咏,真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仅巨刃摩天已也。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惟南海足以当之矣”。诗集有梁启超手写四卷本《南海先生诗集》,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印行;崔斯哲手写十五卷本《康南海先生诗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印行。其他著作很多,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广艺舟双楫》、《共和平议》等。生平事迹有自撰《我史》(又名《康有为自订年谱》)、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张伯桢《南

海康先生传》、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等。(赵慎修)

【刘光第】(1859—1898) 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家贫,早孤。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举人。次年,登进士第,授刑部广西司主事。旋返里。光绪十年,居母丧。光绪十四年,赴京就职。光绪二十四年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尝自谓“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京师与厚弟书》),希望“维新守旧,咸得其宜”(《上张安圃师书》)。常畏新、旧党争之祸,拟急流勇退。未几,政变作,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终生力学笃行,严于律己,慎于交游,守约行简。忧伤国事,关心民瘼,刚正清廉。处世以“雅澹”、“冷僻”自居,以磨砺品行、涵养道德为务。喜游览,能诗文,善书法。尝言古文“可兼经济学,非寻常词章可比”(《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二十七函);“诗文必无一赘语,而不欺其志,斯无愧著作”(见高楷《刘杨合传》)。光第虽重文而轻诗,其写景纪游,刺时抚事之诗俱有佳作。其《城南行》、《美酒行》、《万寿山》、《屯海戍》为感讽时事之作。《洋芍药感赋》为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衰微而作。写景之作以峨眉纪游诗最见功力。梁启超评其诗“在韩、杜之间”(《刘光第传》)。陈衍评其诗“笔力雅健,思路迥不犹人”(《近代诗钞》)。钱仲联评其诗“工于设色,故写景之作为最胜”,“刺时之作,大声疾呼,读之令人心惊骨折”(《梦苕庵诗话》)。有《介白堂诗集》、《衷圣斋诗集》,均收诗三百馀首;《刘光第集》收诗六百馀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四、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赵慎修)

【梁鼎芬】(1859—1920) 字星海,亦作心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编修。中法战争时,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被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旋为张之洞幕僚。张任两广总督,聘主广雅书院讲席;张调两江总督,复聘主钟山书院;张调湖广总督,又随行赴鄂佐幕,深得信任。康有为说张之洞开上海强学会,鼎芬参议章程,名列发起,又秉张意旨,压制《时务报》言论,戊戌政变后,则刊文诋毁康、梁。光绪二十六年,以端方及张之洞荐,用为武昌知府,擢安襄郢荆道。光绪三十年,迁湖北按察使。光绪三十二年,以劾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遭旨呵责,称疾乞退。辛亥革命后赴京自愿侍清室。1917年,扶病参与张勋复辟,寻卒。其诗学宋而兼取唐,写景咏物,思亲怀友,多清逸蕴秀,从容委婉,时有思时忧世之作,有奇崛之气。李渔叔谓其“格调与半山、东坡为近,而及于杜、韩”,“诗笔清劲,时有愤悱嚙杀之音”(《鱼千里斋随笔》)。陈衍亦谓其“时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

家堂奥,佳处多在悲慨、超逸两种”(《石遗室诗话》)。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节庵先生遗诗续编》一卷、《欽红楼词》一卷,编《经学文钞》十四卷。生平见《清史稿》卷四七二。(王飏)

【郑孝胥】(1860—1938) 字苏堪,号太夷。福建闽县(今闽侯)人。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举人。光绪十五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光绪十七年,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员。次年,升任驻日筑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以候补道员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戊戌政变后至武昌。次年,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义和团运动起,佐张之洞筹划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九年,赴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旋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光绪三十一年,寓居上海,筑海藏楼,集股创设日晖织呢厂。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瑗铁路督办。宣统三年夏,任湖南布政使。武昌起义后,隐居上海,以清朝遗老自命。凡诗文简札,均用宣统年号。1913年,组织“读经会”。1923年,经陈宝琛引荐入清故宫,任“总理内务府大臣”。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任伪国务总理,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1938年3月,病死于长春。有诗名。为诗初学谢灵运,继学柳宗元、孟郊、颜延之、韩偓、吴融、梅尧臣、王安石、姚合等。尝自评其诗“多苦语”,“太清哀”(《广雅留饭谈诗》)。与沈曾植同被陈衍推为清末“同光体”诗派之魁杰。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上称其诗“如霜钟出林,悠然意远”,《日本望月怀沈子培》等作“直融会唐、宋之界,而自成一家之言”。陈衍云:“苏堪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炼于东野。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亦怀抱使然。”(《石遗室诗话》卷一)又谓“苏堪之精思健笔,直逼遗山”,“少长都门,自具幽并之气”(《近代诗钞》)。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曰:“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柳亚子则谓其诗“枯寂无生趣”(《论诗六绝句》)。著有《海藏楼诗》十三卷。生平事迹见《民国人物传》第四卷《郑孝胥》(中华书局1984年版)。(赵慎修)

【夏曾佑】(1863—1924) 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浙江杭州人。曾佑幼年好学深思,青年时肄业于紫阳书院。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光绪十六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此后逐步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与梁启超、谭嗣同结识,议论时事,抨击旧学,讨论新学。光绪二十二年改官知县,在天津候补,经孙宝琦推荐,任育才学堂总办。同时,与严复、

王修植、杭辛斋等创办《国闻报》,直至戊戌政变。光绪二十五年底,就任安徽祁门县知县。二十八年离任,寓居上海。光绪三十一年,被委派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随员,赴日本考察。回国后,赴任泗州知府。同时,又被学部奏派为咨议官,被两江总督推荐为会议清廷官制代表。辛亥革命后,退居上海。民国年间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6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4年4月病故。青年时期思想敏锐,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革命先驱”(《亡友夏穗卿先生》)。黄遵宪赞其“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部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己亥续怀人诗》)。晚年颓唐不振。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曾与谭嗣同、梁启超试作“新学之诗”。后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回忆云:“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捃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至今思之,诚可发笑。”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七则称其“读书有神悟,深通释典,博涉宗教家言。性嗜酒,卒以是成疾。平生著作多不存稿,偶作韵语,皆涵蕴深远,出以澹荡,盖有得于诗之外者。”其生前似不经意为诗,亦未整理成集。传有《碎佛师杂诗》,迄未见著录。赵慎修据钱玄同、戴克让抄本《夏穗卿遗诗》整理而成《夏曾佑诗集校》(刊于《中国近代文学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生平事迹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夏元瑛《夏曾佑传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袁英光《夏曾佑》(《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马金科《夏曾佑》(《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赵慎修)

【叶德辉】(1864—1927) 字焕彬,又作奂份,号郎园,又号直山,别号朱亭山民、空灵钓徒。祖籍江苏吴县,少随其父客居湖南,后遂占籍湖南湘潭。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光绪十八年,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未及一年,辞官归里,以编撰为事,以提倡经学为己任。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与王光谦等联名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求斥退梁启超时务学堂教习职务。辛亥革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反对革命。1927年,因反对工农革命运动被杀。能诗文。旁学杂收。著述丰富。诗歌多咏物、记事之作。每以遭乱离、别骨肉、身世之痛,自比于杜甫,亦尝拟杜甫之作,而格调大不相类。著有《观古堂诗录》六卷、《古泉杂咏》四卷、《消夏百一诗》二卷、《观画百咏》四卷、《和金松门观剧绝句》一卷、《昆仑百咏》二卷,编有《觉迷要录》四卷等。1935年,其子叶启倬刻印《郎园先生全书》,收录一三六种。其目录学著作《书

林清话》颇有名。生平事迹见许崇熙《郎园先生墓志铭》、汪兆镛《叶郎园先生事略》、黄兆枚《叶郎园先生传》。(赵慎修)

【丘逢甲】(1864—1912) 又名仓海、沧海。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仲阏、蛰庵、南武山人。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生于台湾苗栗县。出身于寒士之家。幼从父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十三岁冠童军,十四岁补廪膳”(丘瑞甲《先兄丘仓海行状》)。先后受知于丁日昌和唐景崧。丁日昌誉其为“才子”。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次年,登进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旋辞归,行教于台湾衡文、罗山、崇文诸书院。中日甲午之战起,倡办义军,积极筹划台湾防务。《马关条约》签订后,迭电清廷,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民主国”成立,举唐景崧为总统,逢甲为义军大将军,率军抗击日寇。兵败,内渡回广东。先后执教于韩山、东山、景韩书院,摈弃八股试帖,以时务、策论课士。光绪二十六年,于汕头创办同文书院,开岭东风气之先。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广东谘议局成立,任副议长。与黄兴、赵声、胡汉民深相结纳,支持革命,掩护党人。武昌起义后,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1912年五月病逝。少有诗名,在台湾时曾组织栢社。亦曾响应“诗界革命”。长于七言律诗和长篇歌行。多忧时世之作。深受当时新派诗人所推许。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曰:“吾尝推黄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阔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黄遵宪《壬寅致梁任公书》亦称之为“天下健者”。柳亚子《论诗六绝句》云:“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筋残角海云东。”今人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其诗“沉雄顿挫,悲壮苍凉,感怀旧事,伤心时变,激昂不平之气,真切流露,似陆剑南,似元遗山”。诗作很多,据丘瑞甲《岭云海日楼诗钞跋》云:“积各体诗达数万首。甲午之役,与台湾俱亡。”今仅存《柏庄诗草》一卷,收光绪十八年之诗;《岭云海月楼诗钞》十三卷,收光绪二十一年以后之诗。生平事迹见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江琮《丘仓海传》、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丘铸昌《丘逢甲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赵慎修)

【李希圣】(1864—1905) 字亦元,又字亦园。湖南湘潭人。父李光照,精制举文,为名诸生,尝以所作制举之文授希圣,希圣慨然曰:“举业之祸世数百年矣,吾当通经学古以上跻于作者之林。异时得志,必首议废制艺罢科举,以除学界之蠹。”父大惊异,恣其所学。遂博览经籍,淹贯百家。(见成本璞《李先

生墓表》)。受知于湖南学使张亨嘉。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次年,成进士,授官刑部主事。有经世之志,常以国家社会前途为忧。中日甲午战后,倡变法,以为变法当以理财为本,遂搜集清朝政府各部门及各省财政收支情况,成《光绪会计录》一书,于光绪二十二年刊行,大声疾呼必须“卧薪尝胆,举数百年相沿之成法而尽变之”,“速变则救天下之全,迟变则救天下之半,若终不变则不忍言矣”(《光绪会计录序》)。《辛丑和约》签订后,清廷亦议变法,并设政务处司其事。希圣作《政务处开办条例明辨》,主张“分别中西”之异同长短,“然后参以本国之情势,斟酌损益本末先后”,决定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取舍。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希圣为草拟办学章程奏议。光绪二十八年,设京师大学堂,任提调。憨直敢言,时人称之。多忤权贵,郁郁不得志,竟以发愤呕血卒于学堂。工于诗,时人比之李义山,其咏珍妃之《湘君》等庚子咏事诗常为人所称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曰:“李亦园(希圣)当辛丑回銮时,有感事诗数十首,芳馨悱恻,湘累之遗也。”“其风格在少陵、玉溪之间,真诗人之诗也。”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七曰:“亦无苦追义山,实与牧斋相近”,即“专事摘艳熏香,托于芬芳悱恻者”。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一曰:“《雁影斋集》皆庚子以后之作,大致神似玉溪,亦颇多近杜处。然每遇友人称其似义山者,心辄不怡。”王式通《雁影斋诗序》称其“作诗之旨,力戒平易,亦屏除险怪”,“以诗寓史,悱恻缠绵,讽喻之遗,归于忠爱”。著有《雁影斋诗》、《庚子传信录》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成本璞《李先生墓表》(《碑传集补》卷一二)。(赵慎修)

【谭嗣同】(1865—1898) 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十一岁丧母。少年备受继母虐待,自云:“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仁学自序》)及长注意观察社会民生,习剑术,好骑马,鄙视八股文,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救世济民为务。深受王夫之学说的影响,主张“道不离器”,“道随器变”。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一度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游历直隶、甘肃、新疆、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结交有识之士。屡应乡试不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深受刺激,思想剧变,抛弃旧学,锐意于新学。光绪二十一年,筹办浏阳算学馆,试图以浏阳为基地,从算学入手,培育人才,作维新的尝试。光绪二十二年,创办《湘学报》与湖南强学分会。同年,其父为其捐官江苏候补知府,赴南京候补,向杨文会学佛,著《仁学》。抨击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呼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外开放,实行人际平等、博爱。光绪二十三年,回湖

南,参与时务学堂的教学工作。次年,创办南学会,试图把它办成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团体。八月,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政变作,拒不出逃,决心以流血牺牲来唤醒世人。九月二十八日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代表者。博学多才,诗、文兼擅。自以三十岁为界区分其学为新、旧。光绪二十二年前曾与夏曾佑、梁启超试作“新学之诗”,颇自赏,然多难以索解,缺乏诗味。梁启超曰:“复生自烹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又评其三十岁以前之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饮冰室诗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九称其诗“冽利雄健,如铜丸走阪、骏马注坡,不羁才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其诗“代表当时浪漫风气,仿佛似龚定庵”。均指其“旧学之诗”而言。“旧学之诗”收入《莽苍苍诗》中,“新学之诗”散见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谭嗣同全集》于1955年由三联书店初版,中华书局于1981年又出版了增订本。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九、梁启超《谭嗣同传》、邓潭洲《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喜所《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赵慎修)

【蒋智由】(1866—1929) 字观云,别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出身于寒素之家,尝自述:“我年未二十,饥走去东西。汨没遂长久,飘掇如飞蓬。”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始与维新派人士交往,亦主张变法。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赴日本,参与《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并发表诗、文,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在梁启超访美期间,一度主持该刊工作。一时负维新派盛誉,浙江籍留日学生鲁迅和许寿裳常往求教。光绪三十三年,与梁启超、陈景仁等组织政闻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与同盟会相对抗。晚年寓居上海,思想日趋颓唐,“忧伤抑郁,僚侘冤愤,不获偿所愿以死”(陈三立《蒋观云先生遗诗序》)。其诗以光绪三十一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属当时新派诗,殷殷爱国之情,反抗专制、呼唤民主之志跃然纸上。名作《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些诗广为流传,一度竟误传为邹容之作。晚年锐气全销,其《非隐》诗“近市且居殊隐论,违天不死作闲人。看看一棵两棵树,去去五年十年春。南丈荷蓑未全义,西山采薇自求仁。分明孔孟传心学,忧乐为群非此身”,即为其自白。晚年自

编诗集,悔其少作,不收光绪三十二年以前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谓其与黄遵宪和夏曾佑为当时“诗界三杰”,即指其前期诗而言。吴宓《空轩诗话》曰:“昔梁任公尝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诗界三杰。细按之,蒋君殊平庸,夏君为史学家,惟黄先生可当此名。”诗作辑即成书者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前期诗散见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生平事迹散见其诗集等。(赵慎修)

【赵熙】(1867—1948) 初名熹,字尧阶,年十五改名熙,字尧生,一作尧笙,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出身于世代耕读之家。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1)举人,次年,登进士第,改庶吉士。光绪二十年,授国史馆编修。二十三年,丁母忧,主讲于东川书院,曾请门生日本人成田安辉教授日语,开书院之新风。光绪二十五年,服满入京,仍为国史馆编修。次年,朝考得记名御史。光绪二十七年,回四川,主讲于川南经纬学堂,除设经、史课目外,另设日语、地理、算学等课目,并聘请日本籍教师授课。光绪二十九年,回京,任国史馆协修、纂修。光绪三十二年,父丧回里。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实授御史。次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因弹劾庆亲王奕劻、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戊戌六君子”昭雪,而以直声著称。宣统三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任京官保路川南代表。辛亥革命后,以清遗民自居。1912年,曾应周孝怀之请,赴日劝阻梁启超回国与袁世凯合作。后虽历经各省军阀之聘,均辞不就。1948年,病逝于家乡。治学主张纵“当为上下古今之学,不为尺寸耳目之学”,横当为“大通世界之学,不为拘守方隅之学”(《香宋日记》)。论诗主张“专精初、盛唐诸人作也,其次则五古惟宜,再次乃七古”(《致郭季吾书》),由唐、宋而上溯八代。陈衍曰:“观其诗疑若锤凿甚力,而为之则甚乐而易”,“清奇浓淡,无不备也”,“古体极似(文)与可、(韩)子苍,而有时恣肆过之;近体极似子西、与可,亦有似子苍者”(《赵尧生诗稿叙》)。1954年刊行之《香宋诗前集》,录诗一千三百首左右。1986年印行之《香宋诗钞》,录诗五百首。另有《香宋词》和改良川剧剧本《活捉王魁》。生平事迹见赵元凯、赵念君编《香宋诗集》。(赵慎修)

【章炳麟】(1869—1936) 初名学乘,改名炳麟,因仰慕顾炎武(本名绛)之为人,又名绛。字太炎,又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入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学经史与文字学。光绪二十一年,入强学会。光绪二十三年,任《时务报》撰述。戊戌政变后受通缉。光绪二十八年,在日本与秦力山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次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序》于《苏报》,

被捕入狱。出狱后,赴日任《民报》主编。1912年,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南北议和,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主张讨袁。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后,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及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表示不满。1934年,迁居苏州。次年,创办国学讲习所与《制言》杂志。1935年,病逝。尝论诗云:“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已竭,唯五言犹可仿为。”(《自述学术次第》)诗作取法汉、魏五古,典雅凝重,多用典故,思想内容往往为古典的文辞所掩。有诗数十首,多作于清末民初。著述宏富。有《章氏丛书》初编、二编、三编。早期部分诗作刊入《丛书》之《文录》中。后有影印《章太炎自写诗稿》。生平事迹见《自定年谱》、汪东《章先生墓志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

(赵慎修)

【黄人】(1869—1913) 原名振元,字慕庵,改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因仰慕黄石斋、黄梨洲、黄陶庵和黄九烟之道德文章,书斋名为“揖陶梦梨拜石烟之室”。江苏常熟人。黄人年十六入县学。应乡试不中,遂作漫游。常炼丹,“又习剑法及诸异术,常尽月不寐,数日不食”,独自出游,时露宿于山岩树下(见肖蛻《摩西遗稿序》)。“不矜细行,昼则驰马为狭斜游,夜半读书。或弥月不寐,或一夕作诗数十篇”,“终岁遨游耗万金”(金鹤冲《黄慕庵家传》)。尝自言:“朝饮獐血,夜驰燕脂,无一日亲文史,而依马横槊,动辄成帙,随手弃去”(黄人《蛮语摭残》)。年三十,倦游知返,娶妻生子,家道亦中落。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受聘为苏州东吴大学教授。同年,与庞树柏在苏州组织三千剑气文社。光绪三十一年,参与创办小说林书社。光绪三十三年,主编《小说林》杂志。后与王文濡创办国学扶轮社,编辑《国朝文汇》(即《清文汇》)。南社成立,较早入社。武昌起义后,欲外出有所建树,因足疾突发未能成行。1913年,病逝。博学多能,行为奇特,素有“奇士”、“奇人”之称。吴梅称其“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术,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血飞花传奇序跋语》)。其诗亦以才气纵横、想象奇特著称。金鹤冲评曰:“其诗专主才力,奇伟恣肆,自比于舒立人。又自号诗虎,识者以为不诬。”(《石陶梨烟室诗存序》)秦琪称其“近体高华秀拔,神骨天成。古体跌宕纵横,雄奇瑰丽,骨苍而韵逸,气勃而趣博”(《石陶梨烟室诗存序》)。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其为“近代浪漫诗人之魁首”,并谓其“《元日日蚀诗》,最为奇作,虽使卢仝、徐积、刘基

执笔,亦不能过”。诗作未能结集出版。1986年,始部分刊于《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二两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仲联主编)。另有《摩西词》。所著东吴大学讲义《中国文学史》为中国较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原未署名,人多以为黄人著,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属于古代者,出摩西手。汉以后则他人所续也。”生平事迹见金天羽《天放楼续文言》卷四《苏州五奇人传》、金鹤冲《暗泾文钞·黄慕庵家传》等。

(赵慎修)

【包兰瑛】(1872—?) 字者香,又字配菜。江苏丹徒人。幼年时曾抄写《离骚》、魏晋六朝及唐宋诸诗人佳作,朝夕讽诵,吟咏成习。随父宦游浙江、安徽,“每览山色湖光,觉苏、白之诗宛然在目,性灵所托,篇什日增”(《锦霞阁诗集自序》)。获“丹徒才女”之誉。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适如皋朱兆蓉,随之宦游浙江、湖南、湖北等地。曾在杭州与女友结诗社。卒年不详,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尚有诗作。其咏月、咏花、怀人之作,清新流转,时有尖新之句。《咏史》八首刻意翻新,笔锋老辣。俞樾称其诗“清丽之中独饶逸气,至登览、咏古、读史诸篇,精思约旨,风格不凡。其尤警拔者,则枕肱经史,挥斥百家,或老师宿儒终身有未解”(《锦霞阁诗集序》)。著有《锦霞阁诗集》五卷、词集一卷,合刊为《锦霞阁诗词集》。生平事迹见《锦霞阁诗词集》。

(赵慎修)

【黄节】(1873—1935) 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改名节,别署晦翁、黄史氏、甘竹滩洗石人。广东顺德人。早年师事简朝亮。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广州与谢英伯等创办群学书社(后易名为南武公学会),以期启迪民智。次年,应乡试落第,至上海,与邓实创办《政艺通报》,介绍西方文明。光绪三十一年,与邓实创办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同年,在广州参加反美拒约团体,创办《拒约报》和《广州旬报》。光绪三十三年,主讲于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入同盟会,次年入南社,宣统三年,与梁鼎芬等在广州重开后南园诗社。武昌起义后,应聘为广东高等学堂监督。1912年,与谢英伯在广州组织天民社,创办《天民日报》,主张伸民权。1915年,致书友友刘师培,指责筹安会倾覆民国,遭袁世凯仇视。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其后,阎锡山曾聘其为山西教育厅长,王宠惠曾聘其为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均辞不就。1928年,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旋辞职,复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兼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35年,病逝于北京。早年为诗,重深思独得,反对宗法江西诗派。中年师法宋人陈师道,自称“后山以后”。晚年崇尚汉魏六朝诗。尝自评其诗

曰：“亡国哀音怨有思，我诗如此殆天为。”（《我诗》）陈衍《近代诗钞》称其诗“着意骨格，笔必拗折，语必凄惋”。张尔田《黄晦闻〈鲍参军诗注〉序》称其诗“历宋之后山、宛陵诸家，尽规其度，又浸淫于汉魏六朝古乐苑被声之诗，得夫古所谓风者而好之”。陈三立评其诗曰：“格淡而奇，趣新而妙”（《蒹葭楼诗评语》）。其门生吴宓曰：“黄师兼诗学、诗教、诗法而为诗，即其全部之生活及精力，悉用为作诗之预备，绝异于世之以馀事为诗者。作者矜慎而以全力赴之，故黄师之诗精。”（《空轩诗话》）生前曾自编《蒹葭楼诗》二卷，存诗四百二十多首，光绪三十一年以前之作所收极少。今人马以君编《黄节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增补约一百八十首。另著有《黄史》、《诗旨纂辞》、《诗学》、《诗律》、《汉魏乐府风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传》、《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等。生平事迹见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制言》第二期）、刘斯奋《黄节诗选》附录《黄节年表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马以君《黄节诗集》附录《黄节年谱》。

（赵慎修）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一字钝宦，号疾斋。蒙古族。江苏如皋人。明末清初名士冒襄（字辟疆）后裔。早岁从其外祖周星诒治校讐目录之学，并学为诗，又从叶衍兰学为词。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光绪二十四年，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列名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加入保国会。清末官刑部、农工商部郎中。入民国，曾任镇江、淮安海关监督，清史馆纂修、南京考试院委员、高等典试委员、财政部顾问、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与“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等交往甚密，且于宋人诗，尤其是陈师道诗致力甚深，曾为《后山诗注》作补笺，然为诗则与“同光体”迥异，不似黄庭坚、陈师道，而宗法三唐，豪放明快，气盛藻丽。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谓其“诗境俊爽，情韵并茂”，“晚年与闽、赣诸家通声气，诗益苍秀”。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以为其“诗篇恪守梅村、牧斋、竹垞、渔洋诸家矩矱，虽与陈三立、陈衍诸人交游，而不染‘同光体’习气”，“夫惟大雅，卓尔不群”。著有《小三吾亭文集》、《小三吾亭诗集》、《词集》、《小三吾亭词话》、《小三吾亭笔记》、《疾斋杂剧》、《疾斋散曲》、《后山诗注补笺》等，多刊入《如皋冒氏丛书》。生平事迹见冒效鲁《冒鹤亭先生传略》。

（王臧）

【金天羽】（1873—1947）初名懋基，改名天翮，又改天羽，字松岑，号鹤望、鹤舫，别署壮游、金一、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等。江苏吴江人。厌弃科举时文，

喜占文、舆地兵家言及经世之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荐试经济特科，不应。次年，先后在同川书院、自治学社、同川两等小学和明华女学任教。光绪二十九年，加入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并创建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镇支部。与章太炎、邹容、吴敬恒、蔡元培相交，倡言革命。“苏报案”作，章太炎、邹容被捕。避居故里，仍以教书、著述为务，发表诗文，创作小说及翻译小说。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赴苏州振华女子师范教古文。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议员。创建太湖水利委员会。1923年，任吴江教育局长。1927年，任江南水利局长。1932年，参与发起苏州国学会。日本侵占吴江后，逃往上海租界，任光华大学教授。后归故里，病卒。早年即呼吁开创中国文学新纪元。多才多艺，尤以诗歌成就为高。诗作题材广泛，尤多感慨时事、讽谕社会之作。陈衍称其诗“才调纵横，在画家为能品，近代中与龚定庵颇相似”（《近代诗钞》）。路朝銮谓其诗“壮奇恣肆，不可方物”（《天放楼诗集序》）。胡韞玉称其诗“豪放沉着兼而有之。豪放者，山水之情也；沉着者，郁抑之气也”（《天放楼诗集序》）。著有《天放楼诗集》九卷、《天放楼诗续集》一卷、《天放楼诗季集》七卷。散文集《天放楼文言》、《天放楼续文言》等。生平事迹见徐震《贞献先生墓志铭》、金元献《伯兄贞献先生行状》、杨友仁《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

（赵慎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沧江、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二十一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请求清廷变法，组织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次年，与汪康年、黄遵宪在沪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任教于长沙时务学堂。次年，赴京协助康有为创办保国会鼓吹政变。戊戌政变后，在日本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介绍西方文化，以抵制革命与进行启蒙教育为己任。光绪三十三年，与徐佛苏、蒋观云在日本组织政闻社，创刊《政论》杂志。清末帝宣统二年（1910），创办《国风报》，坚持鼓吹君主立宪。1912年，回国，创办《庸言报》，参加民主党和进步党。1913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次年，任币制局总裁。袁世凯恢复帝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帝制，并与蔡锷发动护国之役。1917年，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旋辞职。1923年，发起创办文化学院，被国际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192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对文化与学术有重要建树。思想多变，自谓常以今日之我与昨日

之我作战。知识渊博,著述极丰。二十世纪初期提倡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散文家自负,亦以“新民体”式的新散文传播新学者称于世,影响至巨。生平以馀事为诗,亦不以诗为己之长,但对清末民初的诗歌改革与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曾与夏曾佑、谭嗣同试作“新学之诗”。光绪二十五年,在《夏威夷游记》中大声疾呼“诗界革命”,并提出了以新思想、新意境、新词句和旧形式相结合的改革目标。光绪二十八年后,陆续在《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提倡以诗歌鼓吹尚武精神与进化论,改造国民精神,以及诗歌与音乐相结合。大抵从戊戌政变后有意为诗,曾自言:“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所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饮冰室诗话》)共有诗约三百六十首左右。戊戌变法失败后头几年的诗作,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气势蓬勃,富有理想与追求精神,如《去国行》、《雷庵行》、《志未酬》、《二十世纪太平洋放歌》等。陈衍评其诗曰:“任公诗如其文,天骨开张,精力弥满。”(《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评其《朝鲜哀词》曰:“沉郁雄苍,合少陵《诸将》、《洞房》、《秦州》而治之,义正词严,上承《小雅》,岂愧诗史?其详赡亦前无古人。”又评其《述归五首》曰:“超脱而自在,渐近自然,忘古人之蹊径矣。”(见《梁任公诗稿手迹》,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诗集尚无全本。《梁任公诗稿手迹》约收一百零六首,《饮冰室合集》约收二百七十首左右。传记资料有丁文江、赵尔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孟祥才《梁启超传》等。(赵慎修)

【徐自华】(1873—1935) 字寄尘,号忏慧。浙江石门(今桐乡)人。祖徐宝谦,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庐州知府。父徐杏伯,有名士风。自华聪颖好学,深为祖父所钟爱。五岁从舅父马彝卿读书。光绪十九年,适南浔梅韵笙。生一子一女。光绪二十六年,丈夫病逝。女亦夭折。后返母家,自号寄尘,取奉亲守节聊以寄迹尘世之意。光绪三十一年,南浔张弁群创办浔溪女学,应聘主持校务。当年,秋瑾赴校任教,一见如故,遂结莫逆之交。旋秋瑾赴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捐资一千五百元。光绪三十三年初,与秋瑾一同凭吊南宋故宫遗址,瞻仰岳飞墓,与秋瑾有“埋骨西泠”之约。次年,与陈去病结秋社以纪念秋瑾,任社长。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与其妹徐蕴华加入南社。1913年,赴上海接办竞雄女学。1916年,曾与陈去病等革命党人开会,有占领苏州、反对袁世凯称帝之议。1923年,加入新南社。1935年7月病逝。为女界名流,与吴芝瑛齐名。

是南社著名女诗人,人常比以李清照、朱淑真。诸宗元《五言二截句奉题寄尘女士词卷》云:“石门有女士,巾帼而丈夫。”柳亚子《百字令·题寄尘女士〈忏慧词〉》用定庵赠归佩珊夫人韵称其“奇才如许,有青绫障外,谢家琼树”,“漱玉新词,断肠旧恨,谁辨今和古?蛾眉绝世,人间脂粉如土”。与秋瑾相识后,思想与诗词都受秋瑾影响。生前仅刊行过词集《忏慧词》。今人郭延礼辑校《徐自华诗文集》收诗、词、文各一卷,于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生平事迹见郭延礼《徐自华年谱简编》、陈去病《徐自华传》、秋宗章《记徐寄尘女士》(俱附录于《徐自华诗文集》)。

(赵慎修)

【陈去病】(1874—1933) 字佩忍,号巢南。别号垂虹亭长。笔名季子、有妨血胤、老衲等。江苏吴江人。出身于商人之家。早孤。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马关条约》签订后,与金天羽等组织雪耻学会。光绪二十九年,赴日留学,主持《江苏》杂志,加入拒俄义勇队。次年,于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及《警钟日报》,旋被查禁。继续在《醒狮》、《复报》与《国粹学报》发表诗文,鼓吹革命。光绪三十二年,赴徽州教书。同年,在芜湖入同盟会。次年,赴汕头,与叶楚伦等编辑《中华新报》。同年秋,抵沪,与吴梅等结神交社。光绪三十四年,与徐自华等组织秋社,以纪念秋瑾。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与高旭、柳亚子创建南社。辛亥革命后,在苏州创办《大汉报》。1913年,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部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2年,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其后,日渐颓唐,曾通电支持“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监察委员、博物馆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统治不满,辞官归里。1933年,在苏州出家。旋病逝。主张诗文从字顺,词必已出,反对刻意雕琢与模仿。柳亚子称其诗“去华返朴,屏绝雕镂,且其奋斗之精神、恢弘之器宇,皆有不可磨灭者”(《浩歌堂诗钞序》)。著有《浩歌堂诗钞》十卷。辑有《笠泽词徵》、《松陵文集初编》等。生平事迹见自著《垂虹亭长传》、金荃《陈去病先生年谱》。(赵慎修)

【杨圻】(1875—1941) 初名朝庆,更名鉴莹,1921年更名圻,字云史,又字野王。江苏常熟人。御史崇伊之子,李鸿章之孙婿,故少有“名公子”之称。年二十一,以诸生为詹事府主簿。后为户部郎中。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官邮传部郎中,驻南洋七洲、海门领事。1921年,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秘书长。后复为奉系幕宾。日寇侵华,东北沦陷,退居上海。后避居香港,客死异地。诗宗盛唐,喜作长

篇,有以诗为史之志。有《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同名词钞四卷,合刊为《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赵慎修)

【夏敬观】(1875—1953) 字剑丞,号缄斋、映庵。江西新建人。生于湖南长沙。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次年,入南昌经训书院,从皮锡瑞治经学。光绪二十八年,入张之洞幕。光绪三十三年,任江苏省参议,署理江苏提学使,兼任上海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监督。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辞职。辛亥革命后,率先剪辮,以示拥护革命。1916年,任涵芬楼撰述。1919年,任浙江教育厅长。1924年,辞职。流寓上海,与旧派诗人酬唱往还。晚年以卖画自给。1953年5月病逝。工诗词,精音律,擅书画,通经史。崇尚唐人孟郊、宋人梅尧臣和时人陈三立。其《自题诗卷》曰:“好古肝肠世所憎,空炉无火伴书灯。麈尾市语声初尽,倾几梅花冷可凭。梅水入诗生夜雪,茶馥注砚作坚冰。苦吟纵与年俱进,那及缘愁白发增。”《题伯严散原精舍诗集》曰:“义宁伯子真诗霸,独造深思数十年。字暖肝肠晴曦日,格高心力上摩天。谭陶鼎峙公为最,范郑分庭世亦传。我取蠡杯斟海水,摩挲醉眼出灯前。”即自述其诗学旨趣。陈衍《近代诗钞》曰:“剑丞为皮鹿门之高足,今之学人,于诗尤刻意锻炼,不肯作一犹人语。”《石遗室诗话》卷一四曰:“剑丞溺苦于诗,其造语大有不惊人不休之意。”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曰:“近代江西诗家,陈散原后,最负盛名者推夏剑丞。其诗并不学山谷,而为宛陵之清苦。”著有《忍古楼诗》十五卷、《映庵词》四卷、《词调溯源》、《音学备考》、《忍古楼画说》、《历代御府画院兴废考》、《太玄经考》、《春秋繁露考逸》、《振兴中国棉业说》,选注有《二晏词》、《元好问诗》、《孟郊诗》、《汉短箫铙歌注》。(赵慎修)

【诸宗元】(1875—1932) 字贞壮,又字贞长、真长,别号大至居士。浙江绍兴人。年十岁即熟读《文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慷慨言忧时,糠粃视六经”(《庚戌三十六岁生日赋示亲知》)。服膺魏源、龚自珍之学,因魏源字默深、龚自珍号定庵而自题其书斋为“默定书堂”,中年以后,改为大至阁。尝充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瑞澂幕宾。与黄节、刘师培、邓实、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胡朴安于上海建国学保存会及藏书楼,贡献图书甚多。参加南社。1923年,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幕僚。1925年,应梁鸿志之邀赴北京,仅数月又南下为人掌书记。曾在杭州西湖红柏山购置房屋数间,藏书画万馀卷,欲为终老之所。1929年,遭大火,书画尽毁。民国政府建都南京后,曾一度供职于教育部。1932年,病逝于上海。一生困顿于僚属之间,身后亦颇萧条。与陈三立、郑

孝胥、沈瑜庆、李宣龚等“同光体”诗人及南社社友均有交往。诗宗江西诗派。1914年,在北京法源寺祭祀陈师道,表示对于江西诗派的追怀与向往。其诗以朋友酬唱之作居多,社会内容比较狭窄;但也有少数忧国忧民、感慨幽深之作,如《戊戌秋中寄东虚》、《感事辛丑年作》、《窃愤》、《闻奉天陷于日本》等。诗风冲和淡远,即对于国家大事的感愤之作亦尽量不露锋芒。胡朴安《南社诗话》云:“社员之诗,略具有缙绅文学气味者二人:一潘兰史,一诸贞壮。”“贞壮常与太夷、伯严相唱和,诗之气味,殊不与草泽文学之诗相合,然对社友,则颇被护之。清时,亚子常谓贞壮是吾辈之把标。”著有《大至阁诗》、《中国画学浅说》。生平事迹见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诸贞壮》等。(赵慎修)

【林旭】(1875—1898) 字暲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旭少有文名,长老名宿多折节与之交。沈瑜庆以道员需次南京,返里从塾师处见旭文字,惊其博赡,以女妻之。遂招赘于南昌,并同游武昌,得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及梁鼎芬、蒯光典等名人。清德宗光绪十九年(1893),返里,应童子试,三冠其曹。施应乡试中举。入都,与黄绍基、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结交。光绪二十一年,应礼部试不售。上书反对对日议和及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援例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与张亨嘉在京倡立闽学会;又与王仪通、张元济兴办通艺学堂。五月,应聘入荣禄幕。七月,少詹事王锡蕃荐于朝。德宗特旨召见。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政变作,与谭嗣同等六人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为诗取法唐人孟郊、贾岛,宋人陈师道、杨万里,而苦涩幽僻,与陈师道相近。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其诗“孤涩似杨诚斋,却能戛戛独造,无崇拜古人之意,盖肖其为人也。”《晚晴簃诗汇》卷一七八选其诗,评曰:“诗学宋人,有屹萃峭倩之致。”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谓其“用意谳刻,而措词涩苦,剗削之痕未泯”,其佳句写“眼前意境,未经人道,略似《浙西村人集》中之作”。著有《晚翠轩集》一卷。生平事迹见梁启超《林旭传》、陈衍《林旭传》(均载《碑传集补》卷一二)。(赵慎修)

【沈鹄应】(?—1899) 字孟雅。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贵州巡抚沈瑜庆长女,同邑林旭之妻。林旭遇难后,鹄应欲冒险赴京收尸,为家人劝止,自尽未亡,翌年,悲伤过甚而卒。鹄应虽以词名,亦善诗,其《崦楼遗稿》包括《崦楼诗》及《崦楼词》。其所作悼亡之什广为流传,感人至深。事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一〇。(陈祖美)

【秋瑾】(1877—1907) 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

卿,号旦吾,别署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更名瑾,字竞雄,另署汉侠女儿、秋千。浙江绍兴人。少随祖、父游宦四方,学诗、词,亦曾学骑马、击剑,二十岁嫁湖南纨绔子王子芳为妻。秋瑾对这门亲事很不满,自叹“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面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害、八国联军的入侵,更使关注国事的秋瑾深感忧愤,曾写《杞人忧》、《感事》等诗篇,以表达其“闺人欲负戈”的救国之愿。然而家中羁绊,使其一时“难将巾帼易兜鍪”。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子芳捐官为户部主事,秋瑾亦随王抵京师。在京期间,秋瑾结识了具有维新思想的吴芝瑛,与之订金兰之好。在吴的影响下,秋瑾广泛阅读新潮书报,参加由吴发起的“妇女谈话会”等活动,民主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发展,决心与封建家庭决裂。光绪三十年春,秋瑾终于排除阻难,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结识了宋教仁、周树人、陶成章等革命志士,创办了以宣传民主革命兼及妇女解放为内容的《白话》杂志,奔走呼号,鼓吹革命。光绪三十一年二、三月间,秋瑾首次回国省亲,由陶成章函介,先后在上海、绍兴谒见蔡元培、徐锡麟。在上海,秋瑾加入了由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同年六月,再次东渡,不久加入了同盟会,被推举为浙江分会主盟人。此后,对民族解放事业和争取女权运动更为热心。同年十一月,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之《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尽。此事对秋瑾刺激很大,遂于农历年底回国。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的秋瑾归国约两个月即应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之聘,担任该校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教员,并与校长、南社女诗人徐自华结为知己。从是年五月到十二月初,秋瑾忙于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筹款,自制炸药为起义准备军火,筹创《中国女报》并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辞,并为翌年正月出版的《中国女报》第二期写了《勉女权歌》。此后在主持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武装起义的百忙之中,还写了诸如《感愤》、《柬某君》等不少慷慨激昂的篇什以明志励人。光绪三十三年,原定六月初十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后事泄,徐刺杀恩铭失败,于五月二十六日就义。秋瑾六月初一得到消息后,于万分悲痛中掩护同志,转移他人,初四被捕,英勇不屈,初六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今杭州西湖秋瑾烈士墓上刻有孙中山所题“巾帼英雄”四字。秋瑾能诗善词,以抒发为革命献身与妇女解放之情志为其主旨。邵元冲《秋瑾女侠遗集序》云:“鉴湖女侠成仁取义,大义炳然,不必以文词鸣而自足以不朽。然即就文词而论,朗丽高亢,亦有渐离击筑之风;而一往三叹,音节浏亮,又若公孙大娘舞剑,光芒灿然,不可逼视。”今存

有《秋瑾女侠遗集》、《秋瑾诗词》、《秋瑾集》及集外诗辑、《秋瑾史迹》。生平资料见郭延礼主编之《秋瑾资料》及《秋瑾年谱》。(陈祖美 赵慎修)

【王国维】(1877—1927) 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改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先后在《时务报》任职,并入罗振玉创办之东文学社学习。光绪二十七年,得罗振玉资助,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因病回国,先后在上海南洋公学、通州师范、苏州师范讲授哲学、心理学及伦理学。光绪三十二年,随罗振玉至北京。次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辑等职。武昌起义后,随罗振玉赴日。1916年,回国,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3年,应当时尚在清故宫内保持一小朝廷的溥仪之召,为“五品南书房行走”。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常欲自杀,因家人监视甚严,未遂。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自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投昆明湖自杀。国维青年时期多得罗振玉奖掖与资助。学习过物理、数学,懂日语、英语,受康德、叔本华与尼采之思想影响较大。身体羸弱,性格偏于内向而忧郁。治学由哲学而文学而史学。对甲骨文、古代史、辽金元史、宋元戏曲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贡献。文学评论以《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最著名。诗早年学陆游,自述“平生于诗最不喜用僻韵”,“排律用通韵法”(《与缪荃孙书》)。自评长诗《颐和园词》“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与铃木虎雄书》)。存诗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共约一百九十多首。钱锺书《谈艺录》评其《观堂丙午以前诗》“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古诗不足观;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所作平易流畅,固得放翁之一体”,“属对不免偏枯”。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其《读史二十首》“议论奇辟”,“自是第一流人吐属”。《观堂外集·观堂丙午以前诗》与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只收光绪三十二年以前之诗。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只收《颐和园词》等诗。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收辑最多。生平事迹见萧艾《王国维评传》、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赵慎修)

【高旭】(1877—1925) 字天梅,号剑公,又号钝剑,别号自由斋主人等。金山(今属上海)人。清德

宗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于东京法政大学。次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光绪三十二年,回国,创办健行公学和钦明女学;编辑《觉民》、《醒狮》等刊物,鼓吹革命;并伪造二十多首“石达开遗诗”,以笔名“残山剩水楼主人”的名义刊行。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与陈去病、柳亚子创建南社,任庶务员与《南社丛刻》诗选编辑员。辛亥革命后,任众议院参议员。1918年和1919年,两度南下广东,参加护法政府。1922年,参加北洋系国会。1923年,受贿选举曹锟为总统,人称“猪仔议员”。1925年,病逝。尝《自题诗魂》云“情理以外真诗无,愚夫妇即伟丈夫”,“伪韩伪杜顽且愚,傀儡登场须人扶”,提倡真情之诗,反对复古。梁启超倡“诗界革命”,亦曾写作“新派诗”。其后,虽有赞颂诗歌改革之论,却逐渐趋向于保存国粹,排斥西方文学。早期诗作自由奔放,后期敛才就范。著有《天梅遗集》十六卷,辑有《变雅楼三十年诗徵》。杨天石、刘彦成《南社》有小传。(赵慎修)

【于右任】(1879—1964) 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笔名骚心、大风、剥果、半哭半笑斋主、神州旧主、太平老人等。陕西三原人。两岁丧母,父赴川经商,由伯母房氏抚养成人。家贫,曾牧羊,当童工。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光绪二十四年,应答陕西提学使叶伯皋试卷,被叶誉为“西北奇才”。光绪二十六年,入陕西中学堂学习。光绪二十九年,任商州中学堂监督,因《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议时政,陕甘总督升允加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罪,上奏清廷,请旨拿办。次年,逃亡上海,得马相伯之助人震旦学院学习,化名刘学裕。次年,参与筹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入同盟会。自光绪三十三年起,相继于沪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抨击清廷,鼓吹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加入南社。1914年,受命于孙中山,主持陕西省讨伐袁世凯工作。1918年至1922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与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国共合作。次年,任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1926年,赴苏联敦请冯玉祥回国。冯玉祥成立国民联军,任联军驻陕总司令。1928年,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长。同年,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等人发起寒之友社。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长。1934年,创建标准草书社,提倡草书。1937年,发起创办《民族诗坛》月刊。1941年,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共同发起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又约卢前、张庚

由、庆深庵、刘延涛等编辑出版诗刊《中华乐府》。1949年,去台湾。1955年,参加台南诗人大会;1958年,参加台东诗人节大会,均主张诗应化难为易,接近大众。1964年病逝。终生从政,以国民党元老、要员兼有诗人与书法家之大名。诗多为旧体,亦有少数白话诗。绝大多数为有关国家兴亡、民族荣辱、民生疾苦之作。吴宓《空轩诗话》称誉其诗“苍凉悲壮,劲直雄直,而回肠荡气,感人甚深,在今自成一格,可比昔之辛稼轩、陆放翁,尤以民国八、九年间在陕西统兵,从事革命战役,崎岖艰难之际所作为最佳”。许有成《于右任传》曰:“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诗集有《变风集》、《右任诗存初集》、《右任诗存二集》、《右任诗存笺》。庞齐编《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分体编辑,收诗、词、曲八百五十余首,是目前收录于氏诗歌最多的集子。有刘凤翰《于右任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许有成《于右任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四长、潘志新《民国奇才于右任》(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记其生平。(赵慎修)

【马君武】(1881—1940) 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同,再改名和,字贵公,又字君武,以君武行。广西桂林人。九岁丧父。家贫。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广西体用学堂,习英语、数学。次年,拜康有为为师。光绪二十七年,入上海震旦学院习法文,译《法兰西革命史》。同年冬,赴日留学,结识梁启超,为《新民丛报》撰稿。次年,与章太炎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光绪二十九年,入日本帝国大学攻读工艺化学,结识孙中山,开始发表反清排满演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创立,任秘书长兼广西主盟人。次年,回国,参与创办中国公学,任总教习和理化教习,并在《民报》介绍马克思传略。光绪三十三年,为两江总督端方所迫赴德学习工业。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冬,归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实业部次长。同年,入南社。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长。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1924年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1940年,病逝。终生从事政治、教育、科学技术和翻译,以馀事为诗。辛亥革命时期,曾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脱古胎”(《寄南社同人》),力求推陈出新,改革传统诗歌;又主张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

义”(《诗文集自序》)。陈子展称赞其诗作“雄豪深挚”,其所译拜伦《哀希腊》等诗“具有一种深挚感人的力量”(《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翻译文学》)。著有《马君武诗稿》,译有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黑格尔的《一元哲学》、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刊》,以及拜伦、席勒之诗。生平事迹见《马君武先生纪念册》。(赵慎修)

【宋教仁】(1882—1913) 字遁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漳江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萌发革命思想。次年二月,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七月,与吕大森等在长沙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同年冬,参与策划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遭通缉,逃往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光绪三十一年,与程家桢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同盟会成立,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创刊,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参与筹划广州起义,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长。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代理理事长。1913年,积极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抵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袁世凯暗杀。能诗文,为南社社员。终生从事政治活动,诗作不多,然富于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之思。胡朴安《南社诗话》云:“湖南社员,于国内负盛名者,当首推宋教仁。”“渔父虽为日报文章,每一问题,必检阅多种书籍,于中国古书,尤三致意。故每一社论出,而必理精辞粹,彬彬可诵也。不甚作韵语,余尝读其《思家》、《晚泊》、《秋晓》、《登韬光》五律四首,诗人之诗,亦不过如是。”有《宋教仁集》。生平事迹见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宋教仁》。(赵慎修)

【宁调元】(1883—1913) 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长沙明德学堂。次年,入革命组织大成会和华兴会,创办渌江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赴日入早稻田大学。次年,入同盟会,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易名为《汉帜》),鼓吹革命。受通缉,赴日避难。旋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于光绪三十三年初被捕。在狱中近三年,读书写作不稍懈。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九月,被保释出狱。次年,至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继续抨击时政。武昌起义后,任湖南驻沪特派员。一度参加民社,任《民声日报》总编辑。1912年,赴粤任三佛铁路总办。次年,赴武汉策划反袁,被黎元洪逮捕,英勇就义。早年曾呼吁诗坛革命。在长沙狱中,曾以通讯形式参与筹划南社的创建事宜,为南社著名诗

人之一。感时愤世之作悲壮苍凉。风怀诗缠绵悱恻,意境幽深。著有《朗吟诗草》三卷、《明夷诗钞》二卷、《太一诗存》四卷、补遗一卷,1916年版《太一遗书》和1983年版《宁调元集》均予收录。生平事迹见柳亚子《宁调元传》,杨天石、曾景忠《宁调元年谱》。

(赵慎修)

【苏曼殊】(1884—1918) 原名戡,字子谷,改名玄瑛,曼殊为其出家后的法号。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母为日本人。生于日本横滨。五岁回原籍。十五岁,入日本大同学校。十六岁出家为僧。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青年会。次年,入日本成城陆军学校,参加拒俄义勇队,后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光绪三十年,游暹罗、锡兰,学梵文。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为宗旨。同年,与鲁迅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一生三次出家,三次还俗。交游广泛。富于浪漫气质。懂日语、英语、梵文。能诗善画。有诗百馀首,多七言绝句,多写男女幽怨之情及个人身世之感。诗语轻灵清新,缠绵悱恻。柳亚子赞其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苏曼殊之我观》)。高天梅评曰:“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而笔下尤有奇趣”(《愿无尽庐诗话》)。郁达夫评曰:“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但其人其诗都“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杂评曼殊的作品》)。其诗作有笺注本《燕子龕诗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文言、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译作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拜伦诗选》等。有《苏曼殊全集》。(赵慎修)

【周实】(1885—1911) 原名桂生,字剑灵,改名实,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和劲、山阳酒徒。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家贫。从十三岁起,即陆续读《美国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逐步确立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入南京初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入南社。不久,与阮式等创立淮南社。武昌起义后,回籍组织青年学生响应革命,维持社会治安,被清廷县令杀害。实有经世之志,自言:“逢时多乱,大道未窥,蜉蝣岁月,苦作虫吟;然而朝览镜,夜枕戈,身弱志强,窃不愿以诗人二字了此一生也。”(《无尽庵诗话》)论诗主张“以淋漓慷慨之音,一振柔弱卑下之气”(同上)。其诗有召唤国魂、鼓吹革命之作,如《夏夜独坐》、《感事》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睹

江北流民有感》等。《闺情》则一反悲怨传统,倡导尚武精神。姚锡钧称其诗“不为依傍”,“而回肠荡气,其艳在骨,片语令人之意消”(《跋周实丹烈士遗集》)。胡朴安《南社诗话》曰:“实丹之诗,不谨守声律,而有横厉无前之概,自可使小儒咋舌,诚草泽文人之本色,而其《岁暮杂感》四律,虽无有《痛哭四章》之横厉,而笔怦怦潜跃,譬如鸷鸟出卵,虽羽毛未丰,不同凡禽。他日见杀,流露于字句之间,不可以工拙论也。”遇难后,友人为之刊行《无尽庵遗集》,收诗四卷。柳亚子《周烈士实丹传》载于集中。(赵慎修)

【柳亚子】(1887—1958) 原名慰高,字安如,改名人权,字亚庐,又改名弃疾,字亚子,再改为亚子,名号归一,笔名青兕、唐隐之等。江苏吴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早年同情维新运动,不久即倡言反清革命。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中国教育会。光绪三十年,入国学保存会。光绪三十二年,入同盟会与光复会,创办《复报》,与《民报》相呼应。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与陈去病、高旭创南社,任书记员,以文学鼓吹反清革命。1912年,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为《天铎报》主笔,大力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南京临时政府对袁的妥协退让。1914年,为南社主任,兼任会计与书记。1923年,在原籍创办《新黎里》月刊,称“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发刊词》)。同年十月,与邵力子、叶楚伦、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任社长,宣称“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新南社成立布告》)。次年,入中国国民党,任中央监察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坚持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亡命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皖南事变”后,与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被开除党籍。1946年,与谭平山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与李济深等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1958年病逝。少年时期曾作“香奁体”诗。二十世纪初,一度受“诗界革命”影响,崇拜梁启超与龚自珍,写作以旧形式含新意境之诗。提倡戏剧改革。南社成立后,对内批评宋诗派,对外批判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提倡以唐音发为革命之诗。五四运动前,一度主张诗歌“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五四运动后,转而支持新文化运动。1923年,在《致某君书》说:“仆为主张语体文之一人。良以文言文为数千年文妖、乡愿所巢穴,故必一举而摧其壁垒,庶免城狐社鼠之盘踞。”以后,常对五四新文学作家表示礼赞,并深以自己不能摆脱旧诗格律为憾。毛泽东称其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致柳亚子》)。郭沫若称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意气风发,声调激扬,中国的文学语言,无论雅言或常语,在他的笔下就像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柳亚子诗词选序》)。著有《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集》、《南社纪略》、《南明史纲》、《苏曼殊研究》等,汇编为《柳亚子文集》。生平事迹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赵慎修)

【王德钟】(1897—1927) 字玄穆,别号大觉、幻化。先世居江苏青浦,至其祖始迁江苏吴县周庄。肄业于里中沈氏小学。稍长,常以诗文小品投诸《民立报》。性诙谐。能编新剧,并登台演出。民国初年,入南社。袁世凯当国,作《讨袁贼檄》,抨击袁世凯“罪恶滔天,擢发难数”,“覆载不容,神人共怒”。1916年初,应中表兄弟叶楚伦之邀赴上海主编《民国日报》小说栏,发表长篇小说《掌珠劫》。与胡朴安、王蕴章、潘飞声等诗酒酬唱,结鸥社。1917年,回籍与朱灵修结正始社,提倡国学。自命其书斋曰“风雨闭门斋”,以诗文自娱。1924年,江浙爆发军阀战争时,发起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周庄分会。1927年,以肺病逝世。著有诗集《风雨闭门斋诗稿》、《乡居百绝》、《留都游草》,文集《风雨闭门斋外集》,汇编为《风雨闭门斋遗稿》。生平事迹见《王大觉先生追悼录》等。(赵慎修)

诗风流派

【风骚】《诗经》和《楚辞》的并称。《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四百年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在此之前，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也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代尚诗赋，皆体则风骚。”（《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两汉时代，在尊崇儒术的背景下，有的论者以儒家观点阐释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楚辞”，把它与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相联系。淮南王刘安奉汉武帝诏命所作《离骚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正是出于这样的用心。此后，班固因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又从诗歌发展源流中论定《诗经》与《楚辞》的关系：“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魏晋以后，我国文学发展进入了自觉的时代，为文之士取《国风》以代《诗经》，取《离骚》以代《楚辞》，“风骚”并列，作为文学创作的典范，虽然突出了文学的特性，但仍是儒家强调其讽

喻作用方面来肯定的，这与现代学者把《诗经》和《楚辞》——“风骚”看成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源头，并不是一回事。但魏晋以后，突出了“风骚”的文学特征，终究是一种进步，因而在此以后，人们也常用“风骚”来指代文学的修养、风采乃至文学的成就和事业。如唐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高适《同崔员外綦母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晚晴催翰墨，秋兴引风骚”，是指代文学修养和风采的，而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清赵翼《论诗绝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则是指代文学成就和文学事业的。（费振刚）

【骚体】文体名。亦称“楚辞体”。因仿效屈原《离骚》的形式而得名。句式较为自由，多用“兮”字作语助词。汉以后，赋中有“骚体赋”一体，歌行、琴操亦多用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李）延年以曼声协律，朱（买臣）、（司）马（相如）以骚体制歌。”史称朱买臣善言楚辞，刘勰谓其“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惜其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现传题为司马相如所作者有两篇，一在《古文苑》所收《美人赋》中，

另一篇题为《琴歌》，共两首，见《玉台新咏》卷九。汉、魏、南北朝、唐各代所作之骚体琴操（琴曲），可参见《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所收录的作品。

（费振刚）

【屈宋】屈原和宋玉的并称。屈原是战国时代新兴诗体——楚辞的开创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把宋玉看成是屈原后继者之一，但其他后继者的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王逸《楚辞章句》收宋玉的《九辩》，并称：“宋玉者，屈原之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由此可见宋玉在楚辞这一诗体发展中的承先启后的地位。从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看，屈原、宋玉以他们的创作实绩，结束了《诗经》的群体歌唱的时代，开启了作者以个人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表现对现实感受的新纪元，因而后人把屈宋并称，视为他们创作所应该追求的最高典范。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都表述了这一认识。

（费振刚）

【柏梁体】七言古诗的一种。源于《柏梁诗》。《艺文类聚》卷五六称：“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其诗汉武帝赋首句：“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继之云：“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以下，作者二十四人，至东方朔止，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全诗共二十六句，因作于柏梁台，故名之《柏梁诗》。明清间顾炎武《日知录》据《史记》、《汉书》纪传年表，称《柏梁诗》的年代与官名多相乖舛，因以为是“后人拟作”。现代学者亦多为此说。但《艺文类聚》于《柏梁诗》后，录宋孝武帝《华林都亭曲水联效柏梁体》、梁武帝《清暑殿联句柏梁体》、梁元帝《宴清言殿作柏梁体》三首，均为各诗的作者倡首句，以下则是其臣下接续，虽长短不同，而其体式全同《柏梁诗》，再参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孝武爱文，柏梁列韵”的议论，可见南北朝时人不仅确认《柏梁诗》为汉武帝时所作，而且竞相仿效。后人遂称此种诗体为柏梁体。清赵翼《陔馀丛考·柏梁体》：“汉武宴柏梁台赋诗，人各一句，句皆用韵，后人遂以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然《柏梁》以前如汉高《大风歌》、荆卿《易水歌》……可见此体已久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联句之每句用韵者，乃为柏梁体也。”

（费振刚）

【苏李】①西汉诗人苏武和李陵的并称。《文选》载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列于《古诗十九首》之后。另《古文苑》还收辑李陵《录别诗》八首

（其中两首残缺），苏武《答诗》一首。苏武与李陵之交往，见《汉书·苏武传》。但在诗歌发展史上苏李并称，则是由于上述诗歌的出现而引起的。这一组诗大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以哀婉凄怨的情调抒发人生的悲苦艰辛，是艺术上相当成熟、形式较为完整的五言古诗，其中如“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等句，都很著名，广泛流行于六朝隋唐的诗坛，钟嵘《诗品》评李陵诗为“上品”，《新唐书·宋之问传》引时人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唐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之五中也说：“李陵苏武是吾师”，由此可见这一组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但这一组诗是否是李陵、苏武所作，六朝时有人已提出疑问，南朝宋颜延之认为“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庭诰》）。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据汉成帝诏命刘向校录歌诗三百余篇的记载，指出“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后，自宋代苏轼至近代，许多学者从苏武、李陵事迹，诗中地域以及诗的风格考证，认为这些诗不可能出自于西汉前期的苏武、李陵之手，把这些诗称为苏李诗，当是出于后人的附会。现代学者综合前人的成果，认为这组诗大体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同一时代背景，同为五言诗成立的标志，虽然是托名之作，但对五言诗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②初唐诗人苏味道和李峤的并称。《新唐书·苏味道传》云：苏味道“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

（费振刚）

【苏李体】指传为苏武、李陵所作的所谓“苏李诗”的体制和风格。语出宋严羽《沧浪诗话》：“五言起于李陵、苏武，七言起于汉武帝《柏梁》”，“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严氏所论亦有所本，南朝梁钟嵘《诗品》称：“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任昉《文章缘起》亦云：“五言诗于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唐释皎然《诗式》则说：“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苏李诗”的风格，正如元稹所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文不妄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正因为如此，六朝以后许多诗人都奉之为五言古诗的典范，而竞相模仿，南朝梁江淹有《杂体诗》三十首，中有效“李都尉陵”一首，见《文选》，至于师其意境，或引为故实者，所在多有，不胜枚举，均可说明其影响之深

远。参见“苏李”①。

(费振刚)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合称。汉末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不仅政治地位显赫，又以其杰出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成为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们和其同时期诗人的创作，形成了我国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了曹氏父子在那个变动时代中的文坛领袖地位：“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尊，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在《诗品》中虽然把曹操、曹丕、曹植分别列于下、中、上三品，但同样肯定了他们父子的文坛领袖地位：“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序》）宋以后，在不少的诗话、诗文评中，在论及汉魏诗文时，常常把他们三人的作品风格作对比分析，并出现了“三曹”的合称，如明胡应麟《诗薮》说：“三曹，魏武太质，子桓乐府、杂诗十余篇佳，余皆非陈思比。”清牟愿相《小澹草堂杂论诗》说：“《三百篇》浑噩，譬则黄、农。苏、李、《十九首》左动（疑当作“劲”），譬则虞、夏。古乐府变调，譬则汤、武。三曹诗广大悉备，譬则周公。”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孟德欲为三代以上之词，劣乃似汉；子桓兄弟取法汉体，遂渐沦矣。”又说：“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

(费振刚)

【三祖】魏太祖武帝曹操、魏高祖文帝曹丕、魏烈祖明帝曹叡的合称。语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所论是批评他们乐府诗的创作，指出了其乐府诗的内容表达上与原来有所不同，称“郑曲”，或有讥贬之意。钟嵘也说：“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又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诗品》下）现代学者多认为三人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实大不同，曹操、曹丕文学成就也有高低之分，丕不如操，但各有自己的特色，均为开风气的人物，对后世影响深远，曹叡无论从那方面都无法与其父祖比肩。（费振刚）

【建安七子】指建安时代文坛上七位重要作家：

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第一个把这七位作家合而论之者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琰、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又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隼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曹丕对于“七子”创作特点的评述大体是准确的，为后代学者所认可。以政治而论，“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是东汉旧臣，不属于曹氏集团，而终于被曹操所杀。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他们目击汉末的动乱，有的还经历困苦流离的生活，又有一定的政治抱负，想依靠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渴求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艺术上刚健清新，梗概多气，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七子”文学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南朝梁《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

(费振刚)

【邺中七子】建安时代七位作家的合称。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被封为魏王，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称邺都。由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势，使邺都成为当时实际的政治、文化中心。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皆为曹氏父子的追随者，在名分上为曹操的属僚。曹氏父子与他们以诗文相互酬答的文学活动也多于此地进行。唐释皎然《诗式》有“邺中集”条目，此集或即当时诗文之结集。但其集已佚，现已无法知其具体情况，皎然说：“邺中七子，陈王（曹植）最高。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据此“邺中七子”中当有曹植、刘桢。又据《文选》载谢灵运《拟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分别拟曹丕、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瑒、阮瑀、曹植。则“邺中七子”除曹丕外，七人是也。又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下注云：“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诗。”则“邺中七子”当即“建安七子”。参见“建安七子”。（费振刚）

【曹刘】曹植、刘桢的合称。南朝梁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昔曹刘殆文章之圣。”又说：“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董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建安诗人

中,“三曹”以曹植成就最高,“七子”除王粲外当推刘桢,钟嵘评其诗云:“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在评王粲诗时又说:其诗“源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表明钟嵘认为刘桢的诗歌风格与曹植诗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相近因而曹刘并称,王粲则与其不同,后人亦多沿用这一提法,如唐元稹评杜甫诗为“古傍(一作‘言寺’)苏李,气夺(一作‘吞’)曹刘”(《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亦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方东树说:“观公幹等作,清绮紧健,曹刘并称,有以哉。”(《昭昧詹言》卷二) (费振刚)

【曹刘体】建安诗人曹植、刘桢诗歌的体制风格。语出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则有……曹刘体”。曹植、刘桢都是建安时代诗人中成就突出者,南朝梁钟嵘《诗品》均把他们列入上品,并以曹刘并称。钟评曹诗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刘诗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可见二人诗风有相似之处:“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宋秦观《韩愈论》)。杜甫《壮游》中以“曹刘”喻自己年青的精神状态:“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又在《奉寄高常侍(适)》中以之称赞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都是着重强调他的诗作这一特点,而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曹刘坐啸虎生风,西海无人角其雄。”更形象地指出所谓“曹刘体”的风格特征。参见“曹刘”。 (费振刚)

【曹王】建安诗人曹植、王粲的合称。曹植和王粲分别是“三曹”、“七子”中创作成就最突出者,因此,在六朝时人们习惯以他们指代建安诗坛,如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刘孝标《广绝交论》称赞任昉“道文丽藻,方驾曹、王”。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特别肯定曹植和王粲,他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文选》作“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又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 (费振刚)

【王刘】建安诗人王粲、刘桢的并称。王粲、刘桢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而在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以其政治地位和创作才能成为诗坛的盟主,因此,六朝以来人们把“三曹”看成建安诗坛的主干,而以王刘为其两翼,如南朝梁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王刘诗歌风格虽有所不同,但后人仍把他们合而论之,如明胡应麟说:“汉人诗不可句

摘者,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无一芜蔓,不著浮靡故也……王刘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幹之峭,似有可称,然所得汉人象音节耳。”(《诗薮·内篇》)清刘熙载说:“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二宗。”(《艺概·诗概》)

(费振刚)

【二应】建安诗人应瑒、应璩兄弟的合称。应瑒为“建安七子”之一,与其弟应璩“并以文才称”(《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后人论及诗歌之流派时,遂称应瑒、应璩为“二应”。《南史·陆瑜传》:瑜“少笃学,美词藻,……兄琰时为管记,并以才学娱左右,时人比之二应”。清吴伟业《赠家园次湖州守五十韵》:“族姓叨三谢,词场继二应。” (费振刚)

【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领袖的作家群体。六朝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文学发展过程的新现象,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现代学者即据此称之为“邺下文人集团”,称“邺下”,以其活动大都在魏王都城——邺。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他们都经历了汉末社会的大动乱,目睹了“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的悲惨景象,因而为曹操在群雄争霸过程中所表现的雄才大略所吸引,想依附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使得他们在诗歌创作上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表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时代精神,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邺下文人集团的诗歌成就所体现的就是后人称为“建安风骨”的文学传统,它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费振刚)

【建安风骨】建安时代诗歌创作所形成的风格。该时期曹操在群雄逐鹿中,实行诸如抑制豪强兼并,招抚流亡,广兴屯田,恢复生产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逐步统一了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任人唯贤,加之曹操父子又喜好和奖励文学,这就吸引了大批文人士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现代学者所谓的以曹操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骨干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些文人士

士,在政治上,是曹操父子的属僚,希望依附于曹氏政权做一番事业;在文学上,他们以诗文相往还,抒发政治理想,赞美亲朋情谊。正是这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抱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除了个人的特殊风格外,还具有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乱,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民生活的困苦和艰辛;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风格悲凉慷慨,刚健清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正如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与前代诗歌创作相比较,两汉乐府民歌,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露和抨击,质实朴素,但少华彩;汉末文人五言诗,抒发个人的苦闷和追求,委婉蕴藉,清丽流畅,但情绪低沉颓唐,少昂扬之气。而建安诗人则能取前代诗歌所长,继承并发扬其优良传统,无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深沉,还是就其艺术表现的多姿多彩,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建安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特色,构成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辉煌的丰碑,成为后代诗人所追慕的典范。初唐陈子昂面对六朝诗坛“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风气,感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又说“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可见他们说的“汉魏风骨”就是“建安风骨”,这也是他为其诗歌革新主张所树立的学习榜样。参见“汉魏风骨”。

(费振刚)

【建安体】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的诗歌体式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其下注云:“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其诗或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或抒发作者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表现出悲凉慷慨、刚健清新的风格。体裁样式多写乐府诗,或袭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或根据现实生活自拟新题,其内容大都与乐府古题无关,且相当部分作品已不入乐,形式自由,不避杂言,对后世,特别唐代乐府诗的写作有极大影响。作品多数为五言,无论是题材开拓,还是艺术表现,都比汉末文人五言诗有重大的发展,它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文坛,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参见“建安风骨”、“三曹”、“建安七子”等。

(费振刚)

【黄初体】三国魏黄初时期诗人的诗歌体式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时而论,则有……黄初体”,其下注云:“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黄初是魏文帝曹丕代汉后的第一个年号,前后共七年(220—226),其时建安时代活跃的诗人

除曹丕、曹植外,都已先后去世,诗歌创作不再有往日之兴旺,而在诗的风格、体式上则无重大变化,故严羽谓“其体一也”。也有人认为不必另标出“黄初体”的名目,如冯班在《严氏纠谬》中说:“至黄初之年,诸子凋谢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赘言又有黄初体也。”

(费振刚)

【正始体】三国魏后期的一种诗歌体式风格。以其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9),故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其下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南朝梁刘勰说:“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康)志清峻,阮(籍)旨遥深,故能标焉。”(《文心雕龙·明诗》)其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政治黑暗,老庄哲学风行。阮籍、嵇康以老庄之“自然”对抗司马氏的“名教”,他们的作品多用隐晦的手法,揭露、嘲讽现实的黑暗和礼教的虚伪,抒发高洁的志趣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委婉含蓄,兴寄遥深,是对建安文学慷慨之气和批判精神的继承,成为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但正始诗风也有晦涩艰深的一面,且多人生无常、消极避世思想的流露,对后世亦有消极影响。

(费振刚)

【嵇阮】三国魏后期诗人嵇康、阮籍的并称。正始时期,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氏,已掌握魏国的军政大权,与曹魏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政治异常黑暗。嵇康、阮籍都具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他们不满于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更以其诗歌创作的成就成为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正如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他们的诗歌成就各有不同,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其八十二首《咏怀诗》是后来诗人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的先导;嵇康的四言诗艺术成就高于五言,对陶渊明的四言诗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其诗歌风格亦同中有异,嵇诗清峻警峭,而阮诗则显得委婉深沉。

(费振刚)

【大小阮】三国魏文人阮籍与其侄阮咸的并称。二人同为“竹林七贤”中人物,皆不满现实,纵酒放荡,不拘礼法,名重一时,故世称阮籍为大阮,阮咸为小阮。但阮籍以诗文著称,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阮咸精通音律,以善弹直颈琵琶闻名,无诗歌传世。

(费振刚)

【二阮】三国魏文人阮籍及其侄阮咸的合称。唐皎然《送德守二叔侄上人还国清寺觐师》诗:“道贤齐二阮,俱向竹林归。”明何景明《为陇州李举人寿其伯

尚书公》诗：“竹林仲子追随地，二阮风流尚可攀。”参见“大小阮”。（费振刚）

【竹林七贤】 魏晋间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的合称。晋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误，当作‘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他们生活在司马氏加紧向曹魏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黑暗时期，崇尚老庄，倡导自然，集结于山水竹林间，纵酒酣歌，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王瑶说：“他们都同时嗜酒耽音，笃信老庄，实在是因为他们共同认识的必然理由。对于他们的任真自然，饮酒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寄托和表现的方法。”“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不只在量上他们饮得多，沉湎的情形加深，而且流风所被，竞相效仿，影响也是很大的。”（《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酒》，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但竹林七贤的志趣品格并不相同，当司马氏兄弟相继执政后，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的被司马氏所杀害，有的仍纵酒放诞，以避害全身，有的依附于司马氏，为时人所轻视。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各不相同。阮咸、山涛、王戎三人都无诗歌传世。向秀存《思旧赋》一篇，抒发对亡友的怀念之情，清凄悲怆，向称名篇。刘伶仅存诗一首，其《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相近。嵇康、阮籍是“七贤”中诗文大家，“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成就最高，影响亦大，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费振刚）

【三张】 西晋诗人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的合称。《晋书·张载传》称：“亢字季阳，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属缀，又解音乐技术。时人谓载、协、亢，陆机、云曰：二陆、三张。”兄弟三人文学成就各不相同，成就最高、影响较大者是张协，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将其列为上品，并说：“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杂诗》十首是张协的代表作，内容广泛，且情志高远，造语清新警拔，颇具特色，确有高于当时著名诗人潘岳、陆机的地方。张载的诗以《七哀诗》较著名，钟嵘在《诗品》中列为下品，并说其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玄、咸）”。他的《剑阁铭》写蜀道之艰险，其影响则远在其诗之上。张亢诗多不传，现存五言诗一首，仅四句，疑为残句。（费振刚）

【二陆】 西晋文学家陆机及其弟陆云的并称。《晋书·陆云传》谓云“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南北朝时，对陆机、陆云多合而论之，评其诗才、性情之高下，虽亦认为各有特点，而云不如机是一致的结论。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把陆机列为上品，而把陆云列为中品，并说：“清河（指陆云）之方平原（指陆机），殆如陈思之匹白马（指白马王曹彪，曹植异母弟）。于其哲昆，故称二陆。”刘勰则认为：“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论其性情者，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称：“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位参佐幕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馀，声作钟声，言多慷慨。”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云：“云性弘静，怡怡然为士友所宗，机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晋书·陆机传》：“范阳卢志于众中间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世说新语·方正》同）陆机兄弟出身于东吴大士族，祖父陆逊为吴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家世显赫。吴亡后，退居旧里，闭门读书。晋武帝太康末年陆氏兄弟一同来到洛阳，并受到张华的激赏。其时由于晋武帝统一中国不久，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曾出现了太平繁荣的景象，诗歌的发展也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走上了刻意追求形式华美的脱离社会现实的道路。“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正是简明地指出了太康时期诗歌变化的特点。陆氏兄弟诗歌创作与太康诗风是一致的，他们到洛阳后，仕途上并不顺利，终至双双被害。但他们在当时诗坛上却享有盛名，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认为他们是太康时期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尤其是陆机，尽管当时人指责其诗病“太多”，清代也多人批评其诗“词旨敷浅，但工涂泽”（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〇），但不否定其“大家品位”（刘熙载《艺概·诗概》）。现代学者多认为陆机虽有少数作品抒写了真实处境和独特感受，有其新意，而其多数作品内容贫乏，却竭力追求词藻和对偶，堆砌呆板，繁冗乏力，进一步发展了太康时期的形式主义诗风。从这一意义上说，陆机也确可作为太康时期的代表作家。“二陆”又称“二俊”，参见“二俊”。

（费振刚）

【二俊】 西晋文学家陆机及其弟陆云的合称。《晋书·陆机传》：“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

二俊。”《世说新语·言语》“陆机诣王武子”注引《晋阳秋》作“平吴之利，在获二俊”。陆机、陆云并以才能著称于当世，故张华见到后以“二俊”誉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亦云：“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费振刚）

【两潘】西晋文学家潘岳及其侄潘尼的并称。南朝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据此可知，两潘亦为太康诗风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缺乏社会内容，而追求形式的华美，但终因其铺叙过多，使之平缓繁冗而缺乏含蓄之致。这也是太康诗风共同的毛病。两潘相较，潘岳的诗文成就高于潘尼，他的诗间有真挚的感情，他的《悼亡诗》是传世名篇，写物在人亡的悲哀，颇能动人。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多用“悼亡”为题，可说明其影响之大。潘尼的诗多为赠答之作，无多影响。（费振刚）

【潘陆】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的并称。东晋孙绰曰：“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见《世说新语·文学》）此为最早将二人并论的提法。后《宋书·谢灵运传论》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可见潘岳、陆机并驰名于当世，同为太康诗坛的著名诗人。太康文学“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日盛”（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逐步脱离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傅玄、张华以朝廷重臣之尊而又能诗，率先垂范，对于这一文学的转变是有一定影响的，而真正体现太康文学流向的是潘岳和陆机。陆机、潘岳的诗大都缺乏深厚的内容，但都竭力追求词采的华艳和语句的谐和整齐，铺排堆砌，平缓繁冗而少力度，这些都可以代表太康诗风的共同特征，后人对太康诗风的批评也多集中于这一点。但陆机和潘岳都是有才华而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晋书·陆机传》），他的少数诗作抒写作者的真实处境和独特感受，颇有新意。他的《文赋》是精心结撰的论文名作，对文学创作的种种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他的《悼亡诗》三首，是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以“悼亡”名篇的开始，颇有影响。他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也都是描叙哀情的名篇，为后人所称道。二人的不同处是，陆机的理论建树胜过创作，而创作以诗歌为长，潘岳的成

就主要在创作，而创作以辞赋为胜；风格上，陆机宏丽而深奥凝重，潘岳华美而明畅哀婉。（费振刚）

【陆海潘江】比较西晋诗人陆机、潘岳文学才能的评语。始见于南朝梁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诗，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其中谢混所云，又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但以为孙绰所论，其文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同书又载孙绰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可见关于陆机和潘岳的高下，早有不同评价，而钟嵘倾向于李充的看法，潘浅于陆，故有此比喻。以现存作品而论，陆、潘各有特点，未可轩輊，陆海潘江之说，恐非确论。（费振刚）

【联璧】指西晋诗人潘岳与夏侯湛。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岳、湛曜联璧之华。”又作“连璧”，见《晋书·夏侯湛传》：“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又：“初，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风诗》”。故钟嵘谓“孝若”（原作‘孝冲’，孝冲为夏侯湛弟夏侯淳字，湛字孝若）虽曰后进，见重安仁”。（费振刚）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晋太康时期著名诗文作家的合称。南朝梁钟嵘《诗品序》：“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三张”，指张载、张协、张亢；“二陆”，指陆机、陆云；“两潘”，指潘岳、潘尼；“一左”指左思，他们诗文特点各不相同。参见各条。（费振刚）

【二十四友】西晋惠帝时文人集团。《晋书·刘琨传》：“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除上述五人外，尚有潘岳、缪徵、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瓌、和郁、周恢、牵秀、陈眕、郭彰、许猛、刘讷以及刘琨之兄刘舆（见《晋书·贾谧传》）。“二十四友”成分复杂，文学成就和影响也不相同。潘岳为“二十四友”之首，与陆机、左思、刘琨是西晋著名诗人，欧阳建、陆云、石崇、挚虞也较有文名，其他诸人或不以文学见长，或传世诗文较少，对后世几无影响。（费振刚）

【太康体】西晋时期的一种诗歌风格、体式。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太康体”，下注云：“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太康是晋武

帝司马炎的年号。其时三国鼎立始告结束,晋武帝采取一些稳定统治的措施,社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形势。这使当时的文士忽略了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脱离“建安风骨”的传统,而偏重于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南朝梁刘勰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道出了太康诗风的特点。这一时期是西晋文坛较为活跃的时期,陆机、潘岳、张协等都有不少传世之作,虽亦有特点,但总的来说是其诗歌的技巧虽日趋成熟、精巧,但内容贫乏,且因其有时过分追求形式,而失之雕琢拙滞,平缓乏力。唯左思在太康诗人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南朝梁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费振刚)

【陶体】 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诗的体式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陶体”,下注云:“渊明也。”较之唐人,宋人更加推崇陶渊明,苏轼有《和陶诗》一百余首,可见其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陶诗“质而自然”,也是宋人品评陶诗的共同话题,如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黄庭坚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题意可诗后》)陈善说:“东坡亦尝和陶诗百余篇,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坡诗亦微伤巧,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扞虱新论》下集卷四)朱熹说:“渊明诗本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严羽所谓“陶体”大抵即指这些特点而言。但陶诗也有另外一面,宋人也已有人注意,如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辛弃疾说:“须信此翁(指陶渊明)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水龙吟》)近代诗人龚自珍更把陶渊明与南阳诸葛相比,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杂诗》三首之二)所以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

(费振刚)

【谢体】 晋宋间诗人谢灵运诗歌的体式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谢体”,下注云:“灵运也。”

谢灵运生活于南朝晋宋易代之际,他热中政治权势,到刘宋时代,由于政治欲望不能满足,心怀愤懑,遂肆意游遨山水,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使之在南朝诗坛上确立了优势地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这是谢灵运文学创作的主要贡献,对后世的影响亦是在这一方面。其诗刻镂细致,崇尚藻饰,体现出富艳精工,鲜丽厚重的特色。梁钟嵘谓指谢灵运“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明胡应麟云:“康乐清而丽。”(《诗薮》)

(费振刚)

【陶谢】 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并称。两人皆长于描绘自然景物,都是当时诗坛的代表作家,给予后世诗歌以重大影响,故自唐以来,多以两人并称,如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中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但两人的遭际、诗歌风格、成就各不相同。谢灵运出身于南朝的大族高门,是当时士族文坛中的风流人物,他的诗作多精心刻镂,富丽清新,如“初发芙蓉”(《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共同风尚。陶渊明在当时文坛中声名不如谢灵运显赫,其诗文创作亦少被当时人所称引。所以《文心雕龙》中没有一字提到陶渊明,梁钟嵘《诗品》则把陶、谢分别列为中品和上品,在《文选》收谢灵运诗文较多,而陶渊明只选了八首诗、一篇文。唐以后,陶渊明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唐宋许多著名诗人都推崇陶渊明的人品和气节,并从其朴素、自然的诗歌创作中汲取营养。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实大于谢灵运,两人的风格亦各有特点,且宋以后诗评家多认为谢不及陶,如宋严羽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诗评》)宋陈善说:“诗有格有韵,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句,格高也;康乐‘池塘生春草’之句,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欲韵胜易,欲格高难。”(《扞虱新话》下集)清沈德潜说:“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千古并称,厥有由夫。”又说:“陶诗高处在排,谢诗胜处在排,所以终逊一筹。”(《古诗源》卷一〇)

(费振刚)

【刘郭】 西晋末年、东晋初年诗人刘琨、郭璞的并称。梁钟嵘《诗品序》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潘、左。”西晋末年,玄言诗兴起,一时之间,“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在这样的诗风弥漫之中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的是刘琨、郭璞。刘琨本是贵公子,早年生活浮华放荡,在尖锐的民族

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现存诗三首,是他保卫中原战斗生活的产物,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爱国感情。郭璞的代表诗作是《游仙诗》十四首,钟嵘评为“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卷中)。他们的诗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不能改变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故钟嵘说:“郭景纯用隼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诗品序》) (费振刚)

【袁孙】东晋文学家袁宏和孙绰的并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可见此并称主要从玄言诗中的地位着眼,实则孙绰为晋代玄言诗的代表作家,而袁宏虽有玄言之作,然以咏史诗见称于世,二人颇有异处。 (吴小林)

【孙许】东晋玄言诗派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的并称。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下:“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又《续晋阳秋》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言,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同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见,孙、许并称,已见于当世。孙、许诗传世不多,难据以评论各自的特点,而《晋书·孙绰传》所云:“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可资参考。参见“玄言诗派”。 (费振刚)

【玄言诗派】晋代诗歌流派。其诗作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约始于西晋永嘉年间而盛行于东晋,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要流派。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贵族官僚、以及普通士大夫阶层,为全身远祸而崇尚老庄,喜好谈玄,而有玄学之称。东晋后,佛教盛行,玄学又与佛教逐步结合,清谈玄理成为一时之习尚。这种风气影响到诗坛,便出现了以诗歌形式表达自己对玄理领悟的玄言诗。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由于这些诗篇缺乏艺术形象和真情实感,文学价值不高,故流传下来的作品甚少。孙绰和许询是

玄言诗人的代表,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盛名,但他们的作品,据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孙绰十二首,许询三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人所作的《兰亭诗》,也是玄言诗,我们可以从中领略玄言诗的特点。 (费振刚)

【山水诗派】诗歌流派,特指南朝宋、齐时代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借描绘山水自然景物以抒情的诗歌派别。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这一论述简要地指出了山水诗派的起因及其特点。东晋诗坛为玄言诗所统治。但玄言诗并不排斥山水的描写,相反,玄言诗人往往在玄言诗中以山水的诗句作为玄学名理的印证或点缀。但少数山水诗句无法改变玄言诗枯燥无味的面目,直到东晋后期,出现了谢混《游西池》等少数集中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为玄言笼罩的诗坛带来一点新鲜空气。而大量写作山水诗,并最终确立山水诗在诗坛的优势地位的是刘宋初年的谢灵运。在刘裕代晋后,谢灵运感到其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政治欲望不能满足,于是肆意游遨山水,借描绘江南山光水色,以发泄其政治失意的愤懑,这就使诗歌从枯淡无味的玄理中解脱出来,扩大了诗歌题材,加之他创作中注意诗歌的艺术形象,语言的精工,讲究对句和声色,因而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注意,“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标志着南朝诗歌发展第一个重大变化,他以后谢朓、何逊、阴铿等都有不少山水诗歌,使之成为南朝诗歌显著特点,并直接影响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形成和发展。 (费振刚)

【元嘉三大家】指南朝宋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三人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南朝宋元帝元嘉年间(424—453),是“元嘉体”的主要诗人,后人论诗常把他们并提。宋严羽《沧浪诗话》论“元嘉体”即以颜、鲍、谢并举,元方回有《颜鲍谢诗评》。《南史·颜延之传》称:“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又说:“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由此可以略见当时人们对他们的不同评价及其成就之高下。颜谢齐名,南朝人多次称之,如梁钟嵘《诗品序》说:“谢客(谢灵运的小名)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颜谢

并起,乃各擅奇。”但颜谢成就高低,当时已有定评。而鲍照正如钟嵘所说:“才秀人微,故取埤当代。”(《诗品》)其声名在当时远不及颜谢显赫,但鲍照的诗“得景阳之淑诡,会茂先之靡曼。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钟嵘《诗品》),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后代更以其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探索,尤以乐府、歌行体诗道丽俊逸的风格,受到更多的肯定,谓其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远在颜谢之上,如清沈德潜说:“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五言亦在颜谢之间。”(《古诗源》卷一一)清刘熙载亦说:“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佳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艺概·诗概》) (费振刚)

【元嘉体】 南朝宋元嘉年间的一种诗歌体式。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元嘉体”,其下注云:“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元嘉为南朝宋文帝的年号,颜延之、鲍照、谢灵运是当时著名诗人。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而体现诗坛这一转变就是上述三个诗人的创作。尽管他们诗歌风格和成就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创作中都注重描绘山水景物,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既打破了长期统治诗坛的玄言诗风,也对齐梁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南齐书·文学传论》谈到齐梁诗文时,曾指出有三个流派,一派学谢灵运,一派学鲍照,另一派虽未指出具体人名,而指出他们最讲究对仗和用典,显然是指颜延之的,这既可以了解这三个诗人对后世的影响,也可以了解“元嘉体”的特点。 (费振刚)

【大小谢】 ①指晋宋间诗人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南朝梁钟嵘《诗品》列谢惠连诗于中品,并云:“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凤凋,故长髻未髻。《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据《宋书·谢灵运传》称谢灵运十分赏识谢惠连的才能,《诗品》引《谢氏家录》称:“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似可推知以“大小谢”称谢灵运和谢惠连,是当时人语。②指南朝晋宋间诗人谢灵运及齐诗人谢朓,谢灵运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而谢朓是山水诗派中成就最卓越者,为后人所激赏,如李白经常提到谢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发”(《三山望金陵寄殷淑》)。谢朓与谢灵运同族,又后出,故以“小谢”称之,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此“小谢”即指谢朓。参见“二谢”。 (费振刚)

【二谢】 晋宋间诗人谢灵运和南朝齐诗人谢朓的并称。唐杜甫《解闷》诗:“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谢灵运、谢朓是南朝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他们写诗对景物观察细致,并能用清新流丽的语言加以表现,给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以重大的影响。但二人的诗歌风格也各有不同,灵运诗缺乏社会内容,朓诗则寓有个人的仕途浮沉、人生坎坷的感情;灵运诗讲究对仗、用典,朓诗则注重声律;灵运诗语言精工富丽,但杂有玄言诗的说教,朓诗用语清新自然,较少繁芜词句和玄言成分。参见“大小谢”“三谢”诸条。 (费振刚)

【三谢】 指晋宋间诗人谢灵运、谢惠连及齐诗人谢朓。宋强幼安编《唐子西文录》:“三谢诗,灵运最胜,当就《文选》中写出熟读,自见其优劣也。”(《历代诗话》本)又《子西语录》:“荆公学三谢诗失于巧耳。”注:“谢灵运、谢惠连、谢玄晖诗三十六篇为《三谢诗》。”(转引自《佩文韵府·拾遗》卷八一)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元嘉以还,三谢、颜、鲍为首。三谢亦本子建而杂参于郭景纯。”由此可见三谢合称由来已久,但三谢成就实不相同,以现代学者的眼光看,谢灵运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朓的山水诗成就最高,在诗歌艺术方面对后世启发良多,谢惠连诗艺术成就不大,不足与谢灵运、谢朓相比。 (费振刚)

【山泽四友】 指晋宋间诗人谢灵运的四位诗友。《宋书·谢灵运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四友”中,谢惠连成就较高,时人与谢灵运并称,有“大小谢”之名。何长瑜为谢惠连之师,谢灵运称赏其才能,以“当今仲宣”誉之。又《宋书·谢灵运传》称:“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璿之不及也。”梁钟嵘《诗品》将何长瑜、羊璿之列为下品。可见当时人对“四友”的艺术才能已有品评,但除谢惠连外,何仅存诗二首,荀存诗一首,羊诗全佚。 (费振刚)

【颜谢】 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谢灵运的并称。《宋书·颜延之传》说:“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又梁钟嵘《诗品序》亦称:“谢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可见当时人即以此二人为元嘉诗坛之领袖人物。但颜谢诗风各异,当时人已有品评,《南史·颜延之传》称:“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梁钟嵘《诗品》亦引汤惠休语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后人即

以此论定颜谢艺术成就之高低。参见“元嘉体”、“元嘉三大家”诸条。(费振刚)

【永明体】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形成的一种诗歌体式风格。《南史·陆厥传》：“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自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由于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新的发展，永明年间，周顒发现了汉语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同时著名诗人沈约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指出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等八种声病，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在此之前，人们在写诗过程中，也意识到了音韵谐和的问题，但没有找到具体的调协音韵的办法，周顒、沈约等四声八病说的提出，表明把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变成了对声韵规律的自觉运用，这确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空前创举。沈约称：“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同上)虽不无夸张，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永明体作为诗体的特点是：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体裁短小，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反映了诗歌从比较自由发展到讲究格律的必然趋势。永明作家的诗歌题材狭窄，情调纤柔，因此，就诗歌风格而论，永明体是唐初陈子昂以下许多进步作家批评的对象。由于永明体对诗歌写作的要求过于苛细，很难使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做到完全的统一，谢朓是永明体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但他最为后人所称赞的作品，并不完全符合沈约所提出的声韵格律。(费振刚)

【新体诗】即“永明体”。清王闿运编有《八代诗选》，选自汉至隋八代诗歌二十卷，其中第十二至十四卷专选南朝齐至隋百馀年中讲究声律、对偶的诗歌，名曰“新体诗”。此类诗仍属于所谓“古诗”(亦称“古体诗”)的范畴，为区别比较自由的四言、五言等“古诗”而另有此称。它是“古诗”过渡到唐代格律严整的“近诗体”(律诗、绝句)的一种诗体。参见“永明体”。(费振刚)

【三贤】指南朝齐梁时诗人王融、谢朓和沈约。梁钟嵘《诗品》下：“昔有王元长(王融字)者，常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幼有文辨。于是

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王融、谢朓、沈约是诗歌声律说的首创者和提倡者，又因为他们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且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好学、有文才而知名当世，这使他们的提倡得到众多的士族文士的响应，流为时尚，故称之为“三贤”。(费振刚)

【竟陵八友】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八位文学家的合称。《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的庙号)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友中，沈约、谢朓是“永明体”的倡导者，作诗注重声律，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其余诸人也受其影响，所作诗文均注重声律、对仗，但内容较为贫乏，成就不高，但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当时文学的风尚，故常为文学史家所提及。(费振刚)

【鲍谢】①南朝宋诗人鲍照和谢灵运的并称。唐杜甫《遣兴》：“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宋黄庭坚《寄陈适用》：“寄我五字诗，句法窥鲍谢。”史容注：“明远、灵运。”鲍照、谢灵运是“元嘉体”的代表作家，他们与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尽管鲍、谢的作品风格、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各自的艺术成就哺育了后代诗人的创作，成为后代诗人仰慕的对象，故往往并称之。参见“元嘉三大家”。②南朝宋诗人鲍照和齐诗人谢朓的并称。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南史谓鲍照、谢灵运为鲍谢。”鲍诗俊逸，谢诗清丽，风格有相似处，故合称之。③唐天宝间诗人鲍防、谢良弼的并称。《新唐书·鲍防传》：“防于诗尤工，有所感发，以讥切世敝，当时称之，与中书舍人谢良弼友善，时号‘鲍谢’云。”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鲍防)与谢良(弼)为诗友，时亦称‘鲍谢’云。”白居易颇推崇鲍防，其《与元九书》称：“唐兴二百年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新唐书·鲍防传》所说“当时称之”，或即本此。但其诗已佚，现存鲍、谢诗甚少(谢四首；鲍八首，其中五首又与鲍溶相混)，多为赠答、写景之作，文学成就并不高。(费振刚)

【休鲍】南朝宋诗人鲍照与汤惠休的并称。《南齐书·文学传论》：“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鲍照与汤惠休有诗相互赠答，但诗的风格各异，鲍诗内容深刻、丰富，感情热烈奔放，风格挺拔豪放；汤诗多艳情纤语，风格趋于绮靡。鲍照现存诗二百馀首，汤惠休仅存诗十馀首，就其诗歌成就与对后世的影响，汤难以与鲍比肩，《文学传论》所论及的是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

的过程中,鲍照与汤惠休在谢灵运、颜延之之后,同为山水诗派的后继者,并以此知名于当世。

(费振刚)

【江鲍】南朝梁诗人江淹与南朝宋诗人鲍照的并称。唐人已以此提法,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蓄壮志而未就,期老成于他日。且能倾产重诺,好贤攻文。即惠休上人与江、鲍往复,各一时也。”杜甫《赠毕四曜》:“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称: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鲍照与江淹时代相悬,诗歌风格与成就也不相同,但他们都各以诗情才气而知名于当世,皆善于写抒情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都是传世的精品,所以后人常相并举。

(费振刚)

【沈鲍】指南朝梁诗人沈约和宋诗人鲍照。唐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鲍照“才秀人微,故取埋当代”(南朝梁钟嵘《诗品》)。但他的诗歌成就为后世所公认;沈约历仕宋、齐、梁三代,是齐、梁文坛的领袖,尽管他们的遭际不同、诗风各异,但都以其艺术创造而为后世所瞩目。

(费振刚)

【沈诗任笔】指南朝梁沈约的诗和任昉的文。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中云:“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称沈诗任笔。”又作“任笔沈诗”。《南史·任昉传》云:昉“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沈约提出以“四声八病”之说为核心的声律论,为“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和齐、梁时期的著名诗人。任昉博学能文,著作表、奏、书、启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他对“沈诗任笔”之说“甚以为病”,晚年作诗甚多,意欲与沈较量短长,然终不能胜,故时有“才尽之谈”(《南史·任昉传》)。

(吴小林)

【齐梁体】南朝齐梁时代的诗歌体式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齐梁体”,下注云:“通两朝而言之。”作为诗歌体式,其内涵与“永明体”相近。清冯班《严氏纠缪》谓:“若明辨诗体,当云齐梁体创于沈(约)、谢(朓),南北相仍,以至唐景云龙纪(龙纪,当指神龙、景龙,非昭宗年号),始变为律体。”即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集中所言的齐梁格诗。作为诗歌风格,即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所说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讲究声律谐和,对仗工整,但内容贫乏,格调卑下,浮艳绮靡,所以朱熹说:“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体皆懒慢不收拾。”(《朱子语类》)姚范《援鹑堂笔记》:“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以绮

艳及咏物之纤丽也。”姚氏此论较简明地指出永明体、齐梁体内涵的侧重面有所不同。一说,齐梁体是永明体的继承和发展,永明体在声律上只注意一句之内声调的抑扬顿挫和上下两句之间声调的参差错落,齐梁体则进一步开始重视一篇之内联与联之间的声律结构。

(费振刚)

【南北朝体】诗体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南北朝体”,下注云:“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该书在“黄初体”下亦注云:“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若本其说,此谓“通魏周而言之”,是认为北朝之魏周诗气格与齐梁相同。但古今学者对此论断多有疑惑,郭绍虞称:“昔人论南北朝文学,每谓‘彼此好尚雅有异同’。邢劭《萧仁祖集序》云:‘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违。’不知沧浪合南北朝为一,其意何指。”(《沧浪诗话校释》语)参见“齐梁体”条。

(费振刚)

【三笔六诗】指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三弟刘孝仪工于文和六弟刘孝威善作诗。《南史·刘孝绰传》:“孝绰弟潜,字孝仪,幼孤,与诸弟相勖以学,并工属文,孝绰尝云‘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谓孝威也。”孝仪曾受诏作《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词宏丽,传诵一时。《艺文类聚》卷七六录题为《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一文,严可均认为即是该篇(见《全梁文》案语)。孝威今存诗近六十首,以乐府见长,有些写得清新流利,《陇头水》、《公无渡河》等篇,均可观。

(费振刚)

【选体】南朝梁萧统《文选》所录诗歌的体式、风格。《文选》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出发,选录自汉魏至齐梁期间的重要诗作。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文选》遂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是当时文人的必读书。杜甫《宗武生日》一诗教导自己的儿子要“熟读《文选》理”;宋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均可见当时社会风习之一斑。《朱子语类》中屡言“选诗”,如“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选体”之名当即由此而来。《文选》所录的诗歌作品虽多为五言古诗,但其时代不同,其体式、风格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选体”作为一种诗体的专名,其内涵恐难于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后人可以从体式、风格上来认识《文选》所录作品的特点,称之为“选体”,但不可以把其外延无限延伸。有人认为五言古诗即为“选体”,也有的把仿《文选》选录古诗所作的诗,亦称为“选体”,则不妥。“选体”之名最早见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在“有所谓选体”句下有注云:“选诗

时代不同,体制随异,有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清翁方纲《格调论》(中)也说:“《文选》自汉魏迄齐梁,非一体也,而概目曰‘选体’,可乎?”

(费振刚)

【宫体诗】 南朝梁陈间盛行的一种诗歌流派。《梁书·简文帝纪》称:简文帝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该派的作者除萧纲外,还有庾肩吾、徐摛、庾信、徐陵等。他们的诗作多写宫中女性的姿色、服饰,格调低下,诗风绮靡,是南朝君王、贵族荒淫放荡生活的反映。以描写女性姿容为内容的诗歌,南朝宋齐以来即有出现,但在梁代,由萧纲的提倡,庾、徐等人的扇扬,“宫体所传,且变朝野”,整个诗坛为其笼罩,以至有人斥之为文学的“堕落”(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这种诗风自梁至唐初,其影响延续了一百多年,消极作用甚著。但从诗歌发展过程看,宫体诗的兴起,还与该派诗人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有关,他们虽也强调诗乐与教化的关系,但更强调诗歌要使人“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在诗体上,他们重视诗歌声律的谐美,辞藻的秾丽,且有意识的吸收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形式和新鲜的语言,在创作实践方面亦有一些清丽之作。因此,在指出宫体诗内容不健康和诗风靡弱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它们在开拓诗歌题材和扩大诗歌表现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费振刚)

【吴均体】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诗文创作所体现的一种风格。《梁书·吴均传》:“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吴均今存诗一百四十馀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语言明畅,风格清丽,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与齐梁浮艳之风有所不同。他还善于用骈文写书信,今存《与朱元思书》等短札,俱以写景见长,简净流畅,韵味隽永。

(费振刚)

【俳体】 诗文中诙谐幽默,含有讽谕的游戏之作,称为“俳谐体”,略称“俳体”。唐杜甫有《戏作俳谐体解闷》诗二首。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体诗及笺启。”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卫风·淇奥》云:‘善戏谑兮,不为虐也。’此谓言语之间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虽含讽谕,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耳,不足取也。然以其有此体,故亦采而列之。”

(费振刚)

【玉台体】 南朝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所体现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玉台体”,注云:“《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对于严氏所论,前人已指出其误,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称:“此不熟本书之故。《玉台》所集,于汉魏六朝无所论择,凡言情则录之,自余登览宴集,无复一首,通阅当自了然。”《大唐新语》卷三云:“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徐陵自序亦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又云:“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都表明《玉台新咏》的编撰,是在宫体诗流行之时,为其寻求写作的依据和范本而出现的,因此,是书所收均为涉及妇女的诗篇,其中虽有少数自汉至梁的民歌,不乏刚劲质朴之作,多数则为当时文人所作的宫体诗,写妇女姿色、闺情别怨,风格纤细艳丽。“玉台体”之名当即由此而来。也有人同意严氏之说,认为“玉台体”非“宫体”别称,而是指汉魏六朝时期有关男女艳情诗歌所体现的体制风格。

(费振刚)

【徐庾体】 指南朝梁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体风格。《北史·庾信传》称:庾信“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焉”。徐、庾两对父子此时的诗歌,多为奉旨应制之作,内容贫弱,是一种专事辞藻的宫体诗,所以《隋书·文学传序》说:“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曲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四人中,庾信后来出使西魏,因梁亡,被迫羁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正是这一生活的变故,使其诗文风格由绮靡转为刚劲苍凉,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成为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其余三人有社会价值的好作品不多。

(费振刚)

【二绝】 南朝陈文学家顾野王、王褒的并称。《陈书·顾野王传》:“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于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顾野王才学广博,其所著《玉篇》三十卷,是我国文学训诂学的主要著作,亦能诗赋,今存其诗文十馀篇。王褒原为南朝梁宫廷诗人,后入北周,融南北诗风,如《渡河北》、《关山月》等,描写边塞风光,寄托故国之思,质朴苍劲,在北朝颇负盛名。

(费振刚)

【阴何】 南朝梁诗人何逊和陈诗人阴铿的并称。唐杜甫《解闷》诗:“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在宫体诗盛行的时代,何逊、阴铿能独辟蹊径,创作清新流丽的山水景物诗,在炼句修辞、斟酌音韵上均可见其用心之良苦。陆时雍《诗镜总论》说:“何逊之后,继有阴铿,阴、何气韵相邻,而风华自布,见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时欲袭人。”二人相比较,何诗内容比阴诗稍丰富,阴铿的新体诗更成熟,已接近

唐人律诗。

(费振刚)

【何刘】 南朝梁诗人何逊、刘孝绰的并称。《南史·何逊传》：“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称：“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以现存诗作衡之，何诗内容丰富，格调清新，故明张溥云：“少陵佳句，多从仲言（何逊字）脱出，是以有‘能诗何水曹’（见杜诗《北邻》）之句。后世诗人，知慕少陵，即慕仲言，虽颜董门致讥贫寒，无贬声价。”（《何记室集·题辞》）刘诗为时人所推重，“每作一篇，朝成暮编，好事者咸传诵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南史·刘孝绰传》）但其诗辞藻靡丽，内容贫乏。论诗歌成就与影响，何远胜于刘。（费振刚）

【东海三何】 南朝梁诗人何逊、何思澄、何子朗的并称。《梁书·文学传》：“何思澄，字元静，东海剡人……少勤学，工文辞。……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以现存作品而言，何逊工诗能文，为南朝山水诗派代表作家之一，其新体诗，工于炼字，音韵和谐，已初具唐律规模，为后世所重。何思澄、何子朗各存诗三首，均收入《玉台新咏》，可约略见其特点，对后世无甚影响。（费振刚）

【三何】 指南朝梁诗人何逊、何思澄、何子朗。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思澄《游庐山诗》：“沈约见之，自以为弗逮”（《梁书·文学传》）。今佚。“三何”又称“东海三何”，语出《梁书·文苑传》，详见该条。（费振刚）

【北地三才】 对北魏文学家温子昇和北齐文学家邢邵、魏收的誉称。三人都是北方人，皆以诗文名重于当世，故有此称。《北齐书·魏收传》称：收“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详见“三才”。（费振刚）

【三才】 指北朝文学家温子昇、邢邵、魏收。《北齐书·魏收传》称：收“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南北朝时代，传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北朝文坛在庾信由南入北之前，基本上被南朝浮艳绮靡的风尚所笼罩，“三才”的诗文基本上模仿沈约、任昉，没有什么创造性，成就不高。“三才”中，温、邢以诗见称，魏收工诗赋，又兼史学，各有所长，但却互相指责，尤以魏收为甚，《北齐书·魏收传》说：“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

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又说：“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同儿戏。’”（原文此句作“此外更同儿戏”，据《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删“外更”二字。）（费振刚）

【大邢小魏】 指北朝文学家邢邵、魏收。《北齐书·魏收传》：“初河间邢子才及季景（魏收之从叔）与收并以文章显，世称‘大邢小魏’，言尤俊也。”过去均以为邢较魏长十岁，故有此称。中华书局标点本《北齐书·魏收传》校勘记于上引文句下称：“《北史》卷五六‘子才’下有‘子明’二字。按邢昕字子明，子才族子，见《魏书》卷八三《文苑传》、《北史》卷四三《邢昺传》。《传》云‘大邢小魏’，当时必以子才、子明为大小邢，季景与收为大小魏，才有这话，这里当脱‘子明’二字。”此说为善。邢、魏各有所长，为当时所尊服，但他们都各有偏好而互不服气，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参见“北地三才”、“三才”诸条。（费振刚）

【唐初体】 唐初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下自注云：“唐初犹袭陈、隋之体。”可见“唐初体”之“唐初”，非唐诗分期初、盛、中、晚的“初唐”，其时限要比初唐为短，只指唐朝开国初数十年间的诗歌体制风格。体现唐初体的诗人主要是武德至太微时期的陈叔达、虞世南、欧阳询、张说、李百药、上官仪等。其时，新王朝初立，统治者需要文人为其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加上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在唐初继续泛滥，于是此种诗歌体制风格应运而生。上述诸诗人多奉和应诏之作，讲究辞藻程式，所写律诗尚未成熟，往往非古非律，古律混淆，诗风“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卷二〇一），表现出浮华艳丽、绮错婉媚的特点。此种唐初体，到以后“四杰”出现才得以初变，而待陈子昂登上诗坛，倡导诗歌革新，则有了更大的变化。（吴小林）

【上官体】 初唐诗坛流行的一种体制风格。太宗、高宗时诗人上官仪，诗多奉和应诏之作，婉媚工整，讲究辞藻对仗，内容空洞贫乏，一时竞相仿效，称为“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云：“本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曰：“又有上官体。上官仪工诗，效之者称此体。”（吴小林）

【初唐四杰】 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

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本诗文兼指，后主要论其诗。其名次排列，说法不一。《旧唐书·杨炯传》载炯闻王杨卢骆为“四杰”之称后，“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锐《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载：“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鄮云卿《骆丞集序》亦曰：“（骆）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则云：“后复有王杨卢骆。”杜甫《戏为六绝句》亦有“王杨卢骆当时体”之句。杜诗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称“杨王卢骆”。一般沿用“王杨卢骆”之说。“四杰”皆是富有才华，积极进取，然又命运多舛，遭遇坎坷之人。他们反对当时诗坛上的六朝余风，慨叹“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不满“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主张革除其弊。“四杰”的诗歌虽“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未洗净齐梁习气，然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颇为广泛，内容比较充实，其优秀之作富于真情实感，风格刚健俊逸，在初唐诗歌园地中透发出一股清新气息。王、杨以五言律绝见长，卢、骆以七言歌行取胜，他们为五律的定型和七言歌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杰”已揭开唐诗的序幕。杜甫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对“四杰”给予高度评价。明王世贞亦谓“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艺苑卮言》卷四）。所评甚为公允。（吴小林）

【王杨卢骆体】“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歌体制风格。杜甫《戏为六绝句》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王杨卢骆体。”王杨卢骆之诗，虽未尽脱六朝窠臼，然思革其弊，不少作品刚健清新，富有真情实感，已初步扭转齐梁绮靡诗风，为后来陈子昂诗歌革新之先声。参见“初唐四杰”。（吴小林）

【王氏三珠树】初唐诗人王勣、王勣、王勃兄弟三人的美称。《旧唐书·王勃传》云：“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勣、勣，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杜易简即初唐诗人杜审言之父，《新唐书·王勃传》误为苏易简。

（吴小林）

【文章四友】初唐诗人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

的合称。《新唐书·杜审言传》载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四人是武后时代的宫廷诗人，所作多为应制诗。其中杜审言成就较高，写有一些情真意切的优秀之作，对五、七言律的形成、发展颇有贡献，为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

（吴小林）

【方外十友】初唐诗人陈子昂、卢藏用、赵贞固、陆馀庆、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十人的合称。十人皆为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者，相友善，故称。《新唐书·陆馀庆传》云：“（馀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所载同。

（吴小林）

【沈宋】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的并称。《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二人皆为宫廷诗人，所作多应制诗，语言绮靡，内容贫乏。贬谪流放后写过一些富有情韵，气势流畅的优秀之作。“沈宋”律诗粘对精切，格律严谨，为确定五律、七律的声韵骈对规律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标志着律诗定型的代表诗人。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曰：“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二“七言律”曰：“至唐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

（吴小林）

【沈宋体】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歌体制风格。《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沈宋体。”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上》云：“沈宋体，佺期、之问也。”“沈宋”所作之诗语言靡丽，格律精严，为律诗的定型作出重要贡献。参见“沈宋”。

（吴小林）

【涩体】指初唐诗人徐彦伯艰涩怪僻的诗歌风格体式。宋曾慥《类说》卷四〇引《朝野僉载》云：“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鸱桐，以龙门为风户，以金谷为铕溪，以玉山为琼岳，以乌狗为弃犬，以竹马为篠骖，以月兔为魄兔，以赤牛为炎犊。后进效之，谓之‘涩体’。”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徐彦伯》亦有类似记载，“以凤阁”二句作“以凤阁作鸱阁，以龙门为虬户”。

（吴小林）

【陈杜】初唐诗人陈子昂和杜审言的并称。二人同时，杜擅长五律，为律诗的奠基人之一，陈亦精于五律，故后人往往并称之，且与“沈宋”连举。元方回

曰：“陈子昂才高于沈佺期、宋之问，惟杜审言可相对。此四人唐律在老杜之前，所谓律体之祖也。”（《瀛奎律髓》卷二四）明胡应麟曰：“五言律体，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杜、沈、宋，典丽精工；王、孟、储、韦，清空闲远。此其概也。”（《诗薮》内编卷四）清沈德潜评五律时亦曰：“神龙之世，陈、杜、沈、宋，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然名贵。”（《说诗晬语》卷上）（吴小林）

【陈拾遗体】 初唐诗人陈子昂的诗歌体制风格。陈子昂曾任右拾遗，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陈拾遗体。”陈子昂提倡诗歌革新，其《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反对齐梁以来诗歌浮艳柔靡的弊病，标举风雅比兴，汉魏风骨，崇尚充实的内容和明朗劲健的艺术特点相统一的诗歌风格。其诗擅长五古，具有真切的感情和现实的内容，刚健质朴，雄浑爽朗，开有唐一代新诗风，对后来唐诗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说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唐韩愈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金元好问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论诗三十首》其八）均对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和倡导诗歌革新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吴小林）

【阮陈】 三国魏诗人阮籍和初唐诗人陈子昂的并称。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综论门·体制类》曰：“又尝论五言，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陈子昂有《感遇》诗三十八首，均为五古咏怀组诗，以浑朴含蓄之词感兴述怀，取得较高成就，形成五古咏怀诗深沉委婉的传统，对后来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产生较大影响。（吴小林）

【吴中四士】 初唐诗人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的合称。《新唐书·刘晏传》附《包佶传》曰：包融“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包融为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贺知章为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张旭为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张若虚为扬州（今属江苏）人，四人同时知名，故称。（吴小林）

【盛唐体】 盛唐时期的一种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盛唐体。”下有自注：“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体现“盛唐体”的诗人主要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张九龄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人，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人，以及大诗人李白、杜甫等。其中

李白是集中代表，杜甫则同时表现出向中唐诗歌转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而古典诗歌艺术也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唐殷璠谓其《河岳英灵集》选诗“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叙，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集论》）。又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序》）。古体、近体兼备，五言、七言都得到充分发展，形式与内容臻于和谐统一，是该时诗歌的一大特点。与蒸蒸日上的时代面貌相联系，盛唐诗歌还充满着睥睨一切的气势，乐观向上的自信，旺盛蓬勃的精神，自具一种如严羽所说的“盛唐人气象”（《沧浪诗话·考证》），即雄浑而深厚的美学风貌，这既体现在描写当时昌盛景象的诗篇中，也反映在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里。“盛唐体”并讲究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和含蓄隽永的韵味，严羽曰：“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情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盛唐诸人诗歌体制风格具共同性的同时，又显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明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所云：“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盛唐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不少人皆视盛唐诸人之诗为诗歌的典范，极力推崇，明代前后“七子”，清代尊唐诸流派即是其突出的代表。（吴小林）

【张曲江体】 盛唐诗人张九龄的诗歌体制风格。张九龄为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人而论，则有……张曲江体。”其诗以五古见长，清淡质朴，一洗齐梁铅华。清施补华云：“唐初五言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直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岷傭说诗》）其中《感遇》十二首与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并称。清沈德潜曰：“《感遇诗》，正字古奥，曲江蕴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唐诗别裁》卷一）曲江古近体诗的和雅清淡之风，开后来王、孟、储、韦一派。明胡应麟曰：“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诗薮》内编卷二）（吴小林）

【王右丞体】 盛唐诗人王维的诗歌体制风格。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人而论，则有……王右丞体。”王诗题材、诗风多种多样，尤擅以五言诗形式写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情趣，意境优美，韵味醇厚，语言清丽，音调和谐，往往熔诗情、画意、音乐美于一炉，风格以清腴

自然,明丽秀逸为主。杜甫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其八)。殷璠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苏轼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史鉴类编》评曰:“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黄山紫塞,汉馆秦宫,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真所谓有声画也。”(吴小林)

【孟浩然体】盛唐诗人孟浩然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人而论,则有……孟浩然体。”孟一生主要在隐居、漫游中度过,诗多以五言短篇写山水田园景物和隐逸生活,风格清旷淡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中最早出现的代表作家。杜甫称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其六)。皮日休评其诗云:“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郢州孟亭记》)清王小楫标举“神韵说”,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孟诗《晚泊浔阳望庐山》为例云:“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苏轼则曰:“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吴小林)

【王孟】盛唐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的并称。二人皆以山水田园诗歌见长,风格清新自然,冲淡闲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论者好将二人并提或比较其优劣。明李东阳曰:“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后山诗话》)胡应麟曰:“王孟闲淡自得。”(《诗薮》内编卷二)清王士禛云:“汪钝翁琬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香祖笔记》卷八)乔亿则云:“王、孟齐名,李西涯谓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谓孟不及王。愚谓以疏古论,孟为胜,以澄汰论,王为胜,二家未易轩輊。”(《剑谿说诗》卷上)细析之,二人诗风不尽相同,王维于自然中偏于清腴秀逸,孟浩然则更显得清旷淡远。诗歌成就亦可分高低,王胜于孟为今人的普遍看法。(吴小林)

【山水田园诗派】盛唐时期的诗歌流派。这一流派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田园山水诗创作发展而来。初唐时,王绩遥承陶诗传统,以朴素淡远的田园诗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进入盛唐之后,涌现出大批才思不凡的诗人,大量创作山水田园诗,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明胡应麟云:“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也。”(《诗薮》内编卷二)所谓清淡之派即指风格清新淡远的山水田园诗派。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发端于张九龄,而以王维、孟

浩然成就最高,故又称为“王孟诗派”。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大多以王、孟为中心,志趣相投、交往甚笃。张子容、刘眘虚、储光羲、裴迪、綦毋潜、卢象、邱为、崔兴宗等皆王、孟之友;常建虽与王、孟联系不密,但其创作倾向是一致的。山水田园诗派诗人思想倾向上大多崇尚闲适隐逸,追求恬淡雅致的生活境界。他们大多以五言诗的形式,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名山大川,通过精心选择的自然景致和田园风光,表现自身隐居生活的种种闲情逸致,显示其超尘脱俗的人生价值观念。到中唐大历年间,钱起、刘长卿继承王、孟传统,创作山水田园诗,虽不乏佳制,但未脱盛唐窠臼。著名诗人韦应物崛起,“其五言诗高雅淡远,自成一家之体”(白居易《与元九书》),使山水田园诗更贴近现实生活。中唐贞元、元和年间,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则对山水田园诗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使这一题材诗歌在思想内涵方面达到新的高度,使封建士大夫那种闲情逸致的表现被削弱,而往往在山水的描绘中表现其郁愤不平之气。韦应物、柳宗元在山水田园诗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故往往王、孟、韦、柳并称。虽中唐以后创作山水田园诗大有人在,且有名家,直至晚唐,余波尚传,但其总体水平,艺术造诣,远比不上盛唐时期。(王军)

【高达夫体】盛唐诗人高适的诗歌体制风格。高适字达夫,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曰:“以人而论,则有……高达夫体。”高诗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其中以边塞诗成就最高,诗中描绘边塞风情,抒写安定远理想,歌颂广大士兵慷慨报国的英勇精神,且讽刺边帅不得其人,揭露军队内部将士之间苦乐不均。诗体尤擅七古。风格深沉悲壮,劲健浑厚。唐殷璠评曰:“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徐献忠云:“常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峰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唐诗品》,《百家唐诗》卷首引)清王士禛云:“高悲壮而厚。”(《师友诗传续录》)

(吴小林)

【岑嘉州体】盛唐诗人岑参的诗歌体制风格。岑参曾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世称“岑嘉州”。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岑嘉州体。”岑以边塞诗著称,诗中描绘边塞风光和习俗,叙写边地征战生活,抒发思乡怀土之情,内容丰富广阔。诗体擅长七言歌行。所作诗气势淋漓,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风格雄奇豪放。岑参对边塞诗题材、意境的开拓和技巧、手法的提高卓有贡献。杜甫称“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谓岑诗“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唐殷璠曰:“岑

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杜确评其诗云:“属辞尚清,用意尚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岑嘉州诗集序》)。清王士禛云:“岑奇逸而峭。”(《师友诗传续录》) (吴小林)

【高岑】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并称。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两人皆积极用世,具出塞谋求报国立功之志,且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所作以描写边塞风光和征战生活的边塞诗著称于世,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高岑”均在诗中描绘塞上的奇异景色,抒发安边定远、建功立业的情怀,歌颂将士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气概。情辞慷慨,风格豪放悲壮。宋严羽曰:“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明胡应麟曰:“高岑悲壮为宗。”(《诗薮》内编卷二)两人不同之处为高诗具有更深的社会内容,岑诗题材更加丰富广阔;高适冷静观察,细致描写,直抒胸臆,寄慨深沉,岑参驰骋想象,摹写奇境,倾泄豪情,瑰丽多姿;高诗悲壮中有雄浑,岑诗悲壮中透奇丽;可谓各有千秋。蔡传云:“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明王世贞云:“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道上,而婉缦过之。”(《艺苑卮言》卷四)清王士禛曰:“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诗传续录》) (吴小林)

【王李高岑】盛唐诗人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的合称。李颀、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王维虽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然边塞诗亦有很高成就;李颀、高适、岑参擅长七古,王维兼五七言古今体之长,七古亦很著名,故后人往往合提。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云:“王、李、高、岑别有天授,自成一家,如如来下又有文殊、普贤、维摩也,又如太史公外别有庄、屈、贾生、长卿也。”明胡应麟评四人七言歌行曰:“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内编卷三) (吴小林)

【边塞诗派】盛唐时期的诗歌流派。在唐代,很多诗人都写边塞诗。宋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好诗首推征戍边塞之作。初唐时,杨炯的边塞诗就写得很好。陈子昂的边塞诗更是古朴遒劲,苍凉悲壮。他们的创作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边塞诗派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盛唐时期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这时期涌现出大批以边塞诗创作著称的诗人,如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颀等,他们的边塞诗作都是“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的具体表现。这些诗人都是边塞诗创作的主体,且取得相当高的

艺术成就,故被称做边塞诗派。边塞诗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唐王朝一统天下,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交通便利,给诗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空间,使他们在对天地有尽唐疆无界的描绘中,充满了自信心自豪感。唐代文士求仕,在科举之外还有从军边塞为幕府僚属之途,因而盛唐诗人们积极从军塞上,关切塞垣征戍之事,并在诗中热情歌唱对边塞生活的向往,对功名的渴望,对戎旅生涯的切身体验。在他们求取功名的正当要求中,洋溢着“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英雄主义精神。盛唐边塞诗派还大量地写关于战争的诗歌,他们敢于直面残酷的战争,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此外边塞诗人们还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唐王朝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情况,展现异地风光异族风情,反映了唐文化的开放性。边塞诗派大多以七言诗为主要形式。他们的诗歌风格大多悲壮雄浑、慷慨苍劲。中唐以后边塞诗数量并不见少,但在“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的形势下,人们往往将边塞现实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弊端等作为重大问题讨论,盛唐那种积极豪迈激动人心的时代精神消逝了,艺术成就也不如盛唐时期。但中唐时也还出现了专门创作边塞诗的李益,以及在边塞诗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戎昱、卢纶等诗人,还能继承盛唐边塞诗派的传统,在边塞诗上有某些新建树。 (王军)

【太白体】盛唐诗人李白的诗歌体制风格。李白字太白,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太白体。”其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或针砭政治弊病,揭露社会黑暗;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疾苦;或描绘自然风光,礼赞祖国壮丽河山;或歌颂友谊,描写爱情;而以抒发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情绪和表现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叛逆精神为主要特征。所作诗往往从大处落墨,略貌取神,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感情的表达方式为喷薄而出的爆发式,一气直下,不可羁缚,思绪瞬息万变,结构奔腾跳跃,“壮浪纵恣,摆去拘束”(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宋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色彩绚烂,富有浪漫主义特色。语言自然明净,音节谐美流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体裁多种多样,五古形象生动,词意委婉,在深沉浑穆中透出流畅雄放之势。七古气势磅礴,意象飞动,句式自由流走,结撰奔放不羁,“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

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绝句言近旨远,含蓄隽永,饶有清新俊逸之致,清沈德潜云“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〇)。律诗数量相对较少,但“以古人律”,能运古诗浑壮气势于声调格律之中,常常不拘格律,独树一帜。在各体中,尤擅长七古和七绝,明王世贞曰:“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艺苑卮言》卷四)他善于向民歌学习,所作乐府诗成就最为卓著,明胡震亨云:“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清赵翼亦云:“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瓠北诗话》卷一)李白诗意境雄奇壮美,风格豪放飘逸,他自己说:“李白之文,清雄奔放。”(《上安州裴长史书》)宋严羽曰:“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沧浪诗话·诗评》)其诗作鲜明的个性,浓郁的诗味,神奇的境界,超卓的技巧,产生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感人艺术魅力。(吴小林)

【少陵体】盛唐诗人杜甫的诗歌体制风格。杜甫曾一度居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世号“杜少陵”,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少陵体。”其诗内容丰富,涵意深广,“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杜甫传》),“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李纲《杜子美》诗)。通过直接描绘现实和抒发内心感受,深刻反映他所处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被人称为“诗史”。所作诗往往从小处着笔,善于选取典型的事物,以小见大,由个别反映一般。叙事精雕细刻,真切传神,抒情百转千回,反复咏叹,且常常寄情于事,融情入景,寓主观感情于客观叙写之中。杜诗刻意求工,重视锤炼,强调苦思,“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诗歌语言精警稳重,格律工切严谨。体裁诸体皆备,各体俱工。五言古体诗,以时事入诗,写得波澜壮阔,转折自如。七言古体诗,融爱国忧民之情于字里行间,“沉郁雄浑”(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笔力纵横。“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唐元稹《乐府古题序》)。五言律诗,简重凝练,深沉委折,“气象巍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变化,不可端倪”(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七言律诗,声情顿挫,浑厚博丽,“纵横变化,直欲涵盖宇宙,包括古今,又非唐代所能限”(清高步瀛《唐宋

诗举要》卷五)。前人认为杜甫五七言绝句“俱无所解”,“不甚工绝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实非如此,而是别创新调,另具一格。在众体中,他尤长七律,明王世贞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艺苑卮言》卷四)其诗风格多样,或明快,或雄浑,或质朴,或悲壮,兼而有之,而以沉郁顿挫为主。宋严羽曰:“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清方东树亦称杜诗“凄凉沉郁”(《昭昧詹言》卷一二)。老杜于前人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且作创造性的发展,可谓诗家之能事毕,集我国古典诗歌之大成。唐元稹云:“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宋代秦观亦曰:“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欤!”(《韩愈论》)(吴小林)

【李杜】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并称。二人同时,友谊甚深,均以诗名,《新唐书·杜甫传》云:“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后世有李杜优劣之论。唐元稹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白居易云:“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串今古,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元九书》)此为扬杜抑李者。欧阳修曰:“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又云:“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太白戏圣俞》)此为扬李抑杜者。实则李白诗歌的理想主义及壮志不得实现的愤懑情绪,反映出盛唐的时代精神及当时社会矛盾开始趋向激化的情况,富有浪漫主义特色,语言自然明净,风格豪放飘逸。而杜甫诗歌真实描写现实生活,深刻揭示他所处的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富有现实主义特色,语言精警稳重,风格沉郁顿挫。“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屠纬真文集》,《李太白集》王琦注引);“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王嗣《杜诗笺选旧序》);“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如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明胡应麟《诗薮》卷四);“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二人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均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故又有并称李杜之论。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

籍》)苏轼亦云:“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以此说为胜,李杜堪称我国诗歌史上光耀千古的双星。

(吴小林)

【会稽二清】 中唐诗僧清江和清昼(即皎然,其字清昼)的合称。清江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昼为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古属会稽郡(隋唐改名越州),二人皆工诗,在江南诗僧中颇负盛名,故称。唐赵璘《因话录》卷四“江南多名僧”条云:“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全唐诗》卷八一二云:“清江,会稽人,善篇章。大历、贞元间,与清昼齐名,称为‘会稽二清’。”

(吴小林)

【竹溪六逸】 盛唐诗人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的合称。开元末年,李白等六人居今山东泰安东南的徂徕山,过往交游,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新唐书·李白传》曰:“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又简称“竹谿”。金元好问《息轩秋江捕鱼图》诗(其三)云:“正始风流一百年,竹谿衣钵有真传。”

(吴小林)

【饮中八仙】 盛唐诗人贺知章、李适之、李璡、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的合称。八人嗜酒不羁,交游甚密,时人称作“饮中八仙”。杜甫有《饮中八仙歌》,描写八人豪放纵酒情景。《新唐书·李白传》本其说曰:“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豪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则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八仙”中有裴周南,其说与杜诗、《新唐书·李白传》异。

(吴小林)

【二皇甫】 中唐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的并称。二人工诗,在当时齐名。唐独孤及比之为西晋诗人张载、张协兄弟:“丽藻竞爽,盛名相亚,同乎声者,比之景阳、孟阳。”(《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高仲武则以上下相较,认为冉不及曾:“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皇甫曾)之与补阙(皇甫冉),文辞亦尔。体制清洁,华不胜数。”(《中兴间气集》卷下)宋王应麟称“时号‘二皇甫’”(《小学紺珠》卷七)。南宋时少章评中唐诗人云:“二皇甫亦铁中铮铮。”(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引)

(吴小林)

【钱刘】 中唐诗人钱起和刘长卿的并称。二人皆长五言,尤工五律,前人往往将其看作大历诗人的代表,加以合称。明胡应麟曰:“诗至钱、刘,遂露中唐

面目。”(《诗薮》卷五)清宋荦曰:五律“降而钱、刘、韦、郎,清辞妙句,令人一唱三叹”(《漫堂说诗》)。然亦有不少论者认为刘实高于钱,如明许学夷云:“中唐虽称钱、刘,而钱实逊刘。”(《诗源辨体》卷三六)清李重华云:“大历名手,钱不如刘。”(《贞一斋诗话》)

(吴小林)

【钱郎】 中唐诗人钱起和郎士元的并称。二人均工于五言律诗,所作清丽凝练,诗风相类,且皆擅长投赠送别之作,“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钱,时论鄙之”(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故齐名于世。“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同上卷上)宋葛立方则曰:“然郎岂敢望钱哉?”并在辨析二人的某些诗篇后指出:士元“不及起远甚”(《韵语阳秋》卷四)。

(吴小林)

【钱郎刘李】 中唐诗人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嘉祐的合称。唐范摅《云谿友议》卷上云:“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也!’”刘长卿与李嘉祐交谊颇深,唱酬甚多,此处刘对李讥诮的记载恐不可信。然四人诗歌成就确高低不一,诗风亦有差别,钱、郎清丽精工,刘淡雅清秀,李则绮靡婉丽。

(吴小林)

【大历十才子】 指大历初在京中奔走权门、活跃于权贵华宴上并博得声名的一批诗人。姚合《极玄集》李端小传载,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文艺传》亦云:“(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后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江邻几《杂志》、清王士禛《分甘馀话》、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对十子的具体人员互有进退,要之均以传诗多少及成就高下而论,不足为凭。十才子均生长于开天盛世,到代宗朝入京谋职,因贫寒无援,只得依傍权门,出入贵邸,作豪门华宴上风雅的点缀。李肇《唐国史补》所载李端在昇平公主席上赋诗获赏的佚事很难反映他们日常诗歌活动的情形。他们的得名和交游唱和主要是在大历初年,到大历后期,诸人或入军幕,或外放贬官,或罢官归隐,便很少有联袂酬唱的机会,而随着境遇的差异,诗风也出现各不相同的变化。钱起早年从王维游,颇得王维清雅之致,后遭世变,心灰意懒,诗多衰飒之音;卢纶久困风尘,诗多苦语,自入浑瑊幕,亲历戎马生涯,乃有磊落豪爽之气;韩翃才华轻妙,出入幕府,历任台郎,不改其初,在大历诸子中最有盛唐余响;李端年辈较诸子为少,诗有少年轻绮之态,仕途不顺,沉迹下僚,不免有风尘苦语,调多悲凄;司空曙、耿伟、崔峒均以谏官

久滞不调,晚遭贬谪,斥放远州,诗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叹老嗟卑,最为悲苦;苗发、夏侯审、吉中孚三人诗大概失传,难见其貌。总体上看,十才子的创作除依附权贵、多预饯送之会外,并无特别突出的共同特征,风格也不很接近。钱起、李端衍王维之绪,韩翃、卢纶有李颀、崔颢余风,四子均为古近体兼长。司空曙、耿纬、崔峒则多中唐之调,耿纬至有宋调,三人集中均眇有古风歌行,以五言专胜。就艺术水准论,历来皆推钱起为冠,韩翃、卢纶次之。要之,十才子的创作取材较窄,不如同时代其他诗人那样关心社会现实,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他们的眼光常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但他们都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无论抒情状物都很有表现力,所以他们的作品,尤其是律诗,不仅有浓郁的人情味,也有精致出色的景物刻画,兼之选词造句又很雅致,使他们的作品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很高水平。管世铭说“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正揭示了大历十才子诗的基本风貌。至于十才子的缺陷,则有如胡震亨所指出的“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尚诣五言,擅场饯送,此外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尔”(《唐音癸签》卷七)。此外,结构、语意的重复雷同也是很明显的缺点。参见“大历体”。(蒋寅)

【大历体】 中唐大历十才子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大历体。”后世则常用以指大历、贞元之际的诗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提要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钱)起与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安史之乱中,诗人们经历战乱流离之苦,乱平后又面临着国步维艰的现实,豪迈乐观的情调丧失殆尽。描写满目疮痍的现实,抒发个人的升沉离合、俯仰今昔之感,取代了开元、天宝诗中的豪迈意气、慷慨情怀;与生活上的逃避现实倾向相应的闲雅趣味逐步或为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六朝形似之风尤其是谢朓成为诗人们热心追摹的楷模,叹老嗟卑、向往隐逸成为诗中最突出的主题,而饯送则是创作中的主要内容。其饯送之作有较明显的应酬习气,但在艺术上却非常成熟,颇为后人称道。大历诗人普遍工律诗,尤其五律,温醇闲雅,情味浓郁,在盛唐的精工浑整外另辟清空流畅一途,名作迭出。其七律技巧日趋成熟,常为后人摹仿。总的来说,大历体的基本特征是长于抒情,工于律诗,风格清空闲雅,造语洗练流利,其失在气象衰飒、境界局促,结构陈熟落套,另外,相比于开天、元和之诗,拙于古诗歌行也

是明显的短处。参见“大历十才子”。(蒋寅)

【山中四友】 中唐诗人杨衡、苻载等四人的合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杨衡条云:“(衡)天宝中,避地西来,与苻载、崔群(一本作李群)、李渤同隐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号‘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云月遣怀。”今人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将“四友”校正为杨衡、苻载、李元象、王简言,其同隐庐山时间校正为德宗建中元年(780)。四人中以杨衡之诗为最好,声韵奇拔,颇有特色,尤以“一一鹤声飞上天”句自负。后有中表盗其文章及第,衡盛怒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答曰:“此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犹可恕也。”(《唐摭言》卷二)

(吴小林)

【六窠】 中唐诗人窦叔向及其子常、牟、群、庠、巩的合称。六人均以诗名。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包融条曰:“夫人之于学,苦心难,既苦心,成业难;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尤难。历观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窠……”卷四窦叔向条曰:“(叔向)远振佳名,为文物冠冕。诗法谨严,又非常格。……五子常、牟、群、庠、巩,俱能诗,咄咄有跨灶之誉,当时羨之。”

(吴小林)

【五窠】 中唐诗人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兄弟五人的合称。五窠俱能诗,《窦氏联珠集》五卷,收五人诗各一卷。参见“六窠”。(吴小林)

【韦苏州体】 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歌体制风格。韦曾任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韦苏州体。”韦虽亦写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方面的诗篇,然最为世所传诵的是山水田园诗,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之一。为诗各体皆长,尤擅五古。唐白居易云:“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其诗学陶渊明,并熔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于一炉,风格以冲淡闲远,萧散清幽为主,同时亦有秾艳流丽的一面。唐司空图评韦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与李生论诗书》)。宋张戒谓其诗“闲淡简远”(《岁寒堂诗话》卷上)。明高棅说韦诗“雅淡”(《唐诗品汇总序》)。而徐俯则曰:“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唯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见吕本中《童蒙诗训》)明宋濂亦谓韦诗“一寄秾艳于简淡之中”(《答章秀才论诗书》)。(吴小林)

【柳子厚体】 中唐诗人柳宗元的诗歌体制风格。柳宗元字子厚,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柳子厚体。”其诗多抒写悲愤抑郁和离乡去国的情思,亦有讽刺政治弊病,反映人民疾苦,描写自然山水等方面的内容。体裁不拘一格,

诸体皆工,风格多样,或典雅雄奇,或质朴平淡,或欢快轻松,而以清峻沉郁为主。柳诗受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诗歌的较大影响。宋苏轼评柳诗云:“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又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严羽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诗评》)金元好问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论诗绝句三十首》自注)清姚莹诗曰:“史洁骚幽并有神,柳州高咏绝嶙峋。”(《后湖诗集·论诗绝句》) (吴小林)

【韦柳】 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的并称。两人诗歌题材、风格不尽相同,然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皆受到陶渊明、谢灵运诗歌的影响,韦应物擅长山水田园诗,柳宗元的山水诗亦有较高成就,韦诗风冲淡闲远,柳诗风格也有冲淡自然的一面,故后人往往并称之。宋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首先将韦应物、柳宗元合提。继而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宗元,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后“韦柳”之称渐行于世。论者且尝有韦、柳优劣之争。苏轼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此为柳胜于韦论。明王世贞曰:“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近体卑凡,尤不足道。”(《艺苑卮言》卷四)清王士禛云:“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又云:“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比苏州。”(《分甘馀话》卷三)此为韦胜于柳论。实则韦诗自然而若不经意,柳诗以构思精严取胜;韦诗淡而闲、淡而雅,而柳诗淡而清、淡而峭。二人各有千秋,各具所长。

(吴小林)

【韦柳体】 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韦柳体。”韦应物、柳宗元皆长于山水田园诗,风格均清澄淡远。苏轼曰:“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参见“韦柳”。

(吴小林)

【韦刘】 中唐诗人韦应物和刘长卿的并称。两人诗歌的题材、风格等有相似之处。韦擅长山水田园诗,诸体皆备,尤工五言诗,诗风闲淡自然。刘诗多写漂泊之感和山水之景,亦长于五言,曾自称“五言长城”,风格也有闲远清雅的一面。韦、刘之不同在于,前者精于五古,后者擅于五律,韦诗从高雅闲淡

为主外,风格多样,而刘诗冲淡、浑厚之作并陈。后人论诗常将二人并提或进行比较。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曰:“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

(吴小林)

【王韦】 盛唐诗人王维和中唐诗人韦应物的并称。两人诗歌题材、风格不尽相同,然皆继承陶渊明山水田园诗传统,擅长描写山水田园生活,诗风冲淡自然,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后人往往合提。唐司空图曰:“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与李生论诗书》)宋陈师道曰:“右丞、苏州,皆学于陶。”(《后山诗话》)清王士禛云:“又尝论五言,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带经堂诗话·综论门·体制类》) (吴小林)

【王孟韦柳】 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中唐诗人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四人诗歌题材、风格不尽相同。王维题材较广,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爱情友谊诗、送别纪行诗等皆有较高成就,诗风以清腴秀逸为主。孟浩然集中写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风格清旷淡远。韦应物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描写闲适情趣的诗兼而有之,诗风冲淡闲远。柳宗元主要抒发悲愤抑郁和离乡去国的情思,亦有描写自然山水等方面的内容,风格多样,较为突出的是清峻沉郁。然四人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皆受到陶渊明诗歌的影响,长于五言,擅写山水田园诗,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风格中均有冲淡自然的一面,故后人往往合称之。宋张戒云:“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岁寒堂诗话》卷上)清袁枚称王士禛“气少排奁”,“为王、孟、韦、柳则有馀,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随园诗话》)汪立名亦曾辑录王、孟、韦、柳四家诗编为《唐四家诗》。

(吴小林)

【唐四家】 指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因清汪立名编有《唐四家诗》,收辑王、孟、韦、柳四家诗,故称。四人皆擅写山水田园诗,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诗风亦有相似之处,均具自然淡远的特色。参见“王孟韦柳”。

(吴小林)

【陶韦】 东晋诗人陶渊明和中唐诗人韦应物的合称。韦极为敬慕推崇陶渊明,屡云“等陶辞小秩”(《澧上西斋寄诸友》),“慕陶真可庶”(《东郊》),作诗也“效陶体”,并在诗歌的题材、风格等方面受陶的影响,擅写山水田园诗,诗风闲远自然,颇能得陶诗寄至味于淡泊之真趣,只是醇厚朴茂处尚有不及,后人

往往将其与陶渊明并提。宋张戒谓韦应物“诗闲淡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岁寒堂诗话》卷上)。清翁方纲云:“(法式善)多蓄古今人集,阅览强记,而专为陶韦体。”(《陶庐杂录序》) (吴小林)

【韩昌黎体】 中唐诗人韩愈的诗歌体制风格。韩愈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韩昌黎体。”韩愈在中唐诗坛上独具一格,其诗避熟趋生,变态百出,境界狠重奇险,光怪陆离,笔力遒劲刚健,雄豪峭拔,语言尚异务新,搜奇用怪,且好押险韵,风格以雄放奇崛为主。在写法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运古文章法、句法入诗,多用虚词,好发议论,善于铺排渲染,常用赋体。体裁方面虽律绝亦有佳作,然尤擅古体。其不拘常格、雄健怪奇的诗风和散文化、议论化倾向,对中、晚唐诗,尤其对宋诗影响深远。唐司空图云:“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扶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集后》)宋蔡居厚云:“退之诗豪健奔放,自成一家。”(《蔡宽夫诗话》)张戒评曰:退之诗,大抵才气有馀,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态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岁寒堂诗话》卷上)清叶燮曰:“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对韩愈诗体,尤其“以文为诗”的特色历来评价不一。贬之者有之,如宋沈括云:“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陈师道亦说退之“以文为诗”“要非本色”(《后山诗话》)。褒之者有之,如吕惠卿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今人陈寅恪说韩愈“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论韩愈》)有褒有贬者亦有之,如陈之立曰:“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 (吴小林)

【孟东野体】 中唐诗人孟郊的诗歌体制风格。孟郊字东野,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孟东野体。”孟诗多写荒唐悲苦的事物,也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作品。擅长五言古诗,注意苦吟刻炼,构思精深,造语新奇,然格局较窄,亦有一些生涩粗硬之句。赞赏者有之,唐韩愈称:“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冢。”(《荐士》)又云:“神施鬼出,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近代陈衍说孟诗“复绝千古”(《石遗室诗话》)。贬斥者亦有

之,宋苏轼说读孟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蟛蜞,竟日嚼空螯”,“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读孟郊诗二首》)。严羽亦曰:“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沧浪诗话·诗评》)实际孟诗求新雕刻过分,不免有所弊端,然在当时诗坛自具一格,有偏至独胜之长,五古成就尤其突出。今人钱锺书云:“东野五古佳处,深语若平,巧语带朴,新语入古,幽语含淡。而心思雕刻,笔墨圭棱。”(《谈艺录》) (吴小林)

【韩孟】 中唐诗人韩愈和孟郊的并称。二人友善,经常联句唱和,互相推崇,韩说要“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并谓“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孟郊亦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韩、孟诗皆尚异务新,避熟趋生,风格怪奇瘦硬,为韩孟诗派的代表作家。其相异之处是韩在怪奇中透出雄放,境界阔大,而孟在怪奇中带有寒瘦,格局较小。后世论者往往并提。宋梅尧臣云:“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诗惊有唐。”(《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清刘熙载曰:“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艺概·诗概》)且好进行优劣比较,宋费衎谓:“自六朝诗人以来,古谈之风衰,流为绮靡,至唐为尤甚。退之一世豪杰而亦不能自脱于习俗。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梁谿漫志》卷七)清施补华曰:“孟东野奇杰之笔,万不及韩。”(《岷傭说诗》)而赵翼则云:“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瓠北诗话》卷三)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韩的诗歌创作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皆大于孟。

(吴小林)

【韩孟诗派】 中唐时期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韩门诗派。“孟郊、贾岛、张籍、王建、李贺、卢仝、欧阳詹、刘叉俱从韩愈游,谓之韩门诗派。”(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这里所举张籍、王建虽与韩愈交往,但诗风较接近元、白,欧阳詹则不以诗名,其他则是韩孟诗派的主要作家。韩孟诗派的主要作家大都是耿介孤直狂狷傲岸之上,生活经历有不少共同之处,困顿贫寒,命运乖舛,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老病孤愁常伴随着他们。失衡的心态造成他们的诗歌创作追求奇险怪异的共同倾向。韩孟诗派主张复古,提倡继承《诗经》、《离骚》的传统,声称“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孟郊《出东门》),“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诂。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荐士》),并推重陈子昂、李白、杜甫对诗风的改革。他们主张“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高轩过》),注重对审美客体进行更新更深刻的主观探求,对审美趣味、审美途径进行新的改造,反映在诗歌创作上

就是他们都具有尚奇好险,主观色彩浓厚的倾向。他们在诗歌艺术构思上最有特点,“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孟郊《赠郑夫子鲂》)。他在构思上或将天地间本来就雄阔奇丽的物象运于胸臆之中,展开奇幻的联想,创造出超时间、超空间、超现实的境界及意象来,使艺术表达更显得神奇雄崛,风云变幻。韩愈、李贺、卢仝等的艺术构思即属此类。或是吟诵微物,将琐屑的现实生活景象和自然界细微事物,与诗人主观上深刻的思索结合在一起,运思镌刻,创造出生新险峭的意象来,反映对人生世界的深切体验。孟郊、贾岛、刘叉等诗人即属此类。这派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也追求新奇变化。他们力图摆脱格律的束缚,抛开盛唐大发展的近体诗,舍弃盛唐诗浑融圆熟和谐隽永的韵致,专门作古体诗(除贾岛外),追求古朴拗折、瘦硬生新的风格。他们的诗趋向散文化,句式参差,常用虚词,语气节奏也无拘束,并用古文、赋的表达方式来作诗,使诗向非诗化发展。在诗歌语言方面,他们追求“字向纸上皆轩昂”(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的艺术效果,注重词语的新奇,下笔很重,硬语盘空。韩孟诗派的一些主要诗人都有“苦吟”的风尚,极力炼字炼句炼意,下苦功夫作诗,这也是继承了杜甫的创作风尚,并开宋代某些诗人闭门苦吟之先河。(王军)

【孟诗韩笔】指唐代孟郊的诗和韩愈的文。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之倡导者,所作文变骈为散,顺畅中见屈曲,明晓中显怪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争相师法,影响极大。孟郊是中唐诗坛颇有特色之诗人,风格清寒瘦硬,自树一帜,尤以五言诗著称于时。唐赵璘曰:“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因话录》卷三)(吴小林)

【韩柳】中唐诗文作家韩愈和柳宗元的并称。此多就其散文而言,唐杜牧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宋王禹偁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皆指其文。然亦有指其诗者,如宋姜夔曰:“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韩柳之诗雅出也。”(《白石道人诗说》)且论者好对二人之诗作比较,有的扬韩抑柳,如宋张戒云:“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岁寒堂诗话》卷上)有的扬柳抑韩,如宋刘克庄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后村先生大全集·竹溪诗》)实则韩喜用生词硬语,诗风以雄放奇险为

主,柳往往清辞丽句,风格以峻峭沉郁为主,两人各具特色,难分轩輊。苏轼曰:“柳子厚诗,……退之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明胡应麟曰:“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皆大家材具也。”(《诗薮》外编卷四)此等说法较为公允。(吴小林)

【杜韩】盛唐诗人杜甫和中唐诗人韩愈的并称。二人诗歌内容、风格及成就不尽相同,然韩追慕李、杜,尤尊杜,所作诗与杜甫有相似之处。他们皆对前人诗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又独辟蹊径,自成一派,诗法高古,穷态尽变,有议论化倾向,风格豪雄,体裁长于古体,均为唐诗之大家,开后来有宋一代诗风,尤为江西诗派所推崇,后世往往并提。宋张戒云:“苏黄门子由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岁寒堂诗话》卷上)清方东树曰:“读杜、韩两家,皆当以李习之论六经之语求之,乃见其全量本领作用。至其笔性选字,造语隶事,则各不同;而同于文法高古,奇恣变化,壮浪纵宕,横跨古今。”(《昭昧詹言》卷九)(吴小林)

【杜诗韩笔】指唐代杜甫的诗和韩愈的文。二人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后人视作诗和文的集大成者,其作品被尊为诗文之典范。宋苏轼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秦观曰:“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唐杜牧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读韩杜集》)(吴小林)

【三杨】①中唐诗人杨凭、杨凝、杨凌兄弟三人的合称。《新唐书·杨凭传》云:“(凭)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②明永乐至成化年间诗人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的合称。《明史·杨士奇杨荣杨溥传赞》云:“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三人皆先后官至大学士,为当时的台阁重臣。所作多为应制和应酬、题赠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缺乏现实内容和真切感情,风格雍容典雅,柔弱冗沓,一时为人竞相仿效,被称为“台阁体”,风行达百年左右。参见“台阁体”。(吴小林)

【二包】初唐诗人包融二子包何、包佶的并称。他们在中唐大历、贞元之际以诗著名于时。唐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有唐故秘书监丹阳公包氏讳佶,字幼正。……洎公与兄起居何?又世其业,竞爽于天宝之后,一动一静,必形于文辞,由是议者称为‘二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包融诗时称:“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大历起居舍

人。”又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吴小林）

【三包】 初唐诗人包融及中唐诗人、融二子包何、包佶的合称。包融以诗得名于神龙及开元前期，融子包何、包佶在大历、贞元之际亦以诗著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曰：包融“工于诗。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吴小林）

【贾浪仙体】 中唐诗人贾岛的诗歌体制风格。贾岛字浪仙，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贾浪仙体。”岛诗擅长五律，以苦吟著称，自谓“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虽亦有颇具气势之作和传世佳句，然大部分诗篇题材较狭，格局偏窄，多描写荒寒幽峭的景象，抒发悲愁孤寂的感情，造语生新，风格奇僻孤峭，被韩愈形容为：“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元窗。”（《送无本师归范阳》）其诗注重炼句，追求出人意表的效果，而忽视全篇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畅达。唐司空图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与李生论诗书》）清许印芳评岛之诗曰：“生李、杜之后，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诗法萃编》卷六）贾岛诗在晚唐形成流派，对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等颇有影响。（吴小林）

【郊岛】 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并称。孟为贾之前辈诗人，颇受贾的推崇，然二人落魄不遇，一生穷困的遭际相同，且均受到韩愈的奖掖赏识，韩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翳”（《荐士》），谓贾岛诗“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郊、岛诗风相似，皆属韩孟诗派，故论者往往并提。宋欧阳修曰：“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提出“郊寒岛瘦”之说。王远亦云：“浪仙以诗鸣世，杰出于贞元、元和文章极盛之后。孟郊死，为之不已。其诗与郊分镳并驰。”（《贾长江集后序》）两人诗歌的共同特点是诗风清奇悲愁，孤峭枯寂，讲究苦吟推敲，造语刻炼，格局比较狭小。他们的异处为孟诗接触社会现实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较贾为多，贾对世事甚冷淡，诗作缺少现实气息；孟诗擅长五古，不作律诗，贾诗以五律为主，较少古体。后世好对郊、岛作优劣比较。清代潘德舆曰：“郊岛并称，岛非郊匹。”（《养一斋诗话》）施补华亦云：“孟郊、贾岛并称，谓之郊寒岛瘦。然贾万不及孟，孟坚贾脆，孟深贾浅故也。”（《岷傭说诗》）此为扬孟抑贾之论，然近人中亦有扬贾抑孟者，评曰：“孟专心于古诗之苦吟，不随时俗作律诗，此则昧于文学之有时间性，而囿于复古谬见之深也。而岛则不然，工于五言律，……此其所以为晚唐诗之先

导，而为孟所不及也与！”（章泰笙《贾岛研究》）公允说法应为孟郊诗歌的总体成就高于贾岛，而贾岛对后代的影响大于孟郊，后贾与姚合形成晚唐诗派，为宋代“九僧”、“四灵”、江湖派，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所推崇效法。（吴小林）

【郊寒岛瘦】 又作“岛瘦郊寒”，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诗风。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故称。早在宋初，欧阳修即曰：“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至苏轼正式提出此评语：“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后朱熹则作“岛瘦郊寒”：“君诗高处古无诗，岛瘦郊寒诂足差。”（《次韵谢刘仲行惠荀》）苏轼之论一出，遂成郊、岛诗风之定评，且往往加以疵病。如宋严羽云：“李杜数公，如金鸂鶒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沧浪诗话·诗评》）张表臣曰：“（诗）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珊瑚钩诗话》卷一）然亦有持异议者，如清人潘德舆认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参见“郊岛”。（吴小林）

【姚贾】 中唐诗人姚合和贾岛的并称。二人友善，诗歌风格体制亦相似，皆好锤炼苦吟，擅作五律，多描写荒寒幽峭的景象，抒发悲愁孤寂的感情，诗风清奇孤峭，惟合较岛略为平浅。后世论者往往合称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二人均归入“清奇雅正”目中，姚合为“入室”，贾岛为“升堂”。元辛文房则明确提出“姚贾”之称：“（姚）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唐才子传》卷六）姚、贾诗对宋“四灵”及江湖派影响甚深，“四灵”之一赵师秀（字紫芝）曾选姚、贾二人诗编为《二妙集》。（吴小林）

【贾喻】 中唐诗人贾岛和喻龟的并称。唐末顾云《唐风集序》评杜荀鹤诗云：“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谓“专以诗称”有贾、喻。喻龟曾与贾岛、姚合等人交往唱和，诗亦学贾岛。岛注重锤炼苦吟，诗风清奇幽峭，对后世影响甚大。龟诗亦讲苦吟，“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方干《赠喻龟》），风格也有与贾岛诗相似处，然成就与影响皆不及贾岛。元辛文房谓“晚岁变雅，龟亦风靡，专工小巧，高古之气扫地”（《唐才子传》卷七）。

（吴小林）

【苦吟派】 中唐时期以孟郊、贾岛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这一诗派的作家皆属中唐韩孟诗派。孟郊、贾岛、李贺等诗人继承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尚,着意于文词的锻炼推敲。像孟郊诗中所言“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夜感自遣》)。贾岛亦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他作诗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揣摩。所作《宿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对“推敲”二字选择锤炼以至痴迷,更能表现其苦吟风尚。李贺亦是苦吟之风的代表人物,其作诗常呕心沥血。这派诗人尚奇好险,非常看重诗歌的构思、词语、句式、意象等的新奇、深刻和主观创造性。这一派诗人对宋代苦吟诗人影响甚大。参见“韩孟诗派”。 (王军)

【卢仝体】 中唐诗人卢仝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卢仝体。”《诗评》又云:“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卢仝自号玉川子,其诗好翻新易奇,想象诡诞,常用冷僻字和散文句法,风格怪奇豪放。韩愈爱其诗,称之为“怪辞惊众”(《寄卢仝》),并改其《月蚀》诗而为《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宋代刘克庄谓“卢仝、刘叉以怪名家”(《后村诗话》续集卷二)。韩愈评卢仝诗曰:“其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玉川子诗外集序》)朱熹则曰:“诗须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朱子语类》卷一四。)然亦有疵病其诗怪僻者,如明王世贞斥其《月蚀》为“病热人呓语”(《艺苑卮言》卷四)。 (吴小林)

【卢马】 中唐诗人卢仝和马异的并称。卢仝诗造语生新僻涩,风格怪奇豪放,马异诗亦词调怪涩枯瘠,卢遂引马为同调,与之交往,并作《与马异结交诗》云:“忽闻空中唤马异,马异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今日仝自同,异不异,是谓仝不往兮异不至。……”马亦有诗酬答。后世论者往往并提。明王世贞曰:“前则任华,后者卢仝、马异,皆乞儿唱长短急口歌博酒食者。”(《艺苑卮言》卷四)胡应麟云:“唐诗之拙怪者咸以卢玉川、马河南,开元间任华已先之矣。”又云:“卢仝、马异,并出一时,其诗体酷类,已为奇绝,其名天生的对,尤为奇也。”(《诗薮》外编卷四)

(吴小林)

【咸通十哲】 晚唐懿宗咸通时期诗人张乔、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蟪、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等十二人的合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云:“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复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

张蟪、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〇“张乔”条所记略同,唯时期“咸通中”与《唐摭言》所言“咸通末”异,而确年均未指明。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即称之为“咸通十哲”。“十哲”取孔子十哲弟子之意,虽十二人,仍称“十哲”。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〇“张乔”条以意删去温宪、李昌符二人,变十二人为十人,误。 (吴小林)

【芳林十哲】 晚唐诗人秦韬玉、郭薰等人的合称。芳林,门名,该等诗人皆由此入内侍省交结宦官,故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条云:“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十哲”人名诸书记载有异。《唐摭言》所记“十哲”中之八人为:“沈云翔、林缙(后改名绚)、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秦韬玉、郭薰。宋王说《唐语林》卷四“企羨”门云:“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宦官交游,若刘煜、任江泊、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所记与此同。《唐语林》卷三“方正”门又云:“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薰、罗虬皆其徒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郑谷”条则称郑谷、许棠、张乔等人为“芳林十哲”,误。郑谷等人实为“咸通十哲”,参见该条。 (吴小林)

【九华四俊】 晚唐诗人张乔、许棠、张蟪、周繇的合称。张乔尝隐居九华山(在今安徽青阳),与许棠、张蟪、周繇被时人称为“九华四俊”。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引《永乐大典》云:“《池州府志》:‘张乔字伯迁。时李频以参军主试,乔及许棠、张蟪、周繇皆华人,时号九华四俊。’”“皆华人”三字不确,乔实为池州(今安徽贵池)人,棠为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蟪族望清河(今属河北),繇才系池州青阳即所谓“华人”。 (吴小林)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而兴起的诗歌创作潮流。新乐府之名源于白居易,专指“即事名篇”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诗歌。唐代中叶,顾况、李绅、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诗人提倡并努力从事新乐府诗创作,一时篇章迭起,蔚为大观。并形成了诗歌创作流派,即被称为“新乐府诗派”。由于该派以元稹、白居易为首,故又称“元白诗派”。中唐新乐府是乐府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两汉时期乐府民歌开创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建安时期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继承其传统,发展为“借古题写时事”,以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生活,直到唐代杜甫、元结开创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因事立题”的新题乐府诗创作,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新的发展。中唐前期

顾况师承杜甫、元结新题乐府的写法,学习《诗经》创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仿《诗经·小序》的形式,开创“首章标其目”的形式。中唐贞元末及元和年间,新题乐府诗更盛。李绅首先把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区分开,并创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随后“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接着白居易续其后依其例写成新题乐府五十首,并定名为“新乐府”,把新乐府运动推向高潮。在此之际,白居易、元稹还创作了其他的新乐府诗。此外,张籍、王建也都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在这派诗人中,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艺术成就最高,虽然他写作新乐府诗稍后于李、元、张、王诸人,但人们一般还是把白居易看作这一诗派的代表作家。新乐府诗人还提出了较完整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元稹《乐府古题序》等文章较集中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指出诗歌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提倡诗歌创作讽谕时事政治,同时反对“嘲风雪,弄花草”无病呻吟的诗风。他们诗歌理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把文学的功能看得过于狭窄,并以此为标准批评李白,更有失公允。但是他们的理论对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中唐新乐府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晚唐及宋乃至明清学白居易者大有人在。

(王军)

【白乐天体】 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体制风格。白居易字乐天,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白乐天体。”白的诗论提倡反映时事,进行美刺比兴,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功利目的。所作诗现实主义色彩鲜明,基本风格为平易通俗,质朴浅切。宋王安石云:“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引)甚至有白居易作诗令老嫗都解的传说(见惠洪《冷斋夜话》)。对此种诗风有人评价甚高。刘禹锡赞为“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清薛雪评白诗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赵翼谓白诗“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瓯北诗话》卷四)。刘熙载亦云:“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诗概》)然后世亦有人对白居易诗中太露太尽的弊病颇加訾议。明陆时雍谓白诗“意必尽言,言必尽兴”(《诗镜总论》)。唐司空图说他“力勍而气孱”(《与王驾评诗书》)。白居易各类诗歌的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讽谕诗多为反映民生疾苦和针砭时弊之作,质朴而激切;闲适诗主要抒写作者的闲情逸志,恬淡而自然;感伤诗为随感遇之叹咏,诗风委婉流丽;杂律诗中一些抒情写景的小

诗,多有清新隽永之风,而一部分长篇排律,则铺张富赡。《诗苑类格》云:“白乐天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诗人玉屑》卷一六引)。

(吴小林)

【元白】 ①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之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称:“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唱,故号元白。”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自云:“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稹、白居易二人出身贫寒,曾同登拔萃科,后又同为谏官,交往甚笃,而且经常以诗酬答唱和,“以诗相戒”,“以诗相慰”,“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九书》)。他们对于诗歌创作时常互相切磋,互有影响。二人文学主张相近似,都是新乐府诗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谕作用,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并创作大量的新乐府诗,反映社会生活民生疾苦,且诗歌风格坦易朴素,通俗易懂,十分一致。他们还创作了一些篇幅宏伟的长篇叙事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在诗坛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元、白还竞相创作长篇排律,这种长篇千字排律被称作“元和格”。参见“新乐府运动”、“元和格”。②金诗人元好问、白君举的并称。清赵翼《陔馀丛考·两元白》条:“金末遗山为一代文人之冠,其时有白君举,字寓斋,隰州人,以进士官岐山令,诗名与遗山相颉颃。元、白本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相往来,时人亦谓之‘元白’。”元好问为金最大的诗人,白君举的诗歌成就远不能和其相比。

(王军)

【元白体】 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体制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元白体。”元稹、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互相酬唱,相互切磋,共同创作长篇七言歌行,竞相创作长篇排律,创作倾向一致,诗风相近,其平易通俗的风格影响深远,故后世称为“元白体”。参见“新乐府运动”、“元白”、“元和格”、“长庆体”。

(王军)

【元白诗派】 中唐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诗歌流派。见“新乐府运动”。

(吴小林)

【元轻白俗】 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风。轻指轻佻,俗指通俗。早在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有类似的说法:“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至宋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正式提出此评语:“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独以诗鸣,天锡雄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此处主要是苏轼自况,并非有意贬斥元白。后来有的论者引用此语时,才专门加以疵病。如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

云：“(诗)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吴小林）

【李杜韩白】 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和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的合称。四人诗歌内容、风格不同，成就、地位亦有差异，然均是唐诗之大家，有的论者还分别以李、杜和韩、白为盛唐诗和中唐诗之最，对以后诗歌，尤其宋诗影响甚深，后世往往并提。清何焯云：“诗至明远，发露无馀，李、杜、韩、白，皆出此也。”（《义门读书记》）（吴小林）

【韩孟元白】 中唐诗人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的合称。四人在中唐诗坛皆取得出色成就，且作诗均富艺术个性，分别为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表现出不同的诗风。元、白崇尚功利，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注重反映现实生活，风格以平易通俗为主；韩、孟崇尚怪奇之美，强调抒发主观感情，风格险怪瘦硬。后世有的论者高度评价韩、孟的变怪百出，独树一帜，有的论者则对元、白的平易大加肯定。清赵翼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又曰：“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瓠北诗话》卷四）实则韩、孟与元、白各有所长，难分轩輊。（吴小林）

【刘白】 中唐诗人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并称。二人在诗歌创作上皆取得卓越成就，在当时齐名，互相均极推崇对方。刘称赞白诗：“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又说：“吟君洛中作，精绝百炼金。”（《乐天寄洛下新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白称刘为“诗豪”，并说：“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生子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且刘白交往甚密，友谊很深，经常唱和诗歌，其唱和之作结集为《刘白唱和集》。刘逝世后，白作诗云：“四海声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新唐书·白居易传》云：“（白）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吴小林）

【刘柳】 中唐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并称。二人同为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政治革新集团的重要骨干，改革失败后同时遭贬，十年后又同改远州刺史。《新唐书·刘禹锡传》云：“（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时号二王刘柳。”刘、柳交往甚密，友谊极深，在诗艺上经常唱酬切磋，皆取得很高成就，后世论者往往并提，且好作比较。宋代宋祁《宋

景文笔记》引李淑之语以为“唐称刘柳，刘宜在柳之上”。清方东树则曰：“柳子厚才又大于梦得，然境地得失，与梦得相似；至其五言，则妙绝古今，非刘所及矣。”（《昭昧詹言》卷一八）实则两人诗歌浸淫骚雅，厚于性情，富于味外之味，是其同处；刘诗风格豪雄流丽，柳之诗风清峻沉郁，则是其异处。明胡应麟曰：“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皆大家材具也。”（《诗薮》外编卷四）所评较为公允。（吴小林）

【元和体】 ①指中唐元和年间诗坛上流行诗风的总称。唐李肇《国史补》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元和体。”就此可知元和体是对元和诗坛中流派众多诗歌创作向风格多样化发展的概括。②指中唐元稹、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遭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新唐书·元稹传》云：“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为‘元和体’”。由此可见中唐时人们亦以元白诗风为元和体，学诗之人争相模仿，亦自谓是元和体诗。参见“元和格”。（王军）

【元和格】 指中唐元稹、白居易创作的长篇排律诗体。元稹、白居易互相唱和，竞相创制千字长律，以争胜出奇，这种诗风被称作元和格。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亦云：“居易雅能为诗，……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王军）

【长庆体】 指中唐元稹、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性七言歌行诗体。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皆为篇幅宏伟的长篇歌行，对后世影响甚大。又白居易、元稹诗文集名为《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曰：“此篇与《琵琶行》，一如壮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耳。”清人亦以七言歌行长篇为长庆体。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七言古学长庆

体。”

(王军)

【三俊】 中唐诗人李绅、李德裕、元稹的合称。《旧唐书·李绅传》云：“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新唐书·李绅传》云：“穆宗召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时，号‘三俊’。”

(吴小林)

【张王】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的并称。张、王早年曾同在魏州从师求学，研习写诗，张籍《逢王建有赠》云：“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经今三十余年事，却说还同作日时。”两人友谊颇深，过从甚密，唱答尤多。他们年岁较元、白为长，皆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骨干，均擅作乐府诗，且都占题、新题参用，世称“张王乐府”。后人论乐府诗往往并提。宋魏泰云：“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临汉隐居诗话》）元辛文房曰：“（张籍）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自成机轴，绝世独立。”（《唐才子传》卷五）参见“张王乐府”。

(吴小林)

【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二人皆擅作乐府诗，既用古题，又创新题。所写诗篇，均能继承并发展《诗经》、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尖锐地针砭时弊，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 and 不幸遭遇，体裁多用短篇七言歌行，风格通俗明晓，平易浅近，世称“张王乐府”。宋许颢云：“张籍、王建乐府宫词皆杰出。”（《彦周诗话》）曾季狸云：“唐人乐府唯张籍、王建古质。”（《艇斋诗话》）明胡应麟称：“元白长篇，张王乐府。”（《诗薮》内编卷三）清翁方纲曰：“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后人亦有张、王优劣之论。有的认为张胜于王，如元吴师道引时天彝语曰：“建乐府固仿文昌，然文昌姿态横生，化俗为雅，建则从俗而已。”（《吴礼部诗话》）宋周紫芝云：“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竹坡诗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籍以乐府鸣一时，其骨体突出王建上，后人概称张王，未为笃论。”也有的以为王胜于张。实则王诗题材较广，描写细致含蓄，语言浅俗明晰；张诗抒发爱国感情较王更为突出，语言比较典型，可谓各有所长。

(吴小林)

【张籍王建体】 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乐府诗的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张籍王建体。”自注：“谓乐府之体同也。”《诗评》又云：“张籍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参见“张王乐府”。

(吴小林)

【李长吉体】 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体制风格。李贺字长吉，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

而论，则有……李长吉体。”李诗除揭露社会弊病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愤激外，亦有不少写神仙鬼魅的题材内容。上承《楚辞》、南朝《神弦歌》的传统，并受李白、韩愈等人诗歌的影响，擅长古体，作诗呕心沥血，苦吟推敲，表现出想象奇特，构思奇妙，语言奇诡，色彩瑰丽的特色，风格奇崛幽峭，秾丽凄清，某些诗亦有艰涩之弊。唐杜牧评其诗曰：“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李贺集序》）宋陆游说李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范晔《对床夜语》引）。严羽云：“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沧浪诗话·诗评》）张表臣则曰：“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珊瑚钩诗话》卷一）

(吴小林)

【三舍人】 晚唐诗人令狐楚、王涯、张仲素的合称。三人同为中书舍人，长于绝句，故称。其诗号“三舍人诗”，后人曾编为《三舍人集》。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二云：“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五言七言绝句共作一集，号《三舍人集》。”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云：“令狐楚与王涯、张仲素同时为中书省舍人，其诗长于绝句，号‘三舍人诗’，同为一集。”

(吴小林)

【晚唐体】 晚唐时期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晚唐体。”体现“晚唐体”的诗人主要是开成至唐亡七十余年间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李群玉、韦庄、吴融、韩偓、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他们身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大唐帝国崩溃前夕，所作诗多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情调。艺术上除杜牧俊爽豪健，李商隐绮丽精工，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朴素流畅，各具特色，成就较高外，其他诗人则往往体格卑下，气韵衰竭，气骨不立，伤于浅露局促，轻巧纤弱，正如《诗史》所云：“晚唐人诗多少巧，无《风》、《骚》气味。”俞文豹《吹剑录》亦谓：晚唐体“局促于一题，拘变于声律，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引）。“晚唐体”对后代影响甚大，从宋代的“四灵”诗人、“江湖派”直至近代的“晚唐诗派”，均推尊晚唐诸诗人的诗歌技巧及特色。

(吴小林)

【杜牧之体】 晚唐诗人杜牧的诗歌体制风格。杜牧字牧之，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杜牧之体。”其诗诸体兼擅，且各具特色：古体峭健苍凉，律诗婉曲跌宕，七言绝句精炼含蓄，顿挫抑扬，且富有诗情画意，尤为人所称道。牧之诗往往在拗折峻峭中，饶有风华流美之致，风格俊爽豪健，清新隽永。明胡应麟评其诗曰：“俊爽。”（《诗薮》）清刘熙载谓其诗云：“雄姿英发。”（《艺概·

诗概》)明胡震亨曰:“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特拗峭,虽云矫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唐音癸签》)清李调元曰:“杜牧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李调元诗话》)所评皆颇为中肯。(吴小林)

【李商隐体】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李商隐体,即西昆体也”。此为“李商隐体”名称之出处,其中把“李商隐体”与“西昆体”混而为一不确,因李虽为宋初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所宗,但当时并无“西昆”之目,且李商隐诗亦与西昆体有别。李以政治抒情诗、咏史诗、爱情诗、写景咏物诗为主要题材内容。所作诗感情凄婉沉绵,意境隐微幽美,工于比兴,长于用典,刻画精细,寄托遥深,富于朦胧之美和象征暗示色彩,语言绮丽,韵律铿锵,风格深婉含蓄,富丽精工。诗体各体皆工,尤以七律为长。李在唐诗中独具一格,对抒情技巧的发展贡献良多。宋杨亿谓李商隐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见葛立方《韵语阳秋》)。清朱鹤龄称李诗“沉博绝丽”(《李义山诗集笺注序》)。翁方纲称李诗“微婉顿挫”(《石洲诗话》卷二)。刘熙载评其诗曰“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评其诗曰“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其诗雕饰太甚和比兴过于深隐而流于浮砌晦涩的弊病亦为人所讥评,如宋敖陶孙曰:“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敖器之诗评》)清方东树谓李诗“藻饰太甚,则比兴隐而不见矣”(《昭昧詹言》卷一九)。

(吴小林)

【玉谿生体】 即“李商隐体”,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体制风格。李号玉谿生,故称。见“李商隐体”。

(吴小林)

【小李杜】 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的并称。二人生活在同时,且皆为独具一格的杰出诗人,后人往往并提。明胡应麟云:“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清吴锡麒曰:“义山、牧之,世亦以李杜并称。”因与盛唐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的并称“李杜”相别,遂称“小李杜”。清薛雪曰:“筹笔驿‘笔’字,不可实作笔墨之笔用。唐人如杜牧之‘挥毫胜负知’,李玉谿之‘徒令上将挥神笔’,皆实作笔墨之笔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张,况他人乎。”(《一瓢诗话》)其诗有相似之处,如均在政治抒情诗和咏史诗方面有较高成就,诗作的感伤情调较浓,皆于几乎难以为继的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另创新格。然二人相异之处更甚。杜以七绝为长,富有诗情画意,风格俊爽豪健,清新隽永;李以七律见胜,工于比兴和用典,诗风深婉含

蓄,富丽精工。清刘熙载云:“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诗概》) (吴小林)

【二李】 唐代诗人李白和李贺的合称。元杨维桢《赵氏诗录序》云:“风、雅而降为骚,而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痺,面目不鄙。”二人同为唐代著名诗人,皆受到《楚辞》、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的影响,为诗想象奇特,夸张大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且均喜写古体,少作律诗。其相异处为,李白有较多的游仙诗,李贺好写鬼魅的题材和阴森可怖的景物,白诗风雄放而飘逸,贺诗则奇崛中带有幽怪冷峭的特色,故《文献通考·经籍六十九》载:“宋景文(宋祁)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白诗语言自然明净,清丽秀美,贺作诗锤炼推敲,呕心沥血,语言奇诡生新,宋朱熹曰:‘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吴小林)

【三李】 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合称。古代有将三人联系起来评论的,如元方回《杂言》诗云:“人言太白豪,其诗丽以富。乐府信皆尔,一扫梁陈腐。徐篇细读之,要自有朴处。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丽句。亦焉用玉溪,纂组失真趣。……”(转引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三)而明确提出“三李”者,则始自今人。三人同为唐代著名诗人,皆受到《楚辞》、六朝诗歌的影响,为诗想象丰富,感情浓厚,擅用比兴,词采华茂,极富个性特征。其不同处在于:诗风白豪放飘逸,贺奇崛幽峭,商隐绮丽精工;语言白自然秀美,贺奇诡生新,商隐含蓄深曲,可谓各具特色,各擅胜场。然李白诗歌的总体成就更高,对后代的影响更大。(吴小林)

【香奁体】 又称“艳体”,晚唐诗人《香奁集》所代表及后之仿效者所表现的一种诗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又有所谓……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该类诗歌源自六朝宫体,主要写男女之情和妇女的服饰体态,并由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爱、狎邪生活,多香软之辞,风格绮靡纤弱。后世的效慕者亦有称己诗为“香奁体”的,如宋人叶茵《顺适堂吟稿》有几首以闺情为题材的七绝,就题名“香奁体”。参见“韩偓”及“香奁集”。

(吴小林)

【艳体】 见“香奁体”。

【温李】 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二人诗皆受六朝诗人和李贺的影响,色彩秾艳,语言绮丽,后人往往并称之为。唐裴庭裕云:“(温)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于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新唐书·温庭筠传》)云:“(温)工

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论者且好比较二人的优劣。《旧唐书·文苑传》认为“文思清丽,庭筠过之”。宋刘克庄曰:“温、李二人记览精博,才思横逸,其艳丽者类徐、庾,其切近者类姚、贾。义山之作尤锻炼精粹,幽微探索,不可草草看。”(《后村诗话》卷四)明陆时雍亦曰:“李商隐丽色闲情,雅道虽漓,亦一时之胜。温飞卿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知指适。”(《诗镜总论》)李在讽谕时政之切近以及诗意之深婉、词语之精粹诸方面都过于温,其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皆大于温。(吴小林)

【杜荀鹤体】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杜荀鹤体。”其诗多为律、绝。其中表现山林寂静境界,抒发个人身世之感,寒瘦苦吟的作品占大部分。亦写有被宋人说成“宫词为唐第一”(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的《春宫怨》。而更为著名的则是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风格平易通俗,清新爽健的诗篇。有人对其诗评价甚高,如其友顾云称他“信诗家之雄杰者”(《杜荀鹤文集序》)。元辛文房评其诗曰:“变俗为雅,极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唐才子传》卷九)然亦有论者对其诗颇为不满,如《幕府燕闲录》云:“杜荀鹤诗鄙俚近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引)清翁方纲曰:“杜荀鹤至令严沧浪目为一体,亦殊浅易。”(《石洲诗话》卷二)还有的对严羽列杜荀鹤诗为一体提出异议,清陈仅《竹林答问》云:“杜荀鹤不足列一体,而皮陆松陵一体似应增入。”(吴小林)

【皮陆】晚唐诗文作者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并称。二人友善,时相唱和,诗风相近,齐名于世,故称。宋王禹偁《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云:“前不见刘白,后不见皮陆。”他们不少诗均继承中唐新乐府运动传统,揭露社会弊病,同情人民疾苦,较富现实主义精神,风格朴素流畅。然另一部分收在合编之《松陵集》中的唱和之作,往往险怪僻涩,近似文字游戏。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四曰:“龟蒙与皮日休唱和,另开僻涩一体。”他们的小品文,皆为愤世嫉俗之作,富有讽刺特色和批判精神,鲁迅称之为“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吴小林)

【皮陆体】指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在《松陵集》中所表现出来的诗歌体制风格。《松陵集》为咸通十年(869)皮日休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时,与吴中名士陆龟蒙等人唱和酬答的诗集。集中之诗注重字句的推敲锤炼,讲究章法的排比铺陈,并

追求奇崛险怪的风格,有的甚或近似文字游戏,被后人视为诗中一体。清沈德潜云:“龟蒙与皮日休唱和,另开僻涩一体。”(《唐诗别裁》卷四)陈仅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杜荀鹤体”提出异议曰:“杜荀鹤不足一体,而皮陆松陵一体似应增入。”(《竹林答问》)参见“皮陆”。(吴小林)

【二陶】晚唐诗人陈陶、雍陶的并称。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云:“陈、雍二陶,薛逢,崔塗,皆慕为组织,百菽一豆,时或见之。”二人皆工诗,然特点各异。陈诗多写神仙之想和王霸之说,亦有抒发征夫思妇之苦的作品,尤以《陇西行》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二句为历来所传诵,诗风平淡。雍陶多游历写景之作,风格清婉。(吴小林)

【三罗】晚唐诗人罗隐、罗虬、罗邺的合称。三人皆有诗名,时称“三罗”。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云:“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云:“邺尤长律诗,时宗人隐、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三罗’。隐雄丽而坦率,邺清致而联绵,虬则区区而已。”(吴小林)

【二曹】晚唐诗人曹邺和曹唐的合称。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云:“三刘二曹,如负版升高,竭智毕力,要自有限。”二人均为桂州人(邺是桂州阳朔即今广西阳朔人,唐是桂州临桂即今广西桂林人),同在宣宗大中年间(847—858)举进士,皆善诗,后人曾编为《二曹诗集》。明蒋冕《二曹诗》又跋云:“邺元、尧宾二曹公诗,在唐宋时尝显矣。”二曹诗歌特点有别,邺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见长,诗风平易质朴,唐以游仙诗著称,风格瑰奇绚丽。(吴小林)

【宋初诗歌革新运动】北宋初年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诗风的诗歌革新运动。其先驱者有王禹偁等人,重要骨干是苏舜卿、梅尧臣,领袖人物为欧阳修。宋王朝确立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社会呈现安定繁荣的景象,许多贵族官僚征歌逐舞,吟风弄月,唐末、五代以来的浮靡诗风得到发展,遂导致西昆体的出现。而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宋立国不久便滋生出各种弊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内忧外患越益严重,部分富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提倡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崇尚清新朴素的诗风,诗歌革新运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率先举起诗歌革新大旗者,为稍早于西昆派的王禹偁,他抨击宋初的绮靡诗风,慨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无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标举学习杜甫、白居易之诗,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自贺》),所作诗歌较富现实内容,风格平易

自然。西崑体出现后,石介等人竭力反对雕琢浮华之风,猛烈攻击西崑派代表人物杨亿的“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怪说》中)。然王虽颇有成就,却影响不大,石则重道轻文,无甚创作业绩,均未有效地遏制颓靡诗风。及至与石介同时或稍后的苏舜卿、梅尧臣、欧阳修登上诗坛,诗歌革新遂进入新的阶段。他们明确地反对浮靡诗风,苏舜卿不满以藻丽为胜(《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批评“尔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谄谀,引古称辩雄。经营惟切偶,荣利因被蒙”的不良习气(《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欧阳修抨击西崑诗风,指出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崑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六一诗话》)。他们推崇李白、杜甫、韩愈等人诗作,提倡继承风雅传统,触及现实,有感而发,梅强调“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同上),欧主张“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诗本义·本末论》),提出“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风尚,讲究诗歌的生动含蓄,意新语工,梅一再讲“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苏提出“雄豪尚馀柔,淡泊忽忘言”(《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欧称赞李白的“天才自放”(《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认为苏舜卿的“以超迈横绝为奇”和梅尧臣的“以深远闲淡为意”是“各极其长”,并大力肯定梅的如下说法:“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六一诗话》)他们所作诗具有较强的现实内容,苏的《庆州败》,梅的《田家语》、《汝坟贫女》、《陶者》,欧的《食糟民》、《边户》等均是其代表作,亦有不少诗善于抒写个人感受,苏的《淮中晚泊犊头》,梅的《闻欧阳永叔谪夷陵》,欧的《戏答元珍》、《黄溪夜泊》等皆是,诗风清新自然,朴素流畅,且具议论化、散文化倾向,初步体现出宋诗的特色。欧阳修等人诗歌主张明确,创作成就卓异,欧又是北宋文坛领袖,影响深广,遂使西崑诗风衰歇,诗歌革新取得成功,为以后宋诗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清宋荦认为苏舜卿“挽扬、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苏子美文集序》)。南宋刘克庄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诗话》)。清叶燮指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卿二人。”(《原诗》外篇下)明张綖曰:“杨、刘诸公倡和《西崑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

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刊西崑诗集序》)刘克庄云:“杨、刘又专为崑体,故优人有捋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江西诗派序》)皆对其在诗歌革新中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吴小林)

【西崑派】 宋初的诗歌流派。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间,杨亿等奉命于内廷藏书的秘阁中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在修书之余,所作酬唱诗篇甚多,由杨仁哀聚成集,根据西方崑崙群玉之山为古代帝王藏书之地的传说,名之为《西崑酬唱集》,该派由此得名。宋初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呈现繁荣景象,贵族官僚征歌逐舞,诗酒唱和,遂造成艳丽诗风获得发展之土壤,而自唐末以来影响较大的宗白居易诗的一派和宗贾岛、姚合的一派,或平易通俗但有浅薄轻率之弊,或清幽精工然有枯寂狭窄之病,均引起不少有识者之不满,于是标举李商隐,提倡艳丽之风的西崑派乘时而起。该派领袖人物为杨亿、刘筠、钱惟演,成员包括《西崑酬唱集》中的作者和争相仿效的后进学子。其创作主张主要体现在杨亿所作《西崑酬唱集序》中:“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提倡雕章丽句,模仿前作。杨亿还说李商隐诗“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皇朝事实类苑》引),肯定李诗的含蓄深邃。然该派学李商隐未得其精神,仅学些皮毛,只是因袭李诗的形式技巧,刻意模仿李诗的题目、词语和典故。所作诗内容比较贫乏狭窄,主要写内廷侍臣的优游生活和日常琐事。不少作品缺乏真情实感,只是艳丽词藻的杂乱堆砌,陈旧典故的重新编排而已,如集中的《泪》、《梨》、《柳絮》、《直夜》、《夜宴》、《禁中庭树》等均是。该派诗造成宋初绮靡浮华诗风的弥漫,“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答蔡君谟》),风靡达数十年之久。其模仿李商隐诗句之习曾遭人讥嘲:“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崑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扯至此。’闻者大噱。”(《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引《古今诗话》)石介抨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怪说》中)。欧阳修倡导的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亦以该派的浮艳诗风为挾伐对象。然西崑派也有一些内容具积极意义的讽谕之作,如

杨亿《汉武》、《南朝》，刘筠《汉武》等，某些艺术技巧，如音韵和谐、辞藻丰美，文字精巧等亦有可取之处，对改变五代以来诗风起有益的作用。田况《儒林公议》指出西昆诗“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该派诗“音节铿锵，词采艳丽”，“绮织工致，锻炼精警之处，终不可磨灭”，所论均有一定合理性。其诗对后来亦产生某些积极影响。“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张继《刊西昆诗集序》）。王安石晚年也颇喜欢西昆诗，以为“字字有根蒂”（惠洪《冷斋夜话》卷四）。黄庭坚亦“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朱弁《风月堂诗话》）。对西昆派未可全盘否定。

（吴小林）

【西昆体】 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代表的宋初西昆派的诗歌体制风格。由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标举宗法李商隐。内容多为写内廷侍臣优游生活和身边琐事的唱和之作。皆近体诗，雕章丽句，典故连篇，风格绮靡浮华。此体一出，士子争相仿效，在宋初风靡数十年，至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兴起，才告衰竭。欧阳修云：“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六一诗话》）又简称“昆体”、“西昆”。明张继评西昆体曰：“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刊西昆诗集序》）金元好问诗曰：“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参见“西昆派”。

（吴小林）

【杨刘】 宋初杨亿、刘筠的并称。二人皆为西昆派的领袖人物，在当时齐名。欧阳修云：“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答蔡君谟》）《宋史·刘筠传》云：“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参见“西昆派”。

（吴小林）

【九僧】 宋初诗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的合称。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宋史·艺文志八》则曰：“九僧为淮南惠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他们诗宗晚唐贾岛、姚合，内容主要写日常生活琐事，多唱和之作，注重语

言锤炼，意境寒瘦，风格清幽，然流于枯寂狭窄之弊，属宋初晚唐体一派。除惠崇诗稍好，其诗句“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等被欧阳修称为“佳句”（《六一诗话》）外，其他人的成就及影响均甚小。

（吴小林）

【二宋】 宋初诗人宋庠、宋祁兄弟二人的并称。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宋郑公庠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宋史·宋祁传》云：“祁，字子京，与兄庠同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大小别之。”二人皆以文名。祁文、诗、词皆长，文奇崛奥博，诗清丽工整，均颇具特色，词作不多，然以《玉楼春》词“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著名，世称“红杏尚书”。庠以诗稍好，多秾丽之作。

（吴小林）

【二刘】 北宋诗人刘敞、刘攽兄弟二人的并称。宋王应麟《小学紺珠·氏族》云：“二刘，宋刘敞、刘攽。”二人在仁宗庆历六年（1046）同登进士，皆博学多才，敞擅经学，著述颇丰，攽通史学，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他们且工文，又善诗，敞诗较呆板，攽诗文情胜于乃兄。

（吴小林）

【苏梅】 宋初诗人苏舜卿和梅尧臣的并称。二人皆以诗名，且均反对西昆诗风，为宋初诗歌革新的重要骨干，在纠正当时诗弊和初步开创宋诗特色方面曾起积极作用。最先将二人并提的，为与他们同时的欧阳修，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云：“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磨盖。”后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苏舜卿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二人诗虽齐名，然风格各异，苏诗奔放雄豪，而梅诗则含蓄平淡。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曰：“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亦曰：“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评其各有所长，所言甚是；至于二人优劣，则梅胜于苏为今人较普遍的看法。

（吴小林）

【欧梅】 北宋诗人欧阳修和梅尧臣的并称。二人为挚友，往来频繁，时相唱和，共同反对浮靡的西昆诗风，提倡诗歌革新，所作诗皆较富现实内容和个人的真切感受，诗风通晓流畅，平淡自然，具有散文化、议论化倾向，为矫正西昆派诗弊和初步开创宋诗特色作出重要贡献。南宋叶梦得称“欧公诗始矫昆体，

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龚啸说梅“去浮靡之习,超然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故后世往往将二人并提,宋黄庭坚《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云:“渺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云:“诤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欧梅诗风格同中亦有异处,欧诗以平易疏畅、清新自然见长,而梅诗则以平淡朴素、含蓄深远见长。(吴小林)

【王荆公体】北宋诗人王安石的诗歌体制风格。王安石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王荆公体。”又自注云:“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故“王荆公体”主要指王后期的诗歌体制风格。其后期诗歌,尤以绝句为高,往往继承杜甫“老于渐于诗律细”之精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着意锤炼,格律细密,且意境优美,富有诗情画意,风格摧刚为柔,寓悲壮于闲淡之中,既与唐诗一脉相承,又为初步形成宋诗特色作出贡献,对后来黄庭坚、杨万里等人的影响颇大。宋黄庭坚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陈师道说荆公“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后山诗话》)。叶梦得云:“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其后杨万里更推崇其绝句,曰:“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读诗》)又曰:“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此等语即为严羽之说所本。严羽之后,明胡应麟云:“介甫五七言绝,当代共推。”(《诗薮·外编》卷五)清陈衍云:“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石遗室诗话》卷八)吴之振曰:“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临川诗钞序》)(吴小林)

【邵康节体】北宋诗人邵雍的诗歌体制风格。邵雍卒谥康节,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邵康节体。”邵为宋理学诗派中的代表作家,所作诗不拘诗法声律,不重苦吟锤炼,只求信手拈来,率尔成章,直陈胸臆,无所滞碍,既深蕴义理,有的又颇饶情趣,诗风浅切平畅,在宋诸家中独具一格。其《伊川击壤集自序》云:“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盖曰吟咏情性,曾何累

于情哉。”《闲吟》诗云:“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何尝无对景,未始便忘情。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天机难状处,一点自分明。”《无苦吟》诗云:“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所言正为其诗风之真切写照。(吴小林)

【东坡体】北宋诗人苏轼的诗歌体制风格。苏轼号东坡居士,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苏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境界阔大。任意驰骋想象,浑洒不羁,善使生动比喻,随物赋形,以散文笔法入诗,以议论为诗,用事奥博,富于理趣,开始形成宋诗的特色。风格多样,“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孌者,有简淡者,翕然开阖,千变万态”(刘克庄《后村诗话》),以清雄旷放为主。体裁各体皆工,尤擅七古。宋杨万里云:“‘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又:‘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又:‘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挽吾足乃敢嗔’;此东坡诗体也。”(《诚斋诗话》)严羽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清叶燮曰:“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原诗》卷一)赵翼评曰:“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瓠北诗话》卷五)

(吴小林)

【山谷体】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歌体制风格。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山谷体。”黄为江西派之祖师,倡言“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夺胎换骨”(惠洪《冷斋夜话》);又主张“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不烦绳削而自合”(《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所作诗五言七言,古体律绝,各体兼备。构思奇特,立意深曲,用事奥博,造语生新,写拗句,押险韵,以散文笔法入诗,表现出奇崛瘦硬的独特风格,然亦有境界狭小,晦涩生硬之弊。宋苏轼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又云:“鲁直诗文,如螭蟠、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书黄鲁直诗后》)张耒评黄诗云:“不践前

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读黄鲁直诗》)杨万里曰:“‘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又:‘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此山谷诗体也。”(《诚斋诗话》)金王若虚曰:“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卷二) (吴小林)

【苏黄】 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黄本出自苏轼之门,后诗自具一格,成为江西诗派之祖师,其地位与影响迥配苏轼,二人是元祐时代的最大诗人。后人论诗,常以“苏黄”并提。宋刘克庄云:“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后村诗话》)《宋史·黄庭坚传》云:“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二人诗皆以意取胜,富于理性色彩和个性特征,用事奥博,造语奇警,以散文笔法入诗,以议论为诗,为奠定宋诗特色的代表作家。宋严羽曰:“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对二人诗,褒扬者有之,清赵翼曰:“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瓠北诗话》卷一)刘熙载曰:“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铁强令混合也。”(《艺概·诗概》)贬抑者亦有之,宋张戒曰:“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卷上)金元好问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论诗绝句》)其说均有一定片面性,然由此亦可见出苏黄诗之成就与不足及其影响之大。二人诗又有不同,苏诗题材广泛,境界阔大,风格清雄旷放,挥洒自如,黄诗相对而言内容较窄,气度偏狭,风格奇崛拗折,瘦硬劲峭。黄庭坚自作诗云:“我诗如曹郃,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故以韵道之》)赵翼亦曾比较其优劣曰:“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瓠北诗话》卷一)总体成就,黄不及苏。 (吴小林)

【韩苏】 中唐诗人韩愈和北宋诗人苏轼的并称。二人皆博览群书,阅历丰富,才思横溢,所作诗挥洒不羁,雄健奔放,且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宋代江

西诗派影响甚深,后世往往并提。清方东树曰:“韩、苏并称。”(《昭昧詹言》卷九)叶燮曰:“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馀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原诗》)刘熙载云:“遇他人以为极艰极难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艺概·诗概》)赵翼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瓠北诗话》卷五)韩、苏诗风亦同中有异,韩诗雄中偏于怪奇,而苏诗雄中更见旷放之风。刘熙载曰:“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多于豪。”(同上)。 (吴小林)

【李杜韩苏】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和北宋诗人苏轼的合称。四人诗歌内容、风格及成就不尽相同,然所作诗皆广博深厚,豪雄恣肆,变化不测,诗体中七古造诣较高,对后代诗歌发展影响深远,论诗者往往将其并提。清方东树曰:“李、杜、韩、苏,非但才气笔力雄肆,直缘胸中蓄得道理多,触手而发,左右逢源,皆有归宿,使人心目了然履足,足以感触发悟心意。”又曰:“南宋以来诗家,无有出李、杜、韩、苏四公境界,更不向上求,故亦无复有如四公者。”(《昭昧詹言》卷一一、卷一)也有论四人之异者,如袁枚曰:“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刘熙载曰:“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艺概·诗概》) (吴小林)

【黄陈】 北宋诗人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并称。宋杨万里诗曰:“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幹近诗》)二人皆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作家,是元方回所称该派“一祖三宗”中的二宗。黄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再次韵杨明叔序》),“无一点尘俗气”(《书嵇叔夜诗与侄榎》),陈亦强调“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后山诗话》),观点相似。陈诗学黄,且二人均学杜甫,方回曰:“老杜为唐诗之冠,黄、陈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瀛奎律髓》卷一)然未得杜诗之神似。所作皆主要写自身遭遇和主观感受,境界偏狭。喜好用事,重视在继承前人遗产基础上锤炼语言,风格趋生避熟,瘦硬拗折。黄、陈之诗亦有不同:黄各体皆备,陈相对而言以五言见长;黄瘦硬中更见奇崛奥峭的特点,而陈在瘦劲中透出拙朴幽深。宋朱熹评二人诗曰:“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吴小林)

【苏海韩潮】 亦作“韩海苏潮”或“韩潮苏海”。中

唐诗人韩愈和北宋诗人苏轼诗风的并称。二人诗歌风格皆雄健奔放,波澜壮阔,故称。本指其散文风格,宋李塗曰:“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文章精义》)清俞樾曰:“国朝萧墨《经史管窥》引李耆卿《文章精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然则今人称韩潮苏海,误矣。”(《茶香室丛钞》)卷八“韩海苏潮”条)后亦用来形容二人的诗风或文学作品风格,清孔尚任《桃花扇·听稗》云:“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参见“韩苏”。

(吴小林)

【二苏】①北宋诗人苏舜元、苏舜卿兄弟二人的并称。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云:“舜卿与兄才翁,亦称二苏。”二人皆工诗,风格豪雄奔放。舜卿诗名尤大,为宋初诗歌革新重要骨干之一。二人亦工草隶,舜卿虽先得名,而成就以舜元为高,见宋王巩《王氏谈录·二苏草隶》。②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并称。《宋史·常安民传》云:“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宋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云:“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二人手足情深,嘉祐二年(1057)同登进士,皆以文学名重于时。既擅文,并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又工诗,轼诗清雄奔放,为北宋诗歌成就最高体现者,辙诗远不如轼,然用笔老重,不事驰骋,亦自具一格。(吴小林)

【清江三孔】北宋江西清江诗人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三人的合称。宋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云:“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宋史·孔文仲传》云:“文仲与弟武仲、平仲,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宋王蘧编有《清江三孔集》。三人与苏轼相友善,诗亦受苏轼的影响。其中以平仲的诗为优,文仲、武仲次之。(吴小林)

【后山体】北宋诗人陈师道的诗歌体制风格。陈师道号后山,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后山体。”又自注云:“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陈为江西诗派“三宗”(方回《瀛奎律髓》)之一,主张“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后山诗话》),与黄庭坚的观点相似。诗初学黄庭坚:“仆于诗初无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答秦观书》)后认为“鲁直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后山诗话》),遂改学杜甫,然仅专致于形式格律,未得杜诗深沉雄健之神。创作用力甚勤,锤炼推敲,以苦吟著名,黄庭坚称之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所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相比,以五言见长。风格拙朴瘦劲,枯淡幽深,然亦有拗涩

寒窘之弊。清纪昀评陈诗曰:“大抵绝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弃短取长,要不失为北宋巨手。”(《后山集钞题记》)宋任渊曰:“读后山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后山诗注》)

(吴小林)

【陈简斋体】宋代诗人陈与义的诗歌体制风格。陈与义号简斋,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陈简斋体。”自注曰:“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陈为江西诗派“三宗”(方回《瀛奎律髓》)之一。诗先学黄庭坚、陈师道,后宗杜甫,既具江西派共有之特点,又与黄、陈有异处。以靖康之变为界,诗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抒写个人主观感情,风格明快爽朗;后期遭家国之难,多伤时忧世作品,诗风雄浑悲壮。体裁以律绝为优,尤其七律逼近杜甫。宋刘克庄评陈诗曰:“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后村诗话》卷二)所言颇中肯綮。

(吴小林)

【苏门四学士】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的合称。四人皆曾受到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的培养和荐拔,出其门下,故称。苏轼本人最先将此四人并提:“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之未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玘书》)后四人名扬天下,“苏门四学士”之称遂流行于世。《宋史·黄庭坚传》云: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苏门四学士》曰:“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称苏门四学士。”四人之间以及四人与苏轼之间,造诣和文学风格并不相同。黄庭坚诗自立一宗,为江西诗派之祖师,与苏轼并称“苏黄”,风格奇崛瘦硬,秦观在“四学士”中最受苏轼爱重,以词著称,与柳永并称“秦柳”,又与周邦彦并称“周秦”,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其诗成就不如词,具纤巧妩媚的特色,金元好问讥之为“女郎诗”(《论诗绝句》),所评虽不甚全面,然亦切中其诗气魄较弱之缺陷。张耒以诗名,所作较富现实内容,诗风平易晓畅,晁补之赞其诗曰:“君诗容易不着意,忽略春风开百花。”(《题文潜诗册后》)粗疏草率则为其诗之弊病。晁补之诗词文并工,其中文之成就略高,诗作遒劲隽爽,然亦有散缓之弊。

(吴小林)

【苏门六君子】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的合称。六人曾受到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清钱谦益《苏门六君子文粹序》曰:“六君子者,张耒文潜、秦观少游、陈师道履常、晁补之无咎、黄庭坚鲁直、李廌方叔也。”宋萃《漫堂说诗》曰:“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

称“苏门六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称‘苏门六君子’者，盖陈、李虽与苏交甚晚，而师道则以苏荐起官，廌亦以文章见知于苏轼，故以类附之也。”六人之间以及六人与苏轼之间，造诣和文学风格并不相同。黄庭坚诗自立一宗，为江西诗派之祖师，风格奇崛瘦硬。陈师道亦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与黄庭坚并称“黄陈”，诗风拙朴幽深。秦观以词著称，诗歌具纤巧妩丽之特色。张耒诗较富现实内容，风格平易晓畅。晁补之诗遒劲隽爽。李廌以文见长，诗歌则有雄健奇丽之风。参见“苏门四学士”。

(吴小林)

【苏门后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李格非、廖正、李禧、董荣的合称。李“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与其余三人殆于元祐间同时为馆职，并有文名，以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相别，故称。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云：“李格非文叔、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其中以李格非较为著名，是杰出女诗词作家李清照之父，诗文兼擅，宋刘克庄评曰：“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后村诗话》)

(吴小林)

【宋世二陈】 宋代诗人陈师道和陈与义的并称。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六云：“刘无党差有老成意，如‘客里簿书惭老子，诗中旗鼓避元戎’一首，全不粘景物，而格苍语古，即宋世二陈不能过。”二陈皆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是元方回所称该派“一祖三宗”中的二宗。诗均师法杜甫，讲究锤炼，诗法高古。二陈诗异处在：师道所作多写自身遭遇和主观感受，风格拙朴瘦硬；与义诗作，尤其后期作品则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相融合，多有感时伤世之意，诗风爽健雄浑。

(吴小林)

【宋四名家】 北宋诗人苏轼、黄庭坚和南宋诗人范成大、陆游的合称。清周之麟、柴升编有《宋四名家诗》，辑苏轼等四人诗，故名。四人皆为宋诗之大家，成就卓著，然风格及在诗坛上的地位、影响并不相同。参见“苏黄”和“尤杨范陆”。

(吴小林)

【元祐体】 北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人的诗歌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元祐体。”又自注云：“苏、黄、陈诸公。”苏、黄、陈诸人诗皆以意取胜，着重抒写自身遭遇和主观感受，用事奥博，造语生新，以散文笔法入诗，以议论为诗，风格奇崛纵恣。严羽所言“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宋诗特征，即以苏、黄、陈诸人的元祐体为代表。苏、黄、陈之诗亦有异处。苏、黄各体皆备，陈以五言见长。苏诗境界阔大，黄、陈气度

偏狭。诗风苏轼清雄旷放，黄庭坚奇峭瘦硬，陈师道瘦劲拙朴。

(吴小林)

【江西诗派】 北宋后期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宗，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此图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耆、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他书如《云麓漫钞》等所记与此稍有出入。上述诗人并非都是江西人，吕氏可能因黄庭坚为江西人，成员中又以江西人较多，故取名为江西诗派。该派诗人多以学杜甫相号召，元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初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还说“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被后人列入江西诗派的尚有曾纮、曾思、赵蕃、韩淲等。该派除宗师黄庭坚，代表人物陈师道、陈与义、吕本中、曾幾等以外，其他诗人成就均不甚高。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造成士大夫的畏祸心理，故而诗歌往往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物转向内心，由生活转向书本。诗坛上西昆体绮靡熟滥的诗风引起人们不满，而黄庭坚高扬个性，反俗尚奇，更能体现宋诗特征的诗作得到不少追随者的仿效。他们通过师承和交游关系，互相切磋，遂形成江西诗派。该派以黄庭坚一些重要的诗歌主张为纲领，黄曰：“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见惠洪《冷斋夜话》)，认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杨明叔序》)。又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二)。其说反映出革除西昆派积习，确立独特诗风的追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作为继承前人遗产基础上立意造句、锻炼语言的手法，亦有一定可取之处。然上述理论满足于书本知识，忽略接触现实生活，以借鉴代替创造，只在字句上花样翻新，流弊甚大。金人王若虚曾讥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特剽窃之黠者”(《滹南诗话》卷三)。他们标榜向杜甫、韩愈等诗人学习，然所作诗缺少其深远的内容和鲜明的独创性。除某些反映民生疾苦，感时忧国之作，如黄庭坚《流民

叹》、《上大蒙笼》，陈师道《田家》、《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陈与义《伤春》、《次韵尹潜感怀》等以外，主要抒写自身遭遇和内心感受。黄庭坚的《登快阁》、《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陈师道的《春怀示邻里》、《示三子》，陈与义的《襄邑道中》、《除夜》等都是著名作品。避熟趋生，翻新易奇，重视遣辞造句、运用典故的技巧，是该派的共同特色，尤以黄庭坚为甚。他所作诗构思奇特，立意深曲，用事奥博，词语生新，且常造拗句，押险韵，散文化倾向十分明显，表现出奇崛瘦硬的风格，《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题竹石牧马》等，均为其代表作。而陈师道诗较为拙朴，陈与义诗比较爽健，可说各具一格。江西诗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整个南宋，其势力仍然很大，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无不受其影响，宋元之交的刘辰翁、方回亦为其余响。以后崇奉该派者，也代不乏人。直至清代的同光体诗人的作品，还可看到其流风余韵。（吴小林）

【江西宗派体】 北宋后期江西诗派所作诗的体制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江西宗派体。”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列陈师道以下二十五人，“江西宗派”因此而得名。元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初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黄庭坚提倡“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为新”，所作诗常用僻典，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避熟趋生，奇崛瘦硬，别树一帜，为后学所追随和仿效，遂形成江西宗派体。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覆，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云：“余窃谓豫章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覆，尽兼众体’，则非也。”金王若虚《溁南诗话》卷三曰：“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则曰：“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参见“江西诗派”。（吴小林）

【一祖三宗】 唐代诗人杜甫和宋代诗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的合称。元方回论诗贬斥宋代的西崑派，推崇江西诗派，认为杜甫是唐诗之冠，推为“一祖”，北宋黄庭坚、陈师道俱师法杜甫，南宋陈与义亦嗣其后，是为“三宗”。其《瀛奎律髓·变体》云：“古今

诗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徐可豫配餗者有数焉。”参见“江西诗派”。（吴小林）

【杨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歌体制风格。杨万里号诚斋，故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以人而论，则有……杨诚斋体。”又自注云：“其所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也。”杨早先学王安石、江西派和唐人诗，后跳出步人后尘的框框，自辟蹊径。其《荆溪集序》云：“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既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跋徐恭仲省幹近诗》）又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其诗有抒写爱国感情和反映民生疾苦方面的内容，然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多。艺术上善用活法，能细致观察客观世界，并巧妙地摄取和表现自然景物的特征，想象奇特新颖，情趣诙谐幽默，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表现出独特鲜明的诗风。对其诗前人褒贬不一，宋陆游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知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周必大云：“诚斋诗名牛斗寒，上规大雅非小山。”（《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清陈衍云：“杨诚斋矫矫拔俗，魄力又足以胜之。”（《宋十五家诗选·诚斋诗选》评语）而清叶燮则曰：“宋人富于诗者，莫过于杨万里、周必大，此两人所作，几无一首一句可采。”（《原诗》外篇）翁方纲曰：“诚斋以轻儇佻巧之音，作剑拔弩张之态。”（《石洲诗话》卷三）李慈铭曰：“诚斋则粗梗油滑，满纸村气，似《击壤》而乏理语，似江湖而乏秀语。”（《越縕堂日记》）光绪乙酉十月初四日所言各有所偏。杨诚斋体自树一帜，对宋诗发展颇有贡献，而题材琐细，境界不阔，某些作品风趣流于庸俗，自然流于粗率，则是其缺陷。

（吴小林）

【苏陆】 北宋诗人苏轼和南宋诗人陆游的并称。二人皆为宋代大诗人，分别体现北、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清赵翼云：“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瓠北诗话》卷六）苏、陆诗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境界阔大，风格清雄奔放，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不同处在于，苏诗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抒发个人主观感受为长，陆诗则贯串忧时伤乱、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苏诗清雄中偏于旷放，陆诗则清雄中夹有悲壮；体裁二人皆各体兼备，然苏尤擅七古，“子瞻虽体格创变，而笔力纵横……自是宋歌行第一手”（明胡应

麟《诗藪·外编》卷五),而陆尤长于七律,“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能事亦毕”(《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有的论者认为苏诗在有宋一代首屈一指,赵翼却曰:“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同上)实则苏、陆诗各有所长,亦皆有所短,其总体成就不当论优劣。(吴小林)

【杜氏五高】南宋初姓杜的五位文学家的合称。语出明胡应麟《诗藪·杂编》卷五。五人是:杜旂,字伯高;杜旂,字仲高;杜旂,字叔高;杜旂,字季高;杜旂,字幼高。因其字中均有“高”字,故名。他们五兄弟在当时皆工诗词,曾受到陆游、陈亮等人的称誉。“五高”为浙江金华人,故又称“金华五高”。

(吴小林)

【金华五高】见“杜氏五高”。

【中兴四大诗人】南宋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合称。中兴是偏安的讳称,此处指南宋。元方回《跋尤袤诗》云:“自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四人皆以诗名,然特点及地位、影响并不相同。其中尤袤诗歌成就较小,陆游之诗造诣最高,为南宋诗人之冠。参见“尤杨范陆”。(吴小林)

【尤杨范陆】南宋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人的合称。元方回《瀛奎律髓》云:“乾淳间,诗巨擘称尤、杨、范、陆。”又称“中兴四大诗人”。四人皆以诗名,且均摆脱早年所受江西诗派的影响,然诗歌内容、风格及地位、影响并不相同。其中尤袤作品散佚甚多,成就较小,诗风平淡。杨万里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最多,亦有不少抒写爱国感情和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作品,想象奇特新巧,情趣诙谐幽默,语言自然活泼,形成独具一格的“杨诚斋体”。范成大以爱国诗和田园诗著称,也有一些揭露剥削残酷、同情农民疾苦的佳作,风格清新妩媚、婉峭浅切。陆游诗歌贯串忧时伤乱,抗敌御侮的强烈爱国主义感情,而抒写生活感受,描摹山川景物则是其另一重要内容;诗风雄浑悲壮,明晓流畅;体裁各体皆工,尤擅近体诗。陆游在四人中成就最高,且为南宋诗人之冠,其对后世的影响,由南宋后期一直延及至近代。

(吴小林)

【尤杨】南宋诗人尤袤、杨万里的并称。杨万里《延之寄诗和韵谢之》诗云:“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两人以诗并称于世,然杨之成就远高于尤,实难同日而语,且诗风亦各异,尤诗平淡,而杨诗活泼自然。参见“尤杨范陆”。(吴小林)

【永嘉四灵】南宋中期诗人徐照、徐玠、翁卷、赵师秀的合称和诗歌流派。徐照字灵晖,徐玠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且均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故称。“四灵”中徐

照、翁卷是布衣,徐玠、赵师秀曾作过小官,他们虽本有人仕报国之志,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碰壁后,即转而逃避现实,放情山水,“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行》),为其共同的心态。当时诗坛上,以学问为诗、瘦硬枯瘠的江西派之诗渐为人所厌闻,而宋初出现的讲究锤炼,诗风清苦,反映衰世之音,标榜学习贾岛、姚合的晚唐派诗重又盛行。该派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势和宋诗嬗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反对江西诗派,提倡晚唐诗体,选择贾岛、姚合的创作道路,主张锻字炼句,刻意雕琢,认为:“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引)所作亦有颇富现实内容的诗篇,如徐照《促促词》、徐玠《监造御茶有所争执》、翁卷《东阳路旁蚕妇》等,然具代表性的多为描写自然小景,反映隐逸情趣的作品。体裁以近体为长,尤擅五律,风格清冷,意境幽寂,忌用典,尚白描,重写景,讲刻削,追求野逸清瘦之趣,“大抵中四句锻炼磨莹为工,以题考之,首尾略如题意”,“中四句工,但俱咏景物而已”(方回《瀛奎律髓》)。在人们看惯书卷气息较重的江西派作品的诗坛上,清秀隽逸的“四灵”体颇能给人以新鲜感,加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叶适的大力揄扬,“四灵”之诗便盛行一时。四人中以赵师秀成就最高,其《约客》一诗为传诵之作。翁卷次之,《乡村四月》等诗写得颇为自然秀逸。该派诗的缺陷是学习晚唐诗有生硬模仿之弊,专务刻镂,题材偏窄,境界狭小,赵师秀自称“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刘克庄《野谷集序》引),可见其才力之窘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四灵’之诗,虽镂心铄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可谓切中要害之论。(吴小林)

【江湖派】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流派。当时临安(今杭州)书商兼诗人陈起刊行《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中兴集》等诗歌总集,后遂称其中的诗人为江湖派。该派成员有一百余人,多为科考落第,浪迹江湖的下层知识分子,亦有为官作宦者,代表人物是刘过、姜夔、高翥、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方岳、赵汝铤、叶绍翁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以刘克庄为领袖”。其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许多士子仕途失意,遂以诗或触及时政,表现与当权者不合作之态度,或放情山水,向往隐逸生活,或游食江湖,干谒公卿;文学上江西诗派之流弊越益明显,“四灵”诗人生硬模仿晚唐诗亦引起人们不满,改变诗风之呼声日甚,江湖派便应运而生。该派成员复杂,并无统一而明确的诗歌理论,然其反对江西诗派和不满“四灵”诗人,主张变革的倾向,在刘克庄

所说“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率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则驰骛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刘圻父诗》),“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韩隐君诗序》),戴复古所说“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论诗十绝》)等诗论中均有反映。所作诗有的揭露政治弊病,讽刺朝廷偏安政策,表现忧国之心,如刘过《登多景楼》、刘克庄《戊辰即事》、戴复古的《频酌淮河水》、叶绍翁《题鄂王墓》等,有的抒写贫困百姓的疾苦,表现对人民的同情,如戴复古《庚子荐饥》、《织妇叹》,刘克庄《筑城行》、《苦寒行》,赵汝鐸《翁媪叹》、《耕织叹》,乐雷发《逃户》等,有些描写山水景色,田园风光,如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湖上寓居杂咏》,方岳《农谣五首》,叶绍翁《田家三咏》,利登《田家即事》等,亦有不少诗歌咏闲逸,表现消极避世思想,或干谒权豪,诉穷乞怜。该派许多诗人虽亦提倡晚唐诗风,然容纳较广,且调和融合江西诗派与“四灵”诗人之风,在浅俗简淡中充实学问,锻炼字句,追求真率平易之审美境界。体裁以古体诗和七绝成就较高。境界狭小,气格卑下,以及粗率熟滑,缺少含蕴不尽之致,则是该派诗作的致命弊病。清人王士禛评论江湖诗人曰:“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已,可一概也。”(《带经堂诗话》卷一〇)所言颇中肯綮。

(吴小林)

【江左二宝】 北宋末、南宋初人胡仲、汪藻的并称。《宋史·汪藻传》云:“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仲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仲、汪藻。’”汪藻诗学苏轼,在当时诗坛颇有影响,诗名实高于胡仲。

(吴小林)

【杨赵】 金代文学家杨云翼、赵秉文的并称。二人在南渡后分掌吏部、礼部,朝廷诏文典册皆其手笔。轮流执掌文柄,门生半天下。金元好问《中州集》卷四:“南渡后二十年,(杨云翼)与礼部闲闲公(赵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杨云翼主张“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引)。赵秉文不满于当时浮艳文风,欲以风雅奇古予以纠正。杨云翼之诗质直工练,其文则长于论辩。赵秉文诗作效法唐人,七言长篇放浪纵恣,散文则长于辨析,不离经义名理之学。

(张国风)

【月泉吟社】 宋灭亡后遗民所立诗社。浦江吴渭,宋时为义乌令,入元以后隐居吴溪,立月泉吟社,延请乡里遗老遗民诗人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主持。至元二十三年(1286)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

五七言律诗。次年正月得诗两千七百三十五卷,评选出二百八十名诗友,将前六十名的诗汇为一卷刊行,即名《月泉吟社诗》。作者姓名多为假托,别注本名于下。集中之诗多故国之思。可参见清高士奇《天禄识馀》下《月泉吟社》。

(张国风)

【中州三杰】 金文学家雷渊、高廷玉、李纯父的并称。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六:“雷渊,字希颜,为文章诗喜新奇,饮酒数斗不乱。与友人高廷玉、李纯父号‘中州三杰’。”雷渊工于诗。高廷玉好为诗赋。李纯父初研词赋,后为经义之学,为文法庄周、左氏、《战国策》。

(张国风)

【刘卢】 元初文学家刘因、卢摯的并称。二人以诗文著称于时,作品多抒发故国之思,风格颇为清新爽健,体现出元初诗风的变化。刘因诗、词、文皆长,尤工于诗,为元前期成就较高的诗人。卢摯诗、词、文、散曲均负盛名,然诗、文散佚较多,在现存作品中以散曲成就最著。就诗而言,刘诗豪健,卢诗则富淡泊之致。

(吴小林)

【虞杨范揭】 元代诗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的合称。清顾嗣立《寒厅诗话》:“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造。虞、杨间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时参韦、孟,而天韵疏”四人皆宗法唐诗,然各有特点。虞集曾评曰:“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为三百新妇”,并“自比汉廷老吏(一作‘汉法令师’)也”(揭傒斯《范先生诗序》)。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云:“‘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丽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令师’,刻而深也。”其中虞集,诗多应酬题画之作,时露怀念宋室之情,风格典雅精切,成就较大。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他的诗篇以气势胜。范梈作诗学颜延年、谢灵运,多趣而高妙,揭傒斯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

(张国风)

【元四家】 元代诗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的合称。明毛晋编有《元四家诗》,因此得名。详见“虞杨范揭”。

(张国风)

【遗山体】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歌体制风格。“遗山”系元好问的号,有《遗山集》传世,故称。元好问主张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言不由衷,提倡自然真淳,反对雕章琢句;推崇豪放、典雅,反对纤弱、俳谐怒骂。所作诗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工于七古、七律和绝句。风格遒劲,意境开阔。《金史·文艺传》云:“其诗奇崛而绝雕剏,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

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清赵翼评其古体诗曰:“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窘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评其七律曰:“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瓠北诗话》卷八)(张国风)

【铁崖体】元代诗人杨维桢的诗歌体制风格。铁崖是杨维桢的号,故称。《明史·文苑传》:“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余观廉夫,问学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笼当代。古乐府其所自负,以为前无古人。征诸句曲,良非夸大。以其诗体言之,老苍莽兀,取道少陵,未见脱换之工;窈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消。承学之徒,流传沿袭,槎牙钩棘,号为‘铁体’,靡靡成风,久而未艾。”他所作诗造语造新,风格险怪,诗体以拟古乐府为长,在当时影响甚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曰:“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张国风)

【青丘体】明初诗人高启的诗歌体制风格。高启号青丘子,故称。其诗取法汉魏晋唐诸体,时有模拟痕迹,然才思俊逸,善于借鉴,尚能自具面目,且风格多样,兼长众体,尤擅写景抒情的七言歌行和七律,或才气豪迈,或沉郁苍凉,颇有特色。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比较高启、刘基二家诗歌云:“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容之壮,次及伯温。”汪端《明三十家诗选》评高诗“才气豪雄而不剑拔弩张,辞采秀逸而不句雕字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张国风)

【明初四杰】指明初四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明安磐《颐山诗话》:“本朝诗在国初,高、杨、张、徐,可比唐初王、杨、卢、骆。”又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引李东阳语:“国初称高、杨、张、徐。”《明史·高启传》云:“国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王、杨、卢、骆云。”是亦称“吴中四杰”。高诗隽逸清丽,思致高远,缘情随事,因物赋形,高出流俗。杨基诗擅长写景状物。张羽诗,“五言古诗学杜、学韦,各有神理,非苟然者。乐府歌行,才力驰骋,音节谐畅,不袭宋元格调……七言律诗,清圆浑脱,不事缛缛,全是唐音”(《列朝诗集小传》引程孟阳语)。徐贲诗恬雅而凄清。其中以高诗成就为最高。(张国风)

【吴中四杰】明初诗人杨基、高启、张羽、徐贲的合称。杨基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生长于吴中,高启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张羽本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后侨居吴兴(今属浙江),再徙于吴,徐贲其先本蜀人,后徙常州(今属江苏)、平江(今江苏苏州),四人同时知名,故称。明沈德符《野获编·山人·别号有所本》曰:“杨(基)在洪武间,官至山西按察使,与高启、张羽、徐贲齐名,谓之‘吴中四杰’。《明史·高启传》云:‘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又称‘明初四杰’,参见该条。(吴小林)

【国初三张】明初诗人张以宁、张光弼、张仲简的合称。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国初三张:以宁、光弼、仲简。以宁气骨豪上,国初寡俦,藻绘略让耳;光弼、仲简亦有佳处,然率与元人唱酬。”张以宁为闽诗派先驱,其诗格兼唐宋,初洗元末纤缛之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以宁“五言古体意境清逸,七言古体亦遒警,惟《倦绣篇》、《洗衣曲》等数章,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近体皆清新,间有涉于纤仄者”。张光弼、张仲简诗多唱酬之作。(张国风)

【北郭十友】明初长洲(今江苏苏州)十位诗人的并称。《明史·王行传》:“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十友之诗以咏物写景为多,不乏思旧怀国之作。其中以高启成就为最高,王行、徐贲、张羽、唐肃等人诗亦有可诵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王行)在北郭十子之中,与高启称为勍敌。”又云:“(徐贲)其诗才气不及高、杨、张,而法律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什,并首尾温丽,于三家别为一格。”(张国风)

【越诗派】明初以浙江人刘基为首的诗歌流派。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国初……越诗派昉刘伯温。”主要成员除刘基外,还有胡翰、苏伯衡、宋濂、王子充、方希古等。该派诗现实性较强,风格并不一致。其中以刘基成就为最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刘基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张国风)

【吴诗派】明初吴中以高启为首的诗歌流派。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主要成员为“国初四杰”(又称“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中的诗人,参见该三条。(吴小林)

【江右诗派】明初江西的一个诗歌流派。江右即江西省别称。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国初……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该派又称“西江派”,《明史·刘崧传》:“(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国初诗派,西江则

刘泰和(即刘崧),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汪端《明三十家诗选》评刘诗“妍静疏爽,如新箬摇风,幽花挹露,又如空山听雨,曲磬鸣泉。盖取材中唐、南宋,而不流于佻浅,洵一时雅宗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病其“体弱局于方,不能展拓”。刘诗讲究辞藻,骨格卑弱,为该派诗风之典型代表。(张国风)

【西江派】明初江西以刘崧为代表的诗歌流派。《明史·刘崧传》云:“(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云。”又称“江右诗派”。参见该条。

(吴小林)

【闽中十才子】明初福建诗人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的合称。《明史·文苑传》:“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十才子者,闽郑定、侯官王褒、唐泰,长乐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王偁及鸿弟子周玄、黄玄。”林鸿论诗,大旨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齐梁以下华而不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而在唐诗中,又最崇盛唐之作。该派所作诗摹拟痕较重,在当时影响甚大。明王世懋《艺圃撷余》:“国初林鸿、高廷礼、唐泰辈,皆称能诗,号闽南十才子。然出杨徐下远甚,无论季迪。”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馀载,柔音漫节,卑靡成风。”(张国风)

【崇安二蓝】明初福建崇安诗人蓝仁、蓝智兄弟的并称。二人为“闽中十才子”诗友,诗风亦与之相近,着意学唐,有较明显的摹拟痕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蓝仁诗“规摹唐调,而时时流入中晚。蒋易作是集序,称其和平雅淡,词意融恰,语不雕镂,气无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风。……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为之开先”。又评蓝智诗,“五言结体高雅,翛然尘外,虽雄快不足,而隽逸有馀。七言顿挫浏亮,亦无失唐人矩矱”。

(张国风)

【闽诗派】明初福建的一个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号为“闽中十才子”的林鸿、高棅、王恭、王偁、陈亮、郑定、王褒、唐泰、周玄、黄玄和号为“崇安二蓝”的蓝仁和蓝智。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国初……闽诗派昉林子羽”。该派论诗主张学习盛唐,认为只有极力摹拟唐诗声韵格调,才能纠正元末以来的纤细诗风。《明史·文苑传》说他们的论诗主张是“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复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模”。此派只重视格律、技巧,而忽视内容,因此他们的诗题材很狭窄,多写个人生活

琐事和酬谢赠答之作。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可以视作是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驱,对前后七子产生很大影响。“闽派”的领袖人物是林鸿,在当时诗坛颇负盛名。参见“闽中十才子”、“崇安二蓝”。

(管士光)

【金陵三俊】明弘治、正德间金陵诗人顾璘、陈沂、王韦的合称。《明史·顾璘传》:“初,璘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雨顺。韦婉丽多致,颇失纤弱。沂与韦同调。”三人中以顾璘成就为最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璘诗“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在正德、嘉靖间固不失为第二流之首也”。

(张国风)

【南园五先生】明初广州孙蕡等五位诗人的合称。《明史·孙蕡传》:“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五人在广州南园(即抗风轩)结诗社,时称“南园五先生”,亦称“岭南五先生”、“南园五子”。五人推崇盛唐,贬抑宋元。孙蕡多才情,尤长歌行体,为五人之首。黄哲擅长山水,王佐诗沉郁,李德诗恬淡,赵介诗奇崛。明嘉靖间陈暹辑有《南园五先生诗》,录诗百馀首。后葛征奇又重新刊刻,题为《南园五先生集》。

(张国风)

【岭南诗派】明初广东的一个诗歌流派。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云:“国初……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该派诗人主要是号称“南园五先生”的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他们均为岭南人,故称。该派推崇盛唐,反对宋、元诗风,作品风格通畅,颇有盛唐遗风。其中尤以孙蕡成就最高,他擅长歌行,虽有时表现出繁缛的毛病,但总的看他的诗较有才情,风格昂扬晓畅。其他几位诗人亦有佳作。参见“南园五先生”。

(管士光)

【南园后五子】明嘉靖末广东诗人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合称。梁有誉诸人继明初孙蕡、王佐等“南园五先生”之后,亦在南园(即抗风轩)聚会结社,企图复兴南园之风,世称“南园后五先生”,又称“南园后五子”,清陈文藻辑有《南园后五子集》。五人中梁有誉影响较大,为明“后七子”重要成员。欧大任、黎民表次之,亦被王世贞列入“五子”范围。他们创作多南国风情,然终未脱模拟复古藩篱。

(张国风)

【南园十先生】明代十诗人的合称。明初,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于广州南园(即抗风轩)结社唱酬,称“南园五先生”。为诗推崇盛唐,力去宋元风习。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又聚会南园,以求复振南园之风,称“南园后五子”。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将前后五

子合称“南园十先生”，并建南园十先生祠。参见“南园五先生”、“南园后五子”两条。（吴小林）

【皇甫四杰】 明嘉靖间长洲（今江苏苏州）诗人皇甫冲、皇甫湜、皇甫汸、皇甫濂兄弟的合称。《明史·皇甫湜传》：“（皇甫湜）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王世贞《艺苑卮言》云：“（皇甫兄弟）俱擅菁华，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皇甫冲诗摹古不化，远在汸、濂之下，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引金陵张文寺语“四甫之才，子浚（冲之字）为冠”，并非笃论。皇甫湜五言为工，萧疏古淡，才思稍逊其弟汸，而格韵固未多让。皇甫汸古体源出三谢，近体源自中唐，而雅饰雍容，不事雕琢，兄弟中成就最为特出，后与王世贞齐名，时人谓“百泉（汸之别号）如齐、鲁，变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称王”。皇甫濂诗不及兄汸、湜，然善言情。（张国风）

【会稽二肃】 明初浙江会稽（今绍兴）诗人唐肃、谢肃的并称。《明史·王行传》：“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二人中唐肃影响较大，其诗以婉丽著称，谢诗则劲健疏朗。（张国风）

【景泰十才子】 明代景泰间北京十位诗人的合称。《明史·刘溥传》：“（刘溥）与汤胤勳、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十才子诗多应酬之作，惟刘溥、汤胤勳、沈愚三人诗，略有可观。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刘溥诗“初拟西昆，晚益奇纵，悲愁叹愤，一寓于诗”；评汤胤勳“为歌诗，豪放奇崛，援笔挥洒，如风雨晦冥中电光翕焱，人多为之夺气”；评沈愚“诗餘、乐府，传播人口”。（张国风）

【台阁体】 明永乐至成化间盛行于台阁重臣中的一种诗文体制风格。代表人物为杨士奇、杨荣、杨溥，人称“三杨”。《明史·杨士奇传》：“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三杨”以台阁重臣身份大量写作歌功颂德的唱酬之作，典雅雍容，富丽空泛，时人群起仿效，成为风气。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杨（士奇）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台阁体“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词章取之则未矣”。（张国风）

【茶陵诗派】 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湖南茶陵人李东阳。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成化以后，台阁体粉饰太平的诗歌未流已发展为啾缓冗沓，弊端更著，于是李东阳为首的茶陵

派诗人起而纠正，一时成为诗坛主流。该派以唐为师，重视性情，着力于音节、格调、用字。其宗法唐诗之主张，开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先声。成员除首领李东阳外，著名者还有石珪、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其中李东阳诗深厚雄浑，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意味隽永。石珪才力不及其师东阳，然力斥浮夸，长歌颇有师风。顾清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张国风）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组成，而以李、何为首。《明史·李梦阳传》云：梦阳“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后因与嘉靖、隆庆间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子相区别，故称“前七子”。明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制度，文坛上盛行粉饰太平、雍容萎弱的“台阁体”和迂腐平庸、寡淡无味的“理气诗”。为改变此种文风，“前七子”高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主张散文学秦汉，古诗尊汉魏，近体宗盛唐。他们推崇汉魏盛唐优秀诗歌，以恢复古代文质相称、委曲生动的文学传统，有助于开阔眼界，廓清时弊。然他们唯古是尚，“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认为“宋无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完全抹煞中唐以后诗，则又有所偏。“前七子”之间文学观点也有所区别。李梦阳强调因袭古人格调，死守“古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之法（《答周子书》），主张句拟字模。何景明虽亦倡模仿，然反对李“刻意古范”，“独守尺寸”，提出“富于材积，领会精神，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食古能化，模仿不露痕迹。王廷相亦不满“刻意模古”（《石龙集序》），提倡“古师妙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追求模仿的神似。康海则明确反对模仿，认为“模仿剽夺，远于事实，予犹以为过云”（《大复集序》），不过他并未扭转“前七子”倡言模仿的主导倾向。“前七子”理论上值得肯定之处是比较重视诗歌的审美特征。李梦阳早年即强调“情以发之”（《潜虬山人记》），认为诗歌应具有真情实感，晚年又反省自己的诗作“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非真也”，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徐祯卿论诗也重情，主张“因情立格”（《谈艺录》）。王廷相讲究意象美：“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同上），注重主体的情意和客体的物象融而为一，崇尚空灵含蓄。李梦阳诸人还力主格古调雄，提倡诗歌的雄丽之美。“前七子”的诗歌创作则存在因袭前人、缺乏新意的弊端。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权奸宦官，不满腐朽政治，亦写有一些揭露黑暗、抨击时政的诗作，如李梦阳的《玄

明宫行》、何景明的《鲋鱼》、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鞭挞宦官飞扬跋扈、穷奢极欲、具有现实意义的篇什。“前七子”倡言复古影响巨大,并直接开启了“后七子”的出现,使复古运动在明代盛行达百年之久。明袁宏道批评前七子是“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序》),清末黄人则认为是“愤民矫俗”(《国朝文汇序》),他们分别指出“前七子”的功过是非,颇中肯綮。

(吴小林)

【何李】 明代诗文家何景明和李梦阳的并称。二人皆生活在弘治、正德年间,为“前七子”的首领,名并重于世。《明史·何景明传》云:“(何景明)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与颉颃。”“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然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参见“前七子”。

(吴小林)

【十才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十位诗文作家的合称。《明史·李梦阳传》云: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喜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参见“前七子”。

(吴小林)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七人组成。为了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后七子”。他们在“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声势更为浩大。嘉靖皇帝开始当权,虽有些中兴气象,但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有所改革。而“后七子”中许多人正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在政治上力图改革,而在诗文上也反对疲软现象,再次提倡秦汉古文和盛唐精神。其理论核心仍是沿袭“前七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句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他们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他们认为:“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后七子”左右文坛的时间比“前七子”要长,他们之间的文学主张也有不少差异,并且有所变化和发展。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认为

“历观十四家之作,咸可为法”,“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待到李攀龙声名大盛,更把复古理论推向极端,“谓文有两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当时还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影响更为深广。就在这声势大盛的发展过程中,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运动中某些流弊,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有取于宋元诗。并且,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常用直写性灵为其赞词。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所以他们创作中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七言律诗方面皆有一定功力,如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阔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一些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诗句重复雷同的现象。后来,在公安派、竟陵派的极力反对下,“后七子”的诗文理论已不能左右文坛。但是,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李因笃、朱彝尊、屈大均、毛奇龄的手眼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其影响。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

(尹恭弘)

【王李】 明代诗文家王世贞和李攀龙的并称。二人为“后七子”的首领,名并重于世。《明史·李攀龙传》云:“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清黄宗羲《七怪》云:“应酬之下,本无所谓文章,而黠者妄谈家数曰:吾本王李,风雅之正宗也。”参见“后七子”。

(吴小林)

【李何王李】 明“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和“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龙的合称。《明史·李梦阳传》云:“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与(何)景明、……号七才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参见“前七子”、“后七子”。

(吴小林)

【海内三才】 明中叶诗人李梦阳、何景明与王世贞的合称。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当弘、正时,李、何、王号‘海内三才’”。李、何与王分别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均是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主要作家。参见“前七子”、“后七子”。

(张国光)

【前五子】 明“后七子”成员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的合称。《明史·王世贞传》云:“世

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参见“后七子”。(吴小林)

【后五子】明嘉靖、隆庆年间诗文作者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一作允)、张九一的合称。《明史·王世贞传》云:“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五人皆与王世贞相交游,受“后七子”所倡导的诗文复古运动影响甚深。其中汪道昆(字伯玉)曾受到王世贞所著《艺苑卮言》的称誉:“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余和二张则是王世贞所云“吾党有三甫”中的“三甫”,后加入魏裳则为“四甫”。(吴小林)

【广五子】明嘉靖、隆庆年间诗文作者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的合称。《明史·王世贞传》云:“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濬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五子皆与王世贞相交游,受“后七子”所倡导的诗文复古运动影响甚深。

(吴小林)

【续五子】明嘉靖、隆庆年间诗文作家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炏、赵用贤的合称。《明史·王世贞传》云:“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炏、常熟赵用贤也。”五人皆与王世贞相交游,受“后七子”所倡导的诗文复古运动影响甚深。

(吴小林)

【末五子】明嘉靖、隆庆年间诗文作家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赵用贤的合称。《明史·王世贞传》云:“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谿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五人皆与王世贞相交游,有的在他推引下走上文坛,受其影响甚深,然因年代较晚,已属“后七子”诗文复古运动的末流。其中李维桢诗文创制良莠杂陈,亦有些可读之作;屠隆、胡应麟在诗文理论上较有建树,某些观点已对复古思潮有所突破。

(吴小林)

【嘉定四先生】明万历、天启间嘉定诗人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的合称。《明史·唐时升传》:“四明谢三宾知县事,合时升、坚、嘉燧及李流芳诗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故称。四人均不满于当时诗坛剽窃模拟之风,以清新自然的作品矫之。其中唐诗清浅和畅,娄诗真率平易,程诗清丽温婉,李诗清雅简淡。

(张国风)

【练川三老】明万历、天启年间嘉定诗人唐时升、娄坚、程嘉燧的合称。《明史·唐时升传》:“(唐时升)与里人娄坚、程嘉燧并称曰‘练川三老’。”唐为嘉定县人,其南有练祁塘,又名练川,故称。三人加上李流芳,又称“嘉定四先生”,参见该条。(吴小林)

【三甫】明嘉靖、隆庆年间诗人余曰德、张佳允、

张九一的合称。余曰德字德甫,张佳允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故称“三甫”。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曰:“自是吾党有‘三甫’。肖甫之雄爽流畅,明甫之奇秀超诣,德甫之精严稳称,皆吾所不及也。”清姚之駉《元明事类钞·人品二·三甫》云:“嘉靖中,五子创诗社于长安,于鳞出守,元美为政,南昌余德甫、铜梁张肖甫及助甫相继入焉,是谓‘七子’。元美所谓‘吾党有三甫’是也。”清吴景旭《历代诗话·五子七子》云:“东郡谢茂秦榛、济南李于鳞攀龙、吴郡王元美世贞、长兴徐子与中行、广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实有誉,于时称五子,实六子也。……又益以南昌余德甫曰德,铜梁张肖甫佳允,则所谓七子者也。又有新蔡张助甫九一,与德甫、肖甫相继入七子社者,此元美所云‘吾党有三甫’也。”(吴小林)

【四甫】明嘉靖、隆庆年间诗文作者余曰德、张佳允、张九一、魏裳的合称。在“三甫”,即余曰德字德甫、张佳允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之后,魏裳亦投王世贞门下,魏字顺甫,故称“四甫”。参见“三甫”。

(吴小林)

【吴中四才子】明成化、正德间徐祯卿、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四位诗人的合称。《明史·徐祯卿传》:“(徐)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徐祯卿论诗重情,作诗熔炼精警,被人称作“吴中诗人之冠。”(同上)为“前七子”之一。祝允明诗取材宏富,造语颇妍。唐寅以画名,于诗文不甚措意,然其诗虽不计工拙,亦才气烂漫,时复斐然。文徵明诗,雅饰之中,时饶逸韵。四人于复古之风大炽之时,独立不倚,以抒写心情为作诗第一义,颇难能可贵。

(张国风)

【海岱诗社】明中叶山东的诗歌社团。主要成员有石成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活动时间在嘉靖十四年(1535)至十六年(1537)之间。他们互相唱和的诗大多写景状物,自适性情,风格清新淡远,颇有可诵之作。后编成《海岱会集》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

(吴小林)

【锡山四友】明无锡诗人华察、施渐、王懋明、姚咨的并称。“四友”在嘉靖年间以诗著名于时。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山人懋明》条云:“同时有姚咨者,字舜咨,隐居锡山,教授乡里,与仅约(王懋明字仅约)初俱客于学士,日相倡和。时以子潜(华察字子潜)、舜咨及施子羽(施渐字子羽)为锡山四友。”“四友”诗多酬谢赠答之作,内容比较贫乏,但风格却清新雅丽,其中华察以五言为工,施渐以七言见长,成就较高亦较有影响。

(管士光)

【公安派】 明万历年间的诗文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人物。因“三袁”的籍贯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称。该派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公安派”可谓异军突起。此派成员的文学思想受到李贽的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对当时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发展,文学也应随之发展,“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他们反对摹拟古人,提出“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袁宏道《叙小修诗》),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中道《花雪赋引》)基于这样的认识,公安派致力于解除对文学的各种束缚,求得文体的解放,至有“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的评价。其二,主张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要求文学作品要抒发作家的真实感情,表现作家的个性。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针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们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所以应该“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蒲碧堂集序》)。总之,公安派主张创作要有个性,要表现真情实感,只有“抒性灵”的作品、“从自己胸臆流出”的作品,才可能“令人夺魂”(袁宏道《小修集序》)。其三,公安派认为:文学要有一定的内容,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内容,则会空泛,故而他们认为“物之传者必以质”(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其四,与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和创新论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小说、戏曲创作,提倡通俗文学。他们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认为《西厢记》、《水浒传》,“皆古今至文”,如袁宏道不仅以民歌为诗,而且还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主张,十分新颖和大胆,在当时很有影响,但也遭到传统派文人的批评与攻击,正如鲁迅所说:“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实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公安派作家较长于散文,他们的游记、尺牍、小品或秀丽清雅,或风趣活泼,很有特色。还有一些作品抨击时政,表现出对道学的不满。但总的看,他们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抒写“文人雅士”的闲情逸志、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这与他们消极避

世的态度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诗歌题材十分狭窄,内容贫乏,而诗风又较为轻佻,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云:“三袁诗人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这段话虽然不无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公安派”的风格对清代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都有影响。

(管士光)

【公安体】 明末公安派作家的一种诗文体制风格。其特点是:个性鲜明,语言流畅,文风清新活泼,但又难免有轻佻、纤巧之弊。《明史·袁宏道传》云:“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参见“公安派”、“三袁”。

(管士光)

【三袁】 明后期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的并称。《明史·袁宏道传》云:“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三袁”是“公安派”的代表作家,其中袁宗道是发起者,即所谓“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庶子宗道》);袁宏道是主将,为该派的理论代表和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著者;袁中道则进一步发展了该派的影响。参见“公安派”、“公安体”。

(管士光)

【竟陵派】 明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钟、谭二人均为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明史·袁宏道传》云:“自宏道矫王(世贞)、李(攀龙)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此派在文学上的主张与公安派有共同的方面,他们也反对拟古,提出“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认为摹拟古人词句,只能“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谭元春《诗归序》)。他们主张文学要抒写性灵,而“性灵”只有从古人诗文中才能得到,所编《古诗归》、《唐诗归》即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钟惺《诗归序》)。他们的主张虽与公安派有相同之处,但他们认为公安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故而他们追求“幽情单绪”、“孤

行静寄”的意境,其诗多写孤僻冷漠的情怀和观赏山水风光时的自得情绪,从而形成了竟陵派创作的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且常用怪字、押险韵,冷僻苦涩,佶屈聱牙,导致其作品艰涩费解,脱离现实,致使后人字哑句谜、几无完篇之评,只有少数作品可取。此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受此派文风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管士光)

【竟陵体】 明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诗人的诗歌体制风格。参见“竟陵派”。

(管士光)

【钟谭】 明后期文学家钟惺、谭元春的并称。二人均为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是“竟陵派”的代表作家,二人同选《古诗归》、《唐诗归》,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诗风,一时名声甚赫,世称“钟谭”。参见“竟陵派”。

(管士光)

【晋安二徐】 明诗人徐燧、徐渤兄弟二人的并称,因是福建晋安人,故名。清陈田《明诗纪事》云:“余博览篇章,精核艺藪(万历一朝),着区海相之清音亮节,归季思之淡思远韵……晋安二徐抑其次也。”“二徐”所作效法唐人,其诗多写个人生活,内容较为贫乏,风格及艺术特色亦不突出,但在竟陵派盛行之时,他们能坚持己见,颇难能可贵。“二徐”曾刻意吟咏并选闽中先辈所作为《晋安风雅》集,对闽中诗坛很有影响。因为徐燧字兴公,所以亦有人称“二徐”为“兴公诗派”。

(管士光)

【苕溪五隐】 明武宗正德间诗人孙一元、刘麟、龙霓、陆昆、吴疏的并称。因五人均是隐逸诗人,结成诗社名“苕溪社”,故名“苕溪五隐”。《明史·孙一元传》云:“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佾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陆昆善。而长兴吴疏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疏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五隐”在复古风气浓郁之时能自持己见,其诗多写山水风光,以寄托自己恬淡闲雅的心境,风格清新高雅、自然流畅。其中以孙一元、刘麟二人成就最高,他们的佳作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他三人所作则较为逊色。

(管士光)

【复社】 明末的一个文社组织。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幾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江南应社及黄州质社等许多小社集合而成,规模之大,联系群众之广,为历史上所少见。据史料记载,该社春社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复社”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娄东二张”之称的张溥、张采,主要成员有黄宗羲、陈贞慧、吴应箕、陈子龙、孙临、杨廷枢等人。

此社的宗旨是“期与四方文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明眉史氏《复社纪略》)。表面看,“复社”只是一个文化团体,其主要任务是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实际上这个文社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该社的出现是东林党同阉党斗争的继续,其成员多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的影响,主张复古,但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又大都积极参加了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所主张的“复古”,实际是要求古为今用,古学要为现实服务。他们的一些作品,能较注意反映社会生活,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因此,复社成员的“复古”实与前后七子的拟古有很大区别,又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文风有明显的不同。复社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有较高成就的是吴伟业、陈子龙等人,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艺术上凝炼深沉,别具一格;散文方面有较高成就的是张溥、黄淳耀、侯方域等,均各具特色。复社成员与魏忠贤、徐党、马士英等人以及清统治者进行过长期斗争,或者被害身亡,或者抗清赴难,一直到清顺治九年(1652),复社才被迫解散。

(管士光)

【幾社】 明末的一个文社组织。崇祯初年创立于江苏松江,倡导人为所谓“幾社六子”,即夏允彝、杜磨徵、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另外还有王光承、何刚等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先君子与彝仲有幾社六子会义之刻。幾者,绝学有再兴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义也。”幾社曾经并入复社,但其成员不卷入政治派别之争。每逢三、六、九则雅集赋诗,最兴盛的时候,社友多至百余人。幾社成员的文学观点与复社相同,受前后七子影响很深,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企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反对公安、竟陵两派的抒写性灵之说,讲究文章气节,崇尚《文选》,曾仿《文选》体,将会友文章汇刻为《幾社壬申文选》及《幾社会义》。所作诗文,对时政混浊、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风格大多雄浑、悲壮。其代表作家有陈子龙、夏完淳等。入清以后,幾社分成若干小社,还有人逃亡国外,组织“海外幾社”,因统治者严禁结社,幾社于康熙初年被迫终结。

(管士光)

【娄东二张】 明末文学家张溥、张采的并称。二张为江苏太仓人,太仓有娄江东流过境,故名“娄东”。《明史·张溥传》云:“(张溥)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二人是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在文学理论上拥护前后七子的主张,力主文学复古,后来观点又有所改变,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渐有不

同。张溥虽有不少诗作,但散文成就更高,风格亢爽质朴,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等;张采诗作较突出,题材多样,风格沉郁典雅。(管士光)

【娄东三凤】 明江苏诗人张泰、陆钺、陆容的并称。《明史·张泰传》云:“张泰,字亨父,太仓人;陆钺,字鼎仪,昆山人;陆容,字文量,亦太仓人。三人少齐名,号‘娄东三凤’。”“三凤”的文学主张受李东阳影响很大,其中张泰成就较高,他的诗风格恬淡,较少“台阁体”气息,其次是陆钺,其诗以清淡闲适见长;陆容的诗极为平常,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在“三凤”中影响最小。(管士光)

【云间诗派】 明末清初的一个诗歌流派。倡导者是陈子龙和李雯,成员有夏完淳、黄淳耀、宋徵舆等人。因参加者均为云间(即今上海松江)人,故名。此派诗人接受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论诗主张摹拟前人,追求形似。他们的作品大都内容较为狭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巨变,他们的思想也受到震动而有所转化。其中如陈子龙、夏完淳等都先后参加了复社和幾社,投身于抗清斗争,其作品往往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夏完淳的《军中有作》、《细林野哭》、《易水歌》、《江城》等都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之作,表现出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该派其他诗人也写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的篇章,风格各有不同,其成就远不如陈子龙和夏完淳。参见“云间三子”。(管士光)

【云间三子】 明末清初诗人陈子龙、宋徵舆、李雯的并称。因为他们均是“云间派”诗人,故名。清吴伟业《梅村诗话》云:“陈子龙,字卧子,云间华亭人……初与夏考功璠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暗公同起,而李舒章(李雯字舒章)持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继得辕文(宋徵舆字辕文),又号三子诗,然皆不及。”“三子”受前七子影响,宗法盛唐,主张复古,曾合编《明诗选》以宣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其诗作题材较为广泛,不乏反映明末民生疾苦之作。明亡后亦多有怀念故国的诗篇,风格较为沉郁悲凉。“三子”中尤以陈子龙成就最高,他虽然也接受了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但却不主张盲目拟古,诗除少部分摹拟痕迹明显外,绝大多数都能面对现实,有感而发,其中既有对明王朝腐败现实的不满和抨击,明亡后,又有对故国的怀念,感情真挚而炽烈,如《秋日杂感》等均是感人至深的作品。其诗长于状物,妙于托意,尤其擅长七古和七律。明胡应麟《诗薮》评其诗为“格高气逸,韵远思深。”宋、李二人入清后均中举、入仕,受到时人的指责,但他们的诗作还是很有特色的。(管士光)

【四公子】 明末文学家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

冒襄的并称,因为他们成名时均为青年,又出身于官宦家庭,故名。《清史稿·冒襄传》云:“襄十岁能诗……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四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在南京应试,成为好友,一起参加了复社。明亡后,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或应试,或为僧,或隐居。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亦多种多样。其中以侯方域的成就最高,他早年即以诗文名扬天下,明亡后又致力于写作散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侯方域的文富有气势,诗亦多感慨时事。其他三人的诗文作品也多有佳作。另外,时人亦称侯方域、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为“四公子”。(管士光)

【归奇顾怪】 明末清初诗人归庄顾炎武的并称。清同治《苏州府志》载:“(归庄)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目。”此主要指二人在明、清易代之际佯狂玩世,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的为人作风。与此相联系,归、顾抒写国破家亡沉痛感情的诗篇,磊落不平,恣肆奇崛,亦颇具“奇”、“怪”之特征。(王自周)

【惊隐诗社】 清初的一个爱国诗社。又名“逃社”,意思是暂时逃避以谋再举。创始人是抗清义军领袖吴振远、吴宗潜、叶恒奏,于清顺治七年(1650)在江苏吴江成立。诗社的成员先后有五十余人,顾炎武等人亦曾参加过诗社的活动。有些重要成员,如潘怪章、吴炎等人均被清统治者杀害。诗社被迫于康熙三年(1664)解散。成员的作品大都抒写故国之思,即使是描写山水风光和隐逸生活的诗作,亦有浓厚的眷念故国的情绪。风格以明快激昂为主。此社诗人佳作颇多,在当时很有影响。(管士光)

【江左三大家】 ①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与龚鼎孳的合称。清沈德潜《清诗别裁》卷一载“合肥声与钱吴近”,“时有合钱吴为三家”。龚鼎孳为安徽合肥人,钱、吴为江苏人,江苏属旧江左地区,故名。顾有孝、赵沅曾合辑《江左三大家诗钞》。三家诗多反映明、清之际社会乱离和民生疾苦之作,抒发个人内心彷徨苦闷,对仕清之举皆有所愧悔。三人中,钱文学成就最高,其诗学主张力斥明七子,崇宋调,并创虞山诗派,主盟文坛五十馀载,开一代诗风。吴倡唐声而博取,为娄东诗派之首。其七言歌行仿香山,创“梅村体”,多摹明季清初人物情态,为中国古典叙事诗又一重要发展。龚在三家诗中成就最低,多宴饮登临之篇,模拟痕迹较重,在诗歌史上无甚影响。②清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袁枚、赵翼的合称。袁、赵为江、浙人,江、浙属旧江左地区,故名。又称“江右三大家”,详见该条。(王自周)

【虞山诗派】 明末清初诗歌流派。开创者为钱谦

益,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西北有虞山,因此得名。虞山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严熊与杨烱等。该诗派强调“舒写性情”,推陈出新,力排明七子“诗必盛唐”复古主张,推仰宋调,与同时吴伟业为首的倡扬唐诗、倾向明七子的娄东诗派相对立。其诗内容或抒发兴亡之感,或反映民生疾苦,皆有真情流露。艺术上能摆脱模拟陈习,兼学博取,追求神似,不拘形迹,颇有独特之处。(王自周)

【海虞二冯】明末清初虞山派诗人冯舒、冯班兄弟的并称。二冯是清初诗人钱谦益所创虞山诗派的主要成员,深得钱谦益赞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班与其兄舒,皆以诗名一时,称‘海虞二冯’。”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冯班》条云:“冯班,号钝吟居士,明诸生。少与兄舒齐名,称海虞二冯。”二人中以冯班的成就及影响更大,康熙间著名诗人赵执信对其极为服膺,竟至于亲临常熟,在其墓前自称私淑门人。(王自周)

【梅村体】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诗歌体制风格。因吴伟业号梅村,故名。吴伟业久负诗坛盛名,早期诗以绮丽风华见长,反映生活不够深刻;明亡后,身经丧乱,诗多寓身世之感,诗风颇为沉郁苍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云:“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道上。”诗以七言著称,尤长于七言歌行,取法盛唐诸大家及中唐之元稹、白居易,而又善于创新。所作大多文词清丽,情韵悠然,既含蓄委婉又明快爽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作有讽刺吴三桂降清的《圆圆曲》,写艺人飘零沦落的《楚两生行》,颂扬抗清将领的《临江参军行》,具体描写清兵入关以后广大人民困苦情状的《捉船行》。其他如《松山哀》、《永和宫词》、《听女道士下玉京弹琴》、以及《鸳湖曲》等均是体现吴伟业诗歌风格特色的优秀作品。(管士光)

【娄东诗派】明末清初诗歌流派。开创者为吴伟业,主要成员有王昊、黄与坚、吴兆骞、陈维崧、周肇等。因其多为江苏太仓人,太仓有娄江,别名娄东,故名。又,吴伟业号“梅村”,因之该派亦称“梅村派”。该派诗歌主张倾向明七子,推崇唐诗,但并不墨守于盛唐,而对中唐白居易、宋代陆游等大家亦能有所借鉴。吴伟业为该派之领袖,其所创七言歌行叙事诗中清丽谐美,委婉流畅的“梅村体”,广为成员们所仿效。(王自周)

【娄东十子】明末清初娄东诗派中十位诗人的并称。《清史稿·黄与坚传》载:“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黄)与坚为冠。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撰、王抃、王曜升、顾湄也。”“十子”皆追

随娄东诗派首领吴伟业,推崇唐诗,争相仿效其所创“梅村体”,虽有一定创作业绩,但成就远不如吴。

(王自周)

【宁都三魏】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祥(后改名际瑞)、弟魏礼的合称。三人为宁都(今属江西)人,皆有文名,故称。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故四·征聘不至》云:“唯魏(禧)以古文擅名,其兄际瑞、弟礼,皆有诗名,时号‘宁都三魏’。”其文集亦合编为《宁都三魏全集》。其中以魏禧成就最高。

(吴小林)

【易堂九子】清初文学家魏禧、魏际瑞、魏礼、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和曾灿的合称。清李元度《国朝先生事略·魏叔子先生事略》条云:“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庵、确斋外,曰李腾蛟咸斋、邱维屏邦士、彭任中叔、曾灿青藜。”魏禧之父魏兆凤在明亡后,削发隐居于江西宁都翠微峰,其室名为“易堂”。魏禧等九人亦不求仕进,隐于山中,聚居于此,故名。清人《游翠微峰记一》云:“自宁都西郭外,北望群山,有虎而居者,二峰若相负,北峰为翠微峰,易堂九子讲学之所。”“九子”提倡古文实学,影响很大,其中犹以魏禧成就最高,其余诸人造诣不同,各有特色,亦有不少佳作名篇。道光年间,彭玉雯编有《易堂九子文钞》。“九子”中亦有以诗著称者,如魏际瑞、魏礼、彭士望、曾灿等皆是。(管士光)

【河朔诗派】清初诗歌流派。开创者为申涵光。王士禛《渔洋诗话》:“申凫盟涵光称诗广平,开河朔诗派。”成员主要有殷岳、殷渊、张盖、杨思圣等。他们于清初均无意仕进,诗作多半为辞官归隐生活之吟咏及对清朝统治不满情绪的抒发,间亦有民瘼之描绘,诗意真挚清新。其中申涵光的成就最高,《清史稿·申涵光传》云:“涵光为诗,吞吐众流,纳之炉冶。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高、岑、王、孟诸家。”他又与殷岳、张盖并称“广平三君”,参见该条。

(王自周)

【广平三君】清初河朔派诗人申涵光、殷岳、张盖的并称。《清史稿·申涵光传》云:申涵光“归里,事亲课弟,足绝城市,日与殷岳及同里张盖相往来酬和,人号为‘广平三君’。”三人中,申涵光诗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学工部而得浑厚之气,较有功力,并创河朔诗派。

(王自周)

【岭南七子】清初广东七位诗人的合称。《清史稿·陈恭尹传》载:“梁佩兰负诗名……结兰湖社,与同邑程可则、番禺王邦畿、方殿元及恭尹等称‘岭南七子’。”除上列五人外,还有方殿元之子方远、方朝。七子中梁佩兰和陈恭尹影响较大,二人又与诗人屈

大均并称为“岭南三大家”。其余诸人成就均不著。

(王自周)

【北田五子】 清初广东诗人陈恭尹、陶竄、梁无技、何衡、何绛的并称。《清史稿·陈恭尹传》云：“(陈恭尹)久之归，主何衡家，与陶竄、梁无技及衡弟绛相砥砺，世称‘北田五子’。”“五子”中陈恭尹诗名最盛，他在文学上主张创新，反对拟古，擅长七古、七律，诗风既豪迈雄奇，又蕴藉含蓄，为“岭南三大家”之一。其他诸人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各异，其成就均平平，不能与陈恭尹相比。

(管士光)

【岭南三子】 清广东诗人张锦芳、冯敏昌与胡亦常的并称。《清史稿·文苑传》载：“锦芳……与钦州冯敏昌、同邑胡亦常称‘岭南三子’。”三子中，冯敏昌诗影响较大。其诗雄放怪奇，被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作“岿然为岭南大宗”。胡亦常诗妙语天成，自成一格。张锦芳虽不乏清新之处，成就终不比冯、胡。

(王自周)

【岭南三大家】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并称。由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王隼所编《岭南三大家集》而得名。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云：“王隼尝选佩兰及屈大均、陈恭尹之诗，为《岭南三大家诗选》，隐以抗‘江左三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居里邻近，时相过从，在创作上互相推重，在当时岭南一带享有盛名，但他们的生活道路、生活情趣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有很大的区别。屈大均曾参加反清活动，以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靠务农、买文为生，其诗学盛唐，尤长于五言，有不少不满清朝统治、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陈恭尹也曾积极参加反清斗争，后拒与清统治者合作，在文学上主张创新，反对拟古，长于七言，七律成就尤高，诗作题材与屈大均相近。梁佩兰曾多次应试，后出仕清廷，其诗受前后七子影响较深，尤长于七言古体诗，早期模拟汉魏及唐诗，多为奉酬赠答之作，后虽有改进，但模仿痕迹仍很明显，故其成就逊于屈、陈二人。三人艺术风格之不同，王焘《岭南三大家诗选序》认为梁佩兰的诗“温厚和平，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璉主璧”；屈大均的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陈恭尹的诗“如哲匠当前，众材就正，运斤成风，既无枉挠，亦无废弃，梁栋榱题，各适其用，准程规矩，不得不推为工师”。所评甚确。

(管士光)

【三君】 ①指清初诗人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清王士禛《渔洋诗话》云：“南海耆旧，屈大均翁山，梁佩兰菜亭，陈恭尹元孝齐名，号‘三君’。”三人又有“岭南三大家”之称，详见该条。②指清中叶诗人舒

位、王昙、孙原湘。因当时诗人法式善为三人作《三君咏》(见《存素堂诗稿·初集录》卷一四)而得名。三人皆深受袁枚的影响，为“性灵派”的重要诗人。

(吴小林)

【江左三凤凰】 指清初文学家陈维崧、吴兆骞及彭师度。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吴兆骞》载，吴伟业将吴兆骞“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共目为‘江左三凤凰’”。三人少年时皆才华过人，故有此称。后各人文学上的发展情况很不相同。陈维崧诗词并长，词尤为有名，创阳羨词派。吴兆骞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彭师度，则文名甚微。

(王自周)

【国朝六家】 指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赵执信。乾隆中刘执玉合辑《国朝六家诗钞》，选录六人诗歌，因此而得名。六家中以施、宋、朱、王较为著名，分别并称为“南施北宋”、“南朱北王”，又合称为“国朝四大家”。参见“南施北宋”、“南朱北王”诸条。

(吴小林)

【南施北宋】 清初诗人施闰章与宋琬的并称。施为安徽宣城人，宋为山东莱阳人，齐名于时，故名。清王士禛《池北偶谈·施宋》条载：“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施诗长于五言，尤工五言律诗，较多描绘民众苦难生活，风格淡雅。宋诗工于七言，尤长七言古诗，多抒发个人抑郁苦愁之情，诗风雄浑。两人各擅胜场，同为清初诗坛之大家。

(王自周)

【宣城体】 清初施闰章、高咏的诗歌体制风格。二人为宣城人，故名。《清史稿·施闰章传》云：“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施、高尊唐抑宋，主张作诗要有学力，言之有物。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揭露时弊、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大都朴实自然，风格清新明快。二人相较，高咏的成就不如施闰章，尤其是他后来作了官，诗的题材更加狭窄，诗风也有很大变化。

(管士光)

【燕台七子】 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丁澎、张文光、严沆、赵宾、陈祚明的合称。《清史稿·宋琬传》载：“始婉官京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辈酬唱，有‘燕台七子’之目。”吴振棫《国朝杭郡诗槁》载：“(丁澎)归与祥符张文光、汴州赵宾、莱阳宋琬、宣州施闰章、余杭严沆、仁和陈祚明相唱和，号‘燕台七子’。”“燕台”指北京。“七子”诗作多公馀往来酬赠唱答之歌吟。其中，宋琬、施闰章二人在后来的发展中，诗歌创作较有成就，影响也较大，有“南施北宋”并称之誉。另外五位诗人除丁澎七言律体为诗坛注目外，其余均声名不大。丁澎与严沆曾合辑《燕台七子诗刻》。

(王自周)

【辽东三老】 清初辽东诗人陈景元、戴亨、长海的并称。《清史稿·李锴传》云：“陈景元，字石闾，汉军镶红旗人，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与戴亨、长海为‘辽东三老。’”“三老”虽然均为满族世家，却都喜欢隐居生活，不求仕进，其诗多描写山水田园风光，风格恬淡闲雅。“三老”中陈景元诗最工，风格清奇；戴亨之作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特色；长海的作品较之陈、戴则较为逊色。（管士光）

【陆陈盛江四君子】 明末清初诗人陈瑚、陆世仪、江士韶、盛敬的合称。四人均属太仓（今属江苏）人。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陈瑚》条云：“（陈瑚）少与陆世仪定交……同里共学者，尚有盛敬字圣传，江士韶虞九，人称‘陆陈盛江四君子’。”明亡后，“四君子”不求仕进，隐居乡间著书立说，写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中尤以陈、陆成就最高。陈瑚诗多抒兴亡之感，风格沉郁；陆世仪诗描绘细致，感情充沛，风格雄浑。（管士光）

【西泠十子】 清初杭州诗人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的并称。西泠是杭州西湖桥名，陆圻等结诗社于湖上，时人因以名之。《清史稿·陆圻传》云：“先是陈子龙为登楼社，圻、澎及同里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并起，世号‘西泠十子’。”“十子”论诗受明前后七子影响，诗作有拟古倾向，工于七言律诗。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云：“陆圻字丽京，号讲山。武林耆宿，为西泠十子之冠。”陆圻早有诗名，其诗内容较广泛，有不少不满现实之作。陆圻之外，柴绍炳、毛先舒、丁澎、张丹的诗亦各有特色。其他诸人所作平平，没有什么影响。柴绍炳与毛先舒曾自订《十子诗选》。（管士光）

【三丁】 清初诗人丁澎、丁景鸿、丁淦兄弟三人的并称。《清史稿·陆圻传》云：“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有隼才……弟景鸿、淦并能文，时有‘三丁’之目。”“三丁”中间，丁澎诗学晚唐，擅长七律，诗名较大，是“西泠十子”的重要成员，丁景鸿、丁淦诗名不显，作品亦无突出的特色。（管士光）

【诗中十子】 亦称“金台十子”。清代十位诗人的并称。《清史稿·尤侗传》曰：“曹乐，……与田雯、宋荦、汪懋麟、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称‘诗中十子’。”“十子”曾于北京唱和，为世注目。诗作多个人生活闲情逸志之歌吟。诗风各有特色，以曹贞吉的成就为最高，其七言古体慷慨悲歌，名显一时。王士禛编有《十子诗略》传世。（王自周）

【金台十子】 见“诗中十子”。

【神韵派】 清康熙、雍正年间的诗歌流派。王士

禛为其领袖，他的“神韵说”为其论诗主张，故名。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王揆说他论诗“独标神韵”（《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清史稿》也说王士禛“独以神韵为宗”。据清人翁方纲说，王士禛提倡“神韵说”，目的在“于李、何一辈冒袭伪体之后，欲以清淡矫之，此亦势不得不然”。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最早见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竹》诗中均涉及此词。王士禛在前人基础上，赋予“神韵”二字以新的更深刻的内涵，与前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王士禛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因此他的“神韵说”与南朝梁钟嵘的“滋味说”、唐司空图的“韵味说”、宋严羽的“兴趣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王士禛论诗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和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意境，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诗之最高境界，对严羽“以禅喻诗”和借禅喻诗深表赞许，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色相俱空”的境界。他早年编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后又选《唐贤三昧集》，排斥李、杜，专选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派中“冲和淡远”之作。神韵说对纠正当时专学盛唐的肤廓、晚唐的纤丽和宋人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有积极作用，因此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在清前期统治几达百年，追随者不乏其人。从根本上说，此派以远离现实为旨归，他们没有注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故而他们的作品多表现个人的闲情逸志，追求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描写自然景物很工致，富有诗情画意，但却较少涉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有脱离现实的明显缺陷。该派诗论及其作品曾遭到当时和后人较多的批评与讥议，甚至同样标榜神韵的翁方纲也批评王士禛“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他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却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神韵论》）。这个评语较为公允。参见“神韵”。（管士光）

【渔洋体】 清代诗人王士禛的诗歌体制风格。因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故名。王士禛是清诗一大家，在钱谦益、吴伟业之后，主持文坛达数十年之久，清宋荦云：“五十余年，海内学者仰如泰山北斗。”王士禛论诗标举“神韵说”，以清淡闲远为尚，追求空寂超逸的境界，在当时很有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既而宋元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纤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王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

下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渔洋体”的诗作，从内容上看，主要描写山水田园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从风格上看，大都清新淡雅，追求幽远含蓄的意境。最能体现王士禛风格的是五七言近体诗，尤以七言绝句最能表现“神韵”特色，其中如《秦淮杂诗》、《江上》、《雨中度故关》、《藤花山下》、《真州绝句》、《露筋祠》、《灞桥寄内》、《夹江道中》等均是渔洋体的代表作品。参见“神韵派”。

(管士光)

【南朱北王】 清初诗人朱彝尊与王士禛的并称。因朱为浙江秀水人，王为山东新城人，故称。又名“南北两大诗人”，“二大家”。朱诗众体兼备，富赡博奥，领袖浙派诗坛。王诗力倡神韵，继钱谦益、吴伟业后主盟诗坛近四十载。两人各具所长，各有千秋。清全祖望评曰：“国朝诸老诗伯，阮亭（王士禛）以风调神韵擅场于北，竹垞（朱彝尊）以才藻魄力独步于南，同岑导荅，屹然双峙。”（《鮑琦亭集·莺脰山房诗集序》）

(王自周)

【彭王】 清初文学家彭孙遹、王士禛的并称。《清史稿·彭孙遹传》云：彭“素工词章，与王士禛齐名，号曰‘彭王’”。彭诗词兼擅，所作诗“才学富赡，词采清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主要以诗名，创“神韵”之说，其文学成就和影响较彭为大。（王自周）

【王门二弟子】 指清诗人王士禛的弟子史申义、汤右曾。《清史稿·史申义传》云：“王士禛以风雅诏后进，尝谓史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己衣钵，人称‘王门二弟子’。”二人作诗学王士禛，追求神韵，虽亦有一些风致俊逸之作，但大多为写景咏物、赠答唱和的篇什。其中史申义较著名，与同乡顾图河并称“维扬二妙”，又与周起渭并称“翰苑两诗人”参见该两条。

(王自周)

【维扬二妙】 清诗人史申义、顾图河的并称。史、顾为江都人，江都即今江苏扬州，维扬为扬州的别称，故名。《清史稿·史申义传》云：“史申义，字叔时，江都人，少工诗，与同里顾图河齐名，称‘维扬二妙’。”二人皆有才气，然所作诗内容较狭窄。比较言之，史诗清俊细腻，顾诗恢奇雄肆，各具特色。

(王自周)

【翰苑两诗人】 指清诗人史申义、周起渭。《清史稿·史申义传》载：史申义“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史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林两诗人’之目。”两诗人为诗多咏物酬答之作，内容欠深广。风格相较，史诗清远，周诗豪放。

(王自周)

【四布衣】 指清初四位诗人，因他们均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词科，故名。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四布衣》

条云：“上尝问内阁及内直诸臣以布衣四人名，即富平李因笃、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秀水朱彝尊也。”四人均善诗，文学成就各不相同；李因笃较长于五言排律，其诗崇尚朴厚，不堆砌词藻，风格慷慨悲凉。姜宸英诗多抒怀兴感，较为沉郁浓烈。严绳孙诗多咏山水风光，风格清新自然。朱彝尊的成就最高，诗、词、文均有名篇佳作，而以词为主，是浙派词人的领袖。姜、严、朱三人又有“海内三布衣”之称，参见该条。

(管士光)

【海内三布衣】 指清姜宸英、朱彝尊、严绳孙三位文学家。《清史稿·姜宸英传》云：“宸英绩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踰于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曰宸英及朱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又因其都为江南人，故亦称“江南三布衣”。三人都曾长期在家乡以普通布衣写诗作文，名播一时，清康熙皇帝又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词科，故名。三人中，朱文学成就最著，其诗、词、文均有建树。又与著名诗人王士禛并称“南宋北王”，参见该条。

(王自周)

【浙派】 清代的一个诗派，形成于清中叶，因其发起人朱彝尊是浙西人，故名。该派主要成员有查慎行、杭世骏、厉鹗、符曾、汪沆等人。他们推崇宋诗，注重学问，追求“幽新”的艺术境界。作品内容狭窄，除歌功颂德外便是个人生活和酬答赠谢之作，在艺术上喜欢堆砌词藻，爱用孤僻的典故，故有晦涩难懂的弱点，其代表诗人是厉鹗；也有少数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如查慎行的部分诗作。

(管士光)

【查初白体】 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歌体制风格。因查慎行号他山，又号初白，故名。查慎行论诗宗宋，受陆游、苏轼影响较大，主张重意不重辞，以空灵创新为尚。他认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词话》）。其诗多纪行旅，善用白描，刻画工细，意境浑成。袁枚《论诗绝句》将其拟之为北宋画家李公麟：“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代表作有《麻阳运船行》、《白杨堤晚泊》、《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清初诗人大多学唐，而查慎行崇宋，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当时的诗坛有很大影响。清赵翼云：自吴伟业以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瓠北诗话》卷一〇）。

(管士光)

【惠门八子】 指清雍正、乾隆年间广东何梦瑶等八位诗人。《清史稿·何梦瑶传》云：“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

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何梦瑶在“八子”中诗名最著,早年曾与罗天尺、苏珥结“南香诗社”,称盛一时。余七人诗歌成就均不高。(王自周)

【广陵五宗】 指清广陵(今江苏扬州)诗人宗元鼎、宗元豫、宗元观与宗子瑾、宗子瑜。《清史稿·冯班传》载:“元鼎与从弟元豫、元观,从子子瑾、子瑜皆工诗,有‘广陵五宗’之目。”他们论诗受王士禛神韵说影响甚著。诗作多吟咏琐屑之事,内容欠深广。其中宗元鼎诗成就较高,风格婉丽秀逸,体裁以七绝为长。(王自周)

【蕉园诗社】 清康熙年间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一个女子诗社。闺中少女林以宁与其姑顾玉蕊均工诗文,故邀请当地善作诗文的女子组成诗社,定时雅集,唱和赋诗,名为“蕉园诗社”。主要参加者是五人,又号称“蕉园五子”,即林以宁、徐灿、柴静仪、朱柔则、钱云仪。后林以宁重建“蕉园七子社”,由林以宁、柴静仪、钱云仪、张槎云、毛安芳、冯又会、顾启姬组成。她们的诗多写闺中情思和山水风景,风格较为清新细腻。数名才女结社联吟,一时在西子湖畔传为佳话。(管士光)

【格调派】 清乾隆年间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因该派标举“格调说”,故名。“格调说”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学主张最早由前后七子提出,沈德潜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他通过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或加上评语,或通过序和凡例,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碎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认为汉魏及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不止如此,他还主张学习《诗三百》,在《说诗碎语》里,他批评“学诗但知尊唐,而不知上穷其源”,即是此意。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在《说诗碎语》里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依和声之遗音。”沈德潜主张“格调”,强调作者应该“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宗旨,制定了许多规则,从诗歌的体、格、声、调诸方面提出要求,要求作者遵守,不免偏于琐碎的章法声律,如《说诗碎语》中要求长篇诗歌于铺叙中有峰峦起伏,短诗则于收敛中能含蓄无穷,“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与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诗歌为封

建政治服务的主张,《说诗碎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因此,他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和“极则”,只要“格调”雅正的作品,那么它的内容便一定会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他还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沈德潜的诗多为歌功颂德之作,有些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内容,但往往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而说教成分较浓。因为他的诗歌主张与作品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沈德潜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经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与发展。这种地位,使沈德潜的诗论及诗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有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论诗主张,并按他的榜样写作诗歌,故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参见“格调”。(管士光)

【秀水诗派】 清代浙江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诗人钱载、王又曾等皆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故称。《清史稿·钱载传》云:“(金德英)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定交,晚登第,乃为门下门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该派诗人还有汪孟销、仲沛、朱沛然、陈向中、祝维浩等人。他们推崇宋代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宗,但又能取汉魏唐宋名家之长,颇有创新意识。题材较为狭窄,多为个人生活和往来唱和之作,也有少量的作品写得自然清丽,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管士光)

【南郭五子】 清浙江秀水诗派诗人王又曾、钱载、朱沛然、陈向中、祝维浩的合称。《清史稿·王又曾传》云:“王又曾,字受铭,秀水人。”“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缜深凿险,不堕臼科,又曾与朱沛然、陈向中、祝维浩和之;号南郭五子。”五人论诗主张与创作倾向和其他秀水派诗人相似,参见“秀水诗派”。

(王自周)

【江都二汪】 指清初江苏江都诗人汪楫、汪懋麟。《清史稿·乔莱传》载:“汪楫,字舟次,江都人……同里汪懋麟,字季角,并有诗名,时称‘二汪’。”康发祥《伯山诗话》:“江都之诗人,群推二汪。舟次楫之深稳,尤胜于季角懋麟之豪宕。”二人在乡里并有诗名,故称。

(王自周)

【性灵派】 清乾隆、嘉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该派以“性灵说”为其文学主张,故名。袁枚在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基础上,大力倡导“性灵说”。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不仅要以性情为创作之本,而且还以此作为衡量诗歌高下的标准。他反复强调:“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卷七),“诗者,

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续诗品·神悟》)。从“性灵”出发,袁枚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以为会流于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覆辙;还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认为写诗过分讲究温柔敦厚,必然要妨碍真情实感的表达。由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并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戴园论诗书》)。他也反对翁方纲主张“堆垛学问”的“肌理说”,嘲讽“肌理说”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以为毫无价值。指出“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六)。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戴园论诗书》),并非记载历史和说教的手段。性灵说从要求表达真情实感出发,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反对堆垛学问、滥用典故、过分雕琢、人云亦云的文风。因此该派诗人的作品,力求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情,往往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上追求创新,风格真率自然、清新灵巧。但因为把“性情”抽象化了,此派诗人的作品题材较为狭窄,无非是抒写个人“性情遭际”,咏叹生活琐事,歌唱风花雪月,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流于浅滑,因而有人批评袁枚的诗“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朱庭珍《筱园诗话》)。所言不无道理。参见“性灵”。

(管士光)

【江右三大家】 清乾隆时诗人袁枚、蒋士铨、赵翼的并称。蒋士铨是江西人,旧时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因三人均是乾隆时进士,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在这个时期,故又称为“乾隆三大家”。又因袁、赵是浙江、江苏人,故亦称为“江左三大家”。《清史稿·赵翼传》云:“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三大家”中,袁枚主张抒写“性灵”,诗作晓畅工整,喜用白描手法,擅长七律,多闲情逸致之作。蒋士铨亦推崇“性灵说”,主张“戒蹈袭”,同时颇受黄庭坚的影响,讲究骨力,其诗题材广泛,擅长七古,在艺术上颇有特色,袁枚序其诗说:“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云:“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赵翼主张“独创”和推陈出新,反对摹拟,诗风清晰明畅,长于说理,善为谐谑之词,只是议论过甚,有沉重板滞之病。

(管士光)

【乾隆三大家】 清乾隆时诗人袁枚、蒋士铨、赵翼

的并称。参见“江右三大家”。(管士光)

【高密诗派】 清乾隆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的代表诗人“三李”即李石桐、李叔白、李少鹤为山东高密人,故名。同派诗人尚有王新亭、王颖叔、王蜀、王希江、王子和即所谓“王氏五子”和李五星、王熙甫、王丹柱、单子固等所谓“后四灵”,以及刘崧岚、孙顾崔等。高密诗派不满王士禛“神韵说”和虞山派诗风,推崇中晚唐诗,尤为推崇张籍、贾岛,并选《重订中晚唐人诗主客图》一书以作写诗的榜样。李石桐、李少鹤又将学《主客图》所作的诗编成《二客吟》。这两本书一出,为许多诗人所遵奉,遂形成一派诗风,后传至广西、江西、江苏等地,盛行数十年,至晚清仍有一定影响。此派诗人的创作追求瘦冷的境界,有些诗写得不落俗套,风格清新流畅,但总的看,此派诗人的作品内容狭窄,多为个人生活琐事和酬谢赠答之作,又因他们力图独辟蹊径而往往表现为过分雕琢,因此此派虽然影响很大,但其文学成就却并不高。

(管士光)

【吴中七子】 清代诗人曹仁虎、王鸣盛、王昶、钱大昕、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的合称。他们皆为苏州、上海一带的“吴中”之人,沈德潜编有《吴中七子诗》,故名。“七子”推崇唐诗,作品的内容较狭窄,无非是抒写个人生活及酬谢赠答,风格较平易流畅。沈德潜认为钱大昕可列“七子”之首,实则王昶影响最大。曹仁虎、王鸣盛等人也不乏佳作,其他诸人则较为逊色,影响很小。

(管士光)

【二仲】 清中叶诗人黄景仁和王昙的并称。黄景仁字仲则,王昙字仲瞿,故名。二人皆遭遇坎坷,终身潦倒。所作诗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悲凄之感。风格都显得豪放不羁,不同处在于,黄除学李白外,还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有哀婉的一面,而王在豪迈中夹杂着怪奇。

(吴小林)

【毗陵七子】 清乾隆、嘉庆年间江苏毗陵(今江苏常州)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清史稿·赵翼传》载:“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七子”中黄景仁诗名最大,诗作多抒发穷愁凄怆豪宕感慨之情,诗风婉丽哀怨。洪亮吉、孙星衍诗文亦甚佳,骈文尤著。其余四人无甚文名。

(王自周)

【毗陵后七子】 清江苏毗陵(今江苏常州)七位文人之并称。《清史稿·董祐诚传》载:“其后又有吴颢鸿,字嘉之,道光进士,官代州知州;庄缙度,字眉叔,进士,户部主事;赵申嘉,字芸西;陆容,字蓉卿;徐廷华,字子楞;汪士进,字逸云;周仪颢,字叔程,举人,即仪玮弟也。号‘毗陵后七子’。”“毗陵后七子”文学

成就不如“毗陵七子”，文名亦均不著。（王自周）

【肌理派】 清嘉庆年间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该派以“肌理说”为其论诗主张，故名。清自康熙之后，士人读经考据形成风气，肌理说便是这种风气影响的结果。所谓“肌理”，本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用之来指学问义理和文理，在《志言集序》中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又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溢于宇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他主张诗人写诗要将思想意义与组织结构、学问材料统一起来，首先要求写诗必须以学问为根底，要熟读六经，即所谓“根极于六经”（《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翁方纲虽然不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但又觉得这种主张流于空寂，故提出以肌理来求神韵；“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他又认为袁枚“性灵说”失之片面，故需“由性情而合之学问”（《徐昌谷诗论》）。翁方纲提出“肌理说”，目的在于弥补“神韵说”、“性灵说”以及“格调说”的不足，提倡讲究学问，讲究经术，讲究方法，力求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在“诗法”上，翁方纲主张求儒复古，他的“复古”，不是崇唐而是崇宋，特别推崇“江西诗派”的黄庭坚，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和史学价值。其论诗主张得到了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人的支持，在嘉庆年间风行一时，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又称作“学问诗派”或“学士诗派”。此派诗人所作诗多为把经史、金石的考据勘研写进诗中的“学问诗”，也有一些纪述作者生活行踪和描写山水景物的作品。由于大多违背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大量堆垛学问，往往写得佶屈聱牙，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成为毫无诗味的韵文，令人生厌，所以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五中嘲笑他们“误把抄书当作诗”。参见“肌理”。（管士光）

【宣南诗社】 清中叶的一个诗社。因活动地点多在北京宣武门南，故名。成立于嘉庆九年（1804），十年后一度大盛，道光初年仍有活动。是当时北京士大夫和一般官僚吟诗唱和的文学团体，初因举于冬季，故又称“消寒诗社”。每隔十日一集，集必有诗。后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曾参加活动。该诗社成员的作品，除上述诸人外，大都内容狭窄，题材不出个人生活和酬赠答谢的范围，偶尔也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艺术上很讲究格律与用典，多为平庸之作。（管士光）

【粤东三子】 指清广东诗人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清史稿·张维屏传》载：“张维屏，字子树，番禺人。工诗，计偕入都。翁方纲尝异之。与黄培芳、谭

敬昭，称‘粤东三子’。”“三子”均受翁方纲“肌理说”影响。其中，张诗成就较显，早期多抒写个人生活情怀，诗风清华谐莫，晚岁有不少爱国诗章，笔力刚健遒劲。（王自周）

【同光体】 指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的的一个诗歌流派。因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尊盛唐者”为“同光体”，后来便以此称这一流派。此派主张不应墨守盛唐，也要学习宋诗，即打破唐宋界限，宗主三元：开元年间取杜甫、元和年间取韩愈、元祐年间取黄庭坚而兼及苏轼。同光体诗，又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主张相同，但宗尚有所不同。其作品虽然也有一些要求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较好的内容，但更多的则只写个人身世、山水景物，清亡后较多地表现出对民主革命不满的情绪和复辟思想。在创作方法上，此派极力把诗歌创作引入艰涩隐晦的“荒寒之路”，热衷于模仿江西诗派，好用僻词拗句，力求生涩、枯淡、迂缓，因而毫无生气。早在陈衍标榜同光体的光绪年代，就有人提出批评和非议，如陈衍的同乡林纾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识语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也。”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反对者与赞成者的斗争。后来不断有人对“同光体”诗风进行抨击，但直到1937年陈衍、陈三立先后病死，这个诗派才告终结。（管士光）

【宋诗派】 清代诗歌流派。以推崇宋诗为主要特征。此派诗人主要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认为作诗不必讲究格调宗法，而应随意抒写，还可径发议论。他们的作品效法江西诗派，忌熟避俗，往往流于隐晦艰涩。属于此派的诗人较多，作品的风格也多有不同。清初以钱谦益为代表，以后又有查慎行、宋荦、厉鹗等人。清末的“同光体”亦是“宋诗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说，宋诗派即指“同光体”，参见该条。（管士光）

【晚唐诗派】 近代诗歌流派。标榜晚唐诗，故名。此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主要成员有三多、李希圣、曹元忠等人。他们着重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从韩偓“香奁体”入手，好作艳体诗。一味讲究对仗工巧，玩弄艳词丽句。诗作题材较为狭窄，多写个人生活和山水风景，内容相当贫乏。因该派诗人又宗中唐诗人白居易等人，亦称“中晚唐诗派”。（管士光）

【中晚唐诗派】 近代诗歌流派。标榜中晚唐诗，

提倡学习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诗作，故称。代表人物为樊增祥、易顺鼎。又称“晚唐诗派”，详见该条。
(管士光)

【汉魏六朝诗派】 近代诗歌流派。因其标榜汉魏六朝诗，故称。又称“拟古诗派”和“湖湘派”。主要代表人物为王闾运、邓辅纶，成员有陈锐、程颂万、高心夔等。该派论诗注重“家数”，提倡“摹拟”，他们的诗专专致力之处，则在追摹汉魏六朝，形成了复古摹拟的形式主义风气，近代陈衍《近代诗钞》译云：“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此派诗人也有一些佳作名篇，如王闾运的《圆明园词》、邓辅纶的《鸿雁篇》皆是。

(管士光)

【湖湘派】 近代诗歌流派。该派代表诗人王闾运、邓辅纶及其他成员皆为湖南人，故名。他们标榜汉魏六朝诗，又称“汉魏六朝诗派”，详见该条。

(管士光)

【诗界革命】 近代诗歌改良运动。发端于著名诗人黄遵宪。他在清同治七年(1868)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堆的创作态度，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推陈出新的一套理论，赋予诗歌创作以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成为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面旗帜。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开始试作“新诗”，力图开辟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的新思想。为了适应社会对新文化、新思想的需要，他们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除了写作《饮冰室诗话》，阐发“诗界革命”的理论观点、表扬新派诗人以外，还在许多报刊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等人的作品，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诗界革命要求诗人面对现实，追求创新，不能一味摹拟古人，从而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

倾向。在诗界革命的潮流中产生的许多诗作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通俗自然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管士光)

【南社】 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进步文学团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初于1907年8月在上海酝酿，1909年11月成立于苏州，仍以上海为活动中心。成立初期有社员十七人，辛亥革命前发展到二百余人，辛亥革命后增至一千余人，1923年解体，前后延续了十多年。该社取名“南社”，寓有“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要进行反清革命。鲁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云：“即如清末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早期南社成员多为同盟会会员，具有明确的民主民族革命的立场，对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社员大增，成分十分复杂，部分成员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少数人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的成员投靠了北洋军阀和其他反动政治派系。南社作家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要求通过文学创作，激发群众的“爱国保种”之念，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但在具体文学主张上却不尽相同。如柳亚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弃疾和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等人，反对“同光体”、“常州词派”、“桐城派”。而马君武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张“漫追魏晋隋唐体，自抱文周屈宋思”(《钝根未与元夕南社雅集，以诗见寄，步其韵以答之》)。南社还有些成员是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南社成员的创作以诗歌为主，多以旧形式写新内容，鼓吹革命，富有爱国激情。辛亥革命前以批判清朝统治、呼唤民主为主题；辛亥革命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此时亦有较多理想破灭的悲哀，风格由慷慨激昂转为愤郁低沉。南社著名作家有苏曼殊、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其中以柳亚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管士光)

主要诗集

总集

【诗经】 诗总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又称为《诗》、《诗三百》、《三百篇》等。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称为《诗经》。此书共收诗三百一十一篇，其中除去有题目无文词的六篇（即只有乐曲无歌词的“笙诗”）还余三百零五篇。书中作品写作年代大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六世纪。诗作者除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不可知，其产生的地域包括今日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湖北等省份的一些地区。《诗经》按照乐曲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指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小曲。风分为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一百六十篇。关于周南、召南具体所指，争议较大，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产生于南方的民歌，大体包括今天河南临汝、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一带。雅分为大雅、小雅。雅指正，周人以其首都镐京一带语音歌调为正声雅乐，用这种声调吟咏之诗为“雅”。大小雅之分，多数学者也认为以曲调相区别，旧日之歌为大雅，日久，音调既变为新曲，称之为小雅。二雅共一

百十一篇，六首笙诗即在雅中，实际为一百零五篇。颂，为宗庙祭祀歌曲，以国别分周颂、鲁颂、商颂。商颂实际上是商朝后裔宋国祭祀祖先之诗。三颂共四十篇。《诗经》编纂成书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春秋时孔子曾以此书为课本教授学生。汉代儒生有“王官采诗”与“孔子删诗”之说。他们认为古代设有专门采诗之官曰“行人”，他们奉王命奔走各地采录民歌民谣，呈之于天子，以考查王政得失，因此周天子保存了大量民歌民谣，有古诗存三千多篇之说。孔子从三千篇中“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传播很广，但不可信。《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国风多为民歌，表现出广大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对社会的认识。对于当时不同人群的实际生活有极为生动的描绘。二雅则多为文人与下级官吏的作品，其中优秀的篇章记录了周民族与周王朝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具有史诗价值。一些被称之为“变雅”者，反映了西周末年和东周初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对于腐朽奢

侈的最高统治集团与奸佞宵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与批判。颂为庙堂祭祀歌曲,节奏舒缓,雍容安泰,与舞蹈相配合,实际内容较贫乏,有少量作品描写了周、商民族史。《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风、雅、颂的文学分类,皆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营养。汉代《诗》有专学,传《诗》者有齐、鲁、韩三家,他们所传诗与解释用今文(即隶书)撰写,故称今文学派;后出者有毛萸、毛亨(大、小毛公),他们所传之诗与解释用古文(篆文)书写,故称古文学派。毛诗晚出独存,故后代亦称《诗经》为“毛诗”。因《诗经》词深义奥,历来白文本流传者不多。其称为《诗经》的全集注本较著名者《诗经广诂》(清徐璈)、《诗经通论》(清姚际恒)、《诗经原始》(清方玉润)、《诗经直解》(今人陈子展)等。

(王学泰)

【楚辞】 诗总集。此书为战国至汉楚人所著具有楚国地方风格的诗歌总集,其中大部分为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另外还有楚人宋玉《九辩》、《招魂》(或认为是屈原作品)、景差《大招》,以及汉人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此为十六卷本,是西汉刘向所编,今已不传。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释,称为《楚辞章句》,又加进自己所作《九思》,共十七卷,这是传至今世最早的楚辞合编本。楚辞,最早称为“辞”,是继《诗经》之后产生于楚的一种新的诗体,它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与《诗经》多是民间闾巷歌谣不同,楚辞则是文士们的呕心沥血之作。屈原是这一新诗体的开创者与完成者。他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和楚文化特色的诗体,用以摅写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屈原的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身世遭遇,而且系统地表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先进的社会理想。屈原作品感情充沛,感染力强,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人竞相仿作,但大多是只能得其形式,很难达到高超的艺术境界。汉朝统治者是楚人,对楚辞有特殊的爱好。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皆以楚辞体作歌,《汉书·礼乐志》亦言“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都于寿春(此为楚国最后都城),刘安喜士好文,“著作篇章,分造辞赋”。对于屈原及宋玉等楚人所遗辞赋进行了编辑整理,辑成楚辞第一个整理本,其本人亦曾奉汉武帝之旨为《离骚》作“传”,这是楚辞第一个注本,惜已不传,此后班固、贾逵、马融皆曾为楚辞作注,均不

传,流传至今的楚辞第一个注本即是东汉王逸之《楚辞章句》。《楚辞》一向与《诗经》并称为“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两大源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楚辞又以其奇情异想,宏篇伟构,以及美人香草的隐喻,绮丽的词藻为历代富于浪漫主义情趣的诗人所效仿。楚辞文深义奥,又多用楚地方言俗语,汉代已经难懂,解楚辞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故多以注本行世,白文本罕见。以楚辞名世之注本除《楚辞章句》外尚有《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释文》、《楚辞灯》、《楚辞通释》等等。

(王学泰)

【文选】 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选。萧统为南朝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病逝后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故此书亦名《昭明文选》。《文选》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诗文选集,六十卷本中从十九卷至三十四卷大部分是诗、乐府与楚辞。选录时代上自周末,下迄南朝。在唐代以前诗人专集多佚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赖此以传。书中所选诗歌多为精品,特别是像陶渊明这样杰出的诗人在当时尚未被重视的情况下(钟嵘《诗品》中仅将陶诗列为中品),选其诗近十首。另外如曹操、王粲、曹植、阮籍、潘岳、左思、谢灵运、谢朓、鲍照等优秀诗人都受到应有的推重,作到这一点颇为不易。我们以此与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进行一下比较,即可看出,没有一个选本能作到像《文选》编者那样公正地对待距自己时代不远的诗人。萧氏已经具有初步的文学观念,并有意识地注重文学特性,故入选诗歌作品多是文采斐然,富于真情实感的篇章。然而此选也有缺点,其选诗太重词藻和用事,因此不少清新朴素的作品被排斥在外,在选诗时还常常篡改原句,以合己意。如《古诗十九首》之十五古辞当为“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悌,忧当复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诗句比原来整齐,但却改变了原诗的朴素的面貌。《文选》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其所选诗歌体制风格成为后世所流行一种诗体,名曰“选体”,代有习选体诗者。《文选》本身也成为一种学问,名曰“选学”。《文选》原分三十卷,李善注《文选》,因为引征丰富、篇幅过大,才析为六十卷。现尚有古钞无注本《文选》残本传世。

(王学泰)

【玉台新咏】 古诗选本。十卷。南朝陈徐陵编选。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县)人。南朝梁时曾为东宫学士,通直散骑侍郎,后入陈历任五兵尚书、尚书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为南朝著名宫体诗人,其诗文为当时所宗,与庾信齐名。“玉台”指帝王后庭(语出《穆天子传》)。

此书乃为梁元帝之徐妃所编,供她学习研读之用,故名。书中选录自汉至梁各体诗七百六十九首。前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诗(类似后代五言绝句)。其入选诗多为描写闺情的名篇巧制,如明胡应麟所说,“《玉台》但辑闺房一体”,而且“非词关闺闼者不收”。这些“词关闺闼者”,有许多是描写人们在爱情生活上的悲欢离合,但也有不少是绮艳淫靡之作。如萧纲入选作品竟有一百零九首,其中《倡妇怨情》、《和徐录事见内作卧具》、《咏人弃妾》、《咏内人昼眠》、《变童》等皆近污秽下流,以此作为宫廷后妃读本,可见当时宫闱之腐败,这些作品亦为历代读者所诟病。但此选本甚古,编者所见之诗集手卷,现在多已亡佚,传至今日的许多名篇佳作始见于此书。如《孔雀东南飞》、宋子侯《董娇娆》等。又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其本集皆失载,也因选入本书而得流传。此书是《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最古的诗歌选集,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我们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提供了方便。《玉台新咏》流传很广,据说南唐时即有刻本,已佚。传世最早刊本为南宋嘉定八年(1215)永嘉陈玉父序刻本;这个本子是根据两三个本子拼合校订而成,分十卷,收有六百九十首诗。明代刻本很多,多据此本。常见者《四部丛刊》影印明五云溪馆活字本,亦据陈玉父本印成。另有崇祯六年(1633)吴郡赵均仿宋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曾据此本影印出版,流传较广。

(王学泰)

【文苑英华】 诗文总集。一千卷,诗二百卷。宋太宗时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人奉旨编纂。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曾为参知政事,拜平章事。扈蒙(915—986)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字日用,曾任史馆修撰。宋白(936—1012)字太素,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刑部尚书。此书为宋初朝廷主编四大类书之一(其他三部为《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它是收录上起南朝梁末,下至五代,与《文选》相接的一部诗文集。共收诗赋杂文作品近两万篇,作者两千二百余人。其中唐代作品最多,约占十分之九。作品按类编排,共分三十八类,卷帙浩繁,保存了大量诗文作品,许多无专集的作者作品赖之以存,为后来《古诗纪》、《全唐诗》等总集所取材。此书编自太平兴国七年(982),迄于雍熙三年(986),由于成书草率,且书出众手,编者亦屡易人,所以问题很多,未能付刻。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命人作一次“删繁补阙”的工作,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复核一次,但其缺点、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书中所选诗歌多试帖和官

场应酬之作,思想空洞,艺术性也不高,大量的作品堆砌词藻典故。其选录也多有失当之处,如宋之问选了一百三十首,而柳宗元只选了一首。南宋彭叔夏撰《〈文苑英华〉辨正》十卷,纠其舛谬重复,清劳格又著《辨证拾遗》。《文苑英华》初刻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复刻一次。常见者有中华书局 1966 年影宋本(残缺处以明刻补)并附有彭、劳二书。

(王学泰)

【古文苑】 诗文总集。二十一卷,诗二卷。编者姓名不详,相传为唐人旧藏本,北宋孙巨源(洙)得之于佛寺经龛之中。书中共收从东周到南朝齐诗、赋、杂文共二百六十篇,南宋韩元吉整理编次,分为九卷。南宋章樵又加以注释,扩为二十一卷。章樵(?—1235)字升之,号峒麓,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知平江府吴县事、知涟海军,授朝散郎知处州,卒。此书所收之诗起东周《石鼓诗》(书中编排在文中),终于南朝齐永明之倡和诗。这些都是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收的作品。如曹植、王粲等重要诗人佚诗都有辑入,因此对文献保存有一定价值。章氏为此书补遗勘误,并作注释,虽然间有失误,但后世不传的诗文经章注引用,得以流传。书中把《木兰诗》作为附录,并认为是唐人所写,对研究该诗的真伪有参考价值。四库馆臣认为此书所载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删节本,疑为后人伪作,证据并不充分。此书最初刻于南宋嘉熙丁酉(1237),为樵子淳所刻,此本尚存。淳祐丁未(1247)樵婿盛如杞重刊,有残本存。常见者有清光绪惜阴书局刊本和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清中叶著名学者孙星衍又从金石、传记、方志、类书中辑出古代遗文二十卷,为《续古文苑》。有嘉庆间《平津馆丛书》本。

(王学泰)

【风雅翼】 古诗选本。十四卷。元刘履编纂。刘履字坦之,上虞(今属浙江)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1383),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至京师,授官,以老病辞。此书前八卷为“选诗”补注,取《文选》中诗加以删补训释,注释大多取于唐“五臣”旧注而断以己意。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散见于传记、诸子以及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的古歌谣词四十二首,以补《文选》选诗之缺。最后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诗词一百五十九首为《文选》嗣音。对于所选诗歌仿朱熹《诗集传》之体例详加笺注、串释、评论,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刘氏论文受道学家影响很深,主理不主文,其取舍标准多从宋道学家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故多迂腐之见。如对杜甫“三吏”、“三别”作了这样的批评:“‘三吏’、‘三别’似出一时之笔,若此篇(指《垂老别》)‘牙齿

存’、‘骨髓干’两语,也同‘眼枯见骨’,同一鄙俚。借此建安乐府中容或有之,终非雅韵,特以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数篇用意太迫切,而乏简远之度。然其情周至,诵之终篇不厌,譬若《书》典谟之后,而有殷盘、周诰。盖至此时风气变移既久,而且不能不如此耳。”可见他虽也主张文艺作品可以批评现实,但反对态度激烈、用词尖刻。在风格上,刘氏偏爱雍容不迫、进退有度之作品,对朱熹诗歌赞扬备至,言其:“至义理精微处,则皆本于‘六经’、‘四书’者,又岂他人所能窥测哉!”从这些地方都可见编选者的“头巾气”、“道学气”。总的说来,此选本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内容,择选较精,故明初《沧海遗珍》的编选者沐昂说:“近代选古惟刘履……几无遗憾,则识有过人者矣。”(《沧海遗珍序》)此书在明代刊刻多次,初刻已不得见,但弘治、嘉靖刊本皆有流传,日本文政三年(1820)亦有刊本,可见明清两代流传之广。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古乐府】 乐府诗总集。十卷。元左克明编纂。左克明,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此书自序题至正丙戌(1346),大约为元顺帝时人。《南昌县志》载其寓居铁柱宫,元末明初诗人刘崧(?—1381)有寄《左炼师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力求博大,贪多务得,未免失之于滥。此书务在正本溯源,注重古题古辞,对于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书中所收上起三代,下至陈隋,共分八类。包括(一)古歌谣、(二)鼓吹曲、(三)横吹曲、(四)相和歌曲、(五)清商曲、(六)舞曲、(七)琴曲、(八)杂曲。每类下各有小序,其题下夹行注多采《乐府诗集》之文。此书与郭书相较除删去“近代曲辞”、“新乐府”二目外,还削去“郊庙”、“燕射”二门,并以“杂歌谣辞”作为“古歌谣”列为第一,这样编排与《古乐府》之题不相符合,郊庙与燕射之需要正是汉代设立乐府之目的,从分类中删除是不妥的。此书原刻难见,明刻本有后人窜入文句,明代有王文正刻本。常见的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风雅逸篇】 古诗总集。十卷。明杨慎编纂。此书辑录了散见在古代文献中从上古至战国末年《诗经》以外的逸诗及有韵之文,在卷十附载有篇目而无辞的篇章如《葛天氏八阙》、《木客吟》等。此集取材广泛,搜罗宏富,而且每首均注明出处,并附以本事,便于查考。冯惟讷编《古诗纪》,前集即以此书为蓝本,连杨书误收、漏收,失于考证之处也全承继下来。杨氏重视逸诗,对于古代民歌艺术评价很高。他说:“若因事造歌,异裁别体,若《狸首》、《豳诵》、《蚕蟹》、《龙蛇》,后代词人,刻意莫追。其宛转附物,怊怅切

情,盖不啻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已。”并认为这些精品如散在诸籍则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才辑为一编,以便研究。常见者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据《函海》本排印标点本,后附校记。

(王学泰)

【古今风谣】 古歌谣总集。不分卷。明杨慎编纂。此书辑录从上古到明代的歌谣,其中多数条目注明出处及本事便于查考。书中所载歌谣始于《列子》中载《尧时康衢歌谣》,终于《嘉靖初童谣》。这些歌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风物习俗和人民的愿望,特别是辑录的明代歌谣当为直接采集于民间的第一手材料,如《天顺丁丑童谣》:“京城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赚。”(注云:“范广,天顺中名将;于谦,少保肃愍公也。未几,范广死,谦遭石亨之患。”)表现了人民对含冤而死的民族英雄的同情。《正德中川蜀童谣》:“强贼放火,官军抢火。贼来梳我,军来篦我。”说明了“官军所过,掠劫甚于流贼”。《嘉靖初童谣》:“前头好个镜,后头好个秤。镜也不曾磨,秤也不曾定。”可见当时政治昏暗,持法失平。这些多为后来史书所取材。由于封建时代把民谣、童谣看成诗妖讖语,认为这些预言着政治变动或灾异,因而带有迷信色彩。另外,此书把《史记正义》中所载《虞美人帐中歌》(“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种近于小说家言,也作风谣收入,似不妥。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

(王学泰)

【古今谚】 古谚语总集。不分卷。明杨慎编。此书辑录从上古到明代关于生产与生活的谚语,开卷三条,《古谚不古忽》、《谚谚喧同》、《谚语有文理》为杨氏论谚语之文,是后人刻此书时窜入。此三篇短文指出应该重视谚语,因为谚语中包含着前辈生产与生活上的经验或教训,也常为往昔圣贤所引用;还指出谚语虽多出于田夫野老之口,但其比喻精切、音韵合谐,仿佛“六律之音,出于天籁;五性之文,发于天章”,是极富于文采的“自然之诗”,写诗作文,可以适当采摭。此书虽多是从古籍中勾稽而得,但最后一部分标明“吴谚”、“楚谚”、“蜀谚”、“滇谚”,当是采于当时的民间。楚、蜀、滇都是作者生活和经历过的地方。书中关于农事、气象的谚语最多,有许多至今尚有参考价值,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

(王学泰)

【古诗纪】 古诗总集。一名《汉魏六朝诗纪》,前集十卷,正集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别集十二卷,凡一百五十六卷。明冯惟讷编纂。惟讷字汝言,临朐(今属山东)人。嘉靖戊戌(1538)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以光禄卿致仕。著作甚富。此书搜辑从上古

至隋诗歌。前十卷为古逸诗,载汉代以前的铭、赞、箴、诔、歌、谣、逸诗。此集虽然搜罗较为完备,但真伪杂糅,各类混收,不加分析、缺少条贯。正集收汉至隋之诗歌作品。外集专录隋以前笔记、小说中仙歌鬼诗。别集选录前人对古诗的评论,包括考订源流,分别体例,辨析声律,品藻名篇佳句,以及对与古诗有关的疑难问题的考证,对隋以前诗人的品评,等等。全书采摭丰富,上古至隋诗歌囊括殆尽,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毛病除了有误收漏收和上面提到的真伪杂糅外,还有体例不一之病,一是各集先以类分,各类又以体分。此法颠倒了旧集原本之次序和破坏了乐府因音乐而形成的条贯,割裂窜乱,贻误后人;二是所收各家诗许多从类书中辑出,冯氏不注出处,如从本集抄来;三是滥选误收,贪大误多。如《封禅文》之类也竟收入;四是杜撰题目,仿佛原作即有题。此书出版不久,明末清初的冯舒就写了《诗纪匡谬》纠正其失一百二十二条。多中肯綮,考订精审。清杨守敬针对冯书不注出处而多漏误,撰《古诗存目》一百四十四卷,既逐篇为之索引,又补其未及见之什。冯书明代即有两个刻本,一为嘉靖太原甄敬刻本,一为吴琯金陵刻本。(王学泰)

【古乐苑】乐府诗总集。五十二卷。明梅鼎祚编纂。鼎祚(1548—1615)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宣城(今属安徽)人。少负才华,以诗见长,与同县沈懋学齐名,因屡试不第,遂弃举子业,肆力诗文,编书著述多达四五百卷。郭茂倩《乐府诗集》贪大求全,而脱落甚多,一些相传为古歌的如孔子《龟山操》等不录尚可,而魏明帝《种瓜篇》、曹植《弃妇篇》、无名氏《休洗红》等也未著录,则是其不足。此书补郭书之阙佚,正其讹舛,更全面地搜集上古到隋可以入乐或曾入乐的诗歌作品。全书共分十一类,其分类大体同于郭书,只是删去第一、二类的“郊庙歌辞”与“燕射歌辞”,卷首有“古歌谣”,最后一类为“仙歌曲谣”。各类中所收作品以世次年代为序,世次无考者以时附见。每门类题解多抄自郭书,一字不遗,间也有所补充(多参考左克明和杨慎的意见)。如解释“琴曲歌辞”,梅氏认为郭书所收多伪作,并指出这些“古辞”“亦出于魏晋人之手,相传既久,姑录之”。在“杂曲歌辞”题解里批评郭书的编排“稍似类从,实多错紊。今编但按世次,代以统人,人以统篇”。可见梅书并非全袭郭书。编者贪多求全,无限扩大了乐府的含义,像左思《娇女诗》,从未入乐,此书也作乐府录入,显然不妥,此书虽然真伪杂糅,但仍有拾遗补阙之功。书后附有《衍录》四卷,分总论、原古、名义、声律、品藻、历代评论、辩解、杂记、评解、驳异等部分,多抄冯惟讷《古诗纪》最后“别集”部分。此书有

明万历刻本,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汉魏诗乘】汉魏诗总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明梅鼎祚编纂。此书分前后二集,前十卷为汉诗,后十卷为魏诗。附录为无法确定时代的作者和无名氏之作。全书以世次时代先后排列。卷首辑录历代研究、分析、品藻古诗的评论文字,间附编者自己的意见。书中对作者均有介绍和评论,并介绍和考订所著录诗篇的来源,并附有对该作品真伪或其他有关问题的考证。其所依据为冯惟讷《古诗纪》。冯书初刻于太原,只通行于北方,江南绝少见。梅氏“稍补其体,尚论其世,而有所评鹭及通故者,悉参伍之,……其名曰‘乘’者,以其评鹭论世而名之也”(见《序》)。书中间亦有补冯书之阙处,但此书所录作品真伪杂糅,梅氏又疏于考证,因此窜入许多贗品。有明万历刊本。(王学泰)

【八代诗乘】八代(汉代至隋代)诗总集。四十五卷,附录二卷。明梅鼎祚选。全书包括汉诗、魏诗各十卷,吴诗附录一卷,晋诗六卷,宋诗四卷,齐诗二卷,梁诗六卷、陈诗二卷、北朝诗三卷、隋诗二卷、无名氏附录一卷。此书汉、魏部分全收《汉魏诗乘》,是有诗必录。后部分《六代诗乘》则是由晋到隋诗的选本。编者认为完全否定六朝诗作,说它“兴寄都绝,雅道陵夷”是不对的,但它却有“藻不胜质,情不胜理”的一面,因此应该精心选择。梅氏依据《古诗纪》,并参照了当时宣城知府史起钦的意见,完成了此书。史起钦《序》评《八代诗选》“汉魏为完璧,而六朝为简珠”。汉魏部分之前附有评论汉魏的“总录”,六朝部分之前附有论六朝诗的“总录”,虽以辑录前人的意见为主,间亦表现出编者的看法。梅氏以为六朝诗虽有缺欠,但它“近之先鞭于四杰,远之椎轮于三唐”,肯定了六朝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此书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刻本。(王学泰)

【古诗镜】古诗选集。三十六卷。明陆时雍编选。时雍字昭仲,号澹我,桐乡皂林镇(今浙江桐乡)人,工诗文,尚气节,髫年游泮。崇祯癸酉(1633)下诏举岩壑之士,时雍与之,然终不遇。久留北京,因寄馆于顺天府丞戴澳家,澳因事被劾,拉时雍以为证,因而下狱,卒于狱中。陆氏论诗注重“感通”,他说:孔子删诗“存止三百,亦取感通之至捷者耳。后之人必以义断。则郑、卫何以并存也”。并说:“是非之畛,理义之辨,必附性情而后见。”表现出他对明中叶以来诗人只在格律声调上下功夫,徒摹声响,不见才情的前后七子诗歌创作的不满。他说:“道发声著,情通神达,灵油油接于人,而不厌鸟之关关,鹿之呦呦,未闻其何韵之远,何律之调调也。”《古诗镜》就

是贯彻他的论诗主张的选本。他说“是选不惟其词而惟其情,不惟其貌而惟其意。使天下闻声而志起,意喻而道行”(见其《序》)。注重情深意远的作品,选择较精,去取较严,在明清之际是较好的选本。但由于其说重于神韵,重视情深意远的作品,对于叙事诗则评论多不当。如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附于“乐府古辞”之后,言其情词纰谬,称之传奇则可,作为诗则稍嫌繁絮。有明原刊本。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石仓历代诗选】 历代诗歌总集。一名《石仓十二代诗选》。五百零六卷。明曹学佺编选。此书为明代诗选中最宏伟之作,上自上古,下至明代嘉靖、隆庆,包括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零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此书意在存明人之诗作,故明以前诗择之不精,考订不确,错误很多。即以选诗来说,既滥且缺,许多名篇未能入选。明初集次集之后还有三集百卷,四集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百卷,共三百八十四卷。另外还有明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集》五卷,《江右集》五卷,《江西集》五卷,《陕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又有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五续集四卷、续五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共三百六十七卷,由此可见曹氏欲借此以存明朝一代文献。据近人郑振铎言,三集及以后诸集非如《啸亭杂录》所说,均为抄本,实际都有崇祯间刻本。清陶兰泉有足本,后陶氏书售与日本东京文化研究学院。郑氏所藏为残本,共六百六十卷。常见者为五百零六卷本。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诗文总集。一百十八卷。明张溥编纂。张溥(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崇祯间进士,授庶吉士,崇祯二年(1629)组织当地名士,创立复社,这个社团在反对阉党和抗清斗争中起过作用。唐以前作者别集至明末只存不到三十家,大多散佚,张氏在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冯惟讷《古诗纪》基础上,拾遗补阙,网罗放佚,辑成此集。上起汉代贾谊,终于隋代薛道蕴,两汉魏晋南北朝重要的诗人如曹操、曹植、王粲、阮籍、潘安、刘琨、郭璞、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何逊、徐陵、庾信等人专集俱收入书中,并有所增益,前后共一百零三家。唐以前除《诗经》、《楚辞》和无名氏作品外的重要诗歌作品都可见于此书之中,给研究者带来了便利。每家之前,俱附有题辞,或介绍作家生平经历,或评述作家思想倾向,或品藻诗文的高下、特色,多有创

见。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张氏对每个作家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表现他对汉至隋这段文学发展有总体性的认识。此书缺欠是:一、张氏虽已声明“别集之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概不编入”,但这个原则并未贯彻到底,也有说经(如董仲舒之集录春秋阴阳)、史类(如褚少孙补《史记》)文字阑入。二、有些诗人应编专集而未编,如左思。此书有张氏原刊本传世。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古诗源】 古诗选本。十四卷。清沈德潜选评。此书主要依据明冯惟讷《古诗纪》编选而成。全书选录由上古至隋历朝诗歌七百余篇。编者选评目的在于探索诗之源流,以明诗之正变,故名《古诗源》。此书选诗“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序》)。分古逸诗一卷、汉诗三卷、魏诗两卷、晋诗三卷、宋诗两卷、齐梁诗两卷、陈及北四朝诗一卷,因而它是个带有资料性的选本。编者在选诗、评论时皆贯穿了自己“格调说”的论诗主张。如沈氏认为《诗经》是古代诗歌发展源头;汉代五言诗是《诗经》直接承继者,特别是乐府“措词叙事”较优,风雅颂三体皆备,可以说是诗歌正流;魏晋期间,曹植、左思、陶渊明是诗史上正宗,代表了诗歌发展方向,因而选他们作品特别多。至刘宋以后,南方“体制渐变,声色大开”,“风格渐卑”,故选此期间诗较少。在全书中突出了《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曹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作品的位置,把他们当作诗歌史上的“正宗”,其余者视为别调,并把唐诗看作是诗史上“正宗”发展的结果。在评诗时提倡“温柔敦厚”,在内容上反对“悱怨愤恚”的作品,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风格上沈氏主张典雅庄重,沉郁含蓄,他说:“诗非谈理,亦乌可悖理也?仲长统《述志》云:‘畔散五经,灭弃风雅。放恣不可问矣。类此者概所屏却。’”(上引皆见《例言》)如汉乐府《东门行》本写被穷困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者的反抗与悲哀,而此书却取《宋书·乐志》中所录有个劝善尾巴的《东门行》。由于编者娴于诗歌创作规律,别具艺术鉴赏眼光,在评诗时亦多真知灼见。如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在论陶渊明、谢灵运诗异同时言:“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高处在排,谢诗胜处在排,所以终逊一筹。”从这些评语中皆可见编者之鉴赏力。此书初刻于雍正三年(1725)。民国间中华书局之《四部备要》曾据此本排印。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3

年中华书局两次据此本重印,发行量很大。

(王学泰)

【古诗录】 古诗选本。亦名《宛邻书屋古诗录》。十二卷。清张琦选编。张琦(1764—1831)初名翊,字翰凤,号宛邻,阳湖(今江苏常州)人。道光间举人,曾任章丘、馆陶知县,所至有政绩,工诗古文,尤精舆地之学,有《宛邻文集》。此书共选诗一千一百十八首,共一百七十一家。乐府歌辞二百零八首,无名氏作品三十六首。张氏论诗推重缠绵郁积之情思与身接目见之景互相交会的作品,他认为“汉代以来,诗之工者,未有不由此也”,因此编者“录汉以来诗迄于隋氏,导其源流,备其正变,旨义幽隐,辄为条述,庶几无乖以意逆志之义,又以明夫诗不可苟而已也”。通过这个选本不仅可以看到古诗中的名篇佳制,而且还可以了解汉到隋代诗歌发展状况。其入选较多的是曹植、阮籍、陆机、潘岳、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何逊、庾信等人作品。对阮、左(思)、郭(璞)、陶、江(淹)、庾六人评价尤高,他说此六人“声出金石,气成虹霓,情深文明,言近指远,上规风雅,同符屈宋。百世之下,闻者莫不感发诗道之尊”(以上所引皆见张氏《自序》)。录诗之后间附编者的评语,这些评语往往能以简约的语言概括诗意和分析该诗的特点,也有少数不够妥当之处,如把《陌上桑》解释成“贤者不从权要之词”,对诗句的解释也多牵强。此书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王学泰)

【古今诗删】 古至明诗的流派选本。亦名《诗删》。三十四卷。明李攀龙编选。此书一至九卷为古诗,十至二十二卷为唐诗,二十三卷至三十四卷为明诗,中间不选宋元诗。每代各自分体编排。这是一个去取很严的选本。王世贞说:“今于鳞以意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见王《序》)因为遴选严格,所以此书“得存而成一家言”,体现了李氏论诗观点。如其论五古则推重汉魏,竟说“唐无五言古诗”,即没有李氏所肯定的那种五古,所以他说:“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皆见李《序》)像杜甫“三吏”、“三别”、《北征》、《咏怀》等震撼千古的名篇都未入选。其论七古则赞美“初唐气格”,因而批评李白之七古,“往往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因此李白的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被删去。论七律则认为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对于杜甫却说“篇什虽众,愤焉自放”,使人难以理解。李氏复古思想严重,论及某种诗体往往以此体最初的名篇为体式风格的标准,不合于此者,便予以否定,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学体式的发展。书中以唐诗与明诗衔接,中间跳过

了三四百年,认为宋元无诗,这种作法为后世读者所不满。如四库馆臣所言:“且以此选所录而论,唐末韦庄、李建勋距宋初阅岁无多;明初之刘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数年之内,今古顿殊;一人之身,薰莸互异?此真门户之见,人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攀龙却很自信地说:“后之君子本兹集以尽唐诗,而唐诗亦尽于此。”后来坊间割此选唐诗部分,加以笺注、评论名为《唐诗选》,李氏未著是书。《古今诗删》有明嘉靖中刻本。

(王学泰)

【乾坤正气集】 历代诗选集。亦称小《乾坤正气集》,二十卷。清顾沅编选。顾沅字湘舟,号沧浪渔父,道光年间官教谕,家藏旧籍及金石文字为三吴之冠,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此书刻于鸦片战争前夕,编者感到时代之危机,所以才“阐幽发潜,哀集商周以来忠臣义士之诗”,以达到“革顽儒”、“资劝惩”之作用。其所录皆为“忠臣义士”之作。他们“或亮节著于疆场,或直声震于朝野,或被诬放斥而守身不二,或遭时变故而矢志靡他”(见大《乾坤正气集自序》)。他们有的以功业昭著,有的以正气感人,皆有“托诗歌以见志者,这些对“正人心,易风俗”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编者从《古诗纪》、《全唐诗》、《宋诗存》、《宋诗钞》、《宋诗纪事》、《中州集》、《全金诗》、《元诗选》(顾嗣立)、《历代诗选》(曹学佺)、《明诗综》以及笔记说部、各省方志中选录三百余人,起于周初之伯夷、叔齐,终于明末,每人皆详述其事迹,并略加评论,以宣扬其“正气”。编者所说“正气”,虽也指“公而无私,计一国不计一家,为天下不为一身、至舍其身家以为国、而及天下”,但这个“公”,往往和封建“纲常”、“名节”结合在一起。所选之诗多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编者的用意还在于挽救清王朝危亡。在此之后,顾氏协助姚莹又编纂专门收文章的《乾坤正气集》(也称大《乾坤正气集》),五百七十四卷,收屈原至明末朱集璜辞赋杂文集一百零一家,于是,顾沅所选之诗集遂称小《乾坤正气集》。后者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顾氏艺海楼刻本。前者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袁江节署求是斋刊本。

(王学泰)

【诗女史】 妇女诗总集。十四卷,拾遗二卷。明田艺蘅编纂。田艺蘅字子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岁贡为徽州训导,后辞归。性磊落,以著述为事,大约生活在隆庆、万历期间。妇女作诗,肇自先秦。许穆夫人之《载驰》著录于《诗经·鄘风》,此后代有妇女著作传世。南朝宋始有《妇人诗集》之编纂,但已不传。此书是明代编纂较早的一部历代妇女诗总集。田氏肯定了妇女在社会中与男人相等的地位:

“乾坤异成,男女适敌”,至于“内外各正”只是“职有所司”,分工上的不同,所以他对历代不重视对妇女著作的收集是不满的,并专力搜集古往今来妇女诗作,本着“人有善而必彰,言无微而不齿”的态度,广泛收罗。“自五帝至秦,以其邈远,故所必录;自汉至六朝,则事略而诗详;自唐至五代,则事详而诗略”(见田氏《自序》)。于宋元则突出大家、名家,明代只是偶录所见。由此可见田氏选诗目的在于因诗存人,“当为续史”。此书也不脱明人著书风气,往往好古炫博,考略疏略,如《皇娥歌》本出自晋王嘉《拾遗记》,为小说家言。编者则断为嫫祖所作,甚为荒谬,颇为后人所诟病。有明嘉靖间刊本。另有清李元龄为补《诗女史》十二卷。

(王学泰)

【古今女史】 妇女诗文总集。二十卷,诗八卷。明赵世杰编纂。赵世杰字问奇,武林(今浙江杭州)人。赵氏极倾心于历代才女之诗文,其序云:“海内灵秀,或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表明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反抗和妇女的聪明才智终于为人们所认识,基于此,编者辑此书,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历代妇女生活、心态,以备“古今之阙遗”,所以名之为“史”。全书搜辑虽然疏漏甚多,但编纂较为严肃。有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

(王学泰)

【彤管遗编】 历代妇女诗总集。二十卷。明邨琥采辑。邨琥字仲玉,号玄厓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活于明嘉靖间。此编分前、后、续、附四部分。卷一至卷四为前集,卷五至卷十四为后集。卷十五至卷十七为续集,卷十八至卷二十为附别集。编者自序云:“余博阅群书,得女之工于文翰者,凡四百人,编次成帙,名曰《彤管遗编》,盖取诗人‘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意也。诸体稍备,分卷二十。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嬖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由此可知,此书前后编排是具有道德含意的,而编者之道德观十分迂腐陈旧,因而此书具有十分浓重的封建色彩。每集之中,基本上“以世次远近,列其先后”,各集之中虽然以作者身份为去取标准,其中亦稍有变通。对于“嬖妾文妓之中”有贤行者,升附于前、后集之末,以为后世修行者劝,亦“重在表现”之意也。此书分三十八卷本、二十卷本、十八卷本。据编者自序所言当以二十卷本为邨氏最初编次,此本有明嘉靖间刻本。另有明隆庆元年(1567)所刊三十八卷本。此本分为前、后、续、附、别五集。《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著录之十八卷本。可能是残本。

(王学泰)

【名媛汇诗】 历代妇女诗文总集。二十卷。明郑

文昂编纂。郑文昂字秀卿,闽人。此编收录历代妇女所作之诗,前十八卷为诗,十九卷收赋二十四篇、赞颂二十一篇,卷二十收尺牍五十三首。书中所录历代妇女诗歌,以求全为主,不免真伪杂糅,然编者不像《彤管遗编》编者那样思想陈腐。郑氏对于不同地位、出身、不同遭际之妇女能够一视同仁,颇多同情谅解之心。朱之藩在《序》中称赞文昂“居恒以为正内正外,大义惟均;五生五成,造化攸定”,因而对“古今才士之作,不啻汗牛充栋;后先女史之词,何独晨星朝露”的现象,颇感不平。郑氏“爰探往牒,翻作新编,词以类分,人从世纪。上从宫闱戚里,下及荒墅幽闺,或入道而洗铅华,或倚市而攻歌舞。苟谈言微中,咸咳唾以成珠;倘真意之克宣,传火薪而阅世。大则有关于理乱兴衰之数,小亦曲阐其深沉要眇之思。正固足表其苍筠翠柏之操,雅亦能写其风云月露之致。奏之房中帐底,欢燕不隔千秋,纵同濮上桑间,鉴戒可垂百代”。可见此书极具包容性,编者认为只要能反映真意真情,不管其题材大小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皆有可取之处,因为“此皆天籁之自然”,不是“机心之强致”所以它们自有其存在的意义。此书有明泰昌元年(1620)刊本传世。

(王学泰)

【名媛诗归】 妇女诗总集。三十六卷。明钟惺编选。钟惺论诗,本乎性灵。他对于盛行的拟古风气十分不满,而妇女之作恰恰多出性情。其序云:“今人今上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另外为了纠正公安派之俚俗熟软,他主张诗境应该清幽孤峭,而上层社会(宫闱)之女子深居独处,对此境多有领悟。又云:“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因此,在钟氏看来,妇女有得天独厚的写诗条件,所以他断言“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此书所收多为上层妇女所作。卷一、二为古逸、汉,卷三至七为汉魏六朝,卷八为“回文”,卷九至十五为唐,卷十六至十七为蜀,卷十八至二十二为宋,卷二十三、二十四为元,卷二十五至三十六为明。其间亦有真伪杂出(特别是“古逸”部分),亦为好博炫奇之所致,四库馆臣认为此为伪书,证据似亦未足。有明万历刊本。

(王学泰)

【查制续泐】 妇女诗总集。五卷。清范端昂编纂。范端昂字吕男,广东三水人。所谓“查制”(或“查体”),乃“香奁体”之省称,本指反映士女闺房生活的诗歌体裁,后将妇女写作的诗歌也称为“香奁体”。此书所录皆为历代妇女所制之诗词,以描写春恨秋怨和个人生活的不幸为主。范氏最初刻《香奁诗泐》一卷,传本极罕见。后又刻《查诗泐补》二卷。

第一卷收五绝,包括从张文姬到季嫔十八位女诗人的作品。第二卷收七绝,包括从何仙姑到季嫔三十五位女诗人的作品。此书是第三刻。每卷也多殿以季嫔,书中又多录季嫔批语,可知季氏也参加了这一套妇女诗选的编选工作,所以在《奁制续泐》首卷引季氏之语云:“女子不幸,锦汨米盐,才沉针线,偶效簪花咏絮,而腐儒辄瞠目禁止曰:‘闺中人,闺中人也!’即有良姝自拔常俗亦凤毛麟角,世所希睹。”由此可见妇女对于压制她们的封建礼教的不满。范氏在集中的一些批语也表现出他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如在王韞秀《偕夫游秦》“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别离泪,携手入西秦”后批曰:“此诗真足廉顽立懦。”在李因《秋发百草湾》后批曰:“接齿牙冷然鬯然,若清风明月之入怀也,其灵隽实根天性得来。”“昔人谓乾坤清淑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妇人,诚哉是言。”此书与《香奁诗泐》、《奁诗泐补》均有康熙年间刊本。另外编者还有《奁泐续补》三卷,卷一收古体,卷二为近体,卷三为排律,有雍正十年(1732)刊本。

(王学泰)

【古今岁时杂咏】诗总集。四十六卷。宋人宋绥初编、蒲积中续编。宋绥(991—1040)字公垂,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年十五召试中书,迁大理评事。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应天府,参知政事,卒赠司徒,谥宣献。蒲积中,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平履历不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宋绥在中书省曾手编古诗,魏晋迄唐人咏岁时篇什十卷,晁氏益为二十卷,蒲氏又增成此书,主要是增添了北宋著名诗人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篇。宋书只收一千五百零六首,蒲书增加到二千七百四十九首,其分目不变。此书从元日到除夜共二十八目,计四十二卷。四十三卷至四十六卷按月编排,从正月到十二月。全书所收多为点缀风景、应时应节之作,还有大量的为皇帝、太后、太妃、郡王、夫人而写、在他们所居住的殿阁张贴的帖子,如《春帖子》、《端午帖子》之类。这类作品占的比重很大,却令人生厌。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声画集】诗总集。八卷。南宋孙绍远编。孙绍远字稽仲;居里不详,约为淳熙(1174—1189)年间人。题画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大类,其思想、艺术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自宋以后诗成为文人画的组成部分。孙氏认识到“画之有益于人也多矣,今之世而识古之人、知古之事;生长人间而睹碧落之真……凡宇宙之内苟有形者皆能藏吾室中”(见编者《序》),画难遍得,因此辑题画一集,以便能时时观览。全书分二十六部分,包括:古贤、故事、佛像、神

仙、仙女等等,鬼神、人物、美人、蛮夷、赠写真者、风云雪月、州郡山川、四时、山水、林木、竹、梅、窠石、花卉、屋舍器用、屏扇、畜兽、翎毛、虫鱼、观画题画、画壁杂画。其分类标准不一,其编次也过于琐屑。不过这也是宋代书坊刻分类诗文时特有的风格。集中所收诗逾千,宋代一些题画诗赖此以存。并可以“因诗而知画,因画而知诗”。北宋苏轼即有名句“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幹马》)。集名取义于张舜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跋百之诗画》),南宋钱鞏“终朝诵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宋诗纪事·次袁尚书巫山诗》)。此书名即用此意。有清康熙间曹寅刊本。

(王学泰)

【御定历代题画诗集】历代诗总集。一百二十卷。清陈邦彦奉康熙皇帝旨编纂。陈邦彦字世南,号匏庐道人,海宁(今属浙江)人。康熙癸未(1703)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南宋孙绍远有《声画集》,收录历代题画之作,康熙病其所收面狭隘,只收唐、北宋两代,数量少而且体例杂乱,故命儒臣重新编纂。此编所收题画诗始于唐,终于明末,其收录各体诗八千九百馀首,分为三十类,包括:天文、地理、山水、名胜、古迹、故实、闲适、古像、写真、行旅、羽猎、仕女、仙佛、渔樵、耕织、牧养、树石、兰竹、花卉、禾麦蔬果、禽类、兽类、鳞介类、花鸟合景、草虫、宫室、器用、人事、杂题等,其分类比《声画集》也高明不了多少。其实一幅图画,各景俱备,如有题可按题意分类,如无题,或题意不在这三十类内,于是编者便任意分类。各类之间,界定不甚清晰,出此入彼,极易混淆。然此书将近千年之题画诗作,荟集于一编,读者“不逾几席,而流观山川险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镜往代遗留之迹,以至农耕蚕织,纤悉必具;鸡犬桑麻,宛然如睹”(见康熙皇帝《序》)。书中所涉猎“名物典故,有资考证”;所载之“鸿篇巨制,有益文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编所录亦为研究诗歌与绘画关系提供了方便,直至今日仍为研究者与画家所资取。此书最早刊于康熙间,有内务府刻本,极精美。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诗总集。四百八十六卷。清陈廷敬奉康熙皇帝旨编纂。陈廷敬(1639—1712)本名敬,奉旨改为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咏物诗为中国古典诗歌之重要门类,自上古即有咏物之作。此编“包罗诸品,荟藂群材”,上自天地日月宇宙之大,下及草木鸟兽鱼虫之微,无不囊括以尽。全书共分四百八十六类,又附见四十九类,起于上古,下至明末,收录历代咏

物诗一万四千五百九十首,各代咏物之作,多会于此。如四库馆臣所言,书中所收“诸体咸备,庶汇毕陈,洋洋乎词苑之大观也。夫鸟兽草木,学诗者资其多识,孔门之训也”。“学者坐讽一篇,而周知万品,是以摘文而兼博物之功也。至于借题以托比,触目以起兴,美刺法戒,继轨风人,又不止《尔雅》之注虫鱼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此书不仅使研究咏物诗者便于查考,而且对研究博物史者亦有参考价值。此编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内务府刊本,极精美,此刻分装为六十四本,未分卷。乾隆间收入《四库全书》时分为四百八十六卷,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古谣谚】 古代谣谚总集。一百卷。清杜文澜编纂。杜文澜(1815—1881)字小舫,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曾任江苏省道员、两淮盐运使。此书辑录上古至明代散见于各种书中的歌谣与谚语共三千三百多条,每条包括谣谚、谣谚出处,并加以注释(多采古注、互注或引他书以注之),间附按语以弄清应该辩证之处。全书体例严密,其去取以只“发呼语言,未著文字”为界限,以“初作之时,是否著于文字为断”。并列举了四十多种情况下的“不录”,为“谣”、“谚”作出严格界说。谓“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言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所引皆见《凡例》)。并把极易与谣谚相混淆的歌、诵、讴、词、赋以及成语和泛引古人言语者分开,也不收录当代谣谚,对于出自依托附会古人,仙谣鬼语,迹近荒诞,以及事涉猥亵不登大雅之堂者,皆另立附录一门,加以区别。但在此门也收有所谓“语出盗贼者”,如元末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明末之“迎闯王,不纳粮”,则表明编者之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书中所援据书籍共八百六十余种,多为善本,遇有诸本不一者,则择善而从。编排次序以谣谚出处所属四部(经、史、子、集)为序。总之此书编纂确如刘毓崧序中所言:“采摭期于至详,裁鉴期于至审。体例期于至密,订正期于至精,集诸家之长,而无诸家之失。”有清咸丰刻本,常见者有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王学泰)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古诗总集。五十四卷。近人丁福保编纂。丁福保,字仲祐,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南菁书院,后学医,中西贯通,以西医为业,喜藏书刻书,辑《历代诗话续编》、《说林解字话林》等书。此书上起西汉,下至隋代,收作者七百余人。全书分《全汉诗》、《全三国诗》、《全晋诗》、《全宋诗》、《全齐

诗》、《全梁诗》、《全陈诗》、《全北魏诗》、《全北齐诗》、《全北周诗》、《全隋诗》等,依时代先后和地理位置(先南后北)编次为十一集。丁氏编此书只以冯惟讷《古诗纪》为依据,参酌冯舒《诗纪匡谬》,删去《古诗纪》中的前集、外集和别集(诗论、诗评、品藻、杂解以及考证等),并增入唐许朝宗所辑《文馆词林》残卷中所载各诗,其他则一仍其旧,但没有吸取清杨守敬为补冯书之不足而作的《古诗存目》中的成果。有些地方不仅没有订正冯书之失,反而又增加了新的错误。如冯书录吴均《古意》七首,其中五首原出于《玉台新咏》的《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冯书未能根据《玉台新咏》而全部收入,丁氏据此删去冯书之《古意》七首,录入《玉台新咏》六首,遂使吴集增入一首,而脱去两首。诸如此类例子还有一些。但此书搜罗还较冯书完备,又系排印,卷帙稍简,故较流行。有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王学泰)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 古诗总集。一百三十五卷。今人逯钦立编纂。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笔名祝本,山东省巨野人,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此书收上起上古下至隋代的诗歌(《诗经》、《楚辞》不录)。在冯惟讷《古诗纪》基础上广泛搜辑、考订缺失。以时代先后为次,各代之中先诸家、次谣谚、再次郊庙歌辞,最后为释道鬼神之神诗。此书充分应用了新发现的资料,包括国内已佚的古籍(如从日本传回的唐许朝宗《文馆词林》残卷)、地下发掘和敦煌石室中的遗卷(如汉简中的《风雨诗》、敦煌石室中《老子化胡经》中《玄歌》等),并从碑帖、方志、释道经藏、类书辑出许多为冯氏和丁福保所遗漏的诗歌谣谚,并订正了冯书中的一些错误(如把宋王令的《於忽操》误作庞德公的作品,把晋应享的《四王冠诗》误放在汉朝等)。所录之诗均注出处,并对作品真伪、作者、时代、题目、体裁、时间、顺序以及作品的完整与否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考订。编者在辑诗时掌握偏严,一些作品可录而未录。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王学泰)

【建安七子集】 占诗文合集。七卷。今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指东汉献帝建安时代并称的七位诗文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等。七子皆有诗文别集行世,《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至宋便先后亡佚。现在能见到的七子别集,皆为明人或清人从唐宋类书、总集及史乘中抄撮而成的辑本,其中以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有曹植,无孔融)本,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其中缺徐幹集)本、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

朝名家集》本流传较广,各本也都存在着搜罗未备、勘校欠精等问题。此书在前人辑本基础上,参稽群书,辨伪订讹,重新整理而成。书中所收七子诗文,人各一卷,按诗、赋、文次序编排。每类下篇目,大体按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次序编次,所收诗文一一注明出处,首列之出处即为辑录之底本,以冯惟讷《古诗纪》、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严可均《全后汉文》为校本,并据《文选》、《玉台新咏》、《文馆词林》、《乐府诗集》、《古文苑》以及有关丛书、类书、史籍等详加校勘,后附校记,便于参考。书后附《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建安七子杂著汇编》、《建安七子著作考》、《建安七子年谱》等,为研究建安七子提供了较为准确与详尽的资料。有中华书局1989年排印本。

(王学泰)

【续古今诗苑英华】 六朝初唐诗总集。十卷唐僧惠静编。惠静(又作惠净,慧静),俗姓房,纪国寺僧,有藻识。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古今诗苑英华》,惠静继其后,辑集梁至唐初诗五百四十八篇,诗人一百五十四人,编成《续古今诗苑英华》。刘孝孙为之序。此书起自梁武帝萧衍大同年中所作之《会三教篇》,终于唐刘孝孙之《早发成皋望河》。其选诗标准为“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刘肃《大唐新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此集甚详。盛唐时代,复有无名氏编《诗篇》十卷,仿惠静《续古今文苑英华》,亦起自梁代,迄于当朝,以类相从,诗篇超过惠静所集之数。刘肃《大唐新语》对此两书叙述甚分明。自《旧唐书·经籍志》始,《新唐书·艺文志》、《通志》、《文献通考》均著录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则已将无名氏所集《诗篇》混入其中。明以后,此书少见著录,已散佚。

(吴企明)

【玉台后集】 诗总集。十卷。唐李康成编。这是六朝、初盛唐诗合选本,成书于玄宗天宝年间,选取徐陵《玉台新咏》所遗落的作品以续之,采梁萧子范至唐张赴二百零九人、乐府艳诗六百七十首,其间有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潮等人诗,李康成自选《河阳店家女》等八首编入。《新唐书》、《宋史》之《艺文志》著录此集为李康编,误。宋代公私书目均著录之,刘克庄曾于郑子敬家亲见原书,并有题跋(见《文献通考》卷二四八引)。明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著录此集,《永乐大典》残卷亦引及此书,今已不存,《全唐诗》保存此集二十人诗。

(吴企明)

【古今诗人秀句】 诗总集。二卷。唐元兢编,参预此集编纂的尚有刘祎之、范履冰。元兢,字思敬,高宗时为周王府参军、协律郎,尝预修《芳林要览》。此集乃历代与初唐诗秀句合选本,摘录两汉、魏、晋、

宋、齐、梁、陈、隋唐代(终于初唐上官仪)近四百名诗人之秀句。元兢作《古今诗人秀句序》(载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阐明秀句“乃六义之眉首”,详述撰集秀句“遂历十年”之经过以及“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芳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的取舍准则。是集实启后代摘句之风,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王起《文场秀句》、黄滔《泉山秀句集》、胡嵩龄《唐诗摘句分韵编》,莫不断其绪余。然皎然尝批评曰:“二子(指元兢与元鉴)天机素少,选又不精,多采浮浅之言,以诱蒙俗。”“无益于诗教矣。”(《诗式》卷一)此集在宋代书目已少见著录。明胡应麟则以为唐人好集诗句为图,除《诗人主客图》以外,“余悉不传”(《诗薮》杂编卷二),可知是书明代之前已佚。

(吴企明)

【高氏三宴诗集】 唐诗总集。三卷。唐高正臣编。高正臣,广平(今河北鸡泽)人,联姻帝室,历仕太子正字,润、湖、申、邵、襄州刺史,卫尉卿。工诗,善书法。高宗调露二年(680),高正臣与诸人于上元夜与晦日三次宴集高氏林亭。上元夜,预宴者六人,以春字为韵赋诗,长孙正隐作序。晦日初宴预者二十一人,以华字为韵,陈子昂作序。晦日重宴,预者八人,以池字为韵,周彦晖作序。高正臣汇编全部诗作,一会成一卷,各冠以序。诸诗大抵描绘洛阳上元夜冶游盛况以及宴饮情状、初春景物,风格华丽,其内容不过表现“昌年之乐事、令节之佳游”(长孙正隐《上元夜宴效小庾体序》)而已。《唐诗纪事》卷七录此集诸人诗。有《四库全书》本、《晨风阁丛书》本。

(吴企明)

【珠英学士集】 唐诗总集。五卷。唐崔融编。又名《珠英集》,乃是“但纪朝士”(《中兴间气集》序语)的初唐诗选本。此书成于武则天时代,圣历中,武后令麟台监张昌宗召集李峤等学士预修《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书成奏上。崔融乃编集预修《三教珠英》之学士李峤、沈佺期、宋之问、富嘉謨、员半千、王无竞、马吉甫、元希声、刘知幾、杨齐哲等四十七人所赋诗篇,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勒为五卷,题为《珠英学士集》,并为之作序。是集《新唐书·艺文志四》有著录:“《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然宋以后已湮没。近代于敦煌石窟发见编号为斯氏“二七一七”和“伯氏三七七一”之唐写本《珠英学士集》残卷,共载诗四十九首,其中有不见于《全唐诗》的佚诗二十七首。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指出:“自是集散佚,诸家诗或不尽传。”持残卷与《全唐诗》对照,异文甚多。又,残卷所载之爵里,官职,亦可补史传之不足,如斯二

七一七刘知幾诗,原题“右补阙彭城刘知幾”;伯三七七一乔备诗,原题“满州安遂县令宋国乔备”,均不见于他书。足见《珠英学士集》残卷具有校勘、辑佚、考订等重要学术价值。(吴企明)

【李氏花萼集】唐诗总集。二十卷。唐李义编。李义,本名尚真,赵州房子(今河北临城)人,与兄尚一、尚贞,俱有文名。玄宗开元初,义任紫微侍郎,与苏颋对掌纶诰,时称“苏李”。他将兄弟三人之文集,合为一编,号《李氏花萼集》,《新唐书·艺文志四》有著录。后世书目很少著录,胡应麟叹为“后世不易得也”(《诗薮》杂编卷二)。今已佚。《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一著录《李氏花萼集》五卷,乃宋代李氏兄弟五人词集合编,与李义此集同名而异书。

(吴企明)

【贺监归乡诗集】唐诗总集。一卷。编者不详。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初,太子宾客、秘书监贺知章上疏请度为道士,辞官归越州乡里。玄宗亲作诗序为其送行,百官亦饯送赋诗。本集即编录玄宗及百官赠别之诗而成。《通志·艺文略八》、《宋秘书省续编刊四库阙书目》等书有著录,原书已不存。孔延之编《会稽英总集》卷二收录送贺诗近四十首,多数录自该集。《全唐诗》仅收录五首,余均失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钞本《贺秘监归乡诗》一卷,即据《会稽英总集》录出,并非原书。(吴企明)

【正声集】唐诗总集。又名《唐正声》。三卷。唐孙翌编。孙翌,字季良,以字行,吴郡人,历仕右拾遗、集贤院直学士,监察御史,曾预修《唐六典》、《初学记》。这是初唐诗选本,刘希夷诗选入最多,当时颇有影响。刘肃《大唐新语·文章》载,刘希夷本“不为时人所重”,因赖《正声集》而得名,顾陶《唐诗类选序》曾提及之,五代王贞范《续正声集》即续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尚著录此集,至南宋时已湮没,蓄书最富之尤袤、摭拾甚详之计有功、《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志》亦概莫谈及。明徐爌《徐氏红雨楼书目》著录《唐正声》,此乃高棅《唐诗品汇》之节本。与孙翌《正声集》无涉。

(吴企明)

【辋川集】唐诗总集。一卷。王维编自己与裴迪之唱和诗。王维得宋之问辋川别墅于蓝田,有景点二十处,他与裴迪浮舟往来其间,咏啸终日,弹琴赋诗,“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辋川集序》),因编集之,号为《辋川集》。每个景点题咏一首,共四十首,全为五言绝句,描绘辋川别墅之幽美景色,表现诗人悠闲超脱的心境,风格清新自然,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此集很早附入《王右丞集》,《唐诗纪事》于“裴迪”条中全录《辋川集》诗,单行本有《说郭》

(委宛山堂本)第七十五卷收录之《辋川集》。

(吴企明)

【翰林学士集】唐诗文总集。此书原名不详,考翰林学士始置于玄宗开元时代,集中所载作者均为初唐人,不得称翰林学士,可见今名为后人所加。因原书久佚,历代书目均未著录,编者姓名待考。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录》、清陈田《翰林学士集》景刊本序均以为许敬宗编,系揆理推论,尚无确证。此书早已不见于中土,仅有唐代写卷残本(诗集一卷、墓志一卷),流传至东土,藏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清陈衡山奉使日本,购得《翰林学士集》诗卷之传钞本,携回国内,于光绪年间交其兄陈田雕板影刊,国人始得窥见原书面貌。此影唐卷子本凡收诗六十首,诗人十九位,颇具学术价值:其一,集中四十八首初唐诗及刘子翼、郑元琬、张后胤、陆播、高士廉、郑仁轨等六位诗人,均不见于《全唐诗》,可取之补遗。其二,所载诸人诗,题下列撰人官衔,可与唐史印证,亦可补唐史之阙失。其三,所载文字与《全唐诗》甚多异文,足资校勘。

(吴企明)

【朝英集】唐诗总集。三卷。唐贾曾编。贾曾取“朝端英秀”之义,题集名为《朝英集》。玄宗开元十年(722),张说赴朔方军巡边,玄宗作《送张说巡边》诗,群臣奉和,贾曾奉敕作《张尚书赴朔方序》,并受命编集诸人送别之作。此集收唐玄宗诗及张说应制诗,又收张九龄、宋璟、崔日用、徐坚、胡皓、源乾曜、韩休等人诗,厘为三卷。《朝英集》已佚,诸人送张说巡边诗,均载于《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附载之。《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朝英集》,附注:“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然考张孝嵩于开元十年由安西都护迁太原尹,而诸人诗均题为送张说巡边,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王翰考》云:“宋人误记,乃以张说为张孝嵩。”(吴企明)

【国秀集】唐诗总集。三卷。唐芮挺章编。集前有其友人楼颖之序,称“国子司业苏公”,即苏源明,其任国子司业在天宝十三(754)载后,则此书选诗范围下限为天宝三载,而成集已在天宝末。序又云:“今略编次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然今本“目录”仅载八十八人,集中实存八十五人,诗二百十八首,与原序不合。人选者除李峤、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四人,余均为盛唐诗人。楼序论作诗应“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此实为芮氏甄取诗作准则,因此入选诸诗较多温柔婉丽之作。与殷璠《河岳英灵集》相比,同为盛唐诗选本,而取舍有所不同。殷书重古风、重风骨;芮书重近体、重婉丽;殷书重名家,芮书多小家,不乏庸陋之诗,故北宋曾彦和指出:

“挺章编选,非璠之比。”(《国秀集跋》)《新唐书·艺文志》与《崇文总目》皆阙载此集,《直斋书录解题》有著录。有明嘉靖本,《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此排印。

(吴企明)

【河岳英灵集】 唐诗总集。二卷。唐殷璠编。殷璠,丹阳(今属江苏)人,生平事迹不详。殷璠选录盛唐常建、李白、王维等二十四位诗人、三百余篇诗,起于甲寅(开元二年,714)、止于癸巳(天宝十二年,753),每位诗人皆缀有评语。他以为这些优秀诗人乃锦绣河山所孕育的英才,故命集为《河岳英灵集》。集前有序、论各一篇,概述编选宗旨与盛唐诗歌之成就,云:“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殷璠提倡风骨、兴象,重视高雅、奇警,反对拘限声病,主张声韵自然,力矫南朝以至初唐柔靡、轻艳诗风。入选诸诗基本上能体现盛唐诗歌的基本风貌,在众多的唐人选唐诗中,本书之选篇与品评,均为精当,受到后人推崇。郑谷《读前集二首》云:“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孙光宪《白莲集序》中称道本书“优劣升黜,咸当其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所品题,颇多精惬。”《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本书为二卷,后代刻本或析为上、中、下三卷,历代公私书目多加著录,可见其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其选评结合之体制,为后代选家或诗论家提供了一种模式。今有宋刊本(莫友芝校),《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此本排印。(吴企明)

【丹阳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殷璠编。此书录同郡人包融、储光羲、丁仙芝、蔡隐丘、蔡希周、蔡希寂、张彦雄、张潮、张晕、周瑀、谈戴、殷遥、樊光、沈如筠、孙处玄、徐延寿、马挺、申堂构十八家诗,“前各有评”,其体例与殷璠编纂的另一总集《河岳英灵集》略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此集于《包融诗》附注中,并详载十八人姓名、籍贯、职官。《崇文总目》、《通志》、《遂初堂书目》均著录,高棅《唐诗品汇》还引用过此集。《吟窗杂录》尚存十六则评语与集序之佚文。今人卞孝萱有《殷璠〈丹阳集〉辑校》(载《唐代文史论丛》),陈尚君有《殷璠〈丹阳集〉辑考》(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吴企明)

【篋中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元结编。元结有感于“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之时风,乃取“独挺拔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篋中集序》)的沈千运诗,以及类此风格者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诗,得二十四篇,汇而成集。因这些诗乃“篋中所有”,故题名为《篋中集》。此集编成于肃

宗乾元三年(760),入选诸诗皆情味真挚,气息淳古,“声希味淡”(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评),“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尽矫浮华轻绮之风,颇能体现元结之诗风及审美理想,故刘熙载《艺概·诗概》评曰:“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诸书均著录,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尽取《篋中集》诸诗入选。宋有临安府太庙前大街尹家书籍铺刊本,汲古阁旧钞本,《随庵丛书》影刻尹家书籍铺刊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此本排印。

(吴企明)

【丽则集】 六朝初盛唐诗总集。五卷。李吉甫编。此集选录《文选》以后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成书于德宗贞元时代,贞元中郑余庆为之作序。《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均著录此集。至明代已不易得,王士禛欲见《丽则集》,“访求数十年不可得”(《带经堂诗话》)。今已不传。

(吴企明)

【搜玉小集】 唐诗总集。一卷。编者不详。《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著录《搜玉集》十卷,已佚,此《搜玉小集》盖删削其书而成。《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集云:“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诗六十一首。”已与今本相合,则南宋时已形成现貌。今本存三十四人,系因胡鹄等三人诗混入他人名下,故然。入选诸诗大抵按题材如应制、戎旅、闺思、怀古、冶游等,分类编排,然未明言。有汲古阁刊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以排印。

(吴企明)

【中兴间气集】 唐诗总集。二卷。唐高仲武编。高仲武,仕履不详,郡望渤海。此书选录当代诗人,起自肃宗至德初年(756),迄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肃、代两朝正值安史乱后,时称“唐室中兴”,间气,谓杰出之人才秉五行之气而生,指代杰出人才。故以此命集。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诗“终癸巳”(天宝十二载),本书正与之相接。入选诗人二十六人,诗一百三十余首,诗人前各有评语,其体例与殷书相仿。高氏以钱起、郎士元分置两卷之首,并谓“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甚推重之。所选诗以五律为多,五古次之,风格清新婉丽,“但使体尚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反映了大历时代的主要倾向,亦可见高氏的选诗标准。《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均著录。此书甚为后代选家看重,将其与《河岳英灵集》相提并论,严羽《沧浪诗话·考证》指出:“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毛晋《汲古阁书跋》谓:“《河岳》、《中兴》二集,一选开元迄天宝

名家,一选至德迄大历名家,相继品鹭,真盛唐一大观也。”有武进费氏影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唐人选唐诗(十种)》收录本集,即以后者排印。

(吴企明)

【盛山唱和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权德舆编。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唐次任开州刺史,作诗甚多,和者亦众,凡公卿朝士、司马从事、岩栖处士共二十三人,和诗若干篇。权德舆与唐次友善,乃集众诗编成《盛山唱和集》一卷,为作《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盛山唱和集》一卷,即此书。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著录本集,然未见原书,故注语有舛误,参见《盛山十二诗联卷》。

(吴企明)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唐诗总集。又名《大历年浙东酬唱集》、《大历浙东联句》。二卷。编者不详。此书乃是唐人地域性联句诗合集,收录唐代宗大历年间严维、鲍防、陈允初、谢良弼、吕渭等三十九人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唐代浙东节度使驻地)唱和联句之作,《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八》、《宋史·艺文志八》皆著录此集。原书今已不存,宋人所著《会稽缀英总集》、《古今岁时杂咏》、《唐诗纪事》、《兰亭考》、《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曾引录过此集中之诗篇。《全唐诗》仅收入三首,《全唐诗续拾》卷十七据宋代典籍辑出此集中诗十四首。

(吴企明)

【三舍人集】 唐诗总集。又名《元和三舍人集》。一卷。编者不详。此集收录令狐楚、王涯、张仲素三人的五言、七言绝句诗,因他们在宪宗元和时代均曾任中书舍人,故名。该集未见于公私书目中,然《唐诗纪事》卷四二载:“右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五言,七言绝句共作一集,号《三舍人集》。”并将其“尽录”之。《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亦均据以收录三人诗,但在具体篇章的归属上稍有出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存有明抄本,收入《唐人诗集八种》。

(吴企明)

【御览诗】 唐诗总集。又名《元和御览》、《选进诗》、《唐新诗》。一卷。唐令狐楚编。令狐楚在宪宗元和中任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奉敕编纂新诗备览,故以命集。楚仿《诗三百》例,选三十家诗,起于刘方平,下迄梁锽,得三百十篇(据陆游所见卢纶墓碑之记载),今本仅存二百八十九首,已有散佚。所选诗均为近体诗,“妍艳短章”(毛晋《识语》),入选大历以来诗人,下及张籍、杨巨源等当代作家,可见时人崇尚近体诗的风习。此集系帝王御览,禁外少见,故《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均未著录,《直斋书录解題》始载及之。有汲古阁本,收入毛晋所刊《唐人选唐诗(八种)》中,《唐人选唐诗

(十种)》,即据此排印。

(吴企明)

【盛山十二诗联卷】 唐诗总集。一卷。韦处厚等撰。韦处厚于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816—818),出为开州刺史,游于山水间,作十二诗以记其幽胜。开州,又名盛山郡,因题为《盛山十二诗》。当时和者有十人:元稹、许康佐、白居易、李景俭、严谟、温造、张籍(其余三人,不知其名)。穆宗长庆二年(822),韦将已作与元稹等人唱和诗汇集,联成大卷,名为《盛山十二诗联卷》,请韩愈题其首,愈因撰《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记此盛事。此联卷行于时,慕而为之者日多,影响颇大。《唐诗纪事》卷三十一载此集,然历代公私书目对此书均未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盛山唱和集》一卷,乃别是一书,与此卷无涉。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载《盛山唱和集》,注云:“韦处厚与元稹等十人诗,十二题一卷。”误将两集混为一书。《全唐诗》今录存韦处厚、张籍两人之《盛山十二诗》,其余诸人之诗均已佚。

(吴企明)

【三州唱和集】 唐诗总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之唱和诗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与白居易、崔玄亮同登拔萃科,长庆三年(823),三人分别为越州、杭州、湖州刺史,因三州为邻郡,常寄诗酬唱。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三郡唱和告终,乃结集,号为《三州唱和集》。《唐诗纪事》卷三九载其事。当时,元、白还常以唱和诗盛入竹筒里,来往递送,自称“诗筒”。《新唐书·艺文志四》、《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此集,因未经刊刻,流传不广,后遂不存。

(吴企明)

【吴蜀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刘禹锡编。穆宗长庆四年(824),李德裕为浙西节度使,镇润州,时刘禹锡任和州刺史,二人每赋诗,必驰书相示,且命唱和。文宗大和四年(830),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六年冬入为兵部尚书,时禹锡正任苏州刺史,乃汇集自己与李德裕之唱和诗篇,编为《吴蜀集》。刘氏《吴蜀集引》云:“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新唐书·艺文志四》、《宋史·艺文志八》均著录本集。今已佚。北宋宋敏求曾据本集哀辑刘禹锡遗诗十七首,编入《刘宾客外集》。

(吴企明)

【刘白唱和集】 唐诗总集。三卷。白居易编。此书乃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文宗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取刘、白自大和元年至三年在长安之唱和诗一百三十八首,命侄龟儿编录,题为《刘白唱和集》,勒为二卷,并撰《刘白唱和集解》,述编集之缘由,赞梦得诗之神妙。大和五年(831)冬,刘禹锡出为苏州刺史,时白居易在洛阳任河南尹,时相寄酬唱和。翌年,白居易又取两地唱和诗编为一卷,命为《刘白吴洛寄和卷》,附于《刘白唱和集》后,合成三卷,故《新

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此集为三卷,实已含吴、洛两地唱和诗在内。宋时该集尚存,《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八》、《唐诗纪事》、《宋史·艺文志八》,均有著录。此集今佚。北宋宋敏求曾据此集以哀辑刘禹锡遗诗一百零七首,联句七首,编入《刘宾客外集》。

(吴企明)

【彭阳唱和集】 唐诗总集。三卷。刘禹锡编。本书是刘禹锡和令狐楚的唱和诗集。文宗大和七年(833),刘禹锡任苏州刺史,应令狐楚之请,辑缀二人唱和诗百馀首,勒为二卷,取令狐楚封爵(彭阳郡公)之名名集,并作《彭阳唱和集引》以序之。开成五年(840),令狐楚卒,刘氏取大和五年以来自己与令狐楚唱和篇什,续编入《彭阳唱和集》中,合为三卷,继作《彭阳唱和集后引》,详述编纂始末。《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此集,作三卷;《宋史·艺文志八》则分别著录为《彭阳唱和集》、《彭阳唱和后集》。今已佚。北宋宋敏求曾据此集哀辑刘禹锡遗诗五十二首,编入《刘宾客外集》。

(吴企明)

【汝洛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刘禹锡编。文宗大和八年(834),刘禹锡移汝州刺史,时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元年(836)秋,刘禹锡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朝夕相处,以诗唱和,因編集汝州以来与白氏之唱和诗,勒成一卷,号《汝洛集》,并撰《汝洛集引》,说明編集原委。此集以刘、白两人在汝州、洛阳两地唱和诗为主,亦附有刘禹锡与裴度、吴方之唱和诗,《唐音癸籤》卷三〇载《汝洛集》,释为刘禹锡、白居易唱和集,近是;而《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以为乃刘禹锡与裴度唱和专集,欠妥。北宋宋敏求曾据此集以哀辑刘禹锡遗诗二十七首,联句三,编入《刘宾客外集》。(吴企明)

【断金集】 唐诗总集。一卷。唐令狐楚编。此集乃令狐楚与李逢吉唱和诗集,取“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易·系辞》)义。令狐楚与李逢吉友善,自为进士以至宦达,常相唱和,唐文宗开成初年,楚乃辑其与逢吉酬唱诗编成集,请裴夷直为之序。裴序已佚,《唐诗纪事》李逢吉条尚载有残文。李逢吉卒,令狐楚作《题〈断金集〉》诗有“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句以志哀悼。唐宋时诸家书目均著录此集,尚存。然因未经刊刻,难以远传,今已散佚。(吴企明)

【香山九老会诗】 唐诗总集。又名《洛中九老会》、《香山九老诗》。一卷。白居易等撰。白居易于武宗会昌二年(842)致仕,寓居洛阳,潜心禅学,自称香山居士。五年三月,白氏在其履道坊寓所,与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贞、张浑等六人,合尚齿之会,因各赋七言六韵诗各一首。其年夏,又有洛中遗老李元爽、僧如满与会,绘为《九老图》,白氏赋《九老

图诗》并序记其盛事。时狄兼谟、卢贞(另一人)以年未七十,虽与会不列名。诸人诗叙闲居宴集之事,抒悠然自得、达观常乐之情,《唐诗纪事》卷四九载此事及诸人诗。北宋司马光等人作洛中耆英会,即受其影响。此书有北宋鲍慎由刻本,《四库全书》本据之,附于《高氏三宴诗集》后。《说郛》(宛委山堂本)七十五号收录本书,又有《晨风阁丛书》本。

(吴企明)

【极玄集】 唐诗总集。二卷。唐姚合编。姚合选取二十一家“皆诗家射雕手”之诗人,又于众人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共得百首(《极玄集序》),编为二卷。今本实存九十九首,入选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多清隽之作,可见姚合之选诗标准,亦体现出姚氏之艺术个性。此集于诗人名下均注出其字、里贯、登科年、仕历等,为姚合原注,极有价值,有些可与史传互证,有些为他书未载,如“大历十才子”之名,诸书所载不一,唯此集与《新唐书·卢纶传》合。后代诗家对姚选极重视,韦庄《又玄集序》称“已极精微”,蒋易《极玄集序》:“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特有鉴裁。”本书在后代很有影响,《唐诗纪事》全部录入《极玄集》之选诗,《新唐书》、《宋史》之《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均有著录。仿其体例而编选者,有韦庄《又玄集》、陈康图《拟玄集》,有明秦西岩钞本、汲古阁影宋钞本,汲古阁刊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即用汲古阁刊本排印。

(吴企明)

【窦氏联珠集】 唐诗总集。五卷。唐褚藏言编。宋淳熙五年(1178)刻本,不分卷,合为一册。褚自称西江逸民,约为江西人,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尚在世。褚藏言辑合窦叔向五子常、牟、群、庠、鞏诗为集,以人为目,每人一卷,每卷二十首,诗前各有小传,为藏言所撰。共收诗一百首,附有韩愈、韦贯之、刘伯翁等人之唱和诗。此集流传极广,唐宋诸家书目均著录之,有刻于淳熙五年之宋刊本、汲古阁本、《四部丛刊三编》本、密韵楼景宋本等多种版本传世。

(吴企明)

【南薰集】 唐诗总集。三卷。唐窦常编。集名取“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意。此集乃中唐诗选本,选取中唐诗自韩翃至皎然三十家三百六十首诗,以西掖、南宫、外台分目,诗人名下各系以事迹、赞语,其体例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相仿佛。最早记载本书的是顾陶《唐诗类选》,尔后,诸家书目均有著录,足见流传很广。胡应麟称《南薰集》等唐人选集,“宋末尚传,近则未睹”(《诗薮》外编卷三),则此集于明代已佚。

(吴企明)

【新撰类林钞】 唐诗总集。此为日本所存唐诗写

本,原书未见于诸家书目,故卷数、编者均不详。今存该书卷四,卷首注明“《新撰类林钞》卷四 第三帙上”,第二行书“春 闲散上”。该卷为纸本,长五百五十八厘米,宽二十七厘米,行草书,传为日僧空海所书。所录唐诗凡二十家,四十首,皆盛中唐诗人,其中二十五首见于《全唐诗》,十五首为国内所未见(李颀、贺知章、崔颢、朱千乘)。另有残简数则,存诗五首,作者有何逊、惠敏、吉中孚,则知该书亦兼收六朝诗。日本京都大学小川环树撰《新撰类林钞校读记》,载《中国文学报》第十一册。(吴企明)

【**唐诗类选**】 唐诗总集。二十卷。唐顾陶编。顾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武宗会昌四年(844)进士,宣宗大中间任太子校书郎,与章孝标、刘得仁等诗人为友。顾陶费三十年精力,为“察风纪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宏扬“风雅之作”,“汉魏之风”,推尊李、杜,乃选取唐人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以类相从,分为二十卷,于大中十年(856)编成《唐诗类选》,成为唐人选唐诗中规模最大的一种。顾陶自作《唐诗类选序》、《唐诗类选后序》(今存,见《文苑英华》卷七十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详细阐述选诗宗旨、取舍标准、编排方法及编集经过。此书在宋代广为流传,《能改斋漫录》、《艇斋诗话》、《唐诗纪事》等书,多次引用其材料,据之可考知《唐诗类选》载杜甫、李白、韦应物、杨郇伯、畅当、张潮、王昌龄、金昌绪、朱绛、沈佺期、李敬方、孙叔向、鲍溶、綦毋潜、颜舒、杨牢等人之诗作。此书是第一部大量选录杜甫诗的总集,影响深远,后代选家如赵孟奎《分类唐诗选》,精选有唐一代之作,无不仿效顾陶《唐诗类选》。宋元诸家书目,大多著录此集,至明代则已罕见,胡应麟已慨叹《唐诗类选》之失传(《诗薮》外编卷三),然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著录此书,还曾收藏过,后绛云楼遭火灾,藏书尽成灰烬,《唐诗类选》遂不复存留人世。

(吴企明)

【**虎丘题真娘墓诗**】 唐诗总集。一卷。唐无名氏辑。真娘,唐代吴中乐妓,死后葬苏州虎丘寺前,吴中士人多题诗墓上,事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崇文总目》总集类曾予著录,云:“《虎丘题真娘墓诗》一卷,刘禹锡等三十二人撰。”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亦载及之。然今存之《唐代丛书》本《真娘墓诗》仅辑存李绅、张祜、李商隐、白居易、罗隐、谭铎等六人诗,已非完帙。

(吴企明)

【**同题集**】 唐诗总集。十卷。唐柳玄编。这是专录省试诗的选本,适用于应试举子。《新唐书·艺文志四》与《通志》仅录书名,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标明此书为“省试诗”,与《中书省试咏题诗》、王起《文场秀句》同列。此书自《通志》后,诸家书目均未

著录,故胡应麟以为宋室南渡后已散佚(《诗薮》杂编卷二)。(吴企明)

【**汉上题襟集**】 唐诗文总集。十卷。唐段成式编。宣宗大中时,段成式因事免官,退居襄阳,隐于岷上。时徐商镇襄阳,温庭筠、温庭皓、韦蟾、元繇(《唐诗纪事》作周繇)等皆为其幕府从事,相与唱和,又有崔珏、余知古亦相从唱酬。段成式乃辑集诸人之作,并录往来简牋,类编成集,题为《汉上题襟集》。唐宋书目均著录此集,曾慥《类说》卷四九、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唐诗纪事》卷五八均录其原文,然因未经刊刻,难以久传。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尚提及当时人有藏本。今已佚。(吴企明)

【**瑶池新咏**】 唐诗总集。又名《瑶池新集》、《瑶池集》。二或三卷。唐蔡省风编。蔡省风生平未详,据其《瑶池新咏序》(载《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况今文明之盛”句,当为中晚唐人。此书乃专选唐代妇女诗,选录李季兰、程长文等二十三位能诗妇女之题咏诗一百十五首,每首冠以小序,前有总序。其余女诗人姓名失载,然据年代相近之《又玄集》、《才调集》,大体可推知其姓名。《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著录此集二卷,《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此集作三卷。此书明清书目均未见著录,谅已散佚。

(吴企明)

【**松陵集**】 唐诗总集。十卷。唐陆龟蒙编集皮日休、陆龟蒙苏州唱和诗,皮日休作序。吴郡松江,又名松陵,因以名集。懿宗咸通十年(869),皮日休为苏州刺史崔璞从事,陆龟蒙携诗相访,往复唱和,凡一年,得诗六百五十八首,又附以崔璞及吴中名士之作,编为十卷。是集按往体诗、今体诗、杂体诗、联句问答分体编排,或抒写用世之志与壮志难酬之感慨,或描绘山水景物,表现隐逸生活之情趣,或谈玄说道,咏物唱酬,足以见出皮、陆当时“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松陵集序》)。清王夫之评曰:“皮陆松陵唱和诗,奕奕自别,巧心佳句,诚不可掩。”(《唐诗评选》卷四)而贺贻孙则谓“必欲炫才斗巧,以骇俗人,则亦过矣”(《诗筏》)。元、白以后,皮、陆为唱和诗之巨擘,对宋以后之诗歌创作影响很大,故此集能流传不衰,《新唐书·艺文志四》、《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有著录。旧有明刘济民弘治壬戌(1502)刊本,都元敬序。近人陶湘翻雕汲古阁影宋钞本,最为精审。(吴企明)

【**千载佳句**】 唐诗总集。二卷。日本大江维时编。此书是唐人诗句选本。大江维时,生活于日本醍醐天皇至村上天皇间(897—966),历官大学头、式部大辅及《白氏文集》侍读官。全集收录唐人诗人一百五十三家七言诗句一千零八十二联,按题材内容

分类编次,凡四时、时节、天象、地理、人事、宫省、居处、草木、禽兽、宴喜、游牧、别离、隐逸、释氏、仙道十五大类,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八门。入选诗句下注明诗人姓名、诗题名。其中,元稹、白居易句入选最多,超过半数,其他收诗较多的有许浑、章孝标、杜荀鹤、杨巨源、方干、温庭筠等,多存国内久已失传、《全唐诗》未收之诗句,日本上毛河世宁辑《全唐诗逸》,据之采辑逸诗二百六十三联,然尚有失漏。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钞本。(吴企明)

【又玄集】唐诗总集。三卷。唐末五代韦庄编。韦庄自序称其书继姚合《极玄集》后,“今更采其玄者”,选取一百五十人、三百首诗,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编成。然今本实存一百四十五人,二百九十七首诗。本书选录范围较广,最早的诗人为宋之问,而大多数为中晚唐诗人,编次颇为杂乱。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颇取材于此集。宋《崇文总目》有著录,然南宋重要书目已无记载,国内久佚。日本有享和三年(1803)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后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南唐刘吉编《江南续又玄集》,继其绪余,已佚。(吴企明)

【才调集】唐诗总集。十卷。唐末五代韦毅编。“才调”,犹才气,指文才。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谓唐末“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集名出于此。此集编选宗旨,见韦毅自序:“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每卷一百首,共录千首,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选诗数量最多的一种。所选诗作以中晚唐为主,尤重晚唐诗,颇多男女情爱之词,流丽艳逸之作,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毅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未为未见”。其不选深厚之杜甫、奇崛之韩愈,或出于此。此书编次无序,作者不以时代为序,略有重出,且有误收,然搜罗、流布唐诗之功不可泯。《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此集。清代有评注本问世,如冯舒、冯班《二冯评点才调集》,殷元勋、宋邦绥《才调集补注》,吴兆宜《才调集笺注》。有述古堂影宋钞本,《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又有汲古阁刊本。《唐人选唐诗(十种)》收录本集,即据《四部丛刊》本排印。

(吴企明)

【文章龟鉴】唐诗总集。一卷。五代倪有编。此集又名《诗体律诗例》,专选唐人律诗。《通志·艺文略八》言“唐倪有集前人律诗”,乃最早之唐人律诗选本,对后代之唐律诗选,影响极大,如方回《瀛奎律髓》、王衍《唐律诗选》、何乔新《唐律明玉》等。《新唐

书》、《宋史》之《艺文志》将此集编入集部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八》编入诗评类,《诗薮》杂编卷二视此集为“唐人诗话”,著录归类似均欠当。其书久佚。

(吴企明)

【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总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明人曾将唐人所选唐诗结集刊行,较著名的有毛晋汲古阁刊《唐人选唐诗(八种)》,计《篋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才调集》和《搜玉小集》。清人王士禛汇集传世之九种唐人选唐诗,其中,《又玄集》为赝品,另加姚铉《唐文粹》,编成《唐诗十种选本》,见《带经堂诗话》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毛晋《唐人选唐诗(八种)》的基础上,补入两种,集印成《唐人选唐诗(十种)》:一,韦庄《又玄集》,采用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二,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此系罗振玉影印之敦煌石室所藏伯氏二五六七号唐诗残卷。其余八种,《篋中集》用《随庵丛书》影印宋尹家书籍铺刊本,《御览诗》、《极玄集》、《搜玉小集》,仍采用汲古阁本,另四种用《四部丛刊》本。现存之“唐人选唐诗”,大抵荟萃于斯。从这十种选本,可以看出一个时期的创作概貌和审美风尚。唐代选家的诗学观点、选诗标准和编排方式,为后代选家提供范例,也是校勘、辑佚、考订唐诗最为原始的资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8年排印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该所1962年重印本作新一版刊行。

(吴企明)

【唐百家诗选】唐诗总集。二十卷。宋王安石编。此书收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余首,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次。诸大家如李、杜、王维、韩、柳、刘长卿、韦应物等,均未收,盖以诸家篇章繁富,流布最广,不待选刻以传故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为宋敏求编,《四库全书总目》采其说。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力证此说之诬,主要根据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餘编,委余择其精者。”确证此书为王安石所选无疑。此书入选之诗,亦有不尽如人意者,行世后,褒贬不一。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储光羲后,方是荆公自去取,其去取深不满人意。”沈德潜《说诗粹语》卷下亦云:“王介甫《百家诗选》,杂出不伦。”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一五却说:“荆公此选多取苍老一格,意其时西崑盛行,欲矫其失,乃有此举耶!所选诸诗,虽不能尽唐贤之妙,亦可谓自出手眼,非人云亦云者。”此书有北宋元符戊寅(1098)刊本之南宋初年抚州重刻本,前有章安人杨蟠序,残存第一至第九卷,曾归汪氏艺芸书舍,潘氏滂喜斋,今藏上海图书馆,又有清康熙四十

二年(1703)宋萃刻本,原为残宋本,后经毛扆购得全本补刻成全帙。(吴企明)

【万首唐人绝句】 唐诗总集。一百卷。宋洪迈编。洪迈,字景庐,别号野处,鄱阳人(今江西波阳)人。历仕起居郎,婺、越等州知州,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官至端明殿学士。著有《容斋随笔》五集、《夷坚志》等。《宋史》有传。洪迈于淳熙七年(1180)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因取诸家遗章,得五千四百餘首。后入侍太上皇孝宗,以所编进呈,惊其多,因而继续搜罗,“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万首唐人绝句诗序》)。此书编成于绍熙元年(1190),二年十一月,刻毕,三年奏进。全书一百卷,每卷一百首,按七绝、五绝、六绝编排,总汇唐人绝句于一编,其功不小,然亦误入少量非唐人诗,且有截半首律诗为绝句的现象,王士禛曾病之,曰:“踏讹淆乱”、“略无诠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属数卷者,尤难检阅。”(《带经堂诗话》卷四)有明嘉靖刻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之影印。明赵宦光、黄习远曾加整理、增补。删去重复,诗以人汇,人以代次,厘为四十卷,有万历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即据此本排印。清王士禛有《唐人万首绝句选》。

(吴企明)

【丽泽集】 历代诗总集。三十五卷。不著编者姓氏。此集乃汉魏六朝、唐、宋诗之合选本,无序跋,元代方回谓乃吕成公(即吕祖谦)所编纂,因吕成公撰《关键》,附于其所编之《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后。《丽泽集》选乐府诗一卷,文选诗一卷,陶渊明诗一卷,王无功、沈佺期、陈伯玉、孟浩然、王维、张说、高适、储光羲诗一卷,杜甫诗四卷,李白、元结、韦应物诗一卷,钱起、李嘉祐、刘长卿、武元衡、韩愈诗一卷,孟郊、张籍、卢仝、刘叉、李贺、贾岛诗一卷,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益一卷,元稹、白居易诗一卷,杜牧、王建、李德裕、张祜、李商隐、温庭筠、姚合、方干、鲍溶、陆龟蒙、郑谷、罗隐、许浑诗一卷,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一卷,宋朝四言古诗一卷,乐府歌行附杂言二卷,五言古诗六卷,七言古诗一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三卷,杂体诗一卷。此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之,有宋刊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吴企明)

【众妙集】 唐诗总集。一卷。宋赵师秀编。师秀字紫芝,号天乐,为“永嘉四灵”之一。又编《二妙集》,选姚合、贾岛诗,与本集相辅(《众妙集》不选姚、贾诗)。此集前后无序跋,入选诗人凡七十六家,选诗二百二十八首,大多为中晚唐诗人,少数为初、盛唐诗人,编次杂乱无序。其中,刘长卿选入二十三首,为诸家之冠。集中有近体诗而不取古体诗,多五

言而少七言,显示出“四灵”的审美特征,所谓“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者也。或以为此编与《二妙集》皆师秀“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故前后无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传其诗法者转相缮写。幸留于后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槧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五下赵希弁《附志》著录《众妙集》一卷。铁琴铜剑楼旧藏《众妙集》明抄本,据宋本摹写,现藏北京图书馆。有汲古阁《诗词杂俎》本,《丛书集本初编》据以影印。

(吴企明)

【二妙集】 唐诗总集。一卷。宋赵师秀编。此诗专选姚合、贾岛二人诗,姚一百二十一首、贾八十一首。《瀛奎律髓》卷二十四贾岛《送朱可久归越中》诗下方回评曰:“《二妙集》于浪仙取八十一首。”同卷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昆陵》诗下方回评曰:“姚少监合诗,选入《二妙》者百二十一首。”宋“永嘉四灵”师法姚贾,赵师秀尤得力于姚合,故所选如此。宋槧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五下赵希弁《附志》著录《二妙集》一卷。今有明景宋刻钞本,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此书与《众妙集》之明抄本,出于一人之手,原为朱竹垞旧物,后藏于毛斧季家,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吴企明)

【唐人五言排律选】 唐诗总集。十卷。元李存编。李存,字明远,一字仲公,人称“俟庵先生”,安仁(今属江西)人,通天文、地理、医学、占卜、释道诸学,著有《俟庵集》。此书专收唐人五言排律,有清刻本,未见。仅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知有此书。

(杨旭辉)

【唐诗正声】 唐诗总集。有两部较为著名。①明高棅编。高棅曾选编《唐诗品汇》,因嫌其泛博,乃撮其精粹,删定为二十二卷,定名《唐诗正声》。全书收一百四十余位诗人的作品九百三十餘首,其选录标准沿《唐诗品汇》,仍“详乎盛唐”,“次中、初唐”,“元和以还间得一二声律近似者”。书中评注俱从旧本,唯诗人小传更为详核。编者虽然标榜以声律兴象。文词理致作为品评诗篇之依据,实际上真正看重的乃是声律、格调。因此《品汇》与《正声》之区别不单纯是繁与简,而是标举盛唐与格调之倾向是否鲜明。《正声》之目的在于揭示唐诗之“正声”,以供诗人模拟效法。对有明一代诗创作影响至巨。此书在明代颇多争议,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极为贬低,云:“高棅之选,诚盲灼也。”但是持肯定态度的还是居多数,胡应麟认为唐诗选本“至明高廷礼《品汇》而始备,《正声》而始精”(《诗薮》),何良骏亦认为此选“格最正”。明人刊刻甚多,有正统七年(1442)彭曜刻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何城刻本,延陵吴氏西爽堂刻本等。

明崇古堂本又与《古诗正声》合刊。明人桂天祥和郭濬又各有评点,可见当时影响之大。②清马允刚编。马允刚,字见一,号雨峰,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此书四十七卷,以诗人时代先后编次,兼收各体。每位诗人皆有评述,又将各诗体、诗人进行相互比较,为其他选本所不及。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耘经堂刻本,山东图书馆有藏。(杨旭辉)

【雅音会编】唐诗总集。亦作《雅音汇编》。明康麟编。康麟,字文瑞,广东顺德人,景泰间进士,天顺中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康氏性嗜吟咏,殊有所得但未嫌其韵成类,艰于检阅”(王钝序)。于是手录李杜韩三家本集及杨士弘《唐音》中五七言近体三千八百馀首,凡十二卷,以平声三十韵为纲,以诸诗按韵分隶,故名《雅音会编》。书中所列始音、正音,遗响亦多沿杨士弘《唐音》,无所发明。但书中偶有校正,足以参考。有明天顺(1457—1464)刻本、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沈藩勉学书院刻本以及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藩刻本。(杨旭辉)

【唐诗选玄集】唐诗总集。明万表编。万表,字民望,号鹿园,定远(今属安徽)人,正德中武会试及第,著有《玩鹿亭稿》、《唐诗远玄集》、《海寇议》、《万世家抄济世良方》。此书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凡一百十二家,约千首,不分卷。选诗颇重中唐,尤以大历间为最,其中刘长卿诗一百零四首,韦应物一百零三首,杜甫七十二首,居各家之冠。元白、刘柳、韩孟、皮陆及李商隐诸名家均未录,而无可、可止、处默、景云、栖白、护国等僧人却收诗颇多。全书仅选录诗作,不作笺注评点。有明聚好楼抄本,见者甚少,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册。(杨旭辉)

【唐大历十才子诗集】唐诗总集。明刘成德辑。刘成德,生平不详,约生活于明正德年间,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曾任监察御史。此书专收大历十才子的诗作,书中对文字上的讹误偶作是正,不作笺注评点。有的诗人(如崔峒)附有小传。有明正德刊本,但完帙不存,北京图书馆仅存崔峒、苗发、吉中孚三家集七卷,吴县图书馆又有司空曙一家七卷。(杨旭辉)

【唐音大成】唐诗总集。又题作《重选唐音大成》。明邵天和辑。邵天和,字节夫,宜兴(今属江苏)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官终云南招讨使,所至以清廉称。是书凡十五卷,藏于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有嘉靖五年(1526)叶良佩刻本,世所未见,仅据目录录于此。(杨旭辉)

【广十二家唐诗】①唐诗总集。原名《中唐十二家诗集》。明蒋孝辑。蒋孝,字惟忠,武进(今属江

苏)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累官户部主事。明嘉靖庚戌年(1550),蒋氏以家藏唐人诗集储光羲以下十二家,刊刻于常州。计《储光羲集》五卷(附《储嗣宗集》一卷)、《刘随州集》十卷外集一卷、《毗陵集》三卷、《钱起集》十卷、《卢户部集》十卷、《孙集贤集》一卷、《崔补阙集》一卷、《刘宾客集》六卷、《张司业集》六卷、《贾浪仙集》十卷、《王建集》八卷、《李义山集》六卷,凡七十八卷。诸家编次皆分类。《储光羲集》前录顾况序,《张司业集》有张洎和刘成德二人序。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刻本。②唐诗总集。明陆汴辑。凡八十一家,所录十二家同蒋孝所收。上海图书馆有明刻本。(杨旭辉)

【唐五十家诗集】唐诗总集。一百六十卷。收初、盛、中唐诗人诗集五十种,晚唐诗人不收。各集均无印行者姓名及印书牌记等有关材料,因其为明人铜活字印本,故习称“明活字本”或“铜活字本”。今人陈尚君据明何良骏《四友斋丛说》“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考定此书为徐缙印行。徐缙,字子容,号崦西,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曾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嘉靖八年(1529)罢官还乡,印行此书当在其间(参《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一文)。此书版式一律,细黑口,单鱼尾,鱼尾下为集名和卷页,左右双栏,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此版式和编排形式与当时所印行的同类书籍风格相类。五十种集子兼收诗赋,先赋后诗,诗则依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排、五绝、六绝、七绝之序编排。此书除少数集子为明人重辑本之外,多据宋元旧本刊行,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校勘价值。书中只有《孟浩然集》、《杜审言集》等六七家保留原书序传,馀皆略去,使其版本源流较难稽考,但从收录数、文字内容和避讳、空格等方面考辨,仍可断其与宋元旧本之关系,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指出其所收《李峤集》、《张说之集》“当以宋时单刊诗本重刻”。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将北京图书馆、天一阁及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各本加以汇集,影印出版。(杨旭辉)

【唐诗类苑】唐诗总集。今有三种传于世。①明嘉靖年间张之象辑。张之象,字华超,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著有《彤管新编》、《古诗类苑》、《唐雅》等。张氏以宋赵孟坚《分门纂类唐歌诗》佚阙不全,世无刊本,因辑《唐诗类苑》,与《古诗类苑》相联接。是书二百卷,将所收千余诗人的数万首诗分为日、月、星、河等三十九部,以类编排。书前录有唐历朝年号、诗人姓名及引用书目,虽名选诗,把它视为类书亦未尝不可。此书选诗之多,于唐诗选本中实为罕见,但因品裁未及,所收未免冗滥。此书后为卓明卿所得,割

裂删取而掩为己有。后经华亭王彻重为辨正厘定并付梓,方复张之象旧本原貌。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曹仁孙刻本和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②明卓明卿辑。是书为卓氏割取张之象原书中初盛唐部分而成,计一百卷。有明万历十四年崧斋活字印本,刊于王彻补订本之前。③清吴荣芝重辑张之象本,编为二百卷,一仍其旧名多,有清刻本。

(杨旭辉)

【唐十二名家诗】 唐诗总集。十二卷。明杨一统辑。此书的刊行是有所本的。明“嘉(靖)隆(庆)类刻十二家唐诗,盛行于世”(《诗薮》外编卷四)。明嘉靖前期,首次出现十二家唐诗合刻,乃集正德吴下(今江苏苏州)仿宋复刻本而成,所收十二家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后张逊业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对上书重加编定,黄埭于杭州刊成《唐十二家诗》。万历十二年(1584),南州杨一统对张书重为校阅,再刻于白下(今江苏南京),“校加精焉”(孙仲逸序)。又将张书之行款由半页九行,行十九字易为行二十字。此集有万历十二年刻本,王重民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见到此本(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

(杨旭辉)

【唐五家诗】 唐诗总集。六卷。明佚名汇辑。录皇甫冉诗二卷,郎士元、包何、包佶、皇甫曾诗各一卷,凡六卷。北京图书馆有明正德十四年(1519)吴门陆元大刻本。

(杨旭辉)

【唐诗纪】 唐诗总集。明黄德水、吴琯辑。黄德水,字清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吴琯,字孟白,漳浦(今福建云霄)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刻书颇多。初,黄德水编《初唐诗纪》十六卷而卒,吴琯遂接其绪,依冯惟讷《古诗纪》之体例,补为六十卷,又编成《盛唐诗纪》。与吴琯一起参与编纂的尚有陆弼、谢陛、俞体初、俞策等。吴氏《诗纪》仅编至盛唐,中晚唐未见,不知何故,后明末清初龚贤又继其遗绪,编《中晚唐诗纪》。书前有汪道昆、李维桢、方沅序,《凡例》以及《目录》二十八卷。方序及《凡例》大致讲明编纂旨要,是书按人编排,前列诗人小传,收诗“多本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并且加以较为精审的校订,“是编校订,先主宋版诸书,以逮诸善本,有误斯考,可据则从,其疑仍阙,不敢臆断”。季振宜《唐诗》初盛唐部分则多以《唐诗纪》为底本进行搜集,季稿又为御定《全唐诗》的一大来源,其影响可见一斑。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出版明万历十三年(1585)吴琯刻本,线装四函二十四册,凡一百四十卷,又目录二十八卷。而《北京图书馆善本目》著录的此本则为一百七十卷,目录三十四卷。

(杨旭辉)

【唐诗集】 唐诗总集。一作《新镌名公批评分门释类唐诗集》。四卷。明李维桢撰。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进士,有《大泌山房文稿》、《史通评释》等著作。此书以类编次,分天文、地理、时令等二十三门,另附六言杂咏、音乐、乐府宫怨闺情三类。有作家小传。选诗时有解题、注释和圈点,语不甚详,多空泛之言。编选也多舛误,书中竟收有李陵、苏武、鲍照、谢朓的诗。然书前的《唐诗集论则》,专引前贤名家论述,对绝句、五绝、七绝、律诗、五律、长篇古风古体皆有论述,颇可参考。有明萧世熙刻本,上海图书馆有藏。

(杨旭辉)

【唐诗所】 唐诗总集。四十七卷。明臧懋循编。臧懋循(?—1612),号顾渚,长兴(今属浙江)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精通戏曲,与王世贞、汤显祖相友善,所辑《元曲选》为治曲学者推重。除此而外,尚有《古诗所》、《负苞堂稿》。臧在编成《古诗所》后,一仍其旧体,复编《唐诗所》。分十四门排列,每门又各以类相从,名目繁多琐细,光乐府就有《郊祠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杂辞》、《杂歌谣辞》、《仙歌谣辞》、《男歌谣辞》、而乐府系又有歌、行、曲、词、篇、章、吟、咏、叹、谣等诸种名目,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恒竹割裂”。按其自序,以初盛为前集,中晚为后集,中晚抑者为别集,今仅见前集。有明万历三十四年臧氏雕虫馆刻本和万历徐智刻本。

(杨旭辉)

【初唐四子集】 唐诗总集。明张燮辑。张燮,字绍和,龙溪(今福建龙海)人,万历举人,博学多通,著有《东西洋考》。参与此书考订者尚有曹荃、徐爌、曹学佺等人。是集专收初唐四杰的诗作,其中王集十六卷,杨集十三卷,卢集七卷,骆集八卷,每集各附录一卷,凡四十八卷。《四部丛刊》王集即影此总集本,此本除了对王勃作品加以补遗外,尚作了细致的辨伪工作,将误入其中的王绩《田家》三首删去,在《附录·纠缪》中加以说明。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张燮、曹荃刻本。

(杨旭辉)

【唐诗援】 唐诗总集。二十卷。明李沂撰。李沂,字艾山,亦称壶庵,阳山(今属广东)人,生活于明天启、崇祯年间。当时诗坛有舍盛唐而宗中晚唐者,使得诗坛忘本逐末,诗风日颓。李沂有感于此,于晚年编定此书,极力推崇盛唐,谓盛唐“可以仪型百代”(自序),用以援救诗坛之偏,故命名为《唐诗援》。全书收诗一千一百首,其中杜甫三百馀首,李白、王维各六十馀首,而中晚则寥寥。全书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次序排列,书中对诗对人的评价多有独到之处。宗元豫赞誉此书“逾《品汇》”。所传版本甚罕见,有柳园藏板,二十卷。北京

大学有明崇祯五年(1632)刻本。(杨旭辉)

【唐六名家集】 唐诗集。一名《六唐人集》。明毛晋辑。毛晋少游钱谦益门下,博学强记。家富图籍,世所传影宋精本,多所收藏,家有汲古阁,传刻古书,流布天下,在明末以博雅好事名一时。其所汇辑刊刻唐人总集,还有《唐四名家集》、《五唐人集》、《唐人八家诗》、《唐三高僧诗》、《唐人选唐诗八种》等,多据宋本重雕。此集收《常建诗集》三卷附录一卷,《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王建诗》十卷,《鲍溶诗》六卷、集外诗一卷,《姚少监诗》十卷,《韩内翰别集》一卷、补遗一卷。有毛氏汲古阁自印本,1926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出版,较为通行。(杨旭辉)

【王韦合刻】 唐诗总集。明项纲辑。项氏以王维、韦应物诗风闲淡自然,较为相近,故将六卷本王集与十卷本韦集合而刊之。仅以韦集为例,项氏版本选择颇佳。其所收《韦苏州集》十卷,即以宋刊翻雕,“四库”馆臣认为其所据的宋本即为王钦臣校定本。项氏对毛晋汲古阁本中有疑问的拾遗诗不收人,态度十分谨慎。诗以类相从,编为十五卷,收诗五百七十一首,是韦集中收罗较为全面的一种,故此书中的韦集为《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所收。《王韦合刻》,上海图书馆有康熙项氏玉渊堂刻本。

(杨旭辉)

【唐诗选】 唐诗总集。七卷。明李攀龙辑。李攀龙是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在诗歌创作上,鼓吹“诗必盛唐”,曾编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以为学诗者之矩矱。此编即截取其唐诗部分编成。选诗四百六十五首,作者一百二十八人,重初盛,略中晚。白居易、李贺、杜牧等名家竟一首不录,偏执太甚。但因为与弥漫诗坛、取法盛唐的风气十分合拍,李攀龙又执诗坛之牛耳,故此书一出,颇受欢迎,特别受到“后七子”追随者之推崇。胡震亨言:“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而二百年后,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见《唐音癸笈》)此书印本很多,明代最精者为闵氏朱墨印本。刻于万历年间。当时书贾为牟利计,或称《李于鳞唐诗广选》,或附《诗韵辑要》而行,或谎称陈继儒(眉公)、袁宏道(中郎)“重校”,可见其流行之盛况。真正评注此编者有蒋一葵、王穉登、孙鑛、李颐、钟惺、钱谦益、陈继儒、凌宏宪、叶羲昂、刘孔敦等,体例有笺注、批注、评点、直解多种。此外,日本、朝鲜也有多种《唐诗选》刻本。

(杨旭辉)

【唐音统笈】 唐五代诗歌总集。一千零三十三卷。明胡震亨纂辑。此书卷帙浩繁,搜罗宏富,是我国古代私人纂辑的最大一部唐五代诗歌总集。震亨晚年家居,藏书万卷,日夕探讨,校读精勤,与汲古阁

毛晋等人往来,勤于著述。此书是胡震亨一生研究唐诗的结晶,其子胡夏客说:“先大人孝辕府君搜集唐音,结习自少。至乙丑岁(即天启五年,1625)始克发凡定例,撰《统笈》一千卷。阅十年,书成。”(《李杜诗通》识语)胡夏客所谓《统笈》一千卷,似为约数,《明史·艺文志》录此书为一千零二十四卷,《四库全书》录为一千零二十七卷,《千顷堂书目》则录为一千零三十二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范希仁抄补本一千零三十三卷最为完善。全书以天干为纪,后人推测其命名之由:“唐开元间,列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科,科各置牙签,殊以色。明之季,有海盐胡孝辕先生,学贯群书,仿其意而汇全唐三百年诗,次为一编,若初、若盛、若中、若晚,亦签区之,戊签其晚唐也。晚唐曷以为乎戊签?甲以帝王诗,而后初、盛、中以次相及也。以下无诗乎?有己、庚、辛、壬矣。己、庚、辛、壬非唐人诗乎?唐人之不足名家并不足名诗,与异乎人之人,更兼夫非人之族之诗也。然则癸其遗乎?是用采古今之诗话、诗史,时参以己见,为之殿也。”(杨鼎《唐音戊笈序》)可见《统笈》之前九笈,纯辑录诗作,且基本按诗人所处的时代编排,帝王则置于首,释道鬼神缀于末,乐府单列,《全唐诗》体例受其影响甚明。前九笈名家诗集,首列小传,除引正史外,还引杂史、笔记、地志等材料,且标明出处,颇有价值,偶也注明版本。《癸笈》为诗话,涉及唐诗的各个方面,它不但对唐诗的流变、风格以及作家的高下作出了较系统的论述,还涉及了与唐诗有关的目录、版本及金石之学,内容可谓广博。胡震亨《统笈》一书,搜集宏富,后来清康熙朝编定《全唐诗》即以此与季振宜《唐诗》为基础。《全唐诗》初盛部分多用季稿,亦据胡书进行必要的辑佚和校订;而中晚唐之部,多据《统笈》。因卷帙浩繁,成书后未能全部刊刻,仅有其中部分刊刻。《癸笈》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刊刻,甲乙丙丁戊五笈于康熙间刊刻(丙丁二笈刊刻未全),余四卷均未刊刻。据近人俞大纲《纪唐音统笈》所录,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统笈》之全帙,仅甲乙戊癸全为刻本,丙笈仅卷八十七至九十二、九十六至一百七十一为刊本,丁笈仅卷二百一十一至三百二十一、四百至四百九十七为刻本,余皆为范希仁抄补。《四库全书总目》谓仅有戊、癸二笈有刻,王士禛《分甘馀话》以《全唐诗》为《统笈》之转刻,实乃误记。(杨旭辉)

【中晚唐诗纪】 唐诗总集。六十二卷。清龚贤编。龚贤(1618?—1689),清代画家,字半千,号野遗,江苏昆山(今江苏南京)清凉山,筑半亩园,名寓所为“扫叶楼”。工山水画,兼工书法、诗文,著有《香草堂集》、《画诀》等。龚氏有感于黄德

水、吴琬《唐诗纪》仅有初盛,中晚阙如,而未成完帙,有志与初盛接联,乃编是书。又因中晚唐篇帙浩繁,难于哀辑齐全,乃遇一家刻一家,随得随刻。各集虽非一时刊刻,然外栏相等,仅行款疏密有别,分有“行本”、“秘本”二种,各收诗人三十一家。龚氏以大家名家世有善本,故多收隐僻者,诸如欧阳澥、周匡物、潘存实等,而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不收。书中偶有考证语,如畅当《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诗下注云:“收入杜集,误。”此书对中小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颇著功绩,周亮工《读画录》,赞誉龚贤“真中晚之功臣也”。龚氏收罗广泛,所据多善本,“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叶德辉《书林余话》下)。季振宜亦曾用其中的数种集子为底本辑采唐诗。其中各家诗,《全唐诗》均已采入。此书版本较多,有康熙半亩园刻本、野香堂、贞隐堂刻本,惜流传未广。(杨旭辉)

【唐诗】唐五代诗歌总集。七百一十六卷。清钱谦益、季振宜辑纂。季振宜(1630—1674),字洗兮,号沧苇,泰兴(今属江苏)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兰溪令,历刑部、户部曹,擢御史。家巨富,江南藏书家藏书多归其所有,著有《季沧苇书目》、《静思堂诗稿》。钱谦益晚年归乡,以学术标榜,因家中藏书甚丰,尝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成唐人一代诗之总集,未成而殁。后其稿归钱遵王,复为季氏所得,其篇帙残断,亦已过半。季氏于康熙三年(1664)踵其事,于十二年成七百十六卷,收一千八百九十五位诗人的作品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是书所收各家诗作底本各不相同,另据他书补遗、校勘。如韩愈诗集,以季氏所藏音释本为底本,据《文苑英华》补《赠崔立之》一诗。季氏校正韩集的本子甚多,据宋本列“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中“烟”之异文“花”,又引用《文苑英华》、《唐人绝句》等总集进行校勘。综观全书,季振宜用以校勘的有《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唐人选唐诗,有《唐诗纪事》、《唐文粹》、《乐府诗集》、《文苑英华》以及《瀛奎律髓》等总集,还有宋刊别集,并且把校勘所据的版本或资料出处一一注明。这些内容在《全唐诗》编定时,一律删去,致使出处不明。每位诗人所附小传则是据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南唐书》等史书以及别集序跋、诗话,笔记撰成。全书的排列以高祖始,无名氏终,略依诗人的生活时代先后为次,而不按前人初盛中晚的分法编次。此书历时十二年完成,用力颇勤,且校勘精审,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季氏成书后不久便去世,其稿为内府所得。清康熙间,扬州设局纂修《全唐诗》,圣祖玄烨于四十四年(1705)将此稿付于曹寅。在御定《全唐诗》编定过程中,季振宜《唐诗》

和胡震亨《唐音统笈》是最重要的底本。《全唐诗》刊行后,是书日渐无闻。季氏书稿后为邓邦述群碧楼收藏,见者甚少,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将此书影印出版,定名为《全唐诗稿本》,世人方睹其原书之貌,并由此逆推是书及《全唐诗》的编纂情况。(杨旭辉)

【全唐诗】唐五代诗总集。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命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开局编纂,故又称《御定全唐诗》。历时一年零五个月,至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告成。其间先后参加编纂工作的有江浙两省在籍翰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琛、俞梅等十人。是书汇集有唐一代诗歌,以清初季振宜《唐诗》及明胡震亨《唐音统笈》为底本,参取内库所藏明吴琬《唐诗纪》等唐人总集、别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馀首,作者二千二百馀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为九百卷,另有目录十二卷。全书收罗甚富,堪称集唐代诗歌文学之大成。书中所收诗人兼及已结集者和本集已散佚者。全书主要是以人系诗,帝王后妃诸王公主宫嫔诗列于首;其次为乐章、乐府;而后是历朝诗人,大略按时代排列,并附以小传;最后单列联句、逸句、名媛、释、道、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讖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而于书末缀以补遗及词。《全唐诗》在编定过程中,对所收罗的材料也作了一些考订,“如《册府元龟》所载唐高祖赐秦王诗,则考订其伪托;又旧以六朝人误作唐人者,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之类;以六朝人伪其姓名误为唐人者,如杨慎即陈阳慎,沈炯即陈沈炯之类;以六朝诗误入唐诗者,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标《武陵深行》误作曹邴,薛道衡《昔昔盐》误作刘长卿之类;唐诗之误以诗题为姓名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王维《慕容承携素饌见过诗》作慕容承诗之类,亦并厘正……至于字句之异同,篇章之互见,根据诸本一一校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时也删去了《唐音统笈》中的释氏偈语,道家咒章。一些诗集,经过整理,价值颇高,如贾岛《长江集》和《高适集》,收录完备,校勘精审。然如此浩大之工程,仅以一载余成工,草率之处难免。这在当时就有人指出,朱彝尊曾向曹寅指出一些逸诗以及遗漏诗人生平的情况,并著《全唐诗未备书目》一卷。近人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均有指摘。今人李嘉言首先提出全面改编《全唐诗》的方案,而后不少学者纷纷发表补充意见,傅璇琮《关于〈全唐诗〉的改编》一文(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论之甚详。

《全唐诗》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1. 误收、漏收。今人在《全唐诗》的补辑上用力甚勤,主要有王重民《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全唐诗续拾》等多种。《全唐诗》误收者甚多,如杜牧集中《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实乃许浑诗,显系误收(吴企明《樊川诗甄辨柿札》)。2. 作家、作品重出。如李白《有所思》一诗,重见于乐府和李白集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南大学编有《全唐诗重篇索引》,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检索颇为方便。3. 诗人小传、小注有误。于此亦有学者指出,吴汝煜《全唐诗人名考》,陶敏、郁贤皓《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湘潭师院学报》1986年第1、2期),皆有所发。4. 编次不当。据《全唐诗》凡例来评定,将高适、杜甫、岑参列于韦应物之后,显然不当。5. 文字有夺讹。6. 未注资料的出处,或注而不明。7. 限于条件,一些材料未能看到,如敦煌卷子中的王梵志诗等。鉴于诸多弊端,苏州大学与河南大学合作的新编《全唐五代诗》业已开始,此次重编,汇集了国内专家,力求全面超过清编《全唐诗》。《全唐诗》首刊于康熙四十六年,即“扬州诗局本”,计一百二十册。后又有江宁重刻本、广州巾箱本种种。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据“扬州诗局本”石印。1960年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最为通行,此本以扬州诗局本为底本,并改正了明显的误字,另配有《全唐诗作者索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扬州诗局本,同时出版诗人篇名索引。

(杨旭辉)

【**全唐诗逸**】 唐诗总集。日本上毛野国人河世宁辑。河世宁(1739—1820),字子静、嘉祥,号宽斋,曾官昌平学都讲,著有《谈唐诗选》、《宽斋诗文集》、《日本诗纪》等。河世宁有感于《全唐诗》收罗有阙漏,遂以日本所存的和汉古籍,诸如《千载佳句》、《文镜秘府论》等,辑补《全唐诗》之不足,共得一百二十八位诗人(其中八十二人不见于《全唐诗》)的诗六十六首、诗句二百七十九联,另补李峤六首《杂咏》的缺文,次为三卷。所补佚诗、佚句皆标明出处,《全唐诗》未收诗人则补小传。此书于清嘉庆间传入我国,刊入《知不足斋丛书》中。中华书局《全唐诗》点校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扬州诗局本《全唐诗》,皆以是书附于书末。

(杨旭辉)

【**全唐诗补编**】 唐诗总集。今人陈尚君纂辑。清编《全唐诗》刊行以来,常有后人补其不足,先有日本上毛河世宁《全唐诗逸》,后又有王重民《补全唐诗》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王、孙、童三人的辑佚成果,中华书局于1982年汇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随着唐诗

研究的深入,《补编》即续前人之端,吸收今人考订成果,对王、孙、童诸人的成果进行复核、著录异文,补引书证,提供诗作的最早出处;考订作者事迹;删芟《全唐诗》中已有的重出诗及误收之什。《补编》校定以后,基本保持前人成果的原貌,仅编次略作改动,如以刘修业整理的《补全唐诗拾遗》替代《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并与《补全唐诗》合并。《补编》后半之《全唐诗续拾》为著者发前人未发之作,博采唐宋以来四部典籍,佛道两藏、金石碑刻、碑乘方志,爬梳剔抉,共得诗人一千馀,诗四千三百馀首,句一千馀则,别附录诗二百馀首,全书次为六十卷。《补编》实可视为与《全唐诗》并行的重要唐诗总集,对唐诗研究多有裨益,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杨旭辉)

【**唐近体诗永**】 唐诗总集。一题《唐近体移情》。十四卷。清吴绮编。吴绮早先编有《宋元诗永》,而后推求其源——唐,慨于顾有孝《唐诗英华》“止有七律,而无五言”(《凡例》),故选唐人五、七言近体付梓。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至二十八年编成。全书五律、七律各半,所收以杜甫为最多。其选诗较为重中晚唐,刘长卿、白居易、姚合、许浑、温庭筠之作入选者甚多。书中偶有眉批评点。有康熙二十八年吴氏林蕙堂自刻本。(杨旭辉)

【**唐诗定编**】 唐诗总集。清金是瀛(字天石)、宋庆长(字简臣)撰。二人皆为明末清初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此书的选编受高棅《唐诗品汇》及李攀龙《唐诗选》影响极大,选诗并未冲出明人藩篱,仍以初盛唐为重,轻中晚唐。其“深求选诗之法而得二书(指《唐诗品汇》与《唐诗选》)之所以同……以此为衡,初唐什可得三,盛唐什可得四,中唐什可得一,晚唐什可得一”(吴骥《唐诗定编叙》),可见与明选本之关系。全书十四卷,五古三卷,七古三卷,五律二卷,七律一卷,五言排律二卷,五绝、七绝各二卷,依次编排,并附诗人小传。排列中难免有误,如崔颢置于中晚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置于晚唐。今有清康熙宋氏家刻本。(杨旭辉)

【**全唐诗蠡根集**】 唐诗总集。清李长祥辑。李长祥字研斋,四川达县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李氏以为全唐诗中以李姓为多,李又为国姓,乃于《全唐诗》中辑出李姓诗人二百馀,诗四千多首,一一照录。诗人均有小传以附。对诗作亦有校正补遗,补了《全唐诗》失收的李涉诗四十八首,李中诗二十五首等。今复旦大学藏有清同治二年(1863)岚石山房稿本,弥足珍贵。(杨旭辉)

【**唐诗矩**】 唐诗总集。清黄生辑。黄生,《周氏师古堂书目提要》作黄山,徽州(今安徽歙县)人,约生活于清康、雍、乾年间。全书五卷,专选唐人五律。

以立意、谋篇、琢句、炼字、运典、选韵、言情、绘事、叙事诸法为唐诗之矩，从诸方面品评唐诗，故名。选诗按初盛中晚之序编排，每一部分皆有总评，对各阶段的诗矩进行综述。每首诗前又皆标有该诗的诗矩格式。书末缀以《五言律摘句》，专录唐人五律佳句。此书适用于初学，《周氏师古堂书目提要》云“可导学诗初步”。有民国周学熙《周氏师古堂所编书》丛书本。（杨旭辉）

【唐人试帖】 唐诗总集。清毛奇龄撰。毛氏曾从顾有孝家得《唐人诗帖》一本，常有仿作。康熙庚辰（1700），士子因独不得于试律而下第，就声律相询，于是出旧撰《唐人试帖》，汰去其半，略作考订，遂成是书。全书共四卷，专收唐人试帖诗，计一百二十七题，诗一百五十九首，所收诗人名家极少。书中有圈点、评说，亦有注释解题，都较为简略。评诗多重试文比体的结构特点，诸如“承题”、“破题”以及“八比”（“颌比”、“颈比”、“腹比”、“后比”）等。亦列异文，皆以双行小注形式出现。因为此书实用性强，多有刊行，除原刻外，康熙乙未（1715）有缩字镌行本，以便携带。二十馀年后又有郑尚志书带草堂藏板（有郑序和校正）、学者堂藏板。此书一出，开启后代集唐人试帖诗的风气，后有张严《唐人试帖诗钞》四卷，王锡侯《唐诗试帖详解》，范文献等人的《唐人试帖纂注》四卷、《补编》一卷等多种。（杨旭辉）

【唐贤三昧集】 唐诗总集。三卷。清王士禛编选。专选盛唐王维至奚贾等四十二人的诗作，共四百四十八首。所谓盛唐仅指所录作品写成年代，并非专指诗人的生活阶段。“三昧”，为梵文音译，在佛家为“正定”之义，文论上用作“奥秘、诀窍”讲。王士禛读司空图、严羽二家诗论，颇有感受，于是录盛唐诗中“其尤隽永超诣者”（《自序》），不选李杜，而王维诗最多，达一百一十一首，次则孟浩然、岑参、李颀、王昌龄，在选诗上贯彻了其以“神韵”为最高审美原则的论诗主张。王氏重申严羽之说，以矫正明代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诗风。时人对此书的评价褒贬不一，其门人王立极评曰：“大要得其神而遗其形，留其韵而忘其迹，非声色臭味之可寻，语言文字可求也。”姜宸英在序中赞曰：“是集成而复已坠之响。”批评者更多，阎若璩、赵执信多有批评指摘，赵执信《谈龙录》云：“山阳阎百诗若璩，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如王右丞诗‘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御’讹‘卸’，江淮无卸亭也。……余深知韪其言。”赵执信对选诗标准也大为不满：“李颀《缓歌行》，夸炫权势，乖六义之旨。梁锺《观美人卧》，直是淫词，君子必所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较

为公允：“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但无论如何，《唐贤三昧集》是王士禛最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在清代影响很大。版本颇多，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三十七年盛符升刻本。后又有人为之笺注，吴焯、胡崇《唐贤三昧集笺注》三卷，姚鼐《评点唐贤三昧集》都是。日本、朝鲜也有多种版本流传。后人又仿其体例，如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周咏棠《唐贤小三昧集续集》。（杨旭辉）

【唐人万首绝句选】 唐诗总集。清王士禛编。王士禛认为，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精妙绝句即可体现有唐一代之风貌。渔洋山人自少习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认为它踏驳讹舛，极为严重，如将南朝宋郭震、梁陈时何逊、沈佺等人的诗收入，又有一诗重出现象；又感于其他绝句选本弊端甚多。于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就洪迈之选删繁正误，编成此书。凡八卷，收诗人二百六十四家，八百九十五首。是书仅录诗作，不作任何笺注和评论，而《凡例》中则有较为精简的评述，认为初盛中晚四唐之绝句，“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还极力推崇李白《早发白帝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王昌龄《长信秋词》、王之涣《凉州词》，以为此乃七绝压卷之作，“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矣”。对中晚唐的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亦颇赞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选“从容校理，故较他选为精审”。而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则云：“《唐人万首绝句》其原本不为不富，渔洋选之，每遗佳作”。有康熙四十七年芸香阁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书局重刻本，1931年上海涵芬楼印行。北京图书馆另藏有李慈铭批校清松花屋刊本。（杨旭辉）

【十种唐诗选】 唐诗总集。十七卷。清王士禛删纂。王渔洋对唐人选唐诗这一现象十分重视。为了倡导“神韵说”，曾专门编选《唐贤三昧集》，又对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箴中集》、无名氏《搜玉集》、令狐楚《御览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贗品》）、韦穀《才调集》等集和宋姚铉《唐文粹》进行删汰、选择，合为一编。王氏在《才调集选序》中言：“唐代诸选，殷璠、元结之流，以风骨相高，最为杰出。独令狐氏《御览诗》暨是集（指《才调集》）专尚风调，而穀短于持择，为识者所少，余之有是删，殆亦韦氏之诤臣欤！”因之在每种唐人选唐诗后加“选”字，定为其名。前八种皆次为一卷，《才调集选》与《唐文粹选》各为三卷和六卷，因后二种篇幅较大，所以选择删汰不及前八种精粹，门径丛杂，尤以《文粹》为甚。书前有盛符升、尤侗等人序，其中盛序谈及是书的编选过程和取舍标准。康熙间，与《唐贤三昧集》合刊，《四库全书》收

入,又有《王渔洋遗书》本,南芝塘藏板和萝延斋刻本。(杨旭辉)

【唐八家诗钞】 唐诗总集。清陈明善撰。陈明善,字服旂,江苏武进人,生卒年不详。王士禛《与林吉人书》云,欲刻李杜、王孟、韦柳以及昌黎、玉谿八家诗,然未果。明善服膺其语,于八家全集中择其精纯者汇而镌之,每人录为一卷,凡一千七百四十六首,较之全集,多则占十之六七,少亦占十之四五,“八家杰作大篇亦略尽于此”(《例言》)。庄存与为之序云:“吾知是书出,流布艺林,当与廷礼《品汇》、《正声》诸集并垂世久远也已。”沈德潜亦序云:“有以补从前选体所无有”,“有以开后来选家搜诗之法”。有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杨旭辉)

【全唐诗录】 唐诗总集。清徐倬编。徐倬(1624—1713),字方虎,号蘋村,德清(今属浙江)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著有《蘋村类稿》三十卷。倬以唐诗卷帙浩繁,采撷精华,辑为百卷,每人各附小传,又间附诗话、诗评。四十五年撰成后,适逢圣祖南巡,缮录进呈,颇受嘉奖,由翰林院侍读擢礼部侍郎,圣祖并为之作序,赐帑金刊板,称《御定全唐诗录》。全书略依胡震亨《唐音统籤》之例,自太宗至无名氏,各家诗皆因其原集,或分体,或不分。今有康熙刻本及“四库”本。此书名气颇大,然选诗未必皆精,后人曾指出“读者犹苦其难竟”(赵怀玉《读雪山房诗钞序》)。后有俞思谦《全唐诗录补遗》、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补其不足。(杨旭辉)

【唐诗应制备体】 唐诗总集。十卷。清沈叶栋撰。沈氏生平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此书搜罗唐人历朝试帖诗五百余首,按天地、岁时、珍宝、服御以及昆虫草木诸类分排编次,附补遗一卷。所收诗作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家。遇有新旧二本(即有修改本者),则必仍其旧,以存试帖诗之原貌。诗句下有评注,皆双行夹注夹评。有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最古园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南京图书馆亦有一清刻本。(杨旭辉)

【此木轩唐五言律七言律读本】 唐诗总集。二卷。清焦袁熹撰。焦袁熹,字广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著有《春秋阙如编》,被收入《四库全书》。此书专选唐人律诗,上卷为五律,下卷为七律,以韵编排。对一些有争议的诗往往有精辟的评点。此书收于《焦袁熹全集》。有清嘉庆乙丑(1805)大中堂精刊本。(杨旭辉)

【唐诗指月】 唐诗总集。七卷。清卞之锦编。卞之锦,生平未详,约生活于清康熙年间。有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二册。(杨旭辉)

【唐人千首绝句】 唐诗总集。十四卷。清许人华编。许人华,字之光,高阳(今属河北)人,生活于清初。此书“取文敏原编(即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裁定之”(张遇思序),汰其十之八九,精选千首。许人华去世后,书稿几近散佚,经许氏外侄孙安期重订梓行。卷一为五绝、六绝,卷二至卷十四为七绝,均无评注。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传万堂刻本。

(杨旭辉)

【唐人小律花雨集】 唐诗总集。二卷。清薛雪编。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吴县(今属江苏)人,以医名,又好诗,著有《一瓢诗话》。薛雪于诸诗体中,独取七绝,因为他认为“诗仍绝学,必须悟入七言绝句,乃学人初地功夫于此会得”(《赘言十二则》),由此便可及诸体,是故七绝为小律,亦不为废也。他有感于《万首唐人绝句》拉杂漫收,于是采其中“尤为隽永者,得诗五百篇,汇为一集,读之宛如天花雨空,各各妙香新好,非毁红萎绿所能仿佛,故名之曰《唐人小律花雨集》,以见一代之风”(自序)。薛氏因君王后妃为唐代之尊,杜甫为诗家之尊,不敢去取删汰,故不选君王后妃及少陵之作。书分上、下二卷,所收多为名家之作。后又续选三百首,编为《唐人小律花雨续集》一卷,与正集一起刊行。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扫叶庄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藏。

(杨旭辉)

【唐诗挹藻】 唐诗总集。八卷。清高士奇编。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诸生供奉内廷,为圣祖所宠。著有《清吟堂集》、《春秋地名考略》、《续唐三体诗》。是书间取唐代君臣赓和与馆阁诗,仿《文选》、《文苑英华》之例,将九百余首诗分二十二类四十二门,编为八卷。各类先五言后七言,先古体后今体。书中无注,偶有题解。今有康熙内府抄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杨旭辉)

【五七言今体诗钞】 唐宋诗总集。一作《今体诗钞》。十八卷。清姚鼐编。前九卷为《五言今体诗钞》,专收唐人五律,凡八十七人,诗五百六十首;后九卷为《七言今体诗钞》,选唐宋人七律,诗人六十八位,诗四百一十一首,时有精确评语。在书序后,对唐代不同时代的五、七律作总论,也对王维、杜甫、李商隐等名家的律体作了较为精辟的评价。此书是针对王士禛《古诗选》之不足而选编,《序目》说《古诗选》“论止古体,不及今体,至今日而为今体者纷纭歧出,多趋为谬,风雅之道日衰”,故而选诗“补渔洋之阙编”,以“存古人之正轨,以正祛邪”,“维持诗学,导启后进”。姚氏选诗尤重李杜,选二人诗有四卷之多,其中杜甫五律一百六十首,七律六十首。而后之

学杜者,如李商隐、黄庭坚、陆游等所选亦较多,称黄诗“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沈曾植对《今体诗钞》评价颇高,云:“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刘大櫟),门庭阶闼,矩范秩然。”(《海日楼题跋》)同治间赵彦博称赞此书“遴选严审,核议精深,洵习诗者之大宗也”(《今体诗钞注略序》),并把它列为乡里童蒙课本。桐城派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述唐宋七律多出于此。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即据此书与《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再选而成。有清嘉庆二年(1798)历城方氏刻本、十三年程邦瑞刻本(安徽省图书馆藏本有姚鼐批注)、同治五年(1866)金陵书局刻本,《四部备要》及《惜抱轩全集》亦收此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同治本标点排印。(杨旭辉 宋绪连)

【试体唐诗】 唐诗总集。四卷。清毛张健编。毛张健,字今培,号鹤汀,太仓(今属江苏)人,贡生。此书专选唐人五言试体诗,分颂述、天文、时令、地理、花木、金玉、音乐、鸟兽、杂题、应制、早期、寓直等十五类,凡二百十九首。书中间有双行小注评语,多谈章法结构。有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本和乾隆二十三年(1757)刊本。(杨旭辉)

【唐宋八家集】 唐宋诗总集。五十二卷。清姚培谦辑。姚培谦,字平山,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好交游,名满江左。雍正中保举人材,不赴。学识较博,对唐诗颇有研究,曾有《李义山诗笺注》,多有所发,是李商隐诗集的一个重要注本。是集专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诗。此八家本以古文名世,诗未必皆佳,合此八家之诗甚无谓。有清雍正五年(1727)遂安堂刊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杨旭辉)

【唐诗别裁集】 唐诗总集。一题作《唐诗别裁》,初选稿本作《唐诗宗》。三十卷。清沈德潜编选。“别裁”,取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意。沈德潜论诗主张“格调”,崇尚“温柔敦厚”的“诗教”,故将他所认为不合“诗教”的“伪体”一一剔除。“是集以李杜为宗”(凡例),专主雄浑阔大,同时亦兼及神韵和其他各种风格的作品,并注意到体裁的完备。这一做法对补救王士禛主盟诗坛造成的空疏枯寂的流弊起了一定作用。除了雄阔之作,书中亦收“王杨卢骆唐初一体”、“白傅讽谕”、“张王乐府”以及“荒陲古奥,怨怼悲愁”的长吉呕心之作。对于诗体,能注意各人的特长,如杜甫就多选古诗及律诗,绝句较少;李白则多选古诗、七绝,律诗较少。书中另附诗人小传以及诗作的简要评注。在《凡例》中,著者对唐诗各体流变和风格也加以论述,论述之精,非一般选本所能及。全书收诗人二百七十位,作品一千

九百二十八首,能较全面地反映和概括唐诗的面貌。因为在选编中,始终以“诗教”为重,“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观民风,非为艳情发”,诸如李商隐《无题》、《锦瑟》之类的情诗皆不收。出于功利目的,所选试帖诗较多。尽管在作品的纂集和注释中也有不少舛误,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唐诗选本,流传甚广。是书初版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为碧梧书屋刻本。四十年后增订,即今通行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教忠堂重印本。后又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校点排印。

(杨旭辉)

【唐诗三百首】 唐诗总集。六卷,或八卷。清孙洙及其继室徐兰英合编。孙洙(1711—1778),字苓西,号蘅堂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官卢龙、大城、邹平县令,江宁教授。著有《蘅堂漫稿》。事见《梁溪诗钞》卷四二及《名儒言行录》卷下。徐兰英,工诗善书,《清朝书画家笔录》有传。孙洙有感于世传童蒙《千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于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兼及诸体,诗三百余首,取俗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意,因以名之为《唐诗三百首》。书成于乾隆二十八年,因其选诗雅俗共赏,成为家塾必读课本,流传甚广,“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序》),在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编次,各体末均附乐府诗。收诗人七十七位,诗作三百余首(各本篇数不一,有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十三首、三百一十首诸种)。所收诗人、诗体及流派均有一定的代表性。诗人上至皇帝、后妃,下至释道、女伎、无名氏;既有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之类的大家,又不乏王之涣、金昌绪等存诗极少的诗人。同一诗人,也注意从几种不同诗体来表现他不同的艺术风貌。此书为适应“家塾课本”之用,故所选之诗比较容易上口成诵,反映社会矛盾的诗相对少了一些。原书有江南状元阁刻本、小石山房刻本、常熟黄氏艺文堂刻本。道光年间,有章燮、陈婉俊注本问世。章燮作《唐诗三百首注疏》,于名物典故诠释外,兼疏解章句。此注有常州宛委山庄本、湖南学库山房校刻本等,东海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均有排印本发行。陈婉俊补注诗人小传、名物典故等。陈注有餐花阁刻本、四藤吟社重刻本(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文学古籍刊行社及中华书局曾据后本排印。今人新注不下十种,如朱大可《新注唐诗三百首》、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等。

(杨旭辉)

【七言律诗钞】唐宋金元诗总集。十八卷。清翁方纲编。翁方纲论诗主张“肌理”，重实格。他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在诗法上主张复古，这种复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尤其是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故翁氏论诗重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人，而轻李白，曾专门撰有《杜诗附记》、《苏诗补注》。此集在选录上基本反映了翁方纲的这一诗学观点。全书选唐诗四十家、二百九十首，宋诗五十六家、三百四十七首，金诗七家、五十五首，元诗六家、七十五首。像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元好问、虞集等为翁氏推重者皆单列一卷。是书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当年付梓刊行。其稿本亦传世，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有《苏斋丛书》本。

（杨旭辉）

【唐宋诗醇】唐宋诗总集。四十七卷。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敕编。高宗性好诗文，常与沈德潜等谈论诗文，曾于乾隆三年（1738）编定《唐宋文醇》。后感于“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有文醇不可无诗醇”，因选唐宋诗成就突出者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此书认为，李杜一时瑜亮，千古稀有；乐天平易，最近乎情；奇创而不诡乎理者，莫过昌黎；录此四集，足以观有唐一代之诗。而宋诗不足以匹唐，仅选两集，因山谷多生涩，而选苏诗以示北宋诗坛之功；录放翁诗以见南渡以后诗之大成。谓六家为唐宋诗中之醇醪实不为过。全书有太白八卷，少陵十卷，乐天八卷，昌黎五卷，东坡十卷，放翁六卷。未作笺注，然每诗后皆有评点语，有引前贤之评，亦有时人所评，均极精炼中意，于理解体味诗作皆有点化作用。此书流传很广，多用于家塾学习之课本，故版本颇多。有乾隆十六年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据以著录），此为初刊，台湾大学有藏。乾隆二十五年内府又刻有四色套印本，圈点品评则更为显目，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后世多次重刊，有乾隆二十五年书业堂重刻本，光绪七年（1881）浙江谭钟麟重刊本和江苏局本，等等。

（杨旭辉）

【十八家诗钞】诗歌总集。二十八卷。清曾国藩辑。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此书与《经史百家杂钞》为曾氏手编的诗文选本，后者专收古文，此书收唐宋诗六千五百九十九首，共计诗人十八家，故名。按五古、七古、五律（附排律）、七律、七绝次序排列。曾氏自言抄古今诗，笃志“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圣哲画像记》），故唐诗中收李杜最多，全书共

收唐人诗五卷二千九百二十九首，其中杜甫一千二百六十五首，李白九百十六首，几近一半，列唐八家之首。书中有双行小注，列出异文，诠释出典，亦有评点。其注有曾氏己见，亦引前人成句，如杜诗引吴若本、蔡梦弼、钱谦益等人的注。此书曾经李鸿章审订，王定安校阅，其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最流行者为清同治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本，《四部备要》据之排印。此书后来又有吴汝纶、陈存楠作过评点或详注。

（杨旭辉）

【唐人五十家小集】唐诗总集。清江标辑。江标（1860—1899），字建霞，号萱圃，又字师祁，号笞谿。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尝受业于著名学者金匱华、叶昌炽，于版本目录之学尤为精深。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入翰林，任湖南学政。撰有《黄尧圃先生年谱》，刻有《灵鹫阁丛书》。江标据宋临安睦亲坊陈道人（陈起）书铺刻本影刻而成此书。以初唐四杰始，末缀五代李建勋等，各自成集，少则一卷，多则五六卷。唐集宋刊今存者甚少，从中可窥各集之原貌，因而价值较高。其间亦偶有误断者，如《戴叔伦集》乃明人作伪之本。有清光绪二十一年江氏灵鹫阁湖南使院影刻本。

（杨旭辉）

【全五代诗】五代诗总集。一百卷，补遗一卷。清李调元编纂。编者《凡例》云：“五代诗向无全本，今取昔人所附之唐末、宋初之间者，以成此书。”全书以五代为纲，十国附之。五代享国短暂，长者一二十年，短者仅数年，确定某诗人为某代人很难，《凡例》云：“唯于其人，核其平生，将受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显之时，本其时其事，以定其为何代之人。”录诗先五代，后十国。梁（后梁）诗一至八卷；唐（后唐）诗九至十卷；晋（后晋）诗十一至十三卷；汉（后汉）诗十四卷；周（后周）诗十五至十七卷。十国：吴国诗十八至二十三卷；南唐诗二十四至三十九卷；前蜀诗四十至五十六卷；后蜀诗五十七至六十卷；南汉诗六十一至六十二卷；楚诗六十三至六十五卷；吴越诗六十六至七十四卷；闽诗七十五至八十七卷；荆南诗八十八至九十九卷；北汉诗第一百卷。补遗一卷，录各代遗佚。朝代国别之下按作者官爵、隐逸、道释等不同身份排列，同一作者之诗按乐府、四言、五古、七古、五律、五言排律、七律、七言排律、五绝、六绝、七绝顺序排列。入录诗人皆附小传，传记兼采诸书，间附有关轶事诗话，还有少量笺注。这些多取之于王士禛、郑方坤等人所编纂之《五代诗话》，其体例也受到此书之影响。全书采摭面广，参考书三百余种，收录较完备，可以补《全唐诗》五代部分所录之不足。此书初编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三年间，初只九十卷，后又增荆南齐己诗九卷、北汉诗一卷、补

遗一卷。因此乾隆间所刊《函海》作九十卷,光绪间所刊《函海》本作一百卷。常见者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王学泰)

【二李唱和集】诗合集。一卷。宋李昉、李至撰。李至(947—1001)字言幾,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太宗端拱戊子(988)二月,李昉免除右仆射后,至淳化辛卯(991)九月,与李至唱和不绝,乃编为《二李唱和集》。淳化四年,昉为序。仁宗初,周起为刻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有“今世传《二李唱和集》”之语,知此书北宋时颇流行。《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一卷,后佚。清光绪十五年(1889),陈田(槩)得之于日本,并为刊印。然首尾均有缺页。宣统三年(1909),罗振玉复得一宋本,全书二十六页,缺第十三页。罗氏补刻本卷末有“秘书监知应天府兼留守司周起印行”字一行。知此书为北宋刊本或源出北宋刊本之宋本。此书除缺页外,共有诗一百六十一首(内二首残),与李昉自序所云一百三十三首不同。“昉诗务浅近,效白乐天体”,“诗格亦相类”(《青箱杂记》),盖为“缘情遣兴”(昉序)之作。昉、至,《宋史》卷二百六十五、二百六十六分别有传。(孔凡礼)

【西崑酬唱集】宋诗总集。二卷。宋杨亿编纂。此书为北宋真宗时期一些上层官僚唱和诗之结集,主要包括杨亿(录诗七十五首)、刘筠(录诗七十三首)、钱惟演(录诗五十四首)、李宗谔(录诗七首)、薛映(录诗六首)、刘秉(录诗六首)、刘鹭(录诗五首)、丁谓(录诗五首)等十七人(其他人皆在三首或三首以下),录诗二百五十首。景德二年(1005)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于秘阁中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即《册府元龟》),至大中祥符二年(1008)结束,历时三年,入馆诸臣在公馀之暇互相唱和,后编成此书(十七人中亦有数人未参加编纂《册府元龟》)。集中所录诗多为流连光景、咏物怀古之作。体裁多为五七言律体。作者刻意模拟唐代李商隐,追求词藻,堆砌事典,镂金错彩,风格靡弱,而且许多篇章内容空洞。代表作品为《别墅》、《夜讌》、《霜月》、《鹤》、《泪》、《萤》、《荷花》等。此编一出,其代表的创作倾向影响了一代诗风。《蔡宽夫诗话》云:“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崑体之作,翕然一变。”《六一诗话》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石介亦云:“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刻镂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怪说》)认为它无益于社会与世道。然此编中亦有一些富于社会内容之作品。如《汉武》、《明皇》、《始皇》、《即目》、《南朝》

等篇章借古讽今,用以表达对国家局势之忧念与对宋真宗佞道求仙之劝谏。《公子》一首则大胆揭露了社会之不平。还有一些表现个人情怀之作品如杨、钱、刘等人所写的《无题》等等。不仅可见当时一些正直士大夫之怀抱,亦反映出当时高层官僚内部争斗之激烈。因此,有些论者以为,西崑体之弊乃在于群起而效尤者,“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捋扯之讥”,至于杨、刘诸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崑”集名取义于《穆天子传》之“天子升于崑崙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所谓册府”。“册府”为藏书之处,这里以“西崑”(按崑崙在中原之西)名集,点明其唱酬之处。此集初刊于北宋,《郡斋读书志》中即有记载,宋刻已不可见。传世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十六年(1537)张缵所刊玩珠堂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清代有七个刻本:一为清初徐乾学本,二为康熙戊子(1708)苏州朱俊升本,三为壹是堂本,四为留香室本,五为《浦城丛书》本,六为《粤雅堂丛书》本,七为《徐氏丛书》本。现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为今人王仲莘注。(王学泰)

【同文馆唱和诗】一作《同文唱和诗》。十卷。或以宋邓忠臣辑。元祐二年(1087),吏部铨试文武选人,即以招待高丽使人之地同文馆为试院,邓忠臣、张耒、晁补之、蔡肇、余幹、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温益、口向参与考校事,此即其同舍唱和之作。耒、补之、肇、南仲、公麟、武仲、益,《宋史》有传。忠臣、倚,《元祐党人传》有传。子文字仲远,其妻即苏轼、苏辙堂妹,尝为定州签判,与黄庭坚有交往。辅登嘉祐八年乙科,与二苏有交往,详《祖龙学集》及二苏集。幹与补之为同窗,见《晁补之集》。口向不详。以上十三人,耒、补之、武仲有集传世,肇之《丹阳集》、忠臣之《玉池集》已佚,其余诸人“有集无集,亦不可考,残篇缺句,实藉此以获见一斑”;有集诸人,亦可“藉为参订之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之《考校同文馆戏赠曹子方兼程文潜》等诗,《鸡肋集》未收,尚可资辑佚。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张耒集》卷六二至卷六五,亦收此集,编次略不同。近人余嘉锡以为“此书之有单行本,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给藏书家耳。《提要》不加深考,以为宋时果有此书,遂以舛漏讥《宋志》,岂其然乎?”(《四库提要辨证》)(孔凡礼)

【南岳倡酬集】诗合集。一卷,附录一卷。宋朱熹、张栻、林用中撰。林用中字择之,号草堂,一号东屏,福州古田(今属福建)人,朱熹弟子,事迹杂见《闽

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七、《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孝宗乾道丁亥(1167),忾官湖南,熹访之,用中陪同,三人于是年十一月初十日至十六日同游南岳衡山。七日之中,“上下径行数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殚叙,间亦发于吟咏,更迭倡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张忾序)。然今本倡酬诗实为一百五十六篇,又联句三篇,朱熹独作三篇,共得一百六十一篇。以七绝、五律为主,间有古体。大抵直抒胸臆,然文采间有不足。朱、张之诗皆见集中,文字间有不同;林诗则赖此而传。本书附录收朱与林书三十二篇、林遗事十条及朱为林所作字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非体例”。有明弘治刊本、《四库全书》本。(孔凡礼)

【坡门酬唱集】一作《坡门酬倡》。诗总集。二十三卷。宋邵浩辑。浩字叔义,金华(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此书辑苏轼、苏辙兄弟及苏轼门下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六人倡酬诗六百六十篇。前十六卷为轼诗及诸人酬和诗,次辙诗四卷,次黄、秦、晁、张、陈诗,亦录轼及诸人和作,惟李以晚出之故,有酬而无唱。初刊于绍熙元年(1190)。《宋史·艺文志》著录。诗篇倡酬,在宋代士大夫之间,已成为风尚,甚至为社交所必需,浩辑此书,自二苏倡酬始,其意即在窥二人此类诗之妙,以锻炼个人技巧,有助于赓和。浩有所收获后,遂扩大至黄等六人,其意在使读者神往于“元祐盛际”,直若与“两公六君子”“承欢”(自序)。盖读者自诸人倡酬中“参比互证,得以稍窥用意之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有补于诗学。本书所收诸人倡酬,间有挂漏,是其不足处。本书宋本犹存,有影宋刊本。(孔凡礼)

【宋文鉴】一作《皇朝文鉴》。北宋诗文选集。一百五十卷。宋吕祖谦编纂。淳熙四(1177)年孝宗降旨,校正刊行坊间所刻江钿编《圣宋文海》,翰林学士周必大以为“文海”编辑“殊无伦理”,刻之“恐难传后”,于是经大臣推荐,遂命祖谦编纂一部新的北宋诗文选集,以体现宋朝文治。吕氏收得北宋诗文集凡八百卷,在博采约收基础上,成一代之书。全书编为六十一类。一至十一卷,收赋八十余篇;十二至三十卷,收各体诗(包括“骚”)一千零二十首;三十一卷至一百五十卷,收文一千四百多篇。所收诗文作者,共二百多人,入选诗文,在当时较有代表性。大抵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宗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亦搜求其文”;其人“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亦“不以人废言”(见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入选诗文有不少是为人传诵的好作品。其所依据的文集不少已失传,赖此书得略窥

其一二。此书意在“补治道”(周必大《序》),也收入不少平庸之作。初刊于淳熙丁酉(1177),初刊本已早佚。嘉泰四年(1204)新安郡斋刊本尚残存,有端平元年(1234)刊本。明、清两代有刻本多种,流传颇广。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宋端平本,较明天顺间刻本多三篇,缺卷六一吕陶《论制师服》一篇。另有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之排印本,由今人齐治平校点。(孔凡礼)

【回文类聚】诗总集。四卷,补遗一卷。宋桑世昌辑。世昌字泽卿,号莫庵,高邮(今属江苏)人,陆游甥。《渭南文集》卷三三《陆孺人墓志铭》赞世昌“从诸公问学,不以贫夺其志”。世昌有诗集,《龙川文集》卷十四有序,已佚。有《兰亭考》,今传。回文始于晋时前秦窦滔妻苏蕙的《回文璇玑图》,“反复皆可成章”(桑世昌《序》)。本书卷一即专论《璇玑图》,列举各种读法,末附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题《璇玑图》诗。卷二列举各种回文图十六图,并述其读法。卷三收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回文诗五十三首,卷四收回文词五十五首,作者苏轼等。由图和文字的结合而只用文字,由诗而词,“咏歌渐盛,工巧日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乃诗之一体,本书自源流发展立卷,编次有序,可资研究。本书所收宋人的回文诗词,不少仅见于此书,可备辑佚。本书搜采颇富,惟不书所出,是其所短。《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著录本书,为三卷,且云以太宗至道“御制冠于篇首”。今太宗之回文偈见《全宋诗》卷三八。本书问世后,明张之象为补。清康熙戊子(1708),朱存孝《补遗》一卷,漏收颇多。本书有明万历、清康熙刊本。《四库全书》本删去《补遗》中美人八咏。(孔凡礼)

【千家诗】全名《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亦简称《后村千家诗》。诗选集。宋刘克庄(后村)编选。宋刊本十五卷,后集五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七著录。通行本为《楝亭十二种》,清康熙丙戌(1706)曹楝亭重刊,凡二十二卷。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等十四门。每门之下,分若干类,如时令门分春、夏、秋、冬四类。共一百三十一类。选诗以五、七言近体平易之作为主,五、七言古短篇入选者数首,乐府长篇、五七言古巨制,皆未入选,便于读者掌握;而所写同一事物,归入一类,更便于欣赏、比较和研究。本书共选了三百五十多人的作品。其中南北朝三人。唐约一百人,五代不足十人,宋代大约二百二十人(其中南宋居多),待考的二十多人。搜采范围较广。入选作者中,不少当时有集,如石忞有《橘林集》,沈惟肖有《庸斋小集》,任希

夷有《斯庵集》，潘枋有《紫岩集》等等，皆已失传，赖此选及其他选本类书得以略窥其一斑。然曹本问题亦颇多，傅增湘尝以宋刻校曹本，谓“诗题人名多失载，于是乙诗混入甲作者比比皆是”，今宋本不得见，单就曹本论，如卷四《九日写怀》为宋程俱作，而误为唐高适，卷一九《乞猫诗》乃黄庭坚作，而误为欧阳修；张继《枫桥夜泊》既见卷六，复见卷一五；卷一九李世民《咏饮马》，乃律诗一首，今分为绝句二首，关于作者，时标名，时标字，或标号，前后不一。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村千家诗校注》，以曹刻为底本，在较大范围内，检核现存有关著述，订正不少讹误；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卷末附录《诗人小传》，有利于检索。然仍未尽善，如李泰伯为李觏之字，今仍分而为二；任斯乃任斯庵，即任希夷，今仍曰无考，张中为熙宁三年（1070）进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今亦曰无考。（孔凡礼）

【柴氏四隐集】 诗词文合集。三卷。宋柴望及其从弟随亨、元亨、元彪撰。柴望（1212—1280）字仲山，号秋堂，江山（今属浙江）人。嘉熙间为太学上舍。淳祐六年（1246），上《丙丁龟鉴》，得罪。景炎二年（1277），授国史编修。随亨（1230—？）字刚中，官至知建昌军。元亨字吉甫，历官朝散大夫。元彪字炳中，尝官察推。宋亡，俱不仕。人称柴氏四隐，遂以此名集。本书卷一收望诗六十一首，词十一首，文三篇，卷二收随亨诗二十八首，卷三收元彪诗三十三首，词八首，文一篇。望在世时，有诗集《台州道衣集》、《咏史诗》、《凉州鼓吹》行世。其后以兵燹散佚，元至正四年（1344），从子季武搜其遗存者刻之，名曰《秋堂集》。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嘉庆十七年（1812）手写本，所据为知不足斋校正本，该本所据又为明刊本。1914年，李之鼎为校刻之，收入《宋人集》，补词二首。清写本文字胜李本。元彪有《袜线集》，已佚。随亨、元亨集名皆不可考。望兄弟所作，感慨凄惋，如望之《即事》、《和通判弟随亨书感韵》，随亨之《宿袁州枫林邸》，元彪之《和姜元哲中秋有感韵》，“读之可为下泪”（望墓铭）。大体“诗派在晚唐，以律体为胜”（李之鼎跋）。柴望事迹详苏幼安所撰墓铭，随亨等三人，《宋史翼》卷三四有传。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孔凡礼）

【诗家鼎裔】 南宋诗选集。又名《鼎裔集》。二卷。不著选编者名氏，卷首有序，署曰“倦叟”。序中有“宋季”、“晚宋”字样，四库馆臣以为不类宋人口吻，疑“倦叟”为元初人。清人劳权阅《全芳备祖》“桐花类”中见引《鼎裔集》诗，查而得之，《全芳备祖》编于理宗宝祐前后，遂以为此书编于宋度宗或理宗期间。其序或写于宋亡后耶？“倦叟”当为此书编选

者。上卷入选作者五十八人，下卷三十七人。其中戴复古选八首，严羽七首，刘克庄、高翥、周端臣各六首，赵师秀五首，游次公、冯去非、王炎功各四首，余则一至三首不等。“盖取尝鼎一脔之意，故以为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选诗人，如郑舜卿为乾道五年（1169）进士（光绪《福州府志》卷三六）；章甫，乾道六年已与陆游有交往（见《入蜀记》）；游次公，乾道末已入范成大桂林幕（见《范成大年谱》）皆为南宋中期人，倦叟序概以晚宋视之，盖误。入选诗人大体仕途潦倒，其诗可归于江湖派。然其中不乏佳作，如陆游尝赞郑舜卿《昭君曲》可以继张耒乐府，“能道昭君意中事”（《渭南文集》卷二七《跋郑虞任昭君曲》）；叶绍翁《游园不值》为“古今传诵”（《宋诗选注》）。入选的不少诗人，“有他书别无可考，独见之此编者”（倦叟序）。乾隆《四库全书》藉天一阁藏宋刻“麻沙本”著录。有《四库全书》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孔凡礼）

【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集】 南宋诗总集。南宋陈起初编，明毛晋重纂影钞。毛晋（1598—1659），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名子晋，号潜在，常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好藏书，建汲古阁、自耕楼，藏书万卷，请名士校勘，所刻书流布天下。陈起所编《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等至明末已多散逸，明末开始有人搜集与编刻南宋诸家小集，毛氏是较早的一位。他搜集南宋各家小集六十种（绝大多数属于江湖派，为陈起所编刻）汇集在一起，按照宋代陈氏刻本原来版式影写，非常精细，无改窜臆断之处，乃至序后图印，亦摹写酷肖，正如邓邦述序所说：“技能工巧，至此而极，后人虽雅慕深思，恐难企及。”此编包括：戴复古《石屏续集》四卷、《长短句》一卷，刘过《龙洲道人诗集》一卷，周文璞《方泉先生诗集》三卷，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一卷、《诗说》一卷，赵汝铤《野谷诗稿》六卷，郑清之《安晚堂诗集》七卷（原本六十卷，仅存卷六至卷一二），释永颐《云泉诗集》一卷，岳珂《棠湖诗》一卷，何应龙《橘潭诗稿》一卷，吴惟信《菊潭诗集》一卷，施枢《芸隐倦游稿》一卷、《芸隐横舟稿》一卷，宋伯仁《雪岩吟草》一卷，许棐《梅屋诗稿》一卷、《融春小缀》一卷、《梅屋第三稿》一卷、《梅屋第四稿》一卷、《梅屋诗余》一卷，周弼《汶阳端平诗集》四卷，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薛嵎《云泉诗》一卷，罗与之《雪坡小稿》一卷，高翥《菊涧小集》一卷，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朱南杰《学吟》一卷，王同祖《学诗初稿》一卷，邹登龙《梅屋吟》一卷，邓林《皇芻曲》一卷，沈说《庸斋小集》一卷，叶绍翁《靖逸小集》一卷，张弋《秋江烟草》一卷，杜旂《癖斋小集》

一卷,危稹《巽斋小集》一卷,徐集孙《竹所吟稿》一卷,余观复《北窗诗稿》一卷,毛珣《吾竹小稿》一卷,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赵崇铢《鸥渚微吟》一卷,赵希櫟《抱拙小稿》一卷,李涛《蒙泉诗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胡仲参《竹庄小稿》一卷,陈鉴之《东斋小集》一卷,武衍《适安藏拙余稿》一卷、《适安藏拙二稿》一卷,俞桂《渔溪诗稿》二卷、《渔溪乙稿》一卷,葛起耕《桧庭吟稿》一卷,利登《骹稿》一卷,黄大受《露香拾稿》一卷,吴汝式《云卧诗集》,葛天民《葛无怀小集》一卷,敖陶孙《臞翁诗集》二卷,刘仙伦《招山小集》一卷,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林尚仁《端隐吟稿》一卷,张蕴《斗野稿支卷》一卷,朱继芳《静佳龙寻稿》一卷、《静佳乙稿》一卷,释斯植《采芝集》一卷、《采芝续稿》一卷,黄文雷《看云小集》一卷,张良臣《雪窗小集》一卷,刘翰《小山集》一卷,姚镛《雪蓬稿》一卷,叶茵《顺适堂吟稿》五卷,陈起《芸居二稿》一卷。此编与《江湖小集》相比,多收四家,少收二家。较《南宋群贤小集》多郑清之、岳珂二家,少四家。邓邦述于宣统元年(1909)得毛氏抄本于北京。古书流通处据此本影印“行款大小悉依原书”。(王学泰)

【江湖小集】南宋诗总集。九十五卷。宋陈起初编,清初人重纂。《直斋书录解題》载《江湖集》九卷,为“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作品合为一集,后又陆续编辑刊刻,出版过许多江湖诗人作品,并形成以飘泊江湖、名位不显之诗人为主体的江湖诗派。《江湖集》亦因曾触犯朝廷重臣被毁版而享大名。陈氏所编刻之江湖诸集以及江湖派诗人之小集,亦因元、明两代尊唐薄宋而沉沦不彰。明末清初因宋诗受到士人重视,搜辑、抄录刊刻宋诗集之风遂盛。《瞿氏目录》有旧抄本《宋人小集》九十三卷,并言“此即宋陈起之《江湖集》,后人得不全本哀录之,亦有羈入者。原本藏苏州王逸陶扶摇馆,太仓宋宾王借录,以顾侠君本校过,编分甲至癸十集,凡五十家,十集外又有十六家。”丁氏《藏书志》亦载有旧钞《群贤小集》八十八卷,并云:“陈起收刻海内诗人小集,虽十数叶,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盖一时举场游客炫名之资,并名公贵人小卷,间及北宋所遗,本无一定家数、卷数,后以‘夜月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之句,为史弥远罗织,起从遣戍,书亦劈版,零落之余,尚存旧印。钱塘吴志上允嘉得宋槧本,珍秘倍至,同人稍稍传写,王渔洋得二十八家,吴尺凫汇为六十四家,马秋玉六十家,卷各不同。此为海昌周范兮春旧藏校本。”“四库”所收《江湖小集》亦非《江湖集》,只是众多南宋诗人小集中之一种,其中所收多为江湖诗人之小集,亦有达官

贵人之小集如吴渊、洪迈。所收多为陈起所编刻,亦间有其他书商所编刻,如薛石师《瓜庐诗》为“王师安刊”。其他如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乐雷发《雪矶丛稿》,亦非陈起编刻。所收多为《江湖集》刊行前(即宝庆元年,1225年)编刻,亦有一些为宝庆元年以后所编刻。可知《江湖小集》是在陈起初编各种《江湖集》基础上并杂收其他人所编刻南宋人小集而合成。此编包括:洪迈《野处类稿》(有人认为是伪书),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叶绍翁《靖逸小稿》,严粲《华谷集》,毛珣《吾竹小稿》,邓林《皇芎曲》,胡仲参《竹庄小稿》,陈鉴之《东斋小集》,徐集孙《竹所吟稿》,陈允平《西麓诗稿》,张至龙《雪林删余》,林旂《癖斋小集》,李昇《梅花衲》,施枢《芸隐倦游稿》,何应龙《橘潭诗稿》,沈说《庸斋小集》,王同祖《学诗初稿》,陈起《芸居乙稿》,吴仲孚《菊潭诗集》,刘翼《心游摘稿》,朱继芳《静佳龙寻稿》,林尚仁《端隐吟稿》,陈必复《山居存稿》,斯植《采芝集》,刘过《龙洲道人诗集》,叶茵《顺适堂吟稿》,高似孙《疏寮小集》,敖陶孙《臞翁诗集》,朱南杰《学吟》,余复观《北窗诗稿》,王琮《雅林小稿》,刘仙伦《招山小集》,黄文雷《看云小集》,姚镛《雪蓬稿》,俞桂《渔溪诗稿》,薛嵎《云泉诗》,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周文璞《方泉小集》,危稹《巽斋小集》,罗与之《雪坡小稿》,赵希櫟《抱拙小稿》,黄小受《露香拾稿》,吴汝式《云卧诗集》,赵崇铢《鸥渚微吟》,葛天民《小集》,张弋《秋江烟草》,邹登龙《梅屋吟》,吴渊《吴渊遗集》、《退庵遗集》,宋伯仁《雪岩吟草》、《西塍集》,薛石师《瓜庐集》,高九万《菊涧小集》,许棐《梅屋诗稿》、《融春小集》、《梅屋稿》,戴复古《石屏续集》,利登《骹稿》,李涛《蒙泉诗稿》,乐雷发《雪矶丛稿》,张蕴《斗野稿支卷》,刘翰《小山集》,张良臣《雪窗小集》,葛起耕《桧庭吟稿》,武衍《藏拙余稿》,林同《孝诗》。凡六十二人,诗集文集六十五部,此编保存了南宋名位不显的小家诗作。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江湖后集】南宋诗总集。二十四卷。南宋陈起初编,四库馆臣重纂。此编虽名《江湖后集》,然而并非陈起原编之《江湖后集》,而是针对《江湖小集》而言,此二集皆为四库馆臣所命之名。四库馆臣检《永乐大典》,见其中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除《江湖集》外,其他诸集并非皆为江湖派诗人之作品,从中检取《江湖小集》未收录之作,删除重复,编为一集。共收录六十六家,其中《江湖小集》中未收者有:巩丰、周弼、刘子澄、刘逢吉、周端臣(独占一卷)、赵汝镡(独占一卷)、郑清之(独占二卷)、赵汝绩、赵汝回、赵耕夫、葛起文、赵崇嶠、张桀、姚宽、罗椅、林昉、戴植、林希逸、

张炜、万俟绍之、诸泳、朱复之、李时可、盛烈、史卫卿、胡仲弓、曾由极、王湛、李自中、董杞、陈宗起、黄敏求、程炎子、刘植、张绍文、章采、章粲、盛世宗、程植、王志道、萧澥、萧元之、邓允端、徐从善、高吉、释圆悟、释永颐等四十七家。在《江湖小集》中有专集而又见于此编的作者有敖陶孙(独占二卷,此二卷所录之诗与《江湖小集》之《臞翁诗集》基本不重复)、李堯(《江湖小集》所收李堯之《梅花衲》为集句,此为创作)、黄文雷、周文璞、张蕴、俞桂、武衍、吴仲孚、胡仲参、姚镛、戴复古、危稹、徐集孙、朱继芳、陈必复、斯植、陈起(独占一卷)等十七家,另有词人二家:吴仲方、张辑。(此名单据“文渊阁”本实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开列名单略有差异。)此编在每位作者之前附有小传,颇具参考价值。除《四库全书》本外,又有清人顾修刻《南宋群贤小集》时所附《江湖后集》本,即嘉庆间“读画斋”刻本。(王学泰)

【南宋群贤小集】南宋诗总集。一百三十五卷,附《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宋陈起初辑、清顾修重纂。顾修字仲欧,号绿崖,石门(今浙江桐乡)人。庠生,生活于清乾、嘉之间,博学嗜古籍,刊有《读画斋丛书》为学林所重。陈起原刊江湖诸集已散佚,明末至清乾隆间官方、民间皆在重辑。顾氏辑本是较为晚出的民间辑本。此编较《江湖小集》、《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小集》等专门收辑南宋江湖诗人作品之总集更为丰富。它最初为钱唐吴焯(瓶花斋)荟萃诸家钞本,定为六十四家,又据宋刻增入二家,据花山马氏本增入二家,据秀水朱氏本增入二家,比较完备。鲍廷博钞自汪氏振绮堂、据宋本校正,顾修又加以整理,于嘉庆六年(1801)刊刻行世。包括:危稹《巽斋小集》一卷,罗与之《雪坡小稿》二卷,高翥《菊硎小集》一卷,邹登龙《梅屋吟》一卷,余观复《北窗诗稿》一卷,赵崇禕《鸥渚微吟》一卷,朱南杰《学吟》一卷,王琮《雅林小稿》一卷,吴仲孚《菊潭诗集》一卷,沈说《庸斋小集》一卷,王同祖《学诗初稿》一卷,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何应龙《橘潭诗稿》一卷,毛珣《吾竹小稿》一卷,邓林《皇芻曲》,许棐《梅屋诗稿》一卷、《融春小缀》一卷、《梅屋三稿》一卷、《梅屋四稿》一卷,胡仲参《竹庄小稿》一卷,陈鉴之《东斋小集》一卷,施枢《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倦游稿》一卷,徐集孙《竹所吟稿》一卷,吴汝式《云卧诗集》一卷,武衍《适安藏拙徐稿》一卷、《适安藏拙乙稿》一卷,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叶绍翁《靖逸小集》一卷,张弋《秋江烟草》一卷,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杜旗《癖斋小集》一卷,刘仙伦《招山小集》一卷,黄文雷《看云小集》一卷,赵希橐《抱拙小稿》一卷,葛起耕《桧庭吟稿》一卷,利登《骹稿》一卷,薛嵎《云泉诗》一卷,葛天

民《无怀小集》一卷,俞桂《渔溪诗稿》二卷、《渔溪乙稿》一卷,刘翰《小山集》一卷,张良臣《雪窗小集》一卷,张蕴《斗野稿支卷》一卷,黄大受《露香拾稿》一卷,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敖陶孙《臞翁诗集》二卷,朱继芳《静佳乙稿》一卷、《静佳龙寻稿》一卷,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林尚仁《端隐吟稿》一卷,姚镛《雪蓬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宋伯仁《雪岩吟草》一卷,戴复古《石屏续集》四卷,叶茵《顺适堂吟稿》五卷,刘过《龙洲集》一卷,姜夔《白石道人诗》一卷、《诗说》一卷,林同《孝诗》一卷,李涛《蒙泉诗稿》一卷,周文璞《方泉先生诗集》三卷,薛师石《瓜庐诗》一卷,赵汝钺《野谷诗集》六卷,周弼《端平诗集》四卷,李堯《梅花衲》一卷、《翦销集》二卷,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七卷,释斯植《采芝集》一卷、《采芝续集》一卷,释永颐《云泉诗集》一卷,陈起《芸居乙稿》一卷,陈起编纂《增广高僧诗选前集》一卷、《后集》三卷、《续集》一卷,陈起编纂《前贤小集拾遗》五卷,(此为选本,入选者以南宋为主,兼及北宋),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吴渊《退庵遗集》二卷,翁卷《苇碧轩集》一卷,赵师秀《清苑斋集》一卷,徐照《芳兰轩集》一卷,徐玘《二薇亭集》一卷、《中兴群公吟稿》七卷(此为残本,只存戊集,录戴复古、高翥、姜夔、严粲五人之诗),《群贤小集补遗》一卷,补危稹、高翥、吴仲孚、高似孙、叶绍翁、张弋、刘仙伦、张良臣、朱继芳、宋伯仁、姜夔、翁卷、赵师秀、徐照、徐玘等十五人之诗多取之于方志,为清鲍廷博所补。后附《江湖后集》,与《南宋群贤小集》重复者,则只存题目。常见者有嘉庆间“读画斋”刻本。(王学泰)

【前贤小集拾遗】南宋诗总集。五卷。南宋陈起辑。此书收南宋诗人近百家,多为不知名之士,可能都是浪迹江湖、沉沦下僚不得志的文人,入选作品也颇能体现江湖派诗歌的特点。此集收入《南宋群贤集》,有清《读画斋丛书》本。(王学泰)

【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诗总集。七卷。宋戴复古、高翥、姜夔、严粲撰。严粲字坦叔,号华谷,有《华谷集》。《郡斋读书志》附志下著录《中兴群公吟稿》四十八卷,并云此乃“中兴以来一百五十三人之诗”。戊集凡七卷:戴三卷,一百四十八首;高二卷,一百一十五首;姜一卷,七十六首;严一卷,一百二十六首;为《吟稿》之仅存者。此四人为江湖派诗人,诗亦入《江湖小集》,戴四卷,徐三人皆一卷,与本书不同。《永乐大典》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清修《四库全书》,合诸集为一编,定名为《江湖后集》。《永乐大典》尚有《中兴江湖集》,未辑出《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三部,云缺。《文渊阁书目》又有《宋中兴吟鉴》一部,亦云缺。以上各集,

大约为诗作丛刊或选集。其作者或知名,或不知名,或有集,或无集。本书与以上各集属同一类型,然层次略高。常见者有顾修《读画斋丛书》本。

(孔凡礼)

【两宋名贤小集】 宋诗总集。三百八十卷。南宋陈思编纂,元陈世隆补辑。陈思,生卒年不详,或称陈道人,南宋末年临安商贾,曾入仕为“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搜访”(其《小字录》书后题衔)。编刻有《宝刻丛编》、《海棠谱》、《书苑精华》等。陈世隆字彦龙,又字彦高,钱唐人,思之从孙,顺帝至正中馆于嘉兴陶氏,歿于兵。编纂《宋诗拾遗》二十三卷。此编为北宋、南宋诗人小集之合编,始编于绍定间、前有绍定三年(1230)魏了翁《序》,谓:“予无他嗜,惟书癖不可医,临安鬻书人陈思多为予收揽散逸,叩其书颠末,辄对如响。一日以其所梓《圣宋群贤小集》见寄,且求一言。盖屡却而请不已,发而眎之,球玉琳琅,粲然在目。”至于陈思原编为多少卷,世隆增辑若干卷,今已不可知。所谓朱彝尊之《跋》所云世隆“于思所编六十余家外,增辑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复补缀之”,纯属无稽之谈。此书本以抄本流传,凡四十二册、三百八十卷,亦为“四库”馆臣所分。今人王重民言陈起曾编诸江湖诗人小集,“陈思继陈起之后继续搜辑,世隆因其家世旧藏,益以元初所出,曾勒为一编。此本虽经明、清人附益传录,其源尚出旧帙”(《中国善本书提要》)。全书所收起自杨亿,终于潘音,共收二百五十六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百五十七家,误。)书中后部包括《江湖小集》中的绝大部分,其中也有少量与《江湖后集》所录南宋江湖诗人作品相重复。此集搜罗宏富,两宋许多小家诗作赖此以传。每家之前皆有评传,细致而详尽,可资参考。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清顾修“读画斋”刻本。

(王学泰)

【濂洛风雅】 宋道学家诗选集。六卷。南宋金履祥编选。此集编于元初,金氏馆于韩良瑞家编此书,书中惟收宋理学家诗,始自北宋周敦颐,终于南宋王偁,包括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游酢、杨时、吕大临、尹焞、吕希哲、张绎、谢良佐、胡安国、罗从彦、陈瓘、邹浩、徐夔、吕本中、曾几、胡寅、胡宏、刘彦冲、朱松、林之奇、李侗、朱熹、吕祖谦、张栻、黄幹、陈淳、徐侨、杨立与、刘炎、赵蕃、方士繇、范念德、曾极、真德秀、李仲贯、巩丰、时澜、蔡元定、蔡渊、叶采、刘圻父、何基、王柏等四十八位道学家之诗。“濂”指周敦颐,“洛”指程颢、程颐。卷前仿吕本中《江西诗派图》,作《濂洛诗派图》,以师友渊源为系统,并附以入选诗人之生平仕历。入选作品内容多是演绎儒道,阐明义理,有些根本不能算诗,如周敦颐之《拙赋》、《太极图

说》以及一些祭文、铭文之类,其中也有一些以酣畅之笔描写瞬间感受的作品,饶有诗趣。此编“初不分类例,良瑞以为濂洛诸人之诗,固皆风雅之遗,第风雅有正变大小之殊,颂亦有周鲁之异,于是分诗铭箴诫赞咏四言为风雅之正,其楚辞歌骚乐府韵语为风雅之变,五七言古风则风雅之再变,绝句律诗为风雅之三变云云,具见良瑞所作序中。盖选录者履祥,排比条次者良瑞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濂洛”只是儒学中流派而非诗派,用以比附江西宗派,未免削足适履。道学家中虽亦不乏能诗者,但作诗与讲学为二事,其佳作绝非说道讲理之篇章,因之道学家之诗亦与一般诗人之作相去不远。自此编出,另立道学家诗,遂使“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之尽管书中所选诗“出入风雅,无一不根于仁义,发于道德”(胡凤丹《序》),然终不为社会承认。天下学诗者,终宗李杜,而不宗濂洛也。有《率祖堂丛书》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丛书》。

(王学泰)

【诗苑众芳】 诗选集。不分卷。宋刘瑛辑。刘瑛字伯玉,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所辑诗止于宋亡前夕,瑛当及元。本书辑诗,计潘枋六首,章康二首,黄简二首,赵汝谈三首,方万里二首,郑起潜四首,文天祥二首,李迪二首,郑传之一首,何宗斗一首,蒋恢九首,朱洗七首,魏近思一首,张榘四首,张绍文九首,张元道五首,吕江八首,蒋华子四首,陈钧七首,萧炎二首,沈规二首,吕胜之二首,江朝卿二首,吴龙起二首。以上诸人,或籍于吴,如郑起潜、郑传之、蒋恢;或尝仕于吴,如文天祥、潘枋;或隐于吴,如章康、黄简。其人皆瑛所敬慕,故卷首自题曰“敬编”。诗前有小传,称作者之氏而不名,如潘枋称“长乐潘氏”,以下小字述其名、字、号、略历。亦尊之本意。所辑诗皆近体,大抵缘情遣兴,以秋思、秋意、秋兴、秋吟、秋夜为题者即达七首,晚唐调居多;然亦有感怀国事佳作,如郑起潜《题蜀道难图》、张元道《不如归去》,悲蜀道沉沦,令人唏嘘。所辑诗不少不见于他书,有辑佚价值。其书向以抄本流传,至清始有刻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影元抄本,收入《宛委别藏》。

(孔凡礼)

【忠义集】 诗总集。七卷。元赵景良辑。赵景良字秉善,南丰(今属江西)人。事迹见本集卷首之序。本书卷一为刘壎所撰五古《补史十忠诗》,述宋末李芾、赵卯发、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顷、密侑、李庭芝、陈文龙、张世杰、张珏事。壎字起潜,号水村,南丰人。有《隐居通议》、《水云村稿》。卷二至五收壎次子麟瑞所撰《昭忠逸咏》五十律,述宋末忠义,诗后详叙遗事;麟瑞号如村,自序作于至治元年(1321)。盖

皆据其所见闻而录之,“藉诗以存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为史诗。诗亦悲壮激越。卷六、卷七为《附录诸公诗》,凡七十二首,有文天祥、汪元量(楚狂)等人之作。揆之以理,此“诸公”应为宋末忠义之士或宋遗民,然元人程忘吾等亦厕身其间,不知何故。此书在元不甚著,“明宏治中,江右何乔新始序而梓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末毛氏汲古阁复刻之。今通行本为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另有道光癸巳(1833)徐宗幹刻本,附《续录》三卷。

(孔凡礼)

【瀛奎律髓】 唐宋诗选集。四十九卷。元方回编选。此书专选唐宋两代五、七言律诗,故称“律髓”;自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照奎之义,故称“瀛奎”。共计选诗二千九百八十九首,内唐代作家一百八十馀家,宋代作家一百九十馀家。方回“主江西”,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在选诗时,仍能注意到不同流派。入选宋诗,除江西派外,有西崑体、江湖派、四灵体,赞扬西崑作者杨亿“组织故事有绝佳者”。此书分四十九类,每类一卷,每类有题解,说明其性质和特点。然分类过于琐细,且以类选诗,往往强取充数。如卷九老寿类《睢阳五老图》等诗,并非佳作,亦被选入。然宋代诸集,不尽传于今者(如尤袤《遂初小稿》、潘柽《转庵集》等),颇赖此书以窥其鳞爪。诗后多附评语,保存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重要资料。清中叶,纪昀撰《瀛奎律髓刊误》。纪昀在序文中,谓方回论诗有三弊:党援、攀附、矫激;选诗亦有三弊,为矫语古淡、标题句眼、好尚生新。在具体评论中,纪氏有否定,亦有肯定,尚称持平。纪氏论诗,亦宗杜甫。方、纪二人异中有同,合方、纪之评,扬短取长,有利于了解和学习唐、宋五、七言律诗。方氏之书,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其后流传不广。明天顺间,龙遵叙守徽州,搜访得其传录全本,因校刻之。清康熙间,吴之振复刻之于黄叶山庄,“悬诸家塾以为的”(序),自是流传颇广。今天顺本尚存。《瀛奎律髓刊误》有清光绪间重刊本。方回事迹详《新安文献志》卷九五上《方总管传》。常见者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名为《瀛奎律髓汇评》由今人李庆甲集评校点。

(孔凡礼)

【谷音】 宋诗总集。二卷。元杜本编。杜本(1276—1350)字伯原,学者称清碧先生,清江(今属江苏)人。吴越大灾,岁饥,杜曾上救荒策。惠宗时曾为翰林学士,称疾固辞,归隐。父杜谦曾毁家纾难,以佐文天祥军。杜氏继承父志,十分同情宋遗民。早年漫游,多与憎恨异族统治的“节士”、“幽人”

结交,记录了他们的悲愤之作。此书便是这些作品的精选本。书中共选诗一百零一首,作者二十四人,无名氏六人。所选录之诗歌多沉郁悲壮、感慨苍凉之作,表现了作者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皇甫东生《海口》诗:“穷鸟迷孤青,飓风荡顽寒。不知是海口,万里空波澜。蛟龙恃幽沉,怒气雄屈蟠。峥嵘挾秋阴,挂席潮如山。荧惑表南表,天去何时还。云旗光惨淡,腰下青琅玕。谁能居甬东,一死谅非难。呜呼朝宗意,会见桑土干。”其愤怒激越之情,呼之欲出,诗人与元统治者不共戴天,在南宋灭亡那年“痛哭蹈海”而死。清王士禛有诗赞美说:“谁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此书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以毛晋汲古阁《诗词杂俎》本为底本,并校以《四部丛刊》本排印出版。

(王学泰)

【宋艺圃集】 宋诗选集。二十二卷。明李裘编选。李裘字子田,号黄谷,内乡(今属河南)人。嘉靖癸丑(1553)进士。仕至贵州提学副使。事迹详明李若讷《五品文稿》卷二《李公神道碑》。此书成于隆庆元年(1567)。其时“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裘编选此集,“其学识有过人者”(王士禛《香祖笔记》)。李氏编选此书,意在“见一代之文献”(序),自林逋、潘阆、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而至陆游、严羽、朱熹、谢翱,可略知发展梗概。本书共收二百八十八人作品,其中如廖融、李九龄、王初,《全唐诗》皆误为唐人,实为宋人,此书可正其误,有考订价值。所选诗如单锡《寄隐居士》、王俊民《遇桂英》,不见于他书,可备宋诗辑佚。然“以苏轼、苏辙列张泳、余靖、范仲淹、司马光前、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列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前”,编次后先颠倒;以金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沨、庞铸、史肃、刘迎等人宋,“更属未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本书不足处。本书有明隆庆刊本、《四库全书》本。

(孔凡礼)

【宋诗钞】 诗选集。一作《宋诗钞初集》。清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编选。吴之振(1640—1717),字孟举,别号黄叶村农,石门(今浙江桐乡)人。平生锐意于诗。事迹分别见《碑传集补》卷三六。自牧乃之振之侄。清初,自明代弘治以后盛行的“尊唐黜宋”的诗风还有影响。于是,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陈衍等倡宋诗。吕、吴有感于宋诗“向无总集、亦无专选”(《凡例》),有感于“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其“取材广而命意新”,极欲使“天下黜宋者得见宋之为宋”(吴之振《序》),乃编选此集。选刻始于康熙二年(1663),高

旦中、黄宗羲亦参与搜讨勘订,最后由吴氏叔侄编定。原拟选一百家,刘昉、邓肃、黄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有目而无诗,实为八十四家。每家系以小传,并为品评与考证。选刻完成于康熙十年。此集对宣传宋诗和端正对宋诗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其评语常有独到之处。其不足之处: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往往钞得“前详后略”,入选诗中,间有误入,诗题下小注往往误入诗题。191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康熙十年原刊本此集,由李宣龚校补此集缺文,补七百二十八字。李复自吴兴刘翰怡处得别下斋旧藏本管庭芬、蒋光煦《宋诗钞补》;其书既补选原缺十六家之诗,又少量补选其他各家之诗,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问世。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此集排印标点本,就包括了《宋诗钞补》。

(孔凡礼)

【宋元诗会】宋、元诗总集。一百卷。清陈焯辑。陈焯字默公,桐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壬辰(1652)进士。《国朝书人辑略》卷二九有传。其书前六十卷为宋,得四百八十多人,录诗三千一百五十多首;卷六十一至六十五录金人一百三十多人,诗四百五十多首;后三十五卷为元,得作者二百六十多人,录诗三千七百首。此书旨在辑录散篇零什。盖自明中叶以后,宋、元诸刻,月销日亡,辑者恐自兹日益散佚,乃广为搜求辑录。其所辑之诗和一些诗的作者,在当时已鲜为人知。辑者对传播和保存宋、金、元诗起了作用。辑者改正了潘是仁《宋元诗》、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对于入辑诗人,考其里居出处,可资考证。然其疏漏之处亦颇多:如徐致中、徐玠本为一人,今分而为二;王浚、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頫、张金娥等为金人,今入于宋;《和陆放翁见寄》、《范大参人觐颇爱鄙作以诗谢之》乃姜特立诗,今入于姜夔。所辑诗不注出处,亦为本书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其搜辑之功仍不可没。本书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程仕刊本、《四库全书》本。

(孔凡礼)

【积书岩宋诗选】诗选集。一作《积书岩宋诗选略》二十五卷。清顾贞观编选。顾氏编选此书,乃遵其祖上遗意,以“上追《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教”为归,采取适中篇幅,以为“多既庞杂,少则缺遗”也(张纯修序)。本书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六绝、七绝次序排列,共选诗二千四百零四首,入选作者二百七十人,以大家为主,兼及小家,有特色。入选诗有不少佳作,有品藻眼光,然由于强调诗教,以致讽谕名作(如苏轼《荔枝叹》)以及爱国名篇(如陆游《示儿》、杨万里《渡淮四绝句》)皆未能入选。

本书于诗篇归属、作者时代,间有疏误,未得称为善本。如《申王画马图》乃蔡肇诗,今承前人之误,仍入于苏轼,程自修、刘麟瑞皆元人,今入于宋。盖顾氏选诗时,大量宋诗资料尚有待发掘,顾氏未及见,固未可求全责之。本书有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孔凡礼)

【宋十五家诗选】宋诗选集。十六卷,清陈衍编选。陈衍(1649?—?)字言扬,海宁(今属浙江)人。贡生,官至温州教授。乾隆《海宁州志》卷一一有传。衍乃黄宗羲弟子。黄氏认为宋诗善学唐,自有其优长,然学宋容易出现“空疏率易”(衍自序)。衍编选此书,意在矫正此弊,进一步提倡宋诗。他于诗喜爱韩愈、苏轼,讲究法度,主张炼句。他赞扬梅尧臣的“峻削瘦硬”,陆游的“猛力炉锤”,不满杨万里的“粗服乱头”,“洗净铅华”(衍评语)。此所选诗,大抵能贯彻其主张。他于每家诗前先选录前人评论若干则,再附以己见,有其独到处。他指出分类、分体编排的不合理,主张编年,有见地。他所选十五家,除上述梅、苏、陆、杨外,余为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范成大、王十朋、朱熹、方岳、高翥、文天祥。他认为他们“皆宋之圣于诗、神于诗者”(《自序》),又说他选录曾、苏(辙)、王、高、文之诗,不过为“表彰散逸”(卷首《发凡》),显然矛盾。陈衍所属陈氏自高氏出,而高乃衍之远祖,衍竟全录其诗,尤为失当。此书不分卷,有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原刊本。

(孔凡礼)

【濂洛风雅】道学家诗选集。与南宋金履祥所编同名。九卷。清张伯行编选。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此编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游酢、尹焞、杨时、罗仲素、李侗、朱熹、张栻、真德秀、许衡、薛瑄、胡居仁、罗洪先等十七人之诗八百四十首,以朱熹诗最多(四百零一首),其次为薛瑄(一百二十六首)、杨时(一百零六首)、罗洪先(四十一首)、程颢(三十二首),所取多寡与他们的创作成就基本相符。各家作品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列。张氏言:“濂洛诸先生,未尝以诗名也。若其性情所发,自成天律则有之。盖取其和顺英华也,不徒以声律也。”(见《凡例》)编者强调性情,不强调正变,故其所选较金履祥所编同名诗选要高明一些。金氏已有《濂洛风雅》,“伯行是书,仍其旧名,而一字不及履祥,不可解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为张氏官福建巡抚时所刊。常见者有《丛书集成》本。

(王学泰)

【宋百家诗存】宋诗选集。二十卷。清曹庭栋编选。曹庭栋(1700?—1784?)字六圃,自号慈山居士。

士,嘉善(今属浙江)人。诸生,中年后绝意仕进,《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此书入选者百集,每集一家,已见《宋诗钞》者不收。始魏野《东观集》,终僧斯植《采芝集》。北宋十馀家,南宋八十馀家。存诗十首以下者不收。所采之集,当时均属僻书,抄本居多,于其讹误有所订正。曹氏论诗,“专主性情”(袁枚《随园诗话》),从真性情出发,选了不少有真情实感、艺术性较强的诗篇。其评诗亦往往卓有见地。如谓郭祥正诗“不特句调仿佛太白,其气、味竟自逼真”,言宋人所未言。又谓华岳诗“脱口豪纵,多破胆险句,锤炼处又极冶衍迢丽”,指出他的诗不同于江西诗派和江湖派。书中小传偶有讹误,如称《秋堂遗稿》撰者柴望为南宋高宗时人,实则南宋末人。本书刊于乾隆六年(1741),《自序》说二十八卷,实为十二卷。《四库全书》著录后,改为四十卷。有清乾隆曹氏二六堂刊本,作二十卷。(孔凡礼)

【千首宋人绝句】 宋诗选集。十卷。清严长明编选。严长明(1731—1787)字冬友,一字用晦,号道辅,又号智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曾受学于方苞,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南巡,长明以诸生献赋而得举人,授内阁中书,直军机处,官至内阁中书,参与修撰《一统志》、《通鉴辑览》、《热河志》、《平定准噶尔方略》,以父忧去官,后人毕沅幕。平生博学多闻,诗文辞赋、金石书画、天文历算、医学方技无不通晓。此集编于乾隆二十八年。全书选取宋人绝句千首:七绝六百八十六首,五绝二百一十六首,六绝九十八首,入选作者三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不到三首。选诗最多者为苏轼,凡四十六首,其次为王安石(二十八首)、黄庭坚(二十一首)、秦观(十六首)、陈与义(十一首)、范成大(二十四首)、杨万里(二十一首)、陆游(二十一首)、姜夔(二十二首)、刘克庄(二十四首),分配大体恰当。所选诗避熟就生,名家中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作品(如苏轼《题西林壁》)多不入选,重点选取不为大多读者所知的好诗。分体排列,先七绝、次五绝、后六绝,每体之中按帝王、后妃、宫掖、宗室、降王、降臣、宋臣、属国外臣、闺媛、释子、羽士、尼、无名子、神仙、鬼怪、妓女等分次,每类人按时代先后排列。此编之失,主要有四:一、排列失次,如林逋(967—1028)竟排在苏辙(1039—1112)之后。二、误署作者,如卷二所选曾巩《将行陪贰车观灯》,不见于曾集,而是晁补之作品,见《鸡肋集》。三、误署题目,如卷八徐铉《行园树》,误署为《题雷公井》。四、非绝句而入选,多是将七律、五律截割为绝句,如卷八苏轼《嘲子由》本为五律,此编割其前四句而为五绝。此书初刊于乾隆庚寅(1770),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另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由今人吴战垒注释、校订,名为《千首宋人绝句校注》。(王学泰)

【宋诗略】 宋诗选集。十八卷。清汪景龙、姚燮编选。汪景龙字弼青,姚燮字和伯,乾隆间嘉定(今属上海)人。全书选四百三十四人,诗一千一百九十一首。以人为主,按时代先后编次。景龙等以《宋艺圃集》有“五代金源诗厕其间,体例未合”,又以《宋诗钞》、《宋百家诗存》所收之诗,“未经抉择”(汪序),不便于读者,乃编选此集,在于对浩如烟海的宋人集“甄综而条贯”之,以为“学诗者之指南”。书名所谓“略”者,盖谓通过此选可了解有宋一代诗之风格流变之“大端”,“使天下后世考见宋人真诗”(王鸣盛序)。所选诸诗,间引古人评语,编选者评语亦偶杂其间;间有圈点。作者有小传,小传文字大体简明。其所“采录诸诗,务从善本”(凡例)。编选者用力颇勤。在宋诗众选本中,此选自有其特色。本书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原刊本。(孔凡礼)

【宋诗别裁集】 宋诗选集。原名《宋诗百一钞》。八卷。清张景星等编选。张景星字二铭,娄县(今属上海松江)人,约为雍正、乾隆间人,候补主事。景星等编选此书,意在“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以见宋诗宗派(傅王露《序》)。本书入选作者一百三十七人,计诗六百四十五首,包括了西昆体、江西诗派、江湖派。大家如苏轼,选六十三首;陆游,选五十四首。入选作品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然由于编选者强调“比兴深婉”、“官商协畅”(傅《序》),致使不少思想性、艺术性皆佳的作品未能入选。朱熹不甚以诗称,由于受到编选者的尊崇,其入选之诗,竟达二十首;而负有盛名的黄庭坚,入选仅十一首。是其不足处。此书编选者所加题注间有讹误,如卷一《芳仪怨》,注谓“事见陆游《避暑漫钞》”。按《避暑漫钞》乃明陆深辑,其所引之事,出元宋无《呻吟集》。此书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诵芬楼原刊本,1975年、1981年中华书局缩印诵芬楼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孔凡礼)

【宋诗精华录】 宋诗选集。四卷。近人陈衍编选。陈氏论诗,不争“唐宋之正闰”,认为宋诗、唐诗有着相似的重要地位,发展过程也很相似。陈氏按初、盛、中、晚分宋诗,以元丰、元祐以前西昆诸人及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初宋,录三十九家;尽北宋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为盛宋,录十八家;南渡曾几、陈与义、尤袤、萧立之、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为中宋,录三十二家;“永嘉四灵”以后及谢翱、郑思肖等为晚宋,录四十家。虽不无牵强,但有助于对宋诗发展过程的理解。陈氏力图反映宋诗各种风格。所选诗,既有“丝竹金

革”的“悠扬铿锵鞞鞞”，又有“土木之音”的“沉郁顿挫”，以达到“八音克谐”（自序）。本书选诗近七百首，入选诗在二十首以上的作者有梅、王、苏、黄、陈师道、陈与义、杨、陆、刘克庄。入选一首的作者五十六人。入选的诗，有很多是众口传诵的佳作。本书有193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8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库》曹旭点校本。（孔凡礼）

【月泉吟社诗】 宋诗总集。一卷。南宋吴渭编。吴渭字清翁，号潜斋，浦江（今属浙江）人。南宋末曾为义乌令，宋亡不仕，退居于家。“月泉”得名于月泉书院（浦江城北旧有月泉）。南宋诗社林立，为互相唱和，以文会友之所。宋亡后吴氏成立月泉吟社，邀请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二十三年（1286）春，诗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五言、七言律诗，次年正月得诗两千七百三十五首，选中二百八十名，为刻前六十名，诗七十四首，附摘句三十三联。每人均用假名，而寓真名于其下。诗皆以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藉以表现作者寄情田园，不与元代统治者合作的消极反抗心理和故国之思。风格以温厚和平为主，多用比兴手法。这种结社征诗的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此书的价值还在于它刊登宋代诗社的形制以及征诗时所列的社约、题意要求、誓诗坛文、诗评等章则，卷末附有赏格。据此可以想像南宋诗社活动情景。吴氏立社征诗目的还在于广泛联络遗民，结交社友，故入选之诗的作者也很相近。此书常见者有明毛晋所刊《诗词杂俎》本、清《粤雅堂丛书》本、《金华丛书》本。1984年浦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有复印本。（王学泰）

【宋人集】 诗文合集。二百九十一卷。近人李之鼎编纂。李之鼎，江西南城人，生活于清末民初。其《汇刊宋人集序》云：“夫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顾晁、陈所著录，宋《艺文志》所甄采，亡佚殆不可以数计。本朝四库著录仅存三百九十九种，其中尚多辑诸《永乐大典》者，存目更少传本。北宋距今不逾千载，南宋仅七百年尔，已毁弃摧残若是，再历时日，兵火频仍，不尽澌灭不止。鼎南城之散儒也，力薄愿宏，不自揣量，拟举两宋足本别集，凡本朝无刊本者，节衣缩食，力任校刊。自宣统辛亥（1911）以来梓成者已六十余种，倘炳烛馀光，尚能及远，当自甲乙丙丁编而及戊己递嬗成书，更有宋人已佚之集，如宋白、刘筠、陈瓘、富弼诸贤，无虑数十种，期以五年，遍加搜辑，拟编为闰集。又凡已刊宋集遗文佚诗，往往而有，从事搜讨，别刊补遗，欲使天水一代文献，不致坠失。区区向往微志，当代知言君子，或不遐弃。”从序中可见李氏编辑宋代遗集之宗旨与目的。全编共分甲乙丙丁四编。甲编收寇準、陈舜俞、金君卿、陶

弼、吴可、邓深、吴锡畴、柴望、释道璨、吴龙翰、何景福、李处权、裘万顷、徐经孙、张尧同、潘音、吕声之、吕定、宋伯仁、杨甲，凡二十人，别集凡二十一种；乙编收晏殊、贺铸、吴则礼、冯山、游九言、陈深、陈植、黄彦平、杨杰、陈与义、赵公豫、王镒、汪晫、汪梦斗、黄公度，凡十五人，别集十五种；丙编收李廌、祖无择、陈埭、包恢、释重显、倪朴、张玉娘、杨至质、利登、葛绍体、阮阅、许尚、陈岩、释希旦、詹初，凡十五人，别集凡十六种，并总集一种（无名氏辑《圣宋九僧诗》）；丁编收田锡、邵雍、黄庶、王楙、吴芾、许棐、刘辰翁、高似孙，凡八人，别集八种。所收多为三四流作者之别集，四编共收宋作者五十八人，别集六十种，总集一种，与民国十年辛酉（1921）编者自序中所云“梓成者已六十余种”不合，想必有未入此编者，另行于世。此编所据多为宋钞本、明影宋钞本或明精刊本，并用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后附校记。如丙编所收祖无择《龙学文集》十六卷，即据徐氏积学斋影宋钞本刊刻，并就文津阁“四库”本加以校正。每集之前收录《四库全书》有关之提要、别集原序，作者生平资料及一些考证资料，后附校记及李氏所作跋语。跋语中对于该集作者生平、文章业绩多有简单评价，并介绍该集之版本源流。编者还对该作者之遗文佚诗作了尽可能的补辑。如南宋郑清之《安晚堂诗集》只剩七卷，李氏据《江湖后集》补诗一百七十馀首，又辑诗七首、辑佚句四联，文若干篇。此集传世仅有四编，未能将戊、己诸编“递嬗成书”，更未能将“宋白、刘筠、陈瓘、富弼诸贤”之集重新校勘编刻行世，亦为一憾。《宋人集》有民国初年南城李氏宜秋馆刊本。（王学泰）

【中州集】 金代诗歌总集。十卷。金末元好问编纂。卷首录金显宗、章宗诗三首，末附《中州乐府》一卷，辑入金人词作。题名“中州”，以金朝据有中原，南宋为偏安一隅之意。诗集辑金代已故作家二百五十一家，诗二千零六十六首。其作品和有关材料的来源，一是编者自己的记忆和搜辑所得，二是借用同时代魏元道和商平叔编集的《国朝百家诗》稿本。先完成一至七卷，按时代先后为序。后面的八至十卷实为续编。第八卷卷首旁注“别起”可证。第九卷从刘豫开始又分类别立“诸相”、“状元”、“异人”、“隐德”、“知己”、“南冠”、“附见”诸名目，可知体例尚未统一。前列作家小传，介绍其生平和创作，并有元好问与当代人物的评论。如卷三《赵秉文传》，评曰：“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以他文较之，或不近也。”保存了元好问《论诗》绝句以外的诗歌批评。又如卷

六《王若虚传》，称其“博学强记，诵古诗至万馀首”，“善持论……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若虚字）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又如卷一《蔡珪传》说：国初文士“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继承北宋馀绪”，只能算“宋儒”，而“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谿（怀英）次之，礼部闲文公（赵秉文）又次之”。勾勒了金代前期文学的粗略轮廓。元好问编纂此书，目的之一在“以诗存史”，故撰写作者小传常旁搜博采，举凡金代朝章国故，文化风俗莫不悉心记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为“旁见侧出，不主一格”。元人脱脱修纂《金史》颇得力于是书。全书脱稿后不久，即有刻本问世。今见为《四部丛刊》缩印童氏影元本，明毛晋汲古阁本（亦标为《初刻中州集》），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各本排印出版。

（卢兴基）

【全金诗】金代诗歌总集。全名为《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七十二卷。清康熙年间郭元釭奉敕在元好问《中州集》基础上增补而成。首载康熙五十年（1711）御序。郭元釭字于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参加过《佩文韵府》等书的修纂。《中州集》纂成于金元战乱时期，搜辑不全，兼之不录存世者之作，连元好问本人也不在内。《全金诗》作了尽可能的增补，上自元好问、刘祁等名家别集，下至散在各种文献资料中的一诗一歌，都搜求无遗。诗人从二百五十一家增至三百五十八家，诗从两千零六十六首增至五千五百四十四首。有目无诗者不在此数。增补之作尽量注明出处。并按旧例补撰小传。此集可贵之处是增辑大量的史料，分别附于小传之后，或作品之末。这些史料涉及面广，有诗人生平、创作评论，也有金代社会史料，多来源于如刘祁《归潜志》，元修《金史》，及宋金以来文献史料、稗传别集等。如卷二十九之李经（天因），收诗仅五首，评价却颇高。除保留原《中州集》小传外，另补《归潜志》一条，评之曰：“真今世太白也……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又附赵秉文《答李天因书》，称为“天才英逸，不假绳削……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增补材料，大都与金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及人文风俗有关。如卷二十二孙九鼎下，附《三朝北盟会编》、《金图经》、《松漠纪闻》及《中兴纪事本末》资料各一则，搜集了金代科举考试制度及其沿革的记述，有助于金代科举制研究。此书卷首为“帝藻”、“公族”、“金源”，卷一、二为“诸相”，卷三为“状元”，卷四为“宋耆旧”，卷五、六、七为高官显贵，卷八至十四为“大家”二人（党怀英与赵秉文），卷十五至二十一为“名家”十二人，（蔡珪、刘仲伊、王若虚、麻九畴等），

卷二十二至五十二为“诸家”（包括李俊民等），卷五十三为“异人隐逸”，卷五十四至五十九为“河汾诸老”，卷六十、六十一为“道释”，卷六十二为“讌会”、“名媛”、“仙鬼”、“谣谚”等，卷六十三至七十二为“遗献二人”，录元好问、刘祁二人诗（刘只存诗八首）。此编重出、漏辑现象严重，其编次不伦不类。有清康熙内府刊本及扬州书局本。（卢兴基）

【河汾诸老集】金末元初诗歌总诗。八卷。元房祺编纂。房祺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任河中、大同两路儒学教授，著有《横汾集》。房氏编此书意在保留战后乡邦文献，书中收入金末元初生活在汾河流域八位诗人——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诗，人名一卷，共录诗一百九十八首。这些作品大多产生于金元之际。此时民族矛盾尖锐，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八位作者都是金朝遗民，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亡国之痛，表现了对战乱的厌倦，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八人之风格各不相同，如房氏在《后序》中所言：“夫诸老之诗有深而冲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刘宾客者，有轻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对属切当如许浑者，有骚雅奥义、古风大章，浸入杜草堂之域者。”虽然评价过高，但也表述出他们之间风格的区别。此集编于大德七年（1303），与元好问《中州集》相接。全金之诗有《中州集》与此二书，再加上元好问个人诗集可谓大体已备。此集初刊于元皇庆癸丑（1313），已佚，最早有毛晋“汲古阁”《诗词杂俎》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此排印出版。（王学泰）

【元文类】元诗文总集。共七十卷，其中诗八卷，文六十二卷。元苏天爵编纂。苏天爵（1294—1352）字伯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先世咸以儒名。由国子学生试第一，授从仕郎，历任翰林修撰。为南行台御史，终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此书编于元统二年（1334）。自《唐文粹》、《宋文鉴》出，历代编纂代表时代成就之诗文已为统治者所提倡，因之当时翰林院报请印刻此书之奏文时云：“惟一代之兴，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虽出于众手，而纂述当备于一家，……国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苏氏历时近二十年，搜集宏富。如陈旅《序》云：“百年文物精英尽在此矣，然所取者必有系于政治，有裨于世教；或取其雅制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莫取。”可见编者之编选准则及纂辑目的。在选诗中亦多取社会内容较为丰富之篇章。元初刘因等慨叹宋、金覆亡的诗章均能入选。《元文类》之编纂下距元亡尚有三十馀年，不能反映元代诗文创制之全貌，并且遗漏了元初叶、中叶许多重要的诗文作家。如耶律楚材、邓牧、方回、戴表元、刘将孙、王恽

等,竟无一字入选。此书最初刻于至元间西湖书院,中有脱漏,至正元年(1341)建安刘氏翠岩精舍依此本重刻,现存于世,称“元小字本”。至正二年西湖书院对原刻本加以补苴,重新刊刻,现存于世。常见者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四部丛刊》本,该本影印元至正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

(王学泰)

【圭塘欵乃集】 元诗词总集二卷。元许有壬等撰。此乃许有壬与其弟有孚、子许桢及其宾客马熙唱和诗词集。至正八年(1348)有壬致仕归乡后购得相城之西康氏废园,凿池塘如圭,并加修葺,便成园林,名曰圭塘。有壬日携宾客子弟觞咏其间;一草一木,品题殆遍,积成巨帙,故名其第曰“欵乃”,取渔歌互答之意,亦谦词也。得诗古律五七言二百一十九首,乐府六十六,中惟乐府十解为宾客马熙所作,其他皆有壬、有孚、许桢所作。既而许桢至京师,以其本示马熙,熙取而尽和之,凡诗七十八首,词八首,别题曰《圭塘补和》,附于后。四库馆臣以为“其诗虽多一时适兴之什,不必尽刻意求工。而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其风流文雅之盛,犹有可以想见者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集当初未曾刊刻,向以抄本流传。清代迭经曹溶、吴焯、鲍廷博等人收藏,后收入《四库全书》,嘉庆间吴省兰刊《艺海珠尘》亦收此书。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艺海珠尘》本。

(王学泰)

【天下同文集】 元诗文总集。原编五十卷,现存四十四卷。元周南瑞辑。周南瑞字敬修,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乡贡进士,自称为宋大儒周敦颐之后。此编意在广泛搜罗元代诗词古文,此仅为甲集,目录之后标有“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九字,实际仅此一编而已,“陆续刊行”云云,亦为促销之手段而已。《四库全书》缺十七、十八、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等六卷。此编卷一为制诰,卷二为表笺,卷三为献书,卷四为歌颂,卷五至卷八为记,卷九至卷一一为碑,卷一二至卷一五为序,卷一六为赋,卷一七为论,卷一八为传,卷一九至卷二一为书,卷二二为启,卷二三为牒,卷二四为状,卷二五为议,卷二六至卷二七为说,卷二八至卷二九为赞,卷三〇为颂,卷三一为箴,卷三二为铭,卷三三为题跋,卷三四为祝文,卷三五至卷三六为祭文,卷三七为辞,卷三八至卷四〇为墓志铭,卷四一为杂著,卷四二至卷四七为诗,卷四八至卷五〇为词。此集可能为书商射利而编,故其分类体例皆极庸陋,刊刻纸墨皆劣。有元麻沙版本,前有刘将孙序。明清两代主要以抄本流传。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皇元风雅】 元诗总集。或名《元风雅》。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元傅习采集,孙存吾编次。傅习

字说卿,清江(今属江西清江)人。孙存吾字如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习仕履不详,存吾曾为儒学正。此编以存诗坛全貌为原则,搜罗面较宽,并有意识广征来稿。“后集”目录后有牌记云:“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启。”由此可知,傅、孙二人系与书商合作以成此编。此集与元人蒋易所编纂之《元风雅》名称相同,又皆以刘因开篇,二书又皆有虞集序,故后世读书多混淆。其实二书区别很大,傅、孙所编《皇元风雅》收录诗人二百八十人,而蒋易所编《国朝风雅》只收录一百余人,而前者所录诗篇数仅蒋书之半。另外傅习、孙存吾多收录江西人作品(可能因与编者同里而易于采摭),江西诗人多近宋体,而蒋书所录之诗却近于唐音。《皇元风雅》因为是随得随录,无一定体例,比较杂乱,有些竟是一人两出,但其中多采不见经传之作者诗篇,许多元诗亦赖此以传。此编由于是随得随刊,其分卷亦大不相同,此前后集皆十二卷为卷帙最繁之本,为《四库全书》所著录。另有前后集均作五卷之元刊残本传世,亦有前后集皆作六卷之本,目录后有古杭勤德书堂识语,此本已收入商务印书馆民国间所编《四部丛刊》。还有前集六卷、后集四卷之明初刊本传世。

(王学泰)

【敦交集】 元诗总集。一卷,元魏仲远编。魏仲远名延寿,字仲远,号竹深,以字行,上虞(今属浙江)人。生活于元末,隐居不仕,与高明、王冕、张翥等名人交好。此编录诗七十六首,作者二十六人,所录之诗多为称赞魏氏之为人与赞美其隐居之地——福源精舍而作。此书似未曾刊刻,向以抄本流传。清之抄本自朱彝尊曝书亭流出。乾隆三十八年(1773),鲍廷博又传录曝书亭本,并校一过。近人罗振玉将其收入《元人选元诗》。有民国四年(1915)连平双鱼堂范氏刊本。

(王学泰)

【伟观集】 元诗总集,一卷。编者不详。此编收录元末文人题董旭所画《长江伟观图》诗三十余首,包括董旭本人五言古诗一首,其他为许德彝、唐元寿等二十余人所作。最后为明人金柔之题诗及识语,语云:“此卷原附于《敦交集》后,皆元人所作,并录之。”时在明永乐十年(1412)。近人罗振玉亦将此编随《敦交集》一并收入《元人选元诗》。有民国四年(1915)连平双鱼堂范氏之影印本行世。

【金兰集】 元诗文总集。三卷,附录一卷。明徐达佐编纂。徐达佐(?—1373)字良夫,自号耕渔子,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元末,达佐知天下必乱,尽推田园以贍同族,遁入邓尉山以隐,并筑耕渔轩自居。

明洪武初以荐为建宁训导。元末吴中好客之文士有三：一为昆山顾瑛，一为无锡倪瓒，一为平江徐达佐。徐氏高隐山中，一时文士往还唱酬，颇多题咏。徐氏辑二十年友朋往来之诗文为一编，题曰“金兰”，取义《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意为所收皆为至好亲朋之作。附录一卷则为达佐兄子徐济出守邵武及归田后与朋友唱和之诗。《金兰集》初编于元至正末，现传世之旧钞本四卷，前有至正二十二年(1362)王行序及至正二十五年僧人道衍序。此四卷本较三卷本少录诗一百四十六首、文九篇。四卷本于入录诗人皆注明乡贯字号，三卷本皆无。此编初刊于洪武乙卯(1375)，后久未刊刻。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有达佐后裔徐坚泚溪草堂本。此本还附徐达佐著《耕渔轩遗书》一卷。近人傅增湘曾取此刊本与清初写本相校，发现两本次第不同，字句差异极大，文义以清初写本为优。

(王学泰)

【元音遗响】元诗合集。十卷。元胡布、张达、刘绍撰。胡、张皆元之遗民。胡布字子申，盱江(今江西东部抚河一带)人，生活于元末，曾客闽中，为其帅参谋军事，出使海外，元亡隐居。明太祖征之，不就，被放之荒蛮，不久得释。张达字充秀，盱江人，生平不详。刘绍字子宪，为明人，曾为翰林应奉。此编录胡布诗八卷，张达、刘绍诗各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三人皆元之遗民。”刘绍不应视作遗民。《提要》又云：“他书罕称其诗者，且亦罕称其人者。”亦不确，明胡应麟颇称赞其诗，特别赞美其五言绝句。胡布集又名《崆峒樵音》，全书总题曰《元音遗响》。此编一直以抄本流传。清杨以增海源阁藏明宣德间抄本，与四库本迥异。胡、张二集分上下两卷，又名《崆峒樵音》，后二卷为刘绍诗，总题曰《元音遗响》。此编有数个抄本在藏书家间流传，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大雅集】元诗总集。八卷。元赖良编纂。赖良字善卿，天台(今属浙江)人，仕履不详。此书为赖氏经三十年广泛搜集，采得江南江北诗人古近体诗两千馀首。其采选原则是“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词丽而不淫”，并且要有“关于世教”。当时著名诗人杨维桢为之删节，只保存三百首。杨氏序中说“此书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是不确切的。其中杨基是蜀人，张瑄是陈留人。也有一些是元末名家如倪瓒、张翥、冯子振、顾瑛等。书中所谓杨维桢之评点，也是徒具虚文，因为有评语处不到一卷；故书中提到杨氏之处(包括序和评)可能为书贾伪托，藉以招徕读者。此书前四卷为古体，后四卷为近体，入

选之诗作以元诗水平衡量，质量较高。入选者亦以小家为多，后为《元诗选癸集》所收。此书初刻于元末至正壬寅(1362)，赖之友人卢仲庄亲自手写刻版，中经战乱，终于刻讫以传。但元以后刊本湮没无闻，藏书家所收亦多为抄本。民国四年乙卯(1915)连平范氏双鱼堂影刻“艺风堂”所藏洪武刊本，收入《元人选元诗》。但此本谬误脱漏颇多，近人傅增湘依清初曹溶写本增补八百七十五字，其中包括补诗一首、赖良自跋以及卷七之缺页。

(王学泰)

【国朝风雅】元诗总集。或名《元风雅》。三十卷。元蒋易編集。蒋易字师文，建阳(今属福建)人，生平仕履不详。从此集留下的一些跋语来看，蒋氏可能如南宋陈起、陈思、陈续芸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并与江湖文人来往甚多之书店老板，刻印此书有为声闻不彰诗人立名传世之意。编者自序中言其选录标准：“择其温柔敦厚、雄深典丽，足以歌太平之盛；或意思闲适、辞旨冲淡，足以消融贪鄙之心；或风刺怨谤而不过于谑；或清新俊逸而不流于靡，可以兴、可以戒者，然后存之。”全书收录诗人凡一百五十五人(一本作一百六十人)，首取刘因之作，后以《黄金台》压卷。前十卷收录“诸贤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考”者之作品；十一卷以后皆为“诸君子布在中外”者之诗章，最后三卷为杂编。集中选文天祥、谢枋得及金代元好问诗，亦足反映编者的思想倾向。所选诸诗不乏具有社会内容者，如李存《流民诗》、王东《暹罗回使歌》、杜仲高《读文山诗》等。每位作者之后著录其生平事实，足资考证。此书编于元统、至元(1333—1340)年间，蒋氏跋语言及元统二年(1334)彭元亮自北方归来，许多诗人曾赠之以诗；另一处跋语标明为至元四年(1338)。三十卷本有阮氏所辑委宛山房本。另有十卷残本，此本前七卷，收诗人二十八家。最后三卷跋云：“是编采江湖之所传而不睹其全者，故题曰‘风雅杂编’云。”此本有《元人选元诗》本，为范氏双鱼堂据“唐风楼”所藏元刊本影印。

(王学泰)

【草堂雅集】元诗总集。亦名《玉山草堂雅集》。十八卷。元顾瑛编纂。顾瑛与当时著名诗人张翥、杨维桢、陈基、李孝光、倪瓒、柯九思、释自恢等人交好。江南文人墨客常在顾氏之“玉山草堂”诗酒唱酬。草堂在江苏昆山界溪之上绰墩，其园池、亭榭、饴馆、服玩、声妓之盛，甲于江南。顾瑛在此以文会友，赏鉴古书古画、摩挲彝鼎秘玩，形诸诗歌，著于此集，共录诗三千三百六十九首，作者八十人。这些作者多为顾氏挚友，有些就寄居于顾家。其所采摭均为第一手材料，极为可靠。编者随得随编随刻，第一卷、第二卷均有后卷。入录作者名下为小传，有些仅

存字号、里居,不及文章行谊,不事标榜。入选之诗以流连光景、诗酒唱和之作为主。反映元末战乱和农民运动的诗章很少,但元末重要诗人几尽于此。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于元末部分多采此书。此集有《四库全书》本,十三卷,收录作者仅七十人,起自陈基至释自恢,世称“俗本”。另有元末刻本与徐氏抄本。元末刻本标为十三卷;但卷一有后集二卷,卷二、九、一二各有后集一卷,总数为十八卷,如自柯九思,终于释自恢,凡七十四人,录诗二千九百四十五首,世称“善本”。徐抄本收录八十人,始自柯九思,释自恢后又增释楚石,录诗三千三百六十九首。还有十六卷本、十七卷本等。此书之所以版本歧异较大,可能由于顾代并非一次刻完此编,有所得则陆续增加,故有各种版本传世。民国间陶湘以徐抄本为底本,并用贵池刘氏所藏元刊本和顾嗣立《元诗选》中有关部分互校,影印出版。后附刘氏本及各家题跋和各本目录比较表,写刻均佳。(王学泰)

【**玉山名胜集**】元诗总集。八卷,外集一卷。元顾瑛编纂。“玉山”乃顾氏别墅玉山草堂之省称,其园林池馆之胜甲于东南,顾瑛又极好客,一时文士名流多从之游宴。此编乃顾氏取当时诸贤俊题咏玉山诸作,以地为纲,取类相从,殿以自作。四库本之题咏次序为玉山堂、玉山佳处、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读书舍、可诗斋、听雪斋、白云海、来龟轩、雪巢、春草池、绿池亭、绛雪亭、浣华馆、柳塘春、渔庄、书画舫、春晖楼、秋华亭、淡香亭、君子亭、钓月轩、拜石坛、寒翠所、芝云堂、金粟影。“每一地先载其题额之人,次载瑛所自作春题,而以序记诗词之类各分系其后。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谿。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实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编有多种写本与刊本,卷帙、编排、文字均有差异。如《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所著录《玉山名胜集》皆作二卷,一原始写本为元末诗人张翥所存,一为明初抄本。另有明弘治间刊本作四卷,明万历间刊本作六卷。此八卷并外集一卷本乃明末天启间徐韶翁刊于广东者,张萱为之校勘。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玉山纪游**】元诗总集。一卷。明袁华编纂。元末至正间文坛名流,如杨维桢、陈基、郑元祐、郑韶、沈明远、于立夫、张渥、瞿智、周砥、释良琦、陆仁、顾佐、冯郁、王濡之以及袁华等,皆客居玉山草堂主人顾瑛家,日夕游宴唱和,积而成帙,由袁氏編集。所

游自昆山外,还包括天平山、灵岩山、虎丘、西湖、吴江、锡山、上方山、观音山等地。所以总题“玉山”者,因为“游非一人,而瑛为之主;游非一地,而往来聚会悉归玉山堂也。每游必有诗,每诗必有小序,以志岁月”。集中所收作品虽不如《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宏富,“而山水清音,琴樽佳兴,一时文采风流,千载下尚如将见之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编向以抄本流传。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四库全书本丛书初集》本。(王学泰)

【**乾坤清气集**】元诗总集。十四卷。明偶桓编纂。偶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眇一目,以号瞎牛,太仓(今属江苏)人,曾受知于元末著名诗人倪瓒,明洪武(1368—1398)中官荆门吏目。此书所选上起宋金之末,下至明初,分体编排,共七百六十八首,独缺七言近体,可能是残本。书中辑录之诗多为抒写闲情逸致、应酬赠答、行旅游览以及与释道往来之作,风格以恬淡清新为主,但有的流于纤巧,基本上反映了元诗的面貌。编者在元初尚可以看到元人诗集原刻或作者手录,因而书中入选诗篇或为诗人本集所不载,或字句与集中所载有异,可资参考。近人傅增湘评此集曰:“此偶桓所编,甄采殊为矜慎。朱竹垞称其‘别开生面’。余谓观其命名即可知其旨趣之所在。能力矫元季秣縻之风矣。此书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皆所不载,朱竹垞始称道及之,诸家写本皆自潜采堂传出。本书无序跋,其流传端绪,有无刻本,皆不可知。”(《藏园群书题记》)此书向以抄本流传,《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为十四卷,傅氏所得写本为清康熙时朱彝尊之潜采堂所抄,作十五卷,亦缺七律七绝,第十五卷为六言诗与五言排律,常见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元音**】元诗总集。十二卷,补遗一卷。明孙原理采辑,陈盦凝编选。孙、陈均为元末明初人。孙原理生平不详,陈盦凝曾为福建古田县令。编选者经历元末明初大动乱,深感有总结元朝覆亡教训的必要,其序云“观诗可知元之盛衰”,因此采辑选录元诗“镂板传之天下后世,使观诗者知元之世运”。全书共收元代诗人一百六十七家,大体详于元末略于元初,从刘因开始,终于龙从云。元初杨载、范梈、虞集等大家选诗最多,末附无名氏诗十一首。书中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较多,如《节妇吟》、《去妇吟》、《妾薄命》、《李官人琵琶诗》等。每位诗人有生平简介。此书编讫于洪武间,有洪武十七年(1384)乌斯道序。初为定海丞张中达所刊。传世明建文二年(1400)刊本当即张氏刻本。近人董康以此本和诸家专集、选本及明抄本《元音》互相订补,校改三百餘处。民国年间有诵芬室影印建文本。(王学泰)

【元诗体要】元诗总集。十四卷。明宋绪编纂。宋绪字公传,以字行,余姚(今属浙江)人。笃学有志操,永乐(1403—1424)间,与仲文同被征修《永乐大典》,书成授官,绪独辞谢,帝嘉其恬退,许之。此书分三十六体编排,有:四言、骚、选、乐府、柏梁、五言古、七言古、长短句、杂古、言、词、歌、行、操、曲、吟、叹、怨、引、谣、咏、篇、禽言、香奁、阴何、联句、集句、无题、咏物、五言律、七言律、五言长律、五言绝、六言绝、七言绝、拗体。分类之法颇为不伦,有的按体制区别,如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有的按内容区别,如香奁、禽言、咏物,有的按风格区别,如选(指文选体)、阴何(阴铿、何逊)等。各体之前仿方回《瀛奎律髓》各拟小序,说明此类特点和包括的内容。所选作品不乏名篇佳作,亦有唐人之作误入,此本初刊于宣德八年(1433),正德己卯(1519)辽藩朱宠重刊,《四库全书》即据正德本著录,中有缺页。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元艺圃集】元诗总集。四卷。明李裘编选。李氏曾编选《宋艺圃集》,此编乃其续编,其编纂目的亦在于“见一代之文献”。全编共收录元代诗人一百一十八人,诗六百二十五首,颇具鉴裁,然缺失亦颇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此编“自序称地僻少书籍,无以尽括一代之所长。今观所录,有虞集、范梈、揭傒斯,而无杨载,即一代名人号为‘四家’者,已阙其一。是漏略诚所不免。又刘辰翁乃宋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乃金人,僧来复乃明人,一例载入,颇失断限。其编次则倪瓒、宋无、余阙等皆元末人而名在最前,戴表元、白珣等皆元初人而名在最后。其他亦多先后颠倒,颇无伦序,似亦随见随钞,未经勘定之本”。可见其所收录及编排多有未妥之处。但由于编者自具法眼,去取之间,颇为不苟,因此四库馆臣认为此书“以云备一代之诗,诚为不足,以云鉴别,则较之泛滥旁收、务盈卷帙者精审多矣”。有明万历十年(1582)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元人十种诗】元诗合集。五十九卷,附录二卷。明毛晋编纂。有明一代注重唐诗,元诗集至明末流传已稀,毛晋汲古阁所藏多历代珍本,集元代有代表性几位诗人十种诗集合而刊之,大体上颇能反映元代中叶、末叶诗歌创作之成就。包括:一、元好问《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二、萨都刺《萨天锡诗集》三卷,《集外诗》一卷。三、迺贤《金台集》二卷。四、宋无《翠寒集》一卷,《吟吃集》一卷。五、倪瓒《倪雲林先生诗集》六卷,《集外诗》一卷,《附录》一卷。六、陶宗仪《南村诗集》四卷。七、顾瑛《玉山草堂集》二卷,《集外诗》一卷。八、张雨《句曲外史集》三卷,《补遗》

三卷,《集外诗》一卷,《附录》一卷。九、马臻《霞外诗集》十卷。此编所据有些为元刊本。如《金台集》、《翠寒集》、《玉山草堂集》等,有些并作了增辑,如倪瓒、顾瑛、张雨等人诗集较原刊之集更为完善。此编初刊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清初汲古阁版片尚存,多次刷印,并有所增补。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据汲古阁本影印。(王学泰)

【元诗选】元诗总集。一百一十卷。清顾嗣立编纂。顾嗣立(1669—1722)字侠君,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顾性嗜书,康熙南巡时,顾进所编《元诗选》,颇获赞赏。康熙再度南巡时,顾以宋荦荐召试行在,被选至京师编纂《皇舆全览》等书。康熙五十一年(171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知县,因病乞归。全书分为三集,初集六十八卷,二集二十六卷,三集十六卷。每集中又分十集按天干次序排列,从甲集至壬集(二集、三集独缺丁集)。专收有专集之作者。初集起自元好问,收元好问以下一百家。二集起自段克己、成己兄弟,收段克己以下一百家。三集起自麻革,收麻革以下一百家。按编者之意二集、三集从甲至壬各集要按次序插入与初集相对应的各集(如二集甲、三集甲插入初集之甲集后),这样全书大体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编者另拟癸集收录零章断什、不成卷帙之作,因病逝,癸集并未完成,只刻了部分版片,留下部分手稿(约有十七卷)。此书卷首为帝王之作,各文士之卷皆存其原集之名(《四库全书》收《元诗选》,每集只收作者之名,不存集名,并去掉原来的天干序列。这样,二集、三集俱各独立,难以插入初集)。各家俱附小传,并有评语,对于诗人生平经历搜集考订,多有创获,评论诗人得失亦多中肯綮。全编收罗宏富,蔚为大观,为编纂《全元诗》奠定基础。历来论者多从“选”之角度对此书论短说长,如翁方纲云:“顾秀野《元百家诗》体裁洁净,胜于吴孟举《宋诗选》远矣,犹嫌未尽审别雅俗耳。如关系史事及可备考证者,自不应概以文词工拙相绳。若其言怀叙景之作,自当就各家各体,从其所长,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华,岂必一例编载,陈陈相因哉”(见《石洲诗话》卷五)实际此编之成就首先在于“一例编载”,其缺失亦在于未能“一例全载”。顾氏自称编此书采元集四百余种,有所去取,不能尽存元人别集之全貌。后《四库全书》著录元别集仅一百六十九家,加上存目亦仅二百有馀,从此可见顾氏此书之价值。此书初集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集刊于康熙四十一年,三集刊于康熙五十九年,皆为顾氏秀野草堂刻本。中华书局1985年据秀野草堂本标点排印出版,仍分为初、二、三集。(王学泰)

【元诗选癸集】元诗总集。十六卷。清席世臣编

纂。席世臣字邻哉,青浦(今属上海)人。乾隆间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分校《三分书》(《三国志》)成,受到嘉奖,乾隆五十一年(1786)钦赐举人。席世臣与编纂《元诗选》的顾嗣立为中表亲。顾病歿之后,席收集已刻好的癸集版片和零散残稿,修订整理,编成此书。全书按天干分为十集,从戊集以下均分上下。从甲集到壬集与《元诗选》有对应关系。癸集上为“香奁”、“乐章”等杂类,癸集下为席氏收辑的元代无集诗人的作品。十集共收二千二百多人(席氏所补有二百五十余人)。此书最有价值部分在于诗人小传,引证详博,许多为现在不易见到的资料,对于元诗研究有很大帮助。癸集再加上《元诗选》初、二、三集构成了全元诗的基本骨架,为编《全元诗》奠定了基础。癸集初刻时名《元诗选》四集,有嘉庆间席氏扫叶山房刊本,版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战火。席氏曾孙素威重新整理,再加补葺,于光绪十四年(1888)再版,名曰《元诗选癸集》。(王学泰)

【元诗选】元诗选本。六卷,补遗一卷。清顾奎光编选。顾奎光字星五,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五年(1750)进士,曾官知县,博学多才,诗古文俱有名于时。顾奎光认为元诗成就不高,但“其佳者则婉转悱恻,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丽,虑周而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认为顾嗣立之《元诗选》“意在广收,未遑持择”,宋、明诗皆有选本,而金、元独少,因此编选此书录元朝一代诗作。起自元文宗、李俊民、刘因,终于和尚行端,共收一百九十馀家。以选小诗为主,也选了一些带有史诗性的长诗。书前附有作者简略生平,间有对元诗长处、特点的评论、品藻,并与宋诗作比较,颇多启发性意见。他指出“宋、明运祚长,故一代屡变”,元朝祚短,则不及变而止。元诗人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在纤秾繁缛。他还认为元人中最劣者为揭傒斯,最俗者为黄公绍,最拙稚者为刘清叟、王义山等。有清乾隆间刻本。

(王学泰)

【元诗别裁】元诗选本。又名《元诗百一钞》。八卷,附补遗一卷。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琪编选。此书共选诗六百一十九首,作者一百五十二人,分体编排。元诗就其整体来说,成就不高,此书所选颇能反映元诗概貌和元诗发展变化的情况,其中一些作品表现了在异族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的苦闷。由于编选者推崇理学,理学家的诗和用诗以说明儒道的作品选得略多。此书有中华书局1975年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藜阁刊本缩版影印本,另有商务印书馆据《国学基本丛书》版重印本。(王学泰)

【元人选元诗】元诗总集。二十八卷。近人罗振

玉编纂。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学部参事。对金文、甲骨文颇有研究。此书共收元人选元诗五种,包括:一、《河汾诸老诗集》八卷(胶州柯氏藏元刊本),二、《国朝风雅》七卷《杂编》(唐风楼藏元刊本),三、《大雅集》八卷(艺风堂藏影洪武刊本),四、《敦交集》一卷(艺风堂藏旧抄本),五、《伟观集》一卷(艺风堂藏旧抄本)。两种元刊和一种明初刊本写刻极精。此编俱是影印,因此原刊面貌保存较为完整。有民国四年(1915)连平双鱼堂范氏刊本。(王学泰)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元诗文合集。二十六种。今人王德毅编纂。1949年后元明许多诗文别集善本从大陆被带往台湾。王氏曾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后将所用诗文别集中之珍本二十六种合为一编,缩小影印,由台湾新文丰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包括:一、李庭《寓庵集》,二、刘秉忠《刘太傅藏春集》,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四、阎复《静轩集》,五、吴澄《吴文正集》,六、胡炳文《云峰集》,七、陈栌《陈定宇先生文集》,八、陆文圭《墙东类稿》,九、刘诜《桂隐先生集》,十、元明善《清河集》,十一、安熙《默庵先生全集》,十二、虞集《道园类稿》,十三、索鲁《菊潭集》,十四、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十五、许有壬《至正集》,十六、危素《危太朴集》,十七、梁寅《梁石门集》,十八、华幼武《黄杨集》,十九、沈梦麟《花溪集》,二十、吴海《闻过斋集》,二十一、陈高《不系舟渔集》,二十二、赵偕《赵宝峰集》,二十三、黄镇成《秋声集》,二十四、李道纯《清庵先生中和集》,二十五、韩奕《韩山人诗集》,二十六、陈泰《所安遗集》。

(王学泰)

【沧海遗珠】明诗总集。四卷。明沐昂编纂。沐昂字景高,定远(今属安徽)人。黔宁王沐英之子,初为厢军左卫指挥僉事,永乐中擢都指挥同知,正统初代兄子沐斌镇守云南。卒赠定边伯,谥武襄,有《素轩集》。此书编选明朝初年贬居云南仕绅如朱经、方行、朱琳、曾烜、周昉、韩宜可、杨宗彝等二十人诗作三百馀首。入选作者名下各注其字号里居,以明其所自。所选作品多为留连风景、感事抒怀以及题画之作,其风格也以和平婉丽、清新畅达为主。沐氏世为边庭武将,推行教化、赞武右文,颇有功于边疆,沐昂编此书亦为一例。此书去取精审,入选之诗以文采斐然之作为多。朱经等二十人皆无专集行于世,其诗作赖此集以传。云南地处边疆,自古以来文风不盛,诗人极少,自此书行世之后,风雅渐开。故编云南诗者自明初始。此编名曰“遗珠”,取义于补明初诸诗选,如刘仔肩《雅颂正音》等书所遗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

者,惟此一集而已。”此书刊本罕见。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雅颂正音】 明初诗总集。五卷。明刘仔肩编选。刘仔肩字汝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武三年(1370)因荐召至京师,在京期间多与当时公卿名士往来,互相倡和,遂选一时名士公卿诗编为此集。全书共收作者五十余人,有宋濂、张孟兼二序。宋序云:“‘雅’则燕饔会朝之乐歌,‘颂’则美盛德、告成功于神明者也。”书中所选以这两类作品为主,有些颇能反映明王朝开国气象,如宋濂之《平江汉颂》等。但大多作品如《大祀》、《大飨》等诗味甚少。有些作品似词似曲(如孟昉作品),不仅有悖于体例,而且也使得此选格调不高。另外,书中附有编者自己的许多作品,入选诗中赠酬刘仔肩的作品也有不少,颇多吹捧之辞,如陶敬《赠刘汝弼赴京》。故知刘氏编选此集大有自我标榜之嫌。所选他人之作,每人仅寥寥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盖是时诸人之集,皆未成编,随得随录,故未能赅备。然明初诸家今无专集行世者,颇借以略存梗概。其时武功初定,文治方兴,仔肩拟‘雅颂’,固未免溢美,要其春容谐婉,雍雍乎开国之音,存之亦足以见明初之风气也。”此书初刊于洪武初年,已不传,有明弘治刊本传世。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明诗正声】 明诗选集。十八卷。明穆光胤编选。穆光胤字仲裕,漆园(今山东曹县)人,仕履不详。穆氏论诗一遵高棅论诗主张,尤其佩服所编之《唐诗品汇》,认为此书“尽一代之风雅,归一人之矩矱”,因此他立志仿照《品汇》的缩编本《唐诗正声》,“妄取昭代诸名家集,自洪(武)、永(乐)而下,隆(庆)、万(历)而上,其间名已著而人以仙游者稍为次第”(见自序)。编者强调的“正声”,多指格调声律的雅正,亦即自序所云:“五音迭奏,洪律不奸,而后可谓之正”,“声出金石,调和律度,无非同归于正者”。并将声韵律度合乎之正者神秘化,认为它可以“节八风成万物,动风云而致鳞羽”。这比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反复强调的音节、声调和其所构成的格调律度说又进了一步。本乎此,于是“一切促节繁响,淫声哇韵,俱屏而不用”。那些在描写技巧上有显著成绩,学识宏富,才能卓著者,只要不轨于“正”则一概不收。全书共选诗一千一百余首,作者一百二十人,虽说还是以二李(梦阳、攀龙),何、王(何景明、王世贞)为主,但入选面还是很广。正如商周祚在《序》中所说:“朝不数人,人不数首,而诸人之丰神,累朝之风气,并见互形。”颇能代表初明及盛明诗歌创作成就,在明诗选本中是较好的。有日本享保乙巳

(1725)年奎文馆刻本,书中标陈眉公(继儒)批点,实际并无批评品藻文字,只有一些圈点。此亦书商招徕顾客之惯用伎俩。(王学泰)

【盛明百家诗】 明诗总集。三百卷。明俞宪编纂。俞宪字汝成,无锡(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刑部侍郎,官至湖广按察使,有政绩,后乞归。此书分为前编、后编,共收录明初至明中叶诗人三百三十八家,仿照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体例,每个作者集之前附以小传,介绍其生平经历,并且论其诗歌之特色与成就,俞氏论诗主张近于明前、后七子,注重格调,推崇盛唐,因此,入选作品偏重于学唐崇古诸家之集,肤廓之作不少。编者编选此集亦有标榜声气之意,所以详于同代而略于明初。如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只选了三卷。而“后七子”之首王世贞一人入选两卷。书中还将其子俞渊、俞沂列为二家一并入选,尤为不妥。因此,此编虽有保留文献之价值,却不具备鉴别、品藻之意义。因全书搜罗宏富,卷帙浩繁,多为后世选明诗者所取资。有明隆庆间刊本。(王学泰)

【批点明诗七言律】 明诗选集。十二卷。明穆文熙批选。穆文熙字敬止,东明(今属山东)人。嘉靖壬戌(1562)进士,官吏部员外郎。长于律体,王世贞言其律诗“雄浑奇崛,所当无前;惟小洗伧气,足使唐人退舍”(转引自《明诗纪事》)。石星在此编序中亦谓文熙“苦心声律,而其自为诗又雄深典丽,直逼贞元、大历间,尝与王元美诗并刻”。穆氏对律体情有独钟,共选七言律诗一千四百一十五首,作者二百三十人,卷十二附文熙诗六十二首,乃石星所选批。石星序谓文熙不肯选己作入集,于是“余故与伯完氏拔其七律若干首,谬如例批点,置诸集末”。穆氏选诗亦如“后七子”评诗眼光,以气象高华,音调铿锵者为佳,而批语则多空泛。其品藻诸人诗品,尚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准确,可取之处不多。然此编为明人选明诗,许多入选作品并非采摭于传世之专集,一些无专集传世的作者作品亦赖此书以存。有明万历年间刻本传世。(王学泰)

【国朝名公诗选】 明诗总集。十二卷。明陈继儒编纂、陈元素笺释。陈继儒(1558—1638)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年未三十取儒衣冠焚弃之,归隐于小昆山,著作丰富,享大名于时。陈元素字古白,吴门(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不详。此书选录明初高启、王冕到万历时期李贽、屠隆等人诗作,注重表现诗人个性的作品,拟古之作选得很少。全书包括古风六卷,排律一卷、五律二卷、七律二卷、绝句一卷。入选诗人皆有小传,多采自陈继儒著《古今逸士传》,间记传闻轶事。如王冕小传中写道:“冕少

时,号山农,人目为‘狂奴’。当天大雪,赤脚行雪中,潜澄岳峰,四顾大呼,曰:‘通天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陈元素笺释中亦杂有一些传闻轶事,如笺注屠隆《登吴山远眺》诗,即引金主亮“立马吴山第一峰”故事。此书有钱协和与陈元素二《序》。有天启间初刻本传世,雕印精美,纸墨均佳,为世所重。

(王学泰)

【国雅】 明诗总集。二十卷,续集四卷,附一卷。明顾起纶编纂。顾起纶字更生,号元名,无锡(今属江苏)人。曾为郁林州州判,大约生活在明万历间。此书编选从明初洪武到隆庆、万历间诗人作品。顾氏对当时流行的明诗选本不甚满意,认为这些选本往往详于明初而略于当代。如俞宪《盛明百家诗选》,虽然存殁兼收;但编排无伦次,只以卷帙浩繁取胜。此编意在突出当代色彩。从明初到嘉靖(1368—1522)一百五十余年只收录七八十人;从嘉靖末到隆、万(1522—1572)不过五十年却收录一百余人。由于重当代,所以有标榜声气之嫌,入选之诗平庸之作亦不少。其编选宗旨,即以王世贞《艺苑卮言》为指导,在卷前首列品目一卷,简单评论与品藻入选各家,并列举他们的代表作品和警句,对于前、后七子多引用《艺苑卮言》评语,评价极高。四库馆臣以为当时王世贞、李攀龙声价正高,故崇其诗论,所收录作者也多是与起纶“攀援唱和、有瓜葛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末附书牋二十篇,皆答征诗谢入选者,有明万历勾吴武陵郡奇宋斋刻本。

(王学泰)

【皇明诗选】 明诗选集。十三卷。明陈子龙、李雯、宋徵与等人编选。陈、李、宋三人当时并称为“云间三子”,为明末复古派健将。其论诗推崇前、后七子,受王世贞影响尤深,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此编即为贯彻其诗学主张的选本。其选诗近一千二百首,仅前、后七子的中坚人物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四人的入选作品即近六百首,而明代其他重要诗人,如明初高启(选十四首)、刘基(选十首)、袁凯(选八首)、张羽(选一首)、杨基(选一首)以及明中叶的杨慎(选十四首)、晚明的袁宏道(选一首)等,入选作品偏少。明初孙蕡、刘崧,晚明钟惺皆有其独特的成就,却一首未选。因之,它只是流派选本,未足反映明诗全貌。李雯在《序》中虽然称赞高启、刘基、袁凯、杨基诸人之作是“才颖初见”,但又认为其作品仍然“俚者犹元,腐者犹宋”,这种诗风直到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出现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产生了符合儒家传统诗教的“雅音”。“后七子”承继了“前七子”之事业,至于公安、竟陵诸家,“曼声并作”,化坦途为“萧艾蓬蒿”。由于受到这种

诗学观念的支配,其选目编排也就不足为怪了。编者选诗注重题材风格的一致性与声调格律,以“雅正”为主。陈子龙《序》云:“一篇之收,互为讽咏;一韵之疑,共相推论。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求其旨。大较去淫滥而归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六诗之旨。于是,郊庙之诗肃以雝;朝廷之诗宏以亮;赠答之诗温以远;山藪之诗深以邃;刺讥之诗微以显;哀悼之诗怆以深,使闻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词而知其志恻。”虽然编者派别成见颇深,然而对于诗之艺术分析颇有功力,故对入选诸家评语多中肯。如李雯评徐渭诗云:“文长诗材粗黠,雅人所少。然其一往隽处,如部曲少将新跨紫骝。”此编崇祯末年刻过一次,入清列为禁书。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据该校图书馆所藏崇祯刊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列朝诗集】 明诗总集。八十一卷。清钱谦益辑。此书收录明代两千人诗作。分乾、甲、乙、丙、丁、闰六集,乾集分上、下,丁集分上、中、下。乾集二卷收录明历朝皇帝及宗室诸王作品。甲集三十三卷收录明初洪武(1368)至建文(1402)期间作品。甲前集专收元末明初诸家(多为元遗老),像刘基、宋濂、杨维桢这样有影响的诗人便在甲前集、甲集两次出现。刘基在元末所作,多哀时愤世之音,编入《覆瓿集》;他参加石抹幕府后诗风大变,诗作编入《犁眉公集》;两者分别编入甲前集、甲集之首。乙集八卷收录永乐(1403)至天顺(1464)六朝诗人作品;丙集十六卷收录成化(1465)至正德(1521)三朝诗人作品;丁集十六卷收录嘉靖(1522)至崇祯(1644)六朝诗人作品。闰集六卷,收录高僧、名僧、道士、异人、金陵法侣、香奁、宗室、内侍、青衣、佣书、无名氏、神鬼、滇南、朝鲜、日本、交趾、安南、占城诗。此编次大有深意,可见有明一代诗人的完整系列,又寓以明运虽然中衰,但必有中兴之日。而把有叛逆思想的李贽列于三大异人之首,可见其卓识。另外也收录一些孤寒之士和奴隶佣工诗篇。钱氏编此书仿《中州集》之例,以诗存人,保存有明一代文献,为研究明诗、明史者重要参考资料。因书成于明亡之后,钱氏虽曾降清,顺治三年(1646)罢归后,对清统治者多有不满,借此书以发泄,故在乾隆朝因“语涉诽谤”被列为禁书。现仅有清初绛云轩钱氏自刊本传世。

(王学泰)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明末诗总集。亦名《两朝遗诗》、《启祯诗录》。初集八卷、续集二卷。清陈济生编纂。陈济生字皇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师事黄道周、刘宗周,传其学,以荫官太仆丞,明亡后,奉母隐居,著述甚多,卒年四十七,门人私谥节孝

先生。明清易代之际,因清入侵者的野蛮残暴,汉族人民反抗的强烈,民族主义文学也出现了空前的高潮,许多诗人本身就是抗清志士。另外,天启朝宦官魏忠贤当政,政治黑暗腐败,在野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作坚决斗争,此书辑录的启、祯两朝遗诗大部分是抗清、反阉宦的作品。共录诗人三百零七人,未附小传,亦间有有诗无传、或有传无诗者。“是选以人为重,以节义为主”,“录其人,因以存其诗也”。它继钱谦益《列朝诗集》之后,补其未备,反映了明末的正义斗争。书中诗章及诗人经历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刻于顺治十六年(1659)(分两次刻成,初编刻于十二年),后遭“奸人告讦,因干厉禁”。康熙初莱州黄培诗案发,顾炎武等即为书牵连入狱。诗案发作后,无人敢收藏,故流传绝少。本世纪初上海发现一残本,经陈乃乾抄补,才较完善,后又发现常熟赵氏旧山楼藏本,内容各有不同。中华书局于1958年参补二本而影印出版,后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王学泰)

【明诗综】明诗总集。一百卷。清朱彝尊编纂。此书辑录从明初到明末(包括明遗民)三千四百余人的作品。明代诗歌创作凡三变:永乐前后的台阁体;正德、嘉靖、隆庆之间的前后七子;此后的公安、竟陵二派。明末清初明诗选本往往出入三派,有所偏袒,而此书之编纂意在纠正其谬,取材广泛,“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讫,死封疆之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焉”。“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见自序)。书中涉及明代政治、社会情况的作品收录了不少,可是在收录明末抗清烈士富于战斗性诗篇时仍有忌讳,瞿式耜、张煌言、夏完淳的代表作品都未录入。另外朱氏对后七子及公安、竟陵二派贬斥太甚,李攀龙只选了十八首,其七律七绝佳作多未采录,徐中行、吴国伦律绝俱佳而入选更少。袁宏道佳篇秀句,多有刊落,钟惺、谭元春竟目为“妖孽”,全没其真,有失公允。其他如误收、失收,失于考订之处亦屡有出现,还有任意删削原作、为古人改诗之处,这些皆为此书之病。但此书仍是大醇而小疵,它基本上反映了明诗概貌和各个诗派发展变化情况,入选作品也以佳作为多。有康熙白莲泾原刊本和乾隆六峰阁刊本。(王学泰)

【明诗百州名家诗钞】明诗选集。二十四卷。清王企靖编纂。王企靖字苾远,雄县(今属河北)人。康熙乙丑(1685)进士,官至江西巡抚。编者自序云:“自洪、永以迄启、祯,风会递迁,作者代起。国初四杰,夔然秀出矣;而彬彬郁郁,鼓吹休明者,非长沙

乎?弘、嘉七子,卓尔不群;而莽莽滔滔,抒写性情者,非公安乎?问端揆之重望,则河津、东阿其眉目也。稽著作之耆英,则金华、新都其领袖也。搜隐逸之宗工,则陈昂、童珮其楷模也。佐命元勋刘诚意,灿云霞之色;精忠骏业孙高阳,流金石之音。”清代推崇拟古、崇尚唐音之论者,盛赞唐音,然而,他们往往着眼于注重格调的李东阳和明前后七子,而王氏则着眼于全部明代诗歌创作,既肯定主张“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也不否定强调性灵,反对复古的公安派、竟陵派。既推重身处高位的一代名流如刘基、宋濂、薛瑄、孙承宗;也揄扬或隐于商贾的童珮,或一生极其贫困的陈昂。可见编者意欲通过此编反映明诗全貌,而不存偏见。编者选诗注重有真情实感之作品,“诗以言志,本其性情之真以发为篇章,则天机盎然,神理俱足,若徒以文采争胜,而不出足性情之自然泥塑木雕,何足贵也!是编惟尚其真,凡性情之呈露者,存之以表真诗,而声韵未协,字句不典,概不苛求”。因注重性情之真实,故选诗“未敢执一格以相限”(皆见《凡例》)。全编入选者凡一百三十家,作为正集,编者认为这一百三十人皆能卓然成家者,又附见三十八人,或附于兄弟、或附于师友。编者认为此编尚有缺憾,许多卓有成就者未能搜罗无遗,他列举了“北郭十友”、“景泰十子”以及钟惺、谭元春、李三才等人,并言如天假之年,当再编《明诗补遗》。《明百州名家诗钞》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敬事堂刊本。

(王学泰)

【闲情集】明诗选本。四卷。清顾有孝原辑,陆世楷增辑。顾有孝字茂伦,吴江(今属江苏)人。诸生,居钓雪滩,以选诗为业,是当时有名的诗歌选家。陆世楷字肴山,平湖(今属浙江)人,生平不详。此书专门编选明代艳体诗歌六百餘首,作者二百餘人。“艳体”又称“香奁体”一般是指以妇女生活为题材而又文辞绮丽、笔墨轻艳之诗歌作品。所谓“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之作,“裾裙脂粉之语”。但有的作品也可寄托忧国忧民之感。王士禄序云:“惟胜国季迪(高启)、眉庵(杨基)、昌谷(徐祯卿)诸公,义合风雅,语兼哀艳,直可嗣响唐音,称骚人苗裔。”不无溢美之辞。陆世楷序则谓“古人以情而形诸诗,今人因诗而情弥炽。于是家擅风流,人矜轻薄,搦管则翻《子夜》,濡毫辄拟《无题》。甚且沉酣歌舞之场,纵恣闺房之内”,最后归之于“情之动也,遂有一发而不复止者,将何以救之,还救之以诗而已。诗之为用,能化无情为有情,亦能化有情为无情”。“其始也钟情;其终也忘情矣”。此集选录面宽,明朝有代表性的艳体作品多已入选,其体裁也以模仿南朝乐府和李商隐《无题》为多。但明末以艳体闻名的《疑雨集》作者王

彦泓却一首未选,未知何故。有康熙间刊本传世。

(王学泰)

【遗民诗】 明诗总集。十六卷。清卓尔堪辑。卓尔堪字子任,一字鹿墟,别号宝香山人,生于江都(今江苏扬州)。约生活于康熙时期,曾投效于浙江总督李之芳部下参加讨伐耿精忠之役,后隐居终生。此书收录明末遗民诗二千八百六十七首,作者五百零五人,并对每位作者字号爵里行迹作了介绍。卓氏辑此书意在保存文献,使众多的敛迹岩穴、坚守民族节操之士不至泯灭于后世,故坚持“人更重于诗”的原则。自云:“其有以人传诗者,诗不过数首,虽有微瑕,亦所必录。”而对于晚节有亏者,虽有秀句佳篇,亦摒之而不录。书中保存了许多“纪忠、纪烈、纪事”之诗,揭露了清统治者的野蛮和残暴,表现出汉族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精神。许多史传不载的遗民事迹和诗歌赖此书以传,并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康熙初年精刊本。中华书局1961年据此排印出版,更名为《明遗民诗》。

(王学泰)

【明人诗钞】 明诗选本。正集十四卷,续集十四卷。清朱琰编选。朱琰字桐川,号笠亭,海盐(今属浙江)人。乾隆丙戌(1766)进士,博学工诗,为“嘉禾七子”之一,兼善山水,精于赏鉴,曾官直隶阜平县令,为政廉慎,捐俸建学宫,在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民甚便之,以劳卒于官。此书撮录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中大家、名家六十五人,钞成一编,是为《正集》。朱氏编排极为审慎,他说:“余钞明人诗青田(刘基)、青丘(高启)已列首卷,标为一代宗匠,此卷(指第三卷)分叙各方诗派,冠古田(张以宁)于子高(刘崧)、仲衍(孙蕡)之上。”刘崧、孙蕡分别代表明初的江西派与粤派,此后连收学盛唐的闽派林鸿、高棅、王恭三人,称其为流派之正。又说:“分卷次第,或以时代断限,或以方域师友分别,各有其义,读者可依次而求,可以考一时一方诗教盛衰大略,亦论世之一端也。”在对待各文学集团,如四杰、七子也没有采取一律对待的省事办法,而是根据其成就该入《正集》者入《正集》,该入《续集》者入《续集》。《续集》共收四百三十二家,作为大家、名家的羽翼。每家各附小传,如作者逸事可备一代典故者尽行列入,有关诗本事和诗话评鹭也博采广收,间附编者评语。全书基本上反映明代诗歌发展演变之概貌和各个流派的基本情况,还发掘了过去一些未被注意的作者。此书缺点是:《正集》没有囊括明代所有流派的代表作者,如公安派之袁宏道,竟陵派之钟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樊桐山房刊本。

(王学泰)

【明诗别裁】 明诗选本。十二卷。清沈德潜、周準编选。沈德潜有《古诗源》,已著录。周準字钦莱,号迂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少好读书,绝嗜欲,寡交游,晚年之京师,不交权贵,或以为迂,因号迂村。尝寄寓杭州灵隐寺,遇沈德潜,论诗相合,遂为莫逆之交。此书据朱彝尊《明诗综》编选而成,共选诗一千零十馀首,作者三百余人。沈、周二论诗注重“雅音”,推崇“唐调”,遵循“温柔敦厚”之诗教,其选录标准是:“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这些看法与前、后七子论诗主张相近,所以李梦阳选了四十七首,何景明四十九首,李攀龙三十五首,王世贞四十首,而公安派三袁只选袁宏道一首,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则一首未选。因此,这个选本不能反映明代诗坛之概貌、全面展现明诗创作的成绩,它只能是体现“格调派”论诗主张的选本。书中一些诗后和诗人之后间附评语、品藻评论文字,指陈得失,辨析源流,其中多偏袒前、后七子,对“公安”“竟陵”等派则多鄙薄之词。品藻文字也有流于空泛的。如刘永锡只选一首《行路难》中的二句“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评曰:“四字抵过千万言。”袁枚批评说:“‘风萧萧兮白日寒’,是《国策》语,《行路难》三字是题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为佳,全无意义。”(见《随园诗话》)但此书搜采面广,入选作品多佳篇秀句,仍可作为明诗入门读本。最早有乾隆四年(1739)刊本,中华书局1975年据此本缩版影印。

(王学泰)

【明诗钞】 明诗选本。亦名《明百家诗钞》。十二卷。清鲁之裕编选。鲁之裕字亮侪,麻城(今属湖北)人。康熙(1662—1722)年间举人,官至直隶清河道,署布政使,不随俗俯仰,在官多政绩,尤精水利,著述颇富。此书基本上是据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等大部头总集编选而成。鲁氏注重明初高启、杨基、袁凯等人的作品,高度评价他们能表现性情、富有才情的诗篇。高诗竟有三百二十五首入选,杨诗选了一百六十五首,袁诗选了九十首。对于前、后七子的拟古之作和缺少才情的诗篇则选得很少,如李梦阳只选了二十首,李攀龙选了二十七首,王世贞选了五十七首。由此可见选家的眼光和观点。全书共收明诗人一百七十八人,各附小传,有清乾隆七年(1742)刊本。

(王学泰)

【清诗溯洄集】 清诗总集。十卷。清魏裔介编纂。魏裔介(1616—1686)字贞白,一字崑林,号石生,又号贞庵,柏乡(今属河北)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魏氏为清初第一批汉族大学士,因清朝大典多半出自其手,故以保存清初文献自许。曾编《观始集》(已佚)以辑清初诗歌佳作。

此书即继《观始集》而作。魏氏自序称“诗人好贤，溯洄于方舟之间，不敢言劳。余兹溯洄于铅槧之间，岂敢薄视风雅，使文人心灵淹没无闻而不表见于后世乎”。他编选同时代才人作品为集，其意在于传人，故每人只选诗三数首。全书按体分编，以自己作品殿后，其数量往往超过他人数量倍。书前有他人论诗语录二十则，多为宋荦（牧仲）、贾开宗（静子）语。当时宋荦仅为御前侍卫，少魏氏二十馀岁；贾开宗为明诸生，两人皆明遗民。此集首列其语可见编者好贤怀善之心。次列魏氏论诗语录五十则。其论诗以妙悟为主，以陶潜、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为正宗，与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说”大同小异。有康熙元年（1662）府刊本。常见者有乾隆间刊本。（王学泰）

【皇清百名家诗】清诗总集。八十九卷。清魏宪编纂。魏宪字惟度，福清（今属福建）人。明诸生，撰有《枕江楼集》十卷。另有清诗选本《诗持》。此书号称“百家”，实则九十一家。叶方霭以下十人，仅署其名，未得其诗，可见此书之编意在标榜声气。明末曹学佺有《十二代诗选》，明诗选止于天启，魏氏编选此集以续曹氏选本。书中所选始于明天启四年（1624），终于康熙十一年（1672）。登选作品以得到诗卷前后为序，每家之前各有“小引”，为诗人小传，包括编者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此编以魏裔介为首，所取多达官显宦。以魏宪自己作品殿后，并言自己入选之诗是“同学诸子所论定”，并借他人之口炫耀说：“然魏子之诗不与选，是徒有刳羹而亡至味，宁免遗珠之诮乎？”陈融《颺园诗话》中评此书“阙略”太甚，“为时所訾”，又引《注韩居诗话》云：“惟度尝选百家诗，入选多显宦，刻己于末，而秀水朱竹垞检讨不与焉。检讨有诗云：‘近来论诗多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盖指此也。”可见人们对此书评价不高。有编者康熙间自刊（枕江楼）本，后又有聚锦堂刊本。（王学泰）

【诗观】清初诗总集。又名《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十二卷，二集十四卷、别卷一卷，三集十三卷、别卷一卷，凡三十九卷。清邓汉仪编纂。明末清初，社会由战乱走向安定，邓氏自序谓当时诗人“历乎兴革理乱、安危顺逆之交，中有所藏，类不能默然而已，以故忧生悯俗、感遇颂德之篇，杂然而作。一时公卿以迄韦布，其号为能诗，沈雄古丽，安雅柔澹，以几于汉魏……”此集虽然未能摆脱明末互相标榜之风习，登录之诗亦多为故旧友朋之作，而且“选数多寡，实非有意，皆因其卷之繁简，地点之远近然”，但是由于邓氏所交游者多为故老遗民，或是勉强出仕新朝的士大夫，从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仍然可以窥见时代动乱的影子以及作者依违于故国新朝之间的矛盾心态。此

书所取宏富，清人沈德潜云“足备后人采择”（见《清诗别裁》）。近人徐世昌云：“其中遗集罕传者，颇赖以得梗概。”（《晚晴簃诗汇》）有康熙十一年（1672）至二十九年慎墨堂刊本。另有乾隆十五年（1750）至十七年深柳读书堂刊本。因乾隆时文字有禁，故后者多有删节。（王学泰）

【感旧集】清初诗总集。十六卷。清王士禛编纂。王氏为清初诗坛领袖，交游颇广，有影响、有成就之诗人多与士禛往来。此时（康熙初叶、中叶）正逢清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遁世之遗老，兴国之硕彦，无不萃荟一时”（卢见曾序）。其作品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王氏晚年感时怀旧，因而辑平生故人之诗，存殁兼录，而成此编。全书录诗二千五百七十二首，作者三百三十三人。搜录之面虽广，但绝少滥竽充数之作。士禛在京为官时“岩廊翰苑，朝会燕喜，应制投赠之作，咸乐得先生甄综之。顾寥寥数人外，多置而不录”（朱彝尊序）。此集在王氏生前并未编成，士禛逝世后其同乡后进卢见曾又加以搜辑整理，每人各附小传，并加补遗，补诗置于每卷之后。王氏辑录故人之诗，虽然意在怀旧，但仍贯彻其论诗主张。如卢见曾所说，入选诗人“遭遇不同，情性各异，而一经先生选次，如金之入大冶，渣滓悉化”（《凡例》）。一些风格各异的作者，经过选家的处理，仿佛都变成了风格飘逸恬淡、平和蕴藉的诗人。因此，难于从此集了解清初诗坛的概貌及其发展流变。卢氏编刻此书时颇以己意重加更定，故流传之《感旧集》已与王氏原辑有很大差异。每位作者之下由卢氏补小传。其材料多取自王士禛之说部，有些还是亲自采访而得。小传以记文人韵事为主，间亦杂以评论。书前有王士禛自序、朱彝尊原序及卢见曾序。有清乾隆壬申（1752）精刊本传世。（王学泰）

【篋衍集】清初诗总集。十二卷。清陈维崧编纂。陈氏去世后，乡人蒋景祁在陈家发现当时“名公硕人”所作之诗三百馀纸，认为可以传世，乃与宋人蒋国祥整理刊刻问世。此书所收大多为陈氏交游所作，而且选录很严，“国不过数人，人不过数诗”。其所取风格不一，高雅恬淡、秾丽深挚、婉丽流畅、沉郁顿挫、古拙质朴、清新明朗等不同风格均有代表作品选入，其艺术上也以成功者居多，基本上反映了顺治与康熙初期诗坛的面貌。沈德潜论及清初诗歌选本曾云：“国朝选本诗，或尊重名位，或借为交游结纳，不专论诗也。陈检讨《篋衍集》较诸本为善，然只及康熙癸丑（1673），以下阙如。”（见《清诗别裁凡例》）认为此编去取谨慎，所选多为精品。此集之名取自《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绣”。“篋衍”指盛祭品之竹器，意在赞美所载诗作之

精美。此书有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精刊本。前面署王阮亭(士禛)、宋牧仲(荤)鉴定。

(王学泰)

【名家诗永】 清初诗总集。十六卷。清王尔纲编选。王尔纲字绍李,池州建德(今安徽东至)人。清初廩贡生,能诗文,博通群籍,著作丰富,约二十余种。王氏纂辑此书之主旨在于“表微”,凡明末清初高人逸士、名公巨卿、方外伟才、闺中慧质,都有入选。凡九百九十三人(重出者十三人)。因为意在表彰未享大名之诗人,入选之作则多取之于抄本及友朋所寄之散笺。入选作者很多,但每人所取之诗少者仅一首,多者不过一二十首,诗后间附编者评注。其编选原则是重视内容。王氏说:“选诗先选题,如忠孝节烈,有关名教,国计民生,可备采风;传人记事,足当稗官;考证古今,堪裨学问;加以诗能合格,自必采录无遗。至若花鸟闲吟,或间登一二,寿挽谀词,则一概不收。”(《凡例》)因此,书中空洞庸滥之作不多。在艺术上,多取明朗流畅、通俗浅易之作。编者特别推崇其同乡先辈吴应箕,书前《杂述》中大段转述其论诗之语,选吴诗特多。但此书编辑草率,排列以得诗迟早为序,可见编者有借此广通声气、互相标榜之意。书后大量附录编者自己之诗作,并借他人之口以吹捧自己。书前有金佐亮、宗观、吴非三序及编者自序。有康熙间砌玉轩刊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有影印康熙刻本

(王学泰)

【国朝诗乘】 清初诗总集。十卷。清刘然编选。刘然字简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大约生活于顺治、康熙间,生平不详,有《西涧初集》行世。此集选录清初诗一千馀首,作者一百四十人,随选随刊。刘氏自序称此选“著名称雄者或阙焉,而加意表彰幽隐之士”。书中评语颇多,或评论品藻文字,或分析标举格律,多为有得之语。首卷论诗,编者自云:“殚精研思于六义之正变,诸家之派别,五七言之源流,古乐府之声辞离合,罔不胪列缕析,灿然如指掌,为学者通亿载之津哉!”编者论诗强调诗人首先要有高尚的思想品质:“诗人志芳行洁,不以名位动其心,乃与风雅二字合。不然,笔补造化,皆馀绪也。”并结合唐代著名诗人的经历及作品作了深入的论述。对于生活于社会下层的诗人有着深刻的理解:“独古慧心文人艰辛刻苦,仅以数首诗博身后名。顾使其生少知音,得归湮没,此亦仁人所深悲极痛也。”这说明刘然也是沉沦侘傺之士。此书编刻未成而刘氏去世,其甥朱豫据其遗稿编缀而成。此编以“乘”为名,盖“取诸无所不载之意”。有清康熙间拙真堂刊本。

(王学泰)

【南宋杂事诗】 清诗总集。七卷。清厉鹗、符曾、

吴焯、赵昱、沈嘉辙、陈芝光、赵信等撰。沈嘉辙(?—1733)字栾城,号个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陈芝光字蔚九,号南村,钱塘人。赵信,字意林,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赵昱之弟。此编作者六人每人百首,符曾一百零一首。诗中采摭故实以咏南宋杭州史事,凡与杭州无关者概不入咏。此编为补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而作。凡田《志》有者则避之,或同一事田《志》所阙或所录未详,则广为搜罗,以资博览。其主旨在于网罗一代轶闻。作者上采正史、政书,下搜宋以来诗词文集,旁及野史笔记,别传方志,金石碑刻,取材十分广泛,征引书籍近千种。作者以七言绝句及小注方式,归纳故实,上及开国典礼、宫庙建筑、帝王燕射、典祀国祭、传国玺印、御笔书法、驾幸宴乐、宫闱秘史、陵寝盗发、宋金交涉;中关臣工忠奸、百官除授、科场轶闻、释道理学、文人趣事、画家琴师、音乐书画、佚诗佚文、典籍聚散、时语方言、名胜古迹、园林亭台、花卉树木、鱼禽虫兽、碑刻题名、文物古董、文房四宝、纸钱楮券;下涉四时节令、时尚风土、市井景象、歌妓舞女、名酒名菜、糕点食品、丝绸瓷器,乃至谗语优言、谶兆图纬、火灾火葬、阴曹志怪、戏曲小说等等。凡是南宋整个时代发生在杭州的大小事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映,可作一代诗史读。诗以记事,事即注于下。往往合数事以成一诗,鳞次分注,详载书名,并列总目于首,登记作者姓氏。因过于注重排比事实,许多篇章不免有牵缀堆砌之处。但综观全书,大多还可以作为诗读,其中也有不少佳句。赵殿成在《题辞》中即列举七十馀联。故此编不仅有史料价值,亦是一编较好的咏史诗集。此组诗写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雍正元年(1723)之间。此编前有查慎行、万经、章藻功三《序》并赵殿成《题辞》,后附《南宋杂事诗引用书目》。初刊于雍正间,乾隆丁亥(1767)有小山堂刊本。常见者有刘子端手录、芹香斋摹镌本和同治十一年(1872)淮南书局本。另有道光间扶荔山房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据此本标点排印出版。

(王学泰)

【清诗别裁】 清诗总集。本名《国朝诗别裁》。三十二卷。清沈德潜编选。选录清初至乾隆初年已故作者之作品,前后近百年,录诗三千九百五十二首,入选诗人九百九十六人,起自钱谦益,终于潘廷璠(算至三十卷)。卷三一为“闺秀”作品,卷三二为“方外”作品。沈氏论诗主“格调说”,其选诗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为原则。他认为“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皆见《凡例》)。尽管沈氏是从封建主义立场看

待这些儒家诗教,但是“言有物”必然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书中选录了许多反映现实与民间疾苦的作品。如所选吴伟业诗三十二首,几乎每首都与明朝覆亡和清初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有些反对民族压迫情绪十分强烈的诗篇也被选入。如屈大均(选十五首)、陈恭尹(选十一首)诗多有怨愤之音。此书入选作者众多,其中绝大部分无专集行世,他们的作品亦赖此而传。沈氏深于诗学,学识渊博,在艺术上颇有鉴赏力,所以入选作品多为佳作,其风格含蓄蕴藉,其风调音节近于唐音。编者立意反映清初诗坛概貌,故在此选本中照顾到各个流派,如清初虞山、云间、娄东三派以及浙派、神韵派均有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入选,皆可据以知人论世。此编为清诗较好的选本。初创于乾隆乙丑(1745),完成于戊寅(1758),曾请序于乾隆皇帝,乾隆提出三点应改之处。沈氏未改径刊行。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本三十六卷。另有三十二卷本刊于乾隆二十五年,有教忠堂刻本。中华书局1975年以“教忠堂”本为底本缩印出版。

(王学泰)

【昭代诗针】清诗总集。十六卷。清吴元桂、吴书元编纂。吴元桂字秋岩,号紫山,别号穴企山人,(穴,音“岑”;企,即“仙”),江南无为(今属安徽)人,著有《振华斋诗集》。吴书元字怡川,号袖池,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著有《春雨楼集》。二人皆生活于乾隆间。编者以为清诗成就远迈唐宋,达到最高境界,“本朝百年以来,圣圣相承,广敷声教,天籁之发,远媲南薰。鼎铉宗工,赓飏于上;山泽癯老,鼓吹于下;硕彦茂才,更迭唱和。或逼唐音,或凌宋节,彬彬乎,郁郁乎,极盛矣哉!顾雅颂布于庙廷,词林艺苑,类能传之,而一草一集,家自为言,岂必无大海沉珠,荒涂委璧之叹,则篇章散佚,恐遂多湮没而不传”。为了使“圣朝一代之真诗长留宇宙”(见吴元桂序),故而编纂此书。共录诗二千四百九十六首,作者七百五十七人。以收录声闻不彰之作者为主。至于“台阁巨公,勋业久著,如柏乡(魏裔介)、益都(孙廷铨)、真定(梁清标)、高阳(李蔚)、孝感(熊赐履)、泽州(陈廷敬)诸相国亦不必借珠玉以显,佩服虽殷,兹选从略”。“当代名家,其专集行世已久,如渔洋(王士禛)、愚山(施闰章)、绵津(宋荦)、竹垞(朱彝尊)、荔裳(宋琬)、悔庵(尤侗)诸前辈,莫不树帜海内,大唱宗风,兹选亦不赘。录其未经行世之藏稿,或不嫌多,非有私衷,亦阐幽之意云尔”。此编选诗“约以清真雅正为准,一切感愤不平、漫肆讥排之词,概屏不录”。“举凡雷同、形似浮艳淫靡,无有当于美刺者,并概不录”。“集名《诗针》,取为诗学指南,以存诗家的派”(以上皆见《例言》)。据此可见编者选诗标准

以及编书宗旨。书后附有吴元桂、吴书元及其二子作品数十首。书中所取作品以清新流畅之作为多,可见编者心裁近于袁枚。此书初编于乾隆十三年(1748),有乾隆乙巳(1785)刊本传世,春雨楼藏板。

(王学泰)

【湖海诗传】清诗总集。四十六卷。清王昶编纂。王氏交游广泛,自云:“予弱冠后出交当世名流,及游登朝宁,攷历四方,北至兴桓,西南出滇蜀外,贤士大夫之能言者,揽环结佩,率以诗文相质证。披读之下,往往录其最佳者,藏之篋笥,名曰《湖海诗传》。”(自序)全书共收作者六百余人,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止于嘉庆八年(1803),此为清诗中衰期。虽然作者颇多,“性灵”、“格调”、“肌理”三派诗论亦风行此时,但从诗歌反映社会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深沉以及艺术风格之多样等方面来看,则不如明末清初。王氏为沈德潜门生,承其衣钵,全书以“格调派”眼光为去取标准,以己律人,而不能随人所长,故所取者之诗往往流于肤庸平弱,徒存声调。书中编排以作者科第为序,至于布衣韦带之士,则以年龄约略附之。人不求全、诗不求备,意在借诗存史,俾有益于论世知人。在诗人名下,各附小传,间记有关遗闻轶事,或诗话评论。其所著《蒲褐山房诗话》,体裁全仿朱彝尊附于《明诗综》之《静志居诗话》,史料极为丰富。九十年间朝野诗坛文献,多赖以存。集中所取诗人多为江苏、浙江人士,而其他省份作者收录较少,作为一代总集,则为不足。最早为嘉庆癸亥(1803)三泖渔庄刊本。常见者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此版有1958年重印本。

(王学泰)

【国朝诗】清诗总集。十卷,外编一卷,初编六卷。清吴翌凤编选。此编选清初至清乾隆间诗一千八百余首。编者对于清诗评价不高,其序云:“古人之诗浑,今人之诗巧;古人之诗含蓄,今人之诗发露;古人之诗多比兴,今人之诗多赋;古人之诗,纡徐婉曲,无意求工;今人之诗,好著议论,动使才气,每用一意,惟恐不达,往往自下注脚。此今人所以远逊古人也。”编者所肯定者有“莱阳宋氏(琬)之浑雄;宣城施氏(闰章)之淡远;新城王氏(士禛)之音调谐畅;秀水朱氏(彝尊)之意趣疏宕”,认为他们“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况羽翼接武者,又不一其人乎”(序)。此编选诗最多者为吴伟业(五十一首),其他为王士正(即王士禛)、施闰章(各三十四首),朱彝尊(二十九首),宋琬(二十六首),陈恭尹(二十首),吴嘉纪(十九首),吴兆骞(十七首),陈维崧(十五首)等。清初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残酷,钱谦益、屈大均之作品皆属清廷明令禁止者,吴氏却有胆量冲破禁令,选钱谦

益四十六首,屈大均诗四十九首。为了躲避搜检,为钱谦益编造名为“彭勃”,“字六吉,浙江常山人”;为屈大均造名为“翁绍隆”,“字骚余,广西临桂人”。从中可见当时文字狱并未吓倒一切文士。此编编讫于嘉庆元年(1796)。有嘉庆间刊本。(王学泰)

【怀旧集】清诗总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女士诗录一卷。清吴翌凤编纂。据编者自云此书系继《感旧集》、《篋衍集》而编。其叙曰:“余不敏,束发时即喜为有韵语,稍长谬厕词坛,二三前辈,引为小友,一时谈艺之士,亦皆不我遐弃,与订揽环结佩之好。江湖浪迹,吟侣益多,间尝录其所作,藏诸篋笥,忽忽不自收拾。今者年开八袞,颓然老矣,回忆前辈诸先生,墓木久拱,即辱在辈行者,亦凋丧已尽,苟不急为订定,恐益饱鼠蠹。”“爱取五十余年次第所录者,重加补缀。”全书正集收录二百三十人,续集收录一百九十五人,又续集收录一百零一人,女士诗录收录二十五人。编者辑此书主要目的是表彰“山林寒瘦之士”的“么弦孤韵”,所录皆为已经去世之人,其中亦不乏名家,如杭世骏、沈德潜、袁枚、卢文弨、王又曾、王鸣盛、毕沅、童钰、王文治、黄景仁、高文照、吴文溥、洪亮吉等。入选作者皆注字号爵里著作,间缀以诗话。“诗话”皆为吴氏自撰,其间或述行谊,或论诗品,或叙交游踪迹,聊寓怀人感旧之意,多是编者亲身体验与感受。如述乾隆初期、中期江浙诗坛风气变迁:“先是长洲沈文肱公(德潜)执骚坛牛耳,海内人才,资其月旦。简斋(袁枚)为制府尹文端公(尹继善)所知,复以名园通隐,震动冠盖,由是名益大。文肱公谨守准绳,抗怀正始;简斋则自辟町畦,成一家之言,一时趋之者,至有拜袁揖赵哭蒋之目。四十年来沾丐所及,于以树旗鼓称诗人者,无不以随园为职志。而吴兴坛坫,惟一二老生,守之勿替,亦足以觐风会之转移也。”(见“袁枚”条下)其介绍诗人生平性格亦多值得参考,如“汪中”名下言汪氏“性刚易怒,少可多否,对人辄作白眼,若其人知名士益难称其意。或逢迎之蹙额而旋其面,少焉粗词细语,嬉笑怒骂,不顾人之能受否也,以是人多恶之”。此书有嘉庆十八年(1813)初刻本传世。

(王学泰)

【旧言集】清诗总集。三编。清李兆洛编纂。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清代著名骈文家,著有《养一斋集》。此书以收录明末清初以来常州诗人作品为主,兼及邻近府县诗人作品。入选者多为未扬名之作者。编者自序云:“夫人不必名家,词不必极思,为之者或无意于传,见之者或不甚相爱,而桑梓之旧风,故老之轶事,习俗今昔之异,人物

盛衰之变,每于寻常吟咏,仿佛遇之。使人锵锵洋洋,悠然以思,忽然以悲,此亦乡邦文献所资也。况乎师友之宴语,朋侪亲串之周旋,当其绸缪户庭,契阔风雨,言欢奉手,涉想牵梦,泊乎朝露俄晷,墓草遽宿,暂攀音容,流涟未已,忽睹篇翰,如亲笑言,讵能不寄永思于遗文,申短怀于往迹者哉!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游,凡有所见,随加詮次,间亦敷求前哲,旁及流闻,旋得旋编,不以前后为第。”可见李氏编此书不仅是为了“裨志乘之求”,为乡邦搜集桑梓故老文献,而且包含了对师友之谊、朋辈之情的追怀。全书分初、次、广三编。“初编”主要收常州人士作品,共收杨瑀(字雪臣)等五十一人。“次编”收录宜兴、江阴作者作品,包括翟雷谷等十一人。“广编”收录宝应、怀宁、婺源、扬州等地作者作品,包括刘又徐等五人。本书初编于道光元年(1821),于道光九年编讫,有道光间刊本。(王学泰)

【国朝诗萃】清诗总集。初集十卷,二集十四卷。“初集”为清潘瑛、高岑编选,“二集”为清潘瑛、陈塾编选。潘瑛字兰如,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仕履不详,生活于嘉庆间,为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弟子。高岑字映苔,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塾字熟之,青阳(今属安徽)人。二人仕履皆不详。编者自云:“国朝选本,诗自沈宗伯(德潜)《别裁集》、继陈检讨(维崧)《篋衍集》后补选康熙癸丑以下八十余年诗,迄于乾隆庚辰,皆已往之人。兹补当时所未经采择者及今四十馀年中已往、现在诸贤,分为初、二两集。”(《凡例》)可知此编是继《篋衍集》、《国朝诗别裁》而作。“初集”选录已故作者一百九十人作品。“二集”选录尚存世作者二百四十人。乾嘉诗坛名流,囊括殆尽。编者论诗本之于沈德潜“格调说”,又参以桐城派论文之“义法”。《凡例》云:“诗本性情,自以温柔敦厚为教,而资秉既殊,所学匪一。自八代三唐以下,迄于本朝,作者代兴,风格屡易,惟义取法戒,词尚真醇,足以励风俗而感人心,皆当入选。”可见其选诗除了注重温柔敦厚诗教外,还考虑到诗之格律、义法以及不同风格的作品。“诗人名下只载表字省分郡邑,与夫科目官阶”,并从志传、诗话中采录一些与诗人有关内容加以评论,附于作者小传之后。入选诗下亦间附有编选者之评论。此书前有王昶序,初刊于嘉庆甲子(1804),初集、二集凡二十一卷,晋希堂藏板。嘉庆丙子(1816)板归全椒金珉璞,再刊时为二十四卷。(王学泰)

【本朝名媛诗钞】清妇女诗总集。六卷。清胡孝思编纂。胡孝思字抱一,平江(今江苏苏州)人。此编专录清代妇女诗作,始于清初,终于乾隆初年。胡氏自序云:“名媛诗之有钞也,予采择于本朝,盖已有

年;其间或购之坊家,或受之亲友,或觅之书贾,或承四方之惠教,或于残篇断简中拾其瓣香寸玉,汇而集之,得温厚和平、不愧风雅者,合五言、七言共计三百有奇。至若调近香奁,句裁伪体,则概屏而弗录。”从中可见编者选录标准。入录作者五十七人,清初著名女诗人柴静仪、林以宁、王端淑、许飞云、朱柔则等皆有作品入选。只是其编排漫无次序,作者生平年龄,莫可稽考,书中评论亦多为门面语,缺少真知灼见。此书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凌云阁刊本。

(王学泰)

【国朝闺秀正始集】 清妇女诗总集。二十卷。清恽珠编纂。恽珠(1771—1833)字星联,别字珍浦,晚号蓉湖散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工诗善画,长于刺绣,闺中有“三绝”之誉。其夫完颜廷镛曾官知府,子麟庆官至河南总督。此编选于恽氏晚年,其时随子麟庆在河南任上。书中选清初至清中叶妇女诗作一千七百餘首,作者九百三十三人。不选宫廷后妃、“女冠缙尼”以及“青楼失行妇人”。编者认为:“我朝重熙累洽,化起宫闱,母后妃主,孝德休嘉,徽柔著美,不以文采见长。即偶有吟咏,亦非臣妾所敢妄录。”至于尼姑女冠,不乏能诗之人,因“不足以当闺秀,概置不录”。青楼妇女虽多“风云月露之作”,但恽氏选录主重“性情贞淑,音律和雅”之诗,因之不录青楼娼妓之作。然而如“柳如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实能以晚节盖,故遵国家准旌之例,选入附录,以示节取”。其“采诗先取专集,无专集者,就各选本及诗话辑入。馀则访之族里闺友,美不胜收。今所选至多者,人不过十首,缘是集聊备采风,非为专家刻稿”。其“排比次序,第一首录宗室,红兰主人,女县君作,尊天潢也;次录先高祖姑科德氏作,述祖德也;次录族姑恽清於作,重家学也;次录毕韬文作,标奇孝也;次录伊夫人作,美贤淑也;次录伊太夫人作,昭慈范也;次录林氏作,扬贞烈也;次录希光作,彰苦节也;次录沈惠玉作,示女箴也;次录李氏作,敦诗品也。馀则参仿钦定《国朝诗别裁》体例,分若干年为一,特名媛年齿后先,莫可稽考则以其夫若子之科名官爵为断;故无科名官爵者,按诗中可见之人约略排次。一切无考者,以得诗之先后编入”。此书采录面广,“滇黔川粤,均不乏人,且有蒙古命妇、哈密才媛、土司女士、海滨渔妇,末卷又附载朝鲜国四人”(皆见《例言》)。编者选诗标准,强调“性情名正,雪艳冰清,琴合玉润,庶无惭女史之箴”(《弁言》),因而使得一些下层妇女具有反抗性之诗歌未能入选。此编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刊本。(王学泰)

【国朝闺秀正始续集】 清妇女诗总集。十卷。清完颜妙莲保编纂。完颜妙莲保为恽珠之长孙女。恽

氏编《国朝闺秀正始集》中《例言》曾言“嗣后如有以诗文见惠者,仍当随时补梓”,故“当《正始集》刊成后,仍多投诗及采访邮寄者”,恽珠“悉收奁中,不忍遗弃,暇则频加删定。疾剧,手授女公孙曰:‘此四方女士,闻风投赠及文人采访见寄,恐病不起,有负来者之心,汝其续编,以成吾志。’”(见翁瑛《序》)。于是妙莲保对于来稿按照《正始集》之体例加以检定,“共得十卷,又附录一卷,计四百五十九人,诗九百一十九首。吾母复辑补一卷,得一百三十四人,诗三百十首,末附挽诗一册,以志雅谊”(见妙莲保《小引》)。因为是恽编之续,故名《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有清道光丙申(1836)红香馆刊本。(王学泰)

【熙朝雅颂集】 清诗总集。亦名《钦定熙朝雅颂集》。一百三十八卷。清铁保编纂。铁保(1752—1824)字冶亭,一字铁卿,号梅亭,旧谱姓觉罗氏,自称赵宋后裔,后改栋鄂,隶满洲正黄旗。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山东巡抚。嘉庆九年(1804)进所辑八旗诗集,帝赐名《熙朝雅颂集》。此编是八旗王公贵族、文人武士以及闺媛诗歌作品之辑集。八旗在关外时即有写作汉诗者,入关后百馀年间,更是作者如林,有诗集者亦数以百计。但八旗从无总集刊刻,此与康、雍、乾三朝中限制八旗文士过度汉化之政策有关。乾隆末年,汉化趋势已不可遏止,此书之编纂与嘉庆皇帝对此书之承认,便是清统治者限制八旗文士汉化政策失败之标志。编者深知清统治者之忌讳,故编书时十分谨慎。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复杂尖锐,叔侄兄弟之间骨肉相残之事无代无之,因此,在选录作者之时就颇费斟酌。编者说,此书入选之人以《皇清文颖》为主。故于《文颖》所载之人,其诗未见于他编者仅一一登载,不敢稍为遗漏。天潢贵胄,另编首集,其后先以爵位高低为序。其他则参照《清诗别裁》顺序,以若干年为一,一段作者以科名先后为序。此集所收作品多采自诸家本集,无本集者则从伊福纳《白山诗钞》、卓奇图《白山诗存》(此二种旗人总集皆为抄本)及各选本中录入。亦有人以为此书系铁保委托法式善编纂,而法式善将编此集当买卖,许多旗人以奉金而得列名书中(见《随园诗话》舒坤批语)。全书包括首集二十六卷,收五十六人;正集一百零六卷,收五百三十餘人;馀集二卷,收十六人。此编有清嘉庆间内务府刻本,极精美。(王学泰)

【国朝闺阁诗钞】 清妇女诗合集。一百卷。清蔡殿齐编纂。蔡殿齐,字梅龢,德化(今江西九江)人。道光间曾任翰林编修。蔡氏两代人翰林,家中藏书丰富,其姊蔡紫琼、妻万梦丹皆能诗。梦丹早逝,编者为了纪念其妻,“于是理兹散佚,加以删存。紫凤天

吴,愿无忘乎故绣;黄翰绿骅,思有附于前尘”(见其自序)。故编此集以辑清代妇女诗,每人一集一卷,十卷合为一册,凡十册,得百人百集。从清初至道光间较有名气之女作者诗集,大多入录。如吴绡《啸雪集诗钞》、顾若璞《卧月轩诗稿》、徐昭华《徐都讲诗》、林以宁《凤啸楼诗集》、纪琮《绣馥小稿》、张令仪《蠹窗诗集》、徐德音《绿净轩诗钞》、吴若冰《悟雪堂诗钞》、张佛绣《职思居诗钞》、汪韞玉《听月楼遗草》、袁棠《盈书楼遗稿》、席佩兰《长真阁诗稿》、陈长生《绘声阁诗稿》、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集》等。以其姊蔡紫琼《花凤楼吟稿》、其妻万梦丹《韵香书室吟稿》殿后。此编以天干分册,有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刊本,版藏嫔嫒别馆,同治甲戌十三年(1874)嫔嫒别馆又刊《国朝闺阁诗钞续编》,另收正编所未及之妇女诗别集二十种、二十卷。(王学泰)

【清诗铎】清诗总集。原名《国朝诗铎》。二十六卷。清张应昌编选。张应昌(1790—1874)字仲甫,号寄庵,原籍浙江归安(今湖州),改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舍人。张氏处于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多半中国,英法联军亦曾攻入北京,清政府多次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时事多艰,有感于怀,所以编选这部颇能反映清代社会矛盾的诗总集,以供清统治者采择,并用以警世。全书所选上自清初(包括明遗民),下至清同治间,共录诗五千余首,作者九百五十一人。张氏自序云:“尝读子美《潼关吏》、《石壕吏》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乐府》,洵所谓言易知感易入者。当今之世,不少子美、香山、文昌、仲初之咏,散见于各集中。爰就所见,选辑汇编,名曰《国朝诗铎》。以是为道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陈风,览者苟兴起其好善恶之心,岂曰小补之哉?”可见编者为端正吏治民风,效“道人”(古代掌教化者)振木铎沿途采诗,才编选类似杜甫、白居易、张籍、王建等人的富于社会内容的作品,使诗歌起到“通讽谕而抒下情”的作用。全书按内容分为一百五十二类,如“岁时”、“舆地”、“总论政术”、“善政”、“财赋”、“水利”、“催科”、“刑狱”、“兵事”、“边防”、“民变”、“鬻儿女”、“酷吏”、“风俗”、“商贾”、“淘金”、“采矿”、“鸦片烟”等等。分类甚琐碎。由于编者世界观与时代的局限,有些类别渗透了封建观念,如“会匪”、“捻匪”、“棚民客民”、“训士爱士”、“迎送上官伺座过客”等。所录之诗除了描写民生疾苦、揭露阶级压迫作品外,还有一些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诗作。描写当时恶习陋俗的作品亦颇不少。编者着重歌诗的社会教化功用,选入了一些艺术上较为粗糙的作品。因此,此书之史学

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编选始于咸丰六年(1856),迄于同治八年(1869),前后共十四年。他突破了只重“大家”、“名家”的圈子,搜采到一些不甚引人注意的诗人作品,采用了几百种诗集与诗话,许多现已很难找到。卷首所列入选诗人姓名爵里。著作目录,为研究清诗提供了线索。本书初刻为同治八年永康应氏秀野堂刻本。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本排印出版。后附入选诗人姓名笔画索引,以便翻检。(王学泰)

【笃旧集】清诗总集。十八卷。近人刘存仁编纂。刘存仁字炯甫,号念莪,一号遽园,福建闽县人,举人,生活于咸丰、同治间,卒于光绪初。编者自序云:“余少好诗,师友间有佳什,辄录之。乙卯(咸丰五年,1855)后,羁滞京师,获从贤士大夫游,见闻益广,晨书暝写,都为一集。朱伯韩(琦)观察颜曰‘笃旧’。戊午(咸丰八年,1858)挈来兰州,明年权庄浪(地在甘肃)同知,吏事希简,发篋中藏读之,存歿相伴,风窗雨枕,森列吾前,不啻对故人而把袂剧谈也。即有未经亲炙者,传述仪容警咳,如见其人。爰重加厘定,凡八十五家。屈指平生畏友,因行篋无稿,或未见全集而阙遗者尚夥。”书中所取多为道光、咸丰以来活跃于政界诗坛之著名人物作品,如陈寿祺(编者之师,故列为开篇)、陶樾、林则徐、陈沆、梅曾亮、黄爵滋、潘德舆、张维屏、管同、黄培芳、朱绶、姚椿、端木国瑚、姚燮、朱琦、张际亮、鲁一同、林昌彝、何绍基、魏源、符葆森、许宗衡等。每人皆附小传,摘有他人评论,并附有编者所撰《杞云楼诗话》。诗话中或记所录诗人遗闻轶事,或评论其诗文,颇有参考价值。如“张际亮”条中详记际亮去世后其遗稿流转刊刻过程,“符葆森”条记其轶事与编纂《正雅集》宗旨等。此书录福建诗人最多,张际亮一人录诗四卷。有咸丰九年(1859)兰州刻本。(王学泰)

【晚晴簃诗汇】清诗总集。二百卷。近人徐世昌编纂。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直隶天津人。光绪间进士,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官至内阁协理大臣。1918年任北洋政府大总统,1922年下台,退居天津。此书录清诗二万七千余首,作者六千一百余人,是清诗中卷帙最为浩繁之选本。编者云:“选诗义例本竹垞《明诗综》,参以渔洋《感旧》,归愚《别裁》,不分同异,荟萃众长,旨尚神思,务屏伪体,自名家、大家外,要皆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二例并用,而搜逸阐幽,尤所加意。”态度较为通达。对于清初至清中叶之诗歌创作,此编基本上能够照顾到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作品,尽量予以选录。对于为世所重的大家、名家,则着意“多采其尤以示规范”的作品。至于一般作者,

采录较宽,以多收为宗旨,故其采录人数之众,远远超过了《全唐诗》、《宋诗纪事》、《明诗综》、《明诗纪事》诸书。编者博采广辑,搜罗到各省县方志、各朝清诗选本和抄本,保存了大量的流传稀少的作品以及名不见经传诗人之历史资料。对于晚清作品或由于耳目所及,或因为利益攸关,故多存偏见。例如对于倡导“诗界革命”的维新作者选诗较少,所选亦非其代表作品。集中选谭嗣同诗十二首,多为描写山川风景的行旅诗,而谭氏的愤世嫉俗、反抗黑暗现实、激切地希望变革的作品则一首未选。林纾早年有大量的以新乐府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诗汇》中一首未录,却收录他在辛亥革命后作为清朝遗老数度拜谒清王陵的诗作。至于“振华夏之新声”的革命派诗人,如宁调元、周实、高旭等更无只字入选。同治、光绪期间,学宋者比比皆是,革命派诗人,以振兴唐音自命,是清末诗坛的重要流派,此书弃而不录,从诗学角度看亦是重大缺欠。书中所编选之诗话以及编者之评论,大多以平实为主,可资取处不多。此书最大功绩在于为清诗研究提供了线索与资料。有1927年退思堂刊本。中国书店于1985年有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有闻石点校本出版。

(王学泰)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清诗总集。甲集八卷、乙集八卷。清孙雄编纂。孙雄原名同康,字师郑,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光绪甲午(1894)进士,有《郑斋类稿》。“道咸同光”指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清王朝急剧衰落、清统治全面崩溃时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为诗人增添了许多诗料。因此,自乾隆末年文字狱销歇之后二三十年,反映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诗篇从沉寂到复苏,而且日益增多。此编所收多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重大问题之史诗。孙氏编辑此书之目的在于希望引起全社会注意国家危亡在即;另外亦有以诗存史之意。编者序言云:“而吾所录无以名之,姑名诗史,亦史料而已。以为史则去取必严,以为史料则去取之不严,留以待后人之去取可也。”书中多录叙事作品,如张维屏的《三将军歌》等。许多作品取诸作者手稿,颇具史料价值。此书编排以时代为先后,每集一、二卷为道光朝作品,卷三为咸丰朝作品,卷四为同治朝作品,卷五、卷六为光绪朝作品,卷七为闺秀作品,卷八为方外、藩属等国作品。每位诗人皆附小传。编者最初计划分甲、乙、丙、丁四集印行,结果只出了甲、乙两集。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孙雄哀叹此为古今未有之“人伦奇变”,感到再行编纂,毫无意义,乃中止。有宣统三年(1911)编者自印本。

(王学泰)

【近代诗钞】 清末民初诗总集。三百七十卷。近人陈衍编纂。此书收录自清咸丰元年(1851)至辛亥革命之后陈氏所见到的诗人作品,凡三百七十家,人各一卷。但入选作品数量差距极大。所选多为抒发个人感情和描写日常生活琐事之作,很少有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入选每位作者名下附有小传。间附《石遗室诗话》中有关评语。陈氏论诗宗宋,他认为道光、咸丰之后主持诗坛者为祁寔藻、曾国藩,此书即以祁氏开端,选同光派诗人最多,陈宝琛之后作者约占五分之一,而“诗界革命”参加者则很少有代表性作品入选。至于与辛亥革命相呼应、意欲高倡唐音之南社诗人,则没有一位能够入选,革命者如秋瑾这样重要诗人也未能入选。因此,名为《近代诗选》实际上是缺乏近代代表性的。此编过分突出了曾国藩在晚清诗坛之地位,夸大了曾氏对近代诗歌创作之影响。编者宣告此书不选寿诗、拟古诗,少选咏物诗、长庆体诗、柏梁体诗、长短句,入选作品一般皆具有艺术性,同光派的代表作者与代表作品均可见于此书,因此,它还是研究近代诗歌创作必不可少之书籍。有商务印书馆1924年排印本。

(王学泰)

【晚清四十家诗钞】 诗总集。三卷。近人吴闿生编选。吴闿生(1878—?),原名启孙,字辟疆,号北江,安徽桐城人。诸生,官候选知府。近代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之子,濡染家学,曾从贺涛、姚永概学古文,从范当世受诗法。著有《北江诗集》五卷、《北江文集》七卷。所编《晚清四十家诗钞》,积二十年始成书。此集卷首有自序及曾克瑞、贺培新序各一篇。收清末诗人四十一家,共六百四十馀首。自序称:慨于当时“异说纷腾,李、杜、黄之学将绝于天下”,“今钞近体诗以师友源澜为主”。故以其叔父吴汝绳、吴汝纯开卷,以下诗人如范当世、傅增湘、高步瀛等,多系桐城派张裕钊、吴汝纶之弟子或再传弟子,选诗以范当世诗最多,达一百馀首。所收其他当时名家如易顺鼎、郑孝胥等亦为编者之友。并收入日本人永阪石埭的诗及日本无名氏乐府二首。曾克瑞序称:“及胜清之末,肖堂范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时愤国,发而为歌诗”,“自范先生没,当世负盛名者,多能与范先生同源一趣,而轨辙较近,感发较切,示天下学诗者所从入之途,周莫捷于是矣。此吾师北江先生选录近代四十家诗之微意也”。从中可窥见桐城一派诗风。1924年北平文学社刊行。

(王鹰)

【南社诗集】 诗总集。六册。今人柳亚子主编,高尔松、高尔柏编。高尔松、高尔柏兄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新南社社友,上海开华书局、中学生书局创办人。卷首编者《引言》叙述编辑缘起称:“南

社的出版物,虽只有《南社丛刻》一种,但它每期所载诗、文、词,都是充满革命情绪,提倡民族气节,简直是对着那时的中国文坛抛下的一个巨弹。”但《南社丛刻》印数很少,且散失殆尽;1924年胡朴安辑《南社丛选》二十四卷十二册,其中诗仅选一百六十七人、二千余首。《引言》又称:1933年,“我们和柳亚子、陈陶遗两先生谈及了重刊《南社丛刻》的动议,他们很表同情,而且决定全部刊入,以免遗珠之憾;加上新式标点,借能易读易解。经过两年的时间,我们便在柳先生的主持下,并得到许寿平的绝大助力,把这部洋洋四百万言的《南社丛刻》编成为比较系统的《南社诗集》、《南社文集》、《南社词集》。《南社诗集》共分六册,现在首先发行”。第一集前有胡怀琛《南社的始末》、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第一、二章,曹聚仁《纪念南社》,柳亚子《关于〈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徐蔚南《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五篇文章,有胡朴安、孙璞序各一篇,又有邵元冲、吴敬恒、于右任、叶楚伦、林森、蔡元培等四十人题词。是集共列名诗人三百五十人,据集后柳亚子《附记》,知有同名异籍误作一人的,有将同一人名与号分作两人的,又误收非南社社友一人,故实收诗人三百四十四,其中南社诗人三百四十三。按姓氏笔画排列,共收诗近七千首,均录自《南社丛刻》。每册之后附有该册所录诗人之《南社诗集姓名籍贯考》。1936年开华书局出版,中学生书局发行。(王飏)

【近代诗钞】诗总集。三册。今人钱仲联编纂。全书选录了从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七十馀年间一百位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品。每一诗人均附小传,并引述前人评语及编者评论。卷首《前言》,扼要评述近代诗歌发展概貌及各诗派、名家风格,并说明本书编选体要。编者认为,三十年代陈衍所编《近代诗钞》,收录诗人三百七十家,这一拓荒性成果,为近代诗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囿于时代及陈衍“同光体”派诗学观点,一大批代表进步潮流或艺术成就卓越的其他流派的诗人很少、甚至没有选入;即使对宋诗派作者,所选作品也不尽能显示其全貌;此外,还有抉择未精,收录太滥之病。故编者接受1982年近代文学开封会议委托,新编百家《近代诗钞》,力矫陈氏《近代诗钞》之弊,入选各派,以政治上进步、艺术上高明,在近代诗坛上确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能自成一家为准则;入选诗人,着眼于其本人主要倾向和诗歌特色;入选作品,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艺术性不高的不选;风格与题材,顾及多方面。此集所收诗人,有三十家为陈衍所未收。大体包括“初期宋诗派及后期同光体派”、“汉魏六朝派”、“唐宋兼采派”、“诗界革命派”、“南社诗人”、“西崑体

派”、“革命女诗人”、“诗僧”、“不列宗派者”九类。所选诗作均直接从诗人别集甄选,少者五十首左右,多者达一百五十首左右。此书1993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飏)

【三家宫词】合集。三卷。明毛晋编纂。此编收录唐代王建宫词一百首,五代时期前蜀花蕊夫人宫词一百首,宋代王珪宫词一百首,每人各占一卷,故曰“三家宫词”。(一)王建首创以七绝形式描写皇宫礼制、风俗、宫殿楼阁建筑形制、亭台园囿的风光景色,乃至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等人之日常生活。“只言事而不言情,命曰宫词”(蒋之翘《天启宫词序》)。后人递相效仿,王氏遂为“宫词之祖”。王建宫词在南宋已有部分散逸,有人从唐人描写宫廷生活的七绝中选录一些以充王氏宫词。毛晋据古本删去混入之作,并加以校订,乃成今本。(二)花蕊夫人宫词,过去多认为花蕊夫人为后蜀孟昶之妃。经今人浦江清考证,当为前蜀王建之小徐妃、后主王衍之母。所咏为前蜀王衍宣华苑事,正其名当称《宣华宫词》。宫词百首当不止小徐妃一人所作,并杂有其姐大徐妃、王衍以及昭仪李舜弦、宫人李玉箫等人之作。此组宫词皆咏后妃宫女之实际生活及宫苑景色,文笔细腻,文采藻丽,带有女性特点。(三)王珪宫词。王珪(1019—1085)字禹玉,华阳人,北宋神宗时任尚书左仆射。王氏执政十馀年,耳濡目染,对于宫廷生活及宫廷制度较为熟悉,其描写亦较生动。王珪宫词组诗中有些写宫廷对于朝政的操纵或联系,如“黄昏锁院听麻除”一首即写皇帝诏书由阁臣撰就,送入内廷,再由中书发出的情况。这是一般后妃宫女等人所撰宫词很少涉及的领域。此三家合集,常见者有毛晋所刊《诗词杂俎》本。(王学泰)

【二家宫词】合集。二卷。明毛晋编纂。集中收录北宋徽宗皇帝宫词与南宋宁宗皇后杨氏宫词两种。(一)徽宗皇帝宫词三百首,徽宗名赵佶(1082—1135),元符三年(1100)即位,昏庸腐败,任用奸臣蔡京等,招致亡国之祸。作为艺术家则颇有成就,工书法,自成一家,以“瘦金体”名世,工花鸟,能诗词。相传此三百首宫词为其所作。宫词末有“宣和六年”“帝姬长公主”之跋,因此称谓不伦不类,其中所云宫人孔祯又能忌宋仁宗庙讳,故四库馆臣疑此跋为伪作(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从宫词(如“湘簟凉生暑气微”一首)中所反映的皇帝生活及心态来看,其中必有宋徽宗作品,亦可能有后妃宫女作品混入。(二)杨皇后宫词五十首。杨皇后(1162—1233)为南宋宁宗皇后,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泰二年(1202)立为皇后,理宗朝被尊为皇太后,同听政,逾年撒帘,卒谥恭圣仁烈。篇末有跋云:“右宫词五十

首,宁宗杨后所撰,好事者秘而不传,世亦罕见。癸酉仲春,得之江左,何啻和隋之珠璧耶?王建、花蕊不得专美矣。潜夫识。”“潜夫”乃周密别号(泗水潜夫),癸酉为度宗咸淳九年(1273)。此组诗有三十首、五十首之分,清人缪荃荪谓:“大抵宫闱笔墨,不甚流传于外,好事者辑录之,辗转传钞,多寡不同,故有五十首、三十首之异”(《艺风堂文集·杨太子宫词跋》)宫词虽多为杨后所作,其中也有真伪杂糅之处。这组诗中以写宫廷琐事及宫女心态为主。《二家宫词》常见者有明毛晋《诗词杂俎》本。(王学泰)

【全史宫词】 诗别集。二十卷。清史梦兰撰。此书皆为史氏自撰宫词,起自上古有熊氏,下迄明末,凡一千五百首,每首均详注史事,以与诗相印证。意欲以宫词之体综述五千年治乱兴衰,以为读史之助。故于每朝之前,皆列其统系,以便于掌握。许乃普序云:“其词绮丽,其气流逸,其韵铿锵,富于征引而无摭拾故实之迹,长于讽刺而有和平忠厚之风。令阅者晓然于正变之义,慨然于治乱之故。四千余年兴亡一辙,莫不为之击节而歌,掩卷而泣,听其弦外之音,味其言外之旨,无声有声,如怨如诉,诗之教也。亦史才也。”可见作者较为成功地把诗与史结合起来。近人徐世昌谓其咏史之作“冲和朴厚,无轻佻噍杀之音”,并多警句(见《晚晴簃诗汇》)。此集有清咸丰六年(1856)刊本。(王学泰)

【冬青馆古宫词】 诗别集。三卷。清张鉴撰。张鉴(1768—1850)字春冶,号秋水,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嘉庆间副榜贡生,授武义教谕。阮元抚浙时聘至诂经精舍执教。著有《冬青馆集》等。此集所收宫词三百首,起自春秋时吴、越,终于明代,皆为七绝,写历代宫中事,清末桂荣为之注,引据颇丰。张氏宫词,亦多清词丽句。此组诗为张氏少作,初刻于咸丰间,后收入《功顺堂丛书》。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有排印本。又有民国元年(1912)刊本。(王学泰)

【东周宫词】 诗别集。五卷。清吴养原撰。吴养原(1825—1864)字思澄,江苏扬州人。著有史评《乙部随笔》四卷,作者自云:于咸丰庚申(十年,1860)得史梦兰《全史宫词》读之,认为全书采掇丰富,惟东周列国事多有未及,思有以补之,故撰此书。全书共有三百首宫词,咏春秋战国之事,其中许多琐语细事取自神话、小说。自序言宫词“其陈当代者固足以效揄扬而通讽谕,其述往昔者亦足以资考证、寓奖惩。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得古人赋之遗意”。此书初刊于同治癸亥(二年,1863),常见者有光绪甲申(十年,1884)重刊本。(王学泰)

【十六国宫词】 诗别集。三卷。清周昇撰。周昇

字蓉初,江苏南通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著有《十六国霸史补逸》,未刊。此书分上下两卷,分咏十六国事。此期为我国历史上大动乱时期,十六国多为少数民族所建,包括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夏、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成汉。此组诗反映了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共一百二十首,每诗皆详注史事,各国之前略述各国统系;使读者易于掌握。因十六国史书多记符瑞祥异,故诗中亦多涉及到这些荒诞无稽之事,影响了其价值。本书之长在于一些诗注中包含了作者多年研究十六国史之成果。此书初刊于道光十二年(1832),有初刊本传世。(王学泰)

【五代宫词】 诗别集。一卷。清吴省兰撰。吴省兰字泉之,南汇(今属上海)人,乾隆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工部左侍郎,著有《听彝堂偶存稿》。此组诗皆咏五代史事,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组诗共一百首,分代而咏,每代之前,均略述其兴亡始末,颇能反映这段历史曲折发展过程。诗中没有自注,影响了对诗意的理解。传世者有介休范重荣注本和仁和诸嘉乐注本。前者有嘉庆间刊本,后者有乾隆间刊本。(王学泰)

【十国宫词】 ①诗别集。一卷。清吴省兰撰。十国乃指五代时期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包括北汉、南汉、前蜀、后蜀、吴、吴越、南唐、楚、闽、荆南。十国国君多苟安于小朝廷,无远略,其宫廷生活奢华淫靡,吴氏宫词以清丽之笔描写了他们沉湎酒色、歌舞酣醉的腐朽生活,共一百首。有乾隆间初刊本传世。常见者有同治癸酉(十三年,1873)淮南书局刊本。②诗别集。一卷。清吴闿撰。吴闿字香岩,嘉定(今属上海)人。生活于乾隆间。此组诗亦咏五代时期十国宫廷生活,其友钱大昕序云:“曩岁偕林厚堂、王易圃、诸雪堂、汪少山、王鹤谿、王耿仲、毛海容及余家溉亭分赋宫词各十二首,业流布人口。香岩又举九国而尽赋之。共得一百二十首,并以所采书籍,分注其下。其诗清新婉丽,绝堆垛,既不悖于骚人之旨,而注中考证异同,辩论精审,洵足为薛、欧之功臣,刘、吴之益友也。”不仅指出其诗清丽可诵,亦认为诗中小注颇具史料价值。有嘉庆间刊本。③诗别集。一卷。清袁学澜撰。袁学澜字文绮,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失意场屋,以诗名,生活于道光间。此组诗亦咏五代时期十国宫廷生活,作者自序云“五朝十国,置君如弈棋,坐民于涂炭,尤足动人感喟者哉!爰采其杂事,作《十国宫词》百首,复以隶事烦琐,随为粗加注释,非为盘桓风月,遣情艳体,盖欲观者由诗证史,绎注辨词,垂炯戒以禁荒淫,附于《小雅》诗人之义,而不背乎欧史悯乱之怀,是则区区之

微意也。”有清道光间刊本。④诗别集。一卷。清孟彬撰。孟彬字赋鱼，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此组诗共百首，亦咏五代时期十国宫廷之事。收入《香艳丛书》，有清末石印本。（王学泰）

【元宫词】 诗别集。一卷。明朱楠撰。朱楠（？—1425），明太祖朱元璋之第五子，初封吴王，寻改封周王，卒谥定。楠好学，工词赋。此集序云：“永乐元年（1403）钦赐余家一老姬，年七十矣，乃元后之乳姆女，知元宫中事最悉。间悉细访，一一备知其事。故余诗百篇，皆元宫中实事，亦有史未曾载、外人不得而知者，遗之后人以广多闻焉。”由此可知，此组宫词所记史事得之于口耳相传，颇为珍贵。诗凡一百首，因无小注，其中许多描写元代宫廷生活细节者，后人很难理解。此书有明刊本，刘效祖序。

（王学泰）

【明宫词】 宫词合集。不分卷。今人商传编纂。此编共收录描写明代宫廷生活的宫词十五种。包括：（一）《宫词》七十首，明朱权撰。朱权（1378—1448）号臞仙、涵虚子、丹邱先生，明太祖第十六子，封宁王，永乐初改封南昌，谥献，世称宁献王。戏曲家，自幼长于深宫，此组宫词写于永乐六年（1408），记其幼年所见洪武宫中事，颇有史料价值。（二）《洪武宫词》十二首，明黄省曾撰。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活于正德、嘉靖间，曾从王守仁、湛若水游。此组诗着重记事。（三）《宫词》十首，明沈琼莲撰。沈琼莲字莹中，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给事禁中，为女学士。此组诗记其宫中见闻。（四）《拟古宫词》三十首，明朱让栩撰。朱让栩为蜀成王朱椿之后，正德五年（1510）袭王封爵。此组诗以宫女口吻写宫中生活之凄凉苦闷。（五）《宫词》四十四首，明王世贞撰。此组宫词实为三组：《弘治宫词》十二首，《正德宫词》二十首，《西城宫词》十二首。三组写三朝事，最后一组写嘉靖皇帝好道术，修炼长生丹药事，揭露颇为深刻。（六）《西苑宫词》二十四首，明张名凯撰。张名凯字左虞，江苏吴县人。世袭苏州卫指挥使，与王世贞交好，曾入京“观宫阙苑囿，亲见斋宫醮坛之盛，作西苑诗，窃比讽谏之义”（《列朝诗集小传》）。宫词中对嘉靖皇帝崇尚道教记述颇详。（七）《天启宫词》一百首，明秦征兰撰。秦征兰字楚芳，常熟（今属江苏）人，明末诸生。此组诗写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每诗皆有小注，主要写天启年间客氏、魏忠贤擅权事，极富史料价值。（八）《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明蒋之翘撰。蒋之翘字楚樾，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此组诗与秦征兰所作《宫词》内容及形式皆类似，但记事较秦作简略，且有重复。（九）《启祯宫词》三十三首。明刘诚撰。刘诚字伯

宗，贵池（今属安徽）人。明末诸生，入清为遗民。此组诗只有诗无小注，记天启、崇祯间事，感慨多而叙事少。（十）《拟古宫词》四十首，清唐宇昭撰。唐宇昭字半园，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明崇祯间举人。其自序云：“丁亥（1647）春月，止燕都。过长春禅寺，邂逅一老僧，乃昔御用监内侍也。因从闲话，得故宫轶事数十条。归寓追忆，遂一一占之。”用以寄托兴亡之感。（十一）《崇祯宫词》一百八十六首，清王誉昌撰。王誉昌字露溥，清初诸生。此组诗成于康熙三十年（1691），有小注，所写事多得于“白发宫监”、“青林耆旧”。所记宫廷秘事多有史书所不载者，如崇祯间皇帝与后宫妃嫔改奉天主教事等。（十二）《胜国宫闱诗》四十五首，清顾宗泰撰。顾宗泰字景岳，号星桥，元和（今江苏苏州）人。乾隆间进士。此组宫词只是以诗及注文形式评述明代主要后妃，史料价值不大。（十三）《明宫词》一百首，清程嗣章撰。程嗣章字元朴，号南耕，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此组诗有小注，所据多为野史笔记。（十四）《全史宫词》一百九十二首，清史梦兰撰。另有《全史宫词》本，一千五百首。这里所收为明代部分及明代补遗部分，故仅一百九十二首。（十五）《明宫杂咏》四百七十三首，清饶智元撰。饶智元字珊叔，长沙（今属湖南）人。此组诗写成于光绪间，写有明一代宫廷史事，所引据材料极丰富，多有正史不载之事。此组杂咏，体制宏伟，咏及面广，所咏之事皆注明出处，便于查找。《明宫词》所收虽非明代宫词之全部，但却皆是有代表性之作品，此书于1987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王学泰）

【清宫词】 宫词合集。清吴士鉴等撰。今人石继昌编纂。此集收录清代宫词九种，包括：（一）《清宫词》八十四首。署钱塘九钟主人撰，实为吴士鉴。吴士鉴字公簪，号桐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翰林，官至侍读。此组诗写于1912年清亡之后，自序谓其自京归海上，“取有清一代宫禁旧事，撰为宫词，得八十四首，或出于官书之记载，或采自私家之纂述，至所见之世，尤皆身历其境，信而有征”。此组诗从满洲发祥，咏至清亡，涉及宫廷生活，典章制度，风俗轶闻等。（二）《魏息园清宫词》一百零一首，魏程搏撰。魏程搏字莲裳，号息园，湖南湘乡人。此组诗亦咏有清一代宫廷生活，魏氏弟子李珍注释。初印于1915年。（三）《前清宫词》一百首，作者名已佚。此组诗咏自清初至清亡之宫廷生活，但偏重咏清末慈禧太后种种行事及传闻，多丑诋之词。（四）《长安宫词》一百首，胡延撰。胡延字研孙，一字砚生，四川人。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光绪帝逃难至西安，在西安生活近一年。胡延当时为西安

知府,供奉内廷,深知其事,形诸吟咏。但胡氏因感恩遇,多颂扬之词。(五)《汴京宫词》一百首,颜缉祜撰。颜缉祜字伯秦,号函盒,晚号函叟,与胡延为同年。慈禧与光绪由西安返京,途经河南,曾在汴京(开封)小驻。缉祜奉委内廷供支局,曾至潼关迎驾,故作此组宫词以续《长安宫词》。最末一首云:“宫词百首续长安,圣德渊深珥笔难。敢效胡延思宠纪,却非王建述中官。”小注言诗中所述,皆躬亲目睹,事事有征。(六)《金銮琐记》一百三十七首,补遗六首,高树撰。高树字蔚然,别号珠岩山人,四川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军机章京、兵部司员、御史等官。此组诗写于1923年。作者久任京官,历经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举凡朝野佚事、宫廷掌故、北京风物、里巷琐闻,皆写于此组诗中。(七)《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王小航撰。王小航名照,字藜青,号水东,顺天宁河(今属天津市)人。光绪二十年(1894)翰林,后任礼部主事。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号为“帝党”。方家园为北京东城胡同名,慈禧、隆裕两朝皇后娘家皆在此。此组诗即述此二人轶事。(八)《清宫词》三十首,杨苕械撰。杨苕械字瑟民,宝山(今上海市)人。此组诗写于宣统退位出宫之后,故宫已成博物院,作者曾入内参观,故多写实。(九)《颐和园杂题》十首,周大烈撰。周大烈字印昆,湖南湘潭人。北洋政府时期任众议院议员。此组诗以写颐和园风光为主。以上九种皆为七绝,诗后附小注,有些组诗注文极繁。书后附王闿运《圆明园诗》、王国维《颐和园词》、张怀奇《颐和园词》、邓谔《颐和园词》、王景禧《宫井词》等。此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王学泰)

地方总集

【国朝畿辅诗传】地方诗总集。六十卷。清陶樾编纂。陶樾字宁求,号鳧乡,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红豆树馆诗钞》。“畿辅”指京师附近之地。这里指直隶省,即今河北省。河北于明末清初诗学较发达,出现了名声远播江南的诗人申涵光与以涵光为主的河朔诗派,其他如杨思圣、张盖、殷岳皆有名于时。贵官魏裔介提倡风雅,编选《清诗溯洄集》,对畿辅诗歌创作皆有所影响。乾隆、嘉庆以来,翁方纲、纪昀、朱珪这些开宗立派,影响全国、左右诗坛之达官亦为直隶人。而清初以来诸家清诗选本往往“详于南而略于北”,此书之编意在展示直隶自清初顺治三年(1646)至道光十七年(1837)近二百年中诗歌创作成就,共收八百七十五位诗人之作品。编者自云:“樾系官于

斯(指畿辅)前后凡二十三载。先是在京师已与其邑之人士游,至是益习其土风,谙其故事,而邑人士亦多以所藏选本见眎,乃始荟萃诸作,录而传之,复为小传、诗话以综其事。多者不敢滥,僻者不敢遗。有若宏儒硕学,名在人口,而句律无存,亦复详端绪,以待后人之补辑焉。”(自序)书中所选,注重庙堂文学与能体现封建伦理道德之作品。“我国家文治武功,典礼明备。载笔诸臣,鸿章巨制,雍容揄扬,足备一朝掌故。又如忠义节烈之事,垂之歌咏,足以翊名教而植纲常,有关世道人心,尤非浅鲜。亟应采辑,以广流传。盖不独以清词丽句见长,有裨实用”(见《凡例》)。李蔚为入清后首科癸酉(顺治三年,即1646年)进士,位至东阁大学士,陈廷敬言“其诗遭际盛时,有雍容太平之象”,于是列在卷首;而由明入清之达官(如梁清标)则列在顺治首科进士之后。重要作者均列专卷,或二人一卷。如李蔚一卷,魏裔介、魏象枢二人一卷,杨思圣一卷,申涵光一卷,张永祺、郭棻二人一卷,成文昭一卷,边连宝一卷,朱珪一卷,王永芳一卷,翁方纲一卷,朱筠一卷,纪昀一卷,李惟寅、沈峻二人一卷,舒位一卷,李云章一卷。此编所录之诗多取自诗人专集,非摘自选本,前列各家诗集五百余种,小传、诗话之征引书目凡百十余种,亦列于《凡例》之中。可资考证。诗话中有编者自撰,署名“红豆树馆诗话”。有清道光己亥(1839)红豆树馆刊本。(王学泰)

【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地方诗合集。二十一卷。高凌雯编纂。高凌雯字彤皆,天津人。生活于清末民初。“天津”指天津县,清代天津县属直隶省天津府统辖。高氏修纂天津方志,征求本乡诗人,所得诗集多为未刊之稿。“修志之暇,略加甄择,遂谋付梓,以永其传。凡得十有二家。抚宁张氏,大兴胡氏,生长兹土,子孙入籍,故侪诸乡人之列”。之所以选此十二人,因为“其诗卷帙匪繁,雕镌尚易。故曰‘小集’”。另外,“此十数人,大率家世清寒,势不能为先人刊集,故且代为之谋也”。(均见自序)每个小集皆经过高氏整理,并写有跋语。此集中包括:(一)《欽乃书屋乙亥诗集》,一卷,抚宁张霁撰。张霁字笨山,号帆史,原籍抚宁,生于天津。廩贡生。此集乃其康熙三十四年(1695)作品。(二)《履阁诗集》,一卷,张坦撰。张坦,字逸峰,张霁侄。此集存诗八十八首,前有姜宸英序。(三)《秦游诗》,一卷,张堦撰。张堦字声百,张坦弟。此集为其去西安省父时所作。前有姜宸英《序》。(四)《读书舫诗钞》,一卷,大兴胡捷撰。胡捷字象三,康熙初,其父自大兴徙天津,并定居天津。此集为其南游之作,存诗一百二十六首。(五)《卜砚山房诗钞》,二卷,天津周焯撰。周焯字月

东,号七峰,贡生。生活于雍正、乾隆间。此集前有吴廷华、朱函夏、汪沆三序。(六)《灵斋诗集》,一卷,天津胡睿烈撰。胡睿烈字文锡,诸生,生活于雍正、乾隆间,与查为仁交好。诗笔雅健。此集录自《津门诗钞》。(七)《青蛭居士集》,天津丁时显撰。丁时显字名扬,登进士第。生活于乾隆间。此集为其全稿。(八)《林於馆诗集》,二卷,天津林昌业撰。林昌业字立功,号次斋,原籍浙江海宁,以事遣戍济南。遇赦,北徙天津,遂定居,生活于乾隆间。此集未刊行,得之金氏家,集前有梅成栋、华长懋题辞。(九)《蕉石山房诗草》,一卷,天津康尧衢撰。康尧衢字达夫,生活于乾隆、嘉庆间,尝主一时诗坛。此集为其三十岁以前作品。(十)《欲起竹间楼存稿》,六卷,天津梅成栋撰。梅成栋字树君,以诗名于嘉庆、道光年间,平生写诗五千余首。此集乃应其友余堂之请,并清萧思谏删定,存诗五百六十余首,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终于道光十二年(1832)。前有余堂序与作者自序。(十一)《韵湖偶吟》,二卷,天津刘锡撰。刘锡字梦龄,生活于道光间。此集包括前集与后集各一卷。(十二)《醉茶吟草》,二卷,天津李庆辰撰。李庆辰字筱筠,生活于同治、光绪间。此集乃从其全集中选出,存诗三百一十首,多描写清末动乱之作,前有蒋兰畬《序》,此合集编成于1924年,十年后金钺刊于天津志局。

(王学泰)

【遵化诗存】 地方诗总集。十卷。清孙赞元编纂。孙赞元字襄臣,丰润(今属河北)人。举人。生活于同治、光绪间。遵化在清为直隶省直隶州,统辖丰润、玉田二县。孙氏被聘主讲燕山书院(在遵化),并协修州志,搜集本州文献,遂辑此编以存有清一代遵化文人诗词。清以前遵化少有以诗文名世者,可确考者只有金之王寂、王霖兄弟以及明代张儒。清代遵化诗人渐多。清初谷应泰虽以史学著称,诗亦可观;周体观以诗名世,施闰章言其诗似杜甫秦州诗(此编录周诗三十余篇)。其他如曹鼎望、魏元枢、董榕、曹钊皆一时负才名者。此编共收作者一百余家,其中有九人当时尚存于世,作为附录编为一卷。书中兼收久居遵化之汉军旗人,并附“闺秀”一卷。“每人名下必详其字号爵里与著有何书。其有嘉言懿行见于何书及本集序文中者,亦必摘录数语于前以表梗概,令后世诵其诗,可想见其为人”(见《凡例》)。编者所见之遵化诗人专集全稿,凡三十余种,均能详加著录。其余则多取自故老家藏断简残篇。书后附词一卷,收曹钊、赵国华等五人词。此书编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前有遵化知州陈以培序,以及赵国华、徐会泮、秦澍春三序,后有协助孙氏编纂此集者史恩培跋。有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王学泰)

【沧州明诗钞】 地方诗总集。一卷。清王国均、叶圭书编纂。王国均字侣樵,沧州(今属河北)人,生活于道光、咸丰间。叶圭书字芸士,国均表弟,曾官山东按察使。沧州诗学自明而兴,此编所采皆明代沧州人诗。全书共收十五人,始于明成化间之张缙(曾官沧州,有惠政,致仕后过沧州,被州人留止,遂家于沧州),终于崇祯间贡生王端履。书中取张缙、刘焘、王国祚三人诗较多,全书共录诗三十九首,遗佚颇多。编者序云:“前辈如马公昂、戴公才皆能根柢风骚,牢笼万有,不苟从人步趋者,惜乎兵燹以来诗文散佚,均二十年中极力搜求,了无所获。”每位作者皆附小传及评论。此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编成,有咸丰九年(1859)刊本。附于《国朝沧州诗续钞·补遗》之后。

(王学泰)

【国朝沧州诗钞】 地方诗总集。正集十二卷,补钞二卷,清王国均、叶圭书编纂。沧州,在清代属直隶(河北省)天津府统辖。沧州地近北京,自明以后诗学日渐昌明,但皆未显于世,大兴牛坤序:“予家与沧州旧族王张李叶皆戚谊,其源皆百余年,而不知诗人若是之多也。”之所以如此,亦由于无人表彰。王氏以老布衣竭十馀年心力,编成此集,其目的在于保存乡邦文献,并以“抒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李德序)。全书共录一百二十余人,编者自云:“一人有穷达,诗即因之显晦。此编于名公巨卿,在所必取;而布衣寒士,亦所不遗。世之操选政者,皆恪守门户,独标意旨,合则存,不合则去。此钞不立阡陌,并存作者本色,不敢称为诗选,故名曰诗钞。”(见《序例》)全书录诗一千三百九十余首,题材较为丰富,风格亦较多样。如宋起凤之慷慨多气,王公弼之闲旷平易,戴明说之深浑奇峭,张延绪之恬淡萧疏,皆颇有成就。特别是宋起凤《南北杂咏》组诗十九首,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政情及军事变迁。入录作者在字号官爵下“有事迹可载者以行实居先,逸事次之。见闻最确而无书可征者以按语附后,使人读其诗知其人。庶吾乡前辈典型不至湮没。又诗家小传最贵简要,州志百余年未修,故叙述稍繁,以备异日文献之征”(《序例》)。全书始于宋起凤,终于王国均之兄王国维。所录皆盖棺论定之人,正集刊于咸丰三年(1853),前有山东巡抚李德以及牛坤、俞浩三人序。正集刊成后又编“补钞”,王国均自序云:“《沧诗补钞》即《正钞》诸家所遗之诗也。均以二十年客游于外奔走,不遑采访,率多缺略。道光丙午(1846)仓卒成书,颇以为憾。迨咸丰癸丑、丙辰间(1853—1856)家居数载,于兵燹之余,详加搜辑,复得诗如千首,分为二卷,并以付梓。”有咸丰八年(1858)刊本。

(王学泰)

【国朝沧州诗续钞】 地方诗总集。正集四卷,补遗一卷。清王国均、叶圭书编纂。王、叶已有《国朝沧州诗钞》十二卷、补钞二卷刊刻问世。十馀年后,编者感到“诗钞”、“补钞”皆有所遗;“又亡者之相继,岁月既积,篇什益多”,故王氏又加搜罗,再编此《续钞》。全书共录清代作者五十馀人,始于吕藩(康熙间贡生),终于叶圭桓(编者叶圭书之兄弟)。其中较有名者为庞垲(字雪崖),庞氏康熙十八年曾举博学鸿词,诗专学杜,在沧州为成就最高之诗人,录诗一百六十馀首。其次,录叶圭绶诗亦达百首,叶亦为主书之弟,其诗多写北方风景民俗。“补遗”所录为“续钞”遗漏之人,包括久居沧州之旗籍作者,如提录、明善等,全编共补十三人。有清咸丰七年(1857)刊本。

(王学泰)

【永平诗存】 地方诗总集。二十四卷。清史梦兰编纂。史梦兰(1813—1898)字香崖,号砚农,晚号止园老人,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道光间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府,著有《尔尔书屋诗草》。永平,在清代为直隶(今河北省)之府,统辖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临榆等六县与滦州。永平府地近北京,其诗学在明清之后日渐昌明。此集收清初至同治间永平人诗。始于顺治三年(1646)进士刘鸿儒,终于同治间巡检高承基,最末一卷为历代闺秀。清代永平人中并无特别杰出之诗人,此集所录诗人作品以余一元、林徽韩、张霖、宁长年、薛国琮、李广滋、马恂等人较佳。“所录诗人,皆以盖棺论定者为准,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浅深高下,各就其人之擅长者录之,绝不敢区唐界宋,存选家门户之见”(《凡例》)。编者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之作品兼收并蓄,但书中所录还以质朴、平易作品为多,说明永平诗风即是如此。作者“每人名下必详其字号爵里与著有何书,其有嘉言懿行见于墓志、家乘及本集序文、名人诗话、府州县志书者,亦必摘录数语于前以表梗概。后以《止园诗话》继之,要令后世诵其诗即可仿佛其人,亦元遗山《中州集》之遗意也”。其“编次先后率断以科第,无科第者则按其世次,约略叙入”。“诗中故实有关永平文献者,并存原注,或间附征引”(皆见《凡例》)。全书共收一百六十馀人,前有鲍源深序。有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王学泰)

【山右国朝诗存】 地方诗总集。二十四卷,附集八卷。清李锡麟、王攀、李素等辑。李锡麟字石臣,号铁船,泽州(今山西晋城)人。王攀字桂岩,阳曲(今山西太原)人。李素字东木,山西临县人。三人皆生活在乾隆、嘉庆间。“山右”指山西,疆域与今山西省相近。山西自明以来诗学不振,自清初到嘉庆二百年间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仅傅山、吴雯、陈廷敬三

人,其中纯以诗名世者仅吴雯一人。此书之编意在保存乡邦文献。全书收录自顺治初至嘉庆初年诗人五百八十九人,诗四千二百一十馀首,其中得自容纶常《山右诗钞》、秦紫峰《三晋风雅》者约占十之二三,得之搜辑者十之七八。所辑之诗“不加评释,不著圈点,其原有自注者仍之”。“凡本集有经前人论定及其人懿行见于志乘、韵事见于诗话说部者,略摘梗概著于爵里之下”(见《例言》)。所录诗歌中有许多是写山西风光与风土民俗的。录诗不拘一格,以备一方掌故为主。正集二十四卷所收均为盖棺论定之人,附集八卷皆为“当世名公大人,骚客墨士”。此书前有山西布政使张师诚序与李锡麟《弁言》。有嘉庆六年(1801)刊本。

(王学泰)

【潞安诗钞前编】 地方诗总集。四卷。清程之诏编纂,常煜、连宝东修订。程之诏字二漳,号什裘,又署武陵山人,山西长治人。康熙间岁贡生,有《舌耕堂诗赋》十二卷,兼通医术。潞安,清代为山西之一府,治所在长治,领七县: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此编收录为潞安府之明诗。潞安开化较早,《诗经》唐风、魏风中有些篇章即为潞安人作品。有明一代,名公巨卿,挖扬风雅,对当地诗歌创作颇有影响,诗作颇多。而明末清初,战乱频仍,潞安人诗多散佚。程氏云:“天下诗,天下人共存之;乡人诗,必赖乡人始存也。”因之,“不揣谫陋,有潞安明诗之选也。虽精微奥妙,非所管窥。然于三百年间,上自王公,下逮韦布,旁及释道,冥及仙鬼。平如砥者录,即险如涛者亦录也;清如水者录,即艳如花者亦录也;巍巍然如垂绅播笏者录,即飘飘然如凭虚御风者亦录也。不惟钟、谭、王、李,无容左袒;即汉、魏、李唐,亦无容胶柱。第求其和平温厚,俊逸清新,近于三百之旨者选集成书。”编者认为因其选诗注重内容,所以“三百年之治乱兴衰、臧否得失,讽读之下,咸可助其观人论世之明,则潞之诗即谓潞之史亦可”。全集共收九十四人,诗七百一十三首。录诗最多者为其曾祖程应登(七十五首),其次为潞安名人王廷相(五十九首),依次为刘龙(五十七首)、李尚实(五十首)、程正己(四十五首)、任环(四十三首)、栗应宏(三十六首)、周一梧(二十二首)、渾宪王朱允移(二十一首)、栗永禄(二十一首)。程氏编成书后并未刊刻,后常煜与友人连宝东“重加抉择,细酌去留,详注其里爵出处。信者因之,疑者阙之,繁冗者裁之。故小传中,因其旧者半,斟酌损益之者亦半”(见常煜叙)。于道光十九年(1839)刊刻问世。前有程之诏序与常煜叙。

(王学泰)

【潞安诗钞后编】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常煜编纂。常煜字经桓,号晴川,山西长治人,嘉庆间举

人,曾官广西县令。常氏既刻《潞安诗钞前编》,又辑清初至道光间潞安人诗作。编者认为,人清以来潞安贾瑀升、程之诏、靳荣藩、冯文止等,颇能继明代本乡之诗风而有所发展。潞安清诗“或以古雅胜,或以恬淡胜,或以宏博胜,或以秀丽胜。其他或出奇丽于艰难,或发纤秣于简古。凡稍近风雅者,一二篇录,十余篇亦录。用以备一方之掌故”。“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可知,即其人之学问、心术亦俱可知。至于一代之运会,一方之风尚,又乌不可知哉”(皆见常煜叙)。此书共收作者二百三十四人,录诗一千六百九十四首。录诗最多者为万国宁(一百五十四首),其次为靳荣藩(八十首),冯文止(七十九首),张天宠(七十五首),王家千(七十四首),程之诏(六十二首),贾瑀升(五十六首),郎克谦(五十五首),杜廷采(四十一首)。其他皆在四十首以下。每人皆注明字号里爵,有些系以小传间附评论,其选诗亦以言志抒怀及写当地风俗、风光者为多。有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寡过未能斋藏版”,前有常氏自叙及《征刻国朝潞安诸先辈诗稿启》。(王学泰)

【秀容诗文集】地方诗文总集。十四卷。近人陈敬棠编纂。陈敬棠字芷庄,忻县(今属山西)人,生活于清末民初。“秀容”,古郡名,郡治在秀容县,隋改为州,称忻州,即今山西忻县。忻县于金末产生了大诗人元好问,故当地文风较盛。编者自叙云:有清一代,忻县“文物之盛,不逊于往昔,其间博学能文者,不尽无人。特以士风淳朴,诸先哲多谦抑自持,虽有著述,以为是区区者乌足以问世!其歿也,及门后进,又不克网罗放失,以导扬而表彰之,积岁愈久,散佚愈甚”。陈氏应山西省征求文献之请而编此书。全书共收五十八家,录诗六百餘首。作者名下注明“其姓氏里居以及生平事迹,考之旧志,稽之残碑,均列事略一篇,弁诸篇首”。对于那些“有专集行世而原版尚存,及已载入志乘者,不复收录”(自叙)。其中选诗最多者为杨履晋(二百十首),其次为范沂(一百零一首),杨敬儒(九十八首)。书中所录诗风格亦以古朴平实者为多。此书编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有常赞春、邢玉霖所写二叙及作者自叙,从中可了解此书编辑过程及其意义。有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传世。(王学泰)

【南亭诗钞】地方诗总集。十二卷,附集二卷。清范士熊编纂。范士熊字熊一,号悦山,山西武乡人,著有《瘦寒吟稿》,生活于道光、咸丰间。“南亭”,武乡之古名,即今山西武乡。此书编纂清代武乡人诗作,始于清顺治初年,终于道光末年。共收录作者四十餘人、诗一千一百餘首。武乡本山西太行山麓偏僻小邑,诗学不甚发展。至道光间,程林宗、魏守

经、范士熊等结社吟诗,方有大量作品出现。编者虽云编此书意在保存乡邦文献,实际是使自己及同仁诗作得以传世,故书中以选程、魏、范及同时作品为主。其中选魏守经作品最多(一百九十八首),其次为范士熊(一百九十六首)、程林宗(一百二十四首)。与范、程等交好的赵昌业选一百二十首、王梦聘一百首。书中所保存的武乡先辈之诗作不及全书三分之一,其中也多为程氏、魏氏先人作品,其他家族作品收录极少。此书一至十卷为正集,录诗起自程林宗五世祖程康庄,终于魏守经;十一至十二卷为续集,所录多为程、魏、范三人之兄弟或后辈之作。附集二卷为范士熊诗作,由魏守经选定。此书前有程林宗、魏守经、范士熊三人《序》,有清咸丰间刻本,石竹斋藏板。(王学泰)

【国朝山左诗钞】地方诗总集。六十卷。清卢见曾撰。“山左”即山东,与今山东省疆域大致相同。卢氏自序云:“国初诗学之盛,其盛于山左。渔洋(王士禛)以实大声宏之学,为海内执骚坛牛耳垂五十餘年。同时若宋荔裳(琬)、赵清止(进美)、高念东(珩)、田山薑(雯)、渔洋之兄西樵(王士禄)、清止之从孙秋谷(赵执信),咸各先登树帜,衣被海内。”清初诗歌创作繁荣,主要表现在山东与江浙地区。江浙著名诗人多为明末遗民,或虽勉强出仕新朝而颇怀贰心之人;而山东地区著名诗人多为清朝权贵或官宦。因此,江浙清初诗可视为明诗餘音,山东清初诗可视为清诗之开端。此编共收诗人六百二十餘家,诗五千九百餘首,附见诗一百一十九首。集中特别注重收录有成就诗人之作品。王士禛选三百九十九首,宋琬、赵进美各一百六十三首,高珩、赵执信、王士禄各一百五十多首,田雯一百二十七首,张实居一百首。编者自云:“是集以钞为名,不敢居于选也。选家标立风旨,合旨收之,不合者去之,使人吾选者如金入冶,融炼一色,乃为宗旨。钞者乃存本色。窃尝谓诗有二十四品,非一格之所可拘,入主出奴,亦古今文人之一病。”(《凡例》)因此,集中网罗了各种风格、题材之作品。每位作者各附小传,“以行实居先,逸事次之,见闻最确而书无可征者,以案语附后”。录入之诗“有关于吾乡名胜古迹、园亭物产及小说遗闻、隶事之僻秘者”,“各附考辨于下,述古证今,以释滞而晰疑,固为好学深思者所共赏也。若夫诗有轶人,乡有轶事,皆为补载”(皆见《凡例》)。此书编于乾隆十八年(1753),完成于乾隆二十三年,宋弼、惠栋、沈大氏等协助卢氏编纂。有乾隆二十三年雅雨堂刻本。(王学泰)

【国朝山左诗续钞】地方诗总集。三十二卷,清张鹏展编纂。张鹏展字南崧,上林(今属广西)人,进

士出身,曾为山东学政。张氏于嘉庆十五年(1810)主持山东乡试,后留任山东学政,于暇时征求山东十郡二州文士著述,有感于山东文治兴盛,诗学源远流长,因起意继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编纂此集。其体例与《国朝山左诗钞》同。鉴于卢编有所遗漏,此集开端仍从清初顺治间起,终于嘉庆中叶。所录一千余家,基本上以科名为次序。卷三十收“闺秀”,三十一、三十二卷为“流寓”、“方外”、“鬼仙”。每人皆附小传与评论。编者云:“凡小传所载懿行嘉话,多据其人墓志家乘及本集序文,或府州县志,皆著明所据。间采掇散逸,均有所自,非无征也。”又云:“诗中故实,其有关山左文献者并存原注,或间附征引,若已见于古书,无庸更加详载。”(皆见《凡例》)集中对于已收录之人不再录,对于应制之作以及集句、回文等体亦不录。对于当时有影响的作者选录较多(按,雍正至嘉庆间,山东已无人能与清初宋琬、王士禛、田雯等相媲美),如卢见曾录三十七首,宋弼录一百三十一首,刘墉五十七首,董元度五十三首,韩梦周一百一十三首,李文藻七十一首,阎循观八十二首,李怀民二百二十五首,李宪乔二百九十一首,王宁焯一百二十八首,桂馥三十八首。实际上三李一王一阎录诗之多与其成就并不相称。有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四照楼藏版。(王学泰)

【国朝山左诗补钞】地方诗总集。四卷。清张鹏展编纂。署名卢见曾之《国朝山左诗钞》,实际是山东德州宋弼所编纂,但其取舍两人有分歧。宋氏言:“往时钞诗之役,仆实尸之,是非取舍,具有权衡。又昔人云:‘佳篇既多,则中驷亦逸;雅制未协,虽次乘必录。’由斯以言,岂非彰阐之微义而爱憎所不能加、附和标榜所不能溷者哉!前刻既成,殊乖本怀;而成事不说,固执无益。是以收其简漏,益以新搜,凡得姓氏若干,诗篇若干,以为《续钞》。其原选不当逸者及前仅摭录而后睹全本者,录为《补钞》共若干卷,特藏之篋笥,以俟后贤。于乡国前哲,庶可以告无罪;即于仆之初心,亦可以少安。非若昔人争立门户、伐异党同者也。”(《国朝山左诗续钞补钞序》)《续钞》四卷,共录二百一十七人,由张鹏展编入《国朝山左诗续钞》,并扩大为三十二卷。《补钞》七卷由张氏“略为裁减,并作三卷”。“宋弼札记曾云:‘荔裳(宋琬)先生全集,征之不得,他日宜另补之为第一卷。’今从《安雅堂未刻诗》及《入蜀集》选登若干首为第一卷,以竟其志。”(见张氏序)可知所收作者皆为《国朝山左诗钞》已收录,此编只是补诗而已。其中补诗最多者为宋琬(六十一首)、其次为张谦宜(三十九首)、高凤翰(三十四首)、金奇玉、蒲松龄(各十三首)。其余一百一十餘人在十首以内。作者小传、评论因已见

于《国朝山左诗钞》,故此编一律不赘。有清嘉庆间刻本。(王学泰)

【青州明诗钞】地方诗总集。四卷,续编一卷。近人赵愚轩编纂。赵愚轩字东甫,山东寿光人。曾官山东东平县知县。生活于清末民初。青州在明代为府,属山东省统辖。领有益都、莒州、临朐、博兴、高苑、乐安、寿光、临淄、安丘、昌乐、诸城、沂水、日照、蒙阴等州县。此集收青州一府十四县作者之诗,始于宣德进士马愉,终于明末李思孝。附“闺秀女仙”、“衡藩”(指封于青州之衡王)、“侨寓”。共收录一百四十五人,诗一千一百七十首。“续编”又录九人,诗十六首。明代青州盛于诗学,出现过不少影响南北之诗人,如李舜臣、冯惟敏、冯惟讷、焦竑、公鼐、冯琦等人。清王士禛欲辑青州诗而未果。宋弼所辑《山左明诗钞》,青州仅收四十餘家,诗五百餘首。此编虽晚出,其搜罗远较宋书为富。编者广猎群籍,历时十五年编成。其中有些诗集为前人所未见。如李中行,诗名曾震齐鲁间,宋弼之书载其小传而未录其诗。赵氏得李诗手稿,选诗十数首。又如明末兰阳令来仪曾与李自成交战,被执囚襄阳会仙楼,所著《幽愤集》一卷,亦不为人知,编者得其手稿亦录诗十数首。书中取诗最多者为黄祯(一百零五首),其次为公鼐(九十三首)、蓝田(侨寓七十七首)、公鼐(六十三首)、周若水(五十九首)、钟羽正(四十八首)、冯琦(三十二首)、冯惟敏(三十首),李舜臣、黄卿、冯裕、王若之、王濬各二十餘首,其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其选诗注重较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入录作者“人各系以小传。国史志乘、碑碣家传、名人专集、稗官杂记,有涉及其人及诗中有关忠孝大义、讽刺时事,无所忌讳,足资掌故者,详征博引、摘要著录,注所自来。古人行事,昭于来祀,后之读者,知人论世,可纾高山景行之慕”(见邹允中题辞)。此书前有傅增湘、田步蟾、邹允中及编者四序,后有王之惠、崔志坚后序及编者跋尾。前列“采录书目”凡一百六十五种。有1930年济南排印本。(王学泰)

【牟平遗香集】地方诗总集。十六卷。清宫卜万编纂。卜万字寿卿,诸生,山东宁海州(今牟平)人。牟平,古地名,清代名宁海州,属山东登州府统辖,现又称牟平。宁海地处海隅,名公巨卿罕至,其文治不为外人所知。卢见曾编纂《国朝山左诗钞》,取牟平诗很少。然牟平自明以来,文人学士亦多结社吟诗之举。编者序云:“至胜国正(德)、嘉(靖)以来,擅骚坛者林立矣,王氏子弟(王日新、王居敬等),号称‘乌衣’;河东曲氏(曲谐等),名重‘三凤’。他如常晋侯父子(常秉仁、常康)、胡涑水昆季(胡文英等)、贺鉴湖、曲泗源、王那居、吕吾与诸人,一时刻意弄吟,大

倡诗社。”至于清代,则有李永绍、杨维乔、祝元敏、宋克智、张崧等相继主盟骚坛,赓相唱和。但皆局于一隅之内,鲜为外人所知。官氏认为之所以如此,由于无人搜罗表彰,久而湮灭。此书之辑在于保存文献、表彰先贤,以供修志者参考。全书共收作者百余人,诗千余首,词二十六首。其中五代一家,诗一首;金代四家,诗九首,附词一首;元代一家,诗一首;明代二十一家,诗一百三十八首;重点在清代,一直搜罗到乾隆、嘉庆间人。书中注重采摭诗人遗闻轶事,于“孝行”、“忠烈”、“政绩”等符合封建道德之行为多有表彰。此亦集名“遗香”之意。编者云:“曩哲事迹,自前明以来,志乘缺如,延访多年,凡有所据,撰其故实,缀以小传。裨异日修志者之刍蕘。如无确证,姑阙疑焉,不敢稍参臆见,以讹来者。”(见《凡例》)此编以时代、科目先后为序,后附“流寓”六家以及“羽士”、“女仙”、“闺秀”等。集中录赵子轅诗最多,凡二卷,二百三十余首。编者经营此书凡三十余年,于嘉庆十年(1805)编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集资刊刻问世。前有刘绎、张宗光、屠道彰及编者序,有赵子轅跋及编者后叙。

(王学泰)

【益都先正诗丛钞】 地方诗总集。八卷,附编一卷。清段松苓编纂。段松苓,字劲伯,号赤亭,又号玉华子,诸生。好金石碑版,有《穆如堂诗草》。生活于乾隆、嘉庆间。益都,县名,清属山东青州,今属山东淄博。益都虽小邑,清顺治、康熙间诗学颇盛,著名诗人有赵进美、冯溥、王遵美、赵执信等。此集初编录益都历代诗,起于北魏孙道相、唐之崔信明(以写“枫落吴江冷”而闻名者)及其孙崔辅国(二人作品几乎全录)、明代著名者为冯惟敏、冯惟讷兄弟与冯琦,终于乾隆末。补编为邑人朱沅等人所补,至嘉庆、道光间。附编亦段氏所编,因所收为“闺秀”、“方外”、“仙鬼”诗,与“先正”之名有悖,故列为附编。此编以保存文献为主,“寓一邑之人文,存历朝之遗韵,所钞尤夥,故曰‘丛钞’”。入钞世次本之科目,“小传所载懿行嘉话,多据其人墓志家乘及本集序文、府州县志,皆著明所自,非无自也”。“以行实居先,逸事次之,见闻最确,而书无可征者以案语附后”(皆见《凡例》)。段氏编此书未竟而去世。朱沅、杨绍基等加以增补,杨氏订其遗稿,缀以小序;钞录成帙,丁文田撰凡例,于光绪十年(1884)刊刻出版。

(王学泰)

【渠风集略】 地方诗总集。七卷。清马长淑编纂。马长淑字寥亭,山东安丘人。曾官磁州,生活于乾隆间。渠,邑名,属山东安丘县,此集所收皆明中叶至清乾隆间渠邑作者诗词。渠虽小邑,但诗风甚盛,邑中四大家族曹、马、刘、王有多人从事诗歌创

作,产生了如曹贞吉、曹申吉这样有全国影响之诗人。全书共选作者九十七人(包括流寓及马氏家集中作者)。始于明正德间黄祺,终于清乾隆间秦钧、刘星宿。录诗最多者为清雍正间进士王寿长(四十八首),其次为曹瀚(三十五首),王孟煦、曹贞吉、曹申吉、曹湛、刘正宗(各二十余首)。第五卷马氏家集中马澄、马长春、马应龙、马常沛等亦各有二十余首。其余则在二十首以下,全书共录诗七百余首。选诗不拘一格,“或高华典贵,如商彝周鼎之严重也;或老健雄深,如苍松之森挺也;或天矫离奇,如飞龙腾蛟之变化也;或清润闲雅,如虞琴湘瑟之谐和也。片长悉录,诸美毕登”(曹瀚《渠风后叙》)。每位作者皆注明字号爵里及其生活时代。第一至四卷选录明至清本邑作者,五卷为马氏家集,六卷所收多为流寓渠邑之作者,也有少量“方外”、“闺秀”作品。书前有曹瀚《渠风后叙》、李大本《渠风后序》,并有编者《渠风题词》。此集于乾隆癸亥(1743)编成。有“辑庆堂”刻本。

(王学泰)

【武定诗续钞】 地方诗总集。二十四卷。清李佐贤编纂。李佐贤字仲敏,号竹朋,利津(今属山东)人。道光乙未(1835)进上,官至汀州知府,著有《石泉书屋类稿》。武定,为山东府名,统辖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利津、霑化、蒲台及滨州等九县一州。此集乃继李衍孙《武定明诗钞》与《国朝武定诗钞》而编。编者自《序》云:“吾郡诗钞自惠民吾宗味初公(指李衍孙)编辑,始于明代,以洎国朝,得诗十二卷,文献略备,诚盛举也。迄于今又七十余年矣,而嗣响无闻。此数十年间,后学继起,未必不可追踪前人。况前钞所选当有人虽存而诗有遗者,更有诗与人并遗之者。及今网罗散失,千百中当可有什一之存,倘再听其散佚,恐不免与风烟俱化,岂不重可惜哉!”“吾虑吾郡之著作,今犹及见者,久或无存,因即前钞以后之诗,访而录之。又即前钞所遗之诗,补其缺略而增辑之。”其录诗“则自关乎风教,通乎政事,或正言,或谏诤,固有足尚;即游览赠答、吟风弄月,自适其性情者,亦并收焉,不敢拘一体格也”。录诗始自明初王朴,终于清同治间裴沅,闺秀附后。自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为李氏家集,收李氏家人二十五位,也包括编者本人作品。全书共收录二百八十余人,其中明代十五人,余皆清人。编者云:“是编以诗为主,其诗已见前钞者概不重选,若其人已载前钞而诗有遗珠者,无妨补选,但于人名下注‘见前钞’三字。至前钞未载之人,一概不注,以示区别。”“是钞录诗每人限百首以内,惟吾邑魏东溟(纶)公系前代名臣,幸诗稿之年远未湮,惠民味初公则有功于郡诗钞者,故破例各登百余首。”入录作者皆附

小传(见“前钞”者除外),其“字号科第爵里著作以及夹注内之事迹,多以郡志县志、家传墓志为据。其近人尚无传志而为我所稔知者则以案语注后”(均见《凡例》)。此书亦收录当时尚在世之人,诗名较著者有明代刘效祖,清代杜濬、杜杲、杜垆、张洵等。有清同治六年(1867)李氏家刊本。(王学泰)

【掖诗采录】 地方诗总集。六卷。清张彤编纂。张彤字鄂楼,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次年考充教习,曾为山东登莱青海兵备道。“掖”,指掖县。清代掖县属山东省莱州府统辖,亦为莱州府治所在。此编收录掖县明代至清中叶诗。编者自序云:掖“在唐以诗名者,惟王仲列,金则刘无党。若宋之王定民获见称于东坡,而求其词翰,渺不可得”。全书共收录作者一百四十八家(明代四十三家,清代一百零五家)。明代各家选诗较多,如赵士喆(五十八首)、宿凤翀(四十七首)、毛纪(三十三首)、孙镇(二十八首)、赵士冕(二十五首)、李森先(十九首)、赵瀚(三十一首)。清代选诗较多者为刘彤(三十一首)、任虞臣(二十七首),林冠玉、张之维各十五首。毛、赵、宿、王为掖县四大家族,故书中取此四姓作者几近二分之一。此集作品皆为邑人李兆元搜集,经张彤“详加甄别,刊其枝蔓,擷其菁英”,又特别注重“词旨温厚”、“有关于世道人心”的作品,实际上所录大多平庸之作,“菁英”较少。作者多附小传,旁稽乡评,并各标其出处事功。此编有编者自序、崔钟善跋。初刻于嘉庆间,另有光绪十七年(1891)重刻本。(王学泰)

【中州名贤文表】 地方诗文合集。文三十卷,诗七卷。明刘昌编纂。刘昌字钦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历官河南提学副使,迁广东参政。此编即其提学河南时所编。刘氏在此为官九年,多有余暇,为表彰中州先贤,乃选许衡(河南沁阳人)、姚燧(河南洛阳人)、马祖常(河南潢川人)、许有壬(河南汤阴人)、王恽(河南汲县人)、富珠哩(河南邓县人)六位名家诗文,合为一编,略依其本集之体,各以传志碑铭附后。每位各录诗一卷(或不到一卷),唯独马祖常录诗二卷,祖常在六人中诗歌成就亦最大。许衡、许有壬、王恽、马祖常皆有集传世,姚燧、富珠哩虽亦有集著录,但姚书仅为残本,富集已不传,端赖此书校正其误,或补其佚。此编每集之末皆有刘昌所作跋语数则,颇见考订之功。刘氏自序曾言此编为内集,尚有外集、正集、杂集若干卷,但未见传世。“文集”初刻于成化间,此本尚有传世者,嘉靖间有重刊本。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王士禛劝河南达官宋莘重刻,宋莘委托钱塘汪立名重刊。《四库全书》著录者即此本。(王学泰)

【国朝中州诗钞】 地方诗总集。三十二卷。清杨淮编纂。杨淮字澄波,号笠舟,河南宝丰人,曾任柘阳训导。“中州”指河南,自汉魏以来诗学发达,唐代名诗人辈出,自明以后文化南移,河南诗学日渐衰落,清初至清中叶惟宋莘、梁熙、刘青藜等较有诗名。此书所收从顺治三年(1646)始,由明入清有影响之诗人如周亮工、彭而述、薛所蕴、侯方域、程正揆等俱未收入。共录河南诗歌作者五百余人。编者虽云“钞”而不言“选”,但录诗仍然有其准则。《凡例》云:“体裁以古风为主,今体次之。朱竹垞曰:‘余近录明三百年诗,阅诗不下四千家,凡古诗多者,其诗必工,开卷即七言律者,其诗必下。’竹垞一代词宗,持论最当。”可知书中所录注重古体。又云:“诗所以道性情,性情敦厚,人品必归醇正。集中所载,如汤潜庵(斌)、张仲诚(沐)、张敬庵(伯行)、窦静庵(克勤)、冉蟾庵(覲祖)、李礼山(来章)诸先生,微独以诗论也。其立身制行,虽百世而后,亦足为中州生色,谨录之,以志景仰。”是知此书注重录有修养之理学家及名臣大吏之诗。又云:“题目择其大雅,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若鲍明远之谜,梁简文之药名、卦名,以及离合、回文,皆涉于游戏。其他叫号撞搪、山歌村讴、牛鬼蛇神、待日疑雨等作一概从删。庶几有当于依永和声之义。”于此可知编者正统观念颇强,不仅摒弃了一些近于文字游戏之作品,也排斥了一些接近民歌的通俗诗篇与写男女情爱的诗章。每人各附爵里行实,间附诗话以发明之,但皆取之他人,编者本人不赞一词。二十八卷以前以科目前后编排,二十八卷为“闺秀”(不收青楼女子之作),二十九卷为“流寓”,主要收陈维崧、童钰、张衍懿之作品,三十卷为“方外”,三十一卷、三十二卷皆以附录形式收“时人”(即当时尚在世之人)作品。认为后者都是“拈髭呕心之士,未登仕途,与已登仕途而未显达者,若不收录,恐有散失,附于后,以待后之选者”(《凡例》)。此书编于道光十五年(1835),所选亦截于此,前有河南学政许乃钊、河南按察使张祥河序。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王学泰)

【关中两朝诗钞】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李元春编选。李元春,字时斋,号桐阁,朝邑(今陕西大荔)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关中”,指潼关以西,约指今陕西、甘肃一带。此编收录明清关中六十九位有代表性诗人作品凡两千余首,始于明李梦阳、王九思,终于清吴镇、杨鸾等。着重选录质实之作,编者序云:“不本之身心,又无益于世道,未可为文;亦未可为诗。古人为文与诗,皆有不得已于中与天下之故。不然,道不足而强言,黄陶庵讥之矣。”即以此为标准决定去取。其中选诗最多者为屈复(三百

首),依次为李因笃(二百零五首)、杨鸾(一百五十九首)、王三省(一百五十六首)、李梦阳(一百四十六首)、王九思(一百二十六首)、李楷(一百二十三首)、百首以下、五十首以上者有韩邦靖、杨爵、杨端本、康海、王维楨、韩邦奇、吴镇、孙枝蔚、李柏等。许多无专集传世作者之诗作赖此编以传。有清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守朴堂藏版。(王学泰)

【樊南诗钞】地方诗总集。四卷。清延君寿编纂。延君寿字荔浦,山西阳城人。诸生,曾官莱阳、长信知县,有《六砚草堂诗集》。“樊南”,指山西省泽州府阳城县,因北有樊山,故名。延氏曾与邑内文士组织樊南吟社。编者自序云:“余仕宦走大江南北,谈艺家鲜有知阳城人者,所知则泽州相国(指陈廷敬)而已。斯集之辑,容可已乎?今日辑之而断稿残篇,多不可得,使更迟之,则并此而无之矣。使有如此之诗,沉匿不彰,是亦仁人君子之所深戚者。他日刊行于世,见晋之一小邑,而能矫然自树者,林林有人,其亦西北人之一幸也夫!”可见延氏编纂之宗旨。共录明清阳城作者四十一人,起于明嘉靖间李豸,终于清道光间李毅。采诗最多者为明代名臣张慎言(一百十二首),其次为田懋(九十六首)、张晋(六十一首)、陈廷敬(四十五首)、卫贞(四十首)、李毅(三十七首)、田六善(二十六首),其余多在十首以下,少则仅一二首。录诗多少主要与编者手中是否有作者专集有关。书中对于作者生平介绍极简略。选诗注重择录有关阳城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及民情风俗之作品,编成于清道光六年(1826),有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藏板于西坪书屋。(王学泰)

【山南诗选】地方诗总集。四卷。清严如煜编纂。严如煜(1759—1828)字炳文,号乐园,一号苏亭,湖南溆浦人。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历官陕西按察使。有《乐园诗文集》。“山南”,指陕西秦岭以南汉中与兴安地区。春秋时期此地区就有风诗采入《诗经》,诗学开化较早,唐权德舆,较著名。此集选诗从唐权德舆始。宋代选张知退、雍冲,元代选林东,明代选王昱、张羽、李嘉宾、刘宇等十人。一卷以后皆取清人诗,分县编排,以南郑入入选最多(约四十余人),最多者为余翔汉(五十六首)、其次为王德馨、杨筠、黄元龙各十八首,李国禧(十五首),其余作者只选一二首。此外还有城固(录二十三人),洋县(十人)、宁羌(二人)、沔县(四人),兴安、安康各三人,汉阳(八人),石泉(一人),还有“侨寓”、“闽秀”、“方外”共九人。其中录诗最多者为洋县岳震川五十四首、陈洪范三十一首,安康董诏二十七首,谢申(侨寓二十四首)。从所采录可知编者并未广泛搜采,“惟就见闻所及,慎选一二,人亡集散,全册多难悉”,

故草率成编。每人皆附字号爵里或简单小传。此集编成于道光七年(1827),并未刊刻,次年编者亡故。光绪八年(1882)城固人高万鹏出守常德至严氏家乡,看望其后代,严氏遗属出此稿本。高氏乃于光绪十三年(1887)刊刻行世。有高万鹏序。(王学泰)

【二南遗音】地方诗总集。四卷。清刘绍攸编纂。刘绍攸字继贡,三原(今属陕西)人。生活在乾隆间。“二南”,本指《诗经》中周南、召南。古人认为此两组诗皆产于关中。此编收录清代关中(包括陕西、甘肃等地)诗,故用此名。关中之诗盛于唐,宋以后文化南移,诗风渐衰;至清,虽代有作者,若享大名、集传于后世,必待出关而后,如孙枝蔚、李因笃皆如此。编者有慨于此,故编此集以阐幽表微、使关中寒士穷儒呕心沥血之作得彰显于世。全书共收清初至乾隆初作者一百四十人,始于孙枝蔚,终于郭岱。其中著名者有孙枝蔚、李因笃、李楷、李柏、王又旦、周灿、李念慈、屈复等。在取诗方面偏重才大名微之士。编者云:“国初诸公皆有专集。孙豹人(枝蔚)、李天生(因笃)、王幼华(又旦)久已脍炙人口,故第择其尤者,冠之篇端。若康孟谋(乃心)、张康侯(晋)并为秀杰。康侯仅存写本,孟谋虽经杀青,亦豹一斑。”(《凡例》)因之对这些“萤窗名士”取诗不厌其多。录诗最多者为胡钺(八十三首)、其次为屈复(三十首)、杨鸾(二十九首),吴镇、甘延年各二十八首,康乃心(二十二首),其他皆在二十首以下,以选诗两三首者居多。此集对诗人事迹介绍极简略,对所选诗亦无评鹭。关中幅员辽阔,而此集所取面较窄;以三原、泾阳、兰州为多。此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编者自序,并附编者所著《坤舆考》,论述文化南移之缘由。有乾隆间刊本。(王学泰)

【雍音】地方诗总集。四卷。明胡纘宗编纂。胡纘宗,字世甫,一字可泉,自号鸟鼠山人,陕西泰安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山东河南巡抚,有政绩。著有《鸟鼠山人集》等。雍指雍州,古九州之一,其地包括今陕西、甘肃等省及青海额济纳。此编收录雍籍作家诗作。“始于周太伯、冠以逸诗,暨汉晋隋唐,止乎元,凡百五十人,诗若干首,以李、杜、王、韦诸大雅者列为内编,未尽雅驯者,列为外编”(谢兰《叙》)。所谓“逸诗”包括泰伯诗一首、文王二首、武王五首、周公一首、成王一首、宣王十首(即石鼓诗)，“逸诗”多取自先秦载籍。“内编”二卷始于汉班固四言《东都诗》，按体编排；乐府、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内编所收多为唐人作品，李白、杜甫所收犹多，皆在百首以上。“内编”之前附有胡被所撰“诗考”，评介入选主要诗人之风格特点，并在每位诗人名下附有简单的介绍。“外编”亦二卷，始于西

汉韦玄成四言《自劾诗》，终于元代虞集。最后又补二十余首绝句、联句、歌谣。“外编”体例与“内编”相同，只是在“绝句”前对绝句的起源、发展作了简单的介绍。此书缺点是对两宋时期的关西诗人收录太少，西夏时期则付之阙如。此编最早刊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后随《鸟鼠山人遗集》，数度刷印。

(王学泰)

【**泾献诗存**】 地方诗总集。四卷，外编三卷。近人夏柏堃编纂。夏柏堃字厚甫，陕西泾阳人。生活于清末民初。“泾”指泾阳。明清以来“诗歌之作，盛于东南，而俭于西北”(徐怀璋序)，而泾阳是西北诗学较盛地区之一。“自明清以来，工诗者代不乏人，其著述虽名载邑志，而篇什流传者绝少”(编者自《序》)。此集辑明至清末民初泾阳人诗。起自明英宗天顺间李锦，终于近代韩岳龄、曹尔梅，后附女士一人。共收录作者九十八人，诗八百九十首。录诗原则是“求无背于三百篇之旨，即有咏花木景物之微，似无关于宏旨，而亦可想见当时之风土山川，触物抒怀，亦游览斯土者所不废也”(编者自《序》)。书中收录了许多描写陕西风景与风俗的作品。如明张绍曾《泾干桃花行》，清王昶《榆钱麦饭》、《珍珠花》，张鼎望《对先五兄所遗小车不胜感怆》，张五典《醴泉姬》、《烟市谣》，韩文选《新春观龙灯狮子》、《新村恼观剧》，曹尔梅《跑竹马》、《柳木腿》，贾兆勋《庸医》、《女巫》、《化布施村姬》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在一般诗歌选本中并不多见，此集外编三卷，皆为外地人咏泾阳作品，始于乐府《白渠歌》、柳宗元《泾水黄》，分体编纂。此集编于民国初年，有徐怀璋及编者两序。有1925年排印本。(王学泰)

【**洮阳诗集**】 地方诗总集。十卷。清李苞编纂。李苞字元方，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曾官剑州知州。洮阳，古县名，即明清之狄道，今称临洮。编者云：“是集专录国朝狄道人诗，故曰《洮阳诗集》。”(《凡例》)共录一百九十余人，多与编者同时。首录张晋(康侯)诗一卷，约百余首。张晋在当地开学诗风气之先。其次录张谦(牧公)诗四十六首。录其师吴镇作品最多，分三卷，存诗四百一十三首。其他存诗较多者还有吴承禧(六十九首)、李苞(六十七首)、吴简然(五十九首)、吴承佑(四十首)、吴铤(三十首)等。李苞自云：“是编以集为名，集者合编众人之诗，不敢居于选也。”又云：“诗之大旨总不外乎温柔厚之一言，今编诗以此为准，乖是旨者，概不敢入。”(《凡例》)全书以作者年齿行辈为序，所谓“乡党尚齿”之义。此编成书历时不到两个月，搜罗未广，持择不精，除选编吴镇作品较认真外，其他皆甚粗率。后附《洮阳集句》二卷，上卷为张

晋集句诗，下卷为吴镇集句诗。有杨芳灿序，刊于嘉庆四年(1799)，松花庵藏版。(王学泰)

【**新安文献志**】 地方诗文总集。一百卷，附《先贤事略》二卷。明程敏政编纂。新安，古郡名，宋代称徽州，明代为府，治所在歙县，包括今安徽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绩溪及江西婺源等地。此编所辑即此地区作者之诗文作品。始于南朝齐、梁，终于明代永乐。其编排则略按真德秀《文章正宗》体例，分类辑录，四十九卷以前为各体文，四十九卷至五十九卷为诗，第六十卷为诗余。全编共录文一千八十七篇、诗一千三十四首。王宗植参与校勘，又以类增入明宣德以来先贤文五十一篇，诗四十九首，遂成今本。此编六十卷以前皆为新安先贤诗文，计唐以前作者两人(指齐程茂、梁程旼)，唐代收吴少微、程谏、方干、程宗楚等十人，南唐收郑延光一人，宋代收舒雅、程颢、程颐、汪莘、汪藻、朱松、朱熹、胡仔、程秘等一百四十四人，元代收方回等八十七人，明代收朱升、唐桂芳等九十五人。六十一卷以后所收录皆有关新安之资料(主要是乡先贤行实)，但作者不尽为本地人。分为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才武、烈女、方技等十五门类。“其中有应行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参核而复注之，征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借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巨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附《先贤事略》两卷，上卷为六十卷以前所录诗文作者之生平简历；下卷为六十卷以后所录资料作者之生平简历。此书前有弘治三年(1490)程氏自序，有弘治十年王宗植跋与程氏跋，初刊于弘治十年，明万历年间有重刊本。(王学泰)

【**宛陵群英集**】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元汪泽民、张师愚辑。汪泽民(1289—1356)字叔志，婺源(今属江西)人。延祐五年(1318)进士。官至集贤直学士。至正初居宣城，自号堪老真逸。《元史》有传。张师愚字仲愚，宣城人。曾两领延祐、天历乡荐。本书卷一有小传。有至正元年(1341)张师愚序，知此前已着手辑编。其完成与刊刻，则为汪泽民居宣城后事。本书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原得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体，订为二十八卷。所辑诗人，或籍、宦、寓于宣城，而宛陵为古宣城，故以“宛陵群英”名集。《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梅宛陵群英集》一部，云五册，缺。当即本书。其书久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得诗七百四十六首，分属一百二十九人所作按体分为十二卷，作者事迹，有可考者，俱简要补注于姓名之下；其《永乐大典》失名、失题诸作，则分别附于各体诗后。以宋而论，如陈天

麟、李兼,原有集,久佚,其诗幸赖此书略存一二。此书“虽仅一乡之歌咏,亦可云文献之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备全宋、全元诗辑佚。(孔凡礼)

【宛雅初编】地方诗总集。八卷。明梅鼎祚编纂,清施念曾、张汝霖补。施念曾,清初名诗人施闰章之曾孙,字得仍,号蘼斋,宣城(今属安徽)人,生活于雍正、乾隆间。张汝霖(1709—1769)字云澍,号芸墅,宣城人,与念曾同时。宣城诗以南朝谢朓有名,唐李白也写了大量吟咏宣城诗歌,然二人皆非宣城人。元汪泽民、张师愚曾辑《宛陵群英集》,所收多为寓居宣城者所作。梅鼎祚此编收录唐代至明正德间宣城人诗六百四十六首,作者九十一人。唐为刘太冲、刘太真二人;宋为梅询、梅尧臣、周紫芝、吴潜等九人;元为贡奎、贡师泰、贡性之等五十九人;明为贡鏞、贡汝城等二十一人。入选作品最多者为梅尧臣(一百八十八首),其次为贡师泰(八十三首)、贡性之(四十二首)、贡奎(二十九首)、贡汝成(二十二首)等。梅氏对于入选作者“爵秩事实,或略论数语,或缺而待核”。施、张二人详加补苴,“先考史传,史无,即征诸传记墓志;更无可征,则取郡邑各志登之”(《凡例》)。并广为搜罗历代对于入选作者或作品之评论,附于作者小传之后。这些材料颇多可资参考者。此编初刊于明万历年间,施、张补苴本有清乾隆五十年(1785)西阪草堂刊本。(王学泰)

【宛雅二编】地方诗总集。八卷。清施闰章、蔡蓁春编纂,施念曾、张汝霖补苴。蔡蓁春字大美,一字象山,号芹溪,宣城(今属安徽)人,生活于康熙间。此编继梅鼎祚《宛雅初编》而编纂,收录明正德至明末宣城人诗作四百五十一首,作者七十三人。计嘉靖间十二人、隆庆、万历年间四十三人,天启、崇祯间十八人。录诗最多者为梅鼎祚(九十四首)、其次为梅朗中(六十二首)、沈懋学(四十首)、梅守箕(三十首)、麻三衡(二十四首)等。此书作品皆蔡蓁春所收辑,施闰章选定。关于入选作者之传记资料以及序跋评论,皆为念曾、汝霖搜集登录。此编对于研究中晚明宣城一带诗风演变颇有参考价值。有清乾隆五十年(1785)西阪草堂刊本。(王学泰)

【宛雅三编】地方诗总集。二十四卷,末三卷为诗话。清施念曾、张汝霖编纂。《宛雅》初编、二编后又历百年,宣城人能诗者众,编者感到有重新纂辑宛诗的必要。张汝霖云自己“不揣谫陋,窃附前人表微之意,矢志再续,愚山(施闰章)先生曾孙竹窗适有同心,相与广搜考订,始癸亥(1743),迄己巳(1749),越七岁,乃得成书。以前刻为初编,续者为二编,今续为三编,俾后之君子,继此续之,以至于无穷也”(转引自梅穀成序)。全编录诗一千四百零一首,作者二

百七十九人。此编乃补鼎祚、闰章之初、二编所遗。首录唐罗立言、李咸用、汪遵三人作品;五代与宋补四人,元代补五人,明代补三十人,清代录二百一十五人。录诗最多者为施闰章(一百八十六首),其次为梅庚(八十六首)、李彦用(五十五首)、袁启旭(五十首),沈寿民、梅磊、蔡蓁春、高咏等各三十余首。最后附有闺阁、羽士、释子与妓女作品。卷二一为联句、逸句,卷二二至二四为诗话。所收为历代诗话、笔记、方志中对宣城人诗作之评论。入录作者皆有较详尽的传记与评论,对于“奄弃未久”之作者,其行谊为乡人所共悉,书中亦“备采輿言以载”(见《凡例》)。这些不见于其他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十分珍贵。有乾隆五十年(1785)西阪草堂本。

(王学泰)

【皖雅初集】地方诗总集。四十卷,近人陈诗编纂。陈诗字鹤柴,安徽庐江人。清末民初居住上海,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七十余岁。“皖”指安徽省。清初安庆、徽州等皆属江南省,康熙元年(1662)始分建安徽为省治,地域范围与今大体相同。此集收录清初至清末安徽八府、五直辖州、五十五县诗人之作品。安徽自唐以来诗学日渐发达,至清诗风极盛,但直到清末民初“各省诗篇,咸有总集。导源国风,方輿以判。返观吾皖,乃付阙如”(编者《自序》),于是陈氏穷数年之力,编成此集。共收录顺治至宣统间作者一千二百余家、诗三千七百余首。按行政区划编排。卷一至卷一〇收录安庆府作者三百六十五人;卷一至卷一八为徽州府,二百六十六人;卷一九至卷二二为宁国府,一百六十七人;卷二三至卷二五为池州府,八十八人;卷二六至卷二七为太平府,五十一人;卷二八为广德州,十一人;卷二九至卷三四为庐州府,三百二十二;卷三五为凤阳府,三十六人;卷三六为颍州府,三二人;卷三七为滁州,三十二人;卷三八为和州,三十人;卷三九为六安州,十四人,卷四〇为泗州,三十六人。从这些数字可见安徽各地诗学发展之不平衡。每位作者皆附小传,间有评论。编者之评,署名“静照轩笔记”,其中多记作者之遗闻轶事。此集前有陈三立《序》及编者《自序》,并有王潜、夏敬观、袁思亮、黄式叙等人题诗。有上海美术图书公司民国间排印本。(王学泰)

【宛上同人集】清诗合集。十卷。清强溱编纂。强溱(1786—1851)字东鼎,号沛厓,江苏溧阳人,有《佩雅堂集》。道光六年(1826)阮文藻在安徽宣城(古称宛陵)为官,以诗倡,约郡内同僚唱和,强溱亦参与。后唱和诗稿为人携去。阮氏有感于“当其文酒相从,忽忽不自知其乐;及时移事易,不禁思之于无穷也”。于是“因遍索同人全稿,拟广罗都为一

集”。有些人虽未与此会,但亦曾“官于斯土与客于宛上”,“其诗卓然成家者”也在搜集之列。强氏编读诸集后感到“各集风格有魏晋,有三唐,有宋,有元。盖自谢宣城迄李供奉、崔侍御、宇文太守而后,此邦诗人之聚未有若斯之盛也”(皆见强溱序)。于是合众集为一编,名《宛上同人集》以纪念昔日盛会,并取“同声相应之义”。全书包括诗集十种。每集一卷,以年齿为序:(甲)《桐轩集》,金德荣撰,录诗一百七十三首;(乙)《惟雒斋集》,周仪玮撰,录诗三百十九首;(丙)《听松涛馆集》,阮文藻撰,录诗五百七十八首;(丁)《信芳阁集》,汪汝式撰,录诗一百七十九首;(戊)《佩雅堂集》,强溱撰,录诗三百九十七首;(己)《九叠山房集》,赵仁基撰,录诗一百二十七首;(庚)《佩湘集》,王成璐撰,录诗二百六十九首;(辛)《月波楼集》,甘煦撰,录诗一百二十四首;(壬)《识密斋集》,钱符祚撰,录诗七十二首;(癸)《迦龄集》,庄缙度撰,录诗一百零四首。每集之前皆有小序,介绍作者,评述其诗,多为强溱所撰。此集刻于道光十三年(1833)。(王学泰)

【历阳诗圃】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陈廷桂编纂。陈廷桂(1759—1832)字子屏,号梦湖,晚号花谷翁,和州(今安徽和县)人。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曾官湖北省按察使。“历阳”,即和州。和州在清康熙六年以后为安徽省直隶州,其治所在历阳县。历阳地近南京,江东流风余韵对它有所影响。以诗名世者就有唐张籍、宋张孝祥等人。此编采历代历阳人诗作,起自“春秋江上渔父”、“晋历阳百姓”四首民歌、民谣,迄于清道光间编者胞兄陈廷植之作。共录作者七十九家,诗七百餘首,附词八十餘首。所收除名家外,多为与编者年辈相及之人。至于元、明、及清初之著作大多散佚。编者慨叹:“历阳士习往往埋头‘八比’中,‘八比’以外一切诗古文多度高阁,毕生不一点目,直不解刊布诗文为何事。故先代即有撰著,不知刻以行世,亦不知检出付选以尽显扬之谊。更有一种不肖,藏为私稿,预留他日掠美之地。遇人访求,坚称无有,此其可笑,不堪为外人道。皆此选不能广博之故。”其次亦由于和州多遭兵燹,著述被毁,或因子孙无读书人,先辈苦心撰述一任妇孺残毁、虫蠹啮蚀,直至化为乌有。因之编者感到有及时搜集之必要。编者评本邑诗风云:“咏物及他纤仄小题,吾郡诗流最喜涉笔,不无工丽之作,但风雅道尊,似此易流浅俗。”乃将“此等一概删削,阅者勿以为不识而弃之”。又云“七律在诸体中为至难”,“今世诗家动辄五十六字,所见皆然,吾郡尤甚。惟其易视,是以多作聒不畏雷,殊堪齿冷,但积重难返,不能不随俗一登”(上引皆见《凡例》)。编者注重收录乐府

诗,认为只有娴熟此体,才能自成一家,“拔出于流俗之外”。书中收张籍一百一十四首乐府诗,占一半以上,有示范之意。每位诗人皆注明字号爵里,并加评论。编者云:“唐宋人诗每经前哲雌黄,故所辑前人诗评多,而自撰诗话少。前明暨本朝人诗多未入名人齿颊,又流风未远,传闻较切,故诗评少而诗话多,以时代有久近,非意见有亲疏。”(《凡例》)此书原刻于道光间,未见。常见者有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1921)排印本。(王学泰)

【桐旧集】地方诗总集。四十二卷。清徐璈编纂。徐璈(1779—1841)字六驤,号樗亭,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九年(1814),曾官浙江寿昌县令,有《樗亭诗文集》。此集编辑明至清道光间桐城人诗作。桐城诗学自明初兴起,至清始盛。清初潘江曾有《龙眠风雅》辑录明初至清初诗。从清初至道光间几近二百年,诗家辈出,而合邑通选未有继其事者。徐氏认为潘氏未见桐城自刘大櫟之后诗学之盛,对其取舍,亦有不同意见,故编此集。书中共收录作者一千二百餘家,诗七千七百餘首。其编排“仿《江苏诗徵》之例,分姓列卷。其间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序。至族望之同异、辈行之尊卑、年齿之长幼有不能尽详者,则有各姓之谱牒在”。“每姓以最前之一人为次第。如甲家之卷前一人系洪武朝人,乙家之卷前一人系永乐朝人,则以洪武朝人居前,永乐朝人居次”。编者云:“各家专集,繁简不同,今于诸家之诗所录仅一二首,多者不过八九十首。非妄为去取也。凡千二百餘家,不能不约之又约。”又云:“兹集计千有餘家,所见原集不过三四百家,就各选本、抄本录出者具有大半。”(皆见《凡例》)全书末二卷为“列女”、“方外”诗。每人皆附小传。其中选诗在五十首以上者有方文(六十九首)、方以智(八十四首)、姚鼐(七十九首)、钱秉镫(六十七首)、马之瑛(八十四首)、刘大櫟(九十首)、倪之辇(六十五首)、朱雅(七十首)、祝祺(五十首)等。此书“批评圈点,皆简要而中关键,大家名家,选录尤为精当,小家无刻本,或少从宽”(《校刊桐旧集》后叙)。此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编定,刊刻未及三分之一,编者去世。道光三十年,姚莹、马树华等又倡导捐资刊刻,又经徐氏之甥苏惇元、侄徐寅、徐裕整理于咸丰元年(1851)出版。有姚莹、马树华《序》,苏惇元、徐寅、徐裕《后序》及编者《桐旧集引》。(王学泰)

【上江诗选二集】地方诗总集。八卷。清夏吟、任炎、徐百揆编纂。夏吟字南英,号克斋;任炎字鸿炎,号智泉;徐百揆字叙宾,号孟岑。三人皆舒城(今属安徽)人,生活在乾隆间。明代安徽、江苏合称江南,江苏为下江,安徽为上江。全书共收安徽各县作

者四百九十余人,也有少数流寓安徽人士,在目录中注明。如卢见曾名下注云:“山东德州人,宦游庐州。”入录作者大多选诗在十首以下,如施闰章、阎尔梅、卢见曾、方贞观等知名诗人亦然。选诗最多者为戴之瑾(三十首),其次为方元醴、朱辂各二十首。入选之诗多有批点评论。从中可见编者崇尚唐音、偏爱王、孟风格之作品,亦受王士禛“神韵说”之影响。书末选录编者夏吟诗十五首,任炎十五首,徐百揆十八首,各有评语,不无互相吹捧之嫌。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本,鸣盛轩藏板。(王学泰)

【小山嗣音】 地方诗总集。四卷。清李兆洛编纂。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安徽省凤台知县。有《养一斋诗集》。“小山”,本为西汉辞赋《招隐士》之署名(署“淮南小山”),赋为汉淮南王刘安门客所撰,刘安长住寿州,故此处“小山”指寿州及从其分治之凤台县;“嗣音”,谓此地可继淮南王时文采风流。清代二地皆属安徽省凤阳府统辖。此编收录寿州及凤台自明至清嘉庆间诗作。李氏为凤台县令时“延礼耆秀,采揽故编,辑为《小山嗣音》”。卷一收录明代作者二十三家,诗一百一十八首。始于明洪武时举人罗昭,终于崇祯间诸生方育颖。卷二始于清顺治间进士邓旭,终于顺治进士谢开宠,录四人,诗二百零一首。卷三始于康熙间秀才陈赤,终于乾隆举人邓宗源,录十一人,诗二百六十三首。卷四始于乾隆间秀才陈翰,终于嘉庆间秀才张佩,录十六家,诗一百四十五首。其中录诗最多者为谢开宠(八十一首),其次为夏俱庆(七十五首),邓宗源、邓旭各七十四首,陈赤(七十二首),方名震、刘允谦、陈翰、孙蟠、赵炯然等各三四十首,其余多在十首以内。所选颇多佳作。对于选诗较多者,书中介绍其生平经历亦较详尽。周仪玮序对重要作者风格作了评论:“其慷慨奋发,苍凉沉迈,吟成而通鬼神,诚至而开金石者,则有方中丞(方名震);其志高音苦,幽深渊挚,得风雨之遐颺,晞日月之遒光者,则有赵处士(赵炯然)。”由此可见一斑。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湘雪轩藏版。(王学泰)

【庐州诗苑】 地方诗总集。八卷。清陈诗编纂。清代庐州府属安徽省领四县一州:合肥、舒城、庐江、巢县和无为州。此书收录清初至清末庐州作者二百二十一人,诗九百二十五首。按州县分编。卷一至卷三录合肥县作者七十一人,诗五百三十一首。录诗最多者为史台懋(一百十九首),其次为李天馥(六十四首),李孚青、李经钰各四十四首。而合肥最著名诗人龚鼎孳只收十首。可见编者之目的在于发潜阐幽。卷四至卷五为庐江县,录六十七人、诗一百六

十三首,最多者为金之兰(二十九首)。卷六为舒城县,录二十一人,诗三十首,最多者为郭泽礼(十三首)。卷七为无为州,录三十五人,诗一百三十首,最多者为季孟莲(十八首)。卷八为巢县,录二十七人,诗七十一首,最多者为汤懋纲(三十首)。编者跋云:“首叙科目,志朝代也;继述遗逸,崇隐沦也。各为小传,间论诗篇,仿唐之《中兴间气》、《河岳英灵集》也。或发摭胸臆,称述往事,效赵岐之《决录》、周密之《野记》也。”可见编者是以清遗老眼光编选此集的。编者之评语,署《尊瓠楼诗话》,多录作者之遗闻逸事,颇有参考价值。此书于民国十五年(1926)编成,有编者自序和跋。有民国间排印本。(王学泰)

【江苏诗徵】 地方诗总集。一百八十三卷。清王豫编纂。“江苏”,包括江宁、淮安、扬州、徐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八府,通州、海州、太仓三州及海门厅。江苏诗学自南宋以来极盛,特别是常、苏、扬、松江诸府及太仓州,明清两代诗人辈出。此书只收清代江苏诗人,共五千四百余家。王豫本人藏清人别集极多,曾编有《京江耆旧集》,后在浙江巡抚阮元支持下,又据“阮氏之文选楼、秦氏五笥仙馆、陈氏素村之瓠室所藏而录之”(见《凡例》)。其间还有友人邮寄者亦分别采入,虽有遗漏,阮元评价颇高:“柳村(王豫)益肆力征考,于各家小传、诗话,尤多采择。尝下榻拥书于焦山佛阁中,月色江声,与千百诗人精魄相荡。”“柳村选诗,谨守归愚(指沈德潜)《别裁》(指《国朝诗别裁》)家法,虽各适诸家之才与派,而大旨折衷于雅正。忠节孝义、布衣逸士诗集未行于世者,所录尤多。可谓摭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者矣。”(《江苏诗徵序》)可见编者选诗是遵循沈德潜“格调说”标准。“是集以诗存人,以人存诗,固已然,或人非端士,诗或伤雅教者,皆屏弗录”(《凡例》)。集中对“山林苦吟之士、名不出闾里,其集未刻、或刻而未传者”,录诗较多,对“巨公鸿儒、名垂史册”者则收录较少。阮元、石韞玉皆江苏名人,俱未收录。有触犯时忌者,如因“庄氏(廷钺)明史狱”受牵连被处死刑之潘柟章,竟收录其作于狱中的《虎林漫成四首同吴槐庵作》,可见编者之胆识。对于流寓江苏较久之外籍诗人如孙枝蔚、袁枚等也予以收录,佛子道徒、闺中秀女皆附于后。其他诗人按姓名所在韵部排列。书中“所采诸书或全录或节取,皆于各条上冠以某人某书,使阅者易于稽考,或有仅存书名而全书未见者,亦录其名,以俟后之辑《艺文志》者考焉”(《凡例》)。此集历时十二寒暑,于嘉庆二十二年(1818)编成,当时阮元为两粤总督,索稿校订,为之作序,开雕于督署。(王学泰)

【金陵诗徵】 地方诗总集。四十四卷。清朱绪曾

编纂。朱绪曾字述之,上元(今江苏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为浙江嘉兴知县,官至浙江知府,有《耽古斋集》。金陵指南京,清为江宁府所在,领七县: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高淳。金陵自六朝建都以来,文化南迁,诗学日益昌盛。自晋至明,代有名家,如南朝之颜延之、陶弘景,唐之王昌龄、刘昫、张籍(张籍为乌江人,明时属江浦县辖)、刘三复,宋之张孝祥、吴潜,明之顾璘、顾起元、黄周星、顾梦游、邢昉、龚贤、纪映钟等是其佼佼者。金陵为通都大邑,历来经过或流寓于此之诗人更是不胜枚举。此编收录清以前诗作者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寓贤”二百余人),由此可见金陵地区诗学之盛。如《凡例》所云:“是书宝兹片羽,阐彼幽光。招贾岛之残魂,慰方干于身后,借湖海英灵之集,写桑梓恭敬之思。诗以人存,宁宽毋隘。”所录诸家皆有小传。编者间有按语。或记遗闻轶事,或考误订谬,或评论诗作,颇多可参考之处。如卷一一“李诚”条下云:“余得建文元年《京闾小录》第七名李诚。”后又记其考题、评卷官批语及同榜人姓名籍贯。又如卷一五“翟瑄”条,考订翟瑄中进士年代,订正《存徵录》之谬。由此可见一斑。朱氏编此书时“原本托始周秦歌谣”,六朝寓公也尽行收入;录人存诗也较宽泛,几乎有闻必录。清光绪间经过秦伯虞、甘剑侯、陈伯雨、蒋绍由等人整理修订,因古之作者荒远无征,六朝时客多于主,故此书之始,定于晋;侨寓诸贤,断自唐始;过于滥者,则稍加甄录。江宁翁长森主持醵金出版,时在光绪十八年(1892)。(王学泰)

【国朝金陵诗徵】 地方诗总集。四十八卷。清朱绪曾编纂。此集收录清初至道光间金陵七邑作者两千一百余人及流寓金陵之作者一百七十余人。清代金陵诗歌创作亦较昌盛,而本地诗人享大名者却很少。如笄重光、程廷祚、秦大士、吴镇、方维甸、王友亮、邓廷桢、梅曾亮、管同等在清代亦只算得是二流诗人。而在“寓贤”一栏中却不乏名家,如杜濬、周亮工、熊赐履、方观承、袁枚、孙星衍、唐仲冕等在当时对诗坛颇有影响。因此书中详采“寓贤”之诗,有助于了解金陵诗坛全貌。编者所录颇能注重布衣韦带、幽忧抑郁之士,其入选人数占较大比重。此编与《金陵诗徵》一起编纂。全书共百餘卷,二十六巨册,编成后未即刊刻,后经战乱,稍有残逸。光绪十二年(1886)由编者之子朱桂模组织整理校订,醵金刊刻问世。前有汪士铎与俞樾二序。(王学泰)

【国朝金陵续诗徵】 地方诗总集。六卷。清朱绍亭、陈作霖、秦际唐、周嘉朴编纂。朱绍亭,生平不详。陈作霖字雨生,一字伯雨,号可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秦际唐(1837—1908)字伯虞,号南冈,上

元(今江苏南京)人。周嘉朴(?—1899)字柳潭,上元人。朱绪曾所编《国朝金陵诗徵》录诗仅至道光间。而道光以后至光绪间,金陵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天灾人祸频仍。“金陵士大夫于死亡播迁之由、政教风俗升降之故、桑土牖户绸缪之计,实身历而心危之。惩前毖后,纡轸郁结,既不获见之施行,乃一发于诗。其上者为家父、凡伯之伦;其穷而在下者,亦多忧生念乱之感”(孙锵鸣序)。这些作品皆为朱编所未及。此编即收录清咸丰初至清光绪间作品。共录作者一百二十人,起自朱绍曾,终于童森。“三朝诗人,什得八九”。只是未载闺秀、方外与流寓。全书录诗一千九百餘首。“是书所载,专录有关金陵人物掌故及忧时感事之作。杜陵诗史,睠怀诸将;放翁家祭,引领王师。草茅歌哭,天下大局所系也。若夫流连光景、模范山水,稍从略焉”。如朱绪曾《东园杂咏》二十五首写金陵古迹,金和《围城纪事》、《守陴》、《盟夷》、《壬寅九月书感》写英国侵略军犯城,《军前新乐府》四首写清军之腐败。至于描写战乱兵燹、民生困悴之作品则比比皆是。入录作者多附小传。编者云:“是书小传皆采郡县志书及铭表行状,未敢虚美。有道之碑,允无惭色。极元之集,兼及著作。后之考者,有所本焉。”其编次则以“年辈科分为断”。此书之编成多得力于高德泰之搜罗。编者云:“咸、同作者高子安(德泰)中翰苦心搜罗,积成卷帙,兹之所刊,半皆手录。”(上引皆见《凡例》)书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秋,朱氏等请其师孙锵鸣作序,于同年冬刊刻出版。(王学泰)

【国朝松陵诗徵】 地方诗总集。二十卷。清袁景辂编次。袁景辂(1724—1767)字质中,号朴村,江苏吴江人。贡生,沈德潜门生,中年弃举业,肆力于诗学,有《小桐庐诗钞》。松陵,吴江县治所在,清代属苏州府统辖。吴江自晋张翰以来,即为文人渊薮。至清,诗风尤盛,如朱鹤龄、顾有孝、吴兆骞、叶燮、钮琇、潘耒、徐钊、周篆等,皆一时诗坛翘楚。此编选录清初至乾隆初作者四百四十余人,其中“寓贤”十四人,“方外”、“名媛”共六十三人。选诗本“格调说”,注重唐音。《例言》对书中各体诗之取舍标准作了说明,如“五律以苍劲者为上,淡远者次之,工秀者又次之;七律以气骨雄浑、声调高朗者为上,对仗工整情韵悠长者次之。二者体格不同,而炼意、炼局、炼句、炼字无不同也。又唐律起如闻迅雷,结如截奔马”。符合这种标准则予著录。对其他各体之要求,亦以近于盛唐风格者为佳。书中不取艳体诗,认为“惟温柔乡语,最足感人沉溺其中,有害心术”。“有尘氛俗念”之作亦在摒除之列;应酬和韵之作,只是在其人无诗可选时“勉登一二”;所录登临吊古之作,“必陈

言务去,而能道前人所未及者,方入选”;“有关于吾邑山川风俗、伦常大节、诗文盛事”之作,“即诗仅平妥,亦必急登,庶采风者有所考焉”。其“选乡先辈诗以发潜阐幽之意为主”,故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两者兼顾。入录“诗人名下先书表字世系、集名。而科目、官位之有无,亦各系焉。复引名公评论,以缀其下。若逸事琐言,未经前人道及,或前人议论,有当辨正者,就予鄙见,附缀数语。至名不甚著之人,核其行事,表而出之,视有盛名者较详焉”。叙述小传“其体例当取佳事佳话,以为点缀,不必如史传家谱,历叙生平也”(所引皆见《例言》)。周氏所缀之语,署“朴村云”。此编之搜辑由费周仁、周汝雨二人完成。书前有沈德潜、袁景辂、陈毓乾三序。有乾隆间爱吟斋刊本。(王学泰)

【国朝松江诗录】 地方诗总集。六十四卷。清姜兆翀编纂。姜兆翀字孺山,华亭(今上海)人。松江为江苏之一府,乾隆、嘉庆间包括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七县与川沙厅。松江古称云间,晋陆机、陆云兄弟为云间最早之名诗人,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以陈子龙、李雯等为代表的云间诗派,清初至中叶松江诗学极为发达。此集收录清初至嘉庆初年松江诗人一千四百余人,并附流寓名宦七十余人。全书以作者所处时代编排,卷一至卷一三为顺治朝人,卷一四至卷二五为康熙朝前三十年人,卷二六至卷三四为康熙朝后三十年人,卷三五至卷三九为雍正朝人,卷四〇至卷四五为乾隆朝前二十年人,卷四六至卷五四为乾隆朝后四十年与嘉庆初人,卷五五、五六为名媛,卷五七为方外,卷五八、五九则为名宦寓贤,卷六〇附姜氏家集,卷六一至卷六四则为明遗民。有功名者以“题名录”或“岁科案”年序为标定,监生布衣则据与其往来的有功名者年序约略标定。所收皆已故诗人,所收之诗“各就其本色存之,且就其擅长者存之,不专以云间体为断”。“姓氏下摘录评语、品藻,全诗法《明诗综》辑评也。至自作诗话,或举逸事,或考生平,不敢妄为品论”(均见《凡例》)。此集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有松江知府黄定文序。(王学泰)

【嘉定诗钞】 地方诗总集。五十二卷。清庄尔保编纂。庄尔保,字桐生,嘉定(今属上海)人。嘉定,县名,清初属江苏苏州府统辖,雍正二年(1724)属江苏太仓直隶州统辖。嘉定代有诗人,而集多散逸。明翟校曾编《练音集》,收录宋天圣以后至明弘治诗。入清后王辅铭编《练音集补》,并编《国朝练音集》录清顺治、康熙时嘉定人诗。《诗钞》亦收录清初至道光间嘉定人诗,共录五十人。起自明末清初李宜之,终于道光间陈曦。嘉定名人如钱大昕、张鹏翮、赵

俞、张云章、王鸣盛等,因皆有专集行世,故未录入。入选作者于“姓名下,各纪始末,未详者,概从阙”。“是集只就所见钞辑,非吾邑全诗也。客岁过黄丈樗父(铨),出所藏前辈诗,几及千卷,岁欠蠹损,属为删存,复益以近时诸稿,见存者不录”(皆见《凡例》)。可见编选目的在于保存乡邦文献,阐发幽隐,使苦吟寒士得以表见于世。以“欲见作者之长,不得限篇什之多寡;欲穷体裁之变,不得立宋唐之门户”为原则,尽量多选。每人所选少则三十首,多至三百,并保持原来集名,如李宜《寓园集》、朱硕《蒹庵集》等。较有名气之作者为黄裳、曹仁虎等。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本,有黄铨序。(王学泰)

【嘉定诗钞二集】 地方诗总集。十八卷。清庄尔保编纂。庄氏曾编《嘉定诗钞》,实际是嘉定作者选本之合集,虽然卷帙浩繁,而录入者仅五十人。此编为嘉定作者之诗选集,入选作者达五百二十余人。凡在初集已收录者不重录。始自明遗民徐时勉,终于道光间程汝桐。卷一七为“闺秀”,收录三十九人;卷一八为“方外”,收录二十三人。每人选诗皆在三十首以下。编者在《嘉定诗钞凡例》中尝云:入选多少“以所见多少为别,非敢有所轩轻”。入录二集之作者,多未见全稿,系从“残帙及选本中掇拾者”,因此一般只录数首。每人皆附小传,间亦录其集名并其他著作以便考证。此编与初集一起编成,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王学泰)

【海曲诗钞】 地方诗总集。正集十六卷,补编一卷,二集六卷。清冯金伯编纂。冯金伯号墨香,南汇(今属上海)人。生活于乾隆、嘉庆间。“海曲指南汇,属江苏省松江府统辖。编者自序云:“上海固濒海地,雍正丙午(1726)复割东南境设南汇,真濒海一隅之地。”故名“海曲”。编者又云:“宋时储泳偕弟游隐于周浦(在南汇境内),以能诗名,元则有王泳、朱仲云,至明而盛,至国朝而极盛。不特通显者,鼓吹休明,凡士流韦布,辄喜肄雅,歌风吟咏之声洋溢于里闾间。”编者因被聘修南汇志,采访历代南汇人诗文,邑人亦多以诗文投寄,冯氏利用此便利条件,编成此书。正集共收作者三百一十馀家,起自宋储泳,计宋一家、元二家、明八十一家,后附“闺秀”、“方外”二十馀家。其中“以诗存人者居多,以人存诗者亦间而有之”。补编继收明朱正中一家、清三十馀家。二集又收清诗人八十九家。每位作者附有小传,间有评论。编者自评署“墨香居诗话”,其中多记诗人遗闻轶事。有清嘉庆间刊本。(王学泰)

【海藻】 地方诗总集。二十八卷,补遗一卷。近人严昌埭编纂。严昌埭(1897—1943以后)字载如,号渊雷,上海人。“海”指上海。上海原为东海海滨

一小邑,近世发展为通都大邑。“是编选历代上海人之诗以成书”,用以存“一邑之风雅”。全书共收一千余人,起自唐代陆贽,终于近代叶庆颐、叶景沄等,后附“方外”、“闺秀”。上海诗坛于明末清初与乾隆中叶两度兴盛。清初受云间诗风影响,如夙慧早成的蔡湘,陈子龙高足张宸,其他如叶映榴、张永詮,皆为邑中著名诗人。乾隆中叶赵文哲、黄文莲为吴中七子中成员,皆为“格调派”诗人。其他著名人物还有宋之储泳、李甲,元之朱仲云、陆侗,明之施绍莘、徐光启、张之象、陆深、董晋、董其昌等,书中皆有著录。此集录诗“凡表扬忠孝义烈之作,不论工拙,在所必录,于以存乾坤之正气,挽末俗之浇漓”。“凡诗涉佻体、伤雅教者,虽工弗录”。“是编因人存诗,因诗存人。固已亦有因题存诗者。如有关文献掌故,足以观风俗、知得失及图芬纂懿之什、堪资咏叹者,皆是也”。可见其采诗注重内容。所收各家并系小传。全书资料“大半采摭各总集而再加抉择,其得见各家全稿者,更严定去取。若夫撰人手迹流传及得之传钞,或附见他人集中者,则一鳞一爪,悉为收录”。对于流寓上海日久而定居者,亦为收录。此集所录以朝代编次,“断代编次其姓氏依诗韵分先后。俾便检阅。至胜国遗民不忘故旧,虽身遭鼎革,而自托殷顽,不渝初志。今兹所选,凡易代不臣之上,仍以胜国为依归,所以从其志也”(所引皆见《凡例》)。此书编成于1943年,前有陈三立、郑永治序与编者自序。有民国间上海排印本。(王学泰)

【青浦诗传】地方诗词总集。三十四卷。清王昶编纂。青浦,今属上海,清属松江府,古为云间故地,文化十分发达,代有诗人。王氏自序云:“乾隆辛丑、壬寅(1781、1782)年间,余承修《青浦县志》,一时同修之士、好诵读先民者,各以乡先生之诗来示,虫残蠹蚀之余,不下数十家。其于丛书脞说中勾稽而摘录之,又得二百余篇。志成,将各以诗归之,念此数十家皆无专集行世,其曾勒诸枣木者十之一二,而枣木之亡,亦久矣。其分携散去,不可复聚。”因此,借此机会编纂地方诗集,以保存文献。王氏编辑原则为“或因人以核其地,或因地以存其诗,有本贯非吾邑而所居实在邑者登之,亦有居非在邑而本贯属邑人亦亟登之。必为吾邑之人,然后可以为吾邑之诗,犁然划然,分茅设菑,无致借才异地之讥”。编者“考核精审,别为诗话以记之,綦详綦慎,盖与志之作传相等”。在选诗上“凡囂囂隳突者汰之;空疏陈腐者去之;留连光景、羌无故实者裁之,牵率应酬、庸俗鄙倍,一切剗削,得人三百余家”(皆见自序)。全编录诗三十一卷,后三卷为词。第一卷收屠隆等十三人,皆为青浦县官或学官。从第二卷起收青浦人作品,

始于三国、西晋之际陆机、陆云兄弟,迄于清乾隆间。录诗最多者为陈子龙(一百二十三首),其次为王逢(八十二首)、邵成楨(七十四首)、吕樾(六十九首)、倪瓒(五十七首)、唐镛(五十四首)、田茂遇、王原、潘肇振各五十三首。其他皆在五十首以下。书中所录著名诗人还有宋陈允平,元杨维桢、陶宗仪,明管讷、徐阶、陆树声,清沈荃、徐芑坡等。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者自刊本。(王学泰)

【青浦续诗传】地方诗总集。六卷。清何其超编纂。何其超号藏翁,青浦(今属上海)人。生活于咸丰、同治间。青浦自明嘉靖始置县,在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本为云间故地,诗学较发达。嘉庆间诗坛颇有影响之邑人王昶曾编《青浦诗传》,既存邑人之诗,复传其人。此书乃继王书而编,始自明万历间张文模、崇祯间张希騫,终于清同治间仲恒省、潘信籽,共录九十九人。取诗较多者有赵逢源(五十三首)、章秋驾(四十三首)、金鸿书(三十二首)、何其伟(三十首)、诸自谷(二十九首)、何王模(二十八首)、陆我嵩(二十六首)等。书中选诗如罗忠德所云:“其中古体多射洪(陈子昂)、曲江(张九龄)风格,亦间有前明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之胜;近体多中唐遗音。作者数十家,虽造诣不一,要各有见真之处。”(《青浦续诗传后序》)光绪二十七年(1902)青浦人熊祖诒在滁州长官任上加以勘定,于光绪三十一年排印出版。熊叙、罗序,皆言此书八卷,而行世只作六卷,第六卷目录与正文又相舛谬,可知在勘定中必有遗佚。(王学泰)

【闵行诗存】地方诗总集。四卷。近人黄蕴深纂辑。黄蕴深字云僧,上海人,生活于清末民初。闵行,乡镇名。旧属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管辖,今属上海市。此编所选始于明代成化间蒋坚,终于近人刘涛。所辑皆为“旧闵行乡区内人士作品,而以其人业已去世为断”(《引言》)。共收八十六人,诗作七百九十首。编者云:“‘诗存’与诗选异,有因其人其事而存之者,诗之工拙,在所勿论。”(《引言》)书中惟一享大名之作者为董其昌,录其诗作亦最多,凡一百四十六首。其次为因不满封建婚姻、二十五岁即投苏州狮子林池塘而死的李媿,录其诗一百零三首,诗中多幽怨之词。其他录诗较多者有李邦觝(六十三首)、朱承鼎(六十一首)、李林松(四十六首)、黄家钹(四十三首)、黄琮(三十九首)、李荣滋(三十首)等。以吟咏当地风景、名胜、古迹、民俗者为多,只有清末朱承鼎多为忧国忧民、愤慨时事之作。入选作者各系小传。“编次顺序,悉依作者生前时代。其诗选自专集者,依集定先后;得自采访者,依采到先后,不限体类”(《引言》)。有张一麀、朱孔文二序,黄谱衡《引

言》及黄艺锡跋。1935年由上海瑞华印务局排印出版。(王学泰)

【张泽诗徵】地方诗总集。三卷。清章耒编纂,吴昂锡增订。吴昂锡字介眉,同治六年(1867)举人,精于水利之学,华亭(今上海)人。张泽为一小镇,属江苏省松江府华亭县统辖。“张泽自明季以还,名流踵起,为浦南文藪,距张泽不数里有虹桥宋副宪徵宅于是,副宪在明季与陈忠裕子龙、李舍人雯称‘云间三子’。又有地曰焦村,亦与张泽近,焦征君袁熹居焉,征君于康熙朝与黄宫允之雋齐名,世称‘焦黄二先生’。皆知律者,是录独不及,限于地也”(章耒《张泽诗徵序》)。可见张泽附近皆为文化发达地区。其风气对张泽镇亦有影响。此集收录张泽作者五十人,“寓贤”十八人。始于陈子龙门生蒋平阶,终于光绪间画家封文祥。其中选录封氏家族作者最多,凡二十七人(包括“名媛”)。选诗最多者为吴志喜(六十七首),其次为姜皋(五十首),沈树声、封泰各三十四首,金大绶、封銜各三十首,蒋平阶(二十九首)、封涟(二十一首),其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张泽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为沈树声、金大绶。每人皆附小传。有些兼附遗闻轶事。“寓贤”中较为著名者为章有谟、姜皋。此书由吴昂锡搜集资料,章氏遴选,吴氏再加增订而成。有1942年刊本,封氏藏板。(王学泰)

【张泽诗徵续编】地方诗总集。二卷。清封文权编纂。封文权字衡甫,号庸龢,华亭(今上海)人。精于性理之学,生活于清末民初。此集继《张泽诗徵》而编,收录光绪至民初张泽作者诗一卷,十七人,其中封氏家族十一人。封文权作品最多(二十四首),其次为封廉(十八首)。二卷收录“寓贤”七人。选诗最多者为章耒(四十首),其次为朱运新(三十四首)。所录诗多与本邑人情风土有关。如章耒《题云间诸儒》十三首、《题云间四怪》、《云间三高士》、《题云间九峰》,朱运新《感旧》二十三首,皆为此类作品。有民国间刊本。(王学泰)

【吴都文粹】地方诗文总集。十卷,卷三至卷七为诗。宋郑虎臣编纂。郑虎臣字景兆,吴(今江苏苏州)人。曾为会稽尉。南宋德祐初,自请监押奸臣贾似道,押至漳州木绵庵,椎杀之。郑虎臣为吴中巨富,热心当地文献,辑此书以存苏州风土演变痕迹。吴中,宋代称平江府,包括今江苏苏州、吴江、昆山、常熟、太仓、嘉定等地。书中所收皆为历代至南宋有关吴中诗文,作者未必皆为吴人。所选录诗以东吴陆机《吴趋行》开篇至宋为止。入选作品多有考订文字,有助于考察古代吴中风俗及其演变。如唐皮日休《鱼斗》诗后,皮自注:“吴中卖鱼论斗。”编者又注云:“鱼斗者,吴俗以斗数鱼,今以二斤半为一斗,买

卖者多论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登初阳楼》后,编者注云:“初阳楼在郡池上,既曰初阳,宜占东城,今废。”其他在咏“齐云楼”、“馆娃宫”、“响栗廊”、“采香径”、“长洲苑”、“蠡口”等名胜之后,皆有长注,对这些遗迹有较为详密的考订。此编初刊于宋末,后多以钞本传世。康熙六十年(1721)娄东施氏以活字板刊行,此本多舛谬;而一些抄校本,如乾隆间钱枚手抄本、黄丕烈手校抄本则较好。《四库全书》据施氏活字本著录。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吴都文粹续集】地方诗文总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其中诗占五卷。明钱穀编纂。钱穀字叔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吴中四才子”之一文徵明弟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家贫无书,游于文徵明之门,日取插架之书读之,手抄异书最多,至老不倦,因仿郑虎臣《吴都文粹》,编为续集,初为三百卷,后经编辑整理,成为此编。此编前四十八卷,按所收诗文内容分类,或有文无诗,或兼有诗文。分为:一、都邑、书籍,二、城池、人物;三、学校,四、社学、义塾,五、风俗、令节、公廨,六、仓场,七、古迹、驿递,八、坛庙,九、书院,十、祠庙,十一、园池、第宅,十二、山,十三、山水,十四、题画,十五、花果,十六、食品,十七、徭役,十八、寺院,十九、桥梁,二十、市镇,二十一、坟墓。第四十九卷至五十二卷为“杂文”,所收皆为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逸,第五十卷亦残缺,检勘他本并同。盖流传既久,不免脱遗,已非完本。其中所标二十一门,分类亦多未确,盖能博而未能精者。然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录,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增至十倍。吴中文献,多借是以有征。”此编未尝刊刻,《四库全书》亦据抄本著录。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吴会英才集】地方诗合集。二十四卷。清毕沅选刊。清中叶诗歌创作中衰,唯浙西、吴中仍有一些卓越诗人出现。吴人毕沅为陕西巡抚“开府秦中时,爱才如命,海内文人咸归幕府。因刻《吴会英才集》。凡寒士无力者,取其著作,悉为开镌。诗高名贵,迥非岛、郊者流”(见潘清《挹翠楼诗话》)。此编共选吴中诗人十六家,最著名者为方正澍、洪亮吉、黄景仁等人。毕沅序盛赞吴会“人才之盛”。每位诗人选诗少则一卷,四五十首,多则两卷,一二百首。每位诗人前皆有小序,品评其人其诗。如评方正澍:“忘情仕进,乐志衡门。今之贾浪仙、罗昭谏也,诗工于体物。”评王复曰:“名父之子,翩翩佳士……诗篇蕴藉风流,如其标格,竹垞、樊榭嗣音在此。”评徐书受曰:“性情纯挚,内行可钦。其诗悱惻缠绵,意由心发。”

评顾敏恒诗云：“气清词赡，藻密思沉，如雅乐之有笙簧，名才之挺杞梓。”评陈燮曰：“少负隼才，综览典籍”，“一官奉檄，十载纓忧。仲宣登楼，景行种韭，绎其诗，每悲其志。”评王嵩高诗云：“吊陈迹之多荒，写羁怀之孤往，苍凉高激，风韵邈含。”评徐嵩诗曰：“逸藻古艳，擅青莲、昌谷之长。”评石渠曰：“足迹几半天下，怀古之思，越乡之感，一一发之于诗，时人方之鲍照，谓其诗长于羁旅行役。”等等。此集刻于乾隆间。

(王学泰)

【贞丰诗萃】 地方诗总集。五卷。清陶煦编纂。陶煦字子春，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尝官翰林待诏。贞丰又名周庄镇，清代属苏州府元和县。此编所收诗人不限于周庄一镇，包括苏台全乡，始于清初顺治戴之杰，终于清咸丰间戴其相、叶锦文，最末一卷为“方外”与“寓贤”作品。全书共收作者一百四十二人。选诗最多者为乾隆间廪生俞达(六十二首)，其次为韩来潮(三十八首)、徐汝璞(三十七首)、朱霞灿(三十首)、戴其相(二十三首)，其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其取诗多咏自然风光，咏贞丰者尤多。“诗人名下，先列其表字，次系以某人子弟及科目著作，然后述其生平。戊辰以前，参之拟乘；戊辰以后，询诸父老。苟得行谊可嘉，轶事可传，或详或略，辄缀数语，俾读其诗，如见其为人”。“是辑专为以诗存人，凡得一篇，仅存，即行登录。如有才行可传，而无只字留存者，或为附入他人名下，第未经附入者尚多，不无遗憾”(均见《凡例》)。可见编书目的在于记里中人事。此书编于咸丰末年，有同治三年(1864)刻本，仅一堂藏版。

(王学泰)

【木渎诗存】 地方诗总集。八卷。清汪正编纂，近人郭绍裘重订。汪正(1803—1863)字石心，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郭绍裘字醒春，吴县(今苏州)人。生活于清末民初。木渎为江苏长洲一小镇，自明以来诗人辈出，其享大名者有杨基、杨循吉、文震孟、徐波、徐枋、汪琬、叶燮、沈德潜、黄子云、周永铨、沈钦韩等。至于呕心沥血，耽于苦吟，而老于窗下，声名不彰者，不知凡几。汪氏恐年久而湮，文献无征，故辑为此编，收罗明初至清道光、咸丰间木渎作者诗。其地域范围“东北至于阳山，东南至于石湖，西北至于天池，西南至于横溪”，“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十里，得一百五十人，都为十四卷。其体例取法于沈归愚先生之《别裁集》，其用意则折衷于朱竹垞先生之《明诗综》”(郭绍裘《重订木渎诗存序》)。始自明初王宾，终于咸丰诸生蔡振铭。汪氏“存君子之诗，非徒存其诗，将并以存诸君子操行厉节、忠孝廉洁之概。是因诗以纪行，非采诗而遗行”。故每人不仅详记其事迹，而且在编排次序上也考虑到“以类相从”。如

“自卢雍以下为名臣者六人，而徐如珂为最；自王宾以下为孝子者七人，而王宾、徐有章为最；自杨循吉以下为高节者十人，而杨循吉、朱鹭为最；自赵宦兴以下为苦行者五人，而王人鉴为最”(祖喆《木渎诗钞原序》)。汪氏于咸丰八年(1858)编成此书，并未刊刻。民国间郭氏对此书“重加校勘，芟其繁芜，补其阙失，讹者正之，伪者削之。或其人有嘉言懿行，而诗只寻常数语，芟无可芟，补无可补，则仍重其人而存之”。对于那些只因“位尊金多”而入录者，则“芟去者约十之三，增补亦如之，重订为八卷”(见郭《序》)，并重新加以编排，全按时间前后排列。于1922年排印出版。除郭、祖二序外，还有咸丰间吴大淳跋，并孙继瑑等十人《题辞》。另有张郁文跋。

(王学泰)

【吴江诗录】 地方诗总集。初编四卷，二编二十二卷。近人陈去病编纂。吴江，于五代后梁析吴县地置县，清代属苏州府。此集收录吴江历代作者诗，初编始于三国吴，终于梁时置县；二编始于北宋，终于元末。初编一卷收录六朝作者七人，有张俨、张翰、陆云、顾野王等。二卷、三卷收唐陆龟蒙诗，四卷为唐代流寓吴江作者之诗。二编一卷为宋初谢氏诸贤之作，包括谢涛、谢绛等，二至七卷为宋代作者之诗，包括陈长方、杨邦弼、王懋、范成大、黄由、叶茵、盛文韶、魏汝贤、赵师鲁、孙锐、萧国宝等十余人。其中范成大、叶茵各占二卷。八至十卷为元代作者之诗。包括宁玉、庞朴、陆行直、陆继善、陆祖广、陆德源、张渊、朱斌、华翥、华幼武、丁敏等二十余位作者，以录华幼武诗为最多。十一卷收录宋代“寓贤”之诗，十二卷收宋代“官师”(即至吴江为地方官或学官)之诗。十三卷收录宋、元“方外”诗。十四至十六卷收录宋元两代至吴江游览之诗，署曰“游览”。其诗题皆涉及吴江山水名胜。十七至十八卷收录宋元两代题咏吴江山水名胜之诗，署曰“题咏”。十九卷为“酬赠”，收录宋元两代与吴江人酬赠之诗。二十至二十一卷为“杂载”，包括“甄雅”、“别伪”、“怪异”、“谣谚”四类。二十二卷为“补遗”。此编搜罗详备，只是分类过于琐屑。入录作者皆注字号爵里，并采掇遗闻轶事以附其后。前有编者自序。有1927年排印本。

(王学泰)

【楔湖诗拾】 地方诗总集。八卷。清徐达源编纂。徐达源，字无际，江苏吴江人。生活于乾隆、嘉庆间。楔湖，在吴江县东南四十里，一名金钟湖，一名梨花里(亦简称黎里)。此编所收即为黎里明代至清嘉庆间作者诗。黎里诗风可追溯至寓于此之陆龟蒙。编者云：“唐陆补阙有别墅在陆家荡北，以寓贤开一里诗教，提倡后学，厥功甚伟。自后杨子山

(岚)、方尔止(文)诸诗人,一时推为领袖。”陆、杨等人对黎里诗风皆有影响。所收始于明代汝旻、汝讷等十七人,止于乾隆、嘉庆间周霭、周霞,共五卷。卷六为“名媛”,卷七、卷八为“寓贤”、“释子”。各以辈行年龄编次,因为“乡里尚齿”,“不论科目”。取诗不拘一格,各体、各种风格皆收,唯不收应试之作,因为它“不足以见性情”。对作者介绍极简单,因为“此集原与《黎里志》可分可合”,作者“生平行谊可为后生法者,志中既有传记”(所引皆见《例言》),故不再重复。取诗最多者不过三十首,二十首以上者有毛以燧、毛以燧、吴琮仙三人。清人邱冈、周霁录诗各十一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编成于嘉庆十年(1805),有王昶及编者所撰两序。有嘉庆间孚远堂刊本。

(王学泰)

【七十二峰足徵集】 地方诗总集。八十八卷(其中包括词二卷)。清吴定璋编纂。吴定璋字友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太学生。“七十二峰”指太湖中以东西洞庭山为主的七十二峰。沈德潜序谓太湖“跨江浙二省,连苏、常、湖三府,袤延五百余里,中有七十二峰,星罗棋布,而东西两洞庭、马迹实为之长,其滨湖诸峰左右列者均不与焉”。清代太湖属苏州府,乾隆元年(1736)于此设太湖厅。此书所收为历代太湖诗人所撰诗词。自明以来选太湖诗者不下十余种,其著名者有《洞庭清气集》、《续清气集》、《太湖诗选》、《东山诗纪》等,这些地方诗总集意在传诗,而此集意在传人。因之“广采七十二峰,不拘一隅,务为吾乡先哲存其言行于什一云尔”。其编排“独不以时代为编次,而以氏族作类叙者,窃取世家、世本之意,著其来历,以见家学渊源,相承有自,西门第之甲乙,箕裘之隆替,亦可考世次而得之”。“如卷三起自南宋许必胜、许琮,终于明代许理、许铨、许道中、许绳武、许新民等。所录作品大多未曾刊刻,编者从作者手稿得来,自云:“湖山荒僻,前辈诗人吟啸隐居者,止以自怡,不求人知,其梓稿问世者,十无二三,故《列朝诗选》、《明诗综》两书,胪列一代人物,而所载太湖诗人,不满数家。予从事此书数年来,裹粮移棹于七十二峰古里荒村,无远不到;残篇剩卷,无有不搜,得二百八十余种,姓名可考者六百余人,苦力不能合梓,仅节钞十之五六,非敢云选也。”(上引皆见《凡例》)编者本意将诗文合编,除收诗词外,还录入赋三卷及有关太湖之散文十三卷,后赋、文皆未能刊刻。此编包括太湖诗人诗七十三卷、闺秀三卷、寓公四卷、方外五卷、仙鬼仆伎一卷、词二卷。所收最早之诗人为濮楚,为春秋时吴国延陵季子之孙,吴亡于越,濮逃居东洞庭之虎山,遂为濮氏之祖。最晚则为乾隆间人士。前有沈德潜与秦蕙田两序。有清乾

隆间依绿园刻本。

(王学泰)

【五峰耆旧集】 地方诗总集。二十卷。清杨廷樾编纂。杨廷樾字述臣,一字异之,江苏通州(今江苏南通)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五峰指江苏通州,因境内五峰并峙,故名。清雍正以前属扬州府统辖。雍正初升直隶州,并领如皋、泰兴二县。此集即收录历代通州作者诗。编者自云:“吾通肇建后周,宋代名贤迭出,诗始萌芽,迄乎前明,作者林立,人各有集,然散佚者过半矣。廷撰十数年中左右采获,凡见闻所逮及,自吾郡外泰兴、如皋、海门三邑诗之存者,靡不搜辑。若其人介节义行。政事文章荦荦大者,爰举正史省志泊家乘别集、志传碑铭、丛谈稗说,品录详核,备著于篇。”此书收录宋至明末通州作者四百三十九人,诗四千五百七十首(其中宋代十四人、元代四人,明代三百九十余人),作者与诗远比《明紫琅诗》为多。录诗最多者为明汤有光(三百首),其次为范凤翼(二百八十七首)、白正蒙(二百二十五首)、陈尧(二百十七首)、邵潜(一百九十八首),五人各占一卷。再次为陈宏裔(一百四十七首)、卢纯学(一百四十首)、崔桐(一百三十首)、葛幼元(一百零四首)、陈世祥(九十八首)、冒襄(九十四首)。其中最有名者为冒襄。后附“闺阁”、“道释”、“寓贤”。“寓贤”中著名人物有夏竦、元绛、王安石、孙觉、郑獬、蒋之奇、文天祥、王穉登、屠隆等。所附诗人小传较为详尽,编者之评论署“一经堂诗话”,多记遗闻轶事间有评论考证。资料丰富。有清道光四年(1824)刊本,一经堂藏板。

(王学泰)

【五山耆旧今集】 地方诗总集。八卷。清杨廷樾编纂。五山指江苏通州直隶州,包括海门、泰兴、如皋诸县。此集收录清初至康熙间通州作者一百七十四人,诗一千九百零三首。最多者为范国祿(一百七十九首),其次为陈世景(一百四十九首)、邵榦(一百四十四首),百首以下,五十首以上者有姜任修、何龙光、石为崧、许嗣隆、张圻授、季开生等,其余皆在五十首以下。在通州最有影响的清初诗人季振宜,只选了三十六首,似有不当。编者十分注重介绍录入作者之生平与遗闻轶事,特别对于选诗较多的作者,则从正史省志、家乘别集、志传碑铭、丛谈稗说中,详采有关事迹及评论,颇具参考价值。编者自撰评语署“一经堂诗话”。有清道光四年(1824)刊本。

(王学泰)

【崇川诗集】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补遗一卷。清孙翔编纂。孙翔字吕溪,通州(今江苏南通)人,生活于乾隆间。崇川指通州,清为直隶州,包括海门、如皋、泰兴三县。此集即收通州及三县之诗。包括宋代吴及、胡瑗、王观等九人,元代郭通甫一人,明龔

承芳、茅浦、曹大同、胡介、吴炤、石璜、顾国琬、冒襄、钱岳等一百四十余人,清代选季振宜、冒襄、吴球、白鹤、黄霖、丁有煜、孙世仪、蒋震文、吴廷燮、杨世纶等一百四十余人,后附“闺阁”、“方外”三十余人。其流寓部分多假名人以自重,如宋代收郑獬、陈瓘、文天祥,元代收陈基,明代收王穉登、屠隆,清代收王猷定、屈大均、易东、陈维崧、顾梦游等,其中多非久寓通州者。编者云:“是集不名一体,不拘一格,古风近体,固以汉魏盛唐为正,或宗派西崑、长庆、剑南、眉山,亦各就所长,不遗厥美。”又云:“前贤事实具载史乘,兹集止列姓字、官阶、里居、著述,余不旁及。”(皆见《例言》)集中包括近诗一卷,皆录当时(乾隆中叶)尚在世作者诗篇,这些人多与编者有交往。初编于乾隆三十年(1765)编成,历时八年。有通州知州何廷模叙。有乾隆间刻本。(王学泰)

【崇川各家诗钞汇存】地方诗总集。六十二卷。清王藻编纂。王藻字菽原,晚号七一老人,江苏南通人。生活于道光、咸丰间。此集收录古今江苏通州(即南通)之诗。其编采无一定体例,以“汇存”为主。分三部分:(一)《列朝诗选》,二卷。此集录宋元明三代通州作者一百零一人,始于宋之吴及,终于明之孙模。其中取诗最多者为陈尧(六十首),其次为白正蒙(四十七首)、汤有光(四十二首),再次为崔桐、葛幼元、柳应芳、范凤翼、顾养谦、朱当世、钱铎、卢纯学等在十首以上、二十首以下。其余大多为一二首。(二)《诗钞汇存卷首》,八卷。收录清初通州作者别集八种。每卷一人,录诗多在数十首至百餘首间,惟卷二录范国祿《十山楼诗钞》,存诗一千六百四十七首。卷前介绍作者及其著作。(三)《汇存目录》,五十二卷。此编前四十九卷,除闺秀袁九嫔为明朝人外,其余各卷所收皆为清初至清中叶通州作者之别集。每卷一人一集。每集存诗多在数十首至一百数十首之间。最多者为钱兆鹏《述古堂诗钞》(四百八十六首),其次为李懿曾《扶海楼诗集》(三百三十九首)、范崇简《懒牛诗钞》(二百七十九首)、徐锡爵《弁江诗钞》(二百四十九首)、刘伊《传经堂诗集》(二百十四首)。五十至五十一卷为“总录”。五十卷收录明清零散作者一百四十四人,五十一卷收录明清“闺秀”八人,五十二卷收录明清“方外”十人,每人存诗一二首。前四十九卷有作者介绍。有编者自叙。有咸丰七年(1857)刊本。(王学泰)

【崇川诗钞汇存补遗】地方诗总集。六十一卷。清王藻编纂。此编收录明末至清道光、咸丰间通州作者诗。前五十八卷,每卷一人一集。始于明末崇祯间陈世祥《虫馀集》,终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汤莲渚《藕船吟草》。每集存诗一般较正集为少,

大多只数十首,最多者为宋霖《六雨诗钞》(二百十四首),其次为金丹《月梧诗钞》(一百三十八首)、保培基《西垣集》(一百三十六首)、袁缙《延湘阁集》(一百零一首),其余皆在百首以下,且仅有数首者。最后三卷收录明清零散作者九十一人。对于有专集的作者,多有较详尽的介绍,便于知人论世。有清咸丰间刻本。(王学泰)

【明紫琅诗】地方诗总集。四卷。清陈心颖、孙世仪、孙翔、冯萃同辑。陈心颖字鲁田,号柳园,诸生。孙世仪字虞朝,孙翔字吕溪,冯萃字陟南,皆江苏南通人,生活于清乾隆间。紫琅,南通之别名,明清时南通为州,隶扬州府,清雍正初升为江苏省直隶州,领二县。此编只收明通州之诗,不及二县。起自明初洪武间御史宴承芳,终于明末贡生凌荪,后附“方外”四人。共收录作者一百二十四人,诗五百餘首。此集基本以明嘉靖间卢纯学(子明)所编《江都集》为采录对象。孙世仪序《序》云:紫琅诗学自永乐以后“名公卿暨林壑之士,共鸣厥盛。子明卢先生哀刻其尤,载在《江都集》者,凡一百二十餘家,巍然巨观哉!顾收采既博,或有阑入,间为汰之,得如千篇。向非卢选,胡以得此!”前三卷多据卢选,只作了些删削,而以卢纯学作品殿后。第四卷多为隆庆、万历以后作者,为编者自选。此书取诗多在十首以下。录诗最多者为嘉靖进士陈尧(二十一首),其次为江一鱼、卢纯学(各十八首),葛幼元(十四首),卢纯臣(十三首),彭大翱、江震林各十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以一二首者为多。选诗多取“格律清苍、词旨忠厚”者,入录作者只简单注明字号,参考价值不大。书前有陈心颖、孙世仪二序。刊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学泰)

【国朝紫琅诗】地方诗总集。四卷。清陈心颖、孙世仪、孙翔、冯萃同辑。紫琅为江苏南通别名。陈氏四人为同诗社诗友,在歌吟啸咏之暇,历论本乡诗坛升降运会,感慨百余年来风流销歇,未有搜集当世作者之诗者,任其湮没,至为可惜,遂搜罗邑人诗作,辑为此编。始于清初布衣邵潜,终于乾隆初贡生丁有煜,后附“名媛”“僧”及编者陈心颖、校阅者熊飞诗。录诗最多者陈心颖(三十二首),陈宏简、丁有煜各二十首,其余为陈世祥(十九首),邵潜、顾道含各十七首,保培源十六首,陶开虞、范国祿、陈世杲各十四首,朱文心十一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邑中名人李方膺(“扬州八怪”之一)仅录诗二首。陈氏序谓诗以摭写性情为主“虽无当于一时,异世后必有心契而宝爱之者”。故取诗较为宽泛。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王学泰)

【师山诗存】地方诗总集。十卷。清茅炳文编

纂。茅炳文,字禹门,江苏海门茅家镇人。曾官内阁中书,生活在咸丰、同治间。师山,指海门厅,本为县,后为海吞没大片土地,改为乡。乾隆三十三年(1768)割通州、崇明部分地建为厅,厅治之后有沙丘名师山。自乾隆设厅后,文治“风气日开,人文蔚起,魁儒秀士,项背相望。诗坛文社,操槃敦以从事者,接踵而起,故海门之诗,于是乎浸盛”(见叶裕仁序)。此编录诗始于乾隆建厅之时,书中录海门(包括旧籍崇明、实居海门者)诗人一百五十八家、诗五百八十馀首。每人各附小传,详列遗闻轶事,兼作评论。后附“方外”及“闺雅”。海门地处海隅,从设厅至编纂此书时(1860年)不足百年,能诗者如此之众,可见诗学之盛。其中沈倬、沈棻、黄云骧、袁志筠、黄旭、陈璠等颇有名章隽语。此编有陈奂、叶裕仁序,钱振伦、李联琇题辞及李联琇跋。有咸丰十年(1860)茅斋刻本。(王学泰)

【**娄水琴人集**】 地方诗总集。十集。七十八卷,清周煜编纂。周煜字亦泉,太仓(今属江苏)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此书继汪学金《娄东诗派》而编,《例言》云:“《娄东诗派》断手于乾隆六十年,迄今四十年来,诗人辈出,遗稿恐渐散失,因编是集,以存其概。其有《诗派》应选而未及者,亦为补入。”又云:“是集所采于原稿中,取其上乘,体不尽拘。凡稿本多者录其十之二三,各为一卷,其一家得数人者亦合为一卷。馀或录止数首及一二首者,俱入‘据遗’。”各录一卷者有顾元真、倪遇、毕沅、黄昌言、季梦荃、苏嘉玉、王思济、王瑜、陆云海、陈震、王慰曾、杨云煜、杨云璈、陆恺、金闻鹤、张铎、徐瑛、吴路、毕宪曾、萧揆、萧抡、程师恂、王梦弼、胡金诰、王履基、王谦培、黄印曾、王良佐、王凤翔、王槐、刘瀛客、方毓寅、金越凡、盛徵玟等。这些一人一卷或数人一卷者,皆列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集。壬、癸二集包括“据遗”四卷,“寄寓”、“方外”、“闺雅”各一卷。全书“计得五百馀家。于《诗派》续其后者,十之六七,补其未及者十之三四”(见王宝仁跋)。“是集每人系以小传,传中采录轶事,并其人品学问,考核确实,以备他日修志之助,其未及详悉者阙之”(《例言》)。其所以名“《琴人集》者,谓广陵之散犹在人间,不至人琴俱亡已尔”(徐元润序)。有徐元润、陆煥二序,王宝仁跋。刊于道光十年(1830),有“闲有馀斋”藏版。(王学泰)

【**云间诗钞**】 地方诗合集。十一卷。清章耒编纂。章耒(1832—?)字韵之,号次柯,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生,娄县(今上海市)人。云间,松江之古名,清松江府属江苏统辖,包括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等七县及川沙厅。此编为松江

十位诗人部分作品之结集。编者序云:“学诗古文未成,恐无以传于后,于是录乡先生之诗。诗与史相表里,凡诗之表忠孝、扬节义,及足备掌故者悉存焉。应酬之什,存什之一而已。”此编选丁宜福作品最多。其《浦南白屋诗稿》独占两卷,录诗近二百首,以古体、乐府为多,丁诗反映了当时战乱、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如《感事》、《军功千总》、《团练局董》、《见上司》、《报偏灾》、《白墙门》以及《逃兵行》、《流民叹》、《捉捐户》等等皆为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此编包括:《谷春堂剩稿》一卷,娄县秦渊撰。秦渊约为嘉庆、道光间人。《纫兰轩诗钞》一卷,华亭朱廷栋撰。《醉梦间诗草》一卷,金山唐集撰。《求己山房诗稿》,奉贤朱恒撰。《闻香诗稿》一卷,华亭顾作伟撰。《鲸鹤馆诗钞》一卷,奉贤秦士醇撰。以上五人均均为道光间人。《泖东草堂诗稿》一卷,娄县沈辰吉撰。沈辰吉咸丰、同治间人。《浦南白屋诗稿》二卷,南汇丁宜福撰。《蘋花水阁诗草》一卷,华亭张家焱撰。《赐砚堂诗钞》一卷,华亭吴景延撰,丁、张、吴三人与编者同时。清代云间诗学甚盛,于此可见一斑。有清光绪初年刊本。(王学泰)

【**沙溪诗存**】 地方诗总集。十卷。清邑人集体编纂。沙溪,镇名,属江苏省太仓州镇洋县统辖。编者云:“沙溪在唐宋为涂松市,元始名沙头(明洪武前隶常熟)。其曰团溪、曰印溪、曰渭溪,各指地之一溪,而总称之曰‘沙溪’。”(《例略》)太仓自明以来,人文蔚然。明隆庆、万历间诗坛领袖王世贞,清初名诗人吴伟业均为太仓人。沙溪地属太仓,文风熏染,亦多好学苦吟之士,但大多穷愁潦倒,著述不传于世。“其性情之所得,神明之所会,虽通邑大都词流墨士,欲求似其片言而不能”。故邑人编此集以存其诗。共录二百零七人(始于南宋初年胡峰,终于清嘉庆间诸生吕师镐),诗七百八十馀首。其选诗原则注重阐幽表微:“里人有专集久行、选什互见者,佳篇林立,集中不能多收。至于残篇断简,剩墨零笺,虽未为斯人杰构,亦录之,以见崖略。”(《例略》)宋、元人录诗皆在十首以内,选诗最多者为元瞿孝正(号月蕉,曾与杨铁崖相唱和),亦仅三首。明人录诗最多者为黄翼圣(二十四首),其次为华乾龙(十四首)、曹乾学(十二首)、周诗(十二首),其余五十余人皆在十首以下。清人录诗最多者为叶藩、黄与坚、吕楠、曹荣祖、吕纶(各二十四首),其次唐瑀(二十三首)、邱园(二十二首)、毛师柱、曹延懿、曹家珍(各二十首),其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入录作者多有小传记其字号爵里,生平事迹。其中居沙溪者不注里居,“其穿山、古闸三家市及迁去徙来者,一一注出。间有迁去一二,传而仍录之,则以其人生长于斯,而诗又幽轶也”

(《例略》)。此书编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有杨云璈、毕宪曾、彭兆荪、徐元润序四篇。有清嘉庆间刊本。(王学泰)

【蓬溪风雅集】地方诗总集。四卷。清唐彦槐、胡开泰编选。唐彦槐字竹筠,太仓(今属江苏)人。举人。生活于道光间。胡开泰字子通,太仓人,诸生,彦槐表弟。蓬溪,乡镇名,属江苏省太仓州统辖,地处玉山、娄水间,自宋以来,为文人渊薮。至清结社联吟、独自啸咏者比比皆是,但因名位不彰,家境贫寒,其所作多为后人所弃,散亡殆尽。编者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故编纂此集,共搜得清康熙至道光间蓬溪作者九十人,诗五百余篇。按作者生活时代先后为序,附“流寓”、“方外”、“闺雅”。始于康熙间诸生邹钱斌,终于道光间乔以煦。录诗最多者为郁炯(六十七首),其余为胡步墀(六十三首)、徐云藻(五十一首),邹钱斌、朱锦如(各二十九首),朱元杜(二十七首)、胡元培(二十五首),其他皆在二十首以下,以选一二首者为多。入选诸人多为布衣,其作品也以描写清贫生活、抒发愤懑者为多,诗风渊雅,近于娄东诗派。作者名下只略注字号爵里。有张文淦、唐彦槐、胡开泰三序,有胡廷鑑、唐宗涛、释妙尘三跋。此书编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有道光间刊本传世。

(王学泰)

【娄东诗派】地方诗总集。二十八卷。清汪学金编纂。汪学金(1748—1804)字敬箴,号杏江,晚号静厓,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幼而聪颖。乾隆四十六年(1781)探花,授翰林编修,官至左庶子,以病乞归。“娄”指娄江。“娄东”即指江苏昆山、太仓一带。其地有著名诗人王世贞、吴伟业等,世代诗社相续,形成颇具特点的诗学传统。王世贞模仿唐人、声调铿锵的律体诗与吴伟业注重叙事与词藻、哀感顽艳的七言歌行,皆为娄东诗人所效法,产生了“太仓十子”等较有成绩的创作群。清王士禛云:“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此编共选娄东作者五百余人,始自宋代龚宗元,终于清乾隆间顾灏、汪学铭,未附“方外”、“闺雅”。其中最突出王世贞,一人独占三卷,其次吴伟业,占二卷,理学大师陆世仪一卷。有嘉庆九年(1804)诗志斋刻本传世。

(王学泰)

【梁溪诗钞】地方诗总集。五十八卷。清顾光旭编纂。顾光旭,字华阳,号晴沙,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梁溪,指无锡、金匮两县,属江苏省常州府,因汉名士梁鸿曾隐居于此得名。无锡名人辈出,有晋代名画家顾恺之,诗人有唐代李绅,宋代钱颢、李纲、尤袤,元代倪瓒、

华孟武等。至明清诗学更盛,较著名诗人有浦源、王绂、顾起纶、高攀龙等等。此集收录历代无锡人诗作。编者云:“乾隆丙甲(1776)冬,余归自蜀,从兄谔斋(顾斗光)既辑《梁溪诗钞》,南塘黄可亭(黄正衡)亦有《梁溪诗汇》。二君但序时代,尚未按甲科编定前后,其人不见于史乘者俱无传。而其稿尽归于余。”顾氏在此二稿基础上重加搜集厘订,“于是即由乾隆丁卯(1747)起;上而溯之国初,溯之明元,又溯之宋唐晋汉,下至庚辛壬癸近科诸君子。参之谔斋、可亭二选,各有增删。共集五十八卷,凡一千一百十人。其人显晦出处,各以其时附于甲科以次之”(编者跋)。其中东汉一人(黄彪),东晋一人(顾恺之),南朝宋一人(湛挺),唐一人(李绅),北宋九人,南宋十二人,元十四人,明三百余人,清初至乾隆间七百余人。其取材多自诸家遗稿、初稿、残稿,乃至诗人手定之稿。又取“家集、家谱,参考确证于史乘之外;师友渊源,流传有序,足资依据”(编者跋)。选诗“上遵御定《国朝诗别裁》之义,大要以诗传人,而亦以人传诗。忠孝节廉、丈夫女子、韦布寒饿,一言之善,辄录之”(钱载《梁溪诗钞叙》)。编者亦强调诗之教化与感化作用,因之“不独忠孝廉节之行,形诸歌泣,垂于后世,以感人之深;即里巷之谣谚,贩夫牧竖之讴吟,劳人思妇之咏叹,苟合于道,虽一言亦登之,不敢废也。非是,不在是选”(编者跋)。入录者皆附小传,其中多取诸家传志乘、诗文集序跋乃至故老言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编纂历时十馀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有钱载、王一峰两叙,及前两江总督孙士毅序。有嘉庆元年(1796)双桥艸堂刊本。又有宣统三年(1911)文苑阁排印本。

(王学泰)

【毘陵诗录】地方诗总集。八卷。近人赵震编纂。赵震字少芬,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生活于清末民初。毘陵即常州,清代为江苏省之一府,领八县。此编只收录武进、阳湖两县清人诗。清代常州以诗文名世。杰出诗人有黄景仁、洪亮吉。钱振鍠序云:“毘陵诗学,天下圃田、云梦也。其成名十数大家,已如景星卿云,为天下所共见。若其渊珠璞玉,若存若亡,则又不知凡几也。”“是录以搜遗存逸为宗旨,有通行本者不录,同、光以来有家刻集者不录,生存人不录。”但“集外诗录之,经咸丰庚申之劫,刊本罕存者录之”。“得之全稿者多录,得之选本及诗话、笔力,或同人传钞者少录,非故为轩轻也”(皆见《凡例》)。全书共录二百八十八家。始于清初杨宗发,终于清末张肇宪、赵景年。其著名者有董文骥、毛会健、董以宁、邹祗谟、杨抡、钱名世、程景伊、赵怀玉、杨伦、庄炘、张惠言、张琦、钱天择等。录诗虽不拘一

格,但编者认为:“约计吾邑之诗宗宋者多,宗唐者少。庄虚庵先生序《二轩诗钞》已详言,”因之书中收录宗宋者之作品较多。编者又云,清代常州诗社极多,清初“有谷诒社、浣花社、峨眉社、碧山吟社,互张旗鼓,学子翕然从之。乾隆壬寅、癸卯间,家味辛先生(赵怀玉)偕蒋辛仲、程命三、庄勉余、蜚英、皋直五先生,共举吟社,闻风入社,时有增加。大略言之,若杨氏腾光馆,赵氏山茶厅、味辛斋,汤氏东坡遗馆,左氏念宛斋,洪氏卷施阁,管氏读雪山房,陆氏崇百药斋、双白燕堂,汪氏采真轩,为诗人觞咏最盛之所”(《绪言》)。可见一时风会。此编录诗注重社会内容,编者云:“凡歌咏风上、表彰节义及古迹故事,可资稽考者,皆在所录。若夫义关讽刺,事综朝野,有足见国运兴衰、世风升降者,尤不厌求详。”(《凡例》)。编成于1922年,有排印本。(王学泰)

【曲阿诗综】 地方诗词总集。三十六卷,诗三十卷。清刘会恩编纂。刘会恩字时庵,丹阳(今属江苏)人。生活于乾隆、嘉庆、道光间。此编搜录曲阿一地历代诗词。曲阿乃秦汉时县名,唐天宝后更名丹阳。编者自序云:“余束发受书,即留心邑中掌故,始于乾隆甲寅(1794),凡遇有关文献者即手录度之篋中,辑成一书,名曰《丹阳文献考》。乃自汉迄今得诗尤夥,至道光元年(1821)阅三十一载,三易其稿,更汇为一集,颜之曰《曲阿诗综》。大约宋以前诸诗历世既远,悉辑于已刻缮装书内;元以下以逮今日之耆旧,则尽得谘访搜罗也。”编者严于去取,只有确证为曲阿人才录其作品,从汉(始于丁令威)至清嘉庆间共录诗人九百有馀。其诗作除取自“古今已刻诸集传本、末刻诸集传本而外,益以《醴泉集》、《梅花集》、《广福山志》、新旧《府志》、《邑志》、《练湖考》、《练湖志》、孙氏《烬馀集》、贺氏《广平家乐》、姜氏《家珍集》,以及各种丛书,荟之为集”(见《例言》)。入选各家,皆附小传,宁详勿略,意在保存文献。曲阿在宋以前多有较为著名之作者,如南朝梁萧子良、梁武帝、萧统、简文帝,唐之储光羲、萧颖士、殷遥、权德舆、张祜、许浑,宋之张泌、石延年、苏颂、葛胜仲、葛立方等,元以后所存录作者虽多(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有名气者较少。卷一至卷二为隋以前作者之诗作;卷三至卷五为唐至南唐诗作;卷六至卷八为宋元诗作;卷九至卷一四为明代诗作;卷一五至卷三〇为清代诗作;卷三一为清代闺秀诗作;卷三二为清代方外诗作。编者选诗,力求雅正,其标准近于朱彝尊,亦仿其《明诗综》、《词综》之例,名之曰《曲阿诗综》。此编搜罗宏富,考订精审,不仅保存了该邑大量文献,亦颇具有阅读价值。有道光五年(1825)刊本,版藏于刘九思堂。(王学泰)

【江上诗钞】 地方诗总集。一百七十五卷。清顾季慈编纂。顾季慈字心求,江苏江阴人。诸生,生活于道光、咸丰间。“江上”指江苏省常州府江阴县。江阴诗学肇自两宋,当时有葛胜仲、葛立方以诗闻于世,元有陆文圭、许恕、王逢,明有张袞、王穉登、夏树芳、许学夷,清代有沙张白、曹禾、赵鸣銮、王模等皆当世知名之士。自明以来就有辑江阴诗者,明许学夷辑《澄江诗选》,清初陈芝英辑有《江阴诗粹》、嘉庆间杨敦原编有《江阴诗存》等。此集在这些诗集基础上编纂而成。全书共收录唐至清咸丰间诗作者八百五十九家,始于唐末魏璞,终于清末汪翼麒、孔庆弥。卷一七三以后为“闺秀”。其中许多重要的作者独占一卷。全书共录诗一万七千馀首,蔚为大观。录诗不拘一格,如李联琇序所云:此集“采辑务备,无诸选家誉此诋彼、专取所嗜之嫌。故典雅冲淡,豪俊秣縻,幽婉奇险之辞,随所宜而各适其位”。亦间有“诗不甚佳,而其人足为表率者则诗以人存,或其事足以风世者,则诗以事存”者。入录作者所附小传皆注明其出处。此书于咸丰八年(1858)编成,因卷帙浩繁,并未刊刻。民国初邑人谢鼎镛加以整理校刊(有《校刊例言》),于1931年由陶社排印出版。(王学泰)

【江上诗钞补】 地方诗总集。十一卷。近人谢鼎镛编纂。谢鼎镛字幼陶,号冶盒,江苏江阴人。生活于清末民国间,肄业于南菁书院。此编继顾季慈《江上诗钞》而编。《诗钞》收录历代江阴人诗,虽卷帙浩繁,但仍有遗逸。谢氏穷数十年之力,搜罗顾氏所未及者,体例悉本顾书,故名《诗钞补》。全书共补一百六十八人,计宋二人,元四人,明二十六人,清一百一十人,其余为“闺秀”、“方外”。《诗钞》不录方外,此编则详加补苴。编者云:“诗钞与诗选不同,选诗取其严,钞诗取其备。况是编志在补辑,苟有可存,虽零章断句,亦珍同拱璧。”(《例言》)其十一卷“补遗”部分以零章断句为多。入录作者皆附较为详细之小传,并注明出处。书前注明“采用书目”二十六种,并有陈衍、章钜祚、曹家达、祝廷华、陈宗彝、唐鸣凤等人所撰六篇序。有1932年陶社排印本。

(王学泰)

【京江耆旧集】 地方诗总集。十三卷。清张学仁、王豫编纂。张学仁字冶虞,号寄槎,江苏丹徒人,举人,有《青苔馆诗钞》。京江本指长江下游,此处指镇江府。清镇江府包括丹徒、丹阳、金坛、溧阳四县和太平厅。此集初编于乾隆末,王豫序称:“记辛亥(乾隆五十六年,1791)读书松村阁与张子寄槎共笔砚……因与寄槎搜采润州一郡之诗。豫出所藏二百馀家付寄槎,寄槎阅二十馀年以来留心采访,得五百馀家,商榷去取,总以敦厚和平、不失性情之正为职

志。人各系以小传、或附诗话,如《明诗综》例。汇成十三卷,各曰《京江耆旧集》。“从中可见编纂过程及编纂宗旨。《例言》中进一步说明编者本沈德潜以“格调”论诗宗旨,严于去取:“是集广搜博采,共得六百馀家,严为采择,必属风雅正声,方登拙选。其新奇粗率堆砌艳丽诸作不敢滥入,以夸卷帙之富。”集中所取多者不过四十首。作者小传及评论中多记遗闻轶事。对于前辈名流,负一郡之望者即使不专事吟咏者亦间录一二首,以人存诗;“至于隐士布衣、闺秀方外,偶然流露,能写性情,亦必以诗存人,不敢轻率”(见《例言》)。明末遗民则附于第一卷之后。所取自顺治初年起至乾隆六十年(1795)止,“皆已故者方敢登入,庶不谬集名‘耆旧’之旨”(见《例言》)。有张学仁撰于嘉庆元年(1796)的《京江耆旧集徵诗启》,末云:“仁也技愧雕虫,情殷辟蠹。一篇访得,露浣蔷薇;全帙钞成,香薰笃耨。爰仿《别裁》之例,采择綦严;亦遵《篴衍》之文,据摭较夥。惟冀芹藻名贤,粉榆旧族,启枕中之秘,发累叶之藏。上稽国史之登,下考家乘所载,苕篴频搜,邮筒迭寄,汇成全集,用备大观。将见锦囊宝剑,作花骨以长留;金薤瑶函,并贞珉而不朽。谨启。”可见其征求之诚意。此集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有青苔馆藏版。

(王学泰)

【海虞诗苑】 地方诗集。十八卷。清王应奎编纂。王应奎(?—1757)字东淑,号柳南,常熟(今属江苏)人。诸生,博学能诗,著有《柳南诗钞》、《柳南随笔》。“海虞”为常熟古名,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分吴县虞乡置海虞乡,隋平陈并入常熟县。此编选诗自清初钱陆灿至清乾隆初叶童隐止,作者凡一百八十三人,诗一千六百八十八首。常熟自钱谦益反对明前后七子模拟诗风形成虞山诗派以来,作者辈出,其著名者就有冯舒、冯班、钱陆灿、钱曾、钱龙惕、吴历等,在清初诗坛与云间诗派、娄东诗派鼎足而三。后历时既久,或遗编零落,散在他所;或姓氏沉沦,不省谁作……若任其放佚,不简择汇成一书,久益消亡莫考”(见陈祖范序)。王氏熟谙邑中掌故,苦心搜讨二十年乃成此书。原定编二十四卷,先梓成十六卷,编者应邀编辑《奉贤县志》,暂时停止。后又编成两卷,“甫经脱稿,小传尚缺”,王氏去世,故十七、十八两卷仅有诗无传。前十六卷每位诗人皆附小传,仿《中州集》、《列朝诗集》“以诗存人”之意。编者引钱谦益《与施伟长书》中语:“小传之作,务在采取佳事佳话以为点缀,正不必多引列传、家谱板实语,没却前人风华也。”故传中所记多为琐言细事,与正史列传专记官职迁转不同。此编之作还意在“发潜阐幽”,对于享大名之钱谦益一首不选,对于有专

集行世者,采掇从略,对于“布衣穷老之士”则细加搜集,以不负其一生吟咏苦心。如果“其人可传”,诗虽不甚工,亦加以选录。所选之诗,“苟有关于邑中山川风俗、人物事迹者,即诗仅平通,亦必节取”(皆见《凡例》)。此书有陈祖范序,有王应奎子锡畬、师韦及孙绍祖、绍昌所写跋语。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占处堂藏板。

(王学泰)

【泖溪诗存】 地方诗总集。上下二卷。清冯景元、徐家驹编纂。冯景元字霭堂,徐家驹字逸骐,两人均为江苏常熟人,贡生,生活于光绪间。泖溪在今常熟东南。蒋士骥《泖溪诗存序》云:“吾邑(常熟)东南隅有乡集曰泖溪,其地土膏沃衍、民俗清嘉,居于斯者多隐居子。”此书所收皆此乡集作者,始于元代顾细二,终于清末光绪,凡四十七人,其中方外、闺阁各二人。入选者多与编纂者年辈相近,故书中所记诗人小传、遗闻轶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收诗人多为沉沦下层之文人,所录作品反映社会生活面较为广阔。如冯登瀛诗一百二十四首中《竹钱筹》、《小票》(指纸币)、《洋钱》、《车辘辘》(写手推车)、《传车歌》、《车三传歌》、《推船行》、《挑水谣》、《岸水谣》、《池鱼叹》、《低田乐》等,许多题材为人们所罕作。其他如冯鉴《踏灾行》,陆锡祺《照相》、《人影》、《乌衣使者歌》,亦属于此类作品。蒋序云:泖溪隐者“耽吟咏,自乐其天,而其人初无幸传之心,故未尝自编一稿,自刊一集,以冀世俗之知;而天籁所发,怡然自得之趣,固宜传矣。”故“诗不加删,著其详也;片词必录,珍其文也;有瑕弗掩,存其真也”。书中还有冯景元、徐家驹所撰二跋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王学泰)

【淮海英灵集】 地方诗总集。二十二卷。清阮元编纂。“淮海”指江苏省扬州府,清乾隆间包括江都、甘泉、扬子、兴化、宝应、东台六县,高邮、泰州二州。因此集录诗始自清初,故将旧隶扬州的通州、如皋、泰兴诗也包括在内。阮元序云:“元幼时即思辑录诸家诗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后,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1795)自山左学政,奉命移浙江,桑梓非遥,征访较易,乃博求遗籍,遍于十二邑。陈编蠹稿,列满几阁,校试之暇,删繁纪要。效遗山《中州》十集之体,录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闺秀,癸集收方外,虚己、庚、辛三集以待补录。曰《淮海英灵集》者,高邮秦少游尝名其集曰‘淮海’,唐殷璠选诗亦曰《河岳英灵集》矣。”可见此集编纂经过。甲、乙、丙、丁、戊每集四卷,壬、癸集各一卷。所录之人皆以已故者为断,各为小传数行以纪爵里事迹,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其以甲、乙分集,皆以得诗先后为定。“各家之诗,皆就其所擅长者录之,

庶各体皆备,不敢存选家唐宋流派门户之见”(见《凡例》)。共录诗人八百余名,一般流寓者皆未录入。书中对所录诗人介绍较详,可为研究江苏文学史者参考。协助阮氏编纂者有陈焯、赵蕙棻、陈文述、端木国瑚、焦循等。有嘉庆三年(1798)小琅嬛仙馆刊本。(王学泰)

【白田风雅】 地方诗总集。二十四卷。清朱彬编纂。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江苏宝应人。白田为宝应之别称。清代宝应县属江苏省扬州府。此集收录清初至道光初年宝应县作者三百一十六人,诗一千三百余首。姚椿序云,宝应虽地处江淮河海之间,时有水患,“然其风气朴茂,笃学好古、文儒鸿笔之士,飒飒乎多出其间”。如王岩、乔迈、陶澍、乔莱、刘中柱(雨峰)、陶蔚、乔亿、王嵩高、刘台拱、刘宝楠皆当时著名的宝应硕儒文士(后二人未入选)。此集录诗特别注重富于社会内容之作品。如陶澍诗就较为全面反映了明清之际宝应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书中对于重要作者皆有评论,署名者不止一人,如清初诸家多署“刘雨峰曰”,此为刘中柱之评;或署“刘楚桢曰”,则刘宝楠之评;以署“游道堂诗话”者为最多,此即编者朱彬之评语。二十卷以前作者以时代为序排列。二十卷、二十一卷为朱氏家集(按宝应县以朱、乔、刘、陶为四大家族),二十二卷为“闺媛”,二十三卷为“释子”、“羽士”,二十四卷为“官师”、“流寓”、“酬赠”。所收多为清初至中叶名士,如孙蕙、叶燮、王猷定、宋琬、施闰章、王士禛、程可则、朱彝尊、查慎行、沈德潜、袁枚等。此书编成于道光元年(1821),并未刊刻。清末朱彬曾孙朱绶生请乔止巢加以增订,于光绪间在金陵书局刊刻出版。

(王学泰)

【高邮耆旧诗】 地方诗总集。三卷。清王敬之、周叙、夏崑林同辑。王敬之字宽甫,周叙字雨窗,夏崑林字瘦生,皆江苏高邮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高邮在清为州,属江苏省扬州府。高邮自唐宋即为风雅之区,“其先辈之以诗鸣者,不必复述,而沉思苦吟、伏匿而不出正大有人”(宋茂初《初册序》),因而三人遂辑高邮“未遇诸先辈遗诗”,编为此集。初册一卷,选录历代作者三十六人,始于元末马玉麀、明代著名散曲家王磐,终于乾隆间张垓、管鼎镛,皆为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未遇诸人之作”,二册一卷,选录作者八十六人(包括“流寓”、“闺秀”、“方外”),始于南宋末龚璘,终于乾隆间诸生陆芹。二册补遗一卷,始于南明诸生吴夔,终于康熙末闵麟嗣,十四人。总共一百五十六人,皆为《淮海英灵集》所未录。“间有姓名已载集中,其诗未经遴选,尚有可存,录之以存心血。其人其诗已载《高邮州志》中者,不复录

载”。选诗注重儒家诗教,编者云:“吟咏一事,性情所寄,以稍关感劝为要;泛泛吟风弄月,多从割爱;或失之过激,有乖温厚之旨者,亦未敢录。”此集一般不录乾隆以后去世之作者,因为“嘉庆初年迄今未逾四十载,诗人子孙或者自忖刳剥,可以徐待,不烦代录。其现已实无可待者,不得不附见册中,冀免泯灭”(所引皆见《高邮耆旧诗存初册说略》)。如初册附夏洪基《梅华馥咏》、李必恒《北岳樛巢诗》等七种集名;二册附孙全铨《映珠草堂诗钞》等五种集名。每人皆附小传,不知者缺之。有宋茂初序、《徵刻高邮感旧诗集启》,有王敬之初册、二册跋语。编成于道光十四年(1834),有道光间刊本。(王学泰)

【山阳诗徵】 地方诗总集。二十六卷。清丁晏原辑、王锡祺重编。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晚号石亭居士,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举人,以讲读著述为事。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号瘦荇,清河(今江苏淮阴)人。山阳在清为县,属江苏淮安府,此指淮安府,雍正后领山阳、阜宁、盐城、清河、安东、桃源六县。淮安为运河南北要冲,历来人材极盛。丁氏自序云:“山阳之能诗者,枚都尉(乘)开其先,其诗即《古诗十九首》之八,上接风雅,下启汉魏,实五言之冠冕也。魏有陈孔璋(琳),建安七子之一;唐有吉中孚,大历十才子之一;宋有张文潜(耒),苏门六君子之一。渭南(唐赵嘏)之‘长笛倚楼’,小杜赏之;节孝(徐积)之‘霜松春鸟’,大苏称之。明代有冰壑老人(潘亨)、射阳先生(吴承恩)、虞山逸民(张养重)三子,可称鼎足,谢华启秀,各名一家,为竹垞、渔洋所称赏。”至清代作者林立,有格调雄古者;有风韵清超者;有才力富赡者。著名诗论家潘德舆即山阳人。此集共录历代淮安诗人三百余人,始于枚乘,陈琳;终于道光间潘德舆等,后附“闺秀”、“方外”。乾隆间山阳吴玉搢(山夫)编有《山阳耆旧诗》,“仿元氏《中州集》系以小传,网罗采获,其用力亦綦勤矣”(丁序)。但未成书,亦未刊刻,只以钞本流传。因被俗手窜改,其间舛谬、重沓之处,不胜枚举。丁氏在吴编基础上“广为捃摭,其诗其人,增多以倍;事实又加详焉”。其间对诗之解释及对诗人之评论,凡出于吴玉搢手者必署明“吴山夫曰”,亦有标“耆旧诗云”者。如果为丁氏所评则标为“柘唐脞录”。潘德舆序谓丁氏编此书前后历十八年,其“所征者文也,而献实之,故足贵。然用诗存人,一二篇足矣。一二篇外,必至精者乃录之,弗以多贵也。俭卿然予言,予亦与删择役,要之俭卿搜罗出处行谊轶事之功为大”。书中以征录前人遗事行谊为主。编成于道光七年(1827),有李宗昉、潘德舆、丁晏序

刻。后王锡祺又作了一些增补。有清末排印本。

(王学泰)

【扬州风土词萃】 地方诗词总集。十七种。扬州古旧书店搜辑、刊刻。扬州自古繁华,至清为漕督所驻,尤盛于往时,因之许多诗人词客从诸多方面描写过它。此编便是清代文人以通俗诗词记录扬州风土民俗的一部丛书。它包括:佚名《广陵古竹枝词》,韩晔《扬州画舫词》,王雪州《广陵秋兴》,费执御《扬州梦香词注》,董耻夫《扬州竹枝词》、《董竹枝逸稿》,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林兰痴(即林苏门)《邗江三百吟》,署名集英书屋的《邗江竹枝词》,辛汉清《小游船诗》,臧穀《续扬州竹枝词》,阮先《赤湖杂诗》,阮充《淶湖竹枝词》,孔剑秋《扬州竹枝词》,黄惺庵《望江南百调》,臧穀《扬州杂咏》,无名氏《扬州辛亥歌谣》。此编值得重视者有四:一是董耻夫之《竹枝词》及《逸稿》。董为康熙间人,名伟业,字耻夫,号爱江,沈阳人,寄籍扬州。因擅长竹枝词,人称“董竹枝”。此二集共收竹枝词一百四十四首,其笔触深入到扬州社会各个角落,其中农、渔、商、儒、优、僧、道、巫、尼、娼、医、官、绅、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无所不有。一首写一事物,保存了大量民俗史料。二是林兰痴之《邗江三百吟》、《续扬州竹枝词》。林名嘯云,号兰痴,扬州甘泉人。生活于乾隆间,是嘉庆间达官阮元之舅父与师。其诗以写扬州风俗为主。特别是《三百吟》每诗前有小序,后有注文,对扬州风俗掌故记载颇详。如年节习俗、新异衣饰以及日常生活琐事皆有详细描写。三是《邗江竹枝词》,署名“仪征函璞集英书屋”,作者不详。全编对于扬州吃喝玩乐诸方面之情形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绘。四是臧穀之《续竹枝词》,臧字宜孙,号雪溪,自号种菊生、菊隐翁、菊叟,扬州人。道光、咸丰间进士,其作品主要描写太平军三克扬州,给扬州带来的巨变。所写多为目击身受,可作史料读。此书为近年影印本,无序跋。

(王学泰)

【徐州诗徵】 地方诗总集。八卷。清桂中行编纂。桂中行(1833—1897)字履真,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官徐州知府。徐州,在清为府,属江苏省,包括铜山、萧县、砀山、沛县、丰县、宿迁、睢宁、邳州等七县一州。此书所收为自明中叶至清光绪间徐州人诗,清人占十之八九。编者自序云:“中行不敏,再治徐七岁矣,惧无以道民成俗也。乃陈徐之诗观之,上溯有明,逮及并世,其宣民隐、章俗尚、敷政教也,十尝七八焉。舒郁良窳、宸隆善败之迹,油然有会于心,善者有所感,而不善者有所讽也。其他之留连景物、藻雪矜抱者,十亦二三焉。虽若无与政教耶,然民隐俗尚之所系,犹于是得其倪。徐之父老子弟其

感且讽必有比于中行者,则恶可以已也!”全书共录诗人二百五十馀家,铜山(府治所在)几占其半,录一百二十二家,依次为萧县、丰县、沛县、宿迁(宿迁录诗人最少,仅十三家,而诗较多,独占二卷,仅次于铜山)、睢宁、砀山、下邳。另立“闺秀”一栏。书中所收多为不知名之士,而所录之诗可取者颇多,酬酢赠答、分韵唱和等庸滥之作极少。入选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面广,而且风格各异,颇多佳作。如铜山之朱迈、孙运锦,沛县之朱延恩、阎焜贞,下邳之陈士升,宿迁之陈玉邻、张伟庚,皆有佳篇美句。其作品如《大水谣》、《河兵谣》、《出门》、《西洋纸歌》、《催租吏》、《猛虎行》、《赈厂验》、《三字狱》、《秋霖叹》、《罌粟谣》、《牧牛歌》、《还乡苦》、《河决志感》、《过官兵》、《募乡勇》、《战道口》、《颠倒歌》以及大量的感怀言志之作,皆富于感染力。清代徐州并不以诗名,可能由于穷儒寒士不善于互相标榜之故。此编最早刊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常见者有1914年王为毅刊本。

(王学泰)

【胸海诗存】 地方诗总集。十六卷。清许乔林编纂。许乔林字贞仲,号石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人。与其弟许桂林并称“海州二许”。“胸海”指海州,因州境内有胸山,故名。清代为江苏省直隶州,统辖赣榆、沭阳二县。此集只收海州诗,而两县不与。许氏编此集之目的在于:保存乡邦文献,宣扬儒家诗教。编者叙云:“《江南通志》谓海州密迩邹鲁,号称多材,固人文之藪也。自子徒、子析受业孔门,汉京以还,殊勋茂绩,焜耀汗青,而缪熙伯父子实开此州文苑之先。今则歌咏昇平,几于人人有集,称极盛焉。”但这些作者多为穷儒寒士,“诗窘清贫,诗囊短折,烟墨未传于竹素,姓名不出邱园,一生心力枉勉,将如飘风、春梦之无可踪迹”。编者以本郡人选本郡诗,“就粉榆之闻见,溯师友之渊源,俾先正遗文,不致久而渐佚”(《凡例》)。此编录诗虽然较宽,但严守诗教。吴邦庆为此集所作叙云:“是选宗旨,主于端诗教,持人心,冀保其乡邹鲁淳风,其意甚正。”因之于“侧词艳语,在所禁绝”,或“其语有关系而非承平雅颂之音,亦所不录”。“如里社饼肆中庆吊卷轴,故寿挽之诗,概不入选”,“江湖赝体,钉铰别支,虽能为才语”,亦一概不录。(皆见《凡例》)集中选录清代已故诗人近二百人,其中选其弟许桂林诗最多,诗一百九十六首,凡三卷;其友程宗城一百零五首,占一卷。所选多古体,注重描写本州风物之篇章。每人各附小传,间有评论。编者所撰署“舛榆山房笔谈”,其中多记作者遗闻轶事。此书于道光十一年(1832)编讫,录诗断限亦止于此。有道光间刊本。

(王学泰)

【两浙轺轩录】 地方诗总集。四十卷。清阮元编纂。“两浙”指浙西、浙东，即今浙江省全境。“轺轩”为古使者之车，此编为阮元出任浙江学使时所编，故以之为名。阮氏自序言此编缘起及经过：“余督学于浙，乘轺轩采风，非力之所不能为也。爰访遗编，求总集，遍于十一郡，自国初至今得二千馀家，甄而序之，名曰《两浙轺轩录》。嘉庆三年（1798）书成，存之学官，未及刊版。六年巡抚浙江，仁和朱朗斋、钱唐陈曼生请出其稿，愿共刊之，乃畀之重加编定，序而行之。”此编共收录两浙作者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前三十八卷按作者生活时代前后编排，第三十九卷为“方外”，第四十卷为“闺秀”。所录始于顺治，终于乾隆、嘉庆之际，“皆取其人已经可以论定者录之”。“前明遗老凡已列《明诗综》者，不复录入。其有人本朝至二三十年之久者，间为甄录”。“是选因人存诗，因诗存人。因诗存人，则诗在所详；因人存诗，则诗在所略”（皆见《凡例》）。入选作者皆附小传，注明字号爵里，说明取材所自。入选作品详于小家，略于大家。或从汇选，或从单刻，或从传钞，或从手稿，其间字句差异，编者择善而从。有一篇之中警句可传，而首尾不称，编者也稍加改动，以期完善。至于试帖诗、应制诗等概不收录。有嘉庆间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塘陈氏种榆仙馆合刊本。（王学泰）

【国朝杭郡诗辑】 地方诗总集。三十二卷。清吴颙辑，其孙吴振械补辑。吴颙原名嗣程，字仰颙，号洛波，一号退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举人，官遂昌教谕。此编收录清初至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杭州诗人作品。杭州在清为府，包括钱塘、仁和、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化八县与海宁州。吴氏认为当时流传甚广的《国朝诗别裁》所选杭州诗人作品太少，与杭州府诗人之盛况极不相符，而且《国朝诗别裁》又止于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中叶以后杭诗甚盛，名篇佳作皆未录入，不免有遗珠之憾。吴氏对杭州诗发展的来龙去脉十分了解，从此集可以考察杭州诗派与浙江诗派在清代的发展变化。全书共收录诗人一千三百九十人。自一卷至二十七卷以时代为序。二十八卷收时代未详者作品，二十九卷收“无名氏”作品。三十卷为“闺秀”作品，三十一卷为“名流寄寓”、三十二卷为“方外”作品。此书体例仿《樵李诗系》、《三台诗录》、《越风甬上集》，每人先录小传、所著集名，再介绍诗人逸事及评论（按：此部分多为颙孙吴振械所补）。书中着重搜辑“名位未显”或“后嗣式微”诗人之作，至于名家只是略加采掇，如钱塘袁枚仅录诗四十馀首。采集所本除各家专集外，还取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邓汉

仪《诗观》、孙以荣《湖墅诗钞》、赵时敏《郭西诗钞》、柴杰《浙人诗存》等总集。书前有索引，将所收录诗人姓名按韵目编列。此书吴颙初刊于嘉庆五年（1800），二十年后版毁于火，颙孙振械据旧本加以纂录，增加了一些诗篇，删除了两位非杭籍人士作品。有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王学泰）

【国朝杭郡诗续辑】 地方诗总集。四十六卷。清孙振械纂辑。孙振械（1792—1870）字宜甫，号仲云，又号再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此书为《国朝杭郡诗辑》续编。体例一准《诗辑》。编者于道光十年庚寅（1830）丁忧家居，整理其祖吴颙《诗辑》，发现颇多遗漏，自序云：“伏念顺、康以来，原辑间有脱漏，先大父尝为续辑，而未成书。自庚申（1800年，《诗辑》成书之时）去今逾三十年，名卿耆宿、魁儒隽流，飘忽殒谢，不可计数。遂复搜罗编次得一千七百五十八人，为续辑四十六卷。凡原辑、续辑所录之人，有可考见，辄为缀叙，或采自杂家，或征之闻见。碎事脞言，亦加摭拾。”一卷至四十卷收顺治初至道光十五年（1835）作者，以科目年辈为序；四十一卷至四十三卷收“闺秀”；四十四卷至四十五卷收“流寓”及无名氏（《续辑》特标出“流寓”一目，与《诗辑》不同）；四十六卷收“方外”。所录之诗良莠不齐，自序云：“械谓品鹭良莠，责在宗匠；以诗存人，务广甄录，则先大父显微阐幽之旨于焉斯在。”书前有索引，将作者姓氏按韵目排列。有光绪二年（1876）杭州丁氏刊本。（王学泰）

【国朝杭郡诗三辑】 地方诗总集。一百卷。清丁申、丁丙编纂。丁申字竹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活于道光、咸丰间。丁丙（1832—1899）字松生，一字松存，号嘉鱼，丁申之弟。杭州经咸丰间太平天国战火，文献零落，丁氏兄弟向以抢救文献自任，故继《国朝杭州诗辑》、《国朝杭州诗续辑》而编订此集。全书共收录杭州诗人四千七百八十五人，始于顺治，终于光绪初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者，每科多立专卷，以时代先后为序。如五十二卷为“道光壬辰乡试”者作品，五十三卷为“道光十三年癸巳”参加会试者作品。七十七卷至八十卷收“咸丰庚申、辛酉”死于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士作品，九十二卷、九十三卷收录驻防杭州的八旗旗丁及其后人作品。九十四卷至一百卷收录“闺秀”、“寓贤无名氏”、“方外”等人作品。入选作者皆附小传及评论。吴庆坻序云：此书“博采道光以来之诗，而前百馀年为旧本所未采者并补录焉。庚（午）、辛（未）之难，抗节者众，别为四卷，以阐潜德。八旗驻防，历二百年，人文炳然，甄录所作，以彰国家教养培育之厚。人系以传，一如前例。左采而右获，晨钞而暝写，盖二十年而始成。”书前有

按韵目排列之人名索引。此书编迄于光绪十九年(1893),有清末刊本传世。(王学泰)

【国朝湖州诗录】地方诗总集。三十四卷。清陈焯撰。陈焯字映之,号无轩,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贡生,官镇海县学训导,有《湘管斋诗稿》。湖州在明清时为府,属浙江省,领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七县。湖州诗自南朝齐梁沈约、丘迟提倡而后,日渐发达。元人汇编有《吴兴绝唱集》,明丘吉编有《吴兴绝响录》,皆辑清以前湖州诗。及清沈树本辑《湖州诗撝》,录自六朝,迄于康熙,凡一百八十卷,因卷帙过巨,未梓而散佚。陈氏在沈氏辑录基础上专辑清人诗,自明末清初,迄于嘉庆初年,凡九百余人。书成之后,并未刊刻。陈去世后,乌程县令彭志杰曾刻四卷。后稿本流于沈惇彝处,沈氏委托郑佑加以整理刊刻。此编录诗,不拘一格,“平奇庄逸浓淡,各择所长”。每位作者注明字号、里居、科名。如“后载某孙、某子、某弟,必其先人有诗于前者,以见其家学渊源”。郑氏整理此编时删去流寓湖州者之诗。陈焯父子诗,郑氏将其移入《续录》,其他仍以行辈先后排列。有清道光十年(1830)小谷口刊本。(王学泰)

【国朝湖州诗续录】地方诗总集。十六卷,补编二卷。清郑佑、郑祖琛编纂。郑佑字礼耕,号柳门,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太学生,以子郑祖琛仕,封通奉大夫,著有《得闲山馆集》。祖琛字梦白,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广西巡抚,有《小谷口诗存》。郑佑整理《国朝湖州诗录》时,考虑到陈焯录诗“例以已故者为限”,当时陈已歿二十余年,“昔存今亡者又多矣,合编续录”(见郑佑《国朝湖州诗续录序》)。因此与沈惇彝等多处采访,“远近闻而投赠纷至沓来”,又得二百余家,编为十六卷。体例一准《诗录》。前十四卷按科名年辈次序排列,十五卷收仕女诗、十六卷收方外诗。前编虽已收录,而郑氏感到未录其代表作品,则在《续录》仍予著录。如沈祖孝条下注云:“见前录卷一,今从全稿增录。”郑祖琛在其父《续录》基础上又补编二卷,一同刊刻。有道光十一年(1831)小谷口刊刻本。(王学泰)

【湖阴诗微】地方诗总集。三卷。清徐有珂编纂。徐有珂字韵霄,号小谿,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曾任知县,有《小不其山房集》。“湖阴”指太湖之阴,这里指浙江吴兴(包括乌程、归安二县)。此地向为诗学昌盛之地,但由于“草茅踈伏,名不出里巷,不得拔帜词坛、附青云而彰于世”(吴云《序》)。徐氏为保存乡党文献,表彰闾巷穷士,故编此集。共收作者二十人,始于乾隆间举人徐德元,终于咸丰间诸生沈纪常。所录诗多佳作,以写

吴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及风土民情之作为多。如沈端之《胡淩楼偶题》四首,《绿葭漾棹歌》三十六首,吴梦鳌《东郭杂事诗》二十首,徐自然《东郭杂事诗续》十首,《消寒绝句》四首,《东郭十二咏》、《蚕词》二十二首以及《大水行》等皆为此类作品。徐氏于同治间编就此集,未刊刻而去世。光绪七年(1881)其门生陈根培与子徐凤御选徐有珂诗一百余首,编为第三卷,亦颇多可读之作,如《刈稻歌》、《春日湖上诗》六首等。有光绪间刊本。(王学泰)

【浔溪诗微】地方诗总集。四十卷,补遗一卷。清周庆云辑。周庆云(1866—1934)字湘舲,号梦坡,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浔溪指湖州之南浔镇。南浔为浙西人才荟萃之地,与嘉兴之梅里齐名。李详序云:此二镇之人才“几与名都会相埒,僻左之行省,且莫逮焉”。如明之董斯张、朱国桢、董说、陈忱,清之倪璠、董浩、杨凤苞、施国祁、沈谦、张鉴、汪曰桢等都是。此书采录自元至清末本镇诗人三百四十余家,诗五千九百余首。“意在阐发幽光。其有专集行世者,采摭稍略。至于未刊遗稿以及孤篇警句,精英未耀者,则必广为搜采,惧后散佚”。此编“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诗虽不工,而其人可传者,间亦采入”。另外,“凡诗之有关于里中故实及纪一时灾异之类,虽仅平通,亦必节取,以备志乘之考订”。“是编既第时代,而以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各署字号官爵及所著诗集之目,附以小传,并采及志乘传状,先哲评语,以为知人论世之助,其无可考者阙之”(以上皆见《例言》)。所选之诗“或从传抄,或从手稿,或从汇选,或从单刻,或从图画题咏,或从简册题辞”,对于保存乡邦文献,贡献颇多。选诗最多者为董汉策(四百零二首),其余为董嗣成(一百八十五首)、董说(一百六十四首)、纪磊(一百五十八首)、纪远(一百五十三首)、董斯张(一百四十九首)、纪复亨(一百十七首)、董友松(一百十二首)、杨凤苞(一百十六首)、陈忱(一百零六首)、孙燮(一百零四首)。此书编于辛亥革命之后,前有姚文栋、宗舜年、李详、孙德谦、喻长霖、吴昌硕、刘锦藻序及编者自序,后有刘承干后序。刊于1916年。(王学泰)

【闻湖诗钞】地方诗总集。十卷。清孟彬辑。孟彬字均之,号赋鱼,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乾隆甲申(1764)诸生。“闻湖”介于江苏、浙江之间。编者序云:“距嘉禾郡(即嘉兴)北三十余里有千顷之陂曰‘闻湖’。宋闻人氏家焉,即志所称‘王江泾’也。而闻湖之南北则秀水与吴江分隶之。”此地“烟火稠密,风俗醇茂,凡学士文人扬风扞雅、弦诵其间者,代不乏人”。至明代则有陶、王二氏之兴,明清之际蒋之翘以诗擅名一时。此集之编意在保存地方文献,起

自元代郁遵,终于清乾隆、嘉庆之际,并收录许多当时在世人之作品。孟氏云:“昔人选诗,例属已往之人,盖身后始论定也。第吾里僻近乡村,作者固少,而刻集行世者益寡。是选兼采现在,蒙同人惠教,不敢有遗也。”(《凡例》)入录之诗以写乡邦风光及人文景观者为多。每人各附小传及诗话,诗人籍贯以秀水为多,间有属江苏吴江者。共录诗四百六十九首,作者七十九人,皆以时代为序,后附“方外”、“闺秀”。第七、八、九三卷,为编者自撰诗二百四十三首,包括《十国宫词》一百首。集前附诸家评语,多赞誉之词。如名诗人吴文溥评语为:“大作元气混茫,神与古会,各种俱醇,不愧词坛老手。”此书编成于嘉庆五年(1800),有咸丰间刊本。(王学泰)

【**闻湖诗续钞**】地方诗总集。七卷。清李王猷辑。李王猷字显若,号耘庵,晚号汕翁,江苏吴江人,监生,有《菰芦雪集》。此集继孟彬《闻湖诗钞》而编。“闻湖”地连江浙,为文人渊薮,其地诗学以乾隆、嘉庆间最盛。江浙文士往来,亦多经闻湖,“吾里作东道主者,选胜地,设杯酒,更相迭和,殆无虚日。由是互相切劘,诗学日益进”(编者自序)。可是此期诗作,孟氏并未编入《诗钞》。李氏“念赋鱼先生迄今已越五十余年,后贤接迹而兴,苟无人焉为之纂辑,不几淹没不彰乎?爰复网罗散佚,并旧所藏弃者,详加厘订。计君曦伯助予校勘,利叔又搜访丛残,以补其漏略,编成七卷”(自序)。共录诗六百四十余首,作者一百零四人。其时代始于明,终于清咸丰间。此编体例,悉遵《诗钞》,但亦有不同之处。其一,不录当时尚在世之人作品。其二,不附自己诗作。其三,登录了“闻湖诗社”诸人相互唱和之作。其四,于诗人评语之后附有编者所撰“耘庵诗话”。有咸丰四年(1854)刊本。(王学泰)

【**闻湖诗三钞**】地方诗总集。八卷。清李道悠编纂。李道悠字子远,江苏吴江人,李王猷之从孙。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闻湖一带破坏甚剧,《闻湖诗钞》、《续钞》皆因战火而版片被焚,编者历年搜集到的闻湖诗,亦有所散逸。为使乡邦文献不致失传,故又辑为此编。其体例一遵《续钞》。始于明代沈、卜二氏,终于清光绪间。共收一百二十九人,诗七百餘首。“是辑于名号籍贯下有可追溯者,详书为某某子,若孙、若弟、若从子,俾览是编者,悉知溯源有自也”。对于《诗钞》及《续钞》所遗作者及诗作则详加登录。如蒋之翘《闻川怀古诗十二首》、《闻川杂咏五十八首》,使“里中古迹赖以不泯,其功最巨”。昔时有单行刻本流行,故孟彬、李王猷皆未录。编者云:“今历兵火,刻本绝少,诚恐一旦失传,后人更无从凭藉,今尽数钞入,以期久远”(皆见《例言》)。作者之

后附编者所撰诗话,署“求有益斋诗话”。此编前后搜罗十余年,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五年(1889)编讫,有光绪间刊本。(王学泰)

【**携李诗系**】地方诗总集。四十二卷。清沈季友编纂。沈季友(1652—1698)字客子,号南疑,浙江平湖人。康熙丁卯(1687)副贡生,有《学古堂诗集》。携李本古地名,在今嘉兴西,后专指嘉兴。清代嘉兴府包括嘉兴、秀水、嘉善、海盐、石门、平湖、桐乡七县。嘉兴在六朝时有“士大夫之郡”之称,以诗名世者,实始于唐,如丘为、顾况、殷尧藩等。后经南宋,文化逐渐发达,元、明、清三代,名诗人辈出。此集编辑嘉兴一郡之诗,自汉、晋以迄于清康熙初,共收一千九百餘家,“凡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士著、流寓,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而以仙鬼题咏谣谚附焉。姓氏之下,又各为小传,略叙梗概。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亦间加附注,以备考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种体例为后世辑地方总集者树立了范本。后世辑一省、一郡之诗者大体采用此种模式(如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此书收清初诗虽只七卷,但“多表彰节概之士。季友为人,亦从可知矣”(《清诗纪事初编》)。此书之前,有明景泰间朱翰曾编《携李英华》,崇祯末蒋之翘编《携李诗乘》,但较芜杂。沈氏在前二书基础上去伪存真,又详加搜采,故更为精当详博。沈书一出,朱、蒋二书遂废。书中小传亦偶有沿袭旧说而失考之处。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续携李诗系**】地方诗总集。四十卷。清胡昌基编纂。胡昌基字星禄,号云佇,浙江平湖人。贡生,生活于乾隆嘉庆间,操选政数十年,有《石濂山房诗集》。携李指嘉兴府,浙西嘉兴之诗学至清初叶始大兴,不仅出了朱彝尊、彭孙遒、彭孙贻、李良年、李旦华、吴文溥等著名诗人,而且形成了浙西诗派,诗学传统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此书继《携李诗系》而编,其体例一准《携李诗系》。编者云:“是编志在续纂,而彼此分画,岂能截然?爰托始于康熙己未鸿博(指康熙十八年之博学鸿儒考试)一科,盖是科虽仿唐制,实亘古旷典,我郡与选者四人。于此见昭代之文治跨越前朝也。其馀有无科目诸人,仍从顺治初起,既以全一代冠冕,且以补前编之漏。”(见《凡例》)卷一所收五人,彭孙遒、朱彝尊、陆莱、徐嘉炎四位皆应博学鸿词考试而得中,高士奇亦位至通显。此书诗人小传及评论亦较《诗系》简略,评论中间附编者之见,皆以“石濂山房诗话”命名。此编不于诗后详注山川古迹、风俗土物,不收谣谚仙鬼,注重“阐微表幽”。对于有专集行世之“鸿儒硕学”,所收较略,此

亦是不同于《诗系》处。全书共收诗人一千九百余家,始于顺治,终于嘉庆。原编三十九卷,后因“闺秀”一卷太多,析为三卷。胡氏竭毕生之力编此书,其长子金题(瘦山)担任搜访,后昌基目盲,金题继其任;金题歿,次子金胜(东井)继其任;后金胜亦歿,昌基已逾八十,目忽重明,因得卒其业。书编成后未能刊刻,只钞三副本流传。几度谋刻,均未果。其间又经过修订整理,清末金兆藩“以胡氏原稿本与许、朱二副本参校,稍稍厘正,原稿中有明人已入沈先生书(指《诗系》)而复收者,周拱辰、高道素、项佩凡三家;有本书自相复者,朱鼎炫、陈思光、濮光孝凡三家,今皆删去。有录无诗为张丈(张闻惺),校补者丁允沚、黄凯钧、郑湘屈、何焕、徐贞、孙湘畹凡六家,但补诗话者冯广誉、朱衣珍凡二家。原稿已收复删,今仍增入者马棗、施菑江、李元绣凡三家”(见金跋)。在沈曾植、劳乃宣支持下,经金氏审订之本于宣统三年(1911)在金陵刊刻。(王学泰)

【濮川诗钞】 地方诗合集。四十五卷。清陈光裕编纂。陈光裕字芬佩,号谨堂,浙江桐乡人,庠生,生活于雍正间。“濮川”指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因“宋吏部侍郎濮斗南赐第”于此,杨维桢、宋濂先后有文记此事而得名。明季以来由于沈机、濮淙等人的提倡,桐乡之人,翕然风从,清初诗风号称极盛。陈氏偕沈尧咨(沈机之侄)检得里中前辈遗稿及同社之能诗者数十家之集,合刊为此编,于乾隆五年(1740)刊成。有陆奎勋、陈梓序。此刻仅三十五卷,凡二十九家。《四库全书》收入“存目”。民国间于沈氏红药山房中发现此四十五卷本,由郑日章等人写印出版。包括:沈机《梅泾集》二卷,仲弘道《瓠香集》二卷,濮淙《澹轩集》一卷,周映康《雪芸草》一卷,冯允秀《梅花逸叟集》一卷,沈朗《恬翁集》一卷,周龙雯《怀孟草》一卷,陈选勋《蓝染斋集》一卷,杨炜《云竹集》一卷,杨燮《助亨集》一卷,陈曾祉《心隐集》四卷,张其是《碧草轩集》一卷,徐嘉《得月楼集》一卷,沈履端《竹岳楼草》一卷,鍾梁《来霞集》一卷,沈尧咨《晚盟草》三卷,周甸《峰山集》一卷,周嗽《顺宁楼稿》一卷,陈乐《故乡草》一卷,濮光孝《学圃集》一卷,徐晞《赤岩集》一卷,张弘牧《懒髯集》一卷,杨炯《南游草》一卷,曹士勋《萍梗集》二卷,陈光裕《谨堂集》二卷,陈梓《寓破草》一卷、《客星零草》一卷,张弘範《霁阳集》二卷,潘亮《一得吟》一卷,程琦《芳巖集》一卷,沈孔键《柴门集》二卷,沈鍾泰《获书楼稿》一卷,释氏佛眉依惺《龙潭集》,释氏豁眉寂解《随扣集》一卷。

(王学泰)

【梅里诗辑】 地方诗总集。二十八卷。清许灿编纂。许灿(1653—1716)字恒之,一字衡紫,号晦堂,

浙江嘉兴人,庠生,著有《敦煌》、《击汰》、《楚尾》、《荔雨》等集。梅里即梅令里,指嘉兴县南三十六里之王店镇,因晋代达官王逵世居于此而成巨镇,又因傍梅溪而得此名。梅里自明末以来诗学发达,产生了朱彝尊等有全国影响之诗人,有李光基《梅里诗钞》以及《梅里诗人遗集》、《梅令里诗选》等刊本出现。而此选起自元代王纶,终于清康熙陆人法,所辑最为赅备,书成后并未刊刻。清道光末,朱绪曾任嘉兴知县,以提倡风雅为务,慕朱彝尊之遗风,修葺朱氏遗迹,得知此集系参考彝尊旧稿而成书,因而加以整理修订,“潜心抉择,删其繁芜,复得其所未采者十数家,按时代以增入。属孙君次公(孙融)雠校付梓。共得诗人三百三十四家,得诗三千四百七十三首,分为二十八卷。里人多以编辑之名属于余,余谢之曰:‘晦堂以三十年精力成此编,余何敢掠美耶?惟余所增入管见所及者,加按语以别之可耳’”(《梅里诗辑序》)。朱绪曾并对集中所选朱彝尊、李良年等人之诗重选一过,多选其有关家乡风土之作。每位诗人皆系有小传及评论,署“晦堂诗话”者乃许氏所撰,署“绪曾按”者为朱氏所补。有道光三十年(1850)嘉兴县衙刊本。(王学泰)

【续梅里诗辑】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沈爱莲编纂。沈爱莲字远香,浙江嘉兴人,生活于道光、咸丰间。此书为许灿所编《梅里诗辑》之续编,体例一遵许编。清道光末年嘉兴知县朱绪曾主持刊刻《梅里诗辑》后,沈氏又贡献所搜采到的梅里其他诗人作品。朱氏考虑为使“梅里诗人后先接迹,仍当广为搜采,以衍竹垞(朱彝尊)之诗派”(朱绪曾序)。故命里中文士搜录清康熙至道光间里人诗作,嘱沈氏整理编纂,共得一百五十四家,诗一千二百五十六首。其中许灿、李集、金蓉等人作品较好。李貽德《述哀》组诗写其母年轻守寡,上奉翁姑、下抚幼子之艰辛经历,感情真挚,颇为生动。姚驾鳌《梅花溪棹歌》百首,全是竹枝风韵,并有小注,足以表现梅里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入录诗人皆附小传及评论。署“远香诗话”或“诗话”者为沈爱莲所撰,署“绪曾按”者为朱绪曾所撰,署“融按”为孙融所撰。此书初刊于咸丰元年(1851)。经战乱后,同治十一年(1872)沈氏子人伟补刻重刊。(王学泰)

【竹里诗萃】 地方诗总集。十六卷。清李道悠编纂。竹里,即竹田里,为浙江嘉兴里仁乡之一隅。嘉兴有四镇,竹里与梅里是其二,皆为诗人聚居之地。梅里早有诗集问世,因之竹里人亦有编纂本里诗集之尝试。如咸丰间徐同柏有《竹里诗存》、王逢辰有《竹里诗辑》,二稿皆未刊刻,最终毁于兵火。惟金汤孙《里仁乡诗综》钞本幸存于世。此书收六十余家。

李氏客居竹里三十余年,又曾编《闻湖诗三钞》,感慨竹里文献零落,因而在金书基础上编纂此稿。邀请本邑之人,多方搜访“凡竹里接壤之属里仁乡者,概登之,盖承《诗综》意也。积三年,复得百二十余家,妄加去取,汇而梓之,曰《竹里诗萃》(编者自序)。此编始于元之陆景春,明代收高逊志、高尚志、高承埏等八人,其余皆为清人。最后两卷收录“寓贤”、“方外”、“列女”之作。元明人因年代久远,专集散佚,所录作品多从总集、笔记、方志中搜罗而得,故悉为录入。对清人作品则有所选择。诗人名下注明其字号科目、仕宦、集名。如志传序跋中有可采者亦注其后。并从诗人家谱中采掇了许多材料,“诚恐再历数十百年,或致数典而忘也”(《凡例》)。编者亦仿朱彝尊编《明诗综》例,著《求益斋诗话》附在诗人小传之后,或评鹭诗章,或记佚闻、或考谬订误,颇有参考价值。书中所录之诗多可观,不乏佳篇秀句。录入者亦并非皆为士人。如卷四开篇之胡大年,为开烟草店之商人,他不仅精于行书、楷书,善画老梅、修竹、奇石、其诗亦萧闲淡远,颇有王、孟笔意。此书编迄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一年乡人集资刊刻,版存“蒋十咏庐”。前有嘉兴县学训导王震元、候补同知朱锡傅及编者三序,后有查辉之跋及《募刊竹里诗萃启》。(王学泰)

【严陵集】 地方诗文总集。九卷,前六卷为诗。宋董棻编纂。董棻字令升,东平(今属山东)人,北宋宣和间官镇江府学教授。南宋绍兴间曾知严州,因而辑严州诗文。南宋严州包括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等地。董氏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本其土风而有作,圣人删取各系其国”,是为了“使后世观诗者,因土风而知国俗”。因此他认为哀集一州古今文章叙次以传,是得“圣人之遗意”。书中所录皆为描写严州或与严州有关之诗文,作者不必皆本地人。录入作者始于东汉、迄于北宋末年,编者言及本书编纂过程又云:棻与僚属修是国图经,搜访境内断碑残版及脱遗简编,稽考订正,既成书矣,因得逸文甚多,复得郡人喻君彦先悉家所藏书讨阅相示,又属州学教授沈君僚与诸生广求备录,时以见遗,乃为整比而详择,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后迄国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尝至而赋咏实及此土,如唐韩文公,近世司马温公、苏东坡、黄鲁直,盖不得而不录也;其有名非甚显,尝过而赋焉,一篇一咏,脍炙人口者,盖亦不得而遗也”(见自序)。可见其取录标准十分宽泛。所录唐以前人作品多习见,而宋人诸作,除少数有专集外,许多无专集传世作者,如曹辅、吕希纯、陈瓘、朱彦、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张伯玉、钱勰、李昉、扈蒙、刘昌言、丁谓、范师道、张保雕、章岷、

阮逸、关咏、李师中、庞籍、孙沔、王存、冯京、刁约、元绛、张景修、岑象求、邵元、马存、陈轩、吴可玘、叶棐恭、刘泾、贾青、王达、张绶、余闳、刁衍、倪天隐、周邦彦、罗汝楫、詹元宗、陈公亮、钱闻诗等人诗章,亦颇赖此书以传。因取录较宽,故亦有与严州无关作品阑入。如四库馆臣所言“是集中,如司马光《独乐园钓鱼庵》诗,本作于洛中,以首句用严子陵事,因牵而入于此集,未免假借附会,沿地志之陋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董棻之序作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知本编成于此年之前,然书中有个别篇章写于九年之后,是知《四库全书》所收本有后人附益之作。此编宋刻已不可见,明有天一阁刊本,《四库全书》所著录者即此本。民国间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王学泰)

【蛟川诗系】 地方诗总集。三十一卷。清姚燮编纂。蛟川为镇海县之别名,清代属浙江省宁波府。镇海置县始于五代梁(初名望海,旋改定海,至清康熙始改今名),该地早在隋末唐初就有著名诗人、书家虞世南,唐末则有乐仁,南宋有薛置、余天锡等,元代有丁鹤年等,至明清镇海诗学愈盛。此编搜采隋唐迄清嘉庆、道光间镇海作者凡三百四十五人,各选诗数首或数十首,并人系以传,叙述诗人事迹,以存梗概。此书编排及作者小传极有特色。其编次注重诗人之联系及该邑诗学之发展,而且在每组诗人名次之后皆论述此组诗人之关系。如卷七“薛氏世风删续集补凡十七人”后解释云:“吾郡有薛氏自宋始,分支于定也自明始。其裔孙千仞布衣冈尝集其先世诗简,取合刻之曰《甬东薛氏世风》。”“于其分支居定海裔,别辑一卷,曰《甬东薛氏世风删续集》,凡十二人。”其中有些已漫漶,于是“乃复从零星故纸中搜得一家言,得十人,合为一卷,都十七人。仍千仞布衣原刻之名”,借以存一门风雅。其评署名“蛟川诗话”,多用以评论邑中诗学之发展、变迁。籍贯可疑者则作为附录采入。全书包括“唐诗二家”、“南宋诗六家”、“元诗四家”、“明正、嘉以前诗十三家”、“嘉、隆以前诗二十二家”、“薛氏兄弟尚书诗”、“薛氏世风删续集补凡十七人”、“天愚山人集”、“明季志节诸贤诗十四家”、“薛氏兄弟两布衣诗”、“邵尚书公子三高士诗”、“国初南安诸弟诗”、“梓山星椒社同社诸公拾餘诗九家”、“星椒社谢氏群从诗汇十九人”、“薛氏弟子诗十二家”、“熙、正十子诗之四”、“南安诸孙五谢诗之三”、“国初三朝蒙硕录四十一人”、“宾王先生集”、“南城傅氏诗十二人”、“清泉令裔五世诗十九人”、“上安坊祥符王氏诗十二人”、“九陈衙陈氏家学诗十二人”、“惺斋集”、“城中海晏前壘支胡氏诗十四人”、“芝山莲社集十六家”、“蒿云楼同学三子诗”、

“小有居倡和昆友诗十三人”、“平江裔谢氏五世诗拾餘四十一人”、“候涛山房集”、“乾隆七名家诗”。姚氏编成此集后并未刊刻。有盛炳炜、范寿金两序。1913年邑人盛炳炜主持排印出版。(王学泰)

【蛟川诗系续编】地方诗总集。八卷。近人范寿金编纂。范寿金号柳堂,浙江镇海人。生活于清末民初。姚燮所编《蛟川诗系》录诗止于道光间,南宋至清乾、嘉间之作者亦有遗漏,此书继姚书而编,补姚书之不足,其体例一准姚书。只是其编次与评论不似姚氏特别注重诗作者之间的家族关系。其评论署“野谿氏曰”。全书包括“南宋至清乾嘉间诗二十二人”、“樗斋草”(清任绍曾集)、“听鹧山房草”(清戴璠诗)、“听涛山房草”(清王在田诗)、“瓶壶山房虫吟草”(清王其朋诗)、“红桥舫歌选”(清姚燮诗)、“姚门弟子集三人”、“道咸同光宣五朝诗五十八人”。收录凡九十一人。此集编迄于民国初年,有1914年排印本。(王学泰)

【甬上耆旧诗】地方诗总集。三十卷。清胡文学编纂。胡文学字卜言,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甬上”指今浙江宁波一带,明代为府建制,包括今浙江宁波市区、镇海、奉化、象山、定海等地。甬上在春秋时为古越地。序云:“《吴越春秋》称越地东至于鄞,即所谓甬上也。自后迁置不常,一时人物与句章、余姚各相引重。”此为文化发达之地,贤人君子代而有之,也不乏诗作者。为纪念先贤,明清之际李邕嗣著有《甬上耆旧传》。此编即以“耆旧传”为线索,广为搜辑。上始自春秋间越大夫文种、汉大黃公,终于明季诸家,共采录四百三十人,诗三千首。意在保存本地文献,并借以考察甬上诗歌发展变化。每家之下,据李氏《甬上耆旧传》详列作者之生平资料。本为四十卷,付梓时胡文学去世,其子胡得迈,先刊行前三十卷。“每卷之首,俱有小序,略依其才品名位高下为次,使各以类从,而不尽以时代为断,于支派极为详晰”。四库馆臣对此编评价颇高,言其“体例精审,于部居州次之中,寓论世知人之义。征文考献,条理秩然,固非钓名悦容、瓦砾杂陈者所得而相比矣”(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众多地方诗文总集中,此书为较好之一种。有康熙十五年(1676)刊本,又有康熙四十九年金南铉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续甬上耆旧诗】地方诗总集。一百二十卷。清全祖望编纂。全祖望(1705—1755)字树山,一字绍衣,浙江宁波人。乾隆元年(1736)被荐举博学鸿词,适逢中进士,选庶吉士,未参加鸿博试。后授知县,不赴而归。此为胡文学《甬上耆旧诗》之续编,“甬

上”指浙江宁波,明代为府。所收多为明末清初宁波抗清民族志士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诗。意在表彰忠烈,宣扬民族意识。共录六百余人,诗一万五千九百餘首。第一至五卷为明亡以前士大夫诗作,其中有些是反映与阉党权奸斗争的诗篇。六卷以后则多为明末抗清民族志士作品。如第八卷《正气录》,第十一卷《殉难诸公诗》,第十三卷为张煌言诗,第二十八至四十卷为“三黄”(即黄宗羲及其子宗炎、宗会)诗。入选作者皆附详尽小传,以记遗闻轶事为主,多为野乘笔记所未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编成后,由于清代文字狱严酷,未能刊刻,只有抄本在民间流传。辛亥革命后才有排印本出现。最早的排印本为1918年四明文献馆编印。此本与传抄本出入甚大,排列次序有所调整,诗有删节。

(王学泰)

【四明清诗略】地方诗总集。首卷三卷,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八卷。清董沛编纂。董沛字觉轩,号孟如,浙江鄞县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江西建昌知县,有《六一山房集》。“四明”指浙江宁波府,因其西有四明山,故名。在清代包括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南田六县。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学政潘衍桐编纂《两浙輶轩续录》,董沛负责搜集编辑宁波府诗人及作品。董氏“竭一载之力采嘉、道后郡人诗人八百余家,上之书成,所甄录者,不及其半,先生以搜集之匪易,文献之有存毋废也。乃追辑国初以来诸家之诗,合之所上底本,厘订增补,别为一集”(见序)。未经审定,而董沛去世。三十六年后迭经战乱,原稿部分散佚。董沛之甥忻江明对原稿加以整理,并续辑光绪、宣统时作品,以成一代之诗。全书共收两千一百九十四人,诗九千四百六十八首。首卷所收为明遗民诗人,正集所收为清初至同治、光绪时诗人,续集所收为同治、光绪以后诗人。续编者云:“是稿意在网罗放佚,故正变并收,不分蹊径,袁陶轩先生《四明诗萃》残本几于悉数采入。”又云:“名家之诗,甄录较多,意以示一郡诗学之源流,且俾好古之士,得此一编,借窥诸家崖略。”(见《凡例》)对于录诗较多、诸体皆备者往往列专卷(如李邕嗣、全祖望)。每位作者下注字号爵里世系及诗文集名。小传所采传、状、序、跋之类,皆为摘要。各家姓名分韵编次。有民国初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王学泰)

【蛟川耆旧诗】地方诗总集。六卷。清张本均编纂。张本均字静泉,号郢荃,浙江镇海人,诸生,生活在嘉庆、道光间,有《郢荃诗草》、《郢荃笔记》。蛟川为镇海县之别名,明代称定海卫、昌国卫,清属宁波府。其地自唐代虞世南以后,宋、元、明三朝代有诗

人,著名者有黄震、余天锡、皇甫东生、丁鹤年、华颜、谢绪宏、谢绪恒等。全书共录唐至清嘉庆间一百八十六人,始于虞世南,终于胡湜。以选其曾祖张懋建诗最多(三十首),其次为张懋延(二十七首)、胡湜(二十一首),其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大多只选一二首。此书初编者为康熙进士谢兆昌,仅得三十八人,厘为三卷,遗漏颇多。张懋建重新搜辑,为六卷,未竟其业,卒。本均在此基础上,再加搜访,辑为此编。入录诗人皆详记其字号、生平、经历、著作,书前列“镇邑先辈遗诗失传者”十二人简历,以补志乘之失。有编者自序及《凡例》,叙编书宗旨与经过。有清咸丰间刊本。(王学泰)

【蛟川耆旧诗续集】 地方诗总集。上下二卷。清张锡申编纂。张锡申字岳生,为《蛟川耆旧诗》编者张本均子。此书乃继《耆旧诗》而编,体例一仍其旧。全书录清嘉庆至咸丰作者五十一人,始于郑兆龙,终于张锡冕(编者之兄)。录诗一百九十一首。录任宗于诗最多(二十首),其次为刘灿(十九首)、李恭浚(十三首)、张本均(十二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书后有张锡申所写之传及邑人王际昌跋,叙述编书缘由及过程。有咸丰间刊本传世。(王学泰)

【姚江诗录】 地方诗总集。八卷。近人谢宝书编纂。谢宝书字培卿,浙江余姚人,生活于清末民初。姚江,指浙江余姚县,因境内有姚江,故名。清代所刊姚江诗总集有三种,即黄宗羲《姚江佚诗》、倪继宗《续姚江逸诗》、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此集继上三集而编,体例一准三集,“祇惭寡陋,不敢赍续前贤,故别于‘逸诗’、‘诗存’,曰《姚江诗录》,以待后贤之选取”(见《凡例》)。倪书、张书已选录者,此书概不录入。全书所录始于明末清初,终于清末民初,共录诗人四百七十馀家。其选录原则“宁滥毋苛,诗学浅深,原不一例,唯是诗人一生心血所系,苟有可传,不敢抹煞”。“凡关于山川风俗人物祥异之作,多所采录,俾后之志邑乘者,有所取材”。每位作者皆附小传,“诸家所采志、乘、传、状,意在事增文减,删烦存要,若序跋诗话则从详,间附按语,并仿摘句图以志向往”(以上皆见《凡例》)。录诗较多者除邑中名人如卢文弨、邵晋涵、陈梓、黄璋、张羲年等之外,与编者有血统关系的谢氏作品选入较多,如谢秀岚、谢尚忠、谢煌枢、谢家树等入选作品皆在数十首以上。编者“所访诗稿,未署作者姓氏而循览篇中,确系本邑先正,别录无名氏诗,分甲乙丙丁,以次编定”(《凡例》)。书前有诸章达叙及编者自序,并附《续姚江逸诗》、《姚江诗存》所收作者姓氏录。此集之编始于1925年,迄于1929年。有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年(1931)排印本。(王学泰)

【国朝姚江诗存】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张廷枚编纂。张廷枚字唯吉,号罗山,浙江余姚人,诸生,嘉庆丙辰(1796)举孝廉方正,有《弃馀诗草》。姚江,即余姚县,属浙江绍兴府。余姚诗学至南宋而兴,其间最有名者为高翥。黄宗羲曾编纂《姚江佚诗》存录六朝至明人诗,后康熙间邑人倪继宗复编《续姚江逸诗》,收录明末至清初叶余姚诗人之作。廷枚生于乾隆间,距倪氏之编五十馀年,为保存文献,使姚江诗学存亡继绝,故编此集。此编共收清初至乾隆中叶作者一百六十馀家,特别注重收录明遗民作品,卷一至卷四所收几乎皆为遗民作品。全书以黄宗羲为开篇(倪继宗之《续姚江逸诗》已录黄诗),录其作品三十七首;二卷开篇为谭宗(曼方),录诗六十三首;三卷开篇为吕章成(蓼园),录诗四十三首;四卷开篇为邵以发(颐斋),录诗四十首,此四人皆为明遗民。所收诗多来自个人所存,四方选本,志乘所载,以及故家收藏和作者子孙所保存之手稿。其取诗注重收录“和平敦厚大雅之音”。编者自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古今作者,代不一人,人不一体,要皆根柢风骚,渊源忠孝。故兹集所载,平奇浓淡,体制虽殊,总不敢失诗人之旨。”(《例言》)当时正处于文字狱高潮中,书内又多收遗民作品,故特声明姚江遗民虽不仕新朝,寄迹山林,不求名誉,但“亦无不击壤、抚缶,歌咏圣世”。作者之后附有小传,间有编者评语。清初以诗名者高士奇、王苹、桑调元三人,因其集皆署钱塘籍,故此编不复载。书前有邵晋涵、陶廷珍两序及高抡印题诗二首。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本,宝墨斋藏板。(王学泰)

【溪上诗辑】 地方诗总集。正集十四卷,续编二卷,补编一卷。清尹元炜、冯本怀编纂。“溪上”指慈溪县,属浙江省宁波府,因有慈溪江过境,故名。尹元炜(1773—1853后)字青父,晚号方桥老人,浙江慈溪人,曾经吏部铨选为知县。冯本怀字慎旃,号西卿,浙江慈溪人,曾官内阁中书。慈溪为浙东一大县,自明初以后,文化逐渐发展,出过一些较有影响之诗人,如乌斯道、魏耕、裘琬、姜宸英等。自清初以来就有辑慈溪诗者,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林鹿园之《溪上诗钞》。尹氏自序云:“先是,亡友林君鹿园尝有《溪上诗钞》,广搜博采,积数十年之勤,未及成而卒。余因与西卿取而商定之,稍加增删,其有未经采收者,概为补入,得诗若干首,厘分十四卷,历一年而告成。”正集收录自东晋虞说至清道光间诗人二百馀人;续编收录九十人,补编收录十一人,汰去重出者,尚有三百人左右。较著名者还有虞世南、虞世基、舒亶、黄玠、姚宗文等。每位诗人名下皆注明字号爵里,后附轶事、评语。”援引诸名人评语,俱随诗注明

姓名,至鹿园所加评论,亦一一注明,不敢没其善也。其余现所加评者亦间有分别自识处,大概多不复注(见《凡例》)。诗人按时代先后排列,入清后诸人亦略准世次、辈行、年齿排列。对于流寓,间登一二,不分别列出。正集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续编成于咸丰三年(1853)。有清道光二十九年及咸丰间抱珠楼刊本。(王学泰)

【桐溪耆隐集】地方诗总集。一卷,补遗一卷。清袁炯编选。袁炯字羲庭,号芳郭里人,浙江桐庐人。生活于咸丰、同治间。桐溪,即桐江。桐庐县清代属严州府。正集所选八人皆为道光、咸丰间作者。其中三人——袁世经、袁世纪、袁世纬为编者伯父、叔父,其余五人——江肇壤、方毓瑞等为其伯父、叔父之故旧。正集选诗一百四十一首,选江肇壤诗最多,共六十二首,多摭写独立遗世的恬淡情怀,间亦抒发贫士不平之鸣。入选作者皆详注其事迹、生平以及著作,颇具史料价值。“补遗”所选多为康熙、嘉庆间名位不彰之士的作品,包括王金吉、吴文纬等十二人,每人选一二首。编者自云,桐庐虽地处偏僻,自唐章八元、章孝标、章碣以来,代有能诗者。入清之后,岩濞耕钓,畸材间生,但因无人汇辑,以致阮元之《两浙輶轩录》,也很少著录。经过咸丰兵火,文献损失颇多。袁氏就耳目所及,采录不及百一。为供后来修方志者参考,较详尽地记载了入选作者之事迹。此集编成于同治八年(1868),刊于光绪十六年(1890)。有光绪刊本传世。(王学泰)

【会稽掇英总集】诗文总集。二十卷。宋孔延之编纂。孔延之(1014—1074)字长源,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孔子四十六代孙,文仲、武仲、平仲之父,事迹详曾巩《司封郎中孔公墓志铭》。神宗熙宁四年(1071)延之知越州(会稽),有感于“会稽山水著美前世,而纪录赋咏,多所散佚”,乃辑此书,五年书成,称:“自太史所载至熙宁以来其所谓铭志歌咏得八百五篇,为二十卷”,诗则先律次古,“文则一始于古,稍以岁月为先后”(见自序)。前十五卷为诗:州宅、西园、贺监、山水(分兰亭等子目八)、寺观(分云门寺等子目四,附祠宇)、送别、寄赠、感兴、唱和,后五卷为文:史辞、颂、碑铭、记、序、杂文。编次有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延之搜访甚勤,如所录“大历浙东唱和五十余人,今录唐诗者,或不能举其姓氏,实赖此以获传”。唐诗如此,宋诗亦然。本书所录许安世、沈立、张伯玉、元绛、蒋堂、钱公辅等人之诗,其有集者,集早已失传,其无集者,亦赖以备辑佚。其所录唐宋太守题名壁记,全录原文,可资考证。本书在《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五著录,原本早佚,向无刊刻,只以抄本流传。《四库全书》藉明末清初祁氏淡

生堂抄本著录。嘉庆二十一年(1816)杜丙杰从文澜阁《四库全书》本中录出,并纂辑《拾遗》二十卷(已佚)。有道光元年(1821)杜氏浣花宗塾刻本,附杜丙杰所撰《校正会稽掇英总集札记》一卷。(孔凡礼)

【诸暨诗存】地方诗总集。十六卷。清郦滋德编纂。郦滋德字子言,号黄芝,诸暨浣东人,监生,能诗,生活于同治、光绪间,有《半情居遗集》。诸暨为绍兴府所辖,自宋元以来文教日益发达,元代杨维桢、王冕,明代陈洪绶等皆诸暨名人。此编所收始于宋廖虞弼,终于清咸丰、同治间。“体不限以町畦,词务求其隽雅。若夫闺房之秀,多尚婉丽,忠孝之言,无伤质直。难容别裁,宜以异论矣”(编者序)。选诗不拘一格,以取精去芜为主。所收诗人皆注以名贯爵里、生平行状,并搜考简策,采访旧闻,以为征献。卷一收宋元作者十七人,卷二收元杨维桢一人,卷三收王冕等元代作者十八人,卷四至卷六收明代作者六十五人,卷七至卷一五收清代作者一百七十四人,卷一六收闺秀与方外十九人,共二百九十四人。许多诗篇附有郦氏评语,颇有见地。此书初编于咸丰间,后经战乱,颇有散佚。郦氏去世后,又经其友郭肇及其子郦琮增编补校,于光绪十七年(1891)刊刻出版。前有俞樾序,后有郦琮所写跋语。

(王学泰)

【诸暨诗存续编】地方诗总集。四卷。清郭肇编纂。郭肇字怀初,一字复亭,浙江诸暨人,能诗,有《东埭诗钞》。此书继《诸暨诗存》而编,所收皆为清嘉庆以来人物,凡六十二家,多与编者有所交往。故作者小传中多记遗闻轶事。入选作品,多佳作,编者间附评语,亦颇有见地。书后附有《诸暨诗餘》一卷,收诸暨历代词作,共二十一家。又附郭著《东埭诗钞》一卷。有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王学泰)

【上虞诗选】地方诗总集。四卷。清徐幹编纂。徐幹字小勿,邵武(今属福建)人。约生活于嘉庆、道光间。上虞县,清代属浙江省绍兴府。此集收历代上虞作者诗歌作品,始于东晋谢灵运(灵运为陈郡阳夏人,生于会稽始宁,即清之上虞),终于清嘉庆诸生陈颢、朱绂等,后附“方外”、“闺秀”。凡二百零八人。选诗最多者为谢灵运(四十八首),其次为宋代李光(二十首)、明代谢肃(十七首)、宋代赵友直(十二首)、清代丁鹤(十首),其他皆在十首以下,以选录二三首者为多。选诗以写山水风光者为多,风格以清微淡远为主。无序跋,亦无凡例。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王学泰)

【剡川诗钞】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舒顺方、董彦琦编纂。舒顺方字象坤,一字后村,浙江奉化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岁贡生,官宁海训导,能

诗,有《龙津唱和集》。董彦琦字韦躬,一字奇玉,贡生,与舒顺方等结诗社唱和,亦奉化人。“剡川”指浙江奉化县,因剡溪从县西流过,故名。此集收录奉化历代文人诗,起自北宋林逋(其中汉代黄公、唐末布袋和尚皆属子虚乌有之人),终于清初。全书录诗九百二十六首,为当时奉化知县彭祖训选定,作者一百一十六人。分为四大类:(一)讲学诸公诗,楼钥十六首,陈著一百二十首,戴表元九十首,任士林三十首。凡四卷。此四人选诗最多,为全书主体,故“封面又题”楼攻媿、陈本堂、戴剡源、任松乡诗”。(二)修文诸公诗,共五十四人,凡四卷,以戴良才(十五首)、赵胜(十八首)、邬詮明(十七首)、周立木(十七首)、戴昆樵(二十二首)、戴石臣(十六首)等选诗最多。(三)显名诸公诗,共二十七人,凡二卷,以应履平(十四首)、王子沂(十三首)、王杏(十五首)、戴洵(十六首)、戴澳(十九首)等选诗最多。(四)隐逸诸公诗,共十四人,一卷,以林逋(十四首)、李国标(十首)、周志宁(三十二首)选诗最多。闺中三人附隐逸后。另有方外一卷。此编以“讲学诸公诗”作为主体,表明编选崇奉理学之意。书前有奉化知县彭祖训序,讲明编纂刊刻经过,并揭示编纂宗旨:“所讲览其集者,诵其诗,如见其人,必求得乎其所用心。则先儒心传,犹在三江五岭锦岩宝麓间,董德而善良,闻风而兴起,从此益明圣道,以砥柱运会,翼赞郅隆。则予所重望于剡川之后起者矣。”(见彭序)有舒顺方、董彦琦《征刻剡川诗钞小引》。此编初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嘉庆丁丑(1817)有重刊本。常见者有1915年宁波钧和公司铅印本。(王学泰)

【剡川诗钞续编】地方诗总集。十二卷。近人孙锵、江五民编纂。孙锵字玉叟,号砚舫;江五民字艮园,均浙江奉化人。此书为《剡川诗钞》续编,但体例与《诗钞》有所不同。编者自云:“前钞以楼攻媿、陈本堂、戴剡源、任松乡四先生诗为主体,而以诸家诗为附庸。是编义取平等,无复高下。其有主持风雅,杰出一时者,篇什既富,采录亦较多。”“前钞以人之才品名位依类分编,部居州次,以仿《甬上耆旧诗》体例。是编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各以时代为次,不复分列名目,庶免纷歧。”(皆见《例言》)另《诗钞》中诗人小传极简单,而此编中附有孙、江二人评论,标以“砚舫诗话”、“艮园诗话”,记载许多诗人遗闻佚事,两书之不同还在于前钞多收反映忠孝节义之作,以宣扬理学;而此编无所避忌。江五民在征诗启事中言:“今民国成立,政主共和,言无忌讳。所谓文字有狱,诽谤有罪,皆专制之虐炎,等过去之前尘。则夫戾时之禁书,叹咏之私咏,正可尽情披露,无烦复壁深藏。”书中收录了一些抨击时弊及歌颂明末抗清

志士之作。共录诗一千零四十七首,诗人一百六十八家。始于康熙间舒顺方,终于民国初年尚在世者孙达、王慕兰(女,独占一卷,录诗八十七首,全书中录诗最多)。此书釀资刊印,后附征诗启事与捐资刊印者之姓名。有1916年宁波钧和公司排印本。

(王学泰)

【天台集】地方诗总集。前集三卷,别编一卷,续集三卷,别编六卷。宋李庚、林师葳等编纂。李庚,字子长,尝官御史,生活于南宋初年。林师葳字咏道,临海(今属浙江)人,生活于南宋宁宗嘉定间。此编所辑皆历代至宋代有关台州之题咏,作者不必皆台州人。两宋时台州包括天台、宁海、仙居、临海、黄岩、乐清等地。集前有李兼序,称:历来辑诗“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集,凡域内文什,汇次悉备”,“于其山州土宇、民间士习,互可考见”,此编亦属于此类总集。前集所收为唐及唐以前之诗赋(赋仅三首);续集所收皆宋代诗歌。两集之别编皆为师葳子林表民所辑录,前集别编为补原集所遗,后集别编所收皆宋室南渡后诸人作品。李兼述此集编辑过程云:“州士李荣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哀文集四帙,已而州学谕林师葳又示唐宋诗三百余篇,于是摭取前代之作,删重补佚,而增其未备”,并刊刻行世。四库馆臣言此编所录“虽仅方隅之赋咏,而遗集沦亡者,每借此以幸存百一,足为考古者采摭之所资,固当与《会稽掇英总集》并传不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集南宋台州郡斋刊本已不得见,有明初仿宋刊本传世,《四库全书》所著录即此本。常见者有《台州丛书续编》本。(王学泰)

【国朝天台诗存】地方诗总集。十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清金文田编纂。金文田字性山,浙江天台人,生活在同治、光绪间。天台在清属浙江省台州府。天台僻处万山丛中,清初江浙诗人至此避战乱者颇多,与当地明遗民往来唱和,对天台诗风颇有影响。雍正、乾隆间本邑齐家多诗人,其中以齐召南、齐周华最有成就,其后亦代有作者,由此可见天台诗学之盛。此编即辑清代天台诗人作品。光绪中浙江学政潘衍桐编辑《两浙輶轩续录》,金氏受命搜集天台县诗,经过采访,共得一百八十馀家,诗八百七十馀首,编成此集。书中偏重收录“表彰节义、阐扬幽隐”之作品。每卷皆标明朝代,第一卷顺治,第二第三卷康熙,第四卷雍正,第五至九卷乾隆,第十卷嘉庆,第十一卷道光、咸丰,第十二卷同治、光绪。第十三卷闰媛,第十四卷释子。此集特别注重记录诗人遗闻轶事。编者云:“是编为乡邦文献所系,凡名下各传有所考据,俱加意详备。其事实无所见,或得之于传闻,亦必察其真实可信者载之。”(《凡例》)

集中采诗三十首以上者有许君微、胡作肃、齐召南、齐先觉、徐秉文等五人。前录褚传诰《题辞》七绝三十首,每首论天台一位诗人,可作清代天台诗小史读。编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当时并未刊刻。十七年后,“第念沧海横流,乾坤翻覆,不早为收拾,迟之又久,必且与昆明劫火灰灭无余”(编者《跋》)。于是在邑人帮助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排印出版。

(王学泰)

【永康诗录】 地方诗总集。十八卷。清陈凤巢编纂。陈凤巢字翔斋,浙江永康人。诸生。生活于道光、咸丰间。永康在清代属浙江金华府。此编收录历代永康人诗。始于北宋胡则、楼观、徐无党,终于清道光间陈凤阁、周新扩、陈德纯等,凡一百五十五人,另寓贤及来宦者十三人。录诗一千零七十餘首。浙东自宋以来便为理学家与功利派学者之渊藪,诗风自然受其影响,永康亦不例外。如南宋胡舜陟、徐木、陈亮、胡仔、胡之纯、吴思齐,元代胡长孺,明代李晔,程文德等,皆为政治家诗人或学者诗人。此书采诗亦较重视与政治、社会问题有关的作品,稍涉戏谑者不予收录。编者重视考证,“古人未有传书而其诗备载他书,有非其诗而误传为其诗者;有本其诗而误传为他人诗者;有各传为己诗而不辨其孰是孰非者”,皆详加考订或注明俟再考,“疑其附会者不载”(《条例》)。入录诗人有功能著述及“忠孝节廉”之事迹可考订者则详加考订。清以前作者之记述多据文献记载,并加按语。清代作者则多据所采之稿本、抄本及传说叙述其生平事迹。编者曾以王月洲(王环)作品为例,言其考订之苦:“王月洲诗当时未经付梓,今得其楷本者一百六十三首,得其稿本者二百六十八首。其草书如龙蛇蜿蜒,漫漶而不可猝辨。集中考证,惟斯最苦。”(《条例》)作者编次以时代为先后;诗以古体为先、律绝在后。书前列所采书目一百餘种,其中稿本抄本即在四、五十种以上。有咸丰元年(1851)刻本,有严良训、黄经二序及编者自序。

(王学泰)

【金华诗录】 地方诗总集。正集六十卷,外集六卷,别集四卷。清朱琰编纂。朱琰字桐川,号笠亭,浙江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上,官阜平知县,有《笠亭诗集》。金华,为浙江省一府,领八县: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汤溪、武义。金华自唐以来文化逐渐发达,南宋朱熹在此地讲学,并产生了吕祖谦、陈亮、王柏、金履祥等著名学者,逐渐形成了浙东学派,因此金华有“小邹鲁”之称。其诗学代表最早有唐骆宾王,宋有范浚、郑刚中、吕祖谦、方凤,至元有许谦、黄潜、柳贯、吴莱、吴师道、胡助、戴良,明有宋濂、王祎、胡翰、张孟兼、苏伯衡。正如编

者在《金华诗录序例》所言:“盖自守土有沈休文(约),寓公有刘孝标,词藻斐然,化成风俗,于是乎乌伤骆临海(宾王)振兴于唐初,居‘四杰’之列,以才华冠一代。迄于有宋,理学诸公不专以诗名。至浦阳方韶卿(凤)与闽海谢皋羽(翱)、括苍吴子善(思齐)为友,开风雅之宗。由是而黄晋卿(潜)、柳道传(贯),皆出其门,吴渊颖(莱)又其孙女妻宋潜溪(濂)、戴九灵(良)交相倚重,此金华诗学极盛之一会也。”明以后诗风虽不如元明之交时鼎盛,但亦代有作者。因之自明以来,金华及所属之县就有地方总集之编,如金华县有《长山诗集》,兰溪有《兰皋风雅》,东阳有《历朝诗》。另外有《金华诗粹》,合八县之诗,刻于崇祯末。此编主要借鉴《诗粹》,其正集共收历代作者七百二十二人,诗三千三百六十首。外集录“名宦”六十二人,诗一百五十二首;“流寓”六十一人,诗一百七十一首。别集载“联句”一卷,“月泉吟社”诗一卷,“石洞贻芳”一卷,“诗论合录句图”一卷。所选作品颇重其内容,编者云:“其间忠孝节义之大端,循良之绩,与夫一言一行之可为世法则者,采注不厌其详,读者即以此为讲学之书可也。”又云:“录诗不主一格,各随所长,以存其人。虽以诗为去取,亦因其题之有关系与否,述事言情不妨多,赋物写景不妨少。赠答之篇,则以赠答之人为主。一切世故应酬、十景八景之诗,概不轻录。必其人实无他诗可录者,乃审择一二存之。金华诗人中学有元本,立格选词,俱有家数。如孙石台《父母吟》、郑温卿《棉花行》、黄梦弼《种树篇》,虽过于繁琐,意主通俗,若为创格,然性情真率,兴会淋漓,易于动人,可以讽世,录入卷中,以备一格。”(《例言》)历代人名小传下有遗事可记者,分行小注,使读者参互考订,其或有论及诗文者,记载更为详尽。此书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迄于乾隆三十八年,首倡于金华知府黄琳。时朱氏任金华丽正书院山长主持编纂,书编成朱因忙于谒选,未及复校。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华训导陈焯重加复校订正,刊刻行世。光绪九年(1870)胡凤丹又重新雕版印行。

(王学泰)

【东阳历朝诗】 地方诗总集。九卷。清董肇勋、王崇炳编纂。董肇勋字幼待,号澹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贡生,曾任东阳训导,生活于乾隆间。王崇炳字虎文,号鹤潭,东阳(今属浙江)人,诸生,工诗,有《鹤潭集》,与董同时。东阳县在清属浙江省金华府。浙东自隋唐以后文化逐渐发达。东阳自唐就有名诗人舒元興等,此后有许谦、李裕、陈樵等。此编收录东阳历朝诗作:前集四卷,收录唐至明诗,其中唐七人、宋十五人、元十人、明五十九人。选诗最多者为元李裕(三十五首),其次为元李序(二十八

首)、明李能茂(二十首)、元陈樵(十七首)、明贾天民(十一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后集一卷,收清诗,共十四人,选诗最多者为乾隆间李凤雏(二十一首),其次为王崇炳(十五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外集二卷,收录历代流寓东阳诗人(包括在东阳为官者),始于南朝沈约,迄于清郑性,共四十人。其中不乏名流,如唐戴叔伦、宋方干、朱熹、陈傅良、唐仲友、陆游、魏了翁、刘过、明屠隆、清查嗣琛等。选诗最多者为董肇勋(五十六首),其次为明华炳泰(十五首)、清门应璜(十五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续集一卷,补录前集、后集之疏漏。收录东阳明清诗人三十一人,大多取诗只一二首。以上四集皆为董肇勋所编。又续集一卷,则为王崇炳所编。补清人二十,取诗最多者为王国陞(十五首)、杜瑗(十一首),其余皆在十首以下。所录诸人皆附小传。此编初刊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有郭燕贻序及董肇勋自序。为王崇炳所刊,学耕堂藏板。(王学泰)

【闽中十子集】 明初诗总集。三十卷。明袁表、马莼编选。袁表字景从,闽(今福建福州)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授中书舍人,转户部郎中,出为黎平太守,后以病免官。诗宗唐代开元、大历。马莼字用昭,户部尚书马森子,与袁表同乡。“闽中十子”指明初生活在福建省的诗人群体,包括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唐泰、王偁、王褒、郑定、周玄、黄玄等十人。南宋末叶闽人严羽著《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兴象,推崇盛唐。这些主张影响了后世的全国诗坛,尤为严氏家乡——闽中诗学所祖述。“十子”之一的高棅曾以严氏论诗主张为依据,编选《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林鸿也认为盛唐开元、天宝之际,格调声律齐备,学诗者当以此为楷式。“十子”虽非有组织之社团,他们之间以林鸿、高棅为核心形成两个彼此互有来往、师承的群体,有着共同的学唐倾向。“十子”中成就较高的是林鸿、陈亮、高棅、王恭、王偁,因而此集中入选的作品最多。五人中除陈亮选诗四卷外,其余皆五卷。“二玄”(周玄、黄玄)成就最低,每人只选录一卷。“十子”虽以学习盛唐相标榜,但其风格则更近于中唐的大历、贞元。其诗特点为气象较为浑成,奔放流畅,其缺点为模拟、应酬之作太多,生吞活剥唐人诗句,内容亦较贫乏,各种体裁的作品缺少变化。因之,即使在明朝初年,“十子”也非一流作者。此编按人编排,卷首附有“十子”小传。初刊于明万历年间,清光绪间侯官郭柏苍沁泉丛馆于十二年(1886)重校出版。(王学泰)

【闽诗录】 地方诗总集。三十五卷。清郑杰原辑,近人陈衍补订。闽“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

盛”。元以后,闽中诗人逐渐形成独具风格之流派。“嘉庆间,侯官郑昌英(杰)茂才辑有《全闽诗录》,已刻者惟《国朝诗录》自顺治至乾隆而止。其自唐迄明稿百余册辗转流落于乡先生之家,至郭兼秋先生独取明一代之稿刻之”(皆见陈衍《补订闽诗录叙》)。陈氏得到郑杰原稿加以补订,编成五集:甲集,六卷,收录唐代作者六十七人。其著名者有欧阳詹、陈去疾、黄滔、林宽、陈陶、胡令能等。“流寓”有韩偓、周朴等。乙集,四卷,收录五代作者二十六人。著名者有徐夔(即徐寅)等。甲、乙集郑稿遗漏较少。丙集,二十三卷,收录两宋作者七百二十余人,其著名者有郑文宝、杨亿、柳永、吴处厚、章惇、蔡确、吕惠卿、蔡襄、郑侠、黄裳、胡安国、蔡佃、李弥逊、李纲、黄公度、张元幹、萧德藻、敖陶孙、叶绍翁、刘克庄、严羽、林洪、林希逸、郑思肖、谢翱、林同、真山民等。郑稿收宋代作者仅百余人,陈氏增订五百余人,编成此集。丁集,一卷,仅收金代作者施宜生一人,为陈氏所补订。戊集,七卷,收录元代八十余人,其著名者为杨载、陈普、毛直方、黄清老等。此集郑稿只收十余人,陈补七十余人。凡补入之作者名下注一“补”字。录入作者皆注明字号爵里,附以诗话,以及各种杂著所记之遗闻轶事。陈衍原计划以明代为己集、《国朝全闽诗录初编》为庚集,嘉庆以后清作者诗为辛集,唐至清遗逸为壬集。癸集则俟诸来者。但后四集未能完成。只有此三十五卷本于宣统三年(1911)刊成。为朱字刻印本。(王学泰)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 地方诗总集。二十一卷。清郑杰编纂。郑杰字昌英,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乾隆间诸生。闽自唐以来代有诗人。至明、清两代,诗人辈出,诗风盛于往昔,而闽人鲜为外人所知者,是由于“闽人不善为名,故文采风流,不足争衡上国,非独地势限之,亦缘无好事者流为之搜采,时为表彰”(齐弼序)。这是第一部搜采、表彰全闽清诗的总集。共收一百五十五人,始顺治初廩生赵潜,终于乾隆间郭金台,录诗一千五百余首。录诗最多者为康熙间闻名全国之诗人黄任(九十九首),其次为林澍蕃(八十六首)、叶观国(八十二首)、丁炜(六十八首)、郑洛英(五十首)、蓝涟(四十一首)、陈梦雷(三十八首)、张远(三十二首)、陈霸(三十首),其余皆在三十首以下。编者选诗,不拘一格。郑氏对严羽以来提倡“兴趣”,反对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推崇盛唐、贬低宋诗之闽诗学传统有所批评。在评叶观国诗时云:“至于言诗,非惑于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一语;即泥于高廷礼(棅)初、盛、中之分,溺于所闻,毁所不见,数百年于兹矣,可胜叹哉!”又举叶氏《秋斋杂诗》云:“上乘贵妙悟,科律严且详。使

事犯指戒,太尽来谤伤。偶然涉议论,嫌与性情妨”。又云:“诗家建旗鼓,惑众为大言。中晚不足学,何况宋与元。虎贲虽貌似,不返中郎魂。”可见明初形成的专学盛唐的闽诗派,至清初已经有所变化。所录作者皆“详考其生平出处,兼折衷乎众论,时或附以己意,旁注其后,俾览者有所稽考,庶几知人论世之一助乎”(齐弼序)。郑氏之意见署名为“注韩居诗话”。编者经营此书数年,书稿大体完成后即病故,遗稿由其父及其友人齐弼共同校订完成,时在嘉庆五年(1800)。有嘉庆间刻本。(王学泰)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续】地方诗总集。十一卷。清郑杰编纂。此集所收为清代闽人诗,起自顺治五年(1648)年进士黄肇熙,终于乾隆末布衣叶殿材,共收作者三百八十人,诗五百七十馀首。除郑三才、许均、廖炳各录诗九首外,其他绝大多数每人只录一二首。像林云铭这样重要作者,亦仅录诗一首。从知此书只以著录作者人名为主,录诗为辅。每人皆附小传,注明字号爵里,间附评论。编者往往以“注韩居诗话”记载所录作者之遗闻轶事。另有署“兰院诗话”者,亦以记作者遗闻轶事为主,摘自《莆风清籁集》。郑杰序云:“所录之人俱已盖棺论定。其曰‘初集’、‘次集’、‘三集’留而有待也。曰‘续’者,补初集所未备也。”书成未及刊,编者病逝。其父委托齐弼校订整理,于嘉庆间刊刻出版。(王学泰)

【闽百三十人诗存】地方诗总集。八卷。近人林孝箴等人编纂。林孝箴(1866—1929后)字铭友,其他不详。此编收录清道光间至民国初年福建作者诗。编纂无一定体例。先收林藩《十二辰俳谐体二十二首》、王葆辰《左帅移督陕甘五排百韵》、龚易图《游武夷五排百韵》、林起贞《咏古六言六十首》,此为孝箴手钞先辈遗稿。后为其弟林孝箕集录《花好月圆吟榭联吟七绝》、《花好月圆吟榭联吟五律》、《花好月圆吟榭联吟七律》、《东社怀古联吟七律》。逸社同人又互出所藏,编成《逸社联吟七绝》、《逸社联吟五律》、《逸社联吟七律》。林欣荣又检出慎诚社师友唱和诗《逸社联吟七绝》、《逸社联吟五律》、《逸社联吟七律》。慎诚社为道光、咸丰间名人谢章铤主持。其弟林孝策又出其《旅越吟社七绝》。最后为林孝箴所著《芙蓉厅诗馀咏史咏物》七律三十九首、《貳香室桐花风》七律十四首。全书各吟社所涉及闽作者一百四十一人。前附作者姓名及字并有无执道人序。有1929年华宝公司排印本。由逸社同人校订。

(王学泰)

【莆风清籁集】地方诗总集。六十卷。清郑王臣编纂。郑王臣字慎人,号兰陔,福建莆田人。拔贡生,乾隆间官至甘肃兰州知府,有《兰陔诗集》、《南湖

风雅》等。“莆”指莆田县。莆田自隋开皇九年(589)立县,元属兴化路治,明清为兴化府治。此编收录莆田县自唐至清乾隆作者诗。莆田诗学,肇自唐中叶,其中以韩愈弟子欧阳詹最著名,其后有徐寅、黄滔、林宽等皆有名于世。五代后,文化南移。宋南渡以后,闽地则为文人渊藪。宋代莆田文士以诗鸣者有蔡襄、黄公度、刘克庄等。元明清三朝,莆田诗人辈出。此书共收录历代作者一千一百余人,诗三千馀首。其中唐十四人,两宋七十三人,元十七人,明代五百三十二人,清一百九十二人,其他“方外”、“法侣”、“神异”、“青衣”及“仙游”等二百余人。仙游县本莆阳故地,唐时析置。明郑岳编《莆阳文献》并载之,而此书则别置三卷,以示区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蔡襄、蔡京、蔡卞本为同里。襄以名流推重,遂收莆田;京、卞以奸迹彰闻,遂推之仙游。郑樵夹漈草堂,今仙游尚有遗迹,而以其博洽,又移之莆田,则亦不符公论矣。”录诗以唐人为最全,几乎是有诗必录,两宋以后以存人为主,大多是每人数首乃至一二首。入录作者除注明字号爵里外,多附诗话,编者自撰署“兰陔诗话”。以记遗闻轶事为主,评论考订为辅。对于明朝天启间,对抗权宦魏忠贤者及明末献身于抗清斗争者多有表彰之词。此集编成于乾隆中叶,初刊于乾隆三十七(1772)。曾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光绪二十六(1900)刘尚文购得此书板片,请吴辅校以旧刻各卷,颇多遗佚,令人补刻三十六板,诗一百二十六首,遂为全璧。于光绪末刊刻出版。有仁和钱琦序。(王学泰)

【杭川新风雅集】地方诗总集。三十卷。近人丘复编纂。丘复字荷生,号念庐居士,上杭(今属福建)人。生活于民国间。“杭川”即上杭,清代属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地处偏僻,其诗文创作不为外人所知。明李梅隐曾“广询故老,博访遗文,得宋元至明初三百馀年间名公”诗若干,编为《杭川风雅集》,此集至清失传。编者认为上杭人“禀山川质厚之气,不愿轻自表暴”,“山乡穷瘠,士皆安贫守分,剗削乏资”,而又“山岚湿气,蛀蚁易生”,“书十年即腐”,因此杭川风雅不为外人所知。丘复惧文献失坠,竭二十年之力,编为此书(上引皆见编者自序)。全书收录明诗人、明遗民作品各一卷,清代十八卷,民国八卷,又“女士”、“方外”各一卷,凡四百五十九家,诗六千一百三十五首。入录诗人皆附小传,编者评论署“念庐居士曰”,并多引林昌彝等人诗话。此编选诗较注重诗人品格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对于应酬之作则去取较严。自云:“凡前哲行谊足使后人取法者,虽残篇断句必录存之,以传其人。”(《辑录大意》)有1936年排印本。(王学泰)

【江西诗徵】 地方诗总集。九十四卷。清曾燠编纂。曾燠(1760—1831)字庶蕃,号宾谷,南城(今属江西)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累擢两淮盐运使,官至贵州巡抚,乞归养,卒。江西诗因宋代一些诗人追随黄庭坚,学习其风格奇险瘦硬的诗作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心法”形成的江西诗派而著名。在黄氏之前就有一些著名诗人,如陶潜、刘昫虚、王季友、杨衡、郑谷、陈陶、欧阳修、王安石等。黄氏之后也有一些不属于江西诗派的作品,如宋之杨万里、姜夔、文天祥,元之虞集、揭傒斯、范梈,明之刘崧、汤显祖,清之蒋士铨等。此书所取江西诗不以流派为准,仅以地望为归。书中惟陶潜诗全部抄录,其他如宋之欧、王、黄,元之虞、范、揭则仅择其精者,在百首左右。编者注重甄录未有专集刊刻、或有刊刻而流传不广的诗人之作品,以尽表微阐幽之义。共收作者二千余人,每人各附小传与简单评论。书前有曾氏所撰论诗诗五十四首,分别评论江西诗人中有代表性的作者五十四人,颇多独立见解。有嘉庆九年(1804)赏雨茅屋刊本。

(王学泰)

【西江风雅】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金德瑛、沈澜选编。金德瑛(1701—1762)字汝白,号慕斋,又号桧门,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翰林修撰,曾官江西学政。沈澜字维涓,号泊村,又号法华山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瑞州知府。西江即指江西。沈氏序云:“往岁慕斋奉常视学江右,喜谈诗,有投赠者,辄品鹭甲乙,钞寄商榷,度置篋衍间,蟬蚀过半。今春(指乾隆十八年,1753)料简旧文,重加葺整,搜残补阙,汇若干卷。其先后详略,遵用元本录校,偶有见闻,间附入一二。”全书以选乾隆初叶前后江西诗人为主。以选汪轸作品最多(一百零二首),其次为杨垕(六十首)、吴雯炯(五十一首)、彭廷谟(四十首)、盛乐(三十八首)等,多为名位不彰之士。其时享大名者如蒋士铨只选十八首。选诗不局限于学宋代江西诗风之作品,如汪轸之五言古诗即是模仿陶潜诗风的。选诗以风雅蕴藉为标准,以游历唱和之作为多,也有一些感慨身世之作。全书按体分编,先五言,后七言,先古体,后近体。入选作者皆注明字号爵里,颇简略,无评论。此书编成于乾隆十八年,有汤聘、王兴吾二序,有乾隆间刊本。(王学泰)

【吴楚诗钞】 地方诗总集。十八卷。清李少元编纂。李少元,号渔村,真州(今江苏仪征)人。生活于雍正、乾隆间。此编收录长江中下游流域作者之诗。这个地区自南朝以来诗学日渐发展,南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诗坛主导地区。编者自云:“余家扬州之白

沙吴人也,扬州为吴头楚尾,又所交游多楚人,故自弱冠以来,凡所见闻,名篇佳咏必手钞以藏之,积久遂衰然成集。因付之剞劂,以公同好,即命名曰《吴楚诗钞》。”全书共录吴楚诗人四百余人,录诗不主一格。编者云:“诗不一格,持论者最嫌于偏。即如前明崇王、李者矜风格,而末流必至于剽窃;学钟、谭者尚幽冷,而其末流必至于诡僻。是编清奇浓淡,悉为收采,要归于蕴酿深、学识大、格律细、音调谐,有目共赏,无所偏主而已。”书中钞录许多名家作品,如陈鹏年、顾嗣立、沈德潜、张廷玉、程梦星、蒋士铨、郑燮、袁日修、黄子云、王鸣盛、曹仁虎、马曰琯、钱大昕等皆有作品入选。编者云:“是集所钞诸名篇,公之同好,非选也,随得随钞,即以所得之先后,不以年之长短、时之久近、名位之贵贱为先后也。”录诗“皆就所见闻钞辑成集,不敢以私意增减,其多者固如山阴道上,千岩万壑,目不暇赏;即少者,亦可就一斑窥全豹,读者幸勿以多少为轩輊”。“多见在诸交游以及远近知名之士,素所耳熟者,或蒙寄示佳篇,或辗转构求,敛金在镕,集腋成裘,不敢私诸篋衍,急欲播之海内,遂有是役。”(上引皆见《凡例》)。可知所载多为雍正、乾隆间诗人之作。此书不为诗人立传,不加评论。有乾隆间醴波楼刻本。(王学泰)

【楚风补】 地方诗总集。五十卷。清廖元度编纂。廖元度字大隐,号息园,长沙(今属湖南)人,生活于雍正、乾隆间。此编所谓“楚”包括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地自屈原以来代有诗人,廖氏取历代楚人诗作,辑为一编,始自上古,终于明末,其意在于“陈诗以观风化”。由于编者系据地方志书编选,又疏于考证,故舛漏极多。如四库馆臣所言,“神农因茶山之葬,而收其《蜡词》;虞舜因苍梧之巡,而收其《南风诗》。甚以楚为高阳之苗裔,而收其《丹书》,假借牵附,不一而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于将《楚辞》任意删削;载入本非诗歌的戴凯之《竹谱》,亦可见编者识见庸陋。其他如将北宋之刘跛子列在六朝之际,将闽人严羽当作楚人之类常识性错误亦常出现,故不为世人所重。此书编讫于康熙间,原为五十卷,乾隆十一年(1746)长河知府吕肃高删定为四十八卷,未附一卷,刊刻行世。(王学泰)

【楚诗纪】 地方诗总集。二十二卷。清廖元度编纂。此书继《楚风补》而编纂,如吕肃高序云:“本书踵《楚风补》纪之,起顺治乙酉(1645),迄康熙癸酉(1693),凡前此数十年山川之莫丽,人物之嬉泰,习俗之淳良,皆于一歌一咏见焉。”全编共收录楚地(包括今湖北湖南)作者四百余人,前十八卷为清代作者,后四卷为明遗民。录诗较多者有刘有光(六十四首)、王岱(六十一首)、毛一骏(五十九首)、刘肇国

(五十七首)、金德嘉(五十二首)、高騫(四十四首)、李以笃(三十四首)、戴祁(二十九首)、程正苹、李中素(均二十八首)、许之豫(二十七首)、陈鹏(二十五首)。其他有影响的诗人还有程正揆、顾景星、杜芥等。此编基本反映了清初两湖诗歌创作之概貌,有乾隆十七年(1752)际恒堂刻本。(王学泰)

【**资江耆旧集**】地方诗总集。三十卷。清邓显鹤编纂。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一生致力于乡邦文献编纂。著有《南村草堂诗钞》。“资江”即资水,在今湖南省,此指资水流域。其府县有宝庆府之四县一州:邵阳、新化、城步、新宁与武冈州;长沙府之安化、益阳、湘阴;常德府之沅江以及宁乡、湘乡,此编搜罗此九县一州之作品。湖南文化发展较晚,资水所经多属偏僻之地,所产知名诗人更少,于唐只有邵阳之胡曾、益阳之齐己,宋代有湘阴之邓氏(如邓深)。胡、齐诗见于《全唐诗》,邓集录入《四库全书》,因之此编未予著录。此集所收始于明初于子仁(洪武十八年进士),迄于清道光间。明代着重收录明末湖南闻人:郭都贤、陶汝鼐、车以遵作品(郭四卷、陶二卷,车一卷),谓此三人“关系全楚文献,不仅一方掌故也已”。对于那些“名在海内,均无专集,尤不可听其湮没,故所存最多”。全书共收四百十一人,录诗四千四百余首。此书意在征考文献,表彰乡先贤,故诗人小传;搜罗遗闻轶事不嫌详尽,特别对于“为见闻所及、记载所略者,不憚详登琐载”。录诗不拘一格,以搜剔遐隐为主,所录多为外界少知闻者。编者自云:“吾乡前辈多务朴学而厌声称,资江上游,僻在一隅,尤为冠盖不到之地。深岩穷谷,抱奇蕴愤、老死不求知于人而人遂无从知之者多矣。兹征到各家多系村塾钞本,且多摘录,或就方志抄写。”(所引皆见《资江耆旧集序例》)(王学泰)

【**沅湘耆旧集**】地方诗总集。前编四十卷,本编二百卷。清邓显鹤编纂。楚地诗作,虽然廖元度曾有搜辑,但多舛漏,如王夫之这样有影响的湖南作者皆未收入。邓氏惧沅湘一带骚宗词伯之断壁零圭,没世无称,故编为此书。前编四十卷收录自晋至元末沅湘地区历代诗人,包括公卿、布衣、闺阁、释道,凡三百三十家,诗两千二百三十余首,对收录诗人之生平、著作皆有介绍。前编为显鹤之子邓琮所辑。本编为显鹤自辑。收录自明洪武至清嘉庆、道光间诗人一千六百九十九家,诗一万五千六百八十首,体例与前编同。本编一至四十三卷为明代卷,四十四卷以后为清代卷。宗植为贺熙龄《致同乡诸公书》中表彰此书“规枕南宋诗集《群贤》(指《南宋群贤小集》)例,仿《中州》(指《中州集》),人以为小传。至于

忠肝毅魄,贞媛幽人,大声疾呼,一唱三叹,实为有功名教,不徒无愧诗宗”。此编在地方诗总集中亦为巨著,许多无专集刊刻的诗人作品赖之以传。此书与《资江耆旧集》合而观之,便包括了湖南全省自明至清中叶诗人的代表作品。《沅湘耆旧集》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南村草堂开雕,至二十四年刊讫。

(王学泰)

【**湖北诗录**】地方诗总集。不分卷,六册。清高士熙编纂。高士熙字敬舆,号密斋,湖北钟祥人。安陆府廪生,雍正间贡于京,选官,官至陕西省巩昌府知府。湖北诗学远有楚辞;近世则始于宋。宋初宋庠、宋祁、郑獬皆湖北人,南宋江西派中坚如潘大临、林敏修、林敏功等亦生长于湖北,至明代除产生了如张居正、李维桢等名人外,公安派、竟陵派皆始源与风行于湖北。此编选由宋至清康熙间诗人五百余人,按湖北地方区划编排:即武昌、汉阳、荆州、黄州、宜昌、安陆、德安、襄阳、郢阳等九府(施南府未收)。选人录诗无一定体例,熟悉者多收,反之则少收或不收。安陆一编分上、中、下集与续集,其他各府皆为一集。安陆府共收录诗人二百余位,而文化发达的武昌府亦仅收七十余人、汉阳府三十余人。明代湖北“三袁”及钟惺、谭元春皆为开宗立派之人,而此编每人仅录一二首。权相张居正亦仅录诗十余首。至于对安陆同乡则采录较多。如刘学池录诗三十余首,大都平庸之作。张居正孙张同敞(与瞿式耜一同殉国者)选诗五十余首,亦有表彰明末遗烈之意。此编编迄并未刊刻,故书前无《序》与《凡例》,只有编者简记:“朱竹垞先生云:或因人存其诗,或因诗而存其人。谨录宋元前明国朝湖北名家诗,虽存十一于千百,而维楚有材,于此可窥一斑。”编者逝世后,其子高嵩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又录士熙诗近百首,在武昌刊刻出版。(王学泰)

【**楚庭耆旧遗诗**】地方诗合集。前集二十一卷,后集二十一卷。清伍崇曜编纂,谭莹校字。伍崇曜(1819—1863)字良辅,号紫垣,南海(广东广州)人,举人。谭莹(1800—1871)字兆仁,号玉生,南海人,官教谕。“楚庭”指广东,广东古百粤之地,为楚所灭,故亦视为楚地。此编所收皆清乾隆、嘉庆广东诗人作品,所录者皆伍、谭二人之亲朋故旧。伍氏序云:“爰与学博(指谭氏)露钞雪纂,好写留真。或称弟昆之交;或属丈人之行;或执业所曾事;或闻声辄相思;或望重纪群;或联姻秦晋:裨残补缺,刈楚芟芜。或与古维新;或当今无辈;或精思能至;或偏嗜所存;得前后集各若干卷,署曰《楚庭耆旧遗诗》。”“前集包括宋湘、李黼平等十九人,宋、李各两卷,其余人各一卷。后集包括倪济远、徐良琛等十九人,

倪、徐各两卷,其余人各一卷。每人各附简历、诗话,并有谭莹、伍崇曜评论。谭评标“谭玉生云”,伍评标“茶村诗话”。前后两集所录多佳篇美句,可见广东近世诗学之盛。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伍氏刊本。

(王学泰)

【楚庭耆旧遗诗续集】 地方诗合集。三十二卷。清伍崇曜编纂,谭莹校字。此编继《楚庭耆旧遗诗》而编。伍氏感慨故老旧交日渐凋落,为保存粤东文献,使得英华靡绝,诗文永存,故有“续楚庭耆旧诗之辑也,昔同撰集,原待补亡。选文敢绍乎维摩,立传略追夫陆允。叹老成之代谢,犹有典型;知遗佚之孔多,忍教沦没”(见伍氏自序)。此集体例一准原稿,所收也多为乾隆至道光间与伍、谭有关系的广东诗人。全书共收三十二人,每人一卷。每人皆系爵里名字、诗话以及谭、伍二人之评论。此集编于道光三十年(1850),有当年刻本,为广州聚珍堂所刊。

(王学泰)

【广济耆旧诗集】 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夏槐编纂。夏槐字午庭,湖北广济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曾为松江府金山县知县,有《绿隐堂诗集》。广济,明隶蕲州,清属黄州府。此集收录明清两代广济作者诗,始于明嘉靖间举人张步云,终于光绪间贡生杨枝灿,共录一百零二人,诗一千余首。重要作者如明万历中隐士寇学海,明末秀才,曾率众抵御左良玉乱兵的吴兆崙,皆立专卷。“广济在蕲黄间,盖一小县,唐宋以来,名卿巨儒,鲜有著者。至明中叶,作者始盛。集中所载如王大漠惟尹之恬退,吴党嗣明仲之说直,杨大鳌用极之高义,见于志乘者,殊可慕也。国朝之初,饶定中、杨大勋、吴兆崙辈,不忘故君,隐居遁世,大义凛然。而金会公(德嘉)以巍科绩学,蔚为州部之望。同时刘千里(醇骥)、张长人(仁熙)诸人,虽名位不显,而文章著述,获登秘府(指刘《芝在堂集》、张《藕湾全集》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与康谷子(刘养微)、寇山人(寇学海),后先辉映。盖皆可谓天下之士,而风声所树,实在一乡”(孙衣言序)。这段话概括了数百年来广济才士出处及其诗文成就。广济虽地处湖北,与公安、竟陵接近,其诗学却以学盛唐为主,受到明前后七子影响,而“不甚主公安、竟陵”,“大率严于格律,伐材富而隶事工,自然深稳,少唐以后语言”(范志熙《广济耆旧诗集后叙》)。编者选诗亦多取言之有物、近于唐音者。应酬游戏之作则不取。广济作者除数人刊有别集外,大多取诸未刊稿本、断简零篇以及旧志、家乘等。入录作者大多附有小传,其言行“卓卓可为后学楷模者,必详录之。俾知古人读书,尤以行谊为重”(《凡例》)。此书除孙、范二序外,还有方大湜、张之洞二序,后有夏

槐跋。此书编成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三年(1887年)刊于松江金山县署。

(王学泰)

【容城耆旧集】 地方诗总集。四卷。清龚耕庐编纂。龚耕庐原名宝焯,字耕庐,号湛园,以字行,监利(今属湖北)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官至道台。容城即监利县,地处江干,诗学一道,在明以前鲜可称述。明中叶后方有李先芳等闻于世。此集专收清代监利人诗作,始于顺治间举人刘懋彝,终于光绪二十一年举人董钦墀,后附流寓一人。凡三十八人,录诗七百零一首。录诗最多者为编者伯父龚绍仁(七十九首),其次为余庚阳(六十九首)、龚昌运(编者祖父,六十七首)、王柏心(五十首)、龚缙缙(编者之父,四十三首),其余皆在四十首以下。此编所录以王柏心最有名,《清史稿》有传,与潘学植、蔡以偶、龚润森(编者伯祖父)、郭谐并称“容城五子”。此书第二卷全为“容城五子”诗作。全书以收龚族作品为多,龚族之诗确实长于容城另外四族。诸龚绝少无病呻吟之作,大多数入选诗篇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并着意描写清中叶以后湖北沿江一带人民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有编者所撰《容城耆旧集序》,概述容城诗歌创作发展演变。后有范鹏跋。有清末刊本。

(王学泰)

【汉南诗约】 地方诗总集。二十卷。清雷楚材编纂。雷楚材(1747—1822)字兰樵,又字南翘,号菊溪子,湖北汉阳人。诸生。“汉南”指汉阳县,在清属湖北省汉阳府。此集辑清代汉阳县人诗,始于清初李以笃、李以籍兄弟,终于乾隆、嘉庆之际的阮向葵、梁步墀。最末一卷附“闺秀”与“缙衣”。共收录诗人一百八十二家,诗一千七百余首。“凡集中所录诗,俱经选择,而‘诗约’云者,固陋如予,不敢以选自居,且非由博入约之谓,亦仅撮其大约,得其约略之意云尔”(《例言》)。每人名下皆列字号及生平出处大略,“或考诸志乘,或得诸传闻,撮叙小传,庶几诗传而人亦传云”。入录作者大体以年次为先后,录诗则先古体后今体。录诗最多者为徐志(一百零八首),其次为陈苏(九十五首)、王戩(九十三首)、李以笃(九十首)、朱在镇(八十五首)、彭湘怀(七十首)、方璲、蒋鲁传(各五十九首)、陈时懋(五十首)等。较为知名者有李以笃、熊伯龙、李昌祚、朱在镇等。此书初刻于嘉庆间,录诗及作者均比稿本少,且有出入。稿本有《例言》云:“是集向为射利诱刻,多删佳什,杂附庸作。总由受贿徇情,而又分为初集、二集,且妄易字句,致失庐山真面。”可知刻本并不符合编者意愿。编者稿本一直留存至清末民初,1916年邑人傅守谦用雷氏家藏稿本排印出版。

(王学泰)

【竟陵诗选】 地方诗总集。十三卷,续集一卷,诗

话一卷。清熊士鹏编选。熊士鹏字两溟，一字莼湾，天门（今属湖北）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曾任武昌府教授，有《两溟诗集》。竟陵，古地名，即今湖北天门。竟陵诗因明末钟惺、谭元春提倡幽深孤峭诗风而享大名，形成竟陵诗作。清初此派诗风受到压制，被贬为“诗妖”，称为“亡国之音”。熊氏编此书意在表彰先贤，搜辑乡邦文献；也有提倡诗学、示人矩矱之意。全书共选诗八百一十五首。第一卷收录唐人张祜等曾到竟陵游览、仕宦或流寓人的作品，辑以备览，以见竟陵诗之源。第二卷始列本邑人作品，首列明弘治间会元鲁铎。第三、四卷选录钟惺、谭元春诗，每人近百首，为全书之骨干。编者认为：“钟、谭别开风气，故最著。”并加以评点、推崇备至。但他也反对“转相仿效，惟知尚声调、崇浮华，卒不见所为性情之真、气韵之妙，则亦无殊乎内土木而外冠裳也”。熊氏对入选诗人各取其长，有善必录，力图摆脱门户之见，使此书能够反映数百年来竟陵诗人的创作成果，成为“罗五侯以成罇，贡九牧而铸鼎，四美具，二难并”的选本（上引皆见自序）。五卷以后则为清初至乾隆间竟陵人之诗作，亦以表现情灵、颇具气韵的篇章居多。续集补前编之遗漏，亦始于明代鲁铎，止于清乾隆、嘉庆间。诗话多为评论竟陵或湖北诗人而作。有道光三年（1823）鹄山小隐刊本。

（王学泰）

【成都文类】地方诗文总集。五十卷，其中诗十四卷。南宋扈仲荣等八人所编。袁说友于庆元五年（1199）为四川安抚使。袁以为“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观绝景，仙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窥奇吐芳，声流文畅，散落人间，何可一二数也”。于是“爰属寮士，摭诸方策，哀诸碑志，流传之所脍炙，友士之所见闻，大篇雄章，英词绮语，折法度，极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载而汇辑焉，断自汉以下迄于淳熙”（见袁序）。可知扈仲荣等八人系袁说友之僚属，奉命而编此书。全编凡赋一卷，诗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类中又各有子目，如诗中分都邑（包括城郭、宫苑、楼阁）、寺观、陵庙、亭馆、时序（包括故事、宴集）、题咏（包括书画、器物、雨雪、风月、草木、虫鱼）、赠送、道释、歌谣、宫羽、鬼谣等，颇嫌琐碎。每类之中所收篇目次序以作者时代为先后。此编宋刊本已不可见，有明翻刻本传世，似为明嘉靖、万历间刊刻，《四库全书》据以著录。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全蜀艺文志】地方诗文总集。六十四卷。明周复浚编纂。周复浚字子吁，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

周氏曾官四川按察副使，以为宋代所编《成都文类》所收未备，故重编蜀中文献，广收博采有关当地之诗文，自汉魏以降，止于明。三至二十四卷为诗，其他为文。包括风谣、楚辞、都邑、城郭、楼阁、宫苑、江山、学校、陵庙、亭馆、寺观、怀古、纪行、时序、题咏、赠送、杂赋、道释、哀挽等类，分类极为不伦。所录并非全部为蜀人作品，其他流寓在蜀如杜甫等人有关蜀地诗作也在采录之列。此编本为《四川总志》艺文之部，故明嘉靖刊本附“总志”以行，前有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序，又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周复浚后序，后总志散佚不传，而艺文志则独自刊刻行世。嘉靖中有两种刊本，一为大字本，一为嘉靖谭言藹所刊小字本。另有万历间刊本，题杨慎所编，杨慎序谓此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受四川巡抚刘东阜（大谟）委托而编纂，仅用二十八日即完成，以详远略近，同时年近大老之作概不收录，有集盛行于世者（如杜甫、苏轼）百取其一。以杨氏所述体例，揆之此书亦大体相合。可知两者本为一书。因杨慎以待罪之身，故嘉靖时刊刻不便署名，至万历刊刻方恢复其编纂资格。

（王学泰）

【国朝蜀诗略】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张沆编纂。张沆字仙槎，四川成都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著有《策蹇草》。蜀指四川，清四川省与今四川省、重庆市地域大致相同。此集收清初至道光间蜀人诗。宋明两代四川诗学昌盛，出现许多影响全国及后世之诗人，如苏轼、苏辙、唐庚、杨慎等。而有清一代，蜀中以诗名世者仅张问陶一人而已，其影响更难与宋明名家相比。张沆以搜辑蜀中文献自任，自序云：“沆自束发受书即矢此志，半生游历，留意搜罗，行囊之贮，积稿累累。迩来供职北川，训课之暇，手自选录，共得诗十二卷。上自名公巨卿，下迨闺中方外，无不备载。”此编不录明遗民及在明已出仕、入清复仕之“贰臣”作品。“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盖建树功业者重功业，昌明理学者重理学，诗特其余事也。故功业、理学可传，兼工韵语者，急录之。否则人已不朽，不复登其餘绪”。“是编收诗不一，或多至百馀首；或少至一二首，以所见有多寡之分，非故为取舍也。且如王镇之中丞（汝璧）、李墨庄舍人（鼎元），以及周海山（煌）、彭仲尹、馨泉（指彭肇洙、彭遵泗兄弟）诸先生，尤吾蜀诗坛巨擘，急思多为收录，以广其传。无如全集未见，仅录数首，或少至一二首”（皆见《凡例》）。此集录诗最多为费锡璜，凡一百三十首。依次为马仕骥（一作“马士琪”，闺秀，录诗六十一首）、傅作楫（四十九首）、张问安（四十一首）、张怀溥（三十五首）、张问陶（二十九首）、彭端淑（二十八首）、李调元（二十七首）、李以龄（二十四首）。其

余皆在二十首以下。共收作者一百六十一家,诗八百余首。每位作者皆注明字号爵里,兼附遗闻轶事,并缀以评论。“使观者得其诗品,并可识其为人”。全书按时代先后排列,以科甲先后为准。“闺秀”一栏不取“青楼失节之妇”,“以尊诗品,以端壶范”(见《凡例》)。此集编成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有咸丰九年(1859)刊本。(王学泰)

【国朝全蜀诗钞】 地方诗总集。六十四卷。清孙桐生编纂。孙桐生(1824—1908)字小峰,号饮真外史、忏梦居士,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咸丰三年(1852)进士,官至郴州知州。此集继李调元编纂之《蜀雅》而编,意在网罗清初至光绪间蜀中文士诗作。编者认为诗人可分三档:一为大家、名家,其笔有千秋,作品力追正始,不待选而后传;“次则掇辑菁华,附庸风雅,虽非大雅之音,不散风人之旨,此必借选而后传者也;降而单词小言,偶有会心,如珠汨泥,如兰没草,其不终于覆瓿者几希!此则非选不传者也”(自叙)。在编辑此集对照顾到不同成就之诗人,对大家、名家皆列专卷。张问陶一人独占六卷,录诗近全书十分之一。其他如王汝璧四卷,费锡璜、张怀淮、刘硕辅、孙纘各二卷。独占一卷者有傅作楫、李调元、张怀溥、杨庚、李惺、李炳奎、李崧霖、孙澈、章宝箴、李映棠、马士琪(闺秀)。编者自云,此书从物色采集诗作到编成,历时四十年。对于所采作品“只字必珍,微长必录。不徇爱憎之私,不分门户之见。必欲使古人已逝之魂魄,复见于寸楮尺集中,呼之欲出,相视而笑,庶俾无愧于九泉而后即安”(自叙)。全书共收三百六十二家,录诗五千九百余首。书中不收明遗民以及明已出仕而复仕清之人。编选时既照顾到以诗存人,也兼顾以人存诗。“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之诗,均照李雨村(调元)先生《蜀雅》选本录入,惟于其时代科分舛错者详为订正。其三十年以后之诗,均系予物色于残编蠹简,访求于故家书肆,得之不易,辑而理之尤不易。然所采百余年之诗,较《蜀雅》已多三四倍。在登是集者,固可无憾。”全书按作者科名序列或时代排列,五十九卷以后为“女士”、“浮屠”、“羽士”。每人皆注字号爵里,兼及遗闻轶事与评论,较为简略。此书初刊于清光绪五年(1879)。巴蜀书社于1985年据原刻本缩小影印出版。(王学泰)

【新繁诗略】 地方诗总集。六卷。清杨昌翰编纂。杨昌翰字滌臣,四川新繁人。生活于清光绪间。新繁地接成都,自汉立县以来,文化日渐发达。此编所选起自宋明,终于清末,共选诗四百八十余首,作者五十余人。起自宋之梅挚,终于清末吕藻枢。“是编意在表彰新繁文献,故寄籍及流寓诸人之诗概不

入选”。“是编收诗不一,多至百余首,少仅一二首。然其例有二,宋明二代,篇章零落,文献无存,故博考群籍,有诗必录”,至于清代诸家,则“皆就其全集拣选慎择,精益求精焉”(皆见《凡例》)。新繁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只有费密、费锡璜二人,此编选费密诗五十六首,费锡璜诗一百四十一首。选诗最者为清杨益豫(二百三十五首),其次为吕燮枢(八十九首)、姚桐生(二十首)、姜兆璜(十九首)、宋之梅挚(十六首),清之李湘竹(十五首)、费经虞(十二首),其他皆在十首以下。入选诗人名下只载表字爵里及著作。编者从历代书录传志诗话中辑得三十七则论及入选诗人者,另编一卷,附于书后。其中以蜀人李调元议论最多。书前有邑人杨桢序、编者自序、《凡例》及《引用书目》。此书编成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有清末刊本。(王学泰)

【广州四先生诗】 地方诗合集。四卷。编辑人名已佚。岭南在明以前虽亦有成就较高之诗人,如唐张九龄、邵谒、陈陶、郑愚、宋之问、余靖、李昉英等,但多为粤北人。粤南、广州一带有诗人自孙蕡始。孙氏组织了南园诗社(先后参加者有黄哲、王佐、李德和赵介),并称为岭南五先生或南园五子。五人皆长于七言歌行,学初唐四杰骆宾王、卢照邻豪纵流利之诗风,用富于才藻的诗章描写经过战乱、经济恢复后社会的繁荣景象与其家乡明丽景色。后世唯孙蕡集流传。其他四人诗集皆散佚。此编录黄哲、王佐、李德诗各数十首,赵介诗仅数首,却为了解明初粤派诗人的创作倾向提供了重要资料。有明刊本,未见,多以抄本流传。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广州五先生诗】 地方诗选集。一名《南园五先生集》。二卷。明陈暹编选。陈暹生平爵里不详。“广州五先生”或“南园五先生”指明初粤派诗人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南园”为王佐园林,孙蕡、黄、王、李曾在此园抗风轩中结南园诗社,后赵介也加入。诗酒唱和,留下不少佳作,当时遂将五人并称,号称“五杰”。嘉靖三十六年(1557)谈剡刊“五先生”诗,仅得孙王黄李四家,遂以明初宰相汪广洋诗足之,因汪氏罢相后曾为广东参政。后得赵介《临清集》旧本,乃去汪而增赵,重为合刊。每集前皆有作者小传,乃据黄佐《广州人物传》编写,颇为详尽,对每人诗风有较中肯之评价,并记南园社集与诗人轶事。其中亦有疏误,如记孙蕡之死,与《明史》不合,当以《明史》为是。有嘉靖四十四年刊本传世。崇祯十年(1637)葛徵奇以御史巡抚广东,重加订正刊刻。(王学泰)

【南园后五子诗集】 地方诗合集。二十八卷。清

陈文藻等编纂。明初广州诗人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结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后世称为南园五子。嘉靖间顺德欧大任、梁有誉,从化黎民表,南海吴旦,番禺李时行等五人,再度结社南园,诗酒唱和,人称南园后五子。此编所收即此后五子之诗集。其中大任六卷、有誉五卷、民表七卷、吴旦四卷、时行六卷。书前列五人姓氏,并诸家诗评,每集前附诗人小传。欧、梁、黎、李四人并有别集传世,惟吴旦诗久无传本,其作品赖此编以传。然吴诗收录不全,分编四卷,每卷仅数首。近人陈田又从郭棐《岭海名胜记》中录其诗五首,载于《明诗纪事》。此编后附《南园花信》一卷,收晚明粤人咏《黄牡丹诗》百首。粤人黎遂球在扬州社集中咏黄牡丹十首,当时推为第一,归里后,同里追和者九人,每人十首,合编为此卷。此集有清刻本传世。

(王学泰)

【广东诗粹】地方诗总集。十二卷。清梁善长编纂。梁善长,字崇一,顺德(今属广东)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广东一带自唐代即有诗人传世,至明,诗人始多,形成粤中诗派,引起选家注意,曾有多种当地诗选本问世。善长以为这些选本持择未精,故编此本。全书选诗一千五百五十馀首,作者四百一十三人,始于唐张九龄、邵谒,迄于清康熙、雍正间。其选诗标准,“根本性情,和平中正,粹然无疵,于风教有裨焉”,即王之正序所言编者“取裁于汉魏,斟酌于《选》、《骚》,而折衷于至道”。入选作品“悉从各家原集抄出,某人某诗,某诗某题,编校谨慎,庶无移甲作乙之弊”。“诗中所引典故,大抵皆本经史子集,篇中略为指出。至于吾粤山川名胜、鸟兽草木、省志舆图,或未详载,细加笺注,以便观览”。对于入选作者,如为达官名流、彪炳史传者,则但书其姓氏爵里及选家评语。“至于高人逸士,羽客缙流,及闺闾之秀者,则详其轶事,以补缺略”(皆见《凡例》)。王之正序写于乾隆十二年。有乾隆十二年达朝堂精刊本,由鉴堂藏板。

(王学泰)

【岭南诗存】地方诗总集。八册。近人何藻翔编纂。何藻翔,字翔高,号邹崖逋者,广东顺德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尝官外务部郎中。“岭南”主要指今广东,自明末以来曾有多种岭南或广东诗总集刊刻行世,但大多湮没无存,即有存者,亦罕得见,故何氏编此集,以保存地方文献。其同年张元济跋曰:“兹编以诗存人,主约而精,取便讲诵。嘉、道后作者,《楚庭耆旧集》、《学海堂集》,其有存书,所采从略。而宋明遗老之作,甄选独富,殆由身世之感,针磁相投;而明清之际,亦粤诗极盛时代也。”全书按诗体编排,凡五绝六十六首、五律六百零九首、五排七首、五古二百八十三首、七绝三百六十三首、七律六

百一十三首、七古二百三十七首、谣谚乐府一百二十六首。元济跋又云:“粤自张曲江(张九龄)开有唐一代正声,陈白沙(陈献章)讲学江门,复重诗教,故历代名臣硕儒,殆无不工诗者。故即此一编,而广东名人古迹,已十得七八矣,其诸谈粤乘者所不废欤?诗随选随钞,行辈先后,未能论次,亦汲古阁六十家词选例也。”入录诗人上自唐张九龄,下迄近代黄遵宪、康有为等,皆具简历。入选作品也多为名篇佳作。编者为清遗民,所附己诗中多悼念清王朝之作。有商务印书馆1925年排印本与1928年再版本。

(王学泰)

【岭表诗传】地方诗总集。六卷。清梁九图、吴炳南编纂。梁九图字福草,吴炳南字星侪,皆广东顺德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此编所选为广东省明至清嘉庆间诗人作品。共收一百二十四人(明代四十九人,清代七十五人)。起于明初孙蕡,终于清嘉庆间进士何太青。每人大多选十首以下,超过十首者有黎民表(二十一首),李时行、梁有誉、胡亦常各十八,孙蕡、黄佐、刘鸣鹤、黎简各十五首,冯敏昌、吴荣光各十四首,邱濬十二首。此书只选明初叶、中叶,清乾隆、嘉庆诗人作品,而明末清初大量优秀诗人如“南园后五子”中之欧大任,明末清初黎遂球、陈子壮、邝露、屈大均、陈子升、陈恭尹及顺治、康熙间有影响的诗人程可则、方殿元、梁佩兰、王隼等皆未入选。嘉庆间名诗人宋湘只选一首。而这些被遗漏者与明南园前后五子,清代黎简、宋湘等人作品,正是代表了明初至清中叶广东诗人的最高成就。另外,入选者多为编者同乡顺德人。除广州、肇庆二府外,很少选其他州府诗人作品。入选作者皆附小传,所选诗篇精品不多。此书编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有紫藤馆刊本。

(王学泰)

【端溪诗述】地方诗总集。六卷。清黄登瀛编纂。黄登瀛字液州,高要(今广东肇庆)人,生活于嘉庆、道光间。端溪,古县名,即今广东德庆。端溪产佳砚,自唐以来为世所重,亦为广东文化发达之地。编者序云:“端溪为两粤交会之区,讲院为陶冶人文之地,前明制府驻节于此,国朝因之。”编者在端溪书院(即“讲院”)十馀年,“所得与诸先生讲论为多,凡诗文经义之指授,名公卿之往来、寄示之篇章,辄手录之不敢忘,道光初与修邑志,访求古迹,搜罗存稿,残篇断简,不忍遐弃,以为后进欲观先进文采,于此可窥一斑,况其为风教之助也”。卷一为唐至宋元咏及端溪诗,其中唐十六人、宋三十三人,元九人,附端溪籍莫宣卿、陈万言二人;卷二为明人咏及端溪诗,作者四十五人,附端州籍十一人;卷三为清代咏及端溪诗,收作者四十九人,著名者有王士禛、朱彝尊、梁

佩兰、屈大均、陈恭尹、阮元、邓廷桢等；卷四、卷五所采皆历任端溪书院山长及监院者之作，以粤秀书院（在今广州）山长附之，皆清人，有全祖望、杭世骏等十七人；卷六皆为清代端溪人诗，凡三十八人。可见此编兼收历代外地人咏及端溪诗和端溪人所作诗，体例特殊，故以“诗述”名之。有道光二十四（1844）六榕书屋刊本。（王学泰）

【**溟南诗选**】 地方诗总集。二卷。明陈是集编选。陈是集字虚斯，号筠似，文昌（今属海南）人。生活于明末，清兵南下时殉难。此编专收海南岛诗人作品，始于明正统间进士丘濬，终于万历间进士林震，附“神仙”、“闺媛”。共录作者二十八人，选诗五百余首。丘濬诗最多（一百余首），其次为白玉蟾、王弘海、海瑞等。明末陈子壮欲辑《广东历代诗选》，委托陈是集搜录海南诗。此书编迄，未及行世，明祚告终，是集殉难，无人知有此选。民国间海南王国宪编采《琼台文献集》，与其后裔陈繁三相识，得此书钞本。书中原无“闺媛”诗，后从温谦山《广东诗海》明“闺媛”诗中补入。编者自序谓海南诗学自“宋玉蟾子（即白玉蟾）始。古来仙子未必能诗，即能诗，亦带铅汞中语尔。玉蟾子能为诗，又不尽为仙诗，诗所以佳也。明元以来，文庄先生（指丘濬）淹通少两，人或浅率目之。不知其才自贻，笔下无迹可摸，古体尤胜，使与青莲对垒，未必屈座也。王汝学（王佐）诗老而益工，近体冲澹隽远，步武唐人。钟、唐二司徒（指钟芳、唐胄）歌行亦佳，由学问渊邃，有以使之。郑篁溪赠丽多姿。王宗伯（王弘海）归田所作，远胜于馆阁诸篇。唐景夷任诞自废，师海琼子一派，跨出父兄之上”。这段话基本概括了明代海南诗之状况。书后有王国宪《溟南诗选后序》叙述此集编纂及出版过程。王氏于民国1931年醴资，由海口海南书局排印出版。（王学泰）

【**粤西诗载**】 地方诗词总集。二十五卷，其中诗二十四卷，词一卷。清汪森编纂。汪森字晋贤，桐乡（今属浙江）人，曾官桂林通判。粤西（指今广西）开发较晚，文化较为落后。汪森在桂林颇感粤地方志阙略，为考察粤西一带山川风土，故“取历代诗文有关斯地者，详搜博采，记录成帙，归田后复借朱彝尊家藏书，荟萃订补，共成《诗载》二十四卷，附词一卷，《文载》七十五卷。又以轶闻琐语可载于诗文者，更辑为《丛载》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编以类编排，所收诗词或作于粤西，或咏粤西山川风物、历史胜迹，而作者大多非粤西人。编者广采博收，许多资料取之金石遗刻，著录的许多作品不仅不见于作者之别集或有关总集，而且也是志乘所未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间疏漏舛误亦在所不免。有

康熙四十三年（1704）梅雪堂刊本。（王学泰）

【**明滇南诗略**】 地方诗总集。十卷，首一卷。清袁文典、袁文揆编纂。袁文典字仪雅，号陶村，保山（今属云南）人。生活于清嘉庆间，曾为广西州学正，以母老乞养归。袁文揆，文典弟，号苏亭，曾在甘肃为官。滇南指云南，远在边陲，文化较落后。诗歌创作兴起于明朝。萧霖序云：“肇开文运，实始前明。上多董劝之师儒，下有振兴之贤哲。加孤臣放逐，时作悲歌；远客栖迟，间留题咏，因风移而俗易，乃户诵而家弦。”明初沐昂《沧海遗珠》主要编选“远客栖迟”滇南之诗作。此书则收录滇南本土诗人之作品。凡一百三十余人，以有全国影响的滇南诗人为主。如杨一清、唐尧官、张含、杨士云、李元阳等皆有大量作品入选。入选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如木青、禄洪、木公、木增。其中木公是纳西族诗人，选诗四十余首。诗中描绘了故乡丽江的美丽山川，再现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有审美价值，亦有史料价值。卷首为《滇南集古录》，辑录明以前的歌谣和少量文人作品，最早者为《水经注》之《渡兰沧歌》，系汉明帝时歌谣。全书不仅收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而且详细介绍作者生平，评论其诗风。有云南巡抚初彭龄、萧霖、袁文典三序，师範后序。有嘉庆五十五年（1790）肆雅堂刊本，另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华书院刊本。（王学泰）

【**滇诗嗣音集**】 地方诗总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清黄琮编纂。黄琮字象坤，昆明（今属云南）人。生活于道光、咸丰间。此书继袁文典、袁文揆所编《国朝滇南诗略》而作。黄氏认为《诗略》编成已有五十年，在此期间又有许多作者产生，“敬伸桑梓，久钦前辈之才名，艳摘兰荈，犹待后人之荟蕞”。此编即是乡前辈诗作之“荟蕞”，也包括《诗略》遗漏的作者与作品。全书共收作者二百余人。始于清康熙迟奋翮，终于道光间张晋熙。入选作品最多者为刘大绅（一百五十首），独占两卷，其次为师範（一百三十一首）、罗颢恩（七十九首）、袁文揆（七十七首）、张履程（五十八首）、钱允济（四十四首）、李於阳（四十一首）、王毓麟（三十四首）、程含章（三十三首）、刘士珍（三十一首），其余皆在三十首以下。入选作品以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与羁旅行役为多。有咸丰元年（1851）五华书院刊本。（王学泰）

【**黔诗纪略**】 地方诗总集。三十三卷。清黎兆勋采诗，莫友芝编纂。黎兆勋（1804—1864）字伯庸，贵州遵义人。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邵亭，晚号瞿叟，贵州独山人。“黔”即贵州，历来文化发展较落后，直至明清两代才有较有名望文士出现。清咸丰三年（1853）唐树义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于是

请莫氏选辑明代作品。莫友芝小序曰：“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设科，文献留治，乃稍可述。故是编甄录断自胜朝。”此为搜辑黔诗始于明代之原因。咸丰四年夏编成三十卷。后几经周折，于同治九年（1870）始合旧稿与近年所增益之作而成此编。书中对入选作者小传、评论，详加考订，资料丰富翔实。如所录有关杨文骢（龙友）之资料远比《明史》、《明史稿》、《南疆绎史摭遗》、《前明忠义别传》、《崇祯忠节录》、《小腆纪传》等史书丰富。同治十年九月《纪略》编至第二十一卷，其他诸卷尚待审定，而莫氏遽逝。其子绳孙认为自己幼不向学，对于乃父未完遗著不甚了解，因此对于“未定者，不敢妄自阑入；删改未定者，亦不敢辄去。谨就原稿共三十三卷，亟付剞劂。唯第二十二卷何忠诚公传，以甲寅之乱，阙佚不完，今检先君行篋，所录《忠诚遗事》，请之江宁汪梅岑先生，为补撰焉”。又云：“是编若仅论诗，则孙（应鳌）、谢（三秀）、杨（文骢）、吴（中蕃）诸家以降，应录者殊少，是故不能无桑梓之私。”全书共采录贵州作者二百五十三人。录诗最多者为孙应鳌（四百五十八首），其次为吴中蕃（三百九十六首）、杨文骢（三百十四首）、越其杰（二百二十六首）、谢三秀（一百八十首）。大多仅选录数首。此编为唐树义出资刊于金陵，有同治十二年梦研斋刊本传世。

（王学泰）

【黔诗纪略补】 地方诗总集。上中下三卷。清陈田辑。此编继《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而作。上中二卷补莫友芝《黔诗纪略》，专补明诗。上卷共收十八人，诗一百一十八首。编者序云：“余自光绪癸未（1883）从事《明诗纪事》，于黔人尤极措意，至今几三十年，仅获专集一人，掇拾总集、说部、杂志者，补七人，《纪略》中有诗而事未详、诗未备者补十人。”所获专集者为谢士章。上卷录其诗六十八首。中卷收明代作者三十七人，诗六十四首。陈序云：“辛亥（1911）夏，余辑明代黔诗，将次刊竣，铜仁徐尚之参事出其先世十二代诗集，并其远祖黎所辑《黔诗萃》三十卷，余得之狂喜，亟录其溢出莫氏《纪略》之外者十九人，莫氏有诗而未备者十五人，又参以余向所搜采者三人，黔中诗家，可谓备矣。”下卷收录《黔诗纪略后编》所遗清代作者及其诗作，共收四十五人，诗一百三十八首。陈氏自云：“明代黔诗余既补辑矣，国朝诗家尚有遗漏者，余复旁采得二十二人，内改正莫氏《纪略》误刊于明代者一人，《后编》有诗而未备者十九人。芷升（莫庭芝）、受生（黎汝谦）诗亦附于末。”此编体例一如《黔诗纪略》及《后编》，入选作者皆附小传，并详加考证，所附资料也极丰富。有清末

民初刊本。

（王学泰）

【黔诗纪略后编】 地方诗总集。三十卷。清莫庭芝、黎汝谦采诗，陈田传证。莫庭芝（1817—1889）字芷升，贵州独山人。友芝之弟。黎汝谦字受生，贵州遵义人。陈田（1849—1921）字松山，贵州贵阳人。此编继莫友芝《黔诗纪略》而编，体例一仍其旧。所收皆为清代作者作品，始于清初顺治间拔贡陈祥士，终于同治、光绪间秀才杨花池。第二十九卷为“女士”，三十卷为“方外”，共录作者四百余人。最多者为陆榕（一百二十三首），其次为傅玉书（一百首）、黎兆勋（八十二首）、郑珍（七十三首）、赵本放（七十二首）、潘淳（六十五首）、莫友芝（六十二首）、周起渭（五十八首）、朱凤翔（五十五首）、黎庶蕃（五十首）、黎庶焘（四十四首），其余皆在四十首以下。最有成就者为郑珍、莫友芝、周起渭等。陈田序谓此集编纂乃经多人之力：“搜辑国朝黔诗自傅竹庄（玉书）父子始，厥后一辑于黎伯容（兆勋），再辑于莫芷升、黎受生，中间又有铜仁徐蔗塘（黎）。余丙戌（1886）请急归，芷升以此事相属，始克竣事。”陈氏主要就入选作者生平、著作详加论述，对于作者所属之诗派、其诗品之高下及诗风异同均作论述。此编又有陈夔龙序。宣统三年（1911）刊于北京。

（王学泰）

别集

【张河间集】 诗文别集。东汉张衡撰。《后汉书·张衡传》称：“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后汉河间相《张衡集》十一卷”，注：“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子部别录《灵宪》一卷、《黄帝飞鸟历》一卷，集部别录《五都赋》六卷（与左思合撰，内当有《二京赋》）。可见六朝时期张集有多本，至隋为十一卷本，似已不包括《灵宪》等篇。《旧唐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张衡集》十卷，别录《二京赋》二卷，又子部著录《灵宪图》、《浑天仪》、《黄帝飞鸟历》各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唐李贤注《后汉书·张衡传》释“悬图”云：“《衡集》作《玄图》，盖‘玄’与‘悬’通。”说明唐十卷本尚有《悬图》篇。《宋史·艺文志》作《张衡集》六卷，大抵唐、宋以来逐渐散佚。明张燮《七十二家集》蒐辑遗文辑为《张河间集》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合为诗文两卷，剔除误收的《周天大象赋》（隋李播作），实得四十四篇，其中收诗仅三篇。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录诗九题，二题为残句，最完善。注本有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许逸民）

【蔡中郎集】 诗文别集。一作《蔡中郎文集》、《蔡中郎伯喈文集》。东汉蔡邕撰。《后汉书》本传称：“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海、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这大概就是晋荀勗《中经新簿》、宋谢灵运《四部目录》中所载蔡集的情况。《隋书·经籍志》著录《蔡邕集》十二卷，并注：“梁有二十卷，录一卷。”梁本或为蔡集足本，但经过江陵之厄，此本已属稀见，故《隋志》仅著录残本十二卷，又唐吴兢《西斋书目》作十五卷。唯两《唐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均著录为二十卷，似唐代仍有足本。唐末以来，偶存残本。《崇文总目》谓《蔡邕文集》五卷，郑樵《通志》谓《蔡邕外集》一卷，《宋史·艺文志》谓《蔡邕集》十卷。十卷本已经宋人增补重编，《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作十卷，前者说“今录止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后者说“今本缺亡之外，才六十四篇”。考北宋仁宗天圣（1023—1032）初年欧阳序本十卷六十四篇，又巾箱本十卷七十二篇并《外传》一卷，二者即后世祖本。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兰雪堂铜活字本、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徐子器刊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即欧序本而又增补六篇，凡六十九篇；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杨贤刊本复增补为九十二篇，编为《汉蔡中郎集》六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析六卷为十二卷，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又分为八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重加删补，合一百三十二篇为二卷，尚未赅备。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严可均校辑《蔡中郎集》十五卷，其中包括《独断》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再补《月令章句》三卷，加《总目》一卷（卷一九），凡十九卷一百四十八篇。严辑有写本，未梓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记其目录甚详。（许逸民）

【曹操集】 诗文别集。一作《魏武帝集》。三国魏武帝曹操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太祖魏武帝）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在戎马倥偬中，曹氏不废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著录，曹氏著述有十九种之多，文集只是其中一种。《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武帝集》二十六卷，并注：“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说明南朝梁以前，曹操的诗文有四十卷行世，至隋已亡其半。《世说新语·豪爽》载，晋王敦每醉后以如意打唾壶，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为曹诗在当时脍炙人口时明证。又南齐沈约撰《宋书》，其《乐志》胪列《气出唱》、《薤露》、《蒿里》、《短歌行》、《秋胡行》、《步出夏门行》等共十三题十八

首。《乐志》还谈到曹操尤好作《但歌》，然而自晋以来不复传，也说明曹集至南朝后期开始陆续有散佚。隋本二十六卷似为梁三十卷本的残帙，而非汇辑全部遗文，所以《隋志》又著录《魏武帝集新撰》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复著录《魏武帝集》三十卷，必非梁人旧本。《宋史·艺文志》不载，似可推断唐人曾就隋本作分合，但入宋终于亡佚。由唐及宋前期所纂类书引录情况看，曹集最后散佚的时间当在北宋末叶。明人据《宋书·乐志》、《初学记》、《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重新辑集成书，首先见于张燮《七十二家集》中，次则见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本《魏武帝集》一卷，共收文一百三十九篇，诗十五题二十一篇。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爬剔残缺，编曹文为三卷。1911年，丁福保以严辑三卷文，加上张溥本一卷诗，编为《魏武帝集》四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1959年，中华书局以丁本为底本，参校类书、总集，补订出处，又增加了《孙子注》，改名《曹操集》出版。此书总分为诗集、文集、孙子注三部分，文集再分三卷。另附录传记资料、佚文数则以及《曹操年表》（江耦编）、《曹操著作考》（节录《三国艺文志》）。这是现今校辑最赅备的本子，当然也还有个别零句残篇未及补入，如《白氏六帖》卷一引《与钟繇书》、《太平御览》卷九一七引《乐府》等。1979年中华分局又出版了根据这个本子所作的《曹操集译注》。曹诗注本则有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亦佳。

（许逸民）

【刘公幹集】 诗文别集。东汉刘桢撰。《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桢）著文赋数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桢集》四卷，录一卷，两《唐志》著录唯馀二卷，宋则无存。明人辑本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刘公幹集》一卷兼收诗文，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亦有《刘公幹集》一卷，诗取张本，文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有《刘桢集》一卷，所收较丁本为备。（许逸民）

【王粲集】 诗文别集。一作《王侍中集》、《王仲宣集》。东汉王粲撰。《三国志·魏书》本传称“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杂记篇》说：“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粲集》十一卷，两《唐志》作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八卷，可能因为《尚书问》二卷已自本集析出别行（姚振宗说）。《郡斋谈书志》亦著录八卷，谓“今集有八十一首”，“其诗文反多于史所纪二十馀篇”（衢

本卷一七),似宋本已有阙误。而清姚振宗则认为“史所言篇数或以卷分,或以类分,晁氏以首数为篇数似不然”(《隋书经籍志考证》)。今存明人辑本,主要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王侍中集》三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一卷。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辑有《王仲宣集》三卷,诗取自张溥本,文取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人俞绍初在丁本基础上重新辑校为《王粲集》三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又俞辑《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有《王粲集》一卷,采获最多。又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三卷,有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

(许逸民)

【陈思王集】 诗文别集。一作《曹子建集》。三国魏曹植撰。植封陈王,谥思,后人称陈思王。《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曹植《文章序》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这个自编的《前录》是曹植作品的第一个集本。所收只限于少作。又《三国志》本传载:魏明帝景初(237—239)中,明帝诏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这是曹植作品的第二次结集,在其身后约六、七年。《隋书·经籍志》著录《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又《列女传颂》一卷、《画赞》五卷,合计有三十六卷之多,说明唐以前传世的曹植作品卷帙甚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一本三十卷,三十卷或为隋唐旧本,二十卷则当是后人合并编定的新本子。入宋,三十卷本湮没无闻,二十卷本虽见于私家书目,但“其间亦有采取《御览》、《书钞》、《类聚》诸书中所有者”,“亦非当时全书矣”(《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此时另有一个新的十卷本广为流传,所收“诗文二百篇”(《郡斋读书志》卷一七),书名改称《曹植集》。此本今存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刊本(原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明人所刊诸种版本,有称《陈思王集》者,有称《曹子建集》者,皆属宋刊十卷本流裔。其中张燮《七十二家集》、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仍作十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则合为二卷。清穆宗同治(1862—1874)初年,丁晏以明万历间程氏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张溥本及唐宋类书、总集,补遗正误,编为《曹集诠评》十卷,间有评点和注释。书后并附《逸文》一卷,汇集诸本不载的诗文残篇;《附录》一卷,辑存史传和前贤评论资料。近人丁福保又取丁晏本,改名《曹子建集》,编入《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丁晏《曹集诠评》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赵幼文的《曹植

集校注》,是在十卷旧本的基础上是正文字,重新编次,大抵按照作品创作时期的先后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卷,无作年可考者汇附卷三之末,旧本误收的作品亦作考辨,附卷末。曹植诗的单注本,尚有黄节《曹子建诗注》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许逸民)

【阮嗣宗集】 诗文别集。一作《阮步兵集》,又作《阮籍集》。三国魏阮籍撰。《晋书》本传称:“籍善属文,初不留意。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为之贵。文多不录。”可知阮籍当时以诗著名,平生所写的文章亦复不少。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齐、梁时代,阮籍的诗文集多至十三卷,目录一卷。又据唐李善《文选注》,宋诗人颜延之、梁诗人沈约都曾为《咏怀》诗作注,而萧统《文选》中收录阮氏诗文也有十九篇之多。至唐初修《隋书》时,阮集似已有所散佚,故《隋志》仅著录一个无目录的十卷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又连这个十卷本也不见了,唯剩有一个五卷本。五卷本又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说明唐朝时曾流播于海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另著录《阮步兵集》十卷,亦可证十卷本在唐并未亡佚。宋代的公私书目对十卷本均有记载,当即隋唐旧本。此外尚有一个四卷本诗集,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阮步兵集》四卷,其题皆曰《咏怀》。首卷四言十三篇,余皆五言,八十篇,通为九十三篇。”明朝以来,十卷本只在陈第《世善堂书目》中昙花一现,诗集四卷原本的踪迹也扑朔迷离。冯惟讷《古诗纪》说:“京师曹氏家藏《阮奇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孔宗翰亦有本,与此多同,凡诗歌八十七首。”这个唐写本似与四卷本接近,但《古诗纪》所录诗和明人诸刻却没有多少差别。明人所刻阮诗甚繁,较早的有嘉靖刊《六朝诗集》本《阮嗣宗集》三卷,又有李梦阳序刊本《阮嗣宗诗》一卷。最早的诗文合集本当推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陈德文、范钦篆刻的《阮嗣宗集》二卷,上卷文十三篇(赋六、论三、奏记一、书一、传一、笺一),下卷诗八十三首(五言八十一,其第二十二首系江淹拟作,实止八十;四言二)。诗集部分大抵与上述二本相同。明熹宗天启(1621—1627)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收入《阮步兵集》五卷,诗凡四卷,与陈、范本略同。至于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盖出于陈、范与张燮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阮籍集》二卷,以陈、范本为底本,参校汪士贤、张燮、张溥诸本及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诗补四言一首。1987年,中华书局版《阮籍集校注》二卷,陈伯君笺

注,并有集评可资鉴赏,唯校勘不主一本,眉目欠清晰。南宋陈振孙所谓《咏怀》“四言十三篇”,在以上各本中或只收两首或只收三首,均非完璧,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也是如此,至1984年第二版时始补入全部十三篇。按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说:“阮嗣宗《咏怀》诗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旧本刊于存余堂,多四言《咏怀》十三首。”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未能觅得朱本,在《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题记中引为憾事。黄节说:“余亦未见朱子儋本,惟旧藏潘璫本乃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翻嘉靖刻者,有嘉靖癸卯(1543)陈德文序,有崇祯丁丑(1637)潘璫序,分上下二卷,录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氏刻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意与朱子儋本必无大异,或且潘本在朱本之前也。”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据黄注本录阮诗五言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一一考订出处,为最完备。(许逸民)

【傅鹇觚集】 诗文别集。一作《傅玄集》。西晋傅玄撰。《晋书》本传称:“文集百餘卷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傅玄集》十五卷,注:“梁五十卷,录一卷,亡。”两《唐志》著录为五十卷,恐系附会梁本。《宋史·艺文志》著录仅止一卷,几近于亡。今存明人辑本,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皆称《傅鹇觚集》,前者三卷,后者一卷。张溥本晚出,凡赋五十三篇、杂文四十五篇、乐府三十八篇、诗二十五首。(许逸民)

【孙冯翊集】 诗文别集。一作《孙子荆集》。西晋孙楚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孙楚集》六卷,注:“梁十二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作十卷,《宋史·艺文志》未见著录。今存最早为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孙冯翊集》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合燮本为一卷,诗凡六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补辑为八首。(许逸民)

【嵇中散集】 诗文别集。一作《嵇叔夜集》。三国魏嵇康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王粲传》引及《嵇康集目录》,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德行》引及《嵇康集叙》,唐李善注《文选·与山巨源绝交书》引及《嵇康文集录注》,说明齐、梁以前已有《嵇康集》行世,这个集子有目录,目录下还有注,注明诗文有关人物的字号和生平事迹。《隋书·经籍志》著录《嵇康集》十三卷,又称“梁十五卷,录一卷”,则上述有目有注的本子应当就是十五卷本,至隋何以成为十三卷则不可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嵇康集》十五卷,可能是隋前旧本,也可能是隋十三卷本的新编次。不论如何,这个本子到北宋时又有散佚,《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

解题》都只著录为十卷本。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八说:“仆得毘陵贺方回(铸)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康诗才三数首。《选》唯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唯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答难》一篇四千餘言,辩论甚详。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日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耳。《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为何。”由此可看到十卷本的概貌。元、明版本众多,其源盖出于宋十卷本。其中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黄省曾翻宋本《嵇中散集》十卷影响巨大,明后期汪士贤的《汉魏诸名家集》本、张燮的《七十二家集》本、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皆来自黄本,唯二张合十卷为一卷而已。黄本与王楙所见本卷数无异,实则并非一书。据周树人(鲁迅)《校本嵇康集序》,黄氏依据的底本已经过前人改动,“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学论》第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可见黄本较王楙所见本已亡佚一个整卷和两个半卷。明代又有吴宽(匏庵)的丛书堂抄本,清陆心源丽宋楼抄本亦自此出,此本比黄本收诗略多。在黄、吴两个版本系统外,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博采总集、类书,补苴罅漏,收文六卷,较诸本为详。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录嵇诗五十三首,后与严辑六卷文合编为《嵇叔夜集》七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1924年,周树人校《嵇康集》十卷,有文学古籍刊行社版。又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黄山书社1986年版),是全十卷的注本。

(许逸民)

【张司空集】 诗文别集。一作《张茂先集》。西晋张华撰。《晋书·张华传》称:“(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张华集》十卷,录一卷。两《唐志》、《日本国见在书目》亦作十卷。《崇文总目》于天文类著录张华撰《小象千字诗》一卷,一名《小象赋》。《中兴馆图书目》有《括星诗》一卷,“集星宿躔度为五言诗凡一百十六韵”,或谓此即张华《小象赋》。《宋史·艺文志》著录《张华集》二卷,又《诗》一卷,疑后者亦指《小象赋》。《郡斋读书志》著录《张华集》三卷,谓“集有诗一百二十,哀词、册文二十一,赋三”(衢本卷一七)。《直斋书录解题》

著录《张司空集》三卷,谓“前二卷为四言、五言诗,后一卷为祭祀哀诔等文”(卷一六),与郡斋所见当属同一种版本。今存明人辑本只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种,外封题《张司空集》,内封则题《张茂先集》,止一卷,凡赋八篇,杂文二十二篇,乐歌三十一首,诗二十二题四十五首。(许逸民)

【潘安仁集】 诗文别集。一作《潘黄门集》。西晋潘岳撰。《隋书·经籍志》著录《潘岳集》十卷,两《唐志》同,《宋史·艺文志》作七卷。今存明人辑本,主要有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本《潘黄门集》六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本亦作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则合为一卷。六卷本以赋十九篇分为三卷,诗十四题四十五首为一卷,杂文三十篇分为二卷。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有《潘安仁集》五卷,所收文同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诗未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补辑。

(许逸民)

【左太冲集】 诗文别集。西晋左思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左思集》二卷,注:“梁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左思集》五卷,似即梁旧本。宋以下无只字记载,显已亡佚。明冯惟讷《古诗纪》始辑诗五篇十四首,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文七篇,皆抄撮总集、类书以成编。1911年,丁福保编《汉魏六朝名家集》,以冯惟讷、严可均所辑诗文合称《左太冲集》,不分卷。所录诗有遗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补辑。

(许逸民)

【张景阳集】 诗文别集。西晋张协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张协集》三卷,注:“梁四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入宋湮没无闻。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张景阳集》一卷,诗四题十三首。

(许逸民)

【陆机集】 诗文别集。一作《陆士衡文集》、《陆平原集》。西晋陆机撰。《晋书·陆机传》:“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陆云《与兄平原书》称:“集兄文为二十卷。”又东晋葛洪《抱朴子》也说:“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北堂书钞》卷一〇〇引)可知在两晋时陆机的集子卷帙甚繁。《隋书·经籍志》著录《陆机集》十四卷,并谓“梁四十七卷,录一卷,亡”,梁四十七卷本当接近于晋代之数,此后渐有散佚,入隋实已不及原本的半数。《隋志》总集类还著录陆机《连珠》一卷,南朝宋何承天注。按《旧唐志·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陆机集》十五卷,可能就是隋十四卷加《连珠》一卷。宋代书目仅止著录一个十卷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陆机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今存诗、赋、论、议、笺、表、碑、

诔一百七十余篇,以《晋书》、《文选》校正外,余多舛误。”此可见十卷本面目。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徐民瞻知华亭县事,合刻陆机、陆云集为《晋二俊文集》,其中《陆士衡文集》十卷,当即晁公武所见者。从清影宋抄本《晋二俊文集》(现藏北京图书馆)可以明显看出,此本是经宋人重新纂辑的,因为采自唐宋类书,集中多有断简残篇。明代以来,徐本成为唯一的祖本,较为通行的有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陆元大翻宋本,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亦取陆本。陆机单刻本则有明张燮《七十二家集》的《陆平原集》八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陆平原集》二卷,虽卷次有异,篇目仍与陆元大本略同。上述清影宋抄本在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屡经赵怀玉、翁同书、严元照、卢文弨校勘,文字胜陆本一筹。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诸名家集》中有《陆士衡集》十卷,序跋卷次悉据陆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陆机集》(金涛声点校),正文十卷,补遗三卷。正文以陆本为底本,参校清抄及史传、总集、类书,删除原卷七《悲哉行》(萋萋春草生)一首(谢灵运作)、卷九《吴丞相江陵侯陆公诔》一篇(陆云作)。补遗约八十五篇,按赋、诗、文分类编为三卷。此本卷末并附录陆机专著(《晋纪》、《洛阳记》、《要览》)的遗文,以及传记资料和版本序跋。陆机诗有郝立权《陆士衡诗注》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许逸民)

【陆云集】 诗文别集。一作《陆士龙集》、《陆士龙文集》、《陆清河集》。西晋陆云撰。《晋书·陆云传》称:“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卷,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于子部道家著录“梁有《陆子》十卷,亡”,《陆子》盖即《新书》。又集部著录《陆云集》十二卷,注:“梁十卷,录一卷。”两《唐志》著录为十卷,似经重编以充梁本,当与隋本稍异。《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为十卷,唯《崇文总目》止作八卷。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徐民瞻刻《晋二俊文集》于华亭县学,其中《陆士龙文集》十卷原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可见宋十卷本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史称云所著文词凡三百四十九篇,此仅录二百余篇,似非足本”。《晋二俊文集》有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陆元大翻刻本,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即用此本。又薛应旂《六朝诗集》有诗集四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有诗文集八卷。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依据张燮本,更取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编为《陆清河集》二卷。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有《陆士龙集》十卷,用《四库全书》本,亦即明陆元大本,只是根据张溥本,将《答兄平原书》中一段文字摘出作《羊肠转赋》,编入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黄葵点校

本《陆雲集》，底本悉依南宋华亭县学本，参校明以来诸本，并有新的补遗，最称完善。（许逸民）

【束广微集】 诗文别集。一作《束阳平集》。西晋束皙撰。《晋书》本传称，皙才学博通，其《补亡诗》及文集数十篇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束皙集》七卷，注：“梁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作五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其遗佚，编为《束广微集》一卷，凡赋、论等文十六篇，诗只有《补亡诗》六首。（许逸民）

【刘琨石集】 诗文别集。一作《刘中山集》、《刘司空集》。西晋刘琨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刘琨集》九卷，注：梁十卷；又《刘琨别集》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仅著录《刘琨集》十卷。《崇文总目》既著录《刘琨集》十卷，又著录《刘琨诗集》十卷，可见北宋时诗文存世尚多。至南宋则大多散佚，《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刘司空集》十卷，谓“前五卷差全可观，后五卷缺误，或一卷数行，或断续不属，殆类抄节者，末卷《刘府君诔》尤多讹，未有别本可以是正”。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刘越石集》一卷，收诗四题十一首。（许逸民）

【郭弘农集】 诗文别集。东晋郭璞撰。《晋书》本传称“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隋书·经籍志》著录《郭璞集》十七卷，注：“梁十卷，录一卷。”两《唐志》著录为十卷，疑有散佚而非萧梁旧本。《宋史·艺文志》作六卷，说明北宋时散佚几半。今存明人辑本，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皆称《郭弘农集》二卷。张溥本编赋、疏、表、序、设难、哀策文为卷一，编《山海经图赞》、《尔雅图赞》及诗为卷二，诗除《游仙》十四首外，尚有《赠温峤》等六首。（许逸民）

【孙廷尉集】 诗文别集。东晋孙绰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孙绰集》十五卷，注：“梁二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作十五卷，宋则湮没无闻。明张燮《七十二家集》辑为《孙廷尉集》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合为一卷，凡诗五题七首，有遗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诗三十首，唯其《赠温峤》五首恐非孙作。（许逸民）

【谢康乐集】 诗文别集。南朝宋谢灵运撰。《宋书·谢灵运传》称，灵运在始宁，纵放自娱，游必有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可见他的诗在当时抄传甚广。《隋书·经籍志》经部、史部、集部共著录灵运著述十二种，集部除《谢灵运集》十九卷（梁二十卷）外，还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梁五十一卷，又张敷、袁淑补

《谢灵运诗集》一百卷）、《诗集钞》十卷（梁有《杂诗钞》十卷，录一卷）、《诗英》九卷（梁十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设论连珠集》十卷，则隋前有诗近百卷，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入唐，本集有所散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灵运集》十五卷，不过《诗集》、《诗集钞》、《诗英》、《七集》、《回文集》、《设论连珠集》仍存于世，其中《回文集》仅一卷，已亡其大半。两宋书志唯《宋史·艺文志》著录《谢灵运集》九卷，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谢诗》（灵运、惠连、朏）一卷，其余隋唐诸集则一字无及。《三谢诗》今存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刊本，灵运诗全取自《文选》，说明本集至宋代已不复行世。明朝前期李梦阳、黄省曾最先辑集谢诗，辑本今亦不传。现在所见最早辑本是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沈启原《谢康乐集》四卷，计卷一《山居赋》一篇，卷二杂赋十三篇，卷三乐府二十首、诗七十一首，卷四文二十四题三十一篇。明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即用沈本。又张燮《七十二家集》中有《谢康乐集》八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承燮本而重编为二卷，二张本与沈本所收诗文多寡略异。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冯惟讷辑《古诗纪》，清嘉庆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蒐采诗文较完备。近人丁福保以冯、严二书为底本，编为《谢康乐集》五卷，计卷一至二赋十四篇，卷三至四文三十四篇，卷五诗八十一题九十五首，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近人黄节采用沈启原万历本卷三乐府及诗，重新编次，并加笺释，成《谢康乐诗注》四卷，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许逸民）

【鲍参军集】 诗文别集。一作《鲍氏集》、《鲍明远集》。南朝宋鲍照撰。照罹难后，篇章流散。至南齐武帝永明（483—493）间，文惠太子萧长懋命散骑侍郎虞炎广事蒐访，始辑成《鲍照集》。虞炎序称：“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倘能半焉。”此时上距鲍照之死仅二十年，其诗文已佚其大半。《隋书·经籍志》著录《鲍照集》十卷，附注：“梁六卷。”所谓六卷本当是虞炎原本，嗣后有所增补，故得为十卷。此十卷本历唐、宋而流传不绝，唯唐避武后讳，改鲍照为鲍昭，南宋又易名《鲍参军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南宋十卷刻本至清初犹存（《绛云楼书目》卷三），《四部丛刊》影印的明毛扆校宋本《鲍氏集》十卷，《四库全书》采用的明武帝正德五年（1510）朱应登刊本《鲍氏集》十卷，其集名、分卷、篇第均与宋本无大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朱本乃明都穆所重辑，不确。明又有薛应旂《六朝诗集》本《鲍氏集》八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本《鲍参军集》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鲍参军集》二卷。二张本分卷、

篇第与十卷本不同,显然出于重辑。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其中《鲍明远集》三卷,卷一至二赋及杂文,卷三乐府及诗,分别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明冯惟讷《古诗纪》为底本。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钱仲联笺注《鲍参军集》六卷,此稿原为清钱振伦据明张溥本重编,卷一赋、表、疏,卷二启、书、颂、铭、文,卷三至四乐府,卷五至六诗、联句,附鲍令暉诗。此为鲍氏兄妹的全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钱仲联增补集说校勘的新一版。又,黄节补注《鲍参军诗注》四卷(清钱振伦原注),内附《鲍令暉诗注》一卷(清吴兆宜原注),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许逸民)

【沈休文集】 诗文别集。一作《沈隐侯集》。南朝梁沈约撰。《梁书》本传称有文集百卷行世,此百卷本见于《隋志》、两《唐志》和《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而不见于《宋志》,可知至迟亡于北宋。两《唐志》又著录《沈约集略》三十卷,似为选本,宋亦不存。《崇文总目》著录《沈约集》九卷,《宋志》同。《宋志》另著录“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沈约集》十五卷、《别集》一卷,又九卷,谓“十五卷者,前二卷为赋,余皆诗也。《别集》杂录诗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诏草也。《馆阁书目》但有此九卷及诗一卷凡四十八首”,南宋诸本情况解说甚详。今存明人刻本,最早为薛应旂《六朝诗集》一卷本,次为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杨鹤校刊《武康四先生集》本《沈休文集》四卷,万历四十三年沈启原刊《沈隐侯集》四卷似出杨本,蒐集未备,编次未善。明末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二卷,所录篇目与体例均胜于前。近人丁福保取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冯惟讷《诗纪》等合编为《沈休文集》九卷,计卷一赋,卷二至八杂文,卷九郊庙歌辞、乐府和诗,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本。另有近人郝立权所注《沈休文诗注》四卷。(许逸民)

【江文通集】 诗文别集。一作《江醴陵集》、《江光禄集》。南朝梁江淹撰。《梁书·江淹传》称:“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显然在其生前即有《前集》和《后集》行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后集》十卷,又集部总集类著录《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按所谓“梁二十卷”疑当是前、后集的合称,隋九卷本则可能是从《前集》十卷中抽去了《拟古》一卷。今集内有《自序传》一文,谓平生无他著述,唯有集十卷,据考即《前集》序言。《序传》自称官中书侍郎,称萧道成曰“高帝”,则《前集》编定的时间约在齐武帝永明(483—493)初年。两《唐志》著录前、后集各十卷,说明唐代犹有全帙。

南宋书目仅著录一个十卷本,不言为前集、后集,唯《郡斋读书志》以“今本二百四十九篇”,多于史传记载,疑有后人增益而非隋唐旧观。《宋史·艺文志》则在十卷本外,另于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江淹《铜剑赞》一卷,此或原属于《后集》。元、明以后,或覆刻宋本,或重编新本,版本流传,形成两大体系。覆宋本可以《四部丛刊》本《江文通集》十卷(明影宋本)为代表,元抄八卷本、明梅鼎祚校本、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本,虽卷数不同,皆应出于十卷本。全书按赋、诗、文分为三大类编次,各类大抵以作年先后为序,凡录诗文二百五十六篇。重编本可以《四库全书》本《江文通集》四卷为代表,此乃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梁宾据汪士贤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及汤斌家藏抄本参互取舍而成,前此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四卷),后此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八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均属于这一系统。库本总收诗文二百六十八篇,较《四部丛刊》本增多赋三篇、文二篇、诗八首,而少《应刘豫章别》诗一首。这是现今收录最完备的本子。明胡之驥的《江文通集汇注》,底本用梅鼎祚校本、汪士贤本,拟《文选》分类体例重新编次,并据史传、总集、类书有所补佚。其注释除采用《文选》注外,多引用杨慎语,自注殊简约,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全集注本。初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今有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李长路、赵威点校)。(许逸民)

【孔詹事集】 诗文别集。一作《孔德璋集》。南齐孔稚圭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孔稚圭集》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郡斋读书志》亦作《孔稚圭集》十卷,并称集有序云:“所为文章,虽行于世,竟未撰集,今摭其遗逸,分为十卷。”此序当属隋唐旧本所有,撰集遗逸之事亦当在隋前。又《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孔德璋集》十卷,《文献通考》作一卷,书名的变更与卷帙的减少说明旧本已渐散亡。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孔詹事集》一卷,诗仅四首,以《白马篇》二首(其二疑隋炀帝作)稍佳。

(许逸民)

【任彦昇集】 诗文别集。一作《任中丞集》。南朝梁任昉撰。《梁书·任昉传》称:“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任昉集》三十四卷,又谓“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亡”,疑《文章始》佚文已入本集,故为三十四卷,较史传记载增多一卷。两《唐志》著录亦为三十四卷,唯《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二十八卷,显然晚唐五代时已有散失。《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六卷,似为宋人辑本。今所见最早为明神宗万历十

一年(1583)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本《任彦昇集》六卷,又张燮《七十二家集》本《任中丞集》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一卷。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取明冯惟讷《诗纪》、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录诗文,合编为《任彦昇集》五卷,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本。(许逸民)

【丘司空集】 诗文别集。一作《丘中郎集》。南朝梁丘迟撰。《梁书·丘迟传》称:“所著诗赋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丘迟集》十卷(并录),注:“梁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十卷,入宋则散亡。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丘司空集》一卷,收诗十一首。(许逸民)

【梁武帝集】 诗文别集。一作《梁武帝御制集》。南朝梁武帝萧衍撰。《梁书·武帝本纪》称其著述甚多,“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周书·萧大圜传》则谓梁亡后,大圜(梁简文帝子)在北朝秘阁得见《梁武帝集》四十卷,乃手写以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又《诗赋集》二十卷、《杂文集》九卷、《别集目录》二卷、《净业赋》三卷、《围棋赋》一卷、《连珠》一卷(沈约注)、《制旨连珠》十卷(萧纶注)、《制旨连珠》十卷(陆缅注),两《唐志》唯著录《梁武帝集》十卷(《玉海》圣文御制集类引《唐志》作《梁武帝集》四十卷与萧大圜所见本合),而《宋史·艺文志》只字未及,可见隋唐诸本于宋已大多散佚。今存明人辑本,主要有薛应旂《六朝诗集》本《梁武帝集》一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梁武帝御制集》十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梁武帝集》二卷。近人丁福保在明冯惟讷《诗纪》、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本基础上,编文为七卷、诗一卷,成《梁武帝集》八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有1911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本。(许逸民)

【谢宣城集】 诗文别集。一作《谢玄晖文集》、《谢宣城诗集》。南齐谢朓撰。齐、梁诗人刘孝绰作诗“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颜氏家训·文章篇》),似朓诗当时已有集本行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朓集》十二卷,又《谢朓逸集》一卷,前者盖即南朝齐、梁时通行本,后者成书或稍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谢朓集》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于十卷外,又著录《谢吏部集》一卷,十卷本当是隋十二卷之劫馀,所谓《吏部集》恐系《逸集》之别称。唐十卷本至南宋犹存,北宋《崇文总目》改名《谢玄晖文集》,南宋《郡斋读书志》仍称《谢朓集》,并谓“《文选》所录朓诗仅二十首,集中多不载”(衢本卷一七),足证十卷本较隋十二卷确有散佚。南宋《直斋书录解題》最先著录《谢宣城集》五卷,注明底本为通行十卷本,“止以上五卷赋与诗

刊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概不录。此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楼炤刻本,今存明影抄本(见《四部丛刊》),又有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洪伋翻刻本。自五卷本出,十卷本遂致湮没。明代诸刻皆五卷本流裔,主要有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刘绍刻五卷本、张燮辑《七十二家集》六卷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一卷本。燮本另辑杂文十九篇编为一卷附五卷末,溥本亦有辑佚,略依赋、疏、表、策问、启、书、序、颂、哀策文、墓铭、乐府、诗、联句为序合编一卷。清人刻本以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吴騫《拜经楼丛书》本为佳,号称“依宋校本”整理成书。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所收《谢宣城集》五卷,底本用明刘绍本、张溥本,杂文附于五卷诗末。1936年,郝立权取传本五卷中所有诗作注,成《谢宣城诗注》四卷,并附《集说考证》。1969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洪顺隆《谢宣城集校注》五卷,诗文分别以明影宋抄本(《四部丛刊》本)、张溥本为底本,广校诸书,是正文字,注释则偏于征举典实,笺评则注重考订作年、阐发微义。卷首有《绪论》评介作者传略、作品背景、作品特色、作品价值及朓集源流。卷末附录历代评论及版本序跋资料,兼驳前人注释之疏失。(许逸民)

【吴朝请集】 诗文别集。南朝梁吴均撰。《梁书·吴均传》称,所著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吴均集》二十卷,两《唐志》并同,似唐前犹完好无损。其实不然,《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一七著录《吴均集》三卷,谓“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此判断晁氏所见《唐志》作十卷,今本作二十卷乃后人依《隋志》妄改。北宋《崇文总目》著录《吴均集》正作十卷,可为唐本十卷佐证。《宋史·艺文志》著录《吴均诗集》三卷,此又说明南宋郡斋所见三卷本亦当有诗无文。宋本已不传,今存明人辑本,主要有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吴朝请集》三卷,不过抄撮《艺文类》、《初学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成为一编。又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合燮辑为一卷,凡赋和杂文十三篇、乐府三十首,诗六十七首。(许逸民)

【何逊集】 诗文别集。一作《何仲言集》、《何水部集》、《何记室集》。南朝梁何逊撰。《梁书》本传称,逊死后,其乡人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按僧孺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梁书》本传作普通三年,今据《南史》,而逊约卒于天监十八年(519),则最初的《何逊集》应编成于普通元年(520)前后。《隋书·经籍志》著录《何逊集》七卷,两《唐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并著录为八卷,宋黄伯思《跋何水曹集后》亦谓“《隋·经籍志》、《唐·艺文志》逊集皆八卷”(《东

观馀论》卷下),颇疑《隋志》七卷字讹。又黄跋说:“晋天福本但有诗两弓,今世传本是也。独春明宋氏(宋敏求)有旧本八卷特完,因借传之。然少陵尝引‘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语,而此集无有,犹当有佚者。”可见宋虽有八卷本,已非唐前旧貌。《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六著录《何仲言集》三(当作“二”)卷,必是诗集,即黄跋所谓晋天福本。今存最早的刻本乃《四库全书》收入的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张紘刊《何水部集》一卷,凡诗九十五首,附载范雲、刘孝绰同作《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并附《七召》一篇。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薛应旂汇刻《六朝诗集》,内有《何水部集》二卷,有诗无文。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张燮辑《何记室集》三卷(在《七十二家集》中),所收篇次不同于张紘本,文字亦颇歧异,收文则多出赋一篇、书一篇、笺二篇。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何记室集》一卷即出自燮本。1980年,中华书局以张燮为底本,广校诸本及类书、总集,补辑佚诗《伤徐主簿》三首、《送司马长沙》一首,改题《何逊集》,是为最佳版本。

(许逸民)

【庾度支集】 诗文别集。南朝梁庾肩吾撰。《梁书·庾肩吾传》只设“文集行于世”,未见卷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均著录为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说明北宋时已亡其大半。今存明人辑本,最早为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庾度支集》四卷,后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一卷。张溥本收文四十一篇,乐府八首、诗七十六首、曲水联句及八关斋夜赋四城门联句十七首,遗篇略备。

(许逸民)

【梁昭明太子集】 诗文别集。一作《梁昭明太子文集》。南朝梁萧统撰。《梁书·刘孝绰传》:“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今存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作于“大梁二十一载”,即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称其集“一帙十卷”。按此事发生在萧统生前,所集止十卷。《梁书》本传谓“所著文集二十卷”,当包括萧统平生所作诗文。萧统死后,简文帝萧纲有《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所上者亦当是二十卷本,二十卷本无疑由萧纲主持编纂。《隋书·经籍志》著录正作二十卷,两《唐志》同,显系旧本。《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并著录《昭明太子集》五卷,五卷本曾有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袁说友刻本,已佚。现存各本皆出于明人纂辑,一为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都杨慎、周满校刊本《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一为阎光世《萧梁文苑》(《文选遗集》)本《昭明太子集》六卷。前者有明辽国宝训堂重刊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即用

此本;后者有明嘉兴叶绍泰刊本,《四库全书》用之。又明张燮《七十二家集》亦祖五卷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则合五卷为一卷。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采掇明冯惟讷《诗纪》、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诗文,编成《梁昭明太子集》四卷,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本。

(许逸民)

【梁简文帝集】 诗文别集。一作《梁简文帝御制集》。南朝梁萧纲撰。《南史》本纪称有集一百卷行世。又《周书·萧大圜传》:大圜为梁简文帝子,梁亡入周,见麟趾殿藏《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乃手写二集。又《南史·陆罩传》:“简文居藩,(罩)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可见《简文帝集》当编成于武帝太清三年(549)以前,陆罩曾参与其事。《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是否原帙,抑有散佚,不可考。两《唐志》著录八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八卷,似下脱“十”字,说明唐五代尚存其大半。《宋史·艺文志》只著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五卷,并注:“按《隋志》八十五卷,唐已缺五卷,《中兴书目》止存一卷,诗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诗,总二百四十四篇。”今存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薛应旂辑刻《六朝诗集》本《梁简文帝集》二卷,当出自南宋五卷本。明后期又有张燮《七十二家集》辑本十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本二卷,二张本皆称《梁简文帝御制集》,诗文并收。近人丁福保以所编《全汉三国两晋六朝诗》中的简文帝诗一卷,与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简文帝文七卷,合编为《梁简文帝集》八卷,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本。

(许逸民)

【徐孝穆集】 诗文别集。一作《徐仆射集》。南朝陈徐陵撰。《陈书》本传称,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后遭丧乱,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徐陵集》三十卷,两《唐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并同。又《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徐陵笔集》十卷,当专收表檄诏策之属。五代而下,三十卷本亦亡其大半。北宋《崇文总目》著录《徐陵文集》仅止二卷,南宋《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徐孝穆集》一卷,谓“今唯诗五十余篇”。《宋史·艺文志》所谓《徐陵诗》一卷与直斋所著录者当为一书。今所见皆明人辑本,最早为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屠隆评点本《徐孝穆集》十卷,后来则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徐仆射集》十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徐仆射集》一卷,各本所收篇目大同。又明抄本《徐孝穆文集》七卷,卷一乐府、诗、赋,卷二诏、表、启,卷三、四、五书,卷六书、序、檄、移文、铭、颂,卷七碑、铭、哀、策、墓志。傅增湘《藏园群

《书经眼录》卷一二说：“此本分作七卷，其编次亦与各本不同，未知何据。第校其文字，实视二张本为优。如《劝进梁元帝表》，一篇中改订至数十字，咸为佳胜，知其所出之源必较古也。至《四元畏寺刹下铭》不特为《百三家》本所逸，即《七十二家》本亦不收，斯真天壤间之奇秘，弥可宝矣。”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吴兆宜以张溥本为底本而重新分卷，成《徐孝穆集笺注》六卷（未及卒业，故卷六无注，同里徐文炳续为补注，称为《备考》附卷六末），“主于据拾字句，不甚考订史传”（《四库提要》语）有扬州吴氏原刊本、《四库全书》本，又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最通行。（许逸民）

【梁元帝集】 诗文别集。一作《梁元帝御制集》。南朝梁元帝萧绎撰。萧绎早年所撰《金楼子·著书篇》，自称有集三秩三十卷。《梁书》本纪谓有文集五十卷。三十卷固非全集，五十卷亦当是唐人所见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梁元帝集》五十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两《唐志》著录《小集》仍为全帙，而本集则为五十卷本，已有散佚。《宋史·艺文志》一字不载，唯《直斋书录解題》诗集类著录《梁元帝诗》一卷，未言篇目多寡，是此时全集、小集几近于亡。今存诸本皆出明人辑集，有薛应旂《六朝诗集》本一卷、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卷（诗文合集）、阎光世《文选遗集》本八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一卷。近人丁福保根据明冯惟訥《诗纪》、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诗文合编为《梁元帝集》五卷，所收乐府十八题二十一篇、诗八十二题九十六首，与明人晚出的张溥本略同，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本。（许逸民）

【王司空集】 诗文别集。一作《王子渊集》。北周王褒撰。《梁书》、《周书》、《北史》本传皆未言有集，《隋书·经籍志》始著录《王褒集》二十一卷并录。《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十卷，《旧志》有误。全集于唐末似已亡佚，可能有诗集单独流传。今存明薛应旂《六朝诗集》本《王子渊集》一卷，或出于宋本。明又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王司空集》三卷、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本一卷，诗文兼收。张溥本晚出，诗文并录，凡文二十五篇、诗四十七首（其中乐府诗十八首）。（许逸民）

【庾子山集】 诗文别集。一作《庾开府集》。北周庾信撰。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滕王宇文逌结集庾信入北以来的诗文，编成文集二十卷，这就是后世传本的祖本。据宇文逌序称，在南朝时，庾信还曾有建康时期的十四卷本和江陵时期的三卷本，前者“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后者“重遭军火，一字无遗”。《隋书·经籍志》著录《庾信集》二十一卷，增多

的一卷可能是隋平陈后所得的南朝旧作。一说隋魏澹曾奉太子命注《庾信集》，或者即由他重新编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并著录为二十卷，似为唐人整理隋本以符迥序，而非滕王旧帙。宋代公私书目著录与唐无异。至元代，二十卷本已属罕见（倪瓒《清閼阁集·与彝斋学士书》言及借阅《庾子山集》事），明、清以来，书目中虽屡称二十卷本，实不过剿袭旧说而已。现今所见皆明人辑本，分诗集、诗文合集两大类。诗集主要有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朱承爵（存余堂）刻四卷、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朱曰藩刻六卷、薛应旂刻《六朝诗集》本二卷，最早的存余堂本大概有南宋本残卷为依据，又抄撮类书、总集而成的。诗文合集本有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屠隆评点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徐庾合集》）、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庾开府集》十六卷、天启六年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本《庾开府集》十二卷。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用张燮本，但分诗文为二卷。庾集注家除魏澹的全集注外，尚有唐张庭芳、崔令钦、宋王道珪、魏彦渊四家注《哀江南赋》一卷，惜已不传。清代有两家注本，一为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十卷，用张溥本为底本；一为倪璠《庾子山集注》十六卷，用屠隆本为底本。吴注有扬州吴氏刊本，倪注有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崇岫堂原刊本，又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许逸民）

【江令君集】 诗文别集。南朝陈江总撰。《隋书·经籍志》著录《江总集》三十卷、《江总后集》二卷。按《陈书》本传谓“有文集三十卷，并行于世焉”，又《姚察传》谓江总曾有“编次文章”之事，颇疑三十卷本乃江总自编，其中收有徐陵、姚察等名贤唱和的《登宫城五百字》诗，而二卷本《后集》则当成于江总身后。两《唐志》著录《江总集》二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既著录《江令集》三十卷，又著录《江令君集》二十卷，说明唐五代全本与残本并传。《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七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诗集类仅著录一卷，谓“《唐志》集三十卷，《中兴书目》七卷，今唯存诗近百首云”。宋本已佚，今所见均属明人辑本，最早为张燮《七十二家集》本，编诗文为五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袭用燮本而合称一卷，凡乐府二十九题三十六首，诗六十二首。（许逸民）

【张散骑集】 诗文别集。南朝陈张正见撰。《陈书》本传称：“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张正见集》十四卷，两《唐志》作四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三卷，至《宋史·艺文志》则唯存一卷，显然已散失殆尽。明冯惟訥《诗

纪》辑乐府一卷,诗一卷,张燮《七十二家集》编为《张散骑集》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诗文兼收,合为一卷,凡赋三篇,启一篇,乐府四十一篇,诗四十首。(许逸氏)

【阴常侍集】 诗集。一作《阴常侍诗集》、《阴晋陵集》。南朝陈阴铿撰。《陈书》本传称:“有集三卷,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两《唐志》只字未及,似已散失。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阴铿集》一卷,谓“《隋志》已亡其二,今所存者十数诗而已”。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亦止诗集类著录一卷,“才三十餘篇”。可知南宋时只有诗集,而且已非隋前旧本,很可能属于宋人的辑集。今存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薛应旂辑刻《六朝诗集》,其中《阴常侍集》一卷,录诗三十四首,当即《直斋书录解題》所见本。入清,又有两家新辑本,一即周春兮辑《阴晋陵集》一卷,未刊,较《六朝诗集》多《咏鹤》一首,而少《罢故章》、《蜀道难》、《昭君怨》三首;一即张澍《阴常侍诗集》一卷,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刻入《二酉堂丛书》。张澍序称:“余从《文苑英华》及诸类书哀集得三十五首,较冯北海(惟訥)《诗纪》多一篇,复参校其字之同异,叙而刊之。”所多一篇为《昭君辞》(按此诗《英华》卷二〇四作阴铿,而《类聚》卷三〇作陈明)。张辑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郝立权有《阴常侍诗注》一卷(1937年版)。(许逸氏)

【卢武阳集】 诗文别集。一作《卢思道集》。隋卢思道撰。《隋书》本传谓“有集三十卷,行于时”,《北史》本传则谓“集二十卷,行于世”,按《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十卷,而两《唐志》均作二十卷,或唐时确有二种卷数不同的本子流传,至五代则散亡殆尽,故宋人书目中未载。今存明人辑本,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卢武阳集》三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卢武阳集》一卷,张溥本晚出,凡赋二篇,杂文九篇,乐府十一篇,诗十五首。(许逸氏)

【薛司隶集】 诗文别集。一作《薛道衡集》。隋薛道衡撰。《隋书》本传称:“有集七十卷,行于世。”其《经籍志》仅著录《薛道衡集》三十卷,似当世已有散佚。两《唐志》著录并同《隋志》,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宋史·艺文志》均不载,说明唐末以来集已不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有《薛道衡集》一卷,谓存诗十九篇,大抵好事者于类书中抄出以备家数而已。今存明人辑本,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薛司隶集》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薛司隶集》一卷,张溥本晚出,凡赋一篇,杂文六篇,乐府五篇,诗十六首。(许逸氏)

【陈后主集】 诗文别集。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撰。《陈书·文学传序》:“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又《姚察

传》:“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据此,陈后主生前即有集传世,文字且经过姚察润饰。《隋书·经籍志》著录《陈后主集》三十九卷,又有《陈后主沈后集》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陈后主集》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十五卷,后者可能包括《陈后主沈后集》十卷在内。《崇文总目》著录为十卷,《宋史·艺文志》则仅一卷,南北宋之交似已散佚殆尽。今所见为明人辑本,最早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薛应旂《六朝诗集》一卷本,嗣后张燮《七十二家集》辑诗三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袭用燮本,惟合诗文为一卷。近人丁福保编《汉魏六朝名家集》,辑《陈后主集》二卷,收文三十八篇,诗六十三题九十七首,其中《戏赠沈后》、《隋渠》、《小窗》、《寄碧玉》诗皆出于小说依托。有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本。(许逸氏)

【隋炀帝集】 诗文别集。隋炀帝杨广撰。《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两《唐志》三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二十八卷,《宋史·艺文志》及私家书目不载,可见五代而后已散亡。今存明人辑本,薛应旂《六朝诗集》收诗一卷,张燮《七十二家集》诗文并收作八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合诗文为一卷。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隋炀帝诏敕玺书檄令等文为四卷。近人丁福保摭取严辑四卷,加上己所辑《全汉三国两晋六朝诗》中炀帝诗一卷,编成《隋炀帝集》五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中,有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本。

(许逸氏)

【虞世南集】 诗别集。四卷。唐虞世南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虞世南集》三十卷,已佚。明人高儒《百川书志》仅著录一卷,当为明人辑本。今存明武宗正德(1506—1521)、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的铜活字本,收诗二十二首,首列赋二篇。另有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唐百家诗》本和嘉靖三十三年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明张寿镛重为辑补,编成《虞秘监集》四卷,收入《四明丛书》第一集中,收罗较为完备。(杨旭辉)

【李百药集】 诗别集。一卷。唐李百药撰。百药为太宗时名诗人,诗作多应制奉和。《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百药集》三十卷,已佚。今仅存明朱警辑《唐百家诗》中《李百药集》一卷。(杨旭辉)

【魏郑公集】 诗文别集。文三卷,诗一卷。唐魏徵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魏徵集》二十卷,此二十卷似为诗文兼收本。后此

集不传,仅有清代王灏辑得文三卷,诗一卷,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据之排印)。(杨旭辉)

【王无功文集】 诗文别集。五卷。一作《东皋子集》、《东皋子集略》、《王绩集》。唐王绩撰。王绩的诗文,最早由其挚友吕才蒐辑结集,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称:“君所著诗赋、杂文二十馀卷,并多散逸,鸠访未毕,且编成五卷。”后中唐时陆淳删汰五卷本,编成《东皋子集略》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均有《王绩集》五卷的著录,另外,《崇文总目》还著录有《东皋子集》二卷,《宋史·艺文志》在著录《王绩集》五卷的同时,又著录有陆淳《东皋子集略》二卷。可见由唐迄宋,五卷本和两卷本并行于世。但元代以后,五卷本即不见著录。流传于世的为三卷本,有明焦竑、余萧客、林云凤、赵琦美抄本,曹荃、黄汝亨刻本,清《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等皆为上述明抄本的翻刻本。而三卷本实皆源自《东皋子集略》。近年清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复见于世,有大兴朱筠家藏手抄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本、陈氏晚晴轩抄本,皆承吕才原编而未经后人淆乱,为王绩传世诗文集足本。五卷本较通行之三卷本溢出诗六十馀首,文十馀篇。另敦煌遗书伯二八一九号有《王绩集》残卷,也为五卷本系统。今人韩理洲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最称完备。

(徐俊)

【许敬宗集】 诗别集。一卷。唐许敬宗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许敬宗集》六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许敬宗集》八十卷。到元时,仅存十卷(《宋史·艺文志》载),明高儒《百川书志》仅见一卷本,可见敬宗之作散佚甚多。明人辑本有朱警《唐百家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以及铜活字本。

(杨旭辉)

【王梵志诗校辑】 诗别集。六卷。唐王梵志撰,今人张锡厚校辑。王梵志诗,两《唐书》未曾著录,成书时间相当于唐末的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卷一五六六内有《王梵志诗》二卷的著录,知唐时已传至日本。《宋史·艺文志七》曾著录《王梵志诗集》一卷,久佚。唐宋间人所著《诗式》、《历代法宝记》、《云溪友议》、《鉴诫录》、《林间录》、《冷斋夜话》、《梁溪漫志》等书中收录其诗二十馀首。后于敦煌遗书中发现唐五代写本《王梵志诗集》约三十种。1925年,刘复(半农)校理巴黎所藏三种抄本,收入《敦煌掇瑣》。1935年,郑振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王梵志诗拾遗》,收入《世界文库》第五册。此前,日本编《大正藏》亦收其诗一卷。《王梵志诗校辑》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搜集整理的王梵志诗集,据二十八种写本

及唐宋人著作,共辑录诗六卷三百三十六首又梵志体禅诗十二首,并有较详的校订和注释。末附有关评论考辨等资料,一时颇称完备。但也间有误收、误校等疏失,海内外诸家多有匡正,后郭在贻汇总诸家之说,撰有《王梵志诗汇校》,刊于《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出版后,苏联所藏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残卷始公诸于世,有张锡厚整理本,得诗六十馀首,刊于《文学遗产》1988年第六期。又有项楚整理本,刊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项文指出列藏王梵志诗集中有若干首为盛唐时托名梁释宝志作品《大乘赞》的改作,并结合以前的发现,认为王梵志诗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结集。《王梵志诗校辑》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徐俊)

【唐太宗皇帝集】 诗别集。二卷。唐太宗李世民撰。太宗原集,《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四十卷,北宋时已佚。南宋人辑有《唐太宗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六),又辑有《唐太宗诗》一卷,凡六十九首(《玉海》卷二八引《中兴书目》),均不传。今存明铜活字本《唐太宗皇帝集》二卷,卷上收赋三篇及五言杂诗,卷下均五言杂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十家诗集》影印本。另有明朱警《唐百家诗》本《唐太宗文皇帝集》一卷。另有今人吴云、冀宇校注本,名《唐太宗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排印出版。

(徐俊)

【骆宾王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四卷。唐骆宾王撰。因骆宾王晚年参加徐敬业在扬州反对武则天的起义,兵败,所作诗文全部散逸。唐中宗时,诏求临海诗文,命郝云卿编成《骆宾王文集》十卷,仅“数百篇”(《新唐书·骆宾王传》)。此本在宋代仍有著录,《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录作十卷。宋时另有新刊;陈振孙云:“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顾广圻、黄丕烈及杨绍和见及此本,并作题跋,其卷六至卷十配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今归北京图书馆,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秦敦夫于扬州覆刊印行,中华书局1973年又将此本影印出版。元代亦有十卷本刊行,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记》、江藩《半龛斋题跋》以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均有著录;《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刻本就是元刊的翻刻本。明人辑骆宾王集的颇多,且多不相同,论卷数,则有一卷、二卷、四卷、六卷、八卷和十卷不等;集名亦多不同,有沿其旧者,亦有题《骆丞文集》、《骆先生集》、《骆临海文集》、《灵隐子》者;有的诗文兼收,有的仅收诗、赋。其中,以陈魁士注的骆集最为著名。陈注在传布中又形成不同的版本多

种,有的甚至卷数也不同,当以《天禄琳琅》著录的《骆子集注》四卷为正。《四库全书》则收颜文选注《骆丞集》四卷。清文宗咸丰(1851—1861)间,义乌(今属浙江)人陈熙晋著有《骆临海集笺注》十卷,该书对明清两代流行的骆集作了总结,在吸取前人成果同时,又断以己见,并多方辑录佚文,加以考订,分体编年,作了校补,厘定为一个较完善的全集本,并作了笺注。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61年和1985年按原刻排印出版。(杨旭辉)

【卢照邻集】诗文别集。一作《幽忧子集》、《卢升之集》。七卷,补遗一卷。唐卢照邻撰。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六记卢照邻“不幸有再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旧唐书》本传、《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作二十卷,唯《新唐书·艺文志》又有《幽忧子》三卷。《崇文总目》卷五作《卢照邻集》十卷,又《幽忧子》三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六著录也作十卷,《郡斋读书志》卷四作“卢照邻《幽忧子集》十卷”。疑《幽忧子》三卷所载仅为“释疾”类诗文,而《郡斋读书志》之《幽忧子集》则是以其自号名其集,实即宋代通行的十卷本诗文集。二十卷本、十卷本、《卢照邻集》以及《幽忧子》三卷,元明以后均已失传。明张逊业辑《唐十二家诗》有《卢照邻集》二卷、杨一统辑《唐十二名家集》有《卢照邻集》一卷、许自昌辑《前唐十二家诗》有《卢照邻集》二卷,均有诗无文。明张燮辑《初唐四子集》,其中《幽忧子集》七卷附录一卷,其中诗三卷,为现存最早的卢照邻诗文的合集。有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四部丛刊》本《幽忧子集》即据张氏刊本影印。清代项家达辑《初唐四杰集》中《卢升之集》七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卢升之集》七卷,均与张燮本相同。中华书局出版今人徐明霞整理本《卢照邻集·杨炯集》,卢集即以张氏本为底本,另有《补遗》一卷,载新辑补之作。末附傅璇琮著《卢照邻杨炯简谱》,有1980年排印本。今人任国绪据张氏本撰有《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排印本。(徐俊)

【杜审言集】诗别集。一卷。唐杜审言撰。据新、旧《唐书》二志记载,宋初还有十卷本流传,南渡以后仅见有诗无文的一卷本。今存宋槧前有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序中述赵彦法之语云:“近已旁搜远摭,得其诗四十二首,将刻枣印,印以传诸好诗者。”此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明人所刊多源出于赵彦清辑本,录诗皆四十三首,仅分卷略有不同,如朱警《唐百家诗》本、张逊业《唐十二家诗》、杨一统《唐十二名家诗》等。台湾中央图书馆另有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刊三卷本,据高儒《百川书志》所录三卷

本言“诗凡四十三首”,其与他本并无甚多大差别。诸种明人刻本,其质量都较高,赵执信《怡山文集》录一卷本《杜员外诗集》,曰:“犹是明刻手之善者,校勘亦颇精细。”今人徐定祥以宋刊为底本,作有《杜审言诗注》,收入《唐诗小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杨旭辉)

【李峤集】诗别集。三卷。唐李峤撰。《旧唐书·李峤传》云“有文集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亦载《李峤集》五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十卷,疑误)。原集北宋已不传。后世传其集有二:一为《杂咏诗》,分十二门,凡一百二十首(《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二卷,殆以一门为一卷)。宋时存一卷,或题作《单题诗》。明人将其辑入三卷本《李峤集》,单行本明以后不传。日本有古抄本二卷,天瀑山人林衡据以刻入《佚存丛书》,题《杂咏百二十首》。《杂咏》有唐玄宗天宝(742—756)间张庭芳(一作张方)注本,日本存二个系统的写本七种,已非张注原貌。另敦煌遗书斯五五五、伯三七三八存张注二残片。二为《李峤集》三卷,为明人据《单题诗》及《文苑英华》等书辑录而成,今有《唐五十家诗集》明铜活字本、明朱警《唐百家诗》本、明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徐俊)

【王子安集】诗文别集。十六卷、附录一卷,其中诗、赋三卷。唐王勃撰。杨炯《王勃集序》谓勃“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而《旧唐书》本传、《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作三十卷。洪迈《容斋四笔》则说:“今存者二十七卷”,此当指三十卷本,南宋已有散佚。以上各本今均不存,但日本尚有古抄残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及罗振玉皆见及,此抄本当系从三十卷原本抄录,一为《王勃集》卷二八,一为《王勃集》卷二九、三〇,罗振玉曾据以补明人辑本之不足,成《王子安集佚文》一册。今传明人辑本,如朱警《唐百家诗》本、铜活字本、张逊业《十二家唐诗》本、许自昌《前唐十二家诗》本、杨一统《唐十二名家》诗本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据张逊业本校注本,仅收诗、赋,编次大致相同,当属同一系统或同祖一本。《四部丛刊》所影印《王子安集》为明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张燮、曹荃的诗文辑本,诗仍以张本为基础,又加辑补,连文赋共十六卷,附录一卷。此本在附录中将《田家》三首王绩诗抽出,在《纠谬》中说明为误收。清项家达《初唐四杰集》之王集即以张燮本校刊。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又据此本加注,并作辑佚,有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刻本。另日本国会图书馆尚有大正十年《王勃集诗序》抄本一卷。(杨旭辉)

【盈川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一卷。杨炯撰。炯集本三十卷,后多亡佚,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仅著录二十卷,也已不传。今唯可略窥宋本旧貌的仅有孙星衍藏影抄北宋本一卷,仅收诗,收入《唐四杰诗集》。今存明朱警《唐百家诗》本,张逊业、杨一统、许自昌诸家“十二家诗”本以及铜活字本,专收诗、赋,不录杂文。活字本收赋七篇,收诗三十四篇。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童珮辑十卷本乃最为通行之本,《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所收皆为此本,其于诗赋发现不多,于文收罗较广,未附有关资料,别为附录一卷。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张燮、曹荃重辑,编为十三卷,并附录一卷,收入《初唐四子集》中,清文选阁据之精抄。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徐明霞点校本《杨炯集》,与《卢照邻集》合刊。

(杨旭辉)

【宋之问集】 诗别集。二卷。唐宋之问撰。其集为唐初武平一编定,新、旧《唐书》两志、《崇文总目》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皆作十卷,盖为原本。此本不见于后代诸家著录,已不传。今存宋集多为明人掇拾之本。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刊《唐百家诗》,收《宋之问集》二卷。嘉靖二十一年,张逊业、黄埠刊《唐十二家诗》收诗一百七十四首,次为二卷。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杨一统《唐十二名家诗》翻刻张本,仅删去重出诗及张九龄诗各一首。许自昌《前唐十二家诗》本与张本全同。明活字本宋集二卷,与张本亦大致相同。《四部丛刊续编》据以影印刊行。以上诸本皆仅列诗、赋,且多有误收。今北京图书馆崇祯刻本《宋学士集》九卷,诗文并收,分体编排,亦为明人所辑,似据《唐音统籤》,删汰误收诗九首,又补诗十五首。宋集另有题为《宋考功集》者,凡十卷,附录一卷,为清周世敬抄校本。

(杨旭辉)

【陈伯玉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赋二卷。唐陈子昂撰。陈子昂去世后,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十卷,收其遗诗逸文一百余篇,后代历经翻刻,差异不大,仅在收录的篇目上小有不同。今从敦煌残卷中发现《故陈子昂遗集》残本(伯三五九〇、斯五九七一),存卷八部分及卷九、卷一〇全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言之甚详。宋代官修《崇文总目》卷五录《陈拾遗集》十卷,今虽未见宋刊,然可知宋时有传。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杨澄黑口本《陈伯玉集》收作品较多,并附《新唐书》本传等有关资料,《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据杨澄本前的张颐序,此本乃杨澄从秘中抄录,似为宋、元古本。《四库全书》收《陈拾遗集》十卷,亦为内府藏本,与今存之敦煌卷本核对,多合,似为更近唐旧本原貌之古本。今人徐鹏

《陈子昂集》点校本,以《四部丛刊》为底本,参考《世界文库》之《陈伯玉集》校文,并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拾遗》等总集,补入诗七首、文六篇,当为现今收罗最完备的本子,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出版。今人彭庆生又有《陈子昂诗注》,所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杨旭辉)

【沈佺期集】 诗别集。七卷。唐沈佺期撰。沈集,新、旧《唐书》两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作十卷。《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皆已不存。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有摹写宋刊抄本《沈雲卿集》二卷,“视《百家诗》刻真霄壤矣”,可见旧本与明辑本差别之大。但钱所见抄本今亦不存。今存明铜活字本四卷,嘉靖朱警《唐百家诗》本、张逊业《唐十二家诗》本二卷、许自昌本二卷、汪应皋本二卷以及杨一统一卷本,编次虽或不同,收诗大致相同,诸本中亦偶有误收。王廷相刻本七卷,是沈集仅见的单行本,以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诸体分为七卷,诗句下多注异文,为他本所无。明人张廷登曾有评点,著《沈诗评》二卷,补遗一卷,有明刻蓝印本。(杨旭辉)

【张燕公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四卷。唐张说撰。张集,宋人著录皆作三十卷。而明人却未见宋刊之完本,后世传刻者皆为辑本。最早的辑本为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伍德辑《张说之集》二十五卷,诗文兼收,1918年吴兴刘承幹曾重刊,收入《嘉业堂丛书》。伍氏后裔继其祖志,于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校订刊刻,《四部丛刊》即影此,卷末另附傅增湘据双鉴楼藏汪小米校正十卷残本补诗九首,故此二十五卷本之流传较前本更为广。清高宗乾隆(1756—1795)时,又旁加搜辑,得佚文六十一篇,依类补入伍本,并对伍氏本加以校订,仍为二十五卷,收入武英殿《聚珍丛书》。《四库全书》所收《张燕公集》即此本。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仁和朱澂《结一庐剩馀丛书》以明抄为依据,并广为采辑,成《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补遗》五卷,以合三十之数,亦为一重要版本。1934年,傅增湘在邢詹亭家获见影抄宋蜀本三十卷《张说之文集》(说见《藏园群书经眼录》)最近燕公集原貌,弥足珍贵。

(杨旭辉)

【崔曙集】 诗别集。一卷。唐崔曙撰。《直斋书录解題》及《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皆著录一卷。今存《崔曙集》亦一卷,为明人辑刊之本。有朱警辑《唐百家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明刻《唐人四集》本、明铜活字本。(杨旭辉)

【曲江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四卷。唐张九龄撰。张九龄文集,《旧唐书》本传云“有集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

志》所载皆同。然宋以后,《曲江集》几乎不传。至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翰林学士邱濬从内阁录出,韶州知府苏铎为之刊行,才得以重新流传。今传《曲江集》诸本皆以苏铎刻本为祖,“此本卷数与《唐志》合,盖犹宋以来之旧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据此翻刻,名为《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亦为二十卷。另有分卷不同的十二卷本多种,亦多出邱本,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李而进刻本、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5)王民刻刻本,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顾懋光刻本等多种。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张氏刊十二卷本,另附《千秋金鉴录》五卷,据云,亦出于邱本。此外,朱警《唐百家诗》本、毕懋谦《十家唐诗》本,无不源出于邱濬本,只是仅收诗赋,不收文而已。今人刘斯翰《曲江集》校注本,以《广东丛书》本为底本加以整理;此《广东丛书》本有温汝适撰《曲江集考证》二卷,颇有参考价值。(杨旭辉)

【崔颢诗集】诗别集。二卷。唐崔颢撰。颢集,世不多见,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明长安田澜,“倍徙他集”(徐景嵩《刊崔颢诗集序》),得诗凡四十一首,其友徐景嵩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为之刊刻。此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另有一明刊本,三卷,收诗四十二首,把《渭城少年行》析为两首,实则仅有四十一首。又有明铜活字本《崔颢集》二卷,收诗四十二首,校订较为精审,堪称善本,后来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唐百家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皆以之为本。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崔颢诗集》三卷,诗四十三首”,诗的首数多于上述诸本,大抵后来辑本均有遗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元竞君《崔颢诗注》(与《崔国辅诗注》合印),以活字本为底本,并作简明注释。(杨旭辉)

【祖咏集】诗别集。一卷。唐祖咏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祖咏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題》同。今传本皆一卷,有明铜活字本、朱警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明刻《唐人四集》本、毕懋谦《十家唐诗》本,多为辑本。如铜活字本收诗三十二首,卷末附以有关评语及皎然《诗式》中所存的断句三联,但仍有遗漏,《全唐诗》已补四首,《全唐诗补编》又续有补辑。(杨旭辉)

【储光羲集】诗别集。五卷。唐储光羲撰。储集最初由王维之弟王缙编次,并为作序,后由嗣息储溶以家集请顾况序,凡七十卷(见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新唐书·艺文志》有载录,亦作七十卷。晁氏《郡斋读书志》及陈氏《直斋书录解題》皆作五卷,则宋时已多散佚。今仅见明人合刊本《储光羲集》。《天禄琳琅书目·明版集部》云:“《唐储光羲诗集》

……书五卷,凡诗二百二十四首,前有顾况序,殷璠评语一条,栾城遗言一条。”明铜活字本所收诗数与之亦近,且也冠以顾况序、殷璠评和栾城遗言。今所见的明人合刊本有以下数种:明铜活字本、蒋孝《中唐十二家诗集》本,陆汴《广十二家唐诗》本,朱之蕃《唐四家诗集》本,神宗万历(1573—1620)毕懋谦《十家唐诗》本和万历四十七年(1619)《储王合集》抄本。另据邵懿辰《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有“许氏有影宋抄本”之记载,此本不知今藏何处。1930年上海述学社刊储皖峰辑《储氏丛书》,其中收有《储光羲诗集》五卷,并有附录一卷。(杨旭辉)

【孟浩然集】唐诗别集。孟浩然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浩然诗集》三卷,下云:“弟洗然、宣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由是观之,孟集当时有孟洗然与王士源所编的两种三卷本。孟洗然编定本,后代无著录,未传世,而后代诸多孟集版本悉出王士源本。唐玄宗天宝四载(745),浩然去世不久,王氏编录其诗,努力搜求,保存了诗作二百十八首,分为三卷。天宝九年,韦滔得到王本,又重加缮写,“增其条目”,“送上秘府”(韦滔《重序》)。宋代流传的本子即为此本。《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诸书目,虽书名或题“浩然”,或作“襄阳”,均录为三卷,《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一卷本,乃晁氏据王氏三卷本合并而成。《孟浩然集》,今存有宋蜀刻本,三卷,原为黄丕烈所藏,后历经杨绍和、李盛铎诸人,今归北京图书馆。此书虽不显立类目,但考其内容,实按游览、赠答、行旅、送别、宴乐、怀思、田园七类。此种编排形式为后来之元刻刘辰翁评点本、明朱警《唐百家诗》本、顾道洪本及毛晋汲古阁本所沿袭,诸本卷数、编次全同,仅收诗多寡略有不同,当属同一系统。另有分体编排本,如三卷之明铜活字本。《四部丛刊》所影印明刊四卷本当又别为一体系。此本最为通行,收诗二百六十三首,较王本多四十五首,其中亦混入别人的作品。前人未有注孟诗者,仅有刘辰翁、李梦阳、袁宏道等作过点评。今有台湾学生书局于1975年印行之游信利《孟浩然集笺注》,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徐鹏《孟浩然集校注》。(杨旭辉)

【常建诗集】诗别集。二卷。唐常建撰。常建诗,宋人屡有刊刻,《新唐书·艺文志》及晁、陈两家书目均有著录,作一卷。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仁坊南陈道人书棚本始将其析为上、下二卷。杨士奇家曾藏有此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亦有著录,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天禄琳琅丛书》第一集曾将其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还有一宋刻二卷本。聊城海源阁藏有与杜审言、岑参、皇甫冉合刊的二卷宋槧。

(见《楹书隅录》)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又将其分类析为三卷,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中补辑《吴故宫》一诗。《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惟以汲古阁补诗非常建作而删汰。明代尚有众多合刊之本,如朱警《唐百家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万历毕懋谦《十家唐诗》本等。

(杨旭辉)

【高常侍集】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八卷。高适撰。高适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初已有集进奏于朝。今敦煌写卷中多有适诗,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二有《高适诗集》残卷,此卷“避唐讳甚严,的是唐人所书”(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今本适诗,编于进奏本后、此卷子本前,然此卷亦非最后之定本。另伯二五五二、伯二五五五等《诗选》残卷中皆有其诗,其中伯二五五二与罗振玉《鸣沙室佚书》中《唐人选唐诗》互为接连,乃同一写卷分裂而成。今存的写卷中有不少诗作为适集中所无。适集于两《唐书》中均作二十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皆录为十卷,可见宋代曾重编、重刊,宋孝宗乾道(1165—1173)间又有陆游刊本,然诸多宋槧旧本皆不传。今行于世的影宋、覆宋本颇多,尤其是清初辗转影抄宋本,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云:“《达夫集》,予借林宗宋槧本影摹,族祖求赤又从予转假去录而藏于怀古堂。今宋槧本流落无闻。予本久已归之沧苇(季振宜),此乃怀古堂录本也。”清陈树杓《带经堂书目》亦提及此“传录钱求赤怀古堂影宋本”。《四库全书》所收则为鲍廷博知不足斋影宋写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残本,序次、文字多与馆藏的清初影宋抄本同,是知其亦为据宋精抄本。明抄《唐十八家诗》本《高常侍集》一卷,与上述诸本同,皆不分体。估计以上诸本乃据某一不分体之宋刊影抄,当属同一系统。明人另有覆宋刊的分体十卷本,藏北京图书馆,郑振铎题跋中疑此本出于南宋书棚本。又有瞿镛铁琴铜剑楼藏十卷本,前八卷为诗赋,后两卷为文,诗则依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编次,今亦藏北京图书馆。此两种分体本,在文字上相差不大。高适集的刊行,后以诗单行者多,北京大学藏明刊《唐十二家诗》本,凡八卷,其集名、行款、分卷以及篇目序次与分体本前八卷无异,似为汰文而刊行。张逊业《十二家唐诗》,只是将十卷分体本前八卷并成上、下二卷,并未作多大改动,故源于张逊业本的杨一统刊《唐十二名家诗集》本、郑能《唐十二家诗》本以及许自昌《前唐十二家诗》本皆无甚大异。明铜活字本虽与上述几种同源,序次、文字、篇目相差却较大;《四部丛刊》所收即为此本,同时又校正了一些舛误。今人刘开扬有《高适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又出

版孙钦善校注的《高适集校注》。

(杨旭辉)

【李翰林集】诗别集。一作《李太白集》。李白撰。李白集,早在唐代即有人编定,惜今无传本存世。最早编定《李白集》者为太白友人魏颢,今有《李翰林集序》存世。此集仅二卷,当时李白尚在,自不可能收集太白毕生创作,故序中云:“白未绝笔,吾其再刊。”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太白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从叔李阳冰为序,旋即逝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当即此本。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复编太白遗稿,“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到北宋时代,不断增订。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乐史重订其集,编《李翰林集》二十卷,又收文编为《李翰林别集》十卷。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宋敏求增补旧本李白集,得诗一千零一首,次为三十卷。后曾巩就宋敏求本编年排次,在部分诗下注明写作地点,并为之序。元丰三年(1080),晏知止又对曾订本予以校订,于苏州镂版以传,是为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世称“苏本”。后来又有据“苏本”翻刻的蜀刻本。此集首卷专载碑序,诗二十三卷,杂著六卷。此本原为南宋楼心源所藏,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荃孙见后,据以翻刻,世称“缪本”。蜀刻原本后随南宋楼旧籍悉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影印问世。最早为太白集作注者为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高儒《百川书志》有著录。元初萧士赧删补杨注,撰成《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自此单行杨注本除汲古阁有翻刻外,极为少见。萧氏补注大致详赡,但仍嫌繁芜而有疏漏。此注本后世流传颇广,自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刊行以来,历代都有刊刻。《四部丛刊》影印之明郭雲鵬三十卷本即就萧注加以删节,另增杂文五卷。明代胡震亨著《李诗通》二十一卷,一般典实不注,偶下己见,亦多驳正旧注之误。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王琦汇集旧注,补充订正,著成《李太白全集》(又称《李太白诗集注》、《李太白文集辑注》)三十六卷,其中卷三十为王氏采他书所录逸篇之《拾遗》,后六卷为自撰年谱及有关太白的资料。前人注李诗者,以此为最善,翻刻流传最广,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刻本,后又有重刻本,略有改动。1979年,中华书局据重印本标点排印出版。今人瞿蜕园、朱金城撰有《李白集校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前此的杨齐贤至王琦各家旧注为基础,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补充,并考订缪误;又以王琦注

为底本,参校诸本,撰成详细的校记,并增辑诗文五篇,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李白集注释本。

(杨旭辉)

【王右丞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六卷。唐王维撰。唐代宗好文,尝闻王维乐章,令维弟王缙进呈,缙言其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旧唐书·王维传》),编辑成十卷。宋人著录卷数与王缙辑本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家集》,多异于他本,而此集编次尤无伦。”顾广圻曾在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发现一个宋蜀刻本,并在《王摩诘集跋》中云:“题《摩诘集》者,蜀本也;题《王右丞集》,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诗,后四卷文,自是唐代宗宝应二年(763)表进之旧;而蜀本第二以下全错乱,故《直斋书录解题》斥为“尤无伦”。由此看来,钱曾述古堂藏南宋麻沙刻本,当渊源于建昌本,此刻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亦作“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即藏书家所谓“山中一半雨”本。蜀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曾据以影印出版。麻沙本历经季振宜、徐健菴、黄丕烈和陆心源丽宋楼,今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有。刘辰翁评点唐诗中有王维诗,系抽取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中的诗歌部分六卷,作有评点,有元代刻本。《四部丛刊》所收《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即据此本影印。明人另有重刊,题作《唐王右丞诗刘须溪校本》。明人顾璘又有评点本《王摩诘诗集》七卷,有凌濛初刻闵氏朱墨套印《盛唐四名家集》本。明人顾可久又有《唐王右丞诗集注说》六卷,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刻印。此二家注评,皆源自刘辰翁评点本,须溪的评点文字均附于集中。在现存的王维集中,明人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十卷,是最早的笺注本。此本将原来的六卷诗集析为十卷,分体分类作注;末附以四卷文,凡六十四篇,无注。以上诸本中,顾璘、顾起经注本中属入王涯《太平词》、《闺人赠远》、《献寿词》、《秋夜曲》等三十几首诗。刘辰翁本未尝有混入,而顾氏竟有此误。清人注本以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最为有名,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注本,除笺注全部诗文外,并附评语,对作者可疑的作品加以说明,间加考订。集中又收辑有关王维生平和书画评论的资料,作为附录。此笺注本先后收入《四库全书》及《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于1961年将赵殿成注重加校订,排印出版。郑振铎《世界文库》以《四部丛刊》影元刊为底本,亦将赵注作为重要的参校本作校订。

(杨旭辉)

【颜鲁公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一卷。

唐颜真卿撰。按鲁公行状,其佐吉州时有《庐陵集》,刺杭州时有《临川集》,刺湖州时有《吴兴集》。但这些集子,历经五代战乱,全部亡逸。北宋时,吴兴沈侯采掇遗逸,辑编为十五卷,刘敞为之序。此为最早的辑本。后宋敏求广加采录,重编为十五卷,目次已非沈氏之旧。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间,留元刚以其所得宋敏求残本十二卷,益以拾遗一卷,又撰《年谱》一卷,并附行状、碑传为一卷,仍合十五卷之数。以上诸本皆已不见。今所传通行本为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锡山安国据吴郡都穆重编十五卷本重梓的《颜鲁公文集》十五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四部丛刊》亦据以影印。《四库全书》本又增安氏本未收的诗文作品增入《补遗》卷内。后来的不少版本即源自此本,如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刘思诚翻安氏本,万历二十四年颜胤祚重刻本等。其中颜胤祚本多脱漏舛误,尽失其旧。颜集佚佚颇多,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文忠集拾遗》四卷,专收其佚文。今搜集最备之本,当属清宣宗道光(1821—1850)间黄本骥刊《颜鲁公集》,总题三十卷,内多附有关鲁公的资料,道光二十五年(1845)黄氏三长物斋有刊本,后收入《三长物斋丛书》。此本包括《颜鲁公集》十二卷、《外集》八卷、《书评》十卷、《补遗》一卷。《四部备要》据以排印。

(杨旭辉)

【李颀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李颀撰。李颀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亦同。然宋、元旧槧,未见传本。明代多有辑本行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颀诗凡有数本,明正德乙亥(1515年)辽东按蒲坂刘成德刻于江宁,己卯(1519年)吴郡包山陆涓又刻之。”今传多为合刊本,较常见的有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辑《唐百家诗》本,嘉靖三十三年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神宗万历(1573—1620)毕懋谦《十家唐诗》本,明铜活字本以及明刻《唐五十家集》本,无名氏辑仿宋刊本《李颀王昌龄诗合刻》。《江苏一图善本目》著录明武宗正德(1506—1521)依宋刊本《李颀诗集》(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录此集后无名氏跋云:“予藏是集,讽诵日久,不觉心契,遂为刻而传之。正德己卯四月十日。”于此本可见宋槧旧貌之一斑。除以上诸种合刊外,万历十四年(1586)凌登瀛辑刻《李颀诗集》一卷,考正刘成德、陆涓等诸旧本,重刻行世,乃今存唯一的单行本。

(杨旭辉)

【杜工部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其中诗十八卷。唐杜甫撰。由于杜甫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杜集版本及各类注本也就特别多。今人周采泉有《杜集书录》一书,摭拾几备,择要述之。《旧唐

书·杜甫传》云“甫有集六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润州刺史韩滉集）。惜此本早已亡佚。后又有蜀本二十卷等多种，诸多版本中并无完集。此值宋初，“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宋人对杜甫集的整理重在辑佚和编年，基本形成杜集的定貌。其中尤以王洙、王琪二人功绩最大。洙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编成杜集二十卷；此次编辑，用力最勤，参考的本子多，分为古、近体，同时又作了初步的编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琪就王洙本重为编定，由裴煜复视，镂版刊行，成为杜集的一个定本。此本流布甚广，为以后一切杜集的祖本，“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一不出于二王之所辑梓”（张元济《宋本杜工部集跋》）。以后有毛晋汲古阁和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1957年，张元济以二本相配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王琪本有翻刻，即所谓浙本和吴若本，钱谦益注杜诗用的底本就是吴若本，并云：“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南渡以后，杜诗的编辑又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的杜集，除浙本、吴若本外，又出现了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此本把王洙以来杜集以古诗、近体编排的体例打破，以编年为主，同时对杜诗又作了一次辑佚，比王洙本更完备，然此本不见于历代著录，也未见传本，只存有李纲《校定杜工部集序》。后又有蔡兴宗、鲁豈沿其编年体例所编杜集。蔡本误字甚多，不为人所重；鲁豈本凡十八卷，今亦不传，止有一序，可略知梗概。以后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及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就是以鲁豈本加以注释会笺的。宋人编杜集，除分体及编年两类外，还有以门类为序编次的，以徐居仁《门类杜诗》二十五卷为代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曾提及。随着杜诗的编订和流布，宋人对杜诗日益重视，注释之风应运而起，三种不同系统的版本都有一批著名的注本出现。分体类诗集注本有鲍钦止注、托名苏轼的《老杜事实》（一作《杜诗释事》）、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和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一名《九家集注杜诗》），其中，以《集注》“最为善本”（《直斋书录解題》），较他注精审简要。编年类注本除前已述者，尚有黄鹤父子的《黄氏补注杜诗》，此注“大旨在于案年编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门类注本皆以徐居仁本为基础，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据谦牧堂藏宋板影刊）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宋代还出现了刘辰翁的评点本。元、明以来，对杜集的整理没有更大的进展，研究风尚转向选集解律，注释训解本日多。元人有虞集《杜律虞注》二卷、赵沅《杜律五言

注解》、俞季渊《杜诗举隅》等。明人注杜诗颇多，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张綖《杜诗通》等九种。其中，明人注本最有名的当属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又名《钱注杜诗》，凡二十卷。有清一代，对杜诗研究作了集成性工作，多集注批点，较为通行的有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诠》等。又有史炳《杜诗琐证》之类的研究专著多种。为适应学术研究之需要，建国后又重新出版了大量的杜集和各类旧注本。（杨旭辉）

【岑嘉州集】诗别集。八卷。唐岑参撰。岑参去世后，其嗣子佐公出所存遗文，由杜确“区分类聚，勒成八卷”。宋人著录则多云十卷。此十卷与八卷本，久已不见。今所传另有八卷本和七卷本两个系统。最早本子为杨绍和《楹书隅录》中的四卷。此四卷为宋刊八卷残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其次序杂乱，并非杜确所说的“区分类聚”，可见宋人所刊八卷本已非杜确所次之原貌。陆游曾“杂取世所传公遗诗八十余篇刻之”（《跋岑嘉州诗集》，见《渭南文集》），说明宋刊岑诗尚有遗逸。明抄八卷本之前四卷与宋槧残本接近，盖以残本为底本，又参校他本，略作变更。此完整抄本可令人了解宋刊八卷的大致原貌。源于此抄本的明铜活字本八卷，依诗体编次；周叔弼以此与海源阁藏四卷残宋本对勘，发现“宋本序次与吴氏所抄目录正同”。明代还有不少合刊本，虽卷数不同，但细细勘比，亦属八卷本系统，其中以张逊业《十二家唐诗》本为代表。后来杨一统刊《唐十二家诗》、郑能刊《唐十二家诗》、许自昌《前唐十二家诗》皆源于张刻，故其中所收《岑参集》，虽一卷、二卷、八卷不等，而实少有异处。《全唐诗》基本上也按此系统分为四卷，同时也参校了较多的异本和《文苑英华》、《唐诗纪事》等诗文总集，注出异文，收诗较为广泛。而《四部丛刊》影印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熊相济南刊本，则别属七卷本系统。此七卷本极可能有宋元旧本为依据，因《季沧苇书目·宋元杂版书》及朱学勤《别刻结一庐书目》皆录有宋板七卷本。与八卷本相比，无论分卷序次和文字，差异都很大。熊氏刊刻之同年，沈恩将其所见之七卷分体残缺本“缩之为四卷，总若干万言”，“参订而翻刻之”，此即为《四部丛刊初编》所影印者。更为巧合的是，也在正德十五年，谢元良在嘉州以别本进行辑佚，得诗三十五首，以补七卷旧刻本，次为八卷，虽曰八卷，实仍属七卷本系统。1958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岑嘉州集》。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有《岑参集校注》，此校注本不按旧本分体编排，而将岑诗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在此之前，1980年台湾国立编译馆还印行了阮廷瑜的《岑嘉州诗校注》。（杨旭辉）

【刘随州集】 诗文别集。十一卷,其中诗十卷。唐刘长卿撰。《刘随州集》在宋代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十卷,一为十一卷。《直斋书录解題》云:“诗九卷,末一卷杂著数篇而已。”又云:“建昌本十卷,别一卷为杂著。”宋槧十卷本,后世少见,后出版本多源自十一卷本系统。长卿诗在宋代也曾有过抄本流传,陆游曾购得尹耘师抄本(见《渭南文集》)。十卷本今存一北宋残本六卷,曾经黄丕烈、瞿镛之手,黄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编》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皆云原书十卷,当是,瞿镛云十一卷实乃误记。宋刊十一卷原本,明人有翻印本。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记》卷二的“明版”、何焯以建昌本覆勘的明正德刊本(卢文昭后有抄录之本),都渊源于十一卷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明弘治有两刊本,均十一卷,一西蜀李士修知随州所刊,一徐姚韩明所刊。”据《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及《藏园群书题记》,李氏刊本刻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韩本由临洮太守李纪于同年刊印,有韩明跋,出自南宋书棚本。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李纪刻本又为人覆印,剔去卷一杂文,而别有《刘随州外集》一卷,《四部丛刊》影印者即此本。《四库全书》所收为诗十卷、文一卷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随州集提出了种种质疑,指出其中多有不可信之作,认为“盖宋本亦有善不善,不能一一精核也”,而此似为明人所妄增。除诸多单行刊本外,还有明铜活字本等多种合刊,傅增湘以为明活字本颇有异文可取,但分体编次,已非宋时旧第。诚如四库馆臣所说,现存刘长卿诗,无论见于哪种版本的全集或《全唐诗》,都杂有他人之作,有些已在诗题下注明一作某人诗,也有些未注明,需要精心甄别其真伪。(杨旭辉)

【钱考功集】 诗别集。钱起撰。钱起诗,《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一卷。宋人所传钱起集众多,卷数多寡各不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钱起集》二卷。北宋鲍钦止于《夷白堂小集》中记云:“钱起考功诗,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旧有五卷,王仲至续为八卷。”北宋蔡居厚《诗史》亦云:“唐太清官使、翰林学士钱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诗,不过百首。有钱蒙仲得《江行无题》一百绝,皆人家藏本所无。”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十卷,又言蜀本作十三卷。诚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所说“谓后人分二卷为十卷,未必然也”,其中不断录入他人之诗,如钱珣、赵起、王维、卢纶等,致使今传《钱起集》颇多疑问。今人岑仲勉《唐诗余藩》、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吴企明《钱起钱珣诗考辨》(收入《唐音质疑录》),都对此作了考订。宋、元旧刻本,未见著录,清人所见多为旧抄本。今

传《钱考功集》多为十卷本,如明铜活字本(《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四库全书》本。钱起集“所编甚驳”(徐焘《红雨楼题跋》),前人虽已作详细的考订,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尚待精校。(杨旭辉)

【郎士元集】 诗别集。一卷。唐郎士元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郎士元诗》一卷,宋人书目皆同。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录有明翻宋本《郎刺史集》一卷,《江苏一图善本目》亦有明正德依宋刊本,二本即或为同一书。明人刊本收诗大致六十余首,卷次一、二、六各不等。朱警辑《唐百家诗》、王准《唐十子诗》(1907年陶氏涉园据以抄录)以及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均仍其旧,作《郎刺史诗集》一卷。铜活字本和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则为二卷。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江都萧海校刻《耿沛诗集》所附者为六卷本。(杨旭辉)

【元次山集】 诗文别集。十卷,《拾遗》一卷,其中诗三卷。唐元结撰。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元结应举,“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元结《文编序》)。元结最初将诗文作品结集,是为了行卷。到代宗大历二年(767),他又因“地偏事简,得以文史自娱,乃次第近作,合于旧编,凡二百三首,分为十卷”(《文编序》),此本就成为《文编》的定稿。又据李商隐《容州经略史元结文集后序》云,元结的外曾孙辽东李恽辞又收遗逸,聚为《元文后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及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所记,宋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为蜀本,载元结自序,并有拾遗一卷;一为江州本,李义山序冠其首,分置十卷,拾遗分载集中,二者稍有不同。此《元子文编》,宋元旧槧未见流传,仅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记有一影抄元刻本《唐漫叟文集》十卷,附拾遗和拾遗续。明初则又有一重新汇编刻印本《唐漫叟文集》,亦有拾遗和拾遗续各一卷,瞿镛疑出于宋蜀本。此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皆有藏。今最为通行之本当属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湛若水校郭勋刊刻的《唐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遗》一卷,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云:“依宋板本讐勘无伪。”傅增湘曾跋是书,《四部丛刊》即借傅氏双鑑楼藏本影印。今人孙望则又以此为底本进行校点,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明人刊本除此而外尚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刻本、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夏鏗补刻本、德藻堂十二卷印本。《四库全书》所收《次山集》十二卷,乃明末陈继儒、吴震元和王时敏三人同校之刊本(说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其实十二卷之诸多本子,亦无不略同于十卷,仅是第十一卷曰拾遗,第十二卷曰拾遗补或拾遗续。今人整理成果,除孙望校《元次山集》外,聂文郁还有一注解本《元结诗

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杨旭辉）

【**昼上人集**】 诗别集。十卷。唐僧皎然撰。皎然，俗姓谢，字清昼，尝居吴兴杼山，故其集后人又称作《昼上人集》、《杼山集》。唐德宗贞元八（792）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于顷“采而编之，得诗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见于顷《释皎然杼山集序》）。此即晁公武所称“德宗诏录本”。后世钱曾《读书敏求记》及吴焯《绣谷亭薰习录》皆云有贞元原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四库全书》所收《杼山集》，“卷数与《唐志》合，顷序亦存，盖犹旧本”。《四库全书》本前加有赞宁《宋高僧传》中的《皎然传》，书末缀以毛晋补辑的集外诗。除贞元原本外，宋人似有刊本，卷数与原本皆合。今宋刊本已不可复见，但有影宋精抄本多种传世，北京图书馆有明叶氏赐书楼影宋抄本，上海图书馆有清影宋抄本，《四部丛刊》所影印的傅增湘双鉴楼影宋精抄本，皆颇可贵。于顷成集时，皎然尚在世，其后所作诗文未能收录，故毛晋有感于德宗诏藏本遗逸颇多，乃据《唐诗纪事》等另辑得一卷，附于本集后，并重为刊刻，收罗最富。明张睿卿所编《吴兴五家集》中的《杼山集》仅四卷，而其篇目与十卷本大致相同，唯分卷不同而已。（杨旭辉）

【**皇甫曾诗集**】 诗别集。一卷，校记一卷。唐皇甫曾撰。《新唐书·艺文志》录《皇甫冉诗集》三卷，仅在注中云冉“与弟曾齐名”，而不录曾诗。曾诗，宋代已有结集，《直斋书录解題》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曾诗一卷。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记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本《皇甫御史诗集》一卷，并云：“此亦与席刻相同，当从宋本重刊。”《江苏一图善本目》中有此本，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亦从宋槧出，复采《文苑英华》及《唐诗类苑》，得逸诗六首，别为一卷《补遗》。《四库全书》所收刘润之编《二皇甫集》七卷为皇甫冉、皇甫曾合集，其中曾集一卷、冉集六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其为明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张元济曾以明武宗正德（1506—1521）、世宗嘉靖（1522—1566）之际的《皇甫冉诗集》附《皇甫曾诗集》为底本，取校铜活字本、黄贯曾刊本、徐献忠刊本、袁翼覆宋刊本以及席启寓刻本，文字有歧异，别录校记一卷；又从席本补冉诗二首，从活字本补曾诗一首，从《全唐诗》补冉诗四首、曾诗七首，成《补遗》一卷，《四部丛刊》即以张元济整理成果与明刊一起影印，较为完备。（杨旭辉）

【**韩君平诗集**】 诗别集。五卷。唐韩翃撰。韩翃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皆作五卷，今仅有黄丕烈跋明抄本

及明抄《唐四十四家诗》、《唐四十七家诗》为五卷。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刘成德辑、萧海校正刊本作八卷，黄尧圃晒之曰：“明知集为五卷，而必分体为八卷。”此本今未见。傅增湘指出：“君平诗自《唐百家》本（朱警本）、《唐二十六家》本（黄贯曾辑）、活字本外，专刻者较为罕见。”（《藏园群书题记》）。单刻除刘成德本外，另有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江元提刻三卷本，是本与明活字本同，《全唐诗》所收诗及次序也大致相同，盖必以此为祖本，仅比其多收诗十首，则必采自他书。与刘本比，江本较佳。清人王萱龄曾刻江氏是书，并补其未收佚诗，但未超过《全唐诗》所补十首之数。韩翃诗集还有席启寓本及《中晚唐诗纪》本。1973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曾出版陈玉和《韩翃诗校注》。（杨旭辉）

【**于鹄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于鹄撰。《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于鹄诗》一卷。后代辑本未有超过此数者。有明朱警《唐百家诗》本、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准《唐十子诗》本（1907年陶氏涉园据此影抄）、明刻《唐五十家诗》本、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和龚贤《中晚唐诗纪》本等。（杨旭辉）

【**司空曙集**】 诗别集。三卷。唐司空曙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司空曙诗集》二卷，而《直斋书录解題》于《司空文明集》二卷外又有“另本一卷，才数篇”的记述，此别本当为正集之外的补遗。后代司空曙的集有二卷、三卷的。北京大学藏影宋抄本《唐司空文明诗集》三卷，复有补遗一卷，与著录本又有不同。明铜活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及清抄本均为二卷。三卷本则有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刘成德刻《唐大历十子诗集》本有于鹄诗集，卷数达七卷，实乃按体分卷，所录诸诗亦不超过上述诸本，吴县图书馆有藏。（杨旭辉）

【**耿纬集**】 诗别集。二卷。唐耿纬撰。《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俱作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耿纬诗》三卷。《江苏一图善本目》所载明正德依宋刊本《耿纬诗集》一卷（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卷数却不与宋人记载同。正如明徐燉《红雨楼书目》所云，今存耿拾遗诗集多一卷之本，如朱警《唐百家诗》本、明神宗万历（1573—1620）毕懋谦《十家唐诗》本、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江标影刻《唐五十家小集》本。与宋、元书目同者，仅有明铜活字本及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虽作三卷，恐非旧貌。（杨旭辉）

【**唐崔峒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崔峒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峒诗》一卷。明代高儒的《百

川书志》记云：“《崔峒集》一卷。集贤学士博陵崔峒诗三十八首。”今存诗集见收于明陆汴《广十二家唐诗》和蒋孝、朱之蕃二种《中唐十二家诗集》和清初抄《百家唐诗》中，俱题《崔补阙诗集》。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刘成德《唐大历十子诗集》所收《唐崔峒诗集》次为四卷，卷数较一卷多，而收诗并无增益。（杨旭辉）

【李端诗集】诗别集。四卷。唐李端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端诗集》三卷。以今存之明覆刻宋书棚本和清江标影刻书棚本观之，与《新唐书·艺文志》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次相同。朱警《唐百家诗》本亦作三卷，丁丙云朱氏辑唐集“多宋本”，当亦有所据。黄丕烈士礼居曾得一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抄本《李校书集》三卷，极有可能源自宋本，黄氏并作了校订。其他的本子则多作四卷，显然已非旧次，如明铜活字本，杨绍和《楹书隅录》以为“谬误特甚”，不及黄尧圃所校之明抄。除上述诸本外，尚有清胡介祉谷园刻《李司马集》四卷。（杨旭辉）

【毗陵集】诗文别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其中诗三卷。唐独孤及撰。《毗陵集》的结集过程，独孤氏门人梁肃《毗陵集后序》言之甚明：“常州刺史独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葬，门下生安定梁肃咨谋先达，稽览故志……于是缀其遗草三百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宋人官、私著录均同，但宋、元旧槧未见传。明吴宽自内阁录出是集，抄藏于家，始传于世，以后众多抄本莫不据此（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引祝允明跋《毗陵集》）。《四库全书》所收《毗陵集》二十卷即为此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了其误收、漏收之篇章，但为存旧本原貌而未补入。长洲叶氏石君曾以吴岫等数抄本校吴宽内阁录出之本，是正不少舛误，并补入杂文若干，自诩为完书。此本后为鲍廷博所得。清高宗乾隆五十六（1791）年，赵怀玉亦有生斋据以校订刊行，其中诗三卷，文十七卷，又补遗、附录各一卷，《毗陵集》始大为流布。《四部丛刊》影印赵氏刊本时，不仅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举六篇佚文补入，又从《历代赋汇》、《文苑英华》、《唐文粹》中补录四篇。单刻诗集有明蒋孝《中唐十二家诗集》本、陆汴《广十二家唐诗》本和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皆作三卷。日本在天保四年（1838）曾有一官刻二十卷本《毗陵集》。（杨旭辉）

【严武集】诗别集。一卷。唐严武撰。明高儒《百川书志》云：“《严武诗集》一卷。”今仅存严武诗七首。观明人所辑集本：明铜活字本、朱警本《唐百家诗》、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明刻《唐五十家集》以及《全唐诗》皆仅收诗六首，另一首则为《全唐诗续补遗》所辑补。（杨旭辉）

【严维集】诗别集。一卷。唐严维撰。《新唐书·艺文志》和《直斋书录解題》皆著录维诗一卷。清江标影刻《唐人五十家小集》，称其所刊《严维诗集》影自南宋刊本。此集收诗五十五首，且多墨钉，其收罗之数及刊刻质量皆不及后代各本。后代的朱警本、铜活字本、王准《唐十子诗》本（1907年武进陶氏涉园有影抄）、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多为重新辑校之本，且不断有所增补。明铜活字本收诗达六十一首，《全唐诗》增诗四首、断句八。今《全唐诗补编》又补诗二首、断句六。（杨旭辉）

【寒山子诗集】诗别集。一卷。唐寒山撰。寒山曾作诗自称“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唐德宗贞元（785—805）末，寒山圆寂。台州郡守闾丘胤令僧道翘于村壁树间收其诗偈，得三百餘首，编辑成集。同时，于国清寺土地神庙壁见拾得偈词，一并收入寒山集中（事见《宋高僧传》）。以后诸本寒山集中并附拾得及丰干的诗偈，仅多寡略有不同。三人并称为“三圣”或“三隐”。《太平广记》引杜光庭《仙传拾遗》则以为寒山诗先由好事者收集，后经徐灵府整理并为之序，分三卷行世。以后，寒山的诗流传甚广，远至东瀛。及至五代梁，曹山本寂禅师曾注《对寒山子诗》七卷，《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最早的集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天台山国清寺志南刻本，此本为最佳之本。但此本前当有更早的刊本。日僧成寻所撰《参天台五台山记》云，他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入参天台山时，国清寺中即有寒山诗一帖。到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可明又以志南本再刻，并作跋，习称东皋寺本。僧无我慧身又据东皋寺本补刻，董康曾见于日本图书寮。1905年日本岛田翰覆刻之底本即此本。以上数种，按诗体编排，属同一版本系统。这一类还有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江东漕司刻本（习称“三刻本”）、黄丕烈所谓“外洋本”、《四部丛刊》初印所据元代高丽复宋本。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天台僧又重刊志南本，集作《天台三圣诗集》。另一系统的版本，五、七言杂录，不分体，《四部丛刊》二次印本所影印的毛晋汲古阁影宋本即是。民国时期，刊印寒山诗者甚多。东瀛传布寒山诗尤为普遍，仅注本就有宽文（1661—1672）年间的《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1688—1703）年间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享（1744—1747）年间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记闻》等，不胜枚举。近年，港台及美国也出版或编译了不少《寒山诗集》。（杨旭辉）

【拾得诗集】诗别集。唐僧拾得撰。拾得为天台山国清寺高僧，与寒山、丰干并称国清寺三圣。《宋高僧传》卷一九、《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及《国清高僧

传》有传。据传,僧道翘辑寒山诗时于土地庙壁上发现其诗五十首,次为一卷,附于寒山集后,今存各本《拾得诗集》亦均附于寒山集后。今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又据《宗镜录》补逸诗二首。参见《寒山子诗集》。

(杨旭辉)

【丰干诗集】诗别集。唐丰干撰。丰干,一作“封干”,天台山国清寺高僧,与寒山、拾得并称国清寺三圣。《宋高僧传》卷一九、《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及《国清高僧传》有传。今存丰干诗二首,次为一卷,与拾得诗并附于寒山集中。丰干所传二诗,据近人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考订为宋人伪托之作。参见《寒山子诗集》。

(杨旭辉)

【华阳集】诗别集。三卷,《补遗》一卷。唐顾况撰。据皇甫湜《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顾况诗有二十卷,《旧唐书·顾况传》、《新唐书·艺文志》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均作二十卷。陈振孙则称“集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宋人著录诸本今皆不传,仅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录有《顾况文集》十九卷,似为旧本之残。明高儒《百川书志》云“《顾况集》二卷,又《华阳真逸集》二卷”,则有两种顾集并行于世。此二本篇目序次大略相同,仅前者少收《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前集今有明铜活字本及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后集则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依宋刊本,《江苏一图善本目》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中,又有朱警本及江标影刻本。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一(1613)年,顾况二十五世孙顾名端在《华阳真逸集》基础上,又哀合《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况诗,编为《顾华阳集》三卷,后附况子非熊诗集一卷。《四库全书》即据名端本收入,且指出其收录未为赅备,在《文苑英华》、《唐文粹》中尚有况诗四首,非熊诗一首。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中有《顾逋翁诗集》四卷,悉录明刊《顾华阳集》中诸诗,并从《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又玄集》、《才调集》、《御览集》中补入八十五首,重为编次。《全唐诗》录顾况诗四卷,即以此为基础,并据诗话、方志补入五首,分隶各体之后,又补断句六联,于《谐谑》及《联句》中也录有二首、一联。至清高宗乾隆三十八(1773)年,顾况裔孙顾履成感于明刊收录未备,又进行了一番辑佚,编成《顾华阳集》三卷,附补遗一卷,所录诗较《全唐诗》又多二诗、二联句。今人赵昌平以《全唐诗》四卷为底本,进行校订,并对作品的真伪作了甄别,将删汰诗附于卷末,又有补遗,使顾况集更趋完备,题为《顾况诗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排印出版。

(杨旭辉)

【戴叔伦集】诗别集。二卷。唐戴叔伦撰。《郡

斋读书志》著录《戴叔伦述稿》十卷、诗一卷、《书状》一卷。集有马总序,集名或题曰《会录》。此本已不传。明人书目《百川书志》、《红雨楼书目》或作一卷或作二卷,均为辑本,多窜入他人诗,而一卷之本今亦不见。明清辑本有铜活字本、朱警本及席启寓本。其他版本的价值不高。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刻本并非补宋本,实为明人作伪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不分卷《玉屏诗集》,实为家谱本;民国陈庆年《横山草堂丛书》本又系翻刻明刊。相对而言,《全唐诗》本较佳,但也有误收和漏收,今人傅璇琮《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的真伪考辨》对误收之作多有考证。

(杨旭辉)

【韦苏州集】诗别集。十卷。唐韦应物撰。韦集在宋人著录中皆为十卷,仅集名或作《韦应物集》,或作《韦应物诗集》。据王钦臣《宋嘉祐校定韦苏州集序》所言,尚有《古风集》、《泮上西斋吟稿》,今无从考其详。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王钦臣取诸本,去其杂厕,分五十类,合五百七十一首。王氏原本今不传,但今存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刻本及南宋书棚本,俱出自王氏校订本。在乾道本前,尚有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葛繁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刻本,皆同源,但均不存。之后又有宋人刊行(见《宝礼堂宋本书录》)。后代韦集大抵依宋十卷本覆刻校订。元麻沙本即为翻宋本,但集中增加了刘辰翁的批注评点文字;此乃研究须溪评点之完璧,后人翻刻时则多少有削汰。“韦集,世多明刻”(柳诒徵《韦苏州集跋》),尽管刊印多,但与宋本差别不大。观明清众本,大致有三类。一为翻宋刊本,基本保持宋本旧貌。影响较大者有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李瀚、刘玘刻本、上海图书馆“明黑口本”、汲古阁本以及嘉靖桃村周氏本;其中,周本颇有误字。明刊多有舛误,殆昉于斯。《四库全书》所收清代项纲玉渊堂本(《四部备要》据以校刊)及席启寓本,“皆仿宋人原集,一一校讎而付之梓”(叶燮序)。二为依宋校订本,在保持原貌基础上,又加上了校订者的成果。著名的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华雲刊行本,据华复初《题识》,可定其源自宋本,又加校订,并删去大部分注文,同时增添了有关韦集的丰富资料。《四部丛刊》影者即为此本。嘉靖余怀刻本、《万有文库》所据凌濛初朱墨套印本以及《全唐诗》(包括《唐音统笈》、《唐诗》以及源于《全唐诗》的胡风丹本、许贞干《唐四家诗合集》本),皆属此类。三为依宋重新编次本。其中以明铜活字本最有代表性,将分类编排改成分体,且删去旧注,收罗最为完备,凡五百七十一首,其中一首为顾况诗。

(杨旭辉)

【戎昱集】 诗别集。一卷。唐戎昱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云：“《戎昱集》五卷。其侄孙为序，言弱冠谒杜甫于渚宫，一见礼遇。”侄孙之序当作于昱故后，昱在世时并未将其诗作刊定，当以此为最早之本。陈氏所见当为此本。而《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分别著录为一卷和三卷，似应有不同本子行世。今存昱诗集。见收于朱警《唐百家诗》、明抄《唐四十四家诗》、清刘云份《十三唐人诗集》和《中晚唐诗》以及席启寓、江标等诸种辑本中，均作一卷，其中席氏刻本又有《戎昱诗补遗》一卷。《全唐诗》亦次作一卷，其中杂有戴叔伦等人的诗。今人臧维熙有《戎昱诗注》，以《全唐诗》为底本，剔伪诗二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出版。（杨旭辉）

【卢纶诗集】 诗别集。五卷。唐卢纶撰。《新唐书·卢纶传》云：“文宗尤爱其诗，……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诗五百篇以闻。”《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卢纶诗集》十卷。此集不传，以后其诗散佚颇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集部》虽录为十卷，然仅存诗三百三首。此宋槧今亦未见，仅南京图书馆有一明翻十卷宋本。由于卢集传布不广，故明人蒋孝《中唐十二家诗集》、陆汴《广十二家唐诗》、明刻《唐十一家集》以及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虽尽力搜罗，次为十卷，然诗篇数字远少于五百。仅以刘成德正德十五年（1515）刻三卷本《唐卢纶诗集》与席本对勘，刘本所录诗中竟有十一首不见收于近三百首的席刻中，《藏园群书题记》列举了十一首的诗题。日本也曾于元禄二年（1689）刊行过刘成德的这个校增本，今日本国会图书馆有藏。卢集另有六卷的明铜活字本、一卷的朱之蕃《中唐十二家诗集》本。今人刘初棠有《卢纶诗集校注》，以《全唐诗》为底本，取校他本，书末附有《卢纶简谱》，唯未见刘成德本，故刘本中多出之诗大多未能补入。此《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杨旭辉）

【中唐刘言史集】 诗别集。一卷。唐刘言史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言史诗歌》六卷，《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刘言史诗》十卷。皮日休谓其“有歌诗千首”（《刘枣强碑》）。而此后言史集不见传，遗散极多。《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仅收八十首，与千首之数相距甚远。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刘云份曾重为辑理，编为一卷，收入《八刘唐人诗》、《唐代刘氏诗集》、《中晚唐诗》三种丛刊中，此三种丛刊均有刘云份野香堂自刻本。另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著录《刘言史歌诗》一卷，未知为何人所辑。此本应出《全唐诗》之前，当更早于刘云份辑本，惜今未见。（杨旭辉）

【李益集】 诗别集。二卷。唐李益撰。李益生前

曾亲辑其从军诗五十首赠人，流传一时。后人将李益的诗或编为一卷（《直斋书录解題》和《宋史·艺文志》著录），或次为二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另又有题作《李君虞诗集》者。益诗在宋代颇多亡佚，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指出，其名作《征人早行》亦不见于集中。明高儒《百川书志》同时记载了《李益集》二卷和《李君虞集》二卷两种不同系统的本子。从今存的明本来看，《李益集》与《李君虞集》颇不相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曾将朱警辑《唐百家诗》本《李益集》二卷与明孝宗弘治（1488—1505）、武宗正德（1506—1521）间刻《李君虞诗集》对勘，前者较正德本少诗十八首，而朱氏辑本中又有二十五首不见于后本之中。正德本见录于《江苏一图善本目》，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中，题为明依宋刊本。又据丁丙说，“朱氏所集，多宋本，当别有所据”。由是看来，两种版本自宋时即有差异。属朱本系统的还有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和铜活字本《李益集》；而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则祖于正德本《李君虞诗集》。《全唐诗》在编辑时，以分体编次的《李益集》为基础，补入《李君虞诗集》中的六首联句诗，又从《御览诗》、《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中补入其他散佚的诗三十一首。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张澍有辑本，未刊。”此张澍辑本《李尚书诗集》一卷实《全唐诗》的重新调整编次本，后收于《二酉堂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又据以排印。今人范之麟有《李益诗注》，以《全唐诗》为底本，删去了显系戎昱的《闻笛》和卢纶的《赴虢州留别故人》，后并附生平资料和评论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收入《唐诗小集》第一辑出版。（杨旭辉）

【澈上人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僧灵澈撰。据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中述灵澈门人秀峰之言云：“师尝在吴，赋诗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为十卷，自大历至元和凡五十年间，接词客闻人唱酬，别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僧灵澈诗集》十卷，此后仅《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一卷。《全唐诗》收诗十七首（其中一首见于《补遗》），残句十则。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中列出《僧灵澈集》十卷，前有刘禹锡序，盖为古本。今未见。今存佚名辑《唐四僧诗》中有灵澈集一卷，则吉光片羽，非其完书。《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日本静嘉堂文库另藏有一写本。（杨旭辉）

【孟东野诗集】 诗别集。十卷。唐孟郊撰。孟郊诗在晚唐已有结集，晚唐邵谒曾有《览孟东野集》一诗。据宋敏求记述，宋初孟集行世之本很多，但卷数不一，多寡各异。宋敏求把它统编成十四类，合成十卷，使孟集有一个较善之本，而以前的汴吴本、周安

惠本、蜀之二卷本《咸池集》俱废。宋敏求本遂成为以后一切孟集的祖本。晁公武、陈振孙所著录的都是此宋编十卷本。黄丕烈曾得一北宋槧本,半页十一行,行十六字,后历经辗转,为李盛铎木樨轩所得(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今藏于北京大学。1934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印者即为此本。黄丕烈另有一北宋蜀本,仅存五卷,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天台国材曾用宋敏求本钐诸梓。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无锡秦禾于都穆处得国材旧本,秦氏又从之翻刻,卷帙行款尚是宋本之旧,未附与韩愈的联句。此本又有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增入刘辰翁评语。须溪评语仅赖凌本以传。国材本系统之外,尚有书棚本系统流传。陆心源诂宋楼藏汲古阁影宋精抄《孟东野诗集》十卷,题后有“临安府棚前北睦亲仁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一行,因知乃抄自棚本。今《四部丛刊》所影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刊本,据丁丙判断,“其为翻雕棚本无疑,……惟无临安府棚前一行耳”(《善本书室藏书志》)。孟集刊刻者甚多,又有汲古阁本、闵氏套印本、席启寓刊本等,皆源于宋敏求本,仅在个别处有出入。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华忱之校订的《孟东野诗集》,末附年谱,辑录遗事。注释本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十卷及夏敬观《孟郊诗选注》。(杨旭辉)

【武元衡集】诗别集。二卷。唐武元衡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元衡集》十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旧有《临淮集》七卷”,而晁氏著录者仅为二卷。此本盖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所谓二卷川本。陈氏所录的一卷本,初用莆田李氏本传录,后复以石林叶氏(叶梦得)本校订。以上诸本均未见传,今仅有明铜活字本、朱警《唐百家诗》本、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及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等丛刻本收录,卷数二、三不等。今以《全唐诗》与活字本比勘,排列顺序大致相同,仅卷数由三卷变作二卷,各体类后又补入活字本未收之诗。(杨旭辉)

【权文公集】诗文别集。五十卷,其中诗十卷。唐权德舆撰。德舆尝自纂《制集》五十卷,杨凭为作序。其孙权宪又编其诗文为五十卷,杨嗣复为之序。元、明以来,权集散佚不全。今北京图书馆存残宋本,仅十九卷,诗十卷全存,文残缺颇多。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刘大谟于杨慎处得十卷残本,全为诗赋,以之刊行于世。《四库全书》所收即为此本。王士禛《居易录》谓见抄本《权文公集》五十卷,而后世又不知其下落。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朱珪于其侄锡庚处借得一五十卷本,命书手日夜抄成,并于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以宋体梓行,自此五十卷本《权文公集》又大行于世,经《四部丛刊》影

印,流布愈广。后来,孙星衍对此本颇多指摘。傅增湘将朱本与见及的宋蜀刻本对勘,以为朱本多强为分析,不无参差,无论体式、编辑、校勘都有缺点。故《四部丛刊》再版时,补录了姜殿扬的校补记,又补遗文十篇为《补遗》。(杨旭辉)

【羊士谔集】诗别集。一卷。唐羊士谔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谓士谔“有诗集行于世”;其所见诗集殆晁公武、陈振孙在书录中所说的一卷本《羊士谔集》。以后单行本不复见,明朱警及清席启寓之辑本一卷均为合刊。明铜活字本与明刻《唐十一家集》则将集析为二卷,与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所见的明抄二卷本当属一类。江标称其《唐人五十家小集》中《羊士谔诗集》为据宋影刻,卷数仍其旧载,作一卷。若江氏所言属实,则从此本可窥见宋槧之概貌。(杨旭辉)

【张籍诗集】诗别集。八卷。唐张籍撰。按张洎《张司业集序》云:“自皇朝多故,荐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可见张司业诗在五代前有过结集,只因战乱而多有散逸。洎之所谓遗集,殆为《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通志·艺文略》中所载的七卷本《张籍诗集》。到五代末,张洎“相次辑缀,仅得四百余篇,藏诸篋笥。徐则便俟博访,以广其遗阙”。后钱公辅得之而名曰《木铎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作十二卷。晁公武云,此本“与他本相出入,亦有其他本所无者”(《郡斋读书志》)。晁氏又云其所著录之五卷乃“张洎为之编次”。则张洎所编次诗集似曾有两种本子,盖洎原欲陆续搜访遗佚,以求完善,时有所补,形成三卷或五卷等初编本,到定名《木铎集》后方才成定本,故云《木铎集》有“他本所无者”。上述五卷、七卷、十二卷本均已不见,仅有三卷之《张司业诗卷》残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为南宋临安府陈氏书棚本。到南宋末年,番阳汤中(季庸)以家藏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写本校以诸本,刻而传之;吴郡人魏峻刊刻时,又得《木铎集》,凡他本所无者悉附其末。今司业集之通行者,即皆源出于此。明人所刊各本,多所窜乱。《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虽与魏峻八卷本卷数相同,但分体编次,非尽原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整理本《张籍诗集》则以此为底本。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亦非据宋本,而是刘氏重新加以编排的。唯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系依照孙潜夫藏八卷旧抄本覆雕,能不失宋刻之旧。近人陈延杰曾为张籍诗作注,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张籍诗注》八卷。今人徐澄宇注有《张王乐府》,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行。

(杨旭辉)

【王建诗集】诗别集。王建撰。王建集,《崇文总

目》著录为二卷,《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为十卷。今存北京图书馆之南宋临安府陈解元书棚本即与诸目载录同。此本曾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9年校补标点出版,并根据其他各本补录诗九十二首,为当前较完备的本子,但所补之诗属入他人之作甚多。清席启寓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亦作十卷。明毛晋汲古阁刻本为八卷,自云据宋本考校,不知所据为何本,而其校正所用底本则为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刘成德刻《唐王建诗集》八卷本(收入《唐大历十子诗集》,今存)。清人胡介祉又重为刊刻,题曰《王司马集》,仍次为八卷。《四库全书》所收即为此刻本。据《直斋书录解題》云,王建集中第七卷录出别行为《王建宫词》一卷。后有别行之《宫词》多种,有黄鲁曾《编选四家宫词》本、汲古阁《诗词杂俎·三家宫词》本、汲古阁《十家宫词》本等。明人顾起经注《宫词》,成《编注王司马百首宫词》二卷,有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顾祖美刻本。今人吴企明有《王建宫词辨证稿》等文(见《唐音质疑录》),对百首宫词之考订、笺注颇有见地。今人徐澄宇《张王乐府》则对王建乐府诗之笺注尤为详赡。(杨旭辉)

【牟融诗集】诗别集。一卷。唐牟融撰。融集全不见于宋、元人书目记载,仅有明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牟融集》一卷。”殆其诗初并无成集,及有明一代,方有辑集。今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刻《唐人小集》本(南京图书馆藏)、明刻《唐五十家集》(重庆市图书馆藏)和清初抄《百家唐诗》本(北京图书馆藏)三种。《全唐诗》多方蒐集,录诗六十九首,次为一卷。(杨旭辉)

【韩昌黎集】诗文别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其中诗十卷。唐韩愈撰。韩愈文集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韩愈去世后,由其门人李汉编辑的,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名为《昌黎先生集》。据方崧卿《韩集举正》序文所言,宋以前韩集有令狐(澄)氏本、南唐中主保大(943—957)本和赵德文录本多种。经过五代战乱,并未散佚,宋初《崇文总目》仍录为四十卷。宋人对韩集的整理不像对李、杜、白那样,集中精力辑佚补缀,而是校正辗转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和异同。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穆修、欧阳修都曾校正过韩集。欧阳修还曾以碑校集,《集古录》有好几条跋尾即是,可惜其校本未加刊刻。穆修本仅数百部,流传不广。在二人之前,已有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杭本(后又有仁宗嘉祐(1056—1063)小字杭本)、真宗天禧(1017—1021)蜀本(后又有嘉祐蜀本,源自天禧本)。在此之后有李汉老、谢任伯所校秘阁藏本,即朱熹所谓“阁本”。此本“最为详密,字之疑

者,皆标同异于其上”(《韩集举正序》),故方崧卿以此为底本撰《韩集举正》。此外,还有谢克家本、李昉本、洪兴祖本及晁本、潮本、泉本多种,但传世甚稀,即便有传,亦残缺不全,如北京图书馆藏《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刻,仅存十五卷,且以另二宋本补入。据悉,台湾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个本子,系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锦溪张监税宅翻刻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广东潮州本,据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的然无误,实可珍贵。宋人对韩集的辑佚有所发展,有补诗人《外集》一卷,后将《顺宗实录》并入,以至外集成八卷。由于宋人校勘韩集者颇多,版本亦多,以致各本之间参差不一,需有一吸收各本之长的综合本,于是出现了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此本以“阁本”为主,参以大中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唐令狐本、南唐本参互勾贯,各取其长,一时称为善本。此书初刊于淳熙十六年,《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后来朱熹感于《举正》多依“阁本”,且往往曲从,遂更为校定,悉考异同,校讎尤为精审,成《韩文考异》一书,影响甚大,使《举正》几近湮没。此外,宋人还对韩集作了注释工作,著名的有樊汝霖《韩集谱注》、韩醇《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文说《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以及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另有三个著名的集注为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黄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莹中《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魏书收集甚广,多种亡佚的书赖以保存,初刊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四库全书》收有此本,涵芬楼亦曾影印刊行。世綵堂注对宋人韩集注释成果作了一个总结,初刊于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计五十一卷(1928年上海蟬影庐影印)。后明人徐时泰东雅堂复刻世綵堂本,全录朱熹《韩文考异》、节录五百家注而成,此本一出,其他诸集几废。《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东雅堂本。宋人集注,无论学力还是编辑技术都有缺点,未能真正总结宋人的成果。清人陈景雲《韩集点勘》四卷,不列原文,纠正了世綵堂本中的不少错误,其“所校,考据史传,订正训诂,删繁补阙,较原本实为精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韩集历代诗文合刊,重文轻诗。有清一代,韩诗得到重视,刊行颇多,有顾嗣立《昌黎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有钱仲联另行系年的注释本《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在韩诗的校、笺、注方面,均可称集大成之作。(杨旭辉)

【玉川子诗集】诗别集。二卷。唐卢仝撰。宋代韩愈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作《玉川子诗外集序》云:“歌诗百篇,镂板已行于世,……近友人李生于道士崔怀玉处又得集外一十五首……以编附旧本。”是在北宋时,已有诗集行世。又《永乐大典》九〇六诸

家诗目中有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刊本,集中之《月蚀》一诗曾经胡伯和考订注释,钩玄探秘,一句一字,必详其所出。然宋之庆历、嘉熙旧本皆不见传,后人所著录者多为影宋抄本,且多如《直斋书录解题》所录的正集二卷、外集一卷。丁丙藏明抄宋本有无名氏题云:“予家藏宋刻本,最为完善,因寿之梓”,则明人不仅曾见宋本,且曾据以梓行。涵芬楼藏旧抄本于此题记后有一行“后学徐献忠跋”,可见《四部丛刊初集》影旧抄本亦源出宋刊。瞿镛于其《藏书目录》中说,明时吴郡陆涓曾以家藏旧宋本翻雕。给卢仝诗作注的除胡伯和外,还有清孙之騄;其所著《玉川子诗集注》,据《全唐诗》增诗二十二首,又误增入《栢铭》、《月》二首。之騄嗜奇,特注全集,对理解奇谲诗颇有助益,然其注多有枝蔓、割裂之处。有《晴川八识》本及1923年卢永祥刻本。(杨旭辉)

【鲍溶诗集】诗别集。六卷、《补遗》一卷。唐鲍溶撰。据曾巩《鲍溶诗集目录序》云,《鲍溶诗集》宋史馆旧本为五卷,并讹题为《鲍防集》,《崇文总目》亦同此讹。曾巩后以《唐文粹》、《唐诗类选》及鲍防的《杂感诗》考证,定为鲍溶之集,又以欧阳修所藏无卷第之本(即宋槧袁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谓一卷本)参校,于史馆旧本二百首诗外又补诗三十三首,别为一卷附于后,总题为《鲍溶集》六卷。然衢本《郡斋读书志》所说的五卷本,仅有诗一百九十二首,既不同于史馆本,又异于曾巩订本,可见鲍溶集在宋代的传本已有彼此间的差异。宋本不见传。《四库全书》所收《鲍溶诗集》六卷、外集一卷,为江南叶裕家所抄。此本集外诗一卷合于曾巩所增三十三首之数,而正集多一卷,诗只有一百四十五首,乃残缺重编之本。毛晋汲古阁刊本、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为正集六卷,另附集外诗或补遗一卷。与《全唐诗》相比,毛晋刻本则少《寄王璠侍御求蜀笺》以下十六首诗及《风筝》一首、《秋思》二首。然《全唐诗》与宋人传本对照多有异文,仅《山中冬思》一诗与宋何溪汶《竹庄诗话》引《山中寒思》(二者实为一诗)之异文竟达八字之多。(杨旭辉)

【吕衡州集】诗文别集。又名《吕和叔文集》。十卷,《校勘记》一卷。唐吕温撰。吕温文集最初由刘禹锡编次,有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可证,然此原编宋时已逸。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虽著录有十卷本,但明确说:“非禹锡本也。”后宋槧亦散佚,不见著录。吕集的流传,全靠明人的传抄和清人的校勘整理。其中之功臣,首推冯舒。冯氏跋称,甲子岁(1624年)于钱牧斋处借得前五卷,戊辰岁(1628年)又从郡中购得十卷之后三卷,俱为宋本,乃照宋抄录,从《文苑英华》、《唐文粹》所载者照目写入,以补

六、七二卷之缺,又按陈解元棚本增入《闻砧》下十五首作品(在卷二)。后来的旧抄虽多,其源大抵出自冯舒本。《四库全书》所收《吕衡州集》十卷即此本。述古堂又另有一抄本,六、七两卷不缺,实冯舒所未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和叔集》,绛云楼宋槧本缮写。凡载于《英华》、《文粹》中,或字有异同,俱详注于上。”此本很值得注意,《四部丛刊》据以影印,但其中讹误不少,故《丛刊》影印时附有校勘记一卷。此外,吕集还有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秦恩复校刻本,有《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据以排印。另有单收诗的《吕衡州诗集》,朱警本、席启寓本以及江标本皆是。(杨旭辉)

【刘宾客集】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八卷,乐府二卷。唐刘禹锡撰。刘禹锡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曾将所作诗编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此为刘诗的首次结集。元初,方回似曾见此自选集,他在《瀛奎律髓》卷二七中云:“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此后,刘禹锡又有不少创作,元和自选集所收自非其作品全部。到宋代,其集已零落不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其中外集十卷乃宋敏求于三十卷外裒辑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而成。后世刘集的刊本流传很少,仅靠多种抄本传世。现存的宋刻本有三。一是清代承德避暑山庄旧藏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棻刻本,傅增湘曾于故宫见此书,认为此乃刘集传世的最善之本,并据此是正了《结一庐剩馀丛书》中的讹失(见《藏园群书经眼录》),近人徐森玉主馆事时,曾为影印。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曾据董棻本重刊,习称“浙本”,今已不见。明清以来的不少版本,基本上属于这一系统,如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刻《中山集》,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仁和朱澂《结一庐剩馀丛书》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则以此为底排印)。而今最为通行的《四部丛刊》本,则源自今存的第二个宋本。此宋本藏于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1913年内藤虎跋语云:“相传千光国师入宋时所贵归。……此本则正、外两集完好无缺,宋氏所裒,《直斋》所录,忽获睹于数百载后,可称艺林奇宝也。”民国初,董康以珂罗版从日本影印百部,对原本的漫灭处加以描补,残缺处据他本抄补。《四部丛刊》即又据之影印,流传甚广。还有一个宋残本,仅存一至四卷,藏于北京图书馆,为宋建安坊刻本。除此三种宋本外,还有单刻诗集者。席启寓单刻十八卷本,为《全唐诗》所据,分体分类,全不按其旧次。明蒋孝《中唐十二家诗集》及清云份《唐代刘氏诗集》亦专收诗集。日本国会图书馆还有一朝鲜刻本《刘

宾客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又前后出版了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和卞孝萱等点校的《刘禹锡集》，前者以《结庐剩馀丛书》本为底本进行校笺，后者则以绍兴本为底本校勘，较为完备。

(杨旭辉)

【白氏文集】诗文别集。七十一卷，《外集》二卷，其中诗三十七卷。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系生前手定，曾数次增订。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尽征其文，手自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题为《白氏长庆集》。文宗大和二年(828)，居易又事续编，即《后集》，未编定卷次。大和九年，又继前集勒成六十卷，此本更名为《白氏文集》。开成元年(836)，又编成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增至六十七卷。直至武宗会昌五年(845)，白集方形成定本，凡七十五卷，《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又《续后集》五卷。此集抄录五部；三部分置于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和苏州南禅院，另二部付侄龟郎(行简之子)及外孙谈阁童，以期流传。即便如此，白集亦难以幸免劫难之命运。洛阳本、苏州本以及白氏家传本历来未见著录，可能早成劫灰。庐山东林寺本亦为高骈取走。自此白集手定本不复存世。后唐明宗之子李从荣于明宗长兴(930—933)中补写白集。后又有人补东林寺所藏本，据岑仲勉考证，是人为吴杨行密子加官中书令者。白集一南一北，几为同时掇拾，传为美谈(见宋敏求《春时退朝录》)。是时补写，概括外间所传之本，联缀成书，未加详审。今本白集杂伪作多篇，即此时混入。《春明退朝录》云，杨氏子所补之本“与今吴、蜀摹板无异”，则可见宋敏求所见吴本、蜀本，与此本同，皆为七十卷。宋真宗时，东林寺所藏，已多散失，非复会昌旧录，且杨氏补本亦不存在，故“真宗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渭南文集》四十六《入蜀记》)。东林本经崇文院写校，《崇文总目》录作白集七十卷。可见北宋诸本皆出于七十卷本，《续后集》不复见。《新唐书·艺文志》录为七十五卷，当是据白居易《白氏集后记》，或未见其书。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均作《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此处多出一卷当为后人得续后集中律诗一百首而成。而宋敏求所见吴本、蜀本，当在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以前。南渡以后，又有吴本、蜀本，清汪立名曾对此有记述：“案直斋陈氏《书录解題》曰：吴郡李伯珍刻白集，有年谱一卷，维扬李璜、德劭撰。又曰：知忠州汉嘉何友谅以居易旧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谱，列之集首。……按此即所谓吴、蜀本也。”此二本之刊刻分别在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末和宁宗

嘉定(1208—1244)初，惜未见流传。在吴、蜀本前的高宗绍兴(1131—1162)刻本是今存最早的白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书中遇构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渊圣御名，的为宋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以影印出版《白氏长庆集》。明以后，又有多种刻本，有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华坚兰雪堂铜活字本、正德十四年郭勋刻本(即郭武定本)以及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钱应龙刻本、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刻本。其中马本最为通行。此本基本与宋绍兴本相同，但“脱误甚多”(卢文弨《群书拾补》)。白诗在日本颇受欢迎，东瀛刻本有多种，其中以那波道圆1618年活字覆宋本最为著名，《四部丛刊》曾影印。此本较绍兴本似更古，前五十卷保持元稹编次，先诗后文，但把书中原注全部删去，是为大憾。到清初汪立名，参互众本白集，重加编次，定为《白香山诗集》四十卷，仅诗无文，其中《补遗》二卷，于每首下加以笺注，《四部备要》以之排印。近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氏诗文多作考订。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顾学颉点校本《白居易集》。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为当今最完备的集注本。(杨旭辉)

【柳河东集】诗文别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其中诗三卷。唐柳宗元撰。柳宗元的集子是刘禹锡受宗元临终前的托付而为之编次的，名曰《河东先生集》，共三十卷。至北宋时，此集流传很少。北宋初，经过穆修的多年访求，曾得一个四十五卷的旧本，已非旧编，经穆修校定，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重为刊行，称《河东先生文集》。此四十五卷本就成为后来一切柳集的祖本。北宋时，对柳集的整理主要在编辑、校订上。除穆修外，徽宗政和四年(1114)沈晦据穆本、京师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及晏殊本校订，编成“四明新本”。后又有李石参前人校订诸本，重编一本。以上北宋时的诸多编定本，今均亡佚，仅从存世的序跋等史料中窥知一二。南渡以后，对柳集的整理多侧重于音释和注解，今所见的宋本柳集亦为各种南宋注释本。较早的有张敦颐《柳文音释》、严有翼《柳文切正》、童宗说《柳文音释》、潘纬《柳文音义》、韩醇《柳文诂训》等。和韩集一样，诸家注本一出，书坊汇辑注家综合本后，以上各家单行注本皆废。韩醇的《新刊诂训柳先生文集》于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与韩集并刊。韩醇所注柳集的版本为穆修、沈晦四十五卷本系统，今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而张敦颐、潘纬、童宗说三家的注本则合为《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宋时有麻沙书坊刻本，元、明人翻刻者甚多，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有善

敬堂覆宋本。今存最早的版本则为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元刻建本(《四部丛刊》有影元刊本)。南宋更有所谓百家、五百家之集大成的综合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海源阁杨氏旧藏《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是现存柳集宋刻中最早而又较完整的,其中保留了前人沈晦、任渊、文说以及韩醇、张敦颐、童宗说诸人的成果,据专家鉴定为宋蜀刻本,已是海内孤本。后又有本于百家注本的《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此本为宋魏仲举集注刊刻,所收仅近百家注。魏氏曾与《新刊百家注音辨韩昌黎先生文集》并刊。此五百家注本一直未见翻刻,今仅存宋残本十一卷,《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有文渊阁影印本。郑定《重校添注柳文》则据五百家注本重为校订添注,傅增湘曾见过此书之宋刊九行本(见《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据今人吴文治考定,后世著名的廖莹中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与郑定本基本相同,只是删去了其中各家注释者的姓氏,偶加以校正和注文,实际上是郑定本的改头换面。明嘉靖郭云鹏重刻世綵堂本,改题济美堂,以与韩集东雅堂本并称。世綵堂本今有上海蟬隐庐影宋刻,1958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又重印。元、明人多覆刻宋本,新刊者少。明蒋之翘辑注《唐柳河东集》四十五卷(与韩集合刊)较为有名,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和《四部备要》排印本。今人吴文治有校点本《柳宗元集》,以宋百家注本为底本,参校十余种主要版本,且力求善本对校,较为完备,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出版。

(杨旭辉)

【元稹集】 诗别集。又名《元代长庆集》,六十卷,《外集》八卷,其中诗二十卷。唐元稹撰。元稹的集子在其生前曾亲自编订三次,从其《叙诗寄乐天书》、《上令狐相公诗启》以及《进诗状》等文章中都有反映。唐宪宗元和七年至十年(812—815),在任通州司马时,为满足好友李景俭的要求,辑集其诗作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分为古讽、乐讽、乐府等十体,计二十卷。元和十四年左右,因谪官无事,乃专力于诗章,作诗向千首,合为五卷。又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自编杂诗十卷,奉旨进献穆宗。后二种仅为谋求进取,收集不如前一种全。以上元稹生前手自编定的这三个集子。自非全集可知,且今皆不传。白居易作《元稹墓志铭》称其著文一百卷,曰《元氏长庆集》。到宋时已有亡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为六十卷,并云:“有长庆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亦同。《宋史·艺文志》及《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題》引)又作四十八卷,钱曾述古堂又有据北宋刊本校过的七十五卷本,可见宋时曾有六十、四十八、七十五卷多种。北宋徽宗宣和六年

(1124),建安刘麟刊刻《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习称“闽本”,乃刘麟父亲的辑成本。“闽本”虽已不传,但后代不少元稹集的刊刻皆源于此。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洪适(kuò,括)在绍兴据闽本覆刻,此即“浙本”,今仅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及日本东大图书馆有八卷残本。在闽本与浙本间有一蜀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是刻前有刘麟序,编排体例与浙本略有差异。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本以及《四部丛刊》影印的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东吴董氏刻本亦均据刘氏闽本翻刻。董氏本刊刻精美,但于宋本漫灭处则以臆测妄补。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马元调又据以翻刻,共六十卷、补遗六卷。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6年影印出版明杨循吉依宋本抄、钱谦益补抄宋本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是较好的一个本子。今人陈寅恪曾著有《元白诗笺证稿》,对元诗多所发明。冀勤点校本《元稹集》即以影宋抄本为底本,参照宋刻残本和明代几个刻本,加以补苴、校订,后附志传、序跋、书录、诗文、丛说,并有篇目索引。有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

(杨旭辉)

【刘叉诗】 诗别集。一卷。唐刘叉撰。据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刘叉诗酷似玉川子,而传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此数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录二十余篇的一卷本以及《唐才子传》、《百川书志》的载录大致相符,《全唐诗》收录亦为二十七,《全唐诗续拾》又补诗一首,句二联。刘叉的诗作见收于朱警《唐百家诗》、王准《唐十子诗》、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者皆为三卷,而刘云份《唐代刘氏诗集七十种》及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黄省曾长庚堂刻本则为一卷。刘叉《冰柱》、《雪车》二诗颇有名,明人樊镇故为作校注,有抄本《刘节士冰柱雪车诗斟注》一卷藏于南京图书馆。

(杨旭辉)

【长江集】 诗别集。贾岛撰。贾岛卒后,为编次其诗者二人:许彬所编名《小集》;天仙寺浮屠无可所编名《天仙集》(见宋龚鼎《贾浪仙祠堂记》)。其中,《天仙》一集,后无著录,早已亡佚。因岛于文宗时坐谤贬长江主簿,后代多名岛诗为《长江集》。据清人题跋,可知《长江集》宋代有过刊行,明人翻刻本极多,《四部丛刊》所影印之《唐贾浪仙长江集》十卷即为明翻宋本。另有七卷本,则系明人分体编次本;黄丕烈称其讹谬百出,不如十卷本几仍本宋人旧貌。此外,尚有汲古阁本、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亦皆十卷。今人李嘉言以为《全唐诗》之《长江集》最佳,故用为底本,参校别本及有关总集、选集,著有《长江集新校》,并附录所撰《贾岛年谱》、《贾岛交游考》及所辑浪仙诗评等,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出版。近人陈延杰尝作有《贾岛诗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有铅印本出版。（杨旭辉）

【姚少监集】诗别集。姚合撰。姚合早年曾为武功县主簿，所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诵，故诗家习称之为姚武功。此三十首诗似有成集，毛晋曾藏有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间王颐石刻《武功县诗》三十首（见《汲古阁书跋》）。《崇文总目》载录《姚合集》仅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同。陈振孙又云：“川本卷数同，编次异”，可见宋代有两种十卷本行世。一为“川本”，一为：“浙本”。“川本”题《姚合诗集》，“浙本”题《姚少监集》。此二种久不行于世。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毛晋得一明抄本，“盖吾宗图记，印宋刻”（毛氏跋语）。此本为《四部丛刊》所影印，最为通行，毛氏称此本由“浙东”而来，分类编排，分送别、寄赠、闲适、时序、风月、题咏、游览、宴集、和答、酬谢、花木、鸟兽、器用、哀挽、杂咏等类，唐人編集，从无此例，当为宋书贾所为。毛晋得此抄后，急授诸梓，收入《六唐人集》中，广为流布。《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清黄丕烈后又得一残宋刊本，存卷一至卷五，与毛氏抄本对勘，二者果异，遂定此宋刊残本为蜀刻。残宋本今归北京图书馆。此外，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尚有《姚少监诗集》十卷。（杨旭辉）

【章孝标诗集】诗别集。一卷。唐章孝标撰。《宋史·艺文志》著录《章孝标集》七卷。考丁丙《善本书室藏志》著录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依宋刊本（《江苏一图善本目》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及江标影刻南宋本《唐人五十家小集》皆作一卷，与《新唐书·艺文志》、《百川书志》著录同。盖宋时于一卷本外又别有七卷本。明代还有《唐五十家集》、《唐四十四家诗》合刊本，此外别无单行之本。

（杨旭辉）

【朱庆馀诗集】诗别集。一卷，附《校勘记》一卷。唐朱庆馀撰。今较为常见的《朱庆馀诗集》是《四部丛刊续编》所影印的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棚本。宋书棚本是今存唯一的宋刊朱集，原书藏于北京图书馆。清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也据此本影刻。《四部丛刊》本于正集一卷之后，又附校勘记一卷，乃取书棚本与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对校，勘其异同。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云，席刻所据当为别一宋刊，瞿镛也有“盖席本出自别本，故亦有席本是而此本（书棚本）非者”（《藏书目录》卷一九）之语，可见席刻之价值亦不可轻视。（杨旭辉）

【李德裕文集】诗文别集。唐李德裕撰。德裕平生所著甚丰，宋代以后李集的版本亦多。仅《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

卷、《外集》四卷，《李卫公备全集》五十卷、《摭遗》一卷。《会昌一品集》多收唐武宗会昌（841—846）时所作制诰表状之属，而《别集》、《外集》又并非会昌时作，故后人多以《李卫公文集》、《李文饶文集》名之，以代“会昌”一名。叶石君曾手跋“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张孟恭所藏苏州文衡山宋本校”（见《藏书志》七〇）。丽宋楼主人陆心源尝于月湖丁氏处借得影宋抄本，用以校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本，此为现存最早的李集版本，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得。今最通行的《四部丛刊》影明正德、嘉靖间刊本《李文饶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前有郑亚序，后有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袁州刊版后序。此本与陆校本基本相同，大体仍沿宋刻之旧，唯讹误较多。《丛刊》二次印本有《李卫公集补》，据《全唐文》、《唐文拾遗》、《全唐诗》及席启寓刻本补诗十首，断句若干，又补文十二篇，收罗较为全面。值得一提的是，《全唐诗》本《李德裕集》，经过编者的认真整理，摭录异文特丰，远过于丽宋楼本，于集外又有所补遗，亦偶有误收。（杨旭辉）

【丁卯集】诗别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唐许浑撰。润州丹阳有丁卯桥，浑别墅在焉，因以名集为《丁卯集》。许浑自序其集二卷，五百篇。而据宋人题跋记载，《丁卯集》有二卷三百余篇者，贺铸校正四百五十四篇者，两卷五百首者，以及蜀本等数种，其编帙颇混乱，尤以续集为甚。宋刻原本仅有蜀刻传世，正集外有遗篇、拾遗各一卷，合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今藏于北京图书馆，《续古逸丛书》曾影印刊行。今较为通行的是《四部丛刊》影常熟归氏影宋写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尚藏有常熟钱氏也是园影抄南宋临安陈氏书棚本。宋板虽佳，然以之与元祝德子校订的《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二卷相比较，元本多诗几大半，此则又为宋本所弗及。《四库全书》所收的《丁卯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凡收诗五百，较为完备。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系同一版本。《全唐诗》编辑时，将其诗混编为一卷，多混入他人的作品，其中以杜牧诗尤多，亟待校勘辨伪。许浑诗的注本有李捷注《许郢州诗》（《千顷堂书目》录，今不传）及清许培荣《丁卯集笺注》八卷。

（杨旭辉）

【李贺集】诗别集。李贺撰。据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贺在生前曾将平生所著诗歌厘为四编，凡二百二十三篇，交与集贤学士沈子明。宋代所传李贺诗集有五种：京师本、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鲍钦止家本（又称上党本）。据吴正子云，前三种本子都收诗二百十九首，鲍氏本有后卷（即外集），共收二

百四十二首,而宣城本虽不清有无外集,收诗与鲍本同。可知宋时所传诸本正集四卷,均为二百十九首,附有《外集》者补诗二十三首。诸本中,宋蜀刻本今传,收入《续古逸丛书》。又1918年诵芬室影印有宋宣城本;《密韵楼景宋本七种》所影《李贺歌诗编》亦为宋宣城本。后代鲍本之影响亦颇大。据钱曾《读书敏求记》,南宋临安府陈解元书棚本所刻《李贺歌诗》即为鲍本;今传毛晋刻《唐人四集》本附外集一卷,亦为校刻鲍本而成。《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俗称“金刊本”),颇值得注意。此本为耶律铸与吕颀论诗时言及长吉,出所藏司马光所有之旧本校定而成,后由赵衍刊行。此本前人多不见重,《丛刊》影印后方为世人知晓。尚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复古堂本,出自陈氏书棚本,亦不外乎鲍本之列。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锦囊集》又为至元本之覆刻;二年后又有汝宁刘淮翻刊。最早注长吉诗的为南宋吴正子《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最早评点本为刘辰翁评《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后有清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姚文燮诸家评说注释,采择众说,较为审慎,在长吉集各注本中最详赡,传布最广。另有陈本礼《协律钩玄》及黎简、吴汝纶等评注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8年将王琦之《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与方世举《李长吉诗集批注》合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三家注》重新标点出版,更名为《李贺诗歌集注》。今人叶葱奇曾注《李贺歌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合年谱与诗注为一著,解诗多与旧注不同。今人另有多种选注本。(杨旭辉)

【张承吉文集】 诗文别集。十卷。唐张祜撰。祜尝自草表荐,以诗三百首献于朝,盖为祜诗之最早结集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祜诗》一卷,《郡斋读书志》亦同,而《直斋书录解題》作《张祜集》十卷。近时于北京图书馆发现的南宋蜀刻本《张承吉集》,卷数与陈振孙记载相同。前二者所收仅为诗,后者所著录之集诗文兼收,以致卷次差别甚大。张祜诗旧传本另有六卷、五卷及二卷数种。清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著录旧抄本《张处士诗集》,今藏于北京图书馆者,即为六卷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录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依宋刊本《唐张处士诗》即为五卷;据丁氏云,此本当出于南宋临安棚北陈氏书肆刊本,《江苏一图善本目》著录于《唐人小集三十四家》中。明朱警辑《唐百家诗》本亦为五卷。《全唐诗》则据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录诗二卷,又补诗七首,然遗佚颇多。新发现的南

宋蜀刻本最为完备,今人孙望据此本以及《永乐大典》、韦庄《又玄集》、冯翊子《桂苑丛谈》、《太平广记》引康骕《剧谈录》等书,补录诗一百五十三首,收入《全唐诗补逸》,后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及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又补诗五首,断句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将宋蜀本影印,成为通行之本。

(杨旭辉)

【顾非熊诗】 诗别集。一卷。唐顾非熊撰。《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題》皆录为一卷,盖其作诗不多,后代辑本未有过一卷者。诗集多附于其父顾况集之后,如《四库全书》所收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顾名端辑本即是。此外,尚有明初抄《唐十八家诗》本、明抄《唐四十四家诗》本、席启寓《席诗百名家全集》本以及清初抄《百家唐诗》本等不附于况集的本子。参见《华阳集》。(杨旭辉)

【温飞卿集】 诗别集。温庭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录温集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崇文总目》所著录仅有前二种;《郡斋读书志》载《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而《直斋书录解題》径题为《温飞卿集》七卷。可见温集在宋代已逐渐亡佚,所传各本亦参差不一。而晁公武所著录的正集七卷、别集一卷之本,成为今传各本之祖。此本清初尚有。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钱曾藏抄本有题记“冯定远云,何慈公家有北宋本”。钱曾《虞山钱尊王藏书目汇编》有影抄宋本之《温庭筠诗》七卷、别集一卷;此本后为丁丙所得,《四部丛刊》据以影印的即此本。另毛晋有刻本曰《金荃集》,收入《五唐人诗集》中。最早为飞卿诗作注者当为山阴曾益,注有《温八叉集》四卷;此书仅见于《天一阁书目》、叶德辉《郎园读书志》载录,原书不见。后长洲顾氏父子以其阙讹颇多,在其基础上,重为笺注。初由顾予咸笺注,未成而卒,其子顾嗣立继其绪而重加校订,终成《温飞卿诗集笺注》九卷。前八卷依正集七卷、别集一卷,嗣立又从《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等书中辑得集外诗七十六首,编为九卷,成为最完备的温诗注本。《四部备要》所印即为顾氏秀野堂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也将其校点出版。另据顾光昌、顾之义《重修唯亭顾氏家谱》,顾予咸另一子嗣协于笺注飞卿亦有贡献,著有《重订曾益注温庭筠八叉集》四卷,高铈为之序,惜此书不见。(杨旭辉)

【晚唐刘得仁诗】 诗别集。一卷。唐刘得仁撰。《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刘得仁诗一卷,后不见有单行本。而《全唐诗》编刘得仁诗为二卷,《补遗》及《全唐诗补编》又补诗及断句若干。清康熙间刘云份因同姓之故,将其

诗结集成一卷,收入《八刘唐人诗》、《唐代刘氏诗集》(又题《全唐刘氏诗》)以及《中晚唐诗》三种丛刊中,成为仅有的三种《刘得仁诗集》,此三种均有刘氏野香堂刻本。(杨旭辉)

【项斯诗集】 唐诗别集。一卷。唐项斯撰。南唐张洎作有《项斯集序》云,“君之遗句,绝无知者。虑年事浸久,没有不传,故聊叙所云,著于卷首”则项诗历五代之乱,多有遗失,张洎重辑成集,此即《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之一卷本。《直斋书录解题》亦同。今存有朱警辑本、席启寓刻本、江标影刻本数种合刊。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项斯诗》一卷,附有张洎序,此抄为叶石君从旧邻林宗(叶奕)藏本抄出,题记中并云,辛亥(1671)之冬,又从叶奕处购得底本。

(杨旭辉)

【李远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李远著。李远诗传世不多,且向无单行之刊本。除《百川书志》著录为二卷,《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以及今见合刊本均为一卷。《全唐诗》收李远诗三十五首(其中二首与他人重出)及二联断句,今人李之亮即以之为底本,并参校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以及《文苑英华》等总集,复从《青琐高议》、《竹庄诗话》辑得诗二首,著成《李远诗注》,与《秦韬玉诗注》合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第二辑。除上述诸本外,尚有朱警《唐百家诗》本、刘云份《中晚唐诗》本等。

(杨旭辉)

【周贺诗集】 诗别集。又题作《清塞诗集》。一卷,附《校勘记》一卷。唐周贺撰。贺诗最古刻本当为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所见的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杨无为所叙的北宋旧槧。此书今不知所在,唯尧圃手校异字于毛晋汲古阁刻本之上,可资考证。《清塞诗》宋刻在李和父所编《唐僧广弘秀集》中,《周贺诗》宋刻自有书棚本在。毛晋汲古阁刻即由李和父《广弘秀集》中录出,汰其重复,将一卷析为上、下两卷;此本在明代颇为流行。常熟铁琴铜剑楼有书棚原刻本,今已归北京图书馆。清人颇多摹此本者,韶宋楼陆心源、丁丙以及金俊明纷纷影抄,而金俊明在影抄本卷末又补抄宋本所缺的七律《赠厉玄侍御》一首。《四部丛刊》借得铁琴铜剑楼藏本影印出版,卷末又附张元济所作《校勘记》一卷,从《全唐诗》及《弘秀集》中又有所补辑,使之臻于完备,成为当今最为通行的本子。

(杨旭辉)

【樊川文集】 诗文别集。唐杜牧撰。牧临终前,“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裴延翰《樊川文集序》),幸其外甥裴延翰所贮藏的比焚

馀者十多七八,厘为二十编,共存诗文四百五十篇,题曰《樊川文集》。此本一直流传存世,未曾散佚,所以《崇文总目》等公私书目皆录为二十卷。唯《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在二十卷外又多不知名者所编《外集》一卷。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槩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汶上卢訢处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指《樊川文集》及《外集》)所逸者”,又补《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凡六十首,为《别集》。另据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及《后村诗话》,宋时另有金华刊的补遗集《续别集》,“十八九是许浑诗”(《后村诗话》),但此集今已不见。《樊川文集》收《外集》、《别集》最早之刊本为北宋本,而此本中土早已不存,明、清藏书家所见多为翻宋本或从宋刊摹写者,《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刻本为一全仿宋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以校点印行)。此本铁琴铜剑楼、丁丙善本书室皆有过。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杨守敬据日本枫山官库中藏宋本影印,使失传已久的宋刊又与国人见面。经历代学者考证,《外集》、《别集》都混入了他人的伪作。另有专刊诗的四卷本《樊川诗集》。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为最为通行的旧注本,冯氏注仅注《樊川文集》之前四卷诗歌,《外集》、《别集》中诗概不出注,以为此皆樊川临终前欲弃焚者,非欲留者。冯氏所注,用力尤勤,历经十载,于名物典章、难词僻典以及诗人交游,多有疏解,极为详尽,但过于追求无一字无来历,不免流于繁琐。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缪钺整理的《樊川诗集注》,又从诗话、笔记中辑补成《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以附,最为完备。

(杨旭辉)

【段成式诗】 诗别集。一卷。唐段成式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集》七卷,今不见。今所见《段成式诗集》一卷为明、清人所辑,有北京图书馆藏清初抄《百家唐诗》本和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段成式另撰有《汉上题襟集》十卷。唐宣宗大中(847—860)时,段退居襄阳,与温庭筠、余知古、韦蟾等同游于徐商幕府,相与唱和,段辑录诸人唱和来往之作,成是集。《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唐诗纪事》卷五八亦引集中诗句。后因未刊刻,日渐稀少。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分甘馀话》、《万首唐人绝句选凡例》均提及当时有藏本,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亦有著录,可见清初尚存,今已不见。

(杨旭辉)

【李义山集】 诗别集。三卷。唐李商隐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玉谿生诗》三卷,《崇文总目》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有诗集五卷。《李义山集》三卷,自宋以来,除晁氏

云五卷外,所传官本大都如此。但今传之三卷已非宋初旧次。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说宋初杨亿“孜孜求访,共得二百八十二首”,后来钱若水又“留意撙拾,才得四百餘首”。现在流传诸本,共存诗六百餘首,其中一百多首为钱若水以后之人所补辑,故往往有他人的作品羼入,如白居易《送阿龟归华》、杜牧《赤壁》、《定子》等。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国光社影印《李商隐诗集》三卷,其所据为钱谦益手校本,吴县蒋斧跋云:“至为精密,为传世李集第一善本。”蒋氏所言有溢美之处,而此本校勘精谨,在众多义山谿集中确有其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所收《李义山诗集》三卷则系内府藏本,据《天禄琳琅》上,谓此三卷本专录其诗,卷数虽与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相同,而其书各异,非宋人所刊无疑,实为明刊。毛晋汲古阁《唐人八家诗》及席启寓刻皆为三卷。而《四部丛刊》影印的蒋孝《中唐十二家诗》本及陆沚《广十二家唐诗》本皆作六卷,分体编排。明姜道生《李商隐诗集》分体次为七卷。《唐音统籤》本及北京图书馆藏朝鲜刊本又分作十卷。义山作诗,多用暗示象征,情思意境朦胧,“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故元好问《论诗绝句》云“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最早有宋刘克、张文亮二家注本,但今已不传。明末释道源始又为之作注,然此注亦不存。今见最早的李集完整注本,当为清初朱鹤龄删补道源旧本而成的《李义山诗集笺注》,此注简明稳妥,虽征引故实不及后出,但力驳历来对李义山的偏见和诬蔑。后来注商隐集者,如程梦星、姚培谦、冯浩诸家,大抵以此为蓝本,而补正其阙误。后来沈厚燠又将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点辑入朱注,遂成今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在众多清人注本中,冯浩钩玄探微,对李义山诗文注释用力最勤,他的《玉谿生诗笺注》(又名《玉谿生诗详注》),广泛吸收了前人及当时学者的评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突破。在征事、解词、释意等方面较前人更为详赡精切,尤其对李义山生平事迹的考订上有所发明。虽此冯注在解说注释时也不免流于伪造妄增和穿凿附会,近人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对其中一些不当之处作了纠正,但仍不失为李义山诗歌笺注中最有价值之作。“冯注”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1763)初刻本,乾隆四十五年重刻本及仁宗嘉庆六年(1801)校本。诸本间不仅篇数编次有变更,就是内容上亦大半如出两手,此乃冯氏不断有所修订之故。今人笺注李集者,有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和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用力甚

勤,对诗意、篇章疏解,都有切当中肯之处。

(杨旭辉)

【李群玉诗集】 诗别集。三卷、《后集》五卷。唐李群玉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李群玉诗》三卷、后集五卷。三卷者,乃群玉于宣宗大中八年(854)“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首”者(《唐才子传》卷七)。后集五卷,当是三卷以外以及大中八年以后之作。今传《李群玉诗集》有南宋陈道人书棚本,卷数与书目记载吻合。原书今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但经《四部丛刊》影印,已成为通行之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将其诗按体分排,统前后集为三卷,名为《李文山诗集》,已非旧次。黄丕烈曾取宋本校毛刻,并云:“其(毛刻)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信知宋刻之佳矣。”(《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然宋本多有缺字,叶德辉《郎园读书志》七录有校记,依《全唐诗》补足宋本之缺字。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后集卷五末,有“东山席氏悉从宋本刊本琴川书屋”木牌记,是其所据亦宋本,但其墨钉缺字更多。

(杨旭辉)

【薛许昌诗集】 诗别集。十卷。唐薛能撰。《许昌集》最古之刻本是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三川刻本,是书虽不传,但有张咏序可知其集之源委。薛能诗千余篇,张咏收其诗凡四百一十八首,编为十卷。到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山阴陆荣望因其诗作累句甚多,遂删其瑕颣,得全美者二百三十首刊行于世,后世传本大体依此删选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中即有《薛许昌诗集》十卷,通得二百二十七首,视绍兴旧本,更差三首,文字夺讹甚多。陆心源尝赖旧抄本以校正,并作有校记,是正不少错误。今收罗最全者当数《全唐诗》,计三百餘首。

(杨旭辉)

【喻凫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喻凫撰。方干《哭喻凫先辈》有诗句云“日夜役神多损寿,先生下世未中年”,是知凫年寿甚促,故传诗不多。其集仅见《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尤袤《遂初堂书目》等著录,余皆不灵。集有明朱警辑《唐百家诗》、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刘云份辑《中晚唐诗》本及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等数种合刊。

(杨旭辉)

【林宽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林宽撰。林宽集不见于新、旧《唐书》二志著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林宽集》一卷”,《宋史·艺文志》亦同。今存集子多为明、清辑本,如朱警《唐百家诗》、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刘云份辑《中晚唐诗》本。江标本称为影南宋刊本。

(杨旭辉)

【刘驾诗集】 诗别集。一卷。唐刘驾撰。刘驾

诗,《崇文总目》作《刘驾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題》作《刘驾集》一卷,而《宋史·艺文志》则作《刘驾古风诗》一卷。江标影刻南宋本《唐人五十家小集》,卷数与宋人记载同,盖依宋人原本翻刻。今存刘驾集多为清人辑本,刘云份曾辑集收入《八刘唐人诗》、《唐代刘氏诗集七十种》及《中晚唐诗》三种丛刻,此外尚有明朱警辑《唐百家诗》本。(杨旭辉)

【比红儿诗】诗别集。一卷。唐罗虬撰。虬从鄞州李孝恭为从事,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乃请红儿歌而赠之缙彩。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首,题为《比红儿诗》,大行于时(事见《唐摭言》卷一〇),宋代亦有刊行。《郡斋读书志》有著录;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二亦收全百首;更有虞山钱曾尝藏有宋板《罗虬比红儿诗》一卷,见录于《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元、明时,则《说郛》本(宛委山堂本及商务本皆收)及朱警《唐百家诗》均有收录。此百首绝句之缘由颇为小说家乐道,故《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香艳丛书》均见收录。此集,宋人方恂有注本《解注比红儿诗集》一卷,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清代沈可培又有《比红儿诗注》一卷。钱曾有《比红儿诗注》十卷抄本,未著录注者,或为方恂注本。(杨旭辉)

【罗邺诗集】诗别集。一卷。唐罗邺撰。罗邺诗传世者不多,《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以及后来的《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都作集一卷。清江标灵鹫阁影刻宋本《罗邺诗集》,收入《唐人五十家小集》,可略见宋本旧貌。另有《唐百家诗》本和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今人何庆善、杨应芹以《全唐诗》为底本,取校江标本、席本以及《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等总集,作有《罗邺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唐诗小集》第二辑出版。(杨旭辉)

【邵谒诗集】诗别集。唐邵谒撰。邵谒诗,《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云:“《邵谒集》一卷,……集后有胡宾王者为之序。”胡序今不见存,于《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及席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邵谒诗集》附录中仅见片言只语,言胡宾王时冠以“安定”二字,疑为胡曾,俟考。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王准刻《唐十子诗》序称“余文周水部得宋本,下以授准刊行”(《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引),未知此本与《嘉庆一统志》所说“明王佐得其集于秘阁,梓传之”之本是否同源。《全唐诗》收邵谒诗三十二首(另有一首《降巫诗》),虽较《百川书志》二十八首有增加,但较宋《李希声诗话》记李乘彝家藏八十首之数,相差仍甚多。

(杨旭辉)

【禅月集】诗别集。唐僧贯休撰。唐昭宗乾宁三年(896),贯休出所作歌诗草一本与吴融,曰《西岳集》,吴氏为之序。休卒后,门人昙域又“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题号《禅月集》”(昙域《禅月集序》),是年为前蜀后主乾德五年(9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刻专集自是集始,是亦可资考证也。”惜此刻今已不传。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兰溪兜率寺僧可灿借童必明家藏旧本重刊。后毛晋得此刻,又辑补遗一卷,即行刊刻,是为汲古阁二十五卷本《禅月集》,与皎然、齐己合为《唐三高僧诗》。《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汲古阁刻本以前,多赖传抄本流布,故存世之《禅月集》抄本尤多,较著名的有明柳金抄本、汲古阁影宋抄本、《四部丛刊》所据江夏徐氏藏影宋写本等。各抄本间,文字脱误,多有不同。清人胡凤丹重为编校,定为十二卷,有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退补斋刊本,后收入《金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又据以排印。(杨旭辉)

【罗昭谏集】诗文别集。八卷,其中诗四卷。别有序集名《甲乙集》十卷、《补遗》一卷。唐罗隐撰。综合《吴越备史》、《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題》的记述,罗隐的著作有《甲乙集》十卷、《罗隐集》二十卷、《江东后集》十卷、《谗书》五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淮海寓言》等多种,但传于今者不过《甲乙集》、《谗书》以及子部《两同书》,其他诸集,均已散佚。今所见之《罗昭谏集》乃后人汇编而成的综合本。《甲乙集》旧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本、清初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十卷外尚有补遗一卷。清仁宗嘉庆(1796—1820)中,黄丕烈获见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仁坊南陈氏书铺本十卷,其事见《百宋一廛赋》注。《四部丛刊》影印者即此宋刊本,使此一珍本得以通行于世。此本宋槧旧本与毛氏汲古阁本相较,各有胜处,毛刻有一作某,而宋刻无之;而毛本有逊于宋刊者,则如瞿镛所云,多有文字讹误,皆可据宋刊以订正,如:《咏绣》“洞房西室女绿劳”,“绿”实为“工”字之误。《谗书》乃诗人行卷之作,“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结果招致了“辱”和“困穷”。《谗书》五卷在宋代已难求,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即云“求之未获”。历元、明、清湮没已久,直至嘉庆十一年(1806),黄丕烈获一传抄本。此抄本的祖本是明人顾从化所藏的元刊本,前有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东嘉黄真甫德弼序及紫阳山人方回跋。到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姚士粦将罗隐的作品重新加以辑校整理,才编成综合本《罗昭谏集》五卷,或题作《罗昭谏江东集》,最后付屠中孚刻印。此本今北京图书馆有藏。《四库全书》所收八卷本《罗昭谏

集》则是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张璠重辑的瑞榴堂刻本。此外,还有一个十四卷附补遗的旧抄本《罗昭谏集》,见载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氏云:“与宋刻《甲乙集》合,前十卷皆诗,即出自宋本,其中字句颇有胜于汲古阁刻者。”由此可见,其收诗不比八卷本多。清宣宗道光四年(1824)吴塘重刻张璠本,又增补一卷,仍未能尽搜罗隐遗著。今人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在此基础上又有发现,最为完备,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发行。(杨旭辉)

【皮子文藪】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一卷;校点本附诗十卷,唐皮日休撰。皮日休在自序中云:“咸通丙戌(866)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篋丛萃,繁如藪泽,因名其书曰《文藪》焉。”《文藪》刻本,后世流传甚广,唯不见宋刊旧本传世,而后代传布之本又多源自宋本。袁表、袁燮“始获宋版《文藪》,刻之家塾”(许自昌《刻文藪小引》),是年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许自昌又据之刻行传世,收入《合刻陆鲁望皮袭美二先生集》。此外,合肥李松寿曾以家藏旧槧刊布(事见李氏《重刊宋本文藪序》),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郑城于氏又有影宋本。《文藪》诸本,字句间颇多异同。《四库全书》本和日本享和二年(1802)本(山东大学有藏)有多处优于他本,故今人萧涤非于1979年重新出版点校本时,依此二本改动了1959年旧版中的一些问题,使之更为完备。皮日休所作远非《文藪》一编,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尚有《皮日休文集》十卷、《胥台集》七卷、《诗》一卷,惜均未见传世。明许自昌又析出《松陵集》中的皮子诗,独立成《皮从事唱酬诗》一集。

(杨旭辉)

【韦庄集】旧称《浣花集》。诗别集,唐韦庄撰。唐昭宗天复三年(903),韦霁次其兄庄之诗歌为《浣花集》,并为作序。序云:“余家之兄庄,自庚子乱离前,凡著歌诗文章数十通。属兵火迭兴,简编俱坠,唯馀口诵者所存无几。”序中又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霁便因闲日,录兄之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五卷,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浣花集序》)但韦霁編集、作序时,庄尚在世,方得杜甫草堂,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自是以后,篇什皆未载焉,故往往散见于诸书,后人递有增入。”据《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浣花集》有二十卷,以后则时有散佚。今传本仅十卷,凡二百五十馀首。观今传诸本,皆源于宋书棚本。今通行本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朱承爵(子儋)刻本,《四部丛刊》影印刊行,与宋本对勘,“竟少误字,盖朱刻亦出宋本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惜霁序未

录,后毛晋获见补入,“复阅《才调集》、《文苑英华》诸书,又得诸体诗三十首有奇,悉附作补遗”(《汲古阁书跋》)。《全唐诗》所录,又较毛本多《勉儿子》、《即事》等三十二首。除此而外,郭煌残卷又发现韦氏长诗《秦妇吟》,经王国维、罗振玉、刘修业等学者的努力,大显于世,陈寅恪等又相继为之笺注,与《浣花集》别行。今人向迪琮有点校本《韦庄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另有李谊《韦庄集校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合注存世之韦庄诗、词、文,并附资料多种及主要研究论文。

(杨旭辉)

【香奁集】诗别集。唐韩偓撰。对韩偓此集,历来褒贬不一。诋者以为“诲淫之言”(方回《瀛奎律髓》),褒之者以为借言情影射时事,寄托忠君之思。据集中自序,集中诗为唐僖宗乾符六年(879)至广明元年(880)所作,用以比附后来之时事,实不足取。此集多附于《韩内翰集》后,另有元刊三卷本及汲古阁一卷本单行于世。《香奁》一集,沈括《梦溪笔谈》以为五代和凝所著,托名韩偓,后人附此说者甚多,今人多有辨正,多认为韩偓、和凝均著有《香奁集》,而和集早已佚,今传《香奁》一集实韩偓所作。今人徐复观尚有异说,以为今存《香奁集》为和凝选编偓的部分艳丽之诗及己之少作而成,见其《韩偓诗〈香奁集〉论考》(收入其专著《中国文学论集》,台湾民主评论社1966年版)。

(杨旭辉)

【韩内翰别集】诗别集。又名《玉山樵人集》。唐韩偓撰。《崇文总目》仅著录《韩偓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另录《香奁集》一卷。以后各家著录皆附有《香奁集》。偓曾于生前手自编定诗集,据其自叙,此编为朱温乱权入闽依王审知后之作,得百馀篇,不忍弃捐,随时编录而成。此本沈括尝于偓四世孙奕处见及,为偓之原迹,事见《梦溪笔谈》卷一七。但今传诸本所收,远不止百馀篇。仅以《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玉山樵人集》为例,不计《香奁集》已有诗二百二十馀首,盖偓手定之本仅收入闽后之作,而朱温乱前“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四部丛刊》本韩偓自叙)。由此可知,偓入闽前诸诗,虽经后人努力收辑,仍有不少已佚。《四库全书》所收为江苏采进本,题《韩内翰别集》一卷,与汲古阁刊《韩内翰别集》同出一源。此外,另有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及多种抄本传世。参见《香奁集》。

(杨旭辉)

【唐风集】诗别集。唐杜荀鹤撰。《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皆云《唐风集》十卷。但据顾云所作序云:“分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风集》。”今存诸本多为三卷。此集,宋时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为北宋所

刊《杜荀鹤文集》，下题曰《唐风集》，此本不分体，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即为此种北宋刊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另有南宋陈解元书棚本《唐风集》，不仅集名不同，编排亦复不同，为分体本，与北宋本相较，此本舛讹较多，仅顾云一序就多有夺漏，以至末尾文不相属，且少诗三首。汲古阁依南宋本刊刻，沿袭其误，远不及祖于北宋本的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季振宜尝有一明写棉纸本《唐风集》，收诗凡三百十七首，较毛刻、席刻更佳，乃汇集各本择善而校的校正本，后季氏编《唐诗》时，即以此集编定荀鹤诗，《全唐诗》承其旧本，故收诗较为完备。1959年中华书局用贵池刘氏翻汲古阁本排印，校以《全唐诗》，多有补正；但未能吸收席启寓《唐百名家全集》本之优点，是为憾。题为《杜荀鹤诗》，与《聂夷中诗》合为一集出版。

(杨旭辉)

【唐英歌诗】诗别集。唐吴融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融诗集》四卷，《唐才子传》沿此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唐英集》三卷，此集当即《唐英歌诗》。《宋史·艺文志》又作五卷，则可知到元代，吴融诗集已非旧本，四卷本早已散佚，今存诸集皆作三卷。钱曾《读书敏求记》有宋槧三卷本《唐英歌诗》，今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唐四七家诗》中收有钱曾校《唐英歌诗》三卷，此殆为据宋刊所校。明、清间多有抄本，见于各家书目著录，皆作三卷。今较为常见的刻本为毛晋汲古阁刻《唐人四集》本及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亦皆三卷。据明高儒《百川书志》云，《唐英歌诗》三卷共收诗二百九十六首，而席本略多，盖又有补遗。

(杨旭辉)

【雲台编】诗别集。唐郑谷撰。谷“游举场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馀首”，“乾宁初，上幸三峰，朝谒多暇，寓止雲台道舍，因以所记或得章句缀于笺毫，或得于故侯屋壁，或闻于江左近儒，或只省一联，或不知落句。遂拾坠补遗，编成三百首，分为上、中、下三卷，目之为《雲台编》。”（郑谷《雲台编序》）据祖无择《都官郑公墓表》，谷诗除《雲台》一集外，尚有百首之外集，则《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雲台编》三卷外之《宜阳集》三卷及《宋史·艺文志七》所著《宜阳集》一卷，颇可疑。至南宋，外集“又阙其半”（童宗说《雲台编序》）。陈氏《直斋书录解題》录有《外集》一目，后代均未见著录，可见外集宋末已湮没，行世者仅有《雲台编》一集。今存最早刊本为宋蜀刻本，题为《郑守愚文集》，下有子目云《雲台编》，《四部丛刊》即据以影印，其中有个别诗作于昭宗乾宁（894—898）后，此当与谷手编之原本有异。另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严嵩刻本、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

全集》本，收诗均近三百。收录最全的当属《全唐诗》及《唐音统籤》，凡三百二十六首。今人严寿澂、黄明、赵昌平以《全唐诗》为底本，为之笺注，著有《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杨旭辉)

【于武陵诗集】诗别集。又名《于邺诗集》。一卷。唐于武陵撰。《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于武陵集》一卷。于武陵，名邺，但以字行，以致于邺、于武陵被看作两人。《新唐书·艺文志》分列《于武陵诗》一卷、《于邺诗》一卷，从而混淆不清。清代席启寓刻《于邺诗集》所收之诗为《全唐诗》分置于武陵、于邺不同名下，实沿《新唐书》之误。此二卷多有重出，去其重者，实存诗六十六首。除席刻外，明嘉靖王准《唐十子诗》本及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于武陵集》、明朱警《唐百家诗》本《于邺诗集》均较为常见。其中王准刻本有宋刊旧本之依，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引王氏刊序言及。传世集皆为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于武陵诗》一卷外又著录《于邺诗》十卷。

(杨旭辉)

【白莲集】诗别集。唐僧齐己撰。齐己《白莲集》系其卒后由门人西文收集、孙光宪编辑而成的，于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勒成十卷，共八百十篇。据《直斋书录解題》云，《白莲集》十卷外，尚附《风骚旨格》一卷。此书北宋曾刊行，传世既久，湮灭不完，诸家庋藏，仅依传抄。今传最早之抄本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抄本，有嘉靖八年（1529）柳金跋文；此抄成为后来众多抄本之母本。《四部丛刊》影印者即此本。明末毛晋从柳金本录出，与皎然、贯休诗合刊为《唐三高僧集》，至此，《白莲》一集才有了新的刻本。据《江苏一图善本书目》，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依宋刊之《齐己诗集》一卷，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白莲集》向为十卷，此竟为一卷，殆收入丛集时合十为一。此书不见于《全国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其详情不得而知。此较诸本，以柳氏抄本为胜；此本较汲古阁本存诗多，且足以正毛本伪误之处甚多，且附《风骚旨格》，为毛本所无。齐己集尚有一卷之朱警《唐百家诗》本及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皆题作《唐齐己诗集》。（杨旭辉）

【徐公文集】一名《骑省集》。诗文别集。三十卷。宋徐铉撰。其集前二十卷为铉仕南唐时所作，由铉自编；后十卷为归宋后所作，由其婿吴淑编成。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都官员外郎胡克顺得其本于陈彭年，刊刻表进，始行于世。有陈彭年序。今存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库刻本，1919年南陵徐乃昌有影刻宋明州本，另有多种清代抄本、刻本，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黄丕烈校

抄宋本,《四部备要》排印宋明州本。(张丽娟)

【**咸平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宋田锡撰。《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五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五十一卷。今本包括奏议一卷,书三卷,赋五卷,论三卷,箴铭二卷,诗六卷,颂策笏记表状七卷,制诰考词三卷,为后人重辑之本。今存明祁民淡生堂抄本及若干清抄本,《四库全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李氏宜秋堂刊《宋人集丁编》本。(张丽娟)

【**乖崖集**】 诗文别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张咏撰。《宋史》本传中称咏“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有集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张乖崖集》十卷,并称“钱易所撰墓志、李昉所纂语录附于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十二卷,附录一卷,称此十二卷本为“近时郭森卿宰崇阳刻此集,旧本十卷,今增广并语录为十二卷”。此为十二卷本之来源。其实所增不多,郭序称于世刻中增诗八篇,别附以韩琦所撰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阳序》、李焘《祠堂记》、项安世《北峰亭记》。今十卷刻本已不可见。十二卷本有两个宋本传世,一为南宋理宗时郭森卿崇阳县斋刊本。即《四库全书》收录本。此本也收入《续古逸丛书》中。二为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间伊赓在崇阳县斋重刊本。前有咸淳五年(1269)龚梦龙之序,序云:前令郭森卿所刊张集之版,于己未(1259)毁于战火,今令尹伊赓复刊行世。另外明、清两代传世写本亦多。近世有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莫氏仿宋刊本。(王学泰)

【**河东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宋柳开撰。附录一卷。其集由门人张景编订,附有张景所撰行状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柳仲塗集》十五卷。今存明吴氏丛书堂抄本及清抄本多种,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张丽娟)

【**小畜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禹偁撰《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禹偁自己编集所作,得三十卷,以《易》“筮,得乾之小畜”,故名为《小畜集》,凡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后其曾孙王汾又辑其遗文,得三百多篇,编为《外集》二十卷。后《外集》残缺,仅存八卷。今存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黄州刻递修本。通行的有《四部丛刊》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张丽娟)

【**和靖诗集**】 诗别集。四卷。宋林逋撰。《宋史》本传记林存诗三百余篇,此集所收亦大致此数。林集编成于作者去世后不久,前有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所写的序。《宋史·艺文志》著录《林逋诗》七卷,又诗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文献通考》皆作三卷、《西湖记

逸》一卷。传世宋刻稀见,皆为残本。据清黄丕烈所见宋残本“《和靖先生诗集》上”,可知此残本或为三卷本,或为二卷本。明刻林集,多作四卷,其最早者当为明英宗正统(1436—1449)间陈贽编次、王圉校正本,题名为《重编西湖林和靖先生诗集》,此为首见之四卷本。陈贽序谓:此编“以类相从,厘为四卷”。后世四卷本多祖此本,如明神宗万历(1573—1620)钱塘何养纯刻本、清圣祖康熙(1662—1722)长洲吴调元刊本皆是。1935年邵裴子以正统刻本为基础(惟古诗部分,正统本列在书尾,编为“拾遗”,而邵氏将古诗排在卷首),参照宋刻残本、明武宗正德(1506—1521)刻本,何养纯本等以及选本、墨迹、校录、史志、诗话、文集、笔记等近五十种书加以校勘、蒐辑,录诗三百一十首,句四联,诗余三首。附录:“遗文”、“投赠”、“评鹭”、“纪事”、“传”、“杂记”、“师友”、“祠墓”、“辨谬”以及校语等。有商务印书馆民国年间排印本。(王学泰)

【**逍遥集**】 诗别集。一卷。宋潘阆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潘逍遥诗》三卷,《文献通考》亦作三卷。《宋史·艺文志》并作一卷。宋代见诸著录者,有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年间刻本与严陵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潘集之原本久佚,“今考《永乐大典》所载,裒而录之,编为一卷。而逸篇遗句载在他书者,亦并采辑,以补其缺。虽不能如晁氏著录之数,而较宋志所载则约略得其八九矣”。此本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刊》本。(王学泰)

【**南阳集**】 诗文别集。六卷。宋赵湘撰。《宋史·艺文志》著录《赵湘集》十二卷。原集为赵抃所编,宋祁曾为序,欧阳修跋亦称之。但此集《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均无著录。今本为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类排订,厘为六卷。通行者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张丽娟)

【**东观集**】 诗别集。十卷。宋魏野撰。《宋史》魏观本传记其撰《草堂集》十卷。据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薛田所撰序云“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是知魏野在去世(1019年)以前已有《草堂集》流传,作十卷,此为魏集旧本。野去世后,其子魏闲“以新旧三百篇,汇为七卷,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见序),可知魏闲编本作七卷。宋编父集成,未必即有刻本,《草堂集》与《钜鹿东观集》写本、抄本依然流传人间,分卷自然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二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编为《东观集》。(按“三百”、“四百”皆举成数而言,实数为三百五十九首。)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记有《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十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传世者有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严陵郡斋刻本(此为残本)，亦分为十卷(黄丕烈曾见)。可见《东观集》在宋时已分为二卷本、七卷本、十卷本，但所存魏诗数目相去不远，皆在三百以上，四百以下。魏集除宋刻本外，元代有刊本(见《袁抒楼书目》)。明代多以写本传世。《四库全书》所收为十卷本。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赵治琛据金兆芝所校江南图书馆藏三抄本刻《钜鹿东观集》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收入《峭帆楼丛书》。贵池刘氏得宋刻本，重摹行世。(王学泰)

【寇愍公集】诗别集。三卷。宋寇准撰。寇准初知巴东县时，曾自择其诗百余首，自为之序，刻于巴东，名《巴东集》。《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三卷，《郡斋读书附志》著录作一卷。后河阳守范雍增辑所作，共二百多篇，编为三卷。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有刊本。今存有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蒋鏊刻本。通行的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张丽娟)

【武夷新集】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五卷。宋杨亿撰。《宋史》本传称亿撰有《括苍》、《武夷》、《颖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以及内外制、刀笔共有一百九十四卷之多。《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集》二十卷、《颖阴集》二十卷、《刀笔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汝阳杂编》二十卷、《壶坡遗札》二十卷。《郡斋读书志》仅载其《刀笔集》十卷；《后志》载《武夷集》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载其《武夷新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并言大年本传记其诗文有一百九十四卷，“馆阁书目犹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集》者，亿初入翰苑当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明年，条次十年诗笔而序之；《别集》者，大中祥符五年(1012)，避谗佯狂归阳翟时所作”。可知《武夷新集》所收乃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出知括苍郡以来诗文。后《别集》亦佚，只此集传世。此集宋刻未见著录，可能一向以抄本流传，至明有《浦城遗书》本。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祝氏留香室再刊《浦城遗书》附《杨文公逸诗文》一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明《浦城遗书》本。(王学泰)

【文庄集】诗文别集。三十六卷。宋夏竦撰。《宋史》称他有文集一百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及他书中辑出其诗文，编为三十六卷。今存有多种清抄本。通行本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影印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文正集】诗文别集。二十卷，另《别集》四卷，《补编》五卷。宋范仲淹撰。此集又名《丹阳集》，凡

诗赋五卷，文十五卷。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为作序。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多篇，即今《别集》四卷。《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均有著录。清圣祖康熙(1662—1722)中，范氏后裔范能濬又搜辑遗文，编为《补编》五卷。今存有宋刻本、元褒贤世家塾岁寒堂刻本及多种明、清刻本。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丛刊》本、《古逸丛书》三编本等。

(张丽娟)

【文恭集】诗文别集。五十卷。胡宿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胡文恭集》七十卷，欧阳修所作《胡公墓志铭》称其有文集四十卷，久无传本。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一千五百余篇，以类编次，厘为五十卷，又搜辑他书佚文，编为《补遗》一卷。今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等。

(张丽娟)

【宋元宪集】诗文别集。宋庠撰。四十卷。庠，原名郊，卒谥元宪。《宋史·艺文志》著录宋庠《缙巾集》十三卷，又《操缦集》六卷、《连珠》一卷，又有《宋郊集》四十四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宋元宪集》四十四卷，而《宋史》本传称其别集为四十卷，当为不同之本。原本久已不传。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四十卷，漏辑者见《四库拾遗》。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湖北先正遗书》本等。

(张丽娟)

【宋景文集】诗文别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宋祁撰。其集宋时已有多种版本，据《宋史》本传称祁有集百卷，《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宋景文集》一百卷，而《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著录其集为一百五十卷。又有《刀笔集》等。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六十二卷，又旁采诸书，成《补遗》二卷，并以轶闻余事各为考证，作为附录。今存本有宋刻本残本，藏于日本，另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张丽娟)

【武溪集】诗文别集。二十卷。余靖撰。集为其子屯田员外郎余仲荀所编，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其中古、律诗一百余篇。《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为二十卷。今存最早的刻本为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苏辂等刻本。通行的有《广东丛书》第一集本，包括补佚一卷。(张丽娟)

【都官集】诗文别集。十四卷。陈舜俞撰。舜俞曾官都官员外郎，故其集称《都官集》。原本三十卷，为舜俞卒后其婿周开祖编，有蒋元奇序。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中，其曾孙陈杞复刊版于四明，有楼钥后序。原本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益以他书所载，编为十四卷，其中诗三卷、文十

一卷。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南城李氏宜秋馆刊《宋人集甲编》本。(张丽娟)

【宛陵集】诗文别集。一作《宛陵先生文集》、《宛陵先生集》。宋梅尧臣撰。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二三有《书梅圣俞稿后》，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据欧文，知此稿乃写本，实为梅尧臣集的最早本子。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撰《梅圣俞诗集序》(《居士集》卷四二)。据序，知此诗集凡十卷，乃谢景初所辑。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所撰《梅圣俞墓志铭》谓梅有文集四十卷。与此同时或略后，修选录梅诗，编为十五卷(见《梅圣俞诗集序》后补记)。以上四本，皆佚。哲宗元符二年(1099)，宋绩臣辑《梅圣俞外集》十卷，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陆游撰《梅圣俞别集序》(见《渭南文集》卷一五)，称此别集乃李兼所辑。另《宋史·艺文志》著录《梅尧臣后集》二卷。此三本亦佚。今通行本《宛陵先生文集》，皆出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六十卷本。前五十九卷为诗。一至二十三卷为第一线，二十四至五十九卷为第二线。各为起讫，断续发展。其第一线分四段，卷一仁宗天圣九年(1031)至卷一一庆历五年、卷一二庆历八年至卷一三皇祐元年(1049)、卷一三皇祐三年至卷一八皇祐五年、卷一八嘉祐三年至卷二三嘉祐五年。其第二线亦分四段，卷二四庆历五年至卷三四庆历八年、卷三四至和二年(1055)至卷三六同年、卷三六皇祐元年至卷三八皇祐三年、卷三九皇祐五年至卷五九嘉祐三年。卷六〇为文赋。绍兴本已佚。今传世之本，有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残宋本、明英宗正统四年己未(1439)本、明神宗万历四年丙子(1576)本、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1702)宋萃本。残宋本存卷一三至一八、卷三七至六〇，较后三者多诗八十七首。宋萃本和正统本、万历本文字有很大不同，实各有继承。正统本、万历本保留当时的通行字，可资研究，版本价值较宋萃本为高。今人朱东润通过深入考订，为梅尧臣的诗进行编年。复在近人夏敬观《梅宛陵集校注》的基础上，对梅诗进行校注。他利用了夏的校勘成果，保存了夏的原注。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十卷。《宛陵先生文集》卷六〇所收可以编年的文赋，亦在此三十卷中。其不能编年者，入卷末《拾遗》；方回《瀛奎律髓》有诗一首，吴曾《能改斋漫录》有词一首，皆未入集，亦入《拾遗》。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然此本所收诗犹未尽，如《苏轼诗集》卷三〇附录的尧臣《木山》诗，即未收。

(孔凡礼)

【徂徕集】诗文别集。一作《徂徕文集》、《石徂徕先生集》、《徂徕石先生文集》、《石介集》、《徂徕石先生

全集》、《徂徕先生集》。宋石介撰。此集乃石介手编，以所居在徂徕山，因以名集。其编集约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均有著录，凡二十卷。后者为南宋理宗时陆子通刻本。《宋史·艺文志》著录卷数同上二书。《文渊阁书目》著录《石徂徕文集》四部，俱全。清代有圣祖康熙五十五年(1716)燕山石氏刻本，其母本为王士禛所藏宋本，有康熙四十九年姑苏张氏《正谊堂丛书》本及徐肇显刻本，有德宗光绪十年(1884)济南尚志书院所刊人影印宋钞本，有光绪十六年临清徐坊校刻本。1933年，有泰山徐守揆校刻本。据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除此本外，尚有另一文集。《宋文鉴》收介所作《根本》、《宋会要辑稿》所收《斥游惰》(残)等文，皆不见今本，疑即出自另一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出版的《徂徕石先生文集》，辑有包括上二文在内的八篇佚文，是目前辑介诗文最完备的本子。

(孔凡礼)

【欧阳文忠公集】诗文别集。一百五十三卷，诗二十一卷。宋欧阳修撰。此编囊括作者除《新五代史》、《新唐书》以外的所有著作。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河东奉使奏草》二卷、《河北奉使奏草》二卷、《奏事录》一卷、《濮议》四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笔说》一卷、《试笔》一卷、《长短句》三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附录》五卷。其中《居士集》与《外集》主要收录其诗文。《居士集》最早由其子欧阳发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编定，其中古诗九卷，律诗五卷，文三十六卷；大体上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此本在北宋中后期已有汴、杭、蜀、闽、赣等地刻本。这些刊本多不传。宋刻只有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年间衢州所刻残本传世。《居士集》单行者较少，著名者有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刻本(附有曾鲁考异)和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李冕刻本。一百五十三卷之大全集，由南宋中叶周必大率丁朝佐、曾三异、罗泌等人编成，蒐罗宏富，并参照汴、杭、吉州、绵州、闽中的各种版本，如《庆历文粹》、《英辞类纂》以及手稿、碑刻等材料。书中校订异文，不仅择善而从，而且把各本异同作了较详细之记载，有助于后世读者了解当时流传的各种刻本之面貌。此编还将流行各本所存篇目真伪作了确实可信的考订，对各本篇目之次第作了适当的调整，因此，此编在宋诸本中为最善，故多次刊刻。其初刻为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所刊，全帙已不存，只有残本传世。后有元刊本、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吉安

知府程宗刊本、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重修程宗刊本、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刘乔刻本、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邵廉刻本、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曾弘刻本、清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祠堂刻本等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系影印元刊本。

(王学泰)

【乐全集】 一作《乐全先生文集》、《张方平集》、《乐全文集》。诗文别集。宋张方平撰。其集乃苏轼所手校,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序。方平卒,王巩为撰行状,称有文“四十卷,号曰《乐全集》,内外制杂著二十卷,号曰《玉堂集》”。苏轼所撰墓志铭,除以上二书外,称尚有《注仁宗乐书》一卷。《遂初堂书目》著录《乐全集》。《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前二者,后者未著录,疑其时已佚。《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著录《玉堂集》,称方平“出入两禁,垂二十年,一时大典多出其手”,刘摯为作序,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尤袤重刻于江西漕台。《宋史·艺文志》著录《乐全集》外,尚著录《进策》九卷。按:此九卷在集中,当为集中抽出的单行本。《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乐全文集》二部,一为七册,一为六册,皆完全。以上二书均未著录《玉堂集》,知自元时起已佚。本书前五卷为诗,余为文。今通行者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源出宋刊。

(孔凡礼)

【苏舜钦集】 诗文别集。一作《苏学士文集》、《沧浪集》、《苏子美集》、《苏子美文集》、《苏学士集》。宋苏舜钦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即舜钦卒后四年,欧阳修得其遗稿于舜钦岳父杜衍家,集录为十卷,题作《苏学士文集》,并为作序。序见《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三。黄庭坚尝见其集,谓未收而“流落人间者,必千数百纸”。《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跋二苏送梁子熙联句》。《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卷一九著录《沧浪集》十五卷,而袁州本卷四下则著录《苏子美集》十六卷。南宋孝宗乾道七年辛卯(1171),施元之刻《苏子美集》十五卷于衢州;周必大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撰《题苏子美帖临本》提及“衢州《沧浪集》”(《平园续稿》卷一五),当即施刻本。《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沧浪集》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舜钦集》十六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苏子美文集》一部二册,云缺。以上各本皆早佚。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1698),徐复惇重刊宋萃校定的《苏子美文集》十六卷。徐本问世不久,何焯以吴宽丛书堂钞本及吕无党据丛书堂钞本校定之本校勘。丛书堂钞本有乾道辛卯施元之刊本时所作跋;跋称其书附录汪应辰所藏黄庭坚为苏舜钦所作诗,其诗亦在。据何焯跋,其诗见《山谷别》(何焯作外,误)集诗注》卷下,题作《观秘阁苏子美题壁及中

人张侯家墨迹十九纸率同舍钱才翁学士赋之》。丛书堂钞本实源出乾道辛卯施刻本,已早佚。据何焯校,十六卷本中之第十六卷行状二篇,乃自十五卷本中之第十五卷抽出,二本所收篇目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十六卷本多出一卷,乃后人“有所续入”,非是。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李星根重编校刊《苏学士文集》十卷,保存欧阳修所作序中十卷之数。李本自《宋诗钞·沧浪集钞》中增入《田家词》一首,自《梁溪漫志》中增入《独酌》诗一首,自《东坡诗话录》增入《六和塔诗》二句。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沈文倬校点的《苏舜钦集》,以徐本为底本,以何焯校本及李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其他有关资料。卷末附拾遗,较李本增收诗八首、词一首、文一篇,是目前收辑比较齐备的本子。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了傅平壤、胡问藩的《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是苏集第一个编年校注本。

(孔凡礼)

【清献集】 诗文别集。十卷。宋赵抃撰。赵抃卒谥清献,故其集名《清献集》。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陈仁玉刻,共十六卷,有陈仁玉序。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有元刊本,亦为十六卷,为元英宗至治(1321—1323)初重刊,凡诗七卷、文七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四库全书》本为十卷,诗文各五卷。今存宋景定元年陈仁玉刻元明递修本(存卷七至卷一六)、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阎铎刻本、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汪旦刻本等。

(张丽娟)

【安阳集】 又名《韩魏公集》。诗文别集。五十卷。宋韩琦撰。此集,《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附志》及《宋史·艺文志》等均著录作十五卷,集后附有《别录》一卷、《遗事》一卷、《忠献韩王家传》十卷。今存有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张士隆刻本,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郭朴昼锦堂刻本等。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丽娟)

【击壤集】 或称《伊川击壤集》。诗别集。二十卷,集外诗一卷。宋邵雍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二十卷;并云“集自为序”,意即此集为雍自编。《直斋书录解題》特其列入“诗集类”,是知其在宋代即只有诗无文。此集何时刊刻,宋无记载,据《天禄琳琅书目》载元刊《击壤集》,云宋时《击壤集》雍所自刻。其自序署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年),当即刻于此年。宋刻传世很少,《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记有宋蔡弼子、蔡文子刊本,题为《康节先生击壤集》,分内外集,与世行本异。另黄丕烈藏有一宋残本。元、明刊本较多。毛晋汲古阁曾藏元刊二十卷本,杨绍和海源阁曾藏十八卷本(号称“宋刻”)。至明初,邵集刻本则多附有“集外诗”一

卷,或“补遗”一卷。较著名者有明初刊本,被季振宜、张蓉镜、郡耀渊等误认为宋刻,至使蓉镜于空页,以血书“佛”字,感谢“慈光覆护”。另有明英宗正统(1436—1449)“道藏本”;宪宗成化(1465—1487)间,有希古(南钊,任河南右参政)乙未(1475年)序本,及河南毕亨庚子(1480年)序本。此两刊可能用一版,即藏于洛阳安乐窝书院之版。毕序本已收入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所编之《四部丛刊》。另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刊本。又穆宗隆庆(1567—1572)间,有黄吉甫刊本,作八卷。此本于神宗万历(1573—1620)末有储昌祚、储显祚重刻本。明末还有文靖书院所刊二十卷本。至清则在圣祖康熙(1662—1722)、高宗乾隆(1736—1795)、德宗光绪(1875—1888)年间皆有刊刻。(王学泰)

【蔡忠惠集】 诗文别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其集卷数不一。《郡斋读书志》著录《蔡君谟集》十七卷,《读书附志》著录《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卷,并云为襄“之曾孙刑部郎洸所刊者,陈参政驥序”。《直斋书录解題》则著录《蔡忠惠集》三十六卷,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王十朋属钟离松访得其书、刻于泉州者。其集,元、明时已罕见。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始有四十卷本、三十六卷本刻行。今存宋刻本为三十六卷本。另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万历四十四年蔡善继双瓮斋刻本等。通行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张丽娟)

【古灵集】 诗文别集。二十五卷。宋陈襄撰。陈襄居侯官之古灵村,因以“古灵”名其诗文。集为其子绍夫所编,有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李纲序。绍兴三十一年,陈辉复刻于赣,有陈晔所撰年谱一卷。今存有宋福州刻本;此本刻于宋末,为赣州本的翻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清抄本传世。常见者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丽娟)

【南阳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宋韩维撰。韩维字持国,曾封南阳郡公,故集名《南阳集》。《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著录《韩持国诗》三卷,《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南阳集》二十卷,“二十”疑为“三十”之讹。其集,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韩元吉刊于东阳郡斋,共三十卷,为兵火后所辑,已非旧本。今本诗十四卷,内制一卷,外制三卷,王邸记事二卷,奏议五卷,表章、杂文、碑志各一卷,手简歌词共一卷,附录一卷,有鲜于侔所撰行状及沈晦跋。有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丹渊集】 诗文别集。宋文同撰。文同同年友范百禄所撰文同墓志铭,有“平生所为文五十卷”之语。今本《丹渊集》卷一〇《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

四首》题下注文谓此胡学士即苏轼,其第四首《月岩斋》题下注文:“诗中子平即子瞻也。”据宋家诚之《丹渊集跋》,此乃“党祸未解”之故。北宋徽宗时,苏轼列名党籍侍从之首,其书为禁书,至南宋高宗时解禁,并转而尊崇之。据此,知《丹渊集》在徽宗时曾经刊行过。《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文与可《丹渊集》四十卷”,当是其书。南宋初,同曾孙鹭重刊此集时,保留下此痕迹。鹭编诗为二十卷,前十八卷,“各以所居为别,东谷古今诗三卷,南幽古今诗二卷,临邛、广汉古今诗各一卷,陵阳古今诗三卷,汉中古今诗二卷,梁洋古今诗三卷,西冈古今诗一卷,画厨、乐府杂咏各一卷”,“乐府独殿于诗后,挽诗既别之以门,复附之于诗”。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家诚之感觉到此编次“不伦”,如东谷是文同家乡,但在“东谷古今诗三卷”中,却有不少并非写于东谷,其他各卷也有类似情况。他指出了这点,但是编次仍从文鹭之旧,“惟取其词赋列于首篇”,“仍分为四十卷,又寻访先生遗文,分为两卷”,刊行于邛州(见卷首及卷末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此集四十卷,未云《拾遗》二卷,当为家诚之刻本。此集传至金统治区,金有刻本,见清杨绍和《楹书隅录》。然在宋末及元代,传播并不甚广。刘克庄《后村千家诗》、方回《瀛奎律髓》均未选录,《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即可证。《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文与可《丹渊集》”二部,一为十册,一为八册,云“完全”。其集宋本已佚,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末刊本。明末刊本源出宋家诚之本,署陈继儒订正;卷首有明神宗万历二年甲戌(1574)吴郡钱允治序及思宗崇祯四年(1631)毛晋序。(孔凡礼)

【公是集】 诗文别集。一作《公是先生总集》、《刘公是集》、《刘原父集》、《刘敞集》。宋刘敞撰。此集乃敞卒后弟敞所编,计古诗集二十卷、律诗集十五卷,内集、外集、小集均为文,分别为二十卷、十五卷、五卷,共七十五卷,敞为序。《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刘公是集》七十五卷,即此书。《遂初堂书目》著录《刘原父集》。《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公是集》七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刘敞集》七十五卷。《文渊阁书目》未著录,以后遂佚。然宋陈思、元陈世隆所辑《两宋名贤小集》所收《公是集》六卷,诗二百九十多首,仍在流传。今传五十四卷本《公是集》,乃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辑出者,计赋二卷、诗二十七卷、文二十五卷。有武英殿聚珍版活字本、福建本、广雅书局本。后二者有《拾遗》一卷、《续拾遗》一卷。今人栾贵明又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出诗十七首,文二篇,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孔凡礼)

【曾巩集】 诗文别集。一作《南丰类稿》、《曾文定公全集》。宋曾巩撰。据韩维《曾巩神道碑》，巩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完整地传下来的只有《元丰类稿》，其他残存于宋刻《曾南丰先生文粹》十卷、金刻《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中。现存《元丰类稿》最早、最完整的刻本是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本，计收诗四百一十首，文七百九十二篇。明、清两代多次刻印，其中校勘最精、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刻本是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顾崧龄本。此本除本集五十卷外，自《曾南丰先生文粹》、《宋明文选》、《宋文鉴》、《能改斋漫录》等书中辑录了集外文二卷，凡文二十一篇。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点校本《曾巩集》，复自《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等书辑得诗三十首、词一首、文七十七篇(原为七十八篇，其中《祭柳子玉文》乃苏轼作)，收录完备。点校者所用的最主要的校本一种、主要校本十种、参校校本四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曾巩诗文集长期以来各种版本流传的实际情况。(孔凡礼)

【传家集】 诗文别集。八十卷。宋司马光撰。此为《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简称，又名《温国文正公文集》或《司马温公文集》。《传家集》本为作者手自编定，其子司马康早歿，稿归晁以道收藏。因司马光名列旧党之首，北宋未能刊刻，后授谢克家、刘峤，南渡后刻版上之于朝廷，时在高宗绍兴二年(1132)，刻于闽中(刘峤时为福建路提刑)。此为《传家集》最早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司马文正传家集》八十卷，即此本。绍兴(1131—1162)末浙江有递修本。现仍有闽中原刻传世(其中卷一至卷四缺，卷七七至卷八〇缺，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卢雍抄配齐全)，已收入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此八十卷本，包括赋一卷、诗十四卷、章奏谥议四十卷、制诏一卷、表一卷、书启六卷、序二卷、记传二卷、铭箴颂原说一卷、赠谕训乐词一卷、论二卷、议辨策问一卷、《史赞评议》、《疑孟》一卷、《史刻》、《迂书》一卷、碑志五卷、祭文一卷。前有绍兴二年刘峤所撰序及进书表。另有光州刻本，为百卷本，《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題》对此本皆有著录。《解題》记《传家集》为一百卷，可能即光州本。《宋史·艺文志》除记《司马光集》八十卷外，又记《全集》一百十六卷。《全集》后佚。百卷本只有抄本传世。八十卷本之《传家集》，除宋本外，后世刊刻颇多，著名者有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苏守李廷美刻本、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平阳府刊本、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山西学使吴时亮刊于夏县之本。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蒋起龙又据吴时亮刊本修补印行。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陈宏谋刊本附有司马光

年谱。此本较善，刊于桂林培远堂，后又重刊，流传较广。还有《司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诗七卷，明嘉靖四年(1525)吕柟刊本，此为选本。(王学泰)

【华阳集】 诗文别集。六十卷。宋王珪撰。其集，《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志》均著录为一百卷。原本久佚，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依类编次，厘为六十卷，并集其遗闻轶事及后人评论之语，编为《附录》十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有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福建有覆印本。常见者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苏魏公集】 诗文别集。七十二卷，其中诗十四卷。苏颂撰。南宋初汪藻为苏集作序，谓“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橐始克集会遗文，使藻与观焉，故谨识其端，而归其书于苏氏”。颂卒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而将苏氏遗诗、遗文编辑成集，当在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其刊刻可能更晚一些。因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未能记载，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始著录，为七十二卷。《宋史·艺文志》在著录《苏颂集》七十二卷时，又有《略集》一卷，当为缩编本，后此编佚。南宋孝宗乾道七年辛卯(1171)施元之刊于衢州之本，约为最早之刻本。宋刻至明末清初《季沧苇藏书目录》中尚有记载，后则亡佚。明代有刻本，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钞本著录。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颂后裔苏廷玉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本中抄出苏集刊刻行世；前有陈寿祺序，后有苏廷玉跋，并附苏颂之《谭寻》及其四世孙苏洵之《冷然斋集》。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今人王国策之排印校点本。(王学泰)

【王文公文集】 诗文别集。一百卷，其中诗四十二卷。宋王安石撰。安石卒后，其门生故吏如陆佃、薛昂都曾为編集，然皆不存。《通志》著录《临川集》百卷，又有《临川后集》八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临川集》一百三十卷，两种可能皆北宋编刻本。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刻《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其中诗三十八卷，世称临川本。此为所知刊刻最早之百卷本，现已不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应雲卫据此本翻刻，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绍兴二十一年(1151)安石曾孙王珪刻《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世称杭州本。此本的分卷及所收诗文与临川本大同小异，其原刻本亦不存于世，只有元、明两代递修本传世。临川、杭州二本，流传广泛，明、清多次翻刻；民国年间亦据以排印(如民国二十四年大东书局本)，然后篇目短缺，编次混乱，是其大病，历代学者多有指出其重出、缺文、脱句与遗漏篇章之处。仅李壁《王荆公诗笺

注》中就有七十二首诗为二本所无。另有《王文公文集》亦为百卷。此本从卷三七至卷八〇为诗词歌曲,诗四十二卷,于南宋之初刻于龙舒(今安徽舒城),亦称龙舒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龙舒本一至七十卷,国内存此本第一至三卷、八至三十六卷、四十八至六十卷,七十至一百卷,与日本藏本相补,恰成全璧。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用两残本照片拼合为一全帙,影印出版。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文公文集》排印本,但此本出书仓促,没有任何校点凡例、说明及版本的采用与评介。龙舒本之缺点亦是遗漏颇多,自清至今,多有辑安石轶文、轶诗以补编者,如陆心源、岛田翰、朱孝臧、唐圭璋、罗振玉等,除所补不全外,亦误收了一些在临川本或其他版本系统中并未遗漏的诗文,因之实有整理出一个全本、善本之必要。

(王学泰)

【彭城集】 诗文别集。一作《彭城先生文集》、《刘贡父集》、《刘攽集》。宋刘攽撰。《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下著录《彭城先生文集》六十卷,谓其集乃攽卒后其子弟所次。《遂初堂书目》著录《刘贡父集》,未云卷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彭城集》六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刘攽集》六十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彭城集》二部,一为十五册,一为十三册,均缺。其书久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得赋十五篇,诗一千二百一十八首,各体文五百六十九篇,分为四十卷。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本。今人栾贵明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十八首、文二十四篇,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然所收未尽。吴开《优古堂诗话·得茶三昧》条所举赠钱唐南屏谦师诗“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云云,施元之《注东坡先生诗·送刘攽倅海陵》注引攽熙宁四年所作《题馆壁》“壁门金阙倚天开”云云,皆不见今本《彭城集》,知佚漏尚不少。

(孔凡礼)

【西溪集】 诗文别集。十卷。宋沈遵撰。南宋初,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将沈遵《西溪集》与沈遼《雲巢集》、沈括《长六集》合刻,刊于括苍,称《吴兴三沈集》。今《四部丛刊三编》有《沈氏三先生文集》。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将《三沈集》并为八卷,《西溪集》在卷一至卷三,而《西溪集》之内又按宋刊分为十卷,卷首题衔“遵”字注“御名同音”,犹存宋刻体制,可知其为明翻宋刻本。

(张丽娟)

【忠肃集】 诗文别集。一作《刘忠肃集》、《刘忠肃公集》、《刘忠肃公文集》、《刘摯集》。宋刘摯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八月,刘安世为作序;序称摯之作“凡奏议、论、说、记、序、铭志、诗、赋诸文总千余篇,次第著集为四十卷,藏于家”,在此后不久即刻印

行世。其书,《遂初堂书目》有著录。《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郡斋读书志》附志均著录为四十卷,后者并称“忠肃制诰附于后”。《宋史·艺文志》著录卷数同上。《文渊阁书目》卷九谓“一部十册,完全”。以后遂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凡得文二百五十三篇,诗四百四十一首,分为二十卷。《武殿英聚珍版丛书》收入此书,辑得文三篇,为《拾遗》一卷。然犹未尽,今人栾贵明,检《永乐大典》残卷,得诗四首、文一篇,辑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其文乃《玉堂集序》,较《拾遗》所收者,多近三百字。

(孔凡礼)

【王令集】 诗文别集。二十一卷,拾遗一卷,其中诗十一卷。宋王令撰。令生前贫困,早卒,未尝編集。令去世后遗腹女,后嫁吴师礼,生吴说。其集乃令卒六十餘年后由吴说编成,名曰《广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未曾刊印,只有抄本流传。后又有人辑得其策问十八篇为补遗一卷,集外佚诗文为拾遗一卷,附于集后。1922年,吴兴刘承幹辑《嘉兴堂丛书》多收宋元遗书,《广陵先生文集》亦被采入。刘刻本据卢文招抱经楼抄本刻印,此本校勘不善,且多臆改之处。今人沈文焯以刘本为底本,校以清孙诒让所藏玉海楼明抄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按《四库全书》作三十卷,与通常抄本分卷不同,内容则无大差别)、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蒋继弼抄校本与吴翼凤藏陈岩、顾友桂校定旧抄本,并参照了《宋文鉴》、《宋文钞》、《王文公文集》中所涉及到的王令诗文,编成《王令集》,后附有关王令及《王令集》的参考资料,与沈文焯自撰《王令年谱》以及“序跋提要”等等。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

(王学泰)

【青山集】 诗别集。一作《郭祥正集》。宋郭祥正撰。今存《青山集》最早刻本,为南宋初刻本。此本三十卷,收诗一千四百二十首,藏北京图书馆。此本有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间重印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著录。北京图书馆藏清影宋抄本,其卷二较南宋初刻本多《桃源行寄张兵部》一首,当成咸淳本。此书流传至清,出现了一些混乱。《四库全书》所收此书,除正集三十卷外,尚有续集七卷。正集编次与宋本不同,宋本卷一为歌行,此为楚辞体,卷一九为挽诗,此本挽诗在卷三〇。续集首二卷所收诗,在宋本的一些卷中;后五卷乃孔平仲诗,在《清江三孔集·朝散集》中。此本较宋本少收歌行五首、五古六十首。《四库全书》本之后,有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刻本。道光本正集三十卷,续集五卷。《四库全书》本续集卷一、二之诗,分见道光本的一些卷中,余皆同。南宋初刻本已于1990年由书目文献

出版社影印出版,堪称善本。(孔凡礼)

【冯安岳集】诗别集。三十卷,存一至十二卷。宋冯山撰。《郡斋读书志》著录《冯允南集》十卷。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中,泸州周锐将冯山与其子冯澥诗文集合刊,前有刘光祖《太师左丞合集序》及何惠固《二冯先生文集序》。冯山集本三十卷,今仅存前十二卷,皆为诗,十三卷以后惟有目录,而文不传。今存若干清代抄本。常见者有民国年间李氏宣秋馆据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刊《宋人集乙编》本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东坡七集】诗文别集。一作《苏文忠公全集》。宋苏轼撰。苏轼诗文,苏辙《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著录者凡六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四卷。六集合刊,加上《应诏集》十卷,便是七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皆著录。此七集,共收诗二千零八十七首(包括帖子词口号六十五首,原收《内制集》)、文一千五百八十九篇(不包括帖子词口号)。此书至明初传世已稀,明宪宗成化(1465—1487)间,程宗为重刻,易《和陶集》为《续集》,他如旧。后人简称程刻为《东坡七集》。《续集》除包括《和陶集》外,尚收诗五百二十六首、文一千一百四十六篇。以诗而论,其中八十多首系他人之作,如《送淡公二首》唐孟郊作,《辘轳歌》唐顾况作,《雷州八首》秦观作,《申王画马图》蔡肇作,《送公为游淮南》晁补之作,《再过泗上二首》张耒作,《答子勉三首》黄庭坚作;其中四十多首,已见《东坡集》、《东坡后集》,系重出,如《代书寄桃山居士张圣可》,即见《东坡集》卷一二,题作《正月二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雨二首》即为《东坡后集》中的《连雨江涨二首》。其余大约四百首,包括《郭纶》等七十九首源自宋仁宗嘉祐(1056—1063)间苏洵、苏轼兄弟自蜀江行转陆赴京师途中倡酬结集——《南行集》之诗,可信为苏轼作。所收之文,少数篇乃他人之作误入,数篇重出,如《与谢民师推官书》乃《东坡后集》卷一四《答谢民师出》。其余包括书简八百篇在内的文章,皆可信为苏轼作。然苏轼诗文犹未全尽于此。此后清查慎行广泛搜求佚诗,并在宋百家注(题王十朋集)、施元之《注东坡先生诗》的基础上,为《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冯应榴继起搜求,并集诸家之注,益以己意,为《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二书收诗近二千七百首(不包括他集互见卷中的他人所作诗)。查氏稍前,明末茅维第一次把苏文全部辑集在《苏文忠公文集》(后来改名《东坡先生全集》)的前七十三卷中(后二卷为词)。此书收文三千八百多篇,其中书简约一千三百篇,较《东坡七

集·续集》约多五百篇。苏轼有大量题跋杂记一类的随笔体文字,宋时,已收入《东坡手泽》、《仇池笔记》、《苏沈内翰叢》、《大全集》中的《志林》、《杂说》以及《百斛明珠》、《东坡诗话》等书中。茅本广为辑集,共得九百零七篇;而《东坡七集》所收此类文字,不过数篇。解放以后,苏轼诗、文集分别点校整理。《苏轼诗集》卷一至卷四六以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卷四七至卷五〇,以冯应榴《苏文忠公合注》为依据;其末《增补》,收新辑佚诗十多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1991年两次重印。《苏轼文集》底本为茅本。茅本辑文仍未尽,整理者复辑得苏轼佚文四百二十多篇(其中一些是残篇),附《苏轼文集》之后,以《苏轼佚文汇编》之名行世。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重印。(孔凡礼)

【栾城集】诗文别集。一作《苏文定公文集》、《苏文定公集》、《苏文定公栾城集》、《苏辙集》。宋苏辙撰。据辙曾孙诒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所撰《栾城集跋》,此集其时已有建安本、麻沙本、蜀本、家藏本。益以诒所刊本及诒之子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丁卯(1207)所刊本,则在宋时即有六种刊本。以后各代刊行不断。在流传过程中,此集形成两个系统。一为九十六卷本,即包括《栾城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据诒跋,前三者乃辙自编类。《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之本即此本。现存最早宋刻,为《苏文定公文集》,存四十六卷;明清梦轩刻《苏文定公栾城集》、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眉州三苏祠刻本(卷数、文字与清梦轩本有出入)、清宛陵贡彧刻本属此系统。另一系统则缺《应诏集》,且缺三十七章疏;属于此系统者有宋刻递修本《苏文定公集》、《栾城集》,皆残。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朱让栩本、明活字本、《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今人曾枣庄、马德富校点的《栾城集》及陈宏天、高秀芳点校的《苏辙集》,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七、一九九〇年出版。前者辑得不见于以上各集的佚作三十七篇,后者辑得七十五篇。

(孔凡礼)

【鄱阳集】诗别集。十二卷。宋彭汝砺撰。汝砺为饶州鄱阳人,故集名《鄱阳集》。史称其所著有《易义》、《诗义》及诗文凡五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鄱阳集》四十卷。今本仅存其诗十二卷,非其完帙,且编次错互,已非原貌。今存若干种清代抄本,均为十二卷。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周彦、高泽履刊本附有《补遗》一卷。通行本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陶山集】诗文别集。十六卷。宋陆佃撰。佃字

农师,《遂初堂书目》著录《陆农师集》,当即此集。《嘉泰会稽志》卷一五《陆佃传》谓“佃著书二百餘卷。《埤雅》、《礼象》诸书,今传于世。”《陶山集》当在此二百餘卷中。盖佃以经学名世,故未提及其诗文集。《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此集,凡二十卷。《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谓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未及此集,其时流传已少。《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此集二部,一为五册,一为四册,云皆缺。自是遂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分十六卷,凡诗二百二十四首,文二百二十二篇。今人栾贵明检《永乐大典》残卷,得文一篇,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佃诗未入集者,尚有佃孙游所撰《家世旧闻》所引《戏马涓》一首,《瀛奎律髓》卷四二《赠别吴兴太守中父学士》一首,《诗林万选》所选之《送人之润州》一首。

(孔凡礼)

【参寥集】诗别集。一作《参寥子诗集》、《参寥子集》。十二卷宋释道潜撰。涵芬楼铅印本《说郛》卷三八引朱弁《续骈韵》:道潜卒后,“其法孙法颖以其集行于世,然犹有不传者”。《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著录,凡十二卷。《咸淳临安志》卷七〇《道潜传》亦谓“法颖以其诗集行于世”。今传宋刊本每卷次行,均有“法孙法颖编”五字,当即朱弁与《咸淳临安志》所云之本。又有题为“三学院法嗣广穹订,智果院法嗣海惠阅”之本,亦为十二卷,其叙次与法颖本迥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汪汝谦刊十二卷本,分卷编次与法颖本不同,疑所本乃广穹、海惠二人所编本。明刊本比法颖本少诗十八首;法颖本许多注脚,明刊本不见;法颖本远胜明刊本。法颖本的通行本,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宋刊本。该本收入《四部丛刊》三编,有张元济跋。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7),钱塘丁氏刊《武林往哲遗著后编》,收入此集,所据即明刊本,有汪汝谦、吴之屏、黄谏序,附录《东坡评道潜》、《秦观评道潜》各一卷。

(孔凡礼)

【山谷集】诗文别集。七十卷,其中《内集》三十卷,诗十二卷,《外集》十四卷,诗十一卷,《别集》二十卷,诗一卷,词一卷,《简尺》二卷、《年谱》三卷。宋黄庭坚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庭坚在听退堂始编自己早年诗作,从千餘篇作品中焚毁三分之二,餘者编成一集,名《焦尾集》,后以为可传者又编为《敝帚集》。此二集皆不传于世。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庭坚外甥洪炎主持编辑了《豫章集》三十卷,集中收诗七百首,只录存神宗元丰(1078—1085)以后作品,早年作品被删削殆尽。此即所谓“山谷内

集”。现存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年间本《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录诗七百零八篇。此本与洪炎原编本相去不远,只是所收作品略有增加,编次也略有差异,可能经过李彤重编。乾道本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影印本。南宋孝宗期间,李彤又编《豫章外集》十四卷。前七卷为诗,中间三卷为文,后四卷又为诗。李彤跋云:“彤曩闻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盘礴云窗,为清禅师编阅《南昌集》,仍改定旧句。彤后得此本于交游间,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诗者,五十餘篇,彤亦尝见于它人集中,辄已除。其称不用者,安敢弃遗,今外集十一卷至十四卷是也。”可知庭坚尚有《南昌集》,系作者生前他人所编,故混有别人作品五十餘篇。此集经过黄氏删定。李氏不肯将庭坚所删弃遗,故放在文后,编为四卷。此本即所谓“山谷外集”,所存早年作品很多,故史容在《外集注序》中言“《焦尾》、《敝帚》即外集诗文也”。此集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皆有著录,但无宋刻传世,后世刻本多附《山谷内集》以行。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庭坚孙黄耆在编纂《山谷先生年谱》的同时又搜罗到山谷内、外集所未收之诗文八百八十一篇,其中诗七十六首,编为《山谷别集》二十卷。此编宋代亦有刻本,晁、陈二书皆有著录,但未见传世。后代所刻黄集多将内、外、别三集同刊,再附以词、简尺、年谱等。现在仍可见的最早的三集合刊本为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叶天爵初刻、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余载仕、乔迁等人重修补刻本。此编除包括词、简尺外,还附庭坚父黄庶《伐檀集》二卷。黄耆所撰《年谱》作三十卷,故全编凡九十九卷,号称《黄先生全书》。此集基本用宋蜀刻本为底本,残缺之处,补以元刻本。因此不失宋本遗意,故为世人学界所重。《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只是删去《伐檀集》(另编)、黄耆之《年谱》作三卷,故为七十卷。现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耆之年谱,专为考证诗文集而作,故刻全集必当兼刻年谱。而近日刻本,或删节年谱,或删并卷次,或移易分类,以就各体,或专刻一集,而不及其全。此本刻于明嘉靖中,前有蜀人徐岱序,尚不失宋本之遗,非外间他刻所及焉。”所谓“他刻”如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方罔等所刻《黄文节山谷先生集》(只刻内集)三十卷、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友梅所刻《外集》、《别集》三十四卷。清高宗乾隆三十年(1765)缉香堂刊《宋黄山谷先生全集》正集三十二卷、外集二十四卷、别集十九卷,对原来分卷编次作了较大的更动。后世刊本多据此,遂失宋本真意。另外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黄铢所刻《豫章黄先生遗文》十二卷及

南宋坊间所刻《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集》等刊本中还有少量黄庭坚佚诗,可备收载。(王学泰)

【清江三孔集】 诗文合集。一作《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孔清江集》、《孔清江文集》。宋孔文仲(1037—1087,字经父,《宋史》卷三四四有传)与其弟武仲、平仲合撰。文仲兄弟为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以文鸣江西,时号“三孔”。著述颇多,多散佚,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王遂守临江,始搜辑刻印成集,计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共四十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宋史·艺文志》有著录。《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云“一部十一册”,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云四十卷;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实为三十卷,缺平仲集十卷。近人胡思敬刻《豫章丛书》,收入此书,计文仲《舍人集》二卷,武仲《宗伯集》十七卷,平仲《朝散集》十五卷,缺平仲集六卷。明旧写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平仲集残本缺卷俱在,计书、小简、记、序、杂著、祝文、祭文、疏语、行状、书纪传后各体文共九十五篇。藏北京图书馆。(孔凡礼)

【画墁集】 诗文别集。一作《张浮休集》、《张舜民集》。宋张舜民撰。八卷。宋徽宗政和(1111—1117)末,刊于汴京,购者至填塞衢巷,禁不止。南渡初,有临川雕本《浮休全集》。见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七《书浮休生画墁集后》。《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一百卷,又《奏议》十卷;卷二下著录《使辽录》二卷,卷三下著录《南迁录》二卷,知二者在集外单行。《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一百卷;《宋史·艺文志》同。《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一部九册,然已缺。书亡于明。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前四卷有诗一百七十四首,词三首,卷五、六收文十三篇,卷七、八为《郴行录》,当即《南迁录》。鲍廷博为《补遗》,收文一篇,诗六首。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中。今人栾贵明检《永乐大典》残卷,得引自张舜民的著述七十五条,而四库馆臣漏辑者竟达五十条(包括诗三十三首、文十七篇)。以残卷较全帙,四库馆臣漏辑者,当甚可观。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也有舜民诗残句。(孔凡礼)

【姑溪居士集】 诗文别集。一作《姑溪集》、《姑溪居士文集》、《姑溪居士全集》。宋李之仪撰。之仪晚年居当涂之姑溪,卒后,其作品散失。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吴芾守当涂,乃求其作品于“邦人,类而聚之,命郡士戴埴订正,厘为五十卷,锓板于学”(见集序)。《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姑溪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不知《后集》是否为吴芾所辑编。本书为诗、文、词合集。《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一著录《姑溪词》一卷,知词于集外同时单行。《宋史·

艺文志》著录同《直斋书录解題》。《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姑溪集》一部十册。明有吴宽丛书堂抄本,然不全。清有宣统三年(1911)刻本。周紫芝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得交之仪,其《太仓稊米集》次之仪韵之作颇多,而之仪原作皆不见;之仪善简牍,周紫芝得两牛腰,今所见之仪尺牍,亦无及紫芝者,知之仪诗文散佚仍多。之仪词名高于诗名,然有他人之作误入,如《好事近》“相见两无言”即非之仪作。

(孔凡礼)

【西台集】 宋人别集。二十卷。毕仲游撰。其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五十卷,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一九亦著录为五十卷(袁本作二十卷)。原本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重编成二十卷。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山右丛书》初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丽娟)

【淮海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宋秦观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作者自编诗文集十卷,名为《淮海闲居文集》,其中收诗一百一十二首,已佚;后又自编《逆旅集》,亦已佚。现存四十卷本《淮海集》只有题为《淮海先生闲居集》之宋刻残本,不知何人所编。有人疑此为秦集最早之编成刻本。附有《后集》之《淮海集》有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原刻本、光宗绍熙三年(1192)永嘉谢零重修本,包括《正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后世刻本多由此出,如明黄瓚曾刻于山东、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张缙刻于鄂州、嘉靖二十四年(1545)胡民表刻于高邮。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之藻再刻于高邮。《四部丛刊》据张缙刻本缩印,《四库全书》亦据张缙本采录。然此本实为残本,勉强凑四十卷之数,有些卷次仅二页。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7),王敬之以李之藻本为底本加以重编,编为《淮海集》十七卷、《后集》二卷、《词》一卷。此本文字经过校订,辑出许多佚诗佚文。对《淮海集》中与他人重复互见之诗文。加以考证注明,前后集互相重出之诗加以删除。此编常见者有王氏原刊本与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所编《四部备要》本。(王学泰)

【宝晋英光集】 诗文别集。八卷,诗一卷。宋米芾撰。米芾本有《山林集》一百卷,南渡时亡于兵火战乱之中。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芾孙米宪辑《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包括赋、诗、词、文、《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各一卷,刻于筠阳郡斋,今尚存此原刻本,前有蔡肇所撰米芾墓志,后有米宪手书之跋。跋作行书,论者以为有乃祖之流风馥韵。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岳珂官润州,修葺

米祠,摭其遗文,合为一编,本六卷,后又经人附益,亦作八卷,所录诗、文较《宝晋山林集拾遗》多数十篇。《四库全书》所收乃此本。此本明有刻本与抄本,皆为六卷,犹存宋代原刻遗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宝晋集》十四卷、可能是合《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宝晋英光集》六卷而言。至清则《宝晋英光集》亦作八卷,甚至有作十卷者,其中多杂取吴中贗迹。《宝晋英光集》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及《丛书集成》本。

(王学泰)

【庆湖遗老集】诗别集。一作《庆湖遗老诗集》、《庆湖贺遗老集》。宋贺铸撰。铸自七岁起,即学诗,日以章句自课,至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1088),凡著之稿者,约五六千首。然以为妄作,三数年一阅,屢焚之。以后,拾其馀而缮写之,至绍圣三年丙子(1096)成集,止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前,为九卷,自作序,凡收诗四百七十二首。是为《前集》。徽宗政和三年(1113),程俱为作序。宣和七年(1125),铸卒,程俱为撰墓志铭,称铸有《鉴湖遗老前、后集》二十卷,知《后集》为十一卷。其书未刻,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间,金人占据铸寓居地毘陵。铸“所著文编,悉为虏酋携去,独巾箱有别录庆湖诗《前集》在”(乾道丙戌寇翼序),于是《后集》散佚。南宋光宗绍熙四年癸丑(1193),胡澄刊《前集》九卷,并得古风一首,近体长句五十八首、七言绝句二十首,为《拾遗》一卷(一作二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有著录。《宋史·贺铸传》谓有集二十卷,盖袭墓志铭之旧。《宋史·艺文志》谓有集二十九卷,疑有刊刻讹误。《四库全书》本唯收《前集》九卷。1916年,李之鼎据开有益斋朱述之本校刊,较《四库全书》本多拾遗一卷、补遗一卷,附杨时、寇翼、胡澄诸人序跋及程俱所撰墓志,其书在《宋人集》中。墓志称铸“它文数十百篇”,周辉《清波杂志》亦言铸文甚多,然已“不传于世”。今其文无一篇传。墓志谓铸有“乐府辞五百首”,今存二百八十四阙。张耒序其词集,名《东山词》,不著卷数。《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一著录《东山寓声乐府》三卷,李冶《敬斋古今藪》卷八有《东山乐府别集》之目,当时传刻甚多。

(孔凡礼)

【后山居士文集】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六卷。宋陈师道撰。师道全集最早为其门人魏衍所编,其《题记》云:“衍从先生学者七年,所得为多。今又受其所遗甲、乙、丙稿,皆先生亲笔。合而校之,得古律诗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诗曰五七,杂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类。衍今离诗为六卷,类文为十四卷,次皆从旧,合二十卷,目录一卷,又手书之。”南宋任渊即据此本作《后山诗注》。魏衍编本最

早刊于南宋蜀中眉山地区,前有写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之谢克家序。此刻至今尚有传本,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此本影印出版。此书原缺第六卷第二十二页,据目录知此页为诗《晚兴》最后两行,《宿齐河》、《别刘郎》、《赵岩》、《鸡笼镇》诗及《东阿》诗题。校者据《宋刻后山诗注》补足,录于后。南宋即有《后山外集》之编。据陈振孙所记,《外集》六卷,收“诗二百餘首、文三篇,皆正集所无”(见《直斋书录解題》)。方回言魏衍所编陈诗始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见《唐师善月心诗集序》)《外集》所录则多为少作。至明,陈集复有三十卷本传世(此本可能包括《后山谈丛》、《后山诗话》、《后山长短句》,其诗文仅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录者为二十四卷本,云:“此本为明马叡所传,而松江赵鸿烈所重刊。凡诗七百六十五篇,编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编九卷;《谈丛》编四卷;《诗话》、《理究》、《长短句》各一卷。”此本录诗较宋刻《后山居士文集》与《后山外集》所录诗之和还多,然其间真伪杂糅,远不如宋刻真确可据。

(王学泰)

【鸡肋集】诗文别集。一作《晁补之集》。宋晁补之撰。卷首宋哲宗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1094)自序,但云哀而藏其所为诗文,名乃自定,其全名为《鸡肋集》。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从弟谦之刊于建阳,计古赋骚辞四十三首,古律诗六百三十三首,表启杂文史评六百九十三篇,凡七十卷。《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之本皆此本。《遂初堂书目》有“晁无咎《鸡肋集》”,未云卷数。《宋史·艺文志》既著录《晁补之集》七十卷,又著录“晁补之《鸡肋集》一百卷”。知二者当时并行。《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十六册。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1635),吴郡顾氏诗瘦阁仿宋刊七十卷本重刊;民国年间,上海涵芬楼复据以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今七十卷宋刊本已早佚,一百卷本,历代藏书家均未言及,不得知其详。《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一著录《晁无咎词》一卷,知补之之词乃单行;今传本名《晁氏琴趣外篇》,凡六卷,有双照楼本。

(孔凡礼)

【张右史文集】一作《宛丘先生文集》、《宛丘集》、《柯山集》、《张耒集》。诗文别集。宋张耒撰。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汪藻编定《柯山张文潜集》(周紫芝记作《张龙阁集》)三十卷,收诗一千一百六十四首,文一百八十四篇。是为张氏诗文集的最早之本。绍兴十三年(1143),张表臣编定《张右史集》七十卷,收古赋三十二篇,诗二千二百五十首,文二百六十四篇,加上《同文唱和》诗,共计二千七百多篇。另有《柯山集》十卷本、收诗文一千八百三首的

《谯郡先生集》一百卷本,见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七《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宋人书目著录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柯山集》一百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宛丘集》七十卷,又蜀本七十五卷。现存张氏诗文集,其卷数与宋本无一相同,分为四个系统:一、《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其中明代小草斋抄本,残,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吕无隐抄本,全,此本所收诗文较完备;二、《张右史文集》,有清翁心存校跋的明抄六十五卷本,有《四部丛刊》影旧抄六十卷本;三、《柯山集》,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武英殿聚珍五十卷本,有闽、粤重印聚珍本并附陆心源所辑拾遗《柯山集补》十二卷及无名氏辑续拾遗一卷本,有傅增湘校补并跋的粤本,有1929年田毓璠据段蔗丈所藏粤本校勘重印本;四、《张文潜文集》,十三卷,乃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选本。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点校整理本《张耒集》是所传张氏著作各种本子的合集。整理者从1929年《柯山集》本为底本,对部分篇章卷次重新进行了编排,如将《同文唱和》由卷二七至卷三〇,移于最后,即卷六二至卷六五;删去其重出者;混为一篇者,据他本分开;底本原缺,据《宛丘先生文集》、《张右史文集》所补诗文,按文体编入各卷。整理者另据《全宋词》辑出张氏所作词,编成一卷,次于集中。复据《竹坡诗话》等书辑出诗十六首(句)、赞文一首,编为《佚文辑存》,置于集末。凡收诗二千二百二十六首、《同文唱和》诗二百二十三首、词六首、文三百一十六篇,是目前收辑张耒作品最全的本子。(孔凡礼)

【**济南集**】 诗文别集。一作《济南月岩集》、《李方叔文集》、《李廌集》。宋李廌撰。廌卒后,其子集其文名曰《月岩集》,宋徽宗政和六年(1166),李之仪为序。序见《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本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著录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云一部四册,全。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俞弁撰《逸老堂诗话》,其书卷上尚引廌文字,知其时其集尚传。以后遂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各四卷,凡八卷;廌所撰《德隅堂画品》,别为一本。1921年,李之鼎为之校勘,收入《宋人集·丙编》,以《德隅堂画品》附后。今人栾贵明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一首,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吕本中《紫薇诗话》引廌作《赠汝州太守诗》“安得”云云一联、《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宋史·李廌传》节引廌作祭苏轼文,今集中皆未收,知所遗者尚多。(孔凡礼)

【**东堂集**】 诗文别集。十卷。宋毛滂撰。滂尝知武康县,县有东堂,故名其集。《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堂集》六卷、《诗》四卷、《书简》二卷、《乐府》二卷。

原本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采辑其诗文,编为十卷,其中诗四卷,文六卷。另有《东堂词》一卷。通行本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丽娟)

【**乐静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昭玘所居有乐静堂,自号乐静先生,故以名集。集为其侄李邴所编,并有后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乐静集》三十卷,并云“其侄邴汉老为书其后”,《宋史·艺文志》著录《李昭玘集》三十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亦有著录,记其集包括诗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记一卷、传序一卷、杂文二卷、书二卷、表三卷、启状七卷、疏一卷、青词疏文一卷、僧疏一卷、进卷二卷、试馆职策一卷、碑志行状三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今存有影写宋绍兴刻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另有若干清抄本。通行者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张丽娟)

【**宗忠简集**】 诗文别集。全称《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一作《宋宗忠简公集》、《宗忠简公集》、《忠简公集》。宋宗泽撰。泽卒后不久,四明刊泽《遗事》,引泽表、疏多篇。南宋中叶,楼昉教授金华,泽曾孙有德出示泽遗文若干卷,昉为补缀而袭藏之。昉旋守南徐,乃以遗文锓梓,并掇取《遗事》所载表、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十二月为序。其书,《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流传不广。此书,明初有刊本,方孝孺为序。今二本俱佚。今所存刊本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刊六卷本、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刊十二卷本、《四库全书》八卷本、《金华丛书》七卷本。各本前六卷皆为撰著,卷一至卷四及卷六为文,卷五为赋及诗。所作散佚甚多,如请还京疏,原为二十四篇,今仅存十八篇。其他各卷为遗事、附录,所收多寡不一。以《四库全书》本为例,卷七为《遗事》,卷八为附录。其附录有敕札、谥辞、题辞、祠记、吊诗、象赞、题墓等。(孔凡礼)

【**晁具茨集**】 诗别集。十五卷。宋晁冲之撰。喻汝砺在《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中言冲之“疾革,乃取平生所著书,取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所存诗“二百许篇”。冲之子晁公武所编《郡斋读书志》著录其父集,名为《晁氏具茨集》分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具茨集》十卷。宋刻已不可见。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冲之裔孙晁璠宝文堂仿宋刻《江西诗派》本重刊,此本为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黄汝嘉刊行,只作一卷。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有晁氏重刊本,收入《晁氏丛书》内,作十五卷;又有梁溪周氏仿宋刻巾箱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番禺番氏刊《海山仙馆丛书》,收此书,亦作十

五卷。《天一阁书目》中作六卷。另有阮元所刊《宛委别藏》本,亦作十五卷,每卷多者录诗二三十首,少者仅数首,中有作者自注及他人所作小注,阮氏估计为明人所注。《宛委别藏》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王学泰)

【溪堂集】 诗文别集。十卷。宋谢逸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溪堂集》二十卷;卷二〇又著录《溪堂集》五卷、《补遗》二卷;卷二一著录《溪堂词》一卷。其集久无传本,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其诗文,订正讹舛,厘为十卷。通行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1915)年胡思敬刊《四宋人集》本,收入《豫章》丛书。

(张丽娟)

【日涉园集】 诗别集。十卷。宋李彭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李彭《日涉园集》十卷。久无刻本传世。北京图书馆有一旧抄本,凡五卷,分体编次,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年人孔继涵手写目录。另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检《永乐大典》所载彭诗颇多,钞撮编次,共得七百二十余首,诸体咸备,谨校定讹谬,仍厘为十卷,以还其旧。”此本前四卷为五言古诗,卷五、卷六为七言古诗,卷七为五律与五言排律,卷八为七言律诗与七言排律,卷九、卷十为五、七言绝句,以及从《两宋名贤小集·玉涧小集》中所采掇之佚诗。孔继涵写本应与《四库全书》本有所差别。1915年刊《豫章丛书》收《四库全书》,作十卷,补遗一卷。

(王学泰)

【竹隐畸士集】 诗文别集。又称《赵承之集》、《竹隐畸士文集》、《竹隐集》。宋赵鼎臣撰。本一百二十卷,鼎臣之孙纲立刊于復州,刊止四十卷而代去,遂止。《遂初堂书目》著录,未云卷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凡四十卷,《宋史·艺文志》同。《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八册。《篆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十一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四十卷。其集约佚于明末。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复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二十卷:卷一至卷七收赋四首、四言诗二首、五古三十八首、七古四十首、五律五十三首、七律九十四首、五排一首、五绝九首、七绝五十四首。卷八至卷二〇,收各体文一百九十五篇。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清丁宝书抄本(丁丙跋)、清抄本(其一有朱笔校)。今人栾贵明《明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二首、杂著三十三篇。

(孔凡礼)

【唐子西集】 诗文别集。二十四卷,诗十卷。宋唐庚撰。唐集,《宋史·唐庚传》与《直斋书录解題》皆作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十二卷(可能包括《三国杂事》),《郡斋读书志》作十卷。唐集有闽、蜀两种

刻本,闽刻卷数多于蜀刻本,学者遂疑《解題》所据为闽刻本,《读书志》所据为蜀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郑康佐刊唐集并作跋;跋语中称其父郑总与庚交好,曾道过鹅城(即惠州),往谒庚,得庚文四十五篇,诗赋一百八十五首,又云:“康佐承乏惠阳,暇日阅公集,盖东坡先生与唐公谪居时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二首、诗赋二百八十七首,较之吾先君所传,颇有重复。既而进士葛彭年以所藏闽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诗赋二百八十七首,较之所见稍加多矣;而篇秩散乱,句读舛讹,殆不可辨。未几,又得蜀本于归善令张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较之闽本益加多矣,而增损甚少,可以取正。遂属教授王维则讎,旁援博取,而唐公之文遂为全编,因其名类,勒为三十卷。”此本刊于惠州,带有舛合之性质,但去其重,而不加编定,故其次序零乱,其前五卷为赋、诗,卷六至卷一六为文和赋二篇,卷一七至卷二二为赋、诗和四篇记,其余为文,共收文一百五十五篇,诗、赋三百一十七首。原刻本已佚,然影写本仍传于世。民国年间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出版。另外宋二十卷本(如包括《三国杂事》为二十二卷)亦有写本传世。清世宗雍正(1723—1735)年间,汪亮采得明末徐燊从何楷家抄传之二十卷本,后又得三十卷本,重为编次,为就《宋史·艺文志》所载之卷数,分为二十二卷,又将《三国杂事》二卷计入,成二十四卷本,题为《唐眉山集》,有雍正三年(1725),南陔草堂活字印本。《四库全书》收此本改题为《唐子西集》。另有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任佃刊《唐先生集》作七卷,藏书家咸认为文字较善。

(王学泰)

【石门文字禅】 诗文别集。三十卷。宋僧惠洪撰。惠洪集为其门人觉慈所编,因惠洪曾住洪州石门,故名。今有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刻径山藏本。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丽娟)

【斜川集】 诗文别集。宋苏过撰。其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著录为十卷,《宋史·艺文志》同。而《宋史》卷三一八《苏过传》则记为二十卷。二本并行。明初修《永乐大典》有征引,自后不久即散佚。《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斜川集六卷提要》云:“乾隆朝仁和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复从各书纂辑诗、文若干,……合之犹可成帙,然竟未及钞入《四库全书》,深可惋惜。”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赵怀玉为之校刻,收诗文二百七十八篇。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8),法式善复在赵刻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中,再辑得诗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鲍廷博以赵刻本为底本,益以法氏所辑,益以他书所

见,为之重刻,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中,共诗文三百六十七篇。其中诗二百七十七篇。然苏过之作,待辑者仍多。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旧抄本《斜川集》较鲍本多诗十三首,周在浚《晋稗》有未见鲍本的诗一首,《永乐大典》卷八九六所引张侃《拙轩集》中《先公守汝阴尝以诗送都曹路君……》,乃过步其父轼《送路都曹》(韵轼诗见《苏轼诗集》卷三四),卷一五〇四〇尚有未见鲍本的文一篇。(孔凡礼)

【横塘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六卷。宋许景衡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横塘集》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与之相同。许集在宋时已有台州郡斋刊刻三十卷本(见《赤城志》)。此本久佚,元以后很少见藏书家著录。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采掇哀次,编为二十卷,前六卷为诗,后十四卷为古文杂著。后即有抄本出现。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书》。另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丹阳集】 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宋葛胜仲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丹阳集》四十二卷,《后集》四十二卷。根据南北宋之交文人惯例,正集(或称前集)一般收录北宋时期诗文,后集收录“中兴以后”(即南宋时期)诗文。葛氏之正集与后集,大约亦如此区分。《宋史·艺文志》著录《葛胜仲集》八十卷,可能是通计其数。据胜仲之婿章侔所作行状称,“有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初刊版于真州,兵燹残阙,隆兴甲寅(疑为甲申,即1164年),知州事宋晓修补之,自跋其后”,“淳熙丙午(1186年)知州事姚格又为重钁,中书舍人王信为之跋”。可知葛集在宋时有数种不同之版本。因此,关于葛集记载多歧异。宋以后胜仲之集遂无见于书录记载。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分类编辑,厘为二十四卷,包括文十五卷、诗七卷、词一卷、所附行状、谥议等为一卷。然宋刻并未完全沉灭。近人傅增湘曾在北京书肆访得《丹阳后集》残页二张,据其考订,当为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浙江刻本。二十四卷本,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所刻《常州先哲遗书》本。(王学泰)

【洪龟父集】 诗别集。一作《清虚集》。二卷。宋洪朋撰。洪朋歿后,同郡黄君著汇集其诗百篇;黄庭坚见其本,称为篇篇可传。其集,《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洪朋《清虚集》一卷,久无传本。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分体编排,得一百七十八首,编为《洪龟父集》上、下两卷。四库馆臣漏辑者,见《四库拾遗》。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洪汝奎刊《晦木斋丛书》,所收《豫章三

洪集》中有朋集二卷,补遗一卷。(张丽娟)

【西渡集】 诗别集。二卷,补遗一卷。宋洪炎撰。洪炎当有诗集数种,其早年就有《倦壳轩集》,然传世者仅此《西渡集》一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作一卷,明焦竑《经籍志》著录此书亦作一卷。直至清仍有宋刻或旧抄本行世。《四库全书》收此集时未用宋刻及旧抄本,而采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鲍本分为上、下两卷,卷末补遗五首诗,另外还附有清人从《宋元诗会》、《辟疆园宋文选》中所辑录的洪朋诗九首、洪刍诗二十四首、记二篇,因朋、刍二人集皆已录入《四库全书》,此为复赘,故删之不录。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朱氏惜分斋刊《西渡诗集》一卷、《补遗》一卷。傅增湘据朱之鈞藏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宋莘家抄本对校,发现朱刻本尚少炎初至临安诗五首。此外,尚有清文宗咸丰(1851—1861)年间金山钱氏所刊《小万卷楼丛书》本与光绪(1875—1808)年间洪汝奎刊《晦木斋丛书》本。(王学泰)

【老圃集】 诗别集。二卷。宋洪刍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老圃集》一卷,但此集所收并非其诗作全部。周紫芝跋云:“此其所载,意其多晚年之作,与昔所见殊不类。”(《书老圃集后》)此跋作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1152年)春,云:“滑台刘德秀借本于妙香寮,乃书以还之。”可见在南宋即已有刻本流传。清沈涛《洪老圃集跋》云,宋人诗话及《合璧事类》所载驹父诗不见此集者甚多;又言宋“谢枋得《秘籍新书》言驹父平生为诗千余篇,著《老圃前后集》”(《十经斋文二集》)。是知一卷本《老圃集》远非洪诗之全部,而此一卷本后亦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洪诗一百七十馀首,因篇幅稍多,分为上、下二卷,以便循览。清文宗咸丰(1851—1861)间韩泰华辑刻《玉两堂丛书》,亦收洪集一卷,补遗一卷,名为《洪老圃集》。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洪汝奎刊《晦木斋丛书》亦收其集二卷,《补遗》一卷,《遗文》一卷,题作《老圃集》。(王学泰)

【初寮集】 诗文别集。八卷,其中诗、赋二卷。宋王安中撰。安中以四六骈文名于时,诗亦曾为宋徽宗叹赏。《宋史》本传记其“有《初寮集》七十六卷传于世”。《郡斋读书志》著录王履道《初寮集》十卷、《内制》十八卷、《外制》八卷,凡三十六卷。《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初寮先生前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并云:“《读书志》止载《初寮集》十卷。希弁所藏乃周益文忠公必大序,《前集》中兴以前、《后集》中兴以后文也。《内外制》二十六卷,则李文敏公邴序。”《直斋书录解题》记《初寮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内外制》二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记《王安中集》

二十卷。四个记载中唯有赵希弁之《郡斋读书志·附志》所记与《宋史》本传同。这些不同卷次之王集皆佚,亦不见抄本流传。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采掇哀次,得诗文数百篇,厘为八卷,前二卷为诗赋,后六卷为古文杂著,前有周必大、周紫芝及李邴三序。考诸南宋间诗话杂著,知安中诗文遗佚尚多,此仅其十分之一。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陵阳集】诗别集。或称《陵阳先生诗集》。四卷。宋韩驹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韩子苍集》三卷,并云:“王黼尝命子苍咏其家藏《太乙真人图》诗,盛传一世。宣和间,独以能诗称云。”可知此三卷本为诗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陵阳集》所五十卷,另录诗集《陵阳集》四卷、《别集》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陵阳集》十五卷、《别集》三卷。这些卷次不同之本,皆舛。现传四卷本之《陵阳集》乃取自黄汝嘉于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间所刻《江西诗派》。《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吕本中《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曾竑《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因今存韩集乃明末从江西诗派总集中所抄,故卷首次行有“江西诗派”四字,卷中语涉宋帝皆空格,尚存旧式。《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清末宣统二年(1913)沈曾植刊江西诗派韩驹、饶节二家集,刻《陵阳先生诗》四卷、《校勘记》一卷。

(王学泰)

【石林居士建康集】诗文别集。八卷,诗铭赞二卷。宋叶梦得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石林总集》一百卷、《年谱》一卷;又著录《石林建康集》十卷,并注明:“皆帅建康时诗文,其初,以所莅官各为一集,后其家编次,总而合之,此集其一也。”另著录《石林审是集》八卷,注明:“其门人盛光祖子绍所录,亦已入总集。”梦得之孙籍跋《建康集》云:“右先君大卿手编《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绍兴八年(1138)再镇建康所作诗文也。别有《总集》一百卷,昨已刻于吴兴里舍。”《建康集》历来传本皆作八卷,看来陈氏著录作十卷似有误。《总集》迟至明代尚有著录,其二十代孙叶万云:“《国史书目》载《石林公集》一百卷,虞山桑玄思藏书目曾有之。玄思去今百有馀年,已不可得。”(《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明末钱谦益绛雪楼亦尝著录,楼焚之后遂湮没无闻,可能毁于火。八卷本《建康集》多赖抄写以传。《中国善本书目》载有明抄本,明末毛晋汲古阁藏有明抄本。有些旧抄本涉及宋宁宗之前皇帝名皆称“庙讳”、涉及“廓”则称“御”名,可知为据南宋宁宗时刊本影写,但宋刻本已湮没无闻。《四库全书》所收即

此八卷本。清代此集曾数度刊刻。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有叶廷琯刊本,清文宗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有苏城裔孙叶雲鵬刻本,附《两镇建康纪年略》一卷。清末叶宣统三年(1911)有叶德辉观古堂刊《石林遗书》本。

(王学泰)

【北山小集】诗文别集。一作《北山集》、《程俱集》。宋程俱撰。此集为程俱所自编(见叶梦得序),凡四十卷。集中之诗,间于题下注所作年份,其年份多处先后失次,当是编而未定。《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北山小集》四十卷;《宋史·艺文志》则著录《程俱集》三十四卷,当是另一系统的刊本。《文渊阁书目》未见著录,说明至明时,传世已稀。此书宋刊本,明末为钱谦益绛雪楼所藏,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末,辗转归黄丕烈。据钱大昕跋,此宋刊本,乃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吴兴官廨刊本。今通行本,为涵芬楼影印江安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影宋写本,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俱十九岁时,米芾读其诗,誉为李太白后身。然今存少数少年所作殊无李白风致,或少作多有散失。贺铸《庆湖遗老集》附录有俱所撰《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其文不见于此集,知俱中年所作亦有散失。惜不得《宋史·艺文志》二十四卷本之详。

(孔凡礼)

【浮溪集】诗文别集。三十二卷,诗四卷,宋汪藻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汪藻集》六十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载汪藻《浮溪先生文集》六十卷、《猥稿外集》一卷、《龙溪先生文集》六十卷,“浮溪”在婺源,为汪藻先世所居;“龙溪”在饶州德兴,即藻生之地,《浮溪集》所收皆为正规之诗文,《龙溪集》所收“皆一时不经意之辞”。此二集皆佚,其遗集十不存一。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赵子常访汪氏家乘,得藻诗文八十五篇,厘为十五卷,题为《浮溪文粹》。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世宗嘉靖(1522—1566)间皆有刊本。后此版在神宗万历(1573—1620)间又被火焚。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藻之裔孙汪士汉再搜家乘,葺其残缺,编为《浮溪遗集》十五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藻诗文若干,合《浮溪文粹》所收,厘为三十二卷,共录文五百五十二篇,诗、词二百八十五首;其集,十已得其六七,但仍有遗佚,如诗中之《桃源行》(《庚溪诗话》)、《避地西亭野步》(《宋诗纪事》)、《春日》(《游宦记闻》)、《大年小景》(《声画集》)、《赋琴高鱼》(《宾退录》)等等均可辑补。又胡仔曾言汪藻与石敏若两人诗作,相犯者众,往往一诗两载,难于断定属谁。后孙星华又辑得《拾遗》三卷、加首卷为三十六卷。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入福建所覆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光绪二十五年又有广

雅书局翻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汪集被收入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王学泰)

【卢溪集】 诗文别集。一作《泸溪集》、《卢溪文集》、《卢溪先生文集》。宋王庭珪撰。有五十卷本,即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九《王公庭珪行状》所云之本。原本已佚。今存最早刊本。为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本,即《四库全书》所收之本。有七卷本,为诗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有著录,已佚。有十卷本,《宋史·艺文志》著录,亦佚。有二十卷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四著录,篇第与嘉靖本大体不异,惟逐卷归并;卷一有校正、重刊衔名两行,当是明代重刊,可以改正嘉靖本误脱之处颇多,系从旧本出,傅氏著录者为明写本。《四库全书》本附录有韩驹等多人跋,最末为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欧阳玄跋,疑元时有刊本。卷一至卷八为古体诗,卷九至卷二四为近体诗,卷二五为换词,共七百六十一首。后二十五卷为杂文。卷末附残篇诗句若干首。另有《卢溪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今存。其他著述《易解》、《论语讲义》、《沧海遗珠》等九种,均早佚。(孔凡礼)

【雪溪集】 诗文别集。又称《郭印诗》。宋郭印撰。其集,《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始著录,谓一部六册。《策竹堂书目》卷三著录郭甲《雪溪集》一册;“甲”当为“印”、“雪”当为“云”之误。《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为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同。知其集明末、清初犹存。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原集已不见,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二卷:卷一收四言诗二首、五古二十六首,卷二至卷五,收五古一百二十二首,卷六收七古三十一首,卷七至卷九收五律二百二十八首,卷一〇至卷一一,收七律一百三十二首,卷一二收五排三首、五绝五十四首、七绝九十二首、六言四首。现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其五律一首。(孔凡礼)

【太仓稊米集】 诗文别集。七十卷,其中诗四十卷。宋周紫芝撰。《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周集皆作七十卷。其集初刊于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间。陈天麟帅襄阳,始钁诸木,前有天麟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所作序。但此本校勘不精,谬误连篇累牍。淳熙十年癸卯(1183),陈公绍赴襄阳学官,道经九江得周集家藏善本,及至襄阳,据此家藏善本对乾道刻本重加修正,命刻工修版,重新刷印,遂取代了乾道本,后世抄本皆据此淳熙本。明初有刊本,后多以抄本流传。《四库全书》所收者乃

从绛云楼宋本抄录而出。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集之名,取义于黄庭坚语“文章直是太仓一稊米耳”,有自谦意。(王学泰)

【梁溪集】 诗文别集。一百八十卷,其中诗二十八卷。宋李纲撰。《宋史》本传言其“文章、歌诗、奏议百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梁谿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直斋书录题解》著录《梁谿集》一百二十卷。由于其各种杂著如《靖康传信录》等,或收或不收,或收多收少,故流传有各种卷帙不同之本。李集最初由纲子秀之编辑,当时只刊表章奏札八十卷,不包括诗、文。赵记之一百七十卷本、陈记之一百二十卷本,皆包括诗、文而言,诗、文部分,当为后人所补辑。此集尚有宋刻残本传世,为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时史氏所刊。另有清影宋刊本,《附录》一卷,为年谱、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词等,刻于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此本犹存宋刻遗意。《四库全书》所收《梁溪集》为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本,包括赋四卷、诗二十八卷、表本诏书二卷、拟制诏四卷、表札奏议六十四卷、札子二卷、状三卷、书二十二卷、启二卷、记二卷、序六卷、赞二卷、颂箴铭辞一卷、论二卷、迂论十卷、杂著六卷、题跋三卷、祭文疏词二卷、碑志五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建炎时政记》三卷,另附年谱一卷、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诗、像赞、书跋等五卷。李集流传版本较多,如南宋嘉定时其孙李大有刊印之八十卷本,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邵武县刊印之《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明末左光先所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七卷以及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李荣芳之重刊本。又有明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卷本。(王学泰)

【茶山集】 诗别集。一作《曾幾集》、《曾文清公集》。宋曾幾撰。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称幾有文集三十卷,未著文集之名。《直斋书录题解》卷二〇著录《曾文清集》十五卷。《后村诗话·续集》卷四云:“茶山诗十五卷,九百一十篇者是也。续刊后集亦十五卷,然中间多泛应漫兴者。”后村所言“茶山诗十五卷”,即《曾文清集》十五卷,乃曾幾自定;《墓志铭》所云文集三十卷,盖合续刊后集而言。《宋史·艺文志》著录《曾幾集》十五卷。现存《永乐大典》各卷引曾幾作品四十一条,皆为诗,其中标引自《曾文清公集》者,凡三十八条。《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曾文清诗集》,谓一部五册。明末潘是仁辑《宋元诗》,有曾幾诗二卷,其集其时尚存。清修《四库全书》时,集已佚,乃自《永乐大典》辑出,分为八卷,名以《茶山集》,幾集以“茶山”名,自是始。福建本、广雅书局本《聚珍版丛书》有《茶山集拾遗》一

卷。今人栾贵明复检《永乐大典》残卷,得诗七首(原为八首,其中一首已见《茶山集》)。除此以外,清同治《清江县志》尚有未入集诗七首。(孔凡礼)

【李易安集】 诗文别集。宋李清照撰。宋徽宗初年,清照之前辈晁补之尝延誉清照之诗于士大夫间(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其时,清照年约二十或稍长。其作品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抄本《萍洲可谈》(源出明抄本)卷中谓清照“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抄本《萍洲可谈》与《守山阁丛书》等刊本朱彧《萍洲可谈》大异。彧父生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而抄本彧序有“嘉祐五年(1060)辞绍倅归”语。据此,知抄本非彧作,然出自宋人,其所载亦有参考价值。首著录此集者,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谓十二卷。晁书成于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间,清照其时已卒约十年。未知其集为诗文集抑包括词。然自抄本《萍洲可谈》观之,则此十二卷本当为诗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一著录《漱玉集》一卷,云“别本分五卷。”说明其时词已单行,并有不同版本。同上书卷一四复著录清照《打马赋》一卷,说明当时其文亦有单行者。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言及《易安文集》,未云卷数。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〇清照小传谓有《漱玉集》三卷。于陈振孙所云词集版本之外,复多一种,说明其词已大行于世。《宋史·艺文志》既著录《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复著录《易安词》六卷。诗文与词分集刊行。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李易安集》十三卷,焦氏多未见原书,不可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永乐大典》卷八九九诗字韵有清照《偶成》诗,他书所未载,说明修《大典》时其集尚存。明抄本《诗渊》有清照《新荷叶》词,各种词集所未收,知今日所传词集或仍有遗佚。入清以后,各家藏书书目均未著录《李易安集》,其集之佚,当在明代。(孔凡礼)

【东莱诗集】 诗别集。二十卷。宋吕本中撰。《宋史·吕本中传》言其“有诗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东莱集》二十卷、《外集》二卷,又言其“少学山谷为诗”,则所记吕集,可能即为诗集。《直斋书录解題》则将此《东莱集》二十卷、《外集》二卷,录入“诗集类下”现存宋刊《东莱集》有二十卷本,乃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沈公雅所编,前有写于乾道二年之曾幾序。序中,谓曾幾与本中同庚,而高宗绍兴元年辛亥(1131年)本中年未五十,诗已独步海内,曾幾亦尝从其学诗云云。此集沈公雅刊之于吴门郡斋。此宋刻流入日本,藏于内阁文库;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影印编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另一宋刻本为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黄汝嘉所刊《江西诗派》本,

题作《东莱先生诗集》,正集二十卷、《外集》三卷(与宋书录所记《外集》二卷不同)。此本仅存正集十八卷至二十卷与《外集》三卷,正集文字及编次与沈公雅本无大区别,《外集》卷首书名下空四格,题“江西诗派”四字,目后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增刊”一行。乾道本无外集,此外《外集》似黄氏所编。《四库全书》所录系明抄本;此抄本缺第十卷,以《外集》卷一配之,或是该书流通过程中书贾所为。清代刊本则有张金吾精刊本及清文宗咸丰(1851—1861)年间吴鏊孙刊本。(王学泰)

【忠正德文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二卷。宋赵鼎撰。《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之《忠正德文集》皆作十卷。《艺文志》还著录了赵鼎之《得全居士集》二卷,皆不传于世。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四库全书》所收《忠正德文集》十卷为辑自《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仅就《永乐大典》散见各条,按时事先后,分类哀缀,得奏议六十四篇、骈体十四篇、古今体诗二百七十四首、诗余二十五首、笔录七篇,又据《历代名臣奏议》增补十二篇,仍厘为十卷。计所存者尚二百九十六篇,与《宋史》所称二百余篇不符。疑其集本三百余篇,传刻《宋史》者或偶误‘三’字为‘二’字欤?”《提要》所言有三误。第一,《宋史·赵鼎传》言其“有拟奏表疏、杂诗文二百余篇,号《得全集》,行于世”。此集二卷,与《忠正德文集》无关,只是赵氏诗文杂著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此集《宋史·艺文志》有著录,已佚。第二,四库馆臣所辑诗文杂著,为三百九十六篇,而非其所云二百九十六篇。第三,此三百九十六篇,亦远非赵氏全部作品。遗佚者不计,还可以从一些总集或杂录辑出一些赵氏诗文。赵鼎曾主持修订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使得“是非各得其正”。修毕,宋高宗亲书“忠正德文”四字,赵用以名集。此集有《四库全书》本和清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吴杰刊本。另有道光二十一年所刊《乾坤正气集》本,作八卷(只有文没有诗词)。(王学泰)

【东牟集】 诗文别集。又称《王东牟集》、《王东牟先生集》、《东牟文集》、《右史集》。十四卷。宋王洋撰。周必大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序其集,为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九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五册;《策竹堂书目》卷三同。《国史经籍志》同《宋史·艺文志》。其集,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已久不见,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四卷:卷一至卷六,收赋一首、五古五十二首、七古八十三首、五律八十七首、五言长律二首、七律二百五十七首、五绝四首、六绝三首、七绝二百二十四首,共七百十二首;卷七至卷一

四,收各体文三百五十九篇。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上海图书馆有抄本,凡五卷。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诗一首、各体文五篇。

(孔凡礼)

【北山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九卷。宋郑刚中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刚中撰《北山集》三十卷。作者自序云:“《北山初集》即余所谓《笑腹编》也。余以绍兴乙卯(1135年)至甲子(1144年)岁所录文字自号《北山中集》;《笑腹编》则宣和辛丑(1121年)至乙卯岁中所录者,因号《初集》。”《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后集》始自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1148)终于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凡十卷,为刚中之子郑良嗣编于孝宗乾道九年癸巳(1173)。其跋称此编“总三集,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谱》冠于篇首。”(现存本中《年谱》已佚。)郑集初刊于乾道(1165—1173)末年,今未见此刻流传。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郑氏乡人曹定远重刊《北山集》,将初、中、后三集,改为初集、二集、三集。后《四库全书》所收即曹氏刻本。四库馆臣进一步将此三编打通,统编为三十卷,但原集秩序,一仍其旧,故其所收录之诗未集中排列。三十卷中第一、二卷为诗,第十一、十二卷为诗,第十八、十九卷为诗,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卷为诗,从这种编排仍可见原编遗意。郑集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曹定远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本,刚中后裔郑世成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名为《郑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另有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胡凤丹所辑《金华丛书》本。(王学泰)

【鄱阳集】 诗文别集。四卷。宋洪皓撰。《鄱阳集》原本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著录,《宋史·艺文志》作《洪皓集》亦十卷,久不传。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四卷,大体以写作年月排比。或年月不可考而能确知其为奉使后作、归国后作或南迁后作者,则以类相从。其他不知作于何时者,则别缀于后。今存《四库全书》本。另有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刊行之洪氏《晦木斋丛书》本,附《拾遗》一卷。(张丽娟)

【筠溪集】 诗文别集。又称《竹溪集》、《竹溪文集》、《竹溪先生文集》、《筠溪文集》。二十四卷。宋李弥逊撰。其集,冠以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楼钥所作序。《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凡二十四卷,《宋史》同,皆称《筠溪集》。《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十一册,《策竹堂书目》卷三同,皆称《竹溪文集》。《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筠溪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所收之本原亦名《竹溪集》,知《筠溪集》

即《竹溪集》。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诸家著录”无“竹溪集”之名,乃改“竹”为“筠”,盖考证未周。其集今有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清丁丙跋佚名校清初抄本,均称《竹溪先生文集》。各本皆为二十四卷:卷一至卷三收奏议四十一首;卷四至卷五收外制一百四十七首;卷六收表十四首;卷七收书一首、启十五首;卷八至卷一〇收议古四十三首;卷一一至卷二〇收五古八十八首、七古五十四首、五言排律一首、五律六十一首、七律二百十七首、七绝二百十六首、挽诗四十七首;卷二一至卷二四收各体文九十首、词八十八首。卷末附录李弥逊家传。通行本为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孔凡礼)

【陈与义集】 诗文别集。一作《简斋集》、《陈简斋集》、《简斋诗集》、《陈与义诗》。宋陈与义撰。陈集最早刊行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凡十卷,收诗五百多首。《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之本即此本,已早佚。光宗绍熙(1190—1194)间,胡穉筴注《简斋诗集》三十卷,附《无住词》一卷问世,其诗当据绍兴本。元有《简斋外集》刻本,凡一卷,收诗五十二首,文三首,皆筴本所无。二书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此集除胡筴本外,尚有《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本。此本有元、明两种刻本,但已流到海外。国内有日本翻刻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朝鲜本。据李盛铎跋,此本“源出宋刊”。此本比胡筴本多《次周漕族人韵》、《水车》、《山居二首》、《拜诏》及《别诸周二首》等七首诗和文一篇。此本有刘辰翁评语一百多条,并删节胡筴,增添新注。增注引用胡筴本、武冈本、闽本及简斋手定本的校勘文字,后三种刊本早已亡佚。增注有助于补正胡筴的疏讹,有版本价值。胡筴本和须溪评点本皆编年。此外还有一种分体本,即《四库全书》本、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此本无注文,删去了《送大光赴石城》、《伤春》、《次韵谢邢九思》等三诗,对诗中“胡儿”、“虏”、“狄”等字样作了改动,其它臆改处也不少。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点校本,从上述三种版本中,收陈与义诗六百二十六首、词十八首、赋三篇、杂文四篇,并录胡筴及须溪本增注,是目前收录最完备的本子。(孔凡礼)

【芦川归来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四卷、词三卷。宋张元幹撰。元幹诗虽在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已流行,但当时多以抄本传世。其集首次结集刊刻当在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元幹去世五十余年之后,由其孙张钦臣主持,里人曾噩任编辑、校勘之责。全书凡十八卷,其中书启、古诗、律诗、赞序共十五卷,附《幽岩尊祖录》一卷,词二卷。

元、明两代,张集流传不广。清初吴之振等编辑《宋诗钞》已云:“有《芦川归来集》十餘卷,得之书肆,废帙逸其大半,诗止六、七二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编纂《四库全书》,其所收《芦川归来集》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得。馆臣所见张集系抄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抄本“但存五言律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而无古体及绝句,知非完善。……及考《永乐大典》所载,则所佚诸篇,厘然具在。今哀集成帙,与钞本互相勘校,删其重复,补其残缺,定为十卷”。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排印之《芦川归来集》即据《四库全书》十卷本校校整理而成。另外《四库全书》存目中所列《别本芦川归来集》六卷,当系四库馆臣据以校十卷本之抄本。今人黄佩玉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得张诗九首,附于所著《张元幹研究》之中。(王学泰)

【**相山集**】 诗文别集。全称《相山居士文集》,又称《相山文集》。宋王元道撰。《相山集》附录《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称之道有文集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之道《相山集》二十六卷,卷二一复著录《相山词》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之道《相山居士文集》二十五卷,复著录《相山长短句》,不言卷数。《直斋》所云二十六卷,当合词而言。知词于文集外别行。《神道碑》所云三十卷,乃家藏底本,刊行时有所调整。《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相山文集》一部十册,又一部十一册。《篆竹堂书目》著录《相山文集》十一册。《国史经籍志》著录《相山集》二十六卷。《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相山居士文集》五册,其书明末犹存。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其书已佚,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三十卷。卷一至卷一五为诗,收五古一百二十八首、七古七十一首、五律一百零七首、七律二百三十二首、五言长律十二首、六言三首、五绝七首、七绝三百零三首;卷一六至卷一八为词,收词一百五十九首;卷一九至卷二九为文,收各体文一百三十五篇;卷三〇为附录。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一首、文五篇。(孔凡礼)

【**紫微集**】 诗文别集。又称《张巨山集》、《张紫微文集》、《张紫微先生集》、《张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张嶠撰。《遂初堂书目》著录,不言卷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为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同。《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张紫微文集》一部十二册,卷一〇复著录《张紫微集》一部三册,完全。后者为诗集,知嶠之诗集有单行本。《篆竹堂书目》卷三、卷四分别著录,同《文渊阁书目》,惟谓《张紫微文集》为十册。其集久佚,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

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以其篇帙较富,编为三十六卷。计卷一至卷一〇,收赋五首、四言诗二首、五古一百三十五首、七古二十二首、五律九十六首、五排四首、七律一百零一首、七排三首、七绝二百四十八首,卷一一至卷三六,收各体文七百零五篇,其中内外制四百十六篇。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湖北先正遗书》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一首、文一篇。

(孔凡礼)

【**韦斋集**】 诗文别集。又称《朱韦斋集》、《韦斋朱先生集》。十二卷。宋朱松撰。《朱子大全》卷九七《皇考朱公行状》谓松“有《韦斋集》十二卷行世,《外集》十卷藏于家”。《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别集类著录《韦斋小集》十二卷,而卷二〇诗集类复著录《韦斋小集》一卷。疑卷一八所著录的《韦斋小集》即《韦斋集》。《宋史·艺文志》著录即作“《韦斋集》十二卷、又《小集》一卷”。《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一部三册,完全,入于诗词类。《篆竹堂书目》卷三著录《韦斋朱先生集》六册,卷四著录《朱韦斋集》三册;前者诗、文合刊,后者为诗。知其时诗有单行本。今通行本有《四部丛刊》续编影铁琴铜剑楼所藏明刊本,卷首有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傅自得序,卷末有淳熙八年尤袤跋,知其源于宋刊。另有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邝璠刻本、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程垅刻本、康熙四十九年朱昌辰刻本、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朱玉刻本、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紫霞洲祠堂刊本。《四部丛刊》本前六卷为诗,共四百十七首;后六卷为文,共八十四篇;末附朱棣《玉澜集》一卷。

(孔凡礼)

【**松隐文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其中诗、赋二十二卷。宋曹勋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曹勋《松隐集》四十卷,据宋楼钥《松隐集序》,此本为勋子编成,宋时亦曾刊刻,但未见其传世。现在可知最早刊本,刻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四十卷。此本前有正统时大理寺洪益中所撰序,谓此集为曹勋十世孙曹参所藏,六册,四十卷。《四库全书》所收之《松隐文集》,系从抄本采抄,为残本,第十四卷全缺,故标为三十九卷。其实抄本亦有全璧传世,如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鲍廷博手写本,即四十卷,丁丙《善本书藏志》亦标明藏有四十卷本(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另有1920年刘承幹所刊《嘉业堂丛书》本,系据明正统刻本刊刻。文物出版社1982年影印了《嘉业堂丛书》,名《松隐集》。

(王学泰)

【**屏山集**】 诗文别集。一作《屏山文集》、《刘屏山文集》,全称《宋儒刘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宋刘

子掣撰。子掣卒后，嗣子珩幼，文多散佚。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珩搜求，编次其遗文，凡二十卷，胡宪为序。珩复为校订，至孝宗乾道九年癸巳(1173)始成书问世，门人朱熹为跋。《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宋史·艺文志》著录。《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四册”，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于鞏十二世孙泽为校订重刊，以朱熹《朱子大全集》中的《跋家藏刘病翁遗帖》附于后。宋本已佚，正德本尚存。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子鞏裔孙震之等复为之重刊，王先谦为序。1932年，杨云为断句，次年，以铅印本问世。卷一收《圣传论》十首，卷二收《维民论》三首，卷三、卷四收《汉书杂论》，卷五收记、序各二篇，卷六收杂著十四篇，卷五收表七首、札子十一首，卷八收启二十二篇，卷九收祭文二篇、墓铭一篇、墓表三篇，卷一〇收赋三篇，卷一一至二〇收诗六百七十九首、词四首。此为现今通行本。

(孔凡礼)

【方舟集】 诗文别集。又称《方舟先生集》。二十四卷。宋李石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为正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宋史》未著录，知传世不多。《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为一部四册，《篆竹堂书目》卷三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同《直斋书录解題》。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其书已久佚，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六收赋二首、五古五十六首、七古八十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六十一首、五绝四十五首、六绝三十首、七绝一百九十一首、词三十四首。卷七至卷一八，收奏议、札子、表、状、策问、议、书、序、赞、记、启、辨、说、题跋、简、铭、疏、文、偈、祝文、墓志铭、祭文、杂著等各体文共二百七十二篇。卷一九至二四，录所论《周易》、《左氏》、《诗》之语。今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十首、赋一首。

(孔凡礼)

【知稼翁集】 诗文别集。二卷，诗一卷。宋黄公度撰。黄集为其子黄沃所刊，其跋云：故笥所存，塗乙之餘，才十一卷，加词一卷，共十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莆阳知稼翁集》十二卷，与此相合。此本包括赋一卷、诗六卷、文四卷、词一卷，末附行状、志铭、圻铭一卷。此书宋刻乃其孙黄处权刊于泉州，后刊本佚，有影写本传世。明熹宗天启五年乙丑(1625)，其裔孙黄崇翰重刊黄集，跋云：“更宋之变，集无存者。嘉靖丙午(1546)陕中选人持是集贄，有前朝秘府御印。乙卯(1555)先考刻于衡州，壬戌(1562)倭变，版复毁，乃就榕城索回一部，崇翰等謄校付梓。”此即两卷本之来历，亦即《四库全书》所收

之本。四库馆臣以为两卷去十二卷差距太远，疑“尚有遗佚”。近人傅增湘曾用影宋写本十二卷者与二卷本相校，“文字次第均同、附录亦同”(见《藏园订补邵亭见知传本书目》)。1920年李之鼎宜秋馆刊《宋人集》收有此集，即用十二卷本，全名为《莆阳知稼翁文集》，正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校记一卷。

(王学泰)

【梅溪集】 诗文别集。一作《梅溪先生文集》、《梅溪王先生文集》、《梅溪先生王忠文公文集》。宋王十朋撰。汪应辰所撰十朋墓志铭，称十朋有《梅溪前、后集》五十卷。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其子闻礼刻之于江陵，合前、后集并奏议，为五十四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梅溪集》三十二卷、《续集》五卷，是当时另有一刊本。十朋在绍兴时所作赋三篇，宋人周世则、史铸为注，以《会稽三赋注》之名行世。史铸有序，作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其书宋刻流传有二本，一为三卷，一不分卷，今尚存。《宋史·艺文志》著录《南游集》二卷、《后集》一卷。前者当为自《梅溪集》抽出的单行本，后者或为《会稽三赋注》。明《文渊阁书目》著录《会稽三赋》一册。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有何濬刊本《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天顺六年(1462)为重修，首为廷试策一卷，次奏议四卷，次前、后集四十九，末附录一卷，乃据绍熙壬子本重刻。今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孔凡礼)

【香山集】 诗别集。十六卷。宋喻良能撰。《宋史》及宋代书录皆未著录其集。《义乌县志》著录其集作三十四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喻集作十七卷，然其书未见流传。清修《四库全书》时，以《永乐大典》所存良能古今体诗尚多，于是从其中采掇裒次，并以《南宋名贤小集》所载参校补入，厘为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24年胡宗楸刊《续金华丛书》，亦收此十六卷本之喻集。“香山”为良能所居山名，用以名集。

(王学泰)

【盘洲集】 诗文别集。八十卷，其中诗十卷。宋洪适撰。《盘洲集》在《郡斋读书志·附志》、《直斋书录解題》及《宋史·艺文志》中皆作八十卷，可见此集在当时已定型。许及之在行状中称其有文集一百卷，藏于家，是未尝刊刻流行之抄本，其刻本行世者则为八十卷本。现存宋刊本为蜀中刻本，八十卷、《拾遗》一卷(已残)；此本虽为后世刊本所祖，恐亦非初刊本，因诸家书录皆未记载有《拾遗》一卷，但此本较善。《四库全书》所收者为毛晋汲古阁所藏影宋写本；此本谬误较多，傅增湘曾用蜀刻本校出其一千三百余个错字。民国间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第一

次据影宋写本影印,第二次影印时便将底本换为宋蜀中刻本。洪集前十卷为诗,依次为内制、外制、词科习稿与进卷、赋、铭、赞、偈、记、碑、传、序、表、章奏、书、启、题跋、经筵故事、策题、婚书、致词、上梁文、青词、疏、祝文、祭文、墓志铭、乐章、《盘洲曲》等。常见者有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泾县洪氏刻本与清穆宗同治(1862—1874)间泾县洪氏《晦木斋丛书》本,此本包括“末一卷”、“校记一卷”。

(王学泰)

【南涧甲乙稿】 诗文别集。一作《南涧集》。二十二卷。宋韩元吉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至乾道元年(1165)正月,元吉与陆游,唱酬颇乐,共赋歌诗三十篇,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有序,元吉之子澹《涧泉日记》卷中所言之《京口小诗集》为其最早所刊诗集。已佚。淳熙九年(1182),元吉刊自作词,名《焦尾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为一卷。其《南涧甲乙稿》七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有著录。《宋史·艺文志》除著录《南涧甲乙稿》外,尚著录《愚黠录》十卷。《文渊阁书目》卷四《经济》(按:所收作品,主要为奏议)著录元吉《登对录》(按:“对”原作“封”,据《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六、一三四九五改)一部,疑即《愚黠录》。同上书卷九著录《南涧集》一部。以上三书久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南涧甲乙稿》,析为二十二卷,卷一为赋与诗,卷二至卷六为诗,卷七为词,余为文。今人栾贵明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文八篇(其中二篇为《登对录》),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孔凡礼)

【莲峰集】 诗文别集。一作《莲峰家集》、《莲峰先生家集》。十卷,其中诗二卷。宋史尧弼撰。其集卷首冠以省斋、任清全二序。省斋序作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1166)谓编尧弼“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刊出与众共之”。然据任序,尧弼之文“至多,皆散落不存”,是乾道本所收已不足。任序作于宁宗嘉定六年癸酉(1213),谓乾道原刻至此时已漫漶,“莲峰兄长之嫡孙师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轩(张栻)少时一跋并诸公所跋附其后”。其集,《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六册。《策竹堂书目》卷三同。《国史经籍志》著录,谓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同。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其集已不见,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卷:卷一至卷二,收各体诗一百三十六首;卷三至卷一〇,收各体文八十五篇。任序所称之张栻及其他跋文皆不见。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一首,文三篇。今行世者有影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孔凡礼)

【澹轩集】 诗文别集。一作《李澹轩文集》、《澹轩文集》、《李滨老集》。八卷,其中诗三卷。宋李吕撰。《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七五《澹轩李君吕墓志铭》称吕“读《易》六十四卦,皆为义说,徧观经史百家之书,……凡兴衰得失论著数百篇”。吕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墓志铭作于略后,未云有集,知其时集尚未刊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墓铭云吕有《澹轩集》十五卷云云,偶误)。其集之刊行,未知始于何时,《宋史·艺文志》无著录。《文渊阁书目》卷九始著录,谓一部十五册。《策竹堂书目》著录,谓三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十五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十五卷。知其书明末清初犹存。清修《四库全书》时已不见其书,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八卷;卷一至卷三为诗,计五古四十首、七古十四首、五律二十四首、五言长律一首、七律四十五首、五绝五十三首、七绝四十六首,卷四为词,计二十四首;卷五至卷八为各体文,计四十九篇。而墓志名所云“论著数百篇”皆未见,知所佚者甚多。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七古诗各一首,跋二篇。

(孔凡礼)

【澹斋集】 诗文别集。一作《澹斋文集》、《澹斋先生集》、《李澹斋文集》、《澹斋先生文集》。十八卷。宋李流谦撰。据《澹斋集》附录流谦之兄益谦所撰流谦行状,《澹斋集》乃流谦手编,集名为流谦自定;行状但云流谦为“长短句、题卷、讲义、杂编若干卷”,知撰行状时,其集尚未刊行。南宋宁宗嘉定七年甲戌(1214),流谦之子廉榘为编次刊行,凡八十九卷。其集,《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卷九始著录,谓一部十五册,《策竹堂书目》同。《国史经籍志》卷九著录,谓八十九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同,当是廉榘所刊本,知其集明末清初尚存。清修《四库全书》时,其集已佚,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八卷:卷一至卷八,收赋一首、五古九十一首、七古一百一十首、五律一百五十四首、七律一百六十三首、五绝六首、六绝四首、七绝一百零一首、词二十五首;卷九至卷一八收各体文一百十四首。另附录行状。今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其五律一首、五古一首、启一首、经解十首。

(孔凡礼)

【陆游集】 诗文别集。一百三十七卷。宋陆游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至乾道元年(1165)正月,陆游为镇江通判,与韩元吉共赋歌诗三十首,辑为《京口唱和》,《渭南文集》卷一四有序,是

为陆诗结集之始。乾道八年,陆游入汉中王炎幕府,有《山南杂诗》百余篇;乾道九年,复自编《东楼集》,收汉中诗三十首。以上三集皆佚。淳熙九年(1182),《剑南诗稿》、《续稿》及《富沙新编》稿本已行世(见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一一与陆书)。陆诗的最早刊本,是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知严州时所刊《新刊剑南诗稿》二十卷本。据郑师尹序,该书收诗“二千五百二十四首,又□七首”。详考《陆游集》全书,知“□”乃赋字。今存十卷,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尚藏有《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宋刊残本八卷,今人赵万里疑为南宋宁宗嘉泰(1201—1204)间吉州所刊,并肯定陆游在世时即已刊行(文物出版社《文物精华》1959年第一期赵文《陆游辛弃疾的手稿和其他著作》)。陆游卒后,长子子虞于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刊《剑南诗稿》八十五卷、《遗稿》七卷于知江州任中,并为跋;理宗绍定(1228—1233)间,幼子子虞复刻《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于知严州任中(《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各刊并行。刘辰翁《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收诗一百九十六首,未见今本《剑南诗稿》者达十四首,此十四首当源于《遗稿》。今存《永乐大典》残卷,共引陆游诗、文五百二十三条,其中引自《剑南续集》、《剑南续稿》者达一百四十六条,足见修《永乐大典》时《续稿》尚行于世。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其祖本当为子虞本。子虞、子适所刊本皆早佚。陆诗为宋南渡之冠,宋人闻仲和为陆诗作注(陈著《本堂先生文集》卷四三),然不传。清杨大鹤《笺注剑南诗钞》,是陆游第一个选注本。今人钱仲联《笺校剑南诗稿》,是全部陆诗第一个校注本,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陆游亦以文鸣。嘉定十三年,幼子子适刻其《渭南文集》五十卷于知溧阳县任中。“渭南”之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陆游。其书包括《入蜀记》六卷,词二卷。今存四十六卷,藏北京图书馆。其书,明有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华锱活字本、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梁乔本、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本、汲古阁本。正德、万历两本去《入蜀记》,词并为一卷,增罗椅、刘辰翁所选陆诗为九卷,共五十二卷。活字本、汲古阁本同初刻本。陆游之词,自宋已单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放翁词》一卷;毛晋刻入《宋六十名家词》中。今人夏承焘、吴熊和为《放翁词编年笺注》二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上述汲古阁本《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包括在收有《老学庵笔记》、《南唐书》、毛晋辑《放翁佚稿》在内的汲古阁《陆放翁全集》中。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陆游集》,只收包括《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放翁佚稿》在内的诗文。《陆游集》卷末附

录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收诗三十首,词三首,文三十四篇,残篇若干篇。除此以外,陆游尚有《家世旧闻》上、下二卷,一向以抄本流传于世。

(孔凡礼)

【范石湖集】 诗词别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范诗最早单行集为《北征集》,《永乐大典》卷一三〇七五引,已佚。是集收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使燕绝句七十二首,在今本《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此后赴桂有《南征小集》(《诗集》卷一三题注),入川有《西征小集》,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有序,淳熙十年(1183)归隐石湖,有《石湖洞霄集》(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三《和谢石湖先生寄二诗韵》序)。此三集,不知是否有单行本。成大亦有词名,光宗绍熙三年(1192),刘光祖刻其词作《馀妍亭稿》二百十二首,以《石湖词》之名行世,杨长孺跋,见《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六。《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之《石湖词》一卷,当为此书,已佚。收有成大全部诗文、由其手自哀次的《石湖诗文集》一百三十卷,由其二子莘、兹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刊行,杨万里为序。其后不久,昆山郡庠刊《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其较《石湖诗文集》多出之六卷为《梅谱》、《菊谱》、《揽髻录》、《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各一卷。此《石湖大全集》,即周必大《范成大神道碑》、《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之《石湖集》,即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范石湖文》所据之本。《宋史·艺文志》于著录《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外,复著录《石湖别集》二十九卷,说明《大全集》漏收之作尚多,此《别集》已佚。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活字本《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问世,此乃范氏诗集第一次自《大全集》中抽出单行者。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顾嗣立复刻之,以《石湖居士诗集》之名行世。顾本前三十三卷为诗,卷三十四为赋及楚辞。据顾序,其时一百三十卷本的《石湖诗文集》尚存,顾氏原来打算在刻完《诗集》以后,接着刻《诗文集》中的其他著作,后未如愿,诗文全集于是失传。顾氏刻书同年,黄昌衢亦刻之,以《范石湖诗集》之名行世。黄本卷一为赋及楚辞,以下三十三卷为诗。两本文字,可资互校。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点校本《范石湖集》。该书以顾本为底本,收入了《石湖居士诗集》;以知不足斋丛书所辑《石湖词》为底本,收入了范氏的词(计《石湖词》七十一首;《石湖词补遗》词十八首,内一首非范成大作),共收诗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词八十八首。此书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作校勘后再版。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所辑《范成大佚著辑存》,辑得文一百三十五篇,诗九首,词八首,残篇若干篇。可略窥《石湖大全集》之

一斑。

(孔凡礼)

【文忠集】 诗文别集。一作《周益公集》、《平园集》、《周益公大全集》、《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周益国文忠公集》。二百零四卷,另一本二百零六卷。宋周必大撰。必大晚年,在家乡吉州,尝刻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以详确称。必大卒,其子纶与曾三异、彭权夏、许凌、罗克宣遵刻欧集之例,订校其集,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刻于吉州,计《省斋文稿》四十卷、《平园续稿》四十卷、《省斋别稿》十卷、《词科旧稿》三卷、《掖垣类稿》七卷、《玉堂类稿》二十卷、《政府应制稿》一卷、《历官表奏》十二卷、《奏议》十二卷、《奉诏录》七卷、《承明集》十卷、《玉堂杂记》三卷、《二老堂诗话》二卷、《二老堂杂志》五卷、《玉蕊辨证》一卷、《乐府》一卷、《书稿》十五卷及《附录》五卷。今有残本。其《辛巳亲征录》一卷、《壬午龙飞录》一卷、《癸未日记》一卷、《闲居录》一卷、《丁亥遊山录》三卷、《庚寅奏事录》一卷、《壬辰南归录》一卷、《思陵录》二卷,以涉及时事未刊。此后不久,吉守郑子敬为补刻之,《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的《周益公集》二百卷,即此书。《解题》并称有年谱一卷。今按,年谱乃其子周纶撰,开禧刻时当已有。《宋史·艺文志》著录时,缺《承事录》。《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周益公文集》五十二册,云缺。至清初,传益稀。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据鲍士恭家抄本著录,定名《文忠集》,合《思陵录》二卷为一卷,附录作四卷,共二百零四卷。吉人欧阳棨取《四库全书》本、彭邦畴校本、张观察抄本互勘,于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年谱》一卷及《省斋文稿》至《承明集》前十一卷共一百六十二卷,于文宗咸丰元年(1851),续刻余三十八卷及附录五卷,共二百零六卷,复宋本之旧。

(孔凡礼)

【梁溪遗稿】 诗文别集。二卷。宋尤袤撰。《诚斋集》卷二四《右延之诗》注文称尤之集,以“梁溪居士”名。《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梁溪集》五十卷。《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称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然《艺文志》无著录。此后即佚。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袤之裔孙侗得朱彝尊之助,自《赤城志》、《瀛奎律髓》等书中,辑得诗四十七首,另辑得文二十六篇,厘为二卷,以《梁溪遗稿》之名刊行。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巳(1821),裔孙兴再刻之。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重刻时。复搜得《三朝北盟汇编》载《淮民谣》一首,《天台别编》载诗十首、《文选跋》一首,自《后村诗话》辑得《寄友人》、《台州秩满归》诗二联,收入《常州先哲遗书》。然遗佚尚多,尚待搜辑,如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录》即载有袤送明清丐外得清七律一首,杨万里

《诚斋集》卷二四附诗一首,即不见于本书;《舆地纪胜》所载袤句,亦多有不见于本书者。(孔凡礼)

【诚斋集】 诗文别集。一百三十三卷。宋杨万里撰。万里“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诚斋江湖集序》)。其存诗自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始。其诗原分集刊行。首曰《江湖集》,收壬午至孝宗淳熙四年丁酉(1177)春知常州前所作,淳熙十五年戊申九月作序。次曰《荆溪集》,收知常州时所作,淳熙十四年丁未四月作序。三曰《西归集》,收罢常州移官广东“既还舍,计在道及待次”所作,淳熙十四年丁未六月作序。四曰《南海集》,收官广东时所作,淳熙十三年丙午六月作序。五曰《朝天集》,收淳熙十一年甲辰十月至淳熙十五年戊甲初秋在朝时所作(淳熙九年壬寅至淳熙十一年甲辰居母丧时未作诗),序作于淳熙十四年丁未。六曰《江西道院集》,收自临安归里及官筠州时所作,淳熙十六年己酉十月作序。七曰《朝天续集》,收“自江西道院召归册府”至接伴金国使者时所作,光宗绍熙元年(1190)四月作序。八曰《江东集》,收“在金陵及行部广德、宣、池、徽、歙、饶、信、南康、太平诸郡”所作,绍熙三年壬子(1192)五月作序。九曰《退休集》,收自金陵罢归至去世前所作。此九集,最早刊行者为《南海集》。其书为淳熙十三年丙午通判肇庆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刘涣所刊。涣跋语谓将继续刊“徐四集”。此“徐四集”乃《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朝天集》。其书题《诚斋先生南海集》,今为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藏,以今全集本校,字句小有异同(《藏园群书经眼录》)。《宋史·艺文志》著录《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归集》八卷、《南海集》八卷、《朝天集》十一卷、《江西道院集》三卷、《朝天续集》八卷、《江东集》十卷、《退休集》十四卷。《南海集》卷数与刘刻本同,可证各集卷数乃宋刻单行本卷数。各集序中皆言及所收诗篇数,然较以今本,往往不符,如《朝天续集》序云收诗三百五十余篇,今本为三百九十七首。据序,前八集收诗一云三千三百多首,一云三千六百多首,加上《退休集》七百十二首,共四千多首或四千三百多首,而今本为四千二百多首。今本乃宁宗嘉定元年(1208)万里之子长孺所编定,首刊于理宗端平元年(1234)。凡一百三十三卷,前四十二卷为诗,自《江湖集》以下各集卷数为:七、五、四、二、六、二、四、五、七。大体单行本二卷合今本一卷,以此校《宋史·艺文志》,疑所云《西归集》“八卷”为“四卷”之误。自四十二卷以下为文,卷一三三为附录《历官告词》等。此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端平原刊本,今藏日本帝室图书寮,国内已不见。《四库全书》据抄本收入,文字上做了一些校订。今通行本为《四

部丛刊》初编影印江阴缪氏艺风堂藏影宋写本。又有《杨文节公诗集》四十二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杨云采据明本校刻，是为诗集单行本。其《诚斋易传》二十卷，以曝书亭影宋本为佳。又有题为万里撰的《诚斋先生四六发遣膏馥》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乃书坊托名，其宋刊本今亦藏日本帝室图书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佚书目，载有此书，然仅七卷，在存目中。又有宋刊本《批点分类诚斋先生文体》二十四卷，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有理宗开庆元年己未（1259）方逢辰序。（孔凡礼）

【晦庵先生集】 诗文别集。又称《朱文公文集》或《朱子大全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其中诗十一卷。宋朱熹撰。《宋史》本传称“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宋史·艺文志》记朱熹诗文为“《朱熹前集》四十卷、《后集》九十一卷、《别集》二十四卷”。《直斋书录解題》载“《晦庵集》一百卷、《紫阳年谱》三卷”。距朱熹时代最近的目录学家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志·附志》中记“《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并云：“朱文公之文，嘉熙己亥（1239年）王埜刻于建安，黄壮猷嗣成之，识于后。《续集》则王遂刊而续之。然南康、黄西坡诸处所刻墨帖之类，或不在焉，然则遗逸尚多有之。”可见朱熹著作丰富，其身后诗文流传的版本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宋史》本传所说的一百卷本，亦即赵希弁所记的一百卷本与《续集》十卷本，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闽本，由朱熹之子朱在所编；《续集》乃蔡觉轩、刘文昌抄掇，付刘叔忠编，刊于建安。后建安通守余师鲁，搜访遗文，编《别集》十卷，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由黄镛刻行世。此刻尚有残本传世，全称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正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集、《别集》十卷，残缺部分为明代补版。此版明代藏于福建提刑按察司，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张大轮、胡岳、潘潢等重刊，前有苏信所撰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之《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六安涂氏求我斋曾据此刊印。属于此系统之刻本著名者还有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贺沈、胡缉刊本。另外还有浙江刊本，约刊于南宋宁宗后；此本全称为《晦庵先生文集》，凡一百卷、《目录》二卷。宋江西亦曾刊朱集，名为《朱文公文集》，凡一百卷，现有残帙传世。此本除无《续集》、《别集》外，与闽本无大异。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此本与闽本差别不大，唯蔡方炳刻此书时改变《续集》、《别集》之分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清代

朱熹裔孙朱玉又将诗文打乱分类按年编纂，名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凡一百一十卷，首一卷，有清世宗雍正（1723—1735）年间刊本；此本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还有《晦庵文钞》、《晦庵诗钞》等选本行世。

（王学泰）

【涉斋集】 诗别集。十八卷。宋许及之撰。《宋史·艺文志》著录《许及之文集》三十卷，《涉斋课稿》九卷，与今本涉斋之名合。明焦竑《经籍志》载《许右府涉斋集》三十卷，“右府”指枢密院，与及之曾官知枢密院相合。但《涉斋集》至清已不存于世，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得《涉斋集》，皆题“许纶撰”，馆臣遂疑许及之初名许纶。不知许纶乃及之之子，《涉斋集》有的诗题言及此子。此集必为许纶所编，而《永乐大典》纂辑者未及深考，遂将编者误为作者。此集明《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皆有记载，至清渐销声匿迹，四库馆臣摭拾残剩，编为十八卷。常见者有影印文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十七年（1928）永嘉黄氏排印《敬乡楼丛书》第一辑中收有此集。

（王学泰）

【义丰集】 诗别集。一卷。宋王阮撰。刘克庄《王南卿文集序》云：“县尹王旦，携其先大夫义丰公遗文五卷示余。”是知王阮原集诗文合编，凡五卷。岳珂在《桯史》卷一有“王义丰集”条云：“阮所作诗号《义丰集》，刻于江泮，其出于蓝者，盖校官冯椅为之序。”可知王阮诗有单集别行者。现传世者有《义丰文集》残本，前有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赵希至题识，后有淳祐三年吴愈序，谓此本刊于惠州之博罗。可知非岳珂所谓“刻于江泮”本，存一卷，题卷一，可知非全帙。后世传抄皆依此本，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全书》所收即抄本。1920年胡思敬刊《九宋人集》，收《义丰集》一卷，附《校勘记》一卷，后收入《豫章丛书》。“义丰”为王阮所居山名。

（王学泰）

【平庵悔稿】 诗别集。十二卷。宋项安世撰。《宋史·艺文志》著录项氏著《丙辰悔稿》四十七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平庵悔稿》十五卷、《后编》六卷，并云：“‘悔庵’者，以语言得罪，悔不复为也。自序当庆元丙辰（1196），《后编》自丁巳（1197）终壬戌（1202）。”如此分卷之刻本与抄本皆不传。现传世之项集，较通行者有十二卷之抄本。前五卷多作于南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之前，其中有时间可考者，有写于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淳熙十五年戊申、淳熙十六年己酉、光宗绍熙元年（1190）、绍熙二年、绍熙三年者等等。第六卷标明作于“丙辰”。第七卷至第十二卷皆标明为“后编”，但也有写于丙辰之前者，如《刘武子生日》即注明“乙卯（1195年）重

九后十二日”；后有“补遗”，多从《后村诗话》补入。此编录诗一千二百八十五首，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另陆氏《藏书志》有抄本《平庵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后编》六卷，并载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吴长元手跋云：“是编为余秋室集太史分纂《永乐大典》摘出，时误传全集已抄入《四库》，遂未编录。庚子（1780年），余寓秋室邸舍，取存稿粘贴成书，手录副本，计《悔稿》、《丙辰悔稿》、《悔稿后编》凡三种，共诗一千四百馀首。以《书录解题》所载较之，《悔稿》十五卷，今丙辰以前，共得诗八百六十馀首，《悔稿后编》六卷，今得诗五百五十馀首，知《悔稿》之所缺甚多也。”并言《后编》诸诗，有作于宁宗嘉泰二年壬戌（1202）之后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此编校十二卷本多收一百馀首，两者相校，当能得一较完善之本。

（王学泰）

【于湖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其中诗十一卷。宋张孝祥撰。《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艺文志》在《文集》之后又附有《词》一卷、《古风律诗绝句》三卷，可能因其诗、词俱佳，故自《文集》分出而别行。《文集》中实际上已囊括了孝祥绝大部分诗、词作品。张集最初为其从弟张孝忠所编，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估计即今尚存的四十卷本。因此，写于光宗绍熙四年（1194）陆世良之《宣城张氏信谱传》中已记孝祥有集四十卷。现在可见最早刻本为宁宗嘉泰元年（1201）其弟江南西路安抚使张孝伯所刊，刻于豫章。前有孝祥门人谢尧生及孝伯两序，言孝祥去世后“天下刊先生之文集者数处”，孝伯“尽以家藏与诸家所刊属其（王大成）讎校”；并言“继有所得，当为后集”云云。后附二十三页，为孝祥之传、官诰、名人记序、诗及挽章等等。此嘉泰刊本曾被明文渊阁收藏，后散落民间，清代盛昱曾收藏，民初袁克文亦曾收藏，后归慈湖李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有刊本；八卷，为焦竑所校，名《张于湖集》。明思宗崇祯六年（1633），张时行据焦竑本再刊。此本较四十卷本少诗四十一首，词、尺牍各一卷，可知焦氏是据张集残本所刊。此外，明、清两代皆有写本，《四库全书》所收即写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排印本，此为今人徐鹏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校点，并新增《补遗》一卷，增收诗、词四十九首，是张集诸本之中最为完善者。

（王学泰）

【南轩集】 诗文别集。四十四卷，其中诗七卷。宋张栻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三十卷、《宋史·

艺文志》作四十八卷，恐皆非朱熹论定之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及此集编纂过程言：“栻没之后，其弟枸哀其故稿四巨编，属朱子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藏事，而已有刻其别本流传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论，而未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语，反多佚遗，乃取前所蒐辑，参互相校，断以栻晚岁之学，定为四十四卷，并详述所以改编之故，弁于书首，即今所传淳熙甲辰本也。”据此可知宋代著录张集卷数不同之故。朱熹编定本注重中晚年论定之作，早年作品多有删削、佚失。张栻早年写于永州之诗，如《题城南》、《马上口占》、《方广寺睡觉》等，诗皆佳而集中未收。此集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年）原刊本尚存于世，另有宋度宗时所刻残本、元刊本、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刻本、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廖辅之刻本以及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剑光阁刊本、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陈鍾祥刻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滕邑洗墨池本与清文宗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滕邑邑人重校本。

（王学泰）

【江湖长翁文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其中诗赋二十卷。宋陈造撰。陈集四十卷，宋已有刻本，但未见《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著录。宋末元初战乱中，陈氏裔孙妇避难姑苏，独携一子及陈集之版片，艰难九死，卒传斯集。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仁和李之藻在江淮负责治水，因近陈造家乡高邮，访求其全集，得前贡士王应元手录之陈氏全集，并秦观集合刊之。前有李之藻姚镗序，二序皆署万历四十六年，另有陆游序、元申屠駟所撰墓志铭，以及郡志本传等。明万历刻本尚有传世者。《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蠹斋铅刀编】 诗文别集。全称《蠹斋先生铅刀编》。三十二卷，其中诗十五卷。宋周孚撰。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当孚卒后之二年，孚友人解百禴为整理其诗、文，刊行于京口，陈珙为序。淳熙七、八年间，辛弃疾复刊于长沙，丘壑为序（见《嘉定镇江志》附录）。二本并行，内容大体相同，珙序及《嘉定镇江志》皆谓为三十卷。然京口本实为三十二卷。与本集目录之后解百禴跋语所云相合。盖多出之二卷，乃卷三一、三二之《非诗辨妄》，百禴取之以附行耳。《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二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四册，《篆竹堂书目》卷三同。长沙本久佚，今所传皆京口本。卷一收赋二首、古诗二十一首。卷二至卷一五收古律诗三百五十六首。卷一五至卷三〇收表、笺、启、书、序、记、疏、青

词、赞、碑、铭等各体文共一百四十七篇。末二卷《非诗辨妄》凡五十一则，为非郑樵《诗辨妄》而作。此二卷之后，为《蠹斋拾遗诗》，凡十四首。其集有明抄本，其书卷首有目录二卷，目录后有解百禴跋。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书，该本删去目录二卷，并删去解百禴之跋，实属可惜。日本静嘉文库有影宋抄本。

(孔凡礼)

【东莱吕太史集】 诗文别集。一作《东莱集》。四十卷，其中诗二卷。宋吕祖谦撰。祖谦去世后，其弟祖俭及侄乔年整理刊刻其遗稿，先编《文集》十五卷，又将家范、尺牋之类编为《别集》十六卷，再编程文之类为《外集》五卷，并将年谱、遗事之类作为附录三卷，又附录拾遗一卷。此即《宋史·艺文志》所著录《吕祖谦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录》三卷。此编有吕乔年原刊本传世，刊于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在乔年刊本之前，还有假托门人所编、真贋杂糅的《东莱集》，但未见其传。元代亦有刊本，完全依乔年本刻。至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安正堂刊本，始通为四十卷，无《文集》、《别集》、《外集》之别。《四库全书》所收《东莱集》四十卷即为此编。另有只收诗文的《吕东莱先生遗集》二十卷。此为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王崇炳所编，有金华陈思肱敬修堂刊本。清穆宗同治(1862—1874)间胡丹凤所刊《金华丛书》则据王氏所编，题作《吕东莱先生文集》二十卷，卷首一卷。1924年胡宗楙刊《续金华丛书》，收《东莱吕太史文集》，仍依宋刻，分《文集》、《别集》、《外集》等另附录《考异》四卷，较为完善。

(王学泰)

【止斋集】 诗文别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其中诗五卷。宋陈傅良撰。陈集在宋、元书记载中差别不大，如《直斋书录解题》为五十三卷，并注明“三山本”作五十卷，《文献通考》中作五十二卷，《宋史·艺文志》作五十二卷，大体相近(其区别可能在《附录》的多少与算不算卷数)，是知在宋陈集已经定型。陈集为其门人曹叔远所编，前有叔远序，谓该集所取，断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迄于宁宗嘉泰三年癸亥(1203)。这种只收学问定型之后诗文的作法，四库馆臣认为“凡乾道以前之少作，尽削之不存，去取特为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学说道之作，中年以后日趋成熟，而诗歌文章，少作则未必粗劣。朱熹编张栻遗集，亦摒“少作”，许多佳篇弃而不录，曹氏所编陈集亦未免有此弊。《止斋集》最早刊于宁宗嘉定元年戊辰(1208)，为永嘉文学徐凤所刊。此刻尚有传世者。据记载嘉定六年癸酉，永嘉郡守施棫再刊此书，藏诸郡斋。元顺帝至正(1341—1368)间重刻，多《附录》一卷，为神道碑、行

状、墓志及杂文八篇，合为五十二卷，后署“至正庚子(1360)仲冬，屏山书院重刊”。明代有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张璉刊本，正德元年(1506)林长繁浙中刊本。前有弘治十八年，王璉序，言其自秘阁录出此集，凡五十二卷，同年张璉巡浙中请梓之以传。后世五十二卷本多从林长繁刻本出。另有二十八卷与二十五卷本，前者最早刻于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为安正堂刊。后者刊于清高宗乾隆十年(1745)，为瑞安爱日楼刊本，还有清德宗光绪(1875—1908)间《永嘉丛书》本。

(王学泰)

【双溪集】 诗文别集。二十七卷，其中诗赋十卷。宋王炎撰。王炎集在宋似未刊刻，流传不广，故《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中皆无记载。其初刻于元仁宗延祐三年丙辰(1316)为其六世孙王偁所刊，厘为十二卷，诗文编排各以类从，每类之中又以写作时间为先后。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炎族裔孙王祺曾重刊。此本流传较广。另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刊本，名为《双溪文集》，为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炎裔孙王懋元所刊，前有潘滋序，及汪思、汪玄锡序，此本十七卷。第三传本为二十七卷本乃神宗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尚宝司丞王鏊得沈一贯之旧藏本，为之校正开雕。《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东塘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七卷。宋袁说友撰。袁集久已散佚，不仅宋、元各种书目不见著录，并其集名一并湮没不彰。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馆臣发现《永乐大典》中收录说友诗、文甚夥，于是搜罗排纂，编为此集，收入《四库全书》。但此后无人刊刻，仍以写本传世。民国年间，中央图书馆印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常见者还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稼轩诗文抄存】 诗文别集。宋辛弃疾撰。今人邓广铭辑。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辛稼轩集序》盛赞弃疾所撰《美芹十论》、《九议》“笔势浩荡”，又有“诵其诗、词”之语，知此《稼轩集》包括文、诗、词，具有全集的规模，与范开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所刊之《稼轩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的一卷本《稼轩词》和提到的信州十二卷本《稼轩词》并行于世。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提到访上饶(即信州)所刊辛集，有词无诗。此辛集，当为十二卷本《稼轩词》。其书，《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虽未著录，然明初流传尚广。现存残本《永乐大典》所引弃疾诗，其所标引用书目，即作《稼轩集》或《辛幼安稼轩集》，明抄本《诗渊》所引弃疾诗，亦有标《稼轩集》者。明成祖永乐

(1403—1424)间所辑《历代名臣奏议》，有弃疾《美芹十论》，当辑自是集。其后传世渐稀，惟见明姜南《蓉塘诗话》卷一九引弃疾帅湖南时所作《赈济榜文》二句、明孙云翼注宋李廷忠《橘山四六》卷四《贺江东梁总领》“貔貅”二句时所引弃疾之启二句。孙为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人，则《稼轩集》之亡，当在明末叶。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弃疾裔孙启泰开始录求弃疾所佚诗、文，他在重刻汲古阁本《稼轩词》时，益以法式善辑自《播芳大全文粹》、《铁网珊瑚》及郡县志、宋人诗话弃疾诗十首，文二篇。会朝廷开唐文馆，式善在馆中，续从《永乐大典》辑录，凡得奏议及其他杂文三十一篇，诗一百一十一首，词五十首，加上启泰所撰《稼轩年谱》，汇编为《稼轩集抄存》。于嘉庆十六年(1811)刻以行世。然法式辛氏辑，间有疏误，如《赠黄冠》乃辛次膺作，《鹅湖夜坐》乃陆游诗，《御书阁额》二首乃秦桧党羽为媚桧而作，《贺杨经略札子》所述与弃疾经历全不合，非弃疾作。今人邓广铭，为详加考辨，对于二氏所辑其他诗文，亦为之校勘，在此基础上，复以明抄本《诗渊》第一至第九册、《永乐大典》、《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一六等书中，辑得文五篇、诗十五首，连法式辛氏所辑，去伪存真，编成《稼轩诗文抄存》。凡文三十四篇，诗一百二十三首、残篇一首。有194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然邓氏之辑犹未尽，近年孔凡礼复自明抄本《诗渊》第十至第二十五册及《永乐大典》中，辑得诗十七首，词三首。为《稼轩诗词补辑》一文，发表在《文史》第九辑上。《诗渊》收弃疾诗约七十首，与《稼轩诗文抄存》重复者达五十多首，其文字往往胜《抄存》。(孔凡礼)

【竹斋诗集】诗别集。三卷，附录一卷。宋裘万顷撰。万顷在当时不以诗名，宋、元目录书中亦无其诗集著录。南宋诗人合集如《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集》、《江湖小集》以及四库馆臣采撰而成的《江湖后集》等书中皆不见收录。刘克庄集中有《裘元量司直诗跋》，称“其犹子南昌理掾应材携竹斋遗墨古律诗三首、其季元龄又手录四十二首。其言若近而远，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远而深者不可能。为人自贵重，耻表曝，惟诗亦然。世知竹斋者多，而见其诗者绝少，理掾盍锲诸梓，与同志共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当时尚无刻本。宋末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当时名为《圣宋群贤小集》)，收录裘诗三卷，存诗二百五十馀首；明潘是仁编《宋元三十七家集》，略收裘诗以备一家。后裘诗集绝少流传。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万顷裔孙裘奏刊裘集，集后附有诰敕志铭，当系家族内传本。清高宗乾

隆(1736—1795)间裘氏裔孙裘曰修重新精刊此集。其内容与裘奏刻本相同。此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14年李之鼎所刊《宋人集》本。(王学泰)

【叶适集】诗文别集。包括《水心文集》二十九卷、《补遗》一卷、《水心别集》十六卷，其中诗三卷。宋叶适撰。叶集最初为其门人赵汝谠按年编次刊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从卷数看，与此《叶适集》略同，实际上差别很大。宋刻叶集，至明初即不见全璧传世。明英宗正统(1436—1449)间赣人黎谅在叶适家乡附近处州任推官，欲编刻叶集，“访求遗本，无有存者。间或得一二篇或数十篇，历八载始克备。有曰《文粹》、曰《叶学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公暇躬自誊录。其各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序、诗、铭并杂著，成章者得八百馀篇，編集汇次，分为二十九卷，其所著经传子史，编为《后集》，总名曰《水心先生文集》”(见黎谅跋)。可知此编不仅在编次上与赵汝谠不同，而且在所收篇目数量也远未达到原刻。此集刊行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但只见正集行世。后世所刊叶集皆由此出，中华版《叶适集》亦不例外。清初与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皆有叶集之刊刻。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瑞安人孙衣言，依钱桂森所藏二十九卷本之黎刻叶集校正重刊，并取《事文类聚》、《黄氏日钞》、《通考》、《浩然斋雅谈》等书中所载叶适诗文，补正阙误，并参校清初与乾隆间叶集刻本，写成《水心文集校注》二卷，但只刊行了《水心文集》二十九卷、《补遗》一卷。《水心别集》为孙衣言门人李春觥所刊。1960年中华书局合并《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去其重，编为《叶适集》并加标校，排印出版。(王学泰)

【南湖集】诗词别集。十卷，包括诗九卷、词一卷。宋张镃撰。张集在宋诸目录著作中皆无记载，镃早有《南湖集》之名目，故杨万里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曾为此集作序。宋末元初，方回为《南湖集》作跋云：近得其前集二十五卷，三千馀首，嘉定庚午(1210年)自序，盖所谓得“活法”于诚斋者。从方回之跋，可知《南湖集》最初编定时间及张镃诗作之多。明初书录中始见著录《南湖集》。《文渊阁书目》与《策竹堂书目》并载《南湖集》五册，不知是否方回所见二十五卷本。但此后张集便沉没无闻。张镃之诗、词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之中，四库馆臣加以采掇裒次，以类相从，厘为十卷，得诗一千一十七首、词七十八阙，编为此集，收入《四库全书》，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鲍廷博刊《南湖集》十卷、《附录》三卷，

其中诗词文亦自《永乐大典》中辑得,附录为遗文一卷、碑刻一卷、逸事一卷,有鲍氏知不足斋刊本。

(王学泰)

【**龙洲集**】 诗文别集。一作《龙洲道人集》、《刘龙洲集》。十二卷,其中诗十卷。宋刘过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己未(1199)夏,过游东阳,得诗文五十余篇,友人集以为《东阳游戏》,许从道为序。是为过诗文结集之始。《东阳游戏》今不传。过所作大抵不自收拾。过卒后,弟澹为搜辑成集,理宗端平元年(1234)为序,其刊行当在此时。《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刘改之词》一卷,是其词另有单行本。《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刘龙洲集》,云一部三册,缺。明王朝用所刻《龙洲道人集》十五卷,为现存最早刊本。其书卷一至卷一〇为诗,卷一一、卷一二为词,卷一三为启,卷一四为杂文,卷一五附录序跋。《四库全书》本附录增宋以后诸人所题诗,为二卷,余卷次同王本,所收诗较王本少数首。清代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包括诗、词、文在内的全集本和诗集单行本多种。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排印校订本《龙洲集》,卷一至卷一〇为诗,共三百七十一首;复有“补遗”,得诗二首。此本收刘过诗最全;其卷一为词,卷一二为文。

(孔凡礼)

【**白石道人诗集**】 诗别集。三卷。宋姜夔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白石道人诗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白石丛稿》十卷。此二集皆佚。现传世明末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本《白石道人诗集》一卷,录姜诗一百六十九首。此本实为南宋杭州书贾陈起所编纂之《江湖集》中的一个小集,故姜集《自叙》之后标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刊行”。它远非陈氏所著录之“三卷本”,是一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言:“考《武林旧事》载夔诗四首,《咸淳临安志》载夔诗三首,《研北杂志》亦载夔诗一首,皆此本所无,知在所佚诸卷之内矣。”鲍廷博为其辑《补遗》一卷。1921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汲古阁影抄本,后附鲍氏《补遗》一卷、姜夔《诗说》一卷,合并为三卷,刻印刊行。姜诗亦与词合刊,诗作三卷、词四卷、《诗说》一卷。常见者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铅排本。

(王学泰)

【**昌谷集**】 诗文别集。一作《曹文简公集》、《昌谷小集》。二十二卷,其中诗三卷。宋曹彦约撰。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彦约墓铭谓其著《舆地纲目》十五卷、《昌谷类稿》六十卷、《经幄管见》七卷,藏于家。其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不知刊于何时。《文渊阁书目》卷九始著录,谓一部十五册,另一部十二册。《策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十五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二十卷。明《内阁藏书目

录》著录,谓十五册。《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二十卷,又《续集》一卷。知其集明末清初犹存。清修《四库全书》时,未见此集,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二十二卷:卷一至卷三收诗,计五古十四首、七古十七首、五律一百十四首、七律一百五十四首、七绝八十一首;卷四至卷二二收表、笺、封事、上书、启、书、状、札子、序、记、榜文、议、说、跋、赞、墓志、杂著等各体文二百六十篇。今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其诗五首、文七篇。

(孔凡礼)

【**清苑斋集**】 诗别集。一作《清苑斋诗集》、《赵师秀集》。宋赵师秀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著录为二卷;又有别本《天乐堂集》一卷,已佚。明潘是仁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有此集,收诗一百三十二首。此后,顾修《南宋群贤小集》、鲍廷博《南宋群贤小集补遗》、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皆收入。鲍廷博氏自《瀛奎律髓》补诗七首,自《东瓯续集》补诗二首,共九首。今人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自《娱书堂诗话》、《贵耳集》、《鹤林玉露》、《全芳备祖》辑得佚联七,自《梅花衲》、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辑得佚句五。该书于198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孔凡礼)

【**芳兰轩集**】 诗别集。一作《徐照集》、《芳兰轩诗集》。宋徐照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著录,凡三卷。据《水心集》卷八《徐师屋广行家集定价三百》诗,照集有家刻单行本,此本或即《直斋》著录之本。宋时尚有《永嘉四灵诗》丛刻本,收照及徐玑、赵师秀、翁卷之诗。其本,明末钱谦益藏于绛云楼,楼遭火,仅存前半部,后归汲古阁毛氏,已佚。其后以钞本流传。本集幸在残存的前半部中,凡甲、乙、丙三卷,总诗二百五十六篇。本集尚有另一流传系统。明潘是仁刻《宋元名家诗集》,收本集,凡诗一百零五首。顾修据潘本收入《南宋群贤小集》,又自《瀛奎律髓》等书补诗十二首,乐清郑氏本因之。1915年,冒广生《永嘉诗祠堂丛刻》本据《东瓯诗存》增诗一首,上海医学书局丁氏聚珍本因之。1928年,永嘉黄群校勘本集,收入敬乡楼丛书铅印本中。其本以影钞《永嘉四灵诗》为底本,卷末自顾氏本补《莫愁曲》、《三峡吟》、《李夫人》三首,共诗二百五十九首,照诗皆备于是。常见者有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之《永嘉四灵诗集》本。

(孔凡礼)

【**二薇亭集**】 诗别集。一作《徐玑集》、《二薇亭诗集》。宋徐玑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著录,凡二卷。又有《泉山集》、《瀛奎律髓》卷二〇翁卷《道上入房老梅》评语言及,已早佚。宋时尚有《永嘉四灵诗》

丛刻本,收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之诗。其本,明末钱谦益藏于绛云楼,楼遭火,仅存前半部,后归汲古阁毛氏,已佚。其后以钞本流传。本集的第一卷,在残存的前半部中,为《永嘉四灵诗》之丁,凡诗九十八首。本集尚有另一流传系统。明潘是仁刻《宋元名家诗集》,收本集,凡诗一百零四首。顾修据潘本收入《南宋群贤小集》,补诗三首,乐清郑氏本因之。1915年,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据《东瓯诗存》补诗二首,上海医学书局丁氏聚珍本因之。1928年,永嘉黄群校勘本集,收入《敬乡楼丛书》铅印本中。其本以影抄《永嘉四灵诗》为底本,自顾本补入六十六首,自冒本补入二首,共诗一百六十六首,玑之诗皆备于是。常见者有今人陈增杰校点之《永嘉四灵诗集》本。198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

(孔凡礼)

【**苇碧轩集**】诗别集。一作《翁卷集》、《西岩集》、《苇碧轩诗集》。宋翁卷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著录为一卷。此集原与《芳兰轩集》、《二薇亭集》、《清苑斋集》俱收于宋本《永嘉四灵诗》;其后为钱谦益所藏(见《牧斋初学集》卷一三),其半毁于火,此集适在毁中。明潘是仁《宋元四十三家集》有此集,约出自叶适《四灵诗选》,收诗一百二十一首。自此以后,顾修《南宋群贤小集》、鲍廷博《南宋群贤小集补遗》、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皆收入。鲍氏自《瀛奎律髓》补诗十四首,自明赵谏《东瓯续集》补诗一首,冒氏自《西岩集》补诗二首,共十七首。今人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复自张端义《贵耳集》、李升集句《梅花衲》辑得佚联一、佚句五。《永嘉四灵诗集》于198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孔凡礼)

【**石屏诗集**】诗别集。一作《石屏集》、《戴石屏诗》。十卷,宋戴复古撰。南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楼钥序复古诗,嘉定七年,巩丰、真德秀复序其诗,未刊。其后,友人赵汝谔选其诗一百三十首,为《石屏小集》,于理宗绍定二年(1229)刊行,其兄汝谈为序。复古复收拾散稿,得四百余篇,赵汝谔等为删去其半,分为两帙,袁甫摘取其中百首,附《石屏小集》(亦称《续集》)后行世。绍定五年,复古自为跋。萧泰来继选为《第三稿》。李贾、姚镛选为《第四稿》上、下二卷,于端平三年丙申(1236)刊行。复刊《第五稿》上、下二卷,自《第四稿》以下称《后集》。复古复自录其父敏《东皋子诗》十诗置之卷端,淳祐四年(1244)陈昉为序。至此,诗集全部刻成。元顺帝至正十八年戊戌(1358),孙文瓚校旧本重刻,贡师泰为序。《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戴石屏诗》,云一部二册,缺。其家藏本亦散佚。明英宗天顺(1457—

1464)、宪宗成化(1465—1487)间,复古之裔孙鏞多方搜求,于《小集》、《续集》、《第四稿》下、《第五稿》上下及律诗数十篇之外,复得其先世曷等二十八人之诗若干首,与此同时,马金亦得写本。马金乃据二本校刊重编为十卷,敏诗仍置卷端,曷等诗附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宋鉴为之刊行。今通行本此书,乃宋鉴刊影印本,收入《四部丛刊》续编。

(孔凡礼)

【**泠然斋集**】诗别集。八卷。宋苏洵撰。张世南《游宦记闻》谓洵有集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卷二〇诗集部分著录此集,标明十二卷,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二十卷,误。明《文渊阁书目》载洵集一部六册。后渐亡佚,只在各种选本中存洵数诗。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洵诗八百五十余篇,厘为八卷,编为此集,使苏洵诗作重显于世,于江湖诗人中,俨然一大家。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中央图书馆印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清中叶以后亦以抄本流传,其中张金吾抄本附《补遗》与《附录》。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苏氏后裔苏廷玉刻印《苏魏公集》后附苏洵之《泠然斋集》。今人栾贵明又从残存《永乐大典》中辑得苏洵诗六首,见《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王学泰)

【**野谷诗集**】诗别集。六卷,宋赵汝谔撰。赵集在宋代未见著录。其集为临安书棚陈起刊刻,附《江湖集》以行,故后世从散佚《江湖集》遗册中所辑成的南宋诸家合集多有《野谷诗集》,如《南宋六十家集》、《南宋群贤小集》等皆收赵集六卷。亦有一些抄本流传,如振绮堂抄本、晋江黄氏抄本等。然《江湖集》中诸集皆为选本,赵集卷帙虽然较多,亦不例外。故在《野谷诗集》之外,汝谔还有其他诗作传世。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采掇江湖诗人作品,编为《江湖后集》其中亦有赵汝谔作品,此亦可视为《野谷诗集》之一部分。《野谷诗集》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翠微南征录**】诗文别集。十一卷。宋华岳撰。原名《华赵二先生南征录》;《永乐大典》卷三五〇〇、三六〇〇、九七六三皆有引录,先列华作,次列赵希蓬和作;其他各卷,有引作《华岳南征录》的,亦为华唱赵和。此书在宋时颇为流行,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选华诗数十首、赵诗多首。赵诗乃步华韵。说明刘克庄乃据《华赵二先生南征录》入选。明抄本《诗渊》大量引用了《华岳南征录》,先列华作,次引赵之和作。说明《华岳南征录》即《华赵二先生南征录》。《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著录《华赵二先生南征录》,谓一部一册,缺。说明明英宗正统(1436—1449)间杨士奇编书目时,此书官藏本已散

佚。《翠微南征录》，明世宗嘉靖（1522—1566）时有王崇志刊本，最早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二九。比较《诗渊》中所引《华岳南征录》和今本《翠微南征录》，有很大不同：前者包括了词，亦华唱赵和，后者无词；前者有五言绝句，后者无此体，前者所收七言绝句，多于后者很多首；前者乃华、赵二人之作，后者只有华作。后者共十一卷，卷一为文，其他各卷为诗。后者或为明代妄人删削、割裂《华赵二先生南征录》而成，通行本为《四部丛刊》三编影旧抄本。

（孔凡礼）

【平斋文集】 诗文别集。一作《平斋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著录洪集。《宋史》本传但言有“外内制、奏议、诗文行于世”，未云集名。《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二部，一为九册，一为八册，均注残缺。其书传世不广。《四库全书》所收的《平斋文集》，虽为三十二卷，然无诗；卷一至六为讲义，卷七至八为故事，其余各卷收各体文四百五十多篇。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洪氏晦木斋为校勘刊行之，并附录《拾遗》，计收赋一篇，诗四十八首、词四十三首，各体文三十四篇。然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本仍在，国内亦有影宋抄本（残），藏瞿氏铁琴铜剑楼。1934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为影印问世，收入《四部丛刊》续篇。《丛刊》本卷一为赋，凡四篇；卷二至卷八，为编年诗，凡一千零四十多首，卷九至卷三二收各体文八百六十多篇。以《四部丛刊》本较《四库全书》本，可见后者“编次分卷，颠倒脱漏”（张元济跋），《丛刊》本远胜四库本。然晦木斋本辑佚诗文，亦间有出《丛刊》本之外者。

（孔凡礼）

【鹤林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宋吴泳撰。《宋史》卷四二三《吴泳传》谓泳有《鹤林集》，不载卷数。其集，《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皆不著录。惟《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见之，亦云“缺卷”。知其集原未分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不见其集，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四十卷：卷一至卷四收五古五十九首、七古二十一首、五律四十一首、五言长律二首、七律八十七首、五绝十首、七绝五十六首；卷五至卷一二，收内外制文三百五十九首；卷一三至卷三九，收表、奏疏、札子、状、启、书、策问、碑、墓志铭、序、记、杂著等各体文六百二十六篇；卷四〇为词，凡三十二首。其集今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七古二首、七律三首、祝文一首、祭文一首、制三百九十三首。

（孔凡礼）

【安晚堂集】 诗别集。七卷。宋郑清之撰。《宋

史·郑清之传》载其“代言奏对，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此集为诗文合集，当时刊于临安。由于清之曾保护过江湖派之中坚陈起，陈在《江湖集》中亦曾收清之诗集。后六十卷本郑集散佚，唯存第六至十二卷，凡七卷，皆为诗，遂为藏书者所宝贵。明末汲古阁毛晋遂据此宋残本影印，称《安晚堂诗集》。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收入《四库全书》。现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古书流通处据毛晋印本影印。民国三年（1914），李之鼎重刻此七卷本，又从《江湖小集》中辑得郑集《补编》二卷，并辑《补遗》一卷、《辑补》一卷，收入宜秋馆所刻《宋人集》的丙编中。

（王学泰）

【鹤山全集】 诗文别集。一百零九卷，其中诗十二卷。宋魏了翁撰。赵希弁之《郡斋读书志·附志》中载《鹤山先生文集》十三卷、《后集》十卷、《续集》十三卷、《别集》十一卷。此本可能是作者生前随写随刊之本，非其身后编定之本。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辛亥（1251年），吴潜为魏集所撰之序云，了翁子魏近思、魏克愚，相与蒐辑亡佚，编成魏氏《正集》、《外集》、《奏议》凡一百卷，初刊于姑苏，继刊于温阳。开庆元年（1259），又从何璟、朱景行等人处得到他们所藏的《雅言》、《周礼折衷》以及墓志铭、书札等魏了翁的未刊之作，合为一编，刊于蜀中成都，时为蒙古军攻蜀之时。此本刊刻仓猝，写刻纸墨均劣，校勘不精，却有刻本传世。元代及明初未见有魏集刻本。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出现魏集二刻本：一为锡山安国安氏馆铜活字本，每卷前题“锡山安国重刊”；二为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邛州知州吴凤刊于官舍本，后署“邛州知州吴凤、郡学王葵校”。另据记载，嘉靖二十年辛丑四川兵备副使高翀亦曾刊魏集（有人疑高翀本实际上就是吴凤本，待考）。吴凤本、安国本均为一百零九卷。此编尚存昔日旧本遗迹，如三十五卷下题《渠阳集》，三十七卷下题《朝京集》，九十卷下题《自庵类稿》，则是其集旧名，删削未尽。《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所影底本则为宋刻一百一十卷本。

（王学泰）

【玉楮集】 诗别集。一作《玉楮诗稿》。八卷。宋岳珂撰。明以前可能只以抄本在家族内流传，未曾刊刻，故《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等书目中未见记载。岳珂十六世裔孙岳元声于明末熹宗天启（1621—1627）间首次刊刻，其门人周念祖等人校订。《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云：“据岳倦翁（珂）跋：‘自写清本，凡百零七版。’今正合其数，每卷首题‘十六世孙元声等藏墨’。”可知元声刊刻之依据为岳珂手眷底稿，但此刻错谬很多。此集非珂诗全集，乃其三年作

品,始自南宋理宗嘉熙二年戊戌(1238)终于嘉熙四年庚子(1240),珂于绍定六年癸巳(1233)以京口观灯作诗涉及徽宗,韩正伦以为借端讽己,遂构陷之,会事得白,嘉熙二年首次召用,故编此集,以为纪念。其集名取义《列子》中刻玉为楮叶,三年而成之意。《四库全书》收此书所据为明抄本,讹误较少。民国十一年(1922),河南官书所刊《三怡堂丛书》本,校订较精,有《附录》一卷。另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其中有《玉楮诗稿》四卷。(王学泰)

【**臞轩集**】 诗文别集。又称《臞轩文集》、《臞轩先生集》、《王臞轩文集》。十六卷。宋王迈撰。其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七册。《策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十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谓二十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仅见《臞轩四六》一卷,余已佚。四库馆臣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六卷:卷一至卷一一,收各体文一百七十三篇;卷一二至卷一六,收五古七十三首、七古四十四首、五律六十五首、五言排律三首、六言四首、七律一百九十七首、五绝五首、七绝四十九首、词五首。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一首、七律六首、五律六首、文二篇。然犹未尽,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二有迈自题画像之文,其集未收。《校辑宋金元人词》有《臞轩诗余》一卷,出自《臞轩集》。(孔凡礼)

【**后村大全集**】 诗文别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诗四十八卷。宋刘克庄撰。林希逸为克庄所撰。行状谓其“有前、后、续、新四集,已行于世”。又据希逸为刘集写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之序,称理宗淳祐八年(1248)守莆田时刊其前集于郡庠。咸淳八年刘希仁之序谓前集刊于莆,既而后、续、新三集,继刊于玉融,后版为书坊翻刻,此书遍传于江左。后村既没,其子季高辑为一部,名为《大全集》。此本将四集通为一编,卷一至卷四八为诗,卷四九为赋,卷五〇至卷一七二为文。卷一七三至一八六为诗话,卷一八七至卷一九一为长短句,卷一九二、一九三为书判,卷一九四至卷一九六为行状、墓志、谥议等。宋刻《大全集》已不传于世。现存于世者有范氏天一阁影宋写本;另有清赐砚堂抄本,版心下方有“赐砚堂”三字。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即影赐砚堂抄本。宋刻传世者惟有建阳刻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此本并非《大全集》之删选本,乃是其前集,前十六卷为诗,次为古文杂著,最后为诗话、诗余。《四库全书》所收录者即此本。《后村集》刊刻以传者,除《诗话》、《长短句》外,仅有清圣祖

康熙五十九年(1720)姚培谦所刊十六卷本,《附录》二卷。(王学泰)

【**秋崖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宋方岳撰。方集宋代即有数个刊本。《绣谷亭书录》记载宋时开化、建阳、临安皆有刻本,又有竹溪书院本、耐轩本,后并散佚。竹溪书院本为南宋理宗宝祐(1253—1258)年间进士方石刻于竹溪书院,其版片元季毁于战乱。此本又称宝祐本,名为《秋崖新稿》,凡三十一卷,有影抄本传世。另有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方岳裔孙方谦刊《秋崖小稿》八十三卷,其中文四十五卷、诗三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以两本参较,嘉靖本(指《秋崖小稿》)所载较备,然宝祐本所有而嘉靖本所无者,诗文亦尚各数十首。又有别行之本,题曰《秋崖小简》,较之本集,多书札六首。谨删除重复,以类合编,并成一集,勒为四十卷。”传世者:有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方谦刻本;另有一清高宗乾隆(1736—1795)、仁宗嘉庆(1796—1820)间活字本,仅有诗三十八卷,仍属于嘉靖本系统。间今较常见者有四十卷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沧浪集**】 诗别集。三卷,包括《诗话》一卷。宋严羽撰。严集初刊于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前有黄公绍序,但此本已佚,宋代目录诸书中亦未见记载。现存严集最早刻本为元刊本,已残,缺二页,后明刻多由此出,亦缺此二页。元刊本作《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前题“樵川陈士元旻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有三个刻本传世:一为淮阳胡岳(仲器)刻本;一为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李坚刊本;一为正德十五年尹忠嗣刊本,前有都穆写于正德十五年之序,此本名为《沧浪先生吟卷》二卷,刊于昆山。另有明神宗万历(1573—1620)末闽刊本,为何若士重编,前有徐燊序。集名《沧浪集》,作四卷。万历四十三年(1615),潘是仁编《宋人三十七家集》,收《严沧浪诗集》六卷。清代有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霞双笏山房刊《樵川二家诗》本(另一家为元黄镇成)、德宗光绪七年(1881)徐氏重刻《樵川二家诗》本,收入邵武《徐氏丛书》之中。另有民国五年(1916)年乌程张氏所刊《适园丛书》本。(王学泰)

【**紫岩诗选**】 诗别集。三卷。宋于石撰。于集是作者去世后其弟子吴师道所编,初为七卷。清丁丙《善本书藏志》称于石“所著诗七卷,今存卷一五古五十三首、七古十一首,卷二七古十七首、五律二十三首、七律二十三首,卷三七律四十首、七绝三十七首,综古今体诗二百四首。每卷后题元门人吴师道原编,明四世孙伯善谨录”。此本称天福山房抄本。

又藏另一写本,凡诗三卷,篇第与前不同,殆别一抄本。后有之江沈廷芳题云:“集久不传,传者仅此册耳。同里门人吴师道为之选次,诗凡三卷,内缺二页,其来已久,不能复补矣。”清人胡玉潜据此,疑七卷本本为吴师道所编,后轶其四卷,遂将三卷本题为师道所选。吴为于氏弟子,不应以选者自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于国华留耕草堂据天福山房抄本,刊刻行世。在此之前,于集只以抄本流传,未见有刻本。后于集又被收入民国年间所编之《续金华丛书》。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雪矶丛稿】诗别集。不分卷。乐雷发撰。雷发生前,其集曾数次刊刻。最早刻本为渝江罗季海、西湖胡雪江所刊。此本“传录失真,甚至杂以他人之作”(见《雪矶丛稿自叙》)。南宋理宗宝祐五年丁巳(1257),乐氏友人朱嗣卿、何尧卿又捐资刊刻,此刊经过作者许可,又曾加以校正。此本曾被收入《江湖集》中,为四库馆臣所辑之《江湖小集》所采,厘为四卷。明英宗正统(1436—1449)间乐氏后嗣乐韶为戎州教官,将其诗与对策合为一编,分为一五卷,由周洪谟作序,刊刻出版,并题“后嗣教谕乐韶、知县乐武校正”。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又有其后嗣乐宣作跋的活字印本。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顾修编纂《南宋群贤小集》,亦收此集。今人萧艾以顾修所编“小集本”为底本,校以《宋百家诗存》、《沅湘耆旧集》中所收乐集,并加详注,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

(王学泰)

【则堂集】诗文别集。全名《则堂先生文集》,又名《则堂文集》、《瀛洲集》。六卷。宋家铉翁撰。元吴师道《吴正传先生文集》卷一七有《家则堂诗卷后题》,未云见其集。其集之刊行时间或较晚。其集,《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六册,完全。《篆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六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十六卷,明《内阁藏书目录》卷三同。《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十八卷。知其集明末清初犹存。清修《四库全书》时,其集不见,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六卷:卷一至卷四收制、记、序、说、书后、跋、箴、赞、偈、疏、祭文等各体文共八十四篇;卷五至卷六收四言诗二首、五古六首、七古三十三首、五绝一首、七绝四十六首、七律九首、词三首、骚体二首。有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东武刘氏嘉荫堂抄本、清知白斋抄本(缺第五、第六卷)、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彊村丛书》有《则堂诗餘》一卷。(孔凡礼)

【萧冰崖诗集拾遗】诗别集。三卷。宋萧立之撰。立之诗集原刊本为二十六卷,谢枋得为序,序作

于癸未。《拾遗》卷下有《壬午元旦试笔……》、《壬午九日……》诗。联系考察,知壬午乃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癸未乃至元二十年。此二十六卷本,当即刊于癸未。此书流传颇广。元韦居安《梅硎诗话》引其《秋日》、《琵琶亭》、《咏秦》、《咏疑冢》多首。其后不久,其书之板,即以遭兵燹无存。然其书仍在流传,影印明抄本《诗渊》第三册有其《桃源》诗一首。立之九世从孙敏、毓多方搜求,得七言古体七十二首,五言古体四首、五言律词三十八首、七言绝句一百七十七首、七言律诗一百零八首,遂为之重刻,从《萧冰崖诗集拾遗》之名行世,此本三卷。然《梅硎诗话》及《诗渊》所载各诗皆不见,知所佚者尚多。诗集原刊本及《拾遗》,公私书目皆不著录。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阮元得《拾遗》,为奏进,收入《四库未收书》,并为提要。1934年,涵芬楼为影印,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孔凡礼)

【叠山集】一作《宋谢文节公集》。诗文别集。十六卷。宋谢枋得撰。据元人李源道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所撰《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枋得有杂著诗文六十四卷,翰林学士卢挚为之序。其后,此集以屡经兵燹,存者无几。枋得里人黄溥乃采辑遗佚,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刊刻。凡十六卷,卷一、卷二为诗,卷三为诗、词,卷四至卷一五为文,卷一六为附录。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黄齐贤为重刻。1934年,商务印书馆据嘉靖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续编,是为今日的通行本。此集,嘉靖(1522—1566)中尚有知广信府事揭阳林光祖所刊二卷本,亦出黄溥本,然所收诗文篇数,与嘉靖本互有增减。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御史吴某据林本重刻于上饶,为十六卷,编次与林本有别。清圣祖康熙(1662—1722)中,弋阳知县谭瑄重订此书,为五卷;《四库全书》收入此本时,删去其中《贺上帝生辰表》、《许旌阳飞升日贺表》、《蔡氏宗谱序》十余篇。清穆宗同治五年丙寅(1866)有皖江六卷刊本,卷一为书,凡十三篇,较《四部丛刊》本多《与李梅臞书》一篇。卷二有序八篇,较《丛刊》本多《蔡氏宗谱序》一篇,少《程汉翁诗序》一篇;有记六篇,较《丛刊》本多《辛稼轩先生墓记》,易《丛刊》本《宋辛稼轩先生墓记》之题为《辛稼轩先生祠记》。卷三、卷四收各体文八十三篇,较《丛刊》本多二十二篇,而《四库全书》本删去的《贺上帝生辰表》、《许旌阳飞升日贺表》,即在其中。又此本卷四有《碧湖杂记》七则,《丛刊》本无。卷五收各体诗九十首,较《丛刊》本多十九首;收词一首,与《丛刊》本同。卷六为附录,较《丛刊》本互有增减。(孔凡礼)

【仁山集】诗文别集。四卷,诗二卷。宋金履祥

撰。履祥平生所著诗、文极多，后多散佚。其集原分类《非非存稿》、《仁山新稿》、《乱稿》（南宋灭亡后诗文稿）、《噫稿》（子亡后之所著诗文），作者生前可能曾经刊行，为其门人林景熙、方逢辰等人所刻。此本不见传世。其弟子吴师道家藏有履祥手稿多种；至明，董遵（或作董遵道，误，董遵字道卿）又补充多篇，于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刊刻问世，为四卷；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再度刻印，为三卷。清世宗雍正三年乙巳（1725），履祥裔孙金弘勋得到依明正德刻本之影写本，又得万历刻本，因合校精刊之，是为六卷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又雍正九年履祥第十八世孙金律亦刻全集，名为《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作四卷，附录一卷。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桐山金祠刻金集，亦作五卷。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胡丹凤辑刻《金华丛书》，亦收金集。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收金集乃据清初写本影印，作三卷。（王学泰）

【草窗韵语】 诗别集。六卷。宋周密撰。此集编于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所收皆为作者四十三岁以前作品，凡三百馀题，诗四百馀首，前有文及翁、陈存敬二序及李莱老、李彭老、李龚三人之题诗及跋。此书尚有宋刻传世，卷一至卷六称为一至六稿，写刻极精美。从周密传世书法遗迹来看，此本当是据其手书上版者。李莱老诸人题诗，亦为手写，全书无一字为印刷体。近人傅增湘云：“李莱老跋，后有墨书‘至正十年（1350）三月，浚仪张雯得之于高文远书肆，五月重书于吴下至乐斋’一行，为元人手迹。此书为宋刊中绝无仅有之逸品，几可视为自书诗册。友人蒋君汝藻与袁兄克文争而后获之，遂以‘密韵’名其楼。有影印本行世。蒋君又请友人董康为之摹刻，收入《密韵楼丛刻》七种。”（见《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王学泰）

【刘辰翁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宋刘辰翁撰。辰翁一生诗文著作极富，其子刘将孙言，曾整理其诗文，“今刻为诗八十卷，文又如干”（《须溪先生集序》）。明杨慎言，辰翁“有《须溪集》一百卷”（《刘辰翁传》）。全集散佚已久，书目也很少著录，明人见者甚罕。韩敬选订诸家之文，以不得辰翁全集为憾。其传世者唯《须溪四景诗集》四卷、《须溪记钞》八卷（《记钞》全收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世所传者惟《须溪记钞》及《须溪四景诗》二种，篇什寥寥。今检《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著、诗馀尚多。谨采辑哀次，厘为十卷。其《天下同文集》及《记钞》所载而不见于《永乐大典》者，亦别为钞补，以存其概。至《四景诗》则原属草行之本，今仍各著于录，故不复采入云。”民国年间，胡思敬编《豫章丛书》，收辰翁诗

文，编《须溪集》七卷，基本上依《四库全书》本《须溪集》，并出《校勘记》一卷、《校勘续记》一卷。现今较完备之本为十五卷本的《刘辰翁集》。此编据《豫章丛书》本之《须溪集》；《彊村丛书》本之《须溪词》以及清中叶流传之《须溪四景诗集》以及《须溪记钞》等合为一编，芟汰其重，又从别录、方志蒐集佚文，由今人段大林校点。出校记，后附有关辰翁及其集之参考资料，并附简注及《刘辰翁集》中所涉及到的人名索引。此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文山先生全集】 别集。宋文天祥撰。傅增湘《藏园君书经眼录》卷一四谓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新刊指南录》四卷，宋刊本；并谓“此本卷中凡虏帅、逆贼及文天祥字，又诗中避忌处皆成空格，盖板刻于宋末，元初乃挖板印行耳”。按《指南录》自序作于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闰月，后序作于同年五月，时端宗已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新刊指南录》即刊于景炎（1276—1278）间。是为文天祥的作品刊行之始。在这以后不久，《吟啸集》问世，元许有壬尝于元成宗大德（1297—1307）间读之，见《全集》附录《文丞相传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吟啸集》乃“当时书肆所刊行”，“与《指南录》颇相复出”。在宋、元易代之际，已有人积极搜求文天祥的文字，得其随笔数十大册，不幸遭难后尽散失。元成宗元贞（1295—1297）、大德间，他的家乡人广泛搜访，以其所得，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以道体堂之名刊行。据天祥所撰《文山观大水记》，道体堂乃其乡里名胜，知此前、后集即刻于乡里。其书，《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流传不广。在前、后集刊刻同时，“《指南前录》三卷，《后录》五卷，《集杜》二百首”，已“天下诵之”，见元刘岳申所撰《文丞相传》，见《全集》附录。明初，尹凤岐从内阁得《前集》、《后集》，重加编次，为诗文十七卷，起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迄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称《文山先生全集》。附以《指南录》一卷、《指南后录》二卷，《纪年录》（年谱）一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文山先生文集》，云一部六册，完全，当即此本。同上书同卷复著录《文山先生遗文》一部八册，云残缺；所收当为《文山先生文集》集外之文。集杜诗有单行本，有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刊《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刻《文山先生全集》问世。其书卷一至卷二为诗，卷三至卷一二为文，卷一三为《指南录》，卷一四为《指南后录》，卷一五为《吟啸集》，卷一六为《集杜诗》，卷一七为《纪年录》，卷一八为《拾遗》，收佚文二篇。卷一九、二〇，附录传记及其他研

究资料。《四库全书》所收《文山集》二十一卷,源出明初刊本。复收《文信公集杜诗》(一名《文山诗史》)四卷,所收诗与嘉靖本《集杜诗》同,次第略有异。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各本所收皆未尽。诗有《集杜句》和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三《妾薄命呈文山道人》附;有明抄本《诗渊》第七册署名浮休道人所作《汪水云援琴访予縲继弹而作十绝以送之》诗,即刘辰翁在选本《湖山类稿》序中所说的《拘幽》十操,皆作于被囚燕都时。文有为汪元量《行吟》所作的题跋,见《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亦作于被囚燕都时;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及明李诒《戒庵老人漫笔》收有天祥的家书。《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四著录《宋文潞公轩诗》三卷,云文天祥撰,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刊本。按:文潞公乃文彦博,此诗集疑非天祥撰。

(孔凡礼)

【**阆风集**】 诗文别集。又称《阆风稿》。十二卷。宋舒岳祥撰。岳祥于宋恭帝被俘赴燕之次年即端宗景炎二年丁丑(1277)自编其诗为《百一老诗》,收诗一百首,囊括天、地、人百物,其意盖以“吾一老人寄于百物之中”。越八年而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复自编其诗为《篆畦诗》;“篆畦”为其宅西小园。此以后,复为《蝶轩稿》,集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以后诗文若干篇。此外尚有《苾墅稿》、《避地稿》、《梧竹里稿》等。当时诸稿,本分帙刊行,而《阆风集》乃其总名。《文渊阁书目》卷九以《阆风集》之名著录,谓“一部五册,完全”。《篆竹堂书目》卷三著录《阆风集》五册。《国史经籍志》卷5著录,谓为二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二十卷,又谓有闽本,五册。知其书明末清初犹存。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其集已不见,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二卷:卷一至卷九收诗七百九十首,卷一〇至卷一二收文三十一篇。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诗七十三首、文一篇。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嘉业堂丛书》本。

(孔凡礼)

【**存雅堂遗稿**】 诗文别集。五卷,其中诗二卷。宋方凤撰。明宋濂作《方凤传》,称其诗三千余篇,这大约是“据其未刻者而言”。方凤逝世后,其门人柳贯辑其遗诗三百八十篇,厘为九卷,属永嘉尹赵敬叔刻置县斋,黄潜为之序。此本未见著录,可能不久即版毁书佚。清世祖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其乡人张燧博采诸书,掇拾残剩,得诗七十三首、文十二篇、《金华洞天行纪》一篇,并附以方凤之子方樗、方梓诗十六首、文五篇,编成此五卷本。原本附有《物异考》一卷、《月泉吟社诗》二卷;外篇辑有他人赠答之作,

并《谢翱传》、《吴莱碑》等。《四库全书》收录方集时一概删削。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民国十三年(1924)胡宗楙所刊《金陵丛书》本。(王学泰)

【**心史**】 诗文别集。宋郑思肖撰。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当宋亡后四年,郑思肖把所撰《心史》,藏在一个铁盒内,沉于苏州承天寺的一个枯井内。明思宗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人疏浚那个枯井,发现了本书。第二年,应天巡抚张国维为之刊刻。第三年,汪骏声复刻之。本书包括诗三种,计《咸淳集》一卷,收自南宋理宗景定(1260—1264)以来至度宗咸淳五年(1269)所作五十首;《大义集》一卷,收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至端宗景炎二年丁丑(1277)所作七十首;《中兴集》二卷,收帝昀祥兴二年己卯(1279)所作一百三十首。包括文三种:《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大义略叙》一卷及后序五篇。此书问世后,清初学者阎若璩疑为伪作(《古文尚书疏证》卷五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三四《心史题辞》、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亦疑之。然顾炎武则深信其真(《亭林诗集》卷五《井中心史歌》)。姚际恒则谓本书“郁勃愤懑,自是一种遗民具至性者之笔,非可伪为也”(《古今伪书考》)。近人蒋逸雪辨前人之疑,谓本书“为国魂所寄”(《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二十三期)。顾等之言良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校点本《郑思肖集》包括了《心史》。

(孔凡礼)

【**湖山类稿**】 诗词别集。一作《增订湖山类稿》。五卷。宋汪元量撰。《湖山类稿》乃元量自编,其名亦自定。宋、元之际,有刘辰翁选本,所收作品止于汪南归之初。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所引汪氏诗,皆出《湖山类稿》,其中有人蜀诗,说明《湖山类稿》乃其全部诗作结集。与《永乐大典》修纂同时,明抄本《诗渊》的编辑者在书中大量引录元量作品,仅现存《诗渊》残本,即有诗二百多首、词三十首,皆题《宋汪元量水云诗》。说明其时元量诗集以两种版本流行。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湖山类稿》十三卷,其时或尚存。今此本与《诗渊》所引之《水云诗》皆已早佚。今存刘辰翁选本《湖山类稿》五卷,前四卷收诗二百零三首,卷五为词,凡二十八首。另有《水云集》,收诗二百四十六首,除去与《湖山类稿》重复的篇目,为一百七十七首;收词一首。二者通行本,为清鲍廷博刻本。又有清汪森藏抄本《湖山类稿》、《湖山外稿》。汪本前者多刘辰翁批点十二条,胜鲍本;后者即鲍本之《水云集》,所不同者,后者已去其重复篇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增订湖山类稿》,在上述二本的基础上,新自《诗渊》、影印《永乐大典》等书辑得诗九十九首、词二十三首,溶于

以上二本中,按时代先后,分别诗、词编次。五卷,前四卷为诗,第五卷为词。这是目前收录汪氏作品最为完备的本子。(孔凡礼)

【**霁山集**】 诗文别集。一作《林霁山集》、《霁山先生文集》、《霁山先生集》、《霁山先生诗文集》。五卷。宋林景熙撰。据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吕洪序,景熙有文十卷,曰《白石稿》,诗六卷,曰《白石樵唱》。以其所居在平阳治后白石巷也。行于世。方逢辰(1221—1291)并为《白石樵唱》作序,章祖程(和父)为注,于元顺帝元统二年甲戌(1334)为序。岁久,其文颇多散亡,吕洪从家藏旧书中,检得记、序、赋、铭而下若干篇,自叶衡处得《白石樵唱》,为校订之,凡诗三卷,文二卷,总题《霁山先生文集》,刻以行世。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明宗室辽藩重刊之,删除章注殆尽。嘉靖九年,张寰为诗集单行刊本《霁山先生白石樵唱》(六卷)作序,此书题“知平阳县事海康桐冈冯彬用先校正重刊”,并刊章注。其书编排次第与今通行本颇有出入。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沈天士、汪士铉复据辽藩本重刊。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鲍廷博病冯本、辽藩本、沈本俱有不足,乃以家藏本,参校各本,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凡诗三卷,文二卷,共五卷,诗并收章注。并辑补诗二首、文二篇,收入《霁山集拾遗》。1915年,冒广生收景熙诗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补诗一首。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以鲍刻本为底本,出版《霁山集》排印本,增冒补诗一首,为通行本。

(孔凡礼)

【**覆瓿集**】 诗文别集。又作《秋晓集》或《秋晓先生覆瓿集》。六卷,其中诗二卷。宋赵必豫撰。赵集编于宋末元初,明代亦曾刊刻,但早年刻本不见传世,书目很少著录,在若存若亡之间,但抄本尚不绝于世,清编《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此六卷本。后粤东人士注重地方文献,认为必豫是仅次于李昉英(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间番禺人)之粤东作家,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伍元薇诗雪斋刊《粤十三家集》,遂将其列入;此本四卷,《附录》二卷。另温汝能所编《粤东诗海》亦收其诗,并云是集久已沦亡,黄石溪手写成,爰校勘而重梓之。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晞发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宋谢翱撰。吴谦《谢君翱圻志》云:“‘晞发’本楚词,因以名其集,有诗八卷,文二十卷。”此外,尚有其他杂著述二十二卷。明初,其诗文尚未散佚。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唐又载刊于扬州,有储罐之序。此本刊时,谢文已散佚不少,文止记、序,共十三篇,全书分六卷。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程煦为重刻,凡六卷。明穆宗

隆庆(1567—1572)间,有邵廉刻本,亦作六卷。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20),长溪令张蔚然复为重刊,凡十卷,乃徐渤所辑,益以降乩之作,人称秽杂,然所附行状、圻志,为旧本所缺。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平湖陆大业以家藏抄本刊行,因卷第已乱,以意厘定为十卷,较他本差为完善。其卷一收宋饶歌鼓吹曲十二首,卷二收宋骑吹曲十首,卷三至卷六收古体一百二十一首,卷七至卷八收五言近体八十首,末二卷收文十三篇。陆刻并收《晞发遗集》二卷,卷上共收近体杂诗五十四首,卷下收《金华游录》,末补录《续琴操哀江南》四章。附《天地间集》一卷,录宋末文天祥、家铉翁等故臣遗老之诗二十首。并附《西台恸哭记》注、《冬青树引》注。《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浦城遗书》本、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国学保存会铅印本。

(孔凡礼)

【**月洞吟**】 诗别集。一卷。宋王镒撰。《宋百家诗存》本《月洞吟》前小序云:“《宋艺文志》载镒文集二十三卷。”考《宋史·艺文志》所载“《王镒集》二十三卷”,乃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学者兼诗人王镒所作。《宋史·艺文志》所收录宋人别集止于南宋理宗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间,不及南宋末年之人,文天祥、刘辰翁、林景熙、谢翱等人之集皆未著录。且《王镒集》所在之位置,也正是南宋初年人之位置(该志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宋末王镒之集,可能最初只以手抄流传。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镒族裔孙王端茂始行刊刻,前有端茂之序及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汤显祖所撰之序,录诗七十馀首。《四库全书》所收《月洞吟》一卷即此本。另有明王楠刊本,亦刊于嘉靖。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有1920年李之鼎宜秋馆所刊《宋人集》本,在乙编。近人傅增湘据吴氏也趣轩写本与王楠刊本合校,补诗一百五十馀首。

(王学泰)

【**秋声集**】 又称《卫宗武诗》。诗文别集。六卷。宋卫宗武撰。其集,有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张之翰序,即刊行于此时。《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三册。《策竹堂书目》卷三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八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十卷。知其集明末清初犹存。清修《四库全书》时,已不见其集,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六卷:卷一收五古一百十二首,卷二收七古三十八首,卷三收五律八十首及五言排律一首,卷四收五绝十一首、七绝六十三首、词十一首;卷五至卷六,收序五篇、记三篇、墓志铭二篇、塔铭一篇、杂著十二篇。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今人栾贵明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一首、七古一首、五律一首、题跋一篇,收入《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有《秋声诗集》四卷,《彊村丛书》有《秋声诗餘》一卷。(孔凡礼)

【心泉学诗集】诗别集。六卷。宋蒲寿晟撰。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载有蒲寿晟(即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六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亦载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六卷;《文渊阁书目》载有《蒲心泉诗》一册一部。后此二种皆佚。清编《四库全书》,馆臣检《永乐大典》各韵部录得蒲诗颇多,皆题名作寿晟。共辑得赋四首、古律诗及绝句凡二百六十七首、词十八首,厘为六卷。刘克庄《心泉记》云:“初,君行山间,得泉一泓,爱之,有会于心,即其所结庵,匾曰‘心泉’。”知“心泉”本其斋名,后用以自号,遂以名集。蒲集后印入中央图书馆所辑《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拙轩集】诗文别集。六卷。金王寂撰。元好问《中州集》称寂著有《拙轩集》、《北迁录》诸书,《北迁录》已不传。《中州集》所选寂诗仅七首及附见姚孝锡传后挽诗一首,其他久佚不见。《永乐大典》内所载寂诗文较多,各体具存。清四库馆臣搜集整理,厘为六卷:卷一为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二为五言律诗、六言律诗、七言律诗,卷三为七言律诗,五、六、七言绝句,逸句,卷四为词,卷五、卷六为文。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说,藕香零拾本《辽东行部志》中有王寂诗五十七首、文三篇,均为四库馆臣所未见,可以增补。此集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光绪海丰吴氏合刻《九金人集》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诗文别集。二十卷。金赵秉文撰。《金史·赵秉文传》谓其“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与现存二十卷之数不合。元好问《中州集》称秉文“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则原集有前集与后集,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卷,通行本为前集,后集则佚。集前有杨雲翼序,称“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日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此序作于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可知此集为此年前的作品,后集则有可能是此年以后之作。《归潜志》卷九称赵秉文“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此集第一卷大学,卷二古赋,卷三至卷五古诗,卷六至卷九律诗,卷一〇杂体,卷一一至卷二〇文。有《四库全书》本二十卷,附录一卷;《畿辅丛书》本二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抄本二十卷。

(邓绍基 史铁良)

【庄靖先生集】诗文别集。十卷。金李俊民撰。

元泽州守段直刊行,李仲绅等为之序。段直曾迎李俊民为师,招延四方来学者。惟序称“郡侯段公锐意文事,时与士大夫会于锦堂,乃鸠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诗、赋、古文仅千余篇,合为十卷,镂板以行”,既云“近年著述”,则远非全集,其作品当有不少遗佚。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郡人李翰重新付梓。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时,板已久佚,所存仅抄本。集中诗末间有注语,序中不言何人所加,余嘉锡认为“当是其弟子史秉直辈之所为”(《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集部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集中于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余嘉锡加以驳正,指出蒙古在忽必烈中统(1260—1264)以前,“从未建立年号”,“文人著书,只得但书甲子”。其集有振绮堂抄本、明正德三年(1508)李翰刻本、《四库全书》本、《九金人集》本。(邓绍基 史铁良)

【元遗山集】诗文别集。四十卷。元好问撰。蒙古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东平严忠杰即刊有《元遗山先生集》四十卷,包括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李冶、徐世隆各为序,杜仁杰、王鹗跋。此本今已佚。今存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李翰、储巏重刊本,诗文仍四十卷,增集评一卷并李、储二序。今《四部丛刊》本即据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弘治本影印。清代有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无锡华希闵重刻本、《四库全书》本,皆据弘治本而删去李、储二序。华本增附录诗五首。今传世的重要刻本还有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张穆刻本。此本在康熙本的基础上有所增补,计诗十四卷,在原来一千二百八十首之外,又从施国祁所辑逸诗得八十二首,共一千三百六十二首;文二十六卷、附录一卷、补载一卷、考证一卷、新乐府(词)四卷、《续夷坚志》四卷、年谱四种(翁方纲谱、施国祁谱、凌廷堪谱、李光廷谱),其中附录与补载二卷均有所增益。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方戊昌读书山房重刊张本时又有所增订,并附有赵培因《考证》三卷,均可堪称为集大成的本子。全集以外,诗集单行本有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刻本。此刻在元刻全集的基础上增诗八十一首归入各体,厘为二十卷。元刻尚有黄公绍本,亦二十卷,但收诗仅七百餘首,为一选本。此外,尚有汲古阁本、潘是仁辑校本。《四库全书》于全集外,又收《遗山诗集》,乃据汲古阁本。惟毛晋以元好问为元人,乃改归于金。清道光(1821—1850)时,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仍按全集十四卷体例,但数量上则称“续采八十一首,今补一首”(“例言”),计得一千三百六十一首。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1986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贺新辉辑注《元好问诗词集》,作品又略有增补。词集《遗山乐府》五卷。据《四库未收书目

提要》：“御定《历代诗馀》载词人姓氏云：‘《遗山乐府》，钱塘凌云翰编辑。’”今有明《百家词》本、双照楼据明弘治高丽晋州本影印本、《彊村丛书》本。数量上以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最为完备。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了由姚奠中主编的点校本《元好问全集》。此书以光绪（1875—1908）年间方戊昌本为底本，参校现存其他各种版本（包括底本较早的一些抄本），诗文方面又有所增补。六十卷，计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词（附散曲）五卷、《续夷坚志》四卷、附录十一卷（包括有关序跋、传志、赠答共四卷、《诗文自警》一卷、清李光谱撰及近人缪钺撰年谱二种六卷）。是迄今最完备的一个本子。（卢兴基）

【磻溪集】诗别集。六卷。元丘处机撰。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年十九为道士，师海宁王真人。蒙古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四年（1219），遣使来召；次年，经蒙古草原，天山，经中亚细亚，到大雪山，见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赐官名长春。成吉思汗十九年，回到燕京。成吉思汗二十二年，逝世。丘处机工诗词，有《磻溪集》，杨维桢醉后常喜歌丘之《青天歌》。其诗如同口语，以浅近而习见事物为比喻，说明道家哲学。此集见《道藏·太平部》，有涵芬楼影印本。集前有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1186）胡光谦序、大定二十七年丁未（1187）毛麾序、金章宗泰和六年丙寅（1206）移刺霖序、泰和八年戊辰（1208）陈大任序，陈序对丘处机之履历记述较详。此集在丘处机生前即已编定，但据毛序中所说“门人弟子齐公所作诗曲杂文谒序引”，今集中无文，则可能已非旧本。此集卷一为七言律诗，卷二为七言绝句，卷三为古体歌行，卷四为五言律绝，卷五、卷六为词。

（邓绍基 史铁良）

【湛然居士集】诗文别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楚材文集在其生前即已编定，据蒙古窝阔台汗（元太宗）五年癸巳（1233）王邻序及孟攀鳞序，《湛然居士集》系耶律楚材门下、中省部事宗仲亨收录楚材馀稿，纤悉无遗，又增补杂文，有古律诗、杂文五百馀首，分为九卷，令工刊行于世。其中卷一至卷七及卷九为诗，第八卷诗、序、书、记等错杂一起。集中所收系窝阔台汗五年之前诗文。孟序、王序称宗仲亨“作新此本”“更新此本”，则此前当有一旧本。以后有人补辑窝阔台汗五至八年诗文，共五卷，合计十四卷，这便是通行的十四卷本。《四库全书》所收即十四卷本。其中卷一〇至卷一二为诗，卷一三、卷一四诗、序、书、记杂陈，情况与第八卷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编次殊无体例，疑传写者乱之”，即指此而言。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指出，《文集》中诗

文迄于窝阔台汗八年丙申（1236），以后作品今已不存。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集》三十五卷，但清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芳郭无名《后序》已称该本“未之见也”。楚材集中保存了很多正史失载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于研究西域、辽、蒙古王朝的历史甚有价值。该集诗多于文，文不敌诗之三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测可能“尚有佚遗”，或“经国之暇，惟以吟咏寄意，未尝留意于文笔”。元以来行世之本有振绮堂精抄本、元宗仲亨刻本、元丞相胡氏重刻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浙西村舍本以及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编入《丛书集成》初编）。今有中华书局版谢方点校本，该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浙西本”互校，并参考“商务本”。校点者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在诗文题后加了系年，又辑录若干正史外有关耶律楚材的资料，作为附录，中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和《耶律文正公年谱馀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湛然居士集提要》及李文田《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跋》等。（邓绍基 史铁良）

【鲁斋遗书】诗文别集。十四卷。元许衡撰。许衡号鲁斋，因以为集名，许氏遗书久散落，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河南巡抚李某下令表彰先贤，命衡七世孙婿郝亚卿辑其遗文，未竟，河内教谕章廷俊继成，何塘作序，河内县令高杰刊行。明世宗嘉靖四年乙酉（1525），山阴萧鸣凤校刊于汴，并作序跋，序后有题识，谓：“鸣凤方校是书，适应内翰元忠奉使过汴，谓旧本次第似有未当，乃重编于左，续得《内法》及《大学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旧本名《鲁斋全书》，窃谓先生之书尚多散佚，未敢谓之全也，故更名《遗书》。”是该本为应良（元忠）所重编，萧鸣凤更名。卷一至九为文，卷一〇、卷一一为诗歌，卷一二至卷一四为附录。因其书为后人所汇辑，无所别择，如《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为启蒙课本，无所发明，《编年歌括》为教学童记历史朝代的歌诀，尤不宜刊入集内。此集有萧鸣凤汴梁刊本、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怀庆府推官怡愉刊、清初修补本十一卷、附录三卷，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重刊本十四卷，《四库全书》本十四卷（后三卷依次为谱传、附录、先儒议论）。

（邓绍基 史铁良）

【稼村类稿】诗文别集。三十卷。元王义山撰。义山（1214—1287），字元高，丰城（今属江西）人。宋理宗景定（1260—1264）中登进士第，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四方学者皆称为稼村先生。晚年退老东湖，题读书之所为“稼村”，因以为集名。《元诗选》评其诗“刻意求新，但全篇率多累句，不免瑜为瑕掩”。诗文有宋末平弱之病，绝少警

策,王士禛《居易录》以为“芜浅无足取”,诋为“最下最传”,未免失之偏颇。其实王诗亦有可诵之作,如《斋居杂兴》、《赠陈梅垣》等。至于文章,说经之作往往自出新意,时有考据,表、启诸作亦清华流丽,组织自然。义山既仕元,原刻仍题为宋人,误。此集系义山子惟肖所编,前有义山自序。集中各体诗三卷,古文杂著二十六卷,乐府乐语一卷。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刊本,明神宗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刊本十卷,《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八千卷楼抄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邓绍基 史铁良)

【藏春集】 诗文别集。六卷。元刘秉忠撰。集前有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阎复序,称“公歿后十有四年,是集始行于世”。刘秉忠所著文集见于《元史》本传者为十卷,与六卷之数不合。六卷本系明处州知府马伟所刊。秉忠所上万言书及奏疏见于本传者,集中皆阙。其中,卷一至卷三为七言律诗,卷四为七言绝句,卷五为词,卷六为附录,收有关刘秉忠的制、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及祭文,系元商挺编。集中诗无五言,也无古体。此集除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刊本外,尚有明英宗天顺(1457—1464)中马伟刊本、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顺德府刊本、《四库全书》本、八千卷楼四卷抄本。清末张钧衡收得刘集旧抄本三十六卷,名为《刘文贞诗文全集》,其中文二十四卷、诗十二卷,前有李治序。

(邓绍基 史铁良)

【艮斋诗集】 诗别集。十四卷。元侯克中撰。《四库全书》所收为元时旧刻,卷首有毛晋印,为汲古阁所藏。集中,律体最多,尤以七律为最。卷一、卷二都是吟经、史之作。卷八为谐音格诗,每首全以音同字异者相叶,如一东叶同、峒、桐、铜、童,二冬叶镛、庸、容、壖、蓉之类,凡七言三十一首,五言二十一首,为侯克中自创之格,自谓“自我作古”。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双溪醉隐集】 诗文别集。元耶律铸撰。耶律铸文集久佚不传,明钱溥《内阁书目》著录耶律丞相《双溪集》十九册,不详其卷目。《永乐大典》所收《双溪醉隐集》篇什较多,有前集、新集、续集、别集、外集诸名,又别载赵著、麻革、王万庆诸序跋,均为铸年少时所作诗集《双溪小稿》而作。所作谓“前”、“新”诸集云云本各为卷帙,有琐碎之嫌,四库馆臣汇集编次,总为一集,而仍以《双溪小稿》原序、原跋分系首末。此本,卷一为赋,卷二为乐府、七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卷四为七言律诗,卷五为五、七言绝句,卷六为七言绝句、诗余、杂著。有《四库全书》本、《辽海丛书》本,另有清德宗光绪十八年

(1892)顺德龙氏所刊《知服斋丛书》本,此本依四库写本校,又从《永乐大典》中辑补佚文、佚诗、佚词八首。(邓绍基 史铁良)

【陵川集】 诗文别集。三十九卷。元郝经撰。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郝经门人集贤大学士郭贯奏请将《陵川集》及经所作《续后汉书》由官府刊行,交赵穆和蒲道元详定,得元仁宗批准,刊于江西行省。后官板散佚,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沁水李淑渊重刻,陈凤梧作序。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泽州守陶自悦拟据李本重刻未果,但作序置其首。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王鏊校刊该集,又从他书辑录有关郝经的资料,别为附录一卷,置于书末,集中志传、行状、官诰、咨文、元明人原序都依旧刻,冠于卷首,以后通行的即王鏊本。此集卷一为赋,卷二至卷七为古诗,卷八至卷一二为歌诗,卷一三至卷一四为律诗,卷一五为七言绝句,卷一六至卷三九为文。此本今有《乾坤正气集》本、《四库全书》本(无附录)、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增补重刊本。

(邓绍基 史铁良)

【紫山大全集】 诗文别集。二十六卷。元胡祇遹撰。此集为其子胡持所编,集前有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祇遹门人刘赓所作序,详记胡之生平,称原本六十七卷。岁久散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载,汇合成编,厘为赋、诗及诗余七卷,文十二卷,杂著四卷,语录三卷,总二十六卷。今常见者有民国十三年(1924)河南官书局《三怡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史铁良)

【秋涧先生大全集】 一名《秋涧集》。诗文别集。一百卷,附录一卷。元王恽撰。全集凡诗文七十七卷、《承华事略》二卷、《中堂事纪》三卷、《乌台别补》十卷、《玉堂嘉话》八卷、附录一卷。其中,诗文分类较细,计有颂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书仪、记、序、辨说、杂著、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文、辞、箴铭赞、翰林遗稿、疏、题跋、乐府等二十一个小类,包罗甚丰。《中堂事纪》记叙自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到次年九月回燕京之事,可补史阙;《乌台别补》为王恽任监察御史时辑录,记御史台事;《玉堂嘉话》则是王恽追忆在翰林院的见闻,关于典制沿革、文章得失,颇为精核。集后有元人王公孺、王秉彝后序。此集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本、《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王军)

【桐江续集】 诗文别集。三十七卷。元方回撰。方回撰有《虚谷集》,已佚。《桐江续集》系元时罢官后作,集中有自序,称“予自桐江休官闲居,万事俱废,独于读书作诗,未之或辍也”,“诗自壬午至戊子

二十卷,卷百首”,可知是他生前编定的二十卷诗集,所收是他五十六岁至六十二岁七年间的作品。而《千顷堂书目》作五十卷。今集中第四卷末题“从事郎宁国路儒学教授同舍生曹佑编次”,第五卷末题“男方存心、正心刊行”,第六卷末题“初授徽州路儒学教授冯蒙龟、林一桂等刊”,第九卷末题“表姪刘秉懿谨编刊行”,第十五卷末题“甥侄汪庭芝谨编”,第二十五卷末题“古杭徐芝石宅沧浪山房刊行”,第二十七卷末题“学生徐编次”,则可知为后人陆续所刊,不是原本。又集中如《七十五翁吟》、《予丁亥生,壬寅年七十六,留杭十二年》一类诗,显然是方回编《续集》之后的作品。原集有诗无文,今集后八卷为文。集中不少诗标出时间、地点,使得有线索可寻。《四库全书》所收系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此本犹元时旧刻,诗集阙卷一、二、三、二一、二三、二四、二六、三二、三四、三六、三九、四〇、四一,仅存二十九卷;文集尚存八卷,已佚十三卷。此集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三十六卷,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三十七卷。另《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著录,方回《桐江集》八卷,疑即《虚谷集》。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作《桐江集》二十卷,《补遗》一卷,《续集》四十八卷。鲍廷博跋曰:“嘉庆乙丑(1806年)借维扬秦氏石研斋(秦恩复)所藏弘治十四年(1501)范文恭手录本重校,凡改正数百字,补落者数千字,始为善本,去乾隆庚寅(1770年)借振绮堂(汪宪)本抄录时,忽忽三十六年矣。”可知鲍氏本不仅收录较多,而且校勘精善。

(邓绍基 史铁良)

【野趣有声画】 别集。二卷。元杨公远撰。集前有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中吴龙翰序,称其“磨墨濡毫,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则杨氏诗、画互为补充,故集有是名。序称此集一卷。而二卷本则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方回跋置于上卷末,跋中所载《回溪道中》一诗却存下卷中,如此集原为二卷,则此跋不应介于两卷之间,如集中原载此诗,则方回必不再录其文;集中又有《丙戌初度》诗,丙戌为至元二十三年,即方回作跋后一年。由此可知,集原只一卷,而下卷为后人所续辑。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说,瞿氏目录有抄本,云“后裔表正、仪邦重辑”,则当是杨公远后裔重编,上卷为宋时之作,下卷为入元后作。此集久无刊本,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汪元锡从其族子汪瀚处得此本,才得传抄。《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方回跋移至集后,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今常见者有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杨公远裔孙杨表臣刊二卷本、《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青崖集】 诗文别集。五卷,元魏初撰。明焦竑

《经籍志》载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渊阁书目》亦载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册,后亡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所载诗文搜辑,厘为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格律坚苍,不失先民轨范”。集中奏议一门都详记岁月,分条胪列,有史所未载者,足以补史之缺。今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为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卷二为六言诗,七言绝句、赋(一首),卷三为诗馀、文,卷四、五为文。

(邓绍基 史铁良)

【牧庵集】 诗文别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元史》本传称姚燧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世。原集有古赋三篇、诗二百二十二篇、序二十八篇、记五十三篇、碑铭墓志一百四十篇、制诰五十八篇、传二篇、赞十五篇、说十一篇、祝册十篇、杂著十三篇、乐府一百二十四篇,总六百八十九篇,凡五十卷。此集久佚。明《文渊阁书目》录《牧庵集》二十册,不详卷数,以后各家著录均未提及。刘昌辑《中州文表》,跋中称:“《牧庵集》五十卷。闻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录本,多残缺,视刻本仅十之二”;黄宗羲序《天一阁书目》,也说“求之不得”。而《永乐大典》中所收燧诗文联多,与刘时中《年谱》所载文目相较,虽少十之二三,而较之《元文类》所选,则多十之五六,诗词更多出诸家选本之外。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载,排比编次,厘为三十六卷,刘时中《年谱》一卷附于后。卷一至卷三一为文,卷三二至卷三四为诗、赋,卷三五至卷三六为词。集前有张养浩、吴善二序。今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等。

(邓绍基 史铁良)

【青山集】 诗文别集。八卷。元赵文撰。明焦竑《国朝经籍志》载《青山稿》三十一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汇辑其诗文,编为八卷,卷一、二为序,卷三、四为记,卷五为碑文、铭、赞等,卷六为墓志铭,卷七为古体诗,卷八为近体诗及诗馀。今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水雲村稿】 诗文别集。元刘壎撰。刘壎文集旧有二本:一为《水雲村泯稿》,是其孙刘瑛于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所手抄,篇目不多,而多杂采刘壎《隐居通议》中语,编辑成帙,不是完本;一即《水雲村稿》,是其裔孙刘凝收集遗佚,别加排次,搜求较完备,原为二十卷,而所存只十五卷,自十六卷以下有录无书,当是传写者失之,但此五卷所载,皆青词祝文,无关大体。集中所载诸启札,大都为在宋世所作。清四库馆臣曾考《隐居通议》,发现其中文章有集中未收者,可见散佚者当不少。此集有《四库全

书》本十五卷,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山东刊本二十卷,又有江西刊本、八千卷楼抄本、道光十年(1830)刘斯崐爱馥堂刊十二卷本、道光十八年刊二十二卷本。《四库提要补正》称陆氏《藏书志》载有明刊本三十八卷,有明熹宗天启元年辛酉(1621)赵师圣序。
(邓绍基 史铁良)

【陈刚中集】 诗文别集。四卷。元陈孚撰。此集包括孚所撰《观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及附录各一卷。《观光稿》系元世祖至元(1264—1271)中陈上《大一统赋》,被署为上蔡山长,任满后谒游京师时所作。《交州稿》仿范成大出使金国诸作,纪道路所经山川古迹,自辞别亲友,由浙江而江苏,而安徽,而山东,而河北,共七十八题近百首。《玉堂稿》系官翰林日所作。有明太祖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刻于浙江之刊本,明英宗天顺四年庚辰(1460)沈琮刻于广州之刊本、丁氏抄《陈刚中集》本、《四库全书》本等。
(邓绍基 史铁良)

【卢疏斋集辑存】 诗文词曲别集。四卷。元卢挚撰。卢挚的诗文集名为《卢疏斋集》,在元代即有抄本、刻本,至明初尚有传本,《永乐大典》时有征引,然今已散失。清顾嗣立编《元诗选》,辑卢挚诗四十馀首为《疏斋集》。卢挚词原有赵万里辑本、周泳先补本,今有唐圭璋《全金元词》本;散曲原有卢前辑本,今有隋树森《全元散曲》本。今人李修生从《天下同文集》、《元文类》、《永乐大典》、《雪楼乐府》、《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书中辑其诗、文、词、曲,成《卢疏斋集辑存》,其中收诗五十馀首、文十馀篇、词二十馀首、散曲小令一百二十馀支。全书分四卷,依次为诗、文、词、曲,除点校、笺注以外,尚有辑者所著卢挚年谱,并附录与卢挚有关的诗文曲词,收罗较丰,为目前收集卢挚作品较完备的集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史铁良)

【剡源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戴号剡源先生,因以为集名。集有自序。有分成甲、乙、丙、丁之四卷本。该集于明初上于史馆,宋濂作序刻板刊行,凡二十八卷,久佚。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四明周仪得其旧目,广为搜辑,厘为三十卷刊刻行世;明神宗万历九年辛巳(1581),戴表元后裔戴洵重新刊行。卷一至卷六为记,卷七至卷一四为序,卷一五至卷一六为墓志,卷一七为墓表、墓碣,卷一八至卷一九为题,卷二〇为跋、铭、箴、赞、述、碑,卷二一为赋,卷二二为史论,卷二三为杂著、祭文,卷二四为书、启、疏、说,卷二五至二六为讲义,卷二七至三〇为诗。诗凡三百九十三首。王士禛《居易录》称海宁刻《剡源集》四卷,是徐姚黄宗羲所选定,非全本。《四库全书》据戴洵刻本收录。现

有明初所刻残本及戴洵刻本传世。另有宜稼堂本三十卷,附清郁松年所撰札记一卷,清德宗光绪(1875—1908)年间孙锵校刻本三十卷,附佚诗六卷、佚文二卷及《四部丛刊》影印戴洵刻本、《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吴文正集】 诗文别集。一百卷。元吴澄撰。此集系其孙吴当所编。明成祖永乐四年丙戌(1406),其五世孙吴燿重刊,集后有燿跋云:“《支言集》一百卷,私录二卷,皆大父县尹公手所编类,刊行于世,不幸刻板俱毁于兵火,旧本散落,虽获存者,间亦残阙。迨永乐甲申(1404),始克取家藏旧刻本,重寿诸梓,篇类卷次,悉存其旧,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谱、神道碑、行状、国史传以冠之。但旧所阙简,遍求不得完本,今故只将残缺篇题列于各卷之末。”从此跋,可知此集原名《支言集》,重刻本乃残缺之余,已非初刻之旧。但残缺不多,仅第十七卷《徐君顺诗序》一篇,第五十四卷《题赵天放桃源卷后》一篇,第五十七卷《题约说后》一篇,又第三十七卷《淳南王先生祠堂记》末注“此下有缺文”而已。吴当所编过于求备,片言只字无不收入,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于稍滥。此集《四库全书》本前九十卷为文,卷九一至卷九八为诗,卷九九为词,卷一〇〇为骚体、杂题,附录年谱、行状、列传、圻记、神道碑。此外,有明宣宗宣德十年乙卯(1435)吴炬刊本(存九十八卷,外集五卷),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临川官刊本,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苏宇庶临汝刊本,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刊本,均为四十九卷,外集三卷。
(邓绍基 史铁良)

【金渊集】 诗别集。六卷。元仇远撰。仇远生前初刊刻所作一编,方风、牟巘、戴表元皆为之作序,在京口时,又汇集所作为《金渊集》,吾邱衍为之题诗,称“仇仁近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渊集》”。但二集皆已佚,所以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顾应祥跋其《赠士瞻上人卷》,已有不见全集之憾。世所传《兴观集》、《山村遗稿》系从仇远手书墨迹搜聚成编,远非完本。清项梦昶又采摭诸书所载,补辑为《山村遗集》一卷。其实仇作在《永乐大典》中尚有数百首,系僧人道衍搜求所得。清四库馆臣据此按各体编排为六卷,皆项梦昶本所不载,仍题《金渊集》,因系仇远为溧阳教授所作,故取投金渊事为名。现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邓绍基 史铁良)

【山村遗稿】 别集。元仇远撰。仇远有《金渊集》六卷,收官溧阳时所作诗,又有清项梦昶从诸书中辑得仇远诗词题跋编成《山村遗集》一卷。明瞿暹旧藏仇远手书七言律诗三十八首,有元末明初诸人题跋,其乡人翰林修撰王希范在卷端题“兴观”二字,故瞿

名为《兴观集》。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瞿又请其伯父瞿佑书所作七律五十首于卷后。魏驥序谓“《兴观集》者,钱塘瞿暹集其乡人先达仇山村、瞿存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体八十八首,世或专称仇远《兴观集》,误也”。书后缀《山村逸诗》一卷,凡诗五十四首、杂著二篇,不知何人所附。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称:《山村遗稿》一卷,附录二卷补遗附录续,清写本,题“吴郡顾维岳手辑”,补遗附录题“知不足斋辑”;又《仇山村遗稿》一卷,清何义门家写本,存诗一百三十四首、杂著六首。《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谓此集有旧抄本二卷,附录一卷;《湛渊集》附《兴观集》一卷、《山村遗稿》一卷。(邓绍基 史铁良)

【湛渊集】 诗文别集。一卷。元白珽著。白珽诗与仇远齐名,人称“仇、白”,戴表元称他为“穷书生”,月泉吟社第十八名唐楚友即白珽寓名。成化《杭州府志》载《湛渊集》八卷,《文渊阁书目》尚著录,后佚。此一卷本为清高宗乾隆(1736—1795)时杭州沈崧町所辑,凡赋二篇、诗六十三首、文六篇,冠以戴表元序,附以宋濂所作墓志。因系散佚之后重辑,大略只存什一。其中又不免间杂伪作,如《杭州府志》所载《三月八日过西马塍》一首,中四句全与月泉吟社诗同,而诗中又以“塍”字与“晴”、“声”、“名”字同押,这显然据明《洪武正韵》,当非白珽所作。集中《游后湖赋》又载方回《桐江续集》中。此集有《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作三卷。八千卷楼有抄本,题作《湛渊遗稿》三卷、补遗一卷。

(邓绍基 史铁良)

【雪楼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元程钜夫撰。郢州有白雪楼,钜夫用以名其所寓,又用为集名。钜夫所著《玉堂集类稿》、《奏议存稿》及《诗文杂著》,本各自为部,其子程大本合辑为四十五卷,门人揭傒斯校正。其孙伯崇又属揭傒斯子揭傒重定为三十卷,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1363)刻于建阳,但仅成前十卷,即遭兵火板毁。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其曾孙程潜刻成。卷一至卷二五为文,卷二六至卷三〇为诗、词。集前有至正十四年(1354)李好文原序,附录《元史》本传及年谱,年谱系其后裔程世京于至正二十七年所编。此集有至正十八年闽刻本,至正二十三年刊十卷本,多附录一卷,明洪武二十八年程潜刊本,此书已有近人陶湘翻刻本传世。八千卷楼有观稼楼抄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静修集】 诗文别集。元刘因撰。刘因曾自订《丁亥诗集》五卷,焚毁其余。刘卒后,其门人故友搜集其佚稿,得《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遗诗》

六卷,《拾遗》七卷,与《丁亥集》五卷,于元顺帝至正(1341—1368)年间刊行。后杨俊民又据拾残剩,一字不遗,辑成《续集》三卷,其中当有因所自焚之作,实与因编集本意不合。后房山贾彝又增入有关刘因的资料,如圻记、墓志等,编成《附录》二卷,合成三十卷。元至正中,官方为之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此本流传甚广,传刻传抄也多,明代有永乐本、成化本、弘治本、嘉靖本。更早的是元文宗至顺(1330—1333)年间宗文堂刊本《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本,《四部丛刊》影印的即此本,原佚李谦旧序,第二次影印本写补。现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三十卷本、《四部丛刊》本、清德宗光绪(1875—1908)年间刊本《静修先生文集》十二卷本(收入《丛书集成》)。各本皆有遗佚。(邓绍基 史铁良)

【墙东类稿】 诗文别集。二十卷。元陆文圭撰。其集本二十卷,久不传,四库馆臣《永乐大典》中辑录遗佚,共得文三百余篇,诗词六百余首,仍依原目,厘为二十卷。卷一至卷一四为文,卷一五为四言诗、五言古诗,卷一六为七言古诗,卷一七为五言律诗,卷一八为七言律诗,卷一九为五言绝句、六言诗、七言绝句,卷二〇为七言绝句、诗余。清金武祥撰有该集的《校勘记》。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即以金校附《类稿》后,而盛刻又有讹误,金又校正数十条,并在《粟香五笔》内。此集有陆氏裔孙刊本、江阴叶氏刊本、《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松雪斋集】 诗文别集。又称《松雪斋文集》、《松雪斋诗文集》。元赵孟頫撰。元诗人杨载作孟頫《行状》,称所著有《松雪斋诗集》,不详卷数。孟頫生前即将自己诗文辑成《松雪斋诗文集》若干卷,戴表元作序,但集未刊行。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孟頫子赵雍请湖州总管何贞立为文稿作序,湖州沈璜(伯玉)据赵雍所藏诗文稿辑成《松雪斋集》,并增加《外集》刊行,计赋五,古诗一百八十四,律诗一百五十,绝句一百四十,杂著五,序二十,记十二,碑制二十六,制诰、策题、批答二十五,赞十,铭一,题跋五,乐府二十,此外有赵孟頫行状、谥文一卷及《目录》一卷,合为一十二卷。这是赵氏诗文集的最初刻本,简称元沈氏刊本。该刻本与戴表元当日所序本当有不同,戴序作于元成宗大德二年戊戌(1298),二十多年后赵孟頫才去世,其间必有不少新作诗文,或由赵本人、或由其子增入集中。沈氏本以后多有翻刻。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江元禧所编《松雪斋集》,寥寥数篇,不是足本。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曹培廉从友人处借得原刻本,校正讹缺,广辑他书及石刻所载,合之家藏墨迹,编成《续集》一卷,又将《元

史》本传载于集首,一并刊行,这就是城书室本。现有任道斌校点本《赵孟頫集》,大致以《松雪斋集》元沈氏刊本为底本,参校城书室本,补辑赵孟頫词《巫山一段云》十二首及文《翠寒集序》,《附录》中增入了《四库总目提要·松雪斋集题要》,这是现在最完备的赵氏诗文集,于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邓绍基 史铁良)

【玉井樵唱】诗别集。三卷。元尹廷高撰。此集有作者自记,载其父竹坡诗“白蘋影蘸无痕水,黄菊香催未了诗”一联,与戴复古《石屏集》以其父遗诗冠于集首同一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气格不高,而神思清隽,尚能不染俗氛”。此集卷上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卷中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有《知不足斋丛书》刊本、《四库全书》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邓绍基 史铁良)

【养吾斋集】诗文别集。三十二卷。元刘将孙撰。刘将孙原有诗文集,据曾以立序,本四十卷。而自明以来,罕见收藏,久已亡佚,惟周南瑞《天下同文集》首有将孙序一篇,中录其文一篇,清顾嗣立《元诗选》仅载其诗一首。四库馆臣采《永乐大典》所载,辑为三十二卷,集前有刘之门人曾闻礼序、吴澄序及刘之季弟刘参序。此集卷一至卷七为赋(一篇)、诗、诗余,卷八至卷三二为文。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长洲顾氏艺海楼蓝格抄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月屋樵吟】诗文别集。元黄庚撰。黄于宋亡后浪迹江湖,以教馆为业,清厉鹗以他为宋遗民,载入《宋诗纪事》中,而集中自序作于元泰定帝泰定四年丁卯(1327),此时元统一全国已五十余年,不得再系于宋,清四库馆臣从《浙江通志·文苑传》例,题作元人。黄集有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张泰刊本四卷;此本题为“清源门婿林伯良集”,张泰之弟张颐得之于谢鸣治,泰校正其讹,刊于西塾。另《知不足斋丛书》本,有泰定丁卯自序。傅增湘《藏园群书过眼录》称:“余昔年曾传抄黄氏诗稿,题为《月屋樵吟》,分为四卷,卷一五言律,卷二七言律,卷三七言绝句,卷四古风、长短句。”傅又曾见另一旧写本,卷一五言律九十首,卷二七律一百二十五首,卷三七绝一百九十二首,卷四古风、长短句九首。前有自序。黄集别有一本,题《月屋漫稿》,与《樵吟》对勘,互有出入,文字差异也很大。《漫稿》较《樵吟》溢出五律五首、七律七首、七绝十二首、七古二十六首,至于《樵吟》有而《漫稿》无者:五律一首、七律一首、七绝十三首、七古六首。《月屋樵吟》除成化本外,还有清德宗光绪

(1875—1908)年间叶氏刊本,此本从顾嗣立《元诗选》中补诗十一首。《月屋漫稿》有《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清容居士集】诗文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此集苏天爵所作《行状》及《元史》本传俱作五十卷,与此相合,当是作者自定本。但刻书在其歿后。到明成祖永乐(1403—1424)间,集被虫鼠损伤,卷目失次,王埜加以补治,序其先后之目,故得以全。清宣宗道光(1821—1850)间,上海郁松年购得完本,又以宝山毛氏所藏写本校勘,有所改易,并志疑义,别作《札记》一卷,附于书后,另附谥议、墓志、王埜跋语。此集卷一为赋,卷二为骚辞,卷三至卷七为古诗,卷八为歌行联句,卷九至卷一二为律诗,卷一三至卷一四为绝句,卷一五至卷一六为《开平集》,卷一七至卷四四为文,卷四五为鲁国大长公主图画奉教题(诗、文兼有),卷四六至五〇为题跋杂记。另附一卷为谥议、墓志铭。此集有明宁波府刊本、《宜稼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影印上海涵芬楼所藏刊本)、《丛书集成》本、《四部备要》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雲林集】诗文别集。六卷,附录一卷。元贡奎撰。奎所著有《雲林小稿》、《听雪斋记》、《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州纪行》等,凡一百二十卷,明永乐间征入秘府,家无副本,因而不传。惟《雲林小稿》宋濂所序者存其曾孙贡兰家,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福州陈崱再为集作序,得以流传。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其裔孙元礼又采诸书所载奎诗及遗文《天游亭记》、《嵇法师碑》、《游长春宫诗序》三篇,附益成编,即《四库全书》所收之本。卷末增载《见妇人》、《偶兴》二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鄙俚秽褻,必委巷附会之说。元礼不知而误收之”,将其删去。此集有明弘治间刊本、《四库全书》本、《十元人集》本。又丁氏《藏书志》著录十万卷楼抄本十卷,称“此本折为十卷,附录《天游亭记》、《嵇法师碑》二篇,乃三世孙兰所增也”。另有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刊本。

(邓绍基 史铁良)

【归田类稿】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元张养浩撰。养浩尝自序其集,称退休田野,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馀首,分为四十卷,名《归田类稿》。李术鲁序作三十八卷,卷数已有不同。《文渊阁书目》载养浩《雲庄传家集》一册,《雲庄集》三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张养浩云文忠集》十八卷,书名、卷数更与张自序不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载《归田类稿》之名,而不记卷数。考吴师道序称“《雲庄集》四十卷,已刻于龙兴学宫”,则所刻即张手编《类稿》,而改

名为《雲庄集》，即《文渊阁书目》所录“《雲庄集》三册”，而所谓《传家集》一册，当由后人掇拾，属外集、补遗之类，但四十卷本已不传。明末有二十七卷本存世，所收多漏略，编次也无系统。四库馆臣以此为底本，别采《永乐大典》所载，删去重复，补其遗阙，得杂文八十八篇，赋三篇，诗四百六十三首，厘为二十四卷。虽不及九百之数，但已达大半。今知张养浩集有明末刊本、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周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另振绮堂有抄本二十八卷附录一卷，韩小享有曝书亭抄本二十八卷，较周氏所刻完善，又昭文张氏有元刊足本二十八卷，俱题《张文忠公集》，东湖丛记有元刊本二十八卷。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引陆氏《藏书志》，认为元人序中所说三十八卷为二十八卷之误，可备一说。

（邓绍基 史铁良）

【白雲集】 诗文别集。四卷。元许谦撰。此集非许谦自定，系明人所编。明英宗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金台李伸得残编于其祖母王氏家，皆谦之草稿，李将其编次成书。明宪宗成化二年丙戌（1466），江浦张瑄初刻于广东，金华陈相为之序。又有明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陈纲重刻跋，称脱去数页，竟不可得，又称改其名为《白雲存稿》。《四库全书》本系从商丘宋荦家传写，题为《许白雲集》，无缺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指出此编体例杂乱、中多谬误外，并认为陈纲跋与书不相应，为之删去。此集除《四库全书》本外，有清世宗雍正（1723—1735）中刊本，《金华丛书》本，率祖堂本。（邓绍基 史铁良）

【待制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元柳贯撰。柳早年之作不存稿，年四十馀北游燕，始集为《游稿》，其后有《西雒稿》、《容台稿》、《钟陵稿》、《静俭斋稿》、《西游稿》、《蜀山稿》。《蜀山稿》之后所作，作者尚未编定即已去世，稿为人持去，不传。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余阙得稿于贯子柳处，属柳贯门人宋濂、戴良编次，凡得诗五百六十一首，文二百九十四篇，勒为二十卷，余阙、危素及苏天爵各为之序，宋濂作后记。天爵序称有别集二十卷，但未见其传本。宋濂记称“尚余诗九百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誉为二十卷，授先生子处藏之”，大概经过删削，未刻。或即苏天爵所谓“别集”。《四库全书》本卷一至卷六为诗，卷七至卷二〇为文。此外，尚有元刊本、明英宗天顺七年癸未刊本、清世祖顺治（1644—1661）年间刊本、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刊本，《续金华丛书》本、《四部丛刊》本。（邓绍基 史铁良）

【杨仲宏集】 诗别集。八卷。元杨载撰。此集前有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范梈所作序，序称杨载死后，其子尚幼，而残稿流落，无人编次，范之友人杜

本就其平生所得杨诗刻于武溪山中，求范作序，但刻本未见。焦竑《国史经籍志》载《仲宏集》四卷，此八卷本不知何人所分。此本按诗体分类，卷一为五言古诗，卷二至四为五言律诗，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至卷七为七言律诗，卷八为五、七言绝句，共收诗近四百首。有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博文堂刻本，此本前有梅南翁原汇序，称杨诗渊源有次，法度可循，足为一代宗匠。但遗集罕见，偶获旧本一帙，而字多磨灭，于是手自校订，付梓刊行。他所说旧本究为何本，并未说明。又有《四库全书》本、汲古阁刻本、清留香室刊本、《蒲城遗书》本、《元诗四大家》本、《四部丛刊》本。《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载《杨仲宏诗集》八卷又《集古诗》二卷。《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元刊本，仅四卷，后四卷已佚。（邓绍基 史铁良）

【范德机诗集】 诗别集。七卷。元范梈撰。范诗原有《燕然稿》、《东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已佚。此七卷本不知何人所并，按诗体编次，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绝，卷四、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为七言绝句，卷七为七言律诗。此集有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益友书堂刊本，《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傅增湘所见为海虞瞿氏所藏，又江南图书馆藏一本。胡心耘有元刊本，八千卷楼有元至元刊本。另有汲古阁刻本、《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雁门集】 诗别集。元萨都刺撰。萨都刺因其先世定居雁门，遂以雁门名其集，生前手自编定，次为二十卷。其友人吴郡干文传为作序，序称“又有《巧题》百首，皆七言律，另为一集”。而《巧题》已不可见。萨集最早刻本为元顺帝至正（1341—1368）年间所刻，八卷，而世罕流传。明英宗天顺（1457—1464）间，萨都刺诸孙萨琦又辑萨都刺诗，重编六卷本《雁门集》，以诗体分卷，乐府古调及诗馀、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绝句各一卷。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萨希亮曾重刻此本。又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赵廷猗刻有八卷本《雁门集》。关于八卷本，张金吾有汲古阁旧藏之元至正刊本八卷，尚有明抄本及清虞山钱氏述古堂抄本。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东昌太守李举刻《萨天锡诗前后集》，不分卷，以诗体分类，《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此本。明末毛晋得别本刊行，并为三卷，后得王氏旧本，以此本未载者别为《集外诗》一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毛晋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八卷之本，今不可得，故姑仍以此本著录。”萨都刺诗刻本较多，除以上各本外，还有明成化二十年张习刊八卷本、清宣统元年（1909）湖北印刷局仿康熙十九年刻本排印之六卷

本、《十元人集》本等。而在各本之中,以清萨龙光编注的《雁门集》为最完备,有清仁宗嘉庆(1796—1820)年间刊本。萨龙光以萨希亮重刻六卷本、李举本、毛晋本、《元诗选》本互相参校,编成十四卷附录一卷之《雁门集》,有详细校记和注释,诗均编年,惟亦有误断。金开诚、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从编年、考校笺释、补辑三方面分析此本优缺点,足资参考。此本除嘉庆刻本外,尚有1924年重刻本。此外,还有日本永和丙辰(1376)刻本《萨天锡杂诗》,其中七律八十七首、七绝二首、五绝一首、疏文七篇,为国内所传各本所无;《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推测该本所收七律与已佚的《巧题》百首相关。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系日本明历三年丁酉刊本,傅按语云:“此本无序跋,诗后附文七首,皆为缙流而作。其诗太半为汲古阁本所不载。”今有殷孟伦、朱广祁校点之《雁门集》,其底本即萨龙光编注之《雁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萨氏诗选注本则有刘世俊等选注的《萨都刺诗选》,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绍基 史铁良)

【道园学古录】 诗文别集。五十卷。元虞集撰。集为元诗四大家之首,也是理学家。此集包括《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其中诗稿又别名《芝亭永言》。黄潜序认为此集为虞集亲手编定,但据四库馆臣考证,虞之《天藻诗序》云:“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其《赋谢李伯宗题》云:“至元庚辰(1280)冬,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访山中,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李本序也说:“至正元年(1341)十有一月,闽宪韩公征先生文稿本,与先生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得《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与今本正相合。又《道园遗稿》前有至正己亥(1359)眉山杨椿序,以为集季子翁归及其门人所编,与李本序合。虞集母杨氏为衡阳守杨文中之女,杨椿即其外家后人,其言应无误。可证黄潜所说不足为据,此集为李本所定无疑,翁方纲也曾辨黄说之非。虞集在朝时为文多不存稿,编辑时已十遗六七,归田后稿也有散佚。此集卷一为赋、操、四言、五言古诗,卷二为七古、五律,卷三为七律、五绝,卷四为七绝、乐府、颂、铭、赞,自卷一至卷四诗都标《芝亭永言》;卷五至卷二六为文,卷二七为赋、四言、五言古诗,卷二八为七言、五律,卷二九为七律、五绝,卷三〇为七绝、乐府、铭、赞,每卷诗前也标《芝亭永言》;卷三一至五〇为文。此集有刘伯温所刻大字本,欧阳玄序称“太史夏台刘君伯温早岁鼓篋从公成均,及为江右肃政使者近公寓邑,

乃哀公之文,将传诸梓书”。此刘伯温非刘基,为元时另一人,说详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五。又有斡克庄所刻建宁本。后人又编其诗文为《道园类稿》,与《道园学古录》互有出入。虞集从孙堪又补辑成《道园遗稿》一编,凡古、律诗七百四十一首,附以乐府,刻于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学古录》除元刊本外,明有代宗景泰(1450—1457)间刻本、世宗嘉靖(1522—1566)间刻本,清有《四库全书》本、勤约堂刊本、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赐书堂刊本,民国年间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四部备要》本。清翁方纲编有《虞文靖公年谱》,附于翁刻《虞文靖公诗集》。(邓绍基 史铁良)

【圭斋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附录一卷。元欧阳玄撰。此集前有揭傒斯序,称玄有《诗流》三卷、《松中》十卷、《驱烟》十五卷、《强学》十卷、《述真》三卷,其门人王师模所编。《四库提要补正》引沈涛《十经斋文集》所载《圭斋集》跋语,辨揭序非为欧阳玄集所作甚详,序中所谓“欧阳先生”当别为一人,而玄之后裔铭、鏞见《揭文安公集》中有《欧阳先生集序》,以为必是序其先人之文,而置于卷首,《四库全书总目》又仍其误。明宋濂序则谓原集一百餘册,皆毁于战乱,只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至至正十七年丁酉(1357)七年之作二十四卷,其孙佑持编录。《四库全书》所收之本计诗赋四卷、文十一卷、附录一卷,题“宗孙铭、鏞編集”,与佑持所编已不同。有明英宗天顺五年辛巳(1461)、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1470)彭时两跋及刘钊跋。据钊跋,铭字光器,鏞字光乐,去玄五世。集中作品并非全是辛卯至丁酉七年中所作,开卷第一篇《天马赋》即系登进士第时作,可知为掇拾残稿,随其所得编入。此集有元刊本,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刊本,成化七年辛卯刘钊校刊本,湖南刊本,明孝宗弘治(1488—1505)重刊本,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刊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揭傒斯集】 诗文别集。元揭傒斯撰。《元诗选》收录揭诗,题为《秋宜集》。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揭傒斯集》一卷,已不见。其诗文集《揭文安公集》系其门人燮理溥化所编。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揭文安公集》五十卷,但其时即已缺十三卷,又著录《文》一卷、《诗》三卷、《文粹》一卷、《文续录》二卷。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同《千顷堂书目》,又注明“今止十四卷,乃门人雪不华所编”,雪不华即燮理溥化。现存十四卷本有两种:一是《四库全书》本,它所依据的“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不知为何种版本;一是《四部丛刊》本,系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孔荭谷抄本,另附有诗补遗一卷。今存揭全集还有《豫

章丛书》本,计《诗集》八卷,《文集》九卷,《续集》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澠理溥化所编“虽不足尽侯斯之著作,然师弟相传,得诸亲授,终较他本为善”。揭的各本全集以及单行本诗集均有遗漏,现存最早刻本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日新堂刊本《揭曼硕诗集》三卷,澠理溥化编,收诗二百一十七首,该本藏北京图书馆。又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中刊本六卷,又名《秋宜集》。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梦生校点的《揭侯斯全集》,该书以《豫章丛书》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海山仙馆》本(《揭曼硕诗集》三卷本)作校本,并以诸选本参校。对于散见于方志或他人文集附录序跋中的揭氏诗文,校点者一并辑出,与《豫章丛书》本失收而见于他本的诗若干首厘为一卷,题为《揭侯斯全集辑遗》,计诗十三题、十五首,文八篇,附全集之后。并将有关揭侯斯生平、著作及唱和等资料辑为附录,分《传记》、《赠答题咏》、《序跋著录》和《评论佚事》四部分,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是目前收录揭侯斯诗文最全之本。

(邓绍基 史铁良)

【瓢泉吟稿】 诗文别集。五卷。元朱晞颜撰。元有两朱晞颜:一即宋无,曾冒朱姓,并以晞颜字行;一为本集作者。又有《鲸背吟集》一书,亦题作元朱晞颜撰。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肯定此朱晞颜即宋无,而将此书归入宋无名下。但《四库全书总目·鲸背吟集提要》则据此书自序所述情事,疑非宋无,则元代可能还另有一朱晞颜。此《瓢泉吟稿》作者朱晞颜,字景渊,长兴(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集中有酬赠鲜于枢、揭侯斯、杨载诸人诗,又牟巘序谓“朱晞颜年甚少,笃志于学”,此序作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庚子(1300),则年岁当与揭侯斯相仿佛。其生平亦不甚可考,吴澄集有晞颜父文进墓表,提及晞颜,称其能诗文而为良吏,亦不详其为何官。从集中诗看,初因习蒙古文,被选为平阳县蒙古掾,后为长林丞,司煮盐赋,又曾为江西瑞州盐税,官职卑微。其集藏书之家罕见著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瓢泉集》四卷,而世无传本。顾嗣立编《元诗选》也未收晞颜诗。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载,抄录编次,厘为二卷、诗餘一卷、文二卷。卷首有牟巘、郑禧所作序各一篇。其诗神理清朗,牟巘评其诗云:“拟古则不失古人作者之意,咏史则能得当时之情,至于他诗,各有思致,老苍隽健。”所称拟古之作,即集中的《拟古十九首》,有汉魏遗意。此集有《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黄学士文集】 诗文别集。四十三卷。元黄潜撰。据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贡师泰序,黄潜在世时此集即已编定,初稿三卷系未第时作,危素所编

次,续稿四十卷为登第后作,门人王生、宋生所编次。贡师泰为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过金华时,得此集于王生,为之作序,交三山学官,使刊刻以行。但通行本从卷四以下仍题危素编次,卷三危素跋称:“素至京师,尽得其文……,谨第录为若干卷。”卷一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二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卷三为赋、骚、文,后有赵孟頫、危素二跋语,危称此二卷为《口损斋初稿》,黄潜年轻时所作。卷四为乐章、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五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六为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卷七至卷四三为文,末附至正十七年门人宋濂所作行状,于潜之家世、生平述之甚详。此集原已不全,张元济从日本影印得全本,补附行状,收入《四部丛刊》。另有元刊二十三卷本、元刊二十二卷本、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补刊本二十三卷、明刊《黄学士集》四十三卷本、明仙居张俭删本十卷(即《四库全书》著录之本,题《黄文献集》,不全)、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黄氏刊本、正续《金华丛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梅花字字香】 诗别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元郭豫亨撰。豫亨自号梅岩野人,约生活在元武宗朝(1308—1311),生平不可考。集中自序为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1311)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此集云:“《离骚》遍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不借梅以自重。……豫亨在至大中,距南宋之末未远,故亦染山人之积习。”大致作者凡见古今诗人咏梅杰作,即随手抄录,然后集句,成咏梅七律九十八首,每首后依次注明每句作者的姓名,取宋晏殊词“唱得红梅字字香”句以名其集。虽为集句,但亦显工巧,即自序所说:“其间句煅意炼,璧合珠联,亦有天然之巧。”前集诗五十首,后集诗四十八首,作者序言“百首”,是举其成数,《四库全书总目》作二百首,“二”是衍文。所集句以宋人为多,间亦有唐句。此集有《四库全书》本(依盐官吴氏抄本)、胡氏琳琅秘室刊本、活字板本。

(邓绍基 史铁良)

【石田文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元马祖常撰。祖常所居有石田山房,遂以“石田”名集。元顺帝至元(1335—1340)年间,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录祖常诗二十首、文二十篇,较之他家,所收为多。苏又请于朝,刊行其集,并为集作序。集前还有王守臣、陈旅二序,卷一为五言古诗,卷二为七言古诗、五言律诗,卷三为七言律诗,卷四为五、七言绝句,卷五为乐府歌行、杂言、联句、骚、赋,卷六至卷一五为文。末

附录虞集《桐乡阡碑》、苏天爵《神道碑》及祖常自作《石田山房记》。此集有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刊本、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熊腾霄刻本、《四库全书》本、民国十一年(1922)古书流通处影印熊刊本、中州名贤文表刊五卷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古逸丛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吴礼部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元吴师道撰。师道年轻时与许谦同师事金履祥,所著有《易杂说》、《诗杂说》、《书杂说》、《春秋胡氏传附正》、《战国策校注》、《绛守居园池记注》、《敬乡录》等。此二十卷诗文集系清人王士禛抄自昆山徐秉义家,因而传于世。本名《兰阴山房类稿》,因师道致仕以后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遂以官名为集名。卷一为赋,卷二、卷三为五言古诗,卷四、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为五言律诗、五言长章,卷七、卷八为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卷九为七言绝句,卷一〇至卷二〇为文。附录有吴师道墓表、墓志铭和碑。又有明写本《吴正传先生文集》二十卷,前有黄潛序,附录墓表、墓志铭和《元史》本传,显然不是昆山本。《四库全书》所收为昆山本。(邓绍基 史铁良)

【此山集】 诗别集。十卷。元周权撰。此集为陈旅所选定,别择颇精,旅及袁桷、欧阳玄各为之序,揭傒斯为之跋,按体编排,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至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为五言律诗,卷七、卷八为七言律诗,卷九为五言绝句,卷一〇为七言绝句。此集有元刊本《此山先生诗集》十卷,附《此山堂题咏》,题陈旅校选,欧阳玄批点,有袁桷序、欧阳玄序、陈旅序,后有谢瑞跋、揭傒斯跋。又有《四库全书》本、路小洲抄本十卷、许氏抄本十卷;另有四卷本,有明刊本、清写本。(邓绍基 史铁良)

【竹斋集】 诗文别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元王冕撰。诗集三卷为王冕子王周所辑,刘基为作序;续集一卷兼载诗文,附录一卷为吕升所作王周行状,则均系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编。魏驥所作《书竹斋先生诗集后》称,王冕所作甚富,但兵灾后已不全,骆居敬所收集仅十之一。卷一为七言律诗,卷二为五言律诗、五言古诗,卷三为七言古诗。续集本分为四部分,后遗佚半数,所收多为王冕自题画梅诗;尚有七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长句及文三篇,文系俳谐之作。集前有刘基所作序,宋濂所作传,集后附魏驥所撰书后。此集有明抄本、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刻本、邵武《徐氏丛书》本、《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圭塘小稿】 诗文别集。十三卷,别集二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元许有壬撰。此集为有壬所自辑,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庚子(1360),其弟有孚抄录并作

序。有壬尚有《至正集》,歿后散亡,而有孚所携此本独存,于是重加编次,得诗文二百四十三首,厘为十三卷。又辑以前寄有孚诗文八十五篇、缙猷可所收《文过集》及林虑记游诗文九十三篇为《别集》二卷,从倚尖野人家所得有壬残编断简为《外集》一卷,有孚重新作序,题“屠维作噩二月”,即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1369),已是元亡之后。许氏子孙世藏其书,明宣宗宣德(1426—1435)间,遗失《外集》,明宪宗成化五年己丑(1469),其五世孙南康知府许容始校正刊行,而以家乘载志文、祭文及有孚等唱和之作编为《续集》一卷,附于书末。其后《至正集》复出,清四库馆臣以两者相校核,虽大略相同,但也互有出入,如此集所载记、序、碑中,有的为《至正集》所无。此集有明成化刊本、《四库全书》本、民国十二年(1933)河南官书局刊《三怡堂丛书》本。又《述古堂书目》著录有十八卷本。(邓绍基 史铁良)

【蛻庵集】 诗别集。五卷。元张翥撰。《元史》本传称张翥遗稿不传,传者有律诗、乐府,仅三卷。清王士禛《居易录》著录《蛻庵集》四卷,衡山释大杼北山編集,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锡山郎成抄本。采入《四库全书》者为朱彝尊所藏,五卷,明初释大杼手抄本,前后有来复、宗泐二人序跋。另有明刊本,题《张蛻庵诗集》,四卷。按张翥与大杼为方外交,翥歿于元末,此时朱元璋北伐,燕京不守,翥无嗣,大杼取其遗稿归江南,别为选次录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考《元音》、《乾坤清气集》、《玉山雅集》诸书所录翥诗,尚有出此集之外者,则此集亦非全本也。”又金章宗明昌(1190—1195)、承安(1196—1200)间,亦有张翥,字仲扬。刘祁《归潜志》载其诗“矮窗小户寒不到”等句,诸书援引,有与元张翥误为一人者。今见《蛻庵集》有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刊本四卷,为衡山释大杼北山編集,前有豫章沙门释蒲庵来复序,后有洪武十年(1377)冬天界善世禅寺住持天台释宗泐序。民国初年董康诵芬室据以覆刻,后又收入《四部丛刊》。缪荃荪为补抄序一首、诗二十三首,又据劳氏丹铅精舍辑本补文一首、诗十一首。又有《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安雅堂集】 诗文别集。十三卷。元陈旅撰。《元史》本传称其集十四卷,顾嗣立《元诗选》亦称“《安雅堂集》十四卷”,但通行本仅十三卷,系其子陈籲所编,有张翥、林泉生二序,一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一作于至正十一年,目次与焦竑《经籍志》所记相合,因此四库馆臣怀疑《元史》笔误,以“三”为“四”。《四库提要补正》据陆氏《仪顾堂续跋》元槧本跋,谓“《陈众仲文集》十三卷,卷五题《安雅堂集》,语涉元帝皆提行,卷一至三赋、诗,卷四至六序,卷七

至十记,卷十一、十二碑铭,卷十三铭、跋、解、说、策问、赞、传,各体皆备,并无缺少,《提要》以《元史》本传“四”字为“三”字之误,良是”。《四库全书》本卷七至九为记,卷一〇至卷一二为碑铭,其他同。张翥序称:“今年(按:指至正九年)冬,出使闽南,询其子籲,得家藏全稿,曰《安雅堂集》,凡十三卷。”既曰全稿,又曰十三卷,亦可证《元史》之误。此集有元刊本、明刊黑口本、《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秋声集】诗别集。四卷。元黄镇成撰。黄镇成平生所著有《易通义》、《尚书通考》、《中庸章旨》、《性理发蒙》诸书,都已亡佚,惟此集尚存。镇成自号秋声子,以为“秋声亦天地间不能无者”,因以“秋声”名集。顾嗣立《元诗选》称,其集原本十卷,又载有郑潜序。《四库全书》所收本仅四卷,又只有黄镇成自序一篇,而无郑潜序,似非完本。此本卷一为歌行,卷二为五言古体,卷三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四为七言绝句。顾嗣立所云十卷本或指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刻十卷本,分诗六卷,文二卷,缺二卷,实只八卷。后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何望海刻四卷本,有诗无文。又有旧写本,四卷皆诗,前有自序一首,有翰林院大官印,卷中有分校刘景岳粘签,为《四库全书》底本。又有《樵川四家诗》本,作三卷。

(邓绍基 史铁良)

【花谿集】诗文别集。三卷。元沈梦麟撰。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云,《花谿集》原本曾遭乱散佚。明孝宗弘治(1488—1505)时,沈氏玄孙江西按察司金事沈清过故里,访求士大夫家,录得此本,然而仅得原本之十一,凡诗文四百二十四篇,三卷,卷一为文,卷二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诗、五言长律、七言律诗、七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此集有《四库全书》本。陆氏、丁氏《藏书志》著录有旧抄本三卷,题邑人陆珩编;又有不分卷抄本一册,多文十一篇,诗二十一首。另有清写本,题“按察使同邑陆珩编”,“副使吴琮校”。

(邓绍基 史铁良)

【复古诗集】诗别集。六卷。元杨维桢撰。杨维桢诗集甚多,此集所载皆琴操、宫词、冶春、游仙、香奁等作,并杂有古乐府,为其门人章琬所编,以其体皆时俗弃而不为,故以“复古”为名,中有黄潜评语和章琬简注。章序称“辑前后所制者二百首,连吴复所编又三百首”,四库馆臣认为:“今此一百五十二首,数不相符,或后人已有所删削,非完本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陆氏《仪顾堂续跋·元槧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跋》云:“其实所谓《复古诗集》也即是《古乐府》,章琬将所注者称为《复古诗集》,其不注者仍为《古乐府》,吴复所编四百零九首,章琬所注一百五十

二首,共五百六十馀首,分计则篇数不符,合计则有多无少,并未经删削。”可是章序说得明确,系将自己所编二百首连同吴复所编三百首,定为《复古诗集》,总数应为五百首,与一百五十馀首之数相差太远,因此四库馆臣所疑不无道理。集中香奁诸诗为他本所不载,古乐府诸篇与《铁崖乐府》相重复者有数十首,而文字稍有出入,又《乐府》本所载诗题与此本亦有不同者,如《北郭词》之作《屈妇词》等等。吴复编《铁崖古乐府》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章琬编此集在至正二十四年,相距近二十年,或杨维桢对旧稿有所改定,章琬据而录之。此集有明初刻本、汲古阁刻本、《四库全书》本、董氏诵芬室刻本、《四部丛刊》本。

(邓绍基 史铁良)

【雲阳集】诗文别集。十卷。元李祁撰。李祁死后,俞子茂刻其遗集十卷。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祁五世从孙李东阳搜辑遗稿,属吉安守顾天锡重刻,即《四库全书》所收十卷本。《四库提要补正》引陆氏《仪顾堂续跋》说:“明弘治刊本,前有危素序,后有弘治壬子(1492)傅瀚跋,潘辰题,弘治癸丑(1493)李东阳跋。”又有旧写本十卷、附录一卷,附录中有欧阳玄赠序,又哀辞、挽诗,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安成彭华、莆田陈音、义兴邵珪、长洲吴宽、晋陵陆简各跋,钱塘倪岳、新喻傅瀚、栝□潘辰书后,李东阳撰墓表,明太祖洪武三年庚戌(1370)东瓯郭永锡跋。又清圣祖康熙(1662—1722)中,广州释大汕根据己意删削十卷为四卷。大汕虽为方外,实则名利之徒,其学识亦不足以知李祁,因而去取深为不当。今有《四库全书》本、康熙中刊四卷本。

(邓绍基 史铁良)

【渊颖吴先生集】诗文别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元吴莱撰。吴莱遗稿甚多,其弟子宋濂摘其有关学术、议论之大者,编为此集,以文为主,有刘基等序。卷一为赋,卷二至卷四为诗,卷五至卷一二为文,宋濂所撰《渊颖先生碑》及谥文作为附录一卷。此集有元末明初刊本,前有刘基序、胡助序,目录后有金华县儒学教谕士谔跋;又有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祝銓刊本、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裔孙守隽刊本、《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另有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王氏刊诗注本,有诗无文。

(邓绍基 史铁良)

【五峰集】诗文别集。十卷。元李孝光撰。《元史·李孝光传》称李有文集二十卷,已不传。清顾嗣立在《元诗选》李孝光小传中说:“《五峰集》向来失传,仅得曹侍郎秋岳编辑抄本。癸未(1703)春,朱检讨竹垞从乐清搜得弘治甲子(1504)乐清令怀远钱果慎斋所刊本合之,允称大备。”而《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未提曹本,仅说“是编乃弘治甲子怀远钱杲为乐清令,访求遗稿,得全集于儒生周纶家,因俾纶编次刊板,杲自为之序,仍以《五峰集》为名。”其诗文原不分卷帙,但以各体分编。四库馆臣依次分为六卷,乐府、四言诗为一卷,五、七言古诗为一卷,五言律诗为一卷,七言律诗为一卷,绝句为一卷,杂文为一卷,卷首别有逸文目录四篇,皆为记,有目无文。而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不同,分十卷,卷一为文,卷二为杂体诗,卷三为四言诗,卷四为五言绝句,卷五为五言古体,卷六为五言律诗,卷七为六言诗,卷八为七言绝句,卷九为七言古诗,卷一〇为七言律诗。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邓绍基 史铁良)

【圭峰集】 诗文别集。二卷。元卢琦撰。圭峰是卢琦所居地,因以为集名。抄本或作《圭斋集》,误。徐渤《笔精》说:“《圭峰集》岁久弗传,近岁惠安庄户部徵甫蒐而梓之,误入萨天锡诗六十馀首。”二卷本为元陈诚中所编,明神宗万历(1573—1620)初,朱一龙、董应举作序并刊刻。此本刻在庄本之前,但已多窜入他人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详举其篇目,计五古中窜入陈旅诗一首,五古、七古、七律中共窜入萨都刺诗三十二首;《提要》并指出,集中窜入萨都刺《溪行中秋玩月》一篇,原自序称“余乃萨氏子”云云,显然为萨氏诗,此集竟改题为《儒有萨氏子》,序末又删去“至元丁丑仲秋书”一句,直是作伪,不属误收,“盖编辑之时,务盈卷帙,以夸蒐采之富,故真赝混淆如此也”。此解释尚待商榷,疑有别因。集中又载赋三篇、记六篇、志铭二篇、祭文一篇、启三篇、杂著九篇,则确为卢琦所作无疑。四库馆臣删去诗之妄录者,并其文录为二卷,末有附录。故二卷本系重编本,不是原本。陆氏《藏书志》有旧抄本七卷,并载有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孙伯延序。

(邓绍基 史铁良)

【清阴阁集】 诗文别集。十二卷,诗八卷。元倪瓒撰。倪氏诗集初为明英宗天顺(1457—1464)年间蹇曦所编刻。蹇曦自识云,其曾祖与倪瓒交好,元顺帝至正(1335—1340)间与王彝斋、张鹤溪等齐名,交谊最洽,题咏最多,因之彝斋季子藏有《雲林集》。天顺间,彝斋后人将《雲林集》重加编辑,蹇曦得而览之,惧屡抄愈讹,因而刊刻行世,名为《雲林诗集》,分为六卷、附录一卷。此编刻于天顺四年(1460),今仍传世,已收入《四部丛刊》。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瓒八世孙倪琨在蹇氏刻本基础上重刊。万历二十八年(1600),倪琨又刊《清阴阁遗稿》十五卷,包括倪氏之诗文。万历四十三年,潘是仁辑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收上述六卷本。明思宗崇祯十一年

(1638),毛晋刻《元人十种诗》,收倪瓒集,在六卷本基础上增“集外诗”一卷。此《清阴阁集》乃清曹培廉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编刻本。培廉在《清阴阁遗稿》基础上,重新编定,并加增补,分十二卷。卷一为四言诗、五言古诗,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诗、五言、六言绝句,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卷六为七言律诗,卷七、卷八为七言绝句,卷九为词、赞、题跋,卷一〇为杂著、尺牋,卷一一、卷一二为外纪。外纪上列遗事、传铭、赠答、吊挽之作,下专载诸家品题诗画语。有清康熙曹氏城书室刻本。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刊《常州先哲遗书》从曹培廉刻本刊出。

(王学泰)

【环谷集】 诗文别集。八卷。元汪克宽撰。汪克宽(1304—1372),字德辅,一字仲裕,祁门(今属安徽)人。曾从胡炳文、吴仲迁等人学。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丙寅(1326),中江浙乡试。次年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之见不合,被黜,南归,弃科举业,聚徒讲学,尽力于经学,笃志著述。以所居山谷环绕,称为环谷,人称环谷先生。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召至京师,与修《元史》,书成,将授官,以老疾辞。洪武五年卒,年六十九。汪以理学名世,当时推为史局布衣第一人,其学以朱熹为宗。其文持论谨严,词意明达,无支离迂怪之病;诗留存极少,而其中七言古诗数首,造语新警,颇近温庭筠、李贺之格。其集系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其裔孙汪宗豫所辑,前列行状、年谱、墓表,又有孙枝蔚序,称《祁门三汪先生集》,系与其孙之集合为一编,因时代各异,四库馆臣分别著录。此集有清康熙中刊本,收入《四库全书》。

(邓绍基 史铁良)

【滦京杂咏】 诗别集。一卷。元杨允孚撰。此集后有罗大己跋,明成化罗璟志。集中诗一百零八首,前一百首系当年随元帝赴上京所作,后八首情调迥异,哀惋凄苦,当是元亡之后不久所写。疑作者曾再游塞上,抚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而有后八首之作。诗本名《滦京百咏》,后改《滦京杂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末几首中“挑灯细说前朝事”、“居庸千载兴亡事”、“试将往事记从头……天上人间今又昔”等句,断“是集作于入明之后”,或误。其中“挑灯细说前朝事”为第九十九首,是写上京寒冷,“土屋人人愁出门”之时,夜坐闲话,用唐人“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意。另两首都都在后八首中。所以后八首实应作为附录,缀于集后。滦京,即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以滦河流经上都城南,故元时有此称。诗中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也颇详细,可资考证。此集有《四库全书》本,一卷;知不足斋刊本,二卷。

(邓绍基 史铁良)

【九灵山房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补编二卷,遗稿四卷,其中诗十六卷(遗稿部分诗文混编,不计在内)。元戴良撰。戴集为其子戴礼(叔仪)、从孙戴侗(伯初)同编于明初,前有写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揭傒序、王祚序、桂彦良序以及写于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宋濂之题辞,刊于洪武间。王祚序、宋濂题辞皆以手书上版。此本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良曾孙戴统在洪武本基础上修订。此二本无“补编”、“遗稿”,皆三十卷,一至七卷为《山居稿》,八至十四卷为《吴游稿》,十五至二十三卷为《鄞游稿》,二十四至三十卷为《越游稿》,此稿第三十卷为象赞及诸人题诗。正统本后有戴统跋,已收入商务印书馆所编之《四部丛刊》。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有傅旭元刊本。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戴良十四世从孙戴殿江以鲍氏抄本为底本,并参校多种抄本,编成三十卷并补编二卷本,前有杭世骏、鲍廷博二序。《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胡丹凤刻《金华丛书》,收录戴集,增“遗稿”四卷。胡丹凤为此遗稿作序,言遗稿所收“诗二百十八首,虽残膏剩馥,正集之所未载”。实际上所补四卷诗绝大多数见于正集。卷一见正集二十卷(次序全同),卷二、卷三见于正集二十一、二十二卷,卷四亦只有个别篇章不见于正集。由此可见胡氏编此书之草率。(王学泰)

【梧溪集】 诗文别集。七卷。元王逢撰。杨维桢序称《梧溪集》为王逢“遭丧乱之所作”,其诗是元末社会动乱的反映。其集在王氏生前即已行世,但后来传本甚稀,王世贞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才盛传于世。集中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之事颇多,首列小序,以说明梗概。据《四库提要补正》,吴氏《绣谷亭薰习录》云:“卷首杂列志传,并汪泽民、周伯琦二小序。此集刊于洪武初,至景泰七年(1456),四世孙孟重翻,南康守钱塘陈敏政后序。泽民序云:‘原吉学诗于延陵陈汉卿,陈与柯敬仲俱事虞邵庵,原吉得其传。’敏政序云:‘先生未歿,集已行世,先生曾手自标题其微辞奥义及人名、地理之难晓者,其第七卷,则先生既歿而其子掖刊也。’考第七卷,皆洪武时作。”此集陆氏《藏书志》记有元刊明印本,并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汪泽民序及至正十九年杨维桢序,又载顾千里手跋云:“少第七卷第四叶,故其三叶末《节石铭》题下,梧溪自注云‘有后序’,而今俄空焉。”又有周荣起手抄本,并载王氏两跋,但少“今歿才五六年耳”以下诸语。有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1388)刊本、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陈敏政补刊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邓绍基 史铁良)

【东山存稿】 诗文别集。元赵汭撰。赵汭卒后,其门人汪荫汇集编辑其遗文为一编,后另一门人范准又搜罗补缀,汪仲鲁为之序,但称若干卷,而不详其数,似作序时尚未编定。又有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鲍志定序,称“文集散佚,间辑于汪、范二君,而未备也”。“先翰林于先生为莫逆交,故诸所撰述,留余家藏书楼中,大率悉备。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好,收摭先生遗文,总汇成集,携游北雍,潜川豫庵汪君亟请绣梓”,则鲍序本为鲍志定之父所编,与汪、范所编已有不同。《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凡七卷,附录一卷。其中诗、词一卷,文六卷,诗文间注本事,有的似为赵汭自注,有的为后人所加。清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赵吉士重刊跋称“第六卷虞集行状中阙二页”,考此篇之末,其文未毕,则尚缺末一页。此集有明嘉靖刊本、清康熙辛酉赵吉士重刊本、《四库全书》本。又有明写本《东山赵先生文集》十二卷(存卷一至卷八、卷一一、诗补、文补、附录各一卷)。(邓绍基 史铁良)

【南湖集】 诗别集。二卷。元贡性之撰。贡性之,字友初,《归田诗话》作有初,宁国宣城(今属安徽)人,生卒年不详。贡师泰之族子,元末始为簿尉,后补闽省理官。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征录师泰后人,大臣推荐性之,性之避居山阴,更名悦。其从兄弟仕于朝者,欲迎归金陵、宣城,俱不往,躬耕自给以终其身。门人私谥为贞晦。以祖居宣城南湖,因号南湖先生,并以南湖为集名。集中《画马》诗云“记得曾陪仙仗立,五云深处隔花看”,《题肃万邦蒲萄》诗云“忆骑官马过滦阳”,有惓惓不忘故国之意,又在诗中赞陶渊明,有不事二姓之意。集前有贡钦序,序称王冕工于画梅,若无贡性之题诗,其画则不贵重,故集中多咏梅诗,如“王郎日日写梅花,写遍杭州百万家。向我题诗如索债,诗成赢得世人夸”,又有“老我江南无俗事,为渠日日赋新诗”句。其集上卷为五、七言古体和五、七言律诗,下卷为五、六、七言绝句。其诗较少用典,清丽明畅。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其裔孙贡钦将《南湖集》出示李东阳,李称其诗清新可传,为删去十之一,由贡钦刊刻行世。此集有明刊本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卷、丁氏抄本六卷。(邓绍基 史铁良)

【佩玉斋类稿】 诗文别集。元杨翮撰。杨翮,字文举,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生卒年不详。刘仔肩选其诗入《皇明雅颂正音》,又杨基集《悼杨文举博士》诗有“白发苍苍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句,则翮之卒当在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翮初为江浙行省掾,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官休宁主簿,历江浙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其父杨刚中于元成宗大

德(1297—1307)间官翰林待制,为当时名宿,有《霜月集》,已不传。虞集、杨维禎是其父执。杨嗣既有家学渊源,又得名家指点,故其诗文意度波澜皆严谨有法度。此集刻于至正末,陈旅、虞集、吴复、杨维禎皆为之作序。吴序作于元顺帝元统三年乙亥(1335),杨序作于至正八年戊子(1348)。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收入《四库全书》,十卷,卷一、卷二为记,卷三至卷八为序,卷九为论,卷一〇题跋等杂著。除十卷本外,另有元刊不分卷本、许氏不分卷抄本一册。振绮堂有精抄本十三卷;丁氏《藏书志》有抄十三卷本(卷一、卷二记,卷三至卷八序,卷九论,卷一〇为题跋,卷一一乐歌,卷一二启,卷一三箴)。据《四库提要补正》,朱绪曾采《上虞水利序》等文六篇、《雅颂正音》所载诗八首,附录于集后。

(邓绍基 史铁良)

【林登州集】 一作《登州集》。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七卷。明林弼撰。林弼生前诗文学作品编为二集,即《梅雪文稿》与《使安南集》。此二集编于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宋濂为撰《使安南集序》。成祖永乐(1403—1424)间,广州增城县教谕郭惠又刊刻林子润所编《登州林先生续集》五卷。思宗崇祯(1628—1644)间,王而弘根据林弼传世各集合编为二十三卷本之《林登州集》,由王志道刊刻,是为林氏传世诗文之全本。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李斯义重新刊刻。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全书》所收即为此本。

(王学泰)

【翠屏集】 诗文别集。四卷,其中诗二卷。明张以宁撰。以宁诗集为其门人石光霁所编。因前有写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宋濂、刘三吾、陈南宾等人之序,后有石光霁写于洪武二十三年的跋,可知此集在洪武(1368—1398)间即有刊本。洪武本未传于世,今存最早之本为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刊本,但亦只存第二卷。可见全璧者有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刊本。此为张氏嗣孙张淮所编刻,并附言云:“诗文一依监本博士石仲濂先生批点,中间漏板,不复刊行;今将家本增于后。成化十六年庚子岁孟冬吉旦嗣孙张淮捐俸重刊。”《四库全书》所收者即为此本。今人章培恒等所编《全明诗》中张以宁卷以成化本的第一卷为一卷,以宣德本第二卷为二卷,并参校成化本第二卷以及《四库全书》所收《翠屏集》中的诗歌部分,后面又补诗若干首,是目前收录张诗最多的版本。最常见的《翠屏集》有影印《四库全书》本。《全明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排印本。

(王学泰)

【蓝山集】 一作《蓝山先生诗集》。诗别集。明蓝仁著。今存有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蓝钜刻本,六

卷,有诗六百八十馀首。集前有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张矩、蒋易序,惠帝建文(1399—1402)年间倪伯文序,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陈珪序。这是收罗较全的版本。但这个版本《四库全书》编者未得寓目,因此收录在四库的《蓝山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谨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辑,得诗五百馀篇,仍厘为六卷,以符原目,著之于录焉。”以嘉靖本与《永乐大典》辑本相比较,嘉靖本多出诗一百五十馀首。蓝仁与其弟蓝智诗作时有混淆之处,要想彻底分辨清楚,已较困难。蓝仁集初刻于明初洪武中蓝山书院,正统间亦有刊本,均佚。今常见者有影印《四库全书》本与清文宗咸丰七年(1857)刻本。

(尹恭弘)

【蓝涧集】 诗别集。六卷。明蓝智著。今存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刻本,卷内题:“方外友生上清道士程嗣祖芳远編集。”集前有元顺帝至正(1341—1368)年间张昶序,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张矩、蒋易序。在张昶序后有“时永乐元年癸未孟春蓝山书舍刊”牌记,在张矩序后又有“嘉靖丙戌孟冬穀旦山涧六世孙可轩、蓝钜等重刊”字样。此集收诗五百馀首,是蓝涧诗作收罗较完备的版本。但清四库馆臣未见此本,收入《四库全书》的《蓝涧集》是《永乐大典》辑本,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蓝涧诗)惟《永乐大典》各韵中所收尚夥,搜辑裒缀,共得古今诗三百馀首,虽篇什不及《蓝山集》之富,而大略已见,谨以类编次,厘为六卷,俾其兄弟著作,均不致泯没于世矣。”以嘉靖本与《永乐大典》辑本相比较,嘉靖本多出诗作一百五十馀首。蓝仁、蓝智诗,选家时有参错之处,有时已很难辨析清楚。今常见者有影印《四库全书》本及清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间其裔孙蓝鼎雯刻本。

(尹恭弘)

【临安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五卷。明钱宰撰。钱宰集在明代曾经刊刻,后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采掇编排,参以诸选本所录,厘为六卷,以备明初一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诗仅两卷。实际上明代抄本尚有传世者。近人傅增湘即藏有“澹生堂写本”的《临安集》。此本诗五卷、文五卷。另外今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临安集》十卷,为清高宗乾隆(1736—1795)前的清抄本。今人章培恒编《全明诗》,收钱宰诗为六卷,前五卷为明抄《临安集》中诗之部分,其编排一仍其旧。第六卷则包括辑自明抄本《临安集》文集中诗二首,又从《四库全书》本《临安集》辑得诗三十一首,从《皇明诗统》中辑得诗二首,共增补三十五首。

(王学泰)

【**雲林诗集**】 诗别集。二卷。明危素撰。《明史·艺文志》著录危素《学士集》五十卷，应包括其在元、明两代所著诗、文。素以元朝高官仕明，又为明太祖所斥，故其集亦不为世所重，五十卷本恐已早佚，其诗仅以抄本流传。此集刻于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所收皆其早年作品，存诗七十六首，其早先所刻之集，恐不只此数。徐泰（明代宗时人）《明风雅·凡例》云：“元诗人入国朝，年齿最高者，若危太素，其诗刻元集已多，但录一二可证也。”（转引自《明诗纪事》）可知《雲林集》仅为其中一集而已。《四库全书》所收之本为浙江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该本又从他书搜采，增入补遗十四首。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胡仲子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一卷。明胡翰撰。《明史》本传谓其“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此则合为一编，为胡翰门人刘刚及浦阳王懋温所编，刊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当时翰犹在世。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胡集旧写本后有盛昱跋云：“据王懋温跋，文十卷，古、近体诗二卷，附录一卷。”与傅氏记所藏洪武所刻十卷本不同。该书另记有《胡仲子先生信安集》二卷；此本刻于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前有开化吾暉序，谓访求遗稿，刻于衢州，工甫訖，适都玄敬以全集属沈邦伯，将续刻并行。可知此编非足本。翰集除洪武本与抄本外，常见者有《金华丛书》本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宋濂诗集**】 诗别集。五卷。明宋濂撰。濂以古文名世，文集多次刊刻，诗散见于一些文集之中，未曾单刻行世。此集为《全明诗》编者所辑，收入《全明诗》中。《明史·艺文志》著录濂有《潜溪文集》三十卷，并注“皆元时作”；明初王祚所著《宋濂传》也说他有《潜溪内外集》三十卷。濂门人郑楷谓其入明前有《潜溪文集》前、后、续三编四十卷与《萝山集》（又称《萝山吟稿》，当为诗集）五卷。现仅存《潜溪前集》、《后集》各十卷。入明后，在濂生前编有刘基所选《宋学士文粹》十卷（今传）及作者手订八集本（未刊刻）。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黄溥据《潜溪集》、《续集》、《文粹》、《萝山集》等重编为《潜溪集》，集中包括诗、文，凡十八卷、附录一卷，刻于蜀中，今传。此编经编者删削，实际上是选本。天顺五年，黄誉亦合所传各集编《宋学士集》二十六卷，较黄溥《潜溪集》所收篇目多一倍，但仍不全。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张潜得到宋濂自己编定、宋璠手书之八集本，凡七十五卷，命人“按本翻录入刻，稍展而大之”，名《宋学士文集》。八集包括《翰苑》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又称《銓坡》前、后、续、别集），《芝园》

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别集十卷及《朝京集》五卷，共收宋濂入明所作诗、文九百零六题。此七十五卷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其主要欠缺是未收濂在元代所著诗、文。后又有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河间知府徐嵩所刻《潜溪文集》八卷，多为七十五卷本未收之文。嘉靖三十年，浦江韩叔阳合世上所传《潜溪集》、《芝园集》、《銓坡集》、《浦阳人物志》等，以类编为《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共收诗、文九百二十四题，其中有二百十五题为七十五卷本所未载。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蒋超从宋濂后裔宋实颖处得到未刻稿三十八篇（实际这些篇出现过在其他刻本上），编为《宋景濂未刻稿》二卷。此二种皆收入《四库全书》。目前最全之本为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吴县严荣所刊《宋文宪公全集》。此编五十三卷，基本上以张潜所刻七十五卷本与徐嵩所刻八卷本为基础，校补以韩叔阳所刻三十三卷本，并参校了其他多种刻本，共收诗、文一千二百六十三题，凡一千四百一十九篇，并附《龙门子凝道记》二卷，《浦阳人物志》一卷。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所编《四部备要》即收此本。《全明诗》所编《宋濂诗集》，以《四部丛刊》所收七十五卷本为底本，并据元末辑明初刊《潜溪》前后集、《宋学士文粹》、《宋学士集》（二十六卷本）、《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本）等书校补。以《翰苑》前、后集诗为第一卷，《翰苑》续、别集诗为第二卷，《芝园集》、《朝京稿》中诗为第三卷。七十五卷本未收而独见于三十三卷本中的诗编为第四卷，辑自他书者编为第五卷。一、二、三卷中皆为人明后诗作，第四、第五卷中包括了许多在元朝时作品。《全明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王学泰）

【**海叟集**】 明诗别集。四卷。明袁凯撰。袁凯诗稿为作者自编，明初刻于祥泽张氏，其版久毁，世不多见。近人傅增湘曾见此本，并作了详细的跋语，明穆宗隆庆（1567—1572）年间何玄之即以此本为底本，以活字排印出版。后世所传各本多由此出，如：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张所望重刻本，即据何玄之本刊刻；清圣祖康熙（1662—1722）末曹炳曾校刻本，则基本依照张所望本，参照何玄之本及他书加以校补，较二本多出“集外诗”一卷。后又有清德宗光绪（1875—1908）间《观自得斋丛书》本，对袁诗又有所增辑，但多伪作。今《全明诗》将曹炳曾本所增辑、《观自得斋丛书》本所增辑及《全明诗》编者所自辑者皆置于诸卷之末以备考。另外还有《在野集》二卷、《瓦缶集》传世；二者皆为选本。关于《在野集》，傅增湘言藏有此集抄本，并谓此本为“天顺中朱氏凤岐手自选录，并为之评点，付杨传刻之，而张璞为序。

缘公以疾告归,终老田野,故以‘在野’为名,诗凡一百二十六篇。正德元年(1506),鄢陵刘君捐俸重刻于山东,有陈镐撰序以行。逮嘉靖八年(1529),刘之子浚于南都得海叟全集,以前时选本见遗者半,乃录遗别刻,于是有补刊《在野集》之举”(《藏园群书题记》)。《瓦缶集》为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陆文裕为急于流佈袁诗而选刊于北京。《海叟集》按体分编,常见者有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刊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全明诗》本。(王学泰)

【诚意伯文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赋九卷。明刘基撰。刘基在明位至显要,生前即有诗文集刻本行世。其最早的诗文集刻本当为《覆瓿集》,此编主要收其在元末所写诗文(其中也有少量入明作品),初刊为二十卷,后扩展为二十四卷,传至现今者尚有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刘猷刻本,前有罗汝敬序。次为《犁眉公集》,此编收录刘基入明后所著诗文,五卷,诗风亦与《覆瓿集》有异。如李时勉《犁眉公集序》中所言:“伤今悼古,牢笼百态,可以超迈当世者,则于《覆瓿集》见之;若夫优游闲雅,托兴微婉,而有以尽其自得之趣者,则于是编见之。”此本亦有宣德五年刻本传世。自明成祖永乐(1403—1424)间,即有刘基所遗全部著作的合编本。现仍可见者有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戴贤等所编《诚意伯文集》。此编第一卷为《翊运录》(刘之孙廌等所撰,以其中载诏诰敕旨之类,故列之卷首),第二至四卷为《郁离子》,第五至十四卷为《覆瓿集》,第十五至十六卷为《犁眉公集》,第十七至十八卷为《写情集》,第十九至二十卷为《春秋明经》。此本有杨守陈序,刻于杭州。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处州知府林富据成化本重刻,只是把《郁离子》编为四卷,故此本二十一卷。这些版本皆未打乱原刻次序。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樊献科重编刘集,除《翊运录》一卷、《郁离子》三卷不变外,把《覆瓿》、《犁眉公》二集次序完全打乱,按体裁重编,《写情集》为词,放在诗后,《春秋明经》不收。此编凡十八卷,刻于直隶真定。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谢廷杰见嘉靖本文字漫漶,令何镗、陈烈等重新校正刻印。他们在樊献科重编本基础上,加以校补,又加入了《春秋明经》仍为二十卷。此即流传很广的隆庆本。此本尽削旧序,并原来集名皆不可见。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刘基裔孙刘宗燦在隆庆本基础上作了些调整,仍为二十卷,有青田知县万里序,初刻于永嘉孤兰桥露香园。清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括芝南田果育园本为据雍正本翻刻。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本即据隆庆本影印。《全明诗》所收《刘基诗集》,以成化本为底本,参校正德本、嘉靖本、隆庆本及《四

库全书》所收《诚意伯文集》,其次序一仍《覆瓿集》、《犁眉公集》之旧,凡十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王学泰)

【西隐文稿】 诗文别集。十卷,附录一卷,其中诗三卷。明宋讷撰。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刘三吾为宋讷所撰墓志铭中言其有集十七卷,但《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作十卷。此集传世最早刊本为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刊本。书中有刘师鲁后序,言宋集初为上海张趋所手录,滑县王崇之为上海县令时从张氏后人得此集以刊刻。王为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进士,张当更早于此数十年,应犹能与宋氏相及。刘师鲁因见旧板漫漶,故鸠工刊刻,即此十卷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疑“张趋缮录之时又有所删并”,这不是没有可能。集中所存诗可考知年代,作于明代者占十之八九,讷入明已近六十,而在元作品很少收录,可知此集必经过删并,只是不必确指为张趋。此集第一卷为赋,二至四卷为诗,后六卷为杂文,附以明太祖手敕四道及《白雲茅屋赋》一篇、记一篇。《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明万历六年刻本题为“滑台后学王崇之编次,东莱后学刘师鲁校刊。”(王学泰)

【陶学士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赋十卷。明陶安撰。陶安诗文集本分为《辞达集》、《知新近稿》、《黄冈寓稿》、《鹤沙小记》、《江行杂咏》等,而且各自为集,不知各集是否刊刻。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铅山张祐打乱各集次序,按体混编。其跋语云:“祐署教来姑孰(陶氏家乡)之明年丁巳(1497年),郡侯严陵徐公以所得《学士陶先生辞达类钞诗文集》三卷督命校刊。因询先生之孙致政贰尹廷玉、庠生日华、日端,始得其所藏全集,外即曰《知新近稿》、《江行杂咏》、《黄冈寓稿》、《鹤沙小记》,总二十馀卷,谨并摭其类而次之。”前有费宏序。此编刊于弘治十三年(1500)。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凤阁吟稿】 诗别集。十卷。明汪广洋撰。汪集最早刊本当刻于广东。作者当时曾左迁为广东参政,不久因事赐死,此本便绝少流传。明孝宗弘治(1488—1505)初年,葛庭光曾整理刊刻。储懋集中有致葛庭光书云:“承惠《凤池吟稿》。汪公名迹,久湮于后者,赖有文字之懿。自非执事表彰先哲,则并此集散失之矣。”又称他曾得有汪集抄本,并云:“《后集》有胡仲子(翰)标注,末有三序;闻《前集》亦有标注,惟今阁老丘公(指丘濬)家所收本有标注,不可并得,但此三序,不可不刊,谨录上乞付之梓也。”(转引自王百祥跋)至明神宗万历(1573—1620)初,不仅汪集版刻无存,连印本亦不多见。王百祥之父藏有汪

集(未说明是刻本、抑抄本),手为校订,将付梓而去世,又深藏篋中二十余年。万历末,王百祥兄弟视此本既无序文,亦不分前、后集,更无标注,不知是不是葛庭光刊本,曾过汪氏家乡高邮,就其后裔访求抄本,亦无所得。万历四十五年(1617),王百顺从焦竑家得到汪集的广东刻本,前有写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宋濂所作序(粤刻大约即刻于序后不久),于是将序移于此书之前,更订二十四字而刊刻。后附王应元所撰之汪广洋传,及朝廷所赐诰敕。《四库全书》所收即此王百顺刻本。另有《汪右丞诗集》五卷(可能即粤刻本),《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中有记载。另有八卷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亦有记载。(王学泰)

【清江集】诗文别集。四十一卷,其中诗十卷。明贝琼撰。见集于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即有刻本,作四十卷。后世往往诗、文分刊,其文集有二十卷本、与四卷本传世,皆非完帙。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金坛借得四十卷抄本,与自己所藏四卷本,互校刻行。《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槎翁诗集】诗别集。八卷,补遗四卷。明刘崧撰。刘崧“日课一诗”,平时所作诗极多。宋濂序云:“刘君之诗,十九岁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所存亦十之七八耳。”后来其门人萧綽编为《职方诗集》,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年刊刻。此编所收皆为刘崧五十岁以前之作品,洪武十二年(1379),萧綽又为刘崧刻其五十岁以后之诗作,前有乌斯道序。后此二集皆佚。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叶,张应泰为泰和县令,访其故庐,求其所为遗草,即《职方集》已漫漶不传。后张由刘瀚介绍从刘崧裔孙刘养性得到其全集,即委托刘瀚之师童思善加以选择、裁定,十取其七,刊刻以行,时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全编只八卷,名为《刘槎翁先生诗选》。清《四库全书》所收即八卷本。此集之补遗四卷,所录诗近于童思善所删的十分之三。可能为刘崧后裔又将其所删汰作品补刻于后,合成此十二卷本。(王学泰)

【眉庵集】诗别集。十二卷,补遗一卷。明杨基撰。杨集最初为明初郑钢编辑刊行,此本已不可见。明宪宗成化(1465—1487)间,吴人张习重刻,前有嘉州江朝宗写于成化二十年(1484)之序。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陈邦瞻、汪汝淳加以校刊重刊,实际上陈本远不如张本。近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云:“余尝取两本粗事校阅,知陈本脱误弘多。如:陈本卷二《终月湾秋影》诗,张本此下尚有《赠萧处士别》、《哭翟好问》二首,则陈本于卷末夺去一叶又二

行矣。又,各卷诗后往往有旁注,如:卷一《望新淦城》下云‘以上仕江西作’;《潇湘八景》下云‘右使湖南作’;卷二《闻蟾》下云‘以上在吴中作’;卷七《赠道士徐介之》下云‘以上在金陵并勾曲作’;卷八《梅花梦》下云‘以上元末在吴中作’;《梅杏诗》下云‘右仕京并闲居秣陵江畔作’。如此者凡数十则,皆于孟载出处事迹攸关,陈本悉为芟落,殊不可解。其他字句违异者,尚难缕述。则陈本所标为校订,要未足信。”可见陈本虽晚出,实不足珍。今常见者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王学泰)

【静居集】明诗别集。四卷,补遗一卷。明张羽撰。张羽生前,其集未曾刊刻,死后多散佚,余者只以抄本流传。明孝宗弘治(1488—1505)间,张羽曾言“吴中抄本,所谓《静居集》者,什惟二三,自幼抵老,求之靡得其全”,因就此本刊刻,当张氏将刊毕,“又得‘吴兴本’,较之虽曰加倍,犹未完备,亦并刊入”。此原编六卷,刊于弘治四年(1491)。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陈邦瞻改为四卷,内容任意归并,《四库全书》据以入录。民国初年胡思敬辑《豫章丛书》亦即收此四卷本。胡思敬跋云:“此集用万历陈刻本付刊,行款一仍其旧,唯原刻以《雨中试笔》、《送莫翥入郭》、《山居寄止仲》、《题胡玄素画》诸近体,编入五古,殊欠斟酌。以流传既久,亦不敢轻改,用存古书真面目。”书后附胡之校勘记,书前首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吴兴张睿卿写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之序。此集之名源于居室名,羽曾榜所居曰“静者居”,高启为作《静者居记》。此《豫章丛书》本刊于民国六年(1917)。(王学泰)

【西庵集】诗别集。十卷。孙黄撰。孙黄集为黄被害后其门人所编,未言曾刊刻。传世最早刊本为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金兰馆活字印本。书前有吴郡张习序云:“从旧篋中得《西庵集》一帙,固非全帙而诸体稍备。大理寺正陈公思道、吾郡太守林公思绍皆先生乡人,图欲印行,属校其亥豕,厘为十卷云。”(转引自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此本很少流传。傅增湘所经眼的弘治本后归北京图书馆收藏。传世较多者为九卷本,其中诗八卷、文一卷。《四库全书》所收者即此本。此本题为“姑苏叶初春选”,最早为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刊本。傅增湘曾取二本而校之,云:“叶本诗凡八卷,其前七卷次第略同,惟取此本(按:指弘治本)卷七中《朝云》、《琪林夜宿》二篇别出为卷八,又增入《祭灶文》等四首为卷九,其于各卷诗什初无去取,而标为选本,何耶?且不独此也,此本七言律诗二卷(活字本为卷八、九,万历本为卷五、六),以万历本详校,不特词句大有差殊,且篇什更为悬绝。因手勘终卷,此本有而

万历本无者多至九十一首。是此本不仅以稀见为珍,其坠简遗篇足以补阙本之阙失,为尤足贵也。或疑七律所少近百篇,安知非叶氏选录所遗,何所据而谓之阙失?然余编稽各卷,凡五、七言古诗以及歌行、乐府、近体之属,以二本相校,篇章未尝减削,何独于七律严加芟汰?其为原本所无断可知矣。盖叶氏亦知所得未为完帙,故特题选本以掩迹耳。”(《藏园群书题记》)万历本有而弘治本所无者有七律二首、七绝二首。清宣宗道光(1821—1850)间,蕢之八世孙据万历本加以校勘重刻。卷首附有诗人传记及评论。

(王学泰)

【北郭集】诗别集。十卷,补遗一卷。明徐贲撰。徐贲所制乐府诗文若干卷,签题《悟澈集》后已不传。此《北郭集》为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张习(企翔)所编刻,前有写于成化二十二年的闵珪序;序中云:“先生去今百余年之久,集未有传,广东金宪张君企翔始寿诸梓。”张习跋云:“谓之《北郭集》者,由祖自毘陵来居吴城北望齐门外,故以名集,后屡迁仍系旧名,乃首丘意也。”又云:“先生平昔所作甚富,已成大家,所存殆不止此,此其散亡之余。”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云:“李日华《六砚斋三笔》录幼文《泰山记游》三诗,雄奇高浑,雅近唐音。今检集中,乃无此诗,然则幼文所作,散佚不存者正多矣。”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陈邦瞻将《北郭集》改为六卷,非复张刻之旧,其舛误不可胜纠。《四库全书》所收六卷本,即为陈氏编本。此成化本收入商务印书馆于民国间所编《四部丛刊》三编。

(王学泰)

【高青丘集】诗别集。十八卷,遗诗一卷。明高启撰。高启平时以诗为事,如谢徽所说:“季迪之于诗,可谓能尽其心焉尔。”(《缶鸣集序》)故作诗颇多,有时一日五首,每一生活阶段皆有诗集之编纂。如元末隐居吴淞江上时,编有《江馆集》、《青丘集》。寓居娄江时有《娄江吟稿》。入明被征召修《元史》期间的诗作收入《凤台集》。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由南京返苏州,复居江上之青丘,至洪武四年又编有《姑苏杂咏》。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年,曾将至正十八年戊戌(1358)至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结集和未结集作品编为《缶鸣集》,收诗七百三十二篇。洪武三年,再次检点以前所作诗歌,从两千篇中精选出九百余篇,编为一集,亦曰《缶鸣集》。谢徽在为此集所写序中云:“今年冬,予访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诗示予,盖取旧所集诸诗,益加删改,汇粹为一,总名《缶鸣集》。自古乐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诸体,得诗九百余篇,皆其精选。富矣哉!亦可谓不易矣。然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1370)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这些自编集都是可以确切知其编

纂时间的,另外还有不知其编纂时间的如《吹台集》、《南楼集》、《胜壬集》等。启遇难二十馀年后,其内侄周立据其“手泽亲稿”,“益加考订校正,重编足一千首,俾学子李盛缙写成帙,用绣诸梓,期于不朽”(见周立序)。时在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亦曰《缶鸣集》。此编虽行于世,然其版片于英宗正统(1436—1449)末毁于火。郡人徐庸在周立所编《缶鸣集》基础上,加以扩充,按体分编,辑成《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录诗二千馀首。时在代宗景泰元年(1450)。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张习又将高启弟子吕勉所编之《槎轩集》十卷,重加校录,刊刻问世。此集所收皆为洪武三年庚戌(1370)以后作品。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金檀以徐庸所编《高太史大全集》为底本,增入《槎轩集》中有、而《大全集》中所不载的篇章,并广泛从方志及他人所编总集、合集中搜辑到许多佚诗,并附《皕藻集》、《扣舷集》和有关高启的参考资料,如本传、年谱、哀诔、祭文、悼诗、诗评、杂记等,初刊于雍正六年(1728)。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排印出版,由今人徐澄宇、沈北宗校点。

(王学泰)

【蚓窍集】诗别集。十卷。明管时敏撰。管时敏有《秋香百咏》、《还乡记行》等集,此编只是管集之一,集中作品大多写于楚王府,故楚王为之出资刊刻,前有楚王府教授吴勤写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序和楚王府右长史胡粹中写于成祖永乐元年(1403)的序。书中有元末名诗人丁鹤年的评语及圈点;丁当时亦居楚,受到楚王礼遇。此编按体编排,有些卷录诗极少,如九卷仅录六言绝句四首。此集得名于韩愈《石鼎联句》之“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用以自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以为此书刻于永乐元年,其根据为胡序写于此年。而书前所附周子冶之《全庵记》(此记记管氏生平)中有“(洪武)三十一年改长史,在职十年,公亦年登七十,乞致其事以归田里”诸语,可知此记至早写于永乐六年(1408),因此,即使永乐元年初刊《蚓窍集》,而传世的印本因有《全庵记》,亦当刷印于永乐六年之后。民国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四部丛刊》三编收录此集。此本经明、清两代许多著名文人收藏,书后有清何焯所补管佚诗《题张子正桃花春鸟图》一首,《四部丛刊》影印本未收,兹录于后:“十年不见故园春,画里题诗半古人。老去风流浑减尽,东风花鸟易伤神。”

(王学泰)

【王常宗集】又名《三近斋集》、《王徵士集》。诗文别集。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其中诗一卷。明王彝撰。王集本名《三近斋集》,明孝宗弘治(1488—1505)中都穆(字元敬)编为文三卷、诗一卷,

刘廷璋、浦杲又辑补遗一卷,后世传抄本又有续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辑。书前有都穆与浦杲二序。明刊本已不传于世。《四库全书》所收为何焯所藏之抄本。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王士禛门人嘉定陆廷灿据抄本重新刊刻。此集亦不常见。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白石山房逸稿】 诗文别集。二卷。张孟兼撰。据孟兼十一世孙思煌言,其先祖有《白石山房文稿》二十卷与《蜀山遗集》,二书皆遭火焚,片字不存。《明史·艺文志》著录《张孟兼文集》六卷,可能为后人辑本。此本亦不传于世。张思煌所刊《新本白石山房稿》虽作五卷,录诗仅三十首左右,三卷至五卷皆录同时人所投赠或唱和诗文以及后人所著传志之类。此二卷本所收诗文反较五卷本为多。《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此本为明人所编,故张思煌编新刊本时“未之见也”。五卷本有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刻本,二卷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密庵稿】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五卷。明谢肃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谢集“传本久稀,藏书家罕著于录。惟《永乐大典》中所收肃诗文颇多”,因于《永乐大典》中录其诗、文八卷,编入四库。实际上谢集仍存于世,最早刊本为其门人任守礼、刘翼南校正编次,刻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时距谢肃去世不到十年。此刻本曾为傅增湘所得。据傅氏言,此本“分甲至癸十卷,甲卷五言古诗,乙卷歌行,丙卷近体五言、长律五言、近体七言,丁卷近体七言,戊卷近体七言、长律七言、绝句五言、绝句七言”。己卷及以下为文。诗集有刘翼南后序。缺目录,前五叶抄补。此本较《四库全书》本多收诗一百三十六首,但也有两诗仅见于《四库全书》本。此本初刻于谢肃家乡上虞,世称洪武本。明穆宗隆庆三年己巳(1569),此本再刻于锡山;熹宗天启五年乙丑(1625),三刻于粤中。据其从孙谢瑜于隆庆元年(1567)所写序云,原刻板藏县库,四方学士,宦游过此者,求索无虚日,不一二年,板即剗敝漫灭。其流布于远近者,计不下千百帙,而至肃六世孙谢师严重梓时,举家藏旧帙,旁索亲友故家,参互校订残文缺字,竟无由补全,以致空楮墨钉,弥望皆是。天启本为肃七世孙谢伟所刻,墨钉也极多。傅增湘得洪武本,夏桐孙得天启本。傅氏持两本互校之,各成完书。天启本归北京图书馆藏。洪武本由商务印书馆印入《四部丛刊》三编。(王学泰)

【浦舍人诗集】 诗别集。四卷。明浦源撰。浦源原有《舍人集》十卷,因其早逝,流传稀少,颇为罕见。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俞宪选刻《盛明百家

诗》,曾云:“吾乡旧有浦集,久而湮废,遍索乌有,顷乃得墨本于故家,仅四十首,以备乡先辈一代故实。”(见浦集徐焯序)徐焯又云:“是浦诗在昔时,同乡已自难觅,矧今日乎?焯辑诸选,并先辈杂抄,共百五十首,视俞本已增其三矣。”(见徐序)此编分为四卷,于明思宗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刊刻出版,但流传既久,此本亦极罕见。民国十二年(1923)无锡侯鸿鑑等编辑《锡山先哲丛刊》,将此编列入第二辑,由俞复校订,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前保留徐焯序,后附丁福保撰《浦舍人传》,并附丁福保辑“浦舍人事迹汇录”七条。此编分体编排,先古体后近体,先五言后七言,录诗仅一百四十六首,较徐焯所言少四首。

(王学泰)

【鸣盛集】 诗别集。四卷。明林鸿撰。林集又名《膳部集》。明焦竑所著《国史经籍志》著录“林鸿《膳部集》五卷”。这可能是林集的较早刊本,已佚。林集最早编于洪武间,此集有倪桓写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的序与刘嵩写于洪武十三年(1380)的序。这些早期的编本早已不传。现仍可见者为编于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的邵铜本,邵为林鸿同乡,谪守温州,从政之暇,览其旧稿,慨然兴思,因详加校勘,补其阙略,缮写成编,捐俸刊刻。《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全书包括五言古诗一卷,五言近体一卷,七言古体、近体一卷,七言绝句、词话集一卷,附录载赋两篇、《梦游仙记》一篇。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王氏翻刻本。

(王学泰)

【秣陵先生集】 诗文别集。七卷,附录一卷,其中诗三卷。明黎贞撰。黎贞诗文著述甚富,去世后未曾刊刻,遂多散佚,其零章碎句只以抄写流传。明中叶新会名儒陈献章对黎贞颇推崇,其诗文方为世所重。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贞六世孙黎善积访求贞诗文,在江西布政使、邑人区越支持下得以刊刻,署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贞裔孙翼再度搜辑遗帙,重付剗刻,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问世。此编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刊,传世者有都会书屋本。

(王学泰)

【逊志斋集】 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二卷。明方孝孺撰。孝孺诗文在其生前即行编辑,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林右、王绅曾为作序。孝孺遇难后,其作品严禁流传。其门人王徐将其文私下抄录成《侯城集》,但未能刊刻。英宗天顺七年(1463),临海赵洪始从烬馀采掇编辑其诗文,共得二百六十七篇,得以在成都刊刻,世称蜀本。此为方身后之首刻本。宪宗成化(1465—1487)间,谢铎、黄孔昭等人有

慨于蜀本遗漏太多,又与叶盛、林鹗、王汶等人勤加蒐辑,编成文集三十卷、拾遗十卷,共得诗文一千二百余篇,宁海(方氏家乡)守令郭绅愿为刊刻,遂于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刻于宁海,世称邑本。武宗正德(1506—1521)间,台州知府顾璘有慨于邑本之版年久漫漶,遂与参军黄绶等删定伪谬,重加订正,于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刊于台州,版藏郡斋,世称郡本。世宗嘉靖(1522—1566)间,浙江按察司提督学政副使范惟一、浙江按察司佥事唐尧臣及台州知府王可大以郡本为底本,参酌蜀本、邑本等版本,去伪存真,增遗补漏,编为二十四卷本,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刊于浙江。后世刊方集多据此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丁宾、孙如游等在南京所刊《逊志斋集》亦据此本,只是增加“外纪”二卷。《四库全书》所收亦为此本。(王学泰)

【练中丞集】 诗文别集。二卷,其中诗一卷。明练子宁撰。子宁被难后,其诗文在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遭严禁。孝宗弘治(1488—1505)间,王佐始蒐集其遗诗、轶文,名曰《金川玉屑集》,作六卷于武宗正德七年(1512)由其新淦乡人刊于本县,受到当时在江西为提学副使的李梦阳支持,故人称此本为李氏刊本。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在江西任职的陆时雍、王养正复刻。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高从礼、王文燿续刻。万历三十七年,泰和郭子章据旧本重编为二卷,附遗事一卷;其裔孙绮复增辑之,刊于万历(1573—1620)末年。《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高荣重刻此集。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饶梦铭与子宁裔孙练立采集遗篇,排比较勘,另刻新版。此后,清宣宗道光(1821—1850)及末帝宣统(1909—1911)间,陆续有新刻本问世。存诗八十二首。(王学泰)

【王舍人诗集】 诗别集。五卷。明王绂撰。绂卒于官舍,其集为其子王默所编。王进为作序云:“其子默哀集遗稿,得诗若干首,汇次成帙,题曰《友石先生诗集》,将寿诸梓,求余序之。”可知王集最初之名与现在通行之名不同。此编前有曾荣写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之序及王进写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之序,其刊刻当在宣宗宣德(1426—1435)初年。但此本已不可见,传世最早之本为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无锡知县荣华重刊本及弘治六年与《虚舟集》(明王偁著)同刊本。《四库全书》所收当为此本。民国十三年(1924),无锡陶守恒以刻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抄本,编为《王舍人诗集》五卷。前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附王洪撰《王孟端小传》、章炳如撰《孟端王公行状》、胡广撰《王孟端墓表》。

全书按诗体排列,卷一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五言排律,卷二为七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诗,卷四为七言律诗,卷五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此书有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排印本,收入《锡山先哲丛刊》第二辑。

(王学泰)

【东里全集】 诗文别集。九十四卷,包括正集(即东里文集)二十五卷、东里诗集三卷、续集六十二卷(其中诗九卷)、别集四卷(无诗)。明杨士奇撰。正集及东里诗集为士奇亲自编订,刻于明英宗正统(1436—1449)初年。前有杨溥、黄淮二序。杨序于正统元年(1436),黄序于正统五年(1440)。其续集为其子所编刻,故在诗文每卷之后皆署“天顺五年(1461)冬十月男导编定”。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若杨文贞公《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于广东,为人窜入数篇。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可知采录愈全,其病愈多。其后有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年)黄如桂刊本。《东里诗集》三卷、《东里诗集续编》九卷,亦单行。此九十四卷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学泰)

【解学士文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四卷。明解缙撰。解氏冤死后,家被籍没,诗文稿零落。明英宗天顺(1457—1464)初,黄谏慕其人,方始辑其遗稿。黄在序中曾缕述辑解缙诗文之难。缙天才骏发,属文作诗多不留稿,另外由于缙遭遇奇特,生前即享大名,冒名顶替之作亦颇不少。黄谏初编,仅在京师“遍求士大夫家及闻人口诵而录之”,加自己所藏者,共得古、今诗二百五十五首、文十七篇,编校成集,分为六卷,托人刊刻。此为缙身后第一个诗文集刻本。六卷本行世后又从友人手中及解缙经行之地收录一些解缙诗文,按地里岁月远近编为三十卷,名为《解学士先生文集》,刊于天顺八年(1464),前有黄谏、蔡朔二序。此本传世较少,近世藏书家很少寓目,可想在明代流播似亦未广。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罗洪先与缙从孙解桐在三十卷本基础上(从此本首录黄、蔡二序,可知罗、解曾见黄氏刻本),蒐辑散亡,稍剔其伪,重编缙集,分为十卷,其中诗集部分,先将应制之作另编一卷,排在集首,其他按体编排,依次为四古、五古、五律、五绝、五排、七古、七绝、七律、赋、词等。此本刊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传世稍多。清圣祖康熙间,缙十世孙解悦重编解集,并加补葺校勘,厘为十六卷,诗五卷,刊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另有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刊本。(王学泰)

【薛文清集】 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其中诗赋十卷。明薛瑄撰。薛瑄生前曾有《读书录》及《河汾诗集》(八卷)行世,未有全集之刻。瑄去世后,其孙薛

堪编辑其全集,委托常州同知谢庭桂刊刻,未就而稿本零落。明孝宗弘治二年己酉(1489),监察御史畅亨谪官陕右道,过镇阳,瑄门人张鼎向畅问及全集,畅言得之于毘陵朱氏。鼎阅后,见其字句舛讹,多非其旧,“因仿唐《昌黎集》校正编辑,总千七百篇,分为二十四卷,凡三易稿,始克成编”(见张鼎序)。此编前十卷为诗、赋,赋只数篇,未占一卷,其后按体编排,依次为古诗、歌、歌行、绝句、律诗,刊于弘治间。神宗万历(1573—1620)间,张铨有重刊本,此本后附杨鹤为薛瑄所撰之年谱(撰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及有关薛氏之传记资料,包括传、行状、神道碑、祠堂记、崇祀疏、遗事等。另有张珩所编四十卷本,名为《薛文清公全集》,凡十卷、附录一卷,刊于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此本有赵孔昭重校本,刊于穆宗隆庆(1567—1572)间与万历间崔尔进刊本。二十四卷本还有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薛氏刊本及《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于肃愍公集】 诗文别集。八卷,附录一卷,其中诗六卷。明于谦撰。于谦诗文撰著颇多,蒙冤受戮后,稿多零落。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其子于冕上疏申诉父冤,得以平反,遂拾掇谦所遗诗文旧稿,于成化十二年刊成不分卷的《节庵存稿》。此编成书仓促,疏漏颇多。世宗嘉靖(1522—1566)初,陈舜江为河南巡按,考虑到于谦久宦河南,命重编于集。后简霄继任,方编讫此集,分为八卷。河南按察司副使王应鹏所撰后序云:“公宦斯土久,民德公之深,祠之。且于公只字片语,亦知宝之。应鹏所得公诗文,盖访之民间云。”此编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梓于大梁书院,书前有简霄序,前有明宪宗之祭文,附录皆为有关谦之传记资料,并附有礼部为于谦请谥之奏文及皇帝之批复。此本为于集中录诗最多者,凡六百餘首。熹宗天启(1621—1627)初所刊《于忠肃公集》十三卷,卷数虽多,录诗却少,仅一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此外,神宗万历(1573—1620)间所刊、标明为李卓吾批点者《三异人集》中的《于节庵集》七卷,则与大梁书院本相近。后世之《乾坤正气集》本,出自《于忠肃集》;《武林往哲遗编》本则出自大梁书院本。

(王学泰)

【石田诗选】 诗别集。一作《石田先生集》。十卷。明沈周撰。沈周集最早刻本当是明宪宗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刻本,当时周尚在世。此本前有章轩序,全书已不可见,亦未见清人著录。第二次刻于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此时周亦在世,前有彭礼序,版心上书口正面刻“弘治癸亥”四字,背面刻“集义堂刊”四字,分二卷,录诗不分体,只以时代为序,存诗不多,此编曾见残本。三刻于武宗正德元年丙

寅(1506),此时周已至垂暮之年,其友华汝德为之编选,次为十卷,按类编排,分作天文、时令等三十一类,前有吴宽序。全书所录诗超过集义堂本数倍,可能为接近全集之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仁锡刻其先人《白阳山人集》罢,又请钱允治编辑沈集。钱氏自称,他访之于旧家,获沈集一二善本,按体分类(见钱《序》),凡五古二卷,七古一卷,五排、七排共一卷,五律二卷,七律三卷,五绝一卷,七绝一卷,凡十一卷,由书贾翁氏刊刻出版。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瞿式耜又刻《石田先生诗钞》九卷。此为诗、词、文合编之选本,诗词八卷、文一卷,附事略一卷,据钱谦益序中称,此本乃他与程嘉燧互为评定、选录,按写作先后编排,可以见其诗境之变迁。此刻版心有瞿式耜书斋名“耕石斋”。此本入《四库全书》存目。沈集最常见者为《四库全书》所收十卷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

【陈献章集】 诗文别集。六卷,其中诗、赋二卷。明陈献章撰。陈集本名《白沙集》,初为罗侨所刻,诗、文各十卷,刊于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仅距献章去世五年。武宗正德三年(1508),林齐修补其版,重刻,卷帙依旧。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高简、卞峽又重刻,对献章诗文有所增删,并为八卷。此本成另一系统,集名题作《白沙子》。嘉靖三十年,新会教谕俞樟在林齐刻本基础上增一卷,重新加以校订,刊于广州新会县,是为二十一卷本。其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林氏、万历四十年何熊祥、熹宗天启元年(1621)王安舜、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黄之正等人先后覆刻,均为九卷,其编次大体同于八卷本,而诗、文有所增益。清圣祖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又重刊。此本远近搜访,颇有增益,得前刻皆未收入之文若干篇、诗五十五首,合并旧刻,厘为六卷。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陈氏宗族又据此本重刊。今人孙通海以何九畴刊本为底本,校以明刊罗侨刻本之残本、林齐刻本、高简、卞峽刻本、萧世延刻本(即俞樟刻本)、何熊祥刻本、王安舜刻本以及清乾隆(1736—1795)间碧玉楼刻本、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文宗咸丰元年(1851)阮氏梦菊堂刻本,并参以明嘉靖(1522—1566)间马崧所刻《白沙诗教解》,整理成此《陈献章集》。后附《陈献章诗文补遗》(此为何九畴辑)、《古诗教解》与《陈献章诗文续补遗》(此为孙通海辑),并附陈献章年谱、传记资料及其诗文集序跋等,由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定山先生集】 诗文别集。十卷,补遗一卷,其中诗五卷。明庄昶撰。庄集初刊于明武宗正德二年丁

卯(1507),为弓元所编,此时仅距晁去世八年。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定山书院再刻此集。周满序云:“慨自侍御弓君刊后,其集湮没久矣。遍访书肆,乃得之一泉孔君家藏者。”是知仅二十馀年后弓元刻本已不多见。当时南京户部主事云南陈常道、户部主事四川周满等人编校,应天府江浦知县刘缙刊刻。版藏定山书院。此集分体编排: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一卷,录诗四十一首;五言、七言绝句共一卷,录诗二百一十二首;五言律诗一卷,录诗一百零九首;七言律诗二卷,录诗五百零九首。此版多次刷印,故传世颇多。但后世刷印,在第一、二页有所删改,增添了题衔人,将后来主其事者之名亦窜入校阅人中。三刻于萧惟馨,四刻于其裔孙庄清佐。定山书院版无补遗,清佐刻本有补遗一卷,其中所收皆与庄晁有关之生平资料。《四库全书》所收即清佐刻本。

(王学泰)

【李东阳集】原名《怀麓堂全集》。诗文别集。一百卷。明李东阳撰。李氏致仕家居时尝自辑其平生所作诗文,凡九十卷,总名为《怀麓堂稿》,寓怀念其先祖所在岳麓山之意。其中,“诗前稿”二十卷、“文前稿”三十卷,皆写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以前,即作者在翰林院任编修、侍讲、侍讲学士之时;“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皆写于弘治七年以后,即作者在内阁任职之时。宪宗成化八年(1472),陪父返乡,沿途所作诗、文,编为《南行稿》一卷,成化十六年,充南京乡试考官,阅卷后返京所作诗、文,编为《北上录》一卷。此两编附于“前稿”之后。另有《经筵讲读录》(为皇帝讲经记录)、《东祀录》(东祀孔子时所作)、《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历年要求致仕报告)等,附于“后稿”之末。此集初刊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为东阳门生、徽州知府熊桂据东阳所编《怀麓堂稿》副本所刻,前有杨一清序,更名为《怀麓堂集》。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有重刊本;又有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廖方达刊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及清仁宗嘉庆八年(1803)刊本。今人周寅宾以清嘉庆八年陇下学易堂刊本《怀麓堂全集》为底本,校以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怀麓堂集》抄本、清嘉庆八年仰斗斋《怀麓堂全集》刊本对勘。其中,《拟古乐府》一百首收东阳门生何孟春所作注解,并参校了明魏椿刻本《西涯拟古乐府》、清康熙间岭南所刊《西涯先生拟古乐府》、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长沙所刊《拟古乐府注》等。最后附补遗,补佚诗七首。此编易名为《李东阳集》,由岳麓书社于1984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熊峰集】诗文别集。十卷。明石珪撰。石集在焦竑《国史经籍志》与《明史·艺文志》中皆作《熊峰

集》四卷。此为石氏歿后流传于明代之石集刻本。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说《恒阳集》,可能是流传于江南的钞本,皇甫访据以删定为四卷,存诗一百九十馀首。清圣祖康熙六年丁未(1667),藁城(石珪故里)县令孙光易编辑石集,从梁清标家得到清标之父整理的未刊之石集选本及全本。梁清远为石集所作书后云:“不佞出先大夫所选文介集,并未选全本授之。令君又访于其家(指石氏后裔),得别集数篇,并刻以传。”此编自卷一至卷四为诗,卷五、卷六为文,卷七至卷九又为诗,卷一〇为文,因为版已刊定,不能依类续入,故其体例丛脞如此。《四库全书》所收即为此十卷本,而以四卷本列入“存目”。原刊本有梁清标序、孙光易序、凡例,以及梁清宽、梁清远、陈僖等人所作数篇书后。在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梁清标已入《贰臣传》,故四库馆臣将序、凡例、书后等一概删去,致使读者不明石集演变、刊刻之来龙去脉。今仍有孙光易原刊本传世。

(王学泰)

【石淙诗稿】诗文别集。二十卷,诗十九卷。明杨一清撰。一清早入仕途,官至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其诗、文在生前当屡有刊刻,皆不传。此编为一清晚年其门生、故吏所编,并经过一清审定之稿,故将其《自讼稿》之序作为全编之序以自警。其中进士前所作之诗,仅存二首,可知作者对早年作品作了大量的芟削。此编题李梦阳评点,“西巡类”则题李梦阳、康海评点。全编分为“凤池类”、“省墓类”、“潭后类”、“西巡类”、“北行类”、“容台类”、“行台类”、“归田前类”、“自讼类”、“制府类”、“吏部类”、“玉堂类”、“归田后类”、“督府类”、“玉堂后类”,除“归田后类”作四卷,“玉堂后类”作二卷外,其他每类一卷,第二十卷为“柬札类”,是散文作品。此二十卷本当为一清诗全编的最早刊本,故其体例驳杂,每小集称“类”而不称“集”、“稿”。《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即此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入《存目》之《石淙诗稿》十九卷本,当较此编为迟。《中国善本书提要》所收之十九卷本,题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刻本。作者王重民言:“按此即《存目》所据以著录之本。《提要》云:‘考《明史·艺文志》载一清诗二十卷,此本仅十九卷,与《艺文志》卷目亦不合。惟《督府稿》后别附《简札》一卷,当为文集中一种,装辑误入于此。史志或并此数之欤?’余疑《督府稿》并《简札》一卷,合计二十卷之说是也。《督府稿》凡二卷,卷一已载散文,则合《简札》入卷,已为例不纯,况是集非一时所刻,或先有单本,重刻入集,或既有单本,又改其版入此集,故行款不一、字迹各异,则或计为十九卷,或计为二十卷,非书本有异,乃算法不同也。”此编之名

表示不忘祖之意。杨氏祖父居安宁时屋前有水流石间作淙淙之声。一清流寓镇江,仍将其居舍名为“石淙精舍”。今尚有嘉靖刻本传世。(王学泰)

【祝氏集略】 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八卷。明祝允明撰。允明平日所撰诗甚夥,其幼子祝繁云:其父“自少读书绩文,至老不倦,中更五十余年,未尝一日辍笔砚。以是著述为多。或每劝人梓,先公未以为然,唯自詮次成帙以藏而已”(见祝集祝繁跋)。允明去世后,其子祝续官至布政使,退居林下,以校允明集为事,校毕而无力刊刻。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张景贤为应天府巡抚,景慕允明书法,因索其集。祝繁将家藏校本呈上,张据以刊刻,并为作序。实际允明诗、文远不止此。《明史》言其有诗、文六十卷。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允明“他书,如《蚕衣》、《罪知录》、《野记》之类,凡数百卷”。又谓其“别有《金缕》、《醉红》、《窥帘》、《畅哉》、《掷果》、《拂弦》、《玉期》等七集。集各有小序,题曰《祝氏小集》,……亦韩致光《香奁》之流也”。从集名可以想见其内容。这是其子孙与方面大僚不好上版广传的,只是“好事者多传写之”,靠手抄本流传,岁久已佚。此编名“集略”,可能其子考虑到还有诸多诗文及笔记杂著未刊之故。《四库全书》所收祝集名为《怀星堂集》亦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明史》本传言“所著诗文集六十卷”,遂疑《集略》与《怀星堂集》各得其半。今以两本对勘,除小有出入外,大体一致,遂知《怀星堂集》乃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陈以闻刊刻祝集时所易之名。嘉靖原刻本及万历三十九年(1611)陈以闻刻本俱传于今。

(王学泰)

【溪陂集】 诗文别集。十六卷,续集三卷。明王九思撰。正集由王九思门人监察御史王献于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刊于山西,卷首有自序、康海序二篇;续集由巡抚翁万达于嘉靖二十五年刻于鄠邑,有张治道、翁万达二序。后合印为一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别集类《存目》三所著录《溪陂集》十六卷、续集三卷,当系此合印本。又有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张宗孟修补本,题为“《重刻溪陂王太史先生全集》十六卷续集三卷”,另有一本题为“《重刻溪陂王太史先生全集》十六卷续集三卷《碧山乐府》等八卷”,均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续集卷下有《溪陂镇重修石头记》云:“溪陂镇在县西三里许。……陂鱼美,故名之曰溪陂。此溪陂者,关中之奥也,自有子美之诗‘半陂以南纯浸山’,而其名益著。予非镇人,心切爱之,尝自谓溪陂山人。”故因以名其集。

(吴书荫)

【唐伯虎全集】 诗文别集。六卷,补遗一卷,其中

诗词曲四卷。明唐寅撰。唐寅生前不以诗、文自重,作诗撰文,多不属草,故多散佚。其诗、文最早为袁袞编刻,刊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去唐寅逝已十馀年。此编仅二卷,录乐府诗三十二首、赋二首、杂文十五篇,仅收其少年及中年部分作品,那些“务谐里耳”之作一概不收。其诗文在神宗万历(1573—1620)间方受到崇尚性灵文人之重视。何大成三度编辑唐集。初编于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何感慨唐“诗文,翩翩有奇藻,乃其迈往不屑之韵,卓然如野鹤之在鸡群,是乌可以无传哉?噫!其传者亦寡矣”(见何序)。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何大成“旁蒐逸艳,并辑志铭,暨诸名公赠答,厘为若干卷,题曰‘外编’附刻卷末”(见何氏二序)。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云间曹元亮亦刻唐集,其序云袁氏初刻后“何君立(即何大成)复稍加补葺,然终非完豹也。今所集二十二种,百五十馀篇,大都先生中年作”。可知曹刻本是在何大成刻本基础上补葺刊刻的。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何大成三编唐集,并认为曹刻只是“按予旧本稍加增损颠倒其间”(见何氏三序),遂再度“汇而传之”。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唐仲冕据何氏刻本“辑而刻之”,并“补之以家藏山水画端诗”和当时人如阮元、黄易、王文治、邵谿等所藏唐氏佚诗佚文,编为补遗一卷;后附唐寅轶事四卷、制义一卷、画谱三卷,凡十五卷,刊刻出版。大道书局1925年据唐仲冕刻本排印出版。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又据大道书局本影印出版。

(王学泰)

【文徵明集】 诗文别集。正编三十五卷,其中诗十五卷;补辑三十二卷,其中诗十六卷。明文徵明撰。徵明生前即屡有诗集刊刻行世,如曾与桑介合刊《虞吟集》,又与徐祯卿合刊《太湖新录》,但未见传世。现仍可见者有:(1)四卷本《甫田集》,刊于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收录徵明自二十一岁至四十三岁间作品,录诗凡六百七十一首。其中有《次韵陈道济读〈甫田新集〉见寄》,此诗有句云“草草新编漫入评,十年憔悴苦吟声”,可知此集之前还有一《甫田集》收录文诗,并曾行于世。(2)两卷本《文翰林甫田诗选》,分体编,共录诗一百九十一首。此集初刻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时作者七十四岁。徵明身后刊本更多,始刻于明代并传至现今的即有以下几种:(1)《文翰诏集》。此为俞宪所编《盛明百家诗》之一种,刊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录诗九十七首。(2)《续文翰诏集》一卷。亦在《盛明百家诗》中。俞宪题记云,《文翰诏集》付梓后,得四卷本《甫田集》,故又补选五十三首为续集。(3)《文太史诗》四卷。此本收在徵明孙文元肇所编《文氏家藏集》

中。(4)《太史诗集》。此集在《文氏五家集》中,四卷,分体编,录诗三百五十六首,多有诸集所不载者。《四库全书》所收即此集。(5)《甫田集》三十五卷。其中诗十五卷:前四卷皆从四卷本《甫田集》中选出,录诗二百五十四首(约为原书的三分之一),次序一仍其旧;余十一卷,录正德八年(1514)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诗,只取五百零二首,亦是此期间作品之选本。因为此本内容最为丰富,所选诗文迄于作者逝世,故虽非全集,徵明后裔亦多次刊刻,流传很广。近世坊间也多据以翻印,被认作为徵明全集。今人周道振蒐辑各刊本所收文氏诗、文,去其重复,得诗凡一千二百七十一首,分体汇编为十五卷,各体仍按写作先后编排,编年不详者附于后;文二十卷。此为“正编”。周氏又将未刻之集外诗、文,汇录为“补辑”,凡三十二卷。其诗所据包括上海图书馆藏诗残稿一册、上海艺苑真赏社所印文氏诗稿一册、北京图书馆文嘉抄本《甫田集》残本十卷,益以单篇之墨迹、印本及前人著录所载,共辑得各体诗一千四百一十九首、联句二首。书后辑有与徵明生平事迹及有关资料五种,包括序跋、题记、传记、志文、年表、交游酬赠、评论、诗话、词话等。此编有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王学泰)

【空同集】诗文别集。六十六卷,附录二卷。明李梦阳撰。梦阳平生所撰诗文甚夥,晚年所有删订,去世后,第一个诗文全集乃其甥曹嘉(守礼)所编刻,凡六十三卷,于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即梦阳去世后二年刻于凤阳;同时在苏州、杭州亦有刻本。梦阳生前已享文名,诗、文屡有刊刻,但传至今日可见的最早刊本为嘉靖(1522—1566)刻本。如:《空同精华录》三卷,为丰坊所编选、屠本峻刻,前有沈明臣、倪珣二序,约刻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又《嘉靖集》一卷,可能刻于作者生前,书中所录皆为嘉靖元年至三年诗。另有《空同诗选》一卷,为杨慎、张禹山等人所编选,系从梦阳两千一百四十九首诗中选录诗一百三十九首,由乌程闵齐伋所刻,刊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此《空同集》六十六卷本,由东莞邓云霄、歙县潘之恒等人编校、长洲归隆裔等人刊刻。此编是校辑群本而成,较嘉靖所刊诸本更为完善,凡旧本所无而此本新添之诗文皆题“补录”二字以示区别。书前有黄省曾、冯梦祯、王廷相、聂绀、邓云霄、潘之恒六序及作者自序,初刊于神宗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后世翻刻李集多据此本,《四库全书》所收亦即此本。另有万历(1573—1620)间李孝思所刊六十四卷本。万历间李三才刊《李何二先生诗集》,其中《李崐崐先生诗集》三十三卷。清代张祖同辑

《弘治四杰诗集》,其中《李空同诗集》亦三十三卷。

(王学泰)

【康对山先生全集】诗文别集。四十五卷,其中诗十六卷。明康海撰。康海逝世后其友张治道编搜其集,得其全,并加以删削校误,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陕西巡抚翁万达与西安知府吴孟祺刊刻。凡十九卷,为选本,前有王九思、刘储秀、张治道、吴孟祺四序,后有赵时春后序。序中记录了其编辑刊刻之经过。此本校讎草率,讹误颇多,其幼子康桡言此十九卷本“中间抄誊磨对之人,皆不甚通文理,字或难辨,则录其半而逸其半,意或难参,则取其知而舍其不知,甚至门生之代笔,一概甄收,名公之赠章却掷弃,是以先集之出,颇失人望(见万历刻本之后序)。明神宗万历(1573—1620)中,康桡重加辑录,经过李维桢、朱孟震、王世懋删削编辑,以选本刻于关中。此本今已不可见。康桡入仕后,又刊康海全集,名为《对山集》,四十六卷,刻于万历间。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有虞山景氏刊本,四十五卷;又有刊于陕西之马逸姿貽谷堂刊本,亦四十五卷。马氏刻本最常见。马在序中言:“原本剞劂不工,亥豕多谬,予乃广搜里人家藏缮本,与原刻互为参校,字讎句勘,再阅寒暑,始克卷帙。”此本以类分卷,次第仍旧,删重去复,并将原本所收占一卷的张、康二氏族谱全部删削,只存四十五卷。此外,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康氏里人孙景烈以所藏明张治道编辑之康集重加芟汰,仅存十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本虽晚出,而去取谨严,于诗汰之尤力,较诸本特为完善,已足尽海所长矣。”张治安编辑之十九卷本则列于“存目”。(王学泰)

【顾华玉集】诗文别集。四十卷,其中诗二十七卷。明顾璘撰。顾璘诗文集皆其生前所自编;此编为其自己编订诗文之合集,包括:(1)《浮湘集》四卷,所收皆为由开封知府谪广西全州知州时所作,有蔡羽序、金大车后序,初刊于明世宗嘉靖(1522—1566)间。(2)《山中集》四卷。收称病家居时作品,前有陈束序,写于嘉靖十七年(1538)。(3)《凭几集》五卷、《续集》二卷,写于巡抚湖广之时,多作于行旅途中,其自序中云:仅在丁酉(1537)八月至戊戌(1538)四月,行程七千馀里。以车为几,不废写作。此集还有皇甫汈之序,写于嘉靖十九年。(4)《息园存稿》二十三卷,乃其自己编订之诗文集。前有写于嘉靖十七年邓继曾之序和陈子壮序。(5)《缓轡集》一卷,为顾氏官工部侍郎时哭其亡女之作。此五集皆有嘉靖间刊本,后人泚合为一编。有明吴门刊本。常见者有

民国初年蒋氏慎修书屋所刊《金陵丛书》本。

(王学泰)

【徐氏别稿】 诗文别集。五卷,诗文混编。明徐祯卿撰。此编所录皆为祯卿早年未中进士前作品。全书分为五集:(1)《鸚鵡编》,所收皆为其初学诗时作品,录诗五十一首,多为模拟六朝乐府之作,如《倡家咏效何逊》等,也有少量模仿唐人的通俗作品,如《竹枝》、《杨柳枝》等。(2)《焦桐集》,录诗五十八首,皆为近体,以模拟唐代白居易、刘禹锡晚年唱和之作为多,如《岁月》、《老树》、《大抵》等。(3)《花间集》,录诗三十九首,大多作品颇能代表吴中诗风,如《春魂》、《文章烟月》等。(4)《野兴集》,录诗四十四首,多为登临怀古之作。(5)《自惭集》,录诗三十五首,多纪行纪游之作,如《在武昌作》等。全书之后附有《芙蓉怨》等诗。此编约编于祯卿及第之时。李梦阳曾为此集写序云:“《徐氏别稿》五卷,吴郡徐昌谷所著,皆未第时语也。”并写明此编录诗二百二十七首,文一百十八篇,与现存《别稿》相同。此序写于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祯卿去世后,广陵袁氏购得初稿,寄付在豫章为官的李梦阳,由李刊于官署。此刻今已不得见。传世者有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觅睡亭刻本。

(王学泰)

【徐昌谷全集】 诗文别集。十六卷,其中诗十二卷。明徐祯卿撰。徐祯卿生前曾自定其集,录诗一百九十首、杂文二十四篇。诗分为乐府、赠答、送别、寄忆、咏怀、题咏、哀挽等七部分。名曰《迪功集》。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祯卿逝世后,此集由徐缙寄付在豫章为官的李梦阳,由李作序,刊于豫章。另有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刊本,为《四库全书》所收;此本只录诗一百八十二首、杂文二十四篇。此外,祯卿早年所作编为《徐氏别稿》,最初亦刻于豫章。世宗嘉靖(1522—1566)中祯卿子伯虬再辑遗稿刻于吴,后为火焚。神宗万历(1573—1620)中,吴县令傅光宅综合徐集的各种刻本,分为内、外集。内集即据《迪功集》刊刻;外集乃据皇甫湜所编《徐昌谷外集》(十存其九)及《徐氏别稿》(十去其八)删削而成。此两集刻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此本后亦毁,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周文萃从祯卿曾孙徐善长处得到祯卿全部诗文稿,凡是豫章刻本所未收和傅光宅本所删除者一并网罗在内,编成此十六卷本之《徐昌谷全集》。集中打破原来的编排次序,皆按体编排,其次序为歌行、五古、五排、五律、五绝、七古、七律、七绝,存诗凡五百二十二首,刊于吴中。此为传世徐祯卿集中最完善者,有万历年间徐允元刻本传世。

(王学泰)

【鸟鼠山人遗集】 诗文别集。包括《鸟鼠山人小

集》十六卷,其中诗八卷,《鸟鼠山人后集》二卷,其中诗一卷,《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拟汉乐府》二卷,全编诗凡十三卷。明胡纘宗撰。纘宗一生著作甚富,生前即刻有《辛巳集》(或称《可泉辛巳集》)十三卷。辛巳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集中所载诗文止于此年,刊于世宗嘉靖三年(1524)。嘉靖十八年(1537),又刊《鸟鼠山人小集》。此编包括:(1)《正德集》(即《辛巳集》),所收为嘉靖以前作品,皆为诗,仅四卷,而《辛巳集》本为十三卷,可知作了大量的删削。(2)《嘉靖集》,所收多为嘉靖十年以前作品,皆为诗,四卷。(3)《鸟鼠集》,所收多为嘉靖十年至嘉靖十八年作品,凡八卷,诗一卷。此外,尚有嘉靖十八年刻于山东的《拟汉乐府》及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于河南的《拟涯翁拟古乐府》。《鸟鼠山人遗集》当刊于作者去世之后。此编所收也多为晚年家居时作品,但删削很多,狱中诗一首未收。此集版片,一直存在家乡。明嘉靖(1522—1566)后亦屡有印行。如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周盛时为泰安县令时曾补版印行。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曾再次补版印行。但因校勘草率,谬误颇多,并时有空版白页,补刻未备。此次印行缺《近取编》二卷,后附《唐雅》八卷、《雍音》四卷,以及《哀荣录》上、下卷,题曰《鸟鼠山人遗集》。

(王学泰)

【钤山堂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其中诗十六卷。明严嵩撰。严嵩为明中叶权奸,其贪贿误国、陷害忠良为世人所疾,故其诗文不为世人所重。其集最早编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最初为三十二卷,后陆续增刻,有三十五卷本、三十六卷本、四十卷本,以四十卷本为最全。四十卷本刊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此时嵩已年近八十,距其彻底倒台还有六年,此后即有创作,亦不会太多,故可视为其全集。此集按年编次,以其生活各阶段分为《前稿》、《留院》、《使郢》、《留省》、《南谄》、《南宫》诸小集。严氏家乡为江西分宜,附近有钤山,嵩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后,曾回乡筑钤山堂读书十年,故以之名集。其诗另有选本三种传世:(1)《钤山堂诗钞》二卷,有赵文华序,周雨选,孙伟评,刊于嘉靖十九年;(2)《钤山诗选》七卷,为杨慎所选评,约刊于嘉靖三十一年;(3)《振秀集》二卷,选诗一百五十五首,为皇甫孝、顾起纶所选,有杨慎评点,约刊于嘉靖三十四年。《钤山堂集》四十卷本在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还有万松楼刊本。

(王学泰)

【何大复集】 诗文别集。三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六卷。明何景明撰。景明生前即享大名,诗文在其生前即有刊刻,但未见有传世者。景明第一个全集当刻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即其卒后三年,为康

海、张治道等人所编。唐龙序云：“何子既没，张子收其逸稿，与康子于浒西之野，共扬摧之。凡得若干首，洋洋洒洒一唱一叹，而有遗音焉。”康海序亦云：“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为若干卷，首赋、次诗，次文，皆随体区裁，因制列卷，题曰《何仲默集》。……予方定仲默集，时值张子时济过予，所见与予甚同，更与定之。”此集二十六卷，凡辞赋三卷、诗十八卷。卷七、卷八题为《使集》，卷九至卷一三题为《家集》，卷一四至卷二〇题为《京集》，卷二一题为《秦集》，皆因所官或所居地以为名，从中可见其一生诗风转变。此集有两个刻本传世，一为野竹斋本（书口刻有“野竹斋雕”四字）。野竹斋为吴郡沈与文藏书处，知此本刊于吴。另有信阳知州任良幹校本（实际与野竹斋本全同），书口上刻有“义阳书院”字样，书中有王廷相写于嘉靖十年之序。此本所用实即野竹斋版。另有十卷本《何仲默集》，为张治道与康海就何氏全集所选而成。目录后有张治道记云：“何子去关中时，尝以稿付余。余观稿内古诗凡三百五首，律诗凡八百四十七首，暇日与对山康子择而类焉，古诗去七十三首，存二百三十二首；律诗去三百七首，存五百四十首。”又唐龙序后题曰“西安门人费槃、李文华、种雲汉、张三畏校刻”。以上诸集均带有选本性质。嘉靖三十三年，魏良贵过信阳，从景阳子立得所遗诗赋若干卷，立与袁璨编为三十七卷，信阳知州邹察为作跋，袁璨于嘉靖三十四年付梓。神宗万历（1573—1620）间又有三十八卷本出现，为万历五年丁丑（1577）南海陈堂刻本。此本系据袁璨本刊刻，其中增加了《何子》内、外篇二卷，缺序一卷，后增附录一卷，皆为有关景明之传记资料。《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乾隆间景明七世侄孙何辉少等亦据此重新刊刻，流传颇广。（王学泰）

【**太白山人漫稿**】诗别集。八卷，明孙一元撰。一元诗最早刊本当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刊本。此本诗五卷、附录一卷，名曰《太白先生诗》。一元好友郑善夫在序后志曰：“余序太初漫稿成。太初曰：‘子真知我者。’又明年庚辰而太初死，遗命以漫稿必付余。余归吊其庐，抚其孤。携其稿至杭，梓而行之。”此本分体编排，稍后另有《太初集》行世。此集编年汇体，与分体本不同。一元有女无子，不能传其业，平居著作，散佚过半。郑善夫录而传世者不过十之三。神宗万历（1573—1620）间，归安张睿卿重校孙集，并辑散佚，附梓于集中，刊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此本八卷，存诗五百三十首，分体编排，前有一元传记、墓志铭等有关其生平之资料。思宗崇祯（1628—1644）前还有阳湖刻本（未见，可能即冒愈昌刻本）。崇祯间，湖州周伯仁据归安张氏本与

阳湖本刻为《太白山人漫稿》八卷。《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周氏本无附录，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吴兴凌鸣喈又据张氏本重刊，后有附录一卷，并增补许多明万历以后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嘉庆间咏及一元的诗章。（王学泰）

【**少谷全集**】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其中诗六卷。明郑善夫撰。善夫集初刻于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为福州知府汪文盛所刻，其中文十五卷、诗十三卷、附录一卷，刊于福州。当时集中文、诗亦分而行世，故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中收有嘉靖（1522—1566）间刻郑文十五卷、郑诗十三卷。岁久，此版湮漫，神宗万历（1573—1620）初，郑氏外孙林如楚督学东粤时重刻于潮州。万历中，邓汝高惟取其诗，稍加选辑，刻于湖州。其后，又有曹学佺的郑诗选本刊于闽。明末，《少谷全集》已罕见，南京户部主事郑章甫再刻《少谷全集》于金陵，其中各种杂著及赠答、哀挽与墓碑、诗话诸篇，乃邵捷春补刻。至清则有郑氏裔孙的三个刻本传世，即刊于清初的郑念修刻本，刊于高宗乾隆（1736—1795）间的郑科捷刻本及刊于宣宗道光（1821—1850）间的郑炳文刻本。郑集前后凡十刻，各本分卷、详略皆有差异。最常见者为刊于永昌的乾隆本与刊于河南的道光本。后者二十四卷，其中诗六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卷皆为附录，前有《四库全书总目》为郑集所写提要、《明史》与方志之郑善夫传、林钺所撰《郑少谷先生墓碑》以及陈若霖之叙。（王学泰）

【**陆子余集**】诗文别集。明陆燾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三著录《陆子余集》八卷，又《遗集》四卷。《明史·艺文志》著录《贞山集》十二集，盖包括《遗集》四卷。今存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刊本，只有八卷及附录一卷，卷首载吕光洵、周复俊序。周序作于嘉靖三十四年（1564），是集或刊于此年。卷一序记，卷二传、碑铭、墓表，卷三墓志，卷四行状、祭文，卷五奏疏，卷六书简，卷七杂文，卷八诗四十八首。附录一卷为尹台《明给事中贞山先生陆公墓志铭》、黄佐《大明贞山先生给事中陆公墓表》，徐时行《给事中陆公传》、彭年《贞山先生给事中陆公行状》。《四库全书》收录此集时，删去序言及附录。魏学礼《陆子余集序》称陆氏“五言古诗效选，律绝则多效白甫，其声廉，其节哀，其词宏绰而庄郁，信乎善文哉”（《明文海》卷二四八）。此序不载于陆集。

（吴书荫）

【**四溟山人全集**】诗论，诗别集。二十四卷。明谢榛撰。此编前二十卷为诗，后四卷为《诗家直说》（即《四溟诗话》）。谢榛一生以诗为事，著作甚多。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赵康王枕易道人为刊

《四溟旅人稿》四卷,收其诗。康王序中还说,对于谢诗“漫山曹约,尤所爱重,从而刻其五言。予取其全集而刻之”。可知赵刻之前还有曹氏刻本,但只选刻其五言,未及其他,而赵康王所刻,在当时来说,已为榛之全集。嗣后,榛漫游各地,又有《游燕》、《适晋》、《江南》等诗稿。这些或铁而未刻,或刻而未备。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康王曾孙穆王恒易道人命陈养才、张季彦、苏潢等检其全稿,重加辑校,编为此《四溟山人全集》。此编行世十年,发现挂漏颇多,于是赵王复命丁子裕详加讨核,于万历三十二年重刊,即赵王府冰玉堂本。此虽明刻,但传世颇多,海内外许多图书馆皆有收藏。《四库全书》所收为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谢氏家乡临清知州盛以进刊本。此本十卷(本为十二卷,附《诗家直说》二卷,四库馆臣将《诗家直说》删去),盛以进谓得赵邸旧本,重加补订而成。今人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言,盛以进刊本后于此刻者十馀年;而分卷减半。遂疑盛本亦从全集出,只是合并两卷为一卷。然细勘两本,知盛本录诗不及全集三分之二。至今谢榛集录诗最多者仍是赵王府冰玉堂之重刊本《四溟山人全集》。盛氏所谓得“赵邸旧本”云云,可能指赵康王最初为榛所刊之《四溟旅人集》,而非《四溟山人全集》。

(王学泰)

【射阳先生存稿】 别文别集。明吴承恩著。此集四卷,包括诗一卷,文三卷;卷四末附词,卷首有陈文烛、李维桢二序,卷末有吴国荣跋。吴承恩一生诗文颇富,因无子嗣,死后大多亡佚。后由“亲犹表孙、义近高弟”的丘度“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吴国荣跋),而成此集,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刊行。1929年,故宫博物院发现此集之明刻本,于次年铅印出版。1959年,刘修业据铅印本重加辑校,成《吴承恩诗文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青)

【李开先集】 诗文戏曲合集。明李开先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别集类《存目》四,均著录《闲居集》十二卷;《明史·艺文志》别题《中鹿集》十二卷。是集,诸家定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所刻,而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则认为系穆宗隆庆(1567—1571)、神宗万历(1573—1620)间刻本。集中,诗四卷、文八卷。卷首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作者自序,卷末有嘉靖三十六年后序,并有弭子方跋。另有一明刊本仅有自序,而无后序和跋。李开先年四十罢官归里,故弭子方跋云:“右诗四册,中鹿先生还山后作也,尝自称《闲居集》。往往随意成之,信笔书之,不用苦思,有如宿构。多有未及登册而失之者,存者亦无论次。”又云:“初欲并刻其全集,然前作坚不肯出,无奈何,先以此

肇其端云。”今人路工广为搜罗,将李开先所作《闲居集》、《四时行乐诗》、《咏雪诗》、《塞上曲》、传奇《宝剑记》、院本《园林午梦》、《打哑禅》、曲话《词谑》及《中鹿山人拙对》等辑为《李开先集》,并加以点校,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吴书荫)

【沧溟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其中诗十四卷。明李攀龙撰。攀龙最早编成之诗集为《李于鳞古乐府》,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前后编讫,但未刊刻。其最早刊刻的集子为《白雪楼诗集》,初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魏裳所刻,十卷,分体编排。穆宗隆庆四年(1570),汪时元再刊此集,为十二卷,汪氏跋云,他在浙江拜访攀龙,攀龙“以后稿属元续前集校刻”。可知此十二卷本乃受攀龙之托而刊刻。隆庆六年(1672),攀龙去世后第三年,王世贞在《白雪楼诗集》基础上,于各体后分别补入了攀龙的晚年诗作,并增加了散文作品,凡诗十四卷、文十六卷,附录一卷,收录有关李氏生平参考资料,如传记、碑铭、唱和诗歌之类,题作《沧溟集》,前有张佳胤序。初刻于隆庆六年,为徐氏起凤馆所刊,有徐道履后序。神宗万历(1573—1620)间至少有两个翻刻本:一刻本有万历三年(1575)胡来贡序,其附录中所录唱和诗也较多;另一刻本与原刊相同。另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平阳府陈柳吾精刊写本。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景福堂刊《沧溟先生全集》三十卷。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湘雨楼刻《沧溟诗集》十四卷,只收诗,不收文。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渭南严氏刻《明百子诗集》,其中收《沧溟诗集》十四卷。两本皆是取隆庆本《沧溟集》中前十四卷诗刻成,殊少特色。(王学泰)

【欧虞部集】 诗文别集。明欧大任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三著录《虞部集》二十二卷,又《选集》十四卷;《明史·艺文志》著录《虞部集》二十二卷。明刊本未见。今传世者有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清初刊本《欧虞部集》三十四卷,分装为五册,包括《思玄堂集》八卷、《雍馆集》四卷、《浮淮集》七卷、《辋中稿》一卷、《十先生传》一卷、《旅燕稿》四卷、《游梁集》七卷、《南蕲集》一卷、《北辕集》一卷。另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庋藏清刊本《欧虞部集》,十四册二函。计有:《百粤先贤志》四卷,卷首载张鸣凤序及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欧大任自序;《欧虞部文集》二十二卷;《旅燕集》四卷,有穆宗隆庆六年(1572)徐中行序、隆庆三年江都门生徐枢后序;《浮淮集》七卷,有隆庆二年王世贞序;《辋中稿》一卷,有隆庆二年汪道昆序;《广陵十先生传》一卷,有隆庆四年李攀龙序;《浮梁集》七卷,有隆庆六年张九一序、陈玉道跋;《南蕲集》一卷,有神宗万历三年(1575)张鸣凤序;

《北轅集》一卷,有万历五年余日德序;《麀馆集》四卷,有万历六年皇甫汸序、潘豫之跋;《西署集》八卷,有万历十一年刘绍恒序、王世懋序;《秣陵集》八卷,有万历十一年余孟麟序;《诏归集》一卷;《蓬园集》二卷,有万历十八年陈文烛序;卢师孔辑《都下赠言录》一卷。后附其继室李英集四卷。卷前有族曾孙欧必元所撰《家虞部公传》。是集殆为欧大任后人所辑刻。《丛书综录》所著录《欧虞部集》,较北大图书馆藏本多出《思玄堂集》八卷。此集当为欧大任著作收录最全者。(吴书荫)

【鹿城诗集】诗别集。明梁辰鱼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卷一二“集部”著录:“十卷。明万历刻本。”此刻本不详流落何处。今仅存抄本两种:一入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十卷一册”;一为苏州市博物馆所藏,惜已残,只存总目及前三卷。集前有三篇序文,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文徵明《梁伯龙诗序》,穆宗隆庆六年(1572)王世贞《梁伯龙乐府序》,以及神宗万历十年(1582)屠隆《梁伯龙鹿城集序》。从三篇序文的内容和集前总目来考察,《鹿城诗集》应是梁氏生前几部诗作的合集。序文均由武林顾愿书写于“万历癸未中秋”,“万历癸未”即万历十一年(1592),原书殆刊行于这一年的秋季。梁辰鱼时年六十五,这部诗集或许由他本人亲自编订。据集前总目计,共收录各体诗一千零八十五首。北京图书馆另庋藏有一种二十八卷本的抄本《鹿城诗集》,分订为四册。首册扉页上钤有“古吴梁氏”、“晓峰鉴藏”和“金星韬藏书记”等印章。集中凡“玄”字皆不避讳,可见此抄本的年代早于清圣祖玄烨朝。再从“古吴梁氏”印记推之,它或许为梁辰鱼后裔的过录本。后来散出,经清代著名藏书家金檀(字星韬)等人收藏。金氏《文瑞楼书目》著录有此本,云:“四册。传钞未刻本。”与十卷相较,二十八卷的编排体例,视诗作篇什多寡或分为一卷,或析为数卷,不像十卷本每一体诗归为一卷;二十八卷本共收诗一千零九十四首,比十卷本多出九首;二十八卷本的诗题字多而长,且有题中小字注,如五言律《仲夏同周进士胤昌过义兴吴使君石亭山泉旧居二首》,十卷本少“仲夏同周进士胤昌”八字,又如七言律《咏树里灯癸丑四月作》,十卷本未标小字,可能是上版开雕时,为了减少书写和刻工的麻烦,才对诗题做了一些删削。显而易见,二十八卷不是从万历刻本所过录,更接近梁辰鱼原集的面貌,弥足珍贵。(吴书荫)

【太函集】诗文别集。一百二十卷,其中诗十四卷。汪道昆著。是集刊刻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凡一百二十卷。卷首有自序及目录六卷。《四库全书》仅在存目中著录是集。集中有诗十

四卷,文一百零六卷。今有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传世。(尹恭弘)

【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诗文别集。三百八十七卷,其中诗七十五卷。明王世贞撰。世贞生前多次刊刻只辑某一生活阶段的诗文小集。如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曾刊其游阳羨时所写的诗、文一卷,名为《阳羨诸游稿》。穆宗隆庆(1567—1572)间曾刊《戊辰三郡稿》一卷,并附《丙辰奉使三郡稿》一卷。神宗万历(1573—1620)间刊《游太和杂稿》二卷。万历二年(1575)将平生诗文杂著分为四部,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赋三卷、诗五十一卷、文八十四卷、说部三十六卷,凡一百七十四卷,此即《弇州山人四部稿》,于万历五年由世经堂刊刻出版,后又补说部《燕语》、《野史家乘》各三卷,凡一百八十卷。此编包括了万历以前世贞的绝大部分诗文杂著。世贞致仕后,将万历三年以后的诗文整理为《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实际上只有赋、诗、文三部),计赋一卷、诗二十四卷、文一百八十二卷,将此稿付予幼子王士骏,士骏死后,由其子刻讫,时在万历末年,亦为世经堂本。世贞诗文选本,于明、清两代亦屡有刊刻。如:《凤洲笔记》二十四卷,名为“笔记”,实是诗、文,有隆庆三年(1569)黄美中活字印本。明乔时敏编有《王元美先生文选》二十六卷,有万历间刻本。又有明沈一贯编选《弇州稿选》十六卷,有明刻本。又有李衷纯所辑《王弇州先生崇论》七卷,有明熹宗天启(1621—1627)间刻本。至清,有张汝瑚编选的《王弇州集》二十卷,此本皆选文,有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郢雪林刻本。另有《弇州山人诗集》五十二卷,为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渭南严氏所刊。此本只是据《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部五十一卷及赋部中的风雅一卷合编而成,不包括《续稿》中的二十四卷诗歌。(王学泰)

【王百穀全集】诗文别集。十八卷,诗文混编。明王穉登撰。穉登诗文集皆是随撰随刊,未有全集之刻。钱谦益言:“伯穀少子留,字亦房,有隼才,将刻其全集,会病卒不果。曹能始(学佺)携归闽中,未知已刊行否。”(《列朝诗集小传》)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曹学佺为刻《南有堂诗集》十卷,并序云“顷其子弗莠携全集来,余既得而选之,又得合之。选者其取精多也,合者其用物弘也。”“选者”当指将其收入《石仓明诗选》者,“合者”指此书。陈衍后序云:“先生向已有集行世,此其未刻之稿也。”其已刻稿,当指在穉登卒后不久,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史北斗汇集,由金陵书贾叶应祖所刊之《王百穀集》二十一种,四十二卷。史序云:“王先生故有《尊生斋集》十六种,已梓于家塾矣;晚年又有《越吟》、《苦

言》、《法音》、《生志》诸帙，未入集。其中剞劂参差，弗善也。金陵叶氏乃新其版，如一。”此二十一种包括许多小说、笔记、小品，如《客越志》、《吴社编》、《雨航记》、《国朝丹青志》、《虎苑》、《广长庵主生圻志》、《谋野集》等。此十八卷本不知何人汇集，其中所收俱为诗文小集，包括：(1)《明月篇》二卷。作者之自序写于万历五年丁丑(1577)所收多为万历(1573—1620)初年，作客越中时作，集中所收以描写西湖胜景之诗作为多。(2)《燕市集》二卷，有朱察卿序及稗登自序，写于作者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北上求官时，以写北京风景者为多。(3)《竹箭编》二卷，有屠隆万历八庚辰(1580)所写之序，及作者自序，所收为其第二次游越之作。(4)《晋陵集》二卷，晋陵指武进，即常州，作者自常州迁吴，以此名集表示不忘根本之意。所收多为早年作品，其中有不少关注现实之作。前有陈崇庆写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之序。(5)《青雀集》二卷，写于嘉靖(1522—1566)末进京求官不利，取道运河，乘青雀(船)回南途中，多反映不遇知音的愤懑之情。前有王世懋、毛文烨二序。(6)《金阊集》四卷。写于由北京南归之后，前有沈尧俞、黄姬水二序。(7)《荆溪集》二卷，为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前作者游历阳羨、荆溪一带名山胜水时所作。前有王世懋序。(8)《延令纂》二卷，为作者晚年游延令时所作，有张京元、何南金、陈继畴三序。此编亦为万历间刻本。此或为四十二卷的选辑本。(王学泰)

【由拳集】 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十卷。明屠隆撰。《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别集类《存目》六均著录，二十三卷。今存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冯开之秀水刊本。集中卷一为赋，卷二至卷一一为古、今体诗，卷一二至卷二三为杂文。卷首有徐益孙序，万历八年沈明臣序，卷末有青浦门人彭汝让后序。此集行世后，即有苏宁书坊翻刻。另有万历间(1573—1620)克勤斋余碧泉刊本，卷帙与原刻本同。沈明臣序谓屠隆“令青浦所著文章诗赋益鸿钜，益不能自秘，而冯太史开之谓前刻稍阙，乃取而与沈太史君典删定之，增新者十之六，更名曰《由拳集》。盖由拳故青浦地，人传泖水澄隐，隐下见城郭状，以故是集得专名焉。而开之更取付剞劂”。1977年9月，台湾伟文图书公司将《由拳集》收入《明代论著丛刊》第三辑影印出版。(吴书荫)

【栖真馆集】 诗文别集。明屠隆撰。今存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刻本，一为三十一卷，另一为三十卷。两本卷前均有邹迪光序，三十一卷之序署“万历十八年(1590)”，由吕胤基所选；三十卷则署“万历二十六年”。前者当为初刻，后者殆为翻刻本，诗九

卷，文二十一卷，《明史·艺文志》著录《栖真馆集》三十卷，即为是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云：“按是集成于《由拳集》以后，《白榆集》以前，盖在罢官礼部以后也。《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本传云：‘迁礼部主事，西宁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欢。刑部主事俞显卿者，险人也，尝为隆所诋，心恨之，讪隆与世恩淫纵，词连礼部尚书陈经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显卿挟仇诬陷状，所司乃两黜之，而停世恩俸半岁。’卷前邹迪光序绵绵数千言，极称隆之孝谨忠信，而用才贾谤，即辩此事也。”(吴书荫)

【白榆集】 诗文别集。明屠隆撰。《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别集类《存目》六著录，二十卷，今有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龚尧惠刊本，只存文而缺诗。龚刻另有二十八卷本，题《白榆集二十卷诗八卷》，卷首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程涓、丁应泰二序。又有万历二十二年程元方刊本，卷帙与前者同，但早于龚尧惠本六年，或系初刻，较为罕见。1977年9月，台湾伟文图书公司将《白榆集》收入《明代论著丛刊》第三辑影印出版。(吴书荫)

【大泌山房集】 诗文别集。李维桢著。是集刊刻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凡一百三十四卷，目录二卷，其中诗六卷。杂文一百二十八卷。今存有此刻本。集前有王世贞序、张惟任序及自序。《四库全书》仅在存目中著录是集。(尹恭弘)

【鹿裘石室集】 诗文别集。六十五卷，其中诗二十五卷。明梅鼎祚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六著录《石室鹿裘全集》六十五卷，当是此集，书名殆手民误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别集类存目七著录《梅禹金全集》仅二十卷，不知何据。《鹿裘石室集》别称《梅禹金先生全集》，卷首有明熹宗天启三年癸亥(1623)李维桢、汤宾尹、高维岳及次年吴伯与四篇序。总目后有“天启癸亥岁春玄白堂雕”。据此，是集刊于天启三年，吴伯与序系开雕后第二年补入。李维桢等四序后，还有刘绍恒、朱震孟、梅季豹、王寅、沈懋学、田芝衡、吴守淮、欧大任、周光镐等人为鼎祚《与玄草》、《游白岳诗》、《黄白纪游》、《予宁草》、《庚辛草》、《南游集》等所撰的序、引和题词十二篇。此全集收诗二十五卷、文二十五卷、尺牍十五卷。据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还有《梅禹金诗草》二十卷。今存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汝南梅氏鹿裘石室刊本。(吴书荫)

【汤显祖诗文集】 诗文别集。明汤显祖撰。汤显祖最早的诗集为《红泉逸草》，一册，不分卷，收五、七言诗七十五首，系作者十二岁至二十五岁时所作，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临川令李大晋刊。其后有《问

棘邮草》之刻,今存明万历(1573—1620)间金谿谢氏所刊十卷本和山阴张汝霖校刊的二卷本,后者收赋三首、五、七言诗一百四十二首,比十卷本多出赞七首,并有徐渭批释。还有《雍藻》,或为显祖游南太学时所作诗文集,今不见存本。万历三十四年,周如涣刊《临川汤海若玉茗堂文集》,版心题《玉茗堂集选》,南京文斐堂梓。共十六卷,卷一、卷二收赋十七篇,卷一六为《刘氏类山序》,其余各卷为各体诗。此集为帅机等所编选,卷首有帅机、屠隆二序。显祖生前所行各集以此为最全。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吴兴韩敬辑刻有《玉茗堂全集》,或题《玉茗堂集》、《汤若士全集》,只收三十岁后的诗文,计有文十六卷、诗十八卷、赋六卷、尺牍六卷,共四十六卷。显祖诗以此集搜罗最富,流传独盛。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汤显祖外孙辈阮岷等又据此以重梓。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吴郡沈际飞编刊《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三十卷,除收赋四卷、诗十三卷、文七卷、尺牍六卷外,还有戏曲《牡丹亭》、《紫钗记》、《邯郸梦》、《南柯梦》各二卷。此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四著录玉茗堂诗十八卷又文十卷又尺牍八卷;《明史·艺文志》著录《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诗》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著录《玉茗堂集》二十九卷,凡诗十三卷、文十卷、尺牍六卷;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著录《玉茗堂全集》四十卷,计文十六卷、尺牍六卷、诗十八卷。明天启间刻本,今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上各本均未完备,今人徐朔方按潘次耕编顾亭林集例,诗编年,文分体,对汤显祖现存诗、文重新编次,并加以笺校,题为《汤显祖诗文集》。共五十卷,一至二卷为《红泉逸草》,三至五卷为《问棘邮草》,六至四十九卷为《玉茗堂集》,第五十卷为补遗。共收诗、文、赋二千二百多首。此书笺校主要注出各篇创作年代或背景,校正各本文字。书末附有研究资料,如传记、序跋、评论、年表等。此集和钱南扬编校的戏曲集,合为《汤显祖集》,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后徐氏对其笺校诗文集加以增订修正,从《汤显祖集》中抽出,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单独刊行。徐朔方还将《汤义仍先生集》(为诗、赋、文选),《汤海若先生制艺》(专收八股文)合编为《汤显祖诗文集外编》,待刊。

(吴书荫)

【陶庵遗稿】 诗文别集。三卷,诗二卷。明归子慕撰。子慕逝世前将其诗、文委托其友人顾绍芾,并云:“皆在兄审定吾文,愿极意汰之,无有所吝。”顾氏遂将其“诗文精择而审录之,定为三卷”,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行,后与《陶庵札记》二卷及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刊行的《陶庵续稿》一卷(皆文)

合而行之。常熟归氏仍存有归集抄本,归氏族裔孙曾祁于民国二年(1913)据抄本排印出版,将《遗集》、《札记》、《续稿》合订一册,题曰《归陶庵集》,前有沈应奎之序,以及戴璚、高攀龙、张大复等人所作归氏三传,后有顾绍芾之后叙。《续稿》前有顾绍芾所撰小引,后有门人陈参所撰《陶庵先生行略》及许令典之跋,最后附有校记,由“归氏寿与读书室”印行。此集并未收录子慕的全部传世作品,录诗仅一百二十六首,如《暮春》(为欢不卜日)即不见于《遗稿》。

(王学泰)

【负苞堂集】 诗文别集。九卷,其中诗四卷。明臧懋循撰。懋循为明中叶以后著名俗文学与诗歌编纂家及研究家,而其生平事迹不彰,从其诗文中可以考证其生平仕履。此集编于懋循逝世之次年(1621),为其子臧尔炳所编。其跋语云:“孤尝于过庭时,间及风雅。府君以自选杂体诗百五十余篇示孤,孤请益,府君不许,曰:‘若不知杜必简氏名之籍籍而诗之寥寥乎?’孤清梓,府君复不许,曰:‘若其待之。’亡何,府君见背,哀毁荒迷中,笔研都废。独不能不为先人不朽计。因携其稿若干册,谒茅先生孝若,谋可否。先生曰:‘子姑承遗命,嗣为续集可也。’孤乃并府君文合付剞劂,文尤散逸不可稽。今亦第刻其存而自选者。”可知当时所刻诗集,仅为选本,远非其全部。此集共录诗一百七十八首,按五、七言、古、近体分体编排。《四库全书》将此集列入存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程孟阳先生集】 诗文别集。二十五卷,其中诗二十一卷。明程嘉燧撰。程氏以诗为业,作品很多,平时亦注重作品之编辑。其最早刊刻者为明熹宗天启元年辛酉(1621)在山西长治所刊之《雪浪诗》一卷、《吴装诗》一卷、《松寥诗》一卷。《雪浪诗》乃自世宗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以来作品,《松寥诗》乃自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以来作品。此三集写刻古雅,乃嘉燧亲自手书上版者。思宗崇祯(1628—1644)年间又刊《松圆浪淘集》(或名《松圆阁集》)十八卷,其中包括《涉江集》、《春盘集》、《山楼集》、《蓬户集》、《空斋集》、《咏古集》、《谿堂集》、《移居集》、《雪浪集》、《遇琴集》、《春湖集》、《荆云集》、《春帆集》、《松寥集》、《雪江集》、《吴装集》、《易水集》、《尝甘集》等十八个小集,始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终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录诗不足千首。此编所录较最初所刊三集,内容上有所增删,字句有所改定。崇祯二年以后与钱谦益偕隐,所作诗编入《耦耕堂集》,凡五卷,其中诗三卷。清嘉定金氏将《松圆浪淘集》与《耦耕堂集》合为此编,名《程孟阳先生集》,

有清初刻本。

(王学泰)

【袁中郎全集】 诗文别集。明袁宏道撰。在袁宏道生前身后，其诗文刻本颇多。其生前，每一生活阶段皆自编诗文小集，这些小集多传于世。第一个小集为《金屑集》。此集所收诗、文，曾受到李贽赞美，有“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之句（见袁宏道行状），但已失传。传世最早的小集为《敝篋集》二卷，“乃作诸生、孝廉及初登第时作”（见行状）。明神宗万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595—1597）在吴县任县令时所作诗、文，编为《锦帆集》四卷。辞去吴县县令前后作品，编为《解脱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万历二十五年在扬州仪征所作诗、文，编为《广陵集》一卷。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在仪征、北京、河南开封所作诗、文，编为《瓶花斋集》十卷。万历二十八年归公安后至三十四年再度北上所作诗、文，编为《潇碧堂集》二十卷。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在北京为官时所撰诗、文，编为《破研斋集》三卷。万历三十七年典试陕西所作诗、文，编为《华嵩游草》二卷。此后至逝世前所撰诗、文，编为《未刻遗稿》二卷。上述小集除最后一种外在宏道生前皆有家刻本，但传世者稀少。传世最早的刊本为《袁中郎集五种》，包括《敝篋》、《锦帆》（附《去吴七牍》）、《解脱》、《瓶花斋》、《潇碧堂》五种。刊于万历三十六至三十八年，为袁叔度（无涯）书种堂所刻。稍后有《袁中郎十集》之刻，内有《狂言》、《狂言别集》等伪书，不足珍。万历四十五年，有《梨雲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之刻。此本打乱原编次序，将诗文分体编排。此编最初由何伟然编定、金陵大业堂刊刻。后世多次据此本翻刻，如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袁崧圃刻本、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袁照校刊辑补本、日本元禄九年（1696）京都洛阳书林刊本等。万历四十七年，袁中道编刻了《袁中郎先生全集》此编二十三卷，如中道在序中所云：“先是家有刻不精；吴刻（指《袁中郎集五种》）精而不备。近时刻者愈多，杂以《狂言》等贗书，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栴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语，按年分体，都为一集。”此本与《袁中郎集五种》比较接近，但有些删削改动。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陆之选用《袁中郎集五种》、《袁中郎十集》、《梨雲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及遗稿本互相补充，分类编次，刻为《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其《缘起》云：“吴郡六集（指《袁中郎集五种》）、嘉禾十集，各为绣梓，不相统一，购者憾焉。至金陵袁雲馆哀集类编，便于采诵，然先生遗稿八卷，未见梓行，今悉补入，以供世赏。时崇祯二年，岁次己巳，刻于武林之佩兰居。”后《四库全书》存目著录者即此本。实际此本甚粗疏，漏刻很多。清代袁集被列入禁焚

书目，道光（1821—1850）后才有翻刻。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刘大杰校勘重编的《袁中郎全集》。此本打破原书次序，按体重编，以致失原书之貌。此外，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央书店亦印《袁中郎全集》，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编纂方法类似，分装六册，包括袁中郎“尺牍”、“文抄”、“游记”、“随笔”各一本，“诗集”上、下两本，凡六册，题为“襟霞阁普及本”。

(王学泰)

【九籥集】 诗文别集。四十七卷。明宋懋澄撰。宋集乃作者生前身后数度刊刻而成，故传至今日最全之四十七卷本乃由《九籥前集》十一卷、《九籥前集诗》八卷、《九籥集文》十卷、《九籥集诗》四卷、《九籥续集》十卷、《九籥中集》一卷、《九籥后集》二卷、《瞻途记闻》一卷等八集组成，陆续刊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于万历末刊讫。清初吴伟业又编选刊刻《九籥别集》四卷，所收作品皆从懋澄诸集中选录。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因《九籥集》中《东征纪略》以下，触犯清统治者祖先，故被禁焚，以后再未刊刻，传世极少。四十七卷本仅在浙江图书馆藏有一编，鲜有知者，故多数学者认为已佚。今人王利器藏有《九籥集》十卷（即万历刻本之《九籥集文》）和《九籥别集》四卷之抄本。《别集》目录后题曰：“《全集》卷帙甚富，毁于兵火，今先梓《别集》行世，《全集》嗣出。”此本又题“吴伟业选”，可知此集乃据清初刻本而钞。《别集》卷三为“稗编”，与《九籥集》卷一〇全同。王氏将两集合为一编，《别集》卷三只存其目，另辑《九籥诗集》一卷，录诗八十六首，采之于《秋士选诗》、《皇明诗选》、《松风选韵》、《帝京景物略》、《葛道人传》等书，后附佚文三篇与陈子龙《宋幼清先生传》、吴伟业《宋幼清墓志铭》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此据宋懋澄文《刘东山》改写）等。此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排印出版。题目《九籥集》。所以名“九籥”者，作者自记云：“鲍参军《升天行》云‘五图发金记，九籥隐丹经’。余好养生家言，故以名篇。”（见《九籥集》目录后“题记”）

(王学泰)

【珂雪斋集】 诗文别集。三十八卷，附录二卷，其中诗八卷。明袁中道撰。袁中道诗、文，最早刊刻者乃是宏道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吴县为其所刻之诗集。中道生前自刊诗文集多次，至今仍可见者有《珂雪斋近集》十卷、《珂雪斋前集》二十四卷、《珂雪集选》二十四卷、《珂雪斋外集·游居柿录》十三卷等四种。《近集》刊于万历四十五年，集中所收乃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所作诗、文，附其子袁祈年诗一卷。《前集》实为“全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收录诗、文亦到此年。此编是收录中道作

品最多的一种。《集选》二十四卷,刻于熹宗天启二年(1622)。此编在《前集》的基础上有所增删,所增皆为万历四十六年以后之作品、删去《前集》中收录的一些诗、文,故曰“选”。《集选》与《前集》差别不大,诗、文编排次序及格局几全相同。自此编之出,《近集》与《前集》流传遂少。此集题为邹得鲁校。《外集》刻于天启四年(1624),即中道之《游居柿录》(亦称“日记”)。今人钱伯诚汇合四种版本,而以《前集》为底本,合编为《珂雪斋集》。《近集》佚出诗一首、文十五篇,《集选》佚出诗五十八首、文六十四篇,全部补录,编入相应卷数。《近集》、《集选》仅作校本,异文大多未出校记。《外集》十三卷排在诗、文之后,后附其子袁祈年诗一卷、《柞林纪谭》一卷。中道有斋名珂雪,取《观经》“观如来白毫相如珂雪”之意,以之名集。此编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民国年间,中央书店所编《珂雪斋近集》(后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既非《近集》,亦非《前集》,更非《集选》,乃一残本的拼合本,诗文遗漏极多,不足珍重。

(王学泰)

【**隐秀轩集**】 诗文别集。四十二卷,其中诗十四卷。明钟惺撰。钟惺早年诗作曾编为《玄对斋集》,由李维桢作序。此集录诗百馀首,后编全集时多删去。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与谭元春编有《西陵草》,集虽不传,但集中之诗多留存于今。万历四十四年,钟惺从北京到南京,所作诗文编为《舟岳集》。此集诗文亦多传于今,而此编已佚。上述皆其某一生活阶段之小集,而《隐秀轩集》为其平生诗文之总编,最初刻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由林古度刊于南京,但此本已佚。传至现在的最早的《隐秀轩集》为沈春泽于熹宗天启三年癸亥(1623)刻于南京之三十三卷本。沈春泽在所撰序中云:“钟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尽出于集之外也。钟先生既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传矣。夫不可传而求为可传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此编为三十三集,一集一卷,分体编排,先诗后文,十集诗,二十三集文。此版片后归近圣居,思宗崇祯(1628—1644)间曾经再度印行。此编所收诗、文止于天启二年壬戌(1622)。钟惺卒于三年后的天启五年;此三年诗文收入《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中。此集由钟惺五弟钟快手录、徐波刊刻。另有《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十六卷,其中诗五卷。是集辑刻于崇祯九年(1636),合沈春泽刻本及许多所藏遗集编纂而成,故称“合集”。此本编于作者身后,但所据二本皆非全帙,故当全而不全。今人李先耕、崔重庆以沈春泽所刊《隐秀轩集》及明刻《钟伯敬先生遗稿》为底本,校以《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

集》,编为四十二卷,仍旧分体编排,先列原《隐秀轩集》中作品,依次为《遗稿》、《合集》之诗、文。又从明、清所编诗文中录得钟惺轶文轶诗十篇,各附于该体诗文之后,并加以标点、校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王季重十种**】 诗文别集。不分卷。明王季重撰。王集在作者生前即刊刻多次。最早有八卷本《王季重集》刊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间。包括《避园拟存》、《杂文序》、《时文序》、《历游记》、《律陶》、《游庐山记》、《弈律》、《游唤》八种。其中《避园拟存》、《律陶》为诗。思宗崇祯(1628—1644)间,又刻有十五卷本《王季重集》,除上述八种外,还增加《墓志铭》、《传》、《杂记》、《庐游杂咏》、《尔尔集》、《读书佳山水》六种。其中《庐游杂咏》、《尔尔集》为诗集。十五卷本中的其余八种虽与八卷本相同,但除了《律陶》、《游庐山记》、《弈律》、《游唤》外,其他四种页数都有所增加,显然其中增入了万历之后撰写的属于此类体裁之作品。《王季重十种》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编,列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为了突显其文学成就,此编在十五卷本基础上,删去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四种,即《时文序》、《墓志铭》、《传》、《读书佳山水》,保留了杂文、小品、游记与诗歌。其中,《尔尔集》约作于崇祯年间游宦之中;《避园拟存》作于万历末及熹宗天启(1621—1627)间应考与游宦途中;《律陶》为其早年学习陶潜之作,凡三十四首,皆为五律;《庐游杂咏》为作者从家乡绍兴乘船往游庐山之作。其晚年著作,因蒐辑不时已散佚不存。今人任远以三十年代排印的《王季重十种》为底本,校以八卷本、十三卷本、十五卷本的《王季重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石仓诗集**】 诗别集。明曹学佺撰。曹学佺生前好刻书,自撰诗文亦是随得随刊,所至各有集,集多刻频,传世者难计,故所谓《石仓诗文集》一百卷者、十二卷者、八卷者,乃至不分卷而装订为十二册者,皆书贾随意采集曹氏所刊诸小集之拼合本,非学佺自刊之合集。曹殉难后,无人董理其著作,至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方有其曾孙曹岱华为刊此诗集。书前有南京吏部右侍郎同郡叶向高《曹大理集序》,乾隆十九年奉天府提督学政同里陈治滋《重刻曹石仓先生诗集序》。傅增湘《藏园藏书经眼录》卷一六“集部”五著录全集三十三卷,卷目为:(一)金陵初稿,(二)金陵集,(三)挂剑篇,(四)海色篇,(五)游房山稿,(六)藤山香梅诗,(七)续游藤山,(八)玉华篇,(九)荅上篇,(十)钱塘看春诗,(十一)游太湖诗,(十二)芝社集,(十三)天柱篇,(十四)春别篇,(十五)豫章稿,(十六)江上篇,(十七)潞河集,(十八)武林稿,

(十九)巴草,(二十)蜀草,(二十一)雪桂轩草,(二十二)湘西纪行,(二十三)浮山堂,(二十四)福庐游稿,(二十五)听泉阁,(二十六)夜光堂,(二十七)森轩诗稿,(二十八)桂林诗稿,(二十九)桂林集,(三十)更生篇,(三十一)赐环篇,(三十二)西峰集,(三十三)西峰四六集。是集所收诗均按年编次,最早之《金陵初稿》为明神宗万历三年乙亥(1575)至二十八年庚子(1600)所撰诗,最后之《西峰六四集》乃思宗崇祯十年丁丑(1637)时诗,《三山耆社诗敬述》纪年为崇祯丁丑八月之十三日,有助于考证诗人之行实。是集多为当时名家臧晋叔、汤宾尹、吴梦旸、茅维、徐爌、林古度、吴北等校阅,为研究学佗交游提供翔实的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木铎藏书中,另有《石仓三稿》十册二十五卷,除收录诗外,还有序跋、游记、碑铭等文录。(吴书荫)

【谭友夏合集】 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十三卷。明谭元春撰。元春以诗为事,平时所撰诗稿,随时刊刻。此《合集》第二十二卷为《岳归堂已刻诗选·诸稿自序》,从中可见其已刊之集应包括《题虎井诗》、《题西陵草》(与钟惺合撰)、《退寻集》、《客心草》、《游首集》、《仙室草》、《湖霜草》、《秋冬之际草》、《拭桐草》、《简远堂集》、《秋寻集》等。这些小集中作品多为游览或在外作客时所作,亦多为友朋所刊刻;其家刻仅《简远堂集》一种。后友人朱之臣在元春“读书处,尽发于藏,得诸集前后诗刻之,题以‘寒河’”(《寒河诗序》)。那些小集,连同《寒河集》皆未传世。谭集传至今日最早之刻本,当为明思宗崇祯六年癸酉(1633)所刻之《谭友夏合集》。此集为其弟子吴人张泽刊刻,有张泽、徐汧、朱隗、潘一桂、张溥、秦德滋等人的点评。最初只包括《岳归堂新诗》五卷(分体编排)与《鹄湾文草》三卷(卷六至卷八),另有《鹄湾未刻文》,未分卷,附于后。约在元春去世后,将《鹄湾文草》及《鹄湾未刻文》,编为九卷;又将其诸小集所刻之诗选编为《岳归堂已刻诗选》八卷,与前编合在一起,后附张泽所撰《旨斋诗草》一卷,仍称《谭友夏合集》。清世祖顺治(1644—1661)或圣祖康熙(1662—1722)初,其家乡又刊《谭元春诗集》,十一卷,只录其诗。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又按明刊本校点排印了《谭友夏合集》(删去了《旨斋诗草》),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校点者阿英。(王学泰)

【莲鬢阁集】 诗文别集。二十六卷,其中诗九卷。明黎遂球撰。遂球曾撰有《迦陵集》、《明月集》。前者尚有抄本传世;此集不分卷,前有张萱题词及谢长文写于明思宗崇祯五年壬申(1632)之序,题为谢长文订,首为赋、颂,继录诗二百四十馀首,抄于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十年丁丑(1437)遂球之友徐世溥

代为编辑、删订其诗作,在所撰之序中云:“黎子美周《迦陵集》诗二百四十二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1436)长安往还道中诗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删订之,为诗七卷,赋二十六篇,总名之曰《莲鬢阁集》。”但此本未见刊刻流传。遂球殉国后,有人将徐世溥所编诗集增以崇祯十年后所作诗,并与其文合为一编,成为此集,先以抄本流传。后有刊刻,未见。清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间,南海伍崇曜编岭南作者遗集,再行刊刻,其跋云:“黎集,《明志》作十卷,阮《通志》因之,原书实二十六卷。梁子春藏本,借抄重梓。”现常见者有《粤十三家集》本,收入《粤雅堂丛书》。(王学泰)

【咏怀堂诗集】 诗别集。十卷。明阮大铖撰。此编并非阮大铖诗作之全集,而是几个传世小集的拼合本。包括:(1)《正集》四卷,名为《咏怀堂诗》,前有叶灿、邝露及作者所写之序三篇,皆写于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1635),是知此集编于大铖因家乡兵乱逃至南京之时,所收作品乃其被定为阉党四等,应判徒刑,出资输为民、回乡闲居时所作。主要是崇祯七年甲戌及八年乙亥两年作品,分体编排。(2)《外集》二卷,前有作者自叙,为其早年至编此集时所作诗篇之杂编,集中标明写作年代者,最早有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最晚有崇祯六年癸酉(1633)。此集编于崇祯八年。(3)《咏怀堂丙子诗》一卷,前有作者自序及马士英叙。其自序云:“自崇祯乙亥后,系曰‘咏怀堂某年诗’。”丙子为崇祯九年,是阮氏最初定居南京时作品。(4)《咏怀堂戊寅诗》一卷,戊寅为崇祯十年。(5)《咏怀堂辛巳诗》二卷,辛巳为崇祯十四年。此五集乃近人柳诒徵编印,并在所撰跋中云:“此书都十卷,并据阮氏自刊本校印,原刻《咏怀堂诗集》四卷、《外集》二卷,《丙子诗》一卷、《戊寅诗》一卷,旧藏丁氏八千卷楼,今在盩山图书馆。《辛巳诗》二卷,则余游书肆得之,兹为合印,以备谈艺嗜奇者之求。至弘光时诗,不知尚有刊本否也。”此编于1928年由中央大学图书馆印行,后又于次年印《咏怀诗补遗》一卷。柳跋云:“咏怀堂诗十卷既印行。丁君初我自海虞贻书,谓尚有《丙子诗》下卷传抄本,亟丐丁君录示。多漫游江淮,模山范水之作,风调故不二也。”阮大铖诗清新灵秀,多清辞丽句。因其人格卑下,历来极少选其诗者,更无刻其集者。朱彝尊《明诗综》不载大铖姓字,附论于李忠毅诗前曰,大铖“附马士英得志,导之重翻三案,诛钜正人,金壬之反覆,真同鬼蜮,虽有《咏怀堂诗》,吾不屑录之也已”。这是阮诗集罕见之原因。(王学泰)

【瞿式耜集】 诗文别集。四卷,其中诗一卷。明瞿式耜撰。式耜生前所著诗、文极多,殉难后,著作

多散佚。其在桂林狱中与张同敞唱和之作所编《浩气吟》，曾在常熟由瞿氏东日堂刊刻。此外，式耜孙瞿昌文又将其所遗诗文搜辑整理，编纂成集，因常熟与桂林皆有虞山，故名《虞山集》。后因清统治日益严酷，此《虞山集》未能刊刻，直至文字狱缓解后，于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才由常熟许氏校梓刊行，更名《瞿忠宣公集》，“忠宣”乃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所赐之谥。1980年由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与苏州地方史研究所编校整理出《瞿式耜集》。此编以瞿昌文编《虞山集》、《浩气吟》为基础，参照《瞿忠宣公集》、民国初年国学保存会影印本《明瞿忠宣公手札及蜡丸书》，以及桂林文管会编印的《桂林石刻》中有关瞿氏部分，进行了校勘补充，后附《明史》本传与今人瞿果行编写的《瞿式耜年表》。此为瞿集中最完善之本。卷一为奏疏，卷二为诗，卷三为书牋，卷四为杂文。所收诗包括：《耕石斋诗》，始于明思宗崇祯元年戊辰（1628），终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桂林诗》始于福王弘光元年乙酉（1645），终于桂王永历四年庚寅（1650）八月，多写于奔走国事途中及桂林；《浩气吟》写于庚寅十一月至闰十一月十七日殉难之日。附以张同敞之诗。《补遗》录佚诗四首。《瞿式耜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之排印本。

（王学泰）

【疑雨集】诗别集。二卷。明王彦泓撰。彦泓尝自称，作诗无意传世。其作品之流传，全赖好友于儒颖（字弢仲或韬仲）之留抄。集中有诗记此事，题作《余旧诗悉已遗忘，而韬仲皆为存录，展阅一过，觉无端往事交集胸怀，怅然久之，因呈四韵》。诗的前四句云：“不堪重对旧诗篇，潦倒欢场二十年。多为微词猜宋玉，敢持才语傲非烟。”诗中写明了不愿作品传世之原因。彦泓去世后，于儒颖对此集加以整理。全编按年编排，始自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终于思宗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其间崇祯五年壬申、十年丁丑、十一年戊寅、十二年己卯四年无诗。于壬午岁下，于氏注明彦泓去世之年月日。彦泓身后，遗孤尚幼，诗几散佚，赖有于氏抄本在江南一带流传。严绳孙序云：“今《疑雨集》之名藉甚，江左少年传写，家藏一帙。”至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无锡侯文灿选刻历代词籍，有客向他推荐《疑雨集》，侯氏遂刊刻传世，并为作序。此集遂有刻本。清末丁国钧家中有于儒颖手录本，他认为此本“足正坊刻之误者甚夥”，便以此为底本，校以侯氏等刻本，并对诗中词语出处，加以笺注，全编分为四卷，名《疑雨集注》。此本流传颇广，坊间多次刊印。常见者有1924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王学泰）

【楼山堂集】诗文别集。二十七卷，其中诗赋八

卷。明吴应箕撰。吴氏生前即享大名，其诗文合集于明末即有刊刻。其集二十五卷，名《楼山堂集》，其中诗五卷，刻于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收录诗文亦止于此年。应箕抗清牺牲后，其弟吴非（亦名筵）在二十五卷本基础上再加以搜集，成为此编，刻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集中所录诗、文，不少有作者自注，注明写作时间、地点及背景，亦有吴非注者，下署“非注”。这些注文多涉及当时时事。集中，崇祯十五年壬午、十六年癸未两年诗多散佚，第二十七卷仅录壬午诗十二首，诗下吴非注云：“钤版将竣，始求得此册，补编于后。”此编后，附有刘城所作吴应箕传及南海伍崇曜跋。应箕诗、文，因多指斥清统治字句，故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被列入禁焚书目。清中叶以后，方有印本出现，有《粤雅堂丛书》本。清文宗咸丰（1851—1861）间，有木活字本；清末帝宣统二年庚戌（1910），有上海活字印本。

（王学泰）

【洵美堂诗集】诗别集。九卷。明杨文骢撰。文骢早年所著诗、文，连同侍父亲游天台、雁荡所著诸游记皆收入《山水迢》一书中。书不分卷，刊于明思宗崇祯七年甲戌（1634）。此后至崇祯十五年壬午间，文骢曾任华亭教谕与青田县令、永嘉县令，时近八年，于永嘉县令任上刻《洵美堂诗集》。此编按体编排，五古一卷，七古一卷，五律一卷，七律二卷，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一卷（多为与邢昉之联句），五绝一卷，七绝一卷，杂体一卷（多为题画四言诗）。此集刊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刊刻极精，前有吕阳、陈立政、邢昉、史玄四序，多为复社社友。近人陈夔龙于1934年委托卢前在南京仿崇祯印本重刊此集，“字体篇幅一仍原本之旧，间有讹字，亦引旧典校正”（见陈序），刻印纸墨均佳。

（王学泰）

【峤雅】诗文别集。上、下两卷。明邝露撰。邝集初刊于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分体编辑，从乐府始，依次为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独缺五、七言绝句，可见并非完本。集前有阮大铖序，正文乃邝露亲自手书开雕，极精美。入清后，有雪海堂精刊本。此编补入许多作者晚期作品。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年，邝氏族入邝天辅重镌此书，误将部分书页倒置，成为有严重缺陷之本。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邝氏裔孙邝廷瑶重刊此编。并加笺注，如张维屏所言，“题有根据，必考其由来；诗有运用，必为征所自出”（张序），十分详尽，并改正了邝天辅本的错谬，分为十二卷，前十一卷为诗，第十二卷为文。鉴于明末清初粤中有两部《峤雅》，一为邝氏诗文集，一为区怀瑞所辑粤人诗，为避免相犯，廷瑶将此编更名为《雪海堂集》，刊行时名为《海雪集笺》，绮

错堂藏板,有咸丰(1851—1861)间刻本。

(王学泰)

【**陶庵全集**】 诗文别集。二十二卷,其中诗九卷。明黄淳耀撰。淳耀平生写作“不立专稿,所为诗文,多散见于每岁日记中”。明福王弘光元年乙酉(1645)四月曾自“选古文一卷、诗一卷,大抵起自丙子(1636)迄乙酉,十年所得,其删去者,十七八矣”(见侯玄汭跋)。此两卷本未能刊刻,淳耀殉难后遂散佚。后赖其门人陆元辅、张懿实、侯玄汭、张理等人搜罗编辑,陆续刊刻,共得诗三百八十篇,文八十二篇,《史记评》一卷、《吾师录》一卷,初由钱谦益绛云楼刊刻(后清刻本讳言之),先刊其诗,后刊其文。此本共二十二卷,刊迄于清圣祖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至康熙四十二年,又有十五卷本之刻。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黄集已久未刷印,宝山教谕陶应鼐乃在旧刻基础上,重加补葺,益以前刻未收的《自监录》,编为二十六卷,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刊刻。此本写、刻、印、纸均佳,但忌讳太多,删除许多带有反清色彩的篇章,如《北客行》这样重要的作品,竟于题下注“阙”而删除。此版存于嘉定尊经阁。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又由嘉定秦汝卓补刊刷印。清德宗光绪(1875—1908)间,顺德龙凤镛在乾隆本基础上加以校勘,并补葺了初刻中有而在重刊中被删去的作品。卷前附有旧序、旧跋、传、行状、象、年谱、墓表、祠记、附录等。有龙氏知服斋刊本。

(王学泰)

【**陈子龙诗集**】 诗词别集。十八卷,其中诗十七卷。明陈子龙撰。子龙在世时曾刊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雲草》、《湘真阁稿》、《安雅堂文稿》等数种,还有些诗文见于《幾社文选》、《陈李倡和集》、《三子新诗》等总集。子龙殉国后,家被抄索,遗著颇有损毁,其后则有其门人王沄收集子龙自明福王弘光元年乙酉(1645)至桂王永历元年丁亥(1647)之诗,编为《焚馀草》(或称《丙戌遗草》)。以上诸集或以抄本,或以刻本形式流传民间,但未有全集之编订。后宋徵舆、王沄皆曾收辑子龙所遗诗、文,王沄并加以编辑,但因子龙诗文触犯清廷忌讳者比比皆是,故未能刊刻流传。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四年间,娄县吴光裕曾刊刻陈诗文全集,但此编诗文“或得之江湖书贾,或得之旧家僧舍,丛残缺佚”,故虽刻而流传不广,加以文字狱甚烈,不久版片散失,书亦弗传。乾隆四十一年,清廷颁《胜朝殉国诸臣录》,子龙名列其中,追谥忠裕,其诗文全集的编纂方为世所重。华亭王昶于乾隆四十七年始编《陈忠裕公全集》,成书于仁宗嘉庆八年(1804),其稿多来源于王沄所收藏编纂者,再

益之以王昶自己及王希伊、王鸿逵、庄师洛、赵汝霖、何其伟等人所搜罗者,凡三十卷,其中诗词十八卷,刊于嘉庆(1796—1820)间。但此编虽名“全集”,仍有遗佚,并对其中的“违碍”字句作了删改,或以空白处理。今人施蛰存、马祖熙将《陈忠裕公全集》诗词十八卷编为《陈子龙诗集》,并加以点校。对《全集》中删改的字句作了改正,每篇诗、词皆注明其来源,卷末附《自述年谱》、《续年谱》、《明史》本传、王沄《三世苦节记》、《越游记》与各集原序文,陈子龙所写《白雲草序》、《三子诗选》等,以及徐世祯撰《丙戌遗草序》、王昶撰《陈忠裕公全集序》等,另附有诸家评论、哀悼诗、投赠诗等。此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雪翁诗集**】 诗别集。十五卷,附录二卷。明魏耕撰。魏集为作者自编,初名《息贤堂诗集》;息贤堂筑于吴兴郡城东别鲜山之阳,为作者隐居之所。此集分体编排,包括五古三卷、七古三卷、五律两卷、七律两卷、五排一卷、五绝一卷、七绝一卷、乐府一卷,最末一卷为补遗。每体之内,大体以写作年代为序。魏耕殉难后,家被籍没,著作零落。魏耕在江、浙影响很大,其诗为富于民族思想者所好,故传抄不绝。全祖望知“其生平诗有前、后集”,但“所见者不过数十首”,曾托友人代购其集(见《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孙德祖在《息贤堂诗集跋》中说,“年家子何菁卿孝廉磨祥”从书市中购得魏集,“凡三帙”,“不立卷数”。民国年间,张寿鏞于张冷僧处得此集,并跋云:“冷僧得之于魏君友枋。友枋,雪翁之后裔也。”此本凡十四卷,与《续甬上耆旧诗》所称、《慈谿县志》所著录之十五卷本《息贤堂诗集》略有不同。张寿鏞以友枋藏本为底本,更借冯孟颀藏本参校增补,编入《四明丛书》,于1932年刻印出版。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以《四明丛书》本为底本,整理排印出版。

(王学泰)

【**茗斋集**】 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十九卷,诗馀一卷。明彭孙貽撰。孙貽一生写诗很多,约有六七千首,但只有两个小集,约四五百首作品刊刻问世。一为《百花诗》一卷(或分为二卷),其中录咏花诗三百七十九首,前有孙貽自序,为其子彭騫曾、外甥徐兆扈等人刊刻,约刊于孙貽在世之时。此即二十三卷本中的第十九卷。另一为《茗斋集》,即二十三卷本的第一卷,录诗一百六十五首,写于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1627)至思宗崇祯十年丁丑之间,前有孙貽写于清圣祖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之序。此本编成后,可能欲刻而未刻,其同里乡人张伯魁在清仁宗嘉庆十四年(1809)刻成。张伯魁谓其虽知彭孙貽的全部手稿在某处,因借抄不得,故无法刻其全

集。民国初年,出版家张元济频岁搜讨,搜罗到孙貽手书稿本及抄本数种。又从徐行可处得到彭氏手稿十二巨册,这正是张伯魁欲借抄而不得者。只是其中缺庚子、辛丑、壬寅、癸卯四年之诗,补以葛氏抄本;又丁未一年之诗亦补以所得残册。故此二十三卷本实乃刻本(第一卷、第十九卷)、抄本(第七卷、第十一卷)与稿本的胖合本。有的小集有独立名称,如第四卷名《岭上吟》,第八卷名《吴山寓草》,第十二卷名《燕山小草》,第十四卷名《行橈集》、第十五卷名《南行集》。有些小集还有小序,说明名集之由。全部诗稿按写作年月排列(《百花诗》除外),起自明天启七年丁卯,止于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此集前附王士禛撰《彭孙貽传》、徐盛全《孝介先生传》。此集收入商务印务馆所编《四部丛刊》,于民国间影印出版。(王学泰)

【张苍水集】 诗文别集。不分卷。明张煌言撰。今排印本分为五编:第一编《冰槎集》,只收文;第二编《奇零草》,只收诗;第三编《采薇吟》,收诗及词;第四编收《乡荐经义》及《北征录》;第五编为附录,收有关张煌言及其著作之参考资料。煌言在《奇零草序》中云:“余自舞象,辄好为诗歌。先大夫虑废经史,屡以为戒,遂辍笔不谈,然犹时时窃为之。及登第后,与四方贤豪交益广。往来赠答,岁久盈篋。会国难频仍,余倡大义于江东,敕甲戍干,凡从前雕虫之技,散亡几尽矣。于是出筹军旅,入典制诰,尚得于余闲吟咏性情。及胡马渡江,而长篇短什与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诚笔墨之不幸也。余于丙戌(1646)始浮海,经今十有七年矣。其间忧国思家,悲穷悯乱,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或提师北伐,慷慨长歌,或避虏南征,寂寥短唱,即当风雨飘摇,波涛震荡,愈能令孤臣恋主、游子怀亲,岂曰亡国之音,庶几哀世之意。”煌言自从从事反清斗争以来,感事伤时,撰写了大量的诗篇,但因转战各地,颠沛流离,许多诗稿或焚于战火,或沉于江海,毁失殆尽。其《奇零草序》又云:“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俟,思借声诗,以代年谱。遂索友朋所录、宾从所钞次第之。而余性颇强记,又忆其可忆者,载诸楮端,共得若干首,不过如全鼎一脔耳。独从前乐府歌行不可复考,故所订几若广陵散。”可见现所存张诗不过是劫后之余,远非全部。作者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诗作反映其战斗的一生,故所存诗作多与当时重大事件有关,感兴闲情之类极少。其集在清悬为严禁,仅有抄本流传。清代一些具有民族思想的士大夫如全祖望等亦曾为之作序。清末,反清思想高涨,章太炎于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据甬上张氏抄本始排印张集。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国学保存会出版

了黄节编订之校勘本。1934年,张集又被收入《四明丛书》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黄节校勘本为底本,并参照了章刻本与《四明丛书》本于1959年排印出版,名《张苍水集》,后附有关张煌言之传记资料,包括年谱、传略、墓录、序跋以及诗、文中所涉及到的明末清初的“人物考略”。(王学泰)

【杲堂诗文集】 诗文别集。三十卷,其中诗十七卷。明李邕嗣撰。邕嗣一生写诗很多。其生前曾自编文集二十卷、诗十八卷,但因多触时忌,未能全部刊行,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仅有选刻本行世。诗选本名《杲堂诗钞》,七卷,为徐凤垣等选定。此集按体分编,录诗六百首,编成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作者于此集后自题曰:“删后诗犹六百篇,从来未有世人传。谁教得上词家口,编到新题戊午年。”(《漫题》)集前有林时对与徐凤垣二序。后全祖望为编续集时称此已刻之集为“外集”。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全祖望力劝邕嗣孙李世法刻杲堂未刊诗文,并为作序。世法选录邕嗣诗、文八卷,甫开雕,世法遽然去世,计划未能实现。在此前后,全祖望在编纂《续甬上耆旧诗》时曾收录了邕嗣部分诗作。后清德宗光绪(1875—1908)间、民国年间两次刻李集,皆未能收李诗《续钞》。《杲堂诗续钞》六卷,收诗四百余首,一直以抄本流传。1985年,今人张道勤整理《杲堂诗文集》,收录此《续钞》和以集句诗为主的《杲堂诗外集》三卷。此二种均以李氏衣德楼本即邕嗣七世从孙李原建手校本为底本,对于原抄脱误及文字缺坏之处,凡同时收入《续甬上耆旧诗》者,皆据此本作校补。李厚建之孙翼鹏也曾据镇亭山房抄本作校讎。《杲堂诗续钞》前有梁以樟、梁斗枢两序;《杲堂诗外集》前有邕嗣《自题辞》云:“逸心遥集,长怀忽来,吾笔滞不能自写,偶取占人妙处为我写之。”可知此集虽为集句,亦足以表达邕嗣之怀抱。张编《杲堂诗文集》后有《杲堂诗辑补》,为邕嗣裔孙李庆坤从光绪《鄞县志》中抄出的《鄞东竹枝词》七十九首。张编之后还附有关于邕嗣的参考资料。此编于1988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

(王学泰)

【夏完淳集】 诗文别集。又名《夏节愍全集》,十四卷,其中诗词七卷。明夏完淳撰。完淳殉国后,遗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等,但都以抄本流传。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表彰明末忠臣,吴省兰于乾隆末编《艺海珠尘》丛书,始收《夏内史集》。此本仅收赋十篇、诗二百二十六首、文五篇、词二十八首、骚九篇。只占其传世作品的三分之一。清仁宗嘉庆十四年(1809),王昶、庄师洛又辑《夏节愍全集》,经多方搜罗,一再补遗,编为十卷、补遗二

卷,卷首、卷末附录各一卷,共十四卷,刊于松江。此本较为完备。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陈履泰将王昶、庄师洛辑本加以修订,重新刊印。后又有四川新津吴氏刊本;此本分体而不编年,意义不大。1959年,中华书局以王、庄所编辑之《夏节愍全集》为祖本,校以《艺海珠尘》中的《夏内史集》、《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中所收夏完淳作品和《明三十家诗》所收夏完淳诗、《乾坤正气集》中的夏完淳文,以及夏集数种旧抄本,其中有歧异之处,分别注入篇内,题名为《夏完淳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9年排印出版。今人白坚在此基础上,综合各种版本,收录了完淳传世的全部作品,详加校订,对诗文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加以笺释,并对有关夏完淳及夏集的参考资料亦详加采摭,附于书后,名为《夏文淳集笺释》,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王学泰)

【初学集】诗文别集。一百一十卷,其中诗二十卷。清钱谦益撰。此集所收皆为作者在明代所著诗、文,按年编纂,起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终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包括《还朝诗集》、《归田诗集》、《崇祯诗集》、《桑林诗集》、《霖雨诗集》、《试帖诗集》、《丙舍诗集》、《移居诗集》、《东山诗集》等九个小集。此集最初由其门人瞿式耜于崇祯十六年九月刻,其《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云:“吾师牧斋先生以命世异才,蚤登上第,……年及强仕,道明德立。阅天人之变,通性命之理,钻研经史,沉浸载籍。古今学术之升降,文章之流别,皆一一究其源委,击其蒙蔽。一旦摒挡箱篋,胥二十馀年之诗文,举而付之一炬。”由此可知,此集所收诗作起于作者年近四十岁时,并非自此年方作诗,而是悔其少作,“举而付之一炬”。瞿氏又云:“先生为文,每削藁,式耜辄手钞而藏之,先生不能禁也。乃固请于先生,出其所缮写,厘为一百卷,楔梓以公之当世。先生力禁之不得,复手削其作之四五,命其名曰《初学集》。”可见集中所录亦远非钱氏作品的全部。无怪集中每年诗歌作品仅有五六十篇,与作者才思敏捷之誉颇不相称。此集除诗二十卷外还收文八十卷,并收《太祖实录辨证》五卷、《读杜小笺》三卷、《读杜二笺》二卷。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谦益族孙钱曾注释《初学集》中诗二十卷行于世,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又有春晖堂刻本,此诗、文合集遂成仅有诗而无文之别集。乾隆中叶,谦益被列入《贰臣传》,其书遂被禁,板片也上缴销毁。直到清末宣统二年(1910),遼汉斋始以明代瞿氏刻本《初学集》,与钱曾笺注本两相对勘、校订,并加按语,合两本为一本,排印出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今人钱仲联校勘标点的排印本。名曰《牧斋初学集》。此本以遼汉斋

本(其中附有钱曾注)为底本,并据商务印书馆民国年间所编《四部丛刊》的影明刻本及清刻笺注本相互校勘,改正了误字及因避讳而改书之字。

(王学泰)

【有学集】诗文别集。五十卷,其中诗十二卷。清钱谦益撰。此集所收皆为谦益入清之后的诗、文作品。其诗按年编纂,起自清世祖顺治二年乙酉(1645),终于圣祖康熙三年甲辰(1664),包括《秋槐诗集》、《秋槐诗文集》、《夏王诗集》、《绛云馀烬诗》、《秋槐诗别集》、《高令堂诗集》、《长干塔光诗集》、《红豆诗集》、《东涧诗集》等九个小集。其他三十八卷为各体散文。此集最早刊于钱氏去世的康熙三年(1664),由邹铤根据钱曾(谦益族孙)所存手稿刻成,是为甲辰本。康熙二十四年(1685),金匱山房又刻有重定本《牧斋有学集》五十一卷。此版没有改动甲辰本的编排次序,只是在各卷中分别补入了原刻本中未收的佚文、逸诗,补文七十三篇,补诗二十三首;又因题跋、杂文部分增补太多,故另编一卷,附于原本之后。此本删去了一些明显的触犯时忌的文字,如“大明”、“弘光”等字句,篇目也有抽换删改,但也有一些地方保留了甲辰本中没有的深触时忌的文字。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上谕所谓“荒诞悖谬,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清史列传·贰臣传》),主要指《有学集》中所收部分作品。此后,谦益著作皆在焚毁严禁之列。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影印甲辰本,而且附有金匱山房本所载而甲辰本中所无的诗、文和吴县姜殿扬所作的校勘记。钱曾著《有学集笺注》十四卷,专注此集中之诗,有清康熙(1662—1722)间玉诏堂刊本和乾隆间春晖堂刊本。

(王学泰)

【投笔集】诗别集。一卷。清钱谦益撰。此集所收诗一百零四首,皆作于清顺治十六年(1656)至康熙二年,题为《后秋兴》,步和杜甫《秋兴八首》原韵,凡十三叠。近人沈曾植云:“前二叠国姓(按指郑成功)攻金陵时作,后七叠皆为永明王作。中间三、四、五叠作于国姓兵败后。情词隐约,似身在事中者。”(《跋投笔集》)章太炎亦认为,“郑成功尝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且言新天子中兴,已当席藁待罪。当是时,谓留都光复有俾倪间,方偃卧待归命,而成功败。后二年,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几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馀哀也。”(《太炎文录》)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集中篇什的思想内涵作了深入的考证。此集中作品反清情绪十分强烈,谦益生前身后并未刊刻。鸡鸣子曰:

“蒙叟《投笔集》一书，世未有刊本。则以当时文网甚密，而此书微吟深讽，易触忌讳。故秘而未刊。然江南藏书家多有写本。东南人士之留心文献、不忘故国者，恒以一得见其书为快。故传钞殆遍。”（《投笔集跋》）至清末此书方有刊本。有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国粹丛书》本，此本以邹氏抄本为底本，并以山阴诸氏精抄本校过，补入缺字，比较精当。谦益族孙钱曾著《投笔集注》，作二卷。（王学泰）

【尊水园集略】 诗文别集。十二卷，其中诗四卷。清卢世淮撰。世淮生前曾刻诗集《尊水园宿草》、《在輿草》、《闲居漫兴》、《杜亭近草》、《画扇斋诗始》等凡五种，并有未刻诗集《杜亭移草》、《蕙庵掌记庐诗》二种。世淮于顺治十年癸巳（1653）逝世，其门人陈鍾英、赵其星、程先贞据其已刻集、未刻集于当年仓促编成此集。集前有程先贞写于“癸巳中秋”之缘起，并有赵其星、李源所写二序。共录诗凡三百餘首，按体编排，卷一为五古、七古，卷二为五律，卷三为七律，卷四为五言、七言排律，五言、七言绝句。集后有世淮子卢孝餘跋云：“‘尊水园’者，先侍御读书之所，‘集略’者，缘此集计可得十之四五，犹欲待大全于异日也。”此集刻于清世祖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王学泰）

【石臼集】 诗别集。前集九卷，后集七卷。清邢昉撰。昉诗在作者生前即享大名。其集初刻于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名《鲁稽斋诗》（见顾梦游原序），此本已不可见。昉去世前一年（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自订诗稿，编为前、后集：前集写于明，后集写于清；由高淳令范印心与崔正谊刊刻。至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宋荦颇喜昉诗，其子宋至又与昉亲戚王孚交好，荦遂命二人校订邢集，于康熙末年刊刻，仍分前、后集，前集终于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后集始于入清之后，按体分编，每体之中，大体上以时间为先后，但不甚整齐，如前集的五律之中有写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的作品而编于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之前，亦可见王孚、宋至编本，亦非作者亲自手订本。全编前集录诗一千三百首左右，后集录诗八百五十首左右。昉去世后，其诗名益大，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亦有刊本，有沈德潜所作序，但为避免文字狱，诗中文字多有改窜。此集于乾隆中叶被列入禁焚书目，直至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始又有影清初刻本问世。（王学泰）

【默庵遗稿】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八卷。清冯舒撰。此集所录之诗分作五个小集：《空居集》二卷、《北征集》二卷、《浮海集》一卷、《避人集》二卷、《幽违集》一卷。前三个小集作于明代。《北征》一集专收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作者被捕北上时，写沿

途所见、所感之作，以及写于狱中之作。后二种写于南明弘光朝被灭以后。此集为世豸堂所刊，当刻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年，诗多缺字，以避忌讳，但抵触时忌之处仍然不少。常见者有民国十四年（1925）张鸿排印本，收入《常熟二冯先生集》。

（王学泰）

【宝纶堂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词、诗八卷，附《避乱诗》一卷。清陈洪绶撰。《皕亭诗话》云：“按老莲初无诗集，生平作画，懒于题咏，偶有所题，亦未存稿。其老友姜绮季与共晨夕，见有题，辄为钞录。久而得诗一卷，镌于板。老莲见之，大喜，因自为序，名曰《陈老莲集》。老莲卒，毛西河复为之跋。”《诗话》所云恐不确，毛奇龄之跋仍在，未言陈集曾刊刻，只言“自予选越诗，付此稿来，今二十年矣”，后虽言“友人有请刻老莲诗者，乃付之去”，但刊刻与否终属未知，即使刊刻，此本已佚。洪绶子陈字（即儒桢）痛其父诗文不传，将其零散遗稿抄汇成帙，又从亲戚朋友处抄得文、诗、词编为此集，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刊刻传世。岁久湮没，板刻不存，传本日稀。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绍兴董全鑑得陈集的康熙印本，遂命工以活字本印行。原刻所有的罗坤、胡其毅二序及孟远所作《陈洪绶传》仍列于卷首，此后列《绍兴府志》之陈传、毛奇龄所作《陈老莲别传》、朱彝尊之《陈洪绶传》。并附有陈洪绶遗像、张岱之赞语及其轶事，又从徐氏所藏洪绶手书《避乱诗》一卷得诗一百五十二首，其中四十餘首为集中所未见，作为“拾遗”，编在全书最后。有光绪间董氏取斯堂本。

（王学泰）

【丁野鹤集】 诗文别集。十九卷，其中诗十二卷。清丁耀亢撰。是集凡分六小集：《陆舫诗草》五卷，收作者入京为镶白旗教习所著之诗，即清世祖顺治五年戊子至十年癸巳间（1648—1653）作品；《椒邱集》二卷收作者官容城时所作之诗，即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至十五年戊戌作品；《江干草》一卷，收顺治十六年己亥至十七年庚子间诗作；《归山草》一卷，收圣祖康熙元年壬寅（1662）至五年丙午间诗作；《听山亭草》一卷，收康熙六年丁未至八年己酉间诗作；《逍遥游》二卷收作者暮年诗作。前两种为作者自刻，《江干草》以下皆耀亢之子慎行所刻。《陆舫诗草》还有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刻本，此本附补遗一卷。今人邓之诚曰：“（耀亢）自言丁亥（顺治四年）于役淮上，《逍遥》一集，唯缺《山阳游》未刻，或虑触时禁，故讳言之。”从耀亢所刻作品来看，此推测大体近真。耀亢食清室之禄后所作诗中尚时有抑制不住的愤懑，其未仕清时的作品触犯时忌的程度更可想见。其所传世诗章皆为五十岁以后作品。此集编排与传

统编法不同,除收诗、文、杂著外,还收有传奇等戏文。有康熙(1662—1722)间刻本。(王学泰)

【**钝吟老人遗稿**】 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十二卷。清冯班撰。此集包括冯班全部著作,除诗外,还有文一卷、《钝吟杂录》十卷。其诗陆续刻成,故各集名目不同,最早编成者名《冯氏小集》三卷,前有钱谦益序;序写于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是知此集所收皆为明代所作。此外,还有《钝吟集》三卷、《钝吟别集》一卷、《钝吟余集》一卷、《钝吟老人集外诗》一卷、《钝吟乐府》一卷、《游仙诗》二卷。这几个集子皆为其忘年交陆貽典所刊。陆序谓读钱谦益为《冯氏小集》所作序文,“莫不想望定远之人与诗。而其诗刻仅《冯氏小集》百餘首,其友毛氏潜在实任梨枣之役。今潜在不可作矣,好事寥寥,定远贫老日甚,略无有能振之者。居恒谓士生斯世,穷愁潦倒,人多易慢,百岁以往,乃始思其人,而不可得。”从此序可知《冯氏小集》乃其友毛晋(号潜在)出资刊刻,后遂无继之者。这些小集刻于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陆序又言:“余于定远,窃有深慨。顷其犹子窆伯(指冯武)搜访残诗,出录本示余,因理向所藏本互为补辑(原编《钝吟集》二卷,今益一卷。《落花山居诗》向杂友人稿中,今并录出,原刻《游仙诗》五十首,今续五十首),倡于同人醵金授梓,合小集通为九卷,以传于后,诸君之义也,亦朋友之责也。”是知小集为陆貽典等捐金刊刻,但其版式、风格仍类于毛晋所刻。此集中《钝吟杂录》乃康熙十八年己未所刻。这个明末清初泮合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王学泰)

【**隰西草堂集**】 诗文别集。十二卷,其中诗五卷。清万寿祺撰。寿祺集初刊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为其门人吕维扬编刻。因其诗多触时忌,故吕刻之后长期无人刊刻。吕本所收录诗,系按年分集而编,包括《内景堂集》一卷、《癸酉诗》一卷、《二雨斋诗》一卷、《隰西草堂编年诗》八卷。共有十一卷。“隰西草堂”乃其晚年隐居之处,故以之命名晚年作品。后此本久佚。清宣宗道光(1821—1850)间,铜山举人丁泗吉录寿祺诗一卷秘藏之。其后,孙连锦得寿祺手书文稿残卷,合丁氏所录,共分九卷(诗五卷、文三卷、唱和集一卷),刊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此为分体本。清德宗光绪(1875—1908)间,临川桂中行嘱金坛冯煦重编寿祺及阎尔梅遗集,编为《徐州二遗民集》,冯氏为作序。民国间,董士恩又据孙连锦本重刊,并辑入补遗一卷及杂著,编为十二卷,有排印本传世。(王学泰)

【**白查山人集**】 诗文别集。一名《阎古古全集》。十二卷,其中诗十卷。清阎尔梅撰。尔梅文思敏捷,

一生作品很多。其第二次入狱可能是因诗、文贾祸,故黄宗羲谓其以诗祸亡命,尔梅亦有“贾祸诗文尽数删”之句。此集为作者自编,对于明显触犯时忌的诗章尽数芟削,但仍难完全掩盖其反抗的光芒。初刊于清圣祖康熙十四年(1675);高宗乾隆(1736—1795)间,被列入禁焚书之列。清末书禁渐弛,德宗光绪(1875—1908)间,临川桂中行嘱金坛冯煦将此集与万寿祺诗集合刊为《徐州二遗民集》,此本刊落甚多。民国初年,泗阳张相文称得尔梅自订诗集之抄本,于是重辑其年谱、遗文、遗诗,厘为六卷,并称收录了阎氏全部诗作(其实亦远非全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出版,名为《阎古古全集》。(王学泰)

【**霜红龛集**】 诗文别集。四十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其中诗、赋十四卷。清傅山撰。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傅山门人刻《四晋人诗》(包括傅山及其子傅眉、胡庭、白孕彩),中收山诗数十首。此为傅集最早刊本,后此版佚。山生前不甚重视其作品,随写随散,逝世前“以收拾遗文属孙莲苏”(《霜红龛集备存小引》)。山所作古文辞不下数千首,兵燹之余,大多散佚。晋人颇重其诗文,多有传写;以搜集遗文、编辑其集自任者亦代有其人。据《霜红龛集原序》云,清世宗雍正(1723—1735)、高宗乾隆(1736—1795)间,闻喜张直甫搜罗汇集山诗文“几乎大备,贮之一囊,携以自随,将付梓而未逮,一日客游江右,卒于旅邸。或探其囊,先生诗文遂复散失。”其弟子张思孝又勤加搜集,历十餘年,略得十之六七,于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客海陵,力梓之以公世,板垂成而同事者多所猜忌,遂毁其板”(《霜红龛诗略跋》)。所谓“同事者多所猜忌”可能与当时颇令人恐怖的文字狱有关。但此本还是在吴门得以刊行,全书凡十二卷,包括诗九卷、骚赋二卷、杂文一卷。清仁宗嘉庆(1796—1820)、宣宗道光(1821—1850)间邑人张静生搜罗到吴门刻本所未载之诗文六卷,(多得之于傅山裔孙),谓之“拾遗”,未及付梓而静生卒。其弟古娱与寿阳刘霏共同罗访,历四十餘年,所得愈多。后刘氏命其子弟缮清付梓。此本凡四十卷,分类编排,并附傅眉诗集十一卷,于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刻成。此本作了一些校勘,删去了窜入傅集的他人作品,如“吴门刻本”中所收的《题画五绝》本庾信作品,故删去。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山阳丁宝铨据此本重加删订编排,在整理过程中听取了版本学家缪荃孙、罗振玉等人的意见。此本附有傅山传、事略、祭文、“诸家寄赠挽悼怀仰诗什”、“本集诸刻本序例”及丁宝铨所著《傅青主先生年谱》,此集有丁氏自刊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据丁氏刻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愚庵小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其中诗五卷。清朱鹤龄撰。此集按体裁分卷,卷二为五古,卷三为七古,卷四为五律、五排,卷五为七律,卷六为五绝、七绝。每卷内大体依写作时间编次。鹤龄集初刊于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由金闾童晋之梓行,前有王光承序与计东序。实际此版屡经增补,集中不少作品写于康熙十年以后。如五古《朱锡鬯过访时应举将入都》写于康熙十八年,七古中的《刈稻行》写于康熙十一年,五律中的《挽姜如农给谏》写于康熙十三年,七律中的《丁巳除夕》写于康熙十六年,《戊午元日》写于康熙十七年等等,这些都是标明或可以考证时日的,而被排在每卷的中间或偏后,因此,可知还有许多未标明写作时间,但肯定是十年以后的作品。集中还有少量有文无目的作品,如卷二《初夏过严园》二首、卷四《挽李如石明府》、《赠顾季任》二首、卷五《九日遣兴》、《岁暮杂诗》等。这些作品可能是后刻时补入,而忘记在目录中增补之故。此本中的诗、赋多有作者友人之评语,如朱彝尊(锡鬯)、毛奇龄(大可)、申涵光(凫盟)、俞南史(无殊)、徐白(介白)等。评语以赞誉为主,价值不大。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并据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本补入复旦本所无者。另外还有燕京大学民国间铅印本,正集后附补遗二卷,一卷为诗,一卷为文,较为完善。

(王学泰)

【海右陈人集】 诗别集。二卷。清程先贞撰。先贞著有《还山春事》、《燕山游稿》、《愚庵诗草》、《窥园百一、百二合选》四个诗集。先贞晚年向慕冲淡平易诗风,对早年才气充沛、文采庞蔚、激楚悲凉、骀荡沉郁之作有所不满,故从四集中选诗四百四十六首,编为此集。此集分体编次,上卷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下卷包括七律、五律、七排、五绝、七绝。集中所收多为中晚年作品,所收早年诗作皆标明“旧作”二字,编在每体之后。集前有钱谦益、卢世淮、陈鍾英、田雯、萧惟豫、冯廷櫨等人的七篇序言,其中有些序言(如钱、卢三序)乃是为先贞早年诗集而撰,移作为此集序言。先贞晚号海右陈人,故以此名集。其《自伤无以先于世而年逾耆艾因号海右陈人诗以述旨》中云:“嗟此百年身,谁知幻与真。冥怀依水月,忍耻混风尘。漫逐龙蛇化,闲看鸟雀驯。无名何必问,海右一陈人。”集中所录篇什间有小注,颇及时事。此集刊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流传极少。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胡石庄先生诗集】 诗别集。二十七卷。清胡承诺撰。承诺集分四部分:(一)《檄游草》一卷。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承诺被征召进京选官,以老病辞

归。此集皆收其来往道路之作。(二)《青玉轩诗》七卷。此集作品写于明思宗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至清世祖顺治九年壬辰(1652)之间,为隐居家乡和奔走于避乱道路时所作。(三)《菊佳轩诗》十一卷。此集所收为顺治九年以后至康熙十二年癸丑之间的作品。此期间除康熙五年丙午及六年丁未二至京师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家乡。(四)《颐志堂诗》八卷。此集所收皆为康熙十三年甲寅至康熙二十年辛酉之间的作品。此期间作者隐居家乡。承诺集最早刊于清宣宗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当时只有《菊佳轩集》。民国五年(1916),又从承诺后裔处,得到《青玉轩诗》等集,于是重加编排刻印出版。

【沉吟楼诗选】 诗别集。不分卷。清金人瑞撰。人瑞以“哭庙案”被清政府所斩,其诗文全集虽被列为唱经堂“外书”,实则并未刊行。日久零落,其诗仅有二十六首附于所著《杜诗解》之后,名为《沉吟楼借杜诗》(全部诗作均借杜甫诗题)以传世。另外还有若干单篇孤章见于一些诗歌选本中。此集乃人瑞之婿沈六书抄存,得以传世,其间经过大兴刘献庭(继庄)选录,故又称“诗选”。全编按体分类,其次序为:古乐府、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古诗、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古诗。每体中又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每体中未标明“逸诗”者为刘氏所选中之篇什,标明“逸诗”者乃沈六书所增辑,共得诗三百八十馀首。刘氏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寓吴中三十年,与人瑞子金雍过从甚密,故得参与此事。此编中以咏个人生活之作居多,触及时忌者亦间有所见,如俞鸿筹《读后记》所言:“今阅《诗选》中如《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塞北今朝》、《元晖来述得生事》诸作,亡国之思,触处多有。当时文网綦严,犯者则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则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此集后附《唱经堂遗书》目录,分“外书”十三种,“内书”二十一种,前有李重华写于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之序。《沉吟楼诗选》一直以抄本流传,此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王学泰)

【梅村家藏稿】 诗文别集。五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卷。清吴伟业撰。伟业诗文集初编成时名《梅村集》四十卷,为其学生顾湄(伊人)所编(实是作者晚年自定),其中诗十八卷,按体分编,计五古三卷、七古四卷、五律三卷、七律五卷、五排一卷、绝句二卷。各体诗大致按年编次,可以考订每诗的写作时期。此集虽编成于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但并未立即付梓,故卷七末、卷一〇末、卷一五末均收有康熙七年以后的作品,而目录中未载。此集所收多为人清

以后的作品,清末从北京琉璃厂旧书肆售出《梅村家藏稿》,为董康所得。原为六十卷,董氏将五十六卷至五十九卷四卷合并为二卷。卷一至卷八为诗前集,卷九至卷二二为诗后集(包括词二卷),最末一卷为诗话,其他为散文。《梅村集》中有而此集中所无者有文八篇、诗八首、词一阙。此本中有而《梅村集》中所无者有文六十一篇、诗七十三首、词五首。可知此本远比《梅村集》详备。原抄本中有朱笔校注,称“先大夫”云云,乃伟业之子手笔,可见此本系从吴家散出。董康将《梅村集》有而此本无之文、诗、词编为《补遗》一卷,与顾师轼所作《吴梅村先生年谱》一起附在书末,刊刻出版。此即是《诵芬室丛刊》中《梅村家藏稿》。民国间,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伟业遗诗、逸句很多。清人程穆衡的《梅村先生诗编年笺注》辑得四首。今人黄裳、端木蕻良也有所发现。今人邓之诚谓另有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的《梅村先生诗集》十卷。此“十卷本尚有六十馀首为《藏稿》所无”(《清诗纪事初编》)。今人叶君远从一些清初总集,如《明代诗存》、《明诗归》、《江左三大家诗钞》、《吴越诗选》、《感旧集》等书中辑得吴佚诗四十九首,多为入清前之作品,刊登于《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中。另有今人李学颖集评标校的《吴梅村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慧叟诗钞**】诗别集。四卷。清纪映钟撰。映钟诗集最早刊于清世祖顺治六年己丑(1649),名《真冷堂诗稿》一卷,所收多为明、清之际的作品,为其好友龚鼎孳出资绣梓。此本传世很少,孙殿起《贩书偶记》中犹有记载。今人邓之诚云:“所著《真冷堂集》,世无传本”(《清诗纪事初编》),实误。另外还有一部《槩堂诗钞》,以钞本流传。邓汉仪在《诗观》二集就提到过此本。《慧叟诗钞》成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1786)。仪真石樵得其手稿,选为四卷。清末缪荃孙得石樵选本,刊入《金陵丛刻》。石本定于乾隆(1736—1795)间,而集中《故宫》、《兵至》、《录别》等寓禾黍之感的诗篇,未尽删削;亦说明文字狱并未吓倒一切读书人。(王学泰)

【**黄宗羲诗集**】诗别集。五卷。清黄宗羲撰。黄集最初为其学生施敬校刻,诗集三卷,名为《南雷诗历》。“南雷”为唐谢无尘故居,距宗羲所居竹桥仅数里,故以之名集。后戴曾、戴晟又增刻一卷,于是黄集便有三卷本、四卷本两种刻本流传。四卷本刊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是知此两本刊刻之时宗羲尚在世,集中所录之诗,当为作者自订,仅存十之二三,凡四百馀首。有些佳篇已被作者芟落,如罗万藻序中所提到的《死战马》、《老狐行》等等。后全祖

望又增选黄氏晚年诗,编为五卷本。今人闻旭初以四卷本为底本,用重刻本加以校正,并从他书补诗七十九首为一卷,共五卷,是黄集诗集中较全的本子,有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王学泰)

【**变雅堂集**】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十卷。清杜濬撰。《清史稿》本传云:“濬诗最富,世所传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这些诗多未刊刻。濬生前所刻诗文集,亦名《变雅堂集》,包括文集五卷,诗集四卷,诗集为《倦游草》、《三山游诗》、《闻喜游诗》、《游摄山诗》,各一卷,仅录诗一百四十馀首,是其全部作品中极小一部分。后世屡有增辑。汪观刊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杜茶村诗》,凡三卷。此编录诗两百馀首,独无古体。编者取已刻诗乱其次第,不录序,其录诗数目比四卷本略有增益。卓尔堪所编《遗民诗》,选录濬诗一百五十馀首,多为未刻稿。清高宗乾隆八年癸亥(1743),湖北彭湘怀、陈师晋辑得濬诗六百五十首,刻为《杜茶村诗钞》八卷。德宗光绪(1875—1908)间,黄冈沈自申刻《变雅堂遗集》,其中诗十卷,分体编次,每体之中以写作时间为先后,集后附录二卷,皆为有关杜濬及杜集的参考资料,有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刻本。(王学泰)

【**赖古堂全集**】诗文别集。二十四卷,其中诗十二卷。清周亮工撰。亮工诗集最早刊于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名曰《删定赖古堂诗集》四卷,大多为明末清初所撰,钱谦益为序云:“汴水坏城,张林宗抱其诗文与二子沦水中。”此集所录一些诗作当是救于水中者。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亮工两度入狱论死,两度遇赦,起祸之因皆与诗、文有关,故亮工五十九岁时言“一生为虚名所误,老而闻道,何尚留此邪”,后悔不当写诗文以取罪戾,遂尽取所著书之版片与藏书百种焚之。亮工逝世后,其子周在浚对其遗著加以整理删定,于康熙十四年(1675)刊刻,前十二卷为诗,后十二卷为各体古文,附录一卷为周氏年谱、小传、神道碑、墓志铭、行状、行述等。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周在浚刊本影印出版。

(王学泰)

【**塗山集**】诗别集。二十一卷。清方文撰。方集包括:(一)前集十二卷,分体编年,收录明思宗崇祯九年丙子(1636)至清世祖顺治十三年丙申的作品;(二)续集四卷,收顺治十四年丁酉至十八年辛丑的作品,包括《北游草》(1657—1658)、《徐杭游草》(1659)、《鲁游草》(1660)、《西江游草》(1661)四个小集;(三)再续集五卷,分体编年,收清圣祖康熙元年壬寅(1662)至八年己酉作品。文在明末即以诗名,钱谦益曾序其诗,后与孙枝蔚、姚侔合刻为《三家诗》。此二十一卷本为其婿王概所刊,跋云:“塗山先

生,余外舅也,歿既二十一年,槩始克检遗诗。”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吴嘉纪、施闰章、汪琬等人勸勉与帮助下刻成此集,基本上没有剗改之处,有古怀堂刊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古怀堂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藏山阁集】 诗文别集。诗十四卷,文六卷。清钱秉镫撰。此集所收皆为秉镫回乡归隐前诗、文,起自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终于明桂王永历五年辛卯(1651),分五小集:(一)《过江集》二卷,写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至十六年癸未明亡前。作者由家乡至南京投入当时政治斗争,故以“过江”名集。(二)《生还集》十卷,写于崇祯十七年甲申至明桂王永历二年戊子(1644—1648)。此五年中,作者几濒于死,最初被南明当权者马士英、阮大铖等挂名党籍而被追捕,亡命三吴;清兵南下,南京城破,作者先佐钱榘起兵,后仕于闽中隆武帝、粤中永历帝。从此集中可见“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钱秉镫《生还集自序》)。作者认为“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这是当时战乱中的一部“诗史”。所谓“生还”,指生还到达永历帝行在。(三)《行朝集》三卷,写于永历三年己丑至四年庚寅。所谓“朝”,指永历朝廷。此集大多以感慨朝政得失为内容。(四)《失路吟》一卷,写于永历四年庚寅至五年辛卯。此时作者脱离永历朝廷,辗转于路途之中。(五)《行脚诗》一卷,写于永历五年辛卯,由《行脚诗》三十首组成。作者云:“予为卓庵指往庐山,不得去,遂往来江上为《行脚僧诗》以寓志。”《藏山阁诗存》中大多数作品写当时的重大事件,许多篇什中有作者小注,注明写诗的历史背景。秉镫著作生前大多刊刻,独此集未刻。汪德渊云:“先生暮年,尝躬至吴会,刊所著诗、文全集,鬻诸市以自供,故其致王安节书有拙刻付坊间,何法得推行等语。然则,此槩当为先生刻全集时所自芟存之别本。盖其中多据事直书,且有忌讳语,易罹文网故也。”(《藏山阁集序》)此集一直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清德宗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桐城萧穆在秉镫裔孙家中发现此集抄本,钞录以存。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龙潭室主据萧本排印出版。

(王学泰)

【顾亭林诗文集】 诗文别集。十六卷,其中诗五卷。清顾炎武撰。清初文网峻严,庄廷钺《明史案》正发生在炎武创作活动最盛时期,所作诗篇多触时忌,故其诗集于生前未能刊刻,名篇佳作只在故人、弟子中流传。其门人潘耒手抄炎武诗集,编作六卷,此为炎武诗集中最接近原貌之本。此本在清初叶、中叶只以写本流传,清末光绪(1875—1908)间,幽光

阁据戴子高家藏潘耒抄本排印出版,题名为《亭林诗稿》。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潘耒还编刻《亭林诗集》六卷,为炎武诗集的初刊本。较之潘耒抄本,初刊本作了许多删削与窜改,以避文祸。此编为编年本,始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终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收诗四百馀首。后世亭林诗集虽屡有刊刻或笺注,但原文越来越被歪曲,许多尖锐的词句均被磨平,因此,不同的版本之间差异甚大。历来批、校顾集的学者亦颇不少,如翁同龢、孙诒让、吴庠、冒广生、汪辟疆等皆与其事。此《顾亭林诗文集》以康熙间初刻本为底本,并用传录的潘耒手抄本相校,把刊刻时窜改的文字作为校记附在诗后,删去的篇什按原次序补入。此编还参考了朱记荣所刻《亭林佚诗》、兰陵荀兼之《亭林诗集校文》,以及孙毓修依据抄本《蒋山傭诗集》所作的校补,增入校记和一首佚诗,还将徐嘉《顾诗笺注》之《集外诗补》附在最后,遂成为较为完善的本子。此书由今人华忱之点校,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1983年再版。

(王学泰)

【归庄集】 诗文别集。十卷,其中诗一卷、曲一卷。清归庄撰。归庄集最初为其婿金侃所辑,有《悬弓集》三十卷,为诗文合集,收庄早年著作。另有《恒轩诗集》十二卷、《恒山文集》十二卷,录其晚年诗、文。后三本皆失传。清宣宗道光(1821—1850)间,太仓季锡畴得《恒轩稿》六册,辑文一百零五篇为六卷,诗四十八首为一卷,刻为《归元恭文钞》。未几版毁,锡畴别辑不见于《文钞》者一百七十八篇为第七卷。此稿后为归庄后裔所得,又增笔记二十四则,刻为《归元恭文续钞》。同时昆山朱绍成亦辑成诗文十卷,附俗曲《万古愁》于后,编为《归高士遗集》。后徐崇恩在此基础上编成《归玄恭遗著》,录文一百七十七篇、诗二百二十七首。诸编所收诗、文,互有出入、重复。近年又发现《归庄手写诗稿》,录诗一百馀首。此《归庄集》以归、徐、朱三编为基础,加以校勘,又增入了庄手写诗稿,后附庄年谱及传略,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出版。此集是迄今为止收录归氏诗、文最为详备之本。

(王学泰)

【安雅堂集】 诗文别集。十九卷,共八种,包括文集二卷,书启一卷,重刻文集二卷,诗无卷数,《二乡亭词》三卷,《祭皋陶》一卷,未刻稿八卷,《入蜀集》二卷。清宋琬撰。琬诗集在其生前已有数次刊刻。清世祖顺治七年庚寅(1650),刊有《荔裳集》;此集署有“本衙藏版”,版心有“安雅堂”三字,由其门人宣城储日升校订,包括文集一卷、诗集一卷。另外还有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刊刻的《安雅堂文集》二卷、诗无卷数。这两个集子所收诗皆为作者早年作品。清圣

祖康熙五年(1666),琬罢官后居江南,又曾刻《安雅堂集》文集二卷、诗集二卷。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康熙壬子(1672)春,(琬)在京师,求予定其诗笔,为三十卷。”此三十卷本未能刊刻,早佚。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又云:“庚辰(1700),余官刑部尚书,荔裳之子思勃来京师,以《入蜀集》相示,亟录而存之。”康熙(1662—1722)年间,《入蜀集》并未刊刻,王士禛的过录本却在文人间流传。《安雅堂拾遗诗》(指未刻稿)及其词集等,系其族孙宋邦宪所刻,刊于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17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编“掇拾残剩,非但珠砾并陈,亦恐真赝莫别,均不足见琬所长”。此编所录诗止于康熙九年庚戌,即作者逝世前三年。《入蜀集》刊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宋琬诗篇大致载于上述所刻诸集中。从清代所刻总集中如《诗观》、《感旧集》中还能辑到一些佚诗。此《安雅堂集》有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所编《四部备要》本。

(王学泰)

【定山堂集】 诗文别集。四十三卷。清龚鼎孳撰。鼎孳诗作初收入顾有孝、赵澐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选刻之九卷本《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后有《过岭集》之刻,此为龚氏生前自刊本,题曰三十二芙蓉斋刊。有宛上徐泰时评点文字。另外还有《尊拙集》、《香严集》等小集之刻。鼎孳晚年又刻诗集四十卷,名《龚芝麓先生集》。鼎孳逝世后,吴兴祚为其刻全集,包括诗四十三卷,诗馀四卷、奏疏八卷,名曰《定山堂集》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至十五年丙辰泽存堂刊。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鼎孳名列“贰臣”,其著作虽没有如钱谦益作品中那样的明显的“悖逆”之词,但也在焚禁之列,书版被缴入官库。仁宗嘉庆(1796—1820)后,书禁渐弛。宣宗道光(1821—1850)间,有其古文小品及奏议之刻。德宗光绪(1875—1908)初,龚氏后裔得到龚集江南残刻,并据抄本重新补雕,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由圣彝堂印行。民国十四年(1925),龚氏后裔龚心钊校印龚集,又据吴兴祚刻本以及《江左三大家诗钞》、《香严集》等详加校订,由瞻麓斋刊印。

(王学泰)

【甲申集】 诗别集。七卷。清余怀撰。此集所收诗作大多写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国变之时。此年作者由南京逃难到吴越途中所作诗歌皆收入此集,分七个小集:(一)《茂苑诗》,为作者初至吴门而作,以咏苏州风景的篇什为多。(二)《武塘诗》,为与“武塘十友”唱和之作。“十友”包括钱尔玉、钱漱广等。(三)《西陵诗》,收再度游览杭州西湖之作。(四)《山阴诗》,收作者端午节过山阴时之作,诗中多表达眷怀故国之情。(五)《明月庵稿》多为“遥望燕

都,洒泪而作”,有送朋友赴前线抗敌之作。(六)《拟古诗》,只包括《拟古诗十九首》。(七)《律鬘诗》,所收皆律诗。“鬘”本指缨络。作者认为律诗体制最难,曾说:“余之为律,非律也,其犹鬘焉云尔。”此《甲申集》有清初汲古阁毛氏刊本,极精致,很少流传,藏于北京图书馆。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有精抄本。怀传世诗歌集,除《江山集》见另条外,还有《味外轩集》;此集作于清圣祖康熙七年戊申(1668),集中收《看花诗》一百首皆为七绝。其自序云:“予以戊申二月,从吴郡返金陵。日偕二三老友,乘兴寻花。城南城北,江山佳丽,凡有花之地无不到,种花之人无不访,养花之天无不出,以及僧房野店、废圃荒村、一花一树,无不载酒携筇,或乘小车,坐卧其下,徘徊不忍去。凡两阅月,得诗百首”。此编有康熙(1662—1722)间刻本。另有《咏怀古迹》一卷,皆咏南京古迹,诗二十九首,均为七绝,皆有小序记所咏古迹掌故。自序云:“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予以暇日寻揽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诗后附《钟山纪略》。此集刻本为余怀手书上板。极精美,《味外轩集》与《咏怀古迹》皆很难见,今人黄裳将此二编收入其所著散文集《金陵五记》附录中。此书有金陵书画社1982年排印本。

(王学泰)

【江山集】 诗别集。三卷。清余怀撰。集中所录之诗大多写于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至顺治十年之间,其内容与《甲申集》类似,只是伤感气氛更浓厚些。此编包括三个小集:(一)《鸳湖游稿》,为作者于顺治六年至八年游嘉兴鸳湖时作。(二)《石湖游稿》,所收皆作者游苏州石湖所作。(三)《泖湖游稿》,写于顺治十年,游松江泖湖时作,内容多描写身边琐事。此编又称《五湖游稿》,是作者避难吴、越时的生活写照。此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有抄本。清人蒋生沐《东湖丛记》中记载他见到的余怀《江山集》中包括:“一、《平生萧瑟诗》,有虞山某某(按,指钱谦益)序、吴郡叶(襄)序及余自序;一、《三吴游览志》,则吴骏公(伟业)序之;一、《枫江酒船诗》,则姜如须(垓)序之;一、《梅花诗》亦自序。”此刻本与现存抄本内容不同。

(王学泰)

【愚山先生诗集】 诗别集。又名《学馀堂诗集》五十卷。清施闰章撰。闰章生前已享大名,有“南施北宋(宋琬)”之称。其诗,王士禛为作《摘句图》,载于《池北偶谈》,又编《感旧集》,也多选施诗。清圣祖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吴之振编纂《八家诗选》,以闰章为一家,独占一卷。邓汉仪也曾评选《愚山诗钞》二卷,为精选本。闰章诗虽流传颇广,诗话、选本多

有涉及,但其生前并未自行编订与刊刻全集,逝世后诗文集藏于家。在其去世后三十年,扬州织造曹寅致书其子施璫(号隋村),索闰章遗稿,刊之于扬州官署;此为较为完整的作者自订本,但从康熙(1662—1722)间流传的诗话以及选本中还能勾稽出若干逸诗。此集共录古今体诗三千二百八十五首,按体编排,其次序为四言、乐府、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每体之中约略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闰章集中,古体诗很多,五古、七古占二十二卷之多,几近半数。集前有汪琬所作序。此集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棟亭藏板,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有翻刻本,后被收入《四库全书》。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今人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本,易名为《施愚山集》,与文集、杂著分装为四册,另有补遗一卷,从作者残存之手稿遗墨及其子孙记述材料中搜辑到佚文三十五篇、佚诗一百九十首,并附录有研究资料汇编、年谱简编及书目等,为迄今最完善之本。

(王学泰)

【陋轩集】 诗别集。十二卷,续集二卷。清吴嘉纪撰。嘉纪诗得到时人周亮工的称赏,周氏赖古堂刻本为《陋轩诗》的最早刊本;此本仅录诗二百余首,分八卷,刻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初。汪希斯分司东淘(吴氏家乡),曾据周本重刊。康熙十八年(1679),方于震哀其前后之诗刊之。康熙二十三年,程云家、汪舟次复梓其遗稿为六卷;高宗乾隆三十年(1765),泰州陈瓌依旧刻校补刊行。仁宗嘉庆(1796—1820)、宣宗道光(1821—1850)中,泰州缪中重刊其诗,析六卷为十二卷,是为一草亭本。后此版归本邑夏荃。夏氏增选陋轩未刻诗一百二十余首,编为续集上、下二卷,于道光间刊行。这就是吴集中流传最广的“夏退庵本”,录诗一千二百余首。嘉纪诗虽未编年,但此集大体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约始于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迄于作者逝世。续集二卷多写于顺治(1644—1661)初,为与同里王太丹、王鸿宝、方丽祖诸人结社淘上之作。今人杨积庆以此本为底本,并据周亮工刻本补诗九十二首编为十五卷,并校以多种刻本,加以标点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西堂全集、馀集】 诗文杂著合集。一百三十五卷,其中诗歌三十五卷。清尤侗撰。诗歌分十二个小集。(一)《西堂剩稿》二卷,据作者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所写自序言,自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1635)至十七年甲申十年间诗作日多,“丧乱之后,十存二三,因辑为剩稿二卷”,是知此集所收作品多写于明末,可能因多触时忌,故十存其二三。

(二)《西堂秋梦录》一卷,写于作者晚年,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七、八、九三个月所作。(三)《西堂小草》一卷,收清世祖顺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至九年壬辰六月作品,录诗一百二十首。此期为作者出仕清廷时期,自序云:“昔人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予是时殆将出也,故以名之。”(四)《论语诗》一卷,所收皆是以《论语》中语句为题之说理诗。写于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作者在京期间。(五)《右北平集》一卷,写于顺治十二年乙未作者在京期间。(六)《看雲草堂集》八卷。“看雲”取义于杜诗“忆弟看雲白日眠”。作者自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因擅打旗丁被罢官归乡,卜筑于先人庐侧二十一年。此八卷所收即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至康熙十七年戊午二十一年之诗,近六百首。(七)《述祖诗》一卷,所收为题咏其家世的四言古风二十五章。(八)《于京集》五卷。康熙十八年,尤侗举博学鸿儒,授翰林检讨,分修《明史》,在史馆五年。后奉假归,辑为此集。(九)《哀絃集》二卷,作者于康熙十七年戊午赋悼亡,写下许多追念诗、文,皆收入此集。(十)《拟明史乐府》一卷。作者与修《明史》之时,采其遗事,认有可起诫鉴作用者,编为韵语,并附史事,约近百首。编成于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外国竹枝词》一卷。作者采摭旧闻,以成此编,所谓“外国”指南洋一带,于郑和所经之地,多有记述吟咏。以上十一小集之诗刻于康熙二十五年。(十二)《艮斋倦稿》十一卷。作者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请假归田,其间曾游闽海、皖江,四至杭州,此十一卷即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至三十七年戊寅所写之诗。共一千两百余首。此集有康熙末刊本,后皆收入《西堂全集》,亦称《尤西堂全集》。

(王学泰)

【聪山集】 诗别集。八卷。清申涵光撰。此集按体编排:卷一,五古;卷二,七古;卷三,五律;卷四,五排;卷五,七律;卷六,五绝;卷七,六绝;卷八,七绝。集中除言志摅怀之作外,多是与河朔诗派诸子如刘逢源(津逮)、赵湛(秋水)、殷岳(伯岩)、张盖(覆輿)唱和的篇章。涵光集初编于清世祖顺治(1644—1661)间,魏裔介在顺治十年癸巳(1653)曾为之作序。序中云:“大陆多欹崎历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与申子之诗者,其为可传无疑也。乃为之叙而付之梓。”此八卷本当编于清圣祖康熙十四年(1675),因为集中收有《奉寄孙鍾元先生时居苏门年九十二岁传有足疾》诗,考孙鍾元(奇逢)九十二岁时为康熙十四年。此八卷本为刘佑(雲麓)选本,有些卷后有刘佑之评语。邓之诚云:“邓汉仪威称涵光笥中诗甚多,高迈绝伦类,不肯令世人见。此则涵光序张覆輿诗,所谓稍深之语,又难传佈。然则非无深语,特不

肯传佈而已。”(《清诗纪事初编》)刘佑(可能是申氏好友刘逢源子姪辈)曾为蕲春令(集中有《送刘雲麓令蕲春》)。涵光集中的“稍深之语”自然会受到进一步的芟夷。王崇简为初刻《聪山集》写的序中曾言涵光之父殉国难后,涵光南逃,历尽苦难,“悲恻之音,若有痛攀髯属纆之不逮者”。而这类作品在此八卷本却不多见。此集为康熙(1662—1722)间申氏家刻本。

(王学泰)

【王夫之诗文集】 诗文别集。三十六卷,其中《薑斋诗集》凡十八卷。清王夫之撰。夫之在明思宗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春刊刻诗集《滄涛园初刻》,乱后,版片散逸。清世祖顺治五年戊子(1648),又编其诗作为《买薇集》,不久为“土人弄兵者劫夺”。夫之一生写诗颇多,因多触时忌,家又贫困,故其诗绝大部分在作者生前及身后很长时间内未曾刊刻。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夫之子王昶刻《船山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三卷,湘西草堂藏板。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编《沅湘耆旧集》,征求夫之遗诗。夫之后裔王世全与邓合编《船山遗书》,后遂陆续刊佈。穆宗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在南京刻《船山遗书》。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衡阳加以补刊,其中共收诗集十五种、十八卷:(一)《五十自定稿》一卷,所录之诗最早作于顺治五年戊子,最迟者写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二)《六十自定稿》一卷,所录皆作者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诗篇前有自叙;(三)《七十自定稿》一卷,所录皆作者六十岁至七十岁之诗,前有自序;(四)《柳岸吟》一卷,写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其中多为和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白沙)、罗伦(一峰)、庄昶(定山)之作;(五)《薑斋诗分体稿》四卷,按体编排,每体中按年编排,多作于康熙十九年庚申至二十七年戊辰;(六)《薑斋诗编年稿》一卷,写于康熙八年己酉至十五年丙辰;(七)《薑斋诗剩稿》一卷,录诗十四首,其中一首写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八)《落花诗》一卷,写于顺治十七年庚子冬至次年春,包括《正落花诗》十首、《续落花诗》三十首、《广落花诗》三十首、《寄咏落花诗》十首、《落花浑体》十首、《补落花诗》九首;(九)《遣兴诗》一卷,写于康熙二年癸卯,包括《读甘蔗生遣兴诗而和之》七十六首、《广遣兴》五十八首;(十)《和梅花百咏》一卷,写于康熙四年乙巳,包括《咏梅诗》百首和《追和王百谷梅花绝句》十首;(十一)《洞庭秋诗》一卷,写于康熙八年己酉,包括《洞庭秋》三十首;(十二)《雁字诗》一卷,写于康熙八年己酉至九年庚戌,包括《前雁字诗》十九首、《后雁字诗》十九首、《题芦雁绝句》十八首;(十三)《仿体诗》一卷,写作时间不详,录诗三十八首,皆为仿明代名诗

人的七律名作,起自刘基,终于陈子龙、顾开雍,如仿袁凯《白雁》、仿高启《梅花》等;(十四)《岳馀集》一卷,写于崇祯十六年癸未、十七年甲申,当时夫之逃避张献忠之征召,匿于衡岳;(十五)《述病忆得诗》一卷,为作者卧病期间忆得崇祯八年乙亥至顺治四年丁亥所写作品七十馀首,编为一集。以上从第八种到第十三种六种六卷被作者自标为《夕堂戏墨》。此十五种诗集皆为作者所自定。中华书局1962年将此十五种诗集标为《薑斋诗集》与《薑斋文集》合为《王船山诗文集》排印出版。

(王学泰)

【溉堂集】 诗文别集。二十八卷,其中诗二十一卷。清孙枝蔚撰。枝蔚集基本为编年体,分前集、续集、后集。前集九卷,基本上是分体编年,起于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终于清圣祖康熙四年乙巳(1665)。续集六卷,起于康熙五年丙午,终于康熙十七年戊午。此二集为枝蔚就试京师时由赵玉峰出资所刻。枝蔚被放归后至逝世又写诗两千馀首,经本人删削,只存十分之三,编为六卷,在其逝世后,由其子孙匡刊于康熙六十年辛丑。集中,间有作者友人评语,以王士禛、王士禄、汪楫、吴嘉纪评语最多。枝蔚秦人,客居扬州,“溉堂”之名取自《诗经·桧风·匪风》,“谁能亨鱼,溉之釜鬲。谁将西归,怀之好音”,表示不忘乡关,常怀西归之意。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原刊本影印。后集有些篇章有文无目,或有目无文,是知此版亦经过删削与补订。

(王学泰)

【西河合集】 诗文杂著合集。四百九十二卷,其中诗五十四卷。清毛奇龄撰。奇龄才思敏捷,自言为诗每天可一千句,平生作诗万馀首,生前曾刊《夏歌集》、《濂中集》、《鸿路堂诗钞》、《当楼集》、《桂枝集》等。由于对自己诗歌作品不甚重视,奇龄逝世后,其子君远与门生只收存其诗五千首,编为诗集五十四卷。其弟子李塨言其“归田后,学者请较先生诗,先生不答,且曰:‘姑舍之’。因私取《濂中》所剩者,杂以《鸿路堂诗钞》、《丹摘杂诗》,合诸笥所剩,而汇为斯集。旧刻《越州三子诗选》、《越郡诗选》、《空居日钞》诸集一概不录,但五古诗少,远不及七古之半”(见李塨所作序)。全书按体编次,包括二韵诗(指五绝)三卷,七言绝句八卷,排律(指五排)六卷,七言古诗十三卷,五言律六卷,七言律十卷,七言排一卷,五言格诗(即五古,唐古体称格诗)六卷,五、七三韵律(一名小律,一名半律)、六言诗共一卷。其中,间有评语,如邹訐上、史晋生、姜兆熊、刘达、姜希轲、姚淙、来胤佳、平士杰、田得名等人评语。这些评者多为奇龄门人。集后附《徐都讲诗》一卷,“都讲”名昭华,为奇龄女弟子,读奇龄《濂中集》,感佩而从

毛学诗,此卷为“其受学时所存稿”。奇龄曾云:“若以诗,则吾门虽多才,无如都讲者。”此集为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其门人蒋枢书留草堂刊本。

(王学泰)

【海日堂集】 诗文别集。七卷,其中诗五卷。清程可则撰。程氏少时即以诗文名世,为官京都即与享华名流曹尔堪、宋琬、施闰章、王士禄、王士禛、陈廷敬、沈荃等诗酒唱和,有“海内八大家”之称。当时吴之振曾编有《八家诗选》,可则诗独占一卷,此编有清圣祖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刻本传世。可则在家乡南海时即编有《海日堂集》、《遥集楼草》、《萍花草》等诗文集(见《广东通志》)。曹溶为《海日堂集》作序,言其“年才二十馀,不汲汲于世俗之好”。龚鼎孳所作序则言其至京都携此“《海日堂》一编,都人市传观惊叹,等于《上林》、《羽猎》之书”。当时可则作诗颇多,皆入此集。朱彝尊序云:“每一相见,辄出其新诗累百,盖凡名公卿庶寮,下至布衣绌屨之士留京师者,饮食燕游赠送,靡不有诗,益以怀远感旧之篇,岁既久,编为《海日堂集》十卷。”可见可则在京为职方郎中时即有诗十卷。这些诗文集皆未见刊刻传世。后可则于康熙十二年(1673)卒于桂林知府任上,十五年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其侄程翔为三水县令,与其家乡南海相邻,“特具香仪拜于先生故庐”,并为《海日堂集》作序云:“问先生所遗诗文,得《海日堂集》十卷,流离患难之余,所散逸者多矣。”程翔请陈恭尹等论定付梓,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刊刻出版,前有曹溶、龚鼎孳、王庭、钱朝鼎、施闰章、王士禛、汪琬、朱彝尊、陈恭尹、程翔等十篇序,从中可见《海日堂集》演变过程。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翁方纲“石洲草堂”刊刻《海日堂诗集》五卷,其中有康熙刊本未载者数篇,并附有翁氏之评论。后《海日堂集》“岁久漫漶,原版散失,凡书肆中及藏书家鲜有旧本,盖几湮没”,于是可则族孙程士伟以家藏旧本,“细加校讐,订其讹字”,又“其有本集所无而见诸渔洋先生《感旧集》、归愚先生《别裁集》中者俱蒐辑补入,卷帙目次,原序一如其旧,属诸梓人以公同好”(皆见程士伟《海日堂集采补重刊缘起》),于宣宗道光五年(1825)在江苏刊刻。此编共录诗五百馀首,分体编纂。其书版藏于金山县署。

(王学泰)

【尧峰文钞】 诗文别集。五十卷,其中诗十卷。清汪琬撰。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琬曾自刊其诗、文,名《钝翁类稿》六十二卷,其中诗十二卷。康熙二十四年,又刊《钝翁续稿》五十六卷,其中诗八卷。此两稿合为《汪氏传家集》,或称《汪钝吟诗文全集》。此二集据其门人惠周惕所作序云:正、续《类稿》“皆门人编次,未敢有所去取,而传写失真,讹误

多有,先生病之”。于是琬在去世前数月对于正、续《类稿》诗、文重加删汰,互相参订,削去十之二三,并益以晚年文字数十篇,对篇目的排列先后也作了部分调整。由其门人侯官林佶以楷书手钞,哀集成册而付梓。诗集最末一诗为《删校〈尧峰诗文钞〉了有感》云:“纷纷轻薄共沉沦,力障狂流仗一身。举世岂容无定论,异时方解忆斯人。文章自可让馀子,学术要须趋大醇。灯火青荧人迹绝,夜窗独与圣贤亲。”琬认为自己所亲订的诗、文,合于“大醇”,故可以障狂流而传诸后世。集前有宋荦及琬弟子惠周惕所撰之序,刊成于汪琬逝世后三年,即康熙三十二年。

(王学泰)

【定峰诗钞】 诗别集。十三集。清沙张白撰。张白早年就有《辟莽园诗》之编,徐遵汤于清世祖顺治六年己丑(1649)曾为作序,后游楚,又有《楚游诗》之编,楚人杜濬为作序。张白生前所刊仅有《定峰乐府》十卷。其诗集《辟莽园诗钞》十三卷未能刊刻,连抄本也很少流传。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谢鼎镛得知缪荃孙家藏有沙诗集,辗转借得,其跋语云:“余浏览一过,则诗系分体而非编年,每卷首叶第二行必署‘同学峨嵋曹禾选’,则是书尚系选本,而非原本也。夫峨嵋与定峰同业漫园,夙相雅故。《定峰诗钞》之选,固非峨嵋莫属。但书目载十三卷,逐卷细核,尚少卷五七言占下一卷,则即以选本论,亦尚系残本而非全本可知。然定峰《辟莽园诗钞》,自顾氏心求搜辑《江上诗钞》尚及一见,而后嗣经咸丰庚申(1860)之乱,即化劫灰,则居今日而获睹是编,已属先哲呵护之灵,而不得谓非幸事也。”后祝氏又云:“余复竭力搜罗成补遗一卷,以符原书卷数,并遵夏闰枝先生嘱将《定峰乐府》本所有律绝概附是编律绝之后。”又云:“至署名不曰《辟莽园诗钞》,而曰《定峰诗钞》者,以是编尚非《辟莽园诗钞》之旧也。不仍曰《定峰诗选》而曰《定峰诗钞》者,以是编不啻《定峰诗钞》之全也。”全编录诗一千馀首,其编排顺序为四言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补遗。有清同治十三年江阴陶社排印本。(王学泰)

【定峰乐府】 诗别集。十卷。清沙张白撰。此集所收均为张白乐府诗。作者重视诗歌的“奖正刺邪、讽谏规箴”的社会作用,认为诗歌应该成为“匹夫匹妇之心声”,而古乐府及唐代以后新乐府诗多为这类作品,故仿效古乐府、新乐府撰写了大量乐府诗,编为此集。集中作品多以百姓生活为题材,摅写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与愿望,如《蚕妇叹》、《二月丝》、《元麦行》、《续繅绫行》、《大田叹》、《巢林燕》、《青州霖雨叹》、《战城南》、《汲井欢》、《采桑引》、《拆屋》、《缚虎

行》、《铸钱引》等。这些乐府或用古题,或自制新题。其涉及的题材也十分广泛。张白精通史学,集中咏史之作亦颇多,多据史书以敷衍成篇,实不可取,如《咏史》十二首等。此编初刻于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集前所附《诸公论乐府诗》收有曹禾、钱陆灿、杜濬、王崇简、朱崱、魏裔介、施端教、汪琬、龚鼎孳、高珩、吴山涛、詹夔锡、洪昇、陈玉璫、曹延懿等十六家有关乐府诗的论述,并有曹禾的批语。此康熙本不多见。常见者有宣宗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江邑周庄后乐堂精刊本,其批语则套色印刻,书后有写于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的鲍桂星跋语。

(王学泰)

【己畦诗集】诗别集。十卷,“残馀”一卷。清叶燮撰。叶燮集最早编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亦刻于此年。曹溶为作序云:“叶子星期刻《己畦诗》数卷,受而读之,乃大异乎世之作者。”可是传世之十卷本中所收甲子岁以前作品仅有一、二卷中百数十首诗,亦大多平庸,“异乎世之作者”之处并不明显,此二卷恐非曹氏所说之“数卷”本。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又有《西南行草》之编,为其游匡庐、罗浮等名山大川时作品,有张玉书所作序。此集亦未见传世,而十卷本中收有此期之作品。十卷本可能为燮自订本,集中所收诗章之排列,大体以写作时间为先后,但未注明编年。从集中可考写作年代之作品得知此编始于康熙二十年辛酉,终于三十八年己卯,录诗一千馀首,主要为其后半生之作品。其晚年游“会稽五洑之胜”的诗作并未收录在内,则此集可能为作者往游之前的自订本。其早岁诗作部分馀剩收在“残馀”之中,主要是康熙十四至十五年任宝应县令及其被罢官之初的作品,包括被后世所称道的《纪事杂诗》十二首(如《御马来》、《河漕堤》、《军邮速》等)在内。此卷共收录诗作八十馀首,其中标明时间的作品,最早作于清世祖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此“残馀”一卷非燮自订,为其子孙所补。燮集在康熙(1662—1722)间即有二弃草堂刊本,后“阅岁既久,渐多遗失,存者间有字画磨灭”(沈德潜《补刻己畦先生诗》序)。经叶氏曾孙叶昭九“访求原本,重加补刻”,复传于世,有高宗乾隆(1736—1795)间刊本。

(王学泰)

【东庄诗存】诗别集。七卷。清吕留良撰。吕诗触时忌处太多,故作者生前虽已编纂诗集,但终未刊刻。留良身后又遭大狱,并被开棺戮尸,终清之世,无人敢刻其诗。其诗集只以抄本传世,但抄本秘密流传之广甚至超过刻本。今人孙殿起《贩书偶记》载《吕晚村诗集》二卷,为高丽人抄本,虽然所录皆为作者早年作品,但可知其诗亦为域外人士所宝。此集

刊印于清亡之年,即宣统三年(1911)三月,系据抄本排印,包括《万感集》、《怅怅集》、《梦觉集》、《真腊凝寒集》、《零星集》、《东将集》、《欬气集》等七个小集,集各一卷,为神州国光出版社印行。(王学泰)

【曝书亭集】诗文别集。八十一卷,其中诗二十二卷。清朱彝尊撰。彝尊生前多次编刻自己所撰诗文集,计有:(一)《南车集》,刊刻于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彝尊入粤归,刻其游粤诗一百三十首和曹溶诗三十二首为一卷,前有署名“蔗馀道者”之序,言:“自变故以来,诗书之气,无所附丽,天下之才人,往往化为诗人。”语极沉痛。(二)《竹垞文类》二十六卷,录诗十四卷。集中收集了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前绝大部分诗、文,题为“布衣朱彝尊”撰,前有王士禛、魏禧两序。(三)《竹垞文类》二十五卷,刻于彝尊出仕之后(约刻于康熙二十三年),故删去了其中有《吊李陵文》的第二十六卷,并削去总目及“布衣朱彝尊”一行。(四)《腾笑集》八卷,皆为诗赋,编于康熙二十五年,所收多为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试后至二十五年的诗赋。“腾笑”取孔稚圭《北山移文》中“南岳献嘲,北陇腾笑”语以自嘲。此集约刻于康熙三十年左右,故集中补入了一些康熙二十五年以后的作品。(五)《曝书亭集》,编于康熙四十八年,即作者去世的一年,意在搜罗其一生诗文著作,实际上对早年具有战斗精神的作品作了大量删除。如《南车集》录诗一百三十首,而此集只录七十馀首,竟有五六十首缺载。另外《竹垞文类》与《腾笑集》中亦有许多作品缺载。此本按年编次,但不完全正确。集中文字错讹,特别是题目改换、编乱的现象亦屡有出现。此编有康熙四十八年原刊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据原刊本影印。另外还有《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因为《曝书亭集》缺载太多。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彝尊五世孙朱墨林汇集了《竹垞文类》、《腾笑集》及今已不存在的《家藏稿》、《曝书亭类稿手定稿》、《石园集》、《漫兴集》等集中为《曝书亭集》中所缺载的诗、词、文,并从各种书中广为钩辑,编为《曝书亭外集》八卷,其中诗五卷,词一卷,文二卷,有朱氏潜采堂刊本。此集搜罗仍未全备,如《南车草》中某些诗仍有缺载。(王学泰)

【翁山诗外】诗别集。十九卷。清屈大均撰。大均诗在当时已享盛名,尝自谓:“予得名自朱锡鬯(彝尊)始。未出岭时,锡鬯已持予诗遍传吴下矣。”(《屡得朋友书札感赋》)其诗集较早刊本为《道援堂集》十卷、《屈翁山诗集》八卷,前者为钱塘沈用济选,后者为鸳水徐肇元选,沈、徐皆为浙西人,二集之刻,可能与朱彝尊影响有关。后其子屈明洪、其门人陈阿平分别编纂了两种《翁山诗外》。明洪所编十九卷,阿

平所编十八卷,第十八卷原缺。此两本晚出,自较沈、徐二氏所编收录较多。两种《诗外》所录亦互有出入。大均集中诗章多触时忌,于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书被禁焚版,其子屈明洪因自首减罪,被遣戍福建。高宗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严格查禁犯禁书籍高潮中,又从大均族人屈稔浚等人家中发现《翁山文外》、《翁山诗外》,于是再度申明严禁屈书。清末帝宣统二年(1910),国学扶轮社排印《翁山诗外》,作二十卷,较康熙间所刻诸本完备,惜错字较多。

(王学泰)

【松桂堂全集】 诗文别集。三十七卷,其中诗十三卷。清彭孙遹撰。孙遹以诗词名家,清圣祖康熙间,举博学鸿儒,取为第一,生时即享大名,与诗坛领袖王士禛唱和,曾刊《彭王倡和集》。各种诗选、诗话亦多录其诗。生前曾刊《南沚集》三卷,收录康熙二年癸卯(1663)至五年丙午作品,录诗四百八十餘首。此集为孙遹游南粤三年之作。其手订全集,生前未能刊刻,授其子彭景曾。景曾家贫,后宦游又因挂累去官,一直未能刊刻,直至高宗乾隆八年(1743)方侵木问世。集前有钱陈群之序,详细叙述了,彭集问世过程。此集按年编纂,始于顺治十年(1653),迄于康熙三十八年。前三卷不编年,皆收应制之作,包括赋、乐章、省试及应制之诗。中间十一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至二十一卷皆未标明写作年代。乾隆八年刊刻此集时并附《南沚集》三卷、《延露词》三卷,几乎包括了彭氏全部作品,但详检当时诗话及诗选本还有遗漏,仍可再辑。此《全集》收入《四库全书》,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乾隆八年刻本传世。

(王学泰)

【独漉堂全集】 诗文别集。三十一卷,其中诗十四卷。清陈恭尹撰。恭尹生前尝自刻《独漉堂稿》六卷、赋一卷,其中第四卷分上、下。其写于清圣祖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的自叙云:“今四十无闻,老矣。念方将请教于大人长者,吾之善不善,当与天下共见之,何有区区诗文之末哉。因命儿曹,汇为一编,偶一省览,辄掩卷太息,自伤失学而已。”邓之诚言此编“载诗至康熙十九年庚申,似即其时所刻”《清诗纪事初编》。可能诗集初编成于康熙十三年,适逢三藩之乱,故拖至十九年方刊刻问世。此编有彭士望与赵执信二人所作序言。康熙五十六年,恭尹逝世十七年后,又刻此三十一卷本。此本所收诗包括十一个小集。卷一《初游集》、《增江前集》、《中游集》,卷二至卷三《增江后集》,卷四《江村集》,卷五《小禺初集》,卷六《小禺二集》,卷七《小禺三集》,卷八《小禺后集》,卷九至卷一三《唱和集》,卷一四《咏物集》,卷一五为诗餘。卷一六以后还当有《寿言集》五卷,未

刊。每小集前皆有作者或编者所著小序,说明写作时间与名集之原由。这些小序的集合便是作者之小传。如《初游集》小序自言生平与父亲殉国事迹,又言自己“茆独一身,萧条四壁,犹之客也,故谓之游,其诗虽未成声而哀伤之所自始也。自己丑迄甲午(1649—1654)之春,存其稍可观者为《初游集》”。又如《小禺初集》小序云:“小禺者,番禺二山间一小丘也。甲子始卜居兹丘之阳,丙寅之冬遂移家焉。”恭尹自编之集至《小禺二集》,自清世祖顺治五年戊子至圣祖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48—1698)前后五十年,唯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十九年庚辰未编。《小禺后集》为恭尹子陈贛所编,收康熙三十八、三十九两年之诗,《唱和集》、《咏物集》亦皆陈贛编。此三十一卷本的前六卷亦非恭尹最初自编之《独漉堂稿》六卷。三十一卷本前六卷录诗至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比原六卷本多十八年之诗。可知陈贛编恭尹诗时作了大量的删削,作者最活跃时期的作品只编作一卷(第一卷),其中必有大量违忌犯禁作品被删去。三十一卷本最早刊本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所刻。宣宗道光五年(1825),陈氏裔孙陈量平又据印本重加剞劂刊刻,穆宗同治(1862—1874)年间及民国年间皆据此本加以刷印或排印,1919年印本前有德温肃所撰年谱。

(王学泰)

【珂雪诗】 诗别集。六卷。清曹贞吉撰。此编包括《珂雪集》一卷、《珂雪诗二集》一卷、《朝天集》一卷、《鸿爪集》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十子诗略》一卷。《珂雪集》为曹贞吉第一个传世诗集,录诗一百六十五首,始于清圣祖康熙八年己酉(1669)二月,迄于十一年壬子四月,经李良年及贞吉弟曹申吉论定。前有李、曹所撰二序,于康熙十一年刊刻问世。《珂雪诗二集》,录诗凡一百九十餘首,其中有与《珂雪集》同一时期之作品,有的写于康熙十年辛亥、十一年壬子、十二年癸丑。此集曾经其弟曹申吉论定,初刊于康熙(1662—1722)间。《朝天集》,贞吉出为徽州同知,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一度进京,返徽州后将写于道途之诗编为此集,录诗七十餘首,前有袁启旭《朝天集引》,后有靳治荆跋,介绍了此集编写过程。《鸿爪集》,录诗四十四首,乃作者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在徽州任上往来陵阳所作。前有靳治荆、王炜二序及靳治荆题辞。《黄山纪游诗》,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晚秋,贞吉在徽州任上,公事之暇游黄山凡七日,得诗三十七首编为此集。前有汪士鋐之序,靳治荆之题辞。此集与上两集皆刊于作者在徽州时。《十子诗略》,为王士禛所编选。本为宋琬、王又旦、颜光敏、叶封、田雯、谢重辉、丁炜、曹禾、汪懋麟及贞吉等十人(时称“金台十子”)之诗的选本,刊刻后,“其板

分藏各家,故往往各以别本单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集即贞吉曾孙曹益厚刷印问世。集中有些篇章在《珂雪集》、《珂雪诗二集》曾出现,如《小游仙诗》等见于《珂雪集》,《和翼辰〈小屋如渔舟〉》等见于《珂雪诗二集》。贞吉诗作远不止此,其曾孙益原序贞吉诗集云:“曾大父自新安内召,回翔朗署,以疾辞湖广学政,遂归里,前后十馀年,诗若干首,未及付梓,并珂雪遗诗尚夥,后或有力哀集增补,将以是为断。”然后世终未见有人哀集刊刻,其遗诗遂多散佚。此编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本。(王学泰)

【带经堂集】 诗文别集。九十二卷,其中诗五十卷。清王士禛撰。士禛少有诗名,诗作极多,随写随刊,早年就有《落笈堂集》、《阮亭诗选》、《过江集》、《入吴集》、《白门前后集》等。此类小集传世很少,流传较多者为:刻于清圣祖康熙八年(1669)的《渔洋山人诗集》二十二卷,为编年体,录诗始于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迄于康熙八年。此集乃合《过江集》、《入吴集》、《白门集》而成。《渔洋山人续集》十六卷,刊于康熙二十三年,亦为编年体,录诗始于康熙十年,迄于康熙二十二年。《蚕尾集》十卷,刊于康熙三十五年,前二卷录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之诗作(其中康熙二十三年冬至康熙二十四年所作诗另在《南海集》中,不在此集之内),后八卷为文。《蚕尾续集》二卷,康熙四十四年刻。录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四十三年诗作(其中康熙三十五年诗不在其内,另入《雍益集》中)。《蚕尾后集》二卷,刊于康熙四十八年,录康熙四十七年一年诗作。《南海集》二卷,刊于康熙二十五年,录康熙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出使南粤之诗。《雍益集》二卷,刊于康熙三十六年,录康熙三十五年出使陕西、四川所作之诗。以上诸集皆士禛亲自编订行世。此《带经堂集》包括上述《渔洋山人诗集》、《续集》、《蚕尾诗集》、《南海集》、《雍益集》、《蚕尾续集》、《后集》,等等。只是将后四个小集与士禛康熙四十四年归田后六年诗作合为《蚕尾续诗集》十卷。此编为作者自编集中录诗最多者,但仍有遗漏,后又编有《渔洋山人集外诗》上、下两卷,集中收录佚诗一百馀首,有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1777)钱大昕序刊本。《带经堂集》始刻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完成于五十年辛卯冬,为七略堂精刊本。

(王学泰)

【渔洋山人精华录】 诗别集。十卷。清王士禛撰。此集是士禛诗作的自选本,托名其门人盛符升、曹禾。士禛生前享大名,主持诗坛应酬繁剧,作品亦多,刻集不少,而平庸之作的广泛传播,必然给读者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士禛曾引东坡赞美晋人刘伶之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又言黄庭

坚、徐祜卿晚年自定其集,删其诗,所存之诗皆不多。因此,士禛也从已刊诗集——《渔洋山人诗集》、《续集》、《蚕尾集》、《南海集》、《雍益集》中选各体诗篇一千馀首,厘为十卷,其中古体诗四卷、近体诗六卷,托门人林佶写刻,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1770)问世。其佳作名篇,大多收入此编之中,故其流传极广,远过于《带经堂集》,后世读士禛诗者亦多读此集。《四库全书》即收此编,其他各集皆列入“存目”。后世注士禛诗者亦注此书,最早注本有清世宗雍正(1723—1735)间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金氏始撰于康熙四十九年,成书于雍正十二年,前后历时二十五年。此书以笺注典事为主,较疏略,多错谬,但编年较准确,多引王氏自己文章、笔记以证其诗。高宗乾隆(1736—1795)间,著名学者惠栋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附《年谱》二卷及《金氏〈精华录笺注〉辩讹》一卷,指出金注本引书、地理、人物之错谬九十馀条。此书有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精刊本。另有《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六卷,乃伊应鼎选编并评注。此书以评论分析为主。刊于乾隆二十四年。

(王学泰)

【西陂类稿】 诗文别集。五十卷,其中诗二十二卷。清宋荦撰。荦平生所著诗颇多,随得随刊,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将曾刊之各个小集,重自删汰,并为一编,名曰《绵津山人诗集》。诗集中仍存诸小集之目,前有汪琬、刘榛二序,凡三十一卷,包括小集十四种。此《西陂类稿》为宋荦晚年致仕家居时所编定的诗文合集。诗集卷数较《绵津山人诗集》为少,而小集之目加多。前有陈廷敬序,言此编乃是“综其条贯,列其叙位,次其时月,别其游处,胪其向所名者,汇为全编,名《西陂类稿》。西陂者,旧庐也”。全编包括《古竹轩稿》、《嘉禾堂稿》、《柳湖草》、《将毋楼稿》、《古竹圃续稿》、《都官草》、《双江倡和集》、《回中集》、《西山倡和诗》、《续都官草》、《海上杂诗》、《漫堂草》、《漫堂倡和诗》、《啸雪集》、《庐山诗》、《述鹿轩集》、《迎銮集》、《沧浪亭诗》、《红桥集》、《迎銮二集》、《清德堂诗》、《迎銮三集》、《藤荫酬倡集》、《乐春园诗》、《联句集》,凡二十五种,按写作时间、地点、内容归类编次。有的集子全部都是扈从皇帝或迎送皇帝所写下的奉旨应制之作,没有多大价值,如《回中集》、《迎銮集》等。小集中卷帙最繁者为《漫堂草》独占五卷,多作于在江西为官时,其次为《沧浪亭诗》近三卷,作于在江苏作巡抚时;其他小集大多仅一二卷,有的甚至不到半卷,如早年所作的《古竹轩稿》、《嘉禾堂稿》、《柳湖草》三集占一卷,每集仅存十馀首诗,可见作者对少作删汰之严。此集为宋荦门人周龙藻所编,有康熙五十年家刊本。(王学泰)

【**东江诗钞**】 诗别集。十二卷。清唐孙华撰。孙华早年以制艺闻于世,以博闻强记为人称誉。其同学沈受宏序其诗集云:“顾其为文,自时文、古文而外,不屑屑于声律,虽间有题咏,传世者盖少。晚成进士,需次里居,乃肆力于诗。”是知孙华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始大力为诗。此集所收皆为康熙二十七年至五十六年的作品。其诗集之刊刻,始于康熙三十三年,为其弟子揆叙出资所刻。揆叙在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的序中言:“先生所为诗文甚夥,不欲刊刻流布以自炫鬻。予力请再三,始出近所为诗数百篇,复加淘汰,存其十之四五,鸠工镌版,质诸海内。”晚年,诗作益多。康熙五十六年,其“门弟子,请付剞劂,乃复哀辑前后诗,手自删定”(见王吉武所作序),刊刻问世。孙华对初刊本作了较大的删削,康熙三十三年以前诗仅存百馀首。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澹馀诗集**】 诗别集。四卷。清曹申吉撰。申吉自序其集云:“自甲午岁(1654)初学声律,及入馆后,以诗为课,性情所至,时成吟咏。”可知其诗作甚夥。不幸后为贵州巡抚,死于三藩之乱,或云从逆,或云殉难,毁誉不一,其集遂不为世所重。其侄曾孙益厚序此集云:“乃至生平撰著,亦既誉溢当时,声施后世。而一经兵燹,遂复销沉散佚,不尽流布,有足悲者。中丞(指申吉)诗凡数种,自吴难(指吴三桂之乱)后,《澹馀前集》板既湮漫。最后,《黔行》、《黔寄》二集,原板亦湮灭无存。”在黔中所作,除曾刻入《诗观》之六十馀首,还为世所知外,其他则沦没无存。益厚又云:“《黔行》犹家藏一册,《黔寄》三册遂无从追觅矣。”此编乃王士禛所续订,据曹益厚云,“原无序,因暂以前集胡(世安)薛(所蕴)两相国序,并中丞自序弁其端”。可知此编只是曹集之一部分,不包括其早年及晚年作品。此编始于清世祖顺治(1644—1661)末,终于圣祖康熙七年戊申(1668)。其康熙十年出抚贵州之作品,由于益厚未刻,未见传世。《澹馀诗集》刊于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附有《南行日记》一卷,乃康熙六年申吉奉旨祭祀衡岳时写于来往道途之中,其中亦有诗数十首,以写道途所见所感,为《澹馀诗集》所未收。(王学泰)

【**秋锦山房集**】 诗别集。十卷。清李良年撰。良年诗作颇多。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以前编有“纪岁诗”七卷,曾在贵州刊刻。数年后,良年删定此编,仅存十分之七。此后诗作虽亦时有编纂,但未刊刻,故多零落。此编为良年子潮偕整理刊刻于良年去世之后,录诗一千二百四十一首,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良年兄绳远为《秋锦山房集》所撰之序云,此编“断自丁未(1667)以前家居及出杭、湖两州间诸

诗为第一卷;丁未客都下抵宣府历边缴诸诗为第二卷;己酉(1668)偕汪户部于金陵复如京师诸诗为第三卷;辛亥(1671)春从曹侍郎入黔中暨癸丑(1673)秋同弟分虎东归诸诗为第四卷;戊午(1678)及近游滁颍间诸诗为第五卷;戊午之夏被荐入京师至己未(1679)诸诗为第六卷;是岁客濠梁至乙丑(1685)还家诸诗为第七卷;自此居家至戊辰(1688)诸诗为第八卷;是岁入闽中中暨庚午(1690)归来诸诗是为第九卷;辛未(1691)以后遂不复出至甲戌(1694)诸诗为第十卷”。此编远非李良年作品之全部。后合刊其诗、文、词及简牍,为《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其中诗、文各十卷,词二卷,《外集》则为简牍。其诗集前有李绳远序,后有李潮偕跋,并附朱彝尊所撰《徵士李君行状》。有康熙三十五年丙午刊本。(王学泰)

【**古欢堂集**】 诗文别集。三十六卷,其中诗十四卷。清田雯撰。雯生前即曾编辑刊刻其诗集,如其《輶轳诗自序》云,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正月,奉使祭告山川之后,“即以蜡屐命游,概探其胜,往往纪之文辞,缀以诗篇”,因编次成集。但此类小集皆不传。又曾刻《山蘊诗》及《补刻山蘊诗》。其《补刻山蘊诗自序》云,“《山蘊诗》刻,始于壬子(1672),迄于甲戌(1694)止,内辛未(1691)、壬申(1692)两年无诗,凡二十二年,合计千馀篇”,后一度自厌此集录诗之多,日思痛楚而重刊之而不果。“无何,长夏病寂,偶遇废簏,遂出旧稿,初上羹敝帚,无一可存,再阅一过,逐手莫释”,如逢故人,遂“又检刻一百二十五篇,附于甲戌卷末”。此集编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从其自序中可知《山蘊诗》系以写作时间为序,迄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后又“补刻”旧作“附于甲戌卷末”。此《古欢堂诗集》分体编排,其次序为:古杂体、五言古诗(三卷)、七言古诗(三卷)、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二卷)、七言律诗(二卷)、五七言绝句(三卷),录诗一千三百馀首,包括《山蘊诗》全部和《补刻山蘊诗》,以及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以后的诗作。《古欢堂诗话》云:“余老患怔忡之病,不能作诗,一概应酬泛作,皆他人代为之。”是知其晚年作品数量很少。此集有康熙(1662—1722)间刻本传世。高宗乾隆(1736—1795)间,《古欢堂集》(包括诗集)被收入《四库全书》。(王学泰)

【**芦中集**】 诗别集。十卷。清王搢撰。搢少有才名,师事吴伟业。吴氏编《太仓十子诗选》收搢《步蟾集》,此为其诗集最早之编刻。搢于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游京师,出《据青集》一卷,请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指正。士禛为作序,言自己之诗“不逮虹友远甚,才不才之殊不能强也。”是知搢在康熙十五年前

诗集,有名《据青集》者。此《芦中集》为作者晚年编定,录诗六百九十五首,按年编定,起自康熙十五年丙辰,终于三十六年丁丑,所收多为中年以后作品。早年诗作,所收极少,自世祖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至康熙十四年乙卯二十年间,仅录诗一百三十六首。康熙十四年以后亦有间断,如卷三录诗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八月,而卷四起自十七年戊午九月,中间两年无诗;又如卷五终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六月,而卷六起于二十九年庚午九月,中间三年无诗,故知编此集时必有所删削或遗漏,非其全璧。此集以王士禛所撰《据青集序》为序,以表达其知遇之感。此集初刊于康熙三十八年,后流传不广。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原刊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东皋禅师集刊】 诗文别集。五卷,其中诗一卷。清东皋禅师撰。近人高罗佩编注。禅师(1639—1695)俗姓蒋,名兴传,字心越,初名兆隐,别号东皋,又号鹭峰野樵、越道人。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八岁出家于苏州报恩寺,年十三广游江浙,谒觉浪于寿昌寺,参究禅法,因痛明亡,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东渡日本,被水户藩王德川光圀迎至水户,驻锡天德寺,后更名为寿昌山祇园寺,是为日本寿昌派开宗之人。东皋博学多艺,善诗文,长于琴术,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编注此集的高罗佩,荷兰人,字芝台,曾在荷兰驻日本使馆任职,抗战期间,曾在荷兰驻中国使馆中任职,著述颇多。东皋诗文集不存于中土,而在东瀛。高氏在日本学琴,“始闻禅师名而征诸中国文献,其名不彰,心窃憾之。用是发愿,拟辑遗著,汇为一集,传刻于世。辑得《东皋心越禅师全集》付梓有日,适逢太平洋战事起,此事遂废”(见高氏《自序》)。其《东皋诗选序》又云:“禅师诗,今存抄本二集。一水户彰考馆藏《东皋集》六册。一水户祇园寺藏《东皋心越大禅师杂咏》一册。惟两本所录之诗,虽间有记年月日者,而缺者甚多。故孰先孰后,今日已不易考定。欲以时间第其先后,殆不可能。余就其诗之内容,试分为总(兼具、并摄)、法(佛法、禅机)、人(感旧、唱和)、境(游览、咏物)、时(感时、述怀)五部。顾此亦就大体言之耳。禅师之诗,不当以诗人之诗论。特以韵语宏揭佛法,兼寓机锋。其体裁亦似诗似偈。故以上五部,应以法为主。余四姑各从其类,不能严格相绳也。《禅师全集》问世,宜待异日,兹就总、法、人、境、时五部各选若干首,并加校注,名曰《东皋诗选》。”(《诗选序》)全书共选诗一百七十九首。此书其他四卷为《东皋心越禅师传》、《东皋文选》、《东皋琴学东传系略》、《东皋善缘辑要》。此书有194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王学泰)

【百尺梧桐阁诗集】 诗别集。十六卷。清汪懋麟撰。懋麟在刻此集前曾刊有《凤皇台上诗》、《敬亭游草》、《五入燕集》、《南徐倡和诗》、《吴门游览诗》。这些皆为游览之作,随得随刊。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作者家居,整理旧作,编为此《百尺梧桐阁诗集》,亦有驳斥当时人们对其讥评之意。作者在此集的“凡例”中云:“余学诗初由唐人、六朝、汉、魏、上溯《风》、《骚》,规矩矩折,各有源本,不敢放逸。庚戌(1670)官京师,旅居多暇,渐就颓唐,涉笔于昌黎、香山、东坡、放翁之间,原非邀誉,聊以自娱,诂意重忤时好,群肆讥评。故兹集前后并存,俾览者知余本末,而亦自验所学,一变再变,诚不自知其非矣。”懋麟认为自己诗作一贯宗唐,只是在京师时一度学宋,引起论者的不满,故将自己诗作按年排列,让读者自己判断。又在“凡例”中云:“兹集编年始自康熙元年壬寅,随年增入,卷无定数。前此少作,自志学以来,即事拈弄,不过风云月露,语涉儿戏,悉从删削。癸卯(1663)秋举省试入京,始得山川、友朋之助,弃去帖括,肆力为诗。十馀年奔走南北,触绪写怀,凡所得诗,十存四五。虽诗不必工,而意之所寄,亦不忍弃,用志岁月。”此编存诗一千二百九十首,按年编次,刻于康熙十八年。前有计东、徐乾学二序。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刊本影印出版。作者逝世于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十八年以后十年诗刊为《百尺梧桐阁遗稿》十卷,有康熙五十四年瞻芑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据以影印。(王学泰)

【聊斋诗集】 诗别集。五卷,续录一卷。蒲松龄撰。松龄一生撰著小说,诗文乃其馀事。松龄去世后,张元为撰墓表,言其有“诗集六卷”。其孙蒲箬为撰行述,言其有诗“千馀首”,但因家贫,未曾刊刻。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卢见曾编纂《国朝山左诗钞》,录其诗十九首,此为蒲诗初次刊刻。仁宗嘉庆(1796—1820)间,山东学政张鹏展编纂《国朝山左诗续钞》,于蒲氏裔孙处得聊斋诗五卷,又录其诗十三首,并为《聊斋诗集》作序,将原稿璧还蒲家。宣宗道光(1821—1850)间,冯继昭编纂《般阳诗萃》,录蒲诗一百四十五首。德宗光绪九年癸未(1883),潍县高翰生《跋聊斋诗集》云:“癸未夏,搜集齐鲁先哲遗书,陈晋卿出是编见贻,谓此获自蒲先生后裔;手割数首入桑梓之遗,其馀不忍弃置,属余亟为表扬。余受而读之。见其签共五册,计一千二百九十五首;中更兵燹散佚,仅存九十七首,为一册。按年编次,起辛卯(应为庚寅)迄甲午。”此为作者临终前五年之诗。另外,蒲诗集亦以抄本相传,蒲家传抄之“五册本”于文宗咸丰(1851—1861)间、穆宗同治(1862—1874)间散逸。蓬莱栾调甫藏有手抄残帙一卷,存诗

起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迄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凡二百三十一首。淄川孙锡嘏手定《聊斋诗集》上、下卷,存诗三百五十五首。今人路大荒在1956年夏“假得淄川友人所藏《聊斋诗集》五卷,后附《诗馀》一卷。存诗五百三十三首,除第一卷外,均按年编次。起乙卯(1675)迄甲午(1714)”(《蒲松龄集·编订后记》)。在此基础上,路氏“把前后所得,去其重复,依《聊斋诗集》例,按年排比,分为五卷,并将原有张鹏展序列在前面(按现在印本将张序放在最后)。至于一些不能确定年次的,则另辑续录成一卷。共存古今体诗凡九百二十九首,统为六卷”。“在排印期间,又假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聊斋诗文集》旧抄本,内中除与上述各本重复者外,有十馀首为《诗集》所无,但因不能确定写作年次,故只得均收入续录中”(《编订后记》)。此集起于康熙九年庚戌作者三十一岁时,终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作者逝世前一年。此《诗集》收入《蒲松龄集》中,有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排印本。(王学泰)

【莲洋集】诗别集。二十卷。清吴雯撰。王士禛曾言吴集“一刻于吴,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门”(见《莲洋集》曹学闵序),但此三编皆不可见。曹学闵又云:“天章歿后,渔洋手定《莲洋集》抄本,临汾刘绳远得之北平黄侍郎家,宋编修为校订刊行,即今所传刘本也。刘本跋云:‘友人杨山夫示余先生手稿一帙,渔洋先生丹墨如新,又得洪洞观察叔茂本可千馀首。黄本视观察本多十四五,间有渔洋评语。’据此,则杨山夫抄本尽出渔洋评点,而黄侍郎家本不尽出渔洋评点可知也。”刘绳远即刘组曾;黄侍郎即黄叔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士禛所批之《莲洋集》“实已归还吴氏。乾隆辛未(1751),汾阳刘组曾哀其全稿刻之,又以士禛所评者别刊一小册并行,越十三年甲申(1764),蒲州府同知山东孙谔始从雯侄敦厚得士禛所定原本,简汰重刊,详载士禛之评,并以刘本所遗者补刻于后,以所见墨迹补之。其士禛所删而刘本误刻者,咸为汰去。凡得古诗二卷、近体五卷、补遗一卷、诗馀一卷、文一卷”。孙本意在引士禛评语以重雯,士禛所不取者,一概删去,录诗比刘本少。刘本后,组曾跋语云:“先生弟霞哭君诗云:‘收得遗诗三千首’,今所录千九百有奇。”是知刘本录诗已与二十卷本相去不远。此二十卷本由翁方纲编订,录诗二千零六十七首,虽未必是吴诗全部,但迄今为止是历代所刻吴集中录诗最多者,并附录诗话二十三事,录与吴氏唱和诗三十二首、词一首。诗中亦有士禛评语与方纲之校语,于清仁宗嘉庆(1796—1820)初刊刻行世。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版,收入《四部备要》,卷前附翁方纲所撰吴雯年谱。又清

高宗乾隆三十二年(1767),苏尔珪、刘赞选刻傅山及吴雯诗为《晋两徵君诗》,谓得莲洋诸刻本及手稿绢素,未经问世者,共九百馀首,其中亦必有二十卷本所未载之吴诗。(王学泰)

【稗畦集、稗畦续集】诗别集。不分卷。清洪昇撰。昇所著诗集可知者有《啸月楼集》、《幽忧草》、《稗畦集》、《稗畦续集》四种。其中《幽忧草》已佚,《啸月楼集》七卷,有抄本流传到日本,国内仅有照片。《稗畦集》为昇早年诗作选本,前有朱溶、戴普成(洪昇连襟)所作之叙,为朱溶、朱彝尊二人同选,从千馀首诗中删削为二百六十九首,按体编排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其中绝大多数为五律(一百二十四首)。此编选成,本欲付梓刊刻,未果,现仅有抄本传世。现存抄本有二:一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一为南京图书馆藏本。上海本中存录之诗,标明年代者,最早为《癸丑除夕》,写于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最迟为《戊午除夕》,写于康熙十七年。南京本逸去朱、戴二叙及五古、七古,但在五律前多出七律一百四十一首。所多七律标明写作时间者,最迟有写于康熙二十六年的《丁卯除日客舍作》。此首写于朱溶作叙后一年,是知南京本为较晚的抄本。二朱编选完《稗畦集》后,作者可能感到二朱所选七律太少(仅十七首),于是又从删馀七律及新作七律中选出一些补入,使之与五律数目大体均衡。《稗畦续集》为昇诗集的唯一刻本,为管蔚林所编选,前有其门人汪燊序。此集皆选五律,凡一百八十馀首。所收之诗有出自《啸月楼集》者,有写于康熙二十六年以前为《稗畦集》所不载者,也有写于《稗畦集》编成以后者。所选之诗标明写作时间而最迟者为《送郑在宜令凤县》,其四有云:“南北风尘别,蹉跎五十三。一丘吾愿足,百里尔才堪。”此诗写于康熙三十六年。昇诗中有些作品涉及康熙(1662—1722)年间朝政,并有少量感怀故国之作,如《稗畦续集》中就有《京东杂感》、《毛殿雲斋中读朱若始先生〈表忠录〉感赋》等,于是在高宗乾隆(1736—1795)间此集被列为禁、焚书。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将《稗畦集》(包括上海本、南京本)、《稗畦续集》合为一本,排印出版。(王学泰)

【凤池阁集】诗文别集。十六卷,其中诗八卷。清顾汧撰。汧初刻诗集为《学诗初集》,刻于清圣祖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为顾湄(伊人)所校定。徐元文、顾湄为作序,顾序言:“戊午阳月三日,予偕伊在笠泽舟中,湖光如镜,倚篷长吟,各出所为诗相商榷。”“已而伊在刻其近诗,移诗索予一言。”顾汧亦言:自与顾湄谈诗后,不敢苟作,“己丑,叨沐圣恩,予告归,装积三十年所作,藏诸敝簏。归后,……冯勉

曾馆丈索旧作,与诸及门校订付梓”。可知是此《凤池阁集》乃作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致仕后整理刊刻,所收皆为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后作品,刻成于康熙五十年,是年顾卒。此集收录了作者后半生大部分诗作,分体编排:卷一录五古四十三首,卷二录七古二十五首,卷三录五律一百二十六首,卷四录七律一百零六首,卷五录七律一百一十六首,卷六录五排十七首、七排二首,卷七录五绝十六首、七绝一百三十六首,卷八录七绝五十首、诗余十首。前有王鸿绪、吴之振、劳之辨三人所作序及徐元文、顾湄为《学诗初集》所撰序。“凤池”为作者园名,故用以名集。此集为康熙五十年作者家刊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孔尚任诗文集】 诗文别集。八卷,其中诗五卷。清孔尚任撰,今人汪蔚林辑。尚任一生写诗很多,向无全集传世。其流传较广的是《湖海集》十三卷,其中诗七卷,写于随孙在汴到淮扬治河期间,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所收篇什为邓汉仪、宗元鼎、黄云等人所定。此集以《湖海集》为第二卷;第一卷所收为写于《湖海集》之前的作品,多辑自邓汉仪所编《诗观三集》、陶煊所编《国朝诗的》以及倪匡世所编《诗最》;第三卷收尚任由淮扬返京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十年辛未两年作品,多取自于蒋景祁所编《辇下和鸣集》,所收即尚任已佚之《岸堂稿》;第四卷所载诗为《长留集》所存作品,乃康熙五十三年冬南游至淮南访淮徐观察刘廷玑时两人共同编辑,本意在于编当代诗歌总集,后仅完成孔、刘两人诗选,所选主要为尚任由淮扬返京后至此南游二十馀年间诗作,除去与《湖海集》相重外,还存诗千馀首;第五卷所辑均为零散材料,如从孔宪彝所编《阙里孔氏诗钞》辑诗七首,从孔昭董所编《阙里孔氏词钞》辑词五首,从孔传铎所编《同调词》中辑得二首等。此集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

(王学泰)

【广阳诗集】 诗别集。二卷。清刘献廷撰。献廷(1648—1695)字君实,又字继庄,号广阳子,宛平(今北京)人。献廷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平生以著作、讲学为事,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寓于吴。此集录献庭诗三百六十馀首,按体编排。上卷为古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下卷为五言律诗、五言长律。王欣夫云:“《广阳杂记》,潘祖荫已刻入《功顺堂丛书》,而《诗集》则无闻。惟杨宾继庄传言诗主陶、杜,而杜为多。好为之,然亦随手散去。其弟子录为若干卷。沈德潜《国朝诗别裁》言继庄‘韵语其余事也,然豪气飏驰,逸情云上,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人。’此册当为其弟子所录存者。”(《蛾术轩篋存善本书

录》,见“附录”)献庭诗中颇有富于社会内容者,其作品以七律、七绝为最佳。其集向以抄本流传。此本为黑格旧精抄本,书法精美,后附顾嘉誉跋。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抄本影印出版,与金人瑞《沉吟楼诗选》合订一册。(王学泰)

【友鸥堂集】 诗别集。八卷。清黄鹭来撰。鹭来有《见山堂集》与《友鸥堂集》。此集分体编纂,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各一卷。从标明写作年代的诗题来看,集中之诗最早的写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最晚的写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可知此集所收皆为作者中年以后的作品。每卷之中大体以写作时间为序,书前有费锡璜所撰序。锡璜为鹭来老师费密之子,序中描绘了鹭来思想风貌。此集刊刻于康熙(1662—1722)末,其字体秀丽,刻印颇精,但流传极少,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据原刊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敬业堂诗集】 诗别集。五十卷,《续集》六卷。清查慎行撰。此集按年编排,正集起自清圣祖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夏,终于五十七年戊戌四月;续集起自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终于世宗雍正五年丁未(1727)七月。正集共分五十四小集(包括词集一种),为《慎旃集》、《遄归集》、《西江集》、《逾淮集》、《假馆集》、《人海集》、《春帆集》、《独吟集》、《竿木集》、《题壁集》、《橘社集》、《劝酬集》、《湓城集》、《云雾窟集》、《客船集》、《并警集》、《冗寄集》、《白蘋集》、《秋鸣集》、《敝裘集》、《酒人集》、《游梁集》、《皖上集》、《中江集》、《得树楼集》、《近游集》、《宾云集》、《炎天冰雪集》、《垂橐集》、《杖家集》、《过夏集》、《偷存集》、《繙经集》、《赴召集》、《随辇集》、《直庐集》、《考牧集》、《甘雨集》、《西阡集》、《迎銮集》、《还朝集》、《道院集》、《槐篠集》、《枣东集》、《长告集》、《待放集》、《计日集》、《齿会集》、《步陈集》、《吾过集》、《夏课集》、《望岁集》、《粤游集》及词集《徐波词》。续集分五小集,为《漫与集》、《徐生集》、《诣狱集》、《生还集》、《住劫集》。每小集前皆有小序。说明此集写作时间、地点及名集原由。如《竿木集》前言:“起自己巳(1689)十月,终于庚午(1690)二月。”“饮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风,旁加指斥,其击而去之者,意虽不在苏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禅家有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聊用自解云尔,非以解客嘲也。”说明此集写于国丧期间观剧聚饮得罪之后,作者以宋苏舜钦因聚饮被弹劾去官事自况,以逢场作戏自解,实际是藉此以表达对处分失当的不满。如此分集立名,虽伤于琐碎,但从小序中可考察作者生平及思想演变脉络。慎行集初刻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不分卷,名《他山诗钞》或名《慎旃初集》,仅包括写于康熙

十八年己未至二十一年壬戌三年的作品(即此集中的《慎旃集》),前有王士禛、杨雍建、黄宗炎、唐孙华等人之序。五十卷的《敬业堂诗集》刻于康熙五十八年,前有许汝霖序,言其“平生所作不下万首”,经过作者自删削,只存四千余首。附有续集六卷的《敬业堂诗集》乃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刻本,亦为作者手定,但删削未尽,如许昂霄跋语所云:“《诣狱》以后三集,是经改窜,未及删定。”近人张元济又据其六世祖所藏《敬业堂集》补诗六十一首、词五首,并将此本编入《四部丛刊》初编。今人周劭据《四部丛刊》本加以标点,并附查氏外曾孙陈敬章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王学泰)

【闲止书堂集钞】 诗文别集。二卷,其中诗一卷,清陈梦雷撰。梦雷蒙冤受屈,远谪塞外,有怀莫剖,负谤难明,抑郁哀怨,写下许多为自己辩白冤屈和揭露李光地欺君卖友的诗、文。福建一些士大夫了解陈、李交恶之历史背景(耿精忠之乱),多同情梦雷。黄鹗来为此集所写序中言:“方逆变时,余侨居江南梓里,传闻先生事一二大略,无不愤叹。丁卯岁(1687)薄游辽左,得交先生,尽读其诗文,悉事本末,为之扼腕裂眦。”此集刊刻就是“同里诸子”“醵金谋梓以传。庶几为有目之所共睹”。由此可见,不仅黄氏,当时福建同乡也多认为光地背恩卖友、梦雷屈衔冤,值梦雷仆人杨昭编成此集,即聚金付刻,使其传之广远。杨昭在所写跋中谓其主著作颇多,因为他急于救主,故先期刊刻与其冤案有关者,“惟念魂销雪窟,丹书未逮。夜郎泪尽冰天,皂帽尚羁辽左。是用芜检奚囊,董翻枕秘。鸿篇千什,全梓力尚未遑;猿淚三声,变徵期先助叹。倘仁人君子,用心自有至公;斯逐客孤臣,望眼不终饮恨。九重非远,天虽高而听卑;片纸行传,日有明而光照”。从这段跋语中可见杨昭编此书之目的就在于用梦雷自己所写的文字将其冤情上达朝廷,以期得到昭雪。此集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刻于福建。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刊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通志堂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四卷。清纳兰性德撰。性德享寿虽短(仅三十一岁),但其生前已刊刻有《饮水诗集》二卷、《饮水词集》三卷,为顾贞观所选定。此本未标明刊刻年月,而贞观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离京返乡不复出,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是知此本必定于其生前。性德卒后,其师徐乾学受囑编其全集,序云:“余里居杜门,检其诗、词、古文遗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对岩、顾梁汾所藏,并《经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为《通志堂集》。碑志哀挽之作,附于卷后。”此集

按五七言、古今体顺序编排,共录五古一百一十首、七古九首、五律十八首、七律二十九首、五排三首、五绝八首、七绝一百二十六首,凡三百零三首,是纳兰所有诗集中录诗最多者。此编刊于康熙三十年。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版。纳兰诗较平庸,故不如其词集屡有刊刻。合刻诗、词者有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张祥正校刊本,收诗、词各一卷。另《粤雅堂丛书》、《万松山房丛书》中亦收有合刻纳兰诗词集。

(王学泰)

【棟亭集】 诗文别集。十五卷,包括《棟亭诗钞》八卷、《棟亭诗别集》四卷及所附《词钞》一卷、《词钞别集》一卷、《文钞》一卷。清曹寅撰。《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言:“其诗一刻于扬州,计盈千首。再刻于仪征,则寅自汰其旧刻而吴尚中开雕于东园者。此本即仪征刻也。”仪征刻本实际上是扬州本的再选本。扬州本名《棟亭诗选》六卷、《词钞》一卷,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刊刻,距作者去世尚有三年,前有王朝璫序。据序称,棟亭诗集千首,自删存其十之六。广陵诸同志以诗请益者,既手抄付梓矣。既而棟亭重加精采,又去三分之一,命小胥录置案头,聊供吟玩。真州吴尚中力请以归,别于东园开雕。此诗钞所以有两刻也。《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棟亭诗钞》五卷附《词钞》一卷,即是吴尚中在仪征东园开雕的寅诗再选本。此八卷本《棟亭诗钞》,寅自编于康熙五十一年,旋即付刻,集中之诗收到该年初秋为止,距寅之卒仅数月,其为晚年自订本无疑。所收的诗大体按年排比,亦偶有参差者。《棟亭诗别集》等系寅歿后,其门人郭振基等辑集《棟亭诗钞》删余之诗,并寅所作词、文编成,刊于康熙五十二年。《棟亭诗钞》有顾景星、杜芥、毛际可、朱彝尊、姜宸英所写五序,其中顾序写于康熙十八年己未,系为寅早年诗集《荔轩草》所作之序。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棟亭诗钞》、《棟亭诗别集》以及《词钞》、《词钞别集》、《文钞》等集初刻本合为一集,题为《棟亭集》影印出版。

(王学泰)

【怡山诗集】 诗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十九卷。清赵执信撰。执信平生写诗很多,“其诗集流传颇夥,诸本往往不同。《四库全书》所收本名《因园集》,作十三卷,末有其门人丁际隆写于清高宗乾隆六年辛酉(1741)之跋“称是秋重谒秋谷先生于因园,时先生病目弥甚,不作诗者六年矣。从仲君羹梅得先生手定诗稿,分十三集”(以上皆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世的《怡山诗集》即由此而传世。执信每个生活阶段必有诗集之编辑,删订不欲传世之作品,并立集名,作为定本,藏之于家。此集包括:(1)《并门集》,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执信为翰林编修,

曾典试山西,得诗百篇,删去凡庸,存四十四篇,编为此集,前有吴雯序。(2)《闲斋集》,写于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作者为翰林检讨时。(3)《还山集》上,写于康熙二十八年罢官后家居与漫游初期。(4)《观海集》上,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秋作者东游观海之时,前有陈恭尹序。(5)《还山集》下,写于康熙三十一年及观海归来家居之时。(6)《观海集》下,写于康熙三十四年秋第二次至蓬莱、登州一带观海。(7)《鼓柁集》上、下,占七、八两卷,写于康熙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作者第一次南游海粤途中。(8)《涓流集》,写于康熙四十年作者客天津时。(9)《葑溪集》写于康熙四十一年南游吴门之时。(10)《红叶山楼集》上、下,占十一、十二两卷,写于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家居及南游扬州之时。(11)《浮家集》,写于康熙五十九年携家南游途中。(12)《金鹅馆集》写于世宗雍正元年(1723)、二年居苏州金鹅馆时。(13)《回飙集》,写于雍正二年至三年游南京时。(14)《磺庵集》三集,占十六、十七、十九三卷,写于雍正五年至乾隆八年家居之时。(15)《怀旧集》写于雍正(1723—1735)间家居之时,皆为悼念平生好友之作。执信诗对于其一生重大事件皆有记载,其十三个小集系统地展示了其事迹及心态。此集有乾隆(1736—1795)间刻本传世,又有德宗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重刊本。

(王学泰)

【沈归愚诗全集】诗别集。五十九卷。清沈德潜撰。此集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归愚诗钞余集》十卷、《竹啸轩诗钞》十八卷、《归田集》一卷、《南巡诗》一卷、《投赠集》一卷、《矢音集》四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八秩寿诗》一卷、《九十寿诗》一卷。《归田》以下诸集,除两集《游草》外,多是他人作品(包括清高宗诗作),完全是其本人创作的主要为前三集。《归愚诗钞》为其写作高峰时作品的选本,以写作年代为序,始自清世宗雍正二年甲辰(1724),初编时至高宗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仅十四卷,止于作者出都归田之时。后又收录少量告老归乡后的作品,延至二十卷,录诗一千餘首。《归愚诗钞余集》为其晚年作品的选本,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初编时八卷,终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后编至十卷,则终于乾隆三十三年丁亥。《竹啸轩诗钞》则为其早年诗作选本,始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终于雍正元年癸卯。其终了之年正与《诗钞》起始之年相接。录诗七百餘首。魏世效为此集所作序云:“吴门沈子确士,物疏道亲,独工缀述。其于诗也,若车然,扶轮而远也;若川然,叩浦而大也。然犹悔其少作,卷帙所存,率皆立年以后。”“虽准之前古,不无离合,然穷其吐纳,会其委源,敦原统夫关键,辞华管

夫枢机,意窥象先,韵深文外,亦彬彬尔雅者已。”是知沈氏尽删其三十岁以前作品,三十以后也只保留符合温柔敦厚诗教之作品。《矢音集》四卷,皆为归田后受皇帝之命按时向皇帝报告民间疾苦的诗篇。此《全集》系陆续刻成,有乾隆十八年癸酉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教忠堂刊本。

(王学泰)

【秋江集】诗别集。六卷。清黄任撰。任享寿颇高,中年以后优游故里,其集早有编辑。集前桑调元之序即撰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题名《香草斋诗钞》的六卷本刻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而此《秋江集》录诗则有大量的写于乾隆二十一、二十三年以后的作品。其中第六卷中的许多篇章标明写作时间者及或可考订写作时间者已接近作者辞世之年,如《题张南坪太守〈慎独图〉》最早亦写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壬午九月十三日即事六首》则标明为乾隆二十七年作,在这些作品之后仍有许多篇章,估计是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以后的作品。全篇收录古、今体诗一千一百餘首。任诗才敏捷,热衷写作,此集所收远非其作品全部,当为作者晚年自选本。集中诗篇大体编年,但一卷之中,前后排列参差者比比皆是。任集初名《十砚斋集》,后改为《秋江诗集》,又改为《香草斋诗集》。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所刊《香草斋诗钞》未见;现存之《香草斋诗集》与《秋江集》所收作品完全一样。另有其同邑陈应魁所注之《香草斋诗注》。此注本二十卷,六卷为压缩本,除注典事外,多引地方志及当地关于黄任事迹的记载以印证其诗,较有价值。又有长乐王元麟所注之《秋江集注》。此注本以笺注典事为主,很少涉及创作背景、本事,意义不大。任另有《香草笺》一卷,仅录诗二百餘首,与《秋江集》所收互有出入。此集白文本罕见,只以注本传世。陈注本有清仁宗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刊本,王注本有宣宗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东山家塾刊本。

(王学泰)

【冬心先生集】诗别集。四卷,附《冬心斋砚铭》一卷。清金农撰。农先有《景申集》行世,系鲍钊出资刊印,所收皆怀人之作。至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又自编其诗为此集。此集录诗近四百首,按年编排,约起于圣祖康熙五十五年(1716),止于雍正十一年,刻于扬州,每卷后印有“雍正癸丑(1733)十月开雕于广陵般若庵”。此后诗作收入《冬心先生续集》。据法式善《梧门诗话》云,《续集》有金农自序,为其好友罗聘所编,刊于高宗乾隆(1736—1795)间。又记金农“尝手写诗数百篇刊之,甫印三十部,遽毁其板,沉于河,故流传绝少云”(《梧门诗话》)。龚咏樵云:“近浙江丁氏刊其所著《冬心续集》三体诗、自度曲、杂著、随笔于《西泠五布衣遗著》中。”(《葑园诗

话》)是知金农共有五部诗集传世。流传较广者仅《冬心先生集》一部。书后所附《冬心斋砚铭》皆收其所藏砚石铭文,前有作者自序,亦刊于雍正十一年,为“吴郡邓弘文仿宋本字画录写”刻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雍正原刊本将《冬心先生集》与《冬心斋砚铭》影印合订一本出版。(王学泰)

【雅雨堂遗集】诗文别集。七卷,其中诗三卷。清卢见曾撰。见曾于扬州主持风雅多年,与文人墨客诗酒唱和,所作颇多,当时诗话、选本多著录。晚年自己编订文集十馀卷、诗八卷,除《出塞草》一卷曾刊刻外,其他皆未及刊刻而遭火灾焚毁,故未有自编诗文集传世。其曾孙卢枢言:“先祖所掇拾唯古文七十篇、诗二百七十首,又以官守所羁,未暇补缀,而传舍迁移,又几经散失矣。先父、伯、叔宦游归田,始能于姻家故旧访求先人遗稿,积之数十年,先后仅得诗文数十篇,终以不获全集为恨。”(见卢枢所作序)后知乡人金在恒之师封棣堂家藏见曾诗文若干,故请金氏编为此集。其诗包括:《出塞集》一卷,为见曾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被诬陷出山海关至黑龙江一带戍边时所作,所收诗篇多为表现杭葛山一带壮丽景色、边地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及当地习俗之作,编订于乾隆十年(1745)。《雅雨堂诗集》二卷,即卢枢辛苦搜辑得的诗作二百馀首,所收遗漏尚多,如《赠秋玉》、《赠拔江》等皆未收入。此集有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刻本,清雅堂藏板。

(王学泰)

【樊榭山房集】诗文别集。三十九卷,其中正集诗八卷、集外诗一卷,续集诗八卷、集外诗一卷。清厉鹗撰。正集乃鹗自编,其正集自序云:“仆少好篇咏,晚颇知难。三十年来所作,随手弃斥,存篋中者仅十之二三,暇日编次古、今体诗为八卷,长短句二卷。譬之山谣村笛,虽无当于钟吕之响,而向来所阅闲居羁旅,怡愉忧悴,历历在目。”诗按天干排列,由甲卷至辛卷,录诗近千首。此编初刻于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正集的集外诗一卷为组诗《游仙百咏》、《续游仙百咏》、《再续游仙百咏》,凡七绝三百首,作于圣祖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六月,是其十八岁时作品。鹗编《樊榭山房》正、续二集皆未收录。后同里陈鸿寿得到此组诗之抄本,刊刻流传。此刻在仁宗嘉庆(1796—1820)、穆宗同治(1862—1874)、德宗光绪(1875—1908)间皆有翻刻本。续集亦鹗自编,其自序云:“仆诗前集(指正集),自甲午(1714)至己未(1739),凡二十六年,仅编成八卷。词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1751),十二年来,复次第成绩集如前之数,岂中年以往之作工于少时邪?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续集亦按

天干排列,由甲卷至辛卷,录诗亦近千首。由其自序可知,作者对于早年作品删削较严,对中年以后作品则相对较宽。作者于乾隆十六年辛未编成续集,未及刊刻完毕,第二年即去世。后在乾隆四十三年由汪沆刊刻传世。续集的集外诗由汪氏后裔汪曾唯从地方诗集以及方志、笔记中采掇而来,并合以正、续诗集、文集、游仙诗三百首及《秋林琴雅词》为一编,于光绪十一年(1885)刊刻出版,版藏于汪氏振绮堂。宣宗道光(1821—1850)、文宗咸丰(1851—1861)之间,吴江董兆熊曾将樊榭诗集正、续十六卷,加以笺注,以注典事为主。今人陈九思将董氏注文分别系于厉诗每篇之后,并将有关厉鹗的传记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史文苑传》、哀挽诗辞、墓志铭、軼事及缪荃孙重订之《厉樊榭年谱》等,一并作为附录附于书后,加以标点校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郑板桥全集】诗文别集。不分卷。全书分为《板桥集》、《板桥集外诗文》、《板桥研究资料》,前二种皆有诗。清郑燮撰。今人卞孝萱编纂。郑燮平时写诗很多,题画酬赠,随写随散失。清高宗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燮自编手写《板桥诗钞》三卷、《词钞》一卷、《小唱》一卷、《题画》一卷、《家书》一卷,上元司徒文膏精刊。其后,翻印、仿刻者颇多。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郑板桥集》,依据燮手写刻本,加以校勘,增补若干首为后印本所抽去之诗,个别篇章依据所见的郑氏墨迹作了校勘,仍分“家书”、“诗钞”、“词钞”、“小唱”、“题画”等辑,并增加“补遗”一辑。此辑系依据公私藏家及有关报刊书籍碑拓中收录的郑燮集外作品编成。为了便于考核,每篇之末皆标明来源出处或收藏者姓名。因辗转流传,出处一时难以稽考,但从内容风格等方面推究,可以确定为燮之作品,亦予收入,以免遗漏。其明显不可靠者,一概删除不录。其零章碎句、对联之属亦皆不录。此集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增补了题画诗文排印出版。此《郑板桥全集》除继承前述编辑成果外,又从书谱、画册、碑拓、书籍、报刊、文物中抄录已佚诗文,充实了《板桥集外诗文》,并附“印跋”、“郑板桥家书”、“板桥题画佚稿”、“郑板桥集外集”(其中不少是贗品),以资参考。有齐鲁书社1985年排印本。(王学泰)

【石笥山房诗集】诗别集。十二卷,补遗二卷,续补遗二卷。清胡天游撰。天游才思敏捷,颇富篇章,然生前未曾编集刊刻。其友齐召南云:“其为诗文,多在友朋聚会时即席挥毫,甫脱草,人辄持去,无所惜。久之,遂传诵遍人口。余与杭堇浦尝力劝其订存,含笑唯唯,讫无成编。”(《石笥山房集序》)陶元藻

亦云：“在周青崖斋头，见其诗钞一册”，“余劝其付梓行世，云持（天游号）笑曰：‘未能糊八口，何暇镌五言。’盖自伤其贫也。”（见《凫亭诗话》）《天游集》乃其逝世后由其子胡元琢所编辑。全编按体排列，先五言后七言，先古体后近体，最后杂体、诗余。然此编亦未能问世。其四世孙胡学醇言“拟办刻，卒未果。百餘年来已多散佚”（《石笥山房集跋》）。又云：“先君购得古文辞若干首，集为成书”，得文六卷、诗十二卷，又从友人杨以增处得抄本四册及杨抄逸稿两册，详加校订，又在原编之外附补遗三卷（文一卷、诗二卷），于宣宗道光（1821—1850）末刊刻问世。胡学醇刊天游集后，又收到影抄赵希璜所刻《石笥山房集》以及关协华所录沈霞西摭拾逸稿本。关协华录本之诗较道光间刻本为多，于是请高均儒编为二卷，作为“续补遗”上、下。全编共录诗一千四百餘首。于文宗咸丰二年（1852）刊刻问世。《天游集》在仁宗嘉庆（1796—1820）间还有赵希璜刻本和阮元刻本。两本所录诗文皆较此编为少，世亦罕见。《天游集》以此咸丰本最为完善。

（王学泰）

【道古堂诗集】 诗别集。二十六卷，集外诗一卷。清杭世骏撰。世骏生前刻有《岭南集》八卷，收其往广州主讲粤秀书院时作品，但其生前所刻诸集传世较少。此集乃世骏亲自编纂，刊于身后。其好友汪沆之序云：“先生捐馆之逾岁，嗣君宾仁奉其手订《道古堂集》属予审定。”“一时朋好并门下之士，未睹全集者，争醵金以为镂板之助。始工于乾隆乙未（1775）春二月，迄工于丙申（1776）冬十月。”此为初印本，包括十五个小集：（1）《橙花馆集》二卷，（2）《过春集》一卷，（3）《补史亭剩稿》一卷，（4）《闽行杂录》一卷，（5）《赴召集》一卷，（6）《翰苑集》四卷，（7）《归耕集》二卷，（8）《寄巢集》一卷，（9）《脩川集》一卷，（10）《桂堂集》一卷，（11）《岭南集》五卷，（12）《闲居集》一卷，（13）《韩江集》二卷，（14）《韩江续集》一卷，（15）《送老集》二卷。此板由汪氏振绮堂收藏。在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又有许氏刊本，前有毕沅序，板藏于郑氏同文堂。后两板皆焚于战火。清末汪沆裔孙汪曾唯于德宗光绪十年甲申（1884）复检此集残板，加以补刻校订，如其撰写的跋语中所述：“并搜罗集中未载之若干篇为‘集外诗文’。生平轶事，诸先辈遗书所载甚夥，不及备录，钞撮数则附列于左，亦可见先生之概矣。”集前有龚镛《橙花馆集序》、周天度《过春集序》、张增《赴召集序》、曹芝《翰苑集序》、全祖望《脩川集序》、何梦瑶《岭南集序》、曹芝《闲居集序》、汪沆《韩江集序》。此编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王学泰）

【蔣石斋诗集】 诗别集。五十卷。清钱载撰。钱

载集初编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作者在京为官时，集名为《蔣石斋诗钞》。同年，翁方纲为作序云：“秀水钱阁学所为诗曰《蔣石斋集》者三十有六卷，阁学既自序之。……其诗浓腴淡韵，若画家赋色，向背凹凸，东坡谓于王维千枝万叶，一一可寻源者也，爰略摘取为四卷，以见其概，以俟全集之刻云。”可知当时所刊仅为四卷选本，故曰“诗钞”。另有四十九卷本，名《蔣石斋诗集》，作者自编自刊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时载已告老归田。其自序云：“八十一岁田野余生，徒然尚荷君恩，仍次其甲午以后迄今所自以为诗者，缀于卷，俯仰难言，盖莫得而惜之矣。”此集录各体诗两千八百餘首，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第一卷收录乾隆二年丁巳所作诗三十八首。乾隆元年丙辰，作者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未中，滞留于京，此卷皆写于北京，附录世宗雍正六年戊申（1728），十年壬子旧作各一首。第二卷为乾隆三年戊午诗作，从此以下顺年编排，每年所作数量不一，多者一年近二百首，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作一百八十一首，少者仅二首，如乾隆七年壬戌。此编止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距作者辞世尚有五年。此五年中，载虽患病，但不辍写作。袁枚曾云：“庚戌（1790）相访嘉禾，则已中风，半身不遂，年八十三，犹能醺醺清谈。家徒壁立，卖画为生。”（《随园诗话补遗》）可见当时尚能创作。后五年作品收入第五十卷中。此五十卷之《蔣石斋诗集》有乾隆（1736—1795）末刊本。

（王学泰）

【小仓山房诗集】 诗别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清袁枚撰。袁枚诗文，早享大名。清高宗乾隆十二年（1747），枚官江宁时，已有人为刊其早年诗作，名《双柳轩集》。乾隆三十九年，李调元视学广东时，亦尝刊袁诗选令士子学习。枚六十岁时自编诗、文集，对早期作品痛加删削。其诗集二十四卷，起于乾隆元年丙辰，终于乾隆四十年乙未，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略于少时，详于中晚。名《小仓山房诗集》，前有其弟子薛起凤序及蒋士铨、赵翼、李宪乔等人之题辞。此集刊刻后，风行一时。枚七十五岁时相信术士赵文炳言其“寿至七十六”之说，又补编其诗、文集，各增至三十二卷，体例一仍其旧。其七十六岁至八十二岁诗作，后编为五卷，有仁宗嘉庆（1796—1820）间刊本。补遗二卷乃世宗雍正十一年癸丑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33—1786）删余之作。袁枚集刊刻极多。今人周本淳以乾隆随园所刊三十二卷为底本，并据嘉庆诗集单刻本校补标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忠雅堂诗词全集】 诗词别集。三十一卷，其中诗二十九卷。清蒋士铨撰。士铨早年即有诗名，其

集初编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其师金德瑛为作序,言其年未及四十,而有此成就,能“别开生面,数十年来,行辈中罕见其匹也。予又安能测其他日所至耶?”第二次编于乾隆五十年。此时士铨已瘫痪,病卧家中,名其诗曰《藏园集》,请袁枚为序。可知此集为士铨本人编纂。全编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前二十六卷写作时间,始于乾隆九年甲子,终于乾隆四十五年甲辰,各卷诗篇数目极为不均,有的数年一卷,有的一年数卷,有的年份无诗,如乾隆四十年乙未、四十一年丙申两年无诗,而且在“补遗”中亦未补此二年之诗。第二十七卷为《簪笔集》,均为作者在翰林院时所撰写的颂圣应制之作,如《圣武远扬西域效顺大阅礼成恭纪》、《塞宴四事》等等皆是写给皇帝看的。可能此集早已编成于京都,晚年编集时置于最后。“补遗”两卷系收全集编成后遗漏之诗,亦按写作先后为序,始于乾隆十年乙丑,迄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有的一年补一、二首,有的十馀首,有些年份一首未补。全编录诗凡二千五百九十六首。初刊于乾隆(1736—1795)末年,藏园藏板。又有仁宗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桂林重刊本和宣宗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刊本。(王学泰)

【瓯北集】诗别集。五十三卷。清赵翼撰。赵翼一生写诗五千馀首,其集数度刊刻,皆以“瓯北”名集。最早刊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其师汪敦由作序,不知确实卷数,据其编年集看,约为四卷。第二次刊于乾隆四十二年,约为二十二卷,由蒋士铨作序。第三次刊于乾隆五十年,有袁枚、王鸣盛、翁方纲、吴省钦、祝德麟所作五序。翁序言:“今耘耔之诗衰然成帙,既登于梓者二十七卷。”可知此次所刊为二十七卷,止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第四次刊于乾隆五十五年,为流传较广的三十三卷本,由钱大昕作序。第五次刊本为五十卷本,诗止于仁宗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距翼辞世尚有六年。此五次刊刻皆由翼本人主持。此五十三卷本则包括“续增诗集”三卷,皆为嘉庆十三年戊辰以后至嘉庆十六年辛未诗作,当为翼辞世后其子弟编辑刊刻。《瓯北集》系按年编辑,始于乾隆十一年丙寅,终于嘉庆十九年甲戌,前后六十馀年。每次刊刻皆在初刻基础上续加新作。另有《瓯北诗钞》十七卷,盖《瓯北集》三十三卷编成,流传颇广,作者感到所作粗糙,于是重加编订,加以润色,按诗体编排,录诗一千馀首,刊刻问世,前有赵怀玉以及协助其编定《诗钞》的李保泰二序。《瓯北集》与《瓯北诗钞》皆有嘉庆(1796—1820)间湛貽堂刊本传世。(王学泰)

【懋斋诗钞】诗别集。一卷。清爱新觉罗敦敏撰。此集为残卷,署名“燕野顽民”之藏主题云:“蕴

辉阁藏。自乾隆二十九年(按:有误,应为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起至三十一年(按:有误,应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止,共二百四十首。其割裂不完之篇,想皆删而不留者。然草本惜只一卷,约不止此也。予有《四松堂集》,今又得此残本,故略为粘补成卷,因并识之。”可知今所见本乃是“燕野顽民”之“粘补本”,并非原本形状,故多颠倒错谬之处。作者在《东皋集》小序中云:“自山海归,谢客闭门,唯时时来往东皋间。……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故知此集作者自题为《东皋集》。估计此残本只是《懋斋诗钞》中的一个小集。集中保存了作者与曹雪芹过从唱和的一些诗篇,对了解曹雪芹生平、经历、思想、性格颇有参考价值,故为《红楼梦》研究者所重视。其诗在思想艺术上也有一定的价值。此集为抄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影印出版。

(王学泰)

【惜抱轩全集】诗文别集。四十九卷,其中诗十二卷。清姚鼐撰。此编包括姚氏“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卷以及“法帖题跋”三卷,“笔记”八卷,其余为诗。正集十卷,录诗六百五十一首,系鼐手自编订。鼐子姚雉云:“先君《惜抱轩诗集》十卷,嘉庆戊年(1798)年刻板行世。近十馀岁,间有题赠酬答之作,往往手写付人,不自留稿。尝曰:‘诗道非一端,然要贵有才气。人年衰,则才气多随而减,故吾年七十以后,不复常作诗矣。’雉日侍案侧,见有所作,辄私录成编。至乙亥(1815)岁,先君乃见而删去三分之二,盖不欲多存如此。”(见姚雉《惜抱轩诗后集》跋语)可知鼐不欲多存诗,其正集也远非其诗作全部,七十以后则删削更甚。鼐去世后,搜辑七十岁以后诗作,仅得古体四首、近体八十四首,其间《咏白杜鹃花》、《咏蜡梅》二首实系少作,不欲自存者,因为王昶赏识,才又将其编入《诗后集》。此集包括古体、近体、补遗三部分,其中包括词八首。另有“诗外集”一卷,包括试帖诗四十首,乃应付科举考试之习作。十卷本《惜抱轩诗集》有清仁宗嘉庆三年戊午(1798)刊本。其后有其从侄姚原绂刻本,文诗一仍其旧,无所增补。嘉庆二十一年丙子有姚雉增订之“诗后集”、“诗外集”问世,其后有穆宗同治(1862—1874)间刻本传世。民国年间,有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另有《惜抱轩诗释》六卷,为鼐玄孙姚永朴注释,选诗三百五十首,有1926年排印本。中国书店于1991年将此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复初斋诗集】诗别集。七十卷。清翁方纲撰。方纲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中叶以后领袖诗坛,享寿又高,诗作极多。其生前即已编刻自己诗作,故在其去世后门人孙煊编辑遗稿,原稿先后有

序,秩序井然,且所分各个小集,均有名目,皆其手订。此集乃其历年所著各小集的集合、以写作先后为序:卷一为《课馀存稿》(1752—1763);卷二至卷九为《药洲集》(1764—1772);卷一〇为《青棠书屋稿》(1772·2—1773·8);卷一一至卷一四《宝苏室小艸》(1773—1776);卷一五至卷二二为《秘阁集》(1776—1781);卷二三《石兰集》(1781);卷二五至卷二六《秘阁直庐集》(1782—1783);卷二七为《桑梓抡才集》(1783);卷二八至卷三二为《晋观稿》(1784—1786);卷三三至卷三九为《谷园集》(1786—1789);卷四〇至卷四二为《石墨书楼集》(1789—1791);卷四三至卷四四为《小石帆亭集》(1792);卷四五卷五二为《苏斋小艸集》(1793—1799);卷五三至卷五五为《蒿缘艸》(1799—1801);卷五六至卷五七为《有邻研斋稿》(1801—1804);卷五八至卷六九为《石画轩艸》(1804—1817);卷七〇为《墨缘集》(1817—1818)。方纲卒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此书嘉庆刊本仅六十六卷,为其本人编定,无后四卷。后四卷为侯官李彦章所编,多单行。宣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汉口叶志诰有重刊本。集中诗还远非方纲全部作品,近人缪荃孙编有《复初斋集外诗》二十四卷,亦按时间先后编辑,始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终于嘉庆十三年戊辰。此编有吴兴刘氏嘉业堂1917年刊本。

(王学泰)

【四松堂集】 诗文别集。五卷,其中诗二卷。清爱新觉罗敦诚撰。此集包括诗二卷,文二卷,《鹤鹑庵笔尘》一卷,前有纪昀序曰:“其诗古体胜今体,古体七言又胜于五言。高者摩韩、苏之垒,次者亦与剑南、遗山方轨并行。”又言其“虽平生足迹不出京圻,未能周游海岳,以名山大川开拓心胸、震耀耳目,以发其雄豪磊落之气。又甫得一官,即投闲色养,中年坎壈,哀乐损人,未能一展经纶之才,以发其崇论宏议。”此论颇能说明满族宗室之境遇为其创作带来的局限。此编共录诗二百八十一首,其中颇有与曹雪芹酬赠唱和之作,是考证曹氏的重要参考材料,故为《红楼梦》研究者所重视。敦诚卒后,其三弟桂圃刻其所遗诗文,因成此编,除纪昀序外,还有其兄敦敏为其所作《敬亭小传》记其生平。此书初刻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与其兄敦敏的《懋斋诗钞》合为一函。

(王学泰)

【延芬室集】 诗文别集。不分卷。清爱新觉罗永忠撰。永忠(1735—1793)字良甫,号敬轩,又号藕仙、臞仙、栟榈道人、延芬居士。清宗室,为清圣祖第十四子胤禔之孙,多才多艺,诗书琴画,无所不通。袭父职为辅国将军。此集分装三十三册,为未定稿

本,基本按年编辑。(1)《志学草外存稿》,为高宗乾隆十二至十六年(1747—1751)的作品,时作者十三至十七岁。作者在“手选诗目”中言:“自乾隆十二年丁卯年十三岁至十七年壬申年十八岁凡六年之诗俱不选。”实际上并未做到,此编即是删外存稿。另在《志学草》中也保留了一部分这个时期的作品。(2)《志学草》,包括乾隆十七年诗与《快游集》、《红叶诗》。(3)《志学草》,为作者编订之集,前有《志学堂自序》表明此集所收皆为初学诗时作品,始于乾隆十二年,终于乾隆十八年,所录诗与上两集所录基本不重出。(4)《志学草》,收录乾隆十八年作品。(5)《觉尘堂志学草》,收录乾隆十九年作品与《渔阳吟草》。(6)《觉尘堂志学草》,包括乾隆二十年至四十一年作品,其中缺乾隆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年作品。(7)《延芬室诗稿拾遗》,包括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七年诗作以及编年外诗稿,其中乾隆五十三年诗标明为《大雅元音》。永忠诗反映了满族中上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并有涉及曹雪芹与《红楼梦》之诗篇。此编为北京图书馆藏本。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后附史树青所藏《延芬室集》残本的影印本与《熙朝雅颂集》首集二十五卷影印本。

(王学泰)

【绿烟琐窗集】 诗别集。一卷。清富察明义撰。明义,字我斋,满州镶黄旗人,宗室贵族,曾为御前侍卫,生活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此集亦题作《绿烟琐窗集诗选》,是知其所录之诗并非明义诗作全部。集中按诗体类编,包括四言古诗一首,五言古诗九首,七言古诗二十一首,五言律诗九首,七言律诗一百二十六首,五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二百一十二首,后附词二十馀首及一组五言绝句《古意》之草稿。明义诗,长于艳体,内容较狭隘。其七绝中有组诗《题〈红楼梦〉》二十首,并有小序点明《红楼梦》乃曹雪芹所撰,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又指出“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此组诗记录了《红楼梦》的故事梗概(与今传本《红楼梦》略有不同)及其读该书的感想,为最早的题咏《红楼梦》之作,对于《红楼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集向以抄本传世,经过多人的辗转收藏。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影印出版。

(王学泰)

【春柳堂诗稿】 诗别集。一卷。清张宜泉撰。宜泉,名不可考,宜泉其字。汉军旗人。一生不曾出仕,以教馆为生,与曹雪芹交好,生活于清高宗乾隆(1736—1795)年间。家贫寒,生前未有著作刊刻,此集为其孙张介卿(名不详)刊于德宗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前有礼科给事中贵贤与沈阳督学使者延茂

二序,后有工部主事济澂所撰之跋。书前还有宜泉《春柳堂诗稿自序》。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五言排律,多为试帖诗,凡四十二首;第二部分为五言律诗,凡八十六首;第三部分为七言律诗,凡六十七首。诗中间有作者自注,诗后多有评语。此集中作品多记录个人琐事及其贫困的经历与生活,其中有些篇章是怀念或悼念曹雪芹的作品,如《怀曹芹溪》、《题芹溪》、《伤芹溪居士》等,对研究曹雪芹生平颇有价值,故为《红楼梦》研究者所重。此集于光绪十五年己丑初刊,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初刊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容斋先生遗诗】诗别集。五卷,补遗一卷。清汪中撰。汪中一生贫困,写诗又不多,故多散失。此集为汪中去世后由其友刘台拱编定。刘云:“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贡,博闻强记,通知古今,才、学、识三者皆有以过人。为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早岁喜为诗,三十以后绝不复作,旧稿多散失,今录其仅存者若干首。”此说不确,汪中至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尚有诗作,此时已五十岁,距其去世仅一年。全集编年以太岁纪年,始自旃蒙作噩(乾隆三十年乙酉),终于照阳赤奋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共录诗一百四十余首,补遗一卷录诗八首。书后附录员燮、阮元、黄承吉、乐钧、朱彬、顾莼、黄景仁、孙星衍、郑虎文、杨芳灿、张际亮、庄绶甲等名流投赠哀挽之作。补遗及附录皆为其子汪喜孙所搜辑。此编最初由其子喜孙刊于清仁宗嘉庆(1796—1820)间,问经堂藏板。又有宣宗道光(1821—1850)间精刊本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木活字本。光绪二十六年刻鹄斋本,作七卷。另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据汪氏初刊本影印本,收入《四部丛刊》。(王学泰)

【洪北江诗文集】诗文别集。六十六卷,其中诗三十八卷。清洪亮吉撰。亮吉诗共分四种:(1)《卷施阁诗》二十卷,最初编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1794)作者视学贵州之时,为贵州学子所编,原只十四卷,所收乃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至五十八年癸丑所作之诗。刊于乾隆六十年乙卯。后在仁宗嘉庆(1796—1820)间补至二十卷,增收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写于贵州及返京至告假回里及北上之诗,时至嘉庆四年己未(1799)初秋。此集包括《傭书东观集》、《凭轼西行集》、《仙馆联吟集》、《官阁围炉集》、《太华凌门集》、《中条太行集》、《猴山少室集》、《灵岩天筑集》、《西苑祝釐集》、《秘阁研经集》、《五陞联骑集》、《黔中持节集》、《关岭冲塞集》、《莲台消暑集》、《回舟百峒集》、《侍学三天集》、《全家南下集》、《单车北上集》等十八个小集。自《黔中持节集》以后皆乾隆五

十八年以后作。(2)《附鲙轩诗》八卷,为作者少时及壮年时侍母之作。此集最早写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作者十三岁时,最迟写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分《机声灯影集》、《采石敬亭集》、《黄山白岳集》、《长淮清潁集》、《桐庐林屋集》、《锺阜蜀岗集》、《茅峰摄山集》、《天台雁荡集》第八个小集。(3)《更生斋诗》八卷。嘉庆四年己未,亮吉因言事被流伊犁,次年赦回里,自号更生居士,于嘉庆八年癸亥编此集,始自嘉庆五年庚申八月二十七日,终于嘉庆八年癸亥,包括《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山椒避暑集》、《沪渎消寒集》、《簪岭授经集》、《蠡河伤逝集》、《西圃疏泉集》、《北郊种树集》等八个小集。此编与《更生斋文集》、《诗馀》皆刊于嘉庆间洋川书院。(4)《拟两晋南北史乐府》上、下两卷,为咏史组诗,皆以两晋、南北朝历史为题材,写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凡一百二十首。诗中有小注,以释诗中所写史实。此编与各集编为《洪北江诗文集》。有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所编《四部备要》本和世界书局排印本。嘉庆八年癸亥以后到作者逝世以前作品编为《更生斋续集》十卷,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刊行。(王学泰)

【有正味斋诗集】诗别集。正集十六卷,续集八卷,外集五卷。清吴锡麒撰。锡麒在京翰林院为官二十余年,其作品流传词坛,扬名海外,书贾争相刊刻。法式善叙锡麟集云:“先生名重中外,诗文集凡数鐫板,贾人藉渔利致富。高丽使至出金饼购《有正味斋集》,厂肆为之一空,何藉自刻其集。”锡麟诗正集自刊于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按年编排,包括以下十四个小集:《宝石山楼始存稿》,始于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当时作者仅十八岁。《严江集》,写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三十五年庚寅两度游严州时。《翥羽斋集》,写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间。《解褐集》,写于乾隆四十年乙未作者中进士前后。《翰苑集》上、下,写于乾隆四十年后在翰林院任职时。《暂假集》,写于乾隆五十年乙巳作者请假归省之时。《泥爪集》写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作者归京奉旨往热河之时。《白沙江集》,写于乾隆五十一年秋后作者再度乞假南归之时。《重梦集》上、下,写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到嘉庆元年丙辰作者在京为官之时。《归帆集》,写于嘉庆元年作者因事归乡途中。《韩江集》,写于嘉庆四年己未前后作者南游及在扬州之时。《槐市集》,写于嘉庆五年庚申作者在京期间。《吴船集》,写于嘉庆七年壬戌前后作者辞官南归途中。《东皋草堂集》,写于嘉庆九年甲子前后作者乡居生活时期。此集为正集最末一卷。续集前四卷名《萍聚集》,写于作者晚年与家人居乡生活时,约止于嘉庆十六年辛未;后四卷为《韩江酬唱集》,写于

晚年在扬州主讲书院之时,约止于嘉庆二十年乙亥。外集前三卷为《木天清课集》,皆试帖诗赋,为准备科考之作;第四卷为《七十二候诗》;第五卷为《仿唐人咏史试帖》,皆为准备考试而练习之作。续集、外集亦为嘉庆(1796—1820)年间刊本。(王学泰)

【五百四峰堂诗钞】诗别集。二十五卷。清黎简撰。简平生写诗颇多,曾有《西征草》、《南浮草》之编,但未见有刻本传世。此集自编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其自序云:“简自龆髻,先君子即教之为诗。既得其意而喜为之。其间存而惭,惭而焚者屡矣。既又复存,存又复惭,于二十馀年中,若有未可尽焚者。自乾隆辛卯(1771)至于乙卯(1795),所得诗分廿五卷,梓之。”其集按年编纂,共录诗一千八百六十二首,刻于嘉庆二年(1797)。有众香亭刊本。书前附有黎简门人何深所绘简之小影以及孙尔准、孙应瑞、黄其勤、谢兰生、黄丹书、张曰瑤所作画像赞。嘉庆元年至二年所作之诗,收入《五百四峰堂续集》。《续集》录诗八十一首,编为二卷,由微尚斋刊于1926年。另外还有一些题画诗及一些以抄本流传的“集外诗”尚未编入。此《五百四峰堂诗钞》曾数次刊刻,如穆宗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有广州儒雅堂南海陈氏刊本,以及儒雅堂重修本,德宗光绪六年(1880)有顺德教忠堂刊本。(王学泰)

【两当轩集】清诗别集。二十二卷,附录七卷。清黄景仁撰。景仁生平作诗二千馀首。其好友洪亮吉为景仁所作行状云:“及歿而出篋中诗,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景仁逝世半年后,其好友翁方纲为编《悔存诗钞》,选诗五百馀首。当时正处于文字狱高潮中,方纲谨小慎微,景仁诗又多不平之鸣,故“删之又删”。又为之辩解云:“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若少陵之写乱离、眉山之托仙佛,其偶然尔。使彼二子者生于周、召之际,有不能为雅颂哉?世徒见才士多因蹶不遇,因益以其诗坚之,而彼才士之自坚也益甚,于是怨尤之习生,而荡僻之志作矣。”(《悔存诗钞序》)此集编成后未即刊刻,十二年后始由刘大观刊于北京。景仁之佳句名篇,早已流播众口,翁删削太过,自然会引起不满。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黄友赵希璜搜其遗集,得诗八百馀首,编为《两当轩诗钞》十四卷,刻于安阳,书带草堂藏版。嘉庆二十二年,郑炳文又增收景仁词作,再刊数百本行世。宣宗道光(1821—1850)间,吴修从景仁子假得由景仁手定遗稿一千一百篇,细加校阅,按年编为《两当轩诗集》十六卷,起自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终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较赵氏所刊又多出十分之三。此集编成后,仅刻其半而吴氏卒,后由蒋光煦于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刻竣。文宗咸丰八年

(1858),景仁孙志述以原稿为基础,编成正集二十二卷,并参校诸家刻本,得若干条,汇为《考异》二卷,附有关景仁及其集之资料四卷,题为《两当轩全集》,刊刻出版。后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版毁,其妻吴氏承夫之志,节衣缩食,历尽艰辛,于德宗光绪二年(1876)重新刊刻《两当轩全集》,计二十二卷,存诗一千一百七十首、词二百一十六首、文六篇,并附《考异》二卷、《附录》四卷。今人李国章以光绪刻本为底本,补收光绪本中漏刻诗八首,增收咸丰本中所附《酬唱集》二卷,并在《补遗》内增加新发现佚作三篇,题作《两当轩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孙渊如先生全集】诗文别集。二十三卷,其中诗九卷,附王采薇诗一卷。清孙星衍撰。星衍诗集总名《芳茂山人诗集》,为作者逝世后编定刊行。作者生前对自己诗作并不重视,故其撰著虽多,但十不存一。其生前自己编定诗集仅有两种四卷。一为《澄清堂诗稿》上、下二卷,其自序云,因写诗多不存稿,此两卷所录诗多取自“简斋(袁枚)、兰泉(王昶)两先生选入诗编者,并零星稿纸,得赋、诗若干首”,只有古诗,未取近体。二为《冶城絮养集》上、下二卷,收其在清仁宗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解组后居金陵时的作品。后星衍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突然逝世,其弟星衡嘱其婿龚庆在此四卷基础上编辑遗诗,编为八卷六种。(1)《澄清堂诗稿》上、下两卷,录早年所作诗五十八首、赋两篇,为星衍手编。(2)《澄清堂续稿》一卷,为龚庆与严可均共同编定,录诗一百零八首,皆作者于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以后、五十二年丁未以前居京师时所作。(3)《济上停雲集》。作者于乾隆六十年乙卯出任兖沂曹济兵备道,适逢阮元督学山东,诸名士会萃一方,多文宴唱酬,汇为《济上停雲集》。编者从此集中录出星衍作品,附以唱和之作,仍从旧名。又将嘉庆五年庚申、六年辛酉讲学于诂经精舍诗亦收入,共得诗七十六首。(4)《租船咏史集》一卷。星衍于嘉庆八年癸亥起补山东粮道,自历嘉庆九年甲子迄十六年辛未督粮北上者八次,乞假南归一次,来往皆在舟中,拥书数千卷,时有著作,兼会名流,题其船曰“运租咏史之船”。此期所作诗收入此编,得九十五首。(5)《冶城絮养集》上、下两卷,作者自编,录诗一百二十八首。(6)《冶城遗稿》一卷。龚庆跋云:“自七卷已止乃检篋中零星稿纸成帙,此第八卷为《冶城遗集》,凡古、今诗一百二十三首,又七卷中搜罗未尽者也。”此上八卷为龚庆所编辑。后星衍弟子杨文荪又收到裴驷竹茂才寄示藏本一帙,皆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以前少作,中与洪亮吉酬唱者居多。共得古今体二十四首,

与又搜集到的诗、赋,编为《冶城集补遗》一卷,得诗五十七首、赋一篇。以上所述星衍诗集共九卷,后附《长离阁集》一卷,为孙星衍夫人王采薇所作,古今体诗七十八首,王氏为当时著名才女,与孙结缡后极唱和之乐,不幸于乾隆四十一年去世,年仅二十四,星衍遂终生不再娶。星衍集最早有嘉庆(1796—1820)间刊本,常见者有德宗光绪十年甲申(1884)至十一年乙酉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刊本。民国年间,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王学泰)

【留春草堂诗钞】诗别集。七卷。清伊秉绶撰。此集选录秉绶古、今体诗七百三十一首,集中作品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考其内容可知大体按照写作先后编排。集前有法式善撰于清仁宗嘉庆九年(1804)之序云,当时秉绶“自粤罢官来京,出诗草属序”,后有写于同年的翰林编修余正焕所撰后序,可知《诗钞》初编时间。又有写于嘉庆十二年吴贤淑之序云:秉绶于“嘉庆丁卯(1804)遂哀壬寅(1782)已来诸体诗题曰《留春草堂诗集》”。然集中卷六有《叹逝四首》,所悼念之法式善(卒于1813年)、张问陶(卒于1814年)皆卒于嘉庆十二年之后。又秉绶卒于扬州,而此集第七卷多作于扬州,又有《谷人祭酒七十寿诗二首》,“谷人”即吴锡麒。锡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七十整寿,此年即秉绶之卒年,可知此集之诗写作时间应是始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迄于作者去世之年。此集前除法、吴二序外,还有曾燠及魏成宪之两篇题辞,此本标明为嘉庆十九年(1814)刊于广州,秋水园藏板。第七卷(主要写于嘉庆二十年)可能为作者逝世后之补刊本。(王学泰)

【红杏山房诗钞】诗别集。十三卷。清宋湘撰。宋湘于每一生活阶段皆有诗作之结集,如:自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起在北京镶黄旗觉罗官学任教官时,生活困窘,编此三年诗为《不易居斋集》;嘉庆六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编《丰湖漫草》;后返京为翰林编修,则有《燕台剩藩》等。湘编辑自己作品,十分注重质量,在《燕台剩藩自记》中言:“自愧才学浅薄,不能配古作者,所有恭纪朝廷大典礼诗歌无一足存。其余应酬文字,心自薄之,了事即不复省览。间遇登山临水,与夫交游唱和、书画题词之事多不起草。”因此,所存诗作不多。其集分数次刊刻。嘉庆七年,刊《不易居斋集》、《丰湖漫草》、《续草》。嘉庆二十五年刊刻的《红杏山房诗钞》,除收上述三种外,还包括《燕台剩藩》、《南行草》、《滇蹄集》、《红杏山房试诗、试帖诗》、《汉书摘咏》、《后汉书摘咏》、《词馆赋钞》。此为作者自订本,录诗近九百首,前有顾莼题词。湘去世后,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宋维松重刊此集,删去顾莼题词,补入宋湘写于湖北督粮道任上的《楚

艘吟》一卷,为其最后的作品。此为湘集中录诗最多者,约九百馀首。另有作者《南行草》手稿本(包括刻本《南行草》全部及《滇蹄集》卷一中的部分作品,但字句出入很大,编次亦有不同;还有删不入集的一百零四首诗)以及散见的作者手迹和友人诗文中若干集外诗、文。(王学泰)

【天真阁集】诗文别集。六十卷,其中诗正集三十二卷,外集六卷。清孙原湘撰。作者自序云:“原湘十二三时不知何谓诗也,自丙申(1776)冬佩兰归予,始学为诗,积两年得五百馀首。己亥(1779)岁,省先大夫于奉天治中任,尽呈所作。先大夫训曰:‘汝之诗皆袭前人面目,无一性灵语。今后作诗,须自抒情性,一以忠孝为本。’退而敬识之,历今二十载,得诗三千八百有奇,自视与古人鲜有合处,惟于先大夫训,未尝一日忘尔。佩兰鬻钗钏劝予陆续付刊,因手淘汰,存十之五六,断自己亥始,明先大夫教也。”此序写于清仁宗嘉庆五年(1800),可知此集初编之时。集中所录诗按年编排,从卷一至卷一三,为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至嘉庆五年庚申(1779—1800)之诗,存诗一千四百馀首(与自序中所说数目不合)。卷一四至卷三二为嘉庆六年辛酉至宣宗道光八年戊子(1801—1828)之诗。道光九年,原湘逝世,是知其在嘉庆五年初编此集时存诗两千首左右,晚年对前半生所存之诗又作了删削,并一直编到其去世前一年,其存诗三千六百馀首。原湘逝世后,其家属整理其删剩之诗,又编为外集六卷,存诗七百七十一首,多写艳情,可能即为其父所斥之作。此集还包括词六卷、骈文四卷、古文十二卷,并附其妻席佩兰《长真阁集》七卷,有嘉庆间刻本。另有光绪辛卯(1891)重刊本。(王学泰)

【船山诗草】诗别集。二十卷,补遗六卷。清张问陶撰。正集除首卷《乐府十章》作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诗人三十三岁时外,皆按写作先后编排。除第一卷外,共分《戊丁集》、《戊巳集》、《出山小草》、《松筠集》、《乞假还山集》、《扁舟集》、《京朝集》、《奇零集》、《己庚集》、《辛癸集》、《依竹堂集》、《出守东莱集》、《药庵退守集》等十三个小集。从卷首到《辛癸集》为作者自编。其自叙云:“自十五岁乾隆戊戌(1778)始,至四十岁嘉庆癸亥(1803)止,共二十六年,得诗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删存一千七百四十六首,分为十五卷。其甲子四十以后诗,另卷附后。观存者之有不必存,知删者之有不应删矣,愜心之事,难哉。嘉庆戊辰(1808)冬日,船山记,时年四十五。”后作者遽然逝世,其遗稿由石韞玉为之删存,编为十七至二十卷,凡四卷。《补遗》六卷乃其乡人陈葆森从问陶侄张立轩处得问陶删剩之诗十五卷,转交

顾翰,经顾删削,“择其词之名隽及有关风教者,复得四百余篇以授立轩,谓之‘补遗’”(《船山诗草补遗序》)。《诗草》与《补遗》共存诗三千余首,《诗草》最早刊于嘉庆二十年,距作者去世仅一年;《补遗》刊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后曾重刊。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及《补遗》合为一编,标点排印出版。另有《船山诗草选》六卷,为士礼居黄丕烈刊本,选诗五百余首,为“独学老人”手录选出,分体编次,有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刊本。《船山诗草》有四川李岑、江海清注本,有穆宗同治九年(1870)席珍山馆刊本。

(王学泰)

【瓶水斋诗集】诗别集。十七卷,别集二卷。清舒位撰。舒位生前诗作即享大名,陈裴之《乾隆戊申恩科举人拣选知县舒君行状》云:“长洲宋观察思仁为刻《皋桥今雨集》诗两卷行世。君是时名满天下。”此为其集问世之始。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巴光浩在真州为刊《瓶水斋诗集》位在《岁暮自真州还吴下留别巴朴园副使宿匡观察》三首之二云:“落帽题襟四十年,倾囊倒篋五千篇。读书少似欧阳九,行路多于司马迁。一曲焦桐矜大雅,半林酸枣爱诸天。江中瓢与江头笠,直是先生累我传。”小注云:“时将为不佞刊诗稿。”此刻十六卷,全编按诗章写作先后排列,始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终于嘉庆十九年甲戌,录诗两千首有馀,不及其存诗之半。嘉庆二十年,作者即辞世,此年所作诗又编为第十七卷。别集二卷皆为组诗。卷一作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为《春秋咏史乐府》一百四十首,其“大旨以左氏内传为经,而以《国语》、公、穀为纬,并杂采诸他书之论春秋时事者”(见组诗序),但大多篇章质木无文,缺少感染力。二卷写于嘉庆二年丁巳,为《黔苗竹枝词》组诗五十二首,系统介绍贵州苗族源流、支派及其语言、风俗,并加小注,描写得十分具体,不仅有审美价值,而且极具史料价值。《瓶水斋诗集》十七卷本刊于嘉庆二十一年,书前有诸多名人之序,如王良士、赵翼、宋思仁、法式善、梁同书、萧抡等。附石韞玉、陈文述所撰两篇《舒铁云传》,并附其祖舒大成之诗及《瓶水斋诗话》二卷。清德宗光绪十二年丙戌,又有王氏谦德堂重刊本。另有今人曹光甫点校本,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

(王学泰)

【灵芬馆诗集】诗别集。三十卷。清郭麐撰。麐著作颇富,其诗集包括初、二、三、四集及《曩馀集》中部分诗作。初集四卷,编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乙丑(1805),所收皆为其早岁浪迹江湖、游于京都之诗。始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终于乾隆六十年乙卯,录诗五百十一首。前有孙均所撰之序,谓

麐刊其二集之后,编嘉庆元年丙辰岁以前诗作得十一卷二千余首,删为四卷五百余首。是知郭氏少作尚夥,此远非其全部。二集十卷,收录其还乡后与近游吴、越之诗,始于嘉庆元年丙辰,终于嘉庆八年癸亥,集前有阮元、吴锡麒、查初揆所撰三序。此集录诗九百五十八首,分《近游集》、《近游后集》、《探梅集》、《会吟集》、《移家集》、《山阴归棹集》、《白下集》、《楮槩集》、《竿木龠集》等九个小集。每个小集前皆有作者小序,说明该集的写作时间、地点、心境以及名集之含义,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其诗作背景。三集四卷,录诗五百零九首,始于嘉庆九年甲子,终于嘉庆十二年丁卯,所收皆为其家居患病以及数度游扬州之作,包括五个小集。每个小集前除有作者所撰小序说明该集写作时、地以及因由外,还多有名人所作之序。如:《后移家集》有杨芳灿序,《邗上云蓂集》有彭兆荪序,《云蓂续集》有乐钧序。《刚卯集》有朱文翰序,只《得闲集》无序。四集十二卷,录诗一千一百六十五首,始于嘉庆十三年戊辰,终于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为其游江西、真州、扬州、淮阴等地之作。分《旅逸集》、《江行倡和集》、《皋庠集》、《逾淮集》、《五岳待游集》、《遽庵集》等六个小集。四集前有马洵序,其小集有彭兆荪、汪慎、夏宝晋三序。另有《续集》九卷,录其晚年之作;《曩馀集》二卷录其漏编之诗词。麐集皆随编随刻,非成于一时,晚年曾将诗、词、杂著、诗话、词话合为一编出版,有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刻本传世。

(王学泰)

【小谿觞馆诗集】诗别集。正集八卷,续集二卷。清彭兆荪撰。正集为作者自编,分六个小集:(1)《楼烦集》一卷,写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至五十二年丁未(1781—1787)作者侍父官塞上之时。其自序云:“山右、宁武,古楼烦地,西极河湟,北邻火筛,瓦刺诸部、雁门三边之一也。兆荪象勺之年,家君作宰,十稔于兹,朔代燕云,还往如织。当夫霜月白夜,古情郁霞,黄麐酒酣,铜斗歌作,辄衔其山川,学为赋咏。删十存一,戢戢已多,虽操觚率尔,而以志少时鸿爪。”序中解释名集之由及写作的时间与环境。作者自编于乾隆五十二年。(2)《南鸿集》一卷,写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至五十五年庚戌彭父因病解职、兆荪侍父南归之时。其自序云:“予少长塞垣,其视归也,转若宾焉,题曰《南鸿》,取喻且志候也。”自编于乾隆五十五年。(3)《星社集》二卷,写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至六十年乙卯作者随父在颍州作教官之时。自编于乾隆六十年。(4)《佣书集》二卷,写于乾隆六十年乙卯至仁宗嘉庆元年丙辰(1796)彭父去世后兆荪为衣食奔走于京口、楚州之时。自编于嘉庆五年庚申。(5)《苇杭集》一卷,写于嘉庆四年己未至八年

癸亥作者“流转泖湖、佐人述课”之时。自编于嘉庆八年。《观涛集》一卷，写于嘉庆九年甲子至十一年丙寅作者馆于曾燠两淮盐运使署之时。兆荪集初刊于嘉庆十一年韩江寓舍。《续集》为作者去世后所补，多为嘉庆十一年以后作品。此集在宣宗道光(1821—1850)、穆宗同治(1862—1874)、德宗光绪(1875—1908)年间陆续有刊本。另有孙元培与其侄孙长熙笺注本。(王学泰)

【恩福堂诗钞】诗别集。十卷，附外集一卷。清英和撰。此编所收为作者自幼至谪戍黑龙江以前所作。除第一卷是作者从学诗至登进士第期间(1780—1792)所作外，其他各卷皆为官时所作，如法式善所说为“一官一集”，包括《蛾术集》、《瀛洲集》、《容台集》、《民部集》、《西馆集》、《水部集》、《赓扬集》等。可想见其诗作数量之多，而此《诗钞》结集于清宣宗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录诗至道光八年戊子，前后达五十年，仅收古、今体诗四百九十二首，可见其芟汰之多。编讫后又恐以诗贾祸未即刊刻。(高宗曾训戒满族亲贵大臣不得以作诗为事)。所附外集则收录其寄怀与悼念亡妻之作。此编前有作者自序、法式善序及戴衢亨之题词，初刊于道光(1821—1850)末年，作者逝世后不久。199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诗钞》与《卜魁集》、《恩福堂笔记》、《恩福堂年谱》汇为一编，排印出版。(王学泰)

【卜魁集】诗别集。一卷。清英和撰。作者于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因事谪戍黑龙江，至道光十一年放还，其往返黑龙江途中及定居卜魁(邻近今齐齐哈尔)时，触事感物，形诸诗篇。此集即收录此时作品，凡二百零二首，后附其子奎照《龙沙纪事诗》一首，其中作品大多反映当地的自然风光及社会习俗，为时人所重。其自序云，曾将此集“寄质孙平叔制府为证推敲。制府书来，以为春明旧雨索观者多，不若付诸剞劂，以省钞胥之劳，且可与前刻《卜魁城赋》相辅而行”。但当时并未刊刻。约刊于道光(1821—1850)之末。其封面仍署为《恩福堂诗钞》。199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集与《恩福堂诗钞》、《恩福堂笔记》及《恩福堂年谱》合为一编排印出版。(王学泰)

【碧城仙馆诗钞】诗别集。十卷。清陈文述撰。此集所收皆作者早年诗作，起于清仁宗嘉庆元年丙辰(1796)，开篇即为受到浙江学政阮元赞赏的《仿宋画院制团扇》诗，终于嘉庆十年乙丑。文述在《颐道堂诗选自序》中言及此集写作及结集之经过：“余束发受书，资质椎鲁，未尝学诗。嘉庆丙辰，仪征阮伯元视学浙江，见余试作，谓余曰：‘子之文，扬、班俦也，诗亦可及高、岑、王、李，若之何其不学也？’余家

无藏书，又里闾无师友之助，因先生言，始有向学之志，观书于市，且钞且读。越二年戊午(1798)，从先生入都；明年己未，又从至浙；越二年又计偕入都，居京师者五年。孙君古云为余刊《碧城诗钞》，所存藻饰之作为多。”集中，除写于浙江、京师及来往路途的作品外，因有溧阳之行，还有百余首出塞之作。前有铁保、杨芳灿、查揆三叙，并有李元崑所写跋。此集目录作八卷，故许多书录皆作八卷著录，实际全书共十卷，每卷录诗在百首上下，全编近千首。最早刊于嘉庆十年，后经战乱版毁，震泽庄元植、长洲谢承恩于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据原刊本重刊，后有《附钞》一卷，收《眉赋》、《半臂赋》、《金匱女士杨蕊渊金箱芸说序》三篇骈赋或骈文，前有谢承恩所作《陈颐道先生小传》，后有庄、谢二人所撰《重刊碧城仙馆诗钞启》及赞助刊刻者所付银两数。(王学泰)

【颐道堂诗选】诗别集。三十卷。清陈文述撰。文述一生写诗极多，总数在万首以上。尝自云：“潘榕皋先生谓余诗过多，无人能阅全集者。”(《王县(答陈云伯书)案》)故作者多次编辑刊行自己的选集及分类、分体之专集。此集则编辑刊刻多次。(1)初刊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十四卷本《颐道堂诗选》。作者自序云：“余学诗至今垂二十年，所为诗约五千首，删定之为千馀首，编十四卷。”(2)编于宣宗道光三年(1823)的十九卷本《颐道堂诗选》。书后有其友王豫跋，言其刊此本时，以少作编为外集，并加补遗。(3)刊于道光五年的二十卷本《颐道堂诗选》。其门人曹增序云：“吾师颐道先生示增《颐道诗选》二十卷、《续集》四卷、《补遗》十卷、《秣陵集》六卷、《湖山怀古集》六卷。”(4)刊于道光八年戊子的此三十卷本。越明年作者六十，戒不作诗。后子死、家贫，再度出仕，因酬酢而开戒，有《云台唱和集》，又编为《戒后诗存》十六卷。其所刊分类或分体之专集，除曹增提到的《秣陵集》、《湖山怀古集》与早年所刊《碧城仙馆诗钞》外，还有《碧城诗髓》八卷本、五卷本。另有《西泠怀古集》十卷、《西泠仙咏》三卷、《西泠闺咏》十六卷，等等。(王学泰)

【退庵诗存】诗别集。二十五卷。清梁章钜撰。章钜诗初编为《藤花吟馆诗钞》十卷，收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至宣宗道光三年(1823)间所作诗。后有《吴中唱和集》，为道光八年至九年任江苏布政使时与陶澍、朱珔、吴廷琛等唱和之作。此《退庵诗存》系章钜晚年編集，包括《藤花吟馆诗钞》所收及道光三年以后作品，大体按年代、行踪编次。卷首有翁方纲、曾燠、叶绍本、郭麐、董士锡、沈涛、白守廉、陆若霖、吴慈鹤等人题词，杨文荪、陈寿祺《藤花吟馆诗钞跋语》，及道光十二年吴廷琛为《退庵诗存》所撰序。

有道光(1821—1850)年间刊本。(王飏)

【松心诗集】一名《松心十集》。诗别集。十集二十九卷。清张维屏撰。张维屏诗,初刻为《听松庐诗钞》十六卷,有清仁宗嘉庆(1796—1820)末年刊本。后其门人李长荣从其自高宗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至文宗咸丰四年甲寅(1854)六十年间所作诗中,选录三百余首,编为《松心诗录》十卷,有咸丰四年刊本。此《松心诗集》则为维屏诗全集。卷首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作者《听松庐诗钞自序》、李长荣《松心诗录序》。收诗始于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咸丰九年,按其一生宦历行踪,编为十集。甲集为《珠江集》二卷,系十五岁至二十七岁在乡时所作;乙集《燕台集》、《燕台二集》各一卷,为嘉庆十一年至十六年赴京会试时所作;丙集《白雲集》二卷、《罗浮集》一卷,为返乡后与粤东诸诗人于广州城北白雲山麓筑雲泉山馆雅集唱和及游罗浮所作;丁集《燕台三集》、《洞庭集》、《燕台四集》、《燕台五集》各一卷,为嘉庆二十二年大挑一等,至宣宗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期间几度赴京所作;戊集《黄梅集》、《松滋集》、《广济集》各一卷,为在湖北之县任县令时所作;己集《襄阳集》、《清濠集》、《燕台六集》各一卷,为调署襄樊、丁忧归里至捐升同知、赴京候选时所作;庚集《豫章集》、《匡庐集》各一卷,为在江西任官时所作;辛集《桂林集》一卷,为道光十七年告归后游桂林所作;壬集《花地集》四卷,为道光十七年六月至二十六年归居广州城南花地乡期间所作,时经鸦片战争,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所称“惄然有忧”、“有据鞍顾盼之概”的《三元里》、《三将军歌》、《越台》、《江海》、《书愤》诸诗,均在此集;癸集《草堂集》五卷,为道光二十七年听松园落成后至逝世前所作诗,其中《声》、《战场》、《新年入城》等,皆有关广州人民反英军入城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事。有咸丰九年刊本。穆宗同治十一年(1871),陈澧又选其诗二百余诗,编为《听松庐诗略》二卷,辑入《学海堂丛刻》,有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王飏)

【雲左山房诗钞】诗别集。八卷。清林则徐撰。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林则徐之孙林洄淑刊印。卷首有光绪十二年谢章铤序。卷后附诸家唱酬诗一卷、诗馀一卷、试帖诗一卷。正集及附卷共收诗五百七十四首,按写作年代编次。是集收诗尚非完帙。郑丽生校笺之《林则徐诗集》,以此集为底本,增辑林氏家藏《使滇小草》诗稿及散见于前人著作之佚诗七十九首,共六百五十三首,较为完备。1987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王飏)

【简学斋诗】诗别集。《简学斋诗存》四卷、《简学斋诗删》四卷,共八卷。清陈沆撰。沆诗集初名《白

石山馆诗》,生前未刻,逝后“其子小舫检篋中遗诗编次,友朋选定者曰《诗存》,其余若干首为《诗删》”。断自己已(1809)以后,然少作他人诗集、杂记中往往见之”(叶名澧《简学斋诗存序》)。《诗存》卷首有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叶名澧、汪正璠、汪正荣诸人序及魏源、吴嵩梁、包世臣、姚学塽、陶澍旧序、题跋。集中诗后多附龚自珍、魏源、包世臣诸家评识。诗按年编次,始于仁宗嘉庆十四年(1809),迄于宣宗道光四年(1824)。《诗删》不编年,也未分类。二集共收诗三百六十余首。有咸丰二年刻本,与其馆课赋、馆课试律合刊十二卷,与《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简学斋诗文钞》十二卷之数相合。另有兴化双湖书屋陈氏藏本陈沆手录、龚自珍、魏源、吴嵩梁等手批《白石山馆诗》稿本,1960年上海图书馆据以影印,题名《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所收诗均见《诗存》,而龚、魏批语则有今本《龚自珍全集》、《魏源集》未收者。又光绪六年庚辰(1880)续修之《蕲水县志·艺文志》录陈沆《咏史乐府》十三首,为集外诗。(王飏)

【程侍郎遗集】诗文别集。一名《程侍郎遗集初编》。十卷。清程恩泽撰。恩泽诗、文,生前多未付梓。卒后,其子程德威将遗稿交张穆,而“涂乙潦草,首尾多不完”,且“乙酉(1825)以前之作,竟无一字存”(张穆《程侍郎遗集序》),疑别有清本而未检获。未几,德威亦卒。张穆乃与何绍基据稿本粗为编排付刻,并于卷首《启事》称:“伏凯海内与侍郎交旧,读此集有校出遗篇、缺题、讹字者,不惜邮函相告”,“以备重事厘定,俾成足本”,故此集名《初编》。卷前有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张穆序、梅曾亮序、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阮元《诰授荣禄大夫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春海程公墓志铭》。编为赋一卷、诗及词五卷,文四卷。其卷二至卷六收诗四百余首,词十二首。道光二十六年(1846)初刻,又有清德宗光绪(1875—1908)年间《粤雅堂丛书》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王飏)

【意苕山馆诗稿】诗别集。十六卷。清陆嵩撰。所收诗始于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迄于穆宗同治十年(1860),共一千二百余首。卷首有宣宗道光九年(1829)朱绶序,道光十五年陈用光序、道光二十三年张履、张肇辰序。有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初刻本。(王飏)

【龚自珍全集】诗文别集。十一辑,其中诗二辑。龚自珍撰。龚自珍著作的最早刊本,为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自刻本《定庵文集》三卷,附《少作》一卷;其同时编成的文《馀集》及诗、词集均未刻。后有道光十九年自刻《定庵续集》,即《己亥杂诗》,世称羽琤别墅本。龚自珍逝世后,遗稿曾由魏源编订,

又经其子龚橙删削,名《定庵文录》,未刊。穆宗同治七年(1868),始有吴煦刻《定庵文集》三卷、《定庵续集》四卷,为流行于世的七卷本龚自珍别集。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朱之榛据所获龚橙原藏残稿刊印《定庵文集补编》四卷。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以吴刻本、朱刻本为基础增补,刊印了十二卷本《龚定庵全集》,为最早的龚氏全集。此后所刊龚自珍诗文集版本甚多。全集主要有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庵全集》十卷;同年有国学扶轮社刊本《精刊龚定庵全集》十四卷,内附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一卷;1935年上海国学整理社刊、世界书局发行、王文濡编校《龚定庵全集》等。诗词别集主要有宣统二年邓实校刊《风雨楼丛书》本《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等。辑佚主要有章钰辑《定庵文拾遗》、张祖廉辑《娟镜楼丛刻》本《定庵遗著》等。此十一辑本《龚自珍全集》为王佩诤以吴、朱刻本、《风雨楼丛书》本、《娟镜楼丛刻》本及未刊《龚自珍集外文》稿本、《孝珙手抄词》(龚橙抄)等为底本,参以其他各本,及师友批校本、后人手校本,互相校核,并据诸书引载及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辑补,整理编定,成为目前较完备的龚自珍全集,但集外尚有佚作。全书编为十一辑,其中第九辑为编年诗,收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所作诗二百八十七首,按诗作年代编次,但若干诗系年有误。第十辑为《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两辑共收诗六百零二首,然自珍诗远不止此数,多已散佚。此书卷首有鲍正鹄撰前言,本书编例;卷末附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及魏源诸家序跋、题诗,并附《龚自珍佚著待访目》及王佩诤《校印后记》,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初版,1962年重版。又有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前言改收陈旭麓撰《重印前言》,卷末增收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删去原校者《校印后记》,1975年出版。(王飏)

【古微堂诗集】诗别集。十卷。魏源撰。魏源早期诗集名《清夜斋诗稿》,存手书稿本,于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与陈沆手书《简学斋诗稿》影印合刊。后有自订《古微堂诗稿》五卷,以抄本流传。穆宗同治九年(1870),湖南新化人邹季深据其所藏魏源诗全稿梓行,名《古微堂诗集》。卷首有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因魏源曾谓“诗集宣分体,不必编年”,故此集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古乐府、新乐府、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六言绝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编次,共收诗二百六十馀题,七百五十馀首。郭嵩焘序称“默深先生喜经世之略”,“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先生所著书,流传海内,人知宝贵之,而其诗之奇伟无能言者”,并盛称其

诗“极古今文字之变,自发其嶮崎历落之气”,“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化,潏然赍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然此集所收诗尚未全,有部分诗作存《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稿》或散见诸家诗话、总集中,而此编未收。1976年,中华书局将其诗、文合编为《魏源集》,其诗集部分即以此同治九年刻本《古微堂诗集》为底本,与《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稿》、《古微堂诗稿钞本》残本,以及《射鹰楼诗话》对校,补入诗六十馀题、一百六十馀首,共得九百馀首,同题而文字有异者亦作校勘记,或并录异文,为较完备之本。(王飏)

【东洲草堂诗钞】诗别集。三十卷。清何绍基撰。卷首有朱琦、梅曾亮、苗夔、张穆、杨季鸾等撰《使黔草叙》各一篇,顾复初、朱鉴成撰《峨眉瓦屋游草叙》各一篇,贺长龄、邓显鹤等人题词,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自序》。卷末附《东洲草堂诗馀》一卷。是集共收诗二千三百二十四首,始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迄于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其中第九至十一卷为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典试贵州时所作,别题《使黔草》。第十五、十六卷为文宗咸丰五年(1855)被降免四川学政后游川陕所作,别题《峨眉瓦屋游草》。同治六年(1867)家刻初刊本为二十八卷,德宗光绪初年增刊为三十卷。(王飏)

【思伯子堂诗集】诗别集。三十二卷。清张际亮撰。卷首有姚莹《张亨甫传》、朱琦七言诗一章叙该诗稿删订事。目录后附姚浚昌跋识,叙是集刊刻经过。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际亮于京师病笃弥留之际,自订诗稿,属朱琦代为勾乙。际亮歿后,诗稿存姚莹处。穆宗同治六年(1867),其门人李雲浩欲刻《张亨甫全集》,求全本不得,乃集其散稿刊为诗二十七卷,颇多遗讹,且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鸦片战争时期所作诗全缺。故姚莹子、姚浚昌据其自订诗稿刊为是集。收诗始于仁宗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迄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共三千另五十一首。据姚浚昌跋识云,其“癸卯岁(1843)诗二十馀首,原载别本,乱后佚去,故今所编迄于壬寅。凡稿中已删去之什,不复刻入;未删者,虽诗未工亦仍存之,盖当时去取,容有深意”。有同治八年刻本。(王飏)

【怡志堂诗初编】诗别集。八卷。清朱琦撰。卷首有杨传第序,梅曾亮、张际亮、龙启瑞等十三人的评、跋,祁雋藻、边浴礼等十一人的题词。卷末有宗鉴成《书后》。卷一为《新饶歌》四十章,作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因其为颂扬清初平定中原、统一天下之武功,故“别为卷,列集首”。自卷二至卷八,按年编次,始于道光十年,迄于文宗咸丰七年

(1857),录诗四百二十七首。此诗集初刊于咸丰九年己未,有木活字本,后有穆宗同治三年甲子(1864)京师刊本。(王颺)

【**复庄诗问**】诗别集。三十四卷。清姚燮撰。鸦片战争期间,姚燮身历战乱,目击心伤,战后复罹危疾几死,因有所悟,取平生所作绮语十数种悉烧之,自号“复庄”,乃以名其集。是集为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作者四十二岁时自订诗集,目录后有《复庄手定总目跋》称“勉存癸巳(1833)以前之作十之一,甲午(1834)以后之作十之五”,共三千四百八十八首,约为姚燮诗作总数三分之一。卷首“诗传”录徐时栋、张培基所撰姚燮小传两篇,“诗评”辑录当时名家、朋辈六十四家评赞。道光二十八年初刻,后收入《大梅山馆集》,另有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劭标点本。(王颺)

【**通甫诗存**】诗别集。正集四卷,《通甫诗存之馀》二卷。清鲁一同撰。《通甫诗存》收诗始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25),迄于文宗咸丰八年(1858),共三百二十二首,按年编次。卷首有作者自序,卷末有周韶音跋。此集为作者手定,取去颇严,仅存所作十之二三。其未入正集而犹可取者,编为《诗存之馀》,共一百六十一首,未编年。有咸丰九年刻本。(王颺)

【**巢经巢诗钞**】诗别集。《前集》九卷,《后集》六卷,《外集》一卷。清郑珍撰。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望山堂初刻《巢经巢诗钞》九卷,收宣宗道光六年(1826)至咸丰元年诗四百九十二首,按年编次。此本系作者手定二十一岁至四十六岁所作诗。卷首有莫友芝、王柏心序,卷末有作者之子郑知同跋。咸丰二年以后所作诗,有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高培谷资州刻本《巢经巢诗钞后编》四卷,录诗二百六十二首;光绪三十年云南矿务局刻本《巢经巢遗诗》四卷,录诗二百九十九首。此外,有陈夔龙刻本、莫棠刻遗诗本、卢前刻逸诗本、《四部备要》排印本等。1940年,赵恺辑刻《巢经巢全集》,以望山堂本为《巢经巢诗钞前集》九卷;合高培谷刻本《后编》及云南刻本《遗诗》,删其重复,增收手稿十馀首,共得三百八十四首,厘为六卷,名《巢经巢诗钞后集》,卷首有黎汝谦《巢经巢诗钞后集引》、唐炯《巢经巢遗稿序》等;又辑集外逸诗一卷,为《巢经巢诗钞外集》;另存《巢经巢遗诗》六首。计《全集》所收《巢经巢诗钞》凡十六卷又六首,为郑珍诗全本。(王颺)

【**半行庵诗存稿**】诗别集。八卷。贝青乔撰。卷首有作者自序、黄富民序、恽世临序各一篇。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感逝集》曾释此集取名缘起称青乔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以友人诿谗,

作黔游。越三年,自滇、蜀东还,在峡江覆舟,幸先登岸获免,而行李诗稿皆失,事后追忆写出,尚得七八,取东坡‘身行万里半天下’句以名其稿”。青乔《半行庵诗存稿自序》则称:“峡江之役,著书全亡,竭思省录,十仅存五,所幸半生游迹,尚可彷彿得之。”此集按年代先后编次,始于道光(1821—1850)中期,迄于穆宗同治三年(1864)。有同治五年刊本。(王颺)

【**咄咄吟**】诗别集。二卷。贝青乔撰。此集实为一部大型组诗,共一百二十首七言绝句。卷首作者自序称:“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二十日,扬威将军奕经奉旨进剿宁波英夷,道出吾苏,驻节沧浪亭行馆。仆投效军门,荷蒙收隶麾下,随之浙中。”“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为二卷,题曰《咄咄吟》,言怪事也。”组诗完整记录了自道光二十一年秋奕经出师,战败退守,清政府签订和约,直到次年冬奕经被革职问罪的全过程,暴露了朝廷大臣甘心乞和、将帅昏聩畏敌、清军腐败不堪的种种怪事,也反映和歌颂了爱国将士与乡勇平民英勇抗敌的事迹,足称诗史。每诗下有小注,详记军中事实,诗以记史,注以证史。有清德宗光绪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王颺)

【**邵亭诗钞**】诗别集。六卷。其续编名《邵亭遗诗》,八卷。清莫友芝撰。《邵亭诗钞》系作者于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自编诗集,收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元年即三十四岁至四十一岁所作诗四百零一首。卷首有黄统、翁同书、郑珍序各一篇及郑珍等人题识。有咸丰二年湘川讲舍初刻本、穆宗同治五年(1866)江宁三山客舍刻本。《邵亭遗诗》为作者之子莫绳孙辑,汪士铎、黎庶昌点定,收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所作诗五百四十六首。卷首有张裕钊《徵君莫子偲墓志铭》。德宗光绪元年(1875)初刻。《邵亭诗钞》、《邵亭遗诗》均收入《独山莫氏邵亭丛书》,有光绪六年扬州刻本及196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据扬州刻本重印本。(王颺)

【**曾文正公诗集**】诗别集。四卷。清曾国藩撰,李瀚章编,王定安增辑,杨书霖校。收诗三百馀首,大体按写作先后编排,始于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迄于穆宗同治(1862—1874)末。然编次未尽确当。杨书霖于《咏史》诗后注云:“公所为古今体诗,唯官京师时较多,而稿本散逸,兹所搜葺未能悉定其先后岁月。查此五首,系道光乙未岁(1835)公以公车留京时所作,故托始于此。以后虽按年编次,但于其大致略可寻参而已,各题下不复旁注岁月,以昭谨慎。”有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传忠书局刻本。德宗光绪二年(1877)刻《曾文正公全集》,其中《诗

集》改为按体编排,依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为序。光绪二十九年上海鸿宝书局本及此后各本《曾文正公全集·诗集》多从此编例。1986年,湖南岳麓书社刊行《曾国藩全集》,其中,诗即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诗集》为底本,参校湖南图书馆藏曾氏家抄本及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曾文正公诗集》本,按诗体编次,计收五古五十七题一百零五首,七古四十一题六十六首,五律十六题四十二首,七律三十题七十九首,五绝一题一首,七绝六题三十五首,共计一百五十一题三百二十八首,为目前收诗较全的曾国藩诗集。(王飏)

【秋蟪吟馆诗集】 诗别集。一名《来云阁诗稿》。六卷。清金和撰。此集包括七个小集,每集前有小序。卷一为《燃灰集》,收清宣宗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至文宗咸丰二年(1852)作品。小序称“余存诗断自戊戌,凡十五年至壬子,得诗二千首有奇”,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全失,“凭记忆一二百录之”。卷二《椒雨集》,收咸丰三年至四年初诗一百五十首,全为纪事之作,记太平军攻破南京及作者潜逃出城至清营请兵诸事。卷三含《残冷集》及《壹弦集》两集,卷四《南栖集》,收咸丰四年至穆宗同治六年(1867)作者流寓江淮为馆师、佐吏,及游幕粤东时所作诗。卷五《寄零集》,收晚年所作诗。卷六《压帽集》专录香奁绮语之作,取欧阳修“酒治衫袖重,花压帽檐偏”句意名其集。金和诗集最早由束允泰于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在杭州开刻,名《来云阁诗稿》,有谭献序及光绪二十一年束允泰《金文学小传》。1914年,作者之子金遗、金还重刻,并在跋中说明:“实则‘来云阁’者,先君自署词稿之名,诗稿自署为《秋蟪吟馆诗钞》”,故复其名。卷首增收冯煦《重刊〈秋蟪吟馆诗钞〉序》,集后附《来云阁词钞》一卷、《来云阁文钞》一卷。(王飏)

【白香亭诗集】 诗别集。一名《白香亭诗草》。三卷。清邓辅纶撰。此集最初有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高心夔南昌刻本,仅一卷。卷首有高心夔《白香亭诗集序》。收咸丰三年以前所作诗。王闿运《邓弥之墓志铭》所称“诗仅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或即指此。此本今已少见。德宗光绪十九年(1893),作者卒后,其友东河河道总督许振祎刻其诗于行署,编为三卷。卷一、卷二为古、今体诗,收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光绪(1875—1908)中叶所作诗三百余首。卷首有作者小像及刘人熙撰小像题辞、王闿运撰《前浙江试用道内阁中书舍人邓君墓志铭》、高心夔《白香亭诗集序》、许振祎《邓弥之同年诗集序》及诸家题词。卷三为“和陶诗”一卷,专收作者拟陶、和陶之作,首冠其弟邓绎《白香亭和陶诗

序》。又有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广雅书局重刻本,题作《白香亭诗草》,三卷,正文全同,并收高序、许序、邓序,而未收王闿运《邓君墓志铭》,增收袁昶、李凤苞挽词若干首,并收光绪二十三年吴翊寅跋。

(王飏)

【白华绛跗阁诗初集】 诗别集。一名《越缦堂诗初集》。十卷。清李慈铭撰。卷首有作者于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所作《白华绛跗阁诗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谓:“白华绛跗阁者,先王母建以奉佛者也。予四岁时,即从王母识字于此阁中;比十岁,好读唐人诗……此盖予学诗之始也。”故以此名其诗集。此集收诗始于宣宗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迄于同治十三年甲戌,共收八百五十余首,按年编次,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有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又有1935年铅印本,收诗全同,集名改为《越缦堂诗初集》,卷首增收平步青《李君莼客传》。又作者《白华绛跗阁诗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后附识称乙亥(1875)以后诗为《杏花香雪斋诗二集》,然作者生前未编定。1921年,由其弟子孙雄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出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至光绪十五年己丑诗,编为《杏花香雪斋诗》十卷。又有由云龙辑其光绪元年乙亥至十年甲申诗,编为《越缦堂诗续集》十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飏)

【广雅堂诗集】 诗别集。一名《张文襄公诗集》。四卷。清张之洞撰。此集有三种刊本。一为纪钜维编校本,清末顺德龙氏刻印,无序跋。收诗二百余首,始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约迄于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为《张文襄公全集》本,1928年刊行,题名《张文襄公诗集》。卷末有作者之弟子樊增祥跋。《全集》有中国书店影印重刊本,列为《海王邨古籍丛刊》之一。三为严范孙批注本,1930年由严范孙之子严智怡在北平影印。卷首清末帝宣统二年(1910)端方序称:“是集四卷,殆文襄曳杖易簪前手自编定者也。”卷末严智怡跋称:“是集乃民国八、九年先公家居时所手注”,“尚待增补,固为未定稿也”。集中眉端有严范孙批注,详于典故,而本事稍略。三本录诗及编排稍有出入。(王飏)

【入境庐诗草】 诗别集。十一卷。清黄遵宪撰。由作者自行编订,实为作者诗歌的编选定本。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首次由黄遵楷和梁启超为之刊行、校对。线装四册。梁启超题笺。不收《入境庐诗草自序》。卷首有著者像、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卷末有黄遵楷跋。诗集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收穆宗同治三年(1864)至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诗作二百四十题,数百首。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出

版了同名标点本。由高崇信、尤炳圻编辑点校。精装铅印一册。钱玄同题签。卷首始收作者为该集所写自序。卷末除收录宣统三年初印本黄遵宪跋和此书点校者《编校记》之外,还收录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有关部分、黄遵宪《新嫁娘诗》(董鲁安辑)、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十首,尤炳圻编《黄公度先生年谱初稿》。所收黄诗次序数量悉依初版。长诗划分了段落。部分诗加了注释,或过录了古直的注释。各卷之首印有丰子恺漫画一幅,卷中插有选自《中文名歌五十曲》的插曲三首。是集为《入境庐诗草》第一个标点本,所收有关资料亦颇丰富。后又有钱仲联笺注本《入境庐诗草笺注》,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重加厘定,增补改正了很多材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赵慎修)

【入境庐集外诗辑】诗别集辑佚。清黄遵宪撰。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1960年初版。编者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卷抄本《入境庐诗草》、《新民丛报》、《新小说》、《饮冰室诗话》,以及黄遵庚抄寄稿,共辑录二百六十多首诗。依写作年代顺序编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卷抄本《入境庐诗草》是作者在伦敦编辑的初稿,作者在晚年定稿时从中删去了九十四首。黄遵庚所抄稿多为著者青年时期的作品。此书卷首刊有著者像、诗稿手迹,编者前言。卷尾附录收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入境庐诗草》目录;《入境庐诗草》校勘记和黄遵楷撰《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赵慎修)

【沧趣楼诗集】诗别集。十卷,附《听水斋词》一卷。陈宝琛撰。1939年刻印本。线装四册。卷首有1936年陈三立序,卷末有陈懋复(著者之子)及陈宗藩跋。所收诗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初由陈曾寿选编,复由著者晚年手定。收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至1935年之诗七百九十一首。(赵慎修)

【八指头陀诗文集】诗文别集。释敬安撰。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敬安于浙江刻《嚼梅吟》二卷,收诗三百余首。光绪十四年(1888),刻《八指头陀诗集》五卷(陈三立、罗顺循编),收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四年诗;光绪二十四年,叶德辉增收其光绪十五年二十四年诗,编为六至十卷,以十卷本刊行。光绪三十年,浙江刻其《白梅诗》。1912年,杨度在北京法源寺收其遗稿,于北京文楷斋刻印《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八指头陀诗续集》八卷、《八指头陀文集》一卷。此《八指头陀诗文集》由梅季编辑标点,以杨度所编诗集、文集为基础,汇集了《嚼梅吟》、《白梅诗》,以及刊于《海潮音》十三卷十二号上的《法语》和散文。诗逐年编排,不分卷,始于同治十二年,迄于作者示寂当年。卷首收有著者画像、手迹、编者

前言,卷尾附录收有敬安《法语选录》,太虚等为作者所写的传记、诗集序言,梅季撰《八指头陀年表》。由岳麓书社于1984年出版。(赵慎修)

【闽中新乐府】诗别集。一卷。林纾撰。此集为一组诗专集,诗均作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适值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前夕。卷首有林纾自序。共收新乐府体诗二十九题三十二首,“皆由奋念国仇、忧愤败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亢激之音”(朱义胄《贞文先生年谱》)。每诗题下自注点明题旨。如《国仇》注“激士气也”,《灯草翁》注“伤贫民苦于税券也”。采白居易讽喻诗形式,语言通俗晓畅,“俚词鄙谚旁收杂罗”(魏瀚《闽中新乐府序》),为近代诗中别开生面之作。有光绪二十三年福州刻本。

(王臧)

【畏庐诗存】诗别集。二卷。林纾撰。卷首有1922年作者《自序》。所收诗无目录,始于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迄于1922年,共二百二十馀题、三百三十首。其自序称:“不为诗近三十年,辛亥春,罗榘东集同人为诗社,社集必选名胜之地,每集必请余作画,众系以诗,于是复稍稍为之”,“是岁九月,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余心,因触成诗”;“十年来每下愈况,不知所穷,盖非亡国不止,而余诗之悲凉激楚,乃甚于三十之时”。故集中记事、伤时、怀旧、赠友之作,每寓遗老之思。然山水纪游、图画题咏诸诗,多情景交融、清丽隽永,深于画理。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印行本。(王臧)

【窥园留草】诗别集。许南英撰。1937年铅印于北京。线装一册。不分卷。卷首有著者六十二岁时在台南题辞、照片,1921年施士洁序、汪春源序,1922年沈琇莹序、林景仁序,作者《窥园先生自订年谱》,1933年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许敦谷画《窥园之一隅》。诗集系按年编排。始于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止于1917年。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以前之作较少,1912年和1916年之作最多。共收诗一千零四十首。其中七律四百七十五首、七绝三百三十五首、五律一百三十二首、五绝三十八首、五古三十五首、七古二十三首、其他二首。全书系许赞堃等根据作者底本编辑而成,是其仅传的诗集。集后附《窥园词》,收词五十九首。(赵慎修)

【文道希先生遗诗】诗别集。不分卷。清文廷式著。叶恭绰辑印。1929年铅印本。一册,收诗约四百五十首。封面及扉页分别由夏敬观、狄平子题签。卷首有1929年陈三立序、陈诗序、叶恭绰《文道希先生遗诗叙》、徐乃昌题诗二首。文廷式以词名世,诗名为词名所掩,诗作散失很多。叶恭绰《叙》中述及是书的编辑过程:“廿载前,吾师萍乡文道希先生既

歿,恭綽撰挽诗久而不成,盖情绪烦拂,哀至于无文,遂无以自达也。既乃思辑其遗著,询诸师之子永誉,知强半散佚,仅《晋书·艺文志》暨《云起轩词》先刊行者犹传于世,为恍然者久之。”“乃誓为搜集,越十载未有所获。久之,闻湘中有藏师遗稿者,未得见。乃得诗二卷,忆少时曾读师诗稿,审非其全。复致力访求,期成完帙。凡三载,共得诗若干首,携至海上,与永誉共校之。二人之意,以为人事无常,宜先印诗稿,徐及其他,乃举付手民。”(赵慎修)

【**鸣坚白斋诗存**】 诗别集。十二卷。补遗一卷。沈汝瑾撰。1921年刻本。线装四册。吴昌硕封面题签作“鸣坚白斋诗集”。卷首收著者像、1917年吴昌硕《鸣坚白斋诗序》、沈焜《鸣坚白斋题辞》。卷尾收《钝居士生圻志》、《生圻志后》,1921年俞钟奎《跋鸣坚白斋诗刻》。诗集由作者自编,收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至1917年之诗约一千五百首左右。汝瑾临终遗言,请挚友吴昌硕为之点定诗集。诗集亦终由吴昌硕、朱砚涛和刘翰怡集资刻印问世。

(赵慎修)

【**琴志楼编年诗集**】 诗别集。十二卷。易顺鼎撰。1920年铅印本。线装二册。《琴志楼丛书》之一。卷首有作者像、自序、郭筠仙、周荇农、顾子远等题辞诗,王闿运手书三则,王秉恩、宋育仁、王蔚林、王以敏、王铁珊、田其田、樊增祥、程伯葭等序。诗集目录列为十九卷,实则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四年、五年上半年及十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之诗,因已有专集行世而未收入,仅有十二卷。共收诗五百八十四首,是作者自行编订的编年体诗选本。1920年自序云:“余刻诗最早,十五六岁时即刻《眉心室悔存稿》。以后所刻,则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樊山沌水诗录》、《吴篷诗录》、《蜀船诗录》、《巴山诗录》、《锦里诗录》、《峨眉诗录》、《青城诗录》、《游梁请剩》、《庐山诗钞》、《四魂集》、《湘社集》、《湘坛集》、《江坛集》、《魂西集》、《霭园诗集》、《魂南续集》、《庐余集》、《宣南集》、《岭南集》、《甬东集》、《广州集》、《高州集》、《癸丑诗存》,凡二十余种,然随时所刻,不相连属。其未刻者则凌杂散乱,弃置数敝簏中。”“今年庚申夏,余卧病已年余,乃始因病得闲,因恐速死,而得排比辑抄。”卷首所收郭筠仙等人题辞、序言系为其他诗集所作,汇刊于此。

(赵慎修)

【**康南海先生诗集**】 诗别集。十五卷。康有为撰。其女康同薇、康同璧编。崔斯哲手抄。商务印书馆1941年影印。平装四册。卷首有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康有为自序、作者像、崔斯哲像赞、作者诗稿手迹五幅。卷末有1935年康同璧跋、1936

年崔斯哲跋。诗集十五卷,依次题名为《延香老屋诗集》、《汗漫舫诗集》、《万木草堂诗集》、《明夷阁诗集》、《大庇阁诗集》、《须弥雪亭诗集》、《逍遥游斋诗集》、《寥天室诗集》、《避岛诗集》、《漪涟诗集》、《南兰堂诗集》、《憩园诗集》、《纳东海亭诗集》、《美森院诗集》、《游存庐诗集》。各集之首多有作者“小序”。所收诗大致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收光绪(1875—1908)初年至1927年之间诗作共一千五百七十二首,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多的康有为诗集。此集近年有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本,精装二册,列为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辑。此集后部,尤其是民国时期之诗多故作阙文,当为政治上关键字词。

(赵慎修)

【**介白堂诗集**】 诗别集。刘光第撰。初以抄本行世。所见有:(1)作者修改本。无署名,无题签,无目录,无序跋。线装一册,不分卷。共十七页,录诗约八、九十首。作者涂改甚多。《梨花盛开忽有寄兴》开篇原作“轻雨若雾淞,泛彼梨花雪。陋儒一何鄙,造化有至文”。改为“宅东有梨树,开花如白雪。微物虽无知,造化有至文”。《夜坐》改作《秋夜》,题下自注云:“此忧时先几之作。”开篇原作“晚饭憩簷下,飞月投我前”。改为“暝色忽然堕,飞月投我前”。扉页有杜大恒评语云:“结字生,锻句辣,命意曲,铸格高。作者孤怀耿抱,娉娉尘坵有年。近所诣益精,所伤益甚,故入占深而兴象转远,取径险而意境弥宽。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夜分诵之,吾不怖其奇而怖其法。”(2)传抄本,署富顺刘光第裴村。无序跋,无目录。二册,二卷。有作者自注自评及宋芸子等人评语。(3)宜宾俚峰书屋木刻本,线装二册,二卷。据鬻心鉴跋云,此集系其师、作者之好友杜先生根据诸抄本编订而成。疑此杜先生即杜大恒。(4)《戊戌六君子遗集》本。铅印。一册,二卷。无序。卷末有宜宾刻本鬻心鉴跋,似乎一仍宜宾刻本之旧,但编排亦有改动。1986年中华书局版《刘光第集》依据多种版本,分体编排,共录诗六百七十八首。

(赵慎修)

【**海藏楼诗**】 诗别集。郑孝胥撰。所见有两种版本:(1)八卷本。1914年武昌刻印,线装二册。卷首有顾云序,1914年陈衍叙。收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至1914年之诗约六百首左右。(2)十三卷本。刻印于1936年以后。扉页仍作“太岁在阙逢摄提格刊于武昌”,系仍初刻之旧。线装四册。卷首刊有著者照片以及八卷本所刊之顾云序、陈衍叙。前八卷所录诗与八卷本相同。九至十三卷所收为1915年至1936年之诗约四百首左右。共录诗在千首以上。卷末附录《名流诗话》十多则。另有十卷本《海藏楼

诗》，当刊于八卷本和十三卷本之间。未见。

(赵慎修)

【**观古堂诗录**】 诗别集。不分卷。叶德辉撰。1914年郎园自刻本。线装一册。收《南游集》、《朱亭集》、《岁寒集》、《书空集》、《汉上集》、《于京集》。无全书序跋，每集多有小序记其由来。全书收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至1914年之诗。(赵慎修)

【**岭云海日楼诗钞**】 诗别集。十三卷。丘逢甲撰。1913年广州清风桥文茂印务局印制本，原为十二卷。线装二册，丘辑辅、丘兆甲编，收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之诗。无总目。卷末丘辑辅跋曰：“先父潜斋先生能诗，先兄诗学乃出自庭训，特资质颖异，八岁即能诗，读作日不辍，积各体诗达数万首，甲午之役与台湾俱亡，兹编计仅千余首。”1937年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十三卷本，并增收“选外集”。仍署丘辑辅、丘兆甲编；另署邹鲁校订。线装四册。卷首有著者像、手迹，邹鲁、冒广生像赞各一则。卷末收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丘琮《丘仓海传》、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丘铸昌校点本，即以中山大学出版部本为底本。卷首有丘铸昌撰写之前言、岭云海日楼故居照片二幅，删去了邹鲁、冒广生像赞。卷末增收了十二卷本丘瑞甲(即丘辑辅)跋，删去了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丘应枢、丘晨波、黄志萍校点本。除正文十三卷、选外集之外，“选外集补遗”增收早年诗作及《柏庄诗草》。卷首增加丘逢甲故居、手迹照片多幅，以及蔡啸、李辰、钟敬文题辞，黄杨前言。卷末增收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邹鲁《岭云海日楼诗钞序》、陈炎政《柏庄诗集跋后》等。此外，台湾也出版了1960年“台湾文献丛刊”本和1979年影印本。(赵慎修)

【**雁影斋诗**】 诗别集。一卷。李希圣撰。1917年仁和双照楼刻本。线装一册。卷首有王式通序。依次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一年(1905)之诗约三百首。所录诗多忧时感世之作。《乱离一首仿元白体示颂年叔进两太史》、《陶然亭题壁》、《感旧》、《乱后同曾重伯还京师有感》、《曲江》和《故宫》等反映了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北京的荒凉萧条景象。《西苑》、《望帝》为系念光绪皇帝之作。《湘君》为悼念珍妃之作。《党论》、《新法》等系感慨新旧党争之作。《与客谈日俄战争》、《中立》、《三韩》为有感于日俄战争之作。《论诗绝句四十首》评论了汉、魏以来至清代朱彝尊等四十多位诗人。王式通《雁影斋诗序》称其“作诗之旨，力戒平易，亦屏除险怪”，“以诗寓史，悱恻缠绵。讽谕之遗，归于忠爱”。吴宓《空轩诗话》

曰：“近世中国旧诗人多为宋诗，宗唐者寡，其学李义山者，汪荣宝而外，有湘乡李亦元希圣。”(赵慎修)

【**谭嗣同全集**】 诗文别集。谭嗣同撰。初版于195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虽曰三联书店编辑，实由蔡尚思、方行主编，陈子展、赵纪彬、邱汉生参与编辑。四卷。卷一收《仁学》、《壮飞楼治事》、《治言》等论著十四篇；卷二收人物传记、自叙等三十余篇和《石菊影庐笔识》；卷三收书信；卷四收诗、铭赞和联语，完全打破了著者自编的诗集，依古体、律诗、绝句另行编排。卷首有作者像一帧、与唐才常等合影一帧、作者手迹五幅。卷末附录梁启超《仁学序》、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菴师书序》、康有为《六哀诗·哀谭复生》。此书于1981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列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书名之下有“增订本”字样，编者亦径署蔡尚思、方行。编辑体例一改三联版之旧而有较大变动。凡谭嗣同生前已经编订专集、稿本的，一般都保持原来面目，按照脱稿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凡未经著者编订的书信、论文、讲义等则另行编辑。共分十二种，计有：(1)《寥天一阁文》，(2)《莽苍苍斋诗》，(3)《远遗堂集外文》，(4)《石菊影庐笔识》，(5)《思纬壹壹台短书》，(6)《兴算学议》，(7)《秋雨年华之馆丛牒书》，(8)《仁学》，(9)《报章文辑》，(10)《壮飞楼治事十篇》，(11)《书简》，(12)《拾遗》。《远遗堂集外文》原为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所作，因谭嗣同编入其“旧学四种”，故一仍其旧。两卷《莽苍苍诗》及补遗系著者三十岁以前之作。三十岁以后的诗作散见于《秋雨年华之馆丛牒书》。(赵慎修)

【**香宋诗前集**】 诗别集。赵熙撰。1954年铅印本。线装二册。卷首有周善培叙，似为周氏所编选。此书由郭沫若倡议，并由郭沫若、戴自牧、江庸、周善培捐资印制出版，注明为“非卖品”。诗分五部分。第一部分题作《北游诗录》，为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十八年北京京师会试纪游之作。以下四部分分别收录五七言古诗、五律、七律和七绝。共录存诗约一千三百首。周善培叙曰：“香宋先生诗既得付印，以酬海内求索之望。曰‘前集’者，先生诗散在四方，集之不易尽，又局于资，仅能即已集者先印其十之六，权以为前集。余十之四，或续有所集，能复得资，更当付即，则以为‘后集’。”但“香宋诗后集”终未出。(赵慎修)

【**香宋诗钞**】 诗别集。二卷。赵熙撰。赵元凯、赵念平(均作者之子)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平装一册。卷首有作者八十岁照片、作者诗稿手迹、陈衍《赵尧生诗稿序》。卷末有选注者后记。选诗五百首。按写作年代编排。起于清德宗光

绪十六年(1890),迄于1945年。每首诗均有题解和注释。有关作者经历及诗歌本事,采《香宋日记》以印证。编选者后记对于此集的编选原则、体例解释说:“年来通家知好,咸相询责;成渝世契,屡示佚篇。乃固藏稿,谨录五百首付印,遵遗命也。其事多涉庚子、辛亥、内战、抗日之作,存诗史也。复据《日记》及趋庭见闻,按年编次,作必要注释,而以本事为主,有关遗事造文者间亦及之。其间前辈,但称姓字;唱酬之作,不录存者,从旧例也,谨致歉咎。”(赵慎修)

【北山楼集】诗文别集。吴保初撰。今人孙文光点校,黄山书社刊《安徽古籍丛书》之《近代人集》一种,1990年出版。吴保初(1869—1913)为清穆宗同治(1862—1874)、德宗光绪(1875—1908)年间将领吴长庆之子,字彦复,号君遂。安徽庐江人。以荫补刑部侍郎。身为名公子而锐意革新,工古诗文,与湖南浏阳谭嗣同、江西义宁陈三立、广东丰顺丁惠康、号称“清末四公子”。其诗文发为时代心声,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以庐江故家有北山楼,因名其集为《北山楼集》。此集包括诗、词、文三部分,以诗的篇幅为最多,书后附录四项:序跋、传志、题赠、杂评,搜罗材料甚广,不但有近现代文集、诗话、笔记中的有关论述,且有今人回忆文字。(纪伟)

【石陶梨烟室诗存】诗别集。黄人撰。黄人仰慕黄石斋、黄陶庵、黄梨洲、黄九烟之为人,因以“石陶梨烟室”名其书斋与诗集。诗集稿本原为金叔远收藏,1937年毁于战火。凌景埏所录副本又于1931年在邮寄中失落。夏素民复从金叔远等处搜集黄诗,成《石陶梨烟室诗存》抄本,今藏于江苏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6年,钱仲联为标点整理其中一部分,约五百首左右,以《石陶梨烟室诗存》名,刊载于《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和第二辑。正文之前有钱仲联《编者按》,庞树森、金鹤冲、秦琪三篇序文,夏素民、金鹤冲两篇跋文,庞树柏题词诗四首,金鹤冲《黄慕庵家传》。黄人与其诗俱以奇著称,但流传不广,陈衍《近代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俱不选。此次刊载虽非全帙,亦可谓黄诗首次问世。

(赵慎修)

【黄节诗集】诗别集。黄节撰。马以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发行。作者生前曾自编两卷诗集《兼葭楼诗》,收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33年之诗三百六十五题四百二十三首,惟不收1897年至1905年之间诗。张尔田、诸宗元、陈三立为作序,作者于1935年初病故,未及见诗集问世。此《黄节诗集》以《兼葭楼诗》为底本,增收一百八十六首。1897年至1905年之诗,以及1934年之诗全系增补。全部编年。对每首诗均注明原载何

处,收于何集,当初署名,录自何处。出处文字有异者均于《校记》说明。卷首收有马以君所写前言,张尔田、诸宗元、陈三立为《兼葭楼诗》所作三序。卷末收有黄节词三首、诗补遗四首、马以君编《黄节年谱》、《各家论黄节诗》及本书的编辑后记。黄节是学者型的诗人,诗不轻作,诗作大致备于是集。

(赵慎修)

【天放楼诗集】诗别集。九卷。金天羽撰。上海有正书局1922年铅印本。线装二册。卷首有张謇、叶德辉、路朝銓、胡韞玉、高燮所作序各一篇。卷末有作者门人高圭、马貽谋所写跋各一篇。诗分三集。第一集题名《谷音集》,分三卷,录诗二百六十八首,收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至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之诗。第二集题名《雷音集》,分五卷,收1912年至1921年之诗三百五十七首。第三集题名《潮音集》,一卷,收1922年之诗三十六首。合计录诗六百六十一首,为作者五十岁以前诗歌结集。是应门人高圭之请,为庆祝五十寿辰而编,出资刊行者有高圭、徐麟、张锡佩、马貽谋等金氏门人。(赵慎修)

【浩歌堂诗钞】诗别集。十卷。陈去病撰。1925年铅印本,线装二册,《百尺楼丛书》之一。卷首有汪兆铭、侯鸿鉴、姚锡钧、柳亚子、徐自华所作序各一篇。诗集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每卷各有题名。卷一《东江集》,作于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卷二《壮游集》,作于光绪二十九年东渡日本时。卷三《黟山集》,卷四《袖椎集》、卷五《岭南集》,分别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当时作者已加入同盟会,先后组织黄社、秋社、匡社、越社、神交社,在皖、浙、闽、粤等地为革命而奔走。卷六《呻吟集》,作于清末帝宣统元年(1909)。卷七《光华集》,作于1912年。卷八《湖上集》,作于1916年。卷九《护宪集》,作于1918年至1920年。卷一〇《从征集》、《南雍集》,作于1921年至1924年在广东任孙中山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时。其中《壮游集》、《岭南集》、《光华集》、《从征集》中佳作较多。徐自华序谓作者“通计生平所作略得三千馀首”,仅存千馀首。

(赵慎修)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诗词别集。十七卷,其中诗十三卷。杨圻撰。其子杨宏祚、杨炎祚、杨丰祚、杨贞祚编辑。1926年,中华书局铅印初版。平装二册。封面及扉页为康有为题答。卷首有作者1924年所写自叙、1923年和1925年分别署名野王、云史、思霞的《野王诗词钞弁言》三篇。全书包括《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和《江山万里楼词钞》四卷,附录著者原配夫人李道清《饮露词》一卷。诗钞第一卷名《少年集》,收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至三十二年

之诗。二至六卷名《壮年集》，收光绪三十三年至1917年之诗。七至十卷为《中年集》，收1917年至1923年之诗。十一至十三卷为《强年集》，收1924年至1926年之诗。卷一收有张百熙、杨士骧跋言各一篇。卷四有作者自跋。作者曾于1923年自编诗集，从二千九百多首诗中删存一千七百六十首，分为十四卷。1924年有所散失。1925年重新编订，有所增删，定为十二卷。第十三卷似为其子所编。现存十三卷，收诗一千六百二十五首。诗集中收有孙雄、费仲深、曾朴、易顺鼎、张野秋、范肯堂、杨莲府、王晋卿、阮斗瞻、李小溪、何鬯威、康南海、李仲仙的眉批。

(赵慎修)

【天梅遗集】 诗词别集。十六卷，其中诗十卷。高旭撰。高基编辑。1934年刻本。线装四册。无序跋。目录后有高君定所写附记。卷尾附录傅熊湘悼念作者之谏词、高君定《校刊从兄天梅遗集迄已告基有作》诗。此集前十卷为诗，后六卷为词。诗稿初编于1912年和1913年之间，由傅钝根、黄履平从作者诗稿中选定，词由柳亚子选编，后由高基等增补而成。诗、词均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诗始于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二十二岁，至1919年。词始于光绪三十年，止于1913年。第一至六卷题为《未济庐诗》，收光绪二十四年至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诗六百七十三首；第七、八两卷题作《变雅楼诗》，收1912年至1916年之诗二百五十一首；第九卷题《丙辰游燕草》与《丁巳游燕草》，分别录1916年诗五十一首、1917年诗四十七首；第十卷题作《变雅楼诗》，收1918年和1919年诗五十一首。共计收诗一千零七十三首。第十一至十六卷收词一百七十一首。诗、词合计一千二百四十四首。作者此后的诗、词散见于当年报刊。

(赵慎修)

【宁调元集】 诗文别集。宁调元撰。今人杨天石、曾景忠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列为“湖南近代名人文集丛书”之一。精装一册。全书分上、下两篇。系在《太一遗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宁调元于1913年就义后，傅尊、刘谦、柳亚子曾收集其著作，编为《太一遗书》，收《朗吟诗草》三卷、《明夷诗钞》二卷、《南幽百绝句》一卷、《太一诗存》四卷、《太一诗存补遗》一卷、《明夷词钞》一卷、《太一文存》一卷、《太一笺启》一卷、《庄子补释》一卷、《读〈汉书〉札记》一卷、《太一丛话》五卷、《南幽杂俎》二卷、《南幽笔记》一卷，于1915年和1916年铅印行世。此《宁调元集》上编悉依《太一遗书》之旧，并对一部分诗、

文的写作时间和刊行出处进行了考订。下编全部为此书编者从《洞庭波》、《汉帜》与《帝国日报》中辑录。始于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止于1913年7月12日，依写作和发表先后编排。卷首杨天石、曾景忠所撰前言论述了宁调元的生平事业。卷末附录部分收录了柳亚子《宁调元传》、傅尊《亡友宁太一事略》、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醴陵县志·宁调元传》，以及《宁调元被捕案卷》、本书编者所编《宁调元师友要录》、《宁调元年谱》。《朗吟诗草》为调元早年作品，光绪二十九年编定。《明夷诗钞》与《南幽百绝句》均作于长沙狱中。《太一诗存》作于1903年至1913年之间。

(赵慎修)

【无尽庵遗集】 诗文别集。周实撰。柳亚子编，周人菊校。上海国光印刷所1912年铅印本。线装二册。卷首收何竞南、高旭、邵天雷、吴引湘、丁宝铨、曹凤笙、仲民新、夏建瓴、胡韞玉、高燮等所写序各一篇，柳亚子《周烈士实丹传》、《阮烈士梦桃传》，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卷末有时人对周实和阮式的挽诗、挽联若干首。本书收文集一卷、诗集四卷、诗话二卷、《尊情录》一卷、词集一卷、北曲《清明梦》一种。周实系南社社员中第一个为革命牺牲者，震动颇大。此集系南社编印。诗系从作者诗稿中编选而成，约有四百首左右。

(赵慎修)

【磨剑室诗集】 诗别集。柳亚子撰。初为柳亚子前期诗集之名。初集、二集各十卷，收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22年之诗，每年一卷。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柳亚子文集》之一《磨剑室诗词集》，始以此名称作者全部诗作，而以原《磨剑室诗》初集、二集为第一辑与第二辑。第三辑收1923年至1929年之诗，第四辑收1929年至1940年之诗，第五辑收1940年至1942年之诗，第六辑收1942年至1944年之诗，第七辑收1945年至1948年之诗，第八辑收1949年之诗，第九辑收1950年至1951年之诗。上述九辑，全系诗人自行编定。从第三至第九辑每卷各有名称。共收诗约计四千八百首以上。《补编》由编者辑录，收光绪二十八年至1951年作者所失收之诗、词，其中光绪二十八年之诗系诗人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之作，当为作者有意弃而不录者。《磨剑室诗词集·编者的话》说：“这本诗词集基本上将目前已收集到的都编了进去。编排的体例也按照亚子先生生前手订的顺序排列”，名称和注释均予以保留。

(赵慎修)

诗作名篇

【弹歌】 古歌名。又称《竹弹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范蠡进善射者陈音，勾践问以善射之道，陈音答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即肉字）’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文心雕龙》称“黄歌断竹，质之至也”（《通变》），“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章句》）。刘勰认为《弹歌》产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是二言诗的发端。今人多认为《弹歌》产生于黄帝时代不可信，然该歌反映了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是一首以二字一句为形式的比较接近原始形态的诗歌，其短促的句式，与由劳动动作所派生出来的节奏是一致的。（费振刚）

【击壤歌】 古歌名。相传唐尧时有老人击壤而唱此歌。见于《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其词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歌最早见于王充《论衡·艺增》，其末句与此稍有不同。此歌反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生活和思想认识。从社会发展看，不可能产生于生产力极低下的原始公社时期。但上古时代的歌

谣，多系简短的韵语，口耳相传，内容会有变化，写定时又有所修饰，而从其基本内容看，产生的年代较早，似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是后人的伪作。该歌对后世影响较大，常用为诗文的典故。（费振刚）

【赧歌】 古歌名。见《尚书·益稷》，题目为后人所加。赧歌，意为作歌唱和。这首歌为虞舜时的作品，由虞舜和臣下唱和的三段歌词组成。第一段舜唱：“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第二、三段皋陶唱：“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史记·夏本纪》将第三段作舜唱。《益稷》在《尚书》中属《虞书》，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后代儒者根据古代某些传闻编写的，表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并非真正的上古史料，因此《赧歌》肯定不是虞舜时的作品。但它每句押韵，反映了诗歌的较为原始的形态。（费振刚）

【南风歌】 古歌名。传为虞舜弹五弦琴所唱的歌。见《孔子家语·辩乐》。其词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是王肃杂采秦汉诸书所载孔子的遗文逸事综合而成的托名之作，不可尽信。《南风歌》的形式与《孟子》所载的《孺子歌》相同，不可能产生于虞舜时代，但《尸子》中已载此歌，因此它或许不是

王肃的臆造。它反映以家族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时希望风调雨顺、自给自足的思想情绪。

(费振刚)

【卿云歌】 古歌名。相传为舜将帝位传给禹时和臣僚们一起唱的歌,见《尚书大传》卷一。其词云:“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亦作庆云,一种彩云,古人以为是祥瑞。现代学者认为,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显然是经过后人润色的,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有上古时代习俗的影子。

(费振刚)

【塗山歌】 古歌名。传为夏禹时塗山人所歌。见《艺文类聚》卷九九、《太平御览》卷五七一所引《吕氏春秋》。其词云:“绥绥白狐,九尾痾痾。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引,除与以上四句文字稍有不同外,另增四言四句)据称夏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有人以“恐时暮失嗣”为由,劝其择偶。夏禹则说:“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出现,夏禹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吴越春秋》作“王之证也”,可从)。”塗山人为他唱了这首歌,夏禹于是娶塗山女为妻。又《吕氏春秋·音初》记:夏禹因去南方巡视未与塗山女举行婚礼,“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按:禹与塗山女事又见《楚辞·天问》、《淮南子》(《汉书·武帝纪》颜注引)诸书,当是上古夏禹治水神话中一个片断,非历史史实。《吕氏春秋》以为这是南国歌谣之始,下开《周南》、《召南》,是研究歌谣史的重要资料。

(费振刚)

【五子歌】 古歌名。见《尚书·五子之歌》。传为夏启之子太康的五个弟弟追述夏禹训诫之作。《尚书》有今古文之争,经清人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现传本《尚书》中包括《五子之歌》在内的二十五篇为东晋梅賾所伪造,因此该歌也是伪作。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称《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与此略同,可证歌为先秦逸文。”说亦有据,可供参考。一说,五子,即五观,亦作武观,人名,非兄弟五人谓之也。

(费振刚)

【麦秀歌】 古歌名。传为箕子所作。《史记·宋世家》云:殷灭后,“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尚书大传》亦载此诗,文字稍有不同,

并以为微子所作。后来诗文中用“麦秀”指亡国之痛。此诗风格似《诗经·国风》,多沿用《国风》的成句,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后人所拟作。

(费振刚)

【采薇歌】 古歌名。传为伯夷、叔齐作。见于《史记·伯夷列传》,其词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现代学者多认为此诗为后人所拟作。但由于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耻食周粟,逃至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故旧时诗文常用以喻隐居不仕。

(费振刚)

【饭牛歌】 古歌名。传为春秋时宁戚作。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裴驷《集解》引应劭语,又见《艺文类聚》卷四三、《文选》李善注引《淮南子》应劭语,《太平御览》卷五七二引《淮南子·道应训》,《孟子·告子》下孙疏引《三齐记》,文句多有不同,今录裴驷《史记集解》所引:“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离骚》有“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句,《吕氏春秋·举难》、《淮南子·道应训》都记有宁戚饭牛夜半,扣角而歌以感动齐桓公事,但均未载他的歌词。故梁启超认为它是“晚汉依托之作”,并说“此诗就诗论诗,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但我敢说,这种诗格决非春秋时所有;摆在东汉乐府里头,倒还算上乘。”(《中国美文史稿》)梁氏所论很有见地,故录以备考。

(费振刚)

【宋城者讴】 古歌谣名。春秋时宋国筑城的民工所唱,见《左传·宣公二年》。鲁宣公二年(前607),郑、宋两国交战,结果宋国大败,主帅华元被俘。宋国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将华元赎回,并让他担任筑城的监工。当他来到工地视察时,民工对他唱此歌谣,讽刺他兵败被俘而归不思反悔,反而洋洋得意到这里来指手画脚。“睥其目”、“蟠其腹”、“于思”(同偲,又作戇),以形体的丑陋来嘲笑他的无能;“弃甲而复”、“弃甲复来”意为丢盔卸甲兵败而归,不配作我们的监工。华元让其护从去辩解,结果又遭到民工的强烈反驳,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工地。这首歌谣表现了民工对统治者无能的愤慨,也显示出他们的诙谐性格和讽刺才能。

(费振刚)

【穗歌】 古歌名。传为春秋时晏婴作。见《晏子春秋·内谏》下。其词云:“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齐景公欲建一长舍,并想进一步装饰它。在一次酒宴上,晏婴唱了这首歌以为劝谏,终使齐景公作罢。

(费振刚)

【弹铗歌】 古歌名。战国时齐冯谖所唱。见《战国策·齐策》四。其词云:“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冯谖

为孟尝君门下客,初到时,因其自称“无好”、“无能”,孟尝君的左右仅以一般食客对待,于是冯谖倚柱弹剑唱了上面的第一段歌词。如是者再三,每唱一次,他的待遇就上升一级。冯谖感念孟尝君的厚遇,为之经营“三窟”,终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费振刚)

【龙蛇歌】古歌名。传为春秋时晋介子推所作。见《吕氏春秋·介立》。其词云:“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介子推(或作介之推、介推)功成不肯受赏,因自作此歌,悬书公门。介子推功成不受禄,与其母偕隐,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作此歌的说法与《左传》所记“身将隐,焉用文”的思想不符,因此后世学者或从《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之说,认为这是介子推之从者所为,可资参考。另,“桥死于中野”,当从毕沅说,作“槁死于中野”。此歌,《史记》、《说苑》、《新序》诸书,词句多有不同,但其主旨都是为介子推鸣不平的。(费振刚)

【邶民歌】古歌名。战国时魏国邶地人民所唱。见《吕氏春秋·乐成》,又见《汉书·沟洫志》。其词云:“邶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邶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汉书》所记与此文字稍有不同)魏襄王以史起为邶令,引彰水溉邶,使人民大得其利。于是人民传唱这首歌,以歌颂史起的贤明。(费振刚)

【优孟歌】古歌名。春秋时楚优孟作。见《史记·滑稽列传》。其词云:“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死后,其子贫困。优孟着孙叔敖衣冠,仿其神态,在酒宴上为楚王祝酒。楚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遂唱此歌,赞扬孙叔敖为相廉洁,而其子孙贫困不堪,楚相是不可作的。于是楚王以寝丘封孙叔敖之子。杨慎认为这首歌“无音韵章句,而史以为歌者,不可晓。岂当时隐括转换,借声以成之欤?史不能述其音,但见其义也。”(《风雅逸篇》)卷六)另《隶释》三所载后汉熹平三年所立《孙叔敖碑》有优孟所作《忼慨歌》,与《史记》之《优孟歌》当为同一首歌,文词不同,详略互异,碑文所记或是《史记》所载之演化而成。(费振刚)

【忼慨歌】古歌名。春秋时楚优孟作。见《隶释》三之《楚相孙叔敖碑》中。其词云:“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披褐而卖薪。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优孟为春秋时楚国优人,擅长滑稽讽谏,其事迹见《史记·滑稽列传》。碑文所记优孟为孙叔敖子鸣不平事与《史记》稍异,所记优孟所唱的歌词与《史记》所载《优孟歌》实为同一首歌,但文词不同,详略互异,或是年代变迁,在传唱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

(费振刚)

【楚狂接舆歌】古歌名。春秋时楚国隐士接舆作。或称《凤兮歌》。见《论语·微子》。其词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周行天下至楚,接舆过其车而唱此歌,欲以感悟孔子,谓乱世已不可复治,不如退而归隐。另《庄子·人间世》亦载此歌,前四句与此相同,仅文字稍异。“天下有道”以下,疑为庄子自撰。

(费振刚)

【孺子歌】古歌名,春秋时民歌。或称《沧浪歌》。见《孟子·离娄》上,又见《楚辞·渔父》。其词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在江边的劳动者即兴所唱,以抒其自足自得之意。《孟子》称孔子听到一个小孩唱此歌,教训他的学生说:“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再进一步申发:“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并说这就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意思。《楚辞·渔父》中渔父唱此歌,是用以劝谕流放中的屈原的,望其审时度势,与世推移,世治则仕,世乱则隐。此皆是引申发挥之辞,不一定是此歌的本意。现代学者多认为此歌与《说苑》所载之《越人歌》是楚国民歌,与楚辞的产生有一定关系,是楚辞形式的重要来源。

(费振刚)

【越人歌】古歌名。春秋时,楚王弟鄂君子皙在江中泛舟作乐,摇船的越人把桨而唱此歌。歌辞原是越方言,鄂君子皙不解,又命舟人加以翻译,今存的歌辞即其译文。见《说苑·善说》。其词云:“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谄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这是长江下游一带的民间情歌。它与《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在形式和情调上都有所不同。在形式上,它不再是整齐的四言体。歌辞前半,每隔一句末尾用语助词“兮”字,这是“楚辞”体诗歌的突出特征;后半句中夹一“兮”字,与《楚辞·九歌》相同。格调凄婉深沉。这些都为屈原《楚辞》体诗歌的创作提出了丰富的养料。

(费振刚)

【易水歌】古歌名。战国荆轲所唱。见《战国策·燕策》三。其词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荆轲为燕太子丹赴秦国行刺秦王。太子丹在易水边上为他饯行。席间，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唱此歌。其声慷慨悲壮，“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后世即以此为壮士送别之故实。（费振刚）

【丘陵歌】 古歌名。传为孔子作。见《孔丛子·记问》。其词云：“登彼丘陵，崩施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苦远。遂迷不复，自婴屯蹇。喟然回虑，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兹蔓延。惟以永叹，涕霑潺湲。”据《孔丛子》称，孔子周行天下，鲁哀公使人如卫迎回而不能用，因作此歌以抒其感慨。《孔丛子》旧题孔鲋撰，古今学者多认为是托名之作，或系出于魏王肃之手。此歌不见于先秦文献，《史记·孔子世家》亦不载，故今人对此歌是否孔子作，多不作肯定的断语。（费振刚）

【获麟歌】 古歌名。传为孔子作。见《孔丛子·记问》。其词云：“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鲁哀公十四年，鲁人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因此绝笔，认为这是“吾道穷”之征兆。《孔丛子》称这首歌即孔子为获麟而作，现代学者多认为不能确指。（费振刚）

【琴歌】 古歌名。传为春秋时秦相百里奚妻作。见《太平御览》卷五七二引《风俗通》。其词云：“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行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此歌另见《太平御览》卷五七六引《典略》、《颜氏家训·书证》。歌辞大同小异，《乐府诗集》卷六〇作《琴歌》三首，恐不确。据《风俗通》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此曲，经询问，乃其故妻，遂夫妇团圆。这首歌所蕴含的是一个故事，这与后来流传的赵五娘、秦香莲寻夫等都表现了同一母题。歌以七言为主，这是后世七言诗的原始形态，《诗经》、《楚辞》中已略见，汉代民歌、民谣中则大量出现。此歌虽不能认定为春秋时作，但可以认为是秦汉间流行的民歌形式。（费振刚）

【秦始皇时民歌】 秦汉民歌。见晋杨泉《物理论》。其词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作品反映了秦代人民反对征戍徭役的激愤情绪。《汉书·贾捐之传》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可以想见当时人民利用歌谣同秦代的黑暗统治进行斗争的情形。此类歌谣流传下来不多，这是仅见的一首。（费振刚）

【楚人谣】 秦末原楚国地区流传的民谣。见《史记·项羽本纪》，又见《风俗通·王霸》。其词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战国时，秦国不断发动战争，先后灭亡了中原的六个国家，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六

国人民视秦国为虎狼之国，楚怀王被张仪骗至秦国，被囚禁而死于秦国。楚国人民极为愤慨，作此民谣以抒其情。虽短短八字，但它表达了楚国人民复仇的决心，成为秦末农民起义极有鼓动力的口号。（费振刚）

【子产诵】 古歌谣名。春秋时郑国役卒所歌。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又见《吕氏春秋·乐成》，但文句稍有不同。其词云：“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是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历简、定、献、声公四朝，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初期，由于人民不理解，曾遭到反对；后来改革终于使人民得到了好处，人民又转而拥护他。《子产诵》两章分别产生于其实行改革的第一年和第三年，它们反映了人民情绪的变化。（费振刚）

【秦世谣】 秦代民谣名。见《异苑》卷四。其词云：“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秦始皇的暴政，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无不诅咒其早日灭亡，这首民谣即反映了这样的情绪。这与后世在政治黑暗的年代流行于民间的谶语有相似之处，均为人民反抗精神的流露。（费振刚）

【伊耆氏蜡辞】 古歌谣名。见《礼记·郊特牲》。其词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古代部落首领。蜡，蜡祭，古代于十二月祭祀百神的名称。据《礼记》称这个祭祀活动是伊耆氏始创的。蜡辞就是祭祀上用的祝祷词，伊耆氏生活年代不详，当是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蜡辞虽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具有“咒语”作用，反映了原始人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该歌在形式上亦同“咒语”相似，多为韵语，简短精炼，自然流畅，它与原始人在劳动中产生的劳动歌谣一样，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原始形态。（费振刚）

【祷雨辞】 古歌谣名。见《荀子·大略》。其词云：“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荀子》称这首歌谣是商王成汤因天旱不雨祈祷降雨而作，不确。或为荀卿假托成汤之名，利用民间流传的祭神歌谣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作。但它与《伊耆氏蜡辞》一样，反映远古人民对自己语言力量的信任，是原始人企图用“咒语”的手段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习俗的遗留形态。（费振刚）

【成相杂辞】 古歌谣名。战国时荀卿作。见《荀子·成相》。“成相”，古代民间歌谣的一种形式。《礼

记·曲礼》上“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注：“相，谓送杵声。”“相”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卢文弨以为即《周礼·笙师》之“舂牍”，它是用竹子制成的，两端有空，演奏时“以两手筑地”。由此可推测它可能是由舂米或打夯用的劳动工具发展而成的一种乐器。“成相”即用此以击节，它的节奏韵律也是由这类劳动动作演变而来。全篇分成三段，每段均以“请成相”开头，因此名篇。每段又分成若干节，每节一韵。基本句式为“三三七四七”，整齐而富于变化，是对四言体诗歌的发展。尤其七言句的大量使用，在先秦诗歌中极为罕见。它为我国诗歌由四言演化为五言、七言，搭起了一座桥梁。

(费振刚)

【祈招诗】 周逸诗。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作。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其词云：“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周穆王欲漫游天下，祭公谋父作此诗用以劝谏，因而使善终于祗宫。周代诗歌作品，除《诗经》外，在先秦和秦汉的文献中尚有一些残句，故称逸诗，此诗是其中较为完整者。

(费振刚)

【石鼓诗】 古诗歌名，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又称《石鼓文》。在十块鼓形的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因以为名。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前的大篆，即籀文。这一组作品主要写秦国贵族阶级的田猎游乐生活。格调与《诗经》中的《秦风》及西周末年的雅诗相近，在遣辞造句上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原石于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被发现，杜甫、韦应物、韩愈等著名诗人均有诗题咏。出土时，石上文字已有磨损，宋欧阳修所见仅485字，此后文字磨损日益严重。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一石文字全部无存，其余九石也有残缺。作品写作年代，唐代多认为是西周，宋代开始有人提出系秦始皇以前的秦刻石。今人多持后说，但具体写作年代，则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难于一致。《石鼓诗》最初流传的是其拓本或摹本，楷书释文见于总集者，现存以《古文苑》为最早。

(费振刚)

【关雎】 《诗经·周南》篇名。为《诗经》的第一篇，历来受到重视。《毛诗序》认为此诗是歌咏“后妃之德”的，是对“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赞美。《鲁诗》认为是大臣（毕公）刺周康王好色晏起的。朱熹则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诗集传》）摒除其对统治者的颂扬和对封建礼教的涂饰，《毛诗序》和朱熹对这首诗本义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是一首古老的恋歌，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全诗三章。首章四句，以雎鸠和鸣于洲上起兴，表现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二章

八句，极写主人公相思之苦，以至长夜不眠，“辗转反侧”。三章八句，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为喻，写主人公想象其愿望实现时的和悦和欢乐。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诗写对爱情之追求，直率热烈，又止所当止；写相思之痛苦，一往情深，又不陷入不能自拔的绝境。孔子的话准确地指出了这首诗质朴健康的格调，也为以后这类诗的创作提出了一个典范和批评标准，影响深远。

(费振刚)

【葛覃】 《诗经·周南》篇名。是写女子归宁的诗，表现女主人公回娘家探亲前的兴奋心情。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起三句写葛藤生于谷中，枝叶繁茂，后三句写黄鸟飞鸣于树丛之中，是眼前之景，亦由此触景生情，产生归宁之念及想象与父母相聚的和悦欢乐的情景。二章字面承上章而来，虚写缝制衣裳的劳动过程。三章之“师氏”，即保姆，闻一多《诗经通义》云：“姆即师氏……论其性质，直今佣妇之事耳。”全章是女主人公吩咐其女佣准备衣物的话，其探望父母的兴奋、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费振刚)

【卷耳】 《诗经·周南》篇名。此为妇女思念其远行丈夫的诗。全诗四章，章四句。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卷耳为易得之物，顷筐为易盈之筐，久采而不盈，最后竟至将之置于大道而不顾，生动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心不在焉，神思恍惚，翘首远方的情态。后三章写其丈夫跋涉艰难，借酒浇愁，幽思难抑的情状。今人多认为是女主人公幻想中的情景，通过“从对面着想”的巧妙构思，以设想丈夫思妻，曲写妻子思夫。这种手法多为后代诗人所借鉴，如徐陵的《关山月》、杜甫的《月夜》。俞平伯则认为：“此诗作为民间恋歌读，首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均系直写，并非代词。当携筐采绿者徘徊巷陌，正征人策马盘旋，度越关山之顷。两两相映，境殊而情却同，事异而怨则一。由彼念此固可；由此念彼亦可；不入忆念，客观地相映发亦可。所谓‘向天涯一样缠绵，各自飘零’者，或有当诗人之旨乎？”（《读诗札记》）似是更为通达之论。

(费振刚)

【樛木】 《诗经·周南》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采用叠章的手法，只在相应的地方替换意义相近的动词，反复表达的是祝福“君子”安享福禄。方玉润《诗经原始》云：“观纍、荒、紫等字，有缠绵依附之意，如芰萝之施松柏，似于夫妇为近。”认为此诗以葛藤牵樛木，借喻夫妻相爱，是妻子祝颂丈夫之词。有人以为臣下祝颂君上，或祝颂贵族，亦可通。《毛诗序》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当是臆说。

(费振刚)

【螽斯】《诗经·周南》篇名。此为贺人多子多孙的诗。螽斯，蝗虫的一种，多而成群。全诗三章，章四句，运用重章叠句的手法，以螽斯喻人之多子，反复咏唱，以示祝贺。《毛诗》及“三家诗”皆有美后妃之说。而方玉润《诗经原始》则云：“其措词亦仅借螽斯为喻，未尝显颂后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后世多用此作为对亲友多子多孙的颂词。（费振刚）

【桃夭】《诗经·周南》篇名。此为有关民间婚俗的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方氏此论，当是确解。全诗三章，章四句。以民间歌谣的复沓形式，反复叠唱，表达对新娘婚后家庭美满和谐的良好祝愿。各章以“桃之夭夭”起兴，并分咏桃花之艳丽，桃实之丰润，桃叶之茂密，既点明婚礼的时令，烘托婚礼的热烈、欢畅，又使人联想到新娘姿容的秀丽、身段的窈窕，自然贴切，含蓄婉转。后世诗词中的“面如桃花”、“艳如桃李”等语，以及“人面桃花”的传奇故事，皆源于此。

（费振刚）

【兔置】《诗经·周南》篇名。此为赞美武士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写诗人见威武雄壮的武士正在打桩张网捕兔，联想其才力，期望他们成为受公侯信任的国家保卫者。首章所写之“干”，即盾牌。干和城都比喻捍卫者。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以武夫自固，为捍蔽如盾，为防守如城然。”后世把捍卫国家的将士称为“国之干城”，即源于此。（费振刚）

【采芣苢】《诗经·周南》篇名。此为妇女采集芣苢时所唱的歌。是《诗经》中重章叠句最突出者。全诗三章，十二句，六句为“采采芣苢”，另六句只在相应处更换一个动词，其余文字均同。全诗随着六个动词的变换，表现了妇女们由开始泛言往取，最后满载而归的整个采摘过程。芣苢，即车前，据称有治妇人不孕或难产的功用，故《毛诗序》说：“《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韩诗》则以为“《采芣苢》，伤夫有恶疾也”。采芣苢是为丈夫治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认为：“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今人多取此为说，以为它表现了田家妇女在田野劳作中群歌互答的愉悦情趣。（费振刚）

【汉广】《诗经·周南》篇名。此为男性失恋者所唱的悲歌。全诗三章，章八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首章的前四句，表现男子对所思慕的女子不可求而得之的失望。二、三章的前四句是叠章，意思相同，写男子虽失望但仍然心系于所思慕者，并幻想女子嫁给自己，甘心当她

的马夫，着重表现其率真善良的性情。各章后四句字句完全相同，所谓“终篇忽叠咏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方玉润《诗经原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失恋者内心的悲哀。这种叠章形式，在《诗经》中较为特殊。（费振刚）

【汝坟】《诗经·周南》篇名。此为思妇诗，写其在汝水边砍柴时，思念她远行的丈夫。全诗三章，章四句。一章写其思念丈夫的焦躁心情。第四句“怒如调饥”中的“调饥”，即朝饥。《郑笺》：“怒，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闻一多、钱钟书皆以为这是古代的度词，以饮食喻男女之情事。二章写其见到丈夫后的愉悦。三章写其丈夫归来后的宽慰心情。今人据“王室如毁”句，以为这是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以后的诗。（费振刚）

【麟之趾】《诗经·周南》篇名。此为贵族之作。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祥瑞动物。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麟，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王者至仁则出。”全诗三章，章三句。以麟为喻，称赞贵族子孙众多而且高贵聪明。高亨以为鲁哀公十四年，鲁人在鲁西郊猎得一只麒麟，孔子很受刺激，记在《春秋》上，从此停笔，并作了一首《获麟歌》，可能就是这首《麟之趾》（《诗经今注》）。可备一说。（费振刚）

【鹊巢】《诗经·召南》篇名。此为祝贺女子出嫁的诗，诗中以“鸠居鹊巢”来比喻女居男室，成语“鹊巢鸠占”即源于此。全诗三章，章四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诗百两皆指迎者而言。将者，奉也、卫也。首章往迎，则曰御之。二章在途，则曰将也。三章既至，则曰成之。此诗之次也。”《毛诗序》以为是赞扬“夫人之德”，又以百辆车子迎娶，故有人认为这是写贵族家庭婚姻之事，亦通。（费振刚）

【采芣】《诗经·召南》篇名。此为描写宫中女子劳作的诗。《毛诗序》说：“《采芣》，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左传》隐公三年：“蕝芣蒹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据此知此诗写公侯夫人采芣以为祭祀。又，芣即白蒿，相传用白蒿煮水浇在蚕子上，蚕可早出。古代后妃、夫人有亲蚕之礼，此诗写她们在宫中养蚕之事。二说均可通。全诗三章，章四句，写得平淡而含蓄。

（费振刚）

【草虫】《诗经·召南》篇名。此为思妇诗，写其对远出丈夫的怀念以及她丈夫归来时的喜悦。全诗三章，章七句。每章前四句写未见时的忧思。草虫鸣叫是秋天的物候，采芣、采芣当在春天，由秋而春，着

重表现分别日久,思念深切之情。每章后三句写夫妻相聚之喜悦,从其反复叠唱中,使人想见其场面的热烈,情绪的奔放。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始因秋虫以寄恨,继历春景而忧思。既未能见,则更设为既见情形以自慰其幽思无已之心。此善言情作也。然皆虚想,非真实观。”又说:“本说‘未见’,却想及‘既见’情景,此透过一层法也。”可备一说。(费振刚)

【采蘋】《诗经·召南》篇名。此为写女子出嫁前祭祀祖先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礼记·昏义》:“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苴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诗中所描写的就是采集蘋藻用以祭祀的情形,反映了当时的礼俗。

(费振刚)

【甘棠】《诗经·召南》篇名。《毛诗序》云:“美召伯也。”三家诗无异说。《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全诗三章,章三句。因人及物,因物思人,写的是不忍损伤召伯曾在下面歇息的树木,表达的是对召伯爱戴的感情。后世因用“甘棠”来称颂地方官吏的清廉。召伯,一般以为指与周公旦齐名的召公奭,也有的认为是指周宣公时的召穆公。

(费振刚)

【行露】《诗经·召南》篇名。此为女子拒婚的诗。全诗三章,一、三章三句,二章六句。《毛诗序》说:“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朱熹也认为“女子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这与《鲁诗》所引召南申女以夫家轻礼违制而不肯与之成婚的故事相同。今人或认为诗中的女子已有夫家,因以对方要求缔结婚姻的理由不充分而拒绝其强行聘娶,这首诗就是女子家长对于男方以打官司作为压迫手段的答复。

(费振刚)

【羔羊】《诗经·召南》篇名。此诗描写士大夫养尊处优,从容自得的生活情态。全诗三章,章四句。羔羊,小羊。以小羊之皮制为裘,是当时大夫的服饰。《毛诗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当系附会。今人或以为这是一首对当时官吏奢侈生活的讽刺诗。(费振刚)

【殷其雷】《诗经·召南》篇名。此为思妇诗。朱熹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诗集传》)全诗三章,章六句。以隆隆的雷声起兴,接写其“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而诗之女主人公随着这雷声由远而近,想象

丈夫从役在外,无时不处于奔波劳碌之中,心情越来越焦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在每章末的反复出现,正真切地表现了这一心情。晋傅玄《杂言诗》:“雷隐隐(《白帖》作殷殷),感妾心,倾耳倾听非车音。”可与此诗参读。

(费振刚)

【摽有梅】《诗经·召南》篇名。此为待嫁女子所唱的情歌。她感叹青春年华易逝,希望求偶的男子及时向她求婚。全诗三章,章四句。每章前二句以梅子坠落比喻青春的消逝,后二句是写女子对男子的热切期望。通篇抒写率直,感情热烈,且直中带曲,情景交融。

(费振刚)

【小星】《诗经·召南》篇名。《毛诗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郑笺》、朱熹《诗集传》均就此发挥,实为臆说,但旧时却因此以“小星”作为妾的代称。该作实为小官吏之诗。全诗二章,章五句。写主人公连夜外出办事,奔走于途,望着空中微弱的星光,想到尊卑之间的劳逸不均,发出了命不如人的感叹。

(费振刚)

【江有汜】《诗经·召南》篇名。此为被遗弃的女子自怨自慰的诗。江,长江;汜,《毛传》云:“决复入为汜。”《尔雅》、《说文》说同。据此,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妇人为人所弃,而仍不忍忘其夫,犹幸其万一自悔,有以处我,我且啸歌以自遣。”今人多因之,认为这诗中女子仍幻想其丈夫会回心转意,与她重归于好。全诗三章,章五句。重章叠句,回环往复的抒写特点十分突出。

(费振刚)

【野有死麇】《诗经·召南》篇名。此诗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是一首“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婚姻之诗”(姚际恒《诗经通论》)。全诗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首二章写青年猎手在郊外林中遇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猎手以自己的猎物为赠,终于获得了姑娘的爱情。末章是姑娘悄悄嘱咐对方的话:“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意即“别冒冒失失,别动手动脚,别惹得狗儿叫起来,惊动了人”(余冠英《诗经选》)。俞平伯《读诗札记》评此云:“为婚时女之密语,神情宛尔,绝妙好词。”

(费振刚)

【何彼秣矣】《诗经·召南》篇名。此诗描写周王女儿(即王姬)下嫁诸侯时的盛况。全诗三章,章四句。《毛诗序》以为这是称赞王姬能“执妇道”。朱熹也认为是表现王姬下嫁诸侯“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一说是讽刺其车马服饰过于奢侈,而与其德不相称。

(费振刚)

【驺虞】《诗经·召南》篇名。此为赞美猎人技艺高超的诗。全诗三章,章三句。《毛诗序》以为该诗

写田猎以时,“庶类蕃殖”,是赞美“文王之化”。《毛传》云:“骆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三家诗则认为骆虞是天子掌鸟兽的官。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为此诗陈古刺今,以古之“良臣之众盛”,“伤圣泽之不逢”。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费振刚)

【柏舟】①《诗经·邶风》篇名。全诗五章,章六句。此诗的主题以及作者的身分性别,历来众说纷纭。《毛诗序》以为是“仁者不遇,小人在侧”的君子失意之诗。《鲁诗》则认为是卫寡夫人自誓忠贞,守志不嫁的诗。朱熹《诗集传》则认为“妇人不得于其夫”,因作此诗以明志。今人俞平伯《读诗札记》云:“观其措词,观其抒情,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殆非男子之呻吟也。”余冠英《诗经选》云:“从诗中用语,像‘如匪浣衣’这样的比喻看来,口吻似较适合于女子。从‘亦有兄弟,不可以据’两句也见出作者悲怨之由属于家庭纠纷的可能比较大,属于政治失意的可能比较小。”俞、余二氏从朱说,又有所发挥,较胜。②《诗经·鄘风》篇名。全诗二章,章七句。《毛诗序》谓其为“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今人陈子展依三家诗遗说及《史记·卫世家》所说,认为“共伯余立为卫君,为其弟和所攻而自杀,共姜已嫁,诗为寡妇守节之词”(《诗经直解》)。今人亦有从作品文义出发,认为此诗所叙与史事无关,“是一首少女要求婚姻自主,宁死不易其志的诗”(《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细绎全诗,当以此说为胜。按《诗经》有两首诗均以“柏舟”为题,另一首编于《邶风》中,两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均为女性,但由于她们的遭遇不同,因之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以及所用的艺术手法,都有很大区别。《邶风·柏舟》作于已遭弃离之后,故诗中充满了痛苦的反思;《鄘风·柏舟》作于热恋之时,故诗中突出了愤怒的抗争。在艺术手法上,前者用的是“回荡的表情法”,“是一种极浓厚的感情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它抽出来”;后者所用的是“奔迸的表情法,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感情尽量表出”(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费振刚)

【绿衣】《诗经·邶风》篇名。《毛诗序》云:“《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朱熹亦谓“庄公惑于嬖妾,夫人庄姜贤而失位,故作是诗。言绿衣黄里,以比贱妾尊显而正嫡幽微,使我忧之不能自己也。”显系臆说,不足取。此实系悼念亡妻之诗。全诗四章,章四句。写衣裳是妻子亲手缝制,如今人已作古,睹物思人,使已倍增伤感。为后世“悼亡”诗词之滥觞。(费振刚)

【燕燕】《诗经·邶风》篇名。《毛诗序》云:“《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崔述以为“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于归者。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读风偶说》)。今人多取崔氏之说,认为是卫国国君送别女弟远嫁之诗。全诗四章,章六句。前三章写送别时之情景,末章写其兄称赞女弟的美德并以此自勉,为后世送别诗之滥觞。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词:“看燕燕,送归妾。”即以此诗为典故。(费振刚)

【日月】《诗经·邶风》篇名。为妇女受到丈夫的虐待所发出的沉痛呼声。全诗四章,章六句。《毛诗序》云:“《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云:“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今人多以为无法确指。闻一多曰:“《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日月篇》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此以日月为夫之象,最为著明。”(《诗经通义》)(费振刚)

【终风】《诗经·邶风》篇名。此诗与《日月》主旨相近,但它着重描写丈夫的浪荡放纵,视女子为掌中玩物,突出了女主人公处境的险恶。全诗四章,章四句。《毛诗序》以为这诗是写庄姜伤己“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诗当作于卫桓公死后。朱熹《诗集传》以为是庄公生前所作,“庄公之为人,狂荡暴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毛诗序》所言与诗意不合,朱熹的论断似亦不确,今人以为诗中所言不能确指。(费振刚)

【击鼓】《诗经·邶风》篇名。此诗反映远征战士长期不得归家的怨愤情绪。《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参以《左传》有关记载,郑玄以为这是描写鲁隐公四年(前719),卫与宋、陈、蔡联合伐郑的战争(《毛诗传笺》)。也有人以为是写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的战争。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全诗五章,章四句。突出描写士兵远征于外,处境艰险,情绪极度消沉,“一时怨愤离叛之状可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普通征人思乡的诗不尽相同。(费振刚)

【凯风】《诗经·邶风》篇名。此为儿子歌颂母亲的诗。《毛诗序》用“美孝子”来概括这首诗的主旨基本是正确的,但它用“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

成其志尔”，来解释这首诗产生的原因，却甚为荒谬。朱熹《诗集传》也承袭了这一说法，但此诗的本义在汉代以至北宋并没有泯灭，在史籍或文人创作中，多有用《凯风》《蓼莪》并提，或单提《凯风》“寒泉”，以歌颂母亲或寄托对母亲的思念。全诗四章，章四句。“凯风自南”的起兴，是对母亲慈爱心怀的赞美，“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是儿子心中的母亲形象，并由此产生自责：“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费振刚）

【雄雉】《诗经·邶风》篇名。此为怀念远出丈夫的诗。全诗四章，章四句。《毛诗序》以为卫宣公“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细绎诗意，有怀念之情，有劝勉之意，而无所谓对“淫乱”的谴责。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是“期友不归，思而共勸”的诗，可备一说。

（费振刚）

【匏有苦叶】《诗经·邶风》篇名。此诗描写一位女子在河边等待自己情人的所见所感。全诗四章，章四句。前三章写女子在期待中的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故有人以为诗之前后文义绝不相属，也有人赞赏其制局离奇变幻，忽断忽连。四章以女子答复舟子的话“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作结，表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

（费振刚）

【谷风】①《诗经·邶风》篇名。此为著名的弃妇诗，也是《诗经》中少数有浓厚叙事成分的作品之一。全诗六章，章八句。“通篇全作弃妇之口吻，反复申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不特悱恻，而且沉痛。篇中历叙自己持家之辛苦，去时之徘徊，追忆中之情痴，其绵密工细殆过于《上山采蘼芜》。彼诗只寥寥数语而此则絮絮叨叨；彼诗是冷峭的讥讽，此诗是热烈的怨诅。《三百篇》中可与匹敌者只《氓》耳；而又各有各的好处，全不犯复。”（俞平伯《读诗札记》）②《诗经·小雅》篇名。此为责备丈夫忘恩负义的弃妇诗。全诗三章，章六句。《毛诗序》云：“《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诗集传》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这与诗中“真予于怀”的描写不符，故今人多不从。闻一多认为此诗与《邶风·谷风》“所咏一事，惟文词详略为异，当系一诗之今化”（《诗经通义》）。顾颉刚、俞平伯也有与闻说相似的看法。

（费振刚）

【式微】《诗经·邶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四句。《毛诗序》云：“《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郑笺》亦云：“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式微”因此成为思归的典故。又，式微即天将暮之意，后来也用以称事物的由盛而衰。今人多不取《毛诗序》说，而认为这是人民苦于劳役所发出的怨责

声，表达他们对于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憎恨。

（费振刚）

【旄丘】《诗经·邶风》篇名。全诗四章，章四句。《毛诗序》云：“《旄丘》，责卫伯也。”认为黎国为狄所灭，黎国君臣逃到卫国，而卫国迟迟不肯出兵救黎，黎之臣下因作此诗以责怨。今人或以为这是流离失所的人们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诗，或以为女子思念爱人的歌。

（费振刚）

【简兮】《诗经·邶风》篇名。此诗以女性的眼光，用赞美的口吻描写了卫国公庭上的一场万舞（一种舞名）。全诗四章，三章章三句，一章六句（《毛诗》作三章，章六句）。一章写舞师出场，二章写武舞，三章写文舞，四章写对舞师的怀念。全诗的重点是赞美高大雄武的舞师。《毛诗序》以为该诗是“刺不用贤”，朱熹《诗集传》发挥说：“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与诗意不合，显系附会。

（费振刚）

【泉水】《诗经·邶风》篇名。全诗四章，章四句。《毛诗序》云：“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今人多从之。何楷《毛诗世本古义》以为此诗与《竹竿》、《载驰》都是许穆夫人所作。属推测之词，实难于确指。

（费振刚）

【北门】《诗经·邶风》篇名。此为小官吏诉苦的诗。全诗三章，章七句。一章写他因无人理解他的贫窘的生活而忧心殷殷，二、三章为叠章，写他外有公事的逼迫，内有家人的责怪。各章均以“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作结，表现了他无法摆脱困境的沉重心情。《毛诗序》云：“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后人因此用以比喻怀才不遇。

（费振刚）

【北风】《诗经·邶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六句。《毛诗序》云：“《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今人多本此说，以为这是写卫国人民不堪虐政，号召友朋共同逃亡的诗。有的则认为这诗写一对相爱者的出走。闻一多则认为是“亲迎之诗”，“车即亲迎之车。古诗‘良人惟古（故）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盖本此。”（《风诗类钞》）均通。

（费振刚）

【静女】《诗经·邶风》篇名。此为爱情诗。《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因此有人以为这诗是“刺宣公纳伋妻”的。王先谦据三家诗遗说以为是“媵侯迎而嫡作诗”，“为望媵未至时作也”（《诗三家义集疏》）。皆为附会之词，今人多不取。朱熹承袭欧阳修的论断定为“淫奔期会之诗”（《诗集传》）。今人取其“期会”之意，而认为这是写

男女约会的。全诗三章,章四句。首章写男子应约而来,女子却故意把自己隐蔽起来,急得他“搔首踟蹰”。二、三章写会面的情景,女子把从牧场带回的彤管、蕙草送给男子,男子则以“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的双关语作答,显现了他一片爱人及物的诚挚痴迷之心。(费振刚)

【新台】《诗经·邶风》篇名。此为卫国人民讽刺卫宣公夺娶儿媳的诗。《毛诗序》云:“《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郑笺》:“伋,宣公之世子。”卫宣公夺子妻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及《史记·卫世家》。今人均据此以为说。全诗三章,章四句。运用叠章复沓的形式,以华美高峻的新台、滔滔东流的黄河为反衬,以“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为比喻,突出这本来应当是“燕婉之求”的好事结果却成了父占子妻的丑闻。三章之“鸿”,旧解为“雁之大者”,今人多从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解为蟾蜍,即蛤蟆,诗作者以此对卫宣公进行辛辣的嘲讽。(费振刚)

【二子乘舟】《诗经·邶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四句。《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伋、寿二子争死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今人多取此为说,认为是卫国人知道卫宣公和宣姜害伋的阴谋,写此诗表示对伋、寿的忧虑和耽心。有的则不取这一历史事实,仅以为是父母悬念乘舟远行孩子的诗,亦可通。(费振刚)

【墙有茨】《诗经·邶风》篇名。此为卫国人民讽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诗。《毛诗序》云:“《墙有茨》,卫人刺其上。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所谓“君母”,即宣姜。公子顽即昭伯,宣姜子惠公之庶兄,宣姜与之通奸,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此事见《左传·闵公二年》,即为《诗序》说之所本。全诗三章,章六句。以叠章的形式,用宫墙之蒺藜不可扫除,比喻宫廷之内秽闻不可言谈。(费振刚)

【君子偕老】《诗经·邶风》篇名。此为讽刺卫宣姜的诗。《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郑笺》:“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全诗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用反衬手法,着力渲染其作为“国母”的仪表之雍容庄重,服饰之华美高贵,而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点破,说明其品德与之不相称,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费振刚)

【桑中】《诗经·邶风》篇名。此为男子抒写他和想象中的情人幽会的诗。全诗三章,章七句。每章

前四句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表现了男子的期望;末三句,写其与情人相聚时的种种情景。咏唱再三,表现男子的无限柔情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诗中出现三个女性的名字:孟姜、孟弋、孟庸,今人多以为是反复咏叹和叶韵的需要,并不是一人思三女。

(费振刚)

【鹑之奔奔】《诗经·邶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四句。《毛诗序》云:“《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鹑之不若也。”今人多据此为说,以为此诗讽刺宣姜私通公子顽,责骂她荒淫无耻,连禽兽都不如。亦有人疑为刺宣公之作。(费振刚)

【定之方中】《诗经·邶风》篇名。此为颂美卫文公徙居楚丘,重建卫国的诗。据《左传》载,闵公二年(前660)冬,狄人灭卫。在宋、齐等国的帮助下,卫迁遗民于漕,立戴公。不久,戴公卒,文公立。僖公二年(前658年),文公在楚丘重造城市宫室,“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此诗即是对他重建国家的歌颂。全诗三章,章七句。一章描写营造宫室,种植树木的情形,二章追叙在筑城前对地势的考察,并最后用占卜的方式加以确定。三章是对文公的称颂,说他勤于农桑畜牧,具有切实而深远的谋虑。(费振刚)

【蟋蟀】《诗经·邶风》篇名。《毛诗序》云:“止奔也。”《后汉书·杨赐传》李注引《韩诗序》:“刺奔女也。”今人多以此为说,认为此诗写一个女子私自出奔,不顾当时的礼法,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因而受到舆论的指责。这从反面反映了当时妇女婚姻不自由的情况和这个女子与之抗争的精神。全诗三章,章四句。前二章以“蟋蟀在东”、“朝济于西”起兴。蟋蟀、济皆指虹,古人认为虹是阴阳交接之象,是淫乱或阴淫于阳的象征。该诗责怪女子私奔,故以此为兴(详见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三章首句“乃如之人”,指女子,以下三句,均为指责之词。

(费振刚)

【相鼠】《诗经·邶风》篇名。此为讽刺诗,正面斥责在位的贵族统治者的偷食苟得,罔味无耻。全诗三章,章四句。各章均以鼠起兴,也以此反衬,以见人不如鼠,而“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的诅咒,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眼光的犀利以及对自己力量的确信。(费振刚)

【干旄】《诗经·邶风》篇名。《毛诗序》云:“《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今人或据此为说,以为此诗赞美卫文公招致贤士,复兴卫国。也有人认为“旄”多指女性,因之以为该诗写贵族男子乘车去看望或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亦通。(费振刚)

【载驰】《诗经·邶风》篇名。写许穆夫人回漕邑吊唁卫侯，向许国大夫表明自己救卫的主张，是《诗经·国风》中唯一可以明确作者姓名的诗。此诗反映了作者对自己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她见识的远大。许穆夫人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全诗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此依《毛诗》，朱熹《诗集传》、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此稍异）。许穆夫人事迹见《左传·闵公二年》。一章写卫国为狄人所灭后，许穆夫人快马加鞭赶至漕邑吊唁，并希望为卫国策划向大国求援，可是许国大夫竟赶来劝阻。二、三章是许穆夫人答复许国大夫的言辞，表示与自己的祖国人民同赴国难的决心。四、五章写她终于冲破阻拦，踏上卫国土地的心情，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费振刚）

【淇奥】《诗经·卫风》篇名。《毛诗序》云：“《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史记·卫康叔世家》称：“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又据《国语》、徐幹《中论》等称武公年过九十，还能小心谨慎，欢迎批评。今人多据此为说，以为是时人称赞卫武公之诗。全诗三章，章九句。每章首二句以淇水曲岸边茂密绿竹起兴，中三句全用譬喻，以象征卫武公的品格德行。全诗在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上颇具特色，对后世赞颂体的文字甚有影响。又闻一多以为此诗的大意与《魏风·汾沮洳》相像，似乎也是女子的作品。可备一说。（费振刚）

【考槃】《诗经·卫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毛诗序》云：“《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宋以后学者认为是隐者之诗，如朱熹说是赞美贤者隐居涧谷之中而自得其乐（《诗集传》）。今人多从此说，以为是隐逸诗的发端。

（费振刚）

【硕人】《诗经·卫风》篇名。此为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毛诗序》本此为说，谓庄公嬖爱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无子，国人闵之，以作此诗。今人多从之，但不认为此诗有闵其“贤不见答，终以无子”之意。全诗四章，章七句。一章写她的出身高贵，二章写她的容貌美丽，三章写她出嫁时礼仪之盛，四章写她的随从之多。二章开头连用一系列比喻来写庄姜身体的一些细部，最后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作结，写其神态，形象生动，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细致刻画

女性容貌、情态美的篇章，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

（费振刚）

【氓】《诗经·卫风》篇名。此为著名的弃妇诗，在《诗经》同类题材中，与《邶风·谷风》可称为姊妹篇，皆具浓厚的叙事成分，并分别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弃妇形象。全诗六章，章十句。一、二章写其相恋和结婚的经过。三章写其对不幸婚姻的检讨，“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是女主人公的追悔，也是她留给后世姐妹的血的教训。四、五章写男方的负情背德。文章写其对男方的痛恨和自己决绝的态度，表现了她性格的刚强与反抗精神，与《谷风》中女主人公的柔顺和被弃逐时的徘徊顾恋形成鲜明的对照。（费振刚）

【竹竿】《诗经·卫风》篇名。《毛诗序》云：“卫女思归也。”今人多据此为说，以为是卫国女子远嫁别国，思归不得的诗。何楷《毛诗世本古义》以为此诗与《泉水》、《载驰》同为许穆夫人所作，属推测之辞，难于确指。全诗四章，章四句。二章三句“女子有行”，《诗经》中凡四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于《蟋蟀》诗疏中说：“女子，谓奔者。行，嫁也。奔而曰‘有行’者，先奔而后嫁。”王疏又引《列女传·齐宿瘤女》言：“赖大王之力，父母在内，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随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称《蟋蟀》之女主人公与宿瘤女相反，是“不受教而随君者”，似亦可以理解为卫女思归不得的原因。录以备考。（费振刚）

【芄兰】《诗经·卫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六句。《毛诗序》云：“《芄兰》，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郑笺》：“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谓有才能而骄慢于大臣，但习威仪，不知为政以礼。”今人多认为此诗讽刺贵族子弟幼稚无能，却装腔作势，大摆其贵族的派头。也有人认为是一位姑娘嘲笑其恋人在她的面前摇头晃脑，假充斯文。（费振刚）

【河广】《诗经·卫风》篇名。此为宋人侨居卫国思乡抒怀之诗。《毛诗序》云：“《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郑笺》：“宋桓公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诗以自止。”今人多以为未可为据。全诗二章，章四句，由四组一问一答构成。河水滔滔，诗人却以为可以“一苇杭（航）之”、“曾不容刀（舫）”；漫漫归途，诗人却以为可以“跂予望之”，“曾不崇朝”。正是这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地表现了诗中主人公思乡的深切和不可归之的沉痛心情。（费振刚）

【伯兮】《诗经·卫风》篇名。《毛诗序》云：“《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无反顾。”《郑笺》亦云：“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

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西周后期至春秋时代,卫国战事一直不断,将士们常年离家征战。《伯兮》便是通过妇女在家思念出征丈夫的描写,反映了这一社会问题,委婉地表达广大人民的怨愤情绪。全诗四章,章四句。一章写妻子以自豪的口气赞美自己的丈夫是杰出的武士、爱国英雄。二章写妻子在丈夫出征后的愁闷心绪,短短四句,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百无聊赖的生活情状。这两章的表现手法是赋。三、四章进一步揭示女主人公思念之情的深度。“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起兴,新颖别致,并兼有比的作用,把女主人公极为失望的心情作了有力的烘托和渲染。“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也是奇特的写法,使之如痴似狂的刻骨相思和伤心神态跃然纸上。四章的表现手法同三章相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较为平易朴实,令人倍感真切。此篇对后世“闺怨”诗的写作,有重大影响。(费振刚)

【有狐】《诗经·卫风》篇名。此诗写妇女思念远行于外的丈夫。全诗三章,章四句。各章皆以狐狸独行淇水岸边起兴,比喻其丈夫远行于外,并与每章后二句想象其丈夫衣服破烂的景况联成一体,表现了她深沉的思念。《毛诗序》以为这是“刺时”之作,“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因之也有人以为是怨女旷夫相求的诗,亦可备一说。(费振刚)

【木瓜】《诗经·卫风》篇名。此为写情人赠答的诗,作者似是男性。全诗三章,章四句。意为投我以木瓜、桃李,我用佩玉来报答,其实这不是为了报答,而是用以表现永久的恩爱。三章重叠,表现了男主人公对女子真挚和坦诚的爱意。(费振刚)

【黍离】《诗经·王风》篇名。《毛诗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诗也。”旧时因以用为凭吊故国、忧思伤乱之词。今人或取此为说,或以为是流浪者所忧之词。郭沫若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是旧家贵族悲哀自己的没落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诗三章,章八句。每章前四句以“彼黍离离”起兴,以稷由苗到穗到实表示时间的变化,并由此引出抒情主人公出场。一、二、三章的“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与各章起兴相对应,显示出主人公郁闷心情随时序的变化而日益加深。每章后四句句字句相同,反复倾诉主人公不为人所理解的愤怨之情。

(费振刚)

【君子于役】《诗经·王风》篇名。此为思妇诗。全诗二章,章八句。《毛诗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王先谦则云:“据诗文鸡栖、日夕、牛羊下来,乃室家相

思之情,无僚友托讽之谊,所谓‘君子’,妻谓其夫,《序》说误也。”(《诗三家义集疏》)以后说为胜。作品以女主人公独白的形式,用朴实简净的语言揭示了她内心的无限忧思,特别是其中夕阳西下、牛羊下来这一特定景物的描写,把女主人公的寂寞孤独、刻骨相思的苦况映衬得更加深切动人。清人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评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此作对后世思妇诗、闺怨诗具有深远的影响。

(费振刚)

【君子阳阳】《诗经·王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四句,《毛诗序》云:“闵周也。”谓在朝的臣僚“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故诗人作此诗表示忧闵。此说与诗意不符,当是附会之辞。该诗实为描写舞师或乐工表演的作品,重点是赞扬他在演出中自得自乐的精神状态。与《邶风·简兮》诗意相近,或许也是一位女子的作品。

(费振刚)

【扬之水】①《诗经·王风》篇名。此为戍卒怀乡的诗。《毛诗序》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郑笺》云:“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微弱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余冠英据《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十三年(前738)楚人入侵申国,三十六年(前736)周王遣兵戍守的记载,以为“这诗可能就是那时产生的”。全诗三章,章六句。诗用叠章形式,因此,有人认为守边在“申”、“许”、“甫”,因连类而及,不一定同时戍守三国。②《诗经·郑风》篇名。《毛诗序》谓“悯无臣也。君子悯忽之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是诗也。”今文三家无异说。朱熹《诗集传》则认为这是“男女相谓”之词,“言扬之水则不流束楚矣,终鲜兄弟,则维予与汝矣。岂可以他人离间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诳女耳”。现代学者多循此两说加以申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盖诗人见人有所间于其兄弟二人者,作此诗以自傲,并期兄弟共傲之。”闻一多《风诗类钞》则说:这是男子“将与妻别,临行慰勉之词”。程俊英同意闻说,以为“从诗中殷殷叮嘱的意味来看,这一说法还是比较切实的。”(《诗经注析》)《诗经》中有三首诗均以“扬之水”起兴,除本首外,分见《王风》、《唐风》,这是诗人运用民间流行的诗歌套语,作为自己歌唱的发端,它与下文的意义并无固定的联系,这正是中国民歌创作的一个民族特色。③《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强盛,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朱熹《诗集传》亦谓:“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其后沃强盛而晋微弱,国人将叛而归之,故作此诗。言水缓弱而石巉岩,以比晋

弱而沃盛,故欲以诸侯之服从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见君子而无不乐也。”参照《左传》、《史记·晋世家》有关记载,毛、朱所论当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代学者亦多据此以发挥诗旨。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昭侯一系的贵族,他到曲沃去,投靠桓叔一系,作这首诗表示对桓叔一系的忠诚。”陈子展《诗经直解》则认为这首诗是“揭露桓叔既得封于曲沃,而阴谋叛乱之作。诗人既叛从桓叔,又欲以危言耸动昭公,故作首鼠两端之辞。”程俊英《诗经注析》则进一步指出这首诗与《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均以“扬之水”起兴,“但这三首诗的主题却各不同,《王风·扬之水》是久戍思归之曲,《郑风·扬之水》是叮咛劝勉之词,此诗是首鼠两端之言。在风格上,前二者表现缠绵难解和惶惑不安之情,后者表现矛盾抑郁的心曲。同是用‘扬之水’起兴,便是借助这句民间诗歌习语的含义和韵律节奏上的特点,造成一种沉闷哀怨的气氛,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以上三种说法虽有不同,但均有助于对诗旨的理解。

(费振刚)

【中谷有蓷】《诗经·王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六句。为描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悲伤无告的诗。《毛诗序》云:“《中谷有蓷》,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朱熹复申此说,以为是“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词也”(《诗集传》)。今人多持弃妇诗说。

(费振刚)

【兔爰】《诗经·王风》篇名。全诗三章,章七句。是一篇伤时感事、悲观厌世的诗。《毛诗序》云:“《兔爰》,闵周也。桓公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现代学者对此诗作者的身份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是一首破产贵族的诗”,“在下位的兔子悠游得乐,在上位的野鸡反投了罗网。这投了罗网的野鸡便反反复复地浩叹起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种认为“这是小民在徭役重压之下的痛苦呻吟”(余冠英《诗经选》)。(费振刚)

【葛藟】《诗经·王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六句。《毛诗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今人黄焯《诗说》中对此解释为“平王东迁,实由申侯主之。西都倾覆,幽王见杀,其祸皆自申侯。平王徇其私恩,绝灭天性,诗人所以为刺也。谓他人父者,刺平王谓申侯为父也。”似与诗意不合。朱熹《诗集传》以为“世衰民散,有去取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今人多据此为说,认为该诗描写流亡他乡者潦倒乞讨而无人救助的痛苦心情。

(费振刚)

【采芣】《诗经·王风》篇名。《毛诗序》云:“采

芣,惧谗也。”《毛传》:“事虽小,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今人钱钟书《管锥编》虽也就《毛传》所言做了许多发挥引申,然钱氏亦云:“《毛传》非即合乎诗旨,似将情侣之思慕曲解为朝士之疑惧。”现代学者多不取《诗序》之说。此实为思念情人的恋歌。全诗三章,章三句。每章之“一日不见,如三月(三秋、三岁)兮”,形象地表达了相思之苦,沟通了古今之人共具的相思之情,遂成千古传唱的名句。(费振刚)

【大车】《诗经·王风》篇名。此为女子热恋情人之作。全诗三章,章四句。一、二章是叠章,写女主人公很想同她所爱的人偕逃,但她又不确知对方心里究竟如何,故不敢去找他。三章是女主人公的誓词,表示她对爱情的生死不渝。方玉润认为该诗是周人从军,“恐此生永无团聚之期,故念其室家而与之诀绝”之词(《诗经原始》)。可备一说。

(费振刚)

【丘中有麻】《诗经·王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关于此诗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三:一、《毛诗序》认为是“思贤”:“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二、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是“招贤以共隐”,“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尚留本国,故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三、朱熹《诗集传》以为是妇人之词,“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来乎。”今人多以朱说近是,但解说亦不尽相同。

(费振刚)

【缁衣】《诗经·郑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毛诗序》云:“《缁衣》,美(郑)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朱熹《诗集传》因之。季本《诗说解颐》进一步指出这是“美武公好贤之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因之。今人多据此为说,以为是写贵族好贤的诗。也有人以为“改衣”、“授粢”,是较亲密的家人口气,作品表现的是夫妻或男女相互爱恋的情景。

(费振刚)

【将仲子】《诗经·郑风》篇名。此为情歌,写一个女子碍于家庭和社会的舆论,委婉地谢绝情人前来幽会。全诗三章,章八句。诗用叠章法,从其再三言及的“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的可畏,使人感受到当时社会对于妇女在婚姻选择上的层层束缚以及她们深重的苦闷。《毛诗序》以为诗中“仲子”,即劝谏郑庄公的祭仲(事见《左传·隐公元年》)显系附会,不足为据。

(费振刚)

【叔于田】《诗经·郑风》篇名。此为赞美猎人的诗,与《大叔于田》是姊妹篇,诗的主旨相似,但表现上有不同侧重。全诗三章,章五句。用夸张对比的

手法,突出地表现猎人的技艺超群、品格高尚。《诗经》中用伯、仲、叔、季的表字,多半是女子用以称其情人或丈夫的,是敬语,也是爱称,可见该诗是以女子的口吻,着重抒写其对猎人的爱慕之情。《毛诗序》以为此诗和《大叔于田》都是写郑庄公之弟太叔段的,朱熹《诗集传》亦沿袭此说,今人多以为是附会,不足信。(费振刚)

【大叔于田】《诗经·郑风》篇名。此为赞美猎人的诗,“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充满了爱怜的感情,与《叔于田》诗意相同。但该诗侧重描写打猎的具体场面,突出猎人的勇武,使人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全诗三章,章十句。一章写其搏虎的雄姿,二章写其驱车逐兽的精良技艺,三章写其打猎结束的从容。“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便为《长杨》、《羽猎》之祖”(姚际恒《诗经通论》)。据《诗经》命题之惯例,此诗本应作《叔于田》,加一“大”字,是为区别于短篇的《叔于田》。大,有“长”的意思。(费振刚)

【清人】《诗经·郑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春秋·闵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卫,郑弃其师。”《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入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毛诗序》即据此为说,以为《左传》所说的“郑人”即公子素,因其“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今人多认为《诗序》所论,史有确证,可以成立。但有的提出此诗虽极力渲染战马的强壮和武器的精美,然每章末句皆含有讽刺意味。有的则认为这诗无讽刺意味,是赞扬清邑士兵在训练中军容整齐,战术精熟,有尚武精神。以前说稍胜。(费振刚)

【羔裘】①《诗经·郑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为赞美郑国一位正直官吏的诗。《毛诗序》囿于正变之说,以为此诗陈古讽今,讽刺郑国朝廷没有这样正直的人,不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伐宣子于郊。……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从韩宣子的回答可见此诗当时流行于郑国朝野,并且是歌颂性的。②《诗经·唐风》篇名。《诗经》中以“羔裘”为题目的有三首诗,除本首外,分见《郑风》、《桧风》。“羔裘”,《郑笺》解为“诸侯之朝服也”,朱熹《诗集传》解为“大夫服也”。因此,历来的研究者有不少人认为这三首都与政治有关。本首诗,《毛诗序》认为“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今文三家无异说。现代学者中有人则另立新说,闻一多认为这是“女欲奔男之辞”,并于《风诗类钞》中将其编次于《郑风·狡童》与《郑风·褰裳》之间,以见其义,大意为:“你羔裘豹袖的人,自是对我们傲慢,难道没有别人,非同你好不可?”这一见解是

有相当理由的。它与《狡童》、《褰裳》章法相同,二章,章四句,简净明快,表现了女主人公泼辣爽朗的性格。③《诗经·桧风》篇名。《毛诗序》谓:“《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持论与《毛序》略同。现代学者亦多据此认为这是一位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为讽谏其君而作的政治怨刺诗。而闻一多则认为此诗与《郑风·将仲子》、《魏风·汾沮洳》、《卫风·淇奥》“语气相近,都是女欲奔之辞”。“中心是悼”即《王风·大车》“思子不敢”之意(《风诗类钞》)。程俊英不赞成闻说,认为这是一首“怀人的诗”,并指出“怀人之诗,多有即景起兴者,而此诗全用赋体。每章首二句通过鲜洁光润的羔裘狐袍,逍遥遨游的自在态度,将作者心目中的大夫描写得英俊潇洒。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人,作者想念得忧伤不已”(《诗经注析》)。闻、程二说持论不同,但均不从《毛诗序》的说法,不附会史实,全从文本出发,亦可各备一说,足资参考。(费振刚)

【遵大路】《诗经·郑风》篇名。《毛诗序》云:“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今人多从朱说,以为这是一首弃妇诗。全诗二章,章四句。从其揽对方衣袖和手的动作以及哀哀苦求的告白中,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妇女的悲惨处境。(费振刚)

【女曰鸡鸣】《诗经·郑风》篇名。此为对话体诗,表现一对青年夫妇相互警戒、相互爱悦的美好生活情景。全诗三章,章六句。今人对于此诗中哪些是男词,哪些是女词,颇多歧见。余冠英《诗经选》认为:“第一章妻说:鸡叫了。夫说:天将亮未亮。妻说:你起来看看天吧,启明星那么亮。夫说:那我要去射鳧雁了。第二章妻说:射得鳧雁我为你制肴下酒。愿我们和乐偕老。第三章夫答:我知道你是和我同心,衷心爱我的。我将这杂佩送给你,表示我的报答。”分析得较为通达,录以备考。(费振刚)

【有女同车】《诗经·郑风》篇名。全诗二章,章六句。为恋歌,以一个男子的口吻赞美同车女子的美丽端庄,品貌双全。《毛诗序》以为此诗讽刺郑庄公世子忽不肯与齐联姻,失去大国支持,终于被臣下所驱逐。所论虽本之《左传》,但与诗意不符,故今人多不取。《左传》另有忽“如陈逆妇妁”的记载,因有“《有女同车》,实陈亲迎之礼,谓忽取陈女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说法。今人或不取忽取陈女之史实,而认为这诗为男子迎亲之事,似可备一说。

(费振刚)

【山有扶苏】《诗经·郑风》篇名。此为轻松活泼的恋歌。全诗二章，章四句。各章前二句为兴句，以自然事物两两相对，各得其所，以喻男女情爱的美满和谐。后两句于笑骂中蕴含着爱怜，是调侃戏谑之词。

(费振刚)

【蓀兮】《诗经·郑风》篇名。此为青年男女聚会时女子所唱的歌。全诗二章，章四句。叔、伯，在《诗经》中常用为女子对男子的亲昵称呼，在本诗中且说明男子不止一个，而女子也当是一群。或一人唱，众人附和，或群歌互答，反映了聚会时青年男女的欢快情绪。

(费振刚)

【狡童】《诗经·郑风》篇名。此为恋歌，写一个女子因为发觉对方态度有了变化而寝食不安。全诗二章，章四句。作品的语言明快畅达，既表现了女主人公性格的坦诚开朗，也暗示其爱情结局并非是悲剧性的。前人对《狡童》诗意的阐释颇多分歧，《毛诗序》以为此诗是刺郑昭公不能与贤臣共事，而导致权臣专擅。这显系附会，不足信。现代学者有的以为是写女性失恋的痛苦，也恐与此诗的基本格调不尽相符。

(费振刚)

【褰裳】《诗经·郑风》篇名。此为恋歌，是一个女子对她的情人的戏谑之词。全诗二章，章五句。大意是女子对她的情人说：你要想爱我，就过河来找我；如果你不想爱我，还有别人来爱我。你真是大大的糊涂虫。这种近似打情骂俏的表达，显示了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大胆热烈和朴实活泼的性格。

(费振刚)

【丰】《诗经·郑风》篇名。《毛诗序》云：“《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郑笺》：“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后世经学家有的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傅恒等撰《诗义折中》以为是郑人悔不从晋，而托为妇人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认为是悔仕进不以礼的诗。皆系附会，实不可信。今人多取《毛诗序》“男行而女不随”之说，认为是婚姻问题的诗作。全诗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前二章写男子到女家迎娶，而女子却不肯去，随后又后悔，希望男方能重申旧好。后二章写女子切盼其丈夫再来迎娶。

(费振刚)

【东门之墠】《诗经·郑风》篇名。此为写男女相思的诗。全诗二章，章四句。“室迩人远”的反差对比，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所给予主人公的种种限制，以及主人公思之而未得见之的痛苦心情。诗中无男女字，孔颖达疏以为是“皆女奔男之事”。方玉润《诗经原始》则云：“就首章而言，曰室迩人远者，男求女之词也。就次章而言，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诗中自为赠答。”以全诗而论，语

气一贯，感情细腻深挚，以郑说为长。（费振刚）

【风雨】《诗经·郑风》篇名。此为情诗，写在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乱鸣的时候，女主人公见到自己心上人飘然而至的喜悦心情。全诗三章，章四句。每章前二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写景，着重渲染环境的凄凉。后二句写相见后的喜悦心情。章末用反诘句，朴素含蓄，意在言外。方玉润说：“风雨晦冥，独处无聊，此时最易怀人。况故友良朋，一朝聚会，则尤可以促膝谈心，虽有无限愁怀，郁结莫解，亦皆化尽，如险初夷，如病初瘳，何乐如之。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也。”（《诗经原始》）以为此诗是“怀友”，虽未必使人信服，但他对其艺术特点的评论颇有见地。《毛诗序》以为这诗写“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当属臆测，然后人就此发挥，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两句诗赋予新意，鼓励人们在世衰俗败之时，保持节操，为善不息。

(费振刚)

【子衿】《诗经·郑风》篇名。此为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前二章是叠章，写女子等候自己恋人时的内心独白；那一领青衫，那块青丝带的玉佩，时刻牵动着我的心。纵然我没有预先去找你，难道你就不来这里看一看吗？末章前二句，写随着等候时间的延长，急得她在城阙上来回走个不停。后二句虽是心声，却越发使人感受其久候恋人不至的焦躁不安的神情。《毛诗序》说：“《子衿》，刺学校废。”《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后世因以“青衿”一词代指读书人。

(费振刚)

【出其东门】《诗经·郑风》篇名。此为写一位男子表示对爱情忠贞不二的诗。全诗二章，章六句。诗纯用赋体，直书其事，写其所见，抒其所感。他在东门之外，看到了宛如绚丽的云霞的众多女子，但他明白地宣布：这不能使他动心，他所爱的只是那“缟衣綦巾”的姑娘！在朴拙直说中，见其坦诚、真挚、专一，显示出独有的艺术特色。《毛诗序》以为是“闵乱”之作，朱熹说：“人见淫奔之女作此诗”（《诗集传》），都是曲解诗意，不足信。

(费振刚)

【野有蔓草】《诗经·郑风》篇名。此为情歌，写一对男女不期而遇于野田草露之间的自由结合。全诗二章，章六句。《毛诗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据此可知此诗所写当是古代男女结合的一种婚姻方式。但这种婚姻方式为封建时代学者所讳言，故有方玉润“朋友相期会也”（《诗经原始》），王先谦的“思遇贤人”（《诗三家义集疏》）等曲解。闻一多认为二章的“藏”与“藏”同义（旧注作

“善”解),是指男女藏于幽僻之地,是符合这诗的本义的。(费振刚)

【溱洧】《诗经·郑风》篇名。汉代的《毛诗》、《鲁诗》、《齐诗》均认为此诗反映风俗衰乱、男女私会的不正常社会现象,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淫奔者自叙之词”,皆为封建卫道者的陈词滥调,不足取。唯《韩诗》说的比较客观,认为:“《溱与洧》,说(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见《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韩诗内传》)古代所称上巳节,后来演变为“三月三”,与旧历的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同是我国古代民间的重要节日。诗中描写在此春天节日里,青年男女在河边聚会的欢乐情景,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春游的诗歌,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过活泼健康愉快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溱洧》,与《国风》大部分作品以抒情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不同,采用第三者叙述口气来作客观描写。全诗二章,章十二句。以“方涣涣兮”、“浏其清兮”写景,用“士与女方秉简兮”、“殷其盈矣”写人,洗练生动地再现了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节日气氛。以男女对话穿插其间,显示男女双方情浓意切的神态,用笔也极为精炼。最后以男女狂欢作乐,互赠香草作结,着重于渲染气氛,引人无限遐想,给人以美的享受。(费振刚)

【鸡鸣】《诗经·齐风》篇名。《毛诗序》云:“《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熹《诗集传》亦承袭此说,但改陈古刺今为颂美古之贤妃。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也”。今人多从方说,认为是一首妻子催促丈夫早起的诗。丈夫要上朝,当是士大夫。成语“鸡鸣戒旦”即源于此。全诗三章,章四句。与《女曰鸡鸣》相同,是夫妇对话。首二章的前二句是妻子催促丈夫,后二句是丈夫的回答。末章是妻子劝告丈夫的话,一说上二句属夫,下二句属妻,亦通。(费振刚)

【还】《诗经·齐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写两个猎人相遇于山中,共同打猎,并互相赞美。《毛诗序》云:“《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此说不甚确切,诗中反映了当时齐国人民喜好田猎的习尚,但无讽刺意味。(费振刚)

【著】《诗经·齐风》篇名。《毛诗序》云:“《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郑笺》:“时不亲迎,故陈亲迎之礼以刺之。”今人多不认为此诗有刺意,而认为是记亲迎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古人结婚,新郎要到女家亲迎,先在庭中守候。女方父母将新娘送出,

新郎携其手出门,然后一同上车归家。诗以新娘的眼睛作为视点,“著”、“庭”、“堂”实指中庭一地,是她和新郎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充耳以素”、“尚之以琼华”是新郎给她的第一个印象。(费振刚)

【东方之日】《诗经·齐风》篇名。全诗二章,章五句。《毛诗序》云:“《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熹《诗集传》云:“言此女蹶我之迹而相就也。”今人或以后者为说,认为是写一个女子追求男主人公的诗。也有人认为这是描写新婚幸福,夫妻恩爱的诗,亦通。(费振刚)

【东方未明】《诗经·齐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毛诗序》云:“《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今人或就此发挥引申,认为是一首反映农奴给奴隶主当差,服徭役,备受压迫的诗。或认为是一个小官吏的妻子写其丈夫忙于公事,早晚不得休息,又对自己不放心。“折柳樊圃”是“折杨柳以为园圃之藩篱,所以防闲其妻也”;“狂夫瞿瞿”是其丈夫“临去复于篱间瞿瞿然窥视,盖有不放心之意”(闻一多《风诗类钞》)。二说相较,前说近是。(费振刚)

【南山】《诗经·齐风》篇名。此为讽刺齐国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诗。据《左传》记载,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奸。鲁桓公三年,文姜嫁给桓公为妻,还继续保持与齐襄公的暧昧关系。鲁桓公夫妇到齐国,桓公发觉了文姜兄妹的奸情,对文姜进行了谴责。齐襄公在文姜怂恿下,派人杀死了鲁桓公。这一丑闻引起了人们的憎恶,遂作此诗。全诗四章,章四句。前二章写文姜已出嫁,而齐襄公仍与之保持暧昧关系,后二章借责问鲁桓公来表现人们的憎恶感情。(费振刚)

【甫田】①《诗经·齐风》篇名。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认为是刺齐襄公“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朱熹《诗集传》以为“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无功也”,均与诗意不符,故姚际恒认为是“影响附会之论”(《诗经通论》)。今人多认为是怀人之作,但关于诗中主人公的身份亦众说纷纭。闻一多认为是“女词”,可备一说。全诗三章,章四句。前二章为叠章,写女主人公怀人时心情的烦乱,“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虽为兴句,亦是比喻。末章写女主人公心情烦乱的原因,闻一多说:“男子二十而冠,亦二十而娶,突然见人家戴弁了,不免有哑然自失之感。”(《风诗类钞》)②《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这是题外发挥之义,诗篇本身并无刺意。这是周王春夏祈谷于上帝,祭四方神、土地神、先农神以及时雩旱祷诸神的乐歌。全诗四章,每章十句。

除了写祭祀之外,还写到周王至田间巡视,以及农夫的耕作等农事,反映了周代统治者以农立国的思想。

(费振刚 蒋见元)

【卢令】《诗经·齐风》篇名。此为赞美猎人的短诗。全诗三章,章二句。每章首句写猎犬,只写其颈上的重环发出的响亮声音;后句写猎人,只写其与内美一致的英俊身姿。从犬到人,绘声绘形,语言单纯自然,形象鲜明生动。全诗虽仅二十四个字,却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记。

(费振刚)

【敝笱】《诗经·齐风》篇名。全诗三章,章四句。《毛诗序》云:“《敝笱》,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此诗是“齐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鱼,比鲁庄公不防闲文姜,故归齐而从之者众也”。据《左传》记载,鲁桓公被齐襄公杀死后,鲁立文姜所生的儿子为君,是为庄公。文姜做了寡妇后,仍多次回齐国,和齐襄公幽会。据此当以朱说为是。该诗为齐国人民借指责鲁庄公不能制止其母文姜继续与其舅父齐襄公幽会,以讽刺文姜的淫乱行为。

(费振刚)

【载驱】《诗经·齐风》篇名。全诗四章,章四句。《毛诗序》云:“《载驱》,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今人多据此,以为这是讽刺文姜回齐国和齐襄公幽会的诗,与《敝笱》、《南山》属同一主题。另据《易林》引《齐诗》及《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所记“公如齐逆女”,有人认为此诗写鲁庄公迎娶齐哀姜事,无刺意,似亦通。

(费振刚)

【猗嗟】《诗经·齐风》篇名。此诗赞美一位少年不仅有俊美的身姿,且有高超的射箭技巧。全诗三章,章六句。自《毛诗序》以来,历代都认为诗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是鲁庄公,有的还据诗中“展我甥兮”等句,以为这是讽刺鲁庄公虽“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方玉润则说:“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愚于是诗不以为刺而以为美,非好立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诗经原始》)。他虽然也认为所写是鲁庄公,但以颂美之论颇有见地。

(费振刚)

【葛屨】《诗经·魏风》篇名。魏诗共七首,此为第一首。《毛诗序》以为本诗讽刺“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嗇褊急”。其说与诗歌内容不符。朱熹《诗集传》云:“此诗疑即缝裳之女所作。”至于缝裳女的身份,《郑笺》认为是结婚未满三月的新娘,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则谓:“此诗疑其时夫人之妾媵所作,以刺夫人者。”姚说为是。诗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以缝衣女之口吻,叙缝衣服事之辛勤贱苦及“好

人(嫡夫人)”的安贵享荣、拿腔作势。在鲜明的对比中,“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诗旨得到形象的抒发和揭示。对后来唐秦韬玉“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女》)的诗思不无影响。

(李泉)

【汾沮洳】《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云:“《汾沮洳》,刺俭也。其君子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朱熹《诗集传》同其说。皆为望文臆解,与诗义不合。闻一多《风诗类钞》谓:“这是女子思慕男子的诗。”得诗之要旨。诗三章,章六句。均以女子于汾水边采摘野菜起兴,三章重叠,反复吟咏对意中人的赞美思慕之情。歌者把“美无度”的“彼其之子”与“公族”等贵族官吏相比照,显示出了对重人品轻财势的纯真爱情的追求。诗歌词意明朗,节奏轻快,意绪热烈健康。

(李泉)

【园有桃】《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云:“《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提供了产生此诗的背景:国小而又无德政,疆土日削,形势危迫。诗之宗旨则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言,“此贤者忧时之诗”。为统治阶层中一位有识之士的忧时之作。今人或以为是破产贵族忧贫畏饥哀叹没落的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二章,章十二句。反复咏唱诗人心中的忧愤郁闷。并通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的假托设问,竭力宣泄不被世人理解的愤世嫉俗之情。方玉润称“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怨愁之词易工也”(《诗经原始》)。诗歌隐约委婉,呈现出纵横顿挫、沉郁含蕴的风格特征。

(李泉)

【陟岵】《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朱熹《诗集传》承其说:“孝子行役,不忘其亲,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仅揭出本诗思想内容的浮面层次。而诗歌的更深一层意蕴,则是由怀念亲人所反映出的行役者戍战劳苦和厌战思归情绪。诗三章,章七句。分叙对父、母、兄的瞻望。通过反向设想手法的运用,以想象中父、母、兄的谆谆叮咛,映衬出征人思亲之情的至深至切。清·汪梧风云:“此诗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亲之念已祝已俱从瞻望中想象出来。不言己之念亲,而反言亲之念己;不言己之自慎,而极言亲之欲其慎。则所以念其亲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矣。”(转引自陈子展《诗经直解》)见解精辟。“陟岵”、“陟屺”遂成为后世思亲之喻词。

(李泉)

【十亩之间】《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云:“《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朱熹《诗集传》则云:“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姚际恒《诗经通论》更认为是

“类刺淫之诗”。均与诗义乖连不合。今人余冠英《诗经选》说：“这是采桑者劳动将结束时呼伴同归的歌曲。”符合本诗的实际。古时西北地带普遍植桑，采桑之事由妇女承担，故此为妇女咏唱劳动后愉快之情的歌曲。诗仅二章六句。以白描手法，绘出夕阳徐照下，桑女结伴归家的生动情景。六句尾字均为“兮”，语调悠长，节律舒缓，浓烈地渲染了轻快融和的气氛。

(李泉)

【伐檀】《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仕进尔”的评述，接触到了本诗“刺贪”的内容，但“君子不得仕进”的说法，改换了诗歌反映阶级对立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曲解。而朱熹《诗序辨说》“此诗专美君子不素餐”的见解，则更是对诗旨的歪曲。今之学者认为这是一首魏国劳动人民鞭挞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诗。诗三章，章九句。反复叠唱，以反诘排句谴责主人不劳而获，气势饱满喷涌；章末的反语冷嘲，不仅点睛揭题具有深刻讽刺含义，开我国讽刺诗之滥觞，而且使诗风婉曲幽默，增添了隽永含蓄的艺术魅力。后世以“素餐”一词比喻无功食禄。

(李泉)

【硕鼠】《诗经·魏风》篇名。《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鲁说》则云：“履亩税而《硕鼠》作。”（《潜夫论·班禄篇》）诗为反对“履亩税”维护井田制而作。（“履亩税”是指君主向私田征税，承认私田合法性的一种新型土地课税法。）考之诗歌实际，《序》说与诗旨较为切近。这是劳动者以逃亡来反抗残酷压榨的诗作。诗三章，章八句，重章歌唱，以贪吃嗜啮的硕鼠，喻脑满肠肥的剥削者，不仅形象贴切生动，且蕴有对之深恶痛绝的强烈感情色彩，实为别开生面的艺术创新之作。“硕鼠”因也被后世当作贪黷自肥的官吏的代名词。

(李泉)

【蟋蟀】《诗经·唐风》篇名。唐风十二首，此为第一。诗之要旨在写士大夫之深忧远思、勤奋警勉。姚际恒《诗经通论》：“《小序》谓刺晋僖公。《集传》谓民间终岁劳苦之诗。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此说较是。诗三章，诗意相同。每章八句，上四句感物伤时言及时行乐，下四句乐思其忧戒勿过甚，应勉职事。诗人借“蟋蟀在堂”以起兴，慨叹时序变迁，后人遂有“感时思蟋蟀”之诗句（曹摅《思友人诗》），而本诗也被姚际恒誉为古代“感时惜物诗”之“肇端”了。

(李泉)

【山有枢】《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山有枢》，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

刺之也。”揭出“刺”诗性质，是。至谓“刺晋昭公”则无史实可据。诗乃唐地人民讽刺贵族守财奴之作。三章诗意互补。章八句，章首起兴，中段铺叙守财贵族的吝啬，章末诅咒吝啬者的不妙下场。有现代研究者认为，诗中鼓吹及时行乐，是没落贵族抒发其颓废思想之作。此说与本诗字词间透露的不满情绪，以及洋溢于全诗的明显的嘲弄口吻相乖违。诗歌辞语机锋峻快，笔调辛辣幽默。

(李泉)

【椒聊】《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椒聊》，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这是对如下史实的附会：公元前745年，晋昭公封叔父桓叔于曲沃。势强力盛，国大而得众。六十七年后，桓叔之孙曲沃武公灭晋，代晋为诸侯（《左传·桓公二年》）。旧说多从之。而朱熹《诗序辨说》表示怀疑：“此诗未见其必为沃而作也。”今人高亨《诗经今注》认为是“赞美一个男子”的诗，说较平实。也有学者着眼诗之“椒聊”起兴，以花椒多子喻妇人生子之多，推定“这是一首祝贺妇人多子的诗”。全诗赞颂之情浓郁炽烈，结尾以椒聊的条远香馨，喻其人之笃厚品格，“咏叹淫溢，含意无穷”（吴闿生《诗义会通》）。后世因以“椒聊”喻子孙繁衍众多。

(李泉)

【绸缪】《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此说之妄，朱熹《诗序辨说》已有所明：“此但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词，未必为刺晋国之乱也。”指出诗与刺晋无关，是对的；说诗是抒写新婚夫妇的喜悦之词，则不够确切。今人或谓：“《绸缪》，盖戏弄新夫妇通用之歌。此后世闹新房歌曲之祖。”（陈子展《诗经直解》）此说为是。诗共三章，重复歌唱。章首二句托物起兴，渲染良夜美景的缠绵气氛；章后四句设问述陈，尽情笑谑新人爱情生活的美满幸福。诗歌语词浅显，情趣活泼欢快，体现了俚俗民歌的自然天籁之美。

(李泉)

【杕杜】①《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以为此诗有感于晋君孤立无助，有被曲沃吞并之虞而作。《诗集传》则云：“此无兄弟者自伤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词。”谓诗歌内容与晋君无关。二说均与诗义不符。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诗之意，似不得于兄弟，而终望兄弟比助之辞。”认为诗旨为兄弟失和切望重归于好。此说近是。这是一首痛感于兄弟离畔而孤独无助的诗作。诗二章，章九句，重章复唱，用独棵挺立的棠梨树起兴，喻诗人的孤寂无依；又用排比的两组反问，深化主题，加强了渴盼兄弟和好的感情的抒发。后世因以“杕杜”一词

喻骨肉情谊,如“既伤蔓草别,方知杕杜情”(江淹《王侍中怀德诗》)。^②《诗经·小雅》篇名。这是一篇妇女思念久役丈夫的诗。《盐铁论·繇役》说:“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懣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这是对《杕杜》诗旨很精当的概括。《毛诗序》认为这是文王“劳还役”之诗。程俊英说:“疑《杕杜》原来是一首民歌。后为统治者所采,配以雅乐,作为慰劳出征归来的将士时弹奏的乐章”(《诗经注析》),是很有道理的。全诗四章,前三章都是思妇想象之词,由于季候的变化,思妇想象自己的丈夫应该回来了,然而丈夫终于久期而不至。末章写思妇为此而询问卜筮,得到吉兆,表现了她无限思念的惶乱心情。(李泉 费振刚)

【鸛羽】《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鸛羽》,刺时也。(晋)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释义可谓不误。但“君子”之说不确。朱熹《诗集传》:“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是诗。”谓农民苦于征役不得养父母者,痛心呼吁之作。切合诗旨。诗三章,章七句,回环复唱,执著而又强烈地抒发了思乡念亲之情,“始则痛居处之无定,继则念征役之何极,终则恨旧乐之难复”(方玉润《诗经原始》)。诗以鸛鸟栖树不稳起兴,兴中含比。鸛鸟无后趾,其性不栖于树。今栖非所居,需不时颤翅振羽保持体态平衡,用以隐喻服役者的劳苦不安,居处无定,形象新颖生动。

(李泉)

【无衣】^①《诗经·唐风》篇名。此诗意颇深微,古今解说纷纭。《毛诗序》说是“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认为曲沃武公杀死晋君吞占晋国,他的大夫请求周王正式任命武公为晋侯,并作此赞美诗。朱熹《诗序辨说》力驳《序》妄,认为武公弑君篡国,为王法所必诛,《序》却以为美之,“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今人多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说:“此盖诗人窥见武公隐微:自恃强盛,不惟力能破晋,而且目无天王,特以晋人屡征不服,不能不借王命以慑众心。故体其意而作是诗。”是一首借武公自述的表现方式以讽刺武公强傲无礼请命封侯的诗。诗共两章六句,为三百篇中最短诗篇之一。章法奇特,首句突兀而起,二三句转承而迄,洗练紧凑,机锋冷峻。^②《诗经·秦风》篇名。此为颂扬战士友爱情谊和抗敌爱国精神的秦地军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

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说明了此类诗歌诞生的特定社会地理条件。而《毛诗序》所释:“《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与诗意不符。至于诗的作者,清王夫之《诗经稗疏》认为是春秋后期的秦哀公。其根据为《左传·定公四年》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的记载。今之研究者则以为,秦哀公不过是“赋诗言志”,诗的作者应是秦国军民。诗三章,章五句,以重章叠唱、回环复沓的形式加强艺术效果,使英雄豪爽之气升华至崇高无私的精神之巅。被前人赞为“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吴闿生《诗义会通》)。(李泉)

【有杕之杜】《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有杕之杜》,刺晋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贤以自辅焉。”朱熹《诗序辨说》认为“此《序》全非诗意。”诗意是“此人好贤,而恐不足以致之”,故用饮食申其殷勤之意以求之。《诗集传》闻一多《诗风类钞》则解为女性求爱之诗:“饮食是性交的象征瘦语。”“古人说牡曰棠,牝曰杜,果然如是,杜又是象征女子自己的暗话。”而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又主张“全篇为乞食者之歌”。求贤、求爱、求食,三说各有其据,迄无定论。诗二章,章六句,重复吟唱。

(李泉)

【葛生】《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葛生》,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可作为本诗写作背景的参考。《郑笺》释此诗为“夫从征役弃亡不反”,妻忧思而作。后儒解诗多依此说。今人余冠英《诗经选》说:“这是女子悼念或哭亡夫的诗。”是。诗五章,章四句,前三章悲悼亡夫长眠地下的孤苦,后两章自伤未来岁月漫长,度日维艰,寄希望于百年后同归一穴。同穴其圻的心理刻划极富典型意义,后世诗歌也不乏此种描述内容,如“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白居易《赠内》)。成为封建时代中夫妻情感坚贞的象征。诗歌情意哀恻,凄惋缠绵,开后世“悼亡诗”之先河。

(李泉)

【采芣】《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云:“《采芣》,刺晋献公也。献公好听谗焉。”后人或以为是刺献公听骊姬之谗而杀太子申生之事。朱熹予以辩驳:“献公固喜攻战而好谗佞,然未见此二诗之果作于其时也。”《诗序辨说》认为“此刺听谗之诗。”《诗集传》要之,此为劝人切莫听信谗言的诗,不必过于指实晋献公。诗三章,章七句。各章分别以“采芣”“采苦”“采葑”于首阳山起兴,喻证谗言之不可信。对此,清·朱鹤龄的解说简明切要:“芣生隰,苦生田野,葑生圃。今必曰生首阳,则驾虚之辞耳。故

以兴谗言之不可信。”(引自陈子展《诗经直解》)

(李泉)

【车邻】《诗经·秦风》篇名。秦诗十首。此为第一首。《毛诗序》云:“《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序说有据,后世治诗者多从之。朱熹《诗集传》:“是时秦君始有车马及此寺人之官,将见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国人创见而美之也。”认为这是一首秦人赞美其国君始有侍御之臣、乐师车马之盛的诗作。今人或谓诗旨应是秦人赞美秦仲好乐,而“今者不乐,逝者其耄”的及时行乐思想,对后世文人创作有消极影响。诗三章,章四句,首章赞颂车马、侍御之美,二三章反复吟咏礼乐之盛。

(李泉)

【驺虞】《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驺虞》,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诸家无异说。此为记述秦襄公田猎的诗。据《史记·秦本纪》,秦为西周之附庸,平王避犬戎之难东迁洛邑时,襄公以兵护送,有功,始封为诸侯。“始命”,即指此。诗三章,章四句。用烘云托月的映衬手法,铺叙出猎时车马随从之盛、禽鹿猎获之丰,以显示秦君的英武威势;第二章围猎的剧烈紧张与第三章游憩北园的舒缓悠闲,描叙张弛有节,使诗歌于平铺中生发波澜、显出情致。唐诗人王维名作《观猎》,于结构叙事等艺术手法上,对本诗有所借鉴。

(李泉)

【小戎】《诗经·秦风》篇名。此为贵族妇女怀念出征丈夫的诗。《毛诗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揭出本诗的写作背景:诗作于春秋初秦襄公率国人征伐西戎之时。全诗三章,章十句。一章写兵车,二章述战马,三章叙兵器,用借物喻人的表现手法赞美征夫的尊贵威武。章法错综有致:“一章言车,而‘驾我骐驎’豫以起次章之马。二章言马,而‘龙盾之合’既以起卒章之兵;‘鋈以觶鞞’又以蒙首章之车。三章言兵,而‘偃驷孔群’复蒙上章以言。此章法错综之妙也。”(顾广誉《学诗详说》)各章又分前后两部,前部六句铺叙其君子服用之物的精美,文词古奥质直;后部四句直抒妇人思念之情的深挚,语气平易蕴藉。

(李泉)

【蒹葭】《诗经·秦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何所指也。”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实为:“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今人多以为乃怀念情人之恋歌。至《毛诗序》所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则纯属附会。诗三章,章八句。通过一意三叠的复沓重唱、即景起兴的氛围渲染、惆怅迷离的意

象营造,使全诗境界深远,意蕴无穷,“最得风人深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唐·李商隐《无题》诗深得其中三昧。而“蒹葭伊人”则成为后世慕念异地友人的典故。

(李泉)

【终南】《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宋范处义进一步申发《序》说:“周地虽有王命,时尚为戎有。《序》云戒劝者,戒其无负天子之托,而勉其必取也。”(《逸斋诗补传》)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此秦人美其君之词。”认为不必指实为秦襄公。今人多从之。诗二章,章六句。皆以“终南何有”的提问式起兴开篇,以“其君也哉”、“寿考不忘”的颂赞祝愿作结,意绪开朗热烈。

(李泉)

【黄鸟】①《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序》说的史实依据是《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据此,“三良”乃被杀殉葬。而《郑笺》三良“自杀以从死”之解(“三家诗”说同),则与诗中“临其穴,惴惴其慄”的情景相违。这首挽歌共有三章,章十二句,分悼奄息、仲行、鍼虎三良。均以黄鸟哀鸣起兴,又以棘、桑、楚三字,谐音双关急、丧、痛楚。气氛悲怆,情调激越凄楚。②《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谓其“刺宣王也”。未说明所刺何事。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今人多据此作进一步发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黄鸟就是瓦雀,这和耗子是一样,也就是和坐食阶级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的。痛恨本国的硕鼠,逃了出来,逃到外国又遇到一样的黄鸟。天地间哪里有乐土呢?倦于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他本国去了。”这一分析是切合诗旨的。此诗与《魏风·硕鼠》参看,可以想象出当时社会的昏暗荒乱和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有很强的现实性。其手法亦与《硕鼠》相同,以黄鸟起兴,用责问的语气,斥责黄鸟的“集于穀”“啄我粟”的丑恶行径,表现了诗人对于坐食阶级的厌恶心情,语言质朴有力,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李泉 费振刚)

【晨风】《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晨风》,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谓为刺秦康公忘父业、弃贤臣而作。朱熹《诗序辨说》则以为:“此妇人念其君子之辞。”是一首妻子思念丈夫之歌。明、清学者于此二说争讼不已。方玉润勉为

解纷：“今观诗词，以为刺康公者固无据，以为妇人思夫者亦未足凭。总之，男女情与君臣义原本相通，诗既不露其旨，人固难以意测。与其妄逞臆说，不如阙疑存参。”（《诗经原始》）诗三章，章六句。一意三叠，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遭遗忘者的愁怨忧思。后世放逐之臣遂常以“晨风”喻指遭时不遇。东汉杨终被罪充边，作诗抒愤，即题作《晨风行》。（李泉）

【渭阳】《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诗为秦康公见舅思母，送别舅氏而作。诸家无异说。但康公即位，在晋文公重耳死后八年，故今文三家诗遗说认为，诗当作于康公为太子送重耳返国之时，而非即位之后（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诗两章，章四句，全用赋体。首章叙生离之情，次章见舅忆母，抒思母之痛。后世以“渭阳”一词用作甥舅情谊的典故。如杜甫《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诗：“气春江上别，泪血渭阳情。”（李泉）

【权舆】《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各家无异说。今之研究者或认为，此实为没落贵族留恋以往生活，悲叹今不如昔之诗。全诗二章，章五句，用鲜明的对比手法，饱含情意的感叹句式，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怨嗟之情。章法整齐而又有变化：“起似居食双题，下乃单承，侧重食一面，局法变换不测。于此可悟文法化板为活之妙。”（方玉润《诗经原始》）（李泉）

【宛丘】《诗经·陈风》篇名，为陈诗十首中的第一首。《毛诗序》云：“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毛传》则谓所刺者为陈大夫。要之，诗刺陈幽公君臣荒淫无度。诸家无异说。今之学者多认为这是一首男子爱慕歌舞巫女的情诗。诗三章，章四句，为直陈其事的赋体。描述了以巫女飘荡舞姿为中心，展现于整个宛丘的欢舞场面。诗歌格调爽朗，饶有世俗风土的情致。（李泉）

【东门之枌】《诗经·陈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为反映男女歌舞欢会的民间风俗诗。《毛诗序》所说：“《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显然与诗歌实际不符。诗三章，章四句，为赋体。首章写姑娘独舞，次章叙男女欢舞，末章述彼此相悦。全诗结构齐整，节律明快；描绘生动，“婆娑字形容绝妙”（孙铤语，引

自陈子展《诗经直解》），充溢着清新康乐之气。

（李泉）

【衡门】《诗经·陈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诗。”是一首安贫乐道、无求于世的隐士之诗。至于《毛诗序》所说：“《衡门》，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认为诗为诱导懦弱的陈僖公立志自强、励精求贤而作，恐非诗之本义。王先谦云：“皆言贤者乐道亡饥，无诱进人君之意。即为君者感此诗以求贤，要是旁文，并非正义也。”（《诗三家义集疏》）诗三章，章四句。首章写隐者简陋清幽的环境居处，二、三章叙其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全诗意绪淡泊，境界高雅，实为后世“隐逸”“闲适”诗之滥觞。而“衡门栖迟”、“泌水乐饥”，也成为旧时诗文中常用的安贫乐道的典实。

（李泉）

【东门之池】《诗经·陈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此亦男女会遇之词。”是。此为男女邂逅相遇，男子爱慕女子的情诗。至于《毛诗序》所释：“《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子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实属附会。全诗三章，章四句，以回环复沓的章法，突出对“淑姬”的叹美以及双方感情由对歌、交谈到吐露衷曲的过程。各章章首“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纆、菅）”的起兴，一则点明故事地点、姑娘身份；二则用沤麻使柔，寄寓男方的挚情可以打动姑娘之意。（李泉）

【东门之杨】《诗经·陈风》篇名。《毛诗序》云：“《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失之牵强。朱熹《诗集传》云：“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起兴也。”今之学者多从此说。诗二章，章四句，重章复唱。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的叙事写景，暗示约期已过，恋人爽约，情感抒发委婉含蓄；而沙沙作响的白杨、星光璀璨的夜空，则又以动衬静地创造了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的动人意境。（李泉）

【墓门】《诗经·陈风》篇名。《毛诗序》云：“《墓门》，刺陈佗也。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据《左传》，陈佗为陈文公之子、陈桓公之弟。桓公疾病，佗杀太子免而代之。陈国因而大乱。故此，宋苏辙又认为，诗是刺桓公的。以其怙恶养奸，不能早除陈佗，国人追其咎而刺之（参见姚际恒《诗经通论》）。两说可互补，诗刺陈佗兼及桓公。由于诗所含孕的历史内容，被方玉润誉为陈国的《诗史》（《诗经原始》）。据刘向《列女传·陈辩女》，陈国采桑女曾咏歌此诗，说明诗于其时已广泛流传陈国民间。全诗二章，章六句。首二句兴中有比，以

“棘”、“鸛”象喻恶人当道,恶声喧嚣,恨斥之情溢于言表。(李泉)

【防有鵲巢】《诗经·陈风》篇名。《毛诗序》云:“《防有鵲巢》,忧谗贼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陈宣公信谗于史有证(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史记·陈杞世家》)。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词。”是一首忧惧有人谗间其恋人的情诗。今之研究者多从朱说。诗二章,章四句。每章首二句兴中含比:“鵲巢于木,不于防;若生于下湿,不于丘。中唐,非鵲所也。鵲谓绶草,亦生下湿,非邛之所产也。”(朱郁仪语,见姚际恒《诗经通论》)诗人连用四种生非其地、用非其所的事物起兴,象喻谗言的无中生有,黑白颠倒,写得一气呵成,柔肠曲尽。(李泉)

【月出】《诗经·陈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今之治诗者多从之,认为是一首月下怀念美人的爱情诗。而《毛诗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之说,失之牵强。全诗三章,章四句,为赋体。诗人用幻想虚神的笔法,描述了晶莹月光下美丽少女的容色体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骚动不安的心绪。意象虚幻、境界清幽,具有一种朦胧含蓄的美。开后世“月下美人”类诗歌之先河。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从男意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并非实有所遇。盖巫山、洛水之滥觞也”。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的创作受有本诗的影响。(李泉)

【株林】《诗经·陈风》篇名。《毛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谓诗为讽刺陈灵公君臣淫乱而作。此说与诗、史俱合。据《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戏于朝。”宣公十年(前599)陈灵公被夏姬子夏徵舒所杀,故此诗当作于是年之前。诸家无异说。诗二章,章四句。通过故设疑问和“说于株野”、“朝食于株”的行为描述,意在言外地揭露了陈灵公君臣的荒淫无耻,讽刺手法含蓄委婉,极为高妙。(李泉)

【泽陂】《诗经·陈风》篇名。《毛诗序》云:“《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而现代研究者或以为与男子怀念女子的《月出》相反,是一首女子思慕男子的怀春诗作。诗三章,章六句,于重章复沓中抒发了诗人的无限思恋之情与极度愁郁之感。“辗转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诗集传》)南朝乐府《子夜歌》、《西洲曲》等显然承其绪。(李泉)

【素冠】《诗经·桧风》篇名。《毛诗序》云:“《素

冠》,刺不能三年也。”认为诗为讽刺时人不能遵行服丧三年的礼制而作。这是根据诗中“素冠”、“素衣”的描写,并附会儒家思想所作出的联想。旧说多从之。姚际恒《诗经通论》则云:“此诗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劳心’‘伤悲’之词,‘同归’‘如一’之语,或如诸篇以为思君子可,以为妇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遂迂其说以为‘刺不能三年’乎!”《礼记·檀弓》注:“凡物无饰曰素。”故素色衣冠不必指孝服。现代研究者或以为是一首女爱男、因故不得结合而忧伤苦闷、自誓心愿的诗。全诗三章,章三句,句尾都是叹词“兮”字,意绪哀婉,悠思不尽。(李泉)

【隰有苕楚】《诗经·桧风》篇名。朱熹《诗集传》云:“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此说切近诗旨。而郭沫若则进一步论证为:“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于《毛诗序》所释:“《隰有苕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与诗歌内容不符。诗三章,章四句。各章前三句述苕楚(羊桃)之花繁枝俏,第四句叙诗人对无知苕楚的慕羡。诗歌意在言外,“不必说自家苦,只羡慕苕楚之乐,而意自深矣”(钟惺语,引自陈子展《诗经直解》)。(李泉)

【匪风】《诗经·桧风》篇名。《毛诗序》云:“《匪风》,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诗为桧大夫忧叹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桧国小政乱,将及祸难而作。旧说多从之。朱熹《诗集传》则解为“贤人忧叹”“周室衰微”之诗。今之学者或认为是一首游子瞻望道途思念家乡的诗。盖分歧在于对诗中“周道”一词的解释。《毛诗序》释作“周之政令”,朱熹解为通周之路,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释为“大路”。全诗三章,章四句。一、二章倾吐东行者的忧思愁苦,末章寄希望于托人捎归平安家信。诗歌起势超忽,结尾深情蕴藉。(李泉)

【蟋蟀】《诗经·曹风》篇名。为曹诗四首中之第一首。《毛诗序》云:“《蟋蟀》,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朱熹《诗序辨说》则谓“言昭公,未有考”。今人以为此诗可能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曹国大夫,为忧伤其君臣醉生梦死,徒好衣裳楚楚,不知国亡将在旦夕而作。全诗三章,章四句,重章歌唱。以朝生暮死而又羽翼美艳的昆虫蟋蟀,喻曹国君臣奢侈华靡而无远虑,形象生动贴切。(李泉)

【候人】《诗经·曹风》篇名。《毛诗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朱熹《诗集传》以为序说或即指晋文公入曹,责共公不用贤人僇负羁,而使无德居位者多至三百人之事(事见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则引《国语·晋语》载楚成王诵此诗为例,疑诗非作于共公时,因共公与成王同时。今之研究者多认为这是一首同情下级小吏、谴责无功受禄者的讽刺诗。诗四章,章四句。首章用对比手法显示执事候人的辛劳,二、三两章直斥服饰耀眼的官僚之无德无能,末章以南山云蒸的美景起兴,反衬幼女受饥,倍增其惨怜。(李泉)

【**鸛鸣**】《诗经·曹风》篇名。此诗主旨歧解颇多。《毛诗序》云:“《鸛鸣》,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承朱说,认为诗是“曹人美晋文公之复曹伯”而作。清方玉润加以反驳:“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与谄而不正的晋文公不符。诗应是“追美曹之先君德足正人”的开国贤君曹叔振铎。今人多从此说。诗四章,章六句。均以鸛鸣(布谷鸟)起兴,取其“饲子朝从上而下,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的比意(《诗集传》),以喻君子的言行如一。(李泉)

【**下泉**】《诗经·曹风》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切近诗旨。此为衰周乱世,曹人思明王贤伯之作。诗四章,章四句。前三章为重调,以泉水浸伤众草起兴,比喻王室凌夷,小国困弊,诗人自己也处境不妙;第四章用阴雨滋润黍苗,喻拟小国得王朝保护,有郇伯慰劳。比兴的转换,使诗人明王贤伯之念、今昔盛衰之感,抒写含蓄而又沉痛。而“下泉”一词,也就成为后世诗文中渴盼明主盛世之典故,如王粲诗曰:“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李泉)

【**七月**】《诗经·豳风》篇名。豳诗七首,此为第一首。《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认为诗是周公陈王业之作。朱熹《诗集传》进一步阐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清代学者有以为诗为豳人旧作,或者周公增损之,以诗说教,如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穡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今人则多主张此为真切描述周代农夫繁重劳作、凄苦生活的农事诗,由民间世代流传集体创作而成。全诗八章,章十一句,为国风中之第一长篇。用赋体,以时序作

经,农事作纬,衣食作重点,白描铺叙一年间的勤苦耕作和生活状况。叙事朴质细致,抒情含蓄深沉。为我国民歌中十二月歌体形式之滥觞。(李泉)

【**鸛鸣**】《诗经·豳风》篇名。《毛诗序》曰:“《鸛鸣》,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鸣》焉。”认为是一首周公向成王表明心迹的诗。此说根据《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公。”诸家无异说。然于诗义不符。此实为寓言诗。诗人借母鸟自诉遭鸛鸣欺凌后、修窝筑巢的艰辛危苦,寄托对自己困苦遭遇的嗟叹和不平。诗四章,章五句。用拟人化手法,赋予禽鸟以人的情感和心理;把动物的某些生理特征和遭遇,与人类社会中的类似现象作有机的联系,刻画生动贴切,为后世寓言诗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李泉)

【**东山**】《诗经·豳风》篇名。《毛诗序》云:“《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认为诗为大夫赞美周公东征归来而作。据《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东征,三年践奄”。结合本诗“于今三年”的叙述,序说提供的时代背景似属可信。至于诗的作者,朱熹《诗序辨说》认为:“此周公劳归士之词,非大夫美之而作。”而崔述《读风偶识》则谓:“此诗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归士之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今之学者多从此说,认为诗为还乡士卒抒发思家厌战之情而作。诗四章,章十二句。首章直抒久戍喜归之情,次章想象家园荒芜,三章设想妻子念己,末章追忆三年前新婚美景。全诗为半重叠形式,每章起首四句的重复吟唱,使“悲”字笼罩全诗,效果独特。“章首四句,言其往来之劳,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见其感念之深。”(朱熹《诗集传》)反向设想手法的运用,使诗歌构思曲折新颖,而思情则更为深切。王士禛《渔洋诗话》评本诗曰:“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杜甫的《月夜》诗可谓深得本诗之三昧。(李泉)

【**破斧**】《诗经·豳风》篇名。此为反映周公东征获胜,兵卒美戡乱、庆生还的诗。《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认为是周大夫所作,此说与诗义不合。朱熹《诗序辨说》云:“此归士美周公之词,非大夫恶四国之诗也。”是。《毛传》谓:“四国,管、蔡、商、奄也。”今文三家诗则认为“四国”是泛指,不专指管、蔡、商、奄(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此说有据。《竹书纪年》载,周公自成王二年秋东征,五年春结束,历时三年。则本诗约或

作于成王五年。诗三章,章六句。复沓歌唱,变文协韵。用赋体,叙周公兵威四方,降服叛军,士卒得以生还。全诗连下九“我”字,一唱三叹,“往复委宛,用意深至,令人低徊不尽”(吴闿生《诗义会通》)。

(李泉)

【伐柯】《诗经·豳风》篇名。《毛诗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认为诗为周大夫美周公而作。此说与诗义不合。后人或以为此诗与下篇《九罭》本一篇而误分之,当合读其义乃见。(见吴闿生《诗义会通》)今人则多认为这是一首新婚谢媒诗。诗二章,章四句。“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遂成为后世行媒作伐的典故,“伐柯人”也就成为媒人的代称。

(李泉)

【九罭】《诗经·豳风》篇名。《毛诗序》释旨与《伐柯》同:“《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熹《诗集传》以为是东人挽留周公西归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承朱说:“此东人欲留周公不得,心悲而作是诗以送之也。”要之,诗为周公东征胜利,以上公冕服西归,东人惜别挽留之作。今人多从此说。因本诗首章末二句“我觐之子,衮衣绣裳”,与上篇《伐柯》最末二句“我觐之子,笾豆有践”的诗意、文字似皆相衔接,故后人或谓此诗与《伐柯》本为一篇,此系后半篇(见吴闿生《诗义会通》)。诗四章,章三句。前三章以“鱄魮(美味鱼)”、“鸿飞”起兴,兴中有比,喻西归者之伟大尊贵;末章为赋体,直抒对西归者之留恋深情。诗中以“衮衣绣裳”隐喻贵客,创用衣冠指代人物的表现手法,后世诗文多有运用。

(李泉)

【狼跋】《诗经·豳风》篇名。《毛诗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各家无异说,认为此诗赞美周公摄政,虽遭四方流言、幼主致疑,却处变不惊,王业终成,而又功成还政,圣德无瑕。今人或谓此为豳人讽刺周幽王宠臣虢石甫的诗(高亨《诗经今注》)。诗二章,章四句。以老狼的跋前疐后起兴,喻周公处境的进退维谷,颇为生动。吴闿生评篇中“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两句诗云:“写圣人遭难而不失其度,春容大雅,千载而下,如见其人。”(《诗义会通》)

(李泉)

【鹿鸣】《诗经·小雅》篇名。为《小雅》第一篇。《毛诗序》云:“《鹿鸣》,燕(宴)群臣嘉宾也。”《鲁诗》则认为此诗是周大臣“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太平御览》五七八引蔡邕《琴操》)从诗的内容看,以《毛诗》说为是。其写作年代,有以为在周文王时,有以为在成王、康王时,也有以为是“周衰之作”,均无确据,以第二说为胜。全诗三章,每章八

句。章首均以“呦呦鹿鸣”起兴。以鹿得甘美之食则呼同类共食,象征君王设宴热情款待群臣。全诗音节流畅,情调欢悦和顺,反映了西周贵族宴会宾客的情况。其乐调一直保持至西晋初年。唐以后科举制度,乡试放榜次日举行“鹿鸣宴”。即取此诗宴嘉宾之遗意。

(蒋见元)

【四牡】《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三家《诗》无异义。从诗的内容看,是出使的官吏在途中自述劳苦思归之情,《毛诗》以为君劳使臣,朱熹以为“君探其(使臣)情而代之言”(《诗集传》),均不合诗意。据《仪礼》,周代燕礼、乡饮酒礼均歌此诗,《毛诗》盖就其作为燕饗乐歌之义而言。全诗五章,章五句。诗人通过赋句与兴句抒写自己的感情,用词造境都比较平直。感情悲伤而不怨怒,“悲情中有愿意”(王质《诗总闻》),是“温柔敦厚”一类作品。

(蒋见元)

【皇皇者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三家《诗》无异义。此诗与《四牡》相同,也是出使的官吏在途中自咏之作。由于周代的燕礼、乡饮酒礼等仪式上,乐工要演唱《鹿鸣》、《四牡》与此诗,所以《毛诗》以乐歌之义来解释诗旨,以为是君王送使臣之词。全诗五章,每章四句。从“周爰咨谋”等诗句看,诗人出使,似为察访调查民情。历来分析此诗,有“五善”、“六德”之说(见《左传·襄公四年》、《国语·鲁语》),均以统治者详察民情、俯询贤人为善政,可证此诗主要为歌功颂德而作。首章“每怀靡及”句为全诗纲领,以下四章均重章叠唱,整齐中寓变化。

(蒋见元)

【棠棣】《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棠棣》,燕(宴)兄弟也。”三家《诗》无异义。诗的作者,《国语》记载为成王时周公所作,《左传》记载为厉王时召穆公虎所作,据今人考证,《左传》说较可靠。全诗八章,每章四句。诗以死丧祸乱与和平安宁对比,朋友妻子与兄弟对比,突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主题。抒情与说理相兼,“反复缕说,有抑扬,有顿挫,全以气骨胜”(孙鑛《批评诗经》),为《诗经》名篇之一。诗中有“棠棣之华”、“脊令在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等句,后世遂成为描写兄弟友爱的成语。

(蒋见元)

【伐木】《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韩诗》则认为:“《伐木》,废朋友之道缺……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文选》谢混《游西池诗》注引《韩诗序》)《鲁诗》认为“周德始衰……《伐木》有‘鸟鸣’之刺。”(蔡邕《正交论》)《毛诗》说较接近诗旨。前人有认为周文王作此诗,有认为周公作此诗,虽言之成理,但无确据。全诗三

章,每章十二句,通过描写宴饮同姓父党、异姓母党、妻党及庶姓朋友,表达了“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的主题(《毛诗序》)。诗中对偶句情趣天成,不假雕琢,排比句参差错落,成功地渲染了亲朋欢宴的气氛。(蒋见元)

【天保】《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天保》,下报上也。”意为臣下报答君上所作。三家《诗》无异义。明清学者有以此诗为周公营雒邑定都之作,不确。此诗为歌功颂德之典型。全诗六章,每章六句。前三章均以“天保定尔”起首,反映了周人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四、五章写到祭祀与育民,反映了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诗人善用博喻,前后以“如山如阜,如冈如陵”等九个比喻,描述天赐福禄之厚及君主德业之盛。后世遂以“天保九如”一词为祝贺福寿延绵之用。(蒋见元)

【采薇】《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三家《诗》则以为诗作于周懿王时,清人有以为作于周宣王时。目前尚无定论,一般倾向于三家《诗》说。全诗六章,章八句,描述一位守边战士服役思归的感伤情绪,以及御敌、恋家不能两全的矛盾心理。在题材上为后世边塞诗之祖。全诗抒情含蓄委婉,怨而不怒。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两句情景交融,为千古传颂名句。其所创造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王夫之《薑斋诗话》)的意境,为后世杜甫《哀江头》等诗所用手法之权舆。(蒋见元)

【出车】《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出车》,劳还率(帅)也。”将其与《采薇》编为同时代诗。三家《诗》则认为作于周宣王时。今、古文学于其写作年代颇有争论,迄无定论,一般倾向于三家《诗》说。全诗六章,每章八句,是一位跟随南仲出征玁狁的战士凯旋归来所赋之诗,旨在歌颂南仲讨伐玁狁的功绩。此诗被编为乐歌后,可能用于君王慰劳将帅胜利归来的场合,故《毛诗序》释为“劳还率(帅)”。作者前两章设想为南仲口吻,末两章又设想为南仲之妻口吻,语气屡变。不少诗句与《国风》及《小雅》他篇诗句相仿,套用的痕迹明显。(蒋见元)

【鱼丽】《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齐诗》以为思古忧时之作,不确。今人有以为捕鱼之人妒羨君子鱼酒之多,作此诗刺之,亦属臆想。周代乡饮酒礼、燕礼均歌此诗,可证其尝用作燕飨之乐歌。全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描写与歌颂贵族鱼多酒美、物质丰富。重章叠唱,结构简单。惟前三章有二字句、

三字句,后三章每章只二句,为《诗经》中所少见。

(蒋见元)

【南有嘉鱼】《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三家《诗》无异义。全诗四章,每章四句。此诗与《鱼丽》相同,在周代亦用为乡饮酒礼、燕礼的乐歌,惟《鱼丽》仅言鱼酒之美,而此诗兼述宾主宴饮欢乐之情。诗中兼用赋法和兴法,但“其实无甚深意”(方玉润《诗经原始》)。(蒋见元)

【南山有台】《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三家《诗》无异义。此诗在周代用为乡饮酒礼、燕礼的乐歌。全诗五章,章六句。内容为祝祷“君子”有德、有寿、子孙绵长。至于“君子”的身份,《毛诗》以为指贤人,宋、明、清学者有以为指君主。二说均可成立,以《毛诗》为长。每章均以“南山有×,北山有×”的《国风》习见句式起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蒋见元)

【蓼萧】《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蓼萧》,泽及四海也。”三家《诗》无异义。全诗四章,每章六句,描写西周初年,周天子设宴款待来朝见的四邻边远之国的君长。朱熹认为是天子“燕诸侯之诗”(《诗集传》),近人认为是“诸侯颂美天子之作”(吴闿生《诗义会通》),均可通。诗中“我”为远国君长或诸侯自称,“君子”指周王。每章均以香蒿兴盛、露珠滋润的景象起兴,象征周天子的恩泽遍及四海。将上下融洽的关系归结为周王的德业崇高和对远国之君以兄弟相处的态度,由此反映出周初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后人评为“写一时欢乐光景,蔼然可味。”(孙鑛《批评诗经》)(蒋见元)

【湛露】《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湛露》,天子燕诸侯也。”三家《诗》无异义。郑玄《笺》认为此诗为天子宴同姓诸侯,后人有以为兼异姓言之。考周代礼制,郑说为长。今人以为赋诗时为宴同姓诸侯,用作乐歌后,则于宴异姓诸侯场合亦可歌之(陈子展《诗经直解》),颇有理。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前两章以“不醉无归”为中心,显示天子劝酒之殷勤;后两章以“莫不令德”为中心,显示诸侯饮而不失礼仪,有美中寓戒之意。此诗可称劝酒词之祖。

(蒋见元)

【彤弓】《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三家《诗》无异义。西周时天子赐彤弓给有功诸侯是一种殊荣,亦是权力的象征,即所谓“凡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郑笺》)。全诗三章,每章六句。描写天子赐诸侯彤弓的大典,包括赐弓矢和设宴款待,也表达了周王对受赐诸侯的奖掖赞扬之意。全诗纯用赋法,无比兴,语言质

直。诗意尽于首章,后两章只是重复咏叹,加强感情。(蒋见元)

【菁菁者莪】《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三家《诗》无异义。朱熹反对《序》说,改为“燕饮宾客之诗”(《诗集传》),似无据。清人有以为“人君喜得见贤之诗”(姚际恒《诗经通论》),则与“乐育材”之意大同小异。全诗四章,每章四句。描写太学之学生见到“君子”视学后的喜悦心情。前三章均以“菁菁者莪”起兴,以表明“育材之有地”(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末章以杨舟沉浮起兴,表示太学生惧不见用的心情,见到“君子”后始得安然。今人有以为“读此诗,则知利欲熏心,患得患失,此知识分子之传统陋习,盖自三千年前已萌其端矣”(陈子展《诗经直解》)。亦见仁见智之论。“菁莪”二字,后世遂作乐育贤才之成语。(蒋见元)

【六月】《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三家《诗》无异义。周代自厉王起,政治腐败,国势衰弱,四周异族乘机入侵,北方猃狁威胁尤大。宣王即位后,发兵讨伐猃狁,取得很大胜利,保证了国家安定。此诗即叙当时的情事。全诗六章,每章八句。一章述备战,二、三章叙出征,四、五章写激战,末章为凯旋宴饮,是一首完整的叙事诗。主旨在歌颂主将尹吉甫的功绩。此诗风格“严整闳壮,俨然节制之师气象。语不浓,却劲色照人,盖自古质中炼出”(孙鑛《批评诗经》)。末章“余霞成绮,变卓犖为纾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堪称奇文。(蒋见元)

【采芣】《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采芣》,宣王南征也。”三家《诗》无异义。此诗与《六月》相同,为描写周宣王时周族与异族的战争。惟《六月》写北伐猃狁,此诗写方叔南征荆蛮(即楚)。据《竹书纪年》,南征在宣王五年(前823)八月。近人有谓南征荆蛮非实有其事,乃作者虚拟颂祷之词,不确。全诗四章,每章十二句,主要描写周人军队声势之盛大,军纪之严明,主帅方叔谋略之英明,从而震慑了荆蛮,与《六月》正面描写战争相比,辞气较为徐缓。末章振笔挥洒,声色俱厉,与《六月》结尾之冷隽亦成对照。(蒋见元)

【车攻】《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三家《诗》无异义。全诗八章,每章四句,写周宣王在东都雒邑会同诸侯,狩猎于圃田的活动。这次狩猎活动含有显示军威、慑服诸侯的政治目的,因此极写车马旌旗之盛,射手御夫之

精,以及猎后大营之整肃景象。末章归结于赞美宣王,揭示威慑诸侯的题旨。秦献公时之《石鼓文》,遣词造句显然承袭此诗。又诗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八字为传世名句。杜甫《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即自此二句脱胎。(蒋见元)

【吉日】《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写周宣王田猎的诗。从诗中首先记载日期及祭祀的情况分析,此诗当为史巫之流所作。全诗四章,每章六句。依次叙述猎前祭祀马祖,选择马匹,驱赶野兽,猎毕以野味宴飨臣宾等,颇具条理,也反映了周代贵族狩猎生活的过程。(蒋见元)

【鸿雁】《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三家《诗》无异义。但关于此诗作者身份,颇多歧说,可归纳为二:一以为西周王朝奉命招抚流民的官员所作,一以为是流民所作。以前一说为长。全诗三章,每章六句,写西周王朝的官吏招抚流民,组织他们筑墙重建家室,但他的辛勤工作却不为人所理解,反而遭到批评。此诗每章均以“鸿雁于飞”起兴,后世由此引申,遂以“哀鸿”一词作为流民的代称。(蒋见元)

【庭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鲁》、《齐》诗解释诗的背景,认为周宣王曾早朝晏起,怠于政事,其妻姜后脱簪待罪而谏,宣王纳谏改过,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此诗即为此而作。但仅就诗的内容看,并无规谏之意,故今人有以为写周王早起视朝之诗,有以为赞美官僚早晨乘车上朝之诗。在无其他佐证之前,似宜依旧说。全诗三章,每章五句。为一问一答的问答体。通过描写廷中火炬颜色由明变暗,诸侯上朝的车子由远及近,现出一派勤政戒旦的早朝景象,“而箴之之意自在言外,此所谓微文也。”(吴闿生《诗义会通》)此诗较典型地反映了《诗经》风格之一——“咏歌依违,不直谏”(《郑笺》)。(蒋见元)

【沔水】《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沔水》,规宣王也。”过于简单。三家《诗》无说。后人或以为宣王听谗,诸侯不朝之诗;或以为宣王时大臣杜伯因谗被杀,其子隰叔所作畏谗之诗;朱熹则以为忧乱之诗(《诗集传》)。此诗向称难解,迄无定论。全诗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此章明显脱首二句)。章首以流水、飞隼起兴,引入“念乱”、“心忧”、“谗言”等内容,最后归结于要朋友有所儆戒。据诗意推测,大致为畏谗忧乱之作,与“规宣王”无涉。(蒋见元)

【鹤鸣】《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鹤

鸣,海宣王也。”《郑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三家《诗》以为系贤者避世隐居之诗。全诗二章,每章九句。通篇用借喻,写鹤鸣、鱼潜、园檀、山石,比隐居之士,借以抒发招致人才的主张,亦可称为“招隐诗”。此诗全用比体,以隐语为开导,为三百篇中所仅见。或以为此诗无隐词隐语,通篇用赋法,写“小园位于湖山深处,园外邻湖,鹤鸣鱼跃,园中檀树成林,落叶满地。其旁有山,山有坚石可以攻错美玉”(陈子展《诗经直解》)。指此诗为后世田园山水一派诗之滥觞。此与旧说迥异,可备一说。

(蒋见元)

【祈父】《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祈父》,刺宣王也。”《郑笺》:“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则职废。”三家《诗》无异义。祈父是周代掌管都城禁卫的长官,亦称司马。周宣王执政后期,因兵员不足,曾调发都城禁卫部队从征作战。禁卫之士由此而有怨言,但不敢直接指责宣王,只能咒骂祈父征调不当。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诗人指责祈父将他调到令人困扰的战场,害得他有家难归,有母不得奉养。诗中三呼“祈父”,口气激烈愤怨。后人评为“惊心动魄,极悲极愤”(吴闿生《诗义会通》)。

(蒋见元)

【白驹】《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白驹》,大夫刺宣王也。”《郑笺》云:“刺其不能留贤也。”《鲁》、《韩诗》以此诗为“贤人远引,朋友离思”之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后人有因殷人尚白,大夫乘驹,疑此诗为周武王送箕子所作(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今人有提出“这首诗分明是中春通淫,行执驹之礼时的恋诗”(郭沫若《螽斯铭考释》)。《毛诗》说牵强附会。三家《诗》说为后世多数说《诗》者所遵从,影响颇大。郭说新颖,可供进一步研究。全诗四章,每章六句。写主人为了挽留贤友,将为他驾车的白马的脚系住,再三劝他多住几天,叮嘱他走后不要断绝音讯。言辞恳切诚笃,一往情深。后人评曰:“写依依不忍舍之意,温然可念,风致最有馀。”(孙鑛《批评诗经》)

(蒋见元)

【我行其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郑笺》云:“刺其不正嫁取(娶)之数,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毛诗序》所说过于笼统,且将《祈父》、《白驹》、《黄鸟》及此诗均归入宣王时之刺诗,亦十分牵强。《齐诗》以为是“既嫁不答,思复邦国”之作(《易林·巽之豫》)。朱熹以为“民适异国,依其婚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诗集传》)。均近是。今人多释为弃妇诗。又有释为“弃夫诗”者,以“作者为一男子,他被女家所逐,愤而唱出此诗”。认为“这是野蛮时代特有的婚姻状态——

对偶婚在《诗经》中的反映”(朱杰人《文化学视野中的〈诗经〉情诗》),颇新颖有据,可供研究。全诗三章,每章六句,重复咏叹,形式近似于《国风》中之歌谣,故后人以此为“西周民风”(龚橙《诗本谊》)。

(蒋见元)

【斯干】《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所谓“考室”,即宗庙群寝建成后,涂血而祭祀,类似后世所谓落成典礼。三家《诗》认为是赞美宣王“迁都,俭宫室”的诗,不确。朱熹认为“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是时(宣王)之诗”(《诗集传》),方玉润进一步认为是“公族考室”(《诗经原始》),均可通。全诗九章,四章每章七句,五章每章五句。可分为三层次,第一层一章,总述宫室之地势,连及兄弟家族之和睦。第二层四章,描绘宫室建筑情况,反映出我国传统的反宇结构建筑形式,在当时已经形成。第三层四章,为颂祷之词,写入居宫寝后生男育女、繁衍后裔,反映出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全诗结构精巧,写宫室多用叠词,形象生动,音节谐美。汉赋中写宫室者如《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等均远绍其意。后四章颂祷语以虚笔写占测梦境,有蛛丝马迹,岭断云连之妙。

(蒋见元)

【无羊】《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无羊》,宣王考牧也。”三家《诗》无异义。所谓“考牧”,《郑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此为歌颂贵族牲畜繁盛之诗,但是否为宣王而作,并无确证。全诗四章,每章八句,以白描手法写牧人形象,写牛羊之动态和静态,生动细腻,尽妍极态,宛如一幅《群牧图》。诗的布局也十分巧妙,以“谁谓尔无羊”反诘句开端,起势飘忽。二章“尔牲则具”一句为全诗主脑,但只是淡淡一笔点过,无说教之累赘。末章以牧人梦境及占梦作结,与《斯干》相仿,均十分奇幻。此诗历来被认为是三百篇中佳作。

(蒋见元)

【节南山】《诗经·小雅》篇名。三家《诗》仅以《节》为篇名。《毛诗序》云:“《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齐诗》以为此刺周大夫争田之诗。《毛诗》近是。作者家父,三家《诗》作嘉甫或嘉父。据《春秋》记载,家父为周平王时人,距幽王时已六七十年。有人因而认为诗作于平王时。但有人认为古人父子同字者往往有之,《春秋》之家父与作诗之家父未必为同一人,诗仍当作于幽王时。后一说为长。全诗十章,六章每章八句,四章每章四句。谴责周王朝太师尹氏为政不平,任用小人。最后将责任归结到幽王身上,希望他回心转意,重新理政。从诗中可以看出西周王朝官僚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危害。诗中刻划师尹的面目颇为传神,后人评为“画千古小人,如在

目前”(钟惺《诗经评点》)。(蒋见元)

【正月】《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三家《诗》无异义。清人推断此诗作于幽王六年至八年之间(前776—前774)(陈奂《读毛氏传疏》),近是。有人以为是平王东迁之后的诗,不确。这是一首忧国伤时、愤世嫉俗的诗。诗人眼看周幽王嬖爱褒姒,荒淫无道,信用佞人,朝政昏乱,国家逐步走向崩溃,因而忧心如焚,但又深感孤独。从诗中可以看到西周末年的社会政治情况。全诗十三章,八章每章八句,五章每章六句。以“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为主题,反复申说朝政的黑暗和自己的忧愤。比喻和抒情相结合,比喻奇警得当,抒情深沉缠绵。末二章突出自己的孤独,与《离骚》有相似之处。全诗“是深悲极怨之调,新意层出,愈说愈不能尽”(孙鑛《批评诗经》)。(蒋见元)

【十月之交】《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三家《诗》无异义,惟篇名有作《十月》者。郑玄认为“刺幽王”当作“刺厉王”,引起后世纷争。据现代天文历法科学考证,诗中“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即指公元前776年(幽王六年)9月6日的日食,诗为幽王时作无疑。其中“艳妻”一词,《毛诗》以为指褒姒,三家《诗》以为指另一宠妃,各执一说,然无关宏旨。今人有以“艳妻”为“焰齐(烈火)”之假借(黄典诚《诗经通译新论》),则过于穿凿。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共分三层。前三章以日食、地震等灾异示警,哀叹执政者不知戒惧。中三章点名指责皇父等七个佞臣与褒姒共同作恶,着重批评皇父自营私邑,聚敛财富。末二章写诗人劳苦而被谗,忧愁感慨,而以安命尽职自解。全用赋法,叙议结合。其记日食,为世界上有年月日可稽的最早最可靠记载;其言地震,描绘生动,均具科学史料价值。(蒋见元)

【雨无正】《诗经·小雅》篇名。《诗经》篇名大多数取首句二、三字为之,此题于诗中无据。朱熹《诗集传》引刘安世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穡’八字。”可备一说,但也有人认为此后人伪托之文。《毛诗序》云:“《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郑笺》以为“刺厉王”。朱熹引或说:“疑此亦东迁后诗。”(《诗集传》)《毛诗》说为长。全诗七章,二章每章十句,二章每章八句,三章每章六句。作者是幽王身边的侍御之臣。他见幽王昏庸,国势危殆,群臣逃避自保,作恶多端,由此忧心忡忡,发而为诗。全篇起势阔壮,结尾陡峭,言语沉痛,笔势斩绝,忧国之心溢于言表。(蒋见元)

【小旻】《诗经·小雅》篇名。诗首句为“旻天疾

威”,篇名却冠以“小”字,对此历来众说纷纭。有以为此诗所刺之事小于《十月之交》、《雨无正》等;有以为此诗属《小雅》,冠“小”字以别于《大雅·召旻》;有以为“旻天”涉及范围太广,故去“天”而加“小”字。均无确据,至今存疑。《毛诗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三家《诗》义未详。朱熹云:“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诗集传》)郑玄以为此诗“刺厉王”,不确。全诗六章,三章每章八句,三章每章七句,写幽王对政策的制订,多从邪僻之言,对正确的主意却弃而不用。同时表达了作者忧虑恐惧的心情。全诗善用比喻,尤其是末章,寓意委婉,令人玩味不尽。其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句已成为后世通用的成语。(蒋见元)

【小宛】《诗经·小雅》篇名,春秋时又名《鸛飞》。诗首句无“小”字,孔颖达云“刺幽王也,教为小,故曰小宛”(《毛诗正义》)。朱熹引苏氏以为此诗属《小雅》,故以“小”名篇(《诗集传》)。二说均无确据,至今存疑。《毛诗序》云:“大夫刺幽王也。”三家《诗》义未详。全诗六章,每章六句。写对先人的怀念,对兄弟的劝诫和勉励,对衰世的忧虑,及自己小心而恐惧的心情。每章一意,意颇错杂,故后人歧说亦多。一般以为是大夫遭时之乱,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毛诗序》“刺幽王”云云,乃诗外之义。此诗多用兴法,意极恳挚,后人评为“自是一篇家箴,不独处乱世宜然”(钟惺《诗经评点》)。(蒋见元)

【小弁】《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毛诗》说认为幽王娶申氏女,生太子宜咎。后又宠爱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听信褒姒谗言,立伯服为太子,放逐宜咎,宜咎之师傅因作此诗。三家《诗》以为此宣王时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作。尹吉甫感于后妻之谮,逐伯奇,伯奇因作此诗。这是一首被弃逐的儿子抒发忧愤哀怨之诗,表现父亲信谗,弃逐亲儿的题材,当无疑问。诗的背景为宜咎还是伯奇,迄无定论,其实亦无关宏旨。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刻画被弃逐的沉痛心情,感人至深。如“怒焉如捣”、“维忧用老”、“疢如疾首”等语,被评为“古今说忧,尽此数语,非身历不知”(钟惺《诗经评点》)。(蒋见元)

【巧言】《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此为讽刺周王听信谗言因而祸国殃民之诗,当无疑问。唯所刺是否为幽王,现代学者或以为尚难断定,有待考证。全诗六章,每章八句。前三章讽刺听信谗言的周王,指出谗言祸国的关键在于君主本身。后三章斥责进谗的小人,揭露其“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的真面目。均极深刻。全诗感情激

烈,辞锋凌厉,比喻贴切,造语奇特。(蒋见元)

【何人斯】《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何人斯》,苏公刺暴公也。暴公为卿士,而潜苏公焉,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三家《诗》以为苏公、暴公因争闲田而构讼,遂生嫌隙,暴公因事诬陷苏公,而苏公作是诗。可供参考。宋人以为《毛诗》及三家《诗》说“于诗无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朱熹《诗集传》)。今人或以为此诗“似为女子所咏”,劝其负心的男子回心转意(袁梅《诗经译注》)。说甚新颖,然终嫌穿凿。按旧说,此诗之背景或有所据,尚无确证,未可遽废。全诗八章,每章六句。写一个性情反复,行踪诡秘,往来无定的谗人形象,多用反诘句,更显出作者的理直气壮和谗人的理屈心惭。后人评为“穷形尽相,毫无遁情”(方玉润《诗经原始》)。(蒋见元)

【巷伯】《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郑笺》:“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诗中无“巷伯”二字,据《毛诗》,巷伯即诗的作者寺人孟子。据《齐诗》一说,巷伯被谗将受刑,寺人孟子悯伤其无辜而作此诗。以《毛诗》说为长。这是一首因被谗受害而作以泄愤的怨诗。所谓“刺幽王”,只是题外之义。全诗七章,四章每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作者先以织文细密的贝锦与状似张口的箕星起兴,以喻谮人者罗织罪名和飞短流长的伎俩。其次连用叠字以刻画谮人者的丑恶面貌。构思奇巧,形象生动。再次转而哀叹自己的不幸,感情沉痛,笔势夭矫不平。然后又转向痛斥谮人者,诅咒其不得好死,痛快淋漓。后人评为“刺谗诸诗无如此之快利,畅所欲言”(姚际恒《诗经通论》)。其中“投畀豺虎”、“投畀有北”等语,已为后世痛斥卑鄙小人时所常用。此诗与《巧言》、《何人斯》均为刺谗名篇,可以参看。

(蒋见元)

【蓼莪】《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三家《诗》无异义。这是一首苦于服役,悼念父母的哀诗。“刺幽王”为引申之义。全诗六章,四章每章四句,二章每章八句。作者以抱娘蒿与散生蒿蔚的对比起兴,怀想父母生己的辛劳;又以“生、鞠……顾、复、腹”等九个动词,描绘父母爱子的心情;还指出不能终养父母的根源在于朝廷的征发无已。全诗直抒真情,不假雕琢,凄恻悲怆,感人至深,被誉为“千古孝思绝作”(方玉润《诗经原始》)。史书多有读《诗》至《蓼莪》而哀痛流涕的记载。至今“顾复”一词犹用于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深爱。

(蒋见元)

【大东】《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

以告病焉。”三家《诗》无异义。谭是西周时东部的一个小诸侯国,春秋时被齐国攻灭。这是东方诸侯国的臣民讽刺周王室搜刮财物,奴役人民的诗。是否为谭大夫作,无考。全诗七章,每章八句。前四章写东方诸国的财富已被搜刮一空,其臣民还要劳苦服役,与西方周人的逸乐形成明显对比。后三章忽而转到夜观天象,见景生情,历数织女、牵牛、启明、长庚等等星宿的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暗喻周王室统治者徒居高位而不能纾民于困,反而诛求无已。此诗在《诗经》中别具一格,尤其后三章,奇思纵恣,光怪陆离。呼天而问,其意与屈原《天问》相仿佛。清人评为“后世李白歌行、杜甫长篇,悉脱胎于此”(方玉润《诗经原始》)。实为古典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杰作。

(蒋见元)

【四月】《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三家《诗》以为“行役过时,不得归祭,怨思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寻绎诗义,以三家说稍切合。后人又有以为“遭乱自伤之诗”(朱熹《诗集传》),或以为“逐臣南迁”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均未安。全诗八章,章四句。写官吏长期行役,远至南方,自夏至冬,不得归家。途中见国事危乱,虽鞠躬尽瘁,而不见信任,只能作诗述怀,以泄忧愤。诗末“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二句,点明作诗之由,说者以为“道尽古来诗歌作者类皆有其心绪激切之动机”(陈子展《诗经直解》)。

(蒋见元)

【北山】《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三家《诗》无异义。此诗出于周代统治者中最低一等的士之手,讽刺士与大夫之间的劳逸不均现象,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毛诗序》“刺幽王”之说为附会之词,“不得养其父母”亦非主题所在。全诗六章,三章每章六句,三章每章四句,以对比手法写士与大夫之间的劳逸不均,善恶不分,是非不明,连下十二“或”字,连用六组对比,然后戛然煞住,形象极其鲜明,布局亦极奇崛。后人评此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云:“《北山》诗连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觉音之繁、辞之复也。后昌黎《南山》用《北山》之体而张大之,下五十馀‘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沈德潜《说诗碎语》)。

(蒋见元)

【无将大车】《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郑笺》云:“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三家《诗》说同。但此说当以“无将大车”为兴句,“悔将小人”为象征意义,比较迂远。或以为“此亦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朱熹《诗集传》),但诗中

无行役语。清人方玉润云：“此诗人感时伤乱……又知其徒忧无益，只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诗经原始》）较合诗旨。此诗风格类似《国风》，作者当为劳动者，于推挽大车时直赋其事。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三章一意，既写感时之忧，又自我排解，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

（蒋见元）

【小明】《诗经·小雅》篇名。诗中无“小”字而篇名“小明”，或以为诗属《小雅》，冠“小”字以别于《大雅》之《大明》。或以为言幽王日小其明，损其政事，以至于乱，故名篇曰“小明”。二说均无确据，至今存疑。《毛诗序》云：“《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三家《诗》无异义。此为久役怀归，忧时思友之作。“悔仕乱世”是题外之义。全诗五章，三章每章十二句，二章每章六句。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层写作者久役不归，心中忧伤，思家心切，但又怕回家后有所得罪。心理的刻划深妙入微。第二层写作者对朋友的劝勉和祝福，希望朋友谨守职位，以得到神明的佑赐。全为说理语，与前一层之抒情迥异。

（蒋见元）

【鼓钟】《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鼓钟》，刺幽王也。”《齐诗》以为是昭王南巡淮水时所作。历来争论，在于此诗之创作年代。幽、昭二说互异，至今未有定论。这是讽刺周王在淮上奏乐不止，荒淫奢侈，诗人因而伤今思古的诗。全诗四章，每章五句。写周王在淮上奏乐失礼，作者感到忧伤，并由此联想起古代的圣贤君子品德高尚，从而委婉地讽劝周王反省改过。重章叠唱，类似国风。诗中提及钟、磬（大鼓）、瑟、琴、笙、磬、雅、南、箫等乐器，了解周王室音乐的情况有所帮助。

（蒋见元）

【楚茨】《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三家《诗》无异义。《序》言“思古”，即所谓“陈古以刺今”者。宋人驳之，朱熹云：“自此篇至《车辇》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应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者耳。《序》皆失之。”（《诗序辨说》）其说颇有见地。此实为周王秋冬祭祀祖先，祭后私宴同姓诸臣之诗。全诗六章，每章十二句。写丰收之后，秋冬祭祀宗庙的宏大场面及祭祀的具体经过，末以祭毕欢宴作结。因诗中言农事较多，故有人疑此诗与《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为《周礼》所记载之《豳雅》，可备一说。全诗气格宏丽，结构严密，写祭祀过程有境有态，有条有理，然又不乏精语险句。同为祭祀乐歌，此诗与屈原《九歌》相比，

前者庄敬，后者佻傚；前者严谨，后者疏宕。正显出《雅》《颂》与《楚辞》的不同风格。

（蒋见元）

【信南山】《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三家《诗》义未阐。此非刺诗，理由同《楚茨》。盖为周王烝祭（即冬祭）之乐歌。诗言“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谓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又云“中田有庐”，自来说者纷纭，亦皆涉及井田制，故此诗别具史料价值。全诗六章，每章六句。从地利、天时、黍稷、瓜蔬等说起，然后乃及祭祀正事。较之《楚茨》之详密严整，此诗稍为简略，布局亦加跌宕，多闲情别致，显出别一种格调。

（蒋见元）

【大田】《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所谓“刺”，只是陈古以刺今的题外之义，诗中并无刺意。“矜寡不能自存”也只是就诗中“伊寡妇之利”一句生说，不能概括诗旨。三家《诗》义未阐。这是周王祭祀田祖以祈年的诗。诗中提及以火烧灭害虫的方法，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句，为历代西周土地制度研究者所必引，具史料价值。全诗四章，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九句。从春种、夏作、秋收写起，最后归结到祭祀，与前篇《甫田》的交叉写农事与祭事不同。其中描写收获之多，却从侧面刻画拾田间遗穗的寡妇，后人评为“愈淡愈奇，愈闲愈妙，善于烘托法”（方玉润《诗经原始》）。

（蒋见元）

【瞻彼洛矣】《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三家《诗》以为此诗写诸侯世子受周天子爵命，任为军将，率领六军出征。宋儒以为“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都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朱熹《诗集传》）。就诗论诗，以朱熹说为长。全诗三章，每章六句。三章一意，颂美周天子福祿寿考，用词多套语。

（蒋见元）

【裳裳者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裳裳者华》，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三家《诗》无异义。《序》说显误。此为一首赞美诗。前人解说分歧，迄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周王赞美诸侯之词。全诗四章，每章六句。前三章重唱，以鲜明的花朵起兴，以歌颂诗中“之子”的美好，语调轻快而有情致，有赞美之心而无阿谀之意。末章转而写“之子”的内在品德，归结为表里一致，美容美德。可谓善颂善赞。

（蒋见元）

【桑扈】《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三家《诗》

义未阐。朱熹云：“此亦天子燕(宴)诸侯之诗。”较《毛诗》说为优。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前两章以桑扈起兴，祝颂诸侯为国家屏障。后两章则于颂祷中寓箴规之意，颇合周王的身份。(蒋见元)

【鸳鸯】《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三家《诗》义未阐。《序》说穿凿。此诗以鸳鸯、秣马等起兴，皆与古代婚姻有关，故后人以为这是祝贺贵族新婚之诗。全诗四章，每章四句。章首兴句象征婚姻，较有情致。“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两句被评为“细腻如画”(方玉润《诗经原始》)。每章后两句均是当时例祝王者或贵族巨室之谀词套语，诗意大逊。(蒋见元)

【頍弁】《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頍弁》，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三家《诗》义未阐。这是西周末年周王宴请兄弟亲戚之诗，作诗者当是与宴诸人之一。《序》说部分切合诗旨。全诗三章，每章十二句。前两章写宴乐之欢，及同姓、异姓贵族对周王的依附心情。末章则反映出严重的危亡感和及时行乐的颓废心态，被后人评为“乱世悲愁之作”(吴闿生《诗义会通》)。(蒋见元)

【车辚】《诗经·小雅》篇名。又作《车轺》。《毛诗序》云：“《车辚》，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三家《诗》义未闻。朱熹云：“此燕乐其新婚之诗。”(《诗集传》)较《毛诗》为优。全诗五章，每章六句。写一位新郎驾车迎娶妻子，途中赋诗言志。全诗歌颂新娘之美，着眼于她的品德高尚。首尾两章用赋体，一写往迎，一写归来，曼声长咏，绵丽有姿。二、四两章用兴体，写对新娘的钦慕，笔调流和。赋、兴二体间杂使用，章法灵动而不板滞，表现了诗人兴高采烈的心情。(蒋见元)

【青蝇】《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青蝇》，大夫刺幽王也。”《齐诗》以为此讽刺幽王信褒姒谗言而伤害忠贤之作。三家《诗》又以卫武公为此诗作者。全诗三章，每章四句。章首均以青蝇起兴，“以青蝇喻谗言，取其飞声之众可以乱听，犹今谓聚蚊成雷也。”(欧阳修《诗本义》)作者指出谗言的危害以至于“交乱四国”和“构我二人”。后人认为“四国”指戎、缙、申、吕，“二人”指幽王与申后，说亦可通。后世以“青蝇”一词为谗言的代词。(蒋见元)

【宾之初筵】《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据史载，卫武公入为周王朝卿士在

平王之世，可见诗未必为刺幽王。三家《诗》以此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但诗中无悔过之意，故三家说也不切诗旨。此诗实为讽刺奴隶主贵族酗酒败德的丑行，但语气委婉，意在谏诤，从中可以看到周王朝上层贵族的生活侧面。全诗五章，每章十四句。第一、第二章写酒筵伊始，宾客谨守秩序。第三、四章写酒醉之后，宾客失礼失态。末章提出饮酒当符合礼节，进行劝谏。全篇用赋体，章法灵动变化，描写生动而有层次，语言端庄流丽兼而有之，尤其是写酒醉之态，被誉为“穷形尽相”，“是一幅醉客图”(方玉润《诗经原始》)。(蒋见元)

【鱼藻】《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以为是“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诗集传》)。后人也有以为是武王克商，在镐京饮酒庆祝之诗；又有以为是镐京百姓欢迎武王在镐建都之诗。从诗的内容看，并无讽刺之意，《序》说“刺幽王”只是陈古刺今，以美为刺之义。就诗论诗，这是赞美周王在镐京宴饮享乐之作。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风格类似民谣。遣词造句浅近如话，起兴含义耐人寻味。(蒋见元)

【采芣】《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占焉。”《鲁诗》以为这是周王赏赐诸侯命服之诗。较《毛诗》为长。全诗五章，每章八句，写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天子赏赐他车马衣服。诗中多用采芣、采芣、柞叶、杨舟等事物起兴，与所咏之天子锡命等仪式形成鲜明对照。后人以为“事极典重而起极轻微”，断为“草野歌咏”(方玉润《诗经原始》)，可备一说。(蒋见元)

【角弓】《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鲁诗》以为诗作于幽厉之际。具体年代现已不可考。此诗作者是周王室的父兄辈人。他讽刺周王接近谗佞小人，不亲睦九族，以至骨肉相怨。反映了奴隶社会以宗族为纽带而互相维系的宗法思想。全诗八章，每章四句。前四章重在刺周王不亲近兄弟，后四章重在刺小人谗佞得逞。作者信笔由情，章旨多变，故后人评为“光怪陆离，眩人耳目”(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诗中多比喻，且取喻奇特，如“老马反为驹”喻老少颠倒，“毋教猱升木”喻小人攀附本性，均新奇而形象。(蒋见元)

【菀柳】《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三家《诗》无异义。从诗

的内容看,是一个被周王贬谪流放的大臣所作怨诗。他曾受周王信任,参与国政,后无故被撤职流放。后人以为此诗刺厉王,现已无考。全诗三章,每章六句。诗中多用对比来揭露周王的暴虐无常,多用议论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结尾用反诘句,“如撞钟,清音有馀”(谢榛《四溟诗话》)。(蒋见元)

【都人士】《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三家《诗》无异义,但无首章。今文学家认为首章本是逸诗,因其首句与《都人士》的首句相同,而被《毛诗》误合为一诗。朱熹云:“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诗集传》)其说较《毛诗》为优。今人有以为此诗是周都一首恋歌,有以为此诗表达对一个贵族及其女儿的敬爱,均可备一说,但一般从朱熹之说。全诗五章,每章六句,通过描述西周京都男女人士的仪容服饰发型之美,来抒发怀旧的感慨。词小而旨大,言微而意深。东周避犬戎而迁都洛邑,南宋避金人而迁都临安,两代人民心理,有相似之处。陆游诗“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在表现手法上,与此诗可谓异代同揆。(蒋见元)

【采绿】《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三家《诗》义未闻。朱熹认为“此诗怨旷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可怨旷者有所刺于上也”(《诗序辨说》)。较《毛诗》更切合诗旨。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前二章从丈夫“去后着想,极写幽怨神理,刻画情思入微”(陈子展《诗经直解》)。后二章“从归后想象,极写倡随之乐,愈见别离之苦。示欲无往而不与之俱,意中事,诗中景也”(同上)。此诗风格与《国风》中《殷其雷》、《伯兮》略同,纯为《风》体,故后人或称其为“西周民风”(龚橙《诗本谊》)。(蒋见元)

【黍苗】《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三家《诗》以为这是召伯慰劳诸侯之诗。二说均不确。朱熹云:“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又云:“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往营城邑,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诗集传》)其说切合诗旨。《大雅·崧高》也叙述召穆公建筑谢邑之事,可参看。全诗五章,每章四句。写召穆公建筑谢邑完毕之后,役夫士卒的欢欣和思归之情。用语浅显简明,对召伯的功绩颂而不谀。(蒋见元)

【隰桑】《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

以事之。”三家《诗》义未闻。朱熹云:“此喜见君子之诗。词意大概与《菁莪》相类。然所谓君子,则不知其何所指矣。”(《诗集传》)分析诗旨较《毛诗》平实。今人多有指此诗为爱情诗或妇女思夫之作者,说亦可通。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前三章以隰桑起兴,形容想念并希望见到“君子”的精神情意。末章用赋体,极言爱之之诚。(蒋见元)

【白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诗。”(《诗集传》)得诗旨。今人有将作者泛指为贵族弃妇,说亦可通。全诗八章,每章四句。各章前二句均用比兴,后二句则直抒幽怨伤怀之情。八章八次变换比兴之义,虽兴义不易捉摸,引起后人纷纭歧说,但实为三百篇中的创格。且“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耐人玩味处”(陈子展《诗经直解》)。(蒋见元)

【绵蛮】《诗经·小雅》篇名。《齐诗》作“緡蛮”。《毛诗序》云:“《绵蛮》,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从诗的内容看,并无讽刺之意。朱熹云:“此微贱劳苦而思有所托者。”(《诗集传》)王质云:“重臣出行,而下士冗役告劳者也。闻其告劳而旋生恻心,亦必贤者,是管、谢之流也。”(《诗总闻》)二说较合诗旨。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各章均采用两人对话形式,前四句为行役者诉说劳苦之言,后四句为大臣给行役者饮食,并教育他,让他坐车之言。有人认为各章后四句为行役者自道其愿望的幻想之辞,说亦可通。诗意尽于首章,后两章只是重章叠咏,风格类似《国风》。(蒋见元)

【瓠叶】《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瓠叶》,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饔飧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废礼焉。”三家《诗》义未阐。《序》说穿凿。朱熹云:“此亦燕饮之诗。盖述主人之谦词,言物虽薄,而必与宾客共之也。”(《诗集传》)较合诗旨。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均用赋体。各章后两句只改动一字,形式类似《国风》。写宾主在宴饮时不因菜肴简约而扫兴,依然来往敬酒,“有不任欣喜之状”(陈廷杰《诗序解》)。但全诗“格调平庸,词意肤浅”(方玉润《诗经原始》),在《小雅》宴饮诗中不算上乘之作。(蒋见元)

【渐渐之石】《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渐渐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诗也。”三家《诗》

义未闻。这是士卒在东征途中慨叹劳苦而作之诗。据史载,幽王时无东征之事。但据《诗》言,则幽王实有东征之役。于此或可见《诗》即史之作用。全诗三章,每章六句。风格类似《国风》。末章“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写行役途中遇滂沱大雨之实事实境,而造语十分奇警。(蒋见元)

【**苕之华**】《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云:“《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三家《诗》义未阐。这是灾年饥荒,民不聊生,而“饥者歌其食”的作品。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章以苕花芸黄、苕叶青青起兴,感物之盛而叹人之衰,反衬灾年饥馑的悲苦境遇和忧伤绝望的心情。末章先提出“牂羊坟首,三星在留”两件典型事例,描述出饥馑之余,百物凋耗的可怕景象。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有二解:一解以为人人都很少有吃饱的时候。另一解以为人自相食,但灾年人瘦,吃人也吃不饱。后一解更为沉痛。白居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与此同意。此诗写得极为悲苦深痛,令人不忍卒读,在《诗经》中亦属罕见。(蒋见元)

【**何草不黄**】《诗经·小雅》篇名。为《小雅》最后一篇。《毛诗序》云:“《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是诗。”(《诗集传》)与《诗序》可以互补。全诗四章,每章四句。写万民无不从役,统治者视民如禽兽的衰世景象。“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方玉润《诗经原始》)编《诗》者将其置于《小雅》之末,以反映西周王朝的衰败没落。(蒋见元)

【**文王**】《诗经·大雅》篇名。为《大雅》第一篇。《毛诗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历来对“受命”的解释不同。古文家认为周文王受纣王之命为西伯,今文家认为文王受天命而称王。据诗的内容,今文说较合理。前人多谓作者为周公旦。诗作于周成王时。一说作于周文王时,不确。全诗七章,每章八句。通过歌颂文王受命于天的德业,告诫成王要牢记殷商亡国的教训,以文王为榜样,承顺天命。全诗宣扬天命观,反映了西周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思想。此诗乐章用于宗庙祭祀及天子诸侯朝会等场合,“隐然为周之国歌”(陈子展《诗经直解》)。全诗“只谈事谈理,更不用景物点注”(孙鑛《批评诗经》),故庄严有馀而生动不足;但句与句、章与章之间运用蝉联格修辞,结构浑成,转换自然。后世曹植《赠白马王彪》

等诗的修辞滥觞于此。

(蒋见元)

【**大明**】《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篇名又称《明明》,即取首句“明明在下”为题。《毛诗》取名《大明》者,或以为“二圣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郑笺》),或以为“盖对《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迄无定论。三家《诗》无异义。《大雅》中有周人自述开国史诗六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及此诗。按诗的内容为序,此为最后一篇。从文王父母王季、太任结婚叙起,至文王出生及与太姒结婚,再至武王伐纣胜利为止。全诗八章,四章每章六句,四章每章八句。以天命不常,维德是辅的思想统领全篇,同时通过歌颂文王母亲太任和武王母亲太姒的婚配及生育,反映了与天命观相配合的宗法血统观念。全诗重点在歌颂武王克商的胜利,故末两章描写牧野之战十分生动传神。诗中奇数章每章六句,偶数章每章八句,相间编排,别创一格。(蒋见元)

【**绵**】《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叙述太王由豳地迁往岐山之下的诗,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太王即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初居豳,后避戎狄侵扰,迁居岐山之下,定国号曰周,开国奠基,由此周民族走向兴盛。今文学家有以为此诗美文王,不确。全诗九章,每章六句。写古公亶父在豳地仍过着穴居生活,迁至岐周广阔平原后,开始整理经界,建筑房屋。末两章突然大幅度跨越时空,写文王驱逐昆夷,感化邻国,任用贤臣,以证明周之兴盛,在于太王奠基开拓,至文王才得昌大。整篇结构宏大,章法奇崛,“叙迁岐事历历详备,舒徐有度。至此(写文王)则如骏马下坡,将近百年事数语收尽。笔力绝雄劲,绝有态,顾盼快意”(孙鑛《批评诗经》)。(蒋见元)

【**棫朴**】《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棫朴》,文王能官人也。”所谓“官人”,即举贤授职之意。《齐诗》以为此诗“见文王受(天)命则郊,郊乃伐崇。”(《春秋繁露·郊祭篇》)二说皆可通,以今文说稍胜。全诗五章,每章四句,前两章写文王郊祭天神,三章写伐崇,末两章歌颂文王长寿,文质俱美,超出伐崇的范围。此诗歌功颂德,前人评末二章为高华典丽,但遣词章法均嫌板滞。(蒋见元)

【**旱麓**】《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禄焉。”三家《诗》无异义。所谓“受祖”,指祭祀祖先,并得到祖先赐予的福禄。全诗六章,每章四句。反复颂扬“君子”(即文王)的祀祖

得福,同时也记叙了供酒献牲的祭祀仪式。为祭祀诗性质所囿,除三章“鸛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较生动外,其余诗味均平淡。(蒋见元)

【思齐】《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思齐》,文王所以圣也。”三家《诗》无异义。这首诗歌颂文王的美德,兼及太王之妻太姜、王季之妻太任、文王之妻太姒。前人以为这是“推本言之”,意欲证明文王之圣明是由于上有圣母,内有圣妃。这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中心的意识在周代诗歌中的残留。全诗五章,二章每章六句,三章每章四句。首章歌颂太姜等“周室三母”,二章起歌颂文王以身作则,修身、齐家、治国的德业。章法颇有波折,用字也较练净。

(蒋见元)

【皇矣】《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先述太王开辟岐山,打退昆夷。次述王季继承先祖德业,传位给文王。末述文王伐崇伐密的胜利。全诗八章,每章十二句。以王季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上推源太王,下带出文王,“长篇繁叙,规模阔阔,笔力甚驰骋纵放。然却有精语为之骨,有浓语为之色,可谓兼终始条理”(孙鑛《批评诗经》)。后世歌行,在章法布局上多有祖述此诗者。

(蒋见元)

【灵台】《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三家《诗》无异义。这首诗记叙周文王建筑灵台,并在灵囿、灵沼中游赏,奏乐自娱的情景。今人有谓《毛诗序》之“民始附”当谓“崇人始附”,此诗显示周文王灭崇后,役使新占有之崇人奴隶从事建筑灵台的工程(见陈子展《诗经直解》),颇有见地,可备一说。全诗五章,每章四句。三家《诗》分为四章,前二章每章六句,后二章每章四句。这是歌颂文王之诗,但从筑台、游观、奏乐等侧面描摹入手,以造成“与民偕乐”的太平景象,颂意见于言外,与《大雅》诸诗的正面颂美有所不同。

(蒋见元)

【下武】《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三家《诗》无异义。这是赞美周武王、成王能继承先王功德,并告诫嗣位新君要紧跟祖先足迹的诗。据诗意,当作于康王即位、诸侯来贺时。篇名“下武”,汉儒释为后人能继先祖;宋儒有释为不尚武,即偃武。以汉儒说为胜。全诗六章,每章四句。颂美与告诫并存。诗中运用前章尾句与后章首句相同的连珠格,以及前章第三句与后章第三句相同的连环格,前后相承,上递下接,从形式上再现了周代统治者从三后(太王、王季、文王)至武王,从武王至成王,

从成王至康王的不断继承关系。(蒋见元)

【文王有声】《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三家《诗》无异义。《郑笺》云:“继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纣。”此诗即记述文王伐崇后迁都丰邑,武王伐纣后定都镐京之事。全诗八章,每章五句。前四章述文王作丰事,后四章叙武王都镐事。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故第五章首句“丰水东注”起承上递下之功,不着痕迹,轻妙之至。又各章皆以单句赞词“××烝哉”煞尾,可见当时入乐歌唱时曼声长咏之风格。

(蒋见元)

【生民】《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第一篇,记述周民族始祖后稷的事迹。诗言后稷之母姜嫄踩了上帝的足迹而有孕生子,历来对此辨说纷纭,现代学者指出,这种传说反映了上古野合杂交或血族群婚向对偶婚过渡时期的婚姻现象,可视为原始社会母系制之残留。后稷在诗中为一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他自幼从事农艺的神异传说,反映了周人以农立国的传统,及上古农业发展情况。全诗八章,四章每章十句,四章每章八句。结构严密瑰奇,写神话而不脱离现实生活,写现实而不乏神话意味。语言整饬,形象生动,“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入纤,绝有境有态”(孙鑛《批评诗经》)。可视为一篇很好的《后稷传》。

(蒋见元)

【行苇】《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认为此诗泛言周先世之忠厚。三家《诗》以为此专写公刘仁德之诗。三家旧说或有所据,但诗中并无明言。就诗论诗,这是写周代贵族与族人宴会、较射、尊老祈福的诗。《毛诗》分全诗为七章,二章每章六句,五章每章四句。郑玄分为八章,每章四句。朱熹分为四章,每章八句。以朱说稍胜。写宴饮、较射、尊老祈福三事,层次清晰。首章用兴句,其后均赋体,描述也较生动。

(蒋见元)

【既醉】《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既醉》,大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周代统治者祭毕飨燕,而公尸祝福之诗,《序》说不确。全诗八章,每章四句。前三章是参加祭毕宴会,群臣颂王之词。后五章以问答形式,逐一道出扮演先王神灵的公尸致祝词的内容。诗表达了周代统治者向往福寿,胤嗣永昌的生活追求,也反映出西周盛期四方宁静,政权巩固的社会现实。末章“其仆维何”云云,历来皆不得其解。现代

学者指出“仆”即奴隶,在奴隶社会,奴隶也是世代相袭的,可为定论。
(蒋见元)

【鳧鷖】《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周代统治者绎祭宴饮公尸之诗。古者天子诸侯祭祀,第一天享神灵,称正祭;第二天燕饮扮演神灵的公尸,称绎祭。全诗五章,每章六句。写主人宴请的诚敬,公尸的和悦欢欣及神灵的赐福助成。满篇写福祿欢宴,末句却以“无有后艰”收尾,反映了兢兢戒慎以守成的心态。五章诗除每章第五句外,句句押韵,且各章重唱复沓,有热烈昂扬之情。
(蒋见元)

【假乐】《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假乐》,嘉成王也。”三家《诗》作《嘉乐》,以诗为“美宣王”,与《毛诗》异。从诗的内容看,没有明确显露创作年代。朱熹疑为“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诗集传》),亦无据。全诗四章,每章六句,写周王宴饮群臣,臣下歌功颂德。方玉润云:“此等无非奉上美词,若无‘不解(懈)于位’一语,则近谀矣。”(《诗经原始》)析诗格甚确。
(蒋见元)

【公刘】《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三家《诗》认为此诗专美公刘,与召康公戒成王无关,较《毛诗》为胜。这也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记述周族首领公刘带领周民由邠迁豳的故事。前人以为与《七月》同为豳地遗诗。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后代,约生于夏末商初,因避夏桀、戎狄而迁往豳地,进一步发展农业。全诗六章,每章十句。首章写公刘率周人迁徙情景,二、三章写在豳择地定居过程,末三章写定居后开荒垦田、祭祖祀神、艰苦创业的场面。意境开阔,气魄宏大,反映了周代先民的开拓精神和自信乐观的民族心理。布局疏密得宜,大笔勾勒与细微描摹相间,极有风致。其中“涉渭为乱,取厉取锻”二句,被现代考古学者引为史证,证明至少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我国先民已开始把锻铁应用在制造兵器方面。
(蒋见元)

【洞酌】《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三家《诗》以为赞美公刘之诗,不确。从诗的内容看,无以确定创作年代。《毛诗》旧说或有所据。后人以为此诗是召康公教成王以软硬兼施手段感化被征服的殷族奴隶而作,可备一说。也有以为这是殷族奴隶歌手所作讽刺诗,但诗中未见讽刺之意,其说难成立。全诗三章,每章五句。歌颂周王能得民心,同

时也含有劝戒意。重章复沓,其体类似《国风》。

(蒋见元)

【卷阿】《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三家《诗》以为召康公避暑卷阿而作。从诗的内容看,是周王出游卷阿,作者陈诗答王之歌。旧说作者为召康公,或有所据。今人有以此诗本为两篇,前六章为一篇,名《卷阿》;后四章为一篇,名《凤皇》(见高亨《诗经今注》)。说颇新颖,但无确据。全诗十章,六章每章五句,四章每章六句。写君臣出游,群臣献诗的盛况,歌颂周王能够礼贤下士。篇章结构完整,文字首尾呼应。凤凰飞集之传说起兴,以喻朝廷多贤士,反复吟咏,宛转蕴藉,是善于歌功颂德者。
(蒋见元)

【民劳】《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三家《诗》无异义。前人称此诗至《桑柔》五篇为“厉王《变大雅》”(见陆德明《经典释文》)。这是劝告厉王安民防奸的诗。作者揭露了当时朝廷中欺诈、残暴、丑恶、昏乱的现象,对人民的痛苦表示同情,对周王加以深深的规劝。从诗句口吻来看,作者是召穆公大致可信。全诗五章,每章十句。章首均以“民亦劳止”起句,表达了作者关心民瘼的心情。每章都有“无纵诡随”、“式遏寇虐”两句,以此为中心,揭露奸人的面目,规劝周王疏远小人,亲近贤臣。前人评曰:“五章章法一例,唯于字句浅深间见变换,又一格也。”(方玉润《诗经原始》)
(蒋见元)

【板】《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三家《诗》大致相同。这是托劝告同僚之名,实际劝告厉王的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混乱,财用匮乏,人民痛苦呻吟,周王众叛亲离。凡伯为周公后代,有人考证凡伯即共伯和,世称其修德行,好贤仁。周厉王失败逃往彘地,有一段时间诸侯立他为周王。全诗八章,每章八句,以“老夫”的身份进行“大谏”,因此直言坦陈,苦口婆心,有训斥,有劝导,极见意志迫切,激情难抑。行文颇多变化,比喻形象生动,措词精警入神,是谏诗中较富文采者。
(蒋见元)

【荡】《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诗人哀伤厉王无道,周室将亡的诗。全诗除第一章外,其余各章都借托周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气,实际讽刺厉王。从诗中“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等句来看,西周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诗八章,每章八句。格局奇巧,虽是伤时之作,而却幻化为文王嗟叹殷纣之语。通篇无一言显斥厉王,只于篇末“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二句微词见意,极帷灯匣剑之奇。前人评为“词意超妙,旷古所无”(吴闳生《诗义会通》)。此种托古讽今的表现手法,是后世咏史诗的滥觞。“殷鉴”一词,已成为借鉴往事的成语。(蒋见元)

【抑】《诗经·大雅》篇名。《国语·楚语》引此诗又作《懿》。《毛诗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三家《诗》大致相同,唯不云“刺厉王”而云“刺王室”。据前人考证,卫武公作诗时已年迈,距厉王之世近九十年,无刺厉王之可能。有人以为此卫武公自戒并刺平王之诗。也有人以为卫武公自戒之诗,无刺王意。从诗的内容看,自戒与刺意并存。旧说为卫武公所作,或有所据,只是所刺何王已不可考。全诗十二章,三章每章八句,九章每章十句。诗中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腐朽荒淫和社会的动荡不安。通篇议论说理,语言生动,深含哲理,如“夙兴夜寐”、“白圭之玷”、“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等句,后世均衍化为流传甚广的成语。(蒋见元)

【桑柔】《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桑柔》,芮伯刺厉王也。”三家《诗》以为“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潜夫论·遏利篇》)较《毛诗序》为详。《逸周书·芮良夫解》为芮良夫谏厉王之作,与此诗相表里,可参看。诗的创作年代,有认为作于厉王三十年(前849年),以荣夷公为卿士后;有认为作于厉王奔彘,共和摄政之初,以前说为胜。全诗十六章,八章每章八句,八章每章六句。描写当时兵祸连年,灾荒频仍,奸臣争权夺利,为祸乱之由,厉王刚愎自用,使民心思乱,全面反映了西周末年的危乱形势,同时抒发了自己忧伤国事而无力回天的怨愤心情。兴法赋体交相使用,笔阵开合,动荡有势,极沉郁顿挫之致。(蒋见元)

【云汉】《诗经·大雅》篇名。此诗至《常武》,旧说列为“宣王《变大雅》”。《毛诗序》云:“《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韩诗》以为此诗是“宣王遭旱仰天”之作(钞本《北堂书钞·天部》引《韩诗》及注文)。较《毛序》简明切要。仍叔为周大夫,是否此诗作者并无确据。此诗创作年代在宣王二年至六年之间(前827—前822年)。全诗八章,每章十句。写周宣王求神祈雨之词。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旱灾之严重,具史料价值。全诗语调沉痛,祈求上帝不要降灾的话“重重复复,说了又说,样样说到,喋喋不已,最见忧旱恳切之意”(孙鑛《批评诗经》)。对旱象的描绘,无论用赋体还是用比喻、夸张,都十分传神贴切,难以移易。遭旱祈雨称为雩祭。此诗用为雩祭乐章,

直至南北朝时尚见于记载。(蒋见元)

【崧高】《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诗集传》)较《毛诗序》简明扼要。《小雅·黍苗》写召伯奉宣王之命,为申伯建筑谢邑,与此诗相表里,可参看。前人有以为此诗语虽褒美,而微文深意则在言外,讥宣王疏远申伯贤臣,不能引以自辅。此读诗者之理解,可备一说。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写宣王命召伯建筑谢邑,经营土地,又派傅御代迁家人,临别设宴饯行,赏赐丰厚,申伯荣归封地,为各诸侯做出表率。每事申言,句义多重复之处,前人以为“写(宣王)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严粲《诗缉》)。此诗写赠别,但以崧岳巍峨起首,发端庄严凝重,气势雄伟,“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方玉润《诗经原始》)。篇末作者尹吉甫自报姓名,自述作意,并自评自赏己诗为“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实为创格。(蒋见元)

【烝民】《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诗集传》)较《毛诗序》更直接。仲山甫是周宣王时大臣,他的具体身世事迹,历来歧说纷纭,史料有缺,无可考实。全诗八章,每章八句。以“德”为基石,以“则”为主脑,列举仲山甫的德性、学行、事业以及世系、官守,极意推崇,备加赞美。首章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说理开端,高浑有势,同时也是“《三百篇》说理第一义”(方玉润《诗经原始》)。全诗语意高妙,探微入奥,以理趣胜。宋人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究其根源,可谓滥觞于此诗。语言富有生命力,如“小心翼翼”、“爱莫助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名句,后世都衍化为成语。(蒋见元)

【韩奕】《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韩侯初立来朝,始受王命而归。诗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为尹吉甫作,今未有据。”(《诗集传》)较《毛诗序》为胜。诗中叙述韩侯朝周,受王册命,周王大加赏赐。他离开镐京,途经屠邑抵达颍里,与韩媾结婚。最后周王任命韩侯为统率北方诸侯的方伯。全诗六章,每章十二句。前三章正面赞美韩侯,落笔冠冕堂皇,为颂词正体。四、五两章转写韩侯娶妻和韩地沃美,从侧面极意烘托,为颂词变体。末章又归结到封邦建侯,收笔庄雅得体。结构之妙在四、五两章的穿插,使全诗庄重而不板滞,灵动而不佻达,舒展而不浮泛。较一般堆砌颂词

的谏诗高出一筹。

(蒋见元)

【江汉】《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三家《诗》无异义。此诗写宣王命召虎带兵讨伐淮夷。末章记召虎作簋记事。今人郭沫若据西周金文辞，断定此诗为召伯虎簋铭之一。作者即召伯虎，盖自铭其器。《毛诗序》云尹吉甫所作，非。诗的创作年代在宣王六、七年间(前822—前821)。全诗六章，每章八句。以美武功为主，但无一字铺张威烈，方言兵本出动，立刻跳跃至平淮奏捷。三章起专叙宣王锡命及召公对扬之词，雍容揄扬，笔意高远。是写战争诗的别体。唐韩愈《平淮西碑》即祖述此诗。

(蒋见元)

【常武】《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三家《诗》无异义。诗无“常武”字而篇名《常武》，后世说法不一。宋人有云“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王质《诗总闻》)。其说近是。近人有以为武王克商乐为《大武》，宣王中兴乐为《常武》，以乐名诗，亦可备一说。《序》云召穆公所作，无确据。此诗赞美宣王伐淮夷及徐戎的武功。宣王是否亲征，旧说不一。从诗的内容看，似是亲征。全诗六章，每章八句。全用赋体，描写战争颇有特色。五章以“如飞如翰”等四句一连串比喻，形容南征军队之勇猛迅疾，“措语之精，振古无伦”(吴闿生《诗义会通》)。紧接“绵绵翼翼”三句，“承上文而下，气势浩穰，有天地褰开，风云变色之象”(同上)。可称是一篇古战场文字。

(蒋见元)

【瞻卬】《诗经·大雅》篇名。《毛诗序》云：“《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三家《诗》无异义。方玉润云：“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乱也。”(《诗经原始》)，较《毛诗序》更为详明。作者是否凡伯，今无考。全诗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揭露幽王祸国殃民的罪恶，追溯其宠爱褒姒以致祸乱的根源，同时抒发作者痛惜国运危殆的情怀。诗的重点在斥责褒姒，极言“女祸”之害，“可谓穷形尽相，不遗余力”(同上)。反映出“女人祸国”的思想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已十分成熟，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蒋见元)

【召旻】《诗经·大雅》篇名。为《大雅》最后一篇。《毛诗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三家《诗》无异义。诗首句为“旻天疾威”，末章提到召公，故篇名《召旻》，以别于《小旻》。这是讽刺幽王任用小人的诗，与上篇《瞻卬》刺幽王宠褒姒可参看。诗中怀念昔日贤臣召公，《毛诗》以为指宣王时召穆公，三家《诗》以为指文王、武王时召康公，以《毛诗》为胜。全诗七章，四

章每章五句，三章每章七句。通过对比和比喻，描绘当时社会动乱的状况，刻画奸佞小人的种种丑态，对比今昔国运的迥异，希望幽王能幡然改悟，任用旧臣。前人评曰：“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吴闿生《诗义会通》)

(蒋见元)

【清庙】《诗经·周颂》篇名。为《周颂》第一篇。《毛诗序》云：“《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三家《诗》大致相同。对“清庙”的解释，历来有歧说。一说以为清庙专指文王庙，“清”以所祭有清明之德者言。一说以为清庙广指祖先诸宗庙，“清”以庙貌肃然清静言。以后一说稍胜。此诗最初作为祭祀文王的乐章，后又作为兼祀文王、武王的乐章；此外，鲁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庙，也以此为祭祀乐章。全诗一章，八句。无韵。因为《颂》诗载歌载舞，节奏较缓，韵脚不起作用，故《周颂》多无韵(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周颂》)。此诗风格简淡寂寥，颂文王之德而不从正面着笔，写清庙，写助祭众人，侧面烘托，意味反觉深长。

(蒋见元)

【维天之命】《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维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周公旦摄政，辅佐成王时，祭告文王的乐歌。周武王卒，其子成王尚幼，其弟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归政于成王。郑玄以为此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末，陈奂以为作于摄政六年(前1110年)制礼作乐之后，以陈说较有据。全诗一章，八句。前四句盛赞文王之德，下四句写祭祀者诚敬遵循文王之道。条理清楚，语言古朴，不用比兴、夸饰，只是反复咏叹，以见祭时心情之虔诚及场面之肃穆。

(蒋见元)

【维清】《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维清》，奏象舞也。”《鲁诗》作“象武”，《齐诗》作“象乐”。意同。这是祭祀文王时表演《象舞》所配的乐歌。文王在位七年，先将商纣的属国如密、崇等都灭掉，孤立商纣，为武王灭纣奠定基础。武王建立周王朝后，制《象舞》以纪念文王的武功。前人以为武王所制《象舞》为徒舞，无歌。至成王时，周公作此诗以为《象舞》之节，歌以奏之。全诗一章，五句。是《诗经》中最短的诗篇。有人因此疑其有缺文。但一般认为辞语简约而意旨深远，正是此诗特点，并非有缺文。

(蒋见元)

【烈文】《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三家《诗》同。这是成王祭祀祖先，祭毕敕戒助祭诸侯的诗。创作年代在成王七年，周公归政，成王亲政告祖之时(前1109年)。诗的作者，有以为成王，有以为周公，有以为史

官。均可通,以第一说稍胜。全诗一章,十三句。前八句为戒勉诸侯的话,后四句既戒诸侯,亦以自戒。末句以追念祖先的叹词作结。用词简单朴拙,惟末句叹词意味较含蓄。(蒋见元)

【天作】《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鲁诗》同。此诗主题尚有多解,有以为祭太王之诗,有以为武王祀岐山之诗,有以为成王祀岐山之诗。据诗的内容看,确为周统治者祭祀岐山之诗。岐山为周王朝奠基之地,故特为设祭。主祭者为武王还是成王,史远无考,当存疑。全诗一章,七句。写太王开辟岐山,文王继而经营,子孙应永远保有。诗从“天作高山”说起,取势雄伟。自太王、文王、子孙一气贯下,短短七句而历史跨度极大,故前人评为“峰峦起伏,绵亘万里”。(吴闿生《诗义会通》)(蒋见元)

【昊天有成命】《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鲁诗》同。朱熹云:“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诗集传》)其说是。诗当作于康王之时。近人王国维认为此诗是《大武》乐曲的第一章,今人以为其说不妥。全诗一章,七句。重点在称颂成王能继承祖先的事业。句式参差不齐,有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之别,散文文化倾向明显。文字简质,前人评为“通首密练”(姚际恒《诗经通论》)。(蒋见元)

【我将】《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鲁诗》同。这是在明堂祭祀上帝,而以文王配祭的乐歌。前人有以为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前1111年)。今人有以此诗为《大武》舞曲第一章,可备一说(见高亨《周颂考释》)。全诗一章,十句。前三句祭天,中四句祭文王,末句为祭者告诫周王之词。条理十分清楚,反映了周人祭天祀祖的礼制及敬畏天命的天道观念。(蒋见元)

【时迈】《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郑笺》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三家《诗》大致相同,惟《毛诗》以为武王巡守,三家《诗》以为成王巡守。《毛诗》说近是。所谓“柴望”,柴是祭天之礼,望是祭山川之礼。诗通过写武王巡守各地诸侯,祭祀上天及山川百神,歌颂并神化武王,以利于周王朝的长久统治。旧说以诗为周公所作。全诗一章,十五句。语气居高临下,威严中有柔和之意,反映出统治者的双重手段。前人评为“遣词最古而腴”(孙鑛《批评诗经》)。(蒋见元)

【执竞】《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此昭王以后之诗。”(《诗集

传》)后人对此诗是单祭武王还是三王并祭多有争执,迄无定论。据周代典制,无三王并祭之例。但据诗意,确为三王并祭。就诗论诗,以朱熹说稍胜。全诗一章,十四句。前七句写三王功德之盛,后七句写奉祭者获福之隆。后半段连用叠词,渲染祭礼的隆重气氛,庄严之中不乏生动意味。(蒋见元)

【思文】《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三家《诗》同。这是周王在南郊祭天,以后稷配祭的乐歌。旧说为周公所作。后稷为周人始祖,以其配天,是结合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为赞颂的统一体,为巩固周王朝政权服务。从此诗及《清庙》、《我将》、《执竞》、《昊天有成命》等诗篇中,可以考见西周奴隶制社会关于各种祭祀的情况,具史料价值。全诗一章,八句。后稷为农业生产的推广者,故此诗也谈及农事。此诗与《生民》同为歌颂后稷,但“《生民》述事,故词详而文直;《思文》颂德,故语简而旨深”(《诗经传说汇纂》引张所望语)。由此也可见《雅》《颂》风格之区别。(蒋见元)

【臣工】《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三家《诗》同。方玉润云:“王耕籍田以敕农官也。”(《诗经原始》)其说近是。周王拥有一大片土地,由农奴耕种,称为籍田。每年春天,周王带领群臣去耕籍田,扶犁推几下,以示对农业的重视,然后祭祀土谷之神。此诗即籍田祭祀时所唱乐歌。创作年代大约与《噫嘻》相去不远,在成王之世。全诗一章,十五句。以告诫群臣起首,接着问及春天的农业生产,末又预言秋天的丰收,并指出是上帝的赐予。层次清晰,语言典重朴质。偶有写景、写动作之处,则清新生动。诗中提及“钱镛”等农具,今人据此考证西周前期已有铁制农具。

(蒋见元)

【噫嘻】《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三家《诗》同。此诗主题的解释,古今学者分歧极大。除《毛诗》外,有以为此成王戒农官之词(朱熹《诗集传》),有以为此康王春天祈谷祭祀之诗(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有以为此成王祈呼上帝之助的农事诗(戴震《毛郑诗考正》等),有以为写成王籍田,告诫农奴之词(高亨《诗经今注》等),迄无定论。此诗反映周初的农业情形,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但由于对主题及个别字句(如“骏发尔私”的“私”)解释的不同,此史料可以证明何种历史事实,尚属学术界争鸣的问题之一。全诗一章,八句。语言概括精炼,叙事明白而有气势。

(蒋见元)

【振鹭】《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三家《诗》略同。武王克商

后,封虞舜之后于陈,封夏禹之后于杞,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墟,使各奉其先祀。后武庚叛乱被诛,周王朝改封纣的庶兄微子于宋。《毛诗序》所谓“二王之后”,即指杞和宋。后人以为此诗单为宋微子来周王朝助祭所作。虽是推测之词,但据诗的内容来看,亦不为无因。全诗一章,八句。前四句描写助祭者的仪容行止,形象鲜明而优美。后四句表达周王朝对来宾的殷切期望,反映了西周初期怀远柔近的民族政策。言词委婉,含箴规于劝勉之中。前人评为“全在意象之间,绝不著迹”(姚际恒《诗经通论》)。

(蒋见元)

【丰年】《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丰年》,秋冬报也。”《鲁诗》同。这是秋天丰收以后祭祀的乐歌。关于祭祀的对象,历来歧说纷纭。一说以为秋冬报祭,从祖妣以至上帝百神,皆歌此诗,较合诗旨。全诗一章,七句。从“万亿及秭”的描述,反映了周初国有的大规模耕作,具史料价值。所写场面宏大,意气亦颇高昂。

(蒋见元)

【有瞽】《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三家《诗》同。由于《毛诗序》文字简略,因此对于“乐”、“合”、“祖”三词的确切含义,后人仍多争论,现已难于一一剖析并加论定。大致此诗是将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在宗庙演奏以祭祖的乐歌。前人以为作于周公摄政六年(前1110年),制礼作乐之时。全诗一章,十三句。写乐工的位置及各种乐器的名称、形状,对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具史料价值。文字简洁生动,结尾善用侧面烘托法。

(蒋见元)

【潜】《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潜》,季冬荐鱼,春献鲋也。”三家《诗》同。这是周王以鱼类献祭宗庙时所唱乐歌。全诗一章,六句。罗列各种献祭的鱼名,并求祖先降福。文字简约。以叹美之词起首,气氛较活泼。

(蒋见元)

【雝】《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雝》,禘大祖也。”三家《诗》略同。但太祖,《毛诗》指后稷,《鲁诗》指文王。以后说稍胜。据朱熹说,这是武王祭文王的乐歌,用于祭祀完毕撤去祭品时所歌。全诗一章,十六句。前四句描写祭祀场面,多用叠词,较生动。后十二句赞美文王之德并祈求赐福赐寿,无非一般祭歌的套语。

(蒋见元)

【载见】《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三家《诗》同。关于“诸侯始见”的时间,一说以为在周公居摄七年而归政成王之时,一说以为在成王初即位之时,一说以为在成王三年免丧,武王木主初入祫庙(父庙)之时。以第三说为胜。全诗一章,十四句。写诸侯来朝,在成王

率领下祭祀武王的典礼。前六句写致祭场景,徐徐有度,气势庄严。后八句写助祭仪式,以祈求福寿为主。末以长句收尾。结构上较其他祭祀诗更为灵动。

(蒋见元)

【有客】《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三家《诗》同。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武王克商后,封微子于宋。周公诛灭叛乱的纣子武庚后,就改命微子为殷后,奉其先祀。此诗即写微子朝见周王,临别时周王设宴饯行的情景。清人有以为这是箕子朝见周人祖庙的诗。箕子为商纣的诸父,曾因谏纣而被囚禁,武王克商后将其释放。其说亦可通,但一般皆从《毛诗》说。全诗一章,十二句。清人有分为三章,每章四句。可备一说。全诗写设宴送别之意,殷勤款切,语言生动流畅,不失为一首送别佳作。但是末二句“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反映出周王朝对殷人之后恩威并重的政策,在上述依恋惜别的情调中掺入一丝阴影。

(蒋见元)

【武】《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武》,奏《大武》也。”三家《诗》同。这是叙述武王克商的《大武》乐歌,作于武王时代,作者旧说为周公。周成王时有《武乐》,又名《大武之乐》,是合数曲而成的一组舞曲。前人以此诗为《武乐》的第一首乐歌,也有以为第二首乐歌。年代久远,详情已难有定论。全诗一章,七句。主要歌颂武王克商的功绩。《武乐》表演时有音乐,有歌唱,有舞蹈,是一种“声容具备”的形式。今天舞姿和乐曲均亡佚,所以单从歌词很难想象其艺术特点。

(蒋见元)

【闵予小子】《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鲁诗》以为“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之所歌也。”较《毛诗》为详。据此,诗作于成王三年除武王之丧时。或以为诗作于成王七年,周公致政之后;或以为作于武王既葬,附祭于宗庙之时,均不确。诗的作者,有以为成王自作,有以为周公托为成王之词,今已无考。前人以此诗及《访落》、《敬之》、《小毖》四篇为一首诗之四章,乃成王自作悔过之词,《周颂》误分为四篇(参见高亨《诗经今注》)。说颇新颖,但无确据。全诗一章,十一句。先诉先王去世后的哀痛,再颂先王之美德,最后表达自己继承遗志的决心。章法严谨,一波三折,为后世哀祭体作品所取法。

(蒋见元)

【访落】《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访落》,嗣王谋于庙也。”三家《诗》同。武王灭商后,立纣子武庚为诸侯,又命己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商地一部,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武庚勾结淮夷等国起兵反周,三监也流言周公欲谋害成王,发动“三监之变”。周公率兵东

征,平定叛乱。诗就是在这样纷乱背景下创作的。全诗一章,十二句。写成王在武王庙祭祀的同时,延访群臣,商议国事。首二句揭明题旨,后六句就国家形势提出要群臣扶助的愿望,末四句祈祷歌颂父亲武王。言简意赅,前人评为“多少宛转曲折”(姚际恒《诗经通论》)。(蒋见元)

【敬之】《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三家《诗》同。后人以为这是成王自我儆戒并告群臣的诗;有以为是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并且回答群臣的诗;有以为前半段为群臣戒成王之词,后半段为成王答群臣之词。从诗的内容看,前后文义确实不同,故后人三说均可通,均胜于《毛诗序》,但迄无定论。全诗一章,十二句。前六句告戒成王要敬畏天道,后六句成王自述年幼无知,要勤奋学习,并希望群臣指示其美好的德行。全诗四、五、六、七言句参差使用,结构较有变化。“高高在上”等句精心锤炼,后世传为成语。(蒋见元)

【小毖】《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三家《诗》同。这是成王自我惩戒而求助于群臣的诗。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位,成王也怀疑周公。周公为此率军居东方二年以避嫌。不久武庚与三监叛周,成王认识到自己怀疑周公的错误,迎回周公,并请他率军东征平叛。此诗大约作于平叛之后。全诗一章,八句。首二句写自己当吸取教训以防后患,成语“惩前毖后”即由此衍化。后四句以蜂螫、虫飞为喻,阐明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富有哲理,又生动形象。末二句叹息自己处境艰难,充满忧思。前人评曰:“愤懑蟠郁,发为古奥之辞。编取草虫等作喻,以见姿致,尤奇。”是《周颂》中的佳作。(蒋见元)

【载芣】《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载芣》,春籍田而祈社稷也。”三家《诗》同。这是一首农事诗,周王春天籍田并祭祀社稷之神时,将此诗作为乐歌。有人以为这是周王秋天报祭的乐歌,亦可通。但从下篇《良耜》是秋报社稷之歌来分析,还是《毛诗序》为胜。全诗一章,三十一句。诗中并没有描写周王籍田的情况,也没有专写祭社稷的句子。只是写春耕、播种、收获及祭祀,反映了农业奴隶大规模耕作的情况,以及奴隶主阶级享用奴隶劳动成果的心理,具史料价值。诗中描写耕耘场面疏密相间,生动有趣;写农作物的生长细腻传神,非亲身耕作者难以道出。这是《周颂》中艺术性较高的佳作。(蒋见元)

【良耜】《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良耜》,秋报社稷也。”三家《诗》同。这也是一首农事

诗,在秋天收获之后报祭社稷之神时用作乐歌。此诗与上篇《载芣》有三句完全相同,可能出于一人之手。此诗所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情况及史料价值与《载芣》相似。全诗一章,三十一句。基本用赋体,描写细致,形象鲜明。写粮仓的高大众多则用比喻,贴切传神。颂体简约庄严,但此篇与《载芣》二诗写农事却十分详尽,在《周颂》中别为一格。(蒋见元)

【丝衣】《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三家《诗》同。绎是祭祀后第二日再祭之名。尸是扮成神的模样受祭之人。宾尸即以宾礼待尸。灵星即天田星,古人以为是主稼穡之神。据《毛诗序》,这是周王绎祭后,以宾礼宴请灵星之尸的乐歌。后人以为这是祭祀而饮酒之诗,有以为是雩祭或蜡祭,有以为是举行养老之礼所唱乐歌。迄难定论。全诗一章,九句。前五句写祭祀之始,祭者衣冠及祭品祭具。后四句写祭后宴饮、宾客仪态,并祝长寿。(蒋见元)

【酌】《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三家《诗》同。这是成王时《大武》乐歌之一。《大武》有六成,即六支舞曲。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周颂》的《武》、《桓》、《赉》为其中之一。其余三成,据近人王国维研究,为《昊天有成命》、《酌》、《般》(见《观堂集林·周大武乐章考》)。据今人陆侃如、高亨研究,为《我将》、《酌》、《般》(见陆侃如《诗史》、高亨《周颂考释》)。《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勺”即“酌”,舞勺即以此诗为节而舞,为当时学校的学科之一。全诗一章,九句,也有分为八句。主要歌颂武王出师伐纣,取得天下的功绩。起语雄健,用词典重。因为配合舞蹈,所以篇幅不长。(蒋见元)

【桓】《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祫也。桓,武志也。”三家《诗》同。类祫是二种祭祀的名称。祭天曰类,祭造为军法者即军神曰祫。这种祭祀,在出兵打仗或大规模田猎时均要举行。据《左传》记载,此诗是周初《大武》舞曲中的一章。有人以为是《大武》的第四章,一般认为是第六章。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武王)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也有人以为是武王祀明堂之诗。全诗一章,九句。歌颂武王克商后,各国安定,年谷常丰,天下太平,并以为这是天命归周所致。全篇谀词,是典型的颂赞体。(蒋见元)

【赉】《诗经·周颂》篇名。《毛诗序》云:“《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三家《诗》同。这是武王克商之后,在文王之庙大封诸侯之诗。

后用为《大武》乐曲的第三章,也有人以为是第五章。诗中无“赉”字。赉是赐予之意,此诗写封诸侯于庙,赐予爵禄,故以“赉”名篇。全诗一章,六句。以武王的口气,说文王创业辛苦,自己应当继承大业,并且勉励大家都要寻绎思索得天下之由。在赞颂的同时,提出思考的命题,反映出周武王不同于众的思想境界,在《周颂》中别具一种格调。后人评为:“古淡无比。‘于绎思’三字以叹勉,含味最长。”(孙鑛《批评诗经》) (蒋见元)

【般】《诗经·周颂》篇名。为《周颂》最后一篇。《毛诗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郑笺》:“般,乐也。”三家《诗》言巡狩祀四岳河海,并行封禅之礼,将诗归于成王。《毛诗》则归于武王,而不言封禅之事。二说迄无定论。周初《大武》乐曲以此诗为第四章,也有人以为是第六章。全诗一章,《毛诗》七句。三家《诗》八句,章末多“于绎思”一句。诗中无“般”字。旧说释般字,有以为快乐,有以为出游,有以为盘旋,均可通,迄无定论,要之也是以内容而定篇名者。前四句写登山观河,望祀山川之神。后三句遍祀天下诸神,重申周王朝承受天命而立国。诗境阔大,语气庄严凝重,体现出周初开国的气魄。

(蒋见元)

【驹】《诗经·鲁颂》篇名。是《鲁颂》第一篇。《毛诗序》云:“《驹》,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圉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三家《诗》以为《鲁颂》四篇均奚斯所作。较为有据。这是歌颂鲁僖公时牧马盛壮的诗。先秦的军队,主要由马拉的兵车组成,因此马匹的多少与良驽,反映国力的强弱。歌颂鲁僖公的马政,实际就是赞美他治国有方。方玉润认为此诗“借马以比贤人君子”,是“喻鲁育贤之众”的作品(《诗经原始》)。这是后人体会发挥之义,诗本身并无这层意思。全诗四章,每章八句。格局一律:先从颂马入题,通过列举各种毛色的马,以见马群之盛;然后赞扬马匹驾车的壮健娴习,点出养马的用途;再后歌颂鲁僖公的深谋远虑,由马而及人,进入颂诗正题;末一句仍以颂马作结。层次井然,颂意明白,用词多变化,是颂诗中的上乘之作。唐代杜甫善咏马,滥觞于此诗,但生动精警则远过之。孔子评论《诗经》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三字即取自此诗。

(蒋见元)

【有骐】《诗经·鲁颂》篇名。《毛诗序》云:“《有骐》,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云:“此但燕饮之诗,未见君臣有道之意。”(《诗序辨说》)方玉润云:“燕饮不忘在公,颂祷专称岁有,既无

怠政,又勿忘本,君臣同乐,所谓‘有道’。”(《诗经原始》)他结合诗的内容,调和《毛诗序》与朱熹之说,较为和洽。有人认为此诗称美伯禽君臣,无据。有人怀疑此诗非美僖公,亦无确据。似应仍旧说。全诗三章,每章九句。每章均以颂马入题,然后赞颂鲁公在公室办事的勤勉,描写他们饮酒起舞的欢乐,末章还祝祷年年丰收。全诗四言句、三言句夹杂使用,末尾以赞叹作结,整齐中有变化,故前人评为“音节绝佳”(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此诗开后世柏梁体燕飨赋诗献颂之渐。

(蒋见元)

【泮水】《诗经·鲁颂》篇名。《毛诗序》云:“《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赞美鲁僖公战胜淮夷后,在泮宫祝捷庆功,宴请宾客的诗。但据历史记载,鲁僖公并无征服淮夷的武功,反而曾被淮夷俘虏过。此诗将败仗美化为胜仗,大加称扬,反映出当时宗庙歌功颂德之词中夸张和虚假的特点。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前三章写在泮宫饮酒场面,后五章歌颂鲁公征服淮夷的武功。《鲁颂》为春秋时诗,其体与《周颂》庙堂祭祀乐章不同,此诗前三章类乎《召南》之《采芣》、《采芣》及《小雅·采芣》,全诗与《采芣》尤相似。末章忽以飞鸢集林,食桑葚而吐好音起兴,点缀胜利气氛,使全诗空灵飞动,饶有情致。后人评曰:“大体宏贍,然造语却入细,叙事甚精核有致。前三章近《风》,后五章近《雅》。”(孙鑛《批评诗经》) (蒋见元)

【閼宫】《诗经·鲁颂》篇名,为《鲁颂》最后一篇。《毛诗序》云:“《閼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三家《诗》无异义。这是歌颂鲁僖公能够中兴祖业,恢复疆土,建造新庙的诗。作者奚斯,亦名公子鱼,鲁国大夫,僖公同时人。前人对于诗中“奚斯所作”一句之义有争论,一说以为奚斯作新庙,非作诗。此说不确。全诗八章,朱熹分为九章,共一百二十句,为《诗经》中最长一篇。孙鑛评曰:“其格宏壮,其词瑰玮,其色苍古,其思沈密。其尾作室,中间祖德、侯封、祭祀、武功,次第铺叙。而赞颂福祉,作三项分插,整然有法。细玩,宛似后世一篇纪功碑”。(《批评诗经》)此诗就章法风格而言,已开西汉赋铺张扬厉的先声。就内容言,虚功溢美,对封建社会歌功颂德的诗文颇有影响。

(蒋见元)

【那】《诗经·商颂》篇名,是《商颂》第一篇。《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据此,《毛诗》以《商颂》为商诗。三家《诗》则以《商颂》为正考父所作,为宋诗。争论颇烈。据近人王国维研究,“《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

颂》之后,逮《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后。”(《观堂集林·说商颂》)此说较今古文均胜。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写祭祀时的奏乐、舞蹈较详。诗中的《万舞》,后人以为即周代用以歌颂商汤的《大濩》;所描写的音乐,也即《大濩》之声。商人尚质,但此诗语言却颇工致,尤其是写各种乐器的演奏,十分生动和谐。

(蒋见元)

【烈祖】《诗经·商颂》篇名。《毛诗序》云:“《烈祖》,祀中宗也。”朱熹以为“此亦祀成汤之乐”(《诗集传》)。此篇起首与《那》相仿,末二句则与《那》全同,以朱说为胜。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写祭祀的清酒和羹,助祭者车马之盛,并祈求祖先降福降寿,年年丰收。有人以为此诗与《那》为祭祀烈祖成汤同时所用乐歌,《那》用于迎牲之前,故言乐声;此诗用于杀牲之后,故言祭品。语言风格亦与《那》相似。

(蒋见元)

【玄鸟】《诗经·商颂》篇名。《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三家《诗》以为是宋公祀中宗之诗。中宗即殷王太戊,汤的玄孙。高宗即殷王武丁,中宗的玄孙之孙。二说以《毛诗》为胜。这虽是祭祀高宗武丁的乐歌,但从商人始祖契的出生说起,具有史诗性质。诗中人物为半神半人的英雄,所叙史事也杂有神话传说成分。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前十句写高宗能嗣承祖德,后十二句写高宗能使四海安定,诸侯来朝。方玉润认为“诗骨奇秀,神气浑穆,而意亦复隽永,实为《三颂》压卷”(《诗经原始》)。

(蒋见元)

【长发】《诗经·商颂》篇名。《毛诗序》云:“《长发》,大禘也。”大禘是君主在郊社祭天而以祖先配祭的仪式。三家《诗》则以为是在成汤之庙祭祀成汤而以伊尹从祀之诗,较《毛诗》为胜。诗中叙述了商人先妣简狄、始祖契、契的后裔相土以及商代开国君主成汤的业绩,具有史诗性质。后人将《玄鸟》及此诗称为商人开国史诗。全诗七章,一章八句,四章每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前二章历叙商民族的英雄有娥氏女(即简狄)、契、相土的功绩,后五章则详言汤的功绩,末章提到伊尹,说他辅佐成汤之功。商人祭神,重视乐声。虽然《诗经》乐谱已佚,音乐效果大多丧失,但从此诗文字的音韵中,还能领略一点铿锵悦耳的意味。前人评为“声满天地”(吴闿生《诗义会通》)。

(蒋见元)

【殷武】《诗经·商颂》篇名,是《商颂》最后一篇,也是《诗经》最后一篇。《毛诗序》云:“《殷武》,祀高宗也。”三家《诗》派学者以为这是春秋时宋襄公所作,赞美其父宋桓公伐楚的诗。此诗主旨的解释历来分歧极大。若以为此系殷人祭祀高宗武丁之乐

歌,则诗当成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叶,为《诗经》中最早的诗篇。但此诗语言流畅,风格成熟,不像殷商时代的作品。若以为此宋襄公美桓公伐楚之诗,则史籍无宋伐楚得胜之记载,此诗虚美过甚。迄难定论。据诗的内容,以祀高宗为近是。而作者,似可据王国维研究,为“宗周中叶宋人所作”。全诗六章,三章每章六句,二章每章七句,一章五句。首章宣扬伐楚武功,二章告诫楚人,三、四章铺叙天子分封诸侯,臣民各守疆土。五章写商都繁荣昌盛。末章以建成宗庙祭祀作结。较之汉魏以降的郊庙乐歌,此诗要生动得多。

(蒋见元)

【离骚】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多字。诗题《离骚》二字,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近人又认为“离骚”是“劳商”二字的异写,是古代楚地的一种歌曲名。《离骚》的写作年代,或谓屈原前期楚怀王时被疏时作,或谓屈原晚年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作。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上)《离骚》是屈原抒写身世遭遇、政治理想、爱国情思的伟大诗篇,具有自叙传的性质。全诗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诗人自叙家世、生辰、美名,并回顾了自己殚精竭虑、一心报国的苦斗历程;后一部分则写诗人在蒙冤被逐后,内心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以及忠于理想、誓死报国的决心。诗中既对楚国腐朽贵族的趋利忘义、颠倒是非、嫉贤害能的黑暗统治和误国罪行做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救国无门的极端痛苦及忧伤。全诗感情激荡,震撼人心;吸取了大量的楚地方言土语入诗,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丰富的形象,通过奔放无羁的想象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宏伟壮丽,是一篇浪漫主义诗歌杰作,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褚斌杰)

【九歌】楚辞篇名。屈原作。此为运用楚地民间祭歌形式写作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袭用的是古曲的名称,据记载《九歌》属于夏乐,“九”是虚数,指由多个篇章组成的乐曲的意思。全组诗包括十一篇作品,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各有不同内容,即以祭歌的形式各写一神:《东皇太一》写天之尊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写湘

水配偶神,《大司命》写主寿命的神,《少司命》写主子嗣的神,《东君》写太阳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只有《国殇》是写人鬼的,为悼念楚国阵亡将士而作。其写作同楚国的巫风有密切的关系。楚国南方沅、湘一带地方,民间风俗重鬼神,喜祭祀,祭祀时必定奏乐、唱歌、跳舞,并由巫觋装扮成鬼神的形象,表演一些鬼神故事,目的是讨得神灵的喜欢,以求得福祐。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民俗活动。该组诗既保留了原来流传在楚地民间祭歌中的神话故事,又赋予了这些故事一些新的意义,并在艺术上作了很大加工和提高,在遣辞用意上与屈原的其他作品一脉相承,是屈原著作中的一组重要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的,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等。它所赞颂的神明主要是自然神,其内容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热爱,同时也凝聚着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美好的愿望。还有许多是描写神与神、人与神相恋爱的作品。在古代传说中,本多有这方面的内容,屈原则又根据民间恋歌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对它们作了加工改写,使之成为一些十分优美动人的爱情歌曲。如《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大司命》、《少司命》等。《国殇》是《九歌》中具有特殊风格的一篇。它以激越的感情,壮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明显地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礼魂》作为一首送神曲,描写典礼完成时的场面,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绵绵不绝地进行祭祀的愿望。《九歌》的诗歌语言,以情味悠深见长。它往往十分单纯自然,而又非常优美动人,令人有读之不尽、味之无穷之感,是我国抒情艺术的珍品。

(褚斌杰)

【东皇太一】 楚辞《九歌》首篇。屈原作。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楚辞章句》)《汉书·郊祀志》:“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太一”是至高无上之意;“皇”是最为尊贵之神的通称。“东皇太一”即楚人对皇天上帝的称谓。本篇又曾被疑为整个祭神典礼的迎神曲(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但从本篇内容看,它写的只是众神中的一神,与后面各篇诸神的描写并无联系,故此说还值得商榷。全诗计十五句,以特有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古代祭礼的隆重场面,表达了古代楚地人民虔诚的宗教感情,以及当时人们企图通过敬神、娱神活动而获得安宁幸福生活的愿望。气氛肃穆、热烈而隆重。

(褚斌杰)

【云中君】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洪兴祖《楚辞补注》云:“云神丰隆也。”朱熹《楚辞集注》亦称

“谓云神也”。但另外又有水神说(王闿运《楚辞释》)、月神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及泽神、虹神说等等。云中君当即指云神,因其居于云中,驾驭浮云来去而得名。诗中写云神高洁华美,充满光辉,且来去迅速,不受大地、四海阻隔,正是对天上彩云特征的掌握和性格化。诗中生动地描写了群巫扮云神出现时的场面和祭者的景慕、赞颂及依恋之情。其中既有对自然美的捕捉,又蕴含着人们对高洁、博大、自由等美好境界的追求。也有人以为对云神的祭飨,是因为云能施雨,与古代人民的祈雨有关(马茂元《楚辞选》)。

(褚斌杰)

【湘君】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湘水是楚国境内最大河流。湘君为湘水之神,男性,与湘夫人为配偶。关于“二湘”的解释,异说颇多。传说湘君是舜,湘夫人是尧之二女舜妃娥皇、女英。此在疑似之间,未可拘泥。从作品看,此为女巫扮湘夫人迎候湘君之词,写的是湘水水神的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湘夫人思念湘君,久候不至,便乘桂舟、吹洞箫前去迎接,但湘君始终未出现,于是她埋怨湘君“交不忠”,“期不信”,在失望中将佩玉抛入江心,以示决绝。但她又徘徊江边不忍离去,其缠绵悱恻之情,跃然纸上。

(褚斌杰)

【湘夫人】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此诗为现(男巫)扮湘君寻迎湘夫人之词。写湘君眺望洞庭,仿佛湘夫人飘然而降,但又倏忽不见,心中充满愁思。在焦灼的等待和苦苦的寻觅中,他产生了种种幻觉,似乎听到湘夫人对他的召唤,于是筑室水中,准备欢聚,但湘夫人实际始终未来。全诗充满了怀人而无缘相会的哀怨之情。以景物衬托情思,以幻境刻画痴情人的心理,楚楚动人。特别是“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写沅湘秋景,清丽如画,一直被传为名句。

(褚斌杰)

【大司命】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大司命,传说中掌管人间寿命的神。本篇描绘了巫扮大司命下降和迎神巫者相会的场面。写大司命降临时,广开天门,使风为先驱,暴雨洒尘,十分威严。并表示他是九州芸芸众生的寿命的执掌者,常常或阴或阳,诡谲莫测,任凭所为。又写迎神者折花相送,愿在老之将至时亲近不离。但却未能如愿,大司命终于乘龙车,高驰而去,留下的只是一片愁思。诗以神人对唱的方式,展示了神灵的形象和性格,以及迎神者对神的无限依恋之情。

(褚斌杰)

【少司命】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少司命是掌管子嗣和儿童的守护神。王夫之《楚辞通释》说:“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全诗为主祭之男巫

的唱词。首写女神降临在用香花美草装饰的神堂,满目含情;忽而又默默无言地离去,从而令迎神者发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感叹。继写女神登上九天,一面抚彗星,为人间扫除一切灾病,一面手持长剑,怀抱婴儿,做人类生生不息的主宰。全诗塑造了一位既威武、勇敢而又深情、慈爱的婴儿守护神的形象。(褚斌杰)

【东君】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祭颂日神的歌。《广雅·释天》:“朱明、曜灵、东君,日也。”日出东方,“东君”为日之别称、尊称。诗中描写日神是人间光明的象征,它雄伟壮丽,瑰丽多姿,而且具有除暴安良的正义感。它既有自然界太阳的素质,又具有人世间英雄的性格。此诗对日神东君出现的描写,宛然是对自然界旭日东升的图景的描摹,美丽动人。“举长矢兮射天狼”一语,古今注者或认为有所隐寓,王夫之《楚辞通释》云:“其寓意于去谗以昭君之明德者,事与情会,而因寄所感。”戴震《屈原赋注》云:“此章有报秦之心”。马茂元《楚辞选》云:“按这里的天狼,确系影射秦国,秦在当时,号称‘虎狼之国’,专事侵掠,与传说中天狼星的性质是相合的。”此诗系对自然界太阳神的礼赞,是否有政治寓意,尚可研究。(褚斌杰)

【河伯】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河伯为黄河之神,传说名冯夷。屈原《天问》“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是说后羿夺取河伯之妻的事。相传河伯之妻为洛水女神宓妃,本篇或正是写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河伯携其爱侣乘坐荷盖水车,驾四龙,遨游于九河之上,昆仑之巅,直至暮色四合,几乐而忘返。又双双居于水宫之中,嬉戏于洲渚之滨。最后“送美人兮南浦”,交手而别。篇中描写了许多水族和水中品物,正与水神的身份切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思和奇想。(褚斌杰)

【山鬼】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山鬼即山神。清人顾天成《九歌解》云:“楚襄王游云梦,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今人郭沫若从之,并补证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认为“於”与“巫”古音通转,山鬼即宋玉《高唐赋》中所写的巫山神女(《屈原赋今译》)。可备一说。本篇写一位山中女神的爱情故事,描述女神赴约不遇、失恋后悲哀的情景。全诗以抒情为主,兼有一定的情景描写和情节进展,特别是比较细致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把一个多情女子在追求爱情时的一往情深的自信,以及失恋后的无限痛苦和悲哀,都写得淋漓尽致。在写法上,缘情入景,以景托情,十分优美、动人。(褚斌杰)

【国殇】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洪兴祖《楚

辞补注》云:“谓死于国事者。《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本篇祭祀为国而牺牲的战士。诗中通过激烈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与敌人奋战到底,至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开篇写楚军的装备和威严,接着写战斗激烈的程度和楚将士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最后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诗句作结。全诗写得激昂壮烈,正气凛然,其风格亦刚健质朴,雄浑悲壮,有强烈的感染力。(褚斌杰)

【礼魂】 楚辞《九歌》篇名。屈原作。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礼魂,谓以礼善终者”。王夫之《楚辞通释》则认为“此章乃前十祀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曲也”。诗中首句云“成礼兮会鼓”,成礼,指祭礼的完成,其性质为送神曲无疑。全诗仅五句,二十七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典礼完成时五彩缤纷的场面和热闹的气氛,表达了楚人虔诚的心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语言精美,情味悠深。(褚斌杰)

【天问】 楚辞篇名。屈原作。是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全诗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五百多字,皆采用问句体写成。诗从邃古之初,宇宙洪荒写起,其中神话传说杂陈,历代兴亡并举,宏览千古,博大精微。东汉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在外,心怀“愁思”,“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此诗(见《楚辞章句》)。关于此诗的性质和主旨,历来解释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抒发愤懑说、讽谏楚王说、究理问难说。近人、今人或以为是哲理诗、咏怀诗、咏史诗,说法不一。从结构看,全诗可分三个部分。前半部分。自“邃古之初,谁传道之”至“羿焉彗日,乌焉解羽”,凡一百十二句,是关于大自然的神话、传说史。就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大地的形状,川流的走向,以及鲧禹治水的故事等等一一发问,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璀璨无比的远古神话世界,而其中通过诘问所流露出来的,则是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考,是对古信仰的怀疑。后半部分,自“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至“易之以百两,卒无禄”,凡二百四十五句,为人世间历代兴亡史。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发问,陈事见理,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夏桀、商纣、周幽王)的历史教训做了较详的陈述和探索,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和以史为鉴的思想。最后的尾声则是忧国伤己的感喟,以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结,对楚国当权者的倒行逆施,表现了无限失望和愤慨。全诗基本为四言句,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三句、四句一问;疑问词亦多种多样,如“何”、

“胡”、“焉”、“孰”、“几”、“谁”、“安”等交替灵活使用，奇矫活脱，充沛有力。《天问》一诗不仅是中国诗史上的罕见杰作，亦为世界诗歌艺术宝库中的无上珍品。

(褚斌杰)

【九章】 楚辞篇名。屈原作。为一组诗，原是单行的散篇，非一时一地之作。《九章》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作《九叹》中：“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一般认为《九章》便是刘向编辑《楚辞集》时，将诗人屈原作品中内容、形式大致相似的九篇作品辑在一起，编为组诗，并冠以《九章》之名。《九章》中的作品，依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其中除《橘颂》一篇大约是诗人屈原的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两次流放(汉北、江南)时所作。这些诗真实地记述了诗人流放期间的痛苦生活经历和诚挚的爱国思想感情。其政治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与《离骚》基本一致。但《九章》中的作品除少数片断外，采用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主要是纪实，并用直接倾诉的方法来表现其复杂的心曲和愤懑的感情。语言生动形象、情味悠长。篇章结构跌宕有致，语气随着诗人感情的起伏而变化。诚挚的爱国思想，优美的情志与感情的力度相结合，是《九章》这组诗歌的主要特色。

(褚斌杰)

【惜诵】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被楚怀王疏远以后。诗中首句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标题取此。“惜”，痛惜；“诵”，陈述诉说，意思是以痛惜的心情述说自己的忧愤。诗中表述自己竭忠而事君，先君而后身，专君而无他，结果却成了“招祸之道”。离开朝廷以后，陈志而无路，呼号又莫吾闻，烦闷困惑不知如何是好。诗人说他曾梦游天庭，问卜吉凶，神灵告诉他作忠造怨，不如改变先前的心志。最后抒发占卜以后的感情，以表示洁身自保作结。

(褚斌杰)

【涉江】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晚年流放江南时。篇中着重记述诗人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的历程和心情，故名《涉江》。此诗具体叙写他这次被放逐的地区和所行的路线，即渡江后，经过鄂渚(今湖北武昌)，至洞庭湖地区；然后又上沅水西行，经枉渚(今湖南常德)、辰阳(今湖南辰溪)，入溁浦(今湖南溁浦)，独处于深山之中。这是有关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重要史料。其流放的地区十分僻远、荒凉，但诗人却表现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坚持理想、决不屈服的无私无畏精神。本篇为纪实之作，但在诗的开端却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极写他的苦闷和欲忍不能的感情，表示他

既不被污浊黑暗的社会所了解，则将“高驰而不顾”，幻想自己将乘龙驾马，去寻古帝重华(帝舜)同游于天上，以至“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全诗感情起伏，回旋激荡，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褚斌杰)

【哀郢】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当时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屈原百感交集，遂作此哀歌。“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开头描写郢都百姓因避难而四散逃亡的荒乱景象，继而写诗人离郢时对故都的系念和国破家亡的悲哀，并对楚统治集团误国的罪行加以揭露和批判，结尾则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诗句，表达了诗人至死不忘故都的深挚感情。全诗紧扣“哀”字展开，并多用呼告、感叹句，词悲情烈，裂人肺腑，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褚斌杰)

【抽思】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被疏居于汉北时。诗中有“与美人之抽思兮”(一本作“抽怨”)，即题意所本。“抽”，抽绎，引发；“思”，情思，意思是向怀王陈述自己的情怀。全诗追忆了在朝时的往事，指责怀王信谗多怒，不明自己的心迹。在结构上又有“少歌”、“倡”、“乱词”三部分，分别写怀王骄傲自专，不听进言；自己流落在外，日夜怀念郢都，又无人传达衷情；最后写由汉北南行，愁苦无告，作此诗以自我排遣。全诗层次递进，缠绵往复，曲折入微。

(褚斌杰)

【怀沙】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自沉汨罗之前，一般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怀抱沙石而自沉。一说“沙”指长沙，屈原流放至此，感怀而作。时值孟夏，诗人奔波于南土，感到前途茫茫，不胜伤怀。思及自己身处黑白不分、上下颠倒的现世，虽怀瑾握瑜，却不被赏知；怀质抱情，却孤立无援，从而抱定以死殉国的决心，最后以“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诗句，表达了绝望以后，从容就义，宁死也不改易初志的大无畏精神。全诗写得质朴无华，感情冷峻，是对黑暗现实的最后控诉。

(褚斌杰)

【思美人】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首句“思美人兮”，为题意所本。“美人”，指楚怀王。本篇或疑非屈原作，但证据并不充足。篇中写诗人被疏后离开朝廷，烦冤愁苦，欲向楚王通问，以表心迹而不能；欲屈志从俗，而又不肯，只得兀自逍遥以纾忧。全诗表现屈原思国情笃，而报国无门的苦闷。以香草美人为喻，象征自己的高洁和寄托对楚王的恋念、希冀之情。一腔苦衷，低徊往复，感情深挚。

(褚斌杰)

【惜往日】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晚年

流放江南时。诗中首句为“惜往日之曾信兮”，篇题取此，意思是哀惜和追叙他早年曾得到怀王信任时的往事。诗中叙写他当初辅佐怀王，刷新政治，修明法度，反对心治，从而一度使国家富强，给楚国带来希望；但不久就遭谗人嫉妒，楚王不省是非，使革新大业毁于一旦，自己亦蒙冤被逐。最后诗人表示自己将从容沉渊而死，而所痛惜的是“壅君之不识”！此诗比较明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早年的一段政治经历，是了解诗人进步思想的一篇重要作品。纪事与抒情合一，明白晓畅，语言激切，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褚斌杰）

【橘颂】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橘”，是长江流域楚地的特产；“颂”，颂赞、歌颂。此为咏物诗。以拟人化手法，对橘树斑斓夺目的外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的歌颂，如写橘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闭心自慎”、“秉德无私”，认为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师表，实际上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对自己志向和理想的抒写。颂橘，也正是自颂。全诗立意高远，构思巧妙，语言优美，对后世咏物诗很有影响。又诗中情调开朗乐观，没有任何失意悲愤的情绪；形式上基本四言一句，“兮”字放在句尾，说明诗人创造的“楚辞”体，这时还在探索和形成中，故后人多认为此诗为屈原早期之作。（褚斌杰）

【悲回风】 楚辞《九章》篇名。屈原作。写于放逐后。此篇亦有人怀疑非屈原作，证据尚嫌不足。诗中首句：“悲回风之摇蕙兮”，标题取此。“回风”，回旋伤物之风，以比恶势力。诗中以独处的佳人自比，叙说自己德性的美好而又孤凄无助的愁苦之情。继写登山览景以抒忧，并思古之贤者，愿为榜样。但又转念思及古忠贤之士的悲惨遭际和与事无补，更增添了自己的彷徨和难解的悲情。（褚斌杰）

【远游】 楚辞篇名。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屈原之所作也”。后世学者认为这篇作品有浓烈的道家方士思想，与屈原的思想不类，又多模仿《离骚》词句，故断为汉代人的伪托之作。还有人认为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全诗一百七十八句，一千一百四十字，主要描写作者受到时俗的困厄，欲求解脱，从而追慕仙境，神游四方，最后达至至清无为，与造化同游的愉快。表达了作者不满现实的孤独和苦闷，但宣扬的完全是道家出世思想。本篇由现实生活写到神形相离的幻想境界，并对天地四方做了丰富而神奇的想象，有许多精彩的描写，在构思和技巧上不乏可取之处，对后世游仙诗有重大影响。（褚斌杰）

【卜居】 楚辞篇名。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屈原

作，近世学者多认为是屈原同时或稍后的人所作。“卜”是求神问卜；“居”是立身处世，“卜居”就是假托向神求卦，以问处世之方。篇中写屈原被放逐，“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向太卜郑詹尹问卜决疑，从两方面提出了八对问题。其中心是说：在混浊不清的世道中，应继续坚持廉洁正直的操守，还是应采取随波逐流、苟且偷安的态度？实际是借正反两方面的提问来表明屈原的可贵品格和正确选择。此作文辞优美，构思新颖，全篇用对问体，对后世主客问答的赋体作品有相当影响。（褚斌杰）

【渔父】 楚辞篇名。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屈原作，近世学者多认为屈原同时或稍后的人所作。篇中写屈原被放逐后，行吟泽畔，与一渔父问答。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思想。渔父劝屈原要“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免遭祸患；屈原则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同流合污。此作表现了屈原决不向世俗妥协、向邪恶低头的高贵品格。全篇多用对偶排比句，和谐匀称，以议论为主又长于抒情。（褚斌杰）

【九辩】 楚辞篇名。宋玉作。宋玉为屈原弟子。《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相传为夏朝流传下来的古曲。王夫之《楚辞通释》云：“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九辩”，指由九个乐章组成的乐曲。此篇与屈原《九歌》一样，皆取古乐章为篇题。是自叙身世遭遇的长篇抒情诗，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怀才不遇的苦闷，并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缺少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抗争精神。此诗在抒情诗艺术手法上有独创性，以秋景、秋色、秋声、秋容为衬托，把萧瑟冷落的秋气与哀怨愁苦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写出，极富艺术表现力，以至“宋玉悲秋”成为文学史上的熟语，并对后世文人诗词创作起过深远影响。（褚斌杰）

【招魂】 楚辞篇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作，王逸《楚辞章句》则称宋玉作。《史记》记载较早，可信。本篇主旨，有宋玉招屈原魂，屈原招怀王魂和屈原自招诸说。古代招魂民俗，不专施于死者，也施于生者。按篇中内容和口吻，当为屈原放逐后，以民间俗体，借题寄兴，寄托自己的爱国情思之作。结构为前序，后“乱”，中间为招魂词。其写法为“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以殷切、深情的口吻，劝戒魂灵不要上天、下地或到四方去，认为还是楚国最美好，可以作为最后的归宿。其词用楚地巫觋惯用的禁咒语“些”字做语尾，有浓厚的民俗味。文中对上下四方的描写，层次分明，辞采华丽，并极尽夸张铺陈之能事，对后世汉赋有很大影响。（褚斌杰）

【大招】 楚辞篇名。作者不详,王逸《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以后或谓屈原,或谓宋玉,或谓景差,或谓西汉无名氏作品。诗中有“三公穆穆”、“立九卿只”等语,三公、九卿之制定型于西汉,又用“乎”、“只”为语气词同于《诗经》,此诗当为西汉文士模仿《招魂》悼屈原之作。结构、写法略同于《招魂》,分述东南西北均险恶可怖,魂不可往,而以楚国的居处观览之盛、政治清明、国富民强为招引,实际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歌颂,对屈原遭遇的同情,是一篇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招魂词。(褚斌杰)

【惜誓】 楚辞篇名。汉代贾谊作。王逸《楚辞章句》称“或曰贾谊,疑不能明”。后人考其旨趣与贾谊《吊屈原赋》略同,肯定为贾谊作。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惜誓者,惜屈原之誓死,而不知变计者也。”诗中对屈原的忠贞,遇昏君而愤死表示痛惜,但也认为屈原不知进退,故遭祸尤。实际是以道家的远害全身的思想,来痛惜屈原之死,表达了作者的进退观。在汉代仿楚辞体而悼念屈原的作品中,《惜誓》是富有真情实感的一篇,故王夫之说:“顾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褚斌杰)

【招隐士】 楚辞篇名。汉淮南小山作,其姓氏、生平平均不详,仅知为淮南王刘安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此当为仅存的一篇。其背景说法不一,王逸《楚辞章句》说是“闵伤屈原”之作,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是“为淮南王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而作,也有的研究者以为是淮南小山思念淮南王之作。作品铺写山中凄厉可怖的景象,招唤隐居的“王孙”,劝他不可久留,早日归来。采用夸张、渲染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氛围,其中伴以“王孙兮归来”的深情呼唤,取得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其艺术构思受到楚辞《招魂》的影响,王夫之说它“绍楚辞之余韵,非它辞赋之比”,是汉人拟作楚辞中少有的佳篇。(褚斌杰)

【七谏】 楚辞篇名。汉东方朔作。“谏”,即进谏、谏劝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云:“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又云:“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全诗模拟屈原的口吻写成,包括《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篇。形式仿袭屈原楚辞体,亦多用楚辞中语句,创造性不足。后人说此篇用意也在讽谏汉主。(褚斌杰)

【哀时命】 楚辞篇名。汉代庄忌作。首句云:“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遇时。”即标题所

本。王逸《楚辞章句》云:“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诗中主要申述了忠贞被嫉,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借屈原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的不平,并对屈原的忠信不迁,做了很高评价。(褚斌杰)

【九怀】 楚辞篇名。汉代王褒作。“怀”,怀念忧思的意思。由九个篇章构成,故称“九怀”。王逸《楚辞章句》云:“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所包括的九个篇章是:《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诗中既咏屈原的遭遇和心态,又充满着作者对屈原的悲悯之情。故王逸又说王褒写作此诗的目的是:“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迫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褚斌杰)

【九叹】 楚辞篇名。汉代刘向作。刘向是《楚辞集》的最早编辑者。王逸《楚辞章句》说刘向在编览旧文时“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全诗包括九个篇章:《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每章后均用“叹曰”结尾,叹息之情溢于言表。(褚斌杰)

【九思】 楚辞篇名。东汉王逸作。是一组用楚辞体代屈原言志抒情的代言体作品。王逸自云:“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全诗由九个短章组成,即《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诗中代屈原抒发了生逢乱世、遭谗被毁、怀才不遇的忧伤之情,同时刻画了屈原心存楚国、担忧国事的爱国情怀。九个篇章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较准确地把握了屈原遭逐后的心态和操守。但作为仿作,在思想的深度和震撼力上,在艺术创造性上,均远逊于屈原,此与刘向、王褒的楚辞作品相同。(褚斌杰)

【垓下歌】 汉诗篇名。项羽作。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入卷五八《琴曲歌辞》题为《力拔山操》。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驻军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兵少食尽,刘邦军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以为楚地尽失大势已去,遂起饮军帐,慷慨悲歌而作此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书·项籍传》:“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四句诗抒发了项羽英雄末路的悲壮情怀。首句气势不凡,内蕴丰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既反映出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本纪》)的禀赋特点,又浓缩了他在反秦斗争中叱咤风云名冠诸侯的半生功绩。续后三句一个大转折,于感慨哀叹中表露了穷途无奈的悲哀心情。诗歌情意沉挚,雄放中交织着凄婉,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特定心态。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曰:“项王不喜读书,而《垓下》一歌,语绝悲壮。”据《乐府诗集》题解,后世《虞美人曲》“亦出于此”。(李泉)

【和项王歌】 汉诗篇名。虞姬和项羽《垓下歌》之作。《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歌数阕,美人和之。”歌辞载《楚汉春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述引)词意浅白晓畅,表达了一个以顺从依附为天性的封建社会女性在丈夫死后无意独生的誓愿。清沈德潜认为“虞姬和歌竟似唐绝句”(《古诗源》卷二),因而《古诗源》未选录。

(李泉)

【四皓歌】 汉诗篇名。“四皓”作。“四皓”是汉初商山的四个隐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年皆八十馀,须眉皓白,故称四皓。事迹初见于《史记·留侯世家》。《四皓歌》的写作缘起,《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南山四皓隐居,高祖聘之,四皓不甘(《诗纪》卷一作“出”),仰天叹而作歌。”《乐府诗集》收入卷五八《琴曲歌辞》,题为《采芝操》。诗为四言共十句:“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歌辞古朴,表述了诗人不满纷乱时世、安于山野清贫、怀恋安宁平和生活的心绪,是我国隐逸诗歌之滥觞。

(李泉)

【大风歌】 汉诗篇名。刘邦作。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史记·乐书》称为《三侯之章》(司马贞《索隐》:侯,语辞也。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也)。《艺文类聚》始称之为《大风歌》。《乐府诗集》收入卷五八《琴曲歌辞》,题作《大风起》。公元前195年,刘邦击破淮南王英布叛军后还归,途经家乡沛县(今江苏徐州西北),邀集故人父老子弟宴饮,酒酣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三句诗一泻而成,抒发了诗人一统天下后的满怀豪情,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的思想忧虑。诗旨鲜明,正如李善《文选注》所释:“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海内,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全诗气象恢宏,辞意慷慨,风格雄放,为帝王诗作之佼佼者。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九评曰:“高祖《大风》之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

(李泉)

【鸿鹄歌】 汉诗篇名。刘邦作。始见于《史记·留

侯世家》。刘邦以太子刘盈仁弱,屡欲废之,更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重,废立之心更为迫切。于是,吕后用张良计请来商山四皓辅助刘盈。刘邦见此,无可奈何地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戚夫人悲泣,刘邦为作歌一曲,即《鸿鹄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诗为四言古体,反映了刘邦的复杂心态。既为太子刘盈在其母吕后庇护下,根基已牢,辅翼已成而感慨,又因力不从心,无法给宠姬爱子以身后的安全保障而不安。全诗风格古朴,意绪低婉。比体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感。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评曰:“《大风歌》冲口而出,卓伟不群。即《鸿鹄》酸楚之音,犹有笼罩一世之气。”

(李泉)

【戚夫人歌】 又名《春歌》、《永巷歌》。汉诗篇名。戚夫人作。始见于《汉书·外戚传》。《乐府诗集》收入卷八四《杂歌谣辞》。戚夫人,定陶(今山东定陶县)人,汉高祖刘邦宠妃,生赵隐王如意。惠帝立,皇太后吕雉报当年戚夫人争立太子之仇,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钳(剃发,以铁圈束颈),穿囚衣舂米。戚夫人作此歌,且舂且唱:“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莫,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凄切的歌辞,抒写了戚夫人悲苦佛郁的情怀。诗句浅白如话,直叙其事,直抒胸臆,具有真切感人的民歌风格。此歌给戚夫人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吕太后闻此歌后大怒,杀了赵王如意,斩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以哑药,使居窟室中,名曰“人彘”。故本诗还蕴有反映封建帝王宫闱内部权势争夺的残酷性的深层内容。

(李泉)

【秋风辞】 汉诗篇名。刘彻作。始载于《汉武帝故事》,《乐府诗集》辑入卷八四《杂歌谣辞》。据《汉武帝故事》,此诗是武帝巡游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荣河城北汾水南岸),祭祀后土(土神),泛舟汾河,与群臣宴饮时所作。其时约在元鼎四年(前113)。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通过对秋景的描绘抒发了人生易老的感叹。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文治武功均有建树,是历史上的一位雄主,因此,“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感伤,似应含有积极努力的意绪在内,所以《文选》中李善引《古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乃悲伤”注释此句。刘彻爱好辞赋,此篇诗作显然受到楚辞的影响,因而沈德潜《古诗源》卷二有“离骚遗响”之评。

(李泉)

【李夫人歌】 汉诗篇名。刘彻作。始见于《汉书·外戚传》。《乐府诗集》辑入卷八四《杂歌谣辞》。李夫人本是乐伎,因妙丽善舞深得武帝爱宠,不幸青春夭亡。刘彻思念不已,方士齐少翁言能致李夫人之神。于是夜张灯烛,设帷帐,令武帝居帐中,遥望见美女如李夫人形貌,却又不能接近逼视,武帝因而愈加相思悲感,遂作此诗:“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方士的幻术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得。简短的诗篇,生动地抒写了诗人渴望相见却又真幻莫辨、神智迷离的情态。(李泉)

【柏梁诗】 汉诗篇名。刘彻等作。始见于《三秦记》。据载:元封三年(前108)作柏梁台,武帝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坐。于是君臣联成此诗。诗为七言古体,共二十六句。参加联吟的有帝、王、将、相、御史、宗正、太常、卫尉等各类人物,每人都结合自己的职司联诗一句,如丞相石庆的诗句是“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将军卫青为“和抚四夷不易哉!”而掌管宫中饮食的大官令则是“枇杷橘栗桃李梅”。宋吴聿《观林诗话》曰:“汉武《柏梁台》,群臣皆联七言,或述其职,或谦叙不能,至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则又有规警之风。”君臣即兴赋诗,一句一意,内容比较驳杂,但也有一个中心,即群臣如何克勤克勉,共建帝国,效忠皇上。此诗人各一句,每句用韵,后世模仿称为“柏梁体”。据《唐诗纪事》一,唐中宗于景龙四年(710),曾在大明殿同群臣仿柏梁体联句。顾炎武《日知录》认为,此诗考之史,多不符。其为后人拟作无疑。参见《古诗笺》“七言诗歌行钞”卷二。(李泉)

【李延年歌】 汉诗篇名。李延年作。始载于《汉书·外戚传》。《玉台新咏》卷一辑录。《乐府诗集》收入卷八四《杂歌谣辞》。李延年是西汉的著名音乐家,汉武帝爱妃李夫人之兄,“性知音,善歌舞”,颇受武帝赏识。并因其妹而贵幸,官至协律都尉。此歌是他“侍上起舞”时所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诗以其妹李夫人为原型,勾勒了一位绝代佳人的形象。用“倾国”、“倾城”的夸张手法,赞颂佳人之美,新颖别致,极富艺术感染力,而李夫人也即由此而得幸。全诗为节律流畅的五言体,对其后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李泉)

【黄鹄歌】 汉诗篇名。刘弗陵作。始见于《西京杂记》。《乐府诗集》收入卷八四《杂歌谣辞》。据《西京杂记》,始元元年(前86),有黄鹄飞下太液池,汉昭帝因而作此歌:“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跼跼。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

薄,愧尔嘉祥。”前五句是叙实,描绘了一幅黄鹄飞落于建章宫太液池的行食图;末二句写意,自叹德性菲薄,有愧于上天所施示的祥瑞。古人受“天人感应”论的影响,把一些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看作是上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一举千里的黄鹄降落在帝宫液池,显然是上帝赞助明君所显示的祥瑞,因此曾被作为一件大事受到昭帝君臣的庆贺。《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而汉昭帝刘弗陵也确实是个有德之君,在位十三年,轻徭薄赋,政和民阜。诗末的自愧之叹,符合诗人品性实际,是真切可信的。(李泉)

【五噫歌】 汉诗篇名。梁鸿作。始载《后汉书·梁鸿传》,《乐府诗集》收入卷八五《杂歌谣辞》。东汉隐士梁鸿家贫好学,以气节为尚,与妻孟光隐居霸陵山,耕织为业。此诗为梁鸿过帝京洛阳时所作。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诗人登上洛阳城北的邙山,由眼前所见京都宫阙的雄峻豪华,联想到服役人民所受的无穷劳苦,不由得发出深深的嗟叹。全诗感情浓烈,一句一叹,五个叹字“噫”,鲜明地表露了作者愤慨统治者奢侈、叹怜人民劳苦的爱憎之情。清代张玉穀《古诗赏析》云:“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据《后汉书》本传载,“肃宗闻而非之”,汉章帝对这首歌极为不满,下令搜捕作者。梁鸿因此改名换姓,避居齐鲁。由此亦可见本诗影响之大。(李泉)

【四愁诗】 汉诗篇名。张衡作。始见于《文选》卷二九“杂诗”。前有短序,说此诗是诗人做河间王相时,有感于“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而作;效仿屈原楚辞的比兴手法,“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即借写怀美愁思以抒忧时报国之情。据近人考订,此序乃伪作,为后世编集张衡诗文者增损有关史料而写成。因此,“序文”所释的诗歌寓意,可作重要参考而并不是定说。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句七言,反复咏叹所思之人远在东南西北四方,路遥途艰,追随不得,衷情难达。文辞婉丽,寄托幽深,“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少陵七歌原于此。”(沈德潜《古诗源》卷二)为我国古代七言诗的先驱之作。(李泉)

【刺世疾邪诗】 汉诗篇名。赵壹作。原载《后汉书·赵壹传》。赵壹为东汉灵帝时名士,恃才傲物,屡拒征辟。所作著名小赋《刺世疾邪赋》,犀利地抨击了世事的邪恶不平。赋的结尾部分,作者托用“秦客诗”和“鲁生歌”两首短诗加以收束,即为本篇。秦客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

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髀倚门边。”鲁生闻诗作歌:“势家多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两诗主旨一致,指斥小人窃位得势,豪强横行把持,刚正有才者遭轻贱埋没的黑暗现实。诗歌辞气愤激,格调直率,情感鲜明强烈。(李泉)

【羽林郎】 汉诗篇名。辛延年作。始载于《玉台新咏》卷一,《乐府诗集》辑入卷六三《杂曲歌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武帝时始设羽林军,任皇家禁卫之职,羽林郎为羽林军的军官。此诗所叙乃酒家女抗拒霍家奴冯子都调笑之事,内容实与“羽林郎”无关,可能是用乐府旧题讽咏当时新事。然而诗中仗势欺人的冯子都却又是西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家的“奴监”(家奴头子),这又是生活在东汉的作者用历史题材以抨击时弊的假托手法。朱乾《乐府正义》疑此诗所讽乃东汉窦景之说,可资参考。史载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兄弟骄横。其弟执金吾窦景,更是纵容部属强抢财货妇女,凶恶如盗寇(《后汉书·窦融列传》)。此诗文辞华美,节律流畅,以铺陈夸张的手法,生动地刻塑了鄙薄权势、勇于抗暴的胡姬形象,是文人学习乐府民歌的成功之作。

(李泉)

【悲愤诗】 汉诗篇名。蔡琰作。始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蔡琰是东汉学者蔡邕之女,博学多才,妙于音律。董卓之乱中,为胡骑所掳,流落南匈奴十二年,嫁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用金璧把她赎回,改嫁屯田都尉董祀。《后汉书·董祀妻传》说她“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第一章为五言体凡一百零八句,第二章是骚体共三十八句。五言体诗以自述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一幅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乱世画面,记录下了诗人被掳入关、身陷胡中十多年流寓生活的悲惨踪迹,以及回乡后自感鄙贱常患忧惧的精神创伤和内心痛苦。逼真的细节、典型的事例、充溢悲剧气氛的环境场面,多种艺术因素的浑然组合,不仅强烈地抒发了诗人悲愤难抑的思想感情,也使长诗蕴有深广的社会、历史涵义,从而有着“史诗”的价值,称得上是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杰作。清人沈德潜评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古诗源》卷三)骚体《悲愤诗》所述情节与作者身世经历多有不合,学界大多认为非蔡琰所作。

(李泉)

【胡笳十八拍】 乐府篇名。传为蔡琰所作。见录于朱熹《楚辞后语》,《乐府诗集》辑入卷五九《琴曲歌辞》,其“题解”引《蔡琰别传》曰:“汉末大乱,琰为胡

骑所获,在右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诗言志,曰:‘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嚶嚶。’”辞为骚体,共十八章,一章一拍,故名。抒写了诗人流落胡地、殷切思乡的凄怨之情,以及被赎归汉与亲子生离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全诗哀婉凄楚,感人至深。此篇不见录于《后汉书》,且文体也与一般汉、魏作品不同,故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学术界曾有纷争,迄今真伪无定论。(李泉)

【练时日】 汉乐府《郊祀歌》篇名。始载于《汉书·礼乐志》,《乐府诗集》收入卷一《郊庙歌辞》,其“题解”云:“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郊祀歌》是专供帝王祭祀天地时演唱的歌曲。《练时日》即为此十九章之首一章。因首句“练时日,侯有望”而名篇。通篇作三言句式,描绘了佳酿香醇、鲜花芬芳、女乐奇丽的迎神场面,表达了对神灵安享、垂恩降福的颂赞祝愿。歌辞富丽,氛围热烈,有较浓的浪漫色彩。沈德潜曰:“古色奇响,幽气灵光,奕奕纸上。屈子《九歌》后,另开面目。”(《古诗源》卷三)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沿袭作《郊祀歌》以供祭祀天地之用。(李泉)

【象载瑜】 汉乐府《郊祀歌》篇名。为其十九章中之第十八章。始载于《汉书·礼乐志》,《乐府诗集》收入卷一《郊庙歌辞》。《汉书·礼乐志》说是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故又名《赤雁歌》。诗为三言体,共十二句。歌辞大意是说,西获象载(《汉书》服虔注:鸟名),东得赤雁,这都是神灵施福所显示的祥瑞。(李泉)

【安世房中歌】 汉乐府《郊庙歌辞》篇名。汉高祖妃唐山夫人作。始载《汉书·礼乐志》,后收入《乐府诗集》卷八。原名《房中祠乐》,汉孝惠帝二年更名《安世乐》。《汉书·礼乐志》改题《安世房中歌》。乐歌为宗庙祀神时所用,“房”是古代宗庙陈列神主的地方。共十七章。内容多宣扬孝道仁德、礼乐教化,以使国泰民安,汉祚长存。诗体形式大部分为古朴整齐的四言,少数篇章作七言、三言。(李泉)

【思悲翁】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二。《乐府诗集》辑入卷一六《鼓吹曲辞》。铙歌本是行军时马上演奏的军乐。汉歌原有二十二首,亡佚四首,现存十八首。歌辞内容泛杂,战阵、祥瑞、武功、爱情等均有涉及,有文人之作,也有民间谣歌。《乐府诗集》“题解”引《古今乐录》:“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思悲翁》一诗曰:“思悲翁,唐思,夺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查高飞暮安宿。”文多讹误,旨意难明。魏晋后文人多有依汉铙

歌篇名写作歌诗者。

(李泉)

【艾如张】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三。《乐府诗集》收入卷一六《鼓吹曲辞》。词曰：“艾而张罗，(夷于何)行成之。四时和，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奈雀何？为此倚欲，谁肯磔室。”《乐府诗集》“题解”说，“艾”与“刈”同，艾草；“如”读为“而”。如此，诗题《艾如张》即首句“艾而张罗”的省略。诗歌大意谓，割除艾草，张罗捕雀，然而黄雀高飞奈其无何。陆游《剑南诗稿》三十一《艾如张》：“东村西村烟雨晚，萧艾离离林薄浅。翩然一下骇机发，汝虽知悔安能免。”袭其意而反写之。(李泉)

【上之回】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四。《乐府诗集》列入卷一六《鼓吹曲辞》。《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颜师古注谓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汉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其歌称帝‘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皆美当时事也。”歌辞是为赞美汉武帝靖边拓疆、臣服外夷的武功功绩而作：“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词为杂言，诗题截取首句“上之回”三字而得名。(李泉)

【战城南】 ①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六。见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此诗托为战死者的自诉，从描写战场恐怖凄凉的角度，揭露战争所造成的杀伤无数，破坏生产力的惨重灾难。想象奇特，句式灵活。“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弩马徘徊鸣”等句，以渲染环境气氛增强诗的悲剧效果，动人心魄。清沈德潜评曰：“读‘枭骑’十字，何等简劲。”(《古诗源》卷三)后代诗人多有此题之拟作，其中以唐代李白的最为著名。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乐府旧题，宋郭茂倩亦将此诗收入《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汉铙歌》。内容本乐府古辞，描写战争之惨酷，谴责天宝年间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征战无时。《唐宋诗醇》卷二曰：“语尤惨痛，意更切至，所以刺黩武而戒穷兵者深矣。”结语“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揭示诗旨，有画龙点睛之妙。方东树评曰：“虚议作收，陈琳、鲍照不逮其恣。”(《昭昧詹言》卷一二)诗中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句式参差错落，且有散文化倾向，笔调摇曳跌宕，别具一唱三叹之致，变旧辞的古朴浑厚为奔放不羁，体现出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吴小林)

【巫山高】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七。《乐府诗集》辑入卷一六《鼓吹曲辞》。唐吴兢

《乐府古题要解》上曰：“其词大略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是一首游子思归的诗：“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诗以巫山之高兴起淮水之深，渲染出归途的险阻，从而抒发了诗人欲归不得的伤痛心情。参差的句式，形成回肠荡气的节律，感人颇深。(李泉)

【将进酒】 ①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九。见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内容为抒写饮酒放歌时的感情。后萧统、李白、元稹、李贺等人均有根据此旧题创作的诗篇。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诗题一作《惜空酒樽》。其写作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作于天宝年间赐金还山以后，另一说认为写于开元年间首次入长安失败而归之后，与《襄阳歌》、《梁园吟》的创作时期相近。该诗在沿袭乐府旧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于及时行乐，开怀畅饮的抒写中，透露出抑郁失意和对不合理社会现实愤懑的情绪。萧士赅曰：“太白填之以申己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全诗感情充沛，气势奔放，瞬息万变，不可羁勒，鲜明地表现出李白诗歌“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特点。其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四句用兴和比的表现手法写时不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钟鼓馔玉不足贵”以直接议论抒情反映其积极用世和蔑视富贵的思想，均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吴小林)

【君马黄】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十。《乐府诗集》收入卷一六《鼓吹曲辞》。诗曰：“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骝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诗意难明。清陈沆《诗比兴笺》以为讽刺上下不一心，但也可能是男女伤别之词。(李泉)

【有所思】 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十二。《乐府诗集》录入卷一六《鼓吹曲辞》。这是一首民间情歌，抒写女主人公与恋人决绝时的情感波动。词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颭，东方须臾高知之。”全诗呈现出了三个感情层次：寄赠精心修饰的玳瑁发簪，以示爱恋之深；闻变后毁簪、焚簪，显现出因爱恋之深而引起的怨恨之切；复

后忆及昔日的定情幽会,则又深深陷入犹疑彷徨的痛苦之中。“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余情无尽。”(沈德潜《古诗源》卷三)作品通过具体行动的细致描叙,展示出人物复杂曲折的心理情感,真切生动,十分感人。(李泉)

【雉子斑】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十三。《乐府诗集》辑入卷一六《鼓吹曲辞》。诗曰:“雉子,斑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雉子,车大驾马滕,被王送行所中。尧羊蜚从王孙行。”诗叙雉子遭“王孙”捕捉,母雉与之生离死别的哀情。文中“雉子”的三次呼唤,语调情感变化不同,始为爱抚,次作叮嘱,终则哀呼。文词古拙,当是一首寄托社会内容的寓言诗。(李泉)

【上邪】汉乐府《铙歌》篇名。为其十八曲之十五。《乐府诗集》录入卷一六《鼓吹曲辞》。这是一首表达坚贞不渝爱情的誓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连用五种天地间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为誓证,以反衬出女主人公坚如磐石的情意。“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正》)浪漫奇特的诗思,构筑成了本诗“泼墨”浓烈、刚朴恢阔的风格气势,把古代妇女向往、追求纯洁爱情的心志抒写得淋漓尽致。“设誓反证”的手法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民歌的创作。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明代山歌《劈破玉·分离》等,均基本沿袭此法。(李泉)

【箜篌引】①乐府篇名。亦名《公无渡河》。见《乐府诗集》卷二六《相和歌辞·相和六引》。晋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之而止之,不及,遂堕河水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②乐府篇名。曹植作。见《文选》卷二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辑入卷三九《相和歌辞·瑟调曲》,题作《野田黄雀行》。见“野田黄雀行”。(吴小林)

【公无渡河】汉乐府篇名。亦见“箜篌引”。①诗叙描写了一个夫死妻殉的悲剧,似有一定的寄寓。朱嘉徵《乐府广序》评曰:“《公无渡河》,慎所往也。世患无常,君子不轻蹈之。”认为诗歌是借冒险涉河溺死事件的劝止痛悼,来隐喻世途凶险当谨慎行事的人生哲理的。诗篇短小浅显,简捷凝重,一气贯连,表达了一种极为深挚真切的情感。(李泉)

【江南】汉乐府民歌篇名。始见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收入卷二六《相和歌辞·相和曲》。这是江南人民唱的一首采莲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全诗以游鱼在莲叶之间的穿梭嬉戏为艺术建构的主体,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形象鲜明地描叙出游鱼自由欢快的生态,由此喻托采莲人活泼欢愉的情态和心境。多用双关隐语,七句诗中每句都含一“莲”字,谐音“怜”(爱)。“采莲”即暗示意中人的寻觅,“鱼戏莲叶间”象征着情侣的追逐嬉戏。天然素朴的语言,鲜明生动的形象,使本诗呈现出“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胡应麟《诗薮》),清新明朗的风格。(李泉)

【薤露】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二七《相和歌辞·相和曲》。是一首古代送葬时唱的挽歌。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诗以“薤露易晞”比喻人寿短促,表现了对生命的留恋、人生无常的感慨。②魏诗篇名。曹操作。见《曹操集》。《乐府诗集》载入卷二七《相和歌辞·相和曲》。此诗借乐府古题以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用直叙其事的赋笔,记录下了东汉末年灵帝死后的一场政治动乱。始二句概述动乱根源在于灵帝的任人不良。接着叙写外戚何进的优柔无能、宦官的恶作乱、军阀董卓的杀主篡权,而延续二十二世的汉朝帝业也就在三者的厮杀火并中倾覆崩溃。通过现实时事的记述,抒发了诗人悯时伤乱的深沉感慨。诗作笔力雄健,风格朴质,富于现实性和历史感。(李泉)

【蒿里】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二七《相和歌辞·相和曲》。与《薤露》并为古代送葬时唱的挽歌。词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本为泰山南的一座小山名,是埋葬死人的坟地。古人由此想象为人死后魂魄聚居的场所。《汉诗说》评曰:“‘聚敛魂魄无贤愚’,使人意气都尽。要是汉人作诗语,皆断绝千古,不使后人更有可加。凡诗使后人有可加处,诗便不至。”(引自《汉魏乐府风笺》卷一)认为诗歌把人们在死亡面前的悲哀无奈惧怖之感,抒写得淋漓尽致了。诗仅四句,叙写鬼伯催索人命难留,气氛惨刻,哀痛至绝。②魏诗篇名。曹操作。见《曹操

集》。《乐府诗集》辑入卷二七《相和歌辞·相和曲》。这也是一首借乐府旧题以写时事的诗作。概括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关东军阀联合讨伐董卓未成,转而相互残杀,百姓惨遭祸殃的历史现实。诗为五言古体,共十六句。以白描手法,叙写了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惨象,并由此抒发诗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表露了对封建割据势力的谴责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风真朴雄阔,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之赞(钟惺《古诗归》)。

(李泉)

【鸡鸣】 汉乐府民歌篇名。始见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载入卷二八《相和歌辞·相和曲》。此为讽刺汉世权贵之作。全诗由三部分组成:“初言天下方太平,荡子何所之;次言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置酒作倡乐为乐,……;终言桃伤而李仆,喻兄弟当相为表里。”(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首六句告诫“荡子”太平之世,法不可犯;中间十八句追叙“荡子”得势贵幸时的显赫骄奢;末六句谓其遭祸败灭后的兄弟自相倾陷。艺术上突出中段铺排描绘,极写繁华之状,以寓奢僭不法作威必败、盛极则衰的嘲讽之意。陈祚明曰:“当时必有为而作,其事不传,无缘可知,但觉淋漓古雅。古雅,辞也;淋漓,情也。即事不传而情未尝不传。”(《采菽堂古诗选》)诗末“李代桃僵”的比喻,成为后世习用的典故。

(李泉)

【乌生八九子】 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二八《相和歌辞·相和曲》。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古辞‘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言乌母生子,本生南山岩石间,而来为秦氏弹丸所杀。白鹿在苑中,人可得以为脯;黄鹄摩天,鲤在深渊,人可得而烹煮之;则寿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叹前后也。”这是一首托鸟语以抒人生感叹的寓言诗。乌遭杀而自责藏身不密,继而转念善藏身的白鹿、黄鹄、鲤等也避患无方不免被害,可见世途难测,祸福无形,寿夭在命。诗歌情调凄楚,表露了乱世之人的忧患意识。前人评此诗曰:“奇横伸缩,妙不可言。”(李子德语,引自《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南朝梁刘孝威有同名拟作,梁吴均《城上乌》诗亦出于此。

(李泉)

【平陵东】 汉乐府民歌篇名。始见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载入卷二八《相和歌辞·相和曲》。晋崔豹《古今注》:“《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均以为诗乃汉末翟义门人悲悼翟义被王莽所害而作,然此说与诗意不符。诗曰:“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

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此为反映官贪如匪劫勒无辜的叙事短诗。通过义公被劫、官民交涉的典型事例,揭露了当时社会暴吏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语言朴实,格调凝重。以三三七言的句式,三句成一小节,布局十分匀称。每节首句又与上句后三字重复,是为民歌习用的顶针格修辞手法,不仅使音律流畅,也使叙事中的抒情气氛大为增强。

(李泉)

【陌上桑】 汉乐府民歌篇名。始见于《宋书·乐志》,题作《艳歌罗敷行》;后《玉台新咏》辑录,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乐府诗集》收入卷二八《相和歌辞·相和曲》,名为《陌上桑》。《宋书》原注:“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解”为乐歌段落,一解相当于一章。诗歌通过太守调戏采桑女遭到嘲讽拒绝一事的叙写,反映了封建社会达官贵族横行、下层妇女受欺的黑暗现实,刻画了集智勇美于一身的罗敷的光辉形象。与同类题材的民间作品《韩凭夫妇》《秋胡行》相比,本诗着力于理想形象的塑造,喜剧气氛的烘染,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全诗以罗敷的美为铺叙中心,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艺术方法:“写罗敷全须写容貌,今止言服饰之盛耳,偏无一言及其容貌,特于看罗敷者尽情描写,所谓虚处着笔,诚妙手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叙事中铺陈、衬托、夸张等多种手法的结合运用,成功地渲染了诙谐活泼的喜剧风格。罗敷虚拟的“夸夫”结尾,扬此抑彼,借夫婿风采压使君气焰,扬自我气节,更是别开生面,余韵无穷。本诗为完全的五言叙事诗,它的产生标志着东汉民歌中五言体叙事诗的成熟,为建安文人五言诗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泉)

【王昭君】 晋乐府篇名。石崇作。《文选》题为《王明君辞》,《乐府诗集》载入卷二九《相和歌辞·吟叹曲》,题作《王明君》。明君本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昭为明。《旧唐书·音乐志》:“《明君》,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悚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说明汉古词已亡,石崇依旧曲作新词。歌词代昭君立言,以“我”的口吻,叙述远嫁匈奴的经历及其内心的哀怨和精神上的孤苦屈辱。所叙史实与《汉书·匈奴传》的记载相吻。诗为五言,古朴质直,后世诗人多有仿作。

(李泉)

【长歌行】 汉乐府篇名。始见于《文选》卷二七,《乐府诗集》辑入卷三〇《相和歌辞·平调曲》。共有古辞三首。第一首:“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即为《文选》之所载。崔豹《古今注》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李善《文选》注反驳:“古诗曰‘长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傅玄《艳歌行》曰‘咄来长歌续短歌’。然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李说在理,“长”“短”是就音节曲调而言,与年寿无关。这是一首用比喻手法阐明人生短促、应及时努力的哲理诗。诗共十句,前八句都是比,结尾两句点题。通过“朝露易晞”的取譬,“秋节叶衰”、“百川东逝”的象征,诗人以景寄情,由情入理,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于鲜明的形象刻画之中。“长歌行歌《青青园中葵》,思立业也。传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盖欲及时也。”(朱嘉徵《乐府广序》)“及时立业”,这就是诗人从一系列景象引发的联想中所归结到的理性认识。绘景、抒情、述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使这首哲理诗既发人深思又不枯燥抽象,有着耐人寻味的艺术力量。

(李泉)

【**蝦蟇篇**】 魏乐府篇名。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六,《乐府诗集》列入卷三〇《相和歌辞·平调曲》,其引《乐府解题》曰:“曹植拟《长歌行》为《蝦蟇》。”诗曰:“蝦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事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是谋讎。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此为忧国明志的抒情诗。起语浩然,通过游戏水沟篱笆的蝦蟇、燕雀与一飞千里鸿鹄的对比,抒发了诗人鄙薄庸碌、崇尚大德的高远志向。随之又以追势逐利的嗷嗷者与猛气纵横的壮士加以对照,表达了作者“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的报国壮怀。朱嘉徵评曰:“长歌行歌《蝦蟇》,怀王室也。……一曰此文帝时作。子建求嗣魏公,以骄纵见疏,有用世之思,为文帝所绌。然文帝溺燕安而忘远图,亦可见矣。”(《乐府广序》)提供了此诗的写作背景,足资参考。

(李泉)

【**短歌行**】 魏乐府篇名。本是汉乐府歌名,古辞失传。曹操借旧曲写新辞,见《曹操集》。《乐府诗集》载入卷三〇《相和歌辞·平调曲》,共二首,《文选》卷二七辑录“对酒当歌”一首。“对酒当歌”一诗,抒写的是作者为统一天下而求贤若渴的心情。陈沆《诗比兴笺》云:“此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首八句为第一节,感叹人生短暂,虽调子低沉亦寓有及时立业之意;中段十六句为第二节,引用《诗经·鹿鸣》成句,反复申述思贤心意;结尾八句,运用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韩诗外传》卷三)的史实,表明了广招贤士实现政治一统的雄心大志,是为全篇的主旨。本诗语言质朴自然,

情意真切深沉。《诗经》成句和“周公吐哺”典故恰到好处地引用,使思想情感的表达更其凝炼含蓄。整首诗都是四言,句法高古,为“四言变体之工者”(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另一首《短歌行》“周西伯昌”,写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虽然兵势广大,建立起了王霸事业,却仍然以大事小,遵守臣节,事奉殷、周王室,受到世代称颂。作者借历史人物的吟咏以剖明心迹,表白自己绝无窃汉篡位的野心。

(李泉)

【**铜雀台**】 亦名《铜雀妓》。南朝乐府篇名。陈代张正见作。见《乐府诗集》卷三一《相和歌辞·平调曲》。铜雀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建安十五年曹操筑。台高十丈,有殿屋百二十间。楼顶铸大铜雀,故名。据《邺都故事》,曹操临终遗命诸子,死后葬邺之西岗。置诸妾、伎人于铜雀台。台上设六尺床帐,早晚供奉酒食。每至月初、十五,于灵帐前演唱歌舞。诸子于是时登台,瞻望西陵墓田。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谓:“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也。”诗曰:“凄凉铜雀晚,摇落墓田通。云惨当歌日,松吟欲舞风。人疏瑶席冷,曲罢缦帷空。可惜年年泪,俱尽望陵中。”意谓一代雄杰曹操生时,铜雀台的歌舞想是热烈辉煌的,而今却是难以言喻的冷寞惨凄。通过人去席冷、曲罢帷空的境界的刻画,诗歌表达了一种生死悲凉的感慨,以及对禁闭于台上的不幸者的同情。后世文人多有同题拟作。

(李泉)

【**猛虎行**】 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一《相和歌辞·平调曲·猛虎行》。词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诗以“猛虎”、“野雀”起兴作比,写游子虽饥饿难耐、漂泊无着,却决不随猛虎攫食、与野雀同栖、苟且求安、行非法非礼之事,而是自重自爱,有着耿介孤傲的节操。这一诗题后世文人多有拟作,多半用以抒发抑郁不平的感慨,与古辞的题旨不尽相同。

(李泉)

【**君子行**】 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二《相和歌辞·平调曲》。《艺文类聚》卷四一、《诗纪》卷一三皆题曹植作。诗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云:“古辞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言君子虽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以言远嫌疑也。”诗可分前后两解。前解反面告诫,君子处世要谨慎小心,远离嫌疑,以防患于未然;后解正面立言,君子行事要勤劳谦恭,学习“周公吐哺”的精神。此为流行于封建士林中的人生格言诗。其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诗句,成为后世的俗谚。

(李泉)

【燕歌行】 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二《相和歌辞·平调曲》。燕,占地名,今河北北部和辽宁一带。《乐府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乐府正义》曰:“燕自汉末魏初,辽东西为慕容所居,地远势偏,征戍不绝,故为此者,往往作离别之辞。”内容写征戍离别之情。古辞今不传,后代多有诗人以此题所作之诗,其中以魏曹丕、唐高适的最为著名。②魏诗篇名。乐府旧题。曹丕作,见《文选》卷二七,亦见《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平调曲》。共二首,其中第一首尤为出色。此诗写女子秋夜怀念远游在外的丈夫。先感物起兴,渲染萧瑟索寞的环境气氛;继而由景入情,直接抒写妇人对丈夫的刻骨思念;末补写夜景,以赋寓比,借传说中之牛、女事,表达女子独守空闺的哀伤。全诗写景和抒情水乳交融,语言委婉清丽,音韵和谐流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王夫之评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古诗评选》)该诗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发展颇有贡献。③唐诗篇名。七古。高适作,见《高常侍集》卷五。乐府旧题,亦见《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平调曲》。该诗在抒写征夫思妇离别之情的旧题中,融进较深的社会内容。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诗前小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张公即张守珪。史称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的部将在与奚、契丹作战中先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敌之功,事颇泄。”(《旧唐书·张守珪传》)此诗当与此有关,但又概括描写一般边塞征战之状况,具有更高的典型意义。全诗分三段。首段叙出征和沙场战前情景,次段写战斗的激烈和艰苦,末段抒发感慨,点明诗旨。士兵的爱国热情,边将的腐朽无能以及军中苦乐不均之情状都得到生动表现。此诗为高适的“第一大篇”(赵熙语,引自《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善于通过刻画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渲染战场悲壮气氛,烘托士卒凄怆心情,浴血沙场的士兵和醉生梦死的将帅之对比描写贯串全篇,在歌行体中运用许多排偶句子,“七古言中时带整句”(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音调铿锵,且具整齐错落之美。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属对工整,对照鲜明,吴汝纶评曰:“二句最为沉至”(引自《唐宋诗举要》卷二),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吴小林)

【从军行】 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二《相和歌辞·平调曲》。《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内容多写边塞征战和士兵生活情况。今古辞不存,现存最早的歌辞为三国魏左延年所作。自魏晋至唐,作此题者甚多,其中以唐杨炯、

李颀、王昌龄等所作最为著名。北周王褒的《远征人》、南朝陈伏知道的《从军五更转》、唐李益的《从军有苦乐行》等题,均由《从军行》演化而来。②唐诗篇名。五律。杨炯作,见《杨盈州集》卷二。为乐府旧题。表现为国从戎的雄心壮志:“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前六句叙写出征过程,后两句抒发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决心,传出当时士子立功边塞的心声。此诗以乐府歌行就律,严整和谐,明快自然,且具雄浑刚健之风,可谓自创一格。清王夫之说杨炯“裁乐府入律,以自意起止,混合入化”(《唐诗评选》)。明胡应麟曰:“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诗薮》内编卷四)这些特点在该诗中均有所体现。③唐组诗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约作于开元十五年(727)前后。共七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皆写边塞生活。其中以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等首较为著名。前两首抒写征战的离恨乡愁,后两首歌颂将士守边杀敌的英勇气概,或悲凉深沉,或慷慨激昂,均以刻画人物内心活动见长,情味隽永,语言凝练,音调铿锵。明胡应麟评此组诗曰:“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诗薮》内编卷六)洵为七绝佳品,边塞名作。(吴小林)

【鞠歌行】 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三《相和歌辞·平调曲》。《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平调又有《鞠歌行》,今无歌者。”古辞已佚。《乐府诗集》辑录的是陆机、谢灵运等问题拟作。陆机《鞠歌行》有序云:“按汉宫阁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诗以三、七言交杂的形式,抒发了渴盼知己、施展才能的意愿。(李象)

【苦寒行】 魏乐府篇名。曹操作,见《曹操集》。《乐府诗集》列入卷三三《相和歌辞·清调曲》。诗写于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率军征讨高干之时。袁绍甥高干建安十年降曹,复又反叛,屯兵于壶关口(今山西长治市东南)。曹操兵出邺城(今河北临漳),取道河内(今河南武陟),北度太行山,其时恰在正月。三个月后,高干败亡。诗歌截取行军太行山时的见闻境遇作为描叙中心。通过“羊肠坂诘屈”、“虎豹夹

路啼”、“雪落何霏霏”的典型景象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冬日山区的荒凉、军旅生涯的艰苦。结尾“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中的《东山》出自《诗经·豳风》,旧说为周公所作。诗人引此,一则比照眼前行役的苦况,再则以东征伐奄、肩负王业重任的周公自喻。此诗用语朴质,格调凄苦,确如钟嵘《诗品》所评:“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李泉)

【豫章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辑入卷三四《相和歌辞·清调曲》。豫章,汉郡名。此为托物寄意诗。写豫章山上白杨遭斧斤砍伐,枝叶相弃,根株分离。根留豫章山,身在洛阳宫。“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的设问,抒写了一种归根恋枝的情愫。结尾“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则悲怨之意溢于言表。诗为五言叙事体,中间脱落十三字。后世作此题者有曹植、陆机、李白等。(李泉)

【董逃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收入卷三四《相和歌辞·清调曲》。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古词云:‘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言。’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为宫阙,而多灵兽仙草,可以求长生不死之术,令天神拥护君上以寿考也。”此说符合诗意。诗叙上神山采仙药以求长生不老事。一说诗作于汉武帝时:“乐府原题谓董逃行,作于汉武帝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吴旦生语。引自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三)又,东汉灵帝时有童谣《董逃歌》,旧说以之与本诗相混,实则二篇辞意迥别。晋陆机、南朝宋谢灵运均作有此题,内容言节物芳华可及时行乐。晋傅玄《历九秋篇》十二章亦题《董逃行》,叙夫妇别离之思,其题旨皆与古辞不同。(李泉)

【董逃歌】 汉童谣名。始载《后汉书·五行志》:“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晋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终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戒焉。”这是一首以董卓乱亡为内容的东汉童谣。“董”指董卓,说他虽然跋扈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据应劭《风俗通》说,董卓忌恨歌谣的矛头针对自己,曾“大禁绝之。”(李泉)

【相逢行】 汉乐府篇名。《玉台新咏》卷一题作《相逢狭路间》,《乐府诗集》列入卷三四《相和歌辞·清调曲》。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写繁华甚盛,变宕百出,古雅纷披。”诗歌以铺叙的手法,绚丽的藻饰,极写贵僚之家的奢侈豪华:黄金为门,白玉作堂,庭桂芬芳,彩灯辉煌,真乃人间天堂。朱嘉徵评说:

“《相逢行》歌相逢狭路间,刺俗也。俗化流失,王政衰焉。”(《乐府广序》)其讽刺意味是通过适度夸张、淋漓铺陈的典型民歌风格体现出来的。《乐府诗集》“解题”说:“《相逢狭路间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然《乐府诗集》卷三五却又另载有《长安有狭斜行》古辞一首。见“长安有狭斜行”。(李泉)

【长安有狭斜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辑入卷三五《相和歌辞·清调曲》。“狭斜”,又作“狭邪”,“狭路”之意。本篇与《相逢行》属同一母题,似是一曲之异辞,而此诗疑为《相逢行》所据之本辞。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古乐府是歌工取佳词合曲,故往往相同。此即《相逢行》语。观其异处,亦能生新作态。……彼但写中子,此分指三子,见异。彼道上生光,是映带狭路间;此室中生光,乃起下三妇艳,各自一法。”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的诗句,则反映了贵家子弟依靠父兄世业窃居高位的政治现实。故旧评认为“此篇所刺尤深,汉诗亦不多得”(李子德语。引自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三)。(李泉)

【塘上行】 汉乐府篇名。首载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录入卷三五《相和歌辞·清调曲》,从《宋书》题为魏武帝作。李善《文选注》引《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作“古辞”是。此为凄楚哀惋的弃妇诗。与《诗经》中著名弃妇诗《氓》、《谷风》相比,本篇在内容和写法上都有新的开拓。女主人公遭弃的原因不是丈夫的喜新厌旧或经济因素,而是“众口铄金”,一种社会习俗舆论所导致的恶果。全诗“但写情,不傍事”(王夫之语,引自《汉魏乐府风笺》卷一一),与叙事成分很强的《氓》、《谷风》不同,是弃妇复杂心理和情感的披露,是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情感抒发细腻委婉,富于层次:首六句为第一层,抒写对“积毁销骨”舆论习俗的痛恨;中六句反复表露对丈夫的缠绵深挚之情,为第二层;第三层的六句诗组成三对排比,以托物取譬方式,表现弃妇忧恐与热望交织的微妙心态;末段用“出亦复苦愁”的复沓吟咏和萧瑟景象描绘,使弃妇的情绪抒发进入到悲歌当哭的巅峰高潮。真挚深厚的情意、细腻朴质的风韵,使此诗极富艺术感染力,“淋漓恻伤,情至之语,不忍多读”(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李泉)

【秋胡行】 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录入卷三六《相和歌辞·清调曲》。诗的本事,即《西京杂记》、《列女传》所载:鲁人秋胡游宦返家,调戏正在采桑的妻子,妻子羞愤自杀。古辞已亡,现存曹操、曹丕等的同题拟作,言神仙,歌魏德,内容已与本事无关。

(李泉)

【陇西行】 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七《相和歌辞·瑟调曲》。陇西,指延伸于陕西、甘肃边境的陇山(六盘山南段)之西。《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古辞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此诗歌颂一个能操持门户的能干主妇。张玉穀《古诗赏析》评云:“此羡健妇能持门户之诗,旧解皆云中含讽意,盖因妇人宜处深闺,不应自应宾客也。然玩诗意,以凤凰和鸣,一母九雏兴起,则此好妇之无夫无子,自可想见。门户既藉以持,宾客胡能不待?篇中绝无含刺之痕。”后世拟作颇多,自梁简文帝始,但言辛苦征战,佳人怨思,其中以唐陈陶所作最为著名。②唐组诗名。七绝。乐府旧题。陈陶作,见《全唐诗》卷七四六。约作于大中(847—859)中。共四首,其中以第二首最为传诵:“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前两句总写将士英勇杀敌,伤亡惨重,为后张本。后两句以沙场枯骨和春闺思梦呼应对比,具体描写长期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构思独特,“凄婉味长”(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明杨慎认为此诗化用汉贾捐之《议罢珠崖对》“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郭,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语意,“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升庵诗话》卷一二)。王世贞评“可怜”二句曰:“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又云:“惜为前二句所累,筋骨毕露,令人厌憎。”(《艺苑卮言》卷四)清沈德潜则曰:“作苦语无过此者。然使王之涣、王昌龄为之,更有馀韵,此时代使然,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唐诗别裁》卷二〇)高步瀛亦以王说为“不然”:“若前二句不若此说,则后二句何从着笔?此特横亘一盛唐晚唐之见于胸中,故言之不能平允。”(《唐宋诗举要》卷八)

(吴小林)

【步出夏门行】 ①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辑入卷三七《相和歌辞·瑟调曲》。大曲之一。写一独居空室的修行者,终于得道升仙,赴泰山拜谒神仙东王父、西王母,并与仙人赤松子为伍,上天同游,受到了白榆、桂树、青龙等星宿的夹路相迎。陈祚明评曰:“东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计?乃言四五里,见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采菽堂古诗选》)以荒唐语写游仙,自有一种谐趣。《乐府诗集》“解题”说,《陇西行》一曰《步出夏门行》。其实《陇西行》另有古辞,虽首四句与《步出夏门行》末四句同,实乃不同诗篇。②魏诗篇名。曹操作,见《曹操集》。此为借乐府旧题以写时事的一组诗作,共五章。序诗“艳”一章,正诗四章:《观沧海》(又名

《碣石篇》)、《冬十月》、《土不同》(又称《河朔寒》)、《龟虽寿》。《乐府诗集》收入卷三七《相和歌辞·瑟调曲》。诗写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之时,描叙了征途所经之处的天时物候、民风士气,气势磅礴地抒发了作者忧念时政、统一天下的胸怀壮志。诗歌笔调雄浑,感情热烈,比喻形象,议论深刻,充溢着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其中尤以《观沧海》、《龟虽寿》著称。《观沧海》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诗句,写出了大海的宽阔雄伟,为我国诗史上描写自然景象的名句。而《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亦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世说新语·豪爽》篇载,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此四句,“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李象)

【西门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三七《相和歌辞·瑟调曲》。此诗宣扬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消极,却也折射了汉末动荡社会中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甚至绝望。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诗句,则高度概括了封建时代精神遭扭曲的世俗之人极度悲愤的心态,具有讽世破俗的意义。东汉后期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一诗,即由本篇演化而成。

(李象)

【东门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辑入卷三七《相和歌辞·瑟调曲》。此为反映下层平民奋起抗争的叙事小诗。用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以社会细胞的家庭作为描写核心,通过一个为生存铤而走险的反抗者形象的塑造,揭示了汉王朝流民暴动的社会原因,从而显示出人民反抗斗争的合理性。小诗如同一出独幕剧,在戏剧性的矛盾中,设置了两类冲突:人物自身的心理矛盾、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紧张的人物冲突、生动的场面描写、激烈的行动刻画,和极富个性的人物对话,使小诗于短少的文字中蕴有丰富的内涵,显示出了叙事诗艺术的高度成就。《宋书·乐志》载有晋乐所奏的《东门行》,曲辞与本篇稍有不同,增加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平慎行,望君归”的词句,削弱了原诗的思想意义。

(李象)

【饮马长城窟行】 ①汉乐府民歌篇名。长城下有泉窟,可以饮马,故名。题一作《饮马行》。最早见于萧统《文选》,题为“乐府古辞”。徐陵《玉台新咏》亦载此诗,题为东汉蔡邕作。郭茂倩《乐府诗集》从《文选》,题为“古辞”,收入卷三八《相和歌辞·瑟调曲》。但诗中所写与“饮马长城窟”不相涉,可能不是最早的本辞。该诗写思妇怀念远方的征人。可分三段,头八句直接抒写妇人的刻骨相思,次四句用比喻手

法写别家有人归来,引起妇人对丈夫更深的思念,末八句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的情景,暗示其仍将继续忍受思念之苦。全诗深情绵邈,百转千回,跌宕有致。明代胡应麟评云:“语断而意属,曲折有馀,而寄兴无尽。”(《诗薮》内编卷二)清人沈德潜亦曰:“缠绵宛折,篇法极妙。”(《古诗源》卷三)后世文人拟作甚多,其中以魏陈琳的一首最为著名。②魏诗篇名。乐府旧题。陈琳作,始见于徐陵《玉台新咏》,后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列入卷三八《相和歌辞·瑟调曲》。《乐府解题》曰:“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或云蔡邕之辞。若魏陈琳辞云:‘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此诗通过筑城卒和长城吏的对话以及筑城卒与其妻子的书信往还,揭露筑长城的繁苛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引用秦时民谣“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益增诗作的悲剧气氛和怨愤感情。全诗语言古朴,辞气俊爽,成功地运用起兴、对话等多种手法,富有民歌特色。清沈德潜评曰:“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与汉乐府竞爽矣。”(《古诗源》卷六)张玉穀亦曰:“此种乐府,古色奇趣,即在汉古辞中亦推上乘。自魏而降,鲜嗣音矣。”(《古诗赏析》卷九)其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的长短参差的句式,对后世颇有影响。宋长白云:“以长短句行之,遂为鲍照先鞭。”(《柳亭诗话》卷一四)明钟惺云:“老杜歌行似此。”(《占诗归》卷九) (吴小林)

【上留田行】汉乐府篇名。载《乐府广题》,《乐府诗集》不作正式选录,引在《相和歌辞·瑟调曲》曹丕《上留田行》的“题解”中。《乐府广题》曰:“盖汉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崔豹《古今注》谓:“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故曰《上留田》。”“亲父子”即同父兄弟。诗乃旁人同情孤儿,讽谏其兄之作。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回车问者,他人问也。不加一语,一父之子,情何以堪。”今人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古今注》所释与诗篇内容不合。另有一篇《上留田》古诗:“出是上独西门,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断绝不长。兄弟有两三人,小弟块摧独贫。”(引自《文选》陆士衡《豫章行》注)才合于崔豹所说,应是《上留田行》真正的古辞。唐李白所作《上留田行》的用义,即以后一篇为本。 (李泉)

【妇病行】汉乐府民歌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八《相和歌辞·瑟调曲》。此诗叙写一个病妇临终前把孤儿托付给丈夫以及她死后夫、儿饥寒交迫的悲惨景象,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贫穷愁苦状况,堪称汉代社会实录,是体现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

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现实主义精神的代表作之一。语言朴素生动,句式长短错落,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展开故事,叙述与人物说话紧密结合,具有绘声绘影,逼真传神的艺术效果。“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宋长白《柳亭诗话》),显示出卓越的叙事技巧。

(吴小林)

【孤儿行】汉乐府民歌篇名。又名《孤子生行》、《放歌行》。《乐府诗集》辑入卷三八《相和歌辞·瑟调曲》。此为孤儿控诉兄嫂虐待、奴役的血泪诗。所写孤儿与兄嫂的血缘之亲,已变为事实上的主、奴关系,故孤儿的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奴婢的处境和命运。诗中择取“行贾”、“行汲”、“收瓜”三桩差事作为情节主轴,通过典型的细节铺叙,饱含感情地渲染了孤儿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杂言参差的诗体形式,委曲哀楚的口语叙述,叙事抒情的交融结合,形成了全诗悲婉流转的动人风格。清李因笃评曰:“腊月来归,三月蚕桑,六月收瓜,盖终岁无暇日矣。曰‘愿还我蒂’,将以自明也。又云‘当兴校计’,则出蒂亦不足塞责。数句之中,多少曲折。”(《汉诗音注》)

(李泉)

【野田黄雀行】①魏乐府篇名。曹植作。《乐府诗集》录入卷三九《相和歌辞·瑟调曲》。《文选》则辑入卷二七,题作《箜篌引》,是。诗二十四句,首句为“置酒高堂上”。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晋乐奏魏曹植‘置酒高堂上’,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乐极而悲,嗟盛时不再。终归于知命而不复忧焉。”是一首感叹盛时难再而主张乐天顺命的诗。②魏乐府篇名。曹植作。《乐府诗集》辑入卷三九《相和歌辞·瑟调曲》。诗十二句,首句为“高树多悲风”。约作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诛杀曹植密友丁仪、丁廙兄弟之时。诗叙黄雀见鹞投罗,少年拔剑相救,事与题意切近。朱柅堂《乐府正义》评曰:“自悲朋友在难,无力援救而作。”此诗抒发了作者好友罹难无力救援的悲愤,以及热爱自由,渴望冲破黑暗牢笼的心情。全诗都用比喻和象征。“风波”暗示环境险恶,“利剑”比喻生杀权势,“黄雀”喻被害朋友,“少年”为理想中有力救援的英雄。讽谕手法的成功运用,不仅使诗旨得到形象、巧妙的表达,而且使这首文人乐府带上了浓重的民歌风采。 (李泉)

【雁门太守行】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三九《相和歌辞·瑟调曲》。古辞备述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德政之美,与“雁门太守”无涉,似非本辞。《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辞,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乐府正义》曰:“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

阳令也,与《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若改用‘庞烈妇行’,则是自为乐府新题,非复旧制矣。”至梁简文帝所作,始据题为之,备言边城征战之思,皇甫规雁门之问。后世诸多拟作中,以唐李贺的最为著名。②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约作于元和初。本于梁简文帝同名作之意。写当时征战,歌颂危城将破,英勇抗敌,为国尽忠的将士:“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全诗意境苍凉,色彩秾艳,语言精警,“字字锤炼而成”(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八)。据传此诗颇受当时“文章巨公”韩愈的赏识:“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张固《幽闲鼓吹》)又传对诗中“黑云”两句评价甚有分歧。宋王安石云:“此儿误矣。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也?”而明杨慎则曰:“宋老头巾不知诗”,并以自己亲身经历肯定“贺之诗善状物也”(《升庵诗话》卷一〇)。以杨说为胜,清薛雪亦曰:“是阵前实事,千古妙语。”(《一瓢诗话》) (吴小林)

【艳歌行】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三九《相和歌辞·瑟调曲》。共有二首。“翩翩堂前燕”一首为游子思归诗。始以堂前燕冬藏夏现来去定时起兴,喻人不如燕,远归无期;中叙游子得客店女主相助而遭女主之夫猜疑,遂以“水清石自见”剖明心迹;尾句触事思归,含无限委曲牢骚。诗歌围绕一件生活小事“缝衣”展开人物关系的描写,以小见大、以少总多地表现游子客居处境的困顿和“远行不如归”的深沉感叹。“南山石嵬嵬”一首写南山之松,由野生野长到雕漆薰香,成为洛阳宫中的栋梁。其主旨解说纷纭。一说“隐者见微,大用于时,诗人美之”;一说“讽上木繁兴”(见朱嘉徵《乐府广序》);一说“疑时朝廷采取民间女以充后宫,自伤离别,故以南山松柏为比”。(朱桓堂《乐府正义》)今人余冠英认为诗歌抒发了“轻荣禄重自然的思想”(《乐府诗选》)。结合“松树窃自悲”的诗句,余说为是。 (李泉)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录入卷四〇《相和歌辞·瑟调曲》。古辞已亡,现存陆机、鲍照、李白等同题拟作。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曰:“曹植等《门有车马客行》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友凋丧之意也。”诗歌皆以有客自外来,备述市朝变异、亲友丧亡为叙写内容。曹植《门有车马客行》诗已佚,另有《门有万里客行》,系从古题演化而出。 (李泉)

【蜀道难】①汉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四〇《相和歌辞·瑟调曲》。该书引《乐府解题》曰:“《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古辞已失,后梁简文帝萧纲、刘孝威、阴铿、李白等人均有根据此旧题创作的诗篇。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关于此诗作年和涵意的说法颇多分歧。有人认为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今人多主张是天宝初年在长安送友人入蜀时所写,与《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为同期作品。此诗早为编于天宝十二年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故以后说为是。对诗意的看法,一说认为有寓意,其中又有多种说法:萧士赟谓讽刺玄宗幸蜀之非计(《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卷三),范摅谓严武镇蜀时欲害房琯、杜甫,李白作此诗为房、杜危(《云溪友议》卷上)。缪氏影印北宋本李集该诗题下注曰:“讽章仇兼琼也。”今人还有寄托仕途坎坷,政治黑暗的说法。另一说认为别无寄托,胡震亨主张不必“求一人一时之事以实之”(《李诗通》卷四),顾炎武认为“即事成篇,别无寓意”(《日知录》卷二六),今人亦有谓无所寄托的。以后说为胜。前人依据此乐府旧题所作诗多为短章,而李白衍为大篇,尽情描绘入蜀道路上奇险壮丽的山川景物,叙写蜀中险恶的政治环境,表现出对友人的深切关心和对社会动乱的深沉感慨。全诗想落天外,感情强烈,句式以七言为主,杂以三、四、五、八、九、十一言,恣意挥洒,动荡流走。诗中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句,显得吞吐呜咽,回肠荡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化用张载《剑阁铭》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所居”的句子,写得更为形象流畅。殷璠评此诗“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卷上)。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贺知章读此诗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吴小林)

【白头吟】汉乐府篇名。《玉台新咏》卷一题作《皀如山上雪》。《乐府诗集》载入卷四一《相和歌辞·楚调曲》。此为痴情女同负心人断交的诀别词。起始描绘“山上雪”、“云间月”两种世上最高洁的事物,作为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纯洁的象征。继以“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作正面表白,最终言“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以“情义”超越金钱的铮铮宣言呼应起始,结束全篇,表现了女主人公重情不重钱的高尚品质。晋葛洪《西京杂记》云:“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说不可信,本诗内容与文君、相如的爱情波折并不相关。而据《宋书·乐志》,本诗与《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等同为“汉世街陌谣讴”。故《白头吟》乃是

一首来自民间的诗作。王夫之曰:“《谷风》叙有无之求,《氓》蚩数复关之约;汉人乐府如此篇,何让‘三百’!”(引自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五) (李泉)

【泰山吟】 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四一《相和歌辞·楚调曲》。《乐府解题》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亦《薤露》《蒿里》之类也。”现有晋陆机、宋谢灵运的拟作各一首。 (李泉)

【梁甫吟】 ①乐府篇名。一作《梁父吟》。见《乐府诗集》卷四一《相和歌辞·楚调曲》。该书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李勉《琴说》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泰山下一座小山名。在今山东新泰市西,是死人聚葬之处。《梁父吟》为葬歌。今传旧辞题名诸葛亮作,一说为齐地土风。内容写春秋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三士被齐相晏婴用二桃所杀之事。辞语古朴,格调悲凉。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乐府旧题,宋郭茂倩亦将此诗收入《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作年主要有二说:一说被谗见逐,离开长安以后所作;一说被征召入京,供奉翰林以前所作。以后说为胜。诗中提到晏婴“二桃杀三士”之事,立意与题为诸葛亮所作之乐府旧辞有联系,但内容已由伤悼死者而变为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全诗分为五段。首段起始两句,开门见山,直接抒写知遇明主,施展抱负的强烈愿望。第二段以吕望和酈食其的故事,说明贤才一定能够实现大志。第三段驰骋想象,发泄横遭小人排斥压抑的愤懑之情。第四段运用各种典故,抒写自己报国无门的忧虑和痛苦。末段与首段呼应,以终能际会风云、实现理想的自我慰藉作结。通篇用典,并借助种种神话传说,出鬼入神,迷离惝恍,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全诗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结构奔腾跳跃,瞬息万变,而又脉理自清。方东树评曰:“此是大诗,意脉明白,而段落迷离莫辨。”(《昭昧詹言》卷一二)沈德潜亦曰:“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以气胜也。若无太白本领,不易追逐。”(《唐诗别裁》卷六)是体现李白诗歌清雄奔放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吴小林)

【怨歌行】 乐府篇名。并见于《文选》卷二七、《玉台新咏》卷一,《乐府诗集》载入卷四二《相和歌辞·楚调曲》,均题为汉班婕妤作。《文选》李善注云:“《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今之学界多从《歌录》,断为无名氏乐府古辞。此诗立意精巧,看似咏扇,实以喻人,为咏物寄意的

闺怨诗:“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首四句咏扇,“霜雪”、“明月”的比喻,暗寓了女主人公品貌的明丽高洁。后六句抒情,写善体人意,受到“出入君怀袖”特殊恩宠的团扇好景难久,秋凉一到,就被无情地抛进了篋笥之中。“常恐”二字是诗意的转折,透露了女主人公对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其曰‘常恐’,若为预虑之词然者,用意特深,所为怨而不怒者也。”(吴伯其语。见《汉魏乐府风笺》卷五)全诗以“秋扇见弃”喻封建社会中弃妇的悲惨命运,开后世宫怨诗的先河。《婕妤怨》《长信怨》《玉阶怨》等,皆以“团扇”、“白露”、“秋月”为特定意象,抒写宫妇的不幸。钟嵘《诗品》卷上评曰:婕妤“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本诗构思精巧,辞采绚美,具有不着一字说尽心中忧恐的含而不露的特点。据《汉书·外戚传》,得宠于汉成帝的班婕妤,因受赵飞燕之谗,失宠居长信宫。其身世极类本篇之弃妇。因而六朝人有关班作此诗的说法,虽属比附,却也不无原由。婕妤,汉武帝时所置女官名,也是妃嫔的称号。

(李泉)

【长信怨】 见“长信秋词五首”。

【玉阶怨】 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四三《相和歌辞·楚调曲》。该书收录齐谢朓、虞炎,唐李白三人以此题所作之诗。②南朝齐诗篇名。谢朓作,见《谢宣城诗集》卷二。汉成帝时宫女班婕妤失宠后退居长信宫,作《自悼赋》,有“华殿尘兮玉阶苔”之句,此诗即本其意,抒写深宫女子的怨情:“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在寂寥沉静的环境气氛中,以一长夜缝衣、百无聊赖的片断场景,表现宫女的孤独哀怨,意境清幽,情味隽永,为我国宫怨诗中的名篇,对后来李白的同名之作颇有影响。③唐诗篇名。五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五。拟谢朓同名作而又有发展创造:“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通过刻画女子由玉阶站久,夜露侵袜到入室下帘,隔帘望月之情状,运用“空谷传音”的手法,极写其幽怨之情。“无一字言怨,而隐然幽怨之意见于言外。”(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妙写幽情,于无字处得之。”(《唐宋诗醇》)比谢诗词意更蕴藉,情韵更悠长,是李白乐府小诗中的精品。 (吴小林)

【白紵歌】 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五五《舞曲歌辞》。以《晋白紵舞歌诗》为最早,又有《宋白紵舞歌诗》、《齐白紵辞》、《梁白紵辞》等。《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古辞盛称舞者之美,宜及时行乐,其誉白紵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馥作巾。袍以

光驱巾拂尘。”据此,“白纻”当是一种洁白细柔的苧麻织物,舞者用以制为袍巾。《宋书·乐志》:“《白纻舞》,按舞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白纻歌》最初当出于吴地民间,后被贵族采入乐府。形式均为七言,内容多描绘舞者形姿、歌宴场面,抒写及时行乐的思想。后世文人如鲍照、李白、柳宗元等均有仿作。(李泉)

【白纻舞歌诗】 见“白纻歌”。

【白纻辞】 见“白纻歌”。

【俳歌辞】 乐府篇名。一曰《侏儒导》。《乐府诗集》列入卷五六《舞曲歌辞》。是古代民间乐舞杂戏中俳优所唱的歌辞。《南齐书·乐志》:“《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今存之《俳歌辞》乃古辞八曲中摘录之一部分。辞意不易理解。据《隋书·乐志》,隋文帝以《侏儒导引》,非乐曲正典而罢之。(李泉)

【昭君怨】 乐府篇名。《乐府诗集》辑入卷五九《琴曲歌辞》,题为汉王嫱作。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诗作四言,抒写远嫁胡地的哀怨忧伤。学界认为诗乃后人依托。(李泉)

【琴歌】 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六〇《琴曲歌辞》。以秦百里奚妻的《琴歌》二首为最早。《风俗通》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亦谓之庚廖。”三首意同,均以追忆夫妇情谊、讽斥“今日富贵忘我”为中心诗旨。《乐府诗集》又录有题为汉司马相如所作的《琴歌》二首。《玉台新咏》卷九选录时并有序:“司马相如游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于壁间窥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可见乃司马相如求卓文君之诗。首二句为“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后人因又名之为《凤求凰》。诗为七言,委婉地抒发了“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的深长情意。(李泉)

【凤求凰】 见“琴歌”。

【秦女休行】 乐府篇名。三国魏左延年作。《乐府诗集》载入卷六一《杂曲歌辞》。诗叙一姓秦名休的女子,为宗亲报仇,手刃仇家于都市,被囚系入狱,后又遇赦得释。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据曹植《精微篇》,论证女休报仇当是汉时事。《乐府诗集》又收有晋傅玄同题诗作一篇,写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赵娥为父复仇,刺杀凶手后到官自首,遇到赦免旌表(事见《三国志·魏志·庞涓传》、《后汉书·列女传》)。傅作用左延年旧题而所咏之事不同,但皆言杀仇报怨,颂其义烈,旨归是一致的,反映了两汉三国统治

者以“孝”治天下的社会现实。(李泉)

【伤歌行】 汉乐府篇名。首见于《文选》卷二七,作古辞。《玉台新咏》卷二选录,题为魏明帝作。《乐府诗集》列入卷六二《杂曲歌辞》,亦作古辞。此为触物咏怀诗。通过清寂幽冷的月夜景物的渲染,抒发内心的深沉忧思和孤愤。起始六句,即刻绘了一个天上人间呼应交融的清幽意境:冷月当空,银辉照不眠。中段叙诗人愁思难耐,然而所思者何?结句“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长歌高吟,对天舒愤,气势高逸雄浑。诗人所念绝非一般儿女离绪,而是有着更为丰富深沉的情感内涵。《乐府诗集》“解题”:“《伤歌行》,侧调曲也。古辞伤日月代谢,年命遒尽,绝离知友,伤而作歌也。”可资参考。语言清新流利,诗风柔婉而又不失朴健。(李泉)

【悲歌行】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收入卷六二《杂曲歌辞》。此为客乡游子欲归不能的“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诗作凌空起句,从游子借悲歌抒发乡愁,以远望聊且当归的无可奈何中,显现其郁积重重的思乡至情。而“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诗句,则不仅曲尽层次地写出了客子走投无路的凄凉处境,也透露出了游子归乡不能的客观社会因由:“或邦国丧乱,流寓他乡;或负罪离(遭)忧,窜身绝域。故词极凄楚,而无可怨恨。”(朱柅堂《乐府正义》)诗歌气韵高古,格调悲凉,是汉乐府中写乡愁的一首代表作。唐李白有同题诗作,悲叹贤臣良将遭黜,与古辞旨义不同。(李泉)

【缓声歌】 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六五《杂曲歌辞》。该书“题解”谓“缓声”是指乐歌的声调缓慢,与求人的年命长缓无关。有《前缓声歌》《后缓声歌》之分。《前缓声歌》存有古辞一首,并有陆机、谢惠连等的同题拟作,内容属游仙诗一类。谢灵运、沈约等又有《缓歌行》之作,亦由此题演化而出。(李泉)

【缓歌行】 见“缓声歌”。

【枯鱼过河泣】 汉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七四《杂曲歌辞》。此为以鱼拟人的寓言诗:“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鮄,相教慎出入。”通过“枯鱼”作书的情节虚构,喻示世途艰危、审慎方能避祸的人生规戒,正如张荫嘉所评:“此罹祸者规友之诗。出入不谨,后悔何及;却现枯鱼身而为说法。”(见《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四)小诗内涵深邃,形式新颖,表现出民歌作者活泼丰富的艺术构思和想象能力。(李泉)

【古歌】 乐府篇名。此诗《乐府诗集》未收,张玉

穀《古诗赏析》归入“汉杂曲歌辞”。是一首流落边关胡地的客子的思乡诗：“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飘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全篇围绕一个“愁”字展开抒写。始六句直抒“愁”意，“令我白头”的感叹，夸张而又真切地描绘了诗人为愁所苦的衰颓形态。后六句通过多种手法，淋漓尽致地表露了诗人无法排遣、不堪忍受、永无穷已的悲苦。体式独特，三、四、五、七言句错综杂用，形成了缓急相间的节奏，和“苍莽而来，飘风急雨，不可遏抑”的气势（《古诗源》卷三），达到形式与内容的谐和一致。（李泉）

【长相思】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六九《杂曲歌辞》。“长相思”本为汉代诗中语，如《古诗十九首》中《孟冬寒气至》“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后南朝及唐代诗人吴迈远、萧统、张率、陈后主、徐陵、江总、李白、张继等皆有以此为题之作。内容多写男女或朋友之间久别相思之情，或直抒其意，或别有寄托。往往以“长相思”三字起始，句式长短不一，抒写委婉曲折。（吴小林）

【行路难】①汉乐府民歌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七〇、七一《杂曲歌辞》。该书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本为汉代歌谣，后晋人袁山松改变其音调，创造新词。现古辞和袁辞均不存，后代文人多有拟作，其中南朝宋鲍照所作十八首《拟行路难》和唐李白所作三首《行路难》对旧题进行革新，尤为著名。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作于天宝三年（744）离开长安时，一说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730—731）离开长安而归时。是政治失意后的述怀之作，共三首。第一首写被迫离开长安的悲愤心情，但仍寄希望于未来。第二首谴责当时统治集团堵塞贤路，排挤英才，表示决意归去。第三首揭露现实政治的黑暗与险恶，并借肯定及时身退的历史人物抒发愤激之情。《唐宋诗醇》卷二曰：“冰塞雪满，道路之难甚矣。而日边有梦，破浪济海，尚未决志于去也。后有二篇，则畏其难而决去矣。”三首诗写得感情激荡，气势磅礴，思绪瞬息多变，体现出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典型风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写对未来满怀希望，“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言世路艰难，四处碰壁，均以生动的比喻、旺盛的气势取胜，为传诵千古之名句。此诗从内容到语言、风格，明显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吴小林）

【古别离】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七一《杂

曲歌辞》。内容多写离情别意。《乐府诗集》云：“《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后苏武使匈奴，李陵与之诗曰：‘良时不可再，离别在须臾。’故后人拟之为《古别离》。梁简文帝又为《生别离》，宋吴迈远有《长别离》，唐李白有《远别离》，亦皆类此。”此书收有南朝梁江淹、唐沈佺期、聂夷中等人的拟作。（吴小林）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民歌篇名，古代长篇叙事诗杰作。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为“无名氏”，前有小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后收入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卷七三《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称“古辞”，并说：“《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现在一般通行的选本常取其首句，名之为《孔雀东南飞》。其写作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作于汉末，也有人把它定为六朝的作品（宋代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最早提出此种看法）。从原序以及诗中的内容、语言风格看，以前说为是。至于诗中杂有某些六朝风俗习惯的描写，则是在流传过程中后人润饰修改时所加，不能据此断为六朝之作。全诗共计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七百多字，明代王世贞称之为“长诗之圣”（《艺苑卮言》卷二）。它通过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受压迫致死的爱情婚姻悲剧，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热情歌颂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和反抗精神。五四运动后刘、焦故事曾被不断搬上戏剧舞台。该诗情节曲折，人物鲜明，结构既严谨有序，又跌宕摇曳，语言朴素流畅，生动活泼，“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陈祚明《采菽堂诗选》）。比兴、铺排、幻想等多种手法的运用，显示出浓郁的民歌风味。它和后来的《木兰诗》，堪称我国乐府民歌中的双璧。（吴小林）

【步虚词】乐府篇名。《乐府诗集》列入卷七八《杂曲歌辞》。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步虚词》，“道观所唱，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庾信、隋炀帝、吴筠等均有拟作。（李泉）

【上山采蘼芜】汉乐府民歌篇名。《乐府诗集》中未收。最早见于徐陵《玉台新咏》，作“古诗”。《太平御览》引此诗，作“古乐府”。此诗通篇问答，其体例在乐府诗中较多，在古诗中则未曾见及，故作“古乐府”为宜。“蘼芜”，又名“江离”，一种香草名，叶子干后可作香料。该作是一首弃妇诗，但与《诗经》和汉乐府中其他的弃妇诗着重写丈夫弃妻过程或抒发弃

妇的哀怨之情不同,主要通过弃妻路遇故夫,相互问答,揭露男子喜新厌旧而又怨新不如旧、朝三暮四的卑污灵魂,在反映古代妇女悲惨命运方面具有独特之处。“通章问答成章”(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四),人物说话声口毕肖,活灵活现。又通篇对比,有助于刻画人物,深化主题。语言质朴简练,用笔含蓄委婉。在艺术上亦别具一格。(吴小林)

【十五从军行】乐府篇名。《乐府诗集》收入卷二五《横吹曲辞》,题作《紫骝马歌辞》。在“十五从军征”句前另有八句与本篇无关的诗句,可能是晋代入乐时所加。《古今乐录》说:“‘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诗。”诗或为汉魏间大动乱时的民歌,反映了长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与《东山》《战城南》等反战名篇相比,本诗在揭露战乱恶果的深刻性上有新颖独到之处。此诗用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方法,以一“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兵为例,揭示了统治者暴力推行超长服役制的残酷和不人道:它无视人性,剥夺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正常的生活内容和权利,因而诗作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通过个别反映整体的典型化手法,也深为后世关注现实人生的诗人所喜用,在王粲《七哀诗》、杜甫《垂老别》、《无家别》,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等诗作中,均可见其影响。该诗以叙事为主,从具体景物、事件和动作的叙写中,自然质朴地流露情感,富有艺术魅力。(李泉)

【淮南王歌】汉代歌谣名。始见于《汉书·淮南王传》。《乐府诗集》收入卷八四《杂歌谣辞》。内容为讽刺汉文帝兄弟相残。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长是文帝异母弟,于文帝六年(前174)谋反,被废为庶人流放蜀郡(今四川),途中刘长绝食身亡。于是,文帝十二年民间开始流传这首歌谣。辞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辞高诱《淮南子叙》录作:“一尺缙,好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歌辞用语俚俗,直承《诗经》国风兴而比的手法,以细微而又不值钱的一尺布、一斗粟起兴作比:穷苦人家,有尺布、斗粟即可共衣食相处和睦,而刘恒、刘长贵为帝王,富甲天下,却还要兄弟相争,彼此残杀。末句与前相对比,揭示题旨,讽刺有力。(李泉)

【城中谣】汉代歌谣名。始载于《后汉书·马廖传》,《玉台新咏》卷一选录题作《童谣歌》,《乐府诗集》载入卷八七《杂歌谣辞》。清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曰:“《后汉书》:前世长安《城中谣》,言改政移风,必有所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据此,歌谣始传唱于西汉都城长安。词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

帛。”讽咏了当时长安城内贵族妇女所时尚的高发髻、阔眉毛、大袖筒的妆饰。由于“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的对应规律,京城时妆被四方各地争相效仿,而且变本加厉地发展到了可笑的地步。歌谣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上行下效、恶滥蔓延的社会风气。东汉马廖曾引用这首歌谣来说明“吏不奉法,良由漫起京师”(《后汉书·马廖传》),认为一切不良风气、腐败现象的滋延,其根源皆在统治者的倡导。由此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六句歌词都是比喻,用形象来发议论,加上适当的夸张,遂使这首民歌在辛辣的讽刺中带着几分含蓄和幽默。

(李泉)

【京都谣】汉代歌谣名。始见于《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是一首评议时政的民谣。东汉顺帝死后,继位的冲帝、质帝各在位一年也都相继夭亡。为立嗣君,宫内朝中展开激烈争夺。太尉李固忠正鲠直,力主迎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为帝;外戚、大将军梁冀为操纵朝政,竭力主张迎立年幼的蠡吾侯刘志。而其他朝官如司徒胡广等则附和梁冀。最终梁冀获胜,刘志即位为汉桓帝。就在桓帝登基的当天,李固即遭梁冀杀害,而后又被暴尸路边。对照之下,附会梁冀的胡广、赵戒、袁汤等人却都一一晋爵封侯。京都洛阳的老百姓为如此不公的现实而愤激难平,遂编此歌谣(参阅《后汉书·五行志》)。“直如弦”喻李固守正被害,“曲如钩”指谄媚逢迎的胡广。贴切生动的比喻,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李泉)

【桓灵时童谣】汉代歌谣名。也称《灵献时人语》、《时人为贡举语》。见于晋葛洪《抱朴子·审举篇》。词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鸡”一作“龟”)《乐府诗集》辑录其中的前四句,收入卷八七《杂歌谣辞》,并于“题解”中引《后汉书》曰:“桓灵之世,更相滥举,人为之谣。”童谣反映的是东汉桓、灵帝时,官吏贪赃受贿、朝廷卖官鬻爵,以至选举、用人名实不符、污滥不堪的政治现实。全篇语调犀利,比喻贴切,讽刺意味鲜明强烈。(李泉)

【古诗十九首】汉五言组诗名。梁萧统将佚名失题而又内容风格相近的十九首五言古诗编入《文选》卷二九之“杂诗”类,题名《古诗十九首》,专名从此确立。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将其中八首列于西汉枚乘名下,不确。据诗中描写洛阳情景与诗之技巧,断定其产生于顺、桓二帝后、建安前,是可信的。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多为社会下层失意之读书人。内容大致分为“别情”与“宦情”两类:前者抒写游子思妇离别相思之苦,后者表现作者宦途失意、伤时忧

己之悲。组诗内容虽较狭窄,但尚能从侧面反映汉末动乱之世与当时下层文人的生活感情。其艺术成就颇高,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能以生活中典型细节抒发曲折复杂的思想感情,并能把叙事、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达到和谐境地。语言平易,不假雕饰,却又警策自然,深衷浅貌。应视为我国早期文人五言诗之典范。南朝梁钟嵘称其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可见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之地位。(李如鸾)

【行行重行行】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一。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为用第一人称抒发对丈夫渴念之情的思妇诗。前八句追叙初别情景,后八句写相思心情。全诗饱含时代悲思,比兴恰切,虚实参错,感情哀婉,虽为文人之作,但仍保持古代民谣风格,堪称一唱三叹、余音不尽的离别之曲。清方廷珪评:“顿挫绵邈,真得风人之旨。”(《文选集成》)贺贻孙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以下十二句,字字皆诉生别之苦。末云‘努力加餐饭’,无可奈何,自慰自解。不怨之怨,其怨更深,即唐人所谓‘减怨似无忆’也。通篇唯‘浮云蔽白日’五字稍露怨意,然自浑然无迹。余皆温柔婉恋,使人不觉为怨,真可以怨者也。”(《诗筏》)(李如鸾)

【青青河畔草】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二。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为思妇诗。开篇写思妇眼中春景,“盈盈”四句正面写思妇姿容丽质,“昔为”二句叙写身世愁怀,结尾二句见出思妇难耐空闺凄凉寂寞。全诗写景、叙事渗透诗人真挚感情;思妇形象鲜明;双字句连绵而下,实属罕见。洪亮吉称:“古诗《青青河畔草》一篇,连用叠字,盖本于《离骚》、《九章》之《悲回风》。”(《北江诗话》卷五)方东树谓“此诗以叠字为奇,凡三换势。”(《昭昧詹言》卷二)严羽评为:“‘青青河畔草……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沧浪诗话·诗评》)贺贻孙则云:“《十九首》之妙,多是宛转含蓄。然亦有直而妙,露而妙者:‘昔为倡家女,……空床难独守’是也。”(《诗筏》)(李如鸾)

【西北有高楼】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五。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诗抒写失意者知音难遇之叹。开篇四句写楼阁高耸而华美,是诗人所见。中间八句先概说弦歌者之悲和由此推想歌者的身份与遭际,再描写听曲全过程,这是诗人所闻。结尾四句,诗人发出知音难遇的叹息,热切希望与歌者比翼双飞,挣脱污浊尘世,是诗人所感。全诗意境缥缈空灵,色调悲凉凄婉。作者对人物形象“不着一字”,但

“尽得风流”。诗中那独处深闺中女性内在与外在美,那落拓潦倒之士的气度与襟怀,宛然如在。明陆时雍评曰:“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古诗镜》)方东树称:“此言知音难遇,而造境创言,虚者实证之,意象笔势文法极奇,可谓精深华妙。”(《昭昧詹言》卷二)贺贻孙云:“《西北有高楼》一篇,皆想象之词。阿阁之上,忽闻弦歌,凭空摹拟,幻甚。此下皆描‘悲’字之神。‘无乃杞梁妻’,惆怅疑似,妙不可言。‘清商随风发’四句,肉竹之外,别有妙理,此知音者所以难也。盖歌者既苦,则知音自稀,伤知稀即所以惜歌者也。一种幽怨全从言外得之。”(《诗筏》)(李如鸾)

【涉江采芙蓉】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六。五古。见《文选》卷二九。征人思归之作。全诗八句。开篇“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谓客子涉水采莲,又到兰泽撷取兰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谓采芳是要遗远。“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客子“远望可以当归”,但故乡渺邈,心愿难遂,徒增感伤而已。结尾“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将有家归不得的难言之隐曲曲传出。“一语罄衷,最为简会”(陆时雍《古诗镜》)。全诗构思精巧,含蓄蕴藉,古朴无华,思想和艺术都显然受到楚辞影响。陆时雍称此诗“落落有致,绵绵情绪”(同上);方东树亦称“此诗节短而托意无穷,古今同慨”(《昭昧詹言》卷二)。(李如鸾)

【明月皎夜光】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七。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为失意之士秋夜即兴之作。诗凡十六句,前半写景,后半叙事抒慨。诗人有感于萧瑟秋景正如自己落寞心境,故以悲秋起兴;并以时节之变衬托人情之变,寄托世态炎凉之慨。构思新巧,转换自然,情景交融,手法高妙。清方廷珪谓:“此刺富贵之士,忘贫贱旧交而作。”(《文选集成》)李因笃评:“俯仰寥阔,忧从中来,感时序之易移,悲草虫之多变,而故交天上,远者日疏;星汉悠悠,修名自悼,其大指如此。”(《汉诗音注》)(李如鸾)

【迢迢牵牛星】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十。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为变相思妇诗。开篇以对句将构成悲剧之二形象牵牛、织女推到读者目前。“纤纤”二句扣住织女形象,以其勤于机杼突现其擅长劳作,以其手巧善织寄托对其美好感情。“终日”二句诗意一转,预设伏线。结尾四句谓银河清浅,却只能相望而不得相语,揭出“终日不成章”之原由。全诗共用六叠词,加强语言音乐美。此外,状写形象善于表现内心世界,布局谋篇亦费巧妙经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清李因笃评:“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

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汉诗音注》)陆时雍谓:“追情妙绘,绝不费思一点。”(《古诗镜》)方东树称:“此诗佳丽,只陈别思,旨意明白。妙在收处四语,不着论议,而咏叹深致,托意高妙。”(《昭昧詹言》卷二)张庚则曰:“《青青河畔草》章双叠字六句,连用在前;此章双叠字亦六句,却有二句在结处,遂彼此各成一奇局。”(《古诗十九首解》) (李如鸾)

【回车驾言迈】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十一。五古。见《文选》卷二九。诗写客游失意者的人生咏叹,正如贺贻孙云:“《回车驾言迈》篇,感寿命之不常,而欲以荣名为宝。”(《诗筏》)全篇情文并茂,景理结合,具有哲学意味。吴淇称:“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诗反将一片艳阳天气,写得衰飒如秋,其力真堪与造物争衡,焉得不移人之情?”(《选诗定论》)方东树亦云:“意旨极明白,而气体高妙,语质而豪宕,更胜妍辞丽色。”(《昭昧詹言》卷二) (李如鸾)

【客从远方来】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之十八。五古。见《文选》卷二九。此诗写伉俪情深。篇中多用谐音双关手法,如以“长相思”代指丝棉,“思”与“丝”谐音,“长”与“绵绵”同义,“缘”具有“姻缘”的引申义,又以“结不解”表示无法解开,用以象征爱情,颇有民歌特色。全诗“极缠绵之致”(陆时雍《古诗镜》)。前人对其章法、立意皆有好评。方东树云:“结句以正意结上喻物。‘此’即指上喻物也。……‘相去’二句,夹在此为文法。后人必置此于‘胶漆’句上,而文势平近无奇矣。”(《昭昧詹言》卷二)朱筠称:“于不能合欢时作合欢想,口里是喜,心里是悲。更‘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无中生有,奇绝幻绝。说到此,一似方成鸾交,未曾到别离者。结曰‘谁能’,形神俱忘矣。”(《古诗十九首说》) (李如鸾)

【明月何皎皎】 汉诗篇名。《古诗十九首》最末一首。五古。见《文选》卷二九。诗写客子思归,一说思妇念远之作,亦可通。方东树云:“客子思归之作。语意明白。见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画。”(《昭昧詹言》卷二)诗用第一人称,两句一意,或承或转,平韵到底。其显著特色是用人物行动表露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如张庚所云:“因‘忧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既‘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户’,既‘出户’而‘徬徨’,因徬徨无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层次井井,而一节紧一节,直有千回百折之势,百读不厌。”(《古诗十九首解》)正是这一连串动作,成功地刻画了游子形象。 (李如鸾)

【苏李诗】 组诗名。传为苏武、李陵七首赠答诗。《文选》卷二九录有西汉李陵《与苏武三首》,苏武《诗四首》(其中“结发为夫妇”一首,又见于《玉台新咏》卷一题作苏武《留别妻》)。纯作五言体。自六朝始,

代有学者指出,诗乃后人依托之作。(参见《文心雕龙·明诗篇》、《东坡全集·答刘沔都曹书》、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今之研究者亦多认为,西汉前期决无此种成熟的五言诗体,诗或产生于东汉末年,作者已不可考。今人余冠英说:“这些诗大都写朋友、夫妇、兄弟之间的离别,可以总题为《别诗》。”(《汉魏六朝诗选》卷一)符合诗的实际。诗篇“言情叙别”,风致婉约清新,情意自然真切,钟嵘《诗品》卷上说它“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有较高的艺术性。除《文选》所载,《古文苑》又收有李陵《录别诗》八首,苏武《答诗》、《别李陵》各一首,后世或题作“拟苏李诗”。 (李象)

【子夜歌】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四。“吴声歌曲”简称“吴歌”,系流传于长江下游,即今江苏南京(古称建业)一带的南朝民歌。《子夜歌》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说明作曲者是晋代一个名叫子夜的女子,而歌词则为佚名的群众创作。《子夜歌》为南朝民歌的代表作。现存晋、宋、齐三代歌词共四十二首。内容多反映市民生活情调,以妇女的口吻歌唱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形式上为五言四句,多用双关隐语和形象的比喻,如:“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匹”是双关语,以织丝不成匹段隐喻情人不成匹配。又如:“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梧子”即指梧桐树的子实,谐“吾子”,指男方。《子夜歌》大多写得生动活泼,巧妙有趣,充分体现出南朝民歌的特殊风格。例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写出了一位思欢女子想得入神,恍恍惚惚中似乎听到爱人断断续续的呼喊声,以至不由自主地答应起来。“虚应空中诺”揭示出女子思念爱人的痴迷程度,描绘出她的痴憨情态,使人于可笑可怜之余,获得一种妙不可言的审美满足。 (诸天寅)

【子夜四时歌】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四。《子夜四时歌》简称《四时歌》,又称《吴声四时歌》,是从《子夜歌》变化出来的一种歌唱四时的曲调。《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现存晋、宋、齐歌词共七十五首,其中春歌、夏歌各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内容系写妇女在一年四季里的生活和思绪,均能结合不同季节和景物的特点表达各种细腻的生活情感。语言清新秀丽,委婉动听。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春歌》)“青荷盖绿水,芙蓉葩红

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夏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秋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一作‘似’)?”(《冬歌》) (诸天寅)

【**大子夜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五。《大子夜歌》也是《子夜歌》的变曲。《乐府诗集》所收共二首：“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都是赞美《子夜歌》的善于表情达意，开以诗论诗之先河。第一首侧重说明《子夜歌》不加雕饰，清新自然。第二首则是说丝竹要借助乐器的力量才能够发出清朗的乐声，哪里赶得上《子夜歌》的美妙，它能够直接表达出内心的真情实感。“声势出口心”，一说作“声势出由心”。 (诸天寅)

【**上声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五。《古今乐录》曰：“上声歌者，此因上声促柱得名，或用一调，或用无调名。如古歌辞所言，谓哀思之音不及中和，梁武因之改辞，无复雅句。”《乐府诗集》所收《上声歌》晋、宋、齐歌词共八首。内容系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八首诗有一定的连续性。大致是说上声歌的曲调为男方所作，女方为了表示感谢，特意在宴饮时高歌一曲上声歌。以下便是回忆双方的恋情，表现得情意绵绵，感人至深。如：“新衫绣襦裆，连著罗裙里。行步动微尘，罗裙随风起。”“襦裆与郎著，反绣持贮里。汗汗莫溅浣，持许相存在。”“春月暖何太，生裙连罗袜。暖暖日欲冥，从依门前过。” (诸天寅)

【**欢闻变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五。《古今乐录》曰：“欢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儿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不，声既凄苦，因以名之。”由此可知，《欢闻变歌》是一种曲调凄苦悲凉的哀歌。《乐府诗集》收有《欢闻变歌》六首，内容系写爱情生活中的失意以及对情爱的忠贞不渝。多用比喻，尤善以舟渔生活设喻，形象鲜明生动，或为水乡之渔歌。如：“张罾不得鱼，不棹罾空归。君非鸬鹚鸟，底为守空池。”“刻木作班鸬，有翅不能飞。摇着帆樯上，望见千里矶。”“饿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诸天寅)

【**丁都护歌**】一作《丁督护歌》。①南朝乐府民歌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四五《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该书引《宋书·乐志》曰：“《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旰收殓殓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旰至阁下，自问敛送之

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今存歌词五首，内容为督护出征送别情事，与《宋书·乐志》所言本事不合。《乐府诗集》和《玉台新咏》均题宋武帝作，从某些诗的内容和口吻看，亦不足信。其中第四首“督护初征时，依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和第五首“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渚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较为著名。前者借用商妇死后变作石尤风阻人行旅的传说，表达送行妇人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望，后者直抒胸臆，倾吐女子送别征人时的悲痛心声，想象新奇大胆，感情真率浓烈，富有民歌特色。后唐代李白用《丁督护歌》写社会现实情况，是对此乐府旧题的发展创造。②唐诗篇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六。作年众说纷纭，迄今无定论。当为诗人游云阳(今江苏丹阳县)时，目睹船夫在炎热的天气里逆水运石的苦况，耳听他们拉纤时哼着哀怨的《丁都护歌》，有感而作。诗分三层，第一层泛写船夫拖船之苦，第二层进一步叙写船夫拉纤时的干渴之苦，第三层作者抒发感叹，总结全诗。诗中叙事和抒情交错结合，描写真切，感慨深沉，是李白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代表作。《唐宋诗醇》评该诗曰：“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 (吴小林)

【**丁督护歌**】见“丁都护歌”。

【**团扇郎**】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五。《古今乐录》曰：“《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珣捉白团扇，与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珣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鸬鹚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后人因而歌之。”说明歌名来自一段曲折哀婉的爱情故事。《乐府诗集》收有《团扇郎》六首。内容系写利用团扇可以祛暑遮阳，夏不离手，暗喻情爱的深笃。如：“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飏(或作“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以上二首，《玉台新咏》卷一〇作《桃叶答王团扇歌》)另收有“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一首，即据《古今乐录》所记谢芳姿所作之意而改成，《玉台新咏》卷一〇作《桃叶答王团扇歌》。 (诸天寅)

【**碧玉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五。《乐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乐府诗集》收《碧玉歌》三首，又同题二首。前三首为：“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碧玉小家女,不敢贵德攀。感郎意气重,遂得结金兰。”同题二首为:“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杏梁日始照,蕙席欢未极。碧玉奉金杯,绿酒助花色。”歌中表现了大胆热烈的情愫,意趣盎然。其中“破瓜”系旧时文人拆“瓜”字为二八字以纪年,谓十六岁。“小家碧玉”后成为喻称平民家少女的成语。

(诸天寅)

【懊恼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六。《古今乐录》曰:“《懊恼歌》者,晋石崇绿珠所作,唯‘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后皆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乐府诗集》所收共十四首。《懊恼歌》又作《懊恼歌》、《懊恼歌》。“懊恼”是烦闷之意。其歌产生于江南民间,为东晋及南朝时流行于长江下游一带的歌谣。内容多描写爱情遭受挫折的苦恼与怨恨,但也有以轻松笔调,抒写旅途之畅快舒适感受的,如:“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其中第一首:“丝布涩难缝,令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相传为西晋石崇妾绿珠所作。另最后两首并非五言四句:“山头草,欢少四面风,趋使依颠倒。”“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依与汝。”据《古今乐录》曰:“宋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齐太祖常谓之中朝曲。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敕法云改为相思曲。”《宋书·五行志》曰:“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师,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人皆有所获焉。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抱,信矣。”这里谈及东晋桓玄代晋自立,兵败自杀后,其家族及同党之家子女妓妾的悲惨遭遇。唯所引之“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一首未见收入十四首之中。

(诸天寅)

【华山畿】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六。《古今乐录》曰:“《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说明歌名的由来是根据华山附近一对男女情死的故事。《乐府诗集》收歌词二十五

首,其中第一首相传即为此女所唱。其余二十四首,内容大多写男女间的相思之情和爱情不能如愿的苦痛心情,但与《古今乐录》所述传说已无关。这二十五首歌词中五言四句者仅一首,其余三五五句式者凡十首,五言三句者凡十三首,另一首为三五五五五之句式。句式的变化,说明表情达意的灵活性,且已有后世词之小令之意味。如:“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啼相忆。泪如漏刻水,昼夜流不息!”据1992年春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和镇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联合采风调查组进行的民间文化采风调查,丹徒县石桥乡华山村应是民歌《华山畿》的真正发生地。

(诸天寅)

【读曲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六。《宋书·乐志》曰:“《读曲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古今乐录》曰:“《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按义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南齐时,朱硕仙善歌吴声《读曲》,武帝出游钟山,幸何美人墓。硕仙歌曰:‘一忆所欢时,缘山破伤荏。山神感依意,盘石锐锋动。’帝神色不悦曰:‘小人不逊,弄我。’时朱子尚亦善歌,复为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观骑立踟蹰。太阳犹尚可,且愿停须臾。’于是俱蒙厚赏。”由此可知,《读曲歌》起于宋元嘉十七年(440)。《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读曲》又作《独曲》(《玉台新咏》)卷一〇录“柳树得春风”一首,题为《独曲》,《独曲》意即徒歌,其特点是演唱时不奏乐器。内容多写女子怀人,感情真挚、热烈,常用双关隐语。如:“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依绪?”其中“星不亮”,隐“心不谅”。“明”字双关,既是照明的“明”,又是表明的“明”。有的构思新巧,夸张大胆而适度,如“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八十九首中有三五五句式者,凡十二首,如:“折杨柳。百鸟啼园林,道欢不离口。”《读曲歌》歌词保存量较大,与《子夜歌》同为南朝民歌中的代表作品。

(诸天寅)

【春江花月夜】①南朝乐府篇名。陈后主(陈叔宝)作。见《乐府诗集》卷四七《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唐书·音乐志二》曰:“《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原词已佚,后世有隋炀帝杨广、唐张子容、张若虚、温庭筠等人的拟题之作,其中以张若虚所作最为著名。②唐诗篇名。七古。张若虚作。见《全唐诗》卷一一七。该作突破原题宫体藩

篱,另辟新径。全诗分三段,首段八句描绘春江月夜之景,意境优美;次段八句抒写人生感慨,寓意深邃;末段二十句为诗之主旋律,叙写离别相思之苦,情韵无限。诗中紧扣题面“春江花月夜”,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语言清新流利,音韵宛转悠扬,一洗六朝浓脂艳粉,为初唐七古杰作。明胡应麟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诗薮》内编卷三)钟惺评此诗云:“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唐诗归》)清王闿运称该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近人闻一多誉之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吴小林)

【玉树后庭花】 南朝乐府篇名。陈后主(陈叔宝)作。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七。其题解称:“《隋书·乐志》曰:‘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骠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五行志》曰:‘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辞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南史》曰:‘后主张贵妃,名丽华,与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并有宠,又以宫人袁大捨等为女学士。每引宾客游宴,则使诸贵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千数歌之。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乐府诗集》所收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其词曰:“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内容系赞美其妃嫔的姿色娇艳,光彩照人。陈叔宝终日沉溺于声色,陈朝不久即为隋所灭,《玉树后庭花》遂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唐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即指此曲。(诸天寅)

【黄竹子歌】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七。唐李康成曰:“《黄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时吴歌也。”《乐府诗集》收《黄竹子歌》一首:“江边黄竹子,堪作女儿箱。一船使两桨,得娘还故乡。”这首民歌很像一首简短明快的船夫曲。歌中以男青年船夫的口吻唱出得到一位好姑娘作配偶,双双乘船回归故乡的欢快心情。歌中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写见到江边的黄竹,便联想到砍伐后可以用来制作姑娘的箱笼,箱笼里装上嫁妆,便可以一同上路了。“一船使两桨”句,表明划

船时的用力,意欲船速加快,好早些同姑娘一起回到故乡。格调刚健清新,充分表现出天真活泼的特点。

(诸天寅)

【神弦歌】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见《乐府诗集》卷四七。《古今乐录》曰:“《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圣郎》,四曰《娇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采莲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神弦歌》为南朝祭祀民间杂神所用的乐章,曲名系取“弦歌娱神”之意。《乐府诗集》收有《神弦歌》十一题十八首。每首二句到六句不等。其中以《白石郎》《青溪小姑》《采莲童》等曲文学意味较为浓郁。如《白石郎曲》之二:“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采莲童曲》之一:“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侣,齐声采莲歌。”(诸天寅)

【青溪小姑曲】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为《神弦歌》之六,见《乐府诗集》卷四七。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曰:“会稽赵文韶,宋元嘉中(元嘉五年,428)为东(宫)扶侍,廨在青溪中桥。秋夜步月,怅然思归,乃倚门唱《乌飞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许,诣门曰:‘女郎闻歌声有悦人者,逐月游戏,故遣相问。’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暂过。须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许,容色绝妙,谓文韶曰:‘闻君善歌,能为作一曲否?’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下’,声甚清美。女郎顾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脱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连宴寝,将旦别去,以金簪遗文韶,文韶亦赠以银碗及琉璃匕。明日于青溪庙中得之。乃知得所见青溪神女也。”按干宝《搜神记》曰:“广陵蒋子文,尝为秣陵尉,因击贼,伤而死。吴孙权时,封中都侯,立庙钟山。”《异苑》曰:“青溪小姑,蒋侯第三妹也。”《乐府诗集》所收《青溪小姑曲》为:“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这是一首祭歌,表达了对小姑的怀念、敬重之情。一、二两句,写青溪小姑住处环境清静幽雅。三、四两句,写青溪小姑孤身独处的寂寞生活。此系四言体,语言明白如话,毫无雕饰之痕迹。(诸天寅)

【乌夜啼】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七。《旧唐书·音乐志》曰:“《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

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教坊记》曰：“《乌夜啼》，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阳。后有之，使未达，衡阳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此曲。”史书称临川王义康为江州，而云衡阳王义季，传之误也。《古今乐录》曰：“《乌夜啼》，旧舞十六人。”《乐府解题》曰：“亦有《乌栖曲》，不知与此同否？”《乐府诗集》收《乌夜啼》歌词八首，多写男女间难分难舍的恋情，与上述本事不符。如第八首为：“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执手与欢别，痛切当奈何！”第一句交代离别的地点，第二句写离别地点的环境，第三句言离别时的难以分手，最后一句写痛苦的心情。四句诗连贯起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诸天寅）

【乌栖曲】 ①南朝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四八《清商曲辞·西曲歌》。梁简文帝、梁元帝、萧子显、徐陵等人并有此题之作，内容多写男女欢爱。后唐代李白亦曾以此题为诗，讽刺古代帝王的荒淫生活。②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疑为初次游苏州时所作。词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口。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此诗描绘吴王夫差日夜欢娱情事，寓讽刺于客观叙写之中，意深词婉，不着痕迹，为李白七古中别具一格之作。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唐宋诗醇》卷二评曰：“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

（吴小林）

【莫愁乐】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八。《旧唐书·音乐志》曰：“《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因有此歌。”《古今乐录》曰：“《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乐府解题》曰：“古歌亦有莫愁、洛阳女，与此不同。”《乐府诗集》所收《莫愁乐》共二首，其第一首为：“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石城”，地名，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艇子”：指一种小船，此处指划船人。一、二两句以问答形式交代地点，十分活泼。后两句写划船人用力划动双桨，为的是赶快把莫愁姑娘接来。（诸天寅）

【石城乐】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七。《西曲歌》是构成南朝《清商曲》两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为《吴声歌曲》）。它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即今湖北省江陵、宜昌、襄樊一带，乐调较吴歌急促紧迫，因此在风格上

不像吴歌那样柔婉曲折。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有吴声和西曲两部，并且以这种女乐赏赐宠臣。可知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是当时的女乐。《乐府诗集》收《石城乐》一题五曲。《旧唐书·音乐志》曰：“《石城》，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古今乐录》曰：“《石城乐》，旧舞十六人。”由此可知《石城乐》的作者为宋代臧质。演奏此曲由十六人伴舞。“石城”，在竟陵郡，今湖北省钟祥县治。其第五首为：“闻欢远行去，相送方山亭。风吹黄檗落，恶闻苦篙声。”第一句中的“欢”，即所爱之人，此指女子所喜欢的男子。第二句中的“方山亭”，《太平广记》引《幽明录》：“东阳丁晔出郭，于方山亭宿。”是方山亭在东阳郭外。东阳即今浙江省金华县，距石城很远，东阳郭外的方山亭和此诗所称或非一地。后二句是双关隐语。“黄檗”是苦木，黄檗做藩篱可称“苦篙”，“篙”和“离”同音双关。（诸天寅）

【估客乐】 南朝乐府篇名。齐武帝（萧赜）作。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八。《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偷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旧唐书·音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乐府诗集》所收南朝《乌夜啼》歌词共五首。其一首为齐武帝所作：“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樊”指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邓”指今河南省邓县一带。这首诗是说齐武帝回忆布衣时曾游樊、邓，现在做了皇帝，踌躇满志，十分得意。唐代诗人元稹、张籍等有拟作。（诸天寅）

【襄阳乐】 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八。《古今乐录》曰：“《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449）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也。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又有《大堤曲》，亦出于此。简文帝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通典》曰：“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产为襄阳太守，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蛮夷顺服，悉缘沔而居，由此歌之，号《襄阳乐》，盖非此也。”《乐府诗集》所收《襄阳乐》共九首，内容均写男女恋情，其中女子当系来自扬州，故有“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依处。乘星冒

风流,还依扬州去”这样的诗句。(诸天寅)

【三洲歌】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八。《旧唐书·音乐志》曰:“《三洲》,商人歌也。”《古今乐录》曰:“《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其旧辞云:‘啼将别共来’。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肤浅所闻。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以不?’敕云:‘如法师语音。’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故歌。’歌和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旧舞十六人,梁八人。”《乐府诗集》所收《三洲歌》共三首,内容系写男女之间的缠绵感情,以女子的口吻写出愿意终生厮守,永不分离的美好愿望。如第二首为:“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诸天寅)

【采桑度】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八。其题解曰:“《采桑度》一曰《采桑》。《唐书·乐志》曰:‘《采桑》,因《三洲曲》而生,此声苑也。《采桑度》,梁时作。《水经》曰:‘河水过屈县西南为采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晋里克败狄于采桑是也。’梁简文帝《乌栖里》曰:‘采桑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古今乐录》曰:‘《采桑度》,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即非梁时作矣。’”《乐府诗集》所收《采桑度》共七首。按曲行歌叫度。这是产生在梁以前的一组舞曲歌词。内容多为描写春季采桑、养蚕活动,表现劳作的欢愉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如:“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把妇女们在劳动中愉快的心情和活泼不凡的身手尽情表现出来,给人以明朗健康的审美享受。(诸天寅)

【那呵滩】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九。《古今乐录》曰:“《那呵滩》,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其和云:‘郎去何当还’,多叙江陵及扬州事,那呵,盖滩名也。”《乐府诗集》所收《那呵滩》共六首。其中以第四、五首较著名。其诗曰:“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棹折,交郎到头还。”“篙折当更觅,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哪得到头还。”这两首诗写一对青年男女在江上摇橹对唱,先写女子的发誓,次叙男子的答辞,真切地描绘了徭役给船家带来的离别痛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下层人民朴实的情感。语言浅显,形式活泼。(诸天寅)

【拔蒲】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见《乐府诗集》卷四九。《古今乐录》:“《拔蒲》,

倚歌也。”倚歌无舞,是一种在乐器伴奏方面“悉用铃鼓,无弦有吹”的歌曲。《乐府诗集》收《拔蒲》二首。“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发桂兰渚,尽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蒲”,水生植物名,嫩蒲可食,又名香蒲。《诗·大雅·韩奕》中就曾提及:“其蔌维何?维笋及蒲。”《拔蒲》二首反映在湖中采拔香蒲的劳动生活场景。与《采桑度》一样表现出江南水乡的明媚风光以及下层人民的劳动生活与爱慕感情的交织。“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写得含蓄而风趣,给读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余地。(诸天寅)

【杨叛儿】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清商曲辞·西曲歌》类,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旧唐书·音乐志》曰:“《杨伴》,本童谣歌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旻随母入内。及长,为后所宠。童谚云:‘杨婆儿,共戏来。’而歌语讹,遂成‘杨伴儿’。”《古今乐录》曰:“《杨叛儿》送声云叛儿,教依不复相思。”《乐府诗集》所收《杨叛儿》共八首。内容均写男女恋情,多用比喻及双关隐语。如第二首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把所恋的男子比作沉香,把自己比作香炉,借以说明不可须臾分离,比喻新颖绝妙。又如第五首云:“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以“莲”谐“怜”,全诗以协商口吻写出,楚楚动人,爱意油然。后人的拟作,以李白的较为著名。(诸天寅)

【江南弄】南朝乐府篇名。梁武帝萧衍作。属《清商曲辞》,见《乐府诗集》卷五〇。《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风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约作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亦谓之《江南弄》云。”在南朝乐府中,梁武帝是大量拟作民歌的作者,《江南弄》便是一例。《乐府诗集》所收七首,均有和歌,即伴唱,如《江南弄》和云:“阳春路,娉婷出绮罗。”《龙笛曲》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这七首诗的内容大多写女子容颜美丽,歌舞技艺超群。在形式上为杂言。词句香艳旖旎,显系经过加工之作。如《江南弄》为:“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龙笛曲》为:“美人绵眇在云堂,雕金镂竹眠玉床,婉爱寥亮绕红梁。绕红梁,流月台,驻狂风,郁徘徊。”较多地堆砌华丽绮靡的词藻,缺乏清新活泼气息,其成就远不能与民歌等量齐观。(诸天寅)

【采莲曲】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五

○《清商曲辞·江南弄》。为梁武帝制《江南弄》七曲之一。《采莲曲》本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汉乐府《江南》。后世拟作颇多，内容多写江南妇女采莲的情状，其中以唐王勃、王昌龄等人所作较为著名。参见“江南弄”。②唐诗篇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共两首，均佳，第二首尤为著名：“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前两句言裙叶不分，人花莫辨，由此引出后两句写采莲少女隐入荷叶荷花丛中，望而不见，忽闻“歌声”，才知“有人”，美丽活泼之采莲女子形象活现纸上。全首紧扣题目，写人与写景融而为一，似有若无，显得诗味隽永，情趣盎然，且富民歌风味。明瞿佑引贡有初语评曰：“诗意谓叶与裙同色，花与脸同色，故棹入花间不能辨，及闻歌声，方知有人来也。用意之妙，读者皆草草看过了。”（《归田诗话》卷上）清黄牧邨亦云：“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意所本。‘向脸’字却妙，似花亦有情。乱入不见，闻歌始见，极清丽。”（《唐诗笺注》卷八）（吴小林）

【采菱曲】南朝乐府篇名。梁简文帝萧纲作。属《清商曲辞·江南弄》，见《乐府诗集》卷五一。诗曰：“菱花落复含，桑女罢新蚕。桂棹浮星艇，徘徊莲叶南。”描绘养蚕女在蚕事活动告一段落后，星夜驾船采菱的情景，写得比较清新自然，像一幅淡雅轻盈的水墨画。（诸天寅）

【西洲曲】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杂曲歌辞》，见《乐府诗集》卷七二。为无名氏作品。全诗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有的长篇。因首句为“忆梅下西洲”，故名。根据温庭筠写的《西洲曲》中“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的诗句推测，西洲当在武昌附近，或即武昌市西南方长江中的鹦鹉洲。《西洲曲》是一首情歌。由于它“声情摇曳而行回”（《古诗归》），有些诗句不很连贯，意思亦不显豁，所以对其内容历来有不同解释。细绎此诗当系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双方接唱式的长诗。从开头至“门中露翠钿”为第一部分，写男子托人寄梅给情人，为男子之歌。由“开门郎不至”到“海水摇空绿”为第二部分，是女子给男子带回的答复。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是男子得知女子对自己的深情之后的内心独白。诗中善于紧扣住季节和客观景物的变化来刻画人物的情感。“语语相承，段段相结，应心而出，触绪而歌”，被称为“言情之绝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全诗四句一转韵，诗韵谐和悠扬，婉转多姿，而且多用谐音双关、顶针等修辞手法，加强诗歌语言的音乐节奏感。这种婉约、细致的风格正体现了南朝民歌的

特色，是这一时期民歌最成熟最精致阶段的作品。

（诸天寅）

【长干曲】南朝乐府民歌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七二《杂曲歌辞》。长干，古建康里巷名，有大长干、小长干，大长干巷在今南京市中华门外，小长干巷在今南京市凤凰台南，巷西通长江。占辞共四句：“逆流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描写江边女子不怕风浪从事劳作的情景及其心理状态，清丽委婉，自然精妙，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反映妇女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佳作。后来唐代崔颢的《长干曲》、李白的《长干行》，或模拟该诗，或受其影响创作而成。（吴小林）

【出塞】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二《横吹曲辞·汉横吹曲》。该书引《晋书·乐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而《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根据《西京杂记》卷一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指出“高帝时已有之，疑不起于延年也”。现在一般认为其曲为汉武帝时李延年据西域乐曲改制而成。今存歌辞多为南北朝以来文人所作，内容写边塞征战生活，其中以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之一最为著名。唐人乐府中之《前出塞》、《后出塞》、《塞上曲》、《塞下曲》等题，亦由《出塞》演变而来，杜甫《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李白《塞下曲》六首，卢纶《塞下曲》六首，李益《塞下曲》为其中的优秀作品。②唐诗篇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诗题又作《塞上行》、《塞上曲》、《从军行》。共二首，以第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为著名。此诗批判边帅不得其人，致使征战不息，士兵久戍未归。清沈德潜评云：“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说诗碎语》）其首句抓住边塞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明月”、“关”，冠之以征战频繁的朝代名“秦”、“汉”，且以互文见义手法出之，精炼含蓄，发兴高远，向为人所传诵。后两句波折顿挫而又意脉贯通，承转亦佳。末句斩绝明快，收结高亢有力。全诗雄浑中见悲壮，激昂中透苍凉，为唐代边塞诗名作。清施补华称该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岷傭说诗》）。明李攀龙推之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见沈德潜《说诗碎语》）。杨慎则认为“此诗可入神品”（《升庵诗话》卷二）。（吴小林）

【入塞】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汉横吹曲》。现在一般认为其曲为汉武帝时李延年据西域乐曲改制而成。今存歌辞都为南北朝以来文人如北周王褒、隋何妥、唐刘希夷等所作，内容写将士从边塞返归情景。参见“出塞”①。（吴小林）

【折杨柳歌辞】 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鼓角横吹曲》是北方民族用鼓和角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其歌词作者主要是东晋以后北方的鲜卑族和氐、羌等族的人民。其中虽然也有汉语歌词，但绝大多数是用鲜卑等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直到北魏太武帝之后，北方各族和汉族在文化上进行了大融合，这些民歌经过翻译流传到南朝的齐、梁，并由梁朝的乐府机关保存下来，故称为《梁鼓角横吹曲》。《乐府诗集》所收《折杨柳歌辞》共五首，尤以第一首和第二首流传较广。“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古人有分别时折柳送行之风俗。据《三辅黄图》记：“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柳”与“留”同音，折柳表示挽留。第一首诗写行客儿自行折柳，表示不愿离去的心情，再用笛声强化忧伤的气氛，带有传统的民族特点，对后世诗歌影响甚大。如唐权德舆“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送陆太祝》），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均为用折柳与笛声来表现离愁别绪的名句。第二首写送郎的女子此刻也愁闷不乐。愿化作马鞭与情郎永不分离，设想奇妙，表现出深沉真挚的一片痴情。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离不开马，这是游牧生活的特点。诗中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人民豪爽、质朴的性格特点，自有一种粗犷豪放的韵味。（诸天寅）

【关山月】 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二五《横吹曲辞·汉横吹曲》。共收有梁元帝等写作的歌词二十四首。《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离别也。古《木兰诗》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内容多写兵士久戍不归与家人互伤离别的情景。②宋诗篇名。七古。乐府旧题。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八。诗曰：“和戎昭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此诗为淳熙四年（1177）陆游五十三岁在成都时所作。诗中用守边兵士的口吻，写出十五年来，宋人对金屈服，将军们只知一味欢娱歌舞，贪图享乐，而战士们的白骨却横在沙场。最后指出敌人的命运不会长久，沦陷区的人民正含着满眶热泪，盼望光复。这种强烈爱国思想的抒发，使此诗同陆游另一首名作《书愤》一样，广为后人传诵。（诸天寅）

【紫骝马歌辞】 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

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紫骝马歌》本乐府古题名，是北朝流行的一种民歌，《乐府诗集》收有六首歌辞。《古今乐录》说：“‘十五从军征’（即第三首）以下是古诗。”其第一、二首为：“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煞人。”“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第一首主要反映北朝轻视妇女，尤其轻视寡妇的社会风气。东魏时曾以寡妇配俘虏，可见其时歧视妇女风气之严重。“壮女笑煞人”是说年轻力壮的女子讥笑未婚的男子娶了寡妇。第二首用奇特的比喻，丰富的想象，来暗示远离家乡去从军的男儿，犹如飘零的树叶，难以回归旧枝。以上二首较质朴，反映出北方民歌的特点。（诸天寅）

【紫骝马歌】 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该书除收有《紫骝马歌辞》六曲，另有《紫骝马歌》一曲。《古今乐录》说：“与前曲不同。”其诗曰：“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郎锦襦裆，恒长不忘心。”诗中的前两句是以自然界的树木起兴，三、四句方是诗的主旨，即出行的郎君身上所穿的锦缎的背心（“襦裆”）当为女子亲手所缝制，希望他由背心的温暖想到做背心的人，彼此心心相印，永不相忘。另《乐府诗集》卷二四收有梁简文帝等所作《紫骝马》十九首。引《古今乐录》说：“《紫骝马》，古辞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又《梁曲》曰：‘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娘锦襦裆，恒长不忘心。’盖从军久戍，怀归而作也。”《古今乐录》中所引《梁曲》此诗，与《紫骝马歌》仅差一字，即第三句中的“郎”改变为“娘”。一字之差，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由女性变为男性，内容也由怀郎之作变为怀归之作，境界全非。（诸天寅）

【紫骝马】 见“紫骝马歌”。

【梅花落】 乐府篇名。属《横吹曲辞·汉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四。《梅花落》本笛中曲。按唐《大角曲》中也有《大单于》、《小单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声犹有存者。《乐府诗集》收有鲍照、吴均、陈后主等十人所作《梅花落》歌词。其中鲍照所作一首为：“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飏，徒有霜华无霜质。”诗中歌颂了梅花傲霜耐寒的品质，语句有长有短，灵活自然，不拘一格。（诸天寅）

【企喻歌辞】 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据《古今乐录》说：“《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北朝民歌反映的生活面比南朝

民歌广阔。由于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歌中对那时人民在动乱年代的生活状况有所反映。《企喻歌辞》第一首描写北方健儿的尚武精神,其诗曰:“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鸛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其意是说英雄好汉单人匹马也可闯荡江湖。第四首为:“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这是写从军者阵亡后,野死不葬的惨景,情调十分悲壮。据《古今乐录》说这一首是苻融所作。苻融是苻坚的季弟,氏族人。(诸天寅)

【琅玕王歌辞】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古今乐录》曰:“《琅玕王歌》,八曲。或云:‘阴凉’(第六曲)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觅冻浆。’最后(第八曲)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晋书·载记》:“广平公,姚弋兴之子,泓之弟也。”《乐府诗集》所收《琅玕王歌辞》共八首,内容大多反映北方尚武之风。其第一首为:“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此篇言武士对五尺刀的感情甚于对十五岁妙龄少女的爱慕,反衬出爱刀勇士的豪迈气概。其第八首为:“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此篇从快马难以驾驭入笔,运用烘云托月手法,写出骑士的骁勇威武。(诸天寅)

【陇头流水歌辞】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古今乐录》曰:“乐府有此歌曲,解多于此。”《乐府诗集》所收共三首;“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踰弱泥。”除第二首外,估计有脱文。“陇头”,陇山的顶上。陇山,又叫陇阪,在陕西陇县西北六十里。《三秦记》云:“陇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返。”汉张衡《四愁诗》第三愁开头三句:“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可见“陇阪”自古即以险阻著称。其中第二首极精当地表现了险峻的陇阪在行人心理上的威压。其描述方法符合“言有序”(《易·艮》)的要求,先概括描写,再具体写途中,再特写山顶,最后写心理感受,层次井然。全诗皆用民间口语,明白如话,易读易记。“脚酸”一词真实地写出攀登者的生理反应。(诸天寅)

【捉搦歌】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捉搦歌》共四首,捉搦,戏弄的意思。均是描述过时待嫁大龄女子的心理活动。其第二首云:“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媼。”由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不像汉族受封建礼教影响那

样深重,所以才能毫无顾忌地道出内心真情。其第三首云:“华阴山头百丈井,下有流水彻骨冷。可怜女子能照影,不见其余见斜领。”此篇构思巧妙,描写角度新颖。通过一个待嫁女子对井顾影的叙写,揭示出这女子迫切期待早日出嫁的焦躁心情。山下流水寒凉彻骨,正写出女子心头之凄冷。待嫁女子无人问津,期望得到爱怜而不得,其内心苦闷可想而知。(诸天寅)

【折杨柳枝歌】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共四首,是一组情歌。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北方情歌显得粗放和坦率,与南方情歌的秾艳柔靡大不相同。其中第二首最为有名:“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这种大胆直率的质问长辈,在汉族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类似例子的。其第三、四首为:“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其与《木兰辞》开头十分相似,当系当时民歌惯用手法。唯这位女子之所以停杼叹息,并非如木兰之替父从军,乃系忧虑阿婆许嫁的诺言何时兑现,只此二句,境界全出。(诸天寅)

【幽州马客吟歌辞】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共五首。第一首为:“佗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通过贫苦百姓对困苦生活的控诉,涉及到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幽州,在今河北北部一带。马客,赶马车的人。佗马即快马。剿儿指劳苦百姓。后二句是说金黄的干草可以使瘦马转肥,有了钱才能取得做人的资格。其不平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其第二首为:“荧荧帐中烛,烛灭不久停。盛时不作乐,春花不重生。”表现了及时行乐,良辰难再的思想。其第三首为:“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后二句也表现出北方女子的炽烈坦诚,毫不隐饰的情怀。(诸天寅)

【陇头歌辞】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见《乐府诗集》卷二五。共三首:“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一作“看”)秦川,心肝断绝。”这三首歌词与《陇头流水歌辞》极为近似,尤其是第一首,除第二句一作“山下”,一作“西下”,只一字之差,其余完全相同。“流离”,淋漓。言陇头流水四溢注下,淋漓酣畅。“欣城”,地名,未详。“秦川”,指关中,即从陇山到函谷关一带地方。三首所表现的是一位飘零者在攀登以险峻著称的陇头时的过程。第一首自伤

自嗟,孤寂难挨。第二首侧重写艰难程度,路长天寒,连舌都不敢伸出。第三首则写心理感受:心肝断绝。(诸天寅)

【木兰诗】 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古代长篇叙事诗杰作。《古今乐录》已著录此诗,后《乐府诗集》卷二五收录,属《横吹曲辞》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唐人韦元甫有拟作。该诗产生的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汉魏、南北朝、隋唐三种观点,现今学者大多认为它是北朝民歌,大约产生于北魏。虽曾经过后来文人润色,但仍保持着民间创作的鲜明特色。此诗叙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勤劳、热爱国家、鄙视功名的女英雄形象,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乐观主义精神,并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提出大胆挑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木兰的动人形象至今仍活跃在舞台银幕上。全诗剪裁精巧,繁简得当,叙写生动活泼,语言朴素流畅,句式灵动多变,既具浓厚的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又“事奇诗奇”(沈德潜《古诗源》卷一三),富有传奇性和浪漫主义气息,拟问作答、铺叙夸张、排比复叠等多样手法的运用,使该诗的民歌特点十分显著。明人胡应麟说:“五言之贍,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贍,极于《木兰》。”(《诗薮》内编卷一)它和《孔雀东南飞》共同体现出我国古代长篇叙事民歌的最高成就。后来杜甫《草堂》一诗后半叙写喜迁草堂情景,明显受到该诗描写家人迎接木兰归来所用铺排手法之影响。(吴小林)

【凉州词】 ①乐府篇名。又作《凉州歌》、《凉州》。见《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辞》。原为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一带的地方歌曲,唐开元中由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唐代诗人多以此调作歌词,描写西北塞上风光和征战生活,其中以王之涣、王翰所作最为著名。②唐诗篇名。七绝。王之涣作。见《全唐诗》卷二五三。共二首,以第一首更为著名。该首又见《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题作《出塞》。诗云:“黄河远上(一作“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前两句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描绘塞外景色,气象壮阔,意境苍茫。后两句巧引乐府《折杨柳》曲调抒写征人久戍不归的哀怨,词语委婉蕴藉。明杨慎评曰:“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卷二)胡应麟称该诗“极工”(《诗薮》内编卷六)。清管世铭云:七绝“摩诘、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胜收。王之涣独以‘黄河远上’一篇当之”(《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王士禛推此诗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带经堂诗话》卷四)。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就被广为传唱。③唐诗篇名。七绝。乐府旧题。王

翰作。见《全唐诗》卷一五六。共二首,以第一首更为著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写征人在边塞的宴饮场面,于豪爽中含悲壮情调。清沈德潜曰:“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唐诗别裁》卷一九)施补华云:“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岷僮说诗》)以前说为胜。此诗情味隽永,音节高亮,为唐代边塞诗中千古传诵之名篇。明王世贞称该篇为“无瑕之璧”(《艺苑卮言》卷四)。胡应麟则推之为初唐绝句之冠(《诗薮》内编卷六)。(吴小林)

【竹枝词】 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原为巴、渝(今四川东部)一带民歌,唐代诗人顾况、白居易、刘禹锡等依其声改作新词,内容多写风土人情和男女相思,形式为七言四句,语言通俗,音节谐美,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一五)。其中以刘禹锡所作最为著名,并盛行于世。后代仿效者很多,且用作词调名。②唐组诗名。七绝。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七。共两组,一组为九首,一组为二首。作于长庆二年(822)。其时刘禹锡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当地流行民歌《竹枝》,他认为“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竹枝词九首引》)。于是仿效屈原《九歌》而作《竹枝词》。或写当地风物,或咏男女爱情,情味隽永,音调浏亮,富有民歌风味。宋黄庭坚赞曰:“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其中以《竹枝词九首》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和《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两首尤为著名。前首兴中有比,比中有兴,形象地写出女子对恋人既热烈相爱又忧虑其易情的复杂心态。后首运用谐音双关手法,以天气的“有晴”、“无晴”捉摸不定,描写女主人公无法确定对方恋情的迷惘不安心理。两首都写得情真意切,语语可歌,极富美感。明谢榛评“东边”二句曰:“措词流丽,酷似六朝。”(《四溟诗话》卷二)刘禹锡《竹枝词》对后世影响颇大,宋代苏轼、叶适、元代杨维桢、清代郑燮等人均有仿作。

(吴小林)

【杨柳枝词】 ①乐府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本为汉横吹曲《折杨柳》和梁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歌》,至唐易名《杨柳枝》,开元时已入教坊,白居易、刘禹锡翻为新声,内容虽主要仍为咏杨柳以抒怀,体制则改成七言四句,“词章音韵,听可动人”(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唐代作《杨柳枝》者除白、刘较为著名外,还

有张祜、薛能、温庭筠、李商隐等多人。后沿用为词调。②唐组诗名。七绝。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七。共两组,一组为二首,约作于长庆二年(822)夔州刺史任上;一组为九首,约写于大和六年(832—834)任苏州刺史期间,是与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的唱和之作。其中以《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较为著名。此作为组诗的序曲,表现作者的文学革新精神。词意精警,技法圆熟,语言整齐中具流动之美。是其《杨柳枝词》组诗中的代表作。(吴小林)

【吴孙皓初童谣】三国时民谣篇名。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又见《乐府诗集》卷八八《杂歌谣辞·童谣》。这首歌谣四句五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孙皓(242—283)是三国吴国的末代皇帝,公元264—280年在位。他专横残暴,奢侈荒淫,即位的第二年下令迁都武昌,并要沿途百姓逆江而上,运输财物,供其享用。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六路出兵攻吴,他归降称臣,封归命侯。建业,原东吴都城,今南京市南。武昌,今湖北鄂城县。此谣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人民的怨恨心情以及与统治者的对立情绪。他们眷恋故乡,宁愿老死于建业,也不去武昌定居。(诸天寅)

【陇上歌】晋代民歌篇名。见《乐府诗集》卷八五《杂歌谣辞·歌辞》。《陇上歌》又称《陇上为陈安歌》,歌曰:“陇上壮士(一作健儿)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壮士同心肝。驽骀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驽骀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这首歌谣是歌颂和悼念抗敌英雄陈安的哀歌。公元318年,南匈奴人刘曜在长安称帝,建立前赵政权,随后入侵东晋领土。陈安是晋南阳王司马保的部将,领兵全力抵抗匈奴族的入侵,多次与刘曜战于甘肃天水一带。东晋初大兴元年(318),陈安被刘曜包围在陇上,突围南走陕中,刘曜派猛将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赶。安与壮士十馀骑奋力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斩于涧曲。他牺牲后,陇上百姓作此歌谣表示悼念。篇中用极为简练的笔墨刻画了陈安的外貌特征和作战的勇猛,突现出抗敌英雄的鲜明形象。“为我外援而悬头”句是说陈安从陇西突围出来,准备去调上邦(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南)的军队来解陇西之围,但突围之后才知道这两地已被敌人攻破,于是不得已南走陕中,导致被俘遇难。歌中最后用流水逝去比喻陈安长逝。(诸天寅)

【苏小小歌】南朝民歌篇名。属《杂歌谣辞·歌

辞》,见《乐府诗集》卷八五。又作《钱塘苏小小歌》。《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其歌曰:“我(一作妾)乘油壁车,郎乘(一作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油壁车,即用油纸装饰的香车。西陵松柏下,指杭州西陵,是苏小小墓址所在,另一说在嘉兴。苏小小虽为身处底层的歌妓,但仍追求生死不渝、永结同心的爱情,其美好之愿望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重视。除此诗外,唐代李贺、温庭筠、张祜等人均有同题之诗。宋代何逊《春渚纪闻》中,记有司马才仲夜梦美女故事,称之为“唐(代)苏小”。话本《钱塘佳梦》和《西湖佳话》中的《西泠韵迹》,也写苏小小故事。(诸天寅)

【李波小妹歌】北朝民歌篇名。又称《广平百姓为李波小妹语》。见冯惟讷《古诗纪》卷一〇九,另见《魏书·李安世传》:“广平(今河北曲周县北)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公私成患……李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馀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但这首民歌中却对李波之妹极力赞美,可能李波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首领人物。其歌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是一首没有收入《梁鼓角横吹曲》的北朝民歌,估计是北方汉族的歌谣,反映了当时居住在北方的汉族由于不断的战争也养成了尚武的风气。其重点是赞颂李波小妹精于骑射的武艺。通过敛裙骑马奔驰和左右开弓一箭双雕两个特写镜头,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李波小妹飒爽英姿的生动形象。(诸天寅)

【敕勒歌】北朝乐府民歌篇名。属《杂歌谣辞·歌辞》,见《乐府诗集》卷八六。《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其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族居住在朔州(今山西西部)一带。北齐神武帝高欢,在一次集会上,下令敕勒族酋长斛律金唱这首歌,他自己也跟着伴唱。此诗生动描绘了我国北方大草原辽阔、苍茫的景象,展现了当时游牧民族地区水草丰茂、牛羊繁盛的美好风光。起首二句即以直率热情的语言交代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阴山下,指内蒙古高原南麓,其地“草木茂盛”(《汉书·匈奴传》),是天然的放牧场所。三、四句以巧妙的比喻描摹出敕勒川的独特风貌。五、六、七三句,展示出无边草原上牛羊出没的美好景象。全诗很少雕饰,

浑然天成,形象鲜明,气魄很大,充分体现出英爽豪迈的风格。金代诗人元好问评此诗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精辟地道出了此诗的佳处。(诸天寅)

【黄牛峡谣】 古代民谣篇名。见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这是一首写三峡风光的民谣,描述了山重水复的奇异景色。“三峡”,指长江流经四川湖北之间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长约二百多公里,为长江著名的奇景。“黄牛”,峡名,在今湖北省宜昌县西北,是三峡中最为险要之境。峡内高崖上有石纹颇像一人牵一牛,人带黑色,牛带黄色,黑黄分明。这里江水曲折迂回,水流湍急,早晨开船时能望见它,至晚停船时仍能望见它,往往船行三天三夜,还能望见崖上的黄牛。这首歌谣系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中所引,与文字记叙相配合,增添了三峡险峻形势的可信性。歌谣简短扼要,三次重复“黄牛”一词,令人一唱三叹,感到韵味无穷。(诸天寅)

【三峡谣】 见“黄牛峡谣”。

【杂诗】 ①汉诗篇名。五古。孔融作。见《孔少府集》。一说李陵作。所谓“杂诗”,《文选》卷二九曰:“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历代文人作诗多有以此为题者。孔作共二首,第一首言志咏怀,第二首悲悼幼子夭折,写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②魏诗篇名。五古。曹丕作。见《魏文帝集》卷二。共二首,抒写游子思乡的苦闷,委婉清丽,富有情韵,为曹丕诗中的佳作。南朝梁钟嵘称其第二首“西北有浮云”“殊美赡可玩”(《诗品》卷中)。明王世贞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艺苑卮言》卷三)③魏组诗名。五古。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五。共六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不相关联,有怀人之嗟、飘泊之叹,也有才高不遇、壮志不遂之愤,以及闺怨等作。诗风慷慨沉郁。其中以第一首“高台多悲风”、第四首“南国有佳人”、第五首“仆夫早严驾”等较为著名。宋张戒评“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等篇云:“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岁寒堂诗话》卷上)。④唐组诗名。五律。沈佺期作。见《全唐诗》卷九六。共三首,均以思妇口吻写征戍之苦,蕴藉委婉,具有乐府民歌风味。其中以第三首最为著名:“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全诗属对精切,音节谐美,既一气呵成,又宛折跌宕,当初唐五律中之名作。此诗前四句被裁成乐府歌辞,收入《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辞·伊州歌》。⑤唐诗篇

名。七绝。无名氏作。见《全唐诗》卷七八五。其诗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该诗《乐府诗集》题为《金缕衣》,作李谿作;《唐诗别裁》题为《金缕词》,作李谿妾杜秋娘作,非是。杜牧诗《杜秋娘》云:“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又原注曰:“李谿长唱此辞。”上误或出于此,然亦可见此诗在中唐已广为传唱。诗中提倡及时行乐,也含劝人珍惜光阴意。用词重复而有变化,音节回环且又抑扬,“词气明爽,手口相应,其‘莫惜’、‘须惜’、‘堪折’、‘直折’、‘空折’,层层宕跌,读之不厌,可称能事。”(《历朝名媛诗词》)⑥清组诗名。五古。王夫之作。见《王船山诗文集》中的《薑斋诗集·五十自定稿》。作于顺治六年(1649)。共四首,抒写惜时叹逝,悯世忧国的思想情绪。情景妙合无垠,风格悲凉沉郁。其中尤以第四首“悲风动中夜”为佳。(吴小林 李泉)

【观沧海】 见“步出夏门行”②。

【龟虽寿】 见“步出夏门行”②。

【七哀诗】 魏诗篇名。王粲作。共三首,见《王侍中集》。《文选》卷二三录二首。汉乐府中无《七哀》诗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说:“《七哀》起于汉末。”“七哀”表示哀思之多。第一首“西京乱无象”,是诗人初离长安往荆州避难时所作。诗歌通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典型场景的描绘,勾画出一幅怵目惊心的汉末乱世难民图,反映了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等纵兵作乱后,关中地区千里焦土、遍地白骨的惨酷景象,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苦难渴望安定统一的思想感情。诗句质朴自然而又精炼含蓄,白描直叙中渗透着作者的深沉情意。“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既如实叙写行程,又交织着思念明君、向往太平、依恋乡井的复杂感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评曰:“古今流传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静如练’,……情景俱佳,足资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得‘迟迟我行’之意。”第二首“荆蛮非吾乡”,抒久客荆州思乡忧伤之情,主旨与《登楼赋》相似。第三首“边城使心悲”,写边地荒寒,人民谋生艰辛,且受战争之苦。均为感情深挚沉痛、语言素朴明晓的五言诗篇。(李泉)

【赠从弟】 魏诗篇名。刘桢作。共三首,见《文选》卷二三。又见辑本《刘公幹集》。三首诗分咏三种事物,以物喻人,既是对从弟的勉励,也是诗人本身的自励。如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将经风耐寒挺立高

山的青松,作为坚贞性格的象征,勉励他的从弟不屈不挠坚守本性,不与世浮沉同流合污。诗歌立意刚劲,造语质直,纯用比兴,不假雕饰,具有“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卷上)的品格。其余二首,一咏蕨藻,喻其从弟品格之高洁;一咏凤凰,喻其从弟志向之远大。笔法均与第二首同。(李泉)

【名都篇】 魏诗篇名。曹植作。见《文选》卷二十七。又见《曹子建集》卷六。《乐府诗集》收入卷六三《杂曲歌辞·齐瑟行》。是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取诗首二字名篇。内容写都市贵族子弟斗鸡射猎、饮宴击鞠的游荡生活。郭茂倩《乐府诗集》题解曰:“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也。以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也。”是一首讽刺纨绔少年只知游乐、不顾国事的诗篇。今人也有认为诗歌是曹植自己少年时代豪华放诞生涯的夸耀和反映。结合曹植的思想生平,应以前说为是。诗为五言叙事体,既具乐府民歌的流畅晓白的长处,又有文人诗作字锤句炼、精致华美的艺术特色。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子建《名都》、《白马》,乐府之变也。”(李泉)

【美女篇】 魏诗篇名。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六。《文选》卷二七选录。《乐府诗集》收入卷六三《杂曲歌辞·齐瑟行》。是曹植自制的乐府新题,取诗首二字名篇。郭茂倩《乐府诗集》“题解”曰:“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是一首托喻抒情之作。以美女盛年未嫁为喻,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忧伤和苦闷。诗篇脱胎于汉乐府《陌上桑》,用铺陈、衬托、渲染等多种手法对“美女”作了刻画,模仿痕迹显著;然文辞华丽,描摹精致,诗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收束点题,含蓄简练,显示了诗人较高的艺术创造能力。(李泉)

【白马篇】 魏诗篇名。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六。《文选》卷二七选录。《乐府诗集》载入卷六三《杂曲歌辞·齐瑟行》。《太平御览·兵部》引本诗,题作《游侠篇》。为曹植自制的乐府新题,取诗首二字名篇。此诗热情赞美了幽、并游侠儿超群的武艺和报国杀敌视死如归的英勇行为,借以抒发诗人自己捐躯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朱乾《乐府正义》评曰:“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诗为五言叙事体,用铺排的手法,集中笔墨于游侠少年射技、骑术的描写,重点突出地塑造了一个“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胜利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形象。语言节奏明快,情调开朗乐观,风格奔放豪迈,体现了曹植早期诗作的特色。(李泉)

【送应氏】 魏诗篇名。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

五。诗共二首。应氏,指应瑒、应璩兄弟,并为诗人。建安十六年(211),曹植随父西征马超,路过洛阳,与应氏兄弟相会,而应氏又将北往,于是作诗送别。第一首,借送别真实地描写了洛阳遭董卓焚掠后的残破荒凉,反映出频年战乱带给社会的深重灾难。第二首写与应氏兄弟的诚挚惜别之情。诗歌意趣悲凉,语词素朴无华,体现了建安诗风慷慨而多气的特色。(李泉)

【赠白马王彪】 魏诗篇名。曹植作。见《曹子建集》卷五。诗分七章,前有序。最早载于《魏氏春秋》,无序。《文选》卷二四选录,并有序。据李善注,本集原作《于圈城作》,当是萧统根据序文改作此题。白马王,指曹植异母弟曹彪。“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魏有诸侯藩王朝节的制度。每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之前,诸王皆来京师行迎气之礼,并举行朝会,谓之“会节气”。本诗是黄初四年(223),曹氏诸兄弟朝会后回封邑时,曹植写给曹彪的。《魏氏春秋》曰:“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监国使者”是魏文帝曹丕设以监察诸王的。诗歌直抒胸臆,字里行间充溢着忧伤和悲愤,客观上反映了曹魏统治集团内,由权位之争而引起的骨肉相残的政治现实。朴实自然的风韵,出自肺腑的情意,以及“顶真”格修辞法的运用,使本诗慷慨悲凉,十分感人,成为曹植后期诗作的代表。后世对之评价极高,如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李泉)

【七步诗】 魏诗篇名。曹植作。初载于《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引述时改为四句。清毛先舒《诗辨坻》卷二曰:“《七步诗》四句者,词意简完,然不若六句之有态。”诗以萁豆同根的特点,比喻兄弟同胞关系。同根理应相济,兄弟本应相亲。可实际情况却是:萁在釜下燃烧,豆在釜中哭泣。一个“泣”字,使豆和萁都变成了有感情有生命的东西。“萁豆相煎”的比喻,既形象地揭露了曹丕残害手足的恶行,又不露声色地晓喻曹丕以同胞之情,使其天良得以被唤醒。巧妙贴切的比喻,赋予了诗篇强大的攻心魅力,曹丕终于“深有惭色”,放过了曹植。此诗极其通俗,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子建《七步诗》,在当时窘迫中构此,果佳矣,大雅则未也”(黄子云《野鸿诗

的》六七)。

(李泉)

【咏怀诗】 ①魏组诗名。阮籍作。见《阮步兵集》、《阮步兵咏怀诗注》。五言八十二首。另有《先秦三国晋南北朝诗》所辑四言四首,亦称《咏怀》。诗非一时所作,乃阮籍生平诗篇的总题。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窃权谋位,政治黑暗,杀戮惨酷,士族文人随时都有杀身之险。阮籍不愿与司马氏合作,《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为求全性命于乱世,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无法消弭内心的苦闷和忧伤,于是借作诗以咏怀。李善《文选》(卷二三)注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诗中既有诗人忧时愤世、彷徨苦闷、求仙避世等思想心情的表露,也有对统治者虚伪造作、荒淫无耻和势利时俗的揭露,而手法则多用比兴、寄托和象征,因而诗意隐晦曲折、幽深难测。后世咏怀、感遇一类的五言组诗颇受其影响。②南北朝组诗名。庾信作。共二十七首,均为五言。见《庾子山集》卷三。倪璠《庾子山集注》、冯惟讷《诗纪》均作《拟咏怀》。《艺文类聚》无“拟”字。庾信是梁朝宫廷文人庾肩吾之子,早年与徐陵同为“宫体诗”的倡导者。梁元帝时,他奉命出使西魏,适逢梁亡,遂被强留长安。任职西魏。北周代魏后,更受重视,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朝对他“特蒙恩礼”,他却难忘故国旧乡,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后期诗赋内容深厚,多叙“乡关之思”和屈居异朝的怅痛。二十七首《咏怀诗》,即追述乱离,感叹身世,抒南归不得的苦闷,叙报国无望的愁怨,写得悲壮苍凉,独具风韵。

(李泉)

【情诗】 晋组诗名。张华作。见《张司空集》。诗共五首,均为五言。以夫妇赠答的形式,表现离别后双方的思慕之情。抒写清新自然,善于借助比喻进行细致的心理刻画。如第五首“游目四野外”,写的是出游丈夫对妻子的思恋,用了“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虫鸟久处巢穴方能预知风寒阴雨的比喻,说明只有亲历远别之苦的人,才能真正体验思念伴侣的心情,委婉贴切,很是生动。《情诗》五首的内容较为单一,“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而又“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诗品》卷中)。

(李泉)

【赴洛道中作】 晋诗篇名。陆机作。见《陆士衡集》卷五。诗共二首,抒写作者离家赴洛阳时所见的旅途景物和哀伤心情,表现了工于写景、景中寓情和精于炼字的艺术特点。如第二首:“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轡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

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通过“嵩岩”、“悲风”、“清露”、“明月”等的景物描写,渲染出客子忧思不眠的浓重氛围和境界,从而深沉地表露了诗人孤独哀伤的情怀。而“抱影寐”、“衔思往”的诗句,字锤句炼、排偶工整,形象新颖生动。

(李泉)

【悼亡诗】 晋诗篇名。潘岳作。见《潘黄门集》。共三首,为悼念诗人已故妻子而作。诗篇以其感情的真切动人、描写的委婉细密而闻名于世,并对后代悼亡诗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如第一首“荏苒冬春谢”,是潘岳服妻丧一年期满,将要赴原官任所时写的。其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帟屏无髻髻,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八句,写诗人“将出未出,连流虚室,触目伤心景象”(张玉穀《古诗赏析》),确是情致细腻,光景如画。所谓“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七)。

(李泉)

【咏史】 ①晋组诗名。左思作。见《文选》卷二一。诗共八首,托古讽今,借咏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西晋时代,门阀制度形成,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左思虽博学能文、怀抱建功立业壮志,却因出身寒门而屈居下位,才能受到压制,理想不得实现,内心的愤慨不平发而为《咏史》八首。第一首“弱冠弄柔翰”为八篇的总序,自叙文才武略、有志卫国立功,以及功成身退的旨趣。从“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诗句推断,此诗当作于晋武帝咸宁六年(280)灭吴以前。诗以“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概括其强烈的报国效力之心。以下七首分咏鲁仲连、扬雄等古人古事,借史咏怀,抨击门阀制度,蔑视士族权贵,为古今受压抑者鸣不平。诗歌情调高亢激扬,笔力矫健劲挺,被钟嵘誉为“左思风力”(《诗品》卷中)。明胡应麟《诗薮》亦谓《咏史》八首“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②清诗篇名。龚自珍作。七律。见《龚自珍全集》。道光五年十二月(1826.1)写于昆山:“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此诗名为咏史,实是讽今,矛头指向腐朽的清廷统治和残酷的文字狱。通过对盐官帮闲得利、士宦小人掌权、一般学子埋头著书庸碌怕死的社会现象的冷峻嘲讽,表露了诗人不满现实的愤慨之情。诗末二句反激上文,赞叹田横五百壮士的死节,劝喻文人士子不要受功名利禄之诱,当关心世事,以气节为重。全诗语言质朴凝炼,旨意丰厚深远,历史典故的恰当运用,增强了诗歌表达的婉转含蓄。

(李泉)

【扶风歌】 晋诗篇名。刘琨作。见《刘越石集》、《文选》卷二八。《乐府诗集》录入卷八四《杂歌谣辞》，题作《扶风歌九首》。“乐府”每四句为一解，因而九首即一首诗的九解。本诗作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刘琨出任并州刺史之时。扶风，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泾阳县。刘琨忠于晋室，在捍卫西北边疆、长期抗击入侵外族的斗争中，培植了强烈的爱国民族情感和抗敌御侮的豪迈气概。此诗叙述诗人自洛阳赴晋阳途中的所见所感，抒发故国之思、描述程途之险；通过李陵的“忠信反获罪”，透露出一种前途未卜、忧危忠愤的情怀。诗风刚健清新、悲凉慷慨，钟嵘《诗品》卷中用“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相评，实为中肯。

(李泉)

【游仙诗】 晋组诗名。郭璞作。今存十四首(内四首残缺)，见《郭弘农集》卷二。诗以“游仙”为题，却并不专写幻想中的仙山灵域，而是借对神仙的歌咏，抒发诗人的忧生愤世之情；蔑弃世俗的富贵荣华，向往高蹈出世的隐逸生活。钟嵘《诗品》卷中说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诗篇词采华茂，意趣丰富，形象也较生动，远胜当时流行的“淡乎寡味”的玄言诗。

(李泉)

【归园田居】 晋组诗名。陶渊明作。见《靖节先生集》卷二。诗共五首，大约写于诗人辞去彭泽令后的第二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五首诗的内容都是写乡居生活、田园景色，抒发摆脱尘俗羁绊回归自然的愉悦心情。如第一首“少无适俗韵”，自述归田原因在于“性本爱丘山”，直接表露热爱自然、厌恶官场的真情。而“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野生活和风光，则使诗人感受到犹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冲破牢笼重获自由的愉悦。诗人用“尘网”、“樊笼”比喻恶浊的官场仕途，用满带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宁静平和的田园景象，组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形象地表达了诗人鄙弃利禄向往淳朴的人生追求。组诗以朴素的语言、自然的文笔，从平凡的农村景物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诗的意境，平和清淡而又韵味深厚。“东坡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才高意远，造语精到如此。”(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李泉)

【饮酒】 晋组诗名。陶渊明作。见《靖节先生集》卷三。诗共二十首，有序。从序文“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伦次”来看，诗为酒后随意题咏，非一时所作。组诗内

容广泛，抒情寄意似阮籍的《咏怀》。故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第五首为著名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既有精辟的人生哲理阐述，又有绝妙的自然景色描绘，袒露了诗人安贫乐道、悠然自得的心境。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评云：“‘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为一篇之髓。”论述确当。全诗写得清新朴素，情趣生动，具有移人性灵、沁人肺腑的艺术渗透力。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曰：“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渊明‘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

(李泉)

【咏荆轲】 晋诗篇名。陶渊明作。见《靖节先生集》卷四。此为咏史诗。吟诵的是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诗以“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的壮语，刻画荆轲怒发冲冠的气概；“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行为描述，写出荆轲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雄姿；“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强烈感叹，表示对荆轲事业失败的惋惜；结尾更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来称颂荆轲不畏强暴流传千古的侠义精神。豪放的气势，激扬的韵律，反映了诗人虽然隐居田园，却也有着“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的内心的愤懑和不平，表现了与清淡和田园诗风不同的“英气勃发”(《占诗源》卷九)，显示出陶诗的另一风格。

(李泉)

【读山海经】 晋组诗名。陶渊明作。见《靖节先生集》卷四。诗共十三首，是诗人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时有感而作。第一首述隐居耕读的乐趣，其余各篇分咏《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载的神异事物。组诗有起有结，当是入南朝宋后同一时期的作品。《读山海经》诗虽以神话怪异为叙写题材，却寄寓了诗人对现实世事的深沉感慨。如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精卫、刑天是神话传说中两个复仇斗争的形象，作者歌颂他们的顽强不屈，显然是借古咏怀，表露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不满。结尾更是直抒胸臆，感叹壮心徒设，理想难以实现。豪放雄浑的诗风，表明陶渊明的诗歌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吟咏，也还有着情怀激烈的“金刚怒目”式(鲁迅《“题未定”草》)的作品。

(李泉)

【桃花源诗】 晋诗篇名。陶渊明作。见《靖节先

生集》卷六。一般认为作于晚年。诗前有“记”，写渔人发现并进入桃花源的见闻；“诗”则详叙桃花源中耕作、税赋、历法、服饰等有关社会制度的情况。“记”和“诗”相辅相成，构筑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战祸动乱，人人劳动自给、风俗古朴淳厚的理想社会。它是作者在战乱连年、赋役惨重、民不聊生现实生活刺激下，虚构想象的产物，虽是一个带有浓厚复古色彩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却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的愿望和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否定，因而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此诗质朴清新，“桃花源”境界的成功创造，显示了诗人的丰富想象和出色的文字摹写能力。“桃花源”的理想深远地影响着后世诗人的追求和创作，这个词语也成了诗文语汇中安乐世界的代名词。（李泉）

【登池上楼】 南朝宋诗篇名。谢灵运作。见《谢康乐集》卷二。池上楼，在永嘉郡（今浙江温州）。诗人于永初三年（422）七八月至景平元年（423）七八月任永嘉太守。诗当作于景平元年春，写作者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首起抒发官场失意、进退失措的牢骚，中段描绘登楼所见景物，结尾触景伤情，表达持节归隐的意向。善于捕捉瞬间影象，用清新的语言，真切自然地写出初春时节风感物候、春草鸣禽的变化，是本诗艺术成功之所在。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曰：“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李泉）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南朝宋诗篇名。谢灵运作。见《谢康乐集》卷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秋，作者辞官乡居于始宁县（今浙江上虞）的庄园别墅，“石壁精舍”是始宁别墅附近的一座佛寺（或曰读书斋）。湖，指巫湖。诗写自石壁精舍还至巫湖一天的游观乐趣和从中体会到的理意。叙写紧凑有序。张玉穀《古诗赏析》云：“前六，先叙石壁之景、游壁之乐，而以‘出谷’二句点清竟日，落到还湖。中六，则叙湖中所见晚景，趋径、偃扉，又透后题。后四，总上两层，约指其趣，自悟悟人，咏叹作结。”篇中“清晖能娱人，游子淡忘归”的诗句，被后人称为得“三百五篇之余韵”的“古今奇作”（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结尾“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道理的概括，虽仍未脱“玄言诗尾巴”的窠臼，然与前两层的绘景抒情结合得较为自然，因而也还不乏诗味。（李泉）

【代出自蓟北门行】 南朝宋诗篇名。鲍照作。见《鲍参军集》卷二。《乐府诗集》载入卷六一《杂曲歌辞》。《出自蓟北门行》是乐府旧题，代即拟之意。蓟，故燕国都城，今北京一带。诗叙北方边境传警、

朝廷遣师御敌、战士艰苦行军的情状，表现了出征军士牺牲卫国的壮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诗句，凝结着诗人报国立功的热忱。诗歌气势悲壮，语言健劲。“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等诗句所描绘的朔方边塞风物，雄浑真切，很有特色。“皆精言秀调，独步当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李泉）

【拟行路难】 南朝宋组诗名。鲍照作。见《鲍参军集》卷二。《乐府诗集》收入卷七〇《杂曲歌辞》。《行路难》本是汉乐府旧题，内容“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乐府解题》）晋袁山松曾改其音调制造新词（《晋书·袁瓌传》）。古辞、晋辞都已失传。鲍照据乐府古题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歌咏怀才不遇、宦途失意、离别相思、闺愁哀怨等种种人生忧患，表达了诗人对封建门阀统治愤激不平的思想感情。组诗笔意纵横、情感激越，呈现出“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刘熙载《艺概·诗概》）的创作特色，对唐代乐府歌行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尤以第六首“对案不能食”最为著名，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的创作直接受其启迪。（李泉）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南朝齐诗篇名。谢朓作。见《谢宣城诗集》卷三。谢朓曾任随王萧子隆文学，很受赏识。长史王秀之因嫉妒而进谗于齐武帝，于是谢朓被召还京（今南京），返途中写了此诗。下都，指荊州，因是藩国都城，故称。新林，浦名，在今南京市西南。西府，荊州随王府。诗叙恋旧之情和忧谗远祸的心境。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曰：“玄晖不唯工发端，撰造精丽，风华映人，一时之杰。”本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发端，气势壮阔，情韵无限，用以总领全诗，确乎造语精工，动人心魄，足以涵盖一切，“雄压千古”（杨慎《升庵诗话》卷二）。（李泉）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南朝齐诗篇名。谢朓作。见《谢宣城诗集》卷三。诗写登山所见的春江美景和还望京邑（今南京）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三山，在今南京市西南长江南岸，上有三峰，南北相连。本篇是谢朓山水诗的代表作，写景出神入化，风格清俊秀逸。“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诗句，被誉为“浑然天成、天球不琢”之作（唐庚《唐子西语录》）。李白也曾吟诗称颂：“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其诗注重对偶、声律，开唐诗风气之先，施补华《岷傭说诗》曰：“谢玄晖名句络绎，清丽居宗……唐人往往效之，不独太白也。玄晖诗变有唐风，真确论。”（李泉）

【山中杂诗】 南朝梁诗篇名。吴均作。见《吴朝

清集》。诗共三首,多为山中景物的描绘。如第一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通过来烟、鸟飞、落日、云出等景象的刻画,以动衬静地烘染出山居环境的清幽宁静,流露了诗人恬淡闲适的心情。诗风清新自然,古朴隽永。构思上也很有特色,沈德潜说它“四句写景,自成一格”(《古诗源》卷一三)。(李泉)

【相送】 南朝梁诗篇名。何逊作。见《何记室集》。此为留赠送行朋友的诗,诗的制题不够贴切明白。张玉穀《古诗赏析》曰:“此非送人诗,乃别送者诗也,制题亦欠明白。”诗曰:“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抒发了诗人即将孤身远行时的哀感惆怅,并借江上风雨欲来景色的描绘,寄寓对前程未卜、旅途艰辛的忧虑慨叹。此诗即景抒情,写得本色自然,沈德潜《古诗源》卷一三评曰:“仲言诗虽乏风骨,而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宜为沈(约)、范(云)心折。”(李泉)

【入若耶溪】 南朝梁诗篇名。王籍作。见王士禛《古诗选》五言诗卷一〇。诗曰:“舸艫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这是梁天监年间,王籍任湘东王咨议参军时,游若耶溪而作。溪在今浙江省绍兴南若耶山下。通过水天一色、云霞飘浮的风光景色的描绘,抒发了诗人厌倦宦游、归隐自然的心绪。此诗注重对偶声律,已接近唐人律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被广泛传颂,“当时以为文外独绝。”(《梁书·文学传》)(李泉)

【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南朝陈诗篇名。阴铿作。见《阴常侍集》。诗曰:“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叙江边送友不及,独立渡头,目送帆影远去的怅惘依恋之情。通过鼓声渐绝、帆影渐远、日暮人散等细致的情景描摹,浓重地渲染出了诗人的离愁别绪。语言清新流丽,抒情婉曲真挚,表现了“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创作特色。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颇受其影响。(李泉)

【渡河北】 北朝诗篇名。王褒作。见《王司空集》。此为旅途抒怀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写北渡黄河时,在河上叶落秋景和异方悲凉乐曲触发感染下所产生的羁旅之悲、故国之思。诗作情真语切,朴质清健,一洗南朝宫体的纤丽诗风。(李泉)

【重别周尚书】 北朝诗篇名。庾信作。见《庾子

山集》卷四。周尚书名弘正,字思行。陈文帝时自陈出使北周,南归时,庾信写诗赠别。先有《别周尚书弘正》一首,故本诗题为《重别周尚书》。原诗二首。第一首:“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秋雁南飞”比喻周尚书南归。通过这个景象的叙写,寄寓了诗人滞留北地的乡关之恋、故国之思。小诗写得朴素清新、沉挚感人。(李泉)

【昔昔盐】 乐府篇名。隋薛道衡作,见《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辞》。昔昔,即“夜夜”之意。盐,“曲”之别名。此为借乐府体写闺怨的诗。篇中以精巧的构思,华美的词句,通过对人物意态和环境细节的描写,将女子对征人的思念之情刻画得十分细腻生动,是诗人的代表作。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以环境烘托思妇孤寂心态尤为精妙,在当时即脍炙人口,传说诗人由此而引起隋炀帝的妒嫉而遭杀害(见刘餗《隋唐嘉话》)。后唐代诗人赵嘏以薛道衡此诗的每一句为题,写成五律组诗《昔昔盐二十首》,其对后世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吴小林)

【人日思归】 隋诗篇名。薛道衡作,见《全隋诗》卷二。人日,农历正月初七。诗人于隋开皇四年(584)岁末出使南方,五年(585)年初作此诗。写思归之情:“人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诗中扣住“人日”的时序特点,并以物候变化作为反衬,真切地表达自己思家盼归的心情。遣词巧妙,含思委婉,在漫延着齐梁馀风的隋代诗坛上,透露出清新的气息,为历来传诵的名诗。唐刘餗《隋唐嘉话》载:“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人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吴小林)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唐诗篇名。五律。杜审言作。见《全唐诗》卷六。诗题一作《和陆丞早春游望》,作者一说为韦应物。晋陵,今江苏常州市。陆丞,姓陆之县丞,名不详,杜审言之友人。作于永昌元年(689)前后在江阴县任职时,是对陆丞所作《早春游望》的和诗,抒写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襟。”首联言宦游之人对节物气候的变化尤为敏感,起得警拔精巧。中间两联承“物候新”一语,分写江南春景,景中寓情。尾联交待和诗之意,点明思归之情,收结妥帖有力。全诗结构严谨,语言精工,为唐代五律名作。明杨慎评曰:“首句‘独有宦游人’,第七句‘忽闻歌古调’,妙在‘独有’、‘忽闻’四虚字。”(《升庵诗话》卷五)近人高步瀛云:“此等诗当玩其兴象超妙

处。”(《唐宋诗举要》卷四)明胡应麟赞曰:“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诗薮》内编卷四)诗中“云霞出海曙”一联,对仗工整,词语华妙,为历来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正月十五夜】 唐诗篇名。五律。苏味道作。见《全唐诗》卷六五。诗题一作《上元》。唐刘肃《大唐新话》载:元宵之夜,“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令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此篇即为作者记长安贵族及市民元宵夜游之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语言华美,摹写生动,将元宵之夜金吾不禁,狂欢喧闹景象活现笔端。元方回评云:“古今元宵诗,五言之妙,少有出此者。”(高棅《唐诗品汇》卷五六引)诗中“火树银花合”一联,描写花灯错落,竞相争辉,比喻新巧,于镂金错采中韵致流溢,为历来传诵之名句,对后世元宵诗词颇有影响。

(吴小林)

【野望】 唐诗篇名。五律。王绩作。见《东皋子集》卷中。约作于晚年归隐故乡时,写眺望秋原的所见所感:“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论者对其诗旨有不同看法。明唐汝询曰:“此感隋之将亡也。”(《唐诗解》)清沈德潜曰:“通首只‘无相识’意,‘怀采薇’偶然兴寄古人也,说诗家谓感隋之将亡,毋乃穿凿。”(《唐诗别裁》卷九)以后说为胜。此诗首联和尾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在萧瑟静谧的景色中透露出诗人孤独抑郁的心情。诗风朴实,意境高古,格律严整,是早期成熟的五律之一,历来为人所传诵。

(吴小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唐诗篇名。五律。王勃作。见《王子安集注》卷三。诗题一作《杜少府之任蜀州》。蜀川,又作蜀州。蜀川,犹言“蜀地”。蜀州,指古地名“蜀郡”,即现在的成都地区,不是初唐时的“蜀州”,后者在武后垂拱二年(686)才设,其时王勃已死多年。少府,唐代对县尉的通称。这是作者供职长安时所作送别姓杜的友人去四川做官的一首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中强调牢固的友情不会因为形体的分离和空间的阻隔而有所削弱,劝勉朋友在分别时不必伤感。此作一洗过去送别诗缠绵悱恻的风格,并初步扫除了齐梁以来诗坛上的浮华气息,以豪迈的气势、深挚的感情取胜,反映当时青年士子的积极进取

精神,也透露出唐代诗歌革新的最初信息。颈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化用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句子,但较之更概括、更精警,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吴小林)

【长安古意】 唐诗篇名。七古。卢照邻作。见《幽忧子集》卷一。古意,托古意以写今事,借描绘汉代长安的情况,反映初唐的社会面貌。诗作于总章二年(669),为六十八句之长篇,可分四段。首段总写长安的繁华景象,揭露帝王贵族的奢靡生活。二段以市井娼家为描写对象,暴露富家子弟、游侠、武官各色人等纵情享乐。三段写将相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末段与上述繁华景象相对照,借穷愁著书的扬雄自况,表现安贫乐道,以节操自守的人生态度。全诗以赋法为主,杂以兴寄,四句一转,蝉联而下,清词丽语,委婉顿挫,在当时六朝宫体馀风尚炽的诗坛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近人闻一多把此诗的出现比作“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看成是诗风“转机”的标志(《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该诗为初唐七古长篇中之佳构,对诗歌革新和七言歌行的发展曾起重要作用。

(吴小林)

【在狱咏蝉】 唐诗篇名。五古。骆宾王作。见《骆临海集笺注》卷四。作于永隆元年(680)秋。上一年冬,任侍御史的骆宾王因屡次上书言事,触怒武则天,被诬贪赃下狱。狱西古槐上有秋蝉悲鸣,触发感怀,于是写成此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诗中托物言志,借蝉自况,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措辞委婉,风骨凝练,寄悲愤沉痛之情于比兴中,达到诗人自己所言:“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在狱咏蝉序》)为咏物诗中之名作。清施补华曰:“《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道‘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岷傭说诗》)“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一联,对仗工整,语意双关,用典巧妙,极写狱中不堪闻蝉鸣的悲苦心情,是广为传诵的佳句。

(吴小林)

【度大庾岭】 唐诗篇名。五律。宋之问作。见《全唐诗》卷五二。大庾岭,五岭之一,在今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县的交界处。神龙元年(705),宋之问因谄事张易之,由左奉宸内供奉贬泷州(治所在今广东罗定县东)参军,此诗为南贬途中所作,表现感伤情绪:“度岭方辞国,停輶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

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首联一开始即抒写怀乡深情,中间两联写景,景中寓情,尾联巧用贾谊典故,表达早日离开岭南北归的心愿。全诗感情真挚,属对精严,语言流利,典型地体现出作者五律“典丽精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的风格,为初唐五律之名作。

(吴小林)

【渡汉江】 唐诗篇名。五绝。宋之问作。见《全唐诗》卷五三。一说晚唐诗人李频作,误。约作于神龙二年(706)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东)贬所逃归洛阳,途经襄阳附近一段汉水时,抒写潜归途中的心情:“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前两句叙写自己被贬岭南,与家人音书断绝,平中见奇,为下诗伏线,用笔精严圆熟。后两句描摹临近故乡的内心感受,不写其欢喜急切,而着笔于情怯心惧,看似有悖常情,实则活画出私自逃归之贬谪者既思念家人又恐事泄的特殊心态。全诗短小精警,情真意切。清施补华评此诗曰:“五绝中能言情,与嘉州‘马上相逢无纸笔’七绝同妙。”(《岷傭说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为历来传诵之名句。后人对它的理解,已超出原有的特定情景,视作游子行近故乡时普遍心理的反映。论者将该二句与杜甫《述怀》中“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作类比,正着眼于此。

(吴小林)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唐诗篇名。七律。沈佺期作。见《全唐诗》卷九六。古意,犹“拟古”,托古意以抒今情。乔知之,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以左补阙随武攸宜出征契丹,次年回朝。此诗当为乔出征时期所作。诗题一作《独不见》,乐府旧题,又见《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此为裁乐府入律之作,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首联以燕双栖反衬少妇之孤独,中间两联由单写寒砧、落叶声触发妇人相思进而分写行者、居者,最后以含愁惹恨,怨月照帏收结全篇。诗中以渲染环境气氛烘托思妇心情,语言流利,格律工整,为初唐七律中之名篇。明何景明等人推此作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见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清沈德潜评此诗曰:“骨高气高,色泽情韵俱高。”(《说诗醉语》卷上)方东树评云:“远包齐、梁,高振唐音。”(《昭昧詹言》卷一五)

(吴小林)

【代悲白头翁】 唐诗篇名。七古。刘希夷作。见《全唐诗》卷八二。诗题一作《代白头吟》,亦作《白头吟》。《白头吟》为乐府旧题,故此诗又见《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诗中以自然流利之语言,铿锵

谐美之音韵,表现华年易逝,富贵不常的感伤情绪,诗意浓郁,且富哲理,其流畅婉转之风韵,在初唐七言歌行的创作中透露出新的气息。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将物是人非,世事变迁之感慨,以环回跌宕、骈偶对比的语句出之,警拔精粹,古今传诵。据传其舅宋之问甚爱此二句,求为己有,刘许而竟不与,后被宋以土囊压杀于别舍(见《唐才子传》卷一)。此说恐不足信,然可见人们对此联的喜爱。该诗对后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直接的影响,且从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清曹雪芹《红楼梦》的《葬花词》中,亦均可见到其流风馥韵。

(吴小林)

【感遇】 ①唐组诗名。五古。陈子昂作。见《陈子昂集》卷一。“感遇”,意谓生平遭遇所引起之感受,沈德潜曰:“感于心,困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之意自别。”(《唐诗别裁》卷一)共三十八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丰富多样,或感慨时事,讽刺社会弊病,或感怀身世,抒发不平之气,大多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语言质朴,词意委婉,风格爽朗,是体现陈子昂诗歌革新成果的代表作之一。卢藏用评云:“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杜甫诗曰:“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其在五古咏怀组诗的发展中,上承阮籍的《咏怀》,下启李白的《古风》。释皎然曰:“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诗式》卷三)钟惺则曰:“《感遇》数诗,其韵度虽与阮籍《咏怀》稍相近,身分殊两,实远过之。俗人眼耳贱近贵远,不信也。”(《唐诗归》卷二)②唐组诗名。五古。张九龄作。见《张曲江集》卷三。罢相被贬荆州长史后作。共十二首,多用比兴手法,抒发其忧谗畏讥的政治感慨。含蓄蕴藉,古雅清淡。在唐代五古咏怀组诗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者往往将其与陈子昂、李白并称。清人王士禛说唐五古“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继之,太白又继之”(《带经堂诗话》卷四)。沈德潜亦说五古“陈伯玉力扫俳优,仰追曩哲”,“张曲江、李供奉继起”,“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说诗醉语》卷上)。又曰:“《感遇诗》,正字古奥,曲江蕴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唐诗别裁》卷一)刘熙载云:“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艺概·诗概》)

(吴小林)

【登幽州台歌】 唐诗篇名。杂言古诗。陈子昂作。见《陈子昂集》补遗。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攻陷营州,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

担任参谋。武攸宜不晓军事而致败,陈几次献计未被采纳,反遭降为军曹的处分。后诗人登上幽州台(即蓟北楼,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联想到附近古老大地上曾出过燕昭王礼贤下士的历史事迹,百感交集,遂作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诗气势奔放,意境苍茫,音调铿锵,在明君礼遇贤臣历史佳话的对照和北方壮阔河山的衬托下,把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感、孤单寂寞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悲壮动人。黄周星评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泣鬼。”(《唐诗快》卷二)此诗一扫齐梁以来诗歌采丽竞繁的弊病,不愧是开有唐新诗风的力作。

(吴小林)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唐诗篇名。五律。孟浩然作。见《孟浩然集》卷三。题一作《临洞庭》,又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年和张丞相系何人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开元二十五年(737)秋赠当时已贬为荆州长史的张九龄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前四句描绘洞庭湖的壮观,后四句抒写渴望出仕和得到对方援引的心情。此为干谒诗,但托兴于观湖,写得委婉含蓄,不露痕迹。沈德潜评曰:“起法高浑,三四雄阔,足与题称。”“读此诗知襄阳非甘于隐遁者。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外望张公之接引也。”(《唐诗别裁》卷九)诗中“气蒸云梦泽”一联,描写洞庭湖壮阔的景象和雄伟的气势入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同为咏洞庭的名句。方回云:“予登岳阳楼,此诗大书左序毳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刘长卿有句云:‘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世不甚传,他可知也。”(《瀛奎律髓》卷二三)

(吴小林)

【过故人庄】 唐诗篇名。五律。孟浩然作。见《孟浩然集》卷四。此诗叙写诗人过访友人庄园的全过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首联点题,交待应邀过故人庄。颌联描写故人庄的优美景色。颈联叙写宴饮闲谈情况。尾联言重阳再来赏菊之约。诗中赞美农村恬美风光,歌颂朋友深厚情谊,写得清新自然,于简淡中见飘逸。方回评云:“句句自然,无刻画之迹。”(《瀛奎律髓》卷二三)沈德潜亦曰:“通体清妙。末句‘就’字作意,而归于自然。”(《唐诗别裁》卷九)“绿树村边合”一联,层次分明、相映成趣地描绘村庄美景如画,是传诵人口的名句。

(吴小林)

【春晓】 唐诗篇名。五绝。孟浩然作。见《孟浩

然集》卷四。题一作《春晓绝句》。此诗犹如一曲春晨之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前两句用实叙之笔,写春眠的香甜和初醒后所闻啼鸟之声,后两句以虚拟之辞,想象夜来风雨打落春花情景。全诗精妙入微地写出作者对春晨的心灵感受,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重的春的气息。意境清迥,韵致醇厚,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宋人刘辰翁评此诗云:“风流闲美,正不在多。”(《唐诗品汇》卷三九引)是广传人口,蜚声中外的名诗。

(吴小林)

【宿建德江】 唐诗篇名。五绝。孟浩然作。见《孟浩然集》卷四。建德江,浙江流经建德境内一段,在今浙江建德梅城,是新安江和兰江的汇合处。约作于开元十八年(730)游越溯浙江西上之时。此诗写羁旅之思:“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前两句言日暮泊舟引起旅人愁意,开门见山,如实写出。后两句描摹诗人在舟中时而远望天际,时而俯看江面的视觉感受,笔墨空灵,写景如画,且又景中寓情,味在诗外。沈德潜评云:“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唐诗别裁》卷一九)黄叔灿亦曰:“人但赏其写景之妙,不知其即景而言旅情,有诗外味。”(《唐诗笺注》)此二句显受南朝宋谢灵运诗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的影响,而脱化不露痕迹,且构思更巧妙,诗味更隽永,被明代胡应麟誉为“神品”(《诗薮》内编卷六)。(吴小林)

【登鹳雀楼】 唐诗篇名。五绝。王之涣作。见《全唐诗》卷二五三。“雀”一作“鹊”。诗题又作《鹳雀楼》。唐芮挺章编《国秀集》作朱斌诗。鹳雀楼,故址在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此诗即为“唐人留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前两句写登临所见,境界阔大,气象雄浑,可谓咫尺有万里之势。后两句在前写景的基础上,说明登高才能望远的道理,警策精妙,豪健有力。全诗情、景、理三者兼胜,对仗工整,气盛骨高。清沈德潜评曰:“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唐诗别裁》卷一九)诗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两句,寓深刻的哲理于鲜明的形象之中,为千古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咏柳】 唐诗篇名。七绝。贺知章作。见《全唐诗》卷一一二。诗题一作《柳枝词》。此为描写春柳的咏物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前两句以丰富的想象,描绘柳树的翠绿婀娜、柳枝的摇曳飘拂。后两

句通过一问一答,写柳树嫩叶为春风化育而成。全诗构思新颖,比喻工巧,既生动写出柳的形象,又热情礼赞春的美好,是广为传诵的咏柳名篇。“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两句,尤写得奇妙别致,后宋梅尧臣《东城送运判马察院》“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清金农《柳》“千丝万缕生便好,剪刀谁说胜春风”等句,均由此演化而来。(吴小林)

【回乡偶书二首】 唐诗篇名。七绝。贺知章作。见《全唐诗》卷一一二。天宝三年(744),诗人八十六岁辞官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时作。二首均佳,尤以第一首脍炙人口:“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一作“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中年离家,五十馀载后返乡,由年华流逝、沧桑变化引起感慨良多。此诗即通过生活中一个片断,以平淡朴素之语、饶有情趣之笔,将久客回乡者此种普遍心态真切传出,千百年来触发起无数返乡游子的强烈共鸣,成为传世名作。

(吴小林)

【终南望馥雪】 唐诗篇名。五绝。祖咏作。见《全唐诗》卷一三一。诗题又作《雪霁望终南》、《终南霁色雪》、《望终南残雪》。终南,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传说此诗为开元十二年(724)诗人应进士试之作,《唐诗纪事》卷二〇载:“有司试《终南山望馥雪》诗,咏赋曰:‘终南阴岭秀,……’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诗中写从长安远望终南山残雪之情状:“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全篇二十字,紧扣诗题,极有层次地描摹望中终南馥雪之景以及由此引起的感受,写得形神兼备,蕴藉有味。清施补华评该诗:“苍秀之笔,与韦相近。”(《岷傭说诗》)王士禛称此诗为“古今雪诗”中之“最佳”诗作(《渔洋诗话》卷上)。

(吴小林)

【古从军行】 唐诗篇名。七古。李颀作。见《全唐诗》卷一三三。从军行,乐府旧题,此诗以汉喻唐,托古讽今,故前冠以“古”字。约作于玄宗天宝年间。诗中写从军征战生活之艰辛和死伤之惨重,讽刺唐王朝统治者穷兵黩武,开边无已。全诗以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意境苍凉,格调悲壮,音韵宛转,为李颀边塞诗之代表作。诗末“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两句,言无数士兵抛尸塞外,却只换得葡萄移植中原,词句警策,语意沉痛,在全诗中具画龙点睛之妙,历来脍炙人口。

(吴小林)

【次北固山下】 唐诗篇名。五律。王湾作。见《全唐诗》卷一一五。此诗最早见于唐芮挺章编《国秀集》,唐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时题为《江南意》,异文颇多。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市北,三面临长

江。约开元初诗人游江南时作,写途中泊船所见所感:“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诗中扣住“次”字,描摹岁末江上之景和思乡之情,意境开阔,风华秀丽,具有盛唐诗歌的鲜明特征。“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叙写江景和时序交替,极富动感和生机,且炼字炼句颇见工力,为传诵千古之名句。殷璠曰:“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河岳英灵集》)明胡应麟评此二句曰:“形容景物,妙绝千古”,并把此视为盛唐诗句的代表,认为与“中、晚界限斩然”(《诗薮》内编卷四)。沈德潜评云:“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寻常意,一经锤炼,便成奇绝。与少陵‘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一种笔墨。”(《唐诗别裁》卷一〇)

(吴小林)

【黄鹤楼】 唐诗篇名。七律。崔颢作。见《全唐诗》卷一三〇。此诗为咏黄鹤楼之绝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馥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武汉蛇山的黄鹤矶头。传说费文祗登仙驾鹤于此,一说仙人子安乘鹤经此。该诗前四句从传说着笔,抒写人去楼空,世事茫茫的感慨;后四句描绘登楼所见周围景色,烘托思乡愁情。全诗亦古亦律,气势流畅,音节谐美。清方东树评曰:“此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可贵。”(《昭昧詹言》卷一六)沈德潜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一三)宋严羽赞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诗评》)传说李白登黄鹤楼亦欲赋诗,后因见此作而敛手,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见《唐诗纪事》卷二一)李白的《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等诗,有模仿《黄鹤楼》处。

(吴小林)

【长信秋词五首】 唐组诗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其一、其三两首,收入《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列《班婕妤》之后,题《长信怨》。该书《班婕妤》题解云:“一曰《婕妤怨》。”并引《乐府解题》曰:“《婕妤怨》者,为汉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况之女。美而能文,初为帝所宠爱。后幸赵飞燕姊弟,冠于后宫。婕妤自知见薄,乃退居东宫,作赋及纨扇诗以自伤悼。后人伤之而为《婕妤怨》也。”《长信怨》、《长信秋词》盖出于《婕妤怨》。诗题又作《长信宫》、《长信宫秋词》。此组诗托班婕妤事,抒写宫女的哀怨之情。五首中以第三首最为著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

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相传班婕妤作《怨歌行》以秋扇见弃自况,此诗前两句即暗用其意,抒写宫女孤寂无聊的心情。后两句以日影喻君恩,将“玉颜”与“寒鸦”作对比,突出人不如物,委婉而深切地表达宫女的哀苦。全诗构思新巧,语言含蓄,刻画宫女心态细致入微,为唐代宫怨诗中的杰作。清沈德潜评曰:“优柔婉丽,含蕴无穷,使人一唱而三叹。”(《唐诗别裁》卷一九)潘德舆以此诗与晚唐孟迟的《长信宫》作比较云:“龙标‘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与晚唐人‘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犹绕御帘飞’,似一副言语,而厚薄远近,大有殊观”(《养一斋诗话》卷二),对王作极为推崇。(吴小林)

【闺怨】 唐诗篇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此诗写闺中少妇和丈夫离别后的怨情:“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前两句以狡狴之笔,逆题面而写,为下蓄势,可谓匠心别具。第三句由境生情,是为转折。末句以一“悔”字点破离恨,因由前铺垫宛折而至,愈显其怨之深。全诗刻画人物心理变化细致真切,用笔含蓄灵动,为七绝神品,闺怨佳作。明胡应麟称此诗“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诗薮》内编卷六)清黄叔灿评该诗云:“曰‘不知愁’,曰‘忽见’,曰‘悔教’,少妇心情,无端感触,景物撩人,描绘毕现,此天然笔墨。”(《唐诗笺注》卷八)(吴小林)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唐诗篇名。七绝。王昌龄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三。芙蓉楼,故址在今江苏镇江市。开元二十八年(740)诗人出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丞后作。二首中以第一首更为著名:“寒雨连江(一作“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殷璠《河岳英灵集》称王昌龄“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王作此诗正当谤议交加之时,故托回洛阳的友人辛渐向亲朋传达自己的心迹。全诗或景中寓情,或托物言志,寄深意于婉语之中,含蓄蕴藉,余韵无穷。“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本于鲍照《代白头吟》“清如玉壶冰”,姚崇《冰壶诫》“内怀冰清,外涵玉润”等语而又自铸新辞,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高洁清白,设词精警,取喻巧妙,为千古名句。(吴小林)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诗篇名。七绝。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一四。据旧注,此诗为王维十七岁时所写,是重阳节思念家乡亲人之作。其时王维大概客寓长安,而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在华山以东,故诗题称“忆山东兄弟”。全诗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两句直接抒写佳节思亲,后

两句运用“反向设想”的传统手法,以想象家中兄弟们为自己不能与他们团聚而感到缺憾,反衬诗人思亲之情的深切。写得感情真挚,构思巧妙,既有朴素清新的特点,又具委婉曲折的风韵,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怀乡思亲的佳作。“每逢佳节倍思亲”则为广传人口的名句。清代沈德潜认为此诗受过《诗经·魏风·陟岵》的启发:“即《陟岵》诗意,谁谓唐人不近三百篇耶?”(《唐诗别裁》卷一九)(吴小林)

【洛阳女儿行】 唐诗篇名。七古。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六。是新题乐府,故宋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乐府杂题》中。旧注“时年十六,一作十八”,是王维年轻时的作品。“洛阳女儿”,取自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洛阳女儿名莫愁”句,泛指一般贵族妇女。此诗描写唐代贵族少妇奢华无聊的生活情况,并与贫穷女子作对比,揭露当时社会的不合理。在诗尾还抒发作者的感慨不平。沈德潜评曰:“结意况君子不遇也,与《西施咏》同一寄托。”全诗铺排渲染,对照衬托,写得流利酣畅,转折自如,艺术上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境地。

(吴小林)

【老将行】 唐诗篇名。七古。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六。是新题乐府,故宋郭茂倩将此诗收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乐府杂题》。大约为诗人年轻时的作品。描写一位曾经立过战功的老将被朝廷遗弃后的抑郁心情和依旧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歌颂他的爱国热忱,并对贤愚不分,弃置良才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借此抒发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该诗句句用典,内涵丰富深邃,词意含蓄蕴藉,并在七言古中从头至尾几乎都讲对仗,形成句式整饬,气势雄放的特点。沈德潜评曰:“此种诗纯以对仗胜”(《唐诗别裁》卷五)。高步瀛也评论该诗说:“雄姿飒爽,步伐整齐。”(《唐宋诗醇》卷二)(吴小林)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七。《新唐书·王维传》:“别墅在辋川,地奇胜,……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此诗即为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与裴迪游其中时所作:“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诗中描写辋川附近秋日傍晚的幽美景色和裴迪的狂士形象,表现诗人的隐逸之乐。全诗情致深长,绘景如画,音调谐美,是诗歌与绘画、音乐的完美结合,颈联“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确是晚村光景”(施补华《岷傭说诗》),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它从陶渊明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演化而来,两者清腴自然的风格相似,但王句意境更阔大,在虚实布置上更富构图

美。

(吴小林)

【观猎】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八。诗题《唐诗纪事》作《猎骑》。《乐府诗集》和《万首唐人绝句》摘此诗前四句为一首绝句，题曰《戎浑》。约为王维前期的作品。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前四句写出猎，后四句叙猎归，描绘将军一次狩猎活动的全过程，歌颂主人公高超的射技和雄武的英姿，意境阔大，气势雄浑，形象鲜明，写作手法高超。沈德潜评曰：“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卷九）颌联“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逼真传神地写出猎鹰和马匹的敏捷快速，而猎者矫健的身影和得意的神情亦隐隐传出，笔触精细，诗味隽永，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吴小林)

【少年行】 唐组诗名。七绝。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一四。宋郭茂倩收录此诗于《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结客少年场行》后，并引《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又引《广题》曰：“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高步瀛认为“摩诘此诗言少年任侠杀敌报国，盖反前人之意”（《唐宋诗举要》卷八）。《少年行》共四首，相合是一组诗，分咏游侠少年的豪情、壮志、立功、受赏，分开各首又具独立意义，其中以第一首“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和第三首“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尤为著名。前首通过高楼纵饮的典型场景，描写游侠少年风流倜傥、英武豪迈的精神风貌；后首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其以身报国，视死如归的昂扬斗志，都写得形象鲜明，笔墨酣畅，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显示出王维前期诗作积极向上，意气风发的特点。

(吴小林)

【使至塞上】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九。开元二十五年（737），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打败吐蕃，朝廷命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塞上宣慰将士，并在节度使幕中兼任判官。他在出塞途中写下此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描绘边塞的壮丽景色，歌颂唐军的胜利，写得意境壮阔，景象明朗，情调昂扬，是王维边塞诗的代表作。“大漠”二句，选取塞上四种典型景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互相搭配映衬，描摹出一幅边塞奇特壮美的图画。王国维称：“‘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人间词话》）王夫之评曰：“因景因情，自然灵妙。”（《董

斋诗话》）

(吴小林)

【渭川田家】 唐诗篇名。五古。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三。大约是在李林甫当政，张九龄被贬，诗人遭到排斥而产生归隐思想后写的。全诗十句。前八句描写傍晚时候牛羊归村、野老迎候牧童、雉雏蚕眠，田夫路遇絮语等农村景象。后两句直接抒情，表示对农家生活的赞赏，透露归隐田园的心情。全诗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归”字上，王夫之曰：“通篇用‘即此’二字，括收前八句，皆情语，非景语，属词命篇，总与建安以上合辙。”（《唐诗评》卷二）此诗描写肖物传神，形象逼真，犹如一幅田家晚归图。尤其头两句“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更富有画意，显然远承《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的句子“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而整首诗宁静安谧的境界和平淡自然的风格，则受到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高步瀛评此诗说：“天趣自然，踵武靖节”（《唐宋诗举要》卷一），可谓知言。

(吴小林)

【送元二使安西】 唐诗篇名。七绝。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一四。诗题《诗人玉屑》作《赠别》，《乐府诗集》卷八〇《近代曲辞》作《渭城曲》，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全诗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是一首送朋友元二去西北边塞的诗。安西，即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前两句写送别环境，以典型景物衬托离情；后两句写送别的情景，用自然清新的语言，含蓄蕴藉的手法表现深厚的情谊。由于该诗把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别情抒写得淋漓而又隽永，成为唐代七绝中的名作和古代送别诗中的绝唱。清代王士禛称它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带经堂诗话》卷四），明人李东阳曰：“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麓堂诗话》）后来谱入乐府，在别席离筵上被广为传唱。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刘禹锡《与歌者何戡》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李商隐《赠歌妓》诗中亦有“断肠声里听阳关”的句子。可见其影响之大。

(吴小林)

【山居秋暝】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七。大约隐居终南山时所作：“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首联点题，中间两联描绘山中秋夜的优美景色，尾联表现对山间隐逸生活的留恋。诗中除显露作者山水田园诗常有的空寂清幽的特色外，又透发出一定的生趣，为其山水田园诗代表作之一。用笔清新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随意挥写，得大自在”（高步瀛《唐

宋诗举要》卷四),而又在朴素自然中有润泽华采。全诗音韵谐美,富有诗情画意,尤其颌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和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形象鲜明,色调清丽,且静景和动景交相映衬,在整齐中有错落灵动之美。此诗典型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特点。

(吴小林)

【辋川集】 唐代组诗名。五绝。王维、裴迪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三。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南。此处环境清幽,风景优美,原有初唐宋之问的别墅,后为王维所得,作为他母亲奉佛隐居之处,他自己也和好友裴迪在此“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辋川集》即收有他与裴迪所写描写辋川各处景色的唱和诗各二十首。原有王维所作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泚、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欽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其中王维所作各首,意境幽美,兴味深长,向为人们所称道。明胡应麟评曰:“右丞《辋川》诸作,却是自出机轴,名言两忘,色相俱泯。”(《诗薮》内编卷六)清施补华曰:“《辋川》诸五绝清幽绝俗”(《岷傭说诗》)方东树云:“《辋川》叙题细密不漏,又能设色取景,虚实布置,一一如画。”(《昭昧詹言》卷一六)其中以《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等首尤为著名。

(吴小林)

【相思】 唐诗篇名。五绝。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五。诗题一作《江上赠李龟年》。全诗为:“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于我国南方,果实呈豆状,圆而红,又名相思子。传说古代有一个人死于边地,妻子哭于树下而卒,化为红豆,红豆遂成相思或爱情的象征。此诗借咏红豆表达深挚的相思之情,字字扣住红豆来写,又句句不离抒发相思情意,写得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在当时就成为流行的名歌。《云溪友议》卷中载:“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李龟年奔迫江潭,……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曰:‘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阙,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

(吴小林)

【终南山】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七。诗人隐居终南山时所写。此诗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描写终南山的雄奇景象:“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

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首联言其高大,颌联和颈联言其广阔,尾联着重写终南山的清寥幽深。有的论者认为尾联“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与写景的前三联不相称,对此颇有微词。而王夫之指出:诗中写此两句,“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薑斋诗话》)沈德潜也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王、沈之说良是,最后两句可谓不写之写,全诗统一在对终南山雄峻辽廓的描写上,亦属作者境界壮美阔大的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之一。张谦宜说:“《终南山》,于此看积健为雄之妙。”(《笥斋诗谈》卷五) (吴小林)

【汉江临泛】 唐诗篇名。五律。王维作。见《王右丞集笺注》卷八。诗题元方回的《瀛奎律髓》作《汉江临眺》。大约是开元二十八年诗人任殿中侍御史被派往南方主持“南选”考试事,途经襄阳(今属湖北)时所写,描绘泛舟襄阳附近汉水之上所见到的景象:“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首联概括汉水的形势,颌联和颈联描写水上景色,尾联表示流连忘返之意。全诗运用实写和虚拟相结合的手法,并借助错觉映衬,把襄阳附近汉水流域的壮美景观毕现纸上,是诗人境界阔大的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之一。中间两联是名句,尤其前一联,真切传神地写出江流浩瀚邈远,山色若隐若现的景象,富有画意。明人王世贞评此联曰:“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黄大痴江山胜览图》)唐代权德舆《晚渡扬子江却寄江南亲故》中的诗句“远岫有无中,片帆风水上”,宋代欧阳修《朝中措》词中的句子“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都受到过此联的影响。

(吴小林)

【峨眉山月歌】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八。开元十三年(725)出蜀途中所作。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全诗为:“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末句中“君”字,一说指月。沈德潜曰:“月在清溪山月之间,半轮亦不复见矣,‘君’字即指月。”(《唐诗别裁》卷二〇)苏轼有诗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望月时登楼。”(《送张嘉州》)均持此说。一说指友人。按前说,此诗为思乡之作;按后说,此作为怀友之诗,两说均可通。全篇意境清朗秀美,风致自然天成,四句诗中连用五个地名,构思精巧,不着痕迹。刘辰翁曰:“含情凄婉,有《竹枝》缥缈之音。”(《唐诗品汇》卷四十七引)王世贞云:“此是太白佳境”,“益见此老炉

锤之妙”(《艺苑卮言》卷四)。王世懋亦云:“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为绝唱,殊不厌重。”(《艺圃撷馀》)该诗为李白绝句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吴小林)

【渡荆门送别】 唐诗篇名。五律。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五。开元十三年(725)出蜀至荆门时所作。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长江南岸。“送别”,对此二字颇多歧见:一说意指江水送自己离别蜀中,一说赠给送别的友人,沈德潜持又一说:“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卷一〇),唐汝询《唐诗解》亦疑“送别”二字为衍文,以后说为近是。其诗曰:“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首联交待远渡地点和出蜀目的,中间两联描绘舟过荆门山东行所见景色,尾联含蓄地抒发思乡深情,“结二语得象外于圆中。飘然思不穷,唯此当之”(王夫之《唐诗评选》)。全诗运古诗浑壮雄放的气势于声调格律之中,既运笔自如,一气呵成,又符合律诗的规律,是体现李白五律典型特色的佳篇。诗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二句,描写进入楚地后长江两岸地势平坦广阔的特有景色,逼真如画,意境壮美,为传诵之名句。论者好将此与杜甫名句“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进行比较。丁龙友曰:“胡元瑞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此太白壮语也。子美诗‘星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当为‘月涌大江流’之误)二语,骨力过之。予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未可概论。”(《李太白全集》卷一五)翁方纲亦曰:“此等句皆适与手会,无意相合,固不必谓相为倚傍,亦不容区分优劣也。”(《石洲诗话》卷一)

(吴小林)

【长干行】 唐诗篇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四。原诗共二首,第二首一般认为非李白作。诗用乐府旧题,和古辞相比,篇幅由原来的四句扩展为一首长诗,且内容亦由写女子的劳动情景为写商妇的爱情生活,有很大创造。约开元十四年(726)初到金陵时所作。全篇以女子自述的口吻,抒写与丈夫结识和恋爱的过程、初婚时的幸福、丈夫经商别离后的痛苦,着重刻画她对远人的思念之情,体现出当时商妇对真挚爱情的热烈追求。该诗感情纯真,语言流利,风格委婉缠绵,明显受有南朝乐府民歌西曲歌的影响。《唐宋诗醇》评曰:“儿女子情事,直从胸臆间流出,萦迂曲折,一往情深。”是李白集中的名作,亦为我国古代爱情诗中的佳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等句,描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嬉戏游玩,相处融洽之情

状,十分真切生动,是传诵人口之名句,成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即由此演化而来。(吴小林)

【静夜思】 唐诗篇名。五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六。为诗人自制乐府诗题,《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亦收录此作。全诗共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过一个典型的生活细节,生动入微地刻画游子的思乡之情。信口而成,不工而工,清新隽永,妙造自然,充分体现出李白诗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乐府民歌风味。明人钟惺评曰:“忽然妙境,目中口中凑泊不得,所谓不用意得之者。”(《唐诗归》)清代沈德潜亦云:“旅中情思,虽说明却不说尽。”(《唐诗别裁》卷一九)是妙绝古今、广传人口的思乡名作。

(吴小林)

【春思】 唐诗篇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六。全诗共六句:“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运用比兴手法,描写女主人对远人的思念。情与景妙合无间,刻摹思妇心态生动入微,语言清新自然,富有民歌特色。“春风”二句脱胎于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春歌》中“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的句子,抒写思妇对远人不归,独宿孤眠的哀怨,凄婉动人,亦可如萧士贇所说,“末句喻此心贞洁,非外物所能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六),解为比喻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吴小林)

【子夜吴歌四首】 唐组诗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六。为乐府旧题。《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收有《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旧唐书·音乐志二》曰:“《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多为男女幽会和相思之辞。《子夜吴歌》题承《子夜四时歌》而来。共四首,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春夏秋冬四字,每首复标春、夏、秋、冬。体制由《子夜四时歌》一首四句衍为六句。第一首言秦地采桑女拒绝显贵的追逐,第二首描写越地之女的美貌,第三、四首写思妇对征夫的怀念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似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以第三首最为著名:“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通过月夜捣衣的场景描写和秋风撩人愁绪的直接抒发,把妇人对征夫的刻骨思念曲曲传出。写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王夫之曰:“前四句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唐诗评选》卷二)对末二句,历来颇多歧见。田同之云:“余窃谓删去末二句作绝句,更觉浑含无

尽。”(《西圃诗说》)沈德潜则曰:“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吴歌》,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说诗晬语》)又曰:“不言朝家之黠武,而言胡虏之未平,立言温厚。”(《唐诗别裁》卷二)

(吴小林)

【秋浦歌十七首】 唐组诗名。五古、五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八。作于天宝十三年(754)游秋浦时。秋浦,即今安徽贵池县,因其地有秋浦水而得名。今人詹锳曰:“黄山谷《书自草秋浦后》:‘绍圣三年五月乙未新开小轩,闻幽鸟相语,殊乐,戏作草,遂书彻李白《秋浦歌》十五篇。’似山谷所见太白集《秋浦歌》只十五篇,其今本《秋浦歌》十七首之中尚有二首伪作耶?”(《李白诗文系年》)今人瞿蜕园、朱金城曰:“《绝句》收十二首,无‘秋浦长似秋’、‘秋浦猿夜愁’、‘两鬓入秋浦’、‘千古石楠树’、‘淶水净素月’五首。”(《李白集校注》卷八)内容多描写秋浦景色,抒发诗人客中之愁和反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其中以第十四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最为著名。前者生动地写出冶矿工人冶炼时的劳动情景,题材内容弥足珍贵。后者以艺术夸张的手段,波折倒装的笔法,抒写诗人年华流逝,壮志未酬的忧愁苦闷,新奇形象,生面别开。王琦评曰:“起句奇甚,得下文一解,字字皆成妙文。洵非仙才,那能作此。”(《李太白全集》卷八)尤其前二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为李白诗中夸张比喻的典型例子,郭兆麟云:“语涉粗豪,然非尔便不佳。”(《梅崖诗话》) (吴小林)

【赠汪伦】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二。天宝十四年(755)自秋浦至泾县(今属安徽)游桃花潭时所作。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题作《桃花潭别汪伦》。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云:“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酤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全诗为:“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抒写友谊,真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唐汝询评曰:“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唐诗解》卷二五)诗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通过比喻衬托,把抽象的友情写得具体可感,巧妙生动,为传诵千古之名句。李锳云:“言汪伦相送之情深耳,直说便无味。借桃花潭水以衬之,便有不尽曲折之意。”(《诗法易简录》)

(吴小林)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三。约作于天宝七年(748)。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

安)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好友。其时,王昌龄因细故被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闻知,写此诗寄之:“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前两句写景叙事,后两句抒情,全诗信手写成,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清施补华评此诗云:“深得一‘婉’字诀。”(《岷傭说诗》)尤其三、四句,构思巧妙,造语别致,通过愁心寄月的奇想,把诗人对朋友的怀念和担忧表达得既淋漓尽致又曲折委婉。沈德潜评曰:“即‘将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怀’之意,出以摇曳之笔,语意一新。”(《唐诗别裁》卷二十〇)李瑛亦曰:“三、四句言此心之相关,直是神驰到彼耳,妙在借明月以写之。”(《诗法易简录》)此诗与《赠汪伦》同为李白诗中抒写友情的名作。

(吴小林)

【梦游天姥吟留别】 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五。题一作《别东鲁诸公》。约天宝五年(746)将离东鲁南游越中时所作。天姥,山名,在今浙江省新昌县南部。诗分三段。首段由对神仙世界的半信半疑引出天姥山,交待入梦缘由。次段为该诗主体,描绘梦游历险之情状,展现瑰丽变幻之奇景,其中既融铸诗人过去所游名山大川之印象,又烙有作者天宝初长安宫廷生活的迹印。末段抒写梦醒后之感慨,点出否定黑暗的现实世界,追求理想的自由生活之题旨。全诗已写梦境,又入仙境,可谓奇而又奇,幻而又幻,迷离惝恍,变化莫测,富有浪漫主义特色,且从心所欲不逾矩,章法谨严。《唐宋诗醇》卷六评曰:“此篇天姥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沈德潜亦云:“托言梦游,穷形尽相,以极洞天之奇幻,……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诗别裁》卷六)结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两句,直抒胸臆,直发议论,唱出蔑视权贵、向往自由的心声,为具有鲜明的李白个性特征之名句。 (吴小林)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五。一本无“黄鹤楼”三字,一本“之广陵”作“下维扬”。约作于开元十六年(728)暮春。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武汉蛇山黄鹤矶上。孟浩然,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好友。广陵,今江苏扬州。全诗为:“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前两句交待送别之处、送别之时和送往之地,后两句选取孤帆远影的典型江景,烘托离别深情。通篇抒写对故人的情谊,言近旨远,醇厚隽永。尤其后两句是情景兼融,富有韵味的送别名句。唐汝询评曰:“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言外。”(《唐诗解》)此诗为李白

七绝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吴小林)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集》卷一八。天宝十二年(753)秋作于宣州(今安徽宣城)。谢朓楼,名叠嶂楼,为南齐诗人谢朓官宣城太守时之高斋地,一名北楼,亦称谢公楼。云,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李华于天宝十一年官监察御史,唐人称监察御史为侍御。次年秋李白与李华相遇于宣城,登谢朓楼而作此诗。该作先抒写虚度光阴,报国无门的痛苦,次借赞美建安诗文和谢朓诗歌肯定彼此的才华与抱负,末以消极出世来挥斥幽愤。全诗既笔酣墨饱,一气贯注,又摇曳跌宕,奔腾跳跃,充分表现出李白诗歌清雄奔放,纵横变幻的特点。开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二句,“破空而来,不可端倪”(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引),极写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二句,以出人意外之奇特想象,抒写宏大的志趣。“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二句,言自己欲消反增,无法排遣的愁苦,比喻新颖生动,都是传世的名句。(吴小林)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一九。约天宝九年(750)为酬答友人王十二所赠诗《寒夜独酌有怀》而作。全诗分四段。首段设想王十二寒夜独酌、怀念自己的情景。第二段慨叹王十二不能学时人凭斗鸡媚上,借杀戮邀功,而徒以吟诗作赋自娱,故不为世所用。第三段揭露黑白不分、贤愚莫辨的黑暗现实。末段显示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归隐山林的决心。通过形象的议论,生动的比喻,参差的句式,将诗人一腔被谗见逐、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倾泻而出。萧士赅曰:“此篇造语叙事,错乱颠倒,绝无伦次,董龙一事尤为可笑,决非太白之作。乃先儒所谓五季间学太白者所为耳。”(《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朱谏曰:“士赅此论,大概得之。”(《李诗辨疑》)胡震亨《李诗通》则径以此诗编入附录。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已辨上述说法之非,当以詹说为是,该诗绝非伪作。

(吴小林)

【把酒问月】 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〇。题下原注:“故人贾淳令予问之。”贾淳,生平不详。此诗以“天问”式的奇特想象,塑造出永恒、美好的月的形象,显示诗人自己超旷脱俗的胸怀。通篇挥洒自如,脉络贯通,音节谐美,唱叹有致,为情理兼胜之佳构。对宋代苏轼词作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显著影响。苏词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即由李诗起首二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演化而来。诗

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两句,句式回环错综,音调抑扬顿挫,且富有浓郁的诗情和深邃的哲理,是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登金陵凤凰台】 唐诗篇名。七律。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一。作年颇多歧见,主要有二说:一说天宝六年(747),一说上元二年(761),以前说为胜。凤凰台,在今南京西南隅,相传南朝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山上,毛呈五色,状如孔雀,时人以为凤凰,遂筑台于山上,称山曰凤凰山,台曰凤凰台。此诗为诗人登台有感而作:“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首联点题,抒发怀古之幽情。颔联紧扣金陵为东吴、东晋故都的特点,抒写兴亡之感,寄托忧国之思。颈联描绘凭台远眺所见壮丽江景,以境界开阔,景色如画为人所传诵。尾联照应题中“登”字,抒写感叹,表现对被谗放逐的愤恨和对国事的忧念,寄慨遥深,余味无穷,亦是传诵之名句。全诗气势恢宏,情韵无限,是登览杰作,也是唐代律诗中的名篇。论者多认为该诗深受崔颢《黄鹤楼》一诗的影响,并比较其优劣:王世懋说:“青莲气短”,“窃以为此诗不逮,非一端也”(《艺圃撷馀》)。瞿佑云:“崔颢题黄鹤楼,太白过之不更作,时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讥。及登凤凰台作诗,可谓十倍曹丕矣。”并说李诗结句比之崔诗结句“爱君忧国之意远过乡关之念,善占地步矣。”(《归田诗话》)方回则曰:“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唐宋诗醇》卷七亦曰:“崔诗直举胸情,气体高浑;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意象偶同,胜境各擅。”

(吴小林)

【望庐山瀑布二首】 唐诗篇名。五古、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一。作年有两说,一为开元十四年(726),一为至德元年(756)。两首中以第二首更为著名,一本题作《望庐山香炉峰瀑布》,为一绝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绘庐山瀑布的壮观,意境阔大,笔墨空灵。尤其三、四两句,运用夸张比喻,发挥丰富联想,把望中所见庐山瀑布的景象写得气势飞动,神理俱出。宋代苏轼称赞道:“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戏徐凝瀑布诗》)此诗诚为咏瀑布之作中的千古绝唱。

(吴小林)

【望天门山】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一。天门山,指今安徽当涂的东梁山与和县的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绝壁千仞,形如天门,故名。全诗为:“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

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抓住叙写对象独有的特征,以“望”字相贯串,在动态中描绘出天门山奇险秀美的景色,抒写诗人酣畅淋漓的兴会。运笔自然,气势雄放,为李白七绝名篇。《唐宋诗醇》评曰:“此及‘朝辞白帝’等作,俱极自然,洵属神品,足以擅场一代。”三、四两句把舟过天门山时楚江两岸峰峦迭起,竞相突出的感觉生动传出,是曲尽山水之妙的佳句。(吴小林)

【早发白帝城】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二。题一作《白帝下江陵》,一作《下江陵》。作于乾元二年(759)春。是时,李白因永王璘案获罪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心情异常兴奋,旋即由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乘舟东返江陵(今属湖北省),写下此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舟行之速映衬诗人获赦东返的轻快喜悦心情。全诗可谓句句写景,句句抒情,景和情融合无间,且写得明快流利,空灵飞动。施补华说:“太白七绝,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岷傭说诗》)该诗是体现此种特色的代表性诗篇。沈德潜誉之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说诗碎语》)。其中“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以猿声山影烘托舟船飘然出峡的迅疾,施补华说:“无此句则直而无味,有此句,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可悟用笔之妙”(《岷傭说诗》),信为“能使通首精神飞越”(桂馥《札朴》)的神妙之笔。(吴小林)

【月下独酌四首】 唐组诗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三。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云:“长安。”作于天宝三年(744)。其时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不被君王重用,又遭权臣谗毁,政治理想破灭,心情抑郁苦闷,该组诗即写其借酒消愁情景。其中以第一首“花间一壶酒”最为著名,想象奇特,感情真挚,在旷达洒脱的独酌者形象中,透露出诗人愤懑不平的情绪。《唐宋诗醇》评曰:“千古奇趣,从眼前得之。”沈德潜曰:“脱口而出,纯乎天籁。”(《唐诗别裁》卷二)诗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两句,奇思妙想,化“独”为“三”,由此通篇皆活,是广为传诵之名句。“东坡喜其造句之工,屡用之。”(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如苏轼“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爱有谪仙人,举酒为三客”(《妒佳月》)等诗句,显系由李白诗脱化而来。(吴小林)

【古风五十九首】 唐组诗名。五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古体诗。非一时一地之作。其组合,一说李白自己选择组成,一说编集者汇集而成,以后说为胜。该组诗,或“指言时事”,如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其十九“西上莲花山”;或“感

伤己遭”,如其十“齐有倜傥生”、其十五“燕昭延郭隗”;或抒写志向抱负,如其十二“松柏本孤直”、其十三“北溟有巨鱼”;或表述文学观点,如其一“大雅久不作”、其三十五“丑女来效颦”,题材广泛多样,内容丰富深刻。其作多以“风”、“雅”为尚,继承《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诗、陈子昂《感遇》等所形成的五言咏怀古体组诗感慨深沉,抒写委婉的传统,而思想显豁,语言明晓,融有七古奔放流畅的特点,则是其发展创造,可谓集五古咏怀组诗之大成者。陈廷焯曰:“太白一生大本领,全在《古风五十九首》。”(《白雨斋词话》卷七)刘克庄曰:“太白《古风》与陈子昂《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之诗人,皆在下风。”(《李太白全集》卷二引)胡震亨评云:“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实相源流也。但嗣宗诗旨渊放而文多隐避,归趣未易测求。子昂淘洗过洁,韵不及阮,而浑穆之象尚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循径而窥,又觉易尽。此则役于风气之递盛,不得不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李诗通》)诗中“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其十九),“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其十五),“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其十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其一)等句,或叙写安史之乱造成的灾难,或揭露贤愚莫辨的黑暗现实,或展示孤傲耿直的品格,或反对六朝浮靡绮艳的诗风,形象生动,浑朴有力,均为广传人口的名句。(吴小林)

【远别离】 唐诗篇名。七古。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三。为乐府旧题,萧士贇曰:“乐府《远别离》者,别离十九曲之一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王琦曰:“江淹作《古别离》,梁简文帝作《生别离》,太白之《远别离》、《久别离》二作,大概本此。”(《李太白全集》卷三)该诗写作年代和涵意的说法颇多分歧。王世懋谓写肃宗上元元年(761)李辅国将玄宗劫而幽之事,讽刺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艺圃撷馀》)。陈沆认为是讽刺天宝末年(756)玄宗入蜀马嵬赐死杨妃之事(《诗比兴笺》卷三)。萧士贇谓天宝年间玄宗荒于政事,内用杨国忠,外宠安禄山,借人国柄,大权旁落,李白借此诗隐喻寄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此作为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作年当不晚于天宝十二年(753),故第三说近是。全诗抒写作者对君权下移,朝政日非现状的忧虑,但不是如实描绘,而是通过有虞二妃与帝舜生离死别、尧幽舜和舜野死等传说,摹写幻景,渲染气氛,进行比兴寄托,富有楚歌骚体的韵味。胡震亨评曰:“其辞闪幻可骇,增奇险之趣。盖体干于楚骚,而韵调于汉铙歌诸曲,以成为一家语。”(《李诗通》卷

四)

(吴小林)

【独坐敬亭山】 唐诗篇名。五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三。天宝十二年(753)秋作于宣州(今安徽宣城)。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北,又名昭亭山。全诗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中紧扣一个“独”字,渲染敬亭山孤寂清幽的环境,抒发诗人愤世嫉俗和超脱旷达的心情,含而不露,富有神韵,是李白五绝中之佳作。三、四两句运用拟人化手法,以与山相伴相守、百看不厌,烘托作者一腔孤愤,向为人们传诵。沈德潜评曰:“传独坐之神。”(《唐诗别裁》卷一九)李颀亦曰:“首二句已绘出‘独坐’神理,三、四句偏不从独处写,偏曰‘相看两不厌’,从不独处写‘独’字,倍觉警妙异常。”(《诗法易简录》) (吴小林)

【哭晁卿衡】 唐诗篇名。七绝。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二五。晁衡,又作朝衡,日本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汉名。开元五年(717)来华留学,后在唐朝任官职,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友谊深厚。天宝十二年随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东返日本,途中遇风暴,漂至安南,后于天宝十四年折回长安。此诗为天宝十三年(754)李白传闻晁衡遇难悲悼而作:“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运用生动的比喻和丰富的联想,设置凄怆的氛围,表达对日本友人晁衡的赞颂、怀念和哀思,词浅而意深,语短而情长,既是一首出色的悼亡诗,又是一份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珍贵的形象化资料。

(吴小林)

【塞下曲】 ①唐组诗名。五律。李白作。见《李太白全集》卷五。乐府旧题有《出塞》、《入塞》,该诗盖出于此,宋郭茂倩将李白《塞下曲》收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乐府杂题》。共六首,均为边塞诗,或颂将士英勇杀敌的无畏精神,或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之情,而为国立功,平定边患则是其共同主题。其中以第一首最为著名:“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第一、二联写边地环境的艰苦,第三联言军旅生活的紧张,末联揭示杀敌靖边的诗旨。全诗气势雄放,意境苍凉,对仗不拘常格,典型地体现出李白“于律体中以飞动嫖姚之势,运旷远奇逸之思”(《姚鼐语,引自《唐宋诗举要》卷四)的特点。沈德潜评曰:“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说诗碎语》卷上)②唐组诗名。五绝。卢纶作。见《全唐诗》卷二七八。题一作《和张仆射塞下曲》。本于乐府旧题《出塞》、《入塞》。该组诗共六首,从将军发令,夜战破敌,到奏凯庆功,题名麟阁,简练而完整

地写出边地的征战生活。其中以第二首“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第三首“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两首更为著名。前者借用汉代名将李广中石没镞的典故,歌颂边地将军的神勇;后者通过单于乘夜逃遁,边将披雪追击的典型场景,刻画将军的骁勇善战。均避实就虚,欲擒故纵,写得浑然天成,饶有馀味,且雄壮豪放,“俱有盛唐之音”(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为中唐边塞诗中的杰作。③唐诗篇名。七绝。李益作。见《全唐诗》卷二八三。本于乐府旧题《出塞》、《入塞》。全诗为:“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道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诗中运用汉代名将马援、班超和唐初大将薛仁贵的故实,抒写从军报国,安边定远的志向,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句句用典又不使人觉,词意深婉,格调雄浑,是中唐边塞诗和七绝中的传世佳作。 (吴小林)

【题破山寺后禅院】 唐诗篇名。五律。常建作。见《全唐诗》卷一四四。此诗最早收录于殷璠在天宝十二载(753)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全诗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破山寺,又名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虞山北部的破山上。该诗是作者游览这座江南名刹,寻幽探胜、写景抒情之作。颌联“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既写出后禅院幽静的环境,又蕴含着一种恬淡的情趣,构思巧妙,意境优美,向为人们所传诵。宋代欧阳修在《题青州山斋》中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又说晚来青州,“益欲希其仿佛,竟尔莫获一言”(《居士外集》卷二三)。可见对此联的推崇备至。颈联“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亦写得造语精警,情景兼融,殷璠称此联和上一联为“警策”(《河岳英灵集》)。此诗全篇皆工,富有诗情画意,前人曾评曰:“兴象深微,笔笔超妙,此为神来之候。”(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四引)是唐代山水诗中的传世名篇。 (吴小林)

【封丘作】 唐诗篇名。七古。高适作。见《高常侍集》卷五。题一作《封丘县》。约作于天宝九、十年(750、751)间封丘(今属河南)县尉任上。高适长期仕途失意,至天宝八年经张九皋荐举有道科方登第,但因权奸把持朝政,只授封丘县尉,深感失望。此诗即写其任县尉后痛苦厌倦的心情和对弃官归隐生活的向往。全诗一气呵成,情真意切,质朴自然,体现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的特点。诗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两句,刻画封建社会正直小吏复杂矛盾心态入微,自来传诵人口。 (吴小林)

【别董大二首】 唐诗篇名。七绝。高适作。见《高常侍集》卷八。敦煌《唐诗选》残卷题作《别董令望》。董大,一说即唐玄宗时代著名音乐家董庭兰;一说因诗题别作《别董令望》,恐非庭兰而另有其人。二首中以第二首更为著名:“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以荒寒阔大的景色设置别时的环境气氛,后两句词意一转,用有才者必知己遍天下的豪语慰藉友人。全诗意境悲壮,格调爽健,为唐代送别诗中的杰作。清代徐增评曰:“此诗妙在粗豪。”(《而庵说唐诗》卷一一)尤其“莫愁”二句,词语慷慨,充分显出积极进取、开朗乐观的盛唐时代精神,广为人所传诵。

(吴小林)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诗篇名。七古。岑参作。见《岑嘉州集》卷二。约天宝十四年(755)任安西北庭判官时,为送别友人武判官返京而作。前十句着重咏雪,但始终照应送别,为送别设置环境气氛;后八句着重写送别,但一直穿插雪景的描绘。全诗咏雪和送别紧密结合,既脱去一般咏边塞雪景诗的苦寒荒凉景象,又一扫传统送别诗的伤感悲哀情调,写得色彩明丽,意境壮伟,满含乐观昂扬的气概。清方东树评为“奇峭”(《昭昧詹言》卷一二)。这是体现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璠《河岳英灵集》)独特风格的最著名的边塞诗。诗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两句描写雪景,翻用梁萧子显《燕歌行》中“洛阳梨花飞如雪”诗句,但比原句显得更奇丽、更壮美,为千古传诵之名句。方东树评云:“奇才奇气,奇情逸发,令人心神一快。”(同上)

(吴小林)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唐诗篇名。七古。岑参作。见《岑嘉州集》卷二。轮台,今新疆米泉。作于天宝十三年(754)任安西北庭判官时,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西征播仙送行而写,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同一时期之作。诗分四段。第一段六句描写敌人入侵、两军对垒的紧张形势。二段四句描绘大军出征的雄壮声威。三段四句悬想战争的惨烈和环境的艰苦。末段四句预祝出师奏捷。全诗叙写生动,气势豪迈。近人藤元粹评云:“二句一解,平仄互回,末一解四句收结,格法森严。”(刘开扬《岑参诗选》引)诗中“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等句,或用夸张笔法渲染将士进军的浩大声势,或以写实手法极言边地的奇寒无比,均为充满奇情异采的名句。

(吴小林)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唐诗篇名。七古。岑参作。见《岑嘉州集》卷二。走马川,在轮台

(今新疆米泉)附近,一说即左末河(今新疆车尔臣河)。行,诗歌体裁名。作于天宝十三年(754)供职安西北庭判官期间,时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出师西征播仙,作者写此诗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送行。诗分三段。首段描绘边塞的奇异风光,渲染环境的恶劣。次段设想夜晚进军情景,突出将士的英勇无畏。末段预祝大军凯旋而归,将等候献俘报捷。想象奇特,感情激越,音调铿锵,把戍边将士的出征表现得壮美动人。清方东树评曰:“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昭昧詹言》卷一二)沈德潜云:“势险节短。句句用韵,三句一转,此《峰山碑》文法也。”(《唐诗别裁》卷五)诗中“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等句,比喻生动,格调雄健,均为体现“岑奇逸而峭”(王士禛语,见《师友诗传续录》)特点的名句。

(吴小林)

【逢入京使】 唐诗篇名。七绝。岑参作。见《岑嘉州集》卷七。作于天宝八年(749)赴安西(今新疆库车)途中。表现诗人远涉边塞时的思乡怀亲之情:“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全诗信口而成,于淡语中见深情。“凭君传语报平安”写得尤好,将生活中习见之事提炼成极富有诗意的一笔,本色而又韵味醇永,遂成传诵千古之名句。明谭元春评此诗曰:“人人有此事,从来不曾写出,后人蹈袭不得,所以可久。”(《唐诗归》卷一三)清沈德潜亦曰:“人人胸臆中语,却成绝唱。”(《唐诗别裁》卷一九)

(吴小林)

【望岳】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杜甫以《望岳》为题的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其中以这首望东岳泰山的诗最为著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诗人第一次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壮游》)快意生活的时候。诗中着重描绘泰山高出于群山之上的雄峻形势,以反映作者的豪放胸襟和不凡抱负。全篇气势雄浑,境界开阔,语言警拔,是诗人早期富有浪漫气息的代表作。“会当”二句化用《孟子·尽心上》中“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话,以登岳表现雄心壮志,为传诵千古的名句。浦起龙评曰:“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卷一)。

(吴小林)

【兵车行】 唐诗篇名。七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此诗属于杜甫所创制的新题乐府,元稹称之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故为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乐府杂题》。约作

于天宝十一年(752)。诗的背景旧有两说:一为明人单复曰:“此诗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读杜诗愚得》卷一)另一为清人钱谦益曰:“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士卒死者六万。杨国忠掩其败状,反以捷闻。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瘴疠,士卒未战而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此诗序南征之苦,设为役夫问答之词。”(《钱注杜诗》卷一)以后说为胜。前段叙写士卒出发,家人送别的凄惨景象;后段以被征士卒现身说法,直接揭露封建统治者不义的扩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尖锐地抨击唐玄宗时代的穷兵黩武,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该诗寓强烈的主观感情于客观的叙述之中,写得哀怨愤激,动人心魄。大量运用口语,句式参差错落,押韵富于变化,具有自然流畅,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为杜诗中广传人口的名篇。(吴小林)

【前出塞九首】 唐组诗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乐府旧题有《出塞》、《入塞》,杜甫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创新而作,故郭茂倩将它们收入《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汉横吹曲》。作于天宝十一年(752),一般认为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诗中通过一个士兵的遭遇,叙写征战之苦,揭露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诗共九首,前后连贯,如同一首,又各有侧重,可以独立成篇。一首叙初发时辞别父母情事,二首言途中之事,三首写路上心情之烦乱,四首叙路上被驱迫而叹,五首诉说初到军中情事,六首写为当时黩武而叹,七首言严寒天气筑城戍守之事,八首写其英勇作战,九首批评争功邀赏者。整组诗以士卒的现身说法,形象地表明作者对当时拓边政策的看法,写得朴实流畅,颇为感人。明张綖曰:“李杜二公齐名,李集中多古乐府之作,而杜公绝无乐府,惟此前后《出塞》数首耳。然又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轴,不主故常,昔人称‘诗史’者以此。”(《杜诗通》卷二)其中尤以第六首最为著名:“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四句运用谚语,排比而出,强调“擒王”之意,黄生说:“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杜诗说》卷一)后四句亦即第一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之意,以直接议论揭示全诗主旨,表达反黩武的政治观点。张远曰:“大经济语,借戍卒口中说出。”(《杜诗会粹》)(吴小林)

【丽人行】 唐诗篇名。七古。杜甫作。见《杜诗

详注》卷二。为杜甫创制的新题乐府之一。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春。其时,杨贵妃受宠于玄宗,其三个姊妹皆被封为国夫人,从兄杨国忠亦于天宝十一年(752)被任为右丞相,杨氏兄妹显贵无比。杜甫故作此诗,通过写杨国忠兄妹游宴曲江之事,揭露权贵的骄奢淫佚,气势薰天,针砭时政的昏暗腐败。先写丽人姿态之美和服饰之盛,次叙其饮食肴饌之奢,末言杨国忠声势之烜赫及其与妹虢国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全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锋芒犀利,且铺排渲染,精描细绘,形容曲尽。浦起龙评此诗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施补华亦说:“前半竭力形容杨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后半叙国忠之火焰逼人,绝不作一断语。使人于意外得之,此诗之善讽也。”(《岷傭说诗》)蒋弱六则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真可笑可畏。”(《杜诗镜铨》卷二引)王嗣奭也说此诗“善于形容”,“形容已极”,“真化工之笔”(《杜臆》)。所言极是。(吴小林)

【后出塞五首】 唐组诗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四。郭茂倩将它们收入《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汉横吹曲》。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四月。诗中通过一个脱身而归的士兵的诉说,揭露唐玄宗黩武好战,过宠边将,遂使安禄山跋扈骄恣,养虎贻患,表现出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注。组诗共五首,既一气连贯,又可独立成篇。一首叙应募和辞家情事,二首记途中之事,三首言边将贪功生事,四首写主将气骄欲叛,五首写士兵不欲从逆脱身而归。明张綖曰:“前四章,著明皇黩武不戢,过宠边将,启其骄恣轻上之心。末章,直著禄山之叛,以见明皇自焚之祸也。”(《杜诗通》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为著名:“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筋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叙写出征队伍雄壮严整的声威和肃杀悲凉的气氛十分传神,宋刘辰翁评曰:“其时、其境、其情,真横槊间意,复欲一语似此,千古不可得。”(引自《杜诗镜铨》卷三)诗中“落日”二句是传世名句,后句“马鸣风萧萧”化用《诗经·小雅·车攻》中“萧萧马鸣”成句,加一“风”字,使全句更加动荡流走,并增强了关塞苍凉悲壮的氛围。(吴小林)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四。天宝十四年(755)十月,杜甫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离长安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家室,此诗为到家后所作。全诗五百字,可分为三段:首段自述生平大志,抒写忧国忧民怀抱;二段叙述途经骊山时的所见所闻,抒

发社会不公之感慨；三段叙写到家后情形，由幼子饿卒的家庭悲剧联想至百姓的困苦。诗中无情揭露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荒淫奢侈，深切表现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为诗人长安十年政治生活之总结。其时安史之乱已爆发，只消息还未传至奉先，但时弊丛生，危机四伏，动乱将至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气氛在诗中得到深刻反映。该诗是杜集中长篇诗史式作品之一。诗题为“咏怀”，实则集咏怀、纪行、纪事于一篇，熔议论、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全篇间架宏阔，波澜浩瀚，蔚为壮观，且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邵长蘅评曰：“《咏怀》、《北征》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赞其铺陈排比，浑涵汪茫，正是此种。”（《唐宋诗举要》卷一引）杨伦亦云：“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碾’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卷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二句，自陈爱国忧民之心，感人肺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针砭贫富悬殊社会现象，“惊心动魄”（赵翼《瓠北诗话》卷二），均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吴小林）

【月夜】 唐诗篇名。五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四。至德元年（756）八月，杜甫把家人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后只身前往行在，途中被安史叛军俘虏，此诗为身陷长安时所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全诗抒写乱离中对家人的思念，感情深挚，写法独特，全从对方望月思己落墨，可谓无笔不屈，无语不曲，含蓄隽永，韵味醇厚，为杜甫五律名篇。王嗣奭评该诗曰：“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杜臆》卷二）浦起龙云：“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读杜心解》卷三）黄生评其尾联说：“‘照’字应‘月’字，‘双’字应‘独’字，语意玲珑，章法紧密。五律至此，无忝称圣矣。”（《杜诗说》卷三）

（吴小林）

【春望】 唐诗篇名。五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四。至德元年（756）六月，安史叛军攻占唐都长安，八月，杜甫把家人安顿有鄜州，只身前往灵武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到次年春季三月，当杜甫眺望被战乱破坏得颓败荒凉的长安城时，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国破山

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诗前四句写春望之景，景中有情，侧重睹物伤怀；后四句写春望之情，情中含景，着重遭乱思家。通篇以“望”字相贯穿，抒发诗人忧虑国事、思念亲人的深挚感情，是充分体现杜诗情景交融特点和沉郁顿挫风格的优秀代表作之一。颌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两种解释：一说是花鸟本为平时可娱之物，诗人却因感念时局，怅恨离别，看见春花反而伤心落泪，听见鸟鸣反而心惊不安。宋人司马光《司马温公诗话》等即持此说。另一说是以移情拟人手法，写花感时而落泪，鸟恨别而惊心。以前说为胜。此联运用“律句中加一倍写法”（施补华《岷傭说诗》），比一般直接抒写忧国思家具有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与下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均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吴小林）

【哀江头】 唐诗篇名。七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四。作于至德二年（757）春陷长安时。“江”，指曲江，在长安城东南，为著名游览胜地。杨伦曰：“此公在贼中时，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因帝与贵妃常游幸曲江，故以《哀江头》为名。”（《杜诗镜铨》卷三）该诗以曲江宫殿盛衰变化为背景，以杨贵妃由专宠骄奢以至缢死马嵬的历史悲剧为中心，抚今追昔，抒写国破家亡的巨大哀痛，亦含讽谕帝妃荒淫误国之意。全诗深情绵邈，词意婉曲，富沉郁顿挫之风。黄生评曰：“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杜诗说》卷三）邵长蘅说：“转折矫健，略无痕迹。”（《杜诗镜铨》卷三引）历代论者好以此诗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作比较，颇多歧见。苏辙云：“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栞城三集》卷八《诗病五事》）《唐宋诗醉》评曰：“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高步瀛则说：“以上二说似相反，然实各有所见。由前说可见诗格高下，由后说可知诗人各有独到之处，不必强出一途也。”（《唐宋诗举要》卷二）诗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二句，对比鲜明，反差强烈，为咏杨名句。

（吴小林）

【北征】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五。作于至德二年（757）秋自凤翔行在至鄜州探家时。仇兆鳌曰：“公遭禄山之乱，自行在往鄜州，鄜州在凤翔东北，故以《北征》命篇。”（《杜诗详注》卷五）此诗为七百字之大篇，可分为五段：首段写蒙恩探家、辞朝登程时依恋和忧虞的心情，次段叙途中所见战乱景象与人民苦难情况，三段述到家后与亲人

相聚时悲喜交加的情景,四段议论时政,对如何平定安史之乱提出看法,末段表示对平乱的信心,寄中兴之期望于唐肃宗。这是一首规模宏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实际也是杜甫作为左拾遗用诗歌形式所写的一篇奏章,其忠贞鲠直之心和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浦起龙曰:“读《北征》,见杜子一腔血性。”(《读杜心解》卷二)沈德潜亦说:“是诗家第一篇大文,公之忠爱谋略亦于此见。”(《唐诗别裁》卷二)该诗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运用以赋为主,兼有比兴的手法,既展示壮阔的社会图景,又对细节进行生动描写,结构谨严,层次井然,且驱遣自如,变幻无迹,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为铺陈终始、纵横开阖的诗史式大篇。宋人叶梦得称此作“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石林诗话》卷上)明人钟惺评曰:“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长篇不易作。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处,得其篇法之妙。”(《杜诗详注》卷五引)施补华则云:“《奉先咏怀》及《北征》是两篇有韵古文……后人无此才气,无此学问,无此境遇,无此襟抱,断断不能作。”(《岷傭说诗》) (吴小林)

【羌村三首】 唐代组诗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五。作于至德二年(757)秋。这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到凤翔行在,五月被任为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幸由张镐解救,才告无罪。八月肃宗诏放其回鄜州探家,此组诗为杜甫回到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境内)家中后所作。共三首,第一首写初到家与亲人团聚时悲喜交集的情景,第二首言被肃宗疏远放归家中后抑郁寡欢的心情,第三首叙邻里携酒慰问的情形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慨。该组诗,每首各有承转,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以小见大地展示出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情况与诗人忧虑国事的情怀,堪称“乱离图”。全诗擅用白描手法,语言平易自然,摹写生动传神,感情真挚深厚。明人王慎中评曰:“一字一句,镂出肺肠,令人莫之措手,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者。”(《杜诗五家评》卷二)清人杨伦亦云:“语语从真性情流出,故足感发人心,此便是汉魏三百篇一家的髓传也。”(《杜诗镜铨》卷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二句,写夫妻乱离重逢之状入神,是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的名句。仇兆鳌说:“乱后忽归,猝然怪惊,有疑鬼疑人之意。‘偶然遂’,死方幸免。‘如梦寐’,生恐未真,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杜诗详注》卷五)唐人戴叔伦诗《江南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宋人晏幾道词《鹧鸪天》:“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

逢似梦中”,亦由此二句脱化而出。 (吴小林)

【三吏三别】 唐代组诗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七。包括《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属于杜甫所创制“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作于乾元二年(759)春。是时唐军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部于邺城(今河南安阳),结果大败,为扭转危局,朝廷遂向民间强行征兵。杜甫于洛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目睹此事,有感而发,写下这组诗。诗中反映安史之乱造成的残破景象,揭露唐王朝的腐败及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现诗人对人民的高度同情和对国事的深切忧念,是杜集中诗史式的名篇。六首诗各写一事,独自成章,又互有关联,浑然一体。“‘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该组诗寓主观倾向于客观叙写之中,以个别反映一般,描述情事,刻画入微,摹写人物,声情毕肖,语言精炼生动,结构严谨灵动。唐汝询曰:“杜五言古,体情莫妙于‘三别’,叙事莫核于‘三吏’。”(《杜诗详注》卷五引)王嗣奭曰:此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又曰:“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同上卷七引)杨伦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沉警独绝矣。”(《杜诗镜铨》卷五) (吴小林)

【石壕吏】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七。组诗“三吏”“三别”中“三吏”的第三首。石壕,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此诗叙写诗人途经石壕村,目睹暴吏夜间拉夫,老妇被迫应征之事。首段六句写差吏深夜捉人情景,次段十四句叙老妇诉说一家悲惨遭遇和其被迫应河阳之役,末段四句言老妇被抓之后家中的凄凉景象。全诗直陈其事,不着一字主观评论,而差吏之横暴、战乱中人民之痛苦以及作者对人民遭遇之同情均自然流露。记事或记言,都简约精悍,描摹入神,有身临其境之效。仇兆鳌曰:“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杜诗详注》卷七)李因笃评曰:“急弦则响悲,促调则意苦,最近汉魏。”(《杜诗集评》卷二)陆时雍亦云:“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杜

诗详注》卷七引)此诗为“三吏”“三别”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首。清代诗人袁枚《马嵬》一诗写道:“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石壕吏》对后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吴小林)

【新婚别】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七。组诗“三吏”“三别”中“三别”的第一首。此诗以一暮方结婚晨即送夫出征的新妇口吻,反映战乱中强行征兵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宋人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引)而诗中新郎亦被征,足见当时兵役之苛酷。首段四句以比喻总提“嫁女与征夫”的悲惨遭遇,次段二十四句写新妇诉说内心痛苦,末段四句以比喻表达其对爱情的坚贞。全诗运用第一人称写法,叙述暮婚晨别经过和刻画女主人公复杂心态真切生动;擅用比兴手法,摹写形象而又含蓄;语言朴素流畅,平易通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浦起龙评此诗曰:“比体起,比体结。语出新人口,情绪纷而语言涩。”(同上)王嗣奭曰:“‘暮婚晨告别’是诗柄,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杜臆》卷三)仇兆鳌云:“《新婚》一章叙室家离别之情及夫妇始终之分,全祖乐府遗意,而沉痛更为过之。”“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杜诗详注》卷七) (吴小林)

【无家别】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七。组诗“三吏”“三别”中“三别”的第三首。此诗叙写一个邛城战败逃散的士兵回到家乡,亲人丧尽,孑然一身,后再次被征入伍,要告别而竟无家可别,以此反映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残破景象。前段十四句叙士兵返乡所见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的凄凉情景,后段十八句写其重被征召服役、无家可别的悲愤情绪。浦起龙曰:“末二,以点(题)作结。‘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卷一)卢元昌亦曰:“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室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姬,《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收足数章。”(《唐宋诗举要》卷一引)该诗明显受有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的影响,但内容较之更为忧愤深广,艺术上亦多所创造,以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烘托人物的感情,重视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运用比喻、暗示、对比等多种手法增强诗作含蓄隽永的艺术效果等,均为其显著特点。

(吴小林)

【佳人】 唐诗篇名。五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七。作于乾元二年(759)秋流寓秦州之时。仇兆鳌云:“司马相如《长门赋》:‘夫何一佳人兮,步道

遥以自娱。’此为陈王后见废而作,诗题正取之。”(《杜诗详注》卷七)该诗先写佳人在战乱中兄弟丧生的不幸遭遇,次叙佳人遭丈夫遗弃的内心痛苦,末言其坚守节操的品格。全篇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塑造一貌美品高的弃妇形象,借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慨怀抱。对此诗为写实抑或有寄寓,历来聚讼纷纭。仇兆鳌曰:“天宝乱后,当是实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同上)陈沆认为纯系寄托:“夫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兄弟谓同朝之人,官高谓勋戚之属,如玉喻新进之猖狂,山泉明出处之清浊。摘花不插,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托,未之前闻。”(《诗比兴笺》卷三)黄生则云:“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人之感,故作是诗。”(《杜诗说》卷一)杨伦亦说:“此因所见有感,亦带自寓意。”(《杜诗镜铨》卷五)以黄说、杨说为胜。诗中集写人、叙事、抒情于一篇,赋与比兴的手法兼而用之,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和摹写生动、寓意深长的特点。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尤为写人寄慨的神来之笔。沈德潜曰:“结处只用写景,不更着议论,而清贞贞正自隐然言外,诗格最超。”(《唐诗别裁》卷二)后世曾有不少据此而作的诗意画,宋代苏轼的词《贺新郎》、姜夔的词《疏影》等诗词作品亦明显受到此诗的影响。(吴小林)

【蜀相】 唐诗篇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九。“蜀相”,指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这是上元元年(760)诗人居成都游南郊的诸葛亮祠堂武侯祠时所作,表现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前四句着重写祠堂之景,后四句侧重写丞相之事。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传诵千古的名句,既抒写对诸葛亮未捷先死、赍志以殁的惋惜同情,也融和着诗人对当时失地未复,自己又失意落魄的忧思悲愤。据记载,唐代王叔文在永贞革新失败时、宋代爱国将领宗泽在临死前都吟诵过这两句诗,足见其艺术魅力之强和影响之大。全诗写祠堂与写人和谐结合,写景与抒情融合无间,凭吊古人与悲叹自己浑然一体,内涵丰富,感情深挚,格调沉雄。浦起龙评曰:“后来武侯庙诗,名作林立,然必枚举一事为句,始信此诗统体浑成,尽空作者。”(《读杜心解》卷四)

(吴小林)

【春夜喜雨】 唐诗篇名。五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〇。上元二年(761)春作于成都。全诗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

锦官城。”写诗人对夜降春雨，滋润万物的喜悦心情，反映其关心人民的可贵思想。此诗观察细致，摹写入微，且情景交融，形神俱佳。全篇不露“喜”字，而“‘喜’意都从罅缝里迸透”（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无一字不是春雨，无一笔不是春夜喜雨”（查慎行语，《杜诗集说》引），写得精妙隽永之至。“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二句，扣住春雨的特点，描写雨水润物达到入化之境，是咏雨的千古名句。清人仇兆鳌评此二句曰：“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杜诗详注》卷一〇）沈德潜亦云此二句“传出春雨之神”（《唐诗别裁》卷一〇）。

（吴小林）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诗篇名。七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〇。上元二年（761）秋作于成都。乾元二年（759）底杜甫流寓至成都，上元元年（760）春在亲友帮助下于城西浣花溪畔盖起茅屋，定居下来，此即为著名的“成都草堂”。到次年十月，一阵狂劲的秋风卷走屋顶茅草，造成房破漏雨，诗人通宵难眠。该诗即述此苦况，并写作者推己及人，深切同情人民疾苦的博大胸襟。全诗可分四段，首段五句叙狂风破屋情景，次段五句写顽童抢走茅草场面，第三段八句言屋漏偏遭连夜雨的境况，末段六句抒写诗人的感慨和愿望。通篇熔叙述、描写、抒情于一炉，剪裁精当，结构谨严，语言朴素生动，句式、用韵富于变化。清人邵长蘅曰：“诗亦以朴胜，遂开宗派。”（《杜诗镜铨》卷八引）诗的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诗人身处穷迫之境仍怀忧民之心，甚至“宁苦身以利人”（黄彻《碧溪诗话》）的伟大精神，是震撼人心的不朽名句。后来白居易《新制布裘》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王安石《子美画像》诗：“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均受此诗影响。（吴小林）

【戏为六绝句】 唐代组诗名。七绝。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一。作于上元二年（761），一说作于宝应元年（762）。“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一）当时存在“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的风气，或者完全否定六朝文学，或者崇尚浮靡诗风，杜甫此组诗即对此有感而发。共六首，每首各有侧重，独立成篇，又互有联系，浑然一体。前三首评论庾信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诗人，后二首揭示论诗宗旨，提倡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强调审美价值和社会作用的

统一、优美与壮美的兼胜、继承和创新的结合。其中“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等，均为体现杜甫诗歌理论主张的名句。此组诗触机成趣，直抒己意，以议论识见取胜，风格质朴雅健，在唐代绝句中别开异径。仇兆鳌说：“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摭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同上）正指此等诗篇。这是最早的论诗绝句，以后此体成为评论诗歌的重要形式之一，金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清人王士禛的《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等，均直接受其影响。

（吴小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诗篇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一。作于广德元年（763）春。前一年十一月，在唐军进攻下，安史叛军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同年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兵败自杀，河南（黄河以南今河南洛阳一带）、河北（黄河以北今河北一带）相继收复，至此延续近八年的安史之乱宣告基本结束。其时杜甫流寓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闻此消息后欣喜若狂，便写下这首热情洋溢的名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前四句写喜悦心情，后四句言还乡打算，通篇以一“喜”字相贯串，流露出诗人喜怒哀乐之情都以国事为转移的可贵精神。此诗气势流畅，音节响亮，风格爽健明快，虽为格律严谨的律诗，却又带有古诗韵味，在杜诗中别具一格。明人王嗣奭评曰：“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杜诗详注》卷一一引）清人邵长蘅云：“一片真气流行，此为神来之作。”（《杜诗镜铨》卷九引）浦起龙亦云：“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馀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卷四）

（吴小林）

【旅夜书怀】 唐诗篇名。五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四。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遂率家离开成都，乘舟东下，经渝州（今四川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至云安（今四川云阳）。此诗为途中所作：“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前四句写旅夜景色，后四句抒发感触，反映诗人当时孤凄悲苦的心情。“星垂”二句，“垂”和“涌”字均为诗眼，“垂”字更显出平野之阔，“涌”字则更烘托出江涛澎湃，波澜激荡的景象，是杜诗中炼字的典型例子。“飘飘”二句，即景自况，

点出诗旨,亦为传诵名句。黄生曰:“‘一沙鸥’,何其渺!‘天地’,何其大!合而言之曰‘天地一沙鸥’,作者吞声,读者失笑。”(《杜诗说》卷五)全诗情景交融,意境雄浑悲凉,语言精警稳重,为老杜五律代表作之一。浦起龙评此诗曰:“笔笔高老。”(《读杜心解》卷三)纪昀云:“通首神完气足,气象万千,可当雄浑之品。”(《唐宋诗举要》卷四引) (吴小林)

【秋兴八首】 唐组诗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七。作于大历元年(766)秋流寓夔州(今四川奉节)时。诗因秋而发兴,故以“秋兴”名篇。是年,杜甫率家沿长江东下至夔州,因兵戈未定,道路阻隔,滞留于此。当他看到巫峡萧瑟的秋景,想起近年经历之种种磨难和仍然动荡不安的时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此诗。诗中以身居夔州、心念长安为线索,抒写遭逢丧乱、羁留他乡的漂泊之感和故国之思。全组诗可分两大部分,前三首着重写夔州的秋景和羁旅思乡的感情,后五首侧重写对长安旧事的回忆。其中首篇是“八诗之纲领”,第四首是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前后大关键”,第八首“为八诗大结局”(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每首诗各有重点,可以独立成章,又首尾呼应,一气贯注,为组织严密的艺术整体。陈豕宰曰:“《秋兴八首》,命意炼句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论: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如常山之阵,首尾互应。”(《杜诗详注》卷一七引)王夫之云:“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唐诗评选》卷四)此诗运用对比烘托、回环往复、情景交融的手法,把夔州的萧森气象和长安的繁华旧事加以绾合,以抒发抚今追昔、忧国伤时的感慨,写得格律精工,音节铿锵,韵味浓郁,在凄清悲凉中具有沉雄富丽的意境,为老杜七律中的杰作,历来受到高度评价。陈继儒曰:“云霞满空,回翔万状,天风吹海,怒涛飞涌,可喻老杜《秋兴》诸篇。”郝敬亦曰:“八首,声韵雄畅,词采高华,气象冠冕,是真足虎视词坛,独步一世。”(《杜诗详注》卷一七引)首篇“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二句,格调沉雄,意境壮阔,虽写眼前阴晦肃杀景象,而诗人飘零、国家丧乱之意全在其中,是传世名句。 (吴小林)

【咏怀古迹五首】 唐组诗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七。作于大历元年(766)流寓夔州时。五首诗由湖北江陵的庾信故居、宋玉故宅、秭归的昭君村、四川白帝城的永安宫、夔州的武侯庙等古迹引发,分别咏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但全组诗并不是为咏古迹而咏古迹,而是借古迹以咏怀,抒发诗人漂泊流离的身世之感和对国家政治的忧念之情。杨伦曰:“庾信避难,由建康至江陵,虽

非蜀地,然曾居宋玉之宅,公之漂泊类是,故借以发端。次咏宋玉以文章同调相怜,咏明妃为高才不遇寄慨,先主、武侯则有感于君臣之际焉。”(《杜诗镜铨》卷一三)该组诗抒怀与咏古紧密结合,故显得含蓄蕴藉,精警沉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李子德云:“五首托兴最远,有纵横万古,吞吐八极之概(同上引)。卢世淮也说:“杜诗《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脉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泪,万遍水磨,不唯不可轻议,抑且不可轻读,养气涤肠,方能领略。”(《杜诗详注》卷一七引)所评颇中肯綮。第一首中“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二句,第五首中“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二句,以生动的语言,热烈的感情,精确而形象地写出庾信的诗赋特点和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并打入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慨,为咏古的传世名句。 (吴小林)

【阁夜】 唐诗篇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一八。作于大历元年(766)冬寓居夔州西阁之时。其时杜甫的好友郑虔、苏源明、李白、严武、高适先后去世,蜀中又有崔旰之乱,诗人心情十分沉重。在一个大雪初霁之夜,触景生情,写下此诗:“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首联感叹岁月流逝,沦落天涯;颌联描写寒夜所闻所见,声景俱壮;颈联诗人神驰千里,忧国忧民;尾联感慨史事,自我慰藉。全诗通过叙写岁暮寒宵的三峡之景,抒发作者对军阀混战,百姓涂炭动荡时局的忧虑和自己羁旅万里,漂泊无依的孤凄心境。意境悲壮,气象雄阔,格律谨严,为老杜七律中的名篇。胡应麟评论七律时,说该诗“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诗薮》内编卷五)卢世淮亦评此诗说:“一题不止为一事,一诗不止了一题,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当与《诸将》、《古迹》、《秋兴》诸章相为表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二句,写得阔大雄浑,情景兼融,悲中有壮,撼人心魄。苏轼称此为“七言之伟丽者”,“尔后寂寞无闻焉”(《东坡题跋》)。纪昀也说:“三、四壮伟,冠绝古今。”(《唐宋诗举要》卷五引) (吴小林)

【登高】 唐诗篇名。七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〇。是诗人在大历二年(767)秋天流寓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所写。杜甫此时56岁,年老体衰,久客不归。这年重阳节扶病登高,看到萧瑟的秋景,触目伤怀,写下这首名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

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前四句紧扣秋天的节令特征和夔州地处长江三峡中瞿塘峡入口处的地理特点，描写登高的所见所闻。其中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刻摹三峡秋景形神毕肖，气势磅礴，是传诵的名句。宋辛弃疾词作名篇《南乡子》中的句子“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即由此演化而成。后四句抒发寂寞悲凉的感慨。其中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表现多层意思，是体现杜甫语言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典型例子。全诗初读一气呵成，似乎句句都不对仗，实则字字妥帖，句句都对。杨伦曰：“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卷一七）胡应麟则曰：“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移，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学，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引自《杜诗详注》卷二〇）

（吴小林）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唐诗篇名。七古。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〇。作于大历二年（767）寓居夔州时。公孙大娘，唐代开元间著名的舞蹈家，郑处海《明皇杂录》：“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公孙大娘弟子，即序中所言李十二娘。剑器，古武舞曲之一。杜甫年幼时曾在郾城（今属河南省）观看过公孙大娘舞，其时正值开元盛世，五十年后自己白首飘零至夔州时又见其弟子舞剑器，则唐代国势已江河日下，于是“感时抚事”，写下此诗。诗前有序文，交待写作缘起和诗旨。正诗先从公孙大娘善舞写起，次叙见李十二娘舞而感怀，最后抒发盛衰之感。全诗不仅生动地叙写出公孙大娘及其弟子出色的舞技，而且尤重在抒写自开元、天宝以来五十年间国家兴衰治乱、个人漂荡流离的感慨，写得语意蕴藉，音节顿挫，是老杜七古中沉郁悲壮的杰作。王嗣爽说：“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详注》卷二〇引）方东树曰：“此诗亦‘豪宕感激’，‘浏亮顿挫’，独出冠时，自大历至今，先生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一二）

（吴小林）

【登岳阳楼】 唐诗篇名。五律。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二。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乘船自夔州出峡，十二月由湖北的江陵、公安漂泊到湖南的岳阳，此诗即写诗人登岳阳楼的所见所感：“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先

写渴望登临而夙愿终尝的心情，次写洞庭湖的壮阔景象和雄伟气势，最后抒发由登楼引起的孤独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忧念时局的爱国挚情。全诗意境沉郁阔大，律法工稳自然，语言精警深曲，是体现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特点的五律代表作之一。黄生曰：“前半写景，如此阔大，五六自叙，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结语凑泊极难，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也。”（转引自《杜诗详注》卷二二）其中对洞庭湖的描写，尤其是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唐庚说：“尝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其气象阔放，涵养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方回曰：“尝登岳阳楼，左序毳门壁间大书孟诗，右书杜诗，后人不复复题。”（同上）王嗣爽也说：“只‘吴楚’二句，已尽大观，后来诗人，何处措手！”（《杜臆》卷一〇）

（吴小林）

【江南逢李龟年】 唐诗篇名。七绝。杜甫作。见《杜诗详注》卷二三。大历五年（770）春作于潭州（今湖南长沙）。李龟年，唐代著名音乐家。郑处海《明皇杂录》曰：“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杜甫早年曾在洛阳听过李龟年歌唱，如今漂泊至潭州相遇，不禁触发起今昔盛衰之感，于是以此诗相赠：“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前两句言过去之盛，为感慨张本；后两句写现在之衰，抒发感慨。全诗含蓄隽永，情韵无限，时世之凋弊丧乱，彼此之凄凉飘零，尽寓于其中。黄生评曰：“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杜诗说》卷一〇）邵长蘅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杜诗镜铨》卷二〇引）此诗确为杜甫绝句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吴小林）

【春陵行】 唐诗篇名。五古。元结作。见《元次山集》卷三。作于广德二年（764）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春陵，汉县名，故址在今湖南宁远县附近，唐时为道州辖地。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广西少数民族“西原蛮”武装反抗唐王朝，曾攻占道州月余。元结于次年五月赴刺史任后，看到战乱后的道州残破凋敝，人口锐减，而官府征敛仍有增无减，于是在上书请免“科率”的同时，作此诗“以达下情”（《春陵行序》）。诗中具体描写乱亡后道州人民困疲不堪的景象和官府催逼赋税的情况，坦露作为地方官吏的矛盾心情以及最后抗命缓征，不惜丢官

的决心,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全诗摹写细腻,讽喻鲜明,语言质朴醇厚。杜甫称该诗和《贼退示官吏》为“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并赞曰:“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清沈德潜评云:“杜老所谓‘为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者也。千载以下,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唐诗别裁》卷三) (吴小林)

【贼退示官吏】 唐诗篇名。五古。元结作。见《元次山集》卷三。作于广德二年(764)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广西少数民族“西原蛮”发动反对唐王朝的武装起义,曾攻占道州达一月有余。第二年五月元结任道州刺史,七月“西原蛮”又攻破邻近州县,而未攻道州。诗人认为这并非官府“力能制敌”,而是“贼”(指“西原蛮”)对战乱中道州人民的“伤怜”,可朝廷使臣却仍旧对百姓残酷征敛(《贼退示官吏序》),于是有感而作此诗。诗中运用对比手法,反映官不如“贼”的社会现实,揭露当时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的残民本质,表现出作者深切同情民生疾苦的可贵精神。全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感情愤激,不事雕琢,显示出元结诗歌质朴简古、平正切直的典型特色。杜甫称该诗和《春陵行》为“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并赞曰:“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 (吴小林)

【枫桥夜泊】 唐诗篇名。七绝。张继作。见《全唐诗》卷二四二。诗题一作《夜泊枫江》,《中兴间气集》又作《夜泊松江》。全诗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在今江苏苏州市西郊十里处,是当时运河的重要渡口。寒山寺,在枫桥附近,建于南朝梁代,原叫妙利普明塔院,后因名僧寒山和拾得到此住持,遂更名寒山寺,为古城苏州的重要名胜之一。此诗大概是安史之乱后作者流寓苏州时所作,描写半夜时分泊船枫桥的所见所闻。诗中江南水乡秀丽的山川之景和诗人绵邈的羁旅之愁融为一体,充满着诗情画意,具有强烈而独特的审美效果,千百年来广传人口,蜚声中外。由于该诗的出现,使原本极为普通的枫桥和寒山寺名播四方,成为后人不断题咏的对象。如明代高启的《枫桥》一诗曰:“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张继此诗很早就传入日本。“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俞樾《新修寒山寺记》)可见这首小诗影响之深远。 (吴小林)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诗篇名。五绝。刘长卿作。见《全唐诗》卷一四七。山以芙蓉为名者甚多,

诗中所指不详。此诗写逢雪暮夜投宿见闻:“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前半叙写山居凄清萧条景况,后半勾勒主人风雪夜归细节。全篇目见与耳闻错落着笔,诗中有画,言外含情,具有独特的韵味。清施补华评此诗曰:“较王、韦稍浅,其清妙自不可废。”(《岷傭说诗》)“风雪夜归人”一句,以凝练的语言,倒装的句法,活画出人物顶风冒雪深夜归来情景,历来传诵人口。 (吴小林)

【闺情】 唐诗篇名。七绝。李端作。见《全唐诗》卷二八六。此为闺怨诗:“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我国古代民间有灵鹊报喜之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此诗前两句写女子彻夜不寐情景,突出其思夫之深情;后两句通过不满灵鹊报喜未应验的细节,进一步将其切盼夫归的心情曲曲传出。全诗不着一个“怨”字,而女子之闺怨之情毕现,既含蓄蕴藉,又活泼新巧,在闺怨诗中别具一格。其以埋怨鹊声报喜不灵曲折展现思妇心态的写法,对后世诗词颇有影响。《敦煌曲子词》中《鹊踏枝》由怨鹊而锁鹊,宋徐伸词《转调二郎神》“闷来弹雀”等写法,均是对此诗的继承和发展。 (吴小林)

【省试湘灵鼓瑟】 唐诗篇名。五言长律。钱起作。见《全唐诗》卷二三八。作于天宝九年(750)应进士考试时,是试帖诗,题目“湘灵鼓瑟”出自屈原《远游》中的句子:“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全诗十二句六韵:“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此诗纯用赋体,扣题紧密,结构严谨,为试帖诗之名作。纪昀评云:“此诗之佳,世所共解。惟三句随手注题,浑然无迹,四句提醒醒目,通篇俱纳入‘听’字中,运法甚密,读者或未察也。”(《唐人诗律说》)诗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清音有馀,悠然不尽,可谓神来之笔,历来为人传诵。《旧唐书·钱徽传》载钱起“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崱所试《湘灵鼓瑟》试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崱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鬼谣”云云虽出之后人附会,然由此亦可见此二句为人深赏之景况。清沈德潜评此二句曰:“远神不尽。”(《唐诗别裁》卷一八)《唐诗纪事》载大中十二年(858)宣宗与中书舍人李藩讨论试帖诗中重用字的问题时,李曾以此诗作为试帖诗的范本作解释,于此则可看出该

诗影响之深远。

(吴小林)

【寒食】 唐诗篇名。七绝。韩翃作。见《全唐诗》卷二四五。诗题一作《寒食日即事》。寒食,节名,清明前两天(一说前一天),是日禁火寒食,而唐代有寒食节末一天傍晚取火以赐近臣的制度,该篇即以此题材为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关于此诗题旨有两说:一说讽刺皇亲国戚或宦官的特权,明唐汝信曰:“时方禁烟,乃宫中传烛以分火,则先及五侯之家,为近君而多宠也。”(《唐诗解》)清吴乔曰:“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围炉诗话》卷一)一说别无讽刺,吴昌祺曰:“清明赐火,则寒食之暮,为时近矣”,认为并非特权(《删订唐诗解》)。唐德宗十分赏识此诗,特赐韩翃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的官职,并为把诗人韩翃与任江淮刺史的韩翃相区别,御笔亲书此诗,于末尾处又加注:“与此韩翃”(见孟荣《本事诗》),显然亦以为该诗并无讽刺意。以前说为胜。此诗寓意深刻,笔法含蓄,技巧十分圆熟,为咏寒食诗中的佳作。首句“春城无处不飞花”,信口而出,写景如画,广为人们所传诵。

(吴小林)

【寄全椒山中道士】 唐诗篇名。五古。韦应物作。见《韦江州集》卷三。全椒,属滁州(今安徽滁县)。山中,指全椒西三十里之神山。此诗作于兴元元年(784)任滁州刺史时,表现对山中道士的忆念之情:“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全诗由“冷”字领起,围绕“念”字展开,时而用葛洪《神仙传》中白石先生“尝煮白石为粮”故实,想象山中道士生活情况,时而欲持酒远行,以示慰藉,末以行迹难觅之无限怅惘作结。萧疏空灵,高雅闲淡,全以神行,为韦诗之名篇。结尾二句“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意境清幽,韵味悠长,尤为人所称道。清沈德潜评曰:“化工笔,与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妙处不关语言意思。”(《唐诗别裁》卷三)宋许颢评云:“韦苏州诗云:‘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彦周诗话》)清施补华亦曰:“《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岷傭说诗》)

(吴小林)

【滁州西涧】 唐诗篇名。七绝。韦应物作。见《韦江州集》卷八。滁州,今安徽滁县。西涧,在滁州城西郊外。作于建中三年至兴元元年(782—784)任

滁州刺史期间,写春游滁州西涧所见:“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诗中有画,景中寓情,在涧边草幽、水急舟横的清幽意境中,传达出诗人悠闲恬淡的心情,为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以飞动流转之势衬出闲淡宁静之景,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清沈德潜誉之为“即景好句”(《唐诗别裁》卷二〇)。后世据此所作的诗意画和受此影响所作诗句颇多,宋寇準《春日登楼怀归》:“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即由此脱化而来。

(吴小林)

【过山农家】 唐诗篇名。六绝。顾况作。见《全唐诗》卷二六七。一作张继作,题为《山农》。约作于晚年隐居茅山(在今江苏省西南部)时。此诗写作者过访山农的情景:“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前两句自远而近地描绘山村清幽静谧的景色,后两句以摇曳顿挫之笔叙写山农的爽朗性格和劳动中的喜悦心情。全诗由景及人,绘声绘色,山村的自然美和人情美活现笔端,语言工丽自然,格调明朗轻快,六言句式 and 两字一顿、三个音步的均匀节奏与诗中的表情达意取得和谐一致,为唐人绝句中独具一格之作。

(吴小林)

【游子吟】 唐诗篇名。五古。孟郊作。见《孟东野集》卷一。题下自注:“迎母溧上作。”当于贞元十六年(800)任溧阳(今属江苏)县尉时,迎母有感于奉养之恩而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前四句通过为游子缝衣的生活细节,歌颂平凡而又伟大的母爱。后两句以小草难以报答春天阳光作比喻,抒写儿子对慈母的孝心。此诗用短小的篇幅,平淡的语言,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母子深情生动感人地表现出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成为广传人口的名篇。宋刘辰翁誉之为“诗之尤不朽者”(《孟东野诗集》评语)。至清康熙年间,溧阳有人作诗云:“父书空满筐,母线尚萦襦”(史骥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是为《游子吟》之千古馀韵。

(吴小林)

【城东早春】 唐诗篇名。七绝。杨巨源作。见《全唐诗》卷三三三。约为在京任官职时所作。写京城长安早春景象:“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诗中紧扣一个“早”字,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热情礼赞早春的清新之景,且表达诗歌创作见解:诗人应感觉敏锐,开风气之先,道人之所不道,而不能落在人后,亦步亦趋。此诗集清景与丽景于一篇,熔诗情和理趣于一

炉,为七绝独具一格之作。

(吴小林)

【李凭箜篌引】 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李凭,当时善弹箜篌的梨园弟子。箜篌引,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箜篌,一种弦乐器。箜篌种类多样,李凭所弹乃竖箜篌。约作于元和五、六年(810、811)在长安任奉礼郎时期。此诗运用奇特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调动自然界和神话中一系列富于审美特质的形象,极写李凭弹奏箜篌的技巧之高和感染力之强。“似景似情,似虚似实”(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迷离恍惚,变幻不羁,在描写音乐的诗歌名作中独具一格。吴汝纶评曰:“通体皆从神理中曲曲摹绘,出神入幽,无一字落恒人蹊径。”(《唐宋诗举要》卷二引)方世举云:“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诗中“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两句,形容弹奏箜篌效果的强烈,可谓想落天外,戛戛独造,宋人杨万里称之为“惊人句”(《诚斋诗话》)。(吴小林)

【梦天】 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此诗写梦游天上月宫的幻想境界:“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属郭璞游仙诗一类,而又另辟新境。前四句描绘月宫景色,后四句写从天上下视尘寰所见沧桑变化和景物之渺小,以仙境的美好表达诗人对尘世的厌恶。想象奇特,境界开阔,富有浪漫主义特色。“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分明说置身霄汉,俯视天下皆小”(姚文燮《昌谷集注》卷一),“梦中之游真豪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比喻新巧,气势豪纵,颇具李白遗风,为传世名句。(吴小林)

【南园十三首】 唐组诗名。七绝、五律。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南园,指李贺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县)故居的田园。作于辞去奉礼郎从长安回昌谷后。十三首中七绝十二首,五律一首。内容或描写田园景物,或感慨仕途失意。其中以第五首“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第六首“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较为著名。前首言“未有以书生而封侯者,不得不弃笔墨而带吴钩矣”,后首说“即有才如宋玉,能赋悲秋,亦何处用之?”(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均为发泄怀才不遇、文章无用牢骚之作。语言明晓,感情愤激,显示出李贺诗歌风格的另一面。

(吴小林)

【金铜仙人辞汉歌】 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约作于辞去奉礼郎离长安赴洛阳之时。诗前有小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牛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青龙元年”应为“景初元年(237)”。此诗即写汉武帝金铜仙人被魏宫官拆移时曾流泪的传说,描绘铜仙辞汉过程中的凄婉情景,既借古讽今,表现诗人对时世的忧虑,又借事寄慨,抒写“宗臣去国之思”(陈沆《诗比兴笺》卷四)。意境悲凉,词采惊艳,“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李贺集序》),被宋人范晞文誉为“杰作”(《对床夜话》卷二)。诗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设想奇特,烘托金铜仙人的凄苦之情艺术效果极佳。宋人司马光评曰:“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勍敌。”(《温公续诗话》)王琦则曰:“细玩二语,终有自然勉强之别,未可同例而称矣。”(《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此句曾为后代诗人所借用或化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吴小林)

【老夫采玉歌】 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约作于供职长安时期。此诗写年老民工为官家采玉的艰难情景和内心痛苦,对其忍饥受寒,冒死劳作的遭遇深表同情,为李贺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的代表作。与韦应物写采玉之苦的《采玉行》同一机杼,但用笔更锋利,言辞更激切,且在真切的现实描写中融有奇特的想象,体现出李贺诗奇崛瑰丽的独特风格。“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两句,言仿佛溪水厌恶生人故致其死,而民工惨死千年后仍在怨恨溪水,“夫不恨官吏,而恨溪水,微词也。”(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涉想新奇别致,词语愤激而委婉,为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致酒行】 唐诗篇名。七古。李贺作。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文苑英华》载此诗题下注云:“至日长安里中作”,为诗人供职长安时友人招饮,有感而作。首二句言己落拓蹭蹬中承蒙主人设宴劝酒,“起得浩荡感激”。次六句写主人致词,以主父偃、马周两古人事劝慰,详略不一,写法有变。末四句写诗人回答,以期待施展抱负自我慰藉,“末转慷慨,令人起舞”(《唐诗品汇》卷三五引刘辰翁语),在故作旷达中表现愤激之情。全诗音情顿挫,词意婉曲。诗中“雄鸡一声天下白”一句,比喻终有壮志得酬的一天,颇有气魄,曾为后代诗人所化用。其他“天荒地老无人识”、“少年心事当拏云”等,亦均为语新境奇之名句。

(吴小林)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唐诗篇名。七绝。柳宗

元作。见《柳宗元集》卷四二。在柳州时作，为酬答友人曹侍御经过象县时的赠诗而写：“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象县，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前两句扣诗题中的“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后两句切诗题中的“酬”，抒发诗人虽知友人经过近地而不能前去晤面的惆怅之情，流露出对贬谪受拘牵生活的不满。通篇运用比兴寄托手法，显得含蓄隽永，余意不尽。沈德潜认为此诗“词特微婉”（《唐诗别裁》卷二〇），并评之为七绝中“压卷”之作（《说诗粹语》卷上）。宋叶梦得词作《贺新郎》中“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句，明显受有该诗后两句的影响。（吴小林）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唐诗篇名。七律。柳宗元作。见《柳宗元集》卷四二。漳汀封连四州，指漳州（州治在今福建漳州）刺史韩泰、汀州（州治在今福建长汀）刺史韩晔、封州（州治在今广东封开）刺史陈谏、连州（州治在今广东连县）刺史刘禹锡。柳宗元和他们曾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而遭到贬谪。宪宗元和十年（815）初，他们五人奉诏进京，原以为能回朝廷任职，不料由于腐朽势力的阻挠，又被分别调到更加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连州任刺史。同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有一次登上城楼，触景生情，写下此诗寄赠二韩、陈、刘四人：“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全诗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与景融合无间；赋中有比，实中有虚，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含蓄蕴藉地抒发诗人的无限愁思和对朋友的深切怀念，并表达对执政者排斥异己的强烈不满。纪昀评曰：“通篇情景俱包得起。三、四，赋中之比，不露痕迹。”（《瀛奎律髓刊误》卷四）沈德潜也说：“惊风密雨，言在此而意不在此。”（《唐诗别裁》卷一五）这是一首体现柳诗清峻沉郁风格的杰出代表作。（吴小林）

【江雪】 唐诗篇名。五绝。柳宗元作。见《柳宗元集》卷四三。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全诗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两句写背景，后两句写人物，生动地描绘出江上雪景和渔翁独自垂钓的情形，宛如一幅雪天寒江独钓图。其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实际就是柳宗元的自我写照，由此表现他政治上失意后孤独苦闷的心情和孤傲不屈的品格。全诗在简淡峻洁的文字中，充满着醇厚的神韵，具有无限的言外之意。苏轼称“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并引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作比较，认为后者不过是“村学中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引《洪驹父诗话》）。

杨万里也作诗说：“令人还忆柳柳州，解道千山绝飞鸟”（《次昌英主簿雪韵》），对此诗给以很高评价。后来雪江垂钓成为画家经常选取的题材，亦可见该作影响之深远。（吴小林）

【渔翁】 唐诗篇名。七古。柳宗元作。见《柳宗元集》卷四三。作于永州。全诗共六句：“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该诗在清寥萧散的景色中，勾勒出安闲自在的渔翁形象，其中有着诗人自己的影子，透露了他遭贬后孤高的志趣和寂寞的心态。风格明丽中含淡远，平易中见奇妙。苏轼评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见《冷斋夜话》）。其末一句话后来引起历代诗歌评论家的长期争论。同意此说者，认为删去末二语，“余情不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八）。反对此说者，则认为这诗“不类晚唐”正赖有此末二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引刘辰翁语）。从论诗方面看，以前说为胜。但如选录原诗，则不宜删去末二句。

（吴小林）

【山石】 唐诗篇名。七古。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作年主要有三说：方世举断为贞元十七年（801）七月离徐州赴洛阳途中游洛北惠林寺后到洛阳时作（见《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王鸿盛谓“当是南迁岭外时作”（《蛾术编》），王元启认为“此诗在徐独游而作”（《读韩记疑》），以第一说为长。此诗以首句开头二字为题，顺序叙写黄昏宿寺和翌日离寺山行途中的见闻，末尾引出感慨，抒发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全用赋体，直陈其事，讲究呼应转折，以古文章法作诗，具有明显的“以文为诗”的特点。何焯评该诗曰：“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有荆、关也。”（《义门读书记》昌黎集卷一）方东树说：“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昭昧詹言》卷一二）该诗风格劲健，显示出阳刚美，金代诗人元好问把它和秦观《春雨》中的诗句相比，写诗评论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绝句》），此说曾引起后人的争论。这诗颇为苏轼所推崇，他与友人游南溪时曾朗诵《山石》，并依其原韵和诗一首。他另有一首《王晋卿所藏〈着色山〉》（其二）：“幸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润碧时。”也显然受有韩诗《山石》的影响。（吴小林）

【南山诗】 唐诗篇名。五古。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作于元和元年（806）秋。南

山,即今陕西长安县南之终南山。此诗用汉赋排比铺张手法,描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和山势的各种奇姿异态,状物写景穷极工巧,变怪百出,且在长篇巨制中叠用奇字,频押险韵,为最能体现韩愈才学和丰富想象力的奇作之一。亦有艰涩难懂之弊。洪兴祖评该诗曰:“此诗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可到也。”(《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引)顾嗣立亦说:“此等长篇,亦从骚赋化出”,“公以画家之笔,写得南山灵异缥缈,光怪陆离。中间连用五十一‘或’字,复用十四叠字,正如骏马下冈,手中脱辔。忽用‘大哉立天地’数语作收,又如柝声忽惊,万籁皆寂。”(《昌黎先生诗集注》)自宋以后,论者多以此诗与杜甫之《北征》比较其优劣,扬韩或扬杜之论不一而足,其中亦有较公允者:方世举认为“《南山》、《北征》,各为巨制,题义不同,诗体自别,固不当并较优劣也。此篇乃登临纪胜之作,穷极状态,雄奇纵恣,为诗家独辟蚕丛。无公之才,则不能为。有公之才,亦不敢复作。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近人徐震亦说“《北征》主于言情,《南山》重在体物,用意自异,取材不同,论其工力,并为极谐,无庸辨其优劣也。”(《南山诗评释》)

(吴小林)

【石鼓歌】 唐诗篇名。七古。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作于元和六年(811)。《石鼓诗》(亦作《石鼓文》)为我国刻石文字中最早者,亦是周代除《诗经》外仅见的诗歌作品,书体是大篆(籀文),刻法精工,它在文学史、文字史、美术史等方面皆有重要的地位。唐初被发现后,不少诗人都有诗题咏,韩愈这首诗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诗人赞扬这一珍贵文物的发现,对其文章、书法予以高度评价,并呼吁世人加以爱护。韩愈认为这是周宣王时的作品,太史籀所书写,代表了唐代多数学者的认识。此诗体势典重,音节铿锵,风格于平直中显奇崛。它把枯燥的“金石学”入诗,且写得生动飞扬,在诗歌中融入学术内容的作法上具开辟作用,对后世颇有影响。

(费振刚)

【听颖师弹琴】 唐诗篇名。五古。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诗题中“颖”字一作“颖”,李贺亦有《听颖师弹琴歌》,据此当作“颖”。作年有二说:一说元和十、十一年(815、816),另一说元和六、七年(811、812),李贺诗作于元和六、七年,故以后说为是。颖师,天竺僧人,“盖以琴干长安诸公而求诗”(方世举《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此诗描写琴的音乐形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赞美颖师高超的弹琴技巧。全篇奔腾跳跃,起落无迹,比喻形象贴切,造语生新别致,具有明显的雄放奇崛风格,是

唐诗中描写音乐之美的名作。方世举把它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并提,赞许为“皆摹写声音至文”(《李长吉诗歌批注》)。朱彝尊亦评曰:“写琴声之妙入髓,又一一皆实境”,“可谓古今绝唱”(《唐德堂重刻《昌黎先生诗集注》》)。而欧阳修认为“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苏轼亦“深然之”,并“尝因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亦取退之《听颖师琴诗》稍加櫟括,使就声律,为《水调歌头》以遗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六)。后世多人曾加以辨证之,以为退之此诗深得琴趣,“未易讥评也”(蔡條《西清诗话》)。(吴小林)

【调张籍】 唐诗篇名。五古。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约作于元和十一年(816)。调,调侃,戏谑。此诗先并提李白、杜甫,给予高度评价;中间赞颂他们诗歌的卓越成就,表示仰慕之意;最后以向李、杜学习与张籍共勉。开头两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已成为对李白、杜甫诗歌成就的千古定评。接着四句“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为讥斥妄言李杜优劣者的名句。对于该诗矛头所指,方世举认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李、白交讥”,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其尊杜而贬李,亦已甚矣”,“时其论新出,愈盖闻而深怪之,故为此诗,因元、白之谤,而欲与籍参逐鞫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今人钱仲联也谓:“籍虽隶韩门,然其乐府诗体近元、白而不近韩,故白亟称之。元、白持论,当为籍所可,故昌黎为此诗以启发之欤?”(《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而方成珪则曰:“微之《墓志》亦是文家借宾定主常法耳,况并未谤伤供奉也。谓此诗为微之发,当不其然。”(《韩集笺正》)以批评随意抑扬李、杜的倾向,不专指元、白说为胜。此诗想象神奇别致,笔力遒劲刚健,境界狠重险怪,是体现韩诗雄放怪奇之美的典型作品之一,“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等,均为极具代表性的诗句。朱彝尊评此诗曰:“议论诗,是又一别调,以苍老胜,他人无此胆。”(《唐德堂重刻《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吴闿生云:“雄奇岸伟,亦有光焰万丈之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引)

(吴小林)

【晚春】 唐诗篇名。七绝。韩愈作。韩以《晚春》为题的七绝共有二首,一作于元和八年(813),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另一作于元和十一年(816),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诗题一作《游城南晚春》,以后者更为著名:“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该诗抓住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运用拟人化手法,描绘诗人

游郊外时所见晚春景象,写得生动活泼,生面别开,为唐诗中摹写晚春景色的名篇。后两句可能有寓意,但不能理解过死,历来对其寓意的解释颇多歧见,均有穿凿之嫌,其主要还是以写景见长。朱彝尊评此二句曰:“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引)此说颇有见地。

(吴小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诗篇名。七律。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使者至凤翔迎佛骨入宫中,韩愈上《论佛骨表》加以谏阻,触怒佞佛以求长生的宪宗,险些被处以死刑,后经裴度等人说情,改成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当他远赴贬所行至蓝关时,其侄孙韩湘赶来护送,他悲愤地写下此诗给韩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蓝关,即蓝田关,又名峽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湘,韩湘,韩愈侄孙韩老成之子。诗中抒写对非罪远贬的不满和对自己前途的忧虑,并表示为国除弊、不计得失的决绝态度。好用叙述语句,多用“欲为”、“肯将”等虚词,作诗“以文章之法行之”(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诗以文为诗的特点。全篇感情深沉凝重,音节回翔抑扬,有沉郁顿挫之风,颇具杜甫诗歌神韵。其颈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描绘如画,情景交融,是历代传诵的名句。后世曾出现许多根据这两句诗绘制的图画,如《韩昌黎画图》,有人评云:“善画者绘为图,山岭重叠,雪景模糊,人马行其间,俱有畏寒凌兢状,观之令人凄然”(陈栌《定宇先生集·题韩昌黎画图》),这实际也是对该联艺术魅力的充分肯定。(吴小林)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唐诗篇名。七绝。韩愈作。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二。作于长庆三年(823)。水部张十八员外,指张籍,他曾任水部员外郎,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十八,故称。该诗原作二首,其第一首更为著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诗视角独特,构思精妙,全篇扣住一个“早”字,通过直接描绘和对比衬托,把早春风光的佳处写得形神毕肖。宋人胡仔把此诗和苏轼的初冬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并提,指出“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〇)此诗体现出韩诗风格中朴素清新的一面。第二句“草色遥看近却无”,观察细致,写景入化,逼真传神地描绘出初春细雨衬托下草色隐隐约约,似有却无的景

色。黄叔灿评此句曰:“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唐诗笺注》)它被公认为描写早春景色的绝妙好句。

(吴小林)

【夜上受降城闻笛】 唐诗篇名。七绝。李益作,见《全唐诗》卷二八三。受降城,有东、中、西三城,此指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作于贞元元年至六年(785-790)期间,是时诗人在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节度使杜希全幕府中任职。该诗写久戍边地将士的思乡之情:“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前两句写登城所见月下景色,后两句言笛声勾起征人的乡思。全诗融诗情、画意、音乐美于一炉,无一字直接抒写乡思,而笔笔传情,具空灵蕴藉之妙。明王世贞赞曰:“‘回乐峰前’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艺苑卮言》卷四)清施补华评云:“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岷傭说诗》)沈德潜称之为“绝唱”(《唐诗别裁》卷二〇)。在当时即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见《旧唐书·李益传》)。诗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句,承上启下,转折巧妙,为神来之笔。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君》诗中提到李益时,有“边月空悲芦管秋”句,即指此句。后宋代柳永词《倾杯》中“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句子,亦由此句演化而来。

(吴小林)

【野老歌】 唐诗篇名。七古。张籍作。见《张籍诗集》卷一。诗题一作《山农词》。是新题乐府,描写山村农民生活困苦情景:“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倚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诗中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山农所受繁苛赋税的残酷剥削及其与商贾之间贫富悬殊的生活,富有现实内容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可贵思想。此诗寓愤慨的感情于客观的叙写之中,语言平易自然,风格朴实沉着。白居易赞张籍诗曰:“张君何者为?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该诗即为其乐府诗中的代表作之一。

(吴小林)

【秋思】 唐诗篇名。七绝。张籍作。见《张籍诗集》卷六。此诗写作客他乡者托人捎信的生活片断:“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通过捎寄家书前后的心理活动和行人临走又拆封添加内容的细节,将主人公思念家乡亲人的深情曲曲传出。全诗写习见之事于诗意浓郁之笔墨内,寄真挚亲情于平淡本色语言中,构思巧妙,韵味独特,为历来传诵之思亲名篇。清沈德

潜评云：“亦复人人胸臆语，与‘马上相逢无纸笔’一首同妙。”（《唐诗别裁》卷二〇）潘德舆赞此诗为“七绝之绝境，盛唐诸巨手到此者亦罕”（《养一斋诗话》卷三）。

（吴小林）

【望夫石】 唐诗篇名。七古。王建作。见《全唐诗》卷二九八。望夫石，在今湖北鄂城县北山上。又传江西安德县、安徽当涂县等地皆有望夫石或望夫山。《初学记》卷五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状若人立。古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餧送北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根据此民间传说写成的古代诗歌颇多，该诗即为其中较著名的一首：“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前三句刻画望夫石伫立江边，望眼欲穿，风雨不动的感人形象，最后一句以丈夫归来石头开口说话的设想作结，竭力歌颂女子的坚贞爱情。全诗想象奇特，摹写生动，情味隽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前人称此诗“语意皆工”（吴开《优古堂诗话》）。

（吴小林）

【水夫谣】 唐诗篇名。七古。王建作。见《全唐诗》卷二九八。水夫，指纤夫。此诗通过纤夫的内心独白，写其在水驿服劳役的痛苦生活：日行沙滩，晚宿船头，顶逆风举步，冒雨雪牵船，穿胸透骨，冻手裂足，欲逃亡而又留恋故土。最后以不可能实现之幻想结束全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是对水夫难以摆脱苦况的深刻揭示，亦是对不合理徭役之愤怒谴责。全诗叙写情事和刻画心理细腻而有层次，语言平易精警，风格朴实醇厚，具歌谣一曲出天然之妙。明高棅称王建“工于乐府歌行，思远格幽”（《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此诗即为其即事名篇新题乐府中之佳作。

（吴小林）

【十五夜望月】 唐诗篇名。七绝。王建作。见《全唐诗》卷三〇一。诗题一作《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郎中，官名。此为咏中秋之诗：“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前两句写景，不着一个月字，而望月之意自现。后两句抒情，不正面展开，却言人尽望月，并从对方着笔，将己之怀人深情以蕴藉语出之。全诗意境优美，想象丰富，抒写摇曳宛折，含蓄隽永，在古代咏中秋诗中独具特色。清沈德潜评此诗曰：“不说明己之感秋，故妙。”（《唐诗别裁》卷二〇）末句“不知秋思落谁家”，以不肯定的疑问语气突出自己浓挚的感秋思念之情，新巧别致，匠心独运，为历来传诵之名句，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句“可惜数株红艳好，不知今夜落谁家？”显受此句影响。

（吴小林）

【宫词一百首】 唐组诗名。七绝。王建作。见

《全唐诗》卷三〇二。作于宪宗元和末年。据传素材得之于同宗宦官王守澄。写当时宫闱中事，或描绘皇帝上朝祭天景况，或反映皇室奢靡逸乐情形，或抒写宫女抑郁哀怨感情，内容颇为丰富、真实，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欧阳修曰：“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六一诗话》）。该组诗摹写细腻生动，笔法委曲顿挫，语言平易流利。清翁方纲评云：“其词之妙，则自在委曲深挚处有顿挫，如仅以就事直写观之，浅矣。”（《石洲诗话》卷二）其中“笼烟日暖紫瞳瞳，宣政门当玉殿风。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等首，均是代表作，前首写宫廷早朝之情景，后首言宫女难言的痛苦，全组诗的思想艺术特色于此可见一斑。王建《宫词一百首》在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以后作《宫词》者代不乏人，写大型七绝组诗者亦不断出现。

（吴小林）

【遣悲怀三首】 唐组诗名。七律。元稹作。见《全唐诗》卷四〇四。于元和四年（809），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第一首追忆婚后生活，赞美韦氏安于贫贱，勤俭治家。第二首抒写妻子亡故后难以驱遣的悲怀。第三首自悲无子丧妻，死生永隔，表示忠于爱情，不再续娶。全组诗以一“悲”字相贯串，摄取日常生活之细节，运用家常话、本色语叙事抒情，写得感人肺腑，耐人咀嚼，遂成古今悼亡诗中之绝唱。清孙洙评此组诗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唐诗三百首》卷六）第二首中“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句，言贫贱夫妻永诀之痛甚于常人，第三首中“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两句，写生死不渝的爱情，均言浅意深，语短情长，为历来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唐诗篇名。七绝。元稹作，见《全唐诗》卷四一五。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不久于病中闻知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故作此诗，抒写自己的震惊和愁苦之情：“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表现出元、白之间的深挚友情。诗中以渲染环境气氛衬托人物心境，情与景妙合无垠，含蓄隽永，余意不尽，极富艺术感染力。白居易读后曰：“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与元微之书》）宋洪迈评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悲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唐诗品汇》卷五二引）

（吴小林）

【连昌宫词】 唐诗篇名。七古。元稹作。见《全唐诗》卷四一九。连昌宫，唐代行宫之一，高宗显庆

三年(658)建,故址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十九里。此诗作于元和十二三年间(817—818),是时元稹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未尝到过连昌宫,诗乃依题拟议,情节多取自传闻,虚实杂糅。全诗共九十句,分两大段。前六十四句,通过宫边老人的诉说,叙写唐玄宗在连昌宫行乐的情景和该宫今昔盛衰之变化。后二十六句,在诗人与老人的对答中,探索安史之乱前后治乱兴衰的原因。通篇以细腻流畅的笔触,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养痍遗患,表现对圣君贤相清明政治与统一安定太平盛世的向往。诗中既取材于历史事实,又适当虚构夸张,使所写更具典型性,且叙写生动,感慨深沉,语言通俗自然,为唐代长篇叙事诗中之名作。明何良俊称此诗“铺写详密,宛如画出”(《四友斋丛说》)。清贺裳曰:“《连昌宫词》轻隽”,“含有讽谕”(《载酒园诗话》又编)。近人陈寅恪云:“《连昌宫词》深受白居易《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吴小林)

【离思五首】 唐组诗名。七绝。元稹作。见《全唐诗》卷四二二。元和五年(810),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该组诗追忆婚后生活,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和忠贞爱情。其中以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最为著名。此诗取喻生动,对比鲜明,艳而不俗,婉曲深沉,为唐代悼亡绝句中之佳作。“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句,源于《孟子·尽心》“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和宋玉《高唐赋》中有关巫山云雨之语,以表现诗人对爱情的深挚专一,用典巧妙,语意蕴藉,遂成广为传诵之名句。后引申演化为比喻见过世面,眼界很高的成语。

(吴小林)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唐诗篇名。七绝。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四。一本题“十年”作“十一年”,非。作于元和十年(815)春。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由于参加政治革新活动失败而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在玄都观观赏桃花有感而作此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其诗旨的看法有两说:一说讽刺保守派新贵,《旧唐书·刘禹锡传》曰:“语涉讥刺,执政不悦。”一说非必有所讽刺,宋罗大经曰:“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也。”(《鹤林玉露》乙编卷四)今人瞿蜕园亦云:“禹锡以元和十年春至京,正是看桃花时,此亦写实,非必遽有所刺。”(《刘禹锡笺证》卷二四)现一般持前说。该诗笔墨精炼,语意含蓄,在当时和后世广为传诵。

(吴小林)

【再游玄都观】 唐诗篇名。七绝。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四。作于大和二年(828),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之续篇。诗前引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此诗即为重游玄都观时所作:“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对其诗旨的看法亦有二说:一说讥刺昔日之权贵并及君上,一说感慨今昔之变化。现一般持前说。该诗构思巧妙。托讽蕴藉,与前篇同为历来传诵之名作。

(吴小林)

【西塞山怀古】 唐诗篇名。七律。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四。题一作《金陵怀古》,误。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县东,地势险峻,为长江中流要塞之一。作于长庆四年(824)由夔州(今四川奉节县)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途中,有感于西塞山地形之险而咏晋、吴兴亡事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前四句写史事,后四句发感慨,强调险要地形不足凭恃,兴废关键在于人事。当时藩镇割据严重,此诗借古讽今,警告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且表现对国事的隐忧。全诗结构严谨,气势流畅,语意精警,为唐代怀古名作。传说白居易把该诗赞喻为“骊龙之珠”(《鉴诫录》卷七《四公会》)。清薛雪评此诗曰:“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一瓢诗话》)施补华称赞“‘王濬楼船’四语,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岷傭说诗》)。汪师韩曰:“芦荻萧萧,履清时而依故垒,含蕴正靡穷矣。”(《诗学纂闻》)

(吴小林)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唐诗篇名。七律。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外集卷一。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罢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返洛阳,途经扬州,与罢苏州刺史亦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白在酒席上以《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相赠,刘便作此诗酬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诗中抒发因参与革新而遭长期贬斥的愤慨之情,并表现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意志,苍凉中见雄劲,沉郁中见豪放,为酬答诗中的佳作。“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联而发,愤激中包含旷达情怀,比喻精切,寓意深刻。白居易赞此二句曰:“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后人激赏此联中所含之哲理,多用来说明事物新陈代谢之规律,则是在其原意的基础上赋予以新的意义。(吴小林)

【金陵五题】 唐组诗名。七绝。刘禹锡作。见《刘禹锡集》卷二四。作于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824-826)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期间。诗前小序云:“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跼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迺尔生思,歎然有得。”此组诗借咏六朝都城金陵(今南京市)五处古迹,抒发今昔盛衰之感。五题分别为:《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其中以《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首最为著名。石头城,即金陵城,三国时孙权重筑,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上。该诗前两句写江山如旧,人事全非,后两句作今昔盛衰对比。全诗气势苍莽,情调悲壮。白居易赞此诗云:“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刘禹锡《金陵五题序》)清沈德潜评曰:“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华,俱归乌有,令人于言外思之。”(《唐诗别裁》卷二〇)。乌衣巷,在今南京秦淮河南岸,三国时东吴在该处驻军设防,兵士均着乌衣,故名,后东晋贵族王导、谢安等居于此。该诗前两句写景,渲染冷落寂寥气氛,后两句写今昔盛衰之变化。感慨深沉,寓意蕴藉,且富哲理。对后两句的解释,颇有分歧。明唐汝询云:“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唯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唐诗解》)清沈德潜云:“言王、谢家成民居耳,用笔巧妙,此唐人三昧也。”(《唐诗别裁》卷二〇)施补华曰:“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岷傭说诗》)以唐、沈二说为胜。此二诗是金陵怀古中的传诵之作,对后世影响颇深。宋周邦彦词《西河》,通篇化用此二诗诗意而成,元萨都刺词《念奴娇》“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等句,亦由《石头城》中诗句脱化而来。(吴小林)

【题李凝幽居】 唐诗篇名。五律。贾岛作。见《全唐诗》卷五七二。写走访友人李凝不遇:“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全

诗字里行间无不传出一个“幽”字,境界独特,韵味醇厚。宋刘辰翁评曰:“‘敲’意妙绝,‘下’意更好,结又老成。”(《唐诗品汇》卷六八引)其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以响衬静,写出环境的清幽,构思精妙,遣词妥帖,为广传人口的名句。据传诗人曾为用“推”字抑或“敲”字颇费斟酌,最后因韩愈说作“敲”字佳而定,此即著名的“推敲”典故,为诗歌创作中锤字炼句之范例。(吴小林)

【寻隐者不遇】 唐诗篇名。五绝。贾岛作。见《全唐诗》卷五七四。此诗四部丛刊本《长江集》不载。《文苑英华》卷二二八、元杨士弘《唐音》卷一五作孙革《访羊尊师》。一般通行唐诗选本从《全唐诗》。全诗以问答形式写寻访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寓问于答,寓情于景,语平淡而味隽永。近人王文濡评该诗曰:“一问一答,四句开合变化,令人莫测。”(《唐诗评注读本》)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于幽深飘渺的意境中,透出隐者高洁情怀,言简意深,妙造自然,尤为人所称道。(吴小林)

【题金陵渡】 唐诗篇名。七绝。张祜作。见《全唐诗》卷五一。题一作《金陵渡》。金陵,此处指今江苏镇江,非南京。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〇《北固甘罗》:“又如张氏《行役记》,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赵璘《因话录》,言李勉至金陵,屡赞招隐寺标致。盖时称京口(今镇江市)亦曰金陵。”清冯集梧注杜牧《杜秋娘诗序》引《至大金陵志》:“唐润州(今镇江市)亦曰金陵。”(《樊川诗注》卷一)金陵渡,指今镇江附近过长江的渡口。此诗写夜宿金陵的所见所感:“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诗中以萧散轻灵之笔墨,抒写羁旅之愁和江中夜景,情景交融,诗意盎然。后两句绘景如画,极富神韵,颇为后人所赞赏。(吴小林)

【旅次朔方】 唐诗篇名。七绝。刘皂作。见《全唐诗》卷四七二。一作贾岛诗,题为《渡桑乾》。贾岛为范阳(今北京附近)人,非咸阳(今陕西咸阳)人,且文献资料中并无客居并州十年的记载,诗意与贾岛生平不合,以唐人令狐楚辑《御览诗》作刘皂诗为是。近人李嘉言《贾岛年谱》附录《长江集考辨》对此考证甚详。朔方,泛指北方。此诗抒写乡思:“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言诗人长期客居并州,如今北渡桑乾,离乡愈远,有家难回,便反认他乡作故乡。此诗表现思乡之情,视角独特,韵味醇厚。宋谢枋得曰:“旅寓十年,交游欢爱,与故乡无异。一旦别去,岂能无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为故乡也。”明王世懋则认为此诗为“思乡作,何曾与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

州,远隔故乡,今非惟不能归,反北渡桑乾,还望并州,又是故乡矣。并州且不得住,何况得归咸阳”(见《艺圃撷馀》)。以王说较胜。(吴小林)

【古风二首】 唐诗篇名。五绝。李绅作。见《全唐诗》卷四八三。题一作《悯农二首》。为李绅早年的诗作。第一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写封建社会中农民惨遭剥削、丰年饿死的残酷现实。第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强调粮食生产的艰辛,隐含对不劳而获者暴殄天物的愤慨之情。均显示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的新乐府精神。二诗善于选取典型的生活细节和运用对比映衬手法,语言通俗平易,精警形象,叙写概括而不抽象,虽多议论却富诗意,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名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为广传人口的警句。(吴小林)

【题都城南庄】 唐诗篇名。七绝。崔护作。见《全唐诗》卷三六八。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载此诗本事云: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睇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扃锁之。因题诗于左扉。”此说未必属实,然作为诗的背景材料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该诗抒写爱情遭遇的今昔变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全诗通过对比衬托手法,描写失去美好事物的无限怅惘,低回往复,摇曳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人花映照,情景兼融,将多情人眼中之美丽少女形象活现纸上,为传诵千古之名句。“人面桃花”的成语,即由此诗而来。宋欧阳修《生查子》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衣衫袖。”意境与本诗十分相似。

(吴小林)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诗篇名。五律。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三。赋得,指定、限定的诗题,例在题上加“赋得”二字。作于贞元三年(787)诗人十六岁时。属作者自己所分四类诗中的杂律诗。以原上之草比喻别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咏物与抒情融而为

一,构思独特,情味隽永,为脍炙人口的名诗。据传此诗曾得到当时著名诗人顾况的赏识:“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高步瀛评云:“情韵不匮,句亦振拔,宜其见重于逋翁也。”(《唐宋诗举要》卷四)诗中“野火”一联,以工稳的流水对,描写春草的顽强生命力,且含有深刻寓意,历来为人所传诵。(吴小林)

【观刈麦】 唐诗篇名。五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属讽谕诗。题下作者原注云:“时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作于元和二年(807)。诗写作者看到的农民割麦情景:首八句叙述麦子收割季节的忙碌景象,次四句描写农民冒着暑热割麦,后八句写一贫妇抱子拣拾遗穗充饥,末六句写自己为“不事农桑”而年终“有馀粮”而深感惭愧。全诗反映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在繁苛赋税剥削下的贫困生活,表现出诗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为体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精神的早期讽谕诗代表作。通篇对比,寓情于事,结构严谨自然,语言平易通俗,具有“欲见之者易谕”(《新乐府序》)的艺术效果。(吴小林)

【秦中吟十首】 唐组诗名。五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二。秦中,指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平原。诗前原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约作于元和五年(809)前后。十首诗均为揭露政治弊病和同情人民疾苦之作,题旨突出,对比鲜明,语言通俗,社会作用十分显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伤唐衢》),“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与元九书》)与《新乐府五十首》同为其讽谕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出色实践。作者自视甚高:“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同时代之元稹说《秦中吟》等讽谕诗,“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清人叶燮曰:《秦中吟》中《重赋》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此风人之能事也”(《原诗》)。均给予高度评价。(吴小林)

【轻肥】 唐诗篇名。五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二。组诗《秦中吟十首》之一。轻肥,出自《论语·雍也》:“乘肥马,衣轻裘”,指豪华生活。此诗前十四句极写宦官的意气之盛和生活之奢,最后以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两句作结，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和宦官飞扬跋扈带来的严重恶果。层次分明，笔法摇曳，对比强烈，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唐宋诗醇》卷一九评曰：“结句斗绝，有一落千丈之势。”（吴小林）

【买花】 唐诗篇名。五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二。组诗《秦中吟十首》之一。题《才调集》作《牡丹》。唐李肇《国史补》曰：“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闾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此诗即写京城贵游买牡丹花事。前十句描写贵族官僚重金购买牡丹，挥金如土的情景，后六句叙写一田舍翁观看买花，末以其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作结，有力地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和社会的不平。语浅意深，用常得奇。清潘德舆评曰：“《买花》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劲直沉痛。诗到此境，方不徒作。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养一斋诗话》）（吴小林）

【新乐府五十首】 唐组诗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三。题下作者原注云：“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诗前原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该组诗继承和发展杜甫“三吏”、“三别”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传统，以时事入诗，抨击弊政，进行讽谕，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堪称中唐时代的镜子，与《秦中吟十首》同为其讽谕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多为以七言为主，间或杂以三、五言的乐府歌行体，叙事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入神，语言明晓流畅，音调铿锵抑扬，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叙事组诗。宋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金王若虚则曰：“公诗虽涉浅易，要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滹南诗话》卷三）清潘德舆亦云“乐天乐府，则天骥自解，独往独来，讽谕痛切，可以动百世之人心。虽孔子复出删诗亦不能废。”（《养一斋诗话》）（吴小林）

【上阳白发人】 唐诗篇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三。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之一。题一作《上阳人》。上阳，唐宫名，在东都洛阳皇城西南。诗前小序云：“愍怨旷也”。“怨旷”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题下自注云：“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

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此诗叙写一个一生被禁闭幽宫女子的寂寞凄怨生活，表现对妇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全篇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心理刻画细致入神。诗中“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等句，以环境烘托人物心情，极富艺术感染力。清沈德潜曰：“只‘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回圆’二语，已见宫人之苦。”（《唐诗别裁》卷八）施补华评此诗云：“长于讽谕，颇得风人之旨。”（《岷傭说诗》）是唐代宫怨诗中的佳作。

（吴小林）

【新丰折臂翁】 唐诗篇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三。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之一。题一作《折臂翁》。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境内。诗前小序云：“戒边功也。”天宝年间，唐王朝大肆征兵，两次讨伐南诏，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元和初，西北地区边将又邀功求战。此诗即通过一老翁折臂致残以逃避兵役的不幸遭遇，揭露唐王朝统治集团轻启边衅，穷兵黩武的罪行，劝诫当时的执政者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因追求边功而致民怨。全诗取材视角独特，笔法直中见曲，在平易明晓的叙写中包含有深长的意味。清人施补华评此诗曰：“长于讽谕，颇得风人之旨。”（《岷傭说诗》）今人陈寅恪云：“此篇为乐天极工之作。”结尾“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尤非他篇所可及也”（《元白诗笺证稿》）。

（吴小林）

【卖炭翁】 唐诗篇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三。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之一。诗前小序云：“苦宫市也”。宫市，唐代王室直接掠夺人民财物的一种弊政，中唐时尤甚。韩愈《顺宗实录》卷二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官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此诗即通过“卖炭翁”的不幸遭遇，揭露“宫市”的罪恶，反映人民受欺压剥削的痛苦。诗中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真切生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或状卖炭翁悲苦之形貌，或写人物矛盾之心态，均逼肖传神，为传诵人口的名句。全诗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唐宋诗醇》卷二〇评曰：“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着一断语。”是《新乐府》中最著名的诗篇。

（吴小林）

【长恨歌】 唐诗篇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二。属感伤诗。作于元和元年(806)冬。是时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事,相与感叹。根据王质夫的建议,白居易作《长恨歌》,歌既成,陈鸿又为之作《长恨歌传》。两者“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但《歌》远胜于《传》,故独脍炙人口。此诗分四段。首段叙杨贵妃得宠情况,二段言杨贵妃遭变身死,三段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末段写唐玄宗派道士寻找杨贵妃。全诗通过李、杨的婚姻爱情故事,主要歌颂他们之间真挚的爱情,同时亦批判由此造成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误国。剪裁精当,脉络清晰,叙事、写景、抒情熔于一炉,现实成分和浪漫色彩集于一篇,写得音情顿挫,缠绵动人,为我国长篇叙事诗中的杰作。近人王国维云:“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馀也。”(《人间词话》)诗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句,情景交融,词语精警,均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作者对该诗自视很高,曾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后唐宣宗李忱在其吊白居易的诗中亦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一五)清人赵翼曰:“《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并认为白居易有此诗和《琵琶行》。“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瓠北诗话》卷四)。《长恨歌》对后世以唐玄宗、杨贵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深远,元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洪昇的传奇《长生殿》等,均与此诗一脉相承。(吴小林)

【琵琶行】 唐诗篇名。七古。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二。属感伤诗。题一作《琵琶引》。诗前小序云:“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是时白居易因受到权贵谗毁而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此诗描写一琵琶女所弹琵琶的高超技巧、琵琶声传出的幽愁暗恨及其讲述的不幸遭遇,寄托作者自己政治上的沦落之感。诗中琵琶的音乐形象和

琵琶女、诗人失意的人物形象交相融合,且借景物描写烘托环境气氛以突出诗的抒情色彩,语言优美流利,音韵和谐铿锵,达到描绘之工、文采之富、音乐之美的高度统一,和《长恨歌》同为我国长篇叙事诗中的杰作。方世举称该诗与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皆摹写声音至文”(《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唐宋诗醇》卷二二评曰“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与《长恨歌》被人誉为“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诗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句,或以描绘音乐意象取胜,或以摹写形态心理见长,均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的诗中曾高度评价此作:“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一五)清赵翼云:“《琵琶行》亦是绝作。”(《瓠北诗话》卷四)《琵琶行》对后世戏曲颇有影响,元马致远杂剧《青衫泪》、清蒋士铨杂剧《四弦秋》均由此诗演变而成。

(吴小林)

【暮江吟】 唐诗篇名。七绝。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九。属杂律诗。约作于长庆二年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途中。全诗为:“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前两句描绘暮色,后两句摹写夜景,四句融合成完整而动人的江天晚景。比喻精巧,写景如画。明人杨慎评曰:“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致入画。”(《升庵诗话》卷三)《唐宋诗醇》卷二四曰:“写景奇丽,是一幅着色秋江图。”

(吴小林)

【钱塘湖春行】 唐诗篇名。七律。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二〇。属杂律诗。作于长庆三年(823)或四年杭州刺史任上。钱塘湖,即西湖,在今浙江杭州市城西。此诗描写西湖的早春景色:“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诗中突出一个“行”字,且扣住环境和季节特征,刻画西湖的春景之美,并传出诗人赏春的喜悦心情,随物赋形,即景寓情,显得平易自然而又精致工巧。清人方东树评该诗云:“章法意匠,与前诗(《西湖留别》)相似,而此加变化。佳处在象中有兴,有人在,不比死句。”(《昭昧詹言》卷一八)为白居易写景诗中的佳作。

(吴小林)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

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 唐诗篇名。七律。白居易作。见《白居易集》卷一三。属杂律诗。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於潜,今浙江临安。乌江,今安徽和县。符离,今安徽宿县。下邳,今陕西渭南。约作于贞元十五年(799)。其时藩镇叛乱,战祸频仍,灾荒连年,诗人自己亦骨肉分离,过着漂泊羁旅的生活。此诗即抒写其感时伤乱、怀乡思亲的感情:“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全诗不事雕饰,气势酣畅,情韵无限。清孙洙评此诗曰:“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唐诗三百首》卷六)“吊影分为千里雁”一联,以分飞失群之孤雁和辞根飘转之飞蓬比喻弟兄离散漂泊,“共看明月应垂泪”一联,用兄弟五处望月垂泪的想象抒写其共同的思乡深情,均写得精巧贴切,为历来传诵之名句。(吴小林)

【闰意献张水部】 唐诗篇名。七绝。朱庆馀作。见《全唐诗》卷五一五。诗题一作《近试上张籍水部》,张籍曾官水部员外郎,故称。作于宝历二年(826)。作者向张籍投诗行卷,受到张的赏识,张“置于怀抱而推赞之”,而“朱君尚为谦退”,临近应试时又作此诗以献张籍(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运用比兴手法,借新妇问夫的典型细节,向张籍讨教己诗是否合时,构思新巧,比喻贴切。“妆罢”二句,将诗人试前忐忑不安心情生动传出,既富生活气息,又饶风华流美之致。宋洪迈曰:“此诗不言美丽,而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杨慎《升庵诗话》卷四引)后张籍作诗酬答之:“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也用比体,充分肯定对方的才华,与朱诗同为匠心独具之佳构,千百年来传为诗坛佳话。(吴小林)

【寄扬州韩绰判官】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四。诗人于大和七年至九年(833—835)在扬州牛僧儒淮南节度使府作幕僚,韩绰为其同事。此诗当作于离开扬州之后,表现对扬州和故友的怀念之情:“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一本作‘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前两句以清丽之笔描写江南秋景,后两句用调侃口吻询问友人近况,均寄有一片深情。诗中“情虽切而辞不露”(谢枋得《注解选唐诗》卷三)。显得风调俊爽,寓意蕴藉。“二十四桥明月夜”,是广为传诵的咏扬州名句,宋姜夔词《扬州慢》中的句子“二十

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即由此演化而成。

(吴小林)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唐组诗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二。华清宫,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骊山上。三首中以第一首最为著名:“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谢枋得曰:“明皇天宝间,涪州(今四川涪陵)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注解选唐诗》卷三)此诗即通过驿使飞马急运鲜荔枝的典型事件,揭露唐玄宗、杨贵妃的荒淫奢侈生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两句,从反面着笔,以“一骑红尘”和“无人知”相对比,措辞微婉,而讽刺之意越显强烈,为构思精妙,托讽不露之佳句。后世宋苏轼《荔枝叹》中“宫中美人破一颜,惊尘溅血流千载”的诗句,清洪昇传奇《长生殿》中《进果》一出,均曾受此诗的影响。(吴小林)

【江南春绝句】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三。此诗描写江南春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大处着笔,且抓住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进行具体刻画,生动地表现出江南春色的妩媚迷人,为脍炙人口的名诗。论者对此诗是否含讽刺有歧见:一说意含对统治阶级崇佛的讽刺,宋人张表臣曰:“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而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珊瑚钩诗话》卷二)一说纯是描绘江南风物美的写景诗,别无讥刺。对诗中“千里”一词亦有争论:明人杨慎云:“‘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升庵诗话》卷八)清代何文焕则曰:“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吴小林)

【赤壁】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四。赤壁,三国时周瑜大败曹操处,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此诗所咏之赤壁为今湖北黄冈之赤鼻矶,系借题发挥。作于黄州刺史任上(842—844)。“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前两句写兴感之由,后两句发议论感慨,但不正面落笔,而是反说其事,且以二美女之命运形象地反映东吴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一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全诗

以小见大,警拔精悍,隽永有味,为咏史诗之佳构。宋许颢却评曰:“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彦周诗话》)后世论者对此多予以驳斥。清贺贻孙云:“诗家最忌直叙,若竟将彦周所谓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孙氏霸业不成等意,在诗中道破,抑何浅而无味也!唯借‘铜雀春深锁二乔’说来,便觉风华蕴藉,增人百感。此正是风人巧于立言处。”(《诗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许颢)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唯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吴乔认为《赤壁》作为咏史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围炉诗话》卷三)。(吴小林)

【泊秦淮】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四。秦淮,即秦淮河,源头分别出自句容大茅山和溧水东芦山,在秣陵关附近汇合北流,经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入长江。横贯金陵之秦淮河为六朝以来的游宴胜地。此诗是作者夜泊秦淮河边时所作,抒写客中感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耳闻歌女唱陈后主时流行之亡国之音所引起的嗟叹中,寓有对唐王朝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讽刺和对国事的忧虑。全诗构思巧妙,用字精当,且情景兼胜,神韵俱远。尤其“商女”二句,怀古寄慨,含蓄深婉,为传诵千古之名句。清代沈德潜评此诗曰“绝唱”(《唐诗别裁》卷二〇),并称之为唐人绝句中的“压卷之作”(《说诗碎语》)。(吴小林)

【杜秋娘诗】 唐诗篇名。五古。杜牧作。见《樊川诗集》卷一。大和七年(833)途经镇江有感于杜秋娘之遭遇而作。诗前小序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诗中叙杜秋娘一生坎坷遭遇,表现对妇女不幸命运之同情,且寓有个人身世感慨。此作为一百一十二句的长诗,层次分明,唱叹有致。清洪亮吉把该诗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并提:“同是才人感沦落,樊川亦赋杜秋娘。”(《北江诗话》卷六)吴乔认为此诗“至‘我昨过金陵,闻之为歔歔’,诗意已足”,以下议论实属多余,有损“雅人深致”(《围炉诗话》卷三)。(吴小林)

【秋夕】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外集》。此诗亦见于《王建诗集》。宋周紫芝认为王建所作:“以余观之,当是建诗耳。盖二子之诗,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险侧,建多平丽。此诗盖清而平者

也。”(《竹坡诗话》)明杨慎曰:“王建宫词一百首,至宋南渡后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绝句补入之”,以为“银烛秋光冷画屏”一首“杜牧之诗也”(《升庵诗话》卷二)。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亦持杜牧作之说。以后说为是。该诗写失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寂寞心境:“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人物无聊幽怨心情由其两个典型动作传出,写得蕴藉隽永,余意不尽。宋曾季狸评此诗云:“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独言牛女,此所以见其为宫词也。”(《艇斋诗话》)清孙洙评曰:“层层布景,是一幅着色人物画。只‘坐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灵动。”(《唐诗三百首》卷八)

(吴小林)

【山行】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见《樊川外集》。此诗写山行所见:“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前二句描绘山景,是铺垫烘托;后两句摹写枫林红叶,为诗之重点所在。全诗犹如一幅由多种景物所构成的秋山图,疏密相间,浓淡相衬,意境幽美,诚具“写景咏物之妙”(瞿佑《归田诗话》卷上),是唐代写景诗中的杰作。末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比喻新巧,语意精警,历来为人所传诵。此句曾为后代诗人化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吴小林)

【清明】 唐诗篇名。七绝。杜牧作。其集子未载,见《千家诗》卷上。此诗写清明路途遇雨情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语言流畅,意境清新,独具凄迷绵邈的美感,为雅俗共赏之名诗。谢榛评曰:“此作宛然入画。”(《四溟诗话》卷一)“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生动传出迷濛清幽之境界,是历来传诵的佳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两句,极富情趣,且摇曳跌宕,清音有馀,亦颇受人赞赏。

(吴小林)

【咸阳城西楼晚眺】 唐诗篇名。七律。许浑作。见《全唐诗》卷五三三。《全唐诗》诗题作《咸阳城东楼》,题下云:“一作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作西门。”该诗第三句下自注曰:“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故诗题以《咸阳城西楼晚眺》或《咸阳西门城楼晚眺》为是。作于大中三年(849)任监察御史期间。为登临怀古之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描写望中所见景色,感慨古今兴废变化,苍凉浑厚,圆稳律切。“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句,写景逼真传神,且富象征意义,为历来传诵之名句。

(吴小林)

【商山早行】 唐诗篇名。五律。温庭筠作。见《全唐诗》卷五八一。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此诗为作者于大中末年离开长安,经过商山时所作,写羁旅行役之感:“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全诗运用白描手法,勾勒山村早行图画,情景毕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纯用名词组合,然写早行景象绘声绘影,如临其境,为千古传诵之名句。宋欧阳修视此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范例,并引梅尧臣的话说:“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六一诗话》)明李东阳则曰:“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麓堂诗话》)胡应麟称此二句“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诗薮》内编卷四)。(吴小林)

【苏武庙】 唐诗篇名。七律。温庭筠作。见《全唐诗》卷五八二。诗人瞻仰苏武庙后所作,抒写对苏武的凭吊缅怀深情:“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全诗笔墨精警,格调沉雄,一个白发丹心的汉臣形象活现纸上。颌联“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写苏武牧羊绝塞之事,情景交融,意境苍茫,为绝妙佳联。颈联“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设想苏武返汉时的今昔之感,对仗工巧,寄慨遥深,亦为历代诗评家所称许。清沈德潜谓之“逆挽法”,曰:“律诗得此,化板滞为跳脱矣。”(《唐诗别裁》卷一五)。(吴小林)

【安定城楼】 唐诗篇名。七律。李商隐作。见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五。作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春。李商隐于前一年进士及第,此时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试,因遭人妒忌诽谤,被主考官批为“大不堪”而落选。遂西游泾州(即安定郡),入节度使王茂元幕。此诗约作于入幕之初。安定城楼,即泾州城楼。诗云:“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首联写登楼远眺之所见。次联以贾生、王粲自比,既合身份和当时情景,又突出了抱负远大、身世坎坷两点。颈联为诗核所在,浓缩而强烈地倾吐了胸中郁愤与垒块。“言已长忆江湖以终老,但志欲挽回天地,乃入扁舟耳。”(沈德潜《唐诗别裁》)宋王安石激赏李商隐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尤其爱此一联,评曰:“虽老杜无以过。”(《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清

人纪昀也说:“五六(两句)千锤百炼,出以自然,杜亦不过如此。”(《瀛奎律髓刊误》)尾联则借《庄子》书中鹓雏受到鸱枭的猜妒之典,表白自己的高情远志与对谗毁者的轻蔑。此诗是李商隐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董乃斌)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唐诗篇名。五古。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四。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冬。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于汉中病重时,召其前往代草遗表。死后,李商隐与令狐子弟护丧归京,途中见到长安西郊右辅(即今陕西凤翔一带)农村的残破景象,诗人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村民的叙述,详尽而具体地描绘了“高田长榭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的惨况,借此追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尤其着力探讨开元、天宝和安史之乱后政治日益腐败、导致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的原因,并对国家治乱问题提出见解:“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即要求君明臣贤,中枢得人,地方官仁厚爱民。全诗一百韵,长达千字,可分为三大段。“一段叙长安乱后景况,二段遗民述乱亡始末,三段感慨结”(屈复《玉谿生诗意》)。在结构布局、主题旨趣方面效仿杜甫《北征》,而发挥议论则过之。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评曰:“李义山行次西郊百韵,少陵而后,此为嗣音。当与《韩碑》诗两大。”何焯则以为:“此等杰作,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义门读书记》)

(董乃斌)

【锦瑟】 唐诗篇名。七律。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四。作年不详,然论者多以为系商隐晚年之作。其诗意象绮丽,境界凄迷,主旨含蕴朦胧而具多层性,故历来解说纷歧,莫衷一是。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宋刘攽以为诗写恋情,锦瑟乃令狐楚家青衣。(《贡父诗话》)苏轼据《古今乐志》,谓此诗写“适、怨、清、和”四种乐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引黄朝英《缃素杂记》)。清朱彝尊云:“此悼亡诗也。”冯浩从之(分别见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玉谿生诗集详注》)。程湘衡、王应奎则持“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之说(《义门读书记》、《柳南随笔》)。以上几种说法均有人信从而实均有所不足。何焯笺义山诗,谓“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又谓“感年华之易迈,借锦瑟以发端。‘思华年’三字一篇之骨,三四赋‘思’也,五六赋‘华年’也,末仍结归‘思’字。”(《李义山诗集辑评》)因其能涵盖自叙平生、自题诗集与悼念亡妻等内容,以之解诗亦较为圆通,故

为近代多数论者所从。此诗实以锦瑟起兴而引起对华年、往事之回忆。中二联以四个典故(四种比喻)象征才能之高俊、品格之清贵、遭际之数奇和身处此境的迷惘,因所用典故有多面、多层含义,故造成理解的歧异,以至成为古典诗歌中主题、作意难解的典型。如元好问《论诗绝句》所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然若紧扣首尾二联“思华年”、“成追忆”之语及义山诗的总体倾向,则对中二联之象征意义当可取得较为一致或接近的看法。此诗在宋本《李义山诗集》(三卷)中,冠于卷首,向来被视为李商隐诗的代表作品,后世诗人模仿其题或其体格者颇多。“锦瑟年华”亦成为比喻青春时代的成语,如宋贺铸词曰:“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榭,绮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青玉案·题横塘路》) (董乃斌)

【乐游原】 唐诗篇名。五绝。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乐游原为长安东南登临观览之胜地,商隐集中有以乐游原为题的诗三首,此篇最为著名,然作年不详。诗云:“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是李商隐某次登临后有感而作。其所写虽为眼前景,然三四两句于壮丽宏阔之中深含好景易逝之感慨,使人联想到作者身世的时代气氛,故历来论者多以为其有“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或“忧唐之衰”的象征意义(见冯浩《玉谿生诗集详注》),而纪昀之论则较为通达:“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悲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玉谿生诗说》)此诗形象鲜明,涵意丰富而格调凝重深沉,为李商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篇章之一。(董乃斌)

【夜雨寄北】 唐诗篇名。七绝。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诗题一作《夜雨寄内》,然多数版本作“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作年不详。据诗意,其所寄有友人与妻子两种可能,如沈德潜谓“此寄闺中之诗”(《唐诗别裁》卷二〇),冯浩也说:“语浅情浓,是寄内也。”(《玉谿生诗集详注》)然今人则认为“当是梓幕思归寄酬京华友人之作,确年不可考,约在梓幕后期(大中七年,853前后)”(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此诗以构思精巧、感情深挚与韵律优美而为历代读者所喜爱。尤其是构思上“眼前景反作后日怀想,意最婉曲”(桂馥《札朴》)的特点,受到诗论家激赏。王安石《封舒国公》诗“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即仿此。(董乃斌)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唐诗篇名。七绝。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崔雍、崔衮兄弟为商隐重表叔崔戎之子,崔戎任华州刺史时曾聘

商隐入幕,故二子与商隐熟识。此诗为别后所作,但具体作年不详。“骆氏亭非当时名胜,无足深考”(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诗云:“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借写景寓怀友之情,意在言外,含蓄深沉,尤以三四两句诗思曲折,极有馀味。纪昀评曰:“不言雨夜不眠,只言枯荷听雨,意味乃深。”何焯曰:“下二句暗藏永夜不寐,相思可以意得也。”(均见沈厚铤《李义山诗集辑评》)。(董乃斌)

【无题】 唐诗篇名。中国古诗无标题现象颇多。《诗经》篇什最初即无标题。然以《无题》为题大量作诗,则为唐诗人李商隐所首创。李商隐现存诗集中有《无题》诗十七首,写作时间布于义山一生,难以考实,其诗分属各种诗体。五古如“八岁偷照镜”、“幽人不倦赏”(此首一说为失题),五律如“照梁初有情”,七律如“昨夜星辰昨夜风”,七绝如“白道萦回入暮霞”、“紫府仙人号宝灯”。有的为组诗,称《无题二首》、《无题四首》,而二首、四首之诗体不必一律。如《无题二首》一为七律(昨夜星辰昨夜风)、一为七绝(闻道阊门萼绿华);《无题四首》则系两首七律(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风细雨来)、一首五律(含情春日晚)、一首七古(何处哀筝随急管)。李商隐无题诗中除“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鹄沙边亦少留。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一首明白抒写怀古思乡之绪外,其余大体均以艳丽凄婉之词、隐晦含蓄之笔写男女恋慕及追求渴想的情愫,艺术风格优美而朦胧,“意多沉至,语不纤佻。”(清施补华《岷傭说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写爱情之深挚与忠诚极为精确生动。二首之次联,均为千古传诵之名句。“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班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写失恋女子的心理创伤和变态举止。“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写女子爱情追求的热烈执著,场景、人物均极细腻婉曲,既令人如闻如见,又富于联想回味的馀地,故历来脍炙人口。李商隐无题诗中亦有借咏老女不售抒发迟暮之感、不遇之愁

者：“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其隐喻及寄托均十分明显，由此使人想到诸如“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风细雨来”、“紫府仙人号宝灯”乃至前引诸首显系写爱情之作是否亦隐含寄托。对于李商隐无题诗之主题，向有寄托与艳情两说，而两说之中，又有许多具体而微的区别，对寄托的内容与对象，恋爱的女方与本事等等，均有多种看法。如明杨基谓义山无题“皆托于臣不忘君之义，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无题，和李义山商隐》）。清朱鹤龄云无题乃义山“厄塞当途，沉沦记室”，“身危思苦”而作的“曲言”和“漫语”，如“飒飒东风”一首即“不得但以艳语目之”（《李义山诗笺注序》）。吴乔著《西昆发微》则以为义山无题均为寄意令狐绹陈情告哀之作。后来注家如程梦星、冯浩、张采田大抵同其说法。持无题诗艳情说者，对义山所恋对象有贵主、女冠、宫嫔、娼妓等不同推测。近人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名《玉谿诗谜》）甚至指实义山所恋宫嫔之名为飞鸾、轻风。然当代多数唐诗学者对上述两种比附索隐式的本事考证均持怀疑态度。纪昀认为：“《无题》诸诗，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如‘幽人不倦赏’是也。宜分别观之，不必概为穿凿。”（《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具体说法虽可斟酌，但“宜分别观之”的原则赞同者较多。要之，李商隐无题诗乃以爱情生活为主要依据而又融汇全部人生经验、以感伤身世为主题的作品。义山诗中尚有不少取首二字或篇中任意二字为题而实即无题的作品，以它们的总体倾向作为参证，则无题诗之主旨与风格便更为显明可辨。李商隐无题诗对后世影响颇大，历代皆有喜爱者和模仿者，从稍晚于他的韩偓到元杨维桢（铁崖）、明王彦泓、清黄景仁（仲则）、陈文述、孙原湘席佩兰夫妇乃至南社诗人俞樾（剑华）、林庚白（学衡）、李煮梦（小白）和近人陈寅恪等，均有仿商隐无题诗、以绮艳华靡风格出之的作品。（董乃斌）

【隋宫】 唐诗篇名。七绝、七律各一首，李商隐作。分别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卷五。写作时间约在商隐晚年游江东时。通过咏叹隋炀帝南游史迹，指出荒淫必然亡国的历史规律，暗寓针砭晚唐现实之深意。其七绝云：“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七律云：“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

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二诗的共同艺术特点在于从已知的史实（隋炀帝曾开运河乘龙舟三次游幸江都）出发，杂用传说资料（隋炀帝曾梦见陈后主），加以引申夸张和合理想象，使炀帝荒淫奢侈的后果格外触目惊心，从而充分表达作者意旨，在看似平静诙谐的叙述中深含谴责与批评。尤以七律一首获誉最多，如赵臣瑗谓此诗“写淫暴之主，纵心败度，至于无有穷极，真不费半点笔墨”（《山满楼唐诗七律笺注》）。何焯曰：“前半展拓得开，后半发挥得足，真大手笔！”“无句不佳，三四尤得杜家骨髓。”（《义门读书记》）而纪昀则有“纯用衬贴活变之笔，一气流走，无复排偶之迹”，“跌宕生动之极”，“非常敏妙之笔”等评语（见《玉谿生诗说》）。（董乃斌）

【晚晴】 唐诗篇名。五律。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三。据诗意，可能作于大中初（847）商隐随郑亚赴桂海时。诗云：“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其中三四两句抒发久受压抑，暂得宽解，对前途有所期望而又不耽奢望的复杂心情，历来受到激赏，写景寓情，达到情景交融、自然熨贴、浑化无迹之境，且所抒感慨富含人生哲理，颇易引起共鸣。钟惺《唐诗归》谓此二句“妙在大样”，周咏棠《唐贤小三昧续集》赞其为“大家数语”，理由即在此。后二联，亦有“妙于纤细”（贺裳《载酒园诗话》）、“有意无意，亦是少陵遗法”（《唐律消夏录》）的好评。此诗系李商隐即景抒情而有寄托、有寄托而不落痕迹的佳作。（董乃斌）

【嫦娥】 唐诗篇名。七绝。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作年不详。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首写嫦娥彻夜不眠之情状，接探嫦娥心曲，疑其思念人间而难耐孤寂，字里行间充满同情与慰藉之意。对诗旨历来有自伤、怀人、悼亡、咏女冠诸说。论者以为“悼亡说最不可通”，而其余三者“虽似不相涉，实可相通”，盖“嫦娥、女冠、诗人，实三位而一体，境类而心通。咏嫦娥即所以咏女冠，亦即所以寄寓诗人因追求高洁而陷于孤孑之复杂矛盾心理。”（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董乃斌）

【贾生】 唐诗篇名。七律。李商隐作。见明刊本《李义山诗集》卷六。写作时间不详。诗咏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国计民生而询以鬼神之事，借以抒发更深一层的怀才不遇之慨。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被召问，似颇受重视，然所问非国家大事，

直以其为巫祝,岂不更堪悲恨?诗揭出此点,“纯用议论矣,却以唱叹出之,不见议论之迹”(纪昀《玉谿生诗说》),而愤懑讥刺可以意会。此种写法对后人影响颇大,胡应麟称其与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皆宋人议论之祖”(《诗薮》内编卷六)。(董乃斌)

【江楼感旧】 唐诗篇名。七绝。赵嘏作。见《全唐诗》卷五五〇。题又作《江楼旧感》、《江楼感怀》、《江楼书感》。此诗即景怀人:“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全诗抒写由江楼望月引起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的感慨。笔墨轻灵,情味隽永,在风华流美中饶有俊逸淡雅之致。“月光如水水如天”一句,运用叠字回环的技巧和比喻的手法,把月光、水色、天穹三者融成一体,构成银辉泻地、江心抱月、水天相接的明丽图景,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吴小林)

【官仓鼠】 唐诗篇名。七绝。曹邴作。见《全唐诗》卷五九二。此诗写官仓中的老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诗中以鼠喻人,揭露当时官吏的贪污腐败,反映百姓挨饿受苦,且把批判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该诗或受此记载和《诗经·硕鼠》的启迪,比喻巧妙,语言通俗,讽刺尖锐,富有民歌特色,为反映晚唐社会矛盾的名诗。(吴小林)

【橡媪叹】 唐诗篇名。五古。皮日休作。见《皮子文藪》卷一〇。组诗《正乐府十篇》之二。诗中通过一位以拾橡子充饥的贫苦老妇的悲惨遭遇,深刻反映唐末农民大起义前夕人民所受残酷剥削的社会现象。“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当时黑暗吏治的真实写照。诗末“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四句,以大斗贷出,小斗收进,收买人心的春秋时代的田常作衬托,揭露晚唐统治者对人民赤裸裸的掠夺,感慨深沉,锋芒犀利。全诗多用铺叙和对比手法,感情深切真挚,语言朴实无华,为作者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体现“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十篇序》)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吴小林)

【咏田家】 唐诗篇名。五古。聂夷中作。见《全唐诗》卷六三六。题一作《伤田家》。一本将作者另一五绝《田家》“父耕原上田,子嗣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与此诗合并。此诗八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用白

描手法,揭露封建社会苛重赋役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语言质朴,风格平易。清沈德潜评曰:“唐时尚有采诗之役,故诗家每陈下民苦情,如柳州《捕蛇者说》,亦其一也。此诗言简意足,可匹柳文。”(《唐诗别裁》卷四)诗中“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写卖青虽救一时燃眉之急,却丧失农家的命根,比喻形象,语意沉痛,为历来传诵之名句,成语“剜肉补疮”即本于此。(吴小林)

【吴宫怀古】 唐诗篇名。七绝。陆龟蒙作。见《全唐诗》卷六二九。吴宫,指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西施建的馆娃宫,故址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灵岩山上。此诗为诗人游览吴王故宫后的怀古之作:“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前两句运用对比手法,写今昔盛衰变化,隐隐点出吴亡与吴王奢靡腐朽生活之间的联系,含蓄无穷。后两句融议论入诗,一反西施“沼吴”、女色亡国的传统观念,深刻总结吴王荒淫误国的历史经验,新人耳目。全诗言近旨远,爽利自然,为诗人七绝中之佳作。(吴小林)

【题菊花】 唐诗篇名。七绝。黄巢作。见《全唐诗》卷七三三。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言此诗是黄巢五岁时的作品,不可信,然其为诗人早年之作无疑。该诗借咏菊以言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此篇一反过去咏菊表现孤傲高洁品格或单纯抒写傲霜斗雪顽强意志的窠臼,以比兴象征手法,寄托作者不满现存统治秩序的思想和决心扭转乾坤的抱负。语言明晓,风格遒劲,全诗在率直豪爽中不乏含蓄蕴藉之致。(吴小林)

【送人游吴】 唐诗篇名。五律。杜荀鹤作。见《全唐诗》卷六九一。此诗为送人漫游苏州之作:“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苏州河流纵横,古迹众多,山明水秀,风光旖旎,为久享盛誉的江南古城;且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此诗抓住苏州富有特征性的景象,寥寥几笔,就把这个典型的水乡城市毕现纸上,写得清新秀逸,饶有情味,为描写苏州的名诗。清沈德潜评曰:“写吴中如画。”(《唐诗别裁》卷一二)

(吴小林)

【山中寡妇】 唐诗篇名。七律。杜荀鹤作。见《全唐诗》卷六九二。题一作《时世行》。描写一位山中寡妇的不幸遭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诗中以小见大,由寡妇的悲惨命运形

象地反映出唐末动乱时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深重苦难,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全诗不事雕琢,纯用白描,语言朴素清新。诗末两句,扣住题目“山中”二字,连用“任是”、“也应”两个关联词,进一步突出封建剥削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使诗旨得到深化,亦使诗意更加含蓄有余味。通常用乐府古体写的民生疾苦题材,此诗以七律来表现,显示出作者独辟蹊径的创造精神。

(吴小林)

【秦妇吟】 唐诗篇名。七古。韦庄作。见《全唐诗外编》第一编。中和三年(883)三月在洛阳时作。全诗共238句,为唐代最长的叙事诗。僖宗广明元年(880)冬至中和三年春,黄巢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时期,作者羁留城中,亲眼目睹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此诗即借一“秦妇”之口,叙写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称帝建国及其与唐军攻守厮杀情景,展现出当时大动乱的时代画卷。对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同时又对唐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官军的残民暴行进行鞭挞。该诗选择典型的细节和生动的情节,采取层层铺叙的手法,着重刻画场面和渲染气氛,以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写得结构宏伟,布局严谨,语言精丽,气势流畅,体现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重大发展。此作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诗人因此而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后韦庄讳之,未收入其集子《浣花集》,致使长期失传。其讳因,五代孙光宪曰:“《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北梦琐言》卷六)近人陈寅恪则认为此说不确,指出庄所惮者,并非当时唐朝公卿,而是后来蜀中新贵:“怕触新朝宫闱之隐情。”(《读《秦妇吟》》)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此诗的九个手抄本,后经许多学者的研究、校勘,写定后收入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

(吴小林)

【春怨】 唐诗篇名。五绝。金昌绪作。见《全唐诗》卷七六八。题一作《伊州歌》。此诗写女子对远征不归丈夫的思念:“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全诗构思新颖,视角独特,采用层层倒叙,设置悬念的手法,最后才点明题旨,又不自说破。通篇写怨,然不着一“怨”字,婉转含蓄,余意不尽。结构环环相扣,始终不懈。明王世贞评曰:“句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艺苑卮言》卷四)。清沈德潜亦云:“一气蝉联而下者,以此为法。”(《唐诗别裁》卷一九)语言信手信口,生动活泼,富有民歌风味。

(吴小林)

【村行】 宋诗篇名。七律。王禹偁作。见《小畜集》卷九。淳化二年(991),王禹偁因论妖尼道安诬

陷徐铉应获罪,被朝廷贬官商州(今陕西商县)任团练副使。“一郡官闲唯副使”(《清明日独酌》),他便经常寄情于山水,正所谓“平生诗句是山水,谪宦方知是胜游”(《听泉》)。《村行》写于贬官第二年,是此类诗作的代表。全诗为:“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从此诗所描述的村野秋景,见出作者游兴之浓与对当地风光的喜爱。“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向视为名句。此诗风格飘逸,意境清新,饶有朴素的自然美。清贺裳云:“王元之秀韵天成,常有临清流、披惠风之趣。”(《载酒园诗话》)吴乔也称王氏诗作“秀韵天成”(《围炉诗话》卷五)。诗人曾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引),就此诗而言,作者确乎深得白居易七律之精神。

(李如鸾)

【山园小梅】 宋诗篇名。七律。林逋作。见《林和靖先生诗集》卷二,《宋诗纪事》题作《梅花》。原诗为:“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全诗对梅花体态风姿的描绘,正是诗人高雅情怀的真实写照。“疏影”一联为咏梅“千古名句”(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乃从南唐江为诗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点化而来(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一写梅姿之清瘦,一写梅香之淡远,因是以水影月色为衬托,故深得梅花品格高洁、不染尘俗之风骨。韦居安云:“自和靖‘香影’一联为古今绝唱,诗家多推重之。”(《梅硐诗话》卷下)许颢云:“大凡《和靖集》中,梅诗最好,梅花诗中此两句尤奇丽。”(《彦周诗话》)司马光也称此二句“曲尽梅之体态”(《温公续诗话》)。吴乔则认为是“无寄托之好句”(《围炉诗话》卷五)。后“暗香”、“疏影”遂成梅花之代名词,姜夔还以之为调名,自度成词用来咏梅。

(李如鸾)

【江上渔者】 宋诗篇名。五绝。范仲淹作。见《诗人玉屑》卷九。一题《赠钓者》。诗云:“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诗人玉屑》卷九引《翰府名谈》,“但爱”作“尽爱”,“风波”作“风涛”。此诗乃喟叹世人只知鲈鱼美味,却不晓渔者与风浪搏斗的危险与艰辛,从中见出诗人对渔者的关切与同情。全诗感情深厚,风格质朴,语言浅近,又由于不受格律所拘,写来自由,饶有谣谚韵味。吴乔云:“范希文《赠钓者》……宁让子美?”(《围炉诗话》卷五)刘斧亦云:“范希文《赠钓者》诗实寓深意,不徒作也。”(《诗林广记》《翰府名谈》) (李如鸾)

【示张寺丞王校勘】 宋诗篇名。七律。晏殊作。

见《元献遗文》。诗题中张寺丞指张先,王校勘谓王琪,皆晏殊幕中才士。诗云:“上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前四句因时兴感,即景生情。颈联写对春残花落的眷恋叹惋,以及对大化流转的感喟哀怨,属对精工,声调谐亮,意境凄迷,出语新妥,是寓情于景、寓理于境的佳句。诗人自己也深爱之,曾原文填入词内。李东阳云:“律诗对偶最难”,而此联“尤觉相称”(《麓堂诗话》)。尾联借用汉梁孝王好客、才士多游梁园的典故以自况,用饶有风韵的“游梁赋客”借指张先、王琪,表明自己不惜资财,要收留宾客,力荐才士,擢拔后进。此诗清俊疏淡,闲雅浑成,景物情理交相密合,颇见诗人旷达豪俊的性格。(李如鸾)

【陶者】 宋诗篇名。五古。梅尧臣作。见《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六。作于景祐三年(1036)知建德(今属浙江)县时。原诗为:“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前两句写烧瓦工匠的巨大艰辛和极端贫困,后两句写大屋主的安逸与豪富,强烈反差形成鲜明对照。题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倾向性。小诗取材新颖,矛盾集中,用白描,用比衬,不藻饰,不议论,只将真情寓于形象之中。欧阳修赞美其诗“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此诗虽然不能完全体现其风格特色,却也显得古质朴直,简拔有力,堪称佳作。(李如鸾)

【汝坟贫女】 宋诗篇名。五古。梅尧臣作。见《宛陵先生集》卷七。作于康定元年(1040)任襄城(今河南临汝)县令时。《诗经·周南》中有《汝坟》篇,此诗取以为题。汝坟,汝河边。此指北汝河,在河南中部,流经襄城县。诗前小序云:“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壤河,疑即穰河,流经鲁山县入沙河。昆阳,治所在今河南叶县。全诗二十句,除开篇点明贫女身分与她边走边哭诉的情景作为引子,其余十八句全用贫女口吻,诉说老父被强征服役,僵死河边的遭遇与无力为之安葬的悲愤,借以表现广大人民的苦难,抨击苛刻的役政。诗篇选材典型,氛围凄怆,细节描写、人物刻画、主人公的对白,都强化了题旨。龚啸说梅尧臣“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这个评语用于此诗是确当的。

(李如鸾)

【东溪】 宋诗篇名。七律。梅尧臣作。见《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五。作于至和二年(1055)。诗云:“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

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此诗抒写了诗人对家乡宣城东溪(即宛溪)迷人风光的爱恋。“野凫”一联所写溪旁景色,历来为人激赏。方回赞为“当世名句,众所脍炙”(《瀛奎律髓》),陈衍称作“的是名句”(《宋诗精华录》),胡仔也说:“似此等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茗溪渔隐丛话》)。梅氏此类诗篇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造语朴素自然,绘景形象新颖为其艺术特征。欧阳修云:“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此诗中间二联的景语正是作者实践自己文学主张的范例。此诗还明显见出散文化倾向,描述游览历程,层次井然,宛若一篇精萃隽永的记游文字。韩愈《山石》的章法技巧,于此隐然可见。(李如鸾)

【庆州败】 宋诗篇名。七古。苏舜钦作。见《苏学士文集》卷一。仁宗景祐元年(1034)秋,西夏赵元昊进犯庆州(今甘肃庆阳),齐宗矩出兵抵御。宗矩因遇伏兵,战败被俘,后放还。此诗写于齐氏放还后不久。诗篇就此次丧师辱国的战役,对宋王朝边防不修、主将庸碌怯懦和统治者用人不当予以无情谴责,表现出诗人关心国家社稷的情怀。作者前期这类诗作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政论性和战斗性,往往就当时政治事件的现实问题独抒机杼。《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懣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魏泰也称“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临汉隐居诗话》)。欧阳修评他的诗“笔力豪隽”、“超迈横绝”(《六一诗话》)。刘克庄称“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后村诗话·前集》)。这些评论都适用于此诗。至于本篇含蕴与韵味不足,语言也略嫌粗糙,则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弱点。(李如鸾)

【淮中晚泊犊头】 宋诗篇名。七绝。苏舜钦作,见《苏学士文集》卷七。一题《绝句》。庆历四年(1044)春,苏舜钦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入汴京,于旅途中作。诗云:“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此诗即景寄兴:前两句写雨前行舟淮河之中所见到的岸边景物,后二句写黄昏风雨中泊舟于古庙之下观赏晚潮。作者心境随诗境而变化。刘克庄称此诗“极似韦苏州”(《后村诗话·前集》),近人陈衍则认为“视‘春潮带雨晚来急’,气势过之”(《宋诗精华录》)。据说黄庭坚很欣赏苏氏此诗,几次写成条幅(见《王方直诗话》);并写有“满川风雨替人愁”的诗句(《夜发分宁寄杜涧叟》)。吴曾还说:郑獬《田家》的“一树高花明远村”颇似本诗第二句,“皆清绝可爱”(《能改斋漫录》)。

赵翼评为“挥洒出之，全不见锤炼之迹”(《瓠北诗话》)。翁方纲则云，此诗“妙处不减唐人”(《石洲诗话》卷三)。(李如鸾)

【柳絮】 宋诗篇名。七绝。韩琦作。见《安阳集》卷五。共二首，第一首更为著名：“惯恼东风不定家，高楼长陌奈无涯。一春情绪空撩乱，不是天生稳重花。”前两句把握柳絮的外在表现，用拟人手法，说它总是埋怨东风使之居无定所，无论高楼长陌，都有柳絮飞扬。第三句，由“奈”字生发转入情语，面对这纷扬迷蒙的柳絮，不由得使诗人的愁怀也撩乱起来！末句用议论截住：它颠狂起舞，轻薄作态，“不是天生稳重花”；既然如此，作为北宋执政三朝颇有政绩的老臣，自身的心绪又何必受它撩拨呢？着一个“空”字，似有自嘲之意。此诗善于状物，情、景、理交相密合，技法纯熟，构思遣词都有新意。(李如鸾)

【戏答元珍】 宋诗篇名。七律。欧阳修作。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一一。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政治改革而受牵连，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翌年早春，峡州军事判官丁元珍写有《花时久雨》一诗赠他，他当即作此诗回赠，故诗题一作《戏答元珍花时久雨之什》。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颈联一作“鸟声渐变知芳节，人意无聊感物华。”夷陵荒寒的早春透露诗人谪居山城的寂寞。诗篇写景善于抓住地方风物，其《夷陵县至喜堂记》云，那里确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居士集》卷三九)。末二句是自我宽解之语。近人陈衍称此联为“结韵用高一层意自慰”(《宋诗精华录》)。天圣八年(1030)至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曾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故云。此诗情景相生，虚实相衬，构思新巧，语言清丽，别有韵味。作者本人对此诗也颇得意。他曾说：“修在三峡赋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方回称道此诗后三联“句句有味”(《瀛奎律髓》)。(李如鸾)

【晚泊岳阳】 宋诗篇名。七古。欧阳修作。见《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二。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贬放夷陵(今湖北宜昌)，途经岳阳作。诗云：“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阙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此乃其写景名篇。诗人泊船江畔，卧闻城内钟声，心境悠闲淡泊。此时江空月朗，云水苍茫，洞庭湖口的空旷开

阔与氛围的幽寂安闲，可想而知。夜更深沉，在偌大江面上，清辉朗照，忽闻一声渔唱，未及听罢，小舟已倏忽远逝。此诗从所见写到所闻，再由所闻推出联想：如非归舟，为何渔唱霎时不闻？渔唱不闻方知如飞而去；而如飞而去正可判定乃轻舟短楫。诗意含蓄深婉，境界恍惚缥缈，正如方东树所云：“欧公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徊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昭昧詹言》)(李如鸾)

【画眉鸟】 宋诗篇名。一题《郡斋闻百舌》。七绝。欧阳修作。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一一。作于贬官滁州(今安徽滁县)时。诗云：“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首即兴咏物诗的前两句，写画眉鸟在开满春花的山林中纵情放歌。声与色的和谐，渲染了顺应山禽天性的氛围。后两句指出笼中画眉啼叫不甚动听，乃束缚个性所致，从而蕴含挣脱名缰利锁归返自然之意。近人王文濡云：“豢养虽优，究不如林间之自在。此诗盖别有寄托。”(《历代诗话评注读本》)所谓寄托，似指朝廷党争，诗人心境难以平和恬适，生活也难以舒放自由。此诗运用比兴手法，使情、景、理自然融合，显示了宋代咏物诗向哲理化发展的趋势。(李如鸾)

【煮海歌】 宋诗篇名。七古。柳永作。见《昌国州图志》卷六。题下自序“悯亭户也”。亭户，古代盐民之称。柳永曾任昌国(治所在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因此深知盐民疾苦。开篇四句写盐民不事耕织，专以煮海制盐为业，除缴纳赋税外，所剩寥寥，用以总领后文。“年年春夏潮盈浦”十二句，用“赋”的笔法对盐民艰辛的劳动作了生动的铺陈和描绘。诗文将制盐过程款款道来，文字简约，铺叙得法，从中见出收获之不易。“自从漭卤至飞霜”八句，再深入写盐民生活的悲苦。其中“秤入官中充微值”二句，表明官府盐价之低、课税之苛与高利贷盘剥之重。结尾八句，对盐民疾苦寄予深切同情，并表达了善良意愿。诗人切望国富民强，“甲兵洗净”，朝廷广施仁政，废除盐铁官税，选用贤相，恢复所谓夏商周的“三代之治”。此诗题材新颖，全用写实手法，寓议于叙，边叙边议，先叙后议，语言质朴，风格迥然有别于诗人的“偎红倚翠”的词作，在柳永为数绝少的诗作中堪称难得的佳篇。(李如鸾)

【蚕妇】 宋诗篇名。五绝。张俞作。见《皇朝文鉴》卷二六。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一本“到”作“入”，“郭”作“市”，“非”作“不”。此诗撷取蚕妇一个生活片断，用人物细节描写，寄寓作者的不平之鸣。前两句写蚕妇进城和“归来”后的悲伤，后两句仍以蚕妇声口揭

示悲伤之由。此诗描述均为蚕妇所见所感,她“到城郭”与“归来”的前后变化,是情绪的对比,“罗绮者”与“养蚕人”又是生活的对比。小诗构思新巧,诗笔曲折,语短意深,虽不着一字议论,却依旧题旨显豁,富有感染力。清人薛雪称此诗属于“随笔纳忠、触景垂戒之作”(《一瓢诗话》)。(李如鸾)

【客中初夏】 宋诗篇名。七绝。司马光作。见《诗林广记》后集。题一作《居洛初夏作》。诗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前二句写客居洛阳独乐园所见初夏景色——当户南山雨霁的丰姿。后二句借景言志,意谓我非柳絮,不会附和王安石新法;而是如向日葵花,有一颗忠于君王的心。其中“更无”句是化用东晋女诗人谢道韞“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咏雪诗句。诗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退居洛阳,绝口不谈政事,但对北宋王朝初衷未改。宋蔡正孙《诗林广记》收存此诗,后附《东皋杂记》资料,内云:“其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此。”可谓深得题旨,切中肯綮。诗写景有远有近,有实有虚,形象生动,诗意委婉,耐人体味。(李如鸾)

【河北民】 宋诗篇名。七古。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五一。河北,指黄河以北、白沟河以南地区,宋时于此设河北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居汴京任大理评事,同年秋东出京师视察汴河时作。诗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现实:仁宗朝对辽与西夏贵族的侵扰,奉行忍辱求和政策,输岁币的结果,使得府库空虚,民不堪命。开头以临近辽与西夏的边民“长苦辛”统领全篇。下面逐层抒写“长苦辛”之所在:“家家”二句是一层,表明边民劳动所得均由朝廷转送辽与西夏的统治者;“今年”二句是一层,指出哀鸿遍野的大旱之年官府照样摊派役税;“老小”二句又是一层,再写不独河北民如此,这就扩大了社会容量,使诗意更加厚重。“悲愁”二句再作跌宕,转写边民及南人的饥饿感受与沮丧神情。结尾用贞观年间粮食丰足、无兵燹之灾与现实对比,寄寓对时政的批判和对“贞观盛世”的向往。此诗效法白居易的新乐府,“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并具有诗人早期作品的特色,即继承了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及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语言晓畅浅易却不失锤炼的功夫。(李如鸾)

【后元丰行】 宋诗篇名。七古。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三七。作于元丰五年(1082)夏罢相居金陵时。此诗曲折言志,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并对保守派攻击熙宁变法给予严正反驳,与《元丰行示德逢》为姊妹篇。全诗立意谋篇深受《礼记·礼运篇》的启发,但“师其意不师其辞”。开

篇诗句“十日五日一雨风”,写元丰年间风调雨顺,以示“天不爱其道”;“麦行”六句,极写五谷丰登、物产富庶的盛况,以示“地不爱其宝”;最后八句,歌颂推行新法后政通人和,百姓乐业,以示“人不爱其情”。此诗所表现的环境、物产、民俗均具南国风貌,犹如一幅江南水乡的丰乐画卷。据《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元丰元年四月,三年六月,五年六月均明确记载“夏麦大稔”或“蚕麦丰熟”事,足见本诗采用的是写实笔法,当然也不无诗人理想渗透其中。作品以整饬的句式,平浅的语言,多变的韵脚,生动描绘了喧闹的氛围,欢乐的场景,人民的情态,见出诗人纵横役使语言的功底和深厚渊博的文学修养。方东树称此诗:“前言丰年之乐,收处与上诸乐同,却似另出一层,郑重分明。此以馀情闲致,旁面取题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这是对章法的分析。李东阳评王安石咏史诗曾云“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麓堂诗话》)。其实,他的这类政治诗、社会诗又何尝不然。(李如鸾)

【登飞来峰】 宋诗篇名。七绝。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六七。庆历七年(1047)游杭州时作(据《王安石诗文系年》)。一说皇祐二年(1050),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令期满,回故乡临川,路过杭州时作;一说于该年在殿中丞任上出游杭州所作。《清一统志》引《輿地志》云:“晋咸和中,僧慧理登此山,叹曰:‘此中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岭,不知何年飞来?’因名飞来峰,亦名灵鹫峰。”诗云:“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首二句状述塔址与塔身之高,并暗用神话天鸡唱晓的典实,有眼前实景,亦有意中虚景。后二句紧贴登高抒怀,见出诗人的远见卓识与不畏艰险的精神。句中蕴含高瞻方能远瞩之哲理。全诗用景语铺垫,而后出以理语。这样就将义理融于形象之中,不失浓郁诗情。瞿佑称此诗是王安石“咏塔自喻”,“作于未大用前”(《归田诗话》卷上),是颇有识见之论。(李如鸾)

【桃源行】 宋诗篇名。七古。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三七。《王安石诗文系年》云:“此诗作年本不详”,因与《明妃曲》“同属惊世骇俗之语,当非执政后可作,故与《明妃曲》并系于是年(指嘉祐四年)。”可备一说,此诗在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基础上,别出新意。全诗十六句,四句一韵,意随韵转。首四句点明桃源来历及桃源人反对黑暗统治;次四句描述桃源特点,“虽有父子无君臣”,指出那是无国家与王权、无等级与压迫的社会;“渔郎”四句概括陶氏文章内容,转叙渔人与桃源人感叹世代变迁;末四句感慨世乱频仍、太平时代一去不返,含影现实,尤

见深意。清人金德瑛称赏此诗的立意、章法和语言：“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冷庐杂识》引）。方东树也明确指出此诗叙述桃源本事，往往以议论出之的特点：“介甫纯以议论惊空，绝不实写”（《昭昧詹言》）。宋人何汶《竹庄诗话》则引《高斋诗话》云：“荆公此诗追配古人。”翁方纲亦云：“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固不必言矣。”（《石洲诗话》卷一）（李如鸾）

【泊船瓜洲】 宋诗篇名。七绝。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七〇。熙宁元年（1068）春，应召赴京途经京口，与僧友宝觉晤面后至瓜洲作。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是留别友人、即兴寄慨的小诗。首句中“京口”为宝觉所居之处，“瓜洲”乃诗人泊船之地。此句是致意宝觉，以示两人情谊，含有留别意味。次句流露思乡之情。钟山即指江宁，诗人父母均葬那里。第三句说江南已春，宦游又复开始，蕴含感激皇恩之意。末句表现仕途多艰、前程难卜的思绪。此诗不仅精练含蓄，感情深挚，其炼字亦屡屡为人称道。据洪迈《容斋续笔》载：“吴中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李白有“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侍从宜春花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黄鹂百啭歌》），丘为有“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题农父庐舍》），白居易有“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题岳阳楼》）等诗句，王安石此处的推敲或受前辈的启发。但作者毕竟是炼字高手，他把看不见的春风变成伸手可掬的视觉形象，使江南春色呈现鲜明画面，因此“春风”句成了千古传诵的诗句。（李如鸾）

【明妃曲】 宋诗篇名。七古。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四〇。共有二首，其中以“明妃初出汉宫时”一首更为著名。作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同时均有和诗。本篇先侧面烘托昭君的绝艳，再转写昭君出塞后的凄苦境遇，最后从家人角度进行无可奈何的抚慰。方东树云：“此等诗各人有寄托，借题立论而已。”（《昭昧詹言》）此诗所写昭君的悲惋暗寓诗人对君王不能识贤的哀怨，寄托自身无缘报效君王和国家的憾恨。诗中警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赵翼评为“此但谓其色之美，非画工所能形容，意亦自新”（《瓠北诗话》卷一一）。其实此二句为毛延寿翻了旧案，而暗自归咎不辨妍媸的帝王，从而一扫前人“留

恋君恩”的陈腐题旨。“君不见”二句写出君王无情与残酷，并打破胡汉畛域之分，否定大汉族的传统偏见，最具手眼！对这首命意独特的咏史诗，后来的评论家有誉有毁。宋曾季狸云：“荆公咏史诗，最于义理精深。”“他人所不能及”（《艇斋诗话》）。宋何汶《竹庄诗话》转引《渔隐丛话》云：“介甫《明妃曲》二首，辞格超逸，诚不下永叔。”而北宋王回，南宋范冲、罗大经，以及清人周容均有非议，包括笺注王安石诗集的宋人李壁也略有微词。（李如鸾）

【书湖阴先生壁】 宋诗篇名。七绝。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六八。作于元丰六年（1083）退居金陵时。湖阴，即诗人邻里杨德逢隐士。诗云：“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描写了山村人家的初夏景色。首二句写湖阴院内，以表友人的淡泊胸怀与高雅情致。后二句写湖阴院外，将自然山水描绘得如此富有情意，似乎它们颇为赞赏主人寄情山水之意趣与躬耕垅亩之懿行。造语雅丽清新，精严工妥，用寻常景物创出秀美意境，表现出诗人卓越的文学才能。相传作者很得意此二句，曾书之于壁（《苕溪渔隐丛话》卷三三引）。旧说此联用《汉书》“护田”、“排闥”二典（《苕溪渔隐丛话》卷三三）。宋人吴开则云：此联“盖本五代沈彬诗：‘地隈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优古堂诗话》）其实，这可能是作者随手撷拾与景相合的《汉书》现成词语，当然用得极巧妙自然，故金人王若虚云：“虽用‘排闥’字，读之不觉其诡异。”（《滹南诗话》卷三）（李如鸾）

【北陂杏花】 宋诗篇名。七绝。王安石作。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二。诗云：“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前二句写岸上杏花与陂塘花影交相辉映，各领春日风骚，难分轩輊。宋许颢称“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诗人喜此神韵空灵之境界，当与其退居后的心境有关。后二句写杏花生于池边，即使随风飞扬亦自高洁，总要远胜于被碾作尘土的南陌杏花之身同污垢。陈衍称“末二句恰是自己身分”（《宋诗精华录》），可谓切中肯綮。他引此诗并他诗后又云：“以上荆公佳句，皆山林气重而时觉黯然销魂者。所以虽作宰相，终为诗人也。”（《石遗室诗话》）见地不无道理。清吴之振则云：“安石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初集·临川诗钞序》），此诗之艺术风格，即是一例。（李如鸾）

【元日】 宋诗篇名。七绝。王安石作。见《王荆公诗集笺注》卷四一。约为神宗初年（1070）初拜宰相时作。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前两句写在爆竹繁响中辞去旧岁,人们饮了认为可驱邪祛瘟的屠苏酒,暖洋洋地感到春日来临。后两句表明家家户户都沐浴于朝阳中,春节时总要以新桃符取代旧桃符。这是以除旧迎新喻指新法之推行,并表达对变法胜利与人民生活改善充满喜悦之情。它还深含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要代替腐朽没落事物这一客观规律。此诗善于选取典型细节,生活气息强烈,民俗色彩浓郁,情调欢快健康,意境完整,底蕴丰富而深刻。(李如鸾)

【梅花】①宋诗篇名。五绝。王安石作。见《王文公文集》卷七七。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称:“《古乐府》:‘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荆公略转换耳,或偶同也。”又,南朝苏子卿《梅花落》诗前半云:“中庭一树梅,寒多叶未开。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王安石最善点化前人诗句,出以新意。诗人欣赏这梅花的幽微身分与倔强风骨。它具有寒士气节与志士情怀,其中自然不乏诗人的影子。潘德舆称此诗“遥知”二句“亲切有雅气”(《养一斋诗话》卷五)。朱庭珍云:“夫作梅花诗,宜以清远冲淡,传其高格逸韵。”(《筱园诗话》卷四)此诗正是如此。②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五〇。共有六首,其中以第二首较为著名。嘉泰二年(1202)作于山阴。诗云:“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花”一作“前”。诗人得知梅花绽放于晨风之中,欣然往观,但见漫山皆白,纷繁似雪,于是忽发身化千亿以痴心赏梅的奇想。这奇想当受柳宗元“若为化得身千亿”(《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句之启发。潘德舆云:“放翁作梅诗,多用全力。”(《养一斋诗话》)陆游咏梅极重格韵,其笔下梅花形象崇高完美,可见出诗人雅趣与忠贞,不妨说梅花即陆游化身。只是“柳州之化身何其苦,此老之化身何其乐”(陈衍《宋诗精华录》)。(李如鸾)

【暑旱苦热】宋诗篇名。七古。王令作。见《广陵先生文集》卷七。这是一篇在宋诗中气魄最为雄浑,而又独具艺术特色的佳作。开篇四句采用夸张笔法,极写“热”与“旱”,想象已够奇特;结末四句更是浮想联翩:虽然昆仑山高,积雪皑皑,蓬莱岛远,清凉长存,但是无法携天下人共享,又怎忍心独得佳处!此诗表现出诗人博大无私的胸怀与恢宏豪壮的气概。家境清贫的王令能以天下为己任,诚然可贵。全诗充满浪漫激情,这激情又化作新奇的构思和壮阔的想象。散文化的句式更便于作者诗思自由驰骋,

险狠的造语也颇能见出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风之遗响。刘克庄称其作品“骨气老苍,识度高远”(《后村诗话·前集》),此诗即可印证。(李如鸾)

【和子由澠池怀旧】宋诗篇名。七律。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三。作于嘉祐六年(1061)。澠池,今河南澠池县。苏轼弟子由(苏辙)《怀澠池》诗自注:“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此为步原韵之和诗。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末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澠池。”二陵,即河南崤山,在澠池西。此诗首联设问作答,以“飞鸿踏雪泥”喻指人生所到之处。颌联再予以引申:人生长途如同飞鸿千里行程;人迹如同鸿爪于雪泥中留下痕迹,雪融爪迹无法长存,而鸿雁又东西而飞,不再措意。比喻贴切新奇,颇具理趣哲思。如今“雪泥鸿爪”已化为成语。后四句由设喻转入实写。老僧已死,人迹何存?旧壁已坏,题诗安在?皆一时雪爪而已!正因有此怅惘才要怀旧。而那些已不见的老僧、旧题以及当初澠池崎岖困顿的情景正是怀旧之内容。此诗情调虽不免低沉,但仍表现出诗人对人生、对生活的丰富感情。纪昀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纪批《苏文忠公诗》)(李如鸾)

【王维吴道子画】宋诗篇名。七古。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三。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一带)签书判官时作。此系评赞盛唐王维、吴道子精湛画技与绘画成就之篇什。首四句是总说:交代吴画与王画所在的塔、寺,肯定他们在宋前的画坛地位。以下转入分述:“道子”十句专评吴画。“雄放”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概括。其中“浩如海波翻”三句是对吴画雄放气势的补说,体现诗人意在笔先、成竹在胸的绘画理论。“亭亭”六句是对吴画内容的生动描述。“摩诘”十句专评王画。“诗老”一词暗示王维之诗人气质与他“画中有诗”。“佩芷袭芳荪”是对其人品与诗品的赞美。“吾观”二句是就王画艺术风格而言,其中“清且敦”三字兼评其诗风与画风。“祇园”六句状摹所画内容,其中“交柯乱叶动无数”,活画出王维笔下清风中秀竹的神姿。结尾六句再给予两位画师以总评价。全诗气势贯畅,笔力雄健,物象鲜明,脉理甚细,是苏轼早期的得意之作。方东树称誉此诗“神品妙品,笔势奇纵。神变气变,浑脱溜亮。一气奔赴中,又顿挫沉郁”(《昭昧詹言》卷一二)。翁方纲评为“《王维吴道子画》一篇,亦是描写实际,且又是两人笔墨,而浩瀚淋漓,生气迥出。……实苏公独立于千古之作”(《石洲诗话》卷三)。纪昀认为此

诗“奇气纵横，而句句浑成深稳”(纪批《苏文忠公诗》)。(李如鸾)

【游金山寺】 宋诗篇名。七古。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七。熙宁四年(1071)，从汴京赴任杭州通判途经镇江游金山寺作。前八句着重写金山寺形胜，中间十句写深夜江心奇景，结尾四句向江神立誓，收住思乡之情和宦游之慨。黄彻云：“盖与江神指水为盟耳。……指水则誓在其中，不必诅神血口，然后谓之盟也。”(《碧溪诗话》卷八)葛立方云：“苏东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归蜀，怀归之心屡见于篇咏。”(《韵语阳秋》卷一三)。方东树评此诗“奇妙”(《昭昧詹言》卷一二)。纪昀则称此诗“首尾谨严，笔笔矫健，节短而波澜甚阔”(纪批《苏文忠公诗》)。近人陈衍谓：“通篇遂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宋诗精华录》)这篇长诗景象瑰丽，虚实相生，笔意肆恣，别具远韵，堪称诗人七古中的代表作品。(李如鸾)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宋组诗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七。共五首，其一更为著名。作于熙宁五年(1072)杭州通判任上。望湖楼，位于西湖昭庆寺前，又名看经楼、先德楼。五代吴越王钱俶建。诗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此诗描写夏雨骤至乍晴的生动情景。首二句写云写雨，“白雨跳珠”，雨点像珍珠乱跳，用语新奇。后二句写风写水：忽然大风掠地，云收雨歇，楼前水色，仍如湛湛蓝天。所谓“醉书”者，乃诗人不仅为美酒所醉，亦为此西湖奇景所醉。清人王文诰称此诗“随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苏轼诗集》卷七)，当指构思设色皆一新耳目。(李如鸾)

【望海楼晚景】 宋组诗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八。熙宁五年(1072)八月监考贡举时作。共五首，其二更为著名。他在《答范梦得书》云：“某旬日来，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馀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有诗数首寄去。”当指此组诗。望海楼，西湖南凤凰山之中和堂东楼，又称望潮楼，为杭州名迹，于此可观钱塘江潮。诗云：“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此诗先写眼前“壮观”之景：风雨交加，风势之猛；再写见景所顿生之感：待要写诗咏赞，不料于酝酿之际，忽然雨过云收。遂转写风停雨歇后望海楼之晚景：江潮涨满，海阔天青。王文诰评此句云：“七字极有斟酌，确是逐日闲坐楼上看潮人语。”(《苏轼诗集》卷八)结尾用白居易“蛇腾电掣光”诗意，却较白诗更为生动和富有色彩，可谓长于比喻，善于点化，正是“壮观应须好句夸”！(李如鸾)

【吴中田妇叹】 宋诗篇名。七古。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八。熙宁五年(1072)作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题下自注：“和贾收韵。”贾收，字耘老，苏轼诗友。此诗是反映现实、揭露王安石新法流弊的。王安石新法也确实有失当处：如朝廷赋税纳钱不收米，致使谷贱伤农；招抚西北羌人，人民负担加重之类。诗的前八句写霜风秋早、大雨滂沱造成梗稻晚熟与田妇收割勤苦艰难。“‘杷头’句言无用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指农具因潮湿不用而生锈。“眼枯”句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诗意。后八句写钱荒谷贱、民不堪命。其中末二句是点睛之笔，用西汉渤海太守龚遂与颍川太守黄霸两位循良之吏的典故，反讥推行新法的官吏貌似恤民，实则殃民，从而突出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之题旨。今人钱钟书云：“在这里‘龚黄’是说反话；‘作河伯妇’是借用。”(《宋诗选注》)亦即“收言不如沉水死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诗运用写实手法，假借田妇口吻，写江浙农民的天灾人祸，题材典型，形象鲜明，叙议结合，饱含感情，语言体现了宋诗散文化与议论化之趋向。(李如鸾)

【新城道中】 宋诗篇名。七律。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九。共二首，第一首尤为著名。作于熙宁六年(1073)。诗云：“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首联点明出行于连绵春雨之后，写得东风有情。中间二联状写沿途景色：先以絮帽喻晴云，将铜钲比初日，新颖而生动；再用拟人手法，把山桃与溪柳描绘得有声有色。尾联写“行及半道，时已饷耕也”(王文诰《苏轼诗集》卷九)。全诗具有朴素美，景物均渗透诗人热爱自然、赞美劳动生活之情。汪师韩称“野桃”一联“铸语神来”，“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苏诗选评笺释》)。纪昀评“岭上”一联“拙俗不雅”(纪批《瀛奎律髓》)，其实以俗为雅乃苏诗之特色。(李如鸾)

【饮湖上初晴后雨】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九。共二首，其二更为著名。作于熙宁六年(1073)任杭州通判时。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为歌咏西湖名篇。前二句用工妥对语写西湖晴雨皆宜，已将西湖美景描绘无馀。后二句进一步烘托，以西施比西湖。西施无论浓施粉黛或淡雅妆束，均不愧为国色天香；正如西湖，无论晴好之日或阴雨天气，都有动人风韵。陈善《扞虱新话》云：“识者谓此二句已道尽西湖好处。”陈衍认为末二句

“遂成为西湖定评”(《宋诗精华录》)。查慎行则认为:“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初白庵诗评》卷中)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苏轼诗集》卷九)此诗描写西湖不具体摄取一时一地之景,全从宏观把握,先实后虚,颇有特色。

(李如鸾)

【百步洪】 宋诗篇名。七古。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一七。共二首,第一首更为著名。元丰元年(1078)知徐州时作。百步洪,在徐州东南二里,又名徐州洪,水中乱石峭立,悬流湍急,极为壮观。诗篇前十二句,先写行舟之惊险,再赋百步洪。所用博喻形象鲜明,令人目不暇接。赵翼称东坡“笔力所到,自成创格。如《百步洪》诗:‘有如兔走鹰隼落,……飞电过隙珠翻荷。’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瓠北诗话》)纪昀对此也称“语皆奇逸,亦有滩起涡漩之势”(纪批《苏文忠公诗》)。施补华说得更为切实:“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重加形容。”(《岷傭说诗》)后十二句转谈人生哲理。所论佛道之理,不免消极,但表示栖心物外,不为客观支配的旷达之怀,也自有积极因素在。此段因“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语,见《说诗晬语》),颇觉飘逸超脱,行气如虹。正如方东树所评:此诗“熟读之,可得奇纵之妙”;又云:“余喜说理,谈至道,然必于此等闲题出之,乃见人妙。若正题实说,乃为学究伧气俗子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语信然。

(李如鸾)

【东坡】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二二。元丰六年(1083)任黄州团练副使时作。东坡,位于黄州城东郊。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作者即垦辟躬耕于此,并以之为号。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首句写东坡经一场大雨,碧海青天,清辉朗照,显得格外清爽空旷;次句云,奔波于嚣尘之人各自还家,喧闹息气一扫而空,此幽僻胜境应由超然物外之诗人独自领略。末二句写诗人于大石丛错之山坡上行进,非但不知烦恼,反而喜听手杖碰撞山石之声。此乃热爱生活之诗人于坎坷仕途中饱经政治风雨后,仍奋然前行之写照。诗将诗人气质、襟抱与风物融而为一,写得潇洒飘逸,情趣盎然。陈衍评为:“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此类是也。”(《宋诗精华录》)王文诰亦云:“此类句出自天然,人不可学。”(《苏轼诗集》卷二二)(李如鸾)

【海棠】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

集》卷二二。此诗当为元丰七年(1084)离黄州团练副使任前所作。诗云:“东风袅袅泛春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该诗即写定惠院东之海棠在月夜下的情态与诗人观赏时的心情。后二句暗用一典,《太真外传》云:“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八转引)后来便有“海棠春睡”的说法。本诗正借此意以喻海棠。所不同者,玄宗以人喻花,苏轼以花喻人。只是用典不露痕迹,可见诗人技巧之高妙。纪昀评此诗“风姿高秀,兴象微深”(纪批《苏文忠公诗》)。

(李如鸾)

【题西林壁】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二三。作于元丰七年(1084)。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两句写游庐山所见之景象。诗人从特定角度表现庐山峰峦变化、各具姿态的鲜明形象。后两句抒写感受,暗寓深刻哲理:置身山中,难睹全貌,因观察点不同,只能看到不同局部;要突破局限,高于客体,远视旁观,方能全面认识整体。王文诰云:“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中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苏轼诗集》卷二三)陈衍谓“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宋诗精华录》),即肯定其生命力在于“出新意”与“寄妙理”。正因此诗寓哲理于形象中,才耐人吟咏,为人传诵。而纪昀独持异议,谓此诗“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以为高唱则未然”(纪批《苏文忠公诗集》)。

(李如鸾)

【赠刘景文】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三二。元祐五年(1090)作于杭州任上。刘景文,名季孙,为名将刘平之子,时任两浙兵马都监,苏轼曾誉之为“慷慨奇士”。这是一首描写初冬景色的诗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红橘绿时。”本来初冬景色不免萧索,但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富有生机,惹人喜爱,从中可见诗人胸怀的豁达。诗立意新颖,词语警拔,是苏轼的精心之作,亦为描绘初冬景色的名诗。宋人胡仔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此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〇)近人高步瀛不同意此说,云:“或以为此诗与韩退之《早春呈水部张员外》诗相似,徒以‘最是一年春好处’句偶近耳。其意境各有胜处,殊不相同也。”(《唐宋诗举要》)汪师韩评此诗云:“浅语

遥情。”(《苏诗选评笺释》卷五) (吴小林)

【惠崇春江晚景】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二六。共二首,第一首更为著名。一题《惠崇春江晓景》或《书衮仪所藏惠崇画》。元丰八年(1085)苏轼于汴京见到《春江晚景》图时作。惠崇乃宋初画僧,《图画见闻志》:“建阳僧惠崇,尤工小景,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前三句实写,艺术再现画面景物:江边丛竹,竹外桃花,满地蒌蒿,初生芦芽,均属背景,居陪衬地位;江中春鸭戏水,占明显位置。这些景物和谐地构成画面,充满生机。“春江”句含有理趣,为世传诵。末句虚写,收“宕出远神”之效。纪昀称“此是名篇,兴象实为深妙”(纪批《苏文忠公诗》)。近人王文濡亦云:“绝妙风景,老饕见之,馋涎欲滴”(《历代诗评注读本》)。然清毛奇龄评此诗云:“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西河诗话》)清王文诰则驳之曰:“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诗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王说是。(李如鸾)

【荔枝叹】 宋诗篇名。七古。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三九。绍圣二年(1095)作于惠州(今广东惠阳)贬所。此诗由感叹汉唐进贡荔枝弊政进而揭露当世贡茶贡花时弊,讽谕帝王的骄奢淫逸和官僚谄媚君主的可耻行径,表现出诗人关心民瘼的可贵精神,历来被誉为“史诗”。全诗分两部分。前十二句是咏古,其中“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二句,写唐明皇为博得杨贵妃欢心而命进贡荔枝,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词语精警,寄慨遥深,是传诵的名句。后十二句是叹今,“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一段,被人称为“一篇之奇横在此”(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六)。全诗以“叹”字为意脉,道古论今,内容丰富,题旨显豁,笔势腾挪自如,章法摇曳多变,风格沉郁顿挫,颇得杜诗神髓。清人方东树评此诗曰:“小物而原委详备,所谓借题。章法变化,笔势腾掷,波澜壮阔,真太史公之文。”(《昭昧詹言》卷一二)纪昀云:“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九)

(吴小林)

【春日】 ①宋诗篇名。七绝。秦观作。见《淮海集》卷一〇。共五首,第一首更为著名。诗云:“一夕轻雷落万丝,霏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前二句写夜雨及雨后朝阳映照琉璃瓦泛出层层绿光,以衬托庭院之华丽。后二句用对偶形式、拟人手法,描写芍药与蔷薇情态,隐隐托出

惜花之情。此诗形象婉丽,情致蕴藉,体物精微,具有美感。敖陶孙谓其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诗人玉屑》引《臞翁诗评》)。元好问亦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以韩愈诗风对比,讥评秦观诗柔婉纤弱。瞿佑《归田诗话》、袁枚《随园诗话》及于源《灯窗琐话》引朱梦之语,均反对敖、元之说。又陈衍《宋诗精华录》云:“遗山讥‘有情’二语为女郎诗。诗者,劳人思妇公共之言,岂能有雅颂而无国风,绝不许女郎作诗耶?”其说甚是。何况同为写春景,秦观的《春词绝句五首》之五、《春日杂兴十首》之四、颇多壮阔雄迈之句。②宋诗篇名。七绝。朱熹作。见《朱文公文集》卷二。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面看,此诗写春游,表明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给人焕然一新之感。其实是通过鲜明形象、生动情景以说理的诗。“泗水”原为孔子传授儒学之地,南宋时已沦入金人之手,而诗人又不曾北上。此诗是鼓励人们探求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博大精深,如都能悟得真谛,得其精髓——“识得东风面”,便会万紫千红,触处皆“春”了。明乎此,方知诗人构思运笔之妙。

(李如鸾)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 宋诗篇名。五古。黄庭坚作。见《山谷内集诗注》。作于元祐二年(1087)任神宗实录检讨官、集贤校理时。前四句用比拟手法,说自己之诗如吴季札不屑评议的曹、郢二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而苏诗则如宏阔之楚地。次八句赞美苏诗至高境界与辉煌成就。后八句转写二人之关系,结尾以小儿与苏轼孙女日后成婚作收,除见二人情谊,还表明诗才无法相侔,语言诙谐机趣。此诗想象丰富,设譬奇警,文气拗折,迭押险韵,又善融化典实,自出新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载:“《学斋占毕》云:‘鲁直次东坡韵曰:“我诗如曹郢,……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谓至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入律也。……’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予以为不然。”方东树评“黄诗秘密,在隶事下字之妙,拈来不测;然亦在贪使事使字,每令气脉缓隔。……此一利一病,皆可悟见”(《昭昧詹言》卷一〇)。评价极为中肯。

(李如鸾)

【登快阁】 宋诗篇名。七律。黄庭坚作。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一。作于元丰五年(1082)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时。快阁于赣江上游,以江山广远,景物清华得名。诗云:“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

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首联中“痴儿”出自《晋书·傅咸传》杨济语：“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写此诗前，作者每以“狂痴”自命。此谓办完公事愉快地登览快阁，构思新奇。颌联写望中之景，勾绘出一幅高远明净的赣江晚秋图。颈联转入情语：上句用《吕氏春秋》伯牙毁琴事，表明已无知己；下句用《晋书·阮籍传》典，阮籍能以青白眼表达爱憎，此谓对美酒，聊以解忧。尾联表示厌倦官场，企盼归乡与鸥鸟为伴，典出《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以示怀才不遇。此诗一气盘旋而又善于顿挫。姚鼐评为“能移太白歌行于律诗”（《昭昧詹言》引）。方东树评云：“起四句，且叙且写，一往浩然。五六句对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谓寓单行之气于排偶之中者。”（《昭昧詹言》卷二〇）。韦居安亦云：自黄庭坚品题快阁，“前后和者无虑数百篇，罕有杰出者”（《梅涧诗话》卷上）。

（李如鸾）

【寄黄几复】 宋诗篇名。七律。黄庭坚作。见《山谷诗集注》卷二。原注“乙丑年德平镇作”，知系元丰八年（1085）监德州德平（属今山东德州市）时作。黄几复，名介，作者少年与游，时知四会（今广东四会县）令。诗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首联先用《左传·僖公四年》楚子传齐桓公语：“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稍加点化以表相隔遥远，音信难通。再用《汉书·苏武传》寄雁传书事。“谢不能”为《汉书·项籍传》中语，因传说鸿雁不越衡阳，黄氏在岭南，故云。颌联追忆昔年欢聚京师（熙宁九年，二人同科出身），感慨别后索居生活，意象新，境界新，当时即被评为“奇语”（《王直方诗话》引张耒语）。颈联活化二典：上句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家徒四壁立。”下句用《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此写黄几复清正廉洁，有治世之才。尾联全系悬想，不平之鸣表示怜才之意和慰藉之想。方东树评此诗云：“亦是一起浩然，一气涌出。五六一顿。结笔与前一样笔法。山谷兀傲纵横，一气涌现。”（《昭昧詹言》卷二〇）全诗几乎“无一字无来处”，使事用语力求避熟就生，脱弃凡近，并有意用拗律，使句法瘦硬奇峭，以显示苍劲古朴之风，即所谓“奇思，奇句，奇气”（《昭昧詹言》卷一二），这些都体现黄庭坚七律的艺术特色。

（李如鸾）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宋诗篇名。七绝。黄庭坚作。见《山谷诗集注》卷一六。作者“有手书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诗，跋云：“崇宁之元正月二十三日，夜发荆州，二十六日至巴陵。数日阴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独上岳阳楼。太守杨器之、监郡黄彦并来率同游君山。”（《山谷先生年谱》卷二十九）其一为：“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其二为：“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第一首前两句指：哲宗绍圣二年（1095），因被章惇、蔡卞等人诬奏编修《神宗实录》失实，黄庭坚遂被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安置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元符元年（1098）再迁戎州（今四川宜宾）；近六年中，诗人流放于巴山蜀水间，至元符三年（1100）始得放还。此处用语概括凝炼，饱含慨叹。末两句写尚未返回故乡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就先登岳阳楼，面对雨中君山不免一笑。这一笑有欣幸，也有辛酸。后一首写雨中君山美景。诗人以湘夫人绾结的十二螺髻喻指烟雨迷濛之君山，颇有神秘色彩。后二句化用刘禹锡《望洞庭湖》“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诗意，指未能到湖上欣赏山姿水态。诗人将“银山”喻白浪，与“青山”对举，比譬新奇，善于设色。赵翼评黄庭坚“不肯作一寻常语”（《瓠北诗话》卷一一）。方东树评为“山谷立意求与人远”（《昭昧詹言》卷一〇）。阙名《静居绪言》则云：“山谷诗思致巧妙，气骨自奇。”统观二诗，寄怀高旷，笔力雄健，用语清新，颇能表现诗人的胸襟和风格。

（李如鸾）

【春怀示邻里】 宋诗篇名。七律。陈师道作。见《后山诗注》卷一〇。作于元符三年（1100）春贫居徐州时。诗云：“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逐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前四句写寓所简陋，诗人清贫，并表明生性疏懒，倦于赏游，隐然见出诗人不同凡俗的情趣和志节。颈联以小虫繁闹景象点染春意。纪昀评：“起二句言居处之荒凉，五六句言节候之喧妍，故两联写景，而不为复。”（《瀛奎律髓》纪昀评点）尾联写诗人也不禁为春色所动，表示欲往南邻赏花。此诗用蜗牛、蜘蛛等活动衬托烂漫春光，取材新，构思巧，炼字锻句，苦心经营，但仍有雕琢之嫌。然而全诗能紧扣“春”字抒怀，注意常为人们遗忘的春天角落，笔触细腻，独出心裁，仍不失为佳作。方回称此诗“淡中藏美丽，虚处着工夫”（《瀛奎律髓》），是有见地之论。清末翁同龢《瓶庐诗稿》之《补辑》亦收此诗，误。

（李如鸾）

【除夜对酒赠少章】 宋诗篇名。五律。陈师道作。见《后山先生集》。元祐元年（1086）除夕作于汴

京(今河南开封)。少章,秦观弟秦觏,时在汴梁,亦颇潦倒。诗云:“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首联写一年已尽,自己仍无依托,赖有少章相守送岁。颔联说半生忧患,犹如梦境。颈联写愁苦之深重。宋人吴开认为此联本自程文简《饮酒戴花》诗,其句为:“衰颜红易借,短发白难遮。”(《优古堂诗话》)但毕竟经过刻意锤炼。王直方云:“无己初出此一联,大为诸公所称赏。”(《王直方诗话》)胡仔更以为“以一联名世者”(《苕溪渔隐丛话》)。尾联振起。纪昀评为“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瀛奎律髓刊误》卷一六),其实情调仍不免有些苦涩。陈氏属江西诗派,追求“无字无来处”,语言有时失之艰涩生硬,但此诗运思新巧,感情深挚,质朴自然,赢得后人传诵。(李如鸾)

【怀金陵】宋组诗名。七绝。张耒作。见《宋诗精华录》卷二。共三首,其三更为著名。诗云:“曾作金陵烂漫游,北归尘土变衣裘。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首句化用韦庄《庭前桃》“曾向桃源烂漫游”诗句,表明对游历金陵的美好回忆。沈德潜云:“诗人每用‘烂漫’字,玩诗意乃淋漓酣足之状。”(《说诗晬语》卷下)次句活用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为顾彦先赠妇》)、岑参“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之类诗意,以北国风尘反衬江南佳丽之地,更见出对金陵的怀想。结尾二句选取昔游金陵最为惬意的一幕,深化对雨赋风软的金陵春日的怀念之情。“江南第一州”,指金陵。张耒诗风以平易流美著称。晁补之称“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百花开”(《题文潜诗册后》);胡应麟称其诗“闲淡平整,时近唐人”(《诗薮》);《吕氏童蒙训》亦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所及。”此诗就写得晓畅真淳,清新圆润,并兼有“自然奇逸”的艺术风格。(李如鸾)

【早发】宋诗篇名。七绝。宗泽作。见《宗忠简集》。诗云:“伞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全诗生动再现抗金将领统率大军行进的浩荡声势与场面。首句为总写,“伞幄垂垂”形容军容肃穆。次句写行军所见,诗人将艰苦漫长的征途写得美丽而富有韵味,见出作者乐观情怀与热爱河山之情。三句转写所想,表现作者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与运筹决胜的坚定信念。末句回应开篇,表明此为纪律严明、军容整肃的正义之师,作者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于此见出。诗写得安详从容,朴素平实,不作豪语,不务雕饰,颇能代表宗泽诗作的风格。(李如鸾)

【病牛】宋诗篇名。七绝。李纲作。见《梁溪全

集》卷二〇。绍兴二年(1132)罢相贬鄂州(今湖北武昌)时作。诗云:“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首句以病牛昔日辛劳操作所获,比喻自己罢相前革新内政、规取中原所建立的业绩。次句借病牛悲惨处境,抒写为社稷苍生鞠躬尽瘁反被君王所弃的叹惋不平。末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虽屡经打击,但报效国家、拯救众生的信念决不动摇。这种勇于献身、不计私怨的精神极为可贵。此诗咏物,运用比兴与拟人手法,形象完整生动,诗意显豁高远,语言质朴平易,真率感人。正如魏庆之所云:“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诗人玉屑》)(李如鸾)

【夏日绝句】宋诗篇名。五绝。一题《绝句》,又题《乌江》。李清照作。见《李清照集校注》卷二。作于南渡后。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此诗借古讽今,以项羽战败宁愿自刎而“不肯过江东”的豪壮气概,讥讽南宋君臣怯懦苟安的可耻行径与其所奉行的屈辱投降政策,见出作者之民族气节与爱国思想。此诗善于从熟典中发掘新意,寄慨遥深,笔力遒劲,格调昂扬,脱尽其前期词章的闺阁气,也迥然有别于其后期悱恻忧伤的词风,而具阳刚之美。陈衍评该诗云:“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也。”(《宋诗精华录》)

(李如鸾)

【襄邑道中】宋诗篇名。七绝。陈与义作。见《陈与义集》卷四。政和七年(1117)(一说政和八年)暮春。自汴京赴东京(今河南开封),途经襄邑(今河南睢县)时作。诗云:“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诗人此行是任开德府教授期满,入京待选,因此志得意满,心情舒畅。前二句写汴河两岸风光,时届晚春,船行甚速,大有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味。后二句写诗人观感,以恬静的大自然衬托内心之安适与惬意。诗全用白描,色彩鲜艳。词句明净,音调响亮,颇有“韵外致”,“象外象”,可谓“光采明丽”、“流荡自然”(刘辰翁《陈简斋集序》);贺裳亦云:“陈简斋诗以趣胜”,“俊气自不可掩”(《载酒园诗话》)。

(李如鸾)

【伤春】宋诗篇名。七律。陈与义作。见《陈与义集》卷二六。建炎四年(1130)于邵阳(今湖南邵阳)作。诗云:“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此诗感时伤事。前四句揭露南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及其奉行的投降路线,致使帝王宫阙为战火笼罩,君主也被迫逃到偏远的海上,出言沉痛,语含

讥讽。颈联点化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与杜甫《伤春》“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诗意，写自身因忧虑国事，头上已布满繁霜，虽远在湘西，犹深虑朝廷危难，可谓妙语天成。尾联咏眼前事，指出稍感欣慰的是长沙向子諲勇率疲惫之师迎击意锐气盛的金兵。此诗比照鲜明强烈，格调感愤沉郁，联语构思新巧，音韵流转谐亮。纪昀评云：“此诗真有杜意。”（《纪评瀛奎律髓》）（李如鸾）

【汴京纪事二十首】 宋组诗名。七绝。刘子翥作。见《屏山集》卷一八。作于靖康之变后。组诗描述汴京为金人所陷这一历史事件中之若干场景，以抒山河破碎的哀痛。其六、其七两首尤为著名。其六云：“内苑珍林蔚绛霄，围城不复禁乌尧。舳舻岁岁衔清汴，才足都人几炬烧。”此诗叙写汴京陷落前后，徽宗赵佶御园被毁的惨状。全诗举重若轻，辛辣讽刺昏君赵佶的穷奢极侈。其七云：“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前二句谓空叹权奸误国，招致北宋覆亡，如今其骸骨已成粪土，却仍遭人民唾骂。“夜月”句写官封太傅楚国公的王黼住宅，“春风”句写官封太师鲁国公的蔡京府第。如今这些遗迹恰好为其殃民祸国之见证。小诗用意深曲，讽刺巧妙有力，先以叙议结合的笔墨开篇，再以对句的景语锁住，笔法多变，是诗人脍炙人口之作。翁方纲称：“刘屏山《汴京纪事》诸作，精妙非常，……皆有关一代事迹，非仅嘲评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绝，自以此种为精诣。”（《石洲诗话》卷四）（李如鸾）

【池州翠微亭】 宋诗篇名。七绝。岳飞作。见《岳忠武王集》。一题《过滁山作》。池州，今安徽贵池。诗云：“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首句即诗人军旅生活之写照，用自身经历交待登临背景。次句扣题，表明今番是特地登览。第三句直抒胸臆，将捍卫南宋江山与热爱祖国联系起来，则收复失地之热望也自在其中。末句以踏上归途作结，见出诗人对美好山河流连忘返的心境。全诗不写登临所见，只写总的感受；为不致流于抽象，最后以景衬情，突出题旨，加强诗味。此诗情真意切，出自肺腑，语言质朴，读来感人。清人周容云：“岳忠武诗词极佳，盖缘性情过人故也。”并称誉此诗之“诗旨含蓄无限”（《春酒堂诗话》）。（李如鸾）

【碧瓦】 宋诗篇名。七绝。范成大作。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三。诗云：“碧瓦楼前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此诗系描绘王侯府第苑囿之暮春景色。富丽堂皇的楼阁，绣幕低垂；一泓碧绿的溪水，穿桥而过。虽无风。

柳絮依然漫天飞舞；虽无雨，棠梨照样花瓣铺地。从诗题中似可悟其深层底蕴：绣幕后之主人当为南宋达官显要，他们为暖风熏醉，歌舞竟日，毫无忧患意识。而这飞絮飘零、百花纷谢，岂不形象地预示着南宋小朝廷的“繁华春去”！此诗风格蕴藉，有弦外音，言外意，读者须从象外得之。正如薛雪所云：“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一瓢诗话》）（李如鸾）

【催租行】 宋诗篇名。七古。范成大作。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三。前半首从里正一方写起：农民缴租得到官府收据，本可暂得安宁，不料地保之类的公差又来催索。里正手持农家收据又喜又气，因他先要露出催租凶相。当得知人家付清租税，只好换副面孔说：“我只想喝个醉醺醺再回去。”后半首再从被催租的农民一方写起：床头扑满仅有拳头大，打破后里面正好三百钱，农民无奈地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买酒喝，就算是我孝敬您的草鞋费吧！”此诗全用白描，有情节、人物、人物表情与对话，场面颇具戏剧性。寥寥数语便写出公差的穷形恶相，善良农民陪着笑脸、迫不得已要罄其所有的痛苦心情。题材虽旧，写法甚新。钱钟书谓此诗“笔墨轻快，口角生动”（《宋诗选注》）。（李如鸾）

【横塘】 宋诗篇名。七绝。范成大作，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三。《城西道中》二十首之一。横塘，指诗人家乡吴县西南的古渡，它既为名胜古迹，亦是可人景观。诗人《晚泊横塘》《自横塘桥过黄山》等诗都写过它。此诗为：“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这并非具体写某次送别，而是歌咏这个作为人们送别的横塘渡口。前二句写春到江南，“春草碧色，春水绿波”（江淹《别赋》），横塘石桥与朱塔古来依然。后二句写年年春日都有人于此送客，送别时细雨濛濛，绿柳垂丝，画舫傍岸，情景也无甚变化。全诗将石桥、朱塔、垂杨、画船，错落有致地组成一幅饶有画意的江南古渡图，诚不愧为山水诗佳作。翁方纲称“石湖于桑麻洲渚，一一有情”，并云“石湖善作风景语”（《石洲诗话》卷四）。近人王文濡评为“情深似水，不减文通（江淹）《别赋》”（《宋元明诗评注读本》）。清人潘德舆将此诗列入“可与唐人匹”之列，并称“与唐人情声气息，不隔累黍”（《养一斋诗话》卷五）。（李如鸾）

【州桥】 宋诗篇名。七绝。范成大作。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乾道六年（1170）以“祈请国信使”身份出使金邦时作。州桥，指北宋故都横跨汴河之天汉桥。题下自注：“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天汉桥南北是出入皇宫之天街。此桥此街简直是故国的标志。

与象征。昔年诗人途经此地,心情异常沉重,其出使日记《揽髻录》云:“过棂星门,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金改为承天门,五门如画,……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胜。”就在此最能激起民族义愤与耻辱感的天街上,汴梁父老年年期待宋朝皇帝归来,可见他们的故国之思并未因岁月流逝而稍减。《揽髻录》又云:“遗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其感情真挚如此!结尾处诗人设计一个符合艺术真实的细节——汴梁父老询问南宋使者,感人至深。“忍泪失声”,表明金人统治严酷,遗民激动而不敢交谈。“真有”二字,底蕴丰富。清人潘德舆评此诗云:“沉痛不可多读。此则七绝至高之境,超大苏而配老杜者矣。”(《养一斋诗话》卷九)(李如鸾)

【四时田园杂兴】宋组诗名。七绝。范成大作。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二七。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诗前小序云:“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与“冬日”五组,各十二首。组诗结合作者观感,从多方面表现南宋江南农家的生活,诸如自然环境、节令气候、风情民俗、耕耘稼穡以及悲欢离合,均有真切生动的再现。如歌咏田园风光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描述农民辛勤劳动的:“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鞭挞繁重赋税的:“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继承了陶渊明、王维、储光羲的传统,却无闲适冲淡之风,而有浓厚的泥土气息,这便与历来以山水田园寄寓隐逸思想者迥然不同。组诗兼用赋、比、兴表现手法,意境活泼自然,风格明快,语言平实,给人以清新之感,是诗人代表作品。清王载南总评《四时田园杂兴》曰:“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柳亭诗话》)钱钟书指出:“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并评论说:“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宋诗选注》)(李如鸾)

【小池】宋诗篇名。七绝。杨万里作。见《诚斋集》卷七。诗云:“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前二句写小池周围景色:一表小池水源,一表池边花木。“惜”、“爱”二字下得灵动活脱。后二句写池中景物。全诗取景小巧,表现的则为天趣。诗人笔下的泉水、树阴、小荷、蜻蜓,都那样富有情致。它们和谐地构

成一种充满生机的境界。特别是表现一瞬即逝的动态,令人目悦神怡。钱钟书精辟指出:“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免起鹞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蹶风,此诚斋之所独也。”(《谈艺录》)翁方纲评说:“诚斋之诗,巧处即其俚处。”(《石洲诗话》卷四)此诗末二句即是一例。(李如鸾)

【闲居初夏午睡起】宋诗篇名。七绝。杨万里作。见《诚斋集》卷三。共二首,第一首更为著名。高宗绍兴间任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丞时作。诗云:“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前二句以梅子酸、芭蕉绿形象坐实题目中“初夏”字样,并顺势交代诗人居处环境。“软”、“分”二字传神。后二句化用白居易诗:“谁能更学儿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前日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又复戏答》)回应“闲居”“午睡起”题面,表明百无聊赖之际,忽被儿童扑捉柳花的有趣情景所吸引,无聊心绪也为之一扫。作者曾说,此诗功夫“只在一‘捉’字上”(周密《浩然斋雅谈》)。诗的笔触生动流转,艺术再现平凡生活。写梅子重在味,写芭蕉重在色,写柳花重在态,正如《江西诗社宗派图》作者吕本中所说的“活法”,杨万里自己也说:“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二首》)清李慈铭虽贬杨诗为“粗梗油滑,满纸村气”,也不得不承认此诗“清隽”,“不出江湖侧调,然已脍炙人口”(《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王端履则指摘此诗云:“‘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已是初夏风景,安得复有柳花可捉乎?”(《重论文斋笔录》卷九)可备一说。(李如鸾)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诗篇名。七绝。杨万里作。见《诚斋集》卷二三。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净慈寺为西湖南山区的著名佛寺。林子方是与诗人同年中进士又同时为官的好友。诗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写景即兴,表现诗人送客、面临西湖而生的感受。前二句劈头发出一声充满深情的赞叹,虚写西湖风光的独特。“四时”,当泛指除六月外的其他月份。后二句再以对句状摹,实写莲叶稠叠,满眼绿色,一望无际。并托出荷花在阳光照耀下特有的红艳。此诗不表青山,不状绿水,而是浓墨重彩地表现西湖盛夏的莲荷,兼有阴柔阳刚之美。不袭前人,不落窠臼,独具神姿奇彩。(李如鸾)

【初入淮河】宋组诗名。七绝。杨万里作。见《诚斋集》卷二七。淳熙十六年(1189)冬,金国遣裴满、余庆等为使来宋朝互贺新年,杨万里奉派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这组诗即他进入淮河后触景伤怀而作。共四首,第一首更为著名。诗云:“船离洪泽岸

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前二句写此番奉命迎接金使的路线,表明入淮后便心意不适。后二句点出缘由。原来北宋时,两国以桑乾河为界,那时使者“年年相送桑乾上”,而今国界竟移到淮河。诗人遥望中原,感慨系之!语似轻松,心情沉重。全诗叙述和婉,怨而不怒,题旨显豁,语言平浅。清潘定桂《读杨诚斋诗集九首》(其二)云:“试读渡淮诸健句,何曾一饭忘金堤!”(《楚庭耆旧遗诗》后集)高度评价诗人的爱国肝胆。

(李如鸾)

【游园不值】 宋诗篇名。七绝。叶绍翁作。见《靖逸小集》。一题《游小园不值》。诗云:“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此诗饶有情趣与理趣。明明因主人不在未能入园,却偏说可能主人爱惜园中苍苔而闭门拒客。随后写园内一角,取景虽小,但意味深远。“关不住”三字将盎然春意表现得很活跃。“春色”句后常被人引用。陆游有“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马上作》),张良臣有“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偶题》),吴融有“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和“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杏花》)等诗句,此诗末句取意或受前人启发。钱钟书指出,上述诗句都不及叶绍翁写得这样醒豁(见《宋诗选注》)。(李如鸾)

【游山西村】 宋诗篇名。七律。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一。乾道三年(1167)闲居山阴出游邻村作。诗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前三联生动地描述了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民情习俗。其中“山重”一联向为名句,可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尾联见出诗人对农村的挚爱、向往以及与农民亲密无间的情谊。此诗非同封建时代一般文人所写的山水诗、田园诗,它除表现自然美外,还写出农村之风俗美、农民之心灵美,以及诗人之情趣美。赵翼谓陆游“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并谓其律诗“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未见”(《瓠北诗话》)。评语正道出诗人作品中的某些创新之处。方东树评此诗云:“以游村情事作起,徐言境地之幽,风俗之美,愿为频来之约。”(《昭昧詹言》卷二〇)。(李如鸾)

【金错刀行】 宋诗篇名。七古。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四。乾道九年(1173)供职嘉州(今四川乐山)时作。一说乾道八年作于陕南。诗篇前四句歌咏佩刀之精美与华贵,以及其锋芒毕露、寒光逼人;

并由刀及人,写提刀者壮志难酬的愤慨,见出诗人的英武形象。中间四句写结交京华力主抗金的奇士共谋恢复,表现对祖国忠贞不二的品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自豪感。末四句抒写河山壮丽景色与抗敌必胜之信心。全诗咏物抒怀,气魄沉雄,笔力遒劲,形象生动,语言晓畅,四句一韵,韵随意转,充分体现出游七言歌行的艺术特色。赵翼称陆游“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瓠北诗话》)。这是专就其占体诗而言,评说可谓允当。

(李如鸾)

【剑门道中遇微雨】 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三。陆游曾于抗金前线的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中任职,后王炎被撤回,他无奈浪迹后方的蜀中,此诗即乾道八年(1172),诗人从汉中赴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任、途经剑门时作。诗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前两句泛写近期生活失意,表明诗人今番远行虽不情愿,却不得不为之。第三句自问:“莫非自身命定合该做驴背行吟的诗人么?”作者当然不甘心。他向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而事实却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因唐宋诗人多喜骑驴寻诗,故发此问。陈衍评此诗末二句云:“仆谓以‘细雨骑驴入剑门’博得诗人名号,亦太可怜。况尚未知其是否乎!结习累人如此。然此诗若自嘲,实自喜也。”(《石遗室诗话》)此说并不尽然。应视此诗为自嘲抒愤之作。陈衍还激赏此诗格律韵调,他说:“剑南七绝,宋人中最占上峰,此诗又其最上峰者,直摩唐贤之垒。”(同上)

(李如鸾)

【书愤】 宋诗篇名。七律。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一七。陆诗题《书愤》者不止一首,其中以“早岁那知世事艰”一篇最为著名。此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知严州府军州事时。一说诗人于同年春作于山阴,未是。诗云:“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首联回顾早岁立誓收复中原的壮志,并暗示投降派阻挠破坏,抗金大业难以完成。颔联追叙往岁时事,写得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是传诵名句。颈联抒写壮志难遂、年华老大与报国无门的悲愤,格调转为沉郁。尾联借史咏怀,寄寓无人主持北伐,徒使爱国英豪寂寥沦落之慨。尽管诗翁情思邈飞,运笔纵横,极尽沉郁顿挫之妙,因此诗以“愤”字为意脉,故题旨仍然显豁,给人以深沉蕴藉之感。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评陆诗云:“《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方东树谓此诗“志在立功,而有才不遇,奄忽就衰,故思之而有愤也。妙在三四句,

兼写景象,声色动人,否则近于枯竭。”(《昭昧詹言》卷二〇)许印芳评曰:“通篇沉郁顿挫,而三四雄浑。不但句中力量充足,抑且言外神采飞动。”(《瀛奎律髓汇评》)近人王文濡评此诗云:“忠义奋发,直以武侯自命。不知南宋斯时,君臣耽于宴安,弱势已臻极点,虽有武侯,其将如之何哉!”(《宋元明诗评注读本》) (李如鸾)

【临安春雨初霁】 宋诗篇名。七律。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一七。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除朝请大夫,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军州事,入奏行在,住于西湖,三月还家,七月始至严州。此诗即作于临安。孝宗召见时,谓“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欲一心报国,对任此职颇感失望。诗云:“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首联表示对仕途的厌倦与失望,并透露客居京华的懊悔。颔联为传诵名句,小楼听雨,深巷卖花,生动贴切地传出江南城市早春风情。诗境优美,韵味隽永,被瞿佑称为“佳句”(《归田诗话》卷上)。翁方纲则云:“陆放翁诗,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得名,其余七律名句辄类大此类。”(《石洲诗话》)《唐宋诗醇》评曰:“颔联圆转,脱口而出”,“有唐人风韵”。颈联写以书字、分茶自遣,“闲”、“戏”二字寄托郁闷情怀。尾联点化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诗意,用以自慰。此诗除将日常生活写得颇具情趣外,章法极严,用“客京华”、“听春雨”、“晴窗”、“清明”等字样,全面扣题,堪称陆诗佳作。姚鼐评谓:“上法子美,下揽子瞻,制裁既富,变境亦多。其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今体诗钞·序目》)此说不为过誉。 (李如鸾)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二五。共二首,其二更为著名。绍熙三年(1192)作于山阴。诗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开篇用对句,一表黄河之长,一状华山之高,与其《寒夜歌》“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五千仞之太华摩苍旻”诗句,都有感于无将相名臣抗金救国。唐张孜诗云:“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出纵横才。”陆游也有类似诗句:“山川形胜地,历世多名臣”(《哀北》)、“潼华临黄河,古出名将相”(《秋怀》)。可证。结尾两句,在无限关切中原遗民的同时,也满怀对朝廷投降政策的愤慨。全诗意境雄浑,音节铿锵,语意沉痛,感人至深。 (李如鸾)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宋诗篇名。七古。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二五。绍熙三年

(1192)作于山阴。前四句写从戎前作诗无甚成绩:一是随人“学步”,缺乏独创,即“残馀未免从人乞”;二是“力孱气馁”,无磅礴之气与雄劲之风。中间八句历数从军南郑的生活片断以及不时听到琵琶与羯鼓之声。这些场面的描述都为后面阐释创作体会张本。“诗家”四句描述写诗体会:绚烂多彩的生活可开阔视野,丰富阅历,产生创作冲动;并使诗人洞悉屈原、贾谊创作真谛,立意选材得以随心所欲,繁简处理能够巧妙天成。末四句指出其体会未必为“世间才杰”所识,忧虑“诗道”会像古琴曲《广陵散》因嵇康被害而失传。此诗是一篇诗论佳作,体现出朴素的认识论。“以诗论诗”始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后相沿成风,多以七绝论诗。即以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论,亦是四言十二句短制。本诗则为七言长句,通篇一百四十字,实属诗人创举。 (李如鸾)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二六。绍熙三年(1192)冬作于山阴。共二首,其二更为著名。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卫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前二句写诗人年迈力衰,独处荒村,仍渴望为国戍边,足见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刚毅精神。后二句写今番适逢江南冬夜风雨,不禁梦中又浮现昔日在抗金前线的战斗场景,表现出诗人热望重新投入军旅的激越情怀。诗篇写实言志:由“僵卧”而“尚思”,由“尚思”经听雨而“入梦”,层层深入,见出作者所魂牵梦萦的是收复中原、一统中国的千秋大业。此诗隔句相承,交错呼应,以风雨为媒介,将逝去之岁月、惨淡之现实与多年夙愿交织一起,意境开阔,气魄恢宏,笔调亦颇悲凉豪壮,可谓“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瓠北诗话》卷六)。 (李如鸾)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宋组诗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三三。庆元元年(1195)作于山阴。共四首,其中第四首最为著名。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东汉蔡邕,官至左中郎将,戏曲说唱将他讲成背亲弃妻的负心人。施闰章《螭斋诗话》“琵琶记”条载:高则诚“避地于鄞县栎社,用词曲自娱。因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应为陆游作),乃编《琵琶记》,以雪伯喈之耻。今《琵琶》仍是痛诋伯喈,舛悖不伦,不审何云雪耻?”其实蔡邕并未重婚,故作者有感于人死后是非全由他人评论,言外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全诗取材别致,宛如一幅速写,真实反映了南宋民间艺人在农村演唱情景,别具南国风情与诗的韵致。 (李如鸾)

【沈园二首】 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

南诗稿》卷三八。陆游悼念前妻唐琬之作。唐琬是陆游表妹，婚后情深，因不见容于陆母，被迫仳离。唐氏改嫁赵士程，陆游再娶王氏。绍兴二十五年(1155)春，二人于沈园相遇，彼此都很伤感。后不久唐琬辞世。庆元五年(1199)，诗人旧地重游，百感交集，即写下这两首诗。其一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首句写春游沈园的环境氛围，景物悲凉。次句扣题，沈园已“三易其主”——原属沈氏，后属许氏，又改属汪氏，早非原貌。三、四句连贯而下，是对唐琬的悼念，意谓令人伤心的是桥下新绿的春水，当年曾为爱妻临流照影，如今玉骨已成泉下之土，怎不使人感伤流连！其二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首句从回忆唐琬离世写起，漫长岁月，永恒怀念，对一往情深之诗人来说，多么难以排遣！凄楚情调直控全篇。次句转写眼前沈园老柳已见凋残。这老柳抑或四十年前诗人与唐氏相遇之见证。后二句谓自身已逾古稀，将不久于人世，然而凭吊遗迹，对景怀人，仍不免泫然流涕！陈衍云：“无此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宋诗精华录》)此说甚是。(李如鸾)

【示儿】宋诗篇名。七绝。陆游作。见《剑南诗稿》卷八五。嘉定三年(1210)一月，陆游临终绝笔。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前二句见出“九州同”是诗人一生最大夙愿，“不见九州同”是其一生最大憾恨。后二句表示要将实现夙愿寄托身后，可见诗翁强烈的爱国感情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此诗不假雕饰，直抒胸臆，境界壮阔崇高，风格深沉悲壮，情调昂扬从容。诗作以新颖立意、深广内涵和强大艺术感染力引起后世万千读者的共鸣。洪亮吉云：“陆临终诗云：‘……’人悲之，人复敬之。”(《北江诗话》卷三)此诗曾被郎瑛赞为“有三跃渡河之态”(《七修类稿》)；被褚人获赞为有“三呼渡河之意”(《坚瓠补集》)。贺贻孙则评为：“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诗筏》)胡应麟亦称：“忠愤之气，落落二十八字间。”(《诗薮·杂编卷五》)陆广文则云：“《示儿》君国之念，至瞑不忘。翁之生平大节，可概睹矣。”(陆艺香《问花楼诗话》卷二引)(李如鸾)

【观书有感】宋诗篇名。七绝。朱熹作。见《朱文公文集》卷二。共二首，其一更为著名。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以形象比喻与鲜明意境将读书感受表达出来。半亩方塘如打开明镜，清莹澄澈，天光云影，映照其间；此因源头活水长流不竭之故。

借以喻指读书使人增长知识，明辨事理。不过，诗中所谓“源头”不外儒家圣贤之学说；如将原意抽象化，则极富理趣，堪称警句。此诗既有自然审美情趣，也有哲理审美高度；讲哲理不发议论，而让形象体现，堪称“不腐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张谦宜评朱熹诗云：“因他胸中先有许多道理，然后寻诗家言语衬托出来，此却别是一路。”(《笥斋诗谈》卷五)所论不无道理。(李如鸾)

【湖上寓居杂咏】宋组诗名。七绝。姜夔作。见《白石道人诗集》卷下。作于庆元六年(1200)隐居西湖孤山西泠时。组诗状摹湖山胜景，吟咏飘泊生涯，抒写零星感受，是诗人绝句的代表作。共十四首，其最为著名。诗云：“荷叶披披一浦凉，青芦奕奕夜吟商。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诗人白天凭窗远眺，但见荷叶披散于水，满湖碧色；夜晚卧闻湖边青芦作响，一片凄清的商声，因而发出感叹。诗人虽早蜚声词坛，却终身沉沦，晚年朋辈凋零，生活偶赖友人资助，亦颇凄苦，故出此语。结句直抒羁旅之慨，诗人籍贯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今闻异地秋声而撩起乡思，不禁感慨系之！全诗先用“赋”法着意布景，再用比拟渲染氛围，而后以情语收结，琢句精妙，意境清幽，韵格浏亮婉转，可见诗人高致。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称“其诗甚有格韵，雅洁可传”。李慈铭亦称：“南宋中叶后诗，姜尧章最清峭绝俗。”(《越缦堂读书记》下册)该诗即具此种特色。(李如鸾)

【元夜】宋组诗名。七律。朱淑真作。见《断肠诗集》卷三。共三首，其三更为著名。诗云：“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据《元夜》其一“归来禁漏逾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横”与其二“高挂危帘凝望处，分明星斗下晴天”等诗句，推断此诗所写为作者自身情事，更近情理。此诗将元夜盛况写得有声有色，一个“闹”字，境界全出。写元宵赏灯与情侣相会，情意缠绵。从情调看，诗人短暂的欢欣似为无名的哀愁所掩，这或许是封建社会内向型女性的一种心态。全诗以元夜的繁华，赏灯的乐事，反衬相逢的难得，爱情的可贵。感情细腻深挚，手法多变，或渲染烘托，或直抒胸臆，是抒情佳作。(李如鸾)

【约客】宋诗篇名。七绝。赵师秀作。见《清苑斋集》。又题《绝句》、《有约》。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诗用对句写景，富有时令特色与地方风味。细雨蛙声的氛围，不禁撩起诗人寂寥之感。友人因雨受阻失约，主人不胜烦闷，闲极无聊，敲着棋子目

睹灯花落下,其寂寞心情、怀友思绪不言自明。此诗语近情遥,含吐不露,环境气氛渲染得很成功,细节描写亦能想见诗人心理。《柳溪诗话》评为:“意虽腐而语新。”“意腐”当指题材习见;“语新”,是说字句明净。钱钟书认为陈与义《夜雨》“棋局可观浮世理,灯花应为好诗开”诗句拉扯做作,不如本诗干净完整(《宋诗选注》)。(李如鸾)

【题临安邸】 宋诗篇名。七绝。林升作。见《宋诗纪事》卷五六。原诗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首句写临安自然风光及繁华景象。“山”、“楼”、“外”三字叠之成句,以显示峰峦之多与楼阁之密。次句写统治者在此佳丽之地,沉湎歌舞之中。“几时休”是诘问其能沉迷至何时,维持至何时。末二句含蓄揭出主旨:你们终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竟然把南宋都城视作北宋汴京,其前途可想而知!全诗寓愤怒沉痛之情于鲜明生动的形象之中,于讽刺揶揄的言词之中,以景语始,以情语收,以景衬情,乐景写哀,连用三个地名而不觉冗赘,自是佳作。(李如鸾)

【军中乐】 宋诗篇名。七古。刘克庄作。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此诗先叙战地环境:行营有士卒巡逻,帐门有重兵把守,隘口有军旅设防。再写将军极尽“军中乐”:他自恃尊贵,不据鞍马;“射麋捕鹿”用以佐酒,并有随军舞伎以供佚乐;直至更阑月落方能酒醒,赏赐“女乐”一次即“彩缣百段”。足见将军不顾国难,不知兵戎,不恤边卒,不惜财力,是个畏敌如虎、奢靡淫乱的形象。最后以“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陡转作结,形成将军乐与士兵苦的强烈比照,以表现诗人之孤愤,正所谓“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此诗继承中唐“新乐府”传统,以边防为题材,用写实笔法,再现南宋官兵对立的现实。辛弃疾《美芹十论》第六《屯田》:“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诗所写,更有甚之。(李如鸾)

【过零丁洋】 宋诗篇名。七律。文天祥作。见《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二次被俘,翌年正月,由元军押往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大海中,宋帝昺行朝所在)。此系零丁洋地面,文天祥触景生情,写下此诗。后汉奸元将张弘范迫使他招降宋将张士杰,他断然拒绝,并出示此诗以明志,张弘范“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见诗下自注)。诗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前四句先写个人身世及战斗经历。“风飘絮”、

“雨打萍”,形象地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气氛悲凉。五、六句感慨时艰,流连歔歔,以巧对使心境与地名环境自然合拍。尾联振起,表示决心殉国,让耿耿丹心光照史册。豪情壮采,激扬飞动,为千古名句。诗人崇高之精神境界与威武不屈之民族气节,于此可见。全诗沉郁悲壮,气势凛然,感情真挚,是一曲流芳万代、感召后人的悲歌。

(李如鸾)

【正气歌】 宋诗篇名。五古。文天祥作。见《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作于燕京(今北京)狱中。诗前序文写士牢七种恶浊气味,表明身陷囹圄,全以“浩然正气”为精神支柱战胜险恶环境。全诗分四段。第一段写对“正气”的认识与信念,重点陈述国势危殆时“正气”的表现形态,以暗扣南宋灭亡的现实。第二段列举古代胸怀“正气”之士以自勉,运用三组不同排比,句式错落,节奏急促,形成磅礴语势。第三段议论“正气”的重要性。作者之“正气观”虽未能摆脱封建伦理的束缚,却也远胜于宋儒,因他将道德与正义视为精神力量。末段转叙自身处境,以示“正气”与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对自身的影响,表达决心为国捐躯的精神。诗作语言不假雕饰,直抒胸臆,写得大气磅礴,激昂慷慨,苍凉悲壮。诗中表现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以及强烈的爱国思想、崇高的民族精神,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勉人前行。近人王文濡评此诗:“人间正气,天地中声,可泣鬼神,可开金石。”(《宋元明诗评注读本》)

(李如鸾)

【湖州歌】 宋组诗名。七绝。汪元量作。见《水云集》。景炎元年(1276),宋恭帝赵昺与皇室人员为元兵掳至大都(今北京市),作者是宫廷琴师,也被俘北上。《湖州歌》共九十八首,以绝句联章形式写自宋室降灭至君臣抵燕后的过程,其中也流露出诗人的亡国之痛、去国之悲。李珣跋汪元量《湖山类稿》称其诗“亦宋亡之诗史”。《湖州歌》是其“诗史”的代表作,可补正史之所未及。湖州位于今浙江省北部,因组诗是从元丞相伯颜率兵进驻湖州写起,故总题《湖州歌》。诗人则将其视为“野史”,在《答林石田》云:“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其中第五首较为著名:“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累累间青红。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押俘船离开杭州,渐行渐远。在诗人眼中吴山即是南宋王朝永恒之象征,而鳞次栉比、色彩斑斓的楼台未尝不是繁华帝都的同义语。待到船只行驶于夜雾弥漫的江面,诗人手抱琵琶深情怀念故宫的一幕幕场景。全诗韵调凄清,含纳深厚,情景浑化,可代表《湖州歌》的总

体风格。

(李如鸾)

【题陆放翁诗卷后】 宋诗篇名。七古。林景熙作。见《白石樵唱集》。开篇先把陆诗与杜诗相提并论,称陆诗刚健直追杜甫。中间八句概述陆游从戎与归隐的生涯,着重表现其生活情调、爱国感情与终身憾恨。结尾四句借现实抒发感怀,出语沉痛。全诗从大处落墨,取材典型,剪裁得体,使爱国诗人形象卓然特立。虽然诗以叙述为主,但“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读之仍觉诗味醇厚,感人甚深。贺贻孙兼评陆游《示儿》及此诗时云:“二诗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但贺氏仅录此诗后四句,以七绝视之,则显然有误。(见《诗筏》)

(李如鸾)

【雪梅】 宋诗篇名。七绝。卢梅坡作。共二首,其一更为著名。诗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雪因有梅,而透露出春天信息;梅因有雪,而显得分外精神。二者相得益彰,堪为伯仲。此诗却欲于雪、梅间分出高低,实为前人所不曾道,故立意甚新。诗用比拟方式,起得不俗。“未肯降”,托出梅与雪之性格,富有情趣。接写彼此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不得不搁笔思量,用笔顿挫有致。收尾谓梅与雪自有短长:梅不及雪之白,要逊雪三分;但雪又不及梅之香,须输梅一筹。此种持平之论既赞美雪,又歌颂梅,正关合题意。诗中反复出现“梅”、“雪”二字,音调谐亮,琅琅上口。末尾以对话收结,也很自然。(李如鸾)

【月儿弯弯照九州】 宋代民歌名。以首句名题。见《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诗云:“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月儿”原作“月子”。首句起兴,用幽暗朦胧的月色,烘托一种凄清冷寂的氛围,为整首民歌奠定哀怨悲凉的基调。“九州”,地域寥廓广远,见出所叙悲欢情景的普遍性。次句是概说,径直揭露宋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末二句用对比手法具体补叙:富家温馨幸福的生活,关合上句“欢乐”字样;贫家颠沛流离的痛苦,坐实前面的“愁”字。这首民歌语言简练,唱出劳动者的不平之鸣,它是宋代社会,也是整个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作品感情朴实,题材典型,“几家”二字,重出四次,形成音调的回环美,赢得人们的共鸣与喜爱。宋赵彦卫认为此“乃吴中舟师之歌”(《云麓漫钞》卷九)。

(李如鸾)

【岐阳】 金组诗名。七律。元好问作。见《元遗山全集》卷八。金哀宗正大八年,即元太宗纪三年(1231)正月,蒙古兵包围了岐阳(今陕西凤翔县),二月攻克。其时诗人任南阳县令,惊闻岐阳失陷消息,心情沉重,遂作《岐阳》三首。其一曰:“突骑连营鸟

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其二曰:“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其三曰:“耽耽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上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这组诗纪实论事,不离形象思维,论事尤能以情语出之。清人赵翼在《瓠北诗话》中评元好问之七律“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又论《岐阳》曰:“此等感触时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元好问生于金末乱亡之际,宗社丘墟之悲使他在感情上与忧时悯乱的杜甫息息相通,发而为诗,“沉挚悲凉,自成格调,直接少陵”(梁章钜《退庵随笔》)。元好问反对徒事摹拟,他学杜甫,主要是学其意,得其神,诗中有诗人真情,有当时真事,深情滂沛,一气贯注,无摹拟雕镂之迹,善用他人之笔,抒己之情,言如己出,浑然天成。

(诸天寅)

【论诗】 ①金组诗名。七绝。元好问作。见《元遗山诗集》卷一一。共三十首。在姹紫嫣红、万花竞艳的中国诗苑里,论诗诗为颇具特色的品类。元好问二十八岁时所创作的这组论诗绝句,即为论诗诗中的上乘之作。该组诗上承杜甫《戏为六绝句》和稍前王若虚《论诗诗》的形式,纵论自汉魏以迄赵宋的许多代表性诗人、作品和流派,在品评臧否的同时,贯彻、体现着作者的诗学主张和鉴赏情趣。第一首开宗明义,即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使泾渭清浊分明,辨明诗中的正体和伪体。他标举建安的优良传统(“曹刘坐啸虎生风”),认为好诗应当真淳自然(“一语天然万古新”),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慷慨歌谣绝不传”),反对模拟因袭(“窘步相仍死不前”),批评绮靡纤丽的诗风(“斗靡夸多费览观”)。其论诗强调内容,也重视艺术成就和作家人品,能从大处着眼而不流于褊急;肯定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杜甫、韩愈,于李商隐、苏轼、黄庭坚则有比较公允的褒贬;反对俳谐怒骂的怨刺之诗(“曲学虚荒小说欺”、“乱后玄都失故基”),重视“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杨叔能小亨集引》)。《养新录》曰:“元遗山论诗绝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诸篇而作也。王贻上仿其体,一时争效之。厥后宋牧仲、朱锡鬯之论画;厉太鸿之论词、论印,递相祖述,而七绝中又别启一户牖矣。”这组绝句既给读者以理性的启迪,又给人以审美的享受,为历代所传诵,堪称古代论诗诗之

佳品。②清组诗名。七绝。赵翼作,见《瓠北集》卷二八。《论诗》这一题目在《瓠北集》中多次出现,体裁、篇数都不尽相同。其中以这组七言绝句最为有名。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共五首,以第二、三、四首尤为人称道。诗曰:“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赵翼论诗重“性灵”,主创新,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这几首论诗诗就反映了他的诗贵创新的进步主张。他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赵翼善以议论为诗,紧密结合具体、鲜明的形象,而并非枯燥乏味的说教。他把抽象的理论用诗的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寓意深邃,易读易诵,醒人耳目,常为后人所征引,成为历久不衰的名篇。(诸天寅)

【观梅有感】元诗篇名。七绝。刘因作。见《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二。刘因是元代著名诗人,生于宋元之际,先后两次被元世祖征召为官,感时伤事,思念故国,遂有《观梅有感》之作。全诗为:“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首句点明时节,战尘方落,东风劲吹,江山易主,故国沦丧。诗人处此改朝换代之际,心里自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次句引出北宋诗人林逋之往事。林逋隐居杭州西湖之孤山,赏梅养鹤,终身不仕,亦不婚娶,世称“梅妻鹤子”。睡梦中还想着号称西湖处士的林逋,其仰慕钦羡之情可想而知。最后两句暗寓随着春意渐歇,梅花亦将凋零,故国的衰亡同样无法挽回,感伤梅花是虚,思念故国是实,所以说“此心元不为梅花”。(诸天寅)

【岳鄂王墓】元诗篇名。七律。赵孟頫作。见《松雪斋文集》卷四。赵孟頫本宋宗室,入元后,被推荐入朝为官。这首诗是借叹惜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冤屈,总结南宋王朝覆灭的原因,具有很深沉的历史感。全诗为:“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首联写景,岳飞坟上长满青草,墓道两旁的石马、石象等也已破败不堪,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秋日荒凉图景。南渡两句痛斥南宋小朝廷违背民意,一味苟且偷安,不但不图恢复中原,反把忠臣害死。最后四句怀念岳王,就连水光山色也感到无限悲痛,沉郁之情,溢于言表。(诸天寅)

【挽文山丞相】元诗篇名。七律。虞集作。见《元诗选》初集《道园遗稿》。虞集生于宋元之际,入仕元朝,心怀故国。这首《挽文山丞相》诗,沉痛哀悼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壮烈殉国。诗中歌颂文天祥力图恢复宋室,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引用“新亭对泣”的典故,说明宋亡之后,局面比东晋渡江时还不如,连残山剩水,半壁江山都保不住,思之怎不令人内心感到无限凄切。全诗为:“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首诗诗风端严,用典精切,曲折地传达出诗人的心境。他曾遭疑忌,故慨叹当时蒙古贵族统治者的压迫,更甚于东晋、南宋之时。

(诸天寅)

【上京即事】元组诗名。七绝。萨都剌作。见《雁门集》卷六。原诗共五首,作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这一组诗以清新的笔调描绘出祖国北方人民放牧的劳动生活和辽阔苍茫的草原风光。上京,也称上都。终元一代以开平为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多伦县西闪电河北岸。组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为:“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一、二两句是说:在夕阳下牛羊遍野,牧草散发着清香,奶酪多么甜美。三、四句是说:贴着地面到来的北风夹带的黄沙像漫天的飞雪,家家的帐篷门前都把毡帘放下了。全诗以白描手法,写景如绘,反映出塞外风光特点。诗风清丽俊逸,空旷中蕴含宁静,堪称一幅绝妙的草原晚景图。(诸天寅)

【梅花诗】元组诗名。七绝。王冕作。见《元诗选》二集《竹斋集》。王冕善画梅,也善咏梅,这组梅花诗是他为自己所绘梅花而作的题画诗,共五十八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墨梅》和《白梅》二首。《墨梅》诗为:“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白梅》诗为:“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两首诗都是以梅花来表现自己的志节情操。前者着重抒写不求彩艳华丽,只求淡雅清新的高风亮节;后者在颂美梅花的芬芳中,寄托兼善天下的大志,绝俗而又入世,品高而兼志大,既是咏梅,又是自白。两首皆用比兴手法,借梅喻人,突出了人格美。语言清新朴实,意味深长。(诸天寅)

【庐山瀑布谣】元诗篇名。七古。杨维桢作。见《铁崖古乐府》卷三。诗前有序,说明此诗系作者于甲申八月十六夜,梦游庐山后所作。全诗为:“银河忽如瓠子决,泻诸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或作天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便欲手把(或作手借)

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冷渊。”此诗由于系梦游观赏庐山瀑布,便为诗人驰骋想象开拓了广阔天地,使诗中充溢浓郁的浪漫色彩。前六句通过描绘瀑布的神奇美妙,着力赞颂大自然的无比伟力。后六句进一步以夸张语句,刻画壮阔雄伟的神话境界,表现出诗人狂傲不羁的个性特点。全诗想象丰富,有如天马行空,纵意驰骋,脱俗不凡,自成一格。(诸天寅)

【岳阳楼】 明诗篇名。五律。杨基作。见《眉庵集》卷七。岳阳楼即今湖南岳阳市城西门楼,俯瞰洞庭,烟波浩瀚,景色万千。唐张说守此时修筑,北宋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有《岳阳楼记》,从此楼名鹊起,成为诗人墨客歌咏的对象。杨基这首诗为:“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诗中抒写了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的美丽春景,末尾引入静夜风雨交加之时,传来悠扬的笛声,更平添了诱人的魅力。江朝宗在《眉庵集序》中说:“先生之诗秾丽纤蔚,蔼然正太和平之音,殆有唐人风味,夫岂易得者哉!”杨基富有才情,他的诗作里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诗句雅丽流畅;二是注意属对的精工。此诗即是一例。(诸天寅)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明诗篇名。七古高启作。见《青邱诗集》卷一一,此诗作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当时作者在南京修撰《元史》。诗人以沉雄、豪壮的笔调,描绘了河山的壮丽。诗中首段六句写景,表现诗人登上雨花台,遥望长江,所见钟山的雄伟气势。中间十五句怀古,抒写历史上当南北分裂时,割据东南者皆以金陵形胜之地,建都于此,恃长江天堑以为固,其结果往往不旋踵而覆亡。最后五句以明太祖统一南北,四海一家,不必再以长江为天堑作结,语似颂扬,实含讥刺建都金陵之非。全诗波澜壮阔,一气呵成,在驾驭材料上,收放自如,构思严谨精巧,用典切题,写景传神,为艺术性很高的优秀作品。清人周贺说:“季迪长歌磊落崑岑,极其生动。”本篇颇能体现出高启诗作豪放凌厉、沉雄奔放的艺术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高启诗曰:“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秣缚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中。”这首歌行体诗作,便颇具唐人歌行磅礴之气势,兼有雄浑豪放及沉郁顿挫之美。(诸天寅)

【青邱子歌】 明诗篇名。七古。高启作。见《青邱诗集》卷一一。诗前有小序揭示本诗之写作目的

——“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即回击时人对其的恶意嘲讽和攻击。作于至正十八年,诗人二十三岁时。全诗共六十八句,三百九十九字,通篇模仿李白,以酣畅的笔墨,曲折的笔法,形象的语言表现出诗人不羨功名利禄,不为礼法所拘,狂放不羁、恃才傲物的狷介性格。诗中基于现实,又不受其所囿,涂饰一层浓郁的浪漫色彩。在人物刻画上采用多方位、多角度的手法,由表及里地展示出人物形象的全貌。为了造成磅礴的气势,诗中多用排比句式,而且善于通过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长短句相配合,有助于抒发感情,创造气氛。李时远评高启之诗曰:“季迪诗秾丽而无粉泽,清新而复高古,优入盛唐。”陈子龙曰:“季迪诗如渥洼生驹。神骏可爱。”此等特色在本诗中皆有所体现。(诸天寅)

【岳王墓】 明诗篇名。七律。高启作。见《青邱诗集》卷一五。全诗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据《杭州府志》:“鄂国武穆王岳飞墓在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市)栖霞岭。飞子云旁附。初飞潜瘞九曲丛祠,孝宗时改葬是处,墓木皆南向。”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岳飞的由衷敬仰,以及对岳飞遇害的无比哀悼。诗人在另一首诗中说:“父老悲犹在,英雄事已休。栖霞岭前墓,闻说更堪愁。”(《韩蕲王墓》)抒发的也是悲悼英雄业绩的情怀。高启论诗“曰格曰意曰趣,三者得而变化随之,如万物之有洪纤,四时之有荣悴,而诗之道备,故其所自喜乃在兼全众长。”(见《青邱诗集》金檀序)正由于他善于学习,兼师众长,所以具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力。他的律诗写得清雅俊丽,属对工巧,又不露雕琢痕迹。此诗即是典型一例。(诸天寅)

【石灰吟】 明诗篇名。七绝。于谦作。见《于谦诗选》。约作于永乐十二年(1414)。于谦是明代的著名民族英雄,其诗朴质刚劲,感时忧国,尤善托物咏志,《石灰吟》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咏物言志之作。其诗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借石灰的制作过程,表现诗人不惧千锤万击,不怕烈火焚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意志。诗中以象征手法,将物性与人格巧妙地融为一体,石灰的品格恰是诗人的自身写照。全诗句句咏物,又句句是抒怀,明白如话,却又诗味隽永。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风格遒劲,兴象深远……品格乃转出文士之上。”诗品出于人品,此诗之所以能广为流传,与诗人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格分不开。(诸天寅)

【把酒对月歌】 明诗篇名。七古。唐寅作。见

《六如居士全集》卷一。全诗为：“李白前时原有月，唯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首古风显然受到李白《把酒问月》诗的启发与影响，但又表现出独特的创作个性。诗中始终着眼李白与明月的关系，时时将自己与李白比较，在比较中抒发出狂放不羁、蔑视权贵的豪情，可谓奇想联翩，独出机杼。全诗意脉连贯，一气呵成，重言复唱，颇具回环往复之音乐美，语言明白晓畅，清新可诵。

（诸天寅）

【秋望】 明诗篇名。七律。李梦阳作。见《空同诗集》卷二九。题一作《出使云中》。云中，唐郡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大同。正统十四年（1449），北方少数民族瓦剌军进扰大同，英宗率官军五十万亲征。八月十四日，驻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宗被俘。从诗题上看，此篇为作者奉使临边，感怀国事之作。全诗为：“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诗中描写秋天边塞景象，空旷冷寂，而今边患频繁，镇守边防的将领又缺乏有勇有谋之才，所以发出有谁像郭子仪的慨叹。

（诸天寅）

【玄明宫行】 ①明诗篇名。七古。李梦阳作。见《空同集》卷二二。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首领。他提倡复古，标举高格作为学习对象。在政治上，他反对宦官擅权，因弹劾宦官刘瑾，曾两度系狱。玄明宫为宦官所居住之地，《玄明宫行》是一首长篇七言古诗，全诗五十六句，三百九十二字。诗中以玄明宫的盛衰为线索，深刻抨击了宦官“掎克四海真困穷”的穷奢极欲，同时抒发了“人心嗟怨入骨髓”的义愤，最后嘲讽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孽阉顷刻烟消云灭的可悲下场。诗中体现出谴责邪恶势力的真情，实践了他的“温雅以发情，微婉以讽事”（《空同集》卷五二）以及“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空同集》卷六二）的写诗主张。全诗善于章法、结构，写得古朴、苍劲，颇有汉魏之风。②明诗篇名。七古。何景明作。见《大复集》卷一四。何景明与李梦阳同是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其政治态度和文学主张均甚接近。他是封建社会一位富于正义感的官吏。《玄明宫行》是与李梦阳同题的一首七言古诗，在诗中敢于揭露讽刺社会弊端，对宦官窃权，作威作福的情态作了较为生动的剝剔。诗中直刺权宦之名：“我

朝中官谁最贵，前有王振后曹氏”，并且尖锐指出：“天下衣冠难即振，中原寇盗时复起。古来祸乱非偶然，国有威灵岂常恃。”他在《海叟集序》中说“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这首诗兼学“四杰”，注意换韵自然，音节和畅，全诗给人以宛转抑扬之感。特别是善于运用对比手法，以“昔日富贵”与今之寂寞对比，意旨显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诸天寅）

【鲋鱼】 明诗篇名。七律。何景明作。见《大复集》卷二六。全诗为：“五月鲋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赐鲜遍及中珰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这是一首讽刺诗。一、二两句是写江南名贵特产鲋鱼，五月已运到北京，专供帝王贵族享用，就像唐代远方进贡荔枝、枇杷，也未能驾乎其上。三、四两句写封建帝王用鲋鱼赏赐宦官而不供献宗庙，当时宦官权势显赫可以想见。五、六两句直刺为运送鲋鱼而不惜动用水陆两路，劳民伤财。末联以自己受赐无望作结，怨愤之意，隐然流露而出。这首诗以赐鲋入手，事小而义丰，见微知著，发人深思。

（诸天寅）

【关索庙】 明诗篇名。七律。杨慎作。见《升庵集》卷五六。全诗为：“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月捷西来武露布，天威南向阵云赊。行客下马一酹酒，候旗风偃寒吹笳。”关索庙建于关索岭上。关索岭在今云南澄江县西北。岭势险峻难渡，若关隘然，必须牵绳而过，故名。又有小关索岭，在云南寻甸县易龙驿东北，相传三国蜀汉诸葛亮南征时，曾驻军于此。考其诗意，当属后者。诗中既写出关索岭地势险峻，又借千年古庙歌颂三国英雄的功业，意蕴含蓄，情韵深长。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评论杨慎诗说：“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梦阳）、何（景明）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此评语用于本诗亦甚为确当。

（诸天寅）

【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 明组诗名。七绝。李攀龙作。见《沧溟集》卷一二。明卿为吴国伦的字，是作者的友人，因上谏疏而遭贬谪江西，作者遂以此诗表示慰问。全诗共四首，其第二首为：“青枫飒飒雨凄凄，秋色遥看入楚迷。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言简情深，融情入景，抒发出同情友人遭贬的深厚情谊。李攀龙是明代后七子的主将，他虽主张复古，但也比较重视诗歌的情感作用，认为：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葩不易约而核不易衍也。其诗作的另一特点是重视景物描绘，讲求意境，词采俊亮，富于艺术感染力。诗中很少有空发议论之处，正如沈德潜在《明诗

别裁集》中所言：“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这些特点在本诗中皆有所体现。（诸天寅）

【登太白楼】 明诗篇名。五律。王世贞作。见《明诗别裁集》。《嘉庆一统志》：“李白酒楼在济宁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城时，县令贺知章觞之于此。今楼与当时碑刻俱存。”唐宋以下关于李白酒楼的题咏很多，这首诗从空中落笔，颇能写出李白的胸襟气魄。全诗为：“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诗意境开阔，笔力雄健。每二句为一层。“昔闻”两句统摄全篇，再现李白长啸放歌，独登酒楼的傲然神态。三、四句转写此楼经过李白登临，身价倍增，百代享誉。五、六句描摹眼前壮阔景色，象征李白的恢弘气度。最后二句是说：但见济水日夜潺湲，更没有一个像李白这样的人来登此楼了。诗既对现实生活中的芸芸庸人投以鄙夷，又颂扬李白独步千古，罕有所匹。“觅”，《弇州山人稿》误作“竟”，据《明诗别裁》改正。清代沈德潜盛赞此诗：“天空海阔。有此眼界笔力，才许作《登太白楼》诗。”（《明诗别裁集》）确为说论。（诸天寅）

【居庸关】 明诗篇名。五律。谢榛作。见《四溟集》卷四。诗共二首，其一为：“遥遥度关塞，策马正西风。驿路泉声里，人家岚气中。霜余涧草歇，日上石林空。多少长征客，高秋感塞鸿。”其二为：“控海幽燕地，弯弓豪侠儿。秋山牧马处，朔塞用兵时。岭断云飞迥，关长鸟度迟。当朝有魏尚，复此驻旌旗。”居庸关在北京昌平西北居庸山上，又称军都关，北齐时名纳款关，唐代名蓟门关。它悬崖夹持，巨涧中流，奇险天开，古称要隘。关以巨石筑成，屹立崇山之上，气势极为雄伟，自古即为燕台八景之一，名曰居庸叠翠，为诗人吟咏之胜迹。谢榛此诗写出了诗人于秋高气爽季节，策马途经居庸关的感受。第一首着重表现塞外风光，第二首则以弯弓习射的豪侠儿写出关隘的险要，成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谢榛论诗强调诗人在创作中能有“天机”和“超悟”，并且要求情真。他还比较重视诗歌中的情景描写。这在此诗中均有体现。谢榛擅长五律，即以此诗而论，表现出气逸调高、风度凝炼、坚整圆润的艺术功力。

（诸天寅）

【宿榆林驿】 明诗篇名。七律。谢榛作。见《四溟集》卷五。全诗为：“寒夜榆林门独开，愁看霜露满苍苔。驿灯孤照征人梦，边月高悬落雁哀。冒顿几窥青海戍，烽烟又上白登台。当年李广空遗恨，萧飒天风正北来。”榆林，地在陕西。城濒无定河支流清水东岸，紧倚长城，夙称险隘。此诗写诗人途经榆林，夜宿驿馆，由眼前满目霜露苍苔之景，写出驿灯

孤照中旅途的寂寞心境。后四句则写出当时边患频仍，烽烟迭起。白登台，在山西大同东。汉高祖击匈奴冒顿，尝被围七日于此。故诗中有“冒顿几窥青海戍”之句，谢榛论诗注重诗的感兴：“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四溟诗话》卷一）此诗即体现出他“以兴为主”的创作主张。

（诸天寅）

【王元章倒枝梅画】 明诗篇名。七绝。徐渭作。见《徐文长文集》卷一二。王元章即元代画家王冕，曾作倒枝梅画。王冕与徐渭均工诗善画，且皆怀才不遇，遭际坎坷，故徐渭见到王冕此画顿生共鸣，对其寓意寄托，心领神会，遂写此首题画诗。诗曰：“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作为丹青妙手，诗中品味出倒枝梅画的深意，借赞美着地而垂却清香如故的梅花，同情王冕有梅花之高洁而无仕途得志之命运，抒发出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之情。作为一首题画诗，富有鲜明的画面形象，且通过细致观察，准确地把握住倒枝梅的特征，堪称题画诗中的佳作。（诸天寅）

【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 明组诗名。七古。袁宏道作。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六。本诗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作者时在北京。显灵宫，在北京宫城西，祀王灵官。《长安客话》二曰：“王灵官祠前有二古柏甚奇，其干叶上拂云霄，下扫阶砌，游人手约垂枝，乃得入观。列坐其中，如坐疏幕。虽当炎夏，了无暑气，日光不穿，影繁色淡，有类月夜。”集诸公，与诸位友人宴集聚会。以“城市山林”为韵，意谓把“城市山林”四字作为韵脚分别写进四首诗中。原诗四首，以其中第二首最为著名。全诗为：“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馀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恁于洛阳年少泪！”明季万历年间政治腐败，租税苛重，朝廷派系争斗剧烈，国事日非。诗中抒写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又表现出敢怒而缄言退避的软弱态度，但能直率表明“新诗日日千馀言，诗中无一忧民字”，其实道是无忧却有忧，忧患意识隐约可见。（诸天寅）

【小车行】 明诗篇名。七古。陈子龙作。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五。明崇祯十年（1637），陈子龙中进士，殿试在三甲，选放惠州司李。是年六月，两畿大旱，山东蝗虫为灾，流亡遍野。这首诗是作者出京赴任时，途中目击饥民流离之状而写。全诗为：“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枌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

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踈踈空巷泪如雨。”开篇伊始,推出小车缓缓行走的特写镜头。黄昏与尘埃渲染逃荒饥民的疲惫,小车行进之艰难。一路上灾民仅以榆皮充饥,他们的愿望只是能够喝上一口粥。末二句写出饥荒的严重,具体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诸天寅)

【辽事杂诗】 明组诗名。七律。陈子龙作。《陈忠裕公全集》卷一四。辽事,指辽东边防之事。1616年,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进攻辽东,夺取大片土地,迁都沈阳。1636年,其子皇太极称帝为清太宗,改金为清。清军又控制了蒙古各部,屡次攻入长城以南,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此组诗共八首,约作于1637年前后。这八首诗以时间为序,分别写镇辽将军李成梁、王化贞、熊廷弼、毛文龙、熊文灿等在边防抗清战事上的失利,诗人以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表现出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其中以原列第七首最为著名:“卢龙雄塞倚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碣里角声摇日月,回中烽火动楼台。陵园白露年年满,城郭青磷夜夜哀。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谁是出群才。”诗中不仅表现出对国力衰落的慨叹,而且在尾联中抒发了通过谈判解决民族矛盾的远见卓识。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则认为陈子龙的七言律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此诗即其七言律诗的代表作。(诸天寅)

【渡易水】 明诗篇名。七绝。陈子龙作。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一七。陈子龙是明末一位著名的抗清领袖,他的这首诗写得悲壮苍凉,充满了为国献身的壮烈情怀。全诗为:“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一、二句表示出诗人反清易明,以身许国的决心。并刀,指古代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产的宝刀。宝刀在匣中鸣叫,似乎在催促主人赶快行动,用武器去同敌人搏斗。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路遇不平还要拔刀相助,何况江山易主,国土沦丧,怎能就此罢休。三、四两句是感慨易水依旧缓缓流淌,但到哪里去寻找像荆轲那样的壮士,来为他送行呢?实际上他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事败投水自杀,死得也像荆轲那样壮烈。(诸天寅)

【长歌】 明诗篇名。七古。夏完淳作。见《夏完淳集》卷三。全诗十八句,一百六十二字。从诗中内

容上看,当作于1645年秋江南义师失败之后。诗中的“美人”,指南明君王;诗中的“登天”、“御风”、“陟山”、“涉江”之喻,指奔赴南明抗清政府;“欲往从之道路难”,则指欲追随隆武帝或监国鲁王,因道路艰难而未能实现。在艺术手法上,既从屈赋中汲取营养,又借鉴张衡《四愁诗》,充满美妙新奇的想象,异彩纷呈的比兴,华丽丰赡的铺陈,使人在目眩神迷的浪漫色彩中获得意味深长的审美享受。全篇一气呵成,开头连用四叠句,词复意切,力透纸背,沿用《四愁诗》句句协韵之法,节拍谐和,声韵铿锵,呈现出涌泉泻玉的音乐之美。沈德潜评夏完淳其人其诗说:“存古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汪锜不足多也。诗格亦高古罕匹。”(《明诗别裁集》卷一一),夏完淳英才早熟,志节坚贞,《长歌》一诗,为其优秀代表作之一。(诸天寅)

【别云间】 明诗篇名。五律。夏完淳作。见《夏完淳集》卷四。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抗清的爱国志士。1645年夏,清兵南下,十四岁的夏完淳跟随陈子龙起兵太湖。1647年六月,在家乡被捕。上海市松江县,古称云间,即作者家乡。这首诗是作者被捕后,在押往南京前别离松江时所作,原收在他临难前的诗集《南冠草》之中。全诗为:“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首联叙个人遭际,诗人在外三年,奔走抗清,如今刚刚还乡,即被捕囚禁。颌联写出离乡前无限悲痛的心情,化用唐代孟郊《赠崔纯亮》中的诗句:“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恰到好处。颈联点明此去凶多少,自知死期已近,故而更加难分难舍。末联忽作壮语,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想象中当自己就义后,魂归故里,一定会看到抗清战旗在空中高高飘扬。宋代词人姜夔说:“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白石诗说》)诚哉斯言,此诗即为一例。(诸天寅)

【甲辰八月辞故里】 明诗篇名。七律。张煌言作。见《张苍水集》第三编《采薇吟》。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七月,张煌言被清军俘获,八月初,将转解往杭州。这首诗即在离别家乡鄞县前所作。全诗为:“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诗中从大处落墨,盛赞于谦、岳飞的丰功伟绩,激荡着爱国主义情怀。诗人视死如归,愿在忠良坟旁借取一席葬身之地。其抗清志向并未因被捕而有所动摇,决心死后也要化为钱塘江的怒涛,复国之志永不泯灭。诗中自始至终直抒胸臆,感情激昂,具有气壮

山河的艺术力量。

(诸天寅)

【凤阳花鼓】明代民歌名。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二),这首民歌是配合凤阳花鼓表演的歌词,流行甚为广泛。歌词为:“说凤阳,说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凤阳,今安徽凤阳,其地处淮河流域,自古水患严重。朱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凤阳人。这首民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它直言不讳地把封建皇帝同连年灾荒联系起来,可见天灾仅仅是造成灾难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严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荒年之时大户人家出卖骡马,小户人家则卖儿卖女,演唱者当系年轻女性,既无骡马,又无儿郎,只得背起花鼓,流落四方。至此,哀痛之情自现。

(诸天寅)

【闯王歌】明代民歌名。不著撰人。见清人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据《明季北略》记载:“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若酷处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闯王歌》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反映了明末百姓对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歌颂与拥戴,表达出广大人民的革命理想与要求。计六奇的记述还从侧面反映了民歌这种口头文学作品在政治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明季北略》卷二三)。当时流行的《闯王歌》有多首,除上引两首外,尚有“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及“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捐”(见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所引)。

(诸天寅)

【一年】清诗篇名。七律。钱谦益作。见《牧斋有学集》卷八。全诗为:“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势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馀毒螫丹青。”作于清顺治二年(1645)。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年号为弘光。福王在位仅一年即灭亡,故诗题用首句开头二字“一

年”。诗中以福王与陈后主、晋孝武帝作比,指出由于南明政权腐朽堕落,奸佞当权,终于导致迅速灭亡。诗中寄寓了对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谴责了南明奸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在京洛失陷后,仍然迫害坚贞不渝的忠良之上。钱谦益强调诗歌创作应有感而发,抒写性情,其作品均为真实性情的流露。瞿式耜称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邹铤更推崇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併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牧斋先生有学集序》)由于他能够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沉雄博丽”的总体风格,这在本诗中即有所体现。

(诸天寅)

【圆圆曲】清诗篇名。七古。吴伟业作。见《梅村家藏稿》卷一〇。陈圆圆,明末名妓,声色甲天下,后为镇守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妾。李自成攻占北京后,陈圆圆被俘。吴三桂闻讯后,勾引清兵入关,遂演成明朝彻底灭亡,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惨剧。降清后,吴三桂一度飞黄腾达,被封为王。这首长篇叙事诗即作于吴三桂显赫之时。诗中以明末清初李自成入京,崇祯自杀,清兵入关为历史背景,以吴陈关系为线索,通过对陈圆圆曲折经历的描绘,对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陈圆圆,不惜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进行了委婉辛辣的讽刺。对李自成起义军持敌视态度。全诗共七十八句,可分为三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交代背景,由“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引出主要人物陈圆圆。第二部分共六十二句(从“相见初经田窦家”到“一代红妆照汗青”)主要是介绍陈圆圆的身世经历。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但也揭露了她追慕富贵享受的庸俗一面。最后八句为第三部分,抒发诗人的感慨,预言吴三桂不会有好下场。这首诗辞采华美,语言尖锐锋利而又委婉含蓄。基本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平仄韵交替使用,韵律和谐舒缓,节奏明快活泼,读来朗朗上口。形式上受《长恨歌》影响很大。

(诸天寅)

【捉船行】清诗篇名。七古。吴伟业作。见《梅村家藏稿》卷三。顺治、康熙之际,清廷为了镇压各地抗清运动,军事调动十分频繁,地方官吏借口军运,四处捉船,横加勒索。这首诗即反映当时江南水乡船民身遭暴虐、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诗中选取官差捉船这一典型情节,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官差的威逼勒索。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船以钱买脱,中船潜避芦港,倒霉的是小船,由于信息不灵,成为追捕的对象。被捉后,船民不由分说受到鞭打。船户为了生计,只好敛钱致送。此

外还有常行费、门摊等重重额外捐税,百姓之苦,有口难言。妙在结尾处点明一笔:高大巍峨的船根本没有使用,而是长年停泊在码头,打鼓插旗,虚张声势而已。这样就让读者思索,官府乃是有意识地坑害百姓,借机勒索而已。从这首诗的写作可以看出作者不愧是一位深具忧患意识的诗人。(诸天寅)

【海上】 清组诗名。七律。顾炎武作。见《亭林诗文集》卷一。共四首,其中第一、四首较为著名。原诗为:“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万里(一作“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一作“痛苦深”)。水涵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壮士心。”“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此组诗约作于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前一年五月,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同时,浙江绍兴又有张国维、张煌言等拥立鲁王为监国。顾炎武闻知非常高兴。随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并派人与他联络。顾炎武欣然接受任命,曾有应召远赴福州之意。但他尚未成行,即传来闽、浙失利的消息,遂写《海上》四首。从诗的内容上看,当系实地的写景抒怀之作。这四首诗均从登临空山,极目远眺的角度来写。第一首,从回忆十年干戈到想象神山仙阙,抒写自己不平的心情。第四首侧重写结局的悲哀和作者的感慨。自家乡昆山失陷之后,顾炎武离家奔波于江南和浙北一带,积极寻找和联络抗清义军。他怀着家国之痛,登临海上空山,极目远眺,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浮想联翩,思绪万端。诗中把状景、想象与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成为广泛传诵的名篇。这组诗,深得前人赞扬。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中说:“亭林先生诗多沉雄悲壮之作。偶记一律云‘长看白日下芜城……’真气喷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可比也。”确为至论。

(诸天寅)

【精卫】 清诗篇名。五古。顾炎武作。见《亭林诗文集》卷一。精卫,我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相传炎帝之少女名女娃,溺死于东海,死后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见《山海经·北山经》及《述异记》。顾炎武诗作多写兴亡之事,托物寄兴,独抒性情。这首诗作者以精卫自喻,表示自己坚定不移、力图复明的决心。全诗为:“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鹄来燕去自成窠!”诗中以设问开始,引出精卫的回答。有问有答,形式灵活巧妙。“长将

一寸身,衔木到终古”,表面写精卫之志,隐喻诗人复明决心至死不变。结尾二句,既是以燕鹊与精卫比较,又是讽刺那些在明亡之后,贪图富贵,甘心事清的不义之徒。语言平实质朴,不贵奇巧,富于启发性。

(诸天寅)

【山居杂咏】 清组诗名。七律。黄宗羲作。见《南雷诗历》卷一。黄宗羲于清兵入关以后,积极投身抗清复明运动。后隐居著述,屡征不出,终老于家园。这组七律共六首,即为其晚年隐居家园时所作。诗中以调侃轻盈之笔法着意抒写其清贫生活,以示贫贱不能移之气节。如第一首云:“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甘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着多。”罗万藻在《南雷诗历序》中说:“其诗幽折峭拔而恻怛多思”,《山中杂咏》乃“感愤寓物之言”。

(诸天寅)

【髡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 清诗篇名。五古。钱澄之作。见《藏山阁诗存》卷九。此诗写南明奸佞阮大铖降清后暴死结局。诗题之“髡”,指阮大铖,“绝”,意为命绝,“髡绝”即阮大铖命绝而死。诗中所记为作者亲闻耿伯良所述。全诗共一百句,将阮大铖降清附逆,最后死于福建仙霞岭的经过刻画得淋漓尽致。关于阮大铖之死,史书说法不一。此诗当为阮卒之信史。全诗纯用白描,而在平铺直叙中带出讽刺讥弹之意,至为明显。其中如“六月虏渡江,长跪江头迎”;“群酋罕食肉,髡至必大烹”;“健步奔快捷,矍铄聊自鸣”等句,使阮大铖媚敌之丑态跃然纸上。钱澄之的诗作虽然在艺术上借鉴过白居易和陆游,擅长白描,但是并非单纯模拟形似。他做诗一贯反对模仿,其诗能够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二二说:“昔贤评陶元亮(渊明)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指钱澄之诗集《田间集》),庶几其近之。”《髡绝篇》这首诗便是一个例证。

(诸天寅)

【海潮叹】 清诗篇名。七古。吴嘉纪作。见《陋轩诗》卷一。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三日,苏北沿海地区飓风大作,海潮高涨,漂没亭场庐舍无数,男女壮丁死者数万人。飓风凡三昼夜始息;潮退后,草木尽枯死。作者悲天悯人,遂作此诗。诗中着重反映了飓风激潮给沿海居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以及官府并未因此对灾民有所体恤,盐捐粮税照收不误。全诗纯用白描手法,质朴平易,不事雕饰。(诸天寅)

【舟中见猎犬有感】 清组诗名。七绝。宋琬作。见《安雅堂诗集》卷五。作者在船上看到猎犬饭饱睡足,闲着不去猎取野兽,联想到自己虽有远大的抱

负,才能却无法施展,颇有怀才不遇的感慨。全组诗共五首,其第二首较为著名,诗曰:“秋水芦花一片明,难同鹰隼共功名。樵边饱饭垂头睡,也似英雄腴肉生”,这首诗写得极为风趣,作者以猎犬自比,把得宠的权贵比做鹰隼。“樵边饱饭垂头睡”一句,形象地表现出终日无所事事的处境。最后以三国时刘备的故事,说明时不我待,功业未建,含有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的警策之意。顺治五年(1648)于七在山东起义,同族人诬告宋琬与于七同谋,遂被逮捕。释放后,长期闲居在家,故有诗中这种无处效力之感。

(诸天寅)

【钱塘观潮】 清诗篇名。五律。施闰章作。见《学馥堂诗集》卷二八。钱塘江大潮是我国著名自然界奇景之一,每年八月中旬,海潮和江水相激荡,汹涌澎湃,蔚为壮观。作者观潮时是在雨中,更加别有情趣。全诗为:“海色雨中开,涛飞江上台。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绝岸愁倾覆,轻舟故溯洄。鸥夷有遗恨,终古使人哀。”诗中写潮水在雨中的磅礴气势,令人惊心动魄,感慨不已。首联写大海的景色在雨中展现,波涛飞涌一直冲到观潮台上。颔联写涛声犹如千匹骏马疾驰而至,气势就像卷裹着万座山峰一同来到。颈联写海岸像悬在半空,令人担心随时都会翻到海中,轻快的小舟可以凭借潮势逆流而上。尾联以“鸥夷子皮”的故事,凭吊春秋时自杀后被投入钱塘江的伍子胥。

(诸天寅)

【过湖北山家】 清诗篇名。五律。施闰章作。见《学馥堂诗集》卷二八。全诗为:“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村。呼鸡过篱栅,行酒命(一作“尽”)儿孙。去矣吾将隐,前峰恰对门。”诗意淡泊,情趣悠深,字稳句炼,以法度工力见长。施闰章在清初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过湖北山家》属其晚年所作五言近体诗,刻意学唐代王孟韦柳一派,追求空灵蕴藉的情致。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说施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茗。”此诗即是一例。

(诸天寅)

【将归,别练塘诸子】 清诗篇名。五律。陈维崧作。见《湖海楼诗集》卷八。全诗为:“游子衣边雪,慈亲地下心。都将直杖血,迸作苦寒吟。此意复谁识,当歌难自禁。劳君霜下弹,莫打失巢禽。”练塘,地名,在今江苏省丹阳县。这首诗记游子思亲的真情,恻恻动人。陈维崧诗尚词华,受吴梅村影响。徐乾学在《湖海楼诗集序》中说:陈维崧诗“近体似玉谿,歌行之运笔顿挫,婉转丰缛,前少陵而后香山不足多也,顾文益工穷益甚。”杨伦在另一篇序中说:“盖先生之诗文以气为主,故虽镂金错采,绝无堆垛

骘绩之痕,此其所以独胜于诸家者。”试观此诗,清词丽句,哀婉深沉,富有才气,足擅一家。(诸天寅)

【壬戌清明作】 清诗篇名。七律。屈大均作。见《翁山诗外》卷九。壬戌,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当时三藩已先后败亡,台湾郑氏政权亦告倾覆。自清初以来全国范围的抗清运动,至此暂告结束,清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作者眼见复明无望,内心感到无比沉痛,于哀伤中作了此诗。全诗为:“朝作轻寒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全诗因情写景,起首二句先写天气和季节的变化,突出一个“愁”字。落花二句化用杜甫《春望》诗中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落花、啼鸟之无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闷。“龙蛇”二句以龙蛇暗喻隐伏草野,待时而起的志士,同时借寒食节纪念介子推的故事,慨叹自己在明亡之后连归隐安身的处所都没有。全诗的基调较为低沉悲怆,传达了当时志士遗民壮志难酬的共同心态。

(诸天寅)

【于忠肃墓】 清诗篇名。五律。屈大均作。见《翁山诗外》卷五。于忠肃,即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其墓在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这首诗是作者抒发凭吊于谦墓的感受。全诗为:“一代勋猷在,千秋涕泪多。玉门归日月,金券赐山河。暮雨灵旗卷,阴风突骑过。墓前频拜手,愿借鲁阳戈。”起首二句运用赋的手法,概括点明于谦的卓著功勋和悲剧结局。颔联具体铺陈由于于谦坚决抵抗,大败也先,才使明英宗得以塞外生还。颈联通过凄凉气氛的渲染,十分含蓄地为于谦鸣冤,具有很强的震撼力。最后二句既抒发对于谦的崇敬,又表达作者收复国土的雄心。短短四十字融入崇敬、同情、悲痛、愤激多种感情因素,深沉凝重,朴素真切,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诸天寅)

【虎丘题壁】 清诗篇名。七律。陈恭尹作。见《独漉堂全集》卷一。据年谱此诗为清顺治十年(1653),诗人二十三岁时所作。是年诗人自杭州至苏州,游虎丘,故有题壁之作。虎丘山,一名海涌山,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北。《越绝书·吴地传》:“阖闾冢在阖门外,名虎丘。”全诗为:“虎迹苍茫霸业沉,古时山色尚阴阴。半楼月影千家笛,万里天涯一夜砧。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篴客,乞食吴门秋又深。”陈恭尹与梁佩兰、屈大均合称清初“岭南三大家”。其诗“诸体兼擅,手触肩倚,莫不中音,意格浑成,发人神悟”(彭士望《独漉堂诗集序》),尤以七律艺术成就最高。即以此诗而言,写得悲壮苍凉,对仗工整而不露痕迹,寄托遥深而富有情

韵。清人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说他的诗“时或呻吟若伸所痛”，道出其中的抒情特色。（诸天寅）

【水口】清诗篇名。七绝。朱彝尊作。见《曝书亭集》卷一八。作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水口”，地名，在福州西北古田附近，闽江中游。这年夏天，朱彝尊和诗友查慎行同游福州，坐船沿江而下，经过水口，遂作此诗。诗曰：“岸阔滩平漾白沙，船人出险鼓停挝。为贪放溜风头坐，不觉蜻蜓上桨牙。”其中第二句是关键，旧日船过险滩，船夫常击鼓壮胆，此处写鼓停出险，暗示来路经历了无数激流险滩。诗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历险时的惊心动魄场面，而重点写脱离险境后悠闲恬适的情致，乃为反写之法。此诗虽为描写旅次景象之作，但亦交织有诗人身世之感。朱彝尊经历过浙东通海案和宦海风波，如今退隐归田，偕友优游，借景抒怀，才写出这样一首表面悠闲而内里惊险的小诗。（诸天寅）

【秋柳】清组诗名。七律。王士禛作。见《带经堂集·渔洋诗》卷三。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据诗人在《菜根堂集序》中的自述，这年秋季某日，在济南大明湖的水亭中与诸好友聚饮，瞥见湖岸的杨柳已有黄叶，秋色乍染，遂有感而赋此诗。其时作者年方二十四岁，此诗写成之后，传播很广，为其成名之作。原诗共四首，最著名者为其中第一首，诗曰：“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骝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愁总难论。”诗意若断若续，意象的迅捷转换与观念的流动，使全诗显现出感情的跳跃与变幻，具有一种流动、空灵的美感。由于此诗诗意含蓄委婉，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系凭吊明朝济南王府，有的认为写南明亡国遗恨，有的则认为是为南明歌妓而作。总之，借秋柳寄兴，寓意颇深。诗成后，江南诗人多有和作。（诸天寅）

【秦淮杂诗】清组诗名。七绝。王士禛作。见《带经堂集·渔洋诗》卷一〇。共十四首，是作者在顺治十八年（1661）客居金陵，馆于秦淮布衣丁继之家中时所作。丁氏所居，距秦淮之邀笛步甚近。丁少时曾习声伎，经常出入南曲（即旧院，为明末南京歌妓聚居之地）中，得见马湘兰、沙宛在、脱十娘等名妓，故能备述当时曲苑遗事。明亡之后，秦淮无复昔日繁华，作者掇拾丁氏所述，及耳目所接，写成这组伤今吊古，吟咏南京地方风物的诗篇，流连感慨，曾传诵一时。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原列第一首，诗云：“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这首诗以淡墨轻愁勾勒出秦淮浓春烟景的景物特征，寄寓了哀伤往事的无限情怀。（诸天寅）

【真州绝句】清组诗名。七绝。王士禛作。见《带经堂集·渔洋诗》卷一三。此为作者在扬州做官来到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时所作一组写景小诗，共五首，其中最著名的为第三、第四首。“晓上江楼最上层，去帆婀娜意难胜。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离心到秣陵。”“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前一首写作者登楼远眺，目送扬子江中轻盈飘荡的帆船驶向秣陵（今南京市），借景抒发心中的离情别绪。后一首写真州江边秋天傍晚的旖旎风光，恰到好处地点染渔民生活场面，好像是一幅水彩画，令人悠然神往。这两首诗用事、写景工致，音节自然流利，最能表现他所提倡的“神韵”的特色。（诸天寅）

【江上望青山忆旧】清诗篇名。七言绝句。王士禛作。见《带经堂集·渔洋诗》卷二。共两首，其一为：“长江如练布帆轻，千里山连建业城。草长莺啼花满树，江村风物过清明。”其二为：“扬子秋残暮雨时，笛声雁影共迷离。重来三月青山道，一片风帆万柳丝。”两首诗都是写作者乘船在长江上所见到的景色，第一首是写春光明媚的风物，第二首则是描绘出一幅秋江夜雨图。作者倡“神韵说”，主张“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即写诗作画，要注重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刻画出精深独到的意境；写诗不仅要展示眼前之景，更重要的是应写出诗人意中之景，把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融合为一，使诗意浓醇，含蕴丰富，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这两首诗即集中地体现了上述理论主张。（诸天寅）

【寒夜次潘岷原韵】清诗篇名。七律。查慎行作。《敬业堂诗集》卷一。这是作者康熙十八年（1679）在湖北旅途中与友人潘岷所作的一首诗。次韵又称步韵，指和诗时依照原韵原字及相同的次序。全诗为：“一片西风作楚声，卧闻落叶打窗鸣。不知十月江寒重，陡觉三更布被轻。霜压啼乌惊月上，夜骄饥鼠闹灯明。还家梦绕江湖阔，薄醉醒来句忽成。”诗中细致地描写了深秋时节作者为乡愁所扰，在客馆寒夜难眠的情景。统观全诗，抒情层次极为分明，从听觉、触觉、视觉、幻觉等多重角度将秋夜思乡的孤寂之怀层层道出，刻画工细，真实可感。在艺术手法上，通过时间的流动过程，展示难眠的具体情景，化抽象之情为生动、具体的意象，使人体味出作者的凄冷心境。（诸天寅）

【氓入城行】清诗篇名。七古。赵执信作。见《饴山堂集》卷一三。作于康熙十六年（1677）。诗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苏州郊外农民为反抗县官的苛政，蜂拥入城暴动的壮举，表达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样一个在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的主题思想。

开篇四句写县令对百姓一贯凶狠苛刻,因而村民均甚畏惧。以下叙述县令带领手下到村中搜刮民财,激起民愤,村民忍无可忍,终于“一呼万应齐挥拳”,把县令一伙追赶到城里,并捣毁了县衙。在农民的义举面前,“县令深宵匍匐归,奴颜囚首销凶威”,大煞了他昔日的威风。最后四句与开篇四句遥相对照,构成强烈的艺术反差。本篇结构严谨,情采精妙,是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的讴歌农民反抗的优秀之作。

(诸天寅)

【江村】 清诗篇名。七律。沈德潜作。见《归愚诗钞》卷一六。全诗为:“苦雾寒烟一望昏,秋风秋雨满江村。波浮衰草遥知岸,船过疏林竟入门。俭岁四邻无好语,愁人独夜有惊魂。子桑卧病经旬久,里饭谁令古道存。”此诗前四句写江村的秋景,在秋风秋雨中,江村笼罩着烟雾,一片昏暗。后四句抒情,感慨古道今之不存。全诗善于渲染气氛,注重炼句,反映出诗人的格调说主张。梁国治在《归愚诗钞》的题记中说:沈德潜“其长篇大幅,包络宇宙,灭没变化,出奇无穷,老杜之欲掣鲸鱼碧海中也。其近体律绝工整开阖,浑成一气,语近情遥,老杜之老去渐于诗律细也。”清高宗乾隆对其诗也给予很高评价,在《归愚全集》题词中说:“夫德潜之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启)王(士禛)矣,乃独取义于昌黎。归愚之云者,则所谓去华就实,君子之道也。”所评在本诗中皆有所体现。

(诸天寅)

【蒙阴】 清诗篇名。七绝。厉鹗作。见《樊榭山房文集》卷二。全诗为:“冲风苦爱帽檐斜,历尾无多感岁华。却向东蒙看霁雪,青天乱插玉莲花。”厉鹗写诗师法陶渊明、王维,追求清幽峭拔的境界而自成一家。他是浙江钱塘人,在离家北游时,每至佳山胜水,往往即兴赋诗。此诗即在“北来始作泛槎游”期间游至山东蒙阴而作。作者在诗中精心选择了瑞雪新霁、天空转晴这一特定时刻,驰骋丰富的想象,把披雪盛装的东蒙群峰比作上苍于青天之上随意乱插而怒放的白莲花。诗人用文字描摹出一幅幽折峻洁的“雪山行旅图”。厉鹗一生没有步入仕途,长期寄情于自然山水之中,其诗歌内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模山范水,描写祖国秀丽多姿的风景。在艺术上宗宋,格局较小,境界幽远,在当时诗坛上属于因狭出奇,拔戟自成一队的浙派代表诗人。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之十三论厉鹗诗云:“幽怀妙笔风人旨,浙派如何学得来?”(《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二七)道出了厉鹗诗空灵幽峭,不可企及的特点。此诗为其代表作之一。

(诸天寅)

【私刑恶】 清诗篇名。七古。郑燮作。见《郑板桥集二·诗钞》。诗前有小序曰:“自魏忠贤拷掠群

贤,淫刑百出,其遗毒犹在人间。胥吏以惨掠取钱,官长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序中交代出反对私用酷刑逼供的写作目的,但认为胥吏惨掠取钱,官长或不知也,则有掩饰上层统治者的一面。全诗共二十句。前八句写私刑之恶,小吏根本不把百姓当人看待,随意诬民为盗,动用酷刑逼供取赃。中间十句写株连妻女老少,连七十老翁都不放过,行径卑劣,令人发指。最后两句“雷霆收声怯吏威,云昏雨黑苍天泣”,以老天爷也惧怕吏役的威势,写出当时吏治的极端腐败黑暗。诗中对被逼为“盗”者充满同情,表现出关心民间疾苦的进步倾向。

(诸天寅)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清诗篇名。七绝。郑燮作。见《郑板桥集》第五辑“题画”。潍县,今山东省潍县。作者在乾隆十年至十三年(1745—1748)任该县知县。包大中丞括,指作者父执辈包括,时在山东任布政使,署理巡抚,故称之为中丞。全诗为:“衙斋卧听萧萧行,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以丰富的联想,确切的比喻,写出一个廉正的地方官吏对百姓的事不论大小都应关心。诗人善绘墨竹,往往以竹寄托对坚贞、正直、顽强不屈精神品格的赞美。这首题画诗把“竹声”与“民间疾苦”相连,赋予笔下之竹更为丰富的意蕴。语言通俗,诗意隽永,耐人寻味。

(诸天寅)

【梅花岭吊史阁部】 清诗篇名。七律。蒋士铨作。见《忠雅堂诗集》卷二。表彰忠孝节义是蒋士铨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本诗热情歌颂明清之际坚守扬州抗御清兵,最后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同时表示深切的哀悼。全诗为:“号令难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湘。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邙。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九原若遇左忠毅,相向留都出战场。”“梅花岭”,地名,在扬州旧广储门外。“史阁部”即史可法,因曾任南明弘光朝东阁大学士而得名。其衣冠冢在梅花岭。诗中立足“梅花岭”,紧扣“史阁部”,反面以扬州“四镇”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拥兵自重,不听号令,弘光帝及奸佞马士英、阮大铖“君相”征歌选色、醉生梦死的丑行相陪衬,正面以史可法的老师左忠毅公光斗作烘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爱国英雄的光辉形象,称得上是一首感天地泣鬼神的优秀吊古之作。

(诸天寅)

【起早】 清诗篇名。五律。袁枚作。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五。全诗为:“起早残灯在,门关落日迟。雨来蝉小歇,风到柳先知。借病常辞客,知非又改诗。蜻蜓无赖甚,飞满藕花枝。”袁枚早年作过知

县,四十岁告归,卜筑随园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以吟咏书诗为事,过着放情林泉的优游生活。这首诗即为描写家居庭院佳趣之作。诗意浅直率真,韵味浓郁。全诗无一叙说,无一字言情,却于平淡的叙述中展示出真情感、真趣味。诗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含情,于眼前之景暗寓遐思遥想,在轻松疏淡的笔触里透出飘逸、散淡、恬静、深邃的风韵。袁枚论诗倡导“性灵”说,强调性情要真,笔性要灵。他曾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起早》一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代表之作,体现了他作诗务求“味欲其鲜,趣欲其真”(《随园诗话》)的主张。(诸天寅)

【题元遗山集】 清诗篇名。七律。赵翼作。见《瓠北诗钞》。元遗山即金代著名诗人、金末诗风变革的优秀代表元好问。本篇系作者读元好问诗文集后对其的评价和感想。全诗曰:“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此诗前六句写元好问的坎坷经历,最后两句盛赞《元遗山集》的巨大成就,申述诗“穷而后工”之说,阐释诗应反映国家兴亡、人事沧桑之理,点明佳诗绝非单纯吟风弄月之作。元好问诗,内容多写金末战乱中杀戮、掳掠的惨状,艺术上师法杜甫,诗风雄浑开阔,情辞沉郁悲凉。赵翼高度评价《元遗山集》,确有见地。(诸天寅)

【杂感】 清诗篇名。七律。黄景仁作。见《两当轩集》卷一。本篇为作者代表作之一。诗中描写一个萧瑟的夜晚,作者听窗外的风声、虫鸣声,感到人世的艰辛,心中充溢愤愤不平之气。全诗为:“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这首诗写出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下层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以及他们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百无一用是书生”句,是自嘲、愤激之语,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诸天寅)

【都门秋思】 清组诗名。七律。黄景仁作。见《两当轩集》卷一三。都门,指北京。乾隆四十年(1775),作者北上至京,翌年,又接家眷来京。但京城居大不易,作者科场失意,疾病缠身,家计艰难。乾隆四十二年秋,作者登临城门,黄昏远眺,感慨万千,遂赋此组诗。共四首,以原列第二首最为传诵一时。诗曰:“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中通过对自身穷愁潦倒境遇的形象描绘,表

达了不满现状的愤懑,也揭示了所谓“乾嘉盛世”社会生活的真象。诗意沉郁顿挫,语句哀痛,字字辛酸,几令人不忍卒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以这段话评论黄景仁此诗十分贴切中肯。

(诸天寅)

【圈虎行】 清诗篇名。七古。黄景仁作。见《两当轩集》卷一四。约写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778—1780)之间,作者时在京师。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驯虎人的绝技:“虎口呀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舐穀。”同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与虎嬉戏的神态:“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翻身踞地蹴冻尘,浑身抖开花锦茵。盘回舞势学胡旋,似张虎威实媚人。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这首诗的主旨是以虎喻人,寄寓诗人对追名逐利而降志辱身者的嘲讽,抒发了寄人篱下,任人指使的感慨。全诗描写细腻,叙事委婉,构思精严,一气呵成。孙星衍诗评说:“仲则《圈虎行》为七古绝技。”

(诸天寅)

【五人墓下作】 清诗篇名。七律。舒位作,见《瓶水斋诗集》卷四。全诗为:“残碑一丈字犹丹,落日山塘拂藓看。慷慨何殊酬国土,仓黄无那恼中官。狗屠血溅三关热,马鬣封流一水寒。回首西山魂魄馁,碧云何处葬衣冠?”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数万人举行暴动,反抗魏忠贤阉党的专横统治。暴动失败后,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位市民领袖被杀害。事隔十一个月后,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魏忠贤被贬畏罪自缢。苏州士人在原魏忠贤生祠废址为五人建墓立碑。其墓在苏州西北阊门外虎丘,碑立于虎丘前山塘河大堤上。五人墓是明、清两代不少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明代文学家张溥有《五人墓碑记》,明末戏剧家李玉写有长篇传奇《清忠谱》,晚明诗人朱隗有《魏忠贤祠废基旁为五人墓歌》,清代诗人蒋士铨、袁枚均有《五人墓》诗作。在乾嘉诗坛上,舒位诗歌创作成绩突出,与王昙、孙原湘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君”。这首诗描述在落日余晖之中,凭吊五人墓的情景,字里行间寄寓了强烈的爱憎感情和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全诗善于着色,风格奇丽宏富。诚如萧抡《舒铁云孝廉墓志铭》中所说:“兴酣落笔,往往如昆阳之战,风雨怒号,当者无不披靡。”

(诸天寅)

【出嘉峪关感赋】 清组诗名。七律。林则徐作。见《云左山房诗钞》卷七。道光二十二年(1842),作者被褫两广总督职,充军新疆伊犁,于十月十一日出

嘉峪关时所作。嘉峪关,在今甘肃省酒泉县西的嘉峪山西麓,为长城起点。关隘依山而筑,凭险扼守,形势极为险要。明清以来,一直是西北交通要道及防守要塞。此组诗共四首,原列第一首诗最著名,诗云:“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一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人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头只见一丸泥。”诗中极其凝炼地描写出嘉峪关内外的奇异景观,蕴蓄着涵山容海的磅礴气势,同时也刻画出胸中丘壑不平,只身匹马西行远征的自我形象。全诗意境雄浑壮阔,画面高低错落,构成一幅苍凉背景下的“雄关瀚海征人图”。(诸天寅)

【己亥杂诗】清组诗名。七绝。龚自珍作。见《龚自珍全集》第十辑。作者于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辞官南归和北上接眷的往返途中,创作了共三百一十五首七言绝句的大型组诗,总称为《己亥杂诗》。这组诗是作者对前半生生活经验的形象化总结,自述家世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应科举的经历、仕宦生涯、师友交游、个人著述等,内容丰富、复杂,是研究作者生平和晚年作品的重要材料。其中最有名的有原列第五首,诗曰:“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作者辞去了礼部主事的官职,告别同僚旧好,出京南归,心情难免惆怅和眷恋。作者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北京任官职,他自己从童年起就住在北京,二十九岁以后在北京任官职,居住了二十多年并和许多有革新思想的朋友交往,一旦离别,自然怀着无限愁绪。诗中作者以“落红”自比,表示即使化作“春泥”,仍要护育新花的决心。“化作春泥更护花”,既是飞花的自白,也是诗人与腐败官场决裂,向黑暗势力抗争的庄严誓言: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不惜献身甘化春泥。另一首名作原列第一百二十五首,诗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中有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青词,指道上斋醮时的祭神文字。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渴望出现一种政治风雷,打破当时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任用各种人才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全组诗立意高而新,不泥于某一具体问题,而是高屋建瓴,着眼于时代精神面貌的刻画,非有卓异的胆识不能作此高超绝伦的概括。这是诗人一生洞察世变的结晶,实在无愧于“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绝句》)的美誉。通篇以议论入诗,能充分运用比兴和形象说理,将重大题材、深厚丰富的社会内容浓缩在短小的篇幅之中,给人巨大的启迪,且有浓郁的诗情韵味,确为不可多得

之好诗。

(诸天寅)

【夜坐】清诗篇名。七律。龚自珍作。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作于道光三年(1823)春天。时作者三十二岁,在北京以举人资格第四次参加会试,又一次落第,遂作此诗。原作共二首,其一更为流传,诗曰:“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在这首诗里,作者通过对春夜自然景物的描写,巧妙地抒发了期待奇才异能之士出现的愿望,希望尽早结束万籁无言的沉寂局面。诗中的名句“一山突起丘陵妒”,暗寓没有真才实学的官僚妒才忌能,行为卑劣;“江东久陨少微星”一句则悲叹人才零落的现象已经延续很长时间了。全诗托事于物,寓情于景,诗意隽永。(诸天寅)

【三元里】清诗篇名。七古。张维屏作。见《鸦片战争文学集》。这首共三十三句,二百二十四字的长诗,开篇伊始即以“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的撼人声势,统领全篇,点明诗题并交代事件发生的场景和过程。1840年,英国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次年五月,侵略军占领广州附近的泥城和四方炮台,清靖逆将军奕山请降,签订了屈辱的《广州条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爱国义愤。当英军四出骚扰掳掠之时,广州近郊三元里附近的乡民高举“平英团”大旗,自动组织起来与英军展开激战,前后持续三天,围歼英军甚多。这次抗英斗争,拉开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此诗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歌颂了广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作者紧紧围绕三元里斗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一主旨,把万千民众放在全诗的中心来写。其中“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等即是典型例句。另一方面也写到敌人的色厉内荏,恐惧惊慌的心理。笔墨淋漓,豪情酣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则以冷峻的问句鞭挞了清王朝媚颜事敌的可耻行径。这是一首叙事诗,首尾贯注,一气呵成。语言质朴平易。明白中见简括,晓畅中呈劲健,不事雕琢,挥洒自如,炽热的感情以淡语出之。诗中四句一换韵,读来铿锵有力,扣人心弦。清人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誉张维屏诗“清新婉丽,体物浏亮……有据鞍顾盼之概。”以此印证,确为至论。(诸天寅)

【寰海十章】清组诗名。七律。魏源作。见《古微堂诗集》卷九。作者自注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但诗的内容表明,其中多数作于道光二十一年。这年作者在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中,了解到不少有关鸦片战争时期浙东抗英战役情况。作者对朝

廷政策变化无常以及只信任权佞,不信任林则徐等爱国大臣的作法,表示极大愤慨,因此写下这组政治性很强的讽刺诗。由于当时文网森严,诗的表现形式较为含蓄隐晦,而且多用典故,但爱国之情是很强烈的。其中以原列第九首最为有名,全诗为:“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夹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诗辛辣地嘲讽了广东守将奕山畏敌求和的丑行。首联从奕山放弃抵抗写起。二联写英军依仗炮火优势而肆虐无忌。三联揭露清军守将腐败无能,导致败绩。末联斥责清廷不惜用民脂民膏屈辱求和。诗中通过“城上”“城下”“怒潮”“落潮”“宝气”“兵气”的对比,使讽刺、谴责之意表达得更为深入,增强了艺术效果。

(诸天寅)

【双鸩篇】清诗篇名。七古。姚燮作。见《大梅山馆集》卷一〇。鸩,鸟名,羽有毒,用以浸酒,服后可致死。双鸩,指诗中男女主人公双双饮鸩酒自杀。这首诗是作者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会试居北京时所作。诗中记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妇十分恩爱,由于女方父母嫌弃女婿贫寒,硬逼他去边远地区经商,但他不善经营,没能赚钱回来,最后与妻子双双服毒自杀而亡。诗中颂扬了这对男女青年真挚的爱情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的罪恶,唱出了激愤悲恸的不平之声。全诗共三百二十二句,一千九百七十四字,比《孔雀东南飞》一千七百六十五字还长。诗中以七言为主,间以三、五、九言,句式错综参差,富于变化,并融化古乐府、鼓词、民歌等形式,参以李贺奇特瑰丽诗风,在诗歌创作上进行了大胆尝试。例如以花记时,“正月梅花残”、“二月开桃李”等,显系受民歌影响。诗中仍以内心独白式的艺术手法刻画出女青年光彩照人的形象,此作为近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一首长篇爱情叙事诗。

(诸天寅)

【哀旅顺】清诗篇名。七古。黄遵宪作。见《人境庐诗草》卷八。作者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龚自珍之后最杰出的近代诗人。他的诗大多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故有“诗史”之称。本篇即为“诗史”中的一首。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违背民意,采取投降政策,又兼清军积弊重重,腐败不堪,因而中国屡遭败绩,北洋水师也不堪一击。号称“北洋精华”的旅顺军港,于1894年11月22日陷落敌手。作者于同年底或1895年初写作这首诗,愤怒谴责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对国事表示深切忧虑,诗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共十六句,前十二句写旅顺要塞异常险

固的态势,后四句叙写旅顺失陷的经过。全诗语言通俗,描绘如画,哀痛惋惜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诸天寅)

【锡兰岛卧佛】清诗篇名。五古。黄遵宪作。见《人境庐诗草》卷六。据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载:“庚寅正月二十七日午正抵锡兰岛之克伦伯。锡兰一岛长二百五十英里,阔百五十英里,周围得二万五千方英里。开来南庙距岸七英里,余与翻译随员等乘马车往游焉。庙有如来卧像一尊长二丈外,僧云百五十年所塑,又侍者坐佛二尊,其一云系二千四百年前所塑。入庙者皆脱帽献花为礼。此地当即古之狮子国,为释迦如来佛成道之所,或系涅槃之所而非生长之地也。”又据《明史·外国传》载:“僧寺有释迦真身侧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以沉香为之,饰以诸色宝石,庄严甚。”此诗长达二千餘言,层层铺叙,对卧佛雄姿作了生动描绘。梁启超称为“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自豪矣”(《饮冰室诗话》)。这一评价并非过誉。该诗确实气势雄伟,洋洋洒洒,引佛家语,细致描绘了海外卧佛的雄姿,大大地扩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正如作者自己所称“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诸天寅)

【咄咄吟】清组诗名。七言绝句。贝青乔作。见民国二年吴兴嘉业堂丛书第三十四函,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本第二百册。此组纪事诗,内容起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十月奕经奉命东征,止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末奕经于苏州被“拿问进京”,详记诗人在奕经军中的见闻。共分两卷,卷上六十首,卷下六十首,凡一百二十首,卷末另附述怀绝句五首。作者在《自序》中说:“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得有足长胆识者,暇辄记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为二卷,题曰《咄咄吟》,言怪事也。”咄咄,语出《世说新语·黜免》,晋殷浩被黜免,常终日以指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全诗即取此意。鸦片战争中,奕经浙江之行,本想侥幸邀功,无奈将昏兵怯,士气涣散,与敌相接,一触即溃。最后以“乞降”了结浙东战争。组诗中无情鞭挞了清王朝腐朽无能的将领,热情礼赞了英勇抗敌的将士。诗人于道光二十一年投效奕经军幕,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并曾潜入宁波刺探军情,参与前敌作战,因此描写军旅生活和战况十分真实深刻。组诗于每首之后均有一段注文,记叙诗中所述之事,因事作诗,就诗作注,以诗记史,以史证诗,颇有特色。

(诸天寅)

【秋登越王台】清诗篇名。七律。康有为作。见《南海先生诗集》。本篇作于光绪五年(1879)秋,作

者时年二十一岁。全诗为：“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龙蛇最可哀。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时轮回？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越王台，一名粤王台，在广州市北越秀山上，相传为西汉南越王赵佗的点兵台。作者登临古越王台，遥望祖国的大地山川，想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重重危机，从而抒发了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作者一贯主张诗应反映新时期的现实和新诗人的风貌。他在《入境庐诗草序》中说：诗要“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这首诗正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全诗气势奔放，笔力雄健，形成苍凉悲壮的艺术境界。用典精确，熔裁古事，富于暗示作用，使读者联想到正气凛然的文天祥，上下求索的屈原，增强了诗作的历史感。诗中年少才俊、卓厉风发、忧国忧民的诗人自我形象呼之欲出，确乎“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诸天寅）

【出都门留别诸公】 清组诗名。七律。康有为作。见《南海先生诗集》。这组诗写于光绪十四年（1889）八月。此前，作者曾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未能上达，且受到顽固派攻击。是年八月十七日，作者怀着失望而悲愤的心情，离京到南方游历，此组诗即别友时所作。诗题中的“诸公”指京中支持变法的友人。诗前有小序云：“吾以诸生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交代出此次离京的原因。共五首，以原列第一首更为著名，全诗为：“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起首用曲笔写出当时百怪横行的社会背景以及上书请求变法引起的巨大反响。颌联借用龚自珍《夜坐》诗中“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的文意，既寓感叹，又带悲愤。颈联巧用汉文帝时贾谊和三国时祢衡的典故，自明以身许国的心志。最后重申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以及对变法的信心。本诗激情充沛，想象丰富，词语瑰丽，笔势豪纵，显示出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此外，杜诗精工锤炼的语言功力及龚自珍诗独立不羁的战斗精神都在本诗中留有痕迹。

（诸天寅）

【春愁】 清诗篇名。七绝。丘逢甲作。见《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有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条款，这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作者与台湾士民曾抵抗日军，可惜兵败内渡，寄寓广东。1896年春，于马关条约签订一年之后，作者痛定思痛，回顾往事，积愤难遣，遂赋此诗。诗

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此诗写得情动于衷，明白如话。首二句点明题意，作者心中难以排遣的无边春愁正是源于对祖国的热爱。后二句追思往事，呼唤国人切莫忘割地之仇恨。四百万人，指当时台湾的人口。《岭云海日楼诗钞》原注：“四百万人，台湾人口合闽粤籍约四百万人也。”

（诸天寅）

【元宵无月】 清组诗名。七绝。丘逢甲作。见《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四。元宵，农历正月十五，旧称上元。上元之夜，称元宵，即元宵。此组诗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内渡于广东潮州所作。诗中抒发了作者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悲愤以及怀念故乡台湾的深情。共五首，下列二首，更为著名。诗云：“满城灯市荡春烟，宝月沉沉隔海天。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沦没已三年。”“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前一首借元宵灯会上看到的鳌形灯，联想到鳌所背负的神山即为已失去三年的台湾，触物生情，连神仙也会伤心落泪。后一首从望月，到想月，到寻月，抒发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怀念。这不同于一般的乡思，而是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故能深深打动读者。两诗风格苍凉沉郁，语言明快流畅，构思新巧奇妙。

（诸天寅）

【狱中题壁】 清诗篇名。七绝。谭嗣同作。见《莽苍苍斋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捕后狱中。此诗系用煤屑题于牢狱墙壁之上，为近代诗歌中一首著名的绝笔诗。全诗为：“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首句用东汉末年张俭在被迫逃亡的途中，人们看重他的品行声望，都“破家相容”事（见《后汉书·张俭传》），从而设想康、梁等出亡后，会受到人们的救护。次句用东汉安帝时的郎中杜根历尽劫难，终于复官为侍御史事，借以期待维新派人士能效法杜根，度过眼下的劫难。后两句直抒胸臆，表现出作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肝胆两昆仑”，比喻变法失败后无论去者留者都是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像昆仑山一样巍峨高大。

（诸天寅）

【读陆放翁集】 清组诗名。七绝。梁启超作。见《饮冰室合集》。陆放翁即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其诗集为《剑南诗稿》。这组诗是作者阅读陆游诗集时所抒发的感想。共四首，其中两首流传较广。诗为：“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前一首抨击千年以来诗坛上充斥靡靡诗风，销尽了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战斗意志，表现作者胸中愤懑不平之

气。“从军乐”句是说从古到今只有陆游把从军当作乐事写进诗里,因此盛赞放翁才称的上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作者诗末自注:“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后一首写陆游胸怀兵略,一贯主张抗敌复国,可惜一直壮志难酬,辜负了满腹军事谋略。后两句是说陆游对金兵的入侵一直耿耿于怀,但报国无门,只有靠写诗来抒发爱国之情。作者在这首诗末自注道:“放翁集中胡尘等字凡数十见,盖南渡之音也。”南渡是指北宋亡国后,宋高宗赵构逃到江南,建立南宋小朝廷。作者主张写作诗文“笔锋常带感情”,此即一例。

(诸天寅)

【太平洋遇雨】清诗篇名。七绝。梁启超作。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戊戌变法失败,作者流亡海外,前往美洲的旅途中。全诗为:“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前两句气势雄浑,意境开阔。想象雨势磅礴,横贯亚美两洲。后两句借景抒怀,反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句意,感叹自己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劫余幸免于难。从遇雨生发,隐喻自己仍坚持变法图强改良社会的壮志。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著《饮冰室诗话》为之宣传。早年诗作学龚自珍,后学宋人,学杜甫,以旧风格写新现实。对晚清诗坛起有革新改良的进步作用。此诗为其代表作之一。

(诸天寅)

【狱中赠邹容】清诗篇名。五律。章炳麟作。见《章太炎全集》。这首诗是作者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同时在上海租界被捕后,于狱中所作。作者题下自注:“(夏历)闰月二十八日。”即1903年7月22日。全诗为:“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饔。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诗中对邹容为了解救中国的危亡,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英雄气概做了充分的肯定,并表达了与之同生死共命运的深厚友谊。作者作诗不多,辞句古奥,多用典故,其诗论主张学习唐以前的作品,反对宋诗。这首五律写得明白晓畅,朴素简约,感情真挚,激越动人,是为赞颂革命战友而抒写的一首正气歌。(诸天寅)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清诗篇名。七律。秋瑾作。见《秋瑾集》。《秋瑾史迹》此诗题作“日人银澜使者索题,并见日俄战地,早见地图,有感”。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者重新分割朝鲜和我国东北而交战,战场在我国东北境内,清政府却宣布“中立”,听任帝国主义宰割。这首诗是1905年夏作者再次东渡日本时途中所作。全诗为:“万里乘

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一作“难”)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且善作诗歌。这首诗是她晚期作品,笔调雄健,构思巧妙,以观看地图发现改变颜色,暗喻我国领土被帝国主义侵占。诗中对帝国主义强盗蹂躏我国领土,杀戮我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慨,同时表达了不惜以一腔热血拯时救国、力挽狂澜的壮志。诗中渗透着爱国主义的革命激情。

(诸天寅)

【宝刀歌】清诗篇名。七古。秋瑾作。见《秋瑾集》。这是一首长诗,全诗共四十五句,三百十九字。从诗中“几番回首京华望”句,估计这首诗约作于1904年前后,诗人正在日本留学之时。诗的创作动机是诗人接受了一位日本友人所赠的宝刀,遂借刀抒发爱国情思。诗人表示愿持刀驱马,驰骋战场,与敌寇拼杀。另一方面诗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致使“奴种流传遍禹域”。诗人感慨“心死人人奈尔何?”所以才“援笔作此《宝刀歌》”。最后诗体陡变为“辞赋体”,化用汉代贾谊《鹏鸟赋》中的典故,突发奇想,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抒写“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宝刀兮,澄清神州。”诗中的宝刀,既是诗人英雄性格的鲜明写照,又是对武装革命斗争的颂扬。诗人从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血的教训中,痛切地认识到“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的真理。全诗格调高昂,一气奔泻,感情激越。结尾部分以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式,显示诗人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把爱国激情推向高潮。不愧为诗人的代表佳作。诗人生前好友吴芝瑛在《记秋女侠遗事》中说:“(秋瑾)在京师时,摄有舞剑小影,又喜作《宝刀歌》《剑歌》等篇,一时和者甚众。女士原作绝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可见这首诗影响之深广。

(诸天寅)

【孤愤】近代诗篇名。七律。柳亚子作。见《柳亚子诗词选》。全诗为:“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此诗作于1915年,是一首愤世嫉时的政治抒情诗。诗中针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政治形势的急遽变化,痛斥复辟阴谋以及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诗人曾在《天铎报》上撰写《论袁世凯》一文中指出:“袁之为入,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眼见袁世凯阴谋称帝,致使孤愤难扼,随即借用西汉扬雄作《剧秦美新》以及魏晋时阮籍为司马昭写劝进表两则

史实,嘲讽为袁捧场的封建文人。诗的结尾表现出对革命前途充满热切希望。诗中六处用典,借古抒怀,意随笔到,贴切自如,毫无晦涩、板滞之弊。

(诸天寅)

【吊鉴湖秋女士】 近代组诗名。七律。柳亚子作。见《柳亚子诗词选》。诗作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系为哭悼战友女革命家秋瑾而作的挽诗。鉴湖在秋瑾故乡浙江绍兴,秋瑾自号鉴湖女侠。此组诗共四首。以第四首最为著名,诗云:“漫说天飞

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诗中不仅对为国献身的革命烈士寄以深沉的哀思,而且相信先烈的革命精神永存,使人读后从沉痛中受到鼓舞。全诗凄婉真挚,激越悲怆,气脉如注,首尾贯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从诗的节奏和诗人情感变化上,体现出融阳刚与阴柔之美所独具的诗意美感。(诸天寅)

诗坛掌故

【一日三秋】 语出《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形容对人思念之切。三秋，三个秋天。南朝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路迹人遐，音尘寂绝，一日三秋，不足为喻。”唐吴筠《过天门山怀友》：“一日如三秋，相思意弥敦。”唐李商隐《为举人献韩郎中启》：“一日三秋，空咏马嵬之清什。”金李俊明《感皇恩·出京门有感》曲：“一日三秋，寸肠千结。”

（张国风）

【二三其德】 语出《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罔极，没有准则。二三其德，三心二意，本指用情不专。《南齐书·魏虏列传》：“主上方弘大信于天下，不失臣妾。既与辑和，何容二三其德？”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阿英》：“复闻郎家二三其德，背弃前盟。”清浩歌子《萤窗异草·宜织》：“姑佯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令此女又抱弃捐之恨。’”亦作“二三其意”。《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七回：“夫富强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惑于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张国风）

【不稂不莠】 语出《诗经·小雅·大田》：“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原意指谷粒坚实饱满，田里没有杂草。稂、莠皆害苗之草，“不稂不莠”正是丰收景象。后用以比喻不成才、没出息。明毕魏《竹叶舟·收

秀》：“一身无室无家，半世不稂不莠。”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四回：“第一要他自己学好才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儿，岂不可惜？”

（张国风）

【天作之合】 语出《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意谓周文王娶太姒，美满的婚姻是上天撮合的。后用以泛指美满的婚姻。明朱鼎《玉镜台记·下镜》：“以表妹之貌，配温峤之才，真为天作之合。”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二回：“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好姻缘。”偶尔亦用以借指关系亲密的朋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七回：“只见王惠须发皓白，走进门，一把拉着手，说道：‘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

（张国风）

【未雨绸缪】 语出《诗经·豳风·鸛鸣》：“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绸缪即用绳索捆绑，引申为修补。意谓鸛鸣在下雨前就啄剥桑树皮修补窝巢。比喻事先做好准备。清朱用纯《治家格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清无名氏《官场维新记》第四回：“你们中国的兵勇，一到有起事来，不是半途溃散，便是临阵脱逃，那是不管我教习的事，在乎你们自己未雨绸缪的。”

（张国风）

【出谷迁乔】 由低处移到高处。语出《诗经·小

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原指鸟出自深山，移居高树。后用以祝贺人迁入新居，谓之“乔迁”。晋桓温《荐谯元彦表》：“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南朝梁刘孝绰《咏百舌》诗：“迁乔声迥出，赴谷响幽深。”唐张籍《赠殷山人》诗：“满堂虚左待，众目望乔迁。”（张国风）

【如履薄冰】语出《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谓踩在上面，如同走在薄冰之上。比喻做事小心谨慎，惟恐有所失误。汉韦孟《讽谏诗》：“不惟履冰，以继祖考。”唐刘禹锡《让同平章事表》：“退思尘忝，如履春冰。”（张国风）

【板荡】《诗经·大雅》有《板》、《荡》二篇，讽刺周厉王暴虐无道。后遂以“板荡”指政局变乱及社会动荡不安。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北周庾信《伤心赋》：“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清孔尚任《桃花扇》第十六出：“休强，中原板荡，叹王孙乞食江头，栖止榛莽。”也作“版荡”。《旧唐书·萧瑀传》太宗诗：“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张国风）

【投桃报李】语出《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后遂以比喻礼尚往来或相互赠答、报答。亦作“报李投桃”。明高濂《玉簪记》第三十出：“只指望报李投桃，那顾他礼佛看经。”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十九回：“他日小弟敬诣贵邦，王兄如将韵学赐教，小弟定赠美号，以为投桃之报。”（张国风）

【桃之夭夭】语出《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后以“桃”、“逃”谐音，遂以“桃(逃)之夭夭”戏言逃亡不知去向。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两个商量出一条计策来，俟夜静更深，将店中资本席卷，双双的‘桃之夭夭’，不知去向。”清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八回：“等各人走过以后，他才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

（张国风）

【桑梓】语出《诗经·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后遂用以指故乡。汉张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晋陆机《百年歌》之八：“辞官致禄归桑梓，安居驷马入旧里。”清浩歌子《萤窗异草·青眉》：“使狡猾果遂，不独妄羞为弥子之妻，君又何面目归向桑梓乎？”清朱琦《感事》诗：“虏骄愁反复，私忧切桑梓。”（张国风）

【青蝇】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后用以比喻进谗小人。汉王充《论衡·商虫》：“谗言伤善，青蝇污白，同一祸败，《诗》以为兴。”唐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

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清赵执信《遣怀》诗：“飘风踪迹青蝇管，素月心情白堕知。”亦作“苍蝇”。三国魏曹植《赠白马王彪》诗：“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南朝宋鲍照《代白头吟》诗：“食苗实硕鼠，点头信苍蝇。”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张国风）

【黍离麦秀】《诗经·王风·黍离》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黍离。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后遂以黍离、麦秀以指亡国之痛。晋向秀《思旧赋》：“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晋陆机《辩亡论》下：“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宋王安石《金陵怀古》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清史稿·庄元辰传》：“陛下试念两都黍离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张国风）

【美人香草】屈原作《离骚》，时以香草、美人为喻。汉王逸《离骚经章句》：“《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后人遂称《离骚》为美人香草之辞。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寓意于君也”，“留夷、揭车，皆芳草。杜衡，似葵而香，叶似马蹄，故俗云马蹄香也。言己种蒔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清朱冀以为“美人”为屈原自喻（《离骚辨》）。清朱骏声认为是泛指贤士（《离骚补注》）。曹植诗：“有一美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花。”（《渊鉴类函》卷二五五所引）宋苏洵《菊花诗》：“骚人足以思，香草比君子。”（张国风）

【湘灵鼓瑟】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湘水女神。唐钱起有《省试湘灵鼓瑟》诗，其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人传诵，称为绝唱。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怨，湘灵沉怨不知年。”（张国风）

【李代桃僵】《宋书·乐志》卷三《古辞·鸡鸣高树颠》：“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原意谓桃李能共患难，牺牲自己以保全对方，讽刺兄弟却不能互助。后转喻以此代彼或代人受过。旧题明王衡《真傀儡》：“古来史书上呵，知多少李代桃僵。”佚名《古今闺媛逸事》卷二有《李代桃僵》条。清黄遵宪《感

事》诗：“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亦作“僵李代桃”。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诚难消其冤气。”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讼师伎俩》：“今晚勿掩扉，擎孤灯于室中，操刃伺门后，苟有人至，急杀之，李代桃僵，罪可逭也。”（张国风）

【双鲤】《文选·古乐府》卷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汉人书札来往，或以绢素迭成双鱼形状，故名。后人遂以双鲤指书信。唐刘禹锡《途中送崔司业使君扶持赴唐州》诗：“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韩愈《寄卢仝》：“先生有意许降临，更遣长须致双鲤。”或称“双鱼”。唐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五马何时到，双鱼会早传。”宋王安石《次韵酬吴秀珍见寄》诗之一：“君作新诗故起予，一吟聊复报双鱼。”（张国风）

【劳燕分飞】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卷九引《歌辞》：“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伯劳，鸟名。黄姑，星名，即河鼓。后遂称亲友离别为“劳燕分飞”。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转浓，争奈伯劳飞燕各西东。”（张国风）

【瓜田李下】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二《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意谓瓜田里不弯腰提鞋，李树下不整帽子，以避嫌疑。“瓜田李下”比喻易招嫌疑之处。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五：“惧获瓜田李下之讥。”《北史·袁聿修传》：“与邢邵书云：‘今日仰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厚责。’”《旧唐书·柳公权传》：“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宋洪迈《容斋三笔·白公夜闻歌者》：“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记讥也。”（张国风）

【人生如寄】《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意谓人生短促，犹如暂时寄住世间。三国曹丕《善哉行》诗：“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北史·韩风传》：“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张国风）

【秉烛夜游】《古诗十九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意谓人生短暂，何不及时行乐。又三国曹丕《与吴质书》：“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颜氏家训·勉学》：“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唐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张国风）

【诗婢】懂诗的奴婢。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

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胡为乎泥中”，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出自《邶风·柏舟》。（张国风）

【秋风团扇】汉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唐郑谷《代秋扇词》：“汗流浹背曾施手，气爽中宵便负心。”暗用此事。唐刘禹锡《团扇歌》：“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唐项斯《古扇诗》：“昨日裁成夺夏威，忽逢秋节便相违。”南朝梁刘孝绰《班婕妤》：“妾身似团扇，君恩绝履綦。”后人以“秋风团扇”比喻妇人因年老色衰而见弃。（张国风）

【倾城倾国】《汉书·外戚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后因以用“倾城倾国”形容绝色女子。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计倪》：“太宰嚭乃比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求鉴于前史。”五代蜀薛昭蕴《浣溪沙》之七：“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怎当他倾国倾城貌。”元白朴《梧桐雨》第一折：“一个太真妃倾国倾城。”（张国风）

【河梁别】旧题汉李少卿（陵）《与苏武》诗之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河梁即桥梁，后用以指送别、离别。南朝萧谡议《西上夜集》诗：“徘徊将何忧，惜别在河梁。”南朝吴均《别夏侯故章》诗：“新知关山别，故人河梁送。”南朝江总《别袁昌州》诗：“河梁望陇头，分手路悠悠。”又《赋得携手上河梁应诏》诗：“秦川心断绝，何悟是河梁。”北周庾信《拟咏怀》：“游之河梁上，应将苏武别。”唐杜牧《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同心真石友，写恨蔑河梁。”唐唐彦谦《春残》诗：“落花如便去，楼上即河梁。”清牛运震《送观察顾公之任闽中》诗：“看君移节去，飞动过河梁。”（张国风）

【诗妖】指某些预示祸福征兆的诗歌谣谚。东汉王充《论衡·订鬼》：“诗妖童谣石言之属，明其言者也。”《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钳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张国风）

【老骥伏枥】比喻年老而有壮志。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晋书·乐志》于是篇下题作《碣石篇》。宋陆游《闻虏乱有感》：“羞为老骥伏枥悲，宁作枯鱼过河泣！”又《老学庵笔记》卷一：“用飞龙在天，对老骥伏枥。”又《与何蜀州启》：“老骥伏枥，虽未离于壮心；逆

风撑船，终不离于旧处。”

(张国风)

【黄绢幼妇】《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妇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后人多以“黄绢”二字指绝妙好词。唐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唐白居易《赋赋》：“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清赵翼《瓯北集·圣寿谭思黄养老翼以年逾八十得释绢绵米肉之赐》诗：“残牙曾吃红绫饼，妙句渐无黄绢辞。”

(张国风)

【官渡柳】三国魏文帝曹丕《柳赋》：“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感物斯怀，乃作斯赋……”后多以感物伤怀。北周庾信《奉报寄洛州》诗：“黎阳水稍绿，官渡柳应春。”

(张国风)

【荡气回肠】源出宋玉《高唐赋》：“感心动耳，回肠伤气。”魏文帝曹丕《大墙上蒿行》：“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亦作“回肠荡气”。朱自清《读〈湖畔〉诗集》：“就会有悲哀的影闪过他们的眼前，他们坦率的心情也能将他融和，使他再没有回肠荡气的力量。”

(张国风)

【七步成诗】《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用煮豆燃萁，比喻兄弟相逼、骨肉相残。后人又以“七步成诗”誉人文思敏捷，称“七步才”。《北齐书·魏收传》：“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唐李峤《诗》：“天子三章传，陈王七步才。”宋李洪《偶成律句十四韵》：“七步才空敏，千言敌必劲。”元武汉臣《玉壶春》第三折：“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

(张国风)

【傅粉何郎】《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孝标注云：“《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后遂以“傅粉何郎”指美男子。《全唐诗话》卷二李端《赠郭驸马(暖)》：“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元郑德辉《伯梅香》第三折：“唬的那有情

人恨无个地缝儿藏，羞杀我也傅粉何郎。”

(张国风)

【秀色可餐】极赞妇女容色之美。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山堂肆考·美妇》引《南部烟花录》：“隋炀帝每视御女吴绛仙，谓内侍曰：‘古人谓秀色若可餐，绛仙者，可以疗饥矣。’”也用以形容山川秀丽。宋王明清《挥麈录》卷二引李质《艮岳赋》：“森峨峨之太华，若秀色之可餐。”宋辛弃疾《临江仙·探梅》：“剩向青山餐秀色，为渠着句清新。”

(张国风)

【长绳系日】用长绳把太阳拴住，指把时光留住。晋傅玄《九曲歌》：“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唐李白《惜馀春赋》：“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古书。”

(张国风)

【小家碧玉】《玉台新咏》卷一〇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本是人名，后以泛称小户人家的美貌少女。明范文若《鸳鸯棒》传奇二：“小家碧玉镜慵施，赵娣停灯臂支粟。”清彭养鸥《黑籍冤魂》第二十一回：“无论南部烟花，小家碧玉，只要有宜男相，便算得如意珠。”

(张国风)

【一吟一咏】《世说新语·品藻》：“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支道林即名僧支遁，孙兴公即孙绰，许掾指许询。意谓在诗文方面，许询要拜我为师。一吟一咏指吟诗作赋。

(张国风)

【赏奇析疑】晋陶潜《陶渊明集》卷二《移居》诗之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多用于贬义，意谓对荒谬的文章加以剖析。

(张国风)

【锦字】据《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载，前秦刺史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氏思念丈夫，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赠送丈夫，可循环读之，凡三百四十字。后遂以妻子寄丈夫之书信为“锦字”。唐骆宾王《代郭氏答卢照邻》诗：“锦衣回文欲赠君，剑壁层峰自纠纷。”唐李白《久别离》诗：“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唐杜甫《江月》诗：“谁家挑锦字，灭烛翠眉颦。”

(张国风)

【柳絮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兄子，谢朗。兄女，谢道蕴。后人称才女为“柳絮才”，或“咏絮才”。宋苏轼《谢人见和雪夜》诗：“渔蓑句好真堪画，柳絮才高不道盐。”《红楼梦》第五回：“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张国风)

【一笑千金】形容美人的笑颜极其难得,价值千金。南朝宋鲍照《代白紵曲》:“齐讴秦吹卢女弦,千金顾笑买芳年。”东汉崔駰《七依》:“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南朝梁王僧孺《咏宠姬》:“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东周列国志》第二回:“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八:“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张国风)

【一枝春】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人遂以“一枝春”指梅花。寓报春梅花之意。宋黄庭坚《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诗之一:“欲问江南近消息,喜君贻我一枝春。”宋陈师道《和豫章公黄梅二首》之一:“寒里一枝春,白间千点黄。”

(张国风)

【八斗才】后晋李瀚《蒙求集注》:“谢灵运尝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宋无名氏《释常谈·八斗之才》:“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旧时称誉才学之士为“八斗之才”。唐李商隐《可叹》诗:“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陈王即陈思王曹植。唐徐夤《献内翰杨侍郎》诗:“欲言温暑三缄口,闲赋宫词八斗才。”唐赵嘏《广陵答崔琛》:“八斗已闻传姓字,一枝何足计行藏。”明汪道昆《洛水悲》:“帝子驰名八斗,神人结好重渊。”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黄金屈戌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明陈汝元《金莲记·偕计》:“不佞姓苏,名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清《再生缘》第一回:“学富五车真不假,才高八斗果非轻。”

(张国风)

【梦吟春草】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后以此喻兄弟间的思念。清蒲松龄《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抄》诗:“一身浪迹海鸥轻,春草池塘梦不成。”

(张国风)

【江郎才尽】《南史·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寻寺渚,

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蹶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后遂以“江郎才尽”泛指才思衰退。南朝梁钟嵘《诗品》中:“齐光禄江淹。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是为《南史》张本。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一回:“(紫芝道)如今弄了这个,还不知可能敷衍交卷,我被你闹的真是江郎才尽了。”

(张国风)

【一官一集】封建士大夫以自己的官名作为文集的名称,始于南朝梁王筠。《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宋楼钥《送杨廷秀秘监赴江东漕》诗:“一官定一集,流传殆千卷。”

(张国风)

【驴鸣犬吠】形容诗文拙劣。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六:“南人问(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思、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亦作“驴鸣狗吠”。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一三:“僧问:‘如何是梵音机?’师曰:‘驴鸣狗吠。’”

(张国风)

【脂粉气】唐宋之问《伤曹娘》诗:“独怜脂粉气,犹着舞衣中。”后因妇女用脂粉美容,遂称柔艳之风为脂粉气。宋陈善《扞虱新话》卷二《诗评乃花谱》:“予尝与林邦翰论诗,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虽佳,不免有脂粉气,不似‘朱帘暮卷西山雨’,多少豪杰。”

(张国风)

【夺锦才】《新唐书·宋之问传》:“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后因称出人之才为“夺锦才”。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宋陆游《赠邢刍甫》:“割愁何处有并刀,倾座谁能夺锦袍。”明高启《谢赐衣》诗:“被泽徒深厚,惭无夺锦才。”

(张国风)

【镂月裁云】比喻工巧。唐李义府《堂堂词》之一:“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宋李觏《和慎使君出城见梅花》诗:“化工呈巧毕寻常,镂月裁云费刃芒。”

(张国风)

【一家春】形容良辰美景或美好的生活景况。唐

王勃《山扉夜坐》诗：“林塘花月下，别是一家春。”唐杨巨源《圣寿无疆词》十之四：“云山九门曙，天地一家春。”（张国风）

【天涯比邻】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谓两心相通，虽天各一方，犹近若比邻。（张国风）

【曙后星孤】唐孟荣《本事诗》：“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试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司其自谥也。”“曙”、“星”皆语文双关。后称人死后唯遗孤女者为“曙后星孤”。清朱祖谋《减字木兰花·八哀》词：“曙后星孤，留得传家一砚无？”（许逸民）

【柳暗花明】原意指绿柳成荫，繁花耀眼。唐王维《早朝》诗之二：“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宋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作“花明柳暗”。唐李商隐《夕阳楼》：“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今又以“柳暗花明”比喻事情已无希望，忽然出现转机，成一新的局面。（张国风）

【红豆相思】唐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后遂以红豆比喻爱情或相思。宋程大昌《演繁露》：“唐世镂骨为窍，朱墨杂涂，数以为采。亦有出意为巧者，取相思红子纳入窍中，使其色明现而易见。故温飞卿艳词曰：‘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未知？’”（张国风）

【一泻千里】原指江河水势浩大迅猛，奔腾直下，后借以形容文笔气势奔放。唐李白《赠从弟宣州长史昭》：“长川豁中流，千里泻吴会。”宋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书》：“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宋李涂《文章精义》卷七七：“唐子西文极庄重缜密，虽幅尺稍狭，无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然最利初学。”明王世贞《文评》：“方希直（孝孺）如奔流滔滔，一泻千里，而潞回滢漾之状颇少。”明焦竑《玉堂丛语·文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泻千里。”亦作“一泻百里。”唐韩愈《贞女峡》诗：“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张国风）

【诗佛】①指盛唐诗人王维。王笃信佛教，诗负盛名，且受佛教影响甚深，在当时即有“当代诗匠，又精禅理”（《黄檗山断际禅师传法心要》）的赞誉，明代胡应麟评其《辛夷坞》等诗为“入禅宗”之作（《诗薮》内编卷六）后世论者更称其为“诗佛”。②指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云：“蒋心馀太史自称诗仙，而称余为诗佛，想亦广大教主之义。”（吴小林）

【一片冰心】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之二：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后因以“一片冰心”喻心地纯洁。亦比喻性格淡泊，无意名利。旧时文人用以标榜清高。亦可省称“一片冰”。唐杨巨源《酬崔博士》：“青松树杪三千鹤，白玉壶中一片冰。”（张国风）

【诗天子】指盛唐诗人王昌龄。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三云：“昌龄江宁人……史称其诗句密而思清。唐人《琉璃堂图》以昌称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后清宋荦《漫堂说诗》亦云：“诗至唐人，七言绝句尽善尽美……太白、龙标（王昌龄），绝伦逸群。龙标更有‘诗天子’之号。”（吴小林）

【诗家夫子】指盛唐诗人王昌龄。唐人撰《琉璃堂墨客图》中，有“王昌龄，诗夫子”之称。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云：“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吴小林）

【旗亭画壁】唐薛用弱《集异记·王涣之》：“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贯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讌……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筵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掀袖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旗亭，酒楼。“王涣之”系“王之涣”之误。（张国风）

【更上一层楼】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后用以比喻再接再厉，更前进一步之意。（张国风）

【不如归去】相传古蜀帝杜宇，含冤死去，化为杜鹃，即子规。杜鹃鸟鸣声即“不如归去”，旧诗文中多用为思归之词。李白《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宋梅尧臣《杜鹃》诗：“不如归去语，亦自古来传。”宋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不信

呵,去那绿柳影里,听杜鹃,一声声道不如归去。”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三·杜鹃》:“鹃与子雉、子规、催归诸名,皆因其声似,各随方音呼之而已,其鸣若曰‘不如归去。’”

(张国风)

【马耳东风】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意谓言不入耳、不中听。或指不相干。宋苏轼《和何长官六言次韵》:“青山自是绝色,无人谁与为容?说向市朝公子,何殊马耳东风!”宋陆游《衰病》:“仕宦蚁窠梦,功名马耳风。”

(张国风)

【梦笔生花】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后遂以此比喻文人才思丰富。又有“生花妙笔”、“妙笔生花”之称。

(张国风)

【别有天地】唐李白《山中问答》:“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意谓另有一种境界。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但谓涧底流泉,别有天地,不复知峰头春色,更占人间也。”亦作“别有天”。宋董嗣杲《庐山中即事》诗:“莲社招无地,桃源别有天。”

(张国风)

【诗仙】指李白。唐魏颢《李翰林集序》:“故宾客贺公(知章)奇白(李白)风骨,呼为谪仙子。”唐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人言太白(李白字)仙才,长吉(李贺字)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宋徐积《李太白杂言》“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馀年,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明王穉登《合刻李杜诗集序》:“王子曰:余曷敢言诗,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李白)之诗仙,拾遗(杜甫)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亦犹禅人所谓顿渐,李顿而杜乃渐也。”清王嗣奭《梦杜少陵作》:“青莲(李白)号诗仙,我翁(杜甫)号诗圣。”

(张国风)

【钓鳌客】《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五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后人遂以钓鳌客喻豪迈之举止。唐李白《赠薛校书》:“未侔观涛作,空郁钓鳌心。”宋赵德麟《侯鯖录》卷六:“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钓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

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时相悚然。”唐王严光、张枯亦曾以钓鳌客自居。见于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五《钓鳌客》。

(张国风)

【铁杵磨针】亦称“磨杵成针”。《潜确类书》卷六〇:“李白少读书未成,弃去。道逢老嫗磨杵,白问其故,曰:‘欲作针。’白感其言,遂卒业。”后遂以此比喻只要下苦功,一定能成功。明郑之珍《目连救母》传奇四《刘氏斋尼》:“只在自家警省,好似铁杵磨针,心坚杵有磨针日,莫惜区区岁月深。”清颐琐《黄绣球》第十回:“拼着些坚忍工夫,做到铁棒磨成针的地位,看似发达得迟,实在收效最速。”今俗语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

(张国风)

【锦囊佳制】锦囊,锦制之囊。佳制,出色的诗文。意谓妙品、妙作。唐李白《颖阳别元丹丘之淮阳》:“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吾身。”唐李商隐《李贺小传》:“(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苏轼《次韵王晋卿奉诏押高丽燕射》:“锦囊诗草勤收拾,莫遣鸡林得夜光。”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亦作“锦囊佳句”。清沈复《浮生六记·闺房记东》:“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原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天寿之机此已伏矣。”

(张国风)

【吟风咏月】唐范传正《李翰林白墓志铭》:“吟风咏月,席地幕天,但贵其适所以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本指诗人以风月等自然景物为题材,形容心情的悠闲自在。后多含贬刺之意,谓诗歌流连光景,脱离现实。亦作“吟风弄月”、“嘲风弄月”、“弄月嘲风”等。唐白居易《将归渭村先寄舍弟》诗:“咏月嘲风先要减,登山临水亦宜稀。”宋朱熹《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风弄月兴何长。”《宋史·周敦颐传》:“程颢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元无名氏《争报恩》第二折:“俺又不曾弄风嘲月,怎揽下这愁山闷海。”《水浒后传》第六回:“我和你今日啸傲烟霞,嘲风弄月,何等自在。”

(张国风)

【一寸丹心】唐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意即一片赤诚之心。宋杨万里《新除广东常平之节感恩书怀》诗:“向来百炼今绕指,一寸丹心白日明。”亦作“一寸赤心”。宋陆游《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诗:“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

(张国风)

【一洗凡马空】意谓一扫平庸之辈。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宋孙觌《送王循道赴省试四首》之二:“天厩四十

万,一洗凡马空。”

(张国风)

【白衣苍狗】比喻世事变幻无常。唐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宋张元幹《芦川词·瑞鹧鸪·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词:“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浮名一聚散。”宋刘克庄《后村别调·沁园春·和吴尚书叔永》词:“笑是非浮论,白衣苍狗;文章定价,秋月华星。”明汤显祖《合奇序》:“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亦作“白云苍狗”。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处刺史当艚》:“荣枯本是无常数,白云苍狗刹那间。”清姚鼐《慧居寺》诗:“白云苍狗尘寰感,也到空林释子家。”(张国风)

【今雨】唐杜甫《秋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意谓以往宾客们下雨亦来,如今下雨却不来了。后用“今雨”指新交的朋友。宋范成大《丙午新正书怀》诗:“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又《题请息斋六言十首》之八:“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清钱谦益《八月初二日度淮》诗:“关心旧雨还今雨,回首长亭复短亭。”(张国风)

【风吹雨打】唐杜甫《三绝句》:“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指风雨的摧残。也常用以比喻恶势力的迫害。唐陆希声《李径》诗:“风吹雨打未摧残。”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又《浣溪沙》词:“未到山前骑马回,风吹雨打已无悔,共谁消遣两三杯?”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张国风)

【冰雪聪明】唐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上句指才干非凡,下句指用兵勇武。后用以誉人聪明剔透。清曾朴《孽海花》第十回:“俄国有一班大文豪,叫做赫尔岑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冰雪聪明的文章,写雷霆精锐的思想,这种议论,就容易动人听闻了。”清金埴《读杜诗详注》:“聪明直令冰雪净,清真都使铅华剗。”(张国风)

【别开生面】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赵次公注:“凌烟画像颜色已暗,而曹将军重为之画,故云开生面。”后引申为另创新局。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张国风)

【春树暮云】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

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罇酒,重与细论文。”渭北,杜甫所居之地,江东,李白所居之地。借云树写思念之情。后遂以“春树暮云”为怀念远方友人之辞。

(张国风)

【诗王】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杜子美十馀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浩已降,可于豆垆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诗王”乃传说中对杜甫的美称。

(张国风)

【诗史】唐孟棻《本事诗》:“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意谓杜诗深刻反映了时代的苦难,犹如诗歌写成的历史。《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元宋无《杜工部祠》:“秋风茅屋句,春日杜鹃心。诗史孤忠在,文星万古沉。”清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诗:“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清熊文举《白帝城》:“无由吊诗史,寂寞少陵心。”清徐增《读杜少陵诗》:“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清程可则《题杜少陵画像》:“一生落拓无穷已,独有豪吟咏诗史。”清金埴《读杜诗详注》:“杜陵遗老才非凡,诗史诗圣称名咸。”(张国风)

【诗伯】诗坛宗伯,诗坛领袖。唐杜甫《赠毕四曜》:“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至今人称酒仙、诗伯,皆推李白为第一云。”清李节《耒阳吊杜子美》:“惆怅杜陵老诗伯,断碑古木绕荒丘。”(张国风)

【诗圣】诗中之圣,指唐杜甫。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评李杜》:“李白神于诗,杜甫圣于诗。”明陈献章《白沙论诗》:“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清王嗣奭《梦杜少陵作》:“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浣花草堂二首》之二:“诗圣神交盖有年,到来追想一凄然。”清金埴《读杜诗详注》:“杜陵遗老才非凡,诗史诗圣称名咸。”(张国风)

【稻粱谋】本意为鸟觅食,后用以比喻人谋求衣食。唐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清龚自珍《咏史》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张国风)

【横槊赋诗】《旧唐书·杜甫传》:“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宋苏轼《前赤壁赋》:“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张国风)

【翻云覆雨】唐杜甫《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意谓反覆无常,或指玩弄手

腕。宋黄机《木兰花慢·次岳总干韵》词：“世事翻云覆雨，满怀何止离忧。”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半山老人三》：“（王安石）《老人行》云：‘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后笑。’前句老杜《贫交行》，后句老杜《莫相疑行》。”元乔吉《扬州梦》第四折：“翻云覆雨，陷入坑阱。”宋李曾伯《念奴娇·丙午和朱希真老来可喜韵》词：“八尺藤床，二升粟饭，方寸恢馀地。翻云覆雨，从伊造物儿戏。”也作“覆雨翻云。”清顾贞观《弹指词》下《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张国风）

【惨淡经营】 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意匠惨淡经营中。”意谓煞费苦心地谋划经营。宋楼钥《它山堰》诗：“想得惨淡经营时，下上山川应饱看。”清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然其惨淡经营之心力，亦可见矣。”（张国风）

【五言长城】 《新唐书·秦系传》：“（秦系）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权德舆语见其所著《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权载之文集补选》载）“长城”喻其固守难攻，人不能胜。后称长于五言诗者为“五言长城”，亦作“五言金城”、“五言城”。宋马令《南唐书·儒者传》：“刘洞，庐陵人。小游庐山，学诗于陈贶，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庐山二十年，长于五言唐律，自号五言金城，得贾岛遗法。”宋赵蕃《送刘伯瑞》：“长怀远斋老，赠我五言城。”（许逸民）

【孤云野鹤】 唐刘长卿《送方外人》：“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比喻逍遥闲暇之人。又作“野鹤孤云”。元王结《再次丛字韵》诗：“野鹤孤云应笑我，几年能了济时功？”明李贽《喜杨凤里到摄山》诗：“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到山寺。”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成仙》：“孤云野鹤，聊无定所。”（张国风）

【八面玲珑】 唐卢纶《赋得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幕》诗：“四户八窗明，玲珑逼上清。”意谓窗户多，宽敞而又明亮。元马熙《开窗看雨》诗：“洞房遍药屋遍荷，八面玲珑得月多。谁遣天飘絮云过，嫩凉扶我入无何。”后常用以比喻处世圆滑，敷衍各方关系。宋释惟白《续传灯录》卷三七《绍隆禅师》：“锋芒不露，无孔铁锤，八面玲珑，多虚少实。”宋夏乃鼎《满庭芳》词：“虽是无为清静，依然要八面玲珑。”宋葛长庚《满江红·听陈元举琴》词：“八面玲珑光不夜，四面晃耀寒如月。”清曾朴《孽海花》第七回：“原来宝廷的为人，是八面玲珑，却十分落拓。”（张国风）

【人面桃花】 唐孟郊《本事诗·情感》：“博陵崔护……独游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

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睊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祇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崔护得知后，悲恸欲绝，伏尸大哭，而女“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崔护有《游城南》诗，《本事诗》遂由此生发、想象、渲染而成一爱情传奇。“人面桃花”，或指男女邂逅，随即离散，事后追念之不胜惆怅；或指内心爱慕而又不可相见之女子；或指事过境迁，不可复得。（张国风）

【一朝权在手】 唐朱湾《奉使设宴戏掷龙筹》诗：“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指一旦大权在握。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警世格言》：“一朝权在手，堪作令行人。”明顾大典《青衫记·承瑞授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小三军，听吾命令！”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七回：“卜知府本是个欢喜多事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行文各属，查取拖欠的数目，以及各花户的姓名。”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五回：“三天成殓以后，龙光就自己当家。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陆续把些嫖娘先打发出。”（张国风）

【对床夜雨】 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写兄弟相聚之亲密友爱。又唐白居易《招张司业宿》：“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写希望与好友聚会畅谈的心情。宋苏轼、苏辙兄弟自小情笃，及长各游宦四方，后读韦诗而感动，相约早退仕途，向往风雨之夜兄弟对床夜语，遂成故事。苏轼《东府雨中别子由》诗：“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苏辙《后省成直宿呈子瞻》诗：“射策当年偶一时，对床夜雨失前期。”宋辛弃疾《永遇乐·戏赋辛字送十二弟赴都》词：“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夜雨。”又作“对床夜语”。宋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张国风）

【曾经沧海】 《孟子·尽心上》：“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旦旦暮

暮,阳台之下。”唐元稹合用二典于其《离思》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原意是自己经历了最美好的爱情,也就不在意其他的恋情了。后遂用以比喻心中已有理想的意中人,再也看不上别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朱重因见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闲的不看在眼里,立心要访求个出色的女子,方才肯成亲。以此日复一日,担搁下去。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亦作“观于海者难为水”。指见过大场面。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八回:“唐敖四周眺望,眼界为之一宽,真是‘观于海者难为水’,心中甚喜。”(张国风)

【一串珠】唐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之三:“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也作“一串骊珠”。比喻歌声圆转如珠,连续成串。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有子母调,有姑舅兄弟,有字多声少,有声少字多,所谓一串骊珠也。”清洪昇《长生殿·弹词》:“一串骊珠声和韵闲,恰便似莺与燕弄关关。”(张国风)

【大珠小珠落玉盘】唐白居易《琵琶引》:“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意指琵琶之圆润清脆,犹如珠子滚落玉盘。后用以泛指乐声之优美。

(张国风)

【千呼万唤】唐白居易《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指一再地呼唤催促。《玉灯会元·智门祚禅师法嗣》:“师曰:‘却须吃棒,上堂口罗舌沸,千呼万唤露柱因甚不回头?’良久曰:‘美食不中饱,人吃便下座。’”朱自清《温州的踪迹》:“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命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张国风)

【长安居大不易】唐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宋尤袤《全唐诗话》二:“乐天未冠,以文谒顾况,况睹姓名,熟视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乃披卷读其《芳草》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前吾戏之耳。’”后以“长安居大不易”比喻都市求生之艰难。清宣鼎《夜雨秋灯录·记李三三逸事》:“惟是长安居大不易,乃知囊内钱空,始觉旧游如梦。”(张国风)

【锦绣堆】唐白居易《酬卢秘书二十韵》诗:“笔尽铅黄点,诗成锦绣堆。”此以“锦绣堆”比喻诗句秀丽,佳词成堆。唐谢廷浩以擅长辞赋著名,号“锦绣堆”。

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海叙不遇》。

(张国风)

【野火春风】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遂以“野火春风”比喻两种势力互相对抗、竞争。今人李英儒有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

(张国风)

【望眼欲穿】唐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三十韵》:“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后遂以望眼穿或望眼欲穿形容盼望之殷切急迫。元王恽《送李郎中北还》诗:“落日乡音杳,秋空望眼穿。”明西湖居士《明月环》传奇《诘环》:“小姐望眼欲穿,老身去回复小姐去也。”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

(张国风)

【压倒元白】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元稹)、白(白居易)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后用以泛指作品超过同时代的名家。元钟嗣成《录鬼簿》下:“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先生(宫天挺)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词章压倒元白。凭心地据手策,数当今,无比英才。”(张国风)

【二分明月】唐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意谓天下三分明月,扬州占了二分,以此形容扬州当日的繁华。

(张国风)

【石破天惊】唐李贺《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原意是指李凭的箜篌高亢激越,竟把女娲当年用五色石修补的天惊破了,秋雨纷纷地漏落下来。后用“石破天惊”比喻文章议论的出人意外乃至引起轰动。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向予见《楚辞听直》一书,能使灵均别开生面,每出一语,石破天惊,虽穿凿附会不少,然皆能发人神智。”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你只道你们两个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大心事,这等为难。”清张春帆《宦海》第十九回:“陈继泰被他们这样的一来,好似雷霆乍震,石破天惊,只吓得个肺腑皆崩,神魂出窍。”

(张国风)

【天荒地老】亦作“地老天荒”。极言历时之久远。唐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宋杨万里《谒永祐陵归途游龙瑞宫观禹穴》诗:“禹穴下窥正深黑,地老天荒知是非。”宋文天祥《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之二:“国破家亡双泪暗,天荒地老一身轻。”金元好问《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暮云横阁古今情,地老

天荒恨难平。”元费唐臣《贬黄州》：“诗吟的神嚎鬼哭，文惊的地老天荒。”元无名氏《浣范叔》第二折：“一轮红日为谁藏，地老天荒。”明瞿佑《剪灯新话》卷四：“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盖谓世间惟有愿得成双的，随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张国风）

【齐烟九点】唐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齐州，指中国九州。言居绝高而视人间，九州不过点烟杯水而已。宋刘昌诗《白玉楼赋》：“俯齐州兮九点烟，瞰苍溟兮一杯水。”金元好问《范宽秦川图》诗：“西山盘盘天与连，九点尽得齐川烟。”清黄遵宪《海行杂感》诗：“九点烟微三岛小，人间世要纵婆娑。”（张国风）

【诗鬼】《文献通考·经籍六十九》：“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元李维桢《昌谷诗解序》：“世目李长吉为鬼才。……然则鬼才岂易言哉！”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序》：“夫太白之诗，世以为飘逸；长吉之诗，世以为奇险。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长吉即唐诗人李贺之字。李贺诗神秘、奇谲、凄恻、艳丽，故世有“鬼才”、“诗鬼”之称。

（张国风）

【黑云压城城欲摧】唐李贺《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写敌人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形势危急。战士严阵以待，军容齐肃。现多以“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容反动势力的一时猖獗。

（张国风）

【天香国色】本为称颂牡丹之美，非他花可比。唐李肇《松窗杂录》：“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金元好问《兰文仲郎中见过》：“水碧金高步兵酒，天香国色洛阳花。”后用以形容女子美貌。明史槃《宋璟鹓钗记·家麻》：“但国色天香，未易描写；幽怀雅趣，难以形容。”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六十六回：“武后闪目细细观看，只见个个花能蕴藉，玉有精神，于那娉婷妩媚之中，无不带着一团书卷秀气，虽非国色天香，却是斌斌儒雅。”《再生缘》第二十一回：“款款纤腰垂玉带，溶溶粉额映乌纱。起步缓缓辞金殿，分明是，一朵天香国色花。”（张国风）

【司空见惯】唐孟棻《本事诗·情感》：“李司空（绅）罢镇在京，慕刘（禹锡）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意谓经常看到，不足为奇。《唐诗纪事》卷三九作扬州大司马杜鸿渐与刘禹锡事。苏轼《满庭芳·佳人》词：“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清孔尚任《桃花扇·眠香》：“今宵灯影纱红透，见惯司空，也应羞，破题儿真难就。”康有为《大同书》戊部：“夫欧美岂无狡童狂夫，亦皆有粗人下走，其教化尚不如中国之严也，然能修礼防者，实司空见惯然也。”（张国风）

【春梦无痕】唐刘禹锡《春日书怀》诗：“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宋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诗：“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后遂以“春梦无痕”比喻世事空幻如梦、不留痕迹。宋赵德麟《侯鯖录》七：“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张国风）

【诗豪】诗中之豪杰，指唐代诗人刘禹锡。唐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彭城刘梦得（禹锡），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新唐书·刘禹锡传》：“（刘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张国风）

【一落千丈】唐韩愈《听颖师弹琴》诗：“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指琴声突然降低。后用以比喻地位声誉的急剧下降。宋王迈《上何帅启》：“失势一落千丈强，自安蹇步；冲人决起百馀尺，坐看群飞。”清叶廷琯《鸥波渔话·蒋珊渔残稿》：“百步九折馀，一落千丈势！”《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六回：“所以喜奎一嫁，转瞬坤伶声势，一落千丈，伶界牛耳，又让男伶夺去。”（张国风）

【斧凿痕】原指斧凿刻削木石所留的痕迹。唐韩愈《调张籍》诗：“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此谓李白、杜甫之诗，虽如夏禹疏凿山河，有迹可寻，但浑成天然之美，则今不可得而观。后因以比喻艺术作品经过锤炼而又返回浑成天然境界，谓之无斧凿痕。宋朱弁《曲洧旧闻》：“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宣和画谱》卷一五《花鸟》唐：“边鸾，长安人，以丹青驰誉于时，尤长于花鸟……大抵精于设色，如良工之无斧凿痕耳。”

（张国风）

【呕心沥血】唐韩愈《归彭城》诗：“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本指为文学创作苦思苦想，费尽心血。后亦泛指为某一事或事业煞费心血。

（张国风）

【雕肝琢肾】唐韩愈《赠崔立之评事》诗：“劝君韬养待征诏，不用雕琢愁肝肾。”宋欧阳修《答圣俞莫饮酒》诗：“朝吟摇头暮蹙眉，雕肝琢肾闻退之。”均以“雕肝琢肾”比喻文学创作的苦思苦想、艰于锤炼。明宋濂《杏庭摘稿序》：“秦汉以来，至于近代，其间雕肝琢肾以自驰骋于一世者，不为不多。”（张国风）

【蚍蜉撼树】唐韩愈《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蚍蜉，大蚂蚁。后遂以“蚍蜉撼树”比喻以小攻大、不自量力。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张国风）

【寸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意谓区区小草似的微细心意，怎能报答得了春天阳光一般温暖的母爱。后遂以“寸草春晖”比喻子女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明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出：“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

（张国风）

【急来抱佛脚】唐孟郊《读经》：“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宋刘攽《贡父诗话》：“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诗一句。’客亦曰：‘急则抱佛脚是俗谚全语。’”本指平时不行善，临难才求佛解救。后借以比喻事到临头才想办法。明沈璟《一种情》传奇《香兆》：“外：‘如今事已急矣，且烧起香来，看神仙有何判断？’老旦：‘有理，这样叫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张国风）

【春风得意】唐孟郊《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用以指进士及第，或泛指顺利得志的情态。元乔吉《金钱记》四：“他见我春风得意长安道，因此上迎头儿将女婿招。”（张国风）

【走马看花】唐孟郊《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极写登科后得意快乐的心情。引申为游赏之乐。后又以比喻草草地一看，未能仔细深入。亦作“走马观花”。宋刘过《同郭殿帅游凤山寺探桃李》诗：“走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开。”明毕魏《三报恩·嘱托》：“场中看文，如走马看花。”明于谦《喜雨行》：“但愿风调雨顺民安乐，我亦走马看花归帝京。”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三回：“看这部书也不过走马观花。”（张国风）

【藕断丝连】唐孟郊《去妇》诗：“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意谓情意未断。宋黄机《满庭芳·次仁和韵欲之官永兴》词：“人道彬阳无雁，奈情钟藕断丝联。”清魏秀仁《花月痕》第十二回：“鴛母爱钞，姐儿爱俏；所以藕断丝连，每瞒他妈给他许多好处。”

（张国风）

【推敲】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引

《绀素杂记》：“余案刘公《嘉话》云：‘（贾）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故事亦见于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后遂以“推敲”指对某种意见、事情的反复斟酌。宋楼钥《蒋慈谿鸛挽词》诗：“推敲诗益练，骈俪语尤工。”明吴炳《画中人》传奇十《之任》：“（小旦）问他也总是不明白的。枉费推敲，喉间格格浑难了。”清黄宗羲《周公谨砚》：“剩水残山字句绕，剡源仁近共推敲。”清孔尚任《桃花扇·投辕》：“你的北来意费推敲。”清李渔《曲话·宾白》：“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张国风）

【前程万里】比喻人前程远大。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一《崔铉》载，唐崔铉小时咏架上鹰，有“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之句，韩滉说：“此儿可谓前程万里。”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一〇《苏知县罗衫再合》：“哥哥荣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持，不必挂怀。前程万里，须自保重！”

（张国风）

【碧纱笼】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载，唐王播少孤贫，客居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为诸僧所不礼。后富贵，重游旧地，见昔日在该寺壁上所题诗句，僧用碧纱盖护，因题曰：“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又宋魏野尝从寇準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寇準之诗，已用碧纱笼盖护，而魏野之诗则尘灰满蒙。从行官妓即以袂拂拭，魏野徐吟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事见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

（张国风）

【山雨欲来】唐许浑《咸阳城东楼》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后常以此比喻重大事变即将发生前的迹象和形势。

（张国风）

【今朝有酒今朝醉】比喻只图眼前敷衍，不作长远打算。唐权审《绝句》诗：“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悲多恨慢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唐罗隐《自遣》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张国风）

【平地风波】比喻突发事变。唐杜荀鹤《将过湖南经马当山庙因书三绝》之二：“只怕马当山下水，不知平地有风波。”宋苏辙《思归》诗之一：“儿言世情恶，平地风波起。”又作“平地波澜”。唐刘禹锡《竹枝词》七：“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故事琼林》：“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张国风）

【一柱擎天】 屈原《楚辞·天问》：“八柱何当？”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后以之形容山势峻拔、高耸入云，有擎天之状。唐曹唐《仙都即景》：“孤峰应碍日，一柱自擎天。”唐张固《独秀山》诗：“会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宋史·刘永年传》：“仁宗使赋《小山诗》，有‘一柱擎天’之语。”亦比喻独力支撑天下重任。《唐大诏令集》卷六四《赐陈敬瑄铁券文》：“卿五山镇地，一柱擎天，气压乾坤，量含宇宙。”元袁桷《题李士弘枯木风竹图》诗：“西山古渊人莫测，一柱承天万牛力。”（张国风）

【一场春梦】 《才调集》卷四五代张泌《寄人》诗：“倚柱寻思倍惆怅，一场春梦不分明。”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七：“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中呼此媼为春梦婆。”春梦即春宵好梦，意谓富贵无常，世事如梦，转眼成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七《李玉英狱中讼冤》：“可怜李雄盖世英雄，到此一场春梦！”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九回：“当日来时是何等样精力强壮，那知如今老迈龙钟，如同一场春梦。”同书第十六回：“细细想去，仍是一场春梦。”（张国风）

【打油诗】 一种诙谐诗体。据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覆窠俳体打油钉铰》载，唐人张打油有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中原音韵·作词十法》则谓张打油为元人，汴行省掾。后人泛称滑稽浅俗之诗为“打油诗”。《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帘卷水西楼，一曲新腔唱打油。”（张国风）

【冰魂雪魄】 形容清白纯洁的品质。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刘得仁……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宋陆游《北坡梅》：“广寒宫里长生药，医得冰魂雪魄回。”（张国风）

【八百孤寒】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孤寒指贫穷的文人学子。八百极言其多。（张国风）

【扫眉才子】 称有文学才华的女子。唐范摅《云溪友议》：“薛涛，成都乐妓也。韦南康宠之，赠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东风总不如。’”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一〇《蜀才妇》引为唐胡曾赠薛涛诗。一说为唐王建作，诗题作《寄蜀中薛涛校书》。明程嘉燧《阊门访旧作》：“扫眉才子何由见，一讯桥边女校书。”（张国风）

【绿叶成阴】 据宋张君房《丽情集》（《说郛》）卷七

六）、《唐诗纪事》卷五六、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载，杜牧佐宣城幕时，游湖州，得识一女，才十余岁，约十年内与女成婚。后十四年，牧为湖州刺史，访女，已嫁三年，生二子。乃怅而为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张国风）

【落花流水】 或形容残春景象，或比喻事物衰败，或比喻七零八落，不成局面。唐李群玉《奉和张舍人送秦练师归岑公山》：“兰浦苍苍春欲暮，落花流水思离襟。”五代前蜀释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诗：“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五代唐李煜《浪淘沙》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宋向镐《踏莎行》词：“钱塘江上客归迟，落花流水青春暮。”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四十三回：“只顾吃，正如风卷残云，落花流水，一齐上来，抢着吃了。”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三回：“这厮锐气挫了！被我那一路钯打进去时，打得落花流水，魂飞魄散！”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二回：“幸有杨戩在侧，看见闻太师好鞭，只打得落花流水，才把银合马飞走出阵，使枪便刺。”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一时金戈铁马，破空而来；一时流水落花，悠然而去。”（张国风）

【一点灵犀】 唐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传说犀角中心有一条白线，贯通上下，而有灵异。“一点灵犀”比喻男女彼此心心相印，亦比喻聪明剔透。元汪元亨《折桂令·归隐》曲：“跨百尺长鲸，逐双飞彩凤，通一点灵犀。”元王仲诚《粉蝶儿》套曲：“蕙兰性一点灵犀透，举止温柔。”明王玉峰《焚香记·盟誓》：“但得皆如意，两情称，始信一点灵犀，诚通海神。”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何玉凤立地回心，一点灵犀悟澈。”（张国风）

【丁香结】 唐李商隐《代赠》之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用以比喻固结不解之愁思，原指丁香的花蕾。唐末牛峤《感恩多》词：“各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唐陆龟蒙《丁香》诗：“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香。”（张国风）

【剪烛西窗】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剪烛，蜡烛燃久了，需剪去灯心的炭穗才会明亮。两句写何时与妻子团聚，夜晚同叙别离思念之情。后泛指亲友倾心相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连锁》：“与谈诗文，慧黠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友。”清敦诚《寄怀曹雪芹》：“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张国风）

【锦瑟华年】 唐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

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绘文如锦之瑟。“锦瑟华年”，常喻青春年华。宋贺铸《青玉案·横塘路》词：“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张国风）

【枫落句】《新唐书·崔信明传》：“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郑世翼）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后遂以“枫落句”代指诗文之警句。宋陆游《秋兴》：“才尽已无枫落句，身存又见雁来时。”（张国风）

【抛砖引玉】相传唐人赵嘏有诗名，至吴，常建欲得其诗。知其必游灵岩寺，乃先题二句于壁，嘏游寺见诗，为补成一绝。人遂谓常建乃抛砖引玉。按常建为玄宗开元时进士，赵嘏于武昌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建已早卒。二人不同时，其谬不言而喻。习以“抛砖引玉”比喻以浅拙引出高明之谦词。《景德传灯录》十《从谗禅师》：“师云：‘比来抛砖引玉，却得个塹（土坯）子。’”元贯云石《斗鹤鹑·佳偶》曲：“他道是抛砖引玉，俺却道因祸致福。”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八回：“刚才婢子费了唇舌，说了许多书名，原是抛砖引玉，以为借此长长见识，不意竟是如此！”（张国风）

【八叉手】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八叉手”谓才思敏捷。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敏捷》：“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元方回《八月二十四日宾阳华父同登秀亭》诗：“我有平生八叉手，兴来举酒尚洋洋。”《宋宫十八朝演义》：“没有好久，便采选得青城女费慧，真有沉鱼落雁，闭花羞月之貌，而且雅擅诗文，文成倚马，诗构八叉。”（张国风）

【红叶题诗】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一〇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试，偶临御沟，拾得红叶，叶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一些宫女，许从百官司吏。渥得一人，即红叶题诗者。又据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流红记》载，唐僖宗时于祐，于御沟得红叶，上有题诗如前。后在河中娶得遣放宫人韩氏，即红叶题诗者。据唐孟棻《本事诗》，玄宗时顾况于宛中得一大梧叶，上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亦于叶上题诗和之。另据宋王铎《补侍儿小名录》载，唐德宗时，贾全虚在御沟见一花流至，旁有数叶，上题诗句与《本事诗》稍仿佛。全虚悲思其人，不觉下泪。事闻于德宗，得知

为王才人养女凤儿所题。德宗因以凤儿赐全虚。后元白朴杂剧《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文蔚杂剧《金水题红怨》均演此故事。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节次说及唐朝宣宗宫内，也是一个韩夫人。为因不沾雨露之恩，思量无计奈何。偶向红叶上题诗一首，流出御沟。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却得外面一个应试的人，名唤于佑，拾了红叶，就和诗一首。也从御沟中流将进去。后来那官人一举成名。天子体知此事，却把韩夫人嫁与于佑。”元高明《琵琶记·牛相奉旨招婿》：“红楼此日，红丝待选，须教红叶传情。”清李渔《十二楼》卷一：“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亦暗用此事。（张国风）

【寻诗】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郑紫》：“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清赵执信《坠马二首》之一：“骑马城西犯晓寒，生烟集霰共漫漫。本图独往寻诗好，岂敢诸公携酒看。”即以郑紫事自况。（张国风）

【歇后郑五】《旧唐书·郑紫传》：“紫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谦让不获。”郑紫好歇后语，行第五，故时人呼为歇后郑五。（张国风）

【兔走乌飞】古神话传说中说，月亮中有玉兔，太阳中有金乌。后遂以“兔走乌飞”比喻时光飞逝。唐韩琬《春愁》诗：“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五代韦庄《秋日早行》诗：“行人自是心如火，兔走乌飞不觉长。”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二《宋贞禅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闪烁乌飞急，奔腾兔走频。’”元关汉卿《鲁斋郎》第四折：“乌飞兔走疾如梭。”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十二回：“乌飞兔走，瞬息光明，暑往寒来，不觉七载。”（张国风）

【悔读南华】《唐诗纪事》卷五四《温庭筠》：“令狐绹曾以旧事访于庭筠，对曰：‘事出《南华》，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奏庭筠有才无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诗曰：‘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南华经》即《庄子》。意谓学问高深，不为人容。宋陆游《怀镜中故庐》：“从宦只思乘下泽，忤人常悔读《南华》。”（张国风）

【一字师】指改正一个字的老师。据《五代史补》卷三《齐己》载，五代齐己《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句，郑谷改“数枝”为“一枝”，时人称郑谷为“一字师”。又宋杨万里一次与人谈及晋干宝，误作“于宝”，一吏为之纠正，并取韵书给杨查看。杨万里十分高兴地说：“汝乃吾一字之师。”事见宋罗大

经《鹤林玉露》卷一三。又宋曾吉父称韩子苍，张咏称萧楚才为一字师。事见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三、戴埴《鼠璞》。清赵执信《王西泠招饮见余风鸢之什，病其一字，喜而易之，即席呈谢》诗：“谁解攻我短，平生君尚存。便应师一字，何减和千言。”

(张国风)

【诗囊】指唐末诗僧齐己。齐己以诗著称，颈有瘤赘，时号“诗囊”。见《宋高僧传》卷三〇。

(吴小林)

【闲云孤鹤】比喻来去自由、无所拘羁。据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三〇引《古今诗话》载，五代时，释贯休尝以诗投吴越王钱镠，中有“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镠谕改为“四十州”，乃得相见。休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遂入蜀。宋尤袤《全唐诗话》亦载此典。亦作“闲云野鹤”。明张居正《与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即便得归，亦不过芒鞋竹杖，与闲云野鹤徜徉于烟霞山石间，何至买山结庐，为深公所笑耶！”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百十二回：“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

(张国风)

【剜肉补疮】唐聂夷中《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原意谓农家忍痛鬻丝谷以济急，后称以彼补此，只顾眼前救急，不顾将来，叫“剜肉补疮”。明丘濬《故事成语考》：“剜肉医疮，权救目前之急。”宋朱熹《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必从其说，则势无从出，不过剜肉补疮，以欺天罔人。”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若我不允女儿之事，他又剜肉补疮，别寻道路谢我，反为不美。”明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四回：“为他做青色边道袍、毛边裤、毡衫，换人参，南京往返盘费，都是掘地讨天，补疮剜肉。”清朱樟《催祖行》：“剜肉徒充隶蠹肥，医疮岂为农夫计！”

(张国风)

【鱼龙混杂】唐罗隐《西塞山》诗：“波阔鱼龙应混杂，壁危猿狖正奸顽。”后以比喻品质不一的人混杂共处。元方行《送贾彦临训导霍兵》：“天近君门严虎豹，地宽人海混鱼龙。”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四回：“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着，他们也洗洗清。”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六回：“且彼时捐例大开，各省候补人员十分拥挤，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张国风)

【郑鹧鸪】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郑谷》：“乾宁四年，为都官郎中，诗家称‘郑都官’；又常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鸪’云。”《古今诗话》记刘原甫戏梅尧臣：“郑都官有《鹧鸪》诗，谓之‘郑鹧鸪’，圣俞有《河豚》诗，当呼‘梅河豚’也。”见于《宋诗话辑佚》。

清赵执信《晚春有感》诗：“大梦暗随蝴蝶化，小诗轻掷鹧鸪名。”

(张国风)

【百尺竿头】高竿的顶端。唐吴融《商人》诗：“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永乐大典》卷三五〇〇）此指船桅。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一〇《湖南长沙景岑号招贤大师》：“师示一偈曰：‘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人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宋朱熹《答巩仲至书》：“故聊复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势也。”又《答陈同甫书》：“但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又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一三：“王文穆（钦若）罢相帅，朝士皆有诗，陈从易诗最佳，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此喻官品之高。

(张国风)

【金榜题名】金榜，金制的匾额。旧指科举应试考中者的名录。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明洪楸《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旬日之间，金榜题名，已登三甲进士。”亦作“金榜挂名”。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一七《钝秀才一朝交泰》：“小姐盛情，我岂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挂名时。’”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频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张国风)

【诗瓢】本指唐代诗人唐球纳诗稿之大瓢。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〇“唐球”条云：“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为诗撚藁为圆，纳之大瓢中。后临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心尔。’至新渠，有识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才二三。”后以“诗瓢”贮诗稿之器具。宋胡仲弓《约枯崖话》诗：“清风资话柄，流水去诗瓢。”元袁桷《送吴成季五绝》之四：“诗瓢浙沥风前树，雪在深村月在梅。”

(吴小林)

【诗肠鼓吹】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二：“戴颙春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汝知之乎？’”意谓黄鹂鸣声，大好春光，可以激发才思诗兴。

(张国风)

【诗窖子】比喻有才华、作品多的诗人。宋高若拙《后史补》：“王仁裕著诗万首，谓之‘诗窖子’，亦曰‘千篇集’。”见于《类说》卷二六。

(张国风)

【燕足系诗】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传书燕》：“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径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

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恁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

(张国风)

【诗虎】指晚唐诗人罗邺。明程羽文《诗本事》云:“罗邺,时人目为诗虎。”清黄遵宪《玄武湖歌和龙松岑》:“承平公子文章伯,酒龙诗虎争崔嵬。”今人钱仲联笺注:“夏树芳《词林海错》:‘唐罗邺与方干、贾岛齐名,赋《牡丹诗》云:‘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时人称为诗中虎。’”(吴小林)

【千里鹅毛】意喻礼轻而情义重。宋欧阳修《梅圣俞寄银杏》诗:“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宋苏轼《扬州以土物寄少游》诗:“且同千里寄鹅毛,何用孜孜饮麋鹿。”宋黄庭坚《谢陈适用惠送吴南雄所赠纸》诗:“千里鹅毛意不轻,瘴衣腥腻北归客。”史容注:《复斋漫录》:“谚曰:‘是人眼里有西施。’又曰:‘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皆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回:“他这礼物虽觉微末,俗语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张国风)

【近水楼台】比喻近便而得到利益或方便。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仲淹)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公即荐之。”(张国风)

【三上】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修意在讲其写作习惯,后人则见其创作勤奋、点滴时间犹能抓紧。(张国风)

【锦上添花】比喻美上添美,好上加好。宋王安石《即事》诗:“嘉招欲复盃中绿,丽唱仍添锦上花。”宋黄庭坚《了庵颂》:“又要涪翁作颂,且图锦上添花。”明施耐庵《水浒》第十九回:“今日山寨,天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旱苗得雨。”明王世贞《鸣凤记·驿里相逢》:“你小人势利,但知锦上添花;我砥柱中流,偏喜雪中送炭。”此处“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对举,意为为权势者捧场。明康海《中山狼》第一折:“命穷时镇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的锦上添花。”(张国风)

【一枕黑甜】宋苏轼《发广州》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自注:“俗谓睡为黑甜。”即指酣睡。宋张元幹《赋漳南李几仲安斋》诗:“先生睡美黑甜处,

那闻钟鼓朝鸣楼。”俗称睡觉为“黑甜乡”。元马致远《陈抟高卧》第四折:“笑他满朝朱紫贵,怎如我一枕黑甜乡。”清孔尚任《桃花扇·却奁》:“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张国风)

【一刻千金】宋苏轼《春夜》诗:“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比喻时间宝贵。宋刘镇《庆春泽·丙子元夕》词:“灯火烘春,楼台漫月,良宵一刻千金。”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再休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准备着寒窗更守十年寡。”清沈起凤《谐铎》卷一〇:“戴笑曰:‘卿此间以日为年,则春宵一刻洵千金值也。’”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就眼前这花儿酒儿,也还不同野草村醪,再逢着今日这美景良辰,真是一刻千金,你算所望皆全,无意不满了。”(张国风)

【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清仇兆鳌注引张远注:“人生百岁,七十者稀,本古谚语。”后以“古稀”为“七十”之代称。宋辛弃疾《最高楼·醉中有索四时歌为赋》:“长安道,投老倦游归。七十古来稀。”又《感皇恩·滁州寿范倅》:“七十古来稀,人人都道,不是阴功怎生到。”明汤显祖《牡丹亭·延师》:“将耳顺,望古稀,儒冠误人霜鬓丝。”亦称“古希”。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三引苏轼诗:“令阁方当而立岁,贤夫已过古希年。”(张国风)

【失笑喷饭】宋苏轼《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筻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失笑喷饭”指吃饭时,禁不住笑,将饭喷出。(张国风)

【行云流水】比喻纯任自然,毫无拘束。宋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约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宋史·苏轼传》:“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也作“流水行云”。宋洪咨夔《平斋词·寿章君举》:“流水行云才思,光风霁月精神。”(张国风)

【冰壶秋月】宋苏轼《赠潘谷》:“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比喻人表里纯净莹彻,心胸光明坦荡。《宋史·李侗传》:“邓迪尝谓(朱)松曰:‘愿中(侗字)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张国风)

【环肥燕瘦】环指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燕指汉成帝后赵飞燕。杨丰肥而赵轻瘦,故有“环肥燕瘦”之称。后遂以之比喻艺术作品之风格各有所长,各擅其美。宋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恡。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

敢憎。”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四十回：“有的妆台倚镜，有的翠袖凭栏，说不尽燕瘦环肥，一一都收在眼睛里去。”（张国风）

【庐山真面目】 宋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比喻事物的真相，或人的本来面目。清尤侗《上沈旭轮师》：“愿与世人共识庐山面目，勿云后遂无问津者。”清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而先生姪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遗文残缺，访得于义兴之故家，涂抹删改，非复庐山面目。”姚文燮注《昌谷集》凡例：“毋惑乎世之注昌谷者，拘于‘牛鬼蛇神’一语，直欲绘一狞狰幻怪之状以为昌谷也，庐山真面目终不可见矣！”（张国风）

【明日黄花】 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明日，指重阳节后。黄花，菊花。古人多于重阳节赏菊，明日黄花寓有迟暮不遇之意。后用以比喻已经过时的事物。宋胡继宗《书言故事·花木类》：“过时之物，曰明日黄花。”（张国风）

【抹月批风】 细切叫抹，薄切叫批。意谓风月作菜，是文人表示家贫无可待客的戏言。宋苏轼《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之五：“贫家何以娱客，但知抹月批风。”宋杨万里《寄题喻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咏》诗《亦好亭》：“客来莫道无供给，抹月批风当八珍。”（张国风）

【诗奴】 指拙劣的诗人。宋苏轼《赠诗僧道通》：“为报韩公莫轻许，从今岛可是诗奴。”岛指贾岛，可，无可，贾岛从弟。（张国风）

【雪泥鸿爪】 宋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亦作“雪泥指爪”。意谓往事留下的痕迹。明王世贞《题包参军东游稿后》：“幽忧抱疾，块守蜗庐，雪泥指爪，托之梦寐。”清赵执信《太白酒楼歌》：“又不见曹王陵墓碣碣北，残松积藓荒碑亭，雪泥鸿爪半渐灭，雄名空自驰风霆。”（张国风）

【文字禅】 宋朱松《送黄彦武西上》诗：“未忘大学藟盐味，时说定林文字禅。”又戴复古《寄报恩长老恭率翁》：“好留一室馆狂客，早晚来参文字禅。”同书卷六《论诗十绝》：“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所谓“文字禅”，或指以诗文参悟禅理，或指以参禅来帮助领悟诗理。（张国风）

【后浪催前浪】 宋释文珣《过苕溪》诗：“只看后浪催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意谓江水奔流，相继不息，比喻人事相继，新陈代谢。元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三：“长江今经几战场，却正是后浪催前

浪。”元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常言道后浪催前浪。”（张国风）

【一瓣香】 亦称“一炷香”。佛教用语。禅宗长老开堂说法，烧至第三炷香时，长老讲这一瓣香敬献授我道法的某某法师。后来师承某人，亦称瓣香某人。“一瓣香”意为焚香敬礼。宋陈师道《观文忠家六一堂图书》：“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南丰（巩）即陈的老师，故云。又“一瓣心香”，意谓虔诚敬礼，如焚香供佛。唐韩偓《仙山》诗：“一炷心香洞府开。”宋王十朋《行可生日》诗：“祝公寿共诗书久，一瓣心香已敬焚。”魏秀仁《花月痕》第五十一回：“次日，荷生仍来汾神庙，与心印共坐一车，一瓣心香，数行情泪。”文康《儿女英雄传》：“这‘瓣香’两个字倒还容易明白，只是题在卧房门上不对啊。这卧房里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谁呢？”鲁迅《伪自由书·后记》引《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启事：“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张国风）

【击钵催诗】 《南史·王僧孺传》：“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宋陈师道《和李使君九日登戏马台》：“登高能赋属吾侪，不用传杯击钵催。”（张国风）

【黄花晚节】 黄花，指菊花。晚节，指菊花傲霜而开，比喻老而弥坚。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七《韩魏公》引韩琦诗：“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元张伯淳《次韵完颜经历》：“从教苍狗浮云过，留得黄花晚节香。”明王世贞《鸣凤记》第三十八出：“须信苦尽甘来，晚节黄花无既。”（张国风）

【三平二满】 平平稳稳，过得去。宋辛弃疾《鹧鸪天·登一丘一壑偶成》：“百年雨打风吹却，万事三平二满休。”又有平淡、平庸之意。宋陈亮《又乙巳秋（与朱熹）书》：“最可惜许多眼光抹漆者，尽指之为盲人，而一世之自号开眼者，正使眼无翳，眼光亦三平二满，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常在乎！”（张国风）

【别具只眼】 宋叶真《爱日斋丛钞》卷三：“（杨万里）又有送彭元忠诗：学者初学陈后山，霜皮脱尽山谷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意谓有独到的见解。（张国风）

【一代风骚主】 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宋潘若冲《郡阁雅谈》：“郑谷幼负名誉，司空图见而奇之。问之，答曰：‘大夫《曲江晚望》断篇云：‘村南斜日闲回首，一对鸳鸯落渡头。’意深矣。’司空抚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意谓有一定影响的当代诗文佳

作。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郑谷》亦有相似记载。唐刘兼《寄高书记》：“声价五侯争辟命，文章一代振风骚。”（张国风）

【无地起楼台】宋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载，寇準为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处士魏野赠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意谓其为官清廉。后準得罪南贬。有南使至，赐宴，两府预坐，使人历视诸相，问“谁是无地起楼台相公”，众无以答。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夫寇莱公（準）崛起为宰执，立朝未久，而云‘无地起楼台’，世尚传其清节。今吾乡刘文定公，官卿相者三十年，其子今少司马跃云继之，父子服官于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无一亩之官、半顷之地，可云清矣。”（张国风）

【白发青衫】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七：“崇宁中，特奏名状元徐适琼林宴罢，作诗曰：‘白发青衫晚得官，琼林顿觉酒肠宽。平康夜过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青衫，无功名者的服饰。意谓年已老而功名未就。”（张国风）

【云烟过眼】宋戴复古《再赋惜别呈李实夫运使》：“云烟过眼时时变，草树惊秋夜夜疏。”亦作“烟云过眼”。意谓景物易逝。宋苏轼《宝绘堂记》：“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后人亦以过眼烟云比喻荣华富贵之难恃。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六：“盖胜地园林，亦如名人书画，过眼云烟，未有百年不易主者。”（张国风）

【打鸭惊鸳鸯】据宋赵令畤《侯鯖录》卷八载，宋宣城守吕士隆爱恋客妓丽华。一日，吕士隆欲鞭笞军中一官妓。是妓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某人”即指丽华。宋梅尧臣《打鸭》诗“莫打鸭，打鸭惊鸳鸯”，即指此事。比喻惩治甲而惊动乙。后亦指殃及无辜。宋李石《扇子》诗：“不为求蛇熏老鼠，翻成打鸭惊鸳鸯。”（张国风）

【生张熟魏】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六：“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硬，土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寇忠愍（準）令乞诗于魏处士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都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元宋元怀《拊掌录》亦录此掌故。后用以指互不熟悉。”（张国风）

【暗香疏影】宋林逋《山园小梅》诗之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姜夔采林逋语创制《暗香》、《疏影》二词，见《白石道人歌曲》卷四。后遂以“暗香疏影”指梅花。宋辛弃疾《和傅岩叟梅花》：“月澹黄昏欲雪时，小窗犹见岁寒枝。暗香疏影无人处，唯有西湖处士知。”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四回：

“两个站在小桥上，疏影暗香，自甘清冷，屋后山冈积雪如银，背着手玩赏。”（张国风）

【满城风雨】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后以“满城风雨”比喻事情喧腾众口，议论纷纷。宋姚述尧《朝中措》词：“满城风雨近重阳，小院更凄凉。”元高明《二郎神·秋怀》套数：“霜降水痕收，迅池塘犹暮秋，满城风雨还重九。”（张国风）

【诗囚】指苦吟的诗人。谓诗境窘窄，如被拘囚。金元好问《放言》诗：“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长沙”指长沙王太傅贾谊，郊指孟郊（字东野）、岛指贾岛。孟郊、贾岛一生穷搜险觅，苦心为诗，吟诗成癖。故有“诗囚”之号。又《遗山集》卷一一《论诗》一八：“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张国风）

【无边风月】元方回《送周府尹》诗：“几许烟云藜杖外，无边风月锦囊间。”“无边风月”即无限美好的事物。元侯克中《过友生新居》：“西湖风月无边景，都在诗翁杖履中。”（张国风）

【两袖清风】指迎风潇洒的姿态，后用以比喻为官清廉，囊空如洗。元陈基《次韵吴江道中》诗：“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元魏初《送杨季海》诗：“交亲零落鬓如丝，两袖清风一束诗。”明吴应箕《忠烈杨珪传》：“入计时，止馀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而去。”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于少保（谦）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不持一物，人传其诗云：‘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张国风）

【一鳞一爪】清赵执信《谈龙录》：“钱塘洪昉思（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王士禛）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龙在云中，露其一鳞一爪，难见全貌。王士禛主张诗贵含蓄、忌浅露，以此为喻。赵执信意谓心中须有全龙，才能由一鳞一爪反映全龙。后人以“一鳞一爪”指喻片断零星的事物。（张国风）

【舞风病鹤】清代诗人黄景仁一生怀才不遇，穷

困潦倒。其诗如“千金无马骨，十丈有车尘”、“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经易水风”等，酸辛抑郁。洪亮

吉《北江诗话》卷一评价道：“黄二尹景仁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
(张国风)

诗法格律

诗体

【二言诗】 两字一句，逐句押韵的诗，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一种原始诗歌形式。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据说这是产生于黄帝时代的歌谣。《吴越春秋》云：“《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这支歌便是以韵语的形式，叙述了那个“古之孝子”采伐竹子制成工具，用弹驱逐禽兽的活动。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云：“黄帝《弹歌》云云，二言之始也。”

（“诗法格律”部分作者均为羊春秋）

【三言诗】 整篇为三字一句的诗歌形式。此种形式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影响最大的，约有四说：一曰缘于《诗·颂》。首倡者为挚虞《文章流别论》：“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亦云：“《诗·颂》‘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二曰起于《尚书·虞典》。主此说者为唐皎然《诗议》：“三言起于《虞典·元首之歌》。”盖将“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之虚词“哉”字不计在内。三曰始于晋

夏侯湛。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三言起于晋夏侯湛。”胡鑑注：“夏侯湛，字孝若，有集而无三言诗，想已佚矣。”明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驳之曰：“《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马歌》，体制备矣。严沧浪谓创自夏侯湛，盖泥于白氏《六帖》。”其实首倡此说者为梁任昉，他在《文章缘起》中说：“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按任氏所撰之《文章缘起》至隋时已佚，现存者系张绩所补、明陈懋仁所注者。四曰肇于古代民歌。明谢榛认为《江有汜》乃三言之始，盖即《诗·召南》之一篇，便是我国周代的民歌。

【四言诗】 通篇皆四字一句的诗。《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因袭其说曰：“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汉书·韦贤传》：“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其诗甚长，俱载传中。其实四言诗早见于《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列子·仲尼篇》所载之《康衢歌》。至《诗》三百零五篇而大盛。故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云：“《诗家直说》‘四言体起于《康衢歌》’，沧浪谓起于韦孟，误矣。”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亦持此论。清赵翼《陔馀丛考》四言诗条亦谓：“四言诗当以《舜典》喜起之歌为首，大禹所训‘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滥觞也。”四言诗，

极难工。故《诗经》而后,工者极少。《文心雕龙·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钟嵘《诗品序》亦云:“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诗】 全篇皆五字一句的诗。《文心雕龙·明诗》把《诗经·召南》中的《行露》、《孟子·离娄》中的《孺子歌》、《国语·晋语二》中的《暇豫歌》,以及《汉书·五行志》中所载的成帝时童谣,都看作五言诗的滥觞,故曰:“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序》把完成五言诗的历史功绩归之于苏武、李陵。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颜延年在《庭诰》中亦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此种怀疑,大抵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共识。刘勰还把《古诗十九首》中枚乘所作的《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八首,推崇为“五言之冠冕”,而把建安时代,看作五言诗最繁荣的时期。《师友诗传录》也说:“五言之兴,源于汉,注于魏,汪洋乎两晋,混浊乎梁、陈,风斯下矣。”比较通达地描绘了五言诗的发展轨迹。

【六言诗】 通篇皆为六字一句的诗,有古体,也有近体。《文章缘起》说:“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沧浪诗话·诗体》亦云:“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推而广之曰:“六言体起于谷永、陆机,长篇一韵,迨张说、刘长卿八句,王维、皇甫冉四句,长短不同,优劣自见。”就通篇而言,上述说法是可信的。但就单句而言,则六言诗在《诗》、《骚》中早有滥觞。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文心雕龙·章句》也说:“六言、七言,杂出《诗》、《骚》。”

【七言诗】 全篇每句都是七言的诗。《文心雕龙·章句》说七言诗“杂出《诗》、《骚》”。挚虞《文章流别论》谓:“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这是就其单句而言的。若就其通体而言,则宁戚的《饭牛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都是七言的滥觞。至汉武帝在柏梁殿与群臣的联句,则通体皆为七言,故《文章缘起》说:“七言诗,汉武帝柏梁殿联句。”《沧浪诗话·诗体》亦说:“七言起于汉武柏梁。”但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认为“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之乖舛也。”据现有文献资料,真正完整的七言诗,当以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为首创,而曹丕的《燕歌行》,则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六朝以来,七言诗有着迅猛的发展,鲍照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真正把七言诗推到极致的是盛唐诸大家。施补华《岷傭说诗》中说:“然开

合变化,波澜壮阔,必至盛唐而后大昌。”

【九言诗】 九字一句的诗。其单句之见于古籍者,如《尚书·五子之歌》“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马”、《诗·大雅·洞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都是九言。至于通篇都是九言的,《文章缘起》说:“九言诗魏高贵乡公所作。”《沧浪诗话·诗体》亦说:“九言起于高贵乡公。”高贵乡公,即曹髦,文帝之孙。其诗已佚。通体九言诗,极为罕见。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云:“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大是蛇足,只可谓之诗馀耳。此体始于魏。”说明宋末元初有人作九言律诗。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国初有人作九言诗曰:‘昨夜西风摆落千林梢,渡头小舟卷入寒塘坳。’贵在浑成劲健,亦备一体。”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言九言体,亦引此二句,说是无名氏作品。并谓其“声调散缓而无气魄”。杨慎《升庵诗话》卷一说此诗作者为释明山中峰,共八句,题为《九字梅花诗》。还说他自己也口占了一首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错恨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并引卢赞元《酴醾花》九言诗一首,盛赞其“甚切体物,前人亦未道破者”。说明明代亦有作九言诗者。

【杂言诗】 古体诗中的一种。篇幅不限,字数不拘,往往以长短不齐之句式相间使用,少则一字,多则十数字。《沧浪诗话》称为“杂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云:“杂言古诗。按古诗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杂言,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别列为一类,以继七言古诗之后,庶学者知所辨焉。”这种诗歌形式比较自由,句可长短,韵可变换,篇可大小,诗人可以根据抒情达意的需要,交叉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句式。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兵车行》等。此体唐以前罕见,唐以后诗人所作古题乐府及长篇歌行,往往采用此种形式。

【半五言体】 诗体的一种。前一句为六言,后一句为五言,相间成篇,因而得名。《沧浪诗话·诗体》云:“有半五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按此诗见《乐府诗集》卷三七瑟调曲。诗云:“凤凰远生海西,及时昆山冈。五德存羽仪,和鸣定宫商。百鸟并侍左右,鼓翼腾华光。上熙游云日间,千岁时来翔。孰若彼龙与龟,曳尾泥中藏?非云雨则不升,冬伏春乃骧。退衰此秋兰草,根绝随化扬。灵气一何优美,万里驰芬芳。常恐物微易歇,一朝见弃忘。”

【三五七言体】 诗体的一种。全诗六句一韵,一、二为三字句,三、四为五字句,五、六为七字句,依次

排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郑世翼有此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云：“三五七言诗，始郑世翼，李白继作。”查《全唐诗》仅存郑诗五首，无三五七言诗，或者已佚。严氏所引“秋风清”一诗，见《李太白集》，当是李白继作。诗云：“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一诗中三、五、七言俱备。刘长卿《送陆澧归江阴》也是典型的三五七言诗。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后来宋寇準、金赵秉文亦作有此体。

【五七言诗】 全诗四句，前两句为五言，后两句为七言。非诗中正体，作者甚少。如侯夫人《看梅》诗云：“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便是典型的五七言诗。

【一至七字诗】 从一字句至七字句，依次排列，以题为韵，或一句一韵，或两句一韵，形成宝塔的样式，又叫“宝塔诗”。有依次递增至九字句、十字句的。《沧浪诗话·诗体》云：“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一字至七字诗，张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题为韵。偶对成联。又鲍防、严维多至九字。”梁桥《冰川诗式》卷二，有一至十字诗，录宋文同《咏竹》一首为例，可知此体为唐宋人试作，兹录张南史《雪》诗云：“雪，雪。花片，玉屑。结阴风，凝暮节。高岭虚晶，平原广洁。初从云外飘，还向空中咽。千门万户皆静，兽炭皮裘自热。此时双舞洛阳人，惟惜郢中歌断绝。”

【一三五七九言诗】 全诗共十句，一、三、五、七、九言各二句，依次排列，一韵到底。亦系六朝以来诗人创新的试作，极为罕见。如隋僧慧英的《一三五七九言诗》云：“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鹜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年颓秋更秋。已毕著山本愿诚难住，终望持经振锡往扬州。”

【一句诗】 通首只有一句，《沧浪诗话·诗体》称为“一句之歌”。此体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音初》云：“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严羽自注引《汉书》“桴鼓不平董少年”（按“年”为“平”之误）、《后汉书·五行志》灵帝时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按此当为“三句诗”）及《隋书·五行志》梁时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为例，并非始创。

【二句诗】 通首只有两句，《沧浪诗话·诗体》叫作“两句之歌”。首见于《史记·刺客列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又如《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中的《女儿子》：“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

三声泪沾衣。”

【三句诗】 通首只有三句，《沧浪诗话·诗体》叫作“三句之歌”。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首创此体。唐王绩的《春桂问答》二首，也是典型的三句诗。问春桂云：“桃李正芳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云：“春花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否？”（见《全唐诗》卷三七）体略有异，《大风歌》句句用韵，《春桂问答》第二句不用韵。前者为七言，后者为五言。此体最为难工，故作者极少。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云：“古有三句之诗，意足词赡，盘屈于二十一字之中，最为难工。遍检前贤诗，不过四五首而已。”并引用岑之敬《当垆曲》、谢皋羽《寄邓牧心》、詹天胤《寄山中友人》等，皆七言诗，一句一韵。

【五句诗】 每首五句，惟第四句不入韵。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称之为“五句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列有三句、五句、促句三体。陈仅《竹林答问》云：“古五句诗，惟乐府有之。”此说不确，杜甫之《曲江三章章五句》，就是此体，其一云：“曲江萧条秋气高，茱萸折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日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杜甫自谓“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梢林莽”。王嗣奭《杜臆》云：“即事吟诗，体杂古今。其五句成章，有似古体；七言成句，又似今体。”恰好说明了此体的特点。

【促句体】 古体诗的一种。每三句一换韵，韵无论平仄；每三句为一叠，叠可多至六叠。魏庆之《诗人玉屑》称之为“促句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称之为“促句体”。唐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宋黄庭坚《观伯时画马》等，都是例子。

【古体诗】 系对“近体诗”而言，亦称“往体”。它包括古诗和乐府。古诗有长篇、短篇之分；乐府有古乐府、新乐府、正乐府、拟乐府、系乐府、小乐府之别。总之，除“骚体”以外的各种诗体，统统包括在内。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苏、李而上，高简古淡，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简要地说明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古体诗的格律比较自由，不拘平仄，不讲对偶，句不必整齐，韵可以转换，或隔句一韵，或三句一韵，转韵时亦可平可仄，即篇幅亦可长可短，一切服从于表情达意的需要。但仍以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最为常见。

【往体诗】 即古体诗。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云：“今考唐人集录，所标体名，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往体；其所变诗体，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为近体。”则所谓“往体诗”，即汉、魏以下声律未协之古体诗。

【古风】 即古体诗。“风”也就是“诗”，“十五国

风”即十五个地区的诗歌；“风人”即诗人。《文心雕龙·明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可证。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胡震亨谓其内容“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

【古诗】 即“古风”、“古体诗”。它是对绝句、律诗等“近体诗”而言的。句式一般为三言、五言、七言和四言、六言，用韵自由，平仄不拘，对偶不论，长短不限，产生的时代较早，后世使用五、七言者较多。参见“古风”和“古体诗”。

【乐府诗】 主要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所采集和创作的诗歌。《汉书·艺文志》所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文心雕龙·乐府》亦云：“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这是我国最早采集的乐府诗。宋郭茂倩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分为十二类，类各有总序，曲各有解题，题为《乐府诗集》。于是自魏晋至唐五代，举凡按乐府旧谱重填新词，或仿效乐府古题，乃至即事名篇、自创新意的诗歌，皆被称为“乐府”。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清冯班《钝吟杂录》、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并云：“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占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少陵之新题乐府而为七，古乐府尽此矣。”从而概括了乐府诗的发展和分类。后来因为词、曲可以协乐而歌唱，亦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叫《东坡乐府》，马致远的散曲叫《东篱乐府》，此皆乐府之余裔。

【正乐府】 晚唐皮日休自称其所作之乐府十篇为“正乐府”。言其欲“正”“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以恢复乐府“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的作用（《正乐府十篇序》）。观其《卒妻怨》、《橡媪叹》、《贱贡士》、《哀陇民》诸作，真可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

【新乐府】 元稹、白居易积极提倡和创作的一种诗体。它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不用古题，不依旧谱，而用新题写时事，以发挥诗的美、刺作用。白居易《新乐府序》云：“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

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前者说明了新乐府的性质，后者叙述了新乐府的起源。元稹、李绅、白居易各作新题乐府数十首，于是新乐府之名乃确立。钱木庵《唐音审体·新乐府论》引太原郭氏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概括得非常简要准确。

【拟乐府】 仿效古乐府而作的诗歌。但它并不是模拟前贤的字句，取其貌似而已；而是各有命意，各有旨归。或借题以自陶写，自魏武父子、李白、王维，莫不皆然，如《日出入》、《将进酒》、《巫山高》是。或题同而调异，如李白之《子夜四时歌》、《乌栖曲》是。或题同而事异，如傅玄拟左延年之《秦女休行》（左诗言女休为宗报仇，杀人都市之中，傅诗则歌颂“庞氏有烈妇”）。或用题意而改题，如魏武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以代汉之铙歌，晋武令傅玄制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或以乐府诗中语句为题，如《罗敷行》本为相和曲《陌上桑》中语，梁萧子范取以为题，《乌生八九子》本为相和曲《乌生》中语，而梁刘孝威因以为题，《胡姬年十五》本杂曲《羽林郎》中语，而晋刘琨因以为题。或拟题而反其意，如卓文君作《白头吟》，白居易反其意作《反白头吟》，李白作《蜀道难》以讽严武，而陆畅反其意作《蜀道易》以歌颂韦皋。这些都属于拟乐府。

【系乐府】 唐元结将其组诗《思太古》、《陇上叹》、《颂东夷》、《贱士吟》、《欽乃曲》、《贫妇词》、《去乡悲》、《寿翁兴》、《农臣怨》、《谢大龟》、《古遗叹》、《下客谣》等十二篇，总名之曰：“系乐府”，并在《系乐府十二首序》中说：“天宝辛未中，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为引其义以名之。总命曰系乐府。……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

【补乐府】 亦名“补乐歌”。元结在《补乐歌十首序》中说：“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无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乐词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说明它属于乐府诗歌中的“郊祀歌”或“郊庙歌”。与此相类者，还有皮日休所补之《九夏歌》。皮氏在《补周礼九夏系文序》中云：“夏者，大也。乐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诗篇也，颂之类也。”又云：“夫大乐既去，至音不嗣，颂于古不足以补亡，颂于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颂乎？”便是他们补乐府的用心。

【小乐府】 诗体的一种。清施补华《岷傭说诗》云：“谢朓以来即有五言四句一体，然是小乐府，不是

绝句。”说明“小乐府”是形式似五言绝句,而不合音律的古诗。

【乐府古题】 亦称“古题乐府”、“往题乐府”,即“拟乐府”。建安以来,曹操父子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借乐府古题以写时事,如曹操的《陌上桑》、《秋胡行》等。唐诗人更大量借乐府古题以月旦时事,抒发感慨,如李白的《乌栖曲》、《战城南》、《长干行》,王维的《陇西行》、《从军行》,李颀的《行路难》、《古从军行》、《古塞下曲》等。即使积极提倡创作新乐府的元稹,也有古题乐府《估客乐》、《织妇词》。以乐府著称的王建,写了更多的古题乐府,如《凉州行》、《北邙行》、《乌栖曲》、《雉将雏》、《公无渡河》、《饮马长城窟》等。终唐之世,作者蔚起,佳作迭出。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云:“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渡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盖误以借乐府古题写时事、抒感慨为“断题取义”,至其所解乐府古题命名之缘由,虽有时不免附会,亦颇具参考价值。

【往题乐府】 即“古题乐府”。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参见“古题乐府”及“乐府诗”。

【新题乐府】 即“新乐府”,对“古题乐府”而言。它滥觞于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成熟于杜甫之《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而大昌于元稹、李绅、白居易。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和作二十首,白居易亦作《新乐府》五十首,大都为讽谕时政,因而被白居易归入“讽谕诗”中。参见“新乐府”。

【郊庙歌辞】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分类之第一类,是用来祭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的。吴讷《文章辨体序》曰:“秦、汉以后,代有制作。然惟汉、唐、宋为盛者,盖其混一既久,功德在人,虽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懿,终非秦、魏、晋、隋、南北、五季可比也,读者考焉。”简述了此类乐府歌辞创始、发展的大略。

【燕射歌辞】 乐府诗的一种,用于宴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以宾射之礼亲故旧,以享燕之礼亲四方宾客。

【鼓吹曲辞】 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乐府诗集·鼓吹曲辞序》引蔡邕《礼乐志》云:“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周礼·大司马》云:“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注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可见军礼之有恺乐,由来久矣。因此,又叫“恺乐歌辞”。

【横吹曲辞】 乐府诗的一种,是用鼓角在马上吹

奏的军乐。《乐府诗集·横吹曲辞序》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自汉以来,北方诸少数民族皆在马上作乐,总归于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于朝会、道路、赐;有鼓角者为横吹,马上所奏者。

【相和歌辞】 乐府诗的一种,以丝竹相和,都是汉时的街陌歌谣。《晋书·乐志》谓这些“汉旧曲”乃“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又据《旧唐书·音乐志》,相和歌辞还包含楚调、侧调、平调、清调、瑟调。它们皆有辞、有声。大曲还有“艳”、有“趋”、有“乱”。辞,即其歌诗,声是其和声,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一样。

【清商曲辞】 乐府诗的一种。源出于平调、清调、瑟调之相和三调,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序》云:“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所作。”

【舞曲歌辞】 乐府诗的一种。分为雅舞和杂舞。雅舞用于郊庙、朝享,杂舞用于宴会。《乐府诗集·舞曲歌辞序》引《通典》曰:“乐之在耳者曰声,在目者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观。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选和而后大乐备矣。”又引《毛诗序》曰:“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觉手之自运,欢之至也。这便把舞蹈产生的缘由和作用,比较清晰地概括出来。舞蹈时,“天子用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左传·隐公五年》)。服虔解释曰:“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琴曲歌辞】 乐府诗的一种。琴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者也,故先王以是为修身、理性之具。”琴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琴论》加以解释说:“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古琴曲有五曲,即《鹿鸣》、《伐檀》、《猗猗》、《鹊巢》、《白驹》;有九引,即《烈女引》、《伯妃引》、《贞女引》、《思归引》、《霹雳引》、《走马引》、《箜篌引》、《琴引》和《楚引》;又有十二操,即《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飞操》、《别鹤操》、《残形操》、《水仙操》和《襄陵操》。

【杂曲歌辞】 乐府诗的一种。其内容比较庞杂,

有写心志、抒情思的;有叙宴游、言欢乐的;有发愤、伤离别的;有怨行役、苦征戍的。古辞可考者有《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之属,后人拟作者有《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门有车马客》之类。

【近代曲辞】乐府诗的一种。它也是杂曲,因其作于隋、唐时代,故别之为“近代曲辞”。《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序》曰:“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文帝置七部乐,曰西凉、清商、高丽、天竺、安国、龟兹、文康七伎,炀帝增疏勒、礼毕而成九部,至唐太宗又增高昌,并改礼毕为燕乐而成十部。及唐明皇而大盛,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至僖、昭之世,乐曲已大部亡散。

【杂歌谣辞】乐府诗的一种,包括古代的徒歌和谣谚。最早见于载籍者,有尧时之《击壤歌》,舜时之《卿云歌》,禹时之《涂山歌》。《尔雅》曰:“徒歌谓之谣。”《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歛,楚歌曰艳,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可见这一部分乐府诗,大都是里巷歌谣,各地民风。有因地而作的,如《京兆行》、《邯郸歌》;有因人而作的,如《孺子歌》、《徐人歌》;有伤时而作的,如微子的《麦秀歌》;有寓意而作的,如张衡的《同声歌》等。

【新乐府辞】乐府诗的一种。《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它包括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乐府”,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前者滥觞于虞世南之《结客少年场行》、《门有车马客》,李百药之《少年行》、《妾命薄》。兴起于“唐初四杰”,如王勃之《采莲曲》、《江南弄》;杨炯之《梅花落》、《紫骝马》;卢照邻之《关山月》、《上之回》、《巫山高》;骆宾王之《帝京篇》、《畴昔篇》、《从军行》等,造极于王维之《陇西行》、《从军行》,李白之《战城南》、《长干行》等。参见“拟乐府”和“乐府古题”。后者滥觞于长孙无忌之《新曲二首》,成熟于杜甫“即事名篇”之《兵车行》、《丽人行》等,大盛于元稹、白居易所创作的“新乐府”。参见“新乐府”及“乐府新题”。

【饶歌】即乐府诗中之鼓吹曲,是一种军乐,行军时,奏于马上,所以又叫“骑吹”。用以壮军威,赏有功,宴乐群臣。《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饶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雍)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

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亦汉曲也,其辞亡。或云汉饶歌二十一,无《钓竿》。《拥离》亦曰《翁离》。”其中名篇甚多,像《艾如张》、《战城南》、《巫山高》、《有所思》、《上邪》等。后来李白、李贺也分别写了《战城南》、《将进酒》、《巫山高》的“拟古乐府”。

【郊祀歌】乐府诗的一个组成部分,属郊庙歌辞。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郊祀歌十九章:《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齐房》、《后皇》、《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其目以歌之首句为名,除《日出入》、《天马》外,内容多不足道。后来唐李白写了《天马歌》,增加了它的光彩。

【相和曲】乐府歌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是里巷歌谣。《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它的名篇有《公无渡河》、《平陵东》、《陌上桑》、《孤儿行》等。曹操的名篇《薤露》、《蒿里》、《步出夏门行》,李白的《蜀道难》都包括在内。

【吟叹曲】古乐府相和歌辞的一种。《乐府诗集》卷二九《吟叹曲》引《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叹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叹》,四曰《王子乔》。”前三曲都是晋石崇作,惟《王子乔》为古辞。本来有八曲,其中的《小雅吟》、《蜀琴头》、《楚王吟》、《东武吟》四曲已佚。后人作《王昭(明)君》的极多,其中为人所传诵者有鲍照、庾信、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东方虬、刘长卿、李白、白居易等的作品。

【四弦曲】乐府相和歌辞之一。《乐府诗集》卷三〇《四弦曲》引《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四弦》一曲,《蜀国四弦》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调之首。古有四曲,其《张女四弦》、《李延年四弦》、《严卯四弦》缺,《蜀国四弦》节家旧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缺。”《乐府诗集》收有梁简文帝、隋卢思道、唐李贺的《蜀国弦》。

【鼓吹曲】乐府歌词之一。出自北方民族,本为军中之乐。汉有《朱鹭》等十八曲,列于殿庭,宴群臣及上食用之。大驾出游用短箫饶歌,军中行部用横吹,泛言之,统称为“鼓吹”。汉代鼓吹限制甚严,大驾卤簿、赏有功之臣、边将及万人将军始得有鼓吹;魏、晋以后,鼓吹甚滥,牙门督将、五校,皆得用鼓吹。参见“横吹曲辞”。

【平调曲】乐府歌辞之一,属相和歌辞。《乐府诗集》卷三〇《平调曲》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

《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所用乐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种。今见于《乐府诗集》者,有《长歌行》、《短歌行》、《猛虎行》、《燕歌行》、《鞠歌行》五曲,另收有《铜雀台》(《铜雀妓》和《雀台怨》)、《长歌续短歌》、《双桐生空井》和《从军行》,皆为有主名的作品。

【清调曲】乐府相和歌之一,属相和歌辞。与平调,瑟调,合称“三调”,也叫“清商三调”。所用乐器有笙、笛、篪、节、琴、瑟、箏、琵琶八种。《乐府诗集》卷三三《清调曲》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今《乐府诗集·清调曲》除收上述六曲外,还收有《吁嗟篇》、《北上行》、《长安有狭斜行》、《三妇艳诗》、《难忘曲》、《蒲生行》、《苦辛行》等。

【瑟调曲】乐府相和歌之一。所用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箏、琵琶七种,与平调曲、清调曲合称为“三调”。《乐府诗集》卷三六《瑟调曲》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东西门行》、《却东西门行》、《顺东西门行》、《饮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乐宫行》、《妇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墙上蒿行》、《野田黄雀行》、《钓竿行》、《临高台行》、《长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福钟行》、《艳歌双鸿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门有车马客行》、《墙上难用趋行》、《日重光行》、《蜀道难行》、《棹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杨行》、《胡无人行》、《青龙行》、《公无渡河行》。”以上三十八曲中,名作甚多,唐人拟之者,有王维、李白、储光羲、李贺、柳宗元、元稹、王建等。

【楚调曲】乐府相和歌辞之一。《乐府诗集》卷四一《楚调曲上》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箏、琵琶、瑟七种。”张永《元嘉技录》云:“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鷓鴣游弦》、《流楚》、《窈窕》,并琴、箏、笙、筑之曲,王录(王僧虔《技录》)所无也,其《广陵散》一曲,今不传。”今《乐府诗集·楚调曲》所收,尚有《反白头吟》、《决绝词》、《怨歌行》、《明月照高楼》、《长门怨》、《阿娇怨》、《婕妤怨》、《长信怨》、《蛾眉怨》、《玉阶怨》、《宫怨》、《杂怨》等。

【大曲】乐府相和歌辞之一。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大型歌舞曲,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与

宋代以词为基本形式的大曲有别,它系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如董颖咏西施故事的《道古薄媚》,曾布咏冯野故事的《水调歌头》。《乐府诗集》卷四三《大曲十五曲》引《宋书·乐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东门》,二曰《西山》,三曰《罗敷》,四曰《西门》,五曰《默默》,六曰《园桃》,七曰《白鹄》,八曰《碣石》,九曰《何尝》,十曰《置酒》,十一曰《为乐》,十二曰《夏门》,十三曰《王者布大化》,十四曰《洛阳令》,十五曰《白头吟》。”除《碣石》、《步出夏门行》、《西山》、《园桃》、《置酒》为魏三祖及东阿王词外,余皆古辞。又据王僧虔《技录》:“《棹歌行》在瑟调,《白头吟》在楚调。”而《宋书·乐志》归之于大曲,未知孰是。又《乐府诗集·大曲十五曲》中仅收有《满歌行二首四解》,并注明为“晋乐所奏”,未见上述之十五曲曲辞。

【吴声歌曲】乐府清商曲辞之一。即江南的民歌,也叫“吴歈”或“吴趋”。《乐府诗集》卷四四《吴声歌曲》引《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此言吴声歌曲产生与发展的情况。又据《古今乐录》:“吴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四曰《上声》,五曰《欢闻》,六曰《欢闻变》,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护》,十曰《团扇郎》,并梁所用曲。”此言吴声歌曲的歌辞名称。以上十曲,以《子夜歌》为著名。《乐府诗集·吴声歌曲》除上述十曲外,还收有《七日夜女歌》、《长史变歌》、《黄生曲》、《黄鹄曲》、《碧玉歌》、《桃叶歌》、《长乐佳》、《欢好曲》、《懊侬歌》、《懊恼曲》、《华山畿》、《读曲歌》、《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三阁词》、《泛龙舟》、《黄竹子歌》、《江陵女歌》、《神弦歌》等,其中的《懊侬歌》、《桃叶歌》、《华山畿》、《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都是名曲。

【西曲歌】乐府清商曲辞之一。它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其音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把它叫做“西曲”。《乐府诗集》卷四七《西曲歌上》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襄阳蹋铜蹄》、《采桑渡》、《江陵乐》、《青阳度》、《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女儿子》、《来罗》、《那呵滩》、《孟珠》、《翳乐》、《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纛》、《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寿阳乐》、《作蚕丝》、《杨叛儿》、《西乌夜飞》、《月节折杨柳歌》三十四曲。”其中以《乌夜啼》、《估客乐》最为有名。

【江南弄】乐府清商曲辞之一。南朝梁武帝在西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乐府诗集》卷五〇引

《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约作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亦谓之《江南弄》云。”其中以《采莲曲》、《采菱曲》最为著名，唐人作者极多。

【但歌】 乐府楚调曲之一，又名“但曲”。《晋书·乐志》下云：“但歌四曲，自汉世无弦节，作妓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张永《元嘉技录》云：“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鸱鸡游弦》、《流楚》、《窈窕》。”自晋以来，已不复传。

【倚歌】 乐府清商曲辞之一。《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中之“《青阳度》、《女儿子》、《来罗》、《夜黄》、《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纓》、《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作蚕丝》，并倚歌”。又卷四九引《古今乐录》曰：“凡倚歌，悉用鞞鼓，无弦有吹。”可见它与西曲中之《乌夜啼》、《估客乐》、《襄阳乐》等舞曲在运用乐器方面有所不同。

【徒歌】 是一种不被管弦的曼声歌谣。《尔雅》曰：“徒歌曰谣。”《宋书·乐志一》把《子夜歌》、《凤将雏》、《前溪》、《阿子》、《欢闻》、《团扇》、《督护歌》、《懊侬歌》、《六变》、《长史变》、《读曲歌》等古曲，说是“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

【吴歈】 吴地歌曲的泛称。《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庾信《哀江南赋》：“吴歈越吟，荆艳楚舞。”

【吴趋】 吴地的歌曲。《乐府诗集》卷六四《吴趋行》引崔豹《古今注》曰：“《吴趋行》，吴人以歌其地。陆机《吴趋行》曰：‘听我歌吴趋。’趋，步也。”

【伧歌】 旧指粗野的民歌。《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这些歌曲，后来渐被于管弦，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曰：“古曰章，今曰解。”其实相和歌辞中的珍品很多，把“街陌讴谣”斥之为“伧歌”，是一种偏见。

【登歌】 古代举行大祭典、大朝会时所奏的歌。乐府郊庙歌辞之一。也叫做“升歌”。《周礼·大师》曰：“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小师》曰：“大祭祀，登歌击拊。”在汉之世，独奏登歌，后来始用丝竹。登歌是歌颂祖宗的功烈，祈求天神福赐，所以歌时要去钟撤竿，以便传其歌呼之声。王韶之有《登歌》八首，沈约有《登歌》七首。参见“升歌”。

【升歌】 祭祀、宴享时在堂上所奏的歌。属乐府郊庙歌辞，也叫“登歌”。《礼记·明堂位》：“升歌《清庙》，下管象。”又《仲尼燕居》曰：“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尚书大传》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庙》，大琴练弦达越，大瑟朱弦达越，以韦为鼓，不以竿瑟之声乱人声。《清庙》升歌，歌先人之功烈德泽，苟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故《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此之谓也。”说明“升歌”是非常严肃隆重的。参见“登歌”。

【房中乐】 乐府郊庙歌辞之一。用来歌颂后妃之德。《通典》：“周有《房中之乐》，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寿人》。”《汉书·礼乐志》曰：“（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安世乐】 即《房中乐》，孝惠帝所改的名称。今《乐府诗集》卷八收有《汉安世房中歌》十七首，或颂其“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或颂其“承帝明德”，“永受厥福”；“承帝之明，下民安乐”。这大概是更名《安世乐》的用心。参见“房中乐”。

【五言古诗】 不究音律，不求对偶，篇幅可长可短，韵脚可仄可平，或两句一韵，或四句一韵，或八句一韵，一般要求多寡匀称，平仄递用，一句五字的诗体。

【五古】 “五言古诗”的简称。

【七言古诗】 古体诗的一种。字不论平仄，篇不拘长短，七字一句，可以换韵，是常见的一种诗体。它发轫于《柏梁》，成熟于鲍、谢，大盛于唐、宋。

【七古】 即“七言古诗”的简称。清翁方纲有《七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三昧举隅》（皆谈七言古诗），钱木庵《唐音审体》有《古诗七言论》，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有《论七言古诗》，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有《七古凡例》，或论格律，或评作家，或述源流，可资参阅。参见“七言古诗”。

【杂言古诗】 以七言为主，间以三、四、五、六、七、九诸言的古诗。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杂言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中列有“杂言古诗体”，并云：“按古诗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杂言。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别列为一类，以继七言古诗之后。”如李白的《蜀道难》、《梁甫吟》、《庐山谣》、《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杜甫的《兵车行》、《同谷七歌》等。

【长短句】 即“杂言古诗”的别名。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云：“一曰长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间杂长句，始鲍明远。唐人承之，体变尤为不一。当与后歌行诸类互参。”明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云：“其间杂以乐府、长短句、词、吟、曲、引、篇、行、

咏、调之属，皆名为诗。”如卢仝《有所思》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不见心断绝。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绮琴。高调弦绝无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此诗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九言，是“长短句”的典型。

【七言歌行】 七言古诗的一体。歌为总名，铺陈其事而歌之曰行。或称歌，或称行，或兼称歌行。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此释歌行之名。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云：“古人七言歌行止有《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卢思道有《从军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此言歌行发展之迹。清黄子云《野鸿诗的》云：“七言歌行别有音节，音节非平仄之谓，又非语言可晓。如挝鼓者，轻重疾徐，得之心而自应之手耳。”清翟翬《声调谱拾遗》引杜甫《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诗评曰：“此古诗歌行极则也。其用韵转换，声调高下疾徐处，皆当细意味之。”此言歌行韵律之特点。参见“七言古诗”。

【拟古诗】 模仿古人诗歌形式而写的作品。往往在题上冠以“效”、“代”、“学”、“同”等字样，如陆机有《拟古诗》十二首，李白有《拟古十二首》，何逊有《学古三首》，李商隐有《效江南曲》《效徐庾体赠更衣》，杜甫有《同元使君春陵行》、白居易有《代梦得吟》等。宋陈善《扞虱新语》下三《文章拟古》：“拟古之诗，难于尽似，观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便是颜渊具体，叔敖复生也。”历代拟古之作甚多，六朝人拟汉魏乐府，拟《古诗十九首》，后人拟“徐庾体”、“齐梁体”。唐、宋人拟陶诗等，都是“拟古诗”。

【歌行】 古诗的一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歌行体”，并自注云：“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长歌行》、《短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单以‘行’名者。”“歌行”渊源于乐府，形式上采用七言及长短句，一般比较自由，富于变化。唐人以“歌行”名诗者，不胜枚举，而尤以李白、杜甫、岑参、高适、李贺的歌行最为出色。

【歌谣】 民间诗歌。内容质朴，形式多样，一般押韵，可唱可说。换言之，即民歌和民谣的合称。歌和谣的概念，在我国古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有以能不能合乐作为划分的标准。如《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注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以能否划分章节作为标准。如《韩

诗·章句》云：“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有以能否歌唱作为划分的标准。如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将乐歌和谣辞分为两类，乐歌是可唱的，谣辞是只说不唱的。也有对歌和谣不作划分的。如《荀子·礼论》：“歌谣谑笑，哭泣涕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

【歌曲】 配了乐曲的歌诗。“歌曲”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乐书》：“歌曲曰：太一贡兮犬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王充《论衡·讲瑞篇》亦云：“歌曲弥妙，和者弥寡。”

【谣谚】 民间歌谣和谚语的合称。谣和谚都是韵语，都来自民间，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故在我国古代两者可以互训，可以合称。清杜文澜在其所编的《古谣谚·凡例》中说：“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之名。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纾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直速，此谣谚所由判也。”这是从其异的方面而言，即谣可以拖长声音来唱，谚只能用平易的语言来说。从其同的方面而言，他又认为两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

【谣】 民歌。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单独列为一体。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因袭其说曰：“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并自注曰：“抽其意为引，导其情曰曲，合乎俗曰谣。”它是一种通俗的不合乐的民歌，所以《尔雅》说：“徒歌谓之谣。”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亦云：“通乎俚俗曰谣。”

【歌】 古代诗体之一。有的解释为合乐的曲子，如《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孔传加以解释说：“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有的解释为纵情歌唱，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曰：“放情曰歌。”有的说是曲的总名，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歌，曲之总名。”

【吟】 古诗的一体。以写抑郁伤悲之情者多。故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云：“吁嗟慨叹，悲忧深思谓之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悲如蛩蛩曰吟。”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体凡》中亦持此论。凡此种，说明“吟”是宜于写幽愁悲思的。卓文君之《白头吟》，无名氏之《梁甫吟》（一说曾子所作，一说诸葛亮所作），前者是自绝之词，后者为葬歌，皆所以抒悲愤述哀思者。

【词】 古诗的一体。“词”亦作“辞”。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感触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进乎文为辞。”说明“辞”必须有较好的文采。古代多写作“辞”，如汉武

帝的《秋风辞》，乐府诗的《木兰辞》等。唐以后往往写作“词”，如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山鹧鸪词》、《巴女词》，白居易的《狂歌词》、《春词》、《恨词》、《杨柳枝词》，李贺的《绿水词》，李商隐的《汉宫词》、《齐宫词》等。亦有不少写作“辞”的，如陆龟蒙的《战秋辞》、《迎潮送潮辞》、《问吴宫辞》。

【引】 古诗的一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云：“品秩先后，叙而推之谓之引。”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载始末曰引。”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抽其意为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可见“引”是一种兼有“叙事”和“议论”的长篇诗。古有《霹雳引》、《天马引》，杜甫有《丹青引》，李贺有《李凭箜篌引》、《走马引》、《苦篁调啸引》等。

【咏】 古诗的一体。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不有佳咏，何申雅怀。”说明“咏”也就是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咏以永其言。”《诗问》张历友答：“长吟密咏以寄其志谓之咏。”说明“咏”是言情寄志的，是可以曼声歌唱的。颜延年有《五君咏》，高适有《三君咏》，李白有《姑熟十咏》，杜甫有《江头五咏》等。

【曲】 古诗的一种。宋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千歧万辙，非诘屈折旋则不可尽，则为曲。”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声音杂比，高下短长谓之曲。”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委曲尽情曰曲。”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导其情为曲。”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曰曲。”说明曲是一种旋律多变化、内容较曲折、感情较细微的诗歌。《乐府诗集》中有《乌栖曲》、《大堤曲》，李白有《绿水曲》、《凤凰曲》、《凤台曲》，李贺有《贵公子夜阑曲》、《湖中曲》、《屏风曲》、《夜饮朝眠曲》、《江楼曲》、《莫愁曲》、《静女春曙曲》，李商隐有《宫中曲》、《射鱼曲》、《房中曲》、《烧香曲》、《又效江南曲》等。

【篇】 一种篇幅较大的古诗。宋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篇者，举其全也；章者，次第陈之，互见而相明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抽其意为引，导其情为曲，合乎俗曰谣，进乎文为辞，又衍而盛焉为篇，皆以其词为名者也。”如曹植有《美女篇》、《白马篇》、《帝京篇》，鲍照有《代陈思王京洛篇》。

【唱】 古诗的一体。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咏以永其言，吟以申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也说：“发歌曰唱。”说明它是从声音的角度来命名的一种诗体。古人以“唱”名诗者颇

罕见，曹操有《气出唱》，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收入“相和歌辞相和曲”中。

【弄】 一种可以用丝管配乐的古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梁武帝有《江南弄》，唐李贺亦有《江南弄》。

【操】 古诗的一体。《后汉书·曹褒传》：“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注曰：“操，犹曲也。刘向《别录》曰：‘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宋曾慥《类说》引《风俗通》云：“凡琴曲，和乐而作者谓之畅，困忧而作者谓之操。”说明“操”是琴曲之一，是抒发困忧悲愁的情感的。古有《琴操》、《龟山操》、《思亲操》、《别鹤操》。韩愈有《琴操十首》。

【行】 乐府和古诗的一种体裁，即歌行的别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单以行名者”。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说明它是唐人对乐府的一种革新，或叫“歌”，或叫“行”，或叫“歌行”。唐初即有以“行”名诗者，如虞世南之《从军行》、《怨歌行》，李百药之《少年行》等。历“初唐四杰”，以“行”名诗者虽不乏人，但仍未脱乐府之羁绊，真正即事名篇，蔚成风气的是诗圣杜甫，他以“行”名诗，竟达五十题之多，如《兵车行》、《丽人行》、《最能行》、《缚鸡行》、《岁晏行》、《蚕谷行》、《义鹘行》、《贫交行》等。

【叹】 古诗的一体。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吟以呻其郁，叹以抒其伤。”说明“叹”是用来抒发伤感的情绪的。如杜甫的《夏日叹》、《夏夜叹》、《秋雨叹》，统名“三叹”，体现了诗人关心民瘼的深厚感情，有人将它与“三吏”、“三别”并提。唐咸通间，乐工李可及曾作《叹百年曲》，“历叙人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少时娟好，壮时追欢极乐，老时衰飒之状”。其声极其凄惋。见《资治通鉴·唐纪·懿宗纪》胡三省注。

【思】 古诗的一体。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人以“思”名篇者不少，如李白的《春思》、《秋思》、《静夜思》，李商隐的《离思》、《凉思》、《夜思》、《秋日晚思》等。

【怨】 古诗之一体。这是从感情的角度来命名的。大概源于乐府楚调曲的怨歌行，有的说是楚卞和献玉遭刑而作，有的说是汉班婕妤失宠，托辞于纨扇而作，后来曹植和梁武帝都有拟作。唐人以“怨”名篇的，亦不罕见，如崔湜的《婕妤怨》、王翰的《蛾眉怨》、乔知之的《长门怨》、李白的《玉阶怨》、孟郊的《征妇怨》、李商隐的《清夜怨》等，大都写妇女的失宠

之恨、别离之愁。

【悲】一种抒发悲哀感情的诗歌。“悲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抒发一种悲壮的感情。唐人以“悲”名篇的，或将“悲”字置于题前，如杜甫之《悲陈陶》、《悲青坂》，韦应物之《悲纨扇》，或将“悲”字置于题后，如李贺的《铜驼悲》，白居易的《自悲》。

【哀】抒发悲哀感情的古体诗。有将“哀”字置于题前的，如杜甫的《哀江头》、《哀王孙》，孟郊的《哀孟云卿嵩阳荒居》；也有将“哀”置于题后的，如杜甫的《八哀诗》。

【乐】古诗体之一。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乐则杜审言之《大酺乐》，白居易之《太平乐》，张祜之《千秋乐》，又皆以情为其名者也。”唐人以“乐”名篇者，一为歌功颂德之作，如上述之《大酺乐》、《太平乐》、《千秋乐》，以及令狐楚的《圣明乐》等；一为刺世疾邪之作，如李端的《春游乐》，杨巨源的《襄阳乐》，元稹的《估客乐》，李贺的《荣华乐》、《瑶华乐》、《夜来乐》、《少年乐》等。

【赋得】诗体之一。或以事物为题，或以古人诗句为题，叫做“赋得”。唐以前梁武帝有《赋得涉江采芙蓉》，庾信有《赋得荷》、《赋得集池雁》。唐以后，便成为科举考试的“试帖诗”，考官以古人诗句或事物为题，使赋五言排律诗六韵或八韵，叫做“赋得”。唐人以“赋得”名篇者甚多，以古人诗句为题的，如王维的《赋得秋日悬清光》，韦应物的《赋得浮云起离色》，李端的《送客赋得巴江夜猿》；以事物为题的，如戴叔伦的《赋得长亭柳》，李益的《赋得早燕送别》，白居易的《赋得听边鸿》，元稹的《赋得鱼登龙门》。参见“试帖诗”。

【口号】一种未经起草、随口吟成的诗。它可以是古体，也可以是近体。明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一：“曰口号者，或四句，或八句，草成连就，达意宣情而已也。”清马士嶽《诗法火传》卷一五：“口号诗，贵明白晓畅。”以“口号”名篇者，唐以前已有梁简文帝《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南朝宋鲍照《还都口号》；唐人以“口号”名诗者甚多，如王维的《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为五绝；李白的《口号》、《口号赠杨徵君》，前者为五绝，后者为五古；杜甫的《晚行口号》、《紫宸殿退朝口号》、《存殁口号》，第一题为五律，第二题为七律，第三题为七绝；权德舆《李十韶州寄途中绝句使者取报修书之际口号酬赠》、《敕赐长寿酒因口号以赠》，前者为七绝，后者为五绝。

【口占】始见于《汉书·朱博传》：“博口占檄文。”

原指不用起草、随口成文的各体文字，后又为诗所独专，称“口号”。《李太白全集·口号》清王琦注：“口号，即口占也。”又注《口号赠杨徵君》诗云：“诗题有‘口号’，始于梁简文帝《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庾肩吾、王筠俱有此作。至唐遂相袭用之，即是‘口占’之义。”李商隐有《病中闻河中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诗，系五言排律。《董西厢》一：“佳人对月，依君瑞韵，亦口占一绝。”则明指绝句。

【调】可以合乐的诗。李白有《清平调》三章。《太真外传》：“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笈，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章。……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

【长调】唐人称七字一句的歌诗为长调。宋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诗体之一。与宋词的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李贺《申胡子觥觥歌并序》云：“申胡子，朔客之苍头也。……自称学长调、短调，久未知名。”所谓长调、短调，即七言、五言。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云：“长调即七言诗，短调乃五言诗。”

【短调】唐人称五言诗为短调。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曰长调，曰短调。”胡才甫《笺注》云：“长调即七言诗，短调乃五言诗。”

【章】诗体之一。宋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篇者，举其全也；章者，次第陈之，互见而相明也。”按以“章”名诗者，一为乐章，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所谓的“郊庙之乐章”，如裴度之《享惠昭太子庙乐章》；一为连续数章，即李之仪所说的“次第陈之”，如刘禹锡《姑苏台畔有采香径，梁天监中置佛寺曰灵岩，即故宫也，信为绝境，因赋二章》。一为一首、一诗，如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黄滔《翁文尧以美疹暂滞令公大王益得异礼观今宠待之盛辄成一章》，徐夔《览柳浑汀洲采白蘋之什因成一章》，或为七律，或为七绝，“一章”即“一诗”。

【偈】诗的一体，本为佛经中的颂词，多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为句。唐人将其引入诗中，多写见道之语。如白居易的《欢喜二偈》，末二句为“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司空图的《偈》云：“人若憎时我亦憎，逃名最要是无能。后生乞汝残风月，自作深林不语僧。”皆七言绝句，并与释家的思想有关。

【长句】七言诗的别名。一为七言古诗。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仇注引计东曰：“长句，谓七言歌行，太

白所最擅场者。”一为七言律诗。以“长句”名七言律诗者，白居易、杜牧、罗隐、韩偓等诗中所常见，如白氏《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贺而饯之》、《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杜牧《街西长句》、《柳长句》、《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等，皆为七言律诗。亦有称七言排律为长句的，如杜牧《车兵长句十韵》。

【近体诗】 唐代兴起的格律诗。包括律诗和绝句。要求句式整齐，音律和谐，平仄、对偶有一定的格律。宋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近体见于唐初，赋平声为韵，而平侧协其律，亦曰律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其（唐人）所变诗体，则声律之协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为近体。”这里讲了三个要点：一为它是唐人创作的新体诗；二为它要求字数、句数、平仄、韵脚，都要严格按照已经定型的规律；三为它包括律诗和绝句，其中又有五、六、七言之别。

【今体诗】 即“近体诗”。系相对古体诗而言，是绝句、律诗和排律的通称。参见“近体诗”。

【格律诗】 即“近体诗”。唐人在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新体诗。它包括绝句、律诗、排律三大类，要求句有定式，字有定数，律有定声，对偶有定格。参见“近体诗”。

【律格诗】 唐人以绝句、律诗及排律为律诗，而以五、七言古体诗为格诗。《唐诗纪事》四九“项斯”条：“始张水部籍为律格诗，惟朱庆馀亲授其旨。”所谓“律格诗”，即五、七言律绝和五、七言古诗。

【律诗】 唐代初期形成的格律诗。大抵定型于唐初的“四杰”和沈佺期与宋之问。它包括律诗和绝句两大类。律诗又分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五、七言排律。律诗共八句三韵或四韵，每句有一定的平仄，中间两联要求对偶，一般只能押平声韵。十句以上的叫做“排律”，它是律诗的延长。绝句每章四句，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要求字有定声，偶句押韵。

【格诗】 它有两个含义：一即唐人以五、七言古体诗为格诗；一是诗中运用排偶、平仄大致协调的梁、陈诗歌，也叫“格诗”。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云：“建安无偶句，两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陈、梁谓之‘格诗’，有排偶，至无粘。”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唐时有格诗之名，与律诗并举。”按白居易《长庆集》标有“格诗”一目，其所作《元宗简集序》又谓“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所谓“格诗”，正是五、七言古体诗。

【绝句】 诗体的一种。又称绝诗、截句和断句。一首四句，或五言，或七言，也有六言的，平仄和押韵都有一定的格式。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绝句

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这是对绝句的名称和渊源所作的说明。至于绝句的作法，论者甚众。元杨载《诗法家数》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参阅“截句”、“断句”。

【截句】 即“绝句”。有谓绝句即截取律诗的一部分而成，所以把它叫做“截句”。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清施补华《岷傭说诗》云：“五言绝句，截五言律诗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后四句者，如‘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是也；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也；有截前后四句者，如‘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是也。七绝亦然。”盖谓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之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的后四句，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是截首尾四句。但在律诗形成以前，已有“绝句”之名。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一〇即收有《古绝句》四首和吴均的《杂绝句》四首。吴氏第四首云：“泣听离夕歌，悲衔别时酒。自从今夕去，当复相思否？”除押仄韵外，基本上已经合律。可见截取律诗一部分而成之说，尚值得商榷。参阅“绝句”、“断句”。

【断句】 即“绝句”。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绝句，即六朝人所名断句也。”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三：“宋刘昶入魏作断句诗云。按此即今绝句也。绝句之名当始此。以仓卒信口而成，止于四句，而篇足意完，取断绝之义，因相沿为绝句耳。”参阅“绝句”、“截句”。

【绝诗】 一篇四句、音协韵合的格律诗，即“绝句”。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云：“绝句，唐乐府也。篇止四句，而倚声为歌，能使听者低徊不倦；旗亭妓女，犹能赏之，非以扬音抗节有出于天籁者乎？”沈氏所讲三个要点，即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唐的乐府；就其篇幅而言，它止有四句；就其音乐性而言，它可以倚声为歌。参阅“绝句”、“截句”及“断句”。

【古绝】 绝句的一体。它多用仄韵，多为拗句，多不调平仄。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卷一〇收有《古绝句》四首，其第一首云：“薰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宋许颔《彦周诗话》：

“‘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复有山’，言出也；‘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此诗虽押平韵，但未协音律，未调平仄。古绝唐以前多五言，唐以后则五、七言均有。五言如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七言如杜甫《三绝句》之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杨伦《杜诗镜铨》引邵子湘批云：“有古绝，有律绝，此及《黄河》二首，皆古绝也。”

【律绝】 即唐以来流行的近体绝句。相对于“古绝”而言。每首四句，分为五言、六言、七言，称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它要求调平仄，合声律，押平声韵。参见“绝句”。

【五绝】 五言绝句的简称。每首四句，每句五字，押平声韵，一韵到底，并按规定调平仄。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五言绝句，右丞（王维）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韦应物）之古淡，并入化机；而三家中太白近乐府，右丞、苏州近古诗，又各擅胜场也。”此言唐代五言绝诗的成就及其主要作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云：“五言绝有两种：有意尽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尽者。言止意不尽，深得味外之味，此从五言律而来，故为正格。意尽言止，则突然而起，斩然而住，中间更无委曲，此实乐府之遗音，故为变调。”此言五言绝句的创作要诀和渊源。参见“绝句”。

【六言绝句】 绝句的一体。要求有对仗，调平仄，遵循比较严格的格律。作者较少，佳作亦不多见。唐人如王维《田园乐》（一作《辋川六言》）组诗七首，最为脍炙人口。其第六首云：“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宋人如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传诵较广，苏轼、黄庭坚均有和作。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收录其诗，并评为“压卷”之作。其一云：“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七绝】 七言绝句的简称。每首四句，每句七字，一般要求押平声韵，遵循严格的音律。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均云：“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此言七绝的作法。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绝凡例》亦云：“唐末惟七言绝句，不少名篇。司空图《赠日本鉴禅师》、崔涂《读庾信集》，骨色神韵，俱臻绝品，可以俯视众流矣。”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七绝，唐人多转，宋人多直下，味短。”此就各个时代对七言绝句的评说。

【仄韵绝句】 即“古绝”。不要求严格的调平仄，

叶声律，但须押仄声韵。如刘长卿《送方外上人》：“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住”、“处”仄韵，第四句之“知”，未调平仄。

【散体绝句】 绝句之一体。四句皆散，不作对偶。五言如卢纶《和张仆射塞上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七言如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为绝句的正体。

【偶体绝句】 绝句之一体。四句皆对。五言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诗曰：“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七言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拗体绝句】 亦称“拗绝”。绝诗每句的平仄都有定格，不依常格而改变其平仄所作的绝句即为“拗体”。有拗两句者，如李白的《山中与友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一句之第五字应仄而平，二句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而为“仄平仄平仄仄平”。四句全拗的，如裴迪的《孟城坳》：“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此诗的平仄，应为“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而平仄全不调。

【折腰绝句】 绝诗之一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惠洪《天厨禁脔》卷上：“折腰步句法，虽中失粘而意不断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引《西清诗话》本其说，亦作此解。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韦应物《宿中山》：“幽人自爱山中宿，更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按照定律，两诗的第三句，平仄应与第二句同，第四句的平仄，应与第一句同；而此则第一、二句的平仄，与第三、四句的平仄相应。两句失粘，似在中腰折断，故名“折腰绝句”。

【五律】 五言律诗的简称。每首八句，每句五字，中间四句要求对仗，每句平仄要求协调。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初人研揣声音，稳顺体势，其制乃备。神龙之世，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然名贵。开、宝以来，李太白之明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杜子美独辟蹊径，寓纵横排奰于整密中，故应包涵一切。终唐之世，变态虽多，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此言五律之源流变化，可参。

【五言律诗】 即“五律”，见该条。

【七律】 七言律诗的简称。每首八句，每句七字。前二句叫首联，三、四句叫颌联，五、六句叫颈联，七、八句叫尾联。中间二联即颌联和颈联要求对仗，首尾两联有对有不对者。偶句押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还要求字调平仄，符合粘对的规律，即一句之中，偶数字的平仄要相间；一联之内，出句与对句的平仄要相对，上下联相承接的句子，平仄要相粘。《师友诗传录》萧亨答：“七言律诗，五言八句之变也。唐初始专此体。沈（佺期）、宋（之问）精巧相尚，然六朝馀气犹存。至盛唐声调始远，品格始高。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诸作，各臻其妙。李颀、高适，皆足为万世法程。杜甫雄浑富丽，克集大成。”

【七言律诗】 即“七律”，见该条。

【古律】 平仄未尽调、声律未全谐、有时押仄韵的律诗。大抵在律诗尚未定型之前，作者较多。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有古律，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清冯班《古今乐府论》云：“严沧浪云：有古律诗，则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别矣。”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二中，认为“七律有未离古诗气脉者”，“疑即古律诗”。并举姜皎、崔日用、沈云卿、独孤及之《龙池乐章》、《早发龙沮馆》之诗为例。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则认为“《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类，疑即所谓古律诗也”。气脉未离古诗，而平仄又拗的，如崔颢的《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前半未调平仄，未讲对偶，犹有古诗气味，故俞陛云《诗境浅说》、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皆以此诗的格调出自沈云卿《龙池篇》，可为古律之适例。

【变律诗】 变律，其实就是意在讽刺、语主质朴、文字不求藻饰、音律不求和谐的古体诗。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苏涣”评云：“三年中作变律诗九首，上广州李帅。其文意长于讽刺，亦育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故善之。”苏涣的“变律诗”其三云：“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空对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盖因“变风”、“变雅”，所以讥刺时政，故名其意存讽刺之诗为“变律”。

【散体律诗】 通首不对的律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二：“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如孟浩然《舟中晚望》云：“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

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云：“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二此诗后引赵宦光曰：“律不取对，如李白‘牛渚西江夜’云云，孟浩然‘挂席东南望’云云，二诗无一句属对，而调则无一字不律。故调律则律，属对非律也。”

【俚体律诗】 通首皆对的律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彻首尾对者，少陵多此体。”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律诗“有全首俱对者，老杜多此体；有全首俱不对者，太白多此体。皆属变格，或间出而用之。”杜甫五律如《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云：“鬓毛垂领白，花蕊亚枝红。欹倒衰年废，招寻令节同。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有喜留攀桂，无劳问转蓬。”七律如《冬至》云：“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是三秦。”杜律多此体，不胜枚举，以其句句骈俪，故曰俚体律诗。

【仄韵律诗】 通首皆押仄韵的律诗。清冯班《钝吟杂录》：“《瀛奎律髓》有仄韵律诗”。作品较罕见。五律如郑南金《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云：“重阳玉律应，万乘金舆出。风起韵虞弦，云开吐尧日。菊花浮圣酒，茱萸挂衰质。欲知恩煦多，顺动观秋实。”七律如高适《九月九日酬颜少府》云：“檐前白日应可惜，篱下黄花为谁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钱始沽酒。苏秦憔悴时多饮，蔡泽栖惶世看丑。纵使登高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两诗皆平仄协调，对仗工整，只不过均押仄韵。

【转韵律诗】 律诗之一种。其实是古诗之调平仄者。清冯班《钝吟杂录》：“唐人李义山有转韵律诗。”汪师韩《诗学纂闻》：“至冯钝吟谓义山有转韵律诗，此乃指《偶成》转韵一篇，特古诗之调平而似律者耳。”按此诗全题为《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实为转韵之古诗。

【拗体律诗】 突破平仄常规的律诗叫“拗体律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按律诗平顺稳贴者，每句皆以第二字为主，如首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二、三句当用仄声，四句、五句当用平声，六、七句当用仄声，八句当用平声。用仄反是。若一失粘，皆为拗体。”对于拗句，往往要采取“救”的办法，即前句该平处用了仄声，则在下句该仄处用一平声，作为补偿。如杜甫《题省中院壁》：“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雪常阴阴。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袞职曾无一字

补,许身愧比双南金。”此诗一句的“十”,二句的“常”,三句的“丝”和“白”,四句的“青”,五句的“谬”,六句的“违”,七句的“一”,八句的“双”,皆失粘,故为“拗体律诗”。

【六句律诗】 一首只有六句的律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止三韵者。”自注云:“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诗‘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常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天子圣,不战四方平’是也。”按唐人不独有六句五言律,亦有六句七言律,如李白《送羽林陶将军》诗:“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莫道词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句句合律,只中间少一联。清陈仅《竹林答问》:“此体盛于陈、隋之间,盖由古人律之交际也。唐人偶一为之,亦意尽而止耳,未尝拘拘取备一体,后人尽可不学。”

【三韵律诗】 即“六句律诗”。其名称始见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七言小律”下注云:“严沧浪以唐人六句诗合律者称三韵律诗。”按唐人此体甚多,如储光羲的《幽人居》、《石子松》、白居易的《听弹古渌水》、《小池》,皆“三韵律诗”,亦称为“三韵小律”。

【小律】 即五、七言之六句律诗。明王世贞始名之为“小律”。白居易虽有“大江浑处月明时,一夜吟君小律诗”(《江上吟元白绝句》)之句,但所谓之“小律诗”,明指五、七言绝句。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律体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自注云:“严沧浪以唐人六句诗合律者称‘三韵律诗’,昭代王弇州(世贞)始名之为‘小律’云。”

【九言律诗】 九字一句的律诗。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大是蛇足,只可谓之诗馀耳。此体始于魏。”

【排律】 十句以上的律诗。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必须对仗,因其是按律诗的粘对规律,一联一联排比而成,故称为“排律”。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高棅又创排律之名,虽古人有排比声律之言,然未闻谓之排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如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东南行一百韵》,王禹偁的《谪居感事诗一百六十韵》。分为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五言排律南北朝时已有滥觞,如南朝宋谢灵运之《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北周庾信之《奉和山池》。七言排律,据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

犹可,贯珠益艰。”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排律所尚,在气局严整,属对工巧,段落分明,而其要在开合相生,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使语排而忘其为排,斯能事矣。”于斯可知创作排律之难,亦为创作排律之秘。

【长律】 “排律”之别称。清钱木庵《唐音审体》:“七言长律诗,唐人作者不多,以句长则调弱,韵长则体散,故杰作尤难。”参见“排律”及“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各条。

【六言律诗】 六字一句的律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又六言律诗,刘长卿集有之。”按刘氏有《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蛇浦桥下重送严维》两首六言律诗。其前一首云:“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音律和谐,对偶工整,清新可诵。

【长韵律】 即“排律”。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排律之名,始于(明高棅)《品汇》。唐人名长律,宋人谓之长韵律。”

【五言排律】 一篇在十句以上之五言律诗。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五言排律,至杜集观止;若多至百韵,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补缀完局,缘险韵留剩后幅故也。白香山窥破此法,将险韵参错前后,略无痕迹,遂得绰有馀裕。故百韵叙事,当以香山为法。”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刘文房(长卿)五言长律,博厚深醇,不减少陵;求杜得刘,不为失求。”参见“排律”及“五排”。

【五排】 “五言排律”的简称。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五排,即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体已成。”施闰章《蠉斋诗话》:“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夫嗣真》四十韵,沉雄老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旌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于此可见“五排”之渊源及其发展之情况。参见“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一篇在十句以上的七言律诗。清方世举《兰丛诗话》:“七排似起自老杜,此体尤难,过劲荡又不是律,过软款又不是排,与五排不同,句长气难贯也。”张谦宜《缃斋诗谈》卷二:“七言排律,《杜陵集》止有三首,其难可知。一是句长髓不满,一是调缓骨易酥。”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七言排律,唐人断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缘七字诗得四韵,于律法更无遗憾;增至几十韵,势须流走和软,方成片段。似此最易流入唱本腔调,纵复精工,有乖风雅。”可见创作七言排律之不易。参见“排律”。

【七排】 “七言排律”的简称。参见该条。

【竹枝词】 起源于巴渝(今四川东部)的民歌,以

描写人情风土为主要内容。唐刘禹锡《竹枝词序》云：“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汗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咏之，附于末。”

【竹枝子】即“竹枝词”。清王士慎《带经堂诗话》卷一：“竹枝本名竹枝子。”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中列有“竹枝子”，与“鱼歌子”、“生查子”、“沙磧子”并列。生活在刘禹锡之前的顾况亦有《竹枝词》之作，说明《竹枝词》之作并不自刘禹锡始，但刘氏作《竹枝词》九首后，始形成风气，历代作者，均有继作。

【杨柳枝】富有民歌色彩的诗体。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序》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白氏有《杨柳枝词八首》，其第一首末二句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说明《杨柳枝》是白居易从洛下民歌中翻新出来的。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说明《杨柳枝》乃“诗中绝句”。但亦有作七古长篇的，清叶思庵《龙性堂诗话续集》：“开府（庾信）七古《杨柳歌》长篇，藻艳真可挹天，薛道衡、四杰皆其下风也。”

【柳枝词】即“杨柳枝”。《师友诗传录》：“若《柳枝词》，始于白香山《杨柳枝》一曲，盖本六朝之《折杨柳》歌辞也。其声情之嫖利轻隽，与《竹枝》大同小异，与七绝微分，亦歌谣之一体也。”《柳枝词》作者甚多，姚合有《柳枝词》五首，徐铉有《柳枝词》二十二首。

【柘枝词】本乐府舞曲。《乐府诗集》卷五六《柘枝词》引《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唐张祜《观杭州柘妓》诗云：“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红罨画彩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襦催。看着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所描绘的情形，与《乐苑》所云略同。白居易有《柘枝词》一首，系五言律诗，亦有“苍头铺锦褥，皓腕捧银杯。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之语。薛能有《柘枝词》三首，则系五言古诗。

【屈柘枝】亦为乐府舞曲。《乐府诗集》卷五六《柘枝词》引《乐府杂录》曰：“健舞曲有《柘枝》，软舞曲有《屈柘》。”温庭筠有《屈柘词》一首，系五言律诗。

诗云：“杨柳紫桥绿，玫瑰拂地红。绣衫金骝裹，花髻玉珑璁。宿雨香潜润，春流水暗通。画楼初梦断，晴日照湘风。”此诗《全唐诗》卷五八一作《握柘》，当是描绘舞屈柘的歌妓的。

【橘枝词】富有地方色彩的民歌。《师友诗传录》：“南宋叶水心（叶适）又创为《橘枝词》，而和者尚少。”

【山歌】以反映劳动、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民歌。山歌之名，由来已久，白居易有“山歌听《竹枝》”（《江楼偶宴赠同座》）之句，宋王禹偁有《唱山歌》诗，明冯梦龙收集江南民歌三百多首，编为十卷，名之曰《山歌》。

【打枣竿】一种流行于明代大江南北的俗曲。明陈鸿绪《寒夜录》引卓人月的话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沈德符《顾曲杂言·时尚小令》亦说：“比年以来，又有《打枣干》、《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打枣竿》也写作《打枣干》或《打草竿》。

【挂枝儿】明代民间俗曲。明沈德符认为它与《打枣竿》是两个不同的曲子，不过“腔调约略相似”而已，见其所著的《顾曲杂录·时尚小令》。王骥德则认为“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见其所著《曲律·杂论》。

【锁南枝】明代民间俗曲。明李开先《词谑》云：“有学诗文于李崆峒（梦阳）者，自旁郡而至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何大复（景明）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诗词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沈德符《顾曲杂录·时尚小令》亦云：“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

【咏史诗】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诗歌。晋左思有《咏史》八首，辟借古抒怀之蹊径。至唐有汪遵的咏史诗六十一首，周昙的咏史诗八十首，胡曾的咏史诗一百五十二首，孙元晏的咏史诗七十五首。其后历代作者如林，不胜枚举。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太冲（左思）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方薰《山静居诗话》：“咏史诗，今人皆杂议论，前人多有案无断之作，其讽刺劝谕，意在言外，读者自得之耳。”

【咏物诗】以草木虫鱼鸟兽及各种自然现象为题

材的诗歌。如“咏花”、“咏鹰”、“咏雪”之类。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咏物，小小体也；而老杜《咏房兵曹胡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德性之淳良，俱为传出。郑都官《咏鸂鶒》则云：‘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此又以神韵胜也。”“咏物诗”源于盘盂铭辞，而形成于齐、梁。至唐乃大成。老杜咏物诗，感物兴怀，即小喻大，未尝刻意肖题，却自移易不得。

【题画诗】 题在各种画面上的诗歌。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乔亿《剑溪说诗》卷下：“题画诗，三唐间见，入宋寝多，要惟杜老横绝古今，苏文忠（轼）次之，黄文节（庭坚）又次之。金源则元裕之（好问）一人，可下视南渡诸公。至有元作者尤众，而虞邵庵（集）、吴渊颖（莱），又一时两大也。”

【咏怀诗】 抒发胸怀抱负的诗歌。其源本于《小雅》和《离骚》。南朝梁钟嵘《诗品》上：晋步兵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自阮籍《咏怀》以后，历代作者，多以此为题，或作“感怀”、“抒怀”，或作“书怀”、“言怀”。杜甫有《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李贺有《咏怀二首》，苏舜钦有《春日感怀》，范成大有《除夕感怀》等。

【讽谕诗】 以讽刺劝导为目的的诗歌。“讽谕”二字，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白居易将时政的流弊，民生的疾苦诉诸笔端，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一百七十多首，名之曰“讽谕诗”。

【闲适诗】 以安逸生活、清闲情趣为题材的诗歌。白居易曾自编《闲适诗》四卷，并在其《长庆集序》中说：“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所作“闲适诗”，大都描写散诞的生活，悠闲的情趣。如《自咏》中说：“咄哉个丈夫，心性何惰顽？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引满饮一盏，尽忘身外缘。”《食饱》云：“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感遇诗】 有接于目、有闻于耳、有感于心而写的诗歌。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感遇》诗题注云：“感于心，因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意自别。”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陈正字（子昂）、张曲

江（九龄）始倡《感遇》之作，虽所诣不深，而本地风光，殆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朱子（熹）和陈、张之作（指《斋居感兴》二十首），亦旷世而一遇。此后惟陈白沙（献章）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衡之沚。”此言《感遇》诗的创始与继作。

【游仙诗】 借仙境的描绘，寓诗人之志趣的诗歌。倡此体者，为晋郭璞。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以景纯（郭璞字）仙篇，挺拔而为俊矣。”钟嵘《诗品》中云：郭璞“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说明“游仙诗”的实质，乃是“坎壈咏怀”。《昭明文选》以此列为“游仙”一类，收有郭璞、何劭等人的“游仙诗”。至唐曹唐作“游仙诗”一绝及“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以及其他未标明“游仙”的许多诗作，如《仙都即景》、《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刘阮洞中遇仙子》、《萧史携弄玉上升》、《玉女杜兰若下嫁于张硕》等，开始改变格调。后代“游仙”之作，多叙儿女情怀及仙人游戏人间之事，与郭璞的“游仙诗”颇异其趣。真能继承郭璞“游仙诗”之精神实质的，要推李白的《西上莲花峰》、《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的《梦天》和《天上谣》。清黄子云《野鸿诗的》云：“游仙诗本之《离骚》，盖灵均（屈原）处秽乱之朝，蹈危疑之际，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焉耳。建安以下，竞相祖述；景纯、太白，亦恣意描摹；至义山（李商隐）专求有娥、皇英之喻而推广之，倡为妖淫靡曼之词，动以美人香草为护身符帖。末学无知，又因之而变为香奁体，世道人心，欲以复古，难矣。”于此可见“游仙诗”之渊源与发展变化情况。

【招隐诗】 招隐诗有两大类：一是招致隐士出来做官。汉刘安有《招隐士》，中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它是“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明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一二云：“今按此篇，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王说是可取的。一是招人归隐的意思。晋左思、陆机均有“招隐诗”，所谓“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显然是自述其隐居之乐的。《文选》五臣注刘良曰：“思（左思）苦天下溷浊，故将招寻隐者，欲以退不仕，非招致也。”

【无题诗】 别有寄托，不便明言，因以“无题”为名。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无题’，非真无题也。”按无题诗就其内容来说，有爱情诗，即陆游所谓“杯酒狎邪之语”；有政治诗，即清冯浩所谓的刺令狐绹者。就其形式来说，有直标“无题”者，李

商隐诗集中有近二十首;有以诗的第一句首二字为名的,如李商隐诗集中的《为有》(“为有云屏无限娇”)、《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和“一片琼英价动天”)、《昨日》(“昨日紫姑神去也”)、《如有》(“如有瑶台客”)之属。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这些诗歌情致缠绵,景象迷离,含意深邃,辞藻瑰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如以李之“无题诗”,“一字一句皆属寓言”,则未免失之穿凿;如“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所言较合于实际。

【山水诗】 写山水之景、游涉之情的诗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此言山水诗最早见于南朝宋初。钟嵘《诗品》序,则以“谢客(谢灵运小名‘客儿’)山泉”为“五言之警策”,此言谢灵运在山水诗创作方面之造诣。真正把山水诗推到新的艺术高峰的是王维和孟浩然。所谓“诗中有画”,便是苏轼对王维山水诗的恰当评价;所谓“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便是皮日休对孟浩然山水诗的极大推崇。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云:“作山水诗,何独不然。相山水雄险,则诗亦出以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峭,则诗亦与为幽峭;山水清远,则诗亦肖其清远。凡诗家莫不能之,犹是外面工夫,非内心也。……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詮,立跻圣域矣。”此言山水诗之写作方法。可参。

【游览诗】 登山临水,吊古伤今的诗歌。它须写山川之景与游涉之情,泉石、林峦、烟云、花鸟,都是景;吊古伤今,思乡怀远,都是情。将情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斯为“游览诗”的上乘。清叶燮《原诗》卷四外篇下云:“游览诗,切不可作应酬山水语。如一幅画图,名手各各自有笔法,不可错杂。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气象,不可移换。作诗者以此二种心法,默契神会;又须步步不可忘我是游山人,然后山水之性情气象,种种状貌变态影响,皆从我目所见、耳所听、足所履而出,是之谓游览。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泄。如此方无愧于游览,方无愧乎游览之诗。”

【田园诗】 描写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诗歌。晋陶渊明有《归园田居五首》,盛赞“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极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田园生活,向往于“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闲适情趣。钟嵘在《诗品》中说:陶渊明“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认为他不止是“田园诗人”,而是

“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影响于后世者,确实至深且巨,唐之王、孟、韦、柳,无不学其古淡自然,如王之《田园乐》,孟之《田园作》,韦之《幽居》、《观田家》,柳之《溪居》、《田家》等,无不受其影响。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边塞诗】 描写边塞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征夫思妇的怨苦以及反映边境战争的诗歌。它导源于汉魏乐府,造极于盛唐,继响于中晚,影响于宋明。钟嵘《诗品序》便把“鲍照戍边”看作“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也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边塞诗作家当以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李益为代表。他们的边塞诗,既表现了立功异域、战死沙场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反映了风沙之苦,锋镝之危,以及征夫思妇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望,还揭示了战士与将帅之间的阶级矛盾,展现了边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貌。

【赠答诗】 互相赠答的诗歌,或唱酬,或答谢。前者不出答其意、和其韵两个方面,后者不出赠诗、赠物两个方面。杜甫《酬郭十五判官》是据来诗的内容,逐句酬答,是“答其意”;元稹《酬乐天频梦微之》是按来诗的韵脚,依次用韵,是“和其韵”。这是“赠答诗”的第一个内容——唱酬。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是谢其“赠物”,白居易《酬钱员外雪中见寄》、《重酬钱员外》,是谢其“赠诗”。这是“赠答诗”的第二个内容——答谢。参见“次韵”“依韵”“和韵”诸条。

【叙事诗】 诗歌的一种,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我国古代汉诗中第一首长诗《孔雀东南飞》,凡一千七百四十五字,三百五十餘句,历叙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人物的性格鲜明,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又如脍炙人口的《木兰辞》,用杂言六十二句,历叙木兰代父从军,转战千里,胜利归来的英雄事迹。都是“叙事诗”的典范。

【哀挽诗】 视其情谊之深浅,或曰哭,或曰吊,或曰挽,但须切其人之生平、身份,忌在谀而不实,俗而落套。如白居易《哭李三》云:“去年渭水曲,秋时访我来。今年常乐里,春日哭君回。”是叙其交往;“若必夺其寿,何如不与才?落然身后事,妻病女婴孩。”是哀其不寿,哀其身后萧条。周朴《吊李群玉》云:“群玉诗名冠李唐,投诗换得校书郎。”是叙其身份与

生平;“吟魂醉魄知何处?空有幽兰隔岸香。”是叹其魂魄无依,空有馀芳。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首章总领哀挽大意,次章追叙身前,卒章纪送葬情事,既赞其立功塞外,又叹其老不封侯。无不切其人,切其事,切两人的情谊。元杨载《诗法家数》云:“哭挽之诗,要情真事实”,“中间要隐然有伤感之意”。

【闺情诗】 写闺中情思的诗。写离愁,则多缱绻之致;写哀怨,则多伉俪之怀。前者往往以“思”为名,如“闺思”、“春思”之属;后者往往以“怨”为名,如“闺怨”、“宫怨”之类。清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云:“闺情诗本《国风》之遗,题虽小,须以大方出之。”

【宫怨诗】 闺情诗的一种。有写宫女的不幸遭遇;有写文人的怀才不遇,而托为宫女的自怨自艾。谢朓的《玉阶怨》,当为唐人“宫怨诗”的先驱。王昌龄的《春宫曲》、《西宫春怨》、《长信秋词》等,便把唐人的“宫怨诗”推向了极致,运思深婉,刻画入微,把失宠者的抑郁、愁苦、哀怨、嫉妒之情,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李益《宫怨》的“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更是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王建作《宫词》一百首,详细描绘宫人的生活 and 情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其词之妙,则自在委曲深挚处,别有顿挫,如仅以就事直写观之,浅矣。”

【宫词】 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诗。“宫怨诗”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唐大历中,王建作《宫词》百首,始以“宫词”为题。历代以“宫词”为题的极多。汲古阁有《十家宫词》,收自唐王建至宋王珪十家所作。清张海鹏辑《宫词小纂》三卷,收明、清人所撰《宫词》九种。清吴騞《拜经楼诗话》云:“宫词始著于唐王仲初(建的字),继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十家之刻,昔人论之详矣。”说明“宫词”自唐王建以后,作者蜂起,形成十分繁荣的局面。其中寄托深远,讽谕尖锐的佳作不少,也有语涉猥亵、格调低下的作品。参见“宫怨诗”。

【吊古诗】 凭吊历史人物或历史陈迹的诗歌。言古者,往往以当年的繁华,烘托今日之摇落;言今者,则以眼前的荒凉,衬托过去之昌荣。皆须情动于中,意在言外,始能感人,始耐咀嚼。清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下云:“吊古之诗,须褒贬森严,具有《春秋》之义,使善者足以动人之景仰,恶者足以垂千秋之炯戒。如左太冲之《咏史》,则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不胜动人以遗贤之忧;李太白之《怀祢衡》,则曰‘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不禁深人以恃才之惕;谢宣城之《孙权城》,感盛衰于倏忽,知书轨之荐必同;杜少陵之《九成宫》,慨遗迹于雕墙,见夏、殷之鉴不远。”此说可参。

【悼亡诗】 悼念亡妻的诗歌。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真挚动人,为世所推重。后因以悼念亡妻的诗为“悼亡诗”。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云:“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淡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潘安仁(岳)气自苍浑,是汉京馀烈,而此题精蕴,实自韦(应物)发之。江文通(淹)辞繁而意寡,中乏警策,且莫辨为谁何,岂伉俪之辞哉?沈休文(约)短制,亦文通之亚。至如元微之(稹)、李义山(商隐)数篇,虽格韵不高,而情思凄然可诵。金源仅秦略简夫七律一首,风格清老,遗山(元好问)称之,非过也。元傅若金汝励五言数章,亦铁中之铮铮者。独怪梅圣俞(尧臣)名高而诗不称,如‘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成何语也。有明诸名家无诗。国初翁山(屈大均)、阮亭(王士禛)两先生,并多是作,当合诸前辈有是诗者,别为论次云。”此论“悼亡诗”发生、发展的轨迹。可参。

【寓言诗】 以寓言的手法寄托讽谕之思的诗。它的发展较之散文为迟。杜甫的《义鹘行》,写动物之间的一场“见义勇为,除暴安民”的英勇战斗,托物在鸟,寓意在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后刘禹锡的《养鸷词》,元稹的《雉媒》,白居易的《黑龙潭》、《秦吉了》、《燕诗示刘叟》以及王安石的《秃山》,皆为寓言诗之佳作。

【题记诗】 有题陈迹的,如刘禹锡《题淳于髡墓》;有题居所的,如李端《题山中别业》、储光羲《题虬上人房》;有题人物的,如于鹄《题美人》;有题花草的,如羊士谔《题枇杷树》、李颀《题合欢》;有题器皿的,如皇甫冉《题画帐》等。要皆有所感而发,寄托遥深,襟怀豁达,始能动人。如张谓《题长安壁主人》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此言人情冷暖,阿富趋势,长安势利之地,此风尤甚,故题之以见志。

【弃妇诗】 又作“弃妇词”,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卷二所收曹植的《弃妇诗》一首。清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二云:“思王(即陈思王曹植)《弃妇诗》,颠倒错杂,随触而生,无语不转,无意不佳,与灵均(屈原)同一忠悃,故其构思着笔,不期似而适相似。”又唐顾况的《弃妇词》开首即云:“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哀感顽艳,令人不忍卒读,然皆假夫妇之情,寓君臣之义,言已被弃置而不见用。这是一类。亦有确言在封建礼教下,丈夫遗弃妻子有七种借口,叫做“七出”或“七去”。从《诗经·卫风》的《氓》至明、清的民歌,以此为题材的诗歌,不胜枚举。

【写景诗】 以描写景物为主的诗歌。但景中没有

情,便是一幅风景画,一帧静物摄影片,不可能成为一首好诗。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又云:“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这是写景的艺术“三昧”。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写景是诗家大半工夫,非直即眼生心,诗中有画,实比兴不逾乎此。”这是言写景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抒情诗】抒情是诗歌的主要功能,通过诗人的直接抒情来反映社会生活,无论歌颂与揭露,都带有抒情的成分,至于写悲欢离合之情,生离死别之哀,自然是抒情的诗歌。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诗有情有景,且以律诗浅言之:四句两联,必须情景互换,方不复沓;更要识景中情,情中景,二者循环相生,即变化不穷。”又云:“诗有性情,有学问。性情须静功涵养,学问须原本《六经》。”可参。

【应制诗】应帝王之命而作的诗歌。应帝王曰应制,应太子曰应令,应诸王曰应教,名虽不同,其体则一。内容多为歌功颂德,形式多为五、七言律诗。唐、宋诗人,多有应制之作,如上官昭容有《驾幸三会寺应制诗》,欧阳修有《应制赏花钓鱼诗》。《文苑英华》收有“应制诗”十一卷。

【应酬诗】举凡题赠、送别、庆贺、哀挽之作,都属于人际关系间的应酬诗。清叶燮《原诗》云:“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贺贻孙《诗筏》亦云:“汉以前无应酬诗,魏、晋以来间有之,亦绝无佳者。惟卢湛、刘琨相赠二首,颂美中颇有感恩知己、好善不倦之意,应酬中差为铮铮耳。”说明“应酬诗”产生于建安、黄初年间。应酬诗不可拮据套语,须能见作者的性情。还是叶燮在《原诗》中说得好:“应酬诗有时亦不得不作,虽是客料生活,然须见是我去应酬他,不是人人可将去应酬他者,如此便于客中见主,不失自家体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为也。”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云:“酬赠往复诗,须辨别侪类。至亲不得用文饰语,尊者不得用评论语,亦不得轻易用夸奖语。反此者失之。”说明“应酬诗”要有个性,要注意彼此的身份。

【试帖诗】唐以来科举考试中采用的一种诗体。其试题有用经史语者,有用时事者,有咏物者,有赋得诗文句者,故又名“赋得体”。或五言,或七言,或八韵,或六韵,或限韵,或不限韵。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唐人试帖,六韵为率,皆兢兢守定绳尺,绝少排界生动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亦云:

“试帖一体,特便于场屋,大手笔多不屑为,昌黎所谓类于俳优者之词也。即唐贤佳制,与诸体诗并列,几于无可位置。兹选概不之及。惟存钱起《湘灵鼓瑟》一篇,亦以其结句入神而存之,非以其为试帖也。”

【省题诗】唐、宋时,尚书省举行考试时所作的试帖诗。亦称“省试诗”。它限制很严,不易出色。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元韦居安《梅硎诗话》卷中则云:“省题诗自成一家机轴,非他诗比,葛常之《韵语阳秋》盖尝言之。然骚人墨客虽从事于时文,至作省诗,亦不为格律所缚。杨廷秀序训蒙省诗,亦曰:‘以骚人之情性,寓举子之刀尺。’真名言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云:“省试诗多是六联。祖咏《终南馥雪》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二联便呈主司,云‘意尽’。唐人自重如此。”说明省试诗的作者,亦不完全遵守律令,故间有佳作。《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

【府试诗】唐代升京师与陪都所在地之州为府。科举考试规定,考生须通过县、州(含府)两级考试,始能入京应礼部试(即会试、殿试)。此种通过府试所作的应试诗,称之为“府试诗”。如李频的《府试观老人星》,郑谷的《京兆府试残月如新月》,卢肇的《江陵府初试澄心如水平》等皆是。《文苑英华》将其附于“省试诗”后。

【州试诗】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两级制,参加州一级科举考试时所作的诗叫“州试诗”。如白居易《宣州试窗中列远岫》,张乔《华州试月中桂》等皆是。《文苑英华》将其附录在“省试诗”中。

【程试诗】按一定的程式所作的应试诗,如分韵、限韵、拈题、赋得之类,叫“程试诗”。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天圣中,梓州进士杨谔,始以诗著。……景祐(宋仁宗年号)元年,省试《宣室受釐》诗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谔是年及第,未几卒。”按杨谔此诗将汉文帝召见洛阳少年贾生的事加以高度概括,而又不失讽喻之体,故佳。

【御制诗】帝王所作的诗歌。《全唐诗》收录唐太宗至昭宗所作诗四卷。清厉鹗《宋诗纪事》收录宋代诸帝诗一卷。他们的诗,大都雍容华丽,自然有富贵气;亦有胸襟阔大,出语非同凡响的。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风辞》,言固雄伟,而终有感慨之语,故其末年,几至于变。”又云:“唐文皇

既以武功平隋乱,又以文德致太平,于篇咏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辞气壮伟,固人所脍炙。”

【御览诗】 供帝王阅读的诗。唐令狐楚编有《御览诗》一卷,收录作者三十人,作品二百八十九首,皆当时诗坛名流流传较广的诗作。

【女郎诗】 纤巧婉丽的诗歌。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云:“齐、梁、陈、隋诸名家,大抵皆女郎诗,不数中唐以后也。”最早提“女郎诗”的,可能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四:“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这是元氏讽刺秦观的诗风力婉弱,大似女郎。不同意元氏此论的,首先是明瞿佑,他在《归田诗话》卷上说:“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

【百一诗】 魏应璩曾为《百一诗》。有谓“百一”盖指百言为一篇,也有谓“百一”之名,盖言百虑一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钟嵘《诗品》卷中:“魏侍中应璩,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有应璩《百一诗》八卷。郭茂倩《乐府诗集》“杂体诗”中,载《百一诗》五篇,皆璩所作。《百一诗》后人有仿作,也有依托。前者如陶隐居,后者如龚壮。

【七哀诗】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七哀诗》起曹子建,其次则王仲宣、张孟阳也。释诗者谓病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谓一事而七者具也。”《竹林答问》认为《文选》五臣注吕向对“七哀”的解释是“牵合”,“或谓情有七而偏主于哀,亦未当。大抵当时必别有所感,不欲明言。读古人书,遇此等处,苟无关典要,宁阙毋凿可也”。亦可参。

【四愁诗】 东汉张衡所作的七言骚体诗。衡出为河间相,郁郁不得志,作《四愁诗》以寄托其哀怨。《文选》卷二九收录此诗,并为之序曰:“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序虽非张衡所作,然颇得张衡的本心。清沈德潜将此诗收入《古诗源》卷二,并加以评曰:“心烦纤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少陵《七歌》原于此。”

【七体】 诗体的一种。其形式似《骚》。最早以“七”名体者,当推《文选》。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枚乘始作《七发》,后有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駰《七依》、马融《七广》、刘向《七略》、刘梁《七举》、崔琦《七蠲》、桓麟《七说》、李尤《七款》、刘广《七兴》、曹

子建《七启》、徐幹《七喻》、王粲《七释》、刘邵《七华》、陆机《七徵》、孔伟《七引》、湛方生《七欢》、张协《七命》、颜延之《七绎》、竟陵王《七要》、萧子范《七诱》。诸公驰骋文词,而欲齐驱枚乘。大抵机括相同,而优劣判矣。”

【骚体】 具有《楚辞》形式的诗歌。它的标志便是句中有“兮”字,或句尾有“兮”字、“些”字,也有不用“兮”或“些”的。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诗文之有骚赋,犹草木有竹,禽兽有鱼,难以分属。然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

【选体】 模仿梁萧统《文选》著录古诗体所作的诗,叫做“选体”。它与唐以后的近体诗相对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唐以后诗人,学“选体”者甚多。清张谦宜《砚斋诗谈》卷二:“选体诗全要典重深厚,须以学力胜,枵腹掉笔者,遇此必不支。”

【吴体】 杂体诗的一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没有列入“吴体”,清陈仅《竹林答问》云:“杂体中尚应补‘吴体’、‘竹枝’两体。”何谓“吴体”?明胡应麟云:“老杜吴体,但句格拗耳。”清黄白山云:“皮、陆集中,亦有‘吴体诗’,乃当时俚俗为此体耳,诗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既众,时出变调,凡集中拗律,皆属此体。”认为“吴体”即“拗律”。梁章钜根据其师纪昀之说,认为“七律有全首不入律者,谓之吴体,与拗体诗不同。方虚谷(回)《瀛奎律髓》合之拗字类中,非也。如杜少陵之《题省中院壁》、《愁》、《昼梦》、《暮归》诸诗皆是。其诀在每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转,故虽拗而音节仍谐。”又云:“吴体与拗体,方虚谷言之多不了了,必须看纪文达(昀)师所批,方能分晰,与《声调谱》亦合。”可参。自老杜创为此体后,效者甚多。唐之陆龟蒙有《早春雪中作吴体寄袭美(皮日休)》、《独夜有怀作吴体寄袭美》等,皮日休有《奉和鲁望(陆龟蒙)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等。宋之黄庭坚,亦多此体。所以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云:“惟拗体、吴体,宗杜须兼山谷,取其生造,于高老中,时出瘦劲,以助姿峭。”

【变体诗】 宋蔡宽夫《诗话·律诗体格》:“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诗平侧各有一韵,如‘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送风船。偶逢岛市停帆看,深羡鱼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自号变体,此尤可怪者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云:“晚唐章碣八句诗,平仄各押韵: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边。无聊之思,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

按此系唐人力求创新之作,单句都押仄韵“十五翰”,双句都押平韵“一先”,不宜作文字游戏看。

【**诙谐体**】带有诙谐戏谑语句的诗歌。宋黄彻《碧溪诗话》卷一〇云:“子建称孔北海(融)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戏效诙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孔融)为然。自东方生而下,称处士(衡)、张长史(融)、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才力豪迈有馀,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按杜甫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中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沈括《梦溪笔谈》以乌鬼为鸬鹚,《漫叟诗话》以乌鬼为猪,《蔡宽夫诗话》以乌鬼为所事之神。这便是“诙谐”。此种谐谑语,韩愈、苏轼诗中屡见不鲜,如韩诗之“浊醪沸入口,口角如衔钳”,苏诗之“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饥来凭空案,一字不可煮”。

【**艳体诗**】以爱情为题材或以少女的娇态柔情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也叫“艳诗”或“艳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对“艳体诗”提出了批评。然自《诗经》以来,艳诗不少。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亦云:“正人不宜作艳诗,然《毛诗》首篇即言河洲窈窕,固无妨于涉笔,但须照摄‘乐而不淫’之义乃善耳。唐崔颢、崔国辅皆以艳诗名,司勋(杜牧之)较司马(白居易),则殊有蕴藉。如‘愁来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筝不忍弹’,尚是止乎礼义。至‘时芳不待妾,玉佩无处夸。悔不盛年时,嫁与青楼家’。语虽工,未免激而伤雅。”此虽以儒家诗教衡诗,然不否定艳诗可以写作。唐代诗人写艳诗者,除上述崔颢、崔国辅、杜牧之、白居易外,尚有元稹和韩偓。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韩偓《香奁集》百篇,皆艳词也。”许颢《彦周诗话》引高秀实语:“元氏(稹)艳诗,丽而有骨;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

【**伪体**】“伪”是对“真”而言的。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就是要裁去“伪体”以亲《风》、《雅》。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李贵清真,杜裁伪体,清而不真,则伪体也。”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江西宜黄陈少香先生偕灿论诗极精。尝谓昌彝曰:‘诗欲其真不欲其伪。’最初为真,后起非真;信于己者为真,徇于人者非真;足于己者为真,袭于人者非真。是故读书有真种子,作文有真血脉,而作诗有真气骨。得其真,则一花一木,一水一石,一讴一咏,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则虽镂金错彩,累牍连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古今论诗有二:曰性情,曰格调。性情真也,袭格调而丧其面目,伪矣;格调亦真

也,离性情而饰其衣冠,伪矣。此杜少陵所以有‘别裁伪体’之说也。”从性情和格调两方面来论“伪体”,很有见地。

【**僻体**】指模仿前人,失去个性的诗歌。清尚镛《三家诗话》:“自明七子以后,诗多伪体、僻体。”明代前后七子,均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模拟复古,形成不良的诗风。他们字摹句拟,生吞活剥,以模拟代替创造,把剽窃当作创作,写了一些贗鼎伪觚式的假古董,被人讥为“优孟衣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们“字拟句摹,食占不化……以艰深文其浅陋”。

【**涩体**】一种生造艰涩、诘屈聱牙的诗体。唐张鹭《朝野僉载》谓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风阁”为“鸛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铕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箴骖”,“月兔”为“魄兔”。当时人效之,谓之“涩体”。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南渡后诗,杨廷秀推尤、萧、范、陆四家,谓尤延之、萧东夫、范致能、陆务观游也。后去东夫,易以廷秀,称尤、杨、范、陆,萧几不能举其名氏,而诗亦散逸矣。传其《咏梅》云:‘百千年藓着枯树,一点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于‘涩体’者耶?”

【**拗体**】不依常格、变换平仄的绝句律诗,谓之拗体。拗体律诗,大致有三类:一是专用古体,不谐平仄,由杜甫开创,且最擅长;二是晚唐李商隐、赵嘏(也有说是许浑的)辈,创为一种三、五拗用之调(即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类;三是元好问又创一种拗在第五、六字的拗体,如“来时珥笔夸健讼,去日攀车馀泪痕”,“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樽俎间”之类。大约出句拗第几字,对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自谐音律。此虽为熟极求生,推陈出新,佳作亦复不少,但后人习用者少。清施补华《岷傭说诗》云:“拗体不可轻作,此是已成功夫,初学时须律协声稳,不惟五律为然也。”

【**俗体**】指应酬、试帖一类的诗歌。最先提出“俗体”的是唐人殷璠。他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说:“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此以“俗体”和“雅体”相对而言。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陶明浚在《诗说杂记》卷九中加以阐释说:“俗体者何?当是所盛行如应酬诸诗,毫无意味,腴词靡靡,若试帖等类,今亦不成问题矣。”

【**尊题格**】尊此薄彼,抑彼扬此,如咏柳而贬松,

咏美人而贬柳,谓之尊题格。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六云:“孟蜀牛峤《杨柳枝词》:‘吴王宫里色偏深,一簇烟条万缕金。不分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按古乐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诗用此意咏柳而贬松,唐人所谓‘尊题格’也。”又卷八云:“唐彦谦《垂柳》:‘绊惹东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楚王宫里三千女,饥损蛮腰学不成。’‘蛮腰’或作‘纤腰’,非。咏柳而贬美人,咏美人而贬柳,唐人所谓‘尊题格’也,诗家常例。”

【春帖子】亦称“春端帖子”、“春端帖”、“春帖”。宋制,翰林书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宫中门帐,谓之“春端帖子”。体近宫词,多用绝句,大都粉饰太平,亦有意寓规讽者。见宋周焯《清波杂志》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丽可喜。如苏子容云:‘璇宵一夕斗标东,潋滟晨曦照九重。和气薰风摩盖壤,竞消金甲事春农。’邓温伯云:‘晨曦潋滟上帘栊,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脸似知宫宴早,百花头上放轻红。’……皆佳作也。”

【杂体诗】诗体中的一个大类别。多从题材、字形、修辞手段、句法排列、声律或押韵等方面别出心裁的一种变体,为汉、魏、六朝诗人所创制,因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唐以后诗人作者甚少,佳作尤为罕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论杂体,则有风人,藁砧、五杂俎、两头纤纤、盘中、回文、反复、离合,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至于建除、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之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云:“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腹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

【杂诗】谓不拘流别,遇物即言的诗。首先提出“杂诗”之目的是梁萧统《文选》。他把献诗、公宴、游览、行旅、赠答、哀伤、乐府之外的诗歌,统统列入“杂诗”。魏之曹丕、曹植,晋之傅玄、张协、陶潜,均以诗中所写的内容不能归入上述门类,而题为“杂诗”,后世诗人多循其例。

【回文体】杂体诗的一种。可以旋转倒读都能成文的诗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回文”一体,并自注云:“起于窦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梁桥《冰川诗式》卷二:“回文诗,自晋温峤始。”此言“回文诗”的起源。唐徐夤亦有《回文诗》二首,其第

二首云:“轻帆数点千峰碧,水接云山四望遥。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倒读为“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帆轻。”亦清新可诵。宋苏轼《题金山寺》,亦为“回文诗”,足见大诗人亦偶有涉笔者。

【进退体】律诗用韵的一种格式。即相邻两韵,隔句递换来押韵,一进一退,故又名为“进退韵”或“进退格”。此格为唐人郑谷与齐己所创。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一引黄朝英《湘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失此则谬矣。”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李师中《送唐介》错综寒、山两韵,谓之‘进退格’,李贺已有此体,殆不可法。”按李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难”、“寒”在“十四寒”,“山”、“还”在“十五删”,隔句递换。按此格宋人颇多运用,如苏轼《题南康寺重湖轩》,以鱼、虞两韵,相间而押,韩子苍、杨万里,亦均有此体。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诚斋(杨万里)屡用辘轳、进退格,实是可厌。至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牵白石作先锋。’叫嚣伧俚之气,令人掩耳不欲闻。”翁氏对杨诗的评价显然有欠公允。但于此可见进退格,不独可用于五、七言律,即绝句亦可。盖“功”与“锋”分别在“一东”、“二冬”韵中。

【辘轳体】作诗用韵的一种格式。八句中四个韵脚,头两个韵脚用一个韵,后两个韵脚用与之相邻的韵,双进双出,叫“辘轳格”。黄庭坚《谢送宣城笔》、杨万里《重九日雨仍菊花未开用辘轳体》,都是“双进双出”。黄诗云:“宣城变样尊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漫投墨客摹蝌蚪,胜与朱门饱蠹鱼。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将闲写吏文书。”宋袁文《瓮牖闲评》云:“此诗前二韵押七虞字,后二韵押九鱼字,乃双出双入,得非所谓辘轳韵乎?”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辘轳出入用韵,必有奇句乃可,如李师中《送唐介》诗是也。苟句韵寻常,用此何为?又必用韵连而声协者,若东冬、寒山、爻豪、清青之类。”按李师中诗为“进退格”,吴氏误为“辘轳韵”,但所言其他内容,均可参,故录之。

【葫芦体】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

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即凡两韵相通者,先二韵押甲,后四韵押乙,前小后大,形如葫芦,故称“葫芦格”。《围炉诗话》又云:“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樽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乃古诗也。”按李诗为《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自从天地开,更长几千尺。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寄谢山中人,可与尔同调。”此诗的前二韵石、尺为“陌韵”,后四韵笑、照、钓、调,均为“啸韵”,但系古诗,非今体。

【离合体】 杂体诗的一种。离合字的偏旁以成文。即拆开字形,取其一半,与另一字的一半,合成新字,先离后合,因以得名。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始于孔北海(融),余读《文类》,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行驰张(上联离‘鱼’字,下联离‘日’字,合为‘鲁’字)。吕公矶钓,合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上联离‘口’字,下联离‘或’字,合为‘國’字)。好为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上联离‘子’字,下联离‘乙’字。因‘截’字汉隶作‘𠂔’。合为‘孔’字)。六翩将奋,羽仪未彰,蛇龙之蛰,俾也可忘(上联离‘鬲’字,下联离‘虫’字,合为‘融’字)。玫瑰隐曜,美玉韬光(离‘文’字)。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上联离‘與’字,下联离‘手’字,‘举’古作‘舉’,合为‘举’字)。此篇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南朝宋谢惠连有《离合诗》二首,唐权德舆有《离合诗赠张监阁老》。

【连珠体】 诗文体名。其体不直陈情事,只假借譬喻,委婉曲折以达其意。如明珠之连贯,故称“连珠”。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按杜笃、贾逵、刘珍的《连珠》已佚,潘勖《连珠》,见于《艺文类聚》卷五七,乃文而非诗。陆机、庾信也均有《演连珠》。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白公《天竺》诗,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怀契上人》诗,而出以‘连珠体’,自令人不觉。”说明此体为历代作者所不废。

【连章体】 亦称“联章体”。一题数咏,分之可以独立成章,合之则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杜甫《秋兴八首》,即“连章体”之规范。历代评此诗者甚多,就章法而论者,如陈廷敬云:“《秋兴八首》,命意炼句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论,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如常山之阵,首尾皆应。”沈德潜云:“曰巫峡,曰夔府,曰瞿塘,曰江楼、沧江、关塞,皆言身之所处;曰故国、故园,曰京华、长安、蓬莱、曲江、昆明、紫

阁,皆言心之所思,此八章之线索也。”

【反覆体】 杂体诗的一种。随举一字,连环诵读,无不成文,无不押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杂体诗中列有“反覆体”,并自注云:“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覆成文也。”宋钱惟治《春日登大悲阁》诗,即“反覆体”。诗云:“碧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亭。”此诗二十字,连环反覆,读之可得四十首。试随举“天”字,连环读之,则成“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亭碧”;再举一“临”字连环读之,则成“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亭碧天”,各句都成三、二句式,颇有韵味。

【联句体】 又名“连句体”。即两人以上共作一诗,人为一句或一联,连缀成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认为此诗创于汉武帝的《柏梁台》诗。韩愈是此体的代表作家。宋许颢《彦周诗话》:“联句之盛,退之(韩愈)、东野(孟郊)、李正封也。”清方世举《兰丛诗话》亦云:“韩、孟联句,是六朝以来联句所无者。无篇不奇,无韵不险,无出不扼抑人,无对不抵当住,真是国手对局。”其后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联句,亦为历代诗评家所重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皮、陆联句诗,胜其自作。盖两贤相当,节短势偏,则反掩其孱弱之状也。联句体,自以韩、孟为极致。然韩、孟太险,皮、陆一种,固是韩、孟后所不可少。”

【分题诗】 旧时数人相聚,分探题目而作的诗歌。“分题”也叫“探题”。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分题”一目,并自注云:“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陈后主有此体,题作《七夕宴宣猷堂,各赋一韵,咏五物自足为十物,次第用得帐、屏风、案、唾壶、履》。

【分韵诗】 旧时诗人聚集,先规定若干字为韵,然后依拈得之韵字作诗,叫做“分韵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分韵”一目。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三:“古人联句,大概先分韵而后成诗,梁武帝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以所馀‘竞’、‘病’二字与之,曰:所馀二韵,则分韵之余也。”按曹景宗所分“竞”、“病”二字为韵的诗是:“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见《南史·曹景宗传》。后人分韵作诗,亦不限于联句。

【和韵诗】 诗人间彼此互相唱和,依照原作所用韵而作的诗叫“和韵诗”。宋刘攽《中山诗话》:“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吏部(韩愈)和皇甫(湜)《陆浑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晓。”此种和韵诗,历代诗评家多持批评意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和韵

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叠韵诗】一句中的字,都用韵母相同的字组成。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陆龟蒙诗序曰:‘叠韵起自梁武帝云“后牖有朽柳”。当时侍从之臣皆倡和。刘孝绰云“梁王长康强”,沈休文云“偏眠船舷边”,庾肩吾云“载碓每碍埭”。自后用此体作为小诗者多矣。……陆龟蒙所谓“琼英轻明生,竹石滴沥碧”,皮日休所谓“康庄伤荒凉,土虏部伍苦”,皆效叠韵而为之者也。”宋吴聿《观林诗话》云:“谢灵运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上句双声叠韵,下句叠韵双声。后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杜荀鹤“胡卢杓酌春浓酒,舴艋舟流夜涨滩”,温庭筠“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老嫗宝蕖草,愚夫输逋租”,皆出于叠韵,不若灵运之工也。”

【叠字诗】通篇用叠字组成的诗。它滥觞于《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即叠字。《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都是叠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列有“叠字体”。

【半格诗】一首诗之前半幅为古诗,后半幅为格律诗,叫做“半格诗”。白居易的《长庆集》编有“半格诗”一卷。其《小阁闲坐》云:“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簟卷帘坐,清风生其间。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但有巾挂壁,而无客叩关。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前四句是古体,后六句讲对仗,也略合平仄。他如《池上幽境》、《樱桃花下有感而作》、《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三年除夜》等,均为此体。

【禁体】旧时诗人斗胜,相约禁用某些字入诗,叫做“禁体”。欧阳修守汝阴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因又叫做“欧阳体”。苏轼《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得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诗:“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青山有如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此诗句句写“雪”,而不用相约所禁之字,此所谓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然此体实非欧阳修所创,而是进士许洞所创。欧阳修《六一诗话》:“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

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可证。

【建除体】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神,嵌在诗的句首,叫做“建除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建除体”之目,并自注云:“鲍明远有《建除诗》,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诗虽佳,盖鲍本工诗,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鲍诗前半幅云:“建旗出敦煌,西讨属国羌。除去徒与骑,战车罗万箱。满山又填谷,投鞍合营墙。平原亘千里,旗鼓转相望。定舍后未休,候骑敕前装。执戈无暂顿,弯弧不解张。……”明谢榛《四溟诗话》:“鲍照十数体、建除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此变之变也。”而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三则薄之云:“建除、药名等诗,儿童所为也。”

【蜂腰体】律诗的一种变格。凡颔联不用对仗,却以十字叙一事,而意脉与上两句相连贯的,叫做“蜂腰体”,亦称“蜂腰格”。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引《西清诗话》:“蜂腰体颔联亦无对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贯上两句,及颈联,方对偶分明,谓之蜂腰格,言若已断而复续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沈括《笔谈》以次联不对者为蜂腰,引贾岛《下第》诗为证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唐张九龄《望月怀远》之第二联‘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杜甫《月夜》第二联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均唐诗中的名篇,亦未作对偶,皆为‘蜂腰体’。”

【隔句体】诗体的一种格式。即第三句与第一句对,第四句与第二句对。亦称为“扇对格”或“开门对格”。此体滥觞于《诗·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曹植《蝦蟆篇》之“蝦蟆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亦为“隔句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扇对”一体,并自注云:“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郑谷)有‘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清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律诗“有以第三句对首句,第四句对次句者,谓之‘开门对’。”

【偷春体】律诗的一体。凡首联相对,而次联不对者谓之“偷春体”或“偷春格”。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引《西清诗话》曰:“其法颔联虽不拘对偶,疑非声律;然破题已的对矣,谓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云:“律诗所谓‘偷春格’者,首联对,次联不对也。”如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化离放红蕊,想象嗔青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评此诗曰:“此诗一、二对起,三、四散承,用偷春格也,初唐人常有之。”

【折腰体】近体诗的变格。凡中间失粘而意脉不断的叫“折腰体”或“折腰格”。它分为绝句折腰体和律诗折腰体。宋惠洪《天厨禁脔》卷上:“折腰步句法,虽中失粘而意不断也。”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绝句折腰体,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律诗折腰体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前者第三句失粘,后者第二联失粘。

【折句体】七律的句式通常为上四下三,如果为上三下四者,即谓之“折句体”或“折腰句格”。元韦居安《梅硯诗话》卷上:“七言律诗有上三下四格,谓之‘折腰句’。白乐天守吴门日,答客问杭州诗云:‘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到溪桥。’卢赞元《雨》诗:‘想行客过溪桥滑,免老农忧麦陇干。’刘后村《卫生》诗云:‘采下菊宜为枕睡,碾来芍可入茶尝。’《胡琴》诗云:‘出山云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我心。’皆此格也。”

【五仄体】古诗体的一种。五言一句,全用仄声。又叫“五侧体”。它有两种情况:一是全篇各句皆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有全篇字皆仄声者。”并自注云:“梅圣俞(尧臣)《酌酒与妇饮》之诗是也。”按梅诗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二是篇中一联或几联的下句字皆仄。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渔洋(王士禛)以五平、五仄体近于游戏,此特指有心为之者言。若杜之‘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嵯峨’、‘忧端齐终南,溷洞不可掇’、‘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至于‘山形藏堂皇,壁色立积铁’,于五平五仄之中,出以叠韵,并属天成,非关游戏也。”上引各联的下句,全系仄声字。

【五平体】五言诗,全篇每句皆平声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全篇字皆平声者。”自注云:“天随子(陆龟蒙)《夏日》诗四十字皆平。”蔡條《西清诗话》亦云:“晏元献(殊)守汝阴,梅圣俞(尧臣)往见之,将行,公置酒颍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贴,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恨未见侧字诗,圣

俞既引舟,遂作五侧体诗寄公云。”按陆龟蒙杂体诗中有《夏日闲居作四声诗寄袭美》及《奉酬袭美苦雨四声重寄三十二句》之第一首,皮日休杂体诗中亦有《奉酬鲁望夏日四声四首》及《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鲁望》之第一首,全篇皆平声。如陆氏《夏日》云:“荒池菰蒲深,闲阶莓苔平。江边松篁多,人家帘栊清。为书凌遗编,调弦夸新声。求欢虽殊途,探幽聊怡情。”

【五平五仄体】五言诗中,上句全平,下句全仄。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自注云:“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唐陆龟蒙《夏日闲居作四声诗寄袭美》四首之三“新开窗犹偏,自种蕙未遍。书签风摇闻,钓榭雾破见。耕耘闲之资,啸咏性最便。希夷全天真,诂要问贵贱。”皮日休《奉酬鲁望夏日四声诗四首》之三:“怡神时高吟,快意乍四顾。村深啼愁鹃,浪霁醒睡鹭。书疲行终朝,罩困卧至暮。吁嗟当今交,暂贵便异路。”两诗上联皆平,下联皆仄,即“五平五仄体”。

【璇玑体】回文诗的一种。它顺读、倒读、横读、斜读,皆可以成文,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可以成章。此体创自前秦窦滔的妻子苏蕙。梁桥《冰川诗式》卷二:“今按织锦诗体裁不一,其图如璇玑,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横读、斜读皆成章,不但回文。”据传苏蕙织锦为璇玑图寄其夫窦滔,共八百四十字。其图纵横八寸,五色相宣,以别于三、五、七言。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为七图。明康万民增立一图,增读其诗至四千二百零六首。

【盘中诗】回文诗的一种。亦称“盘中体”。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盘中诗,右盘屈书之。傅休奕(玄)云:‘山树高鸟悲。’末云:‘当从中央周四角’是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盘中”一体,自注云:“《玉台集》有此体。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吴氏认为“盘中诗”创自傅玄,严氏以为创自苏伯玉之妻。全诗共二十七韵,四十九句,写于盘中,读时从中央以周四角,屈曲成文,寓宛转回环之意。

【神智体】一种近乎文字游戏的诗体。因其能启发人的神智而得名。此体创自苏东坡。据云宋神宗熙宁间,辽使至,以能诗自夸,帝命苏轼为馆伴,辽使以诗诘轼,轼曰:“赋诗亦易事也,观诗难事耳,遂作《晚眺》以示之,笺上仅书:

亭云出 老松节
首云暮 江照峰

十二字。“亭”字写得极长，“景”字写得极短，“畫”（古“画”字）写作“畫”，下面无“人”，乃是“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字写得大，“拖”字横写，“筇”字竹头写得长，乃是“老大横拖瘦竹筇”。“首”字反写，“雲”字上边的“雨”和下边的“云”距离较远，“暮”字下面的“日”斜写，乃“回首断云斜日暮”。“江”字写作“汸”，“蘸”字倒写，“峰”字山旁侧写，乃“曲江倒蘸侧山峰”。辽使观之，惶惑不知所云，自是不复言诗。见宋桑世昌《回文类聚》。

【**宝塔诗**】即“一至七字诗”。因每句之字，依次递增，形如宝塔而得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此体，自注云：“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亦列有此体，自注云：“张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题为韵，对偶成联。又鲍防、严维多至九字。”兹录严维、鲍防、郑概、成用、陈元初、张叔政、贾弇、周頌等《一字至九字诗联句》一首如下：“东、西（防），步月，寻溪（维）。鸟已宿，猿又啼（概）。狂流碍石，迸筇穿蹊（用）。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元初）。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叔政）。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弇）。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厌问城中喧喧多鼓鼙（頌）。 ”

【**八音体**】杂体诗的一种，又名“八音歌”。每句或隔句冠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字。因金、石等为古代的八类乐器，故称之为“八音体”。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八音，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诗体如‘八音歌’、‘建除体’之类，古人赋咏多矣。”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沈炯六府体、八音体、六甲体、十二属体。”说明创此体者南朝为陈沈炯。其后唐权德舆、宋黄庭坚等均有仿作。兹录权德舆《八音诗》如下：“金谷盛繁华，凉台列簪组。石崇留客醉，绿珠当座舞。丝泪可销骨，冶容竟何补。竹林凉贤人，满酌无所苦。匏居容宴豆，儒室贵环堵。土鼓与污尊，颐神则为愈。革道当在早，谦光斯可取。木雁才不才，吾知《养生主》。”

【**全平全仄体**】即“五平五仄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全篇字皆平声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见“五平体”、“五仄体”。

【**爱憎格**】诗的上联与下联，在对偶中形成爱憎分明的强烈对照，叫“爱憎格”。元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上：“唐人诗云：‘蛇蝎性同生便毒，蕙兰根异死犹香。’《诗人玉屑》许此一联为‘爱憎格’。余观戴式之《京都怀徐渊子直侍院》诗一联云：‘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看。’亦此体也。”

【**风人体**】杂体诗的一种。上句借喻他物，下句

申释其义。此体创自民歌，古代的采诗之官叫“风人”，因以得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则有‘风人’。”自注云：“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曾慥《类说》卷五引《乐府解题》云：“梁简文‘风人诗’，上句一语，用下句释之成文。‘围棋烧败袄，着子知然衣’。”洪迈《容斋三笔》“乐府诗引喻条”云：“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如“理丝入残机，何患不成匹”，“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拥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等，皆上句引譬为喻，下句释出本意。

【**卦名体**】杂体诗的一种。即将《周易》六十四卦的名称嵌入诗的句首或句中。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卦名，右据《周易》所载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卦名”诗一目。梁简文帝萧纲与唐权德舆均有“卦名诗”。梁简文帝《卦名诗》云：“栢比园花满，径复水流新。离禽时入袖，旅谷乍依蘋。丰壶要上客，鹄鼎命嘉宾。车由泰夏闕，马散咸阳尘。莲舟虽未济，分密已同人。”诗中嵌入“比”、“复”、“离”、“旅”、“丰”、“鼎”、“泰”、“咸”及“未济”、“同人”诸卦名。大抵一联中出边与对边所嵌的卦名要在相当的位置上。权德舆的“卦名诗”，首联第一字嵌“节”、“临”两卦名，二联第二字嵌“颐”、“履”两卦名，三联第三字嵌“渐”、“随”两卦名，四联第四字嵌“观”、“丽”两卦名，五联第五字嵌“泰”、“述”两卦名，末联上句将卦名“中孚”嵌于句首，下句将卦名“家人”嵌于句末。更为新巧。

【**数名诗**】杂体诗的一种。即将一至十的数目字嵌入诗句中。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数，右从一至十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的杂体诗中列有“数名”诗一目。此体首见于鲍照的《数诗》。大抵每联依次将一个数字嵌于出边之句首。如唐权德舆《数名诗》云：“一区扬雄宅，恬然无所欲。二顷季子田，岁晏常自足。三端固为累，事物反徽束。四体苟不勤，安得丰菽粟？五侯诚哓哓，荣甚或为辱。六翮未鸾翔，虞罗乃相触。七人称作者，杳杳有遐躅。八桂挺奇姿，森森照初旭。《九歌》伤泽畔，怨思徒刺促。《十翼》有格言，幽贞谢浮俗。”

【**绝弦体**】杂体诗的一种，又名“断弦体”。谓语似断而意犹存。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绝弦体，其语似断弦而意存，如弦绝而其意终在也。”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称之为“断弦体”。如僧谦《寄远》诗：“燕鸿去后湖天远，欲寄知音问水天。七岁弄竿今八十，锦鳞吞钓不吞书。”第三句“七岁弄竿今八十”，似与前二句已断，但“锦鳞吞钓不吞书”，意思仍

在“欲寄知音”，意脉并没有断。

【藏头格】 杂体诗的一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又有六甲十属之类，及藏头歇后等体。”大抵“藏头”有两种解释：梁桥《冰川诗式》卷七：“藏头格，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寓之景与情，而不言题意，至结联方说题之意，是谓藏头。”这是一种解说。明徐师曾《诗体明辨》：“藏头诗，每句头字皆藏于每句尾字也。”这又是一种解释。

【歇后体】 杂体诗的一种。将成语或古人陈句，引用其前一部分，而略去其后面的本质部分。《诗话类编》卷一：“歇后格，五言如‘予有折足铛，中馀五合陈’，……七言如：‘当初只为将勤补，到底翻为弄巧成’，六言如‘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陈”后未说出“粟”，“补”与“成”后未说出“拙”，“有”与“过”后未说出“酒”，便是“歇后格”。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山谷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盖用韩诗‘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后山以为裁去一字，对切而语益峻。余谓此真歇后，非‘弯六钩’‘捐三尺’比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如（唐）彦谦《题汉高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一抔’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则‘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独‘剑’乎？”此皆“歇后格”或“歇后体”。严有翼《艺苑雌黄》：“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为‘友于’，以日月为‘居诸’，以黎民为‘周馀’，以子孙为‘貽厥’，以新婚为‘宴尔’，类皆不成文理，虽杜子美、韩退之亦有此病，此歇后语也。”按此虽隐去“友于兄弟”之“兄弟”，“日居月诸”之“日月”，“周馀黎民”之“黎民”，“貽厥孙谋”之“孙谋”，“宴尔新婚”之“新婚”，创此词汇者为歇后，用此词汇者实为代词，不能视之为“歇后格”。

【六甲体】 杂体诗的一种。隔句冠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中列有“六甲体”一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沈炯六府体、八音体、六甲体、十二属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此变之变也。”可见此体始于沈炯。其《六甲诗》云：“甲拆开众果，万物具敷荣。乙（燕）飞危上幕，雀乳出空城。丙魏旧勋业，申韩事刑名。丁虞陈诗罢，公绥作赋成。戊巢花已秀，满塘草自生。己乃忘怀客，荣乐尚关情。庚庚闻鸟啭，肃肃望鳧征。辛酸多悯侧，寂寞少逢迎。壬蒸怀太古，覆妙贮无名。癸已空施位，诤以召幽贞。”共二十句，隔句嵌一天干名。

【六府体】 杂体诗的一种。古人以水、火、金、木、土、穀为货财所聚，故称六府。隔句冠以六府之名，叫“六府诗”。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六府，

右水、火、金、木、土、穀。”此体亦为沈炯所创。唐权德舆《六府诗》云：“金鼎映玉俎，宾友纷宴喜。木兰泛方塘，桂酒启皓齿。水榭临空迥，酣歌当座起。火云散奇峰，瑶瑟韵清徵。土梗乃虚论，康庄有逸轨。穀成一编书，谈笑佐天子。”

【十二属诗】 杂体诗的一种。亦称“十二辰诗”。将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嵌入诗中，因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十二属，右十二辰所配，若子鼠、丑牛之类。”此体创自沈炯。其法有三：一是依次将十二生肖之名冠于句首，如沈炯所作的《十二属诗》；二是将十二生肖之名，依次嵌入句中，如刘因所作的《十二辰诗》；三是不冠首，不按次序将十二生肖之名写入诗中，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下：“十二辰所配，若子鼠、丑牛之类。”

【人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亦叫“姓名诗”。以将古代的知名人物的姓名嵌入诗中而得名。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梁元帝歌曲名体、姓名体、鸟名体、兽名体、龟兆名体、针穴名体、将军名体、宫殿名体、屋名体、车名体、船名体、草名体、树名体。”说明此体创自梁元帝。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姓名，右据人之知名者。”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王荆公诗有‘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为戏，或者谓前无此体，自公始见之。余读《权德舆集》，其一篇云：‘蕃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愆，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宦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岷，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谖，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德舆已尝为此体，乃知古人文章之变，殆无遗蕴。”此诗依次嵌入人名宣秉、石崇、纪信、张良、苏则、李斯、顾荣、陈农、林类、郭躬、满宠、蒙恬、钟皓、景丹、谷永、梁冀、符生、展禽、直不疑、支离疏，颇不艰涩，堪称佳制。

【鸟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每句嵌入一鸟名而得名。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见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兹录其《鸟名诗》如下：“方舟去鸕鹚，鸕鹚引欲相要。晨凫移去舸，飞燕动归桡。鸡人怜夜刻，凤女念吹箫。雀钗照轻幌，翠鸟绕纤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除末句外，依次嵌入了鸕鹚、鸕鹚、凫、燕、鸡、凤、雀、翠鸟、朱鹭等禽鸟之名。

【兽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以将兽名嵌入诗中而得名。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见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兹录萧绎《兽名诗》如下：“豹韬求秘术，虎略选良臣。水涉黄牛浦，山过白马津。摧锋上狐塞，画像入麒麟。……”诗中嵌有豹、虎、牛、马、狐、麒麟等

兽名。

【药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以嵌入中药之名于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药名，右据《本草》所载。”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中列有“药名体”。此体创自六朝，盛于唐宋，王融、沈约、张籍、权德舆、王安石等，均有“药名诗”。有诗中部分嵌入药名者，如柳宗元《从崔中丞过卢少尹郊居》：“蒔药闲庭延国老(甘草)，开樽虚室值贤人(酒)”。张籍《答鄱阳客》：“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国老”、“半夏”皆药名。有诗中皆嵌入药名的，如王安石《和微之药名劝酒》：“真珠的皪鸣槽床，金罍琥珀正可尝。史君子细看流光，莫惜觅醉衣淋浪，独醒至死诚可伤。欢华易尽悲酸早，人间没药能医老。寄言歌管众少年，趁取乌头未白前。”诗中的真珠、琥珀、史君、独醒、酸早(枣)、管(惯)众、乌头，都是药名。

【草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将草名写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草、树、鸟、兽名，右见于记录者，皆可用也。”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创于梁元帝萧绎。

【树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将树名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均提到“草、树名”的诗体。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

【曲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以歌曲名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歌曲名，右据《乐府》所载。”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为梁元帝萧绎所创。

【车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将车名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车名，右据《周礼》、《汉官仪》所载。”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为梁元帝萧绎所创。

【船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其将古代船名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船名，右若《左氏传》吴舡之类也。”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为梁元帝萧绎所创。

【屋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其将屋名嵌入诗中而得名。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

【将军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其将古代将军职官名称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将军名，右据《职官》所载。”明谢榛《四溟诗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均列有“将军名体”。谢氏并认为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

【宫殿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其将宫殿名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宫殿

名，右若《三辅皇图》等所载。”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

【针穴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以其将针灸穴位的名称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针穴名，右据医家《明堂》所载。”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为梁元帝萧绎所创。其《针穴名诗》云：“金推五百里，日晚唱归来。车转承光殿，步上通天台。钗临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罢逐步廊回。下关那早闭，人迎已复开。”按归来、天台、曲池、玉堂、中庭、下关，均为针灸穴名。

【龟兆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将占卜使用的龟兆名嵌入诗中而得名。据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此体创自梁元帝萧绎。

【相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因其将命相家所谓的骨相名称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相名，历据相书所载，若‘山庭’、‘月角’是也。”

【星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又叫“二十八宿体”。因其将星宿的名称嵌入诗中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星名，右据《天文志》所载也。”南朝齐王融、唐权德舆均有《星名诗》。权氏诗云：“虚怀何所欲？岁晏聊懒逸。云翼谢翩翩，松心保贞实。风秋景气爽，叶落井径出。陶然美酒酣，所谓幽人吉。自当轻尺璧，岂复扫一室？安用簪进贤，少微斯可必。”诗中嵌入了二十八宿的“虚”、“翼”、“心”、“井”、“璧”、“室”六个星宿名和“进贤”、“少微”两星名。

【州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以其将州、郡的名称嵌入诗中而得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中列有“州名诗”。范云、权德舆等均有“州名诗”，今并存。权德舆《州名诗寄道士》云：“金兰同道义，琼简复芝田。平楚白云合，幽崖丹桂连。松峰明爱景，石窦纳新泉。冀永南山寿，欢随万福延。”诗中嵌入了唐代十道的州名，如“金兰同道义”、“幽崖丹桂连”即嵌入唐代的十个州名，其他尚有琼、复、楚、云、松、石、新、泉、冀、永、寿、随、万、延等州名。见《新唐书·地理志》。

【寺名体】 杂体诗的一种。以诗中嵌入著名的寺庙名称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寺名，右若白马、青龙之类也。”

【郡县名诗】 即“州名诗”。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郡县名，右据《地理志》所载也。”梁萧绎有《县名诗》。参见“州名体”。

【道里名诗】 杂体诗之一。以诗中嵌有古代著名的“道”、“里”而得名。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道里名诗，右‘道’谓汉文帝称‘北走邯鄲道’，‘里’

谓高祖‘中阳里’之类,集以为诗也。”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谓“谢庄道里名体”。可见此体创自南朝宋谢庄。

【字谜体】 将诗写成字谜的形式。此体形成甚早,《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擎白’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擎白,受辛也,于字为‘辵’(古‘辞’字);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宋苏轼《仇池笔记》卷上:“鲍明远有《字谜》三首:‘飞泉仰止’者,旧说是‘井’字。又‘乾之一九,隻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云是‘小’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均列有“字谜体”。

【藁砧体】 杂体诗之一。以乐府诗“藁砧今何在”之首二字为题,后人多仿效之。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藁砧今何在,右古词。‘藁砧今何在’?藁砧,铁也,问夫何处也;‘山上复有山’,重‘山’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中列有“藁砧体”。参见“隐语体”。

【隐语体】 即“藁砧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藁砧体”下自注云:“僻辞隐语也。”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古绝句》“藁砧今何在”下评曰:“通首隐语。”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亦云:“诗中诸隐,始于古《藁砧》诗,唐贤绝句,间师此意。”按乐府诗中,此体甚多,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谐“夫容”,“莲”谐“怜”。“石阙生口中,含碑不得语”,“碑”谐“悲”。“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丝”谐“思”。“杀荷不断藕,莲心已复生”,“莲”谐“怜”。皆属此体。参见“藁砧体”。

【五杂俎体】 杂体诗之一。因首句“五杂俎”而得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中列有“五杂俎体”。古乐府《五杂俎》诗:“五杂俎,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仿作的很多,如王融有《代五杂俎》,范云有《拟古五杂俎》,权德舆有《五杂俎》,皆以“五杂俎”开篇,全篇三言六句。权德舆《五杂俎》云:“五杂俎,旗亭客。往复还,城南陌。不得已,天涯谪。”模拟之迹甚明,但有新意。

【两头纤纤体】 杂体诗之一。以首句“两头纤纤”四字而得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中列有“两头纤纤体”。古《两头纤纤》诗云:“两头纤

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膈膈膊膊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后人拟者不少,如齐王融有《奉和纤纤》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冒春荣《葑原诗说》卷四均认为此体“近于戏弄,古人偶为之,然而大雅弗取”。毛先舒《诗辩坻》卷二亦云:“纤纤、杂俎,诗谜肇端;离合、姓名,拆白缘起”,都是“文章儇习,雅道所戒”。亦名“纤纤”。

【四声诗】 杂体诗之一。以平、上、去、入四声为题,因而得名。其体创自唐陆龟蒙。皮日休《杂体诗序》云:“至如四声诗,三字离合,全篇双声叠韵之作,悉陆生(龟蒙)所为,又足见其多能也。”陆龟蒙有《夏日闲居作四声诗寄袭美》、《奉酬袭美苦雨四声重寄三十二句》各四首,皮日休有《奉酬鲁望夏日四声诗四首》、《苦雨中又作四声寄鲁望》。这种诗的特点是一组四首;第一首全平,第二、三、四首全仄;第一、二、三、四首的对句,依次为全平、全上、全去、全入。

【集句诗】 缀集前人一家或数家的诗句而成的诗。此体创自晋傅咸。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晋傅咸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淑。勉尔通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面目。’此乃集句之始,或谓集句起于王安石,非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云:“傅咸《毛诗》,皆取经语,集句之始也。”至两宋而此体大盛,学者便误以为此体至宋始有。明李东阳《麓堂诗话》:“集句诗,宋始有之,盖以律意相称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要自不能多也。”清杨继昌《国朝诗话》卷二亦云:“集句之端,启自石曼卿、王半山(安石),后人由句而首,由近体而古,以化去痕迹,仍见精彩为工。”此虽误以石、王之作为集句之始,但对集句的评论,极为中肯,可参。参阅“百衲衣体”。

【百衲衣体】 即“集句体”。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余最不喜集句诗,以佳则仅一斑斓衣,不且百补破衲也。惟王介甫(安石)集《胡笳十八拍》,一生成,略无掇拾之迹,且委曲入情,能道谈心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山谷(黄庭坚)不喜集句,笑为百家衣。”此说承自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山谷最不爱集句,目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因而有此名,然不免偏至。参见“集句诗”。

【三妇艳体】 杂体诗之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目》列有“三妇艳体”。此体共六句,前三句分别写大妇、中妇、小妇,因而得名。古诗《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的后段,都有大妇、中妇、小妇等辞,此体即专取它的后六句为式。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五“相和歌辞”中收录齐王融、梁沈约、王筠、吴均、刘孝绰、陈后主、唐董思恭、王绍宗的《三妇艳诗》二十一首。唐权德舆亦有《三妇诗》:“大妇刺绣文,中妇

缝罗裙。小妇无所作，娇歌遏行云。丈人且安坐，金炉香正薰。”

【蝉联体】诗体之一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后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赠白马王彪》之诗是也。”按曹诗共七章，其第二章之末句“我马玄以黄”，第三章之首句为“玄黄犹能进”；第三章末句为“揽辔止踟蹰”，四章首句则为“踟蹰亦何留”；四章末句为“抚心长太息”，五章首句则为“太息将何为”；五章末句为“咄咄令心悲”，六章首句则为“心悲动我神”；六章末句为“能不怀苦辛”，七章首句则为“苦辛何虑思”。前章末句之尾，即为后章首句之端，叫做“蝉联体”。清梁章钜《退庵随笔》：“曹子建《赠白马王彪》、颜延之《秋胡行》，皆以次章首句蝉联上章之尾，此本《大雅》《文王》、《下武》、《既醉》三章篇法也。而蔡中郎《饮马长城窟》、晋《西洲曲》，复施其法于一章之中，缠绵委折，而节拍更紧，遂极情文之妙。”可见“蝉联”有两种情况：一是组诗中次章之首句蝉联上章之尾；二是一诗中，下句之首字蝉联上句之尾。后者亦称“连珠格”或“顶真（针）续麻格”。

【连珠格】“蝉联体”的一种，即后一句的首字为前一句的末字。如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此体亦名“顶真续麻格”。

【吃语诗】亦称“吃口令”、“吃语体”。其法将双声叠韵或音近的字词联缀成诗，因其拗口碍舌，急速念出，容易造成“期期艾艾”的口吃，因而得名。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五：“又有口吃诗，因武昌西山多榭叶，其旁即元结湖，多荷花，因题句云：‘玄鸿横号黄斛岷，皓鹤下浴红荷湖。’座客皆笑，请再赋一首。坡（苏轼）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高竿系舸菰菱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供愧愧挽聒，干锅更戛甘瓜羹。’又《和正甫一字韵》诗云：（略）此二诗使口吃者读之，必至满堂喷饭。而坡游戏及之，可想见其风趣涌发，忍俊不禁也。”

【覆窠体】俳谐体之一。词语浅俗，有似“打油”。因为江南方言，以浅俗为“覆窠”，故有此名。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四：“《太平广记》有仙人伊周昌，号伊风子，有《题茶陵县》诗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边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钲芒织草鞋。’时谓之‘覆窠体’。江南呼浅俗之词曰‘覆窠’，犹今云‘打油’也。”

【钉铰体】即“打油诗”。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茶谱》载胡钉铰居白蘋洲，邻有古冢，茶饮必酹之。忽梦一丈夫曰：‘我柳文畅，感子茗惠，教子为

诗。’自是遂工吟咏。”施闰章《蠖斋诗话》亦云：“胡生，郑人也。性落魄，家贫，少为洗镜、钉铰之业。其里有列御寇墓，禁樵采。生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以祭列子祠垆，以祈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书置之心腑，及觉，而吟咏之句，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之。”据此，则钉铰诗并非“打油”者，然其往往与张打油并称，不知何故。

【打油诗】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四：“唐人有张打油作《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可见其言至俚，其意甚谐。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白（居易）又时时颂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是作俑。”清佚名《静居绪言》：“后之论唐诗者，忽而不睹，即讲宋诗者，亦泥于钉铰、打油而为宋诗，不复有如此作手矣。”均以胡钉铰与张打油作为浅俗诗人之代表。

【大言体】杂体诗的一种。用夸大的语言来抒发自己怀抱的诗歌。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大言、小言，固属诗派；了语、危语，亦归韵文。”此以“大言”、“小言”为诗派。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冒春荣《葑原诗说》卷四：“杂体有大言、小言、两头纤纤、五杂俎、离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项，近于戏弄，古人偶然为之，然而大雅弗取。”此以大言、小言为诗体。唐权德舆《大言》诗云：“华嵩为佩河为带，南交北朔跬步内。搏鹏作腊巨鳌脍，伸舒轶出元气外。”以华岳、嵩山为佩，以黄河为带；最南的交州和最北的朔方，不过跬步之内；将大鹏搏来做腊肉，巨鳌切来做鱼脍；舒展一下臂膀，便轶出于大气之外。此均为故作“豪言壮语”。

【小言体】杂体诗的一种。以至微之事物，作为描绘对象的诗歌。它与“大言”相对。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杂体有大言、小言、两头纤纤、五杂俎、离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项。”唐权德舆《小言》诗云：“醯鸡伺晨驾蚊翼，毫端棘刺分畛域。蛛丝结构聊荫息，蚁垤崔嵬不可陟。”醯鸡、蚊翼、毫端、棘刺、蛛丝、蚁垤，皆极微之物。

【危语体】杂体诗的一种。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大言、小言，固属诗派；了语、危语，亦归韵文。”其法以故作惊人之言，达到醒世悟主的目的。如唐曹邺《捕鱼谣》云：“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少年，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便是此体。按此体早已有之。《世说新语·排调》：桓玄与殷仲堪“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渐米剑头炊’，殷

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当是“危言体”之始。

【了语体】 杂体诗的一种。用说到尽头的話,大彻大悟的话,写入诗歌之中。《世说新语·排调》:“桓南郡(玄)与殷荆州(仲堪)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旌。’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此为“了语体”之始。清毛先舒《诗辨坻》卷二:“了语、危语,亦归韵文。”唐杜牧的“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宋范成大的“踏破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都是“了语体”。

【蛮语体】 亦名“胡语体”、“番语诗”。它以将少数民族的语言写入诗中而得名。《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嫩隅跃清池。’桓问:‘嫩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嫩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此为“蛮语诗”之始。宋蔡居厚《诗史》:“余尚书靖使虏,为胡诗,契丹爱之,再往,情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罗(侈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翰勤(厚重)。微臣稚鲁(拜舞)祝若统(福佑),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虏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此诗亦见清周春的《辽诗话·余尚书北语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即此体。“蛮语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将少数民族的诗翻译成为汉诗,如北朝乐府的《敕勒川》。

【首尾吟体】 即首句和尾句皆用同一句诗。此体创自宋邵雍。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首尾吟体,一句而首尾皆用之也。此体他集不载,唯邵雍诗有之。”元陈舜道《春日田园杂兴》:“春来非是爱吟诗,诗是田园遣兴时。行傍山翁驱犊父,坐观邻姬试鹅儿。看秧时测水深浅,种菜闲占春早迟。白日渐长消不去,春来非是爱吟诗。”发端与结尾,均用同一句诗,是仿邵雍“首尾吟体”的。

【禽言诗】 诗体的一种。以鸟名象声取义,用以寓意抒情。如“提壶”、“姑恶”、“婆饼焦”皆鸟名,皆以其鸣声得名,诗人往往象声取义,借以寄兴和讽世。宋梅尧臣有《禽言》诗四首,苏轼又仿其体作《五禽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列有“禽言体”。

【问答体】 诗体的一种。亦称“问对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列有此体,并说:“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辞也。”如晋陶潜设为形、影、神互相酬答的《形赠影》、《影答形》。后世诗人多有仿作。唐白居易《池鹤八绝句》的《鸡赠鹤》、《鹤答鸡》、《乌赠鹤》、

《鹤答乌》、《鸛赠鹤》、《鹤答鸛》、《鹅赠鹤》、《鹤答鹅》,即为此体。还有一种情况,即不是假设之辞,而是写实之作,诗人聚会,一问一答,以相诘难。如皮日休“杂体诗”中有《夜会问答十》,即皮日休与陆龟蒙、张贻的互问互答。

【十七字诗】 俳谐体之一,亦称“三句半诗”。由五言三句和二言一句组成。末句二言是画龙点睛之笔,要能突出诗的主题思想。语言俚俗,意含讽刺。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八载一轻薄子讽刺宋山东张山人寿“十七字诗”一首云:“此是山人坟,过者应惆怅。两片芦席包,敕葬。”

【诸言体】 即“大言体”和“小言体”的合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诸言体,自宋玉有《大言》、《小言》赋后,后人遂约而为诗。”梁沈约有《大言应令诗》、《细言应令诗》,唐权德舆有《大言》、《小言》诗。参见“大言体”、“小言体”。

【诸语体】 即“了语”、“危语”、“安语”诸体的合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列有“诸语体”。唐权德舆有《危语》、《安语》诗。危语极言其危,安语极言其安。其《危语》云:“被病独行逢乳虎,狂风骇浪失棹橹。举人看榜闻晓鼓,屠夫孽子遇妒母。”《安语》云:“岩岩五岳镇方舆,八极廓清氛祲除。挥金得谢归里闾,象床角枕支体舒。”参见“危语体”。

【颠倒韵体】 诗体的一种。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四曰颠倒韵。四句同用两字为韵,略如反覆诗者是也。”如梁萧绎《咏雪》云:“盐飞乱蝶舞,花落飘粉奁。奁粉飘落花,舞蝶乱飞盐。”全诗以“奁”、“盐”两字为韵,后两句即前两句的回文。无论倒读或顺读,仍然是这两个韵。

【论诗诗】 用诗歌的形式来品评诗歌作家、阐述诗歌理论、总结前代诗歌的诗。此体创自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后来仿作者,代有其人。如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王若虚《论诗诗》、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明方孝孺《谈诗五首》、都穆《学诗诗》,清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诗》、赵翼《论诗》等,以上皆为绝句。也有运用古体诗的形式来论诗的,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大雅久不作”),韩愈的《调张籍》等。

【促句体】 古诗的一体。其法三句一换韵,或平或仄,均无限制。以三句为一叠,有多至六叠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称之为“促句法”,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称之为“促句体”。唐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宋黄庭坚《观伯时画马》,皆此体。

【促句换韵体】 古诗的一体。有两句一换的,有三句一换的,如唐岑参《走马川行》;有五句一换的,如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有七句一换的,如宋苏

轼《太白赞》。清陈仅《竹林答问》问：“每句用韵，三句一换韵，如岑嘉州（参）《走马川行》，岂其创格，抑有所本耶？”答：“此体及两句一换韵诗，昔人谓之‘促句换韵体’，实本于《毛诗·九罭》篇两句一换之格。”又问：“‘促句转韵体’有五句一转韵者，如老杜《短歌行送王郎司直》一篇，第三句不用韵，此其定法欤？”答：“每句用韵，要是正格。东坡《太白赞》七句一转韵，亦每句用韵。”

【孤雁入群格】 诗体之一。律诗与绝句，首句不必用韵，如首句用了与之邻近的韵，叫做“孤雁入群格”。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起句可不用韵，故宋人以来，有入别韵者，谓‘孤雁入群体’。然必于通韵中借入，如冬韵诗起句入东，支韵诗起句入微，豪韵诗起句入萧，肴是已。若庚、青韵诗起句入真、文、寒、删，先韵诗起句入覃、盐、咸，杂乱不可为训。”

【孤雁出群格】 此有两种情况：一是七言律绝中，首句借韵者。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七言绝律，起句借韵，谓之‘孤雁出群’，宋人多有之。宁用仄字，勿借平字，若子美‘先帝贵妃俱寂寞’、‘诸葛大名垂宇宙’是也。”二是结句出韵者，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李笠翁以结句亦用别韵，谓之‘孤雁出群’。”又卷一云：“近人五律亦用之，尤谬之甚者也。”

【束广就狭体】 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叙论空间甚大、时间甚长的事件，而又能以简御繁，以少胜多者。元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上：“金陵半山寺，乃荆公（王安石）旧宅，屋后有谢公墩，下临深沟，上有古木，余尝与漕幕诸公同游。荆公旧有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他人欲隐括此意，非累数十言不可，而公以二十八字尽之，真得束广就狭体。”

【形似体】 描写客观事物，得其形似的诗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近代以来，文贵形似。”说明“形似”是东晋以来的诗风。唐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一曰形似，谓邈（貌）其形而得似也。”《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袭其说云：“形似体者，谓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难以粗测者是。”并举出谢朓《新治北窗和何从事》的诗云：“映浦（池北）树疑（如）浮，入云峰似灭（竹外山犹影）”，便是形似之体。

【质气体】 谓风骨遒劲、志气轩昂的诗。唐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二曰质气，谓有质骨而依其气也。”《文镜秘府论·十体》：“质气体者，谓有质骨而作志气者是。”并举出唐虞世基《出塞二首和杨素》诗云：“‘雾烽暗无色，霜旗冻不翻，雪覆白登道，冰塞黄河源。’此是质气之体也。”按诗当作“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烽暗无色，霜旗冻不翻”。

【情理体】 在抒情中富有理趣之诗。唐李峤《评

诗格》：“诗有十体……三曰情理，谓抒情以入理致也。”《文镜秘府论·十体》：“情理体者，谓抒情以入理者是。诗云：‘游禽暮知返，行人独未归。’又云：‘四邻不相识，自然成掩扉。’此即情理之体也。”按“游禽”诗为南朝齐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诗中句。

【直置体】 谓直书其事之诗。唐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四曰直置，谓直书可置于句也。”《文镜秘府论·十体》：“直置体者，谓直书其事，置之于句中者是。诗云：‘马衔苜蓿叶，剑莹鸛鹑膏。’又曰：‘隐隐山分地，沧沧海接天。’此即是直置之体。”按“马衔”一联，系戴嵩《度关山》诗中句。

【雕藻体】 句雕字琢、文采斐然之诗。唐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五曰雕藻。谓以凡目前事而雕妍之也。”《文镜秘府论·十体》：“雕藻体者，谓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妍丽，如丝彩之错综，金铁之砥炼是。”白居易《文苑诗格》亦云：“夫文字须雕藻三两字，文采不得全真，致恐伤鄙朴。”并举出江总《山庭春日》的“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和鲍照《后发渚》的“华志怯（分）驰年，韶颜惨惊节”之句，作为此体的范例。

【映带体】 亦称“影带体”。谓一人一事，反复用之，前后映带，相映成趣的诗歌。唐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六曰影带。谓以事意相洽而用之也。”白居易《文苑诗格》：“影带宗旨：文体直叙，其意语成文，影带回合，三向四通，悉皆流美。”《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映带体者，谓以事意相惬，复而用之者是。”均未能道得明白。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刘越石（琨）‘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谢惠连‘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等，若非前后相映带，殆不可读。”“宣尼”、“孔丘”，“相如”、“长卿”，皆为同一人，而两用之。此就人而言。孔德绍《登白马山护明寺》的“露花疑濯锦，泉月似沉珠”，此意言花似锦，月似珠，而蜀有濯锦川，汉有明珠浦，故特以为映带。又如“侵云蹀征骑，带月倚雕弓”，“云骑”与“月弓”是复用，此映带之类。此就事而言。

【飞动体】 谓能将静态化为动态的诗。唐李峤《评诗格》列入“十体”中的第八体。《文镜秘府论·十体》：“飞动体者，谓词若飞腾而动是。诗曰：‘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又云：‘月光随浪动，山影逐波流。’此即飞动之体。”按“流波”句乃隋炀帝《春江花月夜》诗中句。

【婉转体】 谓委婉曲折之诗。李峤《评诗格》：“诗有十体……七曰婉转。谓屈曲其词，婉转成文也。”《文镜秘府论·十体》云：“婉转体者，谓屈曲其词，婉转成句是。诗曰：‘歌前日照梁，舞处尘生袜。’又曰：

‘泛色松烟举。凝花菊露滋。’此即婉转之类。”

【清切体】语言清丽而贴切的诗。唐李峤《评诗格》将其列入“十体”的第九体。《文镜秘府论·十体》：“清切体者，谓词清而切者是。诗曰：‘寒葭凝露色，落叶动秋声。’又曰：‘猿声出峡断，月彩落江寒。’此即是清切之体。”按“寒葭”一联，系唐崔信明《送金敬陵入蜀》诗中句。

【菁华体】取精用弘、去粗存真之诗。《文镜秘府论·十体》：“菁华体者，谓得其精而忘其粗者是。诗曰：‘青田未矫翰，丹穴欲乘风。’鹤生青田，风出丹穴。今只言‘青田’，只可知‘鹤’；指言‘丹穴’，即可知‘风’，此即文典之精华。又曰：‘曲沼疏秋盖，长林卷夏帷。’又曰：‘积翠彻深潭，舒丹明浅濑。’丹即霞，翠即烟也，今只言丹、翠，即可知烟、霞之义。”

【跌宕格】唐释皎然在《诗式》中列有“跌宕格”二品，其一曰“越俗”，谓“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并以郭景纯的《游仙诗》、鲍明远的《拟行路难》为范。其二曰“骇俗”，谓“其道如楚有接舆，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并以王梵志《道情诗》、贺知章《放达诗》、卢照邻《劳作诗》为典范。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僧皎然著《诗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骇俗。内骇俗引王梵志诗：‘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此俗语所不肯道者，何以骇为？”

【凉冷诗】讽刺社会炎凉、人情冷暖的诗。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作凉冷诗易，作炎热诗难；作阴晦诗易，作晴霁诗难；作闲静诗易，作繁扰诗难；贫诗易，富诗难；贱诗易，贵诗难。非诗之难，诗之工者为难也。”

【声诗】指乐歌。《礼·乐记》：“乐师辨乎声诗。”宋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勒之金石，播之声诗。”

诗律

【诗韵】诗歌创作据以押韵的书。现存最早的韵书，为隋陆法言的《切韵》残本。其书分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共二百零六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的《广韵》，都沿用了它所分的韵部。因为分韵过细，不便运用，宋淳祐间，江北平水刘渊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尽并同用的韵部为一百零七部，称之为“平水韵”。清张玉书奉敕于康熙十三年编撰《佩文韵府》，以宋末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蓝本，将韵部合并为一百零六部，词语则按最后一字分韵排列，共二百十二卷。因为卷帙浩繁，不便携带，清周兆基乃删繁就简，由博返约，成《佩文诗韵释

要》五卷。又因为义简意略，初学者病其不能收到修辞发藻的效果，于是清季旌德、汤祥瑟荃萃各家韵注，详加勘定，增益有关诗料至十余种之多，号为《诗韵全璧》，一时风行海内，被士林推为首善之本，自辛亥革命以还，上海各书肆缩印传布者，无虑数十家。此为韵书发展变化之大要。

【古韵】相对“今韵”而言。自宋以来，学术界称隋陆法言《切韵》以前的汉语音韵为古韵，《切韵》以后的韵书为“今韵”。也叫做“古音”和“今音”。古韵的系统研究始于宋而盛于清。宋吴棫著《韵补》，创古音通转之说，程迥著《音式》，有双声互转之论，对古音韵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清代著名的古音韵学家有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分部繁简，虽各有不同，而发明创见，则俱可不朽。近人章炳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六部，并由分部而研究音值，使古韵研究更趋精密。

【今韵】相对“古韵”而言。学者以周、秦、汉的语言为古音，以隋、唐以来的语言为今音，现在的音韵学者则称前者为“上古音”，后者为“中古音”。据此，则《切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韵府群玉》、《佩文韵府》等韵书，都叫做“今音”，也叫做“今韵”。

【韵部】韵书以同韵的字归为一部，叫做“韵部”。如宋陈彭年的《广韵》分为二百零六个韵部，平水刘渊的《礼部韵略》分为一百零七个韵部，清张玉书奉敕编撰的《佩文韵府》及其后一般的诗韵分为一百零六个韵部。

【韵目】韵书以同韵的字归为一部，每韵以一字标韵，叫做“韵目”。如《广韵》以“东”、“冬”、“钟”、“江”标目，分别为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而通用的诗韵则以“东”、“冬”、“江”、“支”为上平声的前四部的标目。

【韵脚】诗歌及其他韵文的句末押韵的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下：“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故有看去极平，而断难更移者，安稳故也。安稳者，牢之谓也。杜诗‘悬崖置屋牢’，可悟韵脚之法。”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诗句之韵，如大厦之立柱石，此处不牢，倾倒立见。”

【宽韵】同一韵部的字数较多，而且是常用的字，因而押韵时选择的余地较大，叫做“宽韵”。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指韩愈）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三：“今按《此日足可惜》一首，通用东、冬、江、阳、庚、青

六韵;此外如《元和圣德诗》,通用语、麀、马、有、苛五韵;《孟东野失子》诗,通用先、寒、删、真、文、元六韵,余可类推。”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自韩昌黎横空盘硬,妥贴排纂,韵宽者转更出入旁通,韵狭者则界画谨严,险阻不避。欧阳永叔所谓‘退之一生倔强’,见于此也。”

【窄韵】亦叫“狭韵”,即同一韵部的字不多,且多非常用字,押韵时选择的余地不大。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韩愈)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三:“其(指韩愈)用窄韵,亦不止《病中赠张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一首,又《会合联句》三十四韵。”

【险韵】用艰险涩僻的字作为韵脚,也叫做“僻韵”。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勿和韵,勿拈险韵,勿傍用韵。”清乔亿《剑溪说诗》下:“固有险韵,亦有因题而韵险者。”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五:“昌黎好用险韵,以尽其锻炼;东坡则不择韵,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参阅“僻韵”和“尖叉韵”。

【僻韵】用险僻的字作韵脚,叫“僻韵”。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作诗先择韵,险俗僻涩之韵,可弗用也。”此反对用僻韵者。清尚镛《三家诗话》:“荅生(蒋士铨)古诗好用僻韵,好次元韵,多牵强而无味。昌黎、山谷亦所不免,子才则无之也。”参阅“险韵”、“尖叉韵”。

【尖叉韵】即“险韵”。宋苏轼的《雪后书北台壁》与《谢人见和前篇》都用“尖”、“叉”字为韵,如“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老大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尖”、“叉”皆险韵,而能如此浑成,毫无牵强凑泊痕迹,故以“尖叉”代善用险韵。宋黄彻《碧溪诗话》卷七:“临川(王安石)爱眉山(苏轼)雪诗能用韵,有云:‘冰下寒鱼渐可叉’,又:‘羔袖龙钟手独叉’。盖子厚(柳宗元)尝有‘江鱼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尽叉’。”

【俗韵】庸俗的韵。古人认为凡不见于经传的字叫俗字,以俗字为韵脚,叫做“俗韵”。故唐诗豪刘禹锡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便不敢用。宋宋祁不以为然,为诗讥之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此主张用俗韵者。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东川七言古诗,只读得《两汉书》烂熟,故信手挥洒,无一俗料俗韵。”此以为不宜用俗韵者。

【哑韵】读起来不响亮的韵。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押韵不宜多用哑韵,如四支、十四盐两韵中多哑字,须择而用之。”但清贺贻孙不以为然,他在《诗筏》中说:“前辈有禁人用哑韵者,谓押韵要官样,

勿用哑韵,如四支与十四盐皆哑韵,不可用也。而不知诗家妙处全在押韵,押韵妙处,决不在官样。果禁哑韵,则孔子订诗,当预作四韵删正,‘燕婉’、‘威施’之句,必不列于《风》,而‘昭假迟迟’、‘式于九围’,不列于《颂》矣。可为喷饭。”

【嫌韵】即“出韵”,言作诗押韵,用了不是同一韵部的字。如本用“东”韵,而用了“冬”韵;本用“江”韵,而用了“阳”韵。这在近体诗中,在科举时代被认为违犯格律的。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唐人有嫌韵、兼韵之法。嫌韵即出韵也。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嫌韵与兼韵可通用,不可转用。‘寒’与‘删’、‘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转用之‘真’、‘文’、‘元’则不可。”参阅“出韵”。

【出韵】押了非同一韵部的韵脚。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妨。盖律诗只言四韵,绝句只言二韵。王子安(勃)《滕王阁诗》八句六韵,而序曰:‘四韵俱成’,以‘渚’与‘悠’不在韵数中也。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参阅“嫌韵”。

【兼韵】即押可以通用的韵部的字作韵脚。如“东”可以押“冬”韵,“寒”可以与“删”、“先”通用。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又云:“唐人排律有兼韵者,‘东’兼‘冬’、‘庚’兼‘青’是也。”

【叠韵】叠韵有两义:一是用同样的韵脚,写很多的诗篇。清乔亿《剑溪说诗》下:“几韵叠至数四,直儿戏耳,岂足效尤?”清廷君寿《老生常谈》:“近人……又好学宋人,叠韵不休,皆不关系人之能诗不能诗。余四十岁以后,方有叠韵诗,偶为之,非所好也。叠韵诗有极难押之韵,苦思幽索,忽能押得到,亦自可喜,不必以此矜长耳。”二是指双声叠韵之叠韵,即两字声母相同者为双声,韵母相同的为叠韵。宋杨万里《诚斋诗话》:“或问:‘何谓双声叠韵?’曰:‘行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上句叠韵,下句双声也。”按“诘曲”、“崎岖”,声母相同,当为双声;“钩辘”、“格磔”,韵母相同,当为叠韵。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匠门业师问余:‘唐人作诗,何取于双声叠韵,能指出妙处否?’余曰:‘以某所见,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连,取其宛转。’业师叹赏久之。”

【通韵】用可以相通的韵部的字作为韵脚,如“东”、“冬”,“支”、“微”,“齐”、“佳”之类。清汪师韩《诗学纂闻》:“律诗不出韵,古诗可用通韵,一定之理也。”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下:“律诗起句,可不用韵,故宋人以来,有人别韵者。然必于通韵中借入,如‘冬’韵诗起句入‘东’,‘支’韵诗起句入‘微’,‘豪’韵

诗起句入‘萧’、‘肴’是也。”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律诗亦有通韵，自唐已然，惟‘东’、‘冬’、‘鱼’、‘虞’为多。如明皇《钱王陵巡边》长律乃‘鱼’韵而用‘符’字、‘敷’字，苏颋《出塞》五律，乃‘微’韵而用‘麾’字，杜诗《寄贾严两阁老》乃‘先’韵而用‘寒’字，又《崔氏玉山草堂》乃‘真’韵而用‘芹’字。”说明不仅古诗可以用通韵，律诗同样可以用通韵。但亦有持否定态度者，如清方世举《兰丛诗话》：“通韵亦不可依。今韵注者，如‘一东’通‘二冬’，只‘冬’之半耳，‘钟’字以下则不通。”

【转韵】 诗歌每数句转换一韵，叫做“转韵”。清汪师韩《诗学纂闻》：“七言古诗转韵，汉张平子《思元赋》系词，其肇端矣。转韵之首句，古无不用韵者，惟江总持诗有‘云聚怀清四望台’（《宛转台》）、‘来时向月别姮娥’（《新人姬人应令》），二句无韵，此在唐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为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羲皇’（《醉时歌》）、‘或从十五北防河’（《兵车行》）、‘君不见东吴顾文学’（《醉歌行》）、‘先帝侍女八千人’（《舞剑器行》）、‘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杖行》）、‘忆昔霓旌下南苑’（《哀江头》），此六处转句无韵。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清乔亿《剑溪说诗》下：“转韵无定句，或意转、气转、调转，而韵转亦随之。”清梁章钜《退庵随笔》：“袁简斋（枚）曰：‘顾亭林言：《三百篇》无不转韵者，唐诗亦然。惟韩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余按《文心雕龙》云：‘贾谊、枚乘，四韵辄易；刘歆、桓谭，百韵不迁，亦各从其志也。’则不转韵诗，汉代已然矣。”

【通转】 既用可以通用的韵部的字押韵，又用可以转韵的韵部的字押韵，叫做“通转”。清黄子云《野鸿诗的》：“韵有通转，何也？音相同者谓之通，音不同者谓之转。如‘一东’通‘冬’转‘江’是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古韵通转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部为一部，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十韵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为一部，侵、覃、盐、咸四韵为一部。韵之通转，又分两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两界不通转。通转有部、有类、有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东、董、送、真、轸、震通转为类，有入声、无入声通转为界。非此则谓之叶，叶乃通转之穷也。”

【协韵】 也作“叶韵”。因古今音不同，故以今音读古代诗歌，多不和谐，南北朝时提出“叶韵”之说，强古韵以就今韵。朱熹作《楚辞集注》曾经采用“叶韵”之法，其弊至于一字数读，随处可叶。清代对古音的研究逐渐精确，“叶韵”之说，遂为学术界所非议。清方世举《兰丛诗话》：“叶韵必不可用，不得其唇吻喉舌清浊高下，而惟韵书之附见者是从，徒见窘

迫。”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作古诗但用通韵，不必用转韵，叶韵则尤不必。虽古人有之，今人又何必悉效之。往往见人于诗赋句末，旁注叶字，而读之实不能叶，岂非徒劳而罔工乎？”

【换韵】 诗歌中有两句一换韵的，有三句一换韵的，有多句一换韵的。从此韵换成彼韵，叫做“换韵”。清方世举《兰丛诗话》：“换韵，老杜甚少，往往一韵到底。太白则多，句数必匀，匀则不缓不迫，读之流利。元、白歌行，或一韵即换，未免气促。”清张谦宜《砚斋诗谈》卷二，“换韵不接韵，自唐以来多有之，毕竟先接一句是。”又云：“换韵不顶韵，古多有，气味却要灌注，界画尤须分明。”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换韵之中，略以平调句子，使之伸缩舒和，亦犹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韵与仄韵相参错，乃见其势，却须以三平正调挽和之。”

【押韵】 诗歌为了使音韵和谐，往往在偶句的句末押一同韵的字，叫做“押韵”。宋陈善《扨虱新话》一：“韩退之诗，世谓押韵之文尔，然自有一种风韵。”清方世举《兰丛诗话》：“押韵未有不取易者，如‘东’韵之‘中’、‘支’韵之‘时’、‘灰’韵之‘来’、‘庚’韵之‘情’，皆似易而实难，往往如柳絮飘池，风又引去；须当如春人下杵，脚脚着实。宜田尝举杜‘江从灌口来’，晚唐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一‘来’字，见万里险急排荡之势。太白‘落日故人情’，老杜‘因见古人情’，以实字写虚神，有点睛欲飞之妙。又如义山‘却话巴山夜雨时’，东坡‘春在先生杖履中’、‘时’字‘中’字皆有力。引证甚当，足解人颐。”

【限韵】 限制用某些字或某一韵部的字作为韵脚，叫做“限韵”。这在应制诗、应试诗以及诗友集会时是常用的一种方式。限字的如梁曹景宗用“竞”、“病”成五言一首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限某一韵部的较常见，题末有限某韵者皆是。但限韵作诗，反对者甚多，如清李沂《秋星阁诗话》：“若夫限韵，不过欲以险字窘人耳；不求诗工，只夸韵险，并蛙之见，非大方所取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诗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限以一韵，即束诗思。唐时试士限韵，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今日何可为之耶？”

【次韵】 按照原诗所用韵脚的次序加以唱和，叫做“次韵”。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次韵一道，唐代极盛时，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陆始因难见巧，虽亦多勉强凑合处。宋则眉山（苏轼）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长篇押至数十韵者，特以示才气过人耳。……盖次韵随人起倒，其遣词运意，终非一一自然，较平时自出机轴者，工拙正自判然也。”清赵翼《瓠北诗话》卷四：“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

差,此古所未有也。”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次韵用韵,至苏公而极其变化。然不过长袖善舞,一波三折,又与韩公之用力真押者不同,未可概以化境目之。”此可以明次韵之弊端及其源流。参见“步韵”。

【步韵】 即“次韵”,言步武原诗韵脚,加以唱和。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依其次第者,谓之步韵。步韵最困人,如相殴而自挚手足也。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难照顾。”又《围炉诗话》卷一:“步韵,元、白犹少,皮、陆已多,今则非步韵无诗矣。”参阅“次韵”。

【和韵】 用原诗同一韵部的字作为韵脚,但不用原诗的韵脚,叫做“和韵”。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同其韵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然和韵诗往往为人所诟病,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偶一为之可也。然和韵在于押字浑成,联句在于才力均敌,声华情实中不露本等面目,乃为贵耳。”清黄子云《野鸿诗的》则曰:“和韵人皆为难,我独为易。就韵构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即可压众。然究不能成大器,聊一为之可也。”

【依韵】 依照他人原作的韵部进行和唱,叫做“依韵”。宋刘攽《中山诗话》:“唐人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简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

【用韵】 用原诗的韵,但不一定按原诗韵脚的次序。宋刘攽《中山诗话》:“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用其韵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善用韵者,虽和犹其自作,不善用者,虽所自作犹和也。”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次韵用韵,至苏公(轼)而极其变化。”

【借韵】 五、七言近体诗,第一句借用旁韵,叫做“借韵”。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借韵,如押‘七之’韵,可借‘八微’或‘十二齐’韵是也。”按“七之”、“八微”、“十二齐”当为《广韵》或《集韵》的韵目,今通行诗韵则作“四支”、“五微”、“八齐”矣。

【趁韵】 言作诗时,不顾内容和意脉,只是就韵成句。宋尤袤《全唐诗话》卷六:“权龙褒景龙中,为左卫卫将军,好赋诗,而不知声律。……尝吟《夏日诗》:‘严霜白皓皓,明月赤团团。’或曰:‘岂是夏景?’答曰:‘趁韵而已。’……太子援笔讥之:‘龙褒才子,秦州人氏。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

已。’”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下:“以韵为主,而以意相从,中有欲言,不能通达矣。近代专以此见长,名曰和韵,实则趁韵。”清梁章钜《退庵随笔》认为“其法亦起于《三百篇》”,并列举了“中谷”、“中途”、“家室”、“裳衣”、“瑟琴”、“鼓钟”、“孙子”、“女士”之类后说:“亦大抵趁韵之故,遂开后人法门耳。”又以词语倒用为趁韵。

【分韵】 在作诗之前,选定一些字为韵,各人分拈韵字,然后依所拈的韵字作诗,叫做“分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分韵,有用韵。”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三:“古人联句,大概先分韵而后成诗,梁武帝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沈约以所余‘竞’、‘病’二字与之,曰:‘所余二韵。’则分韵后之所余也。案后人分韵,不限于联句。”

【拈韵】 友朋会集,分拈诗韵,进行诗歌创作。清薛雪《一瓢诗话》:“分题拈韵,诗家之厄也。题与诗必须相配,才有好诗。看此题宜作何体,然后据体构思,庶几当行。一遭牵合,未免捉襟露肘。”清张谦宜《观斋诗谈》卷三:“凡拈韵,不可以口头熟字略与领韵声近,便道定是一部,按本字真看得是,方可下笔,勿因兴发直写下去。名人往往有此失。”清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开、宝以前,和诗只和其题,诗中见和意而已;韵则分拈,绝无次用者。此派滥觞于元、白,浸淫于皮、陆,自苏、黄而降,非是不见才之长、情之重矣。”

【相韵】 审察用作韵脚的字。清毛先舒《诗辨坻》卷三:“诗必相韵,故拈险俗生涩之韵及限韵、步韵,可无作也。”这个论点,学者多尊崇之。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下引用毛氏的话后说:“昏昏长夜,得此豁然。”清陈仅《竹林答问》:“韵不佳,不如且止。寇莱公(準)赋《池上柳》,四押‘青’字不倒,遂止不作。夫赋柳押‘青’韵似不甚难,而古人矜慎若是,此其所以不可及也。善乎毛稚黄(先舒)之言曰:……作诗岂不贵于选韵哉?”

【重韵】 一首诗中,重复出现某一韵脚,叫做“重韵”。古人往往不避重韵,今则用韵不宜重叠。宋周知和《松江诗话》:“杜子美一诗,押两‘萍’字,东坡一诗,押两‘耳’字,谓字同而意异,不妨重叠。又谓子美《八仙歌》押两‘船’字,在歌行则可,他不可为法。”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四:“汉、魏诗不忌重韵,《柏梁台》韵用三‘之’、三‘治’、二‘哉’、二‘时’、二‘来’、二‘材’;《陌上桑》用三‘头’、二‘隅’、二‘余’、二‘夫’、二‘须’……至唐始严重韵,而卢照邻《长安古意》重‘相’字;李白《襄阳歌》重‘杯’字,《庐山谣》重‘长’字;杜甫《牵牛织女》诗重‘中’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三‘卒’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重‘省’字、

重‘境’字，《园人送瓜》重‘草’字，《寄狄明府》重‘济’字，《饮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韩愈《此日足可惜》诗重‘光’、‘鸣’、‘更’、‘城’、‘狂’、‘江’字。宋人疑古无重韵，遂分杜公《饮中八仙》为八章，非也。”

【掷韵】 每句换韵，弃掷前韵而不用；或每两句一韵，其意转换，即掷去原韵，而别安韵，随转随换，所以叫做“掷韵”。《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掷韵者，诗云：‘不知羞，不敢留。但好去，莫相虑。孤客惊，百愁生。饭蔬箪食乐道，忘饥陋巷不疲。’此之谓也。”

【叠连韵】 两个叠韵相连以为韵，音韵特别流和，词调特别清丽，叫“叠连韵”。《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云：“叠连韵者，第四、第五与第九、第十同韵，故曰叠连韵。诗云：‘羁客意盘桓，流泪下阑干。虽对琴觞乐，烦情仍未欢。’此为丽也。”按诗中“盘桓”叠韵，“阑干”复叠韵，两叠韵相连以为韵，故曰“叠连韵”。

【重字韵】 两字相重以为韵，如“青青”、“悠悠”、“活活”之类。《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重字韵者，诗云：‘望野草青青，临河水活活。斜峰缆舟行，曲浦浮积沫。’此为善也。”按“活活”是重字作为韵脚。

【同音韵】 音同而义别，因以为韵，叫同音韵。此种例极多。《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同音韵者，所谓同音而字别也。诗曰：‘今朝是何夕，良人谁难覿；中心实爱怜，夜寐不安席。’此上第五字还是‘席’音，此无妨也。”按“夕”、“席”同音，而意义迥别，故可用以为韵。

【交锁韵】 除了偶句押韵以外，奇句亦互相押韵，韵脚交锁其中，特别和谐流走，叫做“交锁韵”。《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交锁韵，王昌龄《秋兴》诗云：‘日暮此西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弥古亭，视听转幽独。或问予所营，刈黍就空谷。’”按此诗以“木”、“肃”、“独”、“谷”为韵，而其奇句之“堂”与“窗”、“亭”与“营”，又各自为韵。交锁其中，更为流美。

【葫芦韵】 律诗用韵的一种格式，即取两个相邻的韵通押，如“东”“冬”、“鱼”“虞”、“萧”“肴”“豪”之类，前两韵在“东”韵，后四韵在“冬”韵，前小后大，形似葫芦，因以得名。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而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壶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

乃古诗也。”

【辘轳韵】 律诗的二、四句用甲韵，六、八句用与甲韵相邻而又相通的乙韵，双出双入，有似辘轳，故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诗人玉屑》二引《绀素杂记》：“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辘轳。辘轳者，双出双入，失此则缪矣。”《冰川诗式》四《辘轳韵法》：“单辘轳者，单出单入，两句换韵；双辘轳者，双出双入，四句换韵。”

【进退韵】 诗中第二句用“东”韵，第四句用与其相邻相通的“冬”韵，第六句又用“东”韵，第八句再用“冬”韵，如此一进一退，叫做“进退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进退韵者，一进一退。”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至如李贺《追赋画江潭苑》五律，杂用‘红’、‘龙’、‘空’、‘钟’四字，此则开后人‘辘轳’、‘进退’之格，诗中另为一体矣。”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引李师中《送唐介》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八句诗一‘难’三‘寒’同部，二‘山’四‘还’又一部，为进退韵格之证。”

【平水韵】 宋淳祐间，江北平水刘渊编修《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尽并同用之韵为一百零七部。其书虽已不存，但元初黄公绍《韵会举要》，即据此分韵。金王文郁《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又并上声“迥”、“拯”为一百零六部，为元以来作近体诗押韵的依据。被称之为“平水韵”。

【声律】 诗的声韵格律。唐权德舆《裴公神道碑铭》：“比兴属和，声律铿然。”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开元以下，好声律者则师景云、龙朔；矜气格者则追建安、黄初，而永明文格微矣。”

【声病】 不合诗的声律所规定的标准。唐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年十五六，初识声病。”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沈隐侯（约）最讲声病，昭明选录至多。余意沈诗生气索然，并不逮何、范两家。”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齐、梁声病之体，自古不谓之古诗，诸书言齐梁体者，不止一处。唐自沈、宋以前，有齐梁诗，无古诗也，气格亦自差古，而皆有声病。”

【双声】 两字的声母相同，叫做“双声”。如“鸳鸯”“蟠蛸”之类。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皮日休《杂体诗序》曰：《诗》云：蟠蛸在东，又曰：鸳鸯在梁，双声起于此也。”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清吴騞《拜经楼诗话》卷四：“吴乔作《围炉诗

话》，于双声、叠韵，尤多强解。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谓‘侵簪’、‘江光’为叠韵，不知‘月影’、‘江光’并双声，‘侵簪’、‘逼屐’并叠韵也。”又云：“少陵诗多用双声叠韵，人皆知之。又往往嵌杂于五、七言诗中，使人乍读之不觉，细玩乃知其下字之妙。”

【平头】 五言诗的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违反者叫做“犯平头”。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因为它的第一字“芳”与第六字“提”，第二字“时”与第七字“壶”都是平声，所以犯了“平头病”。《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三：“唐人诗有平头之病，如窦叔向之‘远书珍重’、‘旧事凄凉’，‘去日儿童’、‘昔年亲友’，唐彦谦之‘泪随红蜡’、‘肠比朱弦’，‘梅向好风’、‘柳因微雨’，亦当慎之。”

【上尾】 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违者为犯病。《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上尾：第一句末字、第二句末字，不得同声。诗得者：‘紫鬟聊向牖，拂镜且调妆。’失者：‘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上尾谓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虽隔韵，何害？律固无是矣。”

【蜂腰】 诗律“八病”之一。谓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否则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蜂腰：第一句中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诗得者：‘惆怅崔亭伯’；失者：‘闻君爱我甘’。”按“君”、“甘”皆平声字，所以是犯。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〇：“近人论诗，多以蜂腰为病。然如杨盈川（炯）‘天将下三宫，星门列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贮文雄’，骆义乌（宾王）‘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明皇帝（李隆基）‘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涧泉含宿冻，山木带馀霜’，张曲江（九龄）‘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山川勤远略，原隰軫皇情’，钟仲文（起）‘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皆历世相传之名作，而亦犯此病，并不累其气体，何也？乃知此病，在诗为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为佳诗耳。”

【鹤膝】 诗律“八病”之一。言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谓两头细，中央粗，好像鹤膝。《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鹤膝：第一句末字，第三句末字，不得同声。诗得者：‘朝关苦辛地，雪落远漫漫。含冰陷马足，杂雨练旗竿。’失者：‘沙幕飞

恒续，天山积转寒。无同乱郢曲，逐扇掩齐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鹤膝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群动，朝光接太虚，年侵频怅望’之类，八句俱如是则不宜，一字犯亦无妨。”

【大韵】 五言诗以某字为韵，则前两句除韵字外的九个字，不得出现与韵脚同部的字，否则犯了诗律。《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大韵：一韵以上，不得同于韵字。如以‘新’字为韵，勿复用‘邻’、‘亲’等字。诗得者：‘运阻衡言革，时泰玉阶平。’失者：‘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按“裂”、“洁”与韵字“雪”同韵，故失。《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弥佳。若立字要切，于文调畅，不可移者，不须避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五大韵，谓重叠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又‘端坐愁苦思，揽衣起西游’。‘胡’与‘垆’，‘愁’与‘游’犯。”

【小韵】 诗律“八病”之一。即五言诗两句内，除本韵外，九字中不得有两字同韵，如“遥”、“条”之类，但叠韵不限，如“飘飘”、“窈窕”、“徘徊”、“周流”之属。《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小韵：二句内除本韵，若已有‘梅’字，不得复用‘开’、‘来’字。诗得者：‘功高乘履石，德厚赠昭华。’失者：‘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六小韵，十字中自有韵，如‘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与‘清’犯。”《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病》：“元氏曰：‘此病轻于大韵，近代咸不以为累文。’”

【旁纽】 亦名“大纽”，诗律“八病”之一。即五言诗的前十字中，不得有双声字。如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字，因为“鱼月”、“元月”、“阮月”、“愿月”都是双声，双声即犯旁纽。《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旁纽：双声是也。如诗二句内有‘风’一字，则不得复有此等字。诗得者：‘管声惊百鸟，衣香满一园。’失者：‘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宋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七曰旁纽，谓十字中有‘田’字，又用‘寅’、‘延’是犯。”按古诗“田夫亦知礼，寅宾延上坐”是犯，因诗中亦有“田”字，又用“寅”、“延”等字。《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病》：“元兢曰：‘此病更轻于小韵，文人无以为意者’。”

【正纽】 亦名“小纽”，声律“八病”之一，即双声在一纽之中，亦即同声母之字，四声相承，如“壬”、“衽”、“任”、“人”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便不得复安“衽”、“任”、“人”等字，否则便是犯。《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病》：“正纽者，谓正双声相犯。其双声虽一，旁正有殊，从一字纽之得四声，是正也。若‘元’、‘阮’、‘愿’、‘月’是。若从他字来会成双声，

是旁也。若‘元’、‘阮’、‘愿’、‘月’是正,而有‘牛’、‘鱼’、‘妍’、‘硯’等字来会‘元’、‘月’等字成双声是也。如云:‘我本汉家子,来嫁单于庭’,‘家’、‘嫁’是一纽之内,名正双声,名犯正纽者也。旁纽者,如‘贻我青铜镜,结我罗裙裾’,‘结’、‘裾’是双声之旁,名犯旁纽也。”

【四平头】 四句相对,皆用平声,叫做“四平头”。《冰川诗式》十:“诗病有齐、梁,谓四句相对,皆用平声,又谓四平头。”清薛雪《一瓢诗话》:“四平头,四实四虚,前后轻重,蜂腰鹤膝,诗中之粗病,极易犯而极不宜犯。”

【平仄】 平指四声中的平声,仄指上、去、入三声。诗歌中所用的字音,须平仄互调,使音和律协,读起来富有音乐美,叫做调平仄。

【平侧】 即“平仄”。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音韵》:“古无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轻重缓急,则自有文字以来,固区以别矣。《三百篇》每章别韵,大率轻重相间,则平侧之理已具。”考先秦时代的作品,在用韵上都十分注意分别平仄,便是证明。如《诗经·魏风·硕鼠》之第一和第三节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第一节的“黍、顾、土、所”,都属鱼部字,而且都是仄声。第三节的“苗、劳、郊、号”,都属宵部字,而且都是平声。韵脚字平押平,仄押仄,如此一致,是“平侧之理已具”的确证。参见“平仄”。

【阴调】 阴平、阴上、阴去、阴入的总称。古代四声,因受声母清浊不同的影响,分化为阴阳两类。清声母的字为阴调,浊声母的字为阳调。

【阳调】 与“阴调”相对,是阳平、阳上、阳去、阳入的总称,它是浊声母的字,发音一般较阴调为低。

【揭调】 高调。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乐府家谓揭调者,高调也。高骈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西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

【粘法】 也写作“黏法”,“粘”、“黏”同字。“粘法”就是调平仄的方法,也就是两个律联之间的粘合方法。它有两种形式:一是同声相粘的结合法,即前一联的下句和后一联的上句偶数字同声,因字声平仄相同而把两联粘合起来,以五言为例,如前联的下句为“仄仄仄平平”,则后联的上句为“仄仄平平仄”。这是正格。二是异声相对的粘合方法,即前联下句和后联上句的偶数字异声,因平仄相异而结合起来,以七言为例,如前联下句为“平平仄仄仄平平”,则后联上句为“仄仄平平平仄仄”。这是变格。

【粘对】 粘,取粘连之意,指律诗或绝句的前联下句与后联上句的第二、第四和第六字的平仄相同,两联如此互相粘连,方为合律。对,取相对之意,指一联内的出句与对句平仄互异。粘对指近体诗(包括绝句、律诗和排律)而言,古体诗不论。近体诗中亦止须料理绝句,如欲作律诗,不过将绝句重叠一次,作排律不过重叠多次而已。参阅“粘对规律”。

【失严】 即“失粘”。谓声调平仄,失其严谨。参见“失粘”。

【失粘】 近体诗的上下两句,平仄不相粘合,即前联的下句与后联的上句平仄雷同,不相粘连,叫做“失粘”。“失粘”现象在初、盛唐诸大家中往往有之,一是因为律诗尚未定型,二是因为诗人出奇变化,不为声律所缚,如陈子昂《赠乔侍御》、王维《使至塞上》、李白《登凤凰台》、杜甫《卜居》和《咏怀古迹》。至中唐以后,“失粘”现象,便不多见。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总以句中第二句为纽,首句平,次句仄,三句次字用仄,四句次字又用平,五句次字又以平接,如此类推,可无失粘之虑。”

【粘对规律】 它滥觞于齐、梁,而成熟于初、盛唐。即一对一粘有规则地变换,造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律形式。即每联节奏点之间在横的方面是平仄相间(即“异音相从”);在纵的方面是平仄相对(即“轻重悉异”)。在每两联之间相邻的两句中,是节奏点的平仄相同相粘。这样,使联内平仄相对,联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时而交叉,时而平行,从而编织出整齐、对称而又有变化的诗律形式。并在首尾两头,留出粘合关系的接头,可以继续按此规则结合下去,从而构成排律的结合形式。这是唐人在诗律发展史上的贡献。

【五绝平仄】 五绝有四种平仄格式:一为仄起仄收式:“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二为仄起平收式,即将上式的第一句“仄仄平平仄”改为“仄仄仄平平”,余三句同。三为平起仄收式:“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四为平起平收式,即将上式的第一句改为“平平仄仄平”,余三句不变。以上四式,一、三两式常见,为正格;二、四两式较少见,为偏格。

【七绝平仄】 七绝有四种平仄格式:一为平起平收式,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二为平起仄收式,即将第一句变为不入韵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其余各句与上式同。三为仄起平收式,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四为仄起仄收式,即将上式第一句变成不入韵的“仄仄平平平仄仄”,其余三句与上式同。其中

一、三两式为正格,较常用;二、四两式为变格,较少用。

【五律平仄】 五律有四种平仄格式:一为平起仄收式,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二为平起平收式,即将上式的第一句“平平平仄仄”改为入韵的“平平仄仄平”,余七句与上式同。三为仄起仄收式,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四为仄起平收式,即将上式的第一句改为入韵的“仄仄仄平平”,余与上式同。五律以第一句不入韵者为正格,第一句入韵者为变格。

【七律平仄】 七律有四种平仄格式:一为仄起平收式:“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二为仄起仄收式,即将前式的第一句改为不入韵的“仄仄平平仄仄”,余七句与上式同。三为平起平收式,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四为平起仄收式,即将上式的第一句改为不入韵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余七句与上式同。七律与五律相反,第一句入韵者为正格,不入韵者为变格。

【排律平仄】 五排是五律的延长,它的平仄格式,即将五律的四种平仄格式分别重复一次或多次。七排是七律的延长,即将七律的平仄格式重复一次或多次。

【古诗平仄】 古诗不拘平仄,而实有一定之平仄规律。如:一、出句终以二、五为凭,落句终以三平为式;二、出句第二字平,第五字仄,其余五仄、四仄亦谐;落句第五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三、第四字、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声之谐;四、平韵到底者,应尽量避免律句;五、落句末三字平,第四字必仄;如第四字平,则第六字必仄以救之。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七古以平韵到底者为正格,不可杂以律句。”“落句则以三平押韵为正调。”“七古有仄韵到底者,则不妨以律句参错其间,以用仄韵,已别于律体,故间用律句,不致落调。”“五古出句住脚,亦当平仄间用,与七古同。惟平韵之出句住脚,不忌用平韵,则与七古异。”参阅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赵执信《声调谱》及翁方纲《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

【一三五不论】 附见于《切韵指南》之“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个规律是不完备的,它只说对

了第二句,因为诗的节奏点,是由第二、四、六字来表现的,故五言的第二、第四字,七言的第二、第四、第六字必须严格按照平仄的规律,以保持其相间相续的特点。至于第一句的“一三五不论”,在律诗则将出现“孤平”和“平三连”的诗病;在古诗则违背了“出句以二、五为凭,落句以三平为式”的规律。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乃不知何时何人,创为‘一三五不论’之说,以疑误后学,村师里儒,靡然从之。”

【拗体】 凡是不合平仄规律而写作的近体诗,叫做拗体诗。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三:“唐人拗体诗有两种,其一苍茫历落中自成音节”,“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大抵第一类如唐人王维、杜甫的律诗,多用古体,不拘平仄,而自然和谐,一片宫商。第二类则由许浑、赵嘏创为拗体,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异。每首诗往往只拗一联。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即拗体之律诗,而其中亦必有应拗之字及必应相救之字。”

【拗救】 诗句该平的用了仄,该仄的用了平,就要在本句或对句的适当位置再拗一次,以为补救。如此平拗仄救,仄拗平救,使之平仄协调,以保持其完美的音乐性,叫做“拗救”。拗救之法有三:一、五言第一字、七言第三字,在“平平仄仄平”和“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平仄格式中出现的拗,会出现“孤平”现象,须要在本句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再拗一次,以补偿一个平声字。二、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出现的拗,则要在另一句相应的位置上再拗一次,以保持上下两句平仄相异相对的状态。三、以一处之拗补救两处,如杜甫《促织》“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许浑《咸阳城东楼》“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句“难”字和“风”字,既救了本句的“故”和“欲”,又救了上句的“得”和“日”,避免了一些声病。

【拗律】 突破平仄常格,不按相粘相对的规律而写的诗。一句拗者称为拗句,通篇拗者称为拗律。清施补华《岷傭说诗》:“拗体不可轻作,此是已成功夫,初学时须律协声稳,不惟五律为然也。”

【拗绝】 绝句之一种,即律绝中不依平仄常格,以致失粘失对的,叫做“拗绝”。如王维的《孟城坳》、《鹿柴》、《竹里馆》等,李白的《山中问答》、《山中与幽人独酌》、《长门怨二首》之一等,皆有拗句拗字,也都是拗绝。

【五绝顺粘格】 根据粘式规则的变换组合,可以得到四种组合形式,即仄起仄收式(仄仄平平仄)、平起仄收式(平平平仄仄)、仄起平收式(仄仄仄平平)和平起平收式(平平仄仄平)四种,凡严格按照以上格式的,都是顺粘格。参阅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

序例·五绝凡例》。

【五绝偏格】 亦作“五绝变格”。五绝继承“齐梁体”的传统,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以用韵为变式,此其一;句中的第三字,应严格遵守粘式规律,不可随意变换平仄,遵循者为正格,不遵循者为偏格。清王士禛《律诗定体·五言仄起不入韵》条云:“凡双句二、四应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断不可杂以仄声,以平平止有二字相连,不可令单也。其二、四应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连,换以平韵无妨也。大约仄可换平,平断不可换仄,第三字同此。”此虽言律,绝句亦如此,此其二。

【七绝顺粘格】 按照粘式组合规律,七绝可以有四种组合形式:一是平起平收式,即在五绝仄起平收式的每句前头加上一个字声相反的节拍,由“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粘合“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而成。二是平起仄收式,这是前一式的变式,只将第一句变为不用韵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其余各句均同。三是仄起平收式,即在五绝平起平收式每句前头加上一个字声相反的节拍,由“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粘合“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而成。四是仄起仄收式,这是前一式的变式,只将第一句变成不用韵的“仄仄平平平仄仄”,其余各句均同。凡是严格按照这个粘式规律组合的,就是七绝顺粘格。参阅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绝凡例》。

【七绝偏格】 凡首句不用韵的,即平起仄收式(平平仄仄平平仄)和仄起仄收式(仄仄平平平仄仄),为偏格,这和五绝恰巧相反。此其一;每句的第三字和第五字不是严格按照平仄规定的,叫偏格,此其二。

【五律正格】 它的正格有两种形式:一是平起仄收式,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二是仄起仄收式,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特点是第一句都不入韵,都由两种律联交叉结合而成。参阅清王士禛《律诗定体·五言仄起不入韵》及《五言平起不入韵》,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律凡例》。

【五律偏格】 它亦有两种形式:一是平起平收式,它是五律正格平起仄收式的变式,即将第一句的“平平平仄仄”改为“平平仄仄平”,从而入韵。二是仄起平收式,是五律正格仄起仄收式的变式,即使第一句改为入韵式,其余七句均同。清王士禛《律诗定体·五言平起入韵》下注云:“平起入韵者少,与仄起入韵同。”说明第一句不入韵是常例,入韵是变例。

【七律正格】 按照平仄规定及粘式规律,七律可以有四种平仄组合形式。其中的平起平收式,即五律的仄起平收式每句前加两个平仄相反的字,以及仄起平收式,即在五律平起平收式每句前加两个平仄相反的字。这两式都是第一句入韵,在七律中较为常见,是正格,它和五律恰相反。参阅清王士禛《律诗定体》、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例》。

【七律偏格】 七律中的仄起仄收式和平起仄收式,第一句都不入韵,在七律较少见,是偏格。七律第一句第三字以及偶句中的第三字,应为仄声者可以换为平声,应平者不可换仄声。没有严格遵守此规律者亦为偏格。参阅清王士禛《律诗定体·七言平起不入韵》。

【排律粘对】 十行以上粘对合律,除首尾两句外,中皆对偶句,叫做“排律”或“长律”。“长律”又分五言和七言,五言长律是五律的延长,七言长律是七律的扩展。五言长律南北朝时代已具雏形,但还没有按粘对规则使之定型化。七言长律则是唐代发展起来的。长律有长至百韵以上的,自然难免有失粘、失对或对仗不工的毛病。

【五古用韵】 一般隔句一韵,韵脚可平可仄,可以一韵到底,亦可以转韵,有二句、四句、六句或八句一转的,可以由平转仄,亦可以由仄转平;可以韵随意转,亦可以韵转而意不转。总之,用韵较宽,也比较自由。偶句的末三字,往往是连三平,这在近体诗是应该尽量回避的,而在古体诗中,则往往更见苍劲。清翁方纲《赵秋谷所传声调谱·息舟荆溪入阳羨南山游善权寺呈李功曹》按语云:“自渔洋先生论五、七言诗,大约以对句末三字叠峙三平,以见苍劲,是固然已。”参阅清赵执信《声调谱》、翁方纲《五言诗平仄举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古凡例》。

【七古用韵】 常见的是二句一韵,一韵到底,也可以换韵,既可由平转仄,又可由仄转平,除偶数句子可以换韵外,也有三句一韵的。平韵到底者,对句往往为三平调。参阅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翁方纲《七言诗平仄举隅》、赵执信《声调谱》、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古凡例》。

【近体诗用韵】 一韵到底,中间不能转换。一般用平声韵,但五绝,特别是古绝多用仄声韵,七绝亦间有仄韵者。律诗用仄韵的则极少见。用平韵的,要避免对句的末三字都是平声,习惯叫做“连三平”或“三平调”。

【孤平】 近体诗中最严格忌避的一种诗病。即律句“平平仄仄平”和“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句型中,五言第一字、七言第三字的平声字,不能改变成仄声,

因为一经改变,便成为“仄平仄仄平”或“仄仄仄平仄仄平”,这样除韵脚外,一句中便只剩下一个平声,这就叫做“孤平”。“孤平”破坏了音乐美,所以必须忌避。

【三平调】亦叫“连三平”、“三平式”或“三平脚”。“三平调”主要发生在“仄仄仄平平”和“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句型中。即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如果将仄声换成平声,就会出现“仄仄平平平”或“平平仄仄平平平”的现象,即以三平声结尾,这就叫做“三平调”。三平结尾是古体诗平声韵偶句的常用句式,在古体诗中显得更加苍劲,而在近体诗中则模糊了后面两个节拍的界限,所以必须避免。

【三平式】即“三平调”。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评苏轼《游径山》云:“古大家亦有别律句者,然出句终以二、五为凭,落句终以三平为式;间有杂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说明古体诗的对句末三字,以“连三平”为常例,如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哀王孙》:“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对句末三字皆“三平式”。又如欧阳修《圣俞会饮时圣俞赴湖州》“全篇十二韵,对句皆三平之调,只前半第四句‘无二三’略于第六字间入一仄字耳”。可证。

【三仄式】亦称“连三仄”、“三仄脚”。“三仄式”古诗不避。如苏轼《石鼓》的“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对句皆连续用三仄声。即近体诗亦不须避,如温庭筠《边笳曲》“嘶马渡寒碛,朝阳照雪堡”。“照雪堡”亦三字连仄。

【三字尾】唐以后之古体诗,往往以句末三字的四种形式“平平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仄”以区别律句,以求其古拙,于是“三字尾”便成为唐以后古体诗的一个标志。参阅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赵执信《声调谱》,翁方纲《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

【五平五仄式】古体诗中,有五字皆平、五字皆仄者,仍不害其为好诗。如阮籍《咏怀》的“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李白《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的“寻幽无前期,乘兴不觉远”,出句皆五平声;又李白前题的“白日忽欲晚,未穷三四山”,杜甫《戏题山水图歌》的“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出句皆五仄声,皆为脍炙人口的好诗,然究不多见。尤其在近体诗中,必须严格避忌。清翁方纲《五言诗平仄举隅》云:“有谓五平之句,对必五仄;五仄之句,对必五平者。有谓对句全似律,则其出句必极拗;出句全似律,则其对句必极拗者。此皆阅历之言,而究非平心定气

之论。”

【律诗失粘】律诗失粘的情况约有七种形式:一是起联失粘,如杜甫《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出句和对句皆仄平起;二是颌联失粘;如杜甫《咏怀古迹》第二句为“风流儒雅亦吾师”,第三句为“怅望千秋一洒泪”,两句平仄应相同;三是颈联失粘,如杜甫《仲夏严公枉驾》第四句为“自识将军礼数宽”,与第五句“百年地僻柴门迥”平仄互异;四是尾联失粘,如柳宗元《哭吕衡州》第六句“九原犹寄若堂封”,不当与第七句“遥想荆州人物论”平仄相异;五是前二联失粘,如李颀《题璿公山池》:“远公遁迹庐山岑,开山幽居祇树林。片石孤峰窥色相,清池白月点禅心。”一、二句同为平起,一、二联为折腰格;六是中二联失粘,如李白《登凤凰台》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第三、四句不当异平仄;七是后三联失粘,如王维《酌酒与裴迪》云:“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二、三联与三、四联均为折腰,不合粘式律。

【绝句失粘】五绝失粘,如陈子昂《赠乔侍御》云:“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因此诗第二句为“云阁薄边功”,即“平仄仄平平”,则第三句不当为“仄平平仄仄”,使之平仄互异。七绝失粘,如张说《泛洞庭》“忽惊水上江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因此诗的第二句为“秋景千寻下洞泉”用仄平起,则下联不当用仄平起,使之成为折腰的形式,不合粘式律。

【双声正格】律诗中间两联,双声叠韵,自宜相对,即绝句、古诗之作对偶体者,亦须用此法,但不若中间两联之严格。律诗如骆宾王云:“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锦车”、“刁斗”皆双声互对;韦应物云:“别从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问苦空。”“方法”、“苦空”亦双声互对。李嘉祐云:“禅心超忍辱,梵语问多罗。”温庭筠云:“金沟故事春常在,玉轴遗图火半焚。”“忍辱”、“金沟”均双声;“多罗”、“玉轴”均叠韵,此以双声对叠韵。古诗如谢朓云:“玲珑结绮线,深沉映朱网。”“玲珑”双声对“深沉”叠韵。绝句如杜甫云:“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燕语太丁宁。”亦以双声“造次”对叠韵“丁宁”。此皆双声正格。清吴騞《拜经楼诗话》卷二:周松霭辑《杜诗双声叠韵括略》,“其体例有双声正格、叠韵正格、双声同音通用格、叠韵平上去三声通用格、双声借用格、叠韵借用格、双声广通格、叠韵广通格、双声对变格、叠韵对变格、散句不单用格、古诗四句内照应格,凡十二类。所摘古近体诗句,自杜外,附汉魏六朝至唐宋诸家。……此书实发千古之秘要,非深通音韵者,不能知其妙也”。

【双声同音通用格】 凡唇音之字,轻音之非、敷、奉、微,重音之帮、滂、并、明,各自相通,凡轻重相通者,属于这一格。律诗如孟浩然“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馀”、“水乘舟楫去,亲望老莱归”,刘禹锡“紫回谢女题诗笔,点缀陶公漉酒巾”,“洞彻”、“舟楫”、“老莱”、“紫回”、“点缀”,皆双声同音通用之例。古诗如谢灵运“岩峭岭稠叠,洲紫渚连绵”、韩愈“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稠叠”、“腾掷”亦皆双声同音通用之例。其对句非双声则为叠韵,如“纡馀”、“连绵”、“连延”等。

【双声广通格】 三十六字母,分为牙、舌、唇、齿、喉各个不同的纽,遇难属对时,因难见巧,取其最近者广通之,即属此格。律诗如杜甫云:“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古诗如杜甫云:“纷披长松倒,揭嶮怪石走。”苏轼云:“郁攸火山烈,霤沸汤泉注。”“宫阙”、“乾坤”、“纷披”、“揭嶮”、“郁攸”、“霤沸”,音不逼近,本非双声,广通而偶用之,是为双声广通之例。

【双声借用格】 字可两读,即行借用,便是此格。如杜甫的“人生会面难再得”、“玉江水仙惜不得”、“天边老人归不得”之“得”字,“满堂宾客皆叹息”、“十年骨肉无消息”之“息”字,皆“十三职”韵,并与“一屋”、“二沃”韵通叶,此为借用。

【双声对变格】 不用正对,皆变格也。所谓变者,或二句中,或四句中,参差多寡,其变不一。律诗如杜甫“临老羈孤极,伤时会合疏”、“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临老”、“羈孤”、“伤时”、“会合”以及“锦江”、“春色”、“天地”、“古今”,俱为双声,此四用之例也;又“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鼓角”、“欲夜”俱双声,“缘边”、“川原”俱叠韵;“白马”、“金谷”、“铜驼”俱双声,“何意”叠韵,此四用之变例也。又“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开口”、“小心”俱双声,“将相”叠韵,此三用之例;又“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石上水”三字,同齿音双声,“天边烟”同韵叠韵,此连绵三字之变例。一隅三反,庶几得之。

【叠韵正格】 李白云:“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以叠韵“翡翠”对双声“鸳鸯”;白居易云:“莫问龙钟恶官职,且听清脆好诗篇。”以叠韵“龙钟”对双声“清脆”;李商隐云:“鸥鸟忘机翻浹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浹洽”、“平生”俱为叠韵,因以为对。凡此皆叠韵正格。

【叠韵三声通用格】 平、上、去三声,可通用为叠韵,至入声则不可通。如骆宾王“关山暂超忽,形影叹艰虞”,“关山”、“形影”,平上去三声通用之例。孟浩然云:“在山怀绮季,临汉忆荀陈。”陆龟蒙云:“让王门外开帆叶,义帝城中望戟戈。”“绮季”与“荀陈”,

“让王”与“义帝”,皆平,上、去三声通用之例。

【叠韵借用格】 律诗如杜甫云:“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莽,读漠古切。顾氏《唐韵正》:“莽,古音莫补翻。”今此字两收于二十姥、三十七荡部中,当削去并入姥韵。又如陆龟蒙云:“为分科斗亲铅槩,与说蜉蝣坐竹樯。”科读驱是。

【叠韵广通格】 凡古韵可通者,如支、微、齐、佳、灰、真、文、元、寒、删、先之类,广通皆为叠韵,推而广之,即可通及于平、上、去三声,只要字音逼近,便是叠韵。律诗如贾岛云:“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陆龟蒙云:“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长江”、“人形”俱叠韵,便是广通叠韵之例。古诗如沈约云:“沃若动龙骖,参差凝风管。”杜甫云:“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沃若”、“经行”、“暄暖”,亦皆叠韵广通之例。

【叠韵对变格】 律诗如杜甫“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怅望”、“洒泪”、“萧条”、“异代”皆叠韵,“千秋”双声,此五用之例。又“联翩匍匐礼,意气死生亲”,“联翩”、“意气”皆叠韵,“匍匐”、“死生”皆双声,此四用之例。又“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高鸟”、“寒蝉”皆叠韵,“黄云”双声,此三用之例。又“云散灌坛雨,春青彭泽田”,“灌坛”叠韵,“春青”双声,此两用之例。又“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艰难”、“去住”、“损春”叠韵,“归故”双声,此四用之变例。又“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涛”,“浮舟”叠韵,“郡郭”、“寄江”双声,此三用之变例。古诗如“羈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羈离”叠韵,“愉悦”、“羸老”、“惆怅”,双声,此四用之例。徐略。

【散句不单用格】 散句原本不拘,但有时意到笔随,天机自发,往往不求而自至,或一句中并见,或两句中相应,总不令其单用,所以求调之响亮,音之和諧。律诗如李白云:“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蚕丛”、“崎岖”双声。杜甫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知谁”、“茱萸”叠韵,“仔细”二字,通用叠韵,兼广通双声,与“茱萸”连用,合格而谐,此律诗散句起结不单用之例。古诗如韩愈“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荦确”叠韵,“黄昏”、“蝙蝠”双声。李白云:“我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澹荡”、“同调”双声,此古诗散句起结不单用之例。

【换头】 它有两义:一是诗的首句第二字是平,第二句第二字换仄;三句第二字是仄,四句第二字换平,其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用平不妨,叫做“换头”。如刘长卿《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一句“心”是平,二句“畔”换仄;三句“至”是仄,四句“归”换平,如此轮转终篇,

叫“换头”。二是词的过拍后另起,也叫换头。《词品·秦少游赠楼东玉》:“秦少游《水龙吟》,赠营妓楼东玉者,其中‘小楼连苑’及换头‘玉佩丁东’,隐‘楼东玉’三字。”

【双换头】“飘飘宕渠域,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开。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此唐元兢《蓬州野望》诗。诗首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仄;三句头两字仄,四句头两字平;五句头两字又平;六句头两字又仄;七句头两字仄;八句头两字又平。如此轮转,自初至终,叫做“双换头”。

【护腰】腰,谓五言句之第三字;护,上句之腰不宜与下句之腰同声。然同平声无妨,同仄声则不可。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山”、“草”为第一、二句之腰,“花”、“鸟”为三、四句之腰,“连”、“抵”为五、六句之腰,“搔”、“不”为七、八句之腰,皆平仄异声,是为护腰。然唐人似多不拘,如杜甫《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君行别老亲,此去苦家贫。藻镜流连客,江山憔悴人。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春。朝夕高堂念,应宜彩服新。”除尾联之“高”与“彩”合于“护腰”的要求外,余皆不合。

【相承】上句五字之内,多上、去、入三声之字,而平声字极少,则下句以三平承之。叫做“相承”。“相承”有向上承者,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溪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上句除“溪”是平声外,余皆仄声字,故下句上以“云霞收”三平承之,是为上承。三平向下承者,如王融《古意》二首之一云:“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上句唯一“君”字是平声,余四字皆仄,故下句末以“双双飞”三平承之,故曰下承。

【对仗】诗歌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由两个字数相等、平仄相异、词性相对、结构相似的句子,形成一种整齐、对称的形式美,就是对仗。如王维《观猎》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杜甫《咏怀古迹》的“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皆铢两悉称,属对工整,便是很好的对仗。参阅“对偶”。

【对偶】即“对仗”。诗文的字面音节,两两相对,就是对偶。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苏丞相颂尝云:‘馆中见王平甫题壁有“宫殿影摇河汉外,江湖梦断鼓钟边”。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复对偶亲切。”参阅“对仗”。

【偏枯】本为病名,借指对偶中搭配不当、轻重失宜,形成一边轻一边重的现象。这是对偶中应当避奇的。明王骥德《曲律·论对偶》:“一句好,一句不

好,谓之偏枯。”杨慎《升庵诗话》卷三:“庾开府诗‘羊肠连九坂,熊耳对双峰’,鲍照诗‘二嶠虎口,九折羊肠’,可谓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风聚萤,骥子莺歌’之句,则杜觉偏枯矣。”

【合掌】本为佛教仪式,借指联语的出边和对边意义相同,词性相似,尤如两掌相合,俗谓之“同边草鞋”。律诗要求词约旨丰,用极少的笔墨表达丰富的内容,而合掌者于一联中重复其意,故为对仗之大忌。清庞垞《诗义固说》下:“近体诗,今人往往有出句无对句,或青黄紫绿,外虽分偶,而意实合掌。其病在诗非一气串下。若一气串下,则出之与对,浅深不同,安得合掌耶?”冒春荣《葦原诗说》卷一:“对法不可合掌,如一动必一静,一高必一下,一纵必一横,一多必一少,此类可以递推。如耿诤‘冒寒人语少,乘月烛光稀’,‘稀’、‘少’合掌。”

【正对】又名切对、的名对、正名对、名正对。即两者正正相对,如“天”对“地”、“南”对“北”、“尧年”对“舜日”、“塞北”对“江南”之类。《文心雕龙·丽辞》:“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又云:“孟阳(张载)《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元兢曰:‘正对者。若尧年、舜日。尧、舜皆古之圣君,名相敌,此为正对。若上句用圣君,下句用贤臣;上句用凤,下句还用鸾,皆为正对也。’”按此为最基本的对法,初学者必从此入手,而后逐渐拓开。参阅“的名对”。

【切对】即“正对”。唐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一曰切对,谓写物切正不偏枯。”宋吴聿《观林诗话》:“前辈作桃花、菊诗虽多,而未见拔俗者。杨元素云:‘清香旧已亲陶令,红艳新能惑阮郎。’张敏叔云:‘但令陶令长为主,莫遣灵芸错认伊。’然世复盛传一联云:‘陶令归来惊色变,刘郎去后笑开迟。’亦未为胜。但‘陶令归来’、‘刘郎去后’,乃切对也。”参阅“正对”。

【的名对】即“正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远,下句安近;上句安倾,下句安正。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初学作文章,须作此对,然后学馀对也。”又:“诗曰:‘东园青梅发,西园绿草开;砌下花徐去,阶前絮缓来。’”释曰:“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园’、‘圃’是其对,‘青’、‘绿’是其对,‘梅’、‘草’是其对,‘开’、‘发’是其对。下二句中,‘阶’、‘砌’是其对,‘前’、‘下’是其对,‘花’、‘絮’是其对,‘徐’、‘缓’是其对,‘来’、‘去’是其对。如此之对类,名为的名对。”

【正名对】 即“正对”。传为魏文帝所撰《诗格》：“八对：一曰正名，二曰隔句，三曰双声，四曰叠韵，五曰连绵，六曰异类，七曰回文，八曰双拟。”梁桥《冰川诗式》九引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参阅“的名对”。

【借对】 又名“假对”。它分为：借音，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借“杨”为“羊”，以与“鸡”对；借色，如“因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借“子”为“紫”，借“洪”为“红”，以为对偶；借数字，如“闲听一夜雨，更对柏岩僧”，借“柏”为“百”，以与“一”对；借人名，如“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朱云”是人名，借以对“白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春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言之者有是也。”按上述诗句借“杨”为“羊”，借“楠”为“男”。以分别与“鸡”、“母”为对。“竹叶”是酒，借以对“菊花”，故云借对。

【假对】 即“借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借对。自注引孟浩然《裴司士员司户见寻》、李白《送内庐山寻女道士李腾空》及杜甫《九日》中的诗句为证。宋蔡启《蔡宽夫诗话》：“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韩退之‘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频’，借‘丹’对‘白’，借‘爵’对‘鱼’，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人遂立以为格。贾岛‘卷帘黄叶落，开户子规啼’、崔峒‘因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以为假胜的对，谓之高手，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参阅“借对”。

【假借对】 即“假对”、“借对”。明俞弁《逸老堂诗话》上：“《天厨禁脔》，洪觉范著，有琢句法中假借格。如‘残春红药在，终日子规啼’，以‘红’对‘子’。如‘住山今十载，明日又迁居’，以‘十’对‘迁’。朱子儋诗话谓其论诗近于穿凿。余谓孟浩然有‘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老杜亦有‘枸杞因吾有，鸡栖奈尔何’，以‘枸’对‘鸡’。韩退之云：‘眼昏长讶双鱼影，耳热何辞数爵频’，以‘鱼’对‘爵’，皆是假借，以寓一时之兴。唐人多有此格，何以穿凿为哉？”参阅“借对”、“假对”。

【扇对】 亦名“隔句对”、“开门对”。即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

句。”清马位《秋窗随笔》：“《芥隐笔记》：乐天诗‘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岁暮春上巳，独立香山下头’，子瞻用之为海外《上元》诗。愚谓此格不专出乐天，唐人中极多，如‘去年花里留连饮，暖日天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又‘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是也。即子瞻犹有‘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风雨’，‘去年花落在徐州，对酒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严沧浪所谓‘扇对’是也。”

【隔句对】 即“扇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隔句对者，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诗曰：‘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抱笑入长安。’释曰：第一句‘昨夜’与第三句‘今朝’对，‘越溪’与‘逾岭’是对。第二句‘含悲’与第四句‘抱笑’是对，‘上兰’与‘长安’对。”参阅“扇对”。

【开门对】 即“扇对”。清冒春荣《葑原诗说》一：律诗“有以第三句对首句、第四句对次句者，谓之开门对”。又云：“‘昔年秋露下，羁旅逐东征。今岁春光动，崎岖别上京’（韩愈），‘几思闻静话，夜雨对禅床。未得重相见，秋灯照影堂’（郑谷），‘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抱笑入长安’（佚名），此开门对格也。”参阅“扇对”及“隔句对”。

【流水对】 又名“十字对”、“走马对”。即五言律诗的上联的下联，只叙一事，表一意，而对偶却十分自然、工整。如“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直愁骑马滑，故用泛舟回”之类。宋黄昇《玉林诗话》：“唐人诗喜以两句道一事，曾茶山（几）诗中多用此体，如‘界从江北路，重到竹西亭’、‘若无三日雨，那复一年秋’、‘似知重九日，故放两三花’、‘次第缙经集，呼儿理在亡’、‘又得清新句，如闻警欬音’、‘如何万家县，不见一枝梅’，此格亦甚省力也。”参阅“十字对”。

【十字对】 即“流水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十字对，刘眘虚‘沧浪千万里，日夜一孤舟’是也。”洪觉范《天厨禁脔》上：“十字对句法：《梅》：‘前村风雪里，昨夜一枝开。’《别所知》：‘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前对齐己作，后对郑谷作，皆十字叙一事，而对偶分明。”参阅“流水对”。

【走马对】 即“流水对”。虽两句道一意，叙一事，直可将两句做一句看，但不限于五律，七律中亦往往有之。如杜甫《九日》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整冠。”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云：“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王令《和束熙之雨后》云：“如何农亩三时望，只得官蛙一晌鸣。”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之一云：“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

堆盐。”皆一气贯串，合成一意。参看“流水对”、“十字对”。

【就句对】 又名“当句对”、“句中对”。言句中自为对偶，而上下联又可为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就句对，又曰当句有对，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李嘉祐‘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是也。”按上述两诗，“小院”与“回廊”对，“浴凫”与“飞鹭”对；“孤云”对“独鸟”对，“万里”与“千山”对，皆就其句中而自为对。参阅“当句对”。

【当句对】 即“就句对”、“句中对”。宋洪迈《容斋续笔》三：“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蒸’、‘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参阅“就句对”。

【句中自对】 即“当句对”、“就句对”。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下：“对仗固须工整，而亦有一联中本句自为对偶者。五言如王摩诘‘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七言如杜必简‘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炫服照江东’，杜子美‘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之类。方板中求活时或用之。”按王诗以“赭圻”对“赤岸”，以“击汰”对“扬舲”；必简诗以“伐鼓”对“撞钟”，以“新妆”对“炫服”；子美诗以“桃花”对“杨花”，“黄鸟”对“白鸟”，皆句中自为对。参阅“就句对”、“当句对”。

【句对】 即“当句对”、“句中对”。王昌龄《诗格》：“势对例五：四曰句对。曹子建诗：‘浮沉各异物，会合儿时谐。’”按“浮”与“沉”对，“会”与“合”对。皆当句有对，是为“句对”。

【交络对】 又名“交股对”、“错综对”、“犄角对”、“蹉对”。指上下两联相对的字颠倒错综，不在相应的位置上。《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十九，交络对。赋诗曰：‘出入三代，五百馀载。’”按“出”、“入”，“五”、“百”，“三代”、“馀载”四字四义皆成对，即所谓交络也。

【交股对】 即“交络对”。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僧惠洪《冷斋夜话》载介甫（王安石）诗云：‘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多’当作‘亲’，世俗传写之误。洪之意，盖欲以‘少’对‘密’，以‘疏’对‘亲’。予作荆南教官，与江朝宗汇者同僚，偶论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诞，殊不晓古人诗格。此一联以‘密’字对‘疏’字，以‘多’字对‘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谓‘蹉对法’也。”由此可知“交络对”又名“交股对”、“蹉对”。

【犄角对】 即“交股对”、“交络对”。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有两句中字法参差相对者，谓之‘犄角对’。

如‘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杜甫），‘众水’与‘一门’对，‘涪万’与‘瞿塘’对。‘舳舻争利涉，来往任风潮’（孟浩然），‘舳舻’与‘风潮’对，‘利涉’与‘来往’对是也。”参阅“交络对”、“交股对”。

【蹉对】 即“犄角对”、“交络对”。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宋人巧猎名色，正对外，有就对，有蹉对，有扇对。”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蹉对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以‘蕙肴蒸’对‘奠桂酒’是也。”参阅“犄角对”、“交络对”及“交股对”。

【巧对】 运思精妙，属对奇特，出入意表，谓之“巧对”。亦称“奇对”。宋李昉《古今诗话·巧对数联》：“给事中马子山，穆王八骏有山子马。王丞相云：‘马子山骑山子马。’莫有对者。相传久之，有姓钱人为衡水令，罢归，或取以为对云：‘钱衡水盗水衡钱。’钱闻之变色。或者对曰：‘吾正欲作对耳，非有实也。’”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有巧对法，如‘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以‘天’对‘地’、‘鸟’对‘渔’也。”参阅“奇对”。

【奇对】 即“巧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奇对者，若马颊河，熊耳山；此马、熊是兽名，颊、耳是形名，既非平常，是为奇对。”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对句法，人不过以事以意，出处备具，谓之妙。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不如东坡奇特，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酸辛。’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以‘鲸’为‘虱’对，‘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诗人玉屑》七引此段文字标为“奇对”。

【蜂腰对】 第二联不对，第三联方对者，叫做“蜂腰对”。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沈括《笔谈》以次联不对者为蜂腰，引贾岛《下第》诗为证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有次联不对，至第三联方对者，谓蜂腰对，言已断而复续也。”下亦引贾岛《下第》诗为证。

【换柱对】 起联对，而次联用流水句的，叫“换柱对”。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玉窗朝日映，罗帐春风吹。拭泪攀杨柳，长条腕地垂’（沈佺期），‘言从石菌阁，新下穆陵关。独向池阳去，白云留故山’（王维），‘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杜甫），‘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唐玄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此换柱

对格也。”

【四柱对】 即“当句对”。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有本句中自相对偶者，谓之‘四柱对’。如‘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王维），‘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时’（元稹），‘远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是也。”参阅“当句对”、“就句对”、“句中对”、“句对”诸条。

【十四字对】 即七律中的流水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十四字对，刘长卿‘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是也。”唐人七律中的十四字对很多，如杜甫《九日》之“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整冠”，《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江楼月》之“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之“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李商隐《哭刘蕡》之“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为招魂”，皆两句一贯，不可分割。故两句中往往有关连词，如“不堪”、“何事”之类。

【反对】 词语相反，而义理相同的叫“反对”。《文心雕龙·丽辞》：“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又云：“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唐李白《塞下曲》的“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两句词语不同，而皆写边情紧张；杜甫《日暮》的“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两句词语虽异，而同为抒发乡思浓郁；他如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的“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常悬捧日心”，贾至《巴陵夜别王八员外》的“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理殊趣合，字异义同，都是“反对”的适例。

【同对】 又称“同类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同对者，若‘大谷’、‘广陵’，‘薄雾’、‘轻云’。此‘大’与‘广’，‘薄’与‘轻’，其类是同，故谓之同对。”杜甫《狂夫》的“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江村》的“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按“风”和“雨”、“翠筱”与“红蕖”、“燕”与“鸥”，皆事物之同类者，故曰“同对”。

【同类对】 即“同对”。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同类对者，云、雾、星、月、花、叶、风、烟、霜、雪、酒、觞、东、西、南、北、青、黄、赤、白、丹、素、朱、紫、宵、夜、朝、旦、山、岳、江、河、台、殿、宫、堂、车、马、途、路。”如杜甫《春思》“不识冶游伴，多逢憔悴人”、《春至》“白片落梅浮涧水，黄梢新柳出城墙”，“伴”对“人”、“白”对“黄”、“梅”对“柳”，皆同类相对。

【言对】 指对偶中但用词语，不用典故者。《文心

雕龙·丽辞》：“言对者，双比空词者也。”又云：“（司马）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又云：“凡偶词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如李白《送友人入蜀》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登金陵凤凰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月夜忆舍弟》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登高》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皆双比空词，羌无故实，是言对的适例。

【事对】 运用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形成工整的对偶形式。《文心雕龙·丽辞》：“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又曰：“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又曰：“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如杜牧《河湟》的“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李商隐《重有感》的“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前者以晁错的被杀表达对元载的悲惨下场，给予深切的同情；以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暗寓对宪宗的好神仙之道而死于宦官之手的讽谕和哀惋。后者以窦融表请讨伐西北军阀隗嚣，暗指昭义军节度刘从谏两次上书表示要清君侧的决心；并以陶侃进军石头，力斩叛臣苏峻，表示对刘从谏的厚望。用典贴切，表意深婉，是事对的适例。

【异类对】 又名“异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山”，上句安“鸟”，下句安“花”。“天”、“山”非敌体，“鸟”、“花”不同类，这就叫做“异类对”。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上官仪曰：‘诗有八对：……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按“风”、“虫”不类；“池”、“叶”殊门，故云“异类对”。此类情况，唐宋诗中，不胜枚举，如杜甫《登岳阳楼》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阁夜》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苏轼《初到黄州》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儋耳》的“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吴楚”对“乾坤”，“东南”对“日夜”，“三峡”对“五更”，“星河”对“鼓角”，“动摇”对“悲壮”，以及“长江”对“好竹”，“山”对“郭”，“笋”对“鱼”，“垂天”对“快意”，“雌霓”对“雄风”，“云端”对“海上”，既非敌体，又非同类，所以是异类对。参阅“异对”。

【异对】 即“异类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元氏曰：‘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残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残’其类不同，名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参见“异类对”。

【联绵对】 亦名“连珠对”。即连若贯珠，不相断绝。《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联绵对者，不相绝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即名为联绵

对。但上句如此,下句亦然。诗曰:‘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听蝉蝉响急,思卿卿别情。’”释曰:“一句之中,第二字是‘山’,第三字亦是‘山’,余句皆然。如此之类,名为‘联绵对’。”

【连珠对】即“联绵对”。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又《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或曰:朝朝、夜夜、灼灼、菁菁、赫赫、辉辉、汪汪、落落、索索、萧萧、穆穆、堂堂、巍巍、诃诃,如此之类,名‘联绵对’。”可知“联绵对”即“连珠对”。此体诗中甚多,如杜甫《江亭》的“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的“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俎来”,《登高》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暮归》的“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参阅“联绵对”。

【双声对】用声母相同的词语为对,叫“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佳菊”、“丽兰”,双声为对。它可以放在句首、句腹,也可以放在句尾。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有双声对者,如‘留连千里宾,独待一年春’,此头双声也;‘我出崎岖岭,君行礲礲山’,此腹双声也;‘野外风萧索,云里月朦胧’,此尾双声也。”按“留连”与“独待”,“崎岖”与“礲礲”,“萧索”与“朦胧”,皆双声字,分别置于句首、句腹、句尾。

【叠韵对】用韵母相同的词语为对。这种对偶,可以置之句头,亦可以置之句中、句尾。《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蕴酌、思维、须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诗有六对,五曰叠韵对。徜徉、放旷是也。”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又有叠韵对者,如‘徘徊四顾望,怅快独心愁’,‘平明披黼帐,窈窕步花庭’,此头叠韵也;‘疏云雨滴沥,薄雾树朦胧’,‘磴危攀薜荔,石滑践莓苔’,此尾叠韵也。”“又古诗‘君赴燕然戍,妾坐逍遥楼’,此腹叠韵也。”按以“徘徊”对“怅快”,“平明”对“窈窕”,皆置于句首,是头叠韵;以“燕然”对“逍遥”,置于句腹,是腹叠韵;以“滴沥”对“朦胧”,“薜荔”对“莓苔”,皆置于句尾,是尾叠韵。

【双拟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双拟对者,一句之中所论,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秋’,二‘秋’字拟第二字;下句亦然。如此之类,名曰‘双拟对’。诗曰:‘夏暑夏不衰,秋阴秋未归;炎至炎难却,凉消凉亦迫。’”释曰:第一句中,两‘夏’字拟一‘暑’字,第二句中,两‘秋’字拟一‘阴’字,第三句中,两‘炎’字拟一‘至’字,第四句中,两‘凉’字拟一

‘消’字,如此之法,名为‘双拟对’。”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上官仪曰:诗有八对,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

【回文对】顺读与倒读,皆可成句为对,叫做“回文对”。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回文,起于窦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上官仪曰:诗有八对,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情新因意胜,意胜逐情新,上官仪诗也。”变“意得”为“意胜”,而皆能回复成诵。

【互成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互成对者,天与地对,日与月对,麟与凤对,金与银对,台与殿对,楼与榭对。两字若上下句安之,名的名对;若两字一处用之,是名互成对,言互相成也。诗曰:‘天地心间静,日月眼中明;麟凤千年贵,金银一代荣。’”释曰:第一句之中,‘天地’一处;第二句之中,‘日月’一处;第三句之中,‘麟凤’一处;第四句之中,‘金银’一处。不在两处用之,名互成对。”

【赋体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赋体对者,或句首重字,或句首叠韵,或句腹叠韵,或句首双声,或句腹双声。如此之类,名为赋体对。似赋之形体,故名‘赋体对’。”唐王昌龄《诗格》:“常用体十四:五赋体,谢灵运诗:‘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此呈其秋怀之物,是赋体也。”按“重字”、“叠韵”、“双声”,均可分别置于句首、句腹和句尾。句首重字,如“皎皎夜蝉鸣,胧胧晓光发”;句腹重字,如“汉月朝朝暗,胡风夜夜寒”;句尾重字,如“月蔽云晒晒,风惊树裊裊”。徐参见“双声对”与“叠韵对”。

【邻近对】此体大抵与的名对相似,但的名对窄,邻近对宽。《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十八,邻近对。诗曰:‘死生今忽异,欢娱竟不同。’又曰:‘寒云轻重色,秋水去来波。’”按诗的前两句为北周无名法师《过徐君墓》句,后两句为陈后主《幸玄武湖饯吴兴太守任惠》句。句以“死生”、“欢娱”和“轻重”、“去来”相邻近的字为对。

【切侧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二十六,切侧对。切侧对者,谓精异粗同是。诗曰:‘浮钟宵响彻,飞镜晓光斜。’‘浮钟’是钟,‘飞镜’是月,谓理别文同是。”唐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二曰切侧对。诗曰:‘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俚语对】用俗语方言做的对联。周遵道《豹隐纪谈》云:“天生好句未尝无对,俚俗之语得之为难。《栗斋诗话》载二对云:‘死人身边有活鬼,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云:‘老手旧胳膊,穷嘴饥舌头。’”按《栗斋诗话》不知撰人。用俚语作对入诗者,历代多有,如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的“射人射先马,擒贼先

擒王”，《戏作俳谐体遣闷》的“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一声对】即“叠韵对”。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洪龟父有诗云：‘琅玕严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玕鸣佛屋，以谓‘薜荔’是一声，须要一声对，‘琅玕’即一声也，予以为然。”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云：“一声即所谓叠韵也，立之不明叠韵，故别创一声之名耳。”参阅“叠韵对”。

【合掌对】上下联的字面虽异，意义则同，叫做“合掌对”，这是对偶的大忌，俗谓“同边草鞋”，言其不能用也。清毛先舒《诗辩坻》卷四：“占最忌合掌对，如‘朝’对‘晓’，‘听’对‘闻’之类，古人亦多有之，玄宗‘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郎君胄‘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虽时有拙致，似不足效。”按以上联语，虽只部分合掌，已为诗病，若全句合掌，则不可谓之诗。

【虚实对】上联是实，下联是虚，或者句首是虚，句末是实，虚实相映，变化无极。清毛先舒《诗辩坻》卷四：“作诗对仗须精整，不定以青对白，以冬对夏，以北对南也。要审死活、虚实、平侧。借如‘登山临水’、‘高山流水’，‘登’、‘临’为活，‘高’、‘流’为死，不得易位相对仗也，或有假借作变对耳。又如‘高山流水’、‘吴山越水’，‘高’、‘流’为虚，‘吴’、‘越’为实，亦不得易位为对仗也，或假借斯有之。”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中联以虚实对、流水对为上。即征实一联，亦宜各换意境。略无变换，古人所轻。”说明审虚实、多变换，是对偶的要着。如杜甫《春望》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月夜忆舍弟》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的“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帏”，《曲江二首》之二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皆一联是实，一联为虚。

【双虚实对】二联的句首是实，句尾是虚，故名“双虚实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二十四，双虚实对。诗曰：‘故人云雨散，空山来往疏。’”盖“故人”对“空山”是双实；“云雨散”对“来往疏”是双虚，故名。

【双声侧对】指字义迥异，而以双声字为对者。《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双声侧对者，谓字义别，双声来对是。诗曰：‘花明金谷树，叶映首山薇。’‘金谷’与‘首山’字义别，同双声侧对。又曰：‘翠微分雉堞，丹气隐檐楹。’‘雉堞’对‘檐楹’，亦双声侧对。”

【叠韵侧对】即“叠韵对”，指字义有别，而韵母相同的词语为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叠韵侧对者，谓字义别，声名叠韵对是。诗曰：‘平生披黼

帐，窈窕步花庭。’‘平生’、‘窈窕’是。又曰：‘自得优游趣，宁知圣政隆。’‘优游’与‘圣政’，义非正对，字声势叠韵。”

【平对】平常之对偶。《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平对者，若青山、绿水，此平常之对，故曰‘平对’也。”

【偏对】有四种形式：一曰宽对，即不求其极工至切；二曰重字，即重叠其字；三曰双声，即上下联以声母相同的词语为对；四曰叠韵，即上下联以韵母相同的词语为对。唐王昌龄《诗格》：“势对例五；五曰偏对，重字与双声、叠韵是也。”《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二十三，偏对。诗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谓非极对也。又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又曰：‘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又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字对】即不问字义，但对字面，如以“桂楫”对“荷戈”，“荷”在这里是“负荷”的意思，但因其字面是植物，故与“桂”为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或曰：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是。诗曰：‘山椒架寒雾，池筴韵凉飚。’‘山椒’，即山顶也；‘池筴’，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按“椒”在字面上为植物，故与“筴”即竹为对。又如“原风振平楚，野雪被长菅。”按“平楚”本为整齐的丛木，“长菅”即深密的茅草，亦就字面为对。

【意对】字面上似非对偶，而事意文理，相因相贯，叫做“意对”。《诗格》：“势对例五，意对三，陆士衡诗：‘惊飚骞友信，归云难寄音。’”按“惊飚”、“归云”，虽似可对；而“友信”、“寄音”，实难为偶，但其事意相因，文理相贯，故以为“意对”之例。《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十一，意对。诗曰：‘岁暮临空房，凉风起坐隅；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芜。’……释曰：‘岁暮’、‘凉风’，非是属对；‘寝兴’、‘白露’，罕得相酬；事意相因，文理无爽，故曰意对耳。”

【声对】字义俱别，惟声相同，因以为对，即“借对”之借声者。唐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五曰声对，谓字义别，声名对也。”《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十六，声对。或曰声对者，若晓路、秋霜；‘路’是道路，与‘霜’非对，以其与‘露’同声故。或曰声对者，谓字义俱别，声作对是。诗曰：‘彤驄初惊路，白简未含霜。’‘路’是途路，声即与‘露’同，故将对‘霜’。又曰：‘初蝉鸣高柳，密莛挂深松。’‘莛’，草属，声即与‘鸟’同，故以对‘蝉’。”参阅“借对”。

【侧对】字义俱别。形体半同，谓之“侧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元（兢）氏曰：侧对者，若‘冯翊’、‘龙首’。此为‘冯’字半边有‘马’，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此为‘侧对’。

又如‘泉流’、‘赤峰’，‘泉’字其上有‘白’，与‘赤’为对。凡一字侧耳，即是‘侧对’，不必两字皆侧也。”

【总不对对】律诗通首不对，但音韵铿锵，无不合律，叫做“总不对对”。《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二十九，总不对对。如‘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共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此总不对之诗，如此作者，最为佳妙。”按上诗为沈休文《别范安成》诗，虽一气呵成，但并不合律，盖此时律诗尚未定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又‘水国无际际’之篇，又李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者。”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二：“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僧皎然有《访陆鸿渐不遇》一首云：‘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着花，到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虽不及太白之雄丽，亦清致可喜。”

【互文对】两句意思，交互补充，交互成文，而形成的对偶。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交互句法，如‘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谓花径不曾因客而扫，今为君扫；蓬门不曾为客而开，今为君开，上下两意，交互成对。”此谓“互文对”或“互成对”。参见“互成对”。

【混装对】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混装对句法，如‘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谓历涧道冰雪，尚有馀寒；到石门林丘，已见斜日，故为混装对。”

【三十六字母】唐末僧人守温所拟订。郑樵《通志·七音略》对此评价很高。明、清以来，学者研究《切韵》系统的语音，论述元以后的语音变化，均以此三十六个声母的代表字为依据。守温原书今已不存，敦煌写本有《三十字母例》。兹就《七音略》及《切韵指掌图》所载，将其名称及分属七音表示如下：

牙音	见溪群疑
舌音	舌头：端透定泥
	舌上：知彻澄娘
唇音	重唇：帮滂并明
	轻唇：非敷奉微
齿音	齿头：精清从心邪
	正齿：照穿床审禅
喉音	影晓匣喻
半舌	来
半齿	日

【清浊】音韵学术语，是清音和浊音的合称。清音就是不带音的声母，即发声时声带不振动的声母。如三十六字母中的“见”[k]、“端”[t]、“帮”[p]等。浊音就是带音的声母，即发音时带振动的声母，如三十六字母的“群”[g]、“定”[d]、“并”[b]等。

【全清】清音分为全清和次清。全清指不送气、不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如三十六字母之“帮”[p]、“端”[t]、“见”[k]、“非”[f]、“心”[s]、“审”[ʃ]、“精”[ts]、“照”[tʃ]等。

【次清】指送气、不带音的塞音、塞擦音。如三十六字母中之“滂”[pʰ]、“透”[tʰ]、“溪”[kʰ]、“清”[tsʰ]、“穿”[tʃʰ]、“晓”[x]等。

【全浊】音韵学上把浊音分为全浊和次浊。全浊指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如三十六字母中的“并”[b]、“定”[d]、“群”[g]、“邪”[z]、“禅”[ʒ]、“从”[dz]、“床”[dʒ]等。

【次浊】指带音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如三十六字母中的“明”[m]、“泥”[n]、“疑”[ŋ]、“来”[l]、“喻”[j]等。

【四呼】音韵学术语。音韵学家分韵母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合称“四呼”，简称“开齐合撮”。四呼是以介音的有无以及介音的性质为标准而定的，即：(1)开口呼：无韵头，而韵腹又不是[i]、[u]、[y]；(2)齐齿呼：韵头或韵腹是[i]；(3)合口呼：韵头或韵腹是[u]；(4)撮口呼：韵头或韵腹是[y]。

【等呼】音韵学术语。“等”和“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元时代的等韵图分韵母为开口、合口两呼，凡介音或主元音是[u]的，叫做“合口”，反之叫做“开口”。又据[i]介音的有无，主元音的洪细（指发音时口腔共鸣空隙的大小），把两呼各分为一、二、三、四等。如：

呼	开 口	合 口
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韵	寒 删 仙 先	桓 删 仙 先
例	干 奸 甄 坚	官 关 勑 涓

（据《韵镜》外转第二十三、二十四）

至明、清时，因语音变迁，开、合各四等之分，在口语上已不能辨别，故人们多主张并等，即把开、合各四等，并为开、合各两等，但还没有“四呼”的名称。清潘耒《类音》始以唇的形状为标准，定为开、齐、合、撮四呼，一直沿用至今。

【等韵】音韵学上分析汉字字音结构的一种方法。狭义专指韵母的等呼，广义则指等呼、七音、清

浊、字母、反切等。因为它以“等呼”来分析韵母的结构,以“七音”来分析声母的发音部位,以“清浊”来分析声母的发音方法,以“字母”来表示汉语的声母系统,以“反切”来表示汉语的注音方法。

【反切】 汉语的一种传统注音方法。其法以两字相切合,取上一字的声母与下一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合成一个字的音,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如“冬,都宗切,”即取上字“都”的声母d和下字“宗”的韵母和声调ōng相拼,读为“冬”(dōng)。

【翻切】 即“反切”。“翻”、“反”同义。如“莽,漠古切”,顾炎武《唐韵正》:“莽,古音莫补翻。”参阅“反切”。

【浮切】 “浮声切响”之缩语。浮声即平声,切响即仄声。《宋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所言“浮声”与“切响”,实即指“平仄”。

【四声】 汉语字音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汉字分别声调,由来已久,但初无“四声”之名,至南朝齐周颙作《四声切韵》、梁沈约撰《四声谱》,始以平、上、去、入四字作为各类的调名,总称“四声”。唐以后以诗赋取士,官私韵书,均以此定四声,四声遂得到广泛运用,一直沿用至今。

【五音】 此有二义:一为音韵学上的术语。按照声母发音的部位,分唇、舌、齿、牙、喉五类,叫做“五音”。“五音”之名,始见于《玉篇·五音声论》。二为古乐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即宫、商、角、徵、羽。《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五声】 即“五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章为五声。”孔颖达疏:“声之清浊,差为五等,圣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土为宫,金为商,木为角,火为徵,水为羽。”参见“五音”。

【七音】 此有两义:一为等韵学家于唇、舌、齿、牙、喉五音之外,又增半舌音、半齿音两类,总名“七音”,见郑樵《通志·七音略》。二为古乐的七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为七音,也叫“七声”。

【声类】 具有二义:一指声母。等韵书中通称字母,清钱大昕、陈澧以字母之名,袭取梵文,用在华文字上,实为不顺,故陈澧作《切韵考》,改作声类。二指韵而言,如清孔广森《诗声类》、严可均《说文声类》,都是研究古韵的书。

【声纽】 声母的别称,即汉字音节开头的部分,或单称“纽”,或称“音纽”。

【洪音】 发音时口腔共鸣空隙较大的音。宋、元等韵学家分韵母为开口、合口两类,每类又分一、二、三、四等。一、二等韵都没有介音[i],发音时口腔

共鸣空隙较大,故称洪音。清江永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之说。明清等韵学家称开口呼为开口洪音,合口呼为合口洪音,齐齿呼为开口细音,撮口呼为合口细音。

【细音】 发音时口腔共鸣空隙较小的音。宋、元等韵学家分韵母为开口、合口两类,每类又分一、二、三、四等,三、四等都有[i]介音,发音时口腔共鸣空隙较小,故称细音。自明、清等韵学家分韵母为开、齐、合、撮四呼以后,便称齐齿呼为开口细音,撮口呼为合口细音。

【阴声】 音韵学术语,也叫“不附声韵”。以元音收尾或无尾的韵母叫阴声。

【阳声】 音韵学术语,以鼻辅音[m][n][ŋ]收尾的韵母叫阳声,也称“附声韵”。

【急声】 古语有二音急读而成一音的,叫做急声。如“奈何”为“那”,“之焉”为“旃”,“何不”为“盍”、不可为“叵”。这“那”、“旃”、“盍”、“叵”便是“奈何”、“之焉”、“何不”、“不可”的急声。现代方言中也有两音急读而成一音的,如“不用”为“甬”(北京话),“没有”为“冇”(广东话),“勿要”为“勳”(苏州话)。

【慢声】 古语有一音缓读而成两音的,如慢声为“之于”或“之乎”,急声则为“诸”;慢声“不律”,急声则为“笔”。即所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

【曼声】 纾缓的长声。《文心雕龙·乐府》:“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五言律差易得雄浑,加以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

【音和】 凡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声调和韵母相同的,叫做“音和切”。如“刚,古郎切”,“古”、“刚”的声母都是g[k],“郎”、“刚”的韵母和声调都是āng[aŋ]。

【古音】 从前的音韵学家称周、秦、两汉的语音为古音,隋、唐、宋的语音为今音。现在的音韵学者则称前者为上古音,后者为中古音,统称为古音。

【今音】 从前的音韵学家称中古音,即隋、唐、宋时代的语音为今音,以区别于周、秦、两汉的古音。

【韵略】 音韵学专著。北齐阳休之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见著录。休之,字子烈,累官至尚书右仆射、领中书监。周武平齐,与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人同时被征,随北周武帝赴长安。所著甚富。《韵略》今已不传,但有清任大椿、马国翰、黄奭、顾震福的辑本。其所分韵之部类,与《切韵》多不合,如“冬”、“钟”、“江”不分,“元”、“痕”、“魂”不分,“山”、“先”、“仙”不分,“萧”、“宵”、“肴”不分。《文镜秘府论·四声论》称之曰:“齐仆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

切,辞人代用,古今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名曰《韵略》。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说明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但隋陆法言《切韵序》说它颇“有乖互”,《颜氏家训·音辞》篇亦说它“殊为疏野”,因而减其身价。

【音韵决疑】 音韵学著作。北齐太子舍人李节撰。二卷。李节事迹略见于《北史·李灵传》,谓其“少好学,然性倨傲,”官至太子舍人。其书已亡,清马国翰辑佚,亦有目无书,惟敦煌本王仁煦《切韵》,犹可见其大略,如“佳”、“皆”不分,“先”、“仙”不分,“萧”、“肴”不分,“庚”、“耕”、“青”不分,“尤”、“侯”不分,“咸”、“衔”不分,皆与《切韵》不合。有人认为《音韵决疑》当作《音谱决疑》。

【韵集】 音韵学著作。晋吕静撰。《隋书·经籍志》载:“吕静《韵集》六卷,晋安复令”。其书今亡,有清陈澧、任大椿、马国翰、顾震福辑本。对于《韵集》的内容和评价,略见于某些书的记载,如《魏书·江式传》云:“(吕静)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隋书·潘徽传》云:“未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云:“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王微之制《鸿宝》,咏歌少验。”褒贬参半,亦足以见其影响之不可忽视。

【韵海镜源】 音韵辞藻类书。唐颜真卿撰。其书已佚。宋人避讳,易名为《韵海鉴源》,或云五百卷,或云三百六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十六卷。较之《切韵》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据《说文》为篆字,次为今文隶字,并列别体为证,然后广引诸家字书,穷其训解,再以经、史、子、集四部中两字以上的词语,按句末一字编入本韵,是一部大型的音韵辞藻的类书。其书影响甚大,宋末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即依其体例,明《永乐大典》列篆书各体于字下,亦遵其体。

【声类】 韵书。①三国魏李登撰。《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并作十卷,为我国最早之韵书。其书今佚,有清马国翰、黄奭的辑本。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云:“至魏时李登,始取其声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声类》,如‘东’、‘中’、‘通’、‘同’为一类,‘支’、‘忌’、‘脂’、‘之’为一类,但取声之相类者而聚于一处,故曰《声类》,然而犹无四声也。”②清钱大昕所著,共四卷,分古音为二十二门。

【四声类谱】 韵书。南朝梁沈约撰。又称《四声谱》。《南史·沈约传》:“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人神之作。武帝(梁萧衍)雅不好焉,尝问周捨曰:‘何

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梁书·沈约传》所载略同。梁钟嵘《诗品序》讥之曰:“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魏甄琛亦讥之曰:“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并著《磔四声谱》以非之。其后唐皎然《诗式·明四声》云:“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李德裕《文章论》亦云:“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功,重轻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夫荆璧不能无瑕,随珠不能无颣,文旨既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沈休文所载八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上尾、鹤膝为最忌。休文之拘滞,正与古体相反,唯近律差有关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以上诸说,但见其病,不见其功,不无偏至之言。

【四声等子】 现存论述等韵的早期著作。一卷。作者不详。分字音为十六摄。等韵是按主元的洪细,前颚介音的有无,把韵母分等,所以叫做“等韵”。它是我国古代研究汉语的发音原理和方法以及音韵结构的专门学问。

【切韵】 音韵学专著。隋陆法言等撰。五卷。分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合计二百零六韵,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资料。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云:“至隋开皇间,有陆词(即陆法言)者,偶与同时刘臻等私相拟议,谓既名切韵,则必细加剖析,而音始亲切。于是又将《声类》中之‘支’‘脂’‘鱼’‘虞’‘先’‘仙’‘尤’‘侯’诸类,前此从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总其名曰《四声切韵类谱》,析为五卷,此则合周颙、李登之说而统为一书。”今其书不传,仅敦煌有唐写残本三种,互相补足,平上去三声大致齐全,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三。但其影响极大,除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重修的《广韵》,均以此书为依据外,唐宋试士虽有《唐韵》、《广韵》、《礼部韵略》等不同名称,实则仍以此书为祖本。

【唐韵】 音韵学著作。唐孙愐撰。原书早已失传,仅存唐写本残卷四十四页,去声一卷,残;入声一卷,全。此书系在隋陆法言所撰的《切韵》,经唐长孙纳言在仪凤二年订讹加注的基础上,孙愐于天宝十载重加订正,改名《唐韵》,而《切韵》便废;宋真宗景德四年,命陈彭年等校订增删,至大中祥符元年书成,改名《大宋重修广韵》,而《唐韵》又废。

【唐韵考】 音韵学专著。清纪容舒撰。五卷。反切一从《唐韵》,唐韵的分合,以及宋韵的并改情况,均可从此书中窥其梗概。故为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文献。

【**广韵**】音韵学著作。宋陈彭年等依据《切韵》增订而成,名为《大宋重修广韵》。五卷,计平声两卷,上、去、入各一卷。分二百零六韵,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下注反切、义训。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它对于《切韵》的增订,主要是增字加注,韵目的次序虽有所调整,但反切系统一仍其旧,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切韵》增订本。学者据此可以上推古音,下证今音,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资料。

【**集韵**】音韵学著作。宋丁度等撰。十卷,计平声四卷,上、去、入各二卷。韵部仍为二百零六,同用韵有所改并,韵目名称与次序亦有所更动,字数则比《广韵》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并注重字的形体与训诂,成书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为司马光所奏上。它与《广韵》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故两书并行,同为学者研究汉语语音的重要文献资料。

【**韵补**】音韵学著作。宋吴棫撰。棫字才老,建安人。宣和六年进士,绍兴中官太常丞,以得罪秦桧,出为泉州通判。其书共五卷,分古韵为九部,认为古人用韵较宽,立古韵通转之说,为后来研究古韵的先驱。此书就《广韵》二百六部,注“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古通某或转入某”,虽不无臆说,而筌路蓝缕之功,究不可没。清莫友芝《韵学源流》云:“其作专书以明之者,自宋吴棫始;后来乖戾无根之说,亦自棫开之,棫所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书,悉为古音而作。”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亦云:“讲古韵者,自吾闽之吴才老棫始,惟《韵补》一书,颇多谬误,连江陈季立第因之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则条例贯通,考证精密。”

【**音式**】音韵学著作。宋程迥撰。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为研究古韵拓开蹊径,其见较吴棫为确,惜其书今已不传。

【**古音丛目**】明杨慎撰。五卷。其书仿吴棫《韵补》之例,以今韵分部,而以古音相协者分隶之。与慎所著之《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虽各为卷帙,号称四种,然核其体例,实本一书。观其《猎要》“东”、“冬”二韵共标,与《丛目》“东”、“冬”所标全复,与《古诗余》“东”、“冬”所标亦复五字,参差互出,即其随手成编,未归划一的明证。故其条例不密。疏漏颇多;然取材丰富,亦有可采。

【**古音略例**】明杨慎撰。一卷。其书取《易》、《诗》、《书》、《礼记》、《左传》、《楚辞》、《老》、《庄》、《荀》、《管》诸书中有韵的词语,加以编排罗列,标为举略、辨误、变例、正误、协音诸目,于古韵颇多发明。

【**毛诗古音考**】明陈第撰。其书共四卷。列举《毛诗》四百四十四字,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

证、旁证二条。其书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本音,非随意改读,展转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偁’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楚辞》、秦碑、汉赋,以至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云:“讲古韵者,自吾闽之吴才老棫始,惟《韵补》一书,颇多谬误。连江陈季立第因之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则条例贯通,考证精密。顾亭林之《音学五书》,实从此出。”

【**屈宋古音义**】明陈第撰。三卷。取屈原《离骚》等二十五篇,去《天问》,又取宋玉《九辩》、《招魂》,益以《高唐》、《神女》、《风赋》、《好色》四篇,共三十八篇,择其中押韵字的音读与今音不同的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每字只列本证,旁证则间附字下,体例与《毛诗古音考》既互相发明,又有所不同。

【**音学五书**】清顾炎武撰。五书为:一、《音论》,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五篇,研究古音,并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为全书之纲领。二、《诗本音》十卷,即据陈第“《诗》无叶韵”之说,就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证,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三、《易音》三卷,就《周易》以求古音。四、《唐韵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音之讹。其凡例云:“凡韵中之字,今音与古音同者即不注;其不同者,乃韵谱相承之误,则注云‘古音某’,并引经传之文以证之。”五、《古音表》二卷,凡分十部,以东、冬、钟、江为第一,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为第二,鱼、虞、模、侯为第三,真、淳、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为第四,萧、宵、肴、豪、幽为第五,歌、戈、麻为第六,阳、唐、庚为第七,耕、清、青为第八,蒸、登为第九,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为第十,皆以平声为部首而三声随之。前人以为,于是古音之道,昭然若揭。

【**韵补正**】清顾炎武撰。正宋吴棫《韵补》之误,对吴书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通用之乖方,各为别白,而得失自见,既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门户之争,最为持平。

【**古今通韵**】清毛奇龄撰。共十二卷,创为“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以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相驳难。然该书不以古音求古音,而执今韵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随世变,而一概加以比合,故征引愈博,异同愈出;条例愈繁,矛盾愈甚,故其价值远不及顾氏之《五书》,但其引证之博,辨析之详,亦多有可采。

【**易韵**】清毛奇龄撰。此书亦针对顾炎武《音学五书》中之《易音》加以论难。顾氏认为古代繇辞大

都有韵,所以《易》也用韵,然其用韵或不用韵,或参用方言以为韵,较之《诗》之必须协韵者为宽。而毛氏则置其无韵之文不论,而论其有韵之文。引证之博,辨析之详,则毛氏为优,至于通其所可通,而缺其所不可通,则顾氏更为审慎。

【古韵通】清柴绍炳撰。其书于今韵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韵之通:一曰“全通”,“冬”、“东”、“江”之类;二曰“半通”,“元”入“寒”、“删”、“先”,“魂”、“痕”入“真”、“文”之类;三曰“旁通”,俗所谓叶韵。分平上去为十一部,分入声为七部,引据甚繁。考证亦甚辨,颇具参考价值。

【古韵标准】清江永撰。四卷。以《三百篇》为主,名曰“诗韵”;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名曰“补韵”。其韵分平上去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条例谨严,创见甚多,大抵于明取陈第,于清取顾炎武,而复补正其讹缺,对于吴棫、杨慎、毛奇龄之书,间有驳难,是研究古韵之最有条理者。

【古文四声韵】宋夏竦撰。五卷。其书“齐”部之后增“移”部,“仙”第二之后,继以“宣”第三,上声“弥”部后分出“选”部,入声“术”部后分出“聿”部,共二百一十部,与《广韵》二百零六韵异。且“覃”、“谈”二部在“阳”、“唐”之前,“蒸”、“登”二部居“添”、“咸”之际,其部序亦与《广韵》异。而与郭忠恕《汗简》分韵及颜元孙之《干禄字书》略同。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宋毛晃撰。五卷。晃因《礼部韵略》字狭,乃蒐采增附;又以《礼韵》凡别体字皆以墨阑圈其四围,亦往往舛漏,晃并为厘定,于音义字画之误,一一辨正,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订正四百八十五字。其子居正校勘,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零二字,各标总数于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注。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晃所加;曰“重增”者,皆居正所加。其辩论考证之语,则各署名以别之。其用力勤挚,考证明辨,亦有可采。

【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撰。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等韵书。全书以三十六字母统摄诸字,并科别清浊为二十图,首独韵,次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次,故“高”为独韵之首,“干”、“官”为开合韵之首,书后附有《检例》卷,名为切韵,实即等韵。是书反切之法,递用则名“音和”,旁求则名“类隔”;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缺则引邻以寓之,谓之“寄韵”。元邵光祖据光之图,别撰《检图例》一卷附于书后。今有《永乐大典》辑本。

【切韵指南】全名《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元刘鑑

著。一卷。是书以司马光之《切韵指掌图》为粉本,而参用《四声等子》,增以《格子门法》。切韵之学,大备于司马光和刘鑑之书。

【韵学源流】清莫友芝著。莫字子偲,号邵亭,贵州独山人,与郑珍齐名。是书系莫氏未定稿,不分卷,向无刊本,1918年康宝忠始据刘师培所得赵幼愚抄本付印。1929年罗常培以康氏印本多脱误,乃圈点分段,校勘重印。1962年,中华书局又据罗氏校本重印。是书分古韵、今韵和反切三部分,略论其源流本末,颇为简要。但其论古韵,则断自顾、江而不及戴震、段玉裁、孔广森和王念孙父子;论今韵则以《洪武正韵》与《韵府群玉》并诋,而不重视《中原音韵》以后之音变;论反切则但详《指掌图》、《切韵指南》和《四声等子》三书,而于前此之《韵镜》、《七音略》,后此之《韵法横直图》、《字母切韵要法》,亦略而弗陈,所以还不能视为完备的音韵学史。

【同文韵统】清胤禄等于乾隆十五年(1750)奉敕编撰。六卷。以藏文字母参考梵文字母,以满文十二字头之法,补所未备,贯合异同,各以汉字译音,说明字母反切的原理。

【音韵阐微】清李光地等奉敕编撰于康熙年间。十八卷。其书沿用《韵府群玉》的一百零六韵为目,附载《广韵》韵目备考。各韵所列的字,依三十六字母的次第及开、齐、撮、合四呼排列,以反切注音。上一字定声,用支、微、鱼、虞、歌、麻等韵的字,下一字定韵,清音用影母的字,浊音用喻母的字,故反切注音,较为准确,且容易掌握。

【音韵述微】清乾隆年间奉敕编撰。共三十卷。其反切注音,都以《音韵阐微》为依据,但《阐微》注重字音,训诂不求详备;《述微》注重字义,考据务求核实。在排列上,《阐微》以三十六字母的次第为序,《述微》则以领韵的字母为首,其下诸母所领之字,以次相从,使归于划一。《述微》收字增多,且增收后起义,故较为完备。

【音韵日月灯】即《正韵通》,明吕维祺撰。共七十卷,包括《韵母》五卷、《同文铎》三十卷、《韵钥》三十五卷。谓沈约知有四声而不知有七音,司马光知有七音而不知有四等,故撰此书,以救其失。惜吕氏未能深究今韵、古韵的源流,所论亦不免有误。

【诗声类】清孔广森著。凡十二卷。它根据《毛诗》用韵,分古韵为阳声九类,阴声九类,共十八类。“东”、“冬”分部,阴阳对转,是此书的创见。

【五方元音】清樊腾凤撰。凡二卷。樊系河北唐山山人,用北方话编写,用北方音分韵。调分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韵分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十二韵,并为梆、匏、木、风、斗、土、鸟、

雷、竹、虫、石、日、剪、鹊、丝、云、金、桥、火、蛙二十个字母,是一种全新的分韵法,在北方颇为流行。

【声调谱】清赵执信撰。以其有《前谱》、《后谱》、《续谱》之分,故又名《声调三谱》,有都为一卷者,有以前、后谱为一卷,续谱为一卷者,有分为三卷者。《续谱》后又附有《通转韵式》。据传赵氏曾向王士禛求教声调之学,王氏靳不肯言,赵乃于唐人诗集中反复推究,始知古调律调之分。盖古调乃自然的音调,故以语言的气势为主;律调乃人为的声律,故以文字的平仄为主。此书一出,遂成为中国诗律史上的一大发现。但所言规律,尚不精密,故只有开创之功,而非完善之作。

【声调谱拾遗】清翟翬撰。凡一卷。翬字仪仲,安徽泾县人。包世臣《艺舟双楫》有《翟秀才传》。此书对赵执信的《声调谱》既有补充与阐述,又有纠正与参照,是对赵谱进一步研究的成果。

【古诗平仄论】清王士禛所定。古诗而讲究声调,自赵执信《声调谱》始,然赵氏作谱之动机,实受王士禛的启发。明人论诗,讲究格调,已感觉到律诗重在吟,古体适于诵,因而古诗中多用律调,反使音节不响,便在唐、宋名家诗中,窥知其在有意无意间避免律调之秘,既解决了拗律之谜,又体会到古诗之格。王士禛亲闻前辈绪论,再加深入钻研,渐发其秘,遂成此书。翁方纲推其“在秋谷(赵执信)本之上”。

【赵秋谷所传声调谱】清翁方纲所著。凡一卷,以卷中多评赵谱之语,故名。盖方纲学诗于黄叔琳,而叔琳为王士禛门人,士禛又得之于吴伟业。而钱谦益之学传之于冯班,执信则服膺于冯氏,得其论著(见惠栋刻《声调谱序》)。则翁氏申王纠赵,是可以理解的。此书与赵谱不同之点有四:一、不录《声调谱》论例;二、删去赵谱论律诗之处;三、不录《续谱》;四、《后谱》不录原诗,只标诗题,亦仅标有赵之言论者,否则即诗题亦不录。

【五言诗平仄举隅】清翁方纲撰。凡一卷,此为翁氏在王、赵两谱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然亦只能说明古诗为自然之音节,并无一定的规律可守。其可取之处,在于它就阮籍、张协、左思、刘琨、陶潜、谢灵运诸家诗,论其平仄,以破王、赵二家“三平”之说。

【七言诗平仄举隅】清翁方纲著。凡一卷。此卷所举皆唐、宋人七言古诗,历论其似律之句与非律之句在古诗音节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何者方可用“三平正调作收”,处处仍在申王。

【七言诗三昧举隅】清翁方纲著。凡一卷,此卷仍在弘扬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之旨意,其意正在破

除一般人所理解之神韵或三昧,以见王氏诗论之无所不包。正如他在《陇头吟》后所说的:“平实叙事者,三昧也;空际振奇者,亦三昧也;浑涵汪洋千汇万状者,亦三昧也;此乃谓之万法归原也。若必专举寂寥冲淡者以为三昧,则何万法之有哉?渔洋之识力,无所不包;渔洋之心眼,抑别有在?”

【声律发蒙】清杨林兰著。全书分东钟、支思、齐微、车鱼、模糊、皆来、真文、山寒、桓观、先天、萧豪、戈何、家麻、车遮、阳唐、庚青、尤侯、侵心、廉纤、緘函二十韵,每一韵有对文两则,前一则用平韵,后一则的前半部用仄韵,对文从三言到十一言不等,如“青玉案,白牙床,红锦帐,碧纱窗。鱼梭燕剪,蝶板莺簧,雨昏鸦作阵,风静雁成行。榴花带雨红巾重,杨柳牵风翠缕长”。它的社会效应,清乾隆翰林院编修孙人龙在《序》中说得很清楚:“《发蒙》一书,切于幼学。吟诵之下,恍觉景物山川,皆成佳趣;庙堂经济,如在目前。学者童而习之,便不至白首茫然也。”清末赵藩在《序》中又说:“南海谭叔裕言见有元人板本,与今坊本相同。”可见此书元时已成书,杨林兰乃增订者。

【龙文鞭影】明萧良有著。原名《蒙养故事》。书中内容,采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故事及神话传说,按照韵部,编成对文,加以排列。清杨臣诤认为此书“有裨后学”,“逸而功倍”,加以订补,改名《龙文鞭影》。李绶恩复加增删,于光绪间刊行。“龙文”,是良马,鞭而疾驰,以喻青少年在此书的教育下,能够收到“逸而功倍”的效果。后来李晖吉与徐赞仿其体例,于清末编成《龙文鞭影二集》,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十五韵,坊间将其与萧、杨所著四卷合刊,遂成今日流行之本。其江韵部分对文为:“古帝凤阁,刺史鸡窗。亡秦胡亥,兴汉刘邦。戴生独步,许子无双。柳眠汉苑,枫落吴江。”每一句都有典,但便于记忆。

【声律启蒙】清邵阳车万育著。全书两卷。按三十个平声韵部编写对文,上、下卷各十五个韵部。每韵有对文三则,每则有联语十对,联语也从三言到十一言不等。对仗工整,语言雅致,一韵到底,便于记忆,流传以来,影响极为深广,深受读者喜爱,因而版本很多。近年来湖南岳麓书社加以整理重印。兹录其“东”韵对文一则,以见一斑:“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蛩。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满园春色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独钓之翁。”

【笠翁对韵】清李渔著。体例与《声律启蒙》略同,惟每韵的对文,从二则到四则不等,不若《声律启

蒙》之划一整齐,有人认为《声律启蒙》是仿其体例而有所完善的,特“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而已。如“卑对长,季对昆,永巷对长门。山亭对水阁,旅舍对军屯。扬子渡,谢公墩。……远水平沙,有客泛舟桃叶渡;斜风细雨,何人携榼杏花村”。

【佩文诗韵释要】清周兆基辑。全书共五卷,其中平声二卷,上、去、入各一卷,凡一百零六韵。周字廉堂,号莲塘,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乾隆进士,授编修,擢翰林院侍读学士,终礼部尚书。精于音韵,因见康熙间张玉书等奉敕所撰之《佩文韵府》,卷帙浩繁,不便携带,乃删繁就简,由博返约,深受士林欢迎,风行海内。同治三年(1864),首刻于皖江,光绪元年(1875)年,朱兰再刻于江左。但谬误相因,未尽厘正。光绪十二年陆润庠视学江左,复取各家刻本,细加校订,重行付梓,是为此书之善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前有陆润庠之序言,后附陈倬所作之《辨正》一卷。

【佩文韵府】清张玉书等奉敕所编。始编于康熙十三年(1674),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卷帙浩繁,正集及拾遗共二百十二卷,收字一万二百五十七,分韵二百零六。词语按最后一字分韵排列,并注明来源,但不作解释。此书以宋末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蓝本,加以增补而成,目的在为科举时代的考生作诗赋时采择典故、修饰词藻之用。即今仍不失为查考诗文典故及词语来源的重要文献资料。但引书谬误不少,应在引用时检核原文。

【韵府拾遗】此书为康熙御定。凡一百一十二卷,为补《佩文韵府》之遗而作。《佩文韵府》已收之字,则补其音切;未收之字,即加以增补;前注不详者,则加以补注;其增收的诗文断句及典故,则名之曰“补藻”。是一部检韵查典的重要文献。

【韵府群玉】宋末阴时夫撰。是一部分韵集录典故词藻的韵书。凡二十卷,收字八千八百二十,分韵一百零六。类书以韵隶事的,现存者以此为最早,明清科举时代的诗赋押韵,即以此为准。清《佩文韵府》亦以此为蓝本。

【五车韵瑞】五车表示多,瑞乃美好之意,言它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好韵书。明凌稚隆撰。凡一百六十卷,分经、史、子、集、杂五部,每部列出二、三、四字的习见语,注明出处,是以宋末阴时夫所撰《韵府群玉》为蓝本,后又成为清张玉书等所编之《佩文韵府》的蓝本。

【礼部韵略】韵书。最早为宋景德四年(1007)丘雍、戚纶所定,今已不存。景祐四年(1037)丁度重修,改名为《礼部韵略》,凡五卷。共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后附《贡举条式》一卷,说明它是科举程式之书。

绍兴三十二年(1162),毛晃表进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较丁度重修的《礼部韵略》增收二千六百五十五字,现存《礼部韵略》,即毛晃的增修本。

【平水韵】宋以前的韵书,据《切韵》分韵为二百零六部。为了便于叶韵,在二百零六韵中,注有独用,同用等字。至宋理宗淳祐年间,平水刘渊始并冬、钟、支、脂二百六部为一百七部,且将三钟、六脂数目尽行删去,而易以今日,被称为“平水韵”。因其书专为试士而设,当时又名《试韵》。此书今已不存。元初黄公绍的《韵会举要》,即据此分韵。金人王文郁的《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又并上声迥、拯为一百零六部,自元、明以来,皆遵用之。参阅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跋平水新刊韵略》、梁章钜《退庵随笔》。

【五音集韵】韵书。金韩道昭撰。以三十六字母分为四等排列。诸字次第大抵以《广韵》为蓝本;增入的字,则以《集韵》为依据。凡十五卷。改《广韵》二百零六韵为一百六十韵。于不可通者,则仍《唐韵》。系韵精审,足以订正重刊《广韵》之失。

【诗韵全璧】《佩文诗韵释要》义简意略,初学者病其不能收到修辞发藻的效果,于是有人逐步加以增益,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有《诗韵含英》、《诗韵珠玑》、《诗韵集成》、《诗韵萃珍》之类。清季旌德、汤祥瑟荟萃各家韵注,详加勘定,并在眉上益以《词林典故》等,题为《诗韵合璧》。在《合璧》的基础上,加以增广,是为《诗韵全璧》。它增益有关诗料至十馀种之多,风行海内,被士林推为首善之本。自辛亥革命以还,上海各书肆缩印传布者,无虑数十家,其中以鸿宝斋《增广诗韵全璧》字体最为清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删其眉头增益的诗料,而保留其后附的《检韵》,予以影印,题为《诗韵》。

【押韵释疑】宋欧阳德隆撰,郭守正增修。郭自号紫云山民,故亦名“紫云韵”。共五卷。德隆以《礼部韵略》有字同义异、义同字异者,与其友易有开,因监本各为互注,以便程式之用。后来书肆屡刊,多所窜乱,守正因取德隆书,参以诸本,为删削增益各十馀条,以成此书。序例后载绍兴新制,次韵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无音释之疑,次《韵略》音释与经、史、子音释异同之疑,次《韵略》字义与经、史、子字义异同之疑,次经、史、子训释音义异同之疑,次本韵字异义异经、史、子合而一之疑,次两韵字同义异而无通用明文者,次出处连文两音之疑,次押经前史后之疑,次经、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俗相传之误等,考证颇为详密。

【韵会举要】元熊忠撰。三十卷。自金韩道昭以七音四等三十六字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

变;南宋刘渊刊《礼部韵略》合并通用之部分,而韵书又一变。此书字纽遵韩氏法,部分从刘氏例,兼二家所变而用之,而韵书旧第至此尽变无遗。

【中原音韵】元周德清著。是书共分为两部分,前者为韵谱,共分十九部,每韵有阴、阳、上、去四声,而以入声悉派三声。虞集在《中原音韵序》中称其“属律必严,比字必切,审律必当,择字必精,是以和于宫商,合于节奏,而无宿昔声律之弊矣”。周氏对实际生活中的语言进行研究,开拓了今音韵学一派,尤其是他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张,对于近代“官话”的推广,具有较大的影响。后者为作词起例,包括字音的辨别,用字的方法,宫调和曲牌的运用。虽为曲韵,在韵学的发展上,实有卓越的贡献。

【洪武正韵】明乐韶凤、宋濂奉敕于洪武时编撰。凡十六卷。此书的文字义训,以宋毛晃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为蓝本,分韵归字,则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依据,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于是历来相传的二百零六韵,并而为七十有六。

【词林正韵】清戈载撰。“发凡”一卷,“正韵”三卷。戈字孟博,号顺卿,江苏吴县人。能辨阴阳,分宫调,姜夔集所列旁谱,亦能一一按诸管弦。此书一出,即为世所重,为清中叶以后的词家奉为圭臬。其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今有名之词,参酌而定,去取审慎,精诣特出,一扫前人陋习,是一部超越前人的词韵。它最早刊于道光元年(1821),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诗法

【诗法】诗歌创作的审题、立意、布局、造语、遣词、协律、押韵等方法。对诗法的理解,前人看法也有不一致之处。如清叶燮《原诗·内篇上》云:“然法有死法,有活法。……死法则执涂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执矣,又焉得泥于法?而所谓诗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曾读《千家诗》者,亦不屑言之。”田同之《西圃诗说》云:“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

【相题】审察诗题的内涵外延及其精神实质之所在。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三:“诗必相题,猥琐、尖新、淫褻等题,可无作也;诗必相韵,故拈险俗、生涩之韵及限韵、步韵,可无作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作诗先贵相题,题有大小难易,内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务相题之所宜,以为构思、命意之标准。标准既立,仔细斟酌于措词、着色、使典、布局之

间,以期分寸适合,境界宛肖,自然切当不移。”

【择题】选择作诗的题目。不可遇题便作,逢题便和。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是故作诗必择题,制题必择人。人不佳则累其题,题不佳则累其诗,下笔不可不慎也。”

【着题】围绕题目去作,不偏离一分。宋朱熹《朱子语类》:“古人做诗不十分着题,却好;今人做诗愈着题,愈不好。”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清贺贻孙《诗笺》:“作诗必句句着题,失之远矣。了瞻(苏轼)所谓‘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如咏梅花诗,林逋诸人,句句从香色模拟,犹恐未切,庾子山但云‘枝高出手寒’,杜子美但云‘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而已,全不粘住梅花,然非梅花莫敢当也。”

【切题】切中题旨。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夫诗贵相题,尤贵切题,人人知之。作山水诗,何独不然?相山水雄险,则诗亦出以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峭,则诗亦与为幽峭;山水清远,则诗亦肖其清远。……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

【布局】把一篇作品的分层、分段、正面、反面、开端、结尾,加以精心的安排和布置。宋范温《潜溪诗眼》:“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如杜子美《赠韦见素》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诗矣。……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

【命意】意为诗歌之灵魂,故在落笔之前,先须立意。宋范温《潜溪诗眼》:“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乃怀大臣’,此句中命意也。”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

【炼局】安顿、经营作品的章法,与布置、布格、布局同意。清陈仅《竹林答问》:“问:渔洋(王士禛)谓炼意,或谓安顿章法,惨谈经营处耳。此语渔洋亦自觉不安,究何如为炼意?(答)渔洋之言,乃炼局之法。炼意则同是一意,或高出一层,或翻进一层,或加以含蓄,或出以委婉,有与人不同处。”厉志心《白华山人诗说》卷一:“古人诗多炼,今人诗每不解炼。炼之为诀,炼字、炼句、炼局、炼意,尽之矣。而最上

者,莫善于炼气,气炼则四者皆得。”

【择韵】选择好的韵脚。韵脚过于艰涩奇僻,往往影响诗的表情达意。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诗宜择韵,若‘秋’、‘舟’平易之类,作家自然出奇;若‘眸’、‘瓠’粗俗之类,讽诵而无音响;若‘饿’、‘搜’艰险之类,意在使人难押。”清吴騄《拜经楼诗话》卷二:“何无忌与人论诗云:欲作佳诗,必先寻佳韵。未有佳诗而无佳韵者也。韵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宜于乙而不宜于甲者。题韵适宜,若合函盖,惟在构思之初,善巧拣择而已。”

【着色】也叫“设色”,语出《周礼·考工记》:“设色之工,画、绩、钟、筐、幌。”说明它原是在画面上、丝织品上及各种器皿上着上合乎审美要求的颜色。清毛先舒《诗辩坻》卷四:“诗本无定法,亦不可以讲法。学者但取盛唐以上、《三百》以下之作,随拈当吾意者,以题参诗,以诗按题,观其起结,审其顿折,下字琢句,调声设色,曲加寻摧,极尽吟讽,自应有得力处。”张谦宜《现斋诗谈》卷六言徐渭之“《杨妃春睡图》,如此熟题,看他设色遣调,苍沉老辣,故是作家开生面处”。说明“设色”是指诗人所描绘的画面,给人以冷暖、明暗的审美享受。

【造语】创造和琢磨词语。宋蔡启《蔡宽夫诗话》:“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工矣,终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刘越石‘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谢惠连‘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等语,若非前后相映带,殆不可读,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馀风犹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净尽矣。”也作“造句”、“琢句”。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问曰:‘造句炼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诗之末务,炼字更小,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康乐(谢灵运)诗矜贵之极,遂有琢句。’”

【命题】出题目作诗。清庞垞《诗义固说》上:“诗有题,所以标明本意,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古人立一题于此,因意标题,以词达意,后人读之,虽世代悬隔,以意逆志,皆可知其所感,诗依题行故也。”此言命题的意义。

【炼句】对诗句的冶炼、锤炼、烹炼,使之完美无缺,神情毕见。清薛雪《一瓢诗话》:“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得篇中之意工到,则气韵清高深渺,格律雅健雄豪,无所不有,能事尽矣。”庞垞《诗义固说下》:“练句要归自然,或五言,或七言,必令极圆极稳,读者上口,自觉矫矫有气。若一字不圆,便松散无力。”参阅“琢句”。

【琢句】雕琢语句。清张谦宜《现斋诗谈》卷三:“所谓琢句,非是故意蹉蹊以为新颖,安于庸腐以为

名理,溺于浮艳以为风流,惑于仙佛以为高旷,假借老病以为感慨,忿口骂世以为悲壮,故意颓放枯瘠以为老气。必须文从理顺之中,有洗旧翻新之巧。意不尽于句中,景已溢于兴外。刻苦却不扭捏,平易却不肤浅。初仍作意,久浚自然。务使五七字内,线穿铁铸,一字摇撼不动,增减不得为度。”参见“炼句”。

【句法】炼句的方法。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范温《潜溪诗眼》:“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

【句眼】古体诗中,句内的某一主要的字,称为“句眼”,也叫“诗眼”。宋何谿汶《漫斋语录》:“五字诗以第三字为句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句眼,古人炼字,只于句眼上炼。”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诗句中有眼,须炼一实字,句便雅健。如……‘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白居易)。又须用一响字,如……‘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又有故用一拗字者,如‘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于良史)……此皆第三字致力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王少伯(昌龄)‘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缓’字与‘随意’相应,是句眼,甚佳。”说明七言诗的句眼,并不一定在第五字。参阅“诗眼”。

【诗眼】诗句中最精彩最关键的某一个字叫“诗眼”,也叫“句眼”。清贺贻孙《诗筏》:“诗有眼,犹弈有眼也。诗思玲珑,则诗眼活;弈手玲珑,则弈眼活。所谓眼者,指诗弈玲珑处言之也。学诗者但当于古人玲珑中得眼,不必于古人眼中寻玲珑。”施补华《岷傭说诗》:“五律须讲炼字法,荆公所谓‘诗眼’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此炼实字。‘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蚁浮仍蜡味,鸥泛已春声’,‘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此炼虚字。炼实字有力易,炼虚字有力难。”参见“句眼”。

【活句】富有生命力的诗句。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须参活句,勿参死句。”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诗贵活句,贱死句。石曼卿《咏红梅》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于题甚切,而无丰致、无寄托,死句也。……子瞻识此病,故曰:‘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其题画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措词虽未似唐人,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乃活句也。”

【死句】无丰致、无寄托、无韵味的诗句。宋曾幾《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陆游《赠应秀才》诗:“我得茶山(曾幾)一转语,文章

切忌参死句。”严羽《沧浪诗话》“须参活句，勿参死句”，即据上述诗句立言。

【下字】 经过锤炼、推敲而选用的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予与乡人翁行可同舟沂汴，因谈及诗，行可云：‘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墟野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下得挟字最好，如《孟子》挟长挟贵之挟。’予谓介甫又有‘紫萸凌风怯，苍苔挟雨骄’，陈无已有‘寒气挟霜侵败絮，宾鸿将子渡微明’，其用‘挟’字，正与王介甫前一联同。”吕本中《童蒙诗训》：“老杜歌行与长韵律诗，后人莫及；而苏、黄用韵、下字、用故事处，亦古所未到。”

【炼字】 诗句中的关键字，须经过仔细的锤炼、冶炼、烹炼。清陈仅《竹林答问》：“平字得奇，俗字得雅，朴字得工，熟字得生，常字得险，哑字得响，此炼字之新也。”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何谓炼字？曰：如王子安之‘兰气薰山酌，松声韵野弦’，岑嘉州之‘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之类是也。”

【字法】 炼字的方法。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作诗虽不必拘拘字句，然往往以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正而害其篇。”此言字法的重要性。《文心雕龙·炼字》：“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清薛雪《一瓢诗话》：“格律声调，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讲，而诗却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汉、魏古诗，后章与前章略换几句几字，又是一种咏叹丰神，令人吟绎不厌。后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无诗耳。”此言炼字的方法。

【字眼】 一句中最精彩、最响亮、最关键的字。元杨载《诗法家数》：“诗句中有字眼，两眼者妙，三眼者非，且二联用连绵字，不可一般。中腰虚活字，亦须回避。”又：“五言字眼多在第三，或第二字，或第四字，或第五字。”又：“诗要炼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诗‘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檐虚’，炼中间一字。‘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炼末后一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炼第二字。非炼‘归’、‘入’字，则是儿童诗。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无因觉往来’，非炼‘赴’、‘觉’字，便是俗诗。如刘沧诗云：‘香消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是炼‘消’、‘入’字。‘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是炼‘空’、‘浩’二字，最是妙处。”

【哑字】 不响的字，对响字而言。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押韵不宜多用哑韵，如四支、十四盐两韵中多哑字，须择而用之。”

【响字】 响亮的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下字贵响，造语贵圆。”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都是说下字贵响。吕本中《童蒙诗

训》引潘邠老的话说得更为具体：“七言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是也。”

【活字】 诗句中最有活力的字。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作诗须用活字，使天地人物，一入笔下，俱活泼泼如蠕动，方妙。杜诗‘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肯’字是也。即元方回《瀛奎律髓》之所谓‘眼’也。”是活字即字眼。

【用事】 运用典实。梁钟嵘《诗品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此不主张在诗歌中用事者。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学有馀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馀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此主张少用事者。清乔亿《剑溪说诗》下：“《诗品》曰：‘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愚谓情性有难以直抒者，非假事陈词则不可，顾所用何如耳。”清《方南堂先生辍锻录》：“作诗不能不用故实，眼前情事，有必须古事衬托而始出者。然用事之法最难，或侧见，或反引，或暗用，吸精取液，于本事恰合，令读者一目了然。”此主张用事者。宋佚名《漫叟诗话》云：“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却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坐灌将军。’《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天然奇作。”此言诗人之善用事者。

【使事】 使用典故，也即“用事”。宋蔡启《蔡宽夫诗话》：“荆公（王安石）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感，岂肯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题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参阅“用事”。

【用典】 使用典故，即“用事”、“使事”。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运古语若己出，毫无费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缚矣。正用不如反用，明用不如暗用。或借宾以定主，或托虚以衬实。死事则用之使活，熟事则用之使生，渲染则波澜迭翻，熔铸则炉锤在握。驱之以笔力，驭之以才情，行之以气韵，俾自在流出，如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而一归于天然，斯大方家手笔矣。”参见“用事”、“使事”。

【属对】 诗文中两句缀成对偶。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

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属对》:“佳句每难佳对,义山之才,犹抱此恨。如《秋日晚思》‘枕寒庄蝶去’,虽用庄周梦蝶事,实是寒不成寐耳;对曰‘窗冷胤萤消’,此却是真萤,未免借对,不如上句远矣。”

【藏拙】言人之才能,各有所偏,应该扬长避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子云(扬雄)服膺长卿(司马相如),尝曰:‘长卿赋不是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谤言欺人云:‘雕虫之技,壮夫不为。’遂开千古藏拙端,为宋人门户。”清袁枚《续诗品·藏拙》云:“善藏其拙,巧乃益露。”薛雪《一瓢诗话》:“今人作平淡诗,乃才短思涩,格卑调哑,无以见长,借之藏拙。如三家村里儿郎,见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与深沉寡默者,截然两途。”

【章法】组织章节的法则。清何世瑾《燃灯记闻》:“为诗须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数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总是起结血脉要通,否则痿痹不仁,且近攒凑也。”沈德潜《说诗碎语》下:“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题数首,又合数首为章法。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若缺一不可,增一不得,乃见体裁。……后人一题至十数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辞采,彼此互犯,虽构多篇,索其指归,一章可尽,不如割爱之为愈已。”

【篇法】组织全篇的法则。元范梈《木天禁语·篇法》云:“有以字论者,有以意论者,有以故事论者,有以血脉论者。”又分述“七言律诗篇法”、“五言长古篇法”、“七言长古篇法”、“五言短古篇法”、“七言短古篇法”、“乐府篇法”、“绝句篇法”,不外起结、分段、血脉、照应诸端。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首尾开合,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采,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

【炼意】提炼主题思想,包括意旨、意象、意境等。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作诗高手在炼意,炼格、炼词次之。词、格之炼,人恒知之,至炼意则未必知也。”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以十字道一字者,拙也,约之以五字则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见数字于五字则工矣。如韦应物‘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权德舆则以‘十年曾一别’五字尽之。如高适‘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马戴则云‘楚雨沾猿暮,湘云拂雁秋’,‘猿’、‘雁’之外更道数事,此所谓炼字、炼句,尤不如炼意也。”

【炼骨】炼就诗的风骨。清贺贻孙《诗筏》:“诗家固不能废炼,但以炼骨、炼气为上,炼句次之,炼字斯

下矣。”

【炼气】提炼诗歌的气势,使之气盛而言宜。清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一:“炼之为诀,炼字、炼句、炼局、炼意,尽之矣。而最上者莫善于炼气,气炼则四者皆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炼字必使字健而能举,炼句必使句健而能举,炼气又使气健而能举,炼笔又使笔健而能举。积字成句,积句成章,而气与笔,则先积之于无字句之中,继积之于有字句之外,以成通章。格调意味,音节法度,风神之用者也。”

【炼格】锤炼诗歌的格调,使之更向上一层。清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何谓炼格?如古之‘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及右丞之‘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徐如《秋兴八首》、《诸将》五篇之作,皆格之最整炼者也。”清刘熙载《诗概》:“论诗者,或谓炼格不如炼意,或谓炼意不如炼格。惟《姜白石诗说》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炼韵】从韵脚上下工夫,使之自然妥帖,圆润响亮。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陈君节,字明信,言炼句不如炼韵。余以为若只觅好韵,则失于首尾不贯穿。”清陈仅《竹林答问》:“问:陈君节言‘炼句不如炼韵’,韵何以炼?(答)唐人‘天清木叶闻’,‘雨馀看柳重’等句,炼在韵上一字,当即所谓炼韵也。选韵易,炼韵难,王直方‘只觅好韵’之语,乃是选韵,非炼韵也。”

【炼神】在丰神、神韵上着意加以锤炼,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清刘熙载《诗概》:“昌黎炼质,少陵炼神。昌黎无疏略处,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妙悟】善于领悟,超乎寻常的悟性。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清徐增《而庵诗话》:“夫作诗必须师承;若无师承,必须妙悟。虽然,即有师承,亦须妙悟;盖妙悟、师承,不可偏举者也。是故由师承得者,堂构宛然;由妙悟得者,性灵独至。”

【天籁】本为自然的音响,后以指诗歌之有自然情趣者。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上:“绝句,唐乐府也。篇止四语,而倚声为歌,能使听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犹能赏之,非以扬音抗节有出于天籁者乎?”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读崔颢《长干曲》,宛如舛

舟江上,听儿女子问答,此之谓天籁。”

【白战】 本指徒手作战,借以喻禁止使用某些常用字眼的诗歌。宋佚名《漫叟诗话》:“欧阳文忠(修)守颖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事。欧公一篇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自后四十余年,莫有继者。元祐六年,东坡在颖,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遂复举前篇令,末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欧阳修)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记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跳脱】 比喻诗文描写极为生动活泼。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义山‘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飞卿‘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对句用逆挽法,诗中得此一联,便化板滞为跳脱。”

【警策】 一篇中最精彩最动人的句子。晋陆机《文赋》:“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宋吕本中《童蒙诗训》:“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活法】 指作诗无一定之法规,不拘泥于某一诗法。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吕紫微》:“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然诗家贵参活法,忌泥死法,千变万化,不可执一律拘。是又在人能神而明之,有定实无定也。”

【避俗】 避免用庸俗的字语和韵脚。宋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榘》云:“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避熟】 避用熟语熟事。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学诗者每作一题,必先立意。不能命意者,沾沾于字句,方以避熟趋生为工。若知命意,迥不犹人,则神骨自超,风度自异。仅在字句求新者,犹村汉着新衣,徒增丑态而已。”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

【倒插法】 一是篇中的倒插法,即先不说明何人,只描述那人的形象,后来才点明他是谁。清沈德潜

《说诗晬语》上:“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二是句中的倒插,即把词的顺序颠倒,更显遒劲。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句法有倒插,有折腰,有交互,有掉字,有倒叙,有混装对,非老杜不能也。倒插句法,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顺讲则‘夜月虚织女机丝,秋风动石鲸鳞甲’,与‘昼省香炉违伏枕,山栖粉堞隐悲笳’皆是。”

【反接法】 指不由正面,而是从反面承接上文之意。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至接笔,则或挺接、反接、遥接,无平接者,故愈显嵒峻。”

【转接法】 掉转笔锋去承接上文的意脉。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又:“少陵《新婚别》云:‘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近于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层层转换,勉以努力戎行,发乎情止乎礼义也。”

【突接法】 言在抒情写景时,突然接着叙事,或突然接发议论,好像与上文毫无关系,实则呼吸相生,血脉贯通,以神接而不以词接,以气转而不以句转。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

【倒装法】 言章、句、字不是顺序,而是倒装。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形家论龙穴沙水,喜逆而恶顺,惟诗亦然。逆则力厚,顺则势走,此章、句、字三者倒叙、倒装、倒押之法所宜讲也。”清施补华《岷傭说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倒装法也。”说明倒装法,可以分别运用于章、句、字之间。如杜甫《秋兴》云:“红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便是倒装句。韩愈《春雪》的“入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亦为效杜之倒装句法。

【逆挽法】 言不用平笔顺叙,而是用逆笔倒挽。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所谓逆挽者,倒扑本题,先入正位,叙现在事,写当下景,而后转溯从前,追述已往,以反衬相形,因不用平笔顺拖,而用逆笔倒挽,故名。”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义山‘此日六军同

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飞卿‘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对句用逆挽法,诗中得此一联,便化板滞为跳脱。”

【呼应法】 指诗歌在结构上前后意脉的互相呼应。清毛先舒《诗辩坻》卷四:“古风长篇,先须构局,起伏开合,线索勿紊。借如正意在前,掉尾处须击应;若正意在后,起手处先须伏脉。未有初不伏脉而后突出一意者,亦未有始拈此意而后来索然不相呼应者。若正意在中间,亦要首尾击应。实叙本意处,不必言其余,拓开作波澜处,却要时时点着本意,离即之间方佳。”绝句篇幅虽小,亦须前后呼应。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绝句字句虽少,含蕴倍深。其体或对起,或对收,或两对,或两不对,格句既殊,法度亦变。对起者,其意必尽后二句。对收者,其意必作流水呼应,不然则是不完之律。……亦有以两句为主者,又有两相呼应者,或分应,或各应,或错综应。”

【翻案法】 推翻前人的论断,别立新说。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用事》:“此前辈所谓翻案法,盖反其意而用之也。”清贺裳《载酒园诗话·翻案》云:“晚唐人多好翻案,如温飞卿则有‘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真有紫芝翁’,徐寅则有‘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又云:“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如‘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其后篇尤甚,故遭人弹射不已。……又郭代公曰:‘自嫁单于国,长衔汉掖悲。容颜日憔悴,有甚画图时。’乐天则曰:‘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似此翻案却佳,盖尤为切情合事也。”

【代字法】 诗歌中常用别的字词去代替所要写的景物,如用“桂华”代“月”、“红雨”代“桃”之类。也作“代字诀”。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乐府是代字诀,故须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怀抱,又未免为无病而呻吟。”

【点染法】 本为中国画中点苔和渲染两种手法,诗话中借来指有些地方点明,点明后再用景物来渲染烘托,使诗歌更有韵致。清顾嗣立《寒厅诗话》:“诗家点染法,有以物色衬地名者,如郑都官‘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是也。有以地名衬物色者,如韦端己‘落星楼上吹残角,偃月营中挂夕晖’是也。”上言诗人以“雨昏”、“花落”等景物来衬托“青草湖”、“黄陵庙”等地名;或以“落星楼”、“偃月营”等地名来烘托“吹残角”、“挂夕晖”等景物。他如韦应物的《闻雁》:“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上两句点明归思,下两句用秋雨、雁声

来烘托。岑参《碛中作》:“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前句点明投宿无处,后句用平沙万里来渲染,而意境全出。

【烘托法】 渲染、衬托,以收“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艺术效果。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用烟霞来写山的精神,用草树来写春的精神,就是用的烘托手法。

【遮表法】 律诗对句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律体中对句用开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为最多。或前遮后表,或前表后遮。表谓如此,遮谓不如彼,二字本出禅家。昔人诗中有用‘是’‘非’‘有’‘无’等字作对者,‘是’‘有’即表,‘非’‘无’即遮。惟有其法而无其名,故为拈出。”

【折句法】 即七言句的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例,或七言句的第四字绾合上三下三两个词语,叫做“折句法”或“折腰句法”。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三:“项斯诗亦甚可喜。‘上高楼阁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剑行’,宋人遵之,号折句法,辗转相效,恶声盈耳。”“上高楼阁”、“看白衣裳”皆上四例。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折腰句法,如‘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集’字‘随’字,句中之腰也。”也叫“折腰句”。元韦居安《梅硎诗话》上:“七言律诗有上三下四格,谓之折腰句。白乐天守吴门日,答客问杭州诗云:‘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到溪桥。’……皆此格也。”

【相因法】 因景生情,因事生感,因拙生巧,因小见大,叫做相因法。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作诗有相因之法,出于偶然。因所见而得句,转其思而为文。先作而后命题,乃笔下之权衡也。”

【收束法】 言诗歌中的长篇,须逐段小收,然后大结。清薛雪《一瓢诗话》:“惟长诗则温(庭筠)不逮李(商隐),李有收束法,凡长篇必作一小束,然后再收,如山川跌换之势;温则一束便住,难免有急龙急脉之嫌。”

【错叙法】 言写景、抒情、叙事交错使用,互相辉映。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有一意直叙者,有前二句开说、后二句绾合者,有以倒叙为章法者,有以错叙为章法者。”

【提顿法】 言无论长篇短制,都要提得起,顿得住,才有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妙。清施补华《岷傭说诗》:“长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顿以见起,用结束以见止;提顿结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轻;段落有长有短,参差错落,以救方板。”

【掉字法】言一联的上下句,掉(调)换一个字,更加光彩夺目,精神倍增。清冒春荣《葦原诗说》:“掉字句法,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及李商隐‘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之类。”上述例句的“桃花”与“杨花”、“黄鸟”与“白鸟”,“醉客”与“醒客”、“晴云”与“雨云”,皆只换一字,而倍觉工整,饶有韵致。也叫“叠字法”,即在句内叠用一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杜荀鹤、郑谷诗,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叠,然荀鹤多用于前后散句,而郑谷用于中间对联。荀鹤诗云:‘文星渐见射台星’,‘非谒朱门谒孔门’,‘常仰门风维国风’,‘忽地晴天作雨天’,‘犹把中才谒上才’,皆用于散联。郑谷‘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谁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皆用于对联也。”上述各句,或叠用“星”、“门”、“风”、“天”、“才”各字,或叠用“落”、“然”、“客”、“丞”、“阁”、“郎”、“性”、“门”诸字。

【关锁法】句中炼一二字绾合语意,使之字字有着落,语语有韵味。清施补华《岷傭说诗》:“‘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一句中炼两字关锁法。‘石出倒听枫叶下,檐摇背指菊花开’,一句中炼一字关锁法。”

【透过一层法】深入一层,加以说理、抒情,更有深意,更有佳致。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上:“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也有全篇用透过一层法写的,如贾岛的《渡桑乾》。明王世懋《艺圃撷馀》:“余谓此岛自思乡作,何曾与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远隔故乡,今非惟不能归,反北渡桑乾,还望并州,又是故乡矣。并州且不得住,何况得归咸阳,此岛意耳。”

【加一倍写法】诗文中一种起强调作用的表现手法。清施补华《岷傭说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是律句中加一倍写法。”又:“小杜‘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是加一倍写法。陵树秋风,已觉凄惨,况无树耶?用意用笔甚曲。”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上:“《悲歌行》,客子怀故乡之作也,妙在起句‘悲歌可以当泣’,人至伤心极处,不能泣而思以歌当之,较泣愈痛矣。此为加一倍法。”

【夺胎换骨法】点化古人的诗句,而赋予新的意境。元韦居安《梅磴诗话》上:“夺胎换骨之法,诗家有之,须善融化,则不见蹈袭之迹。陆鲁望诗云:‘溪山自是清凉国,松竹合封潇洒侯。’戴式之《赠叶竹

山》诗云:‘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合封潇洒侯。’王性之诗云:‘云气与山为态度,月华借水作精神’,式之《舟中》诗云:‘云为山态度,水借月精神’。如此下语,则成蹈袭。”也有简称为“换骨法”的。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二:“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荆公点化之,则云‘缲成白发三千丈’。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点铁成金法】将别人的作品,经过点化,使之成为更好的作品,叫做点铁成金法。清薛雪《一瓢诗话》:“白香山‘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有喜其工,有诋其俗。东坡小词:‘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谓其用香山语,点铁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东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态度。”

【借叶衬花法】喻在诗歌中借他人他事以衬托本人本事,使情景更加突出。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下:“诗有借叶衬花之法。如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自应说闺中之忆长安,却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借叶衬花也。”

【铢两轻重法】言律诗上下两联的对偶,要分量相称,不宜倚轻倚重。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凡对属运用,或史对经,或子对史,不得大段悬绝。此亦铢两轻重法,举隅可以类推。”

【下句抱上句法】言上下句回环互抱,以便更好地抒情达意。杜甫《朝二首》之一:“清旭楚宫南,霜空万岭含。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俊鹘无声过,饥乌下食贪。病身终不动,摇落任江潭。”《杜诗详注》卷二〇:“起联本以下句抱上句。黄生云:‘若用直叙,只是万岭楚宫南,霜空清旭含。’三联,乌鹘并列。黄生云:‘饥乌贪而下食,不知俊鹘之在其上。此伤怀禄而被谗者,故暂借江潭以息机耳。’”

【后二句续前二句法】即诗的后二句接续前二句的意思,不是承上,而是续上、解上。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老杜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如《喜弟观到》诗云:‘待尔嗔乌鹄,抛书示鹄鹄。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晴》诗云:‘啼乌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江阁卧病》云:‘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罍。’《寄张山人》诗云:‘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如此类甚多。此格起于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云:‘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李太白诗亦时有此格,如‘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片言误公子,投杼

感慈亲’是也。”又《杜诗详注》卷一八《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之二“待尔嗔乌鹊”四句注云：“黄生曰：前半喜其至，而又恐其不即至，皆引领延伫时无可奈何之语。嗔乌鹊之不灵，已妙矣，抛书示鹤鸽，尤觉怪得奇异。三、四是解上，不是承上，上意已明，是承上意未完，则须解也。”

【明暗呼应法】诗文中的前呼后应，有明有暗，有隐有显，有远有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元范梈《木天禁语》：“上应下呼：素练抹林云气薄，明珠穿草露华新。上呼下应：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藏头歇后法】诗人用成语入诗，往往用藏头与歇后的手法。如张载诗“泪下沾衣襟”，周弘正则云“行住两沾衣”。曹植诗“歔歔涕沾巾”，杜甫则云“为尔一沾巾”。此藏前头之“泪”字“涕”字，叫做藏头。至于“歇后”，则所见更多。如宋洪刍《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为貽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貽厥无基址’，虽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吴筠曰‘才胜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骆宾王曰‘冰泮有衔芦’，卢照邻曰‘幽谷有绵蛮’，陈子昂曰‘衔杯且对刘’，高适曰‘归来洛阳无负郭’，李颀曰‘由来轻七尺’，唐彦谦曰‘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此皆歇后，何郑五之多耶？”

【增字法】诗人往往在古人的语句上，增加两字，而韵味倍增，境界全出。如庾信“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骆宾王增两字为“隐隐地中鸣鼓角，迢迢天上出将军”。李嘉祐“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增两字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薛据“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舟”，杜甫增两字为“独当省府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舟”。都是增加两字，而句语更精警，风韵更飘逸。

【倒押法】古人押韵，间有颠倒词语，甚至颠倒人名以就韵的。但不宜轻易，须十分谨慎。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古人诗押字，或有语颠倒而于理无害者，如韩退之以‘参差’为‘差参’，以‘玲珑’为‘珑玲’是也。比观王逢原有《孔融》诗云：‘虚云座上客常满，许下惟闻笑习脂’，黄鲁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宫》六言诗云：‘啜羹不如放麋，乐羊终愧巴西’。按《后汉书》有‘脂习’而无‘习脂’，有‘秦西巴’而无‘巴西’，岂二公之误耶？”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惟诗亦然，逆则力厚，顺则势走，此章、句、字三者倒叙、倒装、倒押之法所宜讲也。”

【偷法】亦名“盗法”，有偷意、偷势、偷境之别。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

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杜牧之‘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韦端己‘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三诗虽各咏一事，意调实则相同。”“又如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令狐楚则曰：‘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张仲素更曰：‘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或反语以见奇，或循蹊而别悟，若尽如此，何病于偷。”又云：“凡盗法者，妙于以相似之句，用之相反之处。如陈尧佐‘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写酣适之景如见。至杨万毕《梧桐夜雨》诗‘千里暮云山已黑，一灯孤馆酒初醒’，又觉凄飒满目。如此相同，不惟无害，且喜其三隅之反矣。”又云：“诗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张郎中》曰：‘寒江近户漫流声，竹影当窗乱月明。归梦不知湖水阔，夜来还到洛阳城。’与武元衡‘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顾况‘故园此去千余里，春梦犹能夜夜归’同意，而戎语为胜，以‘不知湖水阔’五字，有搔头弄姿之态也。然皆本于岑参‘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羁人又动故乡情。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则又竿头进步，妙于夺胎。”

【点化】化用古人诗句，加工使之具有新意，亦即“夺胎换骨”的手法。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孔稚圭《白苎歌》云‘山虚钟磬彻’，山谷点化之，则云‘山空响管弦’。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则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比喻】修辞手法，即以形象、具体的乙事物来说明、描述甲事物，使甲事物更形象、更鲜明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和博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湏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是也。李颀（按当作李群玉）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水深浅’……是也。”上面所引的诗句，杜句是明喻，因其有比喻词“如”在前，其余皆为暗中比喻，所以是隐喻。

【借喻】借他物来形容本物。元范梈《木天禁语》的《绝句篇法》中有“借喻”一格云：“借本题说他事，如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比。”明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余阅《木天禁语》有借喻格……如王荆公《咏梅》诗云：‘额黄映日明飞燕，肌

粉含风冷太真。’东坡云：‘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傍山斜。盈盈解佩临湘浦，脉脉当垆卖酒家。’萧束之云：‘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皆借喻也。”

【博喻】用一连串的形象来表述、形容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六：“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连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决江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苏公《百步洪》诗云‘长虹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纤小】言诗文追求工巧而缺乏气骨。与“小巧”、“纤巧”义近。清施补华《岷傭说诗》：“小巧是诗人所戒。如‘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又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炼字着色，至此而止；稍过一步，如‘石压笋斜出，岩垂花倒开’，即近纤小矣，不可不辨。”

【开合】宕开与绾合。宕开即略离题意，纵笔所之；绾合即绾合题意，收束本文。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小诗精深，短篇蕴藉，大篇有开合，乃妙。”元杨载《诗法家数》：“七言古诗，要铺叙，要有开合，有风度，要迢递险怪，雄俊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惟李、杜也。”

【起承转合】此言诗文的章法。元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论述“起承转合”，分别以起联为“破题”，要求“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以颌联为承接，要求“或写意，或写景，或书事，用事引证。此联要接破题，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以颈联为转笔，要求“或写意、写景、书事、用事引证，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以尾联为结尾，要求“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场，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诗之五言八句，如制艺之起承转合为篇法也。起联道破题意，次联承其意，第三联用开笔，结句收转，与起联相应，以成章法。”以上言律诗的起承转合。

【起句】诗的破题儿第一句，也叫“发句”。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馀。”参见“发

端”条。

【发端】即诗的起句。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三：“‘发端忌作举止’，贵高浑也；‘收拾贵在出场’，须超远也。”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七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发端与结句，唐人无不妙者，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二：“五言律起句最难，六朝人称谢朓工于发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压千古矣。”参看“起句”条。

【结句】诗的结束语。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清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下：“结句贵有味外之味，弦外之音。言情则如沈休文之‘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陈后主之‘当由分别久，梦来还自疑’。……写景则有左太冲之‘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谢康乐之‘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言乐则有苏许公之‘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歌声杂管弦’。言哀则有少陵之‘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是皆一唱而三叹，慷慨有馀音者。”

【尾句】即“结句”。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是已；意尽词不尽，如‘抔扶摇’是已；词尽意不尽，‘剡溪归棹’是已；词意俱尽，温伯雪子（《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是已。”

【落句】即“结句”、“尾句”，亦即律诗之尾联。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颌联，有颈联，有发端，有落句。”《续金针诗格》：“第一联谓之破题，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第二联谓之颌联，第三联谓之颈联，须字字对。第四联谓之落句，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僧文或《诗格》：“诗之结尾，亦云断句，亦云落句，须有含蓄旨趣。”参见“结句”、“尾句”条。

【起联】律诗的第一、二句。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起联有对起，有散起。唐人散者居多，惟杜甫好用对起。其对起法，有一意相承者，又有两意分对者，大抵熟于诗律，故拈着便对。”又云：“起联须突兀，须峭拔，方得题势，入手平衍，则通首无气力矣。有开门见山道破题意者，有从题前落想入者，亦有倒提逆入者，俱以得势为佳。”参见“首联”条。

【首联】即“起联”。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下：“论诗拘于首联、颌联、腹联、尾联，直是本领不济，所谓跳不出古人圈套。如太白起句云：‘犬吠水声中，桃

花带露浓。’又云：‘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随手拈来，俱如奇峰峭壁，插地倚天。”参见“起联”条。

【破题】 本指制艺写在前面点破题旨的几句话，后借以指律诗的起联。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是“破题”已泛指各种诗体的首两句。但更多的是指律诗的起联。元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中即以“破题”为起联，并要求“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

【颌联】 律诗的第二联，即第三、四句。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古律，有今律，有颌联，有颈联。”《续金针诗格》：“第二联谓之颌联，第三联谓之颈联，须字字对。”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颈联、颌联，初无此说，特后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论事，次二句犹须论事；首二句状景，次二句犹须状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势，诗之大略，不外此也。”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颌颈两联，如二句一意，无异车前马后，有何生气？唐贤之可法者，如王维‘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岑参‘愁窥白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谿’，杜甫‘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皆神韵天成，变化莫测。”也叫“胸联”。

【颈联】 律诗的第三联，即第五、六句。元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以第三联为“颈联”。要求“或写意、写景、书事、用事引证，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中二联，或写景，或叙事，或述意，三者以虚实分之。景为实，事意为虚，有前实后虚，前虚后实法。凡作诗不写景而专叙事与述意，是有赋而无比兴，即乏生动之致，意味亦不渊永，结构虽工，未足贵也。”

【腹联】 即“颈联”。清钱木庵《唐音审体·律诗五言论》：“尝推而论之，联绝粘缀，至于八句，首、尾、胸、腹，俱已具足。”说明“颈联”又叫“腹联”，“颌联”又名“胸联”。

【尾联】 即律诗的最后一联，多为散体，即律体的第七、八句。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下：“论诗拘于首联、颌联、颈联、尾联，直是本领不济，所谓跳不出古人圈套。”尾联极不容易出色，所谓“诗难处在结裹”也。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上：“收束或放开一步，或宕出远神，或本位收住。张燕公‘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就夜饮收住也。王右丞‘君问穷通理，渔歌

入浦深’，从解带弹琴宕出远神也。杜工部‘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就画鹰说到真鹰，放开一步也。”

【笔法】 本指写字运笔的方法，后亦用以指诗文的结构和造语的方法。就结构而言，则有提笔、转笔、接笔、伏笔、正笔、反笔之分，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下：“总之古人善用反笔，善用旁笔，故有伏笔，有起笔，有淡笔，有浓笔。”就造语而言，则有刚笔、柔笔、淡笔、浓笔之别。清施补华《岷傭说诗》：“太白才逸，笔在刚柔之间，故亦能作五、七绝。”又云：“退之‘荆山已去华山来’一绝，是刚笔之最佳者。”

【接笔】 承接上文意脉的笔法。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至接笔，则或挺接、反接、遥接，无平接者，故愈显嵯峨。”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三：“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

【转笔】 转换曲折的笔法。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转笔，则或疾转、逆转、突转，无顺转者，故倍形生动。其关键勒束处，无不呼吸相生，打成一片，故筋节紧贯，血脉灵通，外极雄阔，而内极细密也。”

【刚笔】 刚健遒劲的笔致，即具有阳刚之美的作品。清施补华《岷傭说诗》：“七绝亦切忌用刚笔，刚则不韵。即边塞之作，亦须敛刚于柔，使雄健之章，亦饶顿挫，乃不落粗豪。”又说：“少陵、退之、东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绝。盖才太大，笔太刚，施之二十字，反吃力不讨好。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五绝究以含蓄清淡为佳。”

【柔笔】 委婉含蓄的笔致，即具有阴柔之美的作品。清施补华《岷傭说诗》：“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

【蹈袭】 因袭沿用前人的语意。宋陈师道《赠田从先》：“落笔如流宁蹈袭，行前应敌却纷纭。”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诗恶蹈袭古人之意，亦有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盖思之愈精，则造语愈深也……李华《吊古战场文》：‘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惓惓心目，寝寐见之。’陈陶则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盖愈工于前也。”

【转意】 变换前人的语意，赋以新的内容。宋佚名《诗宪》：“转意者，因袭之变也，前者既有是语矣，吾因而易之，虽语相反，不失为佳。”

【互文】 诗的上下句中，互有省略，解说时仍须在互文见义上加以理解。如《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是互文，即“迢迢皎皎牵牛星，皎皎迢迢河汉女”。《木兰辞》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也是互文，即“雄兔脚扑朔眼迷离，雌兔眼迷离脚扑朔”。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上：“‘秦时明月’

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适)《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即应理解为“秦时明月秦时关,汉时关汉时明月”。

【互体】 传统诗词中的一种技巧,指一联中的文义互相呼应,互相映衬。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七:“杜少陵《狂夫》诗云:‘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

【诗思】 作诗的情思。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或曰:‘相国(郑紫)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类,皆欲其思之来,而所谓乱思、荡思者,言败之者易也。郑紫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则所谓思者,岂寻常咫尺之间所能发哉?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于埃壚之外。苟能如是,于诗亦庶几矣。小说载谢无逸问潘大临云:‘近日曾作诗否?’潘云:‘秋来日日诗思。昨日提笔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败,辄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见思难而败易也”。

【诗趣】 作诗的兴致和灵趣。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一:“诗肠须曲,诗思须痴,诗趣须灵。意本如此而说反如彼,或从题之左右前后曲折以取之,此之谓曲肠。狂欲上天,怨思填海,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痴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灵心妙舌,每出人意想之外,此之谓灵趣。”清陈仅《竹林答问》:“诗趣、诗机、诗境、诗料,四者作诗之具,非仓卒所可求。必其平素涵养得足,使满腔诗趣活泼泼地,诗机在在跃然欲出,眼前诗境,到处皆春;腕底诗料,俯拾即是,虽终岁不作诗,而盈天地间皆吾诗也。”

【诗品】 诗的品性和品位。梁钟嵘撰《诗品》将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历代在诗话中论述“诗品”的极多,兹列举其重要的论述如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此以诗品为诗的风格。清贺贻孙《诗筏》:“若张曲江(九龄)《感遇》,则语语本色,绝无门面矣,而一种孤劲秀淡之致,对之令人意消。盖诗品也,而人品系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三复此语,为之浮白。”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惘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

者无讥焉。”

【诗讖】 诗于无意中预见祸福的征兆,叫做“诗讖”。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人谓富贵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康强不得言疾病死亡,或犯之,谓之诗讖,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相,岂限绳墨哉?王维作雪中画芭蕉,诗眼见已知其神情善寓于物,俗论则讥其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忽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东坡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俗论。”宋李颀《古今诗话》载诗讖数则云:“丁晋公为侍中时,尝作诗曰:‘千金家累非良宝,一品官高是强名。’未几夺爵,籍没。”又云:“卢多逊方卯角,其父携就云阳观小学,与群儿见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之为戏。多逊尚未识字,抽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岛客。’父见之,颇意以为吉兆。迨作相,与秦王事故败,始因遣堂吏赵白,遂窜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无一字之差。”

【诗囚】 指苦吟诗人,谓其呕心沥血,苦吟不已,成了诗的囚奴。金元好问《放言》:“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上:“遗山(元好问)《论诗》云:‘东野悲鸣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指韩愈)笔,合卧元龙百尺楼。’推尊退之而鄙薄东野至矣。”

【诗魔】 流于怪僻的诗风或诗人。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清叶燮《原诗·外篇上》驳之曰:“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清贺贻孙《诗筏》认为“于是出类之才,欲极力剿除,自谓起衰救弊,为前辈功臣。即此起衰救弊一念,遂有无限诗魔入其胸中,使之为中晚而不自知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诗有魔鬼,宫体淫哇,齐、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钉铰,晚唐、两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绣,弘、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可见所谓诗魔者,或以指入门不正,或以指起衰救弊之一念,或以指各个时期之恶诗。

【诗佣】 指应征、应酬的诗歌作者。清王夫之《董斋诗话》:“诗佣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征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

【诗瓢】 贮存诗稿的瓢。宋李颀《古今诗话》:“唐末蜀州有唐求(《唐诗纪事》五十作唐球),放旷疏逸,方外人也。吟诗有所得,即将稿撚为丸,投大瓢中。后卧病,投瓢于江,曰:‘兹瓢苟不沉没,得之者方知

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识者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接得十才二三。”

【诗筒】传递诗筒的竹筒。唐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为问两川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宋林逋《寄呈张九礼》诗：“若念故人兼久病，公馀无惜寄诗筒。”

【诗牌】题在木板上的诗，唐人叫“诗板”，宋人叫“诗牌”。唐张祜《题灵彻上人旧房》：“寂寞空门支道林，满堂诗板旧知音。”宋林逋《孤山寺》诗：“白云睡阁幽如画，张祜诗牌妙入神。”

【创体】新创的诗歌体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柏梁》为七言歌行创体，要以拙胜。”清贺贻孙《诗筏》：“枚乘《七发》，东方朔《客难》，创体也。后人虽沿袭其体，然丰神气韵，终不能及。张平子《四愁诗》，亦创体也。拟之者不独沿其体，并沿其调，一拟便肖矣。”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三：“自沈、宋创为律诗后，诗格已无不备。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灸师、诅师、巫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张彻》五律一首，自起至结，句句对偶，又全用拗体，转觉生峭。此则创体之最佳者。”又卷四云：“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内：‘检点盘中饭，非精亦非粝；检点身上衣，无馀亦无缺；天时方得所，不寒又不热；体气正调和，不饥亦不渴。’《哭崔晦叔》五古内：‘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连用叠调，此一体也。《洛下春游》五排内‘府中三遇腊，洛下五逢春。春树花珠颗，春塘水曲尘。春娃无气力，春马有精神’，连用五‘春’字，此一体也……”

【创格】新创的诗格。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五：“东坡大气旋转，虽不屑屑于句法、字法中别求新奇，而笔力所到，自成创格。如《百步洪》诗：‘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律解散不对，为孟、李创格，详前篇矣（指《五律凡例》）。七言变体，始于崔司勋之《黄鹤楼》，太白深服之，故作《鹦鹉洲》诗，全仿其格。”清陈仅《竹林答问》：“每句用韵，三句一换韵，如岑嘉州《走马川行》，岂其创格，抑有所本耶？”

【重韵】在一首诗中，再三用同一韵脚，叫做“重

韵”。此在古人诗中虽屡见，然不免为病，仍宜力避。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古人用韵，如《文选·古诗》、杜子美、韩退之，重复押韵者甚多。《文选·古诗》押二‘捉’字，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难’字，谢灵运《述祖德诗》押二‘人’字，《南图诗》押二‘同’字，《初去郡诗》押二‘生’字，沈休文《钟山应教诗》押二‘足’字，任彦昇《哭范仆射诗》押三‘情’字、两‘生’字，陆士衡《赴洛诗》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二‘阴’字，《拟古诗》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阴’字，阮嗣宗《咏怀诗》押二‘归’字，……杜子美、韩退之，盖亦效古人之作。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园人送瓜诗》押二‘草’字，《上后园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咏怀》押二‘旋’字，《赠李秘书》押二‘虚’字，《赠李邕》押二‘厉’字，《赠汝阳王》押二‘陵’字，《喜岑、薛迁官》押二‘萍’字。退之《赠张籍》诗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鸣’字，二‘光’字，《岳阳楼别窦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只鸟》押二‘州’字、二‘头’字、二‘秋’字、二‘休’字。”宋张镃《诗学规范》：“蔡條言：少陵《饮中八仙歌》用韵，‘船’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于古未见其体，予尝质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制，虽重韵无妨，亦周诗分章意也。”

【重调】律诗的中间二联，句式相同，如均为上四下三的句式，便是重调。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七字为句，中二联最忌重调。句法则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上二下五，上五下二，上一下六，上六下一，上二中二下三，上一中三下三，上二中四下一，上一中四下二，上四中一下二，上三中一下三，此十二法尽之。”言在以上十二种句式中，中二联不宜用同一句式。

【头巾气】迂腐之气。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秀才作诗不脱俗，谓之‘头巾气’；和尚作诗不脱俗，谓之‘酸馅气’；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能脱此三气，则不俗矣。”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运意不同，各有境地，何可轩轻！瞿宗吉曰：‘太白忧君之念，远过乡关之思，善占地步，可谓十倍曹丕。’此头巾气，又隔壁听也。”

【酸馅气】指和尚诗歌中的一种特有的腔调和气味。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模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子瞻有《赠惠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尝语人曰：‘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皆笑。”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二：

“僧皎然《冬日送客》：‘平明走马上村桥，花落梅溪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无限路迢迢。’无酸馅气，佳甚。”

【脂粉气】指香艳纤弱的闺阁诗。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亦作“脂泽气”。宋许颢《彦周诗话》：“有李氏女者，字少云，本土族。尝适人，夫死无子，弃家着道士服，往来江淮间。仆顷年见之金陵，其诗有云：‘几多柳絮风翻雪，无数桃花水浸霞。’殊无脂泽气。”

【铅粉气】即“脂粉气”。明顾起纶《国雅品》：“孟居士：荆山居士，其自号也。孟论朱淑贞云：‘作诗贵脱凡化质，僧诗贵无香火气，铅粉亦然。’其诗如《春归》云：‘无情最是枝头鸟，不管人愁只管啼。’《书怀》云：‘天边莫看如钩月，钓起新愁与旧愁。’不但无‘铅粉气’，且雅善用虚字，亦鱼玄机之亚。”参阅“脂粉气”条。

【台阁气】达官贵人所作的诗，往往有珠宝气、富贵气。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也称之为“台阁诗”。《麓堂诗话》又云：“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

【富贵气】诗歌中所表现的富贵气象。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烟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元献相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明瞿佑《归田诗话》上：“晏元献公诗，不用珍宝字，而自然有富贵气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等句。公尝举此谓人曰：‘贫儿家有此景致否？’”

【山林气】具有隐逸恬淡风格的诗歌。明李东阳《麓堂诗话》：“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又云：“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贾浪仙（岛）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则俗矣。况其下者乎？”

【蔬笋气】即“酸馅气”，指僧诗的特殊气质和韵味。宋苏轼《赠惠通诗》：“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三僧》：“三僧中，如璧诗轻快似谢无逸，亦欠工；祖可嗜读书，诗料多无蔬笋气，僧中一角麟也；善权与可相上下。”也作“蔬笋味”。清陈仅《竹林答问》：“写神仙事除铅汞语，写僧佛事除蔬笋味。”参阅“酸馅气”。

【二要】唐释皎然《诗式》：“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这是强调诗歌要“力全”“气足”。

【二废】唐释皎然《诗式》：“诗有二废：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这是强调“思致”和“典丽”在诗歌创作中不可忽视。

【三要】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有三要：曰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这是说音要合自然之节，景要带主观的色彩，情的蕴含虽在言中，而妙会却要在言外。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〇则说：“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这是说诗歌的审美标准，所谓“心术”乃指诗人的创作意图，“气体”乃指诗歌的格调，“时运”当指诗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三多】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永叔（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元杨载《诗法家数》所说略异：“诗有三多：读多，记多，作多。”

【三字】清薛雪《一瓢诗话》：“吾师横山先生（叶燮）海余曰：‘作诗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时理会者。”情，指真感情；理，指真知灼见；事，指重大题材。

【三难】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惟收为尤难。如作平调，舒徐绵丽者，结须为雅调，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叹意。奔腾汹涌，驱突而来者，须一截便住，勿留有馀。中作奇语，峻夺人魄者，须令上下脉相顾，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无迹，方成篇法。”

【三偷】唐释皎然《诗式》以“偷语”、“偷意”、“偷势”为“三偷”，并各举诗例以明之，而以“偷语最为钝贼”。元韦安居《梅硎诗话》上：引李淑《诗苑》云：“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学诗者不可不戒。”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亦标有“三偷”之目，列举蹈袭前人诗意的作品甚多，认为“偷法一事，名家不免”，“或反语以见奇，或循蹊而别悟，若尽如此，何病于偷”？

【三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此言学诗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

【三格】唐齐己《风骚旨格》：“诗有三格：一曰上格用意。诗云：‘那堪怀远道，犹自上高楼。’又云：‘九江有浪船难济，三峡无猿客自愁。’二曰中格用气。诗云：‘直饶人买去，还向柳边栽。’又云：‘四海鱼龙精魄冷，三山鸾凤骨毛寒。’三曰下格用事。诗云：‘片石犹临水，无人把钓竿。’又云：‘一轮湘渚月，’

万古独醒人。”

【四深】唐释皎然《诗式》：“诗有四深：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一中，亦引用其说。

【四离】唐释皎然《诗式》：“诗有四离：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一中，亦全引此语。

【四格】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赠汪伦》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兴也。陆龟蒙《咏白莲》曰：‘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此趣也。王建《宫词》曰：‘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阳》曰：‘下马独来寻故事，逢人惟说岷山碑。’此理也。”

【四难】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陶明潜《诗说杂记》申其说云：“总而论之，律诗难于古诗者，古诗法度宽，行动可以自如；律诗法度严，举止不能率易也。绝句难于八句者，八句字多，可以供其抒写；绝句字少，如垂趾二分，难乎为射也。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者，五言委婉，用力少；七言沉雄，用力多也。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者，七言字尚多，回旋可以自然；五言字益少，字字须警拔，语语须有意也。”

【四种高妙】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对此颇有论难，他说：“夫‘理’即‘意’之托始，‘想’即‘意’之别名，既曰‘高妙’，不‘自然’者何以能之？吾惜其名目之琐而复也，虽自为疏解，庸可训乎？”

【五忌】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陶明潜《诗说杂记》九：“语何以忌直？缘诗主文谲谏，寓意微远，所称甚小，所指极大。意何以忌浅？若率尔操觚，不加锤炼，任心任意，偶然而为，安能入人意中而出人头地乎？矫之之法，惟有苦心深思，不稍轻易。故人所易言，我难言之；人所烦言，我寡言之。脉何以忌露？气脉之来，绵绵如绳，前后相连，首尾互应，虽千言万语，仍然生气勃勃，跃跃如动，乃为能品。味何以忌短？渊永浑厚，非鸡豚味薄者可比。或得之于回，如橄欖然；或得之于老，如甘蔗然，咀嚼不

尽，舌本惟芳；此其所以为贵也。音韵何以忌散缓？如人之发声，壮健无疾者恒遒劲，悒绵多疾者恒散缓。”

【五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陶明潜《诗说杂记》卷九：“俗体者何？当是所盛行如应酬诸诗，毫无意味，腴词靡靡，若试帖等类，今亦不成问题矣。俗意者何？善颂善祷，能谀能谐，毫无超逸之志是也。俗句者何？沿袭剽窃，生吞活剥，似是而非，腐气满纸者是也。何谓俗字？风云月露，连类而及，毫无新意者是也。何谓俗韵？过于奇险，困而贪多，过于率易，虽二韵亦俗者是也。”

【五格】唐释皎然《诗式》：“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用事”者，指用典而言。此亦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所谓“不必多使事”之意。

【六至】唐释皎然《诗式》：“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无迹”即无斧凿痕迹。

【六迷】唐释皎然《诗式》：“诗有六迷：以虚诞而为高古，以缓漫而为冲淡，以错用意而为独善，以诡怪而为新奇，以烂熟而为稳约，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

【七得】一作“七德”。唐释皎然《诗式》：“诗有七得：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

【十体】唐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体：一曰高古，诗云：‘千般贵在无过达，一片心闲不奈高。’二曰清奇，诗云：‘未尝将一字，容易谒诸侯。’三曰远近，诗云：‘已知前古事，更给后人看。’四曰双分，诗云：‘船中江上景，晚泊早行时。’五曰背非，诗云：‘山河终决胜，楚汉且横行。’六曰虚无，诗云：‘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七曰是非，诗云：‘须知项籍剑，不及鲁阳戈。’八曰清洁，诗云：‘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斋。’九曰覆妆，诗云：‘叠嶂供秋望，无云到夕阳。’十曰阖门，诗云：‘卷帘黄叶落，锁印子规啼。’”

【十势】唐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势：狮子反掷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青龙顾尾势；孤雁失群势；洪河侧掌势；龙凤交吟势；猛虎投涧势；龙潜巨浸势；鲸吞巨海势。”除“孤雁失群式”外，每势都有诗例，然颇难会其意。清薛雪《一瓢诗话》：“唐释齐己作《风骚旨格》，……独是‘十势’立名最恶，宛然少林棍谱，暇日当为易去，乃妙。”

【十七势】《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或曰诗有学古今势十七种，具列如后：第一，直把人作势；第二，都商量入作势；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第六，比兴入作势；第七，谜比势；第八，下句拂上句势；第九，感兴势；第十，含思落句势；第十一，相分明势；第十二，一句中分势；第十三，一句直比势；第十四，生杀回薄势；第十五，理入景势；第十六，景入理势；第十七，心期落句势。”

【一片宫商】比喻文辞优美，像音乐一样的和谐美听。宫、商，古代五音中两个音，故以代音乐。源于宋孙光宪《北梦琐言·来鹏诗》：“前进士沈光有《洞庭乐赋》，韦八座岫谓朝贤曰：‘此赋乃一片宫商也。’后辟为闽从事。”其后清沈德潜在《说诗醉语》上说歌行“一韵到底者，必须铿金鏘石，一片宫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调也。”陈仅《竹林答问》亦云：“律诗贵铿锵抗坠，一片宫商，故非独单句住脚字须三声互换，即句首第一字，亦不可全平全仄。”说明无论是赋，是歌行，还是律诗，都要和谐美听。

【一代风流】指开创风尚，影响当代的杰出人物。源出杜甫《哭李常侍峰》诗：“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又宋陈师道《丞相温公挽词》二首之一：“一代风流尽，三师礼数崇。”风流原指英俊的、杰出的，后以指开一代风气的文宗。

【一字连城】形容诗文有很高的价值。见于《魏书·彭城王勰传》：“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勰诗，高祖乃为之改一字……勰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一字千金】形容诗文有着极高的价值。源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后遂以“一字千金”形容诗文的极高价值。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一倡三叹】亦作“一唱三叹”。倡、唱古通，指首唱；叹，指和唱。源出《荀子·礼论》：“《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原意是唱者、和者都不多，后来转以形容诗文婉转而寓意深刻。宋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长篇小字远相寄，一唱三叹神凄楚。”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一斗百篇】形容酒量的宏大和诗才的敏捷。唐

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亦作“斗酒百篇”。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一：“房师孙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后所作，与醒时无异。馆阁诸公，以为斗酒百篇之亚也。”

【一吟一咏】指吟诗作赋。《晋书·孙楚传附孙綽》：“沙门支遁试问(孙)綽，‘君何如许(询)’？’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询)将北面矣。’”言许询的才情，远不如己。

【一觴一咏】指饮酒赋诗。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一鳞半甲】喻诗文创作在某些细节上颇似前人，而未能得其全貌。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苏涣诗”：“三年中作变律诗九首，上广州李帅，其文意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陈子昂)一鳞半甲。”《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唐人以为(苏涣)长于讽刺，得陈拾遗一鳞半甲，观其词气桀亢如此，固自可见其胸中也。”也作“一鳞半爪”或“一鳞一爪”，又转以喻诗文创作的贵含蓄，重神韵。清赵执信《谈龙录》：“(洪昉思)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王士禛)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

【入木三分】本为形容书法的笔力强劲。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相传王羲之在木板上写字，工人用刀刻字时，发现字迹透入木板有三分深。后用以形容诗文写得极其深刻。清赵翼《杨雪珊自长垣归来示近作叹赏不足诗以志爱》：“入木三分诗思锐，散霞五色物华新。”

【力透纸背】本以形容书法的遒劲有力，后以喻诗文的立意深刻。唐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意记》：“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这是形容书法的遒劲。清赵翼《瓠北诗话·陆放翁诗》：“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此古体之工力更深于近体也。”这是喻诗文的立意深刻。

【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民间歌谣，后多指俚俗的作品。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文选》李周翰注：“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

【下笔成章】形容文思如涌，援笔立就。《三国

志·魏志·文帝纪》：“文帝（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又《陈思王植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曹）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

【大醇小疵】意为大体上很好，但略有缺点。唐韩愈《读荀子》：“荀（况）与扬（雄），大醇而小疵。”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马工枚速】马，指司马相如；枚，指枚皋，都是西汉的著名作家。他们两人一个写得工丽，一个构思敏捷，因此比喻各有所长。《汉书·枚乘传》：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梁书·张率传》：“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

【天衣无缝】形容诗文的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源出前蜀牛峤《灵怪录》，说太原郭翰暑夜在月下乘凉，忽见有少女冉冉自空而下，视其衣，无缝。问其故，女答道：“天衣，本非针线为也。”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中说：“对偶之佳者，如‘数点雨声风约住，一枝花影月移来’数联，皆天衣无缝，妙合自然。”

【开门见山】比喻诗文创作，一开端便切入本题，不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沧浪又谓‘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夫诗有通体贵含蓄者，有通体贵发露者，岂有发句必求‘开门见山’之理？此可以论唐人试帖之破题，而不可以论太白诗也。”

【不落窠臼】比喻诗文不落俗套，有独创的风格。窠臼，旧的格式。宋吴可《学诗诗》：“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清薛雪《一瓢诗话》：“王次回云：‘诗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团香镂雪手也，乃有此金针度人之语。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带水，终是上气息、泥滋味。”

【不主故常】言创体诗文，不拘泥于旧的套子。源出《庄子·天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本以指做事不守常规。后转以言诗文不按旧的框架去进行创作。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余评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拟议。”

【不留一字】形容修改文章，一再推敲，以致底稿上不剩原来的一个字。宋陈善《扞虱新话·文贵精工》：“世传欧阳公（修）平昔为文，每草就纸上净讫，即沾挂斋壁，卧兴看之，屡思屡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盖其精如此。”

【不烦绳削】言创作诗文不需要加以纠正或修

改，自然合于规矩。宋黄庭坚《与王观复书》：“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宋《王直方诗话》：“山谷云：‘宁律不谐，不可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可使语涩；此庾开府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

【不赞一辞】不能参加一个字的意见。《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此言作品的精妙高深，别人提不出任何意见来，亦作“不能措一辞”。曹植《与杨德祖书》：“昔尼父（孔丘）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

【飞文染翰】谓挥毫作文，用笔蘸墨，以之形容创作诗文。《旧五代史·卢程传》：“（张）承业叱之曰：公（指卢程）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

【无理而妙】言诗文创作，乍一看来，似乎没有道理，深入下去，却又入情人理。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语。至如义山（李商隐）‘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则又无理之理，更进一尘。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

【云谲波诡】形容文笔的变化莫测。语出汉扬雄《甘泉赋》：“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此言建筑物的构造像天上的云彩、海里的波涛那样千态万状。《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此言文笔的变化无穷。

【尺水兴波】比喻在短小的诗文中，可以有起落、大开合的文章。清刘熙载《诗概》：“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此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

【尺幅万里】形容文字虽短，而概括力极强。语出《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文焕）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也作“尺幅千里”。唐徐安贞《题襄阳图》诗：“图书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后以喻诗文短小，而包含壮阔的内容，深远的意境。明王夫之《薑斋诗话》：“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

【文不加点】言一气写成，无须修改，以形容文思敏捷，写作技巧纯熟。《昭明文选·祢衡〈鹦鹉赋〉序》：“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清袁枚《续诗品·精思》：“文不加点，兴到语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

【文从字顺】形容诗文的选词炼句通顺妥贴。唐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徐林《韵语阳秋序》：“达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于自然者也。文从字顺，宜乎无得而议矣。”

【气盛言宜】形容诗文的气势很壮，语言得宜。唐韩愈《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盖诗以气为主，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亦与人同。……东坡曰：‘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是皆善于言气者。”

【引商刻羽】本以形容音乐的演奏水平很高。《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后以形容音律协调、十分美听的诗词。

【石破天惊】语出唐李贺《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风雨。”本以状李凭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出人意表，造成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境。后以形容诗文的出奇惊人。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于密处迭造警句，石破天惊；于疏处轩起层波，山曲水折。”

【可泣鬼神】极言诗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师，贺知章闻其名，见之，请为文，出《蜀道难》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间人，岂太白星精耶？’于是解金貂换酒醉而归。及见《乌夜啼》曰：‘此诗可以泣鬼神。’”又见《唐诗纪事》十八李白条。

【探骊得珠】语出《庄子·列御寇》，言深渊中有骊龙，颌下有珠，价值千金，而得之甚难。后谓诗文创作，深得命题的精髓。《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同会乐天舍，各赋《金陵怀古》。刘诗先成，白曰：‘四人探骊，子先获珠，所余鳞角，何用？’三公乃遂罢作。”

【浑然天成】言诗文创作自然融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宋诗话辑佚·王直方诗话》：“独鲁直（黄庭坚）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声和鸣，浑然天成，有言外意。”又《蔡宽夫诗话》：“杜子美《收京》诗以樱桃对扶杜，荐樱桃事，初若不类，及其云‘赏因歌扶杜，归及荐樱桃’，则浑然天成，略不见牵强之迹，如此乃为工耳。”金王若虚《溇南诗话》：“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

成，如肺腑中流出者。”又作“自然浑成”。

【自成一家】形容在创作或治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风格。源出《史记·太史公自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唐刘知幾《史通·载言》：“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又《童蒙诗训》：“少游（秦观）《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

【自出机杼】谓诗文创作，能够自出心裁，不落恒蹊。机杼，本指织布机，此以喻诗文的命意构思。《魏书·祖莹传》：“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宋诗话辑佚·休斋诗话》：“《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始无终……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钩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

【片言居要】言作品中有数语为一篇之精粹，为一篇之要义。晋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巧夺天工】言人工之巧，胜过天然。元赵孟頫《赠放烟火者》：“人间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清昼同。”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至东坡则天仙化人，飞行绝迹，变尽唐人面目，另辟门户，敏妙超脱，巧夺天工，在宋人中独为大宗。”

【生吞活剥】比喻生硬地搬用或模仿别人的作品。唐刘肃《大唐新语·谐谑》：“有枣强令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人为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唐诗纪事》卷四亦载此事。明徐谓《奉师季先生书》：“大约谓先儒若文公（朱熹）者，著释速成，并欲尽窥诸子百氏之奥，是以冰解理顺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剥之弊亦有。”又作“活剥生吞”。清薛雪《一瓢诗话》：“有意逞博，翻书抽帙，活剥生吞，搜新炫奇，犹夫生客满座，高贵接席，为主人者虚躬淡洽，有何受用处？”

【生花妙笔】形容作者的才华突出，作品华丽。语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李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溢，名闻天下。”

【出水芙蓉】比喻诗文的清新美妙。芙蓉，荷花。钟嵘《诗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汤惠休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唐李白《终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亦作“初发芙蓉”。《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

【**夸多斗靡**】形容以篇幅多、辞藻美为诗文的最境界,是错误的见解。唐韩愈《送陈秀才彤序》:“读书以为学,缀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

【**曲高和寡**】比喻知音难得。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巴里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现在也用来比喻作品的寓意越深刻,技巧越高超,了解的人也越少。

【**曲尽其妙**】言极尽曲折委婉之能事,达到抒情表意的最高境界。《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孙子》十三篇论战守次第与山川险易长短大小之状,皆曲尽其妙,推高发隐,使物无遁情,此尤文章妙处。”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然其(指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同工异曲**】言曲调虽然不同,却是同样的美妙。唐韩愈《进学解》:“子云(扬雄)相如(司马长卿),同工异曲。”

【**因小见大**】从小的题材中,看到大的意义。清陈仅《竹林答问》:“因小见大,因近见远,因平见险,因易见难,因人见己,因景见情,此命意之新也。”

【**因难见巧**】由于难度很大而更加显出技巧的高妙。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韩愈)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三:“昌黎(韩愈)古诗用韵,有通用数韵者,有专用一韵者。《六一诗话》谓‘其得韵宽,则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今按……其用窄韵,亦不止《病中赠张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一首,又《会合联句》三十四韵,洪容斋(迈)谓除‘螭’‘蝓’二字,《韵略》未收,余皆不出二肿之内。今按‘螭’‘蝓’二字,《唐韵》本收在二肿,则皆本韵也。”

【**行云流水**】比喻诗文的布局都很自然,就像流动着的云彩和河水一样的活泼。宋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

【**字字珠玑**】每个字都像珠玉一样的圆润,比喻诗文极其华丽。珠玑,即珠宝,常以喻诗文之美。唐杜牧《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诗:“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

【**字里行间**】言诗文的意旨不直接表达出来而隐

约透露于文字之间。《艺文类聚》五八南朝梁简文帝《答新渝侯和诗书》:“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

【**寻章摘句**】言不去把握诗文中的要旨,而去搜寻、摘录诗文中的片言只语。《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遣都尉赵咨使魏”段下裴注引《吴书》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馀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唐李贺《南园》诗:“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如椽大笔**】赞美别人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言其所握之笔像房椽一样的大。《晋书·王导传》:“(王)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宋张铉《诚斋再韵见遗走笔复和并邀尤检正京右司观花》诗:“戈挥就借如椽笔,不信湖边日易沉。”

【**运斤成风**】比喻手法熟练,技术高超。源出《庄子·徐无鬼》:“郢人垾漫其鼻端,若蝉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垾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金元好问《王黄华墨竹》:“岂知辽江一派最后出,运斤成风刃发礪。”比喻绘画的艺术。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此数公(指李白、王维等)之于律体,如大匠运斤成风,如骏马直下千丈,何曾似(戴)石屏之琐琐刻画哉!”

【**邯郸学步**】比喻模仿别人不成,反而丢掉了原来的本事。源出《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燕邑)馀子之学行于邯郸(赵都)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后以讽刺模仿别人创作失败的人。宋姜夔《送项平甫倅池阳》:“论文要得文中天,邯郸学步终不然。”

【**别开生面**】另创新的风格,另开新的面貌。唐杜甫《丹青引》:“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赵次公注:“凌烟画像,颜色已暗,而曹将军重为之画,故云开生面。”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自昌黎(韩愈)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别具只眼**】形容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宋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北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也作“独具只眼”。清鲁九皋《诗学源流考》附南丰赵勉斋评语:“而黜(谢)灵运于晋,不得并于陶(潜);殿翁山(屈大均)于明,直上承乎李(白),尤为独具只眼。”

【**别开蹊径**】另外开辟一条途径,形容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山谷(黄庭坚)力求新异,戛戛独造,能以奇奥生峭瘦劲,别开蹊径,虽非东坡匹,亦巨手也。”也作“独辟町畦”。町

畦,田间小道。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宋末谢皋羽《晞发集》,意生语造,古体欲独辟町畦,方之元和时,在卢仝、刘叉之列。”

【含英咀华】比喻细细地品味作品的精华所在。唐韩愈《进学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

【字挟风霜】言文字中带着严厉之气。风霜,喻严峻。《西京杂记》三:“淮南王安著《鸿烈》(《淮南子》)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清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下:“刺恶之诗,贵字挟风霜,庶几闻者足戒。”

【言之成理】谓在进行创作时,能够合乎逻辑和道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荀子·非十二子》:“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器、魏牟也。”

【言为心声】言语言文字是表达心意的声音,所以听其声,便可以知其人。汉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言近旨远】言作品的语言很浅近,而意义很深远。《孟子·尽心下》:“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清《方南堂先生辍锻录》:“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

【沉着痛快】形容诗文内容深刻,语言泼辣。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沉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陶明潜《诗说杂记》:“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着痛快四字而已。”

【穷而后工】言文人越坎坷失意,诗文就写得越好。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苏轼《答钱济明三首》:“又知诗人穷而后工,然诗语朗练无衰气,如季札者听之,亦有以知君之晚节也。”

【穷形尽相】言诗文模山范水、表情达意,都十分细腻、十分逼真。晋陆机《文赋》:“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

【陈言务去】言写作一定要去掉陈词滥调,努力创新。唐韩愈《与李翱书》:“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清廷君寿《老生常谈》:“作诗当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有一题即有一种口头套话。如送人,则有‘骊歌’、‘驿柳’、‘惜别’、‘分手’、‘把杯’、‘洒泪’等字,其他类此。”

【画龙点睛】晋王浮《神异记》:“张僧繇尝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而不点睛,云:‘点之则飞去矣。’人以为妄,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见二龙飞去,未点睛者如故。”后以“画龙点睛”比喻在作品中用一两句

话点明要旨,使全篇顿生光彩。

【奇文共赏】言新奇的诗文,引起人们的共同欣赏。晋陶潜《移居》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拖泥带水】比喻诗文芜蔓,极不简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清薛雪《一瓢诗话》:“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带水,终是土气息、泥滋味。”

【呼之欲出】形容塑造的人物十分逼真生动,好像唤一声就会从作品中跑出来。宋苏轼《郭忠恕画赞》:“怨先在焉,呼之或出。”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三:“‘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

【知人论世】言为了了解历史上的人物,必先研讨所处的时代背景。《孟子·万章上》:“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来用以泛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下:“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

【依样葫芦】比喻模仿前人,缺乏创造。宋魏泰《东轩录》卷一:“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葫芦耳,何宣力之有?’”陶穀乃作诗道:“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清叶燮《原诗》:“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啾啾,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哂而却走耳。”

【金声玉振】《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指钟;玉,指磬。古代奏乐,以钟发声,以磬收韵。孟子以此比喻孔子的声誉远扬。后来泛指才学高超。《晋书·卫玠传》:“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后又用以比喻诗歌的音韵铿锵。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

【金针度人】唐冯翊《桂苑丛谈》载:郑侃之女采娘,得到织女送给她的一根金针,因而具有高超的刺绣技巧。后因以“金针度人”比喻把诗文创作的秘诀传授给别人。金元好问《论诗》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波澜老成】喻文章诗歌波折很多,技巧很熟。唐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宋孝宗《文忠苏轼文集赞》:“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

【诗中有画】形容在诗歌创作中善于描写自然景观,读起来像置身画图之中一样。宋苏轼《书摩诘(王维)蓝关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诗家三昧】三昧,本为梵文的音译,意为排除杂念,保持心中的自然宁静。《智度论》卷七:“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后转为对诗文创作的诀窍或奥妙。《宋史·李之纯传附之仪》:“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苏)轼谓入刀笔三昧。”清王士禛编有《唐贤三昧集》三卷,共选四十三家,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主。盖以唐贤作诗的诀窍和奥妙,尽在于是。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又谓如着盐水中,但辨其味,不见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诗家三昧。”

【披沙简金】言在众多的作品中发现精华。梁钟嵘《诗品》上:“潘(岳)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机)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也作“排沙简金”。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杨诚斋积至二万馀,周益公如之。以多为贵,无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简金,几于无金可简,亦安用多为哉?”

【斫轮老手】比喻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作者。典出《庄子·天道》中的一个寓言:说轮扁在堂下斫制车轮,桓公在堂上读圣人之书,轮扁嘲笑桓公说:那些都是古人的糟粕,读它有什么用?桓公要他说出道理来,否则就要杀他。轮扁说:根据我的经验,凡是真正的精华,都不可能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臣不能以喻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宋苏轼《嘲子由》:“妙哉斫轮手,堂下笑桓公。”

【挂一漏万】形容不完备,多疏漏,挂住了一个,漏掉了一万个。唐韩愈《南山》诗:“因辞试提掇,挂一念万漏。”宋吴泳《答严子韶书》:“对客之暇,随笔疏去,未免挂一漏万。”

【信手拈来】形容积累的资料、词汇很多,创作时可以不加思索,随手写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三:“此诗(指杜甫《红樱桃》)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

【钩章棘句】形容文词很艰涩,不流畅。唐韩愈《贞曜(孟郊)先生墓志铭》:“及其为诗,剟目铍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宋史·选举志》一:“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寝失浑淳。”

【金鷄擘海】喻诗文的气势雄壮。源出旧《华严经》三十六:“譬如金鷄鸟王,飞行虚空,安住虚空,以清静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翅搏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撮取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数公,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

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

【神施鬼设】形容诗文构思极为巧妙。唐韩愈《贞曜(孟郊)先生墓志铭》:“及其为诗……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点铁成金】比喻把不好的作品改成很好的作品。宋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金王若虚《溇南诗话》卷三:“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点金成铁】言把好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顾况《弃妇词》乃云:‘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辞君去,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带伧气,可谓点金成铁。”

【香象渡河】源出《涅槃经》:“如彼驶河,能漂香象。”本喻佛法的广大,后以喻诗文的透彻精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数公,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

【绘声绘色】形容诗文描写极其逼真,极其细腻。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

【浮光掠影】比喻观察不深刻,描写不细致。清冯班《沧浪诗话纠谬》:“沧浪论诗,只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见,其实脚跟未曾点地。”

【笔力扛鼎】形容笔力遒劲,文气雄健。唐韩愈《病中赠张十八(籍)》诗:“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

【笔扫千军】形容诗文的造诣,在当时没有敌手。唐杜甫《醉歌行》:“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笔参造化】形容诗文的笔致精妙,能与大自然的创造力相媲美。唐李白《与韩荆州书》:“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也作“笔补造化”。李贺《高轩过》:“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流自肺腑】形容感情真挚,像肺腑中流出来的一样。也作“流自肺肝”。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若蔡文姬肺肝间流出。”金王若虚《溇南诗话》卷二:“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

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也作“流自肺肠”。清贺贻孙《诗筏》:“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

【倚马可待】 比喻文思敏捷。《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温)北征,袁虎(宏)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唐李白《与韩荆州书》:“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堆垛死尸】 比喻在诗文创中喜欢堆砌典故。宋江少虞《皇朝类苑·诗歌赋咏》:“鲁直(黄庭坚)喜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宋许颢《彦周诗话》:“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

【移宫换羽】 形容作品富有音乐变化。宋辛弃疾《意难忘·美人》:“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宋史·乐志一》:“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馀事耳。”

【得心应手】 形容技艺纯熟,做起来自然顺手。《庄子·天道》:“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清赵翼《瓠北诗话》卷一〇:“(查初白)入京以后,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阅历益久,锻炼益深,气足则调自振,意深则味有馀,得心应手,几于无一字不稳惬。”

【盘马弯弓】 骑着马绕圈子,拉开弓,做好发射的姿势。唐韩愈《雉带箭》诗:“将军欲以巧服人,盘马弯弓故不发。”本以形容射箭者故意卖关子,欲以先声夺人。后以比喻诗文善于铺垫,善于蓄势。

【着盐水中】 言用典要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又谓如着盐水中,但辨其味,不见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诗家三昧。”也作“水中着盐”。《宋诗话辑佚·附诗学规范》:“《名贤诗话》言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清施补华《岷傭说诗》:‘刘长卿《过贾谊宅》诗,‘汉文有道’一联,可谓工矣。上联‘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疑为空写,不知‘人去’句即用《鹏赋》‘主人将去’,‘日斜’句即用‘庚子日斜’。可悟运典之妙,水中着盐,如是如是。”

【羚羊挂角】 语出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一六:“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什么处扞摸。”本以喻无迹可寻,后用喻诗的意境超脱。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粘皮着骨】 比喻诗的头绪不清,脉络不明。宋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明李东阳《麓堂诗话》:“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

【举步换形】 形容诗文的曲折变化很多。清薛雪《一瓢诗话》:“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若举步换形,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为奇?”也作“随步换形”。清沈德潜《说诗碎语》:“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之势。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莽莽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

【情文相生】 感情与文字互相生发,极尽缠绵悱恻。《世说新语·文学》:“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济)。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情见乎辞】 言真挚的感情表现于言语之间。语出《周易·系辞下》:“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后用以形容诗文之有真感情者。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

【情景相生】 言感情的抒发和景物的描写互相激荡、互相促进。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景中之情也。‘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上:“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惨淡经营】 形容在诗文的命意、布局、遣词等方面,煞费苦心,不断琢磨。清陈仅《竹林答问》:“惨淡经营,落笔之先,已定全局;转旋离合,含毫之际,纯任自然。字不妨重,亦须检点,意尤恶复,更忌支离。”又:“于是从首至尾,一路结构,惨淡经营,迨全诗在胸,下笔迅写。脱稿后字句未惬,乃有推敲涂改一番工夫。”

【游刃有馀】 比喻有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有熟练的表达技巧。语出《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本言庖丁善于解牛,具有丰富的解牛经验,后以喻创作的经验与技巧。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诗家之用笔,须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无厚入有间,循其天然之节,于骨肉理腠背脊处,锐入横出,则批郤导窾,游刃恢恢有馀,无不迎锋而解矣。”

【想落天外】形容诗文的构思奇特,为一般人所设想不到。清沈德潜《说诗碎语》:“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也作“想出天外”。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

【触景生情】言因为看到了某种景象而触发了某种感情。明胡应麟《诗薮》:“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入心脾,耐人咀嚼。”也作“见景生情”。明李贽《焚书·杂说》:“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隔靴搔痒】比喻写作诗文,不能鞭辟入里,深化主题,而是泛泛而谈,搔不着痒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

【缠绵悱恻】形容情意深厚、愁苦难言的样子,以喻诗文之有真感情、真境界者。清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二:“刘公幹诗,读之亦无甚深意。意依情生,情厚则意与俱厚,只觉缠绵悱恻,萦绕简编,十日不散。其诗之胜人处,实其情之过人所致。”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比兴二义,盖为一种难题立法。固有不可直言,不敢显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拟出之;或取义于物,以连类引起之。反复回环,以致唱叹,曲折摇曳,愈耐寻求。此诗品所以贵温柔敦厚、深婉和平也,诗情所以重缠绵悱恻、酝酿含蓄也,诗义所以尚文外曲致、思表纤旨也。”

【源头活水】比喻诗文创作有深厚的生活底子,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宋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模山范水】言描写山水景物的诗文,得其形似。《文心雕龙·物色》:“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清梁章钜《退庵随笔》:“今人但知学《文选》诗者为选体,特专指模山范水诸作当之,岂足以该萧选乎?”

【镂月裁云】比喻在诗文创作中精雕细刻。语出唐李义府《堂堂词》:“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也作“裁云镂月”。清薛雪《一瓢诗话》:“温柔敦厚,缠绵悱恻,诗之正也。慷慨激昂,裁云镂月,诗之变也。”

【错彩镂金】形容诗文创作过于堆砌雕刻。南朝梁钟嵘《诗品》中:“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彩镂金。”

【铺锦列绣】形容诗文创作句雕字琢,一味追求形式的美。《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

【敲金戛石】形容诗文的音乐性很强,清脆悦耳。唐韩愈《代张籍与李浙东书》:“未必不如吹丝弹竹,敲金戛石。”

【擘肌分理】形容诗文说理透彻,剖析深刻。汉张衡《西京赋》:“剖析毫厘,擘肌分理。”

【草蛇灰线】比喻诗文的脉络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但还是有迹可寻的。清贺贻孙《诗筏》:“态似侧而愈正,势欲断而愈连,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汉人之妙,难以言传,魏、晋以来,知者鲜矣。”清陈仅《竹林答问》:“诗不宜太露,亦不宜太隐,露则浅,隐则晦,当在不露不隐之间,草蛇灰线,其趣也。”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律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以一手兼之。”也作“灰线蛇踪”。清沈德潜《说诗碎语》:“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莽莽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

【剿说雷同】抄袭别人的作品。《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清沈德潜《说诗碎语》:“王摩诘《西施咏》、李东川《谒夷齐庙》,或别寓兴意,或淡淡写景,以避雷同剿说,此别行一路法也。”

【弹丸脱手】形容诗歌创作的技巧,十分圆熟流畅。宋《王直方诗话》:“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及《送欧阳弼》云:‘中有清员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圆熟也。”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下:“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王)筠亦未能尽也。”

【随物赋形】形容诗文的曲折变化,因物换形,自然天成。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杜工部七言古诗,随物赋形,因题立制,如怒猊抉石,如香象渡河,如秋隼搏空,如春鲸跋浪。”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金王若虚《溇南诗话》:“乐天之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

【斧凿痕迹】言诗文不是自然天成,流露出雕琢痕迹。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造语炼句,则贵生辣警拔,力厚思沉,又须无斧凿痕迹,虽炼而不伤气格,乃为上乘。”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三:“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

【嬉笑怒骂】 言才思敏捷,不拘题材形式,都能任意发挥。宋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笑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

【沉思翰藻】 言在遣词造句方面,必须深思熟虑,细加推敲,勤于烹练。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若其赞论之综辑词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清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

【兔起鹘落】 比喻诗文创作,用笔矫健、轻捷。宋苏轼《筥筵谷偃竹记》:“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清薛雪《一瓢诗话》:“至于诗中音节顿挫,如参背触,触则有相,背则非法。只要吟咏既久,自然而然有兔起鹘落,水到渠成之妙。”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所谓成竹在胸,借书于手;又所谓兔起鹘落,迅迫所见,稍纵即逝也。”

【纤徐委曲】 形容诗文委婉曲折,极具含蓄中和之美。《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文章纤徐委曲,说尽事理,惟欧阳公(修)得之。”又:“曾子固(巩)文章纤徐委曲,说尽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无遗憾矣。”

诗学研究

【诗序】一名《毛诗序》。诗经学专著。其作者及产生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东汉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后汉书·儒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卫宏所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加增益润色。韩愈曾说：“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甚至指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信从范曄《后汉书》，持卫宏作《诗序》之说。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最后成书时间已是东汉。当代学者赞同后一说的人较多。齐、鲁、韩、毛四家诗原都有序，但三家已失传，今所言《诗序》，皆指《毛诗序》。按此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诗序》提出“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风”、

“雅”、“颂”一般认为指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大序》阐述了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并对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精深的见解，涉及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肯定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由此生发。《大序》认为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正变”、“美刺”之说，着眼点完全集中于政治，忽略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诗歌的影响。《诗序》用儒家的“教化”观点，对《诗经》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或附会历史，或凿空妄说，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应当加以分析，区别对待。宋代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多所诂难，颇中其失。《诗》大小“序”均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有明代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明刊古文本等。（洪湛侯）

【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诗经注本。三十卷。西汉（一说秦汉间）毛亨撰。毛亨，生卒年不详。

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关于《毛传》的作者和传授源流,自汉迄唐,诸说不一。现代一般根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定为毛亨(大毛公)所作。相传其诗学传自荀卿,西汉初期开门授徒,所著《诗故训传》传之赵人毛萇(小毛公),为“毛诗学”的开创者。其书之章句训诂,大抵采用先秦学者的意见,取自先秦群籍。如释《既醉》、《昊天有成命》等篇,取自《国语》;释《葛覃》、《草虫》等篇,义见《礼记》。书中解释篇旨,常能保存古义。如谓《大雅·绵》首章叙述古公亶父避狄,自豳迁岐的事。这些经过,《孟子·梁惠王》篇、《庄子·让王》篇、《淮南子·道应》篇都有记载,《传》文引此有助读者了解周之先世自豳迁岐的历史。此书释词精当,义多可取。解字释词,皆有体例。或统释全篇于首章,或统释全篇于末章,或明假借,或释虚词,或以今语通古语,或以今义通古义,或用复词释单字,或用单字释复词,或倒文为训,或比况为训,或探下为释,或补足前训,或字同而训异,或字异而训同。总之,皆有体例可寻,稍加归纳,即见条理,足为古书训诂示范。于创作方法,则独标“兴”体。“六义”之说,最早见于《周礼·大师》“教六师”,《诗序》加以引述,但只解释《风》、《雅》、《颂》,没有说明赋、比、兴的涵义。《毛传》标示“兴”体,实属创举。据宋王应麟《诗经考异》引鹤林吴氏的统计,《毛传》标明“兴也”的凡一百十六篇。综观《毛传》所标“兴”诗,有的所标位置不当,有的与“比”义界限不清,还有少数误标、漏标。然将前人所传赋、比、兴的作法,首次运用于诠释诗篇,为后人提示说诗解文途径,意义重大。东汉末年,郑玄为《毛传》作《笺》,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进一步疏解《毛传》、《郑笺》。清代陈奂作《诗毛氏传疏》疏解更为完备。但毛亨解《诗》,往往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对一些诗篇的主旨,有所歪曲,是其缺陷。《汉书·艺文志》载《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原书已佚,后世传本,均附以《郑笺》。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单行本一部,又残本一部。清代段玉裁撰有《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三十卷。

(洪湛侯)

【毛诗传笺】简称《郑笺》。诗经注本。二十三卷。东汉郑玄(127—200)撰。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生当经学家郑众之后,故世称“后郑”。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学,后从马融学古文经。学成归里,聚徒讲学。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平生著述凡百余万言。其中以《毛诗传笺》、《毛诗谱》、《仪礼注》、《礼记注》、《周礼注》影响最大。郑玄自谓“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

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所谓“表明”,是对《毛传》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加以说明;所谓“识别”,是对《毛传》所说意见不同的地方,加以辨别。《毛传》释词,过分简略,而且很少疏通文理,说明篇旨。《郑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下,《毛传》曰:“丰,丰满也。巷,门外也。”解释词义而没有说明篇旨。《笺》云:“子,谓亲迎者。我,我将嫁者。有亲迎我者,面貌丰丰然丰满,善人也,出门而待我于巷中。”诗的主题就清楚了。郑玄作《笺》,本以尊毛为主,但遇毛说有明显未当之处,亦加笺出,以示订正。其有别解,亦附及之。均在传文之下,笺上已见,但不妄改《毛传》原文。例如《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下,《毛传》:“士,事也。”《笺》云:“他上,犹他人也。”按“士”与“人”为同义词,证之上章“岂无他人”,《笺》义较《毛传》为优。又如《式微》篇《笺》改训“式”为“发声”之辞;《终风》篇改训“终”为“既”,《子衿》篇改训“嗣”为“续”,《狼跋》篇改训“公孙”为“周公”,皆较《毛传》原释为胜。《郑笺》吸收了三家诗可取的训诂和解说。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郑笺》即全用三家说法。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氏兼通今古文,勾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他家。《郑笺》论《诗》旨亦有比附义理、牵强附会之处。此外,郑玄笺《诗》在注《礼》以后,往往以《礼》注《诗》,对《诗》中涉及礼制的地方,考释较多。《郑笺》除文字训诂外,偶尔也有借题发挥、感伤时事之语。清代陈奂《郑氏笺考征》,对《郑笺》的来源考证颇详。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四部备要》本等。

(洪湛侯)

【诗谱】诗经学专著。三卷,一作二卷。东汉郑玄撰。《诗谱》原有图,已亡佚。原本单行,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将《诗谱》文字分列有关各部之卷首,但已非全帙。其后单行本逐渐失传。宋代欧阳修,元代许谦,清代戴震、吴騫、丁晏等,都曾做过《诗谱》的考订和补辑工作。今本《诗谱》,首为《诗谱序》,其下有《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其下每一国风各有一谱,再其下为《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总共十七篇。《诗谱》所叙的内容,多为关于《诗经》各部分的世系源流、地籍变迁以及政治、风俗的介绍。根据刘勰和孔颖达的解说,是谱既有谱籍簿录的涵义,又有序文的作用。由于《毛诗》有“序”,所以郑氏改称为“谱”。郑玄在《诗谱序》中说明他论列各诗的世次是根据《春秋》次第和《史记》年表,编列以后,读者“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

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提供各诗的背景材料,是为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诗义。郑玄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按照时代排列和解释各诗的完整体系,使全部诗篇的编次固定下来,历经一千数百年不再散佚,《诗谱》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也留下不良影响。《诗谱》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有些史事出于传说,诗中并无内证,故所定历史世次,不可信者居多。例如《诗谱》说《商颂》是商朝成汤时代的诗,说《二南》中除《召南》中的《甘棠》《何彼秣矣》二篇为武王时代的诗以外,其余全部都是文王时代的诗,都不符合事实。《诗谱》继承《诗序》“正变美刺”的说法,并进一步发挥,将现存诸诗强分“正变”,按诸实际,根本不能成立。《诗谱》所叙史实,亦多舛误。《诗谱》于《毛诗正义》中分列各部卷首。另有各家辑本多种。宋欧阳修补亡一卷,《毛诗本义》附;清胡元仪辑一卷本,收入《皇清经解续编》。(洪湛侯)

【毛诗王氏注】诗经注本。四卷。三国魏王肃(195—256)撰。清马国翰辑。王肃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曾官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博通六艺,遍注群经。《魏志》本传说他“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王肃自己也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家语序》)他因此伪撰《孔子家语》,又作《圣证论》,用以作为自己立说的依据,每被后人诟议。王肃的诗学著作,《隋书·经籍志》载有《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疏》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一卷。《毛诗奏事》梁代即已亡佚,其余几种,《宋史·艺文志》未见记载。可见宋时就已失传。清代马国翰从《孔子家语》、《经典释文》、《毛诗正义》等书中辑出佚文,分别编成《毛诗王氏注》四卷,《毛诗义疏》、《毛诗奏事》、《毛诗问难》各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毛诗王氏注》的内容包括论述诗旨、阐述礼仪、考证名物、诠释字义、注释字音等方面。如《邶风·击鼓》“爰居爰处”下,王肃注云:“自爰居而下三章,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郑玄《毛诗传笺》则以为“从军者与其伍相约誓之辞”。论者以为王说为长。《诗经》中涉及礼制之纷争,如论昏年、昏期等等,郑、王多异说。后之论者见仁见智,亦各有所主。清人万斯大屡言郑、王相较,王说略胜。孙诒让则认为郊社禘祫,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鲁颂》“牺尊将将”下,《毛传》云:“牺尊,有沙饰也。”王肃注云:“大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以牺牛为尊。”是王肃以为牺尊者,器作牛形,空其中以为尊。此据所见而考证名

物,较毛说为长。《经典释文·叙录》云:“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淳、干宝、李轨。”据此可知王肃的文字音韵之学,亦早为世所称。今各家辑本,字音字义的佚文,辑自《经典释文》者为多。如《小雅·六月》“共武之服”王肃注“共音恭”,《周颂·赉》“於绎思”王肃注“於音乌”。辑本虽为断简残篇,却仍然能够看出王肃说诗是以申毛驳郑为宗旨的。《毛诗王氏注》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有清同治十年辛未济南皇华馆书局补刻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洪湛侯)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诗经学专著。二卷。三国吴陆玑撰。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古代治《诗经》,除有修养、教化之功外,还有博学之用。研究《诗经》的草木鸟兽虫鱼,称为《诗经》博物学。自东汉以来,《毛诗》之学,以《传》、《笺》、《正义》为代表,都是直接解经之作,陆玑此书,是研究《诗经》博物学的第一部专著,开了后世以考据名物治《诗经》的风气。原书久佚,此本不知何时何人所辑,大抵皆从《毛诗正义》中录出。据四库馆臣考证,《正义·卫风·淇奥》篇引陆玑疏淇奥二水名,今本乃无此条,可见采摭未为全备。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陆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唐初编《毛诗正义》全用其说。清初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陆玑之说为据。自陆玑以后,历代有关此类之书甚多,宋代蔡卞《毛诗名物解》、明代毛晋《毛诗陆疏广要》为其较著者。清代又有多种,黄春魁《诗经鸟兽草木考》较为难得(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当代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对《诗经》草木进行考订的,有陆文郁《诗草木今释》、耿烺《诗经中的经济植物》等。日人渊在宽编《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图解》收入《诗经动植物图鉴丛书》。《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收入《四库全书》。又有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光绪间有铅印、石印本多种。近现代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百部丛书集成》。各种丛书本中以《古经解汇函》本为佳。(洪湛侯)

【毛诗正义】一名《毛诗注疏》。诗经注本。四十卷。唐孔颖达(574—648)等撰,是唐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所作的《五经正义》之一,为唐时政府颁布的官书。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由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主体部分是《毛诗传笺》加上孔颖达等的疏文。《毛传》、《郑笺》被称为“注”,孔颖达等所作的“正义”,被称为“疏”,合称

《毛诗注疏》。《毛诗传笺》本是先秦、两汉《诗经》研究成果的代表著作,《孔疏》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全部保留《毛传》、《郑笺》的注文,并给这些注文,再作疏释。它的疏释都必须符合毛、郑的《传》和《笺》,不合的都不予采取。所以《毛诗正义》属于严格的汉学体系。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给《毛诗传笺》补充了新的注解,丰富了义疏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该书附有陆元朗(德明)的《毛诗释文》。陆氏著《经典释文》,综合汉魏以来文字音训研究的成果,考述经学传授源流,收集汉魏六朝学者二百三十余家所注五经文字的音切和训诂,使五经的文字每字都有音切和训义。《毛诗释文》是《经典释文》中的一种,它对《诗经》的文字作了简明的音切和训释,《毛诗正义》把它作为文字音训的标准,合编在一起,成为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它超过以前《诗经》传本的地方。《毛诗正义》以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的文字为定本。从汉代以来,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今古文各派之争,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师法多门,义疏纷纭,章句繁杂,连经文也互有出入。唐初为了实现经学的统一,先由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完成《五经》文字的统一;再由孔颖达等撰述《五经正义》,完成《五经》疏解的一致,都由朝廷颁行为官书。从此,诵读《五经》和明经科取士,经文必须依据《定本》,义疏必须依据《正义》。自《毛诗正义》采用颜师古考定的文字为标准以后,《诗经》的文句就完全固定下来,不再产生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一直流传到现在。《毛诗正义》曾对《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其言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正义·郑玄诗谱序疏》)是历代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第一家。关于“赋、比、兴”的问题,《诗序》没有说明它的涵义,直到《毛诗正义》,才在《诗大序》六义疏文中,引郑玄《周礼·春官》六诗的注文,并补充说“诗文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诸言‘如’者,皆比辞也”;“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又总结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得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成为早期《毛诗》学派的权威论述。《毛诗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持论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

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毛诗正义》收入《四库全书》,又有《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书后附阮元《毛诗校勘记》)。通行有《四部备要》本与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

(洪湛侯)

【毛诗指说】 诗经学专著。一卷。唐成伯玙撰。伯玙生卒年及生平未详。此书凡四编。第一编曰兴述,说明陈诗观风与孔子删诗正乐等事;第二编曰解说,先解释诗义,《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训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第三编曰传受,说明四家诗授受世次和说诗源流。第四编曰文体,研究《诗经》句法的长短、篇章的多寡、措辞的异同以及用字的体例等。此书篇幅不多,前人很少提及。今按其书,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解诗上,不管毛亨、郑玄说法如何,成伯玙完全按照己意去解诗。影响所及,开启了宋以后学者以己意解诗的风气;二是对于《诗序》,定“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萇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苏辙作《诗集传》,于《诗序》惟存其发端一语,以下馀文,悉从删汰。其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实则成伯玙已先言之,他对《诗经》的研究,的确起过一些启迪作用。此外,他注重文体,对于研究《诗经》的艺术特点,也是很有帮助的。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洪湛侯)

【诗本义】 一名《毛诗本义》。诗经学专著。十六卷。北宋欧阳修撰。包括本义说解一百十四篇(卷一至卷十二);一义解二十篇、取舍义十二篇(卷十三);时世论、本末论、幽问、鲁问、序问(卷十四);统解(卷十五)等部分。郑氏诗谱补亡及诗图总序附于卷末(实即卷十六)。本义说解为此书的主体,二论三问则属专题讨论,这些最能窥见作者诗学的基本观点。本义说解多议毛、郑之失。欧阳修在《诗统解序》中提出“予欲志郑氏之妄,益毛氏之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作者早年定下的著书宗旨,颇能坚持始终。对于《诗序》,他是崇信的,在本义说解中,议及序言失当的仅《蠡斯》、《兔罝》等十篇,而评诋毛郑之失者则随处可见。例如《召南·甘棠》篇“本义”云:“毛、郑皆谓蔽芾小貌,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齐风·东方之日》“本义”云:“以诗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郑固皆失之矣。”《周颂·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本义”认为“亦”为语助,“亦白其马”,只是说有客乘白马而已。指斥毛、郑所释“亦周也”、“亦武庚也”皆“妄自为说”。二论三问集中表现了论诗见解。《本末论》把对诗义的解说,归纳为诗

人之意、圣人之志、太师之职、讲师之业四类,并区分本末。主张学者应以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为本,太师之职与讲师之业为末。读诗最重要的是要求得诗人之意,也就是诗的本义,至于太师之职、经师之业即或不去谈它,也无关紧要。他把诗人之意与经师之业分别开来,对那些妄自为说的经师,加以贬抑,是非常卓越的见解。至于他认为《诗经》中具有体现“圣人之志”的教义,认为美刺是诗人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则是错误的,不可取的。《时世论》指出旧时所定作诗时世的矛盾与零乱,指出《诗序》、《诗谱》论述的不当。欧阳修经过考核,认定《关雎》、《鹿鸣》皆周衰之诗,认定《周颂·昊天有成命》、《周颂·噫嘻》皆康王以后诗,认定《周颂·执竞》为昭王以后诗,都是非常可取的见解。《幽问》对于郑玄将《七月》诗八章,分为风、雅、颂三体,提出质疑;《鲁问》对于《鲁颂》盛称鲁僖公的武功,提出质疑;《序问》对子夏作序,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大都中肯。惟在《序问》中肯定《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则是错误的,因为《诗序》晚出,序中多附会和引用先秦典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欧阳修的《诗本义》主要为纠正毛郑之失而作,论及的仅《诗经》中的一部分而非通论全书,理论未成体系,又多尊信《诗序》之说,因而书中难免瑕瑜互见。虽然如此,欧阳修论诗的见解,对整个宋代的《诗经》研究,仍然起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苏辙、郑樵、朱熹更起着直接的启迪作用。《诗本义》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系据钱遵王宋刊本复刊,较佳。(洪湛侯)

【诗辨妄】 诗经学专著。三十四条。宋代郑樵(1104—1162)撰,今人顾颉刚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读书夹漈山中,不应科举。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后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学者称夹漈先生。造述甚富,著作等身。据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统计,就有近六十种,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有《诗辨妄》六卷、《诗传》二十卷,俱已散佚失传。《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载有郑樵《诗辨妄》自序一篇,本文二十三条。所谓自序,是辗转采用《艺文略》的按语删节而成,本文二十三条,前二十二条俱见樵所著《六经奥论》,第二十三条“序草木类兼论诗声”竟是摘抄《通志·昆虫草木略》之序。为此顾氏重新搜辑佚文,编成这个新的辑本。《诗辨妄》极力反对《诗序》。《诗序》的真伪和价值,历来聚讼纷纭,唐代韩愈、北宋欧阳修都已指出《诗序》不出于子夏,郑樵更认为《诗序》绝非子夏所作,所论十分精辟。

此外,论及《小序》释义不当的就有二十余篇。如谓《芣苢》全无“乐有子意”,《简兮》美君子“何得为刺诗”?《将仲子》“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皆中肯綮。《节南山》序言“家父刺幽王”,家父乃桓王时人,郑樵指出:“自幽及桓,盖七十年,何得家父复仕幽朝?”《召旻》之诗,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本是取始末章一字为题,更无深意,《诗序》云:“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荡》首句“荡荡上帝”,谓天之荡荡然无涯也,故取“荡”字名篇,序者不知所出,则曰“天下荡荡然无纲纪文章”,是皆题外发挥,背离诗旨,故郑樵揭而出之。郑樵鄙夷《诗序》,有些说法,虽流于偏激,甚至矫枉过正,但他勇于疑古,直抒己见,尽揭《诗序》之非,对于南宋朱熹考辨《诗序》产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郑樵特重名物之学,《诗辨妄》辑本中,有关考辨鸟兽、草木、天文、地理的论述,不少概见。郑樵治诗,很注重声歌。在《诗辨妄》中论风、雅、颂说:“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风、雅、颂皆声,无形与象,故无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风本风雨之风,雅本乌鸦之鸦,颂本颂容,奈何叙诗者于错字中求义也?”他考定“风、雅、颂皆声”,申述他以乐说诗,主声不主义的观点。清代阮元的释颂,章炳麟的说雅,未尝没有受到郑樵的启迪。可惜《诗辨妄》中论诗乐、论声歌者还不多见,估计原有而已散佚。《六经奥论》尚有数篇,可供查考。《诗辨妄》辑本收入《古籍考辨丛刊》第一辑。

(洪湛侯)

【诗论】 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程大昌(1123—1195)撰。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绍兴进士,任太平州教授、江西转运副使,后又出知泉州、明州,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有著作多种行世,以《考古编》、《演繁露》、《雍录》等,较为知名。《诗论》原隶属于《考古编》之中,故《宋史·艺文志》未单独著录,明末清初刻入丛书,如明崇祯间的《芝园秘录初刻》、清初曹溶《学海类编》,皆收有《诗论》一卷。《诗论》分若干专题,论《诗经》的体制、历史和优劣得失,而不疏解诗句,在经解之中,别开生面。今本多作十八篇,而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七篇,题为《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始改为十八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考原本亦作十七篇……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分之,亦非未见也”。所论十八题(篇)中,以论“古无国风之名”、“南为乐名”最为有见。“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举《论语》中孔子言诗,未尝有言国风者,季札观乐所称,亦无国风名目以为论证。若“古”谓战国以前,则其说当为可信。至谓“左、荀创标风名之误”则系强

以己意,揣测原委,难免求深反感。程氏论南为乐名,主要以《诗序》所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等论说之不当,反证南本为乐。并又专设“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一题,加以论证。对“南”之解释,历来诸说纷纭。《诗序》“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一说以外,尚有毛亨、郑玄的“南夷之乐”说,《吕氏春秋》的“南音说”、林艾轩、赵惠等的“南为楚风”说、王质和崔述的“南为诗体”说,旧说还有以南国、南土、南面以及诗中多有南字等,作为得名为“南”的理由。要之,终以程大昌提出的“南为乐名”最为允当。《诗论》中论及《诗序》者凡五六题,然多非程大昌首创之论。其论“诸国为徒诗”。南宋以后,议者殊多。元代吴澄,清代陈启源、顾镇、马瑞辰、魏源、范家相、皮锡瑞皆举证以辨其非。至于改定《毛诗》标题,程大昌根据《左传》记季札观乐,有雅、颂而无国风之名,乃改定今本《毛诗》标题。如原本作“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毛诗·国风”,程大昌改为“关雎诂训传第一·毛诗·周南”,并云“召南视此而定”。自邶至豳亦皆加以删改,删去“国风”二字。皆系妄改旧文,很不可取。《诗论》有《芝园秘录初刻》本、《学海类编》本、《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百部丛书集成》本。以《学海类编》本为佳。(洪湛侯)

【诗总闻】 诗经注本。二十卷。南宋王质(1127—1188)撰。王质,字景文,郢州(今属山东)人,后徙兴国(今属江西),绍兴进士。博通经史,官至枢密院编修。著有《雪山集》、《绍陶录》等。《诗总闻》体例谨严,条理清晰,所列凡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等十门。每篇又皆有总闻,述其大意。王质认为“二南”是诗的一体,是《诗经》“南、风、雅、颂”四个组成部分之一,并认为它们都是乐歌之名,为此又撰“闻南”、“闻风”、“闻雅”、“闻颂”,分别冠于四个部分之前。持之有故,皆成一家之言。南宋之初,撰序言诗的有郑樵、王质、朱熹三家。“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不字字诋《小序》,故攻之者亦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朱熹疑序受郑樵影响,未言因于王质,可见持论亦不尽相同。王质自称“覃思精研几三十年,始成此书”,书中不乏毅然自用、别出新裁的地方。他主张“说诗当即辞求事,即事求意”(见《周南·葛覃》总闻),所以常能阐发出诗篇本身的文学意义。如说《卫风·竹竿》是:“此去家归人犹在卫,故不离淇水也,举目不见,举足难至,虽近亦以为远,所谓寸步千里,前人亦常见吟咏之间。”说《王风·君子于役》:“当是在郊之民,以役适远,而其妻于日暮之时,约鸡归栖,呼牛羊来下,故兴怀也。大率此时最难为别怀,妇人尤甚。”诸如此类,都能直探诗旨。此书行

文持论,颇有文采,比较耐读。《诗总闻》中,也有不少务造幽深,穿凿悬解之处。如说《齐风·甫田》为“老臣事幼君之辞”;说《桧风·匪风》“当是关中之人,为山东之客者,其知友送归,以此寄怀输情,殆贤者也”。如此者皆颇难索解。王质关于六义的见解,亦与众不同。他认为《周礼》既称太师教六诗,诗三百篇仅是六诗中的风、雅、颂,则赋、比、兴或另有诗篇,他在《诗总闻》中曾说“当是赋、比、兴之诗皆亡,风、雅、颂三诗独存”。这也许是因为汉张逸曾问赋、比、兴之诗而引起的猜度,然亦通人之蔽也。《诗总闻》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百部丛书集成》本。以《经苑》本为佳。(洪湛侯)

【诗集传】 诗经注本。八卷。南宋朱熹撰。朱熹解诗,不信《诗序》,著《诗序辨说》,系统辨斥序说之非。对于《国风》,朱熹也有重大发现,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对于“六艺”中的《风》、《雅》、《颂》,他提出乐歌分类的观点,认为《风》是“民俗歌谣之诗”,《雅》是“正乐之歌”,《颂》是“宗庙之乐”。在作《诗集传》后二十年,说得更详细,他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燕享、朝会、公卿、大夫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王柏《诗疑》引)而且兼及作者,这些,都是汉人所不能道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它诠释诗旨,常多新意。《诗集传》不录《诗序》,每诗之下,都加上自己所作的解题。如说《邶风·北风》为“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说《秦风·蒹葭》为“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这些论述,都比较切近诗旨,且与《诗序》异趣。书中提示作法,义胜前人。《大序》提出“六义”,《毛传》独标兴体,对“赋、比、兴”的含义和用法,都没有作任何解释。《孔疏》把比、兴与美刺混在一起,说到后来,兴与比就很难分别了。朱熹提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一说法,较以前各家所说,简明扼要,平实得体。《诗集传》在每章诗下面,都分别标明其为赋、为比、为兴,对三者的区分,非常精细。朱熹善于博采众长,断以己意。文字音义方面,杂采毛、郑,间用齐、鲁、韩三家,以己意为取舍,不拘泥于训诂笺订之学。宋末王应麟曾历举《诗集传》于《关雎》、《柏舟》、《宾之初筵》等篇采三家诗说为例,盛赞其博采众长。清人陈澧也曾举出《柏舟》“我心匪鉴”和《击鼓》“爰居爰处”等条,谓皆“甚得毛

义,胜于《郑笺》者”,他认为《毛传》简约,《郑笺》多纡曲,《朱传》解经,则务使文从字顺。《诗集传》又有注解扼要,文字浅显的优点。注意韵读,注明读音,不厌其详。但《诗集传》因袭《诗序》之处,仍然不少,特别是二南部分。又常用“天理人欲”之说解释一些恋爱婚姻的诗,不免歪曲诗旨,表现出道学家的谬见。《诗集传》于《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十卷,今本八卷,盖后世坊刻所并。宋刻本现存只有两部,都残缺不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八卷。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现存台湾。明清刻本很多,清代收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二十卷,尚可窥见原书面貌。通行本有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洪湛侯)

【诗序辨说】 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朱熹撰。朱熹怀疑和考辨《诗序》,主要受郑樵《诗辨妄》的影响,经与《史记》、《国语》等书核对,益知《诗序》之不足信,因作《诗序辨说》,分析《诗序》致误的各种原因。首先是正变美刺之不当。如《楚茨》以下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风刺之意,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应属失误。又如《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皆非刺庄公,《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皆非美宣王,如此者数十例。凡有所辨说,所下考语都比较精当。其次为附会历史致误。如《将仲子》诗,《诗序》附会郑庄公、共叔段之事,朱熹辨之曰:“事见《春秋传》。然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今从其说。”再次为据谥而定美刺以致误。例如《蟋蟀》一诗,被《诗序》强指为“刺晋僖公”,朱熹则指出《诗序》所言与诗意正相反。朱熹还指出《宛丘》、《东门之枌》,《诗序》指为“刺幽公”亦以“谥恶”之故。复次为指实其人以致误。《诗序》释诗,指为刺某君、美某公的特别多,皆不顾诗义,指实其人。朱熹往往辨之。最后为凿空妄语以致误。作序者凿空妄语,是《诗序》致误的最大、最常见的原因,后人据此再加推衍,言人人殊,以致离题万里者比比皆是。朱熹皆一一考辨而深斥之。《诗序辨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诸如将男女情爱之诗,一概斥为淫诗;对于二南,不能摆脱“诗教”,只把其中所谓“美后妃”的诗改成“美文王”而已,即使对某些细节,有所辨正,终不能得诗之本义。尽管如此,综览全书,揭露《诗序》之非,每多胜义,其成就远胜欧阳修、郑樵、王质。自北宋以来,能以考辨《诗序》为专书,高举反序大旗冲锋陷阵者,惟此一家。《诗序辨说》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唐宋丛书》本、《朱子遗书重刻合编》本、《五经补纲》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百部丛书集成》本。此外,《西京清麓丛书正编》、《刘氏传经堂丛书》均附于《诗集传》之后,亦皆一卷本。(洪湛侯)

【非诗辨妄】 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周孚撰。北宋时,郑樵作《诗辨妄》,辨《诗序》及毛、郑之非,周孚因作此书,责难郑樵,其自序云:“……自汉以来,六经之纲维具矣,学者世相传守之,虽圣人起,未易废也,而郑子乃欲尽废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见于予书。”可见作书之旨,实为卫道而非学术之争。书中所举凡四十二事,大多缺乏正确理由和事实根据。如驳郑樵“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一条,仅称“理或有之”(原书第二条);驳郑樵“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一条,竟说“其世不可知,则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原书第二十三条);驳郑樵“《召旻》诗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为题,更无他义”,非之曰“此苏子之说也,申言之何益”(原书第二十八条)。从以上三例看来,或作疑辞,或逞强辩,或者借故推诿,答非所问,皆不足以服人。其他未审原意,即加指责者,深文周纳、巧辞以辨者尤多。郑樵论诗,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为守旧势力所容,他的《诗论》和《诗辨妄》成书不久便归于散佚。清代辑佚之风勃兴,亦未见辑之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没有收录和提及郑樵的《诗经》著作,而且还在周孚《蠹斋铅刀编》提要中横加指责。其实,周孚非郑之语,偏激舛谬,大都不堪一驳。《非诗辨妄》清代有单刻本、丛书本多种。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百部丛书集成》,丛书以《涉闻梓旧》本为佳。(洪湛侯)

【吕氏家塾读诗记】 诗经注本。三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东莱集》等。此书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它坚守序、传、笺、疏,按序说诗。在诗篇正文之前,首列《诗序》。各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自毛萁以后,凡引四十四家。书中所称“朱氏曰”者,即所采朱熹早期的见解,其后朱熹疑序,自变前说,吕祖谦则仍坚守毛、郑,成为宋代汉学的最后壁垒。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按汉学诗经学,在《毛诗正义》颁行以后,似已告一段落,宋代汉学家虽然作些零碎修补,少有重大发明。此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可以看作宋代汉学《诗经》注释的普及读本。书中名物训诂,较为详悉,于此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诗经学史

的重要资料。《吕氏家塾读诗记》有明嘉靖刻本、清嘉庆中听彝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墨海金壶》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和《百部丛书集成》。丛书本以《墨海金壶》本为佳。

(洪湛侯)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诗经学专著。三卷。南宋戴溪撰。戴溪字肖望(一说字少望),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历官工部尚书、华文阁学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是“宋戴溪所续吕祖谦之书也。……溪以《吕氏家塾读诗记》取《毛传》为宗,折衷众说,于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篇内微旨,词外寄托,或有未贯,乃作此书以补之,故以续记为名,实则自述己意,非尽墨守祖谦之说”。此书与吕书颇有不同,其解说每与《诗序》相违。如《召南·驺虞》,吕书据《诗序》释为“《鹊巢》之应”,戴溪则云:“草方萌芽,遂以蒐田无蹂践之患,田有五祀,一发遽止”,视为国人所作歌咏狩猎的诗。《小雅·鹿鸣》,戴溪定为“燕嘉宾之歌也”,并且明白指出“诗辞止言嘉宾,序诗者增言群臣”,不遵序说。该书不录诗文,但述篇义,与吕书在诗篇之前,首列《诗序》,每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之体例迥异。戴氏说诗常有可取之见。如谓《唐风·葛生》为“妇人思其君子也……此新婚之别,古之所以为叹也”;《小雅·白驹》为“诗人惜贤者之去而冀其复至也”;所言皆平实简易,每得诗旨。再如《周南·采芣苢》之诗,谓“采采芣苢,凡六言之,采取收拾,执衽褊裾,其同辈相乐,一时嬉戏尚可想也”,黄震《日钞》极其赞赏,谓所言“得其气象”。凡此,皆吕书所不及。此书清初未见传本,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其佚文,谓已得十之七八,其原序总纲则已无从补录。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百部丛书集成》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为佳。

(洪湛侯)

【诗缙】 诗经注本。三十六卷。南宋严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未详。曾官清湘令,能诗。此书采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并杂采诸说以发明之,旧说有未妥者则断以己意。如论大小雅之别,以为其体不同,较《诗序》“政有大小”云云,于理为近,可备一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盖就汉学家立场以言,非持平之论。然其书虽杂采旧说,却时有新义。如说《小雅·无羊》“牧人乃梦”是设词颂祷,非牧人实有此梦;又释“风雨”,认为“诗多以风雨喻暴乱;北风其凉喻虐,风雨凄凄喻乱,风雨飘摇喻危,大风有隧喻贪”(见《邶风·谷风》)。又如《王风·中谷有蓷》,旧以蓷之晒干喻夫妇

相弃,此书则谓岁旱草枯,由此而致离散。凡此之类,说解都比较通达,特别是能够注意到文学写作手法,并能通贯全书。对于音训名物,考证亦颇精核。书中也有不少墨守旧说,或发挥不当之处,如说《邶风·绿衣》是“绿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是皆遵从《诗序》之说,可以看到所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有明赵府居敬堂刊本。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又有清嘉庆刊本、光绪十六年刊本等。今通行有民国时期复性书院刊本。

(洪湛侯)

【诗疑】 诗经学专著。二卷。宋王柏(1197—1274)撰。柏字会之,一字仲会,号鲁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朱熹三传弟子。曾任丽泽书院山长,著述甚富,凡数十种,以《书疑》、《诗疑》为最著名。王柏相信《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的。认定凡是不符合“诗无邪”宗旨的诗篇,都是汉儒妄补乱入的,并认为今本《诗经》出现的错乱,都由汉儒传写造成,因此他主张对《诗经》的篇章次序加以梳理、改动,删除所有“淫诗”。如他认为,“《下泉》四章,其末章与上二章全不类”,《东方未明》“折柳樊圃”两句“与上下意不贯”,此为错简例;他主张把“《豳风》七诗,以类分入变雅”,主张将《閟宫》的九章改为八章,将《硕人》的四章并为三章,此为改变篇次、章次例。他还提出“《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车》当曰《小车》”,此为改变诗篇题目例。最令人感到骇异的是:王柏在《诗疑》卷一,开列了议删的三十二首“淫诗”如《野有死麕》、《静女》、《桑中》等的目录,认定这些诗篇都是汉儒窜入的。成为《诗经》研究史上一大公案,自元至清,附和者只是少数,多数人都对此都加以口诛笔伐。王柏这一主张的出发点是为了卫道,封建学者反对王柏,责备他非圣无法,妄自尊大,敢于删削孔子所订的经典,目的也是为了卫道。在这个具体议题上,旧时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王柏所抱的宗旨是一致的。《诗疑》有《通志堂经解》本。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洪湛侯)

【诗缙绪】 诗经学专著。十八卷。元刘玉汝撰。玉汝字成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尝举乡贡进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题洪武癸丑(1373),则明初尚存也。元代的诗经学,已成为朱熹学派的天下,当时的诗学著作,如刘瑾《诗传通释》、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梁寅《诗演义》等,大都演述朱熹之说,尺寸不逾,少有发挥,惟独刘玉汝所作《诗缙绪》,对于朱熹《集传》,有所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云《缙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凡《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说而遗彼说,或宗主此论而兼用彼论,无不寻绎其所以然……虽未必尽合诗人

之旨,而于《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刘氏阐发《集传》,主要在论比兴之例和用韵之法两个方面,论比兴,谓有取义之兴,有无取义之兴,有一句兴通章,有数句兴一句。分析取兴的方式,别为一体者,亦复不少。阐明用韵之法,曾指出有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韵为韵等类型。此外,论风雅之殊,谓有腔调不同之类,皆可供参考。综观其书,对《集传》所定比兴,发明尤多。例如:《黍离》篇云:“以《黍离》为赋者,谓故都宗庙宫室全不见,而所见惟此耳。然不言所不见,惟言所见,则故都兴亡盛衰之感,皆在黍离二语,而有无限悲怆之情矣,故因以兴下文行迈心忧之意。”这是对《集传》“赋而兴”的阐发。《关雎》篇云:“兴有二例:有无取义者,有有取义者。传前以彼言此者,无取义也;后言摯而有别,和乐恭敬者,兼比也。兼比即取义之兴也。”这是对《集传》“兼比之兴”的阐发。此外,谓《兔罝》篇“此诗全篇兴体也”;谓《泉水》篇“首章之兴,乃一篇之兴”;谓《园有桃》篇“此所兴与所咏尤不相干,不过托此起辞”。分析《集传》比兴之旨,极为精细。此书诸家书目皆未著录,独《永乐大典》颇载其文,四库馆臣辑其佚文,定为十八卷。今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洪湛侯)

【毛诗古音考】 诗经学专著。四卷。明陈第(1541—1617)撰。陈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万历秀才。好学,喜谈兵,精通《五经》,尤长于《诗》与《易》,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尚书疏衍》、《一斋诗集》等。《毛诗古音考》考证古音,订正“叶韵”之说,是他的代表作。“叶韵”说开始于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泛滥一时,竟有为求“叶韵”而擅改古书文字者。朱熹作《诗集传》、《楚辞集注》推用甚广,其弊至于一字数读,随处可见。明人杨慎在《升庵经说》的《毛诗》四卷中,对“叶韵”说已颇致疑,他用归纳方法,举例探讨《诗经》古音的已有数十条之多,然而敢于撰写专书,彻底否定“叶韵”说的,陈第是第一人。陈第《毛诗古音考》,列举大量材料,证明古有定音,指出“叶韵”说的荒谬。他研究了《诗经》用韵与同时代的《易·系辞》、《左传》、《国语》及稍后的《楚辞》等书基本相合,从而推论出《诗经》的用韵是以当时的实际语音为基础的,通过大量的对比研究,他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著名论点,告诉人们,用今音读古诗之所以不谐,并不是因为古无定音,而正是语音演变的必然结果。本书考证古音的方法和体例也很有特色,每字先注音讲解,后列本证、旁证,以加强论据。“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

《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论证古音,虽有创始之功,亦有不足之处。今人康瑞琮在点校此书的《前言》中曾有较详细的论述。《毛诗古音考》由康瑞琮用渭南严氏刻本点校,并编制全书条目的音序和笔划索引,附于书末。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洪湛侯)

【田间诗学】 诗经注本。十二卷。清钱澄之撰。此书大旨以《诗序》首句为主,所采诸家论说,自《毛诗正义》、《诗集传》以外,以宋人之说为多,有十五六家,元代未引,明代仅及四家。所引诸家之中,王安石、杨时、范祖禹、谢枋得四家,今无传本,盖采于他书,陆佃、罗愿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而已。钱氏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十之四。书成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其时官学仍恪宗《集传》,然此书已不墨守朱熹一家,显露出倾向汉学之端倪。论者以为其书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有安徽桐城刊本。(洪湛侯)

【诗绎】 诗经学专著。不分卷。清王夫之(1619—1692)撰。王夫之是清初著名学者,著述甚富,遍注群经,《诗绎》是他研究《诗经》所作的具有诗话性质的专著。另外,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也有论述《诗经》艺术的见解。还有《诗经稗疏》,是疏释《诗经》的著作,《诗广传》则是一部读诗的杂感集。前述两种,注重讨论《诗经》的创作艺术,后两种都是研究《诗经》的内容。以前一般以《诗广传》影响最大,《诗绎》晚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夫之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艺术研究的第一人,《诗绎》则是他从文学角度评论《诗经》的第一部专书。在《诗绎》中,王夫之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如强调诗篇应含蓄而有馀韵。他称赞《周南·采芣》说:“‘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认为《诗经》以后,只有《古诗十九首》和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写出过这样富有馀韵的意境。他提出“意藏篇中”、“字外含远神”、“句有馀韵”才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总结《诗经》和其他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创作经验指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分析《小雅·采薇》末段指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关于比兴,王夫之认为必须要自然而然,提出“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

他赞赏“《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诗绎》还论及《诗经》的优秀传统,“故汉魏以远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绎以三唐”。并指出李白、杜甫都有一些句法借鉴《诗经》。杜甫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继承《小雅》、《国风》政治讽喻和社会怨诽诗的优秀传统。《诗绎》收入《清诗话·蓂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洪湛侯)

【诗经通论】 诗经学专著。十八卷。清姚际恒(1647—1715)撰。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安徽休宁人,长期寓居浙江仁和(今杭州),诸生。博览群籍,潜心百家,年五十始作《九经通论》,历十四载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成书,《诗经通论》为其中的一种,又著有《庸言录》,末附《古今伪书考》。《诗经通论》有姚氏自序,目录卷前有《诗经论旨》和《诗韵谱》,从自序和《论旨》中可以窥见作者的诗学观点。对于前人的诗学著作,他认为“《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鹵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矣”,故是书的重点是评论《诗序》和《诗集传》,他认为《诗序》是卫宏所作,驳杂不可信,并举《大雅·抑》、《周颂·潜》两篇序文,以为《诗序》晚出之证;对《集传》则讥诋尤力,且多过激之词,攻朱甚于攻《序》,矫枉过正,有失公允。姚氏自视甚高,笔舌滔滔,放言高论,批评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他认为把《关雎》篇的“雎鸠”说成“拳而有别”,把《汉广》中的“乔木”说成“上疏无枝”,都是陈言习语,凿空妄谈。姚氏论诗,主张排除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篇本文去探求诗旨。故其书力去陈言,用文学观点解释诗义,确为一大特色。对于具体诗篇,或诠释诗旨,或分析作法,或圈评鉴赏,皆有独到之见。如说《邶风·君子偕老》中的“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认为此篇是宋玉《神女赋》、曹植《感甄赋》的滥觞;谓《豳风·东山》“末章骀荡之极,真是出人意表。后人作从军诗必描写闺情,全祖之”。书中评注鉴赏,亦不乏精彩之论:如《葛生》第四章“夏之日,冬之夜”,第五章改为“冬之夜,夏之日”,姚氏评曰:“此换句特见时光流转。”《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下,姚氏评曰:“无寒字,觉寒气逼人。”凡此,皆赏析独到,大可启发读者文思,提高鉴赏能力。姚氏曾对宋人提出的“趁韵”之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解《丘中有麻》,谓子嗟、子国必非人名,而是“丘中有麻”之“麻”字,“丘中有麦”之“麦”字的“趁韵”字,并推论《邶风·桑中》之“孟弋”、“孟庸”,《郑风·山有扶苏》之“子充”,说

“弋”、“庸”、“充”都是“趁韵”的用词。按照这样的解释,《丘中有麻》、《桑中》、《山有扶苏》说的都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更不是三个人。诗歌须要协韵,须要重复,因而用了没有意义的“趁韵”字,与内容无甚关系,这确是姚氏的一个重要论点,如果此说能够进一步完善,《国风》中不少难题,可望迎刃而解。这些独特的见解,在汉、唐人的经解中是找不到的。《诗经通论》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和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标点本。

(洪湛侯)

【毛诗稽古编】 诗经学专著。三十卷。清陈启源撰。陈启源字长发,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时诸生。是书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卷末自记,谓经历十四年,三易其稿乃定。此书前二十四卷,依次解说各诗,而不载诗文,但标篇目。其无所论说者,则并篇目亦不载。此书训诂以《尔雅》为依据,篇义以《诗序》为依据,诠释内容依据《毛传》、《郑笺》,名物依据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它所辨正的以朱熹《诗集传》为多,对宋元诸家亦有诋评,对刘瑾《诗集传通释》掎击尤甚。从二十五卷到二十九卷为《总诂》,分列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都是关于声音、文字、名物的考证。最后附录一卷,统论《风》、《雅》、《颂》三类诗的意旨,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它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而写作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推为“征实之学”。《毛诗稽古编》收入《四库全书》、《皇清经解》,又有嘉庆十八年(1813)庞氏刊本、光绪石印本。

(洪湛侯)

【诗经传说汇纂】 原名《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

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洪湛侯)

【诗藩】 诗经学专著。二十卷。清范家相撰。范家相字衡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此书之外,尚著有《三家诗拾遗》十卷。《诗藩》乃其释《诗》之作。首为“总论”三十篇,以下依次论说,皆不载诗篇本文,只是列出篇目,对于旧说无须置辨者,篇目亦不列出。所论大旨斟酌于《诗序》和朱熹《集传》之间,而断以己意。如解《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小雅·信南山》“南东其亩”“中田有庐”以及《楚茨》诸篇,考证详悉,依据确凿,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许。“总论”第十五条谓三百五篇之韵,叶之而不谐者,有三方面的原因:“列国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数音,而字音传说已久,非可执一以谐声,二也;诗必歌而后出,每以余音相谐,自歌诗之法不传,而余音莫辨,三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说“足解顾炎武、毛奇龄二家之斗”。范氏之学,源出萧山毛奇龄,持论较奇龄和平、通达,在康、乾时期的诗经学者中,能卓然成一家之言。《诗藩》收入《四库全书》,又有清乾隆刊本、嘉庆中与《三家诗拾遗》合刊本、古趣亭刊本。(洪湛侯)

【诗切】 诗经注本。五十卷。清牟庭撰。牟庭字陌人,山东栖霞人。乾隆贡生,曾任观城县训导。长于经、子、方术之学,著述凡五十余种。其中《同文尚书》和《诗切》,尤为毕生精力所萃。《诗切》稿凡六易,方才写定。取《荀子》“《诗》、《书》故而不切”一语以名其书。作者认为,周秦诸家治《诗》,多注重训诂字义,鲜能切说文意,因为不切之故,以致诗义难明。故所著此书,于汉、宋诸家,皆所不取,亦不泥三家之说,惟是自出己见,以探求有合于诗人之本怀。本书体例,每篇每章,先列诗文。每章之后,皆有说解,杂引鲁、齐、韩和毛、郑以及《尔雅》、《释文》故训,加以

考核论断,最后出以己见,作为结论。说解既竟,标一圆圈,圆圈之后,更用古今字相比,切为韵语,很像现代的《诗经》今译。《诗切》所作新解,多见功力。例如《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汉儒解“祛”为“衣袖”,清人无异说。牟氏援用《左传》、《管子》、《方言》郭注等有关文献资料,考定“祛”为“衣裾”。此外,以俗语释古词,以声训释难词,以及运用“右文说”释词,皆有创获。本书之缺点为刻意求新,流于武断。如释《竹竿》为“卫姬作也,自请和亲,以释献公于曹也”;释《蒹葭》为“百里奚作以荐蹇叔于秦也”。尤有甚者,牟氏对《诗经》全书的篇章,凭主观臆断,作了很大的调整分合。例如《周颂》原本三十一篇,牟氏“依文义合为十二篇”,《豳风》原本七篇,牟氏合《破斧》、《伐柯》、《九罭》为一篇,又入《下泉》一篇,改为六篇;又如牟氏分《丰》篇“衣锦絺衣”以下二章为别一篇;又改《东方之日》为《东方日》,改《鸛之奔奔》为《鸛》,改《东方未明》为《折柳》,把整部《诗经》改得面目全非。此书写成后从未刊刻,以写本流传,1982年齐鲁书社据写本影印,原缺《小雅·鹿鸣》至《雨无正》三十三篇。(洪湛侯)

【读风偶识】 诗经学专著。四卷。清代崔述(1740—1816)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今属河北)人。乾隆举人,嘉庆间历知福建罗源、上杭诸县,有政声。乞归后以著述终老。治学富疑古精神,喜独抒己见,对史学造诣甚深,以《考信录》和《读风偶识》著称于世。后人编有《崔东壁遗书》。崔述解《诗》,最大成就在于有历史观念;《读风偶识》常有创见,考证精辟,立论坚实,足以自成一家。其书本以批判《诗序》为主旨。在崔述以前,郑樵、朱熹、章如愚、姚际恒,在他以后魏源、皮锡瑞都曾历指《诗序》之非,然而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义理方面,唯崔述能用历史观点检验它是否符合史实。崔述认为《诗序》以世次划分“正变”,以“正变”定“美刺”,分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他指出《七月》、《东山》、《破斧》“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还指出《淇奥》、《缁衣》、《鸡鸣》、《蟋蟀》“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他还举出一些具体诗篇,说明“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所辨都很有说服力。他认为《毛诗》最讲不通的地方就是用诗的世次来定“正变”,许多穿凿附会都由此而来。崔氏在这方面的辨诂,多中肯綮。《诗经》注解问题最多的是《国风》,《国风》中曲解最多的是二南。《读风偶识》对二南的论述,最为精辟,为全书的精粹所在。崔述不同意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认为《周南》、《召南》在文王之世的说法。他首先考核所谓“文王之化”的问题,在《考信录》中考定西伯姬昌只是在后来才被追封为

文王的,否定了文王曾自封为王,也就否定了由所谓“文王之化”衍生出来的各种说解,从根本上推翻了《诗序》对二南的附会。崔氏并进一步据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的史实,论证了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亦不尽系成康时诗。如《汉广》“乃周衰时作”,《汝坟》“乃东迁后诗”,《甘棠》“作于康、昭之际”,《行露》、《羔羊》二篇“为周道衰,穆王以后所作”等。崔述的考论对于推翻《诗序》“文王之化”的谬说,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这是《读风偶识》功绩。由于时代的限制,崔述论诗,仍以盛、衰、贞、淫等观点立说,又热衷于诗篇的教义,主张说诗要触类旁通,往往忽视了诗篇原有的旨趣,造成一些新的曲解和附会。《诗风偶识》有《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本。(洪湛侯)

【毛诗后笺】 诗经注本。三十卷。清胡承珙(1776—1832)撰。胡承珙,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进士,官至台湾兵备道。著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尔雅古义》、《求是堂诗集》等。晚年因病辞官返乡,专心著述,以十馀年心血,写成《毛诗后笺》。病中仍著述不辍,写完《鲁颂·有駟》而竟绝笔。《泮水》以下各篇,由友人陈奂续成。《毛诗后笺》旨在申述毛义,凡《郑笺》有失毛义者,胡氏必广征博引,加以辨正,以申《毛传》之说。当时汉学与宋学已壁垒分明,汉学占压倒的优势,宋学很少有人研求,胡承珙在笺注中,常能吸收宋元学者的正确疏解,证成己说。至于名物训诂,及与三家诗文有异同者,务求剖析精微,折衷至当。因而他的诗学著作,具有求实精神。就其研讨《诗经》的观点、方法及援引论据而言,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往往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毛诗后笺》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曾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另外,有《墨庄遗书》本和清光绪十六年(1890)广雅书局刊本。(洪湛侯)

【毛诗传笺通释】 诗经注本。三十一卷。清马瑞辰(1782—1853)撰。马瑞辰字元伯。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官工部员外郎,博通经学,长于考证。本书为清代考据学家研究《诗经》的代表作。其中征引古书,甚为赅博。卷首有自序及例言七则;第一卷通考《毛诗》源流和《传》、《笺》异同得失,共有考辨十九篇。第二卷以下,依诗顺序作诠释,旁征博引,反复论证。本书论诗的宗旨,标榜“汉学”,以《诗序》为准,疏通《传》、《笺》,辨正《郑笺》不同于《毛传》的各种解释,以申毛纠郑。偶有与毛、郑相违者,有所改订,皆言之有据。其诠释诗句,吸收了乾嘉考据学的成果,并参考今文三家诗可取的疏解,辨其异同,说明同类义例,大都能够概括全书。本书的成就,主要在文字训诂方面,采用古音古义来纠正讹误,又用双

声叠韵的原理和语言知识来指明通假。着重纠正孔颖达《毛诗正义》疏释的舛误,也订正了《毛传》、《郑笺》的一些误释。例如《秦风·蒹葭》“宛在水中央”,马瑞辰据《说文》释“央,旁同义”,并指出“诗多以‘中’为语词”,“水中央”犹言“水之旁”,这才与下二章“水中坻”“水中沚”之义相同,从而纠正了《毛诗正义》“中央”二字连读的错误。再如《邶风·静女》篇“爱而不见”句中的“爱”字,《毛传》、《郑笺》都作本义解,马瑞辰考证出“爱”是“蔓”或“媛”的假借字,即“隐蔽”之意,这句应是“隐而不见”的意思。此外,驳正宋元以来诸家臆说甚多,对朱熹《诗集传》也多有贬抑。马瑞辰对于“诗”与“乐”的原始关系持“诗乐合一”的看法,其《诗人乐说》云:“古诗入乐,类皆有散声叠字,以协音律,即后世汉魏诗人乐,其字数亦与本诗不同,则古诗之入乐,未必即今人诵读之文一无增益,盖可知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因为相信诗皆入乐,所以才注意到“散声叠字”的问题。此书着力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的考证,而对于诗篇的文学意义,则很少论及,其疏释也有沿袭《传》、《笺》失误之处,但仍不失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汉学”派《诗经》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毛诗传笺通释》被列为“清十三经注疏”,收入《四部备要》。又有广雅书局刊本。(洪湛侯)

【诗毛氏传疏】 诗经注本。三十卷。清代陈奂(1786—1863)撰。陈奂,字硕甫,号师竹,晚号南园老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咸丰初,举孝廉方正。曾从段玉裁学《毛诗》、《说文》,后又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学文字训诂。晚年潜心著述,著有《毛诗说》、《释毛诗音》、《毛诗传义类》、《郑氏笺考征》等多种。《诗毛氏传疏》是他的代表作。陈奂笃信《诗序》,尊崇《毛传》,不满郑玄采三家诗说,贬抑朱熹《诗集传》。所作《诗毛氏传疏》,训诂一准《尔雅》,通释证之《说文》,专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等方面阐发诗篇的本义,引据赅博,疏训详明,论者推为清代研究《毛诗》的集大成著作。道光、咸丰年间,治《诗经》汉学最著者有马瑞辰、胡承珙和陈奂三家,马瑞辰间亦采录今文三家之说,胡承珙偶亦采及《诗经》宋学诸家,惟独陈奂专主古文《毛诗》,反对三家,也反对宋学,他认为《毛传》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文简而义贍,语正而道精,洵为小学之津梁,群书之钤键。故《诗毛氏传疏》是专治《毛诗》的一家之言。但对于《毛传》的错误,亦曲为回护,则是突出的缺点。《诗毛氏传疏》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经解续编》,今通行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洪湛侯)

【诗古微】 诗经学专著。十五卷(一作十七卷)。

清代魏源撰。这是一部诗论性质的书,不附诗篇本文,也不训释词句,全书包括《齐鲁韩毛异同论》、《夫子正乐论》、《四始义例篇》、《诗序集义》等,共三十多个专题。持论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说,攻击《毛传》及《毛诗》“大序”、“小序”,排斥古文经学派。认为三家均有古序,它们说诗与《仪礼》、《左传》诸书相合,而《毛诗》则动辄与之牴牾。许多说法,可以看到清代今文学派说《诗》的宗旨。关于诗、乐问题,谓“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谓“正乐即正诗”,谓“周时无不入乐之诗”,谓“九夏”是乐而非诗,“狸首”非诗非乐,皆为卓见。又曾说古代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所以“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兴”等,都有见地。不过魏源好创新解,武断之处也不少。如说《关雎》为刺纣王之诗,《狡童》所指为申侯等等,皆不可取。有清道光刻本,并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另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宜都杨氏重刊本和清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席氏补刊本等。(洪湛侯)

【诗经原始】《诗经》注本。十八卷。清方玉润(1811—1883)撰。方玉润,云南广南人。曾为曾国藩幕僚,后任陇州州判。著有《鸿濛室丛书》。《诗经原始》有《凡例》、《诗旨》各一篇。《凡例》介绍编写主旨和体例;《诗旨》论述历代各家论《诗》的得失。方氏认为历来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不能得诗人言外之意。他主张循文按义,探求《诗》的本旨。自序说他撰写此书,不顾《序》、《传》及姚际恒《诗经通论》,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该书主要特色在于能够注意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行文亦富有文采。方氏主张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如其论《采芣》谓:“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从文艺欣赏角度探讨诗旨,足使解经之家,相形见绌。其论写作方法,亦颇精到。如论《陟岵》篇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勗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评《七月》篇中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其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见臻此境界。本书眉批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不但论及写作风格,并兼及它对后世诗风的影响。如《黍离》篇批云:“二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无限。此专以描叙虚神,擅长凭吊,诗

中绝唱也。唐人刘沧、许浑怀古诗,往往袭其音调。”方玉润用文学观点评论《诗经》的艺术成就、写作手法,很受姚际恒的影响,但他所取得的成绩,似已驾乎姚氏之上,成为清代后期具有新倾向的诗经学家。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地方仍然仅是在旧说的基础上,花样翻新而已。如《葛覃》篇改《诗序》“后妃之本”为“敦妇本”,《采芣》篇改《诗序》“夫人不失职”为“夫人亲蚕事于公宫”。有些地方虽然不用《诗序》,所解却十分离奇,如谓《野有死麕》为“拒招隐也”,《摽有梅》为“讽君相求贤也”,《行露》为“贫士却昏以远嫌也”等等。凡此,皆此书之败笔。《诗经原始》有《云南丛书》本、1924年上海泰东书局影印本。另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本,由今人李先耕点校。

(洪湛侯)

【诗三家义集疏】诗经学专著。二十八集。清王先谦(1842—1917)撰。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并曾主持南菁书院多年。编有《皇清经解续编》、《续古文辞类纂》、《十朝东华录》等。著作甚富,除《虚受堂文集》外,以《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较为知名。此书专集三家诗的佚文、遗说。秦火以后,西汉初年,五经中《诗经》出现最早,由于最初流传的地区、传授的经师不同,今文《诗经》遂有鲁、齐、韩三家。《鲁诗》因最初流传于鲁国而得名,由大师申培所传。《汉书·艺文志》记载《鲁诗》的重要著作目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鲁故》当是申培所注的《诗训故》,《鲁说》是其弟子韦、张、唐、褚诸氏的继续补充。西汉时,《鲁诗》最为盛行。至西晋时亡佚。据陈乔枏《三家诗遗说考》考证:“凡荀子书中说诗者,大都为鲁训所本。孔安国从申公受诗为博士,太史公尝从孔安国受业,所习当为《鲁诗》。刘向父子世习《鲁诗》,著《说苑》、《新序》、《列女传》诸书,其所称述,必出于《鲁诗》无疑矣。《白虎通》诗皆鲁说,《尔雅》亦《鲁诗》之学。”《齐诗》由齐人轅固所传,以传者的地区得名。他的弟子们有所谓翼、匡、师、伏之学,把《齐诗》进一步与阴阳五行之说相结合,在西汉后期开始兴盛,东汉前期盛极一时。《汉书·艺文志》载《齐诗》主要著作目录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上述这些著作,在魏时失传。据陈乔枏考证,董仲舒学习《齐诗》,他的《春秋繁露》以及荀悦的《汉记》、焦氏《易林》、桓宽的《盐铁论》等所称引的《诗》说,当是《齐诗》。《韩诗》由传授者燕人韩婴得名。在当时影响不及鲁、齐二家,《汉书·艺文志》载《韩诗》的主要著作目录,有韩婴的《内

传》四卷、《外传》六卷,还有其后传者的《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卷。《韩诗》亡佚较晚,至北宋后才失传。现在留存的《韩诗外传》十卷,已非韩婴原著,亦非释诗之作。辑录三家遗说,自宋代王应麟发其端,清代三百年间,范家相、冯登府、陈寿琪、陈乔枏、魏源等,都有考辑专著。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出,而集其大成。本书收辑西汉以来鲁、齐、韩三家诗说,兼取后人疏解,折衷异同,加以考核说明。书中所述三家对于诗篇本事的说解,如《周南·汉广》所咏江汉人民敬慕汉神的故事,《郑风·溱洧》所述郑国三月上巳节溱、洧之滨男女聚会的风俗等,都比《毛诗》的说法近于情理。其他如《周南·采芣》、《召南·行露》、《王风·大车》、《小雅·小弁》诸篇本事的叙述,虽间有怪诞之说,亦可备参稽。王先谦辑录之余,有时也用案语的形式,发挥己意,每有创获。如据韩、齐二家之说,认定《召南·小星》为卑官奉使、早夜勤劳之作;说《邶风·击鼓》“是与陈宋伐郑之役军士所作”,“一时怨愤离叛之状可见”,都是有识之论。凡三家与《毛诗》的章句与文字异同,亦一一举出,对于理解诗义,颇有裨益。三家与《毛诗》,本是同源而异流,此书对于三家解说诗旨与《毛诗》相同者或三家无说者,都注以“三家无异义”、“三家义未闻”,采取“阙疑”的处理办法。书中论诗,也有比《毛诗》迂曲之处。如论《郑风·野有蔓草》不取《毛诗》“男女之词”的解说,而取三家诗说“思遇贤人”的旨义,是亦通人之蔽。《诗三家义集疏》有民国四年(1915)虚受堂刊本。

(洪湛侯)

【诗经形释】 诗经学专著。四卷。近人徐昂撰。徐昂字益修,江苏南通人。其著作于1944—1954年先后刻入《徐氏全书》。其中涉及《诗经》的,除本书外,尚有《诗经今古文篇旨异同》一卷,《诗经声韵谱》八卷。本书是徐昂《诗经》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自序谓《诗经声韵谱》写成之后,即从事于篇章字句形体之分析,以从中领略古代诗歌的创作艺术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此书四卷,分别为篇章、复叠、助词、杂释。卷一由论篇章、论章句、论句字三个部分组成。论篇章统计出《诗经》各部分章数的多寡,并且分析比较诗篇中各章同式或不同式的情况;论章句主要分析《诗经》各部分中每章句数的多寡及其各种不同的变化情况;论句字主要分析《诗经》各篇之中字数参差变化的情况。卷二分复字、复词、复句、复字复词复句、复体与异体之联绵词偶对五节。作者非常重视“复叠”在诗歌艺术表现中的作用。详细论述了《诗经》中字、词和全句的复叠现象,及其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一一举例说明,例证十分详悉。卷三论助词,所举出的助词,有兮、矣、止、哉、思、斯、也、焉等

字(附旃字)。既有统计,亦有论析,如谓助词中兮字特多,全篇各章逐句助兮字者,尤觉纡徐顿挫,更可想见其舞蹈摇曳之情。卷末附助词通释一篇,详细评述《诗经》运用助词的规律和方法,颇为详审。卷四为杂释。或论声韵,或论字义,或论赋、比、兴,或论异篇同句之例。凡未归附上述三卷之《诗经》文字形体诸问题皆属之。本书虽然理论分析尚嫌不足,但它却提供了大量的《诗经》语词统计资料,分别排比,注明出处,颇便取资。即以工具资料书视之,亦多裨益。《诗经形释》收为《徐氏全书》第八种。有南通翰墨林书局1947年印本。

(洪湛侯)

【诗义会通】 诗经注本。四卷。近人吴闿生(1877—1949后)撰。吴闿生字北江,安徽桐城人。著有《周易大义》、《尚书大义》及本书,合称《经解》三种,本书成就远在其他两种之上。书中探讨诗旨,虽不拘一家,而以《诗序》、《毛传》为主,《集传》及清代诸家之说,亦有采及。作者认为《序》之穿凿,以《周南》为最,然自二南外,则《序》之可信者为多。对于毛、郑,吴闿生尊崇《毛传》,不大重视《郑笺》。他在解释诗义方面,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如谓《唐风·葛生》“当为嫠妇悼夫之作”,《陈风·衡门》“诗为隐居自乐,词义甚明,然后二章乃譬晓之词,似有为而发者”,《小雅·沔水》为“忧乱而戒友之作”。言皆平实,可惜这类自定诗旨的例子并不太多。作者对汉、宋、清解《诗》的重要著作和三家诗的异同,作过深刻的研究,又吸收了清代考据学家训诂、考证、辑佚工作的新成果,在这一基础上,探讨了历代对这些诗篇发生过的比较突出的争论,作出自己的小结。这样,本书对读者确能起到“驾约御博”的作用。此外,本书在编排方面,打破向来把《诗经》分为二十卷或八卷的旧例,压缩成《国风》、《小雅》、《大雅》、《颂》四卷,使《诗经》体制的轮廓,鲜明突出。它还把诗文的说解,约束成最简单的注文,分写在诗句之下;同时,把全诗的大义,包括历来的解法和作者自己的意见,用案语的形式,写在每一篇的后面。对于读者初步掌握历史上解《诗》的说法,很是方便。《诗义会通》有1962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洪湛侯)

【诗经通解】 诗经注本。不分卷。近人林义光撰。林义光,福建闽县人,生卒年不详。在古代文学、古汉语、古文字学方面都有较深造诣。著《文源》十二卷,采钟鼎遗文,审察六书,以定文字的本形本义。《诗经通解》正文之前有《例略》一篇,颇有新见。诗篇正文之下,每章有简要注释。书中论诗主旨,多以《诗序》为根据,其中《邶风·静女》、《卫风·有狐》、《小雅·采薇》诸篇,不从《诗序》,只是少数,大体上都

是据序解诗,并采毛、郑之说。每篇之后,分列“篇义”、“别义”、“异文”三部分。“篇义”选录诸家说解,“别义”多驳斥前人误说,“异文”举示各家文字异同,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然其书的特色,还在于征引钟鼎铭文,考证“文字孳生通假之故,古书传写改易之迹”以探究诗义。如说《小雅·常棣》“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威”字古通作“畏”,并引毛公鼎“疾威”、孟鼎“天威”,“威”皆作“畏”,以证《毛传》“威,畏也”之说。此书间亦采录少数宋人之说解,论证较严谨,词义解释所用方法,比较科学。书末附《诗音韵通说》一卷。有1929年衣好轩排印本。(洪湛侯)

【白屋说诗】诗经学专著。近人刘大白(1880—1932)撰,由《说毛诗》十篇、《杂说》九篇、附录四篇组成。《说毛诗》十篇,分别涉及六义及《绿衣》、《葛生》、《鸡鸣》、《卷耳》诸诗。其论六义,提出古人“依发音底同异,而把这六字分为两类”的说法,以解释《毛诗·大序》所标风、赋、比、兴、雅、颂次序如此错综的原因。这种说法,虽难成立,但历来论及这一问题,常列为一家之说。《说毛诗》能够完全抛开《诗序》,就诗论诗,自作新解,且能言之成理。如论《绸缪》,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以今探古,对后人很有启迪。《白屋说诗》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据开明版影印。(洪湛侯)

【风诗类钞】诗经选注本。近人闻一多(1899—1946)撰。闻一多,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学者。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和唐诗都有很深的研究,于《诗经》、《楚辞》用力尤勤。著作收入《闻一多全集》。其中关于《诗经》的论著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诗新台语字说》和《风诗类钞》。另外尚有《匡斋尺牍》,与学生讨论《采芣》、《狼跋》二诗,发表于《学文月刊》民国二十三年第一卷第一期、第三期。《风诗类钞》分甲编和乙编。甲编录诗四十篇。乙编用“男词”和“女词”来归纳,定为“女词”的有六十四篇,定为“男词”的有二十七篇。其余六十八篇未标男女。甲编除《椒聊》等五篇是乙编中的“男词”以外,其余全为乙编中的“女词”。甲、乙两编,重复很多,解释也大同小异,颇疑甲编为《风诗类钞》的初稿,后人未察,将初稿、修订稿一举而纳入全集,并加“甲编”、“乙编”以区别之,因而出现这种两本并存的现象。在《风诗类钞》各篇中,多用简洁的文字,注明诗旨,其中不乏新见。如谓《简兮》:“慕舞师也。”《木瓜》:“定情也。”《采葛》:“怀人也。采集皆女子事,此所怀者女,则怀之者男。”《女曰鸡鸣》:“乐新婚也。”《泽陂》:“荷塘有遇,悦之无因,作诗自伤。”凡此,皆清新可赏,可惜为数不多。《风诗类钞》中附有闻氏草拟的《序例提纲》,提出用社会学的观点读

诗,并且主张改变原来按照国别的分类,重新按照婚姻、家庭、社会三大类目,将《国风》重行编次。可算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闻氏自己说是“未定稿”。《风诗类钞》收入《诗选与校笺》,见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辛集》。(洪湛侯)

【诗经通义】诗经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解释《诗经》词义的专著,以《诗经》篇名立目,收《周南》、《召南》、《邶风》三部分共计三十一篇,每篇列一题或若干题,并引《诗经》其他部分的相关词语,以为类比论证。全书所论,颇多胜义,如《桃夭》篇“桃之夭夭”,《毛传》训“夭夭”为“少壮貌”,《邶风·凯风》篇“棘心夭夭”,《毛传》训“盛貌”,《朱传》训“少好之貌”。闻一多根据《说文》夭部“夭,屈也,从大,象形”,推知诗中“夭夭”之义,亦当从“屈折”之状去设想,再证之《乐府·长歌行》“夭夭枝叶倾”、谢灵运《悲哉行》“夭夭桃始荣”都是形容随风倾曲的样子。足见旧训“少壮”、“盛貌”并失之。又如《汉广》篇“言刈其楚”,闻氏引《管子·地员》篇“其草宜楚棘”为证,论证说:“楚为草名,故本篇楚与蓼并举,《王·扬之水》篇楚与薪、蒲并举,《郑·扬之水》篇楚与薪并举,《绸缪》篇楚与薪、芻并举。蓼、蒲皆草类,薪、芻亦谓草也。”并以民俗学的观点,推论本篇“二章刈楚与三章刈蓼,乃当时婚礼中实有之仪式”,从而断定《郑笺》以楚为泛喻女之高洁,《王·扬之水》、《毛传》训楚为木皆误。《诗经通义》的缺点一为喜用俗语说诗,并把许多诗篇解释成表达性欲情绪的作品,使诗歌旨趣流于卑下。一为好改字为说,及滥用喻义说诗。如《邶风·柏舟》“日居月诸”,闻氏释为下土即下地,妇人以天喻夫,以地自喻,日月与下土对举,犹天与地对举,并进而断定《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有以偏概全之弊。就多数诗篇看,《诗经通义》每较《新义》为详,又多《邶风》一个部分。二书的写作,孰先孰后,难以断定。《诗经通义》原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后收入《古典新义》,见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乙集》。(洪湛侯)

【诗经新义】诗经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解释《诗经》词义的专著。凡二十三节,以词立目。所释词语有好,覃、诞,汙,夭夭,肃肃等三十六个。主要是属于二南的单字及词句,释义时亦采及其他部分相关词语以为类比。如释《江有汜》“其后也处”,则援引《正月》“瘼忧以痒”、《雨无正》“鼠思泣血”并列论述,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处”是正字,“鼠”是假声字,“瘼”是假声兼意符之孳乳字。这三个字的意思都可以解释为“病”或“忧”,书中释词,征引繁富,见解新颖,多有新义。如释《葛覃》“葛之覃

兮”的“覃”，谓“覃”为“覃”之省，“覃”即“藤”声之转，葛之覃即葛之藤耳。又谓“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与衣为互文，汙与澣亦不分二义，汙澣声近对转，汙亦澣也。是皆通达之论。书中所列之二十三节，除去“覃、诞”、“汙”、“抱”三节以外，其他二十节（三十二字）均见于《诗经通义》，解释互有详略。《诗经通义》原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后收入《古典新义》，见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乙集》。（洪湛侯）

【三百篇演论】 诗经学专著。近人蒋善国撰。共分八篇。全书无目录，各篇用数字区分先后，亦无大小标题。第一篇论孔子删《诗》，兼论《三百篇》皆周代之诗。在所叙各派说法中，作者赞同孔子正乐而未删《诗》之说。第二篇论鲁、齐、韩、毛四家诗的授受渊源。特别提到郑玄笺《诗》的贡献，举出“破字易毛”，“破字申毛”等十四条大例。第三篇论四家诗序。第四篇论“逸诗”问题。从篇辞俱逸、篇名存辞逸、篇名诗辞俱存等三方面举例论述。第五篇论诗篇之篇名及次序。作者认为《三百篇》的名篇，本无一定义例，都是先有诗而后有篇名的。这些篇名有乐官定的，也有诗人定的，也有诗人沿用旧调名的。至于诗的次序，一是以世为次，一是以国为次。认为历来论述的诗的次序，牵强附会较多。第六篇论“四始”与“六义”。第七篇《三百篇》的艺术。分形式、声韵、情意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声韵方面，论述最详。第八篇《三百篇》的特质。以乐舞性、政教性、群众性和普遍性为《三百篇》的特质，所论未必皆然，缺乏新颖、独到的见解。此书初稿写于二十年代，颇有一些看法，得风气之先。如视《诗经》为文学作品，主张把《诗经》这个名字取消，改用《三百篇》以名其书，赞同《风》、《雅》、《颂》以音调分，定《三百篇》为周诗，皆有见地。全书征引繁富、资料详赡，虽无目录，而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书中也有一些地方，观点比较陈旧，有些重要问题，虽然触及而发掘不深。但在同时期和稍后一段时间内出版的《诗经》概论性读物中，还是比较可取的一家。《三百篇演论》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排印《国学小丛书》本。（洪湛侯）

【诗经学】 诗经学专著。近人胡朴安著。全书二十一节。首有绪论一节。前九节，论作诗采诗、大序小序、六义四始等关于《诗经》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中间六节，叙述自孔子至清代的《诗经》研究概况，后五节论《诗经》的文字学、文章学、礼教学、史地学、博物学等，提出了《诗经》研究的相关学科。其中所谓《诗经》的文章学，近于《诗经》文学艺术研究，但所论甚为简略。书中对《诗经》的许多问题，虽已触及，但都还没展开论述，是一部初学入门的书。文字简要，

章节清楚，是其优点。大序小序一节关于诗序的作者，书中罗列了十三种说法，归纳为子夏作、卫宏作等八说，著者本人则认为《毛诗》之序，渊源于子夏，叙录于毛公，增益于卫宏等。此书以《诗经学》命名，绪论云：“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之本身，及历代治《诗经》者之派别，并据各家之著作，研究其分类，而成一有统系之学也。”当代诗经研究者颇引此作为“诗经学”之定义。《诗经学》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排印《国学小丛书》本、台湾《人人文库》本。

（洪湛侯）

【诗经研究】 诗经学专著。近人谢无量撰。“五四”以后出版的一种诗经概论性著作。书分五章，第一章《诗经》总论。叙述《诗经》的来历、义例、诗序、篇次、流传、注家等；第二章《诗经》与当时社会之情势。叙述《诗经》中所表现的固有思想、国家制度、家族礼制等。第三章《诗经》的历史上的考证。分周室、邶、鄘、卫、郑风、齐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等节。第四章《诗经》的道德观。第五章《诗经》的文艺观。书中提倡“妇德”、“厚重”、“厚于故君”、服从一人之特权等等，诗教的痕迹明显。第五章谈《诗经》文艺观，内容十分简略，此书受《毛诗序》的影响很深，仍然属于经学范围，虽然出版较早，但在当时也是比较守旧的。征引资料亦有过于简略，只举书名，不注出处之缺陷。《诗经研究》有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1923）出版的《国学小丛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本。（洪湛侯）

【诗经学纂要】 诗经学专著。近人徐澄宇撰。共列二十二目，实系两大部分，一是《诗经》的基本问题，二是《诗经》研究的历史。关于《诗经》的基本问题，包括诗的来源、诗序（含六义、四始、正变）、诗谱、诗乐、诗教和诗的文字声韵与名物制度等。关于《诗经》的研究史，包括三家、毛郑、汉学、宋学、清学等。诗教一节，提出“汉人不专言诗教，言诗教盛于宋人”，并引用周紫芝说、杨简说、朱熹说，加以论证。博物一节提出“宋人诗博物学以蔡卞为最”，“清人诗博物学以陈大章为最”，可供参考。本书所列篇目范围虽广，然篇幅无多，有些问题仅仅触及，未能展开讨论，引文相当简略且不标出处。论王应麟以后之三家诗辑佚，仅及陈乔枏而未提及王先谦之《诗三家义集疏》。论《诗经》研究史仅迄清代而未及近代。且其书皆从经学角度立论，对《诗经》在文学方面的影响视而不见。书中多次提出“《小序》皆作诗者之本义”，“序决不可废”云云，囿于诗教，观点陈腐。《诗经学纂要》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洪湛侯）

【诗经学新论】 诗经学专著。金公亮撰。原名

《诗经学ABC》，后改今名。本书分《诗经》的来历、《诗经》的年代、孔子与《诗经》、《诗》与乐、《诗经》内容的分析和作者、六义、《诗》和正变与《大小雅》、四始、《诗序》、篇目次第、诗经学的流派、《诗经》的价值与读法、参考书举要等十三节。作者宣称：“凡前人陋解，序文谬说，一概屏弃，就诗言诗，求其会通。”评价朱熹、郑樵、崔述三家，认为“朱子疑古而不敢放言抗论，郑樵敢于抗言而不彻底，惟崔述独标新解，能够不为前人所束缚，言人之所不敢言，极有学者态度”，因而极力表彰崔述精神。然本书属于概论性质，还是从经学角度而不是从文学角度立论，尚未摆脱旧时论诗的樊篱。《诗经学新论》世界书局1929年以《诗经学ABC》为名出版。（洪湛侯）

【诗经之女性的研究】 诗经学专著。谢晋青撰。本书十章，除绪论、结论外，分国论述有关妇女问题的风诗。书中论及的诗篇共八十五篇。论述最多的是恋爱问题，其次是女性生活、女性美，再次是婚姻问题和失恋问题，以上共占六十七篇，其他与女性有关的约十八篇。作者对每一首诗都逐一作出简要的分析，突出它与女性有关的内容，文字浅显易懂。本书取材限于《国风》部分，像《小雅·谷风》这样的弃妇诗，《大小雅》中其他与妇女有关的诗，均弃置不提。所收与妇女有关的诗篇中，诸如《江有汜》、《邶风·柏舟》、《卫风·木瓜》、《河广》、《王风·君子阳阳》、《郑风·风雨》、《子衿》、《扬之水》等篇，并未能确定其必出于妇女之手或确与妇女有关，又嫌过泛。《诗经之女性的研究》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洪湛侯）

【诗经音释】 诗经学专著。林之棠撰。上、中、下三册。首有自序、例言，末有后记。由“韵读”、“纂诂”两部分组成。每首诗篇正文之后，列有“韵读”，并附注音，注音反切与直音间用。“韵读”之后列有“纂诂”（即训诂），对疑难词句作简要的解释。作者主张体玩白文，就诗纂释，不于诗外寻求故实，亦不以故实傅会诗辞，一韵之分，一字之释，既采众家之长，亦有阙疑之义，态度比较客观，惜乎注释简略，有些重要词语的释义，未注出处。本书采江有诰所分古韵二十一部，加上王念孙之“至”部与章太炎之“队”部，共为二十三部以作韵读。但与章太炎所分古韵二十三部不同。与王力《诗经韵读》分古韵为二十九部更有出入。不失为一家之说。《诗经音释》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洪湛侯）

【诗乐论】 诗经学专著。罗倬汉撰。成书于1941年。正文前有“序例”十则。书凡三篇，每篇再分若干章节。第一篇《诗》与孔学，第二篇诗教，第三篇《诗》与乐。作者自谓首篇为纲，二篇三篇为目。然

第三篇实更有价值。该篇又分四章。第一章《雅》与乐。论述“歌乐之次”、“南为乐曲之名”、“雅为乐曲”。第二章《颂》与乐。论述“舞曲未必有辞”，又论“舞曲之辞”，还阐明“雅与颂异”。第三章《风》与乐。论述古代“工歌合乐与吹乐”、“射节奏乐”的制度，以及“配雅、颂之风乐”。第四节述学。其中“诗乐与经学”等节，内容也是阐述《诗》、乐关系的。该篇所阐述和提供有关《诗》、乐的论点与资料，比它同时代几部中国音乐史所述的内容丰富翔实得多。此外，本书在研究《诗经》占本面貌和成书经过，考证编诗之人、编诗之时，编诗者之权衡等方面，也提供了有用资料。《诗乐论》有台湾正中书局1954年刊印本。（洪湛侯）

【读诗札记】 诗经学专著。俞平伯（1900—1990）撰。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又字直民，号屈斋。浙江德清人。主要著作有《红楼梦研究》、《论诗词曲杂著》等。本书是俞氏在二十年代所写，包括对《周南》、《召南》、《邶风》、《鄘风》中九篇作品的分析，每篇都由题旨、诗义分析和故训浅释两部分组成。书中收有胡适、顾颉刚等人有关文章，反映出“古史辨”派关于《诗经》的一些基本观点。本书尖锐地批判了封建诗学观点，主张彻底推翻《诗经》作为经典的神圣地位，恢复《诗经》文学的本来面貌。关于《诗经》研究，俞氏批评了当时存在的片面强调考辨和片面强调鉴赏两种倾向。书中对诗篇内容的艺术特点所作的具体分析，以及运用民俗学理论，研究《诗经》中的民歌，都明白透彻，斐然可观。本书的文章，当年曾在《燕京学报》等刊物刊发，并结集出版。部分收入《古史辨》第三册，建国后收入俞氏自编《论诗词曲杂著》，再次出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排印本。（洪湛侯）

【毛诗郑笺平议】 诗经学专著。黄焯（1902—1984）撰。十卷。黄焯字耀先，湖北蕲春人。精于训诂。研究《诗经》成就甚大。以三十馀年的精力，写成本书和《诗疏平议》两书。黄氏治《诗》，崇信《毛传》和《诗序》，对于《郑笺》，他并不一味排斥，然撰写此书，却有纠郑氏之失的用意。书中对《郑笺》误解词语、穿凿附会、臆解曲说等均有所辨析、批评。对于《郑笺》最先提出的“《王》降为《风》”的误说，将三、九等表示虚数之词误为实指等错误，也有分析和订正。黄焯治《诗》虽过分笃信《诗序》对《诗》义的解释，有些地方比较守旧，然而他能够运用训诂学方法，曲畅旁通，依文述义，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纠《郑笺》之失，皆中肯綮。对于清代治《诗》诸家，黄氏最服膺者为胡承珙《毛诗后笺》，说他能笃信《传》义，遇《笺》义未当而为《传》所未言者，亦能举而驳正之。

又详于训诂名物,玩文之功甚深。故书中采胡氏之说特多。黄氏在本书自序中提出治《诗》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要须审其辞气,探其义旨,说明他已经注意到诗的文辞情意,即文学特色。《毛诗郑笺平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洪湛侯)

【诗疏平议】 诗经学专著。黄焯撰。十五卷。书前有1959年作者自序,后附“引用书目”。本书是《毛诗郑笺平议》的姊妹篇,两书宗旨、体例相同。《郑笺平议》旨在申毛匡郑,本书旨在订正《孔疏》之失。如批评《卫风·氓》“将子无怒”之《疏》为强申《笺》意。批评《小雅·裳裳者华》之《疏》为因《笺》而致误。《商颂·那》“衍我烈祖”一句,则《传》、《笺》之言不异,《孔疏》却两违之而致误。本书还指出了不少《诗疏》自误之例。如《豳·七月》“曰杀羔羊”,《孔疏》云:“言曰杀羔羊,是乡人见大夫而始发此言,故称曰也。”黄焯则指出《诗》中多以“曰”为谄词,如“曰至渭阳”、“我东曰归”之类皆是,马氏《通释》云:“曰、聿、吹、遯四字古通用”,皆语词,《孔疏》显然失之。《诗疏平议》成书于《毛诗郑笺平议》之后,两书评论涉及相同篇章甚多,但无犯复之累。详略之间,前后常能相互照应。《诗疏平议》举出孔氏有误解的篇目竟达二百六十篇之多,每篇少者一条,多者若干条,分量亦较《郑笺平议》为重。所揭《诗疏》之误,多中肯綮,有助于祛除孔氏之惑以探诗义之真诠。《诗疏平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洪湛侯)

【诗三百篇探故】 诗经学专著。朱东润著。收录《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大小雅说臆》、《古诗说摭遗》、《诗心论发凡》、《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等五篇论文。前四篇是在抗战之前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所写,后一篇是1946年为《国文月刊》所写。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合此五篇,改题《诗三百篇探故》重印出版。《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列举八十篇诗,由诗篇作者“自称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诗篇作者“关系人之地位、服御”,由诗篇“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着眼,并结合诗中名物、章句,加以考证,从而“确知其确为统治阶级之诗,皆有明证”。并且采用类推之法,得知《国风》中统治阶级之诗,尚不止此。从而申说了《国风》出于民间者,其言未可信的观点。《诗心论发凡》首先提出“自汉人罢黜百家以后,而先秦之遗说,已在若存若亡之间,不可尽考……经生治《诗》,知有经而不知有诗”,主张读《诗》必先探求乎古代诗人之情性,知古人之诗心,强调从文学角度论《诗》。这些论述,对于《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以及《诗经》文学观的确立,起过相当影响。《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六论】 诗经学专著。张西堂撰。本书是作者《诗经》论文的结集。其中四篇是1931—1933年在武汉大学讲授《诗经》时写的,两篇是1953—1956年在西北大学讲授《诗经》时写的。第一篇《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从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来源、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第二篇《诗经的思想内容》认为《国风》大部分来自民歌。第三篇《诗经的艺术表现》举出概括的抒写、层叠的铺叙、比拟的摹绘、形象的刻画、想象的虚拟、生动的描写、完整的结构、艺术的语言等八项特点来论述《诗经》艺术。第四篇《诗经的编订》否定孔子删诗之说,认定孔子弦歌的本子应即当时乐师传出的本子。第五篇《诗经的体制》从《诗经》本文来证明“南”、“雅”、“颂”都是乐器;“风”是声调的意思,并认为“风”的伴奏应该也是有乐器的,不过还难以确定是哪一种乐器。第六篇《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主要讨论《毛诗序》的名称、作者,并列举《毛诗序》的种种谬妄。本书征引资料相当详备,每一个专题,都详细列举诸家论述和历来争论的意见,最后作出带有总结性的小结。《诗经六论》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洪湛侯)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诗经学专著。孙作云撰。本书收有关《诗经》与周代社会的论文十二篇,附录三篇,是一部论文集,以《诗》论史,为范文澜提出的西周封建社会论,作了论证。《从诗经中所见的西周封建社会》是书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它举出十几首诗,都反映有西周的制度(公田与私田)和剥削形式(“藉”或“助”),以说明西周的封建社会性质。此外,《读噫嘻》、《论七月》两文论旨相同。《说雅》和《论二雅》两文,则从《大小雅》来探讨这个问题。《说雅》认为“雅”与“夏”是同音假借字,“雅诗”即夏地之诗,并指出《墨子·天志》称《大小雅》为“大夏”、“小夏”。《论二雅》一文,论证《大小雅》同为西周晚期诗,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周宣王朝之诗。孙氏认为,《雅》中有“颂”又有“风”,《大小雅》那些祭祀歌和典礼歌,与《周颂》相似,这就是《雅》中的“颂”,它们都同为宣王朝诗;《小雅》中还有一部分民歌,和《国风》中的民歌没有多大区别,有的并且是《国风》中民歌的“母题”,这就是《雅》中的“风”。至于《风》、《雅》、《颂》的区别,孙氏认为大体上是以时代和地域为准,也参照诗歌的内容。《周颂》是西周初期周天子之诗,《鲁颂》、《商颂》是附录,《二雅》是西周晚期周京之诗,《国风》是各国之诗,时代有早有晚,但绝大部分是春秋前期诗。孙氏又认为西周盛世的诗,即称为《大雅》,《大雅》即大夏、大周;西周衰世的诗,即称为《小雅》,即小夏、小周。这些论点都足以成为一

家之言。孙氏又研究了周人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图腾信仰,及灭商以前周社会的性质,根据《小雅·斯干》所记周人的生子信仰,结合《史记·周本纪》及其他资料考出:原始的周人以熊为图腾,写成《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此外,他又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奴大起义》,分析了“厉王奔彘”的原因;撰写了《从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说明“周人在灭商以前,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史实。与西周社会性质有关的论文,还有《周初大武乐章考实》和《小雅大东篇释义》二文,前者想从《大武》乐章中,钩稽出有关武王伐纣的可信的历史事实,并由此推测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后者说明西周时代的农奴有许多是东夷。孙氏认为《周颂》之《酌》(灼)、《武》、《般》、《赉》、《桓》五首诗,“相当于《大武舞》之一二三四六成(之歌),而第五曲无诗。这种看法,与魏源相同,惟次序小异,与龚橙、王国维、高亨诸家,则颇见异同。《诗经恋歌发微》、《诗经的错简》等文,也都提出新颖的见解。《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洪湛侯)

【泽螺居诗经新证】 诗经学专著。于省吾撰。三卷。上卷据1935年出版的《双剑谿诗经新证》删订而成。中卷包括在《文史》第一、二辑发表的《泽螺居诗经札记》、《泽螺居诗义解结》,有所删改。下卷是已发表的有关《诗经》考证的五篇论文,结集时作者亦有所修正。因非一时所写,体例不一。每卷之首,列有细目,颇便查检。书后附《楚辞新证》。上卷、中卷皆考证《诗经》文字之义训。上卷凡二百零七则,中卷凡四十九则。立论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用钟鼎文订正《诗经》词义尤多。例如:《生民》“卬盛于豆”,于省吾引毛公鼎“卬邵皇天”即“仰邵皇天”,《车辇》“高山仰止”,《说文》作“高山卬止”,认定“卬为古文,仰为后起的分化字”。并说“古人祭祀时,设豆于俎几之上,祭者跪拜于神主之前,执燔烈之肉以上盛于豆,故曰‘仰盛于豆’”也。下卷收论文五篇,其中《诗经中‘止’字的辨释》一文,指出《诗经》中的“止”字,有的应作“之”,有的乃“止”字之讹,其用作“容止”和“止息”之“止”者,应改作“止”;其用作指示代词和语末助词之“止”者,应释作“之”。他在本文中,把《诗经》中凡一百二十二见的“止”字,分别加以考证,其改“止”为“之”者凡五十三字,其释“止”为“之”者凡六十九字。这样改正,既澄清了《诗经》中“止”“之”两字一向混淆无别的现象,也订正了前人在义训上的一些误释。《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研究史概要】 诗经学专著。夏传才撰。由十四篇文章结集而成。分先秦、汉学、宋学、新汉学、

“五四”及以后等五个时期,加以叙述。本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料,观点正确,格调新颖,与解放前几部《诗经》概述性著作相比,可谓面貌一新。书中设专章评述自魏晋至唐的《诗经》研究概貌,指出魏晋文学对《诗经》的借鉴,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用文学观点研究《诗经》的重要成果。同时,历举唐代诗人上承《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论述,说明作者从文学角度观察《诗经》研究史所作的努力。至于书中结构松散,泛论过多,以及征引漏略和措辞失当之处,则为本书明显缺点。《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洪湛侯)

【诗经语言艺术】 诗经学专著。夏传才撰。本书收十三篇短论。前八篇,阐述《诗经》的语言艺术特点和赋、比、兴艺术手法。后五篇是关于《诗大序》、史诗等专题论述。第一篇《诗经的语言》谈《诗经》中名词、动词、形容词、虚字及各种修辞格。第二篇《四言和杂言》,认为《诗经》的句型从一言到九言都有,以四言为主,并将除四言以外的各种句型,分别举出例句,加以说明。文中还编制了《风》、《雅》、《颂》各类诗的句型统计表。这些统计很有资料价值。只是历代各家读《诗》,句读不一,字数句数的统计,也往往不同,统计颇难精确。第三、四、五篇,分别论述《诗经》中叠章、叠字、叠句、双声叠韵和韵律。第六、七、八篇,论赋、比、兴。全书所用文字和例证,比较深入浅出。第九篇以后,分别论言志、美刺、毛诗大序等问题,与语言关系不大。《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韵读】 诗经学专著。王力撰。本书由《诗经》韵总论、《诗经》韵例、《诗经》入韵字音表、《诗经》韵读四部分组成。《诗经》韵读为本书主体部分。《诗经》韵总论含对叶音说的批判、古韵学的发展、《诗经》韵分二十九部表等八个小标题,作理论上的阐述。《诗经》韵例分韵在句中的位置、韵在章中的位置、韵在篇中的位置、韵式与韵部的互证等四题,从分析入手,说明《诗经》韵例。《诗经》入韵字音表分二十九部标出入韵字的拟音,是表谱性质的工具书。《诗经》韵读把《诗经》三百零五首诗中入韵的字全都注出古音,便于研究《诗经》古韵的人,按图索骥,逐一查检。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分析细致,有俾实用,是本书的优点。《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语言研究】 诗经学专著。向熹撰。全书六章。第一章略述《诗经》来源以及历代整理研究概况,有绪论性质。第二章《诗经》的文字。论述《毛诗》与“三家诗”的文字差异、《毛诗》内部的文字差异、《毛诗》篇名与诗句的重出,举例相当详备。第三

章《诗经》的用韵和今读。第四章《诗经》的词汇。论述《诗经》里各种词汇、词义,以及《风》、《雅》、《颂》的词汇比较,探讨《诗经》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第五章《诗经》的句法。在大量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论述了诗句的语法结构和句读分合,并逐次分析《诗经》的各种句式,最后分析了诗句的加字、重复、省略和倒装。第六章《诗经》的修辞和章法。列举修辞方式凡十四种,有一部分是编者归纳出的新例。章法部分,采用前人成说为多,经归纳分类,条理更加清楚。本书特色一是长于统计。书中指出《诗经》出现的单字有二千八百二十六个,一个字可以是一个词,也可能仅是一个组成复音词的词素。《诗经》中这样用作词素的字约三百四十九个,词的数目却有三千四百个,包括单音词二千五百个,复音词九百个。《诗经》以四字句为主,也有一些非四字句。整部《诗经》共计有七千二百八十四句,其中四字句就有六千六百六十七句,占全书百分之九十二,非四字句六百一十九句,占全书百分之八。除了四字句以外,对于各种字数(自二字至八字)的句子、单义词、多义词以及一字多音和不常见音等等,也都逐项作了专门统计和说明。二是分析详审。作者分析归纳《诗经》十四种修辞方式,并举例加以说明,又从分析词义入手,专门写了《〈风〉〈雅〉〈颂〉的词汇比较》一节,从称呼和等级名称,国家、朝代和部族名称,历史人物名称,祭祀方面的词汇等七个方面举例说明《国风》和《雅》、《颂》应用语言词汇的明显差别。三是资料详备。如本书对《诗经》篇名和诗句重出的例子,搜集得十分齐备,列出篇名重出的共九组二十一篇;诗句两句重出的十三组,三句重出的三组,四句重出的六组,六句重出的一组。《生民》、《蓺兮》、《正月》、《天作》诸篇某些诗句,曾有过两种、三种甚至四种断句方式,书中皆一一举例加以评介。毛、郑与朱熹《诗集传》分章不同的诗有八篇,本书书末曾列表述其异同。四是时有新见。如作者认为《诗经》词汇虽然丰富,但有不平衡的一面;《诗经》词汇虽然丰富而且重要,仍然只是上古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上古汉语词汇。作者曾经编纂过《诗经词典》,掌握和积累了大量资料,从而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诗经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古今音手册》】 诗经学专著。向熹撰。“《诗经古今音表》”为本书正文。正文前有叙例六则,正文后有附录二种:“《诗经分部及入韵字表》”、“《诗经篇目》”,最后是检字表。本手册收集并注明了《诗经》所有单字的今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诗经》的字音从古到今贯穿起来,可供研读《诗经》与研究上

古汉语音韵者使用。《诗经》今音用汉语拼音注出。全书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诗经》里未出现的字音,本手册不收。所用反切,主要依据《广韵》,《广韵》未收的依《集韵》,极少数用《释文》和《洪武正韵》中的反切。除《广韵》外,都一一注出书名。中古音标明摄、呼、等,调、韵、声,放在反切后面的圆括号里。本手册注明每个字的上古韵部和声母,上古韵部分十一类三十部,并加拟音,用方括号标出。拟音基本上从王力的体系,个别的音略有变动。上古汉语,肯定有声调,但声调是否是四个,前人说法不一,争议较多,本手册对于上古音只标声和韵,不标声调。《诗经古今音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选》】 诗经选译本。余冠英撰。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6 年出版,至 1985 年第 9 次重印时与作者另一部旧作《诗经选译》合并,实际上成为一个新的译注本。包含《国风》七十八篇、《小雅》二十三篇、《大雅》三篇、《周颂》二篇。本书注释,不墨守一家,也不全用旧说,主要从原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着眼,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加以审慎的抉择。有些解释则是作者的发明。在确定诗篇主题方面,作者就诗论诗,把握诗篇的特点,加以阐述,常有新意。如说《园有桃》是一首“忧时的诗,和《黍离》相类”,并说“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说《狼跋》“是一首讽刺诗,诗中把一位统治者(公孙)比做老狼,嘲笑他步态丑笨,进退困窘”,对照原诗,读起来的确很有趣味。所附译诗,大都比较准确和流畅,有些译文,很有诗味。《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洪湛侯)

【《诗经今注》】 诗经注本。高亨(1900—1986)撰。高亨又名晋生。吉林双阳人。长期研治先秦诸子、《周易》、《尚书》和《诗经》,主要著作有《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诂》、《诸子新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商君书注释》、《诗经今注》和论文集《文史述林》等。《诗经今注》为《诗经》全书作了系统的注释,每篇诗的诗题之下,都写有简要的题旨,注文列于全诗诗文之后,凡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则统统列入附录,编排眉目清楚,明朗醒目,而且注文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颇便阅读。本书在解题和注释方面,常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如谓《小雅·沔水》作于东周初年“平王东迁以后,王朝衰弱,诸侯不再拥护,镐京一带,危机四伏,作者忧之,因作此诗”。从诗文反映的忧伤祸乱之情,结合社会背景作出解释,于史有征,较旧说切合诗意。高氏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根柢深厚。注文要言不繁,常多胜义,并能吸取

前人较好的见解,会通提炼,形成新说。注文中还订正不少讹文误字,如发现《溱洧》第二章“伊其将谑”的“将”字是误字,他说“将,当作相,传写而误,上章可证”。他认定此诗一二两章最后三句,都是完全相同的。此书比较突出的缺点是标新立异,造成不少新的穿凿附会。如说《鹊巢》是“召南的一个国君废了原配夫人,另娶一个新夫人。作者写这首诗叙其事,有讽刺的意味”。说《鸛虞》是“贵族强迫奴隶中的儿童给他牧猪,并派小官监视牧童的劳动,对牧童常常打骂,牧童唱出这首歌”。一反旧说,自作新解,想象之词,说得宛如耳闻目睹。其他如对《召南·羔羊》、《卫风·有狐》、《陈风·月出》的解释,皆离奇古怪,很难使人信服。《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试译】诗经选译本。李长之撰。作于1953—1955年。共选四十五首,其中《国风》三十四首、《大小雅》十一首,约占《诗经》总篇数的七分之一。本书以译文为正文,译文前有简短的说明,即该篇的解题,译文之后,附有原诗,最后有简单的注释。本书的译文,颇有特色,采取了比较整齐的、多样化的诗歌形式,语言流畅,颇有诗味,有的很有民歌气息。有些篇章,能在译文中体现出作者对这首诗篇的见解。说明文字简短而优美,有的阐发诗篇主题,往往明确、恰当,间有新见,亦多可取。注释多采毛、郑、朱注为主,近人则采林义光、闻一多两家之说为多,也常表现出自己的见解。本书相当精粹,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失误,惟《采芣》一篇的译文,遗漏主语,令人费解。《诗经试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洪湛侯)

【国风选译】诗经选译本。陈子展撰。子展,湖南长沙人。一生致力于《诗》、《骚》研究,尤其是研究《诗经》,数十年未间断。《国风选译》成书于五十年代初期,接着又续作《雅颂选译》,两书为姊妹篇,体例相同。书分正文、译文、汇注、解题四个部分。无序跋,亦无编辑凡例,然前后体例井然。作者对《诗经》研究的旨趣心得,均体现于译文、解题和汇注中。本书选译《风》诗八十首,占《国风》部分的二分之一。历来公认的名篇,大体上都已选入。《国风》十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选篇,最少的如《曹风》选二篇,最多的如《郑风》选十三篇。作者论诗能博采众长。如《魏风·葛屨》采朱熹《诗集传》的说法,定为“最古的缝衣曲”;《绸缪》、《兼葭》、《月出》等诗,不但引用方玉润,而且还引姚际恒的说法,各有侧重,语皆精彩,都注意从文学角度立论,分析诗篇写作的艺术特点。书中经常采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些说法,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诗篇,故能一反传统旧

说,得其真义。对于三家诗义之可取者,亦皆注意阐述。又常就诗论诗,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本书汇注资料详备,所采除毛、郑、三家外,引清人之说为多,近当代诸家说有可取者,搜采更不遗余力。如《七月》引王国维说,《桃夭》引于省吾说。《国风选译》有一些诗译得较好,有古拙质实的风格。如《氓》、《相鼠》、《驺虞》等。《驺虞》“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辚车鸾镳,载猵歇骄”。译作:“一直游猎到北园,四匹马儿都熟练;轻车鸾铃马銜镳,载着猎犬猵歇骄!”既忠于原作,又有古诗风味。《国风选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洪湛侯)

【雅颂选译】诗经选译本。陈子展撰。成书于1956年。无序跋,共选《雅》、《颂》作品六十篇,每篇分正文、译文、汇注,解题四部分。此书所选多属名篇。其中史诗如《生民》、《公刘》、《緜》、《皇矣》、《文王》、《大明》等;农事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载芟》等;政治讽刺诗如《节南山》、《正月》、《雨无正》、《巧言》、《巷伯》、《大东》、《北山》、《板》、《荡》、《瞻卬》等,清初诗人王士禛认为最古最有神韵的代表作《采芣》和《无羊》,旧时列为“四始”的《鹿鸣》、《文王》、《清庙》等,都在收录之列。《鲁颂》以《閟宫》、《商颂》以《玄鸟》影响最大,本书均收选无遗。其解题着重评介全诗主旨、各章章旨、全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有选择地介绍《诗序》、《传》、《笺》和今文三家的有关论述,更多地采用清人学说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每篇解题,近乎这篇诗的学术史小结,通过分析论证,作出比较恰当的结论。有时自下己见,别开思路,多所创新。书中汇注以资料详审为特色。如解释《周颂·潜》的潜字,除引《毛传》外,还引了马瑞辰《通释》、陈奂《传疏》、王先谦《集疏》,释“潜”为“鱼舍”。《雅颂选译》的今译,字字紧扣原文,力求保持诗歌的原始风味、民间气息。如《小雅·无羊》第四章“牧人乃梦”八句、《小雅·四月》、《小雅·信南山》、《大雅·文王》、《周颂·潜》、《周颂·噫嘻》都译得相当出色。《雅颂选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直解】诗经全译本。陈子展撰。该书是作者在三十年代所作《诗经语译》,五十年代所作《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历时十多年精研而成的著作。包括正文、译文、章旨、今按、简注五个部分。每篇题目之下列有《毛诗序》,并记章句。正文、译文上下排列。章旨评析置于每章之后,今按就是解题,置于每篇之后,简注极为简要,集中置于每卷卷末。本书注解《诗经》,涉及百科知识,其内容可谓博大精深,且有学术史性质。其解题有总结诸说之意。如谓《郑风·丰》为“婚变之诗”,是受戴震启

发,视《秦风·权舆》为冯谖之流的“弹铗之歌”本于魏源的《诗古微》,解《秦风·蒹葭》用汪梧凤引申朱子之说从而得出怀人之作的结论。作者自云其论诗信而好古、无征不信,一方面批评三家诗多用古史佚文或民间传说解诗,往往非作诗之本义;一方面对于三家符合诗义的说法,仍斟酌采用,并无今古文门户之见。如解《小星》、《汉广》、《二子乘舟》、《大车》、《溱洧》等篇,皆采三家遗说,即是显例。提出自己创见之处也很多,如谓《葛藟》为孤儿乞食之歌,谓《唐风·杕杜》亦饥者歌其食之一例,犹之后世乞食者之莲花落、顺口溜、唱快板、告地状,颇有见地。所论章旨每多胜义。所谓章旨,原是中国经学古籍传统体例之一。本书援用旧的程式,扩大它的范围,成为解题、简注以外无所不包的一个项目。由于它的内容灵活、充实,因而成为本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概括每章内容、写作方法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大都言简而意赅,且往往随文抒发议论,涉笔成趣。《诗经》原文特别是一些艺术性较高、涉及典制较多的篇章,译成今体诗颇不易,本书译文力求贴切原意,而又调利口吻,近似现代白话新诗,比较成功。《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译注】 诗经全译全注本。程俊英撰。前言略述《诗经》来源、编订和分类、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以及本书写作宗旨和体例。正文除原诗外,包括题解、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各有特色。译作诗意浓郁,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如《小雅·斯干》第八章“乃生男子”一节,第九章“乃生女子”一节以及《邶风·柏舟》、《小雅·巷伯》、《大雅·江汉》等,都译得非常出色。格律整齐,朗朗上口,达意传神。本书的题解,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基本上都能够概括诗篇的主题。如《郑风·风雨》题解云:“这是一首写妻子和丈夫久别重逢的诗歌。《毛诗序》说此诗写‘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虽属臆测,却使后来很多气节之士,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以‘鸡鸣不已’自励。”作者就诗论诗,确定了本诗的主题,同时又介绍了旧说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本书的注解,以准确简明为特色,即使某些比较复杂的词语,释义也力求简洁,不搞烦琐考证。而且每条注释都分行排列,清楚醒目。这部《诗经译注》应是众多译本中的佼佼者。《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注析】 诗经注本。程俊英、蒋见元撰。这是一部《诗经》新注本,词语注释与主题分析并重,颇有特色。作者阐述主题,论定诗旨,均平实贴切,有些写得别开生面,饶有新意。如说《蓼兮》是古代所谓“仲春‘会男女’的集体歌舞曲”,《椒聊》是“赞美妇

女多子的诗”,《匪风》是“游子思乡的诗”。对于《唐风·羔裘》、《郑风·扬之水》少数主题难定的篇章,则宁存其疑,不做结论。本书词语注释,只注疑难字、关键词,突出重点,略去一般。释义的文字,简练准确,不搞烦琐考证。对于一些常用虚词,往往同时列举它在《诗经》中的几种用法,以便读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对于某些词语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也常举例加以说明。如说《卷耳》“真彼周行”的“周行”指大路,是本义;《鹿鸣》“示我周行”的“周行”指“处事所应遵循的正道”,是引申义,对读者颇多启迪。本书所作的艺术分析,多数都写得非常精彩。如《陟岵》、《鼓钟》等篇,都不乏点睛之笔,分析《北山》末三章连用六个对比,《雝》用对偶、排比;《鱼藻》的设问、自答;《斯干》之多用叠字;《汉广》每章末尾用四个叠韵;《既醉》之用顶真格;《大明》首尾的呼应主题;《江汉》、《常武》同写战争题材,《江汉》雍容揄扬、词深意远,《常武》则写得文势汹涌、淋漓尽致。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艺术特点。同时论述了“风雅比兴”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援证详明,举例繁富,足供治文学史者采撷取资。本书在每一章注释之后加上“韵读”一项,基本依据清代学者江有诰《诗经韵读》,标出该章所属韵部及每个押韵字。上古音与今音差异很大的字在括号中加注直音,实在找不到声韵相同的直音,不得已只好用反切代替。凡是入声字,都予以标明。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诗经注析》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 1991 年 10 月出版。(洪湛侯)

【诗经全译】 诗经全译全注本。金启华撰。本书译文注重直译,以求对原诗比较忠实,比较符合原来的诗意,但缺点是有时难免胶滞不通。因此作者有时亦以疏通原文为主,间或夹以意译,尽可能地表现原诗风格。例如《兔置》篇“肃肃兔置,椳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该书译作“密密地结起了兔网,丁东丁东敲着桩,雄赳赳的武士们,公爷侯爷的屏障。”用“屏障”译“干城”,比较贴切。下文第二章用“搭档”译“好仇”,第三章用“智囊”译“腹心”,也比较合适。可以看出作者词语推敲磨炼之功。本书注释能够博观约取,择善而从。诗中一些关键性的词语,特别是比较古奥艰深、或者历来争议较大的词,译文难觅对应词语未能译出的,都一一出注。全部注释都用原文,并标出处。选用的注文,都非常简明扼要。这在近当代《诗经》今译中,几乎仅此一家。题解文字简洁,概括得体,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如《著》的题解为“女子张望迎娶她的夫婿”,《螽斯》为“祝人多子多孙”,《樛木》为“祝贺人幸福”,《月出》为“对月怀人”,《十亩之间》为“采桑歌”,字数虽少,

却很切题。本书能够实事求是,兼存旧说,既不轻易否定,也不一味盲从,斟酌损益,颇得其宜。《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译注】诗经全译全注本。袁梅撰。引言对《诗经》内容、形式及有关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评介,共有四万五千余字。正文包括原诗、语译、解题与注释考证四个部分。对译、注用力尤多。译文大体上都比较自然通畅,流利上口。短诗如《齐风·卢令》、《小雅·鱼丽》、《周颂·潜》,长诗如《豳风·七月》、《东山》、《鲁颂·駉》等篇,都译得比较成功,只是这样优秀的译作,在全书中还属少数,大多数诗篇,虽然时有佳章佳句,然亦多有病句浮词,烦文赘义。本书在题解和对译方面,不够严谨,注释亦有繁冗之弊。《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国风今译】诗经选译本。兰菊荪撰。原名《诗经国风研究》(上卷)。每诗原文与译文对照,正文之后有关于主题的说明和疑难字注音,没有释义,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译本”。作者别有《诗经》“注释”和“辨说”两稿,稿佚未出。作者译诗主张意译,用的是新语汇,句法又系九言、十言、十一言等民间弹词蜕化出的新格律诗体。书中如《卷耳》、《君子于役》、《隰有萋楚》等诗的译文,都还有些诗意;但就全书而论,译文能符合原意而且没有语病的,为数不多。本书译文错误较多,有些诗篇,名为意译,实则任意改写。例如《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译作“曾记竹马当年一道捉蟋蟀网蜻蜓,两小无猜天天那样的和乐而欢欣”,“捉蟋蟀网蜻蜓”等等,皆原诗所无。《诗经国风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诗经学专著。骆宾基撰。作者为当代著名小说家。本书分上下两编。上为《诗经新解》,共十二篇,内中除《淇奥》篇及一两篇古诗新译之外,大都是1972年《诗经批注》的整理稿。下为《古史新论》,共二十四篇,大都成篇于八十年代前后。作者于1972年夏开始从事金文和古代典籍研究,从殷周青铜彝器图铭里,发现“五帝金文”和“唐虞金文”,写成《金文新考》,本书下集的文章,大都与考订金文有关,只有几处引证了《诗经》的诗文。《诗经新解》十二篇文章中绝大多数写于“文革”之初作者被“隔离审查”期间。其《关雎》首章、《何彼秣矣》、《淇奥》、《斯干》、《绵》、《旄丘》诸篇新解,和《蓼兮》、《伯兮》今译,主要是订正《传》、《笺》、《正义》误说,引用的参考资料,以采自吴闿生《诗义会通》为多,反对传统旧说,论证有据。《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研究反思】诗经学专著。赵沛霖撰。全书

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七章,叙述关于祭祀诗、宴饮诗、史诗、农事诗、战争诗、怨刺诗、情诗的特点、研究概况和研究成果,是对《诗经》中各类型诗篇的专题评介和古今研究概况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亦七章,讨论《诗经》的分类、诗乐关系、《诗序》的作者、《诗序》的评价、比兴的界说和实质、兴的分类以及《诗经》的艺术成就等。这一部分是评介《诗经》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概况。以上两部分具有《诗经》研究史性质,第三部分为《诗经》研究专著提要,收古代八种、现代四种,并选有“五四”至1984年《诗经》研究论文四十二篇。均有简单评述,颇切实用。第五部分为《诗经》研究书目和研究论文分类目录索引,具有资料书、工具书的性质。第四部分为《诗经》研究展望。作者认为《诗经》研究存在危机,提出深化《诗经》研究的途径和加强《诗经》研究宏观规划的一些设想。这一部分和书前的“导言”,最有新意。此书是一部新型的诗学著作,书中着重介绍了近当代《诗经》研究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较有现实意义。《诗经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入《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洪湛侯)

【诗三百精义述要】诗经学专著。盛广智撰。本书分四个部分。《诗经》导论主要阐述有关《诗经》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诗经》思想内容论,分类阐述《诗经》中各种内容的诗篇;《诗经》艺术成就论,主要论述《诗经》的赋、比、兴,语汇、句式、章法和韵律,《诗经》的讽刺艺术及其方法,意境与形象等;最后是诗经学略论,介绍唐以前和宋以后《诗经》研究概况。本书属于概论性质,某些章节尚有一定深度。《诗三百精义述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研究新编】诗经学专著。李湘撰。本书认为《诗经》实际存在着六种篇体结构,即整篇单一兴体、整篇综合兴体、整篇比体、整篇赋体、整篇兼体、整篇赋、比、兴、兼综合体。本书以此为根据,每种选出若干首诗,作为篇例。并在每个篇例下,分别标出“题旨简述”、“体例辨释”、“评赏纪要”、“韵式韵部”、“文字注解”、“白话译文”等六个门类,加以阐述。朱熹《诗集传》对一部分诗篇曾分别注为“赋而比也”、“兴而比也”、“赋而兴而比也”等等,本书显然受其启迪。历代对朱熹“兼体”之论,争议殊多,褒贬不一。故本书“治丝愈棼”之弊,自亦在所难免。《诗经研究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洪湛侯)

【诗经解说】诗经学专著。陈铁键撰。作者对《诗经》的内容、形式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特点,深入浅出地加以解说,故以解说为书名。书分四章,以第

二章《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第三章《诗经》艺术方法为重点。第二章论及《诗经》中的神话传说、史诗、反剥削反压迫、爱国主义及讽刺诗、农牧渔及田猎、爱情与婚姻、风俗与燕飧诗等。第三章论及赋、比、兴、修辞方法、意境、命题、用韵、炼词造句章法等。书中征引原诗较多,凡全篇征引者都附译文,并附有关资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大学文科教材。《诗经解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收入《阅读辅导丛书》。(洪湛侯)

【诗经述论】诗经学专著。洗焜虹撰。此书属概论性质。分六章论《诗经》的渊源、产生、分类、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诗经学之形成与发展。本书着眼于作品的文学性,不涉训诂考证,试图通过剖析作品,揭示诗人心底的情愫,探寻他们怎样从各自的社会地位出发,透过自己心灵的镜子,去映照那个时代的风貌。全书以述为主,以论为辅。《诗经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收入《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洪湛侯)

【诗经】诗经学专著。①金开诚撰。全书五章。分论《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成书的一些问题,《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从诗到“经”和《诗经》的传授等问题。第二章评介《诗经》的篇数和“笙诗”问题、十五国风所属的地域、诗三百篇产生的时代、作者、采集、编订和编排方式。第五章评介“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孔门诗教和诗成为“经”,以及《诗经》的传授和《诗序》问题,能够把比较正确的或具代表性的说法,有选择地介绍给读者。本书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收入《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②周满江撰。分四部分介绍有关《诗经》的知识。内容涉及《诗经》书名来历与诗篇数目,分类、时代、地域、作者和编订过程,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地位影响等。观点正确,结构严谨,内容精练,颇有参考价值。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洪湛侯)

【诗经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共收1956年至1958年发表的《诗经》论文十九篇,其中1957年发表的占十一篇。作者有黄焯、高亨、孙作云等知名学者。其中通论五篇、有关《国风》的三篇、有关二《雅》的四篇、有关《周颂》的二篇、书文评论五篇。书前出版说明说:“收在这里的论文,在我们看来,其中有确有研究和独创见解的,也有论点成问题,可以大大展开讨论的;但我们还是把它出版了。一方面是让我们从过去的脚印上看出今后发展的道路;另方面也希望能引起学术界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使我们的学术,得以再提高一步。”《诗

经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洪湛侯)

【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内收《诗经》鉴赏文章五十五篇,大都写于八十年代前期。赏析的篇目遍及《国风》、二《雅》、三《颂》,而《国风》所占比重为最大,约占全书的五分之四。书中文章大多一文一首诗,也有几篇将艺术特点相同的诗篇合并在一起评价。有的文章,评价同一首诗篇,对诗篇的主题,看法却有不同。徐北文《〈七月〉——西周农家乐》和蓝开祥《农奴凄惨生活的缩影——说〈邶风·七月〉》,虽然同写《七月》,观点迥然不同,见仁见智,各抒所见。不少鉴赏文章,提出一些新见解,如曹道衡《谈谈商颂》,程俊英《读〈小雅·车辇〉》,阴法鲁《〈商颂〉的〈那〉篇和〈烈祖〉篇初探》等。本集所收论文,多出学术界名家之手,故质量较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洪湛侯)

【诗经词典】诗经学工具书。①向熹撰。词典正文前有王力序,凡例十二则,汉语拼音索引和部首检字表,正文后有《诗经》原文及用韵,又有附录五种,书末有《后记》。正文收录《诗经》所有单字二千八百二十六个,作为字头;同时收录复音词近一千条,《诗经》的解题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三百余条,共计一千三百八十八条,兼有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的某些特点。本书释词,比较准确、精练、通俗。每词首先提出编者自己的意见,并引《经义述闻》等专书作为立论依据,后面附以《毛传》的说法,供读者参考。有的义项《辞海》、《辞源》皆未收,颇能显示专业词典的特色。篇名题解,或立新说,或采旧解,亦能各得其宜。例如《陈风·月出》题解说:“这首诗写男子在月下怀念美人,情思宛转,节奏优美,是一首别具风格的双声叠韵诗。”《唐风·葛生》的题解,则兼采各说,不作定论。但特意指出以“葛生”起兴与古俗有关,很有参考价值。本书注音,包括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反切主要依《广韵》;《广韵》未收的依《集韵》,反切前加星号表明;《集韵》也未收的,用其他书中的反切,标出书名。注明每一首诗的韵脚及其所属韵部。又音、旧读,亦适当收录,堪称资料丰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②万祥祯编著,袁梅审订。为董治安、王世舜主编《先秦要籍词典》的一种。正文前有前言、凡例、篇目简称对应表、音序索引、笔画检字表等。本词典以释词为主要任务,收录《诗经》中的全部单字、单音词,兼收意义不可分割的复音词和结构稳定、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组。计三千八百九十六条,按音序排列字头三千零一十九个。不收《诗经》篇名和有关《诗经》的专门词语。

本词典所收条目的释义,只释其在《诗经》中的含义,凡《诗经》中不曾出现过的义项,一律不作解释。有歧义者,则参校异同,斟酌得失,择善而从,一般不排列异说。注音则一律注今音,不注古音。本书释义文字简明,不标出处,不征引训释文字和书证,释义后,即标出有关例句,排列非常醒目,故同时又具引得的功能。本书作者收词立目,能吸收历代研究成果。如《豳风·东山》“有敦瓜苦”,其中的“瓜苦”《郑笺》说是“瓜之瓣有苦者”,实即指苦瓜。本词典 guā 读音下即以“瓜苦”立目,释义谓“‘苦瓜’之倒文,即瓠瓜”,即采闻一多、余冠英二家之说。另有一些条目的解释,根据公认的校勘成果。但书中也有一些立目未能尽当,如在“心”字下,不收“吹彼棘心”(《邶风·凯风》)的例句,而在“棘”字下另出“棘心”词目,却又不列与之对应的“棘薪”条目,自乱其例。某些词本有不一个义项,本词典仅列一种解释,也是美中不足。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洪湛侯)

【毛诗引得】 诗经学工具书。近人洪业、聂崇岐等编纂。引得即索引。本书以引得为正文,前有序及叙例十九则、笔画索引,并附《毛诗》本文。本书是《诗经》的逐字索引。仅凭诗中一字,即可索得全句。书中将《诗》三百五篇的本文,逐篇用号码标明,如第一篇为《关雎》,第三百零五篇为《殷武》,所谓“笙诗”无辞者,则仅列篇名,不加号码。引得每字所出之诗句之下,皆标出它在书中的出处。人名、地名不作特别标明。如“顿丘”、“文王”、“家父”之类,皆分别见于“顿”、“丘”、“文”、“王”、“家”、“父”各条。惟各篇篇名及《国风》、《雅》、《颂》之类,则皆为之引得,并标出所在页数。如《关雎》列于引得“关”字之末,《国风》列于“国”字之末。这部引得采用“中国字庀法”排检,使用很不方便。但其为首次编辑《诗经》单字索引,对当代编辑诗经索引,仍有参考价值。《毛诗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据原哈佛燕京学社编印本缩小影印。

(洪湛侯)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诗经学工具书。近人洪业、聂崇岐等编纂。《毛诗注疏》引书约二百种,散见于全书之中,本引得为便于查检和征引而作。本书以 1926 年影印阮刻之《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引得以数字标明该词目见于《毛诗注疏》何卷何页。《毛诗注疏》引书有时仅举书名,有时著者书名并举,凡此皆并归著者下,书名下则括见著者。例如《说文》皆归并“许慎说文”,《字林》皆并归“吕忱字林”,而于《说文》下标出“见:许慎”,《字林》下标出“见:吕忱”。又书中有时仅举篇名,有时则书名篇名并举,凡此则皆归并书名下。例如《玉藻》皆并归“礼记玉藻”下,

《释兽》皆并归“尔雅释兽”下。《毛诗注疏》所引之书,凡遇一书数称者,则以本名为主,下括诸异称。并在诸异称下,注出见本名。例如《春秋元命苞》下括《元命包》,而在《元命包》下则标出“见《春秋元命苞》”。这样,各个名称都可以辗转查到。本书对于查检隋、唐以前有关《诗经》研究资料,大有裨助。《毛诗注疏引书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据原哈佛燕京学社编印本影印。

(洪湛侯)

【诗经索引】 诗经学工具书。陈宏天、吕岚撰。本书是《诗经》的逐字索引,可以查出《诗经》中的每一字,包括异文、重文、诗题的出处。本书以四角号码索引为主体。1934 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的《毛诗引得》,用“中国字庀法”检索,使用非常不便。今编者吸收其在校勘和编纂上的一些成果,改用四角号码检索,内容更为充实,可为读者查检《诗经》的字词,节约大量时间。但此书校对粗疏,错字、错号太多,给使用带来困难。《诗经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洪湛侯)

【韩诗外传集释】 诗经学专著。许维遹(1905—1951)撰。十卷。许维遹,号骏斋,山东荣城人。除本书外著有《吕氏春秋集释》、《管子集校》等。《韩诗外传》西汉韩婴撰。汉初传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韩婴就是《韩诗》的创立者,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婴撰《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内传》早已散佚,惟此《外传》至今尚存。“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今本《外传》已非《汉志》之旧。《内传》、《外传》体例不同,从后人所辑的佚文看,《内传》可能是阐发经义的,而《外传》内容,则大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收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可见《外传》是用诗来说明历史故事,并非用历史故事来解释诗,《外传》对《诗经》义旨的阐发,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其体例,一般是先讲一个历史故事,或发一通议论,然后在结尾处,引诗为证。这和《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很相似。书中所说的故事,同先秦史传以及诸子书所记载者颇有异同,清人考订此书的,以赵怀玉的《校》和周廷谔的《注》为最著,吴棠以周《注》为主,参以赵《校》,合刊为一书,时人推为善本。许维遹的《集释》,收集数十种有关校、注和不同版本,悉心剪裁,以集校为主,少数地方作了集释,成为目前较好的本子。《韩诗外传》原无章次,许维遹始订为三百十章。今人晨风、刘永平从中选取一百三十余篇,译为现代汉语,编成《韩诗

外传选译》一书。《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洪湛侯)

【楚辞章句】 现存最早的楚辞全注本。东汉王逸作。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任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今本《楚辞章句》题“校书郎臣王逸上”,知为王逸在校书郎任上所撰。此书根据刘向编定的《楚辞》而作,共十七卷。前十六卷注释屈原以至刘向的作品,第十七卷解释其自作之《九思》。宋洪兴祖疑《九思》为王逸之子延寿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系王逸自作。注释体例为各篇均有一序,指出其作者、创作时间及主旨等。如《天问》,于指明屈原所作后,论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遂造成《天问》行文之无序。又云《远游》为屈原放逐之后,“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而作。《渔父》本是屈原与江滨渔父问答之词,楚人怀念屈原,因而加以叙记。这些解说对后人研究《楚辞》,有一定参考价值。《楚辞章句》善于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而又能作客观鉴别,王逸创见即在其中。如司马迁、班固都认为“离骚”是遭遇忧患之意,王逸释为离别的忧愁,“离骚经”之“经”字,王逸释为“径”,屈原“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如论《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首次指出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关于《招魂》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王逸却认为是宋玉。《楚辞章句》长于名物训诂,王逸本系楚人,故对《楚辞》中的楚地方言均能一一道出。此外,该书还保存不少汉儒说法。不足之处是有些释义略显迂阔,且偶有望文生义之处。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仿宋刻本、明隆庆五年(1571)朱多煌夫容馆仿宋本。以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较通行。另有1989年岳麓书社排印本,附有洪兴祖补注,由今人夏祖尧校点。

(徐醒生)

【楚辞音残卷】 楚辞学专著。隋释道骞撰。此书是专门研究楚辞音读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除释道骞之书外,晋徐邈、南朝宋诸葛民、孟奥均著有《楚辞音》一卷,均已亡逸,现仅存敦煌文书中道骞《楚辞音》残卷。《隋书·经籍志》称,释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现存《楚辞音》残卷,只剩八十四行,从“驷玉虬以乘鸞兮”到“杂瑶象以为车”,所释《离骚》经文一百八十八字,注文九十六字,合计二百八十四字。此卷以训释音读为主,所注音读二百七十多条,是研究

隋唐古音的原始资料。卷中列有“直音”、“如字”、“依文读”、“协韵”等例,都是根据魏晋南北朝人旧说。参校今本《楚辞章句》,所录异文大多优于今本,因此有很大校勘价值。此外,它还保留了一些久已亡逸的楚辞旧注,如晋郭璞的《楚辞注》、无名氏的《离骚释文》等。《楚辞音》残卷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徐醒生)

【楚辞补注】 楚辞注本。宋洪兴祖撰。兴祖(1090-1155)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南宋初曾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触犯奸相秦桧,被贬昭州而卒。洪兴祖博学多才,所著除《楚辞补注》十七卷,《楚辞考异》一卷外,还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等。《楚辞补注》是为补王逸《章句》之不足而作,故名“补注”。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云,洪曾得欧阳修、苏轼、孙觉、苏颂等人的楚辞本子,互相参校,兼采众说,所以能补王逸之不足。《补注》撰成之后,又得见姚廷辉的本子,因作《考异》一卷,单行于世。今《考异》一书已散入《楚辞补注》中的“补曰”之前。《补注》原有洪氏自序,已亡佚。其书体例,先列王注于前,然后补注于后。其最大贡献在于广征博引,考证精审,不但补足王逸《章句》之阙,而且纠正王注不少的疏误。尤以保存六朝隋唐及宋人部分遗说,有助于人们了解历代楚辞研究状况。王逸《章句》征引典籍大多不标书名,《补注》则一一指明出处。王逸以后的各家楚辞注本,如郭璞《楚辞注》、徐邈《楚辞音》,今多亡逸,唯于《补注》的征引保留了只鳞片爪。《补注》于名物训诂力求详尽,并注意校勘和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崇它是楚辞注本中“特为善本”之作。该书缺点是过分拘泥于《楚辞章句》,名物训诂方面偶有比附之弊。有清康熙汲古阁仿宋本十七卷;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等。常见者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由今人白化文校点。(徐醒生)

【楚辞集注】 楚辞注本。八卷。南宋朱熹撰。前五卷以屈原所著的二十五篇作品为“离骚”,其篇章次序沿袭王逸的《楚辞章句》;卷六至八,把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十六篇,称为“续离骚”,但篇目与王逸旧本有很大不同,其中增入贾谊《吊屈原赋》和《服赋》两篇,删去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是先把每篇作品分为若干章,每章四句至八句不等,然后按《诗集传》体例,先注字音,次释文义,并通释各章大义。解释中多用赋、比、兴等概念范畴。其注解,纠正汉儒不少谬误,善于发明屈原作品的大义和宗旨,简明扼要,摒弃了旧注繁琐的弊端。此书阐释中时有穿凿附会之病。如认为《山鬼》为寄托之词,暗写怀王、屈原之关系,

即是一例。然许多见解十分精辟独到,发前人所未发。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所作,本书则认为是民间祭祀鬼神之语,屈原“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如本书认为《九章》是屈原被放逐以后“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均为不易之论。今本《楚辞集注》附有《楚辞辨证》二卷和《楚辞后语》六卷。《辨证》是对旧说的驳正和对一些问题的考证。《后语》是根据北宋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补订而成,共收录从荀子到吕大临等人的辞赋作品五十二篇,但只注释了前十七篇,后三十五篇无注。《楚辞集注》有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刊本,该本附《楚辞辨证》;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朱鉴刻本,附《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比较通行的有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排印本。

(徐醒生)

【楚辞集解】楚辞注本。八卷。明汪瑗撰。瑗字玉卿,安徽歙县人,明万历间诸生。此书只注屈原作品,原缺《天问》一篇,后由其子取汪瑗手批朱熹《楚辞集注》之《天问》篇补之。此书着力于引征材料,自王逸、洪兴祖之注至《尔雅》、《论语》及李白、杜甫诗文,范围广博,又“务为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力诋汉宋以来诸家注释,虽不免主观臆断,但有见地的观点不少。如该书最早提出《九歌·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湘君为湘水之神,湘夫人为湘君之夫人等。书后附《楚辞蒙引》二卷,重在辨证考释,因其文字繁冗,不宜作为《楚辞集解》的正文,所以作为附录。另附《楚辞考异》一卷,摘录原句,以王逸、洪兴祖和朱熹三本互校,罗列异文而不下断语。其子汪文英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十三年两刻此书,另有万历四十六年刻本及日本写本。

(徐醒生)

【屈宋古音义】楚辞学专著。明陈第撰。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连江(今属福建)人。以诸生从军,曾任蓟镇游击。此书以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三十八篇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押韵字音读古今不同的二百三十四字,进行详细分析考辨,以此推证古音读。他主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故古音与今音之间也有很大差异,破除了古人的“叶韵”说,开有清一代研究古代语音学的风气。与陈第所著《毛诗古音考》相为发明,对清代学者及今人影响很大。本书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古音韵部与今音韵部进行比较。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徐醒生)

【楚辞听直】楚辞注本。八卷,合论一卷。明黄文焕撰。文焕字维章,永福(今属广西)人,天启五年

(1625)进士。崇祯年间,受黄道周冤狱株连而入狱,在狱中写成此书,时在崇祯末年。本书取名《楚辞听直》,是从《惜诵》中“命皋陶使听直”而来。作者认为屈原被谗受害,冤屈无由得申,故呼之于天。是书乃借为屈原洗冤,摅写自己怨愤。其本意不在字义训诂,而专以探求屈子意旨为务,歌颂屈原忠君爱国,曲折表达对明朝昏君的讥讽和痛恨。在论作品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方面,亦有可取之处。该书还驳斥班固、朱熹对屈原性格弱点的批评。以明崇祯十六年(1643)承启堂刊本为佳。

(徐醒生)

【楚辞笺注】楚辞注本。四卷。明李陈玉撰。陈玉字石守,号谦庵,吉阳(今江西吉水)人,曾任武塘令、侍御史等职。陈玉有感于历代注家对楚辞注释方法的混同,而采取“笺”、“注”的形式,对它们进行研究。本书以《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为屈原作品,而以《九辩》、《招魂》、《大招》为宋玉作。本书笺注的体例是,先作一小序,然后再分段讨论。每段都先串讲大意,然后再笺注词句。本书不以名物训诂为主,而以阐发屈原思想为主。对于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情操多所发掘和褒扬,对后代研究屈原思想者启发颇大。书中亦有比附过当之处。本书的刊本有清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仲春武塘魏子渠本。

(徐醒生)

【楚辞屈诂】楚辞注本。不分卷。清钱澄之撰。此书又名《屈子诂》,与他的另一部著作《庄子诂》合为一书,名曰《庄屈合诂》。《屈子诂》不分卷,其体例是:先列朱熹、汪瑗、张凤翼、黄文焕、李陈玉等人的注释,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本书的特点及其价值在于反对前人的牵强附会,力求做到对屈原作品进行客观、公允的解释。例如,他认为《九歌》“本楚南祀神之乐章,原从而改正之,虽其忠爱之思时有发见,而谓篇篇皆托兴以喻己者,凿矣”。其词句诠释也较为晓畅明快,简炼准确。因此,本书是明、清时期众多的楚辞注本中较好的一种。有清康熙间苏州刻本。

(徐醒生)

【楚辞通释】楚辞注本。十四卷。王夫之撰。此书大致依王逸《楚辞章句》编次,删去《七谏》以下五篇,加入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两篇以及王夫之《九昭》一篇,共四十四篇。明清之际众多楚辞注家大抵借注屈寄寓民族思想,此书表现尤为突出,其《九昭》自序云:“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具体注释中也时时流露痛惜明朝灭亡的感慨,阐述了国家兴亡治乱的道理。如注释《天问》“帝降夷羿”一段,借寒浞杀后羿事议论说:“盖无道必亡,虐民纵欲,虽有强力,不足凭也。”

文字训释和时地考证方面,此书有不少独创之处。如认为《哀郢》作于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后:“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曰东迁、曰揖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渚,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王逸不恤纪事之实,谓迁为原之被放,于‘哀郢’之义奚取焉?”又如认为《九歌·礼魂》是“送神之曲”,是“前十祀之所通用”。这两说虽都晚于汪瑗的《楚辞集解》,但都有所发挥,且影响比汪氏更大。不过此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错误,如把《卜居》中“突梯”一词解释为“大窾曰突,从突而入,缘梯而登,钻穴逾墙之谓”,实为望文生训。又如怀疑上官大夫与靳尚为一人,已为蒋骥辨明其非。以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较通行。(徐醒生)

【楚辞灯】 楚辞注本。四卷。清林云铭撰。云铭字西仲,闽侯(今福建福州)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徽州通判。本书自序说明命名之意云:“二千年来,读骚者悉困于旧诂迷阵,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颜之曰灯,庶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因对《楚辞章句》《楚辞集注》等数十家旧注不加采纳,且考订其种种讹误。不同意《汉书·艺文志》谓屈原作品为二十五篇之说,赞同《史记》和黄文焕的观点,以《大招》、《招魂》为屈原作品。该书只论屈原作品,不收“续离骚”诸作。卷首列《史记·屈原列传》、《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并考订屈原生平事迹。全书体例为每篇作品逐句诠释,旁加圈点,逐段分疏,而又各为总说。还借鉴黄文焕《楚辞听直》,品笺相间,评注结合,诠释训诂与疏通文义并重。林氏释文,专以浅近为务,纯以点评时文之法解释屈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为“乡塾课蒙之本”。有些解释且有臆测附会之病。以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挹奎楼刊本较佳。(徐醒生)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注本。六卷。清蒋骥著。蒋骥,字諫塈,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卷首先列《史记·屈原列传》、《楚世家》节略、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并对屈原生平事迹,有所考辨。书中还附有“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五幅楚辞地理图,逐一推断屈原创作各篇的时间地点,以及行踪等。书中推断屈原各篇作品的创作次序为:《惜诵》、《离骚》、《抽思》、《思美人》、《卜居》、《大招》、《哀郢》、《涉江》、《渔父》、《怀沙》、《招魂》、《悲回风》、《惜往日》。至于《九歌》、《天问》、《橘颂》、《远游》诸篇,蒋骥认为它们“文辞浑然,莫可推诘,故弗敢强为之说云”。此外,《九章》各篇的注释详尽辨析了年月道里等问题。在

《山带阁注楚辞》之后还附有《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楚辞余论》主要是辨驳旧注的谬误,考证名物异同。如考证《离骚》“摄提贞于孟陬”时,蒋骥引《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为证,说明“摄提”为“摄提格”之省称。又如屈原作品中的“民”字,旧注训为“民众”,蒋氏则认为是屈原自指。书中也偶有怪论,如云“魂兮归来哀江南”中的“哀江”为地名。《楚辞说韵》专门研讨楚辞声韵,按字母分列文字,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广博地引证古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山带阁注楚辞》既避免了汉学家偏重训诂、不求屈子深意的毛病,也避免了宋学家囿于迂腐的义理而忽视文字训诂的弊端,是明清众多楚辞注本中较好的一种。最早刊本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武进蒋氏山带阁刻本,后有雍正五年(1727)刻本,1958年中华书局将该书排印出版。(徐醒生)

【离骚汇订】 楚辞会注本。四帙。清王邦采撰。邦采字貽六,无锡人(今属江苏)人,康熙年间诸生。第一帙收录《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以及贾谊《吊屈原赋》,并作序文、书后、象赞以及《读离骚绝句》等文字。后三帙始为《离骚汇订》正文,收有王逸、洪兴祖、朱熹、徐焕龙、林云铭、朱冀六家之说,然后以加案语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在疏通文义的同时,对林云铭、朱冀的一些不确之说多所驳正。在字句训诂方面多有可取之处,但仍不免有些望文生义。在理解《离骚》内容方面,王邦采有独到之处,他把《离骚》分为三个大的段落,准确地揭示了《离骚》内容上的三大层次。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女嬃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段;“索薏茅以筵筮兮”到最后为第三段,这种分段法至今仍多为人们所称道。本书好的版本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雅书局刻本。(徐醒生)

【屈子杂文笺略】 楚辞学专著。王邦采撰。王氏作《离骚汇订》以后,又作《屈子杂文笺略》二帙,注释《离骚》以外的其他屈原作品。在字句训诂方面,与《离骚汇订》相似。但王邦采认为《九歌》应与《九章》、《九辩》一样都是九篇,所以把《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似不足取。(徐醒生)

【屈原赋注】 楚辞注本。十卷。清戴震撰。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做过小商贩,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被召为纂修官,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氏学识渊博,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文字学家。他治学严谨,尤长于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考据。此书亦着重于对楚辞字句的解释及名物的考辨,绝少空谈义理。如“恐皇舆之败

绩”一句,前人多将“绩”释为“功绩”,戴震却有力地证明了“败绩”就是车覆的意思。引证《礼记·檀弓》“马惊败绩”和《左传》“败绩厌覆是惧”两条材料,比汪瑗的论证更进了一步。又释“天问”:“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为罔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诘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舒愤懣也。篇内解其近正,阙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态度十分谨严。《屈原赋注》后附《楚辞通释》两卷,上卷疏证山川地理,下卷通释鸟兽鱼虫、草木花卉,凡有考证均援据充分,且多有新见。书后另有《楚辞音义》三卷,为戴震同学汪梧风所作。汪梧风字在湘,安徽歙县人。在建德周氏刻本《屈原赋注》中,《音义》之后有汪氏自记,称是书根据戴氏《屈原赋注》而作,体例模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现在的通行本删去汪氏自记,使读者误以《音义》也是戴震所作。此书音读详明,释义校勘皆有一定参考价值。《屈原赋注》较好的版本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歙县汪氏刻本以及《湖北先正遗书》本。通行本有民国间世界书局印行的《楚辞五种》本。

(徐醒生)

【屈子章句】 楚辞注本。七卷。清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今湖北浠水)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官饶阳(今属河北)知县。此书所注全为屈原作品,但篇章次序大异前人。书前,刘梦鹏作有《屈子纪略》一篇。《离骚》、《九歌》、《卜居》、《天问》、《招魂》为前五卷,第六卷以《远游》取代《怀沙》,入于《九章》,题为《哀郢九章》。第七卷合《渔父》、《怀沙》为一篇,题为《怀沙赋》,删去《渔父》中“渔父歌”而加入《史记·屈原列传》中“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数字。注释体例为每篇先著总论,其次分段注释。字句诠释以简洁明快为特色。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藜青堂刊本。

(徐醒生)

【楚辞韵读】 楚辞学专著。清江有诰撰。有诰字晋三,歙县(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楚辞韵读》共收入屈原和宋玉作品二十八篇,即:《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渔父》、《卜居》、《九辩》、《招魂》、《大招》。本书一般采用直音法注音,有时还标示四声,便于初学者诵读。不便直音的字,就用反切法来代替,所注音均较为准确。书中亦有个别地方从今音中寻求古音,导致注音出错。而且采用合韵说和通韵说,也过于笼统。然本书仍不失为研究楚辞韵读的较好本子。书后《楚辞韵读古音释》,把楚辞作品中入韵的字分为十八部。本书还附有宋玉赋九篇,它们是《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古文苑》

中的《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笛赋》、《舞赋》。本书较好的版本有清嘉庆十九年(1814)自刻本和嘉庆二十四年的《音学十书》本。通行本有民国时期渭南严氏的《音韵学丛书》本,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据严氏本影印出版。

(徐醒生)

【屈骚指掌】 楚辞注本。四卷。清胡文英撰。文英,字质余,号绳崖,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撰者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为二十五篇是对的,王逸《楚辞章句》把《招魂》、《大招》排斥在外则是不正确的,本书将《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与《大司命》、《少司命》均作为一篇,这样,屈原的作品就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仍为二十五篇。本书体例为先列司马迁《屈原列传》和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后列目次,然后逐篇训释。每篇有题解,逐句注解。考辨名物、地理较详为本书之长。王鸣盛为其所作序文中说:“余读其书,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人之旨趣自出。”但书中也有一些因不严谨而致误之处。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富艺堂刊本,1979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徐醒生)

【楚辞释】 楚辞注本。十一卷。清王闿运撰。本书只收录楚人的辞赋作品,汉代的所谓“续离骚”一概不收。前七卷均为屈原作品。闿运认为屈原作品只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而《招魂》则是宋玉作,《大招》为景差作。后四卷是宋玉的《九辩》、《招魂》,景差的《大招》,宋玉的《高唐赋》。由于第十一卷先录唐李善注,后加王氏注释,且篇目之下署曰“李善注,王闿运释”,所以本书称《楚辞释》。在注释的体例上,前十卷先录王逸注,王闿运再加以注释。第十一卷则李注在前,自注于后。本书立论新颖,自标新说,不少地方突破了古人的藩篱,但有些地方也因此而多附会之处。较好的版本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尊经院刊本和光绪二十七年衡阳刊《湘绮楼全书》本。通行本有1923年刊行的《湘绮全集》本。

(徐醒生)

【屈赋微】 楚辞注本。二卷。近人马其昶撰。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光绪年间曾任学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书中广泛征引清人注释屈原作品的研究成果,即使是笔记书札中所涉及到的言语,也都被采纳,因此,本书荟萃了清人研究屈原的精髓,其中尤以其前辈、桐城派方苞、姚鼐、吴汝纶等人的解说为多。不过作者并非悉取他人成说,书中也时有新论。例如,在解释“惜诵”二字的含义时,他引证《说文》对“惜”的解释

“惜,痛也”,以及《诗经·小雅·节南山》中“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句子,认为“惜诵”就是“痛陈”的意思。本书还在自序中着重分析了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并高度赞扬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现存较好的《屈赋微》刻本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合肥李氏《集虚草堂丛书》本,民国初年北京还有铅印单行本。

(徐醒生)

【楚辞】 楚辞学专著。近人蒋善国编纂。此编主要录楚辞白文,加以新式标点,句后附校记。每段之后有简单文字以概括段意。书前附有四文值得注意。一、胡适《读楚辞》。胡适提出“屈原是谁”的问题,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他从中总结出五大可疑之点。认为传说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其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战国末楚怀王入秦不返,是楚民族伤心事,民间流传有关楚怀王传说,屈原是此故事的一部分,当时怀王是正角,屈原是配角,郑袖为花旦,靳尚是小丑。秦亡后,怀王神话失去作用,原来作配角的屈原反成为主角。胡氏还认为楚辞二十五篇决非一人或一个时代的作品。二、陆侃如《读〈读楚辞〉》。文中主要批评了胡适否定屈原存在之论。陆氏认为,屈原与黄帝、周公不同,后者是在无信史的时代,前者是在有信史的时代。黄帝、周公成为“箭垛式”人物,屈原则不可能。三、徐旭生《天问释疑》。此文主要批评胡适在《读楚辞》中对《天问》的否定。胡适云:“《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而徐氏认为《天问》中提出一百八十几个问题,其大胆的怀疑,是“思想进步的先河”,没有这些便没有知识,没有科学,何“卑陋”之有?徐氏认为屈原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地位,而且在哲学史也应占相当的一席。四、蒋善国之《引言》。其中谈楚辞“定名及意义”、“楚辞在艺术界底批评”、“屈平作品底次序”、“屈宋以后作品”,见解平正通达。此编有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梁溪图书馆排印本。(王学泰)

【屈原赋校注】 楚辞注本。今人姜亮夫撰。作者对屈原的全部二十五篇作品进行详审的校勘、正字和注解。本书的校注工作始于1928年,费时四年,于1932年方始写定。作者注重从屈原的作品中,仔细搜寻考证有关的材料,并结合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进行对比排校,详细分析,从而较为详细而又完整地推论出屈原的身世和创作等情况。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考证精审,注释切当,是屈原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校注本之一。本书除对屈赋二十五篇进行详细的校释以外,还在卷首对《史记·屈原列传》进行了

详细的疏证。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徐醒生)

【离骚集释】 楚辞注本。近人卫仲璠撰。仲璠原名瑜章,以字行。《离骚集释》作于1936年。该书将《离骚》分为十章,分章进行逐字逐句的诠释。在注音上以陈第《屈宋古音义》为主,字句训诂兼采各家之说。每章之后尚有对文义的串讲和要旨的分析。本书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论述不多。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

(徐醒生)

【楚辞校补】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著。作者有感于楚辞的时代背景难明、文字艰深、传本讹误给读者带来的困难而作此书,因此,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书中详采博引各家成说,自洪兴祖至郭沫若共二十八家,对其中数家之说也多所驳正,资料十分丰富。本书收录的楚辞作品,除屈、宋以外,还有汉代以后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数十篇,是今人楚辞校注专著中收录作品较多的一部。本书的贡献在于校定《楚辞》中的不少错误。闻氏所校,多据别本以正今本之误,若各本皆误,也能以理推校,找出错误。本书原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42年国民图书出版社铅印刊行单行本。1948年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中。今最通行者为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本。

(徐醒生)

【天问疏证】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本书重点在于诠释词义。现存手稿有两种,一种是全稿,在原文之下录有王逸注,顶格誊写;而《天问疏证》的本文则低一格书写,原文及王注底本为《四部丛刊》所收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本。另一种不全稿,未录王注,以问为主。今本《天问疏证》是两稿的统一,1980年由三联书店排印出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重又刊行。

(徐醒生)

【天问释天】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本书主要是针对古人注释《天问》的不当之处,尤其是王逸的《楚辞章句》每两句一注的错误做法而作。王逸《章句》之后,古人多相延不改,如此碎裂文义,遂使《天问》多有难明之处。闻一多博采众长,断以己意,“作一总结账之企图,兹先取篇中问天事者四十四句释之,颜之曰《天问释天》”。这就是本书的由来。闻氏注《天问》,每四句一注,对于正确理解作品,有重大意义。《天问释天》原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后收入《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之中。

(徐醒生)

【离骚解诂】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本篇最初是一篇诠释《离骚》词义的文字,共有二十条考证,没有对《离骚》全篇进行解释,被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古典新义》之中。现存的闻一多手稿有扉页篆书《离骚廋义》一稿,前半部分两句一行,后半部分四句一行,且逐行加注,删改增补的地方也较多,似为注释《离骚》全篇的手稿。现在的通行本统一了全书的注释格式,按四句一行的形式来排列,并且注释文字也按句分段置于每行之后,便于读者阅读。书名也一仍《离骚解诂》。本书材料丰富,注释详尽,是专门研究《离骚》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徐醒生)

【九歌解诂】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九章解诂》合刊。此书系据作者今存遗稿整理而成。写作年代不明,书中注释有“并详《校补》”字样,盖知作于已发表之《楚辞校补》(收入作者《古典新义》)之后。本书对《九歌》十一篇作品之难解词句,分别加以考证、诠释。引证古文献十分丰富,对旧注多有纠谬,时出新见。如《湘君》“薜荔柏兮蕙绸”。《解诂》称“柏一作拍,并当为帕,帕与帛通,指旗面而言,旗面是布帛,所以名之曰帛”。并举《尔雅》、《周礼》、《礼记》为证。又《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解诂》云:“予读为眇。《说文》:眇,长眇,直视也。”书中所解诂,均足资参考。书后《整理者附记》云:“《九歌解诂》写成年代不明。今存遗稿中另有一篇《楚郊祀东皇太一乐歌》,系在《解诂》的基础上重新用语体文改写,文字较《解诂》有所增删,但全文未完成。今以《解诂》为主,参考《乐歌》做了一些增改。”(黄筠)

【九章解诂】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撰。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九歌解诂》合刊。本书系从作者今存遗稿中辑出整理而成。本书对《九章》中难解词句,分别加以考证、诠释。引证丰富,时有新见。书后,整理者附记云:“本篇手稿只此一稿。扉页自题篆书《九章》,下注:‘三十年七月陈家营’。后无篇目,今据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本录之如上。原文以同书校之,字句多有增补、改正,其说见于《楚辞校补》者,俱分别注出,以便读者参看。《解诂》所引典籍出处,有两处篇名未能查出,姑缺之以待考。”(黄筠)

【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跋】 楚辞学专著。近人闻一多作。这是闻一多在1936年3月18日为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所写的跋文,详述托王重民在巴黎图书馆拍摄到《楚辞音》残卷照片的过程,说明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的史料价值及在楚辞研究中的意义。文后附校勘记。本文载于1936年4月2日《大

公报·图书副刊》和《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收入《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徐醒生)

【屈原赋今译】 楚辞今译本。今人郭沫若译。本书按照《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说法,所译屈赋也是二十五篇。顺序是:《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至于《远游》、《大招》两篇,郭氏则认定它们非屈原所作。在译文之前,有一《屈原简述》,概述屈原生平、创作情况以及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问题。书后还作有后记一篇。此外,在《九歌》、《天问》、《离骚》、《九章》之后,各有一篇“解题”。本书文笔优美流畅,富有文采和诗的韵味,然有时为了照顾行文的流畅,对原作中的一些词句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使今译文字不够准确,与作品原意有一定距离,个别地方甚至有曲解现象。本书完成于1953年,其中有些作品于四十年代就进行了今译工作,本书现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之中。(徐醒生)

【屈原离骚今译】 楚辞今译本。今人文怀沙著。卷首《祖国的诗人之父——屈原》(代序),简单介绍诗人屈原以及《离骚》等作品的情况。作者还在《离骚》的题解里简单说明《离骚》的创作背景和特色,认为这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时所作。本书译文通俗易懂。书后附录收有作者的三篇文章《屈原和他的诗篇离骚》、《离骚韵读》、《读骚摭拾》以及苏联语言学家博士H·费德林的《伟大的中国爱国诗人》一文。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徐醒生)

【屈原九歌今译】 楚辞今译本。今人文怀沙著。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详述了自己对《九歌》的意见,针对胡适等人否定屈原存在的荒谬见解进行批驳。作者对陆侃如、游国恩、何天行、朱东润等人对《九歌》与屈原的关系等各种不同观点,也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不仅肯定屈原对《九歌》的著作权,还高度评价了《九歌》的艺术表现手法。本书题解简要,译文详细,每篇译文之后还附有原文和简明的注释。本书五十年代曾两次刊行,最通行的是1962年中华书局本。(徐醒生)

【屈原九章今译】 楚辞今译本。今人文怀沙著。作者在“自序”中详细论证了《九章》的创作情况。书中每篇的篇目之下先作一简短的题解,然后是译文,译文之后再附以原文和简单的注释。本书译文风格与他的《屈原九歌今译》和《屈原离骚今译》相同,较通俗流畅。本书五十年代曾两次印行,最通行的是1962年中华书局本。(徐醒生)

【屈原赋选】 楚辞注本。今人王涛选注。共选入

《九歌》、《九章》、《离骚》、《天问》二十二篇。本书注释的体例是：先在每篇作品的标题之下写上一段解释题意的文字，然后对作品进行分段注释，注释之后还有文义的串讲和段落大意的总结，并今译。本书引征前人成果和资料较为丰富，注释详尽且浅显，是一本适合初学者和文学爱好者阅读的通俗读物。本书原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属刘逸生主编《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丛书之一种，主要向海外发行。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内地版，向内地发行。

(徐醒生)

【屈原赋证辨】 楚辞学专著。今人沈祖棻撰。196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对屈赋中的字义、韵读，择要进行训释。作者在王逸、洪兴祖，以及清人戴震、俞樾、孙诒让等人治屈赋的基础上，对前人训释未安或尚未涉及处，提出自己的见解，足补前人所未及。如解申椒菌桂，确指申、菌皆地名，昌披用朱骏声说训为狂邪等，均有参考价值。但对屈赋题旨，往往臆说，如谓屈原《天问》“全言家天下之害”，说《九歌·云中君》“此祀于先王庙。楚地在云梦大泽中，故以云中君为题”等等，均穿凿而不可信。本书上、中、下三卷，后附《答杨纯三、邢璞山两先生书》九件，皆为谈论楚辞问题者。

(黄筠)

【楚辞选】 楚辞选注本。①今人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此书是供“一般的阅读”的普及选注本。全书“选了较早的《九歌》十一篇，屈原的《离骚》一篇，《九章》九篇与《天问》的一部分，宋玉的《九辩》的一部分及《招魂》的全篇”（《前言》）。入选诸篇皆有较为通俗细密的注释，或解字词，或释诗意，“尽量采用各家的长处。有些争论没有结论的，暂时不去作烦琐的考据。为了阅读的便利，注解前后不避重复”（《前言》）。这些特点，便于初学。入选诸篇之前皆有题解，以介绍题意、写作背景以及分析该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选注者将《九歌》视为“楚国民间祭歌”，认为“屈原可能加过工，但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民间的无名诗人”（《前言》），可是从祭祀环境富丽堂皇，遣词造句的典雅华丽，感情变迁的迅捷与细腻看，只能是活跃于宫廷的文人作品。此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出版。②今人马茂元选注。此书“对屈原作品，除了一般人公认为伪作，而它的本身确实并不高明，如《远游》、《大招》等篇而外，都保留下来，不加删汰”。《天问》一篇编者认为自己关于神话传说的知识不足，暂置不录。此外还选了宋玉的《九辩》，难以确定作者的《卜居》、《渔父》和贾谊的《吊屈原》以及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楚辞的精华大多包括进去（见《前言》）。对于入选作品注释详尽、通俗，并能兼采诸家之说，择善而从。正文前之题

解，更为详密，其中罗列诸家之说，一一指其得失，折衷其间。本书前言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楚辞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化意义，对于楚辞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其中所体现的人民性都作了很好的分析。指出楚辞中的“屈原的作品则正面地揭露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它不但反映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斗争，而且系统地表现了作为斗争实践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诗篇应该是很‘政治化’的，但屈赋中并未出现过概念化的说教”，“这是因为作者能够把这些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概括在完整的形象里”。编者特别强调楚辞的“比兴之义”，它已经不像民歌那样表现在某些个别事物的比喻上，“而往往是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事物和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在诗人形象思维的活动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的体系”（见《前言》）。此书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故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但又带有总结楚辞学成就与论辩性质，亦为学术界所重。此书大约是楚辞注本中发行量最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至1962年北京第三次印刷，其印量即达到八万四千册。

(王学泰)

【屈赋通笺】 楚辞学专著。六卷。今人刘永济撰。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屈赋通笺》和《笺屈余义》两大部分。《通笺》五卷，对屈原作品《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分别作出解题、正名、审音、通训和评论，并提出自己见解，如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与历来研究楚辞者不同；于《九章》只录《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五篇，认为其余四篇均非屈原所作，与一般通行本异；又将《国殇》独立于《九歌》之外，认为“即太史公当日所见之《招魂》”，亦属作者独家之见。《笺屈余义》收入十九篇有关楚辞的札记性文章。其自序云：“曾草成《通笺》五卷，校定屈赋五卷，廿年以来，间有所获，未及补入《通笺》中。而近人研治此书者，往往别出新义，其间未始无可以商榷者。《通笺》旧说亦有尚须更定与补充者，有疑而难决，决而仍难安者。乃以余力，重加稽考。其涉及单文只句者，则增入《通笺》中。有关总义者，别成一卷，曰《笺屈余义》，仍用通笺旧式，条分件系之。”《余义》中多考证之文，如《屈原列传发疑》、《屈赋体制出于古乐章说》、《哀郢非哀楚迁陈》、《王逸章句识误》等，均为一得之见，每不同于旧说。

(黄筠)

【屈赋新编】 楚辞学专著。今人谭戒甫撰。此编分上下两集，上集收录作者认为是屈原作品的二十五篇，称为“屈作之部”；下集收作者认为是非屈原所作的作品八篇，称“非屈作之部”。上下集均作有“通论”，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有关屈赋的各个方面问

题作了总的论述。书中对各篇作品也分别作了研究,分概说、考证、释文三个方面,并于每篇作品附有“今读”。今读系经过作品研究后整理出来的屈作与非屈作的本文。谭氏通过自己的考证认为《橘颂》、《招魂》(即《国殇》、《礼魂》)、《抽思》、《哀郢》、《九辩》(谭氏认为它是九篇作品)、《涉江》、《离骚》、《九歌》、(除《国殇》与《礼魂》亦为九篇)、《怀沙》等二十五篇为屈原之作。其余《天问》、《渔父》、《思美人》、《惜诵》、《惜往日》、《卜居》、《悲回风》、《远游》等八篇非屈原所作。之所以如此划分,首先作者认定屈赋为二十五篇,将《九辩》划归屈原作,分为九篇;再将《九歌》中《国殇》、《礼魂》划出,认为此即司马迁曾经阅读过的《招魂》,加上《离骚》共二十篇;于是再从《九章》中划出五篇为屈作,剔去四篇,属于非屈作,其间界限为屈作各篇的题目皆是其自定,立意包括全篇,绝无例外。而非屈作,题目皆由他人而定,只取篇首二字,如《思美人》、《惜诵》、《惜往日》、《悲回风》其题皆见于原篇首句,因此非屈原作。这与《庄子》外、杂篇情况相同。至于《天问》,谭氏认为此乃屈原使齐与稷下学者问答疑难时共同创作。此书新解甚多,然考证极不严密,多悬想之词。此编写成于1972年,中华书局于1978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楚辞新注】楚辞注本。今人聂石樵撰。本书只收录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作品。另外还收有宋玉的《九辩》、贾谊的《吊屈原》。聂氏认为,《卜居》、《渔父》作者不可考,《远游》在内容上宣扬道家神仙思想,在形式上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且亦非屈原作品,故不选入。而《大招》则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对《招魂》的模拟之作,所以也不收录。本书在前言中,概括叙述楚辞的产生、屈原生平、战国时代政治形势和楚国社会现实以及屈原的政治思想、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等问题。在注释上,本书博采历代众家之说,以文字训诂和标明词句含义为主,并善于把史料和作品结合起来,注意吸收他人成果和地下发掘的文物资料,注释比较简明。不足之处是很少对文义进行串讲,缺乏对作品整体的分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徐醒生)

【离骚纂义】楚辞会注本。今人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1980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为《楚辞注疏长编》之一。原文以《四部丛刊》本《楚辞补注》为底本,以《离骚》两句为一节,按时代先后罗列自西汉至晚清的旧注,引书约百六十馀部。除王逸《楚辞章句》全文引用外,其他各家说法,凡有重复,原则上只取最早的一家,但后人有所引申补充,或说得比较明确,也酌量选录。本书辑录旧说,并不只取正确的合

理的,也选录了不少错误以至荒谬说法,以全面反映旧注情况。最后附加按语,除表明编者对原文的解释外,也择要对旧注加以评论,近人研究中比较有价值的或有影响的想法,也在按语中择要介绍。本书是对《离骚》旧注集大成之著,既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又表明了编者的见解,在楚辞学史上有重要价值。

(黄筠)

【离骚发微】楚辞注本。今人魏炯若著。本书在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基础上对《离骚》内容进行探讨,凡是《离骚》中王逸与洪兴祖的注解已经很明确的地方,就不再加以注解,也不再举出原注;只有在对它们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注释不够详审完备而需要加以补充时,作者才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辨分析,作出新的解释,并举出原注作为参照。本书还针对两千年来的注释者大都把《离骚》当成辞赋之祖,从而忽略其政治内容的情况,指出《离骚》不仅仅是一般的辞赋,它还是文学史上没有过的“政治辞赋”。作者认为,《离骚》的内容,就是屈原为楚国、为楚王的政治内容。而屈原的政治,是出于屈原的学术。屈原的自沉汨罗,是殉楚国、殉楚王,也是殉他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作者在前言中还详细地论证了《离骚》的写作时间、内容、写作动机和效果、男女主题、源流、形象思维和局限等方面的问题。本书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离骚笺疏】楚辞注本。今人詹安泰撰。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编《离骚笺疏》以原文四句为一段,采取字词训诂和串讲文义相结合的形式,博采王逸以后诸家之说,加以详细精审的辨析,并涉及音韵、校勘等方面,在串讲文义的同时,注意兼顾上下文义的连续性,对屈原的政治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下编《离骚通论》着重讨论《离骚》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者根据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结合楚国的具体特点和屈原生平,细致地论证了屈原思想形成的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在艺术风格方面,作者认为《离骚》具有情调强烈悲愤,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想象力丰富,语言丰美生动而又明确精练,声调美妙而又富有节奏,结构完整,表现手法和取材新颖等特点,这些都是《离骚》艺术成就突出的主要原因。本书198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天问纂义】楚辞会注本。今人游国恩主编,金开诚等补辑。1982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为《楚辞注疏长编》之二。本书以《天问》原文两句为一节,择录自汉至晚清旧注近百种,最后加编者按语。其体例与《离骚纂义》略同。《楚辞》中最难解者,莫过《天问》,本书按语,除对旧注加以审评外,复钩沉旧史,

详加诠释,对楚辞研究者极有参考价值。(黄筠)

【屈赋音注译解】 楚辞注本。五卷。今人刘永济著。本书所注释者以作者在另一部著作《屈赋通笺》中考定的十篇作品为限。作者认为,能确定为屈原作品的只有《离骚》、《九辩》、《九歌》、《国殇》、《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在注释的体例上,先对各篇作品进行分行分段的串讲和解释,然后在每段之后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对屈原的创作动机,作品的创作背景、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等方面都进行了阐述。每篇作品之后再加上“韵读”和“音义”,分别对作品的韵部以及字的读音和诠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后还附有“校字记”和“后记”各一篇。此外,《屈赋音注译解》还附有《屈赋释词》三卷,上卷解释屈赋中的虚词,中卷解释屈赋中的一般词汇,下卷解释句例。本书资料丰富,取舍得当,作者力求音注、解释的准确与贯通,是今人屈赋注释本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本书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天问新注】 楚辞注本。今人程嘉哲著。本书是一种较为通俗的《天问》注释本,共分为三个部分。卷首载有《试论〈天问〉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代序)》一文,对《天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概括论述。第二部分注释正文,采取四句一段的形式分别加以简洁明了的注解,次之以浅显易懂的解释,中间又有若干“小结”,对作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第三部分则附有《天问异文校订、古音叶韵表》,在校订异文的同时,分析《天问》的古代音韵。本书对于古代文学爱好者及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屈原赋译注】 楚辞今注今译本。今人袁梅译注。作者在“引言”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楚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屈原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屈原的作品只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二十三篇。《卜居》和《渔父》虽非屈原作品,但仍是离屈原不远的先秦文学作品,故附录于后。而《远游》和《大招》两篇则未被收入。在译注的体例上,先对每一篇作品作一“题解”,次之以译文,然后对原文进行分析注释。本书译文流畅,是现代楚辞研究中较早采用“译注”的形式来进行研究的著作之一。1984年齐鲁书社出版。(徐醒生)

【楚辞注释】 楚辞学专著。本书是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的第一编。由刘德重、杨金鼎、殷光熹和王从仁等参加编撰。注释的篇目是:王逸《楚辞章句》所辑楚人作品,即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

招》(一日景差作),宋玉的《九辩》。其中除《天问》、《远游》、《大招》三篇外,其他各篇注释、解题和说明,都是在马茂元《楚辞选》(195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注释的范围主要包括作品解题;对历史上有影响的说法择要录存,并断以己见;较全面地说明作品的名称、历史背景、主旨、创作年代等;注释作品的难词、难句,并做适当串讲。对旧注择善而从,以一说为主。每篇作品后,阐述作品的意义,分析篇章结构和艺术手法。本书的撰写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料丰富,阐释有据,具有学术性和参考价值。1985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筠)

【楚辞讲读】 楚辞选注本。今人朱碧莲选注。此书开章引梁启超语“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编选者认为欣赏楚辞“不仅能提高我们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可以“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楚辞引论》)。全书包括四部分:一、《楚辞引论》,论作为战国时出现的新体诗、代表作家屈原、重要作家宋玉以及其他几位楚辞作家,如景差、贾谊、淮南小山等。二、《略评几种有影响的〈楚辞〉旧注本》,包括《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通释》、《山带阁注楚辞》。三、《楚辞作品》,选屈原之《离骚》、《九歌》(选五篇)、《天问》、《九章》(选五篇)、《卜居》、《渔父》、《招魂》;宋玉《九辩》;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四、附录,附有司马迁之《屈原列传》,刘向《节士篇》(有关屈原部分),王晋《洞庭山》(有关屈原部分),沈亚之《屈原外传》,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离骚经序》,刘勰《辨骚篇》。并附《参考书目及部分论文目录索引》。编选者力图将知识性、通俗性、学术性结合起来,行文流畅简明,便于初学者使用。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王学泰)

【宋玉辞赋译解】 楚辞译注本。今人朱碧莲译解。此书之作有为宋玉辨诬之意,自四十年代郭沫若任话剧《屈原》中将宋玉写成出卖其老师屈原的“犹大”之后,“无耻文人”似乎已经成为宋玉的定评。此书据历史记载与宋玉作品认为“宋玉是一位关心朝政、不满现实、有理想有抱负的正直的诗人”(《论宋玉及其〈九辩〉》)。在文学上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至于宋玉作品之真伪,作者认为楚辞中仅《九辩》为宋玉作品,文赋中属于宋玉者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并且对否认这些作品为宋玉所作的陆侃如、游国恩的论点进行了批驳。此书包括论述、作品、附录三部分。论述有

《论宋玉及其〈九辩〉》、《宋玉辞赋真伪辨》。作品部分,将属于宋玉的作品均作了详密的注释与今译,注释细致准确,译文流畅。其他六篇署名宋玉,但属于伪作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仅作了注释。入录作品皆列“赏析”一栏,对该篇作品内容与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附录包括《有关宋玉的传记资料》、《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和文章索引》。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宋玉的专著仅此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王学泰)

【楚辞直解】 楚辞学专著。今人陈子展撰。1988年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凡例、《屈原传》评注和《楚世家》节录。凡例叙述作者治楚辞的经过和本书体例、特点,凡十则。评注对屈原生平、行迹、创作做了考证和评述。《楚世家》节录,始自楚悼王,终于顷襄王,原文后加有按语。本书第二部分为楚辞直解。原文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并于每句下,加注洪本所校勘之异文,间或增入朱熹《楚辞集注》本或其他善本异文。又据江有诰《楚辞韵读》,注出韵部。每篇作品所分章节之后,提出明确扼要之章旨。作品原文下,附白话译文,其义训,大半取自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补注》。别有所据者,则于篇末加简注。本节第三部分为“楚辞解題”。

(黄筠)

【楚辞鉴赏集】 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之一。书中收屈原作品《离骚》、《九歌》、《九章》以及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作品共二十三篇的赏析文章,撰稿人有马茂元、周振甫、魏际昌、褚斌杰、蒋维森、霍松林、王达津等。主要是对所选楚辞作品的艺术形式、写作技巧进行专门性的分析和探讨,一般均能做到重点突出,分析深入,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审美情趣,做出深入浅出的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黄筠)

【楚辞讲义】 楚辞学专著。不分卷。近人廖平撰。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字旭陔,改名平,字季平,号四益,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光绪进士。曾为教谕。民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廖氏为今文学派,好立异说,此书亦如此。书前序云:“《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词》也。《楚词》即《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诸篇。著录多人,故词意重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当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有呈撰,年湮岁远,多不可通。”为什么归之于屈原呢?“《楚词》为词章之祖,汉人恶秦,因托之屈子。”惟《卜居》、《渔父》二篇中有屈子名姓,故后人遂以屈子

作《楚词》”(见第一课)。全书共分十课,其主要内容为言楚词学为天学,讲鬼神事;与讲史事之人学不同,而与道家同宗旨,典故全用《山海经》,此书即古之鬼神学。《卜居》阐述天道变化之旨;《渔父》阐述地道安定之旨。《大招》、《招魂》与道家神游说同。《九歌》乃《尚书》遗文,言夏启时即有《九歌》,故其乃古书非新作。言《九章》为九人所作,《离骚》疑亦数人所作合为一篇,故其文义重复。廖氏云:“《楚词》之最不可讲者,莫过于词意重犯,一意演为数十篇,自来说者皆不能解此大惑。今定为秦始使博士作,如学校中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以其同题,词意自不免于重犯。”(见第六课)《离骚》首陈“帝高阳之苗裔”。古代自颛顼高阳氏绝天通地;人企望登天由此始,天帝为真人、至人,人欲登天,必须具至人之资格,故以高阳为上天之基础。又将《离骚》分为九篇。廖认为“《离骚》与《远游》文义全同,《远游》有条理,《骚》则杂沓不堪,当以《远游》之例读《骚》则得矣”(见第十课)。所谓《远游》例即《秦本纪》所言始皇博士言“求仙游魂事”。廖氏论点怪异,而证据甚薄弱,多作疑不能定之辞。此书收入《六译馆丛书》,有民初四川刻本。

(王学泰)

【屈原】 诗人研究著作。今人陆侃如撰。本书是作者早期研究屈原的一部著作,共包括“屈原评传”、“屈原集”和“附录”三个部分。在“屈原评传”中,陆氏依据《史记》、《新序》以及屈原的作品,对屈原的生卒年、任职时间以及楚辞中各篇作品的创作年代和真伪问题进行详细考证。陆氏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颇不同于其他各家之说。此外,“屈原评传”还结合屈原生平事迹,给作品系年,并认为屈原作品只有十一篇,其中,《橘颂》、《离骚》、《抽思》、《悲回风》、《惜诵》五篇作于楚怀王时期;《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天问》六篇作于顷襄王时期。在“屈原集”里,作者把“屈原评传”中认定的这十一篇作品,分为上、下两卷,怀王时期五篇为上卷,顷襄王时期六篇为下卷。在“附录”中,陆氏主要参以他本,校定这十一篇作品的错简、错字以及衍文等情况。又根据江有诰《楚辞韵读》注音,纠正时下注音的谬误。此外,还对江氏注音有所补充。本书192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25年再版。

(徐醒生)

【楚词新论】 楚辞学专著。今人谢无量撰。此书分为六章:一、绪论;二、屈原的历史研究;三、楚词的篇目;四、离骚经的新解释;五、屈原的思想及其影响;六、楚词评论家之评论。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出发,认为当时存在南北两大学派,北派守旧,南派革新。南派主张破坏旧思想,用新方法改造社会国

家,楚词正是南派学者的代表作品。但这些作品“几千年来被那些沉溺于北方思想的批评家、注释家把他那南方文学的精神多埋没了”(见第四章),因此作者用自己的“新观察点”解释了《离骚》。如其首节历来称“自序之祖”,而谢氏认为这是“最古的独唱剧之祖”,并言“汉初帝王贵族欢喜楚词,就是欢喜楚国民间流行的这种戏文歌曲”。又云“屈原采取民间平庸普遍的格调来发挥他个性的精神,所以《离骚》是古代平民文学中大作物”。论及屈原影响,指出有爱国思想与超人间思想两点。作者说“他新声楚词一成,大家立刻承认了他发明的资格。不久就流传全国。将这种‘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脑海之中”。“楚词那种激昂抗厉,自然能够鼓舞革命的精神”(见第五章)。作者认为屈原的超人间思想对戏曲的产生有所影响。书中批评了过去的楚辞研究者往往用北方学派的观点去理解评论楚辞,自然不能得其真谛。对于廖平、胡适否认屈原存在的观点也进行了驳斥。此书文字不多,但颇有建树。初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被商务印书馆收入《国学小丛书》。(王学泰)

【楚辞之研究】 楚辞学专著。近人支伟成撰。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研究之部,包括屈原传略、屈原文学艺术之评论、从屈原文学作品中体现之屈原人格、楚辞篇目考等。其主旨言“屈原为我国古代文学作家,秉卓越之天才,遭迍蹇之时会;其作品,表现个性,有极高寒之理想,具极热烈之感情。吾辈处千载而下,读其遗文,既悲其志,复伤其遇,能不与之洒同情之泪哉!爰据《史记》,兼采旁证,考其平生;更就《楚辞》,录其遗作,加以标注。盖以近代人眼光,直接探讨文学生命为旨。信手拈来,固不自知其有当否也”(《序》)。下编为解释之部,列《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招魂》、《大招》等篇。采用新式标点,简单注释。全书从立论、论述到注解皆极简单,但因行世较早,亦曾多次印行。此书初印于民国十二年(1923),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王学泰)

【楚辞概论】 楚辞学专著,今人游国恩著。本书共六篇二十三章,是较早系统研究楚辞的学术论著。陆侃如《序》高度评价本书,指出它“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它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本书“总论”指出楚辞的产生主要受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和楚地民俗歌舞以及山川地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作者把楚辞与《诗经》、《老子》、楚地民歌《沧浪歌》、《越人歌》等加以比较,说明楚辞在艺术形式上对《诗经》的继承,《老子》对楚辞韵文形式的影

响,越地古民歌与楚辞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书中还从民俗、音乐、地理等方面考察,证明楚地巫风、祭祀活动、楚地的民俗和民间音乐歌舞、奇丽的楚地山水等都是楚辞滋生繁盛的土壤。此外,本书指出楚辞对汉赋、骈文和七言诗的影响。对于作者和作品的创作时地等问题,也进行了精细考证。对各篇作品的归属和对篇名的解释也颇有新意。但本书认为《渔父》、《九歌》和《卜居》不是屈原作品,甚至认为《离骚》的艺术成就不及《渔父》、《卜居》,有失偏颇。有1926年北新书局初版。通行本有1928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和《国学小丛书》本。(徐醒生)

【宋玉】 楚辞学专论。今人陆侃如撰。此书分三部分:《宋玉评传》、《宋玉集》、《附录》。历来署名“宋玉”之辞赋甚多,其人亦常为学者所称道,然而以宋玉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为第一本。其评传部分介绍了楚国历史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较详细地考订了宋玉的生平,辑得有关资料二十四条,考其真伪,认为宋玉生年当于屈原卒年(陆氏认为屈原卒于公元前290年左右),与楚国威王、怀王、襄王无君臣关系,与屈原无师生关系,作过小臣,与荀子仕楚时间相近。曾作《九辩》,作《招魂》当在楚徙都寿春之后,卒年与楚亡时相近。署名“宋玉”作品现存十四篇,陆氏认为只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九辩》、《招魂》可确认为宋玉作品,书中对此二诗之内容及艺术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并对其他十二首赋和散文作了辨伪工作。《宋玉集》中将《九辩》、《招魂》加以新式标点,后附校勘记和“古音录”,并在《附录》附有其他十二首文赋的新式标点本。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于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之排印本。(王学泰)

【读骚论微初集】 楚辞学论文集。今人游国恩著。共收论文九篇。一、《屈赋考源》,二、《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三、《论九歌山川之神》,四、《离骚·后辛菹醢解》,五、《天问解题》,六、《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七、《天问昏微遭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八、《天问古史证》,九、《楚辞论疏长编序》。作于1931年至1933年之间,是对《楚辞概论》的补充和修正。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徐醒生)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楚辞学论文集。今人游国恩著。中华书局1989年1月出版。作者是现代著名楚辞专家,其有关楚辞论文曾两度结集出版。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和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均为作者亲手编订。其余部分则未曾结集。本书为作者去世后,由中华书局协同作者家属和游氏学生曹道衡、沈玉成等搜求遗稿,并以《楚辞论文集》中的文

章为主整理增补而成,基本上按发表先后排列,作为本书上编。下编为《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章,分类编次。作者治楚辞数十年,无论在训诂考据方面,还是义理探讨方面,均具卓识,成果赫然,在现代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是研究楚辞者的重要参考著作。

(黄筠)

【楚辞作于汉代考】 楚辞学专著。近人何天行撰。作者于三十年代写《楚辞新考》提出楚辞作于汉代,后又经十年研修而成此书。全书共六章:一、绪论,楚辞的意义及起源。二、楚辞传说的检讨。三、传说与史实之对演发展。四、离骚新证。五、九歌作于汉代诸证。六、九章以下各篇的时代。作者认为:东汉以前没有《楚辞》的记载,战国时无屈原之记载,《屈原列传》中多舛谬之处(如传后提到汉昭帝谥号等),非出于司马迁之手。贾谊除《吊屈原赋》外其他文字皆未言及屈原,而《吊屈原赋》与《惜誓》多雷同之处。又言淮南王刘安好楚辞,而《淮南子》一书多数言及楚怀王、郑袖之事,亦未及屈原。因此,何氏认屈原乃是刘向等据传说所造出的忠臣类典型人物,因为其适合封建统治者需要,遂使人不敢疑。作者认为《离骚》实为刘安所撰。其根据为荀悦《前汉纪》有“初安朝,上使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上”。高诱的《淮南子叙目》、《太平御览》等皆有与此相同之记载。书中还从《离骚》本文中找出一些“内证”(如战国时楚用建子历,而《离骚》用建寅历,这与淮南王所用历法同)。作者认为《九歌》的内容与汉代庙堂歌曲相同,其所祀神在《汉书·郊祀志》中多有记载,并列举一些“内证”认为此组诗亦作于汉代。作者还对《九章》作了分析,认为此九章非作于一时,亦非出于一人之手。又谓《天问》作于秦末。《招魂》中有“庐江”乃汉代地名,其内容受到佛教影响,则亦当产生于汉代,《大招》模仿《招魂》,当然更在其后。书中怪论颇多,如姜亮夫所言此书“实为近数十年疑屈赋说者造极之说”(《楚辞书目五种》)。但书中所论并非皆是无根之言,其许多论点论据值得认真对待。此书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中华书局排印本。

(王学泰)

【楚辞地理考】 楚辞学专著。三卷。今人饶宗颐著。上卷为《高唐考》(附《伯庸考》)、《释阼》、《说沧浪之水》、《涪阳考》、《北姑考》(附《抽思解》)、《三闾辨》、《苍梧考异》、《方林考》。中卷为《洞庭辨》、《说五渚》、《江南解》、《湘水巫山辨》(附《方准考》)。下卷为《释鄢郢》、《释郢》(附《楚昭王墓辨》)、《哀郢辨惑》、《楚黔中考》诸篇。书后附有《楚辞地名索引》。作者在自序中说明自己有所创见的地方,并指出了“辨地名”和“审地望”这两种考证古代地理的方法。

饶氏此书,颇多新见解,在详加考证的基础上,对前人的不当之处多所驳正,而且还在考证地理的同时,兼论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本书卷末附有《楚辞地名讨论集》,收入钱穆的《楚辞地名考》、方授楚的《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钱穆《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陈梦家《论长沙古墓年代》四篇文章。本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醒生)

【屈原研究】 诗人研究著作。今人郭沫若著。本书是全面研究屈原身世、思想和作品的专著。原收入作者的《历史人物》之中,1941年7月由群益出版社于重庆出第一版,五十年代才印行单行本。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屈原的身世和作品。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和学识,结合大量的材料,详细论述屈原的生平遭际和文学创作情况。作者还针对廖季平、胡适二人的“屈原否定论”,进行细致详审的剖析和有力的批判。本书考订屈原一生行事,除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以外,主要依据的材料就是屈原自己的作品,尽管有些地方的论证还不是太充分,但仍不失为研究屈原生平的较为系统而又全面的著作。作者还详细考证了屈原的作品,认定《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这二十三篇为屈原作品,但《远游》、《卜居》、《渔父》则不是屈原所作。作者还考定这二十三篇作品创作的先后顺序,认为屈原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橘颂》、《九歌》、《招魂》为第一时期所作,第二时期的作品有《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时期作品为《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本书第二部分论述“屈原的时代”,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进行一番考证和研究,有一定史学价值。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作者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屈原思想是儒家思想。书末还附有“离骚今译”。本书单行本于1953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屈原与楚辞】 楚辞学专著。今人张纵逸编著。此书分为四章。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生平》,介绍屈原的生平以及他所处时代即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二、《屈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此章除了介绍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外,还分析了屈原的思想,作者认为作为其主导思想的“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那种‘迂阔而疏于事情’的仁义思想”,其思想形成是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学识分不开的,也是与他急于使国家富强的爱国思想密切相关的。作者是五十年代以来较早主张屈原是法家的研究者。三、《屈原的不朽诗篇》,此章分别介绍与分析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四、《屈原与楚辞》,此章介绍了楚辞名称的来源、楚辞与楚歌、楚辞与楚辞

作家、楚辞的特点、楚辞的语法、屈原对后世的影响等等。书中所论,平正通达,新意不多。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王学泰)

【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 年 7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 1951 年至 1956 年间发表在国内各报刊上的楚辞研究论文近五十篇,包括屈原生平和作品考证,屈、宋作品的评价,以及有关楚辞著作的述评等。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来纪念,为此当时《文艺报》发表题为《屈原和我们》的社论,郭沫若、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阿英、游国恩、林庚、陆侃如、王运熙、褚斌杰、李易等发表了研究性的纪念文章。1951 年 3 月至 5 月,朱东润在《光明日报》上以《楚辞探故》为总题连发四文,认为《史记》的《屈原列传》是一篇贗作,对屈原记述不可信。王逸的《楚辞章句》一书,也有诸多疑点。从而提出《离骚》乃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大都也是汉人的伪托之作。其后,郭沫若、沈知方、宋云彬先后著文加以反驳。收在本书中的这组论文,反映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争论过程。另外,郭沫若关于宋玉的评价,认为宋玉是“热衷于利禄”的典型,是个没骨气的人云云,也引起了不同意见。总之,通过本书可以约略看出五十年代初期楚辞研究工作的进展和概貌。(黄筠)

【楚辞解诂】 楚辞学专著。今人朱季海撰。本书对楚辞作品的注释,并没有收录作品原文,而只是摘出自己所要诠释的词句来分析。全书具体诠释的次序为:《离骚》第一,《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天问》第四,《九章》第五,《远游》第六,《卜居》第七,《渔父》第八,《招隐士》第九,《招魂》第十,《九怀》第十一,《惜誓》第十五,《大招》第十六,共二百二十二题,二百二十四条注释(“扈江离与辟芷兮”列三条注释)。后又附有《楚辞解诂续篇》,目次略同于《楚辞解诂》,只是增加了《七谏》第十二,没有收录《招隐士》与《九怀》,共释文五十一条。本书博采众家之说,尤以王逸与洪兴祖之说为主,然后断以己意。有些见解颇为精辟。本书虽以名物训诂为主,却也兼及校勘与音韵,并由此考证出通行楚辞研究中的一些谬误。书后附有《楚辞解诂及续篇引用书目略》,共征引各类书籍一百六十余种。1963 年 12 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徐醒生)

【楚辞今绎讲录】 楚辞学专著。今人姜亮夫著。本书是姜亮夫 1979 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为全国重点大学培训讲师以上楚辞进修生所作学术报告的汇编,由来自各所院校的十二名进修生录音整理,经姜亮夫重校后而成。全书共分十二讲,全面系统地介

绍作者研究楚辞的心得、经验和治学方法,对于一般的楚辞研究者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这十二讲分别为:怎样研究楚辞、读书与写作、楚辞的源流和系统、研究楚辞的方法、屈原事迹、《离骚》析疑、论《远游》及其他、《九章》新论、《天问》概说、《九歌》通说、关于屈子的思想及楚辞作品的艺术特色。每讲之后均附有一定的补充说明和注释,由作者的女儿姜昆武加入。由于这次进修班的讲座是在作者的《楚辞通故》及《楚辞论文集》成书之后,所以本书的许多论点都带有总结性和概括性,是作者数十年楚辞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本书 1981 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徐醒生)

【楚辞韵读】 楚辞学专著。今人王力著。是一部研究楚辞入韵字音读的著作,只收录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诸篇,没有把汉代人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本书在研究楚辞入韵字的时候,逐一注出它们的古音,从而使读者了解到楚辞古韵的和谐。本书分楚辞的韵为三十部,比之《诗经》韵的二十九部多出了一个“冬”部,而这个“冬”部是从“侵”部分化出来的,由此反映出楚辞时代对于《诗经》时代韵部的细微发展和变化。正文之前还列有“楚辞韵分三十部表”、“上古声母表”、“楚辞入韵字音表”。198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醒生)

【楚辞论文集】 论文集。今人蒋天枢撰。此为关于楚辞之专题论文集,包括《〈楚辞新注〉导论》、《〈楚辞新注〉导论二》、《汉人论述屈原事迹中的一些问题》、《屈原年表初稿》、《〈后汉书·王逸传〉考释》、《论〈楚辞章句〉》。其中多论辩性文字。作者主张:“王逸解释《楚辞》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尽管其中说解有误,对于古人事迹的叙述,应当承认他是本之前人,未便笼统地认定他是凭空捏造的。”如他反复论证《九辩》非宋玉自伤身世之作,乃是“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之作,并指出“其寄托深晦处,证以《九章》各篇所言始可索解。篇中所陈义,亦环绕《离骚》篇意旨,间或补其所未及”(见《〈楚辞新注〉导论》)。书中对王逸及其子王延寿的事迹作了十分详密的考证。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排印本。(王学泰)

【先秦辞赋原论】 楚辞学专著。今人姜书阁撰。书中收有关先秦辞赋研究文章八篇。首篇《先秦楚歌叙录》收楚辞产生前之楚歌十首,作者为了探讨楚辞这种诗体的来源,也为了说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是怎样地吸取民歌形式来创造新体诗歌,特地从古代文献中辑录这些楚歌,并于每篇之下加以必要的考订和说明。这一工作,对于楚

辞溯源,是有参考价值的。《屈原与江湘》与《人民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篇,一是对屈原在湖南江湘地区的行实进行考证,一是论说屈原的爱国思想。《屈赋楚语义疏》对王逸以来所注释的楚方言做了订补,计六十四条,三万余言。《宋玉及其辞赋考辨》对宋玉的生平史实和遗文篇目做了考证,认为宋玉约生于楚怀王十年前,卒时当在顷襄王末年,即公元前319年至前263年前后,约六十岁。对前此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对宋玉生卒年的说法,进行了驳正。作者认为宋玉今存遗文,大部分是不可靠的,确属宋玉作品之留存至今者,赋体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三篇,骚体则仅有《九辩》一篇,共四篇而已。在《宋玉〈高唐〉〈神女〉为汉赋之祖说》一文中,通过对骚、赋流变的考察,认为宋玉是词人之赋体的创始人,《高唐》、《神女》是汉赋的“原始”祖模,是汉人赋体之祖。《〈荀子·成相〉通说》与《〈荀子·赋篇〉平议》两文,分别对荀子《成相篇》的性质与意义、渊源与影响和荀赋的来源和价值,做了较深入的分析 and 论说,认为它们在荀著中文学性最强,是研究文学者首先要注意的作品,而却常为文学史著作所忽视。该书对楚辞文献之整理考订,颇为精到;所论所述,亦足成一家之言。1983年9月齐鲁书社出版。

(黄筠)

【天问论笺】 楚辞学著作。今人林庚著。198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在《三读〈天问〉代序》一文中,除叙述作者研究《天问》的经过外,还发表了对《天问》一诗性质、段落、错简和诸多有关疑难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天问》虽然不是叙事体而是问话体,但它是一部史诗般的著作,是一部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兴亡史诗。《天问》笺释部分,以原文两句为一节,进行注释笺证,并对《天问》全文做了今译。另外,还附有《〈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等四篇论文,是对《天问》中带有关键性复杂课题的专门研究。作者系楚辞专家,治楚辞数十年,这是近年所取得的又一成果。

(黄筠)

【屈赋新探】 楚辞学专著。汤炳正撰。1984年2月齐鲁书社出版。本书收作者有关楚辞论文二十篇,大要分为考论屈原生平事迹、关于《楚辞》的成书与传本、谈屈原的思想与流派、谈屈赋里的神话与传说及谈屈赋的语言艺术等五组。作者治楚辞多年,重资料,详考证,亦多新见。如《屈原列传理惑》一文,对传中所窜入的刘安文字问题,屈原作《骚》的年代问题,屈原的流放时间问题,均提出了新见。《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对《楚辞》为刘向所编的传统说法提出了异议,经过考证,认为《楚辞》一书是由战国

到东汉陆续编补而成。其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黄筠)

【楚辞要籍解题】 楚辞学专著。本书是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的第二编。洪湛侯任本册主编,由王从仁、冯海荣、曹旭编撰。本编分《楚辞要籍解题》和《楚辞专著目录》两部分。《解题》部分,择选历代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楚辞专著共六十二种。所选要籍自汉至清约占五分之三,现、当代约占五分之一。主要内容为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基本内容、学术评价、版刻与馆藏情况。《楚辞专著目录》收录历代有关楚辞研究专书,以1982年前(含1982年)出版的为限。入录诸书,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诸项。清代以前,按作者时代前后排列;现代著作,按出版时间排列。1984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筠)

【楚辞学论文集】 楚辞学论文集。今人姜亮夫著。1984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成均楼论文集》第一种,收楚辞研究论文凡二十五篇,附文二篇。作者是现代楚辞学专家,治楚辞数十年,撰有《屈原赋校注》一书,本书为撰《校注》后,所写有关楚辞散篇论文的合集。论文包括对屈原生平的考述,如《史记屈原列传疏证》、《屈原事迹考》、《为屈原庚寅日生进一解》等;有对屈原思想的论述,如《屈子思想简述》、《屈子天道观》等;有对屈原作品的研究,如《九歌解题》、《天问例述》等,此外还有有关楚文化、史地、语言的杂考。作者知识博洽,治学谨严,对楚辞学有重大贡献。

(黄筠)

【楚辞选注及考证】 楚辞学专著。今人胡念贻撰。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本书为胡念贻遗稿,经曹道衡、朱殿生整理成书。前言部分,除对屈原、宋玉的作品进行分析评价外,另附有《屈原小传》、《宋玉小传》两篇文字。《楚辞选注》部分,对于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部分作品)、《卜居》、《渔父》(作者认为是屈原同时或稍后的人所作),宋玉的《九辩》、《招魂》(作者认为宋玉作),做了简明的题解和注释,每段原文和注释后,附有“译意”。《楚辞考证》部分,系仿照朱熹《楚辞辨证》例,讨论和说明一些考证性问题,如作品的真伪、作品的写作年代、某些作品的文义和词句的辨析等。本书的注释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译意精审通达,颇便于一般读者阅读。考证部分,引证丰富,辨析深入,有不少独到见解。

(黄筠)

【楚辞研究论文选】 楚辞学专著。本书是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的第四编。由曹旭、王从仁编选,马茂元、杨金鼎审阅。本书选收“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至1982年底为止的有关楚辞研究

的单篇论文五十余篇,既有材料翔实、论证严密的名家代表之作,也有对某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集中论文,按内容分为“屈原”、“楚辞总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二招、远游”、“宋玉及九辩”等八类。各类文章一般按时间先后排列,并注明作者、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及期、卷数。书后附《楚辞研究论文目录索引》,收1911年至1982年国内报刊所发表的论文数百篇。1985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筠)

【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学专著。本书是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的第三编。由杨金鼎任分册主编,分别由冯海荣、汤璋平、潘啸龙、王从仁等辑录。本书所录,以思想、艺术、文学地位的评论为主,兼及作家生平的记述,作品时代、真伪的考订等。所收资料,按篇章或作者分别编为七类:一、屈原、楚辞和屈赋总论。二、离骚。三、九歌。四、天问。五、九章。六、远游、卜居、渔父和二招。七、宋玉和其他。各家评论依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并于条后注明出处。1985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筠)

【楚辞资料海外编】楚辞学专著。本书是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的第五编。由尹锡康、周发祥编纂。编选日、英、美、法、德、苏、匈等国中国文学专家撰写的有关楚辞研究的论著,按内容分类。每篇文章之后,附译后记,简介作者情况、本文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为了使读者对世界各国研究《楚辞》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译者还撰有概况综述。最后附有《国外楚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以备读者查阅。1986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筠)

【九歌新考】楚辞学专著。周勋初撰。198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屈原《九歌》的考证文章八篇。《九歌异说综述》一文,对历代关于《九歌》性质的不同说法,进行了归纳说明,如忠君爱国说,民间祭歌说,楚郊祭歌说,汉人写作说等,作者认为其中以民间祭歌说和楚郊祭歌说二者影响较大,本书主要对它们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书中对《九歌》中的宗教思想和神祇分别做了考释。作者认为东皇太一神,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最初产生于齐国,战国中后期时,大约只流传在民间。汉武帝时,始传入长安,并成为君临全国的至上神。东君、云中君、河伯等神,均为北方的神祇,非楚产。它们均不该由楚人来祭祀。因此,《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也不是楚国的郊祀歌,也不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九歌》是屈原通过学习、了解中原文化和在流落江南时所接触到的本国一些神祇的祭典和传说写作出来的。其写作年代,在顷襄王时迁谪江南之后。本书引证古文献资料很

多,亦能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可供研究者参考。

(黄筠)

【楚辞研究集成】楚辞学专著。马茂元主编。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历代有关楚辞研究论著、资料,选编成册,并附有关书目和索引,是一部大型楚辞资料书和工具书。全书百万余字,分编为七册。第一编《楚辞注释》,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为准,注释范围除难字难词外,还兼释作品主旨、篇章结构和艺术手法。对历史上有影响的说法,择要并存,以一说为主,择善而从,并断以己见。第二编《楚辞要籍解题》,选择汉至近、现代影响较大的楚辞研究专著,撰写提要,包括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基本内容、学术评价、版本、馆藏情况等。书后附《楚辞专著目录》,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等。第三编《楚辞评论资料选》,收录五四运动以前的楚辞专著,以及文人别集、读书札记、诗话、词话等书中有关楚辞评论的资料,以思想、文学地位、艺术的评论为主,兼及某些对作家生平、作品时代、真伪的考证。第四编《楚辞研究论文选》,选取近、现代至1982年底为限的较有影响的楚辞论文五十余篇,兼及某些争鸣文章,分类编排。书后附《楚辞研究论文目录索引》,收1911年至1982年国内报刊所发表的论文数百篇。第五编《楚辞资料海外编》,选编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按内容分类。每篇文章之后,附译后记,介绍作者情况、文章内容和学术价值等。为了使读者对世界各国研究楚辞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译者还就上述问题撰有概况综述。最后附有《国外楚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以备查阅。本书是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楚辞资料集。(黄筠)

【楚辞与神话】楚辞学专著。今人萧兵撰。作者通过对楚辞中神话的考订研究,认为其中的对太阳神、太阳神鸟、太阳神树、雷雨之神、翼蛇的崇拜,以及创世神话、洪水传说、原始宇宙模式和与此相关的海神形象皆与环太平洋地区国家、民族的神话传说有惊人相似之处。因此,作者认为楚辞文化、楚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文化一样皆属于海洋文化,“海洋是没有距离的”,随风飘荡、逐水而去的一叶小舟往往能把某些文化信息和因子带到今人难以想象的远方,从而使海洋文化成为开放的、多元的、游走的文化,使人类历史从旧大陆走向新大陆。书中对于楚辞神话作了十分详尽的研究与辨析,包括十八小节,即引魂之舟:战国楚《帛画》与《楚辞》神话、马王堆《帛画》与《楚辞》神话、《楚辞》与日月神话、《楚辞》扶桑若木与太阳树神话、“凤凰涅槃”故事的来源、颛顼考、伯庸祝融日神考、女嬃为太阳处女考、巫咸为太阳神巫考、彭咸水神考、女娲考、黄帝为璜玉之神考、

西王母以猿猴为图腾考、神话昆仑及其原型、昆仑水神考、神话里的昆仑构造和宇宙层次、《楚辞》神话传说与原始社会史研究、《楚辞》神话传说与初夏史研究。书中广泛征引环太平洋地区神话传说与作者考证清晰的楚辞神话进行整体对应、多重平行与细节密合的比较研究,得出许多新颖、令人深思的结论,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

(王学泰)

【楚辞类稿】 楚辞学专著。今人汤炳正撰。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本书是一部楚辞札记,凡一百七十五条,长短不拘,盖为作者读书心得之笔录。其中有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和思想的论评,如《屈原是革新家而不是纵横家》、《关于〈屈原列传〉中的“疏”、“绌”、“放”、“流放”等问题》、《汉人论屈者之创见》等等;大部分则是对楚辞作品中某些诗句的诠释,如《离骚中的“掩涕”与“九死”》、《天问首十二句所指何事》、《云中君“与日月兮齐光”》等等。文字虽简短,但为作者稽考文献,潜心研究之所得,具有不少新见。

(黄筠)

【天问研究】 楚辞学专著。今人孙作云撰。全书共分为前言、天问今本章次、天问校正本、天问意译和天问新注五个部分。在前言中,作者从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天问的写作年代及地点、从天问中所见屈原的唯物论思想、天问对于上古史研究的贡献、天问的表现形式、天问的错简、从天问中所见的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评天问三家注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天问》的有关问题,其中颇有新见。在“天问的今本章次”之后,作者校订了《天问》的一些错简情况,重新编订了天问的校正本,对《天问》全文进行意译。意译按照作者的校正本翻译,所以顺序与别家有异。译文流畅自然。最后一部分“天问新注”,注文相对详尽,文中颇有新说。书后附有三十四幅反映古代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的图片资料,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把握《天问》的含义。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徐醒生)

【九歌与沅湘民俗】 楚辞学专著。今人林河撰。作者为湖南侗族人,自幼生活在侗乡苗寨,对湖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作了长时期的田野考察,他发现不单《九歌》的原型还保存在沅湘之间,而且从许多祭祀风俗中都可以看到《九歌》的影子,《九歌》中反映的大量民情风俗,也都可以与沅湘及许多南方民族的民情风俗作比较研究。因此,作者认为要理解来自古代民间的《九歌》,必须懂得诞生《九歌》这块土壤上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创造其文化的,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人神观念,了解他们的巫文化与祭祀风俗。书中指出《九歌》中埋藏着一个被人

遗忘了的古代社会,它是一幅两千年前的沅湘风情画。据作者从沅湘一带古楚语活化石和现今尚在唱的侗族民歌考证认为《九歌》就是《大鬼歌》,“鬼”为沅湘一带姑娘对情人的昵称。全书除对《九歌》十一篇逐篇阐释外,还包括《楚辞、〈九歌〉与楚歌》、《〈九歌〉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九歌〉须知》、《〈九歌〉中疑团试释》、《〈九歌〉与沅湘傩文化》等部分,总之作者认为《九歌》是巫文化的产物,离开了巫文化去研究《九歌》就是缘木求鱼。此书被编入乌丙安主编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出版。

(王学泰)

【楚辞文化】 楚辞学专著。今人萧兵撰。此书为作者所撰写的《楚辞研究》系列论著之一。其中心内容是探讨有关《楚辞》与民俗文化的关系问题。萧氏认为要弄清楚楚辞作为文化的特质,就必须把楚辞放在楚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发展序列里,放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上古史物质、精神文化发展序列里,放在一切相关性、类缘性文化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序列里加以考察和探讨。此书主要论述楚文化、楚辞文化是一种有本土基础的多元文化,可以用“西源东流,南下北承”来概括其演化脉络,即根源于西北,成长于东南。全书包括九节:(一)楚辞文化与西北文化。(二)楚辞文化与东部文化。(三)楚辞文化与南方文化。(四)楚辞文化与西南文化。(五)南国的巫觋文化与楚辞。(六)南国的巫官:灵保、灵修、莫敖。(七)《杵杙》和《美洲虎》:以图腾命名的史书。(八)《山海经》与四方文化。(九)屈原的出现:文化的聚合效应。作者意欲“更新”楚辞学,书中多有新解,立论大胆,然论据有时薄弱。此书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李泽厚主编之《美学丛书》。

(王学泰)

【屈原论稿】 楚辞学专著。今人聂石樵著。全书主要是从屈原的时代、生平、思想和批判精神,屈原的爱国主义,对天神的怀疑和否定,以及屈原作品在艺术上的创造等方面对屈原进行研究。作者善于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作者认为法家源出于儒家,而后另立门户与儒家分庭抗礼,屈原正是处于这种由儒到法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他的思想中就交织着儒与法的观念,但总的来说,屈原基本上是属于法家。但作者认为屈原“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也相当于荀况”,就难以有说服力了。本书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增订本。

(徐醒生)

【东方诗魂】 楚辞学专著。今人王锡三、郝志大主编,赵季、崔胜洪、胡学常撰稿。本书是在1991年10月天津召开的“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

讨论会所收论文和发言稿的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全书分六章。第一、二章论述屈原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第三、四章,通过“屈原传统”传播、流失、变异的历史,论述民族精神之所在。第五、六章,则是以当代意识观照屈原,梗概地阐述了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化热”、“方法热”影响下,屈原研究的新气象。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关于屈原人格、屈原精神、屈原传统的专题概述。书中有许多新观点,可供研究者进一步探讨。1993年8月东方出版社出版。(黄筠)

【楚辞书录】 楚辞学书目。今人饶宗颐撰。是一部最早出版的楚辞书录专书,比较详细介绍了楚辞著作的版本和馆藏情况。对其中一些重要著作,收录尤详,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收录了十三种版本;朱熹的《楚辞集注》收录了二十七种版本等。本书还辑录了不少楚辞研究资料,如晋郭璞的《楚辞注》的注文以及唐陆善经的《文选离骚注》的主要注文等材料,都十分珍贵。本书还进行了一些文字校勘工作。1956年出版于香港苏记书庄。(徐醒生)

【楚辞书目五种】 楚辞学目录。今人姜亮夫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1993年2月修订再版。本书是一部有关楚辞的目录学著作。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楚辞书目提要,内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著录书籍二百二十八种。每种书详载原书序跋,以明著述宗旨,另有版本叙录,以刊行时序罗列版本,兼及书刻情况。二、楚辞书谱提要,内分书法、图画、地图和杂项四类,共著录四十七种。三、绍骚隅录,著录历代摹拟楚辞体作品的篇名和书名,以见屈原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共著录书籍十九种,篇章一百二十九题。四、楚辞札记目录,著录宋代以来各家读书札记中考论楚辞的条目。共收八百零二题,又书籍一种。五、楚辞论文目录,著录“五四”以来有关楚辞论文的目录,前此的单篇论著也附收。共著录四百四十七题。书末附综合索引,以便检索。本书初稿成于1933年,后经不断修改订补而完成。它反映了自汉代以来至现代学者治楚辞的成果,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黄筠)

【玉台新咏笺注】 诗选集注本。十卷。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兆宜,字显令,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时秀才,注徐陵、庾信二人文集,又注《才调集》、《韩偓集》。《清史列传》卷七〇有传。《玉台新咏笺注》成书于康熙十四年(1675),当时仅以抄本流传,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经过程琰删补,方有刻本行世。琰(1739—1796),又名际盛,字焕若,号东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间进士,曾入四库全书馆任编校。程氏取当时的通行本与明赵

均小宛堂覆宋本对原文进行校勘,又在吴注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讹者悉正,删繁补阙,参以评点的工作。此书注释引证颇博,每卷将通行本增益之作退回卷末,并注明何者为宋本所有,何者为后人增益,便于读者了解宋本旧貌,是其突出的优点。缺点是,注文过繁,失于剪裁,“又多以后代之书注前代之事,尤为未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此之外,吴、程二注在引文上也时有错误。例如引《广韵》文而误作《说文》,引《吕氏春秋》文而误作高诱《吕氏春秋注》;又如引《庄子》、《战国策》以至李尤、郭璞等人之文往往出现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玉台新咏》笺注本,在研究《玉台新咏》和汉魏六朝诗歌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旧时通行本有清光绪五年(1879)宏达堂刻本、扫叶山房石印本、《四部备要》本和世界书局本等。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玉台新咏笺注》穆克宏校点本,不但纠正了原注的错误达一百八十馀条之多,还利用有关资料对《玉台新咏》原文作了详细校勘,使本书在质量上大为提高。书后附录明袁宏道至今人郑振铎所作序跋二十八篇,多系世所罕见,对研究《玉台新咏》亦颇有参考价值。(俞绍初)

【六朝声偶集】 古诗选评。七卷。明徐献忠编。献忠,字伯臣,一号长谷,华亭(今上海市)人。嘉靖乙酉(1525)举人,曾官奉化知县。此书实本于杨慎《五言律祖》而扩充之。取南北朝五言诗,以显唐代律诗的渊源。此书取名“六朝声偶”,其所指六朝为南朝齐、梁、陈,北朝齐、周与隋,与通常所说“六朝”为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不同,四库馆臣讥其“自我作古”。所论“声偶”也往往仅列其诗句,对于诗体、诗律的演变过程,亦不加分析,对于读者意义不大。因此《四库全书》仅将其列为“存目”,认为是多馀之作。此书有明嘉靖间徐氏自刊本传世,板左边线外有“华亭徐氏文房”六字。又明万历间邵一儒有《六朝声偶删补》七卷,本于徐著而重新删补。

(跃进)

【古诗镜】 古诗评选。三十六卷。明陆时雍著。选自汉魏以迄陈隋诗歌加以评说。前有总论,以神韵为宗,以情境为主。如称: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处。又说: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说: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这些观点,颇为精到。看得出来,作者标举情、韵,实是针砭流俗。其选诗较为精审,评释亦称详核,其文学变迁之迹,可以据此书考见大概。在明末诸选本中,算是较有特色的一种。其总论中所指晋人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实际

上隐刺钟惺、谭元春。但本书不免时俗,与竟陵诗派实貌同而小异。有明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跃进)

【古诗归】古诗评选。十五卷。明钟惺、谭元春编。收录先唐诗歌,逐一评解,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顾炎武《日知录》颇谪其失,如称:“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这是比较典型的失考臆改之证。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朱彝尊以为这是别人托名钟、谭的伪作,恐不尽然。有明泰昌元年(1620)闵氏三色印本传世。(跃进)

【古诗解】古诗评选。二十四卷。明唐汝谔著。汝谔,字士雅,华亭(今上海市)人。明天启中以岁贡生官常熟教谕。全书分为古歌谣辞、古逸杂篇、汉歌谣辞、乐府、诗等五类。其训诂字义较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多敷衍。对乐府中声词合写的现象,作者多不解而强为解说。关于古诗源流的分析,亦多疏略。其凡例称五言起于邹、枚。枚乘始作五言之说,首见《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然后世多不之信。邹则不知何所本。又将古诗十九首冠于苏、李之前,亦未说理由。然“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龙》称是傅毅作,傅毅东汉人。“去者日已疏”、“客从远方来”二首,钟嵘《诗品》称旧疑建安中陈王所制。古诗十九首时代问题殊多,而本书均失于考证。(跃进)

【古诗评选】古诗评选本。六卷。清王夫之选评。书中介绍了古诗中的名篇佳什。王氏虽也用此书授徒,但主要还是借此宣扬他的诗学观点。选者推崇古诗,爱及齐梁,对于入选的作品赞扬较多。如评《白头吟》说:“亦雅亦宕,乐府绝唱。”评《悲歌》说:“突兀抗壮而无霸气。”评《战城南》说:“所咏虽悲壮,而声情缭绕,自不如吴均一派装长髯大面腔也。”关于《古诗十九首》他说:“十九首情该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并赞美十九首“惊心动魄”,“深练华赡”,“好色不淫,怨悱不伤”。对于唐宋诗人评价不高的六朝,王氏说:“安得起六代人于地人一拯唐人之衰也。”由此可见编选者把汉魏六朝看成诗歌创作的高峰,到唐代则已是诗创作之衰世。他偏爱婉约含蓄,辞气娴雅,优游不迫,无剑拔弩张之气的作品。在评庾信诗时,对杜甫盛赞的庾信“凌云健笔”则大加挞伐。“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爱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他还注重诗歌的神韵风采,反对铺叙刻划,强调“诗”与“史”的区别,他讽刺“诗史”说:“以诗史誉杜”乃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也”。他认为诗之叙事较史尤难,“史才

固以槩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划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馀,于诗则不足”。从中可见夫之迥异于常人的论点。此书在王氏生前身后俱未刊刻,至清末民初,始有刘人熙刻本,常见者有太平洋书局排印《船山丛书》本。(王学泰)

【采菽堂古诗选】诗歌选集。三十八卷,补遗四卷。清陈祚明编选。祚明,字允倩,钱塘人。博学善属文,以贫佣书京师,殁于客舍。有《稽留山人集》,又名《敝帚集》,《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收录汉至隋诗四千馀首。编排以时代而分,诗则汇总作者名下,不取《文选》分类编排之法。本书不作考证,而有圈点详评,颇能阐发意蕴,为学人所重。书前有杭世骏序,以为陈祚明论诗宗旨“曰情曰辞,而总归于雅,其选诗博而不杂,约而不遗,取材于众说而未尝专任去私臆”。作者在书前凡例自道论诗大旨唯在情与辞二端,认为“古诗自汉迄隋代远矣,大抵多五言,齐梁稍趋之律,学者既目为古诗与近体判然,是近体之源也。今为近体如不读古诗,见不高,取材也狭隘”。此书最早刊本为康熙丙戌(1706)刻本,常见者有清乾隆传万堂刊本。(跃进)

【汉诗音注 汉诗评】汉诗评注。十卷。清李因笃著。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末诸生。甲申、乙酉间与顾炎武多所过从。康熙中荐鸿博,授检讨,寻以母老辞归,潜心研学,终不复出。“音注”与“诗评”实为一书的两个部分,而分二名。卷一至卷五题“汉诗音注”,其评语夹注句下;卷六至卷一〇题“汉诗评”,其评语书于诗后。前后体例不同,故又可目为两书。顾炎武有与因笃书,极论古今音韵。因笃亦依清初重音韵学之风评注古诗,唯以《诗经》之韵断其出入,不免胶柱之见。然其评语颇多独到之见,不可全废。此书《四库全书》有存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刻本。(跃进)

【汉诗说】汉诗选评。十卷。清费锡璜、沈用济合著。锡璜字滋衡,吴江人。用济字方舟,钱塘人。本书根据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汉魏诗乘》所载汉诗,略为评释。持论似高,而所说殊粗疏。如汉人饶歌、鼓吹诸曲,沈约《宋书·乐志》明言声词合写,不可复辨,本无文义可推,而必求其说以通解,不免穿凿附会。又本词与人乐之词本不相同,如《白头吟》中“郭东亦有樵”诸句,乃乐工增入,用来谐律,本书亦曲为之说。此外,冯著《古诗纪》、梅氏《汉魏诗乘》多有疏误,而本书亦很少订正,以讹传讹,最典型的如庞德公“於忽操”三章,本是北宋王禹偁所拟,今

载于《宋文鉴》中,而本书却加以载录以为是汉诗,推尊备至。其书刻本较多。张潮编《昭代丛书》又将评诗之语辑出四十三条,独立成编,称曰《汉诗总说》。

(跃进)

【汉诗统笺】 诗歌选注。三卷。清陈本礼笺订。清刻本。是书扉页题“汉乐府三歌笺注”。三歌即郊祀歌、铙歌、唐山夫人歌。书前自序称:“汉诗难读,而郊祀铙歌尤难读。”“汉诗见于《汉书·礼乐志》,唯郊祀十九章,安世乐十六章,有颜师古、李奇、应劭等十一家之注,然于诗之精义均未得其肯綮。国朝关中李子德曾应博学宏词之选,且自谓用心于汉诗四十年,可谓勤矣。惜所著《汉诗音注》,义理尚未有析,句读别字仍复踵讹。徐若沈方舟、费滋衡之《汉诗说》,钱二白之《汉诗释》,董若雨之《铙歌发》,虽间有可取,未尽善也。”因此之故而作是书。其一为郊庙歌辞,先征引《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尔后列《练时日》以为此诗是总祀,注引多书,并疏通字义,总述诗歌要旨,间采李子德、沈归愚等人之说。其二为鼓吹曲辞,先引崔豹《古今注》、《宋书·乐志》等予以解题。尔后逐诗疏解,不时征引前人及时贤诸说。其三为庙祀乐章,先征引《汉书·礼乐志》以为解题,全诗十六章,每章下总以概说,撮述要旨。这三部分笺注,每部分前均有自序,略述古今研究得失以及汉诗研究难易的心得,均作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秋冬之间。

(跃进)

【古诗笺】 古诗选注本。三十二卷。王士禛选,闻人倬笺。王氏认为五言古诗上接《诗经》,所以两汉之作几乎全选,魏晋以下选择渐严,但也不废南北朝和隋诗,于唐只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五家,用意在于明其变而不失于古。对于七言古诗,王氏以为“去三百篇已远,可以极作者之才思,义不主于一格”,因此所选范围较广,不以时代为限,对古歌以至元代作品均有选录。五言诗凡十七卷,包括汉、魏、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七言十五卷,包括汉魏六朝、初唐、盛唐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李颀、杜甫及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冲之、晁补之、陆游、元好问、虞集、吴莱等人作品。笺注者闻人倬,字讷甫,江苏松江人。倾注毕生精力笺注王氏此书,对作品有关的时代背景和本事等多有阐释,对诗中难理解的字句和段落,也作了扼要的疏解。不足的是,有些注释未能考究典故的原始出处,往往拮据于类书;有些注释的征引比较空泛,不够贴切。书前有闻人倬作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序、古诗笺凡例及王士禛古诗选原序和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跃进)

【古诗赏析】 诗歌选集。二十二卷。清张玉穀编选。玉穀,字荫嘉,吴县人。诸生,尝游于沈德潜之门。善书工诗,尤长乐府,有《乐圃词》。本书收录先秦至隋代诗歌七百餘首,箴、铭、戒、誨、祝辞、系辞之类也收录一些。四言诗以先秦为主,然陶渊明四言也多所采摭。五言诗略后详前,以曹植、左思、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为主。其编排次第以时代为先后,每时代则先帝王,次宗室,次诗人,次闺秀,次方外。一人名下,先列古诗,自四言以至五言、七言、杂言,依次排列,尔后是乐府。乐府诗题下注明源流。古诗题下有解说。尤其可贵的是对诗歌作了初步的注释工作。每诗之后,都有解析,沉潜反复,探究诗歌的用意,使诗人运笔诡变、制局奇横、措辞精警之处,得以显豁呈露。在这一部分,本书时常采掇前人诗话附录各人诗中,以资论辨。俞樾在序中称赞此书“于汉魏六朝之诗博收约取而存其精,又详加笺注以求其意趣之所在”,“是真善读古诗者矣”。书前有毛奇龄《古韵目例》以及张玉穀按语。又有张玉穀所作论诗绝句四十首。有清末振新书社刻本。

(跃进)

【诗比兴笺】 古诗选笺。四卷。清陈沆撰。沆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蕲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及第,官修撰。所著尚有《近思录补注》、《简学斋诗存》、《白石山馆遗稿》等。本书选录了一般公认的属于“比兴”体的汉魏乐府、古诗以及六朝、唐代的五七言古诗等共四百多首,逐一笺释,用以说明“比兴”这种表现方法在古典诗歌中广泛深刻的影响。其笺释着重对于诗篇主题思想的阐述和分析,而不斤斤于文字训诂的考释,因而对所选各诗作者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分析得相当详细。本书还根据具体情况,结合诗篇内容,探索诗歌的本意,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著名诗篇,因而纠正前人对某些诗篇的误解和偏见所造成的影响。但本书也有些地方因主观臆测而流于穿凿附会。本书初刻于咸丰五年(1855),重刻于光绪九年(1883)。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光绪本断句排印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1959年本加以重印,书末特增加了校刊记若干条,着重纠正考证上的疏谬及列举有较大出入或影响文义的异文。

(跃进)

【八代诗选】 古诗选本。二十卷。清王闿运选。此编有名当时。卷一、二为四言诗,卷三至卷一一为五言诗,卷一二至卷一四为齐以后新体诗,卷一五至卷一七为杂言诗,卷一八为郊庙乐章及颂德乐词,卷一九为歌谣,卷二〇为杂体诗。本书编纂主旨皆见于选目方面。明人冯惟讷曾辑汉魏六朝人乐府诗歌成《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采摭颇丰,但真伪错杂,

故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八代诗选》实本于冯本,披沙沥金,颇为精要,特别是三卷新体诗的编选,尤见识力,体现了作者重视汉魏六朝诗歌,特别是新体诗的文学思想。作者曾在《湘绮楼论唐诗》(载《国粹学报》十八期)中说:“从八代入手者,可以及唐。从唐入手者,多宜俗赏,而失古音。”作者所以编选《八代诗选》,其缘由在此。本书较通行刻本为光绪十六年(1890)江苏书局刊本。(跃进)

【**古诗歌笺释三种**】 古诗笺注。近人朱自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此书为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之二,收录《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三种论著,大都是汉代以前无名氏诗歌的笺注和解释。《古逸歌谣集说》,原稿题为“诗名著笺前集”,收录诗骚以外的十三篇古诗歌,每诗下总汇诸家的论述考证,原始记载,由古至今,不作案语,是作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古今诗选班上所用教材的一部分。《诗名著笺》是作者授课时的参考教材,收录《诗经》中的十五篇作品加以疏解,先列毛传、朱熹集传,另附三家诗说及后代各家考论,最后列有黄惟庸、郭沫若等人的译文。又有大小雅中的八篇,列为存目。篇末附有《毛诗序》、《季札观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文心雕龙·比兴》以及顾颉刚、吴康等人的有关文章凡四篇。《古诗十九首释》原文刊登在1941年的《国文月刊》上,仅释九首而已,这九首是《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栢》、《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除第一首有注外,余皆仅抄原文,然后加以阐述,颇为精微。(跃进)

【**古诗十九首集释**】 古诗会注本。今人隋树森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考证部分,本于刘勰“比采而推,两汉之作”,论及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两汉无名氏之手,以往确定为东汉人或汉魏间人所作的理由均不充分。笺注部分,多集《文选》李注及五臣注,博采宋明以来诸家新议,务求详备,每诗之下附以评说,以为鉴赏之助。见仁见智,兼采并收。汇解部分,辑录了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张玉穀《古诗十九首赏析》、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饶学斌《古诗十九首详解》等。诸家之说,时复不同,不时还多迂曲之论,但这些论著多能体味诗意,阐发奥蕴,颇有可取之处。评论部分,多辑自诗话文评,始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终于王国维《人间词话》,凡五十则,有助于读者研究和鉴赏。另有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本。(跃进)

【**汉魏六朝诗选**】 诗歌选集。四卷。今人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分汉诗、魏晋诗、宋齐诗、梁陈北朝隋诗各一卷。其中收录六十二位诗人二百十六篇作品,另外还收录有无名氏作品九十九篇,总计三百十五篇诗歌。在汉代诗歌里重点部分是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和无名氏的五言诗(包括《古诗》和曾经被误认为李陵、苏武所作的那些“别诗”);魏代的重点是曹植和阮籍的诗;西晋的重点是左思的诗;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刘宋一代以鲍照的诗为重点;南齐以谢朓的诗为重点;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各为重点之一;庾信的诗也是一个重点。本书注释,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作者生平、作品本事、出处、艺术特点等,无不标而出之,极便读者。凡难词典故及诗句费解处,均串解大意,具有广泛的可读性。1978年曾予再版。(跃进)

【**古诗十九首初探**】 古诗专论。今人马茂元著。本书按照内容把古诗十九首分成描写游子的感慨和刻画思妇的心情两大类,每一类中以《文选》原排次序为先后,加以注释和说明。注释部分的基本原则是:先释词,后释句。不须释句的,就把一个词语或者是有关的几个词语联合起来列为专条解释。不论释词或释句,除说明它的意义或加注音外,对词的变化和性质、句的结构与组织,以及它和上下文的关系、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都作必要的阐述。说明部分,主要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体会综论诗思想和形象,同时收录一些足资参考的重要材料。本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诗的意蕴的阐发和艺术的赏析方面,颇为细微,具有启发意义。书前有长篇序言,论述了乐府和古诗及古诗与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意义、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古诗十九首艺术特色的继承性和独创性等五个问题。本书原名《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新版增加“集评”一项内容,把历代有关《古诗十九首》的论述,上自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下迄王国维《人间词话》,择要辑录,共得一百五十五条,以供读者参考。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跃进)

【**古诗今选**】 古诗选本。今人程千帆、沈祖棻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八代诗选,选录由汉至隋诗歌一百十二首,其中有二十八首无名氏的作品。陶渊明选录最多,其次鲍照、曹植等。第二部分为唐诗选,选录七十四位诗人共二百九十八首诗歌,其中杜甫诗选录最多,其次是李白、王维等。第三部分为宋诗选,选录五十一位诗人的一百九十首诗歌,其中苏轼

的作品选录最多,其次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所选主要限于五七言诗,作家排列大致按年代,一家之中先古诗,后律诗、绝句,先五七言,后杂言。入选作品多有详尽注释,包括字音、字义,揭示典故,疏通句意。诗后加案语,用以说明思想和艺术。(跃进)

【诗纪匡谬】 古诗总集。一卷。清冯舒撰。这是一本匡正明冯惟讷撰《古诗纪》之谬误之作。《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所录诗上起古初,下迄陈隋,遗文佚句,一一登载,六朝以前,有韵之文,以此书为渊藪。由于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牴牾舛漏,在所难免。本书作者翻阅大量原始资料,对《古诗纪》中的讹错一一为之纠正,凡一百一十二条。其中有考证文章流别的,有校正作家作品的,有指正作品中错句错字的,有校正古辞时代的,等等。其中少数条款,批驳所据欠妥;绝大部分均较精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舒因李攀龙《诗删》,钟惺、谭元春《诗归》所载古诗,辗转沿讹,而其源总出于冯惟讷之《古诗纪》,因作是书以纠正,凡一百一十二条。……然他所抉摘,多中其失,考证精核,实出惟讷之上,原原本本,证佐确然,固于读古诗者大有所裨,不得议为吹求,虽谓之羽翼诗纪可矣。”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胡德怀)

【中国中古文学史】 文学史专著。近人刘师培著。本书原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时的讲义,分五课,依先后次序为:概论、文学辨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宋齐梁陈文学概略。此书作者议论不多,都自成体系,学术上颇有可取之处。其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书中以辑录排比所论的当时的文学评论为主,略加引论和案语,以为连缀,因此可以当作中古(汉末、魏、晋、宋、齐、梁、陈)文论的有系统的资料汇编来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推荐此书说:“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由于有丰富的材料作为基础,本书的引论和案语大多要言不繁,颇中肯綮。如论及建安文学,刘师培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有四个特点,即清峻、通脱、骋词、华靡。这个观点已为鲁迅所吸取,并为今天的学者所认同。又论魏晋文学变迁,认为孔融、王粲开启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阮瑀、陈琳开启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摘采骋辞。这些论点具有相当的价值。本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校点本,同时还收录有刘师培所作《论文杂记》,可与此书相互印证。

(跃进)

【古诗十九首研究】 论诗专著。近人贺扬灵著。

上海大光书局1926年印行。全书分五部分:一是论列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二是考证了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三是逐一评析了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点;四是关于古诗十九首与诸家拟作的探讨;五是古诗十九首的校勘记。总的说来,此书内容较浅,论述可取之处不多,有的还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跃进)

【汉魏六朝文学】 文学论著。今人陈钟凡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全书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概述汉魏六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先秦文学发展情况,认为八代文学上承周楚,下启隋唐,为文学发展的枢纽阶段。第二章论两汉文学,从汉代尚武功、崇儒术、劝贞洁谈到汉代多贵族文学,重视伦理,少平民文学,轻视浪漫情调。尔后详论两汉辞赋及诗歌。第三章论建安文学,从思想解放,学术变迁,平民文学的复兴以及社会的发展,详述了建安文学复兴的历史原因。尔后从乐府五言、七言、辞赋等方面分析建安文学的特色。第四章论魏晋文学,除论魏晋文学变迁的原因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对魏晋文学派别的分析。阮籍代表忧愤派,何晏代表厌世派,王羲之代表达观派,郭璞代表理想派。这四派均受道家思想影响。还有两派与此有所不同,一是以曹植、陶渊明、颜延之为代表的咏古派,一是以陆机为代表的拟古派。第五章论南朝文学,从时代纷争,士人贪图安逸的政治背景,优越的地理背景,佛教大兴的文化背景以及帝王倡导与文学独立的文学背景分析了南朝文学勃兴的原因。作者将南朝诗文分为六派,即陶谢为代表的山水派,晋宋以后兴起的宫体派,卞铄、丘巨源、孔稚珪为代表的讽刺派,颜延之为代表的数典派,裴子野为代表的模古派以及平民文学。作者认为,南朝文学有四点趋向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由质趋文,二是由单趋复,三是由刚趋柔,四是由实趋虚。最后一章论北朝文学,比较扼要简明。

(跃进)

【魏晋诗歌概论】 诗论专著。近人郭伯恭著。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全书分六章。第一章总论,论及魏晋诗歌的分期、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以及魏晋诗歌演变的趋势。第二章论建安诗歌,以三曹七子为中心,分析了他们共有的悲剧人生观及其构成因素,又辨析了建安诗歌在形式方面的特点,如对偶、炼字、起端、叠句、音节、刻画等方面,无不涉及。第三章论正始诗歌,概括正始前后诗坛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玄谈诗风。第四章从诗人群体的角度,描述太康诗坛盛况,指出太康诗人在艺术上从天然之美趋向人工之美的事实。第五章论及永嘉以后诗坛,特别指出其玄化及佛理入诗的特点,最后拈出陶

渊明,以为晋诗的殿后将军。最后一章为结论,认为上自《诗经》的无名氏诗人,下至陶渊明,统可称为古体诗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别是魏晋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继承平民文学传统,而又能另辟生路,以五言取代四言,为近体诗铺衍发展的道路,这是魏晋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所占据的独特地位。(跃进)

【古诗论】 诗论专著。近人洪为法著。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初版。本书所论仅限于五七言古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分六章。第一章为界说,第二、第三章论起源,第四章论衍变,第五、六章论创作。五言古诗的起源,合而观之有两派,一是源于上古,二是源于汉代。后者更为大家所接受。本书细致辨析关于古诗源于两汉的七种说法,最后取定于郑振铎、陆侃如二家之说,以为五言诗创于西汉成帝建始前后之民歌,盛于东汉末叶。至于七言古诗又在五言古诗之后。作者逐一批驳了历来关于七言古诗起源的种种曲解伪说,材料颇丰。论衍变无甚新意,论创作主要从结体、命意、炼句、用字四方面立意,深入探讨,可备参阅。(跃进)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古诗考证专著。近人马雍著。商务印书馆 1944 年出版。全书四篇专题论文:导言、苏李诗之著录及论辩、前人对苏李诗之考证及苏李诗作于魏人证。最后一篇为全书重点文章,颇见新意。作者将苏李诗与自汉迄晋的诗歌作了细致的比较,从词类、句法、意境三个方面论证了“所谓苏李问答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的结论。至于更确切的产生时代,作者从考证“子”与“君”字在魏晋时代的不同用法入手,认为今存苏李诗仅一处称“君”,余皆称“子”。而这种由“君”向“子”称呼的变化,可以考知苏李诗的写作年代当在魏太和正始之间。阮德如答嵇康诗中凡八称“子”,阮德如生卒无考,然必与嵇康同时,想必此诗作于正始初。以此为据,则今存苏李问答,当是公元 240 年间的作品。(跃进)

【中古文学史论】 论文集。今人王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新版印刷。本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课程的讲稿,撰于 1942 年至 1948 年间。1951 年曾以《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1956 年,作者又将三书删削几半,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1 年又据 1956 年纸型重印一次。北京大学所印此书,实棠棣版三书之合订者,故其内容大致可分为“文学思想”、“文人生活”、“文学风貌”三个部分,由十四篇独立的论文组成。首篇为《政治社会情况与文人地位》,介绍了东汉士族形成的背景,

华素之隔的远源以及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所享有的特权和在文化方面的积极贡献。《玄学与清谈》从魏晋学术思想的转变着眼,指出玄学源于汉代所尊尚之《易》、《老》之学,马融实为魏晋学术思想的先驱。刘表博求儒士,改定五经章句,注意《易》及《太玄》,实为两汉至魏晋学术转变的枢纽。《玄言·山水·田园》用世情和时序解释永嘉以后至晋末宋初一百餘年间玄言诗的流行情形,论述玄言诗与山水诗源于同样的地理文化及学术背景,颇为精辟。《文人与药》、《文人与酒》两文从思路到方法都可以看出受鲁迅启迪。作者通过深入考察,揭示出了汉魏两晋文学中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汉魏文人的生死观,一是汉末文人、竹林七贤、西晋士人以及陶渊明饮酒的不同内涵。《隶事·声律·宫体》一文拈出齐梁文风中最明显的三个特征,深入论述了齐梁文风产生的社会条件;《小说与方术》论小说是“巫巫厌祝之术”观念通行于汉魏六朝;《论希企隐逸之风》对上古到汉末魏晋的隐逸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就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作了确切的阐述;《潘陆和西晋文士》以潘陆为例论西晋文学的基本倾向是注重轻绮和过分追求辞采;《徐庾与骈体》从对偶发展的历史入手,辩证地分析骈文这一文体的利弊;《文论的发展》论魏晋文论以作家论为主的特点;《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从当时政治上品评人物,校核名实的风气着眼,解释魏晋文学批评何以注意于文体的分类和体性风格的说明,从而把握住魏晋人思维的一般方式,进而推及中国文论从开始起就和人物识鉴保持密切关系的特点。所有这些论述,不仅引证史料丰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对后人多有启示。(跃进)

【汉魏六朝诗论丛】 古诗论著。今人余冠英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收录作者自 1926 年至 1951 年所写的有关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论文共十一篇,重点是乐府诗的介绍与研究。《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是收在本书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作者曾用涵芬楼影印汲古阁本与其他总集并各史志、专集、类书等校读通行本《乐府诗集》,校出许多文字异同及章节编次谬误。本书第一篇是《乐府诗选序》,论述乐府诗的搜集、保存与流传情况,辨析乐府诗的特点,评价汉魏乐府诗的价值。另有六篇专论乐府诗的形式特征和词句篇章上的问题,如《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离析八种类型,具体考察乐府诗的拼合方式。《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例举偏义复词十七例,用以续补黎锦熙、刘盼遂等人未尽之处。《说〈公输与鲁班〉》和《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两文,不仅援引古例,而且还征引今例,指明

汉魏诗歌中常见的修辞现象。《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对古代民歌作了系统的归类工作,为研究民歌的兴起及传播提供了很大便利。《谈〈西州曲〉》具体而微地分析了这篇作品的句法与结构特点,从而得出与时贤不尽相同的新见。《论蔡琰〈悲愤诗〉》与《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两篇论述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最末一篇是《七言诗起源新论》,认为七言诗体源于民间歌谣。这一论点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此书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并能做到言必有据。(跃进)

【古代文学杂论】文集。今人余冠英著。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本书收录十八篇论文,最早者作于抗战时期。1949年以后所写文字,除《关于陈风株林今译的几个问题》一文外,都写于五六十年代。其中《乐府诗选前言》等十篇曾收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其他诸篇,如《诗经选前言》论及《诗经》的年代、体例及内容。《关于改诗问题》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认为《诗经》不但经过统一文字、消灭方言、加工润色之类的修改,而且还曾增减章节,分割拼凑。《汉魏六朝诗选前言》论及这段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创作成就。《三曹诗选前言》论及建安诗风及三曹创作成就。《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与傅庚生讨论此诗文意与修改问题。《读中国文学史稿》就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一书商榷史的分期、章节安排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说雅》例举正、高、精、博、深、重、闲、和为“雅”的条件,论证了雅与真善有关,另外,雅包含典丽厚重的台阁气,清真闲逸的山林气,以及书卷气,雅代表着一种超越的精神,或曰与平凡庸俗相反的贵族精神等。(跃进)

【读诗三札记】论诗著作。今人萧涤非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是关于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的读书笔记,基本上都是黄节在清华大学所讲的内容,由作者记录后整理而成。关于曹植,通过与古诗的比较显示曹诗的特点:一是起调必工,二是句甚工整,三是用字精审,四是平仄妥帖,五是不空发议论,六是结语独出意表,七是怨而不乱,八是游仙思想浓郁,九是纯以意境为主,十是其乐府诗音节多乖戾,十一是其四言诗多平铺直叙,不及《诗经》之千变万化。关于阮籍,作者拈出阮诗的三个特点:一是用典变化,二是命意委曲,三是情感多哀乐同时迸发。作者还认为,阮籍的思想一本儒家,只是其思想之表现不专在于字句,这一点与鲍照正好相反。关于谢灵运,《诗品》以为谢诗源于曹植,本书作者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曹诗朴实,谢诗华赡,朴实易晓,华赡难知,这是两家诗不同之所在,也是汉魏诗与六朝诗大异其趣之所在。作者又比较了陶、谢的

区别,以为渊明诗之冷语皆有其本人在,而康乐则直由热情降为冷语。最后作者又分析大小谢的差异,认为谢朓诗较谢灵运诗浅近,因而可学,大谢之诗不易学。(跃进)

【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诗歌论集。《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是由1959年1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主要讨论《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的问题。肯定者,除郭沫若外,还有张德钧、熊德基、胡念贻、黄诚一、叶玉华、王竹楼、高亨、萧涤非等人。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一、从蔡琰被虏入匈奴的经历看,诗中描写得“无往不通”。二、从文献记载来看,《乐府诗集》征引《后汉书》、《蔡琰别传》,唐人刘商《胡笳曲序》等并言之凿凿。三、从《胡笳十八拍》的用韵和对仗看,也正好反映了当时的文坛风尚。四、从《胡笳十八拍》的命名和编组来看,认为“拍”是匈奴语,非唐代“拍弹”。分组编排命名也是蔡文姬自己。五、从《白氏六帖事类集》和《胡笳十八拍》墨卷来看,《白氏六帖》于“笳”条下记有“蔡琰”“播为琴曲”。北宋出现的墨卷收此诗的头两句,《淳化阁帖》题“蔡琰书”三字。否定《胡笳十八拍》为蔡文姬所作者主要有刘大杰、李鼎文、王运熙、刘开扬、王达津、卞孝萱、刘盼遂、胡国瑞、王先进、祝本、谭其骧等人。他们的主要根据是:一、此诗自魏至隋唐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二、诗中所写的地理和环境与文姬被掠入匈奴的地域不符。诗中那种塞外风光的描写,不可能出于住在山西的蔡琰之手。三、“羯”作为种族名到晋代才有。《韵会》:羯,地名。晋匈奴别部人居之后,因号为羯。而此诗中,“戎羯逼我兮为室家”显系晋后用语,不可能是汉魏时的文姬所写。四、《胡笳十八拍》所述匈奴与汉廷的关系与史实不符。东汉以来,南匈奴对汉廷在政治上臣服,在经济上依赖,在文化上仰慕,在生活上效仿。文姬在南匈奴的十馀年间未有战争。五、诗中所述与文姬被掠入匈奴的经历以及她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相违背。如诗中称呼不一,用语矛盾。又如文姬归汉时仍有亲人在世,而诗中却说“家人尽”。六、与汉魏诗风、体裁,用韵等不合。七、诗中袭用六朝以来的成句,如“泪阑干”、“归来”等。还应一提的是,持否定论者不仅否定了《胡笳十八拍》,卞孝萱认为五言《悲愤诗》也存在着疑点,是假托之作。王先进认为骚体《悲愤诗》也是后人拟作,决不是蔡琰作品。上述两方面针锋相对的意见都收在《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跃进)

【古诗初探】论诗著作。今人李嘉言著。上海古

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收录作者所写有关古代诗歌方面的学术论文十七篇。附录五篇,是其他作者与本书作者的商榷文章。《从离骚看屈原的思想和艺术》认为屈原有三个精神品质值得注意: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为理想而坚持不屈的斗争精神。三是坚持品质修养的自我教育精神。《诗话三则》包括:以《楚辞·国殇》为例略窥祖国文学丰富多彩之表现手法,以陶诗为例试论以考据方法从事批评之错误,以鲍照为例试论在古典文学研究上摆脱传统影响之重要。《南朝乐府民歌主要内容的分析》认为关于商人及妓女的生活描写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内容,宫体诗的兴起与此有关。其他几篇,像《关于白居易卒章显志的讨论》、《诗经彤管为红兰说》、《扶桑为云霞说》、《九歌的来源及其篇数》、《关于楚辞之乱的讨论》、《绝句起源于联句说》、《关于贾岛年谱的讨论》、《李贺诗校释》、《读唐诗文札记》、《李贺与晚唐》、《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等,或辨难论疑,或独出机杼,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全唐诗校读法》、《改编全唐诗草案》尤其值得重视。作者将《全唐诗》编排考订的讹误分为七种类型,逐一举例说明,又从校订、整理、删汰、补正等四方面提出修改《全唐诗》的设想,很有借鉴意义。(跃进)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学论著。今人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收录作者三十篇论文,多数作于1966年以前。先唐文学研究论文凡十篇:《略论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蔡琰与胡笳十八拍》、《吴声西曲中的扬州》、《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钟嵘诗品陶诗源于应璩解》、《范曄后汉书的序和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唐代文学研究论文凡二十篇:《陈子昂和他的作品》、《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王维和他的诗》、《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谈高适的燕歌行》、《李白的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李白诗歌简论》、《谈李白的蜀道难》、《略谈李白蜀道难的艺术》、《谈二李的诗》、《读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元结篋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复古潮流》、《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白居易的新乐府》、《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略谈韩愈的师说》、《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读柳毅传》。这些论文涉及面颇广,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比如对乐府诗,作者有深湛的研究,其论乐府与古诗的区别,从内容、形式、风格及功用入手,深入浅出,平实确切。又如论陶渊明田园诗局限的历

史原因,深入分析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当时他们所受到的诗坛创作风气的影响,要言不繁,颇中肯綮。又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向来的研究往往对其思想内容评价过高,作者梳理了有关史料,认为孔稚珪和他所抨击的周颙在人生情趣、生活道路、结交友朋等方面颇多一致。联系到当时的创作风气,推测《北山移文》只是文人故弄笔墨、发挥风趣、谐而不谑的文章。再譬如论及唐代中期诗歌复古潮流,作者从元结《篋中集》入手,分析了元结及其所选诗歌的作者的生活道路、理想情趣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入揭示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功过。(跃进)

【汉诗研究】论诗著作。今人郑文著。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1年印行。正文九篇:《汉安世房中歌试论》认为此诗作于汉高祖六年至十年秋七月间,是对汉初政策的概括和讴歌,原为十五章,非十七章,句式本于楚歌,因“兮”字被删,遂与大小雅的句式类似。《驳汉铙歌十八曲都是军乐说》是针对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而发,其主要根据是,缪袭、韦昭拟作不全是军乐。《论四皓及所谓四皓诗》认为“四皓”称谓当本于《史记》、《汉书》。所谓“四皓”所作《紫芝操》不可信,可能是崔骃《四皓墟颂》的翻版。《论枚乘诗》、《论所谓汉武帝的秋风辞》、《论李陵与苏武三首诗的假托》、《论所谓班婕妤的怨歌行》、《王昭君怨诗试论》等逐一辨伪。《论太初正历以前汉用夏历》用以证明古诗十九首中“明月皎夜光”、“东城高且长”、“稊稊岁云暮”三诗非太初以前的作品。附录六篇,即《蒲梢天马歌不是西极天马歌》、《落叶哀蝉曲不是汉武帝的手笔》、《皑如山上雪不是卓文君的作品》、《黄鹄歌是汉昭帝的作品吗》、《淋池歌不是汉昭帝的作品》、《招商歌简说》,也都是以证伪为主。所以,本书除《汉安世房中歌试论》、《驳汉铙歌十八曲都是军乐说》二篇外,其余作品原统名为《汉诗征伪》,汇为一书。(跃进)

【古诗考索】诗论专著。今人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录论文三十二篇(内附沈祖棻所作一篇)。前十六篇是1949年至1982年间所写,为上辑;后十六篇是1936年至1949年所写,为下辑。前有作者《题记》,后有周勋初《读后记——兼述作者学诗历程》。上辑十六篇大体可分为三组:《李白〈丁都护歌〉“芒砀”解》、《杜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等五篇可归为一组,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作者运用训诂与校勘知识,给予精微的阐释。《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李颀〈杂

兴》诗说》、《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三篇文章可归为另一组,主要是艺术鉴赏。作者欣赏古诗,不仅仅偏重于直觉感受,更重视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例如唐温如的诗,诗人既不出名,诗的背景又不清楚,但作者仍能从文学发展历史及创作经验上比较论证此诗的独创性,可谓独具慧眼,颇见功力。《论唐代边塞诗中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韩愈以文为诗说》、《相同的题材和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五篇文章可归为第三组。作者在这里更多地运用了现代文学理论,视野更加开阔。下辑十六篇文章基本上是采用了传统的考证方法写成的。这些文章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颇见新意。如《诗辞代语缘起说》依据传统的朴学方法,将古诗代语分类排比,综合分析。《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申延发挥陈寅恪的见解,对唐代女道士常具有娼妓性质这一特殊习俗作了细微的辨析。《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结合唐代科举制度,对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作了深入的疏证,诗史结合,极富启发意义。三十馀年后作者完成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实发轫于此文。其他诸篇,或归纳成例,或解释字词,大都言而有据,持论平达。

(跃进)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文学论著。今人逯钦立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书分为三编,收录了作者从三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所写的关于汉魏六朝文学的二十篇研究论文。第一编三篇:《〈古诗纪〉补》除对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汉至隋十一朝诗)补其遗漏,正其谬误外,还为校补古诗制订了三十六条原则。《汉诗别录》是作者在校辑汉魏六朝诗时的研究心得,其“辨伪”一节对所谓苏武、李陵赠答诗和班婕妤《怨歌行》进行辨析,认为是不可据信之诸作。“考源”一节对五七言诗的源流作了令人信服的梳理。“明体”一节对两汉乐府章法、乐谱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后记》是作者倾毕生心血校辑二百五十多万字古诗所做的总结。第二编收录了作者在编订《陶渊明集》过程中对陶渊明里居、作品、生平思想的考证论述文章共五篇。《〈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从东晋盛行佛教、道教和玄学思想的角度论述《形影神》这组诗在当时反对佛教、道教的思想价值。《读陶管见》对陶渊明研究争议较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第三编收录了作者关于文体、声韵、作家与作品的考证与评论方面的十二篇文章。《说文笔》对文笔说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有关史料

囊括殆尽。《〈文赋〉撰书年代考》以为《文赋》为陆机晚年之作。《〈洛神赋〉与〈闲情赋〉》从比较的角度论述曹植、陶渊明这两篇作品的真实内含。《钟嵘〈诗品〉丛考》对《诗品》的版本、今本序文的谬误、成书年代、全书体例、品录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心雕龙〉三解》对刘勰文学思想及其性质,《文心雕龙》中的“风骨”论、“三准”论等也提出了颇有启发意义的看法。最后一篇是《四声考》,对四声的起源、四声与五声的关系、四声与永明体的关系等问题,论述得尤其透彻,极见功力。

(跃进)

【建安文学研究文集】文学论文选编。艺谭编辑部编。黄山书社1984年出版。这是1983年5月在安徽亳县举行的建安文学讨论会学术论文选编,收录三十五篇论文,有总论,如王达津《建安文学的特色》、殷翔《文学的自觉——浅论建安文学》;有从诗史角度论,如陈祖美《建安诗风的衍变》、刘文忠《建安文学对六朝文学的影响》;有的是旧题新议,如王拾遗《略论建安风骨》、傅生文《建安风骨浅尝》;有分论,如宣奉华《三曹与七子》、宋景昌《论孔融》、凌迅《王粲传论》;还有的注意从文化的、历史的大背景纵论建安文学,如徐树仪《东汉的名士与建安文学——对建安文学的政治思想背景的探索》、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侗庵《试论建安文学初期的黄老思潮——从亳县曹墓出土的两方画砖谈起》,等等,均见新意。书前有三十五幅碑拓、墓砖等实物照片及朱东润序言,书末附有朱一清所编《建安文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自1982年10月至1983年2月。此前有《艺谭丛刊》之一的《建安文学论文索引》,自1905年至1982年9月。

(跃进)

【古诗别解】古诗论著。八卷。今人徐仁甫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所谓别解,取的是“别”有“另”义,乃是对前人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诗的误解、误读,加以纠正。全书分诗经别解、楚辞别解、古逸诗汉诗别解、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别解、魏诗别解、晋诗别解、宋齐梁陈北周隋诗别解及唐宋诗别解。作者就古代一些重要诗篇的词义、校勘等问题,深入研讨,提出很多值得重视的新看法。如《诗经反诘句,传笺正言之》一文,认为毛、郑二家对于反诘句是从相反为训的,王引之不辨此种体例,《经传释词》卷一〇中以“不”、“无”为语词无义,实为误解。又如《离骚》题义,旧解遭忧,为动宾结构;解别愁,为偏正结构,作者据《国语·楚语》“迓者骚离,远者距违”,“骚离”与“距违”互文,为平行结构。屈原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疏分言,是双声,则离骚即离疏。据此又可考断《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此说与《史记》本传相互发明。又如《有

所思》的“相思与君绝”，作者以为“绝”是“继”之误，二字因篆文形近而误。由此下推，陶渊明“如何绝世下”、谢灵运“长绝子徽音”的“绝”字当都是“继”字之误。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对于研读古诗无疑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跃进)

【中古文学系年】 文学资料编年。今人陆侃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稿八十餘万字，作者在1937年至1947年花费十年时间写成。其后，他对原稿不断进行修改、补充，直到1978年底逝世为止。可以说，这是作者用力甚勤的一部力作。本书以年为纲，上自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51年卢湛死，共计四百零三年。每年下以人为目，共收录中古时期一百五十二位作家，详细考证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及著作年代。在年代考订方面，本书或直录前人成说，或略抒己见，时人论著，亦间采入。书中征引书籍数百种，资料极为丰富，对史书记载和旧说不确者，则时有订正。譬如嵇康卒年，旧有正元二年和景元三年两说。作者汇录各种史料，细心梳理，认为上两说均不确，嵇康被杀实在景元四年十月以后。看法颇有参考价值。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古文学编年史稿，本书的开创之功不容置疑，它为中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年代考订方面，很多属推测成分，却又偏要坐实。另外，公元351年以后没有续编，使人有遗珠之憾。

(跃进)

【建安文学编年史】 文学史专著。今人刘知渐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分三编：前编为建安以前的内容，论及乐府诗、辛延年《羽林郎》、古诗十九首及张衡、邯郸淳、蔡邕等人的创作，共五部分，凡七条。正编从建安元年系起，至二十五年止，凡六十九条。后编为建安以后的内容，论及曹丕、曹植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创作，共六部分，凡七条。本书涉及的作品，特别注意文学性，缺乏文采的一般不予论及，如陈琳的檄文、徐幹《中论》、仲长统《昌言》，虽颇有名，但本书未论及。作者希望这本编年史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而不是文章史。书前有作者自序，论及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认为建安文学的发展不能归功于曹操一人。不是曹操培养了七子，而是七子培养了曹丕、曹植。书末有四篇附录：《重评郭沫若先生〈替曹操翻案〉》、《从曹操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建安风骨新探》、《建安作家诗文全目》。

(跃进)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论文集。今人曹道衡著。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共收论文三十餘篇，涉及文学史、作家作品、文体发展、文学理论及史料考证等

多方面的问题。本书运用大量原始资料，开发为前人忽略的领域。《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钩稽六十九位文人，说明十六国文坛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荒凉，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试论北朝文学》一文将十六国以来的北方文学分为十六国时期、元宏迁洛前、元宏迁洛到北齐中、北齐末到隋灭陈四个阶段，并指出，到南北朝后期，北方作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南方。《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一文对长期以来人们把《乐府诗集》中的“吴声歌”、“西曲歌”叫作南朝乐府民歌，把《梁鼓角横吹曲》叫作北朝乐府民歌的现象提出异议，认为有些显然产生于晋代，应改为“东晋南朝乐府民歌”才符合历史事实。《〈相和歌〉与〈清商三调〉》一文细致考察清商曲的历史，澄清了这一概念。本书所收诸论文往往具有较强的史的色彩，涉及了赋史、骈文史、清商曲小史、中古北方文学史等问题。作者长于考证，但又与清代朴学家不同，能以考证推动论述，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跃进)

【中国中古诗歌史】 学术专著。今人王钟陵著。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上下两卷共十二编，每编又分若干章。卷前有前言和引子，卷后有尾声和后记。全书总计近七十万言。其时间跨度，从建安元年(196)起至大业十四年(618)。上卷五编，作者从宏观的理论高度，把握文学发展的大的进程，论述汉魏六朝人审美情趣的转变、审美理想的演化，以及审美原则、审美特征的形成；下卷七编，具体论述了中古诗歌发展历程，勾画了汉魏六朝诗歌发展的轨迹，并涉及其中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介绍。所论颇有新意，所述尚称公允。该书从贴近文学发展的哲学、美学、心理学与艺术学的大文化背景出发，切实而具体地探究了中古诗歌历史的进程，是一部有新意、有特色的文学史著作。(胡德怀)

【八代诗史】 诗歌史论。今人葛晓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自汉至隋八代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的分体断代史。全书以时代先后为序，以问题研究为纲，分为十章。除陶渊明这位八代诗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和南北朝乐府民歌作专章论述外，其余八章分别是八个文学分期，依次为：两汉诗歌的源流、建安风骨、正始之音、西晋诗风的雅化、晋宋诗运的转关、齐梁诗风的功过、北朝诗歌的演进、隋诗的过渡状态。书中各章的第一节都设置了总论，主要结合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文化背景等论述这一时期文学风貌的基本特征，以及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变化原因和发展轨迹，力求相对集中地展示每一个时代横断面上的文学现象。书末又以题为《关于八代诗史中若干问

题的再认识》的文章为小结,着重对八代诗史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进行探讨。这样,每一章的总论与书末的小结便构成全书的经纬线,使每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每一位作家乃至具体一篇作品都可以在这由经纬线织成的纵横交叉点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作者在《我是怎样写〈八代诗史〉的》文中写道,本书所采用的是一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体例,使史的纵向发展线索贯穿在时代、作家、作品的横断面中。本书基本达到了这个目的。(跃进)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诗集索引。近人蔡金重编。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出版。丁福保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此书即据以编作者索引。其排列次第一准“中国字庀擷法”,先将各条目字分为五体,然后化为数码,计算方式详见本书后附之《中国字庀擷表》。为便于不熟知中国字庀擷的读者,本书于前又分别编有笔画索引和拼音索引,每字之下皆附中国字庀擷数码。除帝王以朝代谥号、公主以封号外,余均以姓名为主,括其字、号、封、谥诸异名于下。除异名外,皆缀其所在之卷页数,数码前附有各朝之简称。(跃进)

【张衡诗文集校注】诗文校注本。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书编排分为诗(五首)、赋(十三首)、文(二篇)、铭(一篇)、诔(一篇)、诔(三篇)、赞(一篇)、书(二篇)、疏(十三篇)等九个部分,文依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依据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再参他书,删补并合,完残俱收,凡得四十一篇,为今存张衡之全部作品。由于此本的整理是从文学角度出发,故没有收录《灵宪》、《浑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玄图》等四篇天文学专著。本书卷首有张衡造像(今人王弘力作)及张衡墓图,另有前言概述张衡生平、张衡的学术贡献、张衡的政治思想及张衡的著作存佚。卷末有附录三篇:一为作者所撰《张衡年表》,二为范曄《后汉书·张衡传》,三为崔瑗所撰《河间相张平子碑》。(跃进)

【曹操集译注】诗文集译注本。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译注。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以中华书局1974年版《曹操集》为底本,再参照其他版本略作校勘,凡文字、篇目改动处都有说明,《塘上行》、《兵法》、《兵书接要》三篇,以非曹操所作而删除;对曹操的每篇诗文,以及原书附录所收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曹公与刘备书》和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等,都加以注释和今译。全书分诗集和文集两部分:诗集部分因多数作品无法考定其作年,故按原书顺序编排;文集部分则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时间无考者列于其后。每篇题下附有简短说明,

扼要介绍时代背景,有时也评论其内容。注释简明准确,在吸收旧注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一些注者自己的理解。译文大体直译,文笔清通流畅,能传情达意。书中也有疏误之处,如《上书理窦武陈蕃》题下的说明将杀窦、陈二人的宦官曹节说成是曹操的曾祖父,其实此曹节系南阳新野人(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与曹操的曾祖父不是一人,仅名姓相同而已;又如《辩卫臻不同朱越谋反论》有“及得荀令君书”句,荀令君当指荀攸,而误注为荀彧,凡此皆失于考证。书末附《曹操年表》,根据江耦所编略有增减。

(俞绍初)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诗合集注本。东汉末曹操、三国魏曹丕撰,近人黄节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北京大学出版组讲义本校订出版。此书收曹操诗二十四首,曹丕诗二十八首,后附曹叡诗十三首,除其中曹丕的《黎阳作》三首、《清河作》一首及《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外,皆属乐府诗。其注释内容,与黄氏所撰《汉魏乐府风笺》比较,只删去释音部分,其余无甚差异。注释体例,凡《文选》所录的用李善注,曹操《蒿里行》一首用《古诗笺》闻人倓注,李、闻二注有不完备者,则加以补注,余皆为黄氏创注。注释取材宏富,主要注明词语出处,间或解释词义,对有些诗的写作背景也作了考证,每篇之后并附诸家评论,对于读者理解诗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俞绍初)

【曹魏父子诗选】诗选集注本。今人赵福坊选注。刘逸生主编《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之一种。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在香港出版,向海外发行。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照原版在广州重印。此书所选之诗,计曹操十三首,曹丕二十三首,曹植五十三首,共八十九首。这些作品内容丰富,艺术形式也较多样化。基本上反映了三曹诗风的不同风貌。该书卷首有前言,介绍三曹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主要倾向和特点。入选作品,前有题解,后有注释。题解具体地说明该篇写作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间或简介历代各家评论。注释通俗简明,同时在每则注释开头,用白话文串解诗句。(胡德怀)

【三曹诗选】古诗选注本。今人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1979年经注者修订增补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本书选三曹诗精华加注而成,计曹操八首,曹丕二十一首,曹植五十四首,共八十三首。各篇作有题注,扼要提示作品思想内容,有的还考定其写作年代,对于读者理解诗意颇有启发。正文注释简明精当,时有独到见解。例如曹植《杂诗》六首其六有“思欲赴太山”一句,《文选》李善注:“太山,接吴之境。《责躬诗》曰:‘愿蒙矢

石,建旗东岳。’意与此同。”将太山作实际上的地名理解,然而未得真谛。而余注则云:“‘思欲赴太山’和‘甘心思丧元’是同样的意思,‘赴太山’犹言‘赴死’。古人相信人死后魂魄归于泰山。所以古乐府《怨诗行》道:‘人间乐未央,忽焉归东岳。’应璩《百一诗》道:‘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也有‘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之句,可知汉魏人惯用这种说法。旧说从地理和时事解释此句,多牵强。”正确揭示出“赴太山”的意蕴,纠正了旧注的错误。注者对一些疑难诗句还作了串解,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本书前言详细评述三曹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分析了建安诗的基本特征。

(俞绍初)

【三曹诗译释】 诗选集译注本。东汉末曹操、三国魏曹丕、曹植著,邱英生、高爽编注。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诗三十九首,其中曹操八首、曹丕五首、曹植二十六首,都是三曹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每篇包括注释、译诗和简析三个部分。注释比较详细,几乎逐句串讲,力求通俗易懂,但常有不确和错误之处。如在曹丕《善哉行》“上山采薇”一首中,将“溪谷多风”之“溪”,注作“空虚”;“人生如寄”之“寄”,注作“依附”。由于误释词义,自然也影响了译诗的准确性。译诗格式大略以九字为句,力求整齐,然难免出现为凑足字句而生造词语之弊端。简析就诗的艺术和思想两方面作了提要性的分析,各篇水平不一,以曹丕、曹植部分较简明贴切。书中错字较多,读者使用时应慎重。

(俞绍初)

【三曹年谱】 年谱。今人张可礼著。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谱前先叙曹操姓氏、家世。年谱起自曹操出生的汉桓帝永寿元年(155),止于曹植去世的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按年月次序记录三曹的事历、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本书在考索群书、钩沉索隐上用力甚勤,参考书目达四十七种之多,举凡史传和其他典籍所载的有关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详加引录,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在事迹、作品编年方面,一般能提出证据,说明理由;遇有异说而难定其是非者,则并加采录,供人们辨别抉择;每条史料均说明出处,便于复核。然而,谱中也尚有可商议之处。例如,在建安八年(203)谱中谓曹丕《黎阳作》诗四首写于是年。按此四首含六言一首,四言三首,其实并非作于一时。谱中对于邺下文人的交游、创作等活动着墨不多,作为文人年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总的说来,此书资料丰富,体例严谨,比较全面、正确地反映了三曹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面貌,不失为一部有分量的作家传

记著作。

(俞绍初)

【建安七子年谱】 年谱。今人俞绍初撰。附载于俞校辑的《建安七子集》之后,中华书局1989年7月出版,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一。该书辑录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人诗文,人各一卷,合为七卷。卷末附有《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建安七子杂著汇编》、《建安七子著作考》以及《建安七子年谱》。该年谱从汉桓帝永兴元年癸巳(153)孔融生起,至建安二十三年戊戌(218)徐幹四十八岁卒止,中经六十五年,逐年排列七子生平事迹及当时有关大事,先概叙其事,次引原始资料,末加俞氏按语。该谱考定史无确载的陈琳、阮瑀、刘桢、应瑒等四人的出生年月;著录七子大部分诗文的写作年代;钩沉七子散佚诗文及交往逸事,纠正史籍一些错误记载,评述七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引资料多取自《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北堂书钞》、《文选》等正史或类书。

(胡德怀)

【三曹资料汇编】 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古典文学教研组编。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从魏晋到清末的有关书籍中,辑录关于三曹作品评述和文学活动的资料汇编成书。所收资料,按评述对象分别编为曹操卷、曹丕卷、曹植卷。书后又附录有“建安文学总论”、“建安七子”两部分内容,为读者全面了解建安文学提供参考。各家评述一律按作者姓名立目,各个作者又依时代先后排列。每条资料均注明出处,以便读者复核原书。本书引用书目达一百五十八种之多,所引资料堪称丰富,但也仍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未被采入,如《三国志·吴书·张纡传》裴注引《吴书》载张纡称美陈琳《武库赋》、《应机论》,《太平御览》卷五九〇引傅玄《七谟序》评论王粲《七释》等。个别地方还有疏误,如曹操卷辑录房玄龄《晋书》所载王敦酒后咏曹操乐府“老骥伏枥”一事,其实从现存资料看,记载此事最早的应是刘义庆《世说新语》;又如曹丕卷在刘桢名下辑录《艺文类聚》卷八所引《京口记》的文字,而《京口记》并非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所作,凡此皆失于考核。此书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历代有关三曹创作评论的面貌,而且编排得体,眉目清晰,极便研究者翻检参考。

(俞绍初)

【王粲集注】 诗文集注本。吴云、唐绍忠注。中州书画社1984年出版。该书以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王粲集》校点本为基础,又参考其他辑本,对王粲现存诗文作了注释。多数篇章加有题注,视具体情况或解释题目文字、或考证写作年代、或说明思想内容。其中关于作品写作年代的见解,多采自中华

书局校点本所附的《王粲年谱》，由于未加择别，有因《年谱》之误而误的情况，如据陈琳《神女赋》“汉建安之三七”一句，而误定王粲《神女赋》为建安二十一年(216)所作，即是一例。正文注释，在解释词语时常能交代出处，使读者可信，间亦串讲句意，力求通俗易懂，但有时不够精确。例如《杂诗》“日暮游西园”一首有“冀写忧思情”句，“冀”，当作希冀解；“写”，消除，即《诗·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之“写”，全句是说希望通过游西园来排遣忧思之情。而此注将“冀”解作“记”，“写”字无注，大概认为是今天的常用词，遂使原诗不可理解。又如《柳赋》“致天屈而徂征”句，也由于不明“致天屈”出自《诗·鲁颂·閟宫》，有特殊的含义，而误注为“天屈，边远之地”。此书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王粲诗文的全注本，对读者研习建安文学不无参考价值。书后附有王粲《英雄记》、《王粲年谱》及《王粲资料汇编》，对《英雄记》也加了注释。《王粲资料汇编》收集历代评述王粲及其作品的资料，颇便使用。(俞绍初)

【王粲行年考】 年谱。今人缪钺著。发表于1942年《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后收入作者所著、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的《读史存稿》一书中。行年考以《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为依据，又参考其他史料，记载王粲一生的重要事迹、交游和创作活动，并加以考证，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和结论。例如在初平四年(193)之下，据《魏志·王粲传》及《钟会传》裴注引《博物记》，说明王粲在荆州，不为刘表所重；接着又据曹植《王仲宣诔》谓粲“翕然风举，远窜荆蛮”、“潜处蓬室，不干势权”，以及王粲曾代刘表作《与袁谭书》及《与袁尚书》等事实，进而推定：“刘表在荆州，所与谋军政大计者，有蒯良、蒯越、蔡瑁、韩嵩、刘先、邓羲等，王粲盖仅以工文章、管书记。”这一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的结论颇具说服力。又如考定王粲《初征赋》、《浮淮赋》、《寡妇赋》等的作年，皆言而有据。但是，文中也小有疏失，如《魏志·王粲传》载粲“年十七，……乃之荆州，依刘表”。“年十七”当作“年十六”，而未加纠正；又本传载曹操“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一节，事当赤壁败后北返襄阳时所为，而作者却据《资治通鉴考异》说，疑《魏志》记事有误，亦有失深考。此外，行年考叙事过于简略，在今天看来已不能满足深入研究王粲的生平和创作的需要。(俞绍初)

【曹集铨评】 诗文集辑校本。魏曹植著，清丁晏辑校。丁晏(1794—1875)，字俭卿，一字拓堂，号石亭居士，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举人，咸丰中官内阁中书。生平笃好郑玄之学，于《诗》笺、《礼》注研讨论尤深，手校书籍极多，有《颐志斋丛书》二十二种。

《清史稿》卷四八二有传。《曹集铨评》十卷，成书于同治四年(1865)，第十卷末附有《逸文》。此书取明万历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校以明张溥《百三家集》本，又用《文选》及唐宋类书所载曹植之文相参校，注明文字异同，择善而从，订正原本不少误字，校勘堪称精审。在辑佚方面也所获颇多，与程、张二本相较，仅有题可标者就增出近三十篇，至于所辑之残章剩句更不在少数。对于一些存疑的作品也能加以考辨，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善哉行》“来日大难”一首，《铨评》云：“此篇张无之。《乐府》三十六、《御览》四百十均作古辞，程误收入，《提要》已加驳正；惟《艺文》四十一引为植作，今姑存之。然细味意，乃汉末贤者忧乱之诗，似非子建作也。”态度严谨。但由于丁氏查书未遍，也存在着漏辑的情况，如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曹植文《上九尾狐表》、《萤火论》，又如《一切经音义》引植《宝刀赋》：“丰光溢削”、王柳《野客丛书》二九引植诗“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等等，皆有待于增补。此外，有些衍文也未加删除。作品题下间有小注，注文除考订题目文字外，主要为读者提供有关此题本事或写作背景方面的资料。书眉又加有评语，对作意、作法等表明自己的见解，其中部分不无参考价值。书后附录有史传、年谱及集说，为读者研究曹植提供方便。有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7年出版了叶菊生校订本，此本订正了原书的不少误字，但删除了部分眉批，实不足为法。(俞绍初)

【曹集考异】 诗文集辑注本。三国魏曹植著，清朱绪曾辑注。绪曾(1805—?)，字述之，上元(今江苏南京)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官至浙江台州府同知。博通经史，尤精训诂，所著有《尔雅集释》、《论语义证》等书，都已散佚，今存有《曹集考异》、《开有益斋集》等书。本书始编于道光二十年，历十馀年方成稿。光绪初年，朱氏已去世，由其子桂模参考丁晏《曹集铨评》等，又略作修订。全书共十二卷，其中考异十卷，叙录、年谱各一卷。曹植集原本久已亡佚，传世的宋嘉定翻刻本，也只是宋人据摭残剩，编辑而成，已非隋唐旧本。朱氏《考异》即以宋嘉定本为基础，参稽群书，正其讹误，补其阙遗，成为曹植诗文的较完备的辑本。此书采择颇博，凡所遇曹植佚文，即使是零章断句，以至于有题无文者悉加收录。在辑集佚文的数量上要超过同时而晚出的丁晏《曹集铨评》。例如《开元占经》引曹植《上九尾狐表》、《封氏见闻记》引曹植《诒纣文》、《诗经·东山》篇《正义》引曹植《萤火论》，以及《孔雀赋》、《弈赋》、《临涡赋》、《陌上桑》、《前援声歌》等存其题而亡其文者，一一加以考订辑录，而皆为丁本所失载。然而，在考证的精

审上则不及丁本,如《六代论》、《大飨碑》、《镜铭》等,朱氏明知并非曹植所作,而仍编入其集,又将江淹《杂体诗·拟陈思王赠友》“君王礼英贤”四句,据《韵补》误引而作曹植诗,因而显得驳杂不纯。正文中有双行夹注,其内容包括文字的校勘、词语的诠释、写作背景与作意的考辨等,其中不乏精辟之见,不少已被后来黄节的《曹子建诗注》所采录,但有时也失于繁芜。叙录载各家书目二十三种,各本序跋十四篇。年谱将有关曹植一生事迹和创作有可考年者,按年编排,无可考者列于谱末。有民国三年至五年(1914—1916)上元蒋氏慎修书屋排印本,收入于《金陵丛书》丙集中。

(俞绍初)

【曹子建诗注】 诗集注本。三国魏曹植著。近人黄节注。黄氏于1922年始为曹植诗作注,历时五年,几经重注,于1927年成《曹子建诗注》二卷。此书以朱绪曾《曹集考异》中的诗歌部分为依据,删除其传说者、误入者、疑存者、复增者、断落不完者,取七十一篇加以注释。在注释体例上,凡经《文选》采录的,用李善注,另作补注以求详尽,此外皆为黄氏创注。注文搜采广博,剪裁精当,所注词语典故的出处绝大多数切合诗的原意;对诗的写作意图和背景,充分吸取了朱绪曾《曹集考异》的研究成果,又往往详加考辨,提出注者自己的见解,如认为《送应氏》二首作于建安十六年西征马超道过洛阳之时,《赠王粲》诗则是拟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一首而作等,皆颇深入细密。每篇注文之后附诸家评论,注者间下按断,以表明看法,足资读者参考。注中亦偶有失误,如《赠丁仪》诗题注引《文选》李善注:“五言。《集》云:……”黄氏误读为“《五言集》云”即是一例。但此类小疵,并不影响该书价值。有《蒹葭楼丛书》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叶菊生校订本。

(俞绍初)

【曹植集校注】 诗文集注本。今人赵幼文校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丁晏《曹集诠评》为底本,与瞿氏藏宋本及明清时诸刻本参互比勘,又取类书及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进行复校。在校勘时,遇有异文,则写入校记,并择善而从,但不改动原文,只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校语,以示谨慎;对诸本皆讹的文字也能发疑正误,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如《班婕妤赞》有“在晋正接”句,诸本皆同,但句意不可解。注者据《周易》“晋”卦爻辞有“昼日三接”之语,断定此“正接”必系“三接”之形误,从而校正了原文。由于注者广参诸本,又态度认真,使该书在文字上较《诠评》更为准确可靠。在注释方面,对词语典故,往往能追本溯源,说明出处;对大多数诗文的写作背景和意图,

也提出了注者自己的见解,大体上做到平实可信。但也偶有失误处。在编排上,采用了编年的方式,将大部分作品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编入建安、黄初、太和三卷之中,少数认为无法确定写作时间的作品,则附于第三卷之末。然编年不够细密,甚至有错误的情况确实存在,此外,曹植《杂诗》“西北有织妇”一首未加编录,则更是明显的疏忽。此书是迄今所见的第一部曹植作品的全校全注本,在校勘和注释方面取得可观的成绩。书后附录有逸文和版本卷帙、旧序、旧评录,以及注者所撰《曹植年表》、《曹植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代的影响》等文。

(俞绍初)

【曹植新探】 学术专著。今人钟优民著。1984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共十节,为: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曹植家世,曹植的经历,曹植的哲学思想,曹植的政治思想,曹植的文学理论,曹植的诗歌,曹植的辞赋,曹植的散文,曹植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作者把曹植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较全面的考察。作者认为,曹植在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两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也有不少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该书在论述中,联系历代特别是建国后有关曹植研究中的争论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时有新解。

(胡德怀)

【魏陈思王年谱】 年谱。清丁晏著。此谱撰成于道光十六年(1835),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曹植年谱。谱前有序,以“忠孝”二字立论,评述谱主一生行事。谱文据史传将时事和谱主的事迹按年排比,对有写作年代可考的作品也尽可能加以编年,颇简明扼要。谱中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例如《说疫气》和《喜雨诗》两篇,均有原文可以考定其写作年代,而未加列入。又如《神龟赋》一篇,年谱系之于太和三年(229)曹植徙封东阿王之时,其理由是陈琳《答东阿王笺》有“并示《龟赋》”一语,认为《龟赋》即《神龟赋》,这有一定道理,但认为陈琳的答笺作于太和三年则大成问题。因为陈琳早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已经亡歿。题目中称曹植为“东阿王”显然是出于后人的追改。此谱有《颐志斋丛书》本,又见于《曹集铨评》附录。

(俞绍初)

【曹子建年谱】 年谱。一卷。清朱绪曾撰。这是曹植年谱中较早的一本。该谱载朱氏《曹植考异》。《曹植考异》系《金陵丛书》丙集之九,依宋嘉定本;其中曹植作品考异十卷,叙述为第十一卷,曹植年谱为第十二卷。该谱从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192)曹植生起,至太和六年(232)四十一岁卒止,逐年编排曹植一生的主要事迹;叙写当时有关重大社会事件;考定曹植大部分著作的写作时间;评述曹植的为人

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谱末还有历代诸家对曹植的评论。其材料多直接引用《三国志》等有关史料,如“建安七年壬午,年十一岁:本传云:‘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该书对研究曹植的生平及其诗文颇有参考价值。(胡德怀)

【阮籍集校注】 诗文集注本。陈伯君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伯君(1895—1969)名绍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时曾师事黄侃、黄节、马叙伦、吴梅诸先生,毕业后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建国后任国(政)务院教育部、高教部秘书和研究员。性耽文史,长于诗词,著有《双蕉草庐诗词稿》。阮籍的作品,除《咏怀诗》有蒋师燯、黄节等人的注本行世外,向无诗文合集的校注本。本书在旧本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逐篇作了校勘和注释,为读者首次提供了《阮籍集》的全校全注本。在校勘方面,本书不专据一本,系将各本互校,遇有文字异同则择善而从,可彼可此者则以多数为准,并将他本异文(明显为误字者除外)注于正文之下。这样,使读者易于读通本文,其他各本的面目亦于此可见。注者在校勘时,不仅尽力搜求各种版本,还广及类书、方志和清末以前诸大家之选本,以校正讹夺;遇有可疑之处,态度也极为审慎,非有一种版本作为根据不轻下判断,如《亢父赋》之“亢”字,诸本皆作“元”,遍查有关史地书籍实无“元父”这一地名,“元”显系“亢”字之误,但注者只在检得梅鼎祚本正作“亢”,又陈元龙等辑之《历代赋汇》“元”字下注“一作亢”后,始据以校改。在笺注方面,凡有旧注可作参考者,充分吸收旧注成果,又在此基础上或加补注,或作辨证,提出不少独特见解。尤其是注文部分,除《文选》所录两篇有旧注可参,余皆为陈氏创注。其注往往能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出发,结合阮氏一生的出处、交游,加以多方面探讨,阐幽发微,揭示原文意旨,见出注者之功力。诗文中附有集评,凡对理解诗文立意、背景有启发的旧评广为采录,注者的意见与前人有不同的,则加己按。按语中不乏新见,如《咏怀诗》其五“平生少年时”一首,注者引前人关于“赵李”的五种不同说法,然后指出“诸说并非”,认为“诗中赵李似谓赵高、李斯无疑”,虽未必尽当,但自成一说,足资参考。书后附有《阮籍集》主要版本的序跋、阮籍的传记资料、阮籍年表、阮籍四言诗十首等,为读者研究和欣赏阮籍的作品提供了方便。(俞绍初)

【阮步兵咏怀诗注】 诗别集注本。三国魏阮籍著。近人黄节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经华枕之校订出版,1984年重印时增加

《阮步兵咏怀诗(四言十三首)注补编》,并附伏羲《与阮嗣宗书》等有关阮籍的晋宋人文章八篇。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诗意隐晦曲折,向称难解。唐时李善采用颜延之、沈约旧说曾为之作注,但仅止于《文选》所载的十七首。及至清嘉庆间,蒋师燯《阮嗣宗咏怀诗注》四卷刊刻,方有八十二首全注本问世。黄节鉴于蒋注有附会失实者,有为旧说所误者,有未明嗣宗用古之趣者,并非理想注本,于是取而重注,于1926年成书,作为清华大学的讲义出版。事隔五年之后,黄氏发现明崇祯丁丑潘璫序本《阮嗣宗集》二卷,有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又取而作注,完成《阮步兵咏怀诗注补编》,亦作为清华大学的讲义出版。黄注采择博洽,详明出处,又汇选诸家之说细加剖析,对诗意多有发挥阐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阮步兵咏怀诗注补编》所收的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是阮籍研究的极为珍贵的资料,赖黄氏迻录并加注释方为读者所知,其功绩无疑应加以充分肯定。

(俞绍初)

【嵇康集校注】 诗文集注本。三国魏嵇康撰。今人戴明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嵇康集散佚,至宋仅存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隋书·经籍志》载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并同,郑樵《通志略》所载卷数尚合。至陈振孙《书目解题》则已作十卷,且称康所作文论六七万言,其存于世者仅如此,则宋时已无全本矣。……此本盖明嘉靖乙酉吴县黄省曾所重辑也。”据黄省曾本校刻者,尚有明程崇本、明汪士贤本等。戴明扬即以黄省曾本为主校出。另有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题《嵇康集》,书口有“丛书堂”三字,书中有墨笔、朱笔两校,末有顾千里、张燕昌、黄丕烈等跋。清陆心源宋楼藏抄校本即据丛书堂本校录。鲁迅也是据丛书堂抄本校印,题《嵇康集》凡十卷,存《鲁迅全集》。戴明扬根据明黄省曾嘉靖四年(1525)仿宋刻本为书中正文,而以明吴宽丛书堂抄本及其他诸书引载者校之,也参考了鲁迅校录的排印本。黄本讹杂之处,只加校语于下,不径改补,唯漏落较多,不成句读者,乃依吴宽丛书堂抄本补入。嵇文有旧注者,先录旧注,次加戴注,中以墨围间之;嵇文载于《文选》者,全录李善注文,其五臣及唐人旧注,择其善者录之;互有异同,皆各引出之。明清诸人的评语,择附各篇之后。该书共十卷,其编次:卷一为诗,卷二至卷十为文。卷后有附录十种:佚文、目录、著录考、序跋、事迹、谏评、圣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吕安集、广陵散考。集中了历代研究嵇康生平和诗文较早的材料,颇有参考价值。书末还列举了参校书目七十三种。书中所引鲁迅的校本,系据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

本,与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鲁迅校正稿本,颇有出入。影印本为戴氏所未见,因此,戴对鲁迅校本的评论和引用,并不确切。鲁迅在1935年9月20日致台静农信中曾评及戴氏校本。(胡德怀)

【陆士衡诗注】诗别集注本。三国吴陆机撰。今人郝立权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据齐鲁大学原印本校订出版。陆机集卷帙浩繁,至少有近五十卷,至隋唐散佚已多。《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陆机集》仅止十五卷。宋代以后,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和《宋史·艺文志》著录《陆机集》只有十卷。宋刊十卷本《陆机集》已经亡佚,今存只有明陆元大翻宋本(《四部丛刊》影印)和知不足斋所藏影宋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影宋抄本经卢文弨、严久能校勘,比陆元大翻宋本略胜一筹。另外,明汪士贤辑有《汉魏诸名家集》,其中《晋二俊集》亦系从陆元大本翻刻,舛误与陆本悉同。本书以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中的《晋二俊集》为据,从中摘取陆机的诗,重加排比注解,成为《陆士衡诗注》。其中曾经《文选》采录、李善有注者,均直录李善注,而后,郝博采众说,另作补注;《文选》未采录者,作了更详尽注解。该书共四卷。其编次为:卷一、二为乐府,卷三为五言诗,卷四为四言诗。卷首有自序和本传,卷末有集说,摘引了《北堂书钞》、《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品》等各家对陆机诗文的评述。(胡德怀)

【陆平原年谱】年谱。今人姜亮夫著。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此谱按年详细考订陆机一生事迹、创作活动及其时代背景,资料丰富,分析也较深入细密。其中,对陆机诗文的研究用力尤勤。年谱将今存的陆机作品网罗殆尽,而且往往能联系时代环境和作者的思想,逐篇揭示其意蕴,进而考定或推拟其写作年代,大都做到言之有据,因而使作品编年成为全书最具特色的部分。当然,其间亦不无可议之处。如《遂志赋》,其序有“余备托作者之末”一句,细读上下文,所谓“作者”,当指冯衍、班固、张衡、蔡邕等人,而年谱则以为指著作郎而言,并据以系此赋于元康八年(298)陆机出补著作郎之时,未免失察。又如《文赋》一篇,年谱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之语,断其为太康元年(280)时所作,其实杜甫所说“文赋”,泛指文章辞赋,未必是专名。书首冠章炳麟《陆机赞》以当代序,次列《陆氏世系表》、《晋书》陆机本传、《三国志》裴注引机云别传,书末附《陆机著述考》、《陆机书法》、《陆机轶事辑》及《六朝隋唐诸家论陆语辑》,对研究陆机的生平、创作皆有参考价值。(俞绍初)

【谢康乐诗注】诗别集注本。南朝宋谢灵运著。

近人黄节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校订出版。黄氏此注始作于1921年,历时四年,三易其稿,于1924年成书。正文系选录明万历焦竑本《谢康乐集》的诗歌部分,厘为四卷,卷一为乐府,卷二、三、四为杂诗;唯乐府《相逢行》一首,因《乐府诗集》作谢惠连诗,没有编入。在注释时,参考《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书,对原文作了校勘,遇有重要的异文,在正文下注明“一作某”,不交代根据。注释体例是,凡《文选》所收的作品,径录李善注,善注有未尽者为之补注,补注中亦间采五臣注和他家之说,余则为黄氏创注。黄注着重于笺释词语、典实,采择广博,颇为细密,不但对善注作了补充,有时还纠正其疏失。例如卷二《过始宁墅》:“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静”字,善注引《论语》:“智者动,仁者静。”黄节则以为是用《老子》义,《老子》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从谢灵运一生笃信老庄之说来看,当以黄注更切合原意。黄注也有不足之处,如卷一《君子有所思行》:“总驾越钟陵,还顾望京畿。”钟陵,当即钟山,而黄氏误为豫章郡之钟陵;又如卷二《述祖德诗二首》其一:“临组乍不继,对珪宁肯分?”“乍”字,黄注引胡枕泉说作“止”解,显然是因不明此字与下句之“宁”字乃为互文。此外,黄注对一些诗的作意和作年的考释,有时也不免牵强失当。黄注对于有关佛经的注文,虚心采择,注后附录各家评述,多能阐发谢诗精微。不失是一部较精的注本。

(俞绍初)

【谢灵运集校注】诗文集注本。顾绍柏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谢灵运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载二十卷,久佚不传,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是明清人的辑本,且多有舛误。注者有鉴于此,便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广参群书,辨伪订讹,重加搜剔厘定,并作了注释。全书分杂诗、乐府诗、文三类编排,诗文分别以写作时间先后为次;乐府诗以多数无作年可考而不编年,置于杂诗后;文中亦有四篇无法判断其作年,故置于文类编年之后。编年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注者的见解。此书辑校亦称精审,通过考辨订正了不少被前人误编的作品。例如《七里瀨》诗本一首,明焦竑本《谢康乐集》却把唐方干《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诗误作灵运诗编入,题作《七里瀨二首》。又如明张溥《百三名家集》本收有所谓《楠溪》、《泉山》二诗,实即《登永嘉绿嶂山》、《石室山》诗的片断,所谓《大林峰》诗,实即《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节录。凡此,或加以剔除,或进行归并,恢复了原作的本来面貌。此外,还据它书增补了一些佚文佚诗,包括仅存其目而亡其文者,

遂使本书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谢灵运诗文集。当然也有漏辑的,如《大正藏》中所收《佛法铭赞》一文即是。本书校勘不专据一本,而是选择引录该篇最早、最完整的书作为底本,其他则为参校本,校记随文入注,不单独立项。凡遇异文皆出校,对于原文的错讹,非有确实根据不作改动,只在校记中加以说明,但校记常罗列它本误字,略嫌繁琐。在注释方面,每篇有题注,交代作品出处,扼要提示内容,有的还对写作背景和人物、地名等作了考辨和说明。对词语的注释,既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为成说所拘囿,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注释采用语体文,基本上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拟魏太子》诗中“窈窕究天人”之“天人”,当出自《荀子·天论》和司马迁《报任安书》,指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而此注据李善注所引《庄子》文,解释为“顺应自然之人”;又《拟陈琳》诗“单民易周章”的“单民”,本指单家之民,而注据五臣说解作“单人,只身”,皆未合原意。书前有插图多幅,其中三幅灵运行踪示意图系注者据灵运作品和多种方志所提供的线索,并作部分实地考察后绘制而成。书末附录有《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谢氏家族成员简介》、《〈隋书〉等古籍中所著录的灵运著作及所纂总集》、《评丛》等多种,颇便读者使用。

(俞绍初)

【谢灵运诗选】 古诗别集选注本。南朝宋谢灵运撰。今人叶笑雪选注。此选主要选注谢氏山水诗,亦兼考虑到谢氏其他题材的名作,如《日出东南隅行》、《燕歌行》等模拟古乐府的名作,虽然在内容上还顾及乐府传统,但却体现了灵运镂金错彩诗风;又如《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虽与山水诗无关,但它被萧统采入《文选》,从中可见谢氏曾向建安诗歌学习,故也选入。至于颓废思想浓厚,或用佛典过多的作品则不选。此选以黄节《谢康乐诗注》为依据,其正文则参校影宋刻本《三谢诗》、《乐府诗集》及《四部丛刊》本《文选》,择善而从。注文则用《文选》李善注及《谢康乐诗注》中黄节注为蓝本。全书选诗六十五首,注释细致翔实,注后附有说明文字,用以串解诗句,介绍诗之内容,分析其艺术特色。书前有《前言》,文中分析了山水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社会根源与哲学依据,并对谢灵运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作了论述与评价,亦兼论及陶渊明作品。书后附有编选者所撰《谢灵运传》,传中不仅介绍了灵运的生平遭遇,而且就其政治倾向、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此书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王学泰)

【颜延之年谱】 年谱。今人缪钺撰。原载《中国

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后收入缪钺的《读史存稿》,三联书店 1963 年出版。此谱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384)颜延之生,至孝建三年丙申(456)延之七十三岁卒止,逐年编排延之一生主要事迹;叙写当代有关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考定颜延之部分著作的写作年代;编入颜延之同代作家的生平,如谢灵运等;钩沉和著录延之许多散佚诗文;评述颜延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纠正了史籍上一些错讹记载,如《宋书》本传认为颜延之为“右光禄大夫”,而《南史》本传作“左光禄大夫”,缪以《晋书·颜含传》为据考证《宋书》作“右光禄大夫”是,而《南史》误。该书史料来源多系《宋书》、《南史》、《晋书》、《南齐书》、《通鉴》等正史及《艺文类聚》等类书。谱末还附载延之四子:竣、测、奂、跃,一女适范羲的简史;附录颜延之全部著作目录;摘引历代史籍有关延之文学成就的论述;辑录《宋书》、《南史》、《南齐书》、《高僧传》所载延之事不能考定在何年者,共九条。该年谱内容翔实,评述有据,足资研究者参考。

(胡德怀)

【鲍参军附令晖诗注】 诗文别集注本。南朝宋鲍照及其妹令晖撰,清同治归安钱振伦注。这是《鲍参军集》最早之注本,惜未付梓。钱氏以《四库全书》所收《鲍参军集》十卷本和张溥的《鲍参军集》二卷本为据,校勘注出。其内容:文二卷,诗四卷,后附鲍令晖诗六首。其注笺一部分来自《文选》的李善注,一部分来自《玉台新咏》的吴兆宜注,一部分来自《古诗选》闻人倓注,在此基础上钱氏增补其校注和集说。此书虽未付梓,然其成果,分别为黄节的《鲍参军诗注》和钱仲联的《鲍参军集注》所采纳。首创之功不可没。

(胡德怀)

【鲍参军诗注】 诗别集注本。南朝宋鲍照撰,近人黄节注,今人叶菊生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据原印本校正出版。鲍照文集最早由南朝齐虞炎编次成集,凡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鲍照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亦作十卷。明正德间朱应登刻《鲍参军集》卷数与《隋志》、《宋志》合,而冠以虞炎序。《四库全书》据明正德朱应登刻本著录《鲍参军集》十卷。《四部丛刊》据明毛斧季校宋本影印《鲍氏集》十卷。另外还有明汪士贤刻《鲍明远集》十卷本,张溥刻《鲍参军集》二卷本。鲍照诗至清同治年间钱振伦始为之注,惜未及付梓。黄节在北京大学讲诗,极为推重钱振伦注本,乃取诗注厘之,由北京大学以《鲍参军诗注》排印问世。该书注笺一部分采录《文选》的李善注,一部分采录《玉台新咏》的吴兆宜注,一部分采录《古诗选》的闻人倓注。李、吴、闻三家所未注者,钱振伦补注。黄节在此基础上,再作补注,又间采前人关于鲍照诗的各种评说。该书共四

卷,一、二卷为乐府,三、四卷为诗及联句,后附鲍令晖诗六首。卷首有鲍照集虞序、本传、张溥的鲍参军集题辞、钱振伦注序、张尔田序、黄节的补注自序等。每卷之后,有附考,校正各版本讹漏。(胡德怀)

【鲍参军集注】诗文集注校本。今人钱仲联增补集注校。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过断句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再版,1980年钱又作了较多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改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始为鲍集作注者,为清末同治年间的钱振伦,惜未及付梓。黄节极为推重振伦注本,独取其中诗注部分,增补其注,由北京大学以《鲍参军诗注》排印问世。本书笺注者乃原注钱振伦之孙,他将鲍氏文集部分两卷作补注集说,将诗歌部分在原注和黄节补注的基础上亦再作增补。钱仲联序云:“先大父《鲍参军集注》六卷,晚年手自写定。1923年顺德黄晦闻先生从余家借去钞本,就诗集部分四卷增加补注集说,由北京大学排印问世,流布未广,而文集部分二卷,黄先生未有补注,亦未刊行……更取涵芬楼影印毛斧季校宋本,《文选》六臣注影宋本、《乐府诗集》影宋本、严可均《全宋文》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所引,校勘全集一过,增加校语于注文之后。”因此,本书的校注较为完善。本书编次,一、二卷为文集,分为赋、表、疏、启、颂、铭、文七类共三十七篇;三、四两卷为乐府;五、六两卷为诗。后附鲍令晖诗六首。卷首有钱振伦和钱仲联序、黄节序、虞炎序、张溥题辞、四库提要,卷末还附录《宋书》本传、《南史》本传、钱仲联所撰《鲍照年表》以及历代诸家总论鲍氏诗文的评论摘录。(胡德怀)

【鲍照年谱】年谱。近人吴丕绩撰。194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此谱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鲍照生起,至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止,编写鲍照生平的主要事迹,辑载当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录入鲍照的部分著作写作时间,评述鲍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鲍照生平史书失载。此谱作者据陈沆《诗比兴笺》,以为鲍照《拟行路难》第八首为伤庐陵王义真之作,其年为元嘉元年;《行路难》末首有“余当二十弱冠辰”之句,则元嘉元年鲍照年应为二十岁,以此上推,定照生年为义熙元年(405)。下推至泰始二年在荆州为乱兵所杀,得年六十二岁。而以虞炎序“年五十馀”为六十馀之误。此说学界颇有异议。南齐虞炎去照年代不远,其载当有所据。《行路难》十八首,并非一时之作。第六首自称“弃置罢官去”。照在元嘉十六年始出仕临川王国,不可能在此前十六年已有罢官之事。何况《行路难》第八首陈沆以为系伤义真之死者,其说穿凿不可通,原不足为据。至于鲍照的生年,当前学界多以约生于晋安帝

义熙十年(414)前后。

(胡德怀)

【鲍照年表】年谱。今人钱仲联编写。附载于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此书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再版,后经作者修订,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改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该表有五栏:一、年代,含旧历和公历,二、鲍照岁数,三、当年重大政治社会事件及同代人名家生卒,四、鲍照主要经历,五、鲍照作品。每栏的事迹考证多以“附注”数码标之,详叙附于表后。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鲍照生起,至明帝泰始二年丙午(466)鲍照五十三岁卒止,共编了其中的二十四年。虽未逐年编写,但书中仍记录了鲍照一生的主要事迹,反映当时重大社会事件,考定鲍照大部分作品写作年代,核实史籍许多有争议的记载。鲍照生年史籍失载。吴丕绩的《鲍照年谱》定照生年为义熙元年(405),下推至宋明帝泰始二年在荆州为乱兵所杀,得年六十二岁。《三续疑年录》谓照年四十馀。钱仲联按《宋书·孝武本纪》:大明六年秋,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鲍照有《在江陵叹年伤老》诗,据诗中所叙,其写作时间不能早于大明七年。以大明七年(463)照年为五十计之,则当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下推至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得年五十三,与虞序所云“年五十馀”者相合。此说为当今学界认可。(胡德怀)

【沈休文诗注】诗别集注本。四卷。南朝梁沈约撰,今人郝立权注。1935年印行。沈约所传诗文独多,《隋书·经籍志》载梁特进沈约集一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沈约集一百卷,沈约集略三十卷。自宋以来,沈集篇章散佚,雅韵不存,遗文罕睹,《宋史·艺文志》载沈约集九卷,又诗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云:“沈约集十五卷,别集一卷,又九卷。梁特进吴兴沈约休文撰约有文集百卷,今所存唯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为赋,馀皆为诗也;别集杂录诗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诏草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云:百卷之说盖沿隋唐诸志之旧,非真见其全集也,《书录解題》所称十五卷本,自明以来亦不传。明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沈隐侯集》中指出:“休文大手,史书居长,传者独《宋书》,文集百卷,亦仅存十三。”其《沈隐侯集》只载诗文各一卷。郝氏以张溥辑《沈隐侯集》为据,摘取其中诗歌,重加排比,成为《沈休文诗注》。其中曾经《玉台新咏》采录、吴兆宜有注者和《古诗选》采录、闻人倓有注者,均用吴、闻之注。在此基础上郝氏繁征博采,添补注笺,发其归趣。该书的编次:一、二卷为乐府,三、四卷为诗。卷首有张尔田的题辞、郝立权的自序、《梁书》本传;卷末附有历代评论沈约诗文的

集说和考证。

(胡德怀)

【江文通集汇注】 诗文集注本。南朝梁江淹撰,明胡之骥注。之骥,字伯良,吴(今江苏苏州)人。壮年因避倭乱,流寓于蕲(今湖北蕲春)。其生平事迹未详。《江文通集汇注》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是江淹作品的第一部全注本。此书以梅鼎祚本为基础,参以汪士贤刻《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以及《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和史传所载江淹之文作了整理校勘,并加以注释。全书共十卷,诗赋部分按原书编排,文部分则大体上仿照《文选》分类,每类作品又略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又将《玉台新咏》所载《征怨》、《咏美人春游》、《西洲曲》三首诗和《南齐书》所载《凤皇衔书伎歌辞》、《祀先农迎神升歌》、《飨神歌辞》三篇乐府,与梅本作为拾遗处理的《遂古篇》,一并补入正文。书后附有《南史》本传。此书校勘比较简略,不注明校改的根据,且多有误改和误刻之处。在注释上,吸收了《文选》李善注等注解成果,除注明词语、典故的出处外,间或解释词意,还对一部分作品的写作背景及有关人事作了说明,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方便。但注释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萧骠骑发徐州三五教》,注云:“三五,犹《孙子兵法》所谓三令五申之教也。”这纯属望文生义,其实“三五”是指南北朝时期推行的“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的征兵制度。又如《萧骠骑让太尉增封第三表》“王、钟之素业”,王、钟当指王朗、钟繇,二人都曾任三司之职,于曹魏有功,故文中将他们与西汉之曹(参)、萧(何),东汉之吴(汉)、邓(禹)等人相提并论,而胡氏却误注为王羲之、钟繇,并云:“父子兄弟仕于晋室,俱以能书知名,一时称盛。”钟繇父子并未仕晋,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注释不合正文原意的情况尚属不少。至于引书、引文的错误,更所在多有。尽管如此,它毕竟是江淹集注释开创之作,在尚无新注本的情况下,对于研究者仍有参考使用的价值。此书经李长路、赵威校点,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在整理过程中,对正文作了详细校勘,采录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异文,改正了原注引书、引文的错误,还从别本辑入注本所无的《伤爱子赋》、《井赋》、《牲出入歌》、《荐豆毛血歌辞》、《奏宣列之乐歌》、《铜剑赞》六篇诗文,又据《广弘明集》辑补了《无为论》一文,作为佚文辑补附于正集之后,使全书在质量上有所提高。

(俞绍初)

【江淹年谱】 年谱。吴丕绩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年谱以江淹《自序》和《梁书》、《南史》本传为依据,同时参考有关史料和江淹作品,按年记载谱主的重要事迹和创作活动,以及与谱主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对江淹一生的仕历、行踪、作品等方面作了

比较详细的考证,亦有所发现。例如江淹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一事,《自序》和本传均不说明其具体时间。吴氏则通过《报袁叔明书》的内容,先考定此书作于泰始七年(471),其时江淹二十八岁;再据书中“去岁迫名茂才,冬尽不获有报”之语,从而推定“江淹年二十七,方赴茂才试”,所得结论是可信的。谱中还提供了一些鲜为人们所注意的资料,如在元徽三年(475)谱中引元赵贲翁《江文通集》跋语,知道浙江萧山有江淹别业;在永明五年(487)谱中引梁元帝《金楼子》文,揭示出江淹曾参与竟陵文人集团的活动等,都有助于考证江淹的生平和创作。谱中也存在一些疏误,如《南史》本传误本有“王俭尝谓曰:‘卿年二十五,已为中书郎’”之文,其实“二十五”应作“三十五”,吴氏对此虽有觉察,憾未能改正,仍将此事置于泰始四年谱中;又如《从建平王游纪南城》诗当在荆州时所作,而年谱却将其系于元徽元年建平王出镇南徐州之后,致使编年错乱。然而,年谱体例严谨,叙事也颇有条贯,谱末所附孙溢堪《校勘记》对江淹作品的文字多所勘正,尤有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江淹传记材料和各本题跋。

(俞绍初)

【谢宣城诗注】 诗别集注本。四卷。南朝齐谢朓撰。今人郝立权注。1936年铅印出版。谢朓诗文,《隋书·经籍志》载齐吏部郎谢朓集十二卷,谢朓逸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谢朓集十卷。《宋史·艺文志》称谢朓集十卷,又诗一卷。宋以后只传其诗赋五卷,其余五卷,皆当时杂文,故不传。《四库全书总目·谢宣城集》提要云:“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朓集本十卷,楼昺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刊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考钟嵘诗品,称朓极与子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则振孙之言审矣。张溥刻《百三家集》,合朓诗赋五卷为一卷。此本五卷即绍兴二十八年(1158)楼昺所刻。前有昺序,犹南宋佳本也。”郝立权即以此本和张溥辑汉魏百三家集中《谢宣城集》为据,摘取其中诗歌,重加排比成为《谢宣城诗注》。其注笺,原录于《文选》李善有注者和原录于《玉台新咏》吴兆宜有注者,原录于《古诗选》闻人倓有注者,以及近人黄节所注十六首,悉并抄入,并一一为之疏通校理。所有引用旧注,悉列本名。在此基础上郝氏再增补注。卷首有郝氏自序和《南齐书·本传》,卷后有历代品评谢朓诗文的集说和考证。其中钟嵘《诗品》、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颜之推《家训·文章篇》、王世贞《艺苑卮言》、严羽《沧浪诗话》等书中对朓诗的评说尤有参考价值。

(胡德怀)

【何水部诗注】 诗别集注本。二卷。南朝梁何逊

撰,今人郝立权注。1937年齐鲁大学铅印行。《何水部集》,《隋书·经籍志》载《梁仁威记室何逊集七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何逊集》八卷,后散佚,《宋史·艺文志》载《何逊集》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王僧孺尝辑逊诗编为八卷,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有逊集跋,称为春明宋氏本,盖宋敏求家所传,其卷数尚与《梁书》相符。而伯思云杜甫所引‘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句不见集中,则当时已有佚脱。旧本久亡,所谓八卷者不可复睹。即《永乐大典》所引逊诗,亦皆今世所习见,则元明间已不存矣。此本为正德丁丑松江张紘所刊。首列逊小传,凡诗九十五首,附载范云、刘孝绰同作《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末载黄伯思跋。跋后附《七召》一篇。末复有紘跋。”郝立权即以《四库全书》中《何水部集》一卷本为据,重加排比注解,成《何水部诗注》二卷。其中曾经《玉台新咏》采录吴兆宜有注者和《古诗选》采录闻人倓有注者,均用吴、闻注。在此基础上,郝氏博采众说,添补注笺。卷首有开原马宗芄序,卷末还有《梁书》本传、考证、集说三部分。集说中有无名氏《竹林诗评》、王世贞《艺苑卮言》等评论逊诗的摘录。

(胡德怀)

【徐孝穆集笺注】诗文集注本。六卷。南朝陈徐陵撰,清吴兆宜注。徐陵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久佚不传。此本系后人从《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书中采掇而成,共分六卷:卷一为赋、诗、表、檄、启,卷二、三为书,卷四为序、碑,卷五为碑、颂、铭、哀、策文、墓志,卷六为诏、策、玺书。所辑诗文并不完备,如《艺文类聚》卷七七所引《四无畏寺刹下铭》、《文镜秘府论》西卷所引《陇头水》“陇头流水急”一首,均未加收录。吴氏此注集众手而成,非一人所作,第六卷又无注,由其同里徐文炳加以补注,名曰备考,附于卷末。注释主要是交代词语的出处,采择颇广,但取裁时有不当之处。例如《走笔戏书应令》诗“轻寒入锦巾”的“锦巾”,应是佩巾,由下“偏自着腰身”一句可证,而注却误解为头巾,不嫌其繁地引用《傅子》关于袁绍等将帅着缣巾、魏武帝裁缣帛以为帟一节文字加以说明。又如《鸳鸯赋》“既交颈于千年”一句,当本《玉台新咏》所载之《古绝句》:“南山一桂树,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属于可注而未注。此外,对《陈武帝即位诏》、《陈武帝下州郡书》及《让右仆射初表》、《让左仆射初表》等文的作者归属问题,亦未作考辨。尽管此书存在一些缺点,“然笺释词藻,亦颇足备稽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徐陵集》注本,对于研究徐陵的作品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扬州艺古堂刊本。

(俞绍初)

【庾子山集注】诗文集注本。十六卷。北朝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有《神州古史考》、《方輿通俗文》等。《清史列传》卷七有传。本书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书前有年谱、《北史》本传及滕王道原序。本传、序均加注释,注释与年谱对庾信的生平作了详细考证。此书用明屠隆本作底本,唯屠本乐府类有《从军行》一首,倪注本归入诗类,作《同卢记室参军》;屠本赋十五篇为一卷,倪本分为两卷,各卷分合也稍有不同。在校勘方面,对原文的错误作了一些订正,如指出《伤心赋》“任延”当作“任咸”,“二王”当作“二何”,并分别在总释和注释中说明理由,皆颇精审。遇有重要的异文,注明于正文该字之下,供读者参酌,但例不交代版本根据,仅用“一作×”表示。在注释方面,此书最大的优点是征引广博,阐释诗意,常能探幽发微。例如,《拟咏怀诗二十七首》题注云:“昔阮步兵《咏怀诗》十七首(按指《文选》所录),颜延年以为在晋文代虑祸而发。子山拟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既交代其渊源所自,又点明了诗旨,颇便阅读。又如《哀江南赋》的注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时事,尤为典核”,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当然,倪注也有一些缺点,如引书、引典偶有误,有时也存在着流于臆测、不合原意的情况。但总的说来,此书不失为一本比较精审的庾信集注释本。书后所附总释对注中未尽之处作了补充。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刊本,后《四部备要》即用此本排印。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校订了原文和注释的不少错误,并将总释部分分置于各篇之末,又辑集了庾信的若干佚作,附录于书后,使本书质量大有提高。

(俞绍初)

【庾开府集笺注】诗文集注本。十卷。北朝周庾信撰,清吴兆宜注。庾信集在隋代有魏澹为其作注(见《隋书·魏澹传》),惜未传世;至清代又有胡渭对它加了注释,但也未能成书。吴氏此书在采辑胡注的基础上,又与徐树谷等人作了补注,是集合众手而成的。卷一、二赋,卷三乐府,卷四、五诗,卷六至卷一〇文。用明张溥《百三名家集》作底本,诗的部分据朱曰藩本补入《咏桂》、《庭前枯树》二诗,又从《海录碎事》辑得《愁赋》、《荡子赋》的残句,皆为其他各本所无。但据《文苑英华》卷三二六,《庭前枯树》为孙万寿作,又据《艺文类聚》卷八九,《咏桂》为范云作,可见吴氏轻信前人旧本而失于考证。注释主要

着力于注明典故、字词的出处,比较简略,且缺点也比较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援例评云:“如注《哀江南赋》经邦左汉一事,引《史记·索隐》误本以园公为姓庾,以四皓为汉相,殊不免附会牵合。”这种牵强求合的情况还可举出一些,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阶无玉璧,既异河间之碑。”所谓“河间之碑”,当指后汉张超《灵帝河间旧庐碑》,文载《艺文类聚》卷六四,而吴氏则错误地把河间看成是河间相张衡,并引张衡《西京赋》文句来加以说明,致使正文文意了不可通。至于该注而未加注的情况更所在多有。总的来说,吴注本在精详上比不上倪璠注本。但是,吴注也自有其优点。例如,《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树宿含樱鸟”,倪注仅注:“樱桃,一名含桃。”而吴注则引《礼记·月令》:“天子羞,先以含桃荐寝庙。”注:“樱桃为鸟所食,故曰含桃。”既交代了词语的出处,也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诗人选词的用心。又同诗“迎风下列缺”,倪注引《汉书·扬雄传》及应劭说作注,而吴注则怀疑“缺”当作“子”字,并引《庄子》“列子御风泠然”之文证之,这样“列子”与下句“洒洒召昌容”之仙人昌容相对举,似更合情理。吴注本与倪注本相较,各有得失,它的价值不单是有“经营创始之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可以弥补倪注本的不足。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俞绍初)

【庚子山年谱】年谱。清倪璠著。该年谱按年详细记载了庾信所处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庾信一生的行踪及创作活动,材料富赡,考订精审;其所载事迹史实又往往引庾信的作品,特别是《哀江南赋》加以印证,对读者了解庾信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演变极有帮助。但年谱亦间有疏漏,如庾信入北以后何时迁为司宪大夫、何时拜洛州刺史等问题,缺乏精确的考证。此外,对《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哀江南赋》、《伤心赋》等主要作品,亦未考订其写作年代。此年谱载于倪氏《庾子山集注》卷首,谱后附《庾氏世系图》。(俞绍初)

【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研究专著。唐吴兢撰。二卷。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后时入史馆,参与编修国史。中宗时,官右补阙、起居郎等职。玄宗时,官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左庶子,长期从事修撰史书。著作今存有《贞观政要》十卷及本书。唐人称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诗为古乐府,其曲名为乐府古题,此书专门解释乐府古题,故名《乐府古题要解》。此书分乐府古题为八类: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饶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每类各列若干曲题,每题各有释文,大致说明其起源、古辞内容及后人仿作等,各类下又有总说。大抵对汉魏乐府采择较详备,六朝清商曲仅列七题,则

遗漏较多。此书为现存广泛研究古乐府诗的最早专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引用其说颇多。(《乐府诗集》把它简称为《乐府解》。)书中每题有要解,每类有总说,亦为《乐府诗集》及后来不少总集所取法。书尾部琴曲类之后,又列若干杂题,继列离合、盘中、回文等二十余种杂体诗题,各作简释。按杂体诗乃文人游戏之作,并非乐府诗,此书系之书末,盖属附录性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尝疑此书原本已佚,今本乃元人掇拾《乐府诗集》引文而成。考唐王叡《炙毂子杂录》中之《序乐府》篇(见陶珽本《说郛》卷二三)引此书,内容与今本相同,《提要》之说不可信。但今本琴曲类下尚有数十题,无总说,《炙毂子杂录》引文则有总说,又杂体诗中,《杂录》引文中又有建除、风人诗两条,为今本所无。可知今本已有少数缺漏。有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今通行者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排印),即据《津逮秘书》本重刊。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吴兢尚编有《古乐府》十卷,当是与《要解》为相辅而行之书,惜今已不传。(王运熙)

【乐府诗集】乐府诗总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编纂。茂倩(生卒年不详),字德粲,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通音律,善篆隶,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时任河南府法曹参军。其他事迹不详。此书所收篇章,上起上古,下迄五代,网罗宏富,搜集乐府诗最称完备。凡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辞五卷、横吹曲辞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辞四卷、杂歌谣辞七卷、新乐府辞十一卷。共分十二大类。其中自郊庙至杂曲九类,大致为源出汉魏六朝之古乐府。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分古乐府为八类,此书中前九类古乐府,多数与吴书相同,略有增损改易。近代曲为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新乐曲,新乐府为唐人因事立题、不配音乐的案头之作,与源出汉魏六朝的古乐府有区别。杂歌谣一类虽不属乐府,但乐府诗本多源出歌谣,往往有足资印证处,增入一类,亦便于参考。此书分类堪称全面精当,后世不少乐府总集之分类,大抵以此书为圭臬。此书编排亦颇得当。每题以古辞居前,后来拟作按时代顺序居后,可以考见各题乐府歌辞的原始与流变。在著录歌辞时,编者注意保存古籍中有价值的资料。如相和歌辞中的一部分汉魏篇章,《宋书·乐志》对“解”(乐府诗中的分章)详加注明,此书悉予保存,有利于读者对相和歌辞体制的理解。此书十二大类各有叙说。某些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各小类亦自有叙说。各曲题有解题。它们对各类别、各曲题歌辞之源流、内容、特色等均有详细精当之论述,引

用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信非过誉。编者于乐府体制有深入了解,凡所论述,大抵翔实可信,不似明清人乐府选本、注本,多以意妄测,流于穿凿附会。叙说、解题中征引之古籍,有些后代已失传(如南朝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赖此书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弥足珍视。总的说来,此书搜罗宏富,分类编排合理,论述考核精审,堪称研究汉魏迄唐五代乐府诗最重要的总集。此书间也有疏漏处。明梅鼎祚《古乐苑》凡例曾摘其以古诗混入乐府等谬误若干条,说颇中理,但毕竟是小疵病。此书通行者原有汲古阁刻本、局刻本,《四部丛刊》本均据汲古阁本重印。建国以后,又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和中华书局标校本。又据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郭茂倩尚编有《杂体诗》一书,惜今已亡佚。杂体诗为文人游戏之作,体例与乐府中的少数俳谐作品相近,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于书末曾予论述,郭茂倩则别编一书,与《乐府诗集》相辅而行。

(王运熙)

【古乐府】乐府诗选集。元左克明编选。克明,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生平不详。其书自序题至正丙戌(1346),则当是元顺帝时代人。此书共十卷。专录唐以前古乐府诗,分为八类:古歌谣、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杂曲。自序云:“首以古歌谣辞者,贵其发乎自然也。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也。”此书编著时当参考了《乐府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元童万元刻本《乐府诗集》李孝光序,称其书岁久将弗传,至正六年(1340),济南彭叔仪始得元本校刻,因谓《乐府诗集》校刻,“仅在克明成书前六年,其版又在济南,距江西颇远,则编此集时当未必见郭书,非相蹈袭”。但《乐府诗集》实有宋刻本,流传已久,左氏此书各类歌辞小序及各曲调题解,大抵采用郭氏之题解而加以简化。尤其是杂曲歌辞一卷,各曲调先后次序,基本上同于《乐府诗集》,因袭之迹,极为明显。但《乐府诗集》卷帙繁多,不便浏览,此书屏弃死气沉沉之郊庙燕射歌辞不录,于其他古乐府亦不全录,如《子夜歌》晋宋齐辞,《乐府诗集》有四十二首,该书仅录二十首。“所重在于古题古辞,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此颇为后人重视。但其对《乐府诗集》的考订加以简化,有失妥之处。如郭书鼓吹曲辞题解引《宋书·乐志》之说,以为短箫铙歌至魏晋世始名鼓吹,然后引《晋中兴书》加以驳斥;此书略去《宋书》之文,而照录郭书驳论,变成无的放矢。更有误解郭书考订语者。郭书于吴声歌曲末尾录《黄竹子歌》、《江陵女歌》,引唐李康成语曰:“二歌皆今时

吴歌也。”“今时”乃指唐代,左氏亦编入《古乐府》。故从研究角度言,此书颇多疵漏。有明嘉靖汪尚磨刻本。清初又有吴门刊本,不佳。

(王国安)

【古乐苑】乐府诗选本。明梅鼎祚编。五十二卷。乃大体因循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加以增补之作。《乐府诗集》收录歌辞,止于五代,此书用左克明《古乐府》体例,止于隋代。故《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新乐府辞两类皆未予收录。此书于古乐府歌辞“掇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杂歌谣辞一类,所补尤多。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如吴声歌曲《前溪歌》题解引《茗溪渔隐丛话》说,《懊侬歌》题解引《南齐书·王敬则传》文,对读者都有帮助。杂曲歌辞数量较多,《乐府诗集》编次较乱,此书按照各曲调产生的时代排列,眉目较为清楚,检阅方便。书末附有“衍录”四卷,记作者小传及诸家评论解说之文,其材料大都采自冯惟讷《古诗记》而稍有增益。然此书所增补之歌辞,也颇有不当之处。如收有伪作,所补庞德公《於忽操》,见于《宋文鉴》中,实王令拟作。又如混入不入乐之诗,左思《娇女诗》、温子昇《捣衣》,亦被编录。另外,在编次上体例也不够统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开卷为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迄于秦始皇《祀洛水歌》。而杂歌谣辞中古歌一门,始于《击壤歌》,迄于《甘泉歌》,不知其以何为别”。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原刻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国安)

【乐府广序】乐府诗选集。三十卷。清朱嘉征编。嘉征字岷左,别号止溪圃人。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壬午(1642)举人,入清官徽州府推官。此书,专选录汉魏乐府歌辞,分为三集。以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为风;以鼓吹、横吹之类为雅,以雅舞、杂舞之类为变雅,郊庙歌辞为颂。最后附以歌诗(即杂歌谣辞)、琴曲两类。考《诗经》体例区分乐府类别,始于郑樵《通志·乐略》,郑氏分乐府为风雅之声、祀飨之声两大类,朱氏在其基础上又加细密,区分风雅,雅中又分正变。此书又仿《诗经》体制,于每篇前各为小序以说明其旨意。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为“盖刻意续经,惟恐一毫之不似。牵强支离,固其所矣”。此书体例分解题、小序、注释三部分。小序内容大抵空泛不足观。解题乃转引《乐府诗集》旧文,且时有讹误,如以《古今乐录》为吴兢作;又如《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解题首引《宋书·乐志》,后接郭茂倩解说之文,朱氏亦未予以区分,皆以为《宋书·乐志》原文。注释部分较有可采,采录诸家评论,又有“集考”一项专释词句,皆足资参考。书后附有《诗集广序》十卷,录汉魏古诗。有清原刻本。

(王国安)

【乐府正义】乐府诗选集。清朱乾编注。乾(?—1777),字矩堂,浙江嘉兴人。一生未仕,以授徒著书终生。尝言于学问“尤有心得者,在古乐府”。本书即是其倾毕生心血之作。此书选诗范围原是上自汉魏,下迄于唐,其弟子朱珪认为唐人全诗各有注释,且其体离合不一,故刻书时断自隋代(见《朱序》)。全书分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杂曲、歌谣等九类,共选录乐府诗八百四十四篇,约占《乐府诗集》的六分之一。但选诗范围颇有扩大,如郊庙歌辞中司马相如的《封禅颂》四章、班固《两都赋》所附《明堂诗》以下五首、王粲《太庙颂》三章,杂曲歌中曹植《弃妇篇》,杂歌谣辞中《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之《博南歌》、阮籍《大人先生传》中之《大人先生歌》,均为《乐府诗集》所未收。此书在笺注方面略于词句的解释而详于诗中事实、背景及作者身世的考订。援引丰富,持论亦颇有据。以难于索解的汉郊祀歌十九章为例,《汉书》颜师古注主要着重在词语注释,而此书则就各诗大的方面加以提示揭要。作者对乐府诗体制特征,颇有认识。如论相和歌《雁门太守行》云:“按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指出乐府诗内容不必与乐府旧题完全相合。但书中议论,亦有失之拘泥之处,如论汉魏相和歌辞拟乐府旧题,过分强调了“但须不离其宗”,即内容与旧题的联系,实际上汉魏作品用乐府旧题,仅用其声而不袭其义者甚多,不能以“不离其宗”一言以概之。在释诗意时,间亦有索解过甚,伤于穿凿附会。但总的看来,在明清两代乐府专书中,此书的材料最丰富,见解也最突出。此书卷首有《原乐》一篇,引前人论律吕、礼乐、歌曲、乐府之说,并加考辨,足资参考。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矩香堂刊本。(王国安)

【汉铙歌释文笺正】乐府诗专集笺释。清王先谦著。先谦(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古文词,治经重考证。著述极富,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虚受堂诗文集》等。清代注释铙歌者,此书最晚出,笺释也最详备。其体例为:一、题解。二、正文。其文字校勘、古音叶读即注于正文之下。三、释文。通释全篇大意。四、笺正。采录旧说,申述己意。最后附录魏至明各代拟作。汉铙歌十八曲向称难解,其主要原因为“字多讹误”,“皆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古今乐录》)。作者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沈约收铙歌入《宋书·乐志》时,已重加厘正,离艳辞与声而二之,并由此出发,解释铙歌,其在《例略》中自称:“遗文具在,切究而旁通,鲜

不得当。十八曲中事迹显符者一经指出,固属快心,即冥收隐合,如《拥离》、《石流》等篇,案之事理,皆确不可易,非敢自欺以欺人也。”作者于笺释用力颇勤,材料之翔实,也胜过前人,足资治乐府者参考。但持论时有可商之处,即以作者自认为其解释“确不可易”的《拥离》、《石流》两篇而言,释《拥离》为“讽武帝上林之役”,释《石流》为“苏武伤李陵而作”,也仅仅出于臆测,有望文生训、穿凿附会之嫌。作者于释《铙歌》之外,又曾笺释《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收入作者所著《汉书集注》中,颇有参考价值。有原刻本。(王国安)

【汉魏乐府风笺】乐府诗选注本。近人黄节编注。十五卷。据本书自序,知作于民国十二年(1923)。专释汉乐府民歌及汉魏文人受民歌影响较深之作品。汉诗以乐府所采民间歌辞为主,此外尚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饶》、马援《武溪深行》、张衡《同声歌》、繁钦《定情诗》等少数文人之作。曹魏乐府选录曹操、曹丕、甄后、曹植、曹叡、王粲、左延年、缪袭、陈琳、阮瑀、嵇康等作品。所有作品都属于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相和、杂曲在乐府诗中犹如《诗经》中的“国风”,故书名“风笺”。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乐府歌辞凡十二部。“夫郊庙,颂也。燕射、鼓吹、横吹、舞曲,雅也。琴曲,亦雅之流也。清商,风也;而为吴声、西曲、江南诸弄,与近曲、新辞,皆无与于汉魏。若杂歌谣辞,明其为非曲也,不得列于乐府之风。故兹编于相和歌辞外,独取杂曲歌辞,以附于古采风之义”(卷一四汉杂曲歌辞题解)。本书选录范围及命名由来,于此可见。前人于汉《房中歌》、《郊祀歌》、《短箫铙歌》,颇多专门注释工作,此书始专注相和、杂曲,反映“五四”以后学者对于民歌的重视。本书笺释体例大致分四部分:一、解题。详述源流,对每题都作了必要的解释,颇多采用《乐府诗集》原文。二、笺释词句。于前人旧注,如《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玉台新咏》吴兆宜注、《古诗选》闻人倓注,加以抉择补正,附以己见。三、释音。根据古韵相通之原理分析用韵,引证颇为详确。四、集评。广采各家评说,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吴旦生《历代诗话》、李因笃《汉诗说》、朱乾《乐府正义》、朱嘉征《乐府广序》等,颇便参考。全书笺释,取材宏博,态度谨严,在研究汉魏乐府相和、杂曲歌辞之训诂、音韵方面,此书是材料最丰富之著作。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铅印本。195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据北京大学印本校正出版。(王国安)

【乐府通论】乐府诗研究专著。近人王易著。王易,字晓湘,江西南昌人。另著有《词曲史》。据自序,知本书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全书共分五

篇:述原、明流、辨体、征辞、斟律。全书注重于从音乐角度论述乐府诗。如《述原》论述诗乐与乐府之关系。《明流》从中外音乐混合角度,论乐府流变之迹,可分四个时期:汉魏西晋国乐为主,夷乐为辅;东晋南北朝时期国乐夷乐相长并行;隋唐时期夷乐为主,国乐为辅;五代以后,夷夏混流,习久不辨。作者认为乐府诗的变迁,乃由于音乐和乐器的变化而致。《斟律》专论乐律,系根据作者所著《乐音小识》一书揭其纲领而成。据此书自序,王易家学有自,其父亦曾著书考论乐理,义悉创通,本书即受其父启迪。但作者对音乐之看法颇受旧传统影响,主张兴礼作乐,未免迂腐。此书有民国间神州国光社版及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版。

(王国安)

【乐府诗笺】乐府诗选注本。近人闻一多著。本书专笺汉代乐府诗。共收乐府诗三十九首。首《郊祀歌·日出》篇,次《铙歌十八曲》十八篇,次相和歌辞十一篇和杂曲歌辞三篇。相和、杂曲排列次序略乱,如杂曲《羽林郎》置于相和歌《饮马长城窟行》前;又《艳歌行》二首,分列两处。作者长于训诂,此书于字义诠释,颇多胜解。如释《战城南》“且为客豪”句之“豪”为“号哭”之“号”;疑《巫山高》“我集无高曳”句之“高曳”,为“篙桡(同桡)”;《焦仲卿妻》“恐此事非奇”句之“奇”为“佳”字等等,皆颇警辟。书中于各曲本事、主旨等,亦时有考释,且多新见。如论《蒿里曲》即《下里曲》,《董逃行》与《董逃歌》实为二曲,辨正崔豹《古今注》之误,均核实可信。但据《平陵东》诗意与翟义门人作歌追悼之记载全不相合,因疑崔豹《古今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说为妄,则于乐府体例,犹有未明了处。因现存歌辞并非原作,而崔、吴之说乃叙其本事,此种现象在古乐府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收入《闻一多全集》,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排印本。

(王国安)

【乐府古辞考】乐府研究专著。今人陆侃如著。本书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是近人专治乐府著作之前驱。主要是考订乐府古辞的存亡、内容和性质。本书所谓“古辞”,据该书引言界定是指创制的、入乐的。凡摹拟之作或虽创制而不入乐者,均不在考订之列。其于乐府分类,基本上沿袭《乐府诗集》。但因琴曲多伪作,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不入乐,近代曲辞乃隋唐之作,故分乐府为郊庙歌、燕射歌、舞曲、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及杂曲八类。其中,因《神弦歌》是祭神歌,将它由清商曲移入郊庙歌;又将西曲中《石城乐》等部分舞曲,由清商改隶舞曲,与《乐府诗集》不同。但《神弦歌》和《石城乐》等,皆原属清商,前者风格与吴声西曲接近,又是民间祀歌,与房中、郊祀等庙堂乐差距很大;后者,《乐府诗集》

系据音调列入清商,清商中自可有舞曲,亦不必割裂西曲分隶二类。其考订方法是先按类分列曲调名目,于各调名目下,先罗列前人说,然后加上作者按语。眉目清晰,每类歌辞考订讫,附以总表,注明各曲调存佚情况,颇便于检阅。本书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其收入《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

(王国安)

【乐府文学史】乐府诗研究专著。今人罗根泽著。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县人。五十年代前先后在河南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授教。五十年代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以治诸子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著称于世。据本书自序,作者有编纂“中国文学史类编”的计划,分文学史为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和骈散文等类。但公开出版的仅此一种。本书共分六章,首章为叙论,末章为结论,中四章分别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四时期之乐府。作者主张文学史应按朝代来分期,由于作为文学重要背景之各朝代之政治经济情况不同,文学也就具有不同之特色。一般乐府书籍,大都着重于谈汉魏六朝古乐府,此书对隋唐乐府诗也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是其特点。此书作于三十年代,是作者早年之作,书中的某些论点,本人后来已有不同看法。如书中认为《木兰诗》系唐韦元甫所作,作者后在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予以否定,并提出作于西魏的看法。有民国间北京文化学社排印本。

(王国安)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研究专著。今人萧涤非著。萧涤非(1906—1991),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建国后一直在山东大学执教,另著有《杜甫研究》等。全书共分六编。第一编为绪论,总述乐府之产生、分类及其变化之概况。以下五编,分述两汉、魏(附吴)、晋、南朝、北朝(附隋)乐府。作者于乐府诗用力很深,全书论述,全面而又深入,时有独到之处,成绩突过前此著作。此书在论述形式体制方面,针对历来皆“误认乐府为诗之一体”,提出“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故编中凡与诗体有关之作,皆特加提示。如其论五言诗体,即强调出于两汉民间乐府,而不始于班固。在乐府诗的内容方面,认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虽专指汉代民歌,也是乐府之一大特性,乐府与诗之一大分野,因此,书中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能注意其社会历史内容,钩稽史实,以相印证。如论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引《后汉书·苏不韦传》、《三国志·韩暨传》及魏文帝黄初四年诏,联系当时社会私人复仇风气,指出其诗

“亦足以观一时之风俗”。又如其论南朝清商曲的繁荣,从地理、政治、风尚、思想、制度等方面阐述,非于当时历史有深入了解者不能如此。对于作品本身之性质、时代等方面的考订,也颇多卓见。如《短箫铙歌》前人有疑系《宋书·乐志》“搜罗遗佚,杂凑备数”,作者结合《铙歌》在汉代用于朝会、道路、给赐等实际施用情况,指出“旧云军乐,实不尽然”,其内容庞杂是由于用途之广等等,均可为定论。惟第二编第三章《论东汉乐府之采诗》一节,举《后汉书》《李郃传》、《刘陶传》等为证明,然《后汉书》诸传说所之风谣,系指不入乐之杂歌谣辞(如《乐府诗集》卷八五所录之《五侯歌》、《上郡歌》、《鲍司隶歌》、《董少平歌》、《张君歌》等皆是)而非相和、杂曲歌辞。若相和、杂曲,在当时为黄门倡乐,被认为徒供娱乐而无裨于政教者。综观全书,是迄今为止乐府诗史专著中论证最深入、影响最大的一种。此书原由1943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王国安)

【乐府诗选】 乐府诗选注本。今人余冠英选注。此书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颇为流行的乐府诗选本。主要选录汉魏南北朝时期入乐的民间作品,而以少数歌谣和受乐府民歌影响较大的文人作品作为附录。全书共分五部分,前三部分分别选汉魏乐府民歌、南朝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第四部分即为附录一,选汉至隋歌谣。第五部分为附录二,为汉晋文人乐府作品。其选录标准主要是歌辞本身的社会内容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从乐府诗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汉魏和北朝乐府民歌选录较宽,对南朝乐府民歌和历代文人作品选录较严。这一时期乐府诗的精华大致都已入选。在注释方面,各篇先释字句,后述诗意,间有关于诗的本事、背景的说明和作者介绍之类,都附在后面。此书虽是较为通俗之读本,由于作者对乐府诗有专门的研究,故其注释简明扼要,能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并益以自己的研究心得,做到深入浅出。立论也比较客观,大都经过审慎的考订。对乐府诗的拼凑割裂处,本书不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仅一一加以指出,态度比较客观。本书前言主要介绍乐府采诗源流、乐府主要类别及乐府民歌的特色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便于初学者了解乐府诗的概貌。此书五十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国安)

【六朝乐府与民歌】 乐府诗研究专著。今人王运熙著。现存六朝时代的民间歌辞,大部分保存在乐府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辞中。本书以吴声、西曲为主要探索对象,故名《六朝乐府与民歌》。全书共六篇,前三篇分别论述吴声、西曲的产生时

代、产生地域及其体制的渊源。作者在对吴声、西曲诸曲调进行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指出吴声、西曲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最初是民谣,其后被上层阶级发展成为乐曲;另一类是上层阶级的创作。吴声歌曲其产生时代自东晋初年到刘宋初年,西曲时代较吴声为晚,产生于宋、齐、梁三代,而以宋、齐二代为多。吴声歌曲产生于以当时京城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地区,西曲产生于长江流域中部和汉水流域,而以江陵为中心地区。对吴声、西曲形式体制的渊源,作者主要从歌词和音乐两方面探讨,指出吴声、西曲以五言四句为主要形式,是由于当时是五言诗最昌盛的时期之故,而它的章法恒为四句,则与汉魏相和歌辞也有部分承递关系。此书的中间两篇,杂考吴声、西曲各曲调之作者、本事等问题,并通过乐曲中和送声作用之阐明,解释现存歌辞内容与原始本事不相符合之疑问。第六篇专论吴声、西曲中之谐音双关语,分析其结构特点,并介绍了六朝社会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末尾附录有《神弦歌考》一篇,专论清商曲中的神弦歌,结合歌辞内容及有关史籍,提出《神弦歌》十一题,是一整套的娱神乐曲。吴声、西曲歌辞,一向为前人目为淫哇之词。治乐府者,往往注意汉魏作品,对此颇为忽略。“五四”以后,虽然开始受到重视,但尚未遑稽考史乘,未能认识到其与上层阶级生活的密切关系。此书依据所搜集到的翔实的材料,论证吴声、西曲,虽多民歌,但制为乐曲,实出贵族文人之手,并由其产生时代和地域,说明歌辞内容之特点。论谐音双关语,亦能联系当时社会风尚加以说明。是一部研究南朝乐府民歌材料最翔实的著作。此书五十年代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重印。

(王国安)

【乐府诗论丛】 乐府诗研究著作。今人王运熙著。此书共收有作者有关乐府机构及乐府歌诗的研究论文九篇。前六篇主要是对乐府官署的起始和沿革,乐府某些曲调、曲辞的演变的考证;后三篇主要是讨论乐府和民歌的关系,以及乐府诗名篇《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的产生时代、思想和艺术。作者对汉代乐府官署同乐歌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其考证东汉黄门鼓吹乐的主要内容实即当时俗乐相和歌和杂舞曲(《说黄门鼓吹乐》),汉代相和歌、杂舞曲和短箫铙歌皆可称作鼓吹(《汉代鼓吹曲考》),皆凿凿不可移,至今常为学者引用。书后附有《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将有关乐府的书籍分为正史及政书乐志类,歌辞之编集、选录、注释,乐府研究专著,及一部分论述乐府之著作四类。共收书四十八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它们在研究乐府诗时的用处,于治乐府者甚有裨益。书末附有《七言诗形式的发展

和完成》一文。此书原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于五十年代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重印。(王国安)

【乐府诗史】乐府诗研究专著。今人杨生枝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以乐府诗为研究对象的诗史,前此已有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罗根泽《乐府文学史》。此书在广泛搜集资料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作者从“一代有一代之乐”的观点出发,全书分六章叙述。首章概述乐府官署与乐府诗之关系。其后即分述汉代、魏晋(西晋)、六朝、北朝及隋唐乐府诗。全书引用材料丰富,条分缕析,颇为明晰。叙述之际,也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不同意郭茂倩之“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的说法,提出“大曲的艳、趋、乱并不像和送声一样是演奏方式,而是不同乐曲的不同作用在歌曲中的不同结构”,颇有见地。书中除乐府民歌外,相当的篇幅论述文人乐府诗,较全面地反映了乐府诗的发展面貌。论述各时代乐府诗特点时,又能注意结合其时的社会状况和音乐变迁,如论《神弦歌》,即述吴地祀神之俗;论吴声西曲,即述其时礼法松弛、寒族执政及上层社会声色之嗜好;论萧梁乐府内容日趋轻艳而形式不断创新,即联系“君王嗜好声乐,文士喜爱艳曲”的风尚等皆是。但书中也有一些求新失实之处。如论蔡琰,谓其“开始了真人真事的描写”、“开创了自传体歌诗形式”。后又言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是否琰作“尚有争论”,前后自相矛盾。且言五言《悲愤诗》是乐府诗,也仅是推测,缺乏证据。又如谓唐代为“乐府完成期”也欠妥。然于研究乐府诗者,此书诚不失为一本材料丰富、论述详核之专著,颇有参考价值。(王国安)

【乐府诗研究论文集】论文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汇集五十年代初、中期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乐府诗研究文章三十一篇。辑录的范围较广,凡当时有过一定影响,或可备一说足资参考者,概行收入。但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的专著或已为其他论文集辑录的文章,则概不收入。本书所收文章,大致可分几个方面。一是总论乐府诗的,二是论述汉乐府《陌上桑》的,三是论述汉乐府《羽林郎》的,四是论述汉乐府《孔雀东南飞》的,五是论述北朝乐府《木兰诗》的,六是对几本乐府诗选本的评价。论文既有对乐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也有对创作年代、背景、地理和词义的考证。重视乐府诗中的民间歌辞、作品分析强调人民性和现实性,是这些论文的共同倾向,反映出五十年代研究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分析古典文学所作的努力。(王国安)

【乐府散论】乐府诗选析本。今人王汝弼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共选录《乐府诗集》所载先秦、汉魏六朝作品一百四十七首,大体按照《乐府诗集》的顺序编排。作者本意不是做选注,而是企图借此探讨乐府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如:乐府诗与乐府的关系、乐府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乐府民歌和文人创作的关系、从乐府民歌看古代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等。基本体例是在篇目之下,提出一些问题,加以阐述。对前人的注释,认为有问题的,也拈出附在后面,并不每篇都有。因此,所论篇目不限于名篇,所持论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全书的体例,没有严格的条理性、系统性,故取名为“散论”。此书有别于一般的选注本,实际上是作者研究乐府诗的一些心得体会,作者力求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有些看法,颇具新意,但也有一些穿凿之论。书前有前言,总结乐府诗的一些问题,颇有参考价值。(王国安)

【李善注文选】《文选》注本。李善,唐初扬州江都人,显庆(656—660)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善随同郡曹宪学《文选》,并为之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文选》旧本三十卷,……李善为之注,始每卷各分为二。”因此今传《文选》李注是六十卷。据《旧唐书·儒学传》,曹宪以《文选》授学于江淮之间,学生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等,公孙罗亦撰有《文选注》六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公孙罗与李善同时,又是同学,则三十卷析分为二,并不一定就是从李善开始。唐李济翁《资暇录》云:“《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由此可见李善注《文选》的严肃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在唐时,《文选》李注已有好几种本子传世。据李善《上〈文选〉表》,结尾署:“显庆三年(658)九月日上表。”其后显庆六年(661),李善所注《文选》被诏令藏于秘府。此两本即为不同时期之注本。李善注是一部集大成著作,它的特点在详于释事,对典故、史事大都能注明出处。如沈约《别范安成诗》:“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李注:“《韩非子》曰:‘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这是事典,至于解释语典的始来所从,尤为不易。如潘岳《寡妇赋》:“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李善注:“《楚辞》曰:‘日月忽其不淹,春与秋兮代序。’《毛诗》曰:‘岁聿其暮。’《古诗》曰:‘凛凛岁云暮。’”这就使读者对词语的来历和含义有了清楚的了解。释典以外,李善亦重于解释音义。如鲍照《芜城赋》:

“廛闹扑地,歌吹沸天。”李善注:“郑玄《周礼注》曰:‘民居区域之称。’《说文》曰:‘闹,闹也。’《方言》曰:‘扑,尽也。’郭璞曰:‘今种物皆生,云扑地出也。’”又如嵇康《琴赋》:“或怨嬾而踌躇。”李善注:“嬾,娇也,子庶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在注释体例上,李注特为严明,他在注文中反复交待,如《两都赋序》注称:“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甘泉赋》注称:“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他皆类此。”如此者甚多。在注释态度上,李善也极严肃而慎重,不明之处,宁阙疑而不臆测。由于五臣注《文选》的兴起,李善注在唐代受到冷遇,但自南宋以后,五臣注几无刻本,而李善注却盛传不衰,说明了李善注的价值。今存李善注版本当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天圣七年(1029)国子监本残卷为最早,完整的当数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清胡克家对尤本细加校勘,八易其稿,著《考异》十卷,于嘉庆十四年(1809)完成。中华书局1977年将其影印出版。(傅刚)

【六臣注文选】《文选》注本。六臣指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六人。自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文选》以后,至开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吕延祚对善注不满,遂发起组织衢州常山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刘良以及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重新作注。自称是:“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世称五臣注,而吕延祚不与焉。五臣注本为三十卷,不失萧统原貌。五臣注出,立刻受到唐玄宗赞赏,称“此书甚好”。自唐以迄南宋初年,“五臣注”颇受世俗青睐。直至南宋初年尤袤刻李善注《文选》还说:“今是书流传于世者,皆是五臣注本。”五臣注以通俗浅近为特色,与李善注比较,五臣注不重征引,而详于解释。如《西都赋》:“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太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李善征引了《史记》司马相如《封禅书》、《礼记》、《毛诗序》等有关材料,而五臣注为:“(吕延)济曰,言其娱乐以壮观望也。囿,育兽处,言讲武于此,以威戎狄。”由此可见五臣注的通俗、浅显。此外,对一些易懂字词,李善不出注,而五臣则加以串释。从校注态度看,五臣注不如李善注严谨,因此唐宋以来,五臣注一直受到学者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观其进表所言,颇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然唐李匡又作《资暇录》,备摘其窃据善注,巧为颠倒,条分缕析,言之甚详。”大概因为学习的需要,后人以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而为六十卷,这便是六臣注本。最早的六臣本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开始刻版,政和元年(1111)

刻成,即所谓广都斐氏刻本(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首次著录《六臣文选》之目。《六臣注文选》又分六家本和六臣本。所谓六家本,即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其特点是五臣注详而李善注略。这一系统中最早的是南宋明州本,刊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其次是称为袁本的明袁褊仿宋刊本。最近所见韩国奎章阁本,亦是六家本。六臣本即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当以南宋赣州本为祖本,亦刊于绍兴年间。这一版本系统中有四部丛刊本(涵芬楼藏宋刊本)、明茶陵本等。自宋以后,五臣本几无刻本,大陆学者多以为失传。幸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套足本,即陈八郎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刊刻。(傅刚)

【古钞无注本文选】《文选》抄本。此书藏于日本,最早著录于1856年日本学者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是温故堂藏本,但仅著录一卷。1897年中国学者杨守敬赴日又获得同样残帙二十卷,著录于其《日本访书志》中。这样,加上森立之的一卷,共二十一卷,所缺九卷应为:二、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杨氏将此二十一卷影写带回,归于故宫博物院,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影写卷子本有一部为武昌徐恕(行可)所得,黄侃曾借得以校《文选》。后向承周(宗鲁)又从徐氏借得校录。1938年向氏学生屈守元又从向氏处借得其详校本,临写一过。今向本已不知下落,而屈本犹存,弥足珍贵。此无注本经杨、屈考证,定为李注之前的三十卷本,极具校勘价值。比如《海赋》于“朱熿绿烟,腰眇蝉娟”下多出“珊瑚琥珀,群产相连。砗渠马瑙,渊积如山”十六字,尤刻本原有,却被胡克家翻刻时漏去,今据古抄本可补胡刻之失。又如《神女赋》,其《序》尤刻本将“王”与“玉”颠错,即应为宋玉梦神女,而非襄王,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已指其讹误,今据古抄本可证姚说之确。古钞无注本《文选》今存四川师大屈守元处,未付刻梓。屈氏《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对此本情况有介绍。(傅刚)

【义门读书记·文选】《文选》评本。清何焯著。何焯(1661—1722),初字润千,更字岢瞻,号茶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时召直南书房,赐翰林。焯长于校勘、考订,后人编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其中五卷论《文选》,悉评文之言,而校注之语缺焉不录,幸余萧客、孙志祖、胡克家、梁章钜诸家称引而得保存。何焯博采《文选》众本,以为汲古阁刻本为善,故以之为底本。何氏所评,学者服其精核。如曹子建《洛神赋》,尤刻《文选》有李善注引《记》称曹植感甄妃而作,何焯经考订,斥其无稽。黄侃云:“清代为选学者,简要精核,未有超于何

氏者。”(骆鸿凯《文选学》引)何氏评《文选》虽不脱“起承转合,照应点伏”(黄侃《文选平点》)之法,亦时有精见。如评阮籍《咏怀》云:“《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而其词旨亦复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也。”此书虽不录校语,但评语中往往带出。如评陆机《吴趋行》“泠泠祥风过”,何云:“祥,当作鲜。江淹《杂拟》、许征君《自序》诗注中引此句作‘鲜风’。乐府及《吴郡志》皆作‘鲜’。如《诗》:‘度其鲜原’之鲜。诂为善风,亦与泠泠相贯,庆云恰对。”此说不误,故为梁章钜、胡克家、胡绍瑛等所引用。按,梁章钜《文选旁证》说五臣本作“鲜”,而六臣本李周翰注即作“鲜风”,可证何说之确。何焯评语的缺点据黄侃《文选平点》说有三端:“一曰时代高下之见,二曰俗文门法之见,三曰体裁朦溷之见。”此书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傅刚)

【文选音义】《文选》笺校本。清余萧客著。萧客(1710—1759),字仲林,一字古农,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朴学大师惠栋弟子。著述除《文选音义》外,还有《古经解诂》、《文选纪闻》、《尔雅释》、《注雅别钞》等。江藩《汉学师承记》称:“余氏以汉学名,自幼受《文选》于其母颜氏。年甫三十,即于《尔雅释》、《注雅别钞》之外,成《文选音义》八卷。”余氏自序称:“前辈何义门先生,当士大夫尚韩愈文章,不尚《文选》学,而独加赏好,博考众本,以汲古为善。晚年评定,多所折衷,士论服其该洽。然诸书散见于《文选》出入者,尚多可采。辄不自料,据何为本,益以所闻,摘字为音,作《音义》八卷。先尽善注本音,次及六臣旧刻所补,二书未备,乃复旁及。其字一从汲古,诸本异同,参注其下。叶韵则从沈重改音,古音则从入韵偶见,音叶无考,则从阙疑,五臣注可备一说及可补善注阙者,百无一二。今每卷择稍可数条,列于音后,并注昭明李善序表。别旧训之朱紫,备一家之瞽说,未敢谓李善功臣,然校正数十处,补遗数百事,未尝稍乱李氏旧章。知其说者或不致以吕向、张铣同类见讥,则五臣馀波不能来及,实所望于将来君子。”可见余氏此书以何校汲古阁为本,而于李注、五臣注分析颇精。《四库全书》列此书于存目,《提要》批评其罅漏丛生,与其《古经解诂》,如出二手。并举其八大失误。钱泰吉《曝书杂记》说:“吴县余仲林集《古经解诂》,极精博,所为《文选音义》则体殊不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详言之。……然《音义》多用直音,便于省览。载义门校语颇详,亦初学所不废也。”钱说较平稳。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静胜堂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鸿宝斋石印小字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亦影印收入。(傅刚)

【文选理学权舆】《文选》研究著作。八卷。清汪师韩著。师韩字抒怀,号韩门,又称上湖先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事迹详《清史列传》卷七一。所谓“文选理学”,取杜诗“熟精《文选》理”之义。汪氏自序称该书别为八门:一曰撰人,胪列《文选》作者百三十家,于各家之分隶所撰篇目,有补唐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之意;二曰书目,集录选注所引书目,分类编次;三曰旧注,叙述旧注二十三家及不知名之所注者;四曰订误,著明李善订误四十七类;五曰补阙,著李善所补《选》内脱略、删节等五处;六曰辩论,著李善以注辨《选》内用事不当处四十三条;七曰未详,著李善所标“未详”者一百一十四事;八曰评论,录后儒之论《选》及注者。孙志祖序云:“顾《自序》云:分《评论》为三,《质疑》为二,共十卷。今《评论》止二卷,《质疑》一卷,盖先生未卒业之书也。”可知汪氏此书没有最后完成。所以孙志祖又作《文选理学权舆补》,旨在补《评论》一目。汪、孙二书均收入《丛书集成》。(傅刚)

【文选考异】《文选》研究著作。四卷。清孙志祖著。志祖字诒谷,或作颐谷,号约斋,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分刑部,补山东司主事,由员外郎升云南司郎中,擢江南道监察御史,乞养归,以著作为事。嘉庆六年(1801)掌教紫阳书院,同年以疾卒。事迹见《清史稿·儒林传》。据其《文选理学权舆·叙》称,因汪师韩未见潘耒、何焯、钱陆灿三家《文选》勘本,故仿朱熹《韩文考异》之例,作《文选考异》四卷,以补汪氏《文选理学权舆·质疑》。此书多引潘、何、钱三家校本,对三家之说,或补充,或改正,并不尽从。如《考异》卷一《昭明序》“集其清英”句,孙曰:“何氏焯校‘清’改‘菁’。志祖案,‘清’字似不必改,《西都赋》‘鲜颢气之清英’,二字固有本也。”又卷一《西都赋》“仿太紫之圜方”,孙云:“何云,‘圜’,宋本作‘圆’。《后汉书》注:‘太微方而紫宫圆。’志祖案,《西京赋》‘圜阙竦以造天’,善引《字书》曰:‘圜’亦‘圆’字也,则二字固不分矣。”孙氏又作《文选李注补正》四卷,亦为补汪师韩书之《质疑》,然较《考异》逊色。《文选考异》收入《丛书集成》。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印本。(傅刚)

【文选笔记】《文选》考订著作。八卷。清许巽行著。巽行号密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此书前有巽行玄孙嘉德识语,称:“高祖密斋公校讎《文选》凡十三次,痛削五臣沿习之旧,悉还李氏原有之文,或本六臣,或依史集,随文辨正,历数十年而始得定本。然所校各本,逐篇逐段,皆有更正之文,而多未载入笔记,此所记者乃校本所未及详焉者耳。”由此知许

氏意在复李注之旧。书成于乾隆年间,至光绪间始以铅板。此书校订异文,申说字义,极郑重周详。于《文选》注,尊李善,鄙五臣。其以朴学治《文选》,在汪师韩、孙志祖之先。该书有光绪五年(1879)杭州任有容斋刻本,1928年被影印入《文渊楼丛书》。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亦收入。

(傅刚)

【选学胶言】《文选》考订著作。二十卷。清张云璈著。云璈(1746—1829)字仲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选湖南安福县知县,调湘潭,治县五年,人称“张佛子”、“张青天”。罢官归,以著述自娱。著有《简松草堂诗集》二十卷,《文集》十二卷。《清史稿》有传。张氏《胶言跋》称:“云璈读《文选》久矣。凡诗赋之源流,文章之体格,得其解,心领而神会之;不得其解,则有诸家之说在,一展卷可以了然,诚无所置喙。顾文义无不舛误,注家尚多异同,与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释,间出于诸说所备之外者,不能无疑。随疑随检,随检随记,眉间牍尾,久而渐满。繙之如黑蚁相杂于白蟬趲趲之中,几不复辨,乃取而件系条录,凡诸说未及者补之,诸说已有者删之,诸说未尽者详之,诸说未安者辨之。且因此以见彼,有不必要为《文选》设者,触类而引伸。最后得鄱阳胡中丞克家据尤延之贵池铅本,及袁本、茶陵本,详加雠校,更为《考异》十卷,刻之吴中,尤称周密。书中多采取之,而间纠其失。共存二十卷。”据此可见张氏治《选》的严肃认真,其书前后历三十年而后成。所谓“胶言”,据《跋》说:“《魏都赋》曰:‘牵胶言而逾侈。’注引《李克书》云:‘言语辨聪之说,而不度于义者,谓之胶言。取以颜书,盖志愧也。’张氏尊李注,故此书多据李善,于五臣偶及之。该书自经说史评、山图水注,以及名物象数、声音训诂,无不旁征博引,又颇采胡克家《考异》之说,间加驳正,其考核精细,在清代文选学著作中,亦为佳作。此书有道光十一年(1831)张氏简松草堂刊本,后收入《文渊楼丛书》。

(傅刚)

【文选考异】《文选》校本。十卷。清胡克家(1757—1817)著。克家字占蒙,号果泉,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以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升郎中,积仕至安徽、江苏巡抚。事迹见《清史稿列传》卷三三。此书与孙志祖名同而实异,乃嘉庆中胡氏据所得南宋淳熙尤袤刻本,并与明袁褰六臣本(袁本)、明茶陵陈仁子增补六臣本(茶陵本)互校异同而成,附刊于尤刻本之后。《文选考异序》云:“《文选》之异起于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与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经合并者具在,即任其异而不考,当无不可也。今世间所存仅有袁本,有茶陵

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何以言之?观其正文,则善与五臣已相属杂,或沿前而有讹,或改旧而成误。悉心推究,莫不显然也。观其注则题下篇中,名尝阑入吕向、刘良,颇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误取也。观其音则当句每未刻五臣,注内间两存善读,割裂既时有之,删削殊复不少。崇贤旧观,失之弥远也。……余夙昔钻研,近始有悟,参而会之,征验不爽。又访于知交之通此学者,元和顾君广圻、镇洋彭君兆荪,深相剖析,金谓无疑。乃条举件系,编撰十卷。”据此则《考异》实为胡氏并顾广圻、彭兆荪同撰。本书于袁本、茶陵本之外,又录入何焯、陈景云诸家校语并有所辨正,可谓集当时校勘之精华。与尤刻本相较,胡刻改正其明显的错误达七百餘处。然胡氏仍有许多不足。首先他所据尤本并非尤本中最优者,其本既缺尤刻《李善与五臣同异》,又失袁说友之跋。其次,胡氏称世间所存仅有袁本、茶陵本,也不正确。袁本所祖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所刻明州本,茶陵本所祖南宋绍兴间赣州本并存于世。此外,李善单注本最早当推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刻本,胡氏既未能据以校勘,故称李善注本悉从六臣合并注本中摘出,显见是错误的结论。胡刻《文选》并《考异》,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影印出版。

(傅刚)

【文选集释】《文选》集释本。二十四卷。清朱珔著。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坡,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修《明鉴》。告归,历主钟山、正谊、紫阳书院。《清史稿》有传。朱氏《自序》称:“《文选》一书,惟李注号称精赡,而骚类只用旧文,不复加证。经序数首,更绝无诂语,未免于略。且传刻转写,动成舛误。凡名物犹须补正,并可引申推阐,畅宣其旨。前代诸家率湮没罕行者,近人如汪韩门侍读、孙颐谷侍御,虽弥罅塞漏,经属寥寥。暇时流览,偶寻绎,辄私札记,久之积累盈帙,屡有增改,厘分二十四卷。”此书每卷各列若干条,全书凡数百条,于地理、名物,考订甚详,意在补李善注之不足。有道光十六年(1836)刊本。

(傅刚)

【文选旁证】《文选》考订本。四十六卷。清梁章钜著。梁氏此书《自序》称:“伏念束发受书,即为《萧选》,仰承庭训,长更名师,南往北来,钻研不废,岁月迄兹,遂有所积。最后得鄱阳师新翻晋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异同,均属较是。合观诸刻,窃谓李氏斯注引用繁富,为人考订校雠者,亦宜博综详裁言之。爰聚群籍相涉之处,悉加荟萃,上罗前古,下搜当今,期于疑惑,得此发明,未敢托为抱残守缺自限。

至于五臣之注,亦必反复推究,虽似与李注无关,然可以观之以见李注精核,正一助也。归田后,重加校勘,厘为四十六卷,名之曰《文选旁证》,愿用区区就正有道。”此书以博采见长,其引用典籍达一千三百余种,清人何焯、陈景云、余萧客、段玉裁之说多所征引。特别是段氏校《文选》,书无刻本,而此书征引特详。此外本书根据胡克家《考异》者尤多。朱珔称此书为集大成者,信不虚也。有光绪八年(1882)吴下重刻本。(傅刚)

【昭明文选笺证】《文选》考订著作。清胡绍瑛著。绍瑛(1791—1860)字药汀,一字枕泉,安徽绩溪人。先后掌教于婺源聊城书院和徽州紫阳书院。绍瑛精段玉裁、王念孙声音训诂之学,故遵“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必先审音”之说,以王、段之法治《文选》,由音求义,旁搜互考,正讹纠谬,多发前人所未见。胡绍瑛《自序》称:“国学名儒辈出,前有余氏之《文选音义》,何氏、陈氏之评《文选》、汪氏之《文选理学权舆》、孙氏之《李注补正》、林氏之《文选补注》、胡氏之《考异》、近梁氏又有《旁证》,皆足以羽翼江都。惟王氏、段氏独辟畦径,由音求义,即义准音,能发前人所未发,虽仅数十条,而考核精详,直驾千古《文选》之学,醇乎备矣。绍瑛涉猎《文选》,即窥此秘,以之校读李注,触类引伸,为王、段二君所未及订者尚夥。”由此可见胡氏治《文选》的学术方法。《文选》多古文奇字,自李善以来,虽多有注,却无专著以疏证。清人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并《拾遗》始以《说文》释《文选》,不为凿空之谈,洵为实事求是之作。胡绍瑛《笺证》后出,而精核过之。该书屡易其稿,最后删定,厘为三十二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3月影印出版。(傅刚)

【选学拾沉】《文选》考订本。二卷。清末李详著。详(1859—1931)字审言,江苏兴化人。李氏以骈文知名当世,为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曾为东南大学教授。李氏精于《文选》,《选》学著作除此书之外,还有《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文选萃精说义》、《李善文选注例》。《选学拾沉》以李善注为底本,征典考订,搜讨文字源由,引据精核,颇为精确。王先谦评此书说:“阅生所撰各条,并皆佳妙,无可訾议,只恨少耳。汉魏六朝为文,皆递相祖述,余《瑱言》中所称举数事是也。唐人犹有之,宋以后竟出新意,此义荡焉无存,亦文场一大变局也。生所注兼能搜讨古人文字从出之原,与鄙意符合,不专从征典用意,目光犹为远大。如能一意探求,俾成巨帙,允为不朽盛业。”(据李氏《自序》)有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李审言文集》本。(傅刚)

【文选李注义疏】《文选》校勘、笺疏本。近人高

步瀛著。步瀛(1873—1940)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学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平生著述除《文选李注义疏》外,还有《古文辞类纂笺证》、《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及《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等。此书高氏1929年开始编著,惜因病逝,未竟全功,六十卷中仅完成八卷。1929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印行,1934年重印。高氏精于经学、文字学和史学,其所疏证,往往旁征博引,详考本末,论定是非,或并列诸说,以便读者思考。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的问题,高氏并举诸家之说,然后详加辨明,其说较今人一些文章,更为丰富。体例上,此书前列原文,次列李注,再次以己“疏”。“疏”或列校文,或引典籍及诸家之说。抒发己见则以“步瀛案”以区分。在校勘上,高氏不仅对现存各种李注版本以及五臣本、六臣本等异同,一一校明,而且还使用了故宫博物院所藏日本古抄本及敦煌唐写本残卷,因此自能超越前人。据高氏本书《叙》称,《文选》李注遭遇四厄,而尤以六臣本之臆乱及尤袤诸本之改窜为极,这使李注的精神面目皆失其真。因此,高氏此书自致力于恢复李注原貌。如《魏都赋》疏中考出“亭亭峻趾”句的“趾”字,李注本原作“趾”,五臣本作“跂”。汲古阁本作“跂”,乃误从五臣注本。如此者多是。本书由曹道衡、沈玉成据1934年北平文化学社本校点,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傅刚)

【文选平点】《文选》评笺、考订本。六卷。近人黄侃著。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近代著名学者。黄氏精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经学、文学上也有极高造诣。他的《文选》研究,被章太炎称为近代“知选学者”。此书原来由黄氏1922年寓居武昌时,手批并圈点在湖北崇文书局翻刻胡克家刻本《文选》上,一直在其学生中间传抄,后由其侄及弟子黄焯依方苞、姚鼐《史记》、《汉书》平点之例编辑成书。所谓“平点”,“平”即“平定”之意,“评”为后出字而意义相同。《文选平点》卷首列选目,于篇目下标明此篇又见何书、何卷。文目下所注者系据蒋骥校写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目,其注诗目下者,系依徐行可移录杨守敬《古诗存》目录未定稿。黄氏所写严、杨二目别见四明林氏翻刻胡刻本《文选》目录中,辑者将其增入此书内。黄氏平点《文选》以胡刻为底本,又参校五臣、六臣诸本以及清儒如何焯、汪师韩、余萧客、孙志祖、朱珔、梁章钜、张云璈、薛传均、胡绍瑛诸家,此外,杨守敬所抄日本古抄无注本、罗振玉影印日本敦煌残卷子本,亦得与参校,这是当时《文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很值得重视。黄氏对旧音极加珍视,所谓旧音,据黄氏所说乃

六臣本音及汲古阁本音不在李善注中者,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其次,本书仍旧式评点之法,有圈有点。圈有连圈、重圈、尖圈等,黄焯《平点例言》说:“凡诗文句之特佳者,于其旁加连圈,如班孟坚《西都赋》‘是故横被六合’四句,俱于句旁施连圈。”黄氏一生精研《文选》,尤重视选文的朗诵,其抑扬顿挫的妙处虽不得传,但著者独到的“得古人文之用心处”,仍能赖此书的圈点部分保留下来。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傅刚)

【文选学】《文选》研究著作。近人骆鸿凯著。鸿凯(1892—1955)一名苍霖,字绍宾,号彦均,湖南长沙沅市(今属长沙望城)人。骆氏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学门,为黄侃高足之一,历任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骆氏治学本于黄侃,博研经、子、文、史,尤精于古文字、声韵、训诂及《楚辞》、《文选》之学。著述除《文选学》以外,尚有《尔雅论略》、《楚辞通论》、《楚辞文句集释》、《楚辞连语叠字谱》等。其治学特重家法,于文字宗许慎《说文解字》,声韵宗本师黄侃,训诂宗《尔雅》及汉人经注,楚辞宗王逸,《文选》则崇昭明之旨趣而尊李善注。《文选学》共分十篇,又附编二,附编补一。纂集第一,著述自晋杜预《善文》以来迄于梁总集若干,以明萧统编辑《文选》的环境,末引《梁书》昭明本传,叙述其事迹。义例第二,叙述《文选》体例,哀列前人批评,加以分析辨正。源流第三,论述隋唐、宋元明及清代《文选》学家和著作,以明“文选学”源流。体式第四,汇录《文心雕龙》论文体之语及后之可参考者,论述《文选》中诸文体的体制、源流。撰人第五,对汪师韩《文选理权舆》所列《文选》作者百三十家加以订正。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第六,撰录《文选》作者事迹、生卒年及著述。征故第七,列赋、诗、杂文(附骚)三篇,搜集唐以前人有关评论,以见《文选》作者撰录之意及昭明去取之旨。评鹭第八,采录张惠言所评赋,王闿运所评诗,李兆洛、谭献所评文,有若《文选》集评。读《选》导言第九,导言共分十六,从文字训诂、文学源流、文体风格等方面论述,以为学习《文选》的津梁。馀论第十,包括征史、指瑕、广选三部分。附编一,《文选》分体研究(论);附编二,《文选》专家研究(陆机);附编补,分体研究(书笺、史论、对问、设论)、专家研究(颜延之、任昉、贾谊)。《文选学》完成于三十年代(中华书局1936年版),首次从整体上对《文选》进行系统研究,与传统评点、训诂、校注之学有明显区别,为后世“新选学”发展开辟了道路。此书不足之处在尚未能严格区分“选学”与文学史研究界限,所以不能算作纯“选学”。此外,体例

上亦有不严格之处。此书中华书局1989年再版。

(傅刚)

【文选导读】《文选》导读及选注本。今人屈守元著。守元,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著述除此书外,还有《中国文学简史》、《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等。此书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包括《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文选》的编辑、《文选》学史略述、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文选》流传诸本述略、怎样阅读《文选》等专题。第二部分是选读。选《文选》赋、诗、文十六题三十九首,细加注释。屈氏少研《文选》,尤其据有国内目前尚未面世的日本古抄无注本,所以此书也是学术界了解无注本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文选》的编辑”一章中,屈氏根据《古逸丛书》中邵思的《姓解》,考订出“昭明太子十学士”为张纘、张率、张缅、刘孝绰、到洽、陆倕、王筠、王锡、谢举、王规。这对于研究《文选》的编纂,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屈氏于《选》注尊李善,而黜五臣,故其注《选》文,只用李注及后人的考订,五臣及明清人的庸俗注释,概从屏弃。选注底本用胡刻,以尤刻原本及古抄诸本参订。六臣注本只用明州(以日本汲古书院影足利学本为据)、赣州(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据)两本参校。可见虽为普及之书,屈氏仍严其注例。此书为巴蜀书社《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之一种,1993年出版。(傅刚)

【陶靖节诗注】陶诗注本。四卷。宋汤汉撰。汉字伯纪,号东涧,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理宗淳祐中,充国史实录院检勘。度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谥文清。此编卷一为四言诗,后三卷五言诗。又以《桃花源记》有诗,《归去来兮辞》类诗,并附于卷四之末。《归园田居》第六首“种苗在东皋”、“问来使”,皆指为伪作。《杂诗十二首》“袅袅松标崖”一首,云东坡和陶无此篇,剔出附于集末。诸家笺注多注重用事出处,罕能阐发精义。汤汉受韩子苍启示,窥见渊明忠义之节,凡所笺释,虽间及出处之例,总以表暴心事为主,颇能得陶诗意旨所在。如谓《述酒》为零陵王哀诗,又谓“二疏取其归隐,三良与主同仇,荆轲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马端临《文献通考》称之为渊明异代知己。但既专以“忠愤”论陶,亦不免穿凿之病。如《九日闲居》诗“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本写四时运行,慨叹重阳无酒可饮,注乃谓“指易代之事”,羌无故实。其后元人刘履《选诗补注》、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何孟春《陶靖节集》皆推衍汤汉之说,处处比附,愈演愈烈,虽各有因,而汤注亦不能辞其咎。得失相较,汤注发明之功为大。又此本为今所知最早陶诗注本,文字颇与后世传本不同,自具校勘价值,故甚为后人所重。此书原本在

元、明两代已失传,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复出,初为鲍以文所得,又为周春夺去,最后归海源阁杨以增。吴騫据抄本重雕,遂大行于世,为陶集版本史一大事。今存宋淳祐刊本(藏北京图书馆),疑即海源阁所藏。又有鲍氏重刻本、吴騫《拜经楼丛书》本、光绪十一年(1885)仿刻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正文书局影印本等。(邓安生)

【笺注陶渊明集】 陶诗文注本。十卷。李公焕撰。公焕,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平事迹不详。吴焯跋称:“此编汇集宋朝群公评注,淳祐中又刻于省署,当时所称玉堂本者。”据此则公焕为宋人,而何孟春跋以为元人。二说皆未言所据,不知孰是。此本前四卷诗,次第与汤注本略同。卷五记、辞、传,卷六赋,卷七《五孝传》、《画赞》,卷八疏、祭文,卷九《集圣贤群辅录》上,卷一〇《集圣贤群辅录》下。卷首辑录宋代诸家评陶,为“总论”,次以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卷末附颜延之《陶徵士诔》、昭明太子《陶渊明传》。汇编旧注作双行小字,随文出注,所辑评语则附各篇之后,开后世集注、集评之风。卷首“总论”又开后世辑录陶渊明诗话之风。由于此本保存了大量旧注旧评,故自汤注本失传后,历来颇受重视,流传最广,影响极大。但李氏对陶渊明实未深研,又颇好杂引宋人地志、杂说,故其谬误颇多。伪作《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四时》、《归园田居》之六、《问来使》等悉予保留,后二首诗后尚附录韩子苍、汤汉、《西清诗话》辨伪之语,其余则全无甄别之言。《停云》诗“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下注云:“谓相招以事新朝也”,此实汤注穿凿之语;《与殷晋安别》注谓殷晋安即殷景仁,乃承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之误;《赠长沙公》诗注谓大司马指汉高帝时陶舍,殊乖史实;《酬丁柴桑》诗题下不注丁柴桑其人,乃云“柴桑,傅(浚)阳故里”,实属无谓。《移居》诗注“南里”即栗里,《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注又将南里、南村离为二事,又谓移居在遇火后二年,羌无故实。《还旧居》诗注引《南康志》,谓南康近城五里之上京有渊明故居;《游斜川》诗注引骆庭芝说,谓曾城即落星寺,穿凿比附,如此者甚多。何孟春《陶靖节集·后记》讥评李公焕此本“不见其能为述作家”,不为无因。郭绍虞《陶集考辨》称此书有数本,其所经见者有吴焯绣谷亭旧藏本、吴县潘景郑所藏《天禄琳琅书目》所载本、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印本、《四部丛刊》本(与潘氏所藏同出一本)。按今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二种。又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称据藏元翻宋本翻刻,卷首与附录又颇与陶澍所见本不同。(邓安生)

【陶靖节集】 陶集评注本。十卷。明何孟春撰。孟春字子元,一字燕泉,郴州(今属湖南)人。弘治癸

丑(1493)进士,授兵部主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人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崇祀其父为兴献皇之议初起,上疏力争,又同百官伏阙号泣,获罪贬官南京工部左侍郎,不久削职。卒谥文简。《明史》有传。著有《何燕泉诗》四卷、《徐冬序录》、《徐冬诗话》、《何文简疏议》等。此书卷一诗四言,卷二、卷三、卷四诗五言,卷五赋辞,卷六传赞,卷七述、记、疏、祭文,卷八、卷九《四八目》(即《集圣贤群辅录》),卷一〇附录颜《诔》、萧《传》、陶集序录,总论等。此本出李公焕笺注本,而稍异其编次,李笺本卷六赋二篇并入卷五,而移卷五《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与卷七传赞合为卷六;又以李本卷五《读史述九章》移置《桃花源记》之前,加卷八《与子俨等疏》,合为卷七;原本卷九、卷一〇《集圣贤群辅录》改为卷八、卷九。为足成十卷之数,将诔、传、序录、记、疏及诸家论陶言论,汇为一卷,自称“虽少更置,而伦贯依类,尤觉得宜”。何氏主以“忠愤”论陶,其注着重于抉发陶诗的微旨寓意。何氏未见汤注本,其于李公焕本所引汤汉旧注悉加采录。李本旧注而外,又多采元刘履《选诗补注》。汤、刘二家本多穿凿附会,何氏更加推衍,其失益多。如卷一《停云》诗,于“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下引汤汉注云“谓其又相招以事新朝也”,又于“良朋悠邈,搔首延伫”下引刘履云“此盖元熙禅革之后,而靖节之亲友或有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之,以寓规讽之意”,复于“东园之树,枝条再荣”下自注云:“东园再荣之树,指历事新朝之人也。”又如《岁暮和张常侍》诗,于题下注云:“时义熙十四年冬”,又于篇末注云:“刘履曰:据《晋史》,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刘裕幽安帝于东堂,而立恭帝,靖节《和岁暮》诗盖亦适当其时而寄此焉……汤东涧曰:陶公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既不为狙击震动之举,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谓‘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读之亦可以深悲其志矣。”如此之类甚多。吴瞻泰《陶诗汇注》多采何注,序称何注较李注为强,而“讹缺亦不少”,持论较公允。此本校勘间有创获,如《赠长沙公族祖》诗,题下注云:“族祖二字疑衍。”可谓有见。然失校之处亦多。《述酒》诗“羊胜丧其身”,《拟古》之二“闻有田子春”,一仍李本之旧,未予改正。《读山海经》之十一,首句仍作“巨猾肆威暴”,注云:“猾,一作危,非。”实则《山海经·海内西经》正作“臣危”,作“巨猾”者非。此本首刊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莫友芝《邵亭知传本书目》又载有嘉靖癸未(1523)刻本,郭绍虞以为嘉靖本为范永奎重刊本。但传世极少,至清代即已罕见,时有“异本”之称。今可考知者,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正德刊本。(邓安生)

【陶诗析义】 陶诗笺注本。四卷。明黄文焕撰。文焕字维章,福建永福人。天启进士,崇祯中由山阳知县擢翰林院编修,及同乡黄道周以论杨嗣昌、陈新甲被逮问,受牵连同下诏狱。后获释,流寓南京而终。著有《诗经考》、《楚辞听直》、《赭留集》等。此本是黄氏被系狱中所撰,有借评析陶诗以寄托忧时念乱、抒发忠愤之意。各卷编次与前此诸本略同,唯删去《归园田居》之六及《四时》诗,而以《桃花源诗》列于卷四《联句》之前。其析义之例有三:一为炼句炼章,不专主平淡;二为忧时念乱,不只隐逸;三为理学标宗,圣贤自任。宋元以来尊陶,或以平淡概陶,或以隐逸蔽陶,各得一端,互有偏胜,而罕有能举其全者。至黄氏此本立例,始注意从多方面予以评论。独抒己见,故发明独多。《述酒》、《拟古》等诗,剖析渊明心胆,尤多胜义,颇为吴瞻泰所重,吴氏《陶诗汇注》取其说者多至十分之三四。郭绍虞《陶集考辨》亦称“自来评陶之作,要不得不推此本为首创”。然此本之所长,亦即其所短。由于其未脱明人评点习气,故难以揭出渊明学术思想。由于其专以“忠愤”论陶,故不免穿凿之病。吴琬《抑抑堂集》卷一四载清人段朝端语云:“此书自谓主于作忠,实则艰僻晦塞,舍正轨而骛旁蹊,人虽可取,于论诗无当也。”诋毁亦太过。本书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光绪二年(1876)黄倬昭重刻本。(邓安生)

【笺注陶渊明集】 陶集注本。六卷。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号芭山,江西宜春人。崇祯末为南京国子监生,后卜居庐山,累征不就,以学问博洽闻。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倾轧,诟骂不休。著有《四书大全辨》、《诸家辨》、《字通》等十余种。此本崇祯十七年(1644)撰刻。前四卷诗,卷五记、辞、传、《读史述九章》、赋,卷六疏、祭文。以为《问来使》非渊明不能道,不同意为晚唐人伪作,存而不删,而删去《四时》、《联句》、《圣贤群辅录》上下、《五孝传》,识鉴未免不精。注释、评析极简略,且多不足取。卷首有沈澳、夏允彝、沈寿民等人序及昭明太子所作《序》、《传》与《陶集总论》,卷末附东坡《和陶》诗、明谿庵居士《律陶》、《敦好斋律陶纂》。有敦化堂刻本、乐愚堂刻本。(邓安生)

【陶渊明诗集】 陶诗注本。四卷。清蒋薰撰。薰字闻天,号丹崖,海宁(今属浙江)人。明崇祯间举人,入清为伏羌知县。著有《留素堂集》。此本诗后附《归去来辞》、《读史述九章》。又附其婿周文焄所辑《东坡和陶诗》一卷、《谿庵律陶诗》一卷、《敦好斋律陶纂》一卷。同文山房刻本又有胡月樵《考异》、《陶靖节诗话》二种。各诗注释主要采自李公焕本旧注。卷首“总论”及各诗之后辑录诸家评语,明人钟

敬伯、谭元春、张自烈诸人之说亦并涉及,采集之广,至有陶澍集注本所无者。天头评点之语,扼要点出诗中警句要妙所在,可以明显看出受钟、谭《诗归》影响。此书缺点,一是取舍失当。卷一附《读史述九章》,卷四附《归去来辞》,因袭前人,不必苛责;但卷二保留伪作《归园田居》之六及《问来使》,则识鉴不高。二是疏于校勘,采用旧注亦不加辨别,全书当校未校与旧注不当采而滥采者甚多。三是辑评编次零乱,引据或仅具书名,或只引人名;诸家评语后所附已见,亦多不足取。据其卷四后《自序》,此书系康熙十一年(1672)蒋氏见温群小,蒙垢陇外,自请解伏羌知县,南归途中,寓居汾州郡舍,因读渊明诗,有所感慨而编,是则非积力之作,成于仓促,多有借评注陶诗以抒胸中郁忿之意,故不免诸累。本书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刊本、乾隆最乐堂刊本、同文山房刊本。(邓安生)

【陶诗汇注】 陶诗汇注本。四卷。清吴瞻泰撰。瞻泰字东岩,歙县(今属安徽)人。据自序,本书成于康熙乙酉(1705)。卷首有康熙甲申宋荦序,又载王质、吴仁杰二家年谱,卷末附《渊明诗话》。此本以李公焕笺注本为底本,而删去《归园田居》“种苗在东皋”、《问来使》、《四时》三首,以为《读史述九章》为四言韵语,附于卷末。所采旧注,李公焕本之外,又有何孟春、黄文焕及李善、刘履《文选》旧注。此外,时人汪洪度、王棠、程元愈、程崑等各有笺注,亦多折中采摭。采摭之广,当时最称完备。但吴氏汇注陶诗,并非逞博斗繁,不加甄别。他反对前人注陶的繁杂雕饰,以为“繁而杂,不若简而真”,故虽博采众家之说,而一归于揭示陶诗本旨,要言不烦。采用旧注,凡李公焕本所有者,用“原注”标示,其他各家皆署具姓名;征引典故,则详具书名。于唐宋以来诗话专于单篇有所发明者,附于各单篇之后,其余泛论、总论则合为《诗话》,置于卷末,使各以类从,井然可观。吴氏主以冲淡清真论陶,以为渊明晋代宰辅之后,遭世末流,托讽夷、齐、荆轲,寄怀绮、角,绝非沉冥无意于世者;而后人注陶,惑于“年号甲子”之说,遂欲句栉字比,讥切刘宋,故多穿凿之病。以为黄文焕《陶诗析义》不摭故实,悉抒己意,虽详而无训诂气,为注陶善本,故取其说者独多。但又认为黄氏与刘履注陶,颇好牵合易代之事,伤于穿凿,故除《述酒》诗一类显指易代者,其他一概舍弃不取。如卷一《停云》一诗,自汤汉以后,李公焕、刘履、何孟春、黄文焕等皆附会为讥刺仕宋诸臣,此本则一概汰去,又在诗末按语中力辟穿凿之说,谓《停云》四章只是“思亲友同饮不可得,托以起兴”。于《九日闲居》诗“空视时运倾”下注云:“按‘空视时运倾’与‘寒花徒自荣’皆因

无酒而发,正点明‘持醪无由’四字也。原注谓易代之事,失其旨趣。”《饮酒》诗第四首,诗后针对赵泉山讥切殷景仁、颜延之辈附丽于宋之说,指出“此借失群鸟以自况”,“泉山意似泥”。如此拨乱反正,发明陶诗真义者甚多。吴氏对陶诗虽研究颇深,于集中诸多疑难亦常不能定其是非。如《与殷晋安别》诗,李本原注“景仁名铁”,吴氏依据《宋书》,殷景仁实未尝作南府长史掾,意有所疑,却未能进一步深考殷晋安实乃晋安太守殷隐,直判李注之失。又李本颇好杂入宋人地志以笺居址,虚妄不经,此本亦多采入,沿袭其误。《赠长沙公》诗注虽指出旧注谓大司马指汉代陶舍之误,而仍保留题中“族祖”二字,序文亦于“族祖”下断句。辨《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句,则迟疑于曾纮、周必大二家歧说之间,不能定其是非。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深致讥贬,亦非公论。此本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拜经堂刊本,印制极精;清抄本有屈彊朱笔校,亦佳。又许印芳增订本,款式与拜经堂本悉同,只在卷末增加附评,续抄《诗话》;又有1926年上海大中书局缩影许氏增订本。

(邓安生)

【陶诗汇评】陶诗汇评本。四卷。清温汝能撰。汝能字希禹,号谦山,广东顺德人。乾隆举人,官中书,不久辞官,筑中斋莲溪上,从事著述。著有《谦山诗文钞》、《孝经约解》、《龙山乡志》,辑有《粤东诗文海》一百七十餘卷。此本成于嘉庆九年(1804),刊于十二年。卷首自序,又录昭明太子所作《传》,四卷次序悉从汤汉本。其自序云:“迁居林下……惟于家藏诸刻,缀评笺,抄写成帙。细思陶诗真淡,不事详笺而大旨了然,倘无真评,则古人之心不出,故于每篇末,标明姓氏,详摘其评语录之……于每句下,略加诸家笺释,而不及列其姓氏,亦以重在评而不重乎笺也,故名之曰《汇评》。最末则时缀以鄙见。”据此,《汇评》旨在揭举陶诗真义。其评陶推崇苏轼“外枯中腴”、似淡真美之说。温氏自己亦能作诗,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故评陶每多胜义。如评《与殷晋安别》“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等句云:“‘才华’数语,抑扬吞吐,词似出之忠厚,意实暗寓讥刺。殷景仁当日得此诗,未必无愧。予谓读陶者,当知其蔼然可亲处,即有凛然不可犯处。”评《归园田居》之二云:“‘披草’一作‘披衣’。据《晋书·袁宏传》‘披草求君,定交一面’,作‘披草’是。‘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评《饮酒》诗“结庐在人境”一首云:“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兴会独绝,境在囊中,神游象外,有神无迹,却于此处领会。俗人反先赏其‘采菊’数语,何也?至结二句,则愈真愈远,语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为佳。”温氏此类

独具卓识的见解,是此本精华所在,至今尚有一定参考价值。此本所辑前人评语,大抵不过蒋薰《陶渊明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及闻人倓《古诗笺》等数家,前代与时人董废翁、孙琢等人一些颇有独到之见多未能采入,颇有遗珠之憾。又称引他人之说,不举书名,笺释中即诸人姓名亦一并略去,亦有掠美之嫌。本书有光绪壬辰(1892)上海五彩公司石印本、上海扫叶山房缩影本。

(邓安生)

【靖节先生集集注】陶集汇注本。十卷。清陶澍撰。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进士,道光间官至太子少保、两江总督,卒谥文毅。著有《陶文毅公集》六十四卷、《陶云汀奏议》五十二卷等。此本前四卷诗,卷五赋、辞,卷六记、传、述、赞,卷七疏、祭文,卷八《五孝传》,卷九《集圣贤群辅录》上,卷一〇《集圣贤群辅录》下。删去《归园田居》“种苗在东皋”、《问来使》、《四时》三篇伪作。各卷的分合、字句的异同,参考以前诸本,择善而从。所据之本,计有汤汉本、李公焕本、何孟春本、汲古阁本、焦竑本、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本、张自烈本、毛晋绿君亭本、何焯校本、黄文焕本、吴瞻泰本、蒋薰本,凡十二本,而以汤、李、何三家为主。卷首辑有《诸家序录》、颜《诂》、萧统与史书各传、杂识。卷末附《诸本评陶汇集》一卷,《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其参考《陶集》版本之多,汇集资料之富,前所未有的。又此本立例极谨严,注释最称详核。著者对陶渊明研究亦极着力,诗文中凡涉及史实、出处、行事,考证尤精详。世称佳本,广为流传,不为无因。所惜此本多采用汤汉、刘履、何孟春、黄文焕旧注,以忠愤、讥刺之说注陶,又颇杂引宋元以来方志、杂识,故不免穿凿,且互相牴牾。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题注辨镇军将军非刘裕而系刘牢之,长达三百餘字,终不得其确解。《赠长沙公》诗既取杨时伟说,删去题中“族祖”二字,序文于“族”字断句,而诗末按语复谓吴《谱》以“族祖”连读,张纘《辨证》于“族”字断句,二说皆通,游移二说之间,不能定其是非。《九日闲居》诗注既引汤汉旧注,谓“空视时运倾”指易代之事;又引吴瞻泰说,谓此句与“寒花独自荣”皆因无酒而发,非关易代,前后自相矛盾。其引宋元地志、杂说以注居址,尤牵引无据,说《还旧居》诗之“上京”与“六载去还归”更强为其词,近于臆测。此书有道光九年(1829)苏州官书局重雕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文学古籍刊印社排印本等。

(邓安生)

【陶靖节诗笺定本】陶诗笺注本。四卷。近人古直撰。直字公愚,号层冰,广东梅县人。少有济世志,不获世用,潜心教学、著述,曾任广东大学教授。

著有《隅楼丛书》、《层冰堂五种》。此本为《层冰堂五种》之三,大抵依据李公焕笺注本前四卷次序编排,而删去伪作《归园田居》“种苗在东皋”、《问来使》、《四时》三篇,又将原本卷三《桃花源记》改题《桃花源诗并序》,并入卷四《联句》之后。此本职在笺,故于陶诗用事之处,爬罗剔抉,穷力搜求,详加钩稽。许多为旧注所忽略未笺者,此本皆一一笺出。朱自清曾为之统计,从古笺本引书相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凡四十九条,比吴瞻泰《汇注》与陶澍《集注》两家所引多出三十八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条。六朝以后,历代或以“隐逸诗人”论陶,或以“忠愤”说论陶,皆以为陶渊明受儒家影响最深。若从古笺本钩出的陶诗用事出处看,“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是受儒家影响多,似乎还值得讨论”(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千古之覆,古笺本一旦发之,洵为陶渊明异代知己。本书又多胜解。《述酒》诗自汤汉定为零陵王哀诗,微旨渐显,古笺又从而加密。《命子》诗“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的“可”字,旧注多忽略未注,此本证明“可”乃晋人常语。《和刘柴桑》诗,向来仅据李公焕注,此本题下引《隋书·经籍志》注,证刘柴桑即刘遗民,遂为定论。《还旧居》诗“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次句向无人能解。此本引《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郑注,始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岁之意。《饮酒》诗第十六首“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旧注皆以“孟公”为投辖的陈遵,与诗意不侔。此本据诗中境地定为刘龚,确当不易。《杂诗》第六首“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诸家皆不知“此事”所指。此本引陆机《叹逝赋》序,乃知指亲故凋零。如此之类,探幽抉微,所发明者甚多。又古笺本对于旧注的穿凿附会,亦能有所甄别删汰。此本的缺点主要在牵合其五十二岁说,于旧本的异文,不予标示,唯取一说,以就已意。《游斜川》诗序“辛丑正月五日”,汤汉注:“一作酉。”诗发端一句,汤本、李笺本并作“开岁倏五日”,汤本注:“日,一作十。”此本于序文径作“辛丑”,于诗径作“五十”,欲以强合五十二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汤本、李本、陶本皆作“倏俛六九年”,一作“五十年”,古本径作“倏俛五十年”。此外,其笺《拟古》诗,谓“日暮天无云”一首为“追痛会稽王道子之误国”,谓“种桑长江边”一首为“追痛司马休之失败”,复蹈穿凿比附之病。《还旧居》诗“畴昔家上京”,上京实与《答庞参军》诗之“上京”意同,皆指京师建康而言。此本引《朱子语录》,以庐山南麓之上荆原当之,又与《南康志》之玉京山混为一谈,皆乖本旨。本书有民国二十

四年(1935)上海中华书局刊《层冰堂五种》本。

(邓安生)

【陶渊明诗笺注】 陶诗笺注本。四卷。近人丁福保撰。福保(1874—1952)字仲祐,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南菁书院,后任京师大学堂及译文馆教习。1908年于上海创办医学书局,编印医学书籍。编有《说文解字诂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佛学大辞典》等。此本民国十六年(1927)由上海医学书局刊行。卷首有无锡裘可桴叙及自序。据自序,丁氏家藏陶集凡二十余种,本书以重刊宋绍熙壬子(1192)曾集本为主,以莫友芝仿宋袖珍本为辅,旁参他本而定。卷末附周云青笺注萧《传》。本书属古籍整理性质。整理内容包括笺注、校勘、标注古音三个方面。笺注先释字义,后释句义,于诗中用事,皆指明出处,详其始末。所采旧注,计有汤汉注、李公焕笺、何孟春注、黄文焕《陶诗析义》、程穆衡《陶诗程传》、吴瞻泰注、蒋薰评、陶澍注、顾藹《陶诗发微》、古直笺,凡十馀家。以为古笺最精,采摭尤多。此本于近代最为后出,故采摭最为完备,特别是丁氏购得《陶诗程传》,为海内罕见秘本,多所采入,而广其传,弥足珍贵。旁引博采,资料丰富,是此本之长;囿于旧说,缺乏独见,是其所短。且每诗之下,标明古韵,广引书证,颇有繁芜之累。

(邓安生)

【陶渊明集】 陶集注本。今人王瑶编注。主要依据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参校他本异文,择善而从。删去全部伪作,诗、文分别按年代先后编排,并以现代汉语作简要注释。《陶集》有编年体自此始。《陶集》向无作者自定本行世,今存各本皆出北宋宋庠本,次第、篇目多乖谬,其作品又大多无确切年代可考。编注者钩稽史实,多方探索,爬梳排比,去伪存真,用力甚勤。其中以旧编卷四《杂诗十二首》离而为二,分编两处,诚为有见。谓《行云》、《时运》、《荣木》三诗皆四十岁时所作,《与子俨等疏》作于晋亡以后,亦皆切当。但《移居二首》从李公焕注,系诸义熙六年,《与殷晋安别》系诸义熙七年,《五柳先生传》暂系太元十七年,颇失考。又《桃花源记》旧编《陶集》各本皆在文内,此本改题《桃花源诗并记》,移置编年诗内,恐亦失当。本书于每篇原作之后,简要说明系年根据,注释重在释义,不作繁琐引证,颇便一般读者阅读。《前言》对陶渊明的思想、政治态度、作品的艺术风格等作扼要介绍,持论平实稳妥,对读者亦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是一部有开创性的陶渊明作品普及读本,1956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邓安生)

【陶渊明集】 陶集注本。七卷。今人逯钦立校

注。陶渊明诗文的编排依照鲁铨刻苏写大字本次序,而删去《归园田居》“种苗在东皋”、《问来使》、《四时》、《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八儒》、《三墨》等全部伪作,合为七卷,冀存萧统所编《陶集》卷数。卷首录萧统《陶渊明集序》,卷末附《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文字校勘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以曾集、鲁铨、焦竑、莫友芝、黄艺锡五种刻本参校,此外又参考汤汉、吴瞻泰诸家刻本及有关总集、选本、类书,详录异文。注释用现代汉语,笺注、释义并重,凡引旧注,多注明出处。旧注主要采自汤汉、李公焕、黄文焕、吴瞻泰、陶澍、占直诸家,间亦采程穆衡《陶诗程传》,疑自丁福保笺注本转引。著者研陶多年,发表论文多篇,于陶渊明生平事迹、居址尤多创见。故本书虽不以文字校勘见长,但其简要明确,颇便初学,间有发明,补旧注所未及。《述酒》诗注,谓原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比喻桓玄篡位于前,刘裕润色于后”,《赠羊长史》诗注谓“左军”指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而非朱龄石,《游斜川》诗注谓序中“辛酉”应为干支纪日,《闲情赋》以为旨在“以追求爱情的失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皆自创新义,成一家之言。本书附录《关于陶渊明》一文作于1973年,受当时思潮影响,对陶渊明的思想、人品、作品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本书1979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诗文校笺】 陶集校笺本。今人王孟白撰。该书据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次第编排,删去全部伪作,合诗文为七卷。各篇原作之后,分列校记、笺注、选评。卷末附录《陶渊明诗文总评》,选辑历代评陶文字二十一家,凡数十条,又附《陶渊明年谱简证》。全书著力处在校勘异文,以陶澍本为底本,以曾集、汤汉、李公焕、焦竑、苏写本五家《陶集》参校,旁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总集,不改动底本,详列异文。所用参校本较逯钦立《陶渊明集》所用为少,而校出异文反多出数倍。但因过于固守底本,以致底本明显的避讳字亦不加以改正,未免胶柱鼓瑟。校记中详列异文而不断是非,明显的讹字亦予胪列,总集、类书异文亦“详细周密排比”,均值得商榷。本书笺注侧重斟酌旧注,指明用事出处。总评、选评大抵转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二书。《陶渊明年谱简证》折中诸家旧谱,而采取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三家之说为多;至旧说歧异处,则略加辨析,创见较少。本书1985年6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安生)

【陶渊明集校注】 陶集校注本。今人孙钧锡撰。

本书将陶渊明全部作品按写作时间重新编排,分上、下两编,上编诗,下编文。《前言》对陶渊明的阶级地位、立场、政治倾向、思想、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有简要论述。书后附新编《陶渊明年谱》。诗文编年主要参考王瑶《陶渊明集》而稍加修订。《杂诗四首》移置《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之后,列《五柳先生传》为晚年之作,不为无见。但《乞食》诗移置篇首,谓是出仕之前,二十八九岁时所作,表示希望能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恐理解有误。又《桃花源记》旧编《陶集》各本皆编于文内,此本因袭王瑶注本,改题《桃花源诗并记》,移置诗中,似亦欠妥。本书字句兼释,详明通俗,惜间有沿袭旧注错误之处。校勘以陶澍《靖节先生集》为底本,以曾集、李公焕诸本参校,文字择善而从,但失校处较多。所编年谱,大抵折中旧说,新意不多。此外,本书文字讹误亦不少,如《命子》诗“亹亹丞相”,脱一“亹”字;原本“而近可得”,讹作“近而可得”。本书1986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栗里谱】 年谱。宋王质撰。质字景文,号雪山,先世郢州(今山东郢城)人,后徙兴国(今属江西)。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孝宗朝,卒官奉祠。著有《诗总闻》、《绍陶录》、《雪山集》等。《宋史》卷三九五有传。此谱淳熙十年癸卯(1183)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陶渊明年谱。依据史传陶渊明六十三岁说,将其生平事迹及部分作品系年,以反映其慎出处、谨去就的忠义大节。事属草创,故虽有发明之功,而疏略处亦多。其尤显者:如谱前小序采《宋传》“耻事二姓”说,谓渊明“自宋武帝苻玄复马,遂逆揣其末流,即不出”。好采释家传说故事,谓慧远送渊明过虎溪,而却灵运入莲社,虚诞不经(说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载渊明“寻阳柴桑人”,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柴桑故城在浔阳西南二十里。谱则谓渊明生于楚城驿(今九江荆林街),大相径庭,羌无故实。据集中《庚子岁从都还》、《祭程氏妹文》等作,陶母孟夫人当卒于隆安五年(401)辛丑。此谱太元元年(376)丙子条谓是年渊明十二丧母。《怨诗楚调》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汤汉注:“其年二十丧偶,继娶翟氏。”吴《谱》引《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及《左传》杜注“偏丧曰寡”,谓渊明三十丧妻。汤、吴二说皆可通,而此谱太元九年条,乃谓渊明二十失妾,误解丧偏为失妾。《归园田居》,吴《谱》谓彭泽归后所作,其说有见。此谱据“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遂系诸太元十九年条下,谓渊明是年三十岁,误以“尘网”喻指人世。考渊明仕履,隆安三年至五年,确曾仕桓玄于江陵,《庚子岁五月从都还》诗实系奉桓玄命使都还途中所作。

此谱不详仕履,乃据《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及《从都还》诗,臆测是时以参军衔命自京都上江陵,父在柴桑,渊明因省亲留浔阳逾年,至隆安五年辛丑始赴江陵,元兴二年癸卯又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于京都居父忧,思湓城,作《始春怀古田舍》诗。多方牵合,扞格不通。《游斜川》诗序既有“辛丑”、“辛酉”之歧,诗发端句又有“五十”、“五日”之异,此谱未作只字辨证,乃谓隆安五年辛丑,渊明三十七岁作《游斜川》诗,致与谱主事迹多处牴牾。渊明丧母在隆安五年辛丑,《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齟齬,并罹偏咎”,李《笺》、陶《考》皆谓偏咎为失怙,确凿有据,此谱乃谓隆安五年辛丑丧父。王弘于义熙十四年以抚军将军为江州刺史,见《宋书》本传。此谱既误系于元熙元年,又谓“未审的在何年”。元熙元年条既谓“乙巳至丁卯,迄死未尝他适”,永初元年条复称“自西庐移南村”,又谓迁居当为刘遗民之徒,前后矛盾,复乖史实。陶《考》谓刘柳以后将军为江州刺史在义熙十一年,颜延之居浔阳适当其时,说甚当。延之《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则其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浔阳,当在宋少帝景平二年。此谱系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过浔阳于景平元年,相差一年,又谓首次来浔阳与渊明“介居”未审在何时,疑在不诣刘穆之之时,亦颇失考。以上皆谱中所失之大者。至其他细小疏漏乖误,所在多有。陶澍作《靖节先生年谱考异》,驳正甚详,实此谱之功臣。但此谱既属首创,开创之功不可没。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本、清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等。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收录此谱,以《十万卷楼丛书》本为底本,参校《南村辍耕录》卷一六、吴瞻泰《陶诗汇注》卷首,补订了其中的一些脱误。(邓安生)

【陶靖节先生年谱】年谱。宋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号蠹隐,又号蠹豪。洛阳人,寓居昆山(今属江苏)。淳熙间进士,历罗田令,仕至国子学录。学问博洽经史,曾讲学于朱熹之门,著有《古周易》十二卷、《两汉刊误补遗》十卷、《离骚草木疏》四卷等。《吴中人物志》有传。此谱据史传陶渊明在世六十三岁系年,考证之详,发明之多,排比之密,皆出王质《栗里谱》之上。如太元十九年,援引《左传》杜注以释“偏丧”之义,证渊明三十岁丧妻。元嘉三年条,论史传记檀道济为江州刺史事先后失序,足规史传之失。义熙二年条,推定《归园田居》前五首为彭泽归田次年所作,又引韩子苍语,揭出第六首为江淹拟作,发千古之覆,补王《谱》所未逮。元熙二年条,年号申子之辨,谓“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而“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元嘉三年条名字之辨,谓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入宋则更名曰潜,

而仍其旧字,皆庶几得其实情,故此谱颇为当时及后世所重。本谱之失,主要在胶执“耻事二姓”之说,以致仕履多舛误。隆安四年庚子条,谓是年始作镇军参军,驳《文选》李善注“宋武帝行镇军将军”;隆安五年辛丑条驳叶少蕴疑渊明尝仕桓玄于江陵,又尝仕刘裕,皆不遗余力,并从而大倡“先生兄弟在京师,而女弟居江陵”等臆说。此外,太元元年条谓丁母孟夫人忧,误解《祭程氏妹文》“慈妣”为生母;《怀古田舍》诗二首系诸太元十六年辛卯,谓题中“癸卯”当为“辛卯”之误,曲为之说。太元十八年条,仅据《饮酒》诗“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二语,遽定渊明是年二十九岁出仕。实则“向立年”不过泛言将近“而立”,未必切指二十九岁。元兴二年条,误解《饮酒》诗“行行向不惑”为作诗之年,又胶执“向不惑”谓三十九岁。义熙元年条误以是年刘怀肃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渊明参其军事,从讨桓玄于江陵;又臆测《使都经钱溪》诗盖自江陵使都建康作,又遽断《还旧居》诗乃自京都归浔阳后作。《与殷晋安别》诗之“殷晋安”盖即晋安太守殷隐(详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诗当作于义熙十二年。此谱乃谓殷晋安为殷景仁,遂系其诗于义熙七年辛亥。实则殷景仁未尝为晋安南府长史掾,又何尝居浔阳?《宋书·檀韶传》载韶以义熙十二年为江州刺史,此谱误作义熙八年。《与子俨等疏》文称范稚春为“晋时人”,其作于易代以后甚明。此谱囿于六十三岁说,误系于义熙九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为五十四岁所作,而误刊于义熙十二年五十二岁条下。《赠长沙公》诗本晋义熙间作品,而误系于宋元嘉三年条下,又序文于“族祖”连读,遂横生“族祖”、“族孙”之议,乖违史实。张缵《吴谱辨证》、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多所驳正,切中其弊。本谱有明汲古阁刊《陶靖节集》本、清吴瞻泰《陶诗汇注》本、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本、《灵峰草堂》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本,以陶澍本为最佳。(邓安生)

【柳村谱陶】年谱。清顾易撰。易字中孚,号柳村,江苏新阳人。事迹不详。所作《律陶》五十首、《读陶》、《谱陶》各一卷,合为《柳村集陶》。《谱陶》一帙,权舆于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以史传为经,本集为纬,系陶六十三岁事迹,具有辨证、考订性质。如义熙元年条谓渊明奉建威将军之命使都,作《经钱溪》诗,据“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之语,知渊明自庚子从都还后,久不到此,驳吴《谱》自庚子作参军及六载居京师之说,颇得要领。引《晋书·职官志》郡国及县各置散吏数人,农月劝农,疑《劝农》诗乃为彭泽令时所作,颇为有见。谓《饮酒》诗决在彭泽归田后所作,第十六首“行为向不惑”乃追思语,非言作诗时

年岁,足规吴《谱》系年之失。又吴《谱》因推算错误,以《杂诗十二首》、《与子俨等疏》分别系于义熙八年、九年,此谱亦一一指正。惜此谱笃信史传过于本集,又不能旁参博考,融会贯通,故谱中最具新见处亦即其最大失误处。太元二十年乙未条下谓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移家赴任,隆安五年辛丑条又称赴江陵当因镇军将军移镇江陵,又谓此年奉母至江陵,母卒于幕府,妹居武昌,过渊明所而同居丧,实属臆测。元兴三年条谓本年夏为建威参军,又云建威将军无可确考;义熙元年条详辨辞彭泽归田不在本年,而在次年丙午,不信《归去来辞》自序,转奉《晋传》“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为准的,失渊明出处之实情。本谱有清雍正七年(1729)刊《柳村集陶》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即据此本收录。(邓安生)

【晋陶靖节年谱】年谱。清丁晏撰。晏字俭卿,一字柘堂,江苏山阳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中,以在籍办团练功,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光绪元年(1875)卒,年八十二。平生笃好郑学,于《诗》笺、《礼》注,研讨尤深,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已刊者有《颐志斋丛书》。《清史列传》卷六九有传。本谱依据本集,参稽史传,将陶渊明生平事迹可考者及诗文有年月可系者系诸六十三岁之中,旨在补订王质《栗里谱》之疏误,文字简约,无所发明。其欲纠王《谱》之失者约四事:(1)“丧偏”谓失偶,非丧妾。此说本吴《谱》,非丁氏所创。(2)檀韶为江州刺史在义熙十二年,王《谱》于永初元年追叙其事,明著“义熙间”三字。丁氏谓其误载,非是。(3)王弘为江州在义熙十四年,王《谱》移下一年,丁纠其谬,其说是。(4)檀道济任江州刺史,《宋书》本传及《文帝纪》、《王弘传》皆在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被诛之后,唯《少帝纪》误记于景平二年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尝订其谬。此谱乃谓王《谱》系年与正史不合,实误。此外,《归园田居》(丁谱误作《归田园居》)系诸义熙元年;《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诗系诸义熙十年;《赠羊长史》系诸义熙十二年;义熙四年条谓柴桑旧宅失火,移居南村,作《移居》诗;《与殷晋安别》系于义熙七年等,或蹈袭旧说之误,或为无根之谈。本谱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颐志斋丛书》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即据此本收录。(邓安生)

【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年谱。清陶澍著。陶澍撰有《靖节先生集集注》,《年谱考异》二卷,原附《集注》之后,是研究陶渊明的力作。是书考辨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遗漏、舛误,仿张綰《吴谱辨证》之例,以王、吴二谱并列于前,参考宋元以来诸家之说,或补二谱所未逮,或规王、吴之舛误。其考辨之详核,实前所未有。至其妙解胜义,发前人

所未发,亦后世所罕及。如辨渊明八岁丧父,论慈妣为庶母,谓“尘网”指仕途而言,“怀古田舍”意即于田舍中怀古,建威将军应为江州刺史刘敬宣,《与子俨等疏》当作于宋受禅后,庞参军即卫将军王弘参军庞遵,《答庞参军》诗四言、五言皆景平元年所作等,皆言必有据,可成定论。惜陶氏有“耻事二姓”一语横梗胸中,故辨镇军将军为刘牢之,渊明未尝仕桓玄于江陵,虽不遗余力,终不能无违失。辨出处而外,次则居址之辨为详。谱中广引宋元以来地志杂说,以证《还旧居》诗之“上京”非谓京师,乃系山名,渊明旧居所在,颇伤穿凿;其解“六载去还归”指自庚子参军之军,至乙巳归田,凡六年,尤牵引无据,且与隆安三年己亥条“始作镇军参军”之说自相矛盾。本谱有清道光庚子刊《靖节先生集集注》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靖节先生集》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即据后种收录。(邓安生)

【晋陶徵士年谱】年谱。清杨希闵撰。希闵字铁傭,新城(今江西黎川)人。事迹不详。著有《水经注汇校》、《读书举要》等多种,又编《乡诗摭谭》。此谱一卷,系光绪初寓居台阳海东书院时所编,旨在摘录历代诸家有关传记、评论,以见陶渊明之人品意趣,故于生平事迹之考证,殊未经意,疏漏舛误甚多。其稍可注意者,唯隆安四年驳周保绪《晋略》谓武陵王遵为镇军将军及渊明参镇北刘牢之军事数语,正所谓一得之见。此谱有《乡诗摭谭》本、光绪四年(1878)刊《豫章先贤九家年谱》本,《豫章九家年谱十五家年谱丛书》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据《九家年谱》本收录。(邓安生)

【陶渊明年谱】年谱。梁启超撰。梁启超有《陶渊明》,此谱即其著第二部分。梁氏钩稽《陶集》,得陶渊明诗文中自述年纪语句凡十二处,衡之史传六十三岁说,以为史传记载有误,因而结合颜《诔》“年在中身”之说,提出陶渊明卒年应为五十六岁,并据此将其事迹、诗文系年。所举八证,第一、第二、第三、第八证渊明卒年无六十三岁,大抵可发史传之覆。第三证举《挽歌》诗“早终非命促”,谓若寿六十三,不得言“早终”;第八证举颜《诔》“年在中身,疢唯痼疾”,谓用《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指五十而言,若寿过六十,不得言此。持之有故,故朱自清称之为坚证。自梁氏之论出,史传年岁记载之谬始昭然于世。其后古直倡五十二岁说,赖义辉《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新考》与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继之;郭银田《田园诗人陶渊明》倡六十一岁说;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倡五十九岁说,无不受其启发。但此谱成于仓促,不免疏漏舛误。梁氏又好逞臆揣测,凡遇扞格不通处,往往妄改原文以就己意。如谓

《祭程氏妹文》“慈妣”为“慈考”之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镇军”为“镇北”之讹,《还旧居》诗“上京”当从毛氏绿君亭本“一作上荆”,如此之类尚多。其论渊明年仅五十六岁,凡四证,尤多曲解妄改。游国恩著《陶潜年纪辨疑》(载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二十四日《国学月报汇刊》第一期),专辟此谱五十六岁说,多中其病。所惜持论不无偏颇,以至将本谱所举八证全盘否定,亦非公论。本谱有1923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陶渊明》本、《饮冰室合集》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据《国学小丛书》本收录。

(邓安生)

【陶靖节年谱】 年谱。近人古直撰。古直有《陶靖节诗笺》。此谱一卷,系《层冰堂五种》之一,成于1926年。古氏受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启示,对陶渊明年岁重新考订,创五十二岁说。其钩稽之勤,征引之多,条理之密,过于梁《谱》。论陶渊明无六十三岁,所举八证,皆本梁《谱》。其证陶渊明只有五十二岁,举《祭从弟敬远文》、《归园田居》诗第一首、《归去来辞序》、《饮酒》诗第十六、第十九及《癸卯怀古田舍》诗,及史传文与《饮酒》诗第九首等,但论证不够严密科学。陆侃如曾为文跋此谱(载《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专辟五十二岁说。古氏则作《陶渊明年岁考证》反驳,着重申说《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韶此,并罹偏咎”之义,广征博引,发挥尽致。此文后与《年谱》一并收入《层冰堂五种》。此谱论年岁之外,次则考证里居为详。以为渊明少长栗里,迁居上京,再迁南村而终。其证南村在浔阳负郭,引据本集,辨析详赅,为此谱一大创获。然从《名胜志》,谓栗里即楚城乡之鹿子坂,上京在南康玉京山前,与《朱子语录》所称庐山南上京坡混为一谈,又谓迁居上京在元兴三年,皆牵引无据。本谱有《隅楼丛书》本,中华书局1935年印行《层冰堂五种》本。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据后者收录。

(邓安生)

【陶渊明年谱】 年谱。近人傅东华撰。斟酌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梁启超《陶渊明年谱》三家之说,参以己见,而主要折中于王、吴二谱。稍可取者,唯驳梁《谱》五十六岁说数条。是书于吴《谱》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癸卯”为“辛卯”之误,亦遽信不疑,并为之论证。故朱自清称其为“不甚经意之作”(《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此谱编于民国十五年(1926),原附著者选注《陶渊明诗》之后以行。有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

(邓安生)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论文。近人朱自清著。本篇系关于陶渊明生平事迹与陶渊明年谱研究具有总结性的专论。全文八部分,第一部分对南宋王质、

吴仁杰至近代傅东华七家年谱之短长及所据资料略加论列,以下各部分则就诸家年谱中分歧最大的六个问题,即名字问题、年号甲子之争、居址问题、出处问题、世系问题、年岁问题逐一加以评述,解乱理纷,条分缕析,持论公允,识断往往有过人之处。如论年号甲子之争,论列其源起,评论各家之是非,最后断以“得不书宋号一语,吴、丁以外各家甲子年号之论皆可废”。于出处问题,驳陶《考》,斥“耻事二姓”说,辨“赴假”犹今言销假之义,论渊明确曾仕于刘裕、桓玄。于世系问题,辟全祖望“七世孙”之谬,规阎咏、方东树等人之失;于年岁问题,评梁《谱》五十六岁说、古《谱》五十二岁说之得失,大抵皆能实事求是。于居址问题,谓栗里在柴桑,《庐山记》直以为渊明所居,实无确据。以史传“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之语考之,其说甚是。然据《还旧居》、《移居》二诗与颜《诔》,谓渊明始居柴桑,嗣后三经移居(上京、南村、浔阳),又轻信宋元以来地志杂说之穿凿附会,谓“上京”为地名,渊明旧居所在,则似千虑之一失。王、吴二谱谓六载家居京师,固与事迹不合,但解“上京”为京师,实不刊之论,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新中华》复刊第六卷第三期)尝辨之,衡之本集《答庞参军》诗及魏晋六朝用语,其说是也。本篇首刊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三期,后收入开明书店《朱自清文集》第三册《文史论著》。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附录》据《文集》本收录(邓安生)

【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年谱。今人逯钦立撰。逯钦立有校注《陶渊明集》。1946年,逯氏曾编《陶渊明年谱稿》,刊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其稿参酌梁、古二家之说,论证古氏五十二岁说,并以此系录陶渊明一生事迹与诗文。晚年重理《陶集》,改从六十三岁说,重编此系年附于其《陶渊明集》。是编吸收宋以来诸家研究成果,编排趋于精密,各年扼要钩稽时事,颇便读者了解谱主活动与写作背景。本书根据《宋传》及本集作品,考订谱主住宅凡三处,即上京(里)闲居、园田居(古田舍)与南里(南村);平生凡四移居: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始于上京,义熙二年归园田居,义熙八年移居南里,义熙十年还居上京,直至终老,稍改早年栗里、上京、南里三居之说(见1942年9月《读书通讯》第五十、五十一期《陶渊明行年简考》)。至上京、园田居、南村所在,《行年简考》称皆在浔阳负郭,《系年》则只字未及。辨证《游斜川》诗作于义熙十年甲寅,谓诗序发端干支二字乃纪日,非纪年,列举三证。其第一、第二证言之成理。惜其舍北宋诸本不从,而据南宋书“一作”,遂谓本年正月朔日为辛酉,见与诗

序“正月五日”不合,转称“五”字当误。此乃曲从史传六十三岁致误。是书考《赠羊长史》诗序所称“左军”其人为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非朱龄石。其说有见,可规刘履《选诗补注》之失,正后出诸家相沿之讹,亦有功于陶学。然本编沿袭诸家旧说错误及逞臆误系,亦所在多有。(邓安生)

【陶渊明年谱】年谱。今人许逸民辑校。辑录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绩《吴谱辨证》、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杨希闵《晋陶徵士年谱》、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自宋至近代,按著者年代先后编排。其中顾《谱》因系零种单行,传世甚少,今辑入本书,弥足珍贵。年谱而外,又搜集有关各谱的序跋及评论资料,附于谱后,又于书末辑录陶渊明的主要传记及朱自清、宋云彬、赖义辉的三篇专论,陶渊明的生平事迹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大要已备于此。陶谱之作,逮钦立以前,可考知者凡十四种。此本《前言》称引十三种,不言明人潘璵之作;于宋人李焘所作,不引《诗谱》而引《陶潜新传》,于近现代所撰,不收傅东华、逯钦立二家,似可商榷。此外,《前言》总结陶渊明名字、居址、仕履、年岁等八条,谓“可以作为总结性的意见”,当据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第八节所言四事而略加修改。将此八条意见称为结论,盖未必如是。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谓“在未得新证据以前,渊明的生年尚无法考定”,《前言》讥之,谓宋氏所谓“新证据”,殆绝无可能,恐亦失之轻率。本书1986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年谱】年谱。今人邓安生著。在钩稽排比逯钦立以前十一家陶谱基础上,依据本集,旁考晋宋史籍与宋元以来诸家成果,提出陶渊明终年五十九岁说,并据此作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本谱于谱主名字,不同意吴《谱》及朱自清入宋更名之说,认为“渊明”为原名,其更名为“潜”当在义熙之间。论证史传“寻阳柴桑人”之记载不误,但柴桑并非故里,而是移居之地,故里当在今九江西南二十里处。至于楚城乡柴桑山、栗里、玉京山、宜丰皆宋代以后人所附会,不足为据。论证陶渊明出仕应在二十七岁时,彭泽之归三十七岁,前后经历十年。旧谱胶执“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语,误谓二十九岁出仕,至彭泽归田已四十一岁,与《饮酒》诗第十六首“行行向不惑”自述归田年岁抵牾。认为陶渊明平生移居实仅一次,其时在义熙十一年,由故里徙居南里(南村),即浔阳负郭。考定殷晋安非殷景仁,而是晋安太守殷隐。《与殷晋安别》诗序中的“南府”即南中郎将军府之简称。论证《赠长沙公》诗当作于义熙六年

前后,“长沙公”即陶延寿,诗序当于“族”字断句。论证《饮酒二十首》不仅为抒怀咏志,亦为兼赠故人而作。“故人”当指颜延之、殷晋安辈,诗当作于义熙十一年秋。辨证《游斜川》诗序发端“辛丑”二字当系干支纪日,其时即义熙十四年正月五日,纠正了逯《谱》误从南宋以后本“一作辛酉”,又谓“辛酉”指义熙十年正月朔日之失误。辨析陶渊明与慧远并无过从,指出《莲社高贤传》载慧远招渊明入社及送渊明过虎溪之虚妄。此外,本谱对《杂诗十二首》前四首、《和郭主簿》、《读山海经》、《咏荆轲》等作品之作年,亦有考订,分系各年条下,大抵贯通无矛盾。书前有冯其庸所作序。本书1991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论文集。近人梁启超著。此书收著者1923年所撰陶渊明论文三篇,首篇《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篇《陶渊明年谱》,下篇《陶集考证》。《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评述家世、时代、社会思潮、生活环境、人格、诗文创作等,是近代以来第一篇用语体写成的全面评论陶渊明的重要论文。著者认为,古代作家中能够把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之后,便数陶渊明。本文从抒情文学的本质特征立论,对陶渊明备加推崇,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关于陶渊明的人格,著者强调了他热烈豪气、缠绵悱恻与严正三个方面,认为他一生品格的立足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文章不赞成萧统、沈约等人的“耻事二姓”说,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田的主要动机是看不惯当时仕途的浑浊,“不屑与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陈寅恪批评梁氏这是“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萧望卿批评他“是以千百年后的民主精神衡量古代专制朝廷里的贵族”(《陶渊明批评》),恐皆失公允。关于陶渊明的人生观,文章概括为“自然”二字,认为陶渊明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是农村美的化身,其作品只是“自然”的体现。梁氏之概括不免失之简单,尤其是认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全在儒学,未受玄学影响,不仅与实际不符,亦与其“自然”说相背。《陶集考证》于唐以前版本,考证颇详,日人桥川时雄作《陶集版本源流考》,郭绍虞作《陶集考辨》,皆有所参考。但于南宋以后流传版本,仅著录曾集、汤汉等十一家,明代焦竑本、毛晋绿君亭本皆未亲见,较郭绍虞《陶集考辨》著录相差甚远。《陶渊明年谱》详见本辞典另条。本书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邓安生)

【陶集考辨】专著。今人郭绍虞著。著录、考证、辨析梁代以前至近代陶集版本凡九十八种,其中著

者所亲见者约五十种。陶集版本之研究,权舆于明人何孟春,其后陶澍《靖节先生集》、梁启超《陶渊明》、胡怀琛《陶渊明生活》,续有探讨,至日人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论考尤称详尽,而犹不能无遗漏。郭著旨在补诸家所未及,规众作之失误,故考辨精审,不为泛论,独多创见。其所著录,远出诸家之上。清人程穆衡《陶诗程传》,传世仅有抄本,人所罕见,著者亲睹其书,详加介绍。陶澍《靖节先生集》广传于世,诸家皆已论及,则简略带过。“绍兴本”条辨证此本当为苏写本,即宣和王氏刊本复刻本,详举数事,凿凿有据,可为定论。“李氏陶韦合刻本”条,据《沁水县志》及《陕西通志》,辨李沁水即李瀚,其刻《陶韦合集》当在明弘治间李氏任陕西巡按御史时,足释桥川时雄之阙疑。“何氏陶韦合刊本”条,论何氏即明人何湛之,其书刊于万历间,又规桥川时雄之失。考证版本源流、作者之外,《考辨》间亦论及各本长短优劣,多胜义与精当之言。如“汤汉注本”一条,论汤注穿凿与吴瞻泰《汇注》之肤浅云“作诗固不必定有寄托,然亦不可绝无寄托”,认为自来解《停云》诗者,唯辛稼轩《贺新郎》词最为恰到好处,所谓“抱恨如何”,所谓“搔首延伫”者,均可于此春醪独抚之际,窥其上下今古苍茫之感,“此未尝不可从出处言之,却亦正不必泥出处解之”。“黄文焕析义本”条,谓历来论陶之语,或为时代习令所蔽,或由个性有所专诣,立论互有偏胜,每如盲人扪象,各得一端,罕能举其全者,唯黄本最能表暴靖节忠忱,而又不免明人评点习气,不能尽情阐发渊明之学术思想。此论结合明代治学精神以批评黄本短长,高屋建瓴,切中肯綮,自非庸论所能及。陶集版本甚多,源流极繁,故虽著者博闻广识,搜罗考辨甚力,间亦不免疏漏。明白鹿斋摹古刻本《陶渊明集》(今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清詹允谐撰《陶诗集注》、顾易《柳村集陶》等均未见著录,疑其未尝寓目。又吴瞻泰《陶诗汇注》,康熙四十四年拜经堂刊本、光绪丙申许印芳刻本,今皆尚存,似亦未尝见及。此外,此文不录陶集抄本及海外刊本,未免遗珠之憾。本篇成于1934年,初刊于1936年《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收入著者《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邓安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

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邓安生)

【陶渊明批评】 论文集。今人萧望卿著。全书三章。首章《陶渊明历史的影像》,扼要介绍历代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与评价;二章《陶渊明四言诗论》、三章《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专论陶诗的风格与艺术特色。主要通过对陶诗篇章字句的分析探讨,评价陶渊明的情志与作品艺术价值。文笔自由活泼,可读性强。其中论四言诗一章,独具特识。历代论陶者,多以其四言诗与五言诗相提并论,推崇备至。本书认为:陶渊明四言诗之成就远不如其五言诗,《停云》、《归鸟》、《时运》而外,其余六首意境、文词皆因袭《诗经》,缺乏新鲜与活力。评五言诗一章,对五言诗的语言、结构、意境、个性、承传关系诸多方面,均有涉及。大抵以“质直”、“平淡”论陶,字里行间,时有灼见。该书缺点在于论陶渊明人品思想,未能密切结合时代环境、生活经历,亦未能用发展变化观点对陶渊明作品作全面分析。基于对部分作品个别字句之散论漫议,故其结论难免片面与谬误。本书前有朱自清序,对其特点、创获有简要评价。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开明书店印行。(邓安生)

【陶渊明传论】 论文集。今人张芝著。全书三章。首章《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二章《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三章《陶渊明论》。书前有自序,说明本书写作宗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陶渊明与晋室、桓玄、刘裕的关系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即政治态度;二是陶渊明与儒家、道家、佛家等关系。全书大体分两部分,前为“传”,后为“论”。首章评析陶侃与孟嘉其人及他们对陶渊

明的影响。但具体论述相当机械牵强,且有所夸大。如云陶侃是一个不忠于晋室而有篡夺之心的军人,孟嘉则依附一个不忠于晋室而几乎篡权的军阀桓温,在他们影响与时代风气熏陶下,陶渊明“具有没落的士族意识”,在当时的政治角逐中,“倾向桓氏而无视晋室和鄙夷刘裕”。桓玄篡晋失败是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的政治原因,也是他后半生有着二十二年躬耕生活的真正原因。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本书认为,基本上为儒家,但不排斥道家,并吸收伪《列子》的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面目”。儒家让他安贫乐道,但限制了他和农民之间距离的缩短,表现为“一种没落的官僚地主式的情感”;道家思想使他具有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理想,因此陶诗“在没落的情调中却又有着傲然独往的神气”。本书对陶渊明其人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态度。因此出版后,招致了学术界的批评。郭预衡《评〈陶渊明传论〉》批评著者“实际上是运用了以个人崇拜为中心线索的主观臆测的片面取证的思想方法”,“著者最基本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本书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讨论集】 论文集。《文学遗产》编辑部编。1958年冬至1960年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组织开展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收到作者稿件二百五十一篇,约一百二十四万字。该刊编辑部从中选择部分文章分期发表。为保存资料,方便读者,1960年3月,编辑部将一年多来已发表的文章以及少数尚未发表的来稿,汇集成册,又从其他刊物上选辑三篇较有参考价值的讨论文章,作为附录,共二十九篇,以《陶渊明讨论集》为名出版。所收文章既涉及对陶渊明的总评价、陶渊明的归隐、陶渊明作品反映现实的问题、《桃花源记》等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也涉及古代文学作品及古代作家的评价尺度问题,基本反映了讨论的实际情况。《前言》对来稿涉及的问题作了归纳整理,提出正确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等概念和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对待古代作家作品的意见;对讨论中一些谈得不够的问题,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等,提出了深入讨论的希望。本书196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资料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合编。本书选录历代论陶渊明资料中有代表性者汇为一编。约二百五十家,按时代先后辑录而成。内容包括陶渊明生平事迹、作品系年、陶集版本等,而尤着重于陶渊明思想、艺术、文学地位等,基本反映了历代陶渊明研究的概貌,为

陶渊明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书前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同学写的《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五七级陶渊明研究小组写的《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前者对历史上关于陶渊明研究、评论的情况作了简括介绍,具有提纲挈领性质;后者在1958年以来陶渊明讨论的基础上,对陶渊明其人其文作了较深入的评价。本书1962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12月,又与《陶渊明诗文汇评》同时由中华书局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的“陶渊明卷”(上、下编)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诗文汇评】 资料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本书是《陶渊明研究资料》的姊妹篇。将历代有关陶渊明单篇作品的评论文字,按照时代先后,汇总编排于各篇原作之后。原作的编排,大体采用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本的次序,只是将《归园田居》之六、《问来使》、《四时》、《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等伪作以及后人的有关评论作为附录,置于《自祭文》之后。全书编录有体,辑录资料一百五十六种,远较温汝能《陶诗汇评》、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等书完备。然疏漏之处亦不少。明清以后的某些陶集评注本似未寓目;有些虽已见及,一些重要评论文字却未选入。《停云》诗后不采汤汉注,反录刘履以后评注,取舍亦欠当。《九日闲居》诗选录汤汉“‘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不录吴瞻泰反对之意见;《饮酒》诗之四,选录赵泉山“此诗讥切殷景仁、颜延之辈附丽于宋”,亦不辑吴瞻泰批驳之论,似欠公允。又《引用书目》编排次序间有颠倒错乱,如吴瞻泰《陶诗汇注》初刻于康熙中,《书目》却列在乾隆诸家之间;马璞《陶诗本义》多采黄文焕之评,今马在黄前。本书1961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收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陶渊明卷”下编。(邓安生)

【陶渊明论稿】 论文集。今人吴云著。收录著者有关陶渊明思想及作品艺术评论文章十三篇,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不是对陶渊明作全面研究和论述,而是针对1958年末至1960年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在陶渊明讨论中谈得不够而在学术界又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陶渊明作品反映出的社会诸矛盾》、《陶诗的人民性》、《风格与陶诗》、《陶文的艺术性》、《论〈桃花源记〉》等文,对陶渊明的人品、思想、作品价值、文学地位等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诗文对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的归隐是在政治上不与东晋政权同流

合污的表现,虽有消极面,但从主流方面看,则应给予肯定;《桃花源记》反映了农民的某些思想和愿望,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陶渊明的诗歌和散文都具有非常自然的风格,富有真挚情感,对后代有深远影响;在文学史上,陶渊明应当属于杰出诗人的行列。新编《陶渊明年谱》详前人之所略,突出政治大事的记载和对诗文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书后所附阎万钧编《陶渊明研究论文专著索引编目》,收集资料比较完备,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邓安生)

【陶渊明论集】 专著。今人钟优民著。全书十章,前五章论东晋的社会面貌与陶渊明的家世、经历、政治倾向与思想,后五章论其创作、文学成就与影响。著者认为1958年至1960年那场讨论在许多问题上若明若暗,有必要再作深入探讨。例如,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著者不同意史传的“耻事二姓”说,也不赞同某些论者把陶渊明贬斥为反对变革的分子,认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代表处于无权地位的庶族地主,而与士族地主对立。陶渊明虽有君臣观念,却并非要充当司马王朝的忠顺奴仆;他对刘宋新朝的不满,是因为刘裕不是他理想中的“圣君”。本书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并非是对前代某一家的继承或几家的简单综合,而是由他个人丰富阅历和高超智慧熔铸而成的,带有个人色彩和时代精神。本书论陶渊明美学思想,提出以“真”为核心的人生——美学观。著者认为,就现有陶诗的数量和思想深度看,最能代表诗人真实人格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田园诗,而是大量抒情写志、讥讽时事的咏怀诗。本书将全部陶诗分为咏怀、田园、哲学三类,分别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分析,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本书1981年5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探稿】 论文集。今人魏正申著。汇集作者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十八篇。前十一篇主要就陶渊明入仕与归田、诗文创作、友朋观、晚年思想倾向等问题作探讨;后七篇是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评论。本书勇于立论,提出一系列新看法,主要有:(1)陶渊明一生主导思想是建功立业,由于政治上欲有为而不能,转而从文。归田并非隐居,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事业中去。(2)陶渊明读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诗文创作,读书不仅使他获取了题材和创作灵感,而且激励其创作情绪,坚定其创作态度,拓宽了创作道路。(3)入仕带有从政和从文的双重目的,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力争有为的进取,反映了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也为陶渊明从事诗文创作并成为文学史上的“头等人物”奠定了基础。(4)陶渊明把诗文创作当作自己的终生

事业,作为参与现实斗争的手段,具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5)陶渊明笔下的鸟鸣深有寓意,是他创作诗文的喻比,不同季节的鸟鸣是其文学创作历程的象征。(6)陶渊明交友注重政治倾向和儒家信条,并服务于个人事业与理想的追求。他和颜延之只是一般的应酬,并非挚友。(7)陶渊明具有社会发展阶段论思想。其第三阶段即桃花源阶段,是对阶级社会的根本否定。(8)《咏贫士七首》是陶渊明四十一岁彭泽归田后所作,是他追求事业的宣言书。(9)《饮酒二十首》可以看作是具有文论价值的诗章。(10)《归鸟》诗以喻笔叙写归田后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追求及其诗文创作活动。(11)《九日闲居》诗的主旨是对躬耕田园进行文学创作志向和成就的自赞。总之,著者认为,陶渊明的一切言行都带有鲜明强烈的功利目的。本书1990年12月由北京文津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陶渊明新论】 论文集。今人李华著。汇集作者自1978年以来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二十篇,除首篇《陶渊明年谱辨证》外,下分“考释篇”、“阐微篇”、“思想论”、“艺术论”四部分,或考生平之事迹,或探作品之微旨,或寻思想之渊源,或论艺术之借鉴,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皆有创获。如关于《形影神》诗的主旨问题,著者认为此三首有对慧远“神不灭”论的批评,更主要的则是陶渊明自身幻化为三,借形、影、神互相对话的形式,表现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痛苦、矛盾心情,颇有见地。《隐居风气和陶渊明的隐居》一文,从士流的道德文化传统与玄学思潮由来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探寻陶渊明入世、出世态度的思想依据,给读者以启发。《陶渊明诗“枯槁”说辨疑》指出胡应麟曲解杜诗《遣兴》,以“枯槁”二字论陶之失,客观具体地分析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特色。《陶渊明与阮籍》、《陶渊明与孟浩然》、《陶渊明与王维》三文则用比较方法,分析陶诗的思想、格调,陶诗对汉魏古诗的继承发展与对王、孟诗歌的影响,都是有深度的力作。本书1992年11月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邓安生)

【三体唐诗】 唐诗选本。六卷。宋周弼编选。弼字伯弼,汶阳(今山东宁阳)人。另有《汶阳端平诗集》。此书专选唐人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及五言律诗,故名“三体”。用所选诗以说明七绝、七律、五律诸体的特点及其写作方法。编选者对各体详细分格,依格编排。其七言绝句分七格,有实接,虚接,用事,前对,后对,拗体,侧体;七言律诗分为六格,有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结句,咏物;五言律诗分为七格,有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一意,起句,结句。每格内容特点,编选者均于书前“选例”

中予以说明,如实接,编选者释曰:“截句之法,大抵第三句为主,以实事寓意,接处转换有力,若断而续,涵蓄不尽之趣,此法久失其传,世鲜有知之者矣。”全书共六卷,每体各二卷。此本行世后,评价颇多分歧,褒贬各异。持平而论,此选本所选尚精。因此书旧多以元释圆至之注本行世,故又名《笺注唐贤三体诗法》。清高士奇有补正本,盛传敏、王谦有纂释本。圆至,字牧潜,号天隐,高安(今属江西)人。其注有双行夹注,亦有尾注,多疏通、解释一类,并非笺注。时有题解。亦有不注者,多见于五律部分。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注“疏陋殊甚”。

(阎琦 姚敏杰)

【**风雅翼**】 诗歌总集整理本。十四卷。元刘履编。履字坦子,上虞(今属浙江)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以博学于洪武十六年(1383)授官。后以老疾固辞未归而卒。本书首编昭明《文选》所录诸诗,删补训释,为《选诗补注》八卷;次为《选诗补遗》二卷,选取四十二首散见于传记、诸子及《乐府诗集》之古歌谣词,以补《文选》之阙;再次为《选诗续编》四卷,则取唐宋以来诸家诗词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四库全书》著录此书。四库馆臣云:“其去取大旨,本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其诠释体例,则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谓本书“以其大者不失于正,而亦不至全流于胶固。又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尚非枵腹之空谈,较陈仁子书犹在其上,固不妨存备参考焉”。然亦多责备刘氏所论之病,如谓其“不知讽谕之语,必含蓄乃见优柔;叙述之词,必真切乃能感动”,“不明文章之正变,而谬为大言”,“不知古者采诗以入乐,……但论声律,不论文义”,“不明文章之体裁,而横生曲解”等。(阎琦 姚敏杰)

【**唐音**】 唐诗选本。元杨士弘编次。士弘字伯谦,襄城(今湖北襄樊)人。是书十四卷,始编于至元元年(1335),完成于至正四年(1344),书前有元虞集《序》。杨氏自序云其幼小即喜唐诗,有感于前此诸选本或多主于晚唐,或驳杂简略,所择不精,乃起意编此书。书前有杨氏《唐音姓氏》、《凡例》等,正文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或云正音十三卷,另附一卷为遗响,总数称十五卷,明刻有此种本)。始音唯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家,以“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也。正音则诗以体分,再创以初盛、中、晚三唐之别,计武德至天宝末入选自王绩至张志和等六十五人为初盛唐,天宝末至元和间自皇甫冉至刘禹锡等四十八人为中唐,元和至唐末自贾岛至韦庄等四十九人为晚唐。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而附以僧诗、女子诗。《百川书志》谓其书共选入一百七十五家,诗一千三百四十

一首。然是书不选李、杜、韩三家,其《凡例》称因三家诗世多其集,故弗录。后人对此颇多诟病。亦有批评是书仍详于晚唐或间有舛谬,为未尽善者。但三唐说及始音、正音之分由其首创,影响颇大。高棅《唐诗品汇》即因其体例而稍加变化,将三唐改为初、盛、中、晚四唐,又设正始、正宗、大家、名家诸类以细析唐诗人,皆源自杨氏此书。虞集《唐音序》、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皆颇推许是书,虞曰:“昔之选唐诗者非一家,若伯谦之辩识,度越常情远哉。”李谓“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为庶乎!”是书版本甚多,卷数亦多有出入。十四卷之元刻本平津馆、铁琴铜剑楼曾藏有,现存《唐诗始音》一种,藏北京师范大学。明刻本种类甚多,有十卷者、十一卷者、十四卷或十五卷者。元人颜润卿曾为是书作注,成《唐音辑释》,然久佚,今据宋讷《西隐文稿》卷六《唐音辑释序》,知颜氏喜《唐音》诸体皆备,为便初学,乃考诗之事与景,欲使观者知其事出某代,某景在某地,引经援史,据传摭记,训解注释,略无遗阙。间有正杨氏之误及辨疑(转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明人张震亦有辑注,《四库全书》集部即以此本收入,《提要》谓震字文亮,新淦人,仕履未详,又谓其注“极舛陋”。又有明王庸注本,书名《七体唐诗正音补注》,二卷,成化十一年(1475)刻,天一阁藏(据陈伯海等《唐诗书录》)。另有明人顾璘批点本,于各诗的题下、句中、诗尾分别写有批语评点,并画夹圈以示激赏,偶于某些诗体前作总论,辨明风格体势之特点,评述代表作家优劣得失,对后世有一定影响。(董乃斌)

【**唐诗鼓吹**】 唐诗选本。十卷。金元好问辑。元刊本不著编辑者姓氏,据赵孟頫序,知为好问所编,其门人郝天挺注。《四库全书》即以此本收入,且云旧有姚燧、武一昌二《序》,姚《序》谓宋高宗尝纂唐宋轶事为《幽闲鼓吹》,故好问本之。四库馆臣以为:“《二都》、《二京》,五经鼓吹”,其语见于《世说》,好问立名,当由于此。胡震亨《唐音癸签》则谓是书乃“以声调宏壮震厉,同军乐之有鼓吹,故名”。选七言律诗五百九十六首,凡九十六家,作者各题其名,唯柳宗元、杜牧题其字。第四卷有宋邕诗十一首,郝天挺注以为实出《曹唐集》中,题作宋邕,当必有据。然第八卷则有以宋人诗误入的情况,是其疏舛之处。其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谨严,轨辙归一,大抵以道健弘敞为宗,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故四库馆臣以是书出方氏《瀛奎律髓》之上。郝天挺之注颇简略,但释出典而不甚发挥,故不

涉于穿凿。后之刊本均以元选与郝注并行,如元京兆日新堂本(北图藏)、元冲和书堂本(浙江藏)、元至大元年(1308)浙省儒司刻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及四库所收之通行本。是书又有名《唐诗鼓吹大全》、《高明选增便蒙唐诗鼓吹大全》者,亦为郝注本。至明代,则有廖文炳补注。文炳别号锦台居士,新会人,曾举孝廉,为琼山学博。其书名《唐诗鼓吹注解大全》补郝注外,复增诠释,刊于明万历七年(1759)。清人钱朝鼎、王俊臣、王清臣、陆貽典不满廖书,复删改之以成《唐诗鼓吹笺注》。四人均康熙时虞山(今江苏常熟)人。陆貽典《题词》云:“廖君者起而窜郝之旧文,缀全诗之解,意亦自谓抽精吸髓矣。然多以附会穿穴为擅场,伪造假设为长技。由慧眼观之,则犹鬼家之活计,日下之孤灯耳。”钱、王之注笺对廖解有所删改,但对郝注则保存原样,且廖注、郝注及己之补注均分别标出,校勘亦标明各家,故四库馆臣以为较一般明人臆改古书者差胜。此书有顺治十六年(1659)原刻本。《唐诗鼓吹》虽号为唐诗选本,但初盛唐仅录张说、崔颢、王维、李颀、岑参数篇,余皆元和以后人诗,杜牧、李商隐、陆龟蒙及五代谭用之入选独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书专选七律,此诗体在初盛唐时期尚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由宋至元的唐诗选者对中晚唐诗的重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谓“元遗山《鼓吹》多收晚唐,以为人格,亦非善本”,似未能客观考虑历史潮流及时代风气。《唐诗鼓吹》是唐诗研究史上较重要的一种选本,故影响较大,除上述注解笺释本外,尚有清人评点本多种,评点者有钱谦益、何焯、法式善、董文焕、纪昀、赵执信、朱三锡、吴汝纶等。(董乃斌)

【唐诗品汇】 唐诗选本。明高棅编撰。高棅(1350—1423),字彦恢,更名廷礼,别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后升典籍。擅书画,尤工诗,与闽人林鸿、郑定等号“闽中十子”,著有《啸台集》、《木天清气集》等。本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着手,至二十六年完成,凡九十卷,共选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作者六百二十人,分体编排,计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长短句附),五言绝句八卷(六言绝句附),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七言排律附)。洪武三十一年,高棅又补入作者六十一人,诗九百五十四首,为《补遗》十卷,遂使全书足成百卷,六百八十一人,诗六千七百二十三首。是书前有明马得华、王偁、林慈所写三序,又有高氏自撰《总叙》,简述唐诗流变,在严羽、杨士弘唐诗分期观点的基础上,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对每一时期代表作家的风格特色作了概括;又简述本人学诗

过程,对历代唐诗选本均有所评论,如对杨士弘《唐音》,既肯定其“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又批评其“李、杜大家不录,岑、刘古调微存”及对高适、王昌龄、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等品评失当的缺点,从而引出编选《唐诗品汇》的缘起和具体做法:“远览穷搜,审详取舍,以一二大家,十数名家,与夫善鸣者,殆将数百,校其体裁,分体从类,随类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各立序论,以弁其端。”《总叙》后又有《历代名公叙论》,为历代评论家论析唐诗言论的汇编;有《凡例》、《引用诸书》、《诗人爵里详节》等。《凡例》说明《品汇》一书“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诸品目”而“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是书论述各种诗体,常将九格与四期结合而论,评述唐诗发展演变比较细致深入,且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注意引用历代论者的评论,按评论全人、评某诗全篇抑或评某句之不同,分列于作者姓氏之后、某诗篇前后和某句之下,颇便参考。是书虽标榜初盛中晚各不偏废,实受严羽《沧浪诗话》影响,特重盛唐。明前后七子倡“诗必盛唐”说,名为崛起,实即本诸是书,以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清钱谦益、贺裳、吴乔皆不以此书为然。而以四库馆臣的评价比较公允:“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在众多唐诗选本中,本书可算佼佼者。其版本有明成化十三年(1477)陈炜初刻,后有张璠、姚芹泉、陆允中、张恂、汪宗尼等刻本及《四库全书》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汪宗尼校订本影印。后因《品汇》卷帙过繁,高棅又约选之而成《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有明正统七年(1442)彭曜,嘉靖年间何城、韩诗,万历七年(1579)计谦亨等多种刻本,又有明桂天祥批点、郭濬评注等本。(董乃斌)

【唐雅】 唐诗选本。①明张之象编撰。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别号王屋,人称王屋先生,嘉靖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史·文苑传》附其生平于《文徵明传》中。其著作甚多,《四库全书》著录其《太史史例》、《彤管新编》、《唐雅》、《唐诗类苑》、《古诗类苑》等。《唐雅》二十六卷,为唐君臣唱酬诗赋之选集,起自武德,迄于开元,收帝王七人(自太宗至韩王元吉)、公卿一百六十八人(自虞世南至杜甫)、宫闱八人(自徐贤妃至梅妃)、外夷二人(新罗王和吐蕃舍人明悉猎),诗一千余篇,以类编次,如天文、四时、节

序、山岳、京都、宫殿等。是书前有嘉靖二十年(1541)何良俊《序》,称其所选截止于开元,以为自天宝以后风格渐卑,其音多怨思,故削而不录。可见是书遵七子“诗必盛唐”之说,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潮。有嘉靖二十年(1541)长水书院刻本、二十九年清河张氏刻本、三十一年无锡县刻本等。②唐诗选本,明胡纘宗编选。纘宗字孝思,一字世甫,《明史》有传。泰安(今属山东)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曾令桐城县(据《列朝诗集小传》、《安庆府桐城县志》)。是书八卷,分体编次,为乐府二卷,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各一卷。分体之后,复以内容分类编排,如“猗兰之什”、“临高之什”、“九日之什”、“渔父之什”等等,所分不尽准确,颇有交叉。书前有编者《自序》及盛汝谦、许槎、曹士奇诸人序跋,从中可知是书乃编者“欲备一代之音,取意于乐,故以《雅》名”,其选诗标准则“必其出汉魏,必其合苏、李,必其为唐绝唱,否则虽工弗取。……故乐府必典则,古体必春容,绝句必隽永,近体必雄浑,铿然如金,琤然如玉”。编者对各诗体发展源流与唐诗状况的看法,集中表述于每卷卷首之概论中,如谓“五言古体起于汉,亦雄于汉。唐陈、李、韦、柳诸子浑涵冲淡,其格虽与汉殊,而意兴当与魏晋并长,不愧于汉,故列为雅音中上”云。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文斗山堂刻本及清代翻刻本等。(董乃斌)

【唐诗类苑】 唐诗分类汇编。二百卷。明张之象编辑。《唐诗类苑》为其《诗纪类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选录汉魏六朝诗的《古诗类苑》)。卷首有瑯琊王彻撰《王屋先生传》,另有冯时可、赵应元等人序文数篇。该书之前,有宋赵孟坚《分门纂类唐歌诗》,张嫌其佚缺不全,故有此编。是书规模宏大,录有唐一代千余家诗数万首,分类编排,凡三十六部,自天文地理、帝王职官以至礼乐文武、人物器用、居处技艺、草木虫鱼等类。部下又有小目,如天部八卷,下分日、月、星、河、风、云、雷、雨、雪、阴、霁、虹……等,每类选诗若干,不分体,按作者时代先后分“四唐”排列,初唐自武德至开元初,盛唐开元、大历,中唐大历末至元和长庆,晚唐则宝历、开成以后至于唐末。《凡例》附入选诗人名单,以帝王、公卿名上为序,有姓名无世次及无姓字者、羽流僧人女冠官闺妓流乃至外夷依次附后。之象编辑是书,意取博收,不复简择,故不免冗滥之失,其性质前人以为“虽名选诗,实为类书”(《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版集部》)。且其分类虽琐细,亦每不能与诗意尽合。或有一题二意乃至多意者,则列于一处而他处为参见,其间颇有可议之处。所列诗人名单亦有舛误,如所谓“有姓名无世次者”,内有多人如韦皋、刘辟、张建封、张又新等,其

实世次清楚。虽有种种缺点,但是书搜罗广博,分类编排亦不失为有益尝试,对研究者仍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未刊之先,其稿为浙江卓明卿所得,曾割取初盛唐诗刊之,遂掩为己有。后由王微重为辨正厘定,恢复之象之旧,有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清代续有翻刻及吴荣芝重辑本。清戴明说又就该书选录七千八百余首,刻为《唐诗类苑选》三十四卷。

(纪伟)

【唐诗选】 唐诗选本。明李攀龙编选。攀龙为体现并宣扬其文学主张,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录历代之诗,每代各以体分,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略过宋元直继以明,多选录同时诸人之作,充分显示前后七子“不读唐以后书”的原则。四库馆臣论是书历史价值云:“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明末坊贾割取《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部分共七卷,加以评注,别立《唐诗选》之名,流传既广且久,遂成独立之书。是书所选唐诗凡四百六十五首,一百二十八家。七卷分别为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入选者多为初、盛唐人,七古与五七律均突出杜甫,五七言绝句则推崇太白,中、晚唐人甚少,如白居易、李贺、杜牧竟一首未选。由于篇幅限制,入选作家亦有不少名篇被漏。清人对此批评颇多,吴乔至谓:“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围炉诗话》卷六)胡震亨亦认为“欲以是尽唐,侈言此外无诗,则过矣”(《唐音癸签》卷三一)。但此书由于选者的文坛首领地位,在当时影响颇大,而在诗歌史上则继高棅《唐诗品汇》之后,有扭转宋、元以来过重中、晚唐诗的倾向之功,且其所选刻求精美,因而没有高棅《品汇》“下驷谬入”、“贗宝误收”的缺点。王世贞以为是书“以意轻退作者有之,舍格轻进作者无是也”,良为笃论。是书有多种评注本。较早的有蒋一葵之笺释。一葵字仲舒,别号石原,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甲午(1594)举人,除此书外尚有《尧山堂外纪》等著作。蒋对《唐诗选》笺释甚详,有评语,每一诗体前皆作总论述其源流、特征,另附《统论》二章,摘抄高棅《杂论》若干则。是书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武林一初斋刻本、明施大猷刻朱墨套印本、崇祯元年(1628)黄家鼎刻邹庵重订本及多种清翻刻本。又有标为袁宏道校、序之《唐诗训解》本,袁序对李选评价很高。又有明叶羲昂之《增补唐诗直解》,保留蒋一葵笺释、钟惺评语,并增详细申讲解释。又有明吴逸注本,是书有诗人小传、题解、笺注及吴氏考辨评语各项,每体诗前

引高棅语作总论,诗后亦摘引前贤评论。又有明陈继儒笺释本,题《唐诗选注》,凡四卷,有万历刻本。陈氏笺释甚详,每诗均有题解,书后附《唐诗选附刻诸名家评说》一卷,实转录高棅《唐诗品汇》之《统论》。除上述诸笺注本外,尚有多种评点本,如王穉登、钟惺、孙鑛、钱谦益等均有批点,凌宏宪曾为之集自殷璠至焦竑六十家评,书名改为《唐诗广选》,有凌氏朱墨印本,凌濛初为之序,述此本之由来。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董乃斌)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唐诗选注及汇评。明周珏编撰。珏字无瑕,号青羊,海宁(今属浙江)人,与屠隆、焦竑等人友善,文名颇盛,然蹭蹬场屋,仕宦不利,遂退隐乡居,游戏文墨间。其曾祖周敬(号澹斋逸叟)曾编有《唐诗选脉》一书,刻印未完,遇倭寇焚掠,至是珏乃整理旧稿,重加删补,并作评注,历二十年而成《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此书有崇祯乙亥(1635)刻本,首列陈继儒、倪元璐、陈仁锡、冯国英诸序,及周敬旧序、周珏自序,从中可以了解此书由创始到最后完成之经过,以及编辑宗旨、特色及时人评价等。卷首另有《古今名家论括·统论》,引述高棅、李维桢、揭傒斯、王廷相、朱大复及周珏本人的诗学观点。如周氏谓:“诗先气格,气格既具,性情所到,一往遂成,意不在奇,语不在异,自然韵度宫商,色高彝鼎。”由此可见一斑。凡例三十七则,详叙编撰方法、体例格式,后附引书目、诗人爵里。全书依诗体编排,次序为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七排、五绝、七绝。三、四、六言附卷末,杂言、骚体及词并入七古。每一体中则按初、盛、中、晚四唐之序排列。每首诗前标明作者,作者名下引有评语,诗歌正文有圈点,符号甚烦,凡例中有说明。诗后有“证”、“训”、“评”、“附”四项。“证”即为笺注,“训”乃串讲。“附”则引该作者同类诗作,而众家评论除汇于篇末外,又有列于书眉者,以小字印出。以李颀《送魏万之京》为例,其名下、眉头引陈继儒、顾璘直至胡应麟诸家评语,其“证”引书证若干。其“训”则曰:“当秋羁旅,触遇皆成悲思。此篇前六句写情人妙,声调之工,便为大历诸子楷模,想万此行有志仕进,故结勉之,见繁华之地流景易迈,当及时努力也。送别之什,足称大雅上乘。”是为编者之评析。有的篇目后又列“总评”、“附识”,尽量罗列有关评论资料,颇具参考价值。(纪伟)

【**唐诗解**】 唐诗选注本。明唐汝询辑释。汝询字仲言,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聪颖过人,五岁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诗,旁通经史,笺注唐诗,援据该博(《列朝诗集小传》)。是书五十卷,系综取高棅《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订正笺释而

成,共选唐诗人一百八十四家,诗一千四百余首。编者云:“选唐诗者无虑数十种,而正法眼藏无逾高、李二家。然高之《正声》体格褻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诗选》风骨褻高而微伤于刻,余欲收其二美哉……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其选目基本来自高棅《唐诗品汇》,补充者极少。是书五十卷。五古十卷,七古八卷,歌行长篇二卷,五绝四卷,七绝六卷,五律八卷,七律六卷,五排六卷。重初、盛唐而轻中、晚唐,如五言古,柳宗元以下付诸阙如;七古晚唐仅取李涉一首;七律晚唐除许浑、刘沧各三首外,余皆一二首,其倾向性由此可见。是书特色在于讲解。《凡例》云:“是编之解有二,属辞比事,则博引群书,遵李善注《文选》之例;揣意摹情,则自发议论,遵朱氏传《诗》之例。”其注亦颇用力,有所谓正注、互注、训注之法,正注、互注非陈、隋以上书不列,训注则自唐宋及明,间为采入,然亦必按诸本籍,参互古书。由于其注释详博,笺解明晰,评论公允,对后世注家影响甚大。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杨鹤刻本、清顺治十六年(1659)武林赵孟龙万茝堂刻本及康熙间吴昌祺评订本等。(董乃斌)

【**唐诗近体集韵**】 唐诗总集。三十卷。明施重光辑。施重光,字庆徵,生平事迹不详。本书以唐人近体分上、下平三十韵编次,于研究唐近体诗发展脉络及用韵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上、下平声分三十部,乃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所并,与唐韵不同。唐人私相歌咏者,又与官韵不同,如东、冬二部,萧、肴、豪三部,盐、咸二部,皆互有出入。此书及《唐诗韵汇》均以宋韵分隶唐律,不免时有牵混,而此书之漏略,则又出《韵汇》下焉。”天津市图书馆藏有明刻本。

(阎琦 姚敏杰)

【**唐诗镜**】 诗总集。五十四卷。明陆时雍编。此书分唐诗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先概述每个时期的诗风与特点,后选录各种不同风格、流派诗人的代表作品,并有评语,卓见迭出。编者论诗,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评李白《战城南》:“七言、乐府,意象、作用,得自西汉乐府居多,淋漓痛快,往往追神入妙。”评杜甫《前出塞》:“语如身历,即身历者却不能道。老杜长于造境,造境即情色种种毕著。李青莲长于造情,情到即境不烦而足。”可谓妙解诗理。“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同上)此书初刻于明末,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绪连)

【**唐诗归**】 唐诗选评本。明钟惺、谭元春选评。

钟、谭二人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且诗学观点接近,人称“竟陵派”。《诗归》五十一卷(其中古诗十五卷,单行称《古诗归》;唐诗三十六卷,单行称《唐诗归》),即其具体贯彻诗学主张之选本。钟惺《诗归序》云:“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但又云:“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此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其自负如此。是书按时代分卷,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晚唐诗人中,温庭筠、李商隐、杜牧、许浑、赵嘏、韩偓、韦庄等名家入选甚少,罗隐竟一首未选。可见是书编者虽有意矫前后七子拟古之说,但自身仍未脱尽明人习气。钟、谭的文学主张主要在反对摹仿,崇尚性灵,追求“卓大坚实”的深厚境界,对拟古派遗神袭貌与公安派末流一味变古的偏弊均不满,而力图对公安派有所变革创新,认为应努力求索古人之“真诗”,而力避“极肤、极狭、极熟者”,因此《唐诗归》所选作品立深幽孤峭之宗,大旨以寒瘦生涩为特色。钟惺自云其去取准则:“直拙杨炯一字不录,而《滕王阁》、《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初盛应制七律、大明宫唱和、李之《清平调》、杜之《秋兴八首》等作,多置孙山外。”(《再报蔡敬夫》)既表现了独创性,也暴露了褊狭性。由于观点鲜明且针对性强,此书问世后影响巨大,“《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六)。也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和攻击,朱彝尊即对此书深为不满。钱谦益虽对公安派多有好评,但对竟陵派却诟骂特甚,《列朝诗集小传》至有“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之语。毛先舒《诗辨坻》卷四有《竟陵诗解驳议》专论《诗归》之弊。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谓其专取寒瘦生涩,遂至零星不成章法。四库馆臣谓《诗归》将连章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贺贻孙《诗筏》看法较为持平:“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诗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但未免专任己见……是其疵病,然瑕瑜功过,自不相掩。”此书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古郡方式刻本,明末三色套印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重刻本。1985年5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印行张国光等点校本。

(董乃斌)

【唐诗韵汇】 唐诗总集。三十卷。清施端教辑。端教(1602—1674),字匪莪,泗州(今安徽泗县)人。尝为宣城训导。有《读史汉翹》。本书汇辑者好集唐诗句,故编《唐诗韵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

“大抵取供集句者之用。前有王震序,称其集句为绝艺。可知是书所由作矣”。本书专门采摭唐人近体诸诗,如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以上平韵、下平韵隶之,故以为名。每一诗体前皆有序文一篇。论述该诗体于唐代各期之发展演变。所论诗人颇多,亦屡有创见。故本书不惟可供集唐诗句者所用,亦可为研究唐人近体诗者参考。有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阎琦 姚敏杰)

【二冯先生评点才调集】 唐诗评点本。清冯舒、冯班分别评点后合刊。二冯为明末清初文学家,江苏常熟人。二冯论诗推重温、李,提倡晚唐,反对江西诗派,对严羽《沧浪诗话》力推盛唐颇致不满。二冯借评点韦毅《才调集》,具体发挥其诗学观点,提倡向晚唐温、李及宋初西昆体学习,主张遵从诗教,讲究起承转合之类作法。这是一部贯穿评点者诗学理论的唐诗选本,在当时影响颇大。其缺点是偏执一隅,不够通达。杭世骏《榕城诗话》评为“可谓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有清初刻本。
(纪伟)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又名《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唐才子诗集》、《圣叹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唐诗七律选本,八卷,清金圣叹编撰。此书成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选诗五百八十五首,精讲详析。编撰者别有《杜诗解》,因尊杜而此书不选杜。选诗重点在晚唐李商隐(二十九首)、许浑(二十三首),其次中唐王建(二十一首),晚唐温庭筠(二十首),中唐刘长卿(十七首),中唐杨巨源、晚唐韦庄(各十六首),盛唐王维,晚唐杜牧、赵嘏、刘沧(各十五首),中唐刘禹锡、晚唐吴融(各十二首),晚唐陆龟蒙(十首)。其余一百三十一人选诗皆十首以下。初、盛唐仅选一百首,中唐一百九十二首,晚唐多达三百零三首。徐增《而庵说唐诗》云:“七言律已经圣叹选批,尽此体之胜。”评诗以“分解”法,将七律前两联称“前解”,后两联称“后解”,每首诗分析、批评、论说亦分前后两部分。详者如串讲,略者仅只言片语。侧重艺术分析,议论形式技巧,讲究起承转合,不乏高见卓识,亦时有牵强谬误之处。为一部重要的唐诗七律选本。有清木刻本两种及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皆八卷。上海有正书局铅印本七卷(将卷二“鱼庭闻贯”改称“圣叹尺牍”,移至书后为附录)。198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施建中、隋淑芬整理校订本。

(朱明伦)

【唐诗英华】 唐诗选本。清顾有孝编。有清顺治十四年(1657)顾氏宁远堂刻本,二十二卷,另有《补

遗》二卷,为杨明嗣续刻。顾有孝,字茂伦,吴江(今江苏苏州)人,《苏州府志》卷一〇六有传,谓其少游陈子龙之门,子龙死,遂隐居,家住钓雪滩,以编书选诗为事,所选除《唐诗英华》外,尚有《五朝诗钞》、《明文英华》等,自著有《雪滩钓叟集》。《唐诗英华》卷首有钱谦益、金俊明、陆圻序,对唐诗史提出与严羽、高棅等人的不同看法,并高度评价本书。本书单选有唐一代七言律诗,初、盛唐各二卷,中唐六卷,晚唐十卷,最后两卷为僧人、妇女和五代诗人作品,总计“家凡数百,诗约三千”(《凡例》)。因初盛唐七律尚未大兴,诸诗人创作数量有限、质量不高,故大抵每人仅选一二首。盛唐以杜甫为宗,选入一百零三首,而李白仅六首,王维亦仅十七首,则亦颇能显示各人实际状况。中唐所选比较平均,刘禹锡、李绅各四十首左右,白居易、王建、杨巨源、刘长卿等各三十首左右。晚唐入选最多的是李商隐,有一百零四首之多,其次许浑、韦庄、刘沧、温庭筠、韩偓、罗隐等则四十至九十首不等。从选目看来本书突出中、晚唐,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唐七律的成就和发展演变过程。每一诗人名下有小传一篇,据两《唐书》、《唐诗纪事》等编写,叙述生平经历,并注意反映该作者思想性格的轶事遗闻,如杜审言传特意记入其“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等语,以显示其狂傲自许的性格。此外对该作者的著作版本及其流传情况及前人评语也有所考订和蒐采,以符“古人读书论世之旨”(《凡例》)。本书选诗宗旨主要有两点,一为重视讽咏时事和国家得失,有关一代典故可以以诗证史者;一为注意各种风格以显示唐七律盛况。所谓“风气有初盛中晚之分,人品有贞淫诚伪之别,诗格有雄高轻逸、绚丽清臞之殊,各自成家,采辑具备,庶使千载下诗人兴会,或因流以溯源,或因本以及末,性情既有所归,风格端知所自尔”(《凡例》)。在选诗的思想与艺术结合方面比较稳妥恰当。诗题与句中偶有简注,也便于读者的理解。本书在清初曾盛行一时,是一部本身带有研究和批评色彩的唐诗选本。

(纪伟)

【唐诗快】 唐诗选集。十六卷。清黄周星撰。周星字九烟,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明崇祯进士。黄氏选诗重性情,“快”即读后使人有满足快感之意。此选分三集,卷一惊天集,以想象奇特、浪漫恣肆之诗为主,包括李白、李贺、韩愈等人的诗,选李贺诗最多。卷二至卷三泣鬼集,以沉郁哀婉之诗为主,选杜甫诗最多,卷四至卷一六移人集,内容、风格驳杂,以诗体分,五、七言古、律诗和五言排律,选杜甫诗最多;七绝选白居易、曹唐诗为多;五绝选李白诗最多。绝大多数诗后有评语,好句有圈点,评语有长有短,

亦有夹评,且多己见,有康熙年间刊本。(徐晓民)

【唐诗善鸣集】 唐诗选评本。二卷。清陆次云撰。次云字云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时召试鸿博,未遇。生平著述甚丰。此书选晚唐人诗,内封题为《晚唐善鸣集》,上、下两卷。上卷自杜牧起,薛逢止。下卷自陆龟蒙起,孙元晏止。此书无笺注,有作家小传,对好句有圈点,诗后有评语。有清康熙蓉江怀古堂刻本。

(徐晓民)

【唐音审体】 一作《唐诗审体》。唐诗选集。清钱良择撰。良择(1605—?)字木庵,虞山(今江苏常熟西北)人。此书编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冬。共二十卷,前十八卷为诗,分体编选一千二百馀首,后两卷为赋,分古赋、律赋。卷一、卷二选古题乐府诗,卷三为新乐府辞,卷四至卷八为古诗,卷九至卷一八为律诗。其中杜甫选一百七十首居首位,其次李商隐、李白、白居易、王维、元稹、杜牧、刘禹锡、孟浩然、韩愈、孟郊、王建、罗隐、陆龟蒙等。突出重点诗人,盛、中、晚三个时期明显多于初唐。其选诗原则有三:尊其创格,重视新出现诗体或艺术形式;重视诗人鲜明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汰其熟调,不收专门沿袭和模仿前人形式、声调而无自己个性之作品。在各体之前,均有一段总论,辨正体裁,剖析谬误(后有人辑成诗话一卷)。此书对许多诗有题解,诗后或诗中有评语,偶有对诗人简评。诗后、诗中评语但释文义,有详有略,赵执信对此书评价极高,以为“原委颇具,可观采”。有康熙四十四年(1704)昭质堂刻本。

(朱明伦)

【而庵说唐诗】 一名《说唐诗》,又名《说唐诗原本》、《说唐诗新本》、《说唐诗详解》。唐诗选评本。清徐增(1612—?)著,增字子能,号而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钱谦益弟子,金圣叹好友,善用金圣叹方法解诗。此书写作始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元年(1662)中秋录成。全书二十二卷,按体编次,计选说七体三百零五首(自序曰三百十九首,误。张潮《而庵诗话》小引)亦称“徐而庵所说唐诗,凡三百五篇”,共选九十人作品,李、杜、白、王、孟、高、岑等大家入选作品多。卷首先列唐帝年号世次,次有人选诗人极简略小传(姓氏爵里),后有《与同学论诗》,此部分张潮辑入《昭代丛书》,改称《而庵诗话》,后收入《清诗话》中。徐氏说诗深入浅出,力求雅俗共赏,启人心思,亦有穿凿附会处。常“就今之所寡有者以说之”,尤重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刊行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然《四库全书》仅存目,《提要》谓“其说悠谬支离,皆不可训”。各体诗前均有一二百字简要说明。清康熙初年有九诒堂刊本、青畏堂刊本、南山堂翻刻本、康熙五年(1666)文茂堂刻本、乾

隆二十三年(1758)文茂堂重刻本,后有致和堂重印本、乾隆二十四年崇德堂刊本,皆二十二卷。另有九卷本。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樊维纲校注《说唐诗》,前有校注者前言《徐增和他的〈说唐诗〉》、《校注说明》,又附张潮《〈而庵诗话〉小引》、《〈而庵诗话〉跋》及《徐增其他论诗言论》三条。(朱明伦)

【唐诗评选】唐诗选评本。四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卷一乐府歌行,卷二五言古诗,卷三五言律诗(附五言排律)卷四七言律诗,共选一百五十余人,诗作约五百四十余首。七言律诗初、盛、中、晚各段较平均,其他各体轻晚唐。王氏选诗注意到不少小家,但有时却忽略了韩愈等大家,王夫之评语精辟透彻,胆识、见解过人,不因人废诗,能注意到唐诗与前代渊源关系。偶也有偏激之语。此书是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最重要唐诗选本之一。有清长沙刘人熙刻本与民国间所刊《船山丛书》本。(徐晓氏)

【唐诗体经】唐诗选注本。四卷。清吴廷伟、顾元标选注。廷伟字端人,天都(今甘肃境内)人;元标字天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二人均生活在清康熙年间。书前有张玉书、吴廷伟、顾元标序文各一篇。吴廷伟选篇目,顾元标作注。此书专选唐五七言律绝,重初、盛唐而轻中、晚唐,该书评语、注释、圈点兼备,有作家小传,评语多评作品。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3)刊本。(徐晓氏)

【中晚唐叩弹集】一作《唐诗叩弹集》。唐诗选评本。十二卷,续集三卷。清杜诏、杜庭珠撰。诏字紫纶,锡山(今江苏无锡)人;庭珠字诒穀,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前有秦松龄《序》、杜诏《自序》、杜庭珠《例言》。此书从康熙四十三年(1703)开始编选,至康熙四十四年结束。专选中、晚唐诗,自长庆以下,共选三十七家,一千六百十四篇。取陆机《文赋》“抱景咸叩,怀响毕弹”之意,名为《叩弹集》。杜庭珠《例言》说明选诗标准:“《品汇》以浑成含蓄为宗,是选以才调风情为主。”后来补选了李绅等七十六人诗,共二百六十五首。此书选白居易诗一百三十首,为全书最多,评价也最高。书中有作家小传,时有题解、评点、双行夹评、训释和订正。时引他人诗话中评语,亦多已见。有清康熙间采山亭刻本。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有影印本。(徐晓氏)

【才调集笺注】唐诗笺注本。十卷。清吴兆宜撰。兆宜,松陵(今属江苏)人,复社盟主、词家三绝之一吴兆骞之弟,生活在清康熙年间,此书前有韦毅原序,除总目外,有分卷目录,还有清和同《题记》。书后有吴兆宜之子吴根臣和同乡李澄跋文各一篇,叙述编撰经历。此书“句各有注,详其出处,又考其里居官爵,人为之序,俾读者寓目易了”(李澄跋文

语)。笺注详略适当,明白易晓。有清吴惠叔抄本。(徐晓氏)

【寒瘦集】唐诗选注本。清岳端撰。岳端或作袁端,或作蕴端,字正子,一字兼山,号玉池生,别号红兰室主人,清宗室。长白(今辽宁境内)人。此书只选孟郊、贾岛二人诗,无卷数。内题“长白岳端兼山选评”。书前有孟郊、贾岛小传各一篇及凡例目录各项,共选诗八十二首,五言诗占主体,书中有朱墨套印的圈点和评语,评语精炼,多己见,既评作品,亦评作家。书末有作者《后序》一篇。有清刊本。

(徐晓氏)

【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唐诗笺注本。一作《梅绕庄笺注唐诗七言律》。六卷。清赵臣瑗撰。臣瑗字二安,蓉江(今江苏江阴)人。岁贡生,约生活在康熙年间。此书选六百余首唐人七律诗。卷一选收苏颋、岑参、王维、李白等人诗,卷二只收杜甫诗,卷三选收刘长卿、王建、刘禹锡等人诗,卷四选收李商隐、温庭筠、赵嘏等人诗,卷五选收刘沧、许浑、皮日休等人诗,卷六选收罗隐、韦庄等人诗,选目初、盛、中、晚并重,多取工妙稳练之作。好句有圈点,还有详细的笺注、评释,但精辟不够,缺乏己见。评诗重章法结构。有山满楼原刻本。(徐晓氏)

【唐诗贯珠】又名《唐诗贯珠笺释》。唐诗七律选集。六十卷。清胡以梅撰。以梅字燮亭,清康熙年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此书选唐人七律二千四百首,初、盛、中、晚各时期不偏废,“若夫初、盛之粗疏肤浅失律意者,中、晚之空虚卑弱无赋致者,无益于后者,不敢泛录”(自序)。诗分类编排,有数卷一类,有一卷数类,计分“帝京”、“旅怀”、“赠别”、“咏史”、“亲情”、“感怀”、“闺情”、“艳情”、“山水”、“古迹”、“春”、“秋”、“禽”、“兽”等八十类,内容繁富。诗后有笺注,笺释典故,分析章法。此书为规模较大的唐人七律选本。有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胡氏素心堂刻本。(朱明伦)

【大历诗略】唐诗选集。清乔亿撰。乔亿(1701—1788?),字慕韩,号剑溪,宝应(今属江苏)人。国子监生,著述颇多。该书选辑开始于1757年至1758年间,至1772年完成。共六卷。共选三十二人,五百二十六首诗。入选诗人有小传,诗后有评语,好诗句有圈点,也有旁批,批语精粹。作家末有总评。此书既是唐诗选,也是研究大历年间诗的重要著作。有乾隆安居乐玩之堂刊本。(徐晓氏)

【唐人省试诗笺】唐诗笺注本。三卷。清张桐孙撰。桐孙字介封,堂邑(今属山东)人。约生活在乾隆年间。此书专选唐人省试诗,五言六韵占主体,五言四韵和五言八韵间有数首,附录于后。书前朱辉

珏《序》,对此书推崇备至。然而此书只是从《文苑英华》、《唐诗集》、《唐诗类函》、张之象《唐诗类苑》、毛奇龄《唐人试帖》等选本中择其雅驯者而成。有笺注,无评点。方法上仿效李善注《文选》之例,但注典故,间疏文义,有时也采用毛奇龄《唐人试帖》注。

(徐晓氏)

【唐省试诗笺注】 唐诗笺注本。十卷。清陈忞撰。忞字言扬,海宁(今属浙江)人。贡生。以黄宗羲为师,查慎行与其友善。此书专选《文苑英华》中唐人省试诗,以为当时士林应试之用。书前有沈如淳《序》,另有《省试诗》一文说明诗体,并附州府试情况。所选皆五言,未必皆为大家。有评释、圈点、旁批,详其作法,品其高下,辟其褒讹沿谬。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学海楼发兑本。

(徐晓氏)

【唐诗律笺】 唐诗笺注本。二卷。清朱琰撰。琰字笠亭,海盐(今属浙江)人。约生活在乾隆年间。此书专选唐人应试之作,皆为五言排律。书前无序无跋,只有目录,附《试律举例十二则》,述试律作法。不录初唐诗。只录盛、中、晚三代诗,从王维选起,至无名氏止。所选未必大家、名家,有很详的题解、笺注,有作家小传,无评语。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

(徐晓氏)

【试帖纂注】 唐诗注本。四卷,补编一卷。清范文献、黄达、王兴模撰。文献字瀛山,达字海槎,兴模字匏如,皆云间(今上海松江)人。约生活在乾隆年间。此书内题“唐人试帖纂注”。前有目录和王兴模序文一篇。此书选唐人试帖诗三百余首,以应当时科举考试之需。有笺注附诗后,无评语。篇中援用典故处,特加引释,以便检阅,题必考订来历,唐人或使时事,或引古语,悉于题下注明。唐制命题有不尽限韵者,听举子自拈题字为韵,故编者以平韵为准,仄韵从删。有清宝奎堂刊本。

(徐晓氏)

【唐诗笺注】 唐诗笺注本。十卷。清黄叔灿撰。叔灿字牧村,虞山(今江苏常熟)人。书前有沈德潜序及作者自撰凡例。此书无总目,有分卷目录,书中所选皆五、七言律诗和绝句。作者选诗悉志和音雅,能变化于规矩之中,而无乖乎正始。在每种诗体前有总论,为对诸家某种诗体的总评。此书笺注全在诗尾,以评为主,以笺注为附,笺释约而赅,疏解简而晰。有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徐晓氏)

【全唐试律类笺】 唐诗笺注本。十卷。清恽鹤生、钱人龙撰。鹤生字皋闻,号诚翁,人龙字海允,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生活于乾隆年间。此书无序,所选皆唐人五言六韵诗,以为当时科举考试之用。类笺,即把选诗按天文、地理、草木、鸟兽、虫鱼、珍宝、人事等类加以编排笺释,并有题解、旁批、圈点等

项,诗后评语极少。书后有武进恽宗和手编的《全唐试律类笺声调谱》,详细叙述五言排律声调。有清乾隆间刻本。

(徐晓氏)

【唐诗笺要】 唐诗笺注本。八卷。清吴瑞荣撰。瑞荣字匠珂,高淳(今属江苏)人。约生活于清乾隆年间。此书专为科举考试之用。选诗以盛唐为重而以中、晚唐为轻。书中有诗人小传、笺注、评语和圈点,评语精,多独到见解,评作品,也评诗人。有清乾隆金陵三乐斋刻本。

(徐晓氏)

【读雪山房唐诗钞】 唐诗选集。清管世铭撰。世铭字蕴山(一说臧若,号韞山),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书前有洪亮吉、赵怀玉和管氏自撰序文各一篇。此书从《全唐诗录》抄撮汇编而成,一般作三十四卷,《清史稿》卷一四八《艺文》四《总集类》作四十卷,今人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作三十卷。残本,其中五古七卷,七古六卷,五律二卷,七律二卷,五言排律五卷,五绝二卷,七绝六卷,共选三千九百多首诗,各具各体而篇什较富,每一诗体前有总论,多己见,无评点、笺注。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湖北官书处刊本。

(徐晓氏)

【唐贤三昧集笺注】 唐诗笺注本。清王士禛原选,吴烜、胡棠笺注。烜字退庵,棠字甘亭,均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分上、中、下三卷,前有姜宸英、王士禛原序,吴烜、胡棠序各一篇,此书有笺注,无评语,笺注者颇留意于古人死事活用之妙,多摭取散见于《全唐诗话》、《唐诗品汇》的评语入书。注释简略,不列异文,诗中所引故实有一事数说者,惟取最先最古,但其中诗意有系用后说者,亦取义关本文者为注。有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听雨轩刻本。

(徐晓氏)

【唐诗合选详解】 唐诗选集。八卷。清刘文蔚撰。文蔚字豹君,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约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书成于乾隆年间。全书选九十个诗人,三百六十八首各体诗歌,其中律、绝(包括排律)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偏重选盛唐。在每种诗体前,摘引诗评家对此体之评述。每诗都有题解、注释。注释分笺注(质实)、讲解(释),考核典雅,注释详明,于章句间条分缕析,得其肯綮。有的诗后附王世贞、沈德潜评语。此本有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1917年上海扫叶山房本。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以《唐诗合选》之名出版该书,删刘氏注释,改用杨业荣新注。后附高学安辑录《刘文蔚小传》。

(朱明伦)

【唐诗三百首】 唐诗选集。清孙洙编选。洙别号蘅塘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六年(1752)

进士。此书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八卷,共选唐代诗人七十家各体诗三百一十首。分体排列,卷一五古(附五言乐府)四十首,卷二、卷三七古二十八首,卷四七言乐府十四首,卷五五律八十首,卷六七律五十一首,卷七五绝三十七首,卷八七绝(附七言乐府)六十首。律诗、绝句约占全书四分之三,唐诗脍炙人口者多已入选。选诗最多诗人依次为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编者原序称此书本为家塾课本。然以其选目精粹,数量适中,久已成为家弦户诵之书。强调诗宜熟读,自然成诵,故笺注颇疏。后世为作注释或评点者甚多。本书为近代最通行之唐诗选本。有清江南状元阁刻本、咸丰二年(1852)小石山房刻本、同治九年(1870)常熟黄氏艺文堂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吟社刊本及多种铅印本。(朱明伦)

【才调集补注】 唐诗补注本。十卷。五代韦毅原选,清殷元勋、宋邦绥补注。元勋字于上,邦绥字逸才,号况梅,均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书前有韦毅《才调集叙》及宋邦绥、宋思仁、吴玉纶序文各一篇。宋邦绥《序》谈此书编撰始末。吴玉纶介绍流传情况云:“始刻于宋时沈氏,前明则有临安陈氏刻本,华亭徐氏钞本,虞山冯定远复得钱、叶、赵、宋诸家钞本,印证校勘,加以评点,蔚为完书。而笺注犹阙,读者惜焉。”殷、宋补注甚详,列于诗尾,未标何人注,只标明二冯评语。有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思补堂刻本。(徐晓氏)

【批唐贤三昧集笺注】 唐诗笺注批点本。三卷。清王士禛选,吴煊、胡棠笺注,黄培芳批评。培芳字香石,香山(今属广东)人。嘉庆副贡,少有诗名,“粤东三子”之一,学者称粤岳先生。书前有王士禛、胡棠、吴煊、姜宸英、王鸣盛等人序。黄氏之批评圈点用朱墨套印,评语多在眉端,也有旁批。目的在于略启作诗秘钥,不求与王士禛观点相合,故颇多精辟见解。有清光绪九年(1883)翰墨园刊本。(徐晓氏)

【唐贤三昧集评】 唐诗评点本。三卷。清潘德舆评点。此书有姜宸英、王士禛原序,盛符升,王立极后序各一篇。潘氏为诗论名家,有《养一斋诗话》,此书对原选者王士禛的编选宗旨与取舍眼光,提出批评,褒贬并存。如评及孟浩然作品时便指出孟氏一些具有“至高之境”的五言古诗多被选者所遗漏,另外还在王立极《后序》眉批上谓王士禛于“三昧”二字未甚了然。大多数批语则为对诗人诗作的评论,多为眉批,也有尾批。王维、孟浩然等大诗人有总评,亦有对诗人某一诗体的综评。(徐晓氏)

【唐诗三百首注疏】 唐诗选注本。六卷。清孙洙原选,章燮注疏。章燮字象德,号云仙,建德(今属浙

江)人。约生活于清道光年间。此书六卷,编排体例依照原选。书前有蕲塘退士孙洙《唐诗三百首题辞》、范廷懋《唐诗三百首注疏序》、子墨客卿《唐诗三百首注释序》、书末有章燮《跋》。其于注解、旁批,除保留孙洙原文外,并采各家之说增衍之。凡题之来历,作诗之年月,以及典故之出处,词义之贯串,皆博搜群书而详载之。间或参以章氏见解,酌为订正。注疏方式,五七古不论长短,皆分解数,律绝则不分。具体内容往往引前人注语,亦多引沈德潜、纪昀、唐汝洵、何焯、翁方纲、屈复、顾璘、刘辰翁诸家评语。有清永言堂木刻本。1957年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据此本断句排印出版。(徐晓氏)

【唐诗三百首补注】 唐诗选注本。八卷。清孙洙原选,陈婉俊补注。婉俊,道光年间人,籍贯上元(今江苏江宁)。此书有姚莹道光二十四年(1844)序。补注者对诸诗但论实事,以资检阅。若诗中义蕴之深,意境之妙,则未及评解。补入诗人爵里姓氏,置于诸公诗之初见者题上。其注分引本事以证之的“正注”,博采他书以相证的“互注”,有古人误用事者则辨之,借用事者则证之,有所疑误必索古本订正。故姚莹称赞其“考核援引,俱能精当”。四藤吟社主人称其“字梳句栉,考核精严,能令读者不假祭獭而坐获食蹠,津逮初学,功匪浅解”。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氏餐花阁刻本、光绪十一年(1855)四藤吟社重刻本(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注依《杜诗镜注》),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光绪本断句排印。1984年中华书局校点印行。(朱明伦)

【唐诗大系】 唐诗总集。近人闻一多编。闻一多(1899—1946),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留学美国,攻美术、文学。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抗战中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曾参加新月社,以创作新诗闻名。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汉乐府及唐诗诸方面成绩颇丰。朱自清等编辑其全部著作,由开明书店于1948年出版《闻一多全集》四卷。本书为闻氏遗稿,载于其全集第四卷《诗选及校笺》,系由余冠英整理成书。共收唐代诗人二百六十三家,古近体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全书自初唐至晚唐、五代,依经著者考证之诗人生卒年次序编排。首列诗人姓名,注以生卒年。后列诗人作品,间有笺注及校语。著者突出李杜、王孟、高岑、韩柳、白居易等主要代表诗人之作,兼顾一般诗人之优秀作品。本书之价值在于编者以揭示唐诗整体艺术源流发展为指归,注重唐诗艺术成就与艺术风格,在选诗、题解、考释、笺注诸方面均有显著特色。如其从恋歌、自然、天道、

人事诸方面选诗,一本抒情之原则,来揭示唐诗艺术流变,颇有见地。此书因系未定稿,著者于其所加笺释、校语前后详略不一,所注诗人生卒年亦有失误之处,后人多所辨正。今人整理此书者有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之《闻一多选唐诗》。(阎琦 姚敏杰)

【闻一多选唐诗】 唐诗总集注本。今人张志浩、俞润泉注释,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本书系对收入《闻一多全集》第四卷《唐诗大系》一书之注释、整理。依《闻一多全集》1983年新版排印,闻一多所列各作家生卒年及所选诗之题解、考释、夹注等一仍其旧,以保持原来面貌。对书中脱漏、讹误处,注者均依《全唐诗》或别本加以校正。如“吴象之”误为“吴豸之”,上官仪《八咏应制》误为《入咏应制》,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十六侍御相访》落“访”字等。又如刘德人,闻一多谓《全唐诗》中无其人,无其诗,注者断为刘德仁之误,《全唐诗》亦载其诗。本书对入选诗人之生平平均予简要介绍,对诗中疑难词句亦予注释。于闻氏原著多所补益。书前以郑临川所作《一部偏重艺术技巧的唐诗选本》为“代前言”,对闻一多唐诗研究概况、选诗标准、特点及出版本书之现实意义作出系统论述。后附由郑临川笔录之《闻一多说唐诗》,分“诗的唐朝”、“王绩”、“初唐诗”、“陈子昂”、“盛唐诗”、“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大历十才子”、“孟郊”等十题,系统反映出闻一多论唐诗之精辟见解。此文当与诗选参互阅读,以明互证之旨。(阎琦 姚敏杰)

【千首唐人绝句】 唐诗总集。为大型唐人绝句选本。富寿荪选注,刘拜山、富寿荪评解。广泛选录唐代各个时期作家代表作品,题材丰富多彩,足以展示唐人绝句的全貌。共收唐人绝句一千零七十二首,其中五言绝句三百二十二首,六言绝句十四首,七言绝句七百三十六首。是书注释简明确切。辟有“集评”一栏,附于每首诗的注释之后。对阐幽发微、拓展思路、提高欣赏能力颇有益处。附录《唐人绝句辑评》,分类选辑前人对唐人绝句的概论性评述。书前有富寿荪的《弁言》。1980年曾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后,富寿荪对选篇、注释作了大量增订,广辑旧评,补写新评,成为新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宋绪连)

【唐诗选】 唐诗选注本。今人马茂元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初版,后曾重印。茂元祖父为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有《韩昌黎文集校注》。茂元承家学,精熟唐诗文,曾有论文多篇,结为《晚照楼论文集》。此书虽为选本,实凝聚数十年读诗心得,贯穿以对唐诗史的系统认识,具有相当学术性。全书选唐诗人一百十五家,诗五百馀首,大抵承初盛中晚四

唐说,推重盛唐诗,强调气格、音调、韵致、神采,但能兼顾初唐、元和、晚唐诸派乃至二三流作者,故选目颇具特色。作者小传与注释常有发明与新见,尤为精粹。以其出版较早,曾一度风靡。重印本对选目、传、注均有所修订。(纪伟)

【唐诗选】 唐诗选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后多次重印。该书系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种,以普及为目的。选唐代诗人一百三十馀家,诗六百三十多首。其《前言》称“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但也收入一些思想性较差而艺术确有特色之作。体例为以人系诗,每位作家均有小传,不少小传为编者精心撰写,评价成就颇中肯,文字亦生动可读。诗的注释也较详尽细致。书前有长篇前言,缕述唐诗繁荣状况、分期,唐诗思想、艺术之特色及繁荣原因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纪伟)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唐诗研究专著。今人高嵩著。198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著者以王有三抄自巴黎图书馆,舒学加以整理之P·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为基础,进行认真细致核校之成果。全书先对诗集残卷七十二首诗全部予以注释,并于每首诗前作一简要说明,指出作品系年及内容。再从作品系年、字句补正、作者生年、文学价值、地名、作者押解路线、史实诸方面,对《残卷》进行考辨。末篇《据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再考怀素生年》,通过对怀素生平之考证,说明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之史料价值。本书前有著者“序言”,主要介绍《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大概情况及本书之成书过程。后附舒学整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序》。按高氏所笺释P·2555号写卷七十二首诗并非该卷的主要内容,更非全部内容。P·2555号写卷是连在一起中间无断裂之长卷。正面抄唐人诗一百五十六首(包括高氏所笺之七十二首),文两篇,背面抄诗三十二首,其中只有十六首见于《全唐诗》,一篇文见于《全唐文》。高氏不清楚此写卷全部内容,故其研究、注释不免有歧误之处。柴剑虹据P·2555写卷之照片将七十二首以外之诗文加以补录,并按原抄次序发表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四期。(阎琦 姚敏杰)

【唐女诗人集三种】 唐诗合集注本。唐李冶、薛涛、鱼玄机撰。今人陈文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本书收录唐女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全部诗作,并加校注。收录李冶诗十八首,以《全唐诗》作底本,参校何义门据述古堂影抄宋本精校《中兴间气集》、《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诸旧籍。收录薛涛诗八十九首,以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洗墨池刻本为底本。收录鱼玄机诗四

十九首,以影宋本《唐人小集》中《唐女郎鱼玄机诗》为底本,并以《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全唐诗》等参校。各卷诗篇次序,悉依底本。其底本所无而见诸他本,经考证后确为其人所作者则补入;底本虽有,经考证实非其所作者则径删去。诗后辑录部分评语。每家诗集后各附作家生平资料、诸家唱酬、评述、版本著录及旧本序跋题辞等。书前有陈文华撰写的前言,对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位诗人的存诗、著录、真伪等详加考证。

(宋绪连)

【唐诗三百首新编】 唐诗选注本。不分卷。今人马茂元、赵昌平选注。清人孙洙编选之《唐诗三百首》,是自清乾隆以来流传最广的选本。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不合理性逐渐显露出来。选注者认为“孙编《三百首》是一部以盛唐为正宗,大历为接武,提倡和平清远的诗风,严格区分唐、宋诗的界线的普及选本。书中确实选了不少‘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的雅俗共赏的好诗。然而,它的艺术趣味比较单调,所展现的艺术天地不够宽广,远远不能反映唐代诗歌丰富多彩的全貌,更不能从中窥见唐诗承传因革关系和发展线索。对于唐诗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如何撷取精英,以少总多,今天读者有着更高的历史主义的要求,是不可能从孙编《唐诗三百首》里得到满足的”。因而,此编“吸取了孙编《三百首》的经验教训,力图破除过去各种派别门户之见和一切理论教条的束缚,从唐诗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在可接受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微型断代选本的作用,选取各个时期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优秀诗篇,使之成为既是具有较高美学价值、欣赏价值,为初学者所喜闻乐诵的唐诗读本,同时对于有志研究的读者,它又可作为窥测唐诗发展概况的角度得当的窗口和引向堂奥深处的起步台阶”(皆见《前言》)。在作品编排上,采取按人和分体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每位作家之中按五言、七言、古体、近体次序排列。在注释方面,力求把释事、释义和评文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注释之外有作者小传和评述。小传简要地介绍诗人生平及其创作成就,评述或综论全诗思想艺术,辨析某一问题,或辑录有关资料与注释相发明。此书虽属普及性读本,但其中亦间及考订,订正了前人一些谬误。如《旅次朔方》(客舍并州十年霜)一诗过去一直认为是贾岛所作,今据令狐楚所编《御览诗》断为刘皂,即是一例。此书由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瀛奎律髓汇评】 研究专著。李庆甲集评校点。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卷出版。《瀛奎律髓》系元方回选评之一部大型唐、宋律诗选集。

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今属安徽)人。宋景定间别省登第,曾知严州。入元,授建德路总管,寻罢官。工诗文。论诗宗奉“江西诗派”。有《虚谷集》,已佚。现存著述尚有《桐江集》、《桐江续集》、《续古今考》、《文选颜鲍谢诗评》等,《瀛奎律髓》为其代表著述,比较全面地体现出宋代“江西派”诗学观点。本书正文及方回原评以明成化三年(1467)紫阳书院刻本为底本,参校以元至元二十年(1283)刻巾箱本,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石门吴之振黄叶村庄刻本,清嘉庆五年(1800)侯官李光垣校刻本等版本。汇评部分除录方回原书评语外,尚有冯舒、冯班、陆貽典、查慎行、何义门、纪昀、无名氏(甲)、许印芳、无名氏(乙)等十馀家评语。所录评语多系对入选诗歌而发,仅有部分系对前人评语而发。如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方回评曰:“老杜七言律诗一百五十九首,当写以赏玩,不可暂废。”冯班评曰:“拘情景便非高手。”均系对选诗之评语。然纪昀则评曰:“杜诗亦有佳有不佳,一百五十九首皆‘不可暂废’,是何言欤?”显系对方回评语之评。如此汇评,可使读者于比较中加深认识。此外,著者尚于书中“例略”部分一一指明方回原书存在之诸多问题。本书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阎琦 姚敏杰)

【唐宋诗举要】 唐宋诗选注本。近人高步瀛选注。步瀛,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曾受业于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故其诗论受桐城派观点影响很深。本书五十年代前曾排印出版,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上册为古体诗,下册为今体诗。本书在王士禛《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今体诗钞》三种选本基础上,精选唐诗六百十九首,诗人八十四家;宋诗一百九十七首,诗人十七家。所选唐诗比例较大,均系具有代表性之诗人诗作,其中李白、杜甫之诗选录尤多,凡二百馀首。注释部分为选注者用力最多之处,亦最具特色。著者采用集注方法,于诗人评传、诗歌题解及评注之中,均有选择地征引了许多资料及各家注本。其中多引用王士禛、沈德潜诸人之观点,尤其大量征引桐城派代表人物姚南青、刘大櫆、姚鼐、方东树乃至曾国藩、吴汝纶诸人之言论。然亦常于注内加入己见,持论公允,颇有创见。对于历史事实、地理沿革、典章制度诸方面之注释,著者多引原始材料,严谨翔实。

(阎琦 姚敏杰)

【唐才子传】 诗人传记。十卷。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在朝中任省郎之职。有诗集《披沙集》,已佚。本书为最早一部唐诗人传记专书。

成书于元成宗大德甲辰(1304),为著者早年所作。全书立诗人专传二百七十八篇,附带论及之诗人一百二十人。共述评初唐至五代较为重要诗家三百九十八人。大致依时代、科第先后排列。各篇内容大抵包括传略、诗评、著作流传情况及附论四部分。本书取材颇为丰富,采集史书、文集、笔记、小说之材料甚多,取材亦较可信。如二百七十八篇传记中,即有一百二十余篇采自《新唐书》,其中八十余篇取自《新唐书》列传、附传,四十余篇采自《新唐书·艺文志》之附注。对诸书均未见载者,著者即于诗人作品及他人赠酬诗中勾稽其生平事迹。本书保存有大量久佚唐人登科记材料,对考订诗人生平事迹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传记诗评部分,涉及各家诗歌艺术成就及风格流变,多取前人旧评,参以己见。但著者于材料之采集运用方面,亦多有失误,节录旧史之处,亦间有割裂原文之弊。本书原为十卷,明修《永乐大典》将其全收“传”字韵内。至清中叶,《永乐大典》“传”字韵各卷适佚,十卷单刻本亦于国内失传,四库馆臣遂于《永乐大典》残存各卷杂引辑录,得二百四十三人,附传四十四人,厘为八卷,编入《四库全书》。清光绪间杨守敬出使日本,意外访得十卷元槧,黎庶昌以珂罗版据以影印,传入国内。日本尚有据元槧翻印之“五山版”本、《佚存丛书》本。《佚存丛书》本传入中国后,学人以《四库》八卷本与之对校,先后刻印出数种,较佳者有三间草堂本(嘉庆十年,1805),《指海》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代学者研究、整理此书者,日本有布目潮讽、中村乔合著之《唐才子传之研究》(日本亚洲史研究会出版,1972)。国内有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等。

(阎琦 姚敏杰)

【唐才子传校笺】 诗人传记校笺本。今人傅璇琮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元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版本流传情况复杂。清光绪间杨守敬出使日本所得流传十卷元刊本,后经黎庶昌以珂罗版据以影印,此乃最佳版本。本书即以黎氏珂罗版影印本为底本,以元刊十卷足本之日本“五山版”本、“正保”本与清人校辑之《四库》本、“三间”本、《指海》本、《佚存丛书》本,相互参校,择善而从。辛氏于其引论中称其撰传时“游目简编,宅心史集”。证诸书中传记,大抵可信。所采材料甚丰,有些属佚失已久之珍贵材料,可惜辛氏未提供任何线索,且其于材料之搜罗排比中随意性颇大,书中疏误俯拾即是。本书笺证者广搜博求,探赜索隐,基本考明原传材料之渊源。如《王泠然传》云“泠然,山东人”。两《唐书》均未为

王立传。《经籍志》、《艺文志》亦未著录。笺证者则检诸《唐摭言》,有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字书》,中有“山东布衣,不识忌讳,泠然顿首”语,遂明辛氏所本。复自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所载墓志《唐故右威卫兵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序》中检得“公讳泠然,字仲清,太原人也”语,适补原传无字号之疏。笺证者不惟以材料准确为务,且于原传多所补益。有的考证不仅对诗人研究有重大促进,且使某些久悬未决之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如《孟浩然传》有张九龄署为从事之记载,仅此而已。笺证者则通过孟之数首诗作考知,诗人于荆州幕府曾沿江东下,直抵扬州。八月到洞庭,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此便使诗人两人长安途经洞庭皆非秋季,未及见“八月湖水水平”景象之疑得以解开。笺证者并非无限征引材料,而是博而有节。对原传中之疑点、误点,均考诸信实可靠之史料,予以辨析纠正。如《王维传》谓王维开元十九年登第,笺证者考以王维事迹,得知“十九”乃“九”之误。对原传中屡载诗人轶事,笺证者亦考诸史籍,或引前人考据成果,辨别真伪。本书对原传底本中之异体字、简体字、俗体字均予改为通用体。本书之笺证,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征引专著、刊物材料达四百六十种之多,可谓唐诗史料研究成果之集大成。

(阎琦 姚敏杰)

【唐才子传校正】 诗人传记校本。今人周本淳校正。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日本天瀑山人翻刻《佚存丛书》本为底本,以陆芝荣三间草堂本为主要对校本,参校南京图书馆所藏两种日刊本、《指海》本与《粤雅堂丛书》本,对元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进行校正。校点者仅就《佚存丛书》本误者出校,择善而从,一般不涉及他本误字。对原书材料来源,尽量笺其出处,未罗列原文。本书前言系校正者对辛文房及其所著《唐才子传》之评价。书后附录《唐才子传》各种版本序、跋及有关资料之校点。

(阎琦 姚敏杰)

【唐诗研究】 唐诗研究专著。近人胡云翼著。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分八章,系统论析唐诗。首章导言,分析古今对于唐诗的误解及唐诗的意义与特质,旨在消除传统的笼统、曲解唐诗之观念,以科学分析方法、文学欣赏的角度研究唐诗。第二章论唐诗的来源及背景,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及民族融合之作用,追溯唐诗来源;复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论述唐诗之背景,颇有见地。第三至第六章依高棅“四唐”说,分期予以论述。著者对各期代表作家均有论列,亦兼论许多一般作家之佳作;注意结合时代政治、军事背景,探索诗歌艺术发展源流;分析论述能有选择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且多断以己

见。第七章专论唐代妇女的诗,分“宫人的诗”、“闺人的诗”、“诗人的诗”、“妓女的诗”四类分别论述。第八章附录唐诗人小传,为《全唐诗》六百餘重要作家立传,虽极简略,然其著者用功之勤即此可见。

(阎琦 姚敏杰)

【唐代文学】 研究专著。近人胡朴安、胡怀琛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共分十章论述唐代文学。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书用途及范围。著者于文学范畴之界定,有其独到之见。如向为旧文学家推重之韩愈《原道》,柳宗元《断刑论》,著者以为非文学作品;反之,向为旧文学家轻视之李朝威《柳毅传》,著者则以为是文学中绝妙的作品。第二章唐代文学一览,论述唐文学之分期、体裁。第三章至第九章,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杂文、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唐代文人的轶事等。第十章由“应该细读的书目”与“预备参考的书目”两部分列出“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本书是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之一种。

(阎琦 姚敏杰)

【唐诗概论】 唐诗研究专著。今人苏雪林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国学小丛书》之中。全书共二十章。首章即从学术思潮之壮阔、政治社会背景之绚烂、文学格调创造之努力等方面归纳唐诗隆盛之原因;第二章唐诗变迁之概况,在充分论述历代唐诗分期之说后,分唐诗为五期:第一期系以王绩、“四杰”、沈宋、陈子昂、张九龄为代表之继承齐梁古典诗风时期;第二期系以李白、王孟、高岑、李颀、王昌龄、崔颢为代表之浪漫主义隆盛时期;第三期系以杜甫、大历才子、韩孟、元白、张王为代表之写实文学诞生时期;第四期系以温李、杜牧为代表之唯美主义发达时期;第五期系以韩偓、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为代表之唐诗衰颓时期。著者对各期诗人之分论,多能从艺术发展规律、风格流派演变方面分析论证,识见精到,评价公允。本书论列唐诗,注意详论一流诗人及其作品,亦兼顾二、三流诗人及其诗作。既有宏观描述,亦有微观分析。是“五四”后较早对唐诗进行全面系统理论总结之研究专著。

(阎琦 姚敏杰)

【唐代诗学】 唐诗学专著。近人杨启高著。1935年南京中正书局印行。杨启高,四川南川人,生平不详。本书写成于1935年,分自序、纲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影响七部分。“自序”部分概述唐诗风格流变。“纲领”分唐诗背景、渊源、流派、特质、体例;“初唐”分贞观诗学与武后诗学;“盛唐”分盛唐特色、开元诗人、李杜比较、天宝诗人;“中唐”分大历诗风、元和诗学、长庆诗学、韩白综叙;“晚唐”分大中诗风、咸通后诗;“影响”分宋代、金元、明、清、现代。著者

论唐诗之盛,从时代背景入手,探索经济、政治、文化原因;论唐诗渊源,上溯诗经、乐府、楚辞、汉赋,再以正始、太康二派分叙其影响;论唐诗特质则从作家之多、诗体完备、风格显著、思想丰富几方面把握;论“四唐”之诗,著者重视一流诗人之论述,单列“李杜比较”、“韩白综叙”二章。然亦兼论二、三流诗人。对受时代影响之诗歌流派之形成、风格之变化论述尤详。注意结合作品立论,录诗甚多。本书文字虽颇简略,然唐诗发展之脉络勾勒甚明。有些议论似嫌粗率。

(阎琦 姚敏杰)

【唐诗杂论】 研究专著。近人闻一多著。本书收集著者唐诗论文九篇。《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二篇,系对初唐诗风之整体述评;《四杰》、《孟浩然》、《贾岛》、《杜甫》四篇,属诗人专论;另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两种年谱及译诗评论《英译李太白诗》一篇。闻氏集学者、诗人于一身,故其论诗,多能从诗歌艺术发展源流及诗人创作艺术特点、风格特色诸方面论证分析,识见精审独到,论语新颖警策,其观点多为现代学者所征引。书中所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对杜甫生平事迹考证多有发明;《岑嘉州系年考证》一文系整理考证岑参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之首创,其“以事为经,以诗为纬”,颇有卓见。《英译李太白诗》系对日人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之评论。本书由余冠英结集,编入《闻一多全集》第三卷。古籍出版社1956年尝以“闻一多全集选刊”出版单行本。

(阎琦 姚敏杰)

【读全唐诗札记】 唐诗学专著。今人岑仲勉撰。著于1939年,收入著者所撰《唐人行第录》。本书收著者读《全唐诗》所作札记四百九十九条,依康熙原刻《全唐诗》函册次第编列。著者以《全唐诗》为底本,对其有疑者参校以汲古阁刻《盛唐四家诗》、《唐四家名集》、《五唐人诗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等唐集。尤对《全唐诗》中“篇章复累(除已注明者),小传疏舛”之处,或质疑,或辨正,间有校勘补证,均持之有故,资料翔实。如一函二册系《钱中书侍郎来济》为唐太宗诗,其注云:“一作宋之问诗。非。”同函十册则收为宋之问诗,注云:“一作唐太宗诗。”著者考诸《旧唐书·来济传》及同函八册许敬宗《奉和圣制送来济应制》诗,推断此系高宗诗,并非太宗或宋之问所作。本书于诗人小传考证纠谬方面,多取史料辨证,依据充分。对《全唐诗》中许多前人习而不察之舛误多所厘正,于研治唐诗或唐史提供许多资料、线索,颇有参考价值。

(阎琦 姚敏杰)

【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 唐诗学专著。近人刘开荣撰。“唐代的诗歌,曾忠实地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全貌。许多史家所不愿记录的史实,许多会抵

触当轴的资料,许多当代社会黑暗面的现实,都不曾逃出诗人注意力的范围,都不曾瞒过诗人底犀利的眼光。他们奋起如椽的巨笔,戳破了社会的黑暗面,和恶劣的环境挑战;秉着正义的火炬,照耀黯黯的尘寰,使千百年后的今代人,仍然感受那种耀眼的光芒,我们沿着这光芒的丝缕,得以窥见唐代社会全貌”,作者“用科学方法整理凌乱的材料,使我们得看见唐代妇女生活的全貌”(陈国桦《序》)。此书共分九章,一、引论。介绍唐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及本书研究范围。二至三章,论述劳动妇女。评介采桑、纺织、浣纱、采莲、采菱等劳动妇女,船娘,农耕女工,负薪、负盐女工,酒家女,流浪歌女等人生活在唐诗中的反映,并评介了战乱中的妇女生活及劳动妇女的不平。四、民间一般妇女的日常生活。包括少女生活、婚后生活、出妇、弃妇、寡妇及商人妇的生活。五、民间一般妇女的精神生活。包括已婚妇女的精神生活、恋爱社交生活,并介绍了妇女妆饰与时尚。六、妓女生活。介绍了官妓、家妓、宫妓、私倡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其教育技艺。七、宫廷妇女及贵族妇女生活。包括皇后宠妃、公主、宫中一般妇女与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与文学创作。八、女冠生活。此章介绍唐诗中所写的女道士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与游仙诗中的妇女生活。九、结论。当时社会对于女子的感觉及要求,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此书虽然意在挖掘唐人诗中所描写的妇女生活,从另一面也可见唐诗内容的丰富及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书前除陈国桦序外还有陈中凡、费尔朴及作者三序。此书由商务印书馆1943年排印出版于四川成都。

(王学泰)

【唐代诗歌】研究专著。今人王士菁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著者修订,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重印。本书以诗人为纲,以史为线索,对唐代诗歌进行系统论述。论初唐诗坛,著者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中心人物,进而通过对王绩、四杰、沈宋、杜审言、刘希夷、张若虚、陈子昂等诗人之论述,揭示唐诗由初入盛之变化发展。对盛唐诗坛之论述,以李白、杜甫分别代表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高峰为中心,兼论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张旭、孟浩然、王维、李颀、崔颢、王翰、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等诗人。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揭示盛唐诗坛何以为盛之社会原因以及诗人在封建社会之悲惨命运。中晚唐诗坛,从对元结以及《篋中集》诗人之论述到对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的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张继、顾况、戴叔伦、张籍、王建等诗人之论述,进而论及元白提倡为政治服务之新乐府创作,以及韩愈、孟郊、贾岛、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

温庭筠等诗人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追求艺术技巧上之努力等。亦论及李山甫、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与韦庄对唐末农民起义之不同态度。本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对诗人之评析,多引其作品,言之有据,论断公允,于诗人及其作品之人民性论述尤详。

(阎琦 姚敏杰)

【唐诗研究论文集】唐诗研究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论文三十七篇,作者有刘开扬、王运熙、陈贻焮、俞平伯、刘大杰、萧涤非、郭沫若、游国恩、王拾遗、缪钺等三十二人,基本反映出五十年代国内唐诗研究之实况。本书论涉范围较宽,研究方法灵活多样。涉及初、盛、中、晚四期。有一流诗人之专题研究,亦有二、三流诗人之概括论析;有诗人作品之宏观研究,亦有诗人生平行迹之微观考证,其中不乏颇有卓见之论文。书末附苏联学者H.T.费道连柯《中国唐代的诗歌》,重点评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诗人创作,反映出国外学者研究唐诗之成果。

(阎琦 姚敏杰)

【唐史馀编】研究专著。今人岑仲勉著。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成稿于1944年。著者除研究正史外,对其他杂史、金石文及近代发现之诸种史料,进行相互印证与切实考订。或据别史以补正史,或据正史以考证别史,或据唐史以考制度,或据唐史以考证他书之误,或纠正诗文故实沿袭之误,或校前代史家之误,等等。取材富赡翔实,考证细密严谨,为著者以史证史、以史证文代表作之一。如“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一条,对《韩昌黎集》卷二〇《送幽州李端公序》之旧注所谓“李端公,李益也,时佐幽州刘济幕”提出质疑。著者考诸韦应物《江州集》有《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诗》,而韦氏卒于贞元初,《旧唐书》有关李益曾佐刘济幕及刘济授幽州节度时间当为贞元元年之记载,推知李益佐幽州刘济幕之时间为贞元初年。这与《韩昌黎集》旧注谓韩序作时为元和元年不符。著者既而考诸唐时称谓习惯及多种史籍记载,指出韩文旧注“不类者”、“可疑者”、“无据者”、“应辨者”、“当考者”多处,证明韩文“李端公”并非李益。其他如“补高品传”、“事始”、“岑文本兼中书侍郎”、“刘禹锡诗之韩湖州”、“司空见惯”、“令狐德棻宜州人”诸条,均可体现著者考证方法之特点。本书共收条目二百四十二个,引用书目约九十种。

(阎琦 姚敏杰)

【唐诗小札】唐诗学专著。今人刘逸生著。196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订出版。1980年再版。本书共收唐诗一百零八首,加以赏析阐释,选诗多系绝句或律诗,文字较短。著者于每首诗之

思想内容、创作背景、艺术风格诸方面,均有扼要精到之解说,抓住重点,深入浅出,要言不烦。著者注意寓最大限度之思想容量于简洁洗炼的文字之中,表现出深入研究之功力。文笔生动优美,通俗易懂。诗歌鉴赏部分多表现出著者艺术感受之细腻。著者尚多注意从诗歌结构章法、遣词造语及形象思维之规律诸方面把握其艺术特点,颇有新见。

(阎琦 姚敏杰)

【唐代诗人丛考】 唐诗学专著。今人傅璇琮著。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重印。本书对唐高宗到唐德宗前期间之主要诗人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翔实审慎之考订与辨正。考证之诗人有杨炯、杜审言、王翰、王湾、王之涣、崔颢、常建、李颀、王昌龄、高适、贾至、张谓、张继、李嘉祐、刘长卿、韦应物、刘方平、戎昱、戴叔伦、顾况、皇甫冉、皇甫曾、钱起、韩翃、卢纶、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耿纬、司空曙、李端共三十二人。如对刘长卿事迹之考辨,著者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传记资料之不足给予补充;对姚合《极玄集》所载刘长卿进士及第时间与“终随州刺史”之记载提出驳难;对《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刘长卿两次贬谪之撰次错误给予纠正。考辨结果使旧载矛盾得以解决,相沿之讹误予以澄清,诗人生卒籍贯得到确定或订正,基本仕履得以理清。或使被忽视之诗人得以重视,或使被忽略之创作恢复应有之地位。同时,著者尚对所考诗人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和影响兼有论述,揭示当时诗坛诸如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等特有文学现象,提出一系列值得研究者重视之唐诗论题。如《杨炯考》、《杜审言考》,以二诗人所分别代表之“初唐四杰”与“文章四友”两个文学流派,展现武后朝诗坛情况及其历史嬗变,很有价值。著者对裴行俭与“四杰”关系之详细考辨,对于重新评价“四杰”之思想及为人提供了重要依据。再如对盛唐诗人李颀、常建等人之考证,均能从诗人创作全貌出发,全面切实地概括出诗人创作之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而非以孤篇简单归类。著者对大历时期诗人之考辨用力最勤,不仅概括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十才子”诗人和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在诗歌创作内容与风格上之不同,而且具体到对每个诗人事迹、创作活动之全面考辨,对于扭转以往忽视大历诗坛之研究格局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著者还结合实际情况,从诗人在当时诗坛上之地位、作用及影响来考察文学潮流,如对开元名相张说的论述;而对王湾,则以其名篇《次北固山下》所表现之艺术特点,肯定其在新旧诗风交替过程中之重要意义;亦有对所考诗人创作特点之考察,进而提出新见。此书是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审慎考辨唐代诗人事迹及文学活动之学术著作。它不仅澄清了唐诗研究中许多疑难问题,且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观点、新资料,尤为重要是从研究格局、研究方法诸方面为唐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新课题。

(阎琦 姚敏杰)

【唐诗人行年考】 唐诗学专著。今人谭优学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选唐诗人王翰、孟浩然、李颀、崔颢、王昌龄、高适、储光羲、李益、张祜、赵嘏共十家,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之名,一一考索其生平行事、交游著作,按年加以缕述,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年谱,却有年谱之实。每人在考述完毕之后,并为撰新传一篇,系统概叙其人生,也是一种新创形式。此书问世后,颇受欢迎。作者乃又著《续编》一册,对宋之问、沈佺期、王维、戎昱、王建、许浑、雍陶、薛逢、马戴、薛能、李频、郑谷、崔涂等十三人生平事迹作考订叙述,体例如前,于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其学术质量似略逊于前编。

(纪伟)

【唐代文学研究】 研究专刊。原名《唐代文学》。创刊于1981年,由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与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合编。1982年改名为《唐代文学论丛》,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西北大学中文系主办,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编辑,成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1988年始更名为《唐代文学研究》,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西北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本刊系不定期刊物,亦为国内专门研究唐代文学之唯一刊物。刊登有关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之各类文章。本刊自创刊起,即不断开拓研究范围,其中既有对唐代文学之宏观研究、理论探索,亦有对诗、词、曲子词、散文、传奇、变文、笔记等体裁之专题研究;既有对诗文流派及作家、诗人之述评,亦有对具体作品之赏析、诠释,及对作家、诗人生平行迹、文学活动之考辨;亦有关于海外学者研究唐代文学成果之评介等。此刊于促进唐代文学之深入研究有重要作用。

(阎琦 姚敏杰)

【唐诗论文集】 论文集。今人刘开扬著。1961年初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初版收入著者1956年至1958年三年间所写七篇论文。重版后对原有论文略作修订,并增收论文九篇,增收部分系初版后著作的研究成果。该论文集有对诗人生平与创作情况之综合论述,亦有对诗人创作之专题讨论。书中论文写作时间跨度虽大,然尚能一以贯之。由于著者能够不泥定说,自出机杼,故多独到见解。在研究方法上,亦颇多创新,如关于初唐四杰之论述,著者较早将“四杰”作为一个诗人群体进行综合考察与系统研究,且使论述与考证有机结合。

(阎琦 姚敏杰)

【唐诗通论】 唐诗研究论著。今人刘开扬著。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卷头语”旨在说明本书写作旨趣。著者吸收前人特别是鲁迅对唐诗基本认识之观点,从“唐诗是唐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出发,分析评论具有代表性之唐代诗人及诗篇。第一章为总论部分,从宏观上对唐诗作概括叙述,涉及唐诗发达诸因素、唐诗的品律和分期及唐诗的体裁和声律等。第二至第四章,分别论述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时期之诗,每章之首均有导论,继而评介有代表性之诗人及其作品。著者善于吸收前人成果,不泥成说,断以己见,如对“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大历十才子”、韩愈以及晚唐诗人韩偓等之论述均颇有特色。本书在诗人及其诗作之选择与论述之详略上亦有特色,如所选诗人不拘于一般文学史之涉及范围,对常为人所忽视之诗人,诸如初唐王珪、魏徵、王梵志,盛唐储光羲、王翰、崔国辅,中唐姚合、卢仝,晚唐薛逢、赵嘏、薛能、吴融、方干等人,多有论及。此外,还选择了上官婉儿和薛涛二位女诗人,以及寒山、拾得、皎然、齐己、贯休诸诗僧。本书是学术界结束极左思潮干扰后第一部关于唐诗发展史之研究专著。(阎琦 姚敏杰)

【晚照楼论文集】 论文集。今人马茂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收集著者作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有关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十八篇。其中有对作家作品之品评,如《论〈九歌〉》、《论〈古诗十九首〉》、《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谈杜甫七言绝句特色》、《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等,亦有理论问题之探讨,如《关于〈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说〈通变〉》、《从汉代关于屈原的论争到刘勰的〈辨骚〉》、《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论争》、《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等;亦有文献资料之考订,如《唐诗札丛》、《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三部分内容未予区分,依所论内容之时代先后编次。

(阎琦 姚敏杰)

【蜗叟杂稿】 论文集。今人孙望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著者曾发表于学报或杂志之论文七篇。首篇《王度考》,对《占镜记》之作者王度进行考证。著者通过一些史料,指出学术界长期以为王度即王绩之兄王凝之误,寻求所以致误之由,加以订正,进而论证王度、王通、王凝、王绩、王静等七兄弟之行次,推溯王氏世系。第二篇《韦应物事迹考述》,以《韦苏州集》之诗篇探索诗人生平。首先确定诗人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其次划分诗人一生为三阶段。对前人叙述韦应物生平之错误进行辨正,并对一些重要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第

三篇《莺莺传事迹考》,多方论证小说《莺莺传》中之男主角张生即小说作者元稹之替身,进而探索元稹抛弃莺莺而娶韦丛之曲折过程,提出在元稹与韦丛婚事上起媒介作用者,可能是李绅之看法。第四篇《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系为纪念诗人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而作。第五篇《元结评传》,原系为《元次山集》所作前言。叙述元结生平、家世,评介其作品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肯定其进步文学主张,分析其矫枉过正之处。第六篇《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批驳李贺为法家诗人、韩愈与李贺有师弟子名分关系之谬论,并对李贺生平提出新见。末篇《篋中集作者事辑》,从典籍中搜罗有关《篋中集》七位诗人之生平史实,哀集排比,弥补辛文房《唐才子传》中一些缺漏,亦对过去记载中之错误予以纠正。本书名称中“蜗叟”二字,著者写于1981年元月之“题记”中释云:“蜗叟,是为我今年已满七十岁而取的别号。”

(阎琦 姚敏杰)

【唐声诗】 唐诗学专著。今人任半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九十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十二章九十节之篇幅,从辞、乐、歌、舞四方面,对以唐为主兼及五代之五言、六言、七言等齐言歌辞,进行穷源竟委、广博深入之研究。著者一反以往唐诗研究重文轻声、无视声诗体用之弊,对历代有关唐代诗乐之资料予以爬梳,以其三十餘年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之深厚功力,为唐代固有的声诗之学建立起我国“声诗学”之理论体系。论述既重文人之作,亦重民间乐舞歌辞,而对以声为主的敦煌歌辞、敦煌乐谱、舞谱之见解尤为精辟独到。同时,对古今中外关于声诗之见解,亦多所评析。该本下编著录声诗格调,对一百五十四种诗调间之异同详加辨别。对其著录声诗之格调,分别明其字句、叶韵、平仄、和声、叠句、附加辞等,以为谱式。对每一诗调,既有举其要点之简单介绍,又有与诗调有关之古今各种考证资料。资料虽详略多寡有别,然足以说明诗调历史之演进。为唐代声诗及唐代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阎琦 姚敏杰)

【柿叶楼存稿】 论文集。今人刘开扬著。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所收论文、札记共十九篇。其中关于屈原、司马相如、蔡文姬之研究论文各两篇;关于陶渊明、庾信之研究论文各一篇;关于杜甫之研究论文三篇、札记六篇。另外尚有对中古时期之民谣论述一篇。关于屈原之研究论文系著者建国前所作,主要论述以往屈原研究中存在之问题,对屈原生平事迹、世界观等详予考辨论证。关于研究司马相如之论文,重点论述司马相如对汉赋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亦兼论及诗文。对于蔡文姬及其作

品,著者主要就诗人生平中某些问题与郭沫若、谭其骧展开争鸣。《关于〈临河叙〉及〈兰亭集序〉》一文,旨在考辨《兰亭集序》文之真伪。对陶渊明,著者简要评述其生平、为人、思想及诗歌艺术风格。对中古时期民谣,则结合民谣产生之时代背景论述其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对庾信,著者通过论述其生平与创作情况,充分肯定其诗赋在文学史上之地位。著者对杜甫之论述最多,其中既有对其“文”之论述,亦有对其诗之评析,多发前人所未见。札记六篇主要就杜诗个别篇目述其一得之见。本书在方法论上对于研究古代文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阎琦 姚敏杰)

【唐宋诗之争概述】 唐诗学专著。今人齐治平著。1983年岳麓书社出版。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以前,律诗与绝句尚未定型,体裁未备;自宋以后,历代诗人虽各有制作,各自成家,然大致不越唐、宋之范围。其间以时代风气之不同,诗人好尚之各异,遂致分唐界宋,聚讼纷纭,自南宋迄于近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历时八百年之久的争论。著者即以时代先后,分别总结南宋(附金、元)、明代、清代三大时期之争论,于结语部分,概述“五四”以来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毛泽东诸大家名人之论述。唐、宋诗之分野,非仅朝代之别,实由风格之殊,故著者多从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角度立言,多客观概述,少主观臆断。本书总结这一长期争论,就纵的方面而言,有助于了解南宋以来历代诗坛风尚之嬗变;就横的方面而言,则又可以了解唐、宋诗之特点,以及学唐、宋诗者分合异同之故。

(阎琦 姚敏杰)

【唐宋文学论集】 论文集。今人王水照著。1984年齐鲁书社出版。书中收论文二十三篇,其中涉及唐代文学者七篇,宋代文学者十六篇。唐代文学论文涉及唐诗发展与繁荣之原因、杜甫思想及其诗歌艺术特色、唐末作家韦庄生平事迹及文学创作活动、刘大杰受“左”倾思想影响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唐代部分)一书之教训等四个方面内容。宋代文学论文涉及面较宽,有对散文之综合论述,有对诗、词之总体评价,有对作家及其作品之个别评析,而对苏轼之论述所占比例最大。此外,尚有对宋话本之论述。本书系著者多年研习和讲授唐宋文学的心得之作,论涉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研究方法独特,多有新见。

(阎琦 姚敏杰)

【唐音质疑录】 唐诗学专著。今人吴企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本书集结著者唐诗研究论文及读书笔记共二十一篇,以资料考证见长。多数论文或补苴拾遗,或辨误纠谬,广征博引前人资料,提出新说。如对钱起诗集之考辨,宋代迄今著名

学者均发现其中必定混入他人之作。著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辨出钱集中竟有一百二十一首诗属钱起曾孙钱珙所作。又如著者根据《唐语林》记载韦楚老年龄与李贺年龄之比较,纠正了《诗薮·内编》所谓李贺诗模仿韦楚老之谬误。又从二人诗风相近之情况推知,韦楚老诗系模仿李贺。本书尚有对唐代诗选学之考论,如《“唐人选唐诗”的流传、散佚考》一文,对数十部唐人选唐诗集之流传、散佚情况进行考索;《唐代诗选学略论》一文,则论述唐代诗选学兴盛之原因及其研究价值。此外,著者对王建《宫词》之研究颇见功力。《王建〈宫词〉札迻》一文,对《宫词》中之名物、典章制度及宫廷习俗等,均予详细笺注,征引资料十分宏富。本书在考证方法上,注意微观与宏观结合,得出信实可靠之结论。又能参证史书释诗,将考证与校勘、训诂等手段结合起来。

(阎琦 姚敏杰)

【唐诗百话】 唐诗研究专著。今人施蛰存著。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唐诗话”、“晚唐诗话”四部分一百篇诗话组成,其中包括初唐十三篇,盛唐二十九篇,中唐三十五篇,晚唐十七篇。另有六篇属综论性质。四部分诗话多以诗人及其代表作为题,少数篇目以同题或同体诗为题,介绍诗人生平、时代背景,重在赏析作品。同题或同体诗之比较论述,旨意醒豁。四部分末篇均有“馀话”一节,对该时期诗歌作综合论述。本书论述较多之诗人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全书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资料丰富,论析确切。对诗人及其诗作之评论,多先引前人见解,如第二十八篇《黄鹤楼与凤凰台》,就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二诗之优劣论,引述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方回《瀛奎律髓》、顾璘批点之《唐音》、王世懋《艺圃撷馀》、吴昌祺《删订唐诗解》、沈德潜《唐诗别裁》、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等著作,以及《唐音癸签》中所录徐献忠之意见,然后断以己见。著者善于通过比较展开论述,对诗之释义,力求准确,不避疑难。如第二十七篇《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中对诗题之解释,颇有说服力。第十四篇《王维:五言律诗三首》中对“随意春芳歇”之“随意”二字之注解,详细精确,切合诗意。最末六篇诗话,分别是《唐女诗人》、《六言律》、《联句诗》、《唐人诗论鸟瞰》、《唐诗绝句杂说》、《历代唐诗选本叙录》,从六个方面对唐诗作补充说明。全书论述涉及许多诗学名词、词语及成语,散见于各篇,为便于检索,书后附有索引。

(阎琦 姚敏杰)

【唐诗丛考】 论文集。今人王达津著。1986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论文十九篇。其中诗人诗作评论五篇;诗人生平考订、作品系年等十三篇;杂考一篇。著者除对诗人生卒年进行详尽考证外,还对文献记载有错漏或分歧者多所辨析。如对两《唐书》《宋之问传》中有关宋自岭南逃归洛阳,告发王同皎记载之辨析,考得两《唐书》之误。另如通过孟浩然之诗篇考知《新唐书》本传采用小说家言之谬误,令人信服。对某些名篇诗作,著者不拘新说,探微索隐,或考其作者,或考其时代背景,或考其写作年代。如对宋之问诗《灵隐寺》之考证,即依宋之问与骆宾王之交游,以及二人诗歌风格之差异等因素,考知其非骆宾王诗作,使传说之误得以纠正。著者于详尽考证之同时,注重深入的研究论证。既有对一些重要诗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理论概括,亦有对一些重要诗作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之分析论证。对某些齐名合称之诗人,著者亦比较异同,评定优劣,并对一些少有人注意之二、三流诗人进行考证,均有独到见解。(阎琦 姚敏杰)

【唐诗综论】论文集。今人林庚著。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著者唐诗研究论文及读诗札记凡四十一篇。根据论文内容,全书分三部分,“唐诗高潮”部分为其中心。著者着重阐述盛唐诗歌之精神风范与风格特征,并从诗歌语言、格律及文坛总体变化等不同角度对诗歌史上这一黄金时代详加说明。其中《唐代四大诗人》一文,通过对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之论述,展示异彩纷呈之唐诗高潮演进轨迹及其潜在联系。第二部分“唐诗远音”旨在探求中国诗史上出现“唐诗高潮”之历史原因。著者上溯先秦及至六朝诗坛,勾勒出诗歌随其时代发展之大致轮廓,明了其发展嬗递之逻辑关联。著者集中把握诗歌语言之变化、寒士文学传统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等基本线索,从各个角度阐述诗歌历史演进及盛唐诗歌的伟大成就。第三部分“谈诗稿”汇集著者十九篇读诗札记,多系其早年旧作,体现出著者对诗歌的独特艺术感受。(阎琦 姚敏杰)

【唐绝句史】唐诗学专著。今人周啸天著。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本书系对唐绝句历史发展及艺术经验之理论总结。著者以史为线索,以作家作品为立论依据,从内容题材到艺术风格,详细论述唐绝句之发展,对盛唐诸家论述尤详。如将杜甫绝句专辟一章,分析杜甫绝句突破传统之原因,论述其在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方面的拓新及其在绝句史上的意义。书中对诗人绝句兼有赏析,文思细腻,文笔优美,深得诗人妙言胜义。如论及李白《峨眉山月歌》谓“山月处处可见,使‘思君不见’的情感大为强化。山月可亲可近,而又可望不可接,大是思友之情的物

化”。著者善于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而不盲从,去粗取精,为我所用,重在突出个人见解。本书虽非无懈可击,然此前全面论述唐绝句史之专著尚属阙如,故其有填补此项空白之功。(阎琦 姚敏杰)

【唐诗美学论稿】唐诗学专著。今人陈铭撰。盛唐气象、中唐风貌、气与神、中和之美,这类说法比较抽象,历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此书从美学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与具体的分析和论述。上编包括三章,一、盛唐气象:作者从繁荣时代的前奏,追求本质力量的激情,干谒、温卷与主动精神,永恒主题的时代色彩、边塞烽火中的诗情,自然美的欣赏,真率情怀的坦露这些角度考察唐诗中盛唐气象的恢弘。二、中唐风貌:此章展示了诗风之变及其与时代衰落的关系。唐诗之美向多样化发展,如白居易以俗为美,韩愈以丑为美。三、晚唐余晖:作者认为晚唐审美情趣是中唐的继续,但基调则是国运没落、社会变乱导致的颓唐与哀伤。下编分四章论述了“气与神”、“中和之美”、“民族风俗美”、“实动美”等问题。书中对这些抽象的问题作了深入切实的分析。书中还涉及音乐、绘画、宗教、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等与唐诗有关的许多学科,内容非常丰富。此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唐诗学引论】唐诗学专著。今人陈伯海著。1988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七篇。序说部分简要回顾“唐诗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产生与发展的情况,并对该学科进一步发展提出要求。正本篇探讨唐诗“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及“唐诗的气象”诸问题,并以为以上诸要素构成唐诗区别于其他时代诗歌的质态。清源篇从唐诗“社会渊源”、“思想渊源”、“文学渊源”三方面考察唐诗与外部环境(包括唐诗以外之文学现象)之交流,旨在回答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之问题。别流篇考察唐诗在其发展、运行之中的轨迹及呈现出来的多种风貌。著者以揭示唐诗演进中的内在逻辑性为着眼点,于通盘检视传统“四唐”说及其他一些分期方法之利弊得失后,提出将唐诗整个历史进程区划为三大段:唐前期(即唐初至安史之乱前),为唐诗成长期;唐中期(即安史之乱爆发至穆宗长庆年间),为唐诗转变期;唐后期(即敬宗宝历以下至唐末),为唐诗衰蛻期。在此基础上,著者进一步探讨唐诗质素之形成、转化及蛻变之全过程。辨体篇从唐人“古风”、“绝句”、“律诗”及“古近体的消长与同异”四方面,对唐诗体式及其流衍变化作了美学上的考察辨析。学术史篇将唐诗学之历史进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唐五代(酝酿期);宋金元(形成期);明代(发展期);清及民初(总结期);“五四”以后(创新期)。余

论部分探讨唐诗在后世文学发展中之历史作用及其于当前时代之现实意义。本书系著者从宏观总体角度对唐诗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进行综合性探讨之研究成果,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唐诗进而拓宽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建树颇多。(阎琦 姚敏杰)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论文集。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和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88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系由1984年于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所提交六十余篇有关边塞诗研究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共选编论文二十六篇(包括《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综述》)。论文涉及内容丰富,有对边塞诗性质、涵义以及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之理论探索,亦有对边塞诗渊源、繁荣原因以及对后世影响之分析研究,更不乏从史的宏观研究到具体作家作品之评析,具体诗人涉及“文章四友”、王维、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李益、刘商、白居易、于濂等,尤以岑参之论最多。本论文集专题讨论唐代边塞诗,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宽广,为前所未有的,在许多方面提出有价值之深刻见解。(阎琦 姚敏杰)

【唐音佛教辨思录】唐诗学专著。今人陈允吉著。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辑录了著者有关唐代诗人、唐代文学和佛教之间关系之论文十四篇。附录《佛学对文学影响研究之我见》一文。著者并不局限于对作家与僧侣交游之考证或从作家作品中摘引有关佛学内容之词句,而是从较深层次的思想渊源上探索佛教对文学题材、形象、情节、语言及创作思想之影响。比如以往对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之研究,仅注意其抽象说理之作,很少注意其山水诗作为自然美之感性形象,从内在意义上所包含的理念性之佛教哲学思想。《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一文,即以诗人写景名篇为例,多方面分析其中表现之哲理思辨与佛教观念。又如《李贺与〈楞伽经〉》一文,从整体上研究李贺宇宙观、人生观及创作思想,探寻诗人思想矛盾冲突及其于作品中之表现。有关韩愈文学创作与佛教关系之两篇论文,研究韩愈爱好观赏寺庙壁画所产生之美感体验对其诗歌的通感影响,指出寺庙壁画与韩诗中雄桀险怪特色之联系。《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一文,由对敦煌文献中《目连变》的注意而及《欢喜国王缘》变文,进而再及故事原型《杂宝藏经·优陀夷王缘》,从而以全新的角度揭示出《长恨歌》故事之渊源。该书所收论文单篇刊发时,即已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结集出版,当可系统把握作者对佛教与文学关系之基本思路以及研究方法。

(阎琦 姚敏杰)

【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诗学专著。今人黄世中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是书前有陈祖美序,论证研究古代爱情诗的意义。其后除著者题言、跋文外,收入论文十四篇,分别考论《长恨歌》的创作动因及深层意蕴、元稹《莺莺传》的创作心态、李商隐恋爱事迹及有关诗篇、韩偓《香奁集》本事、唐婉家世与唐陆婚变原因、王次回“疑云”“疑雨”诗创作背景、清代女词人西林顾春与龚自珍“丁香花”诗公案等,大抵与诗人的恋爱婚姻生活有关,并视此为诗人创作的一大动力,反对以往研究者贬低某些恋情诗的倾向,主张“只要它们在今天有一定的伦理的、审美的、认识的价值,都应在批判继承之列”。本书作者行文颇带感情,考论虽或不免揣测臆断,然所涉及的问题及提供的资料仍不失一定的参考价值。末附论唐僧贯休文一篇。(纪伟)

【唐诗答客难】唐诗学研究专著。今人张天健撰。此书通过回答唐诗学中的一百一十一个疑难,表述了自己数十年来研读唐诗之心得。全书分三编,第一编回答唐诗史上的千古之谜,这些问题大多没有确切的答案,作者只是罗列诸说,断以己意。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有关唐代诗人身世的,如“骆宾王结局之疑”、“陈子昂死因之疑”、“李白的死因之疑”、“杜甫的死因之疑”、“皮日休的下落结局之疑”、“关于孟浩然遇唐玄宗之疑”、“关于宋之问杀死刘希夷之疑”。另一类是关于唐诗作品的疑问,如“关于《长恨歌》杨贵妃马嵬被杀之疑”、“关于‘龙城飞将’之疑”、“‘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在何处”、“李白诗《蜀道难》内容之疑”、“李商隐《无题》诗内容之疑”、“《琵琶行》本事之疑”、“关于《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枝采于何处”、“韦庄《秦妇吟》讳因之疑”、“关于悯农诗‘锄禾日当午’作者”、“关于杜甫《北征》、《咏怀》二诗之疑”等。第一编一共五十四个问题,这几乎囊括了唐诗史上最重要的“千古之谜”,介绍它并尝试解答它,对理解唐诗史有很大帮助。第二编解答唐诗史上一些疑难,这些多有标准答案,即使没有标准答案也能发表一些平正通达的意见,如“初唐四杰”、“吴中四士”、“文章四友”、“大历十才子”、“五言长城”、“关于《全唐诗》”、“关于唐诗的发表与流传”、“关于李白、杜甫优劣论”、“关于韩愈、孟郊优劣之争”、“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关于诗史”、“关于唐代诗歌”、“关于唐人选唐诗”、“关于唐诗分期”、“唐诗变体”、“关于唐诗人写诗的特殊爱好”、“关于唐诗人编集题名”等。这类问题共三十个,大多为唐诗史上重要问题。理解了这些问题对唐诗史能有一个概括的把握。第三编解答有关唐诗体制的问题,如“上官体”、“初唐体”、“新乐府”、“元和体”、

“长庆体”、“长吉体”、“香奁体”、“律诗八病”、“试帖诗”、“边塞诗”、“联句诗”、“杂体诗”、“咏史诗”、“怀古诗”等二十七个问题,几乎囊括了唐诗体制中的所有名目,理解了这些问题,对唐代诗体就有了全面的把握。此书以问答形式介绍唐诗学,生动有趣,便于初学。学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学泰)

【唐诗语言研究】 唐诗学专著。今人蒋绍愚撰。作者在前言中说:“读唐诗,却首先遇到语言上的隔阂。唐诗中的一些词语,我们不大懂;唐诗中的一些句法,我们也不大熟悉;唐诗中的一些修辞方式,今天也不大常用了,至于唐诗的平平仄仄,一些年轻人就更觉得难以掌握。所以要读懂唐诗,首先就要扫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真正读懂了,才能进而对唐诗作思想、艺术上的分析和鉴赏。”这本书就是为读唐诗者“扫除语言障碍”的。包括四章,一、唐诗的格律。其中论及唐诗的体裁、近体诗的形成、近体诗的平仄、近体诗的用韵和对仗诸问题。二、唐诗的词汇。此中论及唐诗词汇构成,包括先秦、六朝古词语,诗文用语,口语词及其变化使用等。研究唐诗口语词汇的意义、唐诗口语词汇的概况和方法。三、唐诗的句法。此章论及唐诗的句式、唐诗的省略、唐诗的错位、唐诗中几种特殊的句式。四、唐诗的修辞。其中论及炼字、炼句、炼意、形象、生动、精练、含蓄、比喻、比拟、夸张、想象、沿袭、点化、翻案等。关于唐诗语言方面的问题,大体都已涉及。虽然著者目的在于帮助读者读懂唐诗,书中问题大多围绕这一目的论述,但其中也有不少属于创新性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唐诗口语词汇的阐释,时有新解,后附《唐诗词语小札》。此书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王学泰)

【唐诗赏论】 唐诗学专著。今人初国卿撰。此书由六十篇赏析论述唐诗的文章组成,以分析单篇作品为主,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丽人行》、李商隐的《无题》等。赏论结合是本书特色,作者“往往不拘于诗的字句本身,而是跳将开来,就诗的背景、立意、本事,结合前人的说法,抒发自己的见解”,“有时他又不拘于赏论的那一首诗,而是将相同或相近题材的诗歌拿来比较,旁征博引,饶有兴味”(见袁行霈《序》)。这些赏论文字大多写得富于感情,文字优美,可读性强。此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学泰)

【唐诗艺术技巧】 唐诗学专著。今人师长安撰。许多学者诗人在诗话或一些专论中论述唐诗的艺术技巧,但很少有专著论述这个问题,此书不仅论述了唐诗写作的表现技巧,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更深层次

的唐诗中的审美特征。全书共分两编,上编论艺术技巧,包括:情贵在真、借景抒情、托物寄兴、意出侧面、对面落笔、倒装入妙、离脱之法、壮言夸饰、巧比妙喻、工于发端、妙于转折、以景结情、勘进一层、宛曲达意、曲折生姿、数字入诗、叠字入诗、地名入诗、诗中对比、以动衬静、繁简得当、铺陈有序、欲露还藏、反笔见妙、善于脱胎、异曲同工、意象妙接、句中炼字,共二十八个专题,一题一议,围绕着抒情方式、表现角度、描写手法、写作技巧、修辞手段等方面,通过大量的作品实例论述了唐诗的艺术技巧。下编题为《唐人诗歌审美思考》,包括论文七篇:《感物兴怀 物我情融——论唐人诗歌创作中的移情作用》、《以必无之事 写必有之情——论唐诗中‘无理而妙’的艺术描写》、《缤纷多彩 似幻如真——论唐人诗歌中的梦境描写》、《诗美,呈现在流动中——论王维诗歌的动态美》、《争奇斗巧于尺幅之中——论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诗中议论 咏史绝唱——论杜牧咏史七绝的艺术特色》、《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论唐人绝句的含蓄美》。这些论文多是从审美角度揭示唐诗艺术的深刻内涵。唐诗的艺术技巧正是由唐人审美理想所决定的。作者对于唐人诗歌中某些审美特征的探索,有助于揭示唐诗的创作规律。此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王学泰)

【河岳英灵集研究】 唐诗学专著。今人李珍华、傅璇琮著。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录唐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间二十四位诗人二百多首诗,对每位诗人均有评介论议,全书有叙论一篇,反映了殷璠的论诗主张如兴象说、音律说等,在开元、天宝时期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李、傅之研究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殷璠及其《河岳英灵集》之评论、考证;后一部分是《河岳英灵集》之整理点校。所依据者为宋刻二卷本,而以汲古阁本、毛扆校本、沈氏藏(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本、何焯批校本等对校,以其他唐人选唐诗、《全唐诗》参校,并从《文苑英华》、《文镜秘府论》补入殷璠所作之序论。这是目前信实可靠、堪为研究依据的本子。

(纪伟)

【大历诗风】 唐诗学专著。今人蒋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此书原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补充后成书。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虽有“十才子”的出现,但向被认为是唐诗中衰或低潮时期,研究著作较少。本书作者视大历诗为上承盛唐下启中唐的过渡阶段,是中唐诗的预备期,而中唐诗不仅是唐诗的中变,也是整个中国诗史发生突变的转折点,因此有意系统探讨大历诗风,其考察

范围上起天宝十四载(755),下至贞元八年(792)。本书除导言外,正文八章,讨论了唐诗时代精神风貌由盛唐转中唐的变化、大历诗的主题取向、表现特征、意象结构、体式语言及历史地位等问题,另附录三篇,掲載大历诗人名录及作品数量之统计、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作者在比较细致全面把握大历诗人与其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颖观点,如将大历诗人分为古风派(元结、顾况等)、台阁派(十才子)、地方官诗人(刘长卿、戴叔伦等)、方外派(皎然、秦系等)。对大历诗的艺术成就与不足,持论亦公允妥当。(纪伟)

【王绩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王国安校注。1981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诗小集》,本书为第一辑中的一种。该书以《全唐诗》所收王绩诗一卷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续编影印之明抄本、清嘉庆间孙星衍刻本,以及明万历刻本和清光绪丙午罗振玉唐风楼刻本等。王绩诗文集自中唐以后即有吕才所编五卷足本和陆淳删略本并行于世。此书以源自陆淳的诸种删略三卷本为依据作校注。注释较简明切实,笺注偏重于简介诗意背景,诗句使事用典等方面,一般都能注明出处。校注合一,校刊文字择善而从,纳入注文之中。1984年以后,学术界对重新面世的王绩集五卷足本展开研究。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韩理洲整理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两相比较,三卷本收诗仅五十馀首,而五卷本增加到一百十八首,增补达六十馀首。因此,有必要根据五卷足本重新编注一本王绩诗注,以便深入研究之用。(周建国)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唐别集会校本。今人韩理洲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绩字无功,初唐诗人,所著原有二十馀卷。据最初为王集编集的同时代人吕才说:“君所著诗赋、杂文二十馀卷,并多散逸,鸠访未毕,且编成五卷。”(《王无功文集序》)至中唐陆淳自以“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删东皋子集序》)的标准,删五卷本为两卷本,名曰《东皋子集略》。唐宋之时,这两种本子并行于世。元代以后,五卷本唯偶见于目录学家、藏书家记载,不见流传。通行的则是源于陆淳删略的诸种三卷本。此会校本校点者览读了《王无功文集》五卷的三种清抄本,即清同治四年(1865)陈氏晚晴轩抄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和大兴朱筠家藏手抄本。以校雠精审之李氏抄本为底本,参校朱氏、陈氏两种抄本,以及敦煌残卷,有代表性的三卷本若干种,总集、诗话凡十五种,整理出一部迄今最完备的王绩诗文集。此书比元代以来通行的诸种三卷本增补诗六十馀首,文二十馀篇,为深入研究王绩及其创作提供了

新资料。为保持底本原貌,校点者对原校记均予过录,对原校所据各本及新参校诸本作清楚交代,并酌采诸家,断以己意,凡删改增补者均出示所据校本,便于查核。此书五卷依次为赋、诗、书、杂著。集后补遗收录疑似或重出之作。附录收辑序跋著录、传记、同时代人酬答诗文、集评等资料,足资研究者参考。(周建国)

【王梵志诗校辑】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张锡厚编著校点。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梵志是唐初民间通俗诗人,在唐宋时代颇受僧俗人士欢迎。敦煌遗书、唐宋人诗话笔记都保存有他的作品,但《全唐诗》竟不收其诗。1925年,刘复《敦煌掇琐》迻录了王诗三种写本。其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五编入《王梵志诗集》卷上并序。1935年,郑振铎又校录《王梵志诗》一卷,收入《世界文库》。五十年代后,随着有关敦煌写本的不断发现,王诗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活跃起来,却没有一本辑录完备的王梵志诗集。1978年,编著者着手辑录整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及有关资料,经过多年钩沉辑佚,校定考释,从二十八种敦煌写本和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厘定为此个颇为丰富的《王梵志诗校辑》六卷注本。本书共收诗三百四十八首(包括存疑附载的“梵志体”禅诗十二首),分卷基本上按敦煌写本原编次之顺序,整理工作包括分首、标题、编号、点校,以及对唐人俗语、佛家用语的考释等。书后附编辑录了写本原卷著录简况,我国历代学者、国际学人的有关评述摘辑,以及考证写本、诗人时代的专题论文,王梵志诗语辞索引等资料,一时颇称完备。然而,王诗的校辑考释毕竟难度很高。张氏校辑筌路蓝缕,厥功甚著,而有待匡补之处亦多。本书出版后,周一良、项楚、蒋绍愚、郭在贻等曾著文商榷。其中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分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一辑、《敦煌研究》总第四期)对本书过录讹误、漏校、误校、误注及其他失当之处,提出数百条匡补意见。1987年,陈庆浩在国外撰写了《法忍抄本残卷王梵志诗初校》,首次公布了列宁格勒所藏L.1456王梵志诗残卷。同年在香港召开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朱凤玉在题为《敦煌写卷斯4277号残卷校释》的专论中发现斯4277号残卷与列宁格勒所藏之《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残卷》是同一写卷断裂的两部分。据此,编著者张锡厚将这两个残卷拼合,另得王梵志诗六十馀首,并得以确定本书附载“梵志体”禅诗十二首存疑者,实即王梵志诗,刊于《文学遗产》1988年第六期。(周建国)

【王梵志诗校注】 唐诗别集校注本。今人项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梵志为唐代

著名通俗诗人,其作品散佚严重,近年于敦煌文书中有较多发现,前此已有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出版。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亦有《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一书。项氏此书则根据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诸原卷、影本及唐宋诗话、笔记、禅宗语录所载王梵志诗辑录,其中包括从未公布的列宁格勒藏1456号敦煌卷子及斯4277号卷子,是到目前为止搜集最完备的王梵志诗集辑本。全书七卷,前六卷编次略同于张锡厚、戴密微二氏之书,但分首间有不同。卷七为新增内容,较旧本多六十余首。七卷合计三百九十首。项氏对敦煌文学研究有素,功力颇深,对每首诗所作之校注诠释,堪称精详赅博,实得称为王梵志诗集之功臣。书前有长篇前言,论王梵志其人其诗,附录有校注者关于王梵志诗考订的论文五篇,其中提出的观点,如谓此三百多首诗“决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白话诗人陆续写就的”,“它们的作者应该主要是一些僧侣和民间的知识分子”,视王梵志为一特殊文学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另附有《王梵志诗论著目录》、《王梵志诗语辞索引》,颇便使用。(纪伟)

【**骆临海集笺注**】唐人别集注本。清陈熙晋编著。熙晋,字析木,或称西桥先生,义乌(今属浙江)人。官至湖北宜昌知府。有著述多种。骆宾王曾官临海(今属浙江)丞,陈氏因以标斯集。骆集最早有唐代郗云卿所辑之《骆宾王集》十卷,其书已佚。明代以降,流行的骆集有四卷本、六卷本、十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至于注本,则有颜文选等的数种。编著者在吸收诸家成果基础上多方搜求,分体编年,得成《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本。凡旧本脱漏的骆宾王诗文散见于《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及有关书籍中的,都被辑入,复加纠谬校补,精心考核,基本上解决了骆集的编订和辑补问题,堪称完本。全书卷一至卷五为诗歌,卷六至卷十为赋、颂、表、启、书、序诸体文。书后附录收有两《唐书》本传,明清学者所作续传、补传,各家旧序以及历代有关骆宾王的题咏等。资料比较丰富,略嫌不足的是各家诗话、笔记中的材料没有辑入。本书笺释向称精博,为研究者所推重。凡有关史事、舆地、职官、典故成语、典章制度等注文,多引用原始资料,作详尽的阐述,并将诗文与史实相参稽,探索骆氏生平行迹,多所发明。附录中陈氏撰写的《续补唐书骆侍御传》发幽探微,多有补充史传之阙略者。文史结合,知人论世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唯注文征引略嫌繁杂,作者笺释为表彰骆氏“忠义大节”亦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处。有清咸丰三年(1853)松林宗祠刊本,1937年有吴镜元校、黄侗重印本,1960年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咸丰原

刻重排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全书作了修订,重印出版。(周建国)

【**骆宾王评传**】研究专著。今人杨柳、骆祥发合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评传共十五章,前十章述骆宾王家世、生平经历,对骆参与扬州起事兵败后的下落作了仔细考辨,认为《旧唐书》、《资治通鉴》所述宾王被杀说不可靠,孟荣《本事诗》所述宾王灵隐为僧说乃民间传闻,实际情况应是“兵败逃亡,并匿迹南通,最后埋骨黄泥口”,其家乡义乌上枫塘骆宾王墓乃后人所建之衣冠冢。其后五章系骆宾王诗文研究,分别论述了骆宾王诗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在初唐诗文革新运动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骆宾王生前道路坎坷,死后千多年来其历史评价涉及对武则天的褒贬而时有变化,褒武,或视武为正统者则贬抑骆,反之,则称赞骆为“忠臣义士”。五十年代后亦曾有过浮沉。本评传则认为:骆是骆,武是武,各人功过都有自己一本账。骆宾王是一个怀才不遇、命运坎坷然而又是刚正自守、崇尚节义的杰出诗人。全书以《骆宾王简谱》殿尾,甚便参阅。

(纪伟)

【**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唐诗别集笺注本。今人任国绪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书以明张燮所辑《幽忧子集》七卷为底本,按其各卷顺序、体例为之编年、笺注。全书笺注分题下注、正文注。前者解题、编年、考证本事和作者行迹。后者注释人名、地名、职官名、语典及事典,难句偶有讲疏和按语。凡卢照邻生平事迹有可考或旧籍舛误应予以订正者,于涉及该问题的注文中详加考辨。卢照邻为学广博精深,其诗文用典遍及经、史、子、集,本书首次为之笺注,能够一一注明出处,并能吸收今人研究成果以充实内容,不但具见功力,且显示刻苦认真精神。傅璇琮为本书作序,盛称此种优良学品。本书附录收有卢照邻诗文补遗、正史卢照邻传、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遗事若干则和《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简表一份。笺注者后又在此书基础上再撰《卢照邻年谱》,将原散见于各卷各篇之卢氏生平行迹,统一隶于各年之下,且将王勃、杨炯、骆宾王及其他与卢交游诸人之生平行事亦相应著录,以便于比较参照。关于卢氏一生行踪、思想及创作大节处,则加按语考评之,亦具参考价值。(纪伟)

【**王子安集注**】唐人别集注本。唐王勃撰。清蒋清翊注。清翊字敬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活于清同治间。蒋氏对王集作过长期精细的探究。他在明嘉靖间张逊业刊刻的《王勃集》诗赋两卷本、崇祯时张燮刊刻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清乾隆时项家达刊刻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基础上,又进而辑

补散佚诗文,考辨真伪,校订笺注成《王子安集注》二十卷本,以“从盈川(杨炯)序原编卷数”,其中分赋二卷、诗一卷、文十七卷。编著者“自同治甲子(1864)迄光绪甲戌岁(1874),周一纪,稿凡三易”,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乃得藏事。蒋本是对明以来流行的王集的总结,也是当时最好的王勃诗文校辑本及唯一的注本。据此书凡例云,其从《全唐诗》、《初唐十二家集》、《韵语阳秋》等书辑补诗八首,又从《唐语林》、《全唐文》等书辑补赞、赋、记、序、碑诸体文各一首,并指出原集中《三月上巳祓禊序》、《游冀州韩家园序》系他人作品混入者。蒋注采用集注方式,凡注史事、地理、典章制度,都注重探本寻源,典故都注得很详明,其中虽不免有过于深求之弊,但对研究王集仍有较高参考价值。卷首编有《王氏世系表》、《汇录事迹》、杨炯《王子安集序》等资料,颇详赡。此书有光绪九年(1883)吴县蒋氏双唐碑馆刊本。(周建国)

【王勃诗解】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聂文郁选注。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本中精选王诗五十八首,按明张燮《王子安集》十六卷本的次序编次,所选诗题字句,则从明张逊业《王勃集》诗赋两卷本。每篇诗解包括三部分:题解、诗解、小议。题解除注释题意外兼及各本诗题异同、历代要籍收录情况、写作年代等的说明。诗解主要是典故及生僻字词的注释和诗意的译解。小议是评论性的文字。因此,这是一本既便于初学,又有助于研究者的深入浅出的王勃诗歌选注本。诗篇选解之前有专论《王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王勃在端正初唐诗歌方向这一问题上精辟论述,还编写了简明的《王勃年谱》。书后附录收录杨炯《王子安集原序》、两《唐书》本传、历代诗文评摘要等资料,都很简明实用。(周建国)

【初唐四杰年谱】 诗人年谱合编。今人张志烈撰。属四川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之六。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该书无序跋,开篇首论“四杰”名称之由来及四人家世概况,随后即由生年最早之卢照邻开始,按年代编排四人生平事迹。大体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起述至武后长寿二年(693),前后六十年。该谱暂定卢照邻生于贞观八年,骆宾王生于次年,王勃、杨炯均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年则王勃为上元三年(676),卢照邻为永隆二年(681)后之一二年,杨炯为长寿二年以后的一二年,而骆宾王因参与徐敬业起事失败,其下落竟为千古疑案,卒年也无从考定。本谱对文学史上一些悬案有自己的说法,如谓王勃曾随其父福时至交趾,途中在江西南昌作《滕王阁序》及诗,而于送父抵交趾后北返渡南海时落水惊悸而死。对四杰的某些诗文进行了系年,

并有所考证。

(纪伟)

【杜审言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徐定祥校注。1981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诗小集》,本书为第一辑之一种。该书以现存最早的宋刻一卷本《杜审言集》为底本,校以明嘉靖间铜活字本和张逊业刻本《唐十二家诗·杜审言集》,以及《文苑英华》、《全唐诗》、《唐诗别裁》等总集。底本和参校书籍都比较好。凡收诗四十三首,按《全唐诗》编次排定,不编年。采用校注合一的方法,纳校记于注文之中。作为杜审言诗歌的一个新注本,其对诗中史事背景,用典使事的诠释尚称简明平实。书后附录辑有史传、小传、集序、历代诗评摘要等资料。

(周建国)

【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 唐诗合集注本。今人王启兴、张虹校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唐诗小集》第一辑里的一种,合盛唐前期被称为“吴中四士”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家诗歌为一册。该书以《全唐诗》所录四家诗为底本,参校了《唐人选唐诗》(十种)、《旧唐书》、《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史籍、总集。共收录贺知章诗二十首,包融诗八首,张旭诗六首,张若虚诗两首。《前言》对四家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的评述简要切当,正文校注对诗篇涉及的时代背景、典章制度、典故成语、难解词语等作了简明诠释,校记纳入注中,一般都能注明出处。附录部分辑录了四位诗人的有关生平及其作品评价的材料,较为完备。

(周建国)

【陈子昂诗注】 唐诗别集注释本。今人彭庆生注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陈子昂诗向无注本,是书在校勘诸传本的基础上创为注释,有筌路蓝缕之功。在体例上,用校注合一之法,将校记散入各条有关笺注之中。笺注则对典故、史实、前人诗文及难懂词语予以注释,一般不作串讲。每首诗后有“说明”一篇,阐释本篇背景、主旨、作意及编年依据等,引述前人评论予以讨论。全书除《感遇》诗三十八首依惯例集中排列为卷一外,其余诗作均按编者考订予以编年,分为两卷,凡无法考定具体年月者,则酌情编入某一时期。《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等七篇,编者所依据的四部丛刊影印明杨澄校正本原将诗、序分列两卷,是书则依《全唐诗》予以合并。其他底本缺佚之诗,亦有所补辑。书前有注释者自序,阐述陈子昂的时代、生活经历、思想和创作等。书后附录五项为:卢藏用《陈氏(子昂)别传》;赵儋《故右拾遗陈公旌德碑》;《新唐书·陈子昂传》;注释者参酌罗庸《陈子昂年谱》、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新编的年谱;唐以来诸家评论选辑。

(纪伟)

【陈子昂年谱】 年谱。近人罗庸撰。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1936年5月出版)。中华书局1960年印行《陈子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陈子昂研究》均予附录。陈子昂为初盛唐之交重要诗人,对于破除初唐沿袭的齐梁颓风,开创盛唐之音颇有先驱之功。有《陈拾遗集》十卷。但其生平事迹研究著作不多,此谱实为首创。陈子昂于两《唐书》有传,其笃友卢藏用有《陈氏别传》,此外大历六年(771)十月,建有《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赵儋撰),罗庸即综稽史传碑文及子昂诗文杂著、时人唱酬诸作,编为年谱。是谱据《赵碑》定陈子昂生卒年为高宗龙朔元年(661)至武后长安元年(702),是诸说中较早且较有影响的一种。其他则有656—698,656—695,658—699,659—700诸说(分别见韩理洲《陈子昂研究·生卒年考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后附年谱)。于子昂家世、游踪宦历及作品系年,本谱均有所考订、发现。如子昂垂拱二年(686)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事,两《唐书》本传及《旧唐书·乔知之传》均失载。本谱据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序》、《观荆玉篇序》等文考定子昂此行随军“自居延海入,夏四月次张掖河,五月次同城,七月独南旋,八月至张掖,即归,上书论西蕃州安危事三条”,从而将《吊塞上翁文》、《为人陈情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诸文和《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居延海树闻莺同作》、《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等诗合理有据地系入本年。史学家岑仲勉曾拟为陈子昂作年谱,后知有此书“遂辍初意”。岑氏论此书,以为其文“简洁,辨析处亦大有见地”(《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载《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期合刊,1946年12月出版),乃将罗谱所未论或虽论而有别见者另行撰文。岑氏之文,题目已见上引,其所论包括子昂世系、疑年、及第年、子昂诗文中涉及的人名及诗文编年诸项,属札记性质,今亦为韩理洲《陈子昂研究》附录之一。

(纪伟)

【陈子昂评传】 诗人评传。今人韩理洲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韩氏另有《陈子昂研究》一书。是书即在其诸多论文基础上写成。书由程千帆题扉,霍松林作序。霍序称此书填补了陈子昂研究的空白,赞许此书“不以主观爱好虚美隐恶,而是将陈子昂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放在其时诗歌自身演化的流变中,在与同时代的诗人们的比较中,就确凿的事实作具体的分析”,“如实地展现了陈子昂错综复杂的思想变化,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因

此对陈子昂的评价比较客观、科学。全书十章,并有附录。前六章述子昂生活经历,分青少年时代、任麟台正字、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及归居乡里等阶段。后四章述其创作及文学史地位,分诗歌创作与理论、散文、贡献、历代陈子昂评价综述等。附录陈子昂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6)。《后记》一篇申述了著者研究陈子昂的动机及对唐代二、三流诗人应予重视的看法。

(纪伟)

【陈子昂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韩理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陈子昂是初唐诗坛最重要的革新家,高揭反对齐梁“采丽竞繁”诗风的旗帜,为盛唐昂扬刚健的诗风开辟了道路。本书是作者研究陈子昂系列论文的结集,共分五辑。首辑包括论文四篇,分论陈子昂生卒年(定为658—699)、生平思想和诗文编年补正等问题。次辑论子昂诗产生的时代、子昂诗之思想艺术特色及其渊源,并论及子昂之文。三辑论析子昂某些具体作品,如《感遇诗》、《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晚次乐乡县》、《春夜别友人》等,对前人的笺释(如陈沆《诗比兴笺》)有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四辑、五辑从不同角度论析子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有与王勃文学主张异同的比较,有对子昂文学贡献、影响以及历代对子昂评价的综述,均平允信实,颇见功力。附录六篇:卢藏用《陈氏别传》、大历六年所立《旌德碑》、《新唐书·陈子昂传》、罗庸《陈子昂年谱》、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及本书著者自编之《陈子昂研究资料选》,均甚有参考价值。本书著者另有《陈子昂评传》即在此书基础上写成。

(纪伟)

【张说年谱】 年谱。今人陈祖言撰。香港中文大学1984年初版。张说一生历仕武后、唐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封燕国公,“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与许国公苏颐齐名,有“燕许大手笔”之称,尤长碑志文和山水诗。又喜延纳后进,张九龄、贺知章、徐坚、孙逖诸人均曾受其奖掖提携,遂开一代文风。本谱主要据朱氏《结一庐丛书》本《张说之文集》,并参以张说文集的各种版本、《全唐诗》、《全唐文》加以系年。张说现存诗三百五十首,文二百五十篇,本谱将其诗二百三十一首、文一百八十六篇作了系年,引用史料与考订文字相当精核。谱文不记时事,唯记张说事迹,亦以简明扼要为特色。

(纪伟)

【崔颢崔国辅诗注】 唐诗合集注本。今人万竞君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第一辑之一种,合两家为一册。《崔颢诗注》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铜活字本《唐人集》中之崔集为底本,诗篇编次亦依此本,参校多种明刻本、《全唐诗》以及唐人选唐诗集数

种、《文苑英华》等总集。校本与参校书籍选择较佳。收诗四十二首。校注者在本书前言里对崔颢诗在唐集中的著录情况及其真伪作了简要考释,颇信实。注释着重于作品背景、名物制度、用事用典,以及一些难解的词语等,较简明实用。书后附录诗人传记及其他有关资料,很简略。《崔国辅诗注》以《全唐诗》所收崔诗为底本,参校《河岳英灵集》等唐人选唐诗集数种,以及《文苑英华》等总集,择善而从。本书前言对崔国辅诗在唐集中的著录情况及其真伪作了简要考释,收诗四十一首,均较可信。注释着重于难解的字、词、典章名物制度、古地名、人名、典故等,较简明确切。附录收有传记、诗评、作品著录等资料。

(周建国)

【孟浩然诗集校注】 唐诗别集校注本。四卷。今人李景白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孟氏诗作在其死后不久即有人加以编录,即天宝四载(745)和九载分别由王士源和韦滔辑集的《孟浩然诗集》,收诗二百十八首。由宋至清,其诗续有增补,刻本亦颇多。宋刘辰翁,明李梦阳、袁宏道等曾予批点。是书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为底本,校以宋蜀刻本、明活字本、汲古阁本,清碧琳瑯馆重刊本及《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诗林广记》、《瀛奎律髓》、《全唐诗》等,取校注合一之法,于注释第一条记校语。全书编排一依明本,卷一五古,卷二七古五排,卷三五律,卷四五律七律五绝。另附补遗,自《国秀集》、《又玄集》、《文苑英华》、《全唐诗》等书收入遗诗八首,句二联。附录历代评论,两《唐书》、《唐才子传》孟浩然传及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有校勘)。是书注释详明,凡难词、典故、史实、人名、地名以及前人诗文等均追本求源,注明出处。前人评语有关某篇者,亦适当选录附于该篇之后,且亦注明出处。书前冠以校注者所撰长篇前言,详论孟浩然生平,对历来视孟浩然为纯粹隐士与过分强调他隐逸与仕进之矛盾的偏颇有所批评;分析孟诗思想内容的进步意义,如歌咏积极用世、报效国家的壮志,对政治黑暗表示不满,对怀才不遇表示悲愤,颂扬重然诺的侠义精神和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写了大量赞美祖国山水、田园之美的诗歌等等;尤以主要篇幅细致论述了孟浩然诗的艺术风格,将其概括为以清幽淡远为主而以雄浑壮逸、平易质朴为辅的多方面之统一。论述中大量借鉴前人意见并参以自己的体悟,颇具启发意义。

(纪伟)

【孟浩然诗集校注】 唐诗别集校注本。四卷。今人徐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属该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之一种。是书前言第一、二节分论孟浩然生平及其诗,第三节叙述孟集编录

流传及分合演变的经过十分详尽。孟浩然诗集自唐王士源初编成书后,有三卷、四卷两个系统。宋蜀刻三卷本,分上、中、下三卷,收诗二百十二首,编排未显立类目,但从其内容考核,实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等七类。以后,元刻刘须溪评本,明刻《唐百家诗》本、汲古阁本等,收诗首数有所不同,而编排一仍此例。自明正德间铜活字印本起,乃有按体编排者,而且诗的数量也增至二百六十五首。今徐鹏即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四卷本为底本,校以宋蜀刻本,明活字《唐五十家诗集》本,明朱警辑《唐百家诗》本,明顾道洪刊本,明凌濛初朱墨套印刘须溪批点、李梦阳评本,汲古阁《五唐人集》本,《全唐诗》本,并以多种明刊唐人集和其他唐诗总集、选本参校,将所得异文,择其较有参考意义者写成校记附于每诗之后。每诗并作简注。全书依诗体编排,卷一五古,卷二七古五排,卷三五律,卷四五律七律五七言绝句,最后为补遗。附录五项。第一项诗八首,辑自选本或地志署为孟浩然,然未可遽定者;第二项孟氏传记三篇,分见两《唐书》、《唐才子传》;第三项唐人有关孟氏之诗文;第四项孟氏诗集历代著录考;第五项孟氏作品系年。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韦滔《重序》冠于诗集正文之首,故不入附录。

(纪伟)

【王昌龄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四卷。今人李云逸校注。该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第一辑之一种。以《全唐诗》所收王昌龄诗四卷为底本,校以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辑《唐百家诗》本、嘉靖三十三年黄氏浮玉山房刊黄贯曾辑《唐诗二十六家》本、明铜活字本,并参校了《唐文粹》、《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河岳英灵集》、《文镜秘府论》等十余种总集、诗文评。凡重要异文,并出校记。共收诗一百八十一首,其中从《唐人写本唐人选唐诗》辑补两首,从《全唐诗》中抽去他人作品混入王集者四首(缀于本书附录之一,并加考辨),按《全唐诗》原次,分为四卷。卷末收残句三十二条,除底本《全唐诗》原有七条之外,其余则录自《文镜秘府论》、《韵语阳秋》、《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这是迄今收录王诗最为完备的一个新校本。本书所笺于王诗可系年者殆及半数,考证背景人事用力甚勤。每诗下附评笺数条,总论王昌龄其人其诗者,则编入附录之三。前言对诗人生平及创作和著作著录及校刊都有简要评述。附录考辨重出之诗,辑录有关史传、诗评,及同时代人有诗作。

(周建国)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唐人别集注本。今人刘开扬编注。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所藏明活字本《高常侍集》为底

本,并参校敦煌遗书中唐抄本《唐诗选》残卷、唐抄本《高适诗集》残卷及《文苑英华》、《全唐诗》、《唐诗纪事》等书,整理出一本迄今最为完备的高适诗文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编年诗。第二部分是未编年诗。第三部分是赋。第四部分是误收之诗。第五部分是附录,收有高适所作表、记、议、序诸体文,以及史传、诸家评论等。书前有刘开扬所编《高适年谱》,凡重要诗文可考年代者均列入谱中,以便与各编年诗之笺注相参阅。书后收有编著者《唐诗论文集》中《论高适诗》旧作一篇,简述高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本书收罗广泛,校勘严谨。编年诗及《高适年谱》对集中大部分诗文作了编年,其中虽有可商榷处,但大体稳妥可靠。笺注部分详略得当,持论平稳。对于重要的和篇幅较长的诗作,编著者在注文之后另有笺释,或概括诗意,或分析段落,或评诗论事,或述说背景。本书不足之处是附录部分所收高适十餘篇文章没有注释。(周建国)

【王右丞集笺注】唐人别集注本。二十八卷。清赵殿成笺注。殿成字松谷,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与当时著名学者厉鹗、全祖望、杭世骏、王琦等交游。其著此书时与诸人研讨,书成,诸友为之作序。赵氏在《笺注例略》中自述成书过程曰:“间与友朋会集,质疑访逸,研榷是非,采其合者载之。”书中关于佛书之典的笺注,则多出王琦的帮助。赵殿成之子秉恕在誊写书稿时“往往附注侧行”,亦为赵氏编入注内。是书自雍正六年(1728)写成初稿,至乾隆元年(1736)付梓,实为王维诗文注本的集大成之作。在赵注以前,王维集有南宋刘辰翁校本、明代顾可久《王右丞诗注说》六卷本、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集》十四卷本(诗十卷有注、文四卷无注)。赵氏兼采众本,收罗广泛,重新编成此本。前十四卷为诗,其中古诗六卷,近体诗八卷,大体按刘辰翁校本所有之篇目,比较可靠。第十五卷为外编诗四十七首,不太可靠,乃“别本所增及他籍互见者”(《笺注例略》)。十六至二十七卷依次收赋、表、状、文、书、记、序、文赞、碑、碑铭、墓志铭、哀辞、祭文、连珠、判等文章。第二十八卷为论画三首。卷末附录收有弁言、诗评、画录、年谱、诸家序文等资料。赵注的最大特点是详尽审慎,这为诸家序文所公认。李发枝序说:“其考核精当,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竟可自成一家诗说。”此书有乾隆二年赵氏原刻本。原刻本脱落颠倒和讹误之处很多。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原刻本排印,经叶葱奇勘校,订正了一些错误。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叶葱奇校点本。(周建国)

【右丞年谱】年谱。清赵殿成撰。收入赵氏所著《王右丞集笺注》卷末附录内。此谱按“纪年”、“时

事”、“出处”、“诗文”四项逐年记载。又按王维生卒之年,起自武后长安元年(701),终于肃宗上元二年(761)。赵氏自述此谱乃仿钱谦益所作《少陵年谱》之体格,“惟时事有关于诗笔考证者,虽小必书。其无关于考证者,虽巨勿录,略为小异耳”。此谱较为简明,可与本集诗文笺注相互参证,便于读者对全书的深入研讨。谱末据《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及《送邢桂州诗》定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以驳正《旧唐书·王维传》乾元二年(759)之误,至今为学界所遵信,可见精审。(周建国)

【岑参集校注】唐人别集注本。七卷。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印七卷本《岑嘉州集》为底本,以宋刊残本、明抄八卷本、《全唐诗》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敦煌唐写残卷、《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唐百家诗选》、《唐人万首绝句》等书。校勘谨严审慎,一般不轻易改动底本文字。凡有参考价值的校勘异文均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全书共分五卷,在编排上打破原集本序次,重新编次。诗歌凡作年可考或大致可考者,列入编年诗,起自玄宗开元十七年(729),终于代宗大历四年(769)。前四卷是编年诗,卷一早期之作,卷二两度出塞期间之作,卷三安史之乱时期之作,卷四晚期作品。卷五未编年诗及赋、文、铭。凡收诗三百八十一首四百零三首,赋、文各一篇,铭二篇。编著者在岑诗的补辑、辨伪等方面汲取了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李嘉言《岑诗系年》的成果,并据新发现的材料有所增益。本书注释也有较高学术价值。岑诗历来无注,编著者在少有依傍的情形下广征博引,细心搜求,为岑参诗文作了一次全面初步的笺释。注文虽未必尽当,其中涉及西北地理方面的注释亦不无小误,但总的说来这个新注本较为简明准确。书后附录收有编著者的两篇专文《岑参年谱》和《岑嘉州诗版本源流考》。书中前言说明此谱“是在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的基础之上编定的”,但谱中常能比较众说,断以己意,取舍得当。至于《岑嘉州诗版本源流考》,编著者列举的古本、善本颇为丰富,考订详细,有助于读者探本溯源,对岑集作深入研究。(周建国)

【岑嘉州系年考证】年谱。今人闻一多编著。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二期,后收入《闻一多全集》。闻氏在《考证》篇首自云:“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当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也。”本篇以岑参《感旧赋》为线索,参稽两《唐书》、《唐会要》及唐人诗集,对岑参生平作了深入具体的谱述。此谱谓岑参生于玄宗开元三年(715),卒于代宗大历五年(770)。由于编著者

曾对岑集作过精细考订,并能从有关史籍以及与岑参同时的作家作品中,提供新的研究材料,此谱的学术价值素为研究者所推重。闻作于诗人生平及诗文系年间有创获。如天宝十一载(752)条,据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考证同游的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诸人在那一时期的行迹,从而确定诗作于本年秋,以补仇兆鳌《杜诗详注》之阙。又如大历四年(769)条,据《文苑英华》所载岑参《招北客文》,以纠正《唐文粹》、《全唐文》作独孤及文之失误,并指出杜确集序将此文题目误忆为《招蜀客归》。凡此都能提出证据,说明理由。但闻作撰成较早,其中还有不少可商之处。此后,李嘉言等人所撰有关谱系之作对其多有补正。(周建国)

【岑诗系年】 年谱。今人李嘉言著。此系作者早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旧稿,始刊于1956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三辑。该书以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为依据,凡闻氏已详之事,概不复具。闻著自言岑诗中可确指为某年或某数年间作者,殆十有七八,而《系年考证》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故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李著在吸取闻著成果基础上有所创获。如王季友事迹,前人著述很简略,文中据《喜华阴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送王七录事赴虢州》几首诗,考出王少府、王录事即王季友,由岑诗勾勒出“季友事迹之斑斑可考者”数条,可补史籍之阙。李著收诗颇齐备,共录编年诗三百一十五目,起自《丘中春卧寄王子》,终于《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附录未编年诗六十六目,伪诗及重出诗六目,另附《四部丛刊》正德本辨伪诗两首。(周建国)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 李白诗文集现存最早注本。有二十五卷、三十卷两种刻本。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杨齐贤字子见,春陵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杨氏先有集注《李白诗》二十五卷(见高儒《百川书志》十四),自萧氏补注本出,杨氏单注本渐湮,仅毛氏汲古阁曾重刻。萧字粹可,宁都人,笃学工诗,所著有《诗评》二十余篇及《冰崖集》,均佚。此书二十五卷本,分二十二类,与晏知止本大致相同。前有萧氏至元辛卯(1291)自序,略云其自幼喜太白诗,见杨齐贤注本,“惜其博不能约,因取其本类比为之节文,善者存之,注所未尽者以所见附其后。赋八篇,子见本无注,则并注之”。此本有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及诸多明翻刻本。其书卷首列唐李阳冰、宋乐史、宋敏求、曾巩、毛渐等人序及刘全白《李君碣记》、李华《李白墓志》等。有的刻本(如玉几山人重修本)且附入宋薛仲邕所作《李太白年谱》。至明嘉靖癸卯(1543)有郭云鹏校刻本,删削杨、萧旧注,移易卷第,增入李白杂著五卷,号《分类补注李太

白诗二十五卷分类编次李太白文五卷》。该本编排次第为赋一卷,歌诗二十四卷,除古风、乐府外,分为歌咏、赠、寄、留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等十九类,杂著五卷列于其后。对李白诗进行分类,始自宋敏求。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叙其编订经过云:“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曾巩序太白诗亦有“次道(敏求字)既以类广白诗”之语。但杨、萧对之有所调整。此后,清人王琦辑注太白诗,目次即据之,仅去其分类标目而已。郭云鹏对杨、萧旧注删削颇多,其刻本《跋》云:“缘旧本注坐繁杂,既仿迪功徐先生(祜卿)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已半。”丁丙称赞此本“枕印精洁,殊可珍也”(《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四),而陆心源则批评郭氏删削旧注过多,有全章削去者,有一章削去四五百言而仅留一二句者,又增以“祜卿曰”云云,遂使古书面目几无一存(《仪顾堂续跋》十二)。清《四库全书》采此书通行本收入集部。《提要》评杨、萧注曰:“多引故实,兼及意义。卷帙浩博,不能无失……然其大致详赡,足资检阅。”《四部丛刊初编》据郭云鹏刊本影印。(纪伟)

【李诗选注】 李白诗选注本。十三卷,附《辨疑》二卷。明朱谏选注,其侄守仁校勘,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和隆庆六年(1572)刊本,后者原藏八千卷楼,后归江苏省图书馆。朱谏字君佐,温州(今属浙江)人,弘治进士,官至吉安知府。因居于雁荡山之南,故自号荡南,著有《雁山志》等。其《李诗选注》以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为蓝本,但有所删汰,不全录白诗,故名“选注”。被删落的二百一十六篇,朱氏以为多他人之作属入李集,另作《辨疑》二卷摘论之。《选注》则依朱子释经例,先解文义,次述兴意,征引故事,兼及意旨,微辞奥义,灿然明白,而详简得中,颇便省览,缺点是每篇必以六义相附会,未脱宋以来讲学家说诗之窠臼。其考释纠正旧注不少,然亦时有疏漏。该书不失为李白诗较重要注本之一。

(纪伟)

【李杜诗选】 唐诗选本。明张含选,杨慎等批点。张含字愈光,号禺山,永昌(今属甘肃)人。与杨慎同时且交好。是书选李白诗五卷,一百六十馀首,杜甫诗六卷,二百四十馀首,合共十一卷,所选皆流传之名篇。杨慎、文仲阁为李、杜各作题序,杨序辨李白里贯出处甚详。评语引刘辰翁、范梈、杨慎诸家较多。有明天启乌程闵氏朱墨套印本。此本卷首评语引及钟惺、梅鼎祚,盖由闵氏阑入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总集类存目中。(纪伟)

【李杜二家诗钞评林】 唐诗选评集。明梅鼎祚选,屠隆集评。是书有明余绍崖刻本,十二卷,李诗

抄评四卷,杜诗抄评八卷,各按诗体排列,以五古、七古、五七言律、排律、绝句为序。全书前有《二家诗总评》,各体诗前亦有总评,均引录前人评语,而以梅氏评语附于后,颇多卓见。是书无批点、笺注及序跋,其价值一在于选目,二在于集评,有论者曰:“后世选李、杜诗者不下十数家,然于二家优劣得失的评品上未必及之。”(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故颇有助于了解明人对李白、杜甫的看法。此书除余绍崖刻本外,尚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刊行的八卷本。《宁国府志》与《重修江南通志》之《艺文志》均载此书,然作十卷。(纪伟)

【李诗通】李白诗注本。明胡震亨撰。有抄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另有清顺治七年(1650)朱茂时所刻《李杜诗通》本。其中《李诗通》二十一卷,《杜诗通》四十卷。震亨(1569—1645),字君鬯,后改字孝辕,晚年自号遯叟。海盐(今属浙江)人,万历举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是书首列朱茂时、朱大启及震亨子夏客题识。卷一先载震亨改撰之李白略传、李白年谱,然后续以李白之诗,乐府居前,其下古诗、律诗各以类从,为二十卷。其编次为胡氏所手订,盖嫌宋敏求所收间有伪作相杂,曾巩所编体例亦多错紊之故。向来属入李集之作,如李赤《姑孰十咏》、李益《长干行》、顾况《去妇词》等均为剔出。而伪作已经前人甄辨者别为一卷附于后。胡氏以杨、萧二家注多不中肯綮,故大加删汰,几于十不存一,而间于诗题略注数语以发明题旨作意,一般比较简略。其最有价值处在驳正旧注之纰缪,往往精确可取。如李白《蜀道难》,中唐而后诸说纷纭,几如聚讼,胡氏以此诗见赏于贺知章在天宝初年,谓前人讽严武、讽章仇兼琼、讽玄宗幸蜀诸说“并属揣摩”,而论曰:“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诂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不但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一首诗的涵义,而且批评了传统诗学中穿凿附会的不良风气。震亨平生博极群书,精于诗学,以极大精力从事校讎刊刻,曾编订《唐音统签》凡一千零三十三卷,为清编《全唐诗》所本。《李杜诗通》着手于《统签》完成之后,历时凡七年,集中体现了震亨的诗学见解,为后之李、杜诗研究者所推重。(纪伟)

【李太白诗集注】李白诗注本。清王琦辑注。琦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另有《李长吉歌诗汇解》。李白、杜甫均为唐伟大诗人,但后世对其诗集的注释多寡不均。清杭世骏曰:“注杜者,自宋以后已有千家……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

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孝辕亡后,今且百余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补其阙者。”(《李太白集辑注序》)王琦正是鉴于此种情况,积数十年时力重为编次,参合诸本,汇集杨、萧、胡三家注之长,而纠其错讹疏漏,益以逸篇,厘为三十卷。其前二十五卷略依萧士贇本次第,但删去分类标目及题下所注作者游踪;杂文四卷依郭云鹏本次第,参订以缪曰芑本,并详加注释。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而将缪曰芑本的《考异》一卷散入各篇文句之下。该书补刻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续有重刻。校勘方面,善于取资文义及有关旁证,作出精确判断。其注释考证详于典故与地理。王琦自序云:“芑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山川古迹之地形、鸟兽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故虽知有“绮碎鳞杂”之议,而仍坚持详尽综博,以“搜罗轶典,抉发奥思”。王氏又精通道书佛典,用以注释“才兼仙佛”的李白,正“足以发太白难显之情,而抉三家未窥之妙”(杭世骏《李太白文集序》)。对于前人的见解,王氏能慎重斟酌,去短从长,融入自己的心得,成为新注,总观全书,持论平正,客观可信。是书又名《李太白全集》、《李太白文集辑注》,是当时李白诗文合注最完备的本子,历来得到学术界重视,除王氏自刻者外,有多种翻印本,如《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及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整理本等。今人瞿蜕园、朱金城为李白集作新校注,即以此为底本。

(纪伟)

【李白集校注】李白诗文集新校注本。今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1956年完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本书以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之早期刊本为底本,校以宋刊《李太白文集》、清代影刻宋刊《李翰林集》、元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清刻胡震亨《李诗通》、缪曰芑《李太白文集》以及唐宋两代重要总集、选本。其注释评笺部分,除以杨齐贤、萧士贇、胡震亨、王琦四家为主外,并旁搜采录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及近人研究成果,对其中不足与谬误之处,则另加按语予以笺释补充与必要考辨。故是书材料富赡,辨析精详,集中各旧注本优长而又超过之。第三十卷诗文补遗,除王琦所辑外,又增入《鹤鸣九皋诗》、《上清宝鼎诗二首》等数篇,而辨明黄锡珪《李太白年谱》所辑之《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等三篇实为独孤及之文。王琦本原有附录六种,亦予以调整次序并补充若干材料附后。书前有王运熙序,对李白诗文成就、思想行藏有全面分析。书后朱金城后记对成书经过有简略说明。(纪伟)

【李杜诗选】 李白杜甫诗合选注释本。今人苏仲翔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是书曾于1955年由春明出版社印行,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重印,影响颇广,甚得学界好评。后经修订,对原有题解、注释作了补充,使之更臻完善。此书分两大部分:李白诗选,选李白诗二百零七首,下分古诗一感怀三十二首、古诗二闲适十六首、古诗三登览十九首、古诗四赠别二十六首、乐府一五古十九首、乐府二七言及杂体二十四首、近体一五律二十七首、近体二五七言绝四十四首;杜甫诗选,选子美诗三百零五首,计五古六十首、七古二十八首、乐府三十六首、五律九十五首、七律四十七首、七绝三十八首,每体之中则以杜甫生平系之。无论从数量与具体选目均足以反映李、杜诗歌的基本面貌,如杜甫五七言律共入一百四十二首,重要篇目几无遗漏,七律中不但人们熟知的《堂成》、《蜀相》、《客至》、《登楼》、《宿府》均入选,且《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全录。其注分题解、注释两目。题解主要引证史料、文献说明创作背景,间或对前人不同说法加以介绍、辨析。注释则解释词语典实,比较简明。书前冠以明仇英《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图》、今人刘旦宅《李杜论文图》彩页及编选者自撰长篇导言,阐述李、杜所处时代的交错性(由盛唐到中唐的转变期)、二人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反映在二人诗中的主要精神实质(突出了李白诗的自豪感和杜甫诗的人道主义精神)、李杜诗的风格面貌及他们在诗史上的地位。书末附论文三篇和诗体的《李白论赞》一首。(纪伟)

【李白诗选】 李白诗选本。今人舒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后曾重印。书前有编者前言简略介绍李白生平思想性格、诗歌艺术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全书选入李白诗近二百首,按清王琦《李太白集注》编例分体标目,不编年,各诗文字和注释,也基本依据王琦注本,异文不出校,注释很简单,但选目却相当精当。(纪伟)

【李白诗选】 李白诗选本。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该书从现存李白近千首诗中选录二百七十首,首次采用编年之法排列,并依李白生平分为在蜀中、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在长安、以东鲁和梁园为中心的漫游、安史之乱以后等五个时期,各诗写作年代的考订参考了清王琦、近人黄锡珪、今人詹锳的研究成果,间有编选者研究所得。另有一部分诗无法编年,附于编年诗后。此书文字、注释主要依据王琦注本。其注释为先作题解,说明主题、写作年代与背景等,后作词语解释与串讲,比较通俗简明。(纪伟)

【李白选集】 李白诗选本。今人郁贤皓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是书编者有《李白丛考》。本书为李白诗文合选集,前有编选者长篇前言,前四节分别论述李白身世、生活道路和思想、李白诗歌的时代特色、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末节说明编选经过。本书选入李白诗三百余首,几近李白现存诗作三分之一,分为编年诗、不编年诗两部分。由于李白诗长于抒情,不著事迹,历来研究者对其编年意见颇多分歧,是书之编年实乃反映了编选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有一定特色。李白之文传世不多,是书选入赋、表、书、序等各类文章十八篇,约占总数四分之一强,已可约略见出李白文章的风貌与成就。本书注释简明扼要,一般既引出典,又有语释和串讲。每篇后附评笺,引前人评论若干条,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提高欣赏水平。(纪伟)

【李太白年谱】 年谱。清王琦编撰。为《李太白诗集注》附录之五。前此有宋薛仲邕之《唐翰林李太白年谱》,系草创之作,王琦嫌其“疏略,又不无抵牾”,乃参伍太白诸诗而大加补订,成此新谱。首叙李白家世籍贯,辨旧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之误,而考白生年应为武后长安元年(701),遂成定论。以下按年系事,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及多种唐人碑志、记述和太白集序文等对太白游踪和诗文创作进行考订编年,凡能据诗文内容确定具体年代者,均一一考明标出,另一些只能大致推断作于某一时期,亦加以汇总,并作必要说明。由于编者对李白生平及作品有较好的总体把握,又能谨慎从事,“以此应证旧谱,分别疑似,或删或补,虽不能广引旁罗,年经月纬,悉以诗笔分隶其间,然依此考之,若者作于开元时,若者作于天宝中,若者作于至德以后泊宝应初年,亦约略可定矣”(王琦《李太白年谱跋》)。对于传闻异辞、后世题咏和前人关于太白生平、游踪遗迹、故实的不同说法,本谱择其重要者分别予以附考辨析,具有很高的资料和参考价值。清李调元、邓在珩道光间曾重刊太白集,集后所附太白年谱,即全据王琦此谱翻刻。(纪伟)

【李太白年谱】 年谱。近人黄锡珪编著。脱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家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锡珪字仲猷,广东梅县人。研究李白十馀年,先将其诗文排比年月序次,整理出《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然后根据诗文之编年,相互参稽,寻求太白一生行踪,制成年谱。其自序言王琦所编太白年谱虽远胜薛仲邕谱,然“疏舛之处,谱中亦难以枚数;且事迹亦多援引弗全,凡寓居安陆十年,以及游梁苑十年之事,俱付之阙如;其他每年所经历之地,其出处行藏,挂一而漏万,不足以尽太白一生之游历”。黄谱即为

补正王谱而作。本书附录黄氏所辑太白佚文三篇,据考实为独孤及文。书末附《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然有断而无案,舛误亦多。(纪伟)

【李白诗文系年】年谱。今人詹锳编著。完成于1944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出版。该书按年考订编录李白诗文,自开元七年(719)李白十九岁起,至宝应元年(762)李白卒于当涂止,按其行年编入诗六百十六首、文五十二篇,占李白诗作的三分之二强和文的绝大部分。该书广引史书地志及前人如薛仲邕、杨齐贤、萧士赟、朱谏、胡震亨、王琦、钱谦益、曾国藩等的研究成果,将李白生平与其创作相互比勘参证,详加考证辨析,成功地对李白人部分诗文做了编年的尝试,实际上成为一部新的年谱,故在学术界受到重视与好评。《系年》之后并附《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李白乐府集说》、《存疑之作》三文,书末有《李白诗文系年篇目索引》,按首字笔画编排,甚便查检。编者另有《李白诗论丛》。(纪伟)

【李白杜甫年表】诗人年表。系《李白与杜甫》一书第三部分,今人郭沫若著。此表起自武则天长安元年(701)李白出生,迄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逝世,记述李白、杜甫二人生平游踪、交往,间有重要作品的系年,相当简明扼要。七十年间史事,则另辟“史事札记”栏书之,有助于对李、杜生平事迹及思想变化的理解。(纪伟)

【李白年谱】年谱。今人安旗、薛天纬编著。齐鲁书社1982年8月出版。该谱较晚出,编者于前言中称:对前人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更之。悬案则兼采众说,以利争鸣,或姑从旧说,以俟将来”,故较能赅括近年李白生平研究之进展。本书编者又以“诗为心声”、“循声得情,循情得实”为据,“在编写过程中,除旁征史传外,着重在作品分析。既从微观以求其奥义,复从宏观以瞰其规律”,力图揭示诗人难言之隐,而试抉前人未发之秘。故谱中颇多推论之词,未可遽作定论。(纪伟)

【李诗辨疑】研究专著。二卷,附于《李诗选注》后,明朱谏撰。朱谏既选录李白诗并为作注释,对所删汰的二百十六首逐一指摘其疵累,以明其删削之旨而成此书。原非单行,后乃分刻,有《敬乡楼丛书》本。其书首列作者小序,后有黄群民国十八年(1929)跋文,略云:“此书世已罕传,闻孙氏玉海楼藏有全帙,因将写本寄请孙君缙万校勘。孙氏所藏为嘉靖刻本,缙万为之勘订既极精审,又于白诗字句之讹夺者以汲古阁刊本是正之。”今据此本,知朱谏以《长干行》第二首(忆妾深闺里)、《少年行》(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猛虎行》、《草书歌行》等为贗作,理由不外“鄙俚浅俗”、“粗俗妄诞”之类,大抵从本人阅

读感受出发,但经后人考证辨析,其判断颇有不可移易者。然其辨疑,既多凭臆而谈,则亦往往不免主观武断之处,如谓《白头吟》二首、《巴女词》等为伪作,理由极不充分,见解十分迂腐,且好指某诗为李益作,某诗为李赤作,专辄之弊所在多有。李白诗集在流传中孱入他人作品乃至仿制贗作,这是前人早已感到的,但著为专书,朱谏还是首家,故虽有种种缺点,其对研读李白诗的启发、参考意义仍不可忽视。

(纪伟)

【李杜研究】研究专著。今人汪静之著。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属《国学小丛书》之一。全书七章,首论李、杜之比较,以为全书之纲领,其余诸章从不同角度加以敷演申说。汪氏对前人的李、杜优劣之论深表不满,批评他们以“周公制作”、“孔子大成”肯定杜甫的观点,是一种非文学的陋见。其比较则分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和身体各方面,一一指出李、杜二人的不同特点,并列表加以说明。汪氏认为李、杜由于境遇苦乐的不同,导致精神与欲望状态的差异,从而造成李白诗富有贵族气而杜甫诗平民味浓重的根本区别,但两者都是人间苦、社会苦、世界苦的结晶,因而都是好诗。以下六章分别从李白之流浪生涯与杜甫之穷苦身世、李白之颓废思想与杜甫之博爱襟怀、李白抒情之笔与杜甫之写实工夫作进一步比较、阐论,以证成前说。汪氏本是诗人,对李杜诗浸染颇深,所论均从实际出发并有真切体验,故常有会心与极精辟处,而绝无迂腐之见。

(纪伟)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研究专著。今人李长之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属中法文化丛书之一种。该书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批评,但受西方文论影响,采用了类似作家传记的文体和夹叙夹议兼有抒情的笔调,显示了著者本人的鲜明个性。全书分导论、李白求仙学道生活之轮廓、道教思想之体系与李白、李白从政、李白的文艺造诣、李白之为入等章,不以逻辑推理胜,却极富感悟与启示力。如论李白其人其诗的本质是为生命与生活而奋斗,其价值在于给人以解放,这也就是李白作品充满豪气和生命力的根源;如以道教思想体系一一与李白诗作、行为对照,以说明李白信奉道教之深;如论李白性格之真与重感官享受,李白之寂寞和虚无等。全书文采斐然,尤为重要特色。(纪伟)

【诗人李白】研究专著。今人林庚撰。此书全面评论李白和李白诗歌,凡五章,包括:李白诗歌的现实性,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李白的政治生活,李白的艺术成就,李白与杜甫。此书在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发展为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主要表现在对

书中所论及的“布衣”、“布衣参政”、“布衣斗争”以及“布衣感”问题。作者认为布衣是指平民,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是一位平民。平民处于社会中下层,他们的出身与利益要统治者开放政权。平民通过布衣知识分子进入封建政权中代表自己利益,因而这些布衣知识分子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统治者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于是本来没有地位的布衣,反而以布衣为骄傲,不但在野如此,在朝也如此,这就是“布衣感”。有布衣感的文人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这是民主的胜利。作者还认为布衣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封建社会中乃是于农民直接斗争之外经常代表着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发展得好,布衣之士得以抬头,封建社会就会向前推进。这些观点受到当时历史学界、文学史界的批评,1958年、1959年又受到严厉批判。书后附李白代表作品九十六首,又附“有关李白的重要传记”五篇,如《草堂集序》等。此书原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作的报告,经过数次讨论,作者修改成书。最初于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6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1957年第三次印刷。

(王学泰)

【李白诗论丛】 研究专著。今人詹锳撰。作者另有《李白诗文系年》。全书包括论文八篇及李白游踪图一张。论文涉及李白集之版本、家世、《蜀道难》之本事、唐人书中所见之李白诗、李诗辨伪、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李白乐府探源、李白生平及创作等问题。其中除李白生平及其诗一篇以论述为主,较多阐释分析成分外,其余各篇均为考证,所讨论的均为李白研究中带基础性的问题,其结论也大抵平实可靠,既是作者撰写《李白诗文系年》的重要依据,至今也不失参考价值。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纪伟)

【李白诗论及其他】 论文集。今人孙殊青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该书收论文七篇,前四篇分论李白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自然形象、妇女形象和现实主义精神,对冯至、舒芜等的观点有所辩难。后三篇论及屈原作品中“民”字的解释、《惜往日》真伪问题以及《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等,对丁力、游国恩、孙望等的观点提出商榷。作者对苏俄文艺理论比较熟悉,显示了勇于探索与批评的特色。

(纪伟)

【李白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王运熙等著。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此书为诸作者在编选《李白诗选》的基础上写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师生结合共同研究的成果。内容包括对李白生平思想、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述评,并对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

精神、李白向汉魏六朝民歌和古代诗人学习等问题作了集中论析。其中李白学习汉魏六朝民歌一章由王运熙执笔写成。王氏对乐府诗有精深研究,故阐述李白诗学习发扬乐府诗精神,继承乐府艺术手法并有所创新,从而取得辉煌成就,最为切实精当。

(纪伟)

【李白研究论文集】 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1964年出版。本书共收有关李白研究的论文三十三篇,分上、下两辑。上辑起清末至建国前,下辑自建国至1962年6月以前,凡可备一说、足资参考者,皆予选录,诸文依发表先后排列,观点均保持原样,不作修改,以存其真。上辑较重要的有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孙楷第《唐宗室与李白》等,下辑则有林庚《诗人李白》、俞平伯《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蜀道难〉说》、《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樊兴《〈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等。因为该书不收整本的专著或已辑入专书的论文,书末特附论文索引,供读者参考。

(纪伟)

【李白与杜甫】 研究专著。今人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是书无序跋,内容包括三部分。一、关于李白。下分七篇,分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境内)、家世、政治活动中的两次失败(由待诏翰林到赐金还山、追随永王璘而得罪)、长流夜郎前后、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与杜甫的诗歌交往。二、关于杜甫。下分九篇,分论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之癖以及他与严武、岑参、苏涣等人之关系。三、李白杜甫年表,详见另条。是书约完成于六十年代末,一反著者以前视李杜为唐代诗人中“双子星座”的观点,改持“扬李抑杜”观,虽对李白的功名欲望亦有所批评,但仍以赞扬为主,对杜甫之思想、行为、诗歌内容则多所指责,有时甚至不免曲意贬抑,显示了政治干扰给予学术研究的不良影响。数年后乃有人著文对是书主要观点与倾向进行商榷,并探索其造成失误的原因。是书某些考证和论断(如关于李白出生地为中亚碎叶)也得到学术界重视和认可。

(纪伟)

【李杜论略】 研究专著。今人罗宗强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书是对李白、杜甫二人的全面比较。首章对李杜优劣论作历史回顾,指出不可扬此抑彼,妄论优劣,但却不妨进行比较研究。其余六章分别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对李、杜进行对照论述,指出其相同或相异之处。如谓李、杜均有政治理想,各自从自身所处地位对现实有所批评,

但杜甫触及贫富悬殊,比李白仅揭露朝政黑暗进了一步,二人均迂阔而缺乏政治才能,但并不损及他们的伟大;如谓李白提倡任情率真、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思想,而杜甫则更加提倡讽谕,重视反映社会人生,艺术上具有浑涵汪茫、兼收并蓄的特点,两者的不同与时代变迁有极大关系等。所论均细致而翔实,颇有见地。(纪伟)

【增订李太白年谱】 年谱。近人王伯祥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为四川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是谱以王琦《李太白年谱》为基础略作增删,内容包括:纪年(首揭公历,下列当时实际使用之年号),当时的政治措施和社会情况(据两《唐书》、《通鉴》增辑),谱主事迹,谱主同时历史人物或与谱主有关诸人动态四项。全书仅四万余字,比较简略。(纪伟)

【李白十论】 研究专著。今人裴斐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由十篇论文组成,分别论述历代对李白的的评价、李白经济生活来源、供奉翰林之事、隐逸的思想和行为、其政治抒情诗、从饮酒诗篇看其性格及思想矛盾、其山水诗中的情景问题、游仙诗、上述诸类诗作以外“另一领域”(如思乡、友情、反映下层社会生活)的作品,以及李白诗中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的主题等,比较全面地评论了诗人李白的的生活、思想和作品。(纪伟)

【李白丛考】 论文集。今人郁贤皓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收文十三篇,均为考据李白生平、交游及作品者。其中涉及生平的,有李白蜀中事迹考,出蜀年代考,两人长安考;涉及交游者,有与孟浩然、张垍、吴筠、崔侍御、元丹丘、刘长卿及暮年诸友的交往考证;涉及李白作品的,则有《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及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等。作者对唐史材料熟悉,后此曾有《唐刺史考》五册问世。本书考证细密,颇多新见,如据张祜《梦李白》诗证《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时,据诸碑志证与李白交往甚密之崔四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崔宗之行五非行四,使长期混淆不清的疑案得到澄清。(纪伟)

【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 本书以画论札记而兼及诗学。今人王伯敏著。西泠印社1983年出版。选录李、杜题画诗数十首,分山水景物、动植物、人物等项论诗与画之关系,尤重揭示李、杜论画诗蕴含的意旨,通过对诗语画境的比照分析,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论述了李、杜思想的某一方面(如李白借“无喧”之境表现无为及出世思想,杜甫借画鹰、画马宣泄抱负及纾郁情怀),阐发了诗画相通的神似、求真等美学原则。其中间有考证,如考李白与薛稷时

代不相及,破旧说之附会。并论及李杜某些诗语,如“白摧”、“黑人”等对后世绘画创作和评论的影响。

(纪伟)

【李白诗新笺】 论文集。今人安旗著。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是书除小序与所附李白小传外,载短文十三篇,其中综论两篇,谈李白诗总貌与绝句艺术,余十一篇分别考辨论析李白诗,涉及《蜀道难》、《长相思》、《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公无渡河》、《远别离》、《横江词》、《上皇西巡南京歌》、《庐山谣》等,是作者研习李白诗并试图为之编年过程中的产物,往往能参考众说证诸李白生平与全部作品,时有一得之见,如谓《蜀道难》乃李白一人长安后借写蜀道艰难喻指仕途坎坷之作,《远别离》反映了李白幽州之行后忧国慨时,意欲高举远引的矛盾心理等。(纪伟)

【李白和他的诗歌】 研究专著。今人胥树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本书具有作家评传性质,无序跋,全书七章二十一万字。第一章李白的时代和家世,叙述中除有主线突出的优点外,且能够注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第二章漫游生活的开始,从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起,写到他离开安陆北上游历太原为止。第三章青春和欢乐的歌,集中评赏前章所述时期李白创作的诗,着重谈了《江夏别宋之悌》、《荆门浮舟望蜀江》、《渡荆门送别》、《江行寄远》、《荆州歌》、《杨叛儿》、《白头吟》、《长干行》诸诗,或引前人评论,或将诗之草稿与定稿比较,或剖辨李、杜同类题材作品之得失,行文灵活,颇能启发思考。第四章北上东鲁和三人长安,从所叙时间上上接二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明确提出李白三人长安说,并定李白第三次入长安为天宝十二载(753),对此作了初步考证。本章写法仍是结合诗人经历和思想变化来论析其作品,对李诗特色有深入探讨,并据以重新整理《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可聊备一说。第五章情感的升华,第六章情感的表现,回叙北上东鲁至三人长安时期的李白诗歌,方法是以之与其以前的诗相比较,并将本时期前后两阶段的诗相比较,五章着重谈反映李白政治见解的诗,六章着重谈描写一般日常生活的诗。其中第五章涉及《行路难》、《蜀道难》、《日出入行》、《远别离》、《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襄阳歌》、《古风》等重要诗篇的主题思想,对向来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论证,尤其富于启发性。第七章晚年:今日之日多烦忧,叙述李白于天宝十二载(753)离京南下以后的生活与诗歌,仍以游踪为纲而创作为纬,最后以杜甫《不见》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作结。本

书正文以叙与论为主,而于章末注文中作考据辨析,参考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见解,对许多具体问题(如《菩萨蛮》、《忆秦娥》二词、《笑歌行》、《悲歌行》等均非伪作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著者熟习李白诗歌与史料,颇多真知灼见,且思想活跃,文字洒脱,故本书可读性很强。(纪伟)

【李白论】 研究专著。今人乔象钟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是书由九篇论文与两篇附录组成,是作者1956年以来研究李白的成果结集。其中《李白从璘事辨》系统考论了李白在天宝末年的思想状态、从璘的经过、得罪被流放和赦归的过程,驳斥了视李白从璘为“附逆”的陈说,论析细密,很有说服力。其他诸篇分论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李白思想特点及其社会根源,李白诗论及其艺术实践,李白《古风》的思想内容,乐府诗、山水诗的成就,李白诗中的妇女群象等,亦时有创见。附录分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及殷璠《河岳英灵集》。(纪伟)

【李白研究】 论文集。今人安旗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作者原为新诗评论家,后专攻李白诗数十年,曾与人合作,著《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由四川巴蜀书社于1990年出版。该论文集除代序外,包括论文近二十篇,约分四辑。首辑一篇《论李白》,为《李白全集编年校注》之前言,综论李白生平、思想及作品特色。次辑七篇考论李白事迹,涉及白在蜀中生活、三入长安、入朝由元丹丘所荐、东鲁寓家具体地点及避地剡中真相等问题。三辑十篇对《蜀道难》、《梁园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公无渡河》、《远别离》、《横江词》、《古朗月行》、《蟾蜍薄太清》及《菩萨蛮》、《忆秦娥》二词,或作考辨系年,或作抉隐发微,均能联系李白生平经历及思想变化,作出明确结论,颇多己见,不乏精彩。最后为李诗札记十则、李白诗王琦注补正两篇。(纪伟)

【李白研究论丛】 论文集。李白研究会编。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是书无前言、后记,故编辑原委不明。全书收研究论文二十九篇,二十三万字。首冠江油李白纪念馆供稿之《唐李先生彰明旧宅碑》(994)拓本照片一幅,惜字迹模糊不清。论文分为三辑。首辑总论李白诗之时代价值、创作个性、感情表现特色以及太白诗与庄子的关系、元稹的李杜比较论等。次辑考论李白出生地、籍贯、行踪及卒年,其中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谈李白的籍贯问题》,不同意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所云太白出生地为碎叶,而主张太白“是蜀生之蜀人”,认为要推翻此说,“除非发现足以将魏(颢)、李(阳冰)、刘(全白)、范(传正)诸人的记载推翻的新资料”。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谓“李白一生曾经三次入长安。开元十

八年……是为‘一人’。天宝元年,奉召入朝,待诏翰林,是为‘二人’。天宝十二年春,幽州之行归来,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是为‘三人’。此三次中,‘二人’早已为世所知,‘一人’之说亦基本确立,唯‘三人’之说,尚在探索之始”,故该文即以李白《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古风》其四、其三六、其四六、其五四、《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江上答崔宣城》及《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等诗试考李白“三人”长安说之成立,并略述其“三人”之始末。结论谓:李白“三人”带秘密性质,其时政局黑暗,故诸诗更为幽深曲折,然潜心探求仍可做到“草蛇灰线,虽隐而显;幽愤秘旨,虽曲而达”。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则拟推翻李白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享年六十二岁的旧说,而主李白卒于代宗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说。主要理由是前说出自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而该文乃是伪作,不可信。后说最早由宋人曾巩提出,本文又据李白诗文、碑传、行踪予以多方证明广德年间李白尚在世,其说值得重视。第三辑讨论李白作品,其中有考有论,如考《菩萨蛮》词真伪、《蜀道难》等诗创作年代,如论李白蜀地诗作、《永王东巡歌》之意义等。撰文者有著名学者王运熙、郑临川、朱金城、胡国瑞、徐仁甫等。(纪伟)

【新刊校订集注杜诗】 杜诗注本。三十六卷。宋郭知达辑,曾噩校刊重刻。收入《四库全书》时易名为《九家集注杜诗》。知达,成都人,生平事迹不详。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辑成此书,刻于成都。其自序云:“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深叹。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原叔、薛梦符、杜时可、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凡九家,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精其讎校,正其讹舛,大书钁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庶几便于观览,绝去疑误。”曾噩,字子肃,福建福清人,宋光宗绍熙朝进士,官至广东漕使。因不满于旧本“纸恶字缺”,所以“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会士友以正其脱误,见者必当刮目增明矣”(重刻本自序)。书刊成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旧称“漕台本”。全书三十六卷,古今分体编年,前十六卷古诗,后二十卷近体。所集九家之注,以赵次公为最多,杜田、薛梦符、鲍彪、师尹次之;不标姓名,或称为“旧注”者,多为其他宋本所谓的“王洙注”,为数也不少;其余王安石、宋祁、黄庭坚三家,偶有征引而已。此书删去托名苏东坡的伪注;它本的“王洙注”,书中虽在序言中提及王洙之名,但引用时却不标姓氏,盖因其是否出于王洙,很可置疑

也;赵次公是宋代杜诗注家中用力最勤,成就较高者,曾噩称之为“少陵忠臣”,此书不仅大量引录其注,且在遇有注家意见相左时,又往往以赵注决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别裁有法”,要非溢美。郭知达刻本已久佚,曾噩刻本则流传至今。收入《四库全书》者即武英殿藏曾刻本,嘉庆年间又曾翻刻。四十年代洪业即据以编成《杜诗引得》。其序言云:“其本中之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中之注,皆贗品也。夫郭知达刻本成于淳熙八年,其中自不能有二十餘年后蔡梦弼《草堂诗笺》之注;曾噩重刻本成于宝庆元年,其本自不应载元初刘辰翁评杜之语。”实乃原本残缺,后人据它本抄补者。此本于嘉庆二年(1797)毁于火,但曾刻本仍有两种残本存世。一种存五卷,现在日本静嘉堂书库;一种存三十一卷,抄补五卷,原藏瞿氏铁琴铜剑楼。三十年代,张元济借以制成铅皮版,未及付印而抗战爆发。所幸其版未毁于战火,1982年中华书局据以重新制版印行。此本所缺之五卷,乃据嘉庆翻刻本抄补;中华印行时,版面侵蚀、字迹模糊之处,因原书其时不知下落,也只能据嘉庆本补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善本丛书却在1985年影印了这部瞿氏藏本。据其书之序跋,知此本在抗战初期从铁琴铜剑楼流出,为上海商人沈仲涛购得,后携去台湾,秘不示人,死前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院,遂得以影印刊行。此本虽非完璧,但也可见当年印制之精美,确如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所云“字体端劲,雕镂精善”及黄丕烈《百宋一廬书录》所称“开板宏爽,刻镂精工”。(朱宝清)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杜诗注本。宋黄希、黄鹤补注。全书三十六卷,古今分体,前十六卷为古诗,后二十卷为近体。每诗题下标明写作年月,但并未完全依次编排。黄希,字仲得,一字梦得,号师心,临川(今属江西)人。宋孝宗乾道二年(1164)进士,官永新县令。著名诗人杨万里曾为其所筑之春风堂作记。其子鹤,字叔似,以布衣终生,著有《北窗偶言集》,已佚。黄氏父子积数十年之功,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撰成此书。黄鹤《杜工部年谱辨疑后序》说:“鹤先君未第时,酷嗜杜诗,颇恨旧注多遗舛,尝补辑未竟而逝;又欲所作岁月注于逐篇下,终不果毕力,未必不赍恨泉下也。鹤不肖,常恐无以酬先志,乃取槧本集注,以遗稿为之正定。凡径据引者不复重出,又辄益以所闻,于是稍盈卷帙。每诗再加考订,或因人以核其时,或搜地以校其迹,或摘句以辨其事,或即物以求其意,所谓千四百餘篇者,虽不敢谓尽知其详,亦庶几于得七八矣。”此书号称“千家集注”,实为一百五十一家,又以鲁峕、赵次公、师尹、鲍彪、杜修可之注及所谓的“王洙注”为多。成书

于其前的《九家注》及《草堂诗笺》却未加引录,当因流传未广之故。所引各家皆标以姓名,补注则称“希曰”、“鹤曰”以示区别。此书之成功之处在于编年。黄鹤《年谱辨疑》对前人之疏误,多有驳正;每诗题下所标的作诗年月,虽未能避免疏漏,但杜诗之编年确已基本完善,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仇兆鳌《杜诗详注》等多以之为据。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其《总目提要》谓:“冠以《年谱辨疑》,用为纲领,而诗中各以所作年月,注于逐篇之下,使读者得考见其前后出处之大致。”“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洪业《杜诗引得序》则说:“希所补注,多在文辞典故;鹤所注意,多在年月史实。量其得失,《四库总目》所评尚称公允。”又谓此书及《草堂诗笺》同为重于辑校集注之宋代杜诗注本中“已造其极”之作。此书之初刻本已佚,现存最早的翻刻本为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刊本,残存九卷,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见台湾《书目季刊》1970年夏季号所载叶绮莲《杜工部关系书存佚考》)。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各一部,宋本有《集注姓氏》而无《年谱辨疑》,元本则反之。1970年山东邹城九龙山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一部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武夷詹光祖翻刻本,既有《集注姓氏》,又有《年谱辨疑》,附录次序也与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元本多有不同。《四库全书》本改称《黄氏补注杜诗》,其所据恐为另一元刻本。(朱宝清)

【杜工部草堂诗笺】杜诗注本。宋蔡梦弼撰。梦弼,字傅卿,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平不详,唯知其刻书甚多。俞成《草堂诗笺跋》称其“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刻成此书。蔡氏于跋中自称:“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每于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以出,离为五十卷,目曰《草堂诗笺》。”此书虽未用集注之名,实为采录各家之注再加蔡氏笺语的集注本,编年而不分体。在所录各家注语中,赵子栎注多于其他宋人集注本,此其长处之一。至于蔡氏之笺注,除有疏漏外,还有掠人之美处。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二句之注,即径抄师古之语;在《杜氏谱系》中,直录了马永卿《懒真子》之文,却在其前后标以蔡梦弼“考之”及“为之书”。洪业指出了它的这些不足,但又说:“然其删繁就简,校勘考证,文气相属,既释字句,复详篇意,便于初学。”(《杜诗引得序》)校短量长,不失为中肯之见。此书有三种版本。其一为五十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三十九卷。《中国

版刻图录》认为：“宋讳缺笔至‘廓’字，因推知此书当是嘉泰元年(1201)成书后建阳书肆第一刻本。”另有再附外集一卷，蔡梦弼撰《草堂诗话》两卷，鲁崑、赵子栎《杜甫年谱》各一卷者，也有残卷及清抄本存世。其二为二十二卷之不完全本，今藏于成都杜甫草堂。清光绪二年(1876)，方功惠曾予翻刻。功惠，字柳桥，巴陵(今湖南岳阳)人，长期在广东做官，并在广州建成碧琳琅馆，据其丰富的藏书，刊成《碧琳琅馆丛书》。方氏翻刻时，又据其他抄本配补《诗话》两卷，鲁、赵《年谱》各一卷。其三为四十卷附补遗十卷本。此为宋末坊间翻刻本，朝鲜沈氏再翻刻于世宗十三年(1431)。清光绪十年，黎庶昌在东京据以上两种雕版重印，收入了《古逸丛书》。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古逸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此书之补遗十卷，题作“临川黄鹤集注，建安蔡梦弼校正”，并说：“蔡梦弼尝集杜工部诗四十卷而笺注之，取信海内已久，然其间犹有遗逸，观者不无沧海遗珠之憾。今得黄氏父子《集千家注诗史补遗》，计一十卷，意梓以传，非但有以备前编之遗缺，亦所以集《诗史》之大成欤！”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撰成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刻印又在此后，则十余年前已撰成印行《草堂诗笺》之蔡梦弼怎能为之校正？而且此十卷中，多为蔡氏之笺而无黄氏补注，所以洪业《杜诗引得序》谓此本“乃奸商既盗蔡氏之书，复盗黄氏之名耳”。三种版本以此本为最劣。洪业合评此书及《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说：“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迨南宋之末，蔡、黄二本已造其极。”(《杜诗引得序》)其言甚是。(朱宝清)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杜诗评注本。二十卷。宋刘辰翁评点，元高崇兰辑刊。崇兰，字楚芳，庐陵人，乃刘辰翁子刘将孙之门人。高取宋人《集千家注杜诗》，大量删削旧注，补以《兴观集》及刘氏其他评点杜诗之语，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辑成此书。刘将孙与其子为之校定，并撰序言说：“是本净其繁芜，可以使读者得于神，而批评标撮，足使灵悟，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楚芳于是注用力勤，去取当，校正审，鉴他本草草藉吾家名以欺者甚远。”其言基本符合事实，此书也确实优于刘氏其他门人所辑刊者。此书以编年为序，不分古今体，其编年颇异于黄鹤，实不足据。所引之注以赵次公、师尹、蔡梦弼、黄氏父子及所谓的“王洙注”为多，另有少数采自诗话、笔记的司马光、沈括等人的评注，均各标以姓氏，不标者则为刘辰翁评点之语。刘氏批点，固有空泛之言，却也不乏中肯之见。洪业《杜诗引得序》说：“窃谓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迨南宋之末，蔡、黄二本已造其极。元人别开生面，一转而为批

选。”“顾惟刘辰翁以逸才令闻，首倡鉴赏，于是选集解律之风大起。”关于刘氏评点之影响，钱谦益早就说过：元明两代之宗刘者，对其言是“奉为律令，莫敢异议”(《钱注杜诗·注杜略例》)。此书元明两代流传极广，曾经多次翻刻，书名也有所变化。翻刻本中流传较广者，有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玉几山人曹道刻本及明易山人刻本、约刊于明代末年的许自昌刊本等。以上三种书名中均无“批点”二字。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书名作《集千家注杜诗》。

(朱宝清)

【杜工部诗通】杜诗选注本。十六卷。明张缙撰。缙，字世文，高邮(今属江苏)人。明武宗正德年间中举，曾官光州知州，后归隐故乡之南湖，自号南湖居士，著有《南湖诗集》等。《杜工部诗通》以元范梈《批选杜诗》为底本，但将分体编年改为只以作年先后为次，选注杜诗三百四十六首，每首题下标明写作年月，因能详加考订，故颇有辨正前人系年之误者。又有简要题解，或重于题意，或重于背景。其注先释名物、典故、字意，再串讲全诗，并析章法结构，也有一些作品被标以赋、比、兴者。照录前人注语，均标姓名；取诸前人又参以己意而出者，则不标姓氏。书中不无独到之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即时引其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颇能去诸家钩棘穿凿之说，而其失又在于浅近”。按浅近便于初学，或非缺点。此书在张缙死后，由其子张守中于明武宗隆庆六年(1572)刻成，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以影印，收入《杜诗丛刊》。张氏另有《杜律本义》，也是杜诗选注本。

(朱宝清)

【杜律单注】杜诗选注本。十卷。明单复注。此本乃明代陈明从单复《读杜诗愚得》中选出五七言律诗，辑刊而成。单复，一云又名复亨，字阳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太祖洪武年间中举，曾在湖北做官。平生喜爱杜诗，评注杜诗全集，自称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而命名。单氏之评注，置于每诗之后，先注释词语、典故及时事，后串讲全诗，兼涉评述。屡引宋代赵次公、蔡梦弼等人之注及刘辰翁之评，惜有失考辨，不免有沿袭讹误之处。单氏又仿朱熹《诗集传》之体例，于评论时标明各诗或赋、或比、或兴、或赋而比、或赋而兴，虽未必尽当，但此却为宋元杜诗注本之所无，又为明人邵宝、张缙等人注杜诗时所袭用。仇兆鳌《杜诗详注》也多次引用单氏之评注。陈明，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嘉靖进士。《历城县志·人物传》称其“博学工诗”。陈明辑成此书后，刻于嘉靖十一年(1532)濮州景姚堂。书中评注全同于《读杜诗愚得》。

(朱宝清)

【笺杜陵诗】杜诗笺注。一卷。明董斯张撰。斯

张,字遐周,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明万历时监生,能词,有《静啸斋词》,著述则有《吴兴备志》、《广博物志》、《吴兴艺文补》等。董氏将研读杜诗之心得,汇编成此卷,以数语笺注一诗一句,而不附诗之本文。周采泉《杜集书录》说:“虽所笺仅二十馀则,然援据赅博,推见至隐,明代人读杜札记,应以此为上乘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已上人茅斋》诗:“江莲摇白羽”句之注,引董笺云:“白羽如‘值其鹭羽’之羽,状莲之迎风而舞。”即为很好的诠释。此笺载于董氏《吹景集》之卷六,未见有单刻本。《适园丛书》收有《吹景集》。(朱宝清)

【杜诗通】杜诗评注本。四十卷。明胡震亨撰,此乃胡氏《李杜诗通》之杜诗编。胡氏曾编《唐音统签》,《统签》完稿后的第二年,胡氏开始笺评李、杜之诗,历时二十年,至毅宗崇祯十五年(1642)始告成书。胡氏生前未及刊行,后其子胡夏客又加校订。经校补,考订更趋缜密。至清顺治六年(1649),秀水朱茂时将其与《李诗通》合并刊行。胡震亨于自序中阐述编撰之旨说:“读杜诗即不可不稍知其岁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为穿凿,而于体例多紊乎?今乃依古本,分体为编。一体之中,各以题类为次。一类之中,除长安、蜀中、夔府、湖南确然可见者为次外,其余无可定者,并以题类相附。一切牵强之说,概从芟去。旧注繁芜,百存一二。其意旨未经前人发明者,略抒肤见,以资商榷。”全书四十卷,依次为五言古诗十二卷、七言古诗六卷、五言律诗十一卷、五言排律五卷、七言律诗(附七言排律)四卷、绝句二卷。又大体分类,约略编年。全书以评为主。引录他人评注,各标姓名,胡氏之言,则冠以“遯叟云”。注释不多,仅从高崇兰删存之赵次公、蔡梦弼、黄鹤之注中略取一二,亦有胡氏之注释。所录评语,乃刘辰翁、王世贞、胡应麟、谭元春、钟惺、郑继之等人的意见,而尤以郑氏之“好”、“妙”、“拙”、“劣”为最多。诗篇之字句,胡氏认为佳者,即予圈点;认为劣者,则画一黑线于句之右侧。诗篇上栏之外,又用“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及“删”字品评各诗,也有无上述标识者,对此,洪业认为“殆震亨以为仅居可删可不删之间耳”。洪业又评此书之得失说:“(胡氏)间以自加考证,虽不多,而辄可观。如于《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则议旧注及刘辰翁全失老杜本旨,于是重为稽考,谓是追咏房琯之作。……类此之属,皆可见其好学深思,非徒倚傍他人者比。夫诗之工拙,定评何易!杜律《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一首,郑善夫评云‘无味’。震亨曾游南池,时方新秋,而诗中‘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二联景色,依然不异,遂云‘杜诗诚足千载’。盖情景会心,则妙趣都生;洗

垢索瘢,则何疵不见?震亨神、妙、能、具四品之分,自夸具眼,未免文人习气,殊亦无谓。唯评点杜诗,流风未艾,而彼注中考订之说,亦大略为钱谦益及其后之注杜者所取,其功固不可泯也。”(均见《杜诗引得序》)周采泉《杜集书录》则谓“明人注杜当以此为首选”。除朱茂时刻本外,另有一部无版刻岁月及序跋之翻刻本存世。(朱宝清)

【杜工部集】杜诗注本。清钱谦益笺注。周采泉《杜集书录》按语云:“‘钱笺’以前,自宋迄明,杜诗之家弦户诵者,仅为‘集千家’及虞、赵两注,求一善本而不可得。旧注之失,若伪托古人,傅会前史,伪撰人名,窜改古书,错乱地理等,芜秽舛陋,如出一辙,……至‘钱笺’出,杜诗面貌为之一新。虽后人对‘钱笺’亦有讥其穿凿者,要之其廓清氛翳,荡涤伪注之功,自不可没。”钱氏注诗,注重以史证诗,以钩稽考核历史事实来阐明杜诗的思想内容。对于交游、地理、职官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笺注也颇有资料翔实、论证精当之优长。清代学者注杜蔚然成风,钱氏开启之功不可没。虽然钱氏的某些笺注亦有因过于求深而导致考核失当、穿凿附会之处,然瑕不掩瑜。该书是由钱氏《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增益而成。《读杜小笺》成书于崇祯六年(1633),笺诗六十四则,分上、中、下三卷;次年撰成《读杜二笺》一卷,笺诗三十二则,后又增益为上、下两卷,末附《注杜诗略例》,钱氏笺注之精华可略见于上述“二笺”。全本《杜工部集》笺注曾经钱氏族孙钱曾补充纂订,于康熙六年(1667)由泰兴季振宜刻印,乾隆年间,此书遭到禁毁。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季氏静思堂原刊本断句排印,分上、下两册,书名为《钱注杜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再版,书前有季振宜序、钱氏自序、《注杜诗略例》。卷后有附录“志传集序”,包括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旧唐书·文苑本传》、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孙仅《赠杜工部诗集序》、王洙序、王琪后记、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吴若《杜工部集后记》、《少陵先生年谱》、诸家诗话、唱酬题咏。该书编次与宋郭知达《九家注杜诗》略同,诗分古、近体,约略编年。(尹晓廉)

【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笺注本。二十卷,附集外诗一卷、文二卷。清朱鹤龄撰。朱氏聪颖好学,日以诵书为乐,后又先后为常熟毛晋及钱谦益家塾师,更得以博览群书。著述颇多,尤长于笺疏,著《尚书埤传》、《诗经通义》、《春秋集说》等。又注李商隐诗。撰成《李义山诗集笺注》。约在明亡之后,朱氏开始笺注杜诗,钱谦益知道后,颇加许可,并将自己所笺之家藏秘籍吴若本杜诗及《九家注杜诗》付朱,意欲

由朱将二人之稿合为一书。顺治十二年(1655)至十四年间,两人曾时相商榷。后朱氏返乡完成书稿,钱谦益见后大为不满,虽经朱鹤龄略加修订,且已付梓,钱仍不满意,其《与钱曾书》说:“不谓其学问繁富,心事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钱牧斋先生尺牍》)坚决不肯署名,遂至两人反目,互相攻讦,并各刻其书,为避免授人以柄,故笺注时均力求精审。《辑注》之例言说:“杜诗编次,诸本互异,惟《草堂会笺》觉有伦理。盖古律体制,间有难分;时事后先,无容倒置。不若从此本为便也。”似以《草堂诗笺》为底本,但洪业对此表示疑惑,《杜诗引得序》说:“蔡氏分杜诗为五十卷,朱乃从《集千家注》本分之外二十卷;蔡书编诗从鲁豈之次,朱本次诗乃依违于《集千家注》本与钱本之间。”又罗列其正文与不同处,推断朱氏所用之底本乃《集千家注》本,如明易山人本者之流,其言或是。全书二十卷,附集外诗一卷。诗以时间先后为次,不分体。朱氏辑注重在诠释字句,间或亦在诗末缀一前人或朱氏自己的评述之言。引录前人之注不多,仅赵次公、蔡梦弼、黄鹤三家及钱谦益之笺,余则寥寥。朱氏自序曾谓:前人注杜,有“不可解而强解之”及“可解而不善解之”之失,更有“伪撰假托,疑误后人”之弊,故其“今为翦其繁芜,正其谬乱,疏其晦塞,谘諏博闻,网罗秘卷,斯亦古人实事求是之指,学者所当津逮其中也,余虽固陋,何敢多让焉?”洪业《杜诗引得序》论钱、朱之交往及两书之得失说:“虽然,注杜之争,乃钱、朱二人之不幸,而《杜集》之幸也。考证之学,事以辨而愈明,理以争而愈准。钱氏求于言外之意,以灵悟自赏,其失也凿;朱氏长于字句之释,以勤劳自任,其病也钝。后来作者,大略周旋于二家之间,故清代杜诗之学当以二书为首。”此书第二十卷屡引顾炎武《日知录》中《杜诗注》之语,而《日知录》初刻于清康熙十一年,则《辑注》之初刻当在此稍后。今有康熙间金陵叶永茹刻本存世,1976年日本吉川幸次郎编辑《杜诗又丛》,影印了叶刻本。(朱宝清)

【贯华堂评选杜诗】杜诗选评本。二卷。清金人瑞原评,赵时揖重订。金人瑞字圣叹,别号贯华主人,故称“贯华堂评选”。时揖,字声伯,号晴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约生活于清初,略晚于金圣叹,事迹不详。赵氏对金批杜诗极为推崇,序云:“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名然)、兰雪(名点)昆季暨长文(名昌)诸公处搜求遗稿,零星收辑得若干篇,惧其久而湮也,亟付之梓,天下于是得读《第四才子书》矣。”按此,则此书之刊行,似尚早于《唱经堂杜诗解》。此书分为上下两卷,选评杜诗六十一首,均见于《唱经堂杜诗集》,评解亦全同。此书初刻本已

湮,今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桐荫书屋版、题为《杜少陵诗选》本存世。(朱宝清)

【唱经堂杜诗解】杜诗选注本。四卷。清金人瑞撰。金氏少时即醉心杜诗,壮年即着手批解,而集中批解则在其晚年。原无著作之意,只是读杜时信笔漫批,故是书写作时间长达二十余年,至其身被极刑,尚未完成,今传世之《杜诗解》,系其亲友汇辑刻印之未竟遗稿。金氏评解不肯因袭前人,每解必全力以赴,发前人所未发,道常人所未道,深刻独到之处,随处可见。每首诗有题解、诗中夹注、夹批、分解、总评等项,阐述杜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探索杜诗的制题艺术、格律法度、起承转合、章法、句法、字法等。但是《杜诗解》亦有局限不足:金氏注重杜甫的抒情诗而忽视杜诗作为“诗史”的特点,对许多诗的历史背景常常忽略。再者,他以批才子书之笔调批杜诗,多英雄欺人语,又常意气用事,骂杀前贤,故其说解于精采之余,亦常有失当之处。金氏死后,其评点杜诗文稿散佚多处。先有赵时揖编的《贯华堂评选杜诗》,之后金人瑞从弟金昌经多方搜求其遗稿,辑成《唱经堂杜诗解》,该书版本较多,主要有:清金昌学易堂刻本、宣统二年(1910)邓实辑风雨楼丛书本、民国八年(1919)震华书局石印本、1983年成都古籍书店排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钟来因整理本等。(尹晓康)

【辟疆园杜诗注解】杜诗选注本。十七卷。清顾宸撰。宸字修远,辟疆园乃其居名,无锡(今属江苏)人。生活于明末清初,对杜诗用力颇深,费时数载,注毕全集。稿成后,其友人李壮刻五律十二卷,诗六百二十七首;李赞元刻七律五卷,诗一百五十一首。其余部分曾谋续刻而未果,故行世者仅此包含了杜甫全部律诗的十七卷。其注解颇为详尽。每诗题下有解题,注明时间、地点或题意;诗后置注解,先注释,后评析。所引前人之注,以明代数家及钱谦益、金圣叹为多。又录有李壮、李赞元等人评语,时为有得之言。顾氏之注解,注重以意逆志,探隐索微,力求阐明言外之意,故确有能切中诗旨者。周采泉《杜集书录》则惜其仅为律诗注本,若为全集笺注,则“可与钱笺、朱注鼎足而三矣”。唯稍嫌繁碎,又未能尽免穿凿。此书有清康熙二年(1663)吴门书林刊本,另有题作《杜诗五七言律注解》之五卷本。

(朱宝清)

【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杜诗选注本。五卷。清陈之璠撰。之璠字伯吹,又字孟朴,号朴庵,海宁(今属浙江)人。约生活于顺、康两朝,事迹不详。陈氏著有《杜律注》十卷,五、七律各五卷,此仅其七律部分,收录杜甫全部七言律诗。其注很少引用他人之见,

语言较为简练,也有能阐明诗旨者,沈珩序说此书“间有独开生面者”,倒也合乎事实。但评述多为章法结构的分析,且概以前后四句分作两段加以讲评,则未能免除“腰斩”之陋习;笺释字句,亦偶有失误。此书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陈之璠之侄陈迂著有《读杜随笔》,并曾撰写《杜诗选注》,而迂子世诒又撰有《杜诗集注》,一门三代均孜孜于杜诗,亦世不多见者。

(朱宝清)

【杜诗提要】 杜诗选注本。十四卷。清吴瞻泰撰。书初名《杜诗则》,因编撰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简要读本,故刊行时以“提要”为名。今另有名为《杜诗典要》的抄本残卷存世,此外还有一种易名为《杜诗明镜》的书商盗印本。瞻泰,字东岩,歙县(今属安徽)人,生活于康熙时,生卒年不详,与著有《杜诗说》之黄生为同乡好友。吴著有《陶诗汇注》,其诗文亦归宗自然。吴氏数十年潜心治杜,取杜诗四百七十七篇,编成十四卷,分体编年。诗之编次与正文,与单复《读杜诗愚得》基本相同。注释广采宋以来诸家之见,而以钱谦益为最多。诗之行间,有简要夹注或字句简评,诗末则剖析句段,评述诗旨,兼析字法、句法、章法。其成书之年代,已难确知,但书中多有引用仇兆鳌语处,或其完稿于《杜诗详注》成书之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稍后。今存康熙末年山雨楼刻本,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以影印,收入《杜诗丛刊》。

(朱宝清)

【杜诗阐】 杜诗评注本。三十三卷。清卢元昌撰。元昌字文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活于清初,生平事迹不详。据此书自序之“忆余丁壮盛,沉溺于鸡林之业者垂二十年”,知其曾长期为一书商。卢氏勤奋好学,治学亦尚严谨,著有《左传分国纂略》。卢元昌自康熙四年(1665)开始撰写《杜诗阐》,至康熙二十一年始告完工。此书重点在于阐释诗意,故名。录诗以作年之先后为序,不分古近体,少数诗篇之系年与诸家不同。卢氏对于前人之评注,有所不满,他认为:“有因注反晦者:一晦于训诂之太杂;一晦于讲解之太凿;一晦于援证之太繁。反是者,又为肤浅凡庸之词,曰‘吾以杜注杜也’,则太陋!况长篇而所发明者只一二言,数首而所发明者只一二言,其众所晓者及之,众所不晓者仍置焉,如是者又太简。余于杂者芟之使归于一,于凿者核之使确,于繁者约之使不多指而乱视,于陋者泽之使雅,于简者栉比而遍识之使不里漏,而又加以铢铢组织之功焉。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而又旁罗博采,凡注家未及者约千有馀条。”(见其自序)全书之评注,概出于己而不援引他人。诗题之下,偶有解说;句段之间,也时

加数语,说明其意;诗后则缀一短文,串解全诗,时加阐发,并作评论。《四库全书存目》著录了此书,其《总目提要》讥此书曰:“其注如《四书》讲章,其评亦如‘时文’批语,说诗不当如是,说杜诗尤不当如是也。”洪业《杜诗引得序》则谓此书不无好学深思之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评,“非持平之见也”。周采泉《杜集书录》亦谓此书“所阐发者,正有发人所未发也”,“可取资者不少”,与吴见思《杜诗论文》同为清初杜集注本中有独创风格之作。按卢氏说诗,固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讥之陋习,但总体而言,当以洪、周二说为是。此书现存清康熙二十五年书林刊本,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此本,收入《杜诗丛刊》。

(朱宝清)

【杜诗说】 杜诗选注本。十二卷。清黄生撰。生原名瑄,又名起溟,字扶孟,号白山,歙县(今属安徽)人。生活于明末清初,生卒年不详。博学多才,著述颇丰,惜多散佚,唯《字诂》、《义府》两书因戴震访求而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甚加赞许,足见其颇长于训诂之学。黄生“出入杜诗三十馀年”(《杜诗说序》),又费时六载,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成《杜诗说》。书前有序及《杜诗概说》十六则,乃全书之纲领,其中一再强调“以意逆志”,又认为:“杜公之真面目,蔽于妄注者不少,至其为评,不能深悉公之生平,不能综贯公之全诗,且不融会一诗之大旨,是故评其细而遗其大,评其一字一句而失其全篇,则公之真精神,汨没于俗评者实多。”可见其虽只选注杜诗,却是以揭示杜诗之真精神为己任。所选诗篇分为十二卷,分体编排,依次为五古二卷、七言杂体一卷、五律甲集二卷、五律乙集二卷、七律甲、乙集各一卷、绝句一卷、五排一卷,以上共十一卷,又重出第十一卷,为古诗,第十二卷为近体,但末两卷所录,多已见于前。分体编年,而五七言律诗之甲乙两等,又各自编年,实为分体分等编年体。每诗之末,着一段评述文字,训字词,析句法,评诗旨,颇多真知灼见。洪业《杜诗引得序》说:“其书虽仅为选本,而考证评论,辄多精当之说。”又列举其慧眼独具之处,谓曰:“虽未必皆不易之说,顾亦足以资学者参考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录黄生之说三百馀条,又岂偶然哉?唯认为杜甫受知于玄宗,故集中无讥刺玄宗之语;又以“忧时恋主,叹老嗟卑,处处不出此意”(《杜诗概说》)概括一部杜诗,不免偏颇。评注之文,也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一如评点时文之式”之病。此书刻于康熙三十五年,传世甚稀,又无翻刻。其评幸赖《杜诗详注》等杜集注本的引录始为世人所知。

(朱宝清)

【杜少陵集详注】 杜诗注本。清仇兆鳌注。兆鳌

(1640—1714)字沧注,自号章溪老叟,鄞县(今属浙江)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吏部侍郎。他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广搜博取,汇集了各家注本,潜心研讨,几经增补而成此书。详尽是本书优长。仇氏不但细心揣摩前人百家注解,而且斟酌当时将近十种新的注本,包括他采摭颇多而为世所罕见的《杜臆》。故在编年、校勘、解意、典故出处、体制渊源等方面,能博采众长,而且对他人研究能辨证其得失,态度比较严谨。其注诗体例,于每首诗题之下,首先指明作诗时地、解释题目词语和有关全诗之诸问题。诗文之下,先释大意,字句串解,时有评论发挥,其于词语注解,尤为详尽,广征博引,务求词语之出处由来,尽力搜罗前人及当世注家见解,援引所及不下百家,而尤以赵次公、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等人为最多。长篇诗则分段注解,终了再行总述,注解诠释之后,又辑有各家评论,凡前朝、时人之别集、杂著、诗话,笔记中涉及杜诗之评论,一一列举。然其所列举者皆以羽翼杜诗为标准。如遇有词语歧义者,间或加“附考”,列举诸说之异同,以广见闻。故此,清代众多杜诗注本,收入《四库全书》者仅仇氏一家。但是仇注也有烦琐冗沓的缺陷,而征引多用类书,与原著往往有出入。另外,他在批评别人穿凿附会的同时,自己未能避免附会迂腐之见。至于仇注中的疏漏错误,后出的注本如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均有所补正。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是一部专门驳难仇注失误之书。仇注流传甚广,版本甚多,主要有: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康熙五十二年增补重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迄今最为完善的版本为1979年中华书局重排标点本。该本采用康熙五十二年增补重刻本加以整理、标点,并把原来连排的注文加上注码,移到各诗正文之后。每码另起行,便于查检阅读。该版本较初刻本多上、下两卷。上卷为《诸家咏杜附录》和《逸诗附录》;下卷为《杜诗补注》和《诸家论杜》。为了方便读者,新排本将《逸诗附录》移至二十三卷之末,把《杜诗补注》,连同诗后、卷后增加的补注一起移到每首诗相应的位置。又将个别原注和补注中的重复或矛盾之处作了必要的删节,并改回了清代的避讳字。该本卷首载仇氏原序、两《唐书》杜甫本传、《杜氏世系》、《杜工部年谱》。书末附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樊晃等二十一家序、跋、记,及《诸家咏杜》、《诸家论杜》、仇氏康熙三十二年《进书表》、校勘记和篇目索引等。(尹晓康)

【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 杜诗选注本。二卷。清顾施桢撰。施桢字适园,吴江(今属江苏)人,约生活于康熙朝。此书疏解杜甫七律一百四十七首,分为

两卷。其存诗、编次基本同于《杜律虞注》,但无《虞注》收入的《重泛郑监前湖》及《燕子来舟中作》两篇。疏解分为四部分:其一说明作诗之年及地点;其二解释词语典故,多引前人诗文以为佐证;其三疏意,区分赋、比、兴,揭示诗旨,阐释诗意,兼析章法;其四为直解,以文译诗,又时参己见,颇为详尽。讲解透彻,便于初学,是此书之长;稍嫌繁冗,疏意与直解又多有重复,是其短。除疏解外,诗题之下偶有说明。此书尤注意疏解文字的通俗易懂,故周采泉《杜集书录》谓曰:“杜诗白话解,要以本书为第一部。”清康熙二十五年(1668),此书初刻于心耕堂;雍正十一年(1733),心耕堂又予重刻,并“订其舛讹、正其字画”,订正了个别字句。(朱宝清)

【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 杜诗选注本。四卷。清陈醇儒撰。醇儒字蔚宗,姑孰(今安徽当涂)人。生卒年不详。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曾注杜诗全集,但仅其中的七律部分由其友人许岩光删定,刻成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即为此书。全书笺注杜甫七律一百四十五首,以作年先后编次。诗题下大多附有题解,诗后则置笺注。陈氏于前人注解,除引钱谦益之语标以“钱笺”外,多为取其妥善处,再融合己见而出之,故不标姓名。对前人注释之失误,也能有所辨正。笺注每将诗按前后四句分作两段,概括段意,再逐句串讲,并力求能揭示诗之言外之意。对于一题数首之组诗,则在逐首笺注之后,再总说其命意与结构。一些可备一说之异解也予辑录。周采泉《杜集书录》谓此书“所解明白条畅,有利初学。在清初选本中,亦可别树一帜”。(朱宝清)

【杜诗直解】 杜诗选注本。五卷。清范廷谋撰。编纂时名为《杜诗醒疑》,刊行时改称“直解”。廷谋字周路,号省庵,鄞县(今属浙江)人。雍正时曾任台湾知府。据此书之《廷谋再识》,范氏对于杜诗,二十余年间“苦心焦思,无间晨夕,以意逆志,恍与浣花老人晤对几席间,不觉融会贯通于心胸”,又“于五七言近体尤所酷嗜”,终于在雍正六年(1728)年近七旬时,编成这部杜甫五七言律诗的选注本。书凡五卷,计五律三卷,七律二卷。所选之诗,则约为杜甫五律之半及七律的九成。未录者,自称乃因“自愧识学未到,不能得其奥义,聊用阙疑,非敢妄为去取”,于此亦可见其审慎。诗题下的解说与行间的夹注,均极简略,又多为引录前人之语。诗后范氏再作逐句串讲,“追述作诗之意,复就章法、句法、字法一一抉别无遗,加以评论”。解说尚称简明,也能揭示诗旨,为后之杜诗注家所重视。此书有雍正六年(1728)范氏稼石堂刻本。(朱宝清)

【读杜心解】 杜诗注本。六卷。清浦起龙撰。起

龙(1679—?)字二田,号山伦,无锡(今属江苏)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曾任苏州府学教授,著有《史通通释》、《酿蜜集》等。浦氏参考了清初以前的各家杜诗注本(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三家居多),加以抉择,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一些独立的见解。其书名之由来,盖亦本乎孟子“以意逆志”之义,故在该书“发凡”中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他着重于潜心领悟杜诗主题思想,以解为主,以注为副,在会心诗旨方面往往超越前人。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不作过于繁琐的征引与考证,并且注意结合历史背景、历史事实的考核来阐释篇章大意,故颇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同时,书中着重讲解章节大意,所作注解评论,较之钱注杜诗、朱氏注杜等书,多有立异之处,而考订年月、印证时事,亦颇能正诸家之疏舛。卷首的“读杜提纲”尤能提炼读杜诗的要领及杜甫一生节概。此书按体分为六卷: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绝句。每卷又分若干子卷,若以子卷计之,则共二十六卷。而著者尤重视编年,认为“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故又于各体之中,一一编年,又特于卷首另列编年诗目录一册,以醒眉目。然此种编排,亦颇受非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起龙是编,则于分体之中,又各自编年,殊为繁碎……自有别集以来,无此编次法也。”且于赋笔杂著,不另分卷,而散附各诗之后,有些作品与诗毫无关联,未免强为牵合,不伦不类。评注方法方面,其以封建忠君思想曲解杜甫之处,亦不下于仇注,以致湮没了某些原作的光辉,而在纠正仇注疏漏的同时,其注释也有不少疏漏,有些旧注的失误也相沿未改。此书之写作,始于康熙六十年(1721),成于雍正二年(1724),由浦氏宁我斋刊行。1961年中华书局据宁我斋本标点并铅印成三册,由陈毅署题书名。书前附王志庚点校说明、浦氏发凡、两《唐书》所载杜甫传、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氏世系表略、少陵编年诗目谱、读杜提纲及读杜心解目录。书末为篇目索引。该本于1977年由中华书局重印,书前附加重印说明。(尹晓廉)

【杜诗偶评】 杜诗选评本。四卷。清沈德潜选评。此本录杜诗三百余篇,重在采撷精华,是一部各体具备的杜诗选本。各诗的评论及解说写于行间、篇末,少而精到,其中许多见解颇切诗意。该书版本主要有乾隆十二年(1747)赋闲堂刻本。此书在日本有翻刻本多种。该书卷前有沈氏自序,潘承松所撰凡例。(尹晓廉)

【杜诗镜铨】 杜诗注本。诗二十卷,文二卷。清杨伦撰。伦(1747—1803)字西河,又字敦五,号西禾。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任邑宰。少游名场,即工声韵之学,晚年主讲武昌江汉书院。杨氏自称用力于杜诗近二十年,鉴于“宋以下注杜者名有千家,迩来论列者亦不下数家,然繁简失中,卒少善本”(自序),“注家繁称远引,惟取务博矜奇……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凡例),遂用五年时间,删减仇本繁注而成此书,同时对前代、当代注家在注释微词奥义和时事方面的疏略,亦略有补正。此外,还精选一些前人论诗评语。其以“镜铨”作为书名之意,则可求之自序:“今也年经月纬、句栉字比,以求合乎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镜像未离铨’者。”“镜像未离铨”本杜甫诗句,此处借用,是说己作如镜中之像,有待铨衡,乃自谦之词。此书特点,一是精简,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二是平正通达,不故为异说;三是裁择各本之长,以归于至当;四是款式清晰,省翻检之劳。如该注本置词语注释于句下,章法字评置于行间或栏眉之上,简评则附诸篇末。杨伦注本因其简明扼要,便于初学而版本多达十余种。初刻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柏山房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九柏山房刻本铅印成上、下两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此本再版重印。该本卷前载郭绍虞前言、毕沅序、朱珪序、周樽序、杨伦自序。卷后附张潜《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二卷。又有附录传志(包括两《唐书》本传、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年谱、评论(诸家论杜)。(尹晓廉)

【杜诗集评】 杜诗评注本。十五卷。清王士禄等评,刘澹辑刊。澹字质文,号寓槎,海宁(今属浙江)人,约生活于清嘉庆前后,事迹不详。刘氏汇集清初一些著名诗人的评杜之言于一编,认为“诸先生所评,往往触类引申,揭明此旨,尤具千古只眼,岂世俗评杜者可同日语者”(刘氏自序),并于嘉庆九年(1804)刊行问世。全书分体编次,除句下诗末双行小字之评语外,另有套色的眉批及句旁圈点。刘氏仅辑录诸家之评,而“未敢妄参一语”(该书凡例),故阮元序称其“可谓善述而不徒作”。所录之评语,出于二十二家,但其中十之六七,乃王士禄、王士禛、查慎行、李因笃之评。刘氏选辑,颇具眼力,校核又甚精审,清代的杜诗集评本中,此为最佳之一种。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了嘉庆海宁刘氏藜照堂刻本,收入《杜诗丛刊》。(朱宝清)

【杜工部集】 杜诗集评本。二十卷。明王世贞、王慎中,清王士禛、邵长蘅、宋荦五人评,清卢坤集

刊。坤字静之,号厚山,涿州(今属河北)人,嘉庆进士,道光间官至两广总督。此书之初刻为道光十五年(1835)芸叶龢五色套印本,故又称“五色评本”或“芸叶龢套印本”。卢氏自序说:“诗至少陵极矣,然而言人人殊。余藏有五家合评杜集二十卷,编次完善,汇五家所评,别以五色笔,炳炳烺烺,列眉可数。”“而读杜者,因五家以求津途,则此中自有指南,无虞目迷五色矣。”五色套印之评语,分别为紫色王世贞、蓝色王慎中、硃红王士禛、绿色邵长蘅、黄色宋荦。无卢氏本人之笺评。此书印制极为精美,而王世贞、王慎中两家之评,又为别本杜集所无,故亦为读者所重视。清光绪三年(1876)广州翰墨园又曾复刻,仍为五色套印,只是书品略小,印制亦不如芸叶龢本精致。(朱宝清)

【杜诗选】杜诗选注本。六卷。清陈廷焯撰。廷焯(1853—1892)字亦峰,丹徒(今属江苏)人。清光绪戊子年(1888)中举,工诗词,于古诗词素有研究,著有《白雨斋词话》。陈氏“少为诗歌,一以少陵杜诗为宗,杜以外不屑道也”(《白雨斋词话》王耕心序)。此书选杜诗六百六十三首,分体编为六卷,加以笺评,其中颇多有得之见。如其序云:“窃以为杜诗大过人处,全在沉郁。笔力透过一层谓之沉,语意藏过数层谓之郁。”又如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曰:“沉郁顿挫,至斯已极。杜陵全集以此为第一;千古名作,亦以此为第一。”虽非不易之论,但决非人云亦云者所能比拟者。周采泉《杜集书录》评此书说:“选诗皆具手眼,持论亦平正无颇,考证核实而不繁琐,在清代选本中,有特殊风格。”此书仅以稿本存世,未获刊行。(朱宝清)

【杜甫诗选】杜诗选注本。今人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共选诗二百六十四首,按写作年代编为八卷。首载前言、例言,对于入选诸诗以《全唐诗》中杜集与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为底本,择善而从,并据《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宋本进行校勘。本书注释包括释题、释词、释句,力求简明浅显。其注释主要依据仇注,并参各家杜集、诗话和札记,择善而从。是五十年代中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种杜诗选本。(尹晓廉)

【杜诗散绎】杜诗今译。今人傅庚生撰。1959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以散文译杜诗,又散落地加以阐释。撰者并结合所译之诗对各诗的主题、结构、作意、创作方法以及词采、声律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全书收录译诗九十六篇,另有只录杜甫原诗而未译者五十余篇。共分十二章,按杜诗思想内容分类,每类均以杜甫诗句为题目,并依内

容加副标题。本书重在突出杜诗的人民性和杜甫的非战思想,故选译这方面的杜诗很多。197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有再版本。(尹晓廉)

【杜甫诗选注】杜诗选注本。今人萧涤非选注。该选本在作者《杜甫研究》下卷诗选部分的原有基础上改编而成。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选杜诗共二百八十一首,以编年为序,分四个时期。从选诗角度看,既照顾到杜诗的各种题材、体裁和风格,又注意到全面反映杜诗思想艺术的高度成就。该选本的注解包括题解和一般字句注释。本书主要成就表现在注释上。常透过字句表面揭示更深的涵义和诗外之旨,其精辟处往往出人意表。注中新材料、新见解较之《杜甫研究》下卷更有增多,且更为深入浅出,抉择更精当简要。此外,“以杜解杜”,引诗互证也是本书注解的特点。该书注解于清人注本引用最多,除仇兆鳌《杜诗详注》外,尚有钱谦益《杜诗笺注》、张溍(上若)《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尹晓廉)

【杜甫草堂诗注】杜诗选注本。今人李谊撰。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寓居成都草堂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草堂诗是杜诗艺术达到第二个高峰的过渡阶段,该书把杜甫在草堂所作的全部诗篇按时间顺序以每两句为一组进行了通释和浅注。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依据,并参照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钱谦益《钱注杜诗》等注本,还参考了当代学者的一些杜诗选本和专著。(尹晓廉)

【杜甫选集】杜诗选注本。今人邓魁英、聂石樵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的编选始于六十年代初,选录杜诗三百余篇。编注以年代为序,编年的依据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在编选中,主要选足以代表杜甫思想和艺术的杰作,在注释方面,每首诗都注明写作年代、主要内容或某些艺术特点。注释词语则尽量注明语源和典故出处,并着重对诗歌有关的史实的注释。注释主要依据下列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蔡梦弼《草堂诗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王嗣奭《杜臆》、钱谦益《杜诗笺注》、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对各本出现的异文择善而从,不作更多的考订。该书首附选注者前言,论述杜甫生平、思想及艺术成就。(尹晓廉)

【杜工部年谱】年谱。又称《杜诗年月》或《吕汲公年谱》,简称《吕谱》。宋吕大防撰。大防字微仲,蓝田(今属陕西)人。宋哲宗朝官尚书右丞,封汲郡公,后遭谗贬死。原《谱》已佚,附载于分门本及千家

本杜诗者,已有所改动。吕氏自记说:“余苦韩文、杜诗之误,既讎校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周采泉《杜集书录》说:“原称《杜诗年月》,盖当日年谱之文体尚属创例也。杭世骏以为年谱之制始于宋代,其考证当可信。今世所存北宋人所著年谱,恐以汲公杜、韩两谱为滥觞,则此不仅为杜甫年谱之第一种,亦为我国所有年谱之第一种。”周氏根据吕曾编杜集而推测此《谱》原为分载于每卷之首,以年系诗,诗详事略之诗目谱,“今集亡而《谱》尚存。辗转传录,勒成专卷,已非吕氏之旧矣”。此《谱》语甚寥寥,所有纪年之干支又皆后错一年,但其开创之功固不可没,且意义所在,又不止于“杜诗学”也。此《谱》未见有单刻本。

(朱宝清)

【重编杜工部年谱】 年谱。宋蔡兴宗撰。蔡字伯世,东莱(今山东掖县)人。约生活于宋徽宗朝前后。蔡编有二十卷之《重编少陵先生集》,附《年谱》、《正异》及《考异》各一卷。仅《年谱》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转录而流传至今,其余均已佚。此《谱》仿吕大防《年谱》而有所增定,故称“重编”。《谱》中以诗为出处纪录而诗详事略,订正了《吕谱》纪年干支之误,篇幅较今存之《吕谱》有所增加,考证亦趋缜密,并能对两《唐书》杜甫本传及其他有关杜甫生平之材料中的失误有所订正。此《年谱》无单刻本。(朱宝清)

【杜工部草堂诗年谱】 年谱。宋赵子栎撰。赵字梦援,为宋宗室。元祐进士。靖康中金兵南侵,子栎时为汝州太守,保境有功,迁宝文阁直学士。绍兴中卒。赵氏曾注杜集,并撰《年谱》,其《集》已佚,而《谱》因被《草堂诗笺》转载保存至今。周采泉《杜集书录》说:“《赵谱》自以为订正《吕谱》而作,其实《吕谱》仅纪年干支之差,其他不误;《赵谱》则生没前后皆误,其他舛误尚多。”此《谱》亦为《四库全书》“存目类”所著录,题为《杜工部年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了指出其生卒年之误外,又说:“其所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以其旧本而存之,以备参考焉尔。”此《谱》有清道光二年(1822)山阴杜春生校刊重刻本,民国初年天津华新印刷局也曾排印出版。

(朱宝清)

【杜工部诗年谱】 年谱。宋鲁豈撰。豈字寄卿,号冷斋,嘉兴(今属浙江)人。宋高宗绍兴朝进士,曾官福建提点刑狱公事。鲁有《编次杜工部集》十八卷,附《年谱》一卷,今《集》亡《谱》存。周采泉《杜集书录》说:“此《谱》今所见者,已为文字联贯,自成卷帙之一般年谱,其始当亦为以诗系年之《诗目谱》,此其所以名为《诗年谱》也。”其言或是。此《谱》确受《吕谱》影响,但篇幅加大,考辨增精,史事也有所增

加,又能订正《吕谱》之误。此谱为《四库全书》“存目类”所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近时濠阳张氏(潜)、吴江朱氏(鹤龄)所注杜诗,其年大率仿此而推拓之。”又谓此《谱》“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此《谱》原附载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及《草堂诗笺》,民国初年有天津华新印刷局的排印本。

(朱宝清)

【杜甫年谱辨疑】 年谱。宋黄鹤撰。今所见之宋、元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均附载此《年谱辨疑》,而并无只题作《年谱》者,《四库全书》本同。但在题为“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之《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中又出现了黄鹤《杜工部诗年谱》。对此,周采泉《杜集书录》认为“殊不可解”,但却著录后者,并说“原称《年谱质疑》,或称《年谱辨疑》”。其实,只要合观二者,不难发现它们的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改易了题目,删去了黄氏《年谱辨疑后序》而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乃书商盗名之作,《辨疑》变作《年谱》,当亦盗名者之所为。且《谱》中事多诗少,与《诗年谱》之名也是不相符的。此《谱》称作《年谱辨疑》,其后序又说:“《吕汲公年谱》既失之略,而蔡、黄二《谱》亦多疏漏,遂更为一《谱》以继于后。”可见其致力于考辨。由于引据翔实,对前人之误有所匡正,故虽仍有疏漏,却为后之杜诗注家所重视。《杜甫年谱辨疑》未见有单刻本。(朱宝清)

【重定杜子年谱诗史目录】 年谱。明单复撰。单撰有编年体《读杜诗愚得》十八卷,其凡例曰:“重定《杜子年谱》,以次其诗,且以见游历用舍之实。”故编成此《年谱诗史目录》置于书首,既述杜甫一生之行踪遭际,又为全书之总目录,二者合一,其体例盖仿自吕大防《年谱》。《谱》中在各卷次之下先叙史事,次述杜甫行踪,再系以诗。由于杜甫各时期存诗数量不等,故《谱》中各卷次面目也不相同。卷一纪年从玄宗先天元年(712)至天宝九载(750),故叙史事述行踪语颇多;卷六所收悉为秦州、同谷诗,故无一叙事语,纯为诗目。此《谱》仍有疏漏,如谓杜甫生于京兆杜陵;谓杜甫解褐乃天宝十二载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作于其年等,皆误。此《谱》未见有单刻本。(朱宝清)

【杜工部年谱】 年谱。明胡震亨撰。附载于胡著《杜诗通》之卷首。胡氏《杜诗通自序》说:“读杜诗即不可不稍知其岁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为穿凿,而于体例多紊乎?”这一宗旨也体现于所撰《年谱》中,故其面貌已与诗详事略之吕、鲁等《谱》不同,而略近于黄鹤之《年谱辨疑》。《谱》中以杜甫行踪为主,时事不多,仅“安史之乱”之几年有所述及,系诗则更寥寥。此《谱》虽较简明,但也有考订,

如谓杜甫脱身长安,间道奔赴凤翔行在乃肃宗至德二载(757)夏日之事,驳正了《新唐书·杜甫传》及黄鹤《杜甫年谱辨疑》之误。《谱》中亦仍有失误,如谓杜甫生于长安之杜陵,死于牛肉白酒,且有不必为杜甫讳言之论。此《谱》未见有单刻本。(朱宝清)

【少陵先生年谱】年谱。清钱谦益撰。此谱载于钱氏《杜工部集》卷后,其优长是详于唐代史事及典章制度。宋元以来,当首推此谱最为精当。谱前列杜氏世系,年谱内容分成纪年、时事、出处、诗四部分,并以列表形式出现,故能一目了然,便于检索。

(尹晓廉)

【杜工部年谱】年谱。清朱鹤龄撰。附载于朱著《杜工部集辑注》之卷首。此《年谱》已尽变旧谱诗详事略之面目,与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亦大不相同,乃详述杜甫行踪,时事部分只述及左右杜甫行踪之事。《谱》中不系诗,但在考辨行踪,用为佐证时也有所述及,而于杜甫文赋之作年,倒是记之甚明。周采泉《杜集书录》说:“此《谱》详于经史典故、地理、职官。正如《钱笺》、《朱注》各有千秋,未易优劣。”其评尚称公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则在其凡例中说:传世之《杜甫年谱》,宋、明、清代有其作,而“世以朱氏裁别异同,简净明当,视其《谱》为定本”。此《谱》未见有单刻本。(朱宝清)

【杜工部编年诗史谱目】年谱。清张溍撰。溍字上若,磁州(今河北磁县)人。顺治进上,官翰林院庶吉士。张溍撰有编年体《读书堂杜诗注解》二十卷,并附此《编年诗史谱目》。《谱目》分为三栏。其一为干支纪年,下附帝王年号及时事。其二为杜甫行踪。其三为诗目。细察此《谱目》,颇令人生疑:《谱目》中所列之诗,以《望岳》始;而正文卷一之第一首却为《游龙门奉先寺》,其他也有次序不同者。张氏二十卷之《注解》,乃以刘辰翁批千家本为底本,编次亦一仍其旧。而其《谱目》却颇似径取单复《重定杜子年谱诗史》,略加改易,颠倒干支纪年与帝王年号之次序,删去单复《年谱》中卷次而成,故亦从单复而谓杜甫生于京兆杜陵,两《谱》之文字基本相同。惜合编之时,未加详审,所以有自相矛盾之处。按此,则此《谱目》之不足,不仅仅是“无所发明”(周采泉《杜集书录》)了。《读书堂杜诗注解》初刻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刻本,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了前者,收入《杜诗丛刊》。

(朱宝清)

【知本堂读杜诗目录】年谱。清汪灏撰。灏字紫沧,休宁(今属安徽)人。为康熙之随从词臣,曾总武英殿修纂事,后牵连于戴名世《南山集》之文字狱,因修书有功而得免死。汪氏撰有编年体《知本堂读杜》

二十四卷(重刻时改名为《树人堂读杜》),此《目录》即附于其首。《目录》之前言云:“他诗目录,仅备数耳。若杜公诗,定须设身处地,知人论世,方得其真面目。”“用是合《年谱》于《诗目》中,庶读者了然,易于贯彻。”《目录》共列诗一千四百零七首,另附录四十八首,起《游龙门奉先寺》,终《风疾舟中伏枕书怀》。纪年附记帝王更迭及年号改元,另无述及时事之语。记杜甫行踪亦极简略,仅标出其年杜甫所在地。虽自称“合《年谱》于《诗目》中”,但《年谱》过略,可谓“诗详事略”。《知本堂读杜》刻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道光十二年(1832)银城麦浪园重刻,并改换了书名。(朱宝清)

【杜工部年谱】年谱。清仇兆鳌撰。该年谱载于《杜少陵集详注》卷首,内容多依循旧谱(以朱鹤龄谱为主),但亦有所驳正。(尹晓廉)

【少陵编年诗目谱】年谱。清浦起龙撰。此谱载于浦氏《读杜心解》卷首,是一个简略的年谱,并将杜甫全部诗文系年,依次列于纪年之后。谱前有编纂大旨数则,说明其撰谱要旨,但谱中观点多迂腐之处。(尹晓廉)

【杜工部年谱】年谱。清杨伦撰。此谱载于《杜诗镜铨》卷后附录。谱中之考订多沿仇兆鳌旧说,以简明见长。(尹晓廉)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年谱。近人闻一多撰。其所著年谱是迄今最完整的杜甫年谱之一。其内容丰富,考证详明,条例清楚,注重以史证诗并多从原诗作中勾稽少陵生平材料。此年谱曾刊载于1930年武汉大学印《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至四期。又载见《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有开明书店排印本。

(尹晓廉)

【杜甫年谱】年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是乃《杜甫年谱》中之巨制,达十三万五千字。于杜甫生平及杜诗各篇写作之时地,无不详加考订,期于至当,按年系谱一目了然。《谱》前附《杜氏世系表》,并有详细说明。《谱》中则在年号下分设四栏:时事;生活;作品,系以其年所作之诗目;备考,附载杜甫诗友李白、王维等及其时名流如张九龄、贺知章等人之行踪。其凡例说:“以诗系年,为此谱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杨伦《杜诗镜铨》之编年,“比较近于正确”,故“此编主要依杨氏编次而断以所定之准则”。但《谱》中系诗,亦有与杨伦不同者,如《洗兵马》,《杜诗镜铨》编于肃宗乾元二年(759),而此《谱》却定为乾元元年作。周采泉《杜集书录》评价此书说:“四川人文由来称盛,更以草堂收藏之富,凭藉者厚。以蜀人考证少陵当日之踪迹,当然远胜前作。所有《杜甫年谱》除闻《谱》外,

以此谱最为有据矣。”

(朱宝清)

【杜甫传】 杜甫传记。今人冯至著。最初在杂志上连载,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广泛流传。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它的朴实和严谨。作者力求每句话都有根据,不违背历史。不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特色之二,是作者站在审视中国诗歌发展历史的高度,以热情而深刻的笔触来叙述杜甫的一生以及杜诗的成就和影响。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介绍杜甫的“三吏”、“三别”,认为它是杜甫诗艺术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一座高峰。特色之三,是它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杜甫的思想局限,周采泉《杜集书录》指出:“用阶级观点对诗人作适当之分析批判,当以此为权威著作。”此书1980年再版,对原书只作了些文字修改,在书前附加重版说明,书后增加两个附录。附录一,是作者1962年所写三篇论杜文字。即:《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1962年4月17日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论杜诗和它的遭遇》,其中一、三两篇专论杜诗,弥补了《杜甫传》由于受体裁限制对杜诗难于展开讨论的不足;附录二,是作者1962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以杜甫晚年与苏涣的交往为题材的小说《白发生黑丝》。

(尹晓廉)

【杜甫叙论】 杜甫传记。今人朱东润著。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实为杜甫之评传,初稿成于1977年10月以前。作者对杜诗创作的时代政治背景作历史的追溯,以便在更广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上来认识杜甫在他的时代已经达到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从而说明杜甫在唐诗中地位之不可动摇。本书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因此对于十年中杜甫研究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也有一定程度的批评。作者批评了历来争议的李杜优劣论,指出两人时代不同,成就各异,不能抑此扬彼。作者认为李杜并称,杜的七言不下于李白,而在七律、拗律、排律方面又有自己的创造。晚年之作虽思想高度不及弃官前后一段时间的作品,但在艺术上却是又一个高峰。

(尹晓廉)

【杜甫评传】 杜甫传记。今人金启华、胡问涛著。该评传为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之一。对杜甫的生平和创作进行系统的评述。传文中所引用的杜诗、杜文均按杨伦《杜诗镜铨》注明了页码,诗题的删节亦从之。但引诗、引文及标点却不拘于上书,而是择善而从。评传的正文前后分别附加著者的引言及结束语,对杜诗的思想艺术作了论述。全书共分二十五章,以时间、地点为次序,结合当时作品介绍杜甫的生平、思想及创

作。

(尹晓廉)

【杜甫评传】 杜甫传记。今人陈贻焮著。本书规模空前。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计一百零八万余字。采用夹叙夹议方式,将时代背景、个人经历、诗坛面貌、诗歌的创作与批评比较等等内容熔于一炉。其上卷仅自杜甫诞生叙至乾元二年杜甫自洛阳回华州时的创作活动,已四十万言,其所以如此,正如林庚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此书“盖脱胎于诗话而取意于章回”,“杜甫虽亲身经历天宝乱后的一些年月,而其安身立命之处,沉郁顿挫之际,实又孕育植根于盛唐时代,这正是上卷中精神之所在”。传中有评,脉络分明,精于考订,敢发新见,雅俗共赏,富于诗情是本书的特点。而内容的博赡,文笔的活泼,尤为世人所瞩目。本书上卷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载林庚序、傅璇琮序及作者自识;中、下卷于1988年5月出版,下卷后附葛晓音跋及作者赘语。

(尹晓廉)

【杜诗笺】 杜诗评笺。一卷。宋黄庭坚撰。此书初见于元代陶宗仪之《说郛》,乃取杜诗一、二句,笺以数言,共六十则。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加以评定,收入《萤雪轩丛书》,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版曹树铭《杜集丛校》,亦首列此书之增校本。但关于此书之真伪及黄庭坚是否曾笺杜诗,却至今仍有异议。黄庭坚乃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九家之一,洪业《杜诗引得序》说:其书所引黄氏之言,“殆源出诗话杂著之属”,“岂有山谷注杜诗在手,任从采撷者”。认为此书“乃后人所辑者”。程千帆1934年所著之《杜诗伪书考》(此文又收入程氏1984年版《古诗考索》一书中)则斥为伪书,并谓笺语亦非出自黄庭坚。他的依据主要是黄庭坚之《大雅堂记》。但此《记》并非山谷绝笔,安知其作《记》之后未曾如此《记》中所云“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呢?此书很可能是后人辑录而成,是否出自黄庭坚之手订,似仍以存疑为是;“伪书”之说,恐未必是最后的结论。

(朱宝清)

【诸家老杜诗评】 杜诗评。五卷。宋方醇道、方深道兄弟辑。醇道字温叟,北宋后期兴化(今福建莆田)人,著有《类集杜甫诗史》。深道字正夫,宣和进士,曾知福建晋江县事。此书方深道序叙述编辑过程说:“先兄史君(按即醇道)尝类集《老杜诗史》,仍取唐宋以来名士评公诗者,悉摭其语,别为卷帙,号曰《老杜诗评》,以附《诗史》之后,俾览者有所考证。深道须次之暇,又于后来诸小说中,择其未经纂录者,自《洪驹父诗话》以下凡八家,从而益之,因集成五卷。书之卷首,镂板以传于世云。”该书刻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已佚。今有两种抄本存世。一本存前三卷,藏北京图书馆;一为五卷本,藏北京大学图书

馆。此书汇集了自唐孟棻《本事诗》至宋黄朝英《缃素杂记》共二十五家关于杜甫的诗评。虽然引文偶有重复,但其中亦有他书未加辑录者,且成书较早,所以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说:“(此书)实为后世专论杜诗之诗话、笔记汇辑之嚆矢。”

(朱宝清)

【杜诗学】 杜诗评。一卷。金元好问编纂。此书成于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今已不传,《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诗词部著录:“《杜诗学》一卷,金元好问著。”但周采泉《杜集书录》则谓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的《萤雪轩丛书》收入了《杜诗学》。《遗山集》卷三六之《杜诗学引》一文,述及成书缘由及其书之概况:“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过也。”“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元好问作诗,深受杜甫影响。其于唐以来纷繁之论杜、注杜之局,由此《引》可知,亦了然于胸,且颇具慧眼。中唐以后,论杜、注杜之风气日盛,便在唐宋两朝均极兴盛之《文选学》之外,又兴起一门新学,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至今仍为古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元好问首倡“杜诗学”之名,并辑成这部杜诗学的开山著作,其书虽佚,而其功固不可没。

(朱宝清)

【杜诗攷】 论杜专著。四卷。明唐元竑撰。元竑,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生,字远生,吴兴(今属浙江)人,曾中举,明亡后不食,卒于清顺治四年(1647)。《杜诗攷》乃其研读《千家注》本杜诗之札记,其自序说:“诗始于《三百篇》而终于杜,……是故我始攷《三百篇》而终于杜。攷者何?拾遗也。”全书四卷,论及杜诗五百篇左右,第四卷之末则兼及杜甫文赋。其评或论一句一联,或综论数诗之某一专题。不录原诗,仅于每则开头标出诗题,引述诗句,有时也不标诗题而径引诗句。评论范围颇为广泛,包括词语、典故、章法、诗旨及诗之工拙,其中不乏订正前人之误或发前人所未发者。此书原未刊行,以稿本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评笺“大旨合者为多,胜旧注之穿凿远矣”。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台湾国立图书馆所藏题有“剑州居士校阅”的旧抄本,收入《杜诗丛刊》。

(朱宝清)

【读杜寄卢小笺】 杜诗笺评。三卷。清钱谦益笺。明毅宗崇祯六年(1633),卢世淮刊其所著《杜诗胥钞》,寄赠钱谦益,并请为序。钱氏即录平素研读杜诗之心得寄卢,以与讨论,故名《寄卢小笺》。《小笺》共三卷,笺诗六十首。多不录原诗,仅于诗题下引录所笺之句。笺语出自深思,故内容相当精彩。如谓《洗兵马》诗乃讥刺肃宗之作,后曾自诩此乃“开凿鸿蒙,手洗日月”。崇祯七年,钱氏又有《读杜二笺》二卷,笺诗三十五首,但多与《小笺》重复,乃补《笺》之所作。入清以后,钱氏《杜工部集笺注》书成,两《笺》之影响渐小,但诚如洪业所说:两《笺》“所论杜诗才数十首,然后来二十卷《杜集笺注》之精华,大略已具于斯”(《杜诗引得序》)。其学术价值固不可废也。两笺于崇祯十六年附刻于钱氏《初学集》中,崇祯时又有与卢世淮《杜诗胥钞》合刊之《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单刻本则有1911年国学扶轮社的《读杜小、二笺》。

(朱宝清)

【杜臆】 论杜专著。十卷。明王嗣奭撰。嗣奭(1566—1648)一名于越,字右仲,学者称偶翁先生。鄞县(今属浙江)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知涪州,明亡不仕。他四十三岁时,开始阅读杜集,觉有会心,五十四岁复阅杜集,欲加精选,附以笺语,已写弁言,而书未成。七十岁在成都偶得杜集,间用笺语。七十九岁始正式写《杜臆》。王氏在《杜臆原始》中说:“偶翁王子嗣奭著《杜臆》十卷,始于崇祯甲申(1644)九月之望,竣于乙酉(1645)端二日。”前后仅七个月,就完成初稿,后经几次改补。这是一部杜诗笺选,所选约当杜诗十之七,笺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笺注不载原诗,而是以评论和注释参互成文。嗣奭不满足于前人研究杜诗之方法与成果,力求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他在自述其书名之由来及研究方法时说:“草成而命名曰臆,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他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对杜甫的时代及其政治生活、思想感情等作了深入的探索。在艺术分析方面,本书对于“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材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掣”(《杜诗笺选旧序》)的集大成与创新作了精辟的分析。《杜臆》注重考证,注释具体确切,于前人附会深解之处,有所辨正,并求以杜注杜,增加了注释的说服力。仇兆鳌对是书推崇备至,采录甚多,认为该书是“宋元以来……最有发明者”。其成书后,曾六十餘载不闻于世,终因仇氏《杜诗详注》的采录征引而名重天下。但王氏说诗也存在一些主观臆断的毛

病。仇氏引文与今印本文字颇有不同,且间有仇注所引文,而今本《杜臆》所无者,其原因虽有人考证,但无定论。该书成稿后,迄未刻印,其原稿十卷,分装五册,每册扉页有嗣爽手写书名及册数并以仁、义、礼、智、信为序,现存上海图书馆。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始据此稿本影印,1963年将此本加以整理标点后重新排印,合订为一册。首附刘开扬前言及《杜臆原始》、《杜诗笺选旧序》,书末附顾廷龙《影印杜臆前言》及有关王氏生平资料三则。为便于查检,在每首诗题下均注明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杜诗镜铨》卷页数。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合订本重印。香港曹树铭据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之稿本,与“仇注”所引《杜臆》相校,成《杜臆增校》一书,由香港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尹晓廉)

【杜诗言志】论杜专著。十六卷。撰者佚名。姜亮夫考定为清乾隆年间江西高安陈远新所撰。成书时间约在康熙年间。该书作者选释杜诗重在阐明诗意,而无词语的音训释义。每篇末皆缀一段论说诗旨,或以诗证史,或揭示诗法,时有见解,然又不免繁芜之累。所选诗凡三百二十七首,按年编次,目录总列书端,其体例与吴见思《杜诗论文》略同。该书初为一部未刊行的手稿抄本,1957年扬州古籍书店从泰州购得。1963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雕版印行。198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谭佛雏、李坦点校的铅印本。新点校本所附谭、李《关于〈杜诗言志〉》一文,记叙了该书的来源,并对成书时间及作者进行了推测,还对该书在思想艺术分析方面的特点及局限进行了评析。(尹晓廉)

【初白庵诗评】古代诗歌选评本。书名又作《查初白十二种诗评》,内有三卷杜甫诗评,清查慎行评。乾隆二十四年(1777)海盐(今属浙江)张载华辑刊。查氏号初白。据刘濬“初白先生评阅杜诗凡五本”(《杜诗集评·凡例》)之言,可知查氏嗜杜之深,用力之勤。查氏之评,又为诗人评诗,见解自有不同凡响处,故颇为其后之杜诗评注者所重视。刘濬《杜诗集评》即多录其语。近代文艺书局曾影印张载华辑刊本。(朱宝清)

【读杜诗说】论杜专著。二十四卷。清施鸿保撰。鸿保(1804—1871)字可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著述甚丰,但多散佚,其中《读杜随笔》八卷,疑即为《读杜诗说》。本书系一部手稿,后被张慧剑于杭州偶然购得,并经张氏校订标点,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书前有作者手稿二帧和张氏《关于〈读杜诗说〉》一文。因该书以订正仇氏注之失误为主,故书中诗目、卷次悉依仇注,计五册,二十四卷。前二十三卷分论诸诗,不抄原诗,只列有关仇注文字

与自己评论笺释文字,共论及杜诗六百七十三首。第二十四卷为总说,分上下两卷,今仅存上卷。书中凡辨正仇注之处,但曰“注”,其余各仍原注标出名或字,统称为“说”,惟赵次公、朱鹤龄、王嗣爽、钱谦益四家独标以“赵说”、“朱说”、“杜臆”、“钱笺”,凡是施氏辨正之处,则标以“今按”字样。施氏认为仇注虽有“援引繁博,考证详晰”的优点,但“读之既久,乃觉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转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佻侗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于是他在平日读仇氏及诸家注时,“遇有臆见辨正者,辄识页上空处,久而遂多”,遂成此书,并以“读杜诗说”题之。本书在驳难诸家注释时,不乏个人新见;纠误之中,又常有作者自己的考证或申说自己的体会,因此可将此书视为施氏记录自己多年研究杜诗心得的一部札记。但由于杜诗博大精深,注解并非易事,施氏在反对仇注穿凿的同时,有时专为与仇注立异,亦有失之穿凿者。另外,施氏对旧注诸家于杜诗所作的一些较深的合理探索,未能细心体会,反于浅常处求解,亦是一病。该书版本有:清同治九年(1870)手稿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铅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本。(尹晓廉)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论杜专著。八卷。清周春撰。春(1728—1815)字范兮,号庆霄、松霭、黍谷居士,海宁(今属浙江)人。乾隆进士,曾官岑溪(今属广西)知县。本书为研究杜诗双声叠韵之专著,始撰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四十八年最后定稿,成书后六年,即乾隆五十四年方刻印于世。该书前五卷将杜诗之双声叠韵分为十二格,卷一:双声正格、叠韵正格;卷二(上):双声同音通用格、叠韵平上去三声通用格;卷二(下):双声借用格、叠韵借用格;卷三:双声广通格、叠韵广通格;卷四:双声对变格、叠韵对变格;卷五:散句不单用格、古诗四句内照应格。每格先下定义,次列举杜甫律诗、古诗例证,再列举他人律诗、古诗例证。他人诗例以取李白、王维、孟浩然、韩愈、柳宗元、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白居易、苏轼等名家为主,且占诗例句间取唐以前者。卷六为“诸格摘论”,综论前十二格。卷七为“论各书”,列举王充《论衡》、高诱《吕氏春秋注》、许慎《淮南子注》等四十余人论音韵、声律言论四十余则,并加案语评论。卷八分上下,上为附录二十二条,为周春杂论杜诗,涉及颇广,类似诗话;下为周春自序及凡例五则。该书的版本有: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影印“艺海珠尘”本),日本吉川幸次郎编辑《杜诗又丛》本。(尹晓廉)

【读杜韩笔记】 论杜韩专著。二卷。清李黼平撰。黼平字绣子,又字贞甫,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嘉庆进士,曾任昭应县令,后主讲宝安书院。博学工诗,著有《毛诗细义》等。光绪《嘉兴州志·艺文志》曾著录《读杜韩笔记》,但又注云“未见”,则清末民初此书似未曾刊行。今见者乃1934年中华书局聚珍本。李氏从曾孙雪传跋:“绣子公此《记》二卷,独超众说,通其神旨,非惟学绝,抑亦识精也”。“原稿函藏百年未见”,“今忽从故家得之,倘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者耶?重刊公集已竟,因并及之”。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读杜札记,共六十四则,论及杜诗约七十首。篇幅虽小,但不乏可备一说之见。如《哭严仆射归棹》诗之“天长骠骑营”句,李氏即据《汉书·霍去病传》“起冢象祁连山”,谓当作“骠骑茔”;又如《秋兴八首》“西望瑶池降王母”句,李氏认为是“言宫殿之高,西则压乎西王母,注家谓指贵妃,谬矣”。故周采泉《杜集书录》谓李雪传“学绝识精”之评,“似非过誉”。(朱宝清)

【读杜札记】 论杜专著。清郭曾炘撰。曾炘(1855—1929),字春榆,别号匏庐,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光绪丙戌(1886)进士。郭氏精于考订校雠之学,平生笃嗜吟咏,于杜诗涵泳最深。该书乃郭氏遗著,论及杜诗近六百首,凡三十余万言。书中对宋、元以来的各家评注(如朱鹤龄、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等人)的异同得失,以史实、诗意、字义等方面辨析订误,时有新见。此书经黄君坦标校整理,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书无杜诗原文及诗题,新出版本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详注》所标诗题,补列了全书的目录。对于原稿引述杜诗的先后次序,酌情予以移动和合并,并且还订正了该书所引各家评注中的讹误。该书卷首载出版说明及叶恭綽序,书末附《竹垞论杜集各体诗》、《石洲论杜诗铺陈排比》、《义门论杜诗各本异字》等。(尹晓廉)

【杜甫诗论】 论杜专著。今人傅庚生著。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曾修订重印。该书旨在阐述杜诗创作成就,着重分析杜诗的人民性与爱国精神及其历史地位。而最突出的,乃在对杜诗大量篇什的内容、艺术的考论与辨析,非常细致、具体。(尹晓廉)

【杜诗析疑】 注杜专著。今人傅庚生著。197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取杜诗一百余句,对其存在疑义之处进行分析探讨,其宗旨在于普及,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杜诗的入门之阶。(尹晓廉)

【杜甫研究】 专著。上下两卷。今人萧涤非撰。上卷主要是“论”,对杜甫所处时代背景,杜甫的生活道路、思想倾向以及杜甫作品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颇多剖切允当之论。共分六章,另附录论文四篇。下卷为杜甫作品选注。根据杜甫的生平、思想、杜诗的成就以及杜诗体裁的多样性,共选诗二百六十六首,依年编次,注明诗体,对诗中的一些史实、典故作了注解,对每首诗的写作地点、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均作了简要的介绍。注释的突出特色是引诗互证,“以杜解杜”。对难解或有异说之处,尽可能提出个人看法。下卷末附作者两篇论文:《论杜甫不饿死于耒阳》和《论〈风疾舟中〉一诗确为杜甫绝笔》。该书上、下卷分别于1956年、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齐鲁书社再版,在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动和补充。下卷改为论文汇编,收录了著者五十年代以后有关杜甫的论文,其中《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尤为当时读者所重视。而原版下卷“作品选注”经修改后已另名《杜甫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新版《杜甫研究》首列著者再版前言,其中对人民诗人、人道主义、主导思想、忠君思想、干谒、诗人之死等六个杜甫研究中较大的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书末附作者《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一首。(尹晓廉)

【杜甫研究论文集】 论文集。中华书局编纂。1962年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为了配合这一纪念活动,中华书局选录了报刊上的有关论文编辑成书。所收论文起自“五四”以后,至1962年9月为止。凡可备一说、足资参考者,即选录在内。这些文章发表时间已经很久,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可能与作者后来的看法有所出入,但鉴于该论文集为参考资料性质而保持原貌,未作修改。该书共三辑。一辑于1962年12月出版,所收论文自“五四”至建国,共二十篇,书后附报刊论文目录(1910—1949)。二辑于1963年2月出版,所收论文自建国后至1961年底,共二十六篇,书后附报刊论文索引(1949.10—1961.12)。三辑于1963年9月出版,所收论文从1962年1月至9月。共三十六篇,并按其内容性质分列为五部分。每一部分又大体按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书后附报刊论文目录(1962.1—1962.9)。(尹晓廉)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 资料汇编。今人华文轩编。该书分上、下两编,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上编(唐宋之部)。该书所辑集的是从唐代到“五四”以前有关杜甫研究的资料。按时代先后排列,收录原则是唐宋部分求全,元明以后取精;凡仅是用典、和韵,泛泛地称颂杜甫而无甚见解的一概不录;内容相同的资料,为了避免重复,采用其中最早

或最完备的。杜甫同时代人与其唱和酬赠之作,多予收录,便于读者了解诗人的交流情况。他人诗句而后人误为杜甫作者,本书也予辑录并间加按语予以说明。所收各书版本,选择通行可靠者,一般不改用宋元明旧刻本。各家所引杜甫诗句中的异文,为了供校勘者参考而一仍其旧。该书卷前附故宫博物院藏元人绘本杜甫像、宋刻本杜工部集书影一页、编者前记、唐宋之部引用书目。此书仅出版了上编,元以后迄今尚未出版。(尹晓廉)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研究专著。今人叶嘉莹著。该书原是作者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课程时以《秋兴八首》为中心编撰的参考书,共辑自宋迄清杜诗注本三十五家、四十九种,分别考订异同,各依时代罗列诸家之说。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后作者又回大陆辑资料,增入历代杜诗注本十八种,并据此重新编排改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全书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分章集解四章。前三章以八诗为一单位加以总述;分章集解则以一首诗为单位,按首、颌、颈、尾四联分别集解。所引材料以时代先后为序,辨正与说明写入按语,对意境之评述颇为精到。首以《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一文为代序,另列凡例、引用书目等。(尹晓廉)

【杜诗注解商榷】注杜专著。今人徐仁甫著。历代杜诗研究著作皆详于杜诗名物典故的考证和探求,而略于杜甫语法虚词的研究,本书独重虚词、语法,并以此正前人注解之失。该书引证广博,先秦典籍、六朝诗文皆在甄采之列,借此说明杜诗用字皆有所本;所选采宋代以下注家中,以清代居多。该书依仇兆鳌《杜少陵集注》卷次,共二十三卷,撰“商榷”一百九十余条,先发表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二、三期。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3月香港中华书局翻印。之后,徐氏又续著《杜诗注解商榷拾遗》,载于《草堂》1982年一、二期,并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二百条左右,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名之曰《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尹晓廉)

【杜诗杂说】论杜专著。今人曹慕樊著。该书为读杜笔记,所论范围较宽,涉及杜甫思想倾向、生活道路、杜甫诗艺与创作,以及杜甫诗注等方面。后面还附录杜诗常用字义通释、九种版本杜诗篇名索引。九种版本依次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潘氏滂喜斋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工部诗》、毛晋《宋本杜工部集》、玉几山人刻《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尹晓廉)

【杜诗论稿】论杜专著。今人李汝伦撰。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专题研究,对杜诗的思想、艺术及个别诗作的真伪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固不乏独到之见,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商榷。如谓《江南逢李龟年》非杜甫所作,且谓此诗“内容空洞,感情平淡”,便很难令人信服。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诗史·诗圣·人民诗人》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进行了批评。其二为著者自选的《杜句点评》,乃就杜诗的片言只句,对仇兆鳌等人的注解,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三则为三篇专论杜甫题画咏画诗的文章及对杜甫十八题二十首题画咏画诗的评笺。著者认为杜甫的这些诗作乃此类诗歌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并对之进行集中的评笺,确是此书慧眼别具之处。(朱宝清)

【杜诗论丛】论杜专著。今人吴鹭山撰。著者曾于五十年代与浦江清合注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注释过程中积累了不少不便为《诗选》所收录的心得,以之为基础,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这部论著。198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刊行。全书由四十七篇文章组成,分为四卷及一附录,除了卷三中的七篇文章讨论了“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作外,其余均为专题研究,内容涉及杜甫的思想、创作、交游及杜诗的体裁、风格、咏怀状物、名物训诂等,范围相当广泛,又能持之有故地澄清前代杜诗笺注中一些偏见和失误。附录的三篇文章则为《评郭沫若说杜诗》、《再评》及《三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扬李抑杜之倾向及对杜甫的曲解,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朱宝清)

【杜甫古诗韵读】论杜专著。今人马重奇撰。杜诗在艺术上的集大成也表现在用韵方面,杜诗不为《切韵》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的语音特点。本书介绍杜甫古体诗的押韵情况及入韵字的音韵地位和拟音情况,共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杜甫古诗用韵研究;杜甫古诗韵谱;《广韵》的声母音值的拟测问题以及《广韵》的韵母音值的拟测问题;杜甫古诗入韵字音表;杜甫古诗韵读。在第五部分中,作者试定了《杜工部集》一至八卷古体诗的每一个入韵字的音韵地位——摄、开合口、等、声调、韵母、声母,并且把每一个入韵字拟出读音,写出音标。该书以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三种版本为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出版。(尹晓廉)

【杜诗别解】论杜笔记。今人邓绍基撰。此书原为作者读杜诗笔记,自1978年起曾在刊物上陆续发表。1987年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傅璇琮序中指

出本书主要从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几家注本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征引材料,断以己意。能从前人种种附会割剥中,探寻杜诗本旨。考订是非、解释疑滞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共分两辑,总计九十六篇。排列次序概按仇兆鳌《杜诗详注》。

(尹晓廉)

【杜集书录】 工具书。今人周采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用三十年时间,将历代有关杜诗的著作汇成一系统的簿录,是杜诗研究者的一部必备工具书。作者网罗甚广,无论书之存亡、真伪,无论稿本、名家批点本、善本秘籍,均予酌录。全书共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包括全集校刊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共十一卷;外编则以存目及参考资料为主,包括全集校刊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上、下,集杜、和杜,戏曲类,共五卷。各类书目以著作年代为序排列。每书名下列卷数、作者简介、解题。解题包括著录、版本、序跋及编者按几个部分。书末有附录四则,分别为:历代杜学作者姓氏选存;近人杜学著作举要;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简介;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

(尹晓廉)

【杜诗引得】 工具书。近人洪业、聂崇岐、李书春、赵丰田、马锡用等编纂。“引得”一词译自英文index,即索引之改译。其方法是将杜诗每句分割,逐字或逐词编排。字序的排列,不用笔画或部首而用一种“皮擲法”排列,其方法是将各条之字分为五体,然后化为号码(略似“四角号码”),由小到大排列,计算方法详见于该书所附“中国字皮擲表”。该书为研究杜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该引得于杜诗原文所依据的注本为清嘉庆间(1796—1820)翻刻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本,郭注所缺,则据民国十年(1921)上海扫叶山房石印仇兆鳌《杜诗详注》补入。该书共三册,第一册包括洪业序、叙例、笔画检字、音序检字、中国字皮擲、杜诗各本编次表、杜诗各本逐卷章次起讫表;第二册为《九家集注杜诗》、补遗;第三册为引得。该引得于1966年由台湾台北市中文资料及研究工具图书用书服务中心公司重印,精装三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影印再版,改成精装二册,并增编了四角号码及汉语拼音检字。

(尹晓廉)

【张继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周义敢校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系《唐诗小集》第二辑之一种。该书以《全唐诗》所收张继诗一卷为底本,参校《中兴间气集》、《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唐诗

纪事》等总集、诗文评。编次均依《全唐诗》为序。校注合一,注释着重于作品背景、人名地名、成语典故、难解字词的诠释。其中对若干主名有分歧诗篇的分析,或并存诸说,或断以己意,持论审慎。一些有价值的校记已纳入注文。一般都注明出处。附录收有考定伪诗、版本著录、生平交游、《枫桥夜泊》诗评及集录等四项专精而实用的资料。其中考证原集中十一首伪诗,能提出证据,说明理由。

(周建国)

【元结诗解】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聂文郁注解。元结今存诗,包括王国维所认为伪托的《橘井》一首在内,共九十八首。此书全部收录注解,其间良莠不齐、美丑有异,为了便于选读,注解之后有评介,用以说明诗意,分析其思想及艺术水平之高下。元结有一部分诗写得古奥枯涩、诘屈聱牙,颇为难懂,注者能不避烦难,一一加以注解,是为可贵。书中注解包括注释典实出处,解释冷词僻字,疏通晦文难句。评介除评议诗意优劣外,还包括提示与考订。全书编次完全依照孙望所编《元次山集》中的诗歌部分,即其卷一至卷三。其文字也一如孙望校订本,聂氏校文、注文皆一如孙本,只是孙本中用小字排注文,而聂本则用括号标出。书前有聂氏所辑《论诗人元结的世界观》、《试论元结诗的艺术形式》。书后附唐颜真卿所撰《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有序)、《新唐书·元结传》、据孙望所编《元次山年谱》节录的《元次山事迹简谱》,以及聂文郁所撰《历代诗文评摘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王学泰)

【戴叔伦诗集校注】 唐诗别集校注本。今人蒋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戴叔伦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生历地方官多年,思想中仕隐矛盾复杂尖锐,其诗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原有诗一卷,《崇文总目》著录。但以后散佚,今所传戴叔伦诗,为明人辑本,以明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所收为最早,其中属入许多他人作品。朱警《唐百家诗》、胡震亨《唐音统签》、席启寓《唐百名家集》、《全唐诗》均对戴诗有所增补辨伪,如《统签》中的《戴叔伦集》收诗二百三十八首,删去了三十四篇伪作,又将疑似之作七十六篇别为附录。此后岑仲勉、富寿荪、傅璇琮等续有考辨。蒋寅在前人基础上对戴诗重作考察甄别,确定为戴作者一百八十四首,伪作五十六首,疑似而难定者六十首,遂将其厘为编年、不编年、备考、伪作四卷,用诸本进行校勘,并作注释。注释详于本事、系年考证、典章制度而略于文字训诂。书后附录戴氏佚文、年谱、传记资料、版本著录、历代评论等。其传记资料中有从《道光东阳县志》、《重修戴氏宗谱》抄出之《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陆长源)、《戴公神道

碑》(梁肃),可补《全唐文》之阙,弥足珍贵。

(纪伟)

【戎昱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臧维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唐诗小集》丛书之一种,是戎昱诗第一个全注单行本。该书以《全唐诗》为底本,参考《唐百家诗·中唐二十七家》、《唐人五十家小集》、《中晚唐诗·十三唐人诗》、《唐诗百名家全集》(附戎昱诗补遗一卷)等本进行校注。体例上仍采用《全唐诗》编次,校异补阙,共注诗一百二十二题一百二十五首。对重出诗之难确定者暂依底本收入。其中《同辛兖州巢父虚副端岳相思献酬之作因纾归怀兼呈辛魏二院长杨长宁》、《抚州处士湖泛舟送北回两指此南昌县查溪兰若别》二首已考订为戴叔伦之作,故删去未录。书后附录各种资料中所见之有关戎昱及其诗作的资料十四则。(毕宝魁)

【卢纶诗集校注】 唐诗别集校注本。今人刘初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卢氏诗集据《新唐书·艺文志》载为十卷,有诗五百篇(见《旧唐书·卢简辞传》,卢纶为简辞之父),今所传者仅三百余篇,可见散佚之多。明、清间卢纶诗集有多种刻本,《全唐诗》编为五卷。本书即以《全唐诗》之《卢纶集》为底本,校以明抄本《唐卢户部诗集》、明铜活字本及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之《卢户部诗集》,并以令狐楚《御览集》、姚合《极玄集》、韦毅《才调集》、《文苑英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高棅《唐诗品汇》等书参校,写出详细校记。凡《全唐诗》中卢纶与他人两收之作,或有所判定,或予存疑,校记中均有说明。本书注释力求简明、准确。笺证性文字均列入注释第一条。诗句用典或讽时之处,则力求结合诗意作注。卢纶诗向无笺注,本书实为首创,在着重引述旧籍文献的同时,能注意利用今人研究成果,如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等,然亦时出己见,对诗的编年、本事和题旨考释颇多发明。诗后多数附有历代论者评语,是为集评。本书前有校注者自撰前言,对卢纶生平经历、诗歌特色和成就做了言简意赅的述评,并对笺校注释体例有所说明。书后附录部分,辑有历代著录、传记、评论、唱酬诗等资料,并有校注者所编《卢纶简谱》一份,亦属草创之作。

(纪伟)

【李益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不分卷。今人范之麟注。李益今存诗一百七十四首(包括录《全唐诗》别卷的联句诗九首),以《全唐诗》存诗最全,编排也较为合理。此注本即以《全唐诗》为底本,校以明嘉靖刻本《李益集》、明铜字活字印本《李益集》,明抄本《李君虞诗集》、清康熙刻本《李君虞诗集》、清初抄本《李君虞诗集》诸本和《唐人选唐诗》诸集、《文苑英

华》、《乐府诗集》等总集中的李益诗,择善而从,并录有参考意义的异文,附于注文之内。其编次亦以《全唐诗》为依据,补入的作品排在后面,联句诗、残句排在最后。注释较为翔实、中肯,无论对于研究者或初学皆值得参考。书后所附参考资料丰富。包括:事迹十九条,从唐至清皆有,连蒋防《霍小玉传》也在其中;赠诗十九首,录卢纶、韦应物、孟郊、窦牟、王建、刘禹锡、贾岛、鲍溶、杨巨源等人赠李益诗;历代诗评摘要四十三条。前有《前言》评介李益生平及创作。此书收入《唐诗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学泰)

【孟东野诗集】 唐诗别集整理本。十卷。今人华忱之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后曾重印。孟郊诗北宋时有刻本,华氏即据陶湘影印北宋所刻《孟东野诗集》十卷本,并校以宋蜀刻残本、明弘治己未(1499)刻本、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初刻本及季振宜《全唐诗》本,加以标点,得出一个较完备可靠的新本。全书仍为十卷,以类相次,先后为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末附孟郊所撰文三篇及孟郊诗集最早的编订者宋敏求《后序》全文。华氏自撰《孟郊年谱》附录于书后,该谱对孟郊籍贯、生卒年、经历交游及诗歌系年均作详细考订,尤以诗歌系年与交游考富于参考价值。谱后辑有《孟郊遗事》,分传志、题赠、遗迹、杂记四目,分别搜集了有关研究资料。1982年是书重印时,华氏撰《前言》一篇,简述孟郊生活时代、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特色成就及校订凡例,是目前校订较完备的孟郊诗集。

(纪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唐人别集注本。五十二卷。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福州(今属福建)人,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本书初刊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计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遗文二卷。前列朱熹《韩文考异序》及宝庆三年王伯大序等。《韩文考异》系朱熹以方崧卿《韩集举正》为基础,对韩愈诗文进一步校讎考订之成果,共十卷。朱熹仿照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于本文摘一二字,以小字考校辨证于其下。方本正确者录而存之,误讹者予以辨证,未考校者则补充之。著者考校准确,颇见功力。王伯大将朱氏《考异》散附于韩集每篇句末,又集洪兴祖、樊汝霖、韩醇、祝充之说著为音释,附于篇末。本书宋、元、明、清各代翻刻颇多。天禄琳琅所藏宋本,系理宗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刊本。最通行之《四部丛刊》本,系据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书林王宗玉本影印。(阎琦 姚敏杰)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唐人别集注本。南宋魏仲举编。仲举名怀忠,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宁宗庆元中(1195—1200)书贾。尝编《韩柳年谱》。除本书外,尝有《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本书系宋代具有代表性之韩愈诗文集汇校汇注本。据《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宋版集部,此书有两种刻本。一本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韩文类谱》七卷;另一本增添《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读韩文纲目》一卷,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文集后序五篇,无《韩文类谱》。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九《韩柳年谱》及陈景云《韩谱跋》,康熙时马曰璐曾据前种宋槧单刻《韩文类谱》七卷,此七卷即包括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程俱《韩文公历官记》、洪兴祖《韩子年谱》三种谱记。然清代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宋庆元刊本一部有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昌黎先生序记碑铭》一卷,《韩文类谱》十卷。此本后归南京江南图书馆,1918年商务印书馆即据以影印。此本中之《韩文类谱》十卷,除吕、程、洪三种谱记外,尚收辑樊汝霖《韩文公年谱》、方崧卿《韩文年表》两种。本书所谓“五百家”,据《天禄琳琅书目》统计诂训音释有名氏者一百四十八家,新添逸姓氏者二百三十家,合计三百七十八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唐燕山刘氏迄颖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统计只三百七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云新添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皆同时唱和之人,刘昉、宋祁、范祖禹等,亦仅撰唐史,俱列为一家人,未免牵合。故以当时论,此本并非善本,然因其保存一些久已散佚之专著,功莫大焉。本书初刻于宋庆元六年(1200),元、明以来未见覆刻,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十九年皆有翻刻,江西有仿宋刻本。

(阎琦 姚敏杰)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唐诗别集注本。十二卷。清方世举编注。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桐城(今属安徽)人。博学,不求仕进,乾隆初举荐博学鸿词,不就。又尝批注《李长吉诗集》。晚年注韩诗,为之编年。方氏以为“注而不笺,则非子夏《三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义”,而“年不重编,诗终多晦”,遂“一一考诸史,证诸集,参之旁见侧出之书,以详其时,以笺其事,以辨诸家之说”(自序)。方氏是编即以朱熹《韩文考异》、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世綰堂《集注》、蒋之翘《韩集笺注》、顾嗣立《昌黎诗集注》诸书为基础

而撰。方氏将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中之十卷诗及外集、补遗之诗合并,依作年排列,编为十二卷;每卷先列目录,后注明起至作年,并略述韩愈仕履事迹,后依时次列诗,诗题或有题解,诗后摘字为注。注中引书或前人注皆注明出处,方氏考辨则加“按”字区别。诗后间附后人之多种诗话评论。本书注及评语所引资料颇为丰富,而其编年亦较精确。韩诗之编年,以此书为最早。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雅雨堂初刻本,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

(阎琦 姚敏杰)

【昌黎先生诗集注】 唐诗别集注本。十一卷。清顾嗣立注。嗣立,字侠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一年(1727)进士,选庶吉士,改补中书舍人,以疾归里。复撰有《温飞卿诗集笺注》、《元诗选》等。韩集向来诗文合刊,笺注者又多重文而轻诗,单刊韩诗殊不多见。天禄琳琅藏有宋槧《昌黎先生诗集》一种,当为首次单刊韩诗者。清人承其绪,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首开其端。顾氏于其自序中叙其原委云:“余于诗雅宗仰昌黎先生,而论先生诗者,或有以文为诗之诮,至斥为不工”,“先生之诗,几为其文所掩而不能自伸”。其凡例云:“是刻采诸家笺注,复参以臆见所得”,所采择者有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本,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音释本,徐世泰刻《东雅堂昌黎先生集》等注。对旧本编年、注释之舛错者,多有订正,“旧本存者,约计十之四五”。全书前十卷编次,悉依宋槧《昌黎先生诗集》,末卷为外集诗五首、遗诗十六首及文集中《送汴州监军俱文珍》、《石鼎联句》等。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即顾氏秀野草堂本。有道光十六年(1836)膺德堂、光绪九年(1883)广州翰墨园重刻本等,重刻本增朱彝尊、何焯二家评点。

(阎琦 姚敏杰)

【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 唐诗别集注本。十一卷,年谱一卷。清黄钺增证。钺字左君,一字左田。当涂(今属安徽)人。乾隆进士。嘉庆时官至礼部尚书。工书善画,与大学士董诰称“董黄二家”。老告归,年九十馀。目失明,自号盲左。卒谥勤敏。有《西斋集》。自唐迄清,韩愈集向为诗文合刊,且多重文而轻诗,单刊韩诗者殊不多见。天禄琳琅所藏宋槧《昌黎先生诗集》,当系首次单刊韩诗者。清顾嗣立承其绪,博采诸家笺注,复参以己见,刊《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于旧本编年、注释之舛错者,多有订正。黄钺复依顾氏《集注》,增注证讹,用功甚巨。诚如本书后序所云:“先勤敏公宗仰昌黎先生诗,以各家注虽称完备,然犹有遗漏,且引据有未详确者,故自乾隆壬辰(1772)迨道光辛卯(1831),日事丹铅,点勘不憚,广搜博览,以增其未备,证其伪舛,垂六十

年,所著乃成,洵有功于韩子。”黄钺之子中民“念是书为勤敏公毕生精力所集,未可淹没不彰”,故校刻之。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精刊本,咸丰七年(1857)四明鲍氏二客轩刊本。书前附黄钺编撰《昌黎先生年谱》。(阎琦 姚敏杰)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唐诗别集注本。十二卷。今人钱仲联集释。1957年初版于古典文学出版社,后经增补修改,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中。本书将韩愈诗按作年编排为十二卷,其校、笺、注诸方面,均为集成之作。校则以宋人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为主,参以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以及廖莹中、王伯大等注本之宋元版刻,偶及明清版本,下逮清人考订,参比同异,择善而从。笺则于各诗写作时代背景、年月、本事、人物等,均作详细考索,尽“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旨。如《孟生诗》一首,注者列举诸说,以明韩诗本事、作年。后于“补释”中得出结论:“公识李观在贞元八年,至十年而观卒。夏敬观《孟东野年谱》系此诗于贞元四年,时韩、李尚未聚首京师,东野答诗,何得以二人连称?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系此诗于贞元十一年,时观已卒,系年亦误也。兹从王说。”注则包括音义训诂、使事用典、地理沿革等,务求明确清晰,发明本义,不惟明确原诗用典,亦往往与前代注家之释语相互补充发明。本书对古近人诗话评点、著述论说,广为采摭,又因著者于韩诗颇多心得,故能时出己见,资料虽富而旨意醒豁。

(阎琦 姚敏杰)

【韩愈诗选】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陈迥冬选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坊本为底本,参以别种版本。全书精选韩诗九十五首。以古体诗为主,兼选近体;风格以雄健浑厚为主,兼选其他;素有定评或于某一方面能反映韩诗特点者亦多选入。注释部分杂采众家之言,间出以己意,用力最勤,颇见功力。既有对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生平行迹、思想生活状况之提要介绍,亦有对韩诗名作艺术特点之简要分析。诗注部分慎择旧评,取其精华。多以韩诗、韩文注释韩诗,于比较中见诗意,且多所发明。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与《雉带箭》二诗之比较,《嗟哉董生行》一诗与《送董邵南序》一文之比较等。选注者注意对疑点、难点之疏解。如对《岳阳楼别窦司直》中“趣有获新尚”句,注释为“即‘趣尚有获’。趣,音义同‘趋’”;《嗟哉董生行》中“或山于樵,或水于渔”句释为“或樵于山,或渔于水”之错综句法,等等。本书注者不盲从古人旧注,且常发前人所未见。如《赴江陵

途中寄赠三学士》中“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句,以韩愈“上疏专论宫市之弊”释之,异于前人说法。

(阎琦 姚敏杰)

【韩集校注】 唐人别集注本。今人童第德校。童第德(1894—1969),字藻孙,浙江鄞县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门。曾受业于章炳麟等,专攻训诂学。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童氏博闻强识,治学严谨。著述尚有《论衡补正》、《贾子新书补正》及《韩愈文选》等。《韩集校注》分上下二册,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校勘以宋魏元忠刊本为主,诠释则兼采廖莹中世綵堂刊本、祝本、王伯大校释本,宋后诸家刊本,以宋注家为主,兼及以后诸家,而宋诸家中以方崧卿、朱熹二家为主。全书运用校勘学与训诂学之研究方法,博引书证,详加笺释。著者不满足于简单排列前人校勘之异同,多依需要参以己断,求证益确。注释则依韩文特点,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探求词语典故之根据及演变,多有发明。书前有吴则虞序,序中称本书“博而慎,核而恕,见独而不纤,是读书得其间,著书善用其才者”。

(阎琦 姚敏杰)

【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年谱。宋吕大防编。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其先为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祖父吕通,尝为太常博士,卒后葬京兆蓝田,遂以为家。大防于神宗元丰时曾知成都府,神宗卒,宣仁太后辅政,召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寻即拜相,并封汲郡公。居相位八年,后累贬官,绍圣四年卒于贬谪途中。成都期间,于杜甫、韩愈二集用功颇勤。本谱记事简略,然系韩谱创始之作。谱后识语云:“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故知编者不惟编撰年谱,尚曾校辑杜、韩集。据日本人涩江全善《经籍访古志》载,日本福井榕亭崇兰馆所藏《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即为吕氏校正之宋刊本。本谱当系编者校正韩文集后所编。1918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新刊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宋庆元刊本,辑有此年谱。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所收此谱,即据商务影印本为底本标点整理。

(阎琦 姚敏杰)

【韩文公年谱】 年谱。宋樊汝霖编撰。汝霖,字泽之,金堂(今四川成都)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孝宗时曾仕于蜀。尚有《韩集谱注》四十五卷,系宋人所作韩集注释最早之一。另有《韩文公志》五卷,集碑志、祭文、序谱为一编。此年谱即《韩文公志》后所附。樊氏于其谱后跋中云:“予既集公行状、墓志……与夫汲公所谱,分为五卷,目曰《韩文公

志》。其谱所未尽也,则为此年谱于其后,证据甚明,览者其详之。”故其不免简略,仅就韩愈有关传记资料稍作排比而已,大抵因其编撰者未见洪兴祖《韩子年谱》之故。1918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宋刊本,辑《韩文类谱》十卷,即有此年谱。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所收此谱,即据商务影印本为底本校点整理。(阎琦 姚敏杰)

【韩子年谱】年谱。宋洪兴祖编撰。兴祖(1090—1155)字庆善,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徽宗政和时登第,历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又知广德军、饶州,后为秦桧党羽所劾,贬谪昭州。本年谱编者于谱前序中自谓:“余校韩文,以唐本、监本、柳开、刘焯、朱台符、吕夏卿、宋景文、欧阳公、宋宣献、王仲至、孙元忠、鲍钦止,及近世所行诸本参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诸本异同者兼存之。考岁月之先后,验前史之是非,作《年谱》一卷。其不可以岁月系者,作《辨证》一卷,所不知者阙之。”本年谱系现存宋人所作韩愈年谱中最为详细之一种。本书撰写于徽宗宣和四年(1122)之前,宣和七年加以修订定稿。1918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宋刊本,辑《韩文类谱》,厘本书以为四卷,前有洪氏自序,后有其友人孙伯野之跋语。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所辑此谱,即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为底本校点整理。(阎琦 姚敏杰)

【韩文年表】年表。宋方崧卿编撰。崧卿(1135—1194),字季申,福建莆田人。曾历任地方官。宋孝宗时尝知台州军事。光宗绍熙二年(1191)在广东提点刑狱任所。尚有《增考年谱》,即对洪兴祖年谱而作。原书已佚。另有《韩集举正》一书,系编者依据当时已有韩集版本,汇集众长,参以己意,精心校订之作。本年表一卷,即为其校订韩集成果之一。其体例为表格式,按行年作为标识,此下分纪行、赋、古律诗、联句、书序、表状、杂文、碑、墓铭、祭祝文等项。特点为按年所系诗文较详。此为宋人年谱中依年系文的创始之作。年表内诗文仅列篇名,未注依据,是为独立成篇的年谱不足之处。1918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宋刊本,有《韩文类谱》十卷,即辑有此年表。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所辑此年表,即据商务影印本为底本校点整理。

(阎琦 姚敏杰)

【昌黎先生年谱】年谱。清黄钺编撰。本年谱采用图表式编撰。附于顾嗣立删补、黄钺增注证讹、黄中民校刻之《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之首。先考列韩愈“世系”表,后依“纪年”、“时事”、“出处”、“诗”四项

分列图表,体例悉依顾嗣立所编《昌黎先生年谱》。本年谱系编撰者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增订洪兴祖《韩子年谱》及方崧卿《韩文公年表》所得。详于“时事”及“诗”二项。详于“时事”者,有知人论世之意;详于“诗”者,则因本年谱附刻《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之首,可以相互参证。其略于“出处”者,大抵因韩愈“生平事略悉寓篇章”之故。(阎琦 姚敏杰)

【昌黎先生诗文年谱】年谱。清方成珪编撰。成珪,字国宪,浙江瑞安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曾任海宁州学政,宁波府教授。咸丰中以老病告归卒。方氏精研小学,勤于校讎,于文字音韵造诣颇深。著有《字鉴校注》五卷、《集韵考证》十卷、《韩集笺正》五卷等。本书即附于《韩集笺正》之后,编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系韩愈年谱之集大成者。本书之特点为详于诗文之编年。《韩集笺正》有温州图书馆藏清道光佚名抄本。道光二十一年有瑞安陈氏漱澂斋刻本等。(阎琦 姚敏杰)

【昌黎先生年谱】年谱。清顾嗣立编撰。此年谱系清人研究韩愈年谱之代表作,其体例为表格式,前详列韩愈“世系”图表,次分“纪年”、“时事”、“出处”、“诗”等四项。本年谱详于“时事”及“诗”二项。详于“时事”,寓知人论世之意;详于“诗”之编年,则因其年谱附刻于编撰者所作《昌黎先生诗集注》之后,旨在相互参证。《昌黎诗增注证讹》十一卷,系当涂黄钺依顾氏《昌黎先生诗集注》增证,其子中民校刻,四明鲍氏刊本。原书题“顾嗣立注,黄钺增注证讹”,仍附此年谱于其后。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由徐敏霞校辑之《韩愈年谱》,所辑此年谱,即据四明鲍氏刊本标点。然编者不察详情,误将《昌黎诗增注证讹》归于顾氏名下。(阎琦 姚敏杰)

【韩愈诗文系年辨证】考订论文。今人李嘉言撰。原载《文哲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后即编入论文集中。本文系“五四”以来最早研究韩愈诗文系年之代表作。其特点在于博采此前韩集系年诸作之长,尤详韩集诗文具体篇目之考辨。著者先摘据以辨证诗文系年之原文,既以史籍及韩集系年诸本钩稽厘正,偶标“按”字,参以己见,多所发明。如《答张籍书》一文系于德宗贞元十二年丙子二十九岁。摘文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既引《五百家》注及方成珪谱,著者“按方说非是。玩公文意,未至云者,三十四十俱未至耳。岂只言未至四十耶”,故以《五百家》注为是。

(阎琦 姚敏杰)

【韩愈志】诗人评传。近人钱基博著。本书写定于1929年,1935年初版。后经著者复勘增订,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著者分举六题考论韩愈。首篇《古文渊源篇第一》，考述汉魏六朝以来文风之变化发展，于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论述颇详。《韩愈行实录第二》考辨韩愈家世、生平行迹。《韩愈佚事状第三》，记述韩愈佚事二十事，采摭无遗。《韩友四子传第四》考述韩愈之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揭示四友对韩愈文学创作之影响。《韩门弟子记第五》主要记述韩愈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人之文学经历及与韩愈之交谊。《韩愈读录第六》综论韩愈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之成就。本书前有叙目，概述韩集之流传、整理情况及本书成书缘起。书后附录有“韩愈论汇录写目”。

(阎琦 姚敏杰)

【韩诗论稿】 唐诗学专著。今人阎琦著。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全面系统论述韩愈诗之政治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特色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之地位。首章探讨韩诗产生之时代背景及其政治内容，旨在对作为政治诗人的韩愈给予辩证公允之评价，纠正韩诗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第二章突出韩诗奇崛艺术风格之论述，并以“陈言务去的语言和奇崛意境的追求”及“戏谑、顿挫、浪漫主义和尚诗胆”诸方面深入论述。第三章论述韩诗有异于其奇崛风格之另一领域，即以“工稳、清丽”之五律、七绝，“冲淡”之五古，“阳刚与阴柔艺术的交融”，“写实手段、炼字和写人功夫、比兴手法”等方面揭示韩诗艺术风格之多样性。第四章论述韩愈“以文为诗”，著者于征引前人研究成果之同时，能不泥成说，独出机杼，议论分析深入细腻，评价亦中肯恰切。末章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从韩诗对大历诗风之突破、诗人变革诗风之主张及创作实践等方面，评价韩愈在诗歌发展史上之地位及影响。

(姚敏杰)

【韩愈述评】 诗人传论。今人陈克明撰。此书分六章，全面评述韩愈生平与创作。包括：一、韩愈的家世和经历。此章介绍韩愈所处时代背景、家世及其一生之经历。二、韩愈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主要论述韩愈重视人才，反对弊政，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同情永贞革新，并介绍韩愈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三、韩愈的哲学思想。评介了其历史观、天命观、人性论及其对儒学的维护，对佛、道两教的批判。四、韩愈的文学成就。介绍了古文运动前后因果与韩愈所起的作用，以及其论文主张和散文造詣。这一章中也就韩愈诗歌创作特色作了论述。作者认为韩愈对诗歌创作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创造了新风格，形成了新流派。并从描写现实，千姿百态，浮想联翩，光怪陆离，联句较多，好奇斗胜几个方面评

价了韩诗的成就及其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五、韩愈师友关系。重点评论了他与刘禹锡、柳宗元的关系。六、结束语。书前有张岱年序，书后附录《韩愈籍贯考》、《韩愈年表》和本书引用书目。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排印出版。(王学泰)

【韩愈资料汇编】 资料汇编。今人吴文治编。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辑录了自中唐至“五四”一千一百余年有代表性之评述五百三十余家，引用书目六百余种。不惟辑录有关韩愈生平行迹、轶闻趣事及作品本事之系统评述，且更为全面系统地辑录关于韩愈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及社会伦理思想之评述，对其诗文成就、艺术风格、文学观点，及至韩氏在中国文学史上之贡献、地位之评述辑录尤详。编者不囿习见，客观公允，凡有某种认识价值者一并辑录，反映出历代韩愈研究之本来面目。

(阎琦 姚敏杰)

【薛涛诗笺】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张篷舟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书名虽仅题为“诗笺”，实为薛涛研究资料之总汇。全书分为《薛涛诗》、《薛涛传》、《薛涛坟》、《薛涛字》、《薛涛笺》、《薛涛井》、《薛涛酒》、《薛涛像》、《薛涛剧》九篇。其中的《薛涛诗》、《薛涛传》、《薛涛笺》、《薛涛井》四篇下各设有分章专论，其他各篇均未分章。如《薛涛诗》篇，在分诗笺注后，又分设《版本源流》(下附《薛涛诗专集选集收诗情况表》)、《真伪诗考》、《涛诗评价》、《唱和诗存》四章，分门别类进行考辨，条理明晰。作者生长于成都，早岁即在成都《晓光日报·春华周刊》发表《薛涛的诗》一文，为作者研究薛涛之始。婚后与妻子杨瑞琰共同研究整理薛涛诗作，合薛涛、曼殊诗及事迹为一集，题曰《浪漫二诗人》，1933年由上海南京书店刊行。1942年秋，作者将薛涛诗从《浪漫二诗人》集中析出交由文言出版社再版，次年三版，又增添《元薛因缘》、《薛涛的字》、《江楼联选》三章。1949年，进一步丰富扩充内容，以《薛涛》为名第四次刊印。五十年代后，在前四种版本基础上加以丰富完善，著成《薛涛诗笺》一书。该书资料丰赡赅备，可谓是薛涛资料之集大成者，亦可视为薛涛研究之小史。书中还收有著名画家张大千所绘之《薛涛制笺图》及关山月所绘之《吟诗楼图》，亦弥足珍贵。

(毕宝魁)

【玉川子诗集注】 唐诗别集注本。五卷。清孙之騄著。之騄字晴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与毛奇龄同时并友善。玉川子为中唐诗人卢仝名号。卢仝诗向以险僻怪异著称，韩愈、孟郊均激赏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在北宋时已有百篇镂板行世。《直斋书录》益为二卷，又外集一卷。至《全唐

诗》复增二十三首,编为三卷。孙之騄又搜得《栢铭》、《月》诗各一篇加入,编为五卷,为作注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卷首《月蚀》一篇,考据元和庚寅(810)时事,笺注最详”,但亦指出其枝蔓失检之处。此书卷端有孙撰《玉川先生传》一篇,述其生平著作,卷末有跋,论其诗版本篇目。有1923年卢永祥刊本。(纪伟)

【刘禹锡传论】 诗人评传。今人吴汝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之一。书前王运熙序认为该书“对刘禹锡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作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与分析,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该书十四章,基本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八章为第一部分,阐述其生平与思想;后六章为第二部分,分析其对文学的贡献。作者将作家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把握和研究,注意到作家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以及作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作者用一定篇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裴度、张籍、王建、姚合等人之关系,这对全面深入了解刘禹锡甚有益处。本书资料丰赡,考证翔实,评价精当。是刘禹锡研究的一项成果,对研究中唐文学也颇有参考价值。(毕宝魁)

【白香山诗集】 唐诗别集。清汪立名编。汪立名,号西亭,婺源(今属江西)人。官工部主事。通六书。著有《钟鼎字源》,并辑有《唐四家诗》。本书写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汪氏据明胡震亨所编《唐音丁签》收白香山诗,分原《白氏文集》前二十卷诗为《白香山诗长庆集》,其中讽谕四卷,闲适四卷,感伤四卷,律诗八卷,与《白氏文集》前二十卷同。汪氏以为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谓穆宗长庆时所作仅前集五十卷,其敬宗宝历后所作不应概以“长庆”名之。故以为白氏自编之前后续集本俱名以《白氏长庆集》不确,即以白氏归老之地“香山”名之。编者又将《白氏文集》中卷二一至三七共十七卷诗编为《后集》,分为格诗四卷,律诗十三卷;将原附见于文集之应制诗、试作诗、谣吟歌篇十一首编为《别集》一卷;收集白氏遗诗八十五首编为《补遗》二卷。以上共编四十卷。本书参互诸种版本如万闲堂校本、苕溪草堂本、憩间堂所藏季振宜依宋校本等,予以校正,重新编次。书中附有汪立名《白香山年谱》、陈振孙《白香山年谱》旧本,并录元稹《长庆集序》一篇、《旧唐书》本传一篇等,偶采诸书有关白氏诗之诗话、笔记、史传、杂说等,予以笺注。本书特点在于校讎文字和收集逸诗,而笺注极少。然其笺注所引资料于研究白诗颇为有用,如卷一二《长恨歌》前引陈鸿《长恨歌传》,后引《隐居诗话》;《琵琶行》后引《容斋五笔》等。本

书系宋元以来首次对白氏诗整理校注之本,其于校讎辑佚方面为一大贡献,然其笺注疏略,文字亦有校而未尽之嫌,且有诗无文,诚为美中不足。本书初刊于清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702—1703),一般称汪氏一隅草堂本。后又有《四库全书》本及《四部备要》本。(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集笺校】 唐人别集注本。今人朱金城笺校。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通行的明万历马元调本为底本,校之以宋绍兴本为代表的先诗后笔本及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为代表的前后续集本两系统共十一种《白集》及有关总集七种。全书收白氏诗文(包括补遗)共计三千七百余篇(正集七十一卷,外集三卷,附录传记、序跋、年谱简编各一卷)。笺注者征引历代笔记、诗话、研究专著及有关考证评论资料数百种,几乎囊括有关白氏诗文之全部记载,详加笺证。故其资料丰富,广征博引为该书一个显著特点。如对《牡丹花》一诗之笺证,征引《国史补》、《酉阳杂俎》、《南部新书》、《剧谈录》、《容斋随笔》等书之大量资料,旨在证明唐人对观赏牡丹之重视,于理解诗意不无裨益。笺证者征引资料丰富,但不繁琐,或择善而从,或两相并存。对素有争议之问题,征引多种资料一并罗列。该书对白氏诗文系年笺证及人名、地名之考订用力甚勤,每多新见,在许多方面纠正或弥补史书记载及前辈权威学者(如岑仲勉、陈寅恪)研究之错误或缺漏。如对《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近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一诗作年之考证,据两《唐书》及《通鉴》得知“河阳石尚书”石雄任河阳节度使之时间为会昌四年十二月,故白氏此诗当作于会昌五年,遂纠正日本学者花房英树系此诗于会昌三年之误。本书为迄今为止收白氏诗文最完备之全集注本,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古籍整理中值得重视的成果。(阎琦 姚敏杰)

【元白诗选】 唐诗选注本。今人苏仲翔选注。1956年春明出版社出版。本书为著者《李杜诗选》之姊妹篇,故其选例一仍其旧,分“古诗”、“乐府”、“近体”三类。选注元稹诗一百首,白居易诗二百首。选注者于诗后均有“题解”和“注释”。题解部分介绍诗之作年、背景、作者行迹及诗之大意等。依诗题具体情况,题解有详有略。如白氏《长恨歌》影响较大,其主题于学术界素有争议,故注者详为介绍,并引陈寅恪及《容斋续笔》语以明诗义,又提出己见,客观公允。注释部分多参以史籍及前人诗文,释疑解难,详略得当。本书前有著者导言,详尽阐发元白所处时代及其诗歌创作之实践,并扼要说明其风格异同。书后附《元白年谱》。(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诗译析】 唐诗译注本。今人霍松林著。195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原书名为《白居易诗选译》，后经著者修改加工，并加大分析部分之比重，故改名。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选白居易代表性诗作一百零四首，先列译文，再以原诗、注释、分析列其后。在选诗、译诗、注释、分析诸方面均颇具特色。其选诗是根据进步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有机结合的标准选出来的；译诗力求直译，保持原诗韵味；注释详细、准确，富有启发性；分析部分文字洗炼生动，深入浅出。著者尚注意相同或相近创作题材诗歌之比较，以见其思想及艺术上之共性与个性。本书前有著者前言，详细介绍白氏生平事迹及文学创作活动。对其诗歌理论主张、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等方面介绍尤详。书后附译白氏《与元九书》，以明诗人诗歌理论主张之大概。

(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诗选】 唐诗选注本。今人顾学颀、周汝昌选注。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选白居易诗一百七十六首，校勘以较早之宋本为底本，参以别本，择善而从；遇有异文，择其较为合适之一种。不另立校记，与注释部分结合。注释部分为著者用力最勤处。不仅对白诗做出初步编年并略述其依据，且于较难理解之词句、典故多有疏释，对诗人创作作品时之历史背景、社会情况及诗人生平行迹，注释尤详。注释文字简明扼要。遇有可供参考之较重要资料而为注释所无法包容者，采取备考形式，置于注释后。本书前有王士晋前言，概述白诗产生之历史背景、作者之生平、作品之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白诗之影响等。书末附顾学颀编《白居易年谱》(简编)。

(阎琦 姚敏杰)

【白香山年谱旧本】 年谱。宋陈振孙编。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人。端平(1234—1237)中为浙西提举，改知嘉兴府，终侍郎。尝仕于莆田。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馀卷。著《直斋书录解題》，极精赡。白居易文集行于世者皆有年谱，何友谅所刻蜀本，刊年谱于白氏文集之首。吴门大字本亦于文集之首载以李璣所作谱。陈振孙以为李璣谱“既谱而不系年，其疏略抵牾有不可枚举者”，遂取新旧史、实录等书及诸家传记所载参稽互考，别为此谱。后又与何友谅谱相较，以为“详略互见，各有发明”，固并存之。此谱对白氏始生之年及考终之岁，次第审订，得其详确。清汪立名刊《白香山诗集》，辑陈氏年谱于集首，评价云：“直斋考据精确，多详人所不能详，其他自不嫌疏略也。”此年谱附见《白香山诗长庆集》。

(阎琦 姚敏杰)

【白香山年谱】 年谱。清汪立名编。此年谱采用图表式编撰。先考列白居易“世系”表，再依“纪年”、“时事”、“出处”、“诗”四部分列图表。汪氏于白集颇有研究，刊有一隅草堂本《白香山诗集》，系对白集较早整理的本子。此年谱即附于诗集之首。汪氏以为吴门刊《白氏长庆集》首载李璣所作谱，编次荒唐，疏略抵牾之处甚多，遂博取史书记载为考订，以成此谱。其于“纪年”、“出处”之稽考，多校正史传诸书所载之舛误；其于“时事”及“诗”部分较详，颇合“知人论世”之旨。汪氏与宋陈振孙所作《白香山年谱旧本》比较云：“陈氏撰本不特编年事系与余谱略同，而其辩论《海图屏风诗》为讽王承宗事作及元白隙终之谬之类，无不暗合。”此年谱附见于《白香山诗长庆集》。

(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年谱】 年谱。今人朱金城编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对白居易生平行迹、作品系年及重要时事予以详赡考订。全书分谱文与笺注两大部分。关于白氏文集，编著者参考宋绍兴本、明马元调本、日本那波道圆本、清汪立名一隅草堂本等诸种版本，以校正现存七十一卷《白氏长庆集》之疏误。同时。编著者对前人研究成果广征博引，亦多吸收运用新、旧《唐书》等典籍记载，并对所引用材料中之疏漏失误颇多补正。如近人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中叙白氏行踪有云：“其年(指元和十五年)冬，乐天亦自忠州召还，拜司门员外郎。”说明陈氏以为白居易离开忠州之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冬。编著者于《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中引《商山路有感》诗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以及《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诗“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初收”句，考定白居易离忠州时间当为元和十五年夏初，从而纠正了陈氏之误。编著者于编年方面，对宋陈振孙《白香山年谱旧本》及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中诸多错误予以纠正。本谱不局限于谱主生平及创作，还广泛涉及到中唐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等，故无论其历史资料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都相当高。

(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家谱】 资料汇编。今人顾学颀注释编纂。1983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本书收辑得之于白居易五十二代孙、续谱作者白书斋之家谱及相关材料多种。前列明、清两代白氏谱系序文，其中三篇出自白氏后裔之手。涉及白氏生平及家谱系包括：《白氏先人年事实录》、《乐天后裔白氏家谱》、《履道里第宅记》、《旧唐书·白居易传》，及顾学颀编《白居易行实系年》、白居易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其中《谱系》所载，自乐天迄今千馀年间，五十馀代子孙，昭穆次序，井然不紊，为研究白居易后嗣问题，提

供可靠资料。尤其关于白居易之嗣为侄还是侄孙,向来众说纷纭,据《谱系》知其兄幼文之次子景受,即请李商隐为乐天撰墓碑之人。《谱系》与墓碑之说吻合,千年疑团冰释。(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评传】诗人评传。近人郭虚中著。初版于1936年,1947年上海正中书局重印。本书共分五章,对白居易家世、生平、思想、性格及诗歌作品予以系统评述。首章“导言”分析白氏所处中唐时代之社会矛盾,对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文学主张给以充分肯定。第二章“白居易的一家”,考述诗人家世及对诗人文学事业之影响。第三章“白居易的生平”,著者从“怀才未遇的少年时代”、“一举成名的得意时代”、“贬谪江州的失意时代”、“自忠州至苏州的闲适时代”、“放怀诗酒的晚年时代”五阶段概括叙写诗人坎坷之遭际。第四章“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以“文学批评与文学主张”、“政治主张”两方面论白氏思想。论及文学批评与主张,以白氏《与元九书》为纲;论及政治主张,以其《策林》为纲;论“人物与性格”,则以《醉吟先生墓志铭》及《与元九书》中之数语为纲,分而述之。第五章“白居易的作品”,首叙作品概况,继而分述“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末叙后人对白诗之批评。(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研究】唐诗学专著。今人王拾遗著。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之生活、思想、创作精神等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全书由三篇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之文章组成。首篇《白居易生平事迹考略》,通过对诗人一生主要事迹之考察,结合诗人所处时代的特点,列举许多具体事例,揭示诗人世界观形成之客观因素。著者注意对诗人政治生活之考述,以表现其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之精神。第二篇《试论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即从中唐社会阶级矛盾及其他意识形态之影响方面,分期论证诗人思想的发展与转化。第三章《白居易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态度》,根据诗人文学主张与写作态度,并结合其一生创作经历,阐发诗人之现实主义精神。(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传论】诗人评传。今人苏仲翔著。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本书共分九章,较全面地分析白居易生平、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之实质、风格。首章“导论”简述中唐的社会面貌;二三两章论证白氏家世、生平;第四章论述白居易的思想及其性格,重点分析白氏在政治上与文艺上二重性思想之斗争。第五至第七章,从文学主张、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诸方面对白居易诗给予全面分析。第八章论白居易诗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兼及对国外文学的影

响。末章从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继承、优美形式的创造、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反映及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早形成等方面,对白居易做出新评价。本书著者多取例证,立论有据,并善于吸收前人时贤之研究成果,出以己见,论断中肯。书后附陈鸿《长恨歌传》、白氏《长恨歌》、《琵琶行》、《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及《白居易诗文集版本目录》等,以备查考。

(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传】诗人评论。今人万曼著。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全面系统介绍白居易生平行迹、政治抱负、文学主张及诗歌创作实践等。著者注意结合时代背景叙述诗人生平,对其政治遭际及其在诗歌创作中之表现介绍尤详。在编写体例上,著者善于抓住对诗人一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详叙始末,以见诗人为人、为诗之情实。对诗人生平事迹之叙述,著者多依白氏本人之说,然并非盲从,多参考史籍或前人研究成果,择善而从。如对白氏自叙“家状”两道即持怀疑态度;对白氏母亲看花堕井事,则从宋陈振孙《白香山年谱》所引“阙史”之说。著者还注意“传”与“论”之结合。因其“传”有信实可靠之资料基础,故其“论”亦言之有据,允当中肯。(阎琦 姚敏杰)

【白居易评传】诗人评传。今人褚斌杰著。初版于1957年,后经著者修订,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本书以白居易家世、家庭、生平行迹、政治思想、文学主张、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及其影响诸方面,全面系统进行评述。“导言”部分简要介绍诗人一生及其文学活动。《诗人的家世和家庭》、《诗人的一生》二文,通过对诗人家世家庭及生平之考述,以明其世界观之形成与发展,对其政治主张以及伟大人格给予充分肯定。《开明的政治思想》、《先进的文学主张》二文,通过大量事实证明诗人热爱人民、憎恶贪官污吏的思想感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亦指出其局限性。《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一文,则从白氏“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的分析中,总结其思想内容的人民性,并论及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作品的艺术风格》一文,重点分析白氏“讽谕诗”之艺术特征,末篇《作品的影响》论述白诗在当时及其后世之广泛影响。

(阎琦 姚敏杰)

【元白诗笺证稿】唐诗学专著。今人陈寅恪著。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此书于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刊行;1955年作者修改扩充后,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

版;1959年又经作者增补材料、修订错误,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寅恪文集》之六再版,增补作者十条附记。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对白居易、元稹《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新乐府、古题乐府等进行认真翔实之笺证。著者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白居易、元稹二人作品,区分其题目题材,考订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如第六章《古题乐府》,著者比较元稹所作新题乐府不及白居易之二处,进而分析元稹“欲改创以求超胜”之心理,遂使其于元和十二年(即白居易于元和四年赋新题乐府后之八年),和刘猛、李馀古题乐府诗时所赋古题乐府诗十九首,得以补救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别出新意。对此,著者举其最佳诗作加以证明。对同一性质题目的作品,著者亦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定其作成的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以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及文人才学之高下。如第二章《琵琶行》,著者以白氏《琵琶行》与元氏《琵琶歌》比较,先考订二人作品年代,知元作先于白作。进而通过二诗逐句比较分析,得出白诗胜于元诗之结论。本书著者向以诗史互证之研究著名,故其以史证诗亦于本书可见一斑。如首章《长恨歌》论及杨太真之入宫始末,著者对清朱彝尊书《杨太真外传》后之考证文字中有关武惠妃薨年,再考诸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大唐新语》等史籍,知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薨,而非开元二十四年。杨妃亦非于开元二十五年入宫,而在开元二十八年。考证史料翔实,多有见地。本书后有附论六则:白乐天之先祖与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阎琦 姚敏杰)

【《长恨歌》笺说稿】 唐诗学专著。今人周天著。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四篇文章构成,一篇说吴梅村《圆圆曲》,三篇说白居易诗《长恨歌》,对白氏《长恨歌》之创作缘起、思想、主题、题材、艺术特色等予以全面系统的分析。首篇《说吴梅村〈圆圆曲〉》,旨在明知人论世之理。以“论人当恕,论道则严”之原则,评价吴梅村及《圆圆曲》,为评价白居易及其《长恨歌》确立批评标准。说《长恨歌》三篇文章,其第一篇论长诗及其所反映历史事件间关系,进而总结白氏提炼主题、剪裁材料之手法。第二篇论作者创作动机及长诗在当时社会流传之效果,并论及二者之矛盾,进而追究矛盾所产生之社会背景、历史原因。第三篇论述白氏《长恨歌》与元稹《莺莺传》之间内在联系,通过二者之比较,说明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不同创作方法下产生性格描绘之差异性、联系性及其相互融合的问题。本书为著

者计划撰写《白诗笺说》之一部分。

(阎琦 姚敏杰)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 资料汇编。今人陈友琴编。原名《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第一种,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增补,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从中唐迄清末约二百种著作中,辑录有关白居易的评价资料九百多条,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分编为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五部分,收辑资料全面系统。占篇幅较多者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洪迈《容斋随笔》,清查慎行《十二家诗评》,赵翼《瓯北诗话》及乾隆《唐宋诗醇》中关于白居易诗的评论与记述。其他书中辑录,少则一条,多则十余条。其中不仅有对白氏肯定的评述,亦不乏否定乃至攻击之评价。关于个别词句构造的讨论,白氏之作与其他诗人作品的比较,乃至白诗方言、俚语、声调、韵律诸方面的评述,亦尽量辑录,以便读者研究。编者常于条后附以按语,出以己见。书前有编者序,介绍历代白氏研究概况及成书过程,末附白氏本人论诗意见。(阎琦 姚敏杰)

【李绅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四卷。今人王旋伯注。李绅诗散佚极多,其所首创“乐府新题”二十首即已不存,其他作品也散佚很多。现今传世的《追昔游集》乃作者于开成三年(838)编于汴州。现存最早刻本即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本。此注本即以毛晋刻本为底本,校以清人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中的李绅集与影印扬州书局本《全唐诗》中的李诗。此二本在第三卷末补入了原集未收诗三十一首,注本也增入这些诗,又从韦庄所编《又玄集》录入一首,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补足《莺莺歌》第二至第四首,凡三首,从《刘禹锡集》录入联句二首附于原存残句之后,并考订伪作一首收在集中注明。本书注释较为细致,特别是对于地名、胜迹、典故、难字的注释极细,便于初学,书后附有关李绅身世与李绅集的参考资料十种。前有前言评介李绅其人其诗。此书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唐诗小集》,1985年出版。

(王学泰)

【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 唐人别集注本。宋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宗说字梦弼。南城(今属江西)人。曾为袁州教授,号南城先生。撰有《柳文音释》一卷。敦颐字养正,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进士。由南剑州教授历知舒、衡二州致仕。著《六朝事迹编类》、《柳文音释》。其《柳文音释》自序云:“柳文简古而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难晓。给事沈公晦尝用穆伯常、刘梦得、曾丞相、晏元献四家本,参考互证,凡漫乙是正二千餘处,往往所

至称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释》未有传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它音者,悉原其来处。或不知来处,而诸韵、《玉篇》、《说文》、《类篇》亦所不载者则阙之。”纬字仲宝,云间(今上海松江)人。绍兴中举进士甲科。恬于进取。尝官潜山教授。工著述。有《柳文音义》。陆之渊序云:“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贯穿经史,缪辑传记、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韩文不啻倍蓰,非博学多识前言者,未易训释也。”谓潘氏“能会粹所长,成一家言,将与柳文并行不朽无疑矣”。《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即综合童宗说、张敦颐、潘纬三氏之书合为一辑,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刘禹锡《天论》、祭文三首,新旧《唐书》本传,曹辅、黄翰、许尹祭文,汪藻《祠堂记》,穆修旧本后序,沈晦四明新本后序,李觥柳州旧事后序,文安礼年谱,后序前有乾道三年(1167)陆之渊《音义序》,诸家姓氏、年谱。本书分列各家注于本文之下,各标童云、张云、潘云以别,当系宋麻沙书坊所为。本书除《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外,尚有平津馆、丽宋楼、抱经堂、岳古堂等本。元代翻刻亦甚多,有张氏元延祐间刻本、瞿氏严惇藏本、丁氏元刊小字本、杨氏陈复生藏本等。明代有书林王宗玉戊辰(1388)刻本、正统戊辰(1448)善敬堂覆宋本等。(阎琦 姚敏杰)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唐人别集注本。南宋魏仲举集注。本书正集四十五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柳文纲目、文安礼《柳先生年谱》及评论训诂诸儒名氏各一卷,冠之于卷首。后附柳先生序传碑记一卷,文集后序五篇。本书当与《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并刊,《天禄琳琅书目》三著录,然其仅存前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以下皆缺,外集诸种卷帙完好。《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亦为二十一卷残本,其所谓附录八卷,系并柳文纲目、评论训诂诸儒名氏、年谱、传碑而言。四库馆臣云:“前有评论训诂儒姓氏,检核亦不足五百家,书中所引,仅有集注、有补注、有音释、有解义,及孙氏、童氏、张氏、韩氏诸解,此外罕所征引,又不及韩集之博,盖诸家论韩者多,论柳者较少,故所取不过如此。特故以五百家之名与韩集相配云尔。”其所谓孙氏即孙汝听,有《柳文直解》(已佚);童氏即童宗说,有《柳文音辨》;张氏即张敦颐,有《柳文音释》;韩氏即韩醇,有《柳文诂训》。魏仲举集注于人物考索、史事引证、年代考证诸方面较为详细,然其仅有汇集之劳而无案断之功,有抄撮之能而无辨证之力。其编注体例与《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大同小异。聊城海源阁藏本书宋槧一部,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餘皆缺。另有元流寓日本之俞良甫校刊本,系《经籍访古录》所著录,仅有正集四十五卷。其所附《杨诚斋集》卷第九五,即杨万里《天问天对解》,大抵为俞氏附刻以使后人观览,未必依原刻。俞氏所刻依据何本,不可考。(阎琦 姚敏杰)

【唐柳河东集】唐人别集注本。明蒋之翘辑注。之翘字楚樵,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家贫好藏书。明末避乱村居,收罗名人遗集数十种,选有《甲申前后集》。又尝重纂《晋书》,校注韩昌黎、柳河东集。自著有《天启宫词》。本书辑注柳宗元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与韩愈集合刻。本书略于训诂音辨,详于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并大量征引宋、明人如黄震、茅坤、唐顺之等家关于柳诗文之评论,于认识柳宗元诗文艺术风格、语言色彩、篇章结构等,均有参考价值。有明崇祯六年(1633)原刻本、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双梧居重刻本、道光十七年(1837)重刻本及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阎琦 姚敏杰)

【柳宗元诗笺释】唐诗别集笺释本。今人王国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柳宗元为中唐著名作家,诗文风格与成就分别与韦应物、韩愈齐名,文学史上有“韦柳”、“韩柳”之称。其诗作以前很少单行,通行的《柳河东集》中收其诗,一般编为三卷,曾有多种前人注本。本书以南宋蜀刻《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集》所录之柳诗为底本,校以《重校添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郑定本)、《河东先生集》(世綵堂本)、《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元刊本)、《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库本)、《柳宗元诗集》(古朝鲜活字本)等,并参校多种总集、史籍和中华书局新刊的《柳宗元集》。在编排上,本书打破原集序次,依编年原则重排。贬永州前及在永州所作列为一、二卷,奉召还京至再贬永州为第三卷,柳州之作为第四卷。原诗后首列笺文,详细考订创作年代与有关人事,次列校记与注释,间或摘引前人有关的评论或解说,最后为评笺,采集前人对该诗的品评。全书最后辑录总论柳诗者为一卷。此书是近年出现的学术质量较高的柳宗元诗笺注本。(纪伟)

【柳先生年谱】年谱。宋文安礼撰。安礼,潞州(今山西长治)人。生平事迹不详。本年谱对前人之疏误多所厘正。如辨唐中书令柳奭为柳宗元之高伯祖,而非曾伯祖。又如阳城自国子司业出刺道州,唐史无年月;《资治通鉴》据柳氏《司业遗爱碣》,谓在贞元十四年。本年谱则将《碣》与柳氏《与太学诸生书》并系贞元十五年,故阳城刺道州亦在是年。细观碣文,文氏所辨为确,而《通鉴》为误。本年谱系柳氏年谱最早之一,虽甚简略,然其轮廓初具,为后人编

撰提供借鉴。如今人施子愉作《柳宗元年谱》即多所采摭。本年谱附于《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之中。(阎琦 姚敏杰)

【柳宗元年谱】 年谱。今人施子愉编撰。195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曾删节载于《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柳宗元年谱旧有宋文安礼之《柳先生年谱》、张敦颐之《柳先生历官记》。二谱轮廓虽具,然简略殊甚。柳集旧注则辗转相承,舛误颇多。故本书著者取史传及前人研究成果以为参证,考次柳氏行事及集中诗文,于旧谱、旧注之疏失不复一一举辨。本书对柳宗元生平行迹及诗文考辨较详,便于研究柳宗元及治唐史、唐诗文者参考。(阎琦 姚敏杰)

【柳宗元传论】 研究专著。今人孙昌武著。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二章,主要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以及文学主张、创作成就诸方面对其一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述评。著者传、论结合,评价全面中肯。如第三章论柳氏创作“褒贬讽谕”之文,第八章论柳氏坚持理论斗争等,立论新颖,见解独到。第十二章论柳氏的文学业绩,即从杂文、山水记、寓言、诗歌、辞赋、小说等六种体裁分别论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亦颇有新意。在对柳宗元与韩愈的比较中,著者既充分肯定韩愈作为“古文运动”开创者的杰出地位及其在古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卓越成就,又指出柳宗元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古文运动”作出的独特贡献。书后附录“参考书目”、“建国以来柳宗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和“当代日本研究柳宗元文献目录”等,介绍了国内外柳宗元研究的大致现状。

(阎琦 姚敏杰)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 资料汇编。吴文治编。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收录自中唐迄“五四”一千一百余年有关对柳宗元及其诗文的评述资料。辑录具有代表性的评述四百六十余家,图书资料四百八十余种,依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分唐五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五部分。后又补辑宋、金元、明、清各代部分资料。本书选材以对柳氏思想、诗文创作等进行评述之资料为主,亦选录部分有关柳氏生平事迹及考辨其作品真伪之重要资料,属作品字义疏证之资料,亦酌予收录。本书著者尽可能收辑有关柳氏评述之代表性意见,不惟以见解精辟为原则,对有些观点错误乃至荒谬以及形成长期争论之意见,亦予收录,以使读者对历代研究柳氏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如对柳氏哲学思想之评价,对柳氏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活动之褒贬,对其文学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之评说,韩柳优劣之争,等等,均

兼收各家意见。著者还在前言中简要介绍了历代柳宗元研究概况。(阎琦 姚敏杰)

【长江集新校】 唐诗别集校本。十卷。今人李嘉言校订。宋人著录《长江集》多作十卷,《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却云十卷外,还有小集三卷,但未见此传本。《长江集》有宋刻书棚本多种,如扬州阮氏藏本、遵义杜蕴堂藏本等,今俱不传。明人翻宋本很多,十卷本仍依宋人旧貌,七卷本则为明人分体编次。毛氏汲古阁本、席氏刊本皆为十卷,为后世通行本。校勘较精的是《贾浪仙长江集》,十卷,补遗一卷,此本“乃卢抱经学士手钞,并据冯定远、何义门两家批校本录成”(清萧穆《敬孚类稿》卷六《跋卢抱经手校贾浪仙集》)。收录贾诗最多的是《全唐诗》,凡四百零一首,编为四卷。《长江集》旧有校记,然异文与错误不少,李嘉言新校《长江集》以《全唐诗》为底本,主要参校了《四部丛刊》的明翻本、影宋本《才调集》、缩印明刊本《唐文粹》、涵芬楼影印本《唐人八家诗》、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日本本《又玄集》、中华书局影印宋、明刊本《文苑英华》、清翻宋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多种版本,多方校勘,颇为精详,是目前较好的贾岛诗集校本。诗集卷末附有《贾岛年谱》、《关于贾岛年谱的讨论》、《贾岛年谱外纪》、《贾岛交友考》、《贾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贾岛诗评辑》,皆李嘉言生前手定,对于研究贾岛及唐诗颇有参考价值。本书《后记》为李嘉言子李之禹等所撰,简要介绍《长江集新校》校订与付梓的经过。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并列入该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杨树增)

【贾岛年谱】 年谱。今人李嘉言著。此谱于1936年草成于清华园,1938年春初易稿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年秋二易稿于西南联大,1941年四易稿成,发表在十月份的《清华学报》十三卷二期上。《年谱》上限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99)贾岛生,下限为武宗会昌四年(843)贾岛六十五岁卒后第二年,将其迁葬普州安岳县(今属四川)移风乡之南冈。此书经当时全国学术审议会评定,授学术创作二等奖。1947年9月商务印书馆又将其《贾岛年谱外纪》、《贾岛交友考》、《长江集考辨》、《贾岛诗的渊源及其影响》、《贾岛诗评辑》作为年谱附录一并出版。岑仲勉认为年谱“考证颇见绵密”(见《长江集新校·附录〈关于贾岛年谱的考论〉》)。李嘉言后又对年谱酌加修改,收入1983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集新校》附录内。(杨树增)

【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 唐诗学论文。今人岑仲勉撰。本文发论针对有二:一是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廷杰的《贾岛诗注》,一是1947年由该馆

出版的李嘉言的《贾岛年谱》。贾岛之诗旧无注本,陈注贾诗有开创之功,但岑文以为陈注有泥于字面之弊,注释又往往忽视政治制度方面,因此不能完全理解贾诗真义,评价不够全面。岑文认为李谱考证绵密,但年谱中有一些地方著者的个人主观感情代替了考辨,有虚空测度之误。在评析陈、李二书的基础上,岑仲勉对贾岛的贬谪年代与贾岛享龄又做了新的考证。此文载于《学原》第一卷第八期中,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树增)

【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 唐诗别集注本。元祝德子编订。唐诗人许浑有《丁卯集》,据其自序,为二卷,凡五百篇,然至宋代已有散佚,贺铸、晁公武曾搜辑有得,后亦湮没无闻。此本为元人编刻,正集二卷,续集一卷,续集中含遗篇、拾遗,续补三类,后世传本甚多,见于多种目录与藏书志,较通行者有民国二十五年八月镇江吴氏寒匏簃影印本,吴庠(眉孙)跋称,系陶兰泉借李氏木犀轩所藏黄氏士礼居旧物摄影留真,吴氏复假以影印。吴庠曾就此本与涵芬楼影印宋槧《丁卯集》(即《续古逸丛书》本)对校,谓此本为善,然所谓增广音注,实颇简略,疑义亦多。许浑诗集编帙混乱,旧注又少,故此本亦弥足珍贵。(纪伟)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唐诗别集注本。清王琦等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本书将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方世举《李长吉诗集批注》三集断句合刊而成,故称《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李长吉歌诗汇解》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宝笏楼刻本,“琦此注兼采诸家之本,故曰《汇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琦比勘旧说,互相发明,集前考辨李诗注家姓氏爵里,卷首排列诸家序跋、传论、诗评,外集有采录的二首李贺逸诗。姚文燮(1629—1689)字经三,号羹湖,又号黄檗山樵,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清史稿·循吏一》有传。其《昌谷诗注》四卷,集外诗一卷,初刻于顺治十七年,有江苏苏州本,康熙中有福建建阳重刻本,校订批点,详于初刻,重刻本除有姚文燮自序外,还有陈式、钱澄之等人序文。姚注李诗多据以史料,欲钩稽史实而成一家之言。他以史证诗,钩玄索隐,重于阐发李贺诗中的微言大义,虽多失于穿凿附会,但仍有值得参考之处,如其串讲,颇耐人寻思,可助读者正确理解诗意。方世举,字扶南,号息庵,与姚同籍,博学工诗,乾隆初举博学鸿词,不就,卒年八十馀。《李长吉诗集批注》四卷是其乾隆十六年(1751)完成的手稿本,批注的内容比较杂,有校勘、注释、批点评论,评论虽简略,时有精辟见解。此批注稿本藏于陈本礼处,陈本礼《协

律钩玄·略例》中说:“余家藏又有义门何氏、扶南方氏手评本。”《协律钩玄》一书曾引了数十条方世举的批注。1958年徐声越从过录本上转录写定。1959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对原三书脱误处略作校正并加了点句,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该书为底本,编排上把王琦的汇解部分移于每首诗后,又请蒋凡、储大泓标点出版,改名《李贺诗歌集注》。(杨树增)

【李长吉歌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一名《李长吉歌诗汇解》,卷首一卷,正集四卷,外集一卷,清王琦辑注。《李长吉歌诗汇解》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集前有作者写的序文和《评注诸家姓氏爵里考》,说明注诗的原则,对以往李贺诗的主要评注家做简要考定。卷首汇集了杜牧、李商隐、张耒等唐代以来许多名家的序跋、传论、事纪、诗评等,正集与外集是贺诗及注,值得一提的是外集比宋刊宣城本和鲍止本外集又多出二首李贺的逸诗,这二首是王琦从《乐府诗集》中采录的,作为补遗附在外集内。该书注释比较笃实详尽,有关地理、名物的注解尤为详密、审慎。对以前各家如刘辰翁、吴正子、徐渭、曾益、姚文燮等之说,颇能博取慎择,折衷是非。解诗力求平正通达,反对穿凿比附、曲解诗义或不细考核便望文生义。笺注既重于注释典故、疏通字句,又能对诗的意境与艺术作精彩评析。此书有清乾隆二十五年宝笏楼初刻本,《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校刊,1959年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合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三书出版,新取名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杨树增)

【协律钩元】 唐诗别集注本。四卷,外集一卷。清陈本礼注。本礼,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活在乾隆、嘉庆间。“协律”指李贺,因贺曾为协律郎。“钩元”即钩玄,因避康熙皇帝讳而改“玄”为“元”。此书在李贺诗古代评注本中出书较晚,故能参考历代研究李贺诗之成果。书中大量摘引刘辰翁、吴正子、徐渭、董懋策、黄淳耀、曾益、姚佐、董伯音、王琦、何焯、方扶南等人注文评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礼还从历代笔记、诗话、诗歌中搜集了许多与李贺和李贺诗相关的资料,以加深读者对贺诗的理解。然而,此注仍属于穿凿附会一派,其在序中即言“集中如《李凭箜篌引》、《铜驼悲》、《北中寒》、《假龙吟》、《昆仑使者》等篇,皆愤激痛心而出者;又若《春坊正字剑子歌》、《贵公子夜阑曲》、《老夫采玉歌》、《洛姝真珠》等作,皆感切当时,目击伤心,不敢暴扬国政,总托于寻常咏物写景,不使人易窥其意旨之所在”。因此,对于过去注本,陈氏只肯定姚文燮注,认为他“似得

其措词本意”,其他都是“扞烛扣盘,隔靴搔痒”,而自己要对李贺诗深钩其玄,结果只能失之于凿。如卷一解《蜀国弦》首二句“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钩元》注云:“次句度语也。兑为泽,为少女;艮为山,为少男;山影在泽中,喻少女怀少男之象。”简直视诗句如谜语。至于动辄以感伤时事,或以比喻国政解贺诗,比比皆是。此注成书于嘉庆十三年(1808),有嘉庆间所刊袁露轩刻本。(王学泰)

【李贺诗集】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叶葱奇注。李贺诗集注评本,最早有南宋吴正子《笺注李长吉歌诗》,其后宋末元初刘辰翁,明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佳,清姚文燮、方扶南、王琦、黄淳耀、陈本礼、吴汝纶、李汝栋等都有李贺诗集注本。叶注主要参考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兼采诸家,所增补疏解与订正约占十之三四。叶注注重对李贺诗的评价,分析李诗风格尤为精彩深刻,如认为李诗形式上是唐代一般的古诗歌,而意境、风调却承袭《楚辞》。该书后记指出李贺作品大致采取三种不同格调,一为摹拟《楚辞》,一为摹拟古歌谣,一为摹拟齐梁体,而以第一种为主。叶注评解既注意到李贺对古诗骚精华的继承吸收;亦对李贺诗歌独特风格进行了评析,在李贺诗清新奇崛的字句、浓缛绚烂的词汇、忧愁幽冷的风调中揭示其寄托深邃的苦心和愤郁激越的感情,并能指出李诗中过分求新以致欠理、过分雕琢以致晦涩、过分古朴以致率直的地方。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杨树增)

【李贺诗校笺证异】 唐诗别集笺注本。今人刘衍撰。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贺歌诗自唐代以来流传本甚多,笺注者著名的有曾益、姚文燮、王琦诸人。本书撰者取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校以宋蜀刻《李长吉文集》、吴正子《李长吉歌诗》、金刊本《李贺歌诗编》等,校正了王琦本的不少讹误,提供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异文。对于某些异文,根据史实、文献、民情风俗等作出判断,校证改订之处甚多,然亦有臆改而依据不足者。李贺自编诗集原为四卷(见杜牧《李贺集序》),但宋代以来多种刊本均为五卷,不但多出外集一卷,且诗的排列也多混淆错乱。王琦《汇解》因袭未改,仍作本集四卷、外集一卷。本书则根据北宋鲍钦止所云“李长吉集外诗二十三篇,《南园》一篇第一卷所脱,《感讽》六篇第二卷所脱,余十六篇当附于第四卷后”,分别将这些诗编入四卷中。各卷中次序混乱者,则依宋本加以调整,以期与李贺自编集原貌较为接近。此外,本书补入李贺佚诗、断句及《楚辞》评语十五条,附于四卷之后,搜罗完备,超过前此诸本。其笺释则在前人基础上,据原作诗意加以融会,或有所纠正,或补充新说。

特别对李贺诗中提及的昌谷一带山水地名和风俗习惯,通过查考当地方志和实地调查,常有颇为确切的解说。如考证李贺故居在今河南宜阳县连昌河流经三乡镇处西边二里许之大涧沟庙道口,其涧之南北皆有山,南山亦即李贺诗常提到的南园。又如李贺《昌谷诗》自注“五月廿七日作”,历来不被注意,本书则根据当地农谚“收谷不收谷,单看五月廿六”,说明此诗为李贺见廿六日有雨而感丰收有望之作,对诗中涉及的宜阳其他民俗,亦作了详细考释。此外,本书对李贺歌诗章法结构与艺术技巧也多所分析,并能适当运用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予以阐释。凡此等处,均比前人有所前进。书后附录两种,一为撰者自编的《李贺年谱新笺》,对朱自清、钱仲联二氏所作年谱颇多补充是正;一为李贺诗流传情况介绍及各种版本之辨析,叙述清晰,便于读者进一步研习。

(纪伟)

【李贺哑谜诗歌新编】 唐诗学专著。二卷。今人陈苍麟著。李贺诗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表现手法比较曲折隐晦,著者认为这是因为李贺迫于封建社会险恶情势,才创为这种哑谜形式的诗歌。该书卷一为揭论部分,有“引论”李长吉诗案新探;“涉论”李贺哑谜诗歌的产生和遭遇;“本论”李贺哑谜诗歌的写作意图和掩盖艺术;“散论”清理李贺诗案的某些有关问题。卷二为注释部分,从揭秘底真象的角度对李贺“哑谜诗歌”进行注释。苏仲翔认为此书“持论平允,能窥作者深意,发前人所未发,精审博辩,兼而有之”。周谷城评价著者“引鲁迅用反语讽刺说明李贺用反语讽刺,最能使读者心服”(均见本书扉页题词)。此书确实是一部角度新颖的李贺诗评与诗注本。1990年2月由天津出版社出版。(杨树增)

【李贺年谱】 年谱。近人朱自清撰。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著有《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李贺年谱》初刊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1935年10月出版),卷首略提李贺家世及居地后即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贺出生叙起,分年载事,无事可记阙如,只标贺之岁数,编年截止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是年贺27岁,以病卒。闻一多见到朱谱后,对贞元二十年李贺十五岁“以乐府歌诗名于时”条,所引《新唐书》卷二〇三《李益传》中李益与李贺齐名的内容提出质疑,朱自清于是又作《李贺年谱补记》,刊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五期上(1936年1月)。此书用力亦劬,取材不少,曾收入《朱自清文集》,1953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981年7月又辑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

(杨树增)

【李贺年谱会笺】年谱。今人钱仲联著。钱自称其《会笺》编纂“略依张丈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之法,与《朱谱》编纂颇多殊异,《朱谱》佳处,今多采入”。如元和三年(808)贺十九岁,《朱谱》只记“《黄洞蛮》诗当作于是年”,笺文只引《新唐书》、《资治通鉴》有关记事,而《会笺》却记了李贺婚约、以诗谒韩愈、赴府试、礼部试诸事,笺文引用了《唐会要》、《幽闲鼓吹》、《唐诗纪事》等二十多种文献中的材料。再如《朱谱》卷末以李贺存诗多少作结,而《会笺》对李贺诗集版本、注本的源流变化作了详尽介绍。《会笺》除了引用资料广博外,对前人研究中的失误或异说多有辨证,用按语形式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详细地考证了李贺的世系、家居,简明地指出李诗的旨意。《李贺年谱会笺》与作者《吴梅村诗补笺》合集出版,书名为《梦苕庵专著二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杨树增)

【李长吉评传】诗人评传。近人王礼锡撰。王礼锡(1901—1939)江西安福人,又名庶三,笔名王抟今。早年曾以半工半读至江西心远大学听课,1931年4月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任,并与其妻陆晶清合编《读书杂志》,1932年参与成立“中国作家抗日会”,1939年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届理事。著有《海外杂笔》、《南北朝诗论》等。二十年代末,王礼锡就深感中国还没有一部“标准的中国文学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序》),作者试图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与方法来整理中国古籍,编写无愧于时代的中国文学史。计划将研究所得分别一册一册地印行,内容包括一个时代的通论和代表作家的评传,这些作品统名为《物观文学史丛稿》,《李长吉评传》就是《物观文学史丛稿》中的读本之一。该书从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影响这个新角度,追寻了李贺鬼才、鬼仙形成的物质根源,标举了李贺在唐代诗歌史上,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重大影响,在分析促进李贺诗歌特色产生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让读者同时也窥见了唐代诗歌发展的大致轮廓。《李长吉评传》后附《校后记》一篇,其中录有作者《竹影楼读长吉诗》诗一首,《校后记》简略地叙述了作者曾深受李贺诗的感染和熏陶,说明对李贺研究的兴趣是由来已久的。本书1930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杨树增)

【诗人李贺】诗人评传。近人周闾风著。李贺在中国诗歌史上,素有鬼才、鬼仙之称,评注家在分析李贺性情消极冷僻,诗作怪诞诡异,风格冷艳怪丽时,多从李贺“天资”、“个性”上找其产生原因。此书摆脱了以往传统唯心主义的影响,认为李贺诗歌独

特风格所以会产生,重要的条件是那动荡的社会环境与李贺坎坷的人生遭际,对李贺诗风的产生根源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评估。作者在本书第六章《李贺年谱》中,考证李贺生于唐贞元七年(791),卒于元和十二年(817),这就与朱自清《李贺年谱》中李贺生于贞元六年卒于元和十一年有所不同,学界普遍采用朱说,但周闾风一说也可备参考。作者把李贺短暂的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未入京应举的前期,此时李贺的生活还算悠闲自得,其篇什内容感伤成分还不多,其中有的还蕴蓄着对前程的憧憬与热望。二是应举遭毁的后期,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痛,情绪上多了感伤、烦恼和颓丧,所作诗篇多了阴郁低沉的情调。作者还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李贺诗歌的优点:一是用字造语,不肯苟且,字字有力,句句锤炼。二是诗作大都从实际生活中体验而来,是真情的流露、直观的抒写,多为有感而发。三是诗的艺术技巧达到最高境界,宛如临空架阁,高妙怪丽,非一般诗人所能企及。李贺诗也有缺点:一是从大体上看,还缺乏热烈的情感与奔放的豪气,所以容易在读者中产生消沉、颓废的感应。二是造语冷艳诡怪,奇特百出,多有让人难以领悟理解处,这样就失去了通俗、明快的特性,而不能如当时元白等人的诗作那样深入广大读者之中。三是才华辞藻绰有馀裕,然在内容上总有理不胜辞之感。此书持论公允,评析全面,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李贺研究专集。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出版刊行。

(杨树增)

【李长吉歌诗研究】唐诗别集校释。今人林同济著。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同济为我国著名西洋文学专家,于古典文学亦有深厚素养。此为其读李贺诗笔记,逝世后由《论丛》编者据手稿整理归纳为“释意”(包括解释与笺注)、“校勘”两部分先行发表。其校释的李贺诗集全稿,将另行处理。林氏校读李贺诗凡用七种版本,而以民国吴汝纶评注本为底本,其注释特重揭示章法,辨明题旨,并分别体裁,玩其词句,认为长吉诗十之八九可解,其不可解者或因剗削舛误,或因词典不明,旧称长吉诗艰涩,以之为鬼才,实由于囿于迂腐之见,舍显就晦之故。林氏学通中西,常结合西方文学之例以诠长吉诗,创获颇多,能自成一家之言。

(纪伟)

【李贺研究资料】资料汇编。今人陈治国编。编者搜集了中唐以来关于李贺研究的丰富资料,按《传记·纪事》、《诗评》、《序跋》、《年谱》、《书刊文摘》五部分编次,在每一部分中,以评述者的年代或评述发表的年代先后为序排列,再在评述下注明资料来源出处。《传记·纪事》是从《协律钩玄》、新、旧《唐书》、《容斋三笔》等书籍中,辑录杜牧、欧阳修、徐应秋等

从唐至明的十三人所写的李贺生平纪传、行事经历;《诗评》是从《唐摭言》、《唐才子传》、《诗说》等书籍中,辑录张为、司马光、方以智等唐至清四十七人对李贺诗歌的评价;《序跋》是从《李贺诗歌集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书籍中,辑录李维桢、李世熊、王国维等明至近代十三人关于李贺诗的序跋;《年谱》录有近、现代人王礼锡、朱自清、周闳风所写的李贺年谱;《书刊文摘》部分是本书的重点,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还多,它收集摘录了1921年至1965年和1978年至1981年两个阶段大量的关于李贺的研究资料,有的出自专著,如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周闳风的《诗人李贺》,有的节选于文学史读本,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有的选自其他文学专著,如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徐谦《诗词学》、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刘圣旦《诗学发凡》,有的选自李贺诗集注本序跋,如叶葱奇的《〈李贺诗集〉后记》,有的则选于刊物,尤其是从1978年至1981年间的刊物中,大段大段地选录了李贺研究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赏析李贺重要诗篇,有的分析李贺诗歌艺术风格与创作个性,有的对当时的李贺研究动态进行了探讨,代表了八十年代初李贺研究的水平。此编资料搜集虽还有遗漏,但仍不失为一部李贺研究的重要资料汇编,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3月出版。(杨树增)

【温飞卿诗集笺注】 唐诗别集笺注本。明曾益原注,清顾予咸补注,顾嗣立重校。有秀野草堂本、《四部备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新排印出版。据顾嗣立所撰《后记》可知,其父顾予咸任山阴县令时,邑人曾益注《温庭筠诗》四卷,曰《八叉集》。予咸谓其用心良苦,刻印刊出,流传一时。予咸致仕归里后,翻阅曾注,发现多有阙佚穿凿之处,便“重为笺注,广搜博考,援笔记纂。凡夫割剥支离、舛错附会之说,辄复随手删削,未毕事,而先考功歿世”(《后记》)。当时嗣立只五岁,二十馀年后完成父亲未竟之业,在原有基础上增广内容,纠正讹误,依宋刻本《金荃集》分为《诗集》七卷,《别集》一卷,又从《文苑英华》等书中辑出温庭筠诗集中未收之佚诗定为《集外诗》,并加续注,改名为《温飞卿诗集》。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编考据较为详核,注释简明,然在校勘、注释中尚有不足之处。上海古籍本据顾嗣立秀野草堂本进行校点,并用明毛晋刻本和《全唐诗》复校,择要做出校记。又辑录温庭筠的词和文,作为附录补印于书后,将原刻本中的《旧唐书》本传、

诸家诗评和后记移于书后,亦作为附录。

(毕宝魁)

【温飞卿系年】 年谱。今人夏承焘撰。收入夏氏《唐宋词人年谱》。温庭筠是晚唐与李商隐齐名之重要诗人,并为花间词鼻祖。《旧唐书·文苑诗》有传,《新唐书》附其传于《温大雅传》中。此谱参酌旧史和时人研究著作(如顾肇仓《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温飞卿论》等)创为系年之编,暂定庭筠生年为元和七年(812),约与李商隐同年,卒年在咸通末,得年约六十左右。庭筠游踪甚广而其诗少题甲子,故其诗系年甚难,此谱引顾肇仓说,约指其部分诗之写作地,并列温氏著作目录,可供参考。《唐宋词人年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出版。(纪伟)

【樊川诗集注】 唐诗别集注本。清冯集梧注。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集梧字鹭庭,浙江桐乡(今属浙江)人。其父冯浩乾隆年间进士及第,是著名学者,所注李商隐诗文集极为精审,为后世所重。集梧继承家学,罄数年之心血为杜牧《樊川诗》作注。此书完成于嘉庆三年(1798),付梓在嘉庆六年(1801)后。《樊川文集》二十卷,由杜牧外甥裴延翰编定。据裴延翰《樊川文集序》可知,杜牧早有嘱托延翰代为編集作序之语,后裴延翰将其所留诗文及前此所存手稿编排成集,共分二十编,收诗文赋等四百五十篇。冯集梧所注杜牧之诗,即以此集中之《樊川诗》为底本。诗之编排一仍其旧。此书只注《樊川集》中之诗,非杜牧诗之全注本。为弥补此缺憾,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除《樊川诗集注》正文、《樊川诗补遗》、《别集》、《外集》外,还附录缪钺《杜牧卒年考》一文及《杜牧诗评论汇编》数十则,为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在注释方面,冯集梧致力于词语之阐释而忽略对诗义之贯通。他认为:“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论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是故该书在词语注释方面用力最多,凡诗中名物、輿地、典故、难解之字与词语及唐朝有关的典章制度全都注出,且多有补阙发隐之功。但冯注过于拘泥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论,进行烦琐考据,个别注释亦有不确之处。概言之,本书注释详细,“博采史编,综核时事”(吴锡麒语),乃学习研究杜牧诗歌者不可或缺之书。(毕宝魁)

【杜牧年谱】 年谱。今人缪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有感于杜牧与李商隐诗名相埒,李商隐年谱已有朱鹤龄、冯浩、张采田诸家,而杜牧年谱独付阙如。便于1940年撰成《杜牧年谱》,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集上发表。其后又

旁稽群籍,续加校订,纠正疵谬,补其遗阙,于1964年写定清本。极大地丰富了该书的内容。该谱对杜牧一生之出处事迹进行考证梳理,凡于杜牧有交往之达官文人及当时诗坛名家之主要事迹也一并述之,并附诗文编年。故对整体了解当时的社会概况及文坛面貌也有参考价值。著者还注意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之问题,行文中既有详明有据之考证,亦有高屋建瓴之评述,颇富启发性。如大和五年辛亥(831)条下考杜牧《李贺集序》中的“沈公子明”即沈述师。会昌六年丙寅(846)条下评述杜牧为李戡作墓志时讥评白居易诗歌语言一事,亦简明扼要,对了解杜牧的文学思想及其诗风的形成颇具启迪意义。

(毕宝魁)

【杜牧传】 诗人评传。今人缪钺撰。此书按照杜牧生平经历,将其一生分为家世与幼年、少年科第、十年幕府吏、“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晚年等五个阶段,介绍其仕履,评价其创作。对杜牧在唐朝开国二百年后诗歌昌盛、名家如林之时,能创造英发俊爽之风格,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大量引用杜牧诗歌,有近百首之多。对杜牧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在唐诗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介。此书写成于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王学泰)

【杜牧评传】 诗人评传。今人王西平、张田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动荡不安的时代,由盛转衰的家世;第二章抱负未遂的一生;第三章杜牧的政治军事才略和思想;第四章杜牧的文学思想;第五章杜牧诗歌的思想内容;第六章杜牧诗歌的艺术成就;第七章诗人的文、赋及其他;第八章继承·创新·影响。本书作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阐发新的见解,具有独特的体例和特色。如杜牧对以甘露之变而闻名的李训、郑注的态度问题,作者经过深入分析,作出了令人信服判断,没有一概否定,也不曾随意拔高。是书附录有:杜牧诗文系年考辨、杜牧部分著述编年简表、历代杜牧研究述评汇要、杜牧研究论文索引、参考书目。

(宋绪连)

【赵嘏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不分卷。今人谭优学注。赵嘏集今存者有清人席启寓辑《唐诗百名家全集》收赵集二卷、《全唐诗》中收赵嘏诗二卷;今人段朝端校补《渭南诗集》二卷、补辑一卷(收入《楚州丛书》);《全唐诗》收赵诗二百一十六题二百六十二首,残句十二条。此注本以《全唐诗》为底本,又从《全唐诗外编》、段校本《渭南诗集》中补诗四首,残句二条。又《杜牧集》中有《同赵二十二访张明府郊居联句》系杜、赵合作,排在赵集最后。另外《全唐诗》

赵集中有《华清宫和杜舍人》五言长律,经考证确系张祜所作,从本集除去。故此注本存诗二百一十九题、二百六十五首,并与杜牧联句一首,残句十四条。这次用以作校本的有胡震亨《唐音统签》中的赵集,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段朝端本以及唐人韦毅《才调集》、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存之赵诗,其注释详尽通俗,便于初学,后附历代所记赵嘏轶事及对赵诗的评论。前言对赵氏生平及创作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和较为中肯的评价。此书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唐诗小集》,1985年出版。(王学泰)

【玉溪生诗笺】 唐诗别集笺解本。三卷。清钱龙惕撰。龙惕号夕公,江苏常熟人。此书是其在释道源笺注基础上补充发挥而成,作者在清顺治五年(1648)仲夏的《诗笺叙》中记述了与道源研讨李商隐诗并为之作笺的情况:“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疑而无考者阙焉,得上、中、下三卷。”此书未刻,以抄本流传,朱鹤龄撰《李义山诗集笺注》颇采其言。钱氏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晚明政权之腐朽感慨殊深,往往借笺诗发之,如笺义山《有感》、《重有感》论宦寺之专横误国、李训之无辜冤死及义山诗“感愤激烈,恨当事之无人,有不同于众人之言者”均有现实感触在内。

(纪伟)

【李义山诗集笺注】 唐诗别集笺注本。又名《李义山诗集》、《李义山诗集注》或《李商隐诗注》。三卷。清朱鹤龄笺注。初刊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有乾隆五年刻本、乾隆八年(1734)东柯草堂校刊本、清怀德堂刻本等。此书依旧本次第编排,附《诗评》和《李义山诗谱》。卷首有作者自撰序,略述注《李义山诗集》经过,并对义山其人其诗有深刻独到的论述。如关于义山其人,《旧唐书》云其“放利偷合”,“诡薄无行”,而作者认为其在牛李党争中之去就,“未必非择木之智”。此虽以义山去就牛李之党旧说进行辨驳,但指出“放利偷合”之诬,也是颇有识见之论。至若论义山诗云:“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志。”“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吾故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之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所见特深,为从来论者所未及”。李商隐诗,明以前鲜有注本流传,朱鹤龄在本书《凡例》中说:“《西清诗话》载都人刘克尝注杜子美、李义山诗,又《延州笔记》载张文亮有《义山诗注》,今不传。”明末释道源有义山诗注本,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征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朱鹤

龄此注本虽以释氏注本为据,实“删取其什一,补辑其什九”,有创辟之功。其所注附于句下,凡地理、名物、史事、典故等,广为征引,力求切要。又采录钱龙惕、陈帆、潘畊诸人之说,参以己意,以为之笺。它“一扫诸家穿凿附会之说,繁简颇为得当。故后来注李商隐集者如程梦星、姚培谦诸家大抵以鹤龄为蓝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还遍参宋刻善本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本,参互而折衷之,以“自注”或“一作”夹注句中,对旧本有所校正。由于是初创,本书或有不甚简明和疏误者,尤其笺释缺略较多,亦有与诗意不合者。(苏雨恒)

【玉溪生诗意】 唐诗别集诠解本。一名《李义山诗笺注》。八卷。清屈复笺注,乾隆四年(1739)扬州芝古堂初刻,道光十年(1830)刘传经堂校刊重梓,又有民国六年(1917)上海会文堂石印本。全书按诗体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二卷)、五绝、七绝、五言排律编排分为八卷。注释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为蓝本,加以增删。每诗后先附朱注。作者引据时删繁就简,对原注所未涉者,自为补注于后。注后有对每一作品的分段诠解,以说明诗意。作者注解李商隐诗,于向所谓隐晦曲折最难索解者,注重就诗论诗,发明其有所寄托,但并不穿凿附会,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如《锦瑟》、《碧城》等。其于诗作或以句或以联或以段,用简明扼要的评语说明,并间或指点起承转合之妙,大多较为精当。(苏雨恒)

【李义山诗集笺注】 唐诗别集笺注本。又名《李义山诗集注》。十六卷。清姚培谦笺注。培谦(1693—1766)字平山,号鲈香,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雍正间举人。好注古书。此书有乾隆四年(1739)华亭姚氏松桂读书堂刊刻本,中华书局曾于1918年据此影印。这是清朝乾隆以后极为流行的李商隐诗笺注本。卷首有黄叔琳《序》和《例言》五则,书后附刻《读义山诗存疑》。诗歌分体编排,依次为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三卷,七律四卷,五绝一卷,七绝三卷。作者在《例言》中说:“诸体各分,取便检阅,其中先后,仍不欲稍为紊乱,一以朱长孺本为次。”这种分体编次改变旧本面貌,确有便于分体检阅之效,但又难免凌乱错杂之病。《读义山诗存疑》计七条,对《行次西郊》等七首诗中不甚通达之字句加以考辨体察,疑为刊刻传写之误,指出当作某字为是。本书是根据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删补而成的。黄叔琳《序》云:“云间姚平山氏熟视朱注,惜其未备,乃更为之笺注。”但其注则基本依据朱注,《例言》亦云:“朱注援引极博,兹所用无虑太半”,唯“过繁者删之,间遇缺者补之,伪则订一二”,至于“字句异同处,朱本为优,今悉仍

之”。然而朱注“释其词未尽,释其意间有指称,仅十之二三,则读者犹不能无憾焉”。本书即以释意为主,在诗意的笺释疏解方面卓有成就。全书之释意或三言两语,或详加疏解,皆能释疑显晦,点明诗旨,指陈转折递进之妙。如说《重过圣女祠》“特点出‘沦谪’二字,发自己愤懑”。又云:“义山登第后,仕途偃蹇,未免以汲引望人。”这也可谓是知人论世的达诘了。(苏雨恒)

【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 唐诗别集笺注本。三卷,集外诗笺注一卷。清朱鹤龄原笺注,程梦星删补。梦星(1679—1755)字伍乔,一字午桥,号香溪,又号泂江,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曾官翰林编修。乾隆八年(1743)东柯草堂校刊。本书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为蓝本订正增补而成,但正如厉鹗在为本书所作《序》中所说:“学义山诗者,莫工于杨刘诸公之昆体,读者犹病其组织扞扯,徒用力于字句之间而不得其用意之所在。注义山诗者亦然。吴江朱氏注后虽附钱氏笺数条,不过指陈甘露党人诸事,其隐而未发者尚多也。程泂江先生瘁十年之精思,既为之补注,又抉摭穿穴疏通证明,使义山之情事毕呈于楮墨,其为功于义山非浅矣。”这段话正道出了程氏增补之功和本书特点。朱氏之注功不可没,然而其间犹多挂漏,亦不无违舛。本书作者虽然自言“注则多从朱氏”,实多有改订增删,良有所获。至于笺释,以朱氏“专心致力于注,笺则取诸他人,间于自笺系于题下,系于句下者,什百之一耳”(《凡例》),所以本书之增补尤多。作者不仅对朱氏笺释之缺漏一一求得其实以归之,并且对不少诗作大有发明,理解深入。如李商隐“《无题》诸诗,人多目为闲情之赋;咏物诸作,又或视若尔雅之词”,而作者独以为“《国风》、《离骚》是其所本”(《凡例》)。其所笺释难免有未合之处,但较之朱氏原笺,无疑多所深化拓展。全书之体例基本依朱鹤龄原笺注本,诗歌三卷不按年编排,原朱氏笺本前有“诗话”若干,作者更为采摭编辑后仍附于前。原朱氏注为文中逐段系注,作者以“语句间断,讽诵难之”,改为系于每篇之后。“凡非朱注而新增者,悉加一补字以别之”(《凡例》),原朱注则更不标明。至于笺释,则以“星按”别起,朱氏有笺者,则引据标出,辨析异同,出以己见。(苏雨恒)

【玉谿生诗笺注】 唐诗别集笺注本。又名《玉谿生诗详注》、《玉谿生诗集笺注》。六卷。清冯浩笺注。浩(1719—1801)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乡人。乾隆十三年(1748)曾官翰林编修,典试江南,后以病告归。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德聚堂初刊本、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重校刻本、嘉庆元年(1796)重校增

刻本、同治七年(1868)醉六堂刻本等版本。据冯浩《重校发凡》：“初恐病发，急事开雕。既而检点谬误，渐次改修，积十五六年，多不可计。既欲重镌，通为校改，大半如出两手矣。”“初引典故，初梓半仍旧本，以为何烦尽改也。诂意旧本动有疏误，甚且伪造妄增，以成其说。而后起诸书或不之察，转相据引，袭谬承讹，久而转疑古籍之脱落，是诚为害己。今逐条讨核，不目审而心会者，弗以录也，学者庶可见信。”所谓“重镌”，时在乾隆四十五年，冯浩有“附记”。由此可知，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刻本乃是经作者校改后的版本。嘉庆重校增刻本又对注释、年谱等有所增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蒋凡校点整理的《玉谿生诗集笺注》，以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重校本为底本，对原书的个别明显舛误，参照《李商隐诗集》明嘉靖本、汲古阁本、影印钱谦益手抄宋本、朱鹤龄本及本书之乾隆二十八年初刻本作了校勘，对笺注部分的错字亦加以改正，对引用史料的某些字句谬误至于不能卒读或易于误解的，照所引原书予以校正，还附录了嘉庆增刻本补注及补遗部分。本书作者冯浩精熟史书，学识渊博，于李商隐诗文用力最著，除本书外还有《樊南文集详注》和《玉谿生年谱》等。本书广泛吸收前代和当时学者对李商隐诗的笺释、评论、研究成果，对其诗歌所涉及之人物故事、典章制度、词语出处等，钩玄探微，旁征博引，在诸多方面都卓有创获。在冯浩笺注此集前，李商隐诗已有朱鹤龄注本行世百年，又有程梦星、姚培谦笺本，冯浩取而存其是，补其阙，正其误，以征典为注，达意为笺对作品所笺释，凡旧说之是者，均予以援引，显然误者改之，而似是而非或滋后人之疑者，则赘列而辨正之，又以知人论世之法，探索作者创作意图，自出己见，多所创获。但由于冯浩笺注此集时尚未见到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他又喜标新立异，注释之疏误在所难免，笺说也有穿凿附会之处。如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附会为干求令狐，认为是“屡启陈情之时，无非借艳情以寄慨”（《发凡》），这就流于主观片面了。在诗的编排上，旧本皆作三卷，但或依旧次，或分体编排。冯浩经考订校审后，依其《玉谿生年谱》定为编年诗二卷，不编年诗一卷，遂使商隐诗大多有年可查，免去凌乱错杂之病，虽有错讹，实是功不可没。

（苏雨恒）

【玉谿生诗说】 唐诗别集选评本。清纪昀评说。约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有手抄本，沈厚塽辑评、光绪十三年(1887)朱纪荣朱氏槐庐校刊本以及镜烟堂十种本等。槐庐校刊本朱纪荣《序》云：“抄本《玉谿生诗说》二册，中多批抹增删之处，朱墨烂然，皆公手迹。闲取沈辑本对校，颇有不能吻合”，“盖沈所见

仅是评本，而此则别自为编断，为后定之本无疑也”。于是经雠校后付梓，入《槐庐丛书》三编。全书上下二卷。上卷为李商隐诗选评，按照纪氏的品评标准，“于流俗传诵尖新涂泽之作，大半弃置，而当时习气所渐流于飞卿、长吉一派者亦概为屏却，却瑕取瑜，宁刻毋滥”（《序》），然后录诗若干，间采诸家之评而附以己意。下卷为“抄诗或问”，以问答形式说明诸不入选诗的取舍理由，也评说诗旨高下、艺术成败，兼及各家注释、评论之得失等，涉略较广，形式也比较灵活。朱纪荣《序》谓：“以明其取裁之义，举全集诸题或取或不取，皆有说以处之。”作者原抄本有《补遗》一卷，朱氏校刊时依次入之。又有《补录》若干条附于卷首。本书是较早的李商隐诗选评本，于义山诗多有一家之所得，但所论亦难免偏颇，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对之即多有辨驳。

（苏雨恒）

【选玉谿生诗补说】 唐诗别集评选本。清姜炳璋撰。稿本，未刊刻，有传抄本。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曾著录，谓其三卷。民国十六年(1927)罗士筠修《象山县志》谓此书一名《玉谿生诗解》，四卷。今人郝世峰据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冯浩《玉谿生诗详注》嘉庆元年德聚堂版天头过录之该书笺文一百三十四则，整理成册，由该校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该书抄本两卷，内容较南开本为多。郝世峰整理本前言谓，姜炳璋字石贞，号白岩，浙江象山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二十九年官四川石泉县知县，四年后谢病归里，卒年七十八。姜氏著书二十余种，《诗序补义》、《读左补义》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予著录。《选玉谿生诗补说》成于乾隆二十五年，说诗二百四十馀首，费时仅三月而已。姜氏为经学家，说诗执著于“忠君爱国之意，经世奖善之情”，喜用所谓“性情之正”概括李商隐诗的思想内容，故不免迂阔牵强，而对义山诗之艺术特色则注意不够，理解较浅。但也有些解说，可与冯浩诸人的诠释辉映或互补，不无参考价值。

（纪伟）

【李义山诗集辑评】 唐诗别集评注本。三卷。清朱鹤龄笺注，沈厚塽辑评。同治九年(1870)刊于广州梓署，龙藏街萃文堂刊刷，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据以印行，台湾学生书局曾印行铅字本。本书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为蓝本，辑何焯（义门）、朱彝尊（竹垞）、纪昀（晓岚）三家评，用三色套印，何评用朱笔，朱评用墨笔，纪评用蓝笔。三家评语之顺序编配，大体依何、朱、纪之先后，或于题下，或于诗后，或于上端空白处，或于句中。三家评点或详或略，或有或无，或褒或贬。就评点内容而言，则或者评说诗旨，如《锦瑟》诗，何评曰：“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

谓美人迟暮也。”又云：“感年华之易逝，借锦瑟以发端，思华年三字，一篇之骨。三四赋思也，五六赋华年也，末仍结归思字。”朱评曰：“此悼亡诗也，忆亡者喜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而纪评则曰：“盖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别无所解。因偶列卷首故宋人纷纷穿凿”。或为诗句的批点，以小字注于句旁，如《重过圣女祠》首句：“白石岩扉碧藓滋”，何批“已含迟字”。或为全诗或某句之技法、意境高下的评说解析，如《乐游原》诗，纪评曰：“末二句向来所赏，实妙在第一句倒装，而入此二句乃字字有根。”又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何评曰：“下二句暗藏永夜不寐，相思可以意得也。”纪评：“不言雨夜无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直说则于言下矣。”又云：“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寄怀之意尽于言下矣。”清代笺释商隐诗者良多，朱鹤龄、程梦星、屈复、姚培谦、冯浩等皆有笺注本流传，专事评说者如何、朱、纪诸家，影响亦大。此辑评本辑三家于一本，可谓集众家之说，使人可综合翻览，辨正取舍。三家均是广博之学者，于义山诗用功颇勤，评语中肯允当，多有深解。当然也不免囿于一家之见识，有曲解之处或存偏见。如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即多有辨驳纪评者。此三家评也广为其他笺释本采录，纪评后有《玉谿生诗说》行世，个别地方与此有异；何评于《义门读书记》中，与此亦有不同。

（苏雨恒）

【李义山诗辨正】 唐诗别集评选本。近人张采田撰，今人吴丕绩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初版《玉谿生年谱会笺》收为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重印。本书辑自张采田手批《李义山诗注》。原张氏手批本用朱鹤龄注，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三色套印。吴丕绩辑录时将三家评中有关张氏辨正者附注于原诗之后，其他各家评说有涉及者，也检原说附注于张氏评说之下，如张说已概括其大意则原说从略，或有已不可得见者则从缺。张氏引用书籍过于简略，辑录时加按语予以说明，引用李商隐诗不书篇名者，也加注标出。其他无关张氏辨正者则可简则简，如张氏辨正不涉及的诗也都从略。所辑录的内容主要是张氏驳正何焯、朱彝尊、纪昀的三家诗评，十之九在于驳正纪昀评语之诬，于朱、何二家则只是偶一及之，间或有涉及其他各说者。张氏对各家诗评的辨正，论断基本公允，常在批驳中指出其致误的根源，使读者看出各家评语的得失。他还在评语中揭示出李商隐诗的特点，识辨深入细致。但有时辨驳缺乏说服力，用语过于刻薄。

（苏雨恒）

【李商隐诗集疏注】 唐诗别集注疏本。今人叶葱奇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以清朱鹤龄《李商隐诗集笺注》为底本，用北宋本、南宋本、钱谦益抄校本及《才调集》、《全唐诗》等五种选集、总集参酌校对，诸本异同之字，凡可供参考者，均于注释中分别注明，而作者认为显系谬误者则概不采录。全书分三部分编排：宋本诗三卷（上、中、下），新添集外诗和附录。宋本诗三卷仍依其旧次，而将可以考定为某一年的作品之创作年份注于目录中各诗题下。新添集外诗二十七首，均为宋本三卷之外作品。附录有同时代诗人赠诗四首，五代、宋、元、明、清及近代有关诗话选录，《旧唐书》本传及作者编撰的《李商隐年谱》。《年谱》中有可考定的作品系年，与目录下的附注互相参见。注释取诸家旧注之长，精当可信者尽可能予以选录，间有个人历年探索所得和增补、辨正，均扼要而透彻。诗中较不习见的字，注有汉语拼音和同音字，注释中所引古籍原文一一标明出处，有深奥难解者则附加简释。李商隐诗兴寄遥深，诗意隐晦，疏解对诗中之寄兴寓意等撮要阐发，凡运笔深婉、用典用字隽永之处，以及历史背景等，均予解说，并对诸种旧说加以辨正。如《锦瑟》一诗，自宋以来即有咏瑟说、悼亡说、追忆旧欢说、自伤自序说等，纷若聚讼。作者在对诸说一一辨驳的基础上，认为这是一首客中思家之作，和《夜雨寄北》同一意趣，同一时地，并定为大中二年所作。一些诗的疏解对句意及艺术手法上的起承转合也予以解析，对未能确考的作品系年，也提出作者的意见，如《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

（苏雨恒）

【玉谿生诗醇】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王汝弼、聂石樵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本书共选李商隐诗一百五十六首，基本按可考订之创作年代编排，并在注释中对系年进行辨正，出以己见，不能断定者排列于后。书前有聂石樵序，对李商隐生平、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有较为翔实而精要的评述。书中对作品的注释，以冯浩《玉谿生诗详注》为主，同时参考其他各家笺释、评注，加以补充、校正、钩沉、索隐，详备精审，且多见新意。其中对系年的辨正考订，对诸家旧说的评述取舍，以及对诗作的知人论世的诠诂和艺术解说，都很见功力。如对《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之系年，在对冯《谱》和张《笺》加以辨析后从张说，并引《旧唐书·文宗纪》，以便读者掌握和理解诗所反映的历史事件。

（苏雨恒）

【李商隐诗歌集解】 唐诗别集会校、会注、会评本。今人刘学锴、余恕诚编著。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该书以明汲古阁刊唐人八家诗中的《李义山集》（三卷）为底本，以明清两代李商隐诗集版本八种参

校,并以唐、宋、元三代主要总集及选本进行校勘,作有较详细的校记。注释笺评部分汇集钱龙惕、朱鹤龄、吴乔、陆崑曾、姚培谦、屈复、程梦星、冯浩、何焯、朱彝尊、纪昀、张采田诸家专著,并旁搜宋以来诗话、笔记、选本、文集及近人今人研究论著,将有关资料与论述分系于各诗的集注和笺评之中,较清晰地显示各种意见发展变化的脉络趋向,极便读者比较参照。本书著者对前人注释间有补充或按断,其主要见解集中于每诗会笺会评后的按语之中,内容包括系年考证、疑难问题考辨、诗意解释及主题阐述等。本书编排方式分编年诗、不编年诗、附编诗、附录四个部分。编年诗起《富平少侯》,终《锦瑟》共三百八十一首。李商隐诗之编年创始于清人冯浩,继之者近人张采田,此书编年虽以冯、张二书为主要依据,但出自己见者亦不少。如著者否定冯浩关于李商隐曾有江湘之游的说法,开成末会昌初的编诗遂与冯、张二氏有较大差异,赠、哭刘蕡诸诗均被移至大中年间。其他变易编年之处尚多,均能提出证据,申明理由。不编年诗二百一十三首,大抵按题材分类编排。附编诗十五首,皆原集外诗,疑非李商隐所作者。附录收有关传记资料、各本序跋凡例、书目著录及著者所撰《李商隐年表》、《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

(纪伟)

【李商隐诗选】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刘逸生主编,陈永正选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 年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照原版胶片重印。此选注本共选诗一百三十一首,基本上选录了李商隐诗作的精华,能反映其诗作的思想、艺术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按诗体编排,依次为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七古、五古。与本书所从属之《中国历代诗人选集》的编选准则一致,作品注释唯求通俗简明,而不作过分繁琐的征引或考证。每诗题下均有题解,说明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但不求面面俱到。选注者在诗意的理解上不但能根据史实作大胆的联想,有些地方还抒发了独特的见解,但误解处亦在所难免。每则注释之始均有对诗句的白话文串解。全书开头有前言,介绍诗人生平、思想、创作主要倾向、特点,书后附《李商隐年谱简编》,记诗人生平大事,并为所选作品编年。

(苏雨恒)

【李商隐诗选注】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陈伯海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为该社“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之一。全书共选注李商隐诗六十九首,分编年诗和不编年诗两部分先后排列,编年诗五十首,不编年诗十九首。对作品的注释注重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而不重于版本同异之辨正、系年考订和诸种旧说之解析。每首诗下都有“说明”

和“解释”。说明部分较为详审地概说诗作之内容或诗意,对作品的艺术技巧、风格作精要的评析,对历来理解分歧之处也或有归纳,但以说明己意为主。如《锦瑟》一诗历来分歧最多,“有说是咏瑟,有说是悼亡,也有说是寄托政治怀抱的”,作者认为“诗中已点明主旨为‘思华年’”,并以此来解说全诗。解释部分主要是对字、词的注释,也有对诗句的译解,和部分史实的补充交待。

(苏雨恒)

【李商隐选集】 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周振甫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本书以冯浩《玉谿生诗笺注》为主,参考其他各家笺注本、年谱以及辑评和今人选本,广泛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考辨解析的基础上提出己见。全书以诗选、文选两部分为主体,诗选的编排以冯浩《笺注》本为主而对明显不妥者稍有更动,文选的编排以大多有年可考而按年排刊,无年可考者列后。本书是该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集”丛书之一,诗文的注解和笺释比较详备。在每篇作品的笺释评说中,能辨析各家旧说,进行总的品评,或对诗意、诗法加以鉴赏。如《锦瑟》诗,作者以其列于卷首有代序之意,肯定钱钟书《谈艺录》之说,然后分别对悼亡说、自伤说、寄托说进行辨析,一一指出其局限,虽尚未成为定论,却富于启示。而对《富平少侯》一诗的解说,又几近一篇赏析文字,作品之内涵与技法,尽在其中。笺说文字往往用笔深广,极富活力。本书前言分“李商隐的诗文”和“李商隐的生平”两部分。“李商隐的诗文”部分又分十个论题,对李商隐的骈文、诗歌艺术进行评述,并对诗歌作分类探讨。

(苏雨恒)

【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 研究资料汇编。今人黄世中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本书正文厘为三卷。上卷录李商隐《无题》诗二十首(包括《蝶》诗之二、三,《留赠畏之》之二、三);中卷录以首二字为题实亦无题之诗(如《锦瑟》、《碧城》、《玉山》之类)二十三首;下卷录虽有题而实无题之诗(如《重过圣女祠》、《二月二日》等)二十首,总计三类六十三首,约占李商隐现存诗十分之一。每首下先作会校,以《全唐诗》之《义山集》为底本,校以《又玄集》、《才调集》、《瀛奎律髓》、《唐诗鼓吹》等选本以及《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李义山诗集》,汲古阁刊《八唐人集》之《李义山诗集》,钱谦益写校本,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屈复、冯浩等笺注本,吴乔《西崑发微》,杜诏兄弟《中晚唐诗叩弹集》,纪昀《点论李义山诗集》,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等。次作会注,辑郝天挺、释道源等十四家注,最后为笺评,从五代、北宋至清末民初取一百二十家一百三十种著作,录其有关本诗之笺评,故略具会评规模。正如朱东润先生

为本书所作《序》云：“他平心静气，罗列诸家的见地，使读者可以从此备见古今论断，最后作出自己的认识。”这便是本书价值之所在。此外，书中有《与令狐绹之交往诗辑笺》、《与妻王氏之恋情暨寄内忆家悼亡诗辑笺》、《李商隐生平事迹考索二题》、《〈锦瑟〉旧笺综述》、《无题论》、《李商隐无题诗谱》等附录，编者在按语中申述己见，驳斥《无题》诗寄意令狐说，持《锦瑟》等诗为爱情悼亡之篇的观点。（纪伟）

【李义山诗谱】 年谱。清朱鹤龄编订。顺治十六年(1659)刊《李义山诗集笺注》附录。李商隐生平事迹，旧无年谱，诗文创作之年月亦多不可考。朱鹤龄既注《李义山诗集》，又有感于“义山诗《艺文志》止作三卷，想后人掇拾于散佚之余，故诗与题或不相应，又作诗之岁月多不可考”，故“略于《谱》中论次先后以附于论世之议云”。作者分“纪年”、“时事”、“本传”、“诗”四栏，以表格形式，分记每年时事、新旧《唐书》本传所载诗人行迹和诗作。“纪年”起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止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共历五朝。“时事”录有关重大史事，朝臣之进退，藩镇之叛服。“本传”以《唐书》所载有关诗人行迹出处系于每年下，并加按语略作辨证。“诗”则是把作者所考定为某年之作，加以系年。本谱实属首创，于李商隐年谱之编订有开辟之功，稍后之程梦星、徐树谷以及冯浩等皆据此订误增补而成己作。但本谱较之后出者，实亦过于简略，缺漏甚众，记史事、行迹均从谱主二十馀岁起，又多有舛误，深为后出诸谱所纠。

（苏雨恒）

【重订李义山年谱】 年谱。清程梦星编订。乾隆八年(1743)东柯草堂校刊，《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附录。本《年谱》在今所流传之李商隐之年谱著作中是刊行较早的一种，不可谓详备精审，就其考订史实、编年系诗而言，错误舛误较多。但其晚于朱鹤龄《李义山诗谱》和徐树谷《玉谿生年谱》，朱、徐二《谱》简略，漏略甚众，本《年谱》较之多有增补，亦间有所获。尤其因作于编订《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时，乃有意增补朱氏《诗谱》之作，故于朱《谱》更多增益。如朱《谱》之前后年代时有断缺，不足以考义山年齿，谱主生活之文宗、武宗两朝之事也十分简略，尤不足以考义山诗之旨归。本书则编年纪月，不论谱主无事有事，均一一备录，并于史事多所征引，有助于诗作史实之考证。至于李商隐诗之系年，朱《谱》也多有于时事不合者，本书作者重加考订，有不少纠正。

（苏雨恒）

【玉谿生年谱】 年谱。清冯浩编订。《玉谿生诗笺注》附录，刊刻及版本流传与《玉谿生诗笺注》基本相同。作者以诗文为据，史书为证，对李商隐的生平

事迹进行考订，并为诗文创系年，对于朱鹤龄《李义山诗谱》和徐树谷《玉谿生年谱》、程梦星《重订李义山年谱》有较多增补是正，是清代留存之最为详备精当的商隐年谱。尤其是对诗文的系年，是冯浩笺注商隐诗文编年的依据。王鸣盛在其《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中，说冯氏“钩稽所到，能使义山一生踪迹历历呈露，显显在目”。但本书之臆断讹误之处也在所难免，尤其晚出之《樊南文集补编》冯氏不及见，造成明显的疏漏失考等。钱振伦《玉谿生年谱订误》和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都对本《谱》多有是正增补。

（苏雨恒）

【玉谿生年谱订误】 年谱研究专著。清钱振伦编订。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附录，望三益斋初刊于同治五年(1866)。冯浩所著《玉谿生年谱》完成于《樊南文集补编》刊行以前。在众多的李商隐年谱中，因其钩沉索隐，旁搜远绍，堪称精审详备。但由于未及见《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二百零三篇义山文，故所著《年谱》仍有不少臆断舛误之处。钱振伦在编订《樊南文集补编》之后，根据书中有关书、状等，对冯浩《玉谿生年谱》中之疑误，纠正数条，附于书后，号为《订误》。共有祖籍、家世、生年、行迹、诗文系年等十则。每则均先录冯氏之说，后以“振伦按”表明己见，或为纠正，或提出质疑，或补充证据，皆简要不繁，指论有据，有所发明是正。（苏雨恒）

【玉谿生年谱会笺】 年谱。近人张采田撰。采田(1862—1945)字孟劬，号遯堪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此书成于1911年，吴兴刘氏刊刻于1916年，收入《求恕斋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编辑出版吴丕绩校点本，兼收张氏《李义山诗辨正》，附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据此版本重印。本书是在朱鹤龄、徐树谷、程梦星、冯浩诸谱，特别是冯浩《玉谿生年谱》的基础上删繁补阙而成。它对各谱的错误颇多纠正，更有不少创获，岑仲勉评曰：“应有尽有，弗蔓弗枝，诚不愧谱之正宗。”书中对李商隐所经历的唐代文、武、宣三朝时事，编排翔实有体；于谱主身世的考订用力最多，收获也很丰富；有不少考订对新、旧《唐书》中有关史事的记载有订讹补缺之功。岑仲勉说此书“岂徒爱玉谿诗文者，必案置一册，亦读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备之参考书”。王国维、王秉恩等在为此书所作序中也都予以极高评价，并详述其对李义山年谱的发展和对史学的贡献。本书附载编年诗、文题，在诗、文题下逐篇注明编年依据，并作笺释，对部分诗的笺释实质上已是新的注释和分析。这是对历年谱体制的发展与创造。

（苏雨恒）

【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年谱研究专著。今人岑

仲勉撰。初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玉谿生年谱会笺》附录本篇于后。本书对张氏《会笺》作了全面评价，既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张氏的失考处进行讨论。除对张氏有关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看法加以辨驳外，还分六类对张氏《会笺》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这六类中，除所谓“创误”专就商隐生年立论外，“承讹”类“沿类旧文而误者，计十五条”；“欠确”类“考订之大可疑者，十九条”；“失鹄”类“所释不中的者，九条”；“错会”类“错解旧文因而舛误者，十六条”；“缺证”类“未能证定或有漏略者，十七条”。对上述诸多问题，岑氏多能以确属信而有据、无可置疑的史料加以纠正，或指出其错误，但也有某些失证、漏略或难为定论之处。（苏雨恒）

【李商隐年表】年表。今人刘学锴、余恕诚编订。中华书局1988年版《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四。本表是用年表形式编订的李商隐生平事迹，以“年代”、“生活”、“史事札记”三个栏目，记述编排李商隐生活年代、一生行事以及每一年所发生之相关历史事件。“年代”栏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李商隐一岁，止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李商隐卒。“生活”栏对应考述李商隐一生的出处行藏，并涉及其家世盛衰变化、亲友贬谪升迁及牛李党争等，记录有详有略，繁简有序。“史事札记”栏按年代顺序记录当年发生的事件，可谓是商隐所生活时代的编年史或大事记，藩镇之叛服，朝廷之政治斗争和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其他相关事件历历可见。本栏目内还记载了一些其他诗人的生卒等，提供和李商隐同时生活的文学家的情况，如在李商隐生年记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李贺、杜牧等的年岁，在会昌二年商隐三十一岁记刘禹锡死、韩偓生，对研究李商隐文学创作活动有参考价值。（苏雨恒）

【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诗人生平考证。今人苏雪林著。北新书局1927年版。作者认为，李商隐的诗“除掉一部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特别是“义山的无题”和那些“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由于他恋爱的对象非寻常女子可比，所以他无法将其恋爱史明告于天下，只得制造一大批巧妙的诗谜。据此，作者在本书中对商隐诗中隐晦的恋爱事迹进行了研究探寻。全书前有自序和引论，后有附录——“李义山的诗”和“参考书举要”。正文是《义山诗中的恋爱事迹》，分甲、乙两个论题，分别考述描绘诗人与女道士和宫嫔的恋爱关系，较具体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恋爱之可能性及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局。这些考述虽可备一说，但尚嫌论证不力，也缺

乏足够的论据，难免有牵强附会和过于武断之处。《李义山的诗》乃是作者的一篇论文，讨论李商隐诗的特点、表现手法及诗中的恋爱事迹等。

（苏雨恒）

【李商隐评传】诗人评传。今人杨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编写体例为行踪考证钩稽与创作探讨研究相结合，把对诗人行踪的考述和对创作活动及具体诗篇的分析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从诗人生平活动中探索其作品的寓意，通过对具体诗篇的解析进一步了解他的行迹。全书十七章。第一章总述，第二至第十三章评述李商隐各时期生活、创作、出处行藏以及思想发展变化。如在第五章专设“甘露事变中的诗人”一节；第六章介绍诗人在婚姻中的追求和婚后生活；第七章中设“牛李党争和诗人”一节，评介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以及诗人在党争中的立场态度。这些评述虽有失实之处，仍不掩创造之功。第十四至十七章是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综合研究，既有对思想内容的分类，又有关于艺术特征和手法的探讨，并涉及其诗歌的创作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苏雨恒）

【李商隐诗传】诗人评传。今人钟铭钧著。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此书为艺术评传，试图重现其创作、构思作品的过程，揭示李商隐诗索解艰难、深曲隐晦之因，此是本书撰述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其体例和表述方法独具特色。全书共二十六题，每题以某一时期之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或某一事件为主体，以索解作品内涵为重，根据史实大胆想象，艺术地描述创作过程，并广泛涉及诗人生平事迹、社会历史等。每一题都既有所由生发的点，有连类而及的面，同时因穿插介绍了诗人的生平事迹，又有时间发展的纵向的线。二十六题相互生发，关系紧密，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对李商隐诗篇作了生动的绎释，又形象地展现了诗人“辜负凌云百丈材，一生襟抱未曾开”的不幸。（苏雨恒）

【李商隐传】诗人评传。今人董乃斌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以传记体形式，采用夹叙夹议手法和适当的文学描写，寓说理分析于描绘叙述，对李商隐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活动进行评述，比较系统具体地对其思想、性格、气质，其创作成就和局限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李商隐其人其诗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在传主所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刻画了李商隐的形象和精神面貌，给人以清晰而完整的印象。全书分“人生初程”、“樊南穷冻”、“幕僚生涯”三卷，共二十四章。三卷编排实质上是把李商隐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上的发展作阶段性的划分和富有特征的总结概括。作者注重广泛吸收前人和

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向纵深开掘,揭示与传主生活道路、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有至为重要关联的一系列问题,并多有高度的理论阐释。如“权力角逐中的牺牲者”一章,从社会现实时代政局着眼,经过深入分析后指出李商隐之终生坎坷沦落,是由封建制度的性质和晚唐政局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从而超越了所谓党牛党李的表象是非之争。全书其他一些章节也时有精到见解。(苏雨恒)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唐诗学专著。今人董乃斌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在《李商隐传》基础上作进一步理论挖掘,系统论析李商隐诗文内容风格、艺术特色,并据此探索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渊源与影响诸问题,视角新颖,思路开阔,颇多发明。本书的逻辑结构和展开方式采取由广远、宏观而渐至具体、微观之路径,上编三章概述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学科特征,确定作家研究在文学史体系中的位置,论证作家研究的真正核心乃是揭示其心灵世界,并简述李商隐所处时代的文学、文化背景,使视线由散而聚地向李商隐汇集。下编八章,从不同层面论述李商隐其人其诗,目光所注则是诗人深邃微妙的心灵世界。下编之分析阐说实为上编理论原则之实践与具体化。上下两编有机联系,呼应衬托,形成了一个内蕴比较丰富、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古代作家研究的深化。(孟向荣)

【李商隐研究】 唐诗学专著。今人吴调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书在综合研究并吸收古今研究李商隐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系统地对李商隐生平思想、审美观和诗歌创作进行了探讨,力图对这些问题作高度的理论性把握和学术性的评述,体现了当代李商隐研究的深广度。全书九章,第一章述评李商隐生平和思想,作者注意把握对诗人生活道路和诗歌创作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深入揭示其影响和诗人思想深处的变化轨迹。第二章研究李商隐的审美观,从对诗人生平思想的分析入手,对其诗文作品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和审美体察,论证了李商隐的审美理想具有“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第三到第九章是对李商隐诗歌的全面研究,从内容的分类评述到艺术特色的讨论,以及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期,并论列了李商隐诗歌的渊源、影响和评价等问题。颇多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细腻的审美把握,如认为《锦瑟》是“李商隐全面回顾毕生政治遭遇的名诗”等观点,能发前人所未发,道古今所未道。本书重印时收高海夫《读〈李商隐研究〉》(《读书》1984年第2期)一文为代序,该文对本书有精当评介。(苏雨恒)

【李群玉诗集】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羊春秋辑

注。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明毛晋汲古阁《唐人八家诗·李文山诗》统前后集并为三卷,以诗体分列,《全唐诗》因之。今羊氏之校注,即依明抄宋刻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四部丛刊》本、《湖南丛书》本、《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以及《又玄集》、《才调集》等,并辑入佚作十数首,成为目前搜罗最备之《李群玉诗集》。在编排上则力图恢复其原来面目,分为前集、后集。前集三卷,卷上歌行古体,卷中今体七言,卷下今体五言。后集五卷不分体。补遗收佚诗十二首,断句二联。每首诗下有简明校注,凡能考明之有关人事均予以笺释,有疑问者则注明存疑。因此本书也是《李群玉诗集》的第一家笺注本。全书前有校注者前言,述评李群玉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后有附录,选载有关诗人的传记和评论资料,其后记则对编辑方法和原委作了说明。(纪伟)

【曹邴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不分卷。今人梁超然、毛水清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曹邴诗三卷,至《宋史·艺文志》只有《曹邴古风诗》二卷,其近体已散佚。明人蒋冕《〈二曹诗〉又跋》云:“邴之(曹邴)、尧宾(曹唐)二曹公诗,在唐、宋时尝显矣;至元有国垂百年,乃湮没无闻。皇明混一区宇以来,至我皇上纪元嘉靖,历百五十六年,盖稽古右文极盛之时也。于是前代遗文古书,往往出于江南好事之家。而邴之诗集始获与中唐、晚唐诸集号四十家者皆显于世。”“浙中既有刻本,桂林寻亦刻焉。”现今所传曹邴集及《全唐诗》中的曹集皆出于浙江刻本,卷数皆为二卷。此注以《全唐诗》为底本,并校以《唐五十名家集》、《唐诗百名家全集》中曹邴集和《文苑英华》中所载曹邴诗。其中《故人寄茶》一首,《又玄集》中为李德裕作,故删去,又从《粤西诗载》中辑得曹诗四首,一并编入。其注释较为细致,特别是涉及到广西地名皆能一一指实。书前有前言介绍曹氏生平及其诗作,书后附录有关曹氏及曹集之资料,凡二十一篇。此书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唐诗小集》,1985年出版。(王学泰)

【于湮诗注】 唐诗别集注本。不分卷。今人梁超然、毛水清注。于氏存诗四十五首,几乎全是五古,皆著录于《全唐诗》中。此书以《全唐诗》为底本,其次序编排也依《全唐诗》,参校《唐人五十家小集》本及《乐府诗集》中所著录之于诗。其注释较为细致翔实。书后附《于湮诗辑评》十二条,始自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终于吴乔《围炉诗话》。有前言介绍其人其诗。此注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唐人小集》,1985年出版。(王学泰)

【韦庄《秦妇吟》校笺】 唐诗校笺。今人陈寅恪

撰。《秦妇吟》为唐末诗人韦庄于中和三年(883)所作,借黄巢起义时一妇人在长安及东奔洛阳诸情事,反映当时兵荒马乱之实况。作者因此获“秦妇吟秀才”之称,然晚年讳言此诗,其弟为其编《浣花集》,亦不收入,遂在中土湮没无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敦煌石窟重新发现,先后共得写本十种,其最早者为“天复五年(905)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陈寅恪据此为底本,与王国维校本(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四期)、罗振玉校本(见《敦煌零拾》)、周云青《秦妇吟笺注》、翟理斯《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张荫麟译本,见《燕京学报》一卷一期)及王重民影伯3780、伯3953卷子等对校,对诗中一些地名,如“汴路”、“彭门”及字句如“两史”、“赤水”、“大彭小彭”、“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等进行了考证笺释,论证诗中描述的秦妇行程实即韦庄所亲历,秦妇之经历与所闻所见,表明她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之假托。由于该诗涉及当时驻于长安外围的官军杨复光部,该部八大都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开国之君,且为韦庄所事,因此韦庄《秦妇吟》“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闱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这是对《秦妇吟》长期失传原因的一种重要解释。(纪伟)

【秦妇吟研究汇录】 研究资料汇编。今人颜廷亮、赵以武编纂。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有颜廷亮所撰《前言》,总结《秦妇吟》研究六十多年间发展概貌,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成绩卓著。有《秦妇吟》卷真迹影印图四十七幅。后编分两部分:校勘注释类收文十五篇,起1920年迄1983年;分析评论类收文十八篇(有六篇节录),起1929年迄1985年。每部分编次,原则上依据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而略有变通。附录两篇:清吴任臣《韦庄传》,及本书编者所编《〈秦妇吟〉研究论著选目》。此系最完备最全面之《秦妇吟》研究资料汇编。(朱明伦)

【韦端己年谱】 年谱。今人夏承焘撰。此谱撰于1930年左右,成于1934年,收入夏氏《唐宋词人年谱》一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6年初版,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新一版。夏谱之前,有陈思(字慈首)《韦浣花年谱》之未完成稿,夏曾参酌其说,并在谱中注明。此谱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定韦庄世系,为韦应物四世孙。定韦庄生年为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卒年为前蜀武成三年(910),得年七十五岁,谱末载韦庄著作情况。由于史料不足,所述韦庄生平断阙甚多,如自大中十二年至乾符二年(858—875)竟无一事可系。(纪伟)

【郑谷诗集笺注】 唐诗别集注本。今人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出

版。郑谷是晚唐著名诗人,其诗集名为《云台编》(又称《郑守愚文集》),三卷,今存,但无笺注,《全唐诗》编为四卷。该书为首家郑谷诗笺注本,以《全唐诗》中《郑谷集》为底本,校以《唐音戊签》、《全唐诗》稿本、豫章丛书翻刻严嵩本《云台编》、《四部丛刊》影印蜀宋本《郑守愚文集》及席启寓《唐百名家集》本《郑谷集》,并以《才调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三体唐诗》、《唐音》、《唐诗品汇》、《全唐诗录》等书参校。本书除《全唐诗》所录郑谷诗三百二十五首外,又辑得数首,并前人所辑而可辨为伪作者,列为附录一;集历代著录郑谷集之序跋为附录二;有关郑谷诗集的版本著录为附录三;有关郑谷传说资料为附录四;唐至清与郑谷酬答或吊怀之作作为附录五;历代总评郑谷诗风资料为附录六(单评某诗者隶于所评诗下);赵昌平撰《唐才子传·郑谷传笺》为附录七。该笺注本于原诗后首列校记,次列笺注,采用笺注合一的形式,凡郑谷诗时间、地点、酬答对象可考者,均于注一中笺明,以下则依次释诗中词句,有的篇末尚有“集评”,但为数不多。笺注者对郑谷诗思想、艺术特征的析论,见于书首由赵昌平所撰之长篇前言,其论郑谷诗“悲凉”的气局、综合前人而自成一体及郑谷诗在唐末五代的广泛影响等均颇有见地。(纪伟)

【唐集叙录】 书目专著。今人万曼著。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著者生前曾执教于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多年,本书系其遗著。著者曾于1962年发表《杜集叙录》一文,获好评。本书即以此文为基础扩充而成。书中著录有传本之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凡一百零八家。以各家别集之通行本为题,其先后顺序略依《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总目》相较,本书长于标举版本;与《简明目录标注》相较,本书则多版本纵横关系之论述。著者不殚其烦,详尽介绍所录唐人别集之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辑者、刊刻者、收藏者等项,其旨在辨别传本之优劣。其中对于各集之版本源流、编次体例及其在唐、宋、元、明、清各朝以至近代之流传、演变诸情况考述尤详。本书取材宏富。著者对唐以后诸朝之官修书目、史传记事、私家藏书目录,以至清代著名考订、校讎、收藏、赏鉴诸家之叙录题跋及校勘、考证成果,均予广泛征引。如《王子安集》,先据杨炯《王子安集》序、《旧唐书》本传、《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及洪迈、晁公武诸说,知有二十卷本、三十卷本之分歧,但唐、宋、元旧本今均不存。现有明嘉靖张逊业刊《王勃集》仅存诗赋二卷,崇祯张燮以之为基础,辑及《文苑英华》诸书,文赋共编为十六卷,清项家达刻《初唐四杰集》即依张本校刊。后蒋清翊作《王勃全集笺

注》，以项氏十六卷本为基础，自《唐语林》、《全唐诗》、《初唐十二家集》、《韵语阳秋》及《全唐文》诸书辑补部分诗文，编为二十卷。又引证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记》三旧影写本《唐四杰诗集》四卷之题记，得知此影写本为王集最古本，张逊业本当以此为祖本。由此推知王集诗文佚亡不多；其他杂著，除张鷟编入者外，余皆佚亡。著者还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载王勃序文三十篇，断为《宋史·艺文志》所谓“杂序”一卷。复自罗振玉所辑《王子安集佚文》序文得知，日本正仓院所藏《王子安集》残卷及日本富冈谦藏所藏《王子安集》，正是三十卷文集之原本。本书使用极为方便。一编在手，唐人诗文别集之成书年代、编次体例、版本源流及目前存佚残阙等情况均可翻检即得，于唐集之校勘整理，唐人及其诗文之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阎琦 姚敏杰）

【唐诗书录】 唐诗学工具书。今人陈伯海、朱易安编。1988年12月齐鲁书社出版。本书是著者唐诗学研究丛书之一种。收采现存历代有关唐诗之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起自唐代，迄于1985年底，一一标明书名、卷数、朝代、编撰者及版本。稀见善本及有前人批校、题跋者，则标明馆藏。书中限收国人编撰并在国内出版之著作，包括部分未经刊行之古籍稿本或抄本。今人著作限于正式出版社刊印之书籍。年谱之类资料仅收单行本。本书依习惯将唐诗范围延至五代，对跨越隋唐两代及由五代入宋之作者，依其主要活动年代决定收录与否。本书所收书目依类排列，分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编。各编之内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排列。总集、合集、评论与资料均以书为目，别集则先标著者姓名，以人系书，共收录诗人二百八十四家。有关注本、选本、续补本之类附列于本集之后。有关同一诗人之评论资料亦编排于一处，便于检索。各书目后附有“备考”一栏，适当摘录历代典籍及重要书目记载资料，为查考提供线索。书后附有备考引用书目及四角号码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阎琦 姚敏杰）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书目专著。今人孙琴安编撰。1987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自唐至清唐诗选本共六百余种。每种选本均从编者、版本、选目诸方面加以提要介绍。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著录者，本书则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凡今未见者，均据其他书籍予以大致考略；凡今存而未见者，均注明其收藏之处。对今存选本之编选者介绍从略，今已未见选本之编选者介绍较详。本书在著录体例上，注意到点与面、重点与一般之关系。对明代唐人诗集合刻本中未经选择之总集，一般未

予收录；而对历来有并称者如“王孟韦柳”、“韩柳”等，则予收录；对后人批校或批点之著名唐诗选本，一般未予收录，只收个别名家批校本；对只摘诗句、不选诗篇者，诗文合选者，或者仅用于解释字义者均未予收录。而对日本作者所撰选本提要、民国以来唐诗选本书目及近年台湾出版之唐诗选本书目则附录于后。编著者不仅对所收书目作出简明扼要之介绍，且有选择地征引历代著名藏书家、学者之评价，时断以己见，持论公允。

（阎琦 姚敏杰）

【全唐诗人考】 工具书。今人吴汝煜、胡可先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唐人诗题、小序和自注中提及当时人物，往往喜以官职、封爵、谥号、科第、行辈、地望、职业或字号相称呼，对于阅读与研究带来不便。本书著者先有《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在此基础上复制此书，利用两《唐书》、两《五代史》、《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云溪友议》、《国史补》、《因话录》等笔记，《宝刻丛编》、《千唐志斋藏志》等金石资料以及各种唐人文集，并参考今人研究成果，一一考订唐诗中提及的人物姓名，编为上中下三卷，前有诗人各目录，后附音序索引，查找颇便。此书搜罗齐备，考订谨严，利用他人成果均予注明，学风可嘉。书前有傅璇琮序，书后有吴氏弟子徐宗文跋。

（纪伟）

【唐人行第录】 工具书。今人岑仲勉著。本书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书系著者研治唐代文献过程中对唐人习以行第相称现象之研究成果。所录唐人行第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原文或记载上已明著其名与行第，若行第有参差，则取其可信者；另一类为原文或记载上未著其名字，而由著者考定或拟议者。著者所据考订方法主要有五：“依文义以定其姓”；“依事实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义以正其名与行第”；“姓名、行第、官历与事业之互相串合”者，则排比大量资料，厘正是非。著者广搜博采，征引繁富。除《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太平广记》及唐人专集、唐人笔记等之外，他如《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敦煌抄本、新近出土之墓志等，均为搜求。以上诸书，均以姓氏为纲，依笔画及《康熙字典》中该字排列次序为先后编次，并于每条之下作出详细征引及考证。本书前有著者自序；后附四角号码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阎琦 姚敏杰）

【全唐诗作者索引】 唐诗学工具书。今人张忱石编。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全唐诗》平装本编制。收录《全唐诗》、《全唐诗逸》、《全唐诗外编》中之作者。少量诗篇未注明作者，亦予收录。书中立目分主目、参见条目二类。如

帝王以本姓名立目,无名字之妇女则以姓氏立目,僧道徒以法名立目,姓名有歧异者,以本姓名立目等。而帝王之庙号、妇女之从属关系、有歧异姓名中本姓名下注“一作某某”者,则列参见条。诗篇所属作者有歧异者,则一并收录。凡同姓名作者,均注明其籍贯、职官及从属关系,以示区别。所收作者有疑误者,则加注说明。此索引以四角号码顺序排列,附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以便读者用不同方法检索。

(阎琦 姚敏杰)

【**全唐诗典故辞典**】 唐诗学工具书。今人范之麟、吴庚舜主编。1989年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本辞典分上下两卷,收入辞条七千余条。辞目以笔画顺序排列。每一辞条下以“出典”、“释义”、“例句”三部分加以说明。“出典”部分征引典故原文,指明出处。编者力求引用最早出处,并辨证前人之歧义。如遇史实或故事文字过长者,则以现代语概括,但均注明出处。“释义”部分概述出典原文要义,说明典故一般涵义。如遇一典多义者,解释时逐一说明,不分立义项。“例句”部分举出典故在《全唐诗》中之用例,结合作品逐例阐明该典之具体用法及特定涵义,并指出其修辞、谋篇作用。例句均注明作者、篇名及在《全唐诗》中之页码。“例句”部分系该辞典编者用力最勤之所在。由于诗人用典入诗之情况比较复杂,大多非典故本义和一般意义所可包容,故编者结合诗作,探赜索隐,诠释典故,不惟使读者丰富知识,且能帮助其准确理解并进而欣赏诗歌作品。该辞典系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典诠丛书”三部中之一部。

(阎琦 姚敏杰)

【**全唐诗重篇索引**】 唐诗学工具书。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198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清编《全唐诗》广征博引、辑佚补缺,汇唐诗于一编,功莫大焉。然诗篇重出互见现象颇为严重。本书即针对此问题,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编次,运用首句索引、首句校勘文字或重出注文为线索,以类编诗检查本集诗,以相重作家互校、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等方法,辑录出重出作品。本书之编辑,对唐诗研究、《全唐诗》之进一步整理及其他大型文学总集之编纂,均有一定借鉴作用。本书前后依四角号码顺序排列,末附姓氏笔画通检。所标册、页数,有扬州书局原刊本、同文书局石印本函册卷页,并中华书局排印本旧版、新版册页数,便于读者使用。(阎琦 姚敏杰)

【**万首唐人绝句索引**】 唐诗学工具书。今人武秀珍、阎莉编。198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万首唐人绝句》系宋人洪迈所编分体唐诗总集,录自唐人诗集,亦有及于传记、小说者,凡一百卷,每卷一百首。其中七绝七十五卷,五绝二十五卷,末附六绝一

卷。明赵宦光、黄习远曾予整理、增删,得一万零四百七十七首,分四十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据赵宦光、黄习远本校订排印。本书即以此排印本为依据,按绝句每句首字之笔画顺序排列,对首字相同者,依新排本页码、卷次及诗序为顺序予以排列。书末附有汉语拼音索引。(阎琦 姚敏杰)

【**李贺诗索引**】 工具书。今人唐文、尤振中、马恩雯、刘翠霞等合编。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此书为李贺诗单字索引,依据版本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之《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改题《李贺诗歌集注》。全书分诗题编号表、部首目录、部首检字表、李贺诗索引、音序检字表五部分,读者仅凭长吉诗中一字,即可查得全句全诗。(纪伟)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唐文学研究工具书。1983年创刊,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辑。本年鉴除对每年唐代文学之学术活动进行全面介绍外,重点设有“一年研究情况综述”、“一年论文摘要”、“新书选评”、“唐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和翻译”、“问题讨论综述”、“国外研究动态”、“专家介绍”、“专业研究机构简介”、“专业刊物简介”、“唐代文学家纪念馆、遗迹简介”以及每年研究论文与专著之索引等栏目。本书特点为力求全面反映国内每年研究唐代文学之基本情况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亦反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某些薄弱环节。通过回顾与总结,使研究者能够以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点,制订或调整自己的研究计划,提高研究效率与水平。本书对于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之教学备课、业务进修、科学研究等,均有重要之参考价值。

(阎琦 姚敏杰)

【**西崑酬唱集**】 宋诗总集注本。二卷。宋杨亿编。清周桢、王图炜注。桢,字以宁,虞山(今江苏常熟)人。生平不详。图炜,字彤文,云间(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官至户部贵州司郎中。该书有康熙中后期刻本传世。书中“玄”字避康熙帝讳阙笔而雍正以下不避,可为佐证。今案《西崑酬唱集》明以前刻本已多不传。《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有所谓北宋宝元二年(1039)刊本及元刊本各两部,久已亡佚。清以来流传的精善版本,首推清初冯班抄本,经叶万、何焯先后校勘者。又有明嘉靖时高邮张艇玩珠堂刻本,影印编入重印本《四部丛刊》。周、王合注本则似源于宋刻善本,其款式衔名,悉存唐宋人唱和旧式。因未经叶万、何焯改订,故其文字间有逊于冯班抄本处,而为玩珠堂刻本及源自朱俊升古香楼刻本之《浦城丛书》、《粤雅堂丛书》诸本所

弗及。注释方面,注者针对西崑诗人追求词藻、多用典故的特点,广泛征引历代史籍,对各篇作品的典故出处作了详尽的考察。因此,该本无论在校勘方面,抑或对西崑作品的理解,均足资裨益。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本影印出版。(郑永晓)

【西崑酬唱集注】宋诗总集注本。二卷。宋杨亿编,今人王仲荦注。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注者前言云:《西崑酬唱集》向无注释。不确。有清周楨、王图炜注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王仲荦注本诗按唱和诗题排列,每一诗题下著录唱和该题的诗人诗作。其主要见解集于诗题后的题解之中,内容包括成诗时间确认,历史背景探究,地理位置说明,疑难问题考辨,诗题、诗意诠释及主题阐述等。亦有许多不附题解的诗题。每句诗下,广搜经、史、子、集有关材料,详注本事所在、典故出处、辞语渊源,间附按语,或揭示句意,或考证问题及校勘不同版本字句与纠正误署作者等。是书为注者早年就学时经任董叔指点而哀集成稿,藏之行篋四十余年。付梓前爰据旧稿整理补充,又仿李善注《文选》例,对诗题下某些典故,不憚二次三次注出,以方便读者检阅。注者前言对《西崑酬唱集》的思想、艺术价值及版本流传等情况作了介绍。是书为杨亿原序加注,如谓《四库全书总目》“佚二首”之说,计数偶误,不可为据。书末附录一《西崑酬唱诗人略传》,多节录《宋史》本传。刘鹭、任随《宋史》无传,从《宋会要辑稿》等书录出其事。并作《刘秉疑是张秉说》一文。以上亦多加注,注文中多涉及宋代典章制度。附录二为《西崑酬唱集序跋》。(孟向荣)

【西崑酬唱集笺注】宋诗总集注本。近人郑再时笺注。1986年齐鲁书社据原稿本影印出版。再时,字爱居,山东日照人。即王仲荦《西崑酬唱集注》前言所云建国初逝世之青岛郑先生。郑注本系遗作稿本,据卷尾及稿眉附记,属稿于1939年至1944年,随后又陆续有所增补修订。付印前,编辑部对显见讹误作了订正。《西崑酬唱集笺注》按总目,有于(元芳)序、王(昭范)序、自序、凡例、旧序(张璪、冯武、朱俊升等)、著录、谈藪、姓氏、年谱、杨亿序,笺注上下两卷编次,凡四十万言,为西崑诗注本中最巨者。其中“著录”广收历代目录学典籍对《西崑酬唱集》的梳理;“谈藪”详引历代诗话文章对西崑诗与诗人的评论;“凡例”引元遗山《论诗绝句》“独恨无人作郑笺”一首,谓古人已辨西崑属义山之妄,“今以余之姓适合,笺注此集”,说明意在效法郑玄笺并作《诗谱》的体例,遂编订“西崑唱和诗人年谱”冠于卷首。笺注者不满足于传统诗论对西崑派颇有微词的现状,以西崑唱和主人杨亿为例,述其幼年即抱靖忠之志,郁

郁不得申,而发为诗。集中若“受诏修书”诗及“代意”、“禁中鹤”、前后“无题”、“直夜”、“属疾”等题,随处可见其感慨寄托。王昭范序评价郑注云:“爰居根据善本,既详为校勘,其或诗中所用之典,谬解相因,引用之书,今本刻误者,复博稽群籍为驳正数十事,皆发前人所未发,而又为之考其本事,次其为诗年月之先后,使十七人之精神面目跃然于千载之后,其功乌可没也。”(孟向荣)

【宋诗选注】宋诗选本。今人钱钟书著。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1979年再版,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分别印行第三版。是书选收宋代八十位诗人共二百八十八首诗作。每位诗人后缀以小传和或详或简的评语,诗后附注或不附注。此书前言提出了“六不选”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反映出钱氏文学评论的审美价值、独创性、整体性、历史检验性等标准。《宋诗选注》评论和注释的方式,恪遵“触类而长之”的治学之道,或取前代、当代、后代乃至外国的类似笔墨与之相对照映发,使诗的意境自然显露;或取其本人诗文中的类似文句资为旁证,犹如查出作者之“自白”,颇能剖明义理。其品鉴作家多有独到之处,例如赞赏范成大《州桥》体现了造艺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解析苏轼诗中大量使用的“博喻”;谓王安石“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等。其对宋诗流派条分缕析的梳理,对古典诗歌中形式主义文风的抨击亦颇见精义。《宋诗选注》还将机智、幽默、犀利的文学语言运用于文学批评,在现代文学注本中自张一军,独领风骚。书前有作者序言,对宋诗的来龙去脉,乃至历代的版本、校讎均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孟向荣)

【宋五家诗钞】宋诗选本。近人朱自清著。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为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之四,选收北宋梅尧臣诗十七首,欧阳修诗十六首,王安石诗二十四首,苏轼诗二十八首,黄庭坚诗二十八首。每人均缀以小传,校勘字句,排比旧注,多方参考诗话,亦发己见。例如注苏轼云:“梅溪之注,恒订其间,则子瞻之精神,反为所掩。”反对王十朋那种只把诗看作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诗的整体性。四十年代于昆明属稿时分为五题,即:《宛陵诗钞》、《欧阳文忠公诗钞》、《临川诗钞》、《东坡诗钞》、《山谷诗钞》。原稿经王昭琛、余冠英、冯钟芸、高熙曾、浦江清等人校理订正,编为一集,改

题曰《宋五家诗钞》。

(孟向荣)

【千首宋人绝句校注】 宋诗校注本。今人吴战垒校注。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千首宋人绝句》为清严长明编选,初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毕沅为之作序。长明(1731—1787),字冬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受学于桐城派古文家方苞之门。乾隆二十七年赐举人,官至内阁侍读。著有《归求草堂诗文集》等。《千首宋人绝句》仿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之例,而去其尚奢之弊,严加择别。凡十卷,所选七绝七卷六百八十六首,五绝两卷二百十六首,六绝一卷九十八首,诗人三百六十五家。选者眼光颇为考究,小家好诗均在甄采之列。例如征选词人周邦彦五绝《曝日》;而大家名篇人人耳熟者,一般不予入选,例如未选苏轼、王安石、叶绍翁等某些广为传诵的佳构。校注者取乾隆原刻为底本,校以《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宋元诗会》、《宋诗纪事》、《后村千家诗》、《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集》及各家别集、诗话、笔记等。对于由唐五代入宋及由宋人元诸家之作,还参校《全唐诗》、《元诗选》及有关别集。凡重要异文,均出校记。对严选编次失当、误署作者、他诗牵合入题、非绝句而勒入等伪舛讹失之处,俱见考订。所选诗人,均缀小传。在注释方面,凡有关典实、难解词语等,尽量说明,并选引前人评论及有关资料,时亦参以己见。引书约三百余种。书后附录从《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清史稿》辑出的严长明三传。《千首宋人绝句》还有1927年商务印书馆线装排印本,十年间数次再版。该书则为严选首次校注本。

(孟向荣)

【宋诗三百首】 宋诗选注本。今人金性尧选注。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辑录宋代一百一十一家(无名氏两家)诗人诗作三百三十七首。每一诗人后缀以作者介绍,诗后加注与说明。钩稽前人评语,探求字句,品味意境、风格,时附按语解决疑难问题。所选有重点地保证“主”,复有控制地吸收“次”。《宋诗三百首》选目涉及面较广,例如,选并非以诗著称的包拯《书端州郡斋壁》一首,选理学家邵雍“康节体”诗,选惠洪等僧人诗。对西昆、江西、江湖、四灵各流派亦辨析精微。

(孟向荣)

【宋人绝句选】 宋诗选本。今人傅璇琮选,倪其心、许逸民注。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据傅璇琮前言云,是书选目主要为选者所定,但注者亦参与其间,并有所增删。共选二百九十餘首诗,凡一百六十多家。其中不少诗人之事迹不见史传,作品亦从未为人所选。选者力求在唐诗之外向读者提供别一种艺术风格的佳篇,故多选描摹山水风物、吟咏性情、留连光景之日常生活化诗及哲理化诗,从中颇能窥

见宋人绝句新意。注者订正前人误载,对杜常、林子升等人生平事略均有新说。每位诗人均缀小传,注释简明,然颇下功夫,力求把原作之精微处表达出来。如注王禹偁《清明》“野僧”一词,谓义近“苦行僧”,而非俗语之“野和尚”。每首诗后都附有鉴赏性较强的评语。如简评汪若楫“万木惊秋各自残”一首,品味诗人写秋兴为摧枯拉朽者与被摧拉之枯朽者两方面寄以同情,赞其含蓄深微,颇有新意。

(孟向荣)

【宋诗研究】 宋诗研究专著。近人胡云翼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为该馆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之一种。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唐宋诗的异同,宋诗的背景及其特色,宋诗的发达及其派别,宋诗的西昆时期,革新运动等问题,并专章阐述了北宋诗坛的四大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苏门诗人和江西诗派诗人的作品。作者依时代次序,将宋诗各种派别变迁的脉络,各派的领袖与作者,各派的特色与作风及作品的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下编论述南宋诗坛,共计八章。依次为南渡的诗坛、爱国诗人陆游、田园诗人范成大、白话诗人杨万里、反江西派的诗人、晚宋诗坛、宋诗之弊、南宋诗人补志。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宋诗的著作,虽然其中某些观点,如对江西诗派的评价、对宋人诗话的评价等有待完善,但资料较为丰富,比较全面地勾勒出有宋一代的诗坛风貌。在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郑永晓)

【宋诗派别论】 宋诗研究专著。近人梁昆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为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之一种。著者认为,诗歌有派别始于宋代,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必须明了各流派的长短得失。该书鉴于前人由于不知派别之异而产生的以偏概全的弊病,将宋代众多诗人分为若干派别,即学习白居易者谓之香山体,宋初学姚合、贾岛者谓之晚唐体,与欧阳修诗气味相同者谓之昌黎体,与王安石诗气味相同者谓之荆公体,与苏轼诗气味相同者谓之东坡体,以李商隐诗为准则者谓之西昆派,以杜甫、黄庭坚诗为取法准则者谓之江西派,南宋时以姚合、贾岛诗为准则者谓之四灵派,在《江湖小集》中的作家谓之江湖派,道学家们的作品谓之道学体,宋亡后节士们所作谓之晚宋体。作者依次对上述诸宋诗派别的主要作家、宗主、习尚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各派的优劣长短作了批评,指出了各派流行以至消亡的时间,并列有各派源流表,分析了宋人对唐人及宋人之间的继承关系。从而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宋诗从起步至发展壮大的脉络,为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宋诗提供了依据。

(郑永晓)

【宋诗散论】 诗论专著。今人张白山著。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收文六篇。《宋诗散论》回顾了历史上关于宋诗的争论。从以文为诗、爱国诗及诗与画的关系三方面阐释宋诗。《论宋诗流派》一文,从社会影响、前后左右的诗歌创作关系等角度,考察宋诗流派现象,注意揭示其发展变化过程与彼此之间的对抗和融合。《关于文天祥临刑诗的真伪问题》指出,《临刑诗》二首、《长歌》一首为元代文人或后人伪作。还有介绍王安石和谢翱诗歌的论文三篇。是书附录《从李贺诗歌谈创作个性》一文。有作者序言和后记。(孟向荣)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年谱。今人徐规撰。王氏是宋初最重要诗人之一,是诗文革新的旗手,也是北宋政治改革派之先驱。本书是对王禹偁事迹及其作品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书中按年月编排了王禹偁事迹及当时的有关大事,纠正了史籍上许多错误记载,考订了王禹偁绝大部分诗文作品的写作年代,钩沉和著录了王禹偁的许多散佚诗文,并对《小畜外集》内误收的诗歌作了较深入的考证,补正了《小畜集》中的脱漏及舛误文句,包括影印宋本及王禹偁本文误引的原文,评述了王氏在历史上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年谱之后著录了《小畜集》、《小畜外集》、《小畜集拾遗》的众多版本,并对这些版本进行评价,还著录了王氏佚文、佚诗、佚词中撰年未详者。最后择要著录后人有关王禹偁之记事或评论,仅止于宋,从中可见禹偁在宋代之影响。书前有作者之序,序中较为全面地评价了禹偁之为人及其创作之成就。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及补遗。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学泰)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宋诗别集编年校注本。今人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为该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编者鉴于以往通行梅尧臣集各个版本,编次混乱、讹误甚多的状况,广泛搜集有关史料,详加比勘,对梅尧臣集作了详细精当的整理。编年方面,该书试图将梅尧臣的作品和时代密切联系起来,把每一年作品列为一卷,共三十卷,将梅尧臣逐年的遭遇记在当年作品之前,年谱与作品密切结合,使读者可以较清晰地了解诗人思想与创作之脉络。编者依据《欧阳文忠公文集》、《残宋本宛陵文集》等材料,精心考订,对《依韵和永叔见寄》、《北州人有致达头鱼于永叔者素未闻其名盖海鱼也分以为遗聊知异物耳因感而成咏》、《依韵和原甫厅壁钱谏议画蟹》等一系列难以确定年月的作品均给予妥当安排。校的方面,自第十三卷至十八卷,第三十七卷至六十卷,有残宋本可据者以残宋本为底本,其他三十卷无残宋本可据的部分以

万历本为底本。校记中注明“某字作某字”,不作主观片面的改动。有时诸本相同而仍感不妥之处,据上下文活校之法,备存夏敬观、朱孝臧、冒广生诸家之说及编校者个人所见。注释方面,保存了夏敬观《梅宛陵集校注》中的原有注释,编校者所作补注,则主要集中于作品年代、历史背景和涉及人物的考证笺释,字义典故的注释则较为简略。卷首有《梅尧臣诗的评价》、《如何进行编年》、《梅尧臣集的版本》、《原注和由原注引起的推测》等四篇叙论,对梅尧臣的作品、编年、版本、原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书后有拾遗,包括诗、文、词十一篇。又有《迳录》十六篇,转录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宋绩臣《梅圣俞外集序》、陆游《梅圣俞别集序》等序跋资料。(郑永晓)

【梅尧臣传】 诗人传记。今人朱东润著。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作者遵循把传主放到时代中去考察的原则,力求如实地展示诗人性格形成、发展的时代,从而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愤世嫉俗、耿介亮节、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全书共分九章,循着诗人的创作道路,描述了从宋真宗到宋仁宗几乎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貌,从而为理解梅诗提供了充分的注脚。比如景祐三年发生宰相吕夷简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的斗争,并以范仲淹的被贬告终。时为池州建德县小吏的梅氏自然无法亲身参与,但他却把自己的爱憎倾向诉诸笔端,写下了《彼鸛吟》、《灵乌赋》、《猛虎行》等诗篇,把范仲淹比作为老树除去蠹虫的啄木鸟和告人吉凶的灵乌,而以嗜血成性的猛虎隐喻吕夷简。这就清晰地揭示了诗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鲜明立场,也使读者得以正确理解这些诗歌所寄寓的针砭现实的深意。其后如庆历四年御史中丞王拱辰和集贤校理苏舜钦之间的斗争,皇祐三年宰相文彦博和御史唐介之间的斗争,梅尧臣都因职位低微而没有直接参与,但却以自己的诗作表明了自己爱憎分明的立场。与此同时,该书还以传主梅尧臣为中心,用大量笔墨刻画了一代诗坛的风貌。宋初以“缀风月,弄花草”为能事的西崑派诗垄断诗坛近半个世纪,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诸人最初在西崑派的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由于梅尧臣少年时期曾有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遇,首先把农民的生活引入诗中,写出了《田家》、《观理稼》等明显背叛西崑体的诗篇,从而取代西崑体的盟主地位,把诗坛导向别开生面的新境界。其后在嘉祐二年的考试中,由于欧、梅的擢拔,出现了新一代诗人苏轼。正是苏轼,极大地壮大了宋诗的声势,确立了宋诗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样,该书以梅尧臣为中心,展示了从钱惟演到苏轼这三代人的师承关系,也揭示了宋诗流

变的过程。

(郑永晓)

【欧阳修诗选】宋诗别集选注本。宋欧阳修撰，今人施培毅选注。此书选录欧阳修诗一百七十餘首，并加以注释。编选者自云：“在着手选注之前，给自己定了一个‘方针’：要通过这个选本，大致上反映出欧阳修的一生和欧诗的思想、艺术特点。据此，‘诗选’不能照抄《居士集》、《外集》的编次，必须打乱合编，以欧阳修当初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因此每一篇的注释，都要尽可能地注明其写作的时间、背景和涉及的人事。”（见《前言》）全书所选篇章是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的。每篇第一个注文即注该篇写作时间及其地点，这些多是编选者考证之结果。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欧阳修生平，并对其思想、政治倾向作了较高的评价。文中还分析了宋诗、欧阳修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欧阳诗歌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书后附欧阳修在颍州所作《采桑子》十首简注与编选者所撰《欧阳修的“颍州诗词”》。此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王学泰)

【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年谱。一卷。宋胡柯编。此年谱成于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此前，社会上已有几种欧阳修年谱，然这些年谱中就连比较详细的也多因袭旧体例，即按年排列主要著述，次序不免有混淆，行事也不甚明了，胡柯参稽众谱，旁采史籍，在欧阳修《居士集》五十卷与《外集》二十五卷绝大部分篇幅目录题下一一标明了写作年代，但又与任渊的《后山诗注目录年谱》不同，任渊《年谱》所注释的文字在目录之下，而胡柯在目录标年以外另编《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一卷。年谱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二十一日欧阳修出生编起，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追封欧阳修为楚国公为结，年谱中至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六十六岁卒这一段，逐年编次，熙宁五年后若遇追封赠谥、荫恩子弟及迁葬诸事才列年提及。逐年编次者，有缺乏资料解释处则只列本年行事，有不明行事处则只标年代。由于已将《居士集》、《外集》篇目大都标明写作年代，所以年谱注释多采用史籍来出示所列行事的依据与出处。胡柯自己说：“此谱专叙出处，词简而事粗备，览者当自得之。”（同上）目录编年与年谱互相配合，体例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是《欧阳文忠公集》集前附录卷，《欧阳文忠公集》有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原刻本，有元刊本，《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明清版本较多，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清康熙吉水曾氏刊本，《四部备要》排印本的底本是乾隆十一年（1746）的祠堂刻本。（杨树增）

【欧阳文忠公年谱】年谱。清杨希闵编。希闵，字卧云，新城（今江西黎川）人。曾官内阁中书。著

有《豫章先贤九家年谱》等。此谱为宋人胡柯撰《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之后较为完善的一部欧阳修年谱。作者“上下钩稽，按年编次”，“本集之外，正史别集，凡遇关涉，审慎采摭”（《自序》）。颇为详细地考察了谱主的生平遭遇、仕宦生活和学术文化成就等。始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欧阳修生，终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修卒。著者熟考生平，博征雅记，对前人的许多错误有所辨正，如针对宋洪迈《容斋二笔》、清王士禛《居易录》所云欧阳修中年以后止思颖、无一语及松楸泂冈之上、子孙不临阡表等等说法，著者广泛参考有关碑志行状，抉幽发微，对这些不实之词作了颇为详细的辨诬，足以昭析群疑。该谱无作品系年，但对谱主著述有所考订。卷末引《宋史》本传，韩琦、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祭文，楼钥《跋公与张直讲帖》等材料对谱主作了总结性评价。有清光绪四年（1878）刊《豫章先贤九家年谱》本。

(郑永晓)

【苏舜钦年谱】年谱。今人沈文倬撰。它屏弃了旧日诗人年谱那种“年经诗纬”的旧形式，而多以史实来记载诗人生平，在需要说明史实来源时，才在括号内将资料（包括苏舜钦作品）的标目简要点出。在排比史实时，编者并不仅仅排列诗人个人事迹，而是简略地点出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把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显示出来，说明诗人行事的环境和条件。年谱从概述苏舜钦世系开始，将苏舜钦曾祖苏协、祖苏易简、父苏耆、母王氏、兄舜元、弟舜宾、妻郑氏、杜氏的情况作简要介绍，并附有世系简表。编年纪事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开始，前于苏舜钦生年即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四年，所以如此，旨在记载此年发生的“澶渊之盟”，始开屈辱求和之祸端，它将影响苏舜钦乃至当时每个国人的命运。从仁宗天圣七年（1029）苏舜钦二十二岁始，年谱便逐年列条，到庆历八年（1048）苏舜钦四十一岁卒于吴中止。每年条内，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者都用“辨正”作了辨析考证，如景祐元年（1034）苏舜钦二十七岁，条内的史事中有“（舜钦）知亳州蒙城县”，其“辨证”曰：“《宋史》本传云：‘寻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但据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云：‘举进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县，丁父忧，服除，知长垣县。’亡妻郑氏墓志云：‘甲戌岁予登第，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可证本传漏知蒙城一事，而知长垣实为服除复官后事。”既正讹，又补漏，在年谱中做了辑佚修订的工作。《苏舜钦年谱》附于《苏舜钦集》内，与另附的传记、诗话、序跋、题识相配合，有助于阅读《苏舜钦集》。《苏舜钦集》系沈文倬用清康熙中商丘宋荦校定震泽徐惇复刊印的十六卷本为底本，

又参校了其他多种版本,校点而成,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校点者又作部分修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印,并列入该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中。(杨树增)

【文同诗选】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何增鸾、刘泰焰选注。文同生前其诗文并未整理编集,至其曾孙文鹭始将家传存稿汇集成十八卷,南宋家诚之对其散佚诗文勤加搜集,与文鹭所集成《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上下两卷,附录一卷,凡四十三卷以刊行。明人陈继儒曾加订正,毛晋汲古阁据以刻印,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明刻《丹渊集》影印,本书便以影印本为据,共选诗二百十五首,中有从《盐亭县志》和陕西洋县文化馆所藏碑刻中拾得文同逸诗二首,为以往《丹渊集》所不收。选注本以文同先后居地为序编目,分为:永泰东谷诗、临邛诗、南幽诗、广汉诗、普州诗、陵阳诗、汉中诗、洋州诗、汴梁西冈诗。注者对诗不作题解,注中能结合文同生平事迹和诗画艺术等有关典事,对文同的诗进行考核与探讨,卷后有附录,编排次第为:诸公书翰诗文选录、《宋史》本传、文公墓志铭、《丹渊集》拾遗卷跋、文同年谱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杨树增)

【石室先生年谱】年谱。一名《丹渊年谱》。宋家诚之撰。此为文同年谱。同号石室先生,著有《丹渊集》。家诚之曲沃(今属山西)人,宋庆元中曾任邛州(今四川邛崃)令,因文同曾三仕于邛州,此地多留文同遗迹,家诚之故取《丹渊集》重加修正,卷帙仍保持原样,增拾遗二卷,卷末附录司马光、苏轼等与文同往来诗文,并跋以记之,集前附此谱一卷。据文同墓志推算,年谱自天禧二年(1018)文同生始,终于元丰二年(1079)正月三十一日文同六十二岁在陈州卒。年岁条下先叙史实,然后以“按”的形式列举文同及当时人的墓志、实录、尺牍、诗文等为证,如“熙宁九年丙辰(1076)”条:“是岁先生在洋州。按:先生题《鲁肃简尺牍》后云:‘熙宁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浣泉亭记。’”无须引据者,便只简洁书出史实。《石室先生年谱》附于《丹渊集》内,有《四库全书荟要》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据明刊本。(杨树增)

【王荆文公诗笺注】宋诗别集笺注本。五十卷。李壁撰。壁(?—1222),字季章,号雁湖先生,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壁因依韩侂胄被削三秩,谪居抚州(今属江西)。此书即其谪居时所作。王安石许多诗篇是当时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诗中又喜用典使事。李氏不仅笺释诗中典故出处,而且就诗篇所涉及的人物、作诗背景亦作了较多的探索。他核对版本,还多方搜寻

石刻,访阅安石墨迹,从这些墨本、石刻中又为安石诗补充了作者小叙,这对理解王诗帮助很大。而且当时李壁所参考文献,今多不见,故李注弥足珍贵。此编所收录诗篇较《临川先生文集》多出七十二首,荆公一些精妙七绝,赖此编以传。李注亦有失误之处。某些典故注释所引非始典,征引史实,考索人物,亦有失实处。该书有宋刻本,元大德十年(1306)刊本,清乾隆六年(1741)张宗松清绮斋刊本,日本天保七年刊本,1922年张元济涉园影印大德本等。1958年中华书局用清绮斋本为底本标点出版。近人汪东为作校记。张宗松批评是书体例不一。清沈钦韩曾作《王荆公诗李壁注勘误补正》四卷。

(朱明伦)

【王荆国文公年谱】年谱。一名《王荆公年谱》。三卷,后附《卷后》一卷,《遗事》一卷。清顾栋高撰,刘承干校。栋高(1679—1759)字夏初,号震沧,江苏无锡人,康熙进士,授内阁中书、国子监司业加祭酒,著有《大儒粹语》、《春秋大事表》等。刘承干,浙江吴兴人,近代著名藏书家。顾因前人所撰王安石年谱事迹多阙略,尤缺少以行状、墓志铭来详考其年月先后次第,于是拾掇有关王安石行实的书疏、诗文、碑文、序跋等,排比编订,在雍正十三年(1735)成此卷帙,约三万余字。记述了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卷后》承《年谱》止年,止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记述了一百五十多年两宋朝廷对王安石毁誉褒贬的反复变化。《遗事》汇录了历代正史、稗史、文集、笔录等资料中对王安石的一些评价。三个部分各自独立成篇,又互为补充。联系非常紧密。此书有民国间吴兴刘氏刊《求恕斋丛书》本,又有大东书局1935年铅印本。(杨树增)

【王荆公年谱考略】年谱。三十卷。清蔡上翔编撰。上翔(1717—1810)字元凤,金溪(今属江西)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四川东乡知县,居官八年,政尚严肃,遗爱一方。穷多年之力,所阅正史及百家杂说不下数千卷,于清嘉庆九年(1804)编成此书。书前《王荆国文公年谱考略序》谓:“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诬,已略具于斯编矣。因名其书曰考略。”其编撰此书旨在为王安石申冤辨诬。此书卷首三卷,年谱二十五卷,杂录二卷。附录王文公年谱考略书要附存二卷、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五四、光绪《抚州志·文苑传》、跋《吴兰雷祭蔡东野先生文》。年谱每卷依年、月载谱主生活经历、政治活动及有关言论、交游活动,并录《邵氏闻见录》等对他的攻击诽谤,而予以辨驳。对了解王安石思想颇有参考价值。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73年上海人民

出版社重印。

(朱明伦)

【王安石年谱】 年谱。近人柯敦伯撰。为柯著《王安石》一书的第一章,全书共十八章,其余内容为:王安石的少年时代、外任州县时代、内登馆阁时代、居丧时代、执政时代、退居时代及身后、政治思想、政治实施(理财、改革军政、改革学制、治水、攘外)、哲学、文学、著作及书法。年谱以公元贯之,下注朝代年号便于参见,从公元1021年即宋真宗天禧五年王安石生于临江军记起,至1086年即哲宗元祐元年王安石六十六岁卒为止,其中从1041年即庆历元年王安石二十一岁入京应礼部试起,便逐年记事,所载往往先指明此年王安石岁数,其次是皇帝即位、国家改元等大事,最后才是王安石任职、晋升、陈疏、改革、解职、闲居、著述等生平活动。文字简要,全以史实出之,多为持平之论,不引其他资料来加以诠释。柯敦伯的《王安石》一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属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杨树增)

【苏东坡诗集注】 苏轼诗集集注。三十二卷,年谱一卷,题宋吕祖谦分编,宋王十朋纂编。《苏东坡诗集注》属于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刻本系统,今见有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从延文蔚堂刻本,前有王十朋、顾嗣立序,末有朱从延序,有目录一卷,卷一书名下刊“金华吕祖谦伯恭分编,永嘉王十朋龟龄纂辑,新安朱从延翠庭重校”,卷末有康熙三十七年李枢题记。此刻本据明万历茅维《东坡先生诗集注》三十二卷本重刻,茅氏刻本据元刊本,但将元刊本七十八类并为三十类,并增加了和陶诗,共收苏诗二千五百一十八首,此本又将茅本三十类中的酬和、酬答二类并为一类,成为二十九类。王十朋序中题有百家注,此本引数亦不足,分类又多颠舛,体例与杜诗千家注相同,曾为查慎行、邵长蘅所讥,大概是书肆所为,借吕祖谦、王十朋之名以行。此书疏漏虽多,然援引详明,“未可全废,其于施注所阙十二卷,亦云参酌王注,征引群书以补之,则未尝不于此注取材。……录存是书,亦足资读苏诗者之旁参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本著录者即康熙文蔚堂刻本,1915年上海扫叶山房还有影印文蔚堂本。(杨树增)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苏轼诗集分类注本。二十五卷,附宋傅藻撰《东坡纪年录》一卷,又名《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题名为王十朋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辨证》考证,非王十朋所撰。此书在苏诗“四家注”、“五家注”、“十家注”等注本的基础上,汇集了从黄庭坚到王十朋三兄弟九十六位宋人对苏诗的注释,收诗二千零二十三首,分类编次,资料丰富,舛误也不少,影响颇大,是苏诗

分类编注的初始本,在施注苏诗本未发现翻刻前,此书是最流行的苏轼诗集的唯—完整注本。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四中评价此注本说:“此注兼收博蓄,诚不免舛杂之讥。然搜采近百家,网罗宏富,足供后人掇拾之资。”此书传世的最早刻本是南宋中叶黄善夫家塾刻本,题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署“王十朋龟龄纂集”,流传至今的宋刻本还有建安万卷堂本、泉州市舶司本、魏仲卿家塾本(后二刊本今藏于日本),三本属同一系统,当为一传本互相翻刻。宋末元初,出现一部《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二十五卷,七十八类,仍署王十朋纂集,增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此书“增刊”部分句解和刘辰翁批点,校正旧注的个别疏误,调整部分诗的编排次第,今见传本主要有元建安熊氏刊本、明成化间汪氏诚意斋集书堂刻本、朝鲜铜活字本、日本明历二年(1656)松柏堂刊本。元、明间还有一部《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不收刘辰翁批点,“增刊校正”文字全刻在旧版空白处及删削旧注后省出的版面上,可见的有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刻本。明万历年间,茅维将宋、元流行的二十五卷七十八类本芟补合并为三十二卷三十类,并补录了《和陶诗》等原注本未收的苏诗,共收诗二千五百一十八首,但他任意变更注家姓氏,又删削旧注十馀万字,已失宋、元注本真貌。崇祯年间王永积据茅本翻刻,改题《东坡先生诗集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从延据茅本又重刻,门类并为二十九,《四库全书》抄本即据此。

(杨树增)

【施注苏诗】 苏轼诗集编年注本。原题《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宋施元之、施宿、顾禧注。元之字德初,吴兴(今属浙江)人,以文章著声,其治近于酷吏。绍兴二十四年(1154)与张孝祥同榜进士出身,历仕著作佐郎、起居舍人、左司谏及衢州、赣州等地方官。宿字武子,施元之子,南宋光宗、宁宗时曾任绍兴府通判、知盱眙军、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公事,卒于嘉定六年(1213)。禧字景繁,一作景蕃,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弃官隐居,读书终老。据王文诰、阮元考证,施注本诗题下纪事、小注大都为施元之撰写,句下典故、名物注释多出于顾禧,施元之、顾禧作注大致在同时。施宿在其父与顾禧注的基础上又进行补缀,作年谱二卷附于后,并请陆游为书作序。《施注苏诗》从卷一至卷三九,共收苏诗一千八百八十四首,全按诗的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编次,卷四〇是二十九首遗诗,无编年,卷四一与卷四二是《和陶诗》一百二十二首,单独编排,这样全书体例上基本是按年编次。卷一起自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二十六

岁的苏轼赴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任节度判官厅公事,卷三九止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六十六岁的苏轼卒于毗陵(今江苏常州)。用编年的方式排次苏诗,一反南宋人喜将诗集分类编排的习惯,使读者更易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便于“知人论世”。《施注苏诗》主要征引古书注释苏诗中的典故、名物,不靠自己的理解来发挥,这种方法固然有其缺陷,但也避免了主观臆断、穿凿附会的弊病。在注释典故、名物、语词的同时,在诗题下的小注以及有关注释条中往往对本诗的背景与本事也进行说明。施氏父子与顾禧对苏诗有深刻理解,加上他们诠释求精,其注本博得了人们赞赏。陆游在此书序中说:“司谏公(指施元之)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功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盖几可以无憾矣。”清邵长蘅《注苏例言》中说:“施注佳处,每于注题之下多所发明,少或数言,多至数百言,或引史以证诗,或因诗以存人,或援此以证彼,务阐诗旨,非取泛滥,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即此一端,迥非诸家可比。”此注本在宋嘉泰年间(1201—1204)施宿在余姚(今属浙江)为官刻版刊印,然传本极稀。景定年间(1260—1264)又补刊一次,但到清初,已频于亡佚。清康熙十四年(1675)宋荦官江苏巡抚,得残卷一部,仅三十卷,已缺十二卷,宋荦便与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一起补其缺卷,又对施注删削增补,把原来分系在各句下的注文全部集中在每首诗之后,经整理后的《施注苏诗》与原本有了不少差异。现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宋荦刻本。《四库全书》抄本、清内府刊巾箱本,都是按康熙年间宋荦刻本抄刻的。宋荦补辑施注功不可没,然任意删补,改变了施注原貌。施注原版宋嘉泰刻本现尚有六卷藏于北京图书馆。

(杨树增)

【苏诗补注】苏轼诗集注本。五十卷。又名《补注东坡编年诗》、《东坡先生诗补注》。清查慎行注。查氏先是不满于题名王十朋纂辑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曾为之驳正瑕璺,积久渐成卷帙。后读宋荦新刻之《施注苏诗》,因复补辑旧闻,而成是书。查氏勘验原书,参照他本,补录宋荦所删之处,以存旧貌。又采摭众书,增其未收之作,详其未详之处,正其纪事与郡县山川名称之讹。有先后错乱及将他人之诗混入苏集者,均细加考订,一一标出,全书按写作年代重新编排,得正集四十五卷,补录帖子词、口号一卷,遗诗补编二卷,他集互见诗二卷。他人同时倡和之作散附各诗之后。冯应榴《苏诗合注》、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及其他后出苏诗编注本均受其影响。是书前载宋孝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康熙壬午(1702)查慎行所撰《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

略》、《东坡先生年表》、《苏诗补注采辑书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卷帙浩博,不免牴牾,……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唯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是书查氏草于康熙十二年(1673),基本完稿于康熙十八年,康熙四十一年才最后成书。据载,海昌蒋氏存有《初白手稿》。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香雨斋刊本,较通行,《四库全书》即据当时通行本收入。(杨树增)

【苏诗补注】苏轼诗集注本。八卷。清翁方纲补注。翁氏崇尚宋诗,尤其是苏诗,曾把自己的室名改称“宝苏斋”,可见受苏轼影响之大。翁撰《苏诗补注》主要是为补查慎行《苏诗补注》的阙误,他在自己的《苏诗补注》中作序说:“方纲幸得详考施、顾二家苏诗注本,始知海宁查氏所补者,犹或有所未尽,……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捃残拾坠,录存于篋久矣。歙县曹吉士从方纲订析苏诗疑义,日钞一二条,遂成此帙。而方纲之管见,亦窃附一二于师友绪馀之末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尔。”据曹振鏞(吉士)书中题记载,翁氏的《苏诗补注》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冬,全帙共补施氏原注二百七十五条,新补查氏补注九十四条,其中第七卷末附翁方纲与友人书札二封,第八卷附施元之原注本的序略与顾禧(景繁)《志道集》一卷。乾隆四十七年翁方纲以苏斋丛书刻本刊行,清咸丰元年(1851)伍氏刻入粤雅堂丛书,1924年上海博古斋据翁氏原刻本影印,1931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7年商务印书馆又将其刊入《国学基本丛书》,1985年中华书局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又排印刊行。翁氏的《苏诗补注》对苏轼诗歌的传播与研究起了一定作用,冯应榴汇集众说,补阙删误,编辑《苏文忠公诗合注》时,对翁氏《苏诗补注》多有征引。咸丰元年(1851)南海伍崇曜在为翁氏《苏诗补注》所作跋文中说:“近桐乡冯氏,复汇三家(指王十朋、施元之、查慎行三家所编苏诗注本),兼采新旧各家,而成合注一书,群推博赡。是书序及《志道集序》并附录各条,均载入而辨证焉。”(杨树增)

【苏文忠公诗合注】苏轼诗集注本。五十卷。清冯应榴注。应榴(1740—1800),字星实,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2)进士。官至鸿胪卿。是颇有素养的朴学学者。有《踵息斋诗文集》等。清康熙间,查慎行搜集全部苏诗,编成《东坡先生编年诗》五十卷(即《苏诗补注》)。乾隆间,冯应榴取王十朋、施元之、查慎行三家苏诗注本各披阅一过,病其“体例互异,卷帙不同,无以取便读者”,遂将三家之注“合而订之”,“择精要,删复出”,“援证群书,并得诸旧注

本参稽辨补”(见冯氏《合注》自序),历时七年而成此书。冯氏此书,凡五十卷,保持了查慎行注本的规模。冯氏综合王十朋分类注本、施元之与顾禧注本、查慎行注本的注文,删去重复部分,对于其中的一些注文,进行认真考订,加上“榴案”,即冯氏自己的补注。注文之外,并附有苏轼年谱、史传等。此书以注见长,是阅读苏诗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其缺点是繁琐,虽资料翔实,但征引过繁,往往喧宾夺主;少数考据拘泥于一字一词的来历,使得诗旨晦涩难明。有清乾隆六十年(1795)踵息斋藏版。(刘扬忠)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苏轼诗集集注本。一百卷。清王文诰集注。文诰(1764—?),字纯正,号见大,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游粤三十年,做过幕僚,接触过近代科学知识。有《韵山堂集》。此编《诗注》四十六卷,《编年总案》四十五卷,《两宋杂缀》一卷,《苏海识馀》四卷,附笺诗图一卷,墓志铭、本传注、诸家弁言及诗目各一卷。《编年总案》一项,“分为四十五案,以弁四十五卷编年诗之首”(语见《总案》卷一),每案一卷。《总案》载述苏轼一生之“进退出处,是非得失”(同上),篇幅达六十万字,实为一部详尽的苏轼年谱。其诗注四十六卷,主要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编订而成。冯氏《合注》四十七、四十八两卷为他集互见诗,冯氏认为,其中只有个别诗有可能为苏轼作。王氏干脆删去了这两卷诗。冯氏《合注》四十九、五十两卷为补编诗,其中一些作品,冯氏亦疑为非苏轼作。对于这两卷诗,《集成》少数入集,大部则删去;然联系《集成》删去《合注》一至四十五卷中包括《南行集》在内的个别篇章来看,王氏删诗体例不够严谨。不过王氏在苏轼一生立身行实上下过很多功夫,他调整了《合注》中一些诗的次第,大体可信。《集成》删去了《合注》中的繁冗注文,对苏轼诗句,间有发明,增补了纪昀的评语,诗注部分的篇幅略减于《合注》的十分之二,比较简明。但有的地方删略不当。王氏不满于冯氏拘泥于一字一词来历的过多考据,认为诗乃“性灵所发”(《集成》卷三《和子由澠池怀旧》),但有的注文未免随“性”之所之,主观武断,立论不够周密。此外,注中“诂案”时有妄自尊大处,有的地方还引用别人的话来吹捧自己,有时又借攻击前辈注家以抬高自己。不过总的说来,王氏的编订,对于研读与传播苏诗颇有意义。《集成》的诗注部分,创见虽不算多,但在前人基础上还是有所发展的。也比较切合实际需要,比较便于苏诗读者。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开刻而于道光二年(1822)竣工的武林韵山堂刊本。(刘扬忠)

【苏诗查注补正】苏轼诗别集注本。全名题《苏文忠公诗注补正》。四卷。清沈钦韩补正。钦韩

(1775—1831)字文起,号小宛,江苏吴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授安徽宁国府训导。他淹通诸学,除诗文外,尤长于训诂考证,著有《幼学堂文集》、《诗集》、《范石湖诗集注》、《韩昌黎集补注》等。沈钦韩曾撰《苏文忠诗注补正》三卷,中有蒋凤藻、王颂蔚跋,又作《苏文忠诗集补正》一卷,均系稿本,《苏诗查注补正》四卷当是前二稿本的合集。此书是为补查慎行《苏诗补注》的遗阙而作,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基础上,又充实了一些新资料与新见解,其中辨证考订处尤见注者精深功力。如王文诰编纂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第一首,标题为《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宋刻《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残帙中此诗的标题是《与子由别郑门马上赋》。沈钦韩在《苏诗查注补正》中引《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考证“郑州西门”即“郑门”,证实了此残帙将“郑州西门”省为“郑门”是无误的,且存留了宋刻真面目。《苏诗查注补正》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由长州蒋凤藻心矩斋丛书本刊刻,后为广雅书局翻印,1925年文学山房又有重印本。(杨树增)

【苏轼诗集】诗别集点校本。今人孔凡礼点校。苏轼诗自北宋以来颇多注本。到了清朝,更是注家蜂起,就中宋荦、邵长蘅、查慎行、翁方纲、沈钦韩、冯应榴、王文诰等人,分别对苏诗的刊行、笺注、编年等工作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本书点校者鉴于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具有集成性质,汇集了《施注》、《王注》(《类注》)、《查注》、《合注》、《邵注》、《翁注》等诸家注文;并于苏轼一生立身行实考证较详,比较合理地调整了清初影响较大的《查注》、冯氏《合注》二书中一些篇目的次第;注意摆脱乾嘉学者用考据方法注诗的习气,删去了冯氏合注中的繁琐部分,增加了纪昀等人的一些评语和他自己的案语(即“诂案”),比较便利读者。因而采用王氏《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原刊本为底本,参用其他刊本进行点校。所参用的东坡集刊本共十七种。此外还使用金石碑帖和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清人及近人的苏诗校勘批语和校勘记、清人及近人苏诗专注的有关条目等等作为参考的校勘资料。鉴于《集成》中的《编年总案》四十五卷是可以单行的年谱性质的专著,虽有助于对苏诗的了解,但对苏诗研究直接意义不大,故本书暂不收入。唯“诂案”中时有涉及《总案》云云,一般则从《总案》中做适当摘引,空一格用“案”字附于各该条“诂案”之后。为使读者看到苏诗全貌,掌握有关苏诗比较完备的资料,点校者从《查注》、《合注》中,收入了补编诗和他集互见诗,编成第四十七至五十卷,恢复了《查注》、《合注》五十卷的规

模。其第四十七卷,收一至四十六卷见于《合注》而《集成》未收诸诗。其第四十八卷,收除已编入《集成》的《合注》全部补编诗,其第四十九、五十卷,收《查注》、《合注》他集互见诗。这四卷诗,真伪杂糅,但《集成》悉予删除,究属武断,故点校者还是从《查注》、《合注》中移编过来,以示审慎。点校者斟酌《集成》体例,这四卷采用《合注》注文,并集中排在每篇之末,顺序编号,正文加相应序号,在排印格式上与前四十六卷稍有区别。校勘时,点校者采用汇校方式,逐条写成“校勘记”,附于全书各卷(包括第四十七至五十卷)之后。标点时,在词句和事理难通之处,点校者翻检了原书和有关资料,做了校正。对于“诂案”中少量“妄自尊大”、“替自己吹捧”及“借攻击前辈注家以抬高自己”的文字,点校者认为“既占篇幅,又于诗义阐述没有补益,对读者则可能有不良影响”,故作了适当删削,不入“校勘记”。关于《查注》、《合注》未收的新发现的佚诗,则于五十卷外,另行辑录,附于书末。书末还有附录《铭传》、《序跋》及《苏轼诗集》篇目索引。点校者认为:无论是冯氏《合注》,还是王氏《集成》,从篇目、编年到注文,“都还很不完善,都只能作参考”,希望将来有“比较完善的新版本《苏轼诗集》的编注”问世,而他的目的则是“给将来的新版本多提供一点方便”(见《前言》)。此书凡八册,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刘扬忠)

【和陶合笺】苏轼和陶诗注本。全称《东坡和陶合笺》。八卷。清温汝能纂。苏轼的《和陶诗》乃晚年之作,其中除《和陶饮酒》外,余皆写于遭贬岭南(惠州)、海外(儋州)时期,共有一百二十四首,苏轼亲自将这些和陶诗编纂成集,其弟苏辙为之作序。以后各种版本的苏轼诗集几乎都收录了东坡的《和陶诗》,但其中不少版本的《和陶诗》编排次序不一样,有以内容分类编次,有按编年排列,温汝能《陶诗汇笺》本的《和陶合笺》以诗体为类编排,先四言体,次五言体,次杂言体,最后是附录,将东坡《和陶诗》的顺序排比与《陶渊明集》的编排体例一致起来。《和陶合笺》虽以诗体分类编排,但于具体诗篇的写作时间考辨较为精当,如宋绍圣二年(1095)冬,苏轼曾作《和读山海经》十三首,连按时间先后分编苏轼的查慎行注《东坡先生编年诗》,都谓此十三首不著作诗年月,而《和陶合笺》卷四在该组诗后按云:“考之《栾城集》,《和子瞻和陶公读山海经》诗,编次《盆中菖蒲花》之后,故置惠州卷中。据此应是绍圣丙子在惠州作。”此书在清嘉靖间有顺德温氏刻本,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五彩公司又刊行过石印本。

(杨树增)

【苏轼诗选】苏轼诗选注本。今人陈迥冬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此书选苏轼诗三百三十二首,约占全部苏诗的八分之一弱。关于选录标准,选注者在后记中称,首先是吸收今日尚传诵于人民口头的,那是经过历史考验,既有政治评价又有艺术评价的。从实际入选者来看,以苏轼中年的作品居多。注释部分,基本上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初编的办法和实例。所据底本为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但也未尽从,对其他专注、专批本,如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翁方纲《苏诗补注》、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等等,亦或多或少参酌采用,对诸家突出的或独到的意见,都在注文中特别揭出。所有入选作品,皆编年排列,每首诗之下有一段文字,标明写作时间,并简要说明有关背景或提示题意。此书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复由该社出第二版。再版对初版进行了修订,主要是改正错夺,校订注文,调整注码;选目略有增删;版式由直排改为横排,注文分行,题下编年及附有必须说明的话另出,以清眉目。

(刘扬忠)

【苏轼选集】苏轼作品选注本。今人刘乃昌选注。此书共选苏轼诗一百九十五首,词四十八首,文二十篇。选录作品所依据的底本,苏诗以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为主,参照他本(如王十朋分类集注本、东坡七集本、王见大诗注集成本、纪昀朱批本等);苏词以龙榆生笺注本为主,参照他本;苏文以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本为主,间采他本。此书诗、词、文三部分,每部分均按时代顺序排列。每篇均有题注,简要说明写作时代、背景、本事等,有些篇章对思想和艺术也略加评述。诗选题注对作者履历行踪交待稍详,各篇衔接起来,适足反映作者一生的轮廓。注释部分,难字注音,释文力求简明准确,有的着重注释词语,有的着重串释全句,有的适当征引典实,均视具体情况而定。卷首刊有选注者撰写的题为《略论苏轼及其文学成就》的长文,全面评价苏轼的文学成就。此书较便于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了解苏轼代表作品及其主要文学成就。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

(刘扬忠)

【苏轼选集】苏轼作品选本。今人王水照选注。本书选苏轼诗二百四十多首,词五十多首,文近三十篇,都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所选包括苏氏各体诗文的代表性作品。注释除了疏通原文外,还在原材料的核对和评论资料的征引上下了不少功夫。本书体例谨严,考证详确,在编选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吸取了前人和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普及作用的读物。卷首前言对苏轼的文学

成就进行精辟的评介,特别是其中对苏轼创作分期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选注者长期思索有得之见,有助于读者对苏氏作品思想和艺术特点的深入理解。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国内久佚。复旦大学教授顾易生于1981年2月去日本讲学,大阪市立大学西野贞治先生赠送此书影印本一件,选注者据此加以标点,按原式全文印行,作为本书附录。附录中并有选注者所撰《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一文,对施《谱》的特点和价值作了评介。此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集》丛书之一,1984年由该社出版。(刘扬忠)

【东坡纪年录】年谱。一卷。宋傅藻撰。藻字荐可,仙溪人。在《东坡纪年录》未成之前,已有多种苏轼表谱流行,傅藻博采众家,扬长避短,撰成此谱。他在纪年录的跋中讲:“汴阳段仲谋编为《行纪》,清源黄德粹撰为‘系谱’,一则择焉而不精,一则语焉而不详,予于暇日因二家之述,遍访公之文集,采其标题与其岁月,芟夷繁乱,而质诸名士大夫,以求其当足以观公宦游穷达之节,吟咏著作之时,名之曰《东坡纪年录》。”《东坡纪年录》分三部分,前可为序,中是表谱,后可为跋。最早附于南宋黄善夫家塾刻《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本内,此本将“傅藻”作“傅藻”,元有虞平斋务本书堂本,《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元明时刊印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改为“傅藻”,明有汪氏诚意斋集书堂刻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中收傅藻《东坡纪年录》,便是根据黄善夫家塾本影印。(杨树增)

【东坡先生年谱】年谱。一卷。宋王宗稷编。宗稷五羊(广州别称)人。年谱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苏轼生于眉山编起,逐年排比,止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六十六岁卒于常州。书写格式基本固定,在编年后先点明是年苏轼岁数,下述苏轼此年重要行事,然后主要以苏轼集中有关资料为依据进行注释。此谱成卷较早,疏漏不少,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苏诗,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然《四部备要》本《东坡先生年谱》后有刊行者附语说:“《东坡先生年谱》,其援引多以《大全集》为据,虽若未尽善,然稽考先生出处,大略用心亦专矣。”《东坡先生年谱》向附《东坡七集》本、《东坡集》本,东坡集子在北宋末南宋初就有过多种刻本,如“汴本”、“浙本”、“蜀本”等,现存较早的七集本是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守程宗重刊宋本,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宋荦所刻的邵长蘅删补本,对此年谱进行了订正,《四部备要》本附有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属于成化本系统。(杨树增)

【东坡先生年表】年谱。一卷。一名《苏诗补注年表》。清查慎行撰。查笃好苏诗,然当时苏诗注本流行的唯王氏、施氏两家,查向不满于王注本,施注本多有残脱,宋荦新刻本增删残本,所增部分大都掇拾王氏旧说,已失施氏本来面目。查从吴中借抄一部施注原本,以其所有来补录新刻所删,并参以其他各本,订正讹误,校正新刻妄意改纂,撰成一部《苏诗补注》,集前附所作《年表》一卷。《年表》以表格的形式排列年代次序,在表格内附以简洁文字说明重大历史事件与苏轼一生行事。如“治平三年”条下,一则是“是年十二月立颖王为皇太子”,另一则是“先生年三十一,春在京直史馆,四月……”无文字可附则空缺,表格也依次标出年代,保持体例完整,比之年谱,形式简单明了,以简驭繁,一览悉知史实大概,十分便于查检。《东坡先生年表》向附查氏《苏诗补注》,现存最早刊本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香雨斋刻本,《四库全书》本抄录即乾隆通行本。

(杨树增)

【苏文忠公年谱合注】年谱。清冯应榴编注。对于苏轼生平,宋人早有研究,年谱之作,肇自南宋。冯氏此编,以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为主,以傅藻《纪年录》之可取者节抄分注以备参考,力图“弃瑕存瑜,庶几全璧”(冯氏《合注》按语)。王《谱》有数条讹误,冯氏俱一一指出,并为删正,清初翁方纲的考证成果亦附录于内。清初查慎行有《东坡先生年表》,冯氏择其精要,编入本谱。冯氏本人所订补者均各附注于后。关于上述除王《谱》之外的各项材料的编排情况,冯氏有如下说明:“《纪年录》亦南宋人所作,其编次诗文岁月较详,今仍全附于谱下,不嫌重复也。至查慎行《年表》与《谱》、《录》复者从删,余亦采附。翁方纲又有考正四条并附录焉。余所订补亦各附注于后,至先生(按指谱主苏轼)所经累朝政事及同时之人,凡与诗集有关涉而可考据者大端已载,余皆见各诗注中,不复全载年谱,亦犹邵氏不全增入诗文之例也。”冯氏此著,综合了前人有关著作,并融入本人研究成果,是后人研讨苏轼生平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年谱合注》不单行,而冠于冯氏《苏文忠公诗合注》卷首,有清乾隆六十年(1795)踵息斋藏版。(刘扬忠)

【苏诗编年总案】年谱。清王文诰撰。又称《苏诗总案》,为《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一部分,共四十五卷,六十万字。另一部分即为苏轼诗注,四十六卷,已以《苏轼诗集》之名另行著录。据《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说,此书所以命名为《编注集成》,是由于“一曰编,二曰注,汇为集成也”。所谓编,即指《总案》对苏轼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的编年考证。这

一部分资料丰富翔实,对苏轼的立身行实、仕宦出处、是非得失,多有考核,且不乏创见。它与一般年谱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特别注重考订苏轼诗文的写作时间,二是把苏轼集中的散文完整录入《总案》各条之下,以使《总案》既作为年谱,又可作为诗歌创作背景的内证材料,兼且弥补《集成》收诗不收文的不足。韩对所作序称,该书选苏轼文集之各种文“悉纳入之。事或未备,则佐以老苏、子由、叔党诸集,而系以诗之应入案者,合为编年”,“分编之诗,汇收之注,咸于是取则焉”。如卷三七记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苏轼任定武安抚使时事云:“刘丑厮复父仇,来诉于庭,为记事。和子由咏清汶老诸什。寄王巩紫团参诗。作《中山松醪赋》。”下面小注中便引了文集中《中山松醪赋》全文。而与之对应的《编年古今体诗》卷三七,正为元祐八年十二月所作诸诗,以上记事为读者理解其中的《刘丑厮》、《次韵子由清汶老龙珠丹》、《次韵子由书清汶老所传秦湘二女图》、《紫团参寄王定国》等诗提供了背景材料。《总案》优于普通年谱之处由此可见一斑。有清道光二年(1822)武林韵山堂刻本、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书局重刻本、1967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和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嘉庆原刻本。(郑永晓)

【苏轼评传】诗人评传。今人曾枣庄撰。此书系统介绍苏轼一生并对其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作出相应评价。作者认为在仁宗、英宗两朝苏轼是反对守旧、力主革新的。至神宗朝则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主要因为苏轼不赞同安石变法所依据的理论,苏轼主张渐变,反对王安石骤变,另外他在行政实践中也看到新法存在许多问题。在元祐更化时期苏轼是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中,到绍述新政时期则从出知重难边郡到远谪海南。苏轼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上)”(见《评传》)本书对于苏诗评价很高。作者认为苏轼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作者对于民生疾苦、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愤怒,因此,苏诗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苏轼又是一位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其作品能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苏轼笔下万物似乎皆有人的感情与行为。书中还就

苏轼的世界观和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介绍与论述。此书是国内近几十年第一本苏轼长篇评传,亦有稍嫌简单之处。书后附有苏轼年谱、苏轼著述简介与苏轼行踪示意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王学泰)

【论苏轼的创作经验】评论集。今人徐中玉著。苏轼是一位诗、词、赋、文多产的作家,书法、绘画也很擅长,创作经验异常丰富。从1978年至1981年间,徐氏发表一系列研究苏轼创作经验的文章,分别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学术月刊》等书刊,本书便是这些文章的合集,集印时,文字基本照旧,对题目进行了改动,重新编次,组成一部统一的论集,其目录是:一、言必中当世之过;二、随物赋形;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四、妙算毫厘得天契;五、胸有成竹;六、技道两进;七、自是一家;八、品目高下,付之众口;九、如何作文;十、“八面受敌”的读书法。另一文《略谈“四人帮”的反对苏轼》附于集后,探讨了苏轼创作中那些合乎科学、用之有效、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有一定借鉴作用。本书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树增)

【东坡诗论丛】苏轼研究论文集。苏轼研究学会编。苏轼研究学会从1980年9月成立以来,计划每年出一辑苏轼研究论文集,反映全国研究苏轼的新动态、新成果,每辑所收论文,尽量能集中反映一个主题。第一辑为《东坡词论丛》,本集为研究丛书的第二辑。本集共收论文十七篇,有两篇分别论述苏诗风格多样化及韩诗对苏诗艺术风格的影响,有五篇分别专论苏轼的社会政治诗、题画诗、论诗诗、黄州劳作诗及苏诗中的禅味,有三篇赏析文,评析苏轼的七言古诗《戏子由》和《有美堂暴雨》及柯丘海棠诗,此外有的论苏诗中的用典、苏诗中的梦幻、苏诗中的海南民俗,有的探讨《和陶诗》的系年,有的对东坡两首海南“佚诗”提出质疑,另有考评宋刻集注本《东坡前集》与《纪评苏诗》的文章各一篇。有些文章的议题是前人所未曾涉及到的。论文后还有一篇介绍苏诗版本的资料,全面而详细。本书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增)

【东坡研究论丛】苏轼研究论文集。苏轼研究学会编。《东坡研究论丛》属苏轼研究学会所编丛书《苏轼研究论文集》的第三辑,第一辑为《东坡词论丛》,第二辑为《东坡诗论丛》,此辑论文由1982年11月湖北黄冈举行的苏轼研究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所提供,苏轼研究学会委托武汉大学中文系苏者聪编选,从近百篇会议论文中选录其中的二十一篇。

所选文章涉及面较广,有论苏轼叙事诗、题画诗、咏物诗的,有论苏诗中议论化、散文化、哲理性、行业语的,有对苏词风格进行争议及对具体词质疑商榷的,有论述苏赋特色的,有考证苏轼交友的,有探索苏轼不同时期思想状态及美学思想的,还有调查有关苏轼著作版本、碑帖的,以及考辨苏轼某些诗词年代和苏轼贬谪黄州活动的。1986年由四州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树增)

【苏轼诗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谢桃坊著。全书共分七章,依次为:一、苏诗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胜利成果;二、苏轼诗歌的创作道路;三、苏诗的艺术成就;四、苏诗的艺术渊源;五、苏诗的思想意义;六、关于苏诗的评价问题;七、苏诗对宋诗和后世诗歌的影响。关于苏诗的研究,前人多偏重于评点和注释,全面系统地探讨其思想艺术成就的专著则寥若晨星。建国以来的头三十年,苏诗研究的论文竟只有几篇。与陶诗、李杜诗、白诗、义山诗、放翁诗等相比较,苏诗的确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其成就与地位模糊不清。有鉴于此,著者在引言中提出:“苏诗是一个广袤的领域,须要在对它具体地研读之后,考察苏诗每个创作时期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及其创作上的得失,进而探讨其诗歌的创作道路,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社会意义和艺术风格,才可能认识其真正面目,也才可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它以文学史上应有的评价。”此书正是按照这种要求和设想结撰而成的。对于有关问题,作者都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自己系统的见解。此书理论框架稍显陈旧,具体论述中社会历史评价偏多,审美把握与艺术分析则相对薄弱。此书1984年完稿,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刘杨忠)

【山谷内集注】 宋诗别集注本。原名《山谷诗集注》。宋黄庭坚著,宋任渊注。渊字子渊,新津(今属四川)人。新津有山名天社,因又称其天社人。绍兴元年(1131)以文艺类试四川第一,仕至潼川宪。所作《山谷诗集注》是用建炎二年(1128)黄庭坚的外甥洪炎所编《豫章集》三十卷中的诗集注而成,共二十卷。据卷首许尹序,知其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原与《后山诗注》并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称赞任渊大抵“不独注事,而兼注意,用功为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四称赞任注与史容《山谷外集诗注》能考核出处时事,“其大纲皆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因为按年编排,对研究黄庭坚的生平、思想及诗风变化提供了便利。兼之任渊生活时代与黄庭坚很近,能够见到今人所无法见到的各种黄诗版本、真迹、石刻,故其注释为学者提供了

大量可供参考、比较的有用资料,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典故、语词的注释也大体可靠。今人钱钟书《谈艺录》在指出任注若干失误后,也说:“见他书中有说山谷诗出处者,求之二注(包括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往往赫然已备。”任注也有失误之处,宋袁文《瓮牖闲评》、赵与峕《宾退录》、元方回《瀛奎律髓》等均曾提出批评,今人钱钟书《谈艺录》更指出其注释不当,或应注而未注之处数十条之多。但瑕不掩瑜,任注仍具无法替代的价值。此书初刻于四川,现存宋绍定五年(1232)黄垺闽中刻本十五至十七卷三卷,藏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又有所谓南宋建刊本、明刊黑口本、明陈沛等刊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古刊五三版本,均题《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又有元刻残本,题《山谷大全诗注》,存一至五卷、七至八卷、十二至二十卷,共十六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又有明朝鲜覆刊宋绍定五年闽中刊本,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刻宋绍定五年闽中刊本,日本庆安五年(1649)野田弥兵卫翻刻宋绍定五年闽中刊本,日本覆刊朝鲜甲寅活字本,日本宽永十二年刊本。现存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的最早合刻本为明弘治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均有收藏。其后《四库丛书》即据此本抄录。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校《山谷诗注》,乾隆五十三年(1788)翁氏树经堂刊《黄诗全集》,福建本和广雅书局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山谷诗注》均以此本为底本。翁校本在清中叶后翻刻本颇多,如光绪二年(1876)卢秉均校刻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等。1900年,江西陈三立用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日本宽永六年翻宋刻本《山谷诗集注》及朝鲜活字本《外集诗注》、《别集诗注》为底本,刊刻《山谷诗集注》共三十九卷,并取代翁校本的地位。宣统二年(1910)傅春官南昌重刻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均据此本翻刻。(郑永晓)

【山谷外集诗注】 宋诗别集注本。宋黄庭坚著。宋史容注。容字公仪,号芑室居士。青衣(今四川雅安)人。仕至太史大夫。所作《山谷外集诗注》是用李彤所编《豫章外集》集注而成。今案李彤编《豫章外集》十四卷,系《豫章集》未收诗文,计七卷诗、三卷文,后四卷又是诗。李彤所编《豫章外集》前十卷曾经黄庭坚亲自删订,后四卷则为黄庭坚删除的作品。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只注释了《豫章外集》一至七卷诗,而没有注释黄庭坚有意删除的那一部分。注者史容与《内集》注者任渊有大致相同的条件,距黄庭坚的生活时代也比较近,见到过大量今人无法看到

的各类史书、笔记、诗话以及黄诗的各种版本、真迹、石刻等,在笺注有关史实、人物、背景时,具有后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典故、语词方面的笺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并在诗歌文字校勘方面为后人提供了颇为丰富的资料,该书也存在若干失误。与任注《内集》一样,此书最初也刻于四川,后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蜀之苕城刻本,以古律分类编次,刻于嘉定年间;一为闽宪治刻本,按年编次,刻于淳祐年间,这两种版本的初刻本均已不存于世。蜀刻本系统中今天可以见到者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刊本,卷首序末记云:“今得蜀中《外集》善本,史君容撰注,重新绣梓。”为现存各种《外集诗注》版本中唯一保存宋蜀中苕城刻本原貌者。《四部丛刊续编》曾据此影印。淳祐年间闽中刻本的翻刻本则较多,一般与任注《内集》、史季温注《别集》合刊,如明弘治年间刊本及据此著录的《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翁方纲树经堂《黄诗全集》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等。另有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朝鲜活字本,以及据此翻刻的陈三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傅春官宣统二年(1910)刊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

(郑永晓)

【山谷别集诗注】 宋诗别集注本。宋黄庭坚著。宋史季温注。季温,字子威,《山谷外集诗注》注者史容之孙。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宝祐中官秘书少监。宋淳熙九年(1182),黄庭坚之孙黄耆在编纂《山谷先生年谱》的同时,又搜集了洪炎、李彤等人所编《豫章集》三十卷,《豫章外集》十四卷中未收的佚文、佚诗八百八十一篇,编为《豫章别集》二十卷。其中诗歌七十六首。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即是取《豫章别集》中的诗歌部分集注而成,共二卷。成书于何时不详。该书不分体亦不编年。其注释具较高价值,提供了可供后人参考比较的资料。至于其失误,最显著者为不知《送人赴举》三句诗为缺了首句的残诗,反而称赞说:“诗最多体制,三句者盖亦罕见”,“山谷此诗盖舍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平生句法高妙,早年诗格亦高古矣”。该书初刻当在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但初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明弘治九年(1496)南昌陈沛等刊本,以及以此本为底本著录的《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翁方纲树经堂《黄诗全集》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等,又有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朝鲜活字本,以及据此翻刻的陈三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傅春官宣统二年(1910)南昌刻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郑永晓)

【黄庭坚诗选】 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潘伯鹰选

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注者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覆刻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山谷诗集注》和朝鲜活字本《山谷外集诗注》为依据,精选一百五十首诗作,详加注释,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黄庭坚诗歌选注本。注者在任渊、史容注释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传及宋人笔记中与黄诗有关的材料,并参照钱钟书《谈艺录》中的有关见解,对所选作品在用典、句法、诗旨等方面的特点作了颇为详赡的注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注者常常联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将这类诗作的句法特点作简要交待,如《内集·次韵公择舅》注云:“这是一种六言四句的诗,宋朝人多喜欢作,山谷尤精于此体”,“这其中要诀,须将句法炼得坚挺,把不相干的转折字、虚字删得干净。这样才能将意思的转折藏在里面,因而耐人寻味”。凡此种种,对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而探讨宋诗的独特面貌,颇富启发意义。卷首导言对黄庭坚的生平、政治见解、思想渊源及其诗作在章法、写景、句法方面的特点作了细致的阐述,对理解所选诗作甚有裨益。

(郑永晓)

【黄庭坚诗选】 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陈永正选注。为刘逸生主编《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丛书之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共选注黄庭坚诗一百二十一首,编排次序基本上依黄耆编《山谷先生年谱》,以诗歌创作年代先后为次。注者以任渊、史容两家注释为基础,广泛采择各类史书、历代笔记和近人研究黄诗的成果,对所选作品的典故出处、句法结构、字词意蕴等作了简明通俗的解说。并对诗句加上白话文串解,置于每则注释之始。每首作品均有题解,视具体情况阐述作品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如对绮丽、深情、悠扬、清越的《次韵赏梅》,作者指出,山谷这位反西昆体的健将,原来就是从西昆的营垒中杀出来的,诗人年轻时代的某些作品中,还带有浓郁的脂粉香味。而《次韵裴仲谋同年》的题解,则阐述了该诗在诗句组织结构上摆脱唐诗中习见的那种工整的对偶形式的束缚,力求生新,对句的意思跳跃变化等特点,并指出这种清新奇拗的艺术风格,给后世诗人以很大影响。类似题解大都能抓住作品的主要特点,简明扼要地指出作品的传承、优劣,为学习、欣赏黄庭坚诗歌的精品提供了便利。卷首《前言》对黄庭坚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尤其是黄诗的艺术特色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卷末有《黄庭坚年谱简编》。

(郑永晓)

【山谷年谱】 年谱。宋任渊撰。任氏著有《山谷诗集注》二十卷。所作《山谷年谱》附于《山谷诗集注目录》。实为一编年目录,也可以说是年谱包括详细

的作品系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称赞“其大纲皆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对研究黄庭坚的思想、诗风变化甚有裨益。该谱为各种黄谱中最早的一种,起于元丰元年(1078)在北京为国子监教授,终于崇宁四年(1105)卒于宜州。虽然记述较为简单,但大致勾勒出谱主的行踪、交游和创作情况。作者距黄庭坚生活的时代很近,见到过许多今人所无法见到的黄诗版本、真迹、石刻和其他史书、诗话、笔记等,对有关史实、人物、背景的考证有后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所以作者对谱主生平的勾勒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如卷一《赠郑交》下注云:“山谷在荆州为兴上人书此诗跋云:‘癸亥岁余解官太和过武宁,闻清上人当来延恩,因谒郑子通问消息,题诗子通之壁。草堂,郑交处士隐处也’云云。余家所藏旧本如此”,“此诗盖六年所作”。可见谱中所述均有依据。对某些唱和作品,作者还指出另一方作品之所在,如卷七《奉同子瞻韵寄定国》题下小注:“东坡《玉堂独坐怀王定国》即此韵,在《题无咎竹》后。”其后黄芑作《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有不少材料取自任谱。该谱见于各种《山谷诗集注》刊本。如据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延平本覆刊的明朝鲜翻刻本,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刻本,日本庆安五年(1649)野田弥兵卫翻刻本,日本覆刻朝鲜甲寅活字本,日本宽永十二年(1635)刊本,明弘治九年(1496)刊本。常见者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翁方纲《黄诗全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等。

(郑永晓)

【山谷先生年谱】 年谱。宋黄芑编撰。芑,字子耕,江西分宁人。《宋史》有传。据其本传,芑尝从朱熹学,举太学进士,为瑞昌县主簿,先后知卢阳、台州等地。有《复斋集》。芑又编有《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豫章别集》二十卷。其中《年谱》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黄庭坚生于江西分宁修水故居,终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卒。编撰者广泛搜求黄庭坚之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和四方碑刻,以及它集中有关议论等材料,在吸收任渊《山谷年谱》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黄庭坚一生的行实、交游与创作情况。是现存各种黄氏年谱中最为详尽的一种,其中作品系年尤为精细,不仅将各年所作系于该年之下,而且标明出处。张钧衡在跋中说,该谱“举生平所著诗文,年经月纬,详考其地其人,纤悉毕备,为自来编诗文者所未有”。卷首有《文献通考·豫章先生传》、张元桢撰《山谷祠记》、周季风撰《山谷黄先生别传》等,对黄庭坚的生平、为人、诗文创作等作了概要性介绍评论。

有明嘉靖六年(1527)刊《黄先生全书》本、《适园丛书》据嘉靖本覆刻本、清光绪年间刻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陈以志将黄谱约编为十四卷,题《重刻山谷先生年谱》,有清翁方纲树经堂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黄诗全集》本。

(郑永晓)

【黄文节公年谱】 年谱。清杨希闵编撰。此书依据乾隆三十年(1765)宁州缉香堂刻《宋黄山谷先生全集》、任注、史注、翁方纲刻《黄诗全集》等资料,删去黄谱原有的作品系年,而侧重于谱主生平、仕宦方面的考订。凡记述谱主行实,多注明出处,并间附案语,析疑辨伪。卷末引黄芑原谱序、《宋史》本传、《石洲诗话》、楼钥《跋黄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魏了翁《黄太史集序》、周必大《黄文节公祠记》、黄畴若《山谷荃祠记》、李昂英《题快阁》及自注、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等有关谱主生平、著述的评价资料。又附世传江西诗派图及清张泰来《诗派图论略》、王士禛《跋江西诗派图》等。有清光绪年间刊《豫章先贤九家年谱》本。

(郑永晓)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资料集。今人傅璇琮编纂。为中华书局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种,初版于1978年。编者认为,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较早提出比较明确的主张,形成一个大体相同的风格,并在一个较长时期成为一时诗风的诗派。在北宋末以及整个南宋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稍有成就的诗人不和它在创作上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其理论主张直至清末仍有较大支配力。有鉴于此,编者广泛搜集宋朝至清代约五百四十余种图书中的有关史料辑成该书,以便读者能够系统地研究江西诗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全书大体依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的次序,并益以陈与义和曾几,所录资料分上下两卷:卷上为黄庭坚;卷下为江西诗派,分江西诗派总论,陈师道、韩驹、徐俯、潘大临、潘大观、三洪(洪朋、洪刍、洪炎)、夏倪、二谢(谢逸、谢薖)、二林(林敏功、林敏修)、晁冲之、汪革、李彭、三僧(饶节、祖可、善权)、高荷、江端本、李惇、杨符、王直方、吕本中、陈与义、曾几。每一部分则依资料时代先后排列。凡有关诗人生平事迹,作品评论、考证等,均予以辑录。同一资料牵涉到两人或两人以上者,视重要与否,或一见,或互见。除诗歌评论外,某些评论文、词,书法等艺术的材料,也酌加辑录。从而为全面深入研究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提供了便利。

(郑永晓)

【后山诗注】 宋诗别集注本。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十二卷。任渊的《后山诗注》与其《山谷内集注》并行,《山谷内集注》刊行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由此推断《后山诗注》问世也不会晚于此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中说：“原本六卷，此本（浙江巡抚采进本）作十二卷，则渊作注时每卷厘为二也。”《后山诗注》之前有后山门人彭城魏衍所编的《后山集》，刻本现存以宋蜀刻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为最早，刻本前有绍兴二年（1132）汝南谢克家序，其中收诗六卷，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原本六卷”相合。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中说：“先生既歿，其子丰登以全稿授衍曰：‘先人实知子，子为编次而状其行。’衍既状其行矣，……今又受其所遗甲乙丙稿，皆先生亲笔，合而校之……衍今离诗为六卷，类文为十四卷，次皆从旧，合二十卷，目录一卷，又手书之。”诗文卷数与《后山居士文集》同，编次皆从陈师道亲定旧本，以岁月为序。任渊即用魏本作注，任渊绪正仅限于《示三子》等数篇，并在目录之下作了说明，编次按后山诗写作年月先后为序，自元丰六年（1083）始，皆为陈师道三十一岁以后的诗，独有《赠二苏公》一篇为少作。任渊作注每首诗下都释词阐义，注释所引材料出处都比较精审，然小误亦所不免。《后山诗注》有宋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有明弘治杨一清序刊本、清武英殿本，《四部丛刊》本借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朝鲜活字本影印，卷首有政和五年（1115）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和王云政和六年的题记，以及任渊的《后山诗注目录年谱》。（杨树增）

【后山诗补笺】宋诗别集注本。十二卷，附卷首一卷、年谱一卷。近人冒广生补注。广生（1873—1959）江苏如皋人，字鹤亭，号疚斋，光绪举人，曾任清政府刑部郎中、农工商部郎中，戊戌变法时列名保国会。后以诗文名著当时。辛亥革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校任教，建国后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主要著作有：《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如皋冒氏丛书》、《周易京氏三种》等。任渊注后山诗没有注全，只为《后山集》六卷诗作注，题为《后山诗注》，冒广生作《后山诗补笺》，一是补注任渊未注之诗，一是对任渊所注有所补充发明。后来又作《后山逸诗笺》二卷，再补任渊未注诗，后山诗的补笺才算完备。有人整理《后山诗补笺》，发现中收南宋绍兴二年（1132）蜀大字本《后山先生文集》中的八首诗，即《梅花》绝句七首，《八月十日宿百丈山庆善院明日游松风庵谒震禅师》七古一首，为后来各种版本所不收，此书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杨树增）

【后山诗注目录年谱】年谱。一卷。宋任渊编。《后山诗注》自题为“天社任渊”，据《山谷内集注》中任渊自序，尝受业于黄庭坚，与陈师道是同时代人。任编有《后山诗注》，《后山诗注目录年谱》列于诗注卷首，编成不会晚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此谱以

编年排列陈师道诗作目录，后引资料再以注释，是一种寓年谱于目录的形式，起自元丰六年（1083），陈师道三十一岁，是年列后山诗《妾薄命二首》，目录下先引后山自注：“为曾南丰作”，后有任渊注：“后山学于南丰曾巩子固，南丰卒于元丰六年，此篇必是时所作。”谱编止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后山诗注目录年谱》“编次有序，岁月可考”（任渊《后山诗注自序》），简洁明了，与《后山诗注》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后山诗注》有宋刊本、明弘治本、武英殿聚珍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杨树增）

【李清照集校注】宋人别集注本。今人王学初注。学初字仲闻，浙江海宁人，系近代学者王国维之子。李清照为宋代著名女作家，其词在宋词中有很高的地位，诗、文也极出色。然其集久已失传。清《四库全书》所收《漱玉集》，仅有词十七首，系辑佚而成，远非全貌。本书广为搜集，并加考订校勘，是目前所见搜辑得比较详备而材料又很可靠的一个集子。全书分为三卷。由于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以词为最高，故本书一反前人编次别集之惯例，以词为第一卷。编者态度审慎，在所收集到的五十七首词中，严加考证鉴别，只把可靠的四十三首列入正编，其余十四首则作为“存疑之作”附于其后。第二卷收诗（包括失题者）三十一首。第三卷为文，录李清照文五篇，断句三则。此书优点有五：一为收罗之富。其引用书多达一百六十余种，其中很大部分属于珍本秘籍，有些明刊本，流传极少，有的卷帙浩繁的丛书、类书，皆为当时一般辑佚工作者所无法取资者。二是校勘之精。编者往往因一字之疑，罗列若干种本子相互校讎以定去取；南宋以来所有诗话、笔记，凡有可供参证者，分别系于作品之后，以资对勘，使读者可以触类旁通。三是作品鉴别之慎。决不贪多务得，对于确属误题为李清照的作品，纵为名篇佳什，也坚决区别存疑。四是编者所撰《李清照事迹编年》，对李氏一生经历作了详细考证，颇多参考价值。五是编者对李氏诗、词、文所作注释，引述许多有关宋代社会风习和文物制度的材料，对深入理解作品极有帮助。此书亦微有瑕疵，如注释部分有应注而未注者，有注释不完全、不准确者，有误注者，等等。书稿成于1963年，1964年已排版付型，因故未能出版。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刘扬忠）

【漱玉集注】宋人别集注本。今人王延梯注。本书收集李清照词六十首（正编四十五首，存疑十五首），诗十九首，文五篇。全书主要部分是词，所据版本，以近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中的《漱玉词》为主，参以他本，进行适当校勘取舍。各本文字颇有异同，本书不专主一本，只依文义择善而从。卷首有

注者所撰前言,介绍李清照生平、思想及作品。注释力求通俗扼要,多数作品有题解。书末有两个附录,一为《前人评语》,二为《传序题跋》。此书是既有一定学术性、又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注本。196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刘扬忠)

【简斋诗集笺注】宋诗别集注本。三十卷。宋胡穉注。此为陈与义诗集最早注本。穉潜心于学问,注释简斋诗集历时较久,精益求精。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胡所笺注的《简斋诗集》三十卷附《无住词》一卷脱稿付梓,刊印时距陈与义过世仅五十多年。胡注本按年编诗注释,卷一从《觉心画山水赋》始,胡穉《简斋先生年谱》认定此赋为宣和四年(1122)陈与义居汝州作,时年三十三岁。卷三〇止于《微雨中赏月桂独酌》,此为陈与义绝笔,依胡穉年谱,此诗当为陈与义于绍兴八年(1138)病中作。胡穉贯穿百家,出入释老,旁取曲引,能发诗中之秘,于诗中典故、成语出处的笺注用力尤勤,创获也多。如笺注《觉心画山水赋》,笺语采自多方资料,常见的经史子集著作自不必说,还用了《圆觉经》、《华严经》、《观普贤经》等佛经禅书。通过详明笺注,勾勒出了陈与义的生平大概。胡穉笺注绍熙本原刻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后同元抄本《陈简斋诗外集》一起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称《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简称瞿本。与胡穉笺本同是编年笺注的还有《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本,今能见到的是日本翻刻明嘉靖朝鲜本《简斋诗集》,有刘辰翁的评语一百多条,比胡笺本多出七首诗和一篇铭文,此笺注本或补充胡笺,或订其讹误,或评品诗词,都有一定见地,因此,《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是胡笺本外又一重要刊本,可与胡笺本互为参照。(杨树增)

【简斋先生年谱】年谱。一卷。宋胡穉编次。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穉字仲儒,号竹坡,南宋初人,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完成《简斋诗集笺注》,注本中并附有他所作的《简斋先生年谱》。此谱比较简略,先列出陈与义生年——元祐五年(1090),次注明生地——洛阳,然后便从政和三年(1113)起逐年排列,止于绍兴八年(1138)陈与义病逝,时年四十九岁。叙述陈与义简历时多用陈本人诗文作据,为研读《简斋诗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胡穉笺成的《简斋诗集》三十卷、《无住词》一卷并附年谱刻印刊行于绍熙元年,是为绍熙本,宋本原刻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后同元刊《陈简斋诗外集》一起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其据以影印的宋底本是现存《简斋诗集》最早的版本。元刻本有黄丕烈、赵宗建校跋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无住词》一卷、胡学

士续添《简斋诗笺正误》一卷、年谱一卷,现藏北京图书馆。(杨树增)

【陈简斋年谱】年谱。今人郑骞撰,载于台湾《幼狮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60年4月出版)。骞字因百,辽宁铁岭人。曾任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三十余年。先后出版《辛弃疾年谱》、《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陈后山年谱》、《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等十余种专著,发表论文八十余篇。而对陈与义的生平事迹与诗作用功尤深,所作《陈简斋年谱》是继宋人胡穉《简斋先生年谱》之后较早对陈与义的生平创作进行考辨的著述。著者在深入研读陈与义作品尤其是诗作的基础上,参照前人有关著述,较为详细地勾勒出谱主的家世、仕宦、交游及诗词创作情况,对胡谱的简略、不当之处多有补订。资料翔实,言必有据,为知人论世,深入研读陈与义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便利。(郑永晓)

【陈与义年谱】年谱。今人白敦仁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南宋时即有胡穉为陈与义撰写的年谱。本书作者在研读陈与义作品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资料,对胡谱的不当之处一一作了纠正。为理解与义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知人论世的材料。该谱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人、地、时、事的稽考。兹举二例为证,政和三年(1113)陈与义有《次韵谢文骥主簿兼和刘宣叔》诗,对谢文骥,胡穉无注,该谱则据张元幹《芦川归来集》中《跋苏黄门帖》及《洛阳陈去非自符宝郎谪陈留酒官,予时作丞,澶渊旧僚友也,有诗次韵》等材料,判定谢文骥为苏辙外孙。又如《宋史》陈与义本传、张嵎《陈公资政墓志铭》及胡穉《年谱》均不载陈与义有知均州事,该谱则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五京西南路均州《名宦》:“陈与义,号简斋居士,建炎二年知州。”证明建炎二年夏天陈与义权摄知均州。二是对众多作品作了较精确的系年。如上所述,考出陈与义曾权知均州,则《均阳官舍》、《同通老用渊明独酌韵》、《观江涨》、《和王东卿》等本来难于索解的一系列诗作均可系于建炎二年。又如政和六年(1116),胡谱云:“八月解开德教官而归”,不言归京师抑或归洛。至明年始书“春晚入京,有《襄邑道中》诗”。则似陈与义去开德后,尝一度归洛,至七年春晚始自洛入京者。如此则按原编次第,前此诸诗,自《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建除体》至《送张仲宗归闽中》诸诗皆当为政和七年春晚入京以前在开德数年间之作,着实扞格难通。该谱则订陈与义于政和六年八月解教职后即归京师,其《建除体》以下诸诗为留汴京时作,而《襄邑道中》诗则系之为政和八年(1118),是友人周簿时官襄邑,陈与义闲居京师,偶经过之,于道中所作诗。第

三,该谱通过对陈与义交游和陈与义作品的考察研究,对当时的士风和诗人的怀抱作了简明扼要之揭示。如政和六年,著者加案语说,简斋英年初仕,司教澧渊,不无怀土之思,其交游诸人刘路、刘长言、吕钦问等皆元祐党人之后,又与张元幹、谢文骥、张景方之流气味相投。观人其伦,可见一时风概。凡此之类,对研究陈与义的诗歌不无启示。卷首有前言,对陈与义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诗坛状况、陈与义的诗歌主张及创作实践等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郑永晓)

【杨万里选集】 宋诗文别集选注本。今人周汝昌选注。杨氏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与范成大、陆游等并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其诗活泼、清新,其七言绝句在艺术上最富于创造性。此书选诚斋诗四百余首,其中多为七绝,意在突出其“活法”在七绝创作上的运用。书前引言主要论杨氏在写景抒情时所运用之活法。编者云:“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周氏还以为诚斋主张诗歌的主要任务在于“讽刺讥议”,其诗作也是充满了“忧世之患”,杨氏许多写景抒情之作是系念着家国民生的。此“选集的正文,诗的部分是依据《四部丛刊》影宋写本和《四部备要》据乾隆吉安刻本重排本相互校勘写定的。前者可据性较大;后者异文,多出于不学者(不懂诚斋的特殊字法句法)的妄改或传刻讹误;但因前者是手写本,亦时有讹夺,又赖后者得以救正,问题大致都获得解决;凡属这种,书中一概不列校记,以避烦碎。其他书中(如宋人笔记)引文或有异字,则有时引录以备参考”。其选诗,特别是在选录七绝时“偏重思想性和写得比较深婉味厚的,许多有奇趣妙语但究竟意味不深长的,大都在割弃之列”。其注释,编者希望“应该密切结合作品,透辟,中肯,详而不烦,简而不陋,恰如其分,既要富于启发性,又要给读者留有独自寻味、思考的余地。亦即要‘应有尽有,应无尽无’。文字本身也应该有些味道,不但读作品是享受,读注文也应该不致相反”(皆见《引言》)。本书注释较为详尽,不仅对所选诗篇的艺术特色有深入的分析,而且往往能够揭示该篇文字背后的思想意义。此书人民出版社初版于1962年,1979年再版时作了一些文字修订,并增写了《致读者》一文。

(王学泰)

【范石湖诗集注】 宋诗别集注本。三卷,分上、中、下卷。清沈钦韩注。范成大最早的诗文合集有百三十卷,由其子范莘在宋嘉定间刊行,《宋史·艺文志》却录一百三十六卷,另录《石湖别集》二十九卷、《石湖居士文集》无卷数。由于这些集子早已亡佚,

范成大全集的确凿情况便无从可知。明人从《石湖大全集》中取其诗词部分重刻,范成大诗词才得以传世。今存有明弘治十六年(1503)金兰馆铜活字印本《石湖诗集》三十四卷,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顾氏秀草堂所刻三十四卷《石湖诗集》本(又称爱汝堂本),据依园主人跋,是其友金亦陶据所藏抄宋本校刻的,基本保存了旧式,其中前三十三卷为诗,后一卷为赋词,诗集部分有古今各体诗一千九百一十六首,大概是范成大当年亲自编定的,沈钦韩就是以这个本子来作注。这三十三卷诗较有次序,它不以诗体分类,大体按年编次,一到十卷,大约是宋绍兴二十年(1150)至乾道五年(1169)范成大由遗迹山林到应举为官时期所作的诗,十一至十九卷是从乾道五年到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在临安任京官,赴金出使,任桂林(静江府)、四川地方官时期的诗作,二十卷以后则是从淳熙五年到绍熙四年(1193)范成大任参政知事,不久去职隐居,终老石湖这一期间的诗作。沈钦韩作注,用眉批的方式随手写在诗集之上,内容比较简略,无体例可言,有时只注一个大致出处,连出处有关原文也不征引。富寿荪在《范石湖集校勘说明》中说:“石湖诗向无注本,清沈钦韩《范石湖诗集注》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有《功顺堂丛书》本、广雅书局刻本和《丛书集成》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的排印本《范石湖集》后也附印此诗注,1981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作校勘再版。

(杨树增)

【范成大诗选】 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周汝昌选注。范成大的《石湖诗集》有明活字本,清康熙顾氏本、黄氏本,周氏以顾氏本为主,参照他本,略校其重要异文,从范成大大一千九百多首诗中,选了一百二十多首作注,包括范成大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诗作,既能反映诗人整个人生经历,又能反映各个阶段的精神风貌;既尽量使佳作篇目入选,又避免作品风格的狭隘单一,同时还求得诗选成系统有体例。选注者按内容分类选择排比,大致类别是:有关农民的七十六首,有关国事、政治的六十五首,关系一般生民疾苦利病的十八首,反封建的一首,山川行旅、风土节序、一般生活、景物的八十三首,厌倦游宦、自写生活感想的三十四首,有关个人身世历史、骨肉交游、悲欢离合的二十四首,晚年杂诗十四首,其他专题六首。本书所注,往往酌量引一些有关诗句或其他资料,既解释词句,又给某些历史事物风俗习惯等作较具体的说明,和旧式笺注纯粹是专为罗列“出处”、“来历”的用意大不相同。熔考订语文、赏析艺理于一炉,既解释诗意,又引导欣赏,堪称雅俗共赏的选注佳本。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出版,1984年新版印行时,由选注者对全书作了较细致的考订,增补了不少重要材料,进一步提高了此选注本的学术质量。(杨树增)

【范成大年谱】年谱。今人孔凡礼著。著者从事辑佚、校勘颇勤,曾从史、志、集、帖七十五种书籍中辑得《范石湖集》、《全宋词》、《桂海虞衡志》和《揽辔录》所不载的范氏作品百数十篇,成《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又探源寻迹,从范成大个人著述及碑铭、史传、他人著作中广为搜罗,辑录的范成大生平事迹资料富赡而细密,其中范成大大一生交游情况尤为详明,其平生久隐不彰或不甚为人所知者,则更深入搜采,表而出之。经过精心考定、编排撰成此书。年谱始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范成大生,此前对范氏生平及世系有概括介绍,迄于绍熙四年(1193)范成大六十八岁卒,此后对后人为范氏作行状、写碑铭、印诗文集诸事略有提及。此年谱初稿成于1964年,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前作者曾用六七个月对初稿进行了全面订补,付排后,作者又稍有增补,附在书后。(杨树增)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资料汇编。原名《杨万里范成大卷》。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重印时为了丛书便于分别称引,改为现名,然书内中缝未及改正,仍称《杨万里范成大卷》。今人傅璇琮编,署名湛之。此书编于1960年至1962年间,资料采自宋元明清有关别集、总集、诗话、类书、笔记等,凡二百十六种书籍,所采书目及作者与版本,书中《引书目录》一一标出,计有宋代七十八种,元代十四种,明代二十七种,清代九十七种。资料以涉及杨万里或范成大而划分为两部分,某些资料,同时涉及杨万里与范成大,则视其具体情况,或见于一处,或同时见于两处,编次先为杨万里部分,后为范成大部分,每一部分再按资料作者在世的先后为序排列,大体上看,宋代的资料居多,有些还是杨、范的友人,如张镃、陆游、尤袤、周必大、姜夔等人,写的多是唱酬、应答、题记、序跋等。元明清的评述者都带着时代审美的特点,用各自的标准对杨、范的道德风节、创作实践以及作品进行了评论和探讨。除诗评外,评论文、词、书法等资料也酌情采录。书末附录有《范成大佚文篇目》,共八十八种,包括五篇有目无文者。本书初版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重印过一次,重印时对前言作了较大的修改,1985再次重印,编者在书后附有重印后记,其中全文补录了《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六湖字韵中抄录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孺所撰的《石湖词跋》,同时又列出一些杨万里、范成大未收资料的书目、篇名及卷数,供读者参考翻检。(杨树增)

【剑南诗稿校注】宋诗别集校注本。今人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系南宋大诗人陆游诗集。其《前集》按年编次,诗人生前自定,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刻于严州郡斋;《续稿》收淳熙十五年其逝世前二十余年所作,其幼子子遹复守严州续刻。前后二刻均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剑南诗稿续稿》八十七卷当是合二刻之总称。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其长子子虞于江州所刻《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本,亦按年编次,系现今通行之明末常熟毛晋汲古阁八十五卷刻本之祖本。此书整理即以汲古阁后印本(经毛扆、毛綬德校改后印,较毛晋初印本为胜)为底本。主要根据宋刻《新刊剑南诗稿》(即严州本)及宋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本宋罗椅《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十卷、宋刘辰翁《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八卷、明刘景寅从《瀛奎律髓》中抄出之《别集》、影印本《永乐大典》作校勘。《剑南诗稿》全集向无注本,此书为全集校注之首。项目分三部分:一是题解,包括写作时地、历史背景和题中涉及人物。二是注释,包括地名、诗中涉及人物、典故、僻词、持论之所出、借鉴之前人诗句等,非首首皆注,偶有写景抒情小诗无需注。三是校记。《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放翁集外传》(包括毛晋所辑《逸稿》、毛扆之《逸稿续添》、校注者增辑之《逸稿补遗》)也一并注释。少数人名、地名、典故未能考出,只能阙疑。前人评论,已收《陆游卷》中不再复出,而前人笔记、诗话中有关材料则尽量采用。附录载《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宋史·陆游传》、《山阴陆氏族谱》,三文各有小误,可互补。陆游仕履年代,以校注者所编简要《陆游年表》为准。书前有校注者前言,评述陆游思想及创作成就。此书校注前载《剑南诗稿》严州刊本郑师尹淳熙十四年序,校注后载《剑南诗稿》江州刊本陆子虞嘉定十三年跋及明毛晋跋后。书后附《各家书目及提要汇录》、《引用及参考书目》,另编《篇名索引》。此书材料丰富,校注细致,体例合理,编排有序。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明伦)

【放翁诗选】宋诗别集选本。有《四部丛刊》本,书题为《精选陆放翁诗集》。分《前集》、《后集》、《别集》三部分。《前集》,南宋末罗椅编选。椅字子远,号涧谷,宝祐进士。该集只加圈点而无评批语,前有序,落款为“大德辛丑立夏日適孙慤百拜谨识”,可知此集于“大德辛丑”(1301)夏由罗椅之孙罗慤再刻。又序中有“善和书卷存者仅十一於千百”之语,可知前此尚有“善和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曰:“元大德辛丑其孙慤始刻之”,其语不确。《后集》八卷,南宋刘辰翁编选。该本前后无序跋,句下及篇末

时有附批,其体例与所评杜甫、王维、李贺等集相似。详考其词意观点,确为刘辰翁所选评,非伪托本。“明人刻刘辰翁评书九种,是编不在其中,盖偶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〇)。《前集》、《后集》开始时本各自单行,至元朝时坊贾始将二书合刻,并追题《前集》、《后集》之名,又删其重复者,故两集中无一首重见。《别集》一卷,未题编纂者名氏。其诗皆见之于《瀛奎律髓》中。当是合刻时增补,以补二集之遗。(毕宝魁)

【陆游年谱】 年谱。今人于北山撰。1961年完成初稿。书前《编例》称“本谱体例:首‘时事’,次‘谱文’,再次‘注文’”。“时事”部分,略记宋、金和战形势,“谱文”按年月次序排列,着重谱主之爱国思想、进步观点、政治活动、创作活动、文学见解、仕历变迁、交游动态等;无年月可据者,则推定约在某一时期,用“盖”、“殆”、“应”、“当”诸字,并在按语中说明。“注文”包括两部分:谱主诗文、仕历和交游有关资料;编者按语。谱主诗文作品繁富,具有爱国思想、进步意义以及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之作品,摘录较多;另将一部分重要作品存目,为参考篇目。交游人物,则尽可能录存其有关资料。按语部分,凡编者有说明、补充、辨正、交代、阐述之处皆以“按”字标出。此谱谱文翔实,注文尤丰赡,规模宏大、体例新颖,融年谱、评传为一体。此谱于注文用力尤勤,按语精当。谱前有《山阴陆氏世系简表》,谱后附录若干。此谱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重排出版。修订内容分订正、增补两项,重写、改写按语约四百余条。(朱明伦)

【陆游传论】 诗人评传。今人齐治平撰。本书1956年写成,系当代最早系统研究陆游著作之一。全书分上编、下编。上编“陆游的生平”,以时间为序,分“家世”、“童年”、“婚姻悲剧”、“政治生活的开始”、“入蜀与参军”、“东归以后的宦游”、“田园生活”、“临终示儿”等八章;下编“陆游的创作”,依专题而分为“陆游诗的渊源与师承”、“陆游的文艺理论与实践”、“陆游诗的分期与分类”、“陆游诗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陆游诗的艺术性”、“陆游诗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陆游在其他文艺方面的成就”、“对陆游的评价”等八章。行文简洁,论述全面。上编以陆游政治上的沉浮为主,下篇以评论陆游诗歌创作为主,突出其爱国主义精神及对人民的同情。立论公允,影响颇广。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再版,1961年由中华书局重印,1984年只作少许修订,由岳麓书社重版,并增加附录三篇:论文《读陆游七律〈书愤〉》、与游国恩通信《读〈陆游诗选〉》、游国恩复信《答齐治平先生书》。(朱明伦)

【陆游传】 诗人评传。今人朱东润著。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童年”、第二章“青年”、第三章“大风暴的来临”、第四章“隆兴的战事与隆兴的和议”、第五章“入川”、第六章“诗的开始转变”、第七章“生的高潮诗的高潮”、第八章“欢笑声中的涕泪”、第九章“建安和抚州”、第十章“再度的起用再度的罢免”、第十一章“蛰居山阴的五年”、第十二章“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和韩侂胄接近了”、第十三章“坚持到最后一刻”。此书为陆游一生八十五年作传,突出两方面:一方面陆游与政治关系(即与时局、权要关系),集中在其坚持抗金复国大业上。另一方面写出其诗歌成就。然著者认为:“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都有一个来源,中间也必然要产生变化,诗人的传记就必须把作品的渊源变化交代清楚,同时还得指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的作品的评价又是如何?”青年时代从曾幾学诗,由江西诗派入门。入川后诗风转变。到南郑,“诗里充满了坚强的生命力和胜利的欢笑”。此为诗人“生的高潮诗的高潮”时期。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变化,描述诗歌创作变化,合情入理。此书从政治思想和诗歌艺术两方面塑造了诗人陆游形象,文笔流畅,语言活泼,记叙清晰,议论中肯,描写生动,为优秀传记文学作品。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朱明伦)

【陆游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朱东润著。此书前有自序,后有后记,研究正文有十七个题目:陆游的思想基础、陆游在南郑、陆游在农村、陆游和韩侂胄、陆游卒年考证、陆游所接触到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陆游诗中的山阴风土、陆游和梅尧臣、陆游和曾幾、陆游和江西诗派、陆游作品的分期、陆游的古体诗、陆游律句的特色、陆游的绝句诗、陆游诗中的浪漫主义成分、陆游的词、陆游的散文。著者认为陆游有爱国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儒家思想为主流,佛家思想已渗入其日常生活中,道家思想影响较大。二、三、四题集中从三个方面研究陆游生活与南宋政局的紧密关系。六、七题从上层政治斗争和故乡风土人情两个不同角度了解陆游。八、九、十题探讨陆游诗渊源,上溯梅尧臣,近数曾幾,旁推江西诗派。陆游诗分初期、中期、后期。十二、十三、十四题分别论述陆游各体诗,律诗(尤其七律)成就在古诗之上。陆游是现实主义诗人,同样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十六、十七两题分别探讨陆游词、散文创作特色和成就。诸题皆论述,唯五题考证陆游卒年,持嘉定二年说。此书从思想、经历、文学创作各方面多角度研究陆游。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朱明伦)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 资料汇编。一名《陆游作品述评汇编》。今人孔凡礼、齐治平编

纂。1960年1月编成。不分卷,所搜集资料上起南宋,下迄清末,依朝代顺序排列,同一朝代资料排列则以资料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凡有关诗人陆游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研究(主要是诗,亦包括词、散文、书法等)、评述的资料均予搜集,所收资料以清代最丰,几近三分之二,南宋以周必大、杨万里、苏洞、刘克庄、刘辰翁、周密等人的唱和、评论为多;元代只方回评论多,仅《瀛奎律髓》评语就达一百五十则;清代王士禛、查慎行、吴焯、赵翼、翁方纲、方东树、陈衍评论为多,爱新觉罗·弘历等《唐宋诗醇》评语二百五十六则。有关陆游生平经历、重要事迹评述为少。仅收考证陆游生卒年月、议论其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得失等资料。对陆游诗歌评论占绝大多数,或总论陆游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形式技巧、艺术渊源,或具体品评某首诗意蕴境界、章法结构、锻字炼句等。书后附录《陆游本人论诗文的意见》,收文三十六篇,诗七十首。此书搜罗完备,编排合理,编者数十条按语极可贵,或交待资料背景,或介绍资料作者涉及的人物,或辨伪存正。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朱明伦)

【文成朱先生感兴诗】 宋诗别集注本。一卷。宋朱熹撰,宋蔡模注。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朱熹门人蔡沈之子。书前有朱氏自序,说明自己创作此二十首感兴诗之起因,蔡模亦在书前阐述自己为《感兴诗》作注之缘由。蔡氏注有释词,又有对二十篇总体结构的把握,见解独到。天瀑《书感兴诗注后》云:“觉轩蔡氏注朱子感兴诗一卷,余曩日获活字版古体,乃知其久传于此间矣。后又获高丽本于友人处校之,无甚异同,按《永乐性理大全》,编入感兴诗,其注互举熊、胡、刘、徐数家,而蔡氏则仅一见于第二十首耳。且蔡注孤行,于诸书无所见。岂其佚于彼者久矣。”元大德八年(1304)刘概将此集与陈普所撰《朱文公武夷棹歌注》合为一编刊行,此即天瀑所言“古本”。日人林衡又将此编收入《佚存丛书》印行,商务印书馆之《丛书集成》据此录入。

(徐晓氏)

【朱文公武夷棹歌】 宋诗别集注本。宋陈普注。普(1244—1315)字尚德,号惧斋,宁德(今属福建)人。入元隐居,教授为生。朱熹“淳熙甲辰(1184)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友”。武夷棹歌是九支曲子,以描写武夷风光之美为主。陈氏注曰:“朱文公九曲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第一首言道之全体,彻上彻下,无内无外,散之万物万事,无所不在。”注者以道学家眼光解诗,其中多牵强附会之处。元大德间武夷刘概《跋》云:“概居武夷,常诵棹歌。见其辞意高远,超

绝尘俗,而未得其要领。近获承教惧斋陈先生,蒙出示旨义,有契于心,乃知九曲寓意,直与感兴二十篇,相为表里。诚学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己,敬刊以续感兴诗解之后,与同志共之。”刘氏将此书与蔡模所注朱熹《感兴诗》二十首合为一编,于大德八年(1304)刊印出版。后日人林衡又将其收入《佚存丛书》。商务印书馆编入《丛书集成》之中。常见者有《丛书集成》本。

(徐晓氏)

【朱淑真集注】 宋诗别集注本。二十卷,分前集十卷、后集八卷、外编二卷。宋郑元佐注诗,今人冀勤辑校。朱淑真工诗、善画、通音律,“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世以沦落哀之,故得传于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四)。其死后(约1131—1133)几十年,宛陵(今安徽宣城)人魏仲恭遂辑其诗,合为《断肠诗集》,后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郑元佐作注刊印,清人瞿镛认为“其注亦详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明高儒的《百川书志》著录《断肠诗》为十卷,《后集》八卷。清人黄丕烈曾对校平湖钱梦庐所藏元刻郑注录抄本和硃石蒋君梦华的元刊注本,知两刊本同出一源。明初所刻的递修本,大概所依便是黄氏所见的元刻元抄本。除《断肠诗》外,朱尚有《断肠词》一卷,明洪武三年(1370)即有抄本流传,毛氏汲古阁据此收入《诗词杂俎》。本集注是将《断肠诗集》《前集》十卷、《后集》八卷与《断肠词》一卷、《补遗》一卷合编在一起,采用郑元佐的诗注,并有附录,取名为《朱淑真集注》。诗集部分以清汪氏艺芸书舍影印元抄本为底本,参校了民国南陵徐氏影印元刻本、明初刻递修本、清刘履芬抄本等,还校以《诗渊》、《全芳备祖》、《名媛诗归》等。外编词集部分,采用明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四印斋本、《诗词杂俎》本为校本,还参校了《花草粹编》、《古今词统》、《历朝名媛诗词》等。外编补遗部分收集了朱淑真佚作,中有《璇玑图记》一篇,是王士禛在康熙十年(1671)所见朱淑真宋绍定二年(1229)的手书,原录于其《池北偶谈》内,为各种版本的《断肠集》所不载。附录部分有序跋、书录、丛论三大类,辑集了南宋以来诸家,特别还包括现代港台学者在内的有关朱淑真研究的资料。此集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并列入两浙作家文丛。

(杨树增)

【辛稼轩年谱】 年谱。今人邓广铭编撰。南宋词人辛弃疾(稼轩),前人已有关年谱之作。旧已成书者凡四种:一为辛启泰所编撰,附刻于《稼轩集抄存》卷首;二为梁启超所编撰,有中华书局印本;三为陈思所编撰,有《辽海丛书》之单行本;四为郑騫所编撰,有自印本。另有济南、铅山二族谱。然此类旧谱内容不完全,且有较多错误。邓氏此谱广征南宋一代

重要文献,凡史籍、文集、方志、笔乘之属,均旁搜博采,对《宋史》本传及笔记杂谈中之记事辨伪正误;对材料之收辑,细大不捐,期能集枝节为轮廓,积破碎为整体,使辛氏行实之一般清晰可见。此谱虽分年隶事,然亦兼用纪事本末之体,于关涉谱主之重要事件,均于谱中原始要终,综贯叙述,不以稼轩参与其事之时间为断限。它与编撰者之另一专著《稼轩词编年笺注》互为表里,详于彼者略于此,详于此者略于彼。如与谱主交游诸人,凡有交游之迹可考而为词集所不见者,则于谱中著其事,并间及其人行谊大略。书中还用“比类推求”之法,从宋人文集中搜罗出丰富的旁证,间接地确定了许多辛氏行事的年份月日,祛除了若干以讹传讹的旧说。此谱初稿写于1939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一次。初版之后,编撰者又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花数年工夫陆续进行修改补充,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重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出版新版。

(刘扬忠)

【陈龙川年谱】 又名《陈龙川先生年谱长编》。年谱。近人颜虚心编著。虚心,史学家,浙江台山人,为梁启超之弟子。此谱对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先生)一生行实详加考证,编排颇为清晰翔实。全书共分:卷首、卷一(癸亥至己丑)、卷二(庚寅至戊戌)、卷三上(己亥至丙午)、卷三下(丁未至甲寅)、年谱考证(三卷)、年谱附录龙川文录(一卷)等几部分。其中卷首记陈亮家世,并有陈氏世系表;卷一记陈亮自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出生、至乾道五年己丑(1169)二十七岁时事;卷二记自乾道六年庚寅至淳熙五年戊戌(1178)九年间(即陈亮二十八至三十六岁)事;卷三上记自淳熙六年己亥至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八年间(即陈亮三十七至四十四岁)事;卷三下记自淳熙十四年丁未至绍熙五年甲寅(1194)八年间(即陈亮四十五至五十二岁去世期间)事。谱内各年纪事,多以谱主本人之《龙川先生文集》证之,摘引材料颇为详赡,并辅以其他史料。陈亮一生出处大节,赖此而明。卷首并有著者之友人、近代史学家吴其昌所撰《陈龙川年谱序》及著者自序。二序详述了古代学术之演进大概及陈亮在学术史上之地位价值,并介绍了作谱之经过等等。此谱作为《中国史学丛书》之一,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刘扬忠)

【陈龙川传】 传记。今人邓广铭著。书之封面及扉页署名为邓恭三,恭三乃邓广铭之字。此书传主陈亮,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是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著者鉴于陈亮“挺身而出而独当救亡大

任的热烈怀抱,到今天还以雷霆万钧之力震铄着我们的心”,“激动起我们的慷慨奋发之情”,因而“执笔来传述陈氏的生平”(《序》)。全书正文部分共分二十五章,以陈亮一生重大事件和活动为线索,密切结合南宋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以记述的体裁,详尽地展现了陈亮轰轰烈烈的一生。正文部分虽专主记叙,作者本人为宋史专家,凡是有关陈亮的事件,皆经过周密考证。有些多少有问题的事件,例如陈亮到江西会晤辛弃疾的年月,以及和朱熹辩论王霸义利各书札的先后次第等等,则于铺叙之前,全都作过一番详审的考订工作。收在书后作为附录的《陈龙川狱事考》、《陈龙川斩马盗马故事考辨》、《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等文,便是关系较为重大的几篇。此书对陈亮的才学干略,尽量大笔特写;而对他的某些缺陷,却也不曾曲为回护。作者并不隐晦此书的现实针砭意义,他在序中公开宣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多多少少有些和南宋相似之处,那么,这本书多多少少也还该发生一些警惕作用的吧。”由此可知此书是一部极富作者主体意识的历史人物传记。此书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刘扬忠)

【姜白石诗集笺注】 宋诗别集注本。今人孙玄常笺注。南宋词人姜夔兼善五七言诗,其诗在宋诗中自成一家,颇有特色。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曾著录《白石诗集》一卷。然白石为词名所掩,其诗在后世反而不彰。历代诸家刊本、选本,直至五十年代以后一些宋诗校勘本、选注本,录白石诗甚少。近年来,随着宋诗受到研究界重视,白石诗地位也有所提高。孙玄常之《笺注》广为搜罗,录诗一百八十馀首,并参稽诸本,精审校勘;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采纳诸家研究成果,对每首诗详加注解。实为宋诗研究中填补空白的力作。此书优点颇多,举其大者,约有四端:一、能以一诗人之心境与体会去契合白石的心灵与处境,发前人所未发,注出白石诗的境界、源流和技法;二、广泛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但疏解字、词、句,而且结合白石的交游、行实,正确地展示了原诗的意蕴;三、注者以现代语言学家的身份研治古诗,因而对白石诗的音义训释、典故出处、地理习俗、名物制度等考据严密,辨识精到,颇有贴切可信之见;四、注者少年学画,颇通画技,能以画境证诗心,说明白石诗的独特气韵。其不足之点有二:一是没有广泛搜罗有关白石诗的全部研究成果,使读者缺少取证的材料;二是注文过分追求雅赡,而不免有繁复之嫌。此稿自1943年动笔,至1945年初稿成。后屡经朋辈切磋,窜易其稿,至1972年由叶圣陶审阅匡正,1983年夏复作删定校核,次年始成定稿。夏承焘、俞平伯为之题辞作序,给予很高评价。山西

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刘扬忠)

【白石道人年谱】年谱。近人陈思编撰。谱前有夏承焘所撰序文,序称此谱考张平甫、萧千岩、张思顺诸人行实,定杭州庐舍毁于嘉泰四年(1204),客游浙东在开禧年间等等,皆前人所未发,自来考姜夔遗事者,必以此编为首举。此谱定姜夔生于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卒于绍定四年(1231)。谱中博引群书,详为考辨,并为白石诗词编年。其中若干考证失实及疏漏之处,夏承焘序已指出。虽然夏承焘《姜白石系年》后来居上,但此谱对于研究姜夔其人及其诗词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有《辽海丛书》本。

(刘扬忠)

【姜白石系年】年谱。今人夏承焘著。据作者于篇末自注,旧日曾著《白石道人行实考》,中有年表一种,此编即据以增订而成者;其已详于行实考者,此不再赘。此《系年》广征史料,详考姜夔一生行实,于重大事实多所发明,对前人有关研究成果多所匡正,多所补充,是有关姜夔生平的一部信史。关于姜夔生年,陈思《白石道人年谱》定为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夏氏则以为“固亦相去无几,然取证未充,不如阙疑”,因详引史料,推断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关于姜夔卒年,夏氏不同意陈思、李冰仅据吴潜《履斋诗余·别集一》中只言片语而定在绍定二年之后的旧说,推断为嘉定十四年(1221)。凡此种种,皆言之有据,而为现代学术界所采用。正文之后有附录《白石怀人词考》。此《系年》未曾单行,已收入著者《唐宋词人年谱》一书中。此书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刘扬忠)

【文天祥诗选】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黄兰坡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作者依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的《文山全集》,光绪十三年(1887)仕江周穀诒堂重镌的《庐陵文丞相文山先生全集》,郑振铎编生活书店发行的《世界文库》第八册、第九册中的《指南录》、《指南后录》进行校订,采用编年注诗之体例将文天祥诗分为七个部分,一、德祐以前所作诗(选八首);二、“勤王赴阙”、出使北营被拘留、被驱北行至镇江所作诗(选十三首);三、逃镇江、真州被逐、往扬州所作诗(选二十一首);四、扬州城下、离扬州往高邮所作诗(选十六首);五、从高邮经海陵、通州,渡海南归至景炎二年夏所作诗(选十七首);六、二次被俘北行路上所作诗(选十三首);七、囚系燕狱中所作诗(选十三首);全书共选诗一百零一首,另选词四首。这对了解作者生平与理解诗意颇有益处。本书注释较精详,对《酹江月》(水天空阔)词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该词非文天祥所作,本出自其友人邓剡之手,考证翔实,有理有据,并

指出错误产生之原因,可纠正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鄮懋卿刻本以来诸版本之误及各文学史之讹,甚有学术价值,已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承认。

(毕宝魁)

【谢皋羽年谱】年谱。清徐沁编纂,张潮辑,沈楸惠校。有《昭代丛书》本(甲集卷二)。谱主谢翱字皋羽,号晞发子,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南宋末毁家率乡人投文天祥。文天祥死后曾设奠哭祭。其诗风格沉郁,多抒亡国之痛。有《晞发集》,编有《天地间集》。该谱前有小引,据此可知张潮曾到严子陵祠中拜谢翱之位,“后复得于越徐楚公氏所著年谱及《金华游录注》”,于是将本谱收入《昭代丛书》中。该谱无著者徐沁之序跋,故编成于何年未详,但正文末有“康熙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复酹酒墓上为文哭之以志悲戚云”之语,或当作于是年(1680)。谱文采用编年记事之体例,从十一岁起列年记事,有事则记,无事亦标明年岁。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后谱主之事迹记载颇详,对研究宋末元初江浙一带的文坛概况及文人心态很有参考价值。但其中偶有失误,如扎木杨喇勒知发宋陵事,以《元世祖本纪》参核,当在至元戊寅,不当在乙酉,沁则据周密《癸辛杂识》定为乙酉,黄宗羲为作序,颇疑其非。又姜夔乞正雅乐在宁宗庆元间,而谱以为理宗时,亦沁之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瑕不掩瑜。此编还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毕宝魁)

【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工具书。近人洪业等人编纂。1934年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第十九号引得。是书取清乾隆十一年厉鹗原刻《宋诗纪事》、光绪十九年陆心源家刻《宋诗纪事补遗》及《宋诗纪事小传补正》三书著者姓名、字、别字、别号、谥、私谥、爵、封号等,按中国字度法排列而成。各著者所在三书之卷页,均用阿拉伯字码注于各目之末,以“补”字代《宋诗纪事补遗》,“补正”代《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宋诗纪事》卷页前则不加任何字。叙例详述编纂体例。《引得》前有序、《宋诗引得笔画检字》、《宋诗纪事著者引得拼音检字》、《中国字度法》等。

(孟向荣)

【宋辽金诗选注】宋、辽、金三朝诗的选注本。今人范宁、华岩选注。北京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之一。选编者站在总结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高度,以反映公元十世纪后期至十三世纪下半叶这三百余年整个中国诗坛的概貌为目的,共选注宋、辽、金三个朝代的诗歌一百五十四家,四百一十九首。其中,宋诗一百二十六家,三百四十七首;辽诗五家,十一首;金诗二十三家,六十一首。前言指出:宋、辽、金对峙的时代虽然“攻伐不息,兴亡交替”,但

同属中国的这几个“不同国度的各阶层人物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鉴于此,本书的编选意在勾画出“当时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样式的剪影”。此书尽量撷取那些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又较为完美的诗篇,尤其注意选录能够代表宋诗美学特征、反映宋人审美情趣的作品;对辽、金诗也是如此。这个选本大致能反映出宋、辽、金各自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同地位。每首入选作品的说明文字或详或略地对诗歌的本事、内容或艺术特点作了介绍和提示;注释力求简明、准确,并对前人的注释择善而从,多所吸收。此书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刘扬忠)

【元诗三百首】 元代诗歌选注本。今人邓绍基编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向来元诗选本较少,元人选元诗的有孙存吾、傅习所辑《皇元风雅》,苏天爵所编《元文类》,明代偶桓编有《乾坤清气集》,揭轨编有《光岳英华》,清代有顾嗣立的《元诗选》、张景星的《元诗别裁》。现代尚无专门的元诗选本,《元诗三百首》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前言围绕元人“宗唐得古”的命题,对元诗以及历代有关元诗的主要论述作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该选集为向读者介绍元诗总貌,所选面较宽,并不仅从择善着眼。如王恽诗成就平平,但却是“宗唐”的先导者之一,所以入选三首。体例为先作者小传,依次为原诗、说明和注释。说明部分不囿于对原诗的介绍、分析,往往能有所发挥。

(史铁良)

【元遗山诗集笺注】 金诗别集笺注本。金元好问撰,清施国祁笺注。国祁(1750—1824)字非熊,号北研,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谙熟金史。曾撰《金史详校》《金源札记》。此书原刻未见,今见最早的是清道光二年(1822)南浔蒋氏瑞松堂刊本。首序引、传铭、年谱一卷、诗十四卷,末附录、补载各一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瑞松堂本排印出版。元好问的诗文集,蒙古中统三年(1262)即有刻本问世,共四十卷(其中诗十四卷),已佚。今所见为明弘治十一年(1488)李翰、储懋重刊本。清代通行的是康熙间无锡华希闵重刻本。诗集单行则有元世祖至元十年(1270)曹益甫刻本,二十卷。施本除按中统本十四卷收诗一千二百八十首外,又增入了曹益甫续采的八十一首,外补一首,依类收入各卷。共得诗一千三百六十二首,已接近于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所说千五百余篇之数。卷首保留了李治、徐世隆的中统本序,杜仁杰、王鹗后序,以及曹益甫本的段成己集引等。卷末附录乃弘治本原有,是刻者“从《中州》等集采诸赠言订入者”,华希闵本续有增补,施本仍其

旧,又搜辑部分遗漏资料为“补载”。施本以清刻华希闵本为底本,参校了曹益甫本和其他一些早期刊本,如元至顺庚午(1330)黄公绍刊刻的一个元诗选本,除纠正了华本的一些刻误外,还澄清了清人“因校而益讹”的许多错误,所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读本。遗山诗,除个别作品有作者简略自注外,历来未有笺注。施本《例言》说:“金源史事僻左……国史且然,况文人家集乎!”其笺注,据“积年以来遐收博采”所得,除正史外,尤其重视金元当时人遗留下来的稗传别集中采撷引证,如元好问《中州集》、《续夷坚志》,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集》、刘祁《归潜志》、王恽《秋涧集》等,资料力求翔实可靠。笺注分题注和尾注两部分。题注重在解题并交代全诗有关背景,尾注兼及词语笺释。如卷一《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题注据《中州集》小传介绍了刘云卿的生平,其中尤注意介绍他任叶县令时期的善政,以便理解元诗对刘的赞扬。诗末释“阿京吾所畏”句的“阿京”。笺注者据《秋涧集》的《浑源刘氏世德碑》注出刘云卿子刘祁的生平。刘祁字京叔,生平著述丰富,“少颖异,为学能刻苦”,故而深得元氏赞赏。但尾注条目极少,往往仅一、二条,对元氏自注不加标示,与施注混而不分,这是缺点,然每注必详征博引,给读者提供了大量资料,态度严谨,是近代流行的一个较好读本。

(卢兴基)

【元好问诗选】 金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郝树侯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本书选元好问诗二百二十六首,既注意有定评的名篇,也兼顾各体。代表元好问诗学批评成就的《论诗》三十首全部收入。前有插图四幅。编排以元诗写作先后为序,大多依据清人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部分参酌历代各家及近人的意见,某些很难确定具体年月的作品,则约略指出它的写作时期。本书保留元好问的少量自注,郝注分题解和诗注两部分,文字颇准确简明。

(卢兴基)

【元遗山先生年谱】 年谱。清翁方纲编订。二卷。是元氏的第一个年谱,见于翁氏《苏斋丛书》。清光绪诸书山房刻张穆校订之《元遗山先生全集》并为一卷收作附录。此外又见于《粤雅堂丛书》二编第十四集。1978年台湾《新编历代名人年谱集成》第一集收录。本谱按一般惯例,于每年之下,略叙谱主行迹,次及依据的材料。对于有疑之处,则略加考订。如据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等同时代人所留下的史料,辨明元德明系元好问的生父。他幼年嗣出,随嗣父元格赴任离乡。补正了《金史》本传仅提其父为元德明之失。但整体上,翁谱叙述简略,因而有时不免疏漏,然有草创之功。

(卢兴基)

【元遗山先生年谱】 年谱。清施国祁编订。施谱载于其《元遗山诗集笺注》书前,采用分栏列表形式。“纪年”表示正朔;“时事”记朝政大事;“出处”述谱主生平事迹;“诗文”则为作品系年,是本谱重点。本谱较翁、凌二谱为系统,但所列系年作品仅占谱主诗文的一部分,也未征引其依据,比较简略,较详细的说明见于施氏的笺注。光绪张穆校订之读书山房本《元遗山先生全集》附录本谱。(卢兴基)

【元遗山先生年谱】 年谱。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翁方纲的门生。此谱吸收了翁谱的一些成果。凌氏修谱前曾得到翁氏的指点。脱稿以后,又读到了先于他完成的翁谱,于是加以对照,取“稿中所未备者补录焉”。实际本谱材料较翁谱丰富,对翁谱疏略之处,也时有考订辨正。缪钺评之为:“大抵知人论世,凌氏为精。”本谱收入凌氏《校礼堂全集》,张穆校订之读书山房本《元遗山先生全集》收作附录。(卢兴基)

【广元遗山年谱】 年谱。上下两卷。清李光廷编纂。撰于同治年间,见《适园丛书》第十一集。张穆校订之读书山房本《元遗山先生全集》和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均收作附录。本谱对前此各谱综采优长,汇于一炉,并进一步充实材料,考订谱主生平事迹更为详尽,是以名之曰“广”。其体例和内容,据作者自叙曰:“乃以文为经,以诗为纬,考之舆地,以求其踪迹;博之史集,以征其交游。”诗歌编年,达一千二百七十九首之多,占现存元诗的绝大部分,其中难免武断,后人亦已指出,但仍可资参考。(卢兴基)

【元遗山年谱汇纂】 年谱。今人缪钺编订于1935年,连载于《国风》杂志1935年10月、12月第七卷三、五两期。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收作附编。本谱对前此各谱“参稽互校”,作了“析中研寻”的工作,“其有谬误,间为辨正”,所以名之为“汇纂”。补充了不少材料,是各家元好问年谱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本谱体例为每年之下,撮叙谱主近迹为纲,而以所据资料为目,诸家考证论断及编者之按断皆附焉。如金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本谱分列“在陵川,曾赴试并州”与“本生父(元)德明卒”二事。对可编年的诗词散文,又区别年月,各列论据和按断,较各谱更为严密明晰。诗词系年,撰者认为李光廷谱常未免武断,本谱编年作品数量虽有所减少,但较翔实可信。本谱搜辑元好问资料甚丰,对难以遽作判断者则存疑待考。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此外,本谱还增加了交游考及同时代著名人物的活动和生卒,可资参照比较。(卢兴基)

【虞文靖公年谱】 年谱。清翁方纲撰。翁氏喜虞集诗,曾手自抄录虞集《学古录》中诗及《道园遗稿》,得八卷,又补入二卷,成十卷,题为《虞文靖公诗集》,并为制年谱附集中。此谱首为世系图,始于唐虞世南,终于虞集兄弟,依据为欧阳玄所作《虞集神道碑》。年谱内容主要有三:一为虞集本人之事,一为国家重大事件,一为著名文人生卒,间系有虞集诗文。编者态度严谨,所系必有依据,如虞集生年,据谱主本人所作《送黄敬则序》、《跋潇湘图》,定为宋度宗咸淳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如无可靠材料,则宁缺而不录。(史铁良)

【铁崖古乐府注】 元诗别集注本。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乾隆刻本校刊。与《铁崖咏史诗注》、《铁崖逸编注》合为一函。《铁崖古乐府注》吴复编,楼卜瀍注,杨裴午订。书前有楼卜瀍序、张天雨序、吴复叙。吴复字子中,杨维桢及门弟子,其《叙》曰:“铁崖先生为古杂诗凡五百馀首,自谓乐府遗声。夫乐府出风雅之变,而悯时病俗,陈善闭邪,将与风雅并行而不悖,则先生诗旨也。”又曰:“先生在会稽时,日课诗一首,出入史传,积至千馀篇,晚年取而读之,忽自笑曰:‘此岂有诗哉?’亟呼童焚之,不遗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钱塘、太湖、洞庭间之所得者。”前云“古杂诗凡五百馀首”,但本集共十卷,收诗四百三十馀首,不知何以故,或吴复当时即有所删汰。张天雨是杨维桢朋友,观其落款曰“方外张天雨”,当是僧侣或道士。张序云:“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词,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该书编成于至正六年(1346)春,张序写于同年十月。时杨维桢方满五十岁,尚健在。乾隆甲午年(1774),同邑学者楼卜瀍为之作注,杨维桢十三世孙杨裴午订,并刻印刊行,是为乾隆刻本。该书每卷目录(第十卷无)后由编者加按语,标出篇数,并概括内容与创作主旨。篇中偶有简明注释。(毕宝魁)

【铁崖咏史诗注】 元诗别集注本。清楼卜瀍注,杨之光、杨之昂订。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乾隆本校刻,与《铁崖古乐府注》等合为一函。该书八卷,收诗二百四十馀首。书前有楼卜瀍序云:“杨铁崖先生《古乐府》,编自门人吴复,人称《铁雅》。外此有《咏史诗》,编自门人顾亮,人称《铁史》,予求顾编不可得,盖书缺有间矣。前明万历中,先外王父渊止陈公为刊《古乐府》行世,强半皆咏史诗,吴编所不载。予既出吴编付梓,因删去已见者不重出,另录咏史诗加之笺注,都为一集,名亦仍旧题曰《铁崖咏史诗注》。”据此可知,杨铁崖《古乐府》诗集在清时有

两种刻本,即元时吴复编本和明万历陈刻本,而两本诗目不同。楼卜瀍据吴复编本先注成《铁崖古乐府注》,又据万历陈刻本,删除其与吴刻本重见者,再另录咏史诗加以笺注而成本书。此书之注释体例与《铁崖乐府诗注》相同,惟于每卷目录后无按语,每篇诗是否有“序”(或“引”)亦未注明。(毕宝魁)

【铁崖逸编注】元诗别集注本。清楼卜瀍注,周公瑗、金廷楷订。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乾隆本校刻,与《铁崖古乐府注》等合为一函。书前有楼卜瀍序,述其成书过程。由此可知该书是楼卜瀍注完《铁崖古乐府注》、《铁崖咏史诗注》二编后,将所能搜辑到的杨铁崖诗合为一集,再加注释,故称之为“逸编”。该书分八卷,收诗三百余篇。注释采用双行小字附于篇末,比较简略。楼序云:“先生之诗,据《自序》则有《琼台曲》、《洞庭杂吟》五十卷。据宋潜溪《墓志》则又有《平鸣》、《云间》、《社上》诸集,通数十卷。余所散见于各选家者,有《复古集》,有《铁笛集》,有《铁龙诗》,有《铁崖集》,有《东维子集》,有《草元阁后集》。集如是其多而传者无多,则不传者多矣。”《铁崖古乐府注》、《铁崖咏史诗注》、《铁崖逸编注》三书共保存杨维桢诗作近千首,于研究元末诗坛颇有价值。(毕宝魁)

【王冕诗选】元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张堃选注。为《浙江历代名家诗选丛书》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版。本书选录一百五十九首,按内容分十类,如第二类是反映元代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与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作品;第四类是纪游之作;第十类是咏梅之作等,王冕以画著称,所以题画诗选得较多,又因他最工画梅,因而咏梅之作另立一类。这种分类便于读者掌握诗人的思想性格特点,但各类不免有所交叉。注释浅显易懂,前言介绍王冕生平甚详,书后附《谈谈关于王冕的评价问题》一文,对王冕是否曾见朱元璋,接受谥议参军之职,并为明军策划攻取绍兴一事作了辨析。(史铁良)

【萨都刺诗选】元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刘试俊、张迎胜、丁生俊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萨都刺系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曾被誉为“一代词人之冠”,著有《雁门集》,收有八百首诗和十四首词。本书从中选诗一百九十五题二百余首、词十首。前言介绍萨氏生平,依据历史资料和萨都刺这一名字的语源,论证萨氏为回族,而非蒙古族。并据萨龙光编辑《雁门集》所提供的资料勾画了他的生平轮廓。本书体例为每诗首条注释解题,以下注释亦颇为详尽,有的近于串讲。(史铁良)

【明诗评选】明诗选评本。八卷。清王夫之编选。此书共选明诗一千一百首左右。一、二卷为乐

府歌行,三卷为四言诗,四卷为五古,五卷为五律,六卷为七律,七、八卷为五、七绝。此书重点在表现编选者之诗学观点。选择作品与一般明诗选本不同,很有特点。一是重视明初诸家,刘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袁凯等人入选作品最多,选者认为:“五百余年除宋人烟雨而披青天临白日,洪武诸公廓清之功大矣。”与此相反,对于形成派别(如“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竟陵派”)诗人的作品选得很少。竟陵派中只选谭元春一首。这里除了反映王氏对明末各派之间多党同伐异之争斗的恶感外,主要还是对他们作品或雍容平板、或肤廓滑易、或冷峭幽深诗风的不满。另外选独立于这些家数之外的诗人,如杨慎、徐渭、唐寅、祝允明、王穉登、汤显祖作品也较多。二是入选各家都经过编选者的改造。以乐府歌行来说,入选的多是风流绮旎的作品,仿佛这些作者皆是专写齐梁初唐体的诗人,而把他们学杜、学盛唐,或直接学汉魏乐府的作品一概摒之门外,实际上不能反映这些诗人的整个面貌,更不能表现明诗的整体面貌。另外,书中评语直接表达了选者对诗歌的看法。如他重视某种诗歌体裁的开始时的作品,他认为七言之制始于齐梁,如果“作七言而忌齐梁,犹作四言而忌《三百篇》,作五言而忌《十九首》也。报本亲始之义,胡豺獭之不如耳”。对于通俗的民歌、韵文,对于长庆体,王氏简直深恶痛绝,反映了士大夫的阶级偏见。有民国初湖南长沙刘人熙刻本,后收入太平洋书局排印《船山丛书》。(王学泰)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辑)】论文集。江苏师院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编纂。编者认为明清诗文有保守摹仿的一面,也有突破唐宋以前樊篱、提供新东西的一面,在研究领域,还有不少矿藏有待开发。本刊就是编者在明清诗文研究开发上的成果。本期主要内容包括清人佚稿及未经刊行的有价值遗著的评介;明清人诗词论的专评,如大词人陈子龙的词论、梁任公的诗论等;明清诗文作品的评述;《清诗纪事》一勾;有关明清诗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和国外研究动态。有关诗歌的论文有江村《馆藏明遗民陈璧诗文残稿初探》、吴企明《论明诗与杨维桢的关系》、何振球、袁雪洪《夏完淳和他的〈南冠草〉》、严迪昌《论黄仲则》、王永健《试论贝青乔的〈咄咄吟〉》、尤振中《黄遵宪诗文对沙俄侵略罪行的揭露》、梁文《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陈少松《诗歌表情艺术的有益探讨——梁启超诗论研究之一》、潘树广《清代诗文别集目录述略》。此刊为今人钱仲联编纂,由江苏师院自刊,于1982年发行,后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王学泰)

【高青邱诗集注】明诗别集注本。十八卷。清金檀辑注。檀,字星轺,桐乡(今属浙江)人。他好蓄异书,藏书处为文瑞楼。金檀辑注的《高青邱诗集》,是最为完备的版本。他以明景泰年间徐庸刊刻的《高太史大全集》为底本,又从明成化年间张习刊刻的《槎轩集》补入了不少佚诗,还广泛地从方志及他人编辑的合集中搜辑了许多遗诗。金檀的辑注,颇注意诗意的发掘,凡“诗中有用古事暗切时事者,必拈古事、按时事以并注”(见其《例言》)。这对研究高启诗作颇有助益。金檀的《高青邱诗集注》还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如《大全集》中卷四《约同宿鹤瓢山房》诗,“阿咸”误作“何臧”,卷五《驱疟》诗,“笑嗤”误作“爽垲”等,都一一加以订正。此外,因字音相似、字形相似而形成的错误,也处处加以厘正。金檀的《高青邱诗集注》,还附载了高启的文集《凫藻集》五卷、词集《扣舷集》(不分卷),附录了金檀撰写的《青邱高先生年谱》。金檀在序中说,此集注“凡四易寒暑,始获告竣”,可见其用力甚勤。金檀的《高青邱诗集注》刊刻于清雍正六年。今人徐澄宇、沈北宗对金檀辑注加以校点,以《高青丘集》名,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尹恭弘)

【高启诗选】明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陈祉斋选注。明清两代注明人诗专集者不多,而高启诗集则于清雍正间有金檀注本问世,日本明治间近藤元粹亦有《高青邱诗集注》,并加圈点评批,可见高启诗为中日读者之所重。此编为刘逸生主编《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之一种,选诗一百二十三首,注重选取感情充沛、明快真率之作品。其长篇古体如《青邱子歌》、《题滕用衡所藏山水图》、《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南园》等皆被选入。本书注释以通俗简明为主,不作过分繁琐的征引与考据,但往往在诗句之间加以串释,并在每诗最后一条注释中,用简单语言概括诗意。每诗之前皆有题解,编选者善于用简练而富于感情的文字介绍该诗之写作背景、缘起。《逢吴秀才,复送归江上》题解云:“此诗淡淡写来,中有无限沧桑之感。再三诵之,唯觉酸鼻。经过一场大乱之后,重遇故人,才喜彼此无恙,又匆匆握别,难问前期。末句真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神味。”此书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在香港出版,向海外发行。198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用原版胶片在广州重印,向内地发行。(王学泰)

【青邱高先生年谱】年谱。清金檀撰。《青邱高先生年谱》附于金檀辑注的《高青邱诗集注》之后。金檀在年谱的小引中说:“余读青邱诗,按其时事,则先生之生平,历历可考见之者。”可见金檀是从高启本身的诗作与当时的时事两个方面探索高启之生

平,因而此年谱的记述比较准确。此年谱还考证出高启的许多诗作的创作年代,对研究高启诗作的创作演变颇有助益。另外,此年谱关于高启死因的记述也比较客观,排斥了《吴中野史》所记述的“因诗触怒,假魏守之狱”的说法。(尹恭弘)

【明李文正公年谱】年谱。清法式善撰。此年谱附载在清嘉庆年间刊刻的《怀麓堂全集》里。法式善所撰年谱对诗人李东阳本身的活动进行记述,尤其是对其政治活动的叙述较为详赡,引证了《馆阁漫录》、《辅世编》、《治世余闻》、《内阁行实》、《明朝典汇》等书籍中的原始史料,可资参证之处不少。另外,此年谱对李东阳部分诗文进行了系年,对研究李东阳诗文发展演变也有助益。但,此年谱对李东阳所活动的时代背景未作记述,是为缺点。(尹恭弘)

【于谦诗选】明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林寒选注。于谦为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于诗是作者高尚人格的直接表现。此编选于诗一百三十四首,以《于肃愍公集》为底本,其编排方法亦完全按照此集之编次,即杂体诗(选二十二首)、五言律诗(选十八首)、七言律诗(四十首)、五言绝句(选二十七首)、七言绝句(二十七首)。书中除选诗外还有“注释”与“说明”两部分。“注释”以解释字词和典故为主,“说明”则以阐释诗意与分析作品思想或艺术特色为主。书前有前言,其中除了介绍于氏生平经历之外,对其人品、诗品皆有很高的评价,书后附有《于谦年谱简编》,系据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订正、增补而成。此书初编于五十年代末,初版本选诗仅一百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时,增加篇幅,订正了初版时的一些舛误。(王学泰)

【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明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李天舒选注。唐以后西北诗学日衰,明代陕西、甘肃出现几位较有名气的诗人,纘宗即其一。然其身后,亦颇寂寞。清初朱彝尊在《明诗综》批评胡氏“诗未入格,顾沾沾自喜,到处留题”,近代、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更是绝口不提胡诗。编选者有感于纘宗受到如此不公正之待遇,编选此集,以期引起世人之重视。此选“所收诗作,绝大部分选自《鸟鼠山人小集》和《鸟鼠山人后集》,另有少数诗选自《拟涯翁拟乐府》”(《前言》)。选诗四百五十首,其中在北方所作者二百零七首;在南方为官时所作者二百四十四首。《小集》为胡氏归田以前作品。始于正德五年(1508),止于嘉靖十八年(1539);《后集》为胡氏归田以后作品,始于嘉靖十八年,止于嘉靖三十年;《拟涯翁拟乐府》作于嘉靖十五年在河南为官时期。本诗选的编排依诗人生平行踪分为十个时期,即京师时期、巴蜀时

期、南京时期、安庆时期、苏州时期、山东时期(前、后)、浙江时期、山西时期、河南时期(前、后)、归田时期。胡氏诗作一般都有很强的现实性,从诗中涉及的地点、事件、人物不难判断其所属时期。但也有少数作品缺乏明确的时间标志,只好依据其前后诗作的时间予以推定,“每一时期内诗作先后顺序,尽量依照其在原集中的顺序,也按诗体分类编排。其中有明显不合理的,则适当予以调整”(见《前言》)。编者对于入选之诗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对于诗中所涉及的人和事注释尤详。作者游宦一生,足迹半天下,所交往者三教九流。其诗所涉及人物、事件、地理极繁,编选者皆能一一注出,实属不易。另有“评说”一目,主要评所选诗之得失,言简意赅。书前有《论明代诗人胡纘宗》之长文,对胡氏为人及创作成就作了较中肯的评价。书后附“胡纘宗友人赠答诗选”,入选者十三人,皆当时名流,如康海、杨慎、王守仁、顾璘、文徵明、祝允明、黄佐、边贡、谢榛等,选诗二十七首。此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王学泰)

【唐伯虎诗选】 明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宋戈选注。寅诗通俗易懂,不重格律,为正统文人所轻,言其诗如“乞儿唱莲花落”,故唐氏只以绘画、书法享大名,而诗文则默默无闻,更无注本传世,故此编亦属草创。编选者从唐氏留存的数百首诗歌中,选出古诗、律诗、绝句共一百首,予以注释和简要的分析。选诗“力求取其上乘之作。但为了有助于读者认识唐伯虎思想与创作风格之全貌,也适量选注了思想性欠强或有较明显消极倾向的作品”(《后记》)。本书注释,力求简明。注释中涉及典故或较生僻的词句,一般均指明出处,并适当引证前人作品中意境或用法与之相类似者,以资比较对照,触类旁通。各诗所注,重在词句,多未作逐联或全篇之通释。注释之后有“说明”,藉明诗意,或分析此篇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上的得失。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王学泰)

【杨慎诗选】 明诗别集选本。今人王文才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杨慎是明代中叶的一位重要诗人。他“沉酣六朝,揽采初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在当时诗坛上独立门户,自树一帜。选集辑了杨慎在讽陈时事、忧愤贬逐、寄情交游、题咏山川等方面的优秀之作,以显示杨慎诗作那种含蓄蕴藉、自然流丽的风格。选集所选诗作,“以万历初刊《升庵文集》、《遗集》为底本,参校万历重刊文集二种、嘉靖单刻《玉堂》、《南中》诸集,间取选集、诗话、杂著、拓片及方志校勘”(见《凡例》)。注释详赡,对疏通诗意、窥见诗心颇有

助益。选集编次“略仿钱笺杜诗,分体编年;年次无考者,依类附列”(见《凡例》)。王氏另有专著《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对杨慎生平及其著作情况叙述甚详,可资参考。(尹恭弘)

【杨文宪公年谱】 年谱。明简绍芳编。绍芳,名不详,绍芳为其字,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据《玉笋诗话》记载,绍芳“弱冠客游滇南,题诗山寺。杨升庵一见异之,使人物色,遂定忘年交,出入必引与俱”。可见,简绍芳为杨慎挚友。此年谱本名《赠光禄卿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后清人孙祺校刊《升庵全集》,将此年谱附入,改名为《杨文宪公升庵先生年谱》。因简绍芳与杨慎交游多年,对杨慎的生平事迹了解甚详,所以此年谱的记述基本准确。《明史稿》、《明史》的杨慎传均依据此年谱撰述。有人谓简绍芳先于杨慎而卒,所以谱中杨慎七十以后之事,以及谱末论赞其学行、汇录其著述,皆杨慎子侄所补,待考。

(尹恭弘)

【吴承恩年谱】 年谱。今人刘修业撰。《吴承恩年谱》完成于1947年,首先发表在《周叔弢先生六十一生日纪念论文集》内,后又同《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著述考》一起收入刘修业撰著的《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中。此三篇著述还附录在刘修业校点的《吴承恩诗文集》的后面。由于刘修业遍读正、嘉、隆、万间的明人集子,又参考了许多明末清初的地方志,所以她撰写的年谱比较扎实、可靠,正如孙楷第为此三文所作的旧序中所说:“这是真才实学,不是小玩意儿。”当然,随着近年来资料的不断发现,此年谱也有待充实、修订。苏兴撰写的《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刘怀玉撰写的《吴承恩年表》(附录在《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就是在刘修业《年谱》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尹恭弘)

【徐文长自著畸谱】 年谱。徐渭自编。此《自著畸谱》先收入张维城(即张岱)校辑的《徐文长逸稿》(刊刻于明天启三年,1623)中,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的《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将其收入补编中。徐渭自编的《畸谱》虽较简略,然而是最原始的材料,所以值得研究者重视。此《畸谱》叙述徐渭到处迁徙的时间、出入狱的时间以及嫡母、生母去世的时间,都很准确,足资参考。另外,还记述了他的老师、知交、师长式的人物,这对研究徐渭的人格形成、思想风貌很有助益。(尹恭弘)

【袁中郎】 论文集。近人任维焜等撰。此书是研究明代诗人、散文家袁宏道文学成就之专题论文集。1935年由上海今知社编辑部编辑,今知社出版部出版发行。全书最主要部分为《袁中郎的生平》、《袁中

郎的思想》，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他还包括周作人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代序，此文乃从周氏所著《中国的新文学源流》一书中截取）、《袁中郎全集序一》，刘大杰撰《袁中郎的诗文观》、《袁中郎遗事》，阿英撰《袁中郎与政治》、《袁中郎尺牍序》，张裕钊撰《袁中郎与佛学》，郁达夫撰《袁中郎全集序二》，周木斋撰《读袁中郎集》，刘燮撰《公安小品文之一夕话》，陈子展撰《公安竟陵与小品文》等等。此书虽以论袁氏小品文为主，但在评介袁氏生平、思想、诗文观时也多涉及其诗学观点与诗歌创作成就，是一本较早的以新文艺观点分析袁宏道文学创作的论文集。

（王学泰）

【袁宏道集笺校】 明人别集笺校本。五十五卷。今人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此笺校本全部按年按集重编。其分集分卷体例，均依作者生前手定各集名称及卷次；编年亦基本按照各集次序，其有原集编年次序颠倒错乱者，则为之考订改正。作者未及编集之遗文，另编为《未编稿》三卷，亦以诗文分别按年编次。新编全集共为诗文五十五卷：一至二卷为《敝篋集》，三至六卷为《锦帆集》，第七卷为《去吴七牍》，八至十一卷为《解脱集》，第十二卷为《广陵集》，十三至二十二卷为《瓶花斋集》，二十三卷为《广庄》，二十四卷为《瓶史》，二十五至四十四卷为《潇碧堂集》，四十五至四十七卷为《破研斋集》，四十八卷为《觴政》，四十九卷为《墨畦》，五十至五十一卷为《华嵩游草》，五十二卷为《场屋后记》，五十三至五十五卷为《未编稿》。笺校本以佩兰居四十卷本为底本，又校以下列各本：（1）吴郡书种堂本，（2）袁小修编校本，（3）梨云馆本，（4）《袁中郎十集》本，（5）《袁中郎未刻遗稿》本，（6）翠娱阁评选本，（7）《明诗钞》。不论校改或牖陈异文，都作出校记，附载各篇之后，其取舍从违，若有未当，读者自可再据校记覆案。笺注者还根据各种方志、文集、史籍、笔记等书，搜索勾稽，将集中诗文有关朋辈交游、时事背景、专门制度、经历地理等，均已加笺。事属新创，其功甚巨。如十四卷《夏初黄无净邀同项玄池诸公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一诗及二十二卷《答黄无净祠部》书信中之“黄无净”，笺校者先自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一中知有《夏日高户部循卿招饮大通桥同黄太常思立张国博叔阁项参知庭坚及舍弟中郎》一诗，知其时与宏道兄弟同游者有黄太常思立其人，又自同书卷五中查知《同黄立赵贞甫集萧允升斋中谈禅甚快各赠一诗》中有“念我同门语”一语，知此黄思立系袁宗道之同年进士，又自同诗中“近通无净理”一语，知此人当是以“无净”为号者，然后再从《明进士题名碑录》中查知万历十四年与宗道同举进士之黄姓共有

六人，再据此六人之名里分别查阅各人所属地志，最后方在《赣州府志》中查知此字思立者名大节，曾任太常博士及礼部员外郎，与宏道诗文所述字号、官称适相符合，方考定此黄无净乃黄大节。由此可见其笺注之不易。

（尹恭弘）

【三袁诗文选注】 明代合集选注本。今人李茂肃选注。“三袁”为公安派开创者及中坚，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而不在诗，但“三袁”（特别是袁宏道）在诗歌创作中亦自有其特色与成就。此书选“三袁”诗三十馀首，其中宏道诗二十馀首，多选能体现其文学主张与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品。注文包括“说明”、“解释”两部分，前者介绍该篇写作背景与题意，后者注解字句典故。注文通俗明了，便于初学。书前前言介绍了“三袁”生平、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成就。此书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王学泰）

【陈子龙及其时代】 诗人评传。今人朱东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书除自序外，共分十三章。是书很注重诗人陈子龙所处时代情况的描述，由此说明诗人陈子龙一生三次变化的动因：“从青年到二十岁，他是名士，他关心的主要是诗文，他的作品，和当时的一般名士比较，没有多大的不同，摹古的气息甚至比同时人更突出。从三十岁到现在（指崇祯十七年），由于他接触到黄道周，他认清了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国步的艰难，他不再是一般的名士了，他是志士，确实以国事为己任。待到这一年出任兵部给事中以后，他是战士，他看到国家的艰难，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最后终于在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从子龙的一生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尹恭弘）

【夏完淳集笺校】 明人别集笺校本。十卷，诗六卷。今人白坚笺校。此编为完淳全集笺校，卷一为赋，卷二至卷七为诗（分体编排），卷八为诗馀（词）、词馀（散曲），卷九为散文，卷十为《续幸存录》。全书以王昶、庄师洛等人所辑，于嘉庆十四年（1809）刊于松江之《夏节愍全集》为底本，校以乾隆间松江封氏抄本《夏内史集》、吴省兰所辑收在《艺海珠尘》中《夏内史集》、四川重刊本《夏节愍全集》以及各种总集、方志、史籍、笔记载有完淳著作者，并出较为详尽之校记。其笺释以考订写作年代、背景、本事及作者经历、活动、交游为主，尤重南明史事，所考订论断及详略重轻，悉本诸实际。对于前代典故，一般不予笺释，但如用于拟当时人物及南明史事者，则用一二语点明。郡邑、山川、胜迹，一般不予笺释，但如与南明兴亡密切相关，往往涉及写作背景与本事，则酌情予以指明，并将诸家评语，附于篇后，以为参考。还将

与原相酬唱、和韵及其相关之作,附于每篇之后。书后有附录六种,为:夏家先世资料辑存;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传记事略辑存;丁亥南京之狱清朝实录档案辑存;夏完淳集序跋题词及评论辑存;同时投赠哀悼及后世凭吊纪念之作辑存;夏完淳集笺校参考征引书目。该书前言论夏完淳人格及其创作,并给予高度评价,文中指出“完淳的生平和作品古今罕匹”,他的“光芒是照耀后世,历久而不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学泰)

【清诗选】清诗选注本。今人丁力选注,乔斯补注。本选连无名氏在内计收诗人三百六十五家,诗九百七十首,分上中下三辑,上辑录清初之诗,包括顺治、康熙、雍正各朝;中辑录清中叶之诗,包括乾隆、嘉庆两朝;下辑录晚清之诗,包括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所录诗以能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为主,其他单纯抒个人之情和单纯写景咏物者,亦适当选了一些,题材、风格力求多样。用典太多的诗除了特别有价值的外一般不选。(参见《凡例》)。编者力求挖掘过去不为人们所重的作者,至于一直享大名者,如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袁枚、曾国藩、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陈衍皆被认为是“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正统诗人”,并说“从这些徒有虚名的‘大家’的诗作来看,当然没有什么太好的诗”(《前言》)。因此,这些人入选作品很少,有人一首未选(如曾国藩、陈衍)。编者重视清初反对民族压迫的明遗民作品与晚清反抗外来侵略、具有爱国精神之作品,提出以吴嘉纪、沙张白、释函可代替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龚诗一首未选)为清初三大家。选函可诗四十五首,在全编中入选作品最多。编者认为清诗有六大特点:新乐府特别盛行;现实主义深化,使清诗成为时代晴雨表;题材扩大,清诗题材广泛超过以前各代;清诗注重白描,语言朴素自然;在形式上有所突破;清代诗论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编者注重了诗的社会内容,而对其艺术特点则缺少深入的介绍与分析,清代许多有特色的作者未能入选(如清初的孙枝蔚、余怀、黄任,清中叶的黎简、宋湘、彭兆荪,晚清的张际亮等),注释亦较简略,已被确认的石达开伪诗(《白龙洞题壁诗》)也被选入。此书编自1950年,成书于1983年,历经三十余年,还是有其特色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学泰)

【清诗选】清诗选注本。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操此书之选政者实为黄寿祺、陈祥耀,注者为教研室之同仁。全编选录清初至道光间各体诗歌六百餘首,入录作者一百五十八人,始于林古度、钱谦益,终于陈沆、潘德舆。这一时期代

表作家皆有作品选入。如清初遗民诗人:阎尔梅、傅山、杜溶、钱澄之、顾炎武、申涵光、王夫之、归庄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南施北宋:施闰章、宋琬;“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以及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代表人物乃至宗唐、宗宋诸家几乎网罗殆尽。选诗注重各种题材、各种体裁、各种风格之作品。每位入选作者之前有小传,记其生平爵里并评其诗。注释详尽。书前有陈祥耀所撰前言,其中概述了清初至中叶诗歌之成就及不足,并对清诗的艺术成就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学泰)

【清诗精华录】清诗总集选注本。今人钱仲联、钱学增选注。此编选录清初至辛亥革命诗歌作品六百二十七首,作者一百六十餘人,全书按古、律、绝六种体裁分类编辑。选注者希望能兼及作家、作品、风格、流派、品类、样式等各方面,使读者对清诗全貌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在选作家作品上,尽可能顾及清代各种流派的名家名篇,体现作家各种风格,部分佳作则不限于名家。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力求内容健康,而又确为艺术上的上乘之作。其注释不限于注解词语与典故,兼及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颇多有得之言。钱氏将清诗分为四个时期,即清初、乾嘉、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清初为奠基期,此期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是对明末复古主义诗风的否定,为清诗发展开辟了新路;乾嘉时期,由于文字狱的残酷和社会的表面繁荣,诗歌创作脱离现实矛盾、现实生活,有创造性的作者多在艺术上探索创新之路,故此时期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但在思想内容上比较贫乏。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是清诗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它对乾嘉诗歌创作的中衰是个突破,为晚清重大变异开启先河。晚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时期,此期诗歌创作也面临重大变革,有“诗界革命”,突破了旧体诗的传统规范,也有学习汉魏六朝的湖湘派,有宗尚宋人的同光体,还有兼宗唐宋的张之洞、樊增祥、易顺鼎等。编者认为“晚清诗歌的成就,足以与清初诗坛双峰并峙,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创新方面,则更超过清初”(《前言》)。编者在选诗、为诗人立传与注释诗意时皆贯穿上述对清诗总的评价。其选诗重点也是以清初和晚清为主的。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王学泰)

【千首清人绝句】清诗选注本。今人陈友琴编选。此为编选者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为开明书店所编,名为《清人绝句选》,前有查猛济与叶绍钧(圣陶)二序,查序云:“予友陈子友琴,究心丽则,追踪集

锦之选,上自牧斋(钱谦益),下逮静庵(王国维),凡千馀首,旁采闺阁,间及方外,皆清绝之上乘也。”叶序云:“陈先生这个选本,所选有四百家光景,清代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露脸。我们取来讽读,就好比跟一代诗人促膝谈心,听他们诉说浑凝的诗感,确是快事。”八十年代,编者在原选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在篇目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增选了一批作者;原编限于篇幅,注释未能详尽。新编本增加了较为细致的注释,并参考多种材料,为入选诗人作一小传,记其生平,并品第其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学泰)

【岭南三家诗选】清诗合集选注本。清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撰。今人刘斯奋、周锡馥选注。岭南诗兴自明初,至清初而盛。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为岭南诗人水平最高者,故清初王隼有《岭南三大家诗选》,刘、周以为“王选本收入了三家的若干好诗,但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是选者往往从忠孝节义一类封建道德标准出发取舍作品,选进了不少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不足取的,或者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思想性却比较糟糕的作品。其次,‘岭南三家’作为广东籍诗人,他们曾经写了不少反映广东地方风貌的作品,这是‘岭南三家’诗的一个重要特色。王选本对此也注意不够”(《前言》)。本书试图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多方面选择三家代表作品,并考虑三人的实际成就,选屈大均诗一百首、陈恭尹八十首、梁佩兰四十首。作品取舍上力求照顾到思想性、艺术性两个原则,并适当多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屈诗分编年与不编年两部分;陈诗大体编年;梁诗分体编年。注释分两部分,先作题解,内容包括诗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语句注释,比较深奥曲折的,一般都整句译出,解释诗句,通俗细致,便于初学。此编属于《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王学泰)

【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清诗选注本。今人王英志编选。清代绝句在清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代有名家,如清初吴伟业、顾炎武、王夫之、朱彝尊、王士禛、屈大均、查慎行;清中叶之郑燮、袁枚、赵翼、黄景仁、张问陶;晚清之龚自珍、黄遵宪、苏曼殊等人。五七言绝句皆各有特色。此编选入有清一代诗人绝句五十家,入选诗人作品篇数多则为十首,少则为五首。诗家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同年生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每一诗家的入选作品按内容排列。每人名下有小传。每首诗先注释,后点评。入选诗家尽量照顾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者。同一诗人入选作品考虑题材与风格的多样性。本书只选常见的五绝和七绝。注释侧重于释字与词义(难字注音)。每一释词

后尽量附列前人较早的有关诗句或文句为佐证,以助于深入理解。点评不拘一格,就其内容意蕴或艺术表现的某一点略作阐发,不作周详的赏析;特别注意从诗人的理论与创作相互印证角度进行阐述,试图使读者能借其诗作略知其诗学观点之一斑(参见本书《凡例》)。入选诗人皆附小传,介绍其生平及诗歌创作之成就。全编共选诗三百三十首,清代擅长绝体者多已入选。前言介绍清绝句之概况及成就,后附选注所据诗集与参考书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王学泰)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清诗选注本。今人张玉兴选注。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经常把“免死减等”的重要“罪犯”流放到东北沈阳、尚阳堡、宁古塔、伯都讷、船厂、卜魁、瑗珲、三姓等地。人数最多曾达十几万人,其中也有文人士大夫。这些人被遣,多非其罪,或因对异族统治不满,或因冒犯专制统治。他们在戍所虽然身处困厄,但仍不废吟咏,勤于写作。异域的风光,奇特的风俗,险恶的环境以及抑郁的心情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皆有所反映。这些著作多已散逸,今天能见到的诗歌作品尚有万首之多。编者从中选录五百馀首,作者四十八人。其选录标准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并重。凡有作于戍所之诗或反映流放生活之作者,均在选录之列。凡无诗集行世者,酌情放宽选录标准,不因诗少而遗漏一位流人诗家,以诗存人。凡有诗集传世者,则认真选择,尽量录其名篇佳作。故本书所选之诗,仅为已经发现流人诗作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已经基本上荟萃了流人诗作之精华。选录作品注重使各种内容、各种体裁、各种风格俱备,以达到尝一脔而知鼎味之效果。本书所选作品以形象化语言记录了清初社会的动荡与人们遭受的苦难。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众多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特别是有关东北地区的史事,皆在此编中有所反映。无论是流人怀念故国、抨击时弊、抒发愤懑、哀叹不幸,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描摹风土民情、讴歌边疆山河、赞颂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皆写得质朴无华,感人至深。编者在选诗和注释时注意到用诗存史证史,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因此,该书具有浓重的史学色彩。书中为每位诗人所作小传皆极详赡。书后附录至东北戍所探视流人者之诗作,录六人诗五十六首。附录二为清代东北流人大事年表(顺、康、雍三朝部分)。附录三为清代东北流放地点示意图。此书亦有遗漏,既名为“清代”,不应限于顺、康、雍三朝,或许编选者认为自乾隆元年(1736)之后再无汉人遣戍东北者,实际当年名士卢见曾即获罪被遣戍东北,著有《出塞诗》一卷。该书1988年辽沈书社出版。(王学泰)

【清名家诗钞小传】 诗人评传。四卷。清郑方坤撰。此书即《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是清初至雍正诗人评传之结集，共收诗人一百零四家，诗集一百零四种，最末一种《联句合钞》为王士禛、宋琬、朱彝尊、查慎行等人联句诗合钞。书中以诗钞传人，清初名家多尽于此。每篇小传之中除了记传主生平经历之外，重点在于评论其诗之风格特色及其源流。如《〈弱水诗钞〉小传》评屈复诗云：“其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谓陶之《饮酒》、郭之《游仙》、谢之《登山》、左之《咏史》，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而姑借题发挥。必沾沾然执是数者求之，是之谓买椟而还珠，按图而索骏。今试取《弱水集》读之，繁音促节，词多悠谬，知翁之寄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言其诗“大率多残山剩水之思，麦秀黍离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乱流欲渡，令人累欷增戚而不能已”。证之屈氏作品，这些评论十分贴切。此书有清乾隆间刊本，民初扫叶山房石印本改为《清名家诗人小传》，收入《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王学泰)

【清代诗人艺谈录】 清诗专著。不分卷。清张维屏撰。此书两部分，第一部分评清初至道光间诗人三百一十人，始自顾炎武、魏际瑞、钱谦益，终于谭溥、周玉衡等；第二部分评粤东籍诗人二百四十一人，始自陈恭尹、屈大均（为避文字狱易名为“屈华夫”）、梁佩兰、程可则，终于徐灏、萧谏。每位入录诗人记其字号爵里、轶事，摘其名句，评论其诗风。如评乾嘉间诗人梁同书云：“号山舟，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官侍讲。嘉庆十二年丁卯，公重宴鹿鸣，加翰林院侍讲学士衔。公书用米法，七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鉴止水斋集》）山舟性不近妇人，不宴客，亦不赴人之宴。（《随园诗话》）摘句，毕竟人间胜天上，不然刘阮不归来。（论刘阮事，此为最妙）。”此条是较短小者，仅百馀字，有长达四五百字者。作者自云：“海内诗人众矣，诗亦多矣，岂能遍录？吾唯就吾耳所闻、目所接、心所藏、意所惬者录之，有疏漏，俟他日补之。兹编虽以少为贵，然熙朝之盛事，艺苑之博闻，山川景物之瑰奇，人情物理之繁变，皆可于此见之。观者勿徒以诗话视之。”此编原题《艺谈录》，属于《松心十录》之一种，为庚集，后经维屏门人沈世良、倪鸿校订，较其《国朝诗人征略》完整。今人杨扬据此点校录入《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之中。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王学泰)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二辑)】 论文集。苏州大

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编辑，钱仲联主编。此辑有关诗歌论文有马以君所辑、黄节所撰《蒹葭楼集外佚诗》，马以君《老师·名号·后人·佚诗——补正黄节研究中的几点疏漏》，邹自振《汤显祖诗歌选评》，朱则杰《明诗总结 清诗开山——试论钱谦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刘诚《南明抗清斗争的史诗——读钱秉铨〈藏山阁诗存〉》，赵杏根《论宋湘》，马亚中《简论清诗评价问题》，陈少松《简论黄宗羲的学诗主张》，王永健《晚清诗话一瞥》，徐植农《赵执信年谱》，明清诗文研究室《清人诗文集未刊稿本抄本知见目》，〔美〕黄秀洁《王夫之诗论中的情与景》，《日本百科全书有关明清诗文的条目摘译》（包括《明清诗家流派及诗论的演变》、《吴伟业》、《桐城派》三条）。此辑原为自刊本，于1982年印行。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学泰)

【明清诗文论文集】 论文集。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编纂。此编以研究清诗为主，所收论文十二篇，研究清诗论文十一篇。包括吴孟复《别才非学最难凭——略谈清代诗风与学风》，赵永纪《屈大均的诗论和诗》，王则远《朱彝尊的诗论初探》，朱则杰《论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及其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钟培贤《沈德潜的诗学及其诗作论析》，马亚中《论姚鼐的诗》，赵杏根《时代的现实，进步的思想——论姚燮诗论创作的主要内容》，刘诚《王闿运和“湖湘派”的诗歌》，王英志《清人论诗管窥》，白敦仁《清代贵州厘金及郑子尹的〈抽厘哀〉》，钱仲联、钱学增《〈清诗精华录〉前言》。从清初到清末皆有代表诗人被论及。198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清诗论资料汇编。清郑方坤、舒位、张维屏，近人汪国垣，今人钱仲联撰。今人程千帆、杨扬整理。此书分甲乙二编。甲编为《诗坛点将录合集》，包括舒位之《乾嘉诗坛点将录》、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附金成生《近世文人吟评》）。三篇“点将录”皆用《水浒传》人物一百零八将及有关人物来比喻，评点当时诗坛代表诗人之小传。这种用一百零八将比附著名人物群体的作法，始于明王绍徽之《东林点将录》，绍徽以《水浒》一百单八将比拟东林清流，献之奸宦魏忠贤，忠贤按图索骥，一网打尽。而“诗坛点将录”变贬斥为褒扬，如舒位序所言“爱仿东林姓氏之录，〔演〕为江西宗派之图”，可备一代诗坛之掌故。此三篇“点将录”，评乾隆至近世诗人二百馀人，始自沈德潜、袁枚、毕沅、钱载等至鲁迅、郁达夫等人。乙编则为《诗钞诗艺评点小传合集》，包括清郑方坤之《清名家诗钞小传》、清张维屏之《清代诗人艺谈录》，此五种由今人杨扬合为一书。1986年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学泰)

【初学集诗注】 清诗别集注本。二十卷。清钱谦益撰,钱曾注。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谦益族孙。曾尝从谦益学诗,谦益亦将曾视为自己传人,晚年把手稿及绛云楼烬馀藏书付于钱曾。曾笺注钱诗往往能探得作者本意,在注释上,其引证史实、笺注典事大多事核而义精,钱诗中用释典与道教典很多,注者皆能一一笺出,为读钱诗扫清了障碍;另外钱诗中多与朝政有关之作,涉及到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吴门送福清公还闽八首》中的一些诗句是以宫廷内部斗争为背景,其中有万历之时建储之争、楚宗人华越首告楚王华奎非恭王子事等皆属宫闱秘事,如不是钱曾注出,后世很难知晓。或传注中所涉及时事皆为谦益自注,不然局外人决难详其委曲如此,倘录此注文为一帙,可作别史观。此注之缺点有二:一是当时为世所熟知者不注。如《葛将军歌》是写当时领导抗税监之市民领袖葛诚,此事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故未注,今人读之,便觉隔膜。二是笺注不引原文,如注《题李长蘅为吴生画溪山秋霭图》之“岂意鲁弓还盗手”,只简单注曰:“《左传·文公九年》阳虎归宝玉大弓。”无助于对诗句的理解。此注本初刊于清初,后列为禁书。清末遼汉斋始以瞿式耜所刻《初学集》与钱曾注本对勘,合为一书,排印出版。今人钱仲联以遼汉斋本为底本,再校以瞿刻本与清初刊笺注本,并加标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排印出版。

(王学泰)

【有学集诗注】 清诗别集注本。十四卷。清钱谦益撰,钱曾注。此集所录为谦益入清后所作,许多作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非笺注难以明其意,如《左南宁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涉及到南明颇有实力将领左良玉及其与民间艺人柳敬亭的关系,为史书所不载,只有通过注释,才能理解。《有学集诗注》亦具有《初学集注》本之优点与缺点。此集本是钱曾在谦益去世后编辑而成,其注本则以抄本流传。康熙中叶以后始有玉治堂刊本。乾隆初有春晖堂刻本。后牧斋一切著作皆列为禁书,钱氏诗文尤为乾隆所深恶,故禁之尤严,直至民国间方有文明书局铅印本行世。《有学集诗注》中一些小集的编次、篇目或名称与《有学集》原本略有差别。如原本卷四至卷六的《绛云烬馀集》、《秋槐别集》在注本中改作《敬他老人集》;原本第十二、十三卷之《东涧集》仅二卷,注本分为三卷。故原本诗只作十三卷,注本作十四卷。另外在编年序列上两本也有所差异,在篇目上互有出入。估计是两书编成之年代不同,原本在谦益逝世之年(1664)即刊刻问世,十分仓促;而注本是经过深思熟

虑后编成,两本虽出于一手,其差别也不足为怪。

(王学泰)

【牧斋先生年谱】 年谱。清葛万里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虞阳说苑》甲编本。另有《别号集》本、《葛万里杂著》本,以及《国粹学报》第六卷第三期刊本。著者葛万里,江苏昆山人。谱主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为清初诗坛领袖,与吴伟业齐名。此谱记他读书、生活、仕历、游览等,内容简略。

(董文成)

【钱牧斋先生年谱】 年谱。清彭城退上编。北京图书馆有《牧斋晚年家乘文》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年谱记谱主钱谦益仕历、诗文创作及家事等。内容较葛万里所撰略详。谱前有王文濡跋,称其内容比葛谱增益十之三四,而异处亦不少。

(董文成)

【钱牧斋先生年谱】 年谱。近人金鹤冲编。鹤冲,号叔远。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民国三十年(1941)钱氏排印本。另有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排印本。此谱较为晚出,系编者于清末据谱主诗文集、族谱及葛万里所撰年谱等纂辑而成,乃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故十分详述谱主参加东林党活动,以及与郑成功、瞿式耜等民族英雄密通,与黄宗羲、归庄等民族志士交往等事。谱后之附录,辑补谱主佚事及著述目录,又有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谱前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张鸿序一篇。民国三十年本增钱文选序一篇。

(董文成)

【傅山诗文选注】 清代别集选注本。清傅山撰,今人侯文正、张厚余、方涛选注。傅氏《霜红龕集》在清与民国间曾数度刊刻,但始终无注本、选本问世。此为傅集第一个选注本,选诗二百五十首,赋六首,散文六十余篇。此选突出了关心民族兴亡与关心民间疾苦两大主题,同时也兼顾傅氏诗文内容题材的广泛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还注意到傅山不同阶段的主要活动与思想倾向,使读者对傅山有个较全面的了解。此选本在注释上也颇具特色,能把解题、注词、串句、释义几个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善于将以比兴为主作品的真意揭示出来。后附《傅山年谱》,乃编选者所撰,较丁宝铨所撰《傅青主先生年谱》更为详尽。此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王学泰)

【傅青主先生年谱略】 年谱。清张廷鉴编。廷鉴,字静生,阳曲人。谱主傅山,号青主,为著名的明遗民诗人。此谱简略至极,连谱主字号、乡里均无记载,谱中所记傅山生年及年龄次序颇错乱。正文间有双行补注,出自平遥王晋荣之手者署“晋荣注”。谱后有编者与刘霖、王晋荣等人按语,争论谱主的年

岁,分别持八十与七十九之说。此谱年代虽早,却不甚可靠,其谬多为后人考订所匡正。此谱附于《傅山遗书·仙儒外纪削繁》,另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平遥王氏刊本,藏天津人民图书馆。(董文成)

【傅青主先生年谱】年谱。清丁宝铨编。清宣统三年(1911)刊本。宝铨(1869—1919)字衡甫,号默存,江苏山阳人。缪荃孙、罗振玉校订。谱主傅山,为明遗民诗人。此谱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封皮有罗振玉墨笔题识:“宣统辛亥(1911)二月,山阳丁衡甫中丞出缪艺风参议、段笏林广文所撰青主先生年谱,属为增补。两家所制殊简略,因别撰此谱……戊午三月谨奉之比部教正。”明证此谱的真正作者是罗振玉,丁宝铨只是撰此谱的发起人。此谱资料丰富,所引资料均注明出处,以示郑重。正文记谱主游历、交往、作诗等事颇详,并记述其家事。又多记明末时事,如明清之间的战争、李自成义军的活动等,将谱主事迹纳入时代大背景中加以叙述。谱后附有谱主轶闻琐事若干条,以补正文之遗。据丁氏之序介绍,此谱是为补《谱略》之不足而编写,原《谱略》乃张廷鉴所辑,过于简略。他又声明自己是此谱的著者:“簿书之余,涉猎群籍,见有关傅先生事实者,随笔甄录,久遂成帙,按年分写,厘为一谱。”据此,则丁氏也有一些初稿,但定稿则成于缪、罗诸人之手。初刊于宣统三年,为清人所撰傅山年谱中最好的一种。

(董文成)

【傅青主先生年谱】年谱。近人罗振玉撰。即题丁宝铨编的同名年谱,当是丁氏补旧《谱略》只有一点基础,后托罗氏增补定稿,故罗氏在此谱撰成后,曾在封面上题识撰写过程,并将此谱上卷刊于《国学丛刊》第三册。从而使此谱的著作权发生了争议。原谱藏北京图书馆。内容详见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条。

(董文成)

【吴梅村诗集笺校】清诗别集笺校本。清吴伟业撰。程穆衡笺校。穆衡(1702—1794)字惟淳,号迺亭,原籍安徽休宁,移居江苏太仓。其原著《梅村诗笺》初稿成于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三十年又将初稿“分散各类,依年排次”,析为十二卷。其作笺宗旨是“惟笺诗旨,不及诗辞”,“惟贵核今,无烦征古”,加之他与吴氏同乡,时代相去不远,因此,他的解释极具参考价值。后来的吴诗笺释者,因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采纳程笺阐释作品本事的成果,而程笺也无人敢于刊刻印行,一直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六年杨学沆为程笺增写补注,又从吴梅村的玄孙翔洽处借抄《梅村诗话》原稿作为附录。杨氏对梅村原稿及程笺一再校订,然后写定清稿。此稿板心中缝镌“梅村诗集”四字,下方镌“保蕴楼”三字。1953年,黄永

年得之于上海修文堂书肆,1955年潘景郑为之题识跋语。今判定当是乾隆三十年杨氏清抄本,含诗笺十二卷,词笺一卷,诗话一卷。此本胜于后出之黄丕烈本及《太崑先哲遗书》本,确为善本。198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二册。书首有乾隆三年春程穆衡撰《吴梅村先生诗笺原序》、《娄东耆旧传·吴伟业》、《吴梅村诗笺凡例》、杨学沆《吴梅村诗笺补注弁言》、黄永年前言等文。词笺前,有程穆衡《吴梅村诗余原叙》一篇,后有程穆衡撰《原跋》、《又跋》。诗话之后,有杨学沆撰小跋一篇。全书末尾有潘景郑1955年所写跋语一篇。(董文成)

【吴梅村诗补笺】年谱。今人钱仲联著。收入其《梦苕盦专著二种》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补笺与作者笺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同时完成,旨在借笺诗以阐明明末清初史事及补旧注所未言者。首列各家注本,说明补笺所据,有程穆衡《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靳荣藩《吴诗集览》、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等,次引传记数种,如《清史稿·贰臣传》、郑方坤《梅村诗钞小传》、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吴伟业小传》等,次引赵翼《瓯北诗话》、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张尔田《遯堪书题》评梅村诗语若干条。补笺部分按《吴梅村家藏稿》前集、后集之序排列,不引原诗全文,仅录所笺之联句,于《圆圆曲》、《清凉山赞佛诗四首》、《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等之题旨、作意、内容考辨尤详。附录三种:程千帆《书吴梅村〈圆圆曲〉后》、冯沅君《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及吴梅村诗选录。

(纪伟)

【梅村先生年谱】年谱。四卷。清顾师轼编。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校刊本,另附《世系》一卷。另外,还有清光绪三年重刊本、《梅村家藏稿》本及《涌芬堂丛刊》本。谱主吴伟业(号梅村),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齐名。著者顾师轼,字景和,江苏太仓人。书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其自识云:八阅寒暑,稿凡十数易。可见用功之深。所缺憾者,顾氏未见《梅村家藏稿》,故难免缺漏。谱前列谱主世系,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徐元润序和道光二十五年宋清寿序,较早刊本为道光间刊本、光绪二年刊本及梅村家藏稿刊本。《四部丛刊》收有初印及二次印本。谱后有作者识语,叙编纂缘起。年谱记谱主仕历、学行、交游及诗编年,并涉及复社活动。顾氏编谱所据《梅村集》四十卷,为康熙间顾湄、周瓚所编,较后发现的吴氏家藏稿少二十卷。

(董文成)

【吴梅村年谱】年谱。铃木虎雄编。北京图书馆藏抄本一部。此谱成于顾师轼所撰年谱之后,在顾

谱基础上,又得见《梅村家藏稿》及吴梅村行状(顾湄撰)、墓表(陈廷敬撰)等材料,故内容较顾谱丰富,并有多处订正顾谱之误。年谱记述谱主仕历、家事、交游及诗文创作等,间及南明史事。全谱分绪言、谱主世系、谱主世系表、年谱、著述五部分。著谱者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由于视角不同,对谱主降清一事不像本国人那样看重。(董文成)

【吴梅村年谱】年谱。近人马导源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民国二十年(1931)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乃《中国史学丛书》之一。此谱几乎同铃木虎雄所编相同,只增入《清史列传·吴伟业传》,新资料太少,难辞抄袭旧谱之咎。(董文成)

【顾亭林诗集汇注】清诗别集汇注本。上下两册。今人王遽常辑注,吴丕绩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卷首有顾炎武像及书影六帧,次前言,末附录二:王订亭林诗谱和著作目录;《国史儒林传》顾炎武传、徐嘉《顾诗笺注》原序与凡例。顾炎武的诗文集,最早有康熙潘耒初刻本,但有避忌缺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梓行的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由于以潘刻本为底本,沿袭了这一情况,它收诗仅三百九十首。1959年中华书局校点之《顾亭林诗文集》诗歌部分补入了潘耒手抄本未删作品,计得四百十四首。本书则改以潘耒手抄本为底本,会校包括潘刻在内的公私藏本,恢复顾诗原诗题和潘刻避忌的文字。每篇之后附以校记,是目前最接近原貌的一个本子。徐嘉的笺注本厘为十七卷,潘耒手抄本与潘刻本虽起迄不同,但均为六卷。本集沿潘本旧例,仍为六卷,每卷起迄不同处则在目次中注明,以清版本源流。王氏的汇注,以徐笺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名家批注。作者自注,仍按潘本旧例,以小字注于正文之下。徐嘉笺注,分解题和诗注两种,诗注以双行小字置于诗句之后。本书除分条移置诗末外,其余仍按旧例。注文对各家注释参酌去取,总其所长,择其善者而从之。引文冗繁者,则适当删节;需作补充或重加考订之处,则以“遽常按”标示,以解决汇注中仍有疑义不明或各家之注存有出入矛盾的问题。顾诗用典多,且随处涉及明清易代之际的纷繁历史与军事政治。有些事件事过境迁,往往已成模糊,史难确证。各本批注,常互相抵牾。如卷一《海上》四首之一:“万里风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二句后,顾有自注:“去夏,诚国公刘孔昭自福山人。”黄节《顾诗选注》不同意徐嘉引《明季南略》谓其时鲁王命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事的注释,认为应以顾炎武自注为是。本书笺注者则认为两句各指一事,作者的自注限于下句;上句据吴伟业《鹿樵纪闻》的记载,当时确有冯京第乞师日本以复国之举。肯

定了徐注。本书的笺释工作,部分是为适应当代读者了解古代文史的需要而补作的。如开卷《大行皇帝》一诗,释顾炎武自注的纪年方法,释“大行”一词等,这对今天的普通读者是需要的。(卢兴基)

【顾亭林先生年谱】年谱。不分卷。清吴映奎编订。映奎字止猗,号银帆,江苏昆山人。顾氏年谱,最早由其抚子顾衍生编订,历称“元谱”,但未见,今仅存残抄。本谱在衍生谱残抄基础上增辑而成,是目前各谱中较早的一个完整谱本。但它的刊刻却较晚。今见有光绪六年(1886)《归(有光)顾(炎武)朱(柏庐)三先生年谱》本,潘道根补,金吴澜刻。前有金序一篇,内称:“是谱也,尚未刊行。辗转传抄,舛错颇多。爰倩陈霄卓、王子兰、张铁崖三广文,李芸谱大令,李子骅主政及澜再四校对,付诸手民,以竟子猗未竟之志。”谱前有阮元《国史儒林传》顾炎武传、全祖望《神道表》、潘道根辑补之顾氏世系;后附以亭林佚诗及与友朋赠酬等少量史料,谱文列编年诗作和著,简明扼要。以纪事为纲,引证史料及吴氏按语以双行小字附后。潘道根校语以眉批形式刊于顶端,以示区别。此谱又见于光绪十一年(1885)朱征荣辑《亭林先生补遗十种》。(卢兴基)

【顾亭林先生年谱】年谱。不分卷。清车守谦编订。守谦字秋龄,上元(今属江苏南京)人。有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另道光二十四年刊本作“持谦”,当是一人。此谱完稿在吴谱之后,但刊刻在前,其中吸收了吴稿的内容。据车序称:“谦为亭林先生创年谱,阅岁两稔,才及十之六七,乙未游金坛,遇吾友昆山吴君广斋,知其先德银帆明经已撰有稿本,因急属其录出,则哀然一帙,较谦所辑者,极为详赡。银帆盖以先生抚子衍生所遗之谱仅十馀页而简陋不词,殊无足观。于是随处摭拾,从而推广之……爰合谦未成之本,芟复补遗,按年纂入,彼此相同者仍之,间有谦所增益者以及校正讹误者,注中悉以‘谦按’别之。”车谱较吴谱为详,每年之末仍附以编年诗歌并著述。谱中双行小字引证出处资料,间有异同正误的考订。(卢兴基)

【顾亭林先生年谱】年谱。清张穆编订。穆字石洲,山西平定人。此谱有初刻原稿本,未见。通行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寿阳祁氏刻《顾亭林、阎潜丘(若璩)年谱合刻》本。顾谱一卷,附《国史儒林传》、全祖望《神道表》、何绍基《顾先生祠诗》。另有《粤雅堂丛书》本,析为四卷。《嘉业堂丛书》本仍之,并增附一卷,辑张穆原刻之数十条校订、清人的有关资料与缪荃孙、刘承干二跋。此谱于顾氏事迹、交游等的考订最为精详。张氏对前此各谱兼收博采而又考校其异同,择其善者而从之。此外他自己又补充了大

量的材料,从而叙事详备,体例严明。所据各谱分别注明“元谱”(指衍生谱稿)、“徐谱”或“车谱”。其余征引,俱注明出处。已有所得,则以“穆按”示之。张穆在修谱过程中,还携稿亲赴山东、河南等地实地调查,广泛搜集材料,因而辑得顾炎武的大量集外文章尺牍,不仅充实了年谱,还弥补了前此的亭林诗文集之不足。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校订出版《顾亭林诗文集》,其中佚文辑补部分,注明得自张穆年谱的,即有三十一篇,多为首尾完整之作。如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五十六岁,下引《先生手迹》一篇。中华书局《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题作《与人书》。此文详尽地说明了顾炎武身陷“黄培诗案”文字狱的始末原委,是一篇重要材料。从潘耒本至朱纪荣辑补亭林诗文都遗漏了。但张谱也偶有疏失,清人叶廷琯《吹网集》卷四《亭林年谱有沿误处》即曾指出多处。

(卢兴基)

【顾亭林先生诗谱】 年谱。清徐嘉编订。嘉字宾华,又字遯菴,江苏山阳人,著有《味静斋集》。本谱附于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前,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味静斋刊本。《顾诗笺注》十七卷,是近代通行的一个较详尽的笺注本,诗谱则为其辅佐而设。顾炎武的诗,潘耒稿本即已有时代顺序,此当为作者生前手订。徐嘉在此基础上并参考了各个年谱的编年诗歌,再加以整理修订。编年诗从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顾炎武三十二岁有存世之作开始。首列该年作品,次叙历史大事,谱主生平活动,家庭与交游。以行年为纲,纵横交错。材料注明出处,有所考订则以双行小字夹注其下,叙述简明。

(卢兴基)

【龚芝麓年谱】 年谱。近人董迁编。见《中和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三期,藏南开大学图书馆。谱主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二十岁时中进士,历任湖北蕲水令及兵科给事中。降清后,历任礼科给事中、太常寺卿,户、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刑、兵、礼部尚书。卒谥端毅。明末清初诗文作家。此谱编于1941年,正当日寇侵华时期,作者在沦陷区撰写此谱,叙事多为谱主降清行为讳解,并对一般扬吴(吴伟业)抑龚之说表示异议。年谱以纪事为纲,记谱主仕历及诗文创作等事,后附有关资料,均注明出处。谱后有王士禛在康熙十四年(1675)过龚鼎孳故宅诗一首,还有谱主遗族、遗著考证,另附参考书目。

(董文成)

【柳如是别传】 诗人评传。今人陈寅恪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之七。全三册,八十餘万字。分缘起、清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

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五章。此长篇专著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晚年的一部力作,对明清之际传奇式的女诗人柳如是的身世、事迹和作品都有精辟的考论,资料丰富,考辨精详,力辟种种讹传之谬。同时还涉及同她有交往的几位诗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幾社爱国诗人陈子龙和东林党领袖人物钱谦益。作者考证柳如是用过的许多名号,有:杨爱、云娟、美人、影怜、杨朝、朝云、柳是、柳隐、柳因、柳如是、麝芜、河东君等。作者指出:“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又叙其受李存我、陈子龙、钱谦益影响,及参加幾社的活动等,理出了她思想成长的轨迹;尤其考述她支持钱谦益暗中谋划反清复明的组织活动之事迹,从而对饱受贬毁的钱谦益提供了重新评价的依据。

(董文成)

【吴嘉纪诗笺校】 清诗别集笺校本。今人杨积庆笺校。1980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有1978年4月徐震堉所撰前言及杨氏自撰编例各一篇,后有杨积庆撰《吴嘉纪年表》及征引书目。正文诗十五卷,附录七种,计包括:吴嘉纪手札序赞辑佚;周刻赖古堂本陋轩诗目录;宋石斋抄本陋轩诗续目录;陋轩诗序跋题记;吴嘉纪事迹辑存;诸家品题评论辑存;同时诸家酬赠题咏辑存。据徐震堉前言评价,吴嘉纪《陋轩集》,虽然刻过好几次,但旧本已颇不易得。现在一般所见的,是清道光年间泰州夏氏刻本,即此书之底本。吴嘉纪在同时诗人中,并无赫赫之名,所与交往的,也人都是草野之士,其里居出处颇不易考察,作者钩稽方志及同时人诗文集,十得八九,尤足为论世知人之助。正文中,前十二卷为原《陋轩诗》所收作品;第十三、十四卷为《续诗》,其底本现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其上朱、墨批改甚多,朱笔乃夏荃手笔,墨笔为刘宝楠所写,与夏氏刻本多有不同。徐震堉怀疑《续诗》是吴嘉纪本人的删修稿,同时徐氏又指出:“刘氏批改之处,往往有精义,足以发人深思。”第十五卷据周亮工《赖古堂刻陋轩诗》补入。全书共收一千三百四十三首诗。

(董文成)

【吴嘉纪年谱】 年谱。今人蔡观明编。1964年油印本。藏北京图书馆。谱主吴嘉纪为清初叶诗人,明末遗老,著有《陋轩诗》。据蔡氏前言中所云,

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了地方志乘、名人诗文集和笔记等凡二十余种,写成这部年谱。谱前有《杂考》二篇,分别考谱主家世和《陋轩诗》的版本。正文记载崇祯十二年(1630)谱主二十二岁以后的家事、游历、交游及诗作编年等。谱末附《简评》一篇,对谱主诗作的思想、艺术加以评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此谱为今人所撰,故以公元为序,下附明清纪元、干支及谱主年龄。据谱后附记介绍,东台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汪国璠尚撰一部《吴嘉纪年谱》。(董文成)

【悔庵年谱】 年谱。谱主尤侗自编。藏天津人民图书馆,为《西堂余集残存》本,附有《年谱图诗》、《小影图赞》各一卷。谱主卒年八十七,此谱记到八十六岁止。尤侗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善诗、词、戏曲,尤精戏曲,有《西堂全集》传世。此谱记载谱主的交游和文学活动,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和清初文学史颇有价值。谱前有谱图诗十六首,概括了谱主一生的活动。图前有钱肃润及高士奇所撰跋。另附谱主《小影图赞》共四帧,每帧后均有当时名诗人题赞。《年谱图诗》后面的识语云:“生平事迹琐琐,难以枚举,姑摘其大者绘为十六图,各缀小诗,志其本末,用以自娱,亦可贻诸子孙。”可见,这是一部有个性特点的年谱。(董文成)

【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谭承耕撰。此书全面论述了清代思想家、诗人王夫之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全书共十章,其研究内容“实际上包括以诗论为主的文学观、诗歌批评及诗词等的创作三个大部分,搜集的材料很广,论述亦较全面,多有他人未尝注意者。由于船山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都是以诗为主,因此本书可谓已基本上概括地展示了船山在文学方面的建树的全貌,揭示了其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特点与价值。又由于船山的诗论及其在诗歌批评、创作上的实践本来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船山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本书著者又对它特别注意,因而显得很突出”。书中所作“结论常从较丰富的也较全整的材料中引出,不作空论,并力求符合船山的本意”(所引皆见此书马积高《序》)。亦如马序所指出的书中对于船山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体现的光彩与艺术造诣都阐述得较为充分,而对其狭隘性或偏见则分析得较粗。王夫之在明末三大思想家中是提倡专制统治的一位,他对民本思想较为强烈和主张个性解放的诗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此他在《唐诗评选》对杜甫、白居易的批评、在《明诗评选》中对李贽、“三袁”的抨击并不奇怪,而作者对此未予注意。此书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王学泰)

【王船山先生年谱】 年谱。清刘毓崧编。毓崧,字伯山,江苏仪征人。书成于清同治四年(1865),前

有光绪十五年(1889)曾国荃序。梁廷灿《年谱考略》称此谱“前无所承,创作至难,而叙船山事迹梗概备矣。自序尚称未备者七,故名曰初稿,盖书阙有间也”。谱主王船山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颇大。此谱是结合船山遗书的刊行而编,内容是记谱主家事及仕历,尤详于诗文编年。谱前有《国史儒林传》一篇,大抵据余廷灿《船山先生传》;另有曾国荃序。后叙康熙四十六年(1707)入祀乡贤祠事,又附录其后人之简历。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光绪十二年江南书局刊本。(董文成)

【王船山公年谱】 年谱。二卷。清王之春编。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刊本。著者为谱主王夫之(号船山)八世从孙。书成于光绪十八年,乃据家谱及他书以正刘谱之误而补其缺漏。按之全谱,确较刘谱有所增益。全谱分前后二编,前编始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迄清顺治十八年(1661);后编始于康熙元年(1662),迄康熙三十一年谱主卒。前编含《国史儒林传》、编者序、行述、彭毓林改建船山书院疏、凡例及家谱世系表;后编末附曾国藩《船山遗书序》、《年谱传记》。卷末附余廷灿撰传记、康鉴撰学案及《船山著述目录》等。(董文成)

【船山先生年谱】 年谱。近人王永祥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船山学谱》本(乃《孝鱼丛著》之二)。另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此谱撰于刘、王二谱之后,化繁为简,并注意叙述谱主学术思想。谱后附各家所撰传记及评述。(董文成)

【船山年表】 年谱。今人张西堂编。北京图书馆藏有《王船山学谱》,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内含此表。此表成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乃据刘、王二谱撮制成表,略加增订。表分三栏:(1)公元纪年;(2)明清纪年;(3)船山事迹及有关纪事。简明扼要。(董文成)

【吕留良诗选】 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徐正、蔡明选注。吕氏诗集本名《何求老人诗稿》七卷、《集外诗》一卷。《诗稿》为其去世前两个月时编成,存诗四百六十余首,其余诗稿则焚弃而去。留良死后,其弟子严鸿逵将集外搜集的吕诗编为集外诗一卷。清雍正十年(1732)由于“曾静案”牵连,书被严禁,吕氏被开棺戮尸,此后无人敢刻吕集。其诗集只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并多异名,如《何求老人残稿》、《天盖楼诗集》、《天盖楼吟稿》、《东庄吟稿》等等。另有题为《晚村诗钞》者,系留良之子吕公忠手抄本,此本较别本多四十六首诗,共五百零四首,且有题注、夹注和吕留良门人严鸿逵的批注及后记。此书即据《晚村诗钞》编选,并按其小集先后编次,选诗二百零五首,选诗力求保持全貌,并兼顾内容和风格特点,但

《南前唱和集》及增补的诗均未选用。本书采用先注释、后说明的体例,注释力求浅显易懂,难句作必要的串讲,说明部分适当介绍背景,提示内容,帮助读者领会作诗意旨,了解艺术特色。后附《吕留良年谱简编》。此据包赓《吕留良年谱》、卞慧新《吕留良年谱长编》及有关资料辑成。并附《吕晚村诗集序》、《何求老人残稿跋》(严鸿逵)、《何求老人残稿跋》(细林山樵)、《何求老人残稿跋》(潘景郑)、《天盖楼诗集跋》。此书被收入《浙江历代名家诗选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学泰)

【曝书亭诗录笺注】清诗别集注本。十二卷。清朱彝尊撰,江浩然笺注。浩然(1690—1750)字万原,号孟亭,浙江嘉兴人。诸生,弃举业,客幕府多年,喜读朱彝尊诗,故作此注。朱诗,特别是朱氏晚年作品喜用典故,江氏主要注释典事,所注引证丰富,大多也较贴切,有助于读者理解朱诗。然而其引证多来于类书,因之所注往往没有篇名,只有“某某诗”、“某某文”,斩头去尾,错误不少。另外只注字词典故,不注朱诗所涉及的时事与写作背景,不利于深入理解朱诗。此编完稿于乾隆十四年(1749),未刊。不久浩然去世,其子江堦又加整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编成定本,乾隆三十年由惇裕堂精刊问世。(王学泰)

【曝书亭集诗注】清诗别集注本。二十二卷。清朱彝尊撰,杨谦注。谦字吉人,或作炳南,号筠谷,嘉定(今属上海)人。入赘为州同,工书画,善岐黄之术,究心诗文,约生活于清乾隆间。此书编成于乾隆三十年(1765)。书中收录了朱彝尊所编各集之诗,并包括为朱氏所遗、但保存在《感旧集》(当时尚为写本)等书中的朱诗,以补《曝书亭集》之不足,编为集外诗二卷。故其所录之诗较彝尊自编之《曝书亭集》完善。另外朱氏之集编于晚年,或因暮年记忆有失,或因政治原因,其编年亦有舛误。杨氏结合朱氏其他作品一一加以纠正,并对诗句正文,据其他刊本作校勘,从这些文字变化中可见作者思想脉络之变化。杨注除了因袭江浩然所注字词用典之外,特别重视对诗歌写作背景的注释,在注文中广泛征引当时各种文献,有助于阐发诗旨。朱氏一生经历复杂,交游极广,与之往来唱和者极多,有时指名道姓,有时仅举其官职别号,杨氏竟能一一指明其人,并能广征文献,详加说明,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书后附朱氏年谱一卷。杨注之不足是在笺释字词典故方面缺少创造性,而且多谬误。另外此编之出版正逢清代文字狱高峰期间,故将诗集中凡涉及到屈大均之名与诗者,尽行删去。此注是朱集注本中较好的一个。有清乾隆间本山阁刊本。(王学泰)

【朱彝尊诗词选注】清诗词别集选注本。今人王镇远选注。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之一种,选录朱氏诗词一百餘首,其中诗歌五十四首。朱氏诗作,工于使事用典,书中皆能一一注出,并在说明之中介绍该篇写作背景,以及在思想内容或艺术上的特点,简练明了,便于初学。因为编选者以作者晚年自定的《曝书亭诗集》为依据,此本中朱彝尊将一些具有棱角或锋芒的作品作了较多的删改,如《南草》中具有反清情绪的作品,《腾笑集》中一些自忖出仕的作品,或被删除,或被改写。此书未选其早年所作《风怀诗二百韵》,不知是否因此本已将此诗删除之故。而《风怀》不仅在朱诗中,即使在清诗史上也是一篇佳作,未能入选,不免有遗珠之憾。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学泰)

【朱竹垞先生年谱】年谱。清杨谦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曝书亭集诗注》本,乃木石居石印本。别有《曝书亭诗集》本、《曝书亭诗集残存》附本。著者杨谦,秀水人,与谱主同里。谱主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移居嘉兴。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以事罢职,从事著述。谱主著述闳富,为清初著名诗人和学者。此谱对研究谱主生平及其诗词创作有参考价值。(董文成)

【漫堂年谱】年谱。清宋荦自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康熙间刊《西陂类稿》本。另外有稿本、《三贤政书》本存世,还有民国六年(1917)翻刻全集本。谱主即编者宋荦,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衔。此谱自述仕历及宠遇,间记江南吏治民情,所记漕运资料略有参考价值。所叙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止。稿本藏于北京图书馆。(董文成)

【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清诗别集注本。十二卷。清金荣笺注。荣字林始,昆山(今属江苏)人。生活于清康熙、雍正间。《渔洋山人精华录》为王士禛诗选集,分体编排厘为十卷。此书打破原编体制,由分体改为编年。注者认为,如此编排,作者“出处可以概见。且集中大半于役之作,川涂险阻,雨雪往来,读者即目了然”(《凡例》)。编年参照士禛自编诸集(王氏自编诸集按年编排),其中小有误差者作了调整。金注除笺注典事出处外还注重对该诗写作背景的介绍,因此除重视其自注外,还多从士禛散文笔记,如《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皇华记闻》、《池北偶谈》、《皇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著作中录求本事,用为笺注,故多能得诗本意。

此书注始经营于康熙庚寅(1710),成书于雍正甲寅(1734),历时二十余年,其间又得到惠栋注释《渔洋山人精华录》之稿本与徐夔所注士禎之近体诗,多有采摭。此编初刊于雍正末年,有金氏凤翔堂刻本。乾隆二年(1737)金氏凤翔堂又出版了续刊本。因为此书“开雕后,时有弋获,不便增入卷内,而惠注复不能捐爱,爰仿朱长孺注义山诗例而小变之,补注总附于十二卷后”(《凡例》)。故续刊本增《续补注》一卷、《续录笺注》一卷,凡十四卷。(王学泰)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清诗别集注本。十卷,附年谱二卷。清惠栋训纂。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元和(今江苏苏州)人。著名经学家。《渔洋山人精华录》之有注始于徐夔注乐府与近体诗,此书未刊。惠氏在此基础上加工润色,并加以补充,题为《渔洋山人精华录注》,此稿本尚传世,藏于北京图书馆。后惠栋又详加排比渔洋诗之典故出处,对于其诗本事又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阐释,编成此书。注者为尊重原编,不仅仍按原先分体编纂,先古体后近体,先五言后七言,而且为使其不改旧观,仍然分为十卷。但因增加了注文,篇幅“三倍于前”,故每卷又为分上下,另编目录二卷。惠注本较优于金荣注本,故金氏《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凡例》中言惠注“该洽而于当代事颇为周悉,亟录之,以补余所未逮”。惠注稿本先于金注本而成,故金氏在其注中可以采掇惠氏注文,而惠之《训纂》却后于金注本刊行,故惠栋又见到金注本而作《金氏精华录笺注辨讹》而附于《训纂》之末。惠注本于乾隆中刊行,有红豆斋刊本。民国间中华书局所编《四部备要》收录惠注本,较为常见。(王学泰)

【王渔洋诗文选注】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李毓芙选注。王士禎(渔洋)诗在当时享大名,而近世则不为所重,因此未有选注本与研究专著出现。此书是近几十年来士禎诗文的第一个选注本,也是选目较为得当、注释较为详尽的注本。全书选诗三百篇,四百余首(每篇或包括数首),选注者力求选取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的作品,兼顾古、今体诗,以期所选有一定代表性,能显示渔洋诗的特色。能够体现王氏所主张神韵诗风的《毘陵归舟》、《瓜洲渡二首》、《秦淮杂诗》、《秦邮曲》、《红桥》、《真州绝句》、《夕阳楼》等皆入选,在当时喧腾众口、和者众多的《秋柳四首》也被选入。这些作品能代表王士禎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另外,王氏还写了一些感慨时势、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作,具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写作手法倾向质实的作品如《山蚕词》、《蚕租行》、《题施愚山〈卖船诗〉后》等也被选入,这展示了士禎创作的另一面。注文包括题解、注释两部分。书前前言较为系统论

述士禎诗文创作成就,书后附《王渔洋年表》,记录其生平创作与其生前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此书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前有王渔洋画像和《渔洋诗集》之书影。(王学泰)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年谱。二卷。清王士禎自撰,清惠栋补注。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本,乃清乾隆惠氏红豆斋刻本。另有雍正间红豆斋刻本。此谱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谱主王士禎,字貽上,号阮亭、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著名诗人,主盟诗坛数十年,开创神韵派,为一代宗师。惠栋之补注,补述谱主之经历、创作活动等。谱后附有谱主之子启泮跋一篇,叙年谱编纂情况颇详,可知始编于康熙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即口授由诸子笔录。雍正五年(1727),清稿本遗失,现本乃据草稿本重录者。原为一卷,惠栋补注后,乃析为二卷。(董文成)

【渔洋山人年谱】年谱。清金荣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本。参加纂辑此谱者还有徐淮。此乃表式年谱,前有世系,分纪年、时事、出处及诗文著述四栏,叙述简要,一目了然。资料多采自王士禎自编年谱,然把正文与惠栋补注合而为一。(董文成)

【聊斋诗词选】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殷孟伦、袁世硕选注。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蒲松龄以《聊斋志异》名世,其诗词历来不为世所重。但其诗词传世作品中亦多有名篇佳什,选注者从现存蒲松龄的千余首诗中,选择能较为典型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作者精神状态的、艺术上也较为完美的一百余首;从现存的一百余首词中选择了二十首,加以注释,编成此书。选注者以中华书局《蒲松龄集·聊斋诗集》为蓝本,依据抄本纠正讹误之处。该书注释精当详明,既诠注词语,又串释句意。前言中除介绍蒲松龄诗之内容外,对诗之风格亦进行了概括。该书对全面了解深入研究蒲松龄的生平与文学创作情况颇有参考价值。(毕宝魁)

【康熙诗选】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卜维义、孙丕任选注。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存诗一千一百余首,从中选注一百二十五首。是书虽选诗不多,但可约略窥见康熙诗的基本风貌。其中对有具体时日可考的诗进行系年,某些年代不能确指的诗也按《御制诗》的顺序与系年之作统一编次。对于多数诗的背景,有简要介绍,在注释中参核史料,还引用了清史研究者的有关著作或资料。从选诗可以看出:康熙的诗题材广泛,题旨较为深厚,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活动,几乎在诗中都有所反映。编者以他的诗作为窗口,窥见其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有助于读者对他执

政的漫长岁月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了解。是“以诗证史”的一次尝试。(宋绪连)

【**纳兰成德诗集、诗论笺注**】清诗别集注本。今人马迺骝、寇宗基编注。纳兰以词名世,然其“亦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丰格”(徐乾学《纳兰墓志铭》)。其诗传世者二百馀首,马、寇二人取其全集而注之。全书打破《通志堂集》分体编纂体制,按类编排。第一类为《巡游出塞篇》,包括畿甸行、扈驾东北行、奉使西域行、扈驾五台行、扈驾江南行五部分,录诗七十一首。第二类为《即事咏怀篇》,录诗三十四首。第三类为《爱情篇》,录诗七十七首。第四类为《师情友谊篇》,录诗七十一首。第五类为《拟古咏史篇》,录诗九十七首。第六类为《题跋篇》,录诗十四首。每类之内,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在《纳兰诗论笺注》有论《填词》诗一首。其注释除了笺注典故词语出处外,对于诗中难点还作了必要的解说,对有研究价值的作品介绍有关的背景资料。《纳兰诗论》部分是注释作者论诗词之语,包括《原诗》、《名家绝句钞序》、《绿水亭宴集诗序》、《诗词短论》三十四条及《填词》诗一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学泰)

【**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年谱。清顾嗣立自编。《秀野草堂诗集》附,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另有原刻本,《丙子丛编》本,一名《秀野公自订年谱》。谱主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闾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未第前曾参加《佩文韵府》、《宋金元明四朝诗选》等书籍编纂工作。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又授庶吉士。次年,散馆试入汉书二等,落职。自著《秀野草堂诗集》传世。该谱系作者落职后自记,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止。记载其应试、作诗、编集及家事等,可供研究顾嗣立生平及诗文创作情况之参考。(毕宝魁)

【**沈归愚自订年谱**】年谱。沈德潜自编。《沈归愚诗文全集》附,有清乾隆间教忠堂刊本。一名《沈宗伯年谱》。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以论诗、选诗闻名于世,为乾隆皇帝校《御制诗集》,大受赏识,是康乾以来拟古主义诗派之代表。该谱系作者自编,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其一生之遭际,且多涉及文学创作及与文士交往之情况,对其晚年因诗而受皇帝宠眷之事记述尤详。对研究作者生平及文学创作活动颇有参考价值。

(毕宝魁)

【**厉樊榭先生年谱**】年谱。清朱文藻编,缪荃孙重订。有《嘉业堂丛书》本。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自号南湖花隐,学者多称之为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词人。该谱

系缪荃孙据朱文藻本增补而成。刊者刘承干在跋中云:“《厉樊榭年谱》一卷,朱文藻朗斋撰。”“朗斋,仁和人。于樊榭先生同里后辈。此稿寥寥数叶,盖未成之作。乃属江阴缪艺风征君详考之。在《公车征士录》得其父母及兄之名氏。于本集中得其完娶之年。于《南斋集》、《沙河逸老集》知纳刘氏妾在扬州。于马秋玉诸君挽诗知歿时老亲犹在,补缀成帙,聊可观览。”可知缪荃孙为此谱增补许多内容。该谱记载其创作活动颇详,对其所交游之文士亦多有涉及。但十九岁前仅列年次而未记事迹。谱后还附有刘承干从董汝熊撰《樊榭集注》中辑出原年谱中未见之人名及陈燧诗一首,并附载从鲍亚谷《稗勺》、蒋生沐《东湖丛记》等书中辑出厉氏诗集所未载之逸诗数首。(毕宝魁)

【**厉樊榭年谱**】年谱。近人陆谦祉编。《中国史学丛书》之一,有民国二十五年(1926)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谱主为厉鹗。该谱较朱文藻编、缪荃孙增补之《厉樊榭先生年谱》(以下简称朱谱)为详。但陆谦祉似未见朱谱,该谱中曾引述朱文藻映渭《厉征君年谱稿》,注称:“年谱稿已佚,此据先生本集轶事类录出。”又编者于本谱序中云:“全谱(指蒋天枢所撰《全榭山年谱》)中有引厉太鸿(厉鹗字太鸿)一种,不知系何人所撰,见闻褊陋,未获睹之,深以为憾!”全谱中所引当亦是朱谱,可知陆谦祉并未见到朱谱的全貌。该谱共分两部分。其一曰《传略》,系编者据《杭州府志·文苑传》笺注而成;其二曰《年谱》,系编者据其诗文及其他相关文字钩稽生平事迹按年月编排而成,主要记载其创作活动及交游情况,记同时有关人物之活动尤详。该谱在厉鹗死后,尚择要记其身后营葬、刊行遗书等事,最末一年为光绪十年(1885),距厉鹗之死已一百三十二年。(毕宝魁)

【**板桥诗词撷英**】清代别集选注本。今人陈书良选注。郑燮(板桥)存诗词近两千首,历来为人们所喜读,但历来无选注本。此书从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郑板桥集》中选出诗词共一百零三首,其中诗歌七十七首。选择标准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并加以注释说明。所选主要是两类作品,一为同情百姓疾苦之作,这类诗多为古体,如《悍吏》、《私刑恶》、《抚孤行》、《孤儿行》、《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另一类为抒情言志之作,这些作品多为近体小诗,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题画》(秋风昨夜渡潇湘)等。这两类作品虽不能概括板桥诗歌全部成就,但在其集中确是最引读者注目的。书中注文通俗明了,其评说作品,时加串解,便于初学。前附板桥所作书画照片五幅。广西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王学泰)

【郑板桥年表】 年谱。编撰者未详。附《郑板桥集》后。有 1962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铅印本。该表系刊印全集时由编者参考任乃夔所编《郑板桥先生年谱》手稿编制而成。编撰者当首推任乃夔,惜其生平未详。表中记述郑燮(板桥)出处交游及诗文创作情况,内容比较简略。(毕宝魁)

【吴敬梓年谱】 年谱。今人胡适编。《文木山房诗》附录三,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另存《胡适文存二集》附本、《努力周报》第三一至四七期。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该谱资料主要采自于《文木山房集》,间或引《儒林外史》一些材料相比附。主要是罗列资料,偏于考订,偶尔亦加以评述,适足以表明编者的观点。该谱分三部分。一曰家世,是谱主吴敬梓自高祖以来世系;二曰年谱,以记载吴敬梓之交游出处及文学创作活动为主,兼记同时代学人之生卒等大事,是本谱的主体部分;三曰后记,记载吴敬梓之著述。谱末还附有参考书举要。资料丰赡,足资研究者参考。(毕宝魁)

【袁枚诗选】 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王名超选注。袁枚是清代性灵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享大名于生前身后。近五十年来因被视为帮闲,故其作品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编选者对袁枚及其诗有较高评价,前言有云:“袁枚,这自由的诗魂,不为一切封建世俗的陈规陋习所羁,他的审美认识把我们带到了多么纯净的艺术天地。他毫无顾忌地真诚地袒露自己,把自己的一切,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交给诗!在诗的领地如此虔诚地耕耘着,在诗歌发展的历史上,也不是多见的。”编选者认为有人说袁枚作品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是对袁枚所处时代不了解,当时社会矛盾缓和,袁氏又以在野之身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故其诗以写人之性灵与自然山水之趣为主,此类作品亦应在诗坛上占一席之地,袁氏诗论与创作的主要成就在于“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努力追求,创新精神”。袁氏存诗四千余首,此书选注一百五十一首,以写山水风光之作为多,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初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王学泰)

【随园先生年谱】 年谱。清方浚师编。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别有稿本、民国天津大公报铅印本、民国二十二年(1923)大陆书局铅印本。又名《袁枚年谱》。浚师(1830—1889)字子严,安徽定远人。咸丰举人,官至直隶永定河道,有《退一步斋文集》。谱主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及评论家。该谱体例较他谱有别,编者采取与所选诗笺注并行之方式,以诗集编

年为纲,取文集、诗话中重要内容及诗人行事详记之,而对他人所撰之志传,仅取其有关“政绩”之事载之,其他皆略而不录。这对读者系统了解诗人生平及文学活动大有裨益。该谱约编成于同治九年(1870)。北京图书馆藏本有讨论内容增删问题之眉批,不类编者之手笔,未详为何人所批。(毕宝魁)

【袁枚年谱】 年谱。近人杨鸿烈编。有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该谱系杨鸿烈所著《袁枚评传》之第二章,详细记载袁枚仕历、学行及诗文创作活动情况。每年条下引录诗文及其他有关资料并详细注明出处。考核较详,条理清晰,与方浚师所编《随园先生年谱》(简称方谱)多有不合之处。如本谱认定袁枚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并认为方谱所定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不足为据,又因其采用实龄计算年岁法,故袁枚享年仍为八十二岁。但袁枚诗中有“春秋同丙申”(《小仓山房诗集》卷一八《送省堂南归》)之语,丙申乃康熙五十五年,故当以方谱所定生年为是。该谱记述引录诗文等资料较为详明,于读者翻查检索颇为方便。但编者对袁枚诗文、“政迹”等推崇过甚,似有溢美之嫌,而对其可议之处又多加讳解,中间尚穿插有编者之评述。谱后附有袁枚著作目录,亦便于读者翻检。

(毕宝魁)

【随园诗说的研究】 研究专著。近人顾远芾著。1936 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中国书店 1988 年影印再版。书前有朱荣泉之序。认为此书关于“性灵”论的各点,阐发详尽。全书共十章,按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附表七)是对袁枚生平的介绍,附表中含有“袁枚一生大事年表”、“袁枚家族谱系图”、“袁枚妻妾表”、“袁枚子女表”、“随园风景”、“随园女弟子选录”(共选录女弟子五十三人)等。这些资料对了解袁枚的生平有重要价值。第二章至第四章论述性灵说的意义、源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诗坛概况。第五章至第九章述性灵说的概观、内容论、形式论、创作论、鉴赏论。本部分是全书的主干,不但对性灵说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论析,而且还涉及创作与鉴赏之问题。最后一章是结论。全书眉目清楚,对研究袁枚之生平及诗歌理论有重要价值。

(毕宝魁)

【读随园诗话札记】 诗论专著。今人郭沫若著。袁枚的《随园诗话》集中阐发性灵说,倡导抒写性灵,写真性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过多地记载了一些低级庸俗的趣闻艳事,则是其明显的局限性。此札记认为《随园诗话》“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故“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

带有六十年代“厚今薄古”的印迹。原文从《人民日报》1962年2月28日起陆续刊登,后由作家出版社于1962年9月出版。(宋绪连)

【赵翼诗选】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胡忆肖选注。赵氏一生写诗五千余首,其自编按年编排之《瓠北集》五十三卷,几乎囊括了赵氏全部作品。另有作者自选本《瓠北诗钞》十七卷。此集经过赵翼删削订正,按诗体分编。经过删订,《诗钞》文字较胜于《诗集》,但也删掉了一些好诗。此书所选录作品年代、体例、编排,一律据《瓠北集》,所选录的绝大部分作品的字句依照《瓠北诗钞》。全书共选诗二百零九首,选诗注重赵氏特长,多选其议论诗与怀古咏史诗,作者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尽可于此书得之。注文包括说明、注释两部分,说明不仅讲解该篇题意及内容,而且往往还能联系作者思想加以发挥,给读者以启发;注释以注解典事为主。前言介绍赵翼生平及其创作成就,并对其诗的艺术特色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王学泰)

【瓠北先生年谱】年谱。撰人未详。《赵瓠北全集》附本。清光绪三年(1864)四川官印刷局刊本。梁廷灿《年谱考略》加按语云:“不著撰人名氏。是书末题不孝廷英、廷俊、廷彦校字。”据此推测,该谱当是刊行全集时由谱主赵翼诸子编成附入。翼(1727—1814)字云崧,一作耘松,号瓠北,八十三岁后自号三半老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称“江左三大家”。该谱只记一般行事,比较简略。

(毕宝魁)

【容甫先生年谱】年谱。清汪喜孙编。有江都《汪氏丛书》本、道光间刊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本。别题《汪容甫年谱》、《汪氏秘籍》。梁廷灿《年谱考略》加按语曰:“著者清汪喜孙,字孟慈,谱主之子,有嘉庆二十五自序。”谱主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该谱由其子汪喜孙所编,谱前序中申明宗旨曰:“使后之论世知人之君子,勿为澜言滋惑焉。”似寓有其父解谤之意。该谱记述谱主一生之学行,对论著及诗文编年尤详,引述其与学侣间切磋学术之语亦较多。内容宏富丰赡,可资研究清代学术史者参考。

(毕宝魁)

【黎简诗选】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周锡馥选注。黎简是清中叶广东最有成就诗人之一,存诗两千首左右,著有《五百四峰堂诗钞》与《五百四峰堂续集》。此编从两集中选出古今体诗一百八十四首,以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为入选标准,并适当顾及题材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以期能反映黎氏作品之概貌。

入选作品以写广东广州一带风光民俗者为多,故此选本带有鲜明的南国色彩。黎集版本较多,编者选诗以光绪六年(1880)顺德黎氏教忠堂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及选有黎诗的总集,择善而从,重要的异文一并注出。注释分题解与语词注释两部分,凡属较难的字句,一般都整句译出,加引号,置于每条注文的开头,概述大意则不加引号。题解除了解题之外还往往以简练的文字对该篇的内容与特点加以介绍。如《玉荷包歌》之题解:“玉荷包,是广东荔枝最早熟的品种之一。这首诗着意描写它浑圆的外形与红艳的色泽,并生动、风趣地表现了自己病中思食的心情。”书后附《黎简年谱》。此谱系选注者在黎骚《黎二樵年谱稿》、苏文撰《黎简先生年谱》基础上,进一步参考黎简及其师友的有关撰述以及国内书画公私藏品等各项资料编纂而成。又附《清史列传·黎简传》、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自序》与编选者所辑《各家评语选辑》。书前附有黎氏书画照片两幅。此书收入《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王学泰)

【黄仲则诗选】清诗别集选注本。清黄景仁(字仲则)撰,今人止水选注。黄诗向无注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曾经发行《黄仲则诗》,选黄诗四百首,但注释极其简略。《黄仲则诗选》是第一个较为详尽注释黄诗的选本,所以此书带有草创性质。全书选取黄景仁代表诗作一百零三首,逐一注释、讲解,十分通俗明白。每篇题后皆有解题,说明题意、作诗缘由及该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言简意赅。书后附有《黄仲则年谱简编》。前言介绍了诗人生活及其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特别论述了其情诗。此书为刘逸生主编之《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之一种,最初由香港三联书店在八十年代初出版。1985年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

(王学泰)

【黄景仁诗词选】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胡忆肖选注。景仁是乾隆间最有个人风格的诗人之一,其诗沉郁隽永,摅写愁情苦绪的佳篇名句,两百餘年来,传诵不衰。全书共选黄诗一百六十首、词二十首,多为抒情言志之作。编选者所据为清光绪二年(1876)重刊《两当轩集》,并参照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点校本《两当轩集》。胡氏注释,非常详密,便于初学。在注释之下,有“说明”,主要介绍该诗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有时对难懂的诗句作些串讲。总之,此书为普及性读物,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系列讲座丛书》之一种。书前有廖仲安所作《沉沦末世的天才诗人》一文作为代序,又有胡忆肖之前言,主要介绍黄景仁之生平与创作成就,后有魏际昌所写七言古诗《读胡忆肖先生〈黄景仁诗词

选》。1988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王学泰)

【黄仲则先生年谱】 年谱。清毛庆善、季锡畴合编。有《两当轩集》附录本,清咸丰八年(1858)家塾校刻。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为二书,一曰《黄仲则年谱》一卷,清毛庆善等编;二曰《重编黄仲则年谱》一卷,清季锡畴编。据《两当轩集》附录本季锡畴跋可知,以上二谱均与毛、季二人有关。毛庆善和季锡畴是好友,清道光丁未年(1847)二人共同编纂《黄仲则年谱》,“纂刻于尚友斋中”,是为初刻本。因未见黄仲则手稿,故不无缺略讹舛之憾。当欲重新搜辑编订时,毛庆善去世。到咸丰八年,季锡畴又亲见黄仲则手订稿,复与陆紫峰等人重加删订编纂,雕刻刊行,附入《两当轩集》中,是为重刻本。可见两谱之编纂者皆为毛、季二人,只有初刻、重刻之别,故一并述之。谱主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该谱主要记述其游历、作客、吟诗等事,兼述其交友活动,可资研究者参考。

(毕宝魁)

【黄仲则年谱】 年谱。近人黄逸之编,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上海图书馆馆藏年谱目》、陈乃乾《共读楼所藏年谱目》、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等书著录。谱主黄景仁终生贫困潦倒,诗名很著。该谱记载谱主游幕、交往及文学创作活动等情况,对幼年时期不逐年胪列,所记下限至光绪二年(1876),距其卒年已九十三年。该谱之体例兼采众长,首以谱主行止所在为纲领,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例;凡酬应诗篇,有故则录其目,按《施愚山先生年谱》例;谱主卒后,其身后情况暨著作流传之大概,仍按年分述,采今本《章实斋先生年谱补编》例。

(毕宝魁)

【黄仲则研究资料】 诗人研究资料汇编。今人黄葆树、陈弼、章谷等编纂。黄仲则(景仁)是清乾隆间在艺术上最有成就之诗人,评论其人其诗者甚多。然各种评论资料散播在各种书籍、报刊之中。景仁后裔黄葆树等人主持编纂此部资料汇编,为研究黄仲则其人其诗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全书分四部分:第一辑,包括传记、行状、墓志铭、年谱。第二辑,包括唱酬、题赠、诗评。这些散见于数十种清人别集、笔记、诗话之中,极不易搜集。第三辑,包括评传、综论、题词,这一辑收录了许多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表于当时报刊的文章,搜集亦颇有难度。第四辑,序跋、遗迹、故居、墓址。此辑介绍了许多与黄氏诗歌创作关系较远的资料,如黄氏书法、篆刻等。由于篇幅限制,有些资料未能尽量容纳,特将篇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供检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

版。

(王学泰)

【船山诗选】 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周宇澂选注。清张问陶诗集《船山诗草》刻印后(时在1815年)不久即有《船山诗草选》问世,为黄丕烈刊本。黄氏写于清嘉庆丁丑(1817)识语云:“《船山遗稿》二十卷,于嘉庆乙亥(1815)梓于吴中,一时为之纸贵。迨后全集板已归蜀,而购者日多,苦无以应人之求。适有独学老人有手录选本,分体编次,为卷六,得诗五百余首,因付梓以公同好云。”《船山诗草》有李岑注、江海清增注本,为清同治九年(1870)席珍山馆刻本。此注基本上是胪列字词典故出处,价值不大。周氏选本系从《船山诗草》二千二百余首诗中选取较有代表性,能反映出诗人的思想、生活及其行事的四百一十八首,并加简注。选注者认为,“虽不能说其精华已尽于斯,但诗人的性格品质、政治倾向及其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也就可以看到比较完整形象了”(《船山诗选》小引)。选诗注意到诗人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代表作品,以便于知人论世。然而,问陶除《船山诗草》外还有《船山诗草补遗》六卷,其中亦多佳作,如《老将》、《岁暮怀人作论诗绝句》、《骊山杂咏》、《病怀》、《送罗两峰山人归扬州》、《题朱野云画》等皆值得入选,因未参考此书,故被遗漏。书后附有《清史稿·张问陶传》、李元度《船山先生事略》、周宇澂撰《船山年谱》及《年谱后记》。《船山诗选》列入《古籍选读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出版。

(王学泰)

【宋湘诗选】 清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周锡馥选注。宋湘是清乾隆中叶以后至嘉庆、道光间的岭南重要诗人。其诗收入自己编纂的《红杏山房集》及后人所辑的《红杏山房集外集》。此编从宋集中选出古今体诗一百四十五首,占现存宋湘诗(包括集外诗)十分之一左右。其选录标准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顾及题材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力图反映宋湘诗全貌。宋氏中年以后游宦于湖湘、滇南一带,颇多佳篇,故此书中较多地选录了这一时期作品。本书注释格式一如编选者所编之《黎简诗选》。书前有专论一篇,名为《宋湘和他的诗》,以代前言,文中对于宋湘创作思想与作品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宋湘“以他的突破樊篱、不受羁勒的进取精神,和黎简一起开创了岭南诗坛锐意创新的良好风气,而给予后来在时代风云中涌现的‘诗界革命’一代新人以有益的启示和影响”。编选者认为宋湘诗对后世岭南诗人黄遵宪有明显的影

(王学泰)

【近代诗选】 近代诗选集注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参加者主要有季镇淮、李绍广、孙静、杨天石、孙钦善、陈丹晨、陈铁民、刘彦成、李坦然。卷首有选注者前言,论述近代诗歌发展梗概、特点及本书选注原则。全书按前言所述近代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道咸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本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编为三卷。第一卷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张维屏、陆嵩、张际亮、朱琦、林昌彝、鲁一同、姚燮、黄燮清、贝青乔、金和、王韬、程恩泽、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石达开二十二家诗。第二卷选黄遵宪、杨深秀、林纾、严复、康有为、刘光第、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梁启超、蒋智由、林旭、陈玉树、李慈铭、陈三立、陈衍十六家诗。第三卷选孙文、秋瑾、邹容、黄节、陈去病、柳亚子、周实、宁调元、苏曼殊、马君武、高旭十一家。共收四十九家三百余首诗。每位作者有小传,简介其生平、思想倾向、诗歌创作内容、风格与影响,略加评判。注释在注明词义、典故、史实后,再释句意,有的并加简析批判。这部诗选,主要选录了近代诗歌的主流作家,入选的作家有三类:一类是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的原则考虑,在近代诗坛上有较高的成就的较重要的诗人;一类是虽非诗人,诗也不多,但在近代革命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人——因人存诗,这两类是诗选中最主要的部分;还有一类是政治上也不突出反动,选入了他对了解近代诗歌发展有较大意义,而其诗歌内容也还有一定可取之处的诗人。此选本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也确实选入了许多近代重要诗人,并发掘了一批近人未予重视而确有成就的诗人。该书为1949年后第一部近代诗选本,对其后近代诗歌史研究和各种近代诗选本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王飏)

【近代六十家诗选】 近代诗选集注本。今人郭延礼选注。卷首有选注者前言。全书按前言所论近代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编为三卷。第一卷收龚自珍、张维屏、林则徐、陆嵩、徐荣、魏源、张际亮、蒋湘南、何绍基、朱琦、林昌彝、鲁一同、黄燮清、姚燮、郑珍、贝青乔、莫友芝、金和、江湜、洪仁玕。第二卷收黄遵宪、李慈铭、王闿运、黄焕中、宝廷、陈三立、范当世、许南英、康有为、易顺鼎、刘光第、夏曾佑、丘逢甲、李希圣、谭嗣同、梁启超、蒋智由、林旭、郭筠、包兰瑛。第三卷收柳亚子、章炳麟、秋瑾、樊增祥、敬安、潘飞声、黄节、徐自华、金天羽、诸宗元、陈

去病、高旭、于右任、马君武、张光厚、宋教仁、宁调元、苏曼殊、周实、王德钟。三卷分别以龚自珍、黄遵宪、柳亚子为首,代表近代这三个时期的主流和成就,其他依生年排列。每家作品前冠以诗人小传,主要评述其创作内容和风格,生平较简略。每诗题下有说明,介绍系年、背景、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注释力求简明。该书入选诗人是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并自成一家者,同时尽量照顾近代诗坛上各种流派、社团,并还注意入选不大为人注目而又有相当成就的诗人。此外还选入了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如黄焕中(壮族)、宝廷(满族)和女诗人如郭筠、包兰瑛等。所选作品力求既能反映作家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主导面,也能反映诗作多方面的艺术风格。此选本成书于八十年代,较六十年代出版的《近代诗选》选诗范围有所扩大,以较全面地反映近代诗歌基本面貌。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王飏)

【近代诗举要】 近代诗选集评注本。今人钱仲联选编、钱学增注评。卷首选、注者前言称,本书尽可能提供一个近代诗歌的概貌,在作品的内容上,除突出爱国精神外,也兼及其他主题和题材的作品;在风格流派上,除突出介绍代表进步潮流的诗派外,也注意顾及全面。全书共选近代诗人四十六家一百零六首诗。除张维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何绍基、朱琦、鲁一同、姚燮、郑珍、贝青乔、金和、黄遵宪、陈三立、康有为、陈衍、刘光第、丘逢甲、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黄节、蒋智由、秋瑾、苏曼殊、柳亚子等建国后一般近代诗选本都入选者外,还选了江湜、李慈铭、王闿运、张之洞、袁昶、樊增祥、陈宝琛、沈曾植、易顺鼎、范当世、文廷式、俞明震、李希圣、赵熙、金天羽、曾广钧、夏敬观、陈曾寿、杨圻、林文等家。每位诗人有作者介绍,简介生平、诗歌风格、所属流派等,每诗注释后并加评说,或揭示其思想蕴含,或阐释其艺术表现,力求精要。该选本在选诗及评注方面都有一些独特之处,所选作品题材、风格也较多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飏)

【近代爱国诗选】 近代诗选集注本。今人鲁歌、魏中林选注。卷首有鲁歌撰《乾坤留正气、诗歌唤国魂》为本书前言,着重论述近代爱国诗歌第一次以全民性的完全意义的爱国诗歌面貌出现,并说明选诗以爱国为主题,纠正过去过多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所属政治集团考虑的倾向。全书共选六十八位诗人二百五十余首诗,起自张维屏、林则徐,止于李大钊、周恩来,除各个时期较著名的进步诗人外,还选了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施补华、郑观应等,以及不甚著名的诗人如杨昌浚、杨振鸿、海钟等。每首诗后都先作题解,说明有关史事、题意,全诗的思想意义。

注释比较详细。该书为较早编选的近代爱国诗歌专题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王鹰)

【近代爱国诗词选】 近代诗词选集注本。今人葛杰、冯海荣选注。卷首有选注者前言。该书以爱国反侵略为主题,选录近代五十八位作者以及部分无名氏所作诗一百五十五首、词十首。入选作者除近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诗人外,还有赵函、何仁山、高树、刘大鹏、金嗣芬、龙顾山人(郭则澐)、淡庐主人、陆荪畦、龙鸣剑、罗福星等名不甚著的作者,以及无名氏所作竹枝词、感事诗和太平天国歌谣。每首诗注释后还加以简略评析,对研究近代爱国诗歌有一定参考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王鹰)

【辛亥革命诗词选】 近代诗词选集注本。今人刘运祺、蔡忻生选注。卷首有前言。是集选录诗词范围,大体上起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而止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也选了少量反映讨袁运动的作品。共收五十六位作者二百一十一首诗、词,及二十一首歌词、竹枝词。按作者分四类编排。一类为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和革命先烈以及当时的思想家、宣传家,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于右任、黄侃等,共四十人的作品。第二类为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写的诗词,收李大钊、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熊瑾玎七人。第三类为南社诗人,有柳亚子、周实、宁调元、陈去病、高旭、马君武、苏曼殊、李叔同、黄节九人。第四类收《湖北学生军歌》、《长沙抢米风潮竹枝词》、《四川铁路风潮竹枝词》。所选诗词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者为主,“也收集了某些流露出健康情绪的作品”以便“更全面地、更准确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前言》)。每位作者有简介,注释主要说明写作背景、训释词语并加整句串解。此书选诗面较广,对全面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诗歌有参考价值。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

(王鹰)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诗歌卷】 近代诗选集注本。今人张正吾、钟贤培、陈铭、汪松涛选注。为《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丛书之一。卷首有丛书编委会前言。全书选收五十六家近代诗人的二百一十题二百四十五首诗。入选诗人除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秋瑾、陈去病、高旭、苏曼殊、柳亚子等著名诗人外,还注意选入学术界尚少研究的诗人的作品,如江湜、招子庸、程恩泽、祁寓藻、陈澧、王权、宝廷、樊增祥、沈曾植、寄禅、陈衍、易顺鼎、连横等。所选诗题材、风格

也较多样。编排体例以作者出生年月为序,每家诗作也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每位诗人有简介。每诗题下有题解,说明系年、背景,概括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词语训释简明。卷末张正吾《书末三交代》称,这部诗选力争把不同流派诗人的作品,把同一诗人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品都选一些;注释,也依据同样的指导思想去写,目的是还其本来面目,并试图说明中国近代诗的发展确实有它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鹰)

【南社纪略】 近代文学社团史料与研究专著。近人柳亚子著。①初版本。1940年上海开华书局出版。收入柳亚子著《我和南社的关系》、《读〈南社补记〉后答张破浪先生》、《我和朱鸳雏的公案》、《南社雅集在上海》、《我对于南社的估价》、《关于新南社及其他》、《南社纪念会聚餐记》、《南社大事记》八篇文章,附录一《南社社友姓氏录》,录一千一百八十五人姓名、字号、籍贯,并以数字表示其填写入社书或介绍入社之先后。附录二《新南社社员录》,录二百一十七人。②增订新版本。署柳无忌编,系《柳亚子文集》之一,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卷首增收1940年开华书局版《南社纪略》书影,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影像及三人手迹,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像,南社第一次雅集(1909)、北京雅集(1912)、长沙雅集(1916)及武林同游图影,《南社丛刻》、《新南社社刊》书影等图片十四幅。正文前并有《柳亚子文集》的出版说明和柳亚子《南社纪略叙》墨迹。正文所收篇目文字与初版本同,《附录》则作了增补。《新南社社员录》增补何香凝、沈雁冰等十三人,共二百三十人。另增收胡怀琛《南社的始末》、蒋慎吾《新南社的第二次雅集》和《南社纪念会之史的回溯》、曹聚仁《南社、新南社》四篇文字。书末有柳无忌撰编后记。柳亚子为南社发起人和领导人,胡怀琛、蒋慎吾、曹聚仁亦为南社、南社纪念会、新南社参加者。此书对南社的历史及其影响、地位作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史料翔实可靠。对南社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王鹰)

【南社丛谈】 研究专著。郑逸梅编著。卷首有南社第一次雅集留影、南社主任柳亚子与家人合影、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像、高吹万像及柳亚子、高旭、高吹万、陈去病、胡朴安、傅屯艮、胡石予书画墨迹共十四幅和编者前言。全书包括正文与附录两部分。正文共十四题。一、南社成立前的酝酿。二、南社的成立及其支社,其中收录了《南社叙》、《淮南社序》、《辽社发刊辞》、《南社粤支部序》、《南社湘集简章》、《越社叙》等珍贵史料。三、南社的纠纷和斗争。四、南社后期活动。五、新南社的继起。六、南社纪念会。

七、南社大事记。以上七部分为南社史。八、《南社丛刻》的内容及其他汇刻,介绍了第一集至第二十二集《南社丛刻》出版日期、篇目、主要内容。九、南社社友事略,共撰一百七十三位南社成员小传,其中有许多以往人多不详者。十、南社社友作图寄意。十一、南社湘集的几个地点。十二、《南社湘集》的内容。十三、南社杂碎,记轶闻掌故。十四、南社诗简注,选录一百零三位南社诗人的一千零三十九首诗。附录资料九种:南社社友姓氏录,收录一千一百八十五人姓名、字号、笔名、籍贯;南社社友著作存目表;南社社友斋名表;参加南社纪念会姓氏录;新南社社员录;南社湘集姓氏录;南社广东分社社员姓氏录;柳亚子自谈名号;表录拾遗,录师生、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同学而同参社籍者等。编著者郑逸梅曾为南社社员和南社纪念会成员,并以广辑博闻掌故著称,故此书史料丰富,且有许多鲜为人知者。其中所列有关南社文献,大多据第一手资料,具有可靠性,其他所述出于闻见者或因年久回忆,难免有疏漏错误和不妥当之处,而亦足备考。是书对研究南社有重要参考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王臧)

【南社】近代文学社团研究专著。今人杨天石、刘彦成著。全书共九题,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中“南社成立的历史背景”、“前期南社”、“后期南社”、“新南社和南社湘集”、“南社纪念会”五节全面论述了南社从酝酿、发起、创立、发展壮大到分歧而分裂,以及到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的历史过程和活动。“南社成员的社会政治思想”、“南社成员的文学思想”和“南社成员的创作”三节论述南社政治主张、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其局限性,并着重论述了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和马君武、宁调元和周实、张光厚和王德钟等人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创作。最后一节结语,概括南社分裂蜕化的根源及其历史地位。作者后记称,本书初稿完成于1962年,1964年付排,在排出三校样后即进程中辍,后据旧校样作了增订。该书为建国以后较早系统研究南社的一部专门论著,较此前有关南社历史的回忆和一般评论更为深入,某些观点也反映了该书成稿年代文学研究的政治批判性特点。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王臧)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研究论文集。今人牛仰山编。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室编辑的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间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和资料选集三卷(概论·诗文卷、小说卷、戏剧卷)之一。卷首前言概括评论了1919至1949年间近代诗文研究的得失。全书分上下卷和附录。上卷为概

论卷,收录综合研究近代文学的论文十二篇,其中如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节录)、杨世骧《诗界潮音集》、徐蔚南《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等,均论及近代诗歌的演变与流派。下卷为诗文卷,选录研究近代诗歌、散文的论文二十七篇,其中郑振铎《梁任公先生》,王森然的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评传,赵而昌《记鉴湖女侠秋瑾》,全面论述几位近代重要作家、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评金亚匏〈秋蟪吟馆诗〉》、《评俞恪士〈觚庵诗存〉》,韦坚《略论金(江)弢叔的诗作》,杨世骧《宝廷》、《曾彦的〈桐凤集〉》,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质灵《论黄遵宪的新派诗》,梁国冠《台湾诗人丘仓海评传》,丁丁《诗僧曼殊》,劳无施《论〈石遗室诗话〉》等,则专论这些诗人的创作和诗论。附录则辑录了1919年至1949年间散见于各种期刊及部分报纸、书籍中的综论近代文学和研究近代诗文的文章一百七十八目,各目列有篇名、作者、出处、发表年月等。卷末编后记说明由于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从目录索引所列的篇目到文集所收的论文,仅仅是现已掌握的一部分,并非全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臧)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诗文卷】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为该编者所辑1949至197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四卷(概论卷、诗文卷、小说卷、戏剧·民间文学卷)之一。卷首有编辑说明。共收论文六十三篇,除三篇主要研究散文者外,均为研究近代诗歌或有关诗论的文章。内容包括三方面。有全面论述近代诗歌发展及流派的论文,如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近代诗选〉前言》;有综论某一时期,或某一流派、社团的论文,如论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太平天国诗文、诗界革命、辛亥革命时期诗歌、南社等;多为专论诗人及其作品者,计论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林昌彝、陆嵩、郑珍、洪秀全、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谭嗣同、康广仁、梁启超、王国维、郑观应、章炳麟、秋瑾、邹容、陈去病、柳亚子、高旭、庞树柏、周实等二十馀位诗人。按先综论、后作家作品编排,同一类者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该书精选了1949年后三十年间近代诗歌研究中不同论题、不同观点的代表性论文,集中了此期研究的主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臧)

【近代文学史料】资料结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史料》编辑部编。卷首有黄遵宪致梁鼎芬信手迹、钱玄同书《夏穗卿先生遗诗目录》手迹、柳亚子致钟敬文信手迹、柳亚子与钟敬文合影,及季镇淮撰序言。该书主要内容有:近代作家未

刊稿或集外佚作、作品辑点、作家生平或创作考述、史料介绍和研究资料索引等。其中《魏源佚札系年笺注》、《黄遵宪书信四通》、《夏曾佑诗集校》、《徐自华诗词选钞》、《吴梅集外诗词曲辑》、《柳亚子致钟敬文的信》、《柳亚子反议和文选》、《丘逢甲轶事》、《贺良朴未刊诗词简介》及《中国近代文学总论和诗文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919—1949)》等,均为有关近代诗人、近代诗歌的罕见史料或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飏)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研究专著。任访秋著。该书为著者从六十年代起有计划地选择近代文学各时期代表作家,分别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论文结集。据著者后记称:“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家,在嘉道时期除龚自珍外,又选了魏源。在同光时期,于维新派则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于革命派则选了章太炎、苏曼殊、刘师培;至于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而在文学观上有其正确的一面的如王国维,在对西方文学进行大力介绍、于当时文坛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林纾,也作为论述的对象。而于晚清的小说家,将其中影响较大的选了曾朴、李伯元、吴沃尧、刘鹗四人。”是书收录十六篇论文,以上述十六位作家姓名为题。其中龚自珍、魏源、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刘师培、苏曼殊均有专节突出论其诗歌创作;梁启超、章炳麟亦论及其诗学理论。正文后附录论胡适、钱玄同二位与近代文学关系密切的新文学家及《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争论》一文。该书内容翔实,论述系统,治学谨严,观点明确,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著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飏)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学百题》编写组著,其中论近代诗歌部分主要由王飏、赵慎修撰写。卷首有钟敬文撰导言。此书由一百多篇论文组成,分别就有关中国近代文学总体发展、近代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文学、民间文学、理论批评八个方面的一百多个专题作出概要精炼的论述,包括了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主要文学现象、流派、社团和主要作家及代表作品。其中关于近代诗歌和诗论的论文三十四篇,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宋诗运动、汉魏六朝诗派、诗界革命、南社、翻译诗歌,以及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姚燮、贝青乔、何绍基、郑珍、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陈三立、谭嗣同、梁启超、王闿运、易顺鼎、秋瑾、黄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周实、宁调元、黄节、马君武、苏曼殊、招子庸,和《射鹰楼诗话》作者林昌彝、《艺概》作者刘熙载等二十九位诗人、诗论家及其创作。多数论文在审视角度、理论

深度,或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概括、评价等方面,都力求提出新见,或有所新意,语言生动。此书是一部对近代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作者们在对近代文学进行了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阐述、说明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及相互间关系,综合起来就是一部以问题形式出现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此书对许多问题的论述,较一般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刻,评价也更加准确、公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飏)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研究专著。今人徐鹏绪、张俊才著。为天津教育出版社《学术指南丛书》之一。全书包括“绪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历史回顾”和“概论编”、“诗文编”、“小说编”、“戏剧编”、“资料编”五部分。其中“诗文编”列十三个专题:一、近代诗歌总体研究,二、近代散文总体研究,三、近代诗文理论研究,四、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研究,五、太平天国文学研究,六、诗界革命研究,七、南社及其诗人研究,八、宋诗派、同光体等旧诗派研究,九、近代桐城派研究,十、龚自珍研究,十一、黄遵宪研究,十二、梁启超及新文体研究,十三、秋瑾研究。每个专题都概述该课题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成果、主要观点,并对研究者的贡献或不足作出评价,说明有争论的问题及各方代表性论点,有些还对该专题发展方向作出预测或提出自己的看法。“资料编”收列近代文学作品总集、丛书、类编介绍三十六种;近代作家作品选注、笺注、校注本介绍四十一种;近代文学研究论著介绍九十三种;近代文学史著作介绍十二种;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介绍三十六种;近代文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1919至1989)千馀目,其中诗词部分包括综论和各诗人专论条目共三百馀则。书末有著者后记。该书对从五四运动至八十年代末这七十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系统的回顾、清理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加分析,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和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王飏)

【晚清诗界革命论】研究专著。今人张永芳著。为漓江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共十二节。第一节为引论。第二节至第八节题为:诗界革命兴起的背景、诗界革命的先导——黄遵宪的“新派诗”、诗界革命的幼稚阶段——夏、谭、梁的“新诗”、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新诗”与“新派诗”的合流、诗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诗界潮音集”与“饮冰室诗话”、诗界革命发展的高潮——“新粤讴”与“新体诗”、诗界革命的消歇与尾声,系统论述晚清诗界革命酝酿、发生、发展、消歇的全

过程。第九节至第十一节论述了诗界革命的几位代表诗人,包括作者称为“首席代表”的黄遵宪、“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梁启超,及其他主要参加者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等。第十二节结语:诗界革命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就诗界革命能否算作“革命”、是否失败及其原因、兴起的时间等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结论。该书为建国后第一部专门就晚清诗界革命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有独到的见解。漓江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鹰)

【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研究专著。今人汪毅夫著。书前有俞元桂序。正文共分十二题:鹿耳听鼓浪,菽庄望鲲涛——记台南南社暨厦门菽庄吟社、《窥园留草》识小录、《后苏龛合集》札记、《台南市志·艺文篇》订谬、近代学人游台事迹杂考、台湾近代文学若干史实考、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台湾竹枝词风物记、台湾近代楹联小札、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略谈台湾近代文学的分期、台湾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附录《在福建发现的台湾近代作家之佚文遗物》;《主要作家索引》,列本书所论台湾籍和入台作家七十六人;《主要书刊索引》,列本书所论作家别集和《台湾诗乘》、《台阳诗话》等合集、诗话等四十四种;《主要社团索引》,列“浪吟诗社”、“台湾文社”等社团十二个。此书所论主要是台湾近代诗歌,对近代台湾诗人施士洁、丘逢甲、陈浚芝、汪春源、许南英、连横、林鹤年等人的生平史实作了重要考订,对台湾文学社团崇正社、斐亭吟社、浪吟诗社、牡丹诗社、南社、菽庄吟社的组织、活动等也详加考论,提出新说,在此基础上对台湾近代文学史的发展提出独到见解,为台湾近代文学史的编述打下基础。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鹰)

【张维屏诗文选】近代别集选注本。今人黄刚选注。该书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之一。卷首有陈旭麓为该丛书所写总序和黄刚所写《跨越两时代,首开新诗风(代前言)》。代前言指出:张维屏的《三元里》在我国流传甚广,然而,对于这首诗的作者张维屏其人其事,人们却知之甚少,有关张氏的研究文章也寥若晨星,此书有鉴于此而编撰,并论述了张维屏生平、思想发展及其诗文创成成就,着重肯定其爱国诗歌的价值和时代特色。全书分文选、诗选两部分,诗选选注了一百零一题一百三十首诗,包括咏史、山水、咏怀及鸦片战争纪事各类题材诗作,较全面地反映了张维屏诗歌创作内容和风格。每诗下有说明,简介作品系年、背景、艺术特色。注释重在典故史实。卷末附张维屏年表。本书为建国后第一部张维屏诗文选注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王鹰)

【林则徐诗集】近代诗别集校笺本。林则徐著,今人郑丽生校笺。卷前有林则徐手书诗稿及碑刻拓本等。是集以清光绪十二年(1886)刊《云左山房诗钞》为底本,就今所能求得之有关资料,重新增订、校录,并加句读,全面厘整而成。诗集包括“古近体诗”、“诗馀”、“试帖”三部分,每类按核定系年编次,不复分卷。共收录诗词六百五十三首,其中词十二首,试帖诗二十四首,较原刊本《云左山房诗钞》增益七十九首,系据林氏后裔家藏之林则徐手定诗稿《使滇小草》及今存其手书诗词之墨迹、碑版拓本、影印复制之本,以逮前人载籍引录而足以传信者,分别校补,多为世不经见之佚篇。文字亦据上述文献校勘,凡与原刊本有出入之处,皆作对照说明,沿流溯源,力求矜慎。每诗笺释,重在系时、系地、系人、系事。据林则徐日记核定年、月、日,难以确考者举其大致时间;诗作于何地,事关行踪经历者,亦力求详悉;诗中涉及之人物,分别考其生平略历,凡与林则徐唱酬之篇什,酌予附载;凡与作者生平及史事有关者,酌予笺识,前人有关述评,亦附归篇末。而诗中词语典故,凡可从辞书中翻检而得者,均不注释。卷末附录《林则徐佚诗待访目》及谢章铤撰《云左山房诗钞序》、陈衍《云左山房诗钞书目提要》、林家溱《使滇小草的选批》三篇论诗之作。该书搜罗完备,校笺详明,为迄今最称赅善之林则徐诗集新编本。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鹰)

【林则徐年谱】年谱。今人来新夏编著,启功题签。卷首有林则徐像、广州林则徐纪念碑、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及林则徐手书奏折、书札、诗、联、条幅、横批墨迹和印鉴图片共二十一幅。谱前列“林氏三代简表”。年谱起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止于道光三十年(1850),每年依月、日记事。每条记事下多引录所据资料并注明出处,凡见于《林则徐集》等已刊著述者多摘要,而于未刊稿本或刊本流传较少者辄大量引录。林则徐诗作凡可系时者均予注明,且往往全诗引入并说明本事。有些引录史料或诗词后还加按语作考证或说明。谱后附录有:《谱馀》,录清人笔记杂著中记谱主遗闻琐事,未采入谱中而可供参考者;《林则徐出生时有关人物简况》;《大事索引年表》;《征引参考书目》,收林则徐著作、传记、有关人物年谱、官书奏议、方志、诗文集、资料汇刊、笔记杂著、近人及外人著作、近人论文共二百二十九种。是谱资料丰富,翔实准确,足资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985年增订再版。(王鹰)

【龚自珍诗选】近代诗别集选注本。今人刘逸生选注。成书于1979年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选龚自珍编年诗五十三首,《己亥杂诗》一百零

一首,合共一百五十四首,约占现存全部龚诗的四分之一。每首诗题下有说明,主要介绍写作年代、背景、解释诗题中有关人物、典故、史实,或点明题旨,一般不作评论。诗后注释除注明典故出处、训释文字、考核名物、取证史实外,还较多加上诗句串解,以便初学。较长的诗分段注释。有些诗在注后以按语附注者见解,分析段意或全诗含意。卷首有前言,卷末附注者撰《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一文。前言称:“龚诗一向没有全注本,间有选注,所选数量也嫌太少,可以借手之处甚微,不得不从头做起。”此书注释详明,对前人误解之处多所是正。(王飏)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近代诗别集注本。今人刘逸生注,一本署万尊嶷(刘逸生笔名)注。此书为龚自珍大型组诗《己亥杂诗》的第一部全注本。正文前有注者撰《龚自珍和他的〈己亥杂诗〉》一文及凡例。是集以吴煦刻本为底本,校以诸通行本,并加编号,以便检阅。原作中龚自珍自注间有误记者,均于注中指出订正。注文先作整句串解,或并点明意旨;后注词语,注明典故出处,训释文字,考核名物,取证史实。诗中有借事寓意或以古喻今者,辄于每首诗注后以按语间加注者见解,诠释评析诗意。《己亥杂诗》中涉及作者师友亲属百余人,有名家硕学,亦有业绩不显名不经见者,注者编检前人载记,明其生平,择要录入。此注本据材丰富,注释详明,时有独到见解。对于阅读欣赏《己亥杂诗》及进而研究龚自珍生平经历、政治思想、交游情遇、学问著述,均有参考价值。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署万尊嶷注;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署刘逸生注。(王飏)

【龚自珍诗选】近代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郭延礼选注。成书于1979年10月。选龚自珍编年诗五十九首,《己亥杂诗》六十四首,共一百二十三首,约占现存龚诗五分之一,所选篇目与刘逸生选注本有所异同。注释分说明与注释两部分。题下说明侧重诗歌思想和艺术分析,并联系作者同一主题诗文以证释题旨。注解除简明训词释典外,凡涉及史实者辄详注,或略加评论;释意力求顾及全篇,与相关诗句对照比较;并采用“以龚证龚”方法,以诗句、词语互参互证,力求准确索解原意。卷首有前言,卷末附《关于龚自珍两首诗的写作年代》一文。前言称:“龚诗的选注,几乎可以说是开荒工作”,“无前人的选本、注本可以参考”。此本与刘逸生选注本几乎同时,仅略有先后,各有特色,而同具开拓价值。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王飏)

【定盦先生年谱】年谱。一名《龚定盦先生年谱》。谱主龚自珍,号定盦(庵)。清吴昌绶编。此谱为程秉钊始创。程笃嗜龚自珍文,榜所居曰“龚学

斋”,欲撰年谱,创稿录数十事,病未卒业,托之龚氏姻戚陈昌绅。陈复询访得若干事,以授吴昌绶。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吴昌绶校辑《定庵全集》,乃据旧稿并征之本集及有关著述,充实补苴而成,由章钰、张一麀助之整理,并经郑文焯校阅。光绪三十四年在京定稿付梓。谱前有编者《弁言》及陈昌绅致吴昌绶书,叙明编谱缘起。是谱记龚自珍家世、治学、仕宦、交游、金石收藏等甚详,并为著述编年。其记事之下,每以双行附入所据资料,多不经见。谱末后记附录未及补入年谱者若干条。此书为最早编定之龚自珍年谱,叙其大纲,首尾粗具,为多种龚自珍集所附收,并为其后诸“简谱”、“年表”之所本。有光绪戊申(1908)刻本,又附见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排印本《龚定庵全集》、1935年国学整理社刊王文濡校编本《龚定庵全集》、1959年中华书局版及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龚自珍全集》。(王飏)

【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年谱资料。谱主龚自珍,号定盦(庵)。清张祖廉纂。二卷。谱前有叶德辉序、金蓉镜序及张祖廉自序。张祖廉序叙其纂谱缘由,略谓: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五年(1899)曾在苏州与吴昌绶同订龚自珍书。庚子(1900)冬因友人陈仲彦而得见其尊人小铁先生(陈元禄)札记《羽琤逸事》,录副存之,又摭拾陈仲彦口述龚自珍及其子龚橙轶闻笔之于册。因吴昌绶撰《定庵先生年谱》已刊,未及补入,藏篋多年。至辛酉(1921)始为之爬梳,汰除与《年谱》重复者,属辞比事,命之曰《年谱外纪》。此谱内容几全出于《羽琤逸事》。陈元禄为龚自珍子龚橙之妻弟,《羽琤逸事》成于龚自珍逝世后两月,为最早记述龚氏事迹之著作,所记多外人不知者,弥足珍贵,而仅存抄本,向未付梓,赖此《年谱外纪》以传。此谱不依年次,而存辑若干条,记谱主交游行踪、言谈举止、读书评识、文物收藏甚详,并录存往来书札、唱酬诗作不少,于研究龚自珍志趣、性格、学问、思想等较有价值。叶德辉序称:“其遗闻琐事,非仅得之流传,故于知人论世之中,亦有阐扬幽潜之意,洵足为读先生文者,一洗蚍蜉之陋也。”有1921年《娟镜楼丛刻》本,并附见1935年国学整理社刊王文濡评校本《龚定庵全集》、1959年中华书局版及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龚自珍全集》。

(王飏)

【龚自珍年谱】年谱。今人郭延礼编著。此谱在吴昌绶、张祖廉、黄守恒等诸家撰龚自珍年谱基础上,广泛收集和择取前人研究成果,包括辑佚、史料、注释、论著中有关资料,经编者考辨、研究而撰成。首有前言,略述编谱体例。是谱采用正文加注格式。正文依年系条,每年条下分谱主事迹、编年著作、历

史大事或有关人物生卒三部分。谱主之生平、思想、重要论著皆于正文中叙述,间加评论,与谱主关系密切之人物介绍亦置于正文。而有关所据材料出处、生平事迹考辨、著作年代考证、一般交游简介,均列为小注。全谱计小注近千条。是谱对龚氏生平史实、著述系年,多据本集及有关史料,核定辨正,有不同前人之说者,力求信而有征。对龚自珍思想发展及学术界争议的问题,亦每于记事之中加以评述,或征诸史料,折衷是非,提出己见。谱后附录五种:《龚自珍著作刊刻情况》,简介后人所辑龚自珍别集、全集、收入丛书单篇著作及各种批校本、选本、年谱、研究专著等,并摘引各家评论;《龚自珍传记资料》,录《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儒学案》、《杭州府志》所载龚自珍传;《〈龚自珍年谱〉征引书目》,包括“龚自珍著作及有关研究著作”、“史书、年谱、方志”、“诗文总集、别集及诗话”、“笔记、杂著”、“今人学术论著”、“报刊文章”六类;《〈龚自珍年谱〉人名索引》,列与谱主有关人物二百五十余人,注明在《年谱》中出现页码;《龚自珍研究论著索引》,收录文集序跋、传记、年谱等研究专著,共五十九种,1929至1986年间有关论文二百九十余篇。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

(王飏)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传记资料。今人孙文光、王世芸编。是书辑录了自清代嘉庆朝至1949年前近一百五十年间二百五十余位作者有关龚自珍家世、生平、思想、交游、创作等方面的记载和评论资料。其中一部分是龚自珍同时代人的直接记载,包括碑传志铭、往来书札、赠答诗词、诗话评识、序跋笔记等。另一部分是后世不同时代、不同倾向、不同观点的学者、作家的论著,包括轶闻琐记、事迹考辨、思想评论、作品研究、影响评价等。这些资料辑自数百种典籍,尽可能从原著辑录,有些原作是转引他著的亦注明其原引书籍出处。其中有的录自稿本或抄本,均注明出处及公私藏家。并摘录日本稻叶君山、高桑驹吉、本田成之三家论著有关评论。书末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龚自珍全集》所附王佩诤编《龚自珍佚著待访目》、《龚自珍全集校印后记》及1929至1983年间《龚自珍论文索引》一百八十七则。是书搜罗宏富,其中有许多罕见史料,对龚自珍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黄山书社1984年出版。(王飏)

【龚定庵研究】 研究专著。近人朱杰勤著。为商务印书馆发行、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之一。龚定庵(庵)即龚自珍。卷首自序称:“龚定庵为清代思想启蒙运动之一领袖”,“此编文凡六篇,皆论列定庵最擅之学术,而又鲜人道者”。全书包括《龚定庵别传》、《龚定庵之革命思想》、《龚定庵之掌故学》、《诗

人龚定庵》、《龚定庵之史地学》、《龚定庵之金石学》六篇。其中《诗人龚定庵》一篇对龚自珍诗歌进行全面评论。此书以西方美学和心理学的某些理论,结合中国传统诗学来研究龚自珍,论述欲望、幻梦、灵感、童心、挚情在龚自珍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与表现。突出论证龚自珍是一位“道德感情丰富”即“表同情于人生”之“天才”,“一血性人物,一爱国者”,“伟大之抒情诗人”,旁及其“自传诗”、“爱情诗”、“哲理诗”和艺术形式的“变化复杂”、“风格高绝”,并论述了前代诗人与当时学术文化对龚诗风格形成的影响,和龚自珍对晚清诗人的影响。此书是用近代观念,包括近代文艺理论研究龚自珍的重要著作,也是1949年以前唯一一部系统研究龚自珍的专门论著。194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47年再版,1965年台北再版。

(王飏)

【龚自珍综论】 研究专著。今人陈铭著。为张正吾、陈铭、邓小飞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卷首有郑芜撰代序。全书八章。第一章《生活在激变的时代》,第二章《思想发展的理论渊源》,第三章《哲学思想的复杂性》,第四章《社会批判论》,第五章《社会更法论》,第六章《文艺论》,第七章《诗词创作》,第八章《历史影响》。卷末作者后记说明本书是把龚自珍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加以研究,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去考察,因此对龚自珍思想的各个方面都综合予以研讨,纳入大文化范畴中考察。书中第六、七两章论龚自珍文艺思想和诗词创作,着重论证其“有情说”和“不守家法的创作思想”以及“反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等主张,认为这是启蒙主义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表现。第八章则具体论述了龚自珍同时代人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以来不同时期的评价。作者主要结论是:龚自珍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一位杰出的诗人。漓江出版社1991年出版。

(王飏)

【龚自珍研究】 研究专著。今人管林、钟贤培、陈新璋著。是书为专门研究龚自珍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的一部论著。全书共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论龚自珍所处时代、生平和文艺思想。第二部分专论《己亥杂诗》的思想内容。第三部分论述其他编年诗中表现的思想感情。第四部分专门对《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这两首写得比较隐晦,含意比较深邃的歌行体长诗进行分析、考证。第五部分论龚诗继承庄子、屈原、李白的传统而形成奇境独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第六、第七部分分别论佛学思想、经史研究对龚自珍诗文创制的影响。第八、第九部分论散文和词,

最后论述龚自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书末附《龚自珍年谱简编》。这部专著对龚自珍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历史地位作了较全面和系统的论述,概括了已有研究成果,也不乏独到见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飏)

【魏源诗文选注】近代作家选集注本。湖南省魏源诗文注释组选注。卷首有选注者前言。全书分“《古微堂内集》选注”、“《古微堂外集》选注”、“《古微堂诗集》选注”三部分,共选文三十九篇,诗四十首。所选诗文以清同治九年(1870)刊《古微堂诗集》和宣统元年(1909)黄象离辑《魏默深文集》为底本,参以中华书局《魏源集》和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校订字句。每首分别加以说明、注释和今译。说明介绍系年、题意,着重评析诗作思想内容。注释较详。今译以白话逐句对译而讲求韵律、词句整齐。书后附陈新宪撰《魏源年表》,记事简要而以诗文系年为主。此选注本对研究魏源思想、创作有参考价值,唯所收作品较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王飏)

【魏源诗文系年】年谱。今人李瑚著。卷首有前言及魏源墨迹两幅。是书对魏源作品的绝大部分,均确定或约考其系年,按年排比。正文以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为首条,自第二条1809年(嘉庆十四年)起为诗文系年,逐年编次。每篇诗、文题下,均有考证,凡与其他有关魏源的书系年不同者并加考辨。魏源尝谓:“诗集宜分体,不必编年。”故所作诗文多未记年月。是书系年,考证缜密,大多信而有征,足资参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王飏)

【魏源师友记】诗人传记资料。原名《魏默深师友记》。今人李柏荣撰。此书初稿成于1928年,在北京不慎焚于火。后于南京讲学之余,重为搜罗,得七十余人,名《魏默深师友记》,1936年自费由邵阳大展纸业印刷局出版,印数极少。1937年又续补百数十人,而久未能问世。1979年始由陈新宪等据手稿整理,更名《魏源师友记》。全书共七卷,著录了作者从一千余种典籍钩稽所得之魏源亲长、师友共二百三十三人的生平事迹和著述,以及与魏源的渊源、交往,“辑先哲师友渊源为一书,其体类儒家之学案、史学之纪事”(卷首《柳诒征序》)。不仅为研究魏源及其诗作之重要资料,而且对研究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作家和文学,都极富参考价值。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出版。

(王飏)

【郑献甫诗选注】近代诗别集选注本。清郑献甫著,今人刘映华注。献甫(1801—1872),原名存宁,字献甫,以避清咸丰帝奕訢讳,以字行,别字小谷。

广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官刑部主事。次年即以养亲乞归,后不复出仕,以教授、著书终其生,历主广西德胜书院、庆江书院,桂林榕湖书院、秀峰书院,广东顺德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广西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桂林孝廉书院等,为两粤大吏硕儒所推重。陈澧称其“天资高朗,耿介豪逸,发言行事,纯任自然,谈笑讥贬无所避”,“可谓豪杰之士也”。又谓:“为文章贯穿古今,直抒所见,绝去修饰”(《象州郑君传》),“兼擅六朝唐宋诗文,而模仿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补学轩文集序》)。诗集有《鸿爪续集》三卷,《鸦吟集》四卷,《鹤唳集》四卷,《鸡尾集》六卷,《鸥闲集》六卷,后四集合刊为《补学轩诗集》。另有《补学轩文集》暨《续刻》、《外编》十六卷,其中散文十二卷,骈体四卷。生平见陈澧《象州郑君传》(《续碑传集》卷七九)。本选集不分卷,按原编《鸿爪》、《鸦吟》、《鹤唳》、《鸡尾》、《鸥闲》各集编次,共录诗三百三十二首,大体反映出郑献甫诗“其韵清越,其格老苍,要皆出于自然,不事规仿,故能卓然成家”(林肇元《续刊补学轩诗集序》)的特点。卷首前言突出评论郑氏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诗作,并认为其能自成一家,诗歌语言往往自然质朴,但有时又好用典,往往以史为诗。故此书典故、史实注释较详。此书为郑献甫诗第一部选注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飏)

【郑子尹年谱】年谱。近人凌惕安编著。八卷。谱主郑珍,字子尹。谱前有郑珍遗像、墨迹及编者序、本谱凡例。该年谱分“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卷一为“谱前”,叙谱主先、后世,及外家、师友之关系密切者之略历,其关系较次者,则散见谱中各相关条下。其中较重要者如郑珍外祖父黎安理,舅父亦岳父黎恂,内兄黎兆勋及表弟黎庶焘、黎庶昌,其师莫与俦及子莫友芝,其为拔贡之座师程恩泽等。卷二至卷七为正谱,始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止于同治三年(1864),逐年记述谱主治学、交游、著述、诗作、科试、任教及家事。所记事以郑珍著作为基本材料,其余各家著述有及郑珍事迹者,靡不采录。每条之下,皆注明出处。于诗作尤详具本事,凡有关郑珍事迹之诗,往往全首录入。卷八为“谱后”,专叙谱主逝世后有关事件及遗著梓行经过。是谱内容详尽、信实,为研究郑珍其人其诗之重要参考。其正谱前半部分曾刊载于《贵州文献季刊》创刊号(1938年)、第二、三号(1939年),《贵州文献汇刊》第四期(1940年),载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全书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文献丛刊》第二种,商务印书馆1941出版。(王飏)

【郑珍评传】诗人评传。今人黄万机著。卷首有

郑珍像及其楷、篆、行书墨迹。全书共十章。前七章为“郑珍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游幕与苦读”、“中举与修志”、“首任学官前后”、“执教与著述”、“潜心治学”、“悲凉晚景”，评述郑珍一生出处、交游、治学，其中每引其自述平生、感慨言志，及抒写亲子之情、朋友之谊的诗作，以及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揭露官吏残酷，同情民生悲苦的诗歌。第八章论郑珍世界观及学术成就。第九、十章论述其文艺思想及文学创作，包括诗、画理论，散文和诗歌创作成就。著者认为，郑珍属道光以后宋诗派的倡导者，其诗歌渊源由苏轼、黄庭坚而上继杜甫、韩愈、孟郊，但其论诗主张有感而发、“自打自唱”、“诗无定派”等，都有独到见地。其诗风格也非前人所谓“生涩奥衍”所能概括，大体以“奇奥”与“平易”两种风格居主要方面，而又摇曳多姿，并有发展变化；他与龚自珍、黄遵宪可并列为晚清诗坛的拔萃者，但承袭了较多的传统意识，属于继前世、总其成的诗人，算得旧体诗艺的集大成者。此书资料丰富，叙述翔实，评论力求全面，而又不乏自己的见解。为第一部系统的郑珍评传。巴蜀书社 1988 出版。（王臧）

【莫友芝评传】诗人评传。今人黄万机著。卷首有莫友芝像及墨迹、著者前言。全书共十章。前八章“莫友芝家世与他的童年”、“教授署中”、“铅槧生涯”、“壮年行踪”、“艰难岁月”、“流寓京师”、“鄂皖历程”、“江表十年”，评述莫友芝自幼与郑珍同学，及应试、讲学、交友、纵游、寄幕等一生行踪事迹，其中多引其诗作，与行事互证参释。第九章“人生观与学术成就”论其恪守理学、独善其身的人生志趣，与金石、目录、文字、史学诸方面成就。第十章为“诗词古文与书法”，其中着重论其诗论、诗歌创作、诗歌风格与艺术特色。附录《莫友芝年表》与《莫友芝著作简介》。著者对莫友芝的总体评价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他是典型的儒家学者和诗人，思想言行均未脱出儒家正统思想的藩篱，关心国家安危，同情民间疾苦，不愧是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书法家。是书为第一部莫友芝评传。著者运用广泛搜求的材料，力求再现传主的真实气度和风采，对其学术论著、诗词创作和书法篆刻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王臧）

【入境庐诗草笺注】近代诗别集笺注本。今人钱仲联笺注。此书为第一部黄遵宪诗集全注本，成书于 1936 年，依黄遵宪手定、清宣统三年（1911）日本排印之《入境庐诗草》厘为十一卷。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钱萼孙笺注。卷首有黄遵宪诗稿墨迹，黄遵宪自序，康有为、陈柱、冯振、王遽常、钱萼孙所作序，本书《发凡》，及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清史稿》黄遵宪传、钱萼孙《黄公度先生年谱》三种传记材料。正文笺注为诗内句下夹注。卷末有黄遵宪原跋。另将各家评论汇集为诗话二卷。上卷辑录梁启超、潘飞声、袁祖光、陈衍、高旭、徐世昌、王揖唐、杨香池、钱萼孙诸家所撰诗话中有关评论；下卷辑录汪国垣、何藻翔、吴宓、吴芳吉、古直、诸祖耿、徐英、钱基博、龙沐勋、胡适、胡先骕、陈炯、邵祖平诸家序跋、论文、专著中有关评论。1957 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出版修订本，笺注者于发凡第十四条叙此版修订经过云：“《入境庐诗草笺注》于 1936 年冬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问世，罅漏尚多。后此续有补苴，曾部分发表于《国专月刊》。时近廿稔，所积益夥。增笺本事、补注故实外，其有征典非朔、引书有误者，亦详加厘正，视初稿不啻改弦更张矣。”此版卷首增收黄遵宪手札墨迹，序言仅保留自序、康序、删去陈序、冯序、王序、钱序。卷末增收黄遵宪之孙黄能立 1930 年再版《入境庐诗草》时所撰《校刊后记》。诗话部分增收狄葆贤、陈融、王遽常三家诗话，夏敬观、林庚白二家论著中有关评述。笺注仍为文内夹注，而内容有所增删订正。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重排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署钱仲联笺注。此版最主要改动有二，其一为附收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其二为将原有夹注改为段注，以利阅读。其馀内容亦有所增删，编排亦作调整。卷首除增收黄遵宪像及入境庐故居（未修葺前）图片外，新增笺注者所撰前言。卷末除原收黄遵宪《辛亥初版本跋》、黄能立《辛未校刊后记》外，新增《原稿本卷五至卷八跋》，收录陈三立、吴德潇、夏曾佑、俞明震、范当世、曾习经、何藻翔、梁启超、徐仁铸、温仲和、丘逢甲、刘燕勋、冯骥声十三家跋语。附录也分为三部分，以《日本杂事诗》及自序为附录一；以原刊卷首之《清史稿》本传、《墓志铭》、《年谱》为附录二；诗话二卷为附录三，并删去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增入屈向邦《粤东诗话》及郑振铎、钱钟书有关论著中评论。这部笺注，着重笺释本事，注明典故及训诂。注文力求翔实，凡关近代时事及外国故实，兹博稽诸书，所注务求其详；征典必引其最先者，辑录资料也极为丰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王臧）

【黄公度先生诗笺】近代诗别集选注本。近人古直笺注。三卷。卷首有古直 1926 年撰《〈黄公度先生诗笺〉自序》和《黄公度先生小传》。自谓其夙嗜《入境庐诗》，尝取所尤爱者，别为一编，间有所得，即注其上，朱墨已满，更为掌录，题曰《黄公度先生诗笺》。所选古今体诗近二百首，约占《入境庐诗草》三分之一。然选诗取于所爱，注诗基于所得，有些重要

诗作未入选或选而不注。钱仲联尝批评此书“舛误至夥”，指摘“其间疏密详略，绝不一致，挂一漏万”，“所笺事实，往往不合”，“所注典实，谬误更多”，“其所征引，亦多错误”，“又有强作解事，妄加武断者”为此书“五病”。但钱著《入境庐诗草笺注》仍有存录古直按语者。此书为最早的黄遵宪诗笺注本。1927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出版，线装一册。

(王飏)

【黄遵宪诗选】近代诗别集注本。今人钟贤培、管林、谢华、汪松涛选注。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选注者在前言中概论黄遵宪生平思想及诗歌创作成就，并说明本书编注体要。这部诗选主要根据黄遵宪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定、宣统三年（1911）日本排印的《入境庐诗草》十一卷本和光绪二十四年富文堂印《日本杂事诗》二卷本选编而成，少数作品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入境庐集外诗辑》。选诗原则力求全面地反映黄遵宪的思想及艺术风格。正文前并收录黄遵宪《〈入境庐诗草〉自序》和《〈日本杂事诗〉自序》。该书共选黄诗七十八题二百四十八首，约占现存黄诗的四分之一。编排颇有特色，诗序按内容排列。大体按前言所概括的黄诗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计三十题八十一首；第二部分为“批判守旧，要求变法，救亡图存”者，七题十三首；第三部分为“将日本、东南亚及欧美等国的政治、历史、科学文化和风物入诗”的，十八题七十首；第四部分为抒情、怀人、记游及歌词等题材的，二十三题八十四首。每诗题下有笺，主要说明写作时间、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简略提示艺术特色；不同版本文字歧异者略加介绍，说明出处。诗的注释，侧重有关史实、典故和难解字词，部分概括句意。书末附录黄遵宪所作词三首、散曲一首、赋一首，并选录黄遵宪同时代人王韬、康有为、梁启超、陈衍、高旭、丘逢甲、黄遵楷等评论其人其诗的序、跋、墓志铭、诗话等。此书选诗得体，资料较丰富，对研究黄遵宪诗歌创作有参考价值。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飏)

【黄公度先生年谱】年谱。一名《大诗人黄公度年谱》，又名《黄遵宪年谱》、《黄公度年谱补正》。一卷。今人钱仲联编。谱主黄遵宪，字公度。此谱为编者笺注《入境庐诗草》时所撰。其材料多由潘兰史（飞声）、蒋志范（元庆）、俞运之（鸿筹）、彭精一（忻）提供。对尤炳圻先作之黄遵宪年谱略有采取，其误者纠正之。是谱除依据黄遵宪《入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及《清史稿》、《嘉应州志》、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等传记资料外，还广泛征引翁同龢、夏同善、王

韬、薛福成、袁昶、胡曦、康有为、陈衍、丘逢甲及近人王仲实、正先等诸家日记、别集、著述中有关资料，并辑录黄遵宪从弟黄遵庚（字由甫）口述材料及所藏大量黄遵宪遗文书札。每条记事下以夹注摘录所据资料或注明出处。此谱记事准确，内容翔实，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曾刊于《大陆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又载《国学论衡》第五期、第七期、第八期，均署钱萼孙编。全稿附于《入境庐诗草笺注》，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王飏)

【铁云诗存】近代诗别集注本。清刘鹗著，近人刘蕙荪标注。刘鹗（1857—1909）原名梦鹏，一作孟鹏，字云抟；更名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家淮安。少有经世志，一应乡试不第，遂绝意科举，留心治河、历算、乐律、医学诸实学，又从李龙川受太谷学派教义，益“以养天下为己任”。清光绪十四年（1888）投效河南河工，继为山东巡抚张曜咨调赴鲁，任黄河下游提调，以劳绩咨送总理衙门考验，得以知府任用。应张之洞之邀赴鄂议修芦汉铁路，复为德商所办福公司聘主山西筑路开矿事，又自办实业，多未成。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以贱价购俄军所掠太仓米“平糶”赈民，后以此获罪革职，遣戍新疆，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曾发现殷墟甲骨并开研究甲骨文之先，著《铁云藏龟》等，尤以小说《老残游记》名于世，世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亦能诗，而多散佚。生平见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铁云诗存》为刘鹗之孙刘厚滋、刘蕙荪据家传稿本、抄本并多方搜辑编成，共四卷。卷一《芬陀利室存稿》，为光绪二十二年刘鹗回忆平时所作，手书于“文美斋笺谱”之稿本。卷二《东游草》，系光绪三十二年游日本之作，为其子刘大经抄本。卷三《抱残守缺斋遗诗辑存》。卷四为附录，录《老残游记》所附诗及长短句。卷四后有补遗，均为刘厚滋、刘蕙荪所辑，共七十题一百十三首，大多数诗均有注。各卷尾辑注者识语及书尾跋说明了成书原委。卷首严薇青序称刘诗“才调高旷，清华绝伦；工力深厚，迥异凡响。所谓清新、俊逸、殆兼而有之”，“兼之阐幽发微，标注详备”。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后刘鹗曾孙刘德隆等又辑得八题十二首，题名《〈铁云诗存〉补遗》，与《铁云诗存》一并收入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飏)

【康有为诗文选】近代别集选注本。今人舒芜、陈迥冬、王利器编注。该书初版于1958年，为纪念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康有为诞生一百周年而编选出版，原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注，1983

年重印出版时,改署舒芜、陈迥冬、王利器编注,原编注者前言尾署改为舒芜,并接刊1983年舒芜所撰附记,说明此次重印,除四五处文字上的改动外,全文照旧,以存历史的面目。选目、注释与年谱也未作大改动。正文分“文选”和“诗选”两部分,选文十一篇,选诗一百零九首。诗以梁启超写印的四卷本《南海先生诗集》为底本,参校以崔斯哲本及其他载籍。选录原则为“只选他进步时期的作品,除少数几篇特例外,一般不选他反动时期的作品”,注释除训释词义、典故,介绍本事背景外,还“着重思想内容的分析批判”(《前言》)。书末附录《康有为年谱简编》,戊戌以前以《康有为自撰年谱》为据,戊戌以后主要以诗集为据,未及细致考订。该集为建国后较早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本。虽因当时背景,选目、注释不无偏颇,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83年、1990年重印。(王飏)

【康有为诗文选】近代别集选注本。今人陈永正编注。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正文分“诗选”、“文选”两部分,选诗二百二十五首,文二十一篇,各按编年顺序排列。所选诗以崔斯哲编十五卷本《南海先生诗集》为底本,以梁启超手写本及其他书刊所录参校。每首诗均有题解。注释除训释词语、典故外,时加串解。重要作品篇末附有关材料,摘引史传或前人评语。书末附录《康有为年表简编》。是集所选诗文是康有为一生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中以戊戌变法前和变法运动间的作品为主,也酌量选取一些后期的作品,内容较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康有为诗文选》丰富、全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飏)

【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一名《我史》,又名《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康有为自编。有为,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是谱初编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谱中“光绪二十一年”末有1927年康有为七十岁时附注一条称:“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记事,系谱主于光绪二十四年末流亡日本时所补,此后迄未补编。故是谱始于清咸丰八年(1858),止于光绪二十四年,非完谱。该谱自记其家世、从师、治学、应试、开万木草堂讲学、上书变法诸经历及编年诗文,尤详记戊戌变法活动及失败流亡经过。是为谱主自编,故述其学术渊源、思想变化、志趣主张、变法内情,均足资研究其诗文者参凭。此谱《万木草堂丛书目录》题为《我史》,或康有为自定名。后久未付梓,存多种抄本。赵丰田抄本题《南海先生自编年谱》。1953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本改今名,收入《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王飏)

【丘逢甲诗选】近代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李树政选注。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卷首有丘逢甲遗像及手稿墨迹。李树政撰前言,分四个时期概述了丘逢甲生平和思想发展过程,简论丘逢甲诗歌表现的强烈爱国思想和艺术特点,以及与“诗界革命”的关系。正文据《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和《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诸本,辑录一百零九题一百三十一首诗,其中一百零四题一百二十六首考定系年,列为编年诗,五首列为不编年诗。每诗题下有题解,点明诗意。注释除注明典故出处、训释文字取证史实外,还把难句加以白话文串解,并辑采作者本人、作者胞弟丘瑞甲、丘兆甲及作者之子丘琮所附简注,均予标明。编末附李树政撰《丘逢甲行年简编》。本书具有始创意义,大体上反映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并顾及各种题材、体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飏)

【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年谱。近人丘琮编。谱主丘逢甲,别署仓海。编者系谱主之子。是谱分“前志”、“实历”、“后志”三部分。“前志”记谱主姓氏、名号、里第及世系。“实历”即年谱正文,采用表式,分为纪元、岁次、国家民族大事、年龄、行谊、诗文系年等六栏。其中记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时台湾义军抗日等时事尤详。“后志”分章论述谱主之著述、佚事、业师、知遇、至交、门人弟子等,谱后附编者跋语称:是谱据家传年谱,稍事增订,加入国家民族大事及诗篇著作,使谱主行动之社会背景,著作之思感根源,跃然纸上。并增删其谱前叙述作“前志”,另补入其身后周围各情作“后志”。年谱附刊于丘琮编《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之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王飏)

【黄节诗选】近代别集选注本。今人刘斯奋选注。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卷首有黄节手书扇面墨迹、丛书出版说明及选注者撰凡例。正文选诗一百二十一题一百三十九首,以黄节手定《蕙葭楼诗》为基本依据,兼采若干来源比较可靠的集外之作并注明出处。按照《蕙葭楼诗》原编年排次,集外之作或据其发表时间,或因其内容及时代背景尽量考定系年,阑入其中。每诗题下先作题解。注释力求通俗简明。书末附录选注者编《黄节年表简编》及刘峻撰《诗人黄节的思想和风格》一文。该集所选作品,力求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对反映诗人的思想感情有代表性者,注释文字洗炼而优美。该书对于近现代历史和诗歌研究,具有一定价值。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飏)

【秋瑾诗文选】近代别集选注本。今人郭延礼选注。选注者在前言中说明,此书初成于1964年夏,曾经冯沅君指导审订,修订完成于1979年。正文分“文选”、“诗选”、“词选”、“歌选”四部分,计选文四篇、诗六十题、词十九阙、歌三首。所选作品文字,以中华书局版《秋瑾集》1962年修订本为底本,参以诸本及有关史料,互相比勘,择善而从。每部分作品均采用大体编年的方式编排。“诗选”又分为三期:1904年秋瑾东渡前为第一期,1904至1905年留日时期为第二期,1906至1907年即归国后至就义为第三期。每一期中再按五古、七古、律诗、绝句各体依次编年排列。作品注释,绝大部分篇章都有题解,说明写作年代、地点、历史背景、思想内容等,详略不一。释词力求简明、准确。书末附录《秋瑾年谱简编》。此书为第一部秋瑾作品的编年体选本,大体包括了秋瑾诗文中的精华,对诗意及词语诠释时有创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王臧)

【秋瑾诗词注释】近代诗别集全注本。今人刘玉来注释。注释者在序言中概述秋瑾诗词创作发展过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说明本书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再版《秋瑾集》所收诗、词为底本,共收诗一百二十三题,断句八题、词三十九阙。正文于每首诗、词下有“说明”和“注释”。“说明”部分主要概括或诠释诗意,评析思想内涵,说明系年或大致写作时间,较少艺术分析。“注释”部分力求详尽,释典也多用白话转述,仅点明出处,大多在释词后对整句加以串解。书末有刘玉来撰《年谱》,并附录郭沫若《秋瑾史迹序》、陶成章《秋瑾传》、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该书对秋瑾的现存诗词全部做了注释,注释通俗明了,深入浅出,但有些典故、史实和词语,注释仍有疏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臧)

【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研究资料集。今人陈象恭编著。卷首有编者1982年所撰前言。全书共七个部分,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为编者所撰《秋瑾年谱》,起自1875年(清光绪元年),止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据前言称,本书的草稿,写于六十年代初。是谱主要根据已刊各种秋瑾资料编写排比而成,尚较简略。第二至第七部分为资料辑录,有《秋瑾传记史料》,收录徐自华、柳弃疾、陈去病、陶成章、冯自由、吴芝瑛、郑泽所撰秋瑾碑传墓表、祭文、记事、公启等十篇;《秋瑾著作出版概况》,录各家编秋瑾遗集十种;《介绍秋瑾的生平及著作简介》,录十九种;《涉及秋瑾作品介绍》,录传记及文学史等著作、小说、戏曲、杂志等共五十余种;《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研究秋瑾文章史料目录索引》,录一百二

十四篇。是书汇集介绍了大部分历年出版和散见于报刊的资料,于研究秋瑾有一定参考价值。尚有疏误处。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王臧)

【秋瑾事迹研究】研究专著。今人郭长海、李亚彬编著。全书包括六个部分。《秋瑾事迹系年》,为秋瑾年谱详编。依年、月、日逐条编次,每条记事下摘引所据史料并加按语说明,凡与其他年谱、传记所叙有异者,辄指误辨正。《秋瑾事迹考》,就有关秋瑾出生、行踪、革命活动、被捕就义等三十四个问题逐一考辨。《秋瑾交游考》,考述秋瑾与陈闳生、郑沅、郭宗熙、吴芝瑛、英敛之、徐自华、孙中山、鲁迅等四十馀人的交往、关系、其中有些为一般研究秋瑾论著较少注意或未曾提及者。《秋瑾佚著考》,考定近年发现的《沪上秋感》、《秋日晚眺》、《歌两章》等非秋瑾佚作;论证《秋瑾集》编者认为“确非秋作”之《黄海舟中感怀》、《长崎晓发口占》实为秋瑾作品;并介绍著者发现之佚诗一首、佚信两封、佚文一篇及《秋风秋雨集》中佚诗二十题二十八首。《解放前有关秋瑾研究著作考》,包括“纪念刊”、“史料”、“诗文集”、“小说”、“戏剧”、“传记”、“轶事”、“杂志”八类六十九种,均有简介评述。《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按年编列1907至1948年间有关为秋瑾营葬、建社、纪念、编集等各项活动酝酿、组织、实施过程资料。书末有附录两种,附录一收《谈〈秋瑾诗文选〉》(郭延礼选注)的几个问题;《三十五年来秋瑾研究专著述评》、《日本人士对于秋瑾的介绍和研究》;附录二收录了解放前有关秋瑾研究资料,包括报纸和杂志两部分共七百馀条。本书是一部研究秋瑾生平和研究史的专门论著,作者曾多年广泛收集、调查和发掘秋瑾史料,此书资料丰富、翔实,颇多新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臧)

【秋瑾研究资料】研究资料集。今人郭延礼编。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卷首有秋瑾和服像、便装像、男装像及秋瑾故居绍兴和畅堂、卧室、绍兴风雨亭图片,丛书编辑说明及本书例言。全书共六辑。一辑为“秋瑾生平及其活动”,又分四部分。首列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及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第二部分为传记史料,收秋瑾亲书《兰谱》、1904至1905年《女子世界》等报刊所载秋瑾留日活动纪事、徐锡麟《致秋瑾书》和徐自华、吴芝瑛、佛奴、陈去病、陶成章、王时泽、冯自由、赵而昌、秋宗章、王灿芝、服部繁子、秋高、周作人、徐双韵、周亚卫、周建人等秋瑾亲友或后人所撰传记及回忆文章三十篇。第三部分交流考述,收宋元、王祖猷等关于秋瑾与徐自华、吴妈、王金发、安庆、陶荻子、吕碧城等交往关系的文章七篇。第四部分为考证文字,收

吴小如、王慰慈、秋经武、俞观涛、樽本照雄等考证秋瑾生年、东渡、加入同盟会、就义日期诸问题的文章及新发现的资料十四篇。二辑为“秋瑾思想及作品研究”，包括章炳麟、何震、吴芝瑛、王灿芝、王沅德、夏衍、郭沫若等为各种秋瑾遗集所撰序、跋九篇，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中有关评论及萧善因、郭沫若、夏衍、魏绍昌等论秋瑾文学成就和思想地位的文章十一篇。三辑为“《秋瑾集》集外诗辑”，收录近年发现的秋瑾集外佚诗二十二题三十一首及两篇介绍文章。四辑为“悼念秋瑾诗文和纪事”，包括章炳麟、佩苇、王钟麒、蔡元培等所撰祭文、哀词、墓表、碑记等十篇；柳亚子等诗人及其他的各种署名发表的哭悼、吊挽秋瑾的诗作三十三题九十一首、词三阙，吴芝瑛、孙中山等所撰挽联十一联，徐自华、吴芝瑛、陈去病等为秋瑾营葬、改葬、立秋社、建风雨亭的书启九篇。五辑为“秋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收1907至1986年间七十种专著、五百零八篇论文目。六辑“附录”，收徐锡麟、吴芝瑛、徐自华、王灿芝传记六篇，待考著作等资料。该书收罗丰富、翔实，尽量多选罕见史料，尤其是与秋瑾关系密切的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目录则力求无遗，为研究秋瑾提供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资料。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臧）

【秋瑾文学论稿】研究专著。今人郭延礼著。卷首有秋瑾遗像、手迹、故居卧室及客厅和畅堂图片。全书包括绪言、正文、结语、附录。正文共十章。第一章概述秋瑾的时代及其革命的一生。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题为《一位叛逆女性的心声》、《反帝爱国的战歌》、《民主革命的号角》、《孤独、悲凉及其他》、《秋瑾诗词的艺术风格》，全面论述了秋瑾前期诗词的基本主题，后期诗词的思想内容，及其作品中的某些局限和感伤色彩，秋瑾创作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后四章论述秋瑾的散文、弹词，与徐自华的友谊和诗词唱和，及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先驱作用。结语评述秋瑾的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她的诗作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年轻的革命一代的成长，其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诗人的反帝爱国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想，都达到了那个时代较高的水平，在诗歌形式的革新和诗体的解放上都作了可贵的努力与探索。书后附录关于秋瑾生年、入京等十六个问题的考证。该书为第一部系统而较为深入地研究秋瑾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成就的专门论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出版。

（王臧）

【王国维诗词笺校】近代作家诗词别集笺校本。今人萧艾笺校。王国维诗词向无足本。《静庵诗稿》

曾刊于《教育世界》杂志，并见于《静庵文集》，仅五十首。王氏手定《观堂集林》乌程本曾录部分作品；其后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及王哲安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所收诗、词，为数亦不足。《人间词》甲稿、乙稿初稿曾刊于《教育世界》，并收入《观堂集林》乌程本、《遗书》中之《观堂外集》及《苕华词》。陈乃文辑《静安词》一百十一首，此外有《彊村遗书》之《静安长短句》及沈启无编《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笺校者萧艾在前记中称，兹编即依前人所辑校，或笺或校，稍事增补。大率以《教育世界》所刊及乌程本为底本，参校其他本。共收诗一百九十二首，词一百十五首，每首后笺明系年、背景、本事，略加评识。诸本有异文者则作校勘。是书为迄今较完备之王国维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王臧）

【苏曼殊诗笺注】近代诗别集注本，今人刘斯奋笺注。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之一。卷首有刘斯奋撰前言，正文分诗集、译诗、附录三部分。前言概述苏曼殊生平、思想、诗歌创作的艺术个性和积极浪漫主义风格，并说明苏曼殊诗辑存情况及本书编注体要。苏曼殊遗诗经柳亚子搜辑共得四十四题九十六首，译诗十题十首。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增收《题画》、《题〈静女调筝图〉》、《和三姊妹韵》三首，译诗增收拜伦作《留别雅典女郎》一首。刘斯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订增删，删去柳亚子已说明非曼殊所作之《题画》，将《题〈静女调筝图〉》列入附编；新增入由文芷《曼殊上人诗册》中录出之诗二首；译诗中《留别雅典女郎》为盛唐山民所译，亦删去。故诗集实收四十七题九十九首，其中九十二首参据柳亚子《苏曼殊诗年月考证》重新编年，列为编年诗，七首写作年月无可考者归入不编年诗，另有诗同句异一首、有待考证之作一首、断句四联列为附编。译诗部分，前言及目录均称存十首，实收拜伦诗四首，彭斯、豪易特、雪莱、歌德、陀露哆诗各一首，共九首。每首诗笺的部分说明诗作年月、出处及有关本事材料，注的部分力求简明扼要，偶亦译出整句。编末附录刘斯奋撰《曼殊年表简编》及诸家集评，辑录陈独秀、柳亚子、罗建业、郑桐荪、胡寄尘、柳无忌、高旭、张定璜、周瘦鹃、米泽秀夫等关于曼殊思想和诗作的评论。该书为第一部苏曼殊诗集笺注本，虽辑诗及笺注尚有疏误之处，但具有开创之功。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臧）

【燕子龛诗笺注】近代诗别集注本。近人苏曼殊著，今人马以君笺注。卷首有苏曼殊遗像及题识一幅、遗画二幅，出版说明及前言。马以君在前言中简论苏曼殊生平及诗作，并说明：“本书题名为《燕子龛诗笺注》。‘燕子龛者，曼殊所以自名其飘泊无定之

住处也。’它颇能概括曼殊的身世、际遇、思想和创作特点。”又称：“他的诗作散佚很多，现存的只得五十题一百零三首，确证的三十九题八十九首。”正文实收五十一题一百零三首及断句六联，较文公直《曼殊大师全集》和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增收《莫愁湖寓望》、《樱花落》、《题蔡哲夫藏担当〈山水册〉》三首，无《和三姊妹韵》一首，并将刘斯奋删去之《题画》及归入附编之《题〈静女调筝图〉》仍收入本集。每首诗有题解，说明该诗发表年月、出处、背景、题意及前人评论，注释部分则寻其本事，力考其所据，疏通其文义。卷末附录马以君撰《苏曼殊年谱》及《各家论曼殊诗》，后者辑录柳亚子、王德钟、黄沛功、傅熊湘、郁达夫、文公直及任访秋、郑逸梅、游国恩等人有关评论资料。此书对各诗的背景和本事考察甚详，对了解诗意、欣赏诗味，研究曼殊诗歌的生平都有参考价值。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鹰）

【苏曼殊诗集】近代诗别集注本。今人马以君笺注。该书为苏曼殊故乡（广东香山沥溪乡，今属珠海）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编印刊行的，未正式出版。尹瘦石为书名题签。卷首有孙中山“曼殊遗墨”题字，苏曼殊僧装像、西装像各一幅及诗稿墨迹十四幅，马以君撰序言。正文收苏曼殊诗作五十二题一百零三首及断句八联，翻译诗十首，附盛唐山民译拜伦《留别雅典女郎》一首。卷末有编者后记及注者马以君跋语。该书收目、系年及笺注与同为马以君所编注之《苏曼殊文集》中诗歌部分大体相同，但增加了两项内容。一为每诗题下除简介背景、题意外，还说明诗稿最初出处、最早发表的日期和报刊名，及此后刊载于其他报刊、收入诗集和诗题变动情况，为确定系年、考辨真伪、校勘文字的重要资料和线索；二是每诗注释后还对诗作思想内容、艺术表现略加评析，便于读者理解、鉴赏。（王鹰）

【苏曼殊文集】近代作家别集注本。今人马以君编注，柳无忌校订。为花城出版社《近代岭南文学名家书系》丛书之一。上下两册。上册卷首有苏曼殊遗像四幅，遗诗、遗画墨迹各一幅，初版《断鸿零雁记》书影和孙中山题字“曼殊遗墨”，丛书出版说明，柳无忌撰《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苏曼殊文集〉序》和马以君撰前言。正文收诗歌五十二题一百零三首，小说六部，“杂论·序跋”二十七篇，“题画·题照”六十一则。下册卷首有苏曼殊杂记、书信、译诗手稿墨迹，南社入社书、西湖墓塔、《沥溪苏氏族谱》图影。正文收笔记三部，书信一百八十一通，翻译诗十首及翻译小说二部、译文一篇。所收全部诗文均考定系年，按年编次。卷末有马以君编《苏曼殊年

谱》及后记。柳无忌对此集编注予以鼎力支持，提供了其父柳亚子生前编定、手抄而未刊之《曼殊余集》十三册复印件及大批有关苏曼殊的书籍、手札，并细致审定编注稿。编者马以君曾撰《燕子龛诗笺注》，并广为收集资料，研究有年。故此集在苏曼殊作品辑佚、辨伪、系年、本事考证及释词等方面，较前此诸本均有较大进展。其中诗歌部分所收诗作数量为诸辑本中最多的，新增入《游同泰寺与伍仲文联句》、《代河合母氏题〈曼殊画谱〉》二首，不收确定或怀疑非曼殊所作之《题画》、《和三姊妹韵》二首；根据苏曼殊寄蔡哲夫、诸贞壮等人“叱正”的墨迹考定《本事诗（十首）》所属问题，删去诸本皆归苏曼殊作而实为陈独秀和作之“丹顿裴伦是我师”、“慵妆高阁鸣筝坐”二首，代之以诸本另题为《为调筝人绘像》之一之“淡扫蛾眉朝画师”一首及诸本未收之“愧向尊前说报恩”一首；按苏曼殊诗原稿或最早发表时的诗题调整了若干首诗的题目和排列，如将诸本《寄调筝人（三首）》分列为《水户观梅有寄》、《西京步枫子韵》及《失题》之一。每诗题下说明写作背景及题意，诗下作简明注释。柳无忌在序中称此书为最完备的定型本，使此后的研究者有所依据，并称卷末所附《苏曼殊年谱》翔实、正确。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

（王鹰）

【马君武诗注】近代诗别集注本。今人谭行、刘志坚、邓小飞编注。卷首有马君武民国二年（1913）《诗文集自序》，编注者撰《马君武和他的爱国主义诗篇（代序）》。正文收马君武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40年所作诗六十六题一百二十五首，按年编次。每首诗题注考定作品写作时间，说明背景，句注训释词语、典故、史实及有关人物。卷末附录与马君武译诗四题十九首，包括《米丽客》（歌德原著）、《缝衣歌》（英国虎特原著）、《哀希腊歌》十六章（拜伦原著）、《阿明临海岸哭女诗》（歌德原著）；并附编注者撰《马君武年谱》。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马君武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之一，编注者据《马君武诗稿》并广为收集各种著作、刊物上的马君武集外佚诗及手稿、编成此集，是收录马君武诗最多的结集，也是第一部马君武诗注释本。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鹰）

【柳亚子年谱】年谱。今人柳无忌编。叶圣陶为书名题签。卷首有柳亚子像，毛泽东与柳亚子合影，南社第一次雅集、1958年首都各界公祭柳亚子大会灵堂照片，以及柳亚子遗嘱、书札等手迹和著作书影等，共二十七幅图片；王晶珪撰《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代序）》。是谱采用年表格式。每年一表，表头列纪年、年龄，表内首列是年行踪系地，表左为季、月、

日,表右记事。每条记事所据史料及出处、考证,及有关人、事均于每年表后以小注说明。正文后附录《柳亚子先生墓碑文》、《吴江胜溪柳氏世系表》、《柳亚子家属六代世系表》及参考书目,包括柳亚子遗著、柳亚子编印书籍和其他引用刊物与文章共七十九种。书末编者后记称:“这部年谱的最初五十四年,是以家父的《自撰年谱》为蓝本,尽量引用其中的记载与字句,另以《五十七年》与《南社纪略》二书的材料补充之。《自撰年谱》止于1940年底,以后的十八年,我参照了朱荫龙所撰《年谱》(1940至1944)以及其他我所搜集到的与无非所供的材料。”编著者系柳亚子之子,美籍知名学者,直接掌握并多年搜集有关柳亚子的第一手资料,并得其妹柳无非及柳亚子友人供给的材料,故该年谱坚实可靠,足称信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鹰)

【诗论】 诗学专著。朱光潜著。是书抗日战争时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刊时为十章,分论诗的起源、境界、表现、节奏和声韵等。1948年正中书局增订版补三章,论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及陶渊明等。1984年三联书店重版时收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和《替诗的音律辩护》两篇旧文。《诗论》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它改变了我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的状况。朱光潜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运用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的渊博知识,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规律性进行深入探索,既注重有关科学与艺术对诗的辐射,又注重中国诗创作和西方诗创作的异同并探索其原因,涉笔之处,精见迭出。如依据“直觉”、“知觉”等心理学概念,指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较深刻地解释了中国传统的“境界”说。对莱辛诗画异质论,既肯定它在艺术理论上的贡献,又详论其不足之处,并结合中国诗词的实例,平议“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之论的不准确。运用尼采的悲剧理论和华兹华斯的“沉静中的回味”说,证明所谓“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分在诗中是不存在的。(孟向荣)

【论诗】 诗论专著。蒋伯潜、蒋祖怡著。是书初版于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198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据以影印。原名《诗》,影印本根据著者建议,易为此名。全书二十章,以论述旧体诗为主,兼及新诗、译诗和欧洲诗史。其主要内容有三:从美学理论上界说诗的本质、定义。探讨古近体诗与诗评的历史衍变轨迹。对旧体诗的类别、词藻、韵律、句法、格式、用典等详为爬梳。论诗方法力求贯通中西古今,注意宏观把握、细部阐微的统一。其诗学思想受“五

四”以来新文化潮流影响,同时继承古代诗论“直寻”、“性灵”之说,抨击旧体诗作茧自缚的弊病,趋向于建立一种“我手写我口”的内容充实通俗、形式自由活泼的新体诗歌模式。(孟向荣)

【诗言志辨】 诗学专著。朱自清撰。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是编由四篇论文组成,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初拟书名为《诗论释词》,后因四篇皆以《诗言志》为中心意念,连贯而成,虽分犹合,故易为今名。四篇论文分别研究传统诗论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四个提法,探讨每一问题的历史发展,根据其在各时代的不同用例,研究、阐释四者的本义和变义、源头和流派。是编为作者历时最久、工力最深的理论力作,以较为进步的文学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几个正统的诗学观念进行辨析,颇能廓清陈见陋说而别创新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中。

(许志刚)

【诗境浅说】 诗学专著。俞陛云撰。陛云,字阶青,浙江德清人,清光绪戊戌进士。是书选录王勃、杜审言、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卢纶、白居易、许浑、李商隐、杜荀鹤等近八十位唐代诗人的诗歌或摘句。另续编收录绝句三百九十三首。所选诗歌、摘句后皆有疏解串说。凡命题、作意、境界、典实、句法、字法、声调、格律均剖析言之,从中可以窥见作者诗学思想的鳞爪,如学诗宜求意义,勿猎浮词;品诗见仁见智,无所不可;诗贵天然,不在专工雕琢;写实亦应以诗意融化而出,切忌语太说尽等。该书重视诗歌艺术性,收录了一些今人唐诗选本罕见的小家名篇。且能注意不同诗人相似或不同诗意、诗风的比较。是书有1984年上海书店根据1947年开明书店版影印本。(孟向荣)

【中国诗学大纲】 诗学专著。杨鸿烈著。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国学小丛书》之一种。是书九章,除通论、结论外,躯干部分为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组合的原素、作法、功能、演进七章。将中国各时代论诗之精萃归纳排比,并援引欧美诗学研究成果,以解决中国诗的某些困难问题,为“五四”以后尝试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诗歌史的著作。

(孟向荣)

【诗赋词曲概论】 诗学专著。丘琼荪著。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中国书店影印再版。分四编叙述诗赋词曲,先起源,次体制声律,次演进盛衰过程。附录名篇若干以示范。(朱明伦)

【中国诗论】 诗学专著。《中国文学讲座》之一部

分。约三万五千字,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胡怀琛撰。怀琛(1886—1938)字季仁,一字寄尘,安徽泾县人。著有《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史概要》、《唐代文学》等多部专著。是书三编六章,总论诗之各体,如口诀、诗、词、散曲、戏曲及其嬗变,探讨诗歌产生的原因,及其因民族关系、哲学关系、政治关系而发生的变化。所论涉及诗歌自身形式及外部关系,不无启发人处。(许志刚)

【中国韵文通论】诗学专著。约十七万言。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2月初版,1936年3月四版。为中华书局“文学丛书”之一种。陈钟凡撰。钟凡(1888—1981)又名中凡,号斟玄,江苏盐城人。是编通论古代各体押韵之文。凡九章,依次论述《诗经》、《楚辞》、诗骚之比较、汉魏六代赋、乐府诗、汉魏迄隋唐古诗、唐人近体诗、唐五代及两宋词、金元以来南北曲。除第三章外,每章专论一体。而第三章之论比较,使全书体例稍欠严整。然立于宏观角度,博观约取,总摄而通论之,迥别于罗列故实之作。(许志刚)

【中国诗词概论】诗学专著。刘麟生著。刘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学系主任。1936年世界书局初版,1985年中国书店影印重版。分十二部分:一、中国诗的鸟瞰(论中国诗的地位、诗体、诗韵及词韵、诗词的选本);二至八叙中国诗的发展脉络;九至十一叙词的发展脉络;十二、诗话与词话。该书言简意赅,论析精当,惟不论及《楚辞》为憾。(朱明伦)

【诗法通微】诗学著作。徐英著。正中书局印行。全书六章。第一章诗体杂述,第二章学诗总略,第三至第六章依次讲述古诗法、绝句法、律诗法、律外之法。重在示人以作诗门径,总结作诗法则或规范。“律外之法”一章,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诗歌风格、意境问题。书后有“诗学书目举要”。(徐晓民)

【民族诗歌论集】诗学专著。卢冀野撰。冀野(1905—1951)名前,号饮虹,以字行。江苏南京人。著有《词曲研究》、《中国戏剧概论》等七种。时作者方主编《民族诗坛》,其综论民族诗,与此或不无缘。全书五章,分论民国以来我国民族诗歌、边疆文学鸟瞰、中国文学史上之妇女、民族诗风之倡导者、民族诗歌谈屑。时逢抗日战争,倡言民族诗歌,于统一民族意志不无意义。其间论及汉族之诗,亦正为此。然设专章论妇女之诗,则未免自乱体例。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12月出版。(许志刚)

【民族诗歌续论】论文集。卢冀野撰。冀野有《民族诗歌论》,已著录。全书共四章,分论抗战以来之中国诗歌、所谓“尊皇爱国诗集”、文学史上之贵州、散曲作法。其第二章为单独发表之论文、其余三

章乃为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广播电台、中央大学之讲演稿,故虽号为四章,实各不连属,乃论文与演讲集,与前论体例不一。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3月出版。(许志刚)

【谈艺录】诗论专著。钱钟书著。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正文九十一篇,补遗十八篇。1984年,中华书局为出补订本,以初版本为上编,而稍有删润;订补之文,列为下编,字数几与上编相俦。全书共四十三万字。1984年以后作者续有补正,先发表于《钱钟书研究》专刊(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89),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谈艺录》,已将其收入。该书始属稿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流寓湘西时,至1941年哀集成帙,故自序云:“《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全书评论历代著名诗家,如陶渊明、李贺、韩愈、王安石、梅尧臣、苏轼、陆游、袁枚、龚自珍、王国维等。凡所考论,不仅广涉历代典籍、诗话、文论,而且博采西方文艺与美学理论以资比较发明。根据研究者统计,上编引书一千一百种,下编又新引书约七百余种。由于作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所论虽由一人或一诗而发,但开掘深广,精义迭见。许多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如谓诗分唐宋“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见胜”。又如对李贺诗风、诗境、字法、曲喻等的系统论述及由此引申的艺术本原论:“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凡百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纪伟)

【旧文四篇】论文集。钱钟书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选入作者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四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编集时,作者对各篇作了修改,第一篇的改动最多,但主要论点皆未变换。(孟向荣)

【七缀集】论文集。钱钟书著。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对《旧文四篇》加以删削增润,剔去《也是集》与新版《谈艺录》相合之处,将其中三篇文章稍作修订,共为七篇,依据古代“七缀钵”等名目,取拼拆缀补之意,因题名《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指出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不同于南宗在旧画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标准的诗风,而传统画评承认南宗是标准的画风,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释。《通感》讨论日常经验

和文学艺术里,诸感官可以彼此交通的心理现象,并把它看作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技巧,历数其特征以及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林纾的翻译》分析林纾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实践,对林译小说的特色与得失作了全面而公允的评价。《诗可以怨》为1980年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稿的改定本。对“诗可以怨”、“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等传统文论细加阐述。钱钟书学贯中西,擅长艺术评判,既对中国古文论的精华多所钩稽赅括,尤善对中西诗论貌异实同的诗心作精微辨析,凡所论述,均融广博知识和精卓见解于一体,令读者有从一得十之喜。例如从苏轼“一朵妖红翠欲流”句引出杜甫、元稹、畅当、白居易、汤姆逊、歌德、弗罗斯德等人的诗文,说明语言艺术有雕塑、绘画无可比拟的独特效果。作者批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的研究方法,主张重视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谣谚、训诂里的精湛见解,以此作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

(孟向荣)

【管锥编】 专著。钱钟书著。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书之题名取治学“锥指管窥,先成一辑”之意。借评鹭占籍,阐述哲学、心理、诗学诸方面的观点。所涉之书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以文体性质而言,是书当属于考据辨证类的读书笔记;然细辨结构,则有历历如贯珠的章法。其行文体制为取所考论古籍之一节,以后来载籍中若干同类材料排比于其下,常以“按”字引例作比较证明,以“盖”字引出结论,以“故”字引出前人有关论述,以“然”字引出不同意见。其作用在于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并明确某一种现象的发展源流、继承关系,或异域隔代的暗合情况。《管锥编》体大思精,包罗万象,匪特给予中国古籍以富于辨伪精神的考释和探幽入微的阐发,抑且有大量关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与论析。其征引中外典籍达五千余种,外国著作便有英、美、法、德、意等一千七八百种,堪称集亚契欧铅之大成。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作系统全面整理,进一步确定了汉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书广涉多门学科,而以文艺鉴赏和评判最为杰出。其诸多论点,如“经、史、子”都有“诗心、文心”,“写忧而造艺”,“邻壁之光,堪借照焉”等均极有力而富有启发性;如对“诗无达诂”、“认虚成实”、“铢称寸量而见小忘大”的批评等,皆切中肯綮,有裨诗学。如《车攻·以意声烘托寂静》条,引中外意境相似的诗句,释云:“即心理学中‘同时反衬现象’。眼耳诸识,莫不有是;诗人体

物,早具会心。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归妹·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旁搜远绍,精密核详,拈出常见修辞手法创为新义。其他从创作心理、欣赏心理、主题、意境、情节、风格、表现手法等多方进行研究,求索“文心”堂奥者不胜枚举。《管锥编》初稿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中华书局1986年再版时附《管锥编增订》,1991年重印时又将《管锥编增订》及《增订之二》合为第五册,对“树义之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悉标原书页码,给予补苴附丽。

(孟向荣)

【诗词例话】 诗学专著。周振甫著。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修订重印。是书从诗话词话中钩稽出数百条有裨诗学的精粹言论,梳其渊旨,按类条陈,分为:(一)欣赏与阅读,下设逼真和如画、隔与不隔、出处、偶合等十四子目;(二)写作,下设立意、情景相生、加倍和进层、承转等二十二子目;(三)修辞,下设兴起、顿挫、通感、衬垫和衬跌等二十四子目;(四)风格,下设含蓄、平淡、雄奇、沉郁等十一子目;(五)文艺论,下设子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作者对每一子目均给予详细解释阐说,因题名《诗词例话》。是书“话”的部分颇能注意摘句论诗之不足,力求避免以偏概全。该书表达深入浅出,尤善将诸种典籍论述同一问题的言论集中分析。钱钟书《冯注玉谿生诗集论评》和《管锥编》论修辞的某些片断,虽初由此书披露。

(孟向荣)

【诗歌欣赏】 论文集。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以李白、杜甫等古典诗人,郭沫若、闻一多等现代诗人以及一些民歌为实例,论析如何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作者认为,好诗是美好的内容和美好的形式的统一;它的形式、写法和风格千变万化,欣赏诗歌必须把诗和科学、古和今、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意义加以区别;必须培养对于诗的敏感,学会辨别其精细入微之处。作者本人是著名诗人,所论切中肯綮,文字深入浅出,故此书在当时影响颇大。

(吕伯涛)

【诗词论析】 论文集。张志岳著。196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辑录二十三篇旧体诗词论文。其体例分为“论”、“析”两部。“论”侧重于探讨问题,涉及面较广;“析”侧重于单篇作品的鉴赏,字句推求较多。书中涉及《木兰诗》、《孔雀东南飞》、《七哀诗》及曹植、嵇康、阮籍、陶渊明、王维、李白、鲁迅等诗人,力求纵古通今,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剖阐相结合,重视鉴赏,对诗作品味颇为精细。(孟向荣)

【诗词论析(续集)】 论文集。张志岳著。1980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收论文十七篇,论诗者十四篇。其编排体例一仍《诗词论析》。内容包括屈原政治思想溯源、鲍照及其诗研究、关于杜甫的评价问题以及几首杜甫诗的赏析文字等。多属稿于1978年至1979年间。《说王安石的〈读史〉七律》和《元好问〈论诗绝句〉第十首平议》两文,前者赏析为论者所忽视的名作,后者批评元好问对元稹的错责,均为短篇佳什。

(孟向荣)

【诗学广论】 诗论专著。姜书阁著。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九篇。《学诗篇第一》为绪论,《律史篇第二》叙述从《诗经》到唐代律体诗完成的历史过程。《格调篇第三》论律诗、绝句的格律要求。《词曲篇第四》论词曲格律,并略说其演变。《比兴篇第五》说明诗学(包括词、曲)“三义”——赋、比、兴。《形象篇第六》略述与比、兴密切相关的形象思维问题。《杜韩篇第七》和《三李篇第八》简析唐代诗史,重点介绍杜韩和三李。《两宋篇第九》对西崑派、欧苏、江西派、陆游等以及“四灵”与“江湖派”扼要评述,辨析唐、宋诗之异同。该书重视诗学理论、艺术形式、声调格律的研究,兼顾学术性和知识性。

(孟向荣)

【诗词散论】 论文集。缪钺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收论文十一篇,皆属稿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执教浙江大学时,其中十篇曾以同书名于1948年刊印行世,新版增补《诗三百篇纂辑考》。书中内容除论词三篇外,涉及《诗经》,六朝五言诗,《文选》与《玉台新咏》,李商隐诗,宋诗,姜夔、汪中、王国维等有关问题。《六朝五言诗之流变》谓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朓用声律,皆能免于陈腐,开创风气,从而概括文学嬗变重质而不重形乃渐进蜕化之规律。论李商隐则梳理唐代律诗发展脉络,指出义山运李贺古诗象征之法于律诗中,去其奇诡而变为凄美芳悱,遂于杜诗之外开一新境。《论宋诗》引英国安诺德语反解发微,阐明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心理造就了迥异于别一时代诗风。

(孟向荣)

【迦陵论诗丛稿】 诗学专著。叶嘉莹著。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书辑文章十四篇,属稿于1957年至1981年。叶嘉莹论诗,特尊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盛赞诗人在精神上的“任真”自得,在生活上的持守“固穷”。《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分四阶段阐述杜甫七律体诗由继承、演进而至于突破、革新之历程。《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于“寂寞心”三字探寻诗人灵魂之深蕴。另有几篇依据西方文论,用较新观点分析欣赏中国旧诗的

通论之作。是书有缪钺题记和作者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之与知性之结合》。

(孟向荣)

【异体诗浅说】 诗学专著。吴积才著。1986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书共六十一节,对中国古代表现汉语汉字特征的异体诗(或称别体诗)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利用汉语音节结构特点构成的双声诗、叠韵诗、四声诗等;利用汉语以词序表示语法关系的特点构成的各种回文诗;利用汉语一词多义特点构成的八音诗、四色诗、六甲诗、六府诗、十二生肖诗、五更诗、序数诗等;利用汉字字形特点构成的字谜诗、离合诗、拆字诗、藏头诗、联边诗、形意诗等;利用修辞格构成的顶真诗、双关诗、复字诗、歇后诗、排比诗等。作者批驳了异体诗“难能而不可贵”的传统观点,认为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鉴其得失,以利创新。对每节收录的异体诗作了精细的说明与注释。

(孟向荣)

【诗缘情辨】 诗论专著。裴斐著。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书上篇《诗缘情辨》,下设子目:言志与缘情、想象论、意境论、社会决定论、个性论等。下篇《诗缘情举隅》,下设子目:李杜分期论、太白乐府举隅、杜律举隅、李白与月、贫病老丑话杜甫、杜牧与李商隐。中心观点为:言志论乃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乃诗家的诗论。我国古代诗论的主流非言志论,而为缘情论。缘情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主观感情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该书依据缘情论的审美思考,对唐诗的高峰(李杜)和唐诗的结束(小李杜)进行细致的解剖,并以此印证了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

(孟向荣)

【意境纵横谈】 论文集。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198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书收录国内外学者研究意境问题的论文十五篇。孙昌武《佛的境界与诗的境界》指出,佛之境界为宗教、唯心境界,诗之境界为美学、现实境界;但佛之境界观,尤其唯识学与禅宗的境界理论,突出了认识的主观方面,与诗歌创作有相通之处。陈洪《意境——艺术中的心理场现象》主张以心理场理论阐释意境。认为在审美观照中,当对象可以提供一个心理环境,刺激主体产生自我观照、自我肯定的愿望,并在审美过程中完成这一愿望,这样的审美对象即为意境。朱家驰《陶诗的意境与老庄的虚无哲学》从无言之美的艺术境界,以实为虚的创作构思,遗貌取神的表现手法三方面,探讨道家的虚无哲学与陶诗意境形成的关系。此外还有[美]刘若愚《李商隐诗境面面观》、[日]横山伊势雄《严羽的兴趣论及其他》、向以鲜《试释两种意境美类型的含义——雄浑与冲淡》、张毅

《建国以来意境研究述评》等文。(孟向荣)

【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诗学专著。赵沛霖著。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该社《美学丛书》之一种。是书除绪论、结论外,共为八章,根据发生学观点探讨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兴”的起源、发展,以及“兴”产生后给诗歌艺术带来的质的飞跃。作者在具体考察各种原始兴象与宗教观念、图腾崇拜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诗歌艺术从微观上详细论证历史积淀说,并从宏观上评鹭诗歌艺术的历史发展,为美学中的历史积淀说(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提供了诗歌艺术的具体例证。(孟向荣)

【十二象】论文集。今人流沙河著。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分为《诗中有画》、《十二象》两部分。前一部分侧重从欣赏角度论析诗与画的关系,提出“画+说=诗”之观点,列举“先画后说”者,“先说后画”者,以及“全是画”者(如《敕勒歌》、《江雪》等),分类评鹭。进而由画引申到摄影,列举像一串镜头者(如《青青河畔草》),像分镜头剧本者(如《长恨歌》),运用蒙太奇手法者(如《李凭箜篌引》),讲究光色效果者(如《鹿柴》)等。后一部分系统阐述诗歌意象思维理论。分为易象、象征、兴象、喻象、拟象、隐象、典象、赋象、意象、意象派一例、客观对应物象、象外之象等十二篇,故称“十二象”。作者本是著名诗人,其理论分析以创作实践为依据,切实可信,且确有独到新颖之处。全书穿插大量古今中外诗作,深入浅出,读来趣味盎然。(李翔征)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论文集。袁行霈著。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论文二十一篇。上编七篇,所论以言、意、象、境为核心,亦论诗与禅、音乐美、艺术鉴赏等问题。下编论述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周邦彦、陆游等十三位诗人的艺术特色、风格、成就,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者强调对诗歌艺术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主张对诗歌艺术论的探讨和诗歌艺术史的考察互相结合,互相印证,互相发明。是书有林庚序和作者序跋。(孟向荣)

【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专著。韩经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者力求从哲学层次上把握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古典诗学本体构成的制约,同时努力追循古典诗学的基本演变趋势所呈现的文化思想的变迁轨迹。在阐释方法上,试图以创造性的阐释去发现对象的客观价值。(吕伯涛)

【诗史】专体文学史。李维撰。北平石棱精舍1928年刊行。维从刘毓盘谈艺,受其所著《词史》启

发而作此书。沈尹默、梁启超为题内外封签。此书被列为《国学丛书》之一及《石棱丛书》之一。全书分三卷四十五章。上卷十五章,论诗之起源、《三百篇》至隋代诗;中卷十三章,论唐、五代诗词;下卷十七章,论宋至清代诗。是书体例严谨,颇多卓见。其论魏诗为六朝诗学之先导、两晋诗学极盛与中兴以后作者之玄思、宋诗再振为六朝诗学之极峰,及论盛唐诗学之鼎盛及诗体之大成、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流派之分传等,皆有所发明。(许志刚)

【诗歌史】专体文学史。稿本。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附录辑入。汪辟疆撰。辟疆字笠云,号方湖,江西彭泽人。尝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以诗律授徒,及门受业者以千百数。辟疆深通流略之学,转以其法治诗,故于历代作家,莫不尚论其流派,剖析其异同,而于文心之曲折、风格之变迁,尤三致意焉。龚氏所辑入者,或即南雍授课之本。(许志刚)

【中国诗史】诗歌通史。陆侃如、冯沅君合著。陆、冯伉俪系山东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专家。此书初稿写成于1925至1930年间。全书三卷,每卷四篇,每篇五章。卷一“古代诗史”,述《诗经》、《楚辞》及汉乐府诗。卷二“中代诗史”,述三国两晋六朝及隋唐诗。卷三“近代诗史”,以唐之后诗道渐衰,舍而不论,改论诗之变体一词曲,自唐五代经两宋而至明代。此书为现代发表最早、规模最大之诗歌史专著。作者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文学”之影响,不论唐以后诗,而以词曲为唐后诗歌主体,观点较新颖,但亦引起学界批评。能着重从艺术形式角度论述诗歌发展流变,可谓有见。然书中对具体问题或现象之介绍、分析、阐述不当之处亦所在多有。1931年大江书铺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重印时,著者对全书做了校订。(朱明伦)

【中国诗歌发展讲话】诗歌史著作。王瑶著。原系著者之讲稿,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之《文艺学习》月刊发表。1955年成书,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2年修订重版。全书十二讲,分论诗经、楚辞、乐府诗、魏晋五言诗、唐诗、词、宋诗、散曲、晚清新派诗、新诗。持诗歌起源于人民生活 and 劳动过程,应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流观点。突出唐诗、宋词、元曲,尤其重视新诗,是关于中国诗歌发展较好的普及读物。(朱明伦)

【中国诗歌发展史略】诗歌史著作。郑孟彤撰。1981年10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较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承传关系及流派特征。通过对各个时期诗歌流派变化发展原因的探讨,试图总结诗歌创作的规律。(徐晓民)

【中国诗歌简史】诗歌史著作。张建业撰。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按时代线索,简要勾画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基本脉络,重点介绍各历史时期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叙述中较注意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徐晓民)

【中国诗歌史论】专著。张松如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三十万字,分为三编。上编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鸟瞰,按时代先后分章纵览中国诗史,每章文字不多,均能提纲挈领,揭明发展演变的关捩要害。如元明清诗歌一章,不同意历来认为唐以后无诗的观点,而以戏剧诗、歌唱诗(散曲)的繁荣说明诗歌形式的演变和重心的转移。认为元末明初刘基、宋濂,特别是明初高启都是卓然大家。即前后七子,也并非毫无贡献,只是当时竞相模仿,形成一股拟古风气,才终于被诟病为伪古典主义。但针对它又卷起一股浪漫主义洪流,以李贽的王学左派思想为基础,公安三袁别开一代新风,与冯惟敏、薛论道、冯梦龙的散曲、民歌以及汤显祖“临川四梦”相呼应,打破复古派的统治,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勃发。清朝统治者使历史走了一段弯路,清诗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盛行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导致创作的感伤主义,评论的形式主义。本书中编为中国古典诗歌散论,从精华糟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史诗剧诗与音乐的关系、语言与格律等方面论中国诗的独特性。下编泛论民族传统与新诗歌的发展道路,从古典诗歌、“五四”新诗论到当前的新诗创作。本书著者本人是一位新诗人,故全书贯申论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附录两篇为谈论诗歌传统与创新问题的旧文。

(纪伟)

【中国诗歌史】研究专著。张松如主编,集体编写。该书拟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五卷。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卷,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叙述中颇注意学术史的回顾、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并在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编者的见解,如屈原作品一节,讨论了《离骚》、《天问》、《九章》前五篇以外各篇的归属问题,引录前人论述加以辨析,最后归纳曰:“可确切无疑地定为屈原作品者有《离骚》、《天问》、《九章》前五篇,以及《招魂》诸作。《九歌》及《九章》后四篇,在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缺乏极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当视为屈原所作。至于《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诸篇,则可肯定其并非屈原的作品。”观点明确,不失为一家之言。本书亦能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文艺美学理论,并注重理论阐述,首章论诗歌起源、七章先秦诗歌理论概述,均颇精当。尤以“别为一宗的道家诗学”一节阐发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性哲学

及崇尚自然天籁、返朴归真的艺术理论,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然全书各章亦不尽平衡,如论《诗大序》一节就比较简率,仅分点简介其内容,而于其在儒家文学观及中国诗史中的巨大影响则未论及,是其明显不足。(纪伟)

【中国诗歌漫笔】诗史专著。李庆、武蓉撰。此书以简明通俗形式评介中国古代诗史。全书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从诗经一直论到新体诗。包括序篇——诗歌之花是怎样开放起来的?以下是诗经、楚辞、乐府诗、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唐诗、词、宋诗、散曲、元至清诗、民歌十编。末篇是新体诗歌。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诗歌发展脉络,作者略去枝蔓,集中评介中国诗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对于初学者颇有帮助。此书前有蒋和森序,后有作者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王学泰)

【梦苕斋专著二种】诗学专著。钱仲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内含《李贺年谱会笺》、《吴梅村诗补笺》两种。本书均已另行著录。参见各条。(纪伟)

【绝句衍义笺注】诗学著作。王仲鏞、王大厚笺注。杨慎重视唐诗,尤其注意唐人绝句。所著《绝句衍义》四卷,一向流传稀少,笺注者根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明曼山馆刻本编成是书,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杨慎所选七言绝句一百零四首。首选梁武帝、魏收、梁简文帝、萧子显、江总诸家各一首,以溯其源,见未有七律之先,已有绝句之体。于唐人绝句选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罗邺等六十六家。选诗重风调,主含蓄,多取情韵俱佳之作。能兼顾初盛中晚的不同家数、不同流派。诗后所撰衍义,“或阐其义意,或解其引用,或正其讹误,或采其幽隐”(《绝句衍义序》),要言不繁,尤多精当。焦竑編集《升庵外集》时,大都采入《升庵诗话》和《升庵词品》中。从该书选目和评语中可以看到作者重视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并已注意到唐代诗歌和传奇小说的关系。笺注者订正了原著的某些讹误之处。诠释与按语颇见考证和鉴赏的功力。书中附载焦竑评语十四条,附录杨慎所著《唐绝增奇》、《唐绝精选》、《绝句辨体》的序言等。

(孟向荣)

【笠翁对韵新注】诗学读物。艾荫范、解保勤注释。李渔(1611—1679?)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剧理论家和作家,著有《闲情偶寄》等。所著《笠翁对韵》以平水韵的三十个韵部为目,将常见韵字组织为富于文采而又符合格律的对子,以便学习写作近体诗、词,为当时童蒙读物。注释者着重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和整理:用平仄对原文逐一加以标注,按

分韵体例编排诗韵常用字,将分韵诗选附录书后,并收《诗韵(律)常识》一文。1985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入该社古籍选读丛书。(孟向荣)

【论诗绝句】苏仲翔著。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收入作者论诗绝句一百零一首。冠以导论《风雅新论》,后载王季思跋。作者熟谙文史,对诸大家诗作能融汇贯通,故其书上自风雅,下及明清,或专论一家,或合论数家,勾勒出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纲要,于其中渊源脉流,短长得失,多有新见。“以诗论诗”为传统诗歌评论方式,本书于每诗之后增加注语,标其旨趣,以醒眉目,间或引用诗人生平轶事琐闻,名言隽语,或前人诗话、诗论,夹叙夹议,从而部分地克服了篇章短小的局限。(李翔征)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诗学专著。吴世常辑注。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辑录杜甫、戴复古、王若虚、元好问、方孝孺、李濂、钱谦益、王士禛、严虞惇、赵执信、袁枚、赵翼、洪亮吉、宋湘、张问陶、龚自珍、彭蕴章、朱祖谋、丘逢甲、邓方二十家七言论诗绝句二百四十三首。并附录其他论诗诗二十六首。其中专谈创作理论的有戴复古《论诗十绝》等,批评历代诗人兼谈创作理论的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龚自珍的《舟中读陶诗三首》评论一个作家,邓方《冬日阅国初诸家诗因题绝句八首》、彭蕴章《题元人诗十二首》评论一个历史朝代的作家,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评论几个历史朝代的作家。这些论诗绝句,辞约意丰,形象生动,许多篇章琅琅上口,易记易传,本身即堪称艺术精品。每种论诗绝句之前,缀以作者小传,并对原诗写作背景及其论述主旨,略予稽考评议。注释则疏通字句,详释典实,并能博采众说中有见地者。如对彭蕴章所论元人诗歌皆引出处,以十二家诗文与戴复古“欲参诗律似参禅”相印证,以见诗学与禅宗之瓜葛等。

(孟向荣)

【历代诗话论作家】工具书。常振国、降云编。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以作家列目,《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对后代诗歌影响较大者亦编入。将历代诗话论述该作家之文,散入各作家名下,以便查检。共选入作家三百余人,收较有影响的诗话一百余种。分上下两编,上编辑录钟嵘《诗品》及唐、宋诗话,下编辑录金、元、明、清诗话。同一资料牵涉两人或两人以上者,以一为主,其他“参看”,同一资料见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诗话取较早的一种,但后者倘有引申、补充、辨证者,则并出,或取后弃前。编者对某些诗话中明显的舛误之处,参照他本作了校补。个别条目有简要按语。

(孟向荣)

【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诗论专著。杨庶堪著,彭伯通笺。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庶堪,字沧白,巴县人。清末为诸生,后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政府广东省省长。1942年逝世,卒年六十二岁。是书原稿标名《论诗绝句百首》,诗人排次,未能尽依生年先后,笺者略加调整,保留杨氏自注,在每首诗后列“评介”与“笺”。该书论述自汉迄清诗人九十六位兼及其作品,评点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古诗十九首》、《木兰诗》等佚名作品,最后两首所论总括全帙。作者能融诗学源流与诗家述要于每首二十八字中,既触笔成绘,又切中肯綮。如以“诗家亦有沉雄笔,莽荡乾坤独此人”概括历代诗评给予杜甫的诗圣地位。又如以不甚著名的元代诗人黄庚《池荷》为元绝第一,堪称别具只眼。笺者的“评介”与“笺”,详鹭历代诗评之精要,脉络清晰,偶间笺者妙见,亦于谈艺有裨。(孟向荣)

【汪辟疆文集】论文集。汪辟疆著。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辑录作者学术专著之外的论文、杂著和诗篇。《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提出鉴定材料不能以己意为去取,辨别真伪不能以孤证为定谳,评品诗家不能以时代宗尚失真相的修史原则。《汉魏诗选按语》论述这一历史阶段诗歌流变及作家风格。《谈李义山的诗》具体阐释义山诗的意、韵、辞、声之美,并指出读义山诗深晦的诗要浅看;明显的诗要深看;用事繁缛的要虚字;纯用白描的要呼应。汪辟疆尤擅近代诗学。《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辨析晚清道、咸、同、光四朝五十年之诗,按地域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六家,梳其流别,论其得失。《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亦为作者研究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品。是书书札、序跋、笔记部分,内容遍涉经、史、子、集,而对诗学多所发明。是书由程千帆编订,有程跋。

(孟向荣)

【胡小石论文集】论文集。胡小石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以字行,浙江嘉兴人。本书共收论文十四篇(附录作者《愿夏庐诗词钞》),其中涉及诗学者十篇,以研究楚辞、杜诗见长。《楚辞郭注义徵》运用清儒考据辑佚之法,断定《楚辞》郭璞注亡于唐季,然后遍搜现存群籍中所引《楚辞》郭注遗文,共得二百四十馀条,汇辑成篇,使郭注面目稍稍复原。《杜甫〈北征〉小笺》,逐句索解,考论本事,融考据鉴赏于一炉。《李杜诗之比较》谓太白上承《古诗十九首》而发扬光大,其贡献在独创一家;而子美诗风影响远播宋明之后,其成就在于“开派”。胡小石论诗著作未收录于

此书的还有《唐人七绝诗论》等。(孟向荣)

【寒柳堂集】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十一篇,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与《寅恪先生诗存》。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倘资料不足,则阙疑俟考。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中的叙事名篇所提供的大量史料,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孟向荣)

【金明馆丛稿初编】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陈寅恪文集之二。《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指出,渊明为人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道;其造诣所及,近似千年之后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不愧为“孤明先发”的大思想家。《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和《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考出李白自云先人获罪于隋末又为唐代宗室乃诡称,实则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论韩愈》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分为六门,以证明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指出其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陈寅恪研究诗人诗歌,善于深入到历史或文化思想的领域,虽然植根乾嘉,重视考证,但已由一般的训诂字句升华到探寻历史与文化思想发展过程的联系上,而发明新意,往往取证史籍亦取诗文,具有显著的交叉研究特色。(孟向荣)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论文集。郭绍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分上下两编,收录论文四十九篇。其中诗学论文二十余篇,大致包括四种类型。一是研究诗歌声律,包括《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蜂腰鹤膝解》、《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律的拗体》等篇,对沈约提出的声韵学说详加分析,阐述其流传、演变及影响。二是研究诗学理论问题,包括《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论》、《神韵与格调》、《性灵说》、《“六义”说考辨》、《兴观群怨说剖析》等篇,全面阐发诗禅、性灵等诗学问题的涵义、演变过程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三是研究历代诗话,包括《从〈诚斋诗话〉的时代谈到杨万里的诗论》、《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关于〈沧浪诗话〉讨论的补充意见》、《〈清诗话〉前言》、《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等,认为北宋诗话多资闲谈,南宋诗话开始偏重理论,明代诗话已是论文艺的严肃著作,清代诗话更重系统

性、专门性,比以前各代诗话成就更高。四是研究古代诗人、诗作和诗学观点,如《陶集考辨》、《元遗山论诗绝句》、《朱子之文学批评》等。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诗学史的论文,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所谓传统的文学观》等篇,分别论及道家 and 儒家思想在诗学史上的影响。《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等篇,论及诗歌的产生、发展及其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作者学识渊博,功力深厚,于诗学理论有许多发掘和创见。(吕伯涛)

【顾随文集】论文集。顾随(1897—1960)著。由其女顾之京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诗学著作集中于上编,主要有《关于诗》、《曹操乐府诗初探》、《读李杜诗兼论李杜的交谊》等。下编收录作者创作的诗词杂剧作品。附录《驼庵诗话》,系其学生叶嘉莹据听课笔记整理。作者西学造诣较深,又沉溺于古典文学研究数十年,故对诸大诗人的评论和比较,多精辟深透,成一家之言。(李翔征)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集。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集辑作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其中诗学文章十四篇。《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认为,中国诗的传统是民间歌谣的传统。《中国的诗歌总集》著录古诗及古乐府与五七言古律诗的总集二十六种,简述版本,兼及同类文献。《中晚唐诗纪》考订有功于唐贤的六种《中晚唐诗纪》刊本,排列作者姓氏总目,对是书偏爱刘姓、朱姓诗人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作者善于从文学角度研究目录、版本。或剖判集部诗学要籍,指引读书门径,或从“贞隐堂”、“野香堂”等版本中缝题名,甄辨刊刻时代,推阐编者思想,均能发人所未发。(孟向荣)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集。朱自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分上下两册。辑作者有关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四十二篇,其中诗学论著近半,以《诗言志辨》为最重要,已另立条,可参见。此外,如《乐府清商三调讨论》、《再论〈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王安石〈明妃曲〉》、《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等,多能突破陈说,提出新解。还有一部分指导诗歌初学者入门的文章,如《论诗学门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诗的语言》和收在《经典常谈》中的《诗经》、《诗》、《辞赋》等篇,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吕伯涛)

【论诗词曲杂著】论文集。俞平伯著。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收辑论文二十三篇。所论范围包括《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考察李善注与众

说之十六条谬误。《说杜甫律诗〈题张氏隐居〉》，指出该诗直说、典故双管齐下，并用透过一层写法，实为应酬之作中例外的好诗。《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商榷补缀陈文。《古诗辞例举隅》钩稽名篇中顺叙、倒叙例，重复句例，双起单承极端之例等。俞平伯善于从细微处着眼，反复琢磨有关材料，以期鉴赏深透。考证则注意避免“求深反感，甚难实非”的弊病。

(孟向荣)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集。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县人。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辑作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四十二篇，其中诗学方面的评论考证文章二十四篇，涉及乐府、五言、七言、绝句诗起源，陶渊明、鲍照、李白、杜甫、杨万里、《古诗十九首》、《胡笳十八拍》、《木兰诗》等作家作品以及关于《诗品》、《诗总》、《古今诗话》等著作的论辨或跋尾文字。作者重视实证，博引史料，广搜诸说，以期辨伪求真，溯源明流。《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并载古今该体起源说十数种，加以评鹭，阐说了五言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在考订伪七言诗的基础上，从骚体和歌谣入手，对七言诗蝉蜕过程进行探索，并与五言诗比较，印证由简而繁的文学进化原理。《绝句三源》提出绝句之名源于联句，体裁源于歌谣，格律源于声调对偶的观点。《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贡献》从批评史角度诠释杨万里诗得益于叶适和“永嘉四灵”，概括杨万里文论“重兴、轻赋、卑视唐和”的要旨，亦颇为准确。

(孟向荣)

【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集。陆侃如著。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强调考证的重要性，《〈古代诗史〉自序》一文指出，考证属于历史的批评，它与思想的、艺术的批评相辅而行，不能有所轩轻。《〈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又谓，理想的文学批评宜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到内线的目的。作者素以治《楚辞》与中古文学见长。《屈原评传》对诗人生平、作品真伪的考订自成一家之言。《〈孔雀东南飞〉考证》否定其为汉诗之说。本书收入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五篇。另有《〈二南〉研究》、《中国古代的无韵诗》、《中古诗人小纪》、《宋诗简论》等三十余篇。

(孟向荣)

【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论文集。刘大杰(1904—1977)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四篇，其中诗学论文四篇。《关于〈胡笳十八拍〉》和《再谈〈胡笳十八拍〉》，针对郭沫若肯定《胡笳十八拍》系蔡琰所作的观点，从历史记载、诗歌题目、风格体裁等方面详加考证，认为此诗非蔡琰所作，可能系晚唐拍弹的唱本。《论陈子昂的文学精

神》，认为这位诗人击破几百年形式主义反动思潮，是转变一代风气的开路人。《杜甫的道路》从诗人的生活道路探索其思想和作品发展轨迹。此外，在《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的主流及其他》、《中国文学史中的思想斗争问题》等文中，提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成熟于杜甫、白居易时代。反对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概括中国文学史等观点。

(吕伯涛)

【罗音室学术论著】论文集。吴世昌著。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此为第一卷，收文史杂著二十六篇，前言和自传各一篇。其中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及诗人者九篇。《释〈书〉〈诗〉之“诞”》释《尚书》和《诗经》中的“诞”字为“当”，曾得胡适很高评价。《〈诗〉三百篇“言”字新解》，提出《诗经》中的“言”字除用作本意、专门名词或形容词外，其余九十二字皆可训作“以”。《释〈诗经〉之“于”》，对《诗经》中“于”字的用法分三百六十五条详加分析，以“焉”释“于”。《诗与语音》和《〈诗与语音〉篇的声明和讨论》，研究字音及其引起的情感，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论乐府诗《秦女休行》文三篇，提出该诗本事为《后汉书·庞涓母传》和《三国志·魏书·庞涓传》中所记庞涓之母赵氏为父报仇的故事，从而批评了胡适的说法。《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认为过去文学史对韩愈评价失当，批评韩愈教育下一代的主导思想是唯利是图，唯禄是求。

(吕伯涛)

【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集。李嘉言(1911—1967)，字泽民，河南武陟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作者为先秦至唐代诗歌的专家，是书所收论文研究《诗经》者七篇，研究楚辞者十一篇，研究汉魏六朝及唐诗者三十三篇。其中有诗义训诂，如《诗经“彤管”为红兰说》、《扶桑为云霞说》、《昌谷诗集王注补正》等；有问题考证，如《孔子删〈诗〉辨》、《〈离骚〉丛说》等；有诗体起源与诗境渊源影响之探究及诗歌思想艺术分析。另有《韩愈诗文系年辨证》和若干读诗短札。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孟向荣)

【顾学颉文学论集】论文集。顾学颉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录论文五十篇，其中诗学论文约占一半。以研究白居易、温庭筠为主，涉及陶渊明、谢灵运、徐陵、韩愈、李商隐、陈与义、王渔洋、袁枚诸人。本书系统考证白居易的世系、家族(指出白氏乃汉化胡姓)，婚姻爱情，与牛、李两党的关系，与永贞革新的关系，分析他贬谪江州的前因后果，编制了年谱，在此基础上分析白诗，时有新见。

《读谢康乐诗》论陶渊明、谢灵运生活、志趣、学术、诗文“表里俱不相蒙”。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顾嗣立以李仆射为李蔚（《温飞卿诗集笺注》），作者认为当指李德裕，使全诗解释较为圆满。

（吕伯涛）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论文集。叶嘉莹著。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本，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本。收录论文六篇，除检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一篇外，皆为论诗专著。《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认为，钟嵘论诗既重视诗歌中之“性情”、“风力”、“丹采”三项要素，同时也重视“比兴”之作用。《李义山〈海上谣〉与桂林山水及当日政局》对此诗的意象与神话、历史背景、作者身世及可能的托意进行细致考辨。《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品评传统的兴趣说、神韵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并钩稽中西诗论之异同。叶嘉莹诗学的特点是多从具体作品分析和前人研究成果入手，以现代文学理论的眼光订正先贤的偏浅之处。主张新学旧学兼容，在不失中国诗歌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借西方文论以补不足。

（孟向荣）

【诗词札丛】论文集。吴小如著。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分“诗歌札丛”、“词曲札丛”和“其他”三辑，其中“诗歌札丛”四十篇是以作品鉴赏为主的诗学论文，“其他”中有几篇研究诗论、诗集的论文。作者赏析诗词力求做到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以便讲解得合情入理。所赏析的作品从上古诗《弹歌》、《击壤歌》，到《诗经》、汉乐府，下至唐宋名篇。此外还有关于《诗经》、《唐诗三百首》等集和朱自清《诗言志辨》的评论。

（吕伯涛）

【文史探微】论文集。周勋初著。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收论文十六篇，涉及诗学的有《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诗发微》、《〈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叙〈全唐诗〉成书经过》等篇。作者学风严谨，且有意识地运用古代史学、哲学资料，故对古代诗人及其作品有较完整的认识。

（孟向荣）

【五大诗人评述】论文集。陈祥耀著。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收录评述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诗的论文六篇，属稿于1959年到1962年。付梓前曾作局部修改。文章格局大抵按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生平思想、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为序，或依作品分期及题材体裁之分类加以论列。《陶渊明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驳陶诗“反现实主义”说。《白居易诗论略》，指出其新乐府固然极富现实主义，但也有消极因素，其抒情、闲适诗的艺术价值却不宜一概否定。《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

术特点》与《陆游的生平和诗歌创作》着重说明杜、陆诗的艺术风格。对杜甫善于运用人民口语和善于创造文学语言的卓越艺术才能尤多阐发。（孟向荣）

【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以元延祐庚申（1320）圆沙书院《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诗品》为底本，以明正德元年退翁书院本等二十余种《诗品》的全本或节本为参校本，每节之后均有说明详细之校记。该书之注释，兼及典实注解和释义两个方面，较之该书之前的众多《诗品》注本偏重典实注解而轻释义，可视为优点之一。其释义尤注重对钟嵘诗学观点的源流、美学内涵之考辨，而对于《诗品》中出现的诗论术语、概念，亦多有纵、横两方面的考察和界说。该书前言对钟嵘生平事迹、《诗品》的写作背景、《诗品》的结构和基本内容、钟嵘的论诗趣尚和方法体系及其得失、《诗品》的影响作用、《诗品》的版本流传等问题，一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对于钟嵘品评诗人得失，亦作了评说。书后附录《南史·钟嵘传》、历代《诗品》评论选辑、索引三种，亦不无参考价值，尤以语词索引一种更能方便检索之用。

（党圣元）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研究专著。郭绍虞撰。此书集历代有关《戏为六绝句》的注释、评语、歧解等资料，并加按语，先是对六诗总主旨之集解，后为各首诗之集解。以绝句形式进行文学批评，因形式限制，其旨常不显，集解从多方面阐发，颇便读者。该书原为作者1932年旧稿，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排，但未能印行。1978年始修订出版，并与郭氏笺释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合订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

（尹晓康）

【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该书校勘，以《十万卷楼丛书》所收五卷本《诗式》为底本，以《格致丛书》本、《唐宋丛书》本等十余种版本为校本。另宋以来一些诗话中称引或捃扯《诗式》者，亦用作参校依据。又凡《诗式》论诗所列举之例句，亦对照有关诗集加以校勘。校注者对《诗式》之编次作了若干更动，以纠正流传的五卷本《诗式》在目次上的零散舛乱之弊。具体说来为：将原本卷一中“李少卿并占诗十九首”、“邺中集”、“文章宗旨”等三条移后，因依校注者之见，它们不合列在卷一的总论部分，而应编在总论之后所列举的具体诗句之旁。又原本中对有关诗作之评语均列于诗句之前，该校注本则统列于诗句之后。《诗式》序文原本中分为三部分列于卷首、卷二和卷五，该校注本则合而为一，列于卷首。该书注释之重点在《诗式》的诗学理论和评论部分，对于有关理论批评术语、概念之解说尤为致力。注释中对于涉及皎然诗论源流以及

后人的有关品评等材料,亦多有搜求。对于皎然以十九字分注的前两卷例句的注释,则有助于读者理解皎然的意旨。该校注对《诗式》理论内涵的释解较为透彻。又书后附录之皎然传略、轶事以及皎然其他论诗文字包括《诗议》和《诗论》及诗文选录,亦有助于读者了解皎然诗论之全貌。前言则对皎然的生平事迹、诗论特质及方法特点及其得失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党圣元)

【诗式校注】周维德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该校注以清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为底本,以宋蔡传《吟窗杂录》本、明叶奕抄本等四种版本为对校本,又以元陶宗仪《说郛》本、明胡文焕《格致丛书》本等六种版本为参校本,对于《诗式》中的错、夺、衍字作了细致的改定,对于古体字、异体字以及避讳字亦或改为通行正体,或予以改回,同时对各流传版本的异文现象则择优而从,加以考订。笺注着重于引语出处以及有参考价值的材料等方面,具体说来,大体不外以下几个方面:凡能说明皎然诗论源流之所自出者、后人阐发皎然诗学思想或品评《诗式》中某一问题者、对理解皎然诗论主张有一定启发意义之材料、见于皎然诗文之中而对其诗学观点有相互发明之材料、特殊的词语及术语和概念。撰者并将皎然《诗议》作为补遗,附于《诗式》之后,系由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和蔡传《吟窗杂录》辑出。后人割裂《诗式》而辑成的《诗论》、《中序》则归入《诗式》,并在校文中予以说明。该书附录有《诗式的版本及其他》、《皎然杂文》、《评论》、《序跋》、《传略》等五种,除第一种为校注者自撰外,其余四种均辑自有关书籍。《校注后记》则对皎然的生平思想、论诗崇尚和方法及其得失作了简要的评介。该书是皎然《诗式》的一种较为完备的校注本。(党圣元)

【司空图诗品解说】祖保泉撰。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书体例,先注释,次译文,然后解说。注释侧重于语词、典故等方面,必要之处则对一些文句作串讲。译文则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出原作之韵味。解说部分是该书重点所在,除对每一品所涉及到的诗学理论问题加以阐发而外,又能举诗歌批评史上别家的一些见解来与司空图的观点相比较,或相印证。在解说中,撰者注重对每品的整体特点加以描述,并指明其美学指向。总之,针对《二十四诗品》“玄”、“虚”之特点,撰者在注释和解说中则使“虚者实之”,对每品的美学内涵以及一些概念命题作出明确的界说,以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其“玄”、其“虚”。书前的引言部分,对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二十四诗品》的诗学宗旨及其得失作了系统的评介。又该书附录有司空图《与李生论

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四篇论诗文字,并加以注释,皆有助于读者了解司空图诗学理论之全貌。(党圣元)

【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杜黎均撰。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司空图论》,对司空图的生平事迹、思想特点、《二十四诗品》的理论内容和结构布局,以及司空图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分别进行了系统的论析。中篇为《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对每个品目作了注释、今译和评析。注释重在典实和词语解释,评析则以阐发意旨为主,并适当地引《全唐诗》中的一些诗例,来说明本品所主张的诗美风格之特点,或曰以《二十四诗品》所描述的诗美特征与唐诗的创作实践相互印证。注释中对某些传统的不适当的解释亦有辨正。下篇为《司空图文学理论选注》、《司空图诗歌选注》、《历代各家品评》,分别选注了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谈诗书》、《题柳柳州集后》四篇论诗文字及司空图的七十五首诗作,辑录了历代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的评论文字。该书内容丰赡,尤有利于了解司空图诗论及创作之特点,然评析中亦有枝蔓现象与重点不够突出等问题。(党圣元)

【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该书之校释,分为校注与释义两部分。该书校勘,以明正德间赵郡尹嗣忠校刻本为主,又参考魏庆之《诗人玉屑》所录加以校订,在原文的排列上,与前代流传之版本稍有不同。又《诗人玉屑》中不录而流传各种版本中有的,郭氏疑为后人所增,然不加删除。而《诗人玉屑》中有录,流传版本中无有者,则加以补入。凡有异文之处,或据《诗人玉屑》改定,或在校注中说明。郭氏之校注,除对胡鑑《沧浪诗话注》、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择要节取而外,对于陶明潜《诗说杂记》中释解严羽论诗主张的文字亦多有采用,而郭氏在典实以及有参考价值的背景材料等方面,亦作了大量的注解以及搜求工作。在释义部分,郭氏尤注重列举严羽之前的种种论诗见解,以说明《沧浪诗话》论诗之渊源所自。对于后人对《沧浪诗话》之评价意见,则取其异而不取其同。尤对后人对于《沧浪诗话》的辨驳意见,即使不合严羽原意者,亦尽可能加以摘录,以资参考。在释义中,还就历史上关于《沧浪诗话》论诗主张的一些争论分歧,作了论述阐释,并点明其理论实质之所在。释义中还对严羽诗学观念之得失予以讨论。书后附录有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以及对有关严羽的传记材料、《沧浪诗话》的序跋及提要 and 关于《沧浪诗话》的评论的辑录。(党圣元)

【**董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笺注以清道光时邓显鹤撰《船山著述目录》集类所列《董斋诗话》目次编次,厘为三卷,即卷一《诗译》,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卷三《南窗漫记》。另附录《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共计一百五十条。笺注者以曾国荃金陵刻本《船山遗书》为底本,以王启原辑《谈艺珠丛》本、丁福保辑《清诗话》本、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船山遗书》本为参校本,凡异文、舛误之处,均出校语,置于注释之中。笺注分注、笺、案三部分,注释侧重于诗句、人名的出处,征引颇详。术语概念,亦作释解。一般语辞则不注。笺语部分则辑录散见于王夫之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诗文字,根据内容,分隶于各条之后,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了解王夫之诗学体系之全貌及特点,极为有用。笺中亦间录有他人诗论意见,其或与王夫之诗学主张有渊源关系,或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左,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作用。案语部分,则主要是申说王夫之论诗主旨,亦多有所见。(党圣元)

【**诗问四种**】周维德笺注。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为程千帆主编《明清文艺理论丛书》之一种。是书将王士禛等《诗问》及《诗问续》、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陈仅《竹林答问》四部诗论著作汇为一编。该四种诗论作品俱为一问一答的问答体,笺注者则将每一问答厘为一小节,并标出序次。笺注侧重于引语出处、人物、诗论概念术语、篇章名称、名物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掌故等方面,一般语词则不注。皆能做到要言不繁,并注意搜求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材料。本书在校订、标点、定字方面亦用力甚勤,如《诗问》和《诗问续》,即以康熙间刊本为底本,另选洪楠云刊本、王廷铨刊本、敬义斋刊本和《清诗话》本为对校本,然未出校记似为一缺憾。另外,笺注者还将吴乔《围炉诗话》中有关论诗问答之语,凡《答万季野诗问》未著录者,作为补遗辑录,名为《答万季野诗问补遗》附录于后,亦有助于读者了解吴乔诗论之特点。书末附《后记》一篇,重点对王士禛、吴乔、徐熊飞、陈仅四人的诗歌理论特点及其得失,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作了阐释和说明。以问答体的形式论诗虽不起于清代,但作为专门著作的形式出现,则是清代首见,为诗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体裁式样。因此,该书之编纂、笺注,对于整理清人诗论遗产,总结清人诗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党圣元)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吴世常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本书辑注杜甫、戴复古、王若虚、元好问、方孝孺、李濂、钱谦益、王士禛、严虞惇、赵执信、袁枚、赵翼、洪亮吉、宋湘、张问陶、龚自珍、

彭蕴章、朱祖谋、丘逢甲、邓方等人论诗七言绝句二十种。注释多采众说中有创见者,除疏通文字外,不加断语。每种论诗绝句之前缀以作者小传,并对原诗写作背景及其论诗主旨加以稽考、评议,对所据版本亦有简要说明。(王止斋)

【**袁枚续诗品详注**】刘衍文、刘永翔合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出版。注者自称“兼取汉宋两学之长,合用李善、五臣注《文选》之例,并酌采评点家之法”(《前言》),又借鉴郭绍虞《续诗品注》“以袁注袁之法”,“详注本书”。《详注》对《续诗品》三十二则正文,逐句讲解其来历、出典,其中语句艰深或文义有待探讨者,均略加笺释,并择要采录历代注疏,矜慎考订文献谬舛。凡袁枚诗文、笔记、诗话等足资参证《续诗品》之说者,与每则内容整体有关而难以列入各句注释中者,袁氏著述他处相类之语而较为完整者,他家之说与每则有关或虽相反而足相参者,亦酌选附于各语注释之后。此外,每则之末,缀以注者“小识”,“要旨皆权衡其义,而以己意判焉”。于《知难》一则“小识”中,采撷袁氏论诗文字,特列:创作经验馀谈,时文、诗文与剧曲,文品与人品,诗说、诗选与诗话四项。《详注》兼训诂、释事、章旨、辨说,尤以章旨见长,可概见袁枚“性灵”说全貌。书前有注者长篇前言,对袁枚生平、作品多有考辨。《详注》出版前,曾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流传多年。

(王止斋)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周维德辑校。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清王昶《青浦诗传》三十二卷,录青浦县“乡先生之诗”三百馀家,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湖海诗传》四十六卷,录“当世名流”六百馀人诗作,成书于嘉庆八年(1803)。二书皆附有诗人小传,并间以遗闻轶事缀为诗话。道光三十年(1850),毛庆善摘录《湖海诗传》中附载诗话为《蒲褐山房诗话》稿,未付梓,仅有家藏抄本,罕为人知。周维德复自《湖海诗传》、《青浦诗传》中重新辑录成《蒲褐山房诗话》一书,原载《湖海诗传》者为上卷,计三百零六家,原载《青浦诗传》者为下卷,计一百零三家,共四百零九家。本书所录《湖海诗传》以嘉庆八年三泖渔庄藏本为底本,校以同治四年(1865)重校刊绿阴堂藏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青浦诗传》以乾隆五十九年刊本为底本,校以有关资料。另编有《蒲褐山房诗话人名四角号码索引》、《蒲褐山房诗话姓氏笔画索引》附于书后。(王止斋)

【**编珠续编珠**】类书。正编二卷,旧本题隋杜公瞻撰。补遗二卷,续编二卷,清高士奇所辑。隋志、唐志均未著录,宋志始载。高序称世无传本,乃于内库废纸中得之。原目凡四卷,仅存二卷,遍觅不可

得,遂依原目补为四卷,故有补遗之作;又依类搜讨,辑成续编。公瞻,隋大业七年(611)前后在世,官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并庐,又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供奉内廷,官礼部侍郎,多见异书,著述颇丰。是编隶事为对,体例略如《初学记》,但前无序事,后无诗文。原目分天地、山川、居处、仪卫、音乐、器玩、珍宝等十四门,现存仅前五门。学林颇疑为明人依托之作。士奇所续,亦皆取唐以前事,较其他类书为近古。有高士奇自刊本。乾隆间收入《四库全书》,有影印文渊阁本。另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高氏刻本。

(许志刚)

【北堂书钞】类书。一百六十卷。《唐书·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载为一百七十三卷,今本卷帙已不完整。唐虞世南(558—638)撰。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宏文馆学士,银青光禄大夫。书名之“北堂”,即秘书省之后堂。世南曾仕隋,为秘书郎,于后堂采集群书之文汇为一编,因以名书。原书分八十部,八百零一类。每一类都先摘引群书字句,以大字排列,其下以双行小字注书名或列述原文。今之通行本,体例依旧,而部类残缺,仅存十九部,足见散失较多。是编所保存古籍较多,尚有一定参考价值。有明陈禹谟增改本,孙星衍等校订影宋本。陈氏刊本,增删窜乱,竟采贞观以后至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间,学界以为憾事。常见者有中国书店1989年出版之影印本。

(许志刚)

【艺文类聚】类书。一百卷。唐欧阳询(557—641)撰。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长沙)人。仕隋为太常博士,入唐,官至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是编乃奉诏所作,且有同修者。今本收入沈佺期、宋之问等四人诗,四人皆询卒后而仕唐者,则传写间偶有后人窜乱之文。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兼采前世赋、诗、铭、颂、文章,附于各门类之下。共分四十七部,每部分若干子目,共七百四十余类。于诸多类书中,体例最称完善。且其保存隋以前遗文秘籍繁富,对考稽、校订古文献之类工作,尤为宝贵。有明嘉靖丁亥(1527)胡纘宗刊小字本,明兰雪堂活字本。常见者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出版之排印标点本。

(许志刚)

【初学记】类书。三十卷。唐徐坚(659—729)等撰。坚字元固,湖州(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史称七人书府,封东海郡公。开元十三年(725),坚等奉诏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玄宗亲赐书名,以教诸皇子。全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类目与其他类书大致相同。其体例每条子目则首先“叙事”,其次为“事对”,然后列举诗文。其

叙事虽杂取群书,然前后较连贯,似有次第可寻,较其他类书杂陈故实有别。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又以谨严著称。在唐人类书中,广博逊于《艺文类聚》,而去取之精则胜之。其他类书如《北堂书钞》等,则远在是编之下。是编征引隋以前古籍及初唐诗文颇丰,而今又多散佚,颇赖是编及《艺文类聚》,以考稽遗文,故为学界所珍视。有明嘉靖十年(1531)锡山安国仿宋刊本、茅鹿门本、古香斋本等。常见者有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

(许志刚)

【白孔六帖】类书。一百卷。又称《六帖》,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后六帖》三十卷,宋孔传撰。南宋末年合为一书。百卷之目,不知何人所分。居易令诸生杂采各书中成语、故实,以备写作诗文之用。其体例略同于《北堂书钞》。其所引文献时代、内容,多无次第,又往往割裂文句,失于严谨,则在《北堂书钞》之下。传字世文,孔子四十七代孙。仕南宋,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有明嘉靖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志刚)

【事类赋】类书。三十卷。宋吴淑(947—1002)撰。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以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后官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尝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淑初以此赋进呈,为二十卷,且无书名。其后,太宗诏命自注,乃增益卷数,定为今名。全书分天、岁时、地、宝货等十四部,各部依文字多寡分一至三卷不等,共分子目一百。是编于类书中独具一格,盖熔铸故实,联而为赋,创始于淑。其赋工雅,且又自为注解,与原作妙合无间。其所引述群书,除少数逸书为间接引用外,皆采自原书,非辗转抄袭者可比,于此亦可见其著述之精审。有明嘉靖俞安期仿宋刊本,华氏剑光阁刊本等。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校点本,名《事类赋注》。

(许志刚)

【诗律武库】类书。前后集三十卷。旧本题宋吕祖谦撰。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是编为祖谦年谱所不载,且祖谦乃一代硕儒,文辞闳肆博辩,凌厉无前,而此书征引故实,大抵习见之事,在类书中最为浅薄,学者以为断非祖谦所作,当出于后人依托。有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洞庭东山郑氏桃源山庄刊本,《金华丛书》本。

(许志刚)

【锦绣万花谷】类书。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天一阁藏书目题宋萧赞元撰,或谓萧恭父作,皆不足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不载撰书人。又《千顷堂书目》载

尚有别集三十卷,亦不署作者。原书分作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前有自序,题“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一日”,当为南宋孝宗时人,而书中载有宁宗、理宗事,可见在南宋已有所附益。前集凡二百四十二类,后集凡三百二十六类,续集前十四卷凡四十六类、后二十六卷则为类姓。所录杂驳不精,甚至参错失伦,不似《初学记》诸书之严谨。然是编颇保存一些佚书的章节,且其每类后附录诗篇,亦保存下相当数量的词章之作。凡此,皆有助于考证、校订古文献之需。有明嘉靖丙申(1536)刊本,崇正书院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许志刚)

【韵府群玉】类书。二十卷。旧题宋阴时夫撰,其弟中夫注,或本宋作元。据《千顷堂书目》载,时夫名幼遇,幼遇亦作时遇,字时夫。生卒未详,大抵宋末元初在世。奉新(今江西南昌)人。南宋宝祐年间九经科及第,下距宋亡二十余年。入元不仕。又载中夫为幼遇兄字,名幼达。是编为诗韵之书。前此颜真卿有《韵海镜源》之作,分韵隶事,号称韵书之祖,然其书久佚。词章之士,除记诵外,也时欲检阅,于是,诗韵之书盛行于元初。是编当作于此时。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康熙《御制佩文韵府序》云:“《韵府群玉》、《五车韵瑞》诸书,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稽古者近而取之,约而能博。”足见其有益于士林之功。而明清通行之韵,亦皆从是编录出,亦可见其为韵府、诗韵诸作之本。然是书简而不详,略而不备,引据失误,舛讹相踵,亦为学林所同见。有元大德刊本,明嘉靖乙丑(1565)刘氏刊本。常见者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许志刚)

【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类书。二十卷。元严毅撰。毅字子仁,建安(今福州)人。其生卒、居里未详。卷首载张复序,作于后至元庚辰(六年,1340)。其书体例与《韵府群玉》相近。依韵系字,事摄于字,且采五七言诗句附缀于后。然其引诗,不署作者姓名;所载唯上下平声,而无仄声;于韵又只二十九部,其三江一部因韵窄字少,删而不载,皆可见其疏漏。(许志刚)

【诗学汇选】类书。二卷。明胡文焕撰。文焕字德甫,号全庵,一号抱琴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约万历中在世。深通音律,著传奇四种,又以刻书为事。是书即坊本《诗学大成》中采辑重编,凡三十九门,遍采六朝至明代诗,然精粗妍媸并录,颇芜杂。且《诗学大成》本是托名李攀龙的伪书,是编又从伪书抄袭而成,其低劣可知。有明刊本。(许志刚)

【韵学渊海】类书。十二卷。旧本题明李攀龙

撰。攀龙学有根柢,倡复古学,主张读唐以前书。坊间尝托名刻《诗学事类》二十四卷及《韵学事类》十二卷,皆疏漏庞杂之作。是书乃取前二书汇为一编,亦唐顺之者流依托所为矣。有明唐顺之校刊本。

(许志刚)

【韵粹】类书。一百零七卷。旧本题清朱彝尊撰。彝尊素以博闻多识、学有根柢,蜚声士林,其所撰《经义考》,尤为学者所重。是编采古人词赋新颖之语,分韵编次。所引述,不及经史之文。凡经史之文为汉以后词赋采用者,即以采用之篇注为典故出处。以彝尊之博雅、谨严,似不至为此。学界以为系写作词赋备用之资料汇编,并未成书。后人辗转抄写,以至于此。以抄本传世。(许志刚)

【分类字锦】类书。清康熙间儒臣奉旨而修。康熙六十一年(1722)编成。有1984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内府刊本。凡六十四卷。采掇成语,裁为骈偶,分类编辑。每类以二字、三字、四字为次,各详引原书,注于条下。是编体例详明,剪裁得当,遇丽句可供文藻,而单词不可骈连者,各依字数,附缀于末,谓之“备用”。至于连篇累牍,集为巨帙,足资作诗检索调遣。(孟向荣)

【渊鉴类函】类书。四百五十卷。清张英、王士禛等编纂。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有内府刊本、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同文书局本等。是书为清圣祖敕撰,扩充明人俞安期《唐类函》,博采《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书,广收宋、元、明各代的文章事迹,以供诗赋之用。该书分天、地、帝王至鳞介虫豸等四十五部,每部分若干子目,共约二千五百餘小类。每项子目著录释名、典故、对偶、摘句、诗文五类内容。每一类内容都分为“原”、“增”两部分,分别表示系《唐类函》原有抑是清人所续增。《渊鉴类函》集搜采、分部、序类、剪裁之功,“计其所载,实倍于《御览》。……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亘古所无之巨制,不输宋之四大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因书成众手,亦有不少讹误疏漏。(孟向荣)

【骈字类编】类书。二百四十卷。清张廷玉等编。康熙五十八年(1719)敕撰,雍正四年(1726)告成。有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据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版。该书分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等十二门;补遗一门曰人事。其中数目、方隅、采色等类,为以前类书所无。该书只收双音词,不收单音和多音词;只收实词,不收虚词;于实词中“不甚雅驯”者亦不收录。其性质与《佩文韵府》相似,为赋诗作文时查检

词汇、典故之用,但体例殊异,一改以韵系字之法为以类编之,“俾与《佩文韵府》,一齐尾字,一齐首字”,“互为经纬,相辅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一门目下,由骈字中的第一字加以统摄,共用标首字一千六百零四个。每条所引,以经史子集为次,韵文只收诗赋,不涉词曲。而引书必著其篇名,引诗文必著其原题,或一题而数首者,必著其为第几首,编排颇为精密。该书的缺点为词头数目有限,又囿于体例,故所收词汇大为减少。(孟向荣)

【佩文韵府】类书。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玉书(1642—1711)字素存,号润甫,丹徒(江苏镇江)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仕至文华殿大学士,历官凡五十年。此书是清初官修四大类书之一(其他三种为《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也是卷帙最繁者。此书以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与明代陆稚隆《五车韵瑞》两部类书材料为基础增加葺补而成。全书原为一百零六卷,乾隆间因其“篇页繁重”析为四百四十四卷。书中以字为单位,收字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个,按平水韵目编排,分为平上去入四大部分,各声中又分若干韵,凡一百零六韵。又收以此字为词尾的二、三、四字词四十八万余条,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约二千一百一十五万字。每字皆先标音训,所隶之事凡阴氏、凌氏书已采者,谓之“韵藻”,列于前;两家所未采者,别标“增”字列于后。皆以两字、三字、四字相从,而又各以经史子集为次。其一语而诸书互见者,则先引最初之书,而其余以次注于下,又别以“事对”、“摘句”附于其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对”,书中称为“对句”,即为二字词、三字词的对仗词。“摘句”指以该字为词尾的五、七言诗句。每词下引古书用例,少者一二条,多者数十条,引文一般只注书名,引诗只注作者。如“香”属于下平七阳部(平声分上下两部,上平十五韵、下平十五韵)，“许良切，芳也”。此为注音、释义。“韵藻”，“路香：〔李建勋诗〕云散经窗湿，山晴石路香”。此为阴、凌二书所有者。“增”“市香：〔晋书·佛图澄传〕澄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因烧香祝愿，遥救护之。”此为《佩文韵府》编者所增。“对句”：“官烛，御香；凤纸，龙香”。“摘句”：“衣惹御炉香”，“流水桃花满涧香”。上面所举，仅是“香”字极小一部分，由此可见一斑。此书初编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于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五年以《佩文韵府》收字词多遗漏，复命翰林院检讨张廷玉等“搜奇抉秘”，补其缺漏。五十九年成《佩文韵府拾遗》一百零六卷，体例与《佩文韵府》相同。此书是近代以前所编以勾稽词藻出处为宗旨的类书中最为详密的一

种,为文人吟诗作赋运用典故、查找词藻提供了方便,亦为近世编纂辞书者提供了线索。如日本《汉和词典》、台湾《中文大辞典》皆多采摭此书。然而此书成于众手,又系官书,编纂草率,谬误颇多。此书引典不详注出处,不考虑版本。引诗只注作者,皆使读者查找困难。“词藻”与“增”加词藻部皆不注该词之意义,对读者帮助不大。另外其按韵编排也给今日不熟悉平水韵的读者查找造成困难,因而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排印此书时曾按字头作了索引。“佩文”为康熙皇帝书斋号,故以名此书。此书最初为清廷内务府印本,极精美。民国间有点石斋缩印本,虽然压缩了篇幅,但字小不易辨认。商务印书馆精装排印本,后附索引,较为实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曾将商务印本影印出版。(王学泰)

【诗词曲语辞汇释】工具书。张相著。中华书局1953年初版,以后多次重版。是书汇集唐、宋、金、元间流行于诗、词、曲中的特殊语词予以诠释。搜罗范围,诗以唐人为主,宋诗次之;词以宋人为主,金元词次之;曲以金元人为主,元以后作品次之。所收单字与词组计标目五百三十七,附目六百有馀,分条八百有馀。凡属普通义者,非联带关系不复阑入;其生涩而义晦及寻常而义别者,皆在探讨之列。于每条词语下,先作扼要解释,复将包含这一词语的诗词曲的原文,尽量引证,加以比较、对照、归纳,从而研究和辨析词语的意义。是书突破传统小学局限于先秦两汉的狭隘圈子,注意到唐以后保存口语资料较多的诗词曲,既明其训诂,且以治史之法溯其流变,方法缜密,释义精当。(孟向荣)

【诗词曲语辞例释(增订本)】工具书。王锺著。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书考释“非旧诂雅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的诗词曲特殊词汇。作者有感于《诗词曲语辞汇释》某些条目义例不够完备或值得商榷,作是书以补遗。而资料来源、取例汇义以至编排体例方面,大率不出《汇释》序言中所指示的蹊径和范围。例释丰富精审,有裨诗学。如用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薛能、李中、杨万里诗说明“诸”表“他”义却不限于“诸处”一词,亦有“诸家”、“诸丛”、“诸村”、“诸禽”、“诸人”等说法。对“草草”、“何处”、“偏”、“无端”、“亦”、“殷勤”、“准拟”、“犹”等语辞的多种义项细加辨析,博采诗例,以求定解。所收语辞,有少数并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金元戏曲方言考》、《元剧方言俗语例释》诸书,但举例颇有不同,解释不尽一致,一般都于该条末尾予以注明。《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年由中华书局初版。计标目一百八十四,附目一百二十三,分为二百三十四条。增订本计标目三百一十七,附目二百四十六,分

为四百一十二条。附录《“撮弄”、“爨弄”小考》、《诗词曲语辞存疑录》两文。(孟向荣)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工具书。金开诚、葛兆光撰。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书简介先秦至清代一百二十种重要作家作品及理论著作。诗、词、文总集在前,后为个人作品集六十四家,最后是文学理论著作及文学资料。重点介绍各书成书过程、流传情况、版本优劣、编撰体例和注本比较。资料比较翔实,可为初学者入门之资。(徐晓氏)

【**管锥编、谈艺录索引**】工具书。陆文虎编。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书包括《管锥编索引》与《谈艺录索引》。其中前者据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版《管锥编》及1982年第一版《管锥编增订》编制。分人名索引和书名篇目索引两部分。人名部分收录书中正文、注文中论列的人名(引文中的除外)。人名以本名为主目,其他称谓为参见条目。书中只用异称者,以其本名立目,而将所用异称作为参见条目。书名篇目部分收录书中正文(包括注文)中论列的书名和篇目(引文中的除外)。类书、总集的部、门

名目不立目,专著的各篇名不单独立目,但诗文总集、别集和《太平广记》中的篇名均单独立目。本索引以中文之部和西文之部为纲分别排列。中文之部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制,卷末附有笔画检字表。《谈艺录》索引据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谈艺录》(补订本)编成。本索引为人名索引,其体例与《管锥编》索引略同。西文之部人名姓氏按拉丁字母顺序编排。有郑朝宗序。(孟向荣)

【**中国旧诗佳句韵编**】工具书。王芸孙编。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是书在历代诗人作品中选出众口传诵的佳句一万馀条,依韵脚排列。首列选句,次列其上句或下句,再列作者的时代与姓名,最后列原诗题目。例如:“到处十枝五枝花(有时三点两点雨)唐·李山甫《寒食》。”韵部根据民间流行的十三辙,并参照中原音韵,共分十六韵。该书便于检索佳句的出处和上下句,还可供对用字、用韵、对仗、造句进行研究与取法。各家诗句以类相从,也可供比较研究,从中悟出其继承、衍变的情形。是书附录《选句用字音读举例》和《韵脚字笔画索引》。(孟向荣)

海外及港台研究

【中国古诗在日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不断进行文化交流。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古代典籍传到了日本。随之日本知识阶层努力学习中国文学，并用汉文写诗作文，而孕育出了汉文学。据《日本书纪》所载，显宗天皇元年(485)三月三日，皇宫内仿效东晋雅事举行“曲水宴”，众人纵情诗酒，畅叙幽情，这可视为日本汉诗的滥觞。

自飞鸟时代(593—709)以降，日本政府多次派出遣隋、遣唐僧俗，到中国来学习，并且因承唐制，以诗赋取士，促进了汉文学的发展。从奈良(710—793)至平安(794—1191)时代，汉文学日渐繁荣，以至鼎盛，今存《怀风藻》(751)和所谓“敕撰三集”(即《凌云集》、《文华秀丽集》与《经国集》，公元九世纪初成书)中，辑有百馀年间大量的名家名作。日本诗人对待中国古诗，采取视同己出，不隔不斥的态度。例如，在《游吉野川》(载汉诗集《怀风藻》)中，藤原宇合将游览者与中国诗人屈原、阮籍、陶潜等化为一身，并将吉野山与江南山水融为一体；《诗境记》(载《朝野群载》)作者大江匡房，也把中国诗史当作本国之事加以描述。这时，诗赋是缙绅之冠冕，交往、饮宴常常需要即兴赋诗，因此研究与制作密切相关，留心文藻以为实用。一些诗论、文论著作，如《作文大

体》、《文镜秘府论》、《修辞通》等，多半是辨四声、识韵辙、谈佳作、讲技法，而很少涉及思想内容。在嵯峨、淳和两朝，宫廷文苑人才济济，空海、嵯峨天皇、菅原道真等人，均有诗名传世。平安时代崇尚元白，尤崇白居易，以致“一代之诗尽学白乐天，李、杜、王、孟诸家之诗束之高阁”(广濑淡窗)。当时，皇家不仅珍藏白氏文集，而且大力提倡白诗，白诗因而广泛流播于东瀛。其实平安习唐，初盛晚大家皆有之，不过其诗名多少为白氏所掩。白诗的传入，开了诗歌接近民间社会生活的新纪元，而《长恨歌》还影响到了物语文学的创作。

日本本土原有口耳相传的诗歌，名为“和歌”。后来，日本人创造了以汉字偏旁标音的假名文字，为和歌创作提供了书写媒介，而奈良末叶编成的《万叶集》便是一部最古的和歌总集。从辑诗来看，和歌的定型化过程以及诗中所咏之事、所明之旨，也无不借鉴中国诗歌。

在漫长的幕府政治时期(1192—1867)，中诗依然影响着和汉文学创作，而且在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影响均日益深化。镰仓至室町时代(1192—1573)，禅林文事盛极一时，在京都附近的寺院里形成了“五山文学”。僧侣是其创作主体，从虎关师炼、雪村友

梅,到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再到一休宗纯、春泽永恩,历时近三百年,涌现诗人百余家。他们宗唐习宋,尊佛崇儒,其诗风多样,诗旨各异,把日本的汉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江户时代(1603—1867)的汉诗创作,前期仍承五山文学余绪,后期则名家辈出,派别林立,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藤原惺窝初为五山僧人,后来还俗,专攻儒学,主张“道外无文,文外无道”。尽管其诗多仿《唐贤三体诗家法》(周弼编),重说教而轻抒情,但他学识渊博,弟子盈门,实为一代宗师。其门生石川丈山,人称“日东李杜”,颇得后人赞赏。他写富士山,“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比喻精巧,传为名句。后来诗派渐多,各擅胜场:有的主张诗言情(古学派伊藤仁斋),有的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古文辞派荻生徂徕),有的“前学香山后剑南”(江湖诗社盟主市川宽斋),有的追求高逸蕴藉的诗风(如朱子学派菅茶山),有的广采博收。崇尚“性灵”(如折衷学派广濑淡窗)。这时的诗歌鉴赏与分析,也模仿中国的诗话著作,诸如《淇园诗话》、《葛原诗话》、《淡窗诗话》等等,不一而足。在和歌创作方面,依然可以看到中诗的影响。“俳圣”松尾芭蕉是和歌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由于他学习李、杜、苏、黄等人的诗,才使俳谐离俗而雅,风格为之一变。此外,江户时代中诗和刻本种类繁多,它们保存着原书原貌,对于古籍整理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盛行“脱亚入欧”论,于是西学勃兴,中学衰落。不过由于教育的普及,学术的进步,以及文学观念的更新,日本的中诗研究不仅没有停顿下来,而且规模愈来愈大,探索愈来愈深,方法愈来愈科学。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学者们不再重复“言志”、“美刺”、“经国之大业”一类的话,也不再一味着眼于鉴赏与制作,而是力求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这时,从发展角度审视文学现象,以实证主义考察诗人或版本,以现代文艺观研讨作品蕴含或技巧等等,已经屡见不鲜。二、现在日本大学多半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编辑中国文学研究刊物,乃至结成研究会社(如中国诗文研究会、《诗经》研究会),新人济济,新作累累,迄今已见百家争鸣、新老砥励的盛况。而中国古诗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会聚人才最多的部门。三、近百年来有关中诗的出版物之多,为前所未有的。它们包括研究专著、中诗译著、以及大量的工具书(如目录、辞典、索引)。研究重点是《诗经》、《楚辞》、陶渊明、唐代诸大家、苏东坡、黄庭坚、高启、袁宏道、黄遵宪等。四、与之相应,本世纪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中诗研究家,如研究《诗经》的诸桥辙次、白川静,研究《楚辞》的目加田诚、藤野岩

友,研究陶潜的铃木虎雄、冈村繁,研究盛唐著名诗人的大野实之助、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入谷仙介、松浦友久,研究宋诗的小川环树、前野直彬,研究元明清诗史和个别诗人(如高启、袁宏道)的吉川幸次郎、入矢义高等等。总之,在近现代日本的中诗研究一面继承传统,一面吸纳新学术,培植新特色,而且在中西学术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王晓平)

【中国古诗在西方】 中诗西播大约始于明代末年。那时随着航路的开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陆续东来,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并把这些信息带到了西方。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rham)旅游意大利期间,听人叙及中国和波斯诗歌用语简洁,状如菱形或方块,便在《英国诗歌艺术》(1589)一书中称赞这种“图案诗”的暗示性和简明性。1590年,明初范立本所编蒙童读物《明心宝鉴》,在菲律宾被译成了西班牙文,迄今所知,这是第一部汉籍西译本。书中的训海教化格言,多半与诗句无异,如“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之类。译者是基督教传教士高毋羨(Juan Cobo),他译竣后,献给了西班牙国王斐理伯二世。

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他们读儒书,习儒学,继而翻译汉籍,著书立说,以使西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他们所译,包括诸子散文、纯文学性典籍《诗经》和其他文学作品。其中关于三百篇的译介,尤为人所称道。从这时到清中叶,出现了不少译本和研究,有的出自名家(如金尼阁、白晋、宋君荣、孙璋)之手。不过,他们审视中国典籍,基本上坚持神学观点,虽然偶尔提及这部诗集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但其解释多有牵强附会之处。1735年,法国学者杜赫德(J.-B. Du Halde)编成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辑入来华传教士马若瑟所译《诗经》中的八篇,并以较长篇幅对全集做了介绍。杜编以及其他译介流传欧西,影响颇大,西人由此窥见了中诗风貌,进而转译模仿。英国的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德国的路德维希·翁泽(L. A. Unzer)、大诗人歌德等,均与中诗结缘很深。

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完成了从神学研究向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这时中诗西播也开始了新的里程。1830年,东方学家莫尔(Julius Mohl)编辑出版了传教士孙璋的《诗经》译本,这是欧洲第一种《诗经》全译本。德国诗人兼学者吕克特(F. Rückert)据此本转译成了德文,于1833年出版。吕氏不懂中文,但才华横溢,有时诉诸想象,有时追求忠信,给人以译自原诗的印象。孙译乃拉丁文,只有少数人看懂,他的转化为中诗在民间流传做出了贡献。这一

世纪法国学者仍有不少建树,除《诗经》译研外,又有新的开拓。儒莲的高足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一译圣德尼),选译唐诗近百首,辑为《唐诗》(1862)一册,给西方诗坛带来了新奇的诗韵和诗境。译者还以“中国诗歌艺术与韵律”为题作序,从远古诗歌叙至唐代名篇,试图勾勒诗史的轮廓。德氏法译《离骚》(1870),亦属创举。于是,屈原、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开始吸引西方读者,包括当时巴黎的文艺沙龙。女诗人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师从旅法华人学习汉语,继而产生译诗念头。1867年,所译唐宋等诗歌七十一首结为一集,名之曰《玉书》出版。书中按主题编次,分作月亮、秋天、行旅、酒浆等数章。戈氏译笔自由灵活,常常添加意象,制造戏剧场面,以致后人称作“伪译”。不过戈译更接近一般读者,比德理文译本更受欢迎。于雅乐(C. Imbault-Huart)曾经使华,喜中诗,尤喜袁枚,有著译三种——《袁子才的生平和著作》(1884)、《14—19世纪中国诗》(1886)和《中国现代诗选译》(1892)——传世。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以多卷巨译《中国经典》而闻名,其中包括《诗经》英译(1871)。译文系紧贴原文的无韵散译,文句简明、晓畅;所附译注广涉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卷首附有长篇“序论”,分设五章,介绍三百篇采编、流传、笺注、传序等背景知识。这些信息展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翟理斯(H. A. Giles)及冠东来,居华多年,博览群籍,是治史名家。其《中诗英译》(1898)按年代选译名篇,亦粗具诗史脉络。翟译为韵译,琅琅上口,经久流传而不衰。

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这一世纪下半叶,中诗西播进入了繁荣时期。这时的播扬仍有学者译研和诗人袭用两种方式,但中诗译介之盛、研究之深、流播之广、影响之巨,均非前期所能比拟。

西方的中诗研究,广义上也包括译介、注释和鉴赏。就译注赏析而言,名家精品选介一直占主导地位,有时则按主题选编,如“写景诗”、“边塞诗”、“饮酒诗”、“游仙诗”。由于中诗句法富有弹性,其翻译方法也就多种多样,或复制意象,或模拟韵律,或强调原型意味,或追求幽深意境,尽可能突现原诗的特色。有些译者甚至采用洋味十足的西方诗法(如“弹跳格”、“押头韵法”),以使读者由近及远,同时也保持原诗意象的鲜明和生动。注释和鉴赏深浅不一,随读者对象而定。注释一般是解说僻词、习语、史实、掌故、异物、风俗等等。研究性质较强者,如同我国传统的笺注之作。鉴赏不求全面分析,而凭兴之所至,随意而谈。这类评点著作,不乏精妙、犀利的见解,但也每见渊博有馀而综合不足。西方还有更

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在此,其诗人评传、版本考证、诗史梳理、流派或诗艺剖析等等,均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尤其是西方学者得风气之先,不断移植新兴的文艺理论观点,如意象研究、诗语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巴罗克风格研究。采用新视角来透视中诗,给人以巧妙、灵活之感,所得结论也往往出人意料。在这百年间,西方汉学界已是名家辈出,赓续不绝,如英国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霍克思(David Hawkes),法国的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ér)、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桀溺(J.-P. Digny),德国的德博(Günther Debon)、顾彬(Wolfgang Kubin),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匈牙利的杜克义(Ferenc Tökei),美国的柳无忌、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澳洲的傅乐山(J. D. Frodsham)等,均术有专长,独擅一面,或在本国、或在世界享有文名。他们及其同道勤于著译,其重心在《诗经》、《楚辞》、汉乐府、六朝诗歌、唐代诗歌、以及宋元明清个别大家。他们的译研编纂,迄今已成果累累,无法计数。

中国诗歌对西方诗坛也有一定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意象派、现代派(尤其是艾兹拉·庞德)均从中诗里汲取营养;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崇拜寒山,寒山诗随之风靡一时;由于译本增多,西方诗人借鉴中诗的现象屡见不鲜。中诗经过长期流传,西方读者已知其数量多、技法精、姿质美,中国在西方因而享有“诗国”美誉。(周发祥)

【中国古诗在俄苏】中俄两国的接触交往,一般认为始于十六世纪,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日渐得以深入发展。中国诗歌传播到俄国后,很早就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迄今所知,第一篇由中文直接译出的诗歌发表于1793年。是年,文学作品选集《趣味、理智与情感读本》第十册(刊于莫斯科)上,载有一段不长的文字,上题“中国诗歌”字样,下用俄文字母音译,并附有意译和简短说明。译者未曾署名,只注了个字母“П”,这可能是他姓氏的字头。

在十九世纪,学术研究有了较大改变。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居华十馀年,熟谙汉、满、蒙、藏数种语言,举凡文学、哲学、地理、历史均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翻译了多处引《诗》论《诗》的《四书》及朱熹批注,而且翻译了蒙童读物《三字经》(1832)。《三字经》通篇叶韵,可视为三言诗。这个世纪下半叶,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开始崭露头角。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破天荒地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专门学科加以研究。他所撰《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一书,成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同类著作的开山之作,其中含有相当多的中诗俄译。他还有单行本

《〈诗经〉译注》(1882)传世,亦是正确看待这部诗歌总集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诗经》,尤其是《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并且特别强调它的全人类价值,认为其中反映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观点和理想。就当时神学色彩尚未消失殆尽的欧美汉学而言,他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新人耳目的。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在十月革命(1917年)以后,中诗俄译逐渐增多(其中包括单篇作品、个人专集、以及诗人合集),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国诗歌在俄罗斯传播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诗研究已经成为俄国汉学中蔚为壮观的一个分支。

中诗俄译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先秦两汉魏晋诗歌,一是唐宋诗词。《诗经》和《楚辞》以其固有的艺术特质,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在费德林看来,《诗经》堪与世界名著《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伊戈尔远征记》等相比。宏观比较激发了译介这两部诗集的兴趣。汉乐府、三曹、陶渊明等,也为俄苏读者所喜爱,也拥有较多译本。中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构成了另一热点。早在十月革命以前,阿列克谢耶夫便开始翻译、研究司空图,写下了《中国论诗的长诗》(1916)一书。此后他与门生一起,也注意译介唐代其他诗人。在二三十年代,俄国读者就已经初步了解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人的诗歌。近几十年,唐诗俄译的规模有所扩大,涉及更多的诗作。在唐代诗人中,杜甫最受俄国学者的重视,其诗作的译介研究多而且深。宋代俄译的重点,在词而不在诗,但也有学者译介苏东坡、陆游、文天祥等诗人。这个世纪比较重要的诗人合译或专译为数不少,如郭沫若、费德林(合编)的《中国诗歌集》(1957—1958)、吉托维奇的《中国古典作家抒情诗集》(1962)、艾德林的《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瓦赫金的《乐府》(两种,1959、1962)、切尔卡斯基的《曹植诗集》(1973)、艾德林的《陶渊明诗歌集》(1972)、吉托维奇的《王维诗集》(1959)、《李白抒情诗选》(1956、1957)和《杜甫抒情诗集》(1967)、艾德林的《白居易诗集》(1978)。这些译者,一般都是相应诗人的研究家。此外,李谢维奇研究乐府、费什曼研究李白、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杜甫和陆游、达格丹诺夫研究王维等等,也享誉学界。

译诗实践一般与译诗艺术的探讨并辔而行。现代新汉学奠基人B·M·阿列克谢耶夫,很重视中诗俄译真实性与通俗性。他反对按照简单的文字对译法,把原作弄成只有专门家才能看懂的支离破碎、枯

燥陌生的文献材料,而主张既要保持原作艺术上的完整性,又要采取适合俄国读者欣赏习惯的表达形式,使之仅凭本民族的审美素养,即可品味原作的美学意蕴,获得足够的美感享受。1948年4月,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做了关于中诗俄译的报告(题为《用俄文翻译中国古代经书〈诗经〉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从历代的翻译实践来看,较好的译本具有五个优点:一、总体意旨上忠于原文;二、采用俄国古诗的韵律;三、照顾一般的阅读习惯,不使译文充斥过于艰深晦涩的异国情调;四、避免一般欧洲人所希望的那种肤浅的民俗学解释,不把诗歌译成表达浅薄爱情、性欲的东西,而是保持趣味与情感的高雅;五、不在译文中掺杂过多的专业化研究,而把这些东西放到注释和附录的说明中去,以保证译文的完整性。这里虽然是指《诗经》俄译,但可视为中诗俄译的通则。

中国古典诗歌在俄苏两个多世纪的传播史,赋予俄苏汉学如下特点:第一是现实主义观点与考据式研究方法相结合(即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我国清代“朴学”考据之风相结合);第二是与中国学术密切呼应(如我国重视杜甫研究,俄苏亦重视,郭沫若和费德林等还合作选编中诗);第三是译介与研究中国诗歌时,注重基础性与普及性;第四是学术视野宏远、通达,常常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考虑中诗的文学价值。(李逸津)

【中印诗缘】据考古发现,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可溯至公元前十世纪以前;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载有“支那”之名。那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靠口耳相传。屈原《天问》有“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一语,以及“灵蛇吞象”、“巨鳌戴山”的说法,一般认为来自印度。印度学者则认为,通过口传渠道,中诗影响到了印诗。查特吉(S. K. Chatterji)指出,中印两种自然观原本不同,后来中国道家超然态度的传入,印度才有了新的看法。迦梨陀婆融合了中印两种自然观。他结撰《云使》时,以倩云捎信为母题,很可能受中国文学影响(屈原有“愿寄言于浮云”之句,徐幹也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之诗);后来这个母题还为德国诗人所袭用。新兴人类学根据初民文化遗迹,提出平行发展说。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即认为,屈原《天问》,就遂古之初而发问,涉及宇宙和神话知识,也见于印度《梨俱吠陀》、北欧《埃达》等诗。看来,若断定中印文学口传间的影响,尚须信而有征的史实。自东汉末年以来,随着佛经的翻译,佛理禅说(及因明论)便陆续渗透到中国文学之中。在诗歌创作领域,自曹操以降,代不乏人。曹氏名诗《短歌行》,以朝露写人生,

不仅袭用康僧会《六度集经》的文句,而且袭用其譬喻文学的技巧。在两晋南北朝,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佛教清寂出世思想,潜入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行。隋唐之际,禅宗与诗开始结缘,王梵志、寒山、拾得均以禅诗闻名于世,而王维尤有“诗佛”之称。后来,李、杜、柳、白也受禅佛影响,写出不少名篇(如柳氏的《江雪》)。宋代苏轼、欧阳修和陆游,写顿悟后的禅悦,情思幽深,受人激赏,而严羽的《沧浪诗话》,则开了以禅说诗的先河。元明清诸代,佛禅渗入戏曲、小说的例子日渐增多,但因佛教已在中国文化中深植根基,觅诗释门、吟禅咏佛者,也时有所见。

(孟昭毅 周发祥)

【中韩诗缘】 中韩诗缘始于何时,迄无定论。韩国史书上追传说者,均以开化之功归于箕子。徐居正《东国通鉴》称:“箕子率中国之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此后,两国交往日频,诗缘日深。西晋崔豹《古今注》所录《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及韩人金富轼《三国史记》所录《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其谁与归。”),均为四言诗,明显受中上影响。唐宋两代,韩人来华不绝于途,两国诗人多见订文字之交者,中韩诗缘步入新阶段。张齐《送人及第归海东》句“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即记载新罗学子入唐应举的盛况;而真德女王所作《大唐太平颂》,更属传世名作。韩国汉文学鼻祖崔致远,首先名播中土,然后为国人所知。其文集《桂苑笔耕》辑有五七言近体诗一百首,语言和意境均拟唐风。新罗末年至高丽初年(约与晚唐、北宋相当),韩国汉诗渐呈晚唐风格。高丽初中叶之交,宋诗东传,受此影响,高丽诗坛习宋之风渐兴,与唐风平分秋色。崔滋为扭转诗风,曾主张学习“李、杜、韩、柳”(见《补闲集》);后来,李仁老便始慕杜甫,后追苏、黄;李奎报、李齐贤等均兼习唐宋。综观高丽时期,杜甫、苏轼最受人推崇,甚至胜过李白。及至李氏朝鲜(公元十四世纪开国,历时五百余年),据金万重《西浦漫笔》称,“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这时汉诗发展其实可分三个阶段:初期“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继之“变而专攻黄、陈”;中期受明代前七子影响,回归“诗必盛唐”的旨趣;末期又趋向调和,唐宋重新并行于世。与此同时,中国诗话也传到了韩国,成为促使韩国诗话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周发祥)

【中越诗缘】 《后汉书·循吏列传》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越南史籍亦从其说。所谓“二守”,是指汉光武帝刘秀派往交趾、九真的太守锡光和任延。汉季士燮驻守交趾,带去钟鼓等乐器,教人习学。

《大越史记全书》称:“我国通诗、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燮)王始。”进入唐代,中越诗缘日渐加深。杜审言、沈佺期、张籍、杜荀鹤、刘禹锡、贾岛等,同越南来华士子酬唱赠答,所作数量可观,脍炙人口。而越人姜公辅(官至宰辅),被贬后与中原避乱诗人同隐泉州九日山,笑傲溪山,共吟林泉,其诗颇得“言志”传统。据越南正史载,宋太宗四年(987),越僧法顺禅师和宋使李觉联句咏鹅,前者答句为“白毛铺绿水,红棹摆青波”,可见骆宾王咏鹅诗早已被越人所熟知。由于当时统治者提倡,十一至十二世纪佛教在越南达到极盛,通汉文、写汉诗的高僧,多至数十名。越南陈朝因承前朝余绪,崇尚汉文化,几位帝王如太宗、圣宗、仁宗,均有汉诗文集传世。宋人陈仲微入越,立志“死为越国异乡鬼,生作南朝直谏臣”,因而受到尊重,死后陈圣宗作《挽宋臣陈仲微》诗以吊。1308年,元武帝海山即位时,越南遣莫挺之前去祝贺,他在贡扇上题《扇铭》一诗,由此赢得诗名。明代初中叶,正值黎朝统一越南,其后百年间汉诗再度兴盛起来。诗人阮廌,熟读汉籍,博学多才,所作《抑斋诗集》,凡百五首,诗体齐备,诗旨多样,不仅发挥“独善”、“兼济”思想,而且高扬“杜老何曾忘渭北,管宁犹自客辽东”的爱国精神。黎朝第四代国君黎圣宗(黎思诚),与文臣共办“骚坛会”,宴游赋诗,歌功颂德,演为盛事。他也尊崇孔孟儒学,酷爱汉诗文,既能写诗,又能评诗。及至清代,仍有不少工于汉诗的越南诗人,如邓陈琨、阮攸、阮恂叔、阮锦审、潘佩珠、阮尚贤等。邓氏所作《征妇吟曲》,被誉为“千古绝唱”,诗中有大量汉诗赋中的词语和典故。时至今日,在越南仍有汉文古诗的创作。

(孟昭毅)

【中缅诗缘】 缅甸,史有掸国、骠国、蒲甘、缅甸之称。中缅两国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胞波”情深。诸葛南征、骠国献乐等史实,我国诗人多有歌咏,如唐代李白的《怀南宁常赞府》、白居易的《骠国乐》,以及元明两代王沂、张翥、杨士奇等人的诗作。缅甸阿瓦朝著名诗人信摩诃蒂拉温达(1453—1518)所写四言长诗《离东敦枝》,曾用成语“赴华卖针”(意为“班门弄斧”)之句。明代四夷馆教材集字诗中,辑有两首汉译缅诗。其一为五律:“青草王孙路,风尘四面沙。长亭生早月,晴店送晚霞。钟出僧房夜,泉沉水阁花。韭菜能下酒,不敢问鱼虾。”其二为七绝:“江岸秋风好送行,阳关阴雨几时晴?马蹄别入千山外,沙路云开见日生。”缅甸盛产宝石,宝井远在姚关之外。施武、杨慎均以“宝井”为题,歌咏采玉之难。南明永历帝入缅被杀一事,更见于多家诗作。缅甸贡榜朝诗人越马沙纳瓦德(1755—1840)的“茂贡”诗(即记

事诗)中,有《中国使节莅缅》一篇,记述华使在缅受到隆重接待。今人陈毅《赠缅甸友人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道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孟昭毅)

【中泰诗缘】中国和泰国(史称暹国、暹罗)是近邻,互不接壤,两国文人游处者,虽为数不多,但彼此间文化交流,古今未断。元代谢清高《海录》载:暹罗“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而供其饮食”。张光弼《可间老人集》中《辇下曲》,记述了暹罗进贡之事。清代尤侗的《暹罗》(外国竹枝词)和《海泊行》,则写对暹罗及其人民的印象。泰国吞武里王朝(1767—1782)诗人帕耶玛哈努帕著长诗《广东游记》(又名《中国行》),向国王汇报中国之行。泰国“诗圣”顺通蒲(1786—1885)在叙事长诗《帕阿派玛尼》中,不仅汲取《三国演义》的描写手法,而且融汇很多中国古典文学素材。如“关云长刮骨疗伤”、“张良吹箫”等,都被改造为诗中情节。泰国华裔不乏能诗之人,近人杭立武《湄江诗选》收集不少佳作,涉及寄情、咏物、怀古、饮酒、思乡等情愫,颇为动人。(孟昭毅)

【中伊诗缘】中国和伊朗(古称安息、波斯)早在汉代便有往来,而两国诗缘始于唐代。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注云“南方呼波斯为舶主”,其《西凉伎》描绘波斯狮子舞等杂技艺术。李白《少年行》和《前有樽酒行》,均写胡姬酒肆情景;白居易《胡旋女》则赞美波斯舞姬的优美舞姿。波斯后裔李珣、李舜弦兄妹以诗才著称,其诗收入《全唐诗》。而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50—1020)的史诗《王书》所写父子相残主题,传入了中国西北部,衍生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传说故事。诗人海亚姆(1048—1122)以抒情诗体“柔巴依”进行创作。据考证,这种诗体又称“塔兰涅”(意即绝句),与唐绝句可能同出一源。内扎米(1141—1209)《霍斯鲁与西琳》传入中国后,维吾尔族诗人纳扎尔(1770—1848)受其影响,创作了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萨迪《蔷薇园》与《果园》东传之后,更是数百年来广为传诵,成为穆斯林经堂的规定教材。伊本·白图泰(1304—1377)《游记》,记录了他访问杭州时听到的波斯语歌曲,其中“胸中泛起柔情,心潮如波涛汹涌”恰是萨迪的抒情诗句。哈菲兹(1320—1389)的诗作,多次提及中国麝香和画工。在元代诗人马祖常的笔下,可以看到波斯商贾来华贸易的情景。在现代,郭沫若翻译海亚姆《鲁拜集》、王静斋翻译《蔷薇园》(题名《真境花园》)等,则是伊诗中译的例子。伊朗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记载中的伊朗》等书,包括不少从英文转译的中诗。其他书籍也常见论及李白与杜甫的文字,公认李白诗风与

伊朗当代某些诗作颇为相似。其《静夜思》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伊朗尤受欢迎。

(孟昭毅)

【中国古诗与《怀风藻》】《怀风藻》是日本最古的一部汉诗集,编者不详。序言称,所编“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作者六十四人”,而且编者“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成书时间是“天平胜宝三年(751),……冬十一月”。所收诗歌以五言为主,间有七言,而五言中八句者最多,四句者次之,其余十至十八句不等。诗歌作者除天皇和皇子外,多为朝廷近臣,因此集中几乎不外应制侍宴、述怀咏物之作。在技法上,明显模仿中诗,尤其是六朝诗歌。

(宋再新)

【中国古诗与“敕撰三集”】日本平安时代(794—1191)初期,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敕令编纂汉诗集,遂成《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集》(827),后称“敕撰三集”。《凌云集》收诗九十一首,作者二十四人,以官职为序排列;其中五言三十九首,七言四十六首,杂言六首;七言较多,显然受唐诗影响。《文华秀丽集》收诗一百四十八首(阙五首),作者二十六人;编次袭用《文选》体例,分游览、宴集、饯别、赠答等十一类;其中五言五十二首,七言七十九首,杂言十二首;辑诗多有援用中诗成句者,来源为《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和唐诗;咏史类则多取中国史实入诗,如咏季札、汉高祖、司马迁。《经国集》乃诗文合集,原有二十卷,收汉诗文一千零二十三篇,作者一百七十八人,现仅存六卷,书名取自曹丕名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编次体例一仍《文选》,辑诗中已有中唐词语。

(宋再新)

【和汉朗咏集】《和汉朗咏集》亦称《倭汉朗咏集》,两卷。藤原公任编。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十世纪中期。“朗咏”出自孙绰“凝思幽岩,朗咏长川”(《游天台山赋》)句,是指选取汉诗文佳句或和歌,配上曲调,以供吟诵。这种形式深受平安时代贵族的喜爱。该集选摘唐诗佳句一百九十五条,而白居易诗句占一百三十五条,其余均在十条左右或以下,包括元稹、许浑、刘禹锡、温庭筠等人的诗句,但未选李、杜、韩、柳等大家。所选诗句,纤巧典雅,多写风花雪月,世外幽境,以传达闲适之情。如白居易句“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元稹句“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许浑句“孤馆宿时风带雨,远帆归处水连云”等。

(宋再新)

【中国古诗与五山文学】“五山文学”是指镰仓至室町时代(1192—1573)以京都、镰仓五座寺院之僧为首的文学活动。据称,五山文学始于一宁一山。

他本是元朝僧人,受命入日劝降而被捕,获释后,应皇家之请主持南禅寺,著有《一山国师语录》。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是日本禅林文学之祖。五山诗僧大体模仿中晚唐诗及宋诗风格,习读周弼编《唐贤三体诗家法》、黄庭坚编《古文真宝》、魏庆之编《诗人玉屑》等书。一山门下虎关师炼、雪村友梅同享诗名。虎关淹通汉籍,诗路宽博,用语洗炼,有《济北集》诗文二十卷传世;雪村年少游华,及壮方归,多写中国风物。室町中期,五山文学臻于鼎盛,绝海中津、义堂周信则为翘楚。绝海长于骈文,亦多歌吟,来华时曾得明太祖召见,辑有诗文集《蕉坚稿》;后者诗歌以巧致、博雅著称,辑有《空华集》、《空华日工集》等。后来,五山文学随室町幕府的没落而衰微,后期以景徐周麟、春泽永恩、桂庵玄树成就较大。五山僧人除作诗外,也勤于翻刻汉籍,其中既有佛教经典,又有诗集、诗论。数百年间,禅林出诗人不下百名,他们结交俗界,云游四方,推动了汉诗的普及。

(宋再新)

【中国古诗与芭蕉、芜村】松尾芭蕉和与谢芜村是江户时代(1603—1867)著名的俳谐诗人。“俳谐”由“俳谐连歌”发展而来,后再简化而成为“俳句”。松尾芭蕉(1644—1694),本名松尾宗房,别号桃青、泊船堂等。他自幼学习俳谐,成年后四处游览,常以俳文(即简洁、风趣的短文)、俳谐纪行写景。他倡导黄(庭坚)奇(苏轼)新,兼习李白、杜甫之诗旨,庄子、寒山之修辞,一改俳谐的卑俗倾向,而赋之以清新自然、深沉蕴藉的风格。在他的诗文、日记中,随处可见摘引的中国古诗诗句,化用入俳谐者亦不少。与谢芜村(1716—1783),本姓谷口,别号夜半亭(二世)。他曾受业于芭蕉的门人,提倡“回归芭蕉”,排斥当时创作界的庸俗流风。他的作品力求离俗、纯化,体现艺术美,也有不少俳句由中国古诗演化而来。他还擅长绘画,并援引《芥子园画谱》支持其俳谐离俗论。

(宋再新)

【中华风与西方诗坛】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各国,有一批诗人如德国哈尔斯德费尔(G. P. Harsdorfer)、英国威廉·科林斯(W. Collins)、托马斯·查特顿(T. Chatterton),受当时思潮影响,或追求异国情调,或创作东方牧歌,这种倾向经过长时间酝酿便形成了所谓的“东方风尚”(orientalism),以致后来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如此惊呼道:“亚洲缪斯,一位美妙的外来客,终于变成了不列颠人民的情结!哈非兹的短诗,萨阿迪的歌谣,响彻了我们泰晤士河畔的平野。”(载亚瑟·克里斯蒂《昔日的景象》)而这时风靡欧洲的“中华风”,即是“东方风尚”的一种重要表现。应该说,它对欧洲诗坛有一定影响,但并不十

分显著。因为“在所有艺术中,诗歌最具主观性,诗歌比其他任何艺术要更多展现心底的情愫”(克拉克《东方的英格兰》)。不过,英国托马斯·珀西·威廉·琼斯等人与中国诗歌的结缘,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参见有关诸条目)。

(周发祥)

【中国古诗与托马斯·珀西】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生于英格兰西部什罗普郡布里奇诺斯镇。原名皮尔西(Piercy),后更名,早年在牛津一家教会学院就读,学习勤奋,涉猎广泛,因编辑《英诗辑古》(1765)而引起重视。而其汉学研究在西方也有重大影响。他是通过二手资料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不过他的中国知识异常渊博,在当时英国无人可比。晚年享有盛誉,他的一位朋友说,“去访问这样的人,如同到遥远的圣地去朝圣,会开创一个人生时代”(B·H·戴维斯《托马斯·珀西》,波士顿,1981)。在十八世纪中叶,他一共出版了十多本书,有几本与中国文学有关。他编译的英译本《好逑传》(1761),附有一组中国格言和谚语,以及一些零散的中国诗歌。这是他多方搜集所得,既有《好逑传》原译者威尔金森的节录,又有欧洲其他语言的“翻译之翻译”。所附中诗,实际上取自《书经》(夏太康昆弟《五子之歌》)和《诗经》(如《周南·桃夭》、《卫风·淇奥》)。从珀编中“广而告之”来看,他试图编纂中国诗歌和格言大全。他认为,这些“十分精巧的诗歌奇葩”,难以向外国语言移植:“……中国诗歌之美,是最不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尤其是习惯用语相去甚远,不合所用的语言,所有的欧洲语言无不如此。”次年,他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太太们》和文集《中国诗文杂著》。后者凡两卷,辑有涉及中诗论述或作品。

(周发祥)

【中国古诗与威廉·琼斯】威廉·琼斯爵士(Sir W. Jones)颇具语言天才,精通十三种外语,熟悉二十八种,包括梵语、汉语,是杰出的东方学家。据说,他二十岁时抄录一些汉字偏旁、部首,准备学习汉语,还阅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特别尊崇儒家学说,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希望以一己之“善”,推至世人之“善”。学习儒家典籍,他从旁得知《诗经》,即爱而读之。听说巴黎皇家图书馆有《诗经》原文藏本,就不顾路远,决意前去翻阅。他特别赞赏《卫风·淇奥》,他说“这首诗非常庄严,又非常简洁,每行只有四个字,因此省略是常有的事,但是风格上的晦涩,却增加了它的壮丽。”在学习过程中,他先把首章译成拉丁文,再用英语译成民歌体,如“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两句译作:“看呀,沿着含笑的山谷,淌着一道碧绿的小溪,苍翠的岸上长着轻盈的芦竹,正在

微风里嬉戏”(范存忠《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载《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1979)他曾经打算全部译出《诗经》,甚至想请旅英华人黄阿东(Whang Atong)帮忙,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他所译之诗,仅仅是分别取自《淇奥》、《桃夭》和《节南山》里的三章。1784年,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创办亚洲学会,并任会长。有一次,他以《诗经》为题演讲,引用《论语》,证明《诗经》的美质和重要,如“诗无邪”,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等等(参见上引范文) (周发祥)

【中国古诗与歌德】 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他从小受中华风熏陶,成年后接触儒家经典,大量阅读西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他1827年的日记里,可知他曾经“研究中国诗”(2月2日)、处理《中国的诗》(2月4日)和“抄写《中国女诗人》”(2月6日)。这些诗包括英国汤姆斯(P. P. Thoms)所译《花笺记》(1824)附录的《百美新咏》,歌德据以转译了其中四首——《薛瑶英》、《梅妃》、《开元宫人》和《冯小怜》,总其名曰《中国的诗》,后来则称作《中国女诗人》。爱情和诗歌是他人生的两大精神动力,因此他对中诗很感兴趣。他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诗歌,看到其间有互补共通之处,从而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造出来。……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并非各国文学的简单聚集,而是采撷各国文学精华,汲取其无限活力,进而将之熔于一炉。歌德毕竟是个诗人,他的创作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西文学的融合。1819年他写成《西东合集》,但笔触所及,仅仅远至阿拉伯。而他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27),则将中国风物 and 情调植入诗行。这组诗共有十四首,长短不一,或叙人,或咏物,或写景,或抒情,超凡拔俗,韵味隽永。其中第八首颇得好评。有人认为,诗中直接捕捉感官印象以组织画面的技巧,类似孟浩然和林逋;而诗中使实际感受和精神体验相互交织的匠心,则是欧洲浪漫主义结合两者的最高典范(塞尔登《1733—1833年间德国诗歌里的中国》,伯克利,1942)。(周发祥)

【中国古诗与戈氏父女】 戈氏父女是指法国诗人和小说家泰奥菲尔·戈蒂耶及其女儿朱迪特。戈蒂耶(T. Gautier)自幼生活在巴黎,曾经追逐浪漫主义思潮,后来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一信条

实际以实物之“光亮、坚实、鲜明”为美,反对浪漫主义的过度抒发自我,遥远的中国,为他提供了一种素材。在《中国风》(1835)一诗里,他写了一个家在黄河岸边、娇小可爱的中国女子:“矫首窗棂外,飞燕时抚弄。夜夜如诗人,咏唱柳与桃。”他还延请旅法华人丁敦龄作女儿的家庭教师。他与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深有文字之交,后者受戈氏影响,在诗文里数次提及中国。其散文诗《月亮的恩惠》描述皎洁的月光,在戈氏看来,这里蕴含中诗名篇《玉阶怨》的幽深意境。波德莱尔甚至说,中国一切“无不美好、珍贵、安闲、纯真”,那里“秩序为奢侈高悬镜鉴,幸福与静谧互相伴随,甚至举火为炊都带有诗味”(《邀去旅行》)。当然,这是个诗化了的境界,是“西方的东方”,是“欧洲的中国”。戈氏的女儿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受家庭熏染,酷爱东方,撰有多种以东方为主题的著作。她在成年之后,师从丁敦龄学习汉语,并决意翻译中国诗歌。1867年她的译诗结集出版,名为《玉书》。书中选译唐宋和其他朝代的诗歌七十一首,按照情人、月亮、秋天、行旅、酒浆、战争和诗人编次。初版时题词如下:“此书献给/中国诗人丁敦龄。/J. W. 1867年4月。”丁氏之所以被称作诗人,是因为有诗辑于书内。“J. W.”两字系译者笔名朱迪特·瓦尔特的缩写。她的译诗,自由灵活,常常增添意象,制造戏剧性场面,以致有人称之为“伪译”。不过,这种译法使该书更能接近一般读者,因而广泛流传。该书出版后,震动了法国诗坛,许多文人(甚至包括象征派诗人马拉梅、魏尔仑等)对它赞赏不已。后来它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并再三重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影响到了欧美其他诗人。(周发祥)

【苏黄诗与朝鲜汉诗】 苏轼与黄庭坚的诗歌在宋代即已传入朝鲜,并为朝鲜许多诗人所喜爱、模仿。高丽王朝时期(相当于中国宋元时期),著名作家崔滋(1186—1260)在其所著《补闲集》中写道:“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崔滋又引前辈诗人李仁老(字眉叟,1152—1230)的话说:“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澹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崔滋认为,李仁老的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中来”,同时还认为前辈诗人李奎报(1169—1241)的诗“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由此可见高丽王朝时期朝鲜诗人在汉诗创作上学习苏、黄诗的盛况。在朝鲜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金宗直(1431—1492)等一批文人也大力提倡学苏、黄诗,因而形成了以著名诗人朴侗为中心的“海东江西派”。朴侗(1497—1524)十五岁以文章成名,十八岁科举及第,被誉为“天下

奇才”。他写诗在学习苏、黄的同时,亦着力于学习宋江西诗派的另一中坚人物陈师道。李朝后期作家金昌协(1651—1708)在评价朴简诗学黄、陈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时说:“虽学黄、陈,而天才绝高,不为所缚。”又说:“至其兴会所到,天真烂漫,气机净溢,似不犯人力,此则恐非黄、陈所得囿也。”(见《农岩集》)而申纬(1769—1847)在评论朴简诗时则指出:“余见翠轩(朴简号挹翠轩)诗‘春阴欲雨鸟相语,老树无情风自哀’,最是警策,乃兼学黄、陈也。”又申纬所作《东人论诗绝句》有云:“海东亦有江西派,老树春阴挹翠轩。”(见《警修堂集》)“海东江西派”诗人众多,可视为朝鲜李朝时期的宋诗派。这一诗派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朝鲜兴起“三唐诗人”诗派以后才逐渐衰微,它对朝鲜汉文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参见韦旭昇著《中国文学在朝鲜》)(杜维沫)

【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 本世纪五十年代,寒山诗传到了西方,英国学者韦利于1954年首先将寒山诗二十七首译成了英语(载于《相逢》第十二卷),四年之后,美国诗人斯奈德也译了二十四首寒山诗(载于《常青评论》第二卷、第六期),他译寒山诗的原因是一幅日本人的寒山画像吸引住了他。同年,美国小说家克洛厄克又在其自传体小说《法丐》中进一步把寒山神化,将寒山塑造成嬉皮士的理想人物,并在小说扉页上题着:“献给寒山!”又过了四年,华兹生(B. Watson)的《寒山诗一百首》(纽约,1962年)问世,他所依据的版本是日人人矢义高的注释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些青年对现实不满,便以“脱俗”的方式——蓄长发、穿异服、放弃学业与工作、结群纵欢——来表示抗议。寒山诗的英译迎合了这一所谓“垮掉”派运动的需要,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奈德在译诗序言中特地转述了画像中寒山的形象:身穿褴褛的长袍,头发披散着,手握一本书卷,笑迎狂风,站立在山岩之上。克洛厄克的小说《法丐》更把“垮掉”派领袖斯奈德描绘成寒山式的人物。同年出版的这一诗一文,在美国青年学生中间得到广泛的流传,他们崇拜寒山,效法寒山,一时竟出现了“寒山热”。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寒山诗中的禅宗思想和老庄哲学填补了他们心灵上的空虚,他们企图以参禅事佛的方式来逃避现实,寻求解脱。六十年代末,随着“垮掉”派的消沉,作为偶像的寒山也成为过去,但寒山诗仍为学者们所重视。七十年代,有两篇博士论文以寒山为题:一篇是S·H·鲁彭塔尔的《寒山诗中的佛教思想》(加州大学,1974年),另一篇是R·H·斯托伯格的《寒山诗》(俄亥俄州大学,1977年)。1978年于旧金山出版的《中国诗歌和诗学》(缪文杰主编)辑有浦立本的论文《从语言学

的证据看寒山的年代》,此文认为现存寒山诗非一人之作,它们大部分成于隋末唐初,小部分成于晚唐。

(江原)

【《诗经》研究在国外】 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很重视《诗经》这部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因此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日人译研,历久不衰,高田真治、境武男、目加田诚的全译本,以及吉川幸次郎、白川静的选译本,均得广泛流传。西方的《诗经》译研肇始于来华教士金尼阁(N. Trigault),1626年其《五经》拉丁文译本在杭州铜板印行。此后移译,从未间断。十九世纪德国吕克特(F. Rückert)、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法国顾赛芬(S. J. Couvreur)译本,本及二十世纪英国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瑞典高本汉(B. Karlgren)译注本、苏联什图金全译本等等,分别被视为各语种的佳译。晚近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广涉音韵、训诂、诗语、意象、篇旨、讽喻、创作过程、创作年代等多种范畴,并且在方法论上做了中西比较、西论中用、学科交叉、中诗西用等多种尝试。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大体上论及如下几个问题:(一)关于《诗经》如何创作有如下几种假说:1. 男女对唱说。法国学者葛兰言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是民间歌谣,是中国人民在岁时节庆郊游、聚会、求爱的风俗画,男女青年在河边、山野相互对唱,而留下了这些诗歌(参见《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2. 即兴吟咏说。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根据套语理论,认为《诗经》基本上是即兴吟咏而成(参见“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条)。3. 歌舞诗剧说。日本学者赤冢忠认为,三百篇的大部分,本来是歌舞诗,“兴”的手法源自巫术(参见《古代歌舞诗的系谱》,载1952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集)。(二)关于《诗经》主题和母题研究,多见于译本和普及读本。例如英国学者亚瑟·韦利英译《诗经》时,打散原来编次,把诗篇分别纳入求爱、婚姻、勇士和战争、农作、游宴、歌舞等十七个标题之下,实际即是以主题分类。再如藤野岩友认为,《雅》、《颂》多有颂寿之诗,祈祷寿考,是对“老”表示喜悦,然而亦有“叹老”之辞(参见《见于诗经的叹老》)。(三)关于《诗经》的艺术手法。葛兰言认为,民间歌手创作一面靠“应和”法,一面靠“重复”法。前者是指所写之事与自然之物相应和,有时指诗句内部各节相和,如《郑风·溱洧》首二句:“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后者指两种重复方式,一是只字不变,推动诗思发展;一是诗句稍加变动,使诗思呈阶梯状发展(参见上引葛著)。关于“比兴”的研究,日人家井真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阐释了《诗经》中“鱼”和“渡河”兴的用法。(四)《诗经》语言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所撰《中国

声韵学研究》和《汉文典》两书,均有《诗经》用字之古音的考辨。其训诂学专著是《〈诗经〉注释》。他不拘一说,博采众家,然后对各种解释分析比较,从而确定最佳释义。(五)关于《诗经》学的反思。美籍华裔学者余宝琳所撰《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一书,试图澄清几个易于混淆的概念。她说,有人倾向把三百篇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寓言”(allegory),不很准确。Allegory是个延伸的比喻,它既含有具体的表面的意义,又蕴含另外的抽象意义。《国风》中绝大部分诗篇明显没有这种结构关系,只有一两篇似之,如《豳风·鸛鸣》。葛兰言则认为,简单的文学阐释和象征性解说,均不可靠,中西历代学术往往妄加解说,他提出了自己的研读方案——“读《诗》十六法”,如上所述,他试图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加以理解。(施玉笙)

【读《诗》十六法】 在《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1919)中,法国学者葛兰言不同意中国传统的笺注,提出读《诗》应采取下述十六种方法。其大意是:1.不必注意经学家的解释和引申,只可用其观点来发抉见于《诗经》的种种仪式,而不可用来臆断诗篇的原始意义;2.不必注意所谓暗示的德政之成败,《诗经》中确有讽刺之作,但视《隰有萋处》为刺诗,无疑是误读;3.因此不将《周南》、《召南》和其他《国风》区别对待,而直接加以交叉比较;4.所有象征之说和关于诗人的细微考辨,一概加以排除;5.所有证明象征说的历史资料和民俗资料,要分别加以抉择;6.前人的字句训诂可以利用,但要区别求其真义者和可资做学术探讨者;7.仔细注意诗歌的韵脚(它们透露了事物与事物、事物与感情间的应和,而这种应和可同时说明词义和诗义);8.通过同类诗歌的比较来确定每首诗的意义(此法可增加应和事物的集合,亦可建立一系列诗歌母题);9.根据现成宗教原理或考古学理论所阐释或重建的仪式原则,去解释纯写实的诗歌,经验证明是靠不住的(应以《诗经》解释《诗经》);10.如需外证,则首先考虑远东文化中有关民俗的古今事实;11.不必考虑诗篇之源出、年代或作者的差别;12.应注意译诗可能是再创造之物,而母题则属于早期的结构;13.原始母题必然与情感环境相关联;有些诗歌表达类似的感情,却没有呈现出与原始事实的联系;14.在特定场合,一些母题,甚至整首诗都可能会采取不曾加工或稍作加工的形式;反过来,一种新的仪式形态便多少会授予它们新的价值或意义;15.爱情诗及其母题极有可能纳入新的意义;16.但一些母题或诗歌(即使没有经过大的加工)也有可能充作劝谏诗或讽刺诗。他的观点基于民俗学或

人类文化学,东传后对中日学者有一定影响。

(江原)

【《楚辞》研究在国外】 《楚辞》译介和研究,相对而言日人多而西人少。日本的目加田诚、藤野岩友、星川清孝、石川三佐男,德国的叶乃度(E. Erkes)、鲍润生(F. von Biallas),英国的亚瑟·韦利(A. Waley)、霍克思(D. Hawkes),法国的戴密微(P. Demiéville),匈牙利的杜克义(F. Tökei),美国的史内德(L. A. Schneider)等,均有重要翻译和研究著作问世。《楚辞》研究难度较大,国外学者多集中于下列问题:(一)屈原其人的真实性。对此国外学者一般持肯定态度。尽管先秦不见屈原记载,但司马迁所写的评传,他们仍然认为信实可据。但石川三佐男认为,扬雄看到《史记》屈原传有所虚构,才创作《蜀王本纪》。美国海陶玮虽倾向认为实有其人,但他一面认可《史记》为信史,一面指出其虚构性,因而说屈原乃文学型人物。史内德则代表形象研究倾向,在《楚国的狂人》一书中把屈原当作“忠奸神话”原型,而探索屈原形象在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演变。(二)《楚辞》与巫术活动的关系。霍克思认为,《楚辞》含有礼仪描写,只有用巫术研究方见其义(《求宓妃之所在》)。(三)《楚辞》的艺术形式。星川清孝的《楚辞研究》,细致探讨《楚辞》诗句。认为其句法对后代祭祀文学有所影响。(四)《楚辞》诸篇的思想内容。霍克思认为,《楚辞》有两大原型,即“巡游”和“忧伤”(上引霍著)。星川清孝对《诗经》和《楚辞》加以比较,认为后者反映了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上引星川著作)。关于《离骚》,西村硕园认为,以“遭忧”释“离骚”之义为确(《屈原赋说》)。但竹治贞夫说,“离骚”不外是“忧愁”之意,“遭忧”、“别愁”皆失之(《〈离骚〉——梦幻式叙事诗》)。苏联E·A·谢列勃里雅可夫说,《离骚》是一个怀抱理想却乖违时俗之人的自白(《屈原和楚辞》)。关于创作《天问》的原因和动机,国外学者看法不一。戴密微认为,《天问》里包含着对宇宙起源、结构及其存在原因所进行的哲学思辨,而这些思辨也见之于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在世界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到(《道家的谜》)。德国卫德明在《〈天问〉浅论》一文中,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古代祭祀仪式上,常有关于宇宙和神话的问答。通过加进去的一些诗句,他使那些问题有了新的含义。屈原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作者的作品,在国外也有一些研究的实例,但相对较少。(施玉笙)

【汉代诗歌研究在国外】 汉代立国后,楚地民歌依然久唱不衰,甚至帝王、宫妃也时作楚声短歌。国外汉学家对这些宫廷作品给予较多关注,刘彻、刘邦、刘弗陵等帝王的作品,不仅有英译,而且多半载

之于名集。汉代王室才女,也偶见以诗而远播者,如歌姬唐山夫人、藩王女细君(乌孙公主)、宫妃班婕妤。其他文人的诸体诗作,如梁鸿《五噫歌》(楚声变体)、张衡《同声歌》(五言)和《四愁诗》(七言)、秦徐赠答诗、蔡琰的《悲愤诗》(均为五言)等等,也有外译佳例。汉代民歌的外译,见于多种广为流传的译本,晚近还出现译介汉代民歌的专集。它们包括:日本泽口刚雄的《乐府》、小尾郊一的《文选》、伊藤正文的《汉魏六朝诗集》,苏联瓦赫克的《中国古代乐府选集》,法国马古礼(G. Margouliès)的《中国文学精选》,澳大利亚傅乐山(J. D. Frodsham)和程曦的《中国诗选》(实为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选),英国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的《中国汉代民间歌谣》等。比勒尔的译作最晚出,傅汉思为该书撰写前言,强调民间歌谣具有普遍的吸引力。译者本人的导言重在说明民歌的文献价值、采诗制度、郭茂倩辑本、乐府诗文体和音乐特点等内容。《古诗十九首》译本较多,且有研究著作问世。法国学者桀溺(J. - P. Diény)是“古诗”研究家,其专著《中国古诗之源》论及“民歌的采集”、“音乐理论与消遣”、“汉代抒情诗创作高潮出现的条件”和“乐府机关”。他对“古诗”的起源问题,在此做了细致而深入的阐释。美国傅汉思(H. H. Frankel)则是乐府诗研究专家,他首先将套语理论用于《孔雀东南飞》的诗语研究,撰有专文探讨乐府诗的形式与艺术特点,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中西民歌的平行比较研究。在《乐府诗》一文中,他认为,乐府诗包括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祀歌与民谣,民谣是介于抒情诗和叙事诗之间的诗歌。它既有删冗去繁、保存精粹的倾向,又有精雕细刻、话头延宕的特色。日本历来重视汉乐府研究,尤重《古诗十九首》和《陌上桑》,铃木修次、吉川幸次郎、户仓英美、增田清秀、网祐次等是主要学者。如铃木的《汉魏诗之研究》推断“古诗”的产生年代,吉川的《推移的悲哀》则指出“古诗”的情感内容主要是“人由于意识到生于时间之中而产生的悲哀之情”。此外,东西方学者还有一些关于蔡琰诗真伪问题的讨论。(施玉笙)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在国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众多,诗风多变,国外研究重在几位诗坛名家。三曹之中,曹植倍受同情,他的诗亦受重视。伊藤正文的《曹植》、乔治·肯特(G. W. Kent)的《尘世与琼宫》、高德耀(R. J. Cutter)的《曹植及其诗歌》等,是比较重要的译研著作。陶渊明以其清新质朴的田园诗,而邀人垂青。有的综论诗人诗作,如松枝茂夫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中国诗人之二)、大矢根文次郎的《陶渊明研究》、都留春雄的《陶渊明》、戴维斯(A. R. Davis)的《陶渊明的作品及其涵义》、艾德林的《陶

渊明及其诗歌》,有的译注剖解陶诗(或其名篇),如铃木虎雄的《陶渊明诗解》、斯波六郎的《陶渊明诗歌译注》、冈村繁的《陶渊明——世俗与超俗》、阿克(W. Acker)的《隐士陶潜》、施瓦茨(E. Schwarz)的《桃花源:陶渊明的诗歌》、海陶玮(J. R. Hightower)的《陶潜诗》,还有做中西平行比较,探讨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风的异同。谢灵运是南朝诗人研究的一个重点,如小尾郊一的《谢灵运——孤独的山山水水诗人》、船津富彦《山水诗人·谢灵运》(中国诗人之三)、傅乐山(J. D. Frodsham)的《潺潺的小溪: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生平与创作》、别任的《谢灵运》和《四至五世纪的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在其他诗人之中,也有不少已有专书加以研究,如竹田晃的《曹操的行为与文学》、侯思孟(D. Holzman)的《嵇康的生平与思想》和《阮籍的生平与著作》、缪文杰的《王粲的生平和诗歌》、马瑞志(R. B. Mather)的《诗人沈约》、兴膳宏的《望乡诗人·庾信》(中国诗人之四)和潘岳、陆机、左思、谢朓研究、马约翰(J. Marney)的《江淹》,以及孙康宜兼论数位诗人的《六朝诗》等等。上述研究多半涉及写景主旨,或在说明诗人迷恋田园、忘情山水的志趣,或在剖析诗人不落流俗、洁身自好的情怀,或从更概括的角度论述这时的自然观(如小尾郊一)。南朝民歌也是一个研究重点,成果亦夥。多种中诗译本,如傅乐山等合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选》,均辑有一定数量的南朝民歌。在研究方面,多见分析并欣赏这些民歌的特色,但也有人采用新视角,认为它们不纯是民谣,还潜在着对都市生活抱有深厚爱情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如小尾郊一的《南朝的恋歌——以西洲为中心》)。此外,尚有马约翰的《梁简文帝》(以宫体诗为研究对象)、著名诗集《玉台新咏》的日译本和英译本。(施玉笙)

【唐诗研究在国外】 有唐一代,诗人灿若群星,诗篇浩如烟海,国外学者都认为唐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辉煌时代。无论在日韩还是在俄苏、欧美,唐诗译研最盛者,首推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而王维、孟浩然、高适、寒山、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等诗人,也多见长文或专书译论。在西方,也许受女权主义影响,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越来越受人重视。就翻译而言,日、韩、越、俄、英、法、德、意、捷、匈、瑞典诸文种,均拥有多种唐诗选译本,足见其传播之广。许多学者,如日本的服部南郭、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铃木虎雄、前野直彬、目加田诚,英语国家的亚瑟·韦利(A. Waley)、华兹生(B. Wats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德语国家的德博(G. Debon)、柴赫(E. Von Zach),法国的圣德尼(Hervey de Saint-Denys)、戴密微(P. Demiéville)、程纪贤,瑞典的马悦

然(G. Malmqvist),意大利的马格里尼(M. A. Magrini),匈牙利的陈国(B. Csongor),苏联的费德林、艾德林、吉托维奇等,均以翻译唐诗(及其他作品)或享誉本国,或蜚声寰宇。比较重要的合集译本和个人专译,迄今已难以计数。就合集而言,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的《唐诗选》、前野直彬的《唐代诗集》、圣德尼的《唐代诗歌》、亚瑟·韦利的《汉诗百七十首》及其续集、德博的《唐诗》、费德林(与人合作)的《中国古诗集》唐代卷等,都是读者喜爱的译本。我国名集《唐诗三百首》,也有目加田诚的日译本和威特·宾纳(W. Bynner)和江亢虎的英译本(名为《群玉山头》)流传。就专集而言,除“李白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和“白居易研究在国外”诸条所列者外,尚有多种其他诗人的译介,其中王维、高适、寒山、李贺、杜牧等,所占比重较大。由于唐代国力强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日、朝、越等国也在当时或稍后不久就开始了唐诗的鉴赏和研究,日本虎关师炼、狄生徂徠,高丽李仁老、申钦,越南胡春香等,均有诗话或文集论及唐诗。进入二十世纪,国外研究开始繁荣起来,不仅出现了几乎遍及初盛中晚唐各个阶段的通才,而且出现了独擅一面的专门家。他们的成果,有注释、鉴赏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释重在解说僻词、习语、史实、掌故、异物、风俗等内容;鉴赏不求全面分析,而凭兴之所至,随意而谈,如前野直彬的《唐诗鉴赏辞典》、傅汉思《梅花与宫女》(选有唐诗)。严格的学术研究,则广涉诗人、诗派、诗史、诗体、诗艺、诗蕴、诗思。综而观之,可分为如下几项内容:(一)诗人评传。这类著作为数众多,而入谷仙介评王维,松浦友久评李白,黑田洋一、洪业、谢列布里亚科夫评杜甫,花房英树、平冈武夫、亚瑟·韦利评白居易,原田宪雄评李贺,刘若愚评李商隐,荒田健评杜牧等著作,堪称代表作。若诗人身份不明,便需博览群书,细心钩稽,如吴其昱关于“寒山子”的考辨(他视之为隋唐之际名僧“智岩”,但未得普遍认可)。(二)诗史研究。宇文所安所撰《初唐诗》、《盛唐诗》和《韩孟诗》,涵盖面大,具有叙史性,已引起学界重视。前两者用一定篇幅梳理宫体诗的发展,并阐述其对盛唐诗风形成的影响。古人称宫体“伤于轻艳”,论者却展示远比“轻艳”为丰富的风格特点,因此他宁可称之为“宫廷诗”。日韩、俄苏和欧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包括唐诗发展演变的叙述。(三)诗体研究。包括古体、近体特点研究,以及写景、隐逸、边塞、行旅、游仙、讽喻诸体代表作之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例如,高友工、梅祖麟合写的两篇长文(分别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31、38卷),从新角度细剖了近体诗的句法、意象、隐喻、典故等因素;戴密微的

王梵志研究、达格丹诺夫的王维禅佛思想研究、薛爱华(E. H. Schafer)的曹唐游仙诗研究,均与宗教有关;而王孟的山水、归隐之作,高岑的戍边怀乡之作,元白的新体乐府等等,也有不少精彩论说。(四)诗艺研究。这一研究涉及诗质、诗媒、诗境、诗律等问题,而且由于常以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方诗歌)为衬托,因此显得益加丰富多彩。探讨唐诗的抒情性、句法特点、并置意象、诗句的移情和当下效果、描写“自然之境”、“仙境”和“人境”的艺术手法等等,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更好地译介唐诗、乃至整个中诗,学者们也对翻译方法展开了研究,如关于“拆字法”、“对译法”、“原型法”、“意象突出法”、“弹跳格法”等译法的探讨。一般认为,如何处理中诗意象,往往关系到译文的成败。(施玉笙)

【李白研究在国外】诗仙李白在中国妇孺皆知,其诗经过汉学家的译介研究,在国外亦开始广为流传。日韩的李白研究起步早,历时长,时至今日,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堪称学界重镇。日本青木正儿、武部利男、前野直彬和韩国许世旭等人,均撰有同名著作——《李白》,概说诗人的生平和成就。其他如山田胜文考察诗人的出生地,韩国张槿基叙说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悲惨命运(《李白的忧国精神》),李锡浩探索诗人的宗教思想(《李太白和道教》)。诗人的诗歌艺术,研究者亦多,如大野实之助的《李太白研究》(比较剖析其创作思想)、武部利男的《李白诗中月的比喻》、竹村则行的《李白的月与杜甫的月:李杜咏月诗论》。在日本松浦友久成就较大,他撰有多种研究著作:《李白家世考》,如名所示,考察诗人的生平和家世;《李白——心象与诗》按主题将李诗分为十二类,分别细阐其贯穿意象的流动感、跳跃感;《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则从李诗情感出发,指出它们对“透明而闪光的事物”的憧憬;《李白传记论——客寓的思想》又将“传记考证”与“诗风批评”结合起来,分析李白“客”的情结,由此透视其人生、其诗歌。相对而言,在俄苏、欧美,李白则译介多而研究少。俄国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1880),叙及李白简况,这是对诗人的首次介绍。苏联立国后,译研日多,吉托维奇译有《李白抒情诗集》,费什曼撰有《李白的生平与创作》,波兹涅耶娃在其《东方文学》中,也专辟章节论述李白。欧美的李白译介,始自清初来华传教士,此后在长时间内虽代有译人,但并不繁荣。十九世纪英国德庇时(J. F. Davis)的《汉文诗解》,英译李诗,并介绍其艺术风格,是较为罕见的一例。二十世纪,翻译渐盛,著名译作有翟理思(H. A. Giles),小畑薰良的英译,德博(G. Debon)的德译,马格里尼(M. Magrini)的意译,徐松年

的法译等。论及李白者,可以英国 亚瑟·韦利(A. Waley)、美国宇文所安(S. Owen)为代表。前者撰有《李白诗歌与生平》,后者所撰《盛唐诗》有专章剖析李诗艺术。(施玉笙)

【杜甫研究在国外】 杜甫素有诗史之称,其写实诗篇也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在韩国杜诗备受推崇,明中叶即见《杜诗谚解》刊行,这是第一部朝鲜文译注本。杜甫在韩国影响最大、研究最多。日本译介杜诗亦早,江户时期服部南郭译注李攀龙《唐诗选》,其中包括杜诗。在二十世纪,韩日研究盛况空前,涌现了李丙畴的《诗圣杜甫》和《杜诗谚解批注》、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铃木虎雄的《杜甫全诗集》、雪岭永瑾的《杜诗抄》以及黑川洋一、目加田诚等人各自的同名之作《杜甫》。这些著作对诗人生平和诗歌均有详细的介绍。吉川的《杜诗论集》,还从书生、离乱、羁旅、归省几个阶段叙述诗人的创作生活,其脉络更加清晰。苏联的杜甫研究,较唐代其他诗人为多。吉托维奇是著名译家,译有《杜甫诗集》;谢列布里亚科夫、别仁、波兹涅耶娃则是研究家,分别著有《杜甫评传》、《杜甫传》和《东方文学》(杜甫部分);他们均强调杜诗的社会性、人民性,评价甚高。十九世纪,法国圣德尼(H. de Saint-Denys)的译著《唐诗》,开西方较多介绍杜诗的先河,这部书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奥地利柴赫(E. von Zach)是德译杜诗最多的学者,他的译介为德语世界的杜诗研究奠定了基础。杜诗英译,多见佳例,弗洛伦斯·艾斯库(F. Ayscough)、霍克思(D. Hawkes)、戴维斯(A. R. Davis)、洪业的译本,皆脍炙人口。此外尚有无散见在唐诗(或中诗)合译中的译例。在研究方面,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注释见长,注文篇幅竟然与译文不相上下,译者的考证、辨析功夫,享誉学林。在《盛唐诗》一书中,宇文所安(S. Owen)将杜甫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称其才能与诗歌个性具有多种表现,是世界上最博学的诗人之一。高友工、梅祖麟合写的《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判的实践》,采用结构主义音韵学阐释杜诗,迭出创见,新人耳目。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则采取传统的做法,辑录、整理了自宋迄清数十种杜诗校评;在长篇序言中,论者指出,杜甫是一位感性 with 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除此而外,杜诗还有葡、西、意、挪、匈、捷等国的译介。(施玉笙)

【白居易研究在国外】 在白居易生前,其诗歌就传到了日本,并越出汉文学的范围,影响到整个平安朝文学。时至二十世纪,日本的白居易研究仍十分活跃。平冈武夫主编的《白氏文集歌诗索引》(十二册)和《唐代研究指南》为日本学者必备的工具书。

而花房英树、武部利男、平冈武夫、堤留吉等,还有论著出版。除了诗人的生平之外,其人生观和创作心态也为学者所关注,如围绕“闲适诗”而形成的研究热点。西村富美子以退居下说闲适,下定雅弘说闲适诗的理论 with 变形,高木重俊兼说“讽谕”、“闲适”二诗体,这些讨论强调这一诗体的本身价值,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松浦友久所撰《白居易“适”的意义——以诗语史的独特性为基础》一文,追溯先秦以降的“适”字用法,分类阐说,以逼近白诗基调。白居易对韩国也有不小影响,历代诗话不乏有关的论述,当代则见于多种唐诗选本,且有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等著作。白诗传入越南约在十六世纪,最早将《琵琶行》译成越文的是潘辉咏。今人潘文爱所译《琵琶行》,公认是最佳译文,而越译两卷本《唐诗》所附前言,也对白居易等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西译白诗,大约始于圣德尼(H. de Saint-Denys)的译著《唐诗》(1862),进入二十世纪而渐多。英译以霍华德·列维(H. S. Levy)为最多,他选译《白氏长庆集》,共分四卷,历时八年方出齐。不过,亚瑟·韦利(A. Waley)的英译,因文句优美而广为流传。韦氏选诗,取舍标准不一。他的《汉诗百七十首》选白诗五十九首,其续集又选四十三首;后来数集合刊,并为《中国诗选》,白诗达一百零五首,而李白仅四首,杜甫竟无一诗。钱钟书评之曰,“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谈艺录》)。此外柴赫(E. von Zach)的德译本、罗大冈的法译本、艾德林的多种俄译本,也为人喜爱。俄西的研究著作,以韦利的《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为最重要,而以艾德林的部析最为深入。后者论及白氏思想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精神,白诗的传统性与个人性、风格技巧等等。

(施玉笙)

【宋诗研究在国外】 宋代中日文士僧侣,接触频繁,宋诗得以流播日本,名家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遂成楷模。五山僧人所作《脞说》、《翰苑遗芳》、《蕉雨馀滴》等书,均是为东坡诗作注;而《帐中香》、《山谷诗抄》、《山谷幻云集》等书,则为研习山谷诗而作;江户末年山本北山撰《作诗志彀》,抵制前期一味宗唐习尚,反对强分唐宋,宋诗研究复又出现转机。当代学者如吉川幸次郎、铃木虎雄、前野直彬、小川环树等,译注、研究甚勤。其中吉川的《宋诗概论》,为一系统研究;今关天彭的《宋诗选》编选较早,旨在以广流传;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宋诗”部分,以“全”为鹄的;而前野直彬的《宋诗鉴赏辞典》,分语释、通释、鉴赏三部分,并附诗人小传,则成为雅俗共赏的读本。这时苏黄仍为研究重点(参见“苏轼、黄庭坚研究在国外”条),陆游次之,兼及梅尧臣、

范成大、杨万里等人。前野直彬、一海知义等均有《陆游》一书，河上肇有《陆放翁鉴赏》两册，村上哲见则有力作《圆熟诗人陆游》。此外，还有小野寺郁夫、三浦国雄、清水茂的王安石研究。宋诗在西方，远不如唐诗研究为盛，所论诗人不外梅苏黄陆王范杨数家。纯粹的宋诗合译，迄无要本，但诸多中诗西译合集，包括不少宋诗。研究著作以生平、诗作介绍为主。如乔纳森·查维斯(J. Chaves)的《梅尧臣和初宋诗的发展》，侧重诗史；刘子健的《十一世纪新儒家欧阳修》和罗纳德·伊根(R. C. Egan)《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均有诗人生平介绍，亦涉及其诗作；陆游研究较多，如杜迈可(M. S. Duke)的评传、何秉尧(译音，Ho Peng Yoke)等人的《陆游——诗人和炼丹家》；以及施米特(J. D. Schmidt)的两种研究——《石湖：范成大诗》和《杨万里》；此外亦见曾巩、陈与义、叶适等诗人的研究。吉川的《宋诗概论》，也借华兹生(B. Watson)的译笔而传于欧美。俄苏的译研，以苏黄为多。谢耶布里亚克夫的《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一书，是迄今所见唯一涉及的宋诗的专著。这部书详细论述了宋诗(以及宋词)的发展，诗词在形式、韵律上的差异，并重点论及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施玉笙)

【苏軾、黄庭坚研究在国外】古代日本研究苏黄，多为传统的译注品评。现代研究则名家辈出，要籍迭见。小川环树、金冈照光、山本和义、金藤光男、横田辉俊等人是苏诗研究家，他们或有评传，或有译本。仓田淳之助、荒井健等，则各有黄诗的编译本。苏黄西译，为数不少，如克拉克(C. D. Clark)、华兹生(B. Watson)英译苏东坡，比格(L. Bieg)德译黄庭坚。林语堂的《苏东坡生平与时代》，研究性质较强，且畅销不衰，曾多次重印。研究苏黄的文章，颇具特色，如里李又安(A. A. Rickett)阐释黄庭坚关于诗法与直觉关系的诗论，伊根(R. C. Egan)论苏黄的题画诗，格兰特(B. Grant)论苏诗中的禅趣。(施玉笙)

【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日韩的元明清诗歌研究起步较早，在晚近诗话著作中屡有所见。日本赖山阳以论史之笔论明清诗，撰有《论诗绝句》二十七首，批判明清诗歌的拟古之风，为世人所推重。朝鲜金万重的《西浦漫笔》，将王世贞与苏轼做了比较研究。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于雅乐(C. Imbault-Huart)选译“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诗”和“中国现代诗”，并且译研袁枚，是西方元明清诗歌研究的嚆矢。在二十世纪，这一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属翻译多而研究少。在日本，已有前野直彬的《宋·元·明·清诗集》，大型辞书《中国名诗鉴赏》所辑福本雅一编译的“元明诗”、村山吉广编译的“清诗”，入矢义高的《明

代诗文》、松田毅的《高青邱诗鉴赏》，菅原兵治的《王阳明诗歌》。在西方，已有杨富森和梅茨格(C. R. Metzger)的《元诗五十首》，杰罗姆·西顿(J. B. Seaton)的《长生之酒——元代道家的饮酒诗》，罗郁正和舒威霖(W. Schultz)的《待麟集》(选译清代七十二家的诗词作品)，而查维斯(J. Chaves)的《晚期中国诗歌选》，则实为元明清三代的译诗集。此外，还有牟复礼(F. W. Mote)专著《诗人高启》、林理彰(R. J. Lynn)的《贯云石》，及元好问、袁宏道的诗论研究，贯云石、纳兰性德、袁枚(参见“袁枚研究在国外”条)、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等家的诗歌研究。在俄苏，论及元明清诗者比较罕见。费德林的《中国诗集》第三卷，辑有三代诗人七十馀家，诗歌百馀首，规模较大。斯米尔洛夫因俄译高启、撰写论文《高启生平与创作》，而闻名学苑。(施玉笙)

【袁枚研究在国外】袁枚论诗主“性灵”，诗风清新自然。在日本，其理论经山本北山提倡，产生很大影响。江户后期，日人对袁枚毁誉参半。藤森弘庵认为，袁枚之文是才子之文，对他褒扬有加，菊池海宽则对《随园诗话》加以讽刺。当代时有论文，论及袁枚。法国于雅乐曾经来华，对袁枚有较深研究，写成《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与创作》一书。英国亚瑟·韦利(A. Waley)的《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诗人》，内容亦涉诗人的生平与作品，但尤重创作背景及成就。德国埃格尔特(M. Eggert)的《袁枚》，讲述传主在自我追求与传统习见间的调整，即阐释“性灵说”实乃“自然”与“情感”结合的诗歌理论。(施玉笙)

【新加坡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新加坡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大学中文系，而尤以国立大学中文系实力较为雄厚。国立大学中文系会聚了林徐典、王国璿、陈荣照、杨松年等汉学家。林徐典所著《中国上古文学》中对远古诗歌的研究很受赞誉。王国璿尝试运用中西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探讨，尤其致力于对山水诗的研究。发表有《汉赋中的山水景物》(《中外文学》第9卷第5期)、《中国山水诗的萌芽》(《中外文学》第9卷第11期至第10卷第1卷)等论文，并著有《中国山水诗研究》。陈荣照的研究范围侧重于《诗经》和唐宋文学，著有《诗经史料价值研究》。杨松年的研究范围侧重明清诗论，尝试运用现代西方文艺学、美学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作出新的阐释。著有《王夫之诗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集》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还定期举办各类学术会议，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

的问题。如1991年6月该系曾主办“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系主任林徐典主持会议。本地学者吴英成提交的论文《谢灵运山水诗的自然意象语句创造》以结构主义文学观并结合图表分析谢灵运山水诗的某些语句。王国璿《李白的名士形象》从李白纵酒狂欢、散发裸袒、挟妓遨游、隐逸求仙、放情山水的自我形象中,透视他既傲岸世情,又渴望机遇以展宏志的矛盾心情。林启兴《从罗隐“十举不第”看晚唐科举之路》,考察了罗隐十次科举不及第的经过及原因。这些论文受到与会国际学者的好评,显示了新加坡学者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实力。(郑永晓)

【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 古代日本、韩国和越南诸邻国,历来以中国诗论为本国诗论,指导汉诗人的创作。它们的诗话即受中国影响而产生,形式丰富、多样,其论中国诗说,自然也受中国学术的影响。对于风、骨、神、韵、气、味这些特有的概念,邻国学者同样熟悉。例如,黎贵惇(越南黎朝显宗时人)说越诗,直追“汉魏齐梁”、“隋唐宋元”(《全越诗录例言》);李奎报(高丽朝高宗时人)说朝诗,亦明“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白云小说》)之意;而日本平安时代大江匡房的《江谈抄》,已有类似诗话的片断,镰仓时代虎关师炼的说诗评韵之文,更直接以“诗话”名之。所有这些做法,与中国古人并无二致。日、韩、越三国,至今保存古人的诗文序跋、诗话文话和有关诗文的书信,成了这些国家诗歌理论发展的基础。明治维新以后,它们先后接受西方的影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西学的东渐,深刻地改变着日韩学者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以致使其中国诗论研究,与西方、俄苏相比,也独具特色。以日本为例,中国诗论研究大体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为垦拓期。研究者多出生于明治末年,他们接受了西方思想,一改尊经重史、轻视小说戏曲的旧习,以新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的性质作出概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是第一部中国诗论史著述;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思想史》(1943)和《清代文学评论史》(1950),则属这一领域的开拓性著作。多数学者注重对该领域的总体性描绘与把握。因此,近藤春雄的《文心雕龙》、《诗品》研究,也冠以《支那文学论的发生——〈文心雕龙〉与〈诗品〉》之名。这时虽在总体认识上沿袭西方观念,但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学者可能深于西方学者。当时,日本文学界“艺术至上”的思潮对研究者有所影响,这表现为过高评价魏晋的

文学思想和理论。

二、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为培植期。这时有战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高涨为背景,学术研究已深入到某一时代或某一著述的考证、辨析之中。高松亨明、高木正之等人的《诗品》研究,京都大学的《诗品》、《文心雕龙》研究,九州大学目加田诚、广岛大学斯波六郎的六朝文学思想研究,横山伊势雄的宋代诗论研究,横田辉俊的明代评论史研究等,都在各自领域潜心耕耘。当时中日之间不便交流,日本学者如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郎、目加田诚等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培养新生力量。诸如横山宏的《南齐书·文学论》译本、丰福健二的《六一诗话译注》、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小林建志的《二十四诗品》译本、横田辉俊的《诗薮》译本、泰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国崎望久的《〈沧浪诗话〉给近世歌论的投影》等等,均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著述。

三、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末为收获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学术交流有所加强,战后日本新一代研究者的惨淡经营也开始奉献成果。这时仍以几部要籍为重要研究对象。户田浩晓积数十年《文心雕龙》之研究,结成了《中国文学论考》一书;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兴膳宏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也均是多年成果之集大成。这些著作对垦拓期先师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近来的《文心雕龙》考辨,仍然层出不穷,清水凯夫、门胁广文、安藤信广等人,在此争立新说,研求精义。中国其他诗论,从先秦诸子到清季王国维,也均有书文涉及。现在日本已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研究阵容,研究家多达数十人。

日本学者治学,注重大量占有资料,穷搜欲尽,考辨严谨,不尚空论,但又时有罗列过繁、阐发不足的弊端。在思考方式上,多拒绝绝对化、极端化的观点,而取兼容折衷的态度。研究者甘于寂寞,埋头著述,这种敬业精神是他们的成功之本。(王晓平)

【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 中国诗论的西播史,严格说来并不算长。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西译儒经,稍涉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观。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是作为经学或文化研究的附庸,零星断续地传到西方。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毛诗序》才由理雅各(James Legge)译成英文。又阅数十年,翟理斯(H. A. Giles)撰写《中国文学史》(1901)时,全译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论西译略有起色,出现了《文赋》法译、《沧浪诗话》英译等,但影响不大。中论西播的活跃,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时,《文赋》拥有三种英译,其中修中诚(E. R.

Hughes)译本(1951)有名家理查兹(I. A. Richards)所撰前言,足见西人对中国文论的重视;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1959)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当时“甚至还没有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全译本”(海陶玮)。六十年代,有几本大部头的著作问世,例如,刘若愚的《中国诗艺》(1962)设专编剖析几种传统诗观,并对之进行分类研究;德博(Günther Debon)的《沧浪诗话》德译(1962)则设置导论,提供注释,讲解也颇为详尽;而周策纵所编《文林》第一辑(1968),亦涉文论,包括论“诗”字和论钟嵘《诗品》的文章。

七十年代以降,中论西播呈现出了初步繁荣的景象。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人们对翻译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一代应有一代的翻译”(黄兆杰)之说。李又安(A. Rickett)《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77)和魏世德(J. T. Wixted)《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82)两书,属译研结合型。它们提供所涉理论的全部译文,以及详注和说明。其研究方式与前期并无多大区别,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增强。黄兆杰编《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1983)是部选译,包括《毛诗序》等十三篇论文。研究著作大致包括总体、断代和专题研究三种类型。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是总体研究的代表作,论者以修正了的阿伯拉姆斯艺术四要素说为框架,试图将文论分类科学化。这部著作条理清楚,理论性强,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公认它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新水平。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1992),旨在以要籍选介方式,为中国文论勾勒出发展脉络。1970年各国学者云集维尔京群岛,共同研讨西方尚少知晓的中国文论,会后李又安选文八篇,勒为一集,名为《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1978)。书中所论专题,涉及孔子、文“气”说、欧阳修、黄庭坚、王夫之、常州词派、脂砚斋、梁启超等。断代研究有三种问世:即杜克义(Ferenc Tökei)的《中国三至六世纪的文类理论》(1971)、刘渭平的《清代诗学之发展》(原为连载的期刊文章,后哀辑而成)和王靖宇所编的《清代文学批评》(兼收中西文,1993)。专题研究趣味多样,重点各异。王靖宇的《金圣叹》(1972)一书,是西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热中的产物。陆大伟(David Rolston)所编的文集《如何读中国小说》(1990),则专门介绍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和批注艺术,编者和浦安迪(Andrew H. Plaks)还对小说评点的渊源、发展史、形式特点和重要术语做了细致说明。从阐释学角度透视文学理论,能够触及它的文化根柢,研治中西比较诗学的学者,往往注重对此加以探讨。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an)的《暗示的价值》(1985),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

读法》(1987)等,均属此类著作。这个时期散在而存的中论研究数量也不少,主要是期刊文章、综合性文集选文、辞书条目、或论著的部分章节。

从深隐层次来看,西方汉学由文学作品扩展到文学理论是求全之必然,而为把握作品的奥义而诉诸理论,则是求深之必需。所以西方学者介绍中论,总是或明或暗地与中国的阐释学联系起来,力图阐明独特的术语,要籍的主旨,以及立论断言的独特方式。林理彰(R. J. Lynn)认为,要想把握“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的批评术语,必须注意如下关系:一、某个批评家的著作系列;二、他所属流派或群体的价值观或其他观点;三、他所在文学史上的时期和阶段;四、当时学术话语的广阔背景(包括哲学和宗教著作);五、到那时为止的批评传统。换言之,关于中论的内涵、外延和存在条件,均应纳入学术视野。而这种探索理论背景的外向型研究,广涉历史观念、宗教思想、言意之辨、文化风尚等因素,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的性质。显然,在此必然会涉及中西诗学或中西文化的比较。刘若愚提倡这种比较研究,他认为,中西两种诗学互相并置,可获相得益彰、深入隐微之效,有利于突现两种理论的特质,有利于明辨两种传统的潜理论和前理论,并能借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干扰”(《语言·悖论·诗学》)。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有不少分歧意见,但中西比较诗学为汉学研究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周发祥)

【中国古典诗论在俄苏】1916年,俄苏汉学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出版硕士论文《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从此俄苏的中国诗论研究从无到有,日渐成长。这篇论文具有方法论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奉为典范。阿列克谢耶夫在其他方面也多所开拓,例如,他翻译了《典论·论文》、《文赋》和《诗品》,发表了《中国山水画家——诗人论自己的灵感和自己的山水画》(1945)、《书法家和诗人谈书法艺术的奥秘》(1947)等文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又致力于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写成《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1944)一文,还把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与明代宋濂、袁黄作对比。在他身后,这些论文由人结集出版。阿氏的后继者为数不多,如沃斯克列辛斯基、李谢维奇、戈雷金娜、波兹耶涅娃,但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古典诗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是多产期,大多典籍的翻译完成于此时,并有专著问世。其中有几部重要著作,如李谢维奇的《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戈雷金娜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李著阐释中国诗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在许多问题上提

出了不同的见解。戈著第二章亦介绍中国传统的诗歌概念,以及对诗歌创作特点、创作性质的认识。七十年代以来,俄苏的中国诗论研究日趋活跃,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可观,涉及面较广。《诗大序》、《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等,均有人作专门研究,包括总体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类型。俄苏学者立场正确、态度真诚,这是他们能做出科学评价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们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注意考察一种学说、观点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宏观视野把握对象间的内在联系。

(李逸津)

【比较诗学】“诗学”(Poetics)一语,原为亚里士多德一篇文章的名称,后泛指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旨在超越国家和学科界限,在不同的文学理论之间、在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理论之间证同辨异,溯源追流;旨在从不同的作品或理论中抽取或筛选共同诗学。有人认为,历史考察(法国学派的旨趣)和批评或美学思考(美国学派的旨趣)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便会导致比较诗学的诞生(艾田蒲《比较不是理由》)。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目前存在两种趣向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中西诗学性质迥异,这就决定任何相似均属偶然,而且令人误解。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主张在两者的根本点上进行比较,揭示中西两种传统潜在的设想,及其决定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式。如此比较往往会有宏观的结论产生,如说“西方诗学试图提供一种客观的作品分析,中国诗学则希望通过暗示增加读者的乐趣”(朱利安《暗示的价值》)、“西方的特点是以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新的事实,东方的特点则是诉诸直觉的方法”(诺思罗普《东西方的遇合》)。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各种层次、以各种角度比较,无不适宜,无不给人以启发。刘若愚说,中国诗学如与西方诗学比较,可提供“富有成效的比较点”,可使两种传统的特色益加彰明,还可借以发现两种传统的“潜理论”,即“关于语言、诗歌、诗学和阐释性质的未曾明言的设想(the unspoken presuppositions)”,更进而“为开展真正的比较诗学铺平道路,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干扰”(《语言·悖论·诗学》)这种意见并不排斥辨别异点,而是更强调异同之点,均可比较;它也不排斥察其根本,而是更强调根茎枝叶,均可考察。实践证明,后一种意见比较正确、全面。

(周发祥)

【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西方学者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的方法有如下几种:1.融合法——将中西两种文学理论或批评观点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理论或新的观点。例如,刘若愚根据严羽、王夫之、王

士慎、王国维和马拉梅、艾略特的诗论,提出诗歌为语言和境界的双重探索。这种新诗论适用于中外所有的诗歌。2.抽绎法——从中西两种文学作品中抽取出共同适用的理论。这是建立共同诗学的一种做法,目前尚无范例,但有些学者对此抱有坚定信念。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即提倡通过比较,去发现文学中“恒常不变的因素”,进而确立新的定义(《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3.移植法——移用西方文学理论或美学理论来整理、剖析或认同中国文学理论。据理移中就西者亦应存在,但罕见其例。移西就中的方式有直接认同和间接认同。前者如说金圣叹评诗堪称“古典主义兼浪漫主义”的做法(王靖宇《金圣叹》);后者如移用阿伯拉姆斯所建立的分类框架梳理中国文论(其例有多种)。4.类比法——平行比较两种文学理论,旨在寻找相同之处,但也不排斥辨别相异之点或同中之异。其着眼点甚多,可类比批评方式(如黄维梁说“摘句为评”与阿诺德的“试金石”法相似),可类比关键术语(如陈世骧比较《文赋》中的“姿”字与新批评派的 Gesture),也可类比批评流别或理论倾向(如刘若愚将中国的玄学理论与西方的象征派诗论进行比较)。5.对比法——平行比较两种文学理论,重在辨认相异之处(但也考察异中之同)。如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强调中西文论在根本点上即大异其趣。6.溯源法——从接受角度追溯外来影响的渊源。中国在近代始见引进西论,因此此法多用来考察近代(及其后)学者的借鉴活动。另外,还有从传播角度顺向考察对接受者产生何种影响的“逐变法”,其实例几乎未见。在中日、中韩、中越比较诗学研究中,溯流法和逐变法则大有用场。

(周发祥)

【西方神学观与《诗经》】欧洲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以神学观审视中国典籍,反映在他们的《诗经》研究上。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是开创神学臆说的鼻祖。他试图以汉籍证明上帝基督并非虚构,基督教义也并非虚妄。其以中证西之法有二:一是从汉籍中寻找“上帝”字样,并对此做出解释;一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所本,牵强附会地来阐说孔孟之道。康熙年间来华的某些法国传教士有“象征派”之称,他们也沉潜汉籍,深钻细研,并以“秘义说”(Hermetism)解中诗。白晋(J. Bouvet)声称,圣婴诞生的秘密见之于《诗经·大雅·生民》。后来,有的教士觉察到,中国典籍并非总能充当西方神学的代言者,甚至针对两者抵牾之处,提出质疑,法国人孙璋(A. de la Charne)即是一例。他在《性理真论》中指出:“中国经书但云:‘洪水滔天,坏山襄陵。’不云洪水之降,毕竟为何;且不书其年月,降于何时。”这里虽讲中西差异,

但仍坚持以西方神学为准则。十九世纪,汉学研究逐渐从神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其学术视角开始发生变化,《诗经》更多地被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了。及至二十世纪,美国诗人庞德便公开声称,基督教徒(按: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搞的译本,尽管词语译得正确,精神却完全走了样。(周发祥)

【史诗研究】在西方史诗是一种古老而重要的诗歌类型,而在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绝大多数作品是篇幅短小的抒情诗。因此每当中西文学比较时,史诗问题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史诗。匈牙利学者杜克义(Ferenc Tökei)虽然持否定意见,但提出了哀歌(他指的是屈原的作品)说。他认为,史诗是一种客观描述外在世界的诗型,抒情诗则纯属个人,尤其是诗人自己。在两者之间,有另一文类——哀歌存在。中国古代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的发展,而反对家长制的伟大诗人既要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不放弃创作史诗的宏伟意愿,因此形成了哀歌文类。它应有一定的史诗广度,否则就只能成为讽刺短诗;还应以思考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思考也便谈不上哀歌(《中国哀歌的起源》,布达佩斯,1959)。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从中国特有的英雄主义精神,看到一种别样的史诗,这就是古老的厌战尚文精神。他说,“在《诗经》诸篇(按:指《大雅》里的五篇诗歌)中,一系列史诗事件含有开创神话(a creation myth),还含有关于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Weniad)。”文王上承后稷,重农桑而尚文化,从不怒而即战;其英雄主义表现为以德、以柔治理天下,为民垦殖,敬奉先祖。武王伐纣是“文王史诗”的高潮,他一怒之下,铲除了暴君。可见周王之怒有所不同:文王在柔,武王在刚。但武王之怒仍是文王勇武精神的继续,其志在于安民。灭商后,他返回旧都,命令倒置干戈,纵马放牛,以示不再征战。周代的英雄主义包含着悔战之勇,视兵者乃凶器之勇。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咏战诗往往不提兵刃相搏、血肉横飞的实战情况,有时则用食腐之鸟(如汉乐府《战城南》)来透露战争残忍的消息(《英雄主义》,载《从仪式到寓托》,香港,1988)。他还就这些《大雅》诗篇作了中西比较:“一如《埃涅阿斯纪》,中国史诗也把一个王朝的命运当作基本主题。它同样集中描述先祖之迹,以文王的超凡魅力为高潮;这位帝王亦如埃涅阿斯那样卓然超群地履行他的职责

……‘文王史诗’既是诗歌叙述,同时又是百科全书,旨在通过记录开国者的事迹,为周代社会建立永久的名声和精神气质。”(《史诗》,出处同上)不难看出,海外学者在严格使用史诗定义时,又从语言、哲学、思想、宗教等文化层次提出问题,深化了对史诗的理解。(周发祥)

【语音学研究】语音学研究的一种,旨在求得语音与诗艺的沟通。在《文学和语言学》中,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说:“现代语言学家按照区分音素的细微特征来分析语音体系,因此为批评家更敏锐、更细致地描述诗歌里的音韵提供了可能,包括辨认各种特征和音素的重复型或组合型。”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和梅祖麟则试图以实例证明,音型、韵律特点对诗意和诗情的增饰效果。他们就杜甫《秋兴》八首之三分析说:该诗前四句描写于“江楼”所见景色:千家万户有青山、飞燕、渔舟点缀,本是赏心悦目的美景。但“日日”一语,因有其他叠字衬托,遂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它透露出久享此景而产生的厌倦。在这种语境里,音型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平衡结构接连重复三次,令人觉得单调。前半首的情调是杂有无聊的宁静,而后半首则可说是以失望而告终的焦虑。匡衡和刘向作为儒家的楷模,衬托出诗人自己心事的乖违和宦途的蹭蹬。在此,有几种音韵效果提醒人们注意情调的转变。相类的“gong”音断续重现和软腭鼻音密如连珠,传达出一缕焦急情绪。前四句均为单调的“四:一:二”节奏,而在第五、六两句中,则变成了“四:二:一”节奏。此外,后三句还包含两个允许破格的平仄音型(刘、心、同、少、五、衣)。由于诗人打破了读者的期望,他成功地使读者分享一点自己的失望心情(《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实践》,载《哈佛亚洲研究》第28卷)。旅法华裔学者程纪贤的音韵研究则试图探讨中诗的音乐性,但其潜在意义不限于音乐范畴。他说,律诗诗型的轻重音分布如下:

五言律诗:○ ●/● ○ ●

七言律诗:○ ● ○ ●/● ○ ●

(●=重音节;○=轻音节)

偶数音节和奇数音节轮替充作重音,仿佛一个个轻微冲撞形成的节奏。中间的停顿有如一堵海堤,海浪拍击而来,其律动为“○●”型,折返而来的海浪则相反,其律动为“●○●”型。于是,这一基于阴阳法则(偶数为阴,奇数为阳)而又互成对照的韵律,唤醒了诗行里所有的运动。阴阳互换,对于中国人来说,代表着宇宙间基本的律动。他还认为,双声叠韵的选用也与某种情调有关。李白《玉阶怨》写一位女子徒然熬夜,所用音节即“露”、“罗”、“帘”、“玲珑”,皆

从L得声,来指明露珠、泪水、寒冷、水晶和孤独。此外,李煜名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中,有些音节从an得韵。此韵暗示意气消沉,与ang韵形成对照。后者意气风发,令人鼓舞。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前有柔情似水,后有豪气如钢,两者并置有效地起到了衬托作用(《中国诗歌的写作》,巴黎,1977)。(周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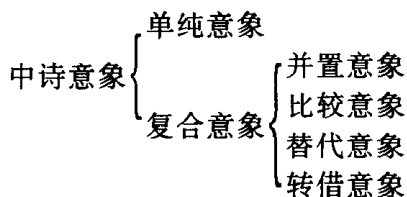
【中诗句法研究】 中国诗歌的一种语言学研究。英国学者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在《连贯的力量:英诗句法探讨》(伦敦,1955)中,阐述了三种句法理论,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和梅祖麟据此透视了唐代近体诗。这三种句法是:孤立句法、动作句法和统一句法。关于孤立句法,详见“非连续诗学”条。关于动作句法,高、梅转述了美国学者费诺罗萨(E. F. Fenollosa)的意见,他把句法视为一种运动:“所有真实均须在句子中加以表达,因为所有真实均是力的转移。”(《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他们指出,费氏论点不无偏颇,动词并非一味表示动作,它们有动态、静态之分,各有独特的情调与效果,只不过动态应是动词的主要形态而已。中国历代诗人均持万物有灵观点,赋予自然之物以人类的思想和感情。这把“主+动+宾”结构中的主语加以人格化,从而为诗歌输入生命和运动。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动和静是中国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用之于解诗必然牵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儒家和道家对自然界生命过程有强烈意识,对此有所表述,如“生生不息”(《易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也是这个道理。关于统一句法,他们转述了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意见。苏珊认为句法功能是音乐性的:诗歌涉及“使各部分保持匀称的统一整体、囊括一切的技巧”(《哲学新解》)。高、梅又以杜甫《江汉》为例指出,首联各由并置的名词性短语所组成,中间无任何连接成分;颌联有些连接成分,也有歧义,句子流动受阻;颈联语序正常,为五言常见的连续型;尾联实为一句,却分两截,连续性最强。尾联是命题句,起统一全诗的作用。在尾联中,为使两句贯通,诗人常用“可怜”、“请看”、“闻道”等语。有时尾联中还出现设问句、条件句、虚拟句,或者介入相对时空,采用“古来”、“旧时”等语(《唐诗的句法、措词与意象》,载《哈佛亚洲研究》第31卷)。(周发祥)

【非连续诗学】 关于孤立句法,美籍华裔学者余

宝琳说:在古代汉语中,“……名词没有性、数、格的曲折变化(inflections),动词也没有数和时态的曲折变化……。这些特点,再加上细部结构所必备的连接成分的省略,创造了一种仅仅依赖词序和语境的孤立句法,一种使意象无所依傍的性质得以强化的句法。”(《非连续诗学》,载《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1979)在中国古诗中,这种句法最为常见,而且由于西方诗歌的映衬,也最为引人注目。西方汉学家通常把这种句法及其相关现象视为“非连续诗学”。他们认为,非连续诗学可以产生多种艺术效果:一、人与自然密切关联。中诗通常一面写人事,一面写景物,由于省略、倒装等手法的运用,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李端的《感兴》,末二句省略代词,显然是为了使隐者与宇宙因素认同;“高人”日常的闲逛也被描绘成了宇宙的运行。再如在李白《送友人》中,自然并非外在的陪衬,而是一幕动人活剧的组成部分。“浮云”、“落日”、“游子”、“故人”这四者,基于内在的必然关联而组织在一起,显示出人生戏剧与自然戏剧的不可分割(程纪贤《中国诗歌的写作》,巴黎,1977)。二、增强了主体间性。如果一首诗涉及多个主体,其间就可能出现建立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上的关联。杜甫《又呈吴郎》里有三个人物:诗人(我)、“吴郎”(你)和“妇人”(她)。通过省略代词,诗人试图创造一种“主体间的”觉识,在此“他者”从未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他始终于另外两个人物认同,仿佛同时有多种视角观察事物。全诗展示了一个人物内心的议论,其中故事和话语一直混淆难辨(上引程氏著作)。三、会出现一词多解。一词多解即是歧义,参见“歧义说”条。四、使得诗歌时间或交错或永恒。时态及其相关词语的省略,以及不同时间的并置或对仗,往往造成时间不定指的效果。有人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错与叠合。有人认为,李商隐擅长兼写当下的时间和引起的时间。如《马嵬二首》之二“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句,虽然写时间的流逝,但这是一种浑然无分的时间,宵夜只是一缕单调的回响,且让人感觉不到白昼的到来(上引程著)。五、使名词意象带有一般性。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近体诗名词意象具有倾向描述性质的特点。如在“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二)中,“黄金”的“黄”和“白雪”的“白”只是强调被修饰名词的性质,而当这些名词再去修饰其他名词时,它们便突出了本身的性质,如“金殿”、“雪峰”。还有一些附加“色”、“声”的词,如“山色”、“柳色”、“泉声”、“蝉声”等,其后缀也给了修饰成分以可见、可闻的性质。而代表

物类且无修饰的原型名词也可产生同样效果。在王维《鸟鸣涧》中,就用了一些这样的名词,诗中写由“人”、“鸟”、“花”、“山”等组成的世界,体现着诗人自然而又素朴的风格。原型名词以及其他倾向性质而非实物的名词的运用,使整个近体诗弥漫着如温姆塞特所说的“梦一般的抽象”和“无所不在的朦胧”(《唐诗的句法、措词与意象》,载《哈佛亚洲研究》第31卷)。(周发祥)

【意象研究】 意象,源自拉丁文 *imago* (英文是 *image*),本指影像或复制品,后来指诗歌(或其他文体)里的具象因素。大多数诗歌技巧如比喻、借代、摹状、比拟等,均与意象运用有关,因此辨识和剖析意象是诗歌研究和鉴赏的重要方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象研究渐成时尚,但关于意象的定义,却众说纷纭。有人强调它诉诸视觉的具象性质,认为“它是文字制成的图画”(C·D·刘易斯);有人强调它对于各种感觉的复制功能,认为它是“任何感官经验在诗歌中的再现”(C·布鲁克斯和 R·P·沃伦);也有人强调它荷载各种抽象事物的兼容功能,和它像火花般闪现的瞬时性——它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庞德)。定义的混乱,造成了分类的繁杂。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建议,最好按照意象种类分别界定。在《中国诗艺》(芝加哥,1970)中,他先把中诗意象分作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两类,并且界定说,前者是“一种词语的表达,它能引起实在的感觉和图画般的联想”;后者是“两件事物并置、对照,一物替代另一物以及一种经验由另一种所假托的词语表达”。然后,他又把复合意象分作四个亚类:并置意象(如“春天树”和“日暮云”)、比较意象(如“江上柳如烟”)、替代意象(如以“秋波”代“眼光”)和转借意象(如“四更山吐月”中的“吐”字)。于是,他得到了下述意象体系:



意象类型中有一特例——象征,一般是代表抽象事物的意象。由于象征与复合意象极易混淆,刘若愚对此也做了辨析。他说,复合意象只有局部意义,而象征具有普遍意义;象征是代表抽象之物的实物,复合意象却并不总是一实一虚,它们常常仅为两种实物或两种实际的体验。联觉意象是另一特例,海外学者对此也常有论说。联觉(*synaesthesia*)又称通感,指多种感觉互相沟通的心理现象。高友工和梅祖麟在分析单纯意象的性质发生转移时,涉及一些联觉

意象。他们说,在“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月夜》)句中,“云”和“玉”形容发髻和臂膀,具有视觉效果,但在上下文中,云似雾气湿,玉如月光寒,两者遂分别有了湿与寒的触觉效果(《唐诗的句法、措词与意象》,载《哈佛亚洲研究》第31卷)。这里虽然说的是性质转移,但与联觉有关。如果在一诗之内,意象多于两个,并且互相关联,便形成了意象组合。美国学者麦克诺顿(W. McNaughton)指出,《诗经》里有一种意象群,可称作“并合意象”。如《魏风·陟岵》三章,叙述征人依次登上了“岵”、“屺”、“岗”,暗示渐行渐远,深入不毛之地。又如《周南·桃夭》,以桃花、桃实和“萋萋”桃叶,暗示少女从新嫁娘向母亲、管家婆的转变。如此连续运用相关意象,便使其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转换时空,释放情结,以及假物写人。另一种组合关系即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 of imagery*),也经常被人提及。中诗因句法特殊,允许在一诗,甚至一句内,平列两个或更多意象,如“细草微风岸”、“葡萄美酒夜光杯”之类。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认为,意象组合可产生绘画性、雕塑性、蒙太奇等等美学效果(《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普林斯顿,1969)。意象统计法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也有用于中诗的例子(详见“意象统计法”条)。如果用意象构成比喻或隐喻,其取譬设喻的行为,便与它们赖以孳生的特定文化密切相关。西方学者由此展开了探寻中国隐喻根柢的讨论,或曰中国隐喻缺少西方那种一实一虚的类型,或曰不尽然如此。可见,意象研究已在多种层次上派了用场。(周发祥)

【意象统计法】 诗歌研究方法。英国学者斯珀津(C. F. E. Spurgeon)所创。她根据意象的复现频率,分析作品的情调和气氛,并推断作者的经历、趣尚、甚至性情。从七十年代起,间或有人用于中诗研究。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以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为抽样本,对自然意象作了统计。自然意象包括天气、天体、山、水、树木、花卉、草、鸟兽八大类。每类又分总称(如花、鸟)和特称(如莲、兰、雁、鹤)两种。从统计结果看,总称意象的复现次数特别多。他指出,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其意象的概括程度逐渐增加;唐人写景,多少是以粗线条勾勒,而非细致描绘;诗人的兴趣,不在眼前景物,而在习用的比喻和象征(如松柏象征长寿和高风亮节,杨柳为诗句增添诗意,攀折杨柳代表送别);缺乏传统喻义的意象比较少见,甚至根本没有(《中国抒情诗风格》,纽约,1971)。华氏所论涉及意象的具体性,美籍华裔学者郑树森对此又作了研究。他衡量意象具体性的标准,是新批评派温姆塞特(W. K. Wimsatt)的词语三风格,即抽象的(如“工具”)、具体的(如“铲

子”)和高度具体的(如“生锈的花园铲子”)。他所用抽样本是叶维廉《王维诗选》英译本。意象分类一仍旧例,但统计时新立“有无修饰语”一项。结果表明,意象多带修饰语,平均占60%。论者人为,唐诗自然意象的具体性,游移在温氏所分的第二、三类之间;与英诗不同,只能略加修饰,而英诗则可累加很多修饰语,是“高度具体的”;因此唐代写景诗(王维)不可能产生英诗(华兹华斯)那种整体印象的特定性(《“具体性”与唐诗自然意象》,载《新亚学术集刊》创刊号)。美国学者詹玛丽(Marie Chan)的岑参研究,也运用了意象统计法。她选来九十首边塞诗(亦有他人之作),分作季节、时辰、衰亡、地貌、天气、禽鸟、植物、戎马生活、军旅乐器等意象,分别作了统计。论者据以分析说,除了沙海、烽火、羽檄、铜钲之外,诗中意象很少与写中原景色者全然不同,边塞诗因承了写景诗的手法(《岑参的边塞诗》,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98卷)。由于意象统计法割裂意象与上下文的联系,有人怀疑它的科学性。(周发祥)

【新批评研究】 新批评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文学批评流派,本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在美国风靡一时,并波及到了其他国家。这一流派成员众多,他们竞相创立学说,铸造术语,提供观察作品的角度。“新批评”有时被称作“本体论批评”,因为这一流派强调作品的内在价值,专注作品本文而加以“细读”,不考虑创作动机、历史背景、社会影响等外在因素,而是根据“张力”、“反讽”、“悖论”等结构原则,过细地分析作品的语言和意象。新批评派不相信作品有形式和内容之分的二元论,也不承认来自作品之外的任何意义,坚持认为作品是个独立自足的有机体。到了五十年代末,新批评盛极而衰。它囿于语言媒介的狭隘做法,招来不少批评。不过直到今天,仍然时常有人采用它所提供的分析方法,海外汉学家也不例外。参见“歧义说”、“悖论说”、“悖论诗学”、“反讽说”诸条。(周发祥)

【歧义说】 歧义的英文是 ambiguity,有“暧昧”、“模棱”、“含混”、“多义”、“复义”等多种译名,英国燕卜苏(W. Empson)所创。他称歧义是“词语的任何细微差别”,而“无论多细微,它总能给读者对同一语言片断所作的反应,提供选择的余地”(《七种歧义类型》)。此说很容易在中诗研究中派上用场。中诗西译,常有歧义需要选择。如“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苏轼《大秦寺》)一联中,下句应有三种译法:一、我孤独地面对明亮的山;二、这座塔孤零零地面对明亮的山;三、这座塔孤零零地在山上闪光。可见言者与塔,均可做诗句主语,但若英译,就只能选择一种译法(杨立宇《自然与自我》,纽约,1989)。赏析中

诗,亦常遇歧义可供玩味。在《梅花与宫女》(纽黑文,1976)一书中,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叙及如下几种情况:一、象声词会造成歧义(如《木兰诗》中“唧唧”二字,既暗示织机响声,又暗示木兰叹息;二、写物关情会造成歧义;三、涉及不同语意层次而造成的歧义;四、一词多解而造成的歧义;五、诗歌意象因功能不同而造成的歧义。词语的歧义大半来自文本语境的烘托、修饰,有时因携带典故或文化背景的意蕴而产生歧解。就整个一篇作品而言,由于特殊技巧的运用(如省略主语、通篇用隐喻语言等),它也会产生暧昧性。在悖论、反讽和张力所指明的较大的诗歌结构中,总有两种含义不同而互相匹敌的因素一并出现,因此也不无歧义的踪迹。

(周发祥)

【悖论说】 悖论(paradox)是指貌似自相矛盾甚至荒谬、但细察却见矛盾双方谐和一致的陈述。它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柏拉图起,就不断有人用它组织警句妙语,其简单形式如“勇敢的懦夫”(这叫作“矛盾修辞”)。它作为一种构思方式,旨在取得新人耳目、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新批评派则把它奉为诗法总则。布鲁克斯(C. Brooks)说,“诗歌语言即是悖论语言”,“只有使用悖论,才能通向诗人要诉说的真实”(《悖论语言》)。从修辞到思维方式,它虽涉及很广,但用于中诗,顺畅无碍。美籍华裔学者罗郁正说,矛盾修辞在中国根本算不上词格,日常用语里就比比皆是,如“大小”、“多少”。诗须对仗后,运用反义复合词已成特色,甚至很早就用以入诗,如“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陶渊明《挽歌诗三首》之一)这是诗语悖论的例子。有些诗句似是信口吟出,实际上纠结着复杂的潜在矛盾,或深刻意蕴,细读之下,便可见出其诗意悖论。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就杜甫写王嫫北嫁之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咏怀古迹》之三)分析说:在杜诗里,琵琶的“胡语”一语双关,每层意思都包含着一种悖论。一方面琵琶曾是胡人的乐器,同其他乐器以及多种乐曲、舞蹈一起,由中亚的行旅带到了中国。在中国,琵琶流传开来,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为乐府歌曲伴奏。因此,提及琵琶很适合联想叙说王嫫北嫁匈奴之行的乐府(以及近“千载”之后的仿作)。由于音乐“语言”为两族人民所共享,即运用和理解它不受民族疆界,这句诗就是悖论性的了。另一方面,这支胡曲又描绘了王嫫不寻常的处境:她虽为汉人,却不得不作为单于的阏氏居住在匈奴。这种举目无亲的异乡环境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变成了一支胡曲。在此,使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悖论性的原因是:这首吟咏王嫫的诗是以汉语而非以“胡语”

写成。该诗最后一联因而巧妙地表现出王嫱自身的悲剧冲突——她外表是单于阏氏(非自愿的),而内心却忠于中华文明(《梅花与宫女》,纽黑文,1976)。由此例可见诗意悖论所含的深沉的感情矛盾和思想冲突。

(周发祥)

【悖论诗学】 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认为,悖论诗学以语言悖论为基础。而语言悖论有正反两种表述形式,即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必要工具,但又说它不能胜任其职;或断言至深至美之物难以用言词来传达,而立论者却用言词作出这一判断。老子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即是一种悖论。庄子亦云,“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这是后代言意之辩的发端。这种思想渗入文学批评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悖论诗学。陆机《文赋序》已知诗学的悖论特质,指出写诗难以尽善尽美,因为现实有不可描述的一面,又以“操斧伐柯”为喻,指出论说诗艺更难做到详尽无遗,因为这要触及写诗之难以尽述所思、所想的性质。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同样承认“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并指出还有“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大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况。在此,刘若愚就其间辩证关系,指明了中国悖论诗学的真谛:“认识语言、诗歌和诗学的悖论性质,并非要顺理成章地放弃语言、诗歌和诗学,恰恰相反,这一认识引导着悖论诗学的发展。”他又强调,这种悖论诗学并非纯粹关于悖论的运用,也并非等同一切诗语皆具悖论性的观点,它“可以概括为言少而意多的原则,其极端形式则是无言而言尽的原则”。他说,唐代以降,不断有人对此做出阐发,如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严羽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等等。甚至诗人也深通此理,李白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诗人以不答而答,显然其感染力比明确回答更强些(《语言·悖论·诗学》,普林斯顿,1988)。

(周发祥)

【反讽说】 反讽在我国是个新术语,英文是 irony,源于希腊文 eironeia;它最早见于柏拉图《理想国》,意近“让人上当的圆滑而卑下的手段”。苏格拉底与人交谈时佯装无知,故意提出貌似寻常的问题,使对方入其彀中,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苏格拉底式反讽”。此外,还有戏剧反讽、宇宙反讽(或称哲理反讽)、浪漫反讽诸类别。英国学者理查兹代表新批评派的反讽观,他声称“反讽在于相反事物即辅助冲动

的引进”(《文学批评原理》)。还有人声称,反讽是诗歌的本质,是诗歌普遍的结构原则;或者明确指出:“所期望的与所得到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所指之间的对照,是反讽效果的基本要素。如果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脱了节,我们就得到了情境反讽。……然而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诗歌特点是陈述反讽,在此字面意义与真实含义形成了对照。”(布鲁克斯、沃伦《理解诗歌》)西方用反讽解中诗者,不乏其例。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说,在王昌龄《闺怨》中有一反讽性戏剧场面:诗中若无第四句,也许会误认此诗是天真少妇的风景小照;换句话说,她也许会真的是个不知愁的女子。但面对翠绿杨柳的一瞥,使她猝然触动埋在心底的愁情别绪,惊得她意识到了周围的空虚,以及天真地置身其间的不幸境况。这有趣的一刹那,即是由于情境逆转而产生的反讽因素的交互影响,和双重和弦的交互影响。如果把最后一句视为反映前三句所建华城丽都的一泓池水,那么这一倒置的画面就完全不成样子了。也就是说,无忧少妇实际上正愁苦满怀,她乘兴攀登翠楼的轻快心情,现在被一种乖时(“春日”)伤情(“凝装”)的心绪压抑下去了;而且杨柳,这个春天、活力和复苏的征兆,反倒在此时使她想起她与丈夫分别的时刻,那时她应该折一段杨柳细枝,送给丈夫作为临别的纪念(《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显然,这属于布鲁克斯和沃伦所说的情境反讽。

(周发祥)

【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 口头诗歌创作研究的一种。帕里-劳德理论又称套语理论(Formulaic Theory),由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及其学生阿尔伯特·劳德(Albert Lord)所创。他们在南斯拉夫做实地考察时发现,远古史诗并非一人所作,而是经过数代口耳相传,不断加工而成。那些口吟诗人多是文盲,自幼跟人学作诗技巧,了解故事内容,熟悉习用的词语(即套语)和连贯故事片断的套路(即套式)。套语帮助他们组织诗行,套式帮助构建整个诗歌。他们一旦独立表演,便能脱口而出,即席吟唱。帕里-劳德理论对西方荷马史诗和其他史诗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它受到普遍重视后不久,西方汉学家就把它移植到了中诗研究领域。移植始于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69年他发表了《中国民歌〈孔雀东南飞〉里的套语语言》(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期)一文,研究的是一部叙事之作。接着美国学者王靖献用来研究抒情诗,写成《钟鼓集》(伯克利,1974)一书,这是迄今所见移用套语理论规模最大、剖析最详的著作。除此而外,还有一些用于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小说研究的例子。《诗三百》有袭用诗句、意匠的现象,这为帕里-劳德理论

提供了试验田。王氏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分辨三百篇的套语与套式,统计套语在各类诗歌中复现的次数。根据统计资料及其分析,他得出如下结论:一、《诗经》基本上属于口头创作;二、它与音乐有关;三、它反映出了从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过渡;四、套语研究有助于确定创作年代的先后;五、西方所说的“套式”与中国所说的“兴”极其类似;六、口头诗歌自有其创作方式、审美标准,不能用书面创作去衡量。王氏将西方的口头叙事诗歌创作理论移用于中国的抒情诗,是个大胆的尝试,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的抒情诗形式短小,创作时诗人可在心内从容推敲,不必像西方吟行诗人那样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参见“《诗经》里的套语”和“《诗经》里的套式”条。(周发祥)

【《诗经》里的套语】 按照帕里所下定义,套语(formula)是指“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习惯用来表达某一特定的基本思想的一组词语”(劳德《咏唱故事的人》)。后来劳德又引出一个相关术语,即套语语句(formulaic expression),是指“建筑在套语型上的一行或半行诗句”(同上)。在《钟鼓集》中,王靖献对套语重新做了界定。按照他的说法,“套语是不少于三个字的一组词语,它们组成语意连贯的单位,重复出现在一首或数首诗内,并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表达一个特定的思想”。他为《三百篇》所划定的套语是下面六种诗句:一、数首诗中重复出现的诗句,如“悠悠我思”、“既见君子”;二、一首诗中重复出现的诗句,如“赠之以芍药”、“滔滔不归”;三、语义相同而字数不一(因配合韵律)的整体重现的诗句,如“我心伤悲兮”和“我心伤悲”、“之子归”和“之子于归”;四、只有感叹词发生变化的诗句,如“乃如之人兮”和“乃如之人也”,或者只有修饰语发生变化的诗句,如“卉木萋萋”和“卉木萋止”;五、义近而字不同的诗句,如“其叶菁菁”和“其叶青青”、“我遗之子”和“我覲之子”;六、义同而字不同的诗句,如“云何其吁”和“云何其忧”、“食我农人”和“食我农夫”。他还补充说,所有这些套语由于与诗句等长,可称作整句套语(the wholeverse formulas);又因基于语义而定,因此也可称作语义套语(semantic formulas)。如果根据句法而定,则可叫作句法套语(syntactic formulas),此即劳德所说的“套语语句”(formulaic expression),是一种带有其他口述文学特点的体系。“它们在韵律和语义上通常关联不多,但在形式上因其两种因素的相对位置一致而有所关联,即一种因素是固定不变的词组,另一种因素是通常为满足叶韵形式而发生变化的词语或词组”。《三百篇》诗句的行韵方式有所不同,其句法套语也就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韵脚在

句末,如“之子于垣”、“之子于归”、“之子于钩”;有的是在句末叹词前,如“之子还兮”、“之子茂兮”、“之子昌兮”;还有的变化因素与不变因素彼此相间,可变者为韵脚,并具有语义价值,如“载渴载饥”、“载起载行”、“载玄载黄”。如果诗人一次接连使用几个套语,这时便会形成“套语团”(clusters of formulas),如《小雅·出车》里的“春日迟迟”、“仓庚喈喈”和“采芣祁祁”诸句,它们表达一种“还归”的愿望。(周发祥)

【《诗经》里的套式】 口头诗歌创作理论术语,指的是“诗歌中重复出现的事件和描述性片断”(劳德《咏唱故事的人》)。这个定义的内涵十分明确,不过人们对它的称述不尽相同,如 theme(主题)、type-scenes(典型场景)、topoi(老套话)、motif(母题)等。它也是口头叙事的一种工具,与套语不同的是,借助它可组成更大的诗歌结构——诗篇。艺人们只有熟记套式,才能延展思路,即咏唱一经开头,后面的语句才能滔滔不绝地涌现出来。王靖献认为,《诗经》里不乏这种套式,如《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等诗里的弃妇怨。它的构成是:一、以“谷风”起兴;二、回忆愿意嫁人育子的初衷;三、前后对比:起初与人守贫,富裕后反遭遗弃;四、叙说丈夫有了新欢,便休了自己;五、叙述自己到田间(或登上山头)去恸哭,并采野菜;六、提起夫妇和谐原则,有时还取譬设喻警告未婚女子(《钟鼓集》,伯克利,1974)。(周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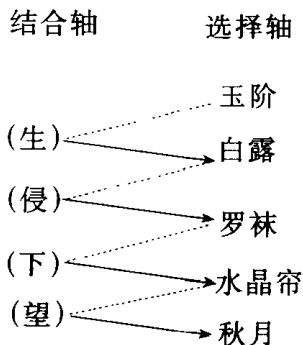
【巴罗克风格研究】 巴罗克(baroque)原指欧洲十六至十八世纪建筑、绘画、音乐、装饰等艺术的风格,后来用于西方诗歌研究。这种风格有多种表现,其总的特点为怪诞夸饰,失衡违常。海外学者把它引入中诗研究后,一面描述中晚唐(有时远及杜甫或五代诗人)的诗风特色,一面试图划出诗史上的巴罗克时期。一般认为,在李商隐诗中,诗语暧昧、藻饰而精细,诗思超脱而怪诞,诗境冲突不宁,色情与理智形成张力,这些均是巴罗克风格的表现。而杜甫两首《绝句》,描写花香景明、时序和谐时,用了许多分析句式——因“迟日”,方见“江山丽”;吹“春风”,才知“花鸟香”;见“泥融”,燕子才匆飞垒巢;觉“沙暖”,鸳鸯才双双安睡……。这种诗风被称作分析式矫正主义风格(巴罗克风格的一种)。也有人认为,韩愈、孟郊、贾岛等喜欢“硬语”和奇喻,是杜甫力求惊人之语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孟郊代表矫正主义风格,他用字省俭,情感强烈,爱好沉思,多用悖论;韩愈则代表鼎盛巴罗克风格,他唱叹恣肆,用语夸张,爱好辩论。关于中国诗史上的巴罗克时期,学者们颇有歧见。一说始于杜甫以新诗风面世之时,至李商隐谢世时为止,前后约有一百来年;一说这个时期约在中晚唐,是唐诗形成期和发展期之后的第三时期——

矫饰期。这些论述见于刘若愚《中国诗艺》(芝加哥, 1962)和《李商隐诗歌》(芝加哥, 1969)、傅乐山(J. D. Frodsham)《中国文学新透视》(坎培拉, 1970)、麦克劳德(Russel McLeod)《巴洛克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期概念》(载《淡江评论》第7卷第2期)和黄德伟《关于中国巴洛克诗歌的界定》(载《淡江评论》第8卷第1期)。(周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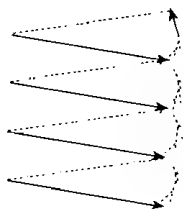
【原型批评】 原型的英文是 archetype, 源自希腊文 architypos; archi 为“初始”、“首例”之意, typos 为痕迹、压痕之意。原型批评为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 Jung)所创。他说, 人类祖先的经验不断以“原始意象”的形式保存在种族的集体无意识里, 世代沿传, 这样的原始意象就是原型。换言之, 原型是“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所公式化了的结果”, “是无数同类经验在心灵上的积淀物”(《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艺术的关系》)。后来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作了修正。他认为“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就是原型, 并引申说: “我以原型指文学作品里的因素; 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种叙事定式, 或是一种思想, 这些因素均可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原型批评用于中国古诗研究, 已见有辨认叙事模式、原型意象、诗歌情调、比较中西有关论说等实例。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认为, 楚辞写巡游时依次列举天下地名的做法, 即“宇宙式”手法, 是一种原型叙事模式。它源自巫术和宗教, 而与诗人的宇宙观有关系。《离骚》中的巡游不怎么明确, 依稀是沿太阳西行路线。而《远游》中的巡游路线, 则明显构成了一个对称的图案式宇宙, 堪与当时铜鉴背面的宇宙图饰相比。这种手法还见之于汉赋(《求宓妃之所在》, 载《大亚细亚》第13卷)。美籍华裔学者缪文杰发现唐代边塞诗中多有运用原型意象的实例。他指出, 这些诗篇象征优美, 诗意遒劲, 词句淳朴, 体验深切, 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如果从原型意象角度加以体察, 还可以窥见它们之所以长久感人的深刻原因。边塞诗往往一面写边陲, 一面写长安, 其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而这种张力即存在于原型结构的因素之中。例如, 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一诗将“故园”与“战场”并置; 另一首《逢入京使》, 则将“故园”与代言人的忧肠寸断和“漫漫”长路并置。这些互相反衬的意象, 潜在着“死亡—再生”神话原型。因为在第一首里, 虽说菊花正在开放, 不过是“傍战场”而开。诗中代言人准备享受这一美景良辰, 但其心情很快就沮丧起来。这首诗的情调似乎是一种压抑的热情。在第二首里, 代言人的境况与遥远的“故园”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则变成

了可怜巴巴的嘲讽: “凭君传语报平安”。“荒漠”是另一种原型意象, 在边塞诗里, 这种意象经常故意用来与“花园”意象互相对照。这种对照涉及艰苦与舒服, 寒冷与温暖, 刺目与柔和的色彩, 衰落(秋)、死亡(冬)与复苏(春)、鼎盛(夏)。它们分别代表着胡疆和唐土两个不同的世界。正是运用诸如此类的原型意象, 使边塞诗的感情色彩固定化了(《唐代边塞诗: 原型批评实践》, 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周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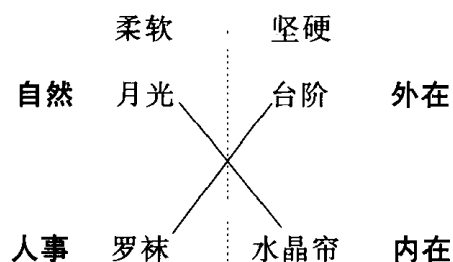
【结构主义研究】 结构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 是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种学科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 中经布拉格语言学派进一步开拓, 至六十年代法国诸家(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德雷达、克莉思特娃等)的新作纷纷问世而臻于鼎盛。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七十年代中期已开始衰落, 而作为一种方法论, 却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结构主义的要义是, 视语言为文学作品的表层意义的传达媒介, 认为其下隐藏着借成规而形成的深层系统, 它体现着文学与社会、与人生的深刻关联。因此, 结构主义学者总是将作品的表层因素(词语、意象、母题、音韵等)拆解开来, 重新组成某种模式或体系, 以之阐明潜在意义。旅法学者程纪贤关于李白《玉阶怨》的剖析, 是以结构主义研究唐诗的例子。他说, 这首诗的大意很简单: 夜间, 一位女子宫阶前等待恋人, 经过很长时间, 他没有来。由于心灰意冷, 夜寒袭人, 她退回屋内。她在此继续等待, 透过水晶帘, 向明月吐露自己的心愿和悲伤。但诗中的叙事因素无非是几个中性的行为动词, 而描写诸如孤独、灰心、悲伤、盼望重逢等情感的词语一概不见。诗中的主角也被省略了, 读者可以从内部体验这个人物的情愫。诗人通过一系列意象(即“玉阶”、“白露”、“罗袜”、“水晶帘”和“秋月”), 创造了一个紧凑的世界。其中, 事物的线性发展维持在隐喻层次上。所有意象都代表光亮或透明之物, 给人以规则地由此生彼的印象:



这是个单行的线性进程,但最后的意象“秋月”可以通过其他意象,与第一个意象“玉阶”联系起来:



“秋月”给每个意象以充分的光亮,即给它们以充分的意义。月光照射在空荡荡的“玉阶”上,加重了诗中令人伤感的气氛;而那种往复循环、无休无止的运动,也只能强化主人公内心里驱之复来的烦乱思绪。程氏还认为,这一线性发展中的纵聚合组织,还可在意象层次上证明雅可布森所谓的从选择轴向组合轴上的投射。诗人巧妙而精细地使语言功能扩而大之,空间层面于是被引入了时间秩序。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象,仿佛“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了诗意:



上述让意象自由“发挥作用”的方法,是结构精简的首要条件,而这,又是把内外远近之物以及主体与客体统一在一起的结构。内在世界使自己向外投射,同时外在世界变成了内在世界的符号。“玉”既是台阶,又是女人的肌肤;“露”既是夜间的寒意,又是女人的愿望;“玲珑”既是女人凝望明月的面孔,又是透过水晶帘幕所见的明月。那轮既作为遥远存在又作为内在情感的明月本身,每遇到一个物体,就无不使之产生新的意蕴。中国古代诗人对夜间十分敏感,月亮是他们喜用的最基本的象征之一。通过保持原始律动的符号的介入,这首诗揭示了一个神话般的、物我交往的月夜的秘密(《中国诗歌的写作》,巴黎,1977)。

(周发祥)

【诗之时空辨析】 诗歌咏唱自然与人生的荣衰兴替,体现着时间和空间观念。诗歌意象以时空为存在条件。空间较具体,直接诉诸诗人感官;时间则较抽象,往往借空间来表达。海外学者对中国时间观的特点、时间观的产生、以及时空之间的依存关系,均多所探讨。(一)中国诗人的时间观。香港学者何冠骥认为,诗人受宗教和哲学的影响,或者相信万事万物依照循环模式而运行,时间亦周而复始,或者相

信时间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中国诗人面对时间流逝,每每流露出哀伤与悲观心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叹息过去不堪回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哀痛今昔沧桑之变;而《将进酒》(李白)之类,则在伤时之余,提倡借酒浇愁,及时行乐,求得暂时解脱。至于未来,诗人有时也感到微茫难测:“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李商隐《马嵬》)。这些喟叹与西方诗歌大异其趣,如华兹华斯视往昔为欢乐,雪莱寄幸福于老年、甚至死亡。中国也有少数诗人完全投入自然而超脱时间的羁绊,如陶潜、王维(《中英诗中的时间观念》,载《中外文学》第10卷第7期)。(二)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产生。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认为,在先秦“时”字含义非一,或作“是”解,或指季节、时机、场合。惟在屈赋之中,它明确等同于现代的“时间”概念。《离骚》多用“朝”、“夕”、“日”、“月”、“春”、“秋”、“年”、“岁”等字眼儿,以无穷而流动的时间,描写人生如寄,万物不常,并体现诗人无畏地抗争,欲在须臾人世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追求。“诗之时间”即如此诞生出来,它经过抗争的洗礼而得纯化,其特征已被铸造成诗歌意象(《论时:屈赋发微》,载《清华学报》1973年6月)。(三)时间展望方式。美国学者刘若愚认为,中诗有三种时间展望方式,即个人性的、历史性的和宇宙性的。个人性展望如贺知章《回乡偶书》,常常涉及房舍、花园、道路等意象;历史性展望如陶潜《咏荆轲》,常常涉及城市、宫殿、废墟等意象;宇宙性展望如李贺《浩歌》,常常涉及河流、山岳、星辰等意象。也有两两结合者,如杜甫《旅夜书怀》、骆宾王《渡易水送别》,或者全部结合者,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中国诗歌里的时、空、我》,载1979年《中国哲学报》)。(四)巧妙的诗歌瞬间。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认为,中诗有一种对照连续事件而不依次叙写的特殊手法。诗人只须占一恰当位置,无须置身于时间之流,便可达到既瞻前又顾后的目的。王维《田园乐》(之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即是一例。诗中昼与夜、雨与晴、枝头着花与花瓣飘落、败英落地与扫去残花、以及山客的眠与醒,两种因素相映成趣。诗歌瞬间因依附过去曾有但未得延续的事物,展望必将发生却尚未来临的事情,而维持着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精巧平衡(《梅花与宫女》,纽黑文、伦敦,1976)。(五)时空转化。古添洪认为,感官对空间特别敏锐,而心灵则可体验时间的存在。“秦时明月汉时关”句中,“明月”和“关”指明诗人所处现实,它们占有空间,却又联系着历史,空间遂置入时间之流。

这一时空交互作用的意象,具有物是人非的美感(《写实心态与即物手法的传统》,载《比较诗学·现代诗》,台北,1976)。刘若愚也认为时空均可借对方来表达。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句,“处”字使行到水源的时间空间化,“时”字使人、云间的空间关系时间化(出处同上)。

(周发祥)

【诗境记】日本平安时代大江匡房著。作者是最早的中诗研究者之一。此书首述诗歌本质与起源,接述先秦至唐五代诗史,再述日本汉诗发展大略。书中多引《诗大序》、《史记》、《文选序》等著作,叙及中日诗歌演进时,采取调和折衷态度,视中国诗史为本国之事。

(王晓平)

【补闲集、续补闲集】高丽中叶汉诗人崔滋著。两书在高丽诗话中占有重要地位。崔氏论诗,以气、骨、意、格、辞为主,谓学诗,“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标举诸家,采用摘句指篇之法,称述多为唐宋诗。评诗则以“新奇绝妙、逸越含蓄”、“俊迈”、“豪壮”、“雄浑古雅”为上品。

(王晓平)

【淡窗诗话】日本江户后期广濑淡窗的汉诗理论著作。淡窗论诗,大抵是融合清代中叶各家诗说。他肯定诗歌的讽谏、教化功能,强调诗出于情,诗可以排遣忧思,陶冶情感。他指出,“诗无唐宋明清”之分,各代均有其佳境,可“从己之所好”而取之。他还主张,学诗者贵在蓄养才识,“养才在于推敲锻炼,养识在于熟读古人之诗”;而且,读者学诗,应以唐诗为范本,“于中、晚唐之中,择其隐秀之诗,朝夕讽刺讽咏之”。

(王晓平)

【汉文诗解】中诗概论。英国汉学家德庇时著。原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议录》第二卷,1929年于伦敦刊印单行本。英文名为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封面顶端有楷体“汉文诗解”四字,下有同义之拉丁文书名。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解中诗作诗法,指出西人应予关注的六件事:语音性质及其入诗的适用性,语调和重音的规律性变化,诗歌韵律的运用,尾韵的运用和对仗诗句的效果;第二部分讲解使上述表面形式充满生气的诗质、诗魂,并与西方诗人两相比较。文中选有《诗经》篇什、《三字经》片断、唐诗、清诗,乃至小说(如《好逑传》)中的诗歌。此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曾多次重刊,考狄尔(H. Cordier)《中国书目》均有著录。

(江原)

【诗经(德译)】译者为德国诗人吕克特(F. Rückert, 1788—1866)。1833年于阿尔托纳出版。吕氏接受哲学家黑格尔的建议,以来华传教士孙璋的拉丁文译本(1830年刊行)为底本,转译成了德文。译者基本按原译编次,但也据主题做了归拢,并给长

诗划分段落,添加标题。此书在德语世界颇受欢迎,有人认为,“他恢复了《三百篇》的诗歌魅力,使人读之感到愉快”(塞尔登《1773—1833年间德国诗歌里的中国》)。

(江原)

【唐诗(法译)】最早的唐代诗人法译合集,1862年于巴黎出版。选译者是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全书选诗人三十五家,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等。编次并非以诗人生年早晚为序,李杜选诗最多,置于卷首。李诗选二十四首,杜诗二十二首,其余诗人则一至五首不等。译诗前附有作者生平和诗作介绍,李杜介绍尤详,且有李白饮酒图一帧。序言《中国的诗歌艺术和韵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重在介绍中诗的发展,由《诗经》叙至《离骚》、汉赋、六朝诗和唐诗;后一部分由汉字入手,讲解唐前诗体(如四言、楚歌)和唐代诗体(如绝句、律诗)的韵律。此书于1977年再版。今人薛爱华(E. H. Schafer)称:“他百年前的这些译作,与当今美国学者的唐诗佳译相比,也毫无逊色,甚至要好过许多译本。”

(江原)

【玉书】中诗选译。1867年于巴黎出版。译者“朱迪特·瓦尔特”,系法国女学者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的笔名。她年青时,师从旅法华人丁敦龄学习汉语,决意翻译中国诗歌,因此初版有“此书献给/中国诗人丁敦龄”的题词。全书以主题编次,辑有言情诗、咏月诗、咏秋诗、咏酒诗、宫廷诗、咏战诗、行旅诗、怀人诗八类,总计百余首。言情诗四十二首,为数最多。所选诗作从《诗经》至近代,涵盖极广,也颇具匠心,大概有丁氏相助。但奉丁氏为诗人,并选入丁诗,后人有所诟病。译笔自由灵活,常常增添意象,制造戏剧性场面,甚至被人称之“伪译”。此书较少书卷气,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曾再三重刊,对西方象征派、意象派产生过一定影响。

(江原)

【诗经(英译)】《中国经典》之第四卷。理雅各译。1871年于香港出版。译本附长序、注文。“序论”约二百页,设五章,分别介绍《三百篇》的采编、流传、内容、版本、笺注、传序、格律、音韵以及地理、政区、宗教等背景知识。译文系无韵散译,文句简明、晓畅。译者自称,译笔“尽可能贴近字面”,“不增译,不意释”。译诗附注,亦广涉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书中部分译诗,后来收入缪勒所编大型丛书《东方圣书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晚清文人王韬的帮助。这个译本被视为《诗经》西译的范本之一,1961年和1967年先后在香港、纽约重刊。

(江原)

【中诗英译】历代诗人选译集。翟理斯译。1898

年于上海出版。1923年与中国散文选译勒为一集,袭用散文卷之名——《中国文学瑰宝》。合刊本选诗有所扩充,上起《诗经》,下止晚清(如秋瑾),收诗人一百三十余家。各代入选诗人比较均衡,粗具诗歌发展史轮廓。大多诗人名下有简短介绍,便于读者解诗。译者以诗译诗,行韵讲究,别具一格,但已不合现代读者口味。(江原)

【中国诗歌的全盛期】副题标明此书为“汉代至六朝”诗选。德国学者佛尔克选译。1899年刊于马格德堡。译者虽云“汉代至六朝”,实则选有李白诗。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如书名所示,包括两汉、魏晋和南朝诗歌;第二部分包括民间歌谣和无名氏之作;第三部分包括或实或虚的叙事诗;第四部分是李白诗选。此书问世较早,且刻意精选,在德语世界有一定影响。(江原)

【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美国美学家费诺罗萨(E. F.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墨,后由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整理发表,1919年首刊于《小评论》,1936年以单行本面世。本文费氏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特点,详细推阐汉字诗学。此文对西方现代诗派影响巨大,甚至波及中诗英译。由于费氏忽略了六书造字的原则,在学术界,他的论点多遭非难。(江原)

【神州集】中诗英译。选诗属唐前与唐代诗作。艾兹拉·庞德译。1915年于伦敦出版。庞氏不懂汉语,其所本为费诺罗萨遗稿。译笔灵活,且常有增删,追求新颖的诗歌效果。此书甫出,即引起轰动,但学界褒贬不一。有人为之欢呼,认为《神州集》诗篇乃极美之物,诗当如何,它们便如何;艾略特(T. S. Eliot)进而称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者(the inventor)”;汉学家则多半指明译者为数众多的误译,并加以订正。叶维廉《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1969)一书,对庞氏英译辩说甚详。(江原)

【汉诗百七十首】历代诗歌选译。亚瑟·韦利译。1918年刊于伦敦。卷首附导言、翻译方法、诗人简介。全书共分两编:第一编自《诗经》、《楚辞》至明代陈子龙,选诗占半数稍强,第二编皆选白居易诗。白诗之多,实为罕见,有人评曰:“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钱锺书《谈艺录》)不过此书在欧美流传甚广,当年即出修订版,至1946年,已出第十二版。在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中国诗歌》(1939)中,有七首根据韦氏译本而转译。另有十餘首,先后由乐坛名家被之管弦,供歌手演唱。(江原)

【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中诗研究。葛兰言

(Marcel Granet)著。1919年刊于巴黎。书中设“《诗经》里的爱情诗”和“古代节日”两部分。前者“如何读古典”一节,涉及中外《诗经》学,而“乡村主题”、“村民之爱”和“山川之歌”,讲述《国风》母题和涵义,以及《诗经》的创作方式;后者为民俗研究,诸多结论亦证之以诗。1932年,葛著有英译本问世。(江原)

【松花笈】中诗英译集。艾斯库(F. Ayscough)和洛厄尔(Amy Lowell)合译。1921年于纽约出版。艾氏年青时来华,久居中国,知中文,爱古诗,而洛氏是意象派诗人,并不通晓中文。在合作中,前者选诗,并译出初稿,寄回美国,交后者润色。此本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产物,在西方有一定影响,曾在1973年重刊。(江原)

【诗经研究】诗学论著。诸桥辙次著。1925年由目黑书店刊印,现收入《诸桥辙次著作集》第二卷(1976)。全书分序论、本论两部分。序论三章,分述中国本土思想、当时的社会、家族;本论四章,依次解说《诗经》概况、《诗经》之为经、史、文。书中还有所论诗集与日本《万叶集》的比较研究。(王晓平)

【玉山】《唐诗三百首》英译本。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合译。1929年初刊于纽约。此集原本平易近人,家弦户诵,兼之中西合作,译笔准确,用语雅驯,甚得读者喜爱,1964年再次刊印。(江原)

【英译中国歌诗选】中诗英译辑本。英国骆任廷(Sir James Lockhart)编辑。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于上海印行。关于编书缘起,张元济在序中说:骆君“旅华多年,精通汉学”,喜欢介绍中国文化。他“归国后,悠游林下,尝以吟诵汉诗自娱。深知吾国诗歌,发源甚古。其体格之递嬗,与夫风调之变迁,凡不失兴观群怨之旨者,多足媲美西土。亦极思荟萃佳什,广其流传”。集中所选,取自翟理斯和亚瑟·韦利的旧作,即翟氏《中国文学瑰宝》、韦氏《中诗百七十首》、《庙及其他》和《中诗英译续编》,系先秦至唐宋诗歌。(江原)

【中国文学选萃】诗文合集法译本。马古礼(G. Margoulière)编译。1948年于巴黎印行。所选由屈原至林纾,凡二百余家,遴选精当,富代表性。译本序言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史,轮廓鲜明,叙述准确。(江原)

【诗经注释】训诂学著作。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1946年刊于斯德哥尔摩。此书原为期刊文章,连载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后来哀集成册,为其《诗经》英译(1950)的姊妹篇。高氏参照《诗》内诸篇和先秦古籍,确定诗字真义,再由字义

推句义、推篇义。在序言中,他批评传统学者妄生美刺,也批评西方汉学家不辨是非而袭用古人。西方咸认,此书是《诗经》研究的要籍;而在1950年,我国亦有中译本问世。(江原)

【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诗人评传。亚瑟·韦利(A. Waley)著。1949年刊于伦敦。全书包括前言、正文(十四章)、附录(两篇)、注释和参考资料。著者声称,此书只写历史,既不虚构事件,也不虚拟思想。正文诸章,分别叙述传主的生平与交游、唱酬与创作,以及白诗类型、白诗所含的政治、宗教、音乐、舞蹈等因素。其中个别章节,曾先在期刊(甚至包括德文期刊)上发表。此书于1957年再版,1960年译为日文在东京印行。(江原)

【文赋(英译)】休中诚(E. R. Hughes)译。1951年刊于纽约。此本印刷和装帧俱佳,卷首有理查兹(I. A. Richards)所撰前言。译文分作六部分,后附四篇译文或简说,包括曹丕《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首篇。(江原)

【杜甫】诗人译研。洪业著。1952年刊于坎布里奇。此书为两卷本,一是杜甫评传,一是杜诗英译。评传部分设引言、结语和正文(共十二章),均以杜诗诗句为题,依次叙说传主生平,如家世、壮游、求官、罹乱、寓蜀、漂泊等等。所选杜诗,共三百七十四首,以自由诗译之,信实而可读。译诗附有大量注文,对于僻语、难句、典故、史实,无不详加说明。这一著作,被认为是对西方汉学的巨大贡献,1969年于纽约重刊。(江原)

【宋诗概说】诗学论著。吉川幸次郎著。1952年由岩波书店刊行。全书设有序章、正文、跋、以及所附的年表、地图。正文六章,以时间为序,分别是“十世纪后半期”、“十一世纪前半期”、“十一世纪后半期”、“十二世纪前半期”、“十二世纪后半期”和“十三世纪、南宋末期”。作者试图阐明:诗歌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宋诗与生活的联系,宋诗的叙事性、哲理性,宋诗的艺术特色,唐宋诗歌的异同,及其在日本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等问题。本书是作者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王晓平)

【林和靖】诗人译研。珀尔伯格(M. Perleberg)著,1952年刊于香港。作者在前言中说,林诗既美且雅,但西人几乎不知,而林诗之美,美在写景,西湖秀色,流于笔端。因此,此书从《林和靖诗集》选译七十餘首,按咏梅、咏春夏秋冬四季编次。正文前,有关于诗人和杭州的介绍。(江原)

【《诗经》诸篇形成之研究】诗学论著。松本雅明著。1958年由东洋文库刊印。作者试图以“兴”的演变,结合社会层面的考察,判明《三百篇》成于何

时。而且他采用法国学者葛兰言的做法,亲赴日本南部奄美大岛,考察那里的原始歌舞和民谣,以异文化作为旁证来研究《诗经》。(王晓平)

【文心雕龙(英译)】译者施友忠。1959年刊于纽约,1970年于台北刊行中英文对照本。译序设置“刘勰之前文学批评的发展”、“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节,叙说较详。当时尚无汉语语体译文和日语译文,因此颇受学人重视。(江原)

【楚辞:南方的歌】中诗英译。霍克斯(David Hawkes)译。1959年刊于牛津。此本为《楚辞》首次西译,注释或详或简,既适合一般读者,又适合专家和学者的口味。译者采用闻一多等人的研究,对原文做了一些校勘。(江原)

【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其时代】诗学著作。杜克义(Ferenc Tökei)著。1959年初刊于布达佩斯;后来作者译成法文,1967年于巴黎出版。全书共有十二章,分述周代社会,铭文,《书经》,史诗,抒情诗,屈原的时代、生平及影响,《楚辞》名篇,悲歌理论等等。他认为,《离骚》介于史诗和抒情诗之间,是一部杰出的悲歌作品,标志着一种新诗体的诞生。(江原)

【楚辞研究】诗学著作。星川清孝著。养德社1961年刊。本书序言探讨屈原的伟大、《楚辞》文学的本质。正文分两编:前编辨明《楚辞》的名实,探讨诗体特点、诗句形式;后编解说诗集的文学性,剖析《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并讲述屈原及《楚辞》对后代的影响。(王晓平)

【中国诗艺】诗学著作。美籍华裔刘若愚著。1962年刊于芝加哥。全书分三编。第一编“汉语作为诗歌表现媒介”,讲解汉字结构、诗语特点、韵律类型和常见诗旨;第二编“中国若干传统诗观”,介绍说教观、表现观、技巧观和直觉观;第三编“综论”,多半是申述己见,指出诗乃境界与语言的双重探索,分析意象的种类与构成,辨别意象和象征的作用与区别,阐明引语、典故和对仗的诗歌效果。有人认为,这本书在中诗西播日渐活跃之时面世,是为了更真实地向读者描绘中诗面貌(傅汉思语),因此得到学术界普遍的好评。(江原)

【沧浪诗话(德译)】德博(G. Debon)译。1962年刊于威斯巴登。此书导论占较大篇幅,介绍历代文论的要点、所译诗话的内容,正文注释也颇为详尽。此书影响已超出德语世界。(江原)

【中国古诗选】历代诗选法译本。由戴密微主持,多人合作编译,戴氏并撰写序言,润色全部译稿。1962年于巴黎出版。选诗以朝代为序,从《诗经》到

清代朱彝尊,凡二百馀家,三百七十馀首。书名中的“诗”字,取其广义,因此选有少量词、曲作品,但未选辞赋(尽管法国有人称赋家为诗人)。所选大多是名家、名作,虽博而精,较能准确反映中诗风貌。诗集序言叙及中诗地位、诗语特征、诗词韵律、诗史梗概、西播概况等等,具有导读性质。此书是法国汉学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江原)

【**汉魏六朝诗选**】 中诗英译集。澳大利亚傅乐山(J. D. Frodsham)和程曦合作编译。1967年刊于牛津。选诗自苏武至庾信,五十多位诗人,一百六十馀首,遴选细致,富代表性。名家如曹植、阮籍、陶潜、大小谢等,占较大比重,另有一些诗人之诗为初次英译,填补了西方中诗研究的空白。(江原)

【**中国古诗探源**】 副题“汉代抒情诗研究”,《通报》专题论文第四种(莱顿,1968),作者桀溺。全文分五章:第一章“民歌的采集”;第二章“音乐理论和音乐消遣”;第三章“汉代抒情诗兴起的条件”;第四章“乐府的职司”;第五章为例诗译解,选诗十五首。此文可视为作者《古诗十九首》译注本(1963)的续篇,前本结论中一些语焉未详的问题,此文有所阐发。(江原)

【**陶潜诗**】 中诗译注。海陶玮(J. R. Hightower)译注。1970年刊于牛津。译出陶诗一百二十九首(疑有他作阑入),并有词语、典故注释和诗旨、诗艺品评。傅汉思认为,无论是译文还是评论,质量均佳。(江原)

【**诗经**】 诗学论著。特威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威廉·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著。1971年于纽约出版。全书分“主题”和“风格”两编,十六个专题。上编交代《诗经》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如仁、义、道、德、无为以及战争、分别、爱情、行乐等等;下编诗体形式、意象构成、修辞技巧等。(江原)

【**兰舟:中国女诗人**】 历代女诗人诗作选译。王红公(K. Rexroth)、钟玲合作编译。1972年于纽约刊行。所选诗歌自东周何氏(韩凭妻)至今人李菊(事见1958年《中国妇女》),凡五十二家,包括蔡琰、鱼玄机、薛涛、李清照、朱淑珍、秋瑾等。词作占一定比重。书末附选诗注解、诗人简介、参考书目等。古代女子地位低下,其诗多写所遭不幸,编译者于简介中一一说明。诗、事相照,凄恻动人。(江原)

【**王维诗之画意**】 程曦、卫鲁斯(Henry W. Wells)合译,程曦作画。1974年刊于香港。程氏认为:“诗画咸出性灵。唐贤于二事并能造微入妙者,必以摩诘为最著。”但“惜其画后世罕觐”,故在卫氏函勉之下,“试作画附于诗后”(译本序)。书中选诗五十首,皆为叙写辋川美景、塞上风云、田园乐趣、山居闲眺

之作。此本诗情画意,交相辉映,景中情致,味之不尽。(江原)

【**葵晔集**】 副题为“中国诗歌三千年”。大型古今诗选英译本。柳无忌、罗郁正编选。1975年刊于纽约。译者逾五十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名家占一定数量;选诗约千首,依次分作六个部分,有许多诗歌属首次英译。译竣后,每首诗至少有三人对照原文查对,以求葆真。因译者甚众,不免有良莠之别。导言长达六十五页,对中国诗语、诗律、诗史等有所说明。(江原)

【**龚自珍**】 诗人评传。特威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王雪林(译音, Suirleen S. Wong)著。1975年于波士顿出版。全书除前言、年表、书目等附文外,正文设六章。分别讲述诗人的时代与生平,他所喜用的象征、意象、主题与表现手法,其名作《己亥杂诗》,龚氏词作,以及诗人的遗作与影响。(江原)

【**诗歌和政治:阮籍生平与作品**】 诗人评传。侯思孟(Donald Holzman)著。1976年刊于剑桥。饶宗颐题词曰,是书“疏理邃密”,“言之务尽”,若“阮公有灵,自当惊知己于千古也已”。正文凡十一章,分别题作“魏初众王”、“东平”、“退争避谤”、“不守缚礼”、“申儒与解老”、“社会与孤独”、“不朽之女”、“追求长生”、“玄学”、“《大人先生传》”和“诗歌”。书中有《咏怀诗》的全译或节译。(江原)

【**杜牧抒情诗**】 中诗译研。顾彬(Wolfgang Kubin)著译。1976年刊于威斯巴登。全书分“理论”和“译注”两编。上编设八节,依次讲述“中国九世纪上半叶的政治背景”、“杜牧生平”、“杜牧作品及其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历代杜牧观与研究目的”、“诗人的政治意识”、“历史观及其与艺术的联系”、“作为高级现实的自然观”和“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下编设三节:第一节是“德译说明”;第二节是杜诗德译,选诗七十馀首;第三节是杜牧传记的德译,原文取自新旧《唐书》。(江原)

【**梅尧臣和宋初诗歌的发展**】 诗学论著。东方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haves)著。1976年刊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著者曾得到夏志清、华兹生(B. Watson)、狄百瑞(W. T. deBary)等名家以及京都大学日本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他指出,关于梅尧臣,西方读者多所不知。因此开宗明义,且交代全书框架:第一章“生平”,简述传主一生,并证之以梅诗;第二章“背景”,交代梅氏之前宋诗的发展;第三章“反应”,描述梅氏、欧阳修、石介对前期宋诗诗风的反应,并辨认启发梅氏灵感的诗人;第四章“理论”,着重讨论梅氏的“平淡”一语;第五章“实践”,评注梅诗,强调其写实性的重要

意义。

(江原)

【古诗十九首(英译)】 何沛雄译。1977年刊于香港。此本为通俗读本,每首诗均有简说、中文原文、英文译文和注释。卷首援引《诗品》、《诗薮》和《古诗归》,以提领全书,卷末则附多家评语。

(江原)

【自然诗】 诗体专论。张心沧著。1977年于布里斯托尔出版。此书以“自然诗”兼指“山水诗”和“田园诗”,叙及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和柳宗元五位诗人。

(江原)

【中国诗歌的写作】 中诗译研。程抱一著译。1977年于巴黎出版,后在1982年由唐纳德·里格斯(Donald A. Riggs)和杰罗姆·西顿(Jerome P. Seaton)译成英文。此书一半为论说,一半为译诗。论说占较长篇幅,设有“导言”、“被动程序”、“主动程序”和“意象”四部分。其内容涉及汉字、书法、绘画与中诗的关系,中诗语法的特殊效果,中诗韵律的动态结构,以及中诗意象的隐含意蕴。作者享有诗名,因此其法文译诗明丽流畅,清新可读。

(江原)

【初唐诗】 诗史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1977年于纽黑文出版。作者自称此书是“中国文学史试探”,但更像译诗选集。全书凡五编,二十五章,各章由三四页至三四十页不等。第一编交代宫体诗及其抵制意见,第二编分析初唐四杰,第三编专述陈子昂,第四编介绍武后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第五编讲述张说和向盛唐的过渡。我国有中译本行世。

(江原)

【元稹】 诗人评传。特威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美籍华人荣之颖(亦作容芷英)著。1977年刊于波士顿。书中有《社会、政治背景》、《生平述略》、《政治改革家》、《文学创新家》、《诗歌天才》、《传奇作者》和《结语》七章。关于元白,有些学者持不确观点,作者有所辨证。

(江原)

【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 日本江户时代刻本总集。1978年影印出版。所辑近五十种,如《诗纪》、《古诗大观》、《六朝诗选俗训》、《御览诗》、《唐诗鼓吹》、《金诗选》、《元诗钞》、《明诗正声》、《明九大家诗选》等。原本大多是中国历代所编诗集,但亦有为日人所编者,有些属珍贵善本,于古籍整理、版本考证、诗文校勘,均有参考价值。

(王晓平)

【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 论文集。缪文杰编。1978年于旧金山出版。撰稿者多为名家。所辑论文凡十篇,它们是:缪文杰论宫体诗、叶嘉莹(和沃尔斯)论钟嵘《诗品》、余宝琳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欧阳桢论世界和诗思中的自然、宇文所安论唐代赞美诗、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从语言学角度考证

寒山所处的时代、詹玛丽(Marie Chan)论高适的《燕歌行》、废林(M. B. Fish)论李贺诗集中的杜牧序和李商隐序、施米特(J. D. Schmidt)论杨万里的“活法”以及林理彰(R. J. Lynn)论明清两代的元诗观。编者在前言中说,这部文集反映出英语读者对中诗性质和理论的理解的深化。

(江原)

【高适】 诗人评传。特威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詹玛丽(M. Chan)著。1978年刊于波士顿。书中设五章,分别是“诗人生平”、“文学背景”、“诗旨主要类型概述”、“边塞诗”和“若干形式和风格特点”。所涉高诗,书末有附录列出。

(江原)

【云游集】 三袁诗文选译并注,译者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haves),1978年刊于纽约。书中导言以“袁宏道和晚明世界”、“袁宏道论文学”和“文人袁宏道”为题,介绍有关的背景知识。译文分四部分:“袁宏道的诗”、“袁宏道的文”、“袁宗道的诗”和“袁中道的诗文”。译文采用美国英语,且为口语,方便普通读者。

(江原)

【孟浩然】 诗人评传。特威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克罗尔(P. W. Kroll)著。1981年刊于波士顿。著者专攻唐代文学,编辑《唐学报》。他指出,虽然公认孟浩然是唐代重要诗人,但只有少数孟诗播于人口,因此,本书旨在对诗人及其诗作做比较全面的介绍。其重点在写襄阳风光、旅游见闻、诗友往来、远离尘嚣、超然物外等内容。

(江原)

【盛唐诗】 诗学著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1981年于纽黑文出版。正文设上、下两编,并附序言。上编九节,讲述盛唐肇始和第一代诗人,包括王、孟、李、高等人;下编七节,讲述第二、第三代诗人,包括岑、杜、元、韦等人。论者强调,不应以李杜总揽盛唐,而应以盛唐的文学特点去理解众多天才。他提出“京都诗”(capital poetry)一语,并分析其渊源、风格和流变。阐释中多有译诗,且时见佳译,但亦有误译或冗译。

(江原)

【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诗论著译(据博士论文排印而成)。魏世德(J. T. Wixted)著译。1982年刊于威斯巴登。书中提供元氏《论诗三十首》的全部译文,并作详注和说明。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论诗诗最为难懂,须细察每首欲明之旨,须辨明所受前人成说的影响。

(江原)

【中世早期的中国诗:王粲生平和诗歌】 诗人专论。缪文杰著。1982年于威斯巴登出版。全书分四章,附前言、中诗原文和书目。第一章介绍王粲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第二章叙述传主的生平;第三章赏析王氏的五言诗;第四章讲解王氏的赋作。前言提供诗史和诗论背景,言简而意赅,有利于理解正

文。

(江原)

【李贺诗集】 中诗英译。傅乐山(J. D. Frodsham)译。1983年于旧金山出版。此书为译者早年译本《李贺诗》(1970)的增补本。编次依照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本》。译本附“前言”(解说中外李诗研究的新进展)、《杜牧序》(英文译文)、“序言”(介绍诗人生平与著作)、以及“译者说明”(主张以诗译诗)。

(江原)

【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 文论选译。黄兆杰编译。1983年刊于香港。所选文章包括《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与杨祖德书》、《文赋》并序、《文章流别论》、《翰林论》、《宋书·谢灵运传》、《诗品序》、《文心雕龙》《神思》和《序志》篇、《与湘东王书》和《文选序》,凡十三篇。译者主张“一代应有一代的翻译”,注重译文质量。

(江原)

【曹植及其诗歌】 1983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影印流传。高德耀(R. J. Cutter)著。全文分六章,并有导言,书末附书目、《三国志》所载曹植传及其引退故实。正文依次剖解曹植的创作环境和诗歌艺术,曹氏即景、抒闷、赠别、行旅、游仙、报效、咏美、言史之作,和他的文学理论。

(江原)

【谢灵运:孤独的山水诗人】 诗学论著。小尾郊一著。1983年汲古书院出版。本书前编《谢灵运的一生》,力求阐明谢氏其人的生活态度、宦途蹭蹬后转向山水的孤寂心情;后编《歌唱山水的诗歌》,重在分析诗人的赏山水之心、歌山水之诗、以及名诗名赋中的写景与抒怀。

(王晓平)

【陶渊明:作品及其涵义】 诗人译论。戴维思(A. R. Davis)译。1984年刊于剑桥。译者认为,“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是中诗传统伟大力量之所在”(序言)。本书分两卷印行:前卷是陶诗英译和评论,后卷包括附加的评论和注释,以及诗人传记。关于古今的陶诗研究,译者多持异议,因此添加副题,提醒读者,并列出自己的看法,供学界参考。

(江原)

【清代诗学之发展】 诗论研究。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刘渭平著。原为期刊文章(连载于台湾英文期刊《中国文化》,1985—1987),后裒辑成册。主要介绍清代四大诗说——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而于诸说渊源、清初和清季诗论,亦有所考察。

(江原)

【六朝诗】 诗人诗作评论。孙康宜著。1986年于普林斯顿出版。所论诗人共有五位,分五章加以评述。著者认为,陶潜恢复了《诗经》的抒情口吻,而谢灵运培植了描述型山水诗;鲍照受赋的影响,写景多用意象,并趋于细描;谢朓写景则转为内向,描写对象是宫廷和御园;及至庾信,宫体兴盛,但他的诗

赋更多家国之思、历史之感。各章还涉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诗作和诗论。

(江原)

【元明清诗选】 中诗英译。狄百瑞主编“东方经典译丛”之一。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naves)译。1986年刊于纽约。中诗虽有词、曲之体,但此书所译大多是狭义之“诗”。所译分元、明、清三辑,译序介绍三代诗歌的发展。

(江原)

【待麟集】 书名为篆体汉字,副题则为隶书“清代诗词选”。罗郁正、舒威霖(W. Schultz)合编。1986年刊于布鲁明顿。导言引李白《古风》和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以明“待麟”(期待太平盛世)之旨。书中选诗人(包括词人)七十二家,规模空前,多有以前未曾西译者。导言阐说社会历史背景、清诗特点(富于爱国激情、诗论兴盛、具有历史感和写实倾向)、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词的复兴等等。

(江原)

【中国诗歌传统里的意象读法】 诗学论著。余宝琳著。1987年于普林斯顿出版。全书包括前言、正文五章和书目。第一章“界定术语”,讲述意象、隐喻、寓托、“引譬连类”的含义;第二至五章“《诗经》中的意象”、“《离骚》中的意象”、“六朝诗歌和批评”与“唐代及其他”,分别讲述中国传统评家对所涉诗歌的理解,以及应该仔细辨析的诗蕴、诗旨。

(江原)

【汉代民间歌谣】 中诗英译。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译。1988年于伦敦出版。译者选诗共七十七首,分作十一类,如“赞美诗”、“寓言诗”、“丧葬诗”、“厌战诗”、“思乡诗”、“爱情诗”等。其遴选范畴有三:一是公认之无名氏之作,二是后代多所模仿之作,三是注意主题的多样性。卷首有导论,介绍乐府诗的流传与采集、诗题与韵律、结构与变体。

(江原)

【中国叙事诗】 诗学研究著作。多尔·利维(Dore J. Levy)著。1988年于达勒姆出版。作者所论,如本书副题所示,主要是后汉至唐代的叙事诗,即蔡琰的《悲愤诗》,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书中对中西叙事手法作了比较。

(江原)

【浣纱集】 韦庄诗译研。罗宾·耶茨(Robin D. S. Yates)论译。1988年刊于坎布里奇。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介绍韦氏早年生活、黄巢起义、离京外徙、南方之游、为宦京城、入川与终老等;第二编对韦庄的诗歌作简要说明;第三编是韦庄诗词选译。疑因选有词作,故用“浣纱”(Washing Silk)二字作书名,而不用“浣花”。

(江原)

【语言·悖论·诗学】 诗学论著。刘慧愚绝笔之作。由其门生林理彰(Richard J. Lynn)整理,1988年

刊于普林斯顿。书中“编者前言”交代成书原委,兼怀师长;“导言”作概括论说;正文四章,依次为“语言悖论”、“诗学元悖论”、“悖论诗学”和“阐释悖论”;跋语名为“非个人性之个人性”。“悖论诗学”为全书重心,论者虚实并举,多方阐说,其意甚明。他还主张,应该积极开展中西诗学的比较,突现两者特质,明辨两者的潜理论和前理论,以获相得益彰、深入隐微之效。(江原)

【诗人沈约】研究著作。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著。1988年刊于普林斯顿。封面有“隐侯”字样。所设章节是:“导言”、“吴兴沈族”、“早年生活”、“历史学家”、“永明体的繁荣”、“道家隐士”、“知佛俗人”和“终老京郊”。(江原)

【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理论】诗学工具书。德国汉学家德博编写。1989年刊于莱顿。全书有三编:首先是中国诗史概述;其次是主体部分,由短文和条目组成,按字母顺序排列;最后是中诗德译,旨在以阐明前文中相关的论点,译诗约百首,多有宋代以降未曾西译者。书中条目有畸轻畸重之嫌,相互间尚欠照应。(江原)

【自然和自我:苏东坡诗歌与华尔华滋诗歌的比较研究】诗学论著。杨力宇著。1989年刊于纽约。全书四章:第一章大体讨论苏氏的写景诗,第二章讨论苏诗中的释老思想,第三、四两章叙写苏氏由焦虑和烦恼而平静、而超脱的转变。华氏的诗歌,则引来作为苏氏心路历程的类比或反衬。(江原)

【寒山诗全译】罗伯特·亨里克斯(Robert G. Henricks)英译。1990年于纽约出版。译出寒山诗三百三十一首。它虽为译本,但也包含一些研究和考辨;导言分析作者的真伪、寒山的生平和诗歌;附录一以内证说明寒山生活的时代;附录二介绍已有的寒山诗的英译。这些内容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江原)

【东坡之路:苏轼诗歌表达的发展】中诗译研。迈克尔·富勒(Michael A. Fuller)译。1990年刊于斯坦福。本书重在论述苏诗的发展,援引历代评家的意见,描绘诗人既继承又创新的实践,揭示苏诗所含的理趣。本书也包含苏诗英译百余首(皆为诗人滴贬黄州时所作),并有注释和分析。(江原)

【王维诗】中诗英译。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和徐海新(译音, Xu Haixin)译。1991年于汉诺威和伦敦出版。王诗英译,版本甚夥,此本较晚出,选译约一百七十首。译诗分“山中隐士”、“辋川组诗及其他”、“勉为朝官”、“边塞诗”、“别离诗”、“稻田嘉木”、“人物肖像”和“云外之思”八个部分。导论解说王诗的题材、

主旨和技法,以及诗人的遭遇、交游和释老思想,多有新意,与一般译本不同。(江原)

【丝线集】唐诗德译。福尔克尔·克洛普什(Volker Klopsch)译。1991年刊于法兰克福。选诗自初唐至晚唐,近八十家。李白、杜甫和王维入选最多,其他选五首以上者,尚有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刘长卿、岑参、韦应物等。书末跋语介绍诗史、诗体及译诗知识。(江原)

【石湖:范成大的诗歌】中诗译研。施米特(J. D. Schmidt)著。1992年刊于剑桥。全书分两部分。一是评传和论诗,一是范诗译介。第一部分设有“范成大生平”、“发展时期”、“江西诗才和范成大”、“佛教和默然达摩”、“山岳河川”、“田野园林”和“爱国主义诗歌”七节。第二部分依年代选译范诗,包括早年作品以及徽州任上、出入京城、南行与使金和老年退隐之作。(江原)

【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文论选介。宇文所安(S. Owen)译。1992年刊于坎布里奇。原为讲稿,整理而成,旨在以要籍选介方式,勾勒中国古典文论的发展脉络。选介包括《毛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沧浪诗话》、《薑斋诗话》、《原诗》等著作。书末所附“基本术语汇编”,颇具特色,选术语五十余种,并有简释和辨析。(江原)

【唐诗创新者陈子昂】诗学著作。何文汇著。1993年刊于香港。原为著者就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时的博士论文,后改写而成。全书分两部分,一叙诗人的生平和时代,一叙诗人的诗说和作品,尤其是“感遇”诗。两部分均有一节结语,分论诗人的政治观点和唐代文人对诗人的评价。(江原)

【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诗人评传。松浦友久著。1994年由研文出版社刊印。松浦的李白研究成果很多,本书是其中之一。在该书中,他独辟蹊径,将生平事迹考证与诗作风格批评结合起来,认为“客”对于李白和李诗,皆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词语。作者由此入手,分析诗人各个时期的遭遇与感想,显示出透视角度的灵活性。关于中日现代学者的观点,作者也做了归纳,并加以讨论。(王晓平)

【人境庐内:黄遵宪的诗歌】诗人译研。施米特(J. D. Schmidt)著。1994年于剑桥出版。全书分三编:“传记”编讲诗人应举、出使和变法,“评论”编讲诗人文学生涯中的理论和创作,“翻译”编则是黄诗英译,依年代先后编次,包括写于早年和晚年、国内和国外的作品。(江原)

【杜诗谚解】第一部杜甫诗朝鲜文译本。全称为《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成宗十二年(1481)初刊。柳

允谦、曹伟、柳方善、柳休复、义砧等译。此书奉敕注译,由集贤殿诸儒主持,历时三十八年。百余年以后,又翻刻重印,与初刊本出入较大。在中世纪,朝鲜重汉文而轻朝文,后者俗称“谚文”,“谚解”即是以朝文所做的翻译和注释。(金珍珠)

【陶渊明及其诗歌】 中诗译研著作。艾德林著。1957年刊于莫斯科。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十六节,概述诗人所处时代、生平和创作,并评析诗人的代表作品;第二部分选译陶诗,以年代为序,分作十三个专题,如致亲友、《归园田居》、《饮酒》、《读山海经》、抒怀咏史等。现存陶诗,译者已译出大半。在研究中,他采用中俄诗歌比较方法,并赞同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即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的作用,如同俄国诗史上的普希金。(王丽娜)

【王维】 研究专著。美国瓦格纳(M. L. Wagner)著。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1981年出版,列入“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中国专辑。本书选译王维诗九十八首,并分生平、御用诗人、山水诗人、佛教诗人、画家五题评述王维一生及其诗作内涵。作者认为,王维晚年因受政治牵连而退隐山水,但事实上他并未放弃过政治追求。顺应性与易变性是王维在官场中长期养成的处世哲学,在他的诗中始终贯穿着官场与自然界相对抗的主题。王维将宫廷诗同山水田园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王诗的艺术特色。在五花八门的王诗中,也很难将佛教禅理诗分离出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诗都带佛老色彩,而纯禅理诗并不多见。王维一方面使用含蓄措词来表达佛家禅意和哲理,一方面又使用明朗自然毫无雕饰的语言来表现自然之美和感情的真挚,多种艺术手法既体现着他的诗意境高远、严肃深沉、情景交融、自负和超然物外的特点,也代表着盛唐绚丽多彩的诗风。

(文节)

【王昌龄】 研究专著。美国华裔学者李珍华著。1982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据周祖谟、傅璇琮著文介绍,《王昌龄》一书写于1976—1980年,全书内容包括王氏生平,论唐诗的形成与盛唐的文学批评,论析王氏诗论的代表作《诗格》,以边塞、送别、宫怨三类绝句诗评析王氏绝句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书中附作家年谱、参考书目及详细脚注。此书记述诗人的生平详实可靠,在某些方面也有新见,如论述王昌龄在723—725年间西北边塞之行及其晚年被贬逐龙标的经历。肯定向有争议的《诗格》为王昌龄所作,并联系日人著作《文镜秘府论》所载,对王昌龄诗歌主张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诗格》中提出的诸如“应物便是”、“假物成然”、“直置”等观念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说,成为盛唐诗歌理论极有价

值的组成部分。强调盛唐诗人的代表作家正是王昌龄而不是别人,其理由是:盛唐时期诗论家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对王昌龄评价最高,诗也选得较多,可以代表当时作家和批评家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再者,从盛唐诗风所包含的高度进取性内容、直置的语言、极其丰富而强烈的音乐性来看,王昌龄的创作也达到了这几个方面的巅峰。(文节)

【李白:心像与诗】 专著。日本松浦友久著。日本社会思想社1970年出版。张守惠中译本书全名为《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像》。此书是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兼具理论性与鉴赏性。作者将李白诗分为十二个门类,即行旅、离别、月光、女性、风景、怀古、饮酒、战乱、政治、游仙、赠寄、独吟,每一门类皆标有醒目的副题,如“月光”门的副题为“光和影”,“女性”门的副题为“美的赞歌”,“风景”门的副题为“寄兴山河”,“怀古”门的副题为“惜时之歌”,“独吟”门的副题为“心声之歌”,等等。这些副题能使读者对某类诗歌先有一个鲜明的印象,说明作者是对各类诗经过仔细品味后而加以精心编排的。此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收每一首诗的艺术意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阐发,并进行生动的形象描绘,把读者引入诗境之中,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在深入分析阐发诗歌意境的同时,作者也时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如说形象的飞跃感、流动感是贯串于李白诗歌中最富独创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李白的写景诗中最为突出;李白不是一个始终明确地站在一个方向思辨的、具有宗教意味的人,而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的、始终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人生的人,他一方面宣扬人世的痛苦、艰难、短暂、虚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达观地顺从自然,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在李白一生中始终处于未加整理的、未获解决的状态。诸如此类的见解,对读者都极富启发性。此书截至1981年在日本已印行十五次,足见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文节)

【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 专著。日本松浦友久著。日本三省堂1976年出版。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以后在东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全书分“序论”、“本论”(一)、“本论”(二)三大部分。作者认为,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的振幅极大,其最基本的因素是对透明的具有光辉的事物的憧憬。作者列举大量例子说明,李白诗中如“清”、“明”、“光”、“辉”、“白”、“碧”、“绿”等属于透明度极高的字以及“白玉”、“白璧”、“白水”、“白鹭”、“清辉”、“清猿”、“清秋”等词汇层出不穷,从而使许多诗作都充满了透明的光辉。在对李白诗歌的各种题材进行细致分析后,作者提出,行旅、离别、饮酒、月光是李白

诗歌最有代表性的题材,这些题材构成了典型的李白式的世界。闺情、边塞、游宴、感遇等题材的诗也不少,但在全部李诗中却不具代表性。至于咏物、题咏、时事、节序等则是李诗中相对缺乏重要性的门类。作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李白的离别诗与杜甫、韩愈等的离别诗加以对比分析,指出:杜甫、韩愈等的离别诗大多对离别对象进行个别的具体描写,甚至每句都不离开对象,而李白的最有影响的离别诗往往是将离别行为形象化,故而具有极高的普遍性和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文节)

【李太白研究】 研究专著。日本大野实之助著。1958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1971年有明书房出版增补本。《李太白研究》长达一千余页,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日本唐诗研究史上的一部巨著。全书分正篇与增补篇两部分,正篇有《李白生活的时代环境》、《李白的经历》、《李白的家世与交游》、《李白的诗文》、《李白诗文的版本》五篇;增补篇有《李白诗歌的渊源》、《李白的乐府诗》、《李白的东武吟》、《李白的讽谏诗》、《李白与山岳》、《李诗与选本》六篇。作者对李白诗歌的“道家色彩”、“佛教色彩”和“儒家色彩”进行详细的比较、探讨,其结论是李白诗歌思想的基本倾向仍为儒家思想。通过对不同形式诗歌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考察李白诗的创作风格,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作者指出,李白注重把《诗经》的比兴手法和讽谏精神融入盛唐诗风中,他的乐府诗是这方面最出色的实践。李白的绝句和古体诗都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最能体现李白思想精神的诗型则是古诗。作者还着重研究了李白与前代诗人的关系,在《李白诗歌的渊源》一篇中详细论述了李白怎样受到屈原、司马相如、扬雄、陶渊明、谢朓等人的影响。(文节)

【李商隐研究】 专著。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著。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本书分为李商隐的生平、李诗的词语结构、李诗的境界、李诗在西方读者中的影响等专章,着重研讨了李商隐的一百首诗。著者认为,李商隐可以说是中国诗人中最擅长写朦胧诗的诗人,这种朦胧引起了读者的歧解纠纷。李商隐早年崇道,晚年信佛,又博学多才。李商隐的思想是儒、释、道的杂烩,他本着儒家思想来批评社会的、生活的弊端,借助道教以逃避严酷的现实,并为他的诗作提供了想象的翅膀,佛教使他晚年得到安慰,尽管他不像王维那样虔诚地信佛。在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特点时,著者提出了李诗表现“多重复杂重叠意境”说。著者指出,在李商隐的那些最优秀的诗篇中,有一部分刻意追求复杂的意境,这种意境中蕴含着几个层次,最典型的作品是《锦瑟》。

这首诗的意境跨越了时空界限;月光与日光,沧海与陆地,现实的感受、情感与往日的经历,实际发生的与想象中的,等等。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著者总的看法是:这些作品揭示了爱之世界自相矛盾的本质——爱的吸引与爱的惩罚,后者又往往多于前者,从而体现其独特的价值取向。那些突出表现了虽然无望却又不悔的爱所造成的痛苦的诗篇,是李诗中最成功、最著名、最值得称赞的。(文节)

【孟郊和韩愈诗歌研究】 研究专著。美国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 汉名宇文所安)著。耶鲁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全书以韩、孟二人的生活、创作及其影响分为十四章。本书认为孟郊和韩愈是一一对文学的本质和目标有着共同信念的密友,但他们在艺术实践、艺术个性方面又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是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他们在复古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新颖的、富有个性的诗歌,他们的探索皆以独创性背叛了传统诗歌的潮流。著者不同意称孟郊为韩门弟子的传统说法,指出孟郊在公元971年结识韩愈之前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孟郊对伦理价值的估价提供了一个内部斗争的创作源泉,在这方面,他完全是一个开拓型人物。他将奇涩、生硬的教诲诗移植入抒情诗中。在他的诗歌中,情感世界、想象力和真实世界是统一的。内部世界改变着外部世界,共同进入他的自我观照之中。各种现实的不平带来了他精神世界的不平。孟郊暮年的诗(如《秋怀》十五首)代表着与外界隔绝的象征主义极限,只有李商隐难于索解的诗歌约略与之相近。著者认为,“以文为诗”这个论断并不能说明韩愈整个诗歌的特色。这只是在他的早期诗中才有的现象。韩愈早期诗是一个试验的舞台,他试图创造一种适合伦理中心的诗风。作为试验品,这些早期诗大多数都失败了。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诗歌革新。不过,韩愈没有像元结那样坚持到底,当他年纪渐大后便滑回了盛唐风格之中。韩愈居汴期间所写的诗标志着其风格正在成熟。这儿有一个从枯燥的说教向有说服力的修辞渲染转移的迹象。韩愈从公元800年前后已开始设法避免盛唐抒情诗传统,而努力在叙事诗中创造个人风格。这种风格可概括为传记文学式的叙事诗,或曰在具体环境中浓缩了的个人和伦理观照的诗。这种叙事诗比较重视修辞技巧和趣味性。韩愈在洛阳还创造了一系列神话诗。在大多数神话诗中,神们被赋予讽刺与幽默的特性,这和它们的神性是对立的。韩愈最后十一年显示出和唐诗传统的和平共处,进而向诗歌传统让步。这一时期的诗表现着成熟和平衡的自我控制。在论述韩孟的联句诗

时,著者指出,竞赛是联句诗的中心。在联句诗中,二人对富于想象的比喻的重视远远过于对情绪表达和观念发展的注意。这样的竞赛给联句诗带来了富于词藻的特点。联句诗中富于想象力和比喻的语言,对孟韩二人后期诗作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文节)

【楚辞论集】 新加坡翁世华著。1988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全书由以下九篇组成:《离骚解题》、《从〈说文解字〉引楚辞说起》、《楚辞九歌的倒装法》、《楚辞“予”字研究》、《楚辞语文零释》、《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辩》、《郭璞楚辞注佚文拾补》、《原本玉篇引骚纪要——兼论王逸楚辞章句之旧本》、《文学的外交——从“赋诗言志”到“赠书寓志”》。在《离骚解题》篇中,作者将历代学者论《离骚》名义归为两大派,即古典传统派和现代炫奇派,并认为古典传统派“去古未远,所论较符屈子命篇之本旨,今所当从”,其余则不可依从。对许慎的《说文解字》引楚辞改字的严重问题,作者认为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还古籍的本来面目。在《文学的外交,从“赋诗言志”到“赠书寓志”》篇中,作者提出:文学“在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它有时所能发生的重大的作用,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潜在着的深远外交意义”,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探研。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辩》篇中,作者提出,淮南王刘安所作确为《离骚传》,而非《离骚赋》,它是意在释字、解经与论述作意,而非一篇创作的辞赋之“赋”。

(王丽娜)

【潺潺流水:康乐公谢灵运的生平及作品】 中诗译研著作。傅乐山(J. D. Frodsham)著。1967年刊于伦敦。此书原为博士论文,后增订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传主生平、诗文选译;下卷为谢氏作品的注释与考证。著者认为,谢氏为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并从历史、社会和宗教背景,理解谢氏诗歌。这本书是西方较早研究谢灵运的著作,因此广受重视。

(王丽娜)

【张华:西晋政治家兼诗人】 中诗译注。安娜·斯特劳海尔(A. Straughair)译。1973年刊于坎培拉。此书包括导言、《晋书·张华传》英译并注,以及二十九首张诗代表作的英译。在导言中,译者指出,《晋书》所记张华,乃一孝子贤官,但基本可信。现实中的张华,并非十全十美,他具有多变的态度、矛盾的个性、易于犯错的缺点。由其诗作,可加深对诗人的理解。

(王丽娜)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 诗人评传。刘子健著。1967年刊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全书共分十二章,除序论、历史背景、早年活动等章节外,其余则分别从“古典主义者”、“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文学大师”几个方面,讲述传主的种种成就和贡献。关于欧阳修诗歌艺术的特点,著者以《钓者》等诗为例指出,其诗极富生活气息,许多诗作犹如山水画,读之赏心悦目。书中所引欧阳修诗词文赋的英译文,系出自名家(如王红公、白之、亚瑟·韦利)之手。书末尚附词语注释、参考书目等。

(王丽娜)

【寻隐者不遇:唐代隐逸诗】 诗歌主题研究。博士论文。陈月桂撰。1985年刊于法兰克福。本书选取三十位唐诗人所作的四十五首诗(均以“寻隐者不遇”为题),集中加以研究。全书共分四章,依次介绍诗人的生平概况、唐前的隐逸生活和隐逸诗、德译所选诗歌、总结中国的隐逸观、以及出仕和退隐的关系。

(王丽娜)

【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 中诗俄译。莫斯科—彼得堡国家出版社1923年出版。为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种。Ю·К·休茨基翻译,В·М·阿列克谢耶夫审校并撰写序言。收录五十四位诗人的诗作,按题材分为自然与我、遁世篇、异乡篇、贬谪篇、妻室篇、寺庙篇、古风篇、垂老篇、白居易《琵琶行》等九个部分。H·古德济和H·И·康拉德为之撰写了书评。

(理然)

【中国古典诗集(唐代)】 中诗俄译。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B·阿列克谢耶夫,А·吉托维奇等译,Н·费德林选编、审订并撰写前言。共收五十八位诗人的作品一百八十首,其中入选最多的是杜甫,二十首,其次为白居易十九首,李白十八首,王维十七首。

(理然)

【唐代诗歌】 中诗俄译。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Л·杰柳辛、Т·列齐柯、В·索罗金等翻译并审校,Л·艾德林编选并撰写前言。是迄今选录作品最多的一个唐诗译本。所收诗人有五十五位,作品五百五十余首。其中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辋川集》等九十九首;李白六十七首,其中《将进酒》等五首为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译;杜甫“三吏”中的二首、“三别”、《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六十二首;白居易诗入选最多,有《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等一百七十二首。司空图的《诗品》也作为诗作收了进来。

(理然)

【中国诗选】 中诗俄译。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1958年出版,共四卷,是迄今为止俄苏出版的最大的一部中国诗集。参加翻译的有Л·缅希科夫、М·巴斯曼诺夫、Л·艾德林、А·阿赫玛托娃等十余人。前三卷为古典诗歌,第四卷为现当代诗歌。由郭沫若和H·T·费德林共同审校,并各有一篇序言。第一卷选录先秦至南北朝之间的作品,其中有《诗

经》四十七首,汉乐府二十首,南朝民歌四首,北朝民歌四首,和屈原、三曹、王粲、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二十二位诗人的诗作四十三首。第二卷选入了唐代六十一位诗人的诗作二百二十四首,其中王维十七首,李白三十四首,杜甫二十三首,白居易二十首。第三卷所收为五代至清末一百十三位诗人的作品一百八十七首,入选最多的是刘基六首,其次为苏轼、陆游各五首,陈与义四首,孟尧臣、李清照等各三首。另有无名氏四人各一首。(理然)

【**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三百首**】 中诗俄译。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Г·О·蒙泽勒编注,А·И·吉托维奇译,Н·И·康拉德撰写序言。李白的诗按内容编排分为六辑,第一辑有《望庐山瀑布》等二十首,第二辑《月下独酌》等十一首,第三辑《沙丘城下寄杜甫》等十七首,第四辑《静夜思》等二十首,第五辑《苏武》等十一首,第六辑《北风行》等二十五首。王维的诗第一辑包括《辋川集》十六首共六十首,第二辑《少年行》等三十六首;杜甫的诗不分辑,包括“三吏”中的“二吏”、“三别”、“秋兴八首”在内共一百十九首。(理然)

【**中国古代抒情诗**】 中诗俄译。列宁格勒出版社1962年出版。О·Л·费什曼编选、审校并撰写前言,А·吉托维奇译。收入屈原《离骚》,曹植《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等十首,陶潜《饮酒》等十一首,元稹《行宫》等八首,苏东坡《江上看山》、《望海楼晚景》等七首,陆游《醉歌》等十八首,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八首。(理然)

【**中国古典诗歌**】 中诗俄译。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5年出版。Л·З·艾德林翻译、注释并撰写前言。所选作品《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八十五首,白居易八十四首,《诗经》二首,屈原二首,庾信、贺知章、李白、杜甫、高适、张继、刘禹锡、李绅、辛弃疾各一首。(理然)

【**诗经**】 俄译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是苏联首次出版的全译本。什图金译注,Н·Т·费德林担任责任编辑并撰写了长达数万言的后记。编者的话说:什图金为翻译此书花了多年的心血。他力求给读者奉献一个学术基础坚实、文字准确优美的译文。译者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对《诗经》的哲学伦理学性质的传统注释持批判态度,对西方学者和译者的成果也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同年,莫斯科还出了一个《诗经》的选本,采用的是该书的译文,只是由Н·康拉德审校并撰写序言。1987年全译本又由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再版,费德林撰写前言。(理然)

【**乐府——中国古代民歌选**】 中诗俄译。莫斯科

—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А·А·瓦赫金译注并撰写序言。入选的有汉乐府七十三首;南朝乐府二百十三首;西部(荆、楚)民歌五十五首;北朝乐府二十首。Е·李福清、В·施克洛夫斯基、И·李谢维奇为之撰写了书评。1969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又出了一个版本,书名为《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系上述选本的选本,由Н·康拉德担任责任编辑并撰写序言。(理然)

【**白居易诗集**】 俄译本。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艾德林译、注并撰写前言。收有“秦中吟”三首、“新乐府”四首、绝句一百四十五首、其他诗二十七首、《长恨歌》、《琵琶行》。1949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曾出过《白居易绝句选》,艾德林译注并撰写前言,收有绝句、“秦中吟”和“新乐府”,是苏联出版最早的一本白居易诗集。1958年国家文学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白居易诗选》,亦为艾德林译。1965年文学艺术出版社又出了一本《白居易抒情诗》,除绝句和律诗外,还收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编、译、注、前言俱系艾德林所为。(理然)

【**杜甫诗集**】 俄译本。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А·吉托维奇译,Г·蒙泽勒编、注。收有《兵车行》、《羌村三首》、“三吏”中的“二吏”、“三别”、《梦李白》、《赠卫八处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一百三十八首。1967年列宁格勒文学艺术出版社出了一本《杜甫抒情诗》,是在《诗集》基础上精选的一个版本,冠有Е·谢列勃里亚科夫的序言。(理然)

【**李白抒情诗选**】 俄译本。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А·吉托维奇译,Г·О·蒙泽勒注,В·И·潘克拉托夫撰写前言。所收诗作按内容分为六组,第一组属于写景诗,有《望庐山瀑布》等二十一首,第二组属于感怀,有《月夜独酌》等九首,第三组是交游诗,有《赠孟浩然》等十四首,第四组是感世伤时的,有《静夜思》等十一首,第五组属于边塞诗,有《苏武》等五首,第六组属闺怨诗,有《玉阶怨》等二十六首。(理然)

【**屈原诗选**】 俄译本。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Н·费德林审校并撰写前言,В·帕纳秀克和费德林作注。先由Г·蒙泽勒、帕纳秀克和费德林作逐字的翻译,再由А·阿达利斯、В·阿列克谢耶夫、А·阿赫玛托娃、А·吉托维奇、Л·艾德林译成诗文。所收作品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卜居》、《渔父》、《招魂》。首尾两篇的翻译,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手笔。收入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郭沫若的文章《屈原》作为附录。1956年,又由同一出版社再版。(理然)

【**祇园南海**】(1677—1751) 名瑜,字伯玉,别号铁冠道人。日本江户中期朱子学者,长于汉诗。江村北海《日本诗史》称其为“近世诗坛之雄”。著有诗论《诗学逢源》,有《南海先生文集》。南海所处时期的文坛,尊崇格调说,受其影响,他喜爱慷慨气象,取法汉魏、初盛唐、明诗,排斥中晚唐。他认为诗有境趣,境就是境界、景色;趣就是意趣。他还提出诗有强弱之说,认为学力甚薄者,诗虽有趣而力弱;才学本健者,无论写什么都自然有力。(王晓平)

【**广濑淡窗**】(1782—1856) 名建,字子基,丰后日田人。日本江户末年汉诗理论家。作品集有《醒斋语录》、《远思楼诗钞》、《夜雨寮笔记》、《淡窗诗话》等。他不仅读过许多中国诗人的作品,而且研究过不少诗话,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是清代中叶的诗论。淡窗论诗主张对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诗作无所偏爱,他曾写过一首《论诗诗》:“雕绩争裁纤巧词,东方诗教久凌迟。君唯勿失真情性,两宋三唐任所之。”他的主要汉诗理论集中在《淡窗诗话》中,大量篇幅涉及如何鉴赏与学习唐诗的内容。他认为作汉诗和写俳句一样,应反复锤炼语言,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字,才能余韵无穷。(王晓平)

【**铃木虎雄**】(1878—1963) 别号豹轩、药房。日本学术转型时期的学者。治学不蹈旧规,勇于探索。他自幼接触中国文化,喜爱诗文,1900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毕业,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高校任教。他的研究以诗赋为主,但涉及很广,从两汉一直延伸到晚清。其史著《中国诗论史》(1927)和《赋史大要》(1936)均为开风气之作,在当时实属罕见;前者是博士论文,后者很早即传入我国,有中译本行世。其中诗译介成果甚多,如《杜少陵诗集》、《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玉台新咏集》、《李长吉歌诗》。生前曾获“文化功劳者”的称号。(江原)

【**青木正儿**】(1887—1964) 别号迷阳。日本汉学家。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文学科毕业。师从狩野直喜与铃木虎雄。少年时即爱好中国文学,大学时代致力于“元曲”的研究,毕业后与同好发起“丽泽社”,发行《支那学》杂志。虽然他以中国戏曲研究名世,但他有不少著述论及中国诗歌和诗评。例如《中国文学概论》(1935)设“诗学”和“评论学”两章,以较多篇幅对诗赋、古体、近体诗的发展,以及历代诗歌评论都做了阐述,观点独到,言简意赅,在日本和中国皆获好评,堪称中国文学初学者的津梁。再如《清代文学评论史》(1950),对清代的反拟古运动、尊唐派诗说、神韵说以及清初诗学理论,做了透彻的剖析,口

碑亦佳。上述两书,在我国均有译本流传。1966—1970年由春秋社出版《青木正儿全集》。

(帅雯霖)

【**内田泉之助**】(1892—1979) 日本汉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任武藏大学教授、私立二松学舍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斯文会顾问。中诗选编译注甚夥,主要有《汉诗百选》、《中国名诗集》、《〈文选〉诗篇》(与人合作)、《文选》、《玉台新咏》、《唐诗新选》、《古诗源》等,并著有《中国文学史》、《唐诗解说与鉴赏》等。(卜胥)

【**网祐次**】(1898—) 日本汉学家。中国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1927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先后在松本高等学校、广岛师范学校、茶之水女子大学等任教,从事六朝文学的研究。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60年以《中国中世文学的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以南齐永明时代为中心》,对诗歌格律形成论述颇详。另有《文选译注》和《〈新译〉文选》等书。

(帅雯霖)

【**藤野岩友**】(1898—) 日本汉学家。别名,柏轩。1922年毕业于国学院大学文学科,历任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等高校讲师、教授。擅长《楚辞》研究,兼及秦、汉、唐、宋其他诗歌,于中诗“叹老”母题多所考辨。著有《巫系文学论》、《楚辞》等。(卜胥)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汉学家。生于日本神户。1924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8年赴北京留学三年;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他年青时即潜心研究中国文学,终生不渝,著述宏富。1973年,有《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版)二十四卷行世。所论以诗文、文论为主,也涉及戏曲、小说。其《中国文学与社会》、《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以及《唐代的诗与散文》、《新唐诗选》、《元明诗概论》等著作,研深辨详,颇多真知灼见。他喜爱《诗经》,认为其文学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他对唐诗着力甚勤,杜甫研究尤精,撰有多种有关杜甫的专题论著,并有遗著《杜甫诗注》十卷。他指出,杜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诗人正确认识生活,不懈追求和谐与美好的世界;而杜诗的笔法,既缜密精确,又超越俗常,使人感到诗中深蕴某种比喻与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其学术研究并未局限于中国文学本身,他常常思考如何根据中国文学的地域性特点,来研讨有关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吉川氏享有世界声誉,其部分著作不仅译成了中文,而且译成了西文

(如华兹生所译《宋诗导论》),他还曾多次赴中国、美国和苏联访学或参加研讨会,在国际上交往甚广。

(何璧)

【目加田诚】(1904—) 192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科,并赴中国高校进修,返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东方学会会员,是著名的中国诗歌研究家。其研究广涉诗体、诗格、诗境、诗旨、诗论等范畴。著有《中国文艺论》、《文学艺术论集》、《诗经》、《诗经·楚辞》、《屈原》、《唐诗散策》、《杜甫》等。

(卜胥)

【星川清孝】(1904—) 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会员。1959年以《楚辞研究》获博士学位,由此进而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著有《屈原》、《楚辞》、《陶渊明》、《历代中国诗精讲》等。

(卜胥)

【太田青丘】(1909—) 本名太田兵三郎,中国古代文学和日中文学交流史研究家,诗人,作家。1934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49年起任法政大学教授。1955年以《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之间的交流》获文学博士。1957年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诸问题》,撰写关于唐诗研究状况。主要著作有《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诗与人生——中国的古典》、《唐诗开眼》等。

(蒋春红)

【小川环树】(1910—) 毕业于京都大学支那文学科,曾赴中国留学,先后在东北大学、京都大学任教,其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东方学会理事,中国语学研究会会员。他恪守教职,勤于笔耕,多次主持研究项目,并长期与吉川幸次郎合编《中国文学报》。其学术兴趣颇为广泛,喜爱中诗研究。著有《唐诗概说》、《苏轼》、《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陆游》、《唐代诗人传记》,编有《王维诗集》、《唐宋诗集》、《苏东坡诗选》等书。

(卜胥)

【冈村繁】(1922—) 文学博士,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理事,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古代文学及历史研究家。1947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科。主要著作有《关于后汉三国评论的研究》、《陶渊明——世俗与超越》等。他的研究范围涉猎很广,在楚辞、陶诗、汉乐府等方面都有建树。

(庄伟)

【铃木修次】(1923—) 文学博士,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综和部教授,东方学会会员,中国学会会员。其中诗研究造诣颇高,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元好问》、《汉魏诗研究》、《唐诗传达的氛围》、《人生有情——警句》、《中国古代文学论——〈诗经〉的艺术性》、《汉字——其特质与汉字文明的未来》、《汉语与日本人》、《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唐代诗人论》(四

卷本)、《杜甫》等。他治唐诗,方法灵活,视角新颖,如比较高适、岑参与杜甫,详细探讨三诗人间的区别与联系。其论文《唐代拟魏晋六朝诗风气》,分析中唐后诗人热衷于模仿魏晋六朝诗这一特殊现象,深入考察这种风气持续不衰的原因,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采民)

【荒井健】(1929—) 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京都大学中国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9年出席日本中国学会第11届学术大会,并提交论文——《论永嘉四杰与他们的外围》。1962年参与有关《诗品》的综合研究,具体负责阐释《诗品》中的基本概念。1967年在“怀德堂古典讲座”上主讲“李长吉诗”,还曾主持“晚唐诗人研究组”的工作。1979年4月访问中国,在西安做了题为《论李商隐》的报告。主要著作有《李贺》、《黄庭坚》、《文学论集》、《杜牧》等。

(庄伟)

【高桥和巳】(1931—1971) 日本汉学家。1954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59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大学执教。在六朝、唐代和清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所建树,著译有《李商隐》、《六朝诗选》、《王士禛(王渔阳)》、《中国诗史梗概》、《中国文学论集》等。

(卜胥)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亨特利镇。他资质聪慧,好学不倦。1837年开始学习汉语;两年后,作为伦敦教会传教士,辗转东来。次年到达马六甲,出任该地所设英华书院院长。鸦片战争后,他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仍然主持书院工作。这时他对中华文明理解日深,决心从事中籍西译。他认为,世界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绵延四千多年而至今犹存,必然拥有独特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力量。而翻译儒家经籍,是了解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所译《中国经典》(1861—1886),凡五巨册,是《四书》、《五经》的英译。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王韬等人的帮助。王氏称他译研《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马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林赛·赖德所撰“译者简介”,载1960年香港版《中国经典》)不过,后人指出,他对清代“诗经学”关注较少。部分译文,曾载入缪勒编辑的大型丛书《东方圣书集》。1875年,他成为鼓励汉学研究“儒莲奖”的首次得主;1876年,成为牛津大学汉语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晚年写过长文《〈离骚〉及其作者》。1897年逝世。葬于牛津郊外沃尔

弗科特公墓。

(江原)

【翟理斯】(Herbet Allen Giles, 1845—1935) 英国汉学家。出生于书香门第。1867年东行,一直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供职。居华期间,他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对中国文学精思细研,而且从古至今无所偏废,以求得到系统的知识。翟氏于1892年返回英国伦敦。1897年,剑桥大学汉语教席因威妥玛辞世而出现空缺,他接任了这一职务。此后,仍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他一生出版著译多种,发表论文数十篇。《中诗英译》一书按照年代的先后选译诗人,提供历代诗歌精品。在增订本的前言中,他重又论及翻译上的老话题:“翻译中国诗歌时,一旦捕捉到了原意,再创造就总有两种选择,以诗译诗或以文译诗。”他个人喜欢以诗译诗,不过,他认为这样做更困难些,要付出更多劳动。“原意”自然是十分重要,而试图保持原诗风格与神韵(spirit),似乎也比较困难。亚瑟·韦利谈到译诗的技法时,称赞翟氏“熟练地把韵脚和信实”结合了起来。他的专著《中国文学史》,是西方同类著作中问世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一种,书中对历代诗歌的概况、特点和成就,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江原)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 英国汉学家。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坦布里奇韦尔斯。从小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因眼疾而辍学,为剑桥大学的肄业生。1916年,自费刊印中诗英译小书约五十本,名为《中国诗歌》,不过,这个译本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从次年始,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翻译和评介。《唐代以前的诗歌》选有十七首诗歌。译诗集《中国诗歌百七十首》1918年年末与读者见面,就其规模而言,堪称当时的汉诗巨译。一连几十年,这本书一再修订重印,总共刊行了十多版。其影响超出了英国,也超出了西方诗苑。不久,韦利又出版了诗文集《中诗英译续集》、《庙及其他》等。终其一生,出版著作四十余种,发表译文、文章、书评数百篇,偶尔还写诗歌、散文。他的重要译本和著作还有:《诗经》英译、《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李白的诗歌和生涯》、《〈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敦煌歌谣和故事选集》等。他不满足于提供中诗英译,常用大量篇幅介绍传主生平、社会背景、选诗特点等内容,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诗歌。他有时做中西比较(如强调中西“言情诗”的不同),有时则对中诗分门别类,加以梳理。翻译方法上的创新,是他西化中诗以便于接受的重要方策。他强调,译者必须首先洞察原作的感情内涵,才能忠实地进行翻译。他感到西方的抑扬(iambic)句式不合中诗韵律,便尝试以所谓的“弹跳格”(sprung

rhythm)译之。他是庞德、艾略特的文友,并经常在其核心刊物《小评论》上发表译作。由于他不懈译介中诗,且影响广泛而深远,1948年被聘为伦敦东方学院的中国诗歌荣誉讲师,1953年再荣获英国女皇诗歌奖章。(江原)

【德理文】(一译圣德尼, Marquis d'Hervey Saint-Denys, 1823~1892) 法国汉学家。生于巴黎,受业于著名汉学家巴赞和儒莲,1874年任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他喜爱中国诗歌。其《唐诗》译介弁有长序逾百页,名为“中国的诗歌艺术和韵律”,概述中诗和唐诗的特点;对所译之诗,每首均有关于作法和技巧的说明。这部书问世较早(1862),且对当时巴黎的文学沙龙有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曾翻译《楚辞章句》。(江原)

【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 法国汉学家。法国北部庇卡底人。年轻时来华传教,长居河间府。他深爱中华文明,每闻无知、贬抑之词,必加辩护。一生勤于著述,成果甚丰。其译作一般兼有法文和拉丁文,信美兼具,雅俗共赏,享有欧译大师称号。其中《诗经》译本,在1896年刻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刊于巴黎,且影响到英语、德语世界。(江原)

【于雅乐】(C. Imbault-Huart, 1857~1897) 法国汉学家。青年时来华,曾在上海、北京、汉口、广州任外交官,并司翻译之职,经常利用业馀闲暇研究中国文学。他喜爱中国诗歌,尤喜乾隆三大家中的袁枚,有《14—19世纪中国诗歌》(刘基、杨基、宋禧、袁枚、乾隆和曾国藩六家选译并注)、《袁子才的生平和著作》、《中国现代诗选译》等书行世。(江原)

【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 法国汉学家。生于法国德龙省卢西安迪瓦镇。先从名家学习社会学,后转向汉学。曾两次来华考察,1926年出任巴黎大学高等汉学研究所教务长。所撰《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摒弃我国传统的笺注,以社会学观点剖析《国风》,试图阐明古代民间创作的实况和民歌艺术。东西方学者对此有所反响,这部书已有日译本。(江原)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法国汉学家。出生于瑞士洛桑。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四处求学,先后到过伯尔尼、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和巴黎。1915年,他在伦敦国王学院读书时开始学习汉语;后来又回到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师从微西也(Arnold Vissiere)、沙畹和烈维(Sylvain Levi)继续学习汉语,研究汉学;1919年,聘为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自1920年起,他东来游学,在河内、厦门、东京等地或做实地考察,或在大学讲课。十年后,返回欧

洲加入法籍,在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任教,讲授汉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国学者王重民在巴黎考察石窟写卷时,他与之过从甚密,继而被广博的敦煌学所吸引。战争结束后,他几乎同时兼任了三种职务——高级研究院佛学教授、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和《通报》主编(与另一人合作)。195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铭文和文学部院士。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佛学、敦煌学、汉学史和中国文学领域,而其治学道路则由佛学渐渐转向了文学。他研究禅学,尤其是临济宗语录,认为中国诗学与宗教哲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一生勤于著述,连书评在内达三百余种,主要包括编辑《中国古诗选》、谢灵运研究、与饶宗颐合写《敦煌曲》、翻译《王梵志诗》等。

(江原)

【柴赫】(E. von Zach, 1872—1942) 奥地利汉学家。生于军人家庭,而终生从文治学。读大学时在课馀学汉语,亦师从荷兰名家薛力赫,但主要靠自学而获知。曾多年居华,后赴荷属东印度群岛,死于海难。生前书评甚多,喜欢辩论,语锋尖锐,在西方颇有影响。翻译中诗,成绩卓著,许多大家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均有专书译介,且大多在巴达维亚刊行。喜爱《昭明文选》,1926年开始全译,至谢世时十九篇什已告译竣。1958年哈佛燕京社重印其译稿,取名为《中国选集》。

(江原)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瑞典汉学家。生于瑞典延雪平,1907年入乌普萨拉大学,受导师影响,喜爱语言研究。1910年来华考察,著有《语言学与古代中国》、《汉文典》、《中国音韵学研究》等书。其《〈诗经〉注释》和《诗经》英译二书,亦借助语言学研究方法。注释本“序言”,评鹭中西“诗经学”颇多的见。他主张,研究《诗经》诗篇,须阐明难字难句,然后通读全诗,贯串字句,辨认全篇旨意。

(江原)

【洪业】(又名洪煊莲, William Hung, 1895—1980) 美国汉学家。生于福建闽侯,曾任哈佛燕京社教授。1947—1948年讲授杜甫及杜诗,随之做专题研究,写成《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两卷,于1952年刊行。上卷叙述诗人生平,英译有关诗歌;下卷是杜诗注释,学术性较强。论者治学态度严谨,知识赅博,此书广得好评,1969年再次印行。

(江原)

【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 美国汉学家。生于美国西雅图,曾入加州大学学习,随后他又到夏威夷大学,师从著名旅美学者赵元任和陈受颐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获硕士学位。二战时在美国海军供职,游踪几乎遍至东南亚诸国;虽在战时,也未中辍研究工作,乘便做实地考察或搜集书

籍。1946年,退伍回国,决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投师卜弼德教授,自1947年起,一直在加州大学任教。他早年攻读人类学,对物理和哲学也有所钻研,并精通德、法、中、日等外语,这为他从事汉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中国文化,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文学,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他一生共撰写十多本著作,主要有《古代中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外来品研究》、《朱雀:唐代南方的意象》、《珍珠海岸:古代的海南岛》、《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时间之海上的蜃景:曹唐的游仙诗》等。

(江原)

【刘若愚】(1926—1986) 祖籍北京,曾入英籍,又入美籍。1948年获辅仁大学学士,1952年获布里斯托尔大学硕士。毕业后,即在伦敦和香港任教。1961年赴美,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地的大学。他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典诗歌、古典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主要著作有《中国诗艺》、《李商隐诗歌》、《北宋主要词人》、《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艺术基础》、《跨语种的批评家》;其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由其学生整理,于1988年出版。他治学不拘一法,倡导中西结合,曾引进巴洛克、新批评、语言与意象分析、比较文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因此立论时多所创见。中西诗学比较,由于两者的文化母体相距甚远,在西方被视为畏途。而其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发展。他在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诗学比较。他明确指出,两种诗学互相并置,可获相得益彰、深入细微之效,有利于突现两种理论的特质,有利于明辨两种传统的潜理论和前理论,并能借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干扰”。他还想进而从中西文论中寻求共同诗学,譬如提出诗歌乃语言与境界的双重探索,但没来得及做更多的思考。其门生如余宝琳、林理彰(Richard J. Lynn)、胡志德(Theodore D. Hutters)等,已在中诗研究和比较诗学领域崭露头角。

(江原)

【戴维思】(A. R. Davis, ? ~ 1983) 澳大利亚汉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东方学院,专长于中国古典文学,尤长中国古诗。1955年应聘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所著《杜甫》,为特威恩(Twayne)世界作家丛书而撰,对传主生平、诗作形式与主题做了比较简明的介绍;所著《陶渊明》,分上下两卷,评译并重,叙说明晰,为西方陶氏研究规模较大的一种。

(江原)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 苏联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出生于彼得堡职员家庭。1902年

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并留校任教。1916年以《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获硕士学位,并于以后被连连擢升:1918年为教授,1919年为博士,1923年为通讯院士,1929年为院士。1904至1928年,先后三次到中国、三次到英国、两次到法国进修或讲学。从1910至1951年去世,执教于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地理学院、俄罗斯艺术史学院等院校,培养出了一批日后卓有成就的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德涅耶娃、语文学博士艾德林等,都是他的高足),为苏联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苏联汉学一代宗师。自三十年代起,阿列克谢耶夫还在亚洲博物院(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任中国室主任和研究员,从事汉学研究。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民俗,广泛涉猎,成就斐然,故有“阿翰林”之美誉。著述凡二百六十余种,大都收入《中国文学》和《东方学》两种论文集里。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著作主要是《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这是一部煌煌巨著,其中的评论部分除了介绍作者生平、成书过程、艺术特色外,还论述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将它同贺拉斯、布瓦洛的诗学著作作了比较,开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先河。阿列克谢耶夫四十年代两篇重要的中西比较诗学文章《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和《法国人布瓦洛和同时代的中国人论诗艺》,通过中西古典诗学的具体比较,从理论上阐述了它们的可比性。此外,对于汉文学俄译问题,阿列克谢耶夫也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论述,有关诗歌翻译的有《〈诗经〉俄译的前提》、《文学作品汉译俄的原则》、《汉译俄的几个特点》、《论诗歌翻译》等。他还为《七至九世纪中国诗选》(1923)作审校并撰写了序言。

(理然)

【康拉德】(1891—1970) 苏联汉学家、日本学家。出生于里加职员家庭,191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东方实习学院日本专业,1914—1917年在日本留学。1926年获教授职称,1934年为语文学博士,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年升为院士。自1913至1950年,先后在基辅商学院、奥尔洛夫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东方学院等处任教。1931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获得过多枚苏联勋章和奖章。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史、东西方文学比较、日本和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著述逾二百五十种,大部收入《东方与西方》(论文集,1966、1972)、《康拉德文选(汉学)》(1977)和《康拉德文选(文学与戏剧)》(1978)中。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多是为俄译诗集撰写序言,如《唐诗三

人集:李白、王维、杜甫三百首》(1960)、《诗经选》(1957)、《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选》(1969)。还写过长篇论文《杜甫〈秋兴八首〉》(1966)。(理然)

【艾德林】(1921—1985) 苏联汉学家。犹太人。出生于切尔尼戈夫手艺人家庭,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2年以论文《白居易的绝句》获副博士学位,并获副教授职称。1951年为高级研究员。1969年以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获博士学位,并升为教授。1937—1952年间,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和军事外语学院任教。自1944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从事汉学研究,并任中国室主任。艾德林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主要论文有《话说杜甫》(1962)、《杜甫1250周年诞辰纪念》(1962)、《象形字诗歌的翻译》(1967)、《唐诗概论》(1967)、《中国古典诗歌》(1977)、《读古诗有感》(1980)等。他还为一些诗集的出版作出了努力,如《陶渊明抒情诗》(1964)的编选、翻译、注释和前言撰写,《陶渊明诗集》(1972)的翻译、注释、前言,《中国古典诗歌》(1975)的翻译、注释、序言,《唐代诗歌》(1987)的前言和《诗经》(1987)的序言。艾德林的汉学研究是以白居易起家的,所以他也包揽了《白居易绝句选》(1949)、《白居易诗选》(1958)、《白居易抒情诗选》(1965)和《白居易诗集》(1978)的编选、翻译、注释和前言的撰写。艾德林长期从事中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对汉诗的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主张汉诗俄译不必押韵,只要保持内在的节奏。他的译诗,一个汉字对应一个俄文实词,接近俄诗的诗格,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艾德林多年研究的结晶,是他1967年出版的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该书分为“诗人”和“诗歌”两篇。前一篇有“诗歌与时代”、“诗人的故土”、“诗人传”、“自然。生与死的主题”、“形、影、魂”、“诗人的世界”等章节,对陶渊明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后一篇是陶诗九十二首的译文。与其他译文不同的是,这些诗每首后面都附有解释和点评,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有些篇什还引了西方的译文,并对其优劣短长进行批评。

(理然)

【郑騫】(1906—1991) 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因百。辽宁铁岭人。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历任河北女师学院中文系主任、燕京大学讲师、暨南大学副教授、东北大学副教授等职。1948年至台湾。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门人弟子众多。研究领域涉及诗、文、词、曲、戏剧等多个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著作十余种,论文近百篇。诗歌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唐伯虎诗辑逸笺注》、《陈后山年谱》、《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以上三书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分别于

1982、1984、1985年出版)。其中《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一书对宋代诗人陈与义诗作的校注用力尤深,出版后颇受好评。又曾把自己六十五岁前发表的专著、论文八十六篇辑为《景午丛编》(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出版),收录研究诗词、散曲和戏剧及考据方面的论述。(郑永晓)

【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建安文学。1982年,台北源流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赵福坛的《曹魏父子诗选》,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江健俊的《建安七子学述》。1984年,陈应龙在《艺文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述曹操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曹操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的功绩。关于曹植,袁宙宗《论曹子建一生的际遇和姿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4卷第1期)、戚宜君《曹子建才高八斗而情有独钟》(《中华文艺》第25卷第1期)等都对曹植的身世和诗歌作了探索。台湾学者在参加由大陆主办的有关学术会议上也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如1995年11月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梅家玲提交的《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探讨了赠答诗的起源与成型,概括了建安作者群赠答诗的群体特色和个体特色,并且指出建安赠答诗在赠答传统中的示范意义。洪顺隆提交的《六朝诗系统论》由题材入手,提炼出分别六朝题材诗类型的九个因素,并据此将六朝诗分为抒情和叙事两大系统十六个题材单元,从而试图全面而新颖地把握六朝诗的诗体本质。杨承祖《从〈五君咏〉论赞贤诗组》从颜延之的《五君咏》入手分析,提出这一组诗上追《春秋》义法,在“赞贤”之外,还寓有“讥贬”。陶渊明研究也颇受重视。在这次会议上,胡楚生提交了《陶渊明咏史诗三首探微》。陈怡良认为陶渊明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物。他在《陶渊明创作背景浅探》(《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7卷第1、2期)一文中,探讨了时代环境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陈怡良又作《陶渊明的家世与家庭》(《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7卷第8、9期)探讨了陶渊明的家世和家庭对他的影响:①陶的历代祖先,如遇衰世,往往恬淡仕途,怡然自得于家居之乐;②渊明先祖陶侃、外祖孟嘉与渊明父亲之性情与禀赋,对渊明的影响极为深切,故虽用世之志未酬,然吟咏诗文,别有怀抱,仍能独步古今;③渊明自幼秉承奉儒课读之训,使其学业与思想,尤能反映其“忧道不忧贫”之儒家素养,使其卓异不群之人格与自然脱俗之作品,彼此融合,因而确定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地位。此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的《陶诗新论》(高大鹏著)也是一部

颇有新意的著述。六朝道教与游仙诗的发展、南朝诗歌的艺术特色以及阮籍、陆机、葛洪、鲍照等作家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邱镇京著《阮籍咏怀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0版)等著作出版。同时学者们也比较注意将视野从一流作家转到过去较少注意的二、三流作家作品上;对已有定评的大家,也有意识地转换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以作出新的阐释。其中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多,既有影响比较研究,也有平行比较研究。如吕正惠所著《杜甫与六朝诗人》(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不拘泥于从字句技巧等形式特征来考索杜甫对前代诗歌的继承,而是从魏晋诗歌传统入手,宏观地把握杜诗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创作的内在联系,也即从杜诗追溯前代诗人的特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此外,张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以名教、魏晋名士人格、魏晋学风、西邸文人集团等为中心,对中古时期人物风气的形成与转变作了多层面的观察。藉此可以把握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特质和内涵。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广泛参阅了国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对建安文学、西晋文学、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创作作了颇为详细的考察,新意迭出。姚振黎《沈约及其学术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除探讨《宋书》、声律论等问题外,还对沈约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论析。这些论著或从新的视角探讨了热门论题,或是阐述了前人较少注意的话题,均很有启发意义。(郑永晓)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唐诗研究】 在唐诗研究领域,台湾除出版了一批唐诗选注本之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版了《杜甫诗传》(李森南著,洪氏出版社1980年版)、《唐韩文公年谱》(马起华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论韩愈》(罗克典撰,台北国家出版社1982年版)、《孟郊研究》(尤信雄著,文津出版社1984年版)、《李贺诗研究》(杨文雄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杜甫夔州诗析论》(方瑜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范淑芬著,文津出版社1984年版)、《白居易研究》(杨宗莹著,文津出版社1985年版)、《陈子昂及其感遇诗》(刘远智著,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唐诗浅探》(朱文长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颜崑阳著,学生书局1990年版)、《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侯迺慧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等一批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开拓了唐诗的研究领域,并将唐诗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一些论文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莫忠慎《王梵志的评价》(《东方杂志》第16卷第6期)一文在全面评述

了各家对王诗的评价之后认为,王梵志的白话诗俚俗质朴,在中国诗史自成一格,可以说是初唐绮靡风气的反动,在当时的风气下这种清新自然的作品是极其可贵的。但就诗论诗,大多数说理诗则没什么价值可言,坊间所见文学史专书中,以刘大杰对王梵志诗的评价最为公允。褚问鹄《李白身世的研究》(《艺文志》第196期)对李白的籍贯和身世问题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的见解,以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李石《杜甫诗与日常生活》(《中外文学》第9卷第7期)分析了杜甫诗歌在描写日常生活诗歌传统中的地位。认为,大至朝廷中的大事,小至个人琐事与细节都能在杜诗里得到体贴入微的反映,并能从日常人事里体会人生问题,把日常生活的诗提高到第一流文学的地位。颜崑阳《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从学术史的角度,纵论历代评注李商隐诗的种种方法及其利弊得失,还特别详细阐述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这两种笺释方法的功能与局限、诗与谱循环论证的逻辑困境、比兴托意应该有怎样的判断依据等三个问题,对历代李商隐诗歌的注解与评析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总结。欧阳炯《从美感经验看义山诗》(《大陆杂志》第66卷第2期)运用近代西方的美感经验说,探讨了李商隐诗的艺术美。认为,美感经验可谓为“形相之直觉”,通观李氏《落花》等诗,情景交会,物我同一,本为怜花,不觉自怜。盖诗人一生沉沦下僚,漂泊四方,故对落花而神伤,直觉与形相相因为用,遂成此诗。其他如心理距离说、移情说都可在李商隐诗中找到例证。温莉芳《月亮神话在李商隐诗中的回响》(《台湾教育》第385期)、简翠贞《李义山诗之声律赏析》(新竹师专学报1983年3月第9期)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李商隐的诗歌进行了探讨。在1990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汪中(东海大学)提交的《杜诗制题》论及了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问题,考察了杜诗题目与诗歌的关系。罗宗涛(逢甲大学)《唐人题壁诗初探》,将题壁作为诗歌的一种传播方式加以研究。这些论文也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郑永晓)

【中国诗歌流变史】 诗歌研究专著。李曰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全书上、下二册,除《总论》外,共分四章:诗经、乐府、古诗、律绝。作者在《总论》中论中国诗歌演进云:“大凡每种诗歌之起,初多盛行于民间,后始播之于音乐,而为墨客骚人所仿效。浸假文学与音乐脱辐,旧诗歌渐趋衰落,而为另一种民间滋长之新诗歌所代者。”所以此书论中国诗歌之流变,并不遵循朝代更替之次第,而是按照诗歌体裁的嬗变予以论述,每个部分又基本依照成因、由来、体制、流变的顺序详论该诗歌体裁

的源流递嬗,其中又以对“流变”的论述最为详细,如“律绝”一章又分为勃兴于六朝、极盛于四唐、别出于两宋、闰余于辽金、衰微于胡元——蒙古、纷竞于朱明、复兴于满清六个部分。各部分又将诗歌的嬗变归纳为各个流派的兴衰,如盛唐的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晚唐的豪宕派、典绮派、格律派、浅俗派、怪涩派等。全书资料详赡,内容丰富,而又纲目清晰,便于检索。(郑永晓)

【中国诗学——设计篇】 诗学研究专著。黄永武著。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76年6月初版。该书为作者《中国诗学》系列之一。着重论述古典诗歌的匠心设计,例如意象如何浮现、时空如何设计、如何浓凝字句以求密度、诗歌的音响、“反常合道”与诗趣以及怎样表现神韵等。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对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前人那套眉批笺释之类的鉴赏法,本身缺少体大思精的体系,使得中国的诗歌永远处于朦胧状态,说不清美在哪里,“本书就是想用细密剖析的方法,讲明这些美如何形成,让抽象的美具体起来,让隐微的美显现出来,让可以意会的都可以言传”。全书共收七篇诗论,运用现代文艺学、美学的相关知识,对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作了细密的论述。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引用诗篇作者小计》。

(郑永晓)

【中国诗学——鉴赏篇】 诗歌研究专著。黄永武著。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76年10月初版。该书是作者《中国诗学》系列之一,由《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者的心境》三大部分组成。作者在自序中将中国传统诗歌鉴赏的方法角度加以分析归纳,厘为十类:诠释字义、考据故实、选抄去取、主观品第、讲明结构、道德伦理、思想类型、分析心理、生平历史、社会风尚,以为将这十种角度融通活用,相辅相成,则不必追随西方,人云亦云。全书即是运用这些方法从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直探索到作者的心境。尤其对于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如何鉴赏诗歌作了极为详细的阐述,如关于诗歌的形式,作者指出应从结构美、辞采美、声律美、神韵美等角度去鉴赏,而其下又划分若干小节予以详述。全书条分缕析,详赡明细,对传统诗歌的理论与鉴赏提出了很多独到之见。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引用诗篇作者小计。

(郑永晓)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诗歌之部(一、二)】 诗歌研究论文集。柯庆明、林明德主编。台北远流图书公司出版。第一册初版于1978年3月、第二册初版于1979年2月。辑入曾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上的古典诗歌研究论文共计二十五篇。作者除台静农、郑骞等学者外,大多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的师生。所收论文涉及《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陆机、郭璞、刘琨、陶渊明、杜甫、李贺、李商隐、敦煌曲子词、吴梅等作家作品。作者之一柯庆明在“弁言”中指出,这些论文中的创见或有深浅之别,但却不因叙述的力求“浅出”,而减少了它们意在“深入”的学术兴味。其特点是尽力摆脱政治、社会、历史诸学科的影响,而视文学研究为一独特的领域,在方法上着重作品语言表现的深入浅出,归结到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命意识,也即某种“境界”的同情共感的把握与传扬。所收论文一方面具有丰富坚实的文本分析以及对英美新批评方法存在的认识,另一方面尚未离开本国文学为主体的立场,而进到“比较文学”或者以西方文学观念为其立论的主体或基点。

(郑永晓)

【中国山水诗研究】 王国璎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10月初版。是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论文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中国山水诗的发展。作者首先探索山水诗的渊源,分析了从先秦到两汉,诗人对山水的态度由敬畏而亲切,其视野由景物个体扩大至山水全貌,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亦逐渐精描细绘的过程,着重探讨了道家思想的中兴在山水诗产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论山水诗的流变,则以山水诗本身的风貌与内涵为重点,考察其自南朝至晚唐期间,如何在文学环境、创作风气改变的过程中,随着诗歌的逐步发展,乃至产生了不同典型的山水诗。第二部分论中国山水诗的特色,着重探讨了“山水诗中的形象摹拟”与“山水诗中的物我关系”等问题。所谓“形象摹拟”既包括山水形象本身的静态现象,也包括山水形象所具有的精神气韵;所谓“物我关系”是从全诗的展露来探索诗人与其所观照的山水之间或相融或相分离的关系。这些阐述对深入剖析山水诗这一文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颇有裨益。

(郑永晓)

【敦煌诗经写卷】 台湾学者潘重规两游巴黎、伦敦,尽读英法所藏敦煌《诗经》写卷。他说,这些卷子大抵皆唐以前人手写,总计二十馀卷,虽属零笺残楮,但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经序传笺约略粗备。六朝、唐人讲习所用诗卷,佚存于世者,具萃于斯。他认为这些卷子有如下研究价值:①借以考察六朝唐代诗学风气。敦煌写卷无一非毛诗诂训传,可知此时为毛郑大一统时期。②借以考察六朝唐代传本型式。敦煌写卷序文与经文每篇皆相连属,承诂训传旧式;有些写卷章句或在篇前,或在篇后,说明经卷章句,标题前后,初无定式;五经正义,自唐迄北宋,皆与经注别行,《大雅·民劳》残卷即其旧式;诗

音多为别行,有书于卷背、字侧者,注音字侧,便于诵读,开宋人注疏本与释文合刻之先河。有关传本型式,写刻源流,校雠家所当考镜。③借以考察六朝唐人抄写状况。现存写卷多俗字讹文,变体简写,与颜(《颜氏家训》)张(《史记正义》)所云,若合符节。

(周发祥)

【诗经研究方法】 《诗经》研究专著。李辰冬著。台湾水牛出版社1982年5月初版。作者为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等。所作《诗经通释》出版后,因观点新颖、结论惊人。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与质疑。此书即是对质疑进行解答文章的结集,共辑十六篇论文。首篇文章《诗经研究方法》中,著者提出:《诗经》研究的科学方法就是先在三百篇中寻找一些原理法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法则来解释三百篇的一字一句。而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的人都是依据《毛序》、《毛传》、《郑笺》或《诗集传》而不依据三百篇本身。著者从《诗经》中共归纳总结出七条原理、十六条法则,并逐条进行阐述。著者在本书中重申了他的两个主要观点:(1)《诗》三百篇皆尹吉甫一人所作,三百篇可说是尹吉甫的自传;(2)《诗》三百篇所涉及的史实,皆与《竹书纪年》一书所述史实相合,故三百篇可依《竹书纪年》所述史实来系年。然而著者关于《诗经》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台湾的《诗经》研究者多不赞同,反驳的文章也不少。

(崔彤)

【诗经研究论集(一)】 林庆彰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初版,1987年再版。编者为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此书共收录何定生、刘节、孙作云、屈万里、顾颉刚、徐复观、王了一、罗敬之、裴溥言、古添洪、谢无量、俞平伯、魏子云等大陆和台湾二十七位学者的三十五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作“诗经基本问题”,收论文九篇,内容包括诗乐关系、国风性质、周召南考、雅的意义、兴的内涵、押韵方式、修辞技巧、文学价值等问题。第二部分题作“诗经内涵研究”,收论文七篇,内容是讨论《诗经》中的神话、人文思想、社会状况、忧患意识、道德观、土地关系等问题。第三部分题作“诗篇解析举隅”,收论文十二篇,内容是关于《关雎》、《何彼秣矣》、《柏舟》等十二篇诗的艺术技巧赏析。第四部分题作“诗经学史”,收论文五篇,内容是依先秦、两汉、宋代、清代、民国之顺序,论述各代《诗经》研究的概况,以见古代学者传承古典的成绩。本书附录郭绍虞的《毛诗序注》和林庆彰的《诗经基本书目》。

(崔彤)

【诗经研究论集(二)】 林庆彰编。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九月初版。共收大陆和台湾三十位学者的三十七篇论文,分为“诗经基本问题”、“诗经内涵研

究”、“诗篇解析举隅”、“诗篇字词考释”、“诗经学史”五个部分。编者在序言中说,第一集将所收论文分为四类,本集另加“诗篇字词考释”一类。“各类之论文有重视其开创性者,如胡适的《谈谈诗经》、《诗三百篇言字解》、阮元的《释颂》、王国维的《说周颂》、《与友人论诗中成语书》、丁声树《论诗经中的‘何’、‘曷’、‘胡’》、郑振铎的《读毛诗序》等皆是。有为其完整而收录者,如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一书,近代人研究论文有三篇,即陈柱的《姚际恒诗经通论述评》,何定生的《关于诗经通论》,顾颉刚的《诗经通论序》,各篇篇幅长短悬殊,内容亦精粗不一,以其得来不易,因此全部加以收录。此外,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乃诗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收入较具水平的论文如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饶宗颐《读阜阳汉简诗经》等。(崔彤)

【汉诗研究】 汉代诗歌研究专著。方祖燊著。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初版。该书由五篇专题论文组成,依次为:《汉五言诗作者与时代问题的辨疑与析证》、《汉武帝柏梁台诗考》、《汉朝诗歌形式的研究》、《汉朝乐府诗的简史与解题》、《建安时代诗歌》。内容涉及几乎所有汉代诗歌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其特点是敢于大胆否定宋代以来诸文学史名家关于汉代诗歌的看法,力求恢复某些有争议作品的作者权。如关于《古诗十九首》、枚乘《杂诗》、汉武帝《柏梁台》诗,现代考据学者、文学史家,大都判定它们产生于东汉或建安时代。作者则对前人的疑问一一予以辨析,认为李善注《文选·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游戏宛与洛”所谓“此则辞兼东都,非尽乘作明矣”不能成立。全书资料翔实,言必有据,虽然某些结论未必符合学术界主流观点,但可备一说。卷首有梁容若序,书末附《汉诗研究的参考书目》。

(郑永晓)

【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 诗歌研究专著。叶日光著。台北文史出版社1979年4月初版。钟嵘《诗品》曾评论左思“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但左氏诗作不多,社会地位又较为低下,是以鲜见有人系统探讨其人其诗。作者认为,左思“上承建安馀风,下开‘咏史’‘娇女’无数法门,其于文学史上之地位与影响,固不容吾人稍有忽视”,因而该书试图“对其作品作一全盘性之分析讨论”(序言)。全书包括五章,依次为“左思的生平及其作品年代的推测”、“左思的时代背景”、“左思的思想人格与个性”、“左思诗的析论”、“左思诗的影响”。作者推论,左思约生于魏嘉平五年(253),卒于永嘉一、二年(约307—308);左思出身微贱,但理想很高,意志顽强,在不断受到冷漠的歧视和睥睨下,自然形成其孤僻

冷傲的性格,从而写作出那种感人肺腑的诗篇。作者对《娇女》诗评价甚高,以为《娇女》诗不仅丰富了诗歌新的内容,开创了诗歌新的领域,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作者还从慷慨悲壮之情怀、古朴简淡之文辞、委婉讽谕之情致、诚挚感情之反映阐述了左思诗歌的风格。书后附有《重要参考书目》。

(郑永晓)

【阮籍咏怀诗研究】 魏晋诗歌研究专著。邱镇京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绪论》,凡三章:分别介绍诗人的家世、生平、时代背景、名士风尚及思想行为。以为阮籍依违于魏晋间,不肯屈身曹氏,又致讥于司马氏的超然立场,是研究《咏怀诗》的关键所在。下篇《本论》,凡四章:分别阐述了《咏怀诗》的版本与源流、内容、特征及技巧、地位和影响等。作者指出,《咏怀诗》不仅胎息于《小雅》,孳生于楚辞,而且深受《古诗》及李、苏和曹植等汉人作品的影响。其内容大致可区分为自述、讽刺、伤感、忧生、隐逸五类,大多可与当时的政治演变相结合;自述、忧生、隐逸部分,乃诗人在时代苦闷重压下的心理反应,为诗人由儒入道、由热情进取向冷漠恬退的过程说明。作者在分析了《咏怀诗》的特征及技巧后,重点阐述了《咏怀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为阮籍是使五言诗脱离民歌风格的关键人物,更是由建安风骨转入太康轻绮柔靡过程中,以冲淡笔法力挽狂澜的大诗人。(郑永晓)

【陶诗新论】 陶渊明诗歌研究专著。高大鹏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1月出版。全书正文由六篇文章组成,依次为:陶诗在文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陶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陶诗评价的历史发展、陶诗的影响、陶诗影响的有关批评、结论。作者根据近代以来西方文艺美学的有关见解,认为陶渊明诗表现出一种“价值取向”,而表现出“价值取向”即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必然具有文学和批评上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在文学史上,陶诗完成了君子的大传统和小人的小传统的价值整合,亦即表现了形而上的伦理、美艺、天理等传统文化的图腾;同时也保存了文化的生物层面,亦即形而下的经济、本能、人欲等传统文化的禁忌。总之陶诗能表现文化上的整体意义。所以陶诗在世界文化上的重要性少有其匹。全书重点在第一章,即以西方理论为参照提出其基本理论的假设,以下各章均为事实上的注释与归纳,以作为第一章的证明。书末附有《论田园诗人陶渊明》等文章七篇。

(郑永晓)

【陶谢诗之比较研究】 沈振奇著。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2月初版。作者在自序中说:“陶诗之研究,已成显学,治谢诗者亦不乏人,惟对二家诗作较有系

统之比较研究者尚付阙如。本文即就此方面进行钻研。”该书“遵循以陶解陶,以谢解谢之方法进行钻研,先将二家之作品,生平事迹,尽可能予以系年;从时代背景、史传记载及二家作品等比较研究二家诗之特色,以期能对二家之生平与诗作更深入之了解,以得更确切之评价。”全书包括引言、陶渊明与谢灵运生平之比较、陶渊明与谢灵运诗之比较和总结四章。作者认为,陶、谢二家,一为田园诗派之大宗师,一为山水诗派之圣手,皆为划时代之大诗人。二人诗歌相较,陶诗具有趣远、真淳、自然、长于意境、排散兼行等特点;谢诗则具有才高、富艳、精工、工于形似等特点。就其渊源而言,陶诗属正始系,谢诗属太康系。书末附录包括“陶谢二家居里图”、“陶渊明世系图”、“谢灵运世系图”等。(郑永晓)

【**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张修蓉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3月初版。该书对汉唐两代贵族与才女诗歌作比较研究,对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戚夫人《永巷歌》、虞姬《和项王歌》、卓文君《白头吟》、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上官昭容、杨贵妃以及唐代众多民间才女等诗人诗作逐条予以论述。通过比较,作者指出,汉代帝王贵族诗歌多属即兴之作,唐代帝王贵族多为诗歌而诗歌;汉代后妃才女多为生命而讴歌,唐代后妃才女为诗而作有感而吟;汉代女诗人对唐代女诗人有启蒙作用,唐代女诗人有导引文学之功;汉代鲜有民间女诗人而唐代则大放异彩。从文学价值方面而论,汉代帝王后妃诸作,均系人生最为得意或悲愁愤懑生死诀别刹那间的即兴讴歌,故能及时捕捉灵感,写下不朽诗篇;唐代帝王贵族诗歌演变成一种特有的宫廷诗形式,其功能在布施恩威,教化天下;唐代后妃宫人与民间才女之诗歌,包容甚广,其价值不逊于男性诗家,具有真挚感人,历久弥新的特点。书后附有参考书目。

(郑永晓)

【**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唐诗研究专著。侯迺慧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6月初版。全书共分六章,依次为“唐代园林兴盛的背景”、“唐代重要文人园林”、“唐代重要文人山水美感与造园理念”、“唐代文人园林生活的内容与形态”、“唐代文人园林生活的境界追求”、“唐代文人园林生活的影响”。作者在分析唐代园林兴盛原因的基础上,以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浣花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裴度的绿野堂、李德裕的平泉庄、牛僧儒的归仁园等为例,介绍了唐代文人园林和文人们游赏园林的概况。作者将文人园林分为春光型、春夏型、夏日型、夏秋型、秋日型五类,以为唐人对园林有种种追求与品鉴,要求园林具有寂静、幽邃、洁净、清

灵、自然、古朴等品质,他们普遍以园林为修道、得道的胜境,其对园林生活的境界追求,往往表现出儒、道、释思想的兼融并蓄。作者最后指出,唐代园林的发展对唐诗、山水画和建筑艺术产生了积极和巨大的影响。该书并附有唐人园林图片多幅。

(崔彤 郑永晓)

【**禅学与唐宋诗学**】唐宋诗学研究专著。杜松柏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10月出版。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无禅学即无宋代理学,无禅学则唐宋诗不能有高玄意境,而尤影响于论诗评诗。全书包括六章,依次为:禅学之兴盛及其特性、唐宋诗学述要、以诗寓禅、以禅入诗、禅学与诗学之合流、结论。作者认为,诗至极盛之时,禅人以诗寓禅;禅极风行之后,诗家以禅入诗。禅理诗论,渐相融合。然以禅学未圆明,据以言诗,而诗理未莹澈,致纠缠困扰宋以后之诗坛。如诸家对司空图严羽之言,固多误解;即对“妙悟”之说,各家所争实各自为言,无益于诗学。作者详考禅学与诗学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为司空图乃取“空”、“有”对待之理,二十四诗品每二品相对而成,又摹神取象,以颂诗之体,表显诗之最高意境。而严羽以禅喻诗,旨在以临济参禅之法,以学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以曹洞学禅之方,以学大历以下之诗。其《诗话》之着眼,在暗排江西,明攻四灵、江湖,而欲回归盛唐之正。作者对禅理与诗学均有研究,故新见迭出,多有创获。

(郑永晓)

【**敦煌的唐诗**】唐诗研究专著。黄永武著。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5月初版。著者曾编辑《敦煌宝藏》和《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此书则是著者积十余年考订撰述之功完成的力作,就敦煌所见唐代数十位诗人真迹的价值作出学术上的判断和艺术性的赏析。全书包括《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敦煌所见王昌龄诗七首的价值》、《敦煌所见孟浩然诗十二首的价值》、《敦煌伯二五六七号中李昂、荆冬倩、丘为、陶翰、常建诗的价值》、《敦煌所见白居易诗二十首的价值》、《敦煌伯二五五五号卷子中二十七首今存唐诗的价值》、《敦煌所见刘希夷诗四首的价值》、《敦煌伯三六一九号卷子中四十一首唐诗的价值》等八篇论文。该书与前人着眼在现今不存的辑佚诗篇有所不同,而是偏重在今存诗篇的校勘工作。作者以敦煌本为主,取诸家诗集的多种版本相对勘,不仅研究文字异同,更利用修辞学及句法习惯的观点,把文字改动后,对诗意的牵连影响,作详细的说明,认为敦煌本唐诗在字义、制度、音律、修辞、语汇、辨伪等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与启示,充分论证了敦煌资料对唐诗研究的重要性。书后附有敦煌卷本唐诗真迹。

(郑永晓)

【王维诗研究】 柳晟俊著。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7年7月初版。全书由“王维评传”、“王维诗之自然风与画趣”、“王维诗之禅趣与意象表现”、“王维诗之地位与对李朝诗人之影响”和“结论”五个部分组成。作者在前言中阐述该书的写作方法为：其一，论王维之生平与思想，阐明其文学思想及背景，例如王维的成长历程、道佛关系与师友交游等。其二，详论王维诗之特性，如第二章至第三章分析王维诗之自然歌咏、诗画之融合、与禅悟之关系、诗之意象表现，以及王维诗的地位及其贡献。其三，根据王维诗风，分析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启示，王维对李朝诗人的影响。作者认为，王维诗能融贯佛道思想于诗意中，开拓其独特境界。王维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田园诗源出陶渊明，能将道佛之心灵世界，表现于田园诗中；而其山水诗，则源出谢灵运、谢朓等，大抵表现虚无主义及个人主义的心灵意识，追求虚幻与脱俗。（二）能将画境融入诗境中，表现诗中独特的美感；（三）以禅入诗，诗境空灵超越；（四）使用视觉、图画、听觉、事物（动植物、矿物）等意象，与内心之情思结合，造成暗示或象征的效果。书后附有主要参考书目。（郑永晓）

【杜甫夔州诗析论】 唐诗研究专著。方瑜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5月出版。该书通过考察杜甫在大历元年春末夏初抵夔，到大历三年正月中旬出峡赴江陵期间的的生活、思想、感情起伏和诗歌创作，力求对杜甫夔州时期诗歌创作的真正成就作出较为明晰的认知与评价。全书包括“导言”、“去留的徘徊——居夔与出峡”、“时政批判与慕隐遁世”、“忆昔与思今”、“景物时序与山水咏怀”、“结语”七个章节。作者认为，夔州时期的杜甫，因体力的衰颓与简淡多暇的平居生涯，容易倾向内省与自我探索，诗篇遂成为杜甫内在矛盾冲突、犹疑不安的真实记录。夔州诗中有精严守律、典丽高华的杰作，也有随兴挥笔、不假雕琢的小品，更有自出规模，戛戛独造，以晚年圆熟自如的技巧欲摆脱绳墨规范的“横逆”之作。这个时期完成的作品，有很多篇都是奠定杜甫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基石。书后附有参考书目。（郑永晓）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叶嘉莹著。本书搜集了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计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分别为之考订异同，对诸家之说各依时代先后加以整理校评，凡二十余万字，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出版。1981年后，作者在大陆又搜集到各种不同版本的杜甫诗集数十种，经过删择，又增入历代杜诗之注本十八种，与前在台湾所收辑者，按时代先后重新加以编排改写，计不同之注

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凡三十余万字，于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辑再版。全书以四万字的长篇论文《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为代序。作者认为：“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且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拘限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七言律诗形成为“中国诗歌中最凝练精美的一种体式”，是由于杜甫“以其过人的感受力与思辨力，及其创作的精神与热诚，扩展了七律一体的境界，提高了七律一体的价值”，《秋兴八首》这组诗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一种经过艺术化了的情意，在技巧上表现出句法的突破传统和意象的超越现实，由此方真正挣脱了格律的压束，使七律得以真正发展臻于极致，在诗坛上奠定了其地位与价值。全书共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和分章集解等部分。前三部分皆以八诗为一单位，集解则以每一诗为一单位，其中又分校记、章旨、集解三节。引用的书包括宋王洙编《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人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鲁崧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外集一卷、补遗十卷，元高楚芳编、附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明胡震亨撰《杜诗通》四十卷，明王嗣奭撰《杜臆》十卷，清钱谦益笺注《杜诗钱注》，清金圣叹撰《唱经堂杜诗解》，清朱鹤龄注《杜工部集》二十卷，清吴见思撰《杜诗论文》五十六卷，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清黄生《杜诗说》十二卷，清杨伦撰《杜诗镜铨》，清施鸿保撰《读杜诗说》二十四卷等，举凡前人注杜、评杜的重要版本几乎包罗无遗。而尤可称道者，在于作者于集解之后每每缀以自己的评论，整理分析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本书是一部资料整理汇编和理论研究并重的学术著作。

（高克勤）

【岑参研究】 专著。史墨卿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2月初版。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人人文库》中。著者认为“论诸诗家，李、杜而外，应推王、孟、岑、高。太白诗仙，少陵诗圣，王为诗中我佛，孟乃诗中高士，至岑、高，则诗中豪杰也”。又认为岑参诗“多蕴忠爱之旨，发警切之言，其声情激越，词意发扬，读之令人奋袖起舞”。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介绍唐代诗坛概况，以说明岑参诗在唐诗中的地位。第二章叙述岑参所处时代。第三章至第八章分别叙述岑参的家世、生平、性格、交游、著作及诗风，第九

章“评鹭”则搜集了大量岑参同代人以及后人对岑参诗的各种评论资料。书后附参考书目。本书可说是资料丰富、论述生动的读物。(孟繁裕)

【孟郊研究】 尤信雄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全书除序言外,共九章,依次阐述和论证孟郊的里籍、生平、赋性、思想、交游、文学批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等。作者认为,欲体味孟郊诗作,必须先明了其人之赋性,而不能笼统地以“赋性褊隘”视之。作者从“高洁好占”、“任性率真”、“耿介方拙”、“温婉仁孝”、“抱道不移”五个方面分析孟郊的性情,依次介绍了孟郊的知音之交、因依恩养者、同病相怜者、文士之唱酬者及方外之士等数十位交游人物,重点考察了孟郊与韩愈的交谊,以为二人真“诗文之骨肉”、“千古之知音”。作者认为,孟郊之诗“于唐贞元、元和间,能一洗当世习俗,独开户牖,遂启一代之风气。使中唐诗歌创作,能突破传统,而开创新局。其诗虽涉奇险,然古淡有味,瘦劲有力,清寒有神。皆率情而书,不用呆字死词,不拘泥用典,不追摹前代,不盗袭古人,而一空依傍,戛戛独造,于宋之江西诗派不无影响”,“其诗作之价值与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书后附录有夏敬观《说孟郊》和参考书目。(郑永晓)

【李贺诗研究】 诗歌研究专著。杨文雄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2月初版,1983年6月再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依次为“绪论——朝向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融合”、“李贺诗的外缘研究”、“李贺诗的内在研究”、“结论——李贺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第一部分阐述了作者有关将传统批评和西方现代批评取长补短,建立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主张。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李贺的生平及其所受前人的影响,以为其创作意识来源于个人困苦生活的升华、遗憾的心理补偿。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着重对李贺诗的语言艺术作了研究与探讨。主要涉及李贺诗歌的意象、动词的使用、严格而又灵活的格律、韵脚转换与抑扬顿挫的节奏以及李贺诗歌的境界等。最后一章指出,李贺作为中唐时代一名杰出的诗人,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反对庸俗、追求完美的艺术表现精神,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对后代众多诗人的巨大影响,造就了他在中唐诗歌史上不可磨灭、不可动摇的地位。书后附录有“李贺研究论著知见目录初编”。(崔彤 郑永晓)

【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 唐诗研究专著。范淑芬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全书计四章十四节。作者在序言中说:“首章根据史乘及相关资料以叙述元稹生平”;“次章探讨元稹所处之时代背景,并叙其文学思想渊源及诗学论见;三章分别就

内容与技巧特色分析元稹乐府诗,以探明其诗歌本身的价值及其理论与创作间之平衡性;末章则以白居易与之相较,以明其乐府诗创作上之相互关系”。该书重点有二:在元稹生平方面,对其颇受疵议的“婚”与“仕”采取较人性的观点;在乐府诗方面,强调元白二人相互激发影响之关系。以为白居易所以有如此斐然可观的成绩,诗友兼诗敌的元稹与其相互唱和、切磋,功不可没。元稹在文学史上所代表的意义,远超过其在乐府诗上所表现的成就。

(郑永晓)

【白居易研究】 杨宗莹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初版。全书分为六章,依次为家世考证、生平事迹、交游状况、生活艺术、思想与处世态度、作品研究。其中以三、四两章最见功力,第三章介绍了诗人一生的交游对象,包括元稹、刘禹锡、李绅、张籍、韩愈、裴度、牛僧儒、令狐楚等二十六人及其他道士、处士、山人等,白氏一生的交往对象可谓搜罗无遗,藉此可以观察诗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第四章本知人论世的原则,对诗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体味作了颇为详细的阐述。第五章以为诗人以儒家思想立身朝廷,以佛老修心养性,又有求长生、退隐、乐天知命等衍生的处世态度,因而能左右逢源,进退绰有馀裕。第六章阐述了白诗的分类与题材;介绍了白集的整理与收藏情况;分析了白诗的艺术特色,并对白诗的渊源和影响作了探讨。书后附有参考书目。(郑永晓)

【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 张仁青等主编。台北天工书局1984年9月初版。该书收录台湾和大陆等地数十位专家学者有关李商隐及其诗歌的研究论文六十七篇。作者有夏敬观、苏雪林、祝秀侠、缪钺、吴调公、徐复观、李曰刚、柯庆明、刘逸生、张仁青、周策纵、龚鹏程、姚一苇、黄永武、邵德润等。所收论文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七类:第一类为李氏的生平与思想,如苏雪林《诗谜专家李商隐》、童黛虹《玉谿生与佛教》;第二类为李氏诗歌的综论,如缪钺《论李义山诗》、龚鹏程《读玉谿生诗札记》;第三类从题材角度如政治、爱情、咏史角度论义山诗,像方瑜《李商隐的咏史诗》;第四类论义山诗的风格、技巧,如陈文华《比较与翻新——论义山七律末联的深一层法》;第五类为李商隐诗分题专探,如“锦瑟诗”、“无题诗”、“嫦娥诗”等,像徐复观《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第六、第七部分是围绕李义山诗产生的争议和讨论,如汤翼海《平质苏雪林〈玉谿诗谜〉》。全书基本反映了近半个世纪海峡两岸学术界对李商隐诗的研究成果。书末附有《重订李商隐诗集》和篇目索引,以备检索。(郑永晓)

【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诗歌流派研究专著。龚鹏程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初版。全书包括五卷：“导论：研究江西宗派之目的与方法”、“宋诗之背景与宋文化之形成”、“宋诗之演变与江西诗社宗派之产生”、“江西诗社宗派事迹简表”。此书特点是把对宋江西诗派考察放在唐宋文化转型、唐宋诗歌转型的交汇点上，在探讨宋代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考察江西诗派的产生、发展及其意义，以为“欲知宋元以来诗体诗法诗学之因革、宗派社集之渊源、及崇唐祖宋诸价值判断之原委”，则莫若考诸江西诗派。作者认为，宋代文化肇自中唐社会变迁之后，而宋诗的风格特质，也与宋代文化的发展相始终，其特点是重视言意之辨，而江西诗派承此风气，最为典型。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实与当时宗族结构、社会组织、群体意识相结合。作者进而考察了《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名称、写作年代、图表形式、流传大略、性质特色，论证了江西诗派诸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特征，并从风格论原理和宗族组织法两方面分析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内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书后附《释江西诗社“学诗如参禅”之说兼论宋代诗学之理论结构》一文。（郑永晓）

【清代诗学初探】 清诗研究专著。吴宏一著。台北牧童出版社 1977 年 2 月初版，学生书局 1986 年修订再版。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全书包括序说和九个章节。序说介绍研究清代诗学的意义、旨趣和资料。以下八章分论清代诗学的背景、清诗话的作者与读者、拟古运动和反拟古运动的余波、形式批评的崛起与理论系统的建立、神韵说及同时代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及清中叶以后的诗论。最后一章是结论。作者指出，清代论诗风气，因受了学术思想的影响，既能熔裁旧说，又能别创新义；清代诗学与明代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关系最为密切；就地域论，清代诗学以江浙一带为最盛，其次则北京、山东等地，中叶以后始渐移向闽粤一带；清人论诗，好立门户，又喜调和，然其论诗主张实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卷首有著名学者郑騫所作序，称该书“不仅论列各个宗派的本身，他们

的赞同者及反对者，也追溯到他们的背景，明代后期及明清之间的诗论。全书体系结构是精密严整的，分枝细节也很周详完备。附录的《清代诗话知见录》尤为切实有用”。（郑永晓）

【清初杜诗学研究】 简恩定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除“前言”外，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导论：清初杜诗学的背景及其意义”、“本论：清初杜诗学的理论探究”、“结论：清初杜诗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范围以自明至清论杜注杜者为主，涉及钱谦益、朱鹤龄二人注杜争议始末、“诗史”一名的论究、杜甫诗圣地位转移之探讨、尊杜与轻杜说的建立和杜诗艺术技巧的阐发等。“本论”为该书的主体，从忠君观念的承袭和转移、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质疑等方面对杜甫的诗圣地位作了全面的考察；分析了“诗史”的含义及以诗补史问题；以为钱、朱注杜之争应是起于二人注解时的意见纷争甚多，再加上朱鹤龄似有掠人之美之嫌疑所致；作者还从以意为主、情景交融、意象化的技巧等方面探讨了杜诗的艺术技巧。“结论”则从考知宋元诗学的取向和明代诗论之梗概两方面阐述了清初杜诗学的价值，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作了简要的说明。（郑永晓）

【王夫之诗论研究】 杨松年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初版。全书由“绪论”、“王夫之诗论作品主要用语阐释”、“王夫之诗观论析”、“王夫之诗观与前代诗论”、“评后人分析王夫之诗论”共五章组成。作者针对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包括王夫之诗论遣词用语含糊不明确的特点，分析了造成语义含糊的根源，并借助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在科学、精细地分析这些用语的基础上，探讨“情”、“意”、“气”、“神”等王夫之诗论主要用语的精确意义，从王夫之论诗的情感、意境、语言、声韵、法度、鉴赏、诗坛习气等方面，详细探讨王氏诗论的主要内涵，以为王夫之论诗本《毛诗序》，讲求纯情雅正，在风格上要求诗情柔婉，诗风轻逸淡缓，贵蕴藉主清雅。作者还对前人论及王夫之诗论时的歪曲偏颇之处作了批评。书后并附有《王敬（荅斋公行述）补证》、《王夫之著述书目》、《王夫之诗选体制分类统计》等。（郑永晓）

词目笔画索引

一画

一三五七九言诗 1149
 一三五不论 1187
 一寸丹心 1134
 一日三秋 1128
 一片冰心 1133
 一片宫商 1218
 一斗百篇 1218
 一代风流 1218
 一代风骚主 1144
 一句诗 1149
 一场春梦 1140
 一至七字诗 1149
 一师心匠 120
 一年 1117
 一字千金 1218
 一字师 1141
 一字连城 1218
 一声对 1196
 一吟一咏(掌故) 1131
 一吟一咏(诗法) 1218
 一串珠 1137
 一枝春 1132
 一枕黑甜 1143
 一刻千金 1143
 一泻千里 1133
 一官一集 1132
 一柱擎天 1140
 一点灵犀 1140
 一洗凡马空 1134
 一祖三宗 711
 一笑千金 1132
 一倡三叹 1218
 一家春 1132
 一朝权在手 1136
 一落千丈 1138
 一觴一咏 1218
 一瓢诗话 234
 一瓢斋诗话 235
 一瓣香 1144

一鳞一爪 1145
 一鳞半甲 1218

二画

二十四友 680
 二十四诗品 156
 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 1452
 二三其德 1128
 二子乘舟 984
 二分明月 1137
 二句诗 1149
 二包 697
 二冯先生评点才调集 1315
 二老堂诗话 187
 二仲 727
 二刘 706
 二阮 678
 二苏 709
 二李 703
 二李唱和集 757
 二言诗 1147
 二应 677
 二宋 706
 二陆 679
 二妙集 747
 二废 1216
 二南密旨 154
 二南遗音 794
 二要 1216
 二俊 679
 二皇甫 693
 二绝 686
 二家宫词 784
 二陶 704
 二曹 704
 二谢 683
 二薇亭集 893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108
 十二石山斋诗话 255
 十二象 1446
 十二属诗 1174

十七字诗 1178
 十七势 1218
 十八家诗钞 756
 十才子 717
 十五从军行 1037
 十五夜望月 1082
 十月之交 1002
 十六国宫词 785
 十四字对 1194
 十字对 1192
 十体 1217
 十亩之间 991
 十势 1217
 十国宫词 785
 十种唐诗选 753
 十家诗话 243
 十朝诗乘 270
 丁仙芝 330
 丁卯集 859
 丁复 478
 丁香结 1140
 丁都护歌 1040
 丁野鹤集 939
 丁谓 392
 丁敬 620
 丁督护歌 1040
 丁澎 585
 丁鹤年 491
 丁耀亢 567
 七十二峰足徵集 804
 七千古来稀 1143
 七月 997
 七古 1154
 七古用韵 1188
 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
 1492
 七步成诗 1131
 七步诗 1051
 七体 1167
 七言古诗 1154
 七言诗三昧举隅 1202

- 七言诗 1148
 七言诗平仄举隅 1202
 七言律诗 1160
 七言律诗钞 756
 七言排律 1161
 七言歌行 1155
 七律 1160
 七律平仄 1187
 七律正格 1188
 七律偏格 1188
 七哀诗(王粲) 1050
 七哀诗(诗体) 1167
 七音 1198
 七绝 1159
 七绝平仄 1186
 七绝顺粘格 1188
 七绝偏格 1188
 七排 1161
 七得 1217
 七谏 1021
 七缀集 1443
 卜居 1020
 卜魁集 965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唐诗研究 1499
 八叉手 1141
 八斗才 1132
 八代诗史 1277
 八代诗选 1270
 八代诗乘 734
 八百孤寒 1140
 八面玲珑 1136
 八指头陀诗文集 970
 八音体 1173
 八旗诗话 246
 人日思归 1055
 人生如寄 1130
 人名体 1174
 人面桃花 1136
 人境庐内;黄遵宪的诗歌 1489
 人境庐诗草 969
 人境庐诗草笺注 1436
 人境庐集外诗辑 970
 人籁 82
 人木三分 1218
 人若耶溪 1055
 入塞 1045
 九月·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1108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060
 九叹 1021
 九华四俊 699
 九言诗 1148
 九言律诗 1161
 九怀 1021
 九灵山房集 914
 九思 1021
 九章 1019
 九章解诂 1257
 《九歌》与沅湘民俗 1267
 九歌 1016
 九歌解诂 1257
 九歌新考 1266
 九僧 706
 九辩 1020
 九跋 998
 九箴集 932
 力透纸背 1218
 又玄集 746
 了元 405
 了语体 1178
- ### 三画
- 三十六字母 1197
 三丁 724
 三才 687
 三上 1143
 三山诗话 266
 三元里 1123
 三不朽 93
 三五七言体 1148
 三仄式 1189
 三节 1216
 三平二满 1144
 三平式 1189
 三平调 1189
 三句诗 1149
 三包 698
 三台诗话 247
 三吏三别 1071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1416
 三百篇演论 1242
 三多 1216
 三州唱和集 743
 三字 1216
 三字尾 1189
 三妇艳体 1176
 三杨 697
 三李 703
 三甫 718
 三体唐诗 1310
 三何 687
 三言诗 1147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680
 三张 679
 三君 723
 三贤 684
 三易 84
 三罗 704
 三舍人 702
 三舍人集 743
 三要 1216
 三峡谣 1050
 三俊 702
 三洲歌 1044
 三祖 676
 三格 1216
 三袁 719
 三袁诗文选注 1413
 三莲诗话 174
 三笔六诗 685
 三唐诗品 268
 三淮 73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1371
 三家诗话 254
 三家宫词 784
 三难 1216
 三曹 676
 三曹年谱 1279
 三曹诗译释 1279
 三曹诗选 1278
 三曹资料汇编 1279
 三偷 1216
 三谢 683
 三韵律诗 1161
 千旄 984
 于石 448

- 于右任 671
 于良史 348
 于武陵 384
 于武陵诗集 865
 于若瀛 548
 于忠肃墓 1119
 于季子 321
 于肃愍公集 922
 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 1114
 于雅乐 1496
 于鹄 344
 于鹄诗集 850
 于湖集 890
 于谦 514
 于谦诗选 1411
 于渍 376
 于渍诗注 1382
 工夫在诗外 93
 下句抱上句法 1210
 下字 1206
 下里巴人(诗法) 1218
 下里巴人(概念) 145
 下武 1008
 下泉 997
 下笔成章 1218
 大小阮 678
 大小谢 683
 大子夜歌 1040
 大车 987
 大历十才子 693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743
 大历体 694
 大历诗风 1330
 大历诗略 1317
 大 43
 大风歌 1022
 大东 1003
 大田 1004
 大司命 1017
 大邢小魏 687
 大曲 1153
 大言体 1177
 大招 1021
 大叔于田 988
 大明 1007
 大泌山房集 930
 大珠小珠落玉盘 1137
 大雅集 769
 大韵 1185
 大醇小疵 1219
 万光泰 625
 万寿祺 569
 万取一收 116
 万首唐人绝句 747
 万首唐人绝句索引 1385
 万斯同 604
 万楚 330
 才性 79
 才胆识力 80
 才调 124
 才调集 746
 才调集补注 1319
 才调集笺注 1317
 寸草春晖 1139
 上山采蘼芜 1036
 上之回 1025
 上邪(汉乐府) 1026
 上江诗选二集 797
 上阳白发人 1086
 上声歌 1040
 上尾 1185
 上京即事 1112
 上官仪 320
 上官体 687
 上官婉儿 327
 上留田行 1032
 上虞诗选 819
 口占 1157
 口号 1157
 山中四友 694
 山中杂诗 1054
 山中寡妇 1093
 山水田园诗派 690
 山水诗 1164
 山水诗派 682
 山石 1079
 山右国朝诗存 789
 山有扶苏 989
 山有枢 992
 山行 1089
 山阳诗徵 810
 山阴诗话 184
 山村遗稿 905
 山园小梅 1094
 山谷内集注 1397
 山谷外集诗注 1397
 山谷先生年谱 1399
 山谷年谱 1398
 山谷别集诗注 1398
 山谷体 707
 山谷集 874
 山林气 1216
 山雨欲来 1139
 山泽四友 683
 山房随笔 195
 山居杂咏 1118
 山居秋暝 1061
 山南诗选 794
 山带阁注楚辞 1254
 山鬼 1018
 山姜诗话 229
 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 1317
 山静居诗话 241
 山静居绪言 241
 山歌 1162
 千里面谭 207
 千里鹅毛 1143
 千呼万唤 1137
 千首宋人绝句 765
 千首宋人绝句校注 1387
 千首唐人绝句 1320
 千首清人绝句 1414
 千载佳句 745
 千家诗 758
 义门读书记·文选 1294
 义丰集 889
 义得言丧 101
 夕堂永日绪论 225
 广十二家唐诗 748
 广元遗山年谱 1409
 广五子 718
 广平三君 722
 广东诗粹 829
 广州五先生诗 828
 广州四先生诗 828
 广阳诗集 954
 广济耆旧诗集 826
 广陵五宗 726

广陵诗事····· 249
 广雅堂诗集····· 969
 广韵····· 1200
 广濂淡窗····· 1494
 亡国之音····· 101
 门有车马客行····· 1033
 己亥杂诗····· 1123
 己畦诗集····· 948
 卫庄姜····· 275
 卫宗武····· 454
 女曰鸡鸣····· 988
 女郎诗····· 1167
 小山嗣音····· 798
 小川环树····· 1495
 小车行····· 1115
 小仓山房诗集····· 958
 小石帆亭著录····· 245
 小石林文外·本朝诗话····· 236
 小乐府····· 1150
 小弁····· 1002
 小戎····· 994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1108
 小池····· 1106
 小李杜····· 703
 小言体····· 1177
 小沧浪诗话····· 261
 小明····· 1004
 小宛····· 1002
 小草斋诗话····· 218
 小豷····· 1014
 小星····· 981
 小律····· 1161
 小畜集····· 866
 小家碧玉····· 1131
 小匏庵诗话····· 261
 小清华园诗谈····· 256
 小谟觞馆诗集····· 964
 小韵····· 1185
 小旻····· 1002
 小澥草堂杂论诗····· 238
 飞文染翰····· 1219
 飞动体····· 1179
 习学记言····· 189
 习学记言序目····· 189
 马工枚速····· 1219
 马中锡····· 519

马曰璐····· 617
 马曰琯····· 617
 马耳东风····· 1134
 马汝骥····· 531
 马君武····· 671
 马君武诗注····· 1441
 马洪····· 516
 马祖常····· 478
 马逢····· 353
 马戴····· 366
 子产诵····· 978
 子夜四时歌····· 1039
 子夜吴歌四首····· 1063
 子夜歌····· 1039
 子衿····· 989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
 体····· 1102

四画

比红儿诗····· 863
 比较诗学····· 1474
 比喻····· 1211
 切对····· 1191
 切侧对····· 1195
 切韵····· 1199
 切韵指南····· 1201
 切韵指掌图····· 1201
 切题····· 1204
 支遁····· 292
 艺文类聚····· 1454
 艺林学山····· 215
 艺苑玄机····· 208
 艺苑名言····· 244
 艺苑闲评····· 217
 艺苑雌黄····· 173
 艺苑卮言····· 212
 艺圃撷馀····· 212
 艺谈录····· 257
 艺概····· 260
 艺薮谈宗····· 216
 云中君····· 1017
 云仙杂记····· 156
 云仙散录····· 156
 云汉····· 1010
 云谷杂记····· 190
 云间三子····· 721

云间诗钞····· 806
 云间诗派····· 721
 云烟过眼····· 1145
 云游集····· 1487
 云溪友议····· 156
 云谿波诡····· 1219
 云樵外史诗话····· 260
 云樵诗话····· 259
 云麓漫钞····· 188
 元人十种诗····· 771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772
 元人选元诗····· 772
 元夕无月····· 1125
 元艺圃集····· 771
 元日····· 1098
 元文类····· 767
 元四家····· 713
 元白····· 700
 元白体····· 700
 元白诗选····· 1365
 元白诗派····· 700
 元白诗笺证稿····· 1367
 元次山集····· 849
 元好问····· 462
 元好问诗选····· 1408
 元严····· 463
 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 1471
 元明清诗选····· 1488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
 赠看花诸君子····· 1083
 元和体····· 701
 元和格····· 701
 元夜····· 1109
 元诗三百首····· 1408
 元诗纪事····· 269
 元诗别裁····· 772
 元诗体要····· 771
 元诗选癸集····· 771
 元诗选(顾奎光)····· 772
 元诗选(顾嗣之)····· 771
 元轻白俗····· 700
 元音····· 770
 元音遗响····· 769
 元宫词····· 786
 元神活泼····· 103
 元结····· 341

- 元结诗解 1359
 元朗诗话 209
 元淮 468
 元遗山先生年谱(施国祁)
 1409
 元遗山先生年谱(凌廷堪)
 1409
 元遗山先生年谱(翁方纲)
 1408
 元遗山年谱汇纂 1409
 元遗山诗集笺注 1408
 元遗山集 901
 元嘉三大家 682
 元嘉体 683
 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 1505
 元稹 1487
 元稹 362
 元稹集 858
 元祐体 710
 无一字无来处 120
 无可 363
 无边风月 1145
 无地起楼台 1145
 无色无著 104
 无衣(唐风、秦风) 993
 无羊 1001
 无尽庵遗集 974
 无我之境 53
 无学之学 102
 无将大车 1003
 无家别 1072
 无理而妙 1219
 无题 1091
 无题诗 1163
 天下同文集 768
 天台集 820
 天衣无缝 1219
 天问 1018
 天问论笺 1265
 天问研究 1267
 天问释天 1256
 天问疏证 1256
 天问新注 1260
 天问纂义 1259
 天作之合 1128
 天作 1012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774
 天放楼诗集 973
 天荒地老 1137
 天香国色 1138
 天保 999
 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 787
 天真 127
 天真阁集 963
 天梅遗集 974
 天涯比邻 1133
 天厨禁脔 172
 天籁(概念) 82
 天籁(诗法) 1207
 天籁阁诗话 271
 开门见山 1219
 开门对 1192
 开合 1212
 不平则鸣 97
 不主故常 1219
 不如归去 1133
 不留一字 1219
 不烦绳削 1219
 不著一字 145
 不落窠臼 1219
 不稂不莠 1128
 不赞一辞 1219
 木天禁语 198
 木瓜 986
 木兰诗 1048
 木渎诗存 803
 木樨香馆诗话 272
 互文 1213
 互文对 1197
 互成对 1195
 互体 1214
 王十朋 429
 王九思 523
 王又曾 624
 王士禄 591
 王士禛 597
 王广心 582
 王门二弟子 725
 王之涣 330
 王之道 426
 王子安集 843
 王子安集注 1332
 王元章倒枝梅画 1115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1331
 王无功文集 842
 王无竞 324
 王夫之 583
 王夫之诗文集 946
 王夫之诗论研究 1506
 王韦 695
 王韦合刻 750
 王友亮 634
 王仁裕 387
 王氏三珠树 688
 王氏 455
 王文公文集 871
 王文治 633
 王文简古诗平仄论 245
 王以宁 421
 王世贞 541
 王世懋 544
 王右丞体 689
 王右丞诗话评 210
 王右丞集 847
 王右丞集笺注 1336
 王令 404
 王令集 872
 王立之诗话 167
 王臺卿 309
 王司空集 840
 王芑孙 638
 王迈 445
 王百穀全集 929
 王贞白 385
 王廷陈 525
 王廷相 525
 王行 502
 王刘 677
 王安中 419
 王安石 402
 王安石年谱 1391
 王安国 403
 王洙 531
 王阮 434
 王观 405
 王杨卢骆体 688
 王李 717
 王李高岑 691

- 王佐····· 502
 王直方诗话····· 167
 王若虚····· 460
 王革····· 610
 王叔承····· 544
 王鸣盛····· 626
 王昊····· 591
 王昱····· 640
 王昌龄(诗人)····· 331
 王昌龄(专著)····· 1490
 王昌龄诗注····· 1335
 王国维····· 670
 王国维诗词笺校····· 1440
 王季友····· 342
 王季重十种····· 933
 王质····· 436
 王舍人诗集····· 921
 王周····· 390
 王炎····· 437
 王洸····· 408
 王建····· 355
 王建诗集····· 854
 王绂····· 511
 王孟韦柳····· 695
 王孟····· 690
 王荆公年谱考略····· 1390
 王荆公体····· 707
 王荆文公诗笺注····· 1390
 王荆国文公年谱····· 1390
 王勃····· 323
 王勃诗解····· 1333
 王拯····· 654
 王昭君····· 1027
 王思任····· 556
 王胄····· 317
 王禹偁····· 389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1388
 王庭筠····· 459
 王庭珪····· 421
 王恽····· 466
 王洋····· 424
 王昶····· 627
 王恭····· 509
 王隼····· 604
 王逢····· 489
 王梵志····· 320
 王梵志诗校注····· 1331
 王梵志诗校辑(别集)····· 1331
 王梵志诗校辑(专著)····· 842
 王常宗集····· 919
 王冕····· 480
 王冕诗选····· 1410
 王船山公年谱····· 1421
 王船山先生年谱····· 1421
 王清惠····· 455
 王涯····· 354
 王渔洋诗文选注····· 1423
 王寂····· 458
 王绩····· 319
 王绩诗注····· 1331
 王维(诗人)····· 333
 王维(专著)····· 1490
 王维吴道子画····· 1099
 王维诗之画意····· 1486
 王维诗····· 1489
 王维诗研究····· 1504
 王琪····· 396
 王湾····· 329
 王遂····· 444
 王韞秀····· 345
 王摅····· 599
 王粲····· 282
 王粲行年考····· 1280
 王粲集····· 832
 王粲集注····· 1279
 王筠····· 307
 王微····· 298
 王慎中····· 536
 王猷定····· 566
 王嘉····· 292
 王僧达····· 299
 王僧孺····· 302
 王德钟····· 673
 王褒····· 313
 王豫····· 644
 王翰(唐诗人)····· 329
 王翰(元诗人)····· 491
 王融····· 304
 王噫歌····· 1023
 王鏊····· 520
 王彝····· 505
 王籍····· 307
 王穉登····· 543
 王翊····· 569
 王偶····· 513
 王雱····· 408
 王珪(唐诗人)····· 319
 王珪(宋诗人)····· 401
 王铤····· 454
 王祜····· 500
 王闳运····· 656
 王铨····· 421
 王驾····· 383
 王彦泓····· 558
 王彦辅诗话····· 168
 五七言今体诗钞····· 754
 五七言诗····· 1149
 五人墓下作····· 1122
 五大诗人评述····· 1451
 五山耆旧今集····· 804
 五子歌····· 976
 五车韵瑞····· 1203
 五仄体····· 1172
 五方元音····· 1201
 五平五仄式····· 1189
 五平五仄体····· 1172
 五平体····· 1172
 五占····· 1154
 五古用韵····· 1188
 五代诗话····· 232
 五代宫词····· 785
 五句诗····· 1149
 五百石洞天挥麈····· 268
 五百四峰堂诗钞····· 962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 1361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
 ····· 1369
 五杂俎体····· 1176
 五声····· 1198
 五言长城····· 1136
 五言古诗····· 1154
 五言诗····· 1148
 五言诗平仄举隅····· 1202
 五言律诗····· 1160
 五言排律····· 1161
 五忌····· 1217
 五俗····· 1217

- 五律 1159
 五律平仄 1187
 五律正格 1188
 五律偏格 1188
 五音 1198
 五音集韵 1203
 五总志 175
 五绝 1159
 五绝平仄 1186
 五绝顺粘格 1187
 五绝偏格 1188
 五格 1217
 五峰耆旧集 804
 五峰集 912
 五排 1161
 五寔 694
 车名体 1175
 车攻 1000
 车邻 994
 车鞅 1005
 丰干诗集 852
 丰 989
 丰年 1013
 韦玄成 279
 韦刘 695
 韦庄 381
 韦庄《秦妇吟》校笺 1382
 韦庄集 864
 韦苏州体 694
 韦苏州集 852
 韦应物 348
 韦孟 278
 韦承庆 322
 韦柳 695
 韦柳体 695
 韦斋集 884
 韦渠牟 350
 韦嗣立 324
 韦端己年谱 1383
 韦襄 405
 友鸥堂集 954
 太仓稊米集 881
 太平洋遇雨 1126
 太田青丘 1495
 太白山人漫稿 927
 太白体 691
 太函集 929
 太康体 680
 尤杨 712
 尤杨范陆 712
 尤侗 583
 尤袤 432
 仄韵律诗 1160
 仄韵绝句 1159
 历代吟谱 186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1457
 历代诗话(吴景旭) 224
 历代诗话(何文焕) 239
 历代诗话论作家 1448
 历代诗话续编 273
 历阳诗囿 797
 区大相 550
 止斋集 891
 少司命 1017
 少年行 1061
 少谷全集 927
 少陵先生年谱 1353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1353
 少陵体 692
 少陵诗格 183
 少陵编年词目谱 1353
 中山诗话 163
 中古文学史论 1273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1277
 中古文学系年 1277
 中世早期的中国诗;王粲生
 平和诗歌 1487
 中印诗缘 1461
 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 1474
 中伊诗缘 1463
 中华风与西方诗坛 1464
 中州三杰 713
 中州名贤文表 793
 中州集 766
 中兴四大诗人 712
 中兴间气集 742
 中兴群公吟稿戊集 761
 中谷有蓷 987
 中序 153
 中国山水诗研究 1501
 中国中古文学史 1272
 中国中古诗歌史 1277
 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 1489
 中国文学选萃 1484
 中国古代抒情诗 1493
 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 1484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
 ——诗歌之部(一、二)
 1500
 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 1472
 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 1472
 中国古典诗论在俄苏 1473
 中国古典诗集(唐代) 1492
 中国古典诗歌 1493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 1451
 中国古诗与五山文学 1463
 中国古诗与戈氏父女 1465
 中国古诗与托马斯·珀西
 1464
 中国古诗与芭蕉、芜村 1464
 中国古诗与《怀风藻》 1463
 中国古诗与威廉·琼斯 1464
 中国古诗与“敕撰三集” 1463
 中国古诗与歌德 1465
 中国古诗在日本 1458
 中国古诗在西方 1459
 中国古诗在俄苏 1460
 中国古诗选 1485
 中国古诗探源 1486
 中国旧诗佳句韵编 1457
 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 1488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 1431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19—1949)·概论、
 诗文卷 1430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
 诗歌卷 1429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 1431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
 (1949—1979)·诗文卷 1430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 1431
 中国诗艺 1485
 中国诗史 1446
 中国诗论 1443
 中国诗词概论 1443
 中国诗学大纲 1442
 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
 1446

- 中国诗学——设计篇 1500
中国诗学——鉴赏篇 1500
中国诗选 1492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1446
中国诗歌史 1447
中国诗歌史论 1447
中国诗歌发展史略 1446
中国诗歌发展讲话 1446
中国诗歌传统里的意象读法
..... 1488
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 1487
中国诗歌的写作 1487
中国诗歌的全盛期 1484
中国诗歌流变史 1500
中国诗歌简史 1447
中国诗歌漫笔 1447
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理论
..... 1489
中国叙事诗 1488
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
其时代 1485
中国韵文通论 1443
中诗句法研究 1476
中诗英译 1483
中泰诗缘 1463
中原音韵 1204
中唐刘言史集 853
中晚唐叩弹集 1317
中晚唐诗纪 750
中晚唐诗派 728
中韩诗缘 1462
中越诗缘 1462
中缅诗缘 1462
内田泉之助 1494
冈村繁 1495
贝青乔 652
贝琼 498
日月 982
日涉园集 878
仁山集 897
化工 83
化而不朽 103
化腐臭为神奇 120
仇远 468
从军行 1029
气 22
气势 26
气质 25
气格 25
气盛言宜 1220
气象 24
气韵 24
今传是楼诗话 271
今体诗 1158
今雨 1135
今音 1198
今朝有酒今朝醉 1139
今韵 1180
介白堂诗集 971
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1438
公无渡河 1026
公刘 1009
公安体 719
公安派 719
公是集 870
分甘馀话 228
分类字锦 1455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 1337
分类诗话 233
分解 123
分韵 1183
分韵诗 1170
分题诗 1170
壬戌清明作(屈大均) 1119
手写我口 92
毛先舒 587
毛际可 596
毛奇龄 588
毛诗王氏注 1229
毛诗引得 1251
毛诗正义 1229
毛诗古音考(专著) 1235
毛诗古音考(诗律) 1200
毛诗传笺 1228
毛诗传笺通释 1238
毛诗后笺 1238
毛诗序 148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1251
毛诗郑笺平议 1243
毛诗故训传 1227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1229
毛诗指说 1230
毛诗稽古编 1236
毛滂 414
毛珣 448
升庵诗话 206
升歌 1154
长干曲 1045
长干行 1063
长句 1157
长發 1016
长庆体 701
长江集 858
长江集新校 1370
长安古意 1056
长安有狭斜行 1030
长安居大不易 1137
长孙正隐 321
长孙佐辅 351
长相思 1036
长信秋词五首 1059
长信怨 1034
长律 1161
长恨歌 1087
《长恨歌》笺说稿 1368
长卿诗话 213
长调 1157
长绳系日 1131
长短句 1154
长韵律 1161
长歌行 1027
长歌(夏完淳) 1116
片言居要 1220
反切 1198
反对 1194
反讽说 1479
反求吾心 103
反接法 1208
反覆体 1170
乌生八九子 1027
乌台诗案 164
乌夜啼 1042
乌栖曲 1043
乌斯道 500
勿待轩诗话存稿 261
丹阳集(总集) 742
丹阳集(别集) 879
丹渊集 870

- 月儿弯弯照九州 1111
 月下独酌四首 1066
 月山诗话 237
 月出 996
 月夜 1070
 月泉吟社 713
 月泉吟社诗 766
 月洞吟 900
 月屋樵吟 907
 月鲁不花 487
 风人体 1173
 风人诗话 224
 风力 35
 风化 35
 风 34
 风月堂诗话 177
 风吹雨打 1135
 风雨 989
 风诗类钞 1241
 风骨 36
 风神 35
 风教 38
 风雅 37
 风雅逸篇 733
 风雅遗闻 247
 风雅翼 732
 风骚 674
 风骚旨格 157
 风骚要式 159
 风骚指格 158
 风韵 38
 凤池阁集 953
 凤阳花鼓 1117
 凤求凰 1035
 凤阁吟稿 917
 六一诗话 161
 六一诗话附录 162
 六一居士诗话 162
 六义 85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100
 六月 1000
 六甲体 1174
 六句律诗 1161
 六臣注文选 1294
 六至 1217
 六观 46
 六红诗话 250
 六言诗 1148
 六言律诗 1161
 六言绝句 1159
 六府体 1174
 六迷 1217
 六朝乐府与民歌 1292
 六朝声偶集 1268
 六朝诗 1488
 六宴 694
 文人相轻 94
 文山先生全集 898
 文天祥 451
 文天祥诗选 1407
 文不加点 1219
 文王 1007
 文王有声 1008
 文从字顺(概念) 91
 文从字顺(诗法) 1220
 文气 23
 文 18
 文心雕龙 149
 文心雕龙(英译) 1485
 文正集 867
 文史通义·诗话 241
 文史探微 1451
 文成朱先生感兴诗 1405
 文同 400
 文同诗选 1390
 文廷式 660
 文庄集 867
 文字禅 1144
 文体四变 13
 文言说 21
 文苑英华 732
 文苑诗格 154
 文忠集 888
 文质 21
 文质彬彬 21
 文采风流 99
 文学 19
 文昭 615
 文选 731
 文选平点 1297
 文选句图 189
 文选考异(胡克家) 1296
 文选考异(孙志祖) 1295
 文选导读 1298
 文选李注义疏 1297
 文选学 1298
 文选音义 1295
 文选笔记 1295
 文选旁证 1296
 文选理学权舆 1295
 文选集释 1296
 文恭集 867
 文笔 20
 文笔要诀 151
 文笔说 21
 文章 19
 文章四友 688
 文章龟鉴 746
 文章流别论 148
 文彭 533
 文赋 148
 文赋(英译) 1485
 文道希先生遗诗 970
 文嘉 535
 文震亨 557
 文徵明 524
 文徵明集 924
 文镜秘府论 153
 文彦博 395
 方干 371
 方太古 525
 方凤 452
 方文 577
 方以智 574
 方外十友 688
 方回 466
 方舟集 885
 方孝孺 510
 方岳 446
 方孟式 561
 方殿元 594
 方澜 473
 方夔 468
 为文造情 67
 为时为事而作 96
 为情造文 67
 心史 899

心泉学诗集····· 901
心斋····· 74
邓云霄····· 552
邓汉仪····· 589
邓旭····· 573
邓肃····· 425
邓辅纶····· 655
邓深····· 429
双声广通格····· 1190
双声····· 1184
双声正格····· 1189
双声对····· 1195
双声对变格····· 1190
双声同音通用格····· 1190
双声侧对····· 1196
双声借用格····· 1190
双拟对····· 1195
双鸩篇····· 1124
双换头····· 1191
双虚实对····· 1196
双溪集····· 891
双溪醉隐集····· 903
双鲤····· 1130
以才学为诗····· 15
以少总多····· 107
以文为诗····· 14
以文字为诗····· 16
以心为师····· 118
以议论为诗····· 15
以形写神····· 75
以《易》为诗····· 16
以情自得····· 69
以禅喻诗····· 11
以意逆志····· 58
引····· 1156
引商刻羽····· 1220
孔子····· 275
孔平仲····· 409
孔武仲····· 409
孔尚任····· 606
孔尚任诗文集····· 954
孔雀东南飞····· 1036
孔稚圭····· 300
孔詹事集····· 837
孔德绍····· 318
孔融····· 281

幻化····· 82
尺水兴波····· 1219
尺幅万里····· 1219
尹吉甫····· 275
尹廷高····· 471
丑····· 50
巴罗克风格研究····· 1480
水口(朱彝尊)····· 1120
水云村稿····· 904
水夫谣····· 1082
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
····· 1349
书愤(陆游)····· 1107
书湖阴先生壁····· 1098

五画

巧对····· 1193
巧夺天工····· 1220
巧言····· 1002
打枣竿····· 1162
打油诗(掌故)····· 1140
打油诗(诗体)····· 1177
打鸭惊鸳鸯····· 1145
艾如张····· 1025
艾德林····· 1498
艾穆····· 545
节南山····· 1001
平仄····· 1186
平水韵(韵书)····· 1203
平水韵(诗律)····· 1184
平头····· 1185
平对····· 1196
平地风波····· 1139
平侧····· 1186
平斋文集····· 895
平调曲····· 1152
平陵东····· 1027
平庵梅稿····· 889
平等阁诗话····· 271
正气歌····· 1110
正月十五夜····· 1056
正月····· 1002
正乐府····· 1150
正对····· 1191
正名对····· 1192
正声····· 113

正声集····· 741
正纽····· 1185
正变····· 113
正始体····· 678
玉山····· 1484
玉山名胜集····· 770
玉山纪游····· 770
玉川子诗集····· 855
玉川子诗集注····· 1364
玉井樵唱····· 907
玉书····· 1483
玉台后集····· 740
玉台体····· 686
玉台新咏····· 731
玉台新咏笺注····· 1268
玉阶怨····· 1034
玉林中兴诗话补遗····· 192
玉林诗话····· 191
玉树后庭花····· 1042
玉洲诗话····· 233
玉壶诗话····· 163
玉筍诗谈····· 216
玉楮集····· 895
玉溪生诗笺····· 1375
玉溪生诗意····· 1376
玉谿生年谱····· 1380
玉谿生年谱订误····· 1380
玉谿生年谱会笺····· 1380
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1380
玉谿生体····· 703
玉谿生诗说····· 242
玉谿生诗笺注····· 1376
玉谿生诗醇····· 1378
示儿····· 1109
示张寺丞王校勘····· 1094
占夫于亭杂录····· 229
古夫于亭诗问····· 231
古从军行····· 1059
古今女史····· 737
古今风谣····· 733
古今岁时杂咏····· 738
古今诗人秀句····· 151
古今诗删····· 736
古今诗话(宋佚名)····· 172
古今诗话(陈继儒)····· 216
古今诗话录····· 173

- 古今诗话选隽 244
古今诗话探奇 244
古今诗说 244
古今总类诗话 177
古今类总诗话 177
古今通韵 1200
古今谚 733
古风二首 1085
古风五十九首 1066
古风 1149
古文四声韵 1201
古文苑 732
古代文学杂论 1274
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 1329
古乐苑 734
古乐府 733
古欢堂集 951
古欢堂集杂著 229
古别离 1036
古体诗 1149
古灵集 870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白居易卷 1368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杜甫卷 1357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陆游卷 1404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柳宗元卷 1370
古诗十九首 1037
古诗十九首初探 1271
古诗十九首(英译) 1487
古诗十九首研究 1272
古诗十九首集释 1271
古诗 1150
占诗今选 1271
古诗平仄 1187
古诗平仄论 1202
古诗归 1269
古诗考索 1275
古诗论 1273
古诗纪 733
古诗别解 1276
古诗评选 1269
古诗初探 1274
古诗录 736
古诗笺 1270
占诗赏析 1270
占诗解 1269
古诗源 735
古诗歌笺释三种 1271
占诗镜 734
古钞无注本文选 1294
占律 1160
古音 1198
占音丛目 1200
古音略例 1200
古绝 1158
占谣谚 739
古微堂诗集 967
占韵 1180
占韵标准 1201
占韵通 1201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1057
古歌 1035
末五子 718
未雨绸缪 1128
本同末异 46
本色 127
本事诗(孟棻) 156
本事诗(徐钊) 229
本朝名媛诗钞 780
击钵催诗 1144
击鼓 982
击壤集 869
击壤歌 975
世说新语 149
甘棠 981
甘瑾 499
东人诗话 264
东山 997
东山存稿 914
东门之池 995
东门之杨 995
东门之埤 989
东门之枌 995
东门行 1031
东方之日 990
东方未明 990
东方虬 326
东方诗魂 1267
东方朔 278
东庄诗存 948
东江诗钞 951
东阳历朝诗 821
东观集 866
东牟集 882
东里全集 921
东君 1018
东坡七集 873
东坡之路:苏轼诗歌表达的
发展 1489
东坡 1101
东坡先生年表 1395
东坡先生年谱 1395
东坡纪年录 1395
东坡体 707
东坡诗论丛 1396
东坡诗话(苏轼) 164
东坡诗话(陈秀民) 200
东坡诗话补遗 164
东坡诗话录 200
东坡研究论丛 1396
东周宫词 785
东南峤外诗话 252
东皇太一 1017
东泉诗话 253
东洲草堂诗钞 967
东莱吕太史集 891
东莱诗集 882
东皋禅师集刊 952
东海三何 687
东堂集 877
东塘集 891
东溪 1095
厉鹗 619
厉樊榭先生年谱 1424
厉樊榭年谱 1424
布局 1204
石门文字禅 878
石介 395
石仓历代诗选 735
石仓诗集 933
石田文集 910
石田诗选 922
石灰吟 1113
石延年 393
石臼集 939

- 石园诗话 252
 石林诗话 173
 石林居士建康集 880
 石城乐 1043
 石洲诗话 244
 石室先生年谱 1390
 石室谈诗 221
 石屏诗集 894
 石破天惊(掌故) 1137
 石破天惊(诗法) 1220
 石陶梨烟室诗存 973
 石崇 288
 石筍山房诗集 957
 石淙诗稿 923
 石遗室诗话 268
 石湖:范成大的诗歌 1489
 石韞玉 639
 石楼诗话 254
 石鼓诗 979
 石鼓歌 1080
 石溪舫诗话 248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1054
 石壕吏 1071
 石珪 520
 右丞年谱 1336
 左太冲集 835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081
 左芬 289
 左思 288
 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 1502
 龙山诗话 238
 龙文鞭影 1202
 龙性堂诗话 227
 龙洲集 893
 龙蛇歌 977
 龙膺 551
 可园诗话 266
 可泣鬼神 1220
 旧文四篇 1443
 旧言集 780
 归子慕 551
 归田诗话 201
 归田诗话录 201
 归田类稿 907
 归庄 578
 归庄集 943
 归园田居 1053
 归奇顾怪 721
 归叟诗文发源 167
 归叟诗话 167
 归潜志 196
 北山小集 880
 北山 1003
 北山集 883
 北山楼集 973
 北门 983
 北风 983
 北田五子 723
 北地三才 687
 北江诗话 242
 北陂杏花 1098
 北征 1070
 北郭十友 714
 北郭集 919
 北梦琐言 159
 北堂书钞 1454
 叶绍翁 443
 叶適 438
 叶適集 892
 叶梦得 419
 叶盛 515
 叶德辉 663
 叶燮 592
 叶颙 485
 叹 1156
 卢马 699
 卢见曾 618
 卢户部诗集 853
 卢世澐 564
 卢令 991
 卢延让 386
 卢纶 349
 卢纶诗集校注 1360
 卢武阳集 841
 卢思道 316
 卢摯 467
 卢象 335
 卢湛 291
 卢琦 484
 卢疏斋集辑存 905
 卢照邻 322
 卢照邻集 843
 卢照邻集编年笺注 1332
 卢溪集 881
 卢肇 372
 卢藏用 324
 卢柟 534
 卢仝 357
 卢仝体 699
 出车 999
 出水芙蓉 1220
 出戍诗话 251
 出谷迁乔 1128
 出其东门 989
 出都门留别诸公 1125
 出韵 1181
 出塞 1045
 出嘉峪关感赋 1122
 目加田诚 1495
 田园诗 1164
 田间诗学 1235
 田雯 599
 田锡 389
 由质开文 22
 由拳集 930
 申涵光 583
 甲申集 944
 甲辰八月辞故里 1116
 四友斋丛说 209
 四公子 721
 四月 1003
 四平头 1186
 四布衣 725
 四声 1198
 四声诗 1176
 四声类谱 1199
 四声等子 1199
 四甫 718
 四时田园杂兴 1106
 四牡 998
 四言诗 1147
 四松堂集 960
 四呼 1197
 四明清诗略 817
 四弦曲 1152
 四柱对 1194
 四种高妙 1217
 四格 1217

- 四离 1217
 四难 1217
 四深 1217
 四朝诗话 272
 四皓歌 1022
 四愁诗 1167
 四愁诗 1023
 四溟山人全集 927
 四溟诗话 208
 史尧弼 430
 史旭 460
 史诗研究 1475
 史浩 428
 史鑑 517
 仕学规范 189
 代出自蓟北门行 1054
 代字法 1209
 代悲白头翁 1057
 令狐楚 355
 冬心先生集 956
 冬青馆占宫词 785
 失严 1186
 失笑喷饭 1143
 失粘 1186
 生民 1008
 生吞活剥 1220
 生花妙笔 1220
 生张熟魏 1145
 生香诗话 254
 丘巨源 299
 丘中有麻 987
 丘为 334
 丘司空集 838
 丘吉 517
 丘迟 303
 丘逢甲 664
 丘逢甲诗选 1438
 丘陵歌 978
 白马篇 1051
 白雲集 908
 白云楼诗话 222
 白氏文集 857
 白孔六帖 1454
 白石山房逸稿 920
 白石诗说 185
 白石道人年谱 1407
 白石道人诗词评论 247
 白石道人诗说 184
 白石道人诗集 893
 白田风雅 810
 白乐天体 700
 白头吟 1033
 白发青衫 1145
 白华山人诗说 259
 白华 1006
 白华绛跼阁诗初集 969
 白衣苍狗 1135
 白居易 360
 白居易年谱 1366
 白居易传 1367
 白居易传论 1367
 白居易评传(万曼) 1367
 白居易评传(褚斌杰) 1367
 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 1485
 白居易诗译析 1366
 白居易诗选 1366
 白居易诗集 1493
 白居易研究(杨宗莹) 1505
 白居易研究(E拾遗) 1367
 白居易研究在国外 1470
 白居易家谱 1366
 白居易集笺校 1365
 白驹 1001
 白耆山人集 940
 白战 1208
 白香山年谱 1366
 白香山年谱旧本 1366
 白香山诗集 1365
 白香亭诗集 969
 白屋说诗 1241
 白莲集 865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068
 白描 128
 白榆集 930
 白珽 469
 白纥辞 1035
 白纥歌 1034
 白纥舞歌诗 1035
 瓜田李下 1130
 句中对 1193
 句对 1193
 句法 1205
 句眼 1205
 包兰瑛 666
 包何 339
 包佶 347
 包融 326
 鸟名体 1174
 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 1411
 鸟鼠山人遗集 926
 处囊诀 160
 用事 84
 用事 1206
 用典 1206
 用韵 1183
 乐 1157
 乐而不淫 88
 乐全集 869
 乐府广序 1289
 乐府——中国古代民歌选
 1493
 乐府文学史 1291
 乐府正义 1290
 乐府古辞考 1291
 乐府古题 1151
 乐府古题要解 152
 乐府诗 1150
 乐府诗史 1293
 乐府诗论丛 1292
 乐府诗研究论文集 1293
 乐府诗选 1292
 乐府诗笺 1291
 乐府诗集 1288
 乐府通论 1290
 乐府散论 1293
 乐钩 643
 乐游原 1091
 乐雷发 448
 乐静集 877
 冯山 405
 冯小青 555
 冯子振 471
 冯延登 461
 冯安岳集 873
 冯如京 571
 冯班 568
 冯梦桢 546
 冯惟讷 537

冯惟敏 537
 冯舒 565
 汉上题襟集 745
 汉广 980
 汉文诗解 1483
 汉代民间歌谣 1488
 汉代诗歌研究在国外 1467
 汉江临泛 1062
 汉字作为诗歌媒介 1484
 汉诗百七十首 1484
 汉诗研究(方祖燊) 1275
 汉诗研究(郑文) 1502
 汉诗音注 汉诗评 1269
 汉诗总说 230
 汉诗说 1269
 汉诗统笺 1270
 汉南诗约 826
 汉皋诗话 175
 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
 1503
 汉铙歌释文笺正 1290
 汉魏风骨 36
 汉魏六朝文学 1272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1276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1291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735
 汉魏六朝诗论丛 1273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 1271
 汉魏六朝诗选(英译) 1486
 汉魏六朝诗派 729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1275
 汉魏乐府风笺 1290
 汉魏诗乘 734
 邝露 560
 礼部韵略 1203
 礼魂 1018
 玄 44
 玄鸟 1016
 玄言诗派 682
 玄妙 45
 玄明宫行 1114
 玄通 45
 主文谲谏 4
 主观之诗人 54
 兰丛诗话 237
 兰台诗话 167

兰舟:中国女诗人 1486
 兰庄诗话 215
 写景诗 1165
 宁今宁俗 92
 宁都三魏 722
 宁调元 672
 宁调元集 974
 永平诗存 789
 永明体 684
 永康诗录 821
 永嘉四灵 712
 头巾气 1215
 半五六言体 1148
 半行庵诗存稿 968
 半格诗 1171
 加一倍写法 1210
 对仗 1191
 对床夜雨 1136
 对床夜话 194
 对床夜语 194
 对偶 1191
 召旻 1011
 台阳诗话 270
 台阁气 1216
 台阁体 716
 台湾近代文学丛稿 1432
 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1499
 弁阳诗话 195
 丝衣 1014
 丝线集 1489
 民劳 1009
 民族诗歌论集 1443
 民族诗歌续论 1443
 皮子文藪 864
 皮日休 380
 皮陆 704
 皮陆体 704
 发端 1212
 司马太师诗话 162
 司马札 372
 司马光 401
 司马君实诗话 162
 司马相如 278
 司马温公诗话 162
 司马槭 415

司马槱 415
 司空见惯 1138
 司空图 381
 司空图诗品解说 1452
 司空曙 344
 司空曙集 850
 辽东三老 724
 辽事杂诗 1116
 辽诗纪事 269
 辽诗话 243
 边贡 526
 边塞诗 1164
 边塞诗派 691

六画

邢劭 310
 邢昉 564
 动与静 90
 式微 983
 戎昱 349
 戎昱诗注 1360
 戎昱集 853
 迂叟诗话 162
 迂斋诗话 194
 协律钩元 1371
 协韵 1182
 地籁 82
 朴拙 130
 权文公集 854
 权舆 995
 权德舆 353
 茺兰 985
 吉川幸次郎 1494
 吉日 1000
 圭峰集 913
 圭斋集 909
 圭塘小稿 911
 圭塘欵乃集 768
 寺名体 1175
 老夫采玉歌 1078
 老生常谈 253
 老杜诗评 174
 老学庵诗话 184
 老学庵笔记 183
 老将行 1060
 老圃集 879

- 老骥伏枥 1130
 考田诗话 248
 考槃 985
 西门行 1031
 西方神学观与《诗经》 1474
 西北有高楼 1038
 西台集 875
 西曲歌 1153
 西江风雅 824
 西江诗法 202
 西江诗话(裘君弘) 230
 西江诗话(曾廷枚) 250
 西江派 715
 西园诗麈 214
 西陂类稿 950
 西河合集 946
 西河诗话 228
 西泠十子 724
 西洲曲 1045
 西圃诗说 232
 西堂全集、馀集 945
 西庵集 918
 西清诗话 170
 西隐文稿 917
 西渡集 879
 西溪丛语 178
 西溪集 872
 西塞山怀古 1083
 西崑发微 226
 西崑体 706
 西崑派 705
 西崑酬唱集 757
 西崑酬唱集注 1386
 西崑酬唱集笺注 1386
 西岱诗话 209
 亚瑟·韦利 1496
 再游玄都观 1083
 列朝诗集 774
 夸多斗靡 1221
 夸饰 81
 夺胎换骨 119
 夺胎换骨法 1210
 夺锦才 1132
 压倒元白 1137
 有女同车 988
 有正味斋诗集 961
 有我之境 53
 有所思 1025
 有狐 986
 有学集 938
 有学集诗注 1417
 有客 1013
 有瞽 1013
 有扶之杜 993
 有骝 1015
 在山泉诗话 270
 在狱咏蝉 1056
 存馀堂诗话 204
 存斋诗话 201
 存雅堂遗稿 899
 达观堂诗话 251
 成公绥 286
 成竹在胸 98
 成廷珪 482
 成相杂辞 978
 成都文类 827
 成彦雄 387
 百一诗 1167
 百尺竿头 1142
 百尺梧桐阁诗集 952
 百步洪 1101
 百衲衣体 1176
 百衲诗评 171
 而庵诗话 226
 而庵说唐诗 1316
 死句 1205
 死法与活法 100
 执竞 1012
 扪虱新话 179
 扫眉才子 1140
 扬之水 986
 扬州风土词萃 811
 毕仲游 410
 毕沅 629
 毕著 563
 尧峰文钞 947
 过山农家 1077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1088
 过故人庄 1058
 过湖北山家 1119
 过零丁洋 1110
 臣工 1012
 匡山丛话 254
 至味无味 29
 至味 29
 夷白斋诗话 204
 此山集 911
 此木轩唐五言律七言律读本
 754
 贞一斋诗说 233
 贞丰诗萃 803
 师山诗存 805
 师友诗传录 231
 师友诗传续录 231
 师氏诗说 188
 尖叉韵 1181
 当句对 1193
 吃语诗 1177
 杞云楼诗话 257
 则堂集 897
 刚笔 1213
 岁寒堂诗话 179
 吕氏诗事录 170
 吕氏家塾读诗记 1233
 吕本中 423
 吕南公 410
 吕祖谦 436
 吕留良 592
 吕留良诗选 1421
 吕陶 403
 吕敏 505
 吕温 359
 吕渭老 420
 吕衡州集 856
 吊古诗 1165
 吊鉴湖秋女士 1127
 早发白帝城 1066
 早发 1104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081
 网枯次 1494
 同工异曲 1221
 同文馆唱和诗 757
 同文韵统 1201
 同对 1194
 同光体 728
 同音韵 1184
 同类对 1194
 同题集 745

- 因小见大 1221
 因革 115
 困难见巧 1221
 因情立格 68
 团扇郎 1040
 回乡偶书二首 1059
 回车驾言迈 1039
 回文对 1195
 回文体 1169
 回文类聚 758
 曲 1156
 曲名体 1175
 曲江集 844
 曲尽其妙 1221
 曲阿诗综 808
 曲高和寡 1221
 竹庄备全诗话 189
 竹庄诗话 188
 竹里诗萃 815
 竹坡老人诗话 176
 竹坡诗话 175
 竹林七贤 679
 竹林诗评 201
 竹林答问 253
 竹枝子 1162
 竹枝词(诗体) 1161
 竹枝词(诗作名篇) 1048
 竹竿 985
 竹斋诗集 892
 竹斋集 911
 竹隐畸士集 878
 竹溪六逸 693
 竹溪诗话 262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 739
 先秦辞赋原论 1264
 迁想妙得 73
 乔知之 322
 朱一是 568
 朱升 491
 朱长文 406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1360
 朱右 497
 朱弁 424
 朱竹垞先生年谱 1422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1449
 朱庆馀 364
 朱庆馀诗集 859
 朱芾煌 566
 朱孝纯 633
 朱松 426
 朱服 411
 朱放 351
 朱孟震 545
 朱皇后 428
 朱淑真 415
 朱淑真集注 1405
 朱翌 427
 朱琦 651
 朱彭 631
 朱超 309
 朱湾 345
 朱筠 629
 朱嘉徵 567
 朱德润 479
 朱鹤龄 570
 朱熹 433
 朱彝尊 593
 朱彝尊诗词选注 1422
 传神写照 71
 传家集 871
 伟观集 768
 休斋诗话 183
 休鲍 684
 伍乔 387
 伏挺 308
 优占堂诗话 179
 优孟歌 977
 优游不迫 140
 伐木 998
 伐柯 998
 伐檀 992
 仲长统 283
 任性而发 66
 任昉 302
 任彦昇集 837
 伤春 1104
 伤歌行 1035
 伧歌 1154
 伪体 1168
 伊秉绶 638
 伊耆氏蜡辞 978
 华山畿 1041
 华幼武 487
 华阳集(顾况) 852
 华阳集(王珪) 871
 华岳 442
 华淑 558
 华察 533
 华镇 410
 延芬室集 960
 自出机杼 1220
 自成一家 1220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069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
 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
 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
 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
 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
 1087
 自家真态 118
 自得 85
 自然 126
 自然和自我:苏东坡诗歌与
 华尔华滋诗歌的比较研究
 1489
 自然诗 1487
 行云流水(掌故) 1143
 行云流水(诗法) 1221
 行 1156
 行行重行行 1038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1090
 行苇 1008
 行路难 1036
 行露 981
 后二句续前二句法 1210
 后七子 717
 后山体 709
 后山诗补笺 1400
 后山诗注 1399
 后山诗注目录年谱 1400
 后山诗话 166
 后山居士文集 876
 后山居士诗话 166
 后元丰行 1097
 后五子 718
 后出塞五首 1069
 后村大全集 896

- 后村诗话 193
 后浪催前浪 1144
 舟中见猎犬有感 1118
 创体 1215
 创格 1215
 全五代诗 756
 全平全仄体 1173
 全史宫词 785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739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
 得 1278
 全宋诗话 251
 全金诗 767
 全相万家诗法 211
 全闽诗话 232
 全浊 1197
 全祖望 624
 全唐试律类笺 1318
 全唐诗人名考 1384
 全唐诗 751
 全唐诗作者索引 1384
 全唐诗补编 752
 全唐诗典故辞典 1385
 全唐诗话 192
 全唐诗话续编 238
 全唐诗录 754
 全唐诗重篇索引 1385
 全唐诗逸 752
 全唐诗蟠根集 752
 全浙诗话 238
 全浙诗话刊误 265
 全清 1197
 全蜀艺文志 827
 会稽二肃 716
 会稽二清 693
 会稽掇英总集 819
 合肥诗话 273
 合掌 1191
 合掌对 1196
 企喻歌辞 1046
 众妙集 747
 肌理 112
 肌理派 728
 肌理说 113
 杂曲歌辞 1151
 杂体诗 1169
 杂言古诗 1154
 杂言诗 1148
 杂诗(诗体) 1169
 杂诗(诗作名篇) 1050
 杂感 1122
 杂歌谣辞 1152
 旨冥句中 107
 名山诗话 270
 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196
 名贤诗旨 201
 名贤诗评 209
 名贤诗话 172
 名都篇 1051
 名家诗永 778
 名家诗法 207
 名家诗法汇编 213
 名媛汇诗 737
 名媛诗归 737
 名媛诗话 259
 负苞堂集 931
 危语体 1177
 危素 494
 鳧亭诗话 238
 鳧鹭 1009
 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
 1450
 刘大槩 621
 刘义恭 297
 刘义隆 296
 刘叉 362
 刘叉诗 858
 刘子翬 427
 刘太真 345
 刘公嘉话 154
 刘公嘉话录 154
 刘公幹集 832
 刘长卿 338
 刘方平 339
 刘卢 713
 刘令娴 311
 刘白 701
 刘白唱和集 743
 刘过 439
 刘光第 662
 刘因 469
 刘仲尹 458
 刘克庄 445
 刘贡父诗话 163
 刘孝先 310
 刘孝威 310
 刘孝胜 310
 刘孝绰 307
 刘辰翁 451
 刘辰翁集 898
 刘体仁 576
 刘伶 285
 刘彻 277
 刘希夷 324
 刘删 316
 刘迎 458
 刘言史 350
 刘应时 437
 刘沧 374
 刘若愚 1497
 刘昂 459
 刘秉忠 465
 刘泾 408
 刘细君 278
 刘绍 500
 刘柳 701
 刘荣嗣 555
 刘禹锡 359
 刘禹锡传论 1365
 刘禹锡嘉话 154
 刘炳 500
 刘将孙 471
 刘宪 324
 刘绘 301
 刘泰 515
 刘桢 282
 刘摯 404
 刘峻 302
 刘铄 299
 刘逖 314
 刘效祖 539
 刘郭 681
 刘宾客集 856
 刘宾客嘉话录 154
 刘宰 441
 刘著 457
 刘基 496
 刘崧 499

- 刘得仁····· 368
 刘商····· 344
 刘随州集····· 849
 刘绩····· 508
 刘琨····· 290
 刘越石集····· 836
 刘敞····· 400
 刘湾····· 340
 刘溥····· 515
 刘熙载····· 654
 刘遵····· 308
 刘贍····· 458
 刘彝····· 402
 刘麟····· 526
 刘弇····· 411
 刘攽····· 403
 刘堽····· 467
 刘育虚····· 326
 刘驾····· 375
 刘驾诗集····· 862
 齐之鸾····· 528
 齐己····· 385
 齐召南····· 623
 齐烟九点····· 1138
 齐梁体····· 685
 齐澣····· 328
 交股对····· 1193
 交络对····· 1193
 交锁韵····· 1184
 庄谐诗话····· 267
 庄靖先生集····· 901
 庄昶····· 518
 庆州败····· 1095
 庆湖遗老集····· 876
 问竹堂诗法····· 238
 问花楼诗话····· 259
 问答体····· 1178
 闽王歌····· 1117
 州名体····· 1175
 州试诗····· 1166
 州桥····· 1105
 冲淡····· 140
 次北固山下····· 1059
 次浊····· 1197
 次清····· 1197
 次韵····· 1182
 冰川诗式····· 211
 冰壶秋月····· 1143
 冰雪聪明····· 1135
 冰魂雪魄····· 1140
 江上诗钞····· 808
 江上诗钞补····· 808
 江上望青山忆旧····· 1120
 江上渔者····· 1094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973
 江山之助····· 99
 江山集····· 944
 江文通集····· 837
 江文通集汇注····· 1286
 江右三大家····· 727
 江右诗派····· 714
 江左二宝····· 713
 江左三大家····· 721
 江左三凤凰····· 723
 江令君集····· 840
 江汉····· 1011
 江西宗派体····· 711
 江西诗社宗派图····· 169
 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230
 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1506
 江西诗派小序····· 193
 江西诗派····· 710
 江西诗徵····· 824
 江有汜····· 981
 江村····· 1121
 江苏诗徵····· 798
 江采蘋····· 332
 江郎才尽····· 1132
 江南····· 1026
 江南弄(萧衍)····· 1044
 江南弄(诗体)····· 1153
 江南春绝句····· 1088
 江南逢李龟年····· 1075
 江革····· 304
 江盈科····· 549
 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1055
 江总····· 314
 江都二汪····· 726
 江雪····· 1079
 江淹····· 299
 江淹年谱····· 1286
 江湖小集····· 760
 江湖长翁文集····· 890
 江湖后集····· 760
 江湖派····· 712
 江楼感旧····· 1093
 江鲍····· 685
 江湜····· 654
 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集
 ····· 759
 池北偶谈····· 228
 池州翠微亭····· 1105
 汤右曾····· 609
 汤有光····· 546
 汤显祖····· 547
 汤显祖诗文集····· 930
 汤胤勣····· 516
 汤宾尹····· 553
 汤惠休····· 298
 汤鹏····· 650
 汝坟····· 980
 汝坟贫女····· 1095
 汝洛集····· 744
 宇文虚中····· 456
 安世乐····· 1154
 安世房中歌····· 1024
 安阳集····· 869
 安定城楼····· 1090
 安晚堂集····· 895
 安雅堂集(陈旅)····· 911
 安雅堂集(宋琬)····· 943
 安熙····· 474
 字为眼····· 122
 字对····· 1196
 字字珠玑····· 1221
 字里行间····· 1221
 字法····· 1206
 字挟风霜····· 1222
 字眼····· 1206
 字谜体····· 1176
 关山月····· 1046
 关中两朝诗钞····· 793
 关索庙····· 1114
 关锁法····· 1210
 关雎····· 979
 羊士谔····· 354
 羊士谔集····· 854
 兴会····· 59

- 兴观群怨 62
 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
 歌艺术 1446
 兴致 60
 兴象 60
 兴寄 61
 兴趣 32
 米芾 412
 许及之 434
 许友 576
 许有壬 481
 许廷铎 615
 许宗鲁 531
 许询 292
 许相卿 527
 许南英 660
 许浑 365
 许敬宗 319
 许敬宗集 842
 许棠 374
 许景衡 418
 许谦 474
 许穆夫人 275
 许衡 465
 许棐 446
 许颢诗话 175
 许彦周诗话 174
 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1396
 论诗(元好问、赵翼) 1111
 论诗(专著) 1442
 论诗词曲杂著 1449
 论诗诗 1178
 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1487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 1448
 论诗绝句 1448
 讽谕 95
 讽谕诗 1163
 访落 1013
 祁彪佳 560
 祁雋藻 649
 军中乐 1110
 那 1015
 那阿滩 1044
 异对 1194
 异体诗浅说 1445
 异类对 1194
 寻诗 1141
 寻章摘句 1221
 寻隐者不遇 1084
 寻隐者不遇:唐代隐逸诗
 1492
 尽善尽美 125
 艮斋诗集 903
 阮元 642
 阮步兵咏怀诗注 1282
 阮陈 689
 阮卓 315
 阮阅 421
 阮嗣宗集 833
 阮籍 285
 阮籍咏怀诗研究 1502
 阮籍集校注 1282
 阮瑀 283
 阳休之 313
 阳关三叠图谱 214
 阳声 1198
 阳春白雪 144
 阳调 1186
 阴声 1198
 阴何 686
 阴调 1186
 阴常侍诗话 250
 阴常侍集 841
 阴铿 314
 防有鹊巢 996
 收束法 1209
 如椽大笔 1221
 如履薄冰 1129
 妇病行 1032
 戏为六绝句 1073
 戏戒诗话 256
 戏答元珍 1096
 观刈麦 1085
 观 47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1075
 观风 48
 观书有感 1109
 观古堂诗录 972
 观我生斋诗话 262
 观沧海 1050
 观林诗话 176
 观梅有感 1112
 观猎 1061
 欢闻变歌 1040
 羽林郎 1024
 牟平遗香集 791
 牟融 355
 牟融诗集 855
 牟巖 466
 买花 1086
 孙一元 529
 孙冯翊集 834
 孙廷尉集 836
 孙许 682
 孙何 391
 孙枝蔚 586
 孙承宗 552
 孙星衍 638
 孙原湘 641
 孙逖 331
 孙淑 487
 孙渊如先生全集 962
 孙绰 292
 孙楚 285
 孙蕢 503
 孙覿 422
 纡馀委曲 1226
 红叶山房诗话 257
 红叶题诗 1141
 红豆相思 1133
 红杏山房诗钞 963
 纤小 1212
 纤 50
 约客 1109
 纪昀 627
 纪河间诗话 263
 纪诗 164
 纪映鍾 573

七画

- 形与神 74
 形似体 1179
 弄 1156
 麦秀歌 976
 进退体 1169
 进退韵 1184

- 远 50
 远别离 1066
 远游 1020
 运斤成风 1221
 杜工部七言律诗注 1347
 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 1349
 杜工部年谱(朱鹤龄) 1353
 杜工部年谱(仇兆鳌) 1353
 杜工部年谱(杨伦) 1353
 杜工部年谱(吕大防) 1351
 杜工部年谱(胡震亨) 1352
 杜工部诗年谱 1352
 杜工部诗话 249
 杜工部诗通 1345
 杜工部诗集辑注 1346
 杜工部草堂诗年谱 1352
 杜工部草堂诗话 187
 杜工部草堂诗笺 1344
 杜工部集(钱谦益笺注) 1346
 杜工部集(王世贞等评) 1350
 杜工部集(别集) 847
 杜工部编年诗史谱目 1353
 杜少陵集详注 1348
 杜氏五高 712
 杜本 477
 杜甫(诗人) 336
 杜甫(专著) 1485
 杜甫古诗韵读 1358
 杜甫年谱 1353
 杜甫年谱辨疑 1352
 杜甫传 1354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1451
 杜甫评传(金启华、胡问涛) 1354
 杜甫评传(陈贻焮) 1354
 杜甫诗论 1357
 杜甫诗选 1351
 杜甫诗选注 1351
 杜甫诗集 1493
 杜甫草堂诗注 1351
 杜甫研究 1357
 杜甫研究在国外 1470
 杜甫研究论文集 1357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1504
 杜甫选集 1351
 杜甫叙论 1354
 杜甫夔州诗析论 1504
 杜诏 612
 杜範 444
 杜牧之体 702
 杜牧 369
 杜牧年谱 1374
 杜牧传 1375
 杜牧抒情诗 1486
 杜牧评传 1375
 杜审言 322
 杜审言诗注 1333
 杜审言集 843
 杜诗义法 235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 243
 杜诗引得 1359
 杜诗杂说 1358
 杜诗论丛 1358
 杜诗论稿 1358
 杜诗别解 1358
 杜诗言志 1356
 杜诗附记 245
 杜诗析疑 1357
 杜诗直解 1349
 杜诗注解商榷 1358
 杜诗学 1355
 杜诗选 1351
 杜诗说 1348
 杜诗通 1346
 杜诗琐证 256
 杜诗笺 1354
 杜诗偶评 1350
 杜诗阐 1348
 杜诗谚解 1489
 杜诗散绎 1351
 杜诗韩笔 697
 杜诗提要 1348
 杜诗集评 1350
 杜诗镜铨 1350
 杜诗攷 1355
 杜荀鹤 383
 杜荀鹤体 704
 杜秋娘诗 1089
 杜律心法 198
 杜律单注 1345
 杜陵诗律 198
 杜韩 697
 杜集书录 1359
 杜默 397
 杜臆 1355
 杜濬 575
 杜杜(唐风、小雅) 992
 村行(王禹偁) 1094
 极玄集 744
 杨一清 521
 杨士奇 511
 杨万里 432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 1403
 杨万里选集 1402
 杨亿 392
 杨广 318
 杨雲翼 460
 杨巨源 352
 杨公远 466
 杨凤苞 638
 杨文宪公年谱 1412
 杨文骢 560
 杨方 291
 杨允孚 488
 杨弘道 463
 杨师道 319
 杨先溥 519
 杨仲弘诗法 198
 杨仲宏集 908
 杨刘 706
 杨圻 668
 杨芳灿 637
 杨奂 462
 杨果 464
 杨备 398
 杨诚斋体 711
 杨柳枝 1162
 杨柳枝词 1048
 杨荣 512
 杨赵 713
 杨炯 323
 杨叛儿 1044
 杨素 317
 杨载 475
 杨基 501
 杨维桢 483
 杨揆 640
 杨循吉 521

- 杨慎诗选 1412
 杨溥 513
 杨衡 353
 杨蟠 400
 杨巍 541
 杨琇 621
 杨傑 403
 邯郸学步 1221
 丽人行 1069
 丽则集 742
 丽泽集 747
 贡师泰 485
 贡奎 473
 声对 1196
 声纽 1198
 声画集 738
 声诗 1180
 声律 1184
 声律发蒙 1202
 声律启蒙 1202
 声类 1199
 声类 1198
 声病 1184
 声调三谱 266
 声调四谱图说 262
 声调谱(专著) 231
 声调谱(诗律) 1202
 声调谱拾遗(诗律) 1202
 声调谱拾遗(专著) 240
 声情 66
 芙蓉港诗词话 247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1060
 苇碧轩集 894
 芸叟诗评 165
 茆苕 980
 花蕊夫人 387
 花谿集 912
 花薰阁诗述 250
 芥隐笔记 187
 苍梧杂志 188
 芳兰轩集 893
 芳林十哲 699
 芳菲菲堂诗话 271
 芦川归来集 883
 芦中集 951
 苏门六君子 709
 苏门四学士 709
 苏门后四学士 710
 苏小小 302
 苏小小歌 1049
 苏小娟 427
 苏天爵 483
 苏文忠公年谱合注 1395
 苏文忠公诗合注 1392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1393
 苏东坡诗集注 1391
 苏过 417
 苏李 675
 苏李体 675
 苏李诗 1039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1273
 苏伯玉妻 289
 苏伯衡 497
 苏陆 711
 苏武 279
 苏武庙 1090
 苏味道 322
 苏诗补注(查慎行) 1392
 苏诗补注(翁方纲) 1392
 苏诗查注补正 1393
 苏诗编年总案 1395
 苏拯 386
 苏亭诗话 264
 苏洵 398
 苏轼 406
 苏轼评传 1396
 苏轼诗研究 1397
 苏轼诗选 1394
 苏轼诗集 1393
 苏轼选集(刘乃昌) 1394
 苏轼选集(王水照) 1394
 苏轼、黄庭坚研究在国外
 1471
 苏颂 401
 苏海韩潮 708
 苏涣 337
 苏梅 706
 苏黄 708
 苏黄诗与朝鲜汉诗 1465
 苏曼殊 672
 苏曼殊文集 1441
 苏曼殊诗笺注 1440
 苏曼殊诗集 1441
 苏舜钦 396
 苏舜钦年谱 1389
 苏舜钦集 869
 苏源明 336
 苏蕙 291
 苏辙 406
 苏魏公集 871
 苏籀 420
 苏洵 442
 苏頲 328
 苏彦 292
 劳之辨 602
 劳燕分飞 1130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68
 走马对 1192
 走马看花 1139
 赤壁 1088
 李士瞻 489
 李山甫 377
 李义山诗话 242
 李义山诗集笺注(姚培谦)
 1376
 李义山诗集笺注(朱鹤龄)
 1375
 李义山诗集辑评 1377
 李义山诗谱 1380
 李义山诗辨正 1378
 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1381
 李义山集 861
 李义府 321
 李之仪 410
 李天馥 601
 李夫人歌 1023
 李开先 535
 李开先集 928
 李太白年谱(王琦) 1339
 李太白年谱(黄锡珪) 1339
 李太白诗集注 1338
 李太白研究 1491
 李少云 429
 李中 387
 李日华 552
 李公麟 412
 李长吉体 702

- 李长吉评传 1373
 李长吉歌诗注 1371
 李长吉歌诗研究 1373
 李氏花萼集 741
 李正民 418
 李玉英 531
 李世民 320
 李世熊 568
 李东阳 520
 李东阳集 923
 李石 428
 李旦华 633
 李代桃僵 1129
 李白十论 1342
 李白与杜甫 1341
 李白 332
 李白丛考 1342
 李白年谱 1340
 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
 1489
 李白论 1343
 李白杜甫年表 1340
 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 1342
 李白抒情诗选 1493
 李白和他的诗歌 1342
 李白诗文系年 1340
 李白诗论及其他 1341
 李白诗论丛 1341
 李白诗选(舒芜) 1339
 李白诗选(复旦) 1339
 李白诗新笺 1342
 李白研究(王运熙) 1341
 李白研究(安旗) 1343
 李白研究在国外 1469
 李白研究论文集 1341
 李白研究论丛 1343
 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 1490
 李白选集 1339
 李白集校注 1338
 李白:心像与诗 1490
 李必恒 599
 李存 478
 李百药 318
 李百药集 841
 李光 420
 李吕 430
 李因笃 595
 李先芳 536
 李华 337
 李延年歌 1023
 李延兴 492
 李充 291
 李祁 484
 李远 368
 李远诗集 861
 李杜二家诗钞评林 1337
 李杜 692
 李杜论略 1341
 李杜诗选(苏仲翔) 1339
 李杜诗选(张含) 1337
 李杜研究 1340
 李杜韩白 701
 李杜韩苏 708
 李孝光 484
 李邕嗣 563
 李何王李 717
 李希圣 664
 李希声诗话 168
 李言恭 539
 李应徵 545
 李治 350
 李良年 598
 李纯甫 461
 李纲 422
 李若水 426
 李昌符 374
 李昌祺 513
 李易安集 882
 李昂 329
 李凭箜篌引 1078
 李波小妹歌 1049
 李诗选注 1337
 李诗通 1338
 李诗辨疑 1340
 李弥逊 425
 李建勋 386
 李绂 613
 李绅 360
 李绅诗注 1368
 李柏 590
 李咸用 385
 李峤 322
 李峤集 843
 李昭玘 414
 李郢 375
 李适之 327
 李重华 616
 李俊民 461
 李洞 383
 李贺 365
 李贺年谱 1372
 李贺年谱会笺 1373
 李贺诗研究 1505
 李贺诗校笺证异 1372
 李贺诗索引 1385
 李贺诗集(叶葱奇注) 1372
 李贺诗集(英译) 1488
 李贺研究资料 1373
 李贺哑谜诗歌新编 1372
 李贺集 859
 李晔 499
 李晏 458
 李颀 336
 李颀诗集 847
 李涉 357
 李流芳 556
 李流谦 430
 李益 351
 李益诗注 1360
 李益集 853
 李调元 632
 李陵 278
 李梦阳 525
 李崇嗣 327
 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 1379
 李商隐 371
 李商隐年表 1381
 李商隐传 1381
 李商隐体 703
 李商隐评传 1381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1382
 李商隐诗传 1381
 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 1505
 李商隐诗选 1379
 李商隐诗选注 1379
 李商隐诗集疏注 1378
 李商隐诗歌集解 1378
 李商隐研究(吴调公) 1382

- 李商隐研究(刘若愚) 1491
 李商隐选集 1379
 李清照 423
 李清照集校注 1400
 李隆基 330
 李维桢 546
 李敬方 366
 李彭 416
 李确 565
 李雯 571
 李舜弦 386
 李善注文选 1293
 李献甫 463
 李频 368
 李新 411
 李煜 388
 李慈铭 655
 李群玉 372
 李群玉诗集(别集) 862
 李群玉诗集(注本) 1382
 李觏 398
 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李嘉祐 339
 李端 345
 李端诗集 851
 李德 507
 李德林 315
 李德裕 364
 李德裕文集 859
 李翰林集 846
 李濂 530
 李壁 440
 李攀龙 537
 李义 325
 李昉 388
 李颀 590
 李廌 414
 李衮 542
 李惇诗话 169
 吾丘衍 473
 严氏纠谬 223
 严羽 447
 严武 346
 严武集 851
 严复 659
 严陵集 816
 严绳孙 588
 严维 346
 严维集 851
 严遂成 620
 严虞惇 607
 巫山高 1025
 两头纤纤体 1176
 两当轩集 962
 两宋名贤小集 762
 两浙轺轩录 812
 两袖清风 1145
 两潘 680
 甫田(齐风、小雅) 990
 束广就狭体 1179
 束广微集 836
 束皙 290
 更上一层楼 1133
 衮制续泐 737
 还 990
 来集之 568
 来鹏 380
 扶风歌 1053
 批点明诗七言律 773
 批选唐诗 216
 批唐贤三昧集笺注 1319
 折句体 1172
 折句法 1209
 折杨柳枝歌 1047
 折杨柳歌辞 1046
 折腰体 1172
 折腰绝句 1159
 抑 1010
 投桃报李 1129
 投笔集 938
 护腰 1191
 把酒对月歌 1113
 把酒问月 1065
 拟古诗 1155
 拟乐府 1150
 拟行路难 1054
 抒情诗 1166
 连昌宫词 1082
 连珠对 1195
 连珠体 1170
 连珠格 1177
 连章体 1170
 步出夏门行 1031
 步非烟 375
 步虚词 1036
 步韵 1183
 邨下文人集团 677
 邨中七子 676
 邨民歌 977
 呕心沥血 1138
 听松庐诗话 257
 听颖师弹琴 1080
 吟 1155
 吟风咏月 1134
 吟叹曲 1152
 吟咏情性 68
 吟堂诗话 201
 吟窗杂录 185
 岐阳 1111
 峴佣说诗 263
 时迈 1012
 时序 80
 旷达 137
 别云间 1116
 别开生面(掌故) 1135
 别开生面(诗法) 1221
 别开蹊径 1221
 别有天地 1134
 别材别趣 79
 别具只眼(掌故) 1144
 别具只眼(诗法) 1221
 别董大二首 1068
 别裁伪体 115
 吴历 596
 吴中七子 727
 吴中田妇叹 1100
 吴中四七 689
 吴中四才子 718
 吴中四杰 714
 吴氏诗话 192
 吴文正集 905
 吴文溥 640
 吴可 420
 吴旦 540
 吴礼部诗话 199
 吴礼部集 911
 吴迈远 298
 吴师道 479

- 吴则礼····· 411
 吴乔····· 575
 吴伟业····· 572
 吴会英才集····· 802
 吴兆····· 549
 吴兆騫····· 595
 吴江诗录····· 803
 吴兴诗话····· 244
 吴孙皓初童谣····· 1049
 吴均····· 304
 吴均体····· 686
 吴志淳····· 498
 吴声歌曲····· 1153
 吴体····· 1167
 吴应箕····· 559
 吴国伦····· 540
 吴泳····· 443
 吴诗派····· 714
 吴承恩····· 534
 吴承恩年谱····· 1412
 吴宫怀古····· 1093
 吴都文粹····· 802
 吴都文粹续集····· 802
 吴莱····· 484
 吴宽····· 518
 吴梅村年谱(铃木虎雄)····· 1418
 吴梅村年谱(马导源)····· 1419
 吴梅村诗补笺····· 1418
 吴梅村诗集笺校····· 1418
 吴敏道····· 546
 吴惟信····· 447
 吴绮····· 584
 吴维岳····· 537
 吴敬梓····· 623
 吴敬梓年谱····· 1425
 吴朝请集····· 838
 吴趋····· 1154
 吴雯····· 604
 吴楚诗钞····· 824
 吴嵩梁····· 643
 吴蜀集····· 743
 吴锡麒····· 635
 吴筠····· 645
 吴筠····· 332
 吴騫····· 632
 吴嘉纪····· 582
 吴嘉纪年谱····· 1420
 吴嘉纪诗笺校····· 1420
 吴稼澄····· 550
 吴潜····· 446
 吴澄····· 468
 吴融····· 383
 吴激····· 457
 吴肅····· 639
 吴猷····· 1154
 岑安卿····· 480
 岑诗系年····· 1337
 岑参····· 338
 岑参研究····· 1504
 岑参集校注····· 1336
 岑嘉州体····· 690
 岑嘉州系年考证····· 1336
 岑嘉州集····· 848
 早麓····· 1007
 围炉诗话····· 225
 园有桃····· 991
 针穴名体····· 1175
 钉铰体····· 1177
 利登····· 447
 私刑恶····· 1121
 秀水诗派····· 726
 秀色可餐····· 1131
 秀容诗文集····· 790
 我行其野····· 1001
 我将····· 1012
 估客乐····· 1043
 体····· 45
 何人斯····· 1003
 何大圭····· 420
 何大复集····· 926
 何水部诗注····· 1286
 何刘····· 687
 何李····· 717
 何妥····· 314
 何劭····· 287
 何彼裵矣····· 981
 何绍基····· 649
 何承天····· 294
 何草不黄····· 1007
 何思澄····· 308
 何逊····· 306
 何逊集····· 838
 何晏····· 284
 何景明····· 528
 但歌····· 1154
 作用····· 127
 作诗体要····· 205
 伯兮····· 985
 兵车行····· 1068
 近水楼台····· 1143
 近代六十家诗选····· 1428
 近代文学史料····· 1430
 近代曲辞····· 1152
 近代诗钞(陈衍)····· 783
 近代诗钞(钱仲联)····· 784
 近代诗选····· 1428
 近代诗举要····· 1428
 近代爱国诗词选····· 1429
 近代爱国诗选····· 1428
 近体诗····· 1158
 近体诗用韵····· 1188
 邻近对····· 1195
 余山诗话····· 216
 余尧臣····· 504
 余句甫诗话····· 261
 余怀····· 580
 余靖····· 394
 余阙····· 486
 含英咀华····· 1222
 含蓄····· 135
 谷风····· 983
 谷音····· 763
 坐驰役万景····· 101
 坐忘····· 74
 狂放····· 134
 饭牛歌····· 976
 饮马长城窟行····· 1031
 饮中八仙····· 693
 饮冰室诗话····· 269
 饮酒····· 1053
 饮湖上初晴后雨····· 1100
 彤弓····· 999
 彤管遗编····· 737
 邹迪光····· 547
 邹浩····· 415
 邹湛····· 287
 系乐府····· 1150
 角弓····· 1005

- 龟兆名体 1175
 龟虽寿 1050
 言之成理 1222
 言不尽意 56
 言为心声 1222
 言对 1194
 言近旨远 1222
 言直而切 96
 言意之辨 57
 言意象 55
 弃妇诗 1165
 辛延年 281
 辛亥革命诗词选 1429
 辛弃疾 438
 辛愿 461
 辛稼轩年谱 1405
 辛稼轩诗文抄存 891
 应制诗 1166
 应酬诗 1166
 应感 62
 应璩 284
 应玚 283
 庐山真面目 1144
 庐山瀑布谣 1112
 庐州诗苑 798
 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1389
 怀旧集 780
 怀沙 1019
 怀金陵 1104
 怀麓堂诗话 203
 快园诗话 250
 闲云孤鹤 1142
 闲止书堂集钞 955
 闲书杜律 207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901
 闲居初夏午睡起 1106
 闲居诗话 163
 闲适 140
 闲适诗 1163
 闲情集 775
 闵予小子 1013
 闵行诗存 801
 冷士眉 591
 冷邸小言 219
 冷斋夜话 172
 冷禅室诗话 273
 汪广洋 498
 汪元量 452
 汪中 634
 汪师韩 624
 汪济 454
 汪莘 439
 汪琬 589
 汪森 608
 汪辉祖 630
 汪道昆 541
 汪楫 600
 汪辟疆文集 1448
 汪遵 374
 汪懋麟 602
 汪藻 421
 沅湘耆旧集 825
 沔水 1000
 沔巢诗话 265
 沙中金集 201
 沙张白 590
 沙溪诗存 806
 汾沮洳 991
 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
 1448
 沧州明诗钞 788
 沧海遗珠 772
 沧浪诗话 190
 沧浪诗话校释 1452
 沧浪诗话(德译) 1485
 沧浪集 896
 沧溟集 928
 沧趣楼诗集 970
 汴京纪事二十首 1105
 沉吟楼诗选 941
 沉郁 137
 沉郁顿挫 138
 沉思翰藻 1226
 沉着 138
 沉着痛快(概念) 138
 沉着痛快(诗法) 1222
 沉雄 139
 沈大成 622
 沈与求 424
 沈千运 342
 沈归愚自订年谱 1424
 沈归愚诗全集 956
 沈辽 405
 沈亚之 358
 沈存中诗话 164
 沈休文诗注 1285
 沈休文集 837
 沈汝瑾 661
 沈如筠 330
 沈约 299
 沈约诗格 152
 沈园二首 1108
 沈宋 688
 沈宋体 688
 沈明臣 538
 沈周 516
 沈宜修 557
 沈诗任笔 685
 沈括 404
 沈炯 311
 沈梦麟 481
 沈琼莲 528
 沈曾植 658
 沈善宝 646
 沈谦 585
 沈遵 404
 沈鹄应 669
 沈愚 515
 沈鲍 685
 沈满愿 311
 沈德潜 614
 沈佺期 327
 沈佺期集 844
 羌村三首 1071
 完颜珣 460
 宋十五家诗选 764
 宋人绝句选 1387
 宋人集 766
 宋九嘉 461
 宋大樽 636
 宋之问 325
 宋之问集 844
 宋子京笔记 161
 宋艺圃集 763
 宋元诗会 764
 宋元宪集 867
 宋无 472
 宋五家诗钞 1386

- 宋氏 455
 宋文公武夷棹歌 1405
 宋文鉴 758
 宋玉 277
 宋玉 1262
 宋玉辞赋译解 1260
 宋世二陈 710
 宋四名家 710
 宋白 388
 宋辽金诗选注 1407
 宋百家诗存 764
 宋讷 497
 宋祁 394
 宋初诗歌革新运动 704
 宋若昭 361
 宋诗三百首 1387
 宋诗纪事 233
 宋诗纪事补遗 264
 宋诗纪事著者引得 1407
 宋诗别裁集 765
 宋诗研究 1387
 宋诗研究在国外 1470
 宋诗钞 763
 宋诗选注 1386
 宋诗派 728
 宋诗派别论 1387
 宋诗略 765
 宋诗散论 1388
 宋诗概说 1485
 宋诗精华录 765
 宋城者讴 976
 宋莘 598
 宋教仁 672
 宋琬 578
 宋景文公笔记 161
 宋景文集 867
 宋湘 639
 宋湘诗选 1427
 宋登春 554
 宋徵舆 581
 宋濂 495
 宋濂诗集 916
 宋懋澄 554
 宋褰 482
 宋庠 393
 穷而后工(概念) 98
 穷而后工(诗法) 1222
 穷形尽相(诗法) 1222
 穷形尽相(概念) 76
 评诗格 152
 词 1155
 词必己出 117
 词林正韵 1204
 补乐府 1150
 补闲集、续补闲集 1483
 初入淮河 1106
 初白庵诗评 239
 初白庵诗评 1356
 初学记 1454
 初学集 938
 初学集诗注 1417
 初唐四子集 749
 初唐四杰 687
 初唐四杰年谱 1333
 初唐诗 1487
 初寮集 879
 咏怀堂诗集 934
 良耜 1014
 张九一 543
 张九龄 328
 张万顷 339
 张之洞 656
 张子容 329
 张元凯 545
 张元幹 425
 张王 702
 张王乐府 702
 张公药 459
 张丹 584
 张凤翼 542
 张方平 396
 张亢 290
 张以宁 493
 张正见 314
 张玉娘 455
 张本 532
 张右史文集 876
 张宁 515
 张司空集 834
 张耒 413
 张协 289
 张曲江体 689
 张廷玉 613
 张乔(唐诗人) 375
 张乔(明诗人) 562
 张仲素 356
 张华 286
 张华:西晋政治家兼诗人
 1492
 张旭 326
 张问陶 641
 张羽 502
 张巡 335
 张远(清诗人) 596
 张远(清诗人) 607
 张志和 342
 张苍水集 937
 张孝祥 435
 张时彻 534
 张伯玉 397
 张含 529
 张良臣 434
 张际亮 650
 张孜 376
 张若虚 326
 张英 601
 张雨 477
 张肯 510
 张明中 434
 张河间集 831
 张泌 388
 张泽诗徵 802
 张泽诗徵续编 802
 张孟兼 506
 张承吉文集 860
 张南史 341
 张昱 483
 张笃庆 604
 张適 501
 张俞 394
 张养浩 474
 张宣 505
 张宪 490
 张说 328
 张说年谱 1334
 张祜 366
 张秦娥 464
 张载 288

- 张祥鸾 539
 张继 339
 张继诗注 1359
 张埴 449
 张著 500
 张斛 456
 张率 306
 张谓 337
 张维屏 646
 张维屏诗文选 1432
 张琦 519
 张散骑集 840
 张敬忠 327
 张惠言 641
 张景阳集 835
 张景修 407
 张循之 325
 张舜民 410
 张献翼 543
 张鹏翮 617
 张煌言 562
 张碧 365
 张翥 481
 张端 479
 张潮 337
 张翰 287
 张融 300
 张燕公集 844
 张衡 280
 张衡诗文集校注 1278
 张籍王建体 702
 张籍 355
 张籍诗集 854
 张栻 435
 张嶠 426
 张詠 389
 张螟 384
 张铤 438
 忼慨歌 977
 纁斋诗谈 230
 灵一 346
 灵气 26
 灵台 1008
 灵芬馆诗话 248
 灵芬馆诗集 964
 灵澈 352
 尾句 1212
 尾联 1213
 君马黄 1025
 君子于役 986
 君子行 1028
 君子阳阳 986
 君子偕老 984
 陆士衡诗注 1283
 陆子馀集 927
 陆雲 290
 陆雲公 313
 陆雲集 835
 陆友 479
 陆文圭 470
 陆平原年谱 1283
 陆世仪 574
 陆机 289
 陆机集 835
 陆次雲 588
 陆圻 577
 陆佃 407
 陆希声 380
 陆龟蒙 379
 陆陈盛江四君子 724
 陆畅 357
 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陆卿子 548
 陆海潘江 680
 陆容 518
 陆琼 316
 陆厥 306
 陆游 431
 陆游年谱 1404
 陆游传 1404
 陆游传论 1404
 陆游研究 1404
 陆游集 886
 陆粲 532
 陆嵩 648
 陆倕 305
 阿列克谢耶夫 1497
 陇上歌 1049
 陇头流水歌辞 1047
 陇头歌辞 1047
 陇西行 1031
 陈三立 659
 陈大章 610
 陈与义 425
 陈与义年谱 1401
 陈与义集 883
 陈之遴 566
 陈子升 559
 陈子龙及其时代 1413
 陈子龙 561
 陈子龙诗集 936
 陈子壮 559
 陈子昂 326
 陈子昂年谱 1334
 陈子昂评传 1334
 陈子昂诗注 1333
 陈子昂研究 1334
 陈无己诗话 166
 陈日华诗话 186
 陈文述 645
 陈文烛 544
 陈允平 450
 陈玉璫 603
 陈去病 668
 陈东 424
 陈龙川年谱 1406
 陈龙川传 1406
 陈尧佐 391
 陈至言 612
 陈师道 412
 陈刚中集 905
 陈后主集 841
 陈兆崙 622
 陈羽 348
 陈寿祺 644
 陈杜 688
 陈伯玉集 844
 陈孚 467
 陈言务去 1222
 陈沆 647
 陈沂 524
 陈叔宝 318
 陈宝琛 658
 陈栌 470
 陈拾遗体 689
 陈思王集 833
 陈衍 660
 陈洪绶 567

- 陈泊 393
 陈泰 477
 陈恭尹 595
 陈起 447
 陈造 436
 陈旅 481
 陈陶 370
 陈继儒 550
 陈基 488
 陈梦雷 608
 陈辅之诗话 166
 陈高 489
 陈庾 463
 陈鸿 556
 陈渊 420
 陈深 470
 陈维崧 590
 陈琳 281
 陈彭年 391
 陈傅良 437
 陈舜俞 394
 陈賡 462
 陈谟 495
 陈瑚 576
 陈献章 517
 陈献章集 922
 陈简斋年谱 1401
 陈简斋体 709
 陈鹏年 611
 陈端生 636
 陈鹤 538
 陈樵 478
 陈襄 399
 妙 45
 妙在含糊 136
 妙造自然 128
 妙悟 106
 妙悟 1207
 邵长蘅 601
 邵齐焘 626
 邵宝 522
 邵晋涵 634
 邵康节体 707
 邵谒 378
 邵谒诗集 863
 邵雍 398
 鸡肋集 876
 鸡鸣(诗经·齐风) 990
 鸡鸣(汉乐府) 1027
 劲健 133
 甬上耆旧诗 817
 驴鸣犬吠 1132
 纳兰成德诗集、诗论笺注
 1424
 纳兰性德 609
- 八画
- 环谷集 913
 环肥燕瘦 1143
 环溪诗话 182
 青山集(赵文) 904
 青山集(郭祥正) 872
 青木正儿 1494
 青丘体 714
 青州明诗钞 791
 青青河畔草 1038
 青浦诗传 801
 青浦续诗传 801
 青崖集 904
 青楼诗话 273
 青溪小姑曲 1042
 青蝇(诗作名篇) 1005
 青蝇(掌故) 1129
 青箱杂记 163
 青邱子歌 1113
 青邱高先生年谱 1411
 武元衡 353
 武元衡集 854
 武 1013
 武平一 327
 武夷新集 867
 武则天 321
 武定诗续钞 792
 武溪集 867
 坡门酬唱集 758
 林下偶谈 192
 林雲铭 585
 林以宁 609
 林古度 563
 林则徐 646
 林则徐年谱 1432
 林则徐诗集 1432
 林旭 669
 林希逸 448
 林紓 659
 林昌彝 651
 林和靖 1485
 林季仲 420
 林逋 390
 林宽 375
 林宽诗集 862
 林鸿 508
 林景熙 453
 林弼 491
 林登州集 915
 柿叶楼存稿 1326
 枚乘 277
 板 1009
 板荡 1129
 板桥诗词撷英 1424
 松心诗集 966
 松石轩诗评 202
 松花笺 1484
 松桂堂全集 949
 松陵集 745
 松雪斋集 906
 松隐文集 884
 枫桥夜泊 1076
 枫落句 1141
 杭川新风雅集 823
 杭世骏 621
 杭淮 522
 耶律倍 455
 耶律庶成 456
 耶律铸 465
 耶律蒲鲁 456
 耶律楚材 464
 耶律履 458
 取影 100
 刺世疾邪诗 1023
 卦名体 1173
 画工 84
 画龙点睛 1222
 画眉鸟 1096
 画禅室随笔 216
 画墁集 875
 直寻 85
 直致 127

- 直置体 1179
 卖炭翁 1086
 苦吟派 699
 苦寒行 1029
 英译中国歌诗选 1484
 英和 644
 范雲 300
 范石湖诗集注 1402
 范石湖集 887
 范成大 431
 范成大年谱 1403
 范成大诗选 1402
 范当世 659
 范仲淹 392
 范纯仁 403
 范祖禹 407
 范姝 646
 范晔 296
 范德机诗集 908
 范梈 475
 苕之华 1007
 苕溪五隐 720
 苕溪渔隐丛话 18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073
 昔昔盐 1055
 枣林艺箴 221
 枣据 286
 雨无正 1002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1103
 雨村诗话 246
 雨村诗话(话今) 246
 事对 1194
 事类赋 1454
 事核而实 97
 奇与正 114
 奇文共赏 1222
 奇对 1193
 奇趣 34
 抹月批风 1144
 拔蒲 1044
 抛砖引玉 1141
 拈韵 1183
 押韵 1182
 押韵释疑 1203
 拙思 1019
 拙轩集 901
 拖泥带水 1222
 拘虚诗谈 204
 抱真堂诗话 223
 招隐士 1021
 招隐诗 1163
 招魂 1020
 披沙简金 1223
 择韵 1205
 择题 1204
 拗体(诗体) 1168
 拗体(诗律) 1187
 拗体律诗 1160
 拗体绝句 1159
 拗律 1187
 拗绝 1187
 拗救 1187
 转笔 1213
 转益多师 115
 转接法 1208
 转韵 1182
 转韵律诗 1160
 转意 1213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68
 欧大任 538
 欧公诗话 162
 欧阳文忠公年谱 1389
 欧阳文忠公诗话 162
 欧阳文忠公集 868
 欧阳玄 476
 欧阳永叔诗话 162
 欧阳建 289
 欧阳修 395
 欧阳修诗选 1389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
 1492
 欧阳詹 354
 欧梅 706
 欧虞部集 928
 瓠北先生年谱 1426
 瓠北诗话 242
 瓠北集 959
 卧园诗话 254
 卧雪诗话 267
 到洽 306
 到溉 306
 势 27
 歧义说 1478
 叔于田 987
 卓文君 278
 卓尔堪 610
 虎丘题真娘墓诗 745
 虎丘题壁 1119
 非连续诗学 1476
 非诗辨妄 1233
 尚巧贵妍 8
 尚颜 383
 味 27
 味疏斋诗话 265
 咄咄吟 1124
 咄咄吟 968
 呼之欲出 1222
 呼文如 549
 呼应法 1209
 鸣坚白斋诗存 971
 鸣盛集 920
 咏 1156
 咏田家 1093
 咏史 1052
 咏史诗 1162
 咏怀古迹五首 1074
 咏怀诗(诗体) 1163
 咏怀诗(诗作名篇) 1052
 咏物七律偶记 245
 咏物诗 1162
 咏柳 1058
 咏荆轲 1053
 岭雲海日楼诗钞 972
 岭表诗传 829
 岭南七子 722
 岭南三大家 723
 岭南三子 723
 岭南三家诗选 1415
 岭南诗存 829
 岭南诗派 715
 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
 1479
 明人诗品 253
 明人诗钞 776
 明日黄花 1144
 明月何皎皎 1039

- 明月皎夜光 1038
 明妃曲 1098
 明李文正公年谱 1411
 明初四杰 714
 明诗正声 773
 明诗百州名家诗钞 775
 明诗纪事 266
 明诗别裁 776
 明诗评 212
 明诗评选 1410
 明诗钞 776
 明诗综 775
 明宫词 786
 明清诗文论文集 1416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辑)
 1410
 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二辑)
 1416
 明紫琅诗 805
 明道杂志 166
 明暗呼应法 1211
 明滇南诗略 830
 邵亭诗钞 968
 洞酌 1009
 函宫 1015
 畅当 350
 畅诸 333
 凯风 982
 忠义集 762
 忠正德文集 882
 忠肃集 872
 忠雅堂诗词全集 958
 昊天有成命 1012
 杲堂诗文集 937
 昌谷集 893
 昌黎先生年谱(黄钺) 1363
 昌黎先生年谱(顾嗣立) 1363
 昌黎先生诗文年谱 1363
 昌黎先生诗集注 1361
 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 1361
 易士达 446
 易水歌 977
 易顺鼎 661
 易堂九子 722
 易韵 1200
 罗与之 448
 罗邛 377
 罗邛诗集 863
 罗虬 376
 罗昭谏集 863
 罗音室学术论著 1450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1450
 罗隐 378
 典论·论文 148
 典远谐则 105
 典雅 40
 国风选译 1247
 国秀集 741
 国初三张 714
 国殇 1018
 国朝山左诗补钞 791
 国朝山左诗钞 790
 国朝山左诗续钞 790
 国朝天台诗存 820
 国朝中州诗钞 793
 国朝风雅 769
 国朝六家 723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 822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续 823
 国朝全蜀诗钞 828
 国朝名公诗选 773
 国朝沧州诗钞 788
 国朝沧州诗续钞 789
 国朝松江诗录 800
 国朝松陵诗徵 799
 国朝杭郡诗三辑 812
 国朝杭郡诗续辑 812
 国朝杭郡诗辑 812
 国朝(明)诗评 212
 国朝金陵诗徵 799
 国朝金陵续诗徵 799
 国朝诗 779
 国朝诗乘 778
 国朝诗萃 780
 国朝闺秀正始续集 781
 国朝闺秀正始集 781
 国朝闺阁诗钞 781
 国朝姚江诗存 818
 国朝(清)诗人徵略初编 257
 国朝(清)诗话 237
 国朝紫琅诗 805
 国朝湖州诗录 813
 国朝湖州诗续录 813
 国朝蜀诗略 827
 国朝畿辅诗传 787
 国雅 774
 国雅品 210
 牧斋先生年谱 1417
 牧庵集 904
 物化 73
 物色 77
 物我无间 72
 物我两忘 72
 物象 76
 钓鳌客 1134
 和子由澠池怀旧 1099
 和 44
 和汉朗咏集 1463
 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 1487
 和项王歌 1022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1055
 和陶合笺 1394
 和靖诗集 866
 和韵 1183
 和韵诗 1170
 和凝 387
 知人论世(概念) 58
 知人论世(诗法) 1222
 知本堂读杜词目录 1353
 知言养气 59
 知音 144
 知稼翁集 885
 委曲 135
 乖崖集 866
 秉烛夜游 1130
 佳人 1072
 使至塞上 1061
 使事 1206
 侧对 1196
 佩文诗韵释要 1203
 佩文斋咏物诗选 738
 佩文韵府 1203
 佩玉斋类稿 914
 依样葫芦 1222
 依韵 1183
 的名对 1191
 岳王墓 1113
 岳阳楼 1113

- 岳岱 545
 岳珂 444
 岳鄂王墓 1112
 徂徕集 868
 往体诗 1149
 往题乐府 1151
 欣赏诗法 213
 质气体 1179
 质实 130
 瓮牖闲评 183
 命意 1204
 命题 1205
 舍筏达岸 119
 念堂诗话 250
 金人瑞 572
 金天羽 667
 金玉诗话 171
 金兰集 768
 金幼孜 512
 金台十子 724
 金华五高 712
 金华宋氏 508
 金华诗录 821
 金农 617
 金声玉振 1222
 金针诗格 154
 金针度人 1222
 金君卿 401
 金明馆丛稿初编 1449
 金和 654
 金诗纪事 269
 金俊明 567
 金涓 490
 金陵三俊 715
 金陵五题 1084
 金陵诗徵 798
 金铜仙人辞汉歌 1078
 金渊集 905
 金错刀行 1107
 金榜题名 1142
 金銮 532
 金履祥 450
 金姓 623
 金鷄擘海 1223
 斧凿痕 1138
 斧凿痕迹 1225
 采芑 1000
 采苓 993
 采莲曲 1044
 采桑度 1044
 采菱曲 1045
 采菽 1005
 采菽堂古诗选 1269
 采绿 1006
 采葛 987
 采辑历朝诗话 261
 采薇 999
 采薇歌 976
 采繁 980
 采蘋 981
 饴山诗集 955
 兔走乌飞 1141
 兔爰 987
 兔起鹘落 1226
 兔置 980
 鱼计轩诗话 247
 鱼龙混杂 1142
 鱼玄机 382
 鱼丽 999
 鱼藻 1005
 炙毂子诗格 155
 周大枢 620
 周少隐诗话 176
 周文璞 443
 周玉箫 558
 周必大 432
 周弘正 309
 周弘让 309
 周邦彦 414
 周朴 373
 周权 480
 周行己 415
 周伯琦 485
 周孚 436
 周茂源 581
 周县 387
 周昂 459
 周京 615
 周实 672
 周是修 509
 周亮工 576
 周济 645
 周贺 369
 周贺诗集 861
 周起渭 611
 周密 451
 周紫芝 422
 周弼 444
 周霆震 482
 周韶 409
 周繇 374
 周筮 587
 氓入城行 1120
 氓 985
 放翁诗话 184
 放翁诗选 1403
 郊岛 698
 郊祀歌 1152
 郊庙歌辞 1151
 郊寒岛瘦 698
 京江耆旧集 808
 京都谣 1037
 夜上受降城闻笛 1081
 夜坐 1123
 夜雨寄北 1091
 变体诗 1167
 变律诗 1160
 变雅堂集 942
 府试诗 1166
 庚溪诗话 183
 废巧尚直 102
 废言尚意 102
 性与情 65
 性灵 111
 性灵派 726
 性灵说 112
 怪诞 143
 怡志堂诗初编 967
 法式善 637
 法若真 578
 法藏碎金录 160
 河广 985
 河东集 866
 河北民 1097
 河伯 1018
 河汾诸老集 767
 河岳英灵集 742
 河岳英灵集研究 1330

- 河朔诗派····· 722
 河梁别····· 1130
 泊秦淮····· 1089
 泊船瓜洲····· 1098
 泠然斋集····· 894
 柳溪诗存····· 809
 泮水····· 1015
 波澜老成····· 1222
 泽陂····· 996
 泽螺居诗经新证····· 1245
 泾川诗话····· 236
 泾猷诗存····· 795
 郑卫之音····· 87
 郑子尹年谱····· 1435
 郑元佑····· 482
 郑文宝····· 389
 郑方坤····· 616
 郑允端····· 490
 郑玉····· 484
 郑刚中····· 424
 郑声淫····· 87
 郑孝胥····· 663
 郑谷····· 383
 郑谷诗集笺注····· 1383
 郑板桥年表····· 1425
 郑板桥全集····· 957
 郑若庸····· 530
 郑珍····· 652
 郑珍评传····· 1435
 郑思肖····· 452
 郑起····· 447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 1449
 郑清之····· 443
 郑巢····· 366
 郑善夫····· 529
 郑道昭····· 305
 郑献甫诗选注····· 1435
 郑騫····· 1498
 郑紫····· 376
 郑鹧鸪····· 1142
 郑燮····· 619
 郑悖····· 323
 郑嵎····· 373
 郑畋····· 375
 宝刀歌····· 1126
 宝纶堂集····· 939
 宝晋英光集····· 875
 宝塔诗····· 1173
 宗臣····· 540
 宗忠简集····· 877
 宗泽····· 415
 宗楚客····· 323
 宗夬····· 301
 定山先生集····· 922
 定山堂集····· 944
 定之方中····· 984
 定泉诗话····· 235
 定峰乐府····· 947
 定峰诗钞····· 947
 定庵诗话····· 268
 定盦先生年谱····· 1433
 定盦先生年谱外纪····· 1433
 官仓鼠····· 1093
 官渡柳····· 1131
 宛上同人集····· 796
 宛丘····· 995
 宛陵集····· 868
 宛陵群英集····· 795
 宛雅二编····· 796
 宛雅三编····· 796
 宛雅初编····· 796
 空同集····· 925
 空灵····· 130
 学斋占毕····· 195
 卷耳····· 979
 卷阿····· 1009
 试体唐诗····· 755
 试帖诗····· 1166
 试帖纂注····· 1318
 诗····· 1
 诗人玉屑····· 191
 诗人主客图····· 155
 诗人李白····· 1340
 诗人李贺····· 1373
 诗人秀句····· 152
 诗人沈约····· 1489
 诗三百精义述要····· 1249
 诗三百篇探故····· 1244
 诗三家义集疏····· 1239
 诗大序····· 147
 诗义会通····· 1240
 诗义固说····· 229
 诗之时空辨析····· 1482
 诗女史····· 736
 诗比兴笺····· 1270
 诗切····· 1237
 诗无达志····· 10
 诗无达诂····· 9
 诗天子····· 1133
 诗王····· 1135
 诗中十子····· 724
 诗中有人····· 17
 诗中有画(概念)····· 16
 诗中有画(诗法)····· 1223
 诗中旨格····· 159
 诗中密旨····· 153
 诗见····· 253
 诗毛氏传疏····· 1238
 诗文正法····· 200
 诗文发源····· 167
 诗文要式····· 213
 诗文浪谈····· 205
 诗为名理····· 17
 诗为活物····· 14
 诗以达意····· 6
 诗占微····· 1238
 诗本义····· 1230
 诗本事····· 220
 诗囚(掌故)····· 1145
 诗囚(诗法)····· 1214
 诗史(概念)····· 170
 诗史(掌故)····· 1135
 诗史(研究著作)····· 1446
 诗仙····· 1134
 诗乐论····· 1243
 诗议····· 153
 诗必盛唐····· 99
 诗奴····· 1144
 诗圣····· 1135
 诗式····· 153
 诗式校注(周维德)····· 1452
 诗式校注(李壮鹰)····· 1451
 诗有七德····· 13
 诗有三思····· 12
 诗有三境····· 12
 诗有五格····· 13
 诗问四种····· 1453
 诗论(概念)····· 175

- 诗论(程大昌) 1231
 诗论(朱光潜) 1442
 诗论正宗 238
 诗如禅 10
 诗观 777
 诗纪匡谬 1272
 诗声类 1201
 诗体明辨 210
 诗体缘起 220
 诗伯 1135
 诗佣 1214
 诗佛 1133
 诗肠鼓吹 1142
 诗言志 5
 诗言志辨 1442
 诗序 1227
 诗序辨说 1233
 诗评(王世贞) 212
 诗评(朱莫培) 203
 诗评(佚名) 161
 诗评(皎然) 153
 诗评(蒋一葵) 220
 诗评(景淳) 159
 诗词札丛 1451
 诗词曲语辞汇释 1456
 诗词曲语辞例释(增订本)
 1456
 诗词论析 1444
 诗词论析(续集) 1445
 诗词例话 1444
 诗词馀话 200
 诗词散论 1445
 诗妖 1130
 诗林广记 195
 诗苑众芳 762
 诗苑类格 161
 诗事 170
 诗虎 1143
 诗的 210
 诗府灵蛇 219
 诗法(黄子肃) 200
 诗法(杨成玉) 203
 诗法 1204
 诗法火传 222
 诗法正论 200
 诗法正宗 198
 诗法丛话 272
 诗法指南 214
 诗法家数 197
 诗法通微 1443
 诗法萃编 265
 诗法源流(王用章) 206
 诗法源流(释怀悦) 202
 诗宗正法眼藏 199
 诗学广论 1445
 诗学 2
 诗学汇选 1455
 诗学问难 253
 诗学规范 189
 诗学指南 249
 诗学梯航 202
 诗学禁脔 198
 诗学源流考 241
 诗学纂闻 235
 诗话 203
 诗话别裁三种 272
 诗话补遗 169
 诗话补阙 169
 诗话耐冷谭 253
 诗话总龟 174
 诗话类编 218
 诗话隽永(宋佚名) 178
 诗话隽永(喻正己) 200
 诗话新编 265
 诗绎 1235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1244
 诗经之女性的研究 1243
 诗经(专著) 1250
 诗经(总集) 730
 诗经(专著) 1486
 诗经今注 1246
 诗经六论 1244
 诗经古今音手册 1246
 诗经传说汇纂 1236
 诗经全译 1248
 诗经形释 1240
 《诗经》里的套式 1480
 《诗经》里的套语 1480
 诗经词典 1250
 诗经译注 1248
 诗经译注 1249
 诗经直解 1247
 诗经(英译) 1483
 诗经述论 1250
 诗经国风今译 1249
 诗经注析 1248
 诗经注释 1484
 诗经学 1242
 诗经学新论 1242
 诗经学纂要 1242
 诗经试译 1247
 诗经研究(谢无量) 1242
 诗经研究(诸桥辙次) 1484
 诗经研究反思 1249
 诗经研究方法论 1501
 诗经研究史概要 1245
 《诗经》研究在国外 1466
 诗经研究论文集 1250
 诗经研究论集(一) 1501
 诗经研究论集(二) 1501
 诗经研究新编 1249
 诗经选 1246
 诗经(俄译) 1493
 诗经音释 1243
 诗经语言艺术 1245
 诗经语言研究 1245
 诗经索引 1251
 诗经原始 1239
 《诗经》诸篇形成之研究 1485
 诗经通义 1241
 诗经通论 1236
 诗经通解 1240
 诗经鉴赏集 1250
 诗经解说 1249
 诗经韵读 1245
 诗经新义 1241
 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 1249
 诗经(德译) 1483
 诗要格律 159
 诗品无异人品 94
 诗品 1214
 诗品(司空图) 157
 诗品(钟嵘) 150
 诗贵色韵 136
 诗界革命 729
 诗思 1214
 诗鬼 1138
 诗律武库 1454

- 诗总 174
 诗总闻 1232
 诗宪 175
 诗说汇 244
 诗说雋永 178
 诗格(王昌龄) 153
 诗格(文彧) 158
 诗格(齐己) 158
 诗格(范梈) 198
 诗格要律 159
 诗格密旨 155
 诗笔 9
 诗病五事 164
 诗酒文饭 18
 诗家一指(范德机) 198
 诗家一指(释怀悦) 202
 诗家三昧 12
 诗家三昧 1223
 诗家夫子 1133
 诗家直说 209
 诗家鼎脔 759
 诗谈 207
 诗教 4
 诗眼(概念) 168
 诗眼(诗法) 1205
 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
 园林生活 1503
 诗婢 1130
 诗赋词曲概论 1442
 诗赋欲丽 8
 诗简 1215
 诗筏 224
 诗牌 1215
 诗集传 1232
 诗客子 1142
 诗道 8
 诗疏平议 1244
 诗缉 1234
 诗缘情 7
 诗缘情辨 1445
 诗缘樵说拾遗 264
 诗韵 1180
 诗韵全璧 1203
 诗源撮要 211
 诗源辨体 217
 诗境记 1483
 诗境浅说 1442
 诗歌史 1446
 诗歌和政治:阮籍生平与作品
 1486
 诗歌欣赏 1444
 诗疑 1234
 诗豪 1138
 诗谭 221
 诗谱(陈绎曾) 199
 诗谱(郑玄) 1228
 诗趣 1214
 诗瓢(诗法) 1214
 诗瓢(掌故) 1142
 诗藪 215
 诗镜总论 210
 诗辨妄 1231
 诗辩坻 226
 诗讖 1214
 诗纘绪 1234
 诗魔 1214
 诗髓脑 152
 诗囊 1142
 诗藩 1237
 诚斋诗话 184
 诚斋集 888
 诚意伯文集 917
 祈父 1001
 祈招诗 979
 郎士元 340
 郎士元集 849
 房中乐 1154
 房俾 464
 居节 543
 居易录 228
 居庸关 1115
 屈大均 594
 屈子杂文笺略 1254
 屈子章句 1255
 屈宋 675
 屈宋古音义(诗律) 1200
 屈宋古音义(专著) 1253
 屈柘枝 1162
 屈复 612
 屈原九章今译 1257
 屈原九歌今译 1257
 屈原与楚辞 1263
 屈原(专著) 1261
 屈原(诗人) 276
 屈原论稿 1267
 屈原诗选 1493
 屈原研究 1263
 屈原离骚今译 1257
 屈原赋今译 1257
 屈原赋证辨 1258
 屈原赋译注 1260
 屈原赋注 1254
 屈原赋选 1257
 屈原赋校注 1256
 屈赋音注译解 1260
 屈赋通笺 1258
 屈赋微 1255
 屈赋新探 1265
 屈赋新编 1258
 屈骚指掌 1255
 建安七子 676
 建安七子年谱 1279
 建安七子集 739
 建安风骨 677
 建安文学研究文集 1276
 建安文学编年史 1277
 建安体 678
 建除体 1171
 鴈鵠 997
 陋轩集 945
 陌上桑 1027
 陔南山馆诗话 261
 限韵 1182
 姑溪居士集 875
 迢迢牵牛星 1038
 迦陵论诗丛稿 1445
 参寥集 874
 孤儿行 1032
 孤云野鹤 1136
 孤平 1188
 孤怀孤诣 104
 孤雁入群格 1179
 孤雁出群格 1179
 孤愤 1126
 驹 1015
 驷骖 994
 驹虞 981
 练川三老 718

练子宁 510
 练中丞集 921
 练时日 1024
 细音 1198
 终风 982
 终南山 1062
 终南 994
 终南望馀雪 1059
 孟雲卿 340
 孟东野体 696
 孟东野诗集(别集) 853
 孟东野诗集(校订本) 1360
 孟郊 352
 孟郊和韩愈诗歌研究 1491
 孟郊研究 1505
 孟诗韩笔 697
 孟浩然(诗人) 331
 孟浩然(评传) 1487
 孟浩然体 690
 孟浩然诗集校注(李景白)
 1335
 孟浩然诗集校注(徐鹏) 1335
 孟浩然集 845

九画

贯雲石 480
 贯休 378
 贯华堂评选杜诗 1347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1315
 珂雪诗 949
 珂雪斋集 932
 玲珑 143
 珊瑚钩诗话 176
 春日 1102
 春风得意 1139
 春江花月夜 1041
 春怀示邻里 1103
 春帖子 1169
 春夜喜雨 1072
 春柳堂诗稿 960
 春树暮云 1135
 春草堂诗话 256
 春思 1063
 春秋诗话 236
 春怨 1094
 春晓 1058

春酒堂诗话 223
 春梦无痕 1138
 春雪亭诗话 248
 春望 1070
 春渚纪闻 173
 春愁 1125
 契嵩 396
 项安世 435
 项斯 368
 项斯诗集 861
 城中谣 1037
 城东早春 1077
 垓下歌 1021
 枯鱼过河泣 1035
 枯淡 141
 柯潜 517
 柘枝词 1162
 相山集 884
 相因法 1209
 相名体 1175
 相和曲 1152
 相和歌辞 1151
 相承 1191
 相思 1062
 相送 1055
 相逢行 1030
 相鼠 984
 相韵 1183
 相题 1204
 柏舟(邶风、鄘风) 982
 柏岩感旧诗话 270
 柏梁体 675
 柏梁诗 1023
 柳子厚体 694
 柳开 389
 柳中庸 353
 柳氏 344
 柳亚子 673
 柳亚子年谱 1441
 柳先生年谱 1369
 柳如是别传 1420
 柳村谱陶 1304
 柳枝词 1162
 柳河东集 857
 柳宗元 361
 柳宗元年谱 1370

柳宗元传论 1370
 柳宗元诗笺释 1369
 柳贯 474
 柳南随笔·续笔 233
 柳是 582
 柳亭诗话 230
 柳恽 304
 柳隐丛谭 260
 柳絮才 1131
 柳絮 1096
 柳暗花明 1133
 柳晉 316
 树名体 1175
 政教 39
 胡小石论文集 1448
 胡天游(元诗人) 482
 胡天游(清诗人) 620
 胡石庄先生诗集 941
 胡仲子集 916
 胡汝嘉 535
 胡应麟 548
 胡茄十八拍讨论集 1274
 胡承诺 571
 胡香昊 599
 胡俨 510
 胡炳文 469
 胡祗遹 465
 胡铨 428
 胡宿 393
 胡曾 374
 胡震亨 553
 胡翰 495
 胡纘宗 528
 胡笳十八拍 1024
 封丘作 1067
 荆溪林下偶谈 192
 郝经 465
 酈炎 280
 南山 990
 南山有台 999
 南山诗 1079
 南风歌 975
 南北朝体 685
 南有嘉鱼 999
 南朱北王 725
 南阳集(赵湘) 866

- 南阳集(韩维)····· 870
 南轩集····· 890
 南园十三首····· 1078
 南园十先生····· 715
 南园五先生····· 715
 南园后五子····· 715
 南园后五子诗集····· 828
 南宋杂事诗····· 778
 南宋群贤小集····· 761
 南社(诗社)····· 729
 南社(专著)····· 1430
 南社丛谈····· 1429
 南社纪略····· 1429
 南社诗集····· 783
 南岳倡酬集····· 757
 南施北宋····· 723
 南亭四话····· 267
 南亭诗钞····· 790
 南部新书····· 160
 南郭五子····· 726
 南浦诗话····· 252
 南涧甲乙稿····· 886
 南野堂笔记····· 244
 南湖集(贡性之)····· 914
 南湖集(张镒)····· 892
 南窗漫记····· 225
 南溪诗话····· 201
 南溪笔录群贤诗话····· 201
 南濠诗话····· 203
 南濠居士诗话····· 204
 南薰集····· 744
 茜桃····· 393
 草虫····· 980
 草名体····· 1175
 草堂诗话····· 187
 草堂雅集····· 769
 草蛇灰线····· 1225
 草窗韵语····· 898
 茶山集····· 881
 茶陵诗派····· 716
 荀况····· 276
 茗香诗论····· 244
 茗斋集····· 936
 荒井健····· 1495
 荡气回肠····· 1131
 荡····· 1009
 荔支叹····· 1102
 药名体····· 1175
 药栏诗话····· 258
 巷伯····· 1003
 带经堂诗话····· 233
 带经堂集····· 950
 迺贤····· 487
 查为仁····· 619
 查初白先生十二种诗评····· 239
 查初白体····· 725
 查揆····· 644
 查嗣琛····· 609
 查慎行····· 607
 赴洛道中作····· 1052
 赵元····· 462
 赵介····· 507
 赵文····· 467
 赵文哲····· 628
 赵可····· 458
 赵用贤····· 544
 赵必豫····· 453
 赵执信····· 611
 赵执信所传声调谱····· 246
 赵师秀····· 440
 赵延寿····· 456
 赵汝燧····· 442
 赵进美····· 586
 赵希蓬····· 448
 赵怀玉····· 635
 赵迪····· 492
 赵秉文····· 459
 赵孟頫····· 470
 赵南星····· 547
 赵威伯诗话····· 192
 赵威伯诗余话····· 192
 赵昱····· 618
 赵秋谷所传声调谱····· 1202
 赵俞····· 599
 赵偕····· 471
 赵壹····· 280
 赵鼎····· 423
 赵鼎臣····· 417
 赵湘····· 390
 赵嘏····· 370
 赵嘏诗注····· 1375
 赵熙····· 665
 赵蕃····· 438
 赵翼····· 628
 赵翼诗选····· 1426
 赵抃····· 397
 赵汴····· 490
 斫轮老手····· 1223
 厚····· 49
 咸平集····· 866
 咸阳城西楼晚眺····· 1089
 咸通十哲····· 699
 咸酸之外····· 108
 挂一漏万····· 1223
 挂枝儿····· 1162
 拾得····· 347
 拾得诗集····· 851
 挥麈诗话····· 219
 轻肥····· 1085
 战城南····· 1025
 点化····· 1211
 点金成铁····· 1223
 点染法····· 1209
 点铁成金(诗法)····· 1223
 点铁成金(概念)····· 119
 点铁成金法····· 1210
 临汉隐居诗话····· 166
 临安春雨初霁····· 1108
 临安集····· 915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1058
 省试湘灵鼓瑟····· 1076
 省题诗····· 1166
 哑字····· 1206
 哑韵····· 1181
 响字····· 1206
 峤雅····· 935
 峥嵘····· 142
 映带体····· 1179
 昭代诗针····· 779
 昭君怨····· 1035
 昭明文选笺证····· 1297
 昭昧詹言····· 255
 毗陵七子····· 727
 毗陵后七子····· 727
 毗陵集····· 851
 毘陵诗录····· 807
 品····· 47
 虽颂刺····· 104

- 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 1115
- 星川清孝 1495
- 星名体 1175
- 星湄诗话 240
- 冒广生 667
- 冒愈昌 556
- 冒襄 575
- 贵耳集 192
- 贵远贱近 117
- 畏庐诗存 970
- 思与境偕 39
- 思无邪 86
- 思(概念) 39
- 思(诗体) 1156
- 思文 1012
- 思齐 1008
- 思伯子堂诗集 967
- 思美人 1019
- 思悲翁 1024
- 骨力 37
- 骨气 37
- 幽州马客吟歌辞 1047
- 幽闲鼓吹 155
- 幽深孤峭 104
- 拜经楼诗话 242
- 秋夕 1089
- 秋风团扇 1130
- 秋风辞 1022
- 秋江集 956
- 秋兴八首 1074
- 秋声集(已宗武) 900
- 秋声集(黄镇成) 912
-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 1108
- 秋柳 1120
- 秋胡行 1030
- 秋星阁诗话 226
- 秋思 1081
- 秋浦歌十七首 1064
- 秋涧先生大全集 903
- 秋崖集 896
- 秋望 1114
- 秋窗随笔 236
- 秋登越王台 1124
- 秋锦山房集 951
- 秋瑾 669
- 秋瑾文学论稿 1440
- 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 1439
- 秋瑾事迹研究 1439
- 秋瑾诗文选 1439
- 秋瑾诗词注释 1439
- 秋瑾研究资料 1439
- 秋蟪吟馆诗集 969
- 钝吟老人遗稿 940
- 钝吟杂录 222
- 钟嵘诗品校释 1451
- 钟惺 555
- 钟谭 720
- 钤山堂集 926
- 钩章棘句 1223
- 钮琇 603
- 复古诗集 912
- 复庄诗问 968
- 复社 720
- 复初斋诗集 959
- 香山九老会诗 744
- 香山集 885
- 香石诗话 252
- 香宇诗谈 214
- 香奁体 703
- 香奁诗话 272
- 香奁集 864
- 香宋诗钞 972
- 香宋诗前集 972
- 香草美人 89
- 香祖笔记 228
- 香象渡河 1223
- 笃旧集 782
- 选玉谿生诗补说 1377
- 选体 685
- 选体 1167
- 选学拾沉 1297
- 选学胶言 1296
- 选诗句图 189
- 适者为美 122
-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 240
- 重订李义山年谱 1380
- 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 1376
- 重旨 82
- 重字韵 1184
- 重别周尚书 1055
- 重拙大 43
- 重定杜子年谱诗史目录 1352
- 重显 392
- 重调 1215
- 重编杜工部年谱 1352
- 重韵 1183
- 重韵 1215
- 严山诗话 205
- 俚体律诗 1160
- 修竹庐谈诗问答 248
- 修睦 386
- 修辞立其诚 93
- 修辞鉴衡 197
- 俚语对 1195
- 促句体 1149
- 促句换韵体 1178
- 俗 41
- 俗体 1168
- 俗韵 1181
- 信手拈来 1223
- 信南山 1004
- 侯方域 580
- 侯克中 465
- 侯鯖诗话 168
- 段成己 464
- 段成式 370
- 段成式诗 861
- 段克己 463
- 皇元风雅 768
- 皇甫四杰 716
- 皇甫冉 340
- 皇甫冲 531
- 皇甫松 367
- 皇甫曾 343
- 皇甫曾诗集 850
- 皇甫濂 536
- 皇甫汈 534
- 皇甫湜 533
- 皇矣 1008
- 皇明诗选 774
- 皇皇者华 998
- 皇清百名家诗 777
- 泉水 983
- 待制集 908
- 待麟集 1488
- 律为骨 121

- 律诗 1158
 律诗失粘 1189
 律诗定体 229
 律诗格 165
 律绝 1159
 律格诗 1158
 叙事诗 1164
 剑门道中遇微雨 1107
 剑南诗稿校注 1403
 剑溪说诗 235
 郝超 293
 俞允文 537
 俞德邻 450
 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 929
 独抒性灵 110
 独坐敬亭山 1067
 独孤及 345
 独鉴录 220
 独漉堂全集 949
 独醒杂志 183
 狡童 989
 狱中题壁 1125
 狱中赠邹容 1126
 饶节 416
 胸海诗存 811
 鸨羽 993
 急声 1198
 急来抱佛脚 1139
 盈川集 844
 怨 1156
 怨而不怒 88
 怨悱不乱 89
 怨歌行 1034
 逃禅诗话 226
 施闰章 581
 施注苏诗 1391
 施肩吾 362
 施朝幹 631
 哀 1157
 哀而不伤 88
 哀江头 1070
 哀时命 1021
 哀郢 1019
 哀挽诗 1164
 哀旅顺 1124
 音式 1200
 音声迭代 122
 音和 1198
 音学五书 1200
 音象意 58
 音韵日月灯 1201
 音韵决疑 1199
 音韵述微 1201
 音韵阐微 1201
 彦周诗话 175
 度大庾岭 1056
 庭燎 1000
 恬致堂诗话 217
 恠格 596
 闻一多选唐诗 1320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1064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108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073
 闻湖诗三钞 814
 闻湖诗钞 813
 闻湖诗续钞 814
 闺秀诗评 219
 闺秀诗话 273
 闺怨 1060
 闺情 1076
 闺情诗 1165
 闺意献张水部 1088
 閻邱先生自订年谱 1424
 闽川闺秀诗话 252
 闽中十才子 715
 闽中十子集 822
 闽中新乐府 970
 闽百三十人诗存 823
 闽诗录 822
 闽诗派 715
 闽游诗话 240
 阁夜 1074
 炼气 1207
 炼句 1205
 炼字 1206
 炼局 1204
 炼骨 1207
 炼神 1207
 炼格 1207
 炼韵 1207
 炼意 1207
 洪仁玕 655
 洪北江诗文集 961
 洪业 1497
 洪彖 418
 洪希文 479
 洪龟父集 879
 洪武正韵 1204
 洪朋 418
 洪炎 418
 洪驹父诗话 172
 洪适 430
 洪亮吉 634
 洪音 1198
 洪咨夔 443
 洪皓 424
 洪昇 605
 洗炼 139
 活句 1205
 活字 1206
 活法 1208
 洮阳诗集 795
 洵美堂诗集 935
 洛阳女儿行 1060
 洛阳诗话 162
 济南集 877
 浑然天成 1220
 浔溪诗徵 813
 将归,别练塘诸子 1119
 将仲子 987
 将军名体 1175
 将进酒 1025
 前七子 716
 前五子 717
 前出塞九首 1069
 前贤小集拾遗 761
 前程万里 1139
 首尾吟体 1178
 首联 1212
 总不对对 1197
 养一斋李杜诗话 255
 养一斋诗话 254
 养自然斋诗话 264
 养吾斋集 907
 举步换形 1224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065

宣城体 723
 宣南诗社 728
 宫声 121
 宫体诗 686
 宫词一百首 1082
 宫词 1165
 宫怨诗 1165
 宫殿名体 1175
 客中初夏 1097
 客从远方来 1039
 客观之诗人 54
 突接法 1208
 美人香草 1129
 美女篇 1051
 美刺 95
 美恶对待 123
 姜氏诗说 185
 姜白石系年 1407
 姜白石诗集笺注 1406
 姜垓 578
 姜宸英 592
 姜夔 439
 姜埰 570
 娄水琴人集 806
 娄东二张 720
 娄东十子 722
 娄东三凤 721
 娄东诗派(诗派) 722
 娄东诗派(诗集) 807
 娄坚 548
 送人游吴(杜荀鹤) 1093
 送元二使安西 1061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
 1056
 送应氏 1051
 逆挽法 1208
 语言·悖论·诗学 1488
 语音学研究 1475
 说诗 211
 说诗乐趣类编 230
 说诗补遗 218
 说诗诗话 256
 说诗管蒯 235
 说诗碎语 234
 说唐诗 226
 祖无择 398

祖孙登 316
 祖咏集 845
 祖咏 329
 神与物游 72
 神气 70
 神会于物 71
 神州集 1484
 神妙 70
 神弦歌 1042
 神思 71
 神骨 69
 神施鬼设 1223
 神理 70
 神智体 1172
 神韵 105
 神韵派 724
 神韵说 106
 祝氏集略 924
 祝允明 522
 祇园南海 1494
 既醉 1008
 郡县名诗 1175
 郡阁雅言 160
 费冠卿 358
 费昶 309
 屋名体 1175
 屏山集 884
 屏麓草堂诗话 255
 昼上人集 850
 退庵诗存 965
 退庵诗话 260
 退庵随笔·学诗 251
 陟岵 991
 除夜对酒赠少章 1103
 险韵 1181
 眉庵集 918
 眉韵楼诗话 267
 姚广孝 503
 姚少监集 859
 姚文燮 587
 姚合 363
 姚江诗录 818
 姚汝循 544
 姚孝锡 427
 姚範 623
 姚贾 698

姚鹄 370
 姚鼐 631
 姚燧 466
 姚燮 651
 贺双卿 625
 贺兰进明 334
 贺知章 325
 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
 注 1333
 贺监归乡诗集 741
 贺铸 412
 柔笔 1213
 结句 1212
 结构主义研究 1481
 绘声绘色 1223
 绘事后素 22
 绚烂 131
 绝句 1158
 绝句失粘 1189
 绝句衍义笺注 1447
 绝诗 1158
 绝弦体 1173
 骆临海集笺注 1332
 骆宾王 321
 骆宾王评传 1332
 骆宾王集 842
 骈字类编 1455
 逊志斋集 920

十画

艳 50
 艳体 703
 艳体诗 1168
 艳歌行 1033
 珠英学士集 740
 班固 279
 班婕妤 279
 颊弁 1005
 烝民 1010
 顽潭诗话 222
 敖英 532
 敖陶孙 439
 敖器之诗话 190
 素冠 996
 蚕妇 1096
 秦女休行 1035

- 秦少游诗话 166
 秦中吟十首 1085
 秦世谣 978
 秦妇吟 1094
 秦妇吟研究汇录 1383
 秦观 411
 秦系 348
 秦始皇时民歌 978
 秦淮杂诗 1120
 秦韬玉 376
 秦嘉 280
 泰山吟 1034
 泰不华 486
 桂馥 633
 桓 1014
 桓灵时童谣 1037
 栖真馆集 930
 桐旧集 797
 桐江诗话 177
 桐江续集 903
 桐荫清话 265
 桐溪耆隐集 819
 株林 996
 格物 79
 格诗 1158
 格律诗 1158
 格调 108
 格调派 726
 格调说 109
 格韵 109
 格意趣 110
 桃之夭夭 1129
 桃夭 980
 桃花源诗 1053
 桃源行 1097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96
 栩园诗话 271
 耿伟 344
 耿伟集 850
 酌 1014
 酌雅诗话 257
 都人士 1006
 都门秋思 1122
 都官集 867
 真山民 454
 真州绝句 1120
 真我 112
 真诗乃在民间 17
 袁上元 479
 袁中郎 1412
 袁中郎全集 932
 袁中道 554
 袁机 626
 袁华 498
 袁孙 682
 袁宏 292
 袁宏道 553
 袁宏道集笺校 1413
 袁枚 625
 袁枚年谱 1425
 袁枚诗选 1425
 袁枚研究在国外 1471
 袁枚续诗品详注 1453
 袁凯 496
 袁易 472
 袁宗道 551
 袁说友 437
 袁昶 657
 袁桷 473
 袁淑 297
 袁袞 535
 袁陟 400
 毫餘诗话 243
 莆风清籁集 823
 莲坡诗话 232
 莲洋集 953
 莲峰集 886
 莲堂诗话 197
 莲塘诗话 197
 莲鬚阁集 934
 莫友芝 653
 莫友芝评传 1436
 莫愁乐 1043
 获麟歌 978
 聂夷中 379
 耆旧续闻 190
 晋安二徐 720
 晋陶靖节年谱 1305
 晋陶徵士年谱 1305
 栗里谱 1303
 贾生 1092
 贾至 341
 贾收 411
 贾岛 363
 贾岛年谱 1370
 贾岛诗句图 155
 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 1370
 贾岛诗格 155
 贾浪仙体 698
 贾谊 277
 贾喻 698
 贾蓬莱 485
 起句 1212
 起早 1121
 起承转合 1212
 起联 1212
 载见 1013
 载驰 985
 载芟 1014
 载驱 991
 载酒园诗话 225
 载酒园诗话评 227
 顾大申 582
 顾大典 545
 顾贞观 602
 顾光旭 630
 顾华玉集 925
 顾况 347
 顾非熊 366
 顾非熊诗 860
 顾炎武 577
 顾学颀文学论集 1450
 顾春 650
 顾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
 1419
 顾亭林先生年谱(车守谦)
 1419
 顾亭林先生年谱(张穆) 1419
 顾亭林先生诗谱 1420
 顾亭林诗文集 943
 顾亭林诗集汇注 1419
 顾逢 454
 顾梦圭 534
 顾梦游 567
 顾野王 314
 顾清 522
 顾随文集 1449
 顾瑛 488

- 顾景星 586
 顾湄 584
 顾嗣立 612
 顾赛芬 1496
 顾沂 606
 顾璘 526
 破斧 997
 破题 1213
 烈文 1011
 烈祖 1016
 夏之蓉 621
 夏日绝句 1104
 夏完淳 563
 夏完淳集 937
 夏完淳集笺校 1413
 夏侯湛 287
 夏敬观 669
 夏竦 392
 夏曾佑 663
 原诗 227
 原型批评 1481
 振鹭 1012
 捉船行 1117
 捉搦歌 1047
 挹翠楼诗话 261
 换头 1190
 换柱对 1193
 换韵 1182
 挽文山丞相 1112
 致酒行 1078
 拏虞 288
 匪风 996
 柴氏四隐集 759
 柴绍炳 579
 柴静仪 583
 柴赫 1497
 党怀英 459
 逍遥集 866
 峨嵋山月歌 1062
 峻峭 142
 贼退示官吏 1076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1106
 蚍蜉撼树 1139
 蚓窍集 919
 晁氏客语 167
 晁冲之 416
 晁补之 413
 晁具茨集 877
 晁说之 415
 晁端友 404
 晁衡 332
 晏殊 393
 恩福堂诗钞 965
 哭晁卿衡 1067
 圆美流转 122
 圆圆曲 1117
 钱仪吉 645
 钱邦芑 569
 钱考功集 849
 钱仲益 493
 钱刘 693
 钱芳标 589
 钱枚 641
 钱牧斋先生年谱(彭城退士)
 1417
 钱牧斋先生年谱(金鹤冲)
 1417
 钱秉镫 577
 钱郎 693
 钱郎刘李 693
 钱起 339
 钱载 625
 钱宰 494
 钱惟善 485
 钱惟演 391
 钱曾 593
 钱谦益 564
 钱塘观潮 1119
 钱塘湖春行 1087
 钱翊 377
 铁云诗存 1437
 铁杵磨针 1134
 铁保 637
 铁崖古乐府注 1409
 铁崖体 714
 铁崖咏史诗注 1409
 铁崖逸编注 1410
 铃木虎雄 1494
 铃木修次 1495
 铅粉气 1216
 秣陵先生集 920
 积书岩宋诗选 764
 积学 78
 笔九花梁 151
 笔力扛鼎 1223
 笔札华梁 151
 笔记 161
 笔扫千军 1223
 笔法 1213
 笔参造化 1223
 笔精 219
 笔墨闲录 188
 造语 1205
 透过一层法 1210
 借叶衬花法 1210
 借对 1192
 借喻 1211
 借韵 1183
 倚马可待 1224
 倚歌 1154
 倾城倾国 1130
 倒押法 1211
 倒插法 1208
 倒装法 1208
 俳体 686
 俳歌辞 1035
 候人 996
 倪瑞璠 623
 倪瓒 486
 射阳先生存稿 928
 射鹰楼诗话 258
 徒歌 1154
 徐子苓 653
 徐中行 542
 徐公文集 865
 徐氏别稿 926
 徐文长自著畸谱 1412
 徐世溥 571
 徐玑 441
 徐自华 668
 徐州诗徵 811
 徐芳 575
 徐孝嗣 300
 徐孝穆集 839
 徐孝穆集笺注 1287
 徐灿 566
 徐昌谷全集 926
 徐昂发 612

- 徐夜 574
徐炬诗话 214
徐波 575
徐学谟 539
徐勉 304
徐铉 388
徐俯 418
徐禎卿 527
徐陵 312
徐庾体 686
徐悱 309
徐淑 280
徐寅 384
徐惠 321
徐媛 548
徐緘 565
徐照 441
徐缙 527
徐凝 367
徐摛 305
徐廌 549
徐贲 503
徐幹 283
徐彦伯 327
徐渤 549
徐鉉 600
殷雲霄 523
殷文圭 385
殷尧藩 358
殷仲文 294
殷芸 305
殷武 1016
殷其雷 981
殷奎 505
殷遥 333
殷 1015
翁山诗外 948
翁方纲 631
翁卷 441
爱日斋丛钞 194
爱憎格 1173
卿云歌 976
狼跋 998
徐冬诗话 204
徐师录 185
脂粉气(掌故) 1132
脂粉气(诗法) 1216
胸襟 78
鸱鸢 997
鸳鸯 1005
留春草堂诗钞 963
逢入京使 1068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1076
旌丘 983
旅次朔方 1084
旅夜书怀 1073
郭元振 325
郭印 421
郭弘农集 836
郭奎 492
郭思诗话 167
郭钰 489
郭祥正 405
郭登 516
郭璞 291
郭麐 643
郭晖妻 455
离与合 91
离合体 1170
离思五首 1083
离骚汇订 1254
离骚发微 1259
离骚笺疏 1259
离骚集释 1256
离骚 1016
离骚解诂 1257
离骚纂义 1259
旁纽 1185
栾城集 873
唐十二名家诗 749
唐八家诗钞 754
唐人万首绝句选 753
唐人千首绝句 754
唐八家诗钞 754
唐人五十家小集 756
唐人五言排律选 747
唐人行第录 1384
唐人试帖 753
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
..... 1323
唐人省试诗笺 1317
唐人选唐诗(十种) 746
唐大历十子诗集 748
唐才子传 1321
唐才子传校正 1322
唐才子传校笺 1322
唐女诗人集三种 1320
唐子西文录 171
唐子西语录 171
唐子西集 878
唐五十家诗集 748
唐五家诗 749
唐太宗皇帝集 842
唐风集 864
唐六名家集 750
唐龙 527
唐四家 695
唐史徐坤 1324
唐代文学 1323
唐代文学研究 1325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1385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
..... 1329
唐代诗人丛考 1325
唐代诗学 1323
唐代诗歌(专著) 1324
唐代诗歌(俄译) 1492
唐百家诗选 746
唐孙华 598
唐声诗 1326
唐求 382
唐时升 548
唐伯虎全集 924
唐伯虎诗选 1412
唐近体诗永 752
唐宋八家集 755
唐宋文学论集 1327
唐宋名贤诗话 172
唐宋诗之争概述 1327
唐宋诗话 172
唐宋诗举要 1321
唐宋诗醇 756
唐初体 687
唐英歌诗 865
唐贤三昧集 753
唐贤三昧集评 1319
唐贤三昧集笺注 1318
唐庚 417

- 唐庚诗话 171
 唐诗人行年考 1325
 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
 杜甫三百首 1493
 唐诗三百首 755
 唐诗三百首补注 1319
 唐诗三百首注疏 1319
 唐诗三百首新编 1321
 唐诗大系 1319
 唐诗小札 1324
 唐诗艺术技巧 1330
 唐诗 751
 唐诗书录 1384
 唐诗正声 747
 唐诗归 1314
 唐诗丛考 1327
 唐诗百话 1327
 唐诗创新者陈子昂 1489
 唐诗合选详解 1318
 唐诗杂论 1323
 唐诗论文集 1325
 唐诗纪 749
 唐诗纪事 181
 唐诗别裁集 755
 唐诗体经 1317
 唐诗近体集韵 1314
 唐诗应制备体 754
 唐诗快 1316
 唐诗评选 1317
 唐诗英华 1315
 唐诗所 749
 唐诗(法译) 1483
 唐诗定编 752
 唐诗学引论 1328
 唐诗贯珠 1317
 唐诗研究 1322
 唐诗研究在国外 1468
 唐诗研究论文集 1324
 唐诗指月 754
 唐诗品 208
 唐诗品汇 1312
 唐诗矩 752
 唐诗选(李攀龙) 750
 唐诗选(马茂远) 1320
 唐诗选(文研所) 1320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1384
 唐诗选玄集 748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1314
 唐诗律笺 1318
 唐诗美学论稿 1328
 唐诗类苑 1313
 唐诗类选 745
 唐诗语言研究 1330
 唐诗雋 749
 唐诗通论 1326
 唐诗笺注 1318
 唐诗笺要 1318
 唐诗综论 1328
 唐诗援 749
 唐诗赏论 1330
 唐诗答客难 1329
 唐诗善鸣集 1316
 唐诗概论 1323
 唐诗鼓吹 1311
 唐诗解 1314
 唐诗韵汇 1315
 唐诗镜 1314
 唐诗挹藻 754
 唐肃 501
 唐柳河东集 1369
 唐省试诗笺注 1318
 唐顺之 536
 唐音大成 748
 唐音 1311
 唐音佛教辨思录 1329
 唐音质疑录 1327
 唐音审体(诗话) 236
 唐音审体(诗集) 1316
 唐音癸签 218
 唐音统笈 750
 唐语林 167
 唐绝句史 1328
 唐桂芳 491
 唐梦赉 592
 唐崔峒诗集 850
 唐寅 524
 唐朝新定诗体 152
 唐朝新定诗格 152
 唐雅 1312
 唐集叙录 1383
 唐韵 1199
 唐韵考 1199
 唐摭言 158
 唐彦谦 380
 病牛 1104
 疾虚妄 101
 悖论诗学 1479
 悖论说 1478
 悔读南华 1141
 悔庵年谱 1421
 阆风集 899
 烘托法 1209
 剡川诗钞 819
 剡川诗钞续编 820
 剡源集 905
 剡溪诗话 189
 凌云健笔 133
 凌云翰 492
 凉州词 1048
 凉冷诗 1180
 浦舍人诗集 920
 浦源 506
 浙派 725
 涉江 1019
 涉江采芙蓉 1038
 涉斋集 889
 消夏录 233
 消寒诗话 237
 浩然斋诗话 195
 浩歌堂诗钞 973
 海上 1118
 海山诗屋诗话 263
 海天诗话 271
 海天琴思录 258
 海内三才 717
 海内三布衣 725
 海日堂集 947
 海右陈人集 941
 海曲诗钞 800
 海氛诗话 261
 海岱诗社 718
 海叟集 916
 海粟诗话 264
 海棠 1101
 海虞二冯 722
 海虞诗苑 809
 海虞诗话 257
 海潮叹 1118

- 海藏楼诗 971
 海藻 800
 浮切 1198
 浮光掠影 1223
 浮声切响 125
 浮溪集 880
 流水对 1192
 流动 140
 流自肺腑 1223
 流类手鉴 157
 浣纱集 1488
 涩体 688
 涩体 1168
 瓶水斋诗话 247
 瓶水斋诗集 964
 剜肉补疮 1142
 益都先正诗丛钞 792
 兼韵 1181
 羔羊 981
 羔裘(郑风、唐风、桧风) 988
 宽韵 1180
 家铉翁 449
 宾之初筵 1005
 宾客嘉话 154
 窄韵 1181
 容甫先生年谱 1426
 容城耆旧集 826
 容斋先生遗诗 961
 容斋诗话 187
 容斋随笔 186
 资江耆旧集 825
 诸言体 1178
 诸宗元 669
 诸语体 1178
 诸家老杜诗评 174
 诸家老杜诗评 1354
 诸葛颖 316
 诸暨诗存 819
 诸暨诗存续编 819
 读山海经 1053
 读风偶识 1237
 读曲歌 1041
 读全唐诗札记 1323
 读杜心解 1349
 读杜札记 1357
 读杜诗说 1356
 读杜寄卢小笺 1355
 读杜韩笔记(专著) 1357
 读杜韩笔记(诗话) 252
 读吴诗随笔 260
 读陆放翁集 1125
 读《诗》十六法 1467
 读诗三札记 1274
 读诗 216
 读诗札记 1243
 读诗拙言 213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241
 读雪山房唐诗钞 1318
 读渔洋诗随笔 251
 读随园诗话札记 1425
 读骚论微初集 1262
 俳谐体 1168
 调 1157
 调张籍 1080
 谈艺录(徐祜卿) 206
 谈艺录(钱钟书) 1443
 谈艺珠丛 263
 谈龙录 231
 谈迂 565
 扇对 1192
 陵川集 903
 陵阳室中语 175
 陵阳集 880
 陶九成 417
 陶山集 873
 陶韦 695
 陶弘景 301
 陶安 497
 陶体 681
 陶者 1095
 陶宗仪 488
 陶学士集 917
 陶诗汇评 1301
 陶诗汇注 1300
 陶诗析义 1300
 陶诗新论 1502
 陶望龄 551
 陶庵全集 936
 陶庵遗稿 931
 陶渊明及其诗歌 1490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1308
 陶渊明(专著) 1307
 陶渊明(诗人) 293
 陶渊明讨论集 1309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1306
 陶渊明年谱(许逸氏) 1307
 陶渊明年谱(邓安生) 1307
 陶渊明年谱(傅东华) 1306
 陶渊明年谱(梁启超) 1305
 陶渊明传论 1308
 陶渊明论集 1310
 陶渊明论稿 1309
 陶渊明批评 1308
 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1306
 陶渊明诗文汇评 1309
 陶渊明诗文校笺 1303
 陶渊明诗笺注 1302
 陶渊明诗集 1300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1309
 陶渊明探稿 1310
 陶渊明集(王瑶) 1302
 陶渊明集(逯钦立) 1302
 陶渊明集校注 1303
 陶渊明新论 1310
 陶渊明:作品及其涵义 1488
 陶集考辨 1307
 陶谢 681
 陶谢诗之比较研究 1502
 陶弼 399
 陶靖节先生年谱 1304
 陶靖节年谱 1306
 陶靖节诗注 1298
 陶靖节诗笺定本 1301
 陶靖节集 1299
 陶潜诗 1486
 陶翰 334
 陶澂 591
 娱书堂诗话 206
 娱书堂诗话 192
 能改斋漫录 178
 桑中 984
 桑柔 1010
 桑梓 1129
 桑扈 1004
 通志堂集 955
 通甫诗存 968
 通转 1182

通变····· 114
通斋诗话····· 260
通雅诗话····· 221
通感····· 81
通韵····· 1181

十一画

理为法源····· 77
理外之理····· 78
理事情····· 67
理雅各····· 1495
理趣与理障····· 33
理趣····· 33
琅玕王歌辞····· 1047
春陵行····· 1075
堆垛死尸····· 1224
梧门诗话····· 246
梧溪集····· 914
梅氏诗评····· 161
梅尧臣····· 394
梅尧臣传····· 1388
梅尧臣和宋初诗歌的发展
····· 148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1388
梅村先生年谱····· 1418
梅村体····· 722
梅村诗话····· 223
梅村家藏稿····· 941
梅花····· 1099
梅花尼····· 455
梅花字字香····· 910
梅花岭吊史阁部····· 1121
梅花诗····· 1112
梅花落····· 1046
梅里诗辑····· 815
梅崖诗话····· 246
梅鼎祚····· 547
梅曾亮····· 647
梅溪集····· 885
梅硎诗话····· 195
聊斋诗词选····· 1423
聊斋诗集····· 952
教化····· 38
乾坤正气集····· 736
乾坤清气集····· 770
乾隆三大家····· 727

乾嘉诗坛点将录····· 248
敕勒歌····· 1049
菁华体····· 1180
菁菁者莪····· 1000
著····· 990
菱溪诗话····· 261
菊坡丛话····· 202
苑柳····· 1005
萧子雲····· 308
萧子良····· 302
萧子显····· 308
萧立之····· 450
萧冰崖诗集拾遗····· 897
萧观音····· 456
萧纲····· 312
萧国宝····· 477
萧绎····· 312
萧衍····· 303
萧统····· 311
萧慤····· 315
萧综····· 311
萧瑟瑟····· 456
萧德藻····· 431
萨都刺····· 475
萨都刺诗选····· 1410
萤雪丛说····· 186
萤雪轩丛书····· 273
黄人····· 666
黄山谷诗话····· 165
黄之隽····· 615
黄子雲····· 618
黄公度····· 429
黄公度先生年谱····· 1437
黄公度先生诗笺····· 1436
黄公望····· 473
黄牛峡谣····· 1050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 1344
黄氏诗法····· 200
黄文节公年谱····· 1399
黄节····· 666
黄节诗选····· 1438
黄节诗集····· 973
黄生····· 587
黄鸟(秦风、小雅)····· 994
黄竹子歌····· 1042

黄仲则先生年谱····· 1427
黄仲则年谱····· 1427
黄仲则诗选····· 1426
黄仲则研究资料····· 1427
黄任····· 616
黄花晚节····· 1144
黄佐····· 531
黄初体····· 678
黄陈····· 708
黄周星····· 574
黄庚····· 471
黄宗羲····· 573
黄宗羲诗集····· 942
黄学士文集····· 910
黄庭坚····· 408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1399
黄庭坚诗选(潘伯鹰)····· 1398
黄庭坚诗选(陈永正)····· 1398
黄哲····· 507
黄峨····· 533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
战争地图····· 1126
黄姬水····· 536
黄绢幼妇····· 1131
黄崇嘏····· 377
黄庶····· 399
黄焕中····· 655
黄淑····· 441
黄淮····· 512
黄淳耀····· 561
黄辉····· 551
黄景仁····· 636
黄景仁诗词选····· 1426
黄景昉····· 566
黄鹄歌····· 1023
黄滔····· 382
黄裳····· 408
黄镇成····· 481
黄遵宪····· 657
黄遵宪诗选····· 1437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1064
黄鹤楼····· 1059
黄爵滋····· 648
黄燮清····· 651
黄翼圣····· 566
黄潜····· 477

- 黄鹭来 607
 蒋石斋诗集 958
 碧溪诗话 180
 曹之谦 464
 曹子建年谱 1281
 曹子建诗注 1281
 曹王 677
 曹仁虎 630
 曹丕 283
 曹申吉 598
 曹尔堪 580
 曹禾 601
 曹贞吉 597
 曹刘 676
 曹刘体 677
 曹邨 372
 曹邨诗注 1382
 曹伯启 471
 曹松 379
 曹学佺 556
 曹毗 292
 曹勋 427
 曹唐 369
 曹寅 610
 曹植及其诗歌 1488
 曹植 284
 曹植集校注 1281
 曹植新探 1281
 曹景宗 301
 曹集考异 1280
 曹集铨评 1280
 曹摅 288
 曹溶 579
 曹操 281
 曹操集 832
 曹操集译注 1278
 曹魏父子诗选 1278
 曹叡 285
 曹彦约 440
 梦天 1078
 梦吟春草 1132
 梦苕盒专著二种 1447
 梦晓楼随笔 232
 梦笔生花 1134
 梦痕馆诗话 266
 梦游天姥吟留别 1064
 梦溪笔谈 163
 梦蕉诗话 205
 梦麟 629
 梵麓山房笔记 254
 硕人 985
 硕鼠 992
 瓠叶 1006
 匏有苦叶(邶风、小雅) 983
 匏庐诗话 253
 龚开 450
 龚芝麓年谱 1420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1433
 龚自珍(诗人) 648
 龚自珍(专著) 1486
 龚自珍年谱 1433
 龚自珍全集 966
 龚自珍诗选(刘逸生) 1432
 龚自珍诗选(郭延礼) 1433
 龚自珍研究 1434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1434
 龚自珍综论 1434
 龚贤 584
 龚定盒研究 1434
 龚翎 514
 龚鼎孳 579
 龚璘 473
 盛山十二诗联卷 743
 盛山唱和集 743
 盛明百家诗 773
 盛唐体 689
 盛唐诗 1487
 戚夫人歌 1022
 戚继光 543
 赓 1014
 雪矶丛稿 897
 雪泥鸿爪 1144
 雪桥诗话 272
 雪翁诗集 936
 雪涛诗评 219
 雪浪斋日记 165
 雪梅 1111
 雪楼集 906
 掉字法 1210
 排律 1161
 排律平仄 1187
 排律粘对 1188
 推敲 1139
 掖诗采录 793
 接笔 1213
 掷韵 1184
 探骊得珠 1220
 虚与实 89
 虚实对 1196
 虚静 124
 常武 1011
 常建 331
 常建诗集 845
 常景 307
 唱 1156
 唱经堂杜诗解 1347
 晦涩 142
 晦庵先生集 889
 晦庵诗说 184
 晞发集 900
 晚泊岳阳 1096
 晚春 1080
 晚唐刘得仁诗 860
 晚唐体 702
 晚唐诗派 728
 晚清四十家诗钞 783
 晚清诗界革命论 1431
 晚晴 1092
 晚晴簃诗汇 782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1054
 晚照楼论文集 1326
 野 42
 野火春风 1137
 野田黄雀行 1032
 野老歌 1081
 野有死麕 981
 野有蔓草 989
 野谷诗集 894
 野客丛书 187
 野望 1056
 野鸿诗的 237
 野趣有声画 904
 鄂尔泰 614
 崧高 1010
 崔兴宗 333
 崔国辅 330
 崔珣 368
 崔峒 345

- 崔莺莺 362
 崔致远 384
 崔涂 384
 崔液 328
 崔道融 386
 崔融 324
 崔曙 337
 崔曙集 844
 崔颢 329
 崔颢诗集 845
 崔颢崔国辅诗注 1334
 崔湜 328
 崇川各家诗钞汇存 805
 崇川诗钞汇存补遗 805
 崇川诗集 804
 崇安二蓝 715
 晨风 994
 曼声 1198
 圈虎行 1122
 铙歌 1152
 铜雀台 1028
 铢两轻重法 1210
 移风易俗 63
 移宫换羽 1224
 移情 68
 笺杜陵诗 1345
 笺注陶渊明集(张自烈) 1300
 笺注陶渊明集(李公焕) 1299
 笱重光 587
 符曾 617
 笠翁对韵 1202
 笠翁对韵新注 1447
 偶体绝句 1159
 偶桓 504
 偈 1157
 偷法 1211
 偷春体 1171
 偷语偷意偷势 119
 停云阁诗话 262
 偏对 1196
 偏枯 1191
 假乐 1009
 假对 1192
 假借对 1192
 皎然 342
 得心应手 1224
 得意忘言 56
 船山先生年谱 1421
 船山年表 1421
 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 1421
 船山诗草 963
 船山诗选 1427
 船名体 1175
 盘马弯弓 1224
 盘中诗 1172
 盘洲集 885
 斜川集 878
 猗觉寮杂记 182
 猗嗟 991
 猛虎行 1028
 象外之象 55
 象载瑜 1024
 逸 49
 逸老堂诗话 207
 高士谈 457
 高氏三宴诗集 740
 高文照 630
 高允 296
 高古 134
 高本汉 1497
 高出 554
 高达夫体 690
 高旭 670
 高克恭 469
 高邮耆旧诗 810
 高岑 691
 高启 504
 高启诗选 1411
 高妙 139
 高青丘集 919
 高青邱诗集注 1411
 高叔嗣 535
 高岱 542
 高適(诗人) 332
 高適(专著) 1487
 高適诗集编年笺注 1335
 高骈 373
 高逊志 493
 高珩 576
 高桥和巳 1495
 高斋诗话 179
 高爽 302
 高常侍集 846
 高密诗派 727
 高翥 446
 高蟾 380
 高棅 508
 商山早行 1090
 商盘 622
 商景兰 560
 章八元 348
 章 1157
 章孝标 364
 章孝标诗集 859
 章甫 436
 章法 1207
 章炳麟 665
 章碣 377
 竟陵八友 684
 竟陵体 720
 竟陵诗选 826
 竟陵派 719
 望天门山 1065
 望夫石 1082
 望庐山瀑布二首 1065
 望岳 1068
 望海楼晚景 1100
 望眼欲穿 1137
 庶斋老学丛谈 197
 庾子山年谱 1288
 庾子山集 840
 庾子山集注 1287
 庾开府集笺注 1287
 庾仲容 306
 庾肩吾 308
 庾信 313
 庾度支集 839
 庾阐 291
 康对山先生全集 925
 康有为 661
 康有为诗文选(陈永正) 1438
 康有为诗文选(舒芜等) 1437
 康拉德 1498
 康南海先生诗集 971
 康南海自编年谱 1438
 康海 526
 康熙诗选 1423
 麻革 463

- 情与景 64
 情见乎辞 1224
 情文相生 1224
 情在言外 68
 情味 30
 情采 66
 情诗 1052
 情理体 1179
 情景 63
 情景相生 1224
 情景相融 64
 情趣 34
 惜阴轩诗话初编 272
 惜抱轩全集 959
 惜往日 1019
 惜诵 1019
 惜誓 1021
 悼亡诗 1165
 悼亡诗 1052
 惊隐诗社 721
 惨淡经营(掌故) 1136
 惨淡经营(诗法) 1224
 阎尔梅 569
 阎防 336
 阎朝隐 327
 清人 988
 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 1415
 清与浊 91
 清切体 1180
 清气为诗 26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1415
 清代诗人艺谈录 1416
 清代诗学之发展 1488
 清代诗学初探 1506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 271
 清名家诗钞小传 1416
 清江三孔 709
 清江三孔集 875
 清江 343
 清江集 918
 清初杜诗学研究 1506
 清苑斋集 893
 清奇 129
 清明 1089
 清庙 1011
 清波杂志 185
 清空 129
 清诗别裁 778
 清诗话 273
 清诗选(丁力) 1414
 清诗选(福建师大) 1414
 清诗铎 782
 清诗溯洄集 776
 清诗精华录 1414
 清浊 1197
 清宫词 786
 清真 126
 清容居士集 907
 清调曲 1153
 清商曲辞 1151
 清雄奔放 134
 清奥 129
 清献集 869
 清邃阁论诗 184
 清函阁集 913
 鸿雁 1000
 鸿鹄歌 1022
 淇奥 985
 渐渐之石 1006
 混装对 1197
 淠水燕谈录 165
 淮中晚泊桡头 1095
 淮南王歌 1037
 淮海英灵集 809
 淮海集 875
 渊明诗话 249
 渊鉴类函 1455
 渊颖吴先生集 912
 淫丽 131
 浞陂集 924
 渔父 1020
 渔洋山人年谱 1423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 1423
 渔洋山人精华录 950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 1423
 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 1422
 渔洋体 724
 渔洋诗话 229
 渔翁 1079
 淡泊 141
 淡窗诗话 1483
 深雪偶谈 192
 涵泳 82
 羚羊挂角(概念) 106
 羚羊挂角(诗法) 1224
 粘对 1186
 粘对规律 1186
 粘皮着骨 1224
 粘法 1186
 断句 1158
 断金集 744
 敝笱 991
 剪烛西窗 1140
 兽名体 1174
 着色 1205
 着盐水中 1224
 着题 1204
 寇準 391
 寇愍公集 867
 寄托 61
 寄扬州韩绰判官 1088
 寄全椒山中道士 1077
 寄园诗话 227
 寄黄几复 1103
 宿建德江 1058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1091
 宿榆林驿 1115
 密庵稿 920
 渠风集略 792
 梁元帝集 840
 梁兰 509
 梁有誉 540
 梁同书 627
 梁甫吟 1034
 梁辰鱼 539
 梁词人丽句 155
 梁启超 667
 梁武帝集 838
 梁佩兰 593
 梁昭明太子集 839
 梁章钜 646
 梁清标 586
 梁鸿 279
 梁鼎芬 662
 梁献 331
 梁简文帝集 839
 梁溪诗钞 807
 梁溪遗稿 888

梁溪集····· 881
 梁溪漫志····· 185
 梁潜····· 511
 梁锠····· 337
 谐声别部····· 233
 渭川田家····· 1061
 祷雨辞····· 978
 弹丸脱手····· 1225
 弹铗歌····· 976
 弹雅····· 217
 弹歌····· 975
 屠隆····· 546
 隋炀帝集····· 841
 隋宫····· 1092
 随园先生年谱····· 1425
 随园诗话····· 238
 随园诗说的研究····· 1425
 随物赋形····· 76
 随物赋形····· 1225
 隐秀····· 108
 隐秀轩集····· 933
 隐居通议····· 197
 隐语体····· 1176
 婉转体····· 1179
 颈联····· 1213
 续五子····· 718
 续古今诗苑英华····· 740
 续句图····· 186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1234
 续甬上耆旧诗····· 817
 续金针诗格····· 161
 续诗人玉屑····· 244
 续诗人徵略····· 271
 续诗话····· 162
 续诗品····· 239
 续梅里诗辑····· 815
 续桃李诗系····· 814
 绮丽····· 131
 维天之命····· 1011
 维扬二妙····· 725
 维清····· 1011
 绵····· 1007
 绵蛮····· 1006
 绸缪····· 992
 绿天香雪簃诗话····· 272
 绿叶成阴····· 1140

绿衣····· 982
 绿烟琐窗集····· 960
 缁衣····· 987
 巢经巢诗钞····· 968

十二画

琢句····· 1205
 琼台诗话····· 203
 琵琶行····· 1087
 琴曲歌辞····· 1151
 琴志楼编年诗集····· 971
 琴歌····· 978
 琴歌····· 1035
 博尔都····· 607
 博喻····· 1212
 椒聊····· 992
 棫朴····· 1007
 联句体····· 1170
 联绵对····· 1194
 联璧····· 680
 散句不单用格····· 1190
 散体律诗····· 1160
 散体绝句····· 1159
 敬之····· 1014
 敬业堂诗集····· 954
 敬君诗话····· 219
 敬斋古今甝····· 196
 雲左山房诗钞····· 966
 雲台编····· 865
 雲阳集····· 912
 雲林诗集····· 916
 雲林集····· 907
 雲溪集····· 881
 韩子年谱····· 1363
 韩元吉····· 430
 韩内翰别集····· 864
 韩文公年谱····· 1362
 韩文年表····· 1363
 韩玉父····· 433
 韩兰英····· 301
 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1362
 韩苏····· 708
 韩希孟····· 453
 韩君平诗集····· 850
 韩昌黎体····· 69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362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1361
 韩昌黎集····· 855
 韩诗外传集释····· 1251
 韩诗论稿····· 1364
 韩驹····· 419
 韩孟元白····· 701
 韩孟····· 696
 韩孟诗派····· 696
 韩柳····· 697
 韩奕····· 1010
 韩维····· 399
 韩琦····· 397
 韩琮····· 367
 韩集校注····· 1362
 韩愈····· 356
 韩愈志····· 1363
 韩愈述评····· 1364
 韩愈诗文系年辨证····· 1363
 韩愈诗选····· 1362
 韩愈资料汇编····· 1364
 韩莼····· 601
 韩翃····· 343
 韩偓····· 382
 韩流····· 440
 朝英集····· 741
 斯干····· 1001
 彭士望····· 573
 彭王····· 725
 彭兆荪····· 643
 彭汝砺····· 407
 彭阳唱和集····· 744
 彭孙贻····· 562
 彭孙遹····· 595
 彭定求····· 605
 彭绍升····· 634
 彭城集····· 872
 彭端淑····· 622
 甚原诗说····· 248
 葫芦体····· 1169
 葫芦韵····· 1184
 葛天民····· 434
 葛生····· 993
 葛立方····· 428
 葛兰言····· 1496
 葛胜仲····· 418
 葛常之诗话····· 181

- 葛覃····· 979
 葛屨····· 991
 葛藟····· 987
 董其昌····· 549
 董思恭····· 320
 董逃行····· 1030
 董逃歌····· 1030
 董说····· 585
 董斯张····· 557
 董嗣杲····· 449
 蒋士铨····· 628
 蒋山卿····· 530
 蒋冕····· 523
 蒋智由····· 665
 蒋薰····· 573
 落句····· 1212
 落花流水····· 1140
 葵畔集····· 1486
 惠士奇····· 613
 惠门八子····· 725
 惠标····· 316
 惠洪····· 417
 惠崇····· 389
 惠崇句图····· 160
 惠崇春江晚景····· 1102
 煮药漫钞····· 265
 煮海歌····· 1096
 越人歌····· 977
 越诗派····· 714
 越缦堂诗话····· 263
 趁韵····· 1183
 超诣····· 136
 雄浑····· 132
 雄雉····· 983
 雁门太守行····· 1032
 雁门集····· 908
 雁荡诗话····· 252
 雁影斋诗····· 972
 提顿法····· 1209
 揭调····· 1186
 揭傒斯····· 476
 揭傒斯集····· 909
 搜玉小集····· 742
 揆叙····· 614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1060
 辋川集(组诗)····· 1062
 辋川集(诗集)····· 741
 辘轳录····· 236
 雅与俗····· 41
 雅····· 39
 雅论····· 221
 雅言····· 40
 雅雨堂遗集····· 957
 雅音会编····· 748
 雅颂正音····· 773
 雅颂选译····· 1247
 雅道机要····· 158
 雅歌堂瓮坪诗话····· 250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
 西府同僚····· 1054
 紫山大全集····· 903
 紫岩诗选····· 896
 紫微诗话····· 169
 紫微集····· 884
 紫骝马····· 1046
 紫骝马歌····· 1046
 紫骝马歌辞····· 1046
 悲····· 1157
 悲回风····· 1020
 悲愤诗····· 1024
 悲歌行····· 1035
 棠棣····· 998
 赏奇析疑····· 1131
 跌宕格····· 1180
 喻鳧····· 371
 喻鳧诗集····· 862
 喻良能····· 429
 喻坦之····· 375
 赋比兴····· 86
 赋体对····· 1195
 赋诗言志····· 6
 赋得····· 1157
 赋得古原草送别····· 1085
 蛟川诗系····· 816
 蛟川诗系续编····· 817
 蛟川耆旧诗····· 817
 蛟川耆旧诗续集····· 818
 蛸蛸····· 984
 暑旱苦热····· 1099
 景雲····· 335
 景泰十才子····· 716
 景媒情胚····· 6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138
 遗山体····· 713
 遗民诗····· 776
 犄角对····· 1193
 铺陈终始,排比声韵····· 99
 铺锦列绣····· 1225
 锁南枝····· 1162
 嵇中散集····· 834
 嵇永仁····· 600
 嵇阮····· 678
 嵇含····· 290
 嵇康····· 285
 嵇康集校注····· 1282
 程本立····· 507
 程可则····· 588
 程先贞····· 570
 程廷祚····· 618
 程侍郎遗集····· 966
 程试诗····· 1166
 程孟阳先生集····· 931
 程晋芳····· 624
 程恩泽····· 647
 程俱····· 419
 程梦星····· 615
 程敏政····· 518
 程嘉燧····· 552
 程钜夫····· 469
 短调····· 1157
 短歌行····· 1028
 黍苗····· 1006
 黍离····· 986
 黍离麦秀····· 1129
 等呼····· 1197
 等韵····· 1197
 答万季野诗问····· 226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1065
 傅山····· 569
 傅山诗文选注····· 1417
 傅占衡····· 571
 傅玄····· 285
 傅光宅····· 546
 傅汝舟(明诗人)····· 555
 傅汝舟(明诗人)····· 530
 傅青主先生年谱(丁宝铨)
 ····· 1418

- 傅青主先生年谱(罗振玉) 1418
傅青主先生年谱略 1417
傅若金 486
傅咸 287
傅亮 294
傅粉何郎 1131
傅鹑觚集 834
傅察 425
傅毅 280
傅綽 315
储光羲 334
储光羲集 845
储嗣宗 372
储巵 521
皖雅初集 796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 1345
集句诗 1176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1391
集诸家老杜诗评 174
集韵 1200
焦氏诗评 213
焦竑 545
粤东三子 728
粤西诗载 830
粤岳草堂诗话 252
御制诗 1166
御定历代题画诗集 738
御览诗 743
御览诗 1167
御选句图 160
艇斋诗话 177
遁斋闲览 169
释洪偃 312
释敬安 658
舒位 642
舒岳祥 452
舒亶 407
舒頔 487
禽言诗 1178
然脂馥韵 272
然镫记闻 231
鲁一同 652
鲁斋遗书 902
就句对 1193
敦交集 768
敦诚 632
敦敏 629
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跋 1257
敦煌的唐诗 1503
敦煌诗经写卷 1501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1320
童心 111
童轩 515
童钰 626
童蒙诗训 170
蛮语体 1178
赓歌 975
湛方生 294
湛渊集 906
湛然居士集 902
湛露 999
湖上寓居杂咏 1109
湖山类稿 899
湖北诗录 825
湖州歌 1110
湖阴诗徵 813
湖海诗传 779
湖湘派 729
湘夫人 1017
湘灵鼓瑟 1129
湘君 1017
湘绮楼说诗 267
温飞卿系年 1374
温飞卿诗集笺注 1374
温飞卿集 860
温子昇 310
温公续诗话 162
温李 703
温庭筠 367
温柔敦厚 4
渭阳 995
渡汉江 1057
渡易水 1116
渡河北 1055
渡荆门送别 1063
游山西村 1107
游刃有馀 1224
游子吟 1077
游仙诗(诗体) 1163
游仙诗(诗作名篇) 1053
游园不值 1107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1262
游金山寺 1100
游览诗 1164
游酢 413
游潜 523
滋味 29
溉堂集 946
滁州西涧 1077
曾幾 422
曾公亮 394
曾文正公诗集 968
曾巩 400
曾巩集 871
曾灿 591
曾国藩 653
曾季狸 426
曾经沧海 1136
曾燠 640
尊水园集略 939
尊古卑今 117
尊西诗话 254
尊瓠室诗话 273
尊题格 1168
牧园诗谈 258
寒山子诗集 851
寒山 346
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 1466
寒山诗全译 1489
寒厅诗话 231
寒夜次潘岷原韵 1120
寒柳堂集 1449
寒食 1077
寒瘦集 1317
富贵气 1216
寓言诗 1165
道山清话 169
道古堂诗集 958
道园学古录 909
道里名诗 1175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783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340
道潜 408
谢三秀 554
谢士章 554

- 谢氏诗源 222
 谢庄 298
 谢体 681
 谢应芳 483
 谢灵运 295
 谢灵运诗选 1284
 谢灵运集校注 1283
 谢灵运:孤独的山水诗人 1488
 谢枋得 450
 谢宗可 478
 谢肃 506
 谢宣城诗注 1286
 谢宣城集 838
 谢皋羽年谱 1407
 谢朓 303
 谢浣湘 651
 谢晦 295
 谢逸 416
 谢康乐诗注 1283
 谢康乐集 836
 谢混 294
 谢惠连 296
 谢道韞 293
 谢叠山诗话 195
 谢缙 508
 谢榛 532
 谢肇淛 550
 谢翱 453
 谢瞻 295
 谢薖 416
 谣 1155
 谣谚 1155
 禅月集 863
 禅味 11
 禅学与唐宋诗学 1503
 禅趣 11
 强至 402
 属对 1206
 隔与不隔 102
 隔句对 1192
 隔句体 1171
 隔靴搔痒 1225
 疏野 42
 姘雅堂诗话 243
 登飞来峰 1097
 登太白楼 1115
 登池上楼 1054
 登快阁 1102
 登岳阳楼 1075
 登金陵凤凰台 1065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1113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1079
 登幽州台歌 1057
 登高 1074
 登歌 1154
 登鹳雀楼 1058
 骚坛八略 240
 骚坛千金诀 213
 骚坛秘语 211
 骚体 674
 骚体 1167
 绌素杂记 173
 缉雅堂诗话 265
 缓声歌 1035
 缓歌行 1035
 编珠 续编珠 1453
 缘情手鉴诗格 157
 缘情绮靡 7
 幾社 720
 十三画
 瑟调曲 1153
 塘上行 1030
 棟亭集 955
 槐堂诗话 235
 榆溪诗话 223
 槎翁诗集 918
 楼山堂集 935
 楼钥 437
 赖古堂全集 942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083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1078
 鹊巢 980
 鼓吹曲 1152
 鼓吹曲辞 1151
 鼓钟 1004
 蓝山集 915
 蓝仁 493
 蓝涧集 915
 蓝智 493
 墓门 995
 蓬溪风雅集 807
 蒿里 1026
 蒹葭 994
 蒲寿晟 454
 蒲松龄 603
 蒲道元 472
 蒲褐山房诗话 242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 1453
 蓉峰诗话 248
 蓉塘诗话 205
 蒙阴 1121
 禁体 1171
 楚人谣 978
 楚风补 824
 楚狂接舆歌 977
 楚词新论 1261
 楚诗纪 824
 楚茨 1004
 楚庭耆旧遗诗 825
 楚庭耆旧遗诗续集 826
 楚调曲 1153
 楚辞与神话 1266
 楚辞之研究 1262
 楚辞(专著) 1256
 楚辞(诗集) 731
 楚辞今绎讲录 1264
 楚辞文化 1267
 楚辞书目五种 1268
 楚辞书录 1268
 楚辞地理考 1263
 楚辞灯 1254
 楚辞讲义 1261
 楚辞讲读 1260
 楚辞论文集 1264
 楚辞论集 1492
 楚辞听直 1253
 楚辞作于汉代考 1263
 楚辞评论资料选 1266
 楚辞补注 1252
 楚辞直解 1261
 楚辞注释 1260
 楚辞学论文集 1265
 楚辞屈诂 1253
 楚辞要籍解题 1265
 楚辞研究 1485

- 《楚辞》研究在国外 1467
 楚辞研究论文选 1265
 楚辞研究论文集 1264
 楚辞研究集成 1266
 楚辞选 1258
 楚辞选注及考证 1265
 楚辞音残卷 1252
 楚辞类稿 1267
 楚辞校补 1256
 楚辞资料海外编 1266
 楚辞通释 1253
 楚辞笺注 1253
 楚辞章句 1252
 楚辞集注 1252
 楚辞集解 1253
 楚辞释 1255
 楚辞概论 1262
 楚辞鉴赏集 1261
 楚辞解诂 1264
 楚辞韵读(王力) 1264
 楚辞韵读(江有诰) 1255
 楚辞新注 1259
 楚辞:南方的歌 1485
 想落天外 1225
 感旧集 777
 感兴 62
 感遇 1057
 感遇诗 1163
 颐山诗话 205
 颐道堂诗选 965
 裘万顷 438
 虞山诗派 721
 虞文靖公年谱 1409
 虞世南 318
 虞世南集 841
 虞世基 317
 虞杨范揭 713
 虞炎 300
 虞集 476
 虞羲 303
 鉴戒录 158
 暗香疏影 1145
 蜗叟杂稿 1326
 蜉蝣 996
 蜂腰 1185
 蜂腰对 1193
 蜂腰体 1171
 蛻庵集 911
 跳脱 1208
 歇后体 1174
 歇后郑五 1141
 蜀太后徐氏 385
 蜀中诗话 220
 蜀相 1072
 蜀道难 1033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1449
 愚山先生诗集 944
 愚庵小集 941
 遣悲怀三首 1082
 雉子斑 1026
 稗畦集、稗畦续集 953
 错采镂金 8
 错叙法 1209
 错彩镂金 1225
 锡山四友 718
 锡兰岛卧佛 1124
 锦上添花 1143
 锦字 1131
 锦绣万花谷 1454
 锦绣堆 1137
 锦瑟 1090
 锦瑟华年 1140
 锦囊佳制 1134
 辞质而径 97
 辞情 67
 筠石山房诗话钞 261
 筠溪集 883
 筱园诗话 266
 简兮 983
 简古 135
 简学斋诗 966
 简斋先生年谱 1401
 简斋诗集笺注 1401
 催租行 1105
 颌联 1213
 腹联 1213
 触景生情 1225
 解学士文集 921
 解颐新语 209
 解缙 512
 鲍由 412
 鲍令晖 298
 鲍防 343
 鲍参军附令晖诗注 1284
 鲍参军诗注 1284
 鲍参军集 836
 鲍参军集注 1285
 鲍泉 311
 鲍桂星 642
 鲍谢 684
 鲍照 297
 鲍照年表 1285
 鲍照年谱 1285
 鲍溶 358
 鲍溶诗集 856
 詹同 494
 靖节先生年谱考异 1305
 靖节先生集集注 1301
 靖康细素杂记 173
 鹑之奔奔 984
 韵目 1180
 韵外之旨 76
 韵会举要 1203
 韵补 1200
 韵补正 1200
 韵味 28
 韵府拾遗 1203
 韵府群玉(诗律) 1203
 韵府群玉(专著) 1455
 韵学渊海 1455
 韵学源流 1201
 韵语阳秋 180
 韵致 108
 韵部 1180
 韵海镜源 1199
 韵略 1198
 韵脚 1180
 韵集 1199
 韵粹 1455
 新丰折臂翁 1086
 新刊校订集注杜诗 1343
 新乐府五十首 1086
 新乐府 1150
 新乐府运动 699
 新乐府辞 1152
 新加坡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1471
 新台 984

新安文献志 795
 新批评研究 1478
 新体诗 684
 新变 115
 新城道中 1100
 新婚别 1072
 新撰类林钞 744
 新题乐府 1151
 新繁诗略 828
 雍音 794
 雍陶 369
 雍裕之 351
 意为脉 121
 意对 1196
 意苕山馆诗稿 966
 意味 30
 意格 51
 意象 51
 意象研究 1477
 意象统计法 1477
 意境 52
 意境纵横谈 1445
 意趣 32
 慎氏 376
 溱洧 990
 满城风雨 1145
 滇诗嗣音集 830
 滇南草堂诗话 247
 源头活水 1225
 溪上诗辑 818
 塗山歌 976
 塗山集 942
 溪堂集 878
 涑京杂咏 913
 溟南诗选 830
 数名诗 1173
 塞下曲 1067
 塞愚诗话 269
 窥园留草 970
 窦氏联珠集 744
 窦巩 359
 窦牟 352
 窦叔向 350
 窦常 351
 窦群 353
 窦庠 354

谪星说诗 270
 楔湖诗拾 803
 褚亮 318
 辟疆园杜诗注解 1347
 嫌韵 1181
 叠山集 897
 叠字诗 1171
 叠连韵 1184
 叠韵三声通用格 1190
 叠韵广通格 1190
 叠韵 1181
 叠韵正格 1190
 叠韵对 1195
 叠韵对变格 1190
 叠韵侧对 1196
 叠韵诗 1171
 叠韵借用格 1190
 缜密 139
 缠绵悱恻 1225
 剿说雷同 1225

十四画

瑶池新咏 745
 瑶溪集 167
 静女 983
 静志居诗话 228
 静夜思 1063
 静居集 918
 静修集 906
 碧瓦 1105
 碧玉歌 1040
 碧纱笼 1139
 碧城仙馆诗钞 965
 墙东类稿 906
 墙有茨 984
 境生象外 55
 境界 52
 境象 54
 標有梅 981
 模山范水 1225
 模拟 118
 携李诗系 814
 榕城诗话 235
 酸馅气 1215
 歌 1155
 歌曲 1155

歌行 1155
 歌谣 1155
 嘉定四先生 718
 嘉定诗钞二集 800
 嘉定诗钞 800
 暮江吟 1087
 蔡中郎集 832
 蔡百衲诗评 171
 蔡汝楠 538
 蔡羽 523
 蔡松年 457
 蔡忠惠集 870
 蔡润石 557
 蔡宽夫诗史 170
 蔡宽夫诗话 170
 蔡邕 281
 蔡琰 282
 蔡肇 410
 蔡襄 399
 蔡珪 457
 蔽庐非诗话 274
 蓼莪 1003
 蓼萧 999
 綦母潜 334
 截句 1158
 碣阳诗话 274
 霁山集 900
 熙朝雅颂集 781
 裴子野 305
 裴夷直 359
 裴秀 286
 裴迪 334
 裴度 354
 裴说 385
 翡翠兰苕 116
 裳裳者华 1004
 蝉联体 1177
 鶚亭诗话 244
 镂月裁云(掌故) 1132
 镂月裁云(诗法) 1225
 篋中集 742
 篋衍集 777
 管世铭 633
 管时敏 505
 管道昇 472
 管锥编 1444

管锥编、谈艺录索引 1457
 筌篈引 1026
 舞风病鹤 1145
 舞曲歌辞 1151
 鼻观望气 100
 鄱阳集(彭汝砺) 873
 鄱阳集(洪浩) 883
 疑雨集 935
 鲜于枢 468
 旗亭画壁 1133
 端溪诗述 829
 敲金戛石 1225
 豪放 133
 鹿鸣 998
 鹿城诗集 929
 鹿裘石室集 930
 廖希颜 535
 廖燕 605
 遮表法 1209
 慢声 1198
 慷慨任气 37
 漱玉集注 1400
 淳南诗话 196
 漫叟诗话 171
 漫斋语录 188
 漫堂年谱 1422
 漫堂说诗 230
 漱浦诗话 237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
 丞括 1121
 精卫 1118
 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
 196
 精选诗林广记 196
 懊依歌 1041
 谭元春 557
 谭友夏合集 934
 谭用之 388
 谭苑醍醐 207
 谭嗣同 664
 谭嗣同全集 972
 嫦娥 1092
 翟理斯 1496
 翠屏集 915
 翠微南征录 894
 熊峰集 923

熊孺登 359
 熊铄 470

十五画

璇玑体 1172
 慧远 293
 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
 1368
 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
 集 1371
 增订李太白年谱 1342
 增字法 1211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1201
 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 1455
 横吹曲辞 1151
 横塘 1105
 横塘集 879
 横槊赋诗 1135
 樗寮诗话 256
 橡坪诗话 256
 橡媪叹 1093
 穆木 979
 樊川文集 861
 樊川诗集注 1374
 樊阜 519
 樊南诗钞 794
 樊榭山房集 957
 樊增祥 656
 聪山集 945
 醇美 123
 飘逸 137
 蕉园诗社 726
 蔬笋气 1216
 趣 31
 辘轳体 1169
 辘轳韵 1184
 髯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
 诗以纪之 1118
 墨庄漫录 178
 题元遗山集 1122
 题记诗 1165
 题西林壁 1101
 题李凝幽居 1084
 题陆放翁诗卷后 1111
 题画诗 1163
 题金陵渡 1084

题临安邸 1110
 题都城南庄 1085
 题破山寺后禅院 1067
 题菊花 1093
 稽古日新 116
 稻粱谋 1135
 稼村类稿 902
 篇 1156
 篇法 1207
 黎民表 533
 黎贞 509
 黎遂球 558
 黎简 635
 黎简诗选 1426
 僻体 1168
 僻韵 1181
 德诚 357
 德理文 1496
 鲋鱼 1114
 颜之推 315
 颜氏家训 150
 颜延之 295
 颜延之年谱 1284
 颜真卿 335
 颜鲁公集 847
 颜竣 298
 颜谢 683
 熟参 145
 潜 1013
 潜溪诗眼 168
 潘大临 417
 潘之恒 550
 潘飞声 661
 潘子真诗话 169
 潘尼 288
 潘耒 606
 潘问奇 596
 潘安仁集 835
 潘陆 680
 潘岳 287
 潘音 474
 潘阆 390
 潘德舆 647
 潘怪章 605
 澈上人诗集 853
 澜堂夕话 222

潺潺流水;康乐公谢灵运的

生平及作品 ····· 1492

澄淡精致 ····· 107

遵大路 ····· 988

遵化诗存 ····· 788

鹤山全集 ····· 895

鹤林玉露 ····· 193

鹤林集 ····· 895

鹤鸣 ····· 1000

鹤膝 ····· 1185

愁斋诗话 ····· 257

履园丛话 ····· 249

履园谈诗 ····· 249

履斋诗说 ····· 187

嬉笑怒骂 ····· 1226

豫章行 ····· 1030

豫章诗话 ····· 214

十六画

樵隐诗话 ····· 262

橘枝词 ····· 1162

橘颂 ····· 1020

翰林学士集 ····· 741

翰苑两诗人 ····· 725

翰府名谈 ····· 165

颠倒韵体 ····· 1178

瓢泉吟稿 ····· 910

薤露 ····· 1026

薛文清集 ····· 921

薛司隶集 ····· 841

薛许昌诗集 ····· 862

薛奇童 ····· 337

薛爱华 ····· 1497

薛逢 ····· 370

薛涛 ····· 357

薛涛诗笺 ····· 1364

薛能 ····· 373

薛雪 ····· 616

薛据 ····· 335

薛道衡 ····· 317

薛媛 ····· 376

薛蕙 ····· 530

薛稷 ····· 323

薛瑄 ····· 514

薛嵎 ····· 449

燕子龕诗笺注 ····· 1440

燕台七子 ····· 723

燕足系诗 ····· 1142

燕射歌辞 ····· 1151

燕歌行 ····· 1029

燕燕 ····· 982

霏雪录 ····· 201

操 ····· 1156

噫嘻 ····· 1012

赠从弟 ····· 1050

赠白马王彪 ····· 1051

赠刘景文 ····· 1101

赠汪伦 ····· 1064

赠答诗 ····· 1164

踵事增华 ····· 132

蹉对 ····· 1193

默庵遗稿 ····· 939

黔诗纪略 ····· 830

黔诗纪略后编 ····· 831

黔诗纪略补 ····· 831

薑斋诗话 ····· 224

薑斋诗话笺注 ····· 1453

薑露齋诗话 ····· 267

穆修 ····· 392

衡门 ····· 995

雕肝琢肾 ····· 1139

雕藻体 ····· 1179

鲸鱼碧海 ····· 116

辨味 ····· 30

辨诗 ····· 201

磨剑室诗集 ····· 974

塵史 ····· 168

懒真子 ····· 176

潞安诗钞后编 ····· 789

潞安诗钞前编 ····· 789

澹仙诗话 ····· 250

澹轩集 ····· 886

澹馥诗集 ····· 951

澹斋集 ····· 886

濂洛风雅(张伯行) ····· 764

濂洛风雅(金履祥) ····· 762

褰裳 ····· 989

寰海十章 ····· 1123

避俗 ····· 1208

避熟 ····· 1208

隰西草堂集 ····· 940

隰有萋楚 ····· 996

隰桑 ····· 1006

十七画

藏一话腴 ····· 194

藏山阁集 ····· 943

藏头格 ····· 1174

藏头歇后法 ····· 1211

藏拙 ····· 1207

藏春集 ····· 903

藏海诗话 ····· 176

鞠歌行 ····· 1029

焱焱室诗话 ····· 272

礪溪集 ····· 902

懋斋诗钞 ····· 959

鰕鰕篇 ····· 1028

戴名世 ····· 608

戴良 ····· 489

戴表元 ····· 467

戴叔伦 ····· 347

戴叔伦诗集校注 ····· 1359

戴叔伦集 ····· 852

戴复古 ····· 441

戴密微 ····· 1496

戴维思 ····· 1497

戴昺 ····· 443

霜红龕集 ····· 940

曙后星孤 ····· 1133

蟋蟀 ····· 992

蹈袭 ····· 1213

铎窗琐话 ····· 260

穗歌 ····· 976

魏了翁 ····· 444

魏夫人 ····· 407

魏文帝诗格 ····· 161

魏礼 ····· 594

魏收 ····· 312

魏观 ····· 494

魏时敏 ····· 517

魏初 ····· 466

魏际瑞 ····· 585

魏陈思王年谱 ····· 1281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 1278

魏坤 ····· 605

魏郑公集 ····· 841

魏耕 ····· 562

魏泰 ····· 418

魏晋诗歌概论 1272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在国外
 1468
 魏野 390
 魏象枢 580
 魏裔介 580
 魏源 649
 魏源师友记 1435
 魏源诗文系年 1435
 魏源诗文选注 1435
 魏徵 319
 魏澹 317
 魏禧 589
 蟬精隽 204
 繁欽 282
 繁縟 142
 朦胧 143
 螽斯 980
 襄阳乐 1043
 襄邑道中(陈与义) 1104
 濮川诗钞 815

擘肌分理 1225
 離 1013
 孺子歌 977

十八画及十八画以上

藕居士诗话 220
 藕断丝连 1139
 藁砧体 1176
 藤野岩友 1494
 覆瓿集 900
 覆窠体 1177
 瞻彼洛矣 1004
 瞻卬 1011
 瞿式耜 558
 瞿式耜集 934
 瞿佑 506
 翻切 1198
 翻云覆雨 1135
 翻案法 1209
 麓堂诗话 203
 警策 83

警策 1208
 曝书亭诗录笺注 1422
 曝书亭集 948
 曝书亭集诗注 1422
 螻斋诗话 224
 瀛奎律髓 763
 瀛奎律髓汇评 1321
 螽庄诗话 251
 麟之趾 980
 螽斋铅刀编 890
 臞轩集 896
 臞翁诗评 189
 螽叟诗钞 942